欧洲史

THE HISTORY OF EUROPE



/ ESSENTIAL /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　目　录

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

伯罗奔尼撒战争

美第奇家族的兴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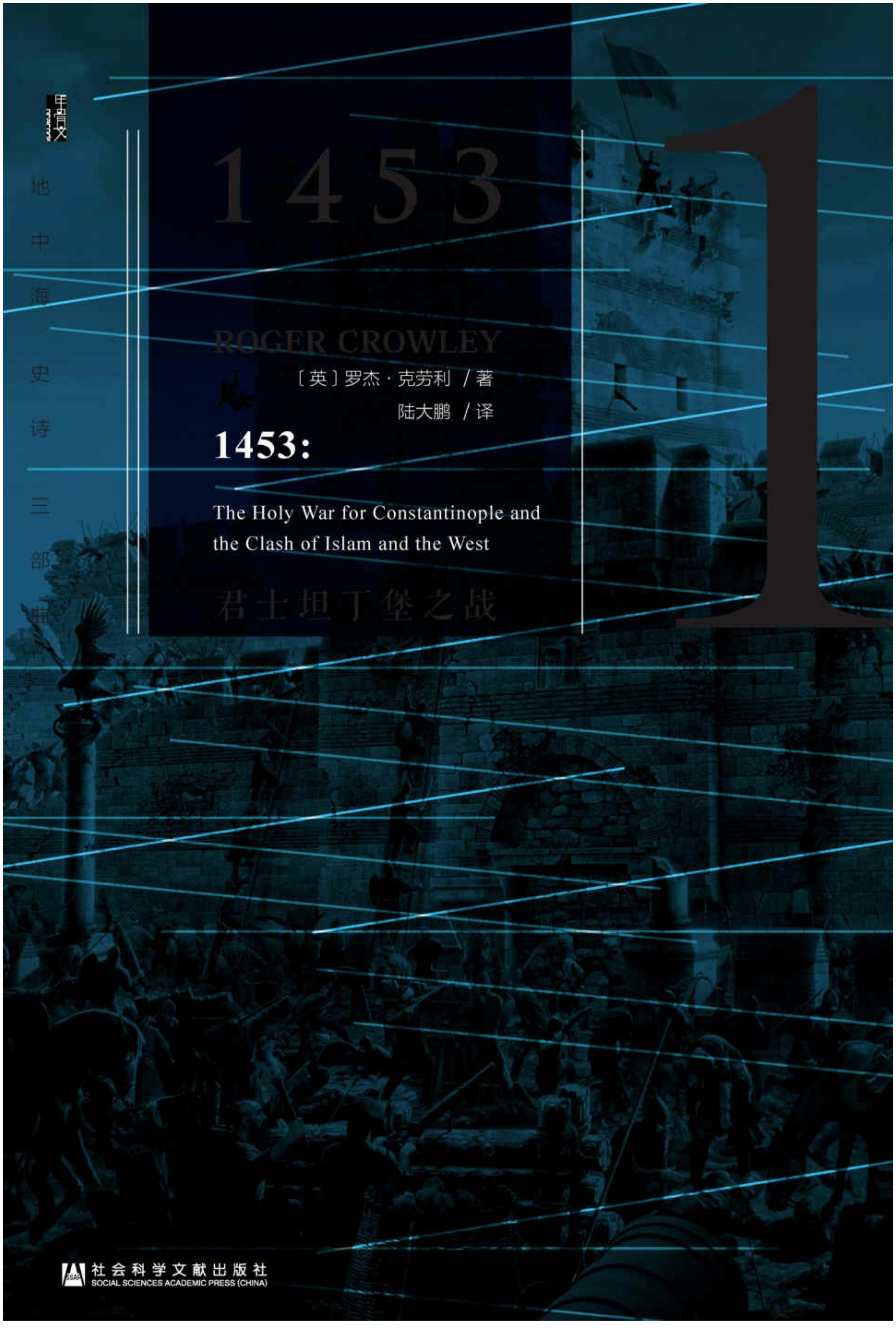
郁金香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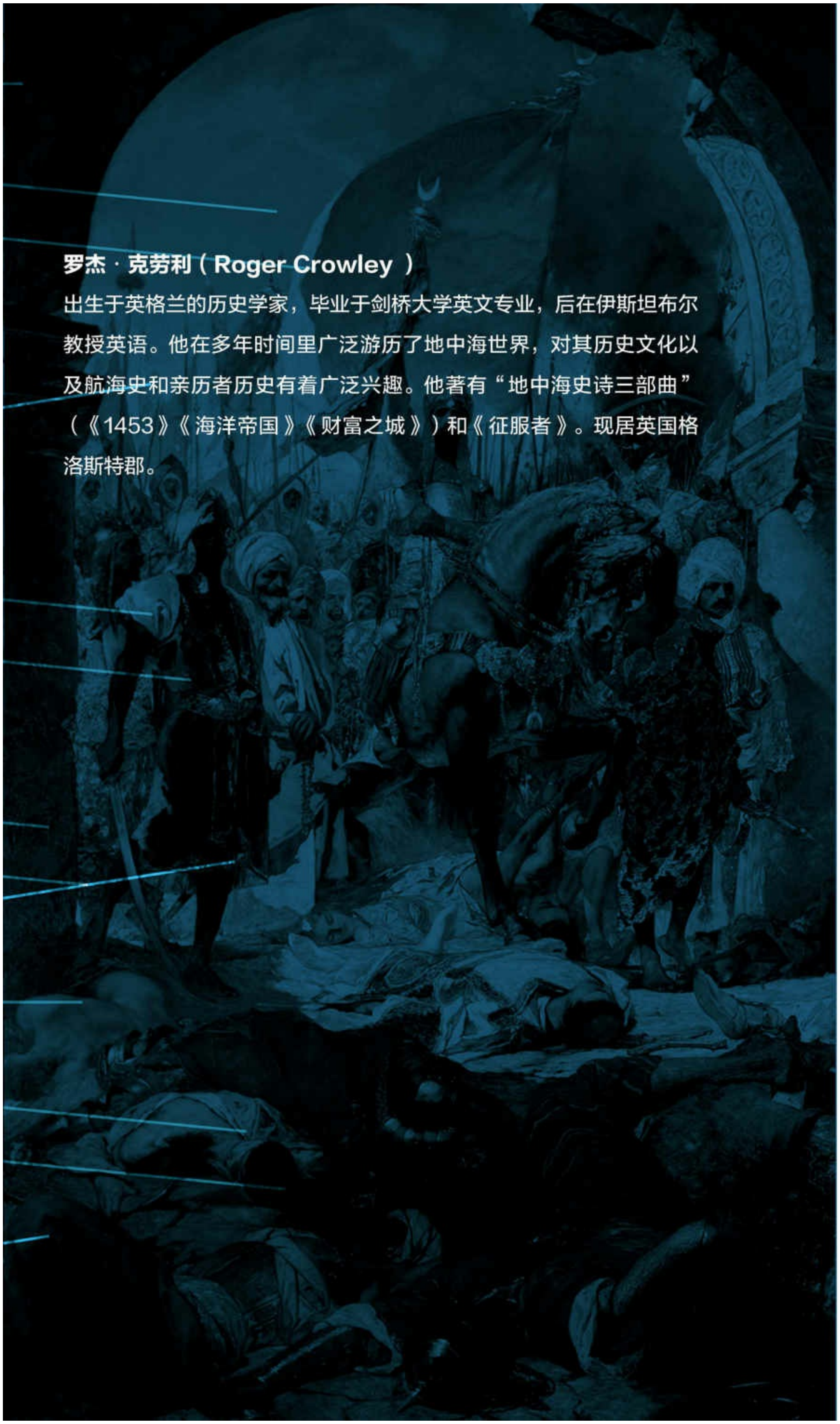
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

特拉法尔加战役

罗马帝国的崛起

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


甲骨文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
1453
ROGER CROWLEY
［英］罗杰·克劳利 / 著
陆大鹏 / 译
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君士坦丁堡之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 ）

出生于英格兰的历史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英文专业，后在伊斯坦布尔教授英语。他在多年时间里广泛游历了地中海世界，对其历史文化以及航海史和亲历者历史有着广泛兴趣。他著有“地中海史诗三部曲”（《1453》《海洋帝国》《财富之城》）和《征服者》。现居英国格洛斯特郡。

1453：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AUTHOR：ROGER CROWLEY

Copyright © 2005 BY ROGER CROWL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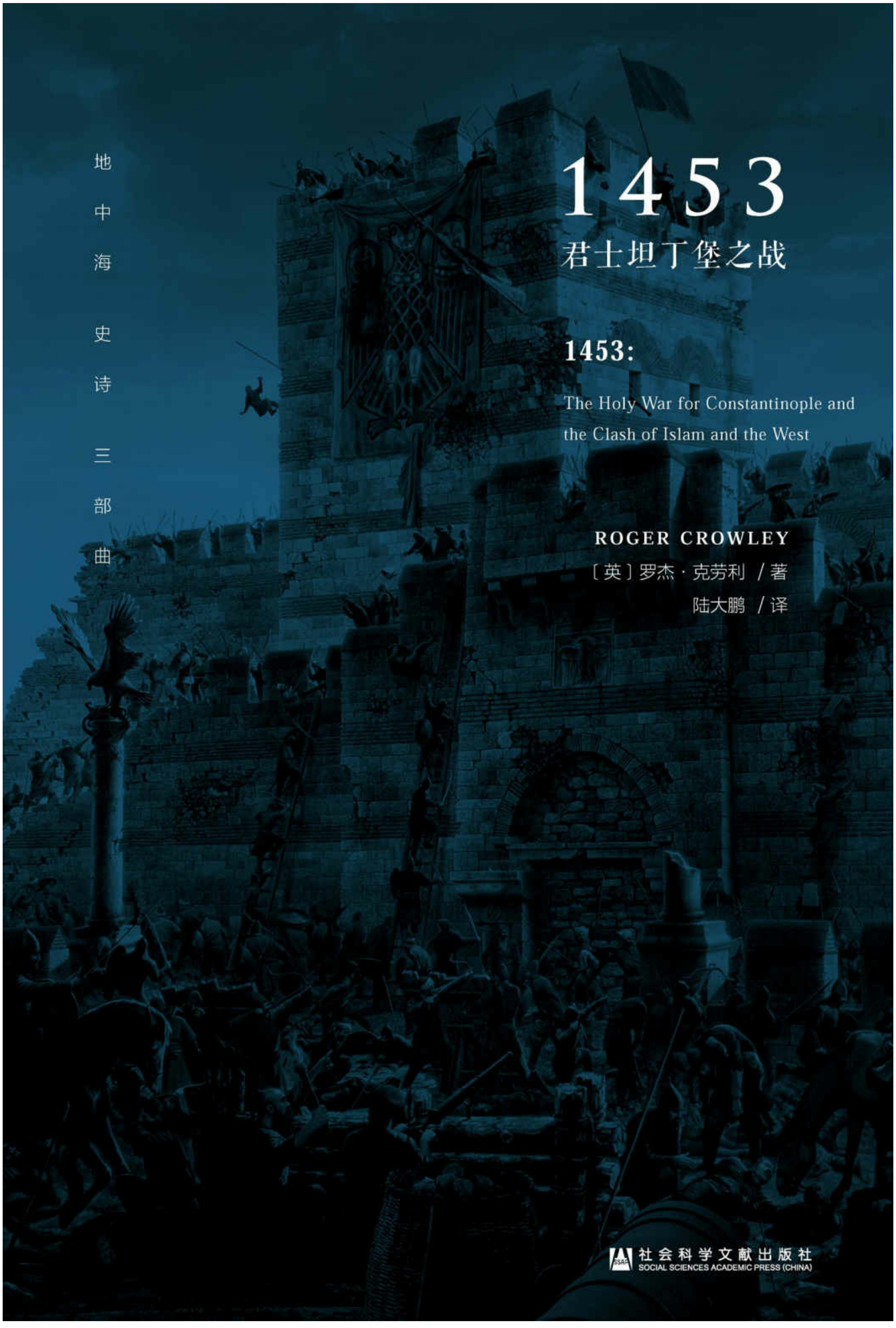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LOWNIE LITERARY AG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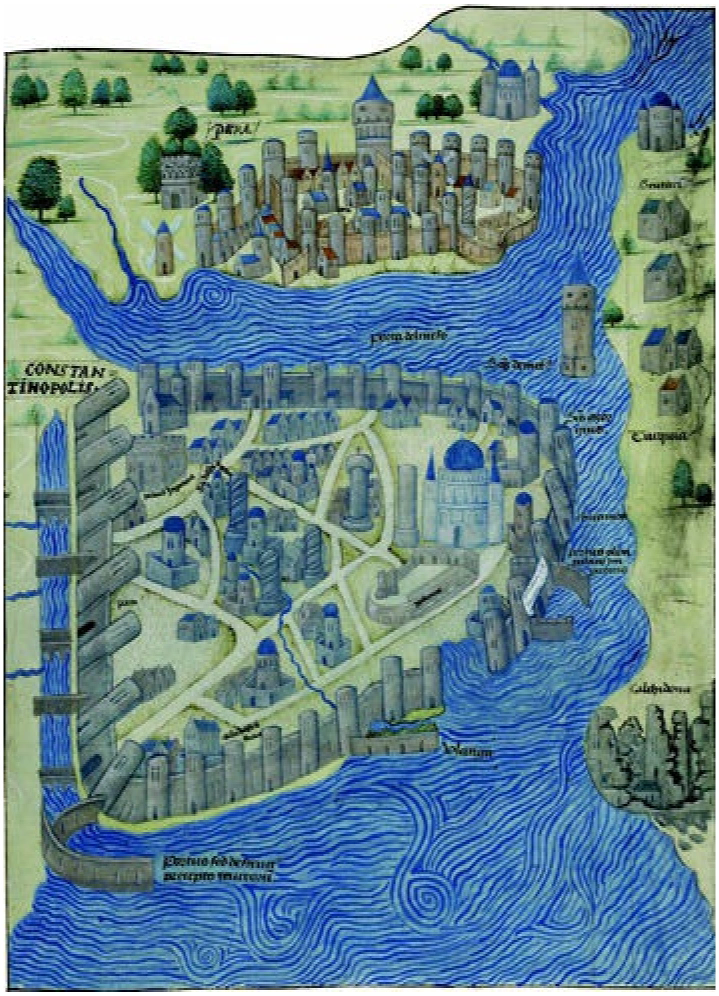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CASS

All rights reserved.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
1453
君士坦丁堡之战
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ROGER CROWLEY
[英] 罗杰·克劳利 / 著
陆大鹏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一幅**15**世纪绘制的由城墙环绕的君士坦丁堡地图。圣索菲亚大教堂和赛马场在右侧，主路从左侧的陆墙处延伸出来。金角湾港口北方是热那亚人的城镇佩拉（或称加拉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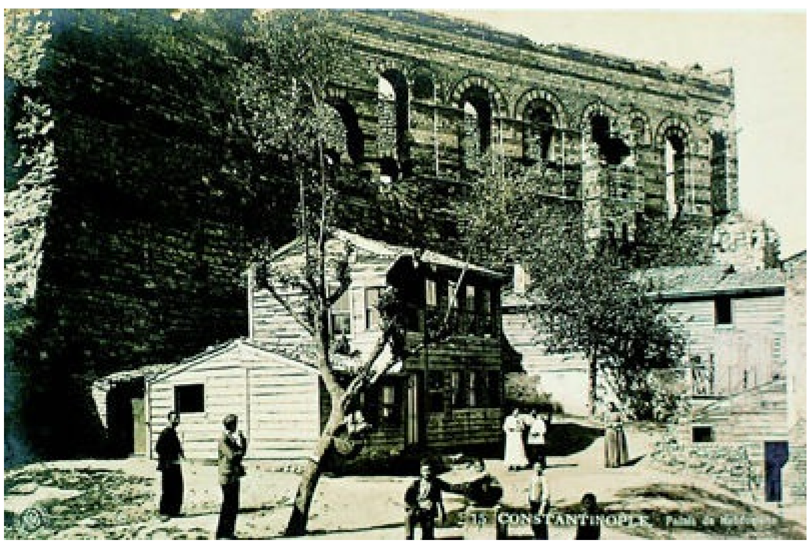
15世纪君士坦丁堡的景象。加拉塔在右侧，金角湾之外。铁链封锁着金角湾。



奥斯曼细密画，晚年的穆罕默德二世，表现的是他热爱自然和学术的一面。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天堂还是人间。”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宏伟中殿，这是古典时代晚期最神奇的建筑。



19世纪布雷契耐皇宫的照片，这是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守城期间的指挥部，位于金角湾附近单层陆墙处。



在现代，三道陆墙的一段遗存。首先是内层塔楼一线，然后是被炮火严重破坏的外层塔楼。中间是壕沟，今天已经大部分填平了，但当年深达**10**英尺，沟壁上砌着砖，在攻城战中给奥斯曼人带来了很大麻烦。越过壕沟之后，攻城者必须先在守军劈头盖脸的火力之下冲过开阔的平台，然后才能攀爬外墙。



金角湾的巨大铁链，每个铁环长**18**英寸。这幅照片是在**19**世纪拍摄的，说明历经数百年之后，铁链的许多部分仍然散落在城市各处。



乌尔班的攻城巨炮早已销声匿迹，但有几尊较小的大炮在伊斯坦布尔被保存至今。这尊巨大的铜炮长**14**英尺，重**14**吨，发射的是重达**500**磅的石弹。



今日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城墙，可见其塔楼和壕沟。



今日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现在的名字叫做圣索菲亚清真寺，其穹顶令人惊叹。



贝利尼的画作，描绘的是一名近卫军士兵，头戴标志性的白帽，身配箭筒、弓和剑。这位意大利艺术大师能够在平面的纸上创作出栩栩如生的立体人像，据说迷信的穆罕默德二世对他的这种神奇本领既着迷，又很害怕。



Ianiſſaire allant à la guerre.

16世纪的近卫军士兵像，他是奥斯曼帝国的一名精英战士，帽子上配有羽饰，肩扛火枪。


Le siege du grant turc auec ij de ses pncipaulx cōseillers
Le siege du capiteine gnal de la turquie

1453年后不久欧洲人创作的攻城图，表现了战役的许多关键事件。在下方是苏丹的大帐，旁边是他的大炮。君士坦丁堡城在上方。金角湾入口处的铁链被画成一座桥。



现代人创作的最后总攻图：前景中是巨炮。士兵们用云梯爬城。塔楼上有一名奥斯曼士兵挥舞红旗，但塔楼前方仍然悬挂着拜占庭的双头鹰旗帜。



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在伊斯兰战士的簇拥下入城。前景地面上是守军的尸体。



贝利尼的著名穆罕默德二世肖像，处在皇室穹顶的框架之下，文字是**“**世界的征服者**”**，但穆罕默德二世看上去有些憔悴消瘦，可能身体不适。



16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建为清真寺，由著名的奥斯曼建筑师希南添加了尖塔。



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宫殿，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米斯特拉斯，被称为“小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精神的一个寓意深远的纪念。

《今日美国》夏季最佳图书 《旧金山纪事报》夏季最佳图书

克劳利引人入胜的叙述……读之更像生动的小说。人物……描摹极其细致，全都是基于历史文献，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洛杉矶时报》

克劳利对君士坦丁堡攻城战的重述极富戏剧性，激动人心。

——《旧金山纪事报》

出神入化……罗杰·克劳利为一个古老而永远引人入胜的故事注入了新活力。《1453》融合了军事史的令人着迷的细节和对宗教意象的丰富指涉，这些意象对战争的双方都有极大影响。

——《经济学人》

节奏轻快，是了解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长期敌对关系的入门必读书。

——《科克斯书评》

君士坦丁堡是一座美名远播的都市，愿大慈大悲和慷慨大度的真主将它变为伊斯兰的都城。

——哈桑·阿里·哈拉维，12世纪阿拉伯作家[1]

我要讲述的是弥天大祸的故事……君士坦丁堡的故事，皆是我亲眼所见。

——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2]

---

[1] quoted Stacton，D.，*The World on the Last Day*， London，1965，p.153

[2]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1972，p.12

中文版序

《1453》《海洋帝国》和《财富之城》这三本书互相关联，组成了一个松散的三部曲，叙述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读者可以从其中任意一本读起。这三本书涵盖的时间达四个世纪之久，从1200年到1600年，这是不同文明和互相竞争的各大帝国为了领土、宗教信仰和贸易控制而激烈地冲突的年代。这场冲突的参与者包括拜占庭帝国（信仰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继承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们复兴了伊斯兰“圣战”的精神），以及西班牙的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皇朝。同样是在这个时期，威尼斯从一个泥泞的潟湖崛起为西方世界最富庶的城市，宛如令人叹为观止的海市蜃楼，从水中呼啸而起。威尼斯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当年和今天一样，在异邦人眼中非同寻常、精彩纷呈。

在这个时期，各国为争夺地中海爆发了激烈战争。居住在地中海周围的各族群——土耳其人、希腊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北非人和法兰西人——认为自己是在为争夺世界中心而战。但与真正的大洋相比，地中海其实是很小的。各民族之间的地理距离只有投石之遥，于是大海成了一个封闭的竞技场，大规模的厮杀就在这里上演。在这个年代，火药武器开始彻底地改变战争的面貌。大海是史诗般攻城战、血腥海战、海盗行径、人口劫掠、“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圣战”的场所，也是利润丰厚的贸易和思想交流的途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漫长而残酷的竞争从本三部曲涵盖的时期开始，将大海分裂为两个迥然不同的区域，双方沿着海上疆界进行了激烈较量。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9·11”事件之后的世界。

幸运的是，大量关于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的目击资料留存至今，尤其是从大约1500年开始，欧洲印刷术的发明刺激了文字材料的爆炸式增长，所以我们得以感同身受地重温这段历史。通过目击者的叙述，我们常常能够近距离观察当时的事件，审视那时的人们如何生活、死亡、战斗、从事贸易，以及礼拜上苍。我尽可能地引用当时人们自己的话，让他们为自己发言。

这三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是“场所”。在地中海地区，我们在游览威尼斯、伊斯坦布尔，或者克里特、西西里和塞浦路斯等大岛屿的时候，仍然能够触及过去。许多纪念建筑、城堡、宫殿和遗址依然完好。借用伟大的地中海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话：“这片大海耐心地为我们重演过去的景象，将其放置在蓝天之下、厚土之上，我们能亲眼看见这天与地，它们如同很久以前一样。只消集中注意力思考片刻或者瞬间的白日梦，这个过去就栩栩如生地回来了。”[1] 我希望这三部曲能够帮助中国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地中海历史以及那里发生的事件（它们至今影响着我们的世界）的重要意义，对其产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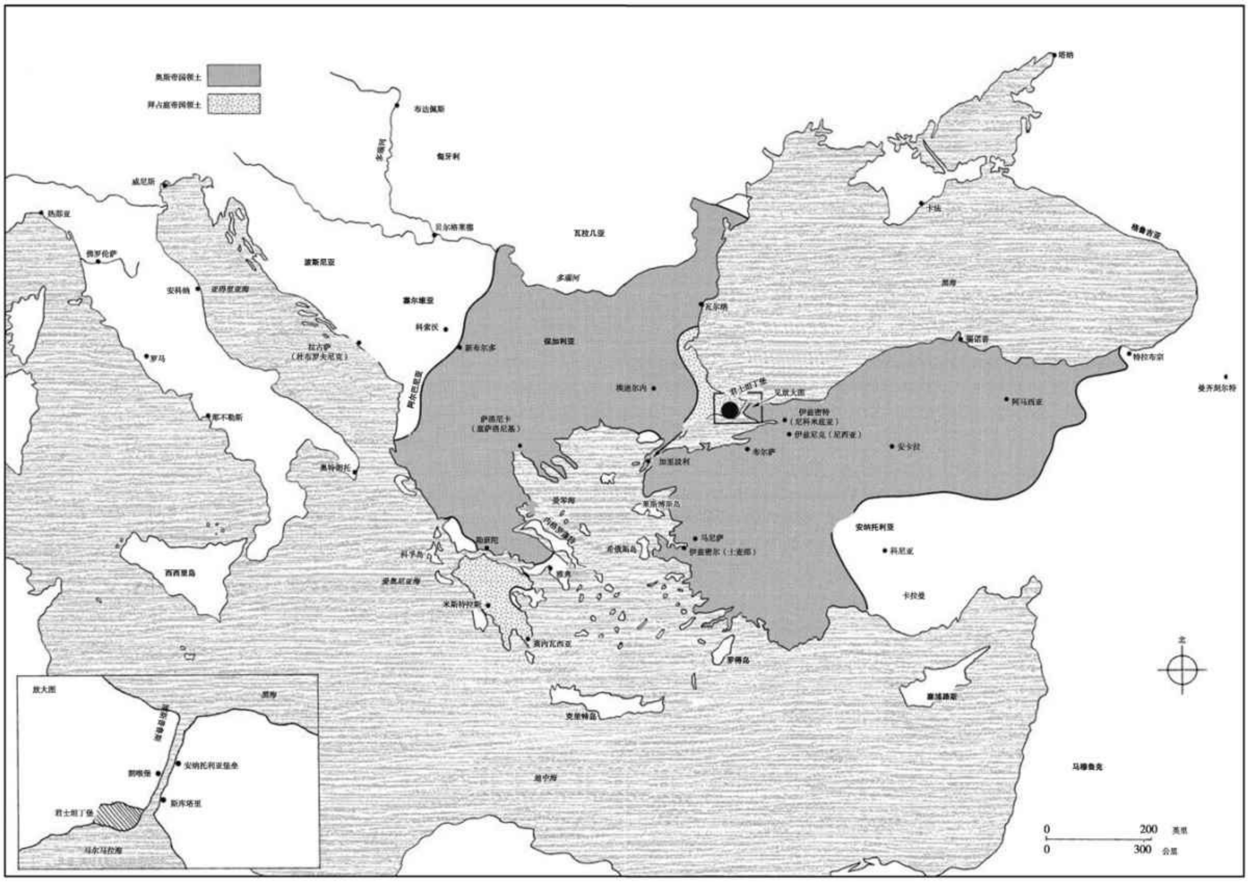
罗杰·克劳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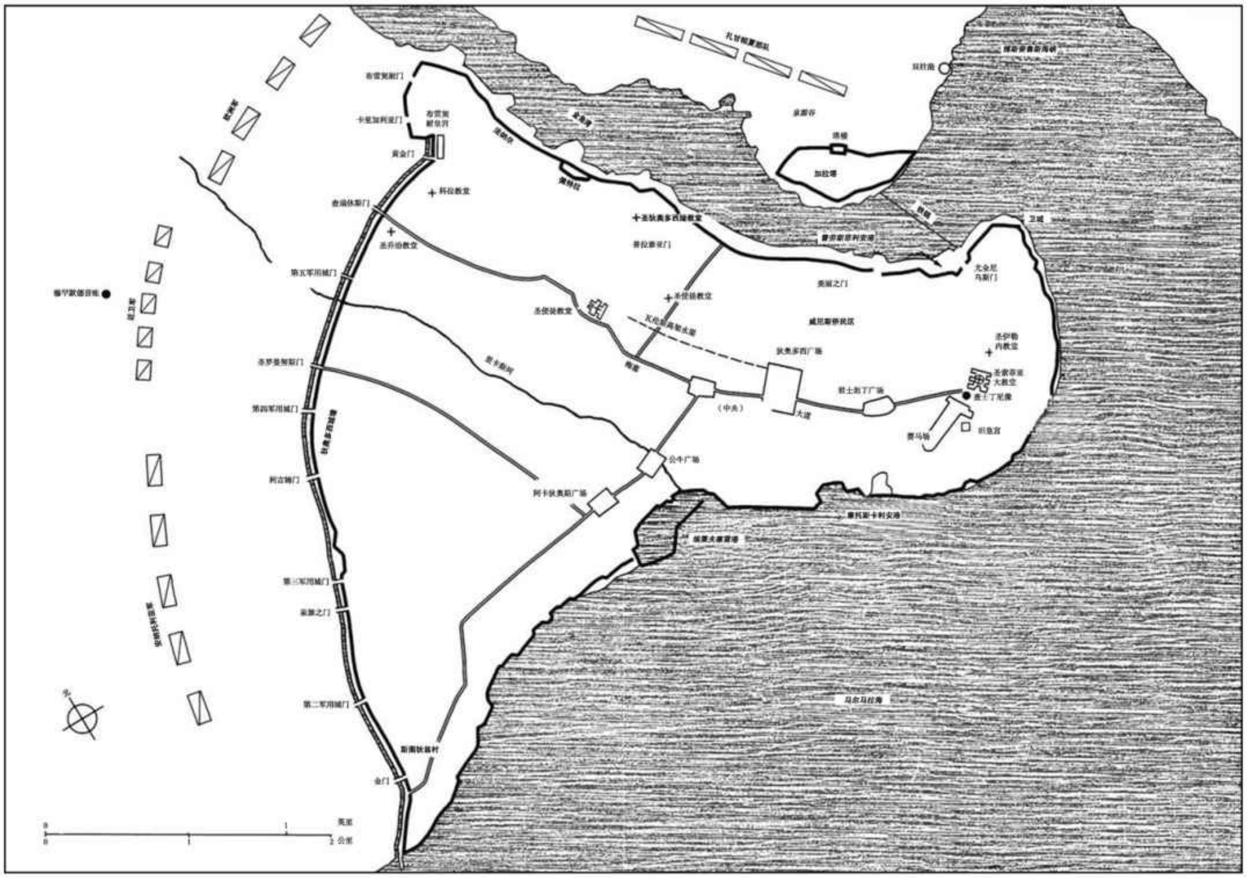
[1] Braudel，Fernand，*The Mediterranean in the Ancient World*，trans.Sian Reynolds，London，2001.

目录

- 序言：红苹果
- 1.燃烧的海
- 2.伊斯坦布尔的梦想
- 3.苏丹和皇帝
- 4.割断喉咙
- 5.黑暗的教堂
- 6.城墙和大炮
- 7.浩瀚如繁星
- 8.世界末日的恐怖号角
- 9.上帝的神风
- 10.鲜血的螺旋
- 11.恐怖的机械
- 12.不祥之兆
- 13.“铭记这一天！”
- 14.紧锁的城门
- 15.一捧尘土
- 16.世界的梦魇
- 尾声：安息之地
- 资料来源
- 鸣谢
- 译名对照表
- 参考文献
- 译后记


奥斯帝国领土
拜占庭帝国领土
布达佩斯
多瑙河
匈牙利
威尼斯
热那亚
佛罗伦萨
安科纳
亚得里亚海
波斯尼亚
贝尔格莱德
瓦拉几亚
多瑙河
塞尔维亚
科索沃
拉古萨
（杜布罗夫尼克）
新布尔多
保加利亚
罗马
那不勒斯
阿尔巴尼亚
萨洛尼卡
（塞萨洛尼基）
埃迪尔内
奥特朗托
塔纳
卡法
黑海
特拉布宗
曼齐刻尔特
阿马西亚
放大图
伊兹密特
（尼科米底亚）
伊兹尼克（尼西亚）
布尔萨
安卡拉
加里波利
爱琴海
莱斯博斯岛
西西里岛
科孚岛
爱奥尼亚海
雅典
米斯特拉斯
莫内瓦西亚
马尼萨
伊兹密尔（士麦那）
希俄斯岛
安纳托利亚
科尼亚
卡拉曼
罗得岛
塞浦路斯
克里特岛
地中海
马穆鲁克
北
0 200 英里
0 300 公里
放大图
黑海
安纳托利亚堡垒
君士坦丁堡
新库塔里
马尔马拉海

地中海东部，**1451**年


黄金门
科拉教堂
第五军用城门
圣使徒教堂
第四军用城门
第三军用城门
第二军用城门
金门
阿卡狄奥斯广场
公牛广场
狄奥多西广场
（中央）
大道
君士坦丁广场
圣索菲亚
大教堂
圣伊琳
内教堂
赛马场
旧皇宫
美丽之门
威尼斯侨民区
加拉塔
卫城
马尔马拉海
北
英里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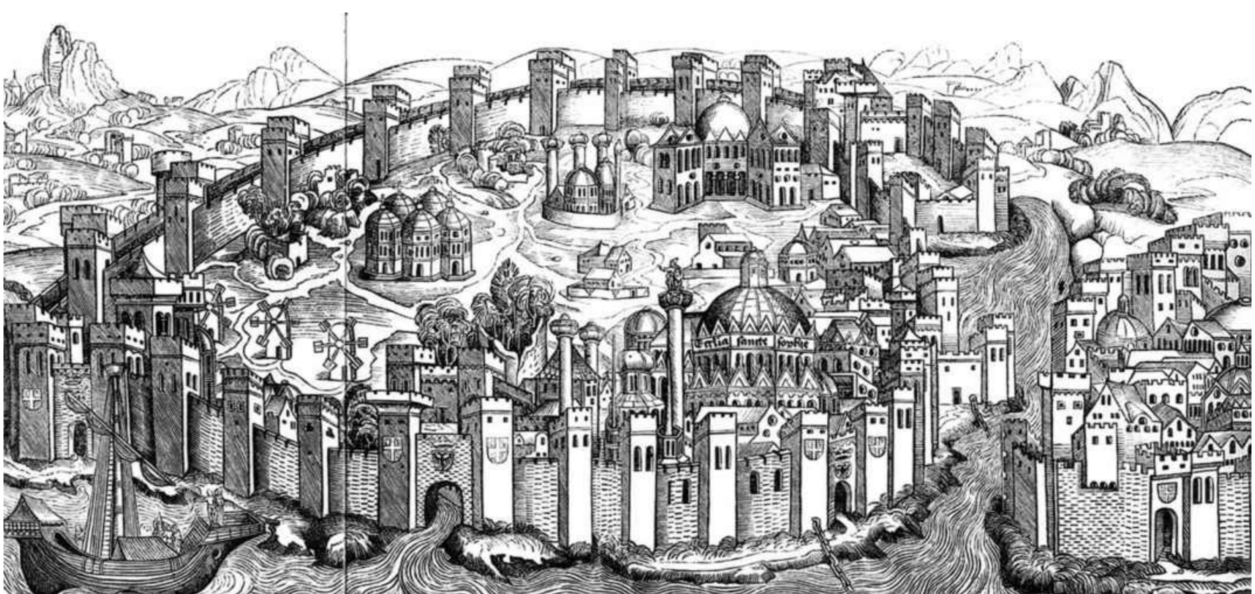
君士坦丁堡，**1453**年

序言：红苹果

红苹果惹人摘。

——土耳其谚语

初春。一只黑鸢在伊斯坦布尔的天空中随风翱翔。它在苏莱曼清真寺周围懒洋洋地划着圈，似乎被束缚在尖塔上。从这里，它可以俯瞰这座1500万人口的城市，泰然自若地静观光阴流逝。



15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想象图，图中右侧远处为加拉塔

如果这只猛禽的先祖1453年3月的寒冷清晨在君士坦丁堡上空盘旋，就会发现，城市的布局与今天相差无几，但远远没有现在这么熙熙攘攘。这座城市的形状非常奇特，大致呈三角形，东边的角有些向上翘，像头凶猛犀牛的尖角，三角形的南北两边都得到大海的保护。北边是有屏障保护的金角湾深水港；南面毗邻马尔马拉海。马尔马拉海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向西奔涌，注入地中海。从空中俯瞰，可以轻松地辨认出三角形沿海的两边岸上连绵不绝的防御工事。海潮则以每小时7海里的速度从犀牛角尖端旁汹涌流过。这座城市既有天然屏障，也有人工防御。

但这个三角形的西面底边最为不同寻常。那是一个复杂的三重城墙系统，设有许多间隔很近的塔楼，城墙外开掘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壕沟。城墙从金角湾一直延伸到马尔马拉海，封闭了城市，阻挡住外来的入侵。这就是历经千年的狄奥多西城墙，中世纪世界最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对14和15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它是“卡在真主喉咙里的骨头”，对他们的雄心予以嘲讽，是个心理阴影，阻碍了他们宏图霸业的实现。对西方基督教世界来说，它是抵抗伊斯兰教的壁垒，保护他们免遭伊斯兰世界的入侵，让他们志得意满。

如果你在1453年春季俯瞰这座城市，还能辨认出筑有防御工事的热那亚城镇加拉塔，这是位于金角湾北侧的一个小小的意大利城邦，那里就是欧洲疆域的尽头。博斯普鲁斯海峡割断了欧亚大陆，像一条大河一样穿过覆盖森林的丘陵，一直到黑海。海峡的另一边是小亚细亚，或者叫安纳托利亚，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东方”。奥林匹斯山白雪皑皑的峰顶就在60英里外，在阳光中熠熠生辉。

在朝向欧洲的那一侧，大地较为平坦、起伏和缓，延伸到西面140英里处的奥斯曼城市埃迪尔内[1]。就在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在连接两座城市的崎岖道路上，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在行

军。大群的白帽和红头巾在移动；劲弓、标枪、火绳枪和盾牌在低角度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成队的前驱骑兵在经过时掀起烟尘；链甲如同涟漪，叮当作响。随后是长长的辎重队伍，有大群骡子、马匹和骆驼，驮着各式军需物资和相应人员——矿工、厨师、军械匠、毛拉[2]、木匠和被战利品吸引而来的冒险家。队伍更后方还有一些东西。大群公牛和成百上千的劳工正在无比艰难地将大炮拖过松软的土地。整个奥斯曼军队都在行动。

如果你能看得更远，就能发现这次军事行动的更多细节。一群划桨船正从达达尼尔海峡的方向艰难而缓慢地顶风驶来，活像是中世纪绘画的背景。高舷运输船正从黑海运来木材、粮食和炮弹。成群的牧人、圣徒、随军商贩、营妓以及流浪汉从安纳托利亚的高原走来，直奔博斯普鲁斯海峡，响应奥斯曼帝国的号召。这些参差不齐的人员和装备组成了一支协调有力的大军，而这支大军只有一个目标：君士坦丁堡，即古老的拜占庭帝国在公元1453年的残余部分的都城。

即将交锋的中世纪各民族是非常迷信的。他们相信预言，追寻征兆。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古老的纪念碑和雕像都是魔法的源泉。人们相信，对世界未来的预言就隐藏在罗马石柱的铭文中，尽管这些铭文的最初故事已经被人遗忘。他们从天气中也能读出迹象，并感到1453年的春季非常令人不安。天气非常湿冷。3月，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笼罩着浓雾。有地震发生，而且还在反常的季节下了雪。在充满期待的城市内，这都是不吉利的预兆，或许甚至预示着世界末日的到来。

正在逼近的奥斯曼军队也有自己的迷信。他们把此次征伐的目标简单地称为“红苹果”，因为它是世界霸权的象征。攻克这座城市是一个可以上溯800年的热忱的伊斯兰梦想，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关于这座城市有着太多的传说、预言和伪经言论。在正在行进的士兵们的想象中，苹果在城内有个具体的位置。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外100

英尺高的石柱上矗立着查士丁尼皇帝的青铜骑马像，这是一座与早期拜占庭帝国威势相称的宏伟纪念碑，也象征着拜占庭扮演的角色：抵御东方侵袭的基督教堡垒。根据6世纪作家普罗科匹厄斯的记载，这座纪念碑非常震撼人心。

> 骑马像面向东方，仪态高贵。骑着马的皇帝雕像全身披挂像阿喀琉斯一样……胸甲是英雄的风格；头上的头盔似乎在上下晃动，非常耀眼。他眺望东升的旭日，纵马奔驰，似乎要冲向波斯。他左手拿着一个球，雕刻家以此表示，整个地球和海洋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尽管除了球上有一座十字架，他没有剑或矛或任何其他武器，但仅凭十字架的力量，他就获得了自己的帝国，赢得了战争。[3]

土耳其人想象中的红苹果就是查士丁尼手中的带十字架的球。土耳其人也就是为了这个来的：极具传奇性的古老基督教帝国的威望，以及它似乎蕴含的世界霸权的可能性。

拜占庭人的记忆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对围城的恐惧。恐怖的围城威胁



查士丁尼像

拜占庭人的记忆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对围城的恐惧。恐怖的围城威胁着他们的图书馆、大理石房屋和饰有马赛克的教堂。但他们对围城非常

熟悉，因此绝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在公元1453年之前的1123年里，君士坦丁堡被围攻了大约二十三次。但它只被攻破过一次，不是被阿拉伯人或者保加尔人[4]，而是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基督教骑士占领，这是基督教历史上最诡异的事件之一。城市的陆墙从未被攻破过，但在5世纪时曾因为地震而坍塌。除此之外，城墙一直固若金汤，因此当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大军在1453年4月6日终于兵临城下时，守军是很有希望生存下去的。

这个时刻之前和之后的故事便是本书的主题。这是一个关于人类的勇气与残忍、技术上的聪明才智、幸运、怯懦、偏见和奥秘的故事。它也涉及一个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的世界的其他很多方面：火炮的研发、攻城战的艺术、海战策略、宗教信仰，以及中世纪人们的神话和迷信。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于地理的故事，关于海流、山岭、半岛和天气，关于土地的起伏和海峡如何将两个大陆分割开——但两个大陆又如此接近，“几乎能够互相亲吻”，强大的君士坦丁堡就屹立于此，受到险峻的岩石海岸的保护，但地质的特殊条件使得它在攻击面前又特别脆弱。这个故事讲述了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带来的无限可能，它给贸易、防御和生计带来的好处，正是这些有利条件使得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命运的关键所在，也吸引了诸多军队来到它城下。“罗马帝国的都城是君士坦丁堡，”特拉布宗的乔治[5]写道，“罗马人的皇帝同时也是全世界的皇帝。”[6]

现代民族主义者将君士坦丁堡攻防战解读为希腊民族和土耳其民族之间的斗争，但这种简单化的观点是非常误导人的。双方都不会接受甚至无法理解这样的标签，尽管双方都用这样的说法来指代彼此。奥斯曼人，或者按照字面意思，就是“奥斯曼的部落”，都自称为奥斯曼人，或者简单地称自己为穆斯林。“土耳其人”（Turk）是西方各个民族国家使用的一个词，总体上是贬义的。1923年，为了建立共和国，奥斯曼人才从欧洲借用了“土耳其”（Turkey）这个词。在此之前，这个说法在奥斯

曼帝国并不为人所知。1453年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将它征服的各民族都吸纳进来，而很少考虑他们的种族身份。帝国的精锐部队是斯拉夫人，主要将领是希腊人，海军将领是保加利亚人，苏丹可能有一半塞尔维亚或者马其顿血统。另外，在中世纪复杂的附庸封建体制下，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士兵也伴随苏丹从埃迪尔内开往君士坦丁堡。他们前来的目的是征服君士坦丁堡讲希腊语的居民，我们现在把这些居民称为“拜占庭人”，这个词第一次在英语中使用是在1853年，也就是这场伟大攻城战发生400年之后。拜占庭人被认为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因此自称罗马人。统领他们的皇帝却有一半的塞尔维亚血统和四分之一的意大利血统，而且守军的很大一部分是西欧人，也就是拜占庭人所说的“法兰克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加泰罗尼亚人，还有一些土耳其人和克里特人，甚至还有一个苏格兰人。如果说很难确定攻防战参与者的民族身份，有一个因素却是所有同时代的史学家都永远不会忘记的——信仰。穆斯林将他们的对手称为“可鄙的异教徒”“可怜的不信真主的人”“信仰的敌人”；基督徒则称穆斯林为“异教徒”“野蛮人”“无信义的土耳其人”。君士坦丁堡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漫长距离上进行的斗争的最前线。在这里，对真理的不同解释在战争与和平中对抗了800年。1453年的春天，两大一神教将在一个历史性时刻中在此地激烈碰撞。

---

[1] 埃迪尔内旧称哈德良堡或阿德里安堡，因罗马皇帝哈德良所建而得名。现在是土耳其埃迪尔内省省会，位于邻近希腊和保加利亚的边境。著名的阿德里安堡战役就发生在此地：公元378年，罗马帝国军队与哥特人交战，遭到惨败，皇帝瓦伦斯阵亡。另外，1365～1453年这里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

[2] 毛拉是伊斯兰教内对学者或宗教领袖的称呼，特别是在中东和印度次大陆。原意为“主人”，在北非也用在国王、苏丹和贵族的名字前。现称毛拉者，多为宗教领袖，包括宗教学校的教师、精通教法的学者、伊玛目（清真寺内率领穆斯林做礼拜的人）和诵经人。

[3] Procopius，*Buildings*， London，1971，p.35

[4] 保加尔人是发源自中亚的游牧民族，为突厥人的一支，从公元7世纪起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定居下来，为巴尔卡尔人与保加利亚人、楚瓦什人和中国的塔塔尔族的先祖。保加尔人后来逐渐斯拉夫化，现已消亡。

[5] 特拉布宗的乔治（1395～1472/1473），希腊哲学家与学者，文艺复兴的先驱之一。他生于克里特岛，但因其先祖来自特拉布宗，因此被称为“特拉布宗的乔治”。他青年时来到意大利，很快成为知名学者。1420及1433年分别任维琴察大学和威尼斯大学希腊语教授，成为文艺复兴的首要人物。他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动物志》、柏拉图的《法律篇》和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译成拉丁文，虽错误很多，有时受到批评，但丰富了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内容。

[6] Mansel，Philip，*Constantinople*：*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1453-1924*，London，1995，p.1

1.燃烧的海

629～7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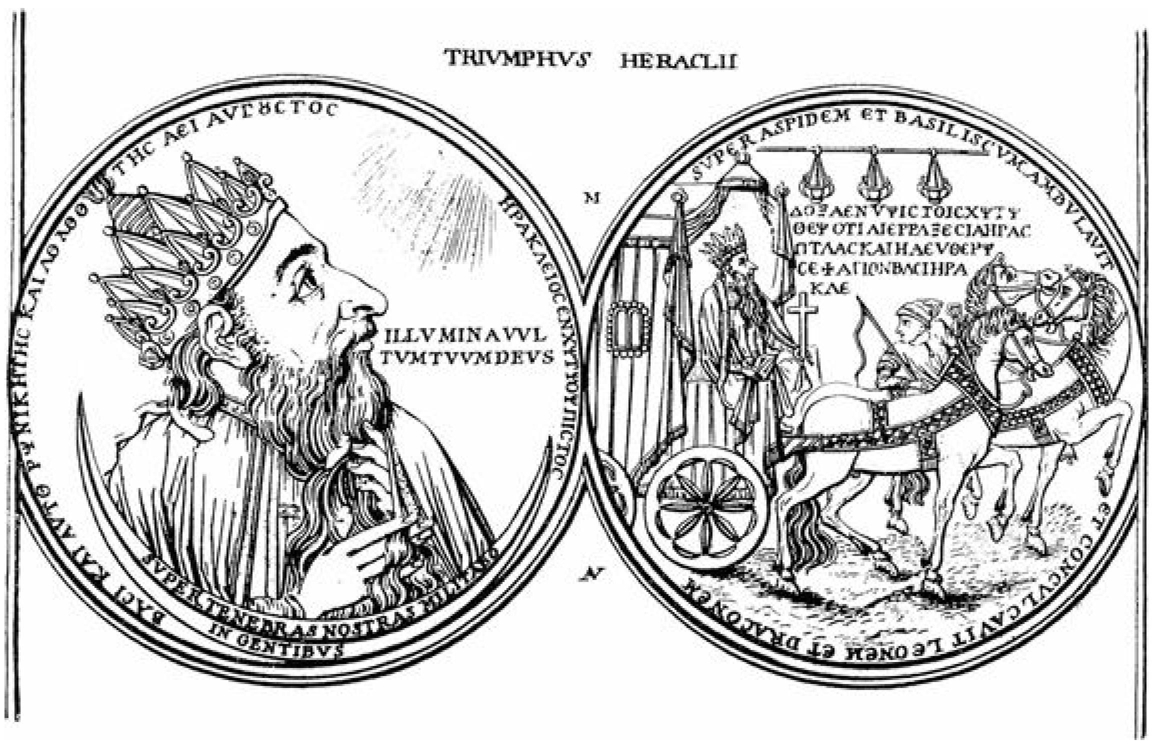
哦，基督，世界的统治者和主宰，此刻我将这座城市、这些权杖，以及罗马的强力奉献于你。[1]

——君士坦丁堡城内，君士坦丁大帝石柱上的铭文

伊斯兰世界对这座城市的渴望几乎和伊斯兰教本身一样古老。争夺君士坦丁堡的圣战由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在一个偶然事件中最先发起。这个故事的真相，就像这座城市历史的大部分一样，已经无法辨明真假。

公元629年，希拉克略——“罗马人的君主”和拜占庭的第二十八位皇帝——徒步前往耶路撒冷朝觐。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辉荣耀的时刻。他在一系列战役中大败波斯人，夺回了基督教世界最神圣的圣物——真十字架。现在，他要带着胜利的荣耀将真十字架返还圣墓教堂。根据伊斯兰方面的记载，他在抵达耶路撒冷城时收到了一封信。信中简单地说：“以大慈大悲的真主之名，穆罕默德，真主的奴仆和他的使徒，向希拉克略，拜占庭人的君主致意。愿遵循真主教导的人都得平安。我邀请你向真主投降。接受伊斯兰，真主将给你双倍的报偿。但如果你拒绝这个邀请，就将误导你的人民。”[2] 希拉克略完全不知道写这封信的是

什么人。但据说他派人进行了探寻，并郑重地对待这封信的内容。穆罕默德发送给波斯“万王之王”的类似的信则被撕得粉碎。穆罕默德对这个消息的回应是直截了当的：“告诉他，我的宗教和我的统治将达到霍斯劳[3]的王国从未涉足的疆界。”[4]对霍斯劳来说这个警告来得太晚了，因为他已经在前一年被一箭一箭地慢慢射死。但这封后人附会的信预示着，可怕的打击即将降临基督教拜占庭和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头上，将让希拉克略皇帝的功业全都化为泡影。



希拉克略带着真十字架凯旋

在此前的10年内，穆罕默德成功地将阿拉伯半岛互相混战的各部落团结在伊斯兰的朴素信条周围。在真主圣言的鼓舞下，在集体祈祷的训诫下，成群结队的游牧劫掠者变成了一支组织有力的军队。它征服的欲望超越了沙漠的边界，投向正被不同信仰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区域的外部世界。一边是伊斯兰世界，一边是“战争的世界”，即尚未皈依伊斯兰教的世界。到7世纪30年代，穆斯林军队如同从沙尘暴中冲出的幽灵一

般，开始出现在拜占庭边境（那里也是有人定居的土地和沙漠的边界）。阿拉伯人敏捷灵活、足智多谋，而且吃苦耐劳。他们把叙利亚境内笨重的拜占庭雇佣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进攻之后又撤回了沙漠，将对手诱出要塞，进入荒芜之地，将其分割包围，全部消灭。他们穿过荒无人烟、条件恶劣的地域，途中宰杀自己的骆驼，从它们的胃中取水，随后再次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的后方。他们围攻城市，学会了攻城的战术。他们攻克了大马士革，然后是耶路撒冷；埃及于641年俯首称臣，亚美尼亚在653年举手投降。20年内，波斯帝国就轰然垮台，并皈依伊斯兰教。穆斯林征服的神速令人瞠目结舌，他们入乡随俗的本领也非同寻常。在真主圣言和神圣征服的驱动下，来自沙漠的人民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基督徒的帮助下，于当地的造船厂建造了自己的舰队，以“在海上开展圣战”[5]。他们于648年占领了塞浦路斯，然后在655年的“桅杆之战”[6]中击败了一支拜占庭舰队。最后，在669年，也就是穆罕默德去世不到40年之后，哈里发穆阿维叶派遣了一支庞大的海陆混合部队前去猛攻君士坦丁堡。在一连串胜利之后，他自信能够顺利拿下这座城市。

对穆阿维叶来说，这将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长期计划的巅峰，此前他为了这个计划的运筹和执行已经投入了极大心血。669年，阿拉伯军队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对岸的亚洲海岸。次年，一支拥有400艘舰船的舰队驶过达达尼尔海峡，在马尔马拉海南岸的库济库斯半岛建立了一个基地。在这里，阿拉伯军队囤积了补给物资，建造了干船坞和用于长期围城的维修设施。穆斯林在君士坦丁堡以西渡过海峡，首次踏上了欧洲的土地。在这里，他们占领了一个港口，从那里围攻城市，并在其腹地周围发动多次大规模袭击。君士坦丁堡的守军躲避在厚实的城墙之后，同时他们的舰队停泊在金角湾，准备对敌人发起反击。

在674～678年的连续5年时间里，阿拉伯人坚持不懈地围攻城市。每年春秋之间，他们攻打城墙，并在海峡内发动海战，与拜占庭舰队持续交锋。双方使用的是相同类型的桨帆船，船员也大体是一类人，因为

穆斯林的航海技术是从业已征服的黎凡特[7]的基督徒那里学来的。冬季，阿拉伯人重新集结在他们的库济库斯基地，修理船只，准备在次年更进一步。他们对君士坦丁堡进行长期围困，坚信胜利终将属于他们。

但在678年，拜占庭舰队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他们向穆斯林舰队发动进攻，时间可能是作战季节的末尾，进攻目标是穆斯林的库济库斯基地。这次攻势的细节要么不甚清楚，要么被故意隐瞒了。拜占庭舰队的先锋是一群快速的德罗蒙战船，这是一种轻型快速的桨帆船。关于当时的战况，没有同时期的文献流传下来，但我们可以根据后来的记载进行推测。进攻的拜占庭舰船逼近敌人时，除了放出常规的箭雨之外，还从船首高高的喷嘴里射出了一种非同一般的烈火的激流。互相逼近的两军之间的海面登时熊熊燃烧起来，然后穆斯林船只也被大火吞没，火焰“就像闪电般降落下来”[8]。火焰爆炸时发出雷鸣般的巨响，黑烟遮天蔽日，蒸汽和毒气让阿拉伯战船上心惊胆寒的水手们窒息倒毙。这火雨似乎能够违抗自然规律：它可以根据操作者的意志向任何方向移动，可以向两侧转移方向，也可以从任意角度向下喷射。它接触到海面之后，海水也会燃烧起来。它似乎还有黏着性，能够粘在木制船体和桅杆上，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将它扑灭。于是舰船和船员都迅速被狂飙突进的火流吞没，那看上去像是天神在大发雷霆。这片非同一般的火海“烧毁了阿拉伯人的船只，将他们的船员活活烧死”[9]。阿拉伯舰队遭到灭顶之灾，饱受摧残的幸存者“损兵折将，伤亡严重”[10]，放弃了围城，返航回乡。冬季的风暴又摧毁了大部分幸存的船只，而阿拉伯陆军则在亚洲海岸遭到伏击和全歼。穆阿维叶灰心丧气，不得不在679年接受了条件非常不利的三十年和约，就此一蹶不振，在次年死去。穆斯林的事业第一次遭受了严重挫折。

史学家们将这场战事付诸笔端，认为它明白无误地证明了“罗马帝国自有神助”[11]，但事实上，拯救拜占庭的是一种新技术：希腊火。甚至直至今天，这种神奇武器的故事仍然是激烈争论和推测的主题。它的

配方被拜占庭视为国家机密。据传说，大约在围城的那个时期，一个名叫卡利尼克斯的希腊逃犯从叙利亚来到君士坦丁堡，带来了一种用虹吸管喷射液态火的技术。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那么他应当是对当时在中东广为人知的火攻武器技术进行了改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希腊火的核心成分就是黑海天然油井产出的原油，混以粉末状的树脂，以赋予它黏着性。在漫长的围城期间，君士坦丁堡的秘密军工厂完善了喷射这种物质的技术。拜占庭人继承了罗马帝国的应用工程技能，似乎研发了一种技术，用密闭的铜容器加热这种混合物，用手压泵对铜容器加压，然后将混合物从喷嘴释放出来，在喷嘴处就可以将这种液体点燃。在木船上操作易燃物、压力设备和火焰，着实需要精准的生产技术和技艺高超的操作人员。于678年打破阿拉伯人斗志的希腊火的秘密就在于此。

40年间，在君士坦丁堡遭遇的挫折让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哈里发们耿耿于怀。令伊斯兰神学界不可思议的是，人类竟然没有渐渐全部皈依伊斯兰教或者屈服于穆斯林的统治。717年，伊斯兰世界进行了第二次，也是更坚决的一次尝试，一心要克服这个阻碍伊斯兰信仰向欧洲传播的障碍。阿拉伯人进攻时，拜占庭帝国内部恰好发生了动乱。新皇帝利奥三世于717年3月25日登基；5个月后，他发现，一支8万人的阿拉伯大军在君士坦丁堡陆墙全线掘壕据守下来，同时还有1800艘战船控制着海峡。阿拉伯人的战略比上一次进步了不少。穆斯林军队的统帅马斯拉玛很快意识到，攻城武器奈何不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这一次必须对城市进行彻底封锁。他的军队带来了小麦种子，准备播种，这印证了他进行长期围困的决心。717年秋天，他们在城墙外开垦土地，播下种子，次年春天的收成将为军队提供粮食。然后他们安营扎寨下来，静观其变。拜占庭人用装备希腊火的战船发动突袭，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未能打破封锁。穆斯林对一切都做了精心准备，一心要打垮异教徒。

但随后，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不可避免也无法逃脱地逐步降临到了阿拉伯人头上。根据他们的史学家记载，利奥三世通过超乎寻常的、按

照拜占庭人的标准也算非常突出的外交欺骗手段蒙蔽了他的敌人。他说服了马斯拉玛，他说如果阿拉伯人销毁自己的储粮，并给守军一些谷物的话，他就能让城市投降。马斯拉玛照办之后，利奥三世就稳坐在城墙后面，不肯出来谈判。上当的阿拉伯军队没有做好过冬的准备，遭到了严冬的摧残。大雪覆盖地面达100天之久；骆驼和马匹逐渐被冻死。越来越绝望的士兵们别无选择，只能把死牲口吃掉。一向偏颇的希腊史学家暗示，阿拉伯军营里发生了更恐怖的事情。忏悔者狄奥法内斯[12]在100年后写道："据说，他们甚至将死尸放在炉子上烘烤，将它们吃掉，还吃了发酵的粪便。"[13]紧随饥荒而来的是瘟疫，还有成千上万人被冻死。阿拉伯人对博斯普鲁斯海峡令人震惊的寒冬毫无经验：地面被冻得铁板一块，无法挖坑安葬死者；他们不得不将几百具尸体海葬。第二年春天，一支庞大的阿拉伯舰队运载粮食和装备抵达，准备接应受到严酷打击的陆军部队，但也未能挽回败局。阿拉伯海军深知希腊火的厉害，卸载货物后就躲在亚洲海岸。不幸的是，有些船员是埃及基督徒，他们逃到拜占庭皇帝那里，将阿拉伯舰队的位置报告给他。帝国派出一队火船，袭击了毫无防备的阿拉伯舰队，将其全歼。从叙利亚赶来救援的阿拉伯陆军则遭到拜占庭步兵的伏击和屠杀。同时，意志坚定、诡计多端的利奥三世在和不信基督教的保加尔人谈判。他说服了保加尔人，让他们进攻城墙外的异教徒；2.2万阿拉伯人在随后的战斗中丧生。718年8月15日，也就是哈里发的军队兵临城下差不多一年之后，他们放弃了攻城战，从海陆两路溃不成军地撤退。败军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一路遭到袭扰，还有一场新的灾难在等待穆斯林的事业。有些船只在马尔马拉海被风暴摧毁；其他船只则被爱琴海的一次海底火山爆发毁灭，火山爆发令"海水沸腾，船只龙骨上的沥青熔化后，他们的船只与水手一起坠入深海"[14]。当初起航时的庞大舰队只剩下5艘船返回了叙利亚，"宣告了上帝的伟业"[15]。拜占庭在伊斯兰世界的进攻下承受了压力，但并没有崩溃。由于技术革新、娴熟的外交、个人的突出表现和强大的防御工事，以及好运气，君士坦丁堡生存了下来。随后的很多个世纪里，这样

的故事一再上演。当然，拜占庭人在这种情况下有着自己的解释：“上帝和圣母保佑着这座城市和基督教帝国……真诚地呼唤上帝的人不会被彻底抛弃，尽管我们由于自己犯下的罪孽在短期内受到了惩罚。”[16]

伊斯兰世界在717年未能攻克君士坦丁堡，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假如君士坦丁堡陷落，伊斯兰世界向欧洲扩张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这或许就会改变西方世界的整个未来；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假如”之一。这次失败打击了伊斯兰圣战的首次强大攻势。这场圣战将在15年后、地中海的另一端达到高潮：一支穆斯林军队在卢瓦尔河畔、在巴黎以南仅150英里处被打败。

对伊斯兰世界来说，在君士坦丁堡的惨败主要是神学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在伊斯兰教问世的最初100年内，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伊斯兰信仰的最终胜利。圣战的法则指向了必然的征服。但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伊斯兰教被与它非常相似的另一种信仰击退了。基督教是与伊斯兰教竞争的另一种一神教，同样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获得更多信徒的欲望。这两种宗教是真理的两个紧密联系的版本，君士坦丁堡划定了它们之间漫长斗争的前线，这场斗争将持续几百年。在此期间，穆斯林思想家们被迫承认，伊斯兰世界和“战争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实际的变化。对非伊斯兰世界的最终征服不得不推迟，或许要一直延期到世界末日。某些伊斯兰法学家为了表达最终胜利的延迟，设想出了第三个世界，即“停战的世界”。圣战的时代似乎结束了。

拜占庭被证明是伊斯兰教最顽固的敌人，君士坦丁堡对穆斯林来说既是一个伤疤，也是一个渴望的源泉。伊斯兰教的很多烈士都牺牲在它的城墙下，包括先知穆罕默德的旗手艾优卜[17]，他于669年阵亡。烈士们的牺牲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伊斯兰的一个圣地，并给占领它的事业赋予了一种救世意义。对它的两次围攻留下了大量神话和民间传说，一代代传承下来。圣训（它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言论的集合体，预言信仰的

战士必将经历失败、死亡和最终胜利的轮回）中有这样的话：“在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圣战中，三分之一的穆斯林将被战胜，这是真主不能宽恕的；三分之一将英勇牺牲，成为伟大的烈士；还有三分之一将最终得胜。”[18] 这将是一场无比漫长的斗争。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之间的冲突规模如此宏大，历时如此漫长，以至于此后的650年之中，君士坦丁堡城墙下再也没有飘扬过穆斯林的旗帜。这个时间跨度比1453年到今天的跨度还要大，但预言宣称，穆斯林还会回来。

在马斯拉玛的军队狼狈撤退的1000年前，人们就在传说中希腊人拜占斯[19] 设立的居民点基础之上建造了君士坦丁堡；马斯拉玛撤退的400年前，君士坦丁堡就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公元324年，君士坦丁皇帝选择这座城市作为他的新的基督教都城。它所处的位置具有极佳的自然条件。5世纪，陆墙修建之后，只要敌人的攻城武器仅限于投石机，城市就几乎固若金汤。在12英里长的外墙之内，君士坦丁堡在一连串陡峭山峰上屹然矗立，居高临下地俯视周围的大海；东面的金角湾形似弯弯的鹿角，是一个安全的深水港。唯一的缺点是，君士坦丁堡所在的海岬非常荒芜；拥有先进水利工程技术的罗马人建造了一系列复杂的高架渠和蓄水池，解决了缺水的问题。

这个地点位置特殊，处于贸易商道的汇聚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早期历史回荡着行军的脚步声和泼溅海水的划桨声。伊阿宋和阿尔戈英雄们曾乘船经过这里，前往第聂伯河口寻找金羊毛。波斯国王大流士率领70万大军走过船只搭建的桥梁，渡过这里的海峡，去讨伐斯基泰人[20] 。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前往黑海之滨的流放地的途中曾满腹忧愁地抬眼眺望“两片大海的巨大门廊”[21] 。在这个十字路口，这座基督教城市渐渐掌控了广大腹地的财富。在东方，中亚的财富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流进帝都的仓库：来自俄罗斯的蛮族的黄金、毛皮和奴隶，来自黑海的鱼子酱，来自远东的蜂蜡、食盐、香料、象牙、琥珀和珍珠。在南方，条条大路通往中东的城市：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巴格达。在西方，

穿过达达尼尔海峡的航道连通整个地中海：通往埃及和尼罗河三角洲、富饶的西西里和克里特、意大利半岛，以及一直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各个角落。在更近的地方有足以建造恢宏城市的木材、石灰岩和大理石，以及供养它所需的全部资源。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奇特海流每年都带来大量鱼群，而欧洲的色雷斯的田地和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肥沃低地为它提供大量的橄榄油、粮食和葡萄酒。

在这里崛起的繁荣城市彰显了帝国的光辉灿烂，统治它的是一位罗马皇帝，居住在这里的是讲希腊语的人民。君士坦丁建造了带有柱廊的街道网络（大街两边是带露台的公共建筑）、气势恢宏的广场、花园、高柱和凯旋门。这些建筑既有异教的色彩，也有基督教的特征。城内屹立着从古典世界劫掠来的雕像和纪念碑（包括可能是希腊雕塑家留西波斯[22] 为亚历山大大帝雕刻的无比雄壮的青铜马，现在已经成为威尼斯城的标志物）、足以与罗马赛马场媲美的赛马场、皇宫以及“数量比一年中的日子还要多的”[23] 教堂。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一座大理石、斑岩、锤扁黄金与辉煌马赛克的城市，人口在巅峰时达到50万。前来做生意或者觐见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外乡人无不被它深深震撼。蒙昧的欧洲的野蛮人被这座“全世界觊觎的城市”[24] 惊得目瞪口呆。沙特尔的富歇[25] 于11世纪到访，他的反应在很多年的来访者中非常典型：“哦，多么绚丽多彩的城市，多么庄严，多么美丽，有如此之多的修道院，在宽阔的大街上凭借劳力修建起了多少宫殿，有多少震撼人心的艺术品：如果要列举所有美好的事物，能把人累垮；金银珠宝，形形色色的服饰，以及如此神圣的遗迹。无论什么钟点，总有船只在这个港口停靠。人所想要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26]

拜占庭不仅是罗马帝国最后的继承者，还是史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27] 。从建城开始，这座帝都就被设想为天堂的复制品、基督胜利的体现，它的皇帝则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随处可见基督教信仰的迹象：教堂的高高穹顶、教堂钟声和木锣声、修道院、数量众多的僧侣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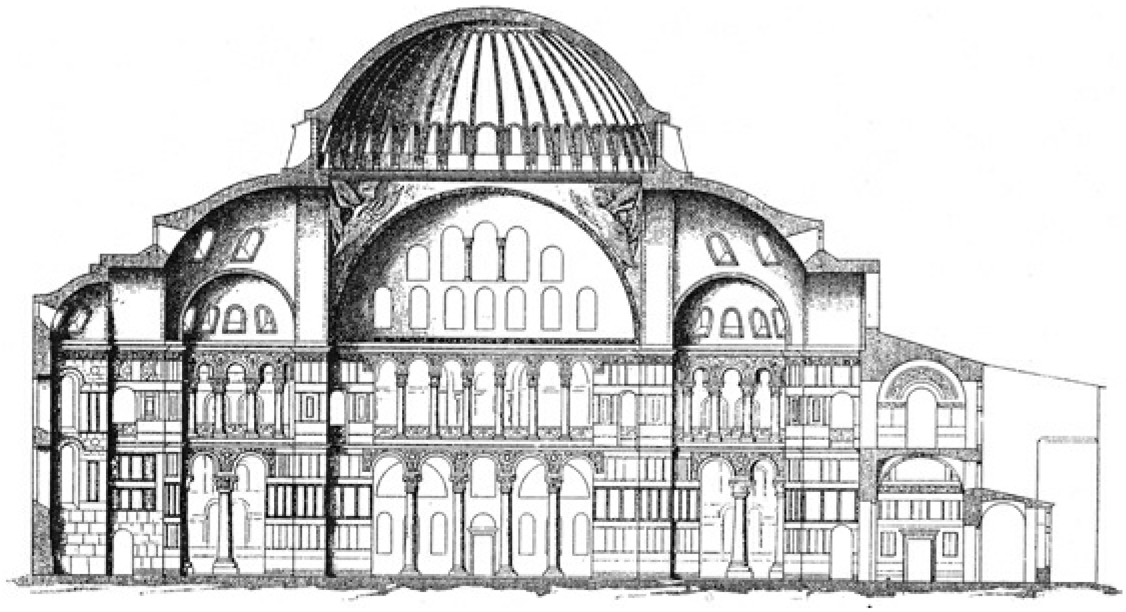
修女、大街和城墙上没有尽头的圣像游行。虔诚的市民和他们的皇帝始终生活在持续的祈祷声和基督教仪式中。斋戒、瞻礼日和整晚的守夜构成了生活的日历、时序和基础。这座城市储存着从圣地收集来的基督教的众多圣物，令西方基督徒非常眼馋。施洗者约翰的头骨、耶稣临终前戴过的荆棘王冠、十字架上的钉子、圣墓上的石块、诸位使徒的遗留物和上千种其他的神奇物品被盛放在黄金打造的圣物匣内，匣子上镶嵌了珠宝。东正教通过马赛克和圣像的鲜艳色彩、点有油灯的昏暗教堂内不断跪拜起伏的礼拜仪式的神秘之美、焚香以及复杂的仪式（正是这仪式使教会和皇帝都沉浸在一种迷宫般的美丽气氛中，用天堂的比喻陶醉人的感官）对群众的情感施加了极其强大的影响。一位于1391年目睹皇帝加冕礼的俄罗斯访客被仪式的缓慢和奢华深深震撼：

> 在此期间，赞礼员吟唱了一曲美丽惊人的乐曲，完全超越人的理解力。皇室队伍前进得极其缓慢，从大门走到皇座所在的平台花了足足三个钟头。十二名从头到脚覆盖链甲的武士环绕在皇帝周围。在他前面走着两名黑头发的旗手。旗杆、旗手的服装和帽子都是红色的。在旗手前面是若干传令官，他们的权杖包着白银……皇帝走上平台，穿上紫色皇袍，戴上饰有圆锯齿的皇冠……然后礼拜仪式开始了。谁能将这全部的光辉灿烂描述出来呢？[28]

在城市中心矗立着气势恢宏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像一艘巨舰停泊于此。查士丁尼在仅仅6年内就将它建成，并于537年将它向公众开放。这是古典时代晚期最了不起的建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无比壮美。没有廊柱支撑的高高穹顶让亲眼看见的人也啧啧称奇，认为它是个无法理解的奇迹。普罗科匹厄斯说："它似乎不是建在坚固的砖石之上，而是漂浮在半空中，遮盖着下方的空间。"[29] 穹顶覆盖的空间如此之广大，足令初次看到它的人目瞪口呆。拱顶装饰着面积达4英亩的黄金马赛克，如此之金碧辉煌，按照示默者保罗[30] 的说法，"金光流水般倾泻而下，让人们眼花缭乱，几乎无法直视"，同时大量的彩色大理石让观者陶醉。它们看上去如同"撒满星辰……像牛奶被泼洒在闪耀的黑色平面上……或者像大海或祖母绿，抑或碧草中的矢车菊，间或有几点雪白"

[31]。10世纪，从基辅前来寻求真理的俄罗斯人目睹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内礼拜仪式的壮美，最终导致俄罗斯皈依了东正教。俄罗斯访客们如此记述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天堂还是人间。因为人间不可能有如此的辉煌和美丽，我们不知道如何描述。我们只知道，在那里，上帝就居住在凡人中间。"[32]东正教无比精细的繁华壮美与伊斯兰教的简单质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伊斯兰教提供的是沙漠地带的抽象的朴素，一种在任何看得见太阳的地方都可以进行的膜拜，以及与神的直接交流；东正教则富有形象、色彩和音乐，以及将灵魂引向天堂的神秘力量的令人陶醉的隐喻。两种宗教同样执着地要让全世界皈依他们的信仰。

拜占庭人的宗教热诚在基督教历史上达到了鲜有匹敌的高度。有时会有太多的军官出家修道，以至于威胁到帝国的稳定；人们在大街上也会激烈地探讨神学问题，有时甚至导致暴乱。"这座城市的工匠和奴隶个个都是神学家，"一个为此感到恼火的外乡人说道，"如果你找人兑换钱币，他会告诉你，圣子和圣父如何不同。如果你询问一块面包的价钱，他会争论说，圣子低于圣父。如果你问洗澡水准备好了没有，会有人告诉你，圣子由虚无而生。"[33]基督是一个神格还是多个神格？圣灵生自圣父，还是生自圣父与圣子？圣像是亵渎神明的还是圣洁的？这些问题可不是闲扯：得到拯救还是遭天谴，就取决于如何回答它们。在帝国的生活中，关于正统教义和异端的争执就像内战一样激烈，而且和内战同样严重地威胁着帝国的统一。



圣索菲亚大教堂截面图

奇怪的是，拜占庭基督教同样又是宿命论的。万物皆由上帝决定，任何不幸，从丢失钱包到城市遭围困，都被认为是个人或集体罪孽招致的。皇帝是由上帝指定的，但如果他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推翻——被密谋者乱刀砍死，或者在浴室内被刺杀，或者被勒死，或者被拴在马后拖死，或者被刺瞎双目、流放远地（皇帝的命运毫无稳定性可言，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这也是上帝的旨意，说明皇帝犯下了某种隐匿的罪孽。因为可以预测人的命运，拜占庭人极其迷信，对预言特别痴迷。缺乏安全感的皇帝常常会随意翻开圣经，寻找能够指示他们命运的线索；占卜是一种主要职业，虽然常常被教会谴责，但根深蒂固，无法将它从希腊人的灵魂中驱逐。有些占卜的方式非常怪异。9世纪，一位到访的阿拉伯人目睹了拜占庭人用一匹马来预言远方战役的进展："马匹被带进教堂，那里悬挂着马笼头。如果马咬住笼头，人们就说：'我们在伊斯兰的土地上获得了一场胜利。'有时马会走近笼头，嗅一嗅它，调转身子，再也不接近笼头。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人们就会心情沉重地离去，预料将遭到失败。"[34]



帝国高层事故：皇帝罗曼努斯三世在浴室暴毙，**1034**年

好多个世纪里，拜占庭和它的都城的形象如同太阳一样灿烂，就像万有引力一样吸引着它疆界之外的世界。它给人的印象是无比富饶、万古长青。它的货币“拜占特”印有皇帝的头像，在中东也是硬通货。拜占庭仍然享有罗马帝国的威望；在伊斯兰世界，拜占庭被简单地称为“罗马”；和罗马一样，它也引来了大门之外的半野蛮游牧民族的贪欲和嫉妒。从巴尔干半岛到匈牙利平原，从俄罗斯的森林到亚洲大草原，一波波游牧部落敲打着它的防线：匈人和哥特人、斯拉夫人和格皮德人[35]、鞑靼阿瓦尔人[36]和突厥保加尔人，以及野蛮的佩切涅格人[37]，都在拜占庭世界横冲直撞。

在鼎盛时期，帝国统治着从意大利到突尼斯的地中海地区。但在这些邻居的压力之下，帝国不断地扩张或者收缩，就像一张巨大的地图，边边角角无时无刻不在卷曲。一年又一年，帝国陆海军从马尔马拉海岸的大型港口出征，旌旗招展、号角齐鸣，要么是去收复某个行省，要么是去稳定某段边疆。拜占庭是一个永远在战斗的帝国，而君士坦丁堡由

于它十字路口中心的地理位置，不断受到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压力。在帝国的最初500年中，不知有多少支异族军队曾沿着君士坦丁堡的陆墙安营扎寨，阿拉伯人不过是其中最为坚决的一支。波斯人和阿瓦尔人于626年兵临城下；保加尔人在8、9、10世纪曾发动多次进攻；俄罗斯的伊戈尔王子于941年来到这里。对希腊人来说，围城是一种心理状态，也是他们最古老的神话：除了圣经，人们还熟知荷马讲述的特洛伊的故事。这让希腊人既讲求实际，又非常迷信。城墙的维护是公民们的一项长期义务；粮仓内总是储有大量粮食，蓄水池总是蓄满，但东正教会认为精神上的防御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圣母是城市的主保圣人；危急时刻，人们高举她的圣像沿着城墙游行。人们相信，717年的围城战中，君士坦丁堡就是因为圣母的佑助才得救的。这些圣像赋予的自信心可与《古兰经》媲美。

在陆墙之外安营扎寨的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打破这些物质和精神上的防御。任何一个企图征服君士坦丁堡的野心家都没有攻城拔寨的技术、海上封锁所需的海军力量，或是通过饥饿让守军屈服的耐心。拜占庭帝国虽然常常走到崩溃的边缘，却显示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城市坚固的基础设施、帝国机构的力量以及在危急时刻机缘巧合地出现的杰出领袖，都使得东罗马帝国得以顽强地延续下去。在它的公民和敌人看来，它似乎将万古长青。

但阿拉伯人攻城的经历对君士坦丁堡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认识到，伊斯兰是一股极其强大的对抗力量，从本质上与其他敌人迥然不同；拜占庭人关于撒拉森人（这是基督教世界对阿拉伯人的称呼）的预言表达出了他们关于世界未来的不祥预感。有一位作家声称，阿拉伯人就是《启示录》中的第四头野兽，它“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38]。[39]11世纪末，拜占庭遭到伊斯兰世界的第二次打击。它发生的如此突如其来，当时无人能够理解它的意义。

[1] quoted Sherrard，Philip，*Constantinople*：*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London，1965，p.11

[2] quoted Akbar，M. J.，*The Shade of Swords*：*Jihad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ianity*，London，2002，p.45

[3] 即波斯萨珊王朝的国王霍斯劳二世（？～628），绰号"不可战胜者"，中国的《隋书》称他为"库萨和"。他曾占领拜占庭的大片领土，但后来被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击败，不久之后被篡位的儿子杀死。霍斯劳二世死后，萨珊王朝陷入内乱，随即被阿拉伯帝国灭亡。

[4] Tell him that …'，quoted Akbar，M. J.，*The Shade of Swords*：*Jihad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ianity*，London，2002，p.44

[5] 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2 vols.，trans. Franz Rosenthal，London，1958，p.40

[6] 公元655年，阿拉伯海军与一支拜占庭舰队（由皇帝君士坦丁二世亲自指挥）交战，这是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次决定性海战，确立了穆斯林随后几个世纪在地中海的霸权地位。在此役中，拜占庭人在桅杆上升起十字架，穆斯林则在桅杆上悬挂新月旗，故名"桅杆之战"。

[7] 黎凡特是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其指代并不精确。它一般指的是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的一大片中东地区。"黎凡特"一词原指"意大利以东的地中海土地"，在中古法语中，黎凡特（Levant）即"东方"的意思。历史上，黎凡特在西欧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中担当重要的经济角色。黎凡特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传统路线。阿拉伯商人通过陆路将印度洋的香料等货物运到地中海黎凡特地区，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从黎凡特将货物运往欧洲各地。

[8] Comnena，Anna，*The Alexiad of Anna Comnena*，trans. E. R. A. Sewter，London，1969，p.402

[9] quoted Tsangadas，B. C. P.，*The Fortifications and Defense of Constantinople*，New York，1980，p.112

[10] quoted Tsangadas，B. C. P.，*The Fortifications and Defense of Constantinople*，New York，1980，p.112

[11] Theophanes Confessor，*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Oxford，1997，p.676

[12] 即圣狄奥法内斯（758/760～817/818），拜占庭僧侣和史学家，出身贵族世家，在帝国宫廷长大，后来成为僧侣和修道院长。在著名的圣像争端中，他主张崇拜圣像。他根据前人的记载整理撰写了一部拜占庭历史，虽然有很多讹误，但仍然是重要的历史资料。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都敬奉他为圣徒。

[13] Theophanes Confessor，*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Oxford，1997，p.546

[14] Theophanes Confessor，*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Oxford，1997，p.550

[15] Theophanes Confessor，*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Oxford，1997，p.550

[16] Theophanes Confessor，*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Oxford，1997，p.546

[17] 即阿布·艾优卜·安撒里（576～674），先知穆罕默德的重要门徒和追随者，伊斯兰教早期的重要领袖和将领。他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但仍然参加了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并在那里战死。他后来被安葬在城墙脚下。他的安葬地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注意关于他的死亡年份，此处原文有误。

[18] quoted Wintle，Justin，*The Rough Guide History of Islam* ，London，2003，p.245

[19] 拜占斯是来自希腊多利亚的城市墨伽拉的殖民者，德尔菲的阿波罗神谕指示他在“盲者之国”对岸定居，拜占斯领导一群墨伽拉殖民者于公元前667年建立拜占庭，完成了神谕的使命。

[20] 斯基泰人（Scythians），中国《史记》《汉书》称之为塞种、尖帽塞人或萨迦人，是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4世纪在亚欧草原中部广袤地区活动的伊朗语族游牧民族，其居住地从今日俄罗斯平原一直到中国的河套地区和鄂尔多斯沙漠，是史载最早的游牧民族，善于养马，据信骑术与奶酪等旨出于其发明。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曾对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以及亚述帝国大举入侵，威胁西亚近七十年，其骑兵驰骋于卡帕多细亚到米底、高加索到叙利亚之间，大肆劫掠；其后逐渐衰落，分为众多部落。5世纪中期随被称为“上帝之鞭”的匈人阿提拉王入侵欧洲，一度抵达巴黎近郊的阿兰人，即为其中之一部。斯基泰人没有文字，但善于冶金打造饰物，留下了许多金器。

[21] Ovid，*Tristia* ，1.10

[22] 留西波斯（公元前4世纪），希腊著名雕刻家，为希腊化时代的雕刻艺术带来了革新。

[23] quoted Sherrard，Philip，*Constantinople*：*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London，1965，p.12

[24] quoted Mansel，Philip，*Constantinople*：*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1453-1924*，London，1995，p.3

[25] 沙特尔的富歇（1055/1060～约1127），法兰西教士与史学家。他对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兰西克莱蒙会议上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演讲的记载是保存至今的这一重要事件的唯一文字记载。富歇后来追随布洛涅的鲍德温（后来的埃德萨第一任伯爵和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他撰写了关于东征和耶路撒冷王国的史书。

[26] quoted Sherrard，Philip，*Constantinople*：*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London，1965，p.12

[27] 第一个承认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应为亚美尼亚，时间为3世纪末至4世纪初。

[28] quoted Sherrard，Philip，*Constantinople*：*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London，1965，p.51

[29] quoted Sherrard，Philip，*Constantinople*：*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London，1965，p.27

[30] 示默者保罗（？～约575至580），拜占庭诗人。他担任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宫廷的官员，负责维持肃静，因此被称为“示默者保罗”。他创作的关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长诗为后世描绘了教堂曾经的光辉灿烂。

[31] quoted Norwich，John J.，*A History of Byzantium*，1 vols.，London，1995，p.202

[32] quoted Clark，Victoria，*Why Angels Fall*：*A Journey through Orthodox Europe from Byzantium to Kosovo*，London，2000，p.17

[33] quoted Clark，Victoria，*Why Angels Fall*：*A Journey through Orthodox Europe from Byzantium to Kosovo*，London，2000，p.14

[34] quoted Sherrard，Philip，*Constantinople*：*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London，1965，p.74

[35] 古代东日耳曼部落，与哥特人有血缘关系，一度在波罗的海地区活动，4世纪时被纳入阿提拉的匈人帝国，后于454年击败匈人，独立建国，最后被拜占庭消灭。

[36] 阿瓦尔人是古时欧亚大陆的一个游牧民族，约在6世纪迁徙到欧洲中部和东部。阿瓦尔人起源于亚洲中部，大部分人认为他们属于泛蒙古—突厥族，一说他们就是中国典籍中记载的古代游牧民族柔然的残部。

[37] 佩切涅格人是来自中亚的一支突厥部落，10世纪时到达顿河和多瑙河下游，在11世纪时与拜占庭帝国发生冲突，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的几场战争中他们被拜占庭帝国所败，后来在匈牙利定居下来，逐渐融入当地居民中。

[38] 《旧约·但以理书》第7章第23节。《新约·启示录》中也提及这个隐喻。

[39] quoted Wheatcroft，Andrew，*Infidels*：*The Conflict between Christendom and Islam 638-2002*，London，2003，p.54

2.伊斯坦布尔的梦想

1071～1422年



我看见，真主令帝国的阳光照耀突厥人的家宅，将天堂环绕在他们的领地周围，为他们取名为“突厥人”，赋予他们权柄，让他们成为时代的帝王，让他们统辖当时的人民。[1]

——喀什噶里[2]

突厥人的粉墨登场再次唤醒了昏昏欲睡的圣战精神。他们最早于6世纪出现在拜占庭的地平线上，当时他们派遣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求与其结盟，共同对抗波斯帝国。对拜占庭人来说，他们不过是连续不断奔向伟大帝都的众多民族中的一个。突厥人的家园在黑海以东，一直延伸到中国。他们是居住在一望无垠的中亚大草原上的异教徒。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波游牧劫掠民族从中亚出发，蹂躏远方的定居民族。他们的语言给我们留下了“ordu”（后来演化为英语的“horde”，意思是：部落、一大群人）这个词，给我们的记忆留下了印迹，就像是沙地上轻微的马蹄印。

早在拜占庭人知道这些突厥游牧民族的名字之前，就已经饱受他们的摧残。最早侵袭定居的希腊人的突厥民族可能是匈人，他们在5世纪

横扫了基督教世界；紧随其后的是保加尔人。每一波侵袭者都像蝗灾一样不可解释，大肆蹂躏拜占庭的国度。拜占庭人把这些侵袭归于上帝对基督徒罪孽的惩罚。就像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蒙古人一样，突厥诸民族也是生活在马鞍上，头顶苍天，脚踩大地，通过萨满的中介膜拜天地。他们天性好动，不肯安分，以部落为单位群居，以放牧和劫掠邻人为生。他们生来就是要劫掠战利品，城市是他们的敌人。他们使用的复合弓和乘骑的机动战术使得他们在军事上远远超过定居民族。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赫勒敦[3]认为这是历史进程的关键。“定居民族习惯于懒惰和安逸，”他写道，“他们以为有了环绕他们的城墙和保护他们的堡垒就能高枕无忧。贝都因人没有城门，也没有城墙。他们总是随身携带武器。他们警惕地观察道路的各个方向。他们只会坐在马鞍上匆匆地打个盹，不会放纵地呼呼大睡……他们对远方微弱的犬吠和其他噪音都高度警觉。坚忍不拔是他们的特征，英勇无畏是他们的天性。”[4]这个主题很快就将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再次回荡。

中亚的持续动荡迫使这些突厥部落向西迁徙。到9世纪，他们已经与伊朗和伊拉克的穆斯林居民建立了联系。巴格达的哈里发认识到他们卓越的战斗技能，招募他们进入他的军队，作为奴隶士兵。10世纪末，边疆地带的突厥人已经完全皈依伊斯兰教，但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种族身份和语言，很快就将从他们的主子那里篡夺权力。到11世纪中叶，巴格达出现了一个突厥人作为苏丹统治的王朝——塞尔柱王朝。11世纪末，从中亚到埃及的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由突厥人统辖。

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迅速崛起不仅没有受到阿拉伯人的怨恨，反而被普遍认为是天意的奇迹，真主如此决定“是为了让奄奄一息的伊斯兰起死回生，恢复穆斯林的和谐统一”[5]。当时埃及出现了一个什叶派王朝，因此选择了逊尼派信仰的突厥塞尔柱人获得了真正“加齐”（反对异教徒和伊斯兰异端的信仰的圣战者）的合法地位。积极进取的伊斯兰精神和突厥人的好战天性水乳交融；对劫掠的渴望在为真主效劳的名义下

而被合法化。在突厥人的影响下，伊斯兰教恢复了阿拉伯人征服战争早期的热情，再次展开了针对基督教敌人的大规模圣战。尽管萨拉丁本人是个库尔德人，但他和他的继承人率领的军队却具有突厥人的精神风貌。拉旺迪[6]在13世纪写道：“赞美真主，伊斯兰得到了强大的支持……在阿拉伯人、波斯人、罗马人和俄罗斯人的土地上，突厥人手持利剑，对他们的利剑的恐惧深深植入人们的内心。”[7]

沿着安纳托利亚南部的边界，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战争已经平静地酝酿了几百年；在这股新力量的驱动下战争迅速爆发。巴格达的塞尔柱统治者被一个不服管教的游牧部落——土库曼人深深困扰。土库曼人渴望劫掠，在伊斯兰腹地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于是塞尔柱苏丹鼓励这些部落战士把他们的力气发泄到西面的拜占庭——罗马人的帝国。到11世纪中叶，四处打劫的圣战者以伊斯兰的名义频繁地袭击基督教的安纳托利亚，迫使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采取果断措施。

1071年3月，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第欧根尼斯御驾亲征，挥师东进，力图挽救时局。8月，他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曼齐刻尔特遭遇了敌人，但这股敌人不是土库曼人，而是一支塞尔柱大军，指挥官是卓越的统帅艾勒卜·艾尔斯兰苏丹，绰号“英雄的雄狮”。当时的局势颇为奇怪。苏丹并不愿意交锋。他的主要目标不是与基督徒作战，而是消灭深受憎恶的埃及什叶派政权。他提出休战，但被罗曼努斯四世拒绝。在随后发生的战役中，穆斯林军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典型的游牧民族伏击战术以及拜占庭雇佣兵部队的叛变决定了战局。罗曼努斯四世本人遭生俘，被迫亲吻踌躇满志的苏丹面前的泥土。苏丹一只脚踩在罗曼努斯四世屈服的脖颈上，以彰显他的胜利和敌人的降服。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对君士坦丁堡来说则是一个灾难。

对拜占庭人来说，曼齐刻尔特战役这一天是“恐怖之日”，这场惊天动地的惨败将深刻影响他们的未来。战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尽管君士

坦丁堡的人们当时还没有立刻理解它的严重程度。土库曼人蜂拥进入安纳托利亚，丝毫不受阻挡。先前他们只是劫掠一番就撤退，现在则站稳了脚跟，不断向安纳托利亚西部这个被誉为雄狮头颅的地区挺进。在经历伊朗和伊拉克的炽热沙漠之后，这些来自中亚、以帐篷为家、以双峰驼为友的游牧部落终于找到了一片适合自己的绵延起伏的高原。与他们如影随形的是正统的逊尼派伊斯兰教以及更为狂热的教派：苏非派、德尔维希 [8] 以及云游圣人（他们既鼓吹圣战，也宣扬对圣人的神秘主义的崇敬，这后一点对基督徒来说也很有吸引力）。曼齐刻尔特战役的仅仅20年后，突厥人就抵达了地中海海岸。成分混杂的基督徒平民大体上没有作任何反抗，有的人改宗伊斯兰教，其他人则因为摆脱了君士坦丁堡的苛捐杂税和压榨剥削而心满意足。伊斯兰教认为基督徒是“有经者” [9]，因此基督徒得到了法律保护和信仰自由。从正统东正教分裂出去的一些派别甚至热烈欢迎突厥人的统治。“由于突厥人统治得公正和井井有条，他们更愿意受突厥人统治，”叙利亚的迈克尔 [10] 如此写道，“突厥人对神秘的信条一无所知，因此与希腊人（他们是一个邪恶和离经叛道的民族）完全相反，不会探究信教行为，也不会迫害宗教异己。” [11] 拜占庭国内的纷争鼓励突厥人更进一步，他们很快就受邀参加把拜占庭闹得四分五裂的内战。突厥人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小亚细亚，受到的抵抗又是如此微不足道；到1176年，又一支拜占庭军队遭到惨败，此时已经再也没有任何希望将突厥入侵者打退了。曼齐刻尔特战役的结果是不可逆转的。到13世纪20年代，西欧作家已经将安纳托利亚称为“土耳其”。拜占庭永远丧失了这个粮食与人力的来源。几乎同时，另一场同样严重的灾难从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向降临君士坦丁堡。这一次的敌人是基督教西欧。

十字军东征的初衷是遏制伊斯兰教突厥人的军事征服。1095年，在克莱蒙 [12]，教皇乌尔班二世作了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布道，提倡反对塞尔柱人，“一个受诅咒的种族，与上帝彻底隔绝的种族”，鼓吹“将这个邪恶种族从我们的土地上完全驱逐出去” [13]，就此发动了长达350年

的十字军东征。尽管拜占庭人对西欧的基督徒兄弟提供了支持，但十字军东征对拜占庭人来说却是一场漫长的磨难。从1096年开始，一波波四处劫掠的西欧骑士先后来到拜占庭，跌跌撞撞地穿过帝国疆土，南下前往耶路撒冷，期待着从他们的东正教兄弟那里获得支持、给养和感激。双方的接触带来了互相的不理解和不信任。双方都有机会对东西方风俗习惯和信仰方式的差别进行观察。在希腊人看来，这些身披重甲的西欧兄弟比粗鲁野蛮的冒险家强不了多少，他们的圣战使命也不过是虚伪地伪装成虔诚举动的军事征服。“他们骄横跋扈，生性残忍……而且对拜占庭帝国抱有根深蒂固的仇恨，”[14]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15] 如此抱怨道。事实上，拜占庭人对已经定居下来的穆斯林邻居更有好感。在伊斯兰圣战最初爆发之后的几百年内，拜占庭人和穆斯林一直近距离互相接触，双方非常熟悉，也互相尊重。“尽管我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同，我们必须像兄弟一样和睦相处，”[16] 君士坦丁堡的一位牧首曾这样写信给巴格达的哈里发。十字军则把拜占庭人视为堕落的异端分子，有非常危险的东方化的世界观。常有塞尔柱和突厥士兵为拜占庭人作战；十字军还震惊地发现，供奉给圣母的君士坦丁堡城里居然还有一座清真寺。“君士坦丁堡因富庶而傲慢，行为阴险狡诈，信仰腐败堕落，”[17] 十字军战士德伊的厄德[18] 如此宣称。君士坦丁堡的财富和镶嵌宝石的圣物更是让十字军战士们目瞪口呆、垂涎三尺。这是一个凶险的预兆。十字军战士们发回诺曼底和莱茵河畔小城的信中渐渐出现了一种隐晦的嫉妒。“自世界开端以来，”香槟军务官[19] 写道，“从没有如此多的财富聚集在一座城市中。”[20] 这是难以抵制的诱惑。

西欧对拜占庭帝国军事、政治和商业上的压力已经积聚了很长时间，但到12世纪末期，这种压力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已经非常具体和明显了。城内建起了一个很大的意大利贸易社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得到了一些特权和利益。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意大利人不受拜占庭人欢迎：热那亚人在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塔（一座有城墙的城镇）设有自己的殖民地；威尼斯人的殖民地“极其富庶和繁荣，也极其傲慢无礼，甚至

蔑视帝国的权威”[21]。君士坦丁堡市民中掀起了一股股排外情绪。1171年，希腊人攻陷并摧毁了加拉塔。1183年，拜占庭将领“可怖的”安德罗尼库斯[22]命人血洗了整个意大利社区。

1204年，互相猜忌和暴力流血的历史再次在君士坦丁堡上演，爆发了一场可怕灾难，让希腊人永远无法完全原谅天主教西欧。作为基督教世界历史中最怪异的事件之一，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队伍乘坐威尼斯船只，名义上是出征埃及，实际上却转而进攻君士坦丁堡。此次行动的幕后黑手是恩里科·丹多洛——80岁高龄、据说双目失明[23]的威尼斯执政官，他诡计多端，亲自领导了此次远征。庞大的舰队搜罗了一个自称有权继承皇位的人，打着他的旗号，于1203年6月在马尔马拉海北上。十字军战士们看到左舷前方出现的是君士坦丁堡，一座具有极其重要基督教意义的城市，而不是埃及海岸时，想必自己也吃了一惊。威尼斯战船粉碎了保护金角湾的铁链，冲到前滩，企图突破海墙，但失败了。80岁的执政官手执圣马可的旗帜，跳上海滩，鼓励威尼斯人奋勇作战。士兵们冲上了城墙；觊觎皇位的亚历克赛[24]被推举为皇帝。

在经历了一个冬天的钩心斗角、玩弄诡计之后，逐渐焦躁不安起来的十字军于次年4月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了彻底的洗劫。随后发生了耸人听闻的大屠杀，城市的很大一部分被付之一炬。“被烧毁的房屋比法兰西王国三座大城市的房屋总数还要多。”法兰西骑士维尔阿杜安的若弗鲁瓦如此宣称。君士坦丁堡伟大的艺术遗产遭到可耻的野蛮破坏，圣索菲亚大教堂惨遭亵渎和洗劫。“他们把骡马牵进教堂，”史学家尼西塔斯写道，“以便更好地运走圣器，以及从宝座、讲道坛、门、家具和其他地方拆下的雕刻金银器物；有些牲畜跌跤倒下，他们就用剑刺杀它们，污血和粪便污染了教堂。”[25]威尼斯人劫走了大量雕塑、圣物和其他珍贵器物，用来装点他们自己的圣马可教堂，其中包括自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以来就矗立在赛马场上的四座青铜骏马。君士坦丁堡成了一座黑烟滚滚的废墟。“哦，城市，城市，所有城市的眼睛，”史学家尼西塔斯哀叹

道，“你饮尽了上帝的愤怒之杯。”[26] 这个回应是典型的拜占庭式的——将灾难归于上帝的惩罚。但不管这场灾难是人为还是天定，结果是一样的：君士坦丁堡一蹶不振，以往的光辉灿烂如今只剩一个鬼影。随后的将近60年里，这座城市变成了“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由佛兰德伯爵及其继承人统治。拜占庭帝国被肢解为一连串分散的法兰克国家和意大利殖民地，很大一部分平民则逃往希腊。拜占庭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尼西亚建立了一个流亡政权，比较成功地抵挡住了突厥人的后续入侵。1261年，拜占庭人收复了君士坦丁堡，发现城市的基础设施已经接近全毁，其领地已经锐减为若干分散的碎片。拜占庭人努力重整旗鼓，抵御来自西欧的新的危险，因此暂时忽略了伊斯兰教的安纳托利亚。他们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安纳托利亚持续受到东方人口迁移的冲击。君士坦丁堡遭十字军洗劫两年后，一个名叫铁木真的部族领袖成功地将蒙古腹地互相厮杀的游牧部落团结起来，组成一支军队，并获得了“成吉思汗”（意思是“普世君主”）的尊号。肩批长发、崇拜天的蒙古人以可怕的迅猛速度杀入了伊斯兰世界。波斯陷入一片混乱，背井离乡的人们潮水般向西迁徙，涌入安纳托利亚。这片大陆是不同民族命运的大熔炉：希腊人、突厥人、伊朗人、亚美尼亚人、阿富汗人、格鲁吉亚人。1243年，蒙古人打败了这一地区最统一和强大的国家——塞尔柱人建立的鲁姆苏丹国，随后安纳托利亚四分五裂为若干小国，如同马赛克一般。四处游荡的突厥部落发现西方没有土地可以供他们迁徙；再也没有异教邻国可以作为伊斯兰征服战争的对象。他们抵达海岸时，有些人得到船只，开始劫掠拜占庭海岸地区；其他人则互相厮杀起来。安纳托利亚一片混乱、四分五裂、险象环生，完全是遍布强盗、土匪和宗教狂人（他们信仰的是神秘主义的苏非信条和正统逊尼派教义的混合体，非常激进和狂热）的狂野西部。土库曼人仍然坐在他们饰有刺绣的深马鞍上，在绵延的天际漫游，寻找可供劫掠的财富，遵循圣战者的传统，不断行进。但只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国，即奥斯曼部落，还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异教徒土地（即

拜占庭）有所接触。

我们今天将这些人称为“奥斯曼人”，但没人知道他们的真正起源。1280年前后，他们从默默无闻的众多土库曼游牧部落中迅速崛起。他们是一群目不识丁的战士，居住在帐篷里，用树木点燃篝火，骑在马背上统治，把拇指印当作签名。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制造神话，重建了奥斯曼的历史。根据传说，部族领袖奥斯曼注定要成就一番伟业。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看见君士坦丁堡“坐落在两片海域和两块大陆的连接点，看似两块蓝宝石和两块绿宝石之间的钻石，因此成为一大片统治疆域上的宝石，而这片疆域囊括了整个世界”[27]。奥斯曼继承了圣战者的衣钵，他的部落对此加以利用。一半靠运气，一半靠机智，奥斯曼从区区小国演化成了梦想中的世界霸权。

奥斯曼的领地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与保卫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外围防御圈接壤。对面就是尚未征服的异教土地，因此这里变成了吸引圣战者、冒险家和渴望拥有自己土地的难民的磁石，这些人都打算在奥斯曼统领下试试自己的运气。奥斯曼是一个与人民紧密联系的部族领袖。同时，奥斯曼人由于邻近拜占庭国家，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可以研究拜占庭，并模仿它的结构。奥斯曼部落的确是“在马背上”学习的，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吸收了拜占庭的技术、礼仪和战术。1302年，奥斯曼首次打败拜占庭人，赢得了巨大的威望，也吸引了更多人加入他的大业。他率军继续推进，打击摇摇欲坠的拜占庭帝国的防御阵线，成功地将布尔萨城[28]分割包围。他没有攻城的技术，因此耐心地围城达7年之久，最后他的儿子奥尔汗一世在1326年攻克了这座城市，并将其作为他的小王国的都城。1329年，奥尔汗一世在佩雷卡诺斯[29]击败了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终止了拜占庭支援安纳托利亚的剩余城市的企图。这些城市接二连三地迅速陷落了：尼西亚于1331年被占领；尼科米底亚在1337年陷落；斯库塔里[30]于1338年被占领。穆斯林战士现在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纵马奔驰，一直驰骋到海边，眺望

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欧洲。他们可以看见远方的君士坦丁堡：绵延的海墙、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巨大穹顶、塔楼和宫殿上招展的皇旗。

征服者一路将攻克的城市的希腊名称换为元音和谐的土耳其语名字。士麦那变成了伊兹密尔；尼西亚（尼西亚信经[31]的诞生地）被改称伊兹尼克；“普鲁萨”变换了辅音，变成了“布尔萨”。至于君士坦丁堡，奥斯曼人虽然继续沿袭阿拉伯语的说法，在官方说法中称其为“君士坦丁堡”，但日常的俚俗土耳其语把它变成了“伊斯坦布尔”，具体的演化过程时至今日仍然不清楚。“伊斯坦布尔”或许是“君士坦丁堡”的简单讹误，或许是通过别的途径变化而来的。讲希腊语的人将君士坦丁堡亲昵地称为“波利斯”，即“城市”。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人会说，他要“eis tin polin”（进城），土耳其人也许会把这个短语误听成“伊斯坦布尔”。



布尔萨的奥斯曼及奥尔汗陵墓

奥斯曼人征服的速度就像7个世纪以前的阿拉伯人一样，如有神助。1331年，伟大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32]拜访了奥尔汗一世的王国，为此地的生机勃勃深感震撼：“据说他（奥尔汗一世）从未在任何城镇停留一个整月。他一刻不停地与异教徒作战，持续攻打他们。”[33]早期的奥斯曼人以圣战者自诩；他们使用“信仰的战士”的称呼，就

像用伊斯兰的绿旗包裹自己一样。很快，他们也成了苏丹。1337年，奥尔汗一世在布尔萨建起了一块石碑，自称为“苏丹、众位圣战者的苏丹之子、圣战者、圣战者之子、天际之主、世界英雄”[34]。这着实是穆斯林征服事业的一个新的意气风发的年代，加快了伊斯兰军事运动的脉搏。“圣战者是真主的利剑，”史学家艾哈迈迪在1400年前后写道，“他是信众的保护者和避难所。如果他以真主的方式牺牲，不要相信他已经死去。他生活在安拉的至福中，享受永生。”[35]无论是对于自由驰骋的游牧劫掠者，还是对于那些衣衫褴褛的神秘托钵僧（这些人相伴穿过了安纳托利亚灰尘满天的道路），这些征服都激起了狂野的雄心。空中到处弥漫着预言和英雄的赞歌。他们记起了关于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圣训和红苹果的传说。14世纪50年代，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邀请奥尔汗一世的人马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帮助他打赢持续不断的拜占庭内战。于是，穆斯林自718年以来第一次踏上了欧洲土地。1354年，加里波利[36]的城墙被地震摧毁，奥斯曼人当即宣布，这是真主发出的讯号，要穆斯林占领该城。大群战士和圣徒持续不断地跟随他们涌进欧洲。1359年，伊斯兰军队在阔别650年后再次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空气中弥漫着千禧年预言的气氛。“圣战者为什么最后出现？”艾哈迈迪自问自答，“因为最好的总在最后出现。就像最终的先知穆罕默德跟在其他先知后面，就像《古兰经》在《托拉》[37]、《诗篇》和《福音书》之后从天堂降临人间，圣战者同样也是最后出现在世界上。”[38]占领君士坦丁堡的梦想似乎已经在实现的边缘。

奥斯曼人推进的速度简直快得出奇，似乎确有天定。借助地理、风俗的有利条件和好运，奥斯曼人得以利用拜占庭国家的瓦解，迅速繁荣昌盛起来。早期的苏丹们亲民、亲自然，对周围的环境和可能出现的政局变化保持关注。一千年的礼仪和传统让拜占庭人非常保守和偏狭，而奥斯曼人却机智灵敏、灵活变通、思想开放。伊斯兰教法要求善待被征服的民族，因此奥斯曼人对臣民的统治是相当温和的，常常要比欧洲的封建制更受人欢迎。奥斯曼人并没有致力于让基督徒（奥斯曼国家的大

部分平民都是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事实上，具有帝国霸业雄心的奥斯曼皇朝总的来讲认为让基督徒改宗不是件好事。伊斯兰教法规定，对异教徒可以征收沉重的赋税，对穆斯林就不能这样。但其实异教徒的赋税负担不算重。巴尔干的农民很高兴能够从沉重的封建奴役中解放出来，因此接受了奥斯曼人的统治。同时，奥斯曼人的朝代延续体制有着内在的优势。和其他的突厥小王国不同，早期的奥斯曼苏丹们从来不会将自己的王国分割；他们也不会指定继承人。所有的王子都接受统治国家的训练教养，但只有一人能够继承王位。这种残酷的方法意在保证最强者的生存。最让西方人震惊的是，奥斯曼人丝毫不重视通过婚姻的继承。拜占庭皇帝就像欧洲所有王室一样，费尽心思地去安排门当户对的婚姻，通过足够尊贵、得到认可的血统延续皇朝，奥斯曼人却根本不管这一套。一位苏丹的父亲当然是前一任苏丹，但他的母亲却有可能只是个嫔妃或者女奴，或许只是个半路改宗的穆斯林，可能来自十几个被征服民族中的一个。这种基因上的包容性将给奥斯曼人带来非同寻常的好处。

奥斯曼人的所有创新举措中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常备军。激情澎湃但纪律涣散的大群圣战者已经不能满足奥斯曼苏丹们日渐增长的雄心野望。攻打防御得当的城市需要耐心、方法和一整套特殊的工艺技能。14世纪末，苏丹穆拉德一世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其成员是从巴尔干国家掳掠来的奴隶。每隔一段时间，奥斯曼帝国就征召一批基督徒青年，令其皈依伊斯兰教，并教他们说土耳其语。这些新兵远离家人，只对苏丹本人效忠。他们是苏丹的私人军队——“城门奴隶”。他们被编入步兵单位（即“近卫军”）和骑兵，组成了自古罗马以来欧洲的第一支领军饷的职业常备军。这支军队将在奥斯曼国家的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奴隶军队的习惯其实来自奥斯曼人自己的历史：突厥人自己也曾作为奴隶士兵，在伊斯兰世界的边疆服役，并以此为敲门砖，飞黄腾达。但在作壁上观的基督徒看来，奴隶军队的体制令人毛骨悚然。基督徒想当然地设想出了奴役压迫的不同景象，并认为让被俘的基督徒儿童去反对其他基

督徒的做法是邪恶和丧失人性的。这将成为“野蛮的土耳其人”这个神话的重要因素。

西方很早就开始使用“土耳其人”这个概念。总的来讲，这是欧洲人的人为建构，是个与西方的种族身份相似的术语。奥斯曼人自己很少使用这个概念，认为它是贬义的。他们使用的称呼既不代表种族，也不代表地域；既能体现不受固定地域限制的游牧民族的传统，也能显示多民族的构成。身份认同主要是宗教性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们渐渐开始用越来越花哨的头衔自诩，如“伊斯兰的君主”；将他们的国度称为“信众的避难所”或“受庇护的土地”；他们的人民则被称为“穆斯林”或者“奥斯曼人”。奥斯曼国家是不同元素和民族的独特混合体：突厥的部落生活方式，逊尼派伊斯兰教，波斯的宫廷制度，拜占庭的行政管理、赋税制度和礼仪，以及将土耳其语结构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混用的典雅的宫廷语言。奥斯曼国家有着自己的独特身份。

在奥斯曼人逐渐崛起的同时，拜占庭却持续不断地衰败下去。14世纪在欧洲被称为“多灾多难的世纪”，东罗马帝国也是命途多舛。分裂、内战、人口锐减和贫困严重困扰着君士坦丁堡。有一些历史时刻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1284年，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做出了自杀式的决定：解散帝国海军。失业的水手们叛逃到奥斯曼人那里，帮助他们建造了一支舰队。1325年前后，帕里奥洛格斯皇朝的皇帝们选择双头鹰作为自己的纹章。它并非像人们有时推测的那样，代表一个震慑东西方的强大帝国，而是象征着当时同一个皇室的两位争吵不休的皇帝之间权力的分割。双头鹰具有预言性。1341～1371年，发生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内战，帝国领土还遭到奥斯曼军队以及强大的塞尔维亚国的入侵，另外还有宗教纷争与瘟疫火上浇油。君士坦丁堡还是第一座遭遇黑死病的欧洲城市：1347年，携带病菌的老鼠从停泊在黑海港口卡法[39]的船只跳板登陆。君士坦丁堡人口锐减到10万多一点。一系列地震严重破坏了城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于1346年坍塌，“纯金”的城市越来越贫困和凄

凉，市民陷入宗教的悲观情绪。到访的异乡人注意到了此处的悲凉景象。伊本·白图泰看到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由田地分隔开的十三座村庄。西班牙人佩罗·塔富尔[40]来访时，发现甚至皇宫也“破败不堪，皇宫和城市的惨景清楚地显示出人民曾经遭受，而且现在仍在忍耐的种种磨难……城市人口稀少……市民衣着寒酸，悲伤而贫穷，命运艰难”。然后塔富尔又加上了真正基督徒的“慈悲”：“但这还没有他们应得的命运那么糟糕，因为他们是一个邪恶的民族，罪恶滔天。”[41]城市在城墙内萎缩，就像老人还穿着年轻时的衣服一样。皇帝们在自己的宫廷里也不过是穷人。1347年，皇帝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加冕时，目击者注意到，皇冠的宝石是用玻璃制成的，宴会桌上的盘子是陶土和白镴的。黄金盘子已经被变卖，以支付内战所需的开支；珠宝则被典当给了威尼斯人，现在保存在圣马可教堂的宝库内。



帕里奥洛格斯皇朝的双头鹰纹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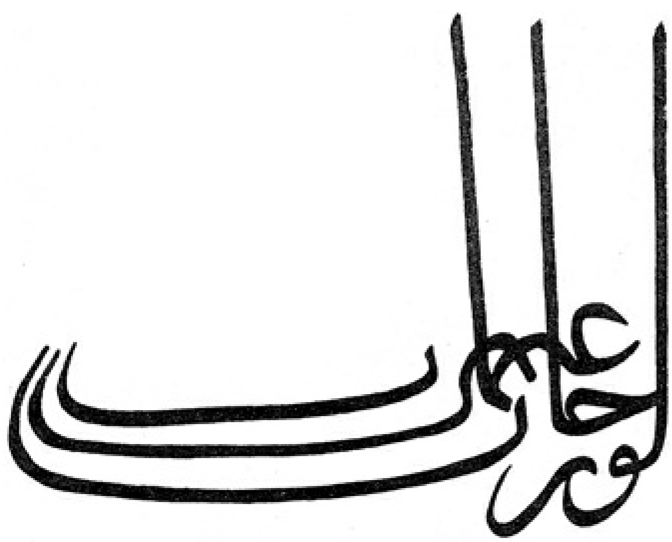
在拜占庭的混乱局面下，奥斯曼人向欧洲的进军势如破竹，不曾受到任何抵挡。1362年，他们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以西的阿德里安堡（它的土耳其语的名字是“埃迪尔内”），实际上已经从背后包围了君士坦丁

堡，并迁都欧洲。1371年，奥斯曼人打败了塞尔维亚人，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与基督教世界的支持就完全隔绝了，别无选择，只能成为苏丹的附庸，按照苏丹的命令提供军队，任命官员也要得到苏丹许可。奥斯曼军队似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到14世纪末，他们的国家已经从多瑙河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土耳其人或者异教徒的扩张就像是大海，”塞尔维亚人、“近卫军战士”米哈伊尔写道，“永远不会安顿下来，永远汹涌前进……除非你打碎蛇头，形势会越来越糟。”[42] 1366年，教皇发布诏书，号召发动针对奥斯曼人的十字军东征，并威胁要将向奥斯曼人提供武器的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地区的贸易城邦处逐出教会，但无济于事。随后50年中，基督教世界发动了三次反对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都是由匈牙利领导，因为它是东欧最受奥斯曼人威胁的国家。这三次东征是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最后的天鹅之歌，均以惨败告终，战败的缘由也不难找寻。欧洲四分五裂，非常贫困，内部争斗不休，而且被黑死病大大削弱了。欧洲的军队行动迟缓、持续争吵、纪律涣散，而且战术愚钝；相反，奥斯曼军队却具有极强的机动性，组织严密，而且为了同一项事业团结一致。少数得以近距离观察奥斯曼军队的欧洲人不得不暗自赞叹“奥斯曼人秩序井然”。15世纪30年代，法兰西旅行者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基里埃[43] 写道：

> 他们非常勤奋，主动地早早起床，生活朴素……他们对在哪里睡眠没有什么讲究，通常直接睡在地上……他们的马匹很好，消耗饲料很少，速度和耐力都很优异……他们对上级绝对服从……讯号发出后，前锋士兵就静悄悄地出发，其他人也同样沉默地跟随其后……10万土耳其大军行军发出的声音比100名基督徒士兵还要小……我必须承认，在我的很多经历中，土耳其人总是坦率、忠诚，需要勇气的时候从来不会让人失望。[44]

在这一背景下，15世纪的开端对君士坦丁堡来说颇为惨淡。奥斯曼军队的攻打已经是司空见惯。1394年，皇帝曼努埃尔[45] 废弃了对奥斯曼人的效忠誓言。苏丹巴耶济德一世对君士坦丁堡连续多次发动进攻，直到1402年，巴耶济德一世自己被突厥—蒙古人帖木儿（就是英国剧作

家克里斯托弗·马洛剧中的主角）击败，才算罢手。随后，拜占庭皇帝们越来越绝望地从西方寻求帮助——曼努埃尔甚至在1400年来到了英格兰。与此同时，他们还玩弄外交伎俩，并支持争夺奥斯曼皇位的人。1422年，为了惩罚拜占庭对觊觎奥斯曼皇位者的支持，苏丹穆拉德二世围攻了君士坦丁堡，但未能得手。奥斯曼军队既没有可以封锁城市的舰队，也没有能够迅速突破厚重岸墙的技术。已经耄耋之年的曼努埃尔仍然是一位极其精明的外交家，他搜罗出了一个新的奥斯曼皇位争夺者，使得奥斯曼国家面临内战的威胁。奥斯曼军队放弃了攻城，但君士坦丁堡已经奄奄一息。奥斯曼军队再次大举进攻、兵临城下，似乎已经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因为害怕欧洲联合起来发动十字军东征，他们才暂时没有轻举妄动。



奥尔汗的花押——帝王的密码，他是围攻并占领布尔萨城的苏丹

---

[1] quoted Lewis，Bernard，*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2 vols.，New York，1974，pp.207-8

[2]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约11世纪20年代～11世纪末期）是出生于中国喀什的维吾尔族大学者。1072～1077年，他在巴格达用阿拉伯文编纂了举世闻名的《突厥语大词典》一书，并献给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

[3] 伊本·赫勒敦（1332～1406），阿拉伯史学家、哲学家、人口学家、经

济学家，被认为是现代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曾在突尼斯、非斯和格拉纳达的宫廷任职，1375年从政坛退隐后，撰写了他的杰作《历史导论》，书中研究了社会性质和社会变迁，发展了最早的非宗教性的历史哲学。他还写了一部有关穆斯林北非历史的著作《训诫书》。1382年，他前往开罗，被指派为教授和宗教法官。赫勒敦被公认为是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一位伟大学者。

[4] 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2 vols.，trans. Franz Rosenthal，London，1958，pp.257-8

[5] Ibn Khaldun，quoted Lewis，Bernard，“Politics and War” in J. Schacht and C. E. Bosworth（eds.），*The Legacy of Islam*，Oxford，1979，p.197

[6] 穆罕默德·本·阿里·拉旺迪（约12～13世纪），波斯史学家，撰写了关于塞尔柱帝国覆灭及花剌子模王朝入侵的史书。

[7] quoted Lewis，Bernard，*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2 vols.，Oxford，1987，p.208

[8] 德尔维希是伊斯兰教苏非派教团的成员。这些神秘主义者强调通过狂喜、舞蹈和旋转表达献身的情感。德尔维希可以集体生活，也可以在俗；云游四方的德尔维希叫作托钵僧，常被视为具有神奇力量的圣人。多数穆斯林将他们视为非正统和极端分子，但该运动已持续至今。

[9] 伊斯兰教所说的“有经者”指的是受神启示者，具体常指犹太人和基督徒。有经者的特征：信仰唯一神；有共同的先知，如摩西（天主教称梅瑟，伊斯兰教称穆萨）；信世界末日、死后复活、审判、天堂、天使；相信创造说。由于《古兰经》对有经者的态度并不一致，故穆斯林对犹太人及基督徒的态度时有不同。在伊斯兰国家，有经者属于受保护的次等公民，至于多神教与无神论者则不在受保护之列。

[10] 叙利亚的迈克尔（1126～1199），叙利亚正教的牧首，著有鸿篇巨制《编年史》，从创世一直写到他自己的时代，尤其是十字军东征等史实。

[11] quoted Cahen，Claude，*Pre-Ottoman Turkey*，trans. J. Jones-Williams，London，1968，p.213

[12] 法国西南部城市。

[13] quoted Armstrong，Karen，*Holy War*：*The Crusades and Their Impact on Today’s World*，London，1992，p.2

[14] quoted Norwich，John J.，*A History of Byzantium*，3 vols.，London，1995，p.102

[15] 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约1155～1215或1216年），拜占庭史学家，著有记载1118～1207年拜占庭历史的著作，其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是对1204年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记述。

[16] quoted Mango，Cyril，（ed，），*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Oxford，2001，p.128

[17] quoted Kelly，Laurence，*Istanbul*：*A Traveller's Companion*，London，1987，p.35

[18] 德伊的厄德（1110～1162），法兰西教士和史学家。他作为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的神父，追随国王参加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并撰写了此次征伐的历史。在该书中，他指责是拜占庭人的背叛造成了东征的失败。

[19] 即维尔阿杜安的若弗鲁瓦（1160～约1212），法兰西骑士与史学家。“香槟军务官”是他的封号。他参加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目睹了1204年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他的著作《征服君士坦丁堡》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法文散文作品。他被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

[20] quoted Morris，Jan，*The Venetian Empire*：*A Sea Voyage*，London，1980，p.39

[21] quoted Norwich，John J.，*A History of Byzantium*，3 vols.，London，1995，p.130

[22] 即后来的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一世·科穆宁（约1118～1185，1183～1185年在位），科穆宁皇朝的末代皇帝，他的两个孙子建立了特拉布宗帝国。安德罗尼库斯是精明强干的名将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传奇式的风流情圣和残酷的暴君。下文会讲到，他的下场极其悲惨。

[23] 据说他早年行商时曾在君士坦丁堡被迫害下狱并被弄瞎双眼，当时正是君士坦丁人排斥威尼斯商人的时候。有人认为这是他后来血洗君士坦丁堡的私人原因。

[24] 即亚历克赛四世·安格洛斯（约1182～1204，1203年8月～1204年1月在位）。他的父亲是皇帝伊萨克二世。伊萨克二世的兄弟亚历克赛于1195年篡权（史称亚历克赛三世），并将伊萨克二世与其子亚历克赛囚禁。1201年，意大利商人将亚历克赛救走，送到神圣罗马帝国。亚历克赛得到西方人的支持，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目标改为君士坦丁堡，希望借助十字军的力量夺回皇位。

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已经被戳瞎双目的伊萨克二世与亚历克赛四世共同统治。亚历克赛与他的父亲以及十字军的矛盾越来越深，最终导致十字军对都城的洗劫。最后亚历克赛四世被廷臣刺杀。

[25] quoted Norwich，John J.，*A History of Byzantium* ，3 vols.，London，1995，p.179

[26] quoted Morris，Jan，*The Venetian Empire*：*A Sea Voyage* ，London，1980，p.41

[27] quoted Kinross，Lord，*The Ottoman Centuries* ，London，1977，p.24

[28] 今土耳其西北部，古称普鲁萨。公元前3世纪建城，在罗马及拜占庭时期颇为繁华。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攻陷后，该城是拜占庭的抵抗中心。14世纪初，奥斯曼人夺取该城，建为最早的国都。15世纪初为帖木儿征服，后又被奥斯曼人夺回。其后奥斯曼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但布尔萨仍持续繁荣。现为农业中心，以生产地毯闻名，城里还有很多15世纪遗留下来的清真寺。

[29] 克里特岛西部的一座港口城市。

[30] 今称于斯屈达尔，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市区，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安纳托利亚一侧。

[31] 尼西亚信经是公元325年的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上制定的有关基督宗教信仰的一项基本议决。它主张圣子是“出于真天主而为真天主，被生而非受造”，与天主父本质相同，确定了圣父、圣子、圣灵为三位一体的天主，本质相同。接受并且信奉此信经的有罗马天主教会、东正教会、英国圣公会、路德宗以及新教的主要教派。

[32] 伊本·白图泰（1304～1368/1369），中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他曾在摩洛哥的丹吉尔受过传统的伊斯兰法律和文学教育。1325年到麦加朝觐后，他决定尽可能地走访世界各地，而且发誓“不走回头路”。他用了27年时间漫游非洲、亚洲和欧洲各地，总旅程长达12万千米。在返回后，他口述撰写了回忆录《游记》，该书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旅行著作之一。

[33] quoted Mackintosh-Smith，Tim，*Travels with a Tangerine* ，London，2001，p.290

[34] quoted Wittek，Paul，*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1963，p.15

[35] quoted Wittek，Paul，*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1963，

p.14

[36] 土耳其欧洲部分的海港城市，今称盖利博卢。它位于一个狭长半岛上，达达尼尔海峡经此通往马尔马拉海，东北方就是伊斯坦布尔。加里波利最初为希腊殖民地，后成为拜占庭要塞，1356年前后成为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第一个征服地。它是防卫伊斯坦布尔的战略要地，被用作海军基地。

[37] 即《摩西五经》。“托拉”是犹太教名词，指上帝启示给以色列人的真道。狭义上专指《旧约》的首五卷：《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与《申命记》。传统看法认为《托拉》是摩西所著，但研究旧约的学者认为它是在远晚于摩西的时期被编写完成的，很有可能是在公元前9世纪到前5世纪，尽管它引用了更为久远的传统典籍。在犹太教中，“托拉”也常用来指全部希伯来圣经（即基督教《旧约》的全部）。从更广义上讲，这一术语也指犹太教的宗教文献和口头圣传。

[38] quoted Wittek，Paul，*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London，1963，p.14

[39] 今称费奥多西亚，位于乌克兰南部、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1347年，蒙古人的金帐汗国围攻卡法，蒙古人把鼠疫病人的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卡法城，后来一名热那亚商人把鼠疫带回意大利，从而引发欧洲黑死病的大爆发。

[40] 又名佩德罗·塔富尔（约1410～1484），西班牙旅行家和作家。他在1436～1439年间游历了欧亚非三大陆，到过摩洛哥、耶路撒冷、拜占庭、特拉布宗、埃及、罗得岛等地，并撰写了游记。

[41] Tafur，Pero，*Travels and Adventures*，*1435-1439*，trans. Malcolm Letts，London，1926，p.146

[42] Mihailovich，Konstantin，*Memoirs of a Janissary*，trans. Benjamin Stolz，Ann Arbor，1975，pp.1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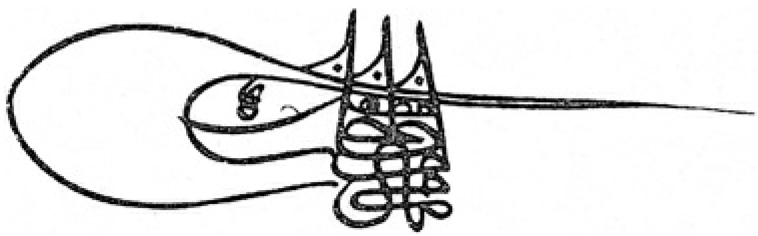
[43] 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基里埃（约1400～1459），勃艮第骑士和旅行家。1432～1433年，他前往耶路撒冷朝觐，游历了拜占庭、匈牙利等地，并写下了一部游记。

[44] Broquière，Bertrandon de la，in *Early Travels in Palestine*，ed. T. Wright，London，1848，pp.362-5

[45] 即曼努埃尔二世·帕里奥洛格斯（1350～1425，1391～1425在位）。

3.苏丹和皇帝

1432～1451年



穆罕默德·切列比，苏丹，愿真主保佑他的权威永固，加强他的力量直到最终审判日！[1]

——穆罕默德二世母亲的墓志铭

君士坦丁·帕里奥洛格斯，信奉基督的真正皇帝和罗马人的君主。

——君士坦丁十一世、第八十八位拜占庭皇帝的正式头衔

君士坦丁堡命中注定的克星出生于穆拉德二世攻城后的第十个年头，他将收紧君士坦丁堡脖子上的穆斯林绞索。根据土耳其传说，1432年是充满了预兆的年份。这一年，很多母马生了孪生马驹；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正午时分，君士坦丁堡上空有长尾巴的彗星掠过。3月29日夜间，苏丹穆拉德二世正在埃迪尔内的皇宫内等待孩子降生的消息。他无法入眠，于是开始阅读《古兰经》。他刚读到《胜利章》（这是许诺穆斯林将战胜异教徒的诗节），一名信使送来喜讯：生了个男孩。这个孩子被命名为穆罕默德，那是穆拉德二世父亲的名字，也是伊斯兰教先知的名字。

和很多其他预言一样，这个关于穆罕默德的预言同样也带有事后捏

造的成分。穆罕默德是穆拉德二世的第三子；他的两个异母兄长年纪都比他大不少，而且穆罕默德从来就不是最受宠的皇子。他长大成人、登基为苏丹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关于穆罕默德的出世，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母亲的身份扑朔迷离。虽然有些土耳其史学家声称她是个纯血统的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但她很有可能其实是个来自西方的奴隶，在边疆劫掠中被俘或者被海盗绑架；她可能是个塞尔维亚人或马其顿人，极有可能生来是个基督徒——这种可能性让穆罕默德矛盾的性格显得更加奇怪。不管穆罕默德的基因是如何混杂，他的秉性与父亲穆拉德二世迥然不同。

到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苏丹们早已不是大字不识一个、骑在马背上打天下的部落领袖。追求圣战和战利品的澎湃激情已经让位于冷静的深谋远虑。苏丹仍然享有伊斯兰土地上最伟大圣战领袖的崇高威望，但这越来越变成皇朝政治的工具。奥斯曼统治者们现在自称“罗马的苏丹”，这个头衔对古老基督教帝国的遗产提出了主权要求；或者自称“帕迪沙阿[2]”，这是一个非常高雅的波斯词语。他们效法拜占庭人，越来越喜欢张扬皇室威严的礼节和仪式；皇子们受到良好教育，为执掌权柄做准备；皇宫有高墙围绕；人们和苏丹的直接接触受到严格管理。由于害怕下毒、阴谋和行刺，统治者和臣民越来越隔阂。1389年的第一次科索沃战役之后，穆拉德一世被一个塞尔维亚使节刺杀，此后苏丹们就越来越远离普通人的视野。穆拉德二世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签名时仍然自称“贝伊”（这是突厥贵族的古老称谓），而不是更尊贵的“苏丹”；他很受民众爱戴。匈牙利僧侣乔治对他的朴素颇感意外：“苏丹的服饰和马匹没有任何特别的标记让他与众不同。在他母亲的葬礼上，我对他作了观察。如果不是有人把他指出来的话，我绝对无法认出谁是苏丹。”[3] 与此同时，苏丹和外界之间开始拉开了距离。“他在公共场合从不饮食，”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基里埃写道，“很少有人能夸耀说，自己曾经看见苏丹说话，或者看见他吃喝。”[4] 后续的苏丹们渐渐退居托普卡帕宫[5]，在高高的宫墙和复杂的礼仪包围下，过着隐士

般与世隔绝的生活。

奥斯曼宫廷冷酷的气氛影响了穆罕默德二世的童年。皇位继承的问题给皇子们的抚养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子承父位的直接继承对帝国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后宫制度保障了足够数量的男童，以维持皇室的延续——却也构成了帝国最大的弱点。皇子们互相竞争，争夺皇位的继承权。奥斯曼人并没有规定长子继承的法律；老苏丹驾崩时，皇子们需要通过斗争来决定帝国的归属。这场斗争的结局被认为是真主的意愿。“如果真主决定，我死后由你继承皇位，”后来有一位苏丹这样写信给自己的儿子，“没有任何活人能够阻碍。”[6] 在现实中，继承皇位常常变成奔赴帝都中心的竞赛，最先抵达的胜利者就能控制都城和金库，获得军队的支持；这种继承制度要么能够保证适者生存，要么就会导致内战。15世纪初，由于皇子们争夺权力、互相残杀，再加上拜占庭人在这场斗争中插了一手，奥斯曼国家险些垮台。利用奥斯曼帝国最脆弱的时刻支持奥斯曼皇位的竞争者和争夺者，几乎成了君士坦丁堡的基本国策。

为了保护皇子们免遭先发制人的打击，同时也传授他们治国之道，苏丹们在诸位皇子非常年幼时就将他们送离京城，去治理行省，并仔细挑选教师来监督他们。穆罕默德人生的最初岁月在埃迪尔内的后宫度过，但两岁时就被送往安纳托利亚的区域首府阿马西亚，准备早早开始接受国君的教育。他的长兄艾哈迈德当时12岁，被任命为阿马西亚总督。在随后的10年中，黑暗的力量始终伴随着这两位皇子，直至登上王座。1437年，艾哈迈德突然在阿马西亚病逝。6年后，当穆罕默德的另外一位异母兄阿里成为阿马西亚总督时，城里上演了奥斯曼版本的“塔楼内的王子”[7] 的神秘惨剧。一位重要贵族卡拉·赫兹尔帕夏被神秘人物派遣到这座城市。他在夜间潜入宫殿，将阿里扼死在床上，并杀死了他的两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一夜之间，皇室的一整个支系就灰飞烟灭了。穆罕默德成了唯一的继承人。在这些晦暗不明事件的背后像黑影一

般涌动的，是奥斯曼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的权力斗争。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加强了由奴隶组成的近卫军，并将一些前基督徒提升为维齐尔[8]，意在建立一支足以与传统的土耳其贵族和陆军抗衡的力量。这场内斗将于9年后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下落幕。

阿里是穆拉德二世最宠爱的儿子，他的死让苏丹万分悲痛。但有人说是穆拉德二世发现阿里在搞阴谋诡计，于是自己下令将他处死，这也并非绝不可能。但他意识到，现在别无他法，只能将年轻的穆罕默德召回埃迪尔内，亲自对他进行教导。此时，11岁的穆罕默德代表了奥斯曼皇朝唯一的未来。穆拉德二世再次看到儿子时十分震惊。穆罕默德生性执拗、任性，听不进任何说教。穆罕默德曾经公开和先前的教师作对，拒绝接受处罚，也不肯学习《古兰经》。穆拉德二世招来了著名的毛拉——艾哈迈德·古拉尼，命令他严厉管教年轻的皇子，使他屈服。毛拉手持用来体罚的棍棒去见皇子。“您的父皇，”他说，“让我来教育您，但如果您不听话，也要处罚您。”[9]穆罕默德听到这威胁不禁放声大笑，于是毛拉把他狠揍了一顿。穆罕默德迅速屈服，开始乖乖地学习。在这位铁腕教师指导下，穆罕默德开始努力学习《古兰经》，然后是更大范围的其他知识。事实证明，这个少年聪颖过人，而且具有非成功不可的钢铁意志。他精通多种语言，根据各方面的记载，他通晓土耳其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还会说希腊语、一种斯拉夫方言和一些拉丁语；他还非常热衷于历史、地理、科学、实用工程学和文学。他的独特个性使他崭露头角。

15世纪40年代，奥斯曼帝国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时刻。在安纳托利亚，一个土库曼人附庸——卡拉曼[10]贝伊正在兴风作浪；与此同时，在西方，匈牙利人正在准备新的十字军东征。穆拉德二世通过一项10年的和约消除了基督教的威胁，然后前往安纳托利亚，去处置棘手的卡拉曼贝伊。他出征之前，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退位了。他害怕发生内战，因此希望在自己去世前就巩固穆罕默德的地位。心力交瘁、看

破红尘或许也是他退位的原因之一。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负担是沉重的，穆拉德二世或许因为心爱的儿子阿里被杀害而沮丧。在埃迪尔内，12岁的穆罕默德在值得信赖的首席大臣哈利勒辅佐下登上了苏丹皇位，史称穆罕默德二世。根据苏丹的特权，从此货币上铸有他的名字，人们在每周的祈祷中也会为他祈福。

穆拉德二世的这个试验酿成了灾难。乳臭未干的年轻苏丹是一个不可抵御的诱惑，教皇立即特许匈牙利国王瓦迪斯瓦夫三世[11]解除与奥斯曼帝国的和约，于是新的十字军大举出动了。9月，十字军渡过了多瑙河；一支威尼斯舰队受命前往达达尼尔海峡，阻挡穆拉德二世返回。埃迪尔内城内颇为动荡。1444年，一个属于什叶派异端的宗教狂人出现在城内。人们蜂拥而至，听取这位波斯传教者的教导；他许诺能弥合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仇隙。穆罕默德二世本人也被他的教导吸引，欢迎此人进入自己的宫廷。宗教当局震惊了，群众对这个异端分子的热情支持也让哈利勒感到惊恐。当局尝试将此人逮捕。当这个传教者寻求宫廷庇护时，哈利勒不得不努力说服穆罕默德二世，将此人交出。他最终被拖到公共祈祷场所，被活活烧死。他的信徒惨遭屠杀。拜占庭人也决定好好利用一下这个混乱局面。先前有一位争夺奥斯曼帝国皇位的奥尔汗王子被拜占庭人关押在监牢内。现在拜占庭人将他释放，让他在奥斯曼帝国煽动反叛。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行省也发生了起义。埃迪尔内城内一片恐慌；城市的一大部分被烧毁，土耳其穆斯林开始逃回安纳托利亚。穆罕默德二世的统治陷入一片混乱。

与此同时，穆拉德二世与卡拉曼贝伊通过谈判达成了和约，匆匆赶回都城，去面对威胁。威尼斯战船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但威尼斯人的竞争对手——热那亚人以每人1杜卡特[12]的高价让穆拉德二世和他的大军渡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穆拉德二世随后快速进军，于1444年11月10日在黑海岸边的瓦尔纳[13]迎战十字军。奥斯曼军队在此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瓦迪斯瓦夫三世的头颅被插在枪尖上送往古老的奥斯曼城市布尔

萨，作为穆斯林得胜的凯旋标志。这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圣战的一个重要时刻。在瓦尔纳的战败使得西方在350年的十字军东征之后彻底丧失了东征的胃口。从此以后，基督教世界再也没有做过团结一致将穆斯林逐出欧洲的努力。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得以确立，君士坦丁堡彻底成为被伊斯兰世界包围的孤立飞地。这样的局面让君士坦丁堡在面临奥斯曼帝国的攻击时难以得到西方的支援。更糟糕的是，穆拉德二世把1444年的混乱归咎于拜占庭人。他的这种观点将很快影响奥斯曼帝国的战略。

瓦尔纳战役之后不久，尽管穆罕默德二世的早期统治是失败的，穆拉德二世还是返回了安纳托利亚。哈利勒帕夏仍然担任首席大臣，但对穆罕默德二世影响更大的是他的两位重臣：宦官总管谢哈布丁帕夏（同时担任欧洲诸行省总督）和一个强有力的前基督徒——扎甘帕夏。这两人都主张把攻打君士坦丁堡的筹划工作继续下去，因为他们知道，觊觎皇位者奥尔汗仍然躲在君士坦丁堡；占领这座城市将巩固穆罕默德二世的统治，并给年轻的苏丹带来无与伦比的个人威望。很显然，甚至在幼年，穆罕默德二世就已经被攻占这座基督教城市、成为罗马帝国继承人的计划深深吸引。在一首诗中，他如此写道："我最热切的愿望是消灭异教徒。"[14] 但穆罕默德二世对君士坦丁堡的渴望既是帝国霸业的体现，也带有宗教意义，同时还有一个非伊斯兰教的来源，这一点倒很令人意外。他对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恺撒的丰功伟绩无比神往。中世纪的波斯和土耳其史诗已经把亚历山大改造成伊斯兰英雄。穆罕默德二世应当从孩提时期就熟知亚历山大的业绩；在宫中，每天他都命人为他朗读罗马作家阿利安[15] 用希腊文写的世界征服者亚历山大的传记。在这些影响之下，他自视拥有两个身份：既是穆斯林的亚历山大，必将征服天下，直至世界边缘；也是征讨异教徒的圣战领袖。他决意逆转世界历史的方向：亚历山大向东征伐，他则要征服西方，给东方和伊斯兰带来荣耀。这是个醉人的梦想，受到谋臣们的激励；这些谋臣看到，征服的浪潮将对他们的个人晋升大有帮助。

早在1445年，早慧的穆罕默德二世就在导师们的支持下开始制订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此时他只有13岁。哈利勒帕夏对此颇感惊恐。他不赞成年轻苏丹的计划。在1444年的乱局之后，他担心新的军事行动会招致更多灾难。奥斯曼帝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由于内战险些崩溃的历史在人们的记忆里还很清晰；而且哈利勒和很多人一样，担心全力进攻君士坦丁堡会促使西方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采取大规模反制措施。他反对战争也有一份私心：他担心，好战的前基督徒们发动新的战争，会损害他自己，以及传统的穆斯林—土耳其贵族的权力。他决定唆使近卫军叛变，借此废黜穆罕默德二世，并请求穆拉德二世返回埃迪尔内，再度掌权。果然，穆拉德二世返回都城时受到了热烈欢迎。高傲而冷漠的年轻苏丹并不受人民和近卫军的爱戴。穆罕默德二世带着他的谋臣隐居到了马尼萨[16]。这是一个可耻的挫折，他永远不会忘记，更不会原谅。将来有一天，哈利勒将因此丢掉性命。

在穆拉德二世的余生，穆罕默德二世一直生活在父皇的阴影之下，尽管他继续以苏丹自诩。1448年，他陪伴父皇参加了第二次科索沃战役，匈牙利人在这里做出了最后一次挫败奥斯曼帝国的努力。穆罕默德二世在此接受了战火的洗礼。奥斯曼军队虽然损失很重，但再次取得了一次像瓦尔纳战役一样的决定性胜利，并进一步强化了奥斯曼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忧郁的悲观情绪开始在西方蔓延。“土耳其人的战术远胜于我们的战术，”近卫军战士米哈伊尔写道，“如果你追击他，他就逃跑；如果他追击你，你是逃不掉的……鞑靼人曾多次击败土耳其人，但基督徒屡战屡败，尤其是在正面交锋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未能阻止土耳其人包围他们并从侧面进攻。”[17]

穆拉德二世的最后岁月是在埃迪尔内度过的。老苏丹似乎已经对新的军事冒险失去了兴趣，更喜欢和平和稳定，拒绝战争的不确定性。他在世的时候，君士坦丁堡虽然心惊胆战，但还享受着和平；1451年2月，穆拉德二世去世之时，朋友和敌人都同样哀悼他。希腊史学家杜卡

斯[18] 宣称："那些凭借神圣誓言与基督徒签订的协议，他是始终恪守的。他的愤怒都是短暂的。他厌恶战争，热爱和平，因此和平的天父赐给他平静的死亡，而不是让他死于刀剑。"[19] 假如这位希腊史学家得知穆拉德二世给他的继承人留下的建议，就一定不会这么满口溢美之词了。15世纪40年代拜占庭对奥斯曼帝国内战的干涉让穆拉德二世确信，只要君士坦丁堡还是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一块基督教飞地，帝国就永远不能稳固。"他给卓越的继承者留下的遗产是，"奥斯曼史学家萨阿德丁[20] 写道，"树立起圣战的大旗，目标是占领那座城市……有了那城市，他就能保护伊斯兰人民的繁荣，打断可悲的异教徒的脊梁。"[21]

苏丹的驾崩对奥斯曼国家来说永远是个危险时刻。根据传统，而且为了阻止任何武装反叛，苏丹驾崩的消息被严格保密。穆拉德二世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叫小艾哈迈德的婴儿，他对穆罕默德二世的继承没有直接威胁，但觊觎皇位者奥尔汗还在君士坦丁堡，而且穆罕默德二世并不受民众欢迎。苏丹驾崩的消息被装在密封的信封内，快马加鞭地送给穆罕默德二世。哈利勒在这封信中建议穆罕默德二世不要耽搁，务必火速抵达埃迪尔内，任何延误都有可能导致叛乱。根据传说，穆罕默德二世收到信后立即命人备马，并向侍从们说道："爱我的人，都跟我来。"在家丁家将的陪伴下，他仅花了两天时间就渡海抵达了加里波利。他纵马穿过大平原前往埃迪尔内的路上遇见了一大群官员、维齐尔、毛拉、总督和平民，这些人前来恭迎他的驾到，这种风俗可以一直追溯到突厥部落在亚洲大草原的时候。欢迎的人群离穆罕默德二世的队伍还有1英里时，就下了马，在一片死寂中徒步走向他们的新主子。离穆罕默德二世的队伍还有半英里时，人群开始号啕大哭，哀悼驾崩的老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侍从们跳下马，加入了哭丧的人群。冬季的土地上回荡着悲戚的哭喊。主要官员向新苏丹鞠躬，然后所有人重新上马，继续向皇宫前进。

次日，文武百官正式觐见新苏丹。这是个气氛紧张的场合，老苏丹

的维齐尔们将听候命运的发落。穆罕默德二世端坐在宝座上，两侧站立着深受信赖的谋臣们。哈利勒帕夏躲在后面，等着看穆罕默德二世会如何决断。少年苏丹说道："我父皇的维齐尔们为何不上前？叫他们近前来，让哈利勒到他惯常的位置上去。"[22] 哈利勒恢复了首席大臣的职位。这是穆罕默德二世的典型决策：先维持原状，同时暗自酝酿计划，等待时机。

新苏丹年仅19岁，既满怀自信，又踌躇徘徊；既野心勃勃，又生性内敛。他的幼年经历显然对他影响极大。他很可能在非常幼小的时候就与母亲分离，主要凭借运气才在奥斯曼宫廷的阴暗世界里生存下来。甚至在年轻的时候，他也深藏不露，对他人疑心很重；他独立、傲慢、缺乏人的温情，而且野心极大。他的性格充满了矛盾，错综复杂。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将他描绘为极度残忍和心理变态的怪物，他也的确是个秉性矛盾重重的人。他精明机敏，英勇无畏，极其冲动，诡计多端，擅长欺骗，有时是个残忍的暴君，有时却能做出令人意外的善举。他喜怒无常，无法预测；他是个双性恋，不肯与任何人结成亲密关系；他睚眦必报，但因为开创了很多虔诚的慈善事业而深受爱戴。他的性格已经成熟，一些关键特征显露出来：既是暴君，也是学者；既是热衷战争的军事战略家，也热爱波斯诗歌和园艺；既是后勤管理和实践筹划工作的专家，又极端迷信，需要宫廷星相家来帮他作军事上的抉择；虽然是伊斯兰的战士，但对非穆斯林臣民也慷慨仁慈；他还喜欢与外国人和离经叛道的宗教思想家做伴。

他一生不同阶段绘制的几幅肖像很可能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画像中最早的一批。从这些肖像可以看出一些一贯的特征：鹰隼一般的侧脸轮廓，鹰钩鼻突出在颇富肉感的嘴唇上方，"如同鹦鹉的喙停歇在樱桃上"[23] （这是一位奥斯曼诗人写下的令人难忘的诗句），突出的下巴上覆盖着微红的胡须。在一幅风格化的细密画上，他用戴着珠宝的手指捏着一朵完整无缺的玫瑰，轻柔地将它拿到自己鼻子前。这是常规的表现手

法，把苏丹描绘为审美家、园艺爱好者和波斯四行诗作者，但画中的苏丹目光凝滞，似乎在眺望世界的尽头。在其他壮年时期的肖像中，他脖颈粗壮，非常富态；在贝利尼[24]创作的那副著名的晚期肖像（它今天悬挂在伦敦的国家画廊）中，他神色严峻、面带病容。所有这些画像都包含一份沉着的威严，因为他是“真主在人间的影子”，自然而然地掌控大权，世界自然而然地就在他手中，因此这算不得傲慢。但画中也有一种冷森森的忧郁，让人想起他冰冷而险象环生的童年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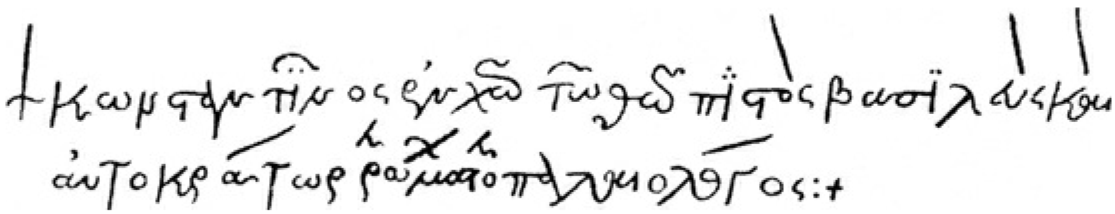
意大利人贾科莫·德·兰古斯琪对年纪轻轻就性格复杂的穆罕默德二世作了一番生动的描绘，与这些画像相得益彰：

> 统治者苏丹穆罕默德贝伊非常年轻……身材强健，体格魁梧，精通武艺，令人生畏的相貌难以让人心生敬意，很少有笑意，极其小心谨慎，非常慷慨大方，执行自己的计划时无比执拗，在所有事业中都大胆无畏，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样渴望荣耀。每天他都让人朗读罗马和其他国家的历史著作给他听。他会说三种语言：土耳其语、希腊语和斯拉夫语。他努力学习意大利的地理……了解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居于何处，以及欧洲有多少王国。他拥有一副欧洲地图，上面标注了各个国家和省份。他最热衷和喜爱的是世界地理和军事。他渴望统领天下；他审时度势，非常精明。我们基督徒要对付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宣布，他将从东方进军西方，就像西方人曾经向东方进军一样。他说，世界上应当只有一个帝国、一个信仰和一个君主。[25]

这生动鲜明地显示了穆罕默德二世的雄心壮志：他要举着伊斯兰的旗帜进入欧洲，逆转历史的大潮。但在他登基时，西方人总体来说还不了解他的野心和智慧。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乳臭未干、毫无经验的青年，其早年的统治以耻辱告终。

穆罕默德二世登基前两年，君士坦丁堡也迎来了一位新皇帝，尽管具体的情况大不相同。注定要在即将拉开大幕的斗争中与穆罕默德二世对抗的那个人与建城者同名——迷信的拜占庭人会很快注意到这一点。君士坦丁十一世是自1261年以来帕里奥洛格斯皇朝的第八位皇帝。这个

皇族是靠篡权上台的，在他们统治期间，拜占庭帝国不可阻挡地坠入混乱和纷争之中。皇帝本人具有非常典型的多民族背景。他说希腊语，但很难说他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是塞尔维亚人，君士坦丁十一世使用了她的娘家姓——德拉伽塞斯；他的父亲有一半的意大利血统。像所有拜占庭人一样，他自称为罗马人，并用先辈们骄傲而古老的头衔自诩："君士坦丁·帕里奥洛格斯，信奉基督的真正皇帝、罗马人的君主。"



君士坦丁十一世签名

这是个空洞的礼仪称号，但日渐衰落的拜占庭人就是这样对仪式和礼节体系死死抱住不放。皇帝属下有一位海军司令，但没有舰队；有一位陆军总司令，士兵却屈指可数。在宫廷的微型世界里，达官显贵们拼命争抢夸张得可笑的庄严头衔，比如内廷总管大臣、大法官或御橱总管。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确是一位没有权力的皇帝。他的帝国疆域已经缩减到只有都城和周围郊区、少数几个岛屿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若干领地。希腊人非常有诗意地将伯罗奔尼撒半岛称为摩里亚，即"桑树叶"。这座半岛的丝绸生产很有名，它的形状也很像蚕的食物。

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皇冠并不值得羡慕。他继承的是破产的国家财政、热衷内战的皇室、被宗教狂热分裂的城市和赤贫而动荡不安的贫民阶层。帝国是皇族内部自相残杀的毒蛇坑。1442年，他的兄弟德米特里引领奥斯曼军队进逼城市。拜占庭帝国作为奥斯曼皇帝的附庸苟延残喘，随时都可能遭到奥斯曼人的围攻。君士坦丁十一世个人的权威也并不十分稳固：他于1449年的登基有些不合常规。他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米斯特拉斯[26]登基的——这对一位皇帝来说是十分不寻常的——后来也从没有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过。拜占庭人不得不请求穆拉德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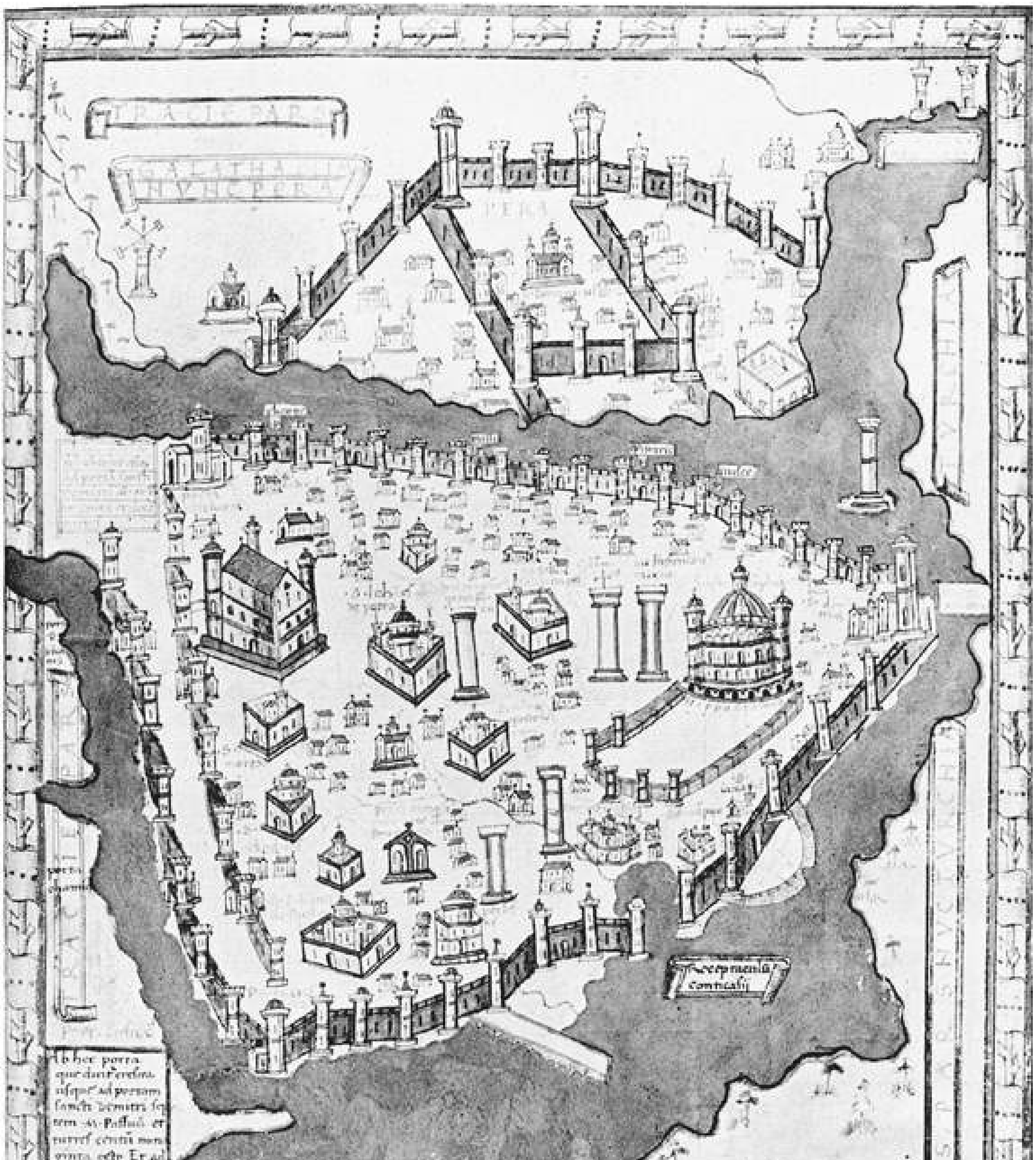
批准他们的新皇帝即位，却没钱送皇帝回家。他不得不忍辱负重，哀求一艘加泰罗尼亚船只送他到都城。

1449年3月，他返回了君士坦丁堡；对于都城当时的情况，没有同时期的记载流传下来。年代较早的一份意大利地图显示，君士坦丁堡城内有很多空地，而在金角湾对岸，热那亚的贸易殖民地加拉塔（或称佩拉）却一派欣欣向荣之景。旅行家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基里埃称："那是一座很大的城镇，居住着希腊人、犹太人和热那亚人。"[27] 他说加拉塔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港口。这位法兰西骑士认为君士坦丁堡颇具魅力，但破烂潦倒。教堂建筑群还是震撼人心的，尤其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他在那里参观了"圣劳伦斯[28] 在上面被烤死的烤架，以及一块形似脸盆架的巨石，据说天使在去毁灭索多玛与蛾摩拉的路上时，亚伯拉罕曾经在这块石头上请天使吃饭"。查士丁尼皇帝的骑马像（布罗基里埃误以为那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像）依然矗立："他左手执掌权杖，右手指向亚洲的土耳其和通往耶路撒冷之路的方向，似乎在显示，那片土地也是他的领地。"但真相是再明白不过的：拜占庭皇帝在自己家里也做不了主。

> 这座城市里到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商旅，其中最强大的是威尼斯人，他们有自己的市政官来管理自己的全部事务，完全独立于皇帝及其大臣。土耳其人也设立了一名官员来监管他们的贸易，和威尼斯人的市政官一样，也是独立于皇帝司法权的。他们甚至拥有这样的特权：如果他们的一名奴隶逃走，躲在城内，他们可以要求皇帝将逃奴交出，皇帝必须服从。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屈从于土耳其苏丹，因为我听说，他每年要向苏丹缴纳1万杜卡特的贡金。

德·拉·布罗基里埃注意到，城内到处是往昔辉煌的遗迹，最显眼的就是赛马场的三座空空如也的大理石基座："基座上曾经矗立的三匹镀金骏马像目前在威尼斯。"奥斯曼军队兵临城下似乎已经只是时间问题，老百姓很可能会主动开门献城。1430年，塞萨洛尼基[29] 拒绝向穆拉德二世俯首称臣，奥斯曼军队仅花了三个小时就冲上了城墙，随后对

这座城市蹂躏和洗劫达三天之久；7000名妇女儿童被贩卖为奴。这对君士坦丁堡人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一幅关于君士坦丁堡**15**世纪初面貌的意大利地图，描绘了陆墙外面巨大的护城

河，图的上方是加拉塔

我们对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相貌知之甚少。雕像上他的面部几乎是一片空白。他似乎继承了父皇曼努埃尔二世的端正面貌和仪态，但当时帝国内外交困，不曾雇佣艺术家为新皇帝留影。黄金国玺上的鹰隼般的清瘦头像也过于简略，不能说明什么。但各方面的记载对他的性格有着一致的描摹。在曼努埃尔二世的所有儿子当中，君士坦丁十一世是最精明强干和值得信赖的，“慈悲为怀，全无恶意”[30]，果断坚定、勇敢无畏，非常爱国。与他那些热衷于争吵、毫无原则的兄弟们不同，君士坦丁十一世非常坦诚直率；他似乎有一种魅力让身边的人都对他忠心耿耿。各方面的观察者都同意，他是个擅长行动的人，而不是一个技艺高超的管理者或有深度的思想家；他精通骑术和兵法，勇敢而有进取心。最重要的是，他面对挫折也坚忍不拔。他对拜占庭的遗产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一生都在努力挽救摇摇欲坠的帝国。

君士坦丁十一世比穆罕默德二世年长27岁，于1405年出生在君士坦丁堡。从其幼年经历来看，他应当对都城的困境心知肚明，不抱多少幻想。1422年，他17岁时经历了穆拉德二世对城市的围攻；次年，他的兄长约翰八世周游基督教列国，请求它们支援拜占庭的事业（这样的求援努力做过多次，但都徒劳无益），在此期间，他被任命为摄政王。1449年，他登基之时，已经44岁，经历了20年的戎马生涯。这段战争岁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努力恢复拜占庭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控制，有胜有败。到1430年，他肃清了外国人在半岛上建立的大部分小王国；15世纪40年代，作为摩里亚的统治者，他将伯罗奔尼撒的疆域推进到了希腊北部。对穆拉德二世来说，他一直是个刺儿头，一个桀骜不驯、需要好好教训的附庸。1446年，在瓦尔纳的十字军战役失败后，奥斯曼帝国做出了决定性的严惩。一支奥斯曼军队横扫摩里亚，将乡村彻底摧毁，将6万名希腊人贩卖为奴。君士坦丁被迫签订一项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向苏丹俯首称臣，并缴纳沉重的贡税。在希腊重振拜占庭帝国的事业失

败了，他的三个兄弟德米特里、托马斯和西奥多要么自私自利、卖国求荣，要么耽于争吵、优柔寡断，设法阻挠挽救帝国残余部分的事业；他却截然不同，仍然表现出昂扬的斗志、更高一筹的军事技巧和坦诚直率的性格。他们的母后海伦娜坚决支持君士坦丁对皇位的继承权：只有他有资格继承这份遗产。



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徽章

根据后来的拜占庭传说，君士坦丁十一世命途多舛。他在摩里亚的军事冒险虽然用意良好而且大胆无畏，但运气非常糟糕。在瓦尔纳的惨败之后，威尼斯舰队返航回乡，热那亚人没有兑现诺言前来援助，他仍然孤军奋战。但他的坚持不懈给希腊人民带来了相当大的苦难。他的私人生活同样不幸。他的第一位妻子于1429年去世，没有留下一男半女；第二位妻子于1442年去世。15世纪40年代末期，他多次努力与外国王室联姻，希望借此支撑起破碎的帝国，并有一位继承人延续皇族的香火。但在穆罕默德二世登基前夕政治气候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他的所有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1451年2月，穆罕默德二世住进了埃迪尔内的皇宫。他的第一个行动令人震惊，也极其果断。穆拉德二世驾崩后留下了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小艾哈迈德，即穆罕默德二世的异母弟。几天后，小艾哈迈德的母亲正式觐见新苏丹，表达对他父皇去世的缅怀。穆罕默德二世派遣一名宠臣阿里贝伊到后宫去，将小艾哈迈德溺死在浴缸内。第二天，他以谋杀罪将阿里贝伊处决，然后把那位伤心欲绝的母亲嫁给了一位贵族。这个残忍而精明的举动将奥斯曼宫廷的权力斗争推向了符合逻辑的结论：只有一个人能统治；为了避免分裂和内战，只有一个皇子能存活。对奥斯曼人来说，这比令拜占庭衰败不堪的无休无止的内战要强得多。穆罕默德二世一下子就澄清了奥斯曼帝国皇位继承的规则，后来还把这个兄弟相残的手段写进了法律："我的儿子中不论谁继承了苏丹皇位，为了世界秩序的利益考虑，他都应将他的兄弟处死。大多数法学家都对此表示认可。今后将按此执行。"[31] 从此以后，每位新苏丹登基之时，都将大开杀戒。这种残酷手段在1595年穆罕默德三世登基时达到了顶峰，当时这位新苏丹的十九位兄弟全部被处死。尽管如此，这种兄弟相残的法律未能阻止内战的爆发：受威胁的皇子们常常会先发制人地采取行动，穆罕默德二世本人就将受到这种悲剧的摧残。君士坦丁堡人应当从小艾哈迈德之死了解到穆罕默德二世的本性，但他们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

[1] quoted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Princeton，1978，p.59

[2] 波斯文中，"帕迪"意为"伟大"，"沙阿"意为"国王"。"帕迪沙阿"是波斯帝王的称号，后来奥斯曼帝国苏丹和莫卧儿帝国皇帝也使用这个头衔。

[3] quoted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Princeton，1978，p.418

[4] Broquière，Bertrandon de la，in *Early Travels in Palestine*，ed. T. Wright，London，1848，p.351

[5] 托普卡帕宫是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一座皇宫，1465～1853年一直是奥斯曼帝国苏丹在首都的官邸及主要居所，也是昔日举行国家仪式及皇室娱乐的场所，现今则是主要的观光胜地。“托普卡帕”的字面意思是“大炮之门”，昔日城堡内曾放置大炮，由此得名。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1459年下令动工兴建托普卡帕宫。

[6] quoted Inalcik，Halii，*Fatih Devri üzerinde Tetkikler and Vesikalar I*，Ankara，1987，p.59

[7] “塔楼内的王子”指的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儿子——爱德华（被加冕为爱德华五世）和理查（受封约克公爵）。爱德华四世去世时，这两位王子年仅12岁和9岁，由爱德华四世的弟弟理查（格洛斯特公爵）摄政。但这位摄政王随后攫取王位，史称理查三世，并将自己的两个侄子囚禁在伦敦塔。后来这两位王子就销声匿迹了。人们普遍相信，他们是被谋杀的。幕后元凶有可能是理查三世，但没有过硬的证据。这个谜团至今没有解开。

[8] 维齐尔最初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首席大臣或代表，后来指各伊斯兰国家的高级行政官员。维齐尔代表哈里发，后来代表苏丹，执行一切与臣民有关的事务。奥斯曼帝国把维齐尔的称号同时授给几个人。在奥斯曼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时代，称首席大臣为维齐尔，但加一“大”字。大维齐尔为苏丹的全权代表，下文中译为“首席大臣”。

[9] quoted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Princeton，1978，p.24

[10] 卡拉曼王朝是13世纪末至15世纪末土库曼人统治的一个国家，位于安纳托利亚中南部，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土耳其共和国的卡拉曼省。该国的统治者称号为“卡拉曼贝伊”，一度具有独立地位，1468年（穆罕默德二世在位时）被奥斯曼帝国吞并。本书故事发生的时候，执政的卡拉曼贝伊是易卜拉欣二世（在位：1424～1464）。

[11] （瓦尔纳的）瓦迪斯瓦夫三世（1424～1444），波兰国王（1434～1444年在位）和匈牙利国王（也称乌拉斯洛一世，1440～1444年在位），他因在瓦尔纳战役中阵亡，得到一个绰号“瓦尔纳的”。

[12] 杜卡特是欧洲历史上很多国家都使用过的一种金币，币值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差别很大。

[13] 今属保加利亚。

[14] Granville Browne，E.（ed.），*A History of Ottoman Poetry*，London，1904，vol.2

[15] 阿利安（86～146），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史学家和哲学家，出身于尼科米底亚，曾在罗马军队服役。在罗马皇帝哈德良在位期间，阿利安曾担任卡帕多细亚总督，并于公元147年担任雅典的执政官。阿利安在退休后专注于文学研究，著有一部描述亚历山大大帝功勋的《远征记》与描述军官尼阿卡斯跟随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的著作。

[16] 在今天的土耳其西部，也是同名省份的首府。

[17] Mihailovich，Konstantin，*Memoirs of a Janissary*，trans. Benjamin Stolz，Ann Arbor，1975，p.171

[18] 杜卡斯（约1400～1462），拜占庭史学家。他对拜占庭帝国最后几十年以及君士坦丁堡陷落的记载是这段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他坚决主张拜占庭与西方联合。

[19]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28

[20] 即霍加·萨阿德丁·埃芬迪（1536或1537～1599），奥斯曼帝国学者、官员与史学家。他曾是苏丹穆拉德三世年幼时的教师，著有奥斯曼帝国历史《历史的皇冠》。

[21] Khoja Sa'd-ud-din，*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trans. E. J. W. Gibb，Glasgow，1879，p.41

[22]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27

[23] quoted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Princeton，1978，p.424

[24] 真蒂莱·贝利尼（1429～1507），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艺术家，以其关于宗教的画作而闻名。他曾在拜占庭帝国宫廷中工作过3年。1479～1481年，他为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画像。这幅画在19世纪被修复；画家的姓名是后来被写上去的，因此无法确定原画家就是真蒂莱·贝利尼本人。

[25] quoted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Princeton，1978，p.112

[26]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城市，十字军曾在此建有城堡。

[27] Broquière，Bertrandon de la，in *Early Travels in Palestine*，ed. T. Wright，London，1848，pp.335-41

[28] 圣劳伦斯（？～258），罗马殉道士。在教皇圣西克斯图斯二世时期，他是罗马的七个助祭之一。在罗马皇帝瓦莱里安迫害基督教、处死圣西克斯图斯二世后，罗马当局要劳伦斯把各教堂的财富交给国家。他反而把钱散发给穷人，为此被判死刑。他临刑前的大无畏精神感召了许多人改信基督教。根据一种传说，他是被放在烤架上烤死的，他对刽子手们说："我的那一侧烤好了，把我翻过来，吃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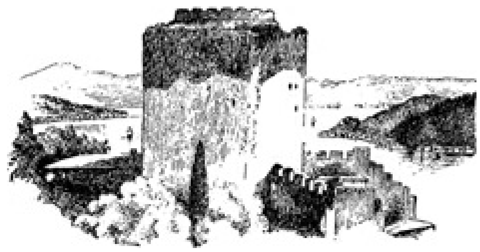
[29] 又称萨洛尼卡，希腊马其顿地区海港城市。

[30]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67

[31] quoted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Princeton，1978，p.47

4.割断喉咙

1451年2月～1452年11月



博斯普鲁斯海峡用一把钥匙开启和封闭两个世界、两片大海。[1]

——皮埃尔·吉勒[2]，16世纪法兰西学者

穆拉德二世的去世让整个西方世界长舒了一口气。在威尼斯、罗马、热那亚和巴黎，人们都过于轻信意大利人弗朗切斯科·菲莱尔福在穆拉德二世驾崩一个月后写给法兰西国王查理七世的信中的描述：穆罕默德二世年幼无知、缺乏经验、头脑简单。菲莱尔福得出的结论是，发动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将奥斯曼人“这群腐化败坏的奴隶”[3]彻底逐出欧洲的时机业已成熟。欧洲君主们或许对他的这个结论不是很感兴趣。1444年在瓦尔纳的血腥惨败已经完全败坏了欧洲人在近期发动十字军东征的胃口。欧洲君主们对乳臭未干的穆罕默德二世登基表示欢迎，却不知这预示着怎样的灾难。

更熟悉苏丹的人就乐观不起来了。穆拉德二世去世时，君士坦丁十一世最信赖的大使乔治·斯弗朗齐斯[4]已经从格鲁吉亚国王的宫廷出发，正要穿过黑海去拜见特拉布宗[5]皇帝。他在进行一连串无休止的外交活动，希望为鳏夫君士坦丁十一世寻找一门合适的亲事，借此改善他

内外交困的处境、获得一名继承人，同时获取一笔嫁妆来填充他的金库。在特拉布宗，皇帝约翰·科穆宁欢欣鼓舞地将穆罕默德二世登基的消息告诉了斯弗朗齐斯：“来吧，大使阁下，我有喜讯与您分享。您一定要祝贺我。”斯弗朗齐斯的回应令人震惊：“这消息让我万分悲痛，就好像听到了我最亲近的人的死讯，我哑口无言地站在那里。最后，我颇为沮丧地说：‘陛下，这消息没有带来任何喜悦；恰恰相反，它令人万般悲痛。’”随后斯弗朗齐斯阐述了他对穆罕默德二世的了解：新苏丹“自幼就是基督徒的死敌”[6]，热衷于攻打君士坦丁堡。另外，君士坦丁十一世缺少资金，需要维持一段时间的和平稳定，以挽救城市的财政。

君士坦丁堡方面匆匆派出使节前往埃迪尔内，向年轻的苏丹致意并寻求安全的保障。使节们受到的接待让他们又惊又喜。穆罕默德二世非常通情达理。据说，他以先知、《古兰经》“和天使与诸大天使的名义起誓，他将与君士坦丁堡和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永结盟好”[7]。他甚至从斯特鲁马下游河谷一些希腊城镇的税收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年金赠给拜占庭人，尽管这些地区在法律上属于觊觎皇位的奥尔汗王子。这些金钱将用来供养仍然被扣押在君士坦丁堡的奥尔汗。

纷至沓来的使节们都得到了和平的保证。9月，在埃迪尔内有商业利益的威尼斯人与穆罕默德二世再次缔结和约；同时，奥斯曼人将塞尔维亚君主杜拉德·布兰科维奇的女儿（她先前嫁给了穆拉德二世）以及一些城镇归还给了他，对他做了一番安抚。穆罕默德二世还请求布兰科维奇牵线搭桥，与匈牙利人缔结和约。匈牙利的卓越领袖匈雅提·亚诺什摄政王是基督教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最大威胁。匈雅提需要粉碎匈牙利国内的一些阴谋，因此很乐意与苏丹缔结为期三年的和约。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希俄斯岛[8]、莱斯博斯岛和罗得岛的诸领主，以及特拉布宗、瓦拉几亚[9]和拉古萨[10]（杜布罗夫尼克）派出的使节都得到了和平的保障，而且条件合情合理。到1451年秋季，西方世界已经普遍认

为，穆罕默德二世被他的温和的维齐尔——哈利勒帕夏牢牢掌控在手心里，对任何人都不会构成威胁。在君士坦丁堡，很多不像斯弗朗齐斯那么谨慎或者有经验的人似乎也同样被蒙蔽了。基督教世界的君主们都乐于相信，一切正常。穆罕默德二世非常小心地隐藏着自己的真实意图。

并不是只有基督徒误读了穆罕默德二世的人格力量。1451年秋季，难以驾驭的卡拉曼贝伊再次试图从奥斯曼帝国控制下夺回安纳托利亚西部的领土。他占领了一些要塞，重新任命了部族领袖，并入侵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二世派遣将领去镇压此次叛乱，在埃迪尔内缔结了各项和约后，亲临前线，当即产生了极大影响。叛乱被迅速粉碎，穆罕默德二世班师回朝。在布尔萨，他遇到了新一轮的挑战，这一次闹事的是他自己的近卫军。“他们站在道路两侧，全副武装，站成两排，向他呼喊：‘这是我们的苏丹的第一次战役，他应当按惯例赏赐我们。’在这样的局面下，他不得不让步。十麻袋的钱币被分发给哗变的士兵。但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这是一场关系重大的意志的考验，他决心非赢不可。几天后，他召集了近卫军统领，对他严词斥责，削去他的官职；多名军官遭到类似的惩罚。”[11] 这是穆罕默德二世经历的第二次反叛。他认识到，如果要成功占领君士坦丁堡，首先必须保证近卫军的绝对忠诚。于是他对近卫军进行了改组；他将自己的7000名亲兵补充到近卫军队伍里，并任命了一位新统领。

就在此时，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谋臣们开始了他们自己的行动，这恰恰说明他们对穆罕默德二世的理解是多么贫乏。除苏丹本人之外唯一对奥斯曼皇位提出要求的人——奥尔汗王子住在君士坦丁堡，供养他所需的经费来自夏季与苏丹商定的税收。拜占庭人派遣大使去布尔萨与哈利勒会面，提出了一个专断的要求：

> 罗马人的皇帝不接受30万阿斯普尔[12] 的年金。因为，与阁下的主公同为奥斯曼后裔的奥尔汗现已成年。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到他身边，奉他为主公和领袖。他本人没有财力对追随者慷慨赏赐，因此他请求

> 皇帝帮助。但皇帝也缺乏资金，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因此我们有两个请求供您选择：将年金翻倍；否则我们就将释放奥尔汗。[13]

言外之意是再清楚不过的：如果年轻的苏丹不肯掏腰包，就将有一个皇位竞争者自由活动，在奥斯曼帝国煽动内战。

这是一个经典的计谋。在拜占庭历史上，对邻国的王朝继承权之争加以利用一直是拜占庭外交政策的基石。这项政策常常能够弥补军事上的弱势，但拜占庭因此得到了阴险狡诈的恶名，这个臭名不值得羡慕也无人可比。在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父亲曼努埃尔二世在位期间，奥斯曼人就已经吃过这条计谋的亏，当时曼努埃尔二世狡猾地推动奥斯曼帝国的内战，导致奥斯曼帝国险些垮台，穆罕默德二世对此事是非常清楚的。君士坦丁十一世显然把奥尔汗看作一张王牌（或许也是他的最后一张牌），决定对其善加利用。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是个弥天大错，也几乎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宫中毕竟还有斯弗朗齐斯这样经验丰富、对奥斯曼宫廷政治相当了解的外交官。或许，君士坦丁十一世如此决断，主要是因为帝国财政已经山穷水尽，而不是因为他真的指望能够借此煽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争斗。无论如何，这使得奥斯曼宫廷的主战派更加坚信，必须占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人的这个提议几乎是刻意要破坏哈利勒维持和平的努力，并且危及了哈利勒自己的地位。年迈的维齐尔大发雷霆：

> 你们这些愚蠢的希腊人，你们的刁滑已经让我受够了。已故的苏丹对你们宽大为怀，是你们的真诚朋友。现在的苏丹可不是那样的。如果君士坦丁十一世目前还没有被苏丹大胆而威严的铁手抓住，那仅仅是因为真主仍然对你们的奸诈和邪恶计划视而不见。你们如果以为凭借这些妄想就能吓倒我们，只能说明你们自己的愚蠢。况且我们最近缔结的和约墨迹未干。我们可不是没有力量或者没有理智的孩童。如果你们自认为能耍什么把戏，就去耍吧。如果你们想在色雷斯推举奥尔汗为苏丹，悉听尊便。如果你们想把匈牙利人带过多瑙河，就让他们尽管来好了。如果你们想收复早就丢失的领地，那就尽管尝试吧。但一定要知道：你们在这些事情上都不会取得任何进展，只会丢掉现在还有的那么一点点东西。[14]

穆罕默德二世听到拜占庭人的提议时面无表情。他“和蔼可亲”地让使臣离去，许诺在返回埃迪尔内之后会斟酌此事。君士坦丁十一世给了他一个非常珍贵的撕毁和约的借口，时机成熟时就可以使用。

在返回埃迪尔内的途中，穆罕默德二世发现，根本无法像他预想的那样渡海前往加里波利。达达尼尔海峡被意大利船只封锁了。于是，他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北上，来到安纳托利亚堡垒。他的曾祖父巴耶济德一世在1395年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建造了这座要塞。在这里，分隔亚洲和欧洲的海峡只有700码宽，是渡过海流汹涌、险象环生的海峡的最佳地点，2000年前的古代波斯国王大流士对此了然于胸，曾在此处用船只连接作为桥梁，让他的70万大军通过。穆罕默德二世的小型舰队在海峡上来回穿梭，将士兵运往欧洲时，他的足智多谋的头脑审视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似乎已经有了几个结论。海峡对奥斯曼军队来说是个脆弱地域：如果不能保障欧亚之间的通航，就不可能稳固地统治这两大洲；同时，如果他能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就能切断从黑海上的希腊殖民地通往君士坦丁堡的粮食和援兵补给线，并剥夺该城从航运获得的海关税收。他设想在欧洲海岸、属于拜占庭人的土地上建造第二座要塞，以控制海峡，“封锁异教徒船只的航道”[15]。同时他很可能也认识到，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以对抗占据海上优势的基督徒。

返回埃迪尔内之后，他立刻开始处置拜占庭人提出的最后通牒，没收斯特鲁马河城镇的税收（这些款项原定用于供养奥尔汗），并将希腊人从这一地区逐出。君士坦丁十一世或许已经能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他于1451年派遣一名使节前往意大利，此人先去了威尼斯，希望能从威尼斯人的殖民地克里特招募弓箭手；然后使节又去了罗马，给教皇送去书信。君士坦丁十一世很有可能仍然希望能够对新苏丹发起积极主动的攻势。他发送给意大利各城邦的信件中并没有显现出形势已经十万火急。

1451年的冬天快到了，穆罕默德二世在埃迪尔内一刻不停地制订计

划。他身边聚集着一大群西方人，尤其是意大利人。他和他们讨论古典时代的伟大英雄亚历山大和恺撒，这两人是他为自己选定的榜样。他对秋季发生在布尔萨的近卫军哗变还记忆犹新，于是对军队和政府机构作了进一步改革。他为某些行省任命了新的总督，增加了皇宫卫队的军饷，并开始储存武器装备和给养。他可能还启动了造船的计划。同时，建造新要塞的计划也在他脑中渐渐成形。第二年春天，他从帝国的各个行省征募了成千上万的石匠、劳工和烧窑工人，并安排建材——“石料、木材、铁和所有有用的物资”[16]——的收集和运输……“用来在君士坦丁堡以北的神圣河口建造一座新城堡”[17]，也就是已经废弃的圣米迦勒教堂附近。

苏丹大兴土木的命令迅速传到了君士坦丁堡、黑海上的希腊殖民地以及爱琴海诸岛屿。人们陷入深深的悲观情绪之中；他们又记起了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现在你们能看得到我们国家的毁灭迫在眉睫的征兆。敌基督的日子已经降临。我们将会有怎样的遭遇？我们该怎么办？”[18]君士坦丁堡的教堂内，人们焦急地祈祷，希望上帝能拯救他们的城市。1451年底，君士坦丁十一世又派遣了一名使节前往威尼斯，带去了更紧急的消息：苏丹正在集结大军，准备攻打君士坦丁堡，如果得不到援救，它必死无疑。威尼斯元老院以自己的议事速度做了斟酌，于1452年2月14日给出了答复。威尼斯人的回应是非常典型的小心谨慎；他们可不想影响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的商业利益。他们建议拜占庭人去寻求其他国家的合作，而不是仅仅依赖威尼斯人；但他们的确批准向君士坦丁十一世提供他索要的火药和胸甲。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十一世别无选择，只能与穆罕默德二世直接对话。他的使臣再次翻越色雷斯的群山，去觐见苏丹。使臣指出，穆罕默德二世没有与拜占庭商议就威胁要建造这座新城堡，是在撕毁和约；苏丹的曾祖父在建造安纳托利亚堡垒的时候是征得了拜占庭皇帝同意的，“就像儿子请求父亲一样”[19]。穆罕默德二世的回答简短而到位：“一座城市里面的东西是它自己的；它在护城河之外就没有任何管辖权，也不拥有任何东西。如果我要在神圣

河口处建造一座要塞，它也没有权力禁止我。”[20] 他提醒希腊人，基督徒曾多次阻挠奥斯曼人渡过海峡，并以典型的直率总结道：“去告诉你们的皇帝：现在当政的苏丹和他的前任不一样。前任苏丹做不到的事情，现任苏丹可以轻松地即刻完成。前任苏丹不愿意做的事情，现任苏丹是肯定愿意的。再有使臣如此进言，就会被活活剥皮。”[21] 苏丹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

3月中旬，穆罕默德二世从埃迪尔内出发，启动了建造要塞的工程。他先去了加里波利，从那里派遣6艘桨帆船和一些较小的战船——“做好了海战的准备，以防万一”[22]，以及16艘运载装备的运输驳船。然后他率领陆军走陆路来到预定的地点。整个工程都是他雷厉风行作风的典型写照。穆罕默德二世在后勤工作上的天才保证了人力和物资都能及时到位，并且数量极其庞大，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工。欧洲和亚洲各行省的总督们征集了劳工，前往施工地点。数量庞大的工人——“石匠、木匠、铁匠和烧石灰工人，以及工程所需的其他各种劳动力，完全不缺人手，携带着斧子、铲子、锄头、鹤嘴镐和其他铁制工具”[23]——抵达施工地点，开始干活。笨重的运输驳船将建材从海峡对面运来：石灰和烧石灰用的炉子、安纳托利亚的石料、黑海沿岸森林和伊兹密特[24] 的木材。与此同时，他的桨帆战船在海峡外围巡逻。穆罕默德二世亲自骑马巡视工地，并和两名建筑师（都是前基督徒）一道规划要塞的布局细节：“从外围塔楼到主要炮塔和城门的距离，以及其他一切细节，他都在脑子里仔细地计算着。”[25] 他可能在前一年冬天就在埃迪尔内对新城堡的设计作了筹划。他监督了地界的划定，并为城堡奠基。工匠们杀死了一些公羊，将羊血与第一层砖石的白垩与砂浆混合，以求得好运。穆罕默德二世非常迷信，受占星术影响极大。有人说，这座城堡的布局形状之所以如此怪异，是因为受了喀巴拉[26] 的影响；或者代表了先知圣名（及穆罕默德二世自己的名字）的阿拉伯文首字母的交织图形。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城堡的布局是由博斯普鲁斯海岸陡峭险峻的地形决定的，因为这一带包含“迂回的扭曲处、覆盖茂密树林的海

岬、内缩的海湾和弯曲部”，并且从海岸到工地最高点的海拔高度足有200英尺。[27]

工程于4月15日（星期六）正式启动，遵循了仔细制定的互相竞争、计件工作的原则。穆罕默德二世恩威并施，奖优罚劣，这也是他的典型做法。全部劳动力，从地位最高的维齐尔到最低贱的搬砖工人，全都行动了起来。城堡有四条边，最重要的三个角上各建有一座强大的塔楼，互相之间由高大雄厚的城墙连接，西南角还建有一座较小的塔楼。建造外层塔楼并为其出资的责任被交给了四位维齐尔——哈利勒、扎甘、谢哈布丁和萨勒贾。苏丹鼓励他们互相竞争，尽快完成各自的任务。当时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而且苏丹本人亲临现场，“一刻不肯停歇”[28] 地监督他们的工作，因此四位维齐尔都受到了极大的鞭策。穆罕默德二世自己则负责主持修建连接各座塔楼的城墙和较小的塔楼。劳工队伍一共有6000多人，包括2000名石匠和4000名石匠帮工，以及各个工种的其他工匠。整个队伍按照军事原则仔细地分为若干分队。每名石匠都有两名帮工在他身边帮忙，每天建成城墙的长度是有任务指标的。来自帝国各地的监察官负责维持纪律，对工人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执法和军事保护由一支有相当规模的军队负责。同时，穆罕默德二世“公开悬赏，鼓励工匠们又快又好地干活”[29] 。根据杜卡斯的记载，在这种竞争和恐惧的高度紧张气氛下，甚至贵族们也感到，有必要亲自去搬运石头和石灰给汗流浃背的石匠们，以此鼓舞士气。这里一半像是临时搭建的小型城镇，一半像是巨大的工地。在邻近的废弃的希腊村庄阿索马通，成千上万的帐篷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船只在波浪滔天的海峡上来回穿梭。微微燃烧的石灰坑喷吐出浓烟；锤子在暖和的气氛中叮当作响；人们不时高声呼喊。施工昼夜进行，火把一直燃到深夜。被木制脚手架环绕的城墙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在工地周围、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春天已经降临：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紫藤和紫荆树正在吐艳；栗树的花朵像白色的星辰；在宁静的夜色中，当月光照过熠熠发光的海峡时，有夜莺在松树丛中歌唱。

在君士坦丁堡城内，人们目睹奥斯曼人的准备工作，不禁越来越恐慌。前所未闻的奥斯曼舰队出现在海峡上已经让希腊人目瞪口呆。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屋顶和斯芬多恩（赛马场南端未被摧毁的地势较高的部分）的顶端，他们可以瞥见上游6英里处奥斯曼人忙碌的景象。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大臣们不知如何是好。穆罕默德二世百般挑衅。在施工早期，奥斯曼工人就开始拆毁城堡附近的一些破败的修道院和教堂，以获取建材。居住在附近的希腊村民和城内的市民仍然把这些地方看作圣地。同时，奥斯曼士兵和工匠开始劫掠他们的田地。夏天一天天过去，庄稼快要成熟，奥斯曼人的这两项挑衅越来越激烈。奥斯曼工匠从被毁的大天使米迦勒教堂拆除石柱，一些市民企图阻止他们，却被俘虏和处死。如果穆罕默德二世是想把君士坦丁十一世引出城来交战，那他就没有得逞。皇帝本人或许想出击，但被说服放弃了。他决定稳妥地解决问题，主动提出给奥斯曼建筑工人送粮，以阻止他们抢劫希腊人的庄稼。穆罕默德二世的回应是鼓励他的部下将牲畜随便放到田地里啃食庄稼，同时不准希腊农民予以阻止。最终，农民们看到自己的庄稼惨遭蹂躏，忍无可忍，把牲畜赶了出去，于是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人死亡。穆罕默德二世命令他的指挥官卡拉贝伊惩罚肇事的村民。次日，农民们收割庄稼的时候，一队骑兵向他们发动突然袭击，将他们全部杀死。

君士坦丁十一世听到这场屠杀的消息后，将城门封闭，扣押了城内的所有奥斯曼公民，其中包括穆罕默德二世的几名年轻宦官，他们正在游览城市。在被扣押的第三天，宦官们恳求君士坦丁十一世释放他们，声称如果他们不回去的话，他们的主人会生气。他们哀求，要么将他们放走，要么立刻将他们处决，因为回去太晚的话还是会被苏丹处死。君士坦丁十一世回心转意，把这些人释放了。他还派遣了一名使臣，向苏丹呈上了既听天由命又大胆挑衅的书信：

> 既然你舍弃和平，选择战争，我无论用誓言还是恳求都无法让你重新回到和平道路上来，那么就遵循你自己的意愿吧。上帝是我的避难所。如果他已经决意将城市交给你，谁又能反抗他或者阻止这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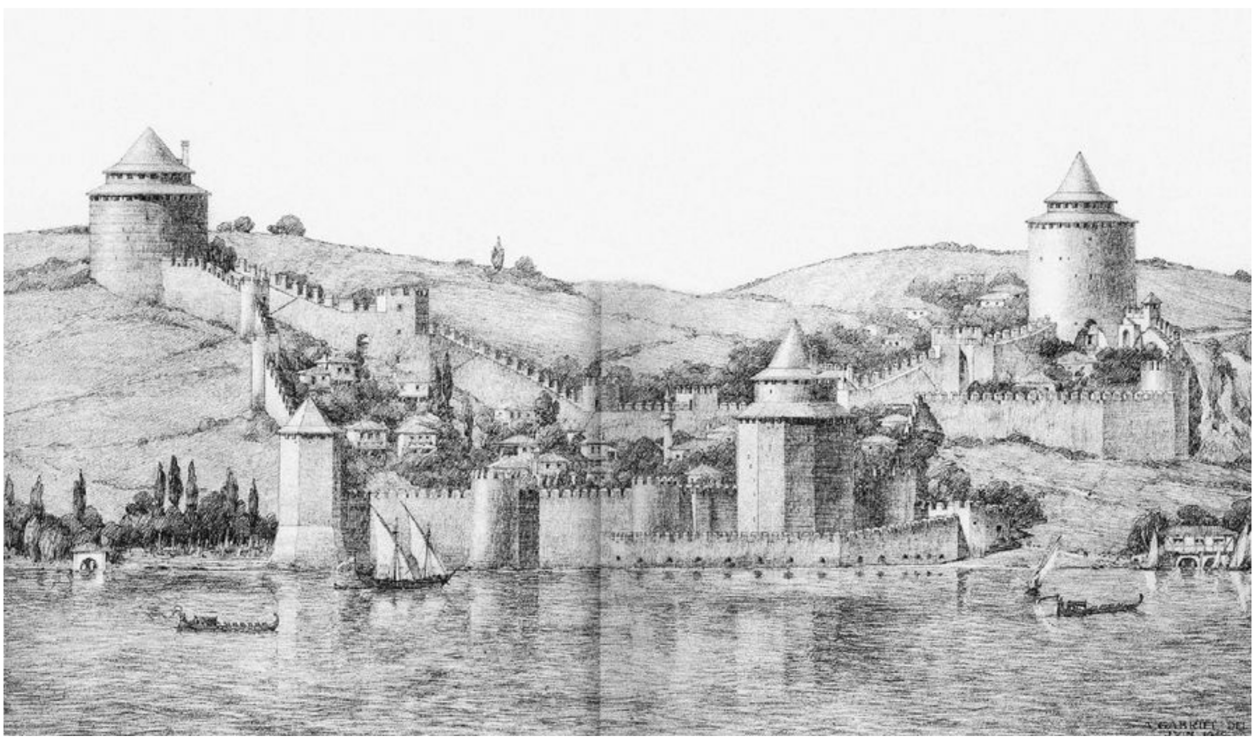
> 呢？如果上帝让你心生和平的意愿，我会很乐意地赞同。目前，既然你已经背弃了我为之起誓的和约，那么就让和约失效吧。从今天起，我将封闭城门。我将竭尽全力，为保卫市民而战。你可以随心所欲，直到公正的最后审判者裁决你我二人。[30]

君士坦丁十一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穆罕默德二世却将使节处死，并送回简短粗暴的回答："要么开门献城，要么做好战斗准备。"一支奥斯曼军队被派去劫掠城墙外的地域，并劫走牲畜、掳掠人口，但君士坦丁十一世已经将附近村庄的大部分居民以及收割好的庄稼都撤入了城内。奥斯曼史学家们记载称，他还企图贿赂哈利勒，希望促成和平，但这种说法更有可能是哈利勒的政敌的诋毁。从仲夏起，城门一直是关闭的，双方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1452年8月31日（星期四），穆罕默德二世的新要塞竣工了，从安放第一块石头到竣工只花了四个半月的时间。新要塞非常庞大，用克利托布罗斯[31]的话说，"不像是要塞，倒像是一座小城镇"[32]，并且掌控着海峡。奥斯曼人称之为"切断海峡的城堡"或"割喉堡"，但后来它的名字变成了如梅利堡（意思是"欧洲城堡"）。城堡布局大体呈三角形，拥有4座大型塔楼和13座较小的塔楼，城墙厚达22英尺，高50英尺；塔楼的屋顶铺有铅皮。这座城堡在当时是建筑学上的一大伟业。穆罕默德二世以惊人的速度协调和完成大型工程的能力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持续地让他的对手瞠目结舌。

8月28日，穆罕默德二世率军策马绕过金角湾的顶角，在君士坦丁堡城下安营扎寨，此时这座城市已经彻底封闭，阻挡他的前进。他花了三天时间细致入微地观察防御工事和地形地貌，做了很多笔记和草图，对防御工事的潜在弱点进行分析。秋天的脚步已经临近，于是他在9月1日返回埃迪尔内，对自己在夏季的工作非常满意。舰队也返回了位于加里波利的基地。400名士兵进驻了割喉堡，指挥官是菲鲁兹贝伊，他受命扣押所有在海峡上航行的船只，向其征收过路费。为了加强割喉堡的

威慑力，奥斯曼人还建造了若干火炮，并将其拖曳到城堡处。城垛上安放了小型火器；还有一个连队的重炮“像口吐烈火的巨龙”[33]，被安置在城堡外墙下方的海岸上。这些火炮的位置和角度不同，因而可以覆盖广阔的攻击范围；它们可以发射重达600磅的巨型石弹，弹道平直、紧贴水面，与过往的船只齐平，就像石子掠过池塘水面一样。对岸的“安纳托利亚城堡”也配有火炮，于是“连一只鸟儿也不能自由地从地中海飞往黑海”[34]。从此时起，无论白天黑夜，没有一艘船只能够不受检查地通过海峡。奥斯曼史学家萨阿德丁记载道：“就这样，帕迪沙阿（他是世界的避难所）封锁了那条海峡，切断了敌船的航道，灼烧了懦弱盲目的拜占庭皇帝的肝脏。”[35]



如梅利堡，即“割喉堡”

在君士坦丁堡城内，君士坦丁十一世正在集合资源，为这场看来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准备，并派遣使节向西方发送越来越十万火急的求援信。他写信给正在摩里亚的两位兄弟托马斯和德米特里，请求他们立刻返回都城。他做出了慷慨的许诺，不论谁来援救，都会得到大片土地的

报偿：他为匈牙利的匈雅提提供了黑海沿岸的塞林布里亚或墨森布里亚；他向阿拉贡和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36]许诺的是利姆诺斯岛。他向希俄斯岛上的热那亚人求援，向杜布罗夫尼克和威尼斯呼救，并再次向教皇求助。实际的援助还没有到来，但基督教欧洲的统治者们很不情愿地意识到，一个可怕的阴影正在笼罩君士坦丁堡。各国通过外交途径做了大量交流。教皇尼古拉五世说服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让后者在3月份给苏丹发去了措辞严厉（但空洞无物）的最后通牒。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向爱琴海派遣了一支拥有10艘船的小舰队，但后来又把它们撤回了。热那亚人在加拉塔和黑海的殖民地也受到了威胁，但他们无力提供实际的帮助。他们命令加拉塔市长，假如君士坦丁堡陷落，务必与穆罕默德二世妥善协商。威尼斯元老院也给他们在地中海东部的指挥官们发出了含糊其辞的指示：他们必须保护基督徒，但同时不能得罪土耳其人。在割喉堡完工前，他们就已经知道，穆罕默德二世威胁了威尼斯在黑海的贸易。很快，威尼斯间谍们就会发回割喉堡及其火炮的详细布局图。威尼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命运非常关注：8月，元老院进行了投票，大部分人都不同意听任君士坦丁堡自生自灭，但未能就更果断的反制措施达成一致。

在埃迪尔内，穆罕默德二世可能是猜测到，或者是从某种途径得知，君士坦丁十一世正向他在摩里亚的兄弟求援，于是迅速采取行动，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1452年10月1日，他命令年迈的将军图拉汗贝伊进军伯罗奔尼撒半岛，进攻德米特里和托马斯。图拉汗蹂躏了乡村，深入半岛南方，使得那里的拜占庭军队无法驰援君士坦丁堡。同时，从黑海到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也渐渐枯竭。秋季，拜占庭皇帝向威尼斯派出了新使节。11月16日，威尼斯元老院做出的答复和以往一样含糊，但威尼斯人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发生在更东方的事件吸引了过去。

到11月，在黑海与地中海之间航行的意大利船主们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是向割喉堡缴纳过路费，还是置之不理、甘冒风险？向南的海流

很迅猛，南下的船只很有可能快速通过检查站，而不至于被大炮击中。11月26日，一名威尼斯船长安东尼奥·里佐驾驶着粮船（粮食是送往君士坦丁堡的）从黑海南下，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接近割喉堡时，他决定赌一把。岸上的驻军发出警告，命令他落帆停船，但他置之不理，继续前进。一轮炮弹从海面上低低地掠过，其中一枚巨型石弹击中了他的桨帆船的轻型船体，将它打得粉碎。船长和其他30名幸存者乘坐小艇登岸，随即遭到逮捕，被戴上镣铐，押往埃迪尔内附近的迪迪莫特孔城，听候苏丹的发落。他们在监狱里煎熬的时候，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大使匆匆赶往苏丹皇宫，请求饶恕这些水手。他来得太晚了。穆罕默德二世已经决定严惩这些威尼斯人，以儆效尤。大多数人被斩首。里佐则被“一根尖木桩插入肛门”。然后所有的尸体都被抛弃在迪迪莫特孔城墙外，作为警示。“几天后，我去那里时看见了他们的尸体，”[37] 希腊史学家杜卡斯回忆道。少数水手被送回君士坦丁堡，以确保那里的人们都听闻了这个恐怖的故事。此外还有一个人活了下来：穆罕默德二世对里佐的书记的儿子很喜爱，将这个男孩送入了后宫。

这个野蛮行径收到了苏丹所希望的效果。君士坦丁堡的民众当即陷入了极大的恐慌。同时，尽管君士坦丁十一世发出了很多求援的呼声，西方还是没有任何联合一致发起救援的迹象。只有教皇能够超越欧洲山头林立的商业利益以及各王室间的宿怨和战争，以基督教世界的名义发出求救，但天主教教廷本身与东正教教会之间有着历史悠久、盘根错节的纷争，这给所有的求援行动都投下了阴影。这将严重影响君士坦丁十一世组织有效防御的努力。

---

[1] quoted Freely，John，*The Companion Guide to Istanbul*，Woodbridge，2000，p.269

[2] 皮埃尔·吉勒（1490～1555），法兰西自然科学家、翻译家和测绘学家。他曾游历地中海和东方，1544～1547年曾在君士坦丁堡寻找古代手稿。

[3] quoted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1978，p.68

[4] 乔治·斯弗朗齐斯（1401～约1478），拜占庭晚期史学家和官员，亲身经历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他撰写的关于这段时期拜占庭历史的著作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5] 特拉布宗是从拜占庭帝国分裂出的三个帝国之一，创立于1204年4月，持续了257年。特拉布宗帝国的第一代君主阿列克赛一世是拜占庭帝国科穆宁皇朝最后一位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一世的孙子，他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预见十字军将攻取君士坦丁堡，便占据特拉布宗独立建国。在地理上，特拉布宗的版图从未超过黑海南岸地区。1461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消灭了特拉布宗。

[6] Sphrantzes，George，*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trans. Marios Philippides，Amherst，1980，p.59

[7]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28

[8] 爱琴海的一个岛屿，距土耳其西岸仅8000米。有种说法称，盲诗人荷马就出生在这里。

[9] 在中世纪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的历史地区，位置大约在今日的罗马尼亚东南部。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庸。

[10] 1358～1808年的一个城邦共和国，以杜布罗夫尼克城为核心，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

[11] Tursun Beg，*The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trans. Halil Inalcik and Rhoads Murphey，Minneapolis and Chicago，1978，p.33

[12] 当时拜占庭的一种金币，单数称“阿斯普隆”，复数称“阿斯普尔”。

[13]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p.234-5

[14] quoted Nicol，Donald M.，*The Immortal Emperor*：*The Life and Legend of Constantine Palaiologus*，*Last Emperor of the Romans*，Cambridge，1969，p.52

[15] Khoja Sa'd-ud-din，*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trans. E. J. W. Gibb，Glasgow，1879，p.11

[16]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19

[17]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p.237-8

[18]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38

[19]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39

[20]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39

[21]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45

[22]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21

[23] Mihailovich，Konstantin，*Memoirs of a Janissary*，trans. Benjamin Stolz，Ann Arbor，1975，p.89

[24] 土耳其西北部城市，是交通枢纽和主要港口。

[25]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22

[26] 喀巴拉是犹太教神秘主义体系，发展于12世纪。本以口述为传统，主要传述《托拉》的神秘智慧。正统犹太教认为这是异教及泛神论的主张。

[27]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22

[28] Tursun Beg，*The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trans. Halil Inalcik and Rhoads Murphey，Minneapolis and Chicago，1978，p.34

[29]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22

[30]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45

[31] 即米海尔·克利托布罗斯（约1410～1470），希腊政治家、学者和史学家。他在奥斯曼帝国保护下撰写了五卷本的史书，记载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他将此书献给穆罕默德二世，在书中对这位君主表示了敬仰，同时哀叹拜占庭的灭亡，但认为这是天意。

[32]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22

[33]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311

[34]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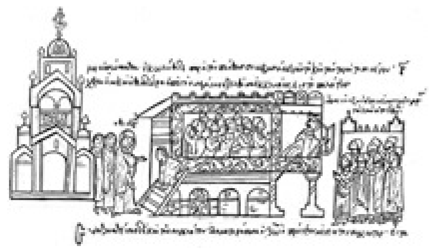
[35] Khoja Sa'd-ud-din，*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 ，trans. E. J. W. Gibb，Glasgow，1879，p.12

[36] 即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五世，同时是那不勒斯国王（称阿方索一世）。

[37]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Paris，1870，p.248

5.黑暗的教堂

1452年11月～1453年2月



让一个国家受伊斯兰教统治，远胜于让它落到不肯承认天主教会权力的基督徒手中。[1]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年

逃离天主教派，就像逃离毒蛇和火焰一般。[2]

——圣马可·尤金尼克斯[3]，15世纪希腊东正教的神学家

君士坦丁十一世从西方获得援助和有效地组织城防的主要困难可以上溯到将近400年前一个夏天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尽管它的真正原因甚至更为古老。

1054年7月16日，下午3点左右，圣索菲亚大教堂内，当教士们在准备下午的礼拜仪式时，三名高级教士身着全套圣服，从西面的一扇大门走进了教堂，刻意地走向祭坛。聚集在教堂内的信徒们注视着他们。这三人是罗马教皇派来的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任务是与东方教会的兄弟们解决神学争端。其中为首的教士名叫穆瓦昂穆蒂耶的安贝尔[4]。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但在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之后，

在这一天的下午，他们终于丧失了耐心，决定采取行动。安贝尔手中文件的内容将对基督教的统一产生爆炸性效果。他走入圣殿，将绝罚诏书放到主祭坛上，敏捷地转过身来，扬长而去。这位生性执拗的红衣主教高视阔步地走进夏日的明媚阳光，甩去脚上的灰尘，大声宣布："愿上主临鉴，评判我辈！"[5] 一名教堂执事手里挥舞着诏书，跑上大街，追上安贝尔，恳求他将诏书收回。安贝尔拒绝了，继续往前走，不再理会诏书的存在。两天后，三位红衣主教乘船返回罗马；君士坦丁堡大街上爆发了激烈的宗教暴乱，东正教会宣布将教皇代表团逐出教门，才把暴乱平息下来。教皇的绝罚诏书被当众烧毁。这个事件就是历史上所谓东西教会大分裂的源起，它将给基督教世界带来严重的伤痛——两大教会的互相绝罚直到1965年才被撤销，但伤痕是不可磨灭的。对于1452年冬天的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东西方教会的分裂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

事实上，1054年的事件不过是两种信仰方式酝酿了几百年的漫长分离过程的总爆发。东西方教会的分裂有着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在东方，教会的语言是希腊语；西方则是拉丁语。信仰形式不同，教会组织方式不同，对教皇角色的看法也不同。一般来讲，拜占庭人将他们的西方邻居视为粗鲁的野蛮人；拜占庭人与邻近的穆斯林的共同点要比与大海对岸的法兰克人多得多。但东西方矛盾的中心是两个关键问题。东正教会愿意接受教皇在诸位牧首中占据特殊地位的观点，但对教皇尼古拉一世于865年表达的观点——教皇拥有统领"整个世界，也就是整个教会"[6] 的权力——非常恼火。东正教会认为这是专制暴君的傲慢。

第二个问题是信条上的。天主教会的绝罚诏书指控东正教会将信条中的一个重要的词忽略了，这个问题对热衷于神学问题的拜占庭公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貌似单纯无害的拉丁词语"filioque"（意思是"和圣子"）其实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最初的尼西亚信经是这样的："我信圣灵，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所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西方天主教会在信条上增加了一个词"filioque"，使得信条变

成了“由圣父和圣子所共发”。后来罗马教会甚至开始指控东正教会省略这个词是弥天大错。东正教会则反驳称，增加这个词在神学上是说不通的；圣灵仅来自圣父，增加“圣子”是异端思想。就是这些问题引发了君士坦丁堡街头的暴乱。

随着时间流逝，东西方的隔阂越来越深，尽管也有人努力弥合双方的矛盾。1204年，基督教十字军洗劫了君士坦丁堡（教皇英诺森三世称此次洗劫为“毁灭的例证、黑暗力量的行径”[7]），更使得拜占庭人对所有与西方有联系的东西都深恶痛绝。由于这次洗劫，意大利各城邦从拜占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让拜占庭人咬牙切齿。1340年，卡拉布里亚的巴尔拉姆[8]向教皇本笃十二世进言：“让希腊人反对您的并非宗教信条的分歧，而是对拉丁人的仇恨。这种仇恨已经深入希腊人的骨髓，因为希腊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了拉丁人的很多残酷的侵害，并且今天仍然受到这种侵害。”[9]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宗教信条对君士坦丁堡平民的信仰方式一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自己的历代皇帝也曾多次改变信仰方式，但平民一直予以阻挠，死守自己的古老信仰，这种执拗和固执己见已经成为拜占庭历史这块马赛克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15世纪，奥斯曼帝国持续不断的压力迫使连续多位拜占庭皇帝不断奔向西方，展开一系列令人心力交瘁的求援行动。15世纪20年代，皇帝约翰八世访问了意大利和匈牙利。匈牙利的天主教国王提议，如果东正教会与罗马教会联合，并向教皇及其信条宣誓效忠，就更容易得到西方的支持。对拜占庭皇室来说，与西方联合一直是潜在的政策工具，也是信仰问题：基督教世界联合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威胁曾多次遏制住了奥斯曼帝国对君士坦丁堡的入侵（约翰八世的父亲曼努埃尔二世在临终前给了他的孩子们一条典型拜占庭式的建议：“土耳其人开始惹是生非的时候，就立刻派遣使臣到西方，主动提出愿意与西方联合，并尽可能地拖延谈判，拖得越久越好。土耳其人非常害怕我国与西方联合，会变得通情达理；但由于拉丁各国的敌意，这种联合是不会实现的！”[10]）。

这条建议在过去非常有用，但随着奥斯曼人越来越强大，拜占庭人的计谋常常取得与他们的意愿完全相反的效果：与西方联合的努力越来越刺激奥斯曼人的武装干预。但对约翰八世来说，虽然他害怕得罪奥斯曼人，同时对自己的臣民又不信任，但敌人敲打城门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当教皇尤金四世提议在意大利召开会议，共商东西方教会联合事宜时，约翰八世于1437年11月乘船前去开会，让他的兄弟君士坦丁（就是后来的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担任摄政王，管理都城。

这次佛罗伦萨会议非常拖沓，与会者互相充满敌意，一直开到1439年6月才结束。会议最终宣布，东西方教会已经正式联合。整个欧洲的教堂都敲响了大钟，甚至远至英格兰也敲钟庆祝。与会的东正教代表只有一人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协议的文本经过了精心设计，特意对一些关键问题做了模糊处理：教皇对至高无上权力的主张以及“filioque”的概念都得到了认可，但并不要求东正教会在自己的信条里加上这个字。但是，协议墨迹未干，希腊人就开始摒弃对它的认可。君士坦丁堡城内，东正教信众充满敌意地迎接了返回的代表团；在协议上签字的很多代表马上翻脸不认账。东正教牧首们拒绝接受代表团的决定；下一任君士坦丁堡牧首格列高利·玛马斯是支持与西方联合的，他非常不受民众欢迎，也根本无法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庆祝联合的成功。联合的问题让城市分为两个敌对阵营：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信任的绝大部分贵族、军官和公务人员都支持联合；教士和平民只有少部分人支持联合。群众认为这个联合是奸诈的法兰克人强加给他们的；而且他们的永恒灵魂也因低贱和物质至上的动机而受到了威胁。民众极其仇视天主教会：他们已经习惯于将教皇和敌基督画等号，将教皇称为“恶狼、毁坏世界者”[11]；市民们喜欢给他们的狗取名叫“罗马教皇”。市民们组成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无产阶级：赤贫、迷信，容易受人煽动去制造哗变和混乱。

君士坦丁十一世登基伊始就继承了无休无止的宗教纷争，这在拜占庭的漫长历史上也是非常典型的。一千一百年前，君士坦丁大帝也曾受

到宗教信条纷争的困扰。君士坦丁十一世是个军人，而不是神学家，他对东西方教会联合的态度完全是务实的。他只有一个执着的目标：挽救这座城市，因为它的古老遗产被交到了他的手中。如果与西方联合有助于这个目标，就这么办好了，尽管市民们因此对他颇为不满。他的皇权和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的：他在米斯特拉斯登基时并没有接受过正式加冕。加冕仪式本应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但人们强烈地感到，如果由一位主张联合的牧首为一位赞同联合的皇帝加冕，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暴乱。于是加冕仪式就被悄悄地搁置了。很多市民拒绝在祈祷时为新皇帝祈福，佛罗伦萨会议上的一名主要的反对者乔治·斯科拉里奥斯退隐到一座修道院，改名为真纳迪奥斯，开始组织反对联合的教士会议，进行抵抗。1451年，牧首格列高利厌倦了这些无休无止的敌对，前往罗马，在那里将反对联合派的活动情况全都告知教皇尼古拉五世。君士坦丁堡城内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替格列高利的牧首职位。于是从此刻起，君士坦丁堡既没有完全合法的皇帝，也没有牧首。

与穆罕默德二世爆发战争的威胁越来越大，君士坦丁十一世向教皇发出了一系列越来越绝望的求救；他不甚明智地在书信中加入了反对联合派提出的召开新的宗教会议的要求。格列高利报告的教会联合在君士坦丁堡的执行情况让教皇尼古拉五世更加强硬，他也不愿意继续忍受故态复萌的希腊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支吾搪塞。尼古拉五世的回复是非常冰冷的："如果你，你的贵族，以及君士坦丁堡人民接受教会联合，你们会发现，我们和我们可敬的兄弟们，即神圣的罗马教会的红衣主教们，永远愿意支持你的荣誉和你的帝国。但假如你和你的人民拒绝接受联合的诏令，我们将被迫采取对你们的灵魂得救和我们的荣誉必需的措施。"[12] 教皇的威胁只是让拜占庭的反对联合派更坚定了决心，他们继续活动，暗地破坏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城内的地位。1452年9月，一名反对联合分子写道："君士坦丁·帕里奥洛格斯……仍然没有加冕，因为教会没有领袖，而且由于虚假的联合造成的动荡和混乱，教会也乱作一团……这个联合是邪恶的，受上帝憎恶，分裂了教会，驱散了教会的孩

子们，把我们完全摧毁。实话实说，这是我们所有其他灾难的来源。”[13]

在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决心采取措施，强制执行佛罗伦萨会议的决议。他决定派遣一名教皇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确保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内庆祝联合的成功。他选择的特使是伊西多尔红衣主教——前任基辅主教。伊西多尔是拜占庭人，对当前问题的微妙性有着最直接的了解。在佛罗伦萨会议上，他是主张东西方教会联合的。他返回基辅之后，他的东正教信众抛弃了他，并将他囚禁起来。1452年5月，他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随行的有200名弓箭手（军饷由教皇支付），作为他此次神学使命的军事支持。途中，他遇见了莱斯博斯岛的热那亚人主教——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此人对后来发生的所有事件都有积极投入但偏见很深的评论。反对联合派已经得到了此二人即将到来的预警，君士坦丁堡城内也因此更加动荡。真纳迪奥斯公开发表了攻击联合的恶毒演说，从正午一直滔滔不绝地讲到晚上。他恳求民众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寄希望于价值甚微的物质上的援助。但在1452年10月26日，伊西多尔红衣主教在君士坦丁堡登陆时，护卫他的一小队弓箭手让民众产生了敬畏之情。这一小队人马或许只是强大援军的先遣部队。于是，很多人一下子又见风使舵地转为支持联合。在一段时间内，这座反复无常的城市的民意发生了拉锯战。反对联合派被指责为不爱国，但人们看到没有更多船只运载援军抵达，于是又重新回到了真纳迪奥斯的阵营。反对联合派发动了暴动。莱奥纳德尖锐地要求君士坦丁十一世逮捕暴乱的幕后元凶。他悲哀而愤怒地抱怨道：“除了……少数僧侣和俗人，所有希腊人都被骄傲迷了心窍，因此没有人会被对真正信仰的热忱或他自己的灵魂得救而驱动，去第一个摈弃自己原先固守的成见。”[14] 君士坦丁十一世拒绝听取他的建议；他担心城市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混乱。相反，他还召集了反对联合派人士到宫中，听取他们的反对意见。

十天后，割喉堡的隆隆炮声传到了城里。里佐及其船员的悲惨命运

被公之于众后，群众陷入了新一轮的恐慌。联合派又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真纳迪奥斯再次慷慨陈词，抨击墙头草：西方的援助会让他们丧失自己的信仰，援助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他自己不愿和西方扯上任何关系。有一件事情比城市陷落更让真纳迪奥斯担心：他真真切切地相信，世界末日已经迫在眉睫。他希望东正教会能够以纯洁无瑕的灵魂迎接最后审判。街头爆发了更多的骚动。僧侣、修女和俗人跑来跑去，争相呼喊："我们不要拉丁人的帮助，也不要和拉丁人联合；让我们彻底清除异端崇拜。"[15] 虽然真纳迪奥斯在煽风点火，但战战兢兢的民众似乎渐渐地决定（虽然很不情愿）接受佛罗伦萨会议的决议，至少是暂时接受。拜占庭人以货真价实的诡辩术对自己的行为作了辩解（他们这种狡辩的本事也算是"优良传统"了）：变通教义。这条教义允许信徒为了保证生存而暂时接受非正统的神学观点。天主教会对这种神学手段火冒三丈。伊西多尔红衣主教则认为强制执行联合、拯救希腊人受威胁的灵魂的时机业已成熟。

在这种充满恐惧和宗教狂热的高度紧张的气氛中，庆祝联合的礼拜仪式于1452年12月12日（这是深冬的一个冷寂日子）在圣索菲亚大教堂正式举行。"教士们极其庄严，可敬的俄罗斯红衣主教（即伊西多尔）也在场，他是被教皇派来的；还有最崇高的皇帝和他的所有显贵，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全体人民。"[16] 联合诏令被当众宣读，祷词中加入了为教皇以及不在场的牧首格列高利祈福的环节，但礼拜仪式的细节对很多在场观看的希腊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礼拜语言和仪式是天主教的，而不是东正教的；圣体包含了未发酵的面包（这在东正教看来是个异端），冷水被倒进杯子，与葡萄酒混合。伊西多尔写信给教皇，报告了自己使命顺利完成的情况：

> 君士坦丁堡全城与天主教会联合了；礼拜仪式中为您祈福；而最可敬的格列高利牧首在君士坦丁堡期间，任何教堂都不曾为他祈福，甚至他自己的修道院都没有；现在，联合完成后，全城也为他祈福。从最低贱的到最高贵的，包括皇帝本人，全城人都团结一致，信奉天

主教。感谢上帝。[17]

据伊西多尔说，拒绝参加联合的只有真纳迪奥斯和其他八名僧侣。这很可能是伊西多尔一厢情愿的想法。一位在场的意大利人记载道，那一天全城陷入了哀恸之中。礼拜仪式期间显然没有发生暴乱。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东正教信众硬咬着牙参加了礼拜，然后成群结队地前往全能之主修道院，去找真纳迪奥斯咨询。真纳迪奥斯已经成为东正教事实上的精神领袖和等待登位的下一任牧首。但他退回了自己的小房间，保持缄默，不肯出来。

从此以后，东正教徒摒弃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认为它“比犹太会堂或古代异教神庙好不到哪儿去”[18]。他们只在城内正儿八经的东正教教堂做礼拜。没了牧首和信众，巨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陷入了黑暗和沉默。持续不断的祈祷声消失了，曾经照亮穹顶（那就像“整个浩瀚夜空，装点着闪闪发光的星辰”[19]）的成千上万盏油灯也噼啪作响，相继熄灭了。联合派的礼拜仪式很少有人参加，聚集在圣殿前的人寥寥无几。鸟儿哀戚地在教堂中殿周围振翅。东正教徒们感到，真纳迪奥斯的严词谴责被证明是正确的：并没有强大的援救舰队从马尔马拉海驶来，保卫基督教世界。从此以后，联合派和东正教徒之间、希腊人和拉丁人之间的隔阂比以往更深，基督教方面对围城战的所有记载都反映出了这一点。东西方的大分裂将给君士坦丁十一世守城的努力投下一道长长的阴影。

1452年11月1日，真纳迪奥斯在自行与世隔绝之前，在全能之主修道院大门上贴了一份宣言。它读起来像是预言，充满了世界末日降临的阴郁和自我辩解：

> 可悲的罗马人，你们竟如此误入歧途！你们背离了希望——因为只有上帝才能给人希望——而信任法兰克人的力量。你们的城市很快就将毁灭殆尽。除了城市之外，你们还丧失了真正的宗教。哦，上帝，怜悯我吧。我在你面前发誓，我在此事上是纯洁无辜的。悲惨的

> 公民们，小心注意你们今天所行之事。你们将面临奴役；你们否认了先祖传下来的真正的信仰。你们供认了自己的不虔诚。你们接受最后审判时必将遭受磨难！[20]

在150英里之外的埃迪尔内，穆罕默德二世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事态的发展。奥斯曼帝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指导原则就是避免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哈利勒帕夏因此主张继续实行和平政策：任何攻打君士坦丁堡的企图都可能使基督教世界团结一致，将保卫君士坦丁堡的事业变成新的十字军东征的契机。但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君士坦丁堡城内传来的消息给了他希望，鼓励他大胆行事。

在冬季的短暂白天和漫长夜晚，苏丹一直在思忖自己的征服梦想。他对此十分执着，但又犹豫不决。他在埃迪尔内的新宫殿开始动用帝国权威，继续对亲兵部队进行改革，并操纵货币的含银量，以支付所有行动的开支。穆罕默德二世召集了一群意大利谋臣，从他们那里获取关于西方时局以及军事技术的情报。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关于防御工事和攻城战的插图版专著。他焦躁不安、兴奋狂热而又踌躇不定。他咨询占星家，在自己脑子里设计打破君士坦丁堡城防的方法，与宣称不可能攻破君士坦丁堡的年迈维齐尔们的保守智慧搏斗。同时，他研究奥斯曼历史以及此前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极其仔细地检查这些战役失败的原因。他在夜间无法入眠，就整夜地绘制君士坦丁堡防御工事的草图（夏天时他曾亲自对其做过观察），并设计攻打这些工事的策略。

史学家杜卡斯对苏丹的这些如痴如狂的黑暗日子作了生动的描绘。他笔下出现的是一位行事诡秘、疑心极重、被野心吞噬的苏丹，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可能为了他的基督徒读者而作了夸张处理。据杜卡斯记载，穆罕默德二世常常在夜间乔装打扮为一名普通士兵，在大街上游荡，在市场和客栈里聆听人们关于他的闲聊。如果有谁认出了他，并愚蠢地按照礼节高呼万岁，穆罕默德二世就会把这人刺死。这种故事口口相传，有无数版本，迎合了西方人对嗜血暴君的想象。根据传说，一天

夜里，将近凌晨时分，苏丹派遣宫廷卫兵去传唤哈利勒。他或许把哈利勒视为他的宏图大略的最大障碍。年迈的维齐尔听到传唤，不禁浑身战栗。在这个时间被叫去觐见“真主在人间的影子”可不是什么好的预兆。他拥抱了妻子儿女，似乎在做最后一次道别，然后跟随卫兵前去，手里端着一个装满钱币的托盘。杜卡斯暗示，哈利勒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他曾收受了希腊人的很多贿赂，劝说穆罕默德二世不要开战，尽管这一点是真是假，永远不可能澄清了——哈利勒自己富可敌国，曾经借钱给老苏丹，即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哈利勒来到苏丹寝宫时，发现穆罕默德二世已经起床，穿戴整齐。老人匍匐在地，举起托盘。“这是什么？”穆罕默德二世问道。“陛下，”哈利勒答道，“根据惯例，一名贵族在非同寻常的钟点被主公传唤，是不能空着手来的。”“我不需要礼物，”穆罕默德二世说，“把那座城市给我就行了。”哈利勒被此次奇异的传唤和苏丹狂热的面容吓得毛骨悚然，表示全心全意地支持苏丹的计划。穆罕默德二世最后说道：“我们将信任寄托于真主的许可，以及先知的祈祷，我们将占领那座城市。”然后允许魂不附体的维齐尔回家。

不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大约在1453年1月前后，穆罕默德二世召集了大臣，发表了决意开战的演说。希腊史学家克利托布罗斯把这份演说记载了下来。苏丹将君士坦丁堡问题放置到了奥斯曼人崛起的整个历史背景中。他十分清楚，50年前，奥斯曼帝国羽翼未丰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煽动了帝国的灾难性内战，给帝国带来了极大损害；他也明白“君士坦丁堡从未停止向我们进军，不断地挑动和教唆我们的人民互相残杀，推动混乱和内战，损害我们的国家。”[21] 他担心，君士坦丁堡将来仍然会成为奥斯曼帝国和基督教国家之间无休止战争的动因。一旦将其占领，它将成为帝国的中心，“但如果没有它，或者让它继续当前的状态，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随时可能丧失，也不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22] 。大臣们也一定清楚地记得，就在不久前，君士坦丁十一世还企图利用奥尔汗来破坏帝国的稳定。苏丹努力推翻可以一直上溯到阿拉伯人攻城时期的旧观念：要攻破君士坦丁堡是不可能的。他对城内近期事态

了如指掌；他知道，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君士坦丁堡市民们“正像不共戴天的死敌一样为了宗教信念的分歧而互相斗争，他们的内部组织因此充满了煽动和动荡”；并且，和往昔不同的是，今天基督徒已经不再控制海上航道。苏丹还谈及了圣战传统——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今天的穆斯林有义务开展圣战。穆罕默德二世还特别强调了尽快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要求务必迅速地集中全部可用资源，决战决胜：“为了这场战争，我们要投入全部力量，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金钱、武器或其他物资，都不能吝惜；直到我们占领或者摧毁城市，其他任何事情都算不得重要。”[23] 这是开展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召唤，似乎已经说服了所有人。战备工作开始加速进行。

正如阿拉伯人在717年经历的那样，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冬天可能会惊人地严酷。从地理位置上讲，君士坦丁堡突入海峡，暴露在从黑海刮来的猛烈北风之下。这里空气潮湿，气温会降到零下，寒风刺骨。一连几周的绵绵苦雨将街道化为泥坑，地势陡峭的小巷可能会突然暴发洪水。暴风雪突如其来，将半英里之外的亚洲海岸完全抹平，然后又迅速消逝。有时浓雾会笼罩城市很多天，诡异的死寂似乎控制了整座城市，教堂钟声传不远，公共广场上的马蹄声也十分模糊，似乎马蹄上包裹着毛毡。1452～1453年的冬天，君士坦丁堡的天气尤其恶劣和多变。人们观察到“罕见而奇异的地震和大地颤动，天上降下电闪雷鸣，十分可怕，以及狂风、洪水和瓢泼大雨”[24]。恶劣的天气让大家的心情更加糟糕。没有任何基督教船只前来救援，以兑现联合派的诺言。城门仍然紧闭，从黑海来的粮食供应也由于苏丹的遏制而逐渐停止。普通市民整天聆听东正教教士们的宣讲，在酒馆里狂饮没兑水的葡萄酒，并向圣母像祈祷，求她保佑城市，就像当年在阿拉伯人围攻时那样。人们陷入狂热，对自己灵魂的纯洁极其关注，无疑是因为受到了真纳迪奥斯谴责的影响。参加联合派主持的礼拜仪式，或者从一位曾参加联合礼拜的教士那里接受圣餐（哪怕他仅仅是仪式的旁观者）都被认为是罪孽。君士坦丁十一世骑马走过大街时受到公开的嘲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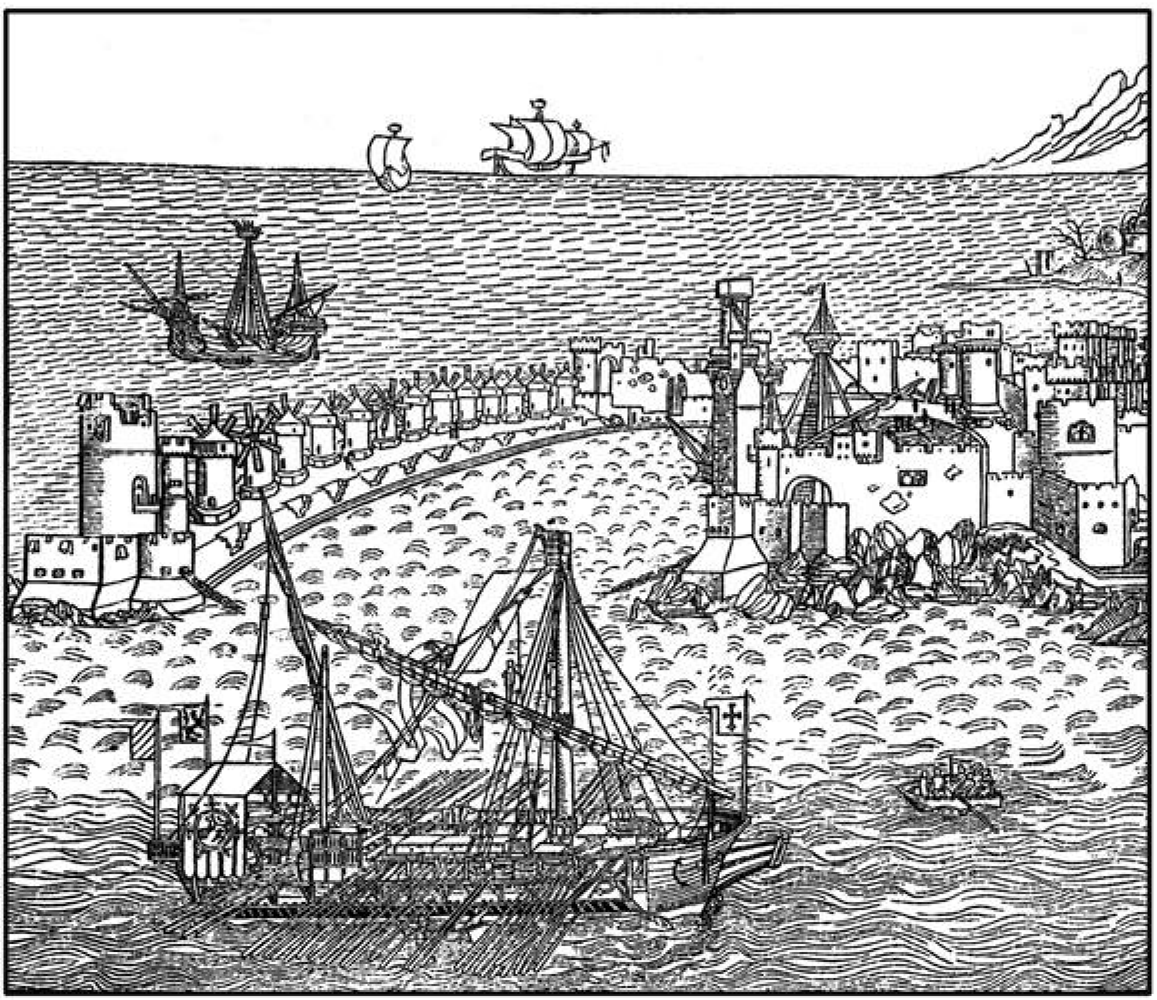
虽然大环境不理想，皇帝还是竭尽全力地准备城防。他派遣使节去爱琴海岛屿及更远方收购食物：“小麦、葡萄酒、橄榄油、干无花果、鹰嘴豆、大麦和豆类。”[25] 同时开始修补防御工事（陆墙和海墙）中年久失修的地段。他们缺少优质石料，也没办法从城外的采石场获取原料，于是不得不从废弃的建筑物和被抛弃的教堂上拆取建材；甚至古老的墓碑也被加以利用。陆墙前方的壕沟被清理干净；虽然民众有所保留，但君士坦丁十一世还是说服他们参加劳动。通过公开募集行动，朝廷从个人、教堂和修道院筹集了款项，用以购买粮食和武器。城内所有可用的武器（数量极少）被收集起来，重新分配。另外还向城墙之外仍然被拜占庭控制的少数几座堡垒派驻了士兵，包括：马尔马拉海北岸的塞林布里亚和埃皮巴托斯，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岸、割喉堡远方的希拉比亚，以及王子群岛[26] 中最大的一个岛屿。作为最后的挑战姿态（尽管它虚弱无力），君士坦丁十一世派遣桨帆船劫掠了马尔马拉海沿岸的奥斯曼村庄，将俘虏带回城内，卖为奴隶。“这使得土耳其人对希腊人大发雷霆，并发誓一定要给希腊人血的教训。”[27]



描绘圣母马利亚的印章

这段时间里，对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除了劫掠奥斯曼村庄之外的唯一一个亮点是，一群迷途的意大利船只来到了君士坦丁堡。他说服

（或者说强迫）他们参加城防。12月2日，威尼斯的一艘大型运输桨帆船从黑海之滨的卡法出发，在贾科莫·科科指挥下，谎称自己已经在上游付了过路费，骗过了割喉堡的大炮封锁线。这艘船接近割喉堡时，船员们向奥斯曼炮手们热情呼唤，称他们为“朋友，向他们致意，吹响喇叭，发出欢天喜地的声音。我们的人发出第三次致敬时，已经驶离了城堡，海流把我们带往君士坦丁堡”[28]。同时，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将真实的局势报告给了各自的共和国当局。两个共和国开始缓慢地采取行动。在里佐的船被击沉之后，威尼斯元老院命令共和国的海湾副统领加布里埃尔·特里维萨诺前往君士坦丁堡，将威尼斯的商船队从黑海带回。此次前来的威尼斯人当中有一位名为尼科洛·巴尔巴罗的随船医生，他在日记中对随后几个月的事件作了极其生动的记述。



威尼斯大型桨帆船，地中海上的散装货船

在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威尼斯殖民地，大家越来越焦虑。威尼斯市政官米诺托是个富有进取心且意志坚定的人，他一心要把三次大型商用桨帆船和特里维萨诺的两艘轻型桨帆船留下，参加城防作战。12月14日，米诺托、特里维萨诺、其他威尼斯船长和皇帝进行了会晤。米诺托恳求船长们留下，“首先是为了上帝的爱，其次是为了基督教的荣誉和我们威尼斯政府的荣誉”[29]。漫长的谈判后，船主们同意留下。但是，就他们应当将货物留在船上还是将它们留在城内作为他们守信的抵押，双方争执了一番。君士坦丁十一世怀疑，一旦货物被装上船，这些船就会扬长而去；最后船主们不得不亲自向皇帝起誓，才被允许将他们的货物（成捆的丝绸、蜂蜡和其他物资）装上船。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2月26日夜间，其中1艘威尼斯船只和6艘来自克里特岛的甘地亚城的船只偷偷起锚，借助一股强劲的东北风溜走了。“很多富人乘坐这些船只逃走，一共有700人左右，这些船只安全抵达了特内多斯[30]，没有被土耳其舰队俘虏。”[31]

虽然发生了这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但也有喜讯传来。加拉塔的热那亚市长的呼救召唤来了具体的援助。2月26日前后，两艘大型盖伦帆船[32]抵达君士坦丁堡，带来了“很多作战所需的精妙装备和机器，以及英勇而自信的精锐士兵”[33]。这些船只隆隆驶入帝国港口，“甲板上站着四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34]，这幅景象当即对民众和皇帝都产生了极深的影响。这些援兵的指挥官是一名与热那亚共和国的名门望族有联系的职业军人，名叫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隆哥。他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自愿发起这次远征，并且自己承担开支。他一共带来了7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其中400人是在热那亚招募的，另外300人来自罗得岛和热那亚控制下的希俄斯岛（那里是朱斯蒂尼亚尼家族的权力基地）。君士坦丁十一世很快认识到此人的重大价值，向他提出，如果能够击退奥斯曼人，就将利姆诺斯岛赏赐于他。在随后几周内，朱斯蒂尼亚尼将在防

御战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还有其他一些士兵陆续赶到。来自热那亚的博基亚尔多三兄弟安东尼奥、保罗和特罗伊洛带来了一小队人马。加泰罗尼亚人提供了一支队伍。一名卡斯蒂利亚贵族——堂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也响应了号召。除此之外，向基督教世界的求援带来的就只有不和谐的回响。市民们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罗马给我们的援助和开罗的苏丹提供的一样多，”[35] 乔治·斯弗朗齐斯悲愤地回忆道。

---

[1] quoted Mijatovich，Chedomil，*Constantine Palaiologos*：*Th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1448-1453*，London，1892，p.17

[2] quoted in an article on the *Daily Telegraph* website，4 May 2001

[3] 即以弗所的马可（1392～1444），希腊以弗所的大主教。他认为西方天主教会是异端，坚决反对与西方联合。他是佛罗伦萨会议上唯一一个拒绝签字的东正教代表。东正教会尊崇他为圣徒。

[4] 穆瓦昂穆蒂耶的安贝尔（约1000～1061），法兰西本笃派僧侣，后来升为红衣主教。据说他是第一个担任红衣主教的法兰西人。他在1054年的行动进一步推动了东西方教会大分裂。有趣的是，他公布教皇利奥九世的绝罚诏书时，教皇已经去世，所以严格来讲，这份诏书已经失效。

[5] quoted Ware，Timothy，*The Orthodox Church*，London，1993，p.43

[6] quoted Ware，Timothy，*The Orthodox Church*，London，1993，p.53

[7] quoted Clark，Victoria，*Why Angels Fall*：*A Journey through Orthodox Europe from Byzantium to Kosovo*，London，2000，p.27

[8] 卡拉布里亚的巴尔拉姆（约1290～1348），出身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地区的学者、教士、人文主义者、语言学家和神学家。他早年信奉东正教，参与了很多神学争端。晚年逃往西方，皈依天主教。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伟大学者。

[9] quoted Norwich，John J.，*A History of Byzantium*，3 vols.，London，1995，p.184

[10] quoted Mijatovich，Chedomil，*Constantine Palaiologos*：*Th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1448-1453*，London，1892，pp.24-5

[11] quoted Gill，Joseph，*The Council of Florence*，Cambridge，1959，p.381

[12] quoted Runciman，Stephen，*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Cambridge，1965，pp.63-4

[13] quoted Nicol，Donald M.，*The Immortal Emperor*：*The Life and Legend of Constantine Palaiologus*，*Last Emperor of the Romans*，Cambridge，1969，p.58

[14]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125

[15] quoted Gill，Joseph，*The Council of Florence*，Cambridge，1959，p.384

[16]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11

[17]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92

[18] quoted Stacton，D.，*The World on the Last Day*，London，1965，p.165

[19] quoted Sherrard，Philip，*Constantinople*：*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London，1965，p.34

[20]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54

[21]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30

[22] Kritovoulos，（in English）*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trans. Charles T. Riggs，Westport，1970，pp.29-31

[23]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32

[24]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37

[25]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

p.257

[26] 王子群岛位于马尔马拉海中，在伊斯坦布尔东南方约10公里处，一共有九个岛。拜占庭时期，皇室将获罪的王子或其他王室成员流放至此；随后的奥斯曼土耳其亦依循此例，王子群岛因而得名。

[27]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3

[28]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4

[29]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5

[30] 今称博兹贾岛，属土耳其，在爱琴海上，邻近土耳其西部海岸。

[31]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13

[32] 盖伦帆船是至少有两层甲板的大型帆船，在16～18世纪期间被欧洲多国采用。它可以说是卡拉维尔帆船及克拉克帆船的改良版本，船身坚固，可用作远洋航行。最重要的是，它的生产成本比克拉克帆船便宜，生产3艘克拉克帆船的成本可以生产5艘盖伦帆船。盖伦帆船被制造出来的年代，正好是西欧各国争相建立海上强权的大航海时代。所以，盖伦帆船的面世对欧洲局势的发展亦有一定影响。但1453年时，应当还没有盖伦帆船。

[33]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Paris，1870，p.265

[34] Kritovoulos，（in English）*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 ，trans. Charles T. Riggs，Westport，1970，p.39

[35] Sphrantzes，George，*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Amherst，1980，p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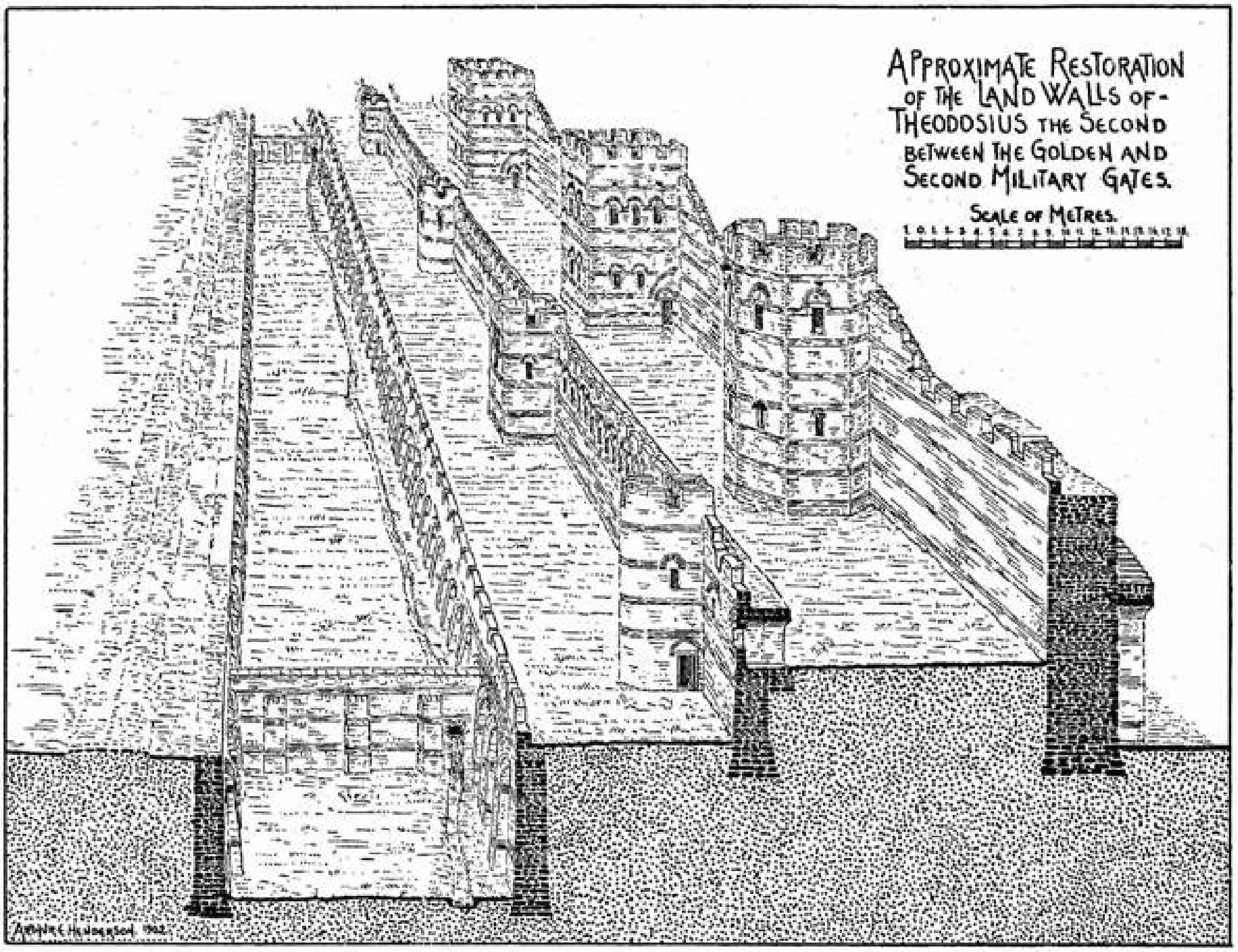
6.城墙和大炮

1453年1～2月



> 某些可燃物质能够产生火焰、闪光和巨响，它们造成的恐惧能够引发奇妙的后果，没人能够抵御或者忍受……如果将少量此种粉末（尺寸不超过人的手指大小）裹在羊皮纸内并点燃，它就会爆炸，生成炫目的闪光和令人震惊的巨响。如果用量更大，或者使用更坚固的东西包裹，爆炸就会更加猛烈，闪光和巨响将令人无法忍受。[1]
>
> ——13世纪英格兰僧侣罗哲尔·培根如此评论火药的效果

热那亚援兵抵达之后，城防工作得以加速进行。朱斯蒂尼亚尼是个“城墙作战的专家”[2]，他冷静地对城市的防御工事作了评估，并采取了适当措施。在他指挥下，守军在2月和3月间“疏浚护城河，修补和加高城墙，修复城垛，加固内外塔楼，并加强了整段城墙，包括面向陆地的和朝向大海的地段”[3]。



城墙截面图显示三层防御结构：内墙、外墙及护城河

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工事虽然破败，但仍然是令人生畏的。拜占庭帝国能够生存这么久，都城防御的固若金汤一直是个主要原因。世界上没有第二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如此得天独厚。城市周界总长度为12英里，其中8英里面向大海。城市的南面与马尔马拉海相接，此处海流极其迅猛，风暴常常骤然降临，因此从海上登陆进攻的风险极大。1000年中，没有一个侵略者认真地尝试从这个地段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海岸得到一道延绵不断的城墙的防护，城墙高度至少有50英尺，沿线分布有188座塔楼和一些较小的设防港口。这道城墙受到的主要威胁不是敌船的攻击，而是海浪对其地基无休止的侵袭。有时大自然会特别凶残：在764年的寒冬，巨大的浮冰冲上胸墙，将海墙摧毁。马尔马拉海沿岸的整段

城墙上到处是纪念历代皇帝修理这段城墙的大理石铭文。水流湍急的大海绕过这一海岸，一直到古卫城处，然后北上进入较平静的金角湾。金角湾本身为帝国舰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安全锚地；这一地段的城墙上设有110座居高临下的塔楼，还有数量众多的水闸以及两个相当规模的港口，但此处的防御一直被认为是比较薄弱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威尼斯人乘战船从这里的前滩登陆，登上城墙，攻破了城市。自717年的阿拉伯人围攻以来，守军在战时为了封锁金角湾的入口，就习惯于在入口处升起一条铁链。铁链长达300码，由铸铁打造，每个铁环长20英寸，整条铁链被安放在坚固的木制浮筒上。如果得到热那亚人的支持，就可以将铁链的一端固定在金角湾对岸加拉塔城海墙的一座塔楼上。冬季，守军将铁链和浮筒都准备就绪，以防备敌人的海上进攻。

城市的西端（也就是三角形的底边）得到长4英里的陆墙的保护，也就是所谓"狄奥多西城墙"。这道城墙横亘从马尔马拉海到金角湾的狭窄陆地，保护君士坦丁堡城，使它免受任何传统的陆路攻击。这座城市的历史中很多最重大的事件就发生在这座非同寻常的城墙沿线。它的历史几乎和城市本身一样悠久，在地中海世界一直是个亘古不变的传奇。穿过色雷斯平原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商人或朝觐者、从巴尔干某个宫廷前来的使节，或者有着征服野心、四处劫掠的军队，从远方首先看到的就是巅峰时期的君士坦丁堡那阴森森的巨大陆墙。它横越轻微起伏的大地，从一道地平线到另一道地平线，壁垒和塔楼连绵不绝。在阳光照耀下，石灰岩打造的城墙的表面化为一片灿烂的雪白，罗马红砖的接缝构成延续不断的水平线条，城墙上还有外形相似、带有穹顶的射箭孔。众多塔楼有的呈方形，有的是六边形，还有的是八边形，偶尔也有圆形。它们互相簇拥，间距极近，据一位十字军战士说："一个七岁男孩能够把一个苹果从一座塔楼投掷到另一座。"[4] 它们分成若干层次，一直向上延伸至内墙最顶端的高度，皇帝的鹰旗就在那里骄傲地迎风招展。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重兵把守、阴森森的城门，和平时期，人畜就从这些城门出入。在城墙南端，靠近马尔马拉海的地方，一座饰有金

板和大理石与青铜雕像的大门在阳光中熠熠生辉。这就是“黄金门”，一座庞大而华丽的拱门，两侧各建有一座磨光大理石打造的恢宏塔楼。在拜占庭的鼎盛时期，得胜归来的皇帝们会带着胜利的象征物——身披枷锁的被征服的外国国王、重新夺回的圣物遗迹、大象、身着奇装异服的蛮族奴隶、堆满战利品的马车，以及威武雄壮的帝国军队——从这里盛装经过。到1453年，黄金门的黄金和很多装饰物都已经没了踪影，但城门作为一座伟大的纪念碑，仍然昭示着罗马人的光荣。

陆墙划定了城市发展成熟后的界线，它虽然被冠以孩童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的名字，但主持建造陆墙的其实是5世纪初的一位重要政治家安特米乌斯，“当时最睿智的人之一”[5]。城市之所以能延续上千年，要无限感激他的高屋建瓴。于413年建成的第一道城墙震慑了匈人的君主阿提拉（绰号“上帝之鞭”[6]），令他在447年放弃攻打城市。阿提拉蹂躏邻近的色雷斯的同一年，城墙因为严重地震而坍塌，全城人立刻行动来应对这个危机。1.6万名市民在短短两个月内就惊人地完全重建了城墙，不仅恢复了安特米乌斯的最初设计规模，还增加了一道同样带有一连串塔楼的外墙、一道防护性的胸墙，以及一道砖砌的壕沟（即护城河），构成了一道极其复杂、令人生畏的可怕障碍。此时，城市西部的防御体系包括了192座塔楼，分为5个独立防区，纵深200英尺，从壕沟底部到塔楼顶端的高度为100英尺。这项丰功伟业被记载在一道充满夸耀的铭文中：“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君士坦丁[7]成功地建起了这些强大的城墙。甚至帕拉斯[8]也无法如此迅速地建成如此强大的堡垒。”[9]

建造完备的狄奥多西城墙凝聚了火药时代之前希腊—罗马世界关于城防的军事工程学的全部智慧。防御体系的核心仍然是安特米乌斯建造的内墙：内墙内部是混凝土，然后在内外两面都覆上附近采石场出产的大块石灰岩，并插入砖块，以便让整个结构更加巩固。城墙顶端的作战平台得到城垛的防护，从下面有阶梯通往顶端平台。按照罗马人的习惯，塔楼并不是与城墙连为一体的，这就可以保证塔楼与城墙可以各自

稳固沉积下来，而不至于破裂。塔楼高达60英尺，包括两个房间；楼顶是平的，可以在上面安放投掷石块和希腊火的机械。哨兵们在塔楼顶端持续不断地扫视着地平线，夜间则与城墙沿线其他塔楼的哨兵互相呼喊，以防止入睡。内墙的高度是40英尺；外墙要低一些，只有大约27英尺，所以外墙上的塔楼也比内墙塔楼要低。内外两道城墙之间有宽60英尺的平台，防守外墙的士兵就集结在那里，随时准备与敌人短兵相接。在外墙脚下，还有一道宽60英尺的平台，任何越过壕沟的侵略者都将在这里惨遭屠戮。砖砌的壕沟又是一道宽60英尺的屏障，内侧沟边筑有一道护墙；1453年的时候，壕沟是部分有水还是完全干涸，我们不得而知。防御体系的纵深之大和复杂程度、城墙的坚固以及居高临下的优势使得狄奥多西城墙几乎坚不可摧，中世纪的只拥有传统攻城武器的军队奈何它不得。

陆墙上开有一系列城门。有些城门通过建在壕沟之上的桥梁通往周边的乡村，这些桥梁在围城之前就会被摧毁；其他城门仅供军用，将各层城墙之间连接起来，方便部队在防御体系内部迅速调动。城墙上还有一些辅助性的边门，但拜占庭人时刻牢记这些边门对城市的安全构成的威胁，因此对它们的管理非常严格。总的来讲，城墙沿线的民用和军用城门是间隔分布的，军用城门用数字编号，民用城门则取了名字。比如，“泉源之门”得名自城外的一处圣泉；还有“木竞技场门”“军靴匠门”“银湖门”，等等。有些城门名字的最初含义已经被遗忘，于是人们给它们取了新名字。第三军用城门也被称为“红党门”，得名自君士坦丁堡早期历史中的一个赛马场派别；而“查瑞休斯门”（查瑞休斯是另一个派别——蓝党的领袖）也叫“墓地门”。防御体系内部还建造了一些值得一提的建筑，体现了拜占庭内在的矛盾。在靠近金角湾的地方，布雷契耐皇宫就偎依在城墙后，据说这座宫殿曾经极其华美，到访的外国人找不到言辞来形容它；布雷契耐皇宫旁边是阴暗而悲戚的阿尼玛斯监狱，这是一座恶名昭彰的地牢，拜占庭历史上一些最恐怖的插曲就发生在这里。约翰五世在这里把他的儿子和3岁的孙子的眼睛戳瞎；拜占庭最臭

名远扬的皇帝之一——“可怖的”安德罗尼库斯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然后被一匹生疥癣的骆驼背着，在群众的嘲讽中被押往赛马场，然后在那里被头朝下地吊挂在两根廊柱中间，继而在戏谑声中惨遭屠戮。

城墙的历史如此悠久，不少地段都与厚重的历史、神话和半被遗忘的传说紧密联系。几乎所有地点都曾经历过这座城市历史的一些戏剧性时刻——可怕的背叛、神奇的解救，以及死亡。628年，希拉克略通过黄金门带来了真十字架。967年，离心离德的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在泉源之门被愤怒的暴民用乱石击毙。1261年，市民们从城内打开了泉源之门，迎接东正教皇帝的归来，摆脱了拉丁人的统治。450年，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在城外山谷坠马负伤，奄奄一息地被人从第五军用城门抬进城。12世纪，有预言称，神圣罗马皇帝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将利用木竞技场门来攻打城市，于是人们将这座城门封闭了。

除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之外，没有任何一座建筑能比城墙更强烈地体现君士坦丁堡人民的精神生活。如果说教堂是他们对天堂的憧憬，城墙则是他们抵御敌对力量攻击的盾牌，并且得到圣母的亲自佑助。在围城期间，人们会持续祈祷，并把圣母的遗迹圣物抬到城墙上巡游；信徒们认为，这比军事准备更有效。这些活动笼罩在强大的精神能量场之下。圣母的袍子被保存在城墙附近布雷契耐的教堂。人们相信，就是它的神奇力量在626年逐退了阿瓦尔人，在860年打跑了俄罗斯人。军事工程的作用则是次要的。人们看到守护天使出现在城墙上的幻象，皇帝们将大理石十字架和祈祷词嵌入外城墙表面。在城墙中心附近有一个简单的护符，表达了君士坦丁堡最深的恐惧：“哦，我主基督，保佑你的城市免于苦难、远离战争吧。征服敌人的狂暴。”

同时，对城墙的维护保养是城市最关键的公共工作，每一位公民都有义务参与，没有任何例外。不管拜占庭国家财政多么糟糕，总是能够募集到金钱来修补城墙。朝廷为维护城墙设立了专门的官职，总体负责

城墙事务的官员拥有“城墙伯爵”的威风凛凛的头衔。流逝的岁月和不断的地震持续令塔楼破裂、石料崩塌，人们不断地进行修理，城墙上留下了大量纪念修理工作的大理石碑文。这些碑文中最早的是在447年的首次重建中留下的，最晚的则是1433年对外墙全面翻新时的纪念。1453年围城前的最后几次维修时留下的碑文表达的意思是，人神共同努力来维护城市之盾。碑文写道：“1438年5月，在最虔诚的两位君主约翰[10]和玛利亚·帕里奥洛格斯治下，由曼努埃尔·布兰尼乌斯·莱昂塔里合作和出资，对这座赋予生命泉水、受上帝保佑的城门进行了重建。”[11]

或许没有任何防御工事比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更能总结出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攻城战的真相。这座城市几乎一直处在围攻之下；它的防御反映了城市的内在特征和历史——君士坦丁堡混合了自信与宿命论、神圣的灵感和务实的技能、悠久历史和保守心态。和城市本身一样，城墙长期以来一直傲然屹立；地中海东部的人们估计，这城市和城墙将永远如此屹立下去。防御工事的结构在5世纪就已经成熟，后来的变化极小；建筑技术非常保守，可以上溯到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时代。筑城技术没有特别的理由去发展，因为攻城战术的演化一直处于停滞。基本的攻城技术和装备——封锁、挖地道和爬城、攻城锤、投石机、攻城塔、地道和云梯——长期以来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守城一方永远占据优势；君士坦丁堡靠近海岸的地理位置更是一大优势。曾经兵临陆墙之下的敌军都不曾成功地突破多层防御体系；同时，城市为了应付不时之需，总是把蓄水池装满淡水，粮仓储满粮食。阿瓦尔人带来了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投石机，但它们的抛射轨迹过于弯曲，破坏力微不足道，无法打破城墙。阿拉伯人则被大批冻死。保加尔人克鲁姆汗[12]尝试了魔法——他用活人祭祀，并向他的士兵们抛洒海水，也无济于事。甚至君士坦丁堡的敌人们也渐渐相信，这座城市得到了神助。只有拜占庭人自己曾经成功地从陆墙一面攻破城市，而且总是依靠诡诈的奸计。最近几个世纪乱七八糟的内战中，多次发生里应外合、在夜间打开城门的事情。

陆墙只有两个地点具有潜在的弱点。在中段，地势沿着一条长长的山谷下降，一直到里卡斯河，然后在河对岸又逐渐升高。因为城墙是建在地势下降的山坡上的，那一段的塔楼就不再是制高点，比远方山峰要低。敌人如果占据了那山峰，就掌握了制高点。另外，里卡斯河通过涵洞被引入城内，因此在那个地段没办法把壕沟挖得很深。几乎所有的攻城军队都发现这一地区是个薄弱环节，虽然从未有人成功过，但还是给进攻者带来一线希望。城防体系的第二个异常环节位于北端。内外三层的城墙的规则体系在接近金角湾时突然发生中断。城墙的周界突然向外拐了一个直角，把一块额外的突出地域包含在内。从这里到金角湾海边的400码距离上，城墙变成了形状不一的堡垒和墙段的大杂烩，虽然是非常巩固地建在露出地表的巨岩之上的，但在大部分地段只有一道防线，而且没有挖掘壕沟。这一段城墙如此建造，是为了将布雷契耐的圣母神龛包含在城内。起初，包含神龛的教堂处于城墙之外。拜占庭人最初认为，圣母的保佑已经足以保护教堂，这真是典型的拜占庭式的逻辑。626年，阿瓦尔人几乎将教堂烧为平地——神龛则被圣母自己救下——于是拜占庭人修改了城墙的走向，把教堂纳入城墙之内，布雷契耐宫也建在这一块土地上。1452年夏季，穆罕默德二世侦察地形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这两个薄弱环节。两段城墙呈直角相交的地点将吸引他特别的注意力。

君士坦丁堡市民在朱斯蒂尼亚尼指挥下修补城墙，并抬着圣像在城墙顶端游行。他们对城墙的防护力信心十足，这是可以理解的。亘古不变、威严宏伟而坚不可摧的城墙一次次证明，一支小规模的守军就足以阻挡庞大的攻城军队，直到后者的意志力被围城战的后勤负担压垮，或者士兵因为痢疾溃散，或者军心涣散。城墙虽然有些部分有所损坏，但基本上还是巩固的。于15世纪30年代访问君士坦丁堡的布罗基里埃发现，甚至较薄弱的直角处也“受到坚固高墙的防护”[13]。但守军并不知道，他们正在为之准备的战争发生在一场技术革命的巅峰时刻，这场革命将深刻地改变攻城战的规则。

没人确切地知道，奥斯曼人究竟在何时获得了火炮技术。火药武器大约在1400年前后通过巴尔干传入奥斯曼帝国。按照中世纪的标准，这种新技术的传播极其迅速，最早的关于火炮的书面记载是在1313年，到1326年就有了最早的描绘火炮的图画，而到了14世纪末，欧洲全境就已经在大量制造火炮。在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生产铁制或铜制火炮的小型工坊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与之相关的工业也迅速发展。硝石“工厂”大量兴建起来；中间商进口铜和锡；熟练工匠们将他们的金属铸造技术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从实际效果上讲，早期火药武器的好处是值得怀疑的：在阿金库尔战役[14]中，英军除了长弓之外还部署了野战火炮，但后者对战局影响甚微。这些武器非常笨重，准备起来无比烦琐，瞄准精度极差，对己方炮手的危险和对敌人一样大。但炮火无疑具有一种震撼的心理效果。在克雷西战役[15]中，英王爱德华三世“以五六门火炮让法军大乱，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这些发出隆隆巨响的机器”[16]。1382年，菲利普·范·阿尔特维尔德[17]的荷兰巨炮“开炮时发出如此巨响，似乎地狱中的所有魔鬼都在喧闹”[18]。这些早期的记载常常用地狱的比喻来描述火炮。这种“战争的恐怖工具”[19]的雷鸣般巨响让人不禁联想到地狱：火炮打乱了自然秩序，彻底断送了骑士风尚。早至1137年，教会就禁止将火药用于军事用途，还彻底禁止使用弩弓，但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魔仆已经出瓶了。

到1420年，除了攻城战之外，火炮对作战的贡献还是极小的，但此时奥斯曼人开始对火炮兴趣盎然。他们攻入巴尔干后，缴获了相关的资源，俘虏了一些工匠，开始制造自己的火炮。他们兴办了铸炮厂，开采铜矿，建立了火药厂；雇用了技能熟练的铸造工人、石弹切割工人和硝石制造工人。奥斯曼人学习得非常快。他们极其擅长吸收新技术，并将有技术的基督徒吸纳进他们的军队，同时训练自己的士兵。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建立起了炮兵的基础设施，在近卫军中组建了炮兵部队和炮车车夫的队伍。与此同时，虽然教皇禁止向异教徒出口火炮，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还是将武器运往地中海东部。兜售技术的工匠们也

热衷于将自己的一身本事卖给正在崛起的苏丹，于是纷纷来到奥斯曼宫廷。

1422年，穆拉德二世攻打君士坦丁堡，让后者首次尝到了奥斯曼人新技术的厉害。根据希腊人的记载，穆拉德二世带来了巨型“射石炮”（由德意志人指挥），轰击城墙，但炮击大体是无效的：70枚炮弹击中了一座塔楼，但没有造成显著的破坏。24年后，穆拉德二世再次用大炮攻打另一段城墙时，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15世纪40年代，君士坦丁十一世试图保护帝国所剩不多的几个行省之一——伯罗奔尼撒免遭奥斯曼人的侵袭，于是在科林斯地峡建造了一道长6英里的城墙（被称为“赫克萨米利翁”，意思是“6里”），从西海岸一直到东海岸，将半岛完全封锁。这是一项规模相当宏大的军事工程，被认为足以抵挡长期进攻。1446年12月初，穆拉德二世用长身管火炮攻打这道城墙，仅仅5天时间就将其突破。君士坦丁十一世险些丢掉了性命。



用火药填充大炮

在1422年和1446年之间，奥斯曼人对火炮的认识大大加深了，而这个时期恰恰是火炮制造和火药技术演化的关键时刻。大约在15世纪20年代，欧洲的火药制造技术有了一个重要进展，大大增强了它的威力和稳定性。在此之前的普遍做法是将火药的原配料——硫黄、硝石和木炭分别储存在不同的桶内，要使用的时候才在现场将它们混合起来。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火药燃烧较慢，容易受湿气影响，而且各种原料很容易互相分开。15世纪初，人们通过实验发现，更好的生产方法是将原料混合成糊状，然后将其烘干，做成饼形，需要的时候就根据具体的用量从饼上取下颗粒。这种所谓“粒状”火药燃烧较快，威力比以往提高了30%，而且不容易受到潮湿环境的影响。有了新式火药，就能够以惊人的力量向一堵城墙发射重型炮弹。此时，长达16英尺、能够抛射750磅重的炮弹的巨型攻城炮也问世了。1412年，根特的巨型射石炮“疯女格丽特”[20]开火时的巨响似乎是“地狱的复仇女神发出的”，打垮了布尔日的城墙。但是，新式火药也增加了对炮手的风险，并影响了铸炮技术：炮管被铸造得更坚固也更长，新的趋势是将火炮整体铸造，因此炮身就必须用青铜铸造，于是造价也飙升了。铜炮的造价是锻造铁炮的三倍，但好处的确很多，昂贵的造价显然是值得的。自从号角的轰鸣令耶利哥的城墙[21]崩塌以来，优势首次转移到攻城的一方手中。在15世纪的欧洲，攻城大炮的怒吼此起彼伏，石弹不断轰击石墙，此前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众多堡垒骤然坍塌。

奥斯曼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技术进步。奥斯曼帝国不断扩张，境内的铜矿可以自给自足，而且拥有天然硝石。帝国通过征服或者贸易掌握了火药技术，然后建立起一些机构，将技术在自己的军队中推广。奥斯曼人很快就精通了火炮制造、运输和射击技术，而且在火药战争必需的深度后勤补给工作上首屈一指。要在指定时间将一个有战斗力的炮兵连部署到战场上，对中世纪的补给链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除了要运输笨重的火炮外，还要及时供应与火炮口径相符的足够数量的石弹以及火药。奥斯曼人从帝国全境搜寻人力和物资——从黑

海获取炮弹，从贝尔格莱德获取硝石，从凡城[22]获得硫黄，从卡斯塔莫努[23]弄来青铜，通过海外贸易获取锡，将巴尔干的教堂铜钟熔化用于铸炮——并通过由大车和骆驼组成的陆路交通网分配和输送这些物资，这个运输网的效率是无与伦比的。深度的计划是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典型特征，因此奥斯曼人在提出特殊要求的火药时代得心应手。

奥斯曼人吸收火炮技术的速度如此之快，到了15世纪40年代，显然就已经掌握了在战场上利用临时设施铸造中型炮管的技术。穆拉德二世将铸炮所需的金属原料运到了赫克萨米利翁，在那里就地铸造了很多长身管火炮。这使得奥斯曼人在攻城战中能够做到特别灵活机动：他们不是将现成的火炮拖到前线，而是更方便快捷地将火炮配件运往前沿，在那里组装；攻城结束后，如果需要，还可以将火炮拆解。在使用过程中炸膛的火炮（炸膛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可以快速得到修复，重新投入作战。在当时，现有的炮弹的口径与火炮可能并不完全相符，于是可以根据手头的弹药，对炮管量身定做（17世纪，在攻打克里特岛上的威尼斯城市甘地亚的史诗般大战中，奥斯曼军队仍然用到了这种方法。在21年的征战中，奥斯曼军队收集了3万发威尼斯制造的炮弹。奥斯曼人的火炮无法使用这些炮弹，于是他们铸造了新的炮管，来适应敌人炮弹的口径，并把它们派上了用场）。

对奥斯曼人来说，攻城炮似乎满足了游牧民族灵魂深处的一种特别需求：它迎合了他们对设防定居点的根深蒂固的敌视。草原游牧民族的后裔已经证明了自己在运动战中的持续优势，只有在面对定居民族的城墙时，他们才觉得棘手。有了火炮，他们就有可能速战速决，避免漫长的围城战。热爱科学的穆罕默德二世在观察君士坦丁堡坚不可摧的城墙时，立刻想到了大炮。他登基不久就开始试验铸造重型火炮。

拜占庭人也认识到了火药武器的潜力。在城内，他们也有一些中型火炮和火枪，君士坦丁十一世竭尽全力地储存相应的资源。他成功地从

威尼斯人那里获得了火药供应，但他的帝国穷得叮当响，无力在昂贵的新式武器上大量投资。大约在1452年之前，一个名叫乌尔班的匈牙利铸炮工程师来到君士坦丁堡，希望在帝国宫廷飞黄腾达。像他这样四处兜售技术的人越来越多，在整个巴尔干到处寻找买家。他表示愿意为拜占庭人效劳，为他们铸造一体化的重型铜炮。囊中羞涩的皇帝对此人很感兴趣，但没有资源让他施展拳脚；皇帝给乌尔班发了一笔微薄的津贴，希望把他留在城内，但这津贴没有按时发放。这位不幸的工艺大师生活越来越拮据；大约在1452年，他离开了君士坦丁堡，前往埃迪尔内，寻求觐见穆罕默德二世。苏丹欢迎了这个匈牙利人，赏赐他锦衣玉食，并仔细询问他。希腊史学家杜卡斯对两人的会面作了生动的还原。穆罕默德二世问他，能否铸造一门足够强大的大炮，它能够抛射足够大的石弹，以摧毁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并比画了一下他估计的石弹的尺寸。乌尔班的回答是非常明确的："如果陛下需要的话，我可以铸造一门能够发射这种石弹的铜炮。我对城墙作了仔细观察。我的大炮不仅能把这些城墙炸为齑粉，巴比伦的城墙也不在话下。铸造这样的大炮所需的工作，我是完全胜任的。但是，"他急于对自己能打的包票加以限制，"我不知道如何让这样的大炮发射，所以不能保证一定能发射成功。"[24] 穆罕默德二世命令他铸造大炮，并宣布他将亲自研究大炮的发射。

不管这次觐见的细节究竟如何，乌尔班大约在1452年夏季，也就是割喉堡施工期间，开始铸造他的第一门巨炮。大约这个时期，穆罕默德二世一定已开始大量储存制造大炮和火药所需的物资：铜和锡、硝石、硫黄和木炭。他可能还颁布圣旨，命令石匠们在黑海沿岸的采石场制造花岗岩弹头。三个月内，乌尔班就铸造出了他的第一门大炮。它被拖到割喉堡，用来监视博斯普鲁斯海峡。就是这门炮在1452年11月摧毁了里佐的桨帆船，并第一次将奥斯曼大炮的威名传遍了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对这一结果颇为满意，命令乌尔班将现有火炮的尺寸翻一倍，铸造一门真正恐怖的大炮，也就是后世巨炮的原型。

在乌尔班以前，奥斯曼人可能就已经在埃迪尔内铸造火炮了。乌尔班的贡献在于，他能够制造尺寸大得多的模具，并控制关键的变量。1452年冬季，他开始铸造很可能是史上最大的巨炮。希腊史学家克利托布罗斯对这个无比艰苦、非同寻常的过程作了详细描述。首先，用陶土混合剁得很细的亚麻布和大麻，制造一个大约27英尺长的炮管形模具。模具分成两个部分，用来容纳石弹的前端的口径是30英寸；用于容纳火药的后端尺寸较小。然后需要挖掘一个巨大的坑，并将已经烧制完毕的陶土模具放入坑内，炮口朝下。然后在模具外再覆盖一层陶土，“就像剑鞘一样”[25]，并固定妥当，两层陶土之间留有空隙，用于注入熔化的金属。然后在整个结构的外围紧紧地堆砌“铁和木料、泥土和石块，从外面压紧”[26]，以支撑青铜的巨大重量。最后在模具上泼洒潮湿的沙子，将整个结构覆盖起来，只留下一个可供注入熔化金属的孔洞。同时，乌尔班建造了两座砖砌的熔炉（它的内外壁覆有烧制好的陶土，并用大石块固定），它们足以抵抗1000摄氏度的高温，并用小山一样的木炭将熔炉埋起来，“埋得非常深，只露出炉口”[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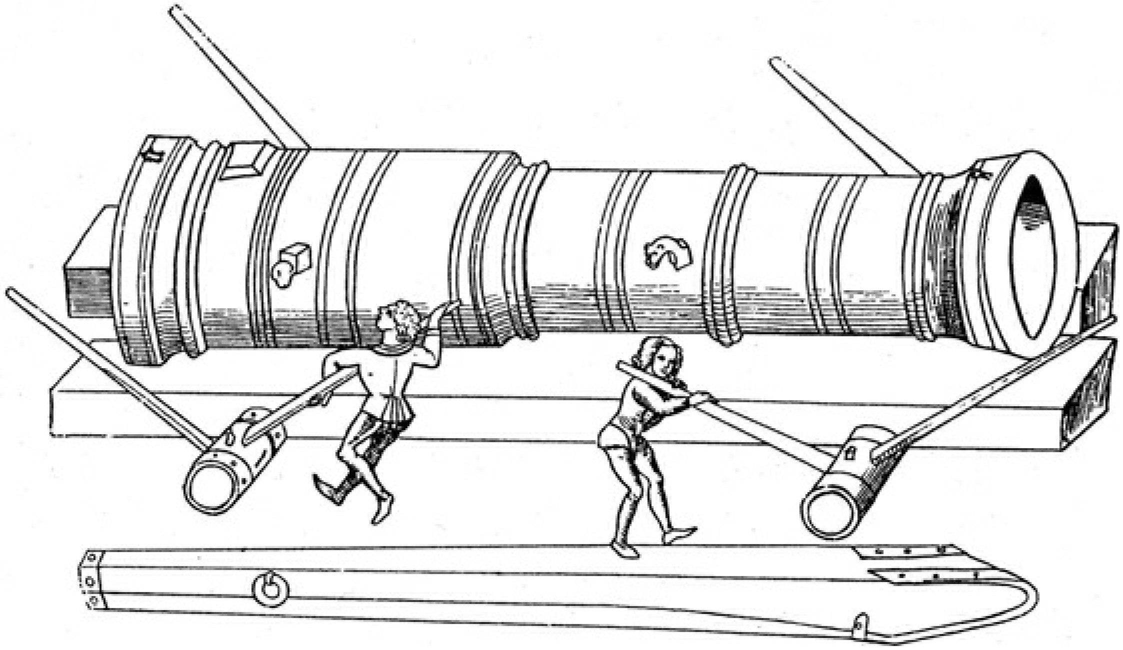
中世纪铸造厂的运作险象环生。后世的奥斯曼旅行家艾弗里雅·切莱比参观了一座铸炮厂，把铸炮工作中人们的恐惧和蒙受的风险描绘了下来：

> 铸造大炮的日子，厂主、工头和铸造工人，以及炮兵总管大臣、主监察官、伊玛目[28]、宣礼员和计时员，全都聚集起来；在“安拉！安拉！”的呼声中，人们将木柴投入熔炉。熔炉烧了二十四小时之后，铸造工和司炉工都脱得赤条条的，只穿着拖鞋和保护胳膊的厚厚衣袖，戴着一种遮蔽面部而只露出眼睛的奇怪帽子；因为熔炉在烧了二十四小时之后，那高温让人无法接近，除非作这样的打扮。想看看地狱烈火是什么景象的人都应当看看这个场面。[29]

人们判断熔炉内温度达到正确值的时候，工人们开始向坩埚内投入铜块，以及一些碎铜（对基督徒们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边角料可能是从教堂大钟上弄来的）。这项工作的危险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工人们需要将铜块一块块地投入沸腾冒泡的大锅，用金属长柄勺捞去在表面漂浮的废渣；锡合金发出有毒气体；如果金属碎片是湿的，它带入的水分就会化为水蒸气，导致熔炉破裂，站在附近的人全都得完蛋。重重危险让工人们非常迷信。艾弗里雅说，在需要投入锡块的时候，维齐尔、穆夫提[30]和谢赫[31]们都应招前来[32]；除了铸造厂人员之外，到场的一共只有四十人。其他随从人员都不得入内，因为熔化中的金属是容不得恶眼注视的。厂主们会请求坐在离熔炉很远处沙发上的维齐尔和谢赫们一刻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一切权力和力量都属于安拉！"然后，工匠师傅们用木制铲子将好几英担[33]的锡投入熔化的黄铜的海洋。领头的铸造工向维齐尔和谢赫们说："请以真正信仰的名义，向铜的海洋中投入一些金银币，作为施舍！"人们用船上的帆桁那么长的竿子将金银混入铜锡合金；竿子被熔化后，就立刻换上新的竿子。

一连三天三夜，若干组铸造工人一刻不停地操纵风箱，对点燃的木炭进行过热处理，直到目光敏锐的铸造师傅判断出，合金已经变成正确的炽热红色。连续好几星期的艰苦工作在这一周到达了一个关键时刻，需要做出精准的判断。"时限已到……铸造师傅和其他工匠师傅们穿上笨拙的毛毡防护服，用铁钩子打开熔炉口，并高呼'安拉！安拉！'。液态金属开始流出，足以照亮百步之外的人脸。"[34]熔化的金属就像岩浆一样沿着陶土管道缓缓流动，进入大炮模具的孔洞。汗流浃背的工人们用非常长的木杆戳着黏滞的金属，把气泡戳破，因为气泡可能会导致金属在烧制时破裂。"青铜从管道中流入模具，直到将其注满，还溢出了一腕尺[35]。大炮就这样铸成了。"[36]紧压在模具外围的湿沙子会减缓冷却的速度，并阻止青铜在这一过程中破裂。金属冷却之后，人们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大炮（它就像是包裹在陶土茧里的幼虫）从地里挖出来，并用牛群将它拖到地面上。这是一个神奇的变化过程。



15世纪的射石炮

工人们将模具敲碎拆除，并对金属进行刮擦和打磨之后，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头恐怖而超凡的怪兽”[37]。原始的炮管在冬日阳光下呈现黯淡的光泽。它长达27英尺。由坚固的青铜铸就的炮管壁厚达8英寸，足以抵御火药爆炸的冲击力；炮管口径为30英寸，足以让一个成年人手脚并用地钻入，能够发射圆周长达到8英尺、重量超过半吨的超重型石弹。1453年1月，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在位于埃迪尔内的新宫外进行一次试射。巨大的射石炮被拖曳到城门附近的指定位置。全城人都得到警告，次日“炮声将有如雷霆，大家务必多加小心，免得毫无准备、耳朵被震聋，或者孕妇被惊吓导致流产”[38]。这一天早上，炮手们给大炮装填了火药。一群工人将一块巨大的石弹抬入炮口，将它滚进炮管深处，稳妥地安放到火药室前方。炮手将点燃的火把伸向点火孔。一声巨响，滚滚浓烟遮天蔽日，巨大的石弹呼啸出膛，在开阔的原野上飞了1英里，最后坠入松软的泥土，一直钻到6英尺深的地下。杜卡斯本人可能也目睹了这次试射。据他说，“这火药的威力如此巨大”[39]，甚至10英里外也能听得见爆炸声。穆罕默德二世则特意让人们将关于恐怖巨炮的消息传回君士坦丁堡：巨炮不仅是实用的武器，也是心理战的利器。

在埃迪尔内，乌尔班的铸造厂继续生产尺寸各异的更多火炮；它们都没有第一门那么庞大，但也有不少身管长度超过了14英尺。

2月初，奥斯曼人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将乌尔班巨炮从埃迪尔内运往君士坦丁堡（路程为140英里）的巨大的实际困难上。大批人员和牲畜被分配去执行这个艰巨任务。人们用铁链将许多大车锁在一起，艰难地将巨大的炮管装载到车上，然后用60头公牛拖曳大车。大车嘎吱作响地在起伏延绵的色雷斯乡间蹒跚前进，200人专门负责扶着炮管，还有一队木匠和劳工负责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巨炮以每天2.5英里的速度向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缓缓前进。

---

[1] quoted Hogg，Ian V.，*A History of Artillery*，London，1974，p.16

[2]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40

[3]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37

[4] Gunther of Pairis，*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The Hystoria Constantinopolitana of Gunther of Pairis*，ed. and trans. Alfred J. Andrea，Philadelphia，1997，p.99

[5] quoted Tsangadas，B. C. P.，*The Fortifications and Defense of Constantinople*，New York，1980，p.9

[6] quoted Van Millingen，Alexander，*Byzantine Constantinople*，London，1899，p.49

[7] 指的是当时的高官弗拉维乌斯·君士坦丁，他在狄奥多西二世命令下主持了城墙的修复工作。

[8] 即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

[9] quoted Van Millingen，Alexander，*Byzantine Constantinople*，London，1899，p.47

[10] 即皇帝约翰八世·帕里奥洛格斯。

[11] quoted Van Millingen，Alexander，*Byzantine Constantinople*，London，1899，p.107

[12] 即“可怖的”克鲁姆（？～814），保加尔大公。他巩固了保加尔人与斯拉夫人的联合，并颁布了一部旨在确立封建制度的法典。克鲁姆大大地扩展了保加尔的版图。他与拜占庭帝国交战达5年之久，曾大败拜占庭军队。814年，克鲁姆围攻帝都君士坦丁堡，被拜占庭皇帝利奥五世击败。克鲁姆在这次战斗中死去，保加尔人被迫与拜占庭议和。

[13] quoted Mijatovich，Chedomil，*Constantine Palaiologos：Th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1448-1453*，London，1892，p.50

[14] 阿金库尔战役发生于1415年10月25日，是英法百年战争中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在英王亨利五世的率领下，以步兵弓箭手为主力的英军在法兰西的阿金库尔击溃了由大批贵族骑士组成的法军，为随后在1419年收服整个诺曼底奠定了基础。这场战役成了英国长弓手最辉煌的胜利，在战争史上影响深远。此役还成为后世大量文艺影视作品的主题，包括莎士比亚的名剧《亨利五世》。

[15] 英法百年战争早期的一次战役，1346年，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军队凭借长弓手的强大火力和坚固的防御阵地，在法兰西的克雷西以少胜多，大败法王腓力六世的军队。这使得英格兰在战争早期占了上风。

[16] quoted Hogg，Ian V.，*A History of Artillery*，London，1974，p.16

[17] 菲利普·范·阿尔特维尔德（约1340～1382），佛兰德贵族。1381年，他率领根特市民发动起义，反抗佛兰德伯爵路易二世，起义先小胜后大败，阿尔特维尔德本人战死。他的父亲“智者”雅各布·范·阿尔特维尔德是佛兰德的著名政治家。

[18] quoted Cipolla，Carlo M.，*European Culture and Overseas Expansion*，London，1970，p.36

[19] quoted DeVries，Kelly，*Guns and Men in Medieval Europe，1200-1500*，Aldershot，2002，p.125

[20] 这门大炮得名自佛兰德民间传说中的“疯女格丽特”，据说她曾率领一支娘子军攻打地狱。

[21] 根据《旧约·约书亚记》，约书亚率领希伯来人攻打耶利哥城，在上帝

保佑下吹响号角，城墙就坍塌了。

[22] 土耳其东部城市。

[23] 土耳其北部城市。

[24]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Paris，1870，pp.247-8

[25]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44

[26]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44

[27]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44

[28] 伊玛目是伊斯兰教社会的重要人物。在逊尼派中，伊玛目等同于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指定政治继承人。逊尼派认为伊玛目也可能犯错误，但假如他坚持伊斯兰教的仪式，仍要服从他。在什叶派中，伊玛目是拥有绝对宗教权力的人物，只有伊玛目才能明晓和解释《古兰经》的奥秘含义，他是真主选定的，不会犯错。这里指的是主持礼拜的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是一种荣誉称号。

[29] Chelebi，Evliya，*In the Days of the Janissaries*， ed. Alexander Pallis，London，1951，p.90

[30] 穆夫提是伊斯兰教法的权威，负责就个人或法官提出的询问给出意见。穆夫提通常必须精通《古兰经》、圣训、经注以及判例。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坦布尔的穆夫提是伊斯兰国家的法学权威，总管律法和教义方面的所有事务。随着伊斯兰国家现代法律的发展，穆夫提的作用日益减小。如今，穆夫提的职权仅限于遗产继承、结婚、离婚等民事案件。

[31] 谢赫是阿拉伯语中的一个常见尊称，意指“部落长老”、“伊斯兰教教长”、“智慧的男子”等。

[32] Chelebi，Evliya，*In the Days of the Janissaries*， ed. Alexander Pallis，London，1951，p.90

[33] 1英担相当于50.80千克。

[34] Chelebi，Evliya，*In the Days of the Janissaries*， ed. Alexander Pallis，London，1951，p.91

[35] 古代的一种长度计量单位，相当于从中指尖端到肘部的长度。

[36]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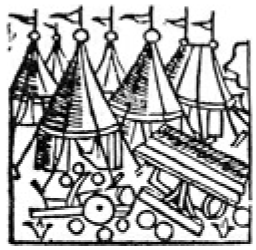
[37]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Paris，1870，p.248

[38]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Paris，1870，p.249

[39]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Paris，1870，p.249

7.浩瀚如繁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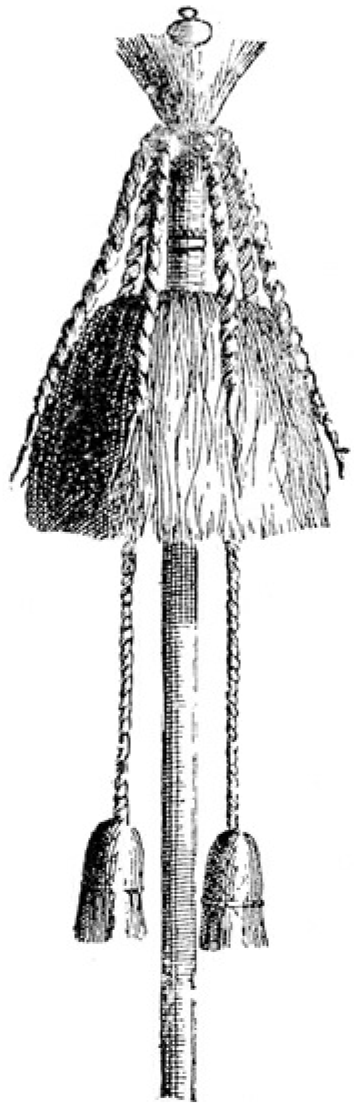
1453年3～4月



它前进时，枪矛如林；它止步时，营帐遮盖大地。[1]

——穆罕默德二世的史官图尔松贝伊如此描绘奥斯曼军队

穆罕默德二世的计划要想完成，不仅需要火炮优势，还需要兵力优势。他决心以压倒性的强大兵力迅速猛攻君士坦丁堡，抢在基督教世界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就把君士坦丁堡彻底打垮。奥斯曼人素来深知，攻城战中兵贵神速。像近卫军战士米哈伊尔（他是当时为奥斯曼人作战的一名战俘）这样得以观察奥斯曼军队的外国人也对此心知肚明：“土耳其皇帝不惜重大代价，快速猛攻和占领城市以及要塞，为的是避免长期围城。”[2] 成功取决于能否在巨大规模上快速地动员人力和装备。



马尾旗：奥斯曼帝国威严的象征

于是，穆罕默德二世在年初发布了传统的征召令。按照古老的部落习俗，苏丹将他的马尾旗树立在皇宫庭院内，宣布即将发动战役。这个讯号发出后，“传令官被派往各行省，命令所有人都前来参加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战役”[3]。奥斯曼帝国的两支军队——欧洲军和安纳托利亚军的指挥结构确保了征召令能够得到即刻回应。根据一整套复杂的契约和征募规则，整个帝国都动员起来。外省的骑兵（他们将组成军队的主力）作为地主，对苏丹负有服兵役的义务，因此必须应征前来，每个人都必须带来自己的头盔、链甲和战马护甲，以及自己的扈从（扈从的数

量由他的地产规模决定）。在骑兵之外，还“从手艺人和农民”[4] 中征募一支季节性的穆斯林步兵部队，军费由全体公民按照一定的比例承担。这些士兵将成为君士坦丁堡战役的炮灰。“两军交锋时，”一个意大利人冷嘲热讽道，“他们就像猪群一样被毫无怜悯地驱赶上前，然后成群地倒毙。”[5] 穆罕默德二世还从巴尔干征召了基督徒辅助部队，主要是斯拉夫人和瓦拉几亚人（他们是帝国的附庸封臣，按照法律规定，有服兵役的义务）。另外他还准备好了精锐的职业军队——著名的近卫军步兵，以及若干骑兵团和相应的炮手、军械匠、卫队和宪兵部队。这些精锐部队能按期领到军饷（三个月发放一次），其武器装备的开支由苏丹个人承担；他们全都是前基督徒，大部分来自巴尔干，幼年时就被掳掠并皈依伊斯兰教。他们只忠于苏丹一个人。虽然他们人数很少（步兵可能不超过5000人），却构成了奥斯曼军队恒久的核心。

战役的动员工作惊人地高效。在穆斯林地区并不需要强拉壮丁，人们会主动报名参军，其积极性让匈牙利的乔治（他此时也是身在奥斯曼帝国的战俘）这样的欧洲人瞠目结舌：

> 开始招兵买马的时候，他们立刻前去报到，如此积极和迅速，就好像他们被邀请去参加婚礼，而不是战争似的。他们按照征召的顺序在一个月内就集结完毕，步兵和骑兵分开，各自有指定的首领，集结的编组也被用于扎营；在备战时……人们热情高涨，争先恐后地报名，愿意代替邻居去服役，那些被留在家里的人感到自己受了冤屈。他们说，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要比在家里寿终正寝强得多……在战争中阵亡的人不会被哀悼，而是被颂扬为圣徒和胜利者，成为世人的榜样，受到极大的景仰。[6]

“人们听说这次战役将是攻打君士坦丁堡，全都蜂拥而至，”杜卡斯补充道，“包括少不更事的孩童和耄耋之年的老人。”[7] 对获得战利品和飞黄腾达的憧憬以及圣战的使命感让他们激情满怀，这些主题密不可分地结合在《古兰经》中：根据伊斯兰教的神圣法律，凡是通过武力攻克一座城市之后，可以在三天之内合法地进行掳掠。辉煌的目标更是让人们更加斗志昂扬：穆斯林普遍相信（尽管这种想法或许是错误的），君

士坦丁堡的红苹果拥有神话般的大量金银珠宝。很多没有受到征召的人也主动来了：志愿兵和自由劫掠者、显贵们的追随者、德尔维希和被古老预言感召的圣徒，他们用先知的训诫和殉道的光荣前景煽动群众。整个安纳托利亚激情如火，记起了，“先知曾许诺和预言，这座巨大城市……将成为信士们的居所”[8]。

人们从安纳托利亚的各个角落蜂拥前来，“从托卡特、锡瓦斯、科马契、埃尔祖鲁姆、甘噶、巴伊布尔特和特拉布宗”[9]赶往位于布尔萨的集结点。欧洲地区的集结点则是埃迪尔内。一支大军逐渐成形：“骑兵、轻步兵、重步兵、弓箭手、弹弓手和长枪兵。”[10]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的后勤机器也隆隆开动，对铠甲、攻城武器、火炮、帐篷、船只、工具、兵器和粮食进行收集、修理或生产。骆驼队在绵延的高原上来回穿梭。奥斯曼人在加里波利维修船只。部队被运送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抵达割喉堡。从威尼斯间谍那里获取了情报。在战役的组织工作上，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与奥斯曼军队相提并论。

2月，奥斯曼人的欧洲军在卡拉加贝伊指挥下开始肃清君士坦丁堡的腹地。君士坦丁堡在黑海沿岸、马尔马拉海北岸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还控制着一些设防的前哨阵地。附近乡间的希腊人撤进了各个要塞。奥斯曼军队将拜占庭的每座要塞都围了个水泄不通。投降的人被释放，没有受到伤害；但也有一些人，比如马尔马拉海边埃皮巴托斯附近一座塔楼的守军则选择了抵抗。奥斯曼军队猛攻了这座塔楼，将守军斩尽杀绝。有些要塞很坚固，没办法迅速攻克；奥斯曼军队就绕过它们，但对其加以监视。关于这些战斗的消息传回了君士坦丁堡，令因为宗教仇隙而内斗不休的市民们愈发惶恐。为了防止君士坦丁十一世率军冲杀出城、扰乱准备工作，奥斯曼军队已经派遣了三个团的兵力对城市进行严密监视。同时，工兵部队在加固桥梁、平整道路，为大炮及重装备（它们在2月份已经在穿越色雷斯）的运输做准备。到3月，一队战船从加里波利起航，驶过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将安纳托利亚部队的主力运往欧

洲。大军开始集中。



一名土耳其近卫军士兵

最后，在3月23日，穆罕默德二世耀武扬威地“率领他的军队，包括骑兵和步兵，穿过乡间，大肆破坏、恣意袭扰，一路带来极大的恐惧和痛苦”[11]。这一天是星期五，对穆斯林来说是一周中最神圣的日子，穆罕默德二世特意选择这一天开拔，就是为了强调此次战役的神圣性。伴随他的有很多宗教人士：“众多乌理玛[12]、谢赫和先知后裔……不断重复祷言……与大军一道前进，策马骑行在苏丹身旁。”[13]穆罕默德二世身边可能还有一位叫作图尔松贝伊的官员，他将记载围城战的始末，这是极其罕见的来自奥斯曼帝国方面的关于此次战役的第一手资料。4月

初，这支大军在君士坦丁堡城下集结完毕。4月1日是复活节，东正教日历中最神圣的一天，市民们带着虔诚与恐惧的复杂心情庆祝了这个节日。午夜，在教堂内，人们用烛光和焚香来宣示复活的基督的神秘。在被黑暗笼罩的城市内，简单但富有魔力的复活节连祷的声音以神秘的四分之一节拍不断升降起伏。教堂大钟被敲响。只有圣索菲亚大教堂一片沉寂，没有东正教徒前来做礼拜。在前几周内，人们“哀求上帝，不要让城市在复活节的神圣一周内遭到攻击”[14]，并从圣像中寻找精神力量。按照习俗和传统，最受尊崇的一幅圣像——“指路圣母像”，这是一幅能够创造奇迹的圣母像——被抬到布雷契耐皇宫，在那里度过复活节的一周。

第二天，奥斯曼先遣部队已经出现在城墙外。君士坦丁十一世派兵出击，与这些敌人对抗。在随后发生的战斗中，一些奥斯曼劫掠者被杀死。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越来越多的奥斯曼士兵出现在地平线上。君士坦丁十一世决定将部队撤入城内。壕沟上的桥梁全部被摧毁，城门紧锁。城市被彻底封闭，静候它的命运裁决。苏丹的军队开始排兵布阵，这些阵势都已经操演熟练，既小心谨慎，又深谋远虑。4月2日，奥斯曼主力部队在离城5英里处停下脚步。它被分为若干部分，每个团都有自己的阵地。随后几天内，大军分批逐步前进，这无情的步步紧逼让观察者想起“奔流入海的大河”[15]。很多史学家都使用了这个比喻来描绘奥斯曼军队难以置信的强大和一刻不停的运动。

围城的准备工作进展神速。工兵们开始将城外的果园和葡萄园夷为平地，以便为火炮开辟出开阔的射击场。他们还挖掘了一条与陆墙相距250码、沿着陆墙全线与之平行的堑壕，堑壕前方筑起了土墙，以抵御炮火。堑壕顶部覆盖了木制框架，以提供防护。在这道防线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将他的主力部队部署到离陆墙1英里处的最终阵地上：“按照惯例，在伊斯坦布尔城外扎营的那天，全军各团分别列队。他在中军，身边簇拥着头戴白帽的近卫军弓箭手、土耳其和欧洲裔弩手、火枪手和炮

手。戴红帽的步兵部队排列在他左右两侧，骑兵压阵。全军以这样的队形进逼伊斯坦布尔。”[16] 每个团都有自己的指定位置：安纳托利亚军在右翼（奥斯曼人以右为尊），指挥官是土耳其将军伊沙克帕夏，他的副将是一名叛教的前基督徒马哈茂德帕夏。基督徒和巴尔干部队则在左翼，由卡拉加帕夏指挥。另外一支庞大队伍则在改信伊斯兰教的希腊人扎甘帕夏统领下，前往金角湾以北的沼泽地带铺设道路，并控制一直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山地，监视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居民点的动静。4月6日（又是一个星期五），穆罕默德二世抵达了精心选择的前沿指挥部所在地——居高临下的马尔特佩山，位于大军的中间，对面就是他认为最脆弱的城墙地段。1422年，他的父皇穆拉德二世也是在这里指挥了攻城战。

城墙上的守军目睹城外平原迅速建起一座帐篷的城市，不禁惊恐万状。据一位作家称，“苏丹的军队人数众多，就像无数沙粒……遮蔽了两片海岸之间的地域”[17] 。奥斯曼帝国的战役准备执行得井井有条，而对具体目标秘而不宣，这种低调更是令人恐惧。拜占庭史学家哈尔科孔蒂利斯[18] 承认：“穆罕默德苏丹的军队和营地秩序井然，粮草充足，扎营时的秩序颇具美感，没有任何混乱和尴尬局面。除了苏丹之外没有任何一位君主能做得到这些。”[19] 锥形帐篷安排得非常整齐清爽，每一群帐篷的中间都是指挥官的营帐，它的主杆上飘扬着显眼的旗帜。在整个营地的中间，人们郑重其事地搭建起穆罕默德二世本人的金红两色刺绣营帐。苏丹的营帐是其尊贵和威严的视觉象征——使苏丹权力具象化，折射出苏丹作为游牧领袖的汗国起源。每位苏丹登基时都会命人为他制作一顶华丽的帐篷，以表现他作为君主的特别之处。穆罕默德二世的营帐位于拜占庭守军弩箭射程之外；按照惯例，在营帐周围建起了木栅，挖掘了壕沟，安放了盾牌；以苏丹营帐为圆心，如同“光晕环绕月亮”[20] 一般部署着他的最为忠心耿耿的部队——“最精锐的步兵、弓箭手和支援部队，以及他的其他私家兵卒，这些士兵是全军的佼佼者”[21] 。这些士兵的任务是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苏丹，整个帝国的安全就寄托

在他们身上。

整个营地的组织工作非常细致。帐篷如海洋一般，顶部飘扬着各色大小旌旗：苏丹本人的金白两色皇旗、他的近卫骑兵的红旗、近卫步兵的绿红两色或红金两色旗帜。旗帜是中世纪军队中权力和秩序的标志。城墙上的观察者还能看得见众位维齐尔和主要指挥官的色彩鲜艳的帐篷，以及不同部队的独特帽子和服饰：近卫军戴着非常突出的白色拜克塔什教派[22]的帽子；步兵头缠红色头巾；骑兵戴着尖顶的头巾式盔帽，身披链甲；斯拉夫人则穿着巴尔干式服装。目睹奥斯曼大军盛景的欧洲人对他们的士兵和装备做了评述。佛罗伦萨商人贾科莫·特塔尔迪声称："他们中的四分之一穿着链甲或者皮甲，其他很多人的装备是法兰西式的，还有匈牙利式的，还有人戴着铁盔，配备土耳其弓弩。其他士兵除了盾牌和弯刀——这是一种土耳其式的剑——没有任何装备。"[23]让站在城墙上的观察者愈发震惊的是，敌人拥有的牲畜数量惊人。"我承认，在军营里的牲口数量常常比人多，以便运输补给和粮食，"哈尔科孔蒂利斯写道，"但是这些人……不仅带来了足以满足运输需求的骆驼和骡子，还把牲畜作为一种娱乐工具，所有人都热衷于展示最好的骡子、马匹或骆驼。"[24]

守军看到敌人忙忙碌碌、用意明显，不禁心生畏惧。黄昏将近时，宣礼员们从营地的数十个地点发出召唤祈祷的呼声，这呼声萦绕回荡在营地上方。人们点燃篝火，准备一天中的唯一一餐（因为奥斯曼军队在作战时生活非常节俭），炊烟随风飘散。两军仅仅相隔250码，城墙上的守军可以听得清敌营的种种声响：喃喃低语声，木槌敲击声，打磨刀剑的声音，马匹、骡子和骆驼的响鼻和嘶鸣声。更糟糕的是，他们或许还能听见敌军中由欧洲人组成的那一翼传来的基督教祷告声。奥斯曼帝国虽然决意打一场圣战，对他们的附庸却非常宽容："尽管他们是苏丹的臣民，他并没有强迫他们摒弃基督教信仰，所以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信仰和祈祷。"特塔尔迪如此写道。奥斯曼军队从基督徒臣民、雇佣

兵、叛教者和技术专家那里得到的巨大帮助成了令欧洲史学家们再三哀叹的主题。“我可以作证，”莱奥纳德大主教咆哮道，“土耳其人那边有希腊人、拉丁人、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波西米亚人和来自其他所有基督教国家的人……如此背弃基督，是多么可憎！”[25] 他的咒骂并不完全公正，因为很多基督徒士兵是作为苏丹的附庸，被强迫参战的。“我们不得不骑马前往伊斯坦布尔，去为土耳其人效力，”[26] 近卫军战士米哈伊尔回忆道，因为如果拒绝服役，就只有死路一条。在被迫参加攻城战的士兵中有一个名叫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年轻的俄罗斯东正教徒。他在俄罗斯南部边疆靠近摩尔达维亚的地区被一支奥斯曼军队俘虏，被迫接受了割礼，以准备皈依伊斯兰教。他所在的部队接近君士坦丁堡时，他开了小差，溜进城市，对后来发生的事件做了生动的描述。

穆罕默德二世麾下的围城军队究竟有多少兵力，没人能说得清。奥斯曼帝国在极其宏大的规模上动员正规军和志愿兵的天赋一次次令他们的对手瞠目结舌、胡乱猜测。为苏丹歌功颂德的奥斯曼史学家简单地将（这种规模）比喻为“钢铁洪流”[27] “浩瀚如繁星”[28] 。目睹这支大军的欧洲人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数字，但都是很大的粗略数字。他们的估算从16万一直到40万都有。得以在近距离观察奥斯曼军队的近卫军战士米哈伊尔的说法更务实一些：“土耳其皇帝为正面交锋动员的兵力不可能有人们传说的那样雄厚。有人说土耳其军队数不胜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统治者都希望知道他的军队究竟有多少人，以便进行组织。”[29] 特塔尔迪的估计数字似乎最为现实，他冷静地计算出：“在围城战中，一共有20万人。其中大约6万人是士兵，其中3万～4万人是骑兵。”[30] 在15世纪，这已经是惊人的数字了，因为阿金库尔战役中英法两军的总数只有3.5万人。如果特塔尔迪的估算接近实际情况的话，奥斯曼军队带来的马匹的数量非常庞大。在6万士兵之外，奥斯曼大军的其余部分是辅助和随军人员：补给队伍、木匠、铸炮工匠、铁匠、军械匠以及“裁缝、糕点师、手艺人、小贩，以及其他为了获利或掳掠战利品而追随军队的人”[31] 。

君士坦丁十一世要统计自己的兵力就简单得多，只需要数一数就行了。3月底，他命令对各城区做一次人口统计，记录“有多少身体健全的人，包括僧侣，以及每个人拥有多少可以用于城防的武器”[32]。在得到统计结果后，他就把计算的工作托付给了他忠心耿耿的大臣和毕生挚友乔治·斯弗朗齐斯。斯弗朗齐斯回忆道：“皇帝召见了我，并说：‘这项任务属于你的职责范围，只有你最适合，因为你有本事进行必需的计算、监督城防的准备工作，并保守秘密。请把这些清单拿回家研究，做出精确的评估：我们究竟有多少手持武器、盾牌、弓和火炮。’”[33]斯弗朗齐斯尽职尽责地进行了计算。“我执行了皇帝的命令，向他呈报了对我方资源的详细估算，计算的结果相当让人灰心丧气。”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城市虽然面积辽阔，守军却只有4773名希腊人和仅仅200名外国人。”[34]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没有利益瓜葛的局外人也主动前来参战，包括“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那些偷偷从加拉塔前来帮助守城的人”，这些人的总数“不到3000”[35]。因此，全城守军只有不到8000人，却要防守长达12英里的城墙。在这不到8000人的守军中，“大部分希腊人不擅长作战，他们使用盾牌、利剑、长枪和弓箭作战时完全是凭本能，而没有任何军事技能”[36]。守军严重缺乏“擅长使用弓弩的人”[37]。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东正教群众能帮多少忙，也很难说。君士坦丁十一世担心兵力如此匮乏的消息如果传播出去，会严重影响士气，因此决定把真实情况隐瞒起来。“真实的数字被当作秘密保守起来，只有皇帝和我两个人知道。”[38]斯弗朗齐斯回忆道。很显然，这场战役的攻防双方力量悬殊。

君士坦丁十一世把真实情况隐瞒起来，开始着手最后的准备工作。4月2日，也就是城门最后一次紧闭的那天，他派遣船只将金角湾的铁链升起，铁链从城内卫城角附近的尤金尼乌斯门一直拉到加拉塔海墙内的一座塔楼上。这项工程由一位名叫巴尔托拉米奥·索利戈的热那亚工程师负责。之所以选择他，或许是因为他能够说服在加拉塔的热那亚同胞，让他们同意将铁链固定在他们的城墙上。这个问题是很有争议的。加拉塔的热那亚居民允许拜占庭人这么做，就可以算是破坏了自己的严

格中立性。如果战事不利，这肯定会招来穆罕默德二世的怒火，但热那亚人还是同意了拜占庭的请求。对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只要有足够的海军力量保护铁链，金角湾沿岸的4英里城墙就几乎不需要部署兵力了。

穆罕默德二世在城外排兵布阵的同时，君士坦丁十一世召开了作战会议，与朱斯蒂尼亚尼和其他指挥官共同商议如何将他的小小军队部署在12英里长的战线上。他知道，只要铁链巩固，金角湾一带就是安全的；他也不是很担心其他地段的海墙。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流非常迅猛，敌人无法轻易地乘船在那里登陆。马尔马拉海沿岸同样有强大的海流，而且岸边浅滩也不利于敌人的登陆作战。最需要关注的是陆墙，尽管它们貌似固若金汤。

双方都知道陆墙的两个弱点。第一个弱点是城墙的中段，即两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门——圣罗曼努斯门和查瑞休斯门之间的那段城墙（被希腊人称为“中墙”）。在这两座城门之间，地势向着里卡斯河谷的方向下降了大约100码。在那里，有涵洞将里卡斯河从城墙下方引入城内。奥斯曼军队在1422年的攻势就聚焦在这一地段。穆罕默德二世将指挥部设在这一段城墙对面的马尔特佩山上，显然是有所图谋。第二个弱点是金角湾附近的那段仅有一层、没有壕沟保护的城墙，特别是两段城墙以直角相接的那个地点。3月底，君士坦丁十一世说服威尼斯桨帆船的船员沿着这段城墙紧急开挖了一道壕沟，但这个地段仍然令人忧心忡忡。

君士坦丁十一世根据具体问题，对自己的部队做了具体部署。他把全城的14个区分为12个军区，并相应地分配了资源。他决定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里卡斯河谷，于是皇帝和苏丹几乎能隔着城墙直接面对面。他把最精锐的主力部队（约2000人）部署在这里。朱斯蒂尼亚尼最初驻扎在北面山岭处的查瑞休斯门，但后来把他的热那亚士兵调往中部，与皇帝会合，并接管了这个关键地段的日常指挥工作。

然后对陆墙的各个地段进行了分配，由“君士坦丁堡的重要人物”[39]指挥。在皇帝的右侧，查瑞休斯门的指挥官可能是卡里斯特斯的西奥多，“一个老当益壮的希腊人，箭术娴熟”[40]。再往北的地段，一直到直角处，被托付给了热那亚的博基亚尔多兄弟，他们“自费前来参战，带来了自己的装备”[41]，包括火枪和威力巨大的大型弩箭；布雷契耐皇宫周围较薄弱的单独一道城墙也大体被交给意大利人防守。威尼斯市政官米诺托亲自住进了布雷契耐皇宫；皇宫塔楼上，圣马可的旗帜和皇帝的旗帜一起飘扬。皇宫的大门之一卡里加利亚门由“来自德意志的约翰”指挥，他其实是苏格兰人，是个职业军人和“能干的军事工程师”[42]。他还有一项任务是管理城内希腊火的供应。

君士坦丁十一世统率的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多国部队，但由于宗教、民族的不同和商业竞争，仍然存在矛盾。为了减少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之间、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间、希腊人和意大利人间的摩擦，他特意将士兵们混编，希望能加强他们之间的互相依赖。他左翼的那段城墙的指挥官是他的亲戚“希腊人西奥菲勒斯，一个来自帕里奥洛格斯家族的贵族，精通希腊文学，而且是几何学专家”[43]。西奥菲勒斯对《伊利亚特》耳熟能详，但对如何防守特洛伊城墙却知之甚少。在接近黄金门的地段，城墙由一群希腊、威尼斯和热那亚士兵防守，陆墙在马尔马拉海岸与海墙相接的那个点则由一名来自拜占庭的坎塔库泽努斯望族的名叫德米特里的贵族镇守。

马尔马拉海岸的守军更加混杂。雅各布·孔塔里尼率领一支队伍驻扎在斯图狄翁村；邻近的那段城墙是敌人不大可能进攻的地段，由一群东正教僧侣负责监视。君士坦丁十一世把一支由叛教的土耳其人（由觊觎苏丹位置的奥尔汗王子指挥）组成的队伍部署在远离陆墙的埃莱夫塞雷港，尽管这些人的忠诚度是非常可靠的，因为假如城市陷落，苏丹一定不会给他们好果子吃。城市北端的海岸由一支加泰罗尼亚队伍驻防，卫城则被托付给伊西多尔红衣主教和他麾下的200人。尽管这一地段有

大海的保护，君士坦丁十一世还是决定给每座塔楼配备两名神射手——一名弓箭手和一名弩手或火枪兵，这说明他对这一带守军的战斗力是多么不放心。金角湾则由热那亚和威尼斯水手防守，指挥官是威尼斯军官特里维萨诺；停在港内的两艘克里特船只的船员则负责把守铁链附近的一座城门——美丽之门。阿卢威克瑟·迪艾多负责保护铁链本身和港内的船只。

为了给他的薄弱“大军”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君士坦丁十一世决定保留一支快速反应的预备队。有两支队伍被保留在离城墙较远的地方，随时待命。其中一支由卢卡斯·诺塔拉斯大公指挥，他是一名技艺娴熟的军人，“在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仅次于皇帝本人”[44]，驻扎在佩特拉区，拥有一百名骑兵和一些轻型火炮。第二支快速反应部队由尼科弗鲁斯·帕里奥洛格斯指挥，驻扎在已经废弃的圣使徒教堂附近的中央山岭上。这些预备队一共有大约1000人。

君士坦丁十一世在这些部署上倾注了他一生的作战和调动军队的经验，但或许他自己也没想到，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些互相竞争的队伍将会打得多么顽强。他把很多关键地段交给外国人防守，因为他是主张东西方教会联合的，不知道城内的东正教信众会不会忠于他。他把四座主要城门的钥匙托付给了重要的威尼斯指挥官，并确保城墙上的希腊指挥官都是宗教上的联合派。卢卡斯·诺塔拉斯可能是反对联合的，所以皇帝特意把他安排在后方，免得他防守城墙时被迫和天主教徒合作。

在君士坦丁十一世努力将他的薄弱兵力部署到4英里长的陆墙上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决断。当初设计三道城墙系统时的设想是有兵力强大得多的部队，可以进行纵深防御，较高的内墙和较低的外墙上都能部署守军。他没有足够的兵力同时防守两道城墙，因此不得不选择在哪一道城墙上抵抗。城墙在1422年的围攻中遭到了炮击，外墙得到了大体修复，内墙却没有修理。在过去的围城战中，守军也曾遇到过同样

的抉择，他们都选择了防御外墙，并且都取得了成功。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围城战专家朱斯蒂尼亚尼选择了同样的战略。在有些地段，这个决定引起了争议。“我一直是反对这么做的，”永远持批评态度的莱奥纳德大主教写道，“我极力敦促不要放弃较高的内墙的防御。”[45] 但他的建议可能是过于强人所难了。

皇帝决心竭尽全力去鼓舞士气。他知道穆罕默德二世害怕天主教国家会援救这座东正教城市，于是决定做一次自己的小规模的武力展示。按照他的请求，威尼斯桨帆船的船员于4月6日上陆，穿着他们显眼的欧洲式铠甲，在陆墙全线游行，“队伍前面举着旗帜……让市民们颇感安慰”[46] 。这是明白无误地让敌人知道，法兰克人也参加了守城。同一天，那些桨帆船也做了作战准备。

穆罕默德二世则派遣一小队骑兵旌旗招展地来到城门前，与守军谈判。按照《古兰经》教法的传统要求，他们先邀请拜占庭人自行缴械投降。《古兰经》称：“派遣使者之前，我不惩罚（任何人）。当我要毁灭一个市镇的时候，我命令其中过安乐生活者服从我，但他们放荡不检，所以应受刑罚的判决。于是我毁灭他们。”[47] 按照这个模式，基督徒守军可以皈依伊斯兰教，举手投降，缴纳人头税，或者选择抵抗，一旦城市被攻破，就将遭到三天的掳掠。拜占庭人早在674年就听到过这种程序化的警告，后来还经历了好几次。他们的回复一直是：“我们不接受人头税和伊斯兰教，也不会将我们的堡垒拱手让出。”[48] 在投降的要求遭到拒绝后，奥斯曼军队就可以认为，他们的攻城得到了神圣法则的批准，于是传令官们在军营中到处宣布，攻城战正式开始了。穆罕默德二世继续将他的大炮运往前线。

君士坦丁十一世决定尽可能多地亲临战场，让士兵们都能看得见他。他的指挥部就是圣罗曼努斯门后的一个大帐篷，每天他都从那里出发，骑着他的阿拉伯种小母马，与乔治·斯弗朗齐斯和西班牙人堂弗朗

西斯科·德·托莱多一起，“鼓舞士兵，检查岗哨，搜寻擅离职守的人”[49]。他无论走到何处，都会在距离最近的教堂做弥撒，并确保每队士兵都有自己的僧侣和教士，以便听取告解和在战场上为临终者做最后的圣礼。他还命令日夜不停地做礼拜，为城市的救赎祈祷；晨祷结束时，人们要抬着圣像在大街小巷以及城墙上游行，以鼓舞士气。城外的穆斯林能看得清基督徒的长胡子，听得见圣歌在春季的空气中回荡。

恶劣的天气对守军的斗志造成了进一步打击。当时发生了一系列轻微地震，还下起了倾盆大雨。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下，很多人自以为看到了预兆，记起了古老的预言。“教堂内的圣像以及廊柱和圣徒雕像出了汗，”史学家克利托布罗斯回忆道，“有人被恶灵附体，受到不吉利幻象的感召，占卜者预言了很多灾难。”[50] 预言没有给君士坦丁十一世本人造成很大困扰，更让他头痛的是敌人大炮的到来。1446年，奥斯曼军队的大炮在五天之内就摧毁了他精心建造的赫克萨米利翁城墙，随后大开杀戒，他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穆罕默德二世凭借卓越的后勤保障能力对装备、物资和雄厚的人力进行了调度协调，现在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他的炮弹、硝石、坑道挖掘装备、攻城武器和粮食都已经收集齐备，做了清点和部署。奥斯曼军队对武器做了清理，将大炮拖曳到指定位置，士兵们（骑兵和步兵、弓箭手和长枪兵、军械匠、炮手、劫掠轻骑兵和坑道工兵）都已经集结完毕，摩拳擦掌。奥斯曼帝国苏丹们对奥斯曼人作为游牧部族的往昔还记忆犹新，非常理解如何去驱动士兵，把他们的热情引导到共同的目标上去。穆罕默德二世熟知如何激励人们的圣战狂热。乌理玛们在军营中来来往往，背诵圣训中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古老预言，以及它对伊斯兰教的重大意义。穆罕默德二世每天都在金红两色帐篷前的地毯上当众朝向东方的麦加方向（也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方向）祈祷。同时，他还许诺，如果能攻克城市，士兵们将得到无限的战利品。信众受到了红苹果的巨大诱惑，满心期待。在为真主的意志效劳的同时还能捞到大量战利

品，这种双重诱惑对以劫掠为生的游牧民族来说是不可抵御的。穆罕默德二世就在这双重许诺的基础上开始准备攻城。

他知道（他的年迈的维齐尔——哈利勒帕夏对这一点的认识更为深刻），必须速战速决。攻城拔寨需要人的牺牲。对攻城的热情和期待，以及用横遭践踏的尸体填满沟壑的意志力都是有时间限制的。意想不到的挫折能够很快导致士气消沉；在如此集中的一大群人中，谣言、异议和不满情绪能够像草原劲风一般快速席卷所有的帐篷；如果战役一直拖到酷夏，哪怕是井井有条的奥斯曼军营也很容易流行伤寒。这次冒险对穆罕默德二世本人来说也是很危险的。他通过威尼斯间谍的网络得知，不管基督教各国是多么耽于争吵和四分五裂，西方最终还是会从陆路或海路驰援君士坦丁堡。他从马尔特佩的小山上仰视起伏的陆墙和排布紧密的塔楼以及三道防御体系，回忆起它们在历史上表现出的固若金汤。他在公共场合或许会宣称自己坚信士兵们的英勇，但他的最终希望还是寄托在大炮上。

对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时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守军的图谋非常绝望而简单。他们无力发动反击来解除围困。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坚持足够长的时间，等待西方的援军强行打破封锁。他们在678年曾经抵挡住了阿拉伯人，现在也必须坚守。

如果说君士坦丁十一世有一张王牌的话，那就是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这个人。这个热那亚人来到君士坦丁堡之前，市民们就早已熟知他作为“久经沙场的老将”[51]的威名。他懂得如何对防御工事的明显弱点进行评估和弥补，如何最有效地使用投石机和火枪这样的防御武器，以及如何让有限的兵力发挥最大的效力。他将守城战的高超本领传授给守军，并考虑了从城市的侧门发动反击的可能性。意大利各城邦之间的残酷战争造就了朱斯蒂尼亚尼这样才华横溢的军事家和技术型雇佣兵，他们把城防当作一门科学和艺术来研究。但朱斯蒂尼亚尼此前从未经历过

大规模的炮击。即将发生的事件将在最大限度上考验他的本事。

---

[1]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315

[2] Mihailovich，Konstantin，*Memoirs of a Janissary*，trans. Benjamin Stolz，Ann Arbor，1975，p.177

[3]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62

[4] quoted Imber，Colin，*The Ottoman Empire：1300-1650*，Basingstoke，2002，p.257

[5] quoted Imber，Colin，*The Ottoman Empire：1300-1650*，Basingstoke，2002，p.277

[6] quoted Goodwin，Jason，*Lords of the Horizons：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London，1999，p.66

[7]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62

[8] Khoja Sa'd-ud-din，*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trans. E. J. W. Gibb，Glasgow，1879，p.16

[9] Chelebi，Evliya，"Le Siège de Constantinople d'après le Seyahatname d'Evliya Chelebi，" trans. H. Turkova，*Byzantinoslavica*，vol. 14，1953，p.2

[10]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38

[11]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39

[12] 乌理玛的阿拉伯文原意为学者，是伊斯兰教学者的总称。任何一位了解古兰经注疏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及有系统的宗教知识的学者，都可被称为乌理玛。它被用来泛指伊斯兰社会中所有的知识分子，包括阿訇、毛拉、伊玛目等。

[13] Khoja Sa'd-ud-din，*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

Tevarikh ，trans. E. J. W. Gibb，Glasgow，1879，p.17

[14]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Paris，1870，p.262

[15] quoted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xx

[16] Tursun Beg，*The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 ，trans. Halil Inalcik and Rhoads Murphey，Minneapolis and Chicago，1978，p.34

[17] Sphrantzes，George，*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he Sphrantzes Chronicle* ，trans. Margaret Carroll，Amsterdam，1985，p.47

[18] 拉奥尼科斯·哈尔科孔蒂利斯（约1423～1490），拜占庭史学家。他的著作是研究拜占庭末期和奥斯曼帝国崛起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19] quoted Goodwin，Godfrey，*The Janissaries* ，London，1994，p.70

[20]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316

[21]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41

[22] 拜克塔什教派是伊斯兰教的一派，受到苏非派的影响，混合了逊尼派、什叶派和苏非派的神学观点，具有神秘主义特点，历史上主要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流行。这一派在奥斯曼近卫军中势力很大。1826年，奥斯曼帝国发起改革，裁撤了近卫军，拜克塔什教派也一度被禁止。

[23]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176

[24]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5

[25]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130

[26] Mihailovich，Konstantin，*Memoirs of a Janissary* ，trans. Benjamin Stolz，Ann Arbor，1975，p.91

[27] quoted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 1 vols., Milan, 1976, p.xx

[28] quoted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 1 vols., Milan, 1976, p.xx

[29] Mihailovich, Konstantin, *Memoirs of a Janissary* , trans. Benjamin Stolz, Ann Arbor, 1975, p.175

[30]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 1 vols., Milan, 1976, pp.175-6

[31] quoted Mijatovich, Chedomil, *Constantine Palaiologos*: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 *1448-1453* , London, 1892, p.137

[32] Sphrantzes, George, *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he Sphrantzes Chronicle* , trans. Margaret Carroll, Amsterdam, 1985, p.49

[33] Sphrantzes, George, *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he Sphrantzes Chronicle* , trans. Margaret Carroll, Amsterdam, 1985, pp.49-50

[34] Sphrantzes, George,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 ,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 Amherst, 1980, p.69

[35]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 Paris, 1823, p.38

[36]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 1 vols., Milan, 1976, p.146

[37]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 Paris, 1823, p.38

[38] Sphrantzes, George,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 ,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 Amherst, 1980, p.70

[39]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p.19

[40]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 1 vols., Milan, 1976, p.148

[41]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27

[42] Sphrantzes，George，*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trans. Marios Philippides，Amherst，1980，p.110

[43]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148

[44]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19

[45]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p.152-4

[46]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p.19-20

[47] *Koran*，*The*，trans. N. J. Dawood，London，1956，p.198

[48] Chelebi，Evliya，“Le Siège de Constantinople d'après le Seyahatname d'Evliya Chelebi，” trans. H. Turkova，*Byzantinoslavica*，vol. 14，1953，p.3

[49] Doukas，*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trans. Harry J. Magoulias，Detroit，1975，p.217

[50]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37

[51]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40

8.世界末日的恐怖号角

1453年4月6～19日



何人的口舌能够言说此等灾难与恐惧？[1]

——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

大炮被装在圆盘轮的大车上，在从埃迪尔内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泥泞道路上冒着春雨缓缓前进，花了很长时间才抵达前线。老远之外就能听见它们行进的嘈杂。拖曳大车的公牛艰难地挣扎，大声吼叫；赶车的人们呼喊着；嘎吱作响的车轴发出持续不断、音节单调的音乐，如同恒星放射出的诡异声波。

大炮抵达前线后，又花了很长时间用起重机械将每一门大炮从车上卸下，部署就位，并调整好射角。到4月6日，只有一些轻型火炮准备就绪。它们对城墙发动了第一轮炮击，但显然收效甚微。在战斗打响后不久，一支热情高涨的奥斯曼非正规部队向里卡斯河谷的薄弱城墙地段发动了一次零乱的进攻。朱斯蒂尼亚尼的士兵从城墙上冲杀出来，把入侵者打得抱头鼠窜，“杀死了一些敌人，还打伤了一些”[2]。奥斯曼军队不得不发动一次相当规模的反击，迫使守军回到城墙上，才恢复了秩序。这次最初的失败让苏丹更加坚定了决心——等待炮兵完全部署就绪，而

不是贸然进攻，损耗士气。

在此期间，他开始执行奥斯曼军队攻城战术的另一套策略。工兵们隐藏在泥土壁垒之后的地堡内，开始在城墙中段之外挖掘地道；他们的目标是挖掘一条长250码的地道，一直通到城墙脚下，然后从地下将城墙炸塌。苏丹还命令士兵们开始“将石头、木料、泥土送往前线，并聚集所有其他种类的物资”[3]，选择合适的地点，尝试将城市的壕沟填平，为大规模攻势铺平道路。这项工作非常危险，甚至是致命的。壕沟离有人据守的城墙只有40码远，没有任何防护，城墙守军可以对壕沟处的人随意扫射，除非用猛烈的火力压制住城墙守军。双方将为争夺每一个立足点或可供推进战线的地域而展开激烈厮杀。朱斯蒂尼亚尼对地形做了研究，开始采取措施，扰乱奥斯曼人的行动。守军多次发动突袭，并在夜色掩护下进行伏击；他们“冲出城门，袭击城墙外的敌人”[4]。他们从壕沟中跳出，有时会被打退，有时则能俘虏土耳其人，从他们口中榨取情报。争夺壕沟的这些小规模战斗很有效，但守军很快就无法接受兵力损失的交换比了。不管能杀死多少土耳其人，己方死亡的每一名战士都是严重的损失，于是在战役早期守军就决定尽量不再出击，而主要从城墙上防守，“有的人用弩箭射击，其他人用普通的弓”[5]。争夺壕沟的战斗将成为这场战役的一场激烈角逐。

4月7日之后的时间里，苏丹一面焦躁不安地等待重炮送抵，一面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奥斯曼军队横扫色雷斯时，将途经的村庄全部占领，但还有少数孤立的要塞仍然在坚守。穆罕默德二世绕过了这些要塞，只留下少量兵力予以监视。大约在4月8日，他派遣了一支相当规模的队伍和一些火炮去攻打希拉比亚要塞（位于割喉堡远方、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座山上）。希拉比亚要塞抵抗了两天，直到奥斯曼军队的大炮将防御工事全部摧毁并杀死了大部分守军。剩余的人“无力继续抵抗，举手投降，表示愿意听从苏丹发落。于是他把这40人全部穿刺在尖木桩上”[6]。马尔马拉海岸边斯图狄乌斯处的一座类似的城堡也很快被

炮火摧毁。这一次，有36名不幸的俘虏被穿刺在城墙外的尖木桩上。

几天后，穆罕默德二世的海军统帅巴尔托格鲁率领部分舰船占领了马尔马拉海中的王子群岛，拜占庭皇族在动荡时期常常选择在这里躲避。在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王子岛上有一座巩固的要塞，驻有“30名重武装士兵和一些当地人”[7]，他们拒不投降。炮火未能让他们屈服，于是巴尔托格鲁的部下在要塞城墙外堆积了大量柴火，放火烧城。在沥青、硫黄和大风的助威下，大火侵袭了塔楼，城堡本身很快起火。没被烧死的人只得无条件投降。投降的士兵被就地处决，村民则被卖为奴隶。

到4月11日，穆罕默德二世返回了金红帐篷，此时全部大炮都已集结完毕。穆罕默德二世把它们分组为14或15个炮兵连，部署在城墙沿线较为薄弱的关键点上。乌尔班的大炮之一（“一门恐怖的大炮”[8]）被部署在金角湾附近布雷契耐的单一城墙前，这段城墙“没有壕沟或外墙的保护”[9]。另外一门大炮被安置在两段城墙的直角相接处，第三门则在更南面的泉源之门处。其他大炮则被拖曳到薄弱的里卡斯河谷沿线的关键地点。乌尔班的超级巨炮（希腊人称之为“皇家大炮”）被部署在苏丹营帐前方，直接威胁圣罗曼努斯门——“全城最薄弱的城门”[10]。苏丹从他的营帐处就可以对巨炮的表现做出评估。每门重炮都得到一些较小的火炮的支持，组成一个炮兵连，奥斯曼炮手们亲切地把它们称为“带着小崽子的大熊”。这些火炮发射的石弹的重量从200磅到1500磅不等，乌尔班的超级巨炮配备的就是1500磅的巨型石弹。根据一位目击者的估测，最大的两门炮所发射炮弹的高度“分别有人的膝盖和腰那么高”[11]。另外一名观察者则声称，最大的炮弹“周长达到我手掌长度的11倍”[12]。虽然目击者谈及了“不计其数的作战机械”，但穆罕默德二世可能一共拥有约69门大炮——按照当时的标准这是一支极其庞大的炮兵部队，同时还有一些技术上更为古老的投石机械，比如杠杆抛石机，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抛射石弹的攻城武器。杠杆抛石机在300年前穆斯林军队攻

克十字军城堡的战斗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现在却已经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旧事物。

安装大炮和准备射击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炮管是独立式的，没有成套的炮车。运输的时候，只是简单地将炮管捆缚在坚固的大车上。奥斯曼军队在前线有土墙保护的地段修建起倾斜的木制平台，并在其前方树立木栅栏，以抵御敌人的火力，木栅栏上有带铰链的门，开炮前要将门打开，炮弹就穿过这个门飞出；炮管运抵前线后，要搭建一个巨大的滑车装置将炮管安放到平台上。

大炮需要极其繁杂的后勤支持。在黑海北岸，奥斯曼人开采了数量巨大的黑色石料，并将其制作成炮弹的形状，然后用商船将它们运往前线。4月12日，这样一支船队抵达了双柱港，送来了“大炮所需的石弹、栅栏和木料，以及军营所需的其他弹药”[13]。如果要长期射击，还必须征用相当数量的硝石。穆罕默德二世命令扎甘帕夏修建一条绕过金角湾尖端、通往港口的道路，应当就是为了加快这些补给物资的运输。运输大炮本身需要大型的木制大车以及大量人员和公牛。和乌尔班一起在埃迪尔内铸造大炮的工匠同时也是炮手。他们亲自运送自己的劳动成果，将其部署到位，装填炮弹，发射，并就地维修。乌尔班巨炮虽然是在150英里之外制造的，奥斯曼军队却把大量资源带到了前线，足以对现有的火炮进行改造，甚至可以锻造或铸造新的火炮。所以，除了攻城士兵之外，工匠们也非常活跃。大量的铁、铜和锡被带到了前线；劳工们挖掘了半球形的木炭坑，建造了砖砌的熔炉。军营内的一个单独区域被改建成临时的工业作坊，那里黑烟滚滚，铁匠们锤音叮咚。

为大炮做战斗准备需要时间和对细节的高度重视。火药被装入炮管，然后向炮管内填入木制或羊皮制的炮塞，用铁棒压紧，以确保“无论何种情况，除了受到火药爆炸的冲击力外，炮塞绝对不会飞出炮膛”[14]。然后炮手们将石弹抬到大炮前端，小心翼翼地填入炮膛。炮弹被

设计成与炮膛匹配，但口径很难做到完全相符。炮手们通过“某些技术和对目标的计算”（在实践中其实就是试射并不断调整）进行瞄准；通过用木楔垫高炮台来调整俯仰射角。另外还要用巨大的木梁将大炮垫放到位，同时用石块压住木梁，以吸收后坐力，“以免火药爆炸的冲击力和猛烈的后坐力使得大炮偏离正确位置，导致射偏”[15]。起爆火药被填入火门，射击准备就完成了。4月12日，在4英里的正面上，苏丹的炮手们将火把凑近火门，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集中炮击拉开了帷幕。

如果说在战争史上有这样一个时刻能够让人们真切地对火药的强大威力心生敬畏的话，那就是1453年春季奥斯曼大炮开始轰鸣的时刻。根据当时的记载：

> 火药被点燃后，瞬间就发出一声可怕的轰鸣，脚下的大地猛烈颤动，一直传播到远方，那噪音是闻所未闻的。然后是恐怖的雷鸣般巨响和可怖的爆炸，火焰照亮和炙烤了周边的万物，木塞子被干燥空气的炽热爆炸冲出，石弹被强大的冲击力推出。难以置信的力量驱使着石弹呼啸而去，击中了城墙，当即将城墙撼动和击毁。石弹本身则被炸裂为无数碎片，碎片四处乱飞，附近站着的人无不死于非命。[16]

巨大的石弹击中较薄弱地段的城墙时产生的效果是毁灭性的：“有时它能将整段城墙摧毁，有时能打垮一半，有时能或多或少地摧毁部分塔楼，或一堵胸墙。没有任何一段城墙足够巩固或厚实，能够抵挡这威力，或者完全不受石弹力量或速度的影响。”[17]起初，守军感到，攻城战的整个历史都在他们眼前展开了。狄奥多西陆墙是两千年来防御工程演化的结晶，是人类智慧所能构建的工程学奇迹，而且得到上帝的保佑；而现在，城墙在遭到一连串瞄准精确的炮弹轰击后就开始坍塌了。莱奥纳德大主教在皇宫附近观察了大炮对单一城墙进行轰击的效果：“他们用炮弹将城墙炸为齑粉。尽管它非常厚实和坚固，还是在这可怕机械的轰击下倒塌了。”[18]

轰击城墙的超级大炮发射的炮弹可以穿越1英里的距离，直接射进

君士坦丁堡的心脏，以可怕的力量摧毁房屋或教堂，将平民成群地打倒，或者将他们活埋在萎缩了的城市的果园和田野上。一名目击者震惊地发现，一发炮弹击中了一座教堂的墙壁，令它当场土崩瓦解。还有人说，方圆2英里内的大地都在震颤，甚至安全地系牢在金角湾港口的桨帆船的坚固木制船体也受到了这震动的影响。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5英里远的亚洲也听到了炮声。与此同时，抛射轨迹更为弯曲的杠杆抛石机也开始将石块投掷到城墙后方的屋顶上，并射中了皇宫的部分建筑。

最初，炮击对守军的心理效果甚至比实际效果更为强大。大量集中的火炮产生的噪音和震动、浓厚的烟雾和石弹撞击石墙产生的巨大冲击力让久经战阵的老兵也不禁胆寒。对于平民来说，这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预告和对他们罪孽的惩罚。按照一位奥斯曼史学家的说法，炮声“如同世界末日的恐怖号角”[19] [20] 。人们跑出自己的房屋，锤击胸膛，画十字架，呼喊着：“主啊，怜悯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有妇女在街上晕倒。教堂内挤满了信徒，他们“请愿、祈祷、哀号和高呼：‘主啊！主啊！我们远离了你。我们的遭遇和你的圣城遭到的苦难，全都是对我们罪孽的公正惩罚。’在忽闪的烛光下，人们跪在最神圣的圣像前，持续不断地祈祷着：‘在最后关头，不要把我们抛弃给你的敌人；不要灭杀你的有德的人民；不要取走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在这时节虚弱。’”[21]

君士坦丁十一世竭尽全力，通过务实的工作和宗教的慰藉去维持城内的士气。他每个钟头都要巡视城墙，鼓舞指挥官和士兵们的斗志。教堂钟声响个不停，他告诫“全体人民，教导他们不要放弃希望，坚持不懈地抵抗敌人，全心地信任全能的上帝”[22] 。

守军尝试了很多方法来减轻石弹的冲击力。他们向城墙外表面泼下了白垩和砖灰混合而成的灰泥，给城墙增加一层保护。他们还在一些地方悬挂了带有成捆羊毛的木梁、成片皮革，甚至珍贵的挂毯，以吸收石

弹的部分冲击力。但火药的推进力十分强大，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守军尽了最大努力，尝试用自己的少量火炮去摧毁敌人的大炮。但他们缺少硝石，而且奥斯曼军队的大炮有木栅的保护。更糟糕的是，他们发现，城墙和塔楼不适合做炮台。它们不够宽阔，无法承受大量火药爆炸产生的后坐力；也不够坚固，无法抵御震动，因为“开炮时城墙会撼动，大炮对己方城墙的破坏要比对敌人的杀伤更为严重”[23]。他们最大的火炮很快炸膛了，这让饱受折磨的守军怒不可遏，他们怀疑炮长是苏丹的卧底，想把他处死，“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他应得这样的处罚，于是把他释放了”[24]。最重要的是，守军很快发现，在战争的新时代里，狄奥多西城墙在结构上是不完善的。

希腊史学家们努力将他们目睹的情形付诸笔端，但甚至找不到合适词汇来描述大炮。“这种装置没有自古就有的名称，”头脑专注于古典时代的克利托布罗斯宣称，“除非把它称为某种攻城锤或攻城器。但在日常语言中，大家都把它称为‘器械’。”[25]其他名字也四处传扬：射石炮、破城者、攻陷城市者、梦魇，不一而足。在压力极大的时刻，一种新的可怕现实（大炮轰击的地狱般场景）改变了人们的语言。

穆罕默德二世的战略是打一场消耗战，尽管他自己也颇为焦躁。他决定用炮火日夜轰击城墙，并不断发动没有规律可循的小规模攻击，以拖垮守军，为最后的总攻打开缺口。“袭击日夜进行，没有间歇，有两军交锋，有爆炸，以及石块和炮弹对城墙的轰击，”梅里西诺斯记述道，“我们兵力远逊于他，因此苏丹希望用持续炮击炸死我们，拖垮我们的精神，用这种方法轻松地拿下城市。于是他不给我们一刻休息的时间。”[26]炮击和争夺壕沟的战斗从4月12日一刻不停地持续到18日。

大炮虽然在最初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震慑，但操纵它们却是非常艰难的工作。皇家大炮的装填和瞄准需要花费很大力气，所以每天只能发射七次，黎明前会先打一发，以警示敌人，这一天的炮击开始了。火炮的

表现难以预测，容易误伤炮手。在春雨中，要把大炮固定在阵地上都很困难。后坐力非常大，大炮就像狂暴的犀牛一样向后猛冲，常常脱离炮台，陷入泥浆。如果不多加小心，附近的人就可能被大炮压死；如果炮管炸膛，站在周边的人就极有可能粉身碎骨。皇家大炮很快就让乌尔班忧心忡忡。火药爆炸产生的高温开始在不够纯净的金属上产生发丝般的裂纹。显然，铸造如此庞大的火炮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希腊史学家杜卡斯对这个技术问题非常感兴趣，回忆说，为了控制这个问题，在炮弹发射出去之后，炮手就立刻用温热的油浸泡炮管，以阻止较冷的空气进入、扩大裂纹。

但炮管可能会像玻璃一样炸得粉碎的危险继续困扰着乌尔班。根据传说，这个基督徒技术雇佣兵很快就遭到了报应。他仔细检查后发现，炮管裂缝的确非常严重，于是希望把这门大炮撤走，重新铸造。一直在前线观察大炮表现的穆罕默德二世急于求成，命令继续射击。与大炮炸膛相比，乌尔班更害怕苏丹的不悦，于是重新装填了大炮，并请穆罕默德二世站远些。点燃火药后，皇家大炮“开炮时炸得四分五裂，碎片乱飞，打死打伤附近多人”[27]，包括乌尔班自己。有很有力的证据表明，乌尔班不是这么死的（基督徒史学家们恨不得他早死早好），但很显然，他的超级大炮在战役初期就毁坏了。奥斯曼军队迅速用铁圈对它进行了加固，重新投入作战，但它很快又炸膛了，这令穆罕默德二世暴跳如雷。这门超级大炮显然超越了当时冶金技术的极限。它的主要效果是对拜占庭人的心理震慑；造成实际破坏的是尺寸较小但仍然威力惊人的其他射石炮。

不久，匈牙利人匈雅提·亚诺什派来了使者，使得穆罕默德二世速战速决的需求愈显突出。穆罕默德二世的政策一直是对他的各个敌人分而治之；因此他与当时的匈牙利摄政王匈雅提签订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和约，以确保在他攻打君士坦丁堡期间不会遭到西方的陆路进攻。匈雅提的使者来到奥斯曼宫廷，向苏丹宣布，他们的主公匈雅提已经辞去了摄

政王职位，还政于他的被监护人——国王拉斯洛五世，和约不再有效。因此匈雅提希望将和约文本返还，并收回苏丹手中的那份和约。狡猾的匈牙利人以此向奥斯曼帝国施压，并且可能是受了梵蒂冈方面的唆使。苏丹不得不考虑，匈牙利军队有可能会渡过多瑙河，前来援救君士坦丁堡，这在奥斯曼军营中也掀起了不安的波澜。这消息当然加强了守军的信心。

不幸的是，匈牙利人的来访也让拜占庭人产生了猜疑，于是流传开了这样一条无法证实的谣言：到访的匈牙利人向奥斯曼帝国提供了重要支持。其中一名到访的匈牙利使者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大炮的发射。当他看见一发炮弹击中了城墙的某个地段，同时炮手们装填第二发炮弹，准备轰击同一地段时，他因为对炮兵技术感兴趣，大笑炮手们的幼稚。他建议炮手们将第二发炮弹瞄准“离第一发炮弹的弹着点30～36码的地方，但高度相同”，第三发炮弹则瞄准前两发的弹着点中间的位置，以便“让三发炮弹的弹着点形成一个三角形。那段城墙就会倒塌”[28]。这种射击策略能够加快摧毁城墙的速度。很快，“带崽子的大熊”就开始紧密协调和配合。由较小的火炮在已经削弱不少的中段城墙上打出三角形的两个底点，然后由一门乌尔班巨炮完成这个三角形：“魔鬼般的力量和不可阻挡的动力将炮弹射往城墙，造成了不可修复的破坏。”[29]史学家们围绕匈牙利人的这条良策编织出了一个奇怪的解释：一位塞尔维亚预言家曾宣称，在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之前，基督徒的苦难不会终结。关于匈牙利人来访的故事凸显了基督徒的几个固执观念：奥斯曼军队只有得到了欧洲人的优越技术知识，才能得胜；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由于基督教世界的衰败；宗教预言仍然在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

虽然大炮的瞄准有困难，而且射速很慢，炮击还是从4月12日一刻不停地进行了6天之久。现在最凶猛的火力被集中到里卡斯河谷一带的城墙和罗曼努斯门。每天能向城市发射约120发炮弹。城墙不可避免地开始坍塌。一周之内，外墙的一段、两座塔楼以及它背后内墙的一座炮

塔就崩溃了。但是，尽管守军起初被炮击吓得肝胆俱裂，但在火力之下却渐渐恢复了信心：“我们的士兵每天感受苏丹战争机器的强力，已经见怪不怪，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或怯懦。”[30] 朱斯蒂尼亚尼毫不松懈地修理破碎的城墙，很快就想出了有效解决外墙坍塌问题的办法。他命人用尖木桩建起了临时壁垒，然后守军在此基础之上堆砌手头能搞得到的任何东西。石块、木料、木柴、灌木和大量泥土被运去封锁城墙的缺口。为了防止木制的临时壁垒被火箭烧毁，还在它的外表面覆盖了兽皮；临时壁垒达到足够高度后，守军在它顶端每隔一段距离就安放一些装满泥土的木桶作为城堞，以保护守军免受奥斯曼军队弓箭和火枪的扫射。为了修补城墙，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天黑之后，男女市民前来干活，整夜搬运木料、石块和泥土，努力填补白天被打破的防御工事。这种持续的夜间劳动让越来越疲惫的市民愈发劳顿，但他们建成的泥土工事抵御石弹的毁灭性冲击力却惊人地有效。石弹落到泥土工事上，就像石子被抛到烂泥里一样，失去了效力：炮弹“被埋在松软和易变形的泥土中，不像撞击坚硬的石墙那样能够打开缺口”[31] 。

同时，争夺壕沟的激烈战斗仍在继续。奥斯曼军队在白天努力将壕沟填满。他们在火力掩护下，将手头能搞得到的所有东西——泥土、木料、瓦砾甚至（根据某种记载）他们自己的帐篷——都拖运到无人地带，然后倾倒进壕沟。夜间，守军从小门出击，将壕沟里的东西清理出来，使它恢复原先的深度。城墙前的小规模战斗非常惨烈，而且是近距离的白刃战。有时土耳其人会试图用网将滚入壕沟的珍贵炮弹回收；有时他们会对被削弱的城墙发动试探性进攻，确保承受极大压力的守军没有任何机会休息。他们还试着用带钩子的木棒将临时壁垒顶端的装满泥土的木桶拽下来。

在近距离交战中，铠甲质量更好的守军比较占便宜，但就连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也对敌人在战火下的英勇印象深刻。“土耳其人在近距离作战中打得非常勇敢，”莱奥纳德回忆道，“所以他们全都死了。”[32] 城墙

上的守军用长弓、劲弩和火绳枪扫射下方，令土耳其人损失惨重。守军发现自己的火炮无法发射重型炮弹之后，就把它们改装成巨型霰弹枪。他们给一门火炮装填五或十个胡桃大的铅球。这些炮弹在近距离攻击中的效果是惊人的：它们“穿透力极强，如果一发铅弹击中一名身披铠甲的士兵，能够直接击穿他的盾牌和身躯，然后击穿站在他身后的人，然后还能再打死一个人，直到火药的力量耗尽。一发铅弹能同时杀死两三个人”[33]。

奥斯曼士兵遭到如此凶悍的火力袭击，伤亡非常惨重；他们去回收己方死者的尸体时，又给守军提供了一个大开杀戒的良机。威尼斯外科医生尼科洛·巴尔巴罗被自己亲眼所见的情景惊呆了：

> 有一两人被击毙后，随即就会有其他土耳其人上前，将死者尸体搬走。他们会将尸体扛在肩上，就像扛猪一样，也不管自己离城墙是多么近。但我们在城墙上的人用火枪和弩弓向他们射击，瞄准搬运战友尸体的土耳其人，把他打倒在地，然后会有其他土耳其人来搬运尸体，丝毫不畏惧死亡，宁愿死去十个人，也不愿让一具土耳其人的尸体留在城墙前，因为那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耻辱。[34]

守军尽了最大努力，但奥斯曼士兵还是在无情炮火的掩护下，将里卡斯河谷的一段壕沟填平了。4月18日，穆罕默德二世判断，对城墙的破坏和对敌人的消耗已经使得发动集中总攻的时机成熟。这一天春光明媚。暮色降临时，奥斯曼军营回荡起召唤人们祈祷的呼声，带着一种平静的确定性；在城墙内，东正教徒们来到教堂参加守夜，点燃蜡烛，向圣母祷告。两个钟头之后，在温和的春季月光下，穆罕默德二世命令他的一支相当规模的精锐部队开始前进。士兵们敲响骆驼皮制成的战鼓，奏响笛子和铙钹（这是奥斯曼军队以音乐为武器的心理战），火光照耀，呐喊连连。穆罕默德二世开始鞭策“重步兵、弓箭手、标枪手和全部近卫步兵”[35]前进。他命令部队进攻里卡斯河谷里的一个薄弱点，那里的陆墙有一段已经崩塌。市民们第一次亲耳听到奥斯曼军队大举进攻时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不禁惊慌失措。“我无法描述他们向城

墙冲锋时发出的呼喊声。”[36] 巴尔巴罗后来战栗地写道。

君士坦丁十一世高度紧张。他害怕敌人会发动全线总攻，并且深知他的部下准备不足。他命令敲响教堂大钟。惊恐万状的群众跑上大街，士兵们则匆匆赶回自己的阵地。奥斯曼军队在大炮、火枪和弓箭的猛烈火力的掩护下越过了壕沟。他们的火力非常强大，守军根本无法在临时搭建的土墙上立足，因此奥斯曼近卫军得以携带着云梯和攻城锤抵达城墙脚下。他们把城墙上的防护城堞都拆除，让守军进一步暴露在地毯式火力之下。同时他们还尝试将木制栅栏烧毁，但未能成功。城墙缺口很狭窄，而且地势倾斜，进攻者的冲锋很不顺利。根据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说法，在黑暗中双方厮杀成一团，非常嘈杂和混乱：

> 大炮和火绳枪的轰鸣声、教堂大钟的咆哮、兵器碰撞声混成一片，枪口焰如同闪电，人们（城内的妇女儿童）的哭喊和呜咽让人相信，天与地已经相接，都在颤抖；如此吵闹，完全听不清别人的说话声。哭泣和尖叫、人们的哀号和抽噎、大炮的怒吼和教堂钟声混合成雷鸣般的巨响。很多地方起火，浓烟滚滚，再加上大炮和火绳枪发出的黑烟，双方阵线上的浓烟都越来越厚，遮蔽了整座城市。两军都看不见对方，也不知道自己在打的是谁。[37]

在皎洁的月光下，双方在小路的狭窄空间内互相砍杀。甲胄较好的守军在朱斯蒂尼亚尼的勇敢指挥下占了上风。进攻者的势头渐渐衰弱了：“他们被砍成碎片，兵力在城墙上消耗殆尽。”[38] 四个小时的鏖战后，城墙上突然一下子安静下来，只有躺在壕沟内的垂死者的呻吟打破这平静。奥斯曼军队“完全不管丢弃的尸体”，收兵回营了。守军则在持续六天的死战之后终于“像死人一样瘫倒在地”。次日清晨，君士坦丁十一世及其随从前来视察城墙。壕沟及其两岸堆满了“残缺不全的尸体”。攻城锤被抛弃在城墙下，火焰还在燃烧。军队和市民都已经筋疲力尽，君士坦丁十一世没法让他们去安葬死去的基督徒，于是这个任务被交给了僧侣。和以往一样，各方面估计的伤亡数字相差极大：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声称奥斯曼军队有1.8万人死亡；巴尔巴罗给出的数字（200

人）更为现实。君士坦丁十一世命令不准阻挠敌人回收他们的死者尸体，但烧毁了攻城锤。然后他带领教士和贵族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向“全能的上帝和最纯洁的圣母感恩，希望邪恶的异教徒在蒙受如此惨重的损失之后，能够自行退去”[39]。城市获得了一个喘息之机。穆罕默德二世的回应则是进一步加强炮击。

---

[1]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45

[2]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41

[3]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46

[4]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Paris，1870，p.266

[5]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Paris，1870，p.266

[6]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47

[7]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48

[8]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130

[9]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1823，p.18

[10]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in English）*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New York，1969，p.30

[11]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43

[12]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130

[13]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15

[14]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45

[15]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45

[16]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45

[17]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45

[18]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130

[19] 典出《古兰经》第36章。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在末日审判时，死人将复活。这个说法与基督教类似。

[20] Khoja Sa'd-ud-din，*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trans. E. J. W. Gibb，Glasgow，1879，p.21

[21]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p.33-5

[22]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35

[23]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p.46

[24]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p.47

[25]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46

[26] Sphrantzes，George，*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he Sphrantzes Chronicle*， trans. Margaret Carroll，Amsterdam，1985，p.48

[27] Sphrantzes，George，*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he Sphrantzes Chronicle*， trans. Margaret Carroll，Amsterdam，1985，pp.48-9

[28]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Paris，1870，pp.273-4

[29]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1972，p.45

[30] Sphrantzes，George，*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Amherst，1980，p.103

[31] Kritovoulos，（in English）*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 trans. Charles T. Riggs，Westport，1970，p.49

[32]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1823，p.38

[33]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Paris，1870，p.266

[34]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22

[35] Kritovoulos，（in English）*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 trans. Charles T. Riggs，Westport，1970，p.49

[36]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p.15-16

[37]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37

[38]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39

[39]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39

9.上帝的神风

1453年4月1～20日



海战比陆战更危险和激烈，因为在海上没有任何退路，别无他法，只能死战到底，听凭命运安排，每个人尽其所能。[1]

——让·傅华萨[2]，14世纪法兰西史学家

4月初，在大炮轰击陆墙的同时，穆罕默德二世也开始首次部署他的另一个新式武器：舰队。他很快就认识到了一个事实（从阿拉伯人围困君士坦丁堡以来，所有意图攻打这座城市的人都很容易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不能牢牢控制大海，攻城很可能会失败。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在1422年攻城时无力阻滞拜占庭的海上航道，因为奥斯曼舰队于6年前在加里波利被威尼斯人歼灭了。如果不能封锁住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黑海沿岸的希腊城市以及地中海的其他基督教国家就能轻易地从海上为君士坦丁堡提供补给。正是为了控制海峡，穆罕默德二世才在1452年夏季兴建了割喉堡，并为其配备了重炮。从那以后，没有任何船只能够不经检查就自由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出黑海。

与此同时，他还开始修理舰船，扩充海军。1452年冬天，奥斯曼帝国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在加里波利的奥斯曼海军基地，或

许还在黑海沿岸的锡诺普以及爱琴海畔的其他一些船坞大量建造新船。根据克利托布罗斯的记载，穆罕默德二世“认为在围城战以及日后的战斗中，舰队的影响将比陆军更大”[3]，因此特别重视造舰工作。帝国在沿着黑海和地中海开疆拓土的过程中获得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造船匠、水手和领航员（既有希腊人也有意大利人），这支技术力量可以运用于造舰事业。穆罕默德二世还拥有造舰所需的大量自然资源：木材和大麻纤维、用于船帆的布、用来制作锚和钉子的铸铁，以及用来堵缝防漏和涂抹船体的沥青和油脂。这些资源来自帝国各地，甚至国外。穆罕默德二世借助卓越的后勤保障能力将这些资源集中起来，用于战争。

就像大炮一样，奥斯曼人很快就从基督教敌人那里学会了造船和海战的技术。中世纪地中海的主要战船是桨帆船，它是古典时期希腊和罗马桨帆船的天然继承者。桨帆船从青铜时代开始，一直到17世纪，不断演化发展，雄霸整个地中海。克里特岛米诺斯文化的印章、埃及的纸莎草纸和古典时期希腊的陶器上都留下了对桨帆船基本外形的描绘。桨帆船在地中海历史上的地位就像葡萄酒和橄榄树一样重要。到中世纪晚期，典型的桨帆战船外形狭长、行动迅捷，长度一般在100英尺，宽度不到12英尺，较高的船首可作为作战平台或者强行登上敌船的桥梁。海战的战术和陆战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桨帆船上载满了士兵，两军交锋时先使用投射武器，然后士兵们就会尝试冲上敌船，展开凶残的白刃战。

桨帆船的出水高度极小，因此船体显得非常低矮。为了将划桨的机械优势最大化，满载的桨帆船的船体超过水面的高度可能仅有2英尺。桨帆船也可以用帆，但在战斗中的速度和灵活性还是主要依靠划桨。桨手只有一排，坐在甲板上，因此在战斗中非常暴露；每个桨位上通常有两到三人；每名桨手操纵一支桨，桨的长度由他所在的位置决定。桨位上非常拥挤；每名桨手坐的空间只有现代的客机座位那么大，划桨时的侧面空间是极其宝贵的；桨手必须用肘部力量将船桨笔直地向前推，在这过程中要从位置上起身，然后再坐回到位置上。因此，划桨需要技术

熟练的桨手节奏协调一致地工作；一支桨可能长达30英尺，重量约100磅，所以需要相当大的肌肉力量。桨帆船的优势就是战斗中的高速和灵活性。一艘龙骨得到充分润滑的桨帆船在人力驱动下可以维持每小时7.5海里的冲锋速度达20分钟左右。如果划桨超过一个小时，桨手很快就会疲惫。

桨帆船在平静海面上速度很快，但也有特别突出的缺陷。出水高度太小使得它的适航性惊人地差，甚至在虽然波浪滔滔但距离较短的地中海也是如此，因此桨帆船的航行主要限制在夏季，而且偏好在近海航行，而不适合长期远航。不合时令的风暴常常将整支桨帆船舰队摧毁。只有在风从船尾方向吹来时，桨帆船的帆才能派上用场；如果有猛烈的逆风，船桨也就没用了。而且，为了获得尽可能高的速度，桨帆船的设计导致船体非常脆弱，而且出水高度太低，在进攻舷侧较高的船只（比如风帆商船或较高的威尼斯大型桨帆船）时就会吃很大的亏。在争夺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桨帆船的优缺点都将受到严峻考验。

穆罕默德二世集结了一支相当规模的舰队。他修复了一些旧船，还建造了一批新的三层桨战船（即每个桨位的上下三层分别有一名桨手的桨帆船）以及一些用于快速袭击的轻型桨帆船，即“有完整甲板的快速长形桨帆船，配备30～50名桨手”[4]，欧洲人称其为“弗斯特战船”。他很可能亲自监督了很大一部分造船工作，精挑细选“来自欧亚所有海岸地区的经验丰富的水手、技术特别熟练的桨手、非熟练船员、舵手、三层桨战船船长、其他船只的船长和海军统领，以及各种类型的船员”[5]。这支舰队的部分船只早在3月份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运兵，但直到4月初，舰队主力才在加里波利集结就绪。舰队司令是巴尔托格鲁，“一位伟人，是拥有丰富的海战经验而且技术娴熟的海军统领”[6]。在奥斯曼军队的七次攻城战中，这是他们第一次带来一支舰队攻打君士坦丁堡。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变革。

加里波利被誉为“信仰守护者的家园”[7]，对奥斯曼军队来说是座充满神奇魔力的城市，也是非常吉利的远征出发点。1354年，在一次带来好运的地震之后，奥斯曼军队在这座城市获得了在欧洲的第一个立足点。充满圣战热情和渴望征服的舰队从达达尼尔海峡起航，开始驶入马尔马拉海。据说，在出发时，船员们“高声呐喊，欢呼雀跃，吟唱祷文，呼喊着互相鼓励”[8]。事实上，这支舰队的欢呼声可能没有那么高昂，因为很大一部分桨手很可能是被强征来的基督徒。根据一位后世史学家的说法，“真主佑助的神风推着他们前进”[9]，但真实情况肯定是很不一样的。在这个季节刮的主要是北风，因此在马尔马拉海北上的航行既不顺风，也不顺水。通往君士坦丁堡的航道长达120英里，对桨帆船来说是一次缓慢而艰难的旅途。奥斯曼舰队到来的消息沿着航道不胫而走，激起了人们的震惊和恐慌。穆罕默德二世深知，和陆军一样，海军的优势兵力也具有心理上的优势。海面被密密麻麻的船桨和桅杆遮蔽的景象让两岸的希腊村民惶恐不已。旱鸭子更容易被这景象震撼，所以对奥斯曼舰船的数量所做的估计过于夸张；像贾科莫·特塔尔迪和尼科洛·巴尔巴罗这样有经验的基督徒航海家的估计就比较可靠。按照他们二人的说法，奥斯曼舰队约有12～18艘桨帆战船（三层桨和两层桨的战船混编）、70～80艘较小的弗斯特战船、约25艘重型运输驳船、一些轻型双桅帆船和小型传令船，总计约140艘大小船只。这支舰队浩浩荡荡地出现在西方海平线上，一定是幅宏伟的盛景。

在舰队抵达君士坦丁堡很久之前，守军就得知了穆罕默德二世雄壮海军的情况，因此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精心制定自己的海军策略。4月2日，他们用铁链封闭了金角湾，为自己的船只建立了安全锚地，并有效地保护较弱的海墙。这种策略在君士坦丁堡的历史上曾多次运用。早在717年，拜占庭人就用一条铁链封锁了海峡，以阻挡攻城的穆斯林海军。按照巴尔巴罗的说法，在4月6日，“我们让来自塔纳的三艘桨帆船和另外两艘狭长形桨帆船做好了战斗准备”[10]，然后船员们在陆墙全线游行，以夸耀自己的兵力。4月9日，守军在港内所有可用的海军资源都

得到了组织，准备就绪。他们的船只种类混杂，能够聚集到一起也是被不同的动机驱使。在场的有来自意大利各城邦及其殖民地（威尼斯、热那亚、安科纳和克里特）的船只，还有1艘加泰罗尼亚船、1艘普罗旺斯船，以及10艘拜占庭船只。守军的桨帆船尺寸不一，有3艘“大型桨帆船”，这种船是意大利海上贸易的主要工具，比普通的桨帆战船慢，但是更为坚固，舷侧更高；还有两艘“狭长形桨帆船”，船体细长，出水高度很小。1453年4月初停泊在金角湾的大部分船只都是风帆商船——侧舷较高、以风为动力的“圆船”，也就是船尾及艉楼较高、坚固耐用而带有桅杆的克拉克帆船[11]。理论上，这些船只都不是战船，但在当时的地中海，海盗活动猖獗，因此很多商船都配有武器，所以商船和战船的区别是很微妙的。这些克拉克帆船出水很高，甲板和桅杆瞭望台居高临下，因此如果配备武器和善战的士兵的话，对低矮的桨帆战船有天然优势。在海战史的这个时期，帆船常常能有效地自卫，打退最坚决的进攻。桨帆船才刚刚开始搭载火炮，口径很小，而且位置太低，很难对克拉克帆船构成威胁。直到50年后，威尼斯人才设计出能够装载在桨帆船上的大威力火炮。另外，来自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城市共和国的生存和繁荣完全依赖海上霸权）的水手精通所有航海问题，自信满怀。他们制定了相应的计划。

于是在4月9日，他们把10艘最大的商船开到铁链前方，“队形紧密，船首向前”[12]。巴尔巴罗对各艘船的尺寸和船长姓名都做了忠实的记载：热那亚人佐尔齐·多里亚的船是2500桶，还有一艘是600桶[13]。他还记录了其中3艘的船名：来自甘地亚的“菲罗玛蒂”号 和“古罗”号，以及来自热那亚的“加塔罗科萨”号。这些商船旁边部署着最坚固的桨帆船。这些船只“全副武装，秩序井然，似乎求战心切，全都非常优秀”[14]，占据了从君士坦丁堡到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塔的整段铁链的距离。内港还有17艘配有横帆的商船和更多的桨帆船担任预备队，包括皇帝本人名下的5艘船（它们的武器可能已经被拆除，以便加强铁链处的防御）。还有几艘多余船只被凿沉，以防它们被炮火击中、蔓延火势。在队形密

集的舰队中，水手们最怕的就是火。船长们对自己的防御措施和航海技术非常自信，并且还在前滩部署了火炮作为额外的保障，于是在海上静候奥斯曼舰队的到来。守军可能总共有37艘船，敌人舰队则拥有140艘。从表面上看，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但是意大利水手深通海战的精髓。操纵船只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活动，依赖于训练有素的船员，因此海战的结局并不由数量决定，而是更取决于经验、决心以及风向和海流带来的偶然运气。“我们看到自己拥有一支如此强大的舰队，感到非常自信，一定能打败异教徒土耳其人的舰队。”[15]巴尔巴罗自鸣得意地如此写道，流露出威尼斯人对奥斯曼帝国航海技术一贯的低估。

4月12日下午1点左右，君士坦丁堡守军终于看到奥斯曼舰队顶着北风徐徐接近。海平线逐渐被桅杆遮蔽，海墙上一定挤满了争相观看的市民。奥斯曼舰队“坚定无比地”[16]驶来，但看到基督教船只已经在铁链处摆开了阵势，就驶向了海峡的另一侧，在对岸排开队形。观看的拜占庭人听到“热切的呼喊声、响板和手鼓的奏乐。敌人用这些声音威慑我们的舰队和城内的人，让我们心生恐惧”[17]，受到了极大震撼，城内气氛愈加阴郁。下午晚些时候，整个奥斯曼舰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北上2英里，来到欧洲一侧海岸的一个小港（希腊人称之为“双柱港”，就是今天的多尔玛巴赫切宫所在地）。这支威武雄壮的庞大舰队无疑让意大利人也颇为沮丧，因为铁链处的船只全天在那里待命，一直到夜间，“等待了一个又一个钟头，以防敌人攻击我们的舰队”[18]，但奥斯曼舰队没有发动进攻。一场消磨意志的猫鼠游戏拉开了帷幕。为了尽可能减小遭到突袭的风险，中立的加拉塔城的城墙上一直部署有两名哨兵，从那个有利地势可以紧密监视博斯普鲁斯海峡远方双柱港的奥斯曼舰队。哪怕是一艘奥斯曼船只在海峡中有所动静，马上会有人跑过加拉塔的街道，奔向金角湾，去向港口指挥官阿卢威克瑟·迪艾多报告。然后作战号角会被吹响，在船上待命的人立刻站起身来，准备战斗。他们就这么神经紧绷地日夜等待，他们的舰船在金角湾平静的水面上轻轻摇曳。

穆罕默德二世给他的新舰队下达了三个明确的任务：封锁城市、尝试冲进金角湾、阻击任何有可能从马尔马拉海驶来的援救舰队。起初，巴尔托格鲁只是派遣巡逻船在城市周边水域游弋，目的是阻止船只进出城市在马尔马拉海那一边的两个小港。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另外一队奥斯曼船只满载着炮弹和其他弹药从黑海赶到。这些补给物资的运抵似乎让奥斯曼军营里展开了新一轮的忙碌。

穆罕默德二世急于加紧对君士坦丁堡的遏制，于是命令巴尔托格鲁尝试进攻铁链。如果奥斯曼军队能够冲进金角湾，君士坦丁十一世就将不得不从陆墙抽调宝贵的兵力去防守海岸。双方为这个时刻都小心翼翼地做了准备。穆罕默德二世对炮兵技术革新的胃口是无止境的。显然是在他的鼓动下，奥斯曼军队将小型火炮装上了他们的桨帆船。他们在桨帆船的作战平台上挤满了重步兵，并给船只配备了大量武器：石弹、羽箭、标枪和易燃物。加拉塔城墙上的瞭望员紧密地观察着这些准备工作，好让拜占庭舰队的指挥官卢卡斯·诺塔拉斯能有足够的时间为大型克拉克帆船和桨帆船配备人员和弹药。

大约在4月18日，也就是奥斯曼陆军向圣罗曼努斯门处的陆墙发动首次总攻的同时，巴尔托格鲁发动了奥斯曼新海军的第一次攻势。舰队从双柱港大举出动，绕过金角湾的尖端，快速向铁链推进。桨手们拼命划桨，向停泊在铁链前方的高大船只的战线冲去，奥斯曼水手们高声呐喊并发出战斗口号，以此互相激励。他们进入了弓箭射程之内，然后放慢速度，用弓箭和火炮向拜占庭舰队发出一轮齐射。石弹、金属炮弹和火箭呼啸着掠过海面，扫荡了拜占庭舰船的甲板。在最初一轮齐射之后，奥斯曼战船继续向停泊不动的敌舰冲去。两军相接时，奥斯曼军队努力按照常规战术强行登上敌船，展开近距离作战。他们投掷抓钩和梯子，企图爬上高大的敌船；他们还尝试砍断这些商船的锚缆。标枪和矛枪像冰雹一样飞向守军。奥斯曼海军的进攻固然非常凶猛，但优势还是在守军更为高大也更为坚固的克拉克帆船那边。奥斯曼桨帆船上的火炮

发射的石弹太小，不足以损坏克拉克帆船结实的木制船体，而且奥斯曼水手们是从低处向上仰攻的，就像从壕沟底部攀爬陆墙一样，非常吃亏。基督教船只上的水手和士兵可以从船首和船尾平台，以及更高的桅杆瞭望台上向下投掷武器。带有稳定翼的铁制标枪、羽箭和石块像大雨一样倾泻到努力攀爬船舷、毫无防护的敌人头上，“打伤很多人，还杀死了相当多的人”[19]。商船的水手们接受过海上近距离作战的训练，而且配有相应的装备；他们早已准备好了水罐，随时可以扑灭火焰；桅杆上安装的简易吊车装置可以抛掷沉重的石块，将它们投向外壳脆弱的大群狭长桨帆船，“以这种方式给敌人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失”[20]。争夺铁链的战斗非常激烈，但最终基督徒占了上风。他们成功地从侧翼包抄了奥斯曼桨帆船舰队。巴尔托格鲁害怕失败受辱，于是选择撤退，返回了双柱港。

第一轮海战的获胜者是拜占庭守军。他们对自己的船只了如指掌，而且深深懂得海战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船员纪律严明、装备精良，严阵以待的商船完全能够抵挡住一大群低矮的桨帆船的进攻。穆罕默德二世在海上运用火炮的希望也落空了。桨帆船的船体比较脆弱，只能安装小型火炮，而这些火炮对大帆船的坚固侧舷没有什么效力；而且火炮操纵的条件（火药很容易吸收海上的湿气，而且在颠簸的甲板上很难有效瞄准）更使得成功的概率大打折扣。到4月19日，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在陆路和海路都受到了挫折，而守军斗志不减。围城战越拖越久，这让穆罕默德二世越来越焦躁，而西方援救君士坦丁堡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对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成功的防御依赖于基督教欧洲的援助。战前的无数次外交活动都是为了向西欧哀求或者租借兵员与资源，以捍卫基督教世界。市民们每天都会向落日的方向眺望，期待能看到一支新的舰队——一群威尼斯或热那亚桨帆战船，带冲角的船首从马尔马拉海的波涛中出现，战鼓齐鸣，号角吹响，圣马可的雄狮旗或者热那亚的旌旗

在带咸味的海风中招展。但大海上一直空荡荡的。

事实上，君士坦丁堡的命运完全被意大利各城邦错综复杂的内政所决定。早在1451年底，君士坦丁十一世就派遣使者到威尼斯，告诉他们，如果没有援助，君士坦丁堡必然陷落。威尼斯元老院对这一问题作了漫长讨论；热那亚人对此支吾搪塞；罗马教皇深表关切，但要求拜占庭人拿出教会联合确已完全执行的证据来。何况，没有威尼斯人的帮助，教皇也没有实际的资源来援助拜占庭。热那亚和威尼斯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紧盯着对方，却什么也没做。

君士坦丁十一世向西方求援是基于宗教上的考虑，这种思维是典型中世纪的；但他求援的对象却是被经济因素驱动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的思维惊人地现代化。威尼斯人对拜占庭人支持还是反对东西方教会联合并不感兴趣，对保卫基督教信仰也没有兴趣。他们是精明而讲究实际的商人，忙于订立商业协定、保障自己航道的安全，以及对经济利益的计算。他们更担心海盗，而不肯为神学费脑筋；更关心商品，而不是宗教信条。他们的商人仔细研究可供买卖的商品（小麦、皮毛、奴隶、葡萄酒和黄金）的价格、桨帆船舰队人力的补给，以及地中海季风的模式。他们靠贸易和大海生存，依赖折扣、利润和现金。威尼斯指挥官和苏丹关系极其融洽，和埃迪尔内的贸易利润很高。另外，君士坦丁十一世在之前的二十年里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威尼斯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利益。

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1452年8月，少数元老甚至投票主张任凭君士坦丁堡自生自灭。第二年春天，威尼斯人得到报告，奥斯曼帝国控制了通往黑海的贸易航道，而且有威尼斯船只被击沉，他们才开始改变对拜占庭的冷漠态度。2月19日，元老院决定组建一支拥有2艘武装运输船和15艘桨帆船组成的舰队，于4月8日起航。这次远征的组织工作被托付给了艾尔维索·隆哥，并给了他谨慎的指示，其中有一条有益的命令：

避免在海峡内与奥斯曼军队发生冲突。他最后于4月19日起航，也就是君士坦丁堡城墙首次遭到总攻的第二天。其他国家也做出了类似的缺乏协调的救援努力。4月13日，热那亚共和国政府请求“在东方、黑海和叙利亚”[21]的公民、商人和官员尽一切努力帮助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摩里亚的君主德米特里。仅仅在5天之前，热那亚政府还在批准贷款为船只提供武装，以对抗威尼斯人。大约在同一时期，教皇写信给威尼斯元老院，表示希望从威尼斯租借5艘桨帆船去援救君士坦丁堡。威尼斯人在追讨债务方面永远是算盘打得很响，他们在原则上接受了这一请求，但是回信提醒教皇，教廷在1444年为了瓦尔纳的圣战（这场战役以失败告终）建造桨帆船而欠威尼斯的债务尚未还清。

但教皇尼古拉五世已经自费采取了一项果断措施。他对君士坦丁堡的命运深感忧虑，在3月份雇用了3艘热那亚商船，为其提供了粮食、人员和武器，派遣它们去援助君士坦丁堡。到4月初，这些船只已经抵达了安纳托利亚海岸之外的希俄斯岛（属于热那亚），但无法继续前进。让奥斯曼舰队步履艰难的北风把这些热那亚人困在希俄斯岛达两周之久。4月15日，风向转为南风，3艘商船再次起航了。到19日，它们抵达了达达尼尔海峡，与拜占庭帝国的一艘重型运输船一起继续前进。这艘运输船满载着拜占庭皇帝从西西里买来的粮食，船长是一个叫弗朗切斯科·利卡奈拉的意大利人。这4艘船在达达尼尔海峡北上，未受阻挡就经过了加里波利的奥斯曼海军基地，这是因为奥斯曼舰队已经全部开往双柱港。这4艘船很可能与几天前在金角湾铁链处抵抗奥斯曼海军的那些商船类似：舷侧很高的帆船，可能是克拉克帆船，奥斯曼史学家图尔松贝伊称其为柯克船[22]。在南风的吹拂下，它们在马尔马拉海的前进速度很快，到4月20日早上，船员们已经看得清东方海平线上巍然屹立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巨大圆顶。

君士坦丁堡市民如痴似狂地坚持瞭望，等待援军抵达。大约上午10点，人们看到了这些船只，认清了船上飘扬的热那亚白底红十字旗。这

消息让市民们当即骚动起来。几乎就在同时，奥斯曼海军的巡逻船也发现了这些船只，把消息报告给正在马尔特佩的营帐内的穆罕默德二世。他纵马狂奔到双柱港，向巴尔托格鲁发布了清楚而专断的命令。穆罕默德二世无疑是因为舰队在铁链处的挫折和陆军在陆墙下的失败而恼羞成怒，给指挥官和舰队发出了毫不含糊的命令："将这些帆船俘虏，把船员带来见我，否则就不要活着回来。"[23] 奥斯曼桨帆船舰队紧急作了战斗准备，配备了满员的桨手，挤满了精锐士兵——重步兵、弓箭手和近卫军。轻型火炮再次被抬上战船，还有燃烧武器和"其他很多武器：圆盾和方盾、头盔、胸甲、投射武器、标枪、长矛，以及其他适合这种战斗的装备"[24]。舰队沿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南下去迎战擅自闯入的热那亚船只。为了维持士气，他们必须胜利。但这第二次海战的战场在海峡中离城市更远处，博斯普鲁斯海峡反复无常的风向和当地的海流更加难以捉摸，对船只的要求也更严酷。热那亚商船顺风前进，奥斯曼舰队则是顶风，所以无法使用风帆，于是降下了船帆，在波浪汹涌的大海上划桨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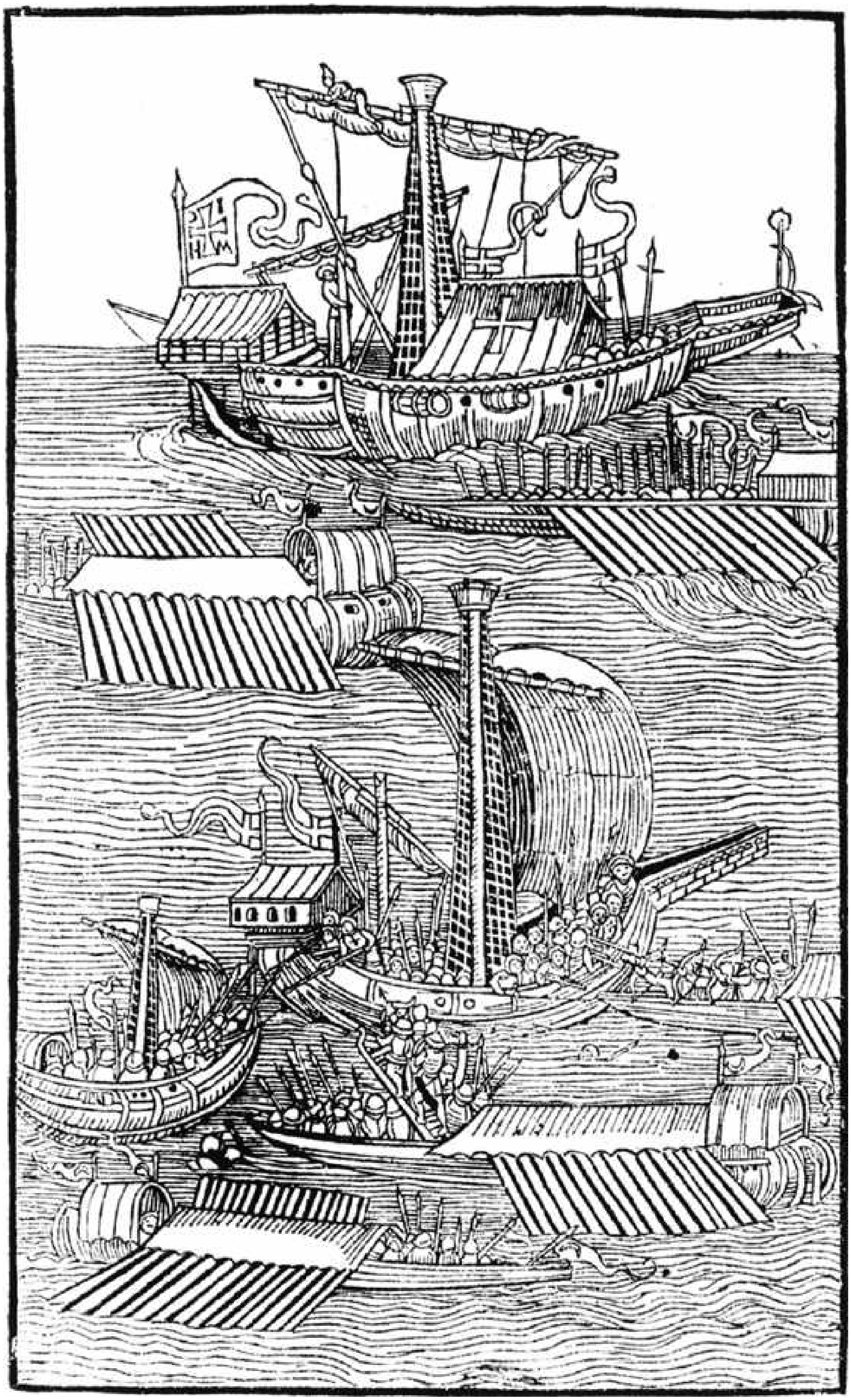
到下午早些时候，4艘救援船已经抵达城市东南方，稳步驶向德米特里大帝塔，那是君士坦丁堡卫城的一个显著地标。它们离海岸较远，准备掉转方向驶入金角湾入口。双方力量的巨大悬殊让巴尔托格鲁的部下"充满必胜的信心"[25]。他们稳稳地接近，"敲响了响板，并向那4艘船高呼，快速划桨，就像渴望胜利的人一样"[26]。奥斯曼桨帆船舰队接近对方时，鼓点和唢呐的乐声飘过了海面。100艘战船的桅杆和木桨汇聚在4艘商船周围，结局似乎是不难猜到的。市民们蜂拥到城墙上、屋顶上或者赛马场的斯芬多恩，以及其他能够俯瞰马尔马拉海及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的高处。在金角湾的另一侧、加拉塔城墙的远方，穆罕默德二世及其随员从一座小山上观看海战。巴尔托格鲁的三层桨战船逼近了最前方的热那亚商船，双方都紧张焦虑而又抱有希望地注视着。巴尔托格鲁从艉楼上专横地命令热那亚商船落帆。热那亚人置之不理，继续前进，于是巴尔托格鲁命令他的舰队向这些克拉克帆船猛烈开火。石弹从

空中掠过；弩箭、标枪和火箭从四面八方射来，但热那亚人岿然不动。这一次，优势仍然在高大的帆船那边：“他们居高临下地作战，从桁端和木制塔楼上射下箭矢、标枪和石块。”[27] 汹涌的浪涛使得桨帆船很难稳定地射击，也难以在克拉克帆船周围准确地运动。热那亚船只在南风劲吹下仍然在破涛斩浪地前进。战斗演变成一场运动战，奥斯曼战船在惊涛骇浪中努力接近对方，以便登船或者烧毁对方的船帆，而热那亚船只则从有城堞的艉楼上使用投射武器猛击敌人。

由高大帆船组成的小船队毫发未伤地抵达了卫城处，准备拐弯驶入安全的金角湾，这时灾难降临了。风突然停息了。船帆毫无生气地垂挂在桅杆上，城市已经近在咫尺，但这4艘船却无力继续前进，开始在金角湾开阔入口处诡异难测的反向海流上无助地漂浮，逐渐飘向加拉塔海岸——穆罕默德二世及其陆军就在那里观战。帆船一瞬间就丧失了优势，主动权转移到了划桨船那一边。巴尔托格鲁聚拢了他较大的战船去包围热那亚商船，再次用投射武器猛击它们，但效果并没有改进多少。奥斯曼桨帆船上的火炮口径太小，安放位置也太低，无法损伤对方的船体，也不能摧毁对方的桅杆。基督徒船员们能够用成桶的水将船上的火焰扑灭。巴尔托格鲁看到猛烈火力也没有奏效，于是“声如洪钟地呼喊”[28]，命令舰队逼近敌人，强行登船。

成群的桨帆船和长船将笨重而丧失行动力的克拉克帆船团团围住。大海上，桅杆和船体纠缠成乱糟糟的一团，按照史学家杜卡斯的说法，“看上去有如陆地”[29]。巴尔托格鲁的三层桨战船的船首撞上了4艘基督教船只中最大但武装最弱的那艘——拜占庭帝国的重型运粮桨帆船。奥斯曼步兵从登船桥梁上蜂拥而去，用抓钩和梯子拼命努力接舷，用斧子砍对方的船体，或者努力用火把将其烧毁。有些士兵沿着锚缆和绳索爬了上去；其他人向木制壁垒投掷长矛和标枪。战斗在近距离演变成了一场残酷的肉搏战。基督教船员穿着优质铠甲，从高处用棍棒猛击爬上船舷的进攻者的脑袋，用短弯刀砍断爬船的敌人的手指，向下方拥

挤的人群投掷标枪、长矛、长枪和石头。他们从居高临下的桁端和桅杆瞭望台上“用可怕的投石机向下轰击，石头像雨点般坠落到队形密集的土耳其舰队头顶上”[30]。弩手小心瞄准，将选定的目标一一杀死；船员们用起重机将沉重的石块和水桶升起，然后砸向敌人长船的薄弱船体，将很多敌船打伤或击沉。各种嘈杂声混成一团：呼喊和嚎哭声、大炮的轰鸣声、身着铠甲的人身体后仰落水溅起的波浪声、船桨断裂声、石头撞击木头的破裂声、钢铁撞击声、箭雨的呼啸声（箭矢降落如此之快，以至于“无法把桨插进水里”[31]）、刀剑砍刺人肉的声音、火焰爆裂声，以及伤者的痛苦哀鸣。“四面八方尽是呼喊和混乱，士兵们互相激励，”克利托布罗斯记载道，“人们砍杀敌人，也被敌人砍杀；屠戮他人，也被他人屠戮；互相推搡、咒骂、威胁和呻吟。这噪音可怕极了。”[32]



奥斯曼帝国桨帆船攻击基督教帆船

一连两个小时，奥斯曼舰队与无比顽强的对手激烈搏斗着。莱奥纳德大主教不情愿地承认，奥斯曼士兵和水手们打得非常勇敢，而且充满激情，“像魔鬼一样”[33]。渐渐地，虽然奥斯曼人损失很重，但他们毕竟兵多将广，开始占了上风。1艘基督教船只被5艘三层桨战船包围，还有一艘被30艘长船团团围住，第三艘则被40艘满载士兵的驳船围了个水泄不通，就像一大群蚂蚁在围攻一只巨大的甲虫。一艘奥斯曼长船因为船员精疲力竭而后撤，或者被击沉，披甲的士兵被海流卷走，或者紧紧抓住船柱，同时更多的战船补充上来，撕咬对手。巴尔托格鲁的三层桨战船顽强地死咬着最大但武装最弱的拜占庭运输船，后者“英勇地自卫，船长弗朗切斯科·利卡奈拉跑来援助”[34]。但热那亚船长们渐渐认识到，如果短期内得不到援救，那艘运输船就完了。他们用操演过的战术设法将自己的船只靠到运输船侧面，并用缆绳将4艘船连接在一起，于是（按照某位观察者的说法）它们就像4座塔楼一样在黑压压一大群奥斯曼战船之间巍然屹立。海面上拥挤的船只如此之多，甚至“几乎看不见海水”[35]。

蜂拥在城墙上和铁链后方、金角湾港内船只上的人们只能无助地观看，只见4艘基督教船只在卫城脚下缓缓地漂向加拉塔海岸。随着海战的战场越来越近，穆罕默德二世策马跑到前滩，激动万分地向英勇奋战的士兵们发出命令、威胁和鼓励，然后催马走进浅水，希望亲自指挥战斗。巴尔托格鲁已经能听得见苏丹呼喊出的命令，但对其置之不理。暮色降临了。战斗已经持续了三个钟头。奥斯曼舰队看来必胜无疑，因为“他们轮流上前战斗，不断接替战友，生力部队取代伤亡者的位置”[36]。基督徒的投射武器迟早要耗尽，他们的力气迟早要用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一瞬间又扭转了战局，基督徒认为唯一的解释是上帝伸出了援手。南风又刮了起来！4艘克拉克帆船的巨大方形帆慢慢被吹动起来，逐渐饱满，船只在不可阻挡的劲风吹动下开始一起向前运动。它

们逐渐加速，冲破了脆弱的桨帆船组成的包围圈，向金角湾入口冲去。穆罕默德二世向他的指挥官和战船大声诅咒，“狂怒之中撕坏了自己的衣服”[37]，但此时夜色已经降临，要追击敌人已经太晚了。恼羞成怒、暴跳如雷的穆罕默德二世只得命令舰队返回双柱港。

在没有月光的黑暗夜色中，两艘威尼斯桨帆船从铁链后方驶出，每艘船上吹响了两三次号角，船员们则高声呐喊，以欺骗敌人，让他们以为“至少20艘桨帆船”[38]正在前来迎战，不敢继续追击。在教堂钟声和市民们的欢呼声中，这两艘桨帆船把帆船拖进了港内。穆罕默德二世“目瞪口呆。他一言不发，狠狠抽动马鞭，狂奔离去”[39]。

---

[1] quoted Guilmartin，John F.，*Galleons and Galleys*，London，2002，p.22

[2] 让·傅华萨（1333？～1400/1401），法兰西诗人和宫廷史官。他作为学者四处游历，生活在若干欧洲宫廷的达官显贵之中。他的《闻见录》是叙述英法百年战争的第一手资料，包括佛兰德、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大事。《闻见录》是封建时代最重要和最详尽的文献材料，也是对当时骑士与宫廷生活的真实记述。他也写谣曲、回旋诗和寓言诗，赞颂典雅的爱情。

[3]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38

[4]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38

[5]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38

[6]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43

[7]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2 vols.，Milan，1976，p.256

[8]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39

[9]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2 vols.，Milan，1976，p.256

[10]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19

[11] 克拉克帆船是15世纪盛行于地中海的一种三桅或四桅帆船。它的特征是巨大的弧形船尾，以及船首的巨大斜桅。克拉克帆船体型较大，稳定性好，是欧洲史上第一种可用作远洋航行的船只。

[12] Barbaro，Nicolo，（in English）*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New York，1969，p.29

[13] 古时常用船只能够容纳木桶的数量来衡量船的尺寸，类似于今天说某船能够搭载多少个集装箱。

[14]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20

[15]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20

[16]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21

[17]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15

[18]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22

[19]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1

[20]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1

[21]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lxxvi

[22] 柯克船是10世纪出现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一种单桅帆船，汉萨同盟在北欧的海上贸易中大量使用这种船只。

[23]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3

[24]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3

[25]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3

[26]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23

[27]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3

[28]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3

[29]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Paris，1870，p.269

[30]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1823，p.30

[31]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Paris，1870，p.269

[32]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4

[33]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1972，p.21

[34]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140

[35]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in English）*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New York，1969，p.33

[36]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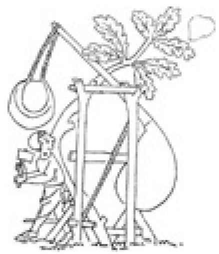
[37]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p.22

[38]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24

[39]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5

10.鲜血的螺旋

1453年4月20～28日



战争就是欺骗。[1]

——先知穆罕默德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战产生了深远的直接影响。短短几个钟头就猛烈地逆转了整个战役的局面，出人意料地让守军重新获得了心理优势。春季的大海如同巨大的礼堂，公开展示了奥斯曼舰队的战败之耻，城墙上人头攒动的希腊人和金角湾对岸的奥斯曼陆军右翼及穆罕默德二世本人都目睹了这一场景。

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庞大的奥斯曼舰队出现在海峡的时候虽然对基督徒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但在航海技术上无法与西方人相提并论。西方人凭借优越的技术和装备、桨帆战船内在的缺陷以及很好的运气赢得了这场海战。奥斯曼帝国未能牢牢地占有制海权，不管苏丹的大炮在陆墙处能够取得什么战果，攻城战都将举步维艰。

城内的情绪突然间又高涨起来："苏丹的野心遭到了挫折，他那威名远播的力量遭到削弱，因为他的这么多三层桨战船甚至无法俘虏一艘

船。”[2] 新来的4艘船不仅带来了急需的粮食、武器和兵员，也给守军带来了宝贵的希望。这支小舰队说不定只是一支更强大的救援舰队的前驱。如果4艘船就能抗衡奥斯曼海军，意大利各共和国的十几艘装备精良的桨帆船或许就能决定战局？“这个意想不到的结局重新点燃了他们胸中的希望，给他们带来了鼓舞和非常乐观的情绪，他们对未来有了美好憧憬。”[3] 在这场弥漫着宗教狂热的冲突中，这种事件绝不仅仅是人和物资的较量，或者偶然的风向变化，它们被认为是上帝伸出援手的明证。“他们向他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祷告，但徒劳无益，”医生尼科洛·巴尔巴罗写道，“而我们的永恒上帝却听到了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祈祷，所以我们才赢得了这场战斗。”[4]

大约在这个时期，君士坦丁十一世可能是受到这场胜利的鼓舞，或者是因为打败了奥斯曼军队的早期陆路进攻，感到求和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可能提议向奥斯曼帝国纳贡，给穆罕默德二世一个台阶下，好让他能够体面地撤军；求和的建议可能是通过哈利勒帕夏发出的。在攻城战中，进攻者和防御者之间其实有着一种复杂的共生关系。君士坦丁十一世完全清楚，城外的穆斯林军营陷入了一种危机情绪。自战役开始以来，奥斯曼人第一次开始表示严重的疑虑。君士坦丁堡依旧岿然不动，是一块“卡在真主喉咙里的骨头”，就像十字军建造的城堡一样。对于有伊斯兰信仰的战士们来说，这座城市不仅是个军事难题，也是个心理障碍。他们原本对战胜异教徒、扭转历史大潮信心十足，因为他们拥有技术和文化上的优势，但现在这信心突然间脆弱起来，人们又回忆起了八个世纪以前先知的旗手艾优卜（Ayyub）在城墙下阵亡的故事。“这个事件，”奥斯曼史官图尔松贝伊写道，“在穆斯林队伍中产生了绝望和混乱……军心大乱。”[5]

对奥斯曼人圣战事业的自信心而言，这是个关键时刻。在4月20日晚上，从务实的角度来看，漫长围城的惨淡前景似乎触手可及，而随之而来的将是后勤困难和士气低落、疾病流行（这对中世纪的攻城军队来

说始终是个大灾难），以及士兵们开小差的可能性。这对穆罕默德二世的个人权威也是个明白无误的威胁。近卫军已经处在公开叛乱的边缘。与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不同，穆罕默德二世从来没有赢得过常备军的爱戴。近卫军此前曾两次反叛暴躁任性的年轻苏丹，这一点并没有被人们淡忘，首席大臣哈利勒帕夏记得尤其清楚。

那天晚上，穆罕默德二世接到了他的精神导师和奥斯曼军营中的主要宗教领袖——谢赫阿克谢姆赛丁的一封信，信里集中体现了当前的严重局势。它描绘了军队的情绪，并提出了警告：

> 此事……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痛苦，沉重地打击了士气。机遇没把握住，导致了一些负面的发展：首先……异教徒欣喜若狂，大肆喧哗地夸耀；其次，有人认为，陛下在发号施令中判断失误，能力欠缺……陛下需要进行严厉处罚……如果不即刻施加严惩……需要填平壕沟、最后总攻命令发出之时，部队就不会竭尽全力。[6]

谢赫还指出，这次失败很可能会打击士兵们的宗教信仰。“有人指责说，我的祷告都失败了，”他继续说道，“还有人说，我的预言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陛下必须对此善加处置，免得最终我们不得不满面羞耻、灰心丧气地撤退。”[7]

在此鞭策下，穆罕默德二世于次日（4月21日）清晨“率领1万骑兵”[8]，从位于马尔特佩的军营出发，前往双柱港，他的舰队就停泊在那里。巴尔托格鲁被召唤到岸上，为这次惨败做出解释。在前一天的激战中，这位不幸的海军司令一只眼睛被己方士兵投掷的石块严重击伤；他匍匐在苏丹面前的时候，一定是魂不附体。根据一位基督徒史学家的生动描述，穆罕默德二世“从内心深处发出呻吟，怒火中烧，气得七窍生烟”[9]。他暴跳如雷地质问，为什么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也没能俘虏敌船：“如果你连这几艘船都对付不了，怎么能消灭君士坦丁堡港内的舰队？”[10]海军司令回答说，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去俘虏基督教船只。“陛下明察，”他为自己辩护道，“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我的桨

帆船的冲角一直死死咬住拜占庭皇帝船只的艉楼。我一直浴血奋战，大家都很清楚，我的很多部下都阵亡了，其他桨帆船上也损失了很多人。”[11] 穆罕默德二世怒火中烧又心烦意乱，命令将海军司令钉死在尖木桩上。群臣大为震惊，匍匐在穆罕默德二世面前，替巴尔托格鲁求情，说他确实是勇敢地死战到底，眼睛负伤就是努力奋战的明证。穆罕默德二世发了慈悲。死刑被撤销；作为惩罚，巴尔托格鲁在舰队和骑兵部队目睹下接受了100下鞭笞。他的官衔和财产全被剥夺，财产被分给近卫军。穆罕默德二世深知这种决策在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宣传价值。巴尔托格鲁从此消失在了茫茫史海中，海军司令的苦差事被重新交给了哈姆扎贝伊，他在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治下曾担任海军司令。目睹巴尔托格鲁受辱的士兵和水手们，以及苏丹身边的维齐尔和谋臣们都得到了一个深刻教训。他们对苏丹不悦的可怕后果有了第一手的观察。

关于这个事件，还有一个不同版本，是希腊史学家杜卡斯记载下来的。他讲述的关于攻城战的故事非常生动有趣，但常常令人难以置信。根据他的版本，穆罕默德二世命人将巴尔托格鲁按在地上，他亲自用“重达5磅的金棒（这位暴君命人制作了这根金棒，专门用来打人）”[12] 抽打了巴尔托格鲁100下。然后，一个希望获得苏丹宠信的近卫军士兵用石块狠砸巴尔托格鲁的头部，并挖出了他的眼睛。这个故事很生动，但几乎可以肯定是虚构的。不过它反映了西方人对穆罕默德二世的普遍看法：东方暴君、富裕的野蛮人、虐待狂，并且有一支奴隶大军对他绝对服从。

穆罕默德二世严惩了海军司令，以儆效尤之后，立即召集近臣，对君士坦丁十一世前一天提出的议和请求进行讨论。这许多事件发生得如此之快，已经互相交叠，对局势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经历重大挫折和首次异议与骚动之后，苏丹面临的问题很简单：是继续打下去，还是寻求以有利条件媾和。

在奥斯曼帝国最高层有两个派系，长期以来一直在苏丹反复无常的统治下为了生存和争夺权力而斗争。其中一派是首席大臣哈利勒帕夏，他是纯血统土耳其人和奥斯曼帝国传统统治阶级的成员，在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穆拉德二世治下就担任过维齐尔，并在年轻的苏丹动荡的早期统治中对他进行了引导。哈利勒帕夏亲身经历了15世纪40年代的危机岁月和近卫军在埃迪尔内对穆罕默德二世的反叛。他深知，假如穆罕默德二世在希腊人的城墙下失败受辱，生存的机会将颇为堪忧，因此他非常谨慎。在整个战役期间，哈利勒的战略一直受到政敌的破坏。他们称他为“异教徒的朋友”[13]，并指控他接受了希腊人的贿赂。

另外一派是奥斯曼帝国的暴发户：一群野心勃勃的军事领袖，他们大多是外来者，即来自不断开疆拓土的帝国的五湖四海的新穆斯林。他们一向反对任何和平政策，并鼓励穆罕默德二世去梦想征服世界。他们自己飞黄腾达的梦想与攻克君士坦丁堡息息相关。他们中领头的是第二维齐尔——扎甘帕夏，他是个皈依伊斯兰教的希腊人，“最令人生畏，影响力和权威也最大”，并且他还是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官。这个派别得到了宗教领袖和圣战宣扬者，比如学识渊博的伊斯兰学者乌理玛艾哈迈德·古拉尼（穆罕默德二世的严厉教师）和谢赫阿克谢姆赛丁的坚决支持，这些人代表了伊斯兰世界长久以来占领这座基督教城市的狂热梦想。

哈利勒提出，必须抓住这个机遇，以有利的条件体面地撤军。他指出，海战的失利已经揭示了攻城的困难；如果战役继续拖下去，匈牙利军队或者意大利舰队前来救援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他表示自己坚信红苹果注定有一天会落入苏丹手中，“就像成熟的果实从树上掉落”[14]，但红苹果尚未成熟。如果他们对拜占庭强加一个条件苛刻的惩罚性和约，胜利的一天就会来得更快。他提议向拜占庭皇帝索要每年7万杜卡特的天价贡金，作为撤军的条件。

主战派坚决反对议和。扎甘回答说，必须加倍努力，坚持打下去；热那亚船只的到来只是突出了对敌人施以决定性打击的必要性。现在是关键时刻。奥斯曼帝国的领导层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但争论的激烈性也反映出，领头的维齐尔们深知，争夺在苏丹面前的影响力，最终也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穆罕默德二世端坐在宝座上，观察着群臣为谋求晋身而互相争斗，但他的天性一直是个主战派。这次会议上以明显多数决定继续打下去。他们向君士坦丁十一世发去了回复：只有立即献城投降，和平才可能降临；苏丹将会把伯罗奔尼撒半岛割让给君士坦丁十一世，并补偿半岛目前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两个兄弟。苏丹刻意提出了一个对方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君士坦丁十一世很自然地拒绝了这个条件，因为他深明自己的历史责任，必须把父皇的衣钵延续下去。1397年，奥斯曼军队兵临城下时，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二世曾喃喃地说："我主耶稣基督，不要让众多基督徒听到，在曼努埃尔皇帝统治的时期，君士坦丁堡以及城内的基督教信仰的神圣与可敬之物被拱手交给异教徒。"[15] 君士坦丁十一世要秉承父亲的精神，死战到底。于是战役继续进行，奥斯曼主战派感到压力巨大，于是决心加紧攻城。

3英里之外，奥斯曼军队继续攻打城市，执行了一个秘密的综合进攻计划，计划的内情只有穆罕默德二世及其将领知晓。从前一天开始，奥斯曼军队开始大规模炮击，一刻不停地轰击了一整夜，持续到苏丹作战会议的那天。炮火主要集中在里卡斯河谷内圣罗曼努斯门附近的城墙上，也就是攻防双方都知道的城墙最薄弱的地段。

在持续炮火之下，一座主塔——巴克塔提尼安塔楼轰然倒塌，好几码宽的外墙也随之坍塌。城墙上一下子打开了一个相当大的缺口，守军骤然暴露了。"城内和舰队上的人们开始感到恐惧，"尼科洛·巴尔巴罗记载道，"我们丝毫没有怀疑，他们想立刻发动全面总攻；所有人都相信，戴头巾的土耳其人很快就会冲进城。"[16] 在足够的火力集中到一个

点上之后，哪怕是看上去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也会在奥斯曼军队的炮口下快速瓦解，这严重地挫伤了守军的士气。“有很长一段城墙被炮火打坏，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完蛋了，因为敌人在区区几天内就摧毁了这么长的城墙。”[17] 从大缺口向外张望的守军清楚地明白，哪怕“只有1万人”[18] 从这个地段发动集中攻势，城市也必然会陷落。他们在等待不可避免的浩劫，但此时穆罕默德二世和全部高级将领正在双柱港商讨是否继续作战，所以没有发布进攻的命令。基督教守军派系众多，防御作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的主动性；而奥斯曼军队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只有在接到了中央的指令之后才会做出反应。因此奥斯曼军队没有做任何事情去利用和扩大炮击的战果，守军得到了重新排兵布阵的时间。

在夜色掩护下，朱斯蒂尼亚尼和他的部下开始对损坏的城墙进行紧急抢修。“他们用装满石块和泥土的木桶修补城墙，在城墙后方开挖了一条非常宽的壕沟，壕沟的一端建有石坝，石坝上覆盖着葡萄藤和多层枝叶，并用水浸透，让它们变得像城墙一样坚硬。”[19] 这道用木头、泥土和石块堆积而成的壁垒仍然非常有效，能够让巨型石弹的威力大打折扣。守军的这些抢修是在敌人的持续火力之下进行的，敌人的“巨炮和其他火炮，以及很多火枪、不计其数的弩弓和很多手枪一刻不停地射击着”[20] 。巴尔巴罗在对这一天战事的记载的结尾处描绘了敌人的恐怖形象。大群装束颇具异国情调的敌人蜂拥而上，让这位随船医生心生恐惧：城墙前的地面“根本看不见，因为完全被土耳其人遮盖住了，尤其是近卫军，他们是苏丹麾下最勇敢的士兵，还有苏丹的很多奴隶，他们戴的是白色头巾，而普通土耳其人戴的是红色头巾”[21] 。但敌人没有再进攻。显然，在这一天，君士坦丁堡凭借好运气，以及“我们大慈大悲的救主耶稣基督”[22] 的保佑，躲过了噩运。

4月21日的战局发展极其迅速和错综复杂，似乎双方都意识到，一个关键时刻来临了。守军持续地采取措施应对敌人的进攻；他们没有兵力可供出击，只能从古老城墙组成的三角之内观察敌情，把希望寄托在

防御工事的坚固上。他们等待敌人的进攻，匆匆地应付每一个危机，堵塞防线上的缺口，同时还在互相争吵。他们有时听到敌人即将总攻的传闻，就灰心丧气；有时听说援军即将抵达，心中又充满了希望，如此周而复始。他们一刻不停地拼命努力去守住防线，并遥望西方的海平线，寻找船帆的迹象。

近几天的事件似乎让穆罕默德二世愈发焦躁，疯狂地大肆活动。海军的战败、对西方援军的畏惧和部队的悲观情绪，他在21日这一天受到了这些问题的困扰。他在城市外围焦躁不安地转来转去，从金红两色营帐到双柱港，又前去视察加拉塔以北的奥斯曼部队，亲自进行实地考察，研究问题，从不同角度观察“红苹果”，脑子里运筹帷幄。他对君士坦丁堡的渴望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孩提时代。从幼年时他从远方眺望这座城市，一直到1452年冬天在阿德里安堡[23]街道上辗转徘徊，他一向对君士坦丁堡痴迷不已，所以专心研究了关于攻城战的西方著作，对地形进行了初步勘察，还绘制了城墙的详细地图。穆罕默德二世为了占领这座城市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不耻下问、搜集资源、招募技术人才、讯问间谍、积攒信息。他将对君士坦丁堡的痴迷深藏起来（在奥斯曼宫廷的危险世界里，他在少年时期就学会了保守秘密），自己的计划在没成熟之前绝不会示人。据说，曾有人询问穆罕默德二世关于未来一场战役的情况，他不肯直接回答，而是说：“请君谨记，假如我的一根胡须知道了我的秘密，我就会把它拔下来，丢进火焰。”[24]他下一步将如何行动，也是一个严格保守的秘密。

他推断，主要问题在于保护金角湾的铁链。它的存在使得苏丹的海军无法从三角形的这一边对城市施压，因此守军可以节约兵力，集中力量防守陆墙，奥斯曼军队的巨大兵力优势因此大打折扣。当初在科林斯地峡，奥斯曼军队的大炮在一周之内就摧毁了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护墙。虽然此时大炮已经在古老的狄奥多西城墙上打开了一些缺口，但进度比他预想的慢得多。从外界看，城墙系统过于复杂、层次太多，壕沟也太

深，很难速战速决。另外，朱斯蒂尼亚尼是个天才的战略家。他极其高效地调动了有限的人力和物资：石墙被打破，土墙却岿然不动，防线坚守了下来。

被封闭起来的金角湾为可能抵达的基督教救援舰队提供了安全的锚地，并为基督教海军的反击提供了基地。金角湾还导致穆罕默德二世的各支陆军部队与海军之间的交通线大为延长，部队要从陆墙前往双柱港就不得不走很远的路，以便绕过金角湾的顶部。铁链的问题非解决不可。

没人知道穆罕默德二世的妙计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他酝酿了多久，但在4月21日，他提出了加快解决铁链问题的方案。他推断，如果无法强行突破铁链，就必须绕过它；要绕过它，就必须从陆路把舰队运走，让它在铁链防线的内部进入金角湾。当时的基督教史学家对这个策略的来源有着自己的解释。莱奥纳德大主教确信，这又是背信弃义的欧洲人给苏丹出谋划策，并用他们的技术帮助苏丹；给穆罕默德二世献计的是"一个毫无信义的基督徒。我相信，那个人是从威尼斯人在加尔达湖的策略中学到了这个把戏，并将它传授给土耳其人"[25]。早在1439年，威尼斯人就从陆路将若干桨帆船从阿迪杰河搬运到了加尔达湖，但中世纪的战史中有很多这样的先例，而且穆罕默德二世非常热衷于钻研军事史。在12世纪，萨拉丁曾将桨帆船从尼罗河运到红海；1424年，马穆鲁克[26]军队把桨帆船从开罗运到了苏伊士。不管穆罕默德二世是从哪里得到这条良策的，其计划显然在21日前就已经开始执行；战事的不利迫使他加紧实施这项计划。

穆罕默德二世这么做还有一个理由。他感到，必须对金角湾对岸加拉塔城的热那亚殖民地施压。加拉塔在这场战役中暧昧的中立让攻守双方都颇为不满。在战前，加拉塔和君士坦丁堡及奥斯曼人都有贸易往来，生意兴隆。在此期间，它在两大势力之间起到了渠道的作用，物资

和情报都通过加拉塔来往穿梭。有谣言说，加拉塔市民白天在奥斯曼军营里公开活动，为其提供冷却大炮所需的油料，以及其他有利可图的货物；夜间则溜过金角湾，去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上站岗放哨。铁链的一端固定在加拉塔城墙内，奥斯曼人无法直接对付，因为穆罕默德二世不愿意与热那亚撕破脸皮。他深知，假如与加拉塔发生直接的冲突，热那亚城就可能会派来一支强大的舰队。同时，他也认识到，加拉塔市民当然会同情基督徒。朱斯蒂尼亚尼就是个热那亚人。前来支援的热那亚船只或许也打破了加拉塔人的暧昧态度。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记载道："此前加拉塔人非常小心谨慎……但他们现在却急于提供武器和兵员，但只能是秘密提供，以防对他们假装友好的奥斯曼人发现。"[27] 热那亚人的脚踩两只船意味着，信息在拜占庭与奥斯曼人之间的传递并不是单向的，这将很快产生悲剧性后果。

加拉塔城外原先遍布葡萄园和灌木丛，这一地域已经完全被扎甘帕夏指挥的奥斯曼部队占领。苏丹可能在攻城战的早期就做出了决定，要修建一条道路，具体走向是：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靠近双柱港的某个点出发，沿着一座陡峭的山谷爬升，来到加拉塔城外的一座山岭，然后从另一座山谷下降，来到热那亚殖民地之外金角湾沿岸一个叫作泉源谷的地方，那里处于加拉塔城墙之外，设有热那亚人的墓地。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就用这条道路来搬运船只。这条道路的制高点大约有海拔200英尺，对搬运船只的工作来说将是个严峻的挑战。但穆罕默德二世有的是人力。他素来高瞻远瞩，而且口风很严，早就为这个行动收集了物资：用来修建简易轨道的木材、用来承载船只的滚轴和支架、成桶的油脂和大量公牛与劳工。奥斯曼人先把这一地域的灌木丛清除干净，并尽可能将地面铲平。4月21日，搬运舰队的工作开始加速进行。成群劳工将木制轨道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铺向山谷，预备好滚轴并涂抹了油脂，还建造了支架，用来将船只抬出水面。为了转移守军的注意力，穆罕默德二世把一个连的大炮调到了加拉塔城以北不远处的一座山上，然后命令扎甘轰击保卫金角湾的基督教船只。

守军能够从加拉塔这个渠道或者奥斯曼军营内的基督徒士兵那里得到情报，却未能发现敌人在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工程，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早先，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可能认为奥斯曼军队是在做简单的修路工作。后来，他们要么是被炮火压得抬不起头来，无法严密观察；要么（按照威尼斯人的说法）他们与奥斯曼人暗地勾结。穆罕默德二世很可能也明令确保他的基督徒士兵不得参加此项工程。不管真相如何，君士坦丁堡守军对敌人的新动向一无所知。

4月22日（星期日）清晨，奥斯曼人的炮火仍在咆哮，基督徒们前往教堂去做礼拜。第一具支架被放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水中。奥斯曼人将一艘轻型弗斯特战船放入支架，然后借助滑轮将它搬到轨道之上的木制滚轴上，滚轴事先已经用油脂做了润滑。始终亲临一线的苏丹在那里观看和鼓励士兵们的努力。“滚轴上已经捆缚了绳索，他将长长绳索的另一端固定在战船的边角上，命令士兵们去拖曳。有的人直接用手拽拉，有的人借助某种绞车和绞盘装置。”[28] 成群的公牛和劳工将战船拖上了斜坡，同时两侧还有更多的工人和士兵扶着战船。战船在轨道上前进一段距离之后，劳工们在它前方铺设更多轨道。在大量人力畜力资源的支持下，战船在陡峭的斜坡上缓缓前进，走向200英尺之上的山岭。

海上吹来了怡人的晨风，穆罕默德二世灵机一动，命令正在被搬运的各艘战船的基本人员登船。“有些人高呼着升起船帆，就好像他们要扬帆远航一样。海风把船帆吹得鼓鼓涨涨的。还有的人坐在桨位上，手里抓着船桨，前后划动，就好像真的在划船一样。指挥官们在桅杆基座旁跑来跑去，吹着口哨，大呼小叫，向桨手们挥动皮鞭，命令他们划船。”[29] 船上五颜六色的旌旗迎风招展，战鼓擂响，小型乐队在船首上吹响喇叭。这是一幅即兴表演的狂欢景象，非常离奇和梦幻：旗帜飘扬、乐队大吹大擂、船桨划动、船帆在清晨的清风中鼓动、牛群低吼着使劲。土耳其人在战争中期做出的这个姿态给对方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震撼，这个故事也将成为土耳其民族征服神话的重要元素。“这景象非同

寻常，”克利托布罗斯记载道，“除非亲眼所见，没人会相信。战船被运过陆地，就像在海上航行一样，船员和全部装备都在船上，船帆也张挂了起来。”[30] 在附近的高地上，扎甘帕夏继续炮击下方的港口。2英里之外，大炮在轰击圣罗曼努斯门处的陆墙。

第一艘被搬运的战船从山岭顶端开始艰难地向下运动，前往泉源谷。特别注重细节的穆罕默德二世已经把第二个炮兵连调到岸边，以防止船只入水时遭到攻击。离正午还有一段时间，第一艘船水花四溅地进入了金角湾的平静水域，船员已经做好了抵挡突袭的准备。其他战船很快也陆续入水。当天一共有约70艘船接二连三地在泉源谷附近入水。这些船都是弗斯特战船，也就是快速的轻型两层或三层桨战船，“配备15～20个，甚至22个桨位”[31]，船身长度在70英尺左右。尺寸更大的桨帆船则留在双柱港海域。

此次行动的所有微妙细节（时间安排、路线以及动用的技术）仍然神秘莫测。事实上，要在24小时内完成整个工程，可能性是极小的。从人体工程学角度来看，搬运距离至少有1.25英里，斜坡角度为8°，要先上坡，然后再稳妥地下坡，哪怕有大量人力畜力以及绞车的帮助，也肯定需要长得多的时间。奥斯曼人很可能在4月22日之前很久就把大型船只拆解，然后在靠近金角湾的地方重建起来，其他船只的搬运也肯定早就开始了。穆罕默德二世是个城府极深的人，把秘密保守到最后一刻是很符合他秉性的，但所有的史学家都同意，在4月22日早上，战船接二连三地进入了金角湾。整个行动在战略和心理上都是了不起的杰作，筹划巧妙，执行有力。甚至后世的希腊史学家也不情愿地予以称赞。“这是一项丰功伟绩，也是杰出的海战策略。”[32] 梅里西诺斯如此写道。这将给守军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加拉塔和金角湾：双柱港位于右上方，泉源谷位于左侧风车下方

由于金角湾沿岸的海墙得到了铁链的保护，而且陆墙承受了极大压力，所以海墙上几乎没有守军。肯定很少有基督徒士兵亲眼看到第一艘敌船从对面山上出现，然后下坡入水。他们发现这个新变化之后，恐慌很快不胫而走。人们从陡峭的街道上跑来，在城墙上战战兢兢地看着奥斯曼舰队陆续进入金角湾。这是奥斯曼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战败之后在战略和心理上做出的巧妙还击。

君士坦丁十一世立刻就认识到，这对他那已经承受了极大压力的部队意味着什么。“现在金角湾沿岸海墙也处于前线，他们不得不派兵驻守，并从其他防区抽调兵力去那里。从城墙其他地段抽调兵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那些地段现有的兵力已经屈指可数，无法有效地防守。”[33] 作为海战指挥官的威尼斯人同样忧心忡忡。这条封闭的海峡只有几百码宽，奥斯曼舰队就在不到1英里之外；金角湾曾经是躲避敌人的避难所，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没有喘息之地的狭窄杀戮场。

> 我们舰队的船员们看到那些弗斯特战船时无疑非常害怕，因为他们确信这些敌舰当晚就会联合在双柱港的舰队，内外夹击地攻打我们的舰队。我方舰队在铁链之内，土耳其舰队在铁链内外都有战船，所以我们面临的危险是极大的。我们还担心敌人发动火攻，烧毁在铁链处的我方船只。我们被迫在海上昼夜守备，对土耳其人万分畏惧。[34]

守军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尽快消灭金角湾内的敌人舰队。第二天，威尼斯市政官和皇帝携手在威尼斯人的圣马利亚教堂召开了作战会议，决心“烧毁敌人舰队”[35]。这次会议只有12人参加，而且是秘密的闭门会议。除了君士坦丁十一世，与会者大多是威尼斯的指挥官和船长。威尼斯人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务，但也允许了一个外人参加：热那亚人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在所有事务上都值得信赖的人”，他的意见受到普遍尊重。会议各方进行了漫长而激烈的辩论，提出了多种不同方案。有人主张整个舰队在白天大举出动，发动全面进攻，这就需要热那亚船只的配合。但这个方案被否决了，因为与加拉塔谈判就会非常复杂，而战局已经十万火急。还有人主张出动一支陆军部队去消灭保护敌

人舰队的火炮，然后将敌船烧毁。但守军的兵力非常薄弱，这么做风险太大，因此也被否决了。最后，一艘特拉布宗桨帆船的船长贾科莫·科科，“一个果断坚决、沉默寡言的人”[36]，强烈支持第三种方案：在夜间发动一次小规模海战，通过出其不意的奇袭烧毁土耳其舰队；行动必须秘密筹划，不通知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并立即执行，因为时间就是生命。他提议由他自己来指挥此次突袭。与会者进行了投票表决，最后这个计划得以通过。

4月24日，科科开始着手实施他的计划。他选择了两艘坚固的高舷商船，在其船舷上堆积了大量装满羊毛和棉花的麻袋，并填塞平整，用来抵御奥斯曼火炮发射的石弹。还有两艘桨帆船将伴随商船前进，击退敌人的反击，而真正挑大梁的将是两艘快速的轻型弗斯特战船，每艘船上配有72名桨手。这两艘弗斯特战船上装满了希腊火和其他易燃物，用来火攻敌人。每艘大船还有一艘运载其他物资的小船伴随。计划很简单：有防护的风帆商船将作为肉盾，保护快速的弗斯特战船，直到后者接近敌人。弗斯特战船将冲出己方的保护圈，向队形密集的奥斯曼战船发动火攻。参战船只将在日落一小时后集合，于午夜发动突袭。事先做了周全的准备；但是，当指挥官们聚集在港口指挥官阿卢威克瑟·迪艾多的桨帆船上听取战前的最后指令时，计划却出人意料地受到了阻挠。城内的热那亚人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打探到了这个消息，也想参加突袭。他们坚决要求暂缓行动，好让他们的船只做好准备。威尼斯人不情愿地同意了。进攻被推迟了。

热那亚人的战斗准备花了四天时间。在此期间，陆墙遭到持续轰击。威尼斯人等得不耐烦了。“从这个月的24日一直等到28日，”巴尔巴罗记载道，“4月28日，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他们终于决定尝试将奸诈的土耳其人的舰队烧毁。”[37] 为了安抚敏感的热那亚人，进攻舰队做了一些微调：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各自提供了1艘有防护的商船；2艘威尼斯桨帆船分别由加布里埃尔·特里维萨诺和扎卡里亚·格廖尼指挥；运

载易燃物的3艘快速弗斯特战船由科科指挥；另外还有一些运载更多沥青、木柴和火药的小船。

4月28日，离拂晓还有两个小时，进攻舰队从金角湾东北角加拉塔海墙的庇护下安静地驶出，绕过通往泉源谷的黑暗海岸的弯曲处，路程不到1英里。打头阵的是两艘商船，朱斯蒂尼亚尼就在其中的热那亚商船上。其他船只紧随其后。海面上波澜不兴，没有任何动静。唯一能够显示有人在的迹象就是热那亚人的加拉塔城楼上短暂闪烁的光亮。他们接近奥斯曼舰队时，听不到任何声响。

尺寸较大的商船在使用人力划桨时速度较慢，而理应接受商船保护的弗斯特战船的桨手更多，速度很快。不知道是受了缓慢接近时的沉寂和紧张情绪的刺激，还是因为进攻被推迟而恼火，或者是由于渴望“扬名天下”[38]，贾科莫·科科突然间摈弃了精心制定的计划。他自作主张，率领他的火攻船脱离了舰队，全速向停泊着的敌人舰队冲去，抢先发动了进攻。一瞬间周遭万籁俱寂。然后敌人向没有防护的火攻船开了炮。第一发炮弹很接近目标，但没有命中。第二发炮弹击中了一艘弗斯特战船的中部，将其击穿。“这艘弗斯特战船坚持的时间还不够念十遍主祷文，就沉没了。”[39]巴尔巴罗记载道。一瞬间，披甲的士兵和桨手们坠入夜色下的大海，很快无影无踪了。

夜色漆黑，跟在后面的船只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状况，继续前进。更多的火炮在近距离开火。“大炮和火枪发出如此之多的浓烟，大家什么都看不见，双方都在大喊大叫。”[40]基督教船只上前时，特里维萨诺的大型桨帆船冲入了火线，当场被两发炮弹击穿了船体。海水迅速灌入船体，但躺在甲板下方的两名伤员沉着冷静地采取了措施，避免了船只沉没。他们用储存在舱内的斗篷堵住破口，总算阻止了海水灌入。被严重击伤的桨帆船虽然已经被海水淹了一半，但仍然漂浮在水面上，桨手们艰难地把船划回了安全地带。其他船只试图继续进攻，但敌人猛

烈开炮，投掷石块和其他武器，火力非常凶猛，再加上特里维萨诺的桨帆船严重受损，于是它们选择了撤退。

天渐渐亮了，但在混乱之中，两艘大型商船仍然停留在战场上，按照原计划摆开了防御阵势，竟没有发现其他船只已经撤退。看到这两艘船出人意料地落了单，奥斯曼舰队从锚地出发，意图将它们包围和俘虏。“爆发了一场可怕而凶残的战斗……看上去着实有如地狱；子弹和箭如同倾盆大雨，大炮不时轰鸣，火枪不断脆响。”[41] 70艘小船蜂拥上去攻击基督教船只，穆斯林水手们高呼安拉的尊名。但那两艘商船侧舷较高，而且有防护，再加上船员们作战经验丰富，因此抵挡住了进攻。近距离激战一连持续了一个小时，双方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最终双方脱离接触，各自鸣金收兵。奥斯曼舰队损失了一艘弗斯特战船，但赢得了整个战斗的胜利。“土耳其军营中欢呼雷动，因为他们击沉了贾科莫·科科的弗斯特战船，”巴尔巴罗回忆道，“而我们满心恐惧地哭泣，害怕土耳其人用他们的舰队打败我们。”[42] 意大利人对损失做了清点：一艘弗斯特战船被击沉，全体船员和一些士兵随之坠入深渊；一艘桨帆船严重受损；意大利人在海战中的优势地位被打破了。阵亡者的名单很长，包括不少有名望的人：“贾科莫·科科，船长；科孚岛的安东尼奥，合伙人；安德烈亚·斯泰科，大副；朱安·马拉尼奥，弩手；特罗伊洛·德·格雷齐，弩手……”；等等。“那艘被击沉的弗斯特战船上的人全都葬身大海，愿上帝怜悯他们。”[43]

4月28日[44] 上午，守军发现，他们不仅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蒙受更恐怖的苦难。原来，失踪的人并非全部被淹死，有大约40人从下沉的战船泅水逃生，在黑暗和混战中游到了敌占海岸，被俘虏了。穆罕默德二世命令将俘虏全部钉死在尖木桩上，并展示给君士坦丁堡全城人看，以儆效尤。海战的幸存者在城墙上战战兢兢地看着敌人的准备工作。一位名叫雅各布·德·坎皮的热那亚商人（他在奥斯曼帝国做了25年的生意）将这可怕景象描绘如下：

> 苏丹命令将他想要惩罚的人按倒在地；一根削尖的长木桩被插入此人的肛门；刽子手用双手举着一个大木槌，使出全身力气向下锤击，木桩被钉入人体。按照木桩插入位置的不同，这个可怜人要么当场死亡，要么还要忍受一段时间。然后刽子手将木桩抬起，将它插入地面。于是受刑的可怜人就只能这样苟延残喘，很快就会死去。[45]

“木桩就这样被安插在那里，受刑者在城墙卫兵众目睽睽之下悲惨地死去。”[46]

当时的欧洲作家对这种死刑方式的残暴大肆口诛笔伐，并认为它是土耳其独有的刑罚。刺刑（尤其是作为一种震慑被围攻的城市的心理战工具）其实是奥斯曼军队从基督教巴尔干学来的。后来，奥斯曼人自己也经受了史上最恶名昭彰的一次暴行：据说，弗拉德·德古拉[47]于1461年在多瑙河平原将2.5万名奥斯曼人钉死在尖木桩上。目击者称：“无数尖木桩被安插在地上，上面挂的不是水果，而是死尸”[48]，而在这些刑具的正中央有一根较高的木桩（以彰显这名受刑者的地位）钉着曾经担任海军司令的哈姆扎贝伊的尸体，还穿着红紫两色的官服。假如穆罕默德二世听到这个描述，一定也会大为震惊、心惊肉跳。

4月28日下午，意大利水手被刺穿在尖木桩上的可怕景象收到了苏丹希望的效果。“城内为这些青年发出的哀恸无法描述。”[49]梅里西诺斯写道。但悲痛很快变成了狂怒。为了取得一点心理平衡，也为了发泄进攻失败的挫折感，他们以牙还牙，自己也做出了暴行。自围城开始以来，城内就扣押着约260名奥斯曼俘虏。次日，很可能是在君士坦丁十一世命令之下，守军进行了血腥的报复。“我们的人暴跳如雷，在城墙上当着奥斯曼全军的面野蛮地屠杀了土耳其俘虏。”[50]俘虏被一个一个地带上城墙，在奥斯曼军队的注视下被吊死。众多绞架围成一个圆圈。莱奥纳德大主教哀叹道：“就这样，由于不虔诚和残忍的行为，这场战争变得愈发野蛮。”[51]

悬挂在绞架上的俘虏和被钉死的水手隔着战线相望，这真是一种无

言的讽刺。但在这一系列暴行之后，战役主动权显然已经再次回到了进攻方那一边。金角湾内的奥斯曼舰队实力几乎毫发无损，守军也清楚地认识到，具有关键意义的金角湾彻底丧失了。这次笨拙的夜袭严重地损害了君士坦丁堡的实力。他们对此进行思考，寻找失败的原因，并控诉负有责任的人，尤其在意大利人之间发生了争吵。很显然，科科的进攻被推迟是个致命错误。敌人通过某种途径得到了风声，在海上守株待兔。穆罕默德二世此前把更多的火炮调到了内港，准备伏击基督徒的突袭舰队。加拉塔城楼上的光亮显然是热那亚殖民地内部有人在向苏丹通风报信。意大利人各个派系之间的互相指责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丧失理性。

---

[1] Lewis，Bernard，*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1 vols.，Oxford，1987，p.212

[2]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1823，p.18

[3]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5

[4]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p.23-4

[5] Tursun Bey，quoted Inalcik，Halii，“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Speculum* 35，p.411

[6]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301

[7]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p.301-2

[8] Barbaro，Nicolo，（in English）*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rans. J. R. Melville Jones，New York，1969，p.34

[9] Sphrantzes，George，*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he Sphrantzes Chronicle*，trans. Margaret Carroll，

Amsterdam，1985，p.56

[10]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25

[11]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25

[12]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14

[13]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p.4

[14] quoted Mijatovich，Chedomil，*Constantine Palaiologos*：*Th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1448-1453*，London，1892，p.161

[15] quoted Nicol，Donald M.，*The Immortal Emperor*：*The Life and Legend of Constantine Palaiologus*，*Last Emperor of the Romans*，Cambridge，1969，pp.127-8

[16]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16

[17]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16

[18] Barbaro，Nicolo，（in English）*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rans. J. R. Melville Jones，New York，1969，p.36

[19] Barbaro，Nicolo，（in English）*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rans. J. R. Melville Jones，New York，1969，p.36

[20]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17

[21]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17

[22]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16

[23] 即奥斯曼帝国当时的首都埃迪尔内。

[24] Doukas，*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Detroit，1975，p.258

[25]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1823，p.28

[26] 马穆鲁克王朝在约1250～1517年统治埃及和叙利亚。“马穆鲁克”是阿拉伯语，意为“奴隶”。自9世纪起，伊斯兰世界就已开始起用奴隶军人。奴隶军人往往利用军队篡夺统治权。马穆鲁克将领在阿尤布苏丹萨利赫·阿尤布（1240～1249年在位）去世后夺取王位。1258年，马穆鲁克王朝恢复哈里发的地位，并保护麦加和麦地那的统治者。在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残余的十字军被赶出地中海东部沿岸，而蒙古人也被赶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文化上，他们在史书撰写及建筑方面成就辉煌。最后他们被奥斯曼帝国打败。

[27]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p.134-6

[28]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6

[29]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6

[30]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6

[31]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28

[32] Sphrantzes，George，*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he Sphrantzes Chronicle*， trans. Margaret Carroll，Amsterdam，1985，p.56

[33]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7

[34]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19

[35]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29

[36] Sphrantzes，George，*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Amherst，1980，p.111

[37]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30

[38]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31

[39]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31

[40]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32

[41]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33

[42]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33

[43]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p.31-2

[44] 原文为“4月29日”，有误。

[45] quoted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1978，p.429

[46]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1972，p.5

[47] 即瓦拉几亚大公弗拉德三世·采佩什（1431～1476），即后世传说中“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原型。

[48] Doukas，*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 trans. Harry J. Magoulias，Detroit，1975，p.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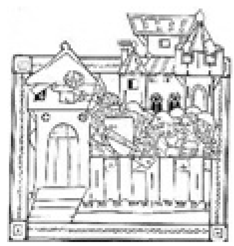
[49] Sphrantzes，George，*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he Sphrantzes Chronicle*， trans. Margaret Carroll，Amsterdam，1985，p.31

[50]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144

[51]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144

11.恐怖的机械

1453年4月28日～5月25日



围城战需要机械：各种类型和形式的龟甲撞城锥……可移动的木制塔楼……不同形式的梯子……挖掘不同类型城墙所需的不同工具……不用云梯登城所需的机械。[1]

——10世纪关于围城战技术的手册

“呜呼，最有福的圣父，这是多么可怕的灾难，海神的狂怒竟然一击将他们灭顶！”[2] 夜袭失败之后，守军当即就为失败的责任爆发了尖刻和激烈的争吵。威尼斯人在这次惨败中损失了80～90名亲密战友，找出了他们认为应该为此负责的人。“可憎的来自佩拉的热那亚人是叛徒，是背弃基督教信仰的逆贼，”尼科洛·巴尔巴罗宣称，“他们借此向土耳其苏丹邀宠。”[3] 威尼斯人声称，加拉塔的某人溜到了苏丹军营，将夜袭的消息报告给了他。威尼斯人还提出了具体的指控：他们认为是加拉塔的市长自己派人去向苏丹报告的，或者是一个叫做法尤佐的人。热那亚人则反驳，威尼斯人应当为这次惨败负全责。科科“是个沽名钓誉之徒”[4]，无视命令，给整个行动造成了灾难。另外，他们还指责威尼斯水手偷偷将物资装上船，准备逃离城市。

双方大吵特吵起来，“互相指责企图逃跑”[5]。意大利人内部的深层敌意浮出了水面。威尼斯人声称，他们已经服从皇帝的命令，将船上的货物卸载上岸，并要求热那亚人也“将你们船只的舵和帆保存在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安全地点”[6]。热那亚人反驳说，他们绝无逃离城市的企图；与威尼斯人不同，他们的妻儿老小和财产都在加拉塔，“我们将保卫加拉塔，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并且拒绝将“我们的高贵城市、为热那亚增光添彩的珍宝交给你们”。加拉塔的热那亚人的暧昧态度使得他们受到了各方面的指控，大家都控诉他们是欺骗盟友的叛徒。热那亚人与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都是贸易伙伴，但他们天性是同情其他基督徒的，而且他们允许拜占庭人将铁链固定在他们的城墙上，就已经破坏了自己的中立性。

君士坦丁十一世很可能亲自干预了互相猜忌的意大利人之间的争吵，但金角湾本身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基督教舰队害怕敌人的夜袭或者两面夹击（金角湾内部、泉源谷附近有一支奥斯曼舰队；金角湾之外、双柱港附近还有另一支舰队），丝毫不敢松懈。水手们昼夜处于戒备状态，小心谨慎地捕捉火攻船接近的声响。在泉源谷附近，奥斯曼军队的大炮严阵以待，准备应对基督教舰队的第二次进攻，但奥斯曼舰队没有采取行动。在科科阵亡之后，威尼斯人对自己的队伍进行了重组。一位新指挥官多尔芬·多尔芬（Dolfin Dolfin）受命接管科科的战船，同时他们还在考虑可否用其他方法消灭金角湾内的奥斯曼战船。在4月28日的失败之后，海路进攻显然是太危险了，于是他们决定用远程手段来骚扰敌人。

5月3日，两门尺寸相当大的火炮被部署到金角湾沿岸某一座水门处（700码外的对岸就是奥斯曼舰队的锚地），并开始炮击奥斯曼船只。起初炮击的效果很可观。他们击沉了一些弗斯特战船，按照巴尔巴罗的说法，“我们的炮击打死了很多敌人”，但奥斯曼军队迅速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一威胁。他们把舰船调离基督徒火炮射程范围内的区域，并用他们

自己的三门大炮还击，“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双方的大炮在随后10天内隔着海面互相轰击，但都无法摧毁对方，“因为我们的大炮在城墙后，他们的大炮则得到了堤岸的良好保护，而且双方的距离达到半英里”[7]。于是，这场炮击竞赛逐渐陷入僵局，但金角湾的压力还在，而且穆罕默德二世在5月5日回敬以自己的炮击计划。

他那不知疲倦的头脑一定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既然加拉塔城墙处在火线上，如何才能炮击铁链处的基督教船只呢？解决方案是建造一门弹道更为弯曲的大炮，让它从加拉塔城的后方射击，炮弹就可以从加拉塔城头顶上越过，不至于误击这座中立城市。于是他命令铸炮工匠们开始研制一种原始的臼炮，“能够将石弹射得很高，石弹落下来之后就能够正中敌船，将其击沉”[8]。新的大炮已经制造成功，准备就绪。它从加拉塔后方一座山上向铁链处的基督教船只开了火。加拉塔的城墙正处于这门炮的火线之内，但这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有个好处：向态度可疑的热那亚人施压。这门臼炮的第一批炮弹从加拉塔市民们的屋顶上呼啸而过，市民们一定感到奥斯曼帝国勒紧了他们脖子上的绞索。当天的第三发炮弹“从山顶上轰鸣着飞下”[9]，没有命中敌船，却击中了一艘中立的热那亚商船的甲板。该船“容积为300桶，装载着丝绸、蜂蜡和其他商品，总价值1.2万杜卡特。它当场就沉底了，桅顶和船体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船上有人被淹死”[10]。于是，守卫铁链的所有船只都转移到了加拉塔城墙之下，寻求庇护。臼炮继续轰击，射程略有缩短，炮弹开始落在城墙和城内房屋上。桨帆船和其他船只上不断有人被石弹击毙，“有时一发炮弹能打死4人”[11]，但城墙提供了足够的防护，因此没有更多船只被击沉。加拉塔的热那亚人第一次遭到直接炮击，尽管只有1人死亡（“一位名誉极佳的妇女，当时站在大约30人的人群中间”[12]），奥斯曼人的意图是一清二楚的。

加拉塔城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来到苏丹的大营，向他抱怨此次攻击。一位维齐尔面无表情地抗议说，他们以为被击沉的船属于敌人，并平静

地向代表们保证，最终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欠他们的钱都会还清”[13]。“土耳其人就用这种侵略行径报答加拉塔人民向他们表现的友谊，”[14]杜卡斯讥讽地宣称。他说的“友谊”指的是加拉塔人向土耳其人通风报信，导致科科夜袭的失败。在此期间，石弹继续以弯曲的弹道越过金角湾。按照巴尔巴罗的说法，到5月14日，奥斯曼军队的臼炮已经发射了“212发石弹，每一发石弹至少有200磅重”[15]。基督教舰队一直被压制在原地，未能发挥任何作用。在14日之前很久，基督徒们就已经失去了对金角湾的有效控制。陆墙处战事吃紧，需要更多的人力和物资，这更加深了水手们之间的矛盾。穆罕默德二世的压力消解了不少，于是命令在金角湾上修建一座浮桥，位置就在君士坦丁堡城外不远处，以缩短他的交通线，并保证人员和大炮能够自由运动。

在陆墙处，穆罕默德二世也在施加更大的压力。他的战术是消磨对方的力量，并越来越重视心理战。现在守军的兵力更加薄弱，他决定用持续炮火把他们拖垮。4月底，他把一些大炮调到圣罗曼努斯门附近的城墙中段，“因为那里的城墙比较低，也比较弱”[16]；当然，他同时还在加紧炮击皇宫一带仅有一道城墙的地段。大炮昼夜轰鸣；奥斯曼军队还随时可能会发动小规模袭击，检验守军的决心，然后一连几天都不进攻，让守军自己松懈下来。

快到4月底的时候，一次大规模炮击把城墙顶端炸塌了大约30英尺。天黑之后，朱斯蒂尼亚尼的部下再次开始抢修，用泥土封堵缺口，但次日奥斯曼大炮又开始了狂轰滥炸。但是，快到中午的时候，其中一门大炮的火药室破裂了，可能是因为炮管的缺陷，尽管俄罗斯人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声称这是被守军的火炮击中所致。这个挫折让穆罕默德二世火冒三丈，命令立即发动一次攻势。奥斯曼军队向城墙发起了冲锋，令守军措手不及。随后爆发了一场激烈交火。城内敲响了警钟，人们冲向城墙。“兵器碰撞、火光夺目，所有人都感到城市已经被连根拔起。”[17]冲锋的奥斯曼士兵被成片地打倒在地，又被后面疯狂冲上来的

其他士兵踩在脚下。对俄罗斯人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来说，这个景象极其恐怖："死尸几乎将壕沟填满，土耳其人踏过己方士兵的尸体，就像在大草原上冲锋一样，继续战斗，死者的尸体成了通往城市的桥梁或者楼梯。"守军最终无比艰难地打退了这次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夜色降临。成堆的死尸被抛弃在壕沟内；"从突破口附近一直到山谷，流血漂橹"[18]。守军士兵和市民们精疲力竭，倒头就睡，任凭伤者在城墙外呻吟。第二天，僧侣们再次开始他们的忧伤工作：埋葬战死的基督徒，并清点敌人尸体。君士坦丁十一世已经被消耗战拖得身心疲惫，现在看到伤亡数字，显然非常烦恼。

疲惫、饥饿和绝望开始给守军带来严重的损失。到5月初，粮食已经短缺；此时已经很难和加拉塔的热那亚人做生意，划船去金角湾捕鱼也变得非常危险。在战斗间歇，很多防守城墙的士兵会离开岗位，为家人搜寻食物。奥斯曼军队知道这个情况后，不断发动突然袭击，用一端带钩子的木棍将城墙上装泥土的木桶拉下来。他们甚至能够大摇大摆地接近城墙，用网兜回收炮弹。城内的争吵愈演愈烈。热那亚人的大主教莱奥纳德控诉擅离岗位的希腊人是懦夫。希腊人反驳说："如果我的家人挨饿，城防关我什么事？"[19]莱奥纳德感到，还有很多希腊人"对拉丁人满腹仇恨"[20]。有人被指控囤积粮食、怯懦畏敌、投机倒把和妨碍城防。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信条和血统出身不同的各个派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朱斯蒂尼亚尼和诺塔拉斯互相争夺军事资源。莱奥纳德严厉谴责"某些人的丑恶行径，他们是喝人血人膏的恶魔，囤积粮食，或者哄抬粮价"[21]。在围城的巨大压力之下，脆弱的基督教联盟开始瓦解。莱奥纳德责怪君士坦丁十一世没能控制住局面："皇帝行事过于宽大，抗命不遵的人既没有受到言语训斥，也没有受到刀剑的惩罚。"[22]城墙外的穆罕默德二世很可能也得知了这些争吵和矛盾。"守城军队陷入了分裂，"[23]奥斯曼史官图尔松贝伊在这个时期记载道。

为了防止士兵去搜寻粮食而玩忽职守，君士坦丁十一世命令向士兵

的家属平均分配粮食。形势已经非常险恶，他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征用了教堂的圣餐盘，将其熔化、铸成钱币，分发给士兵们，让他们去购买粮食。皇帝的这个举措很可能是颇有争议的，不大可能受到虔诚的东正教徒的支持，后者认为城市蒙受的苦难是罪孽和错误应得的惩罚。

拜占庭指挥官们在加紧商讨战局。敌人舰队进入金角湾，严重打乱了守军的计划，他们被迫根据新局势重新部署部队和划分防区。城墙守军昼夜不停地瞭望西方大海，但海平线上没有任何动静。大约在5月3日，守军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指挥官、民政要人和教会人士共商国是。敌人的大炮还在轰击城墙，守军士气越来越低落，大家感到敌人的全面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在充满不祥预感的气氛下，有人提议让君士坦丁十一世离开城市，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在那里重整旗鼓，招募新兵，以图东山再起。朱斯蒂尼亚尼表示愿意提供他的桨帆船送皇帝逃离。史学家对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答复作了非常煽情的记述。他“沉默许久，泪如雨下，然后说道：‘我赞赏和感激你们的建议，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因为这建议符合我的利益，一定是这样的。但我怎么能这么做？怎么能离开教会、上帝的教堂、帝国和所有人民？请告诉我，如果我逃走的话，全世界会怎么看我？不，众位大人，不行。我要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殒身报国。’他向他们鞠躬致敬，哭得伤心欲绝。牧首和在场的其他人都开始默默流泪”。[24]

平静下来之后，君士坦丁十一世提出了一个务实的建议：威尼斯人应当立即派遣一艘船到爱琴海东部，寻找救援舰队的迹象。要突破奥斯曼人的海上封锁是非常危险的，但当即就有12人自愿报名，于是准备了一艘双桅帆船来执行这个任务。5月3日快到午夜时，这12人乔装打扮成土耳其人，登上了这艘小船。船被拖曳到铁链处。帆船张挂着奥斯曼帝国的旗帜，升起船帆，骗过了敌人的巡逻队，丝毫没有被敌人察觉，然后在夜幕掩护下向西进入马尔马拉海。

虽然大炮有一些技术问题，穆罕默德二世仍然继续炮击城墙。5月6日，他判断，发动致命一击的时机已经到了："他命令陆军全军再次向城市推进，全天猛攻。"[25] 城内传出的消息可能让他确信，守军的斗志已经在崩溃；或许还有其他情报警告他，意大利人正在缓慢地组织一支援军。他感到，城墙中段的薄弱环节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他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

5月6日，大炮再次猛烈开火，较小的火炮也加入合唱，此时炮手们对射击模式已经驾轻就熟。炮击还伴随着"呐喊声和响板的敲击声，以威慑城内的人"[26]。很快，又有一段城墙倒塌了。守军要等到夜间才能修补城墙，但这一次，奥斯曼人在夜间也继续炮击，所以守军无法封闭这个缺口。次日早上，大炮继续对城墙基部狂轰滥炸，又打垮了相当长的一段。奥斯曼军队持续炮击了一整天。晚上7点左右，他们向城墙突破口发动了一次排山倒海的进攻，像往常一样大呼小叫、鼓乐喧天。远方港口内的基督徒水手们听到了狂野的呼喊声，担心奥斯曼舰队也会相应地发动进攻，于是做好了战斗准备。成千上万的奥斯曼士兵越过壕沟，冲向突破口，但此处非常狭窄，兵力优势发挥不出来，他们在强行猛冲的过程中踩倒了不少自己人。朱斯蒂尼亚尼冲上去迎战，突破口处爆发了一场绝望的肉搏战。

一个名叫穆拉德的近卫军士兵引领着第一波攻击。他凶猛地向朱斯蒂尼亚尼砍杀，朱斯蒂尼亚尼险些丧命，但这时有一个希腊人从城墙上跳下，用斧子砍断了穆拉德的双腿，才将朱斯蒂尼亚尼救下。率领第二波攻击的是奥斯曼帝国欧洲军的旗手奥马尔贝伊，迎战他们的是朗加比斯指挥下的一大队希腊兵。在大肆砍杀和冲刺的混战中，双方的指挥官在各自部下面前展开了一对一单挑。奥马尔"拔出利剑，向对方猛攻，两人疯狂地互相劈砍。朗加比斯走到一块石头上，双手握剑，砍到奥马尔的肩膀，将他劈成两段，因为朗加比斯的臂力极强"[27]。奥斯曼士兵们看到指挥官战死，不禁火冒三丈，将朗加比斯团团围住，把他砍倒在

地。就像《伊利亚特》的场景一样，双方都冲上去争抢指挥官的尸体。希腊人急于夺回城门外的尸体，“但未能成功，自己损失惨重”[28]。奥斯曼士兵们将残缺不全的尸体砍成肉泥，把希腊兵赶回了城内。这场鏖战持续了三个钟头，但守军坚守住了战线。战斗渐渐平息下来，大炮又开始咆哮，以阻止守军封闭缺口。同时奥斯曼军队发动了一次牵制性攻击，企图将皇宫附近的城门烧毁，但也被击退。朱斯蒂尼亚尼和疲惫不堪的守军士兵在黑暗中努力重建临时壁垒。由于城墙遭到轰击，他们不得不在比原先位置更靠后的地方修建土木壁垒。城墙仍然坚挺着，但非常勉强。在城内，“希腊人因为朗加比斯的战死而万分悲痛和恐惧，因为他是个了不起的武士，非常英勇，而且受到皇帝的敬爱”[29]。

对守军来说，炮击、进攻和修补城墙的循环越来越模糊不清。就像描绘堑壕战的日记一样，史学家的记载也越来越单调和重复。“5月11日，”巴尔巴罗记载道，“除了陆墙遭到相当规模的炮击，陆上和海上都很平静，没有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13日，一些土耳其人来到城墙下，发动了小规模袭扰，但除了不幸的城墙遭到持续轰炸之外，白天和夜间都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30]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对时间的把握开始出错，他记载的事件的顺序开始紊乱，甚至有重复记录。士兵和平民都厌倦了战斗、修理、埋葬死者和清点敌人的死尸。奥斯曼军队对营地内的卫生状况高度重视，总会把己方阵亡者抬走安葬，但壕沟内还是堆满了腐烂的死尸。激烈残杀威胁着饮用水的安全：“河流溪涧中的污血污染了水源，发出恶臭。”[31]城内的市民越来越沉迷于教堂礼拜和圣像创造奇迹的神力，忙于思考罪孽和对局势进行神学解释。“全城到处可以看见所有男女群众组成神秘的游行队伍前往上帝的教堂，泪流满面，赞美和感恩上帝与最纯洁的圣母。”[32]奥斯曼军营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响起召唤祈祷的呼声，借此计时。德尔维希们在士兵中间来回穿梭，告诫信众要坚定信心，牢记圣训中的预言：“在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圣战中，三分之一的穆斯林将被战胜，这是真主不能宽恕的；三分之一将英勇牺牲，成为伟大的烈士；还有三分之一将最终得胜。”[33]

守军的伤亡持续增多，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指挥官们焦急地到处搜寻人力物力来填补缺口。他们虽然竭尽全力，还是无法让所有守军精诚团结。大公卢卡斯·诺塔拉斯与朱斯蒂尼亚尼争吵不休，威尼斯人则大体上独立行动、自行其是。目前唯一尚未动用的人力资源就是桨帆船的船员，于是皇帝向威尼斯社区求援。5月8日，威尼斯十二人议事会召开了会议，投票决定将三艘威尼斯大型桨帆船上的武器卸下，将船员调往城墙，然后在造船厂内将桨帆船摧毁。这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万难之策，目的是确保船员们一心一意地参加守城，但这个措施招致了激烈反对。卸载武器的工作正要开始，船员们手执利剑挡住了跳板，宣称："我们倒要看看，谁敢从这些桨帆船上卸货！……我们知道，一旦我们把这些桨帆船上的货物卸下，在造船厂内把它们击沉，希腊人就会用武力把我们扣押在城内，当作他们的奴隶。而我们现在还是来去自由的。"[34] 船长和船员们害怕自己安全撤离的交通工具被摧毁，封锁了他们的船只，严阵以待。这一天，奥斯曼人仍然在持续不断地轰击陆墙。形势危急，议事会不得不在第二天再次开会，对计划做了修改。这一次，两艘长型桨帆船的指挥官加布里埃尔·特里维萨诺同意将他的船只上的武器卸下，并带领400人加入圣罗曼努斯门的防守。花了四天时间才说服船员们合作并搬运装备。他们在5月13日抵达圣罗曼努斯门时，几乎已经太晚了。

虽然穆罕默德二世的炮火主要集中在圣罗曼努斯门地段，但还有一些火炮在轰击皇宫附近、狄奥多西城墙与单独一道城墙相接的地点。到5月12日，大炮已经摧毁了这里的一段外墙，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在这个地点发动一次集中夜袭。午夜将近时，一支庞大的队伍开始向突破口前进。守军措手不及，被安纳托利亚军旗手穆斯塔法指挥的一支队伍从城墙上打退了。守军从城墙的其他地段迅速调来援军，但奥斯曼军队将他们一一逐退，开始在城墙上搭起云梯。皇宫周边小巷里的人们仓皇失措。市民们从城墙逃走，很多人"在那天夜里相信城市已经陷落了"[35]。

按照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说法，就在此时，在3英里之外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廊上正在召开一场气氛肃杀的作战会议。大家必须直面严峻的形势。守军的兵力一天天减少：“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全都必死无疑，他们就会占领城市。”[36] 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君士坦丁十一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系列选择，供指挥官们斟酌：他们可以在夜间冲杀出城，尝试通过奇袭打败奥斯曼军队；或者死守到底，寄希望于匈牙利人或意大利人的救援，同时等待不可避免的噩运。卢卡斯·诺塔拉斯建议继续死守，其他人则再次恳求君士坦丁十一世离开城市。就在这时，他们得到消息，“土耳其人已经在爬城和屠戮市民”[37] 。

君士坦丁十一世策马奔向皇宫。在黑暗中，他遇见了一些从突破口逃跑的平民和士兵。他徒劳无功地努力让他们返回前线，每过一分钟战局都愈发恶化。奥斯曼骑兵已经开始冲入城内，城墙内已经爆发了激战。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卫队的到来总算稳定住了希腊兵的军心：“皇帝抵达前线，向他的士兵们呼喊，鼓励他们英勇奋战。”[38] 在朱斯蒂尼亚尼的帮助下，他打退了侵入城墙的敌人，把他们困在迷宫般的小巷内，将其分割为两个部分。四面受敌的奥斯曼士兵发动了勇猛的反击，企图杀死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毫发未伤，激情满怀地将敌人一直驱赶到突破口处，甚至还打算继续纵马冲杀出去，“但内廷贵族和他的德意志卫兵拦住了他，劝说他骑马回城”[39] 。没能逃走的奥斯曼士兵全被杀死在黑暗的小巷内。次日，市民们把奥斯曼士兵的尸体拖到城墙上，丢进下方的壕沟，让他们的战友来拖回尸体。君士坦丁堡在这次危机中幸存，但敌人的每一次进攻都让城市的生存希望减小了一分。

这是穆罕默德二世向皇宫段城墙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虽然没能得手，但他一定能感觉到，胜利已经在望。现在他似乎下了决心，要把全部火力集中在最薄弱的地段——圣罗曼努斯门。5月14日，他得知基督徒已经将部分桨帆船的武器拆除，并将大部分船只撤入远离铁链的一个小港，于是得出结论：在金角湾的奥斯曼舰队已经相对安全。然

后他把加拉塔附近山上的大炮也调到了陆墙前。起初，他命令这些火炮轰击皇宫附近的城墙，效果不佳，于是他又把它们调到了圣罗曼努斯门。现在炮击战术越来越改为集中所有火炮射击一个点，而不是把各门火炮平摊在宽大正面上。炮火比以往更为凶悍："这些大炮昼夜不停地轰击我们可怜的城墙，把大段城墙炸塌。我们城内的人日夜劳作，用木桶、柴火、泥土和其他所有必需的东西抢修被摧毁的城墙。"[40] 特里维萨诺指挥下的桨帆船水手们就驻扎在这里，"配备了优质大炮和火枪，以及大量弩弓和其他装备"[41]。

同时，穆罕默德二世不断对守卫铁链的基督教船只施压。5月16日22时，有人发现部分双桅帆船从停泊在海峡中的奥斯曼主力舰队脱离，全速驶向铁链。负责瞭望的基督徒水手们推测，在奥斯曼舰队服役的基督徒在逃离，"我们在铁链处的基督徒欣喜地等待他们"[42]。但这些船只接近的时候，向守军开了火。意大利人立刻出动了他们自己的双桅帆船，将敌人打得抱头鼠窜。基督教战船只差一点就追了上去，但"他们开始拼命划桨，逃回了他们自己的舰队"[43]。次日，奥斯曼舰队出动了5艘快速弗斯特战船，再次发动试探性进攻。守军用"70多发炮弹"[44] 的暴雨将其击退。

5月21日黎明前，奥斯曼舰队向铁链发动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进攻，这一次整个舰队大举出动。他们划着桨逼近铁链，"手鼓和响板的声音震耳欲聋，想用这个来吓唬我们"[45]，然后停了下来，审视对手的实力。铁链处的基督教船只全副武装，做好了战备，一场大规模海战似乎一触即发。就在这时，城内传来宣示全面进攻的警报声。金角湾内的所有基督教船只都迅速开往战斗岗位，而奥斯曼舰队则踌躇不决。最后他们调头返回了双柱港，于是"天亮两个小时之后，双方都十分平静，就好像海路进攻根本不曾发生过"[46]。这是奥斯曼人进攻铁链的最后一次尝试。奥斯曼舰队的桨手大多是基督徒，现在可能士气已经非常低落，无力真正挑战基督教船只，但这些活动让守军精神紧绷，无法休

息。

在其他地方，穆斯林非常忙碌，这对守军来说是不祥之兆。5月19日，奥斯曼工兵建成了一座浮桥，将它架设在城墙外不远处的金角湾海面上。这又是一个临场应变的杰作。浮桥由1000个大酒桶（显然是从加拉塔城内喜好葡萄酒的基督徒那里弄来的）组成，每两个木桶首尾相接，上面铺设木板，形成了一条足够宽的车道，足以让五名士兵并肩行走，同时又足够坚固，可以承载大车的重量。修建浮桥的目的是缩短陆军两翼之间的交通线（在此之前要绕过金角湾顶部）。巴尔巴罗提出，穆罕默德二世准备浮桥是为了发动一次总攻，好让他的士兵能够快速运动。但浮桥直到围城战末期才在最终位置上架设就绪，“因为假如在全面进攻前就把浮桥在金角湾上架好，只需一发炮弹就能将其摧毁”[47]。在城墙上可以对这些准备工作一览无余。守军再次被穆罕默德二世向攻城战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所震撼。但还有一项工程没有暴露在基督徒眼前，它很快就将让他们魂飞魄散。

到5月中旬，穆罕默德二世已经把守军消耗到了极限，但其防线仍然完整。他已经充分使用了陆海军的资源，动用了中世纪攻城战的三项关键战术——突袭、炮击和封锁。还有一项非常经典的技术还没有尝试：挖地道。

在塞尔维亚的奥斯曼附庸国境内有一座叫作新布尔多[48]的城市，它是巴尔干内陆最重要的城市，凭借它的银矿带来的财富驰名全欧洲。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斯拉夫部队中包括了一群来自新布尔多的熟练矿工，有可能是萨克森移民，“精通挖掘和开凿坑道的技术，对他们的工具而言，大理石就像蜂蜡一般柔软，黑压压的群山不过是一堆尘土”[49]。在战役早期，他们就尝试在城墙中段下方挖地道，但由于地形不合适，计划被放弃了。5月中旬，其他的方法都已经失败，围城战进入了第二个月，坑道工兵展开了一个新工程，这一次是在皇宫附近的单道城墙附

近。挖地道虽然非常艰苦，却是摧毁城墙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穆斯林军队使用这个手段已经有几个世纪，屡建奇功。到12世纪末，萨拉丁的继承人已经精通了这门技术，通过炮击和地道双管齐下，在6周内就占领了十字军的多座大型城堡。

大约在5月中旬，在木栅和碉堡的掩护下，萨克森银矿工人开始从奥斯曼军队战壕后方挖掘地道，目标是250码外的城墙。这是需要熟练技术的工作，非常辛苦，特别困难。在冒烟的火把照明下，矿工们挖掘了狭窄的地下坑道，前进的过程中不断用木料支撑地道。奥斯曼军队在历史上也曾经尝试挖地道来破坏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但都没有成功。年老的市民们都坚信，挖地道是行不通的，因为城墙下面大部分是坚固的岩石。5月16日深夜，守军瞠目结舌地发现，这个老观念是错误的。城墙上的士兵偶然听见城墙内的地下传来鹤嘴镐的敲击声和模糊的说话声。地道显然已经从城墙底下穿过，奥斯曼工兵们将要在城内挖出一个秘密入口。守军很快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诺塔拉斯和君士坦丁十一世。他们慌忙召开了一次会议，然后在城内寻找有采矿经验的人，来应对这个新的威胁。临危受命的是个奇人："约翰·格兰特，德意志人，优秀的军人，精通军事问题"[50]，追随朱斯蒂尼亚尼的队伍来到了君士坦丁堡。他其实是个苏格兰人，显然曾经在德意志工作过。他在来到君士坦丁堡之前有哪些经历，已经很难揣测。他显然是个武艺高强的职业军人、攻城战专家和工程师，在一个短暂的时期曾在这场战争最奇异的支线情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格兰特显然非常熟悉坑道作业。他根据敌人挖掘地道的声响判断出了地道的位置，然后偷偷地快速挖掘了自己的地道。守军有着出其不意的优势。他们在黑暗中冲进敌人的地道，烧毁了支撑地道的木料，导致地道崩塌，奥斯曼工兵被困在黑暗中，最后窒息而死。地道带来的威胁让守军彻底丧失了城墙带来的安全感。从此以后，守军特别小心谨慎地寻找敌人挖地道的迹象。格兰特一定是开创了当时防御地道的标准战

术。他在城墙附近地面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放置一碗或一桶水，人们观察水面，如果有涟漪的话，说明地下有震动。确定敌人地道的位置并快速和秘密地予以拦截需要更多技术。随后的日子里，双方在地下展开了一场残酷的斗争。这场地下战斗需要特别的技术和纪律，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争夺城墙和铁链的斗争之外的第三条战线。5月16日之后的几天内，基督教工兵们没有发现敌人的任何新动向。21日，他们发现了一条新地道。它同样从城墙地基下穿过，目的是在城内打开一个入口，好让部队溜进城来。格兰特的部下拦截了这条地道，但没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奥斯曼士兵从地道撤退，将支撑木梁烧毁，于是地道就坍塌了。

后来双方就在黑暗的地下进行了一场猫鼠游戏，打得非常惨烈。次日，“晚祷时分”[51]，守军在卡里加利亚门附近发现了敌人的又一条地道，对其予以拦截。他们用希腊火把地道内的工兵活活烧死。几个小时后，有震动表明，附近还有一条地道，但这条地道很难拦截。但是，地道内的支撑木梁自行垮塌，在场的工兵全部死亡。

萨克森矿工们不知疲倦地埋头苦干。每天双方都要在地下交锋。贾科莫·特塔尔迪回忆说，每一次“基督徒都挖掘自己的地道，然后仔细监听，找到敌人地道的位置……他们用烟把土耳其人熏死在自己的地道内，或者有时用恶臭的东西。在有些地方，他们向地道内灌水，还常常与敌人工兵展开肉搏战”[52]。

在地道战继续进行的同时，穆罕默德二世的工兵们在地上还实施了另一项不同寻常而且完全出人意料的工程。5月19日拂晓，查瑞休斯门附近城墙上的哨兵们开始准备一天的战斗，越过敌人的帐篷海洋眺望，被自己目睹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在他们前方十步远的地方，也就是壕沟边上，屹立着一座巨大的攻城塔，“其高度超过外堡的城墙”[53]，一夜之间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奥斯曼军队非常快速地建起了这座带轮子的攻城塔，在夜间将它运到城墙前，现在居高临下地面对着城墙。敌人

的效率让守军无比震惊，也百思不得其解。攻城塔的骨架由坚固的木梁组成，覆盖着骆驼皮和双层木栅，以保护内部的人员。塔楼的下半部分装满泥土，外面一圈筑有土墙，“所以大炮或者火枪的弹丸奈何它不得”[54]。这座活动攻城塔内的各层之间有梯子相连，梯子也可以用作连接攻城塔和城墙的桥梁。一夜之间，大量劳工还在攻城塔背面修建了一座有防护的堤道，“这堤道有半英里长……上面铺着两层木栅，然后又覆盖了骆驼皮，士兵们就可以安全地从攻城塔走到军营，而不用害怕子弹、弩箭或小型火炮发射的石弹”[55]。守军士兵争相跑上城墙去观看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攻城塔是源自古典时期战争的古老事物，尽管莱奥纳德大主教认为“就连罗马人也很难建造出这样的装置”[56]。奥斯曼人设计这座攻城塔是专门为了填满城墙前棘手的壕沟。在塔内，众多士兵在挖掘泥土，并通过防护层的小口子将泥土抛入前方的壕沟。他们一整天都在这么苦干。同时，攻城塔高层的弓箭手向城内射箭，为下面的人提供掩护。弓箭手们似乎“斗志非常高昂”[57]。

　　这是典型的穆罕默德二世风格的工程——秘密筹划、规模宏大，执行起来速度奇快，就像搬运战船那样。攻城塔给守军造成的心理震慑也是极大的。奥斯曼军队的足智多谋和资源的取之不尽对守军来说一定是个不断再现的噩梦。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指挥官们匆匆来到城垛，应付新的危机，“他们看到它时，无不呆若木鸡。他们非常担心，这座攻城塔将使得城市失守，因为它的高度比外堡还要高”[58]。攻城塔的威胁是非常明显的。它就在守军眼皮底下把壕沟渐渐填平了，弓箭手的掩护火力则使得守军难以做出回应。到黄昏，奥斯曼军队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他们用木材、干树枝和泥土填平了壕沟。攻城塔内的人推动它继续接近城墙。手足无措的守军决定必须当机立断：如果这座居高临下的攻城塔再运作一天，后果将不堪设想。天黑之后，守军在城墙后准备了成桶的火药，点燃引信后将其从城墙上推向攻城塔。发生了一连串的大爆炸：“大地突然像雷鸣一般咆哮起来，攻城塔及其人员被掀上云霄，就像被猛烈暴风卷起一样。”攻城塔开裂爆炸了：“人和木料从高处

飞落下来。”[59] 守军向下方正在呻吟的伤者倾倒了成桶的燃烧着的沥青。守军还从城墙出击，对幸存者大肆屠戮，将死尸和被推到城墙附近的其他攻城武器（“长长的攻城锤、带轮子的云梯、附有防御塔的大车”[60] ）一起烧毁。穆罕默德二世从远处目睹了这次失败。他怒火中烧地命令士兵们后撤。接近了城墙其他地段的类似的攻城塔也被撤下，或者被守军烧毁。攻城塔面对火攻显然太脆弱，于是奥斯曼军队没有再重复对它的试验。

地道战越打越激烈。5月23日，守军发现并进入了又一条地道。他们借助闪烁的火光沿着狭窄的坑道前进，突然一下子迎头撞上了敌人。他们投掷希腊火，把地道顶部弄塌，将敌人的工兵活埋，还俘虏了两名军官，把他们带回地面。希腊人对这两名奥斯曼军官严刑拷打，直到他们招供了其他地道的位置；“他们招供之后，就被斩首，尸体被从城墙上抛下。土耳其人看到自己的人被从城墙上丢下，非常恼火，对希腊人和我们意大利人恨之入骨。”[61]

次日，银矿矿工们改变了战术。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挖掘穿过城墙的地道以打通进入城内的通道，而是在离城墙还有十步远时就改变方向，挖掘与城墙平行的地道。他们用木料支撑地道，并做好将其烧毁的准备，希望借此使一段城墙坍塌。守军在千钧一发之际终于发现了敌人的新动向；奥斯曼工兵被击退，守军用砖块堵住了城墙下的地道。这个事件在城内引起了极大的不安。5月25日，奥斯曼人做了挖地道的最后一次尝试。工兵们再次在很长一段城墙下挖掘了地道，并支撑起来，做好了点火准备，但又一次被守军发现和击退。在守军眼中，这是他们所发现的地道中最危险的一条；它被发现宣告了地道战的结束。萨克森矿工们一刻不停地苦干了10天；他们挖掘了14条地道，但全被格兰特摧毁。穆罕默德二世承认攻城塔和地道都失败了，只得让大炮继续射击。

在君士坦丁堡以西，远离大炮轰鸣和夜袭嘈杂的地方，上演了另一

场规模虽小但同样重要的戏剧。在爱琴海东部一个岛屿的港口，一艘帆船正在锚地摇曳。它就是从君士坦丁堡溜走的那艘威尼斯双桅帆船。5月中旬，它游遍了各个岛屿，寻找救援舰队的迹象，却一无所获，从过往船只那里也没有获得任何好消息。现在他们知道，没有任何船只前去援救君士坦丁堡。事实上，威尼斯舰队正在希腊外海，谨慎地搜寻关于奥斯曼海军意图的情报，而教皇从威尼斯租借的桨帆船还在修建过程中。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寻找援军的水手们完全理解自己所处的局面。他们在甲板上激烈地争论，下一步该怎么办。一名水手强烈主张驶离君士坦丁堡，返回"基督教的土地，因为我很清楚，此时土耳其人肯定已经占领了君士坦丁堡"[62]。他的伙伴们转向他，回答说，皇帝把这个任务托付给了他们，他们必须完成使命。"所以我们必须返回君士坦丁堡，不管它在土耳其人还是基督徒的手中，不管我们此行是生是死，我们都必须返回。"[63]大家进行了民主表决，决议无论如何都要返回。

双桅帆船借着南风在达达尼尔海峡北上，重新假扮成土耳其船只，在5月23日破晓前不久接近了君士坦丁堡。这一次奥斯曼舰队没有上当。他们害怕威尼斯桨帆船舰队前来救援，所以在仔细地巡逻，把这艘小帆船当作了援军舰队的前驱。奥斯曼战船逼近过来，进行拦截，但双桅帆船把它们抛在了后面。铁链及时打开，放它入港。当天，船员们前去觐见皇帝，向他报告说，没有发现任何援军舰队。君士坦丁十一世感谢他们义无反顾地返回城市，随后"失声痛哭起来"。他最终认识到，基督教世界连一艘救援船只都没有派出，这让得到援救的希望彻底断绝了。"有鉴于此，皇帝决定完全听从最仁慈的救主耶稣基督、圣母马利亚以及帝都的保护者圣君士坦丁的安排，但愿能够守住城市。"[64]这是围城战的第48天。

---

[1] *Siegecraft*：*Two Tenth-century Instructional Manuals by Heron of Byzantium*，ed.D.F.Sullivan，Washington DC，2000，p.29

[2]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

1823，p.36

[3]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20

[4]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142

[5]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142

[6]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23

[7]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34

[8]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p.51-2

[9]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1823，p.32

[10]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p.35-6

[11]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36

[12]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1823，p.32

[13]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79

[14]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78

[15]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39

[16]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43

[17]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45

[18]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45

[19]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1823，p.44

[20]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1823，p.46

[21]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1823，p.44

[22]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152

[23] Tursun Beg，*The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trans. Halil Inalcik and Rhoads Murphey，Minneapolis and Chicago，1978，p.36

[24]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49

[25]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53

[26]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36

[27]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55

[28]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57

[29]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57

[30]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39

[31]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47

[32]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47

[33] quoted Wintle，Justin，*The Rough Guide History of Islam*，London，2003，p.245

[34]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37

[35]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39

[36]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57

[37]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59

[38]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61

[39] quoted Mijatovich，Chedomil，*Constantine Palaiologos*：*Th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1448-1453*，London，1892，p.181

[40]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40

[41]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40

[42]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40

[43]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41

[44]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41

[45]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44

[46] Barbaro，Nicolo，（in English）*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rans. J. R. Melville Jones，New York，1969，p.55

[47]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43

[48] 今属科索沃共和国。

[49]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2 vols.，Milan，1976，p.262

[50]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134

[51] Barbaro，Nicolo，（in English）*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rans. J. R. Melville Jones，New York，1969，p.55

[52]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p.5

[53]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42

[54]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43

[55]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43

[56]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1823，p.22

[57] Barbaro，Nicolo，（in English）*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rans. J. R. Melville Jones，New York，1969，p.53

[58]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42

[59]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51

[60]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1823，p.22

[61]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p.4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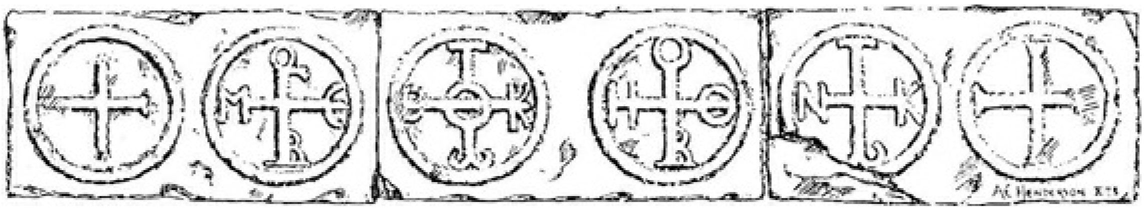
[62]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26

[63]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p.26-7

[64]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35

12.不祥之兆

1453年5月24～26日



> 我们从人们的回答和问候中看到征兆。我们注意家禽的鸣叫和乌鸦的飞翔，并从中总结出预兆。我们研究梦境，相信它们能够预示未来……就是这些罪孽，以及其他的类似罪行，使我们应得上帝的惩罚。[1]

——约瑟夫·布里恩尼奥斯，14世纪拜占庭作家

预言、启示和罪孽：围城战进入了5月的最后几周，君士坦丁堡的人们陷入了宗教的恐惧中。拜占庭人一向迷信征兆。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就是由于神迹的感召：1240年前，君士坦丁大帝在米尔维安大桥的关键战役前夕目睹了十字架的幻象。人们积极地追寻和阐释各种预兆。随着帝国不可阻挡地日渐衰败，这些预兆越来越与深度的悲观主义如影随形。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拜占庭帝国将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帝国，它的最后100年于公元1394年前后开始。人们记起了早期阿拉伯人攻城时留下的古老预言书，广泛地诵读着它们晦涩玄妙的诗节："七山之城，当第二十封信在你的城墙上宣示时，灾难将降临在你头上。你的陷落和你的君王们的毁灭就不远了。"[2] 拜占庭人把土耳其人看作世界末日的民族，标志着最后审判，是上帝惩罚基督徒罪孽的工具。

在这种气氛下，人们持续不断地审视有可能预示帝国末日（或者世界末日）的征兆：疫病、自然现象、天使降临等。君士坦丁堡的古老超越了居民们的理解力，城市本身笼罩在传奇、古老预言和超自然寓意中。城内那些历经千年的古老纪念碑的最初意义已经被人遗忘，被人们认为是魔法密文，隐含着对未来的预示：公牛广场雕塑基座上的雕刻檐壁据说包含着密文写就的关于城市末日的预言，而查士丁尼大帝指向东方的巨型骑马像不再表示对波斯人的自信满怀的统治，而是预示着最终摧毁城市的敌人前来的方向。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随着围城战一天天继续下去，人们对末日审判的预感越来越强烈。有违常理的天气和持续不断的炮击造成的恐怖让东正教信徒确信，末日将在爆炸和黑烟中降临。敌基督将以穆罕默德二世的形象逼近城门。城内广泛流传着预示未来的梦和征兆：有个小孩看见守卫城墙的天使抛弃了自己的岗位；有人打捞到了滴血的牡蛎；一条大蛇越来越逼近，蹂躏大地；对城市造成破坏的地震和冰雹清楚地宣示“全世界的毁灭越来越近”[3]。所有迹象都表明，时间已经不多了。在圣乔治修道院有一份预言文件，分割成方块，显示了历代皇帝，每个方块里有一位皇帝：“随着时间流逝，方块逐个被填满，他们看到，只有一个方块仍然是空着的”[4]，也就是即将由君士坦丁十一世占据的那个方块。拜占庭人有一种观念，认为时间是环形循环和对称的。第二个关于皇室的预言更印证了这种观念：建立和丧失城市的皇帝都叫君士坦丁，他们的母亲都叫海伦娜。的确，君士坦丁一世和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母亲都叫海伦娜。

在这种狂热的迷信气氛下，市民的斗志似乎在瓦解。城内各处不断举行代祷礼拜。不论白天黑夜，教堂内一直有人在持续不断地祈祷，只有圣索菲亚大教堂一直空空荡荡。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看到，“所有人都聚集在上帝的神圣教堂内，哭泣、抽噎、举起双臂向苍天呼吁，恳求上帝的恩典”[5]。对东正教徒来说，祈祷也是城防工作的关键部分，和

每天夜里搬运石头和树枝去修补工事一样重要。祈祷能够支撑起环绕城市的神佑的能量场。更乐观的人记起了一系列相反的预言：圣母马利亚亲自保佑着君士坦丁堡，而且真十字架的遗迹就在城内，所以它永远不可能被攻破；就算敌人打进了城，他们也顶多能前进到君士坦丁大帝的柱廊前，天使就会手执利剑，从天而降，将他们驱散。

尽管有这样的心理安慰，威尼斯双桅帆船在5月23日带回的坏消息还是让大家对世界末日的恐慌更加强烈，这种恐惧在满月之夜持续增强。满月之夜可能就是第二天，即5月24日，但具体的日期无法确定。在君士坦丁堡市民的心中，月亮有着一个特殊地位。月亮会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铜制穹顶上升起，照耀着金角湾风平浪静的海面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自古代以来，月亮就是拜占庭的标志。每天夜里，月亮就像是从亚洲群山上挖出的金币，高高悬挂；月圆月缺象征着城市的古老以及它曾经经历的无止境的时光轮回——波动沉浮、永恒而不祥。人们认为地球在最后1000年中将由月亮统治，“生命将转瞬即逝，财富变幻莫测”[6]。到5月底，人们有着一个特别的恐惧：在月亮渐满过程中，城市绝对不会失陷；但在24日之后，月亮要开始亏缺了，凶吉难卜。这个日期让群众心生恐惧。君士坦丁堡的整个预言的历史似乎即将抵达一个关键点。

因此，在等待5月24日黄昏来临时人们的心情是非常沉重和焦灼的。在一整天的狂轰滥炸之后，夜晚突然变得万籁俱寂。各方面的记载都同意，这是一个美丽的春夜，君士坦丁堡最美丽的时节，最后一缕暮光仍然在西方闪烁，远方传来海浪拍击城墙的声音。“空气清新，没有云彩，”巴尔巴罗回忆道，“天空纯净得像水晶。”[7] 但在日落之后的第一个小时，月亮渐渐升起，城墙上的瞭望者看到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景象。月亮原本应当是一轮完整的金盘，他们看到的却是“只有三天的新月，几乎看不见”[8]。一连四个钟头，月亮一直阴沉苍白，只露出极小的月牙，然后才“一点点艰难地恢复整个圆盘，夜间的第六个小时，才

形成了完整的圆形”[9]。这次月偏食让守军感受到了预言的力量。新月难道不是奥斯曼人的标志吗？穆罕默德二世军营上空飘扬的旗帜上就有这个新月标志。据巴尔巴罗说，“皇帝以及所有的王公贵族对这个迹象都非常害怕，但土耳其人看到这个迹象，在营地内欢呼雀跃，因为胜利似乎属于他们了”[10]。对正在竭力维持民众士气的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次日，君士坦丁堡朝廷（可能是在君士坦丁十一世的鼓动下）决定再一次直接向圣母求救，以鼓舞民众。人们对圣母的超自然神力笃信不疑。她的最神圣的一幅圣像——“指路圣母像”，被认为具有神力。据说福音书作者圣路加本人创作了这幅圣像，它在历史上曾多次在成功保卫君士坦丁堡的战争中扮演了光荣的角色。626年，阿瓦尔人攻城时，守军就抬着这幅圣像在城墙上游行。据说在718年阿拉伯人兵临城下的时候，它再次拯救了城市。于是，在5月25日早上，一大群人聚集在存放圣像的神龛处——科拉神圣救主教堂（就在城墙附近），向圣母求援。指路圣母像被放在木制托盘上，由圣像协会的成员扛在肩上。悔罪的游行队伍按照传统顺序从陡峭狭窄的街道走下：最前方的引路人举着十字架；然后是摇动香炉的黑衣教士，最后是俗家信徒，男女都有，还有儿童，大家很可能是赤着脚走路的。赞礼员引导大家咏唱圣歌。令人魂牵梦萦的圣歌的四一拍音律、人们的哀恸之声、焚香的烟雾以及向佑护世人的圣母发出的传统祈祷，都在这个清晨冉冉升起。市民们一次又一次重复对神力保佑的强烈恳求：“请拯救你的城市，如你所知和所愿。你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的壁垒、我们的盾牌、我们的统帅：为你的人民而战吧。”[11]据说这次游行的具体路线由圣像自己发出的力量决定，就像占卜法杖的牵引力一样。



指路圣母像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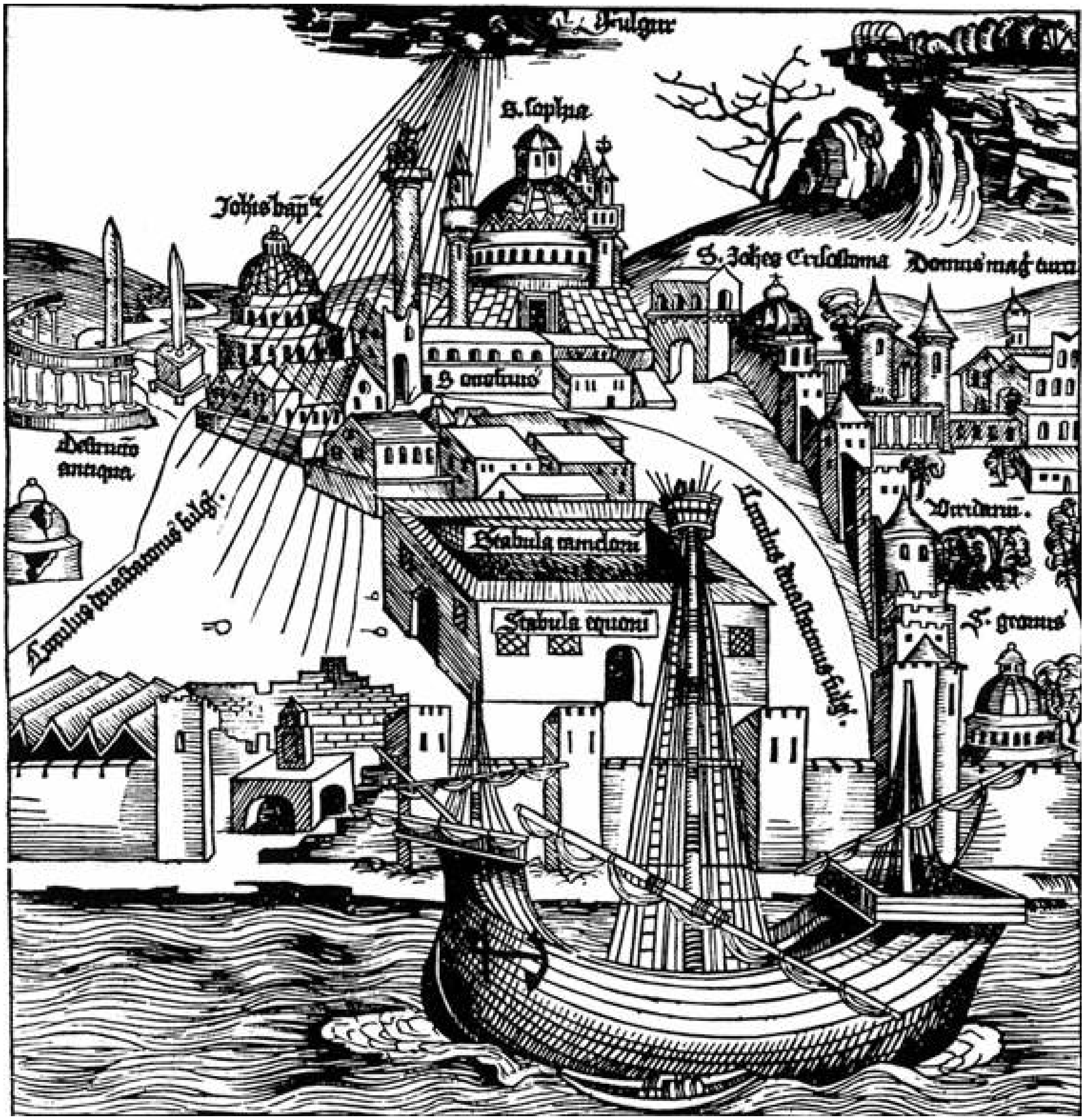
在这种充满恐惧和虔诚的紧张气氛中，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灾难。圣像突然间无法解释、“毫无缘由、不受任何有形力量干预地从人们手中脱落，掉在了地上”[12]。人们不禁毛骨悚然，狂喊着冲上前去，要把圣母像捡起。但它紧紧贴在地上，怎么也拿不起来，就像被铅块压在地上一样。教士和扛圣像的人叫嚷着、祈祷着努力了很长时间，想把圣像从泥地上捡起。最后圣像终于被捡了起来，但所有人都被这个不祥之兆震惊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人们战栗着重新组成了游行队伍，还没走多远，突然下起了雷暴雨。一时间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和冰雹狠狠敲打着狼狈不堪的队伍，人们“既不能站直身子，也无法前进”[13]。圣像摇摇晃晃地停住了。洪流从狭窄的街道上猛冲下来，势头非常凶猛，几乎要把街上的孩童卷走：“跟在后面的很多孩子都面临被可怕的洪水卷走和被淹死的危险，好在有人迅速抓住他们，艰难地把他们拖出了奔涌而下的洪水。”[14]人们不得不放弃游行。人群作鸟兽散，心里带着对此次困境的明白无误的解释。圣母拒绝听取他们的祈祷；暴雨“一定预示着万物迫在眉睫的毁灭，就像凶猛的洪水一样，它将把万物都彻底摧毁”[15]。

第三日，人们一觉醒来，发现城市被浓雾吞没了。一丝风也没有；

空气沉寂，大雾全天笼罩着城市。一切都影影绰绰、沉默、无形。这诡异的气氛让人们更加歇斯底里。似乎天气也在和守军作对，消磨他们的意志。这样不合常理的大雾只有一个解释。它表明“上帝离开了城市，彻底背离和抛弃了它。因为上帝隐藏在云雾中，偶然露面，旋即再次消失”[16]。将近黄昏时，空气似乎越来越浑浊，“一片黑暗开始在城市上空聚集”[17]。还有人目睹了更奇怪的事情。最初，城墙上的哨兵看到君士坦丁堡被火光照亮，似乎敌人正在放火烧城。人们惊恐万状地跑去看个究竟，大声叫嚷，这时他们抬头去看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发现它屋顶上闪烁着一种奇怪的光。生性容易激动的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如此描绘他亲眼所见的景象：“一大团火焰从窗户顶端喷涌而出；它环绕教堂的整个颈部很长时间。火焰成了一体；它发生了变化，其光亮无法描摹。它一下子飞向天空。看见它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开始哀号，用希腊语喊道：‘上帝宽恕我们！光明飞向天堂了！’”[18] 信徒们认为，上帝显然已经抛弃了君士坦丁堡。在奥斯曼军营，不自然的大雾和诡异的光亮对士兵们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奥斯曼人看到这些奇异景象，同样手足无措、惊恐万状。穆罕默德二世在营帐内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他看到城市上空的光亮时，起初感到非常不安，于是召唤毛拉们阐释这个预兆。他们应召而来，宣称这些征兆对穆斯林的事业大吉大利：“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君士坦丁堡的末日快到了。”[19]

第三日（可能是5月26日），教士和大臣们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觐见君士坦丁十一世，表达了自己的不祥预感。他们描述了神秘的光亮，试图劝说皇帝去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对穆罕默德二世进行有效的抵抗：“陛下，请考虑关于这座城市的所有传言。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上帝给了我们这光亮，用来保护伟大的神圣教堂和这座城市。但在今夜，它离开了城市，飞往天堂。这表明，上帝的恩典和慷慨已经离我们而去：上帝想要将我们的城市交给敌人……我们恳请陛下离开城市，免得我们全都灭亡！”[20] 君士坦丁十一世情绪非常激动，再加上过于疲劳，昏倒在地，失去知觉很长时间。他苏醒后，仍然坚持己见：离开城

市将令他的名字永远蒙羞；如果形势无望，他宁愿留下，与臣民共存亡。此外，他还命令他们不得在群众中传播沮丧的言论：“不要让他们陷入绝望、丧失斗志。”[21]



“上帝佑护之城”

其他人做出了不同的反应。5月26日夜间，一位名为尼古拉斯·朱斯蒂尼亚尼的威尼斯船长（他与守军的英雄人物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没有亲戚关系）驾船从铁链处溜走，在夜幕掩护下逃走了。还有一些较小

的船只从马尔马拉海的海墙沿线的几个小港出航，避开了奥斯曼人的海上封锁，驶往希腊人控制的爱琴海的港口。一些比较富裕的市民躲在金角湾内的意大利船只上，认为如果最后的浩劫降临，待在意大利人的船上能给他们最好的生存机会。还有的人在城内寻找安全的避难所。大多数人对战败的后果都不抱任何幻想。

在中世纪充满神秘主义的大环境下，天象的预兆和不合情理的天气变化沉重地打击了君士坦丁堡市民的斗志，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清晰表现。其实，这些恐怖现象的真正原因在遥远的太平洋，能与人们对世界末日大决战的最骇人的想象匹敌。大约在1453年初，澳大利亚以东1200英里处一个叫作库威岛的火山岛发生了大爆炸。8立方英里的熔岩被射入平流层，其爆炸力是广岛原子弹的200万倍。这是中世纪的喀拉喀托[22]，对全世界的天气造成了影响。火山灰被全球暴风裹挟到世界各地，造成气温下降，对从中国到瑞典的农业收成都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中国的长江以南地区的气候原本和佛罗里达一样温和，却连续下了40天的雪。在英格兰，当时对树木年轮的记录表明它们的生长严重受挫。来自库威岛的富含硫黄的颗粒物很可能就是1453年春季困扰君士坦丁堡的不合情理的寒冷以及反复无常的大雨、冰雹、浓雾和降雪的罪魁祸首。悬浮在空气中的颗粒物还造成了耀眼的落日以及奇怪的光学现象。在5月26日笼罩圣索菲亚大教堂铜屋顶的可怖的光带很可能就是火山灰颗粒物造成的，或许还有圣艾尔摩之火（大气放电造成的闪光）的影响。就是这个奇异现象让守军以为上帝抛弃了他们（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导致的耀眼光芒令纽约人同样惊慌失措，但他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更发达的时代，他们更容易误以为那是失火所致，所以去呼叫消防队）。

对预兆充满狂热的不仅仅是君士坦丁堡人。到5月最后一周，奥斯曼军营也面临着士气瓦解的严重危机。在伊斯兰的旗帜之间，人们小声地表达不满。按照阿拉伯阴历，此时是当年的第5个月份，他们从海陆两路攻打城市已经长达7周。他们忍受着春季的糟糕天气，在城墙下蒙

受了惨重的损失。不知有多少惨遭踩踏的死尸被从几乎填满的壕沟处抬走。火葬柴堆的黑烟一天天在平原上空升起。但当他们从帐篷的海洋中仰望时，城墙仍然屹立；在被大炮摧毁的城墙地段，长长的泥土壁垒（顶端放置木桶）堵住了缺口，无言地嘲讽固执的敌人。拜占庭皇帝的双头鹰旗仍然在城墙上飘扬，皇宫上方的圣马可雄狮旗则表明，拜占庭得到了西方人的支持，援军很可能就在路上。没有任何一支身披坚甲的大军能够像奥斯曼军队这样高效地维持一场漫长的围城战。他们对军营生活的基本规则的理解远胜于任何一支西方军队。迅速焚烧死尸、保护水源、以卫生的手段处理粪便，这在奥斯曼军队里都是关键的纪律。但他们面对的困难也越来越大。据估算，在中世纪，每天需要运来9000加仑的水和30吨草料，才能维持一支2.5万人的攻城军队（这规模是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军队的三分之一）的生存。在60天的围城战中，这样一支军队还需要处理掉100万加仑的人畜尿液和4000吨固态生物垃圾。很快，夏日的酷暑将大大增加穆斯林在物质上的不便，疾病的威胁也会日益增长。奥斯曼人的决心也在一分一秒地软化。

事实上，在7周的激战之后，双方都已经疲惫不堪。人们认识到，是要决出胜负了。人们的神经已经达到崩溃的临界点。在此背景下，争夺君士坦丁堡的斗争已经演化为穆罕默德二世和君士坦丁十一世维持部下士气的对决。君士坦丁十一世目睹城内斗志逐渐瓦解的同时，奥斯曼军队也神秘地遭到了类似的打击。这些事件的具体顺序和日期已经无法确定。5月23日，那艘威尼斯双桅帆船抵达城市，带回了没有任何救援舰队的坏消息；奥斯曼军队或许把这艘船当作了基督教救援舰队的前驱。次日，奥斯曼军营中迅速传播开了这个传言：一支强大的舰队正在接近达达尼尔海峡，而一支匈牙利十字军在匈雅提·亚诺什（“可怕的白骑士”）的率领下，已经渡过了多瑙河，正在向埃迪尔内进军。很可能是君士坦丁十一世把这个谣言散播了出去，希望借这最后的努力打击奥斯曼人的士气。这个谣言当即取得了很大成功。平原上蔓延着犹豫踌躇和惊慌失措的情绪。按照史学家的记载，奥斯曼士兵们想起，“很多国

王和苏丹都曾有志于占领君士坦丁堡……并集结和装备了庞大的军队，但没人能抵达要塞的脚下。他们都带着满身伤痛心灰意冷地撤退了”[23]。灰心丧气的情绪笼罩着军营。如果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的说法真实可靠的话，“土耳其人开始大声疾呼，反对他们的苏丹”[24]。疑虑和危机感又一次扣紧了奥斯曼统帅们的心弦，关于围城战的旧分歧也开始再次浮出水面。

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这是个危急关头。如果不能占领城市，他的威望将遭到致命打击，但他的军队的时间和耐心都已经所剩无几。他必须重新赢得部下的信任，当机立断。月食给他提供了一个提高部队士气的天赐良机。前来参战的毛拉和德尔维希们的宗教热情确保了对月食的乐观解释在军营中传播开来，但继续攻城的决定还不能轻易做出。苏丹依其固有的精明和狡猾，决定再一次向君士坦丁十一世劝降。

大约在5月23日前后，他派遣了一名使者，一个叛教的希腊贵族，名为伊斯玛仪，去向拜占庭人描绘他们可能面临的命运。他强调了他们处境的无望：“希腊人，你们已经命悬一线。那么你们为什么还不派一名使者去和苏丹讲和？如果你们把这个使命托付于我，我会妥善安排，请他向你们提出讲和的条件。否则，你们的城市将遭受奴役，你们的妻儿将被卖为奴隶，你们自己会彻底灭亡。”[25]守军谨慎地决定对敌人的提议进行探察，但为了保险起见，他们派去了一个“身份并不高贵”[26]的人，而不是拿一名领袖的生命去冒险。这个倒霉的人被带到了金红两色营帐，匍匐在苏丹面前。穆罕默德二世简明扼要地给出了两个选择：君士坦丁堡要么缴纳每年10万拜占特的巨额贡金；要么全城人都离开城市，“可以携带自己的财物，每个人想去哪里都可以”[27]。这个提议被转述给了皇帝和他的议事会。赤贫的君士坦丁堡显然无力支付如此巨额的贡金；放弃城市、乘船逃走的设想对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仍然是不可接受的。他的答复是，他愿意交出除了城市之外的一切财产。穆罕默德二世反驳说，他的选择只有这么几个：举手投降、死于非命或者皈依伊

斯兰教。城内的人感觉到，穆罕默德二世的和平提议没有诚意，他派伊斯玛仪来“只是为了检验希腊人的精神状态……看看希腊人对自己的处境是怎么看的，他们的位置有多安全”[28]。但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如果君士坦丁堡能够自己投降，就再好不过了。他是打算把这座城市当作自己的首都的，如果拜占庭人能主动投降，就能保全城市；如果通过武力占领了它，按照伊斯兰教法，他就必须允许士兵们对城市自由洗劫三天。

没有人知道，当时君士坦丁堡只差一点就自行投降了。有人提出，热那亚人（他们在加拉塔的殖民地也间接地受到了威胁）向皇帝施压，让他拒绝投降，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向坚决主张抵抗的君士坦丁十一世是不大可能去认真考虑投降的。对双方来说，要议和已经太晚了。仇恨实在是太深了。在50天时间里，双方隔着城墙互相嘲讽和残杀，在对方面前屠杀战俘，和平解决已经不可能了。对奥斯曼人来说，要么撤军，要么征服城市。杜卡斯可能把握住了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答复的深层意思：“你尽可以索要贡金，不管数额多大都行，然后签署和约并撤军，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取胜。如果不这么做，你就只能失望了。我不会，任何一名市民都不会把城市交给你。我们全都宁愿死战到底，也不苟且偷生。”[29]

如果西方援军即将抵达的谣言确实是君士坦丁十一世散布出去的，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奥斯曼人颇为踌躇，但敌人援军的威胁令他们的决策大大加快。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明确答复让奥斯曼军营内的争论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大约在次日，即5月26日，穆罕默德二世召开了作战会议来决定问题：要么放弃围城；要么继续下去，发动一场全面进攻。这次会议的争论焦点与4月21日海上战败之后的那次危机会议相似。年迈的土耳其裔维齐尔——哈利勒帕夏再次发言。他非常谨小慎微，担心年轻苏丹的草率之举会带来恶果，并刺激基督教世界采取联合行动。他曾目睹穆罕默德二世的父亲统治下的风云变幻，深知焦躁不安的军队的危险

性。他激情洋溢地主张和平："陛下的权威已经雄霸天下，通过和平能够比战争更有效地增加陛下的权威。因为战争的结局是难以揣测的，与它相伴的往往是灾祸，而不是繁荣昌盛。"[30] 他指出，匈牙利军队和意大利舰队都可能前来援救君士坦丁堡；他敦促穆罕默德二世向希腊人索取高额罚金，然后班师回朝。叛教的希腊人扎甘帕夏再一次坚决主张战争，指出双方兵力悬殊，而且守军力量日渐衰弱，已经接近彻底的精疲力竭。他对西方可能援救拜占庭的说法嗤之以鼻，表现出对意大利政治的了若指掌："热那亚人分裂成好多派系，威尼斯人正遭到米兰公爵的攻击。他们都不会提供任何援助。"[31] 他感召穆罕默德二世对光荣的渴望，要求"发动一次短暂而猛烈的总攻，如果仍然失败的话，再听从陛下的发落"[32] 。其他将领，比如欧洲军的指挥官图拉汗贝伊，仍然支持扎甘。以谢赫阿克谢姆赛丁和毛拉古拉尼为首的强有力的宗教人士集团也支持他。

辩论非常激烈。奥斯曼宫廷内两大派系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已经持续了10年，在这一刻达到了一个关键点。这场斗争的结果将对奥斯曼国家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但双方也很清楚，他们也是在为自己的性命而斗争。一旦他们的派系失败，他们就只有两条路：要么上绞架，要么被刽子手用弓弦勒死。最终，穆罕默德二世决定追求军事上的光荣，而刻意无视战败或者兵变的可能性。在最终做出裁决之前，他很可能派遣扎甘去巡视军营，将官兵们的态度报告给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扎甘的报告自然是毫不含糊的，他"发现"，军队斗志昂扬，摩拳擦掌地等待最终的总攻。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前思后想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确定总攻的日期吧，扎甘。让军队做好准备，包围加拉塔，让它不能帮助我们的敌人。准备工作要尽快展开。"[33]

军营内迅速传播开了这个消息：近几天之内将准备总攻。穆罕默德二世知道他必须紧抓机遇，鼓舞部队正在衰竭的士气，为最后的总攻做好准备，并迷惑敌人。5月26日黄昏时，传令官们在帐篷之间四处奔

走，呼喊着发布苏丹的命令。每座帐篷前都必须点燃10只火把和篝火。“军营内所有帐篷处都点燃了两堆篝火，火势非常大，亮如白昼。”[34] 守军从城垛上惊愕和迷惑地向下俯瞰，只见火光逐渐以圆形向外扩展，遮蔽了整个地平线，从城墙前的营地一直蔓延到加拉塔周围的山地，对岸的亚洲海岸上也火光冲天。火光非常明亮，甚至可以辨认清楚各个帐篷。“这奇特的景象着实令人难以置信，”杜卡斯记载道，“海面像闪电一样耀眼。”[35] 特塔尔迪回忆说：“似乎大海和陆地都着了火。”[36] 在夜空被篝火照得通亮的同时，奥斯曼人敲响了战鼓和铙钹，这声响缓慢地逐渐增强，信徒们越来越快地不断重复“真主永远无处不在，穆罕默德是他的仆人”[37] 。这呼喊震耳欲聋，似乎“苍穹也要被震裂”[38] 。在奥斯曼军营内，人们欢呼雀跃，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最后总攻。城墙上的有些守军起初过于乐观地以为敌营失了火。他们争先爬上城墙顶端去观看这盛景，然后才明白那火光冲天的地平线和疯狂呼喊声的真正含义。火光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它让守军魂飞魄散，“看似半死，既不能呼气，也不能吸气”[39] 。他们起初对敌人的宗教狂热感到震惊，然后陷入了恐慌。基督徒们狂热地向圣母求救，持续不断地祷告：“救救我们吧，上帝！”[40] 很快，敌人以行动对这呼喊和火光的含义做了证实。在黑暗掩护下，苏丹大军中的基督徒士兵偷偷向城内射箭，箭上缚着的信件对即将开始的进攻做了概述。

奥斯曼军队在借着火光做总攻准备。蚂蚁般的人群冲上前去，将木柴和其他东西运到最前沿，准备将壕沟填平。大炮在此前一整天的时间内对里卡斯河谷的朱斯蒂尼亚尼的临时壁垒进行了猛烈轰击。那一天很可能就是浓雾笼罩的日子，守军已经被这可怕的征兆吓破了胆。石弹如冰雹般一刻不停地落下。防御工事上开始出现裂口。“我无法描述大炮在这一天对城墙造成的破坏，”巴尔巴罗记载道，“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心惊胆寒。”[41] 夜幕降临了，朱斯蒂尼亚尼麾下精疲力竭的士兵们准备再去修补工事，但在明亮火光的照耀下，城墙被照得透亮，敌人的炮击一直持续到深夜。将近午夜时分，篝火和火把突然间全部熄灭了，

奥斯曼人狂喜的呼喊声也骤然消失，炮击也停止了，令人丧失意志的沉默统治了这个5月的黑夜。这沉默和狂欢一样令守军呆若木鸡。朱斯蒂尼亚尼和市民们继续劳作，争分夺秒地利用所剩不多的黑夜时光，抢修城墙。

大约就在这个时间，城墙的逐渐崩塌迫使守军对城防安排做了一个新的小调整。过去他们常常从外围防御工事的门里杀出，发动突袭，以打乱敌人的活动。随着城墙逐渐被摧毁，被临时土木壁垒取代，从他们自己的战线发动偷袭越来越困难了。有些老人知道，皇宫下方有一个隐蔽的边门可供出击，目前是被木栅遮蔽了起来。那个地点就是狄奥多西城墙与较为不规则的科穆宁城墙相接形成的直角处。这个古老的城门被称为“竞技场门”或“木头门”，因为它曾经通向城外的一座木制竞技场。这座小城门被坚固的城墙遮蔽，但士兵们仍然能从这里出击，对外面台地上的敌人进行袭扰。君士坦丁十一世下令将这座门的通道清理干净，继续从这里突袭敌人。另外一个古老的预言似乎已经被大家抛在脑后。669年，阿拉伯人第一次攻打君士坦丁堡时，出现了一本奇异的预言书，即所谓的《伪美多迪乌斯启示录》[42]。在该书的很多预言中有着这样一段：“你，拜占庭，将蒙受灾祸，因为伊斯玛仪（阿拉伯）将占领你。伊斯玛仪的每一匹马都会到来，领头的那匹将在你面前搭起帐篷，然后开战，打破木竞技场门，一直走到公牛那里。”[43]

---

[1] quoted Sherrard，Philip，*Constantinople*：*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London，1965，p.167

[2] Yerasimos，Stephane，*Les Traditions Apocalyptiques au tournant de la Chute de Constantinople*，Paris，1999，p.59

[3]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p.129

[4]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1823，p.14

[5]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69

[6] quoted Yerasimos，Stephane，*Les Traditions Apocalyptiques au tournant de la Chute de Constantinople*，Paris，1999，p.70

[7] Barbaro，Nicolo，（in English）*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rans. J. R. Melville Jones，New York，1969，p.56

[8]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26

[9]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26

[10]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p.26-7

[11] quoted Tsangadas，B. C. P.，*The Fortifications and Defense of Constantinople*，New York，1980，p.304

[12]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8

[13]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8

[14]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8

[15]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p.58-9

[16]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9

[17]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81

[18]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63

[19]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81

[20]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63

[21]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65

[22] 喀拉喀托是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巽他海峡中心一个岛上的火山。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大喷发，造成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都能听到爆炸声，大量的火山灰洒落到8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它引起海啸，浪高36米，造成爪哇和苏门答腊3.6万人死亡。喀拉喀托火山于1927年再次喷发，至今仍在活动。

[23]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309-10

[24]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1823，p.50

[25]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pp.47-8

[26]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p.48

[27]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p.48

[28]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p.48

[29]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86

[30]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1823，p.50

[31]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1823，p.50

[32]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p.6

[33]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1823，p.50

[34]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27

[35]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81

[36]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181

[37]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1823，p.54

[38]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48

[39] Doukas，*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trans. Harry J. Magoulias，Detroit，1975，p.221

[40]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81

[41]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27

[42] 7世纪末出现的一本类似启示录的预言书，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最早用古叙利亚语写成，对穆斯林对近东的征服做出评论。因为被错误地认为是4世纪的教士奥林匹斯的美多迪乌斯所作，所以被称为《伪美多迪乌斯启示录》。它预言了世界末日，包括一位类似救世主的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的出现。

[43] quoted Yerasimos，Stephane，*Les Traditions Apocalyptiques au tournant de la Chute de Constantinople*，Paris，1999，p.157

13.“铭记这一天！”

1453年5月27～28日



> 这些磨难是真主有意为之。伊斯兰的利剑在我们手中。如果我们没有选择忍受这些磨难，我们就不配圣战者的名号，在最终审判日将会羞于站在真主面前。[1]
>
> ——穆罕默德二世

塞尔维亚史学家“近卫军战士”米哈伊尔讲述了一个关于穆罕默德二世征服手段的传说。按照他的说法，苏丹召集了王公贵族，命令“抬来一张巨大的地毯，铺在大家面前，然后在它的中心位置放了一个苹果，然后给大家说了一个谜语：‘你们当中谁能够不踩到地毯就拿到苹果？’他们就商议起来，想这怎么能办得到呢，没有一个人能想出办法来。穆罕默德二世自己走到地毯前，双手抓住地毯，把它卷了起来，一边卷一边往前走；然后他拿到了苹果，又把地毯原样展开”。[2]

穆罕默德二世现在认为夺取胜利果实的时机已经成熟。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最后的斗争已经开始了。苏丹希望能够通过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一举将守军打垮，就像摇摇欲坠的城墙在炮火下终于倒塌一样。君士坦丁十一世通过间谍，或许还从哈利勒本人那里得知，如果他们能

熬过这次攻势，奥斯曼军队一定会撤退，庆祝胜利的教堂钟声就一定会响起。双方的统帅都在为最后决战竭尽全力。

穆罕默德二世开始疯狂地忙碌。在战役的最后几天内，他似乎一刻不停歇地四处奔走，骑马在部队里穿梭，在金红两色营帐内接见部下，鼓舞士气，发布命令，许诺奖赏有功之臣，威胁严惩作战不力者，亲自监督最后的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要让全体将士都看到他。帕迪沙阿的亲临现场激励了士兵们的斗志，让他们准备好去战斗和死亡。穆罕默德二世知道，这就是他命运的关键时刻。光荣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否则就是不可想象的失败。他决心亲自监督每一个细节，战备工作务必做到尽善尽美。

5月27日（星期日）早上，他命令大炮再次开火。这次炮击很可能是整个战役中最猛烈的一次。一整天时间里，大炮持续轰击着城墙中段，目标是打开一个足够宽的缺口，以便发动大规模进攻，并阻止守军进行有效的维修。巨大的花岗岩炮弹锤击城墙三次，才将相当长一段城墙打倒。在光天化日之下，再加上奥斯曼人的火力非常凶猛，守军根本无法进行抢修，但奥斯曼人此时也没有尝试进攻。巴尔巴罗说，整整一天时间，“他们炮击可怜的城墙，把很多段城墙炸塌，有一半城墙严重受损。除了炮击之外，他们什么也没做”[3]。缺口越来越大，穆罕默德二世确保守军的抢修工作越来越困难，守军在总攻之前得不到任何喘息之机。



城市废墟：赛马场残迹与城市的空旷区域

白天，穆罕默德二世在他营帐外召集了军官会议。所有的各级指挥官都聚集在此，聆听苏丹的训示。“行省总督、将军、骑兵军官、军长、高级指挥官，以及千夫长、百夫长或五十夫长、近卫骑兵、船长、舰队司令，全都到场。”[4] 穆罕默德二世向听众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君士坦丁堡神话般的财富，现在这财富已经触手可及：皇宫和宅邸中藏匿的黄金，教堂内的还愿财物和“用黄金白银、宝石和无价珍珠制成的”[5] 圣物，可供换取赎金、占为己有或者奴役的贵族、美女和男孩，还有美丽的高宅大院和花园将供他们居住和享用。他不仅强调了占领世界上最著名城市将带来的不朽荣耀，还指出了攻克它的必要性。只要君士坦丁堡还在基督徒的手中，就一直对奥斯曼帝国构成明显的威胁。将它占领之后，就可以把它作为新的征服战争的跳板。他认为，当前的任务是非常轻松的。陆墙已经严重受损，壕沟已经被填平，守军所剩无几而且士气低落。他还特意贬低了意大利人的决心，因为意大利人参加守城对他的听众来说仍然是个心理障碍。几乎可以肯定（尽管希腊史学家克利托布罗斯没有提及这一点），穆罕默德二世还强调了圣战的意义：伊斯兰世

界对君士坦丁堡的长久渴望、先知的圣训以及殉教的诱惑。

然后他阐述了具体的战术安排。他相信，守军已经被持续不断的炮击和小规模厮杀拖得精疲力竭。事实的确如此。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以用兵力优势压倒对方了。部队将分成若干批，轮番进攻。一支队伍疲劳之后，另一支将迅速替换它。他们将用一波波的生力部队轮番猛攻，直到疲惫的守军支撑不住。需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刻也不停歇："我们开战之后，战斗将一刻不停，不睡觉、不吃喝、不休息，不做任何停顿，持续地向敌人施压，直到战胜他们。"[6] 他们将做好协调，从各个地段同时发起进攻，让守军无法调兵遣将去救援特别危险的地点。虽然苏丹作了慷慨陈词，但无休止的进攻是不可能做到的：在实践中，全面进攻是有限制的，压缩在几个小时之内。顽强的守军能够给猛冲上来的进攻方造成严重损失；如果进攻方不能迅速压倒守军，撤退就不可避免。

每位指挥官都收到了具体的命令。双柱港的舰队将包围城市，牵制住海墙上的守军。金角湾内的战船将协助架设金角湾上的浮桥。浮桥架好之后，扎甘帕夏的部队将从泉源谷开进，进攻陆墙的末端。卡拉加帕夏的部队将攻打皇宫附近的城墙。在陆墙中段，穆罕默德二世、哈利勒和近卫军将进攻里卡斯河谷的破损城墙和土木壁垒，很多人认为这个地段是整个战役的关键。在穆罕默德二世的右翼，伊沙克帕夏和马哈茂德帕夏将尝试攻打通往马尔马拉海的那段城墙。苏丹特别强调确保部队严守纪律。他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服从命令："长官命令他们安静地前进时，他们必须一声不吭；命令他们呐喊时，他们必须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怒吼。"[7] 他重申了此次进攻如果取胜对奥斯曼民族未来的重大意义，并许诺将亲自指挥战役。于是，他解散了与会的军官们，让他们各自返回自己的部队。

随后，在头戴显眼的白头巾的近卫军卫兵护卫下，苏丹策马巡视了

军营。传令官也伴随着他，大声宣布攻势即将发动。在帐篷的海洋中呼喊出的消息点燃了士兵们的激情。攻克城市后，士兵们将按照传统得到奖赏："你们知道，在亚洲和欧洲还有很多空缺的总督职位。最好的职位将被赏赐给第一个冲过敌人木栅的人。我将给他应得的荣耀，用高官厚禄报答他，让他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无比幸福。"[8] 奥斯曼军队在发动所有主要战役之前都会向官兵们许诺等级不同的荣誉，以鼓励大家奋勇直前。同时还有相应的惩罚的威胁："但如果让我看见有人躲在帐篷里，不去城墙下作战，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9] 奥斯曼军队在征服战争中的这种激励手段保证了特别英勇的表现会得到相应的荣誉和利益，以此激发士兵的斗志。苏丹的传令官们在战场上督战，直接向苏丹本人汇报，以执行奖惩制度。他们对某名士兵的英勇表现的记录能够使这个幸运儿当场得到晋升。士兵们知道，伟大的行为会得到奖励。

穆罕默德二世在这方面更进一步。他宣布，既然君士坦丁堡没有投降，那么按照伊斯兰教法，破城之后，士兵们可以自由劫掠三天。他以真主之名，"以四千先知，以先知穆罕默德，以他父亲与儿女的灵魂，以他佩戴的宝剑的名义起誓，他会把城市的一切赏赐给士兵们，包括所有男女市民，所有财物和地产。他将信守这个誓言，绝不违逆。"[10]

对象征着无尽财富和奇观的红苹果的憧憬，是游牧劫掠者灵魂的直接诉求，是马背上的民族对城市财富渴望的一个原型。在绵绵春雨中吃苦受累7周之后，士兵们一定已经对红苹果望眼欲穿。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想象中的富得流油的城市其实并不存在。穆罕默德二世描绘的无比富庶的君士坦丁堡早在两个半世纪前就被基督教十字军洗劫一空。它的神话般的财富、黄金饰品、镶嵌珠宝的圣物在1204年的灾难中大部分已经流失，被诺曼骑士们熔化或者和青铜骏马像一起被运到了威尼斯。1453年5月的君士坦丁堡已经一贫如洗，先前的光辉只剩一个缩小的鬼影，主要的财富就是它的人民。"曾经是智慧之城，如今是废墟之城，"[11] 真纳迪奥斯如此描述奄奄一息的君士坦丁堡。少数富人可能在自家

宅邸藏匿了一些黄金，教堂内还有一些贵重物品，但奥斯曼士兵们仰望城墙时憧憬的阿拉丁传说般的巨大财富早已不复存在。

不管怎么说，苏丹的宣讲还是让聆听的士兵们陷入了狂热的兴奋。他们的高声呼喊传到了在城墙上观察的守军耳边。“哦，如果你听到他们的声音飞向天堂，”莱奥纳德记载道，“你一定会呆若木鸡。”[12] 穆罕默德二世或许并不愿意承诺放纵士兵劫掠，但为了彻底赢得嘟嘟哝哝的士兵们的支持，他不得不这么做。他本人是希望避免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的，如果议和的话就能够保护城市。对穆罕默德二世来说，红苹果不仅仅是可供劫掠的一堆战利品；它将成为他的帝国的中心，因此他特别希望把它完好地保存下来。因此，在许诺战利品的同时，他还发出了这样的告诫：城市的建筑物和城墙将成为苏丹本人的财产；大军进城之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破坏或摧毁这些建筑。占领伊斯坦布尔绝对不能像1258年蒙古人纵火焚烧和洗劫巴格达（中世纪最繁华的城市）那样。

总攻的日期定在第三天，即5月29日，星期二。为了激荡起士兵们的宗教狂热，消除任何负面思想，苏丹宣布，5月28日全天将被用作赎罪。人们将在白天斋戒，进行仪式化的沐浴，祈祷五次，并请求真主帮助他们占领城市。随后两夜将按照习俗点燃蜡烛。这火光、祈祷和音乐混合而产生的神秘和敬畏感对穆斯林和他们的敌人都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震撼，这种心理效果在君士坦丁堡城墙外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与此同时，奥斯曼军营内在热情百倍地做最后的准备工作。他们收集了大量泥土和木柴，用来填平壕沟；制作了云梯；收集了成堆的箭矢；带轮子的防护盾被推到前沿。夜幕降临之后，城市再次被明亮的篝火环绕；对真主之名的有节律的呼唤声从营地里沉稳地升起，战鼓隆隆敲响，铙钹和唢呐齐鸣。据巴尔巴罗说，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安纳托利亚海岸上也能听得见这喊声，“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战战兢兢”[13] 。在君士坦丁堡城内，这一天是东正教的万圣节，但教堂也给不了慰藉，有

的只是悔罪和持续不断的呼救祈祷。

这一天晚上，朱斯蒂尼亚尼和他的部下仍然着手抢修破损的外墙，但在火光照耀下，敌人的大炮仍然持续轰鸣。守军的身形在火光下非常暴露。按照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说法，就在这个时候，朱斯蒂尼亚尼个人的幸运开始枯竭了。在他指挥行动的时候，一块石弹碎片，可能是一发跳弹，击中了这位热那亚指挥官，穿透了他的钢制胸甲，插入了他的胸膛。他当场倒地，被抬回家中床上。

朱斯蒂尼亚尼对拜占庭人的事业具有关键意义。从1453年1月他率领700名身披闪亮铠甲的优秀士兵戏剧性地登上码头的那一天起，朱斯蒂尼亚尼就一直是防御战的标志性人物。他是自愿且自费前来参战的，“为的是基督教信仰的利益和全世界的荣耀”[14]。他精通守城技术，作战英勇无畏，在守卫陆墙的战斗中不知疲倦，只有他一个人同时受到希腊人和威尼斯人的忠诚爱戴，他们原先对热那亚十分仇恨，但在朱斯蒂尼亚尼身上是一个极大的例外。朱斯蒂尼亚尼指挥建造的土木壁垒是一项聪明绝顶的紧急措施，对奥斯曼军队的士气造成了很大打击。按照他的同胞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的说法（尽管这说法不太可靠），穆罕默德二世把朱斯蒂尼亚尼视为主要对手，对他火冒三丈又颇为敬佩，企图用一大笔钱贿赂他。但朱斯蒂尼亚尼不为所动。在这位鼓舞人心的领袖负伤之后，守军一下子绝望起来。他们放弃了城墙的修补工作，任凭它一片狼藉。君士坦丁十一世得到消息后，“立刻丧失了决心，陷入沉思”[15]。

午夜时分，奥斯曼人的呐喊又一次突然停息，篝火也被熄灭。沉默和黑暗骤然间笼罩了帐篷、旗帜、大炮、马匹、战船、金角湾风平浪静的海面以及破败不堪的城墙。医治负伤的朱斯蒂尼亚尼的医生们“一整夜都在为他治疗，努力维持他的生命”[16]。市民们彻夜难眠。

5月28日，星期一，穆罕默德二世对总攻做了最后的安排。刚刚破

晓他就起床，命令炮手们做好准备，瞄准城墙上已经破损的部分，当天晚些时候发布命令后，大炮就能对脆弱的守军开火。近卫骑兵和步兵部队的指挥官们应招前来接受命令，并被分为若干分队。在整个军营中，在喇叭声的伴奏下，命令被发布出去：所有军官都必须坚守岗位，准备第二天的攻势，擅离职守者格杀勿论。

按照巴尔巴罗的说法，炮火再次开始咆哮的时候，“如此猛烈，绝非尘世所能有，因为这是最后一次炮击”[17]。虽然炮火非常凶猛，但奥斯曼人没有发动进攻。守军可以观察到的敌人的另一项活动是收集成千上万的长梯（它们被抬到接近城墙的地方）以及大量木栅栏（它们将在士兵们爬上土木壁垒的时候为其提供防护）。骑兵的战马被从牧场带到了前沿。这是一个晚春的日子，阳光明媚。奥斯曼军营内，人们忙碌地做着准备工作：斋戒和祈祷、磨刀霍霍、检查盾牌和铠甲上的搭扣，或者休息。士兵们在准备最后攻势的时候，陷入了一种内省的思绪，所以安静了下来。这种宗教性的安静和严明的纪律让城墙上的观察者十分焦虑。有些人希望，敌人的安静说明他们在准备撤退；其他人则更为现实。

穆罕默德二世努力鼓舞部队的士气，在几天时间内通过狂热和思考的循环来调节他们的情绪，力图激发斗志，消除人们内心的疑虑。毛拉和德尔维希们在创建正确心态的工作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成千上万的云游圣人从安纳托利亚高地的城镇和村庄来到君士坦丁堡城下，带来了狂热的宗教期望。他们满身尘土，在军营内来往穿梭，因为兴奋而目光灼热。他们背诵《古兰经》的相关诗节和圣训，讲述关于牺牲殉教和预言的故事。他们提醒士兵们，他们在追随阿拉伯人首次攻打君士坦丁堡时阵亡的先知友伴的脚步。这些烈士的名字被口口相传：哈兹莱特·哈菲兹、艾布·赛贝特·乌尔-安萨里、哈姆德·乌尔-安萨里，尤其是艾优卜，土耳其人称他为埃于普。圣人们低声提醒他们的听众，让先知预言成为现实的光荣使命落在了他们肩上：

> 先知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座城市，它的一边是陆地，两边是海洋？”他们答道：“我们听说过，真主的使者。”他说：“在易斯哈格的七万个儿子占领那城市之前，最后审判不会降临。他们抵达那里时，不会用武器和投石机攻打城市，而是用这样的话语：万物非主，唯有安拉。安拉至大！”然后第一道海墙会坍塌，他们说第二遍的时候，第二道海墙会垮台，第三次的时候陆墙会崩塌。他们就会兴高采烈地进城。[18]

这些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所说的话可能纯属捏造，但它蕴含的情感却是真切的。完成历史的弥赛亚式循环的使命被交给了奥斯曼大军，它将实现伊斯兰教诞生以来各个伊斯兰民族的恒久梦想，并赢得不朽荣耀。战死者也将成为有福的烈士，升入天堂：“潺潺溪流浇灌的花园，他们将永远在那里生活，得到贞洁的配偶和真主的恩典。”[19] 这种期望令人陶醉。但在军营里也有一些人，包括谢赫阿克谢姆赛丁自己，对士兵们的真正动机有着非常务实的理解。“陛下明察，”在战役早期他曾写信给穆罕默德二世，“大多数士兵其实都是被武力胁迫才改信伊斯兰教的。为了真主之爱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是极少数。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瞥见了夺得战利品的机遇，哪怕必死无疑他们也会一头冲过去。”[20] 对于这些唯利是图的人，《古兰经》里也有鼓励的话语：“真主以你们所取得的许多战利品应许你们，而将这战利品迅速地赏赐你们，并制止敌人对你们下手，以便这战利品作为信士们的一种迹象，以便真主昭示你们一条正路。”[21]

穆罕默德二世做了最后一次不知疲倦的巡视。他率领一支相当规模的骑兵部队前往双柱港，向哈姆扎下达关于海战的指令。舰队的任务是绕过城市，驶到海墙下的射击距离之内，牵制住该处守军。如果局势允许，可以让部分船只一直驶到滩头，派人尝试攀爬海墙，但由于马尔马拉海的海流湍急，这么做的成功概率不大。金角湾内的舰队也得到了类似的命令。在返途中，他还在加拉塔的主城门外稍事停留，命令城里的主要官员前来觐见。苏丹严厉地警告这些官员，次日不得向君士坦丁堡提供任何援助。

下午，他再次骑马巡视全军，走过两段海岸之间的4英里路程，鼓舞士兵，与一些军官交谈，呼唤他们的名字，激励他们奋勇作战。他重申了“胡萝卜和大棒”的承诺：英勇作战就能得到重赏，抗命不遵就要遭到可怕的惩罚。苏丹命令士兵们不折不扣地坚决服从军官们的命令，否则格杀勿论。最严厉的言辞可能是说给扎甘帕夏麾下被强迫参战因而很不情愿的基督徒士兵听的。他对各项准备工作感到满意，于是返回营帐休息。

在城内，守军也在做他们的准备工作。虽然君士坦丁十一世和医生们忧心忡忡，但朱斯蒂尼亚尼在这一夜顽强地活了下来。他对外墙的状况非常担忧，对它的防御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命人将他抬到城墙上，监督抢修工作。守军再次着手封堵城墙缺口，进展颇为顺利，直到被奥斯曼炮兵发现。很快，倾盆大雨般的炮火迫使他们罢手。朱斯蒂尼亚尼的伤情似乎恢复得不错，重新接管了关键的城墙中段的指挥权。

在其他地段，由于不同民族和宗教派别之间的摩擦，最后防御的准备工作很不顺利。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根深蒂固的敌对关系和互相矛盾的优先目标、粮食的严重短缺、持续劳作带来的疲惫以及炮击的震撼，都严重影响了守军的团结。在长达53天的围攻之后，守军的神经已经紧绷到了快要崩溃的临界点，分歧恶化成公开的冲突。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攻势而做准备的时候，朱斯蒂尼亚尼和卢卡斯·诺塔拉斯为了屈指可数因而弥足珍贵的大炮的部署发生争吵，几乎动手打起来。朱斯蒂尼亚尼要求诺塔拉斯把他指挥下的火炮交出，用于陆墙的防御。诺塔拉斯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他相信海墙的防御也许会需要这些火炮。两人激烈争吵起来。朱斯蒂尼亚尼威胁要用剑把诺塔拉斯刺死。

关于陆墙的物资补给，守军内部也发生了争吵。需要在破损的城垛上堆积有效的防护物，以保护士兵免受敌人投射武器的袭击。威尼斯人开始在他们的住宅区（在金角湾附近）的木匠工坊里制作木栅。广场上

收集了7辆大车的木栅。威尼斯市政官命令希腊人把这些木栅运到2英里外的城墙上。希腊人说，不给工钱就不干。威尼斯人控诉他们太贪婪。很多希腊人的家小都在挨饿，而且对傲慢的意大利人满腹怨恨。他们需要在天黑之前弄到食物或者可以购买食物的金钱。这场争吵越拖越久，导致直到天黑之后木栅才被送到城墙上，那时已经太晚了。

这些激烈的对抗有着很久远的历史。宗教分裂、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君士坦丁堡遭洗劫、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之间的商业竞争：这都导致各方用贪婪、奸诈、懒惰和傲慢这些罪名互相谴责，尽管城市的末日已经不远了。但在这纷争和绝望的表象之下，有证据表明，在5月28日，各方总的来讲都在为城防尽其所能。这一天，君士坦丁十一世一直在组织、恳求和鼓舞民众与来源混杂的守军（包括希腊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土耳其人和西班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精诚团结。一整天时间里，妇女儿童一直在忙碌，把石块搬上城墙，以便向敌人投掷。威尼斯市政官发出了真挚感人的恳求："所有自称是威尼斯人的人都去陆墙，首先是为了我们对上帝的爱，其次是为了城市的利益和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荣誉。希望大家全都坚守岗位，视死如归。"[22] 在港口，守军检查了铁链，所有船只排成了作战队形。在对岸，加拉塔市民们注视着最后决战的准备工作，越来越担忧。加拉塔市长很可能向市民们秘密发出了最后一次召唤，请他们偷偷穿过金角湾去加入君士坦丁堡的守军。他现在认识到，他治理下的热那亚飞地的命运取决于君士坦丁堡的存亡。

和奥斯曼军营的平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君士坦丁堡非常吵闹。一整天时间里，教堂钟声此起彼伏，锣鼓齐鸣，召唤人们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在前几天的可怕预兆之后，人们更加卖力地持续祈祷、举行礼拜仪式和向上帝呼救。5月28日早上，这些宗教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城内基督徒和城外平原上穆斯林的宗教狂热棋逢对手。这天清晨，由教士、男女群众和儿童组成的盛大游行队伍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外集合。城里所有的最神圣的圣像都被从神龛和小教堂内取出。除了在上一次游行中遭

遇凶兆的指路圣母像之外，他们还搬出了圣徒遗骨、包含真十字架碎片的镀金和镶嵌宝石的十字架，以及一系列其他圣像。身穿锦缎法衣的主教和教士们领头，普通信徒跟在后面，赤足行走以示悔罪，哭泣着，捶击自己的胸膛，请求宽恕他们的罪孽，并加入圣歌合唱。游行队伍穿过城市，沿着陆墙全线行进。在每一个重要阵地，教士们都诵读古老的祷词，恳求上帝保护城墙，把胜利赐予忠实于他的人民。主教们举起他们的权杖，为守军赐福，用捆扎成束的晒干的罗勒草向他们抛洒圣水。对很多人来说，这也是斋戒日，要一直坚持到日落。宗教是鼓舞守军士气的终极手段。

皇帝本人很可能也参加了游行。游行结束后，他召集了最重要的贵族和城内各个派系的指挥官，最后一次号召大家精诚团结、奋勇作战。他的演讲和穆罕默德二世的讲话很类似。莱奥纳德大主教在场聆听了皇帝的演讲，并做了记载。君士坦丁十一世轮流向每一个派别讲话，感召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信仰而战。首先他向自己的人民——城内的希腊居民讲话。他赞扬他们在此前53天内为保卫家园而做的顽强斗争，并请求他们不要害怕“邪恶的土耳其人”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发出的狂野呼喊；希腊人的力量在于“上帝的保佑”，但也在于他们优越的甲胄。他提醒他们，穆罕默德二世撕毁了先前的和约，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修建要塞，同时“侈谈和平”，实际上却挑起了战争。他号召希腊人为了家园、宗教信仰和希腊的未来而战；提醒他们，穆罕默德二世妄图占领“君士坦丁大帝的城市、你们的家园、基督教难民和所有希腊人的避难所，还要把上帝的神圣教堂改为马厩，对它们进行可耻的亵渎”[23]。

接着，他先后向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发表演说，赞扬他们的勇气和对城市的忠诚：“你们的很多伟大和高贵的勇士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光荣，你们把它视为自己的城市。现在斗志昂扬地迎接新的斗争吧。”[24]最后他向所有战士讲话，恳求他们坚决服从命令，最后用世俗和天堂的荣耀来鼓舞大家，几乎和穆罕默德二世做的一样：“谨记在心，今天是

你们的光荣之日，如果你们在这一天哪怕只洒了一滴血，也会得到烈士的冠冕和不朽的荣耀。”这些言辞对听众产生了预料之中的效果。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演讲振奋起来，发誓坚决地抵抗即将到来的进攻，“若上帝开恩，我们或许能获胜”[25]。似乎他们都决心捐弃前嫌，携手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战。然后他们各自散去，返回自己的岗位。

事实上，君士坦丁十一世和朱斯蒂尼亚尼很清楚，他们的兵力已经非常稀少。在7周的消耗战之后，最初的8000名士兵现在可能锐减到了4000人，防线全长却足有12英里。穆罕默德二世告诉他的部下，在某些地段，“每座塔楼只有两三人防守，相邻两座塔楼之间的城墙上也只有两三人”[26]。这个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金角湾海岸长约3英里，只有500名本领高强的弩手和弓箭手把守。而泉源谷处的奥斯曼战船以及从浮桥上调来的陆军部队都可以攻击这一地带。在铁链远方、海墙外围的防线有5英里长，每座塔楼上只有一名受过训练的弓箭手、弩手或火枪兵，负责支援的是一群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市民和僧侣。海墙的某些地段被分配给了特定的人群：克里特士兵把守着某些塔楼，一小群加泰罗尼亚人防守着另外一些。觊觎奥斯曼皇位的奥尔汗王子（穆罕默德二世的叔叔）负责防守俯瞰马尔马拉海的一段城墙。他的部下肯定会死战到底，是无论如何不能投降的。但总的来讲，马尔马拉海的海流能够对海墙起到有效的保护，因此所有抽调出来的兵员都被送往陆墙的中段。所有人都洞若观火，奥斯曼人最集中最猛烈的攻击一定在里卡斯河谷、罗曼努斯门和查瑞休斯门之间，那里的部分外墙已经被炮火摧毁。总攻前的最后一天，守军对此处的土木壁垒尽可能做了抢修，并派遣部队来增援。朱斯蒂尼亚尼负责防守陆墙中段，他手下有400名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军队的主力，一共有2000人左右。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指挥部也设在这个地段，以确保全力支持。

到下午三四点钟，守军可以看见敌人在城墙外集结。这是一个天气

晴好的下午。太阳正在西沉。在城外的平原上，奥斯曼军队开始排兵布阵，分为若干个团，不断旋转，升起战旗，遮蔽了两段海岸之间的地平线。在最前锋，士兵们继续填充壕沟；大炮被推到离城墙尽可能近的地方；士兵们还在继续收集登城器械。在金角湾内，被通过陆路搬运入海的80艘奥斯曼战船正在准备将浮桥架设到接近陆墙的地方。在铁链之外，舰队主力正在哈姆扎帕夏指挥下包围城市，经过卫城，绕过马尔马拉海海岸。每艘船上都运载着士兵、投石机和长度与城墙高度相当的梯子。城墙上的人坐下来等待，因为他们还有一些时间。

下午晚些时候，寻求宗教慰藉的君士坦丁堡市民在5个月以来第一次聚集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遭受东正教信徒抵制的光线昏暗的大教堂此时挤满了人，他们焦躁、懊悔、狂热。自1064年夏天以来，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第一次在城内共同祈祷。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400年的宗教分裂和十字军东征造成的仇隙被搁置到了一边，双方共同参加了求救的礼拜。查士丁尼建造的巨大教堂已经经历了1000年的风风雨雨，此时在神秘的烛光下，回荡着礼拜仪式此起彼伏的祈祷声。君士坦丁十一世亲自参加了礼拜。他坐在祭坛右侧的皇座上，满腹热诚地领取圣餐，“跪倒在地，恳求上帝大发慈悲，宽恕他们的罪过”。然后他向教士与群众道别，向四面八方鞠躬致意，离开了教堂。根据热诚的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记载，“在场的所有教士和群众一下子全都哭喊起来。妇女儿童发出哀号和呻吟；我相信，他们的声音直达天堂”[27]。所有的指挥官都返回了自己的岗位。部分平民留在教堂内，参加守夜。还有的人躲藏了起来。有人躲进了地下巨型蓄水池的充满回音的黑暗之中，乘坐小船在柱廊间漂浮。在地面上，查士丁尼皇帝仍然骑着他的青铜马，霸气十足地指向东方。

落日之后，斋戒了一整天的奥斯曼士兵开始进食，为这一夜做准备。战前最后一餐是加强团结和视死如归精神的又一良机。士兵们围坐在集体大锅周围，点燃了篝火和蜡烛，火光比前两天夜里更大一些。传

令官们在笛子和号角伴奏下又一次在军营中穿梭，重申许诺富足生活和幸福死亡的双重信息："穆罕默德的孩子们，欢乐吧，因为明天我们就会俘虏很多基督徒，我们会把他们全都卖作奴隶，两个奴隶卖1杜卡特，我们都会发大财，全身珠光宝气！我们要用希腊人的胡须做拴狗的绳子，他们的妻小都将成为我们的奴仆。鼓起勇气，准备好，为了对我们的穆罕默德的爱，视死如归！"[28] 一种狂热的喜悦席卷了整个营地，士兵们兴奋的祈祷声缓缓地升起，力度渐渐增强，如同惊涛骇浪。这光亮和有节律的呼喊声让等待中的基督徒毛骨悚然。黑暗中，奥斯曼人又开始了一轮大规模炮击，如此猛烈，"在我们看来有如地狱"[29] 。午夜时分，沉默和黑暗又笼罩了奥斯曼军营。士兵们"携带所有武器和堆积如山的箭"[30] ，秩序井然地走向各自的岗位。即将到来的激战让他们兴奋不已，他们梦想着殉道的光荣和触手可及的黄金，一声不吭地等待着最后总攻的讯号。

万事俱备。双方都深知，次日将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双方都做了精神上的准备。巴尔巴罗当然相信，基督教的上帝将最终决定战局发展。据他说，"双方都向自己的神祈祷胜利，他们向他们的神祈祷，我们向我们的神恳求。我们在天上的圣父和圣母一起决定，谁将在这场战役中取胜，这将在第二天揭晓"[31] 。根据萨阿德丁（Sad-ud-din）的记载，奥斯曼军队"从黄昏到黎明，摩拳擦掌，殷切求战……将最值得嘉许的工作联合起来……彻夜祈祷"[32] 。

这一天的故事还有一点补充。根据乔治·斯弗朗齐斯的一本史书，这天夜里，君士坦丁十一世骑着他的阿拉伯母马在昏暗的街道上奔驰，深夜才返回布雷契耐皇宫。他召集了所有佣人和内廷人员，恳求他们的宽恕。在得到谅解后，"皇帝再次上马，我们离开了皇宫，开始沿着城墙巡视，督促哨兵们提高警惕，不要睡觉"[33] 。他们检查了所有的岗位，发现一切正常，所有城门都已经安全地封闭。在第一次鸡鸣时，他们爬上了卡里加利亚门处的塔楼（从这里可以居高临下地俯瞰平原和金

角湾），观看敌人在黑暗中的准备工作。他们可以听到带轮子的攻城塔在黑暗掩护下嘎吱嘎吱地接近城墙，长长的梯子被拖过遭到炮击的地域，很多士兵在忙着填充破损城墙脚下的壕沟。在南面，闪闪发光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上，可以远远地看到大型桨帆船的轮廓，它们像幽灵一般驶往圣索菲亚大教堂巨大穹顶远方的阵地。在金角湾内，较小的弗斯特战船正在海峡上架设浮桥，并逼近城墙。这对经历了无数磨难的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是个百感交集和引发内省的时刻。这位高贵的皇帝和他的忠实朋友们站在外墙塔楼上，听着敌人为最后总攻紧张忙碌，周遭的世界一片黑暗，决定命运的时刻尚未降临。这幅图景令世人难忘。一连53天，他们的微弱兵力挫败了无比强大的奥斯曼军队；他们抵挡住了史上最大的大炮在中世纪发出的最猛烈的轰击（消耗了约5000发炮弹和5.5万磅火药）；他们击退了三次大规模进攻和十几次较小的突袭，杀死了成千上万奥斯曼士兵，摧毁了敌人的许多地道和攻城塔；他们在海上与敌人激战，进行突袭与和平谈判，并不懈地消磨敌人的斗志。他们或许不知道，其实他们已经非常接近胜利。

这幅景象在地理和具体细节上是准确无误的；最高城墙上的哨兵完全可以听得见城墙下奥斯曼军队在黑暗中的活动，也能够俯瞰范围广大的陆地和海洋，但君士坦丁十一世和斯弗朗齐斯是否真的在那塔楼上，我们无从得知。这段记述很可能是虚构的，在100年后由一位因擅长伪造史料而闻名的教士捏造。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5月28日的某个时间，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大臣们挥泪辞别，斯弗朗齐斯对这一天及其意义有着不祥预感。他和皇帝是一生的挚友。斯弗朗齐斯对他的主公忠心耿耿，这种忠诚在拜占庭帝国的最后岁月里围绕皇帝的那群人中是非常罕见的。23年前，在帕特拉斯[34]的围城战中，他曾救过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性命。他曾负伤被俘，戴着脚镣在遍地虫豸的地牢里苦熬了一个月才被释放。31年间，他为皇帝无数次出使外邦，包括花了3年时间在黑海周边为皇帝寻找一位妻子（最后徒劳无功）。作为回报，君士坦丁十一世任命斯弗朗齐斯为帕特拉斯总督；斯弗朗齐斯结婚时，皇帝本人

担任他的傧相，还做了他的孩子们的教父。在围城期间，斯弗朗齐斯承担的风险比其他很多人都更大，因为他的家人还在城内。5月28日，不管这两人是在何时道别的，斯弗朗齐斯心里一定是充满了不祥预感。两年前的这一天，他远离君士坦丁堡，曾经有过一个预感："1451年5月28日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好像回到了城里；我匍匐在地，正要亲吻皇帝的脚时，他拦住了我，扶我起来，亲吻了我的眼睛。然后我就醒了，告诉睡在我身边的人：'我刚做了这样一个梦。铭记这一天吧。'"[35]

---

[1] quoted Inalcik，Halii，*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London，1973，p.56

[2] Mihailovich，Konstantin，*Memoirs of a Janissary*，trans. Benjamin Stolz，Ann Arbor，1975，p.145

[3]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49

[4]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59

[5]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61

[6]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62

[7]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63

[8]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pp.48-9

[9]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p.49

[10]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1823，p.54

[11]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 Princeton, 1978, p.355

[12]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 1 vols., Milan, 1976, pp.156-8

[13]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49

[14]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21

[15]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75

[16] Nestor-Iskander, *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 1998, p.77

[17] Barbaro, Nicolo, （in English）*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 New York, 1969, p.60

[18] quoted Babinger, Franz, *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 Princeton, 1978, p.85

[19] *Koran*, *The* , trans. N. J. Dawood, London, 1956, p.44

[20] Pertusi, Agostino, *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 1 vols., Milan, 1976, p.302

[21] *Koran*, *The* , trans. N. J. Dawood, London, 1956, p.361

[22] Barbaro, Nicolo, *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 ed. E. Cornet, Vienna, 1856, p.50

[23]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 Paris, 1823, p.56

[24] Leonard of Chios, *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 Paris, 1823, p.58

[25] Melville Jones, J. 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 Amsterdam, 1972, p.35

[26]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p.61-2

[27]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 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87

[28]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49

[29] Barbaro，Nicolo，（in English）*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 trans. J. R. Melville Jones，New York，1969，p.56

[30]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49

[31]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29

[32] Khoja Sa'd-ud-din，*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 trans. E. J. W. Gibb，Glasgow，1879，p.27

[33] Sphrantzes，George，*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he Sphrantzes Chronicle*， trans. Margaret Carroll，Amsterdam，1985，p.74

[34] 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城市。

[35] Sphrantzes，George，*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 trans. Marios Philippides，Amherst，1980，p.61

14.紧锁的城门

1453年5月29日凌晨1点30分



战争的胜负没有任何确定性，即便拥有了决定胜利的装备和兵力优势，也未必能取胜。战争中的胜利和优势取决于幸运和偶然。[1]

——伊本·赫勒敦，14世纪阿拉伯史学家

5月28日（星期一）天黑时，对陆墙的炮轰已经持续了47天。穆罕默德二世渐渐地将炮火集中到了三个地点：在北段，布雷契耐皇宫和查瑞休斯门之间；在中段，里卡斯河周围；在南段，朝向马尔马拉海方向的第三军用城门。这些地段的城墙都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所以在战前动员的时候，苏丹能够夸张地对指挥官们说，“壕沟已经被填平，陆墙的三个地点已经被摧毁，不仅你们这样的轻重步兵，甚至马匹和全副武装的重骑兵也能轻易地冲杀进去”[2]。事实上，双方都早已心知肚明，集中攻势将会聚焦在一个地点，也就是陆墙中段，圣罗曼努斯门和查瑞休斯门之间的低浅山谷处。这里是整个防御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穆罕默德二世的最强大火力就消耗在这里。

在总攻前夜，外墙上已经有九个较大的缺口，有的缺口长达30码，大部分缺口都在山谷处，朱斯蒂尼亚尼的部下用木栅一点一点地把这些

缺口封堵了起来。朱斯蒂尼亚尼就是这样用临时拼凑的土木壁垒堵住城墙坍塌造成的漏洞的。这种临时壁垒的框架是连接在一起的木梁和倒塌的城墙的石填料，再加上所有手头能找得到的材料：木柴、树枝、成捆的芦苇和碎石，并用泥土填充空隙。与石制城墙相比，这种工事能够更好地吸收炮弹的冲击力。渐渐地，这种土木壁垒显然被堆砌到与原先的城墙一般高度，其顶端也足够宽阔，可以作为很好的作战平台。工事顶端放置装满泥土的木桶和柳条筐作为城垛，为守军提供防护，奥斯曼军队进攻时的首要目标就是拆除这些临时城垛。自4月21日以来，维护土木壁垒一直是守军的当务之急。士兵和平民都一刻不停地拼命劳作，对它进行修补和扩建。参加劳动的有男有女，有儿童，还有僧侣和修女，他们把石头、木料、成车的泥土、树枝和砍下来的葡萄藤搬运到前线。工事遭破坏和抢修显然是一个无休无止的循环，令人精疲力竭。在敌人的炮火和进攻下，他们不分昼夜，不管日晒雨淋，一发现缺口就立马去填补。临时壁垒代表着全城人的集体力量，在朱斯蒂尼亚尼的指挥下，它回报了人们的辛劳，阻挡住了敌人的每一次进攻，打击了敌人的士气。

5月28日，春光明媚。下午晚些时候，守军的核心部队在临时壁垒后摆开了阵势。根据杜卡斯的记载，此处有“3000名拉丁人和罗马人[3]”[4]，包括与朱斯蒂尼亚尼一同前来的700名精锐意大利士兵的余部、威尼斯桨帆船上的水手，以及拜占庭部队的主力。他们的总兵力很可能只有2000人左右。他们装备精良，身披链甲或板甲，戴着头盔，装备了五花八门的武器：弩弓、火枪、小炮、长弓、剑和钉头锤，既有从远距离扫射敌人的武器，也有在壁垒处近距离作战的兵器。另外，市民们还把大量石块以及燃烧武器（成桶的希腊火和装在罐子里的焦油）搬到了前线。士兵们通过内墙的城门进入内外两道城墙的阵地，然后沿着临时壁垒分散开来，部署到长约1000码的中墙上。内外两道城墙之间的空地宽仅20码，背后就是较高的内墙和一道临时挖出的壕沟（挖出的泥土被用来加强临时壁垒）。在据守工事的士兵们背后，只有足够的骑兵沿着战

线来回奔驰空间。整段战线上，内墙只有四个出入口：圣罗曼努斯门和查瑞休斯门旁边各有一个边门，分别在山头的左右两侧；在小山北坡中央的位置通向空地的雄壮的第五军用门；还有一个边门位置不详，朱斯蒂尼亚尼命令开凿了这个门，以方便进入城市。所有人都很清楚，胜负将在临时壁垒处被定夺，从那里无路可退。因此，守军决定在士兵们进入阵地之后，就把他们背后的几个边门全都锁死，钥匙被托付给他们的指挥官。官兵们将背靠内墙，死战到底。夜幕降临，他们安静下来等候敌人的进攻。黑暗中下起了瓢泼大雨，但奥斯曼军队仍然在把攻城装备运往前线。后来，朱斯蒂尼亚尼进入了阵地，然后是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最亲信的贵族们：西班牙人堂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皇帝的堂弟西奥菲勒斯·帕里奥洛格斯和对皇帝忠心不二的战友约翰·达尔马塔。他们在临时壁垒和城墙后等待敌人进攻的最初迹象。加拉塔市长曾宣称“必胜无疑”[5]，虽然很少有人能像他那么乐观，但大家对挡住这最后一次暴风骤雨还是颇有信心的。

凌晨时分，奥斯曼军队已经准备就绪。在营帐的黑暗中，穆罕默德二世做了例行的小净和祈祷，恳求真主把城市交给他。他本人的准备工作可能包括穿上一件有驱邪神力的衬衫，它上面绣有《古兰经》的诗节和真主尊名，非常富丽堂皇，能够保护他躲避噩运。他戴上头巾，穿上长袍，腰间佩带宝剑。在主要指挥官的陪同下，他策马奔向前线，亲自去指挥攻势。

奥斯曼军队仔细地做好了从海陆两路同时进攻的准备，并严格执行了这个计划。金角湾和马尔马拉海的战船已经就位；重兵云集，准备攻打陆墙沿线的各个关键地点，焦点还是里卡斯河谷。穆罕默德二世决定投入大量兵力进攻守军的临时壁垒，各支部队按照其效用和战斗力从低到高轮番上阵。他命令第一波攻击由非正规部队发起，包括征募来的普通步兵和外籍辅助兵，即为了挣得战利品而应征的训练不足的部队和被强征来的附庸国的士兵。按照巴尔巴罗的记载，第一波部队中的很多人

似乎是“被强迫参战的基督徒”[6]；莱奥纳德则说他们包括“希腊人、拉丁人、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来自所有基督教国家的人”[7]。总之是种族混杂、信仰各异，而且装备也五花八门：有的人拿着弓箭、弹弓或火枪，但大多数人只有简单的弯刀和盾牌。这绝不是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大的作战部队，但穆罕默德二世的目标就是利用这些死不足惜的异教徒来消耗守军的力量，然后才向杀戮地带投入价值更高的部队。第一波部队从城墙北端前来，携带着云梯，准备沿着中墙全线发动进攻，特别重点进攻临时壁垒。成千上万人在黑暗中等待进攻的命令。

凌晨1点30分，号角、战鼓和铙钹齐鸣，宣告攻势开始。大炮开始轰鸣，奥斯曼军队从四面八方水陆并进。非正规部队接到了严格命令，必须稳步前进，不得喧哗。进入射程之后，他们开始射击，“弓箭手、弹弓手开始发威，大炮和火绳枪射出铁制或铅制弹丸”。在第二道命令发出之后，他们向前狂奔，跑过被填平的壕沟，一边大呼小叫，一边“手执标枪、长枪和长矛”冲向城墙。守军早已严阵以待。非正规部队尝试爬墙的时候，基督徒们把他们的云梯推开，向工事脚下拼命攀爬的敌人投掷火把、倾倒滚油。在黑暗和混乱中，只能看到不甚明亮的手执火把的闪光，听到“狂喊乱叫、亵渎神明的辱骂和诅咒声”[8]。朱斯蒂尼亚尼调集了他的人马，皇帝亲临战场也让大家斗志为之一振。守军占了上风，他们“从城垛上往下投掷大石块”，向队形密集的敌群射箭和开枪，“很少有人能逃生”[9]。跟进的奥斯曼士兵开始动摇和后撤。但穆罕默德二世决心要把他的非正规部队用到极限。他在后方部署了一队宪兵作为督战队，他们用棍棒和皮鞭把后退的士兵驱赶向前。在宪兵的背后还有一队手执弯刀的近卫军，随时准备砍倒冲过了宪兵拦截线的人。悲惨的非正规士兵们被夹在前方的火力和背后的持续压力之间，发出了恐怖的呼号，“他们无论向前还是退后都是死路一条”。他们再次转身去进攻工事，顶着劈头盖脸的火力，绝望地拼命树立起自己的云梯，却惨遭屠戮。这些死不足惜的人虽然死伤惨重，但已经达到了苏丹的目的。两个小时内，他们大大消耗了城墙上守军的体力。这时穆罕默德二世才允

许幸存者撤退、一瘸一拐地返回自己的战线。

战斗出现了一个间歇。此时是凌晨3点30分，天色仍然漆黑，但火光照亮了平原。在壁垒上，人们舒了一口气。他们获得了重组部队和抢修城墙的时间。在战线的其他地段，奥斯曼非正规部队的攻击没有这么猛烈；仍然完好的城墙令他们举步维艰。其他地段的进攻主要是牵制性的，让守军在前线都忙得不可开交，无法去接替在中墙承受极大压力的部队。守军兵力部署非常稀薄，在1英里外的使徒教堂附近的中央山岭上待命的预备队已经只剩300人。城墙上的人们向平原眺望，徒劳地希望敌人会到此为止、撤退下去，但敌人终究不会撤退。

猛力攻城的时刻到了。穆罕默德二世骑马来到他右翼的安纳托利亚部队，就在圣罗曼努斯门外不远处。这些部队是装备精良的重步兵，身披链甲，作战经验丰富，纪律严明，而且充满穆斯林的圣战热情。他虽然年仅21岁，但作为苏丹，完全可以用这样平白的父亲式口吻向部落子民讲话："前进，我的朋友和孩子们！证明你们是英雄好汉的时刻到了！"[10] 他们沿着山谷边缘前进，转身面对壁垒，以密集队形逼近，"令人胆寒地呼喊着"[11] 安拉之名。根据尼科洛·巴尔巴罗的记载，他们"就像被解开锁链的雄狮一般冲向城墙"[12] 。这坚定的冲锋让守军高度紧张起来。全城教堂的钟声此起彼伏，召唤所有人到作战岗位上去。很多市民跑到城墙上去帮忙。其他人则在教堂内更加努力地祈祷。3英里外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外，教士们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提供支持。"他们听到钟声后，取出了圣像，走到教堂前，站在那里祷告，用十字架向全城祝福；他们热泪盈眶地诵读着：'复活我们，天主，佑助我们，免得我们最终毁灭。'"[13]

安纳托利亚士兵奔跑着越过了壕沟，以紧密队形向前猛冲。守军用弩弓和火炮向他们猛烈射击，"杀死的土耳其人不计其数"[14] 。但他们仍然继续推进，用盾牌抵挡冰雹般的石块和投射武器，努力强行冲到壁

垒上。“我们向他们投掷致命的投射武器，”莱奥纳德大主教写道，“向他们的紧密人群中发射弩箭。”[15] 安纳托利亚部队毕竟人多势众，成功地在壁垒上搭起了云梯。守军又把云梯推倒，很多攻击者被石块砸死，或者被滚烫的沥青烧死烧伤。有一阵子奥斯曼军队开始后撤，但很快又冲杀上来。壁垒后的守军被敌人的勇猛震惊了，这些敌人似乎被一种超越人类极限的力量驱使着拼命冲杀。这些士兵显然不需要额外的激励，按照巴尔巴罗的说法，他们“全都是勇士”[16] 。“他们不断高声呐喊，更加急切地展开自己的大旗。你看到这样的野兽一定会无比震惊！他们的部队已经大部被歼，但他们仍然带着无限的勇气继续向壕沟冲锋。”[17] 安纳托利亚部队人数太多，而且地上死尸遍地，因此每一波攻击都受到了很大阻碍。士兵们互相踩踏，在其他人身上爬行，形成一个人肉金字塔，拼命想爬到壁垒的顶端。有些人爬上了壁垒，向敌人疯狂地砍杀。泥土平台上爆发了肉搏战，人们互相残杀。那里空间狭窄，安纳托利亚士兵是能够击退守军，还是被抛下壁垒，取决于身体的撞击和近距离的厮杀。在壁垒脚下，人们跌跌撞撞地乱爬，呼喊着，诅咒着。遍地是死尸和垂死的人，到处都是被抛弃的武器、头盔、头巾和盾牌。

战局瞬息万变。“有时奥斯曼重步兵爬上了城墙和壁垒，硬往前挤，毫不动摇。有时他们又被凶猛地打退。”[18] 穆罕默德二世骑马亲临前沿，呼喊着督促他们上前，有时向狭窄的缺口投入更多生力部队，以接替战死和动摇的人。他命令大炮开火。一轮轮石弹锤击着城墙，将守军和安纳托利亚士兵都打倒在地。在这个夏日的凌晨，周围一片黑暗，乱作一团，战斗的嘈杂震耳欲聋，战鼓、笛子、铙钹、教堂钟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再加上羽箭掠过的嗖嗖声、奥斯曼大炮震动大地的巨响和火枪的低沉轰鸣声，“似乎空气都被撕裂了”[19] 。刀剑狠狠地碰撞在盾牌上，发出脆响；刀锋割断喉管、箭头插入胸膛、铅弹打碎肋骨、石块砸扁头颅时的声音则低沉许多。在这些声音的背后还有更可怕的嘈杂的说话声：祈祷和战斗呐喊、鼓励的话语、诅咒、嚎叫、抽噎和濒死者的轻轻呻吟。狼烟和灰尘从前线飘过。奥斯曼士兵们充满希望地将伊斯

兰旗帜在黑暗中高高举起。手持的火把冒着烟，火光照亮了布满胡须的脸庞和甲胄。大炮开火的几秒钟内，火光一下子照亮了炮手们的身形。火枪发出的较小的火舌狠狠地撕裂夜幕；成桶的希腊火呈一个弧线越过城墙，如同金雨一般泼洒而下。

黎明前的一个小时，一门大炮发射的石弹直接命中了临时壁垒，打开了一个缺口。烟尘和大炮的硝烟遮蔽了前线，但安纳托利亚士兵迅速做出反应，冲进了突破口。守军还没来得及反应，300名士兵已经冲了进去。奥斯曼军队第一次突破了守军阵地。里面杀得昏天暗地。守军绝望地重新集结，在两道城墙之间的狭窄空间内直面安纳托利亚人。显然，突破口还没大到让一大群人涌入的地步，所以300名攻击者很快被包围起来。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有条不紊地把他们全都砍成肉酱。这300人无一生还。这个局部胜利令守军士气大振，他们把安纳托利亚部队击退了。奥斯曼军队感到沮丧，第一次发生了动摇，开始撤退。这时已经是早上5点30分。守军已经一刻不停地苦战了四个钟头。

到此时为止，在其他地段，奥斯曼军队也未能取得很大进展。在金角湾内，扎甘帕夏在夜间成功架起了浮桥，不少士兵通过浮桥抵达了陆墙末端附近的海岸。与此同时，他把轻型桨帆船调到城墙近处，让船上的弓箭手和火枪兵扫射城墙上的守军。他还把云梯和木制攻城塔送到这些城墙下，试着让他的步兵爬城，但是失败了。哈利勒在马尔马拉海岸边的登陆作战同样失败了。海流湍急，船只无法停稳，再加上海墙居高临下，俯视海面，所以没有前滩能够建立桥头阵地。尽管这里的城墙守军人数稀少，有些地段只有僧侣防守，但登陆部队还是被轻易地击退或俘虏并斩首。在中墙以南，伊沙克帕夏对守军施加了一些压力，但他最精锐的安纳托利亚部队被调走去对付临时壁垒去了。在布雷契耐皇宫区域（穆罕默德二世早就认定从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入城），卡拉加帕夏的部下发动了一次对守军威胁很大的进攻。“此处的防御摇摇欲坠”[20]，因为城墙破损严重。但负责防守此处的是来自热那亚的博基亚尔多三兄

弟，他们都是本领高强的职业军人。据莱奥纳德大主教记载，“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无论被炮火炸塌的城墙还是炮弹的爆炸，都吓不倒他们……不分昼夜，他们始终高度警惕，用弩弓和可怕的火炮杀伐敌人”[21]。有时他们会从竞技场门这个边门出击，袭扰敌人。卡拉加的部下没能取得任何进展。圣马可的雄狮旗仍然飘荡在黑暗笼罩下的皇宫的上方。

激战四个小时，非正规部队和安纳托利亚部队都失败了，这似乎让穆罕默德二世非常恼火。不仅是恼火，他还非常焦虑。他只剩下一支生力部队了，那就是他自己的5000名精锐卫队，“这些士兵装备极其精良，英勇无畏，比其他人经验丰富得多，也更勇猛。他们是陆军的精锐：重步兵、弓箭手和长枪兵，以及被称为近卫军的部队”[22]。他决定在敌人得到喘息之机、进行重组之前，立即把这支部队投入战场。一切都取决于这次行动；如果连他们也不能在几个小时内突破防线，战役的势头就丧失了，精疲力竭的部队将不得不撤退，围城战就算结束了。

在两道城墙之间的阵地上，守军没有任何停歇的时间。敌人的第二波攻击造成的伤亡更为严重，守军也越来越疲惫。但抵抗的斗志仍然很坚定。据克利托布罗斯说，他们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饥饿、睡眠缺乏、持续不断的战斗、伤痛和残杀、亲人在自己眼前死去或是其他任何恐怖景象，都不能让他们屈服，或者削弱他们的积极性和使命感。”[23]事实上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死战到底；没有任何人接替他们，因为没有其他部队。但意大利人在朱斯蒂尼亚尼指挥下奋战，希腊人在皇帝的注视下拼杀，这两位领袖对部队的感召力就像苏丹对奥斯曼军队那样。

穆罕默德二世知道，在攻势停顿之前，他必须趁热打铁。领军饷的士兵们奋勇作战、报效苏丹的时刻到了。他骑马向前冲，催促士兵们证明自己是英雄好汉。明确的命令发布了出去，穆罕默德二世亲自率领士

兵们稳步推进到壕沟边上。此时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但星光已经昏暗，“黑夜逐渐让位于黎明”[24]。他们在壕沟前停下。在那里，他命令“弓箭手、弹弓手和火枪兵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向守卫壁垒和破损外墙的守军士兵射击”[25]。烈火的风暴席卷城墙。“枪弹和羽箭数不胜数，遮蔽了天空。”[26]“箭雨和雪花般的其他投射武器”[27]迫使守军低头躲在壁垒后。另一个讯号发出后，奥斯曼步兵“发出响亮而恐怖的呐喊”，开始前进，“不像土耳其人，倒像是雄狮”[28]。他们在震天的鼓乐和呐喊声驱使下冲向壁垒。这声音是奥斯曼军队的终极心理战武器，震耳欲聋，甚至远在亚洲海岸（离他们的军营5英里）的人也能听得见。战鼓和笛子齐鸣，军官们发出呼喊和指令，大炮雷鸣般巨响，士兵们自己也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这些声音既鼓舞了他们自己的勇气，也震撼了敌人的神经，都收到了预想的效果。“他们大声呼喊着，夺走了我们的勇气，在全城散布了恐惧。”[29]巴尔巴罗如此写道。在全长4英里的陆墙全线，奥斯曼人同时发动了排山倒海的进攻。城内教堂再一次敲响警钟，非战斗人员加紧祈祷。

重步兵和近卫军“求战心切，而且状态极佳”[30]。他们在苏丹的注视下作战，既是为了荣耀，也是为了争夺第一个登上城墙的功勋。他们坚定不移地向壁垒进发，毫不犹豫，“似乎一心要进城”[31]，心意已决。他们用带钩的木棍拆掉壁垒顶端的木桶和木制炮塔，挖掘壁垒的框架，树立云梯，将盾牌举在头顶上，借此抵挡暴风骤雨般的石块和投射武器，同时努力往上爬。他们的军官站在后面，呼喊着发布命令。苏丹本人策马走来走去，喊叫着激励大家。

在他们的对面，疲惫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再一次投入战斗。朱斯蒂尼亚尼和他的部下，以及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全体贵族、主要骑士和最勇敢的武士”[32]，手执“标枪、长枪、长矛和其他兵器”[33]向壁垒推进。第一批奥斯曼宫廷卫队士兵“遭到石块的打击，倒了下去，很多人当场毙命”[34]，但其他人冲上来接替他们。没有人动摇。很快，为了

争夺壁垒，双方展开了面对面的肉搏战，各自都意志坚定：一方是为了荣誉、真主和重赏，另一方则是为了上帝和生存。在拥挤的近距离搏斗中，可怕的呼喊声此起彼伏，“他们互相嘲讽，有的人用长矛戳刺，有的人被戳，有人杀死敌人，有的被杀死，人们在怒火中互相残杀，场面极其恐怖”[35]。在后面，大炮在发射巨型炮弹，硝烟弥漫了整个战场，有时遮蔽双方士兵的视线，有时又让他们直面对方。巴尔巴罗记载道：“这景象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36]

战斗持续了一个钟头，奥斯曼宫廷卫队进展甚微。守军寸土不让。“我们凶猛地打退了他们，”莱奥纳德记述道，“但我们的很多人现在负了伤，撤出了战斗。然而我们的指挥官朱斯蒂尼亚尼仍然屹立，其他指挥官也坚守着岗位。”[37]这时出现了一个迹象，起初还很难察觉，然后壁垒内的守军感到奥斯曼军队施加的压力轻了一点。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扭转战局的瞬间。君士坦丁十一世把握住了这个机遇，敦促守军前进。根据莱奥纳德的记载，皇帝向士兵们喊道：“勇士们，敌人的军队正在削弱，胜利的冠冕属于我们。上帝站在我们这边，继续战斗！”[38]奥斯曼军队站不住脚，退却了。疲惫的守军找到了新的力量。

但这时发生了两件奇怪的事情，再一次扭转了战局。在战线北面半英里处，朝向布雷契耐皇宫的阵地，博基亚尔多兄弟在此之前成功地打退了卡拉加帕夏的部队，还不时地从竞技场门（隐藏在城墙一个拐弯角落里的边门）出击。这座城门将应验古老的预言。一名意大利士兵出击归来之后，忘了把背后的边门关上。天色越来越亮，卡拉加的一些士兵看到了这座敞开的城门，蜂拥而入。50名士兵通过阶梯冲上了城墙，把那里的守军打得措手不及。有些士兵被砍死，其他人则选择跳墙自杀。随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太清楚。冲进城的奥斯曼士兵似乎没有来得及造成很大破坏，就被守军成功地隔绝和包围了起来，但他们已经从一些塔楼上扯下了圣马可的旗帜和皇旗，换上了奥斯曼旗帜。

在南面的临时壁垒处，君士坦丁十一世和朱斯蒂尼亚尼不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他们仍然自信满怀地坚守战线，这时噩运带来了更严重的打击。朱斯蒂尼亚尼再次负伤。对基督徒来说，这是因为上帝拒绝听取他们的祈祷；对穆斯林来说，这是真主听到了他们的祈祷。对爱读书的希腊人来说，这个瞬间简直是从荷马史诗里照搬来的：按照克利托布罗斯的说法，“邪恶而无情的命运”[39] 导致了战局突然逆转，平静而无情的女神带着奥林匹斯诸神的冷漠与超然观战，这时决定拨动战争的天平，将英雄击倒在地，让他的心脏化为齑粉。

当时情况究竟如何，大家众说纷纭，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的热那亚士兵在那一瞬间惊恐万状。至于随后发生的事情，各方面的记述非常支离破碎和不一致：朱斯蒂尼亚尼“身披阿喀琉斯的铠甲”，受伤倒地的具体状况有十几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的右腿中箭；有人说他胸部被弩箭射中；或者说他在城墙上搏斗的时候腹部被人从下方刺中；又或者一发铅弹击穿了他的手臂后部，又穿透了他的胸甲；或者他的肩部被火枪击中；还有人说，一名友军从背后误伤了他，或者是故意刺杀他。最可能的情况是，他的上半身护甲被铅弹击穿，微小的伤口隐蔽了严重的内伤。

自围城战开始以来，朱斯蒂尼亚尼就在一刻不停地奋战，无疑已经筋疲力尽。他在前一天已经负了一次伤，第二次负伤似乎让他的精神彻底垮了。他站不住脚，伤势远比旁观者能察觉的情况要严重，于是命令士兵将他抬回到船上，接受医治。他们去找皇帝，向他索要其中一座城门的钥匙。君士坦丁十一世知道他的主要指挥官撤离将会带来多么大的危险，恳求朱斯蒂尼亚尼和他的军官们留在前线，直到危险过去，但他们不肯久留。朱斯蒂尼亚尼把指挥权交给两名军官，并许诺处理完伤口就回来。君士坦丁十一世不情愿地交出了钥匙。城门被打开了，朱斯蒂尼亚尼的卫兵们抬着他，来到他的停泊在金角湾的桨帆船上。这是个灾难性的决定。敞开的城门对其他热那亚人来说是个无法抵制的诱惑；他

们看到指挥官已经撤离，潮水般涌过城门，也跟着撤退了。

君士坦丁十一世和他的扈从绝望地努力拦阻这人流。他们不准任何希腊人跟着意大利人离开阵地，命令他们排好队形，上前去堵住战线的缺口。穆罕默德二世似乎感受到了守军的松弛，集中兵力发动了又一次进攻。“朋友们，我们必胜！”他大喊道，“再努力一点，城市就是我们的啦！”[40]

一群近卫军在穆罕默德二世最宠信的军官之一贾费尔贝伊率领下，高呼“真主伟大！”，向前猛冲。苏丹向他们呼喊着：“冲啊，我的雄鹰们！前进，我的雄狮们！”他们听到苏丹本人的激励，又记起了在城墙上首先插旗能够得到的重赏，便奋不顾身地冲向临时壁垒。在前线有个名叫乌鲁巴特的哈桑的巨人，他高举奥斯曼大旗，在30名战友护卫下前进。他用盾牌遮住自己的脑袋，冲上了壁垒，击退动摇的守军，稳稳站立在壁垒顶端。他站在那里，高举大旗，鼓舞近卫军士兵们前进。他在那里坚持了一会儿。这位近卫军的巨人终于把伊斯兰的旗帜插到了基督教城市的城墙上，这是彰显奥斯曼人勇气的激动人心的一刻，注定要成为奥斯曼帝国神话的一部分。但没过多久，守军重整旗鼓，猛烈地投射石块、羽箭和长矛，进行报复。他们打退了那30名士兵中的一部分人，然后把哈桑团团围住，把他打倒在地，剁成肉泥。但在周围，越来越多的近卫军士兵爬上了城墙，或者从壁垒的缺口冲了进去。成千上万人就像冲垮堤岸的洪水一般，开始涌入守军的阵地，凭借兵力优势无情地将守军击退。很快，守军就被推向内墙。内墙前方有一条壕沟，是挖土修建壁垒形成的。有些人被推进壕沟，困在那里。他们没法爬出来，全部惨遭屠戮。

奥斯曼军队沿着不断扩大的战线潮水般涌入守军阵地。守军从壁垒上轰击他们，很多奥斯曼士兵被打死，但此时这股洪流已经不可阻挡。据巴尔巴罗说，15分钟内就有3万人冲进了守军阵地，“发出令人毛骨悚

然的呼喊，如同地狱一般”[41]。同时，人们看见竞技场门附近塔楼上的奥斯曼旗帜（少数奥斯曼士兵冲到那里，插上了他们的旗帜），大喊起来：“城市失守了！”守军完全陷入了盲目的恐慌。他们仓皇失措，转身逃跑，寻找道路逃离封闭的阵地，返回城内。与此同时，穆罕默德二世的士兵们已经开始攀爬内墙，从高处向逃窜的守军射击。

可供逃跑的道路只有一条：朱斯蒂尼亚尼撤离时经过的那座小小的边门。其他门都仍然紧锁着。溃败的守军争先恐后地聚集到边门处，个个都想赶紧逃命，互相踩踏，“门前的活人堆成了一座小山，导致大家谁也逃不掉”[42]。有些人不慎跌倒，被活活踩死。其他人则被从壁垒处以整齐队形横扫过来的奥斯曼重步兵屠杀。死尸堆积成山，更是把逃命的道路堵死。从壁垒上幸存下来的守军被斩尽杀绝。其他的每一座城门——查瑞休斯门、第五军用城门——同样是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因为逃到那里的人也没办法逃离封闭的阵地。在这场令人窒息、惊慌失措、拼命挣扎的混战中，有人最后一次瞥见了君士坦丁十一世的身影，他最忠诚的随从仍然护卫在他身边：西奥菲勒斯·帕里奥洛格斯、约翰·达尔马塔、堂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根据一位不可靠目击者（几乎可以肯定，此人当时并不在场）的描述，皇帝在最后的时刻仍然奋起拼搏，最后倒地，被人群踩踏在脚下，终于从历史中消逝，进入传奇的来世。

一队近卫军爬过死尸堆，强行打开了第五军用门。他们进入城内，一部分人转向左侧的查瑞休斯门，从内部将它打开；其他人向右前进，打开了圣罗曼努斯门。一座座塔楼接二连三地飘扬起了奥斯曼旗帜。“然后大军的其他士兵凶猛地冲进城……苏丹站在宏伟的城墙前（他的大纛和马尾旗就树立在那里）观看着周遭的景象。”[43]这时天已经亮了。太阳冉冉升起。奥斯曼士兵在死人堆之间前进，砍下死人和濒死者的头颅。大型猛禽在他们头顶上盘旋。不到五个小时的时间，君士坦丁堡的防御就土崩瓦解了。

[1] 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2 vols.，trans. Franz Rosenthal，London，1958，p.67

[2] Kritovoulos，（in English）*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trans. Charles T. Riggs，Westport，1970，p.62

[3] 此处“罗马人”是拜占庭人的自称，因为他们一直以罗马帝国自居，尽管他们主要是希腊血统。

[4]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83

[5]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42

[6]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30

[7]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1823，p.16

[8]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66

[9] Barbaro，Nicolo，（in English）*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rans. J. R. Melville Jones，New York，1969，p.62

[10]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67

[11] Kritovoulos，（in English）*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trans. Charles T. Riggs，Westport，1970，p.67

[12]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52

[13]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60

[14]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52

[15]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

1823，p.60

[16]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67

[17]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1823，p.60

[18]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67

[19]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53

[20]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1823，p.40

[21]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1823，p.40

[22]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68

[23]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68

[24]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158

[25]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68

[26]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1972，p.7

[27]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68

[28]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53

[29]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53

[30]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53

[31]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53

[32]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53

[33]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68

[34]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160

[35]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69

[36]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53

[37]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 1 vols.，Milan，1976，p.161

[38]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 Paris，1823，p.44

[39]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68

[40]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70

[41]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54

[42]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 Amsterdam，1972，p.50

[43]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 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70

15.一捧尘土

1453年5月29日早上6点



> 请告诉我，世界末日究竟是何时，又将是何等情形？人们如何才能知道，末日已经临近，已经到了门槛上？末日将有哪些迹象？这城市、新耶路撒冷将往何处去？屹立于此的神圣教堂、受尊崇的圣像、圣徒的遗迹和书籍都将何去何从？请告诉我。[1]
>
> ——埃皮法尼奥斯，10世纪的东正教僧人，如此询问圣愚安得烈[2]

奥斯曼军队潮水般涌入城市，他们的旗帜飘扬在塔楼上的时候，市民们陷入了莫大的恐慌。“城市陷落了！”的呼喊声在大街小巷此起彼伏。人们开始四散逃命。在竞技场门附近城墙驻守的博基亚尔多兄弟看到士兵们从他们的阵地旁逃过。他们纵身上马，向敌人冲杀，暂时把敌人打退了。但他们很快也认识到了局势的无望。壁垒上的奥斯曼士兵居高临下地向他们投掷武器，保罗·博基亚尔多头部负伤。他们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会被包围。保罗不幸被俘，后来被杀害，但他的两个兄弟杀出了一条血路，带领他们的人马返回了金角湾。在港口处，受伤的朱斯蒂尼亚尼得知防线已经崩溃，于是“命令他的喇叭手吹响讯号，召集他的部下”[3]。对其他人来说，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威尼斯市政官米诺托、很多显赫的威尼斯人以及离开桨帆船参战的水手们被包围在布雷契

耐宫，全部被俘虏。在陆墙南段接近马尔马拉海的地方，防御还很顽强，但那里的守军士兵很快发现自己腹背受敌。很多人被杀死；其他人，包括指挥官菲利普·孔塔里尼和德米特里·坎塔库泽努斯，都举手投降，被敌人俘虏。

一眨眼的工夫，全城就乱成了一锅粥。前线的瓦解如此惊心动魄又出人意料，很多人都手足无措。从陆墙逃走的部分士兵奔向金角湾，希望能登上那里的船只，其他人则跑向前线。一些平民被战斗的嘈杂声惊醒，主动前往城墙，去帮助部队防守，途中遭遇了第一波冲进城来、沿途烧杀抢掠的奥斯曼士兵。这些奥斯曼士兵“暴跳如雷地攻击他们”[4]，把他们全部砍倒。最初引发屠城的是奥斯曼士兵对拜占庭人的畏惧和仇恨。他们一下子身处迷宫般的狭窄小巷内，非常迷惑糊涂和惴惴不安。他们原本期待会遇到一支顽强抵抗的大军，而绝不会相信，在临时壁垒处被击溃的2000人居然就是全部守军。与此同时，一连好多周的苦难以及希腊人从城垛上发出的嘲讽让奥斯曼人对敌人恨之入骨。君士坦丁堡曾经拒绝投降，现在必须付出代价了。奥斯曼人的大肆屠戮起初“是为了制造普遍的恐怖气氛”[5]。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他们手执弯刀，见人就杀，不管男女老幼、健康或是伤残”[6]。有些市民进行了顽强抵抗，“从高处向他们抛掷砖块和铺路石……向他们投掷火把”[7]，这可能愈发激怒了奥斯曼人。大街上血流满地，走路都打滑。

陆墙的高高塔楼上飘扬的苏丹大旗把破城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奥斯曼全军。在金角湾沿岸，守军开始逃窜，奥斯曼舰队加紧攻城，水手们将海墙上的一座又一座城门强行打开。很快，邻近威尼斯人住宅区的普拉泰亚门就被打开了，奥斯曼人的队伍开始深入城市中心。在海岸更远方，哈姆扎贝伊和马尔马拉海上的舰队也得到了消息。急于进城掳掠的水手们把战船重新开到岸边，在海墙上搭起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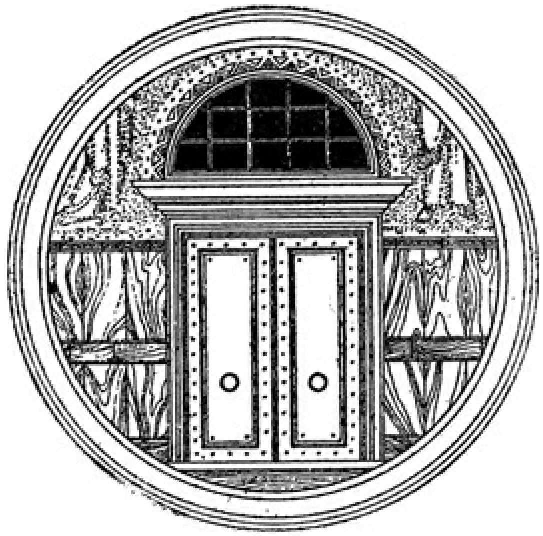
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奥斯曼人进行了无区别的恣意屠杀。据哈尔

科孔蒂利斯记载，“全城各处如同屠场，大开杀戒，死尸遍地”[8]。张皇失措的人们各投生路、寻求自保。意大利人逃往金角湾，登上船只，而希腊人则逃回家中，保护自己的妻小。有些人在半途被俘，还有人好不容易跑回家中，却发现“妻儿已经被绑架，财物被洗劫一空”。还有的人回家之后，“自己也被俘虏，和亲友妻子一起被捆缚起来、戴上镣铐”[9]。还有很多人抢在入侵者之前回到家中，意识到投降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于是决定死战到底，保护家人。有人躲藏在地下室和蓄水池内，或者稀里糊涂地在城里游荡，等待被俘或者被杀。在金角湾附近的狄奥多西娅教堂的景象特别催人泪下。这一天恰好是圣狄奥多西娅的瞻礼日，对这位圣徒的尊崇礼拜仪式在几百年的热诚信仰中被忠实地传承了下来。教堂的正面装点着初夏的玫瑰。在教堂内的圣徒墓穴处，信徒们按照传统通宵守夜，烛光在短暂的夏夜中闪烁。第二天清晨，信徒的游行队伍向教堂走去，盲目地信任祈祷的神奇力量。他们携带着传统规定的礼物——“装饰华美的蜡烛和神香”[10]前往教堂，在路上被奥斯曼士兵拦住并掳走。全体信徒一个也没能逃脱。拥有祈祷者供奉的大量许愿财物的教堂也横遭掳掠。圣狄奥多西娅的骨骸被丢给了野狗。在城内其他地方，很多妇女一觉醒来，发现入侵者闯入了她们的闺房。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奥斯曼军队认识到了真相——城内已经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于是他们的屠杀变得更有针对性和选择性。根据萨阿德丁的记载，奥斯曼士兵遵循了教法的训令：“屠戮他们的老人，俘虏他们的青年。”[11]现在的重点改为活捉俘虏，作为战利品。他们开始捕猎有价值的奴隶：年轻女人、美丽的儿童。“民族、风俗和语言”[12]五花八门的非正规部队（包括基督徒）冲在最前面，“烧杀抢掠、疯狂破坏、恣意侮辱，俘虏和奴役各色人等，不分男女老少，甚至包括教士和僧侣”[13]。对奥斯曼军队暴行的记述大多是基督徒写下的，奥斯曼史学家的描写比较隐晦，但毫无疑问，在这一天上午，君士坦丁堡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史料中包含了一系列生动的记载，甚至总体倾向于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作家克利托布罗斯也描绘了“恐怖、凄惨、超过任何悲剧的

惨景”[14]。妇女们被“凶暴地从卧室拖走”；儿童被从父母身边夺走；无力逃跑的老人以及“智障、麻风病人和体弱的人”惨遭“无情的屠杀”[15]。“新生婴儿被扔到广场上。”[16]妇女和男童遭到强暴。奥斯曼人将形形色色的成群俘虏捆成一串，“野蛮地拖走，对其大肆驱赶、厮打、羞辱、推搡，丑恶可耻地将他们驱赶到十字路口，不断侮辱和虐待他们”[17]。幸存者，尤其是“出身贵族富户、品行端正、习惯于足不出户而不抛头露面的年轻女子”[18]遭受的恐怖和折磨是无法想象的。有些少女和已婚女子不愿遭受这样的凌辱，宁愿投井自尽。为了争夺最美丽的少女，奥斯曼士兵发生了争斗，有人因此毙命。

奥斯曼人特别注意教堂和修道院。邻近陆墙的那些教堂或修道院，比如查瑞休斯门旁的圣乔治军用教堂、佩特拉的施洗者圣约翰教堂和科拉修道院，很快就被洗劫一空。被认为具有神力的指路圣母像被砍成四截，分给士兵们，因为它的框架非常值钱。教堂房顶上的十字架被砸倒；士兵们打开了圣徒墓穴，去寻找财物，墓穴内的骨骸被撕成碎片、丢弃到大街上。教堂的财物（圣餐杯、高脚杯，以及“神圣的工艺品和绣有金线、装饰着宝石与珍珠的珍贵而华美的长袍”[19]）全被抢走，贵金属制品被熔化。祭坛被拆毁，“为了寻找黄金……教堂和圣殿的墙壁被搜了个遍”[20]。据莱奥纳德说，“奥斯曼人在圣徒像前强暴妇女”[21]。奥斯曼人冲进女修道院，将修女们“掳到舰队那里，恣意蹂躏”[22]。僧侣们被杀死在各自的房间内，“在教堂内避难的僧侣被拖出去赶走，受尽种种羞辱”。奥斯曼人用铁棒撬开历代皇帝的墓穴，寻找隐藏的黄金。“暴行种种，不一而足。”[23]克利托布罗斯悲哀地记载道。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延续1000年的基督教君士坦丁堡大体上就无迹可寻了。



圣索菲亚教堂之门

在这股汹涌洪流面前，拜占庭人手足无措，还有能力逃跑的人都想方设法逃走。很多人在本能和迷信的驱动下奔向圣索菲亚大教堂。他们记起了那古老的预言：敌人顶多能前进到君士坦丁大帝的柱廊前，也就是大教堂附近，复仇天使就会手执利剑，从天而降，激励城市守军将敌人赶出城市，从“西方世界和安纳托利亚驱逐出去，一直驱赶到波斯边境上一个叫做红苹果树的地方”[24]。在教堂内，大群教士、信徒（包括妇女儿童）聚集起来，准备做晨祷，将自己的命运完全托付给上帝。教堂的巨型青铜门被紧闭起来，并插上门闩。这时是早上8点。

城市的某些外围城区得以与敌人协商，进行集体投降。到15世纪中叶，由于君士坦丁堡外墙之内的人口急剧下降，城市的某些区域已经发展成了单独的村庄，各自有自己的城墙和木栅。其中的有些村庄，例如马尔马拉海边上的斯图狄翁和金角湾附近的渔村佩特里翁，主动献城投降，条件是奥斯曼人不得劫掠他们的住宅。每个村庄的村长被带去苏丹面前，正式投降。穆罕默德二世可能会派遣一队宪兵去保护这些村庄。根据伊斯兰的战争法则，敌人如此投降之后应当受到保护，因此一些教堂和修道院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在其他地方，仍然有小股守军进行了英勇或者说是绝望的抵抗。在金角湾沿岸，一群克里特水手顽强

地据守三座塔楼，拒不投降。整整一个上午，他们都在抵抗试图驱逐他们的奥斯曼士兵。在远离陆墙的海墙上，很多人仍然在继续战斗，他们往往对真实局势一无所知，直到敌人突然从他们背后杀出。有些守军跳墙自杀，其他人则无条件投降。觊觎奥斯曼皇位的奥尔汗王子和他麾下的一小群土耳其人就没有任何选择了，他们只能死战到底。驻扎在牛狮宫 [25] 附近海墙上的加泰罗尼亚人也战斗到了最后一息。

在逐渐展开的屠城和劫掠中，奥斯曼水手们做出了一个关系重大的决定。他们看到陆军已经杀进城，害怕自己会失去抢劫的机会，于是把船开到岸边，弃船进城，“去搜寻黄金、珠宝和其他财物” [26] 。他们急着登上金角湾的海岸，对从城墙迎面逃窜而来的意大利人视而不见。这对败退的意大利人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奥斯曼人在搜寻战利品的过程中越来越疯狂。金角湾岸边的犹太人区很早就被盯上，因为这里是传统的珠宝交易地；意大利商人也是被奥斯曼人高度“青睐”的目标。战利品的搜集渐渐变得更有组织。进入某座房屋的第一批士兵会在屋外竖起旗帜，表示这座房子已经被洗劫一空。其他士兵看到这旗帜，就会去其他地方寻找。“就这样，他们到处插旗，甚至修道院和教堂上也有。” [27] 士兵们分成若干组，将俘虏和战利品运回营地或船上，然后回来继续抢劫。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幸免：“教堂、古老的地下墓穴和墓地、修道院、地下室、密室、墙壁裂缝和大小洞穴。他们还搜索了所有的隐藏角落，如果里面藏着人或者什么东西，就全都拖出来。” [28] 甚至有人偷窃堆放在军营、无人看管的战利品。

与此同时，生存斗争仍然在继续。在上午，几百名市民吉星高照，得以逃生。基辅红衣主教伊西多尔在仆人的帮助下，脱掉了自己富丽堂皇的主教袍，换上了一名阵亡士兵的衣服，又给这名死者穿上自己的主教袍。奥斯曼士兵很快遇见了这具身着主教袍的尸体，砍下头颅，举着它在大街上胜利游行。年迈的伊西多尔也很快被俘，但敌人不知道他的

高贵身份，而且他年老体衰，似乎不值得贩卖为奴。于是他当场花了一小笔钱，赎回了自己的自由，登上了停泊在港内的一艘意大利船只。奥尔汗王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身穿普通士兵的衣服，而且会讲流利的希腊语，希望能够从海墙蒙混过关。但奥斯曼人认出了他，追了上去。他觉得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跳墙自杀。士兵们砍下了他的头颅，献给了穆罕默德二世。苏丹一直在如坐针毡地等待关于奥尔汗王子命运的消息。其他的主要贵族则被活捉。卢卡斯·诺塔拉斯和他的家人都被俘虏，可能是在他们的宫殿内被抓住的。乔治·斯弗朗齐斯和他的全家也被俘虏了。曾领导反对联合派的僧侣真纳迪奥斯在自己房间被抓获。加泰罗尼亚人一直坚持抵抗，直到全部阵亡或被俘。但奥斯曼人无法将死守金角湾附近塔楼的克里特人逐出。最后有人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穆罕默德二世。他做出了一个典型的堂吉诃德式的侠义姿态，允许他们乘坐自己的船只离去。犹豫一番之后，他们接受了这个提议，自由地逃离了君士坦丁堡。

对很多人来说，金角湾似乎是逃生机遇最多的地方。上午，成百上千的拜占庭士兵和平民潮水般涌过狭窄小巷，希望能登上停泊在港内的意大利船只。海墙大门处一片狼藉，乱成了一锅粥。很多人拼命逃窜，跳上拥挤的划桨船，导致船只倾覆沉没，船上的人都被淹死。有些守门人的决定更使得这悲剧场面愈发凄惨。他们看到自己的希腊同胞逃向海滩，又记起了那个预言（在君士坦丁大帝雕像处能够击退敌人），于是决定把门封闭，希望能够借此劝说同胞们回去作战。于是他们从城墙顶端丢弃了城门钥匙，阻止难民逃跑。抵达停泊在岸边的意大利桨帆船的途径已经彻底断绝，海岸上的景象越来越悲惨。“不分男女，甚至僧侣和修女都号啕大哭起来，捶胸顿足，哀求意大利人的船只来救他们。”[29] 但桨帆船上的人也是惊慌失措，船长们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前线崩溃两个小时之后，佛罗伦萨商人贾科莫·特塔尔迪逃到了岸边，此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游泳去登船，要么坐等“土耳其人的狂暴”。他宁愿冒淹死的风险，于是脱去衣服，游向船只，被拉上了船。他来得正

巧。回头望去，只见大约40名拜占庭士兵正在脱去铠甲，准备泅渡逃生，却被奥斯曼军队抓个正着。“愿上帝保佑他们，”[30] 特塔尔迪写道。加拉塔市长营救了对岸的一些难民，让他们在相对安全的热那亚殖民地避难。“我冒着很大风险把木栅处的难民救到了加拉塔城内；如此恐怖的景象是闻所未闻的。”[31]

意大利船只上的人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简直像瘫痪了一样。清晨，他们听到宣示抵抗决心的教堂钟声渐渐消逝；当奥斯曼水手驾船抵岸，冲击金角湾海墙时，呼喊声传过了海面。难民们哀求意大利船长把船开到岸边来，或者游向船只，不少人因此淹死。威尼斯人也看到了这凄惨景象，但不敢开船靠岸。他们除了害怕被敌人俘虏外，还担心大群难民蜂拥上船，会让船倾覆。另外，桨帆船的很多船员已经被派去守城，船员严重不足。但奥斯曼水手抛弃了自己的战船，加入抢劫，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难民们得到逃生的一线希望，尽管这幸运不会持续多久。意大利桨帆船舰队必须在奥斯曼海军重整纪律之前当机立断。

加拉塔人也踌躇不决、忐忑不安。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传来时，加拉塔市民陷入了恐慌。“我一直深知，一旦君士坦丁堡被攻破，加拉塔也就完了。”[32] 加拉塔市长安杰洛·洛梅利诺后来写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应对。穆罕默德二世认为热那亚人与拜占庭合谋（大部分身强体健的加拉塔人的确在金角湾对岸参加战斗，其中包括市长的侄子），现在对热那亚人的态度还不明朗。此时加拉塔城内只有600人。很多人想尽快逃走。一大群人抛弃了家园和财产，登上了一艘热那亚船只逃跑。另外一艘船（乘员大多是妇女）被奥斯曼战船俘获。但洛梅利诺决定给大家树立一个榜样，坚持留下。他推测，如果他也弃城逃跑的话，城市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洗劫。

在这些考虑的过程中，威尼斯舰队的指挥官阿卢威克瑟·迪艾多在

他的军械师和外科医生尼科洛·巴尔巴罗陪同下乘船来到加拉塔，与市长商议对策：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舰船是否应当联合起来对抗奥斯曼军队，两个意大利共和国共同向苏丹正式宣战；或者还是逃跑？洛梅利诺恳求他们先等一等，让他派遣一名使节去穆罕默德二世那里。但对威尼斯船长们来说，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停船等待幸存者从遭到浩劫的城市泅渡上船，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考虑到准备出航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他们不敢再拖延下去了。迪艾多和他的伙伴们在加拉塔就能看到各艘桨帆船正准备离开金角湾，于是匆匆走过加拉塔的街道，打算返回船上。他们惊恐地发现，为了阻止市民大规模逃跑，洛梅利诺已经封闭了城门。"我们左右为难。"巴尔巴罗回忆道，"我们被关在了城里，桨帆船突然开始扬帆收桨，准备起航，要把他们的指挥官丢下。"[33] 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船只准备逃离，而穆罕默德二世一定不会善待敌方舰队的指挥官。他们苦苦哀求市长放他们走。最后他终于准许开门。迪艾多等人总算及时赶到前滩，登上战船。各艘桨帆船被纤夫缓慢地拖向仍然封锁着金角湾入口的铁链。两名船员手执利斧跳入海中，劈砍铁链的木制浮筒，直到把它们砍断。意大利船只一艘接一艘地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而海岸上的奥斯曼指挥官们只能暴跳如雷，却无计可施。意大利舰队绕过了加拉塔，在已经空荡荡的双柱港（奥斯曼海军的基地）展开了队形。他们就在那里等待更多（在岸上作战的）船员和其他幸存者前来，但到中午时分，他们已经可以确定，岸上的人已经全部被杀或被俘，他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基督教舰队再次得到了命运的眷顾。4月底曾经吹拂热那亚船只，让它们在海峡内得以快速北上的南风已经转为风速12节的强劲北风。巴尔巴罗承认，要不是幸运地刮起了北风，"我们全都会被俘虏"[34] 。

于是，"正午时分，在我主上帝的佑助下，塔纳舰队的指挥官阿卢威克瑟·迪艾多大人乘坐他的桨帆船，扬帆起航"[35] 。和他一起逃走的还有一小群来自威尼斯和克里特的各型船只。有一艘来自特拉布宗的大型桨帆船此前已经损失了164名船员，人手严重不足，所以起帆非常困

难，但因为无人阻挡他们，还是顺利地在马尔马拉海南下，从漂浮在海面上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尸体（“如同运河近岸处漂浮的西瓜”[36]）旁驶过，奔向达达尼尔海峡。他们既为自己的幸运感到庆幸，又为遇难的船员感到悲哀，“他们中有些人被淹死，有些人在敌人的炮击中牺牲，或者在战斗中捐躯”[37]，特里维萨诺本人也阵亡了。这些船只载着于最后混乱时刻逃生的400名幸存者，以及在城市陷落前就已经登船的很多拜占庭贵族（其数量相当惊人）。还有7艘热那亚船只也安全脱离，包括负伤的朱斯蒂尼亚尼乘坐的那艘桨帆船。在他们逃离的同时，哈姆扎贝伊把奥斯曼舰队重新集结起来，绕过金角湾入口，俘虏了仍然停泊在那里的15艘船只（分别属于拜占庭皇帝、安科纳和热那亚），其中有些船只满载难民，严重超载，无法航行。还有很多难民站在前滩，凄惨地号哭，向驶离的桨帆船哀求。奥斯曼水兵把这些难民围起来，驱赶到他们自己的战船上。

从陆墙到市中心的距离是3英里。黎明时分，一群群意志坚定的近卫军士兵已经从圣罗曼努斯门沿着通衢大道挺进，向圣索菲亚大教堂进发。除了红苹果的传说外，奥斯曼军营里还流传着另一个传说：圣索菲亚大教堂（在一连好多周徒劳无功的围城战中，他们都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座大教堂矗立在远方地平线上）的地下室里储藏着海量的金银和宝石。近卫军士兵们大踏步穿过一贫如洗的广场和空荡荡的大道，经过公牛广场和狄奥多西广场，沿着通往城市心脏的梅塞大道（意思是“中央大道”）前进。其他的士兵则穿过北面的查瑞休斯门，经过圣使徒教堂。这座教堂没有遭到抢劫，因为穆罕默德二世似乎在这里部署了警卫，以遏制士兵们对城市建筑物的全面破坏。近卫军一路上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抵抗。他们抵达君士坦丁广场，城市的奠基者从宏伟的柱廊上俯视他们，但并没有天使从天而降，挥舞带烈火的利剑将他们逐退。同时，金角湾和马尔马拉海两支舰队的水手们蜂拥着冲过半岛北端的集市和教堂。到早上7点，近卫军和水手都抵达了市中心，潮水般涌入奥古斯都广场。拜占庭帝国仍然幸存的最恢宏的纪念碑就屹立于此，查士丁

尼的骑马像仍然朝向初生的旭日；米利翁（帝国全境计算距离的基石）也坐落在这里。查士丁尼骑马像的一侧是赛马场和君士坦丁大帝当初的一些战利品，这些战利品把城市与更久远的古代联系了起来：来自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的奇异的三头巨蛇铜像、公元前479年普拉蒂亚战役中希腊人大败波斯人留下的纪念品，甚至还有更古老的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的石柱。奥斯曼士兵第一次仰视这石柱时，它的打磨花岗岩表面上保存极好的象形文字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在查士丁尼骑马像的另一侧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它“直冲云霄”[38]。

在教堂内，晨祷仪式已经开始，九扇巨大的木门（表面镶有黄铜，顶端立有保护它的十字架）紧紧关闭。人数众多的信徒在祈祷天降奇迹，救他们免受门外敌人的伤害。女性信徒按照通常的规矩，在二层廊台祈祷，男人们则在一层。教士们在祭坛前主持礼拜。有些人躲藏在巨大教堂最隐秘的角落里，爬到检修管道里或者屋顶上。近卫军士兵冲进内院，发现大门紧闭，于是开始撞击最中间那扇门，即专供皇帝及其扈从进出的皇室之门。在斧子的持续猛击下，4英寸厚的木门终于动摇，轰然打开，奥斯曼军队涌入宏伟的教堂。在他们头顶上，蓝金两色的马赛克基督像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入侵者，右手举起，做出降福的动作，左手捧着一本书，上面写着“祝你平安，吾乃世界之光”的字样。

我们可以说，就在奥斯曼人最后砍倒圣索菲亚大教堂大门的那个瞬间，拜占庭彻底咽气了。圣索菲亚大教堂曾目击帝都的很多戏剧性场面。这个地点最早的教堂屹立了1100年，随后查士丁尼建造的伟大教堂又延续了900年。这座恢宏的建筑反映和亲历了这座城市风起云涌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历代皇帝（除了末代皇帝，这的确是个不祥的例外）都在这里加冕。拜占庭帝国历史上很多决定命运的事件就在“由一条金链从天堂垂悬”[39]的巨大穹顶下上演。它的大理石地板上曾经有鲜血飞溅；这里曾经发生过暴乱；多位牧首和皇帝曾在这里避难，躲避暴民和阴谋作乱者，或者被从这里强行拖走。穹顶曾被地震摧毁过三次。

教堂威风凛凛的门廊曾经目睹教皇特使手持绝罚诏书冲进来。维京人曾在它的墙壁上乱涂乱画。野蛮的法兰克十字军曾经无情地将它洗劫一空。就在这里，俄罗斯访客被东正教仪式的超脱凡俗之美深深震撼，以致整个俄罗斯民族都皈依了东正教。还是在这里，人们因宗教分歧而争吵不休，前来祈祷的普通信徒的脚将地板磨平。圣索菲亚大教堂（“索菲亚”的意思是“智慧”）的历史就是拜占庭的影子：既圣洁又世俗，既神秘又赏心悦目，既美丽又残酷，高度地不理性，既属神又属人。在1123年又27天之后，它的历史即将落幕。

士兵们破门而入时，畏缩的人群发出一声恐惧的哀号。人们向上帝祈祷，但无济于事。他们被“一网打尽”[40]，很少发生流血事件。少数抵抗的人，或许还有一些年老体衰的人被杀死，但大部分人“像绵羊一般”[41]束手就擒。奥斯曼军队的目标是战利品和利润。每名士兵都努力去控制自己的俘虏，对性别不同、年龄各异的俘虏的哭喊充耳不闻。在争夺最有价值奴隶的斗争中，一些年轻女人险些被撕碎。修女和大家闺秀、青年和老人、主人和奴仆被捆缚在一起，然后被拖出教堂。士兵们用女人们自己的面纱捆她们，用绳索捆缚男人。士兵们分成若干组，每个人都带领自己的俘虏走到“一个特定地点，把他们交给别人看管，然后返回教堂去抓第二批，甚至第三批俘虏”。不到一个小时，教堂内的全体信徒都被捆了起来。“无休无止的俘虏队伍，”杜卡斯记载道，“如同成群牛羊，涌出教堂和圣殿，那景象真是非同寻常！”[42]凄惨的哀恸之声在这个清晨回荡。

然后，士兵们把注意力转向教堂内的宝物。他们把圣像砍成碎片，拆下珍贵的金属框架，“一瞬间就夺走了保管在圣殿内的珍贵而神圣的圣物、金银器具和其他贵重物品”[43]。然后是其他各种装置和器皿，穆斯林认为它们既是冒犯真主的偶像，也是正当的战利品：金链、枝状大烛台、油灯、圣像屏、祭坛及其饰物、教堂家具、皇帝宝座。很快，所有的东西要么被抢走，要么被就地摧毁，教堂变得“空空如也，万分凄

凉”[44]（这是杜卡斯的说法）。大教堂成了一个空壳。这个对希腊人来说的决定性时刻还产生了一个传说，典型地体现出了他们亘古不变的对奇迹的迷信，以及对圣城的渴望。根据这个传说，当士兵们走向祭坛时，教士们拿起了圣礼器皿，接近了圣殿，这时墙壁洞开，让他们进去，随后又封闭如初。教士们将停留在那里，直到将来有一位东正教皇帝恢复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个传说的基础可能是，教堂与其后方的牧首宅邸之间有一条古老通道，有些教士可能得以借此逃生。不过也发生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奥斯曼军队打开了备受拜占庭人仇恨的威尼斯执政官恩里科·丹多洛的墓穴，就是他在250年前洗劫了君士坦丁堡。他们在墓穴里没有找到财宝，于是将丹多洛的骨骸扔到了大街上，任凭野狗啮咬。

整个上午，穆罕默德二世一直留在城墙外的军营内，等待关于城市投降和遭劫掠的报告。他接到了一连串消息，还接见了多个战战兢兢的市民代表团。加拉塔市长的使节呈上礼物，希望苏丹保证加拉塔中立的条约仍然有效，但苏丹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士兵们献上了奥尔汗的头颅，但穆罕默德二世最想看的是君士坦丁十一世的首级。皇帝的最终命运和对他死亡的确认仍然扑朔迷离、不足凭信。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关于皇帝结局的可靠报告。穆罕默德二世可能下令对战场进行了搜寻，寻找他的尸体。当天晚些时候，一些近卫军士兵（可能是塞尔维亚人）向苏丹进献了一枚首级。据杜卡斯的说法，卢卡斯·诺塔拉斯大公当时也在场，他确认这就是他主公的头颅。这枚首级被悬挂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对面的查士丁尼石柱上，以向希腊人宣示，他们的皇帝已经殒命。后来，头颅的皮肤被剥去，在皮肤里面塞满稻草，然后送到伊斯兰世界的各个主要宫廷，在华丽的仪式中昭示天下，作为权威和征服的象征物。

皇帝的真实死因（当然，还有人怀疑，他根本就没有死）仍然无法确定。没有任何可靠的现场目击证人，因此众说纷纭，各种理论互相驳

斥，均不足凭信。奥斯曼史学家都对皇帝之死做了贬抑但非常具体的描述，其中很多描述都是在事件发生很久之后才写下的，有可能是基于先前的记载。据他们的描述，“愚钝而盲目的皇帝”[45]看到大事不妙，企图逃跑。他带领随从，沿着陡峭的街道奔向金角湾或马尔马拉海，去寻找船只，途中遭遇了一群正在抢劫的土耳其步兵和近卫军。“随后爆发了一场绝望的激战。皇帝策马攻击一名负伤的土耳其步兵，不料马失前蹄，这名步兵站起身来，砍掉了皇帝的脑袋。其他拜占庭人看到皇帝已死，斗志顿时瓦解，大部分人都被杀死或者俘虏。皇帝随员携带的大量金钱和珠宝也被抢走。”[46]

希腊人的说法一般都是，在前线崩溃之时，皇帝率领一群忠实的贵族向城墙处的敌人冲杀，最后英勇牺牲。根据哈尔科孔蒂利斯的说法，“皇帝转向坎塔库泽努斯和还在他身边的少数人，说道：‘那么，大家一起冲，杀掉这些野蛮人！’勇敢的坎塔库泽努斯不幸阵亡，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则被击退，遭到无情的追杀，肩膀负伤，随后被杀死”[47]。这个故事有很多版本，皇帝要么是在圣罗曼努斯门处的死人堆那里，要么是在一座紧锁的边门附近被杀死。所有的版本都为希腊人提供了一个关于皇帝的永不磨灭的传奇。“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被杀了。”贾科莫·特塔尔迪的记载非常简单直白，“有人说他的首级被砍下，有人说他死在冲击城门的拥挤人群中。这两种说法都很有可能是真的。”“他被杀死后，首级被插在一根长矛上，献给土耳其苏丹。”[48]驻君士坦丁堡的安科纳领事本韦努托如此写道。奥斯曼人未能明白无误地辨认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尸体，这说明他很可能在最后的鏖战中脱去了皇袍，像普通士兵一样阵亡了。很多死尸都遭到斩首，无头尸体是很难辨认的。离奇的传说比比皆是，有人说他乘船逃走了，但这种说法可以否定。还有人说，穆罕默德二世把他的尸体交给了希腊人，安葬在城市的某地（关于具体地点也有好几种说法），但可靠的地点无法确认。由于皇帝的结局无法确定，希腊人围绕着他编织出了越来越多的传奇，用谣曲和哀歌来寄托他们对往昔光荣的渴望：

> 哭泣吧，东西方的基督徒，为这可怕的毁灭流泪哭泣吧。1453年5月29日，星期二，夏甲[49]的子孙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当君士坦丁·德拉伽塞斯……听到这消息，他抓起长枪，佩上利剑，纵身跨上他的白蹄母马，狠狠地打击土耳其人，那些不虔诚的野狗。他一连斩杀了10名帕夏和60名近卫军，但他的利剑裂口，长枪折断，他茕茕孑立，孤立无援……一个土耳其人击中了他的头部，可怜的君士坦丁坠下马来。他躺在尘土与鲜血中。他们砍下了他的首级，将它插在一根长矛的矛尖，将他的尸体埋葬在一株月桂树下。[50]

“不幸的皇帝”享年49岁。不管他的结局究竟如何，可以确信的是，为了维持拜占庭的香火，他竭尽全力奋斗到了最后一刻。“伊斯坦布尔[51]的君主英勇无畏，不肯投降”[52]，奥斯曼史学家奥鲁奇如此宣称。奥斯曼人是很少这样尊重敌人的，看来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确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对手。

当天晚些时候，城内的混乱渐渐平息，秩序有所恢复，穆罕默德二世胜利进入了君士坦丁堡。他骑马经过了查瑞休斯门（后来被土耳其人更名为埃迪尔内门），众位维齐尔、高级贝伊、乌理玛、指挥官、精锐部队、侍卫和步兵徒步前进，众星捧月地簇拥在他身旁，这个盛大场面后来被传说描绘得更加宏大。队伍叮当作响地穿过拱门的时候，旗手们展开了绿色的伊斯兰旗帜和苏丹的红色旌旗。穆罕默德二世入城的景象很可能是土耳其历史上仅次于凯末尔·阿塔图尔克[53]肖像的最著名的图景，并成为无数诗歌和绘画的主题，世代传扬。在19世纪的绘画中，蓄着络腮胡子的穆罕默德二世腰杆笔直地骑着骏马，无比自豪地前进，面庞转向一侧。他的两侧簇拥着蓄着小胡子、高大强健的近卫军（他们肩扛火绳枪、长枪和战斧）和胡须雪白的伊玛目们（他们的白胡须象征伊斯兰的智慧）。在背景中，迎风招展的大小旗帜以及森林一般密集的矛枪遮蔽了地平线。在图画左侧有一名黑人战士，肌肉结实得像健身运动员一样，他骄傲地屹立在那里，代表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欢迎众位圣战者来接纳先知曾许诺的遗产。他的弯刀指向苏丹脚下的一堆基督徒的尸体，这些敌人的盾牌上都带有十字架，这是对十字军东征的回

忆，也是伊斯兰教战胜基督教的象征。根据传说，穆罕默德二世停了下来，向真主感恩。然后他转向他的“7万或8万名穆斯林英雄”[54]，表示祝贺，喊道：“征服者们，不要停步！赞美真主！你们是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就在这个代表性的时刻，他正式启用了“法提赫”（意为“征服者”）这个称号，后来土耳其语中就一直用这个名字称呼他。就在这个瞬间，奥斯曼帝国的霸业正式奠定。这一年，他21岁。

然后，他策马进入城市中心，去查看那些他曾在远方清楚地想象的建筑物，经过使徒教堂和宏伟的瓦伦斯高架水渠，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他或许并没有被看到的景象深深震撼，而是严肃起来。君士坦丁堡更像是一座毁于人手的庞贝古城，而不是黄金城市。放纵的军队忘记了不得破坏建筑的敕令。根据克利托布罗斯的有些夸张的说法，奥斯曼军队“如同烈火或者旋风一般向城市猛扑……全城空空荡荡，惨遭蹂躏，似乎被火烧烤得枯焦……剩下的房屋全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完全成了废墟，这巨大的破坏惨景让所有目睹它的人都心生恐惧”[55]。虽然苏丹向军队许诺劫掠三天，但城市在一天之内就被洗劫一空。为了阻止更多破坏，苏丹背弃了自己的诺言，命令在第一天落日时就停止劫掠。传令官们能够确保官兵们服从这道命令，这说明奥斯曼军队的纪律的确非常严明。

穆罕默德二世策马前行，沿途不时停下，去查看某些标志性建筑。根据传说，他在经过德尔菲的巨蛇柱时，用钉头锤砸断了其中一个蛇头的下颚。他经过查士丁尼雕像，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前门，翻身下马。他匍匐在地，将一捧尘土倾洒在自己头巾上，向真主表示自己的谦卑。然后他走进了惨遭洗劫的教堂。眼前的景象似乎让他既震撼又惊骇。他穿过巨大的教堂空间，凝视穹顶，看到一名士兵在砸大理石地面。他问这个士兵，为什么要拆毁地面。“为了信仰。”那人答道。穆罕默德二世见这人如此堂而皇之地违背保护建筑的命令，拔剑就砍。穆罕默德二世的侍卫们将这个被砍得半死的人拖了出去。一些躲藏在最深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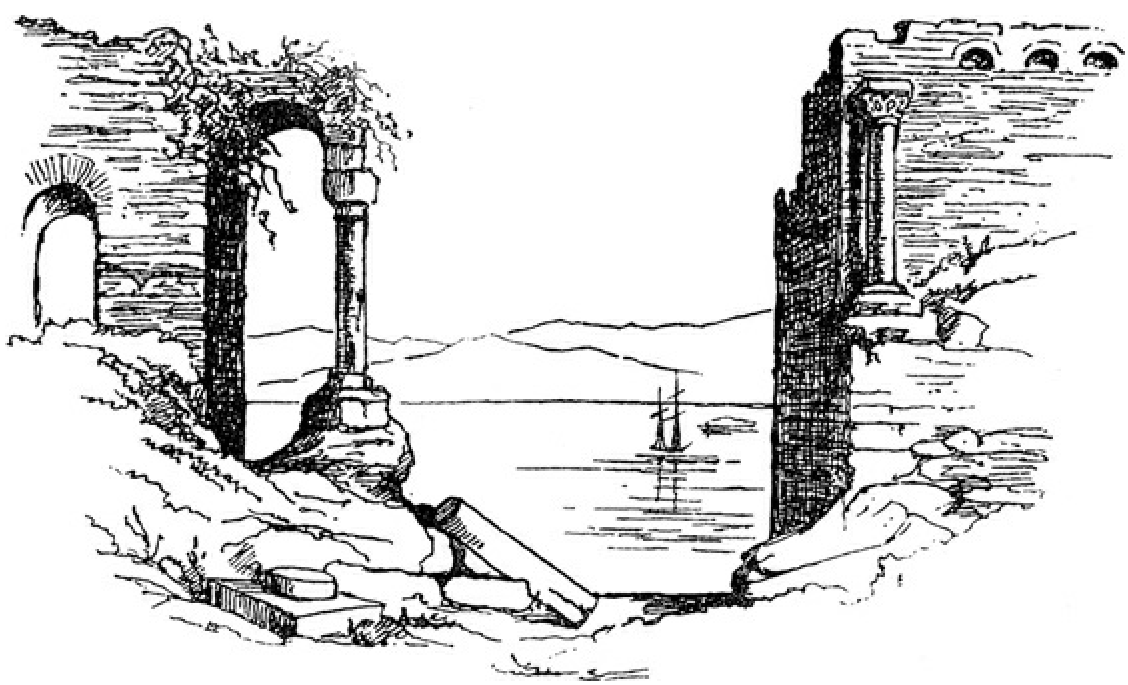
角落的希腊人走了出来，跪倒在苏丹脚下。一些教士也走了出来，或许就是那些被墙壁神奇地“吞没”的人。性格反复无常、难以捉摸的穆罕默德二世大发慈悲，命令士兵保护这些人回家。然后他招来一名伊玛目，让他走到讲坛上，召唤众人祈祷。他自己则爬上祭坛，跪拜下来，向得胜的真主祈祷。

据奥斯曼史学家图尔松贝伊说，穆罕默德二世随后“在真主之灵升上第四层天堂”时，通过教堂的廊台登上了屋顶。从那里，他可以俯瞰教堂和这座基督教城市的古老心脏。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曾经无比辉煌和自豪的帝国的衰败惨景。教堂周边的很多建筑已经坍塌，包括赛马场地势较高的座位区的大部分，以及古老的皇宫。这座皇宫一度是皇权的中心，早已成为废墟，因为它在1204年被十字军彻底摧毁了。在他纵览下方的凄凉景象时，“他想到了这个世界的变幻无常，以及它的最终毁灭，”还记起了追忆阿拉伯人于7世纪灭亡波斯帝国的两行诗句：

> 在霍斯劳的皇宫，如今蜘蛛是卷帘人，
>
> 阿弗拉西亚布[56]的城堡中，猫头鹰发出换岗命令。[57]

这是幅哀伤的景象。穆罕默德二世的梦想都实现了；在这个奠定了奥斯曼帝国在当时的超级大国地位的光辉日子的末尾，他已经想到帝国的衰落。他骑马穿过惨遭蹂躏的城市，返回军营。长长的俘虏队伍被驱赶着进入壕沟外临时搭起的帐篷。全城5万居民的绝大部分都被押回了战船或者军营。当天可能有4000名基督徒在战斗中丧生。与家人分开的儿童呼喊着母亲，男人寻找妻子，“所有人都被这场浩劫惊得呆若木鸡”。在奥斯曼军营，人们点燃篝火，庆祝胜利，伴随着笛子和鼓点载歌载舞。士兵们给马匹披上教士的服装，嘲讽地举着戴有土耳其帽子的十字架在奥斯曼军营内游行。人们用战利品做交易，买卖宝石。据说有人“用几个铜板就能买到很多珠宝”[58]，“金银贱如锡”[59]，因此一夜暴富。

如果说这一天发生了可怕的大屠杀和其他暴行，这绝不是伊斯兰世界独有的。在中世纪，任何一支攻破敌城的军队都会大开杀戒、恣意劫掠。拜占庭历史上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如果说是由于宗教原因，也纯属偶然。奥斯曼人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并不比拜占庭人在961年对克里特岛上的撒拉森城市甘地亚的劫掠（当时，绰号“撒拉森人的白死神”的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放纵他的军队，对甘地亚血洗了整整三天）更残暴；也并不比1204年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的破坏更糟糕；奥斯曼人的行为比1183年拜占庭人毫无理性的排外暴行（拜占庭人当时屠杀了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几乎所有拉丁人，“包括妇女、儿童、老弱，甚至医院里的病人”[60]）更加有组织有纪律。1453年5月29日的黑夜降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潜入圣索菲亚大教堂穹顶的窗户，完全遮蔽了历代帝王和天使的马赛克肖像、斑岩廊柱、缟玛瑙和大理石地面、被砸碎的家具和地上的一摊摊血迹。拜占庭就这样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马尔马拉海岸的何弥达斯（**Hormisdas**）宫殿残垣

---

[1] Sherrard，Philip，*Constantinople*：*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

London，1965，p.102

[2] 圣愚安得烈（？～936），原为斯拉夫人，被卖作奴隶来到君士坦丁堡，因为虔诚、癫狂而被称为“圣愚”。据说他曾看到圣母保护君士坦丁堡、从敌人手中解救城市的幻象，后来被东正教会封为圣徒。埃皮法尼奥斯是他的弟子。

[3]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96

[4]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71

[5]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71

[6]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55

[7]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p.89

[8]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p.51

[9]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95

[10] Doukas，*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trans. Harry J. Magoulias，Detroit，1975，p.228

[11] Khoja Sa'd-ud-din，*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trans. E. J. W. Gibb，Glasgow，1879，p.29

[12]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p.123

[13]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71

[14]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p.71-2

[15]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1823，p.66

[16]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95

[17]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72

[18]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 72

[19]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73

[20]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73

[21]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p.38

[22] Barbaro，Nicolo，（in English）*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rans. J. R. Melville Jones，New York，1969，p.67

[23]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73

[24]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92

[25] 这座宫殿前面曾经有一座小港，其入口处立有公牛和雄狮雕像，因此得名。

[26]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34

[27] Barbaro，Nicolo，（in English）*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rans. J. R. Melville Jones，New York，1969，p.67

[28]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74

[29]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

p.296

[30]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p.185-6

[31]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44

[32]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44

[33]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36

[34]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37

[35]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p.58

[36]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36

[37]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36

[38] Procopius，quoted Freely，John，*The Companion Guide to Istanbul*，Woodbridge，2000，p.28

[39] quoted Norwich，John J.，*A History of Byzantium*，1 vols.，London，1995，p.203

[40]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74

[41] Doukas，*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trans. Harry J. Magoulias，Detroit，1975，p.225

[42] Doukas，*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trans. Harry J. Magoulias，Detroit，1975，p.227

[43]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92

[44]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p.227

[45] Khoja Sa'd-ud-din，*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trans. E. J. W. Gibb，Glasgow，1879，p.30

[46] Tursun Beg，*The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trans. Halil Inalcik and Rhoads Murphey，Minneapolis and Chicago，1978，p.37

[47]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214

[48]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p.184-5

[49] 夏甲是《圣经·创世记》中记载的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一名埃及使女。夏甲为亚伯拉罕生下了儿子以实玛利。伊斯兰教鼻祖穆罕默德自称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大部分穆斯林也视自己为以实玛利的后裔。

[50] Legrand，Emile，*Recueil de Chansons Populaires Grecques*，Paris，1874，p.74

[51] “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语对君士坦丁堡的称呼。

[52] quoted Lewis，Bernard，*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London，1982，p.30

[53]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1881～1938），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建者。少年时入军校受训，毕业时成绩优良，后来对帝国的政治渐生不满，加入了一个土耳其民族主义组织——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政府作战，在加里波利打败协约国军队。最后，协约国胜利，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军队进驻安纳托利亚；凯末尔被指派去维持秩序，他趁机鼓动人民反抗这些入侵者。拜奥斯曼帝国失败之赐而获有土地的希腊和亚美尼亚积极反对土耳其民族主义，但凯末尔击败了所有的反对势力，于1932年建立土耳其共和国。1934年，他被尊为“阿塔图尔克”（意为“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实施西化政策，不再强调宗教，解放妇女，强制使用姓氏，抛弃伊斯兰教的法律制度，以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把积贫积弱的奥斯曼帝国改革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54] quoted Freely，John，*The Companion Guide to Istanbul*，Woodbridge，2000，pp.211-12

[55]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

Berlin，1983，pp.74-5

[56] 阿弗拉西亚布是波斯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国王、巫师和战士。土耳其人吸纳和改编了关于他的传说，使他成为土耳其民族的英雄。

[57] quoted Lewis，Bernard，*Istanbul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Norman，1968，*Istanbul*，p.8

[58]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p.219-21

[59]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327

[60] Norwich，John J.，*A History of Byzantium*，3 vols.，London，1995，p.143

16.世界的梦魇

1453～1683年



前狼后虎，左右为难。[1]

——加拉塔市长安杰洛·洛梅利诺写给兄弟的信，1453年6月23日

奥斯曼人破城不久之后，就开始论功行赏。次日，他们对战利品作了分配。根据传统，穆罕默德二世作为最高统帅，理应享有全部战利品的五分之一。他将自己分得的希腊奴隶安置在城市内靠近金角湾的法纳尔区，这个城区一直到现代都是个传统的希腊人聚居区。大部分普通市民，大约有3万人，被送到了埃迪尔内、布尔萨和安卡拉的奴隶市场。其中有少数重要人物后来被赎买并重获自由，因此我们知道他们的命运。其中有马修·卡马里奥特斯，他的父兄均在围城中丧生，全家失散。他历经艰难险阻，拼命去寻找家人。“我从一个地方赎回了妹妹，从另一个地方赎回了母亲；然后是我的侄子。让上帝欢欣的是，我让他们重获自由。”但总的来讲，他的经历仍然是十分凄惨的。除了亲人的遇难和离散之外，最让卡马里奥特斯伤心欲绝的是，“我的四个侄子当中有三个，历经磨难，由于青年人的脆弱，背弃了基督教信仰……如果我父亲和兄弟还活着的话，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的生

活，如果还能算得上生活的话，充满了痛苦和悲哀”[2]。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的事情并不罕见，因为他们曾经试图通过祈祷和圣物的力量挽救这座得到上帝保护的城市，不让它被伊斯兰世界征服，这样的努力都彻底失败了。更多的俘虏则融入了奥斯曼帝国的基因库，借用亚美尼亚诗人安卡拉的亚伯拉罕的哀叹，“如同尘土一般，四散到全世界”[3]。

幸存的君士坦丁堡显贵很快就受到命运的裁决。穆罕默德二世扣押了所有能找得到的重要人物，包括卢卡斯·诺塔拉斯大公及其家人。穆罕默德二世将威尼斯人视为自己在地中海的主要对手，因此对他们的惩罚特别严厉。威尼斯殖民地的市政官米诺托曾在城防作战中起到重要作用。他和他的儿子，以及其他威尼斯显贵全部被处决。还有29名威尼斯人被赎回了意大利。加泰罗尼亚领事及他的一些主要部下也被处死。奥斯曼人还四处搜寻两名联合派教士——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和基辅的伊西多尔，但他们都乔装打扮，安全逃走了。奥斯曼人还在加拉塔寻找幸存的博基亚尔多两兄弟，但也徒劳无功。他们藏匿起来，躲过了这场浩劫。

加拉塔市长安杰洛·洛梅利诺果断地采取行动，努力去拯救热那亚殖民地。加拉塔曾与君士坦丁堡并肩作战，因此很容易遭到苏丹的直接打击报复。洛梅利诺在给自己兄弟的信中写道，苏丹“说，我们竭尽全力去帮助君士坦丁堡的防御……他这么说当然是正确的。我们面临灭顶之灾，必须顺从他的意志，躲避他的怒火”[4]。穆罕默德二世下令立即摧毁加拉塔的城墙（海墙除外）、壕沟和防御塔，并命令他们交出火炮及其他所有武器。市长的侄子和一些拜占庭贵族子弟被送到苏丹的皇宫当差，作为人质。这项政策既能保障加拉塔人的俯首听命，也能为帝国的行政管理提供年轻而受过教育的人才。

就在这一背景下，苏丹对卢卡斯·诺塔拉斯大公的命运做出了定夺。诺塔拉斯是拜占庭贵族中等级最高的一位，他在围城战期间的角色

颇具争议，意大利人一直对他大肆攻击。诺塔拉斯显然是反对东西方教会联合的；他常说："宁愿要苏丹的头巾，也不要红衣主教的冠冕"。意大利作家常用这个例子来证明东正教希腊人的顽固不化。穆罕默德二世最初似乎打算任命诺塔拉斯为城市的行政长官，这体现了苏丹对君士坦丁堡的筹划的深层次方略，但很可能被大臣们说服，改了主意。根据笔触始终生动鲜明的杜卡斯的记载，穆罕默德二世"酩酊大醉"，命令诺塔拉斯交出自己的儿子，以满足苏丹的欲望。诺塔拉斯拒绝了这个要求，穆罕默德二世就派刽子手去杀他全家。刽子手杀死诺塔拉斯家的所有男性后，"捡起首级，返回到宴会上，将它们献给那嗜血的野兽" [5] 。更有可能的真实情况是，诺塔拉斯不愿意将他的孩子送去做人质，而穆罕默德二世感到，让拜占庭的头号贵族活下去的风险太大。

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建为清真寺的工程马上开始了。工匠们很快建起了一座木制尖塔，用于宣礼（召唤信众前来祈祷）；同时粉刷了墙壁，将华丽的马赛克图案遮盖，但保留了穹顶下的四幅守卫天使像。穆罕默德二世出于对此地魂灵的尊重，决定保留这四幅天使像。古老城市中的其他一些"异教"标志物也在一段时间内得以完好地保存：查士丁尼骑马像、来自德尔菲的巨蛇柱和埃及石柱。穆罕默德二世毕竟还是非常迷信的。6月2日，穆斯林第一次在今天所称的圣索菲亚清真寺进行周五祈祷，"宣读了伊斯兰祷文，诵读了圣战者苏丹穆罕默德汗的名字" [6] 。按照奥斯曼史学家的说法，"全城都听得见重复五次的甜美的穆斯林信仰咏唱" [7] 。在一个虔诚的时刻，穆罕默德二世为城市取了一个新名字——"伊斯兰堡"，这在土耳其语中是一个双关语，意思是"遍布伊斯兰"。但这个名字没能打动土耳其人的耳朵。谢赫阿克谢姆赛丁还奇迹般地很快找到了艾优卜的坟墓。这位先知的旗手在669年阿拉伯人首次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牺牲，他的死极大地激励了攻打这座城市的圣战。

穆罕默德二世虽然表现出了穆斯林的虔诚，但他对城市的重建工作

在传统伊斯兰教义看来是非常有争议的。穆罕默德二世对君士坦丁堡遭到的严重破坏深感不安。据说在首次视察城市的时候，他曾说："我们劫掠和毁灭的是怎样一座城市啊。"[8] 6月21日，他骑马返回埃迪尔内时，离开的无疑是一座空空荡荡的凄凉废墟。在他在位期间，对帝都的重建将是一项主要工作，但他仿效的模板却不是伊斯兰的风格。

于5月29日逃离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船只把城市陷落的噩耗带回了西方。6月初，3艘船只抵达了克里特，船上的水手曾经顽强地防守塔楼，迫使穆罕默德二世释放他们。他们带来的消息让全岛无比惊恐。"如此可怕的事情，前所未闻，将来也不会再有。"[9] 一名僧侣写道。同时，威尼斯桨帆船群抵达了希腊外海的内格罗蓬特岛[10]，令岛民陷入恐慌。当地的市政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群众，阻止他们全部撤离岛屿。他向威尼斯元老院送去了十万火急的信件。随着船只在爱琴海上来往穿梭、传递消息，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噩耗很快传遍了地中海东部的各个岛屿和海港，传到了塞浦路斯、罗得岛、科孚岛、希俄斯岛、莫奈姆瓦夏、莫东[11]、勒班陀。这消息就像一块巨石坠入地中海一样，掀起了恐慌的惊涛骇浪，一直席卷到直布罗陀海峡，甚至更远方。1453年6月29日，这个消息抵达了欧洲大陆的威尼斯。当时元老院正在开会。一艘来自勒班陀的快速单桅帆船停靠在圣马可湾的木制栈桥旁，人们从窗户和阳台上探出身来，急切地询问关于君士坦丁堡、他们的亲属和商业利益的消息。当他们得知君士坦丁堡已经陷落时，"不禁号啕大哭，泪水四溅，呻吟不止……所有人都捶胸顿足，撕扯自己的脑袋和双手，哀悼自己的父亲或儿子或兄弟，或者为了自己财产的损失而伤心"[12]。元老们听到这消息时，目瞪口呆，投票被暂时搁置。大批信件被快马加鞭地送到意大利各地，报告关于"君士坦丁堡和佩拉（加拉塔）两座城市恐怖而可悲的陷落"[13]的消息。噩耗于7月4日抵达博洛尼亚，7月6日抵达热那亚，8日抵达了罗马，随后不久又传到了那不勒斯。起初，很多人都不肯相信，固若金汤的君士坦丁堡居然也会被攻破；他们确信消息确凿无疑后，大街小巷上披麻戴孝、万分悲痛。恐怖

气氛更使得各种飞短流长被大大夸张。有人说，君士坦丁堡年纪在6岁以上的人全被屠杀，有4万人被土耳其人戳瞎眼睛，所有教堂都被夷为平地，苏丹正在集结大军，即将入侵意大利。人们口口相传，特别强调土耳其人的野蛮残暴和他们对基督教世界的迅猛攻击。这些主题将在欧洲回响数百年。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事件中也有一个瞬间蕴含着现代性的情感的话，那就是人们对君士坦丁堡陷落消息的反应。就像肯尼迪遇刺或者“9·11”事件一样，全欧洲的人都能清楚地记得，在最早听到消息的时候，他们自己在什么地方。“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的那天，天色阴沉。”[14] 一名格鲁吉亚史学家写道。“我们听到的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消息是多么可憎！”恩尼亚·席维欧·皮可洛米尼[15] 在给教皇的信中写道，“我写字的时候，手都在颤抖。”[16] 消息传到德意志的时候，弗里德里希三世流下了眼泪。航船、快马和歌谣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一消息传向欧洲的各个角落。它从意大利传向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低地国家、塞尔维亚、匈牙利、波兰和更远方。在伦敦，一位史学家写道，“这一年，基督徒丢失了高贵的君士坦丁的城市，它被土耳其人的君主穆罕默德夺去了”[17] 。丹麦与挪威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将穆罕默德二世描述为《启示录》里从大海中崛起的野兽。欧洲各国宫廷之间的外交渠道持续回荡着消息、警告和对新的十字军东征的设想。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人们写下了数量惊人的信件、史书、预言、歌曲、哀歌和布道，被翻译成基督教世界的所有语言，从塞尔维亚语到法语，从亚美尼亚语到英语。不仅宫殿和城堡内在讲述君士坦丁堡的故事，十字路口、市场和客栈里也在大谈特谈这个话题。它传到了欧洲最遥远的角落和最贫贱之人的耳边：渐渐地，甚至冰岛的路德派祈祷书里也恳求上帝救助他们，避开“教皇的奸诈和土耳其苏丹的恐怖”[18] 。新的反伊斯兰浪潮才刚刚开始。

在伊斯兰世界，虔诚的穆斯林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个消息。10月27

日，穆罕默德二世的一名使节抵达开罗，带来了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还带来了两名希腊贵族俘虏，作为证据。据穆斯林史学家的记载，“埃及苏丹和所有人都为这伟大的征服而欢呼雀跃；每天早晨，都会高声宣布这一喜讯；开罗城张灯结彩两天……人们对商店和房屋做了极其奢华的装点，以此庆祝……我说，应当感谢真主，这了不起的胜利都属于他”[19]。对伊斯兰世界来说，这是一场意义极其重大的胜利。被认为是穆罕默德说出的古老预言终于实现了，伊斯兰信仰向全世界传播的前景一下子又乐观起来。奥斯曼苏丹赢得了超人的威望。穆罕默德二世还按照惯例向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君主送去了捷报，借此宣示自己作为圣战的真正领袖的地位，并启用了“征服者”的称号，“哈里发的呼吸之风”将他与伊斯兰早期的光荣历史紧密联系了起来。据杜卡斯的记载，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塞满稻草”的首级还被送到“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其他突厥人的领袖”[20]那里。穆罕默德二世给埃及、突尼斯和格拉纳达的统治者分别送去了400名希腊儿童。这不仅仅是礼物。穆罕默德二世这是在索取信仰捍卫者的地位以及与之相伴的最终战利品：对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这三个圣地的保护权。他专横地训斥开罗的马穆鲁克苏丹：“保持穆斯林朝觐道路的畅通，是你的责任；我们的义务则是提供圣战者。”[21]同时，他还自称为“两片大海与两块陆地的君主”、诸位恺撒的帝国的继承人。他的雄心是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既是世俗的，也是宗教的：“全世界只能有……一个帝国、一个信仰、一个君主。”[22]

在西方，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改变，但同时也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那些了解局势的人来说，君士坦丁堡显然是不可能守得住的。它是一块被彻底孤立的飞地，被吞并是不可避免的。就算君士坦丁十一世击退了奥斯曼军队，城市也迟早会被攻破。对那些关心此事的人来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或者说是“伊斯坦布尔被占领”，这取决于不同的宗教角度）总的来讲是对一个既成事实的象征性确认：奥斯曼帝国已经是一个世界霸权，在欧洲站稳了脚跟。但很少有人对局势如此洞若观火。就连威尼斯人（他们通过间谍和发往元老院的持续不

断的外交情报，对时局有相当准确的把握）也大体上不了解穆罕默德二世的军事实力。“我们的元老不相信土耳其人能有一支舰队，去攻打君士坦丁堡。”[23] 马尔科·巴尔巴罗（Marco Barbaro）对威尼斯人援救努力的迟缓评论道。他们同样也未能认识到火炮的威力和穆罕默德二世的坚定意志与足智多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强调了地中海的权力平衡发生的巨大变化，并让基督教国家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自己受到的严重威胁。在过去，由于有君士坦丁堡的缓冲，基督教国家自认为安全，因而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视而不见。

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君士坦丁堡的灭亡在宗教、军事、经济和心理上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希腊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罗马教皇、匈牙利人、瓦拉几亚人和巴尔干各民族一下子清醒地认识到了穆罕默德二世的野心勃勃。欧洲人对土耳其苏丹的冷酷无情的形象，以及他渴望成为当代亚历山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进行了癫狂的想象。有一份文献称，这位征服者在进入君士坦丁堡时说：“我感谢先知穆罕默德，是他给了我们这次辉煌胜利；但我祈祷，希望他会允许我享有高龄，能够占领和征服旧罗马，就像我已经占有新罗马一样。”[24] 这个说法并非没有根据。在穆罕默德二世的想象中，红苹果的位置已经向西移动了，从君士坦丁堡移到了罗马。奥斯曼军队虽然还远远没有入侵意大利本土，但在战斗中已经高喊：“罗马！罗马！”西方世界将穆罕默德二世视为敌基督的化身。他一步一步、不可阻挡地继续蚕食基督教世界。在1453年之后的岁月里，他将逐个消灭热那亚和希腊人在黑海的各个殖民地：锡诺普、特拉布宗和卡法相继陷落。1462年，他入侵了瓦拉几亚，次年又进攻波斯尼亚。摩里亚于1464年被奥斯曼人彻底征服。1474年，他兵临阿尔巴尼亚；1476年又打到了摩尔达维亚。奥斯曼人滚滚前进的浪潮似乎无法阻挡。在1480年的著名战役中，奥斯曼军队未能攻克罗得岛，但这只是个暂时的挫折。威尼斯人受到的威胁最大。他们与穆罕默德二世的战争于1463年爆发，一直持续了15年。但这还只是一场宏大战争的序曲而已。在此期间，威尼斯人丢失了重要的贸易据点内格罗蓬特。更糟糕的是，

在1477年，奥斯曼劫掠者蹂躏了威尼斯城的腹地；他们离城市已经非常之近，从圣马可广场的钟楼上都能看得见他们的篝火。伊斯兰世界呼吸的热气已经直接吹拂到了威尼斯的脖颈。“敌人兵临城下！”切尔索·马费伊在给执政官的信中写道，“斧子已经逼近树根。除非上帝伸出援手，基督教之名必然遭到毁灭。”[25] 1481年7月，奥斯曼军队终于在意大利半岛的鞋跟处登陆，进军罗马。他们占领奥特朗托[26] 的时候，将该城的大主教杀死在大教堂祭坛前，还处死了1.2万名市民。在罗马，教皇考虑逃之夭夭，群众惊慌失措。但就在这时，穆罕默德二世驾崩的消息传到了军中，于是意大利战役草草收尾。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影响之下，教皇和红衣主教们又一次努力煽动宗教圣战。这些宗教战争一直持续到16世纪。1459年，深感整个基督教文化受到严重威胁的教皇庇护二世在曼托瓦召开了一次会议，力图将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团结起来，给时局定了基调。他慷慨陈词两个钟头，把局势描绘得极其灰暗：

> 我们放任东罗马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征服。我们安闲怠惰地枯坐家中之时，这些野蛮人的大军正在进逼多瑙河和萨瓦河。在东罗马帝国的都城，他们屠杀了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继承人和他的人民，亵渎了上帝的教堂，用穆罕默德的丑恶邪教玷污了查士丁尼的高贵建筑。他们毁坏了圣母和其他圣徒的画像，掀翻了祭坛，将殉道烈士的遗迹丢弃给猪，杀死教士，强暴妇女和少女，甚至蹂躏献身给上帝的处女们，在苏丹的宴会上屠戮君士坦丁堡的贵族，将受难的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像抢到他们的营地，对其大加嘲讽和讥笑，并高呼着“那就是基督徒的上帝！”，并用污泥和唾沫玷污它。这一切丑恶行径都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我们却呼呼大睡……穆罕默德二世要么取胜，要么被彻底打败，否则永远不会放下武器。每一次胜利对他来说都是通往新胜利的垫脚石，他的最终目标是征服西方的所有君王，然后消灭基督的福音，并将他的伪先知的律法强加于全世界。[27]

教皇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这样激情澎湃的言辞还是没能促使人们付诸实际的行动，就像救援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也以失败告终一样。欧洲各国互相嫉妒和猜忌，一盘散沙（有的国家则过于世俗化，对宗教不感

兴趣），永远也不能再次以基督教之名联合起来。一直有传闻说，威尼斯人秘密帮助了奥斯曼军队在奥特朗托的登陆。但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恐惧的确被煽动起来。直到200年后的1683年，在维也纳城下，奥斯曼军队在欧洲的前进步伐才被彻底阻挡住。在此之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世界将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既有真刀真枪的热战，也有冷战，这场战争将在各种族的记忆中留下很深的印迹，并将两种宗教之间的碰撞的大小事件都串联起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在伊斯兰世界和欧洲都唤醒了对十字军东征的深度回忆。奥斯曼帝国的危险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对基督教世界的攻击的继续；“土耳其人”取代了“撒拉森人”，成为欧洲人对穆斯林的统称。“土耳其人”这个词的言下之意就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对手。双方都认为自己在进行一场生存斗争，因为对手执意要毁灭世界。这是全球意识形态冲突的原型。奥斯曼人一直抱有圣战的精神，如今这精神与他们帝国霸业的使命感联系了起来。在穆斯林中心地带，人们又一次对伊斯兰教的优越性深信不疑。红苹果的传说非常流行。在罗马之后，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也先后被认为是红苹果的所在地。除了这些实际的目标之外，红苹果还象征着对伊斯兰信仰最终胜利的弥赛亚式的信念。在欧洲，“土耳其人”与毫无信义和残酷狠毒成了同义词。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到1536年，“土耳其人”这个词在英语中已经有了“行为如同野蛮人或生番的人”的含义。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它是文艺复兴精神的典型例证）对这些观念火上浇油：印刷术。



16世纪德意志印刷品中的奥斯曼骑兵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时恰好是一场革命的巅峰时刻。在西方，科学探索这列失控的火车开始加速，而宗教却日渐衰落。其中一些力量已经在君士坦丁堡围城战中表现了出来：火药的威力、帆船的优势、中世纪攻

城战的寿终正寝。在之后的70年中，欧洲将会涌现出很多新发明、新事物和新人，比如：黄金补牙术、怀表、星盘、航海手册、梅毒、《新约》的翻译、哥白尼和莱奥纳多·达·芬奇、哥伦布和路德，还有活字印刷术。

谷登堡的发明给大众传播带来了一场革命，并传播了关于针对伊斯兰教的圣战的新观念。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150年中，欧洲的印刷机生产出海量的关于圣战和反伊斯兰教宣传的文字材料。保存至今的年代最早的现代印刷品之一就是1451年教皇尼古拉五世批准募款以抵抗土耳其人、援救塞浦路斯的特赦授权书。在全欧洲范围内，类似文件的成千上万个复本得以传播，另外还有对圣战的呼吁和大开本传单（现代报纸的前身）传扬的关于反对“异教徒的苏丹的可鄙威胁”的新闻。接踵而至的是书籍的爆炸：1480～1609年，仅在法兰西就出版了80种关于奥斯曼人的书籍，而同时期以美洲为主题的书籍仅有40种。1603年，理查德·诺尔斯[28]撰写了他的畅销书《土耳其通史》，将土耳其人称为“世界的梦魇”。此时用英语写成的类似题材的书籍已经数量可观。这些著作的标题都很具暗示性：《土耳其战争史》《撒拉森人的著名历史》《论塞利姆苏丹输掉的血腥残酷的战争》《关于对土耳其人的一场著名胜利的真实消息》《土耳其压迫下基督徒的境遇》。信息的大潮是无止境的。奥赛罗参加的就是当时反对“公敌奥斯曼人”、“戴头巾的恶毒的土耳其人”[29]的世界大战。居住地与伊斯兰世界相隔遥远的基督徒第一次能够通过一些影响极大的绘本中的木刻画了解到敌人的形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巴塞洛缪·杰奥尔杰维奇的《被迫向土耳其人称臣纳贡和被其奴役的基督徒的悲惨境遇和苦难》。这些图画表现了身披铠甲的基督教骑士与戴头巾的穆斯林之间的激战，以及非基督教徒的种种野蛮暴行：土耳其人将俘虏斩首，将一长队被俘的妇女儿童押走，长矛尖端插着婴儿，纵马疾驰。人们普遍将与土耳其人的冲突理解为一场更为漫长和久远的与伊斯兰的较量（持续1000年之久的为真理而进行的斗争）的延续。西方人对这场冲突的特征和起因做了详尽的研究。1644年，托马

斯·布莱特曼在著作中宣称，撒拉森人是“第一群蝗虫，大约在630年兴起”，继承他们的是“土耳其人，一群毒蛇，比他们的先祖更邪恶，彻底消灭了他们的祖宗撒拉森人”[30]。与伊斯兰的冲突一直是非同凡响的：更深刻，威胁更大，也更像是一场噩梦。

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200年中，欧洲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去畏惧更富庶、更强大、组织也更得力的奥斯曼帝国。但欧洲人对这个强大对手的想象却非常偏颇，建立在宗教思维的基础上。而在当时的欧洲，基督教已经开始式微。奥斯曼世界的内部和外部完全是两个迥然不同的面貌，这一点在君士坦丁堡特别明显。

萨阿德丁宣称，在占领伊斯坦布尔之后，“城内教堂中的丑恶偶像和各种污秽腌臢被一扫而净”[31]，但事实并非如此。穆罕默德二世重建的君士坦丁堡与基督教世界想象中的可怕的伊斯兰堡垒迥然不同。苏丹自认为不仅是一位穆斯林统治者，还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因此着手重建了一座多元文化的都城，所有的公民在这座城市都享有一定的权利。他以强制手段让希腊基督徒和土耳其穆斯林都在城里安家，保障了在加拉塔的热那亚飞地的安全，并禁止土耳其人在加拉塔居住。曾激烈反对东西方教会联合的僧侣真纳迪奥斯在战后被变卖为奴，但苏丹将他从埃迪尔内赎回，让他重返城市，担任东正教社区的牧首。苏丹对他告诫道：“去做牧首吧，愿你好运，并请放心，我一定会对你友善相待。你将享有在你之前的历代牧首曾享有的特权。”[32]基督徒居住在自己的社区内，并保留了自己的一些教堂，尽管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们必须穿着显眼的服装，并被禁止持有武器。这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宽容的政策。作为对照，在地中海的另一端，天主教双王于1492年收复了西班牙全境，强迫所有穆斯林和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否则就将他们驱逐出境。西班牙犹太人被鼓励移民奥斯曼帝国——“世界的避难所”。根据犹太难民的经历，他们在奥斯曼帝国总的来讲受到了友好的待遇。“在土耳其人的国度，我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一位拉比写信给在欧洲的兄

弟，“我们拥有巨大的财富，手头有很多金银。我们没有被征收苛捐杂税，我们的商业活动也非常自由，不受任何阻碍。”[33] 穆罕默德二世因为这些宽容政策，受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很多批评。他的儿子，更为虔诚的巴耶济德二世宣称，他的父皇“受到奸臣和伪善者的蛊惑”，“违反了先知的律法”[34] 。

随着光阴流逝，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色彩越来越浓厚，但穆罕默德二世给这座城市确定了多元文化的基调（这的确令人吃惊），使它成为典型的黎凡特城市。对那些不受陈腐观念影响、愿意亲自观察的西方人来说，君士坦丁堡有很多让他们意外的地方。1499年，德意志人阿诺尔德·冯·哈尔夫[35] 访问了这座城市，在加拉塔吃惊地发现了两座方济各会修道院，那里仍然在举行天主教弥撒。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异教徒的人们都很清楚他们的宽容。“土耳其人并不强迫任何人背弃自己的信仰，并不特别努力去劝说任何人改宗，而且非常鄙视叛教者。”[36] 匈牙利的乔治在15世纪写道。这与宗教改革期间令欧洲四分五裂的宗教战争形成了鲜明对照。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难民流动总的来讲是单方向的：从基督教国家逃往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二世本人更热衷于建设一个世界帝国，而不是让全世界都皈依伊斯兰教。



奥斯曼书法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西方来说是个巨大的伤痛。它不仅挫伤了基督教世界的自信，还被认为是古典世界的悲剧性终结，“荷马和柏拉图的

第二次死亡”[37]。但它的陷落同样也把这个地区从贫困、孤立和破败中解脱了出来。普罗科匹厄斯在6世纪称颂的被“水的花环”[38]围绕的城市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富饶的多元文化帝国的首都，跨越两个世界和十几条贸易路线，再一次焕发了生机活力。西方人相信土耳其人是世界末日产生的长尾巴的怪物，“一半是人，一半是马”[39]。就是这些人建设了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美丽城市，与黄金的基督教城市不同，但同样光彩照人。

君士坦丁堡城内带遮阳篷的集市和埃及市场的迷宫般小巷又一次开始经营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骆驼商队和商船又一次把它和黎凡特的所有主要贸易据点联系起来。但对乘船从马尔马拉海接近城市的水手们来说，君士坦丁堡的地平线旧貌换新颜。在圣索菲亚清真寺身侧，城市的山坡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很多清真寺的灰色铅皮屋顶。城市的地平线上还屹立着许多纤细如针或粗如铅笔的白色尖塔，这些尖塔带有凹槽，多层阳台上雕刻着精美的花饰。一连好多位才华横溢的清真寺建筑师在直冲云霄的穹顶下创作出了抽象而永恒的建筑空间：清真寺内部沐浴在安详的日光下，砖块上刻有精细复杂的几何图形、书法和花朵图案。这些图案的诱人色彩——鲜亮的番茄色、绿松石色和青瓷色，再加上大海深处的清澈碧蓝，制造出了《古兰经》中描摹的“无边无际的乐园的影像”[40]。

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伊斯坦布尔是一座赏心悦目、莺声燕语的城市，遍布木屋和柏树，随处可见喷泉、花园、静穆优雅的墓园和地下集市，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工匠们忙得不可开交。每种职业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聚集地，身着五花八门服饰、头戴形形色色帽子的黎凡特各民族在这里劳作或经商。从街角或者清真寺的平台上往往能够突然瞥见大海。十几座清真寺发出的召唤祈祷声从早到晚覆盖了城市的每个角落，就像当地小贩的叫卖声一样亲切。在托普卡帕宫森严的大墙之后，奥斯曼苏丹们建造了可与阿兰布拉宫[41]和伊斯法罕城[42]媲美的恢宏宫殿：

一系列纤弱的砖砌楼台亭阁，更像是坚固的帐篷，而不是普通建筑物，坐落在五彩缤纷的御花园内。苏丹们从这里可以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亚洲的群山。奥斯曼帝国的艺术、建筑和礼仪使伊斯坦布尔成了一个极具视觉震撼力的世界，就像之前的基督教君士坦丁堡一样，令西方访客叹为观止。“我目睹了这个小世界的景观，伟大的君士坦丁堡城，”爱德华·利思戈在1640年写道，“它的灿烂辉煌令观察者目瞪口呆……全世界的人对它赞不绝口，人间没有任何东西能与其媲美。”[43]



新地平线：从海上看伊斯兰城市

历代苏丹为庆祝自己的凯旋而命人制作的细密画中对奥斯曼帝国治下的伊斯坦布尔的旖旎风光进行了极其生动形象的描绘。图画中是一个由原色构成的欢欣世界，景致扁平，没有透视效果，就像砖块和地毯上的装饰图案。图画中有宫廷觐见和宴会、战役和围城、枭首、游行队伍和节庆、帐篷和旗帜、喷泉和宫殿、精美的长袍和甲胄，以及美丽的骏马。这是一个酷爱礼仪排场、鼓乐噪音和光彩的世界。图画中还描绘了

斗羊比赛、杂技演员、做烤肉的厨师、烟火表演；成群的近卫军士兵敲锣打鼓，无声地在页面上行军；在金角湾，杂技演员从船只桅杆之间连接的绳索上走过；戴白头巾的骑兵队伍策马经过富丽堂皇的帐篷；有的图画就是城市的地图，色泽鲜艳得如同珠宝；所有图画都五颜六色、光彩夺目：鲜红色、橙色、品蓝色、丁香色、柠檬色、栗色、灰色、粉红色、碧绿色和金色。细密画展现的世界似乎表达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成就（仅仅200年间，就从游牧部落一跃成为大帝国）的喜悦和骄傲。这也是塞尔柱突厥人曾经在科尼亚[44]圣城的一座门廊上写下的文字（“我所创建的，世间无人能及。”[45]）的回音。

1599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向苏丹穆罕默德三世赠送了一台管风琴，作为友谊的象征。管风琴的制作者托马斯·达勒姆也亲自前往，为奥斯曼统治者演奏。这位大音乐家被人带领着穿过宫殿的连续多个庭院，最后来到苏丹面前。他被富丽堂皇的礼仪深深震撼，“这景象让我几乎以为自己已经身处另一个世界”[46]。自君士坦丁大帝于4世纪建立第二罗马和第二耶路撒冷以来，所有到访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访客都表达了同样的赞叹。法兰西人皮埃尔·吉勒在16世纪写道：“在我看来，其他城市终有一死。而只要人类尚存，这座城市就将一直延续下去。”[47]

---

[1]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p.135

[2] Camariotes，Matthew，“De Constantinopoli Capta Narratio Lamentabilis，” in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es*，*Series Graeco-Latina*，vol. 160，ed. J. P. Migne，Paris，1866，p.1070

[3]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2 vols.，Milan，1976，p.416

[4]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2 vols.，Milan，1976，pp.44-6

[5] Doukas，*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trans. Harry J. Magoulias，Detroit，1975，pp.234-5

[6] quoted Lewis，Bernard，*Istanbul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Norman，1968，p.8

[7] Khoja Sa'd-ud-din，*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trans. E. J. W. Gibb，Glasgow，1879，p.33

[8]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p.76

[9] quoted Wheatcroft，Andrew，*The Ottomans*：*Dissolving Images*，London，1995，p.23

[10] 即希腊的优卑亚岛，是希腊仅次于克里特岛的第二大岛。威尼斯人将这个岛称为"内格罗蓬特"，这个名字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是"黑桥"。

[11] 希腊南部麦西尼亚州的港口城市，今称迈索尼。"莫东"是威尼斯人给它取的名字。

[12]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xxxviii

[13] quoted Schwoebel，Robert，*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the Turk*，*1453-1517*，Nieuvvkoop，1967，p.8

[14] quoted Schwoebel，Robert，*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the Turk*，*1453-1517*，Nieuvvkoop，1967，p.4

[15] 即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1405～1464，1458～1464年在位），他同时也是一位人文主义者、诗人和历史学家。

[16] quoted Schwoebel，Robert，*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the Turk*，*1453-1517*，Nieuvvkoop，1967，p.9

[17] quoted Schwoebel，Robert，*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the Turk*，*1453-1517*，Nieuvvkoop，1967，p.4

[18] Lewis，Bernard，*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London，1982，p.32

[19] Ibn Taghribirdi，Abu al-Mahasin Yusuf，*History of Egypt*，*Part 6*，*1382-*

1469 A.D. ，trans，W. Popper，Berkeley，1960，pp.38-9

[20] Doukas，*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vol. 5，Paris，1870，p.300

[21] Inalcik，Halii，*The Ottoman Empire*：*Conquest*，*Organization and Economy* ，London，1978，p.56

[22] quoted Schwoebel，Robert，*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the Turk*，*1453-1517* ，Nieuvvkoop，1967，p.43

[23]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 ，ed. E. Cornet，Vienna，1856，p.66

[24] quoted Schwoebel，Robert，*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the Turk*，*1453-1517* ，Nieuvvkoop，1967，p.11

[25] quoted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1978，p.358

[26] 意大利东南部港口城市，与阿尔巴尼亚隔海相望。

[27] quoted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Princeton，1978，pp.170-71

[28] 理查德·诺尔斯（约1545～1610），英国史学家，他的《土耳其通史》是用英语写成的第一部关于奥斯曼帝国军政的史书。他的文笔也受到文豪塞缪尔·约翰逊的赞扬。

[29] *Othello*

[30] quoted Matar，Nabil，*Islam in Britain 1558-1685* ，Cambridge，1998，p.158

[31] Khoja Sa'd-ud-din，*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 ，trans. E. J. W. Gibb，Glasgow，1879，p.33

[32] quoted Runciman，Stephen，*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Cambridge，1965，p.155

[33] quoted Mansel，Philip，*Constantinople*：*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1453-1924* ，London，1995，p.15

[34] quoted Mansel，Philip，*Constantinople*：*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1453-1924*，London，1995，p.32

[35] 阿诺尔德·冯·哈尔夫（1471～1505），出生于科隆的骑士和旅行家，他曾前往耶路撒冷朝觐，游历了近东很多国家，包括奥斯曼帝国。他在著作中记述了自己在这些国度的见闻。

[36] quoted Mansel，Philip，*Constantinople*：*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1453-1924*，London，1995，p.47

[37] quoted Schwoebel，Robert，*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the Turk*，*1453-1517*，Nieuvvkoop，1967，p.9

[38] quoted Freely，John，*The Companion Guide to Istanbul*，Woodbridge，2000，p.3

[39] quoted Matar，Nabil，*Islam in Britain 1558-1685*，Cambridge，1998，p.159

[40] quoted Levey，Michael，*The World of Ottoman Art*，London，1971，p.15

[41] “阿兰布拉”的意思是“红色城堡”或“红宫”，位于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是古代清真寺、宫殿和城堡建筑群。宫殿为原格拉纳达摩尔人国王所建，现在则是一处穆斯林建筑、文化博物馆。该宫城是伊斯兰教世俗建筑与园林建造技艺完美结合的建筑名作，是阿拉伯式宫殿庭院建筑的优秀代表，1984年被选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42] 位于今伊朗，历史悠久，一度是伊斯兰世界辉煌和繁荣的名城。

[43] quoted *Istanbul*：*Everyman Guides*，London，1993，p.82

[44] 位于今土耳其西南部。

[45] quoted Levey，Michael，*The World of Ottoman Art*，London，1971，p.18

[46] quoted Mansel，Philip，*Constantinople*：*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1453-1924*，London，1995，p.57

[47] quoted Freely，John，*The Companion Guide to Istanbul*，Woodbridge，2000，p.14

尾声：安息之地



死亡阻挡了凶悍而顽强的野蛮人，这对基督教世界和意大利来说真是大幸。[1]

——乔万尼·萨格雷多，17世纪威尼斯贵族

1481年春季，苏丹的马尾旗被插在了伊斯坦布尔对岸的安纳托利亚海岸上，表明这一年的征战将在亚洲进行。除了苏丹本人之外，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主要大臣，知晓战役的真正目标，这对穆罕默德二世的一贯低调和保密来说是很典型的。新战争的目标很可能是要讨伐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

30年来，苏丹从不懈怠，努力去建设他的世界帝国，事必躬亲地处理国家大事：任命和处决大臣、接受贡礼、重建伊斯坦布尔、强制迁徙人口、对经济进行重新规划、缔结条约、对顽固不化的人进行残酷的惩罚、授予宗教自由，一年年地向东方和西方派遣军队，或者御驾亲征。这一年，他49岁，百病缠身。无情的光阴和自我放纵使得他的身体十分衰弱。根据当时的一份不甚恭敬的报告，他颇为肥胖，“脖子短粗，面色蜡黄，肩膀过高，嗓门很大”[2]。像收集战役奖章一样收集了大量头衔（“战争的雷霆”“海洋与陆地的权力与胜利之王”“罗马人和地球的皇帝”“世界征服者”）的苏丹有时几乎无力行走。他患有痛风和令身体畸

形的肥胖症，深居托普卡帕宫，远离世人的视线。被西方称为“饮血暴君”“尼禄第二”的苏丹的外貌已经非常可怕。法兰西外交官菲利普·德·科米纳[3]声称，“见过他的人告诉我说，他的两腿肿胀得可怕，快到夏天的时候，肿块有人的身体那么大，而且无法割破。然后肿胀消退了”[4]。在宫墙之后，穆罕默德二世从事着对暴君来说不寻常的活动：园艺、手工，以及向新近从威尼斯招来的画家真蒂莱·贝利尼订制淫秽的壁画。贝利尼的名作就是苏丹的最后一幅肖像，它被装裱在一座金色拱形结构下，顶端放置皇冠，暗示了苏丹的某些无法得到抚慰和满足的本质：世界征服者一直到最后都喜怒无常、高度迷信和惶惶不安。

4月25日，穆罕默德二世渡过海峡，抵达亚洲，准备发动这一年的战役，但几乎当即就患了严重胃病，卧床不起。在几天的痛苦折磨之后，他于1481年5月3日在盖布泽[5]驾崩。历史上的另外一个雄心勃勃要征服世界的人——汉尼拔就在此地服毒自尽。穆罕默德二世的结局笼罩在迷雾中。他极有可能是被自己的波斯御医毒死的。虽然许多年来，威尼斯人多次企图刺杀他，但嫌疑最大的人却是他的儿子巴耶济德。穆罕默德二世设定的兄弟相残的继承法则或许诱使这位王子先发制人，夺取皇位。他成功了。父子的关系并不亲近。虔诚的巴耶济德非常憎恶穆罕默德二世的非正统宗教观点。根据意大利某宫廷的流言，巴耶济德曾说，“他的父皇非常专横霸道，不信先知穆罕默德”[6]。30年后，巴耶济德也被自己的儿子“恐怖的”塞利姆毒杀。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说，“王公之间没有亲属关系”[7]。在意大利，人们听到穆罕默德二世的死讯，特别欢欣鼓舞。礼炮齐鸣，钟声敲响；在罗马，人们燃放烟火，举行感恩礼拜。将这消息送到威尼斯的信使宣称，“雄鹰已死”[8]。就连开罗的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也长舒了一口气。

今天，法提赫（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陵寝坐落于伊斯坦布尔一个市区的一座清真寺建筑群内，这个市区和建筑群均以他的称号“法提赫”命名。陵寝的选址不是偶然的。它取代了拜占庭最著名和历史最悠

久的教堂之一：圣使徒教堂。城市的创建者君士坦丁大帝于337年被隆重地安葬在这座教堂中。穆罕默德二世无论生死都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他的陵寝后来被地震摧毁，又得到了彻底重建，所以现在的皇陵内部就像19世纪的法国客厅一样金碧辉煌，配有老爷钟、巴洛克式的天花板装饰和悬挂的水晶枝形吊灯，简直就是一位穆斯林的拿破仑的安息之地。装饰华美的墓穴覆盖绿布，顶端有雕刻出来的头巾。墓穴的长度和一门轻型火炮相当。人们来这里祈祷、阅读《古兰经》，或者拍照留念。随着光阴流逝，法提赫逐渐被奉为圣人。对穆斯林信众来说，他渐渐有了圣人的特征，于是他有了双重身份，既是神圣的，又是世俗的。和丘吉尔一样，他既是整个国家最具代表性的品牌（卡车的品牌、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一座大桥、纪念邮票或者学校建筑上特别显眼的纵马狂奔的英雄形象，都打起了穆罕默德二世的招牌），也是虔诚的象征。法提赫区是传统而新近自信昂扬起来的穆斯林伊斯坦布尔的中心地带。这是个安静平和的地区：祈祷结束后，戴头巾的妇女聚集在清真寺庭院内的悬铃木树下聊天，儿童在她们周围转着圈玩耍，流动小贩叫卖着芝麻卷、玩具汽车和动物形状的氦气球。在穆罕默德二世陵墓的门廊处摆放着一发石制炮弹，似乎是许愿的供奉。

这场围城战中的其他重要奥斯曼人物的命运告诉我们，伴君如伴虎。素来反对战争政策的哈利勒帕夏的末日来得很快。1453年8月或9月，他在埃迪尔内被处以绞刑。接替他职位的是扎甘帕夏，那个热切支持战争的希腊叛教者。老维齐尔的命运标志着国家政策的一个决定性转折：从此以后，几乎所有的维齐尔都是改宗伊斯兰教的奴隶出身，而不是门阀贵族阶层的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至于对胜利贡献极大的铸炮大师乌尔班，有言之成理却无法证实的证据表明，他在战役中活了下来，从苏丹那里得到了赏赐：在占领伊斯坦布尔之后，城里有一个区叫作“炮手乌尔班区”，说明这个匈牙利雇佣兵可能在城里定居了，尽管此前他曾花了很大力气来摧毁它的城墙。在阿拉伯人第一次攻打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阵亡的先知追随者艾优卜对圣战者来说是个极大的激励。奥

斯曼人在金角湾北端风景宜人的郊区埃于普（即土耳其语中的“艾优卜”）的悬铃木树林中为他建造了专门的清真寺建筑群。这是朝觐的圣地，几百年来历代苏丹就在这里的清真寺加冕。

成功逃生的守军后来的命运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希腊难民一般都经历了家园沦丧的难民的典型命运：在异邦忍受贫困，对失去了的城市无比思念。很多人在意大利勉强谋生（到1478年，仅在威尼斯就有4000个希腊人），或者在克里特岛，那里是东正教会的一个堡垒。他们散布到全世界，甚至到了遥远的伦敦。帕里奥洛格斯家族的血统逐渐被欧洲的较次要的贵族吸纳。帕里奥洛格斯家族的一两个后人由于思乡心切或者无以度日，返回了君士坦丁堡，寄希望于苏丹开恩。其中至少有一人，安德鲁，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了苏丹宫廷的一名官员，改名为穆罕默德帕夏。最能体现希腊人悲剧命运的或许就是乔治·斯弗朗齐斯夫妇的经历。他们在科孚岛的修道院了却残生。斯弗朗齐斯写下了一部简短而悲戚的编年史，记述了自己的一生。这部史书是这样开始的：“我是命途多舛的乔治·斯弗朗齐斯，御橱首席总管大臣，现在作为修道士的法号是格列高利。我将讲述我这悲惨一生中发生的事件。如果我从来不曾降生到这个世界，或者在幼年就夭折，一定更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请诸位读者知晓，我出生于1401年8月30日，星期二。”[9] 斯弗朗齐斯以简明而哽咽的语调记录了奥斯曼帝国扩张带来的双重悲剧：他个人的悲剧，以及拜占庭国家的悲剧。他的两个孩子都被送入了苏丹后宫；他的儿子于1453年在后宫被处决。他对1455年9月的记述是：“我美丽的女儿萨玛尔在苏丹后宫患传染病而死。她的凄惨的父亲是多么可怜！她享年只有14岁又5个月。”[10] 他一直活到1477年，目睹了希腊全境被土耳其占领，希腊人的自由彻底丧失。他在著作的结尾再次肯定了东正教关于“和圣子”（filioque）的观点，就是这个问题在围城期间带来了那么多周折。“我坚信，圣灵并非由圣父和圣子所共发，就像意大利人所称的那样，而是全无分隔，从圣父所发生。”[11]

从围城战中幸存下来的意大利人的命运也同样各不相同。负伤的朱斯蒂尼亚尼返回了希俄斯岛。根据他的热那亚同胞莱奥纳德大主教的说法，朱斯蒂尼亚尼不久之后就死去了，“要么是因为伤重不治，要么是因为失败的耻辱”[12]，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责怪他造成了最后的失败。他的墓志铭（现已遗失）上写着：“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安息于此，他是一位伟人，热那亚与希俄斯岛的贵族。在君士坦丁堡被攻破时，拜占庭末代皇帝和东方基督徒的勇敢领袖——最尊贵的君士坦丁不幸阵亡。在此期间，朱斯蒂尼亚尼被土耳其君主穆罕默德打成重伤，于1453年8月8日逝世。”[13] 莱奥纳德则于1459年在热那亚去世。基辅的伊西多尔红衣主教当初到君士坦丁堡的使命是促使希腊人与西方教会联合。教皇任命他为君士坦丁堡牧首（缺席），尽管教皇其实并没有这个权力。伊西多尔罹患老年痴呆，于1463年在罗马去世。

君士坦丁十一世本人的结局却始终无法确定，他也没有墓地。皇帝的阵亡宣示了拜占庭世界的彻底灭亡，以及土耳其对希腊的占领。拜伦[14] 在有生之年也看不到土耳其统治的消亡。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神秘命运成了希腊人灵魂深处对沦丧了的拜占庭光荣的渴望的焦点。随着光阴流逝，人们围绕他的名字编织了大量预言。在希腊大众文化中，他成了亚瑟王一般的神奇英雄人物，往昔和未来之王，长眠在黄金门旁的坟冢内，有一天将会归来，穿过那城门，将土耳其人向东驱逐，一直到红苹果树那里，并收复君士坦丁堡。奥斯曼人对皇帝的神奇形象非常畏惧。穆罕默德二世小心谨慎地监视着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兄弟们，另外还用砖石将黄金门彻底封闭。这些传奇故事使得在有生之年命运悲惨的君士坦丁十一世在死后有了一段新的悲剧生命。到19世纪末，他的遗产将与希腊的民族主义理想合二为一，即所谓“伟大理想”：将拜占庭的希腊居民重新收纳进希腊国家。这促使希腊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兵干预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却被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于1922年击败，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士麦那的希腊居民遭到屠杀，后来进行了人口交换。直到这时，重建拜占庭的梦想才彻底破灭。

如果说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精神尚存，那么不是在伊斯坦布尔，而是在1000英里之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他曾以中世纪小城米斯特拉斯为首府，统治摩里亚。200年间，在别处均已衰败的拜占庭文化传统在米斯特拉斯却得以繁荣发展，令人惊异。它仍然是拜占庭灵魂的神龛：在现代，城堡下方的村庄内，每一根路灯柱都带有双头鹰徽记。在帕里奥洛格广场上矗立着君士坦丁十一世挥剑保卫基督教信仰的雕像，尽管他的最终结局无人知晓。雕像坐落在一座大理石柱基前方，柱基上刻有杜卡斯的言辞。在雕像头顶上张挂着拜占庭旗帜，那是一面带有黑鹰的鲜黄色旗帜，在希腊的蔚蓝天空中悬挂着，不起一丝涟漪。雕像后方就是中世纪的米斯特拉斯古城，芳草茵茵的山坡上有很多坍塌崩坏的宅邸、教堂和厅堂，之间有柏树。这是个令人心酸的地方。在这里，君士坦丁堡得以在缩小的规模上重建，成了希腊的佛罗伦萨，尽管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在这里，艺术家们创作了光辉灿烂的壁画，展现了人文主义对福音的诠释；人们重拾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教诲，憧憬黄金的未来，直到奥斯曼军队将米斯特拉斯摧毁。君士坦丁十一世可能就是在圣德米特里大教堂（它其实只有英国的乡村教堂那么大）加冕的；他的妻子狄奥多拉则被安葬在圣索菲亚教堂。山顶屹立着摩里亚君主的宫殿，背后就是光秃秃的泰格图斯群山，下方则是延绵不绝的斯巴达台地。这座宫殿的建筑风格与君士坦丁堡城墙附近的皇宫相似。我们可以想象，皇帝当年曾经从通风良好的厅堂的窗洞俯视下方的碧绿平原。斯巴达重步兵曾经在这里操练，为温泉关战役做准备；拜占庭人则在这里种植橄榄和小麦，饲养蜜蜂和丝蚕。每年5月29日，土耳其人都会在埃迪尔内门举行战役重演，以庆祝攻克伊斯坦布尔；与此同时，克里特岛带有桶状拱顶的乡村小教堂和希腊诸多城市的大教堂内都会举行纪念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活动，尽管在东正教眼中他至死都是个异端分子，因为他支持与西方教会联合。

在伊斯坦布尔，曾经的基督教城市没有留下多少遗迹，尽管人们仍然可以走过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黄铜大门（这些大门在1453年5月29日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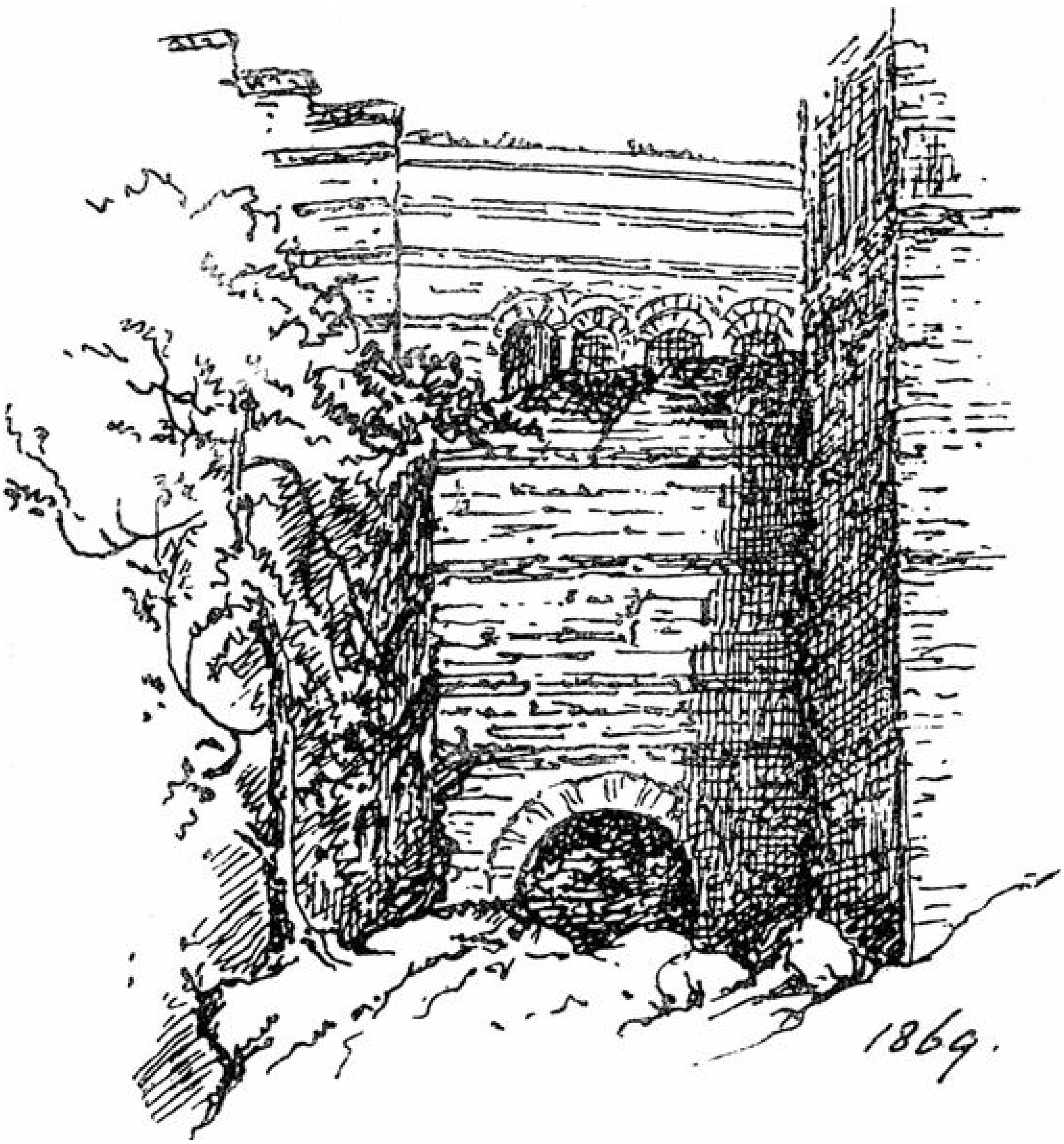
最后一次用武力打开），从举手降福的基督马赛克像下走过，走进教堂的大厅。这座大厅在今天和在6世纪一样，令人叹为观止。城市本身被包容在金角湾和马尔马拉海形成的两边之内，在外观上仍然保留了这决定历史走向的特殊形状。今天，渡船就像当年援救君士坦丁堡的4艘基督教船只那样，从西方稳步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经过卫城（那里曾经爆发海战），然后和古代的航船一样转弯进入金角湾入口。今天的金角湾没有铁链，却建起了一座通往加拉塔的大桥。在金角湾北上的下一站，渡船可以在卡西姆帕沙（“泉源谷”）停歇，穆罕默德二世的战船曾翻山越岭，一艘接一艘地在那里入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如梅利堡（割喉堡）依然横跨那里地势奇特的山坡，水边的主塔（那是哈利勒建造的工程）上飘扬着一面鲜红的土耳其国旗。

城市的部分海墙，尤其是金角湾沿岸的海墙，今天已经只剩残垣断壁。但三角形的第三条边，宏伟的狄奥多西城墙依然威风凛凛。今天从机场出来的游客一下子就能够看到这一盛景。在近距离观察，就能发现1500个春秋留下的印迹：部分城墙残破坍塌，有些地方已经破败不堪，还有些地方新近做了修补，与古老的墙砖非常不协调；塔楼以奇怪的角度倾斜，被地震或炮弹破坏，或者被岁月磨损；曾给奥斯曼军队制造了很大麻烦的壕沟现在已经长满蔬菜，一派和平景象；主干道穿过了一些地段的防御工事，新的地铁体系对防御工事的破坏比当年的塞尔维亚坑道工兵更厉害。但总的来讲，虽然承受了现代世界的巨大压力，狄奥多西城墙的全段几乎都是完整无缺的。在城墙沿线，人们可以从一片大海走到另一片，沿着起伏的地势，走下里卡斯河谷倾斜的中段城墙，那里的城墙早已被中世纪的炮火摧毁；或者可以站在城墙顶端，想象下方的平原当年遍布奥斯曼大军的帐篷和招展旌旗的景象，如同“郁金香的花坛”[15]，而桨帆船无声地在闪闪发光的马尔马拉海或金角湾航行。围城战期间的几乎所有城门都保存至今，它们的沉重拱门的阴影仍然令人生畏。但黄金门早就被穆罕默德二世命令用砖石堵死了，这是为了防止君士坦丁十一世重返人间的预言成真。今天通过一条两侧摆放乌尔班大炮

的石弹的林荫大道，可以走到黄金门。对土耳其人来说，最重要的城门是埃迪尔内门，也就是拜占庭时期的查瑞休斯门。这里安放着一块铭碑，记载了穆罕默德二世当年从此正式进入伊斯坦布尔的盛景。但在围城战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几座城门都在北面靠近金角湾的地段，今天已经被彻底遗忘。

在这里，城墙突然转了一个90°的弯。在这拐弯处附近一块荒地的后方，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宫废墟的旁边，有一座不起眼的被砖石堵死的拱门，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改建和修葺造成的典型例子。有人说，这就是预言中的竞技场门，在最后的战斗中被打开的小边门，第一批奥斯曼士兵就是从这里登上城墙的。或者，竞技场门其实在别的什么地方。关于这场伟大攻城战的事实很容易就演化成了神话。

在1453年春季的战役中居功至伟的大炮仍然可以在现代伊斯坦布尔城内找到。它们散布在全城，安睡在城墙旁边或者在博物馆庭院内。这些原始的带箍的管状火器大体上没有受到500年风吹日晒的影响。有的大炮旁边还摆放着它们曾发射的花岗岩或大理石球形炮弹。乌尔班巨炮如今已经无迹可寻，它可能在位于托帕内[16]的奥斯曼铸炮厂被熔化了。查士丁尼的巨型骑马像也被送到那里熔化掉了。穆罕默德二世遵循占星家的建议，将这座雕像拆除，但它在广场上待了很长时间，最后才被拖去熔化。16世纪，法兰西人皮埃尔·吉勒曾在那里看到雕像的一部分。“碎片当中包括查士丁尼像的腿，它的长度超过我的身高。还有他的鼻子，超过9英寸长。马腿躺在地面上，我不敢公然去测量它们，但偷偷量了其中一个马蹄，发现它的高度达到9英寸。”[17]这是世人对伟大皇帝的雕像，以及拜占庭的璀璨辉煌的最后一瞥。很快，它们就被熔炉吞噬了。



被砖石堵死的黄金门

[1] quoted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Princeton，1978，p.408

[2] quoted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Princeton，1978，p.424

[3] 菲利普·德·科米纳（1447～1511），勃艮第和法兰西政治家、外交官和作家。他的回忆录是15世纪欧洲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

[4] quoted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Princeton，1978，p.424

[5] 土耳其城市，位于马尔马拉海北岸，伊斯坦布尔以东约30英里处。

[6] quoted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Princeton，1978，p.411

[7] quoted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Princeton，1978，p.405

[8] quoted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Princeton，1978，p.408

[9] Sphrantzes，George，*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trans. Marios Philippides，Amherst，1980，p.21

[10] Sphrantzes，George，*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trans. Marios Philippides，Amherst，1980，p.75

[11] Sphrantzes，George，*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trans. Marios Philippides，Amherst，1980，p.91

[12]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1 vols.，Milan，1976，p.162

[13] quoted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vol. II*：*The Fifteenth Century*，Philadelphia，1978，p.429

[14] 乔治·戈登·拜伦勋爵（1788～1824），英国浪漫派大诗人，曾赴希腊参加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希腊独立战争，结果患热病而死，成为希腊的民族英雄。

[15] Chelebi，Evliya，“Le Siège de Constantinople d'après le Seyahatname d'Evliya Chelebi，” trans. H. Turkova，*Byzantinoslavica*，vol. 14，1953，p.2

[16] 今天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区。

[17] Gilles，Pierre，*The Antiquities of Constantinople*，London，1729，p.130

资料来源



这场战争中发生了诸多事件，无法全部付诸笔端，口舌也不能尽述。[1]

——内希里[2]，15世纪奥斯曼史学家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或者说是奥斯曼人占领伊斯坦布尔，是中世纪一个承前启后的时刻。这个消息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人们对这个故事兴趣盎然，如饥似渴，这使得海量的文字资料得以保存下来。报道这起事件的文献汗牛充栋，这诚然是一种福气。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将各个部件组合起来并不能得到一个整体。事件的目击者其实是很少的，而且大部分是基督徒；本书的读者一定已经熟悉了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大主教，他是个脾气火爆的天主教教士；随船医生尼科洛·巴尔巴罗，他写下了在日期记录上最为可靠的日记；佛罗伦萨商人贾科莫·特塔尔迪；俄罗斯东正教徒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图尔松贝伊，他是奥斯曼帝国的一名官员；还有其他一两个人，比如乔治·斯弗朗齐斯，他的编年史让现代史学家非常头痛。在这些亲历者之后，有一小群人的生活年代与围城战相距不远，他们很可能在战役结束后不久就听到了二手的记述。其中包括情绪激动的希腊史学家杜卡斯，他的著作非常生动形象，然而不太可靠，充满了虚

构的故事，但给故事注入了一种活泼的能量。另外一个希腊人克利托布罗斯是因布洛斯岛上的一名法官，他虽然是基督徒，著作却是倾向于奥斯曼帝国的，这非常独特。这位雄心勃勃的史学家的一个愿望是，“西方所有民族”都会阅读他的作品，包括那些居住在不列颠诸岛的人。随后几个世纪中又涌现了很多来自双方的文献，其中一些是直截了当的重述，有的则添加了一些道听途说、失落了的口头记述、神话以及基督教的或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宣传，产生了大量无法证实、容易醉人的混杂信息。本书就是在这些叙述的基础之上写成的。

在处理这些原始资料时，我遇到了很多困难。当然，这些困难是历史研究中特有的，尤其是科学时代之前的历史。围城战的目击者在估测军队兵力和伤亡数字时倾向于给出很大的整数，对日期和时间的记录非常含糊，使用的是他们本地的度量衡系统（这让人非常恼火），而且常常为了哗众取宠而夸大其词。各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顺序一般都是事后捏造的，而事实、故事和神话之间的区别非常微妙。宗教迷信和事件难解难分，因此对城市陷落的记述其实是真实事件与人们的信念的混合。当然，记述者们根本没有客观报道的概念。

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的视角和动机，因此我必须小心谨慎地分析每位作者的观点和特殊利益。作者常常在宗教、民族和信仰的基础上做出评判。威尼斯人当然会大肆宣扬他们的水手的英勇无畏，并诋毁热那亚人的奸诈。热那亚人也是这么干的。意大利人控诉希腊人的怯懦、懒惰和愚蠢。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在信仰鸿沟的两边互相指责。在基督教阵营内，各派系都在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寻找神学上或者现实中的原因，互相口诛笔伐、大肆攻击。当然，所有的基督教作者都会辱骂嗜血暴君穆罕默德二世，只有克利托布罗斯是个例外，他对苏丹极尽谄媚之能事。奥斯曼人自然对基督徒的攻击以牙还牙。

这些目击者讲述的故事总是非常扣人心弦。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自

己目睹和亲历的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各种版本的故事却都有语焉不详的地方。1453年对土耳其民族的历史意义极其重大，但奇怪的是，很少有当时奥斯曼人对攻陷城市过程的记述，没有目击者的叙述。除了谢赫阿克谢姆赛丁（Akshemsettin）给穆罕默德二世的信件之外，几乎没有对穆斯林士兵的情感与动机的描述。当时的奥斯曼社会总体上还是不识字的，他们依赖口头传播，也没有将个人的故事记录下来的传统。他们唯一的文字记载就是文字简练的编年史，后来奥斯曼人对这些编年史做了重新加工，以帮助构建奥斯曼皇朝的传奇。因此往往需要对基督徒记述的字里行间的东西进行仔细分析，才能解读出奥斯曼人的观点。1453年事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历史主要是由失败者书写的。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东正教希腊人也很少有文字记载流传下来。或许是因为很多地位显赫的拜占庭人在最后的洗劫中被杀，或者像乔治·斯弗朗齐斯一样过于悲痛，不肯执念于凄惨的往昔。基督教方面的故事主要是由意大利人和主张联合的希腊人写下的。他们对东正教守军，除了君士坦丁十一世之外，都毫不客气地大肆攻击。因此，故事中包含了很多或许永远无法揭开真相的谜团。土耳其史学家对奥斯曼军队究竟如何搬运战船进行了热烈的辩论。而君士坦丁十一世之死的真相始终笼罩在迷雾中，令人抓狂。不同派别都有自己的解释。事实上，焦躁而情绪激烈的穆罕默德二世在围城战期间似乎无处不在，在他身旁，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形象则显得模糊而虚幻。

我重述“君士坦丁堡的故事”的目标是从这些互相矛盾、困难重重的文献中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间版本，对事实的把握尽可能做到万无一失。我在迷宫般的文献中谨小慎微地择路前行，有时不免显得笨手笨脚，但总是努力使各种资料协调起来，并寻找最有可能的解释。虽然巴尔巴罗的日记对围城战的过程一天天记录下来，但日期仍然是非常难以确定的。每一份文献在事情经过和事件发生日期的细节上都有自己的说法，很多研究过这个主题的学者在某些微妙细节上或许不会同意我。如

果对本书做一番特别仔细的探究，就会发现事件的时间上有些小小的谜团。我保留了这些谜团，让它们作为无法确知、不可调和的东西的记录。总体上，我尽量选择在我看来可能性最大的时间顺序，并在我的叙述中尽可能避免使用“或许”“可能”“也许”这样可怕的词。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把普通读者拖到各种版本资料的泥沼中，那样对这个轮廓已经雄浑有力且五彩缤纷的故事并无助益。与此同时，如果地理、地形地貌、气候和时间的具体证据非常可靠，我就会走捷径，在某些细节上做大胆的推测。

我创作本书的第二个目标是捕捉人的声音：第一手地重建故事主要人物的言辞、偏见、希望和恐惧，并讲述“故事中的故事”，即历史人物相信的东西，以及可证实的真相。这些文献的作者往往都是极富个性的人物，几乎和他们讲述的故事一样具有异国风采和神秘感。有些人物，比如巴尔巴罗，只在自己的故事中存在，此外就完全沉默，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其他人，比如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和基辅的伊西多尔，在当时的教会史上还有更重要的角色要扮演。最令人着迷，同时也问题重重的文献包括俄罗斯东正教徒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记述，他似乎是作为奥斯曼军队的一名士兵来到君士坦丁堡的。根据推理，他似乎在围城战早期就逃进了君士坦丁堡，目睹和参与了很多事件。他对炮击和城墙上发生的事件的记述特别生动鲜明。后来他逃脱了奥斯曼人的报复，可能是装扮成僧侣躲在一座修道院内。他把传奇、道听途说和第一手的观察混为一体，充满神秘主义气息，常常不可思议，把日期和时间顺序搞得一团糟，很多作家倾向于将他的著作完全摒弃，但它的确包含很多令人信服的细节。在争夺城墙的战斗和处理死尸（他本人可能参加了这项工作）的问题上，他的描述特别具体和细致，这在其他文献中是没有的。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著作几乎是唯一一个写到希腊人战斗情况的资料来源，比如他写到了导致朗加比斯死亡的战斗。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记载中，似乎只有意大利人在战斗，希腊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消极厌战，最糟的情况下（由于宗教分歧）则是阻碍城防、牟取私

利和胆小如鼠。

另外两部编年史，乔治·斯弗朗齐斯和杜卡斯的著作，也注定要在后世有着自己的五彩缤纷的历史。世人皆知，斯弗朗齐斯根据同一个故事写了两个版本，分别称为《小编年史》和《大编年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都认为，《大编年史》只不过是对《小编年史》的扩充，因为后者对斯弗朗齐斯漫长一生中最重要（尽管非常悲惨）的事件——君士坦丁堡围城战几乎只字不提。《大编年史》文笔生动，细致具体，可信度很高，长期以来被广泛当作关于1453年事件的主要资料来源。但是，学者们已经明确无误地证明，《大编年史》其实是100多年后由一个名叫马卡里奥斯·梅里西诺斯的人假冒斯弗朗齐斯的名字，以第一人称捏造的，这的确是别出心裁的模仿。梅里西诺斯这人的履历可没法叫人放心。他是个教士，曾经为了赢得神学争端而伪造御旨。于是，《大编年史》的所有内容都受到了质疑。今天的史学家以不同方法小心对待这本书，因为任何人只要想写关于君士坦丁堡围城战的书，就必须决定好，如何对待《大编年史》。根据细致的文本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大编年史》确实是基于斯弗朗齐斯的一部业已失传的较长的史书；它的细节非常具体，如果真的完全是虚构的话，那也说明梅里西诺斯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小说家。斯弗朗齐斯在最后战斗前与君士坦丁十一世一起站在黑暗中塔楼上的那一幕就是梅里西诺斯写的；土耳其历史的一个代表性瞬间的故事——近卫军的巨人乌鲁巴特的哈桑率先将奥斯曼旗帜插上城墙——也源自梅里西诺斯。至少哈桑的故事非常具体和细致，不大可能是虚构的。

杜卡斯的编年史同样奇异——它是一部记录拜占庭陷落的悠长历史的著作。如果说杜卡斯并没有亲历围城战的话，他却目睹了与之相关的很多事件。他有可能目击了乌尔班大炮在埃迪尔内的试射，以及意大利船只在割喉堡被击沉后被俘水手被穆罕默德二世钉在尖木桩上的惨景。他的叙述栩栩如生、态度坚定不移，结尾却非常奇怪：在描述奥斯曼军

队于1462年攻打莱斯博斯时，一个句子还没写完就戛然而止，作者的命运（和故事中的很多东西一样）都悬而不决。对莱斯博斯事件的生动描述给人很强烈的印象，作者本人就在那里，所以有人猜测，希腊守军的最后崩溃使得他无法把史书写完。他和其他守军一样遭受了可怕的噩运（被锯成两截，因为奥斯曼人许诺，不会将他们斩首），还是被贩卖为奴？他就这样一句话没说完就彻底消失了。

对君士坦丁堡故事的讲述也有着自己的丰富历史。本书构建在历史悠久的大量英语作品的基础之上；对这个故事的研究从18世纪的爱德华·吉本开始，然后由两位英国骑士接手，1903年的埃德温·皮尔斯爵士和1965年的伟大拜占庭史学家史蒂文·朗西曼爵士，还有其他语言的大量著作。因布洛斯的克利托布罗斯早在500年前就发现了把故事讲好的困难之处，因此在给穆罕默德二世的献词中加入了一个聪明的免责声明。未曾亲历和目击史实的作者在给世界征服者献词时当然需要审慎。未来的新的史书都可以引用克利托布罗斯的话："我自己并非事件的目击者，因此，伟大的皇帝啊，我艰辛地劳作，去了解这些事情的确切真相。在撰写这部史书时，我有时咨询了那些了解真相的人，并准确地分析所有事情的经过……如果我的言辞无力描摹陛下的丰功伟业……在修史的问题上，我将甘愿让位于技艺比我更高超的人。"[3]

---

[1]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2 vols.，Milan，1976，p.261

[2] 奥斯曼史学家，生卒不详。其著作《世界大观》对史学贡献甚大，是奥斯曼帝国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但关于其生平的资料极少。他可能叫作穆罕默德，在布尔萨居住。1481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驾崩时，他在宫廷任职。

[3] Kritovoulos，（in English）*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trans. Charles T. Riggs，Westport，1970，pp.4-6

鸣谢

写作本书的设想已经酝酿了多年，要感谢的人也很多。如今能够成书，首先要感谢我的代理人Andrew Lownie、Faber出版社的Julian Loose和Hyperion出版社的Bill Strachan，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故事能够成功；然后还要感谢两家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和高度的专业素养，促成本书的问世。

至于本书的深层次起源，我对伊斯坦布尔的捍卫者Christopher Trillo永远心存感激，是他在1973年说服我去了那里；我还要感谢一直给我出谋划策的一小群至交老友：Andrew Taylor、Elizabeth Manners和Stephen Scoffham，他们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并审读了手稿。Elizabeth Manners还拍摄了罗马尼亚的摩尔多维查修道院的壁画，作为本书的封面照片。John Dyson在伊斯坦布尔为我搜集书籍，对我帮助极大，还对我盛情款待。Rita和Ron Morton在希腊也对我热情招待。Ron Morton和David Gordon-Macleod带我去了阿索斯山，去一睹现存拜占庭传统的风采。Annamaria Ferro和Andy Kirby帮助我做了翻译工作。Oliver Poole拍摄了照片，Athena Adams-Florou帮助我扫描了图片，Dennis Naish提供了关于铸炮的信息，Martin Dow在阿拉伯文方面给出了建议。对所有这些朋友，我都非常感激。最后，我还要永远感激Jan，她不仅提出了宝贵意见并帮助审稿，还在土耳其忍受被狗咬的痛苦，多年来一贯深爱和支持着我。

我还要感谢下列出版社许可我在本书中使用了大量节选。本书的部分材料来自《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的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故事》，由

Walter K.Hanak和Marios Philippides翻译和注解，由Aristide D.Caratzas出版社提供（Melissa International Ltd）；还有部分材料来自《征服者穆罕默德和他的时代》（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作者Franz Babinger，得到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授权许可。

译名对照表 [1]

Abraham of Ankara安卡拉的亚伯拉罕

Afrasiyab阿弗拉西亚布

Akshemsettin，Sheikh谢赫阿克谢姆赛丁

Ahmet艾哈迈德

Ahmet Gurani艾哈迈德·古拉尼

Ahmeti艾哈迈迪

Al-Kashgari喀什噶里（Mahmud al-Kashgari，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Al-Rawandi拉旺迪（Muhammad bin Ali Rawandi，穆罕默德·本·阿里·拉旺迪）

Alexios亚历克赛（Alexios IV Angelos，亚历克赛四世·安格洛斯）

Alfonso of Aragon and Naples阿拉贡和那不勒斯的阿方索

Alhambra阿兰布拉宫

Alp Arslan，Sultan艾勒卜·艾尔斯兰苏丹

Amasya阿马西亚

Anadolu Hisari安纳托利亚堡垒

Andrew（Mehmet Pasha）安德鲁（穆罕默德帕夏）

Andronikos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kos I Komnenos，安德罗尼库斯一世·科穆宁）

Anemas阿尼玛斯（地牢）

Anthemius安特米乌斯

Antonio de Corfu科孚岛的安东尼奥

Apocalypse of Pseudo-Methodius伪美多迪乌斯启示录

Arrian阿利安

Artevelde，Philip van菲利普·范·阿尔特维尔德

Asomaton阿索马通

Asper阿斯普尔

Aspron阿斯普隆

Ataturk，Kemal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Attila阿提拉

Avars阿瓦尔人

Aya Sofya mosque圣索菲亚清真寺

Ayyub艾优卜（Abu Ayyub al-Ansari阿布·艾优卜·安撒里）

Bacon，Roger罗吉尔·培根

Bactatinian Tower巴克塔提尼安塔楼

Baltaoglu巴尔托格鲁

Barlaam of Calabria卡拉布里亚的巴尔拉姆

Barbaro，Marco马尔科·巴尔巴罗

Barbaro，Niccolò尼科洛·巴尔巴罗

Battle of Agincourt阿金库尔战役

Battle of Manzikert曼齐刻尔特战役

Battle of the Masts桅杆之战

Bayburt巴伊布尔特

Bayezit I 巴耶济德一世

Bedouins贝都因人

Bektashi拜克塔什派

Bellini，Gentile真蒂莱·贝利尼

Benedict XII本笃十二世（教皇）

Benvenuto本韦努托（领事）

bey贝伊

Bezant拜占特

Blachernae布雷契耐（皇宫）

Bocchiardo，Troilo特罗伊洛·博基亚尔多

Bourges布尔日

Brankovic，George杜拉德·布兰科维奇（Durad Brankovic）

Brightman，Thomas托马斯·布莱特曼

Broquière，Bertrandon de la贝特朗东·德·拉·布罗基里埃

Brother George乔治兄弟

Bryennios，Joseph约瑟夫·布里恩尼奥斯

Bucoleon Palace牛狮宫

Bulgars保加尔人

Bursa布尔萨

Byzas拜占斯

Cafer Bey贾费尔贝伊

Caligaria卡里加利亚门

Camariotes，Matthew马修·卡马里奥特斯

Campi，Jacopo de雅各布·德·坎皮

Candia甘地亚

Cantacuzenos，Demetrios德米特里·坎塔库泽努斯

Çelebi，Evliya艾弗里雅·切莱比

Chalkokondyles，Laonikos拉奥尼科斯·哈尔科孔蒂利斯

Charisius，Gate of查瑞休斯之门

Chosroes霍斯劳

Christian I克里斯蒂安一世（丹麦国王）

Constantine I（君士坦丁一世，大帝）

Constantine XI君士坦丁一世十一世

Contarini，Jacopo雅各布·孔塔里尼

Contarini，Philippo菲利普·孔塔里尼

Coco，Giacomo贾科莫·科科

cog柯克船

Commynes，Philippe de菲利普·德·科米纳

Cyzicus库济库斯

Dallam，Thomas托马斯·达勒姆

Dalmata，John约翰·达尔马塔

Dandolo，Enrico恩里科·丹多洛

Demetrios德米特里（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兄弟）

Didimotkon迪迪莫特孔

Diedo，Aluvixe阿卢威克瑟·迪艾多

Dolfin Dolfin多尔芬·多尔芬

Dolmabache多尔玛巴赫切宫

Doria，Zorzi佐尔齐·多里亚

Doukas杜卡斯

Dracul，Vlad弗拉德·德古拉

Dragases德拉伽塞斯

Dromon德罗蒙战船

Dulle Griete疯女格丽特（大炮）

Ebu Seybet ul-Ensari艾布·赛贝特·乌尔-安萨里

Edirne埃迪尔内

Edward III爱德华三世（英格兰国王）

Eleutherii埃莱夫塞雷

Epibatos埃皮巴托斯

Epiphanios埃皮法尼奥斯

Erzurum埃尔祖鲁姆

Eugenius，Gate of尤金尼乌斯门

Eugenius IV尤金四世（教皇）

Faiuzo法尤佐

Filelfo，Francesco弗朗切斯科·菲莱尔福

Filomati“菲罗玛蒂”号

Firuz Bey菲鲁兹贝伊

Flavius Constantinus弗拉维乌斯·君士坦丁

Francisco of Toledo，Don堂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

Friedrich Barbarossa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

Friedrich III弗里德里希三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Fulcher of Chartres沙特尔的富歇

Galata加拉塔

Gallipoli加里波利

Ganga甘噶

Gataloxa“加塔罗科萨”号

gazi加齐

Gennadios（Scholarios）真纳迪奥斯（斯科拉里奥斯）

Geoffrey of Villehardouin维尔阿杜安的若弗鲁瓦

George of Hungary匈牙利的乔治

George of Trebizond特拉布宗的乔治

Georgevich，Bartholomew巴塞洛缪·杰奥尔杰维奇

Gepids格皮德人

Gilles，Pierre皮埃尔·吉勒

Giustiniani，Nicholas尼古拉斯·朱斯蒂尼亚尼

Giustiniani Longo，Giovanni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隆哥

Golden Horn金角湾

Grant，John约翰·格兰特

Grezi，Troilo de特罗伊洛·德·格雷齐

Grioni，Zacaria扎卡里亚·格廖尼

Guro“古罗”号

Hafiz，Hazret哈兹莱特·哈菲兹

Halil Pasha哈利勒帕夏

Hamd ul-Ensari哈姆德·乌尔-安萨里

Hamza Bey哈姆扎贝伊

Harff，Arnold von阿诺尔德·冯·哈尔夫

Hasan of Ulubat乌鲁巴特的哈桑

Helena海伦娜

Heraclius希拉克略

Hexamilion赫克萨米利翁（墙）

Hodegetria指路圣母像

Horaia美丽之门

Humbert of Moyenmoutier穆瓦昂穆蒂耶的安贝尔

Hunyadi János匈雅提·亚诺什

Ibn Battutah伊本·白图泰

Ibn Khaldun伊本·赫勒敦

Igor，Prince伊戈尔王子

Innocent III英诺森三世（教皇）

Isfahan伊斯法罕

Ishak Pasha伊沙克帕夏

Isidore伊西多尔（红衣主教）

Ismail伊斯玛仪

Izmit伊兹密特

Iznik伊兹尼克

Janissary近卫军

Jason and the Argonauts伊阿宋和阿尔戈英雄

John VI Kantakouzenos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

John VIII Palaiologos约翰八世·帕里奥洛格斯

Justinian查士丁尼

Kaffa卡法

Kallinikos卡利尼克斯

Kara Bey卡拉贝伊

Kara Hizir Pasha卡拉·赫兹尔帕夏

Karaja Bey卡拉加贝伊

Karaman卡拉曼

Kastamonu卡斯塔莫努

Kemach科马契

Khan Krum克鲁姆汗

Knolles，Richard理查德·诺尔斯

Komnenos，John约翰·科穆宁

Konya科尼亚

Kritovoulos，Michael 米海尔·克利托布罗斯

Kuwae库威岛

Ladislas瓦迪斯瓦夫三世（Wladyslaw III）

Lake Garda加尔达湖

Languschi，Giacomo de贾科莫·德·兰古斯琪

Lecanella，Francesco弗朗切斯科·利卡奈拉

Lemnos利姆诺斯岛

Leo II利奥二世

Leonard of Chios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

Leontari，Manuel Bryennius曼努埃尔·布兰尼乌斯·莱昂塔里

Lithgow，Edward爱德华·利思戈

Lomellino，Angelo安杰洛·洛梅利诺

Longo，Alviso艾尔维索·隆哥

Longo，Giovanni Giustiniani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隆哥

Lycus里卡斯河

Lysippos留西波斯

Maffei，Celso切尔索·马费伊

Mahmut Pasha马哈茂德帕夏

Maltepe马尔特佩

Mamluks马穆鲁克人

Mammas，Gregory格列高利·玛马斯

Manisa马尼萨

Manuel Bryennius Leontari曼努埃尔·布兰尼乌斯·莱昂塔里

Manuel II Palaiologos曼努埃尔二世·帕里奥洛格斯

Marangon，Zuan朱安·马拉尼奥

Marmara Sea马尔马拉海

Maslama马斯拉玛

Mehmet II穆罕默德二世

Melissenos梅里西诺斯

Mesembria墨森布里亚

Mesoteichion中墙

Michael the Janissary近卫军士兵米哈伊尔

Michael the Syrian叙利亚的迈克尔

Milvian Bridge米尔维安大桥

Minotto米诺托

Mistra米斯特拉斯（Mystras）

Morea摩里亚

Muawiyyah穆阿维叶

Murat I穆拉德一世

Mustapha穆斯塔法

Negroponte内格罗蓬特

Nestor-Iskander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

Nicene Creed尼西亚信经

Nicetas Chroniates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

Nikephoros II Phokas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

Nicholas I 尼古拉一世（教皇）

Nicholas V尼古拉五世（教皇）

Nicomedia尼科米底亚

Notaras，Lucas卢卡斯·诺塔拉斯

Novo Brdo新布尔多

Odo de Deuil德伊的厄德

Omar Bey奥马尔贝伊

Orban乌尔班

Orhan奥尔汗

Oruch奥鲁奇

Osman奥斯曼（苏丹）

Padishah帕迪沙阿

Palaiologos帕里奥洛格斯

Palaiologos，Nicephorus尼科弗鲁斯·帕里奥洛格斯

Pantocrator全能之主

Patras帕特拉斯

Paul the Silentiary示默者保罗

Pechenegs佩切涅格人

Pelekanos佩雷卡诺斯

Pera佩拉

Petra佩特拉

Petrion佩特里翁

Phanar法纳尔

Piccolomini，Aeneas Sylvius恩尼亚·席维欧·皮可洛米尼（即庇护二世）

Pius庇护二世（教皇）

Plataea，Battle of普拉蒂亚战役

Plateia Gate普拉泰亚门

Princes’ Islands王子群岛

Prinkipo王子岛

Procopius普罗科匹厄斯

Ragusa拉古萨

Rhangabes朗加比斯

Rizzo，Antonio安东尼奥·里佐

Romanus IV Diogenes罗曼努斯四世·第欧根尼斯

Rumeli Hisari如梅利堡

Sa’d-ud-din霍加·萨阿德丁·埃芬迪（Hoca Sadeddin Efendi）

Sagredo，Giovanni乔万尼·萨格雷多

Saracens撒拉森人

Saruja萨勒贾

Scholarios，George乔治·斯科拉里奥斯（Gennadios真纳迪奥斯）

Scutari斯库塔里（üsküdar于斯屈达尔）

Scythians斯基泰人

Seljuks塞尔柱人

Selymbria塞林布里亚

Shihabettin Pasha谢哈布丁帕夏

Sinop锡诺普

Sivas锡瓦斯

Soligo，Bartolamio巴尔托拉米奥·索利戈

Sphendone斯芬多恩

Sphrantzes，George乔治·斯弗朗齐斯

St Elmo’s fire圣艾尔摩之火

St Mark Eugenicus圣马可·尤金尼克斯

Steco，Andrea安德烈亚·斯泰科

Struma斯特鲁马河

Studion斯图狄翁

Studius斯图狄乌斯

Tafur，Pero佩罗·塔富尔

Tamburlaine（Timur）帖木尔

Tana塔纳

Tenedos特内多斯

Tetaldi，Giacomo贾科莫·特塔尔迪

Theodore of Karystes卡里斯特斯的西奥多

Theophanes the Confessor忏悔者狄奥法内斯

Theophilus西奥菲勒斯

Therapia希拉比亚

Thessaloniki塞萨洛尼基

Timur帖木儿

Tokat托卡特

Trapezuntios，George特拉布宗的乔治

Trebizond特拉布宗

Trevisano，Gabriel加布里埃尔·特里维萨诺

Turahan Bey图拉汗贝伊

Tursun Bey图尔松贝伊

Tutmose III图特摩斯三世

ul-Ensari，Ebu Seybet艾布·赛贝特·乌尔-安萨里

ul-Ensari，Hamd哈姆德·乌尔-安萨里

ulema乌理玛

Umayyad倭马亚

Urban II乌尔班二世（教皇）

Varna瓦尔纳

Vladislas瓦迪斯瓦夫

Wallachia瓦拉几亚

Zaganos Pasha扎甘帕夏

---

[1] 译名对照表收入的是一些对全文的论据（因而不只是对文中的单一领域）有着重要意义的概念。

参考文献

Collections of Sources

Jorga，N.，*Notes et extraits pour servir à l'Histohe des Croisades au Xue siècle*，6 vols，Paris and Bucharest，1899-1916

Legrand，Emile，*Recueil de Chansons Populaires Grecques*，Paris，1874

Lewis，Bernard，*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2 vols.，New York，1974

Melville Jones，J. R.，*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Seven Contemporary Accounts*，Amsterdam，1972

Pertusi，Agostino，*La Caduta di Costantinopoli*，2 vols.，Milan，1976

Individual Sources

Barbaro，Nicolo，*Giornale dell' Assedio di Costantinopoli 1453*，ed. E. Cornet，Vienna，1856；（in English）*Diary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rans. J. R. Melville Jones，New York，1969

Broquière，Bertrandon de la，in *Early Travels in Palestine*，ed. T. Wright，London，1848

Camariotes，Matthew，“De Constantinopoli Capta Narratio Lamentabilis，” in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es*，*Series Graeco-Latina*，vol. 160，ed. J. P. Migne，Paris，1866

Chelebi，Evliya，*In the Days of the Janissaries*，ed. Alexander Pallis，London，1951

——，“Le Siège de Constantinople d'après le Seyahatname d'Evliya Chelebi，” trans. H. Turkova，*Byzantinoslavica*，vol. 14，1953

Comnena，Anna，*The Alexiad of Anna Comnena*，trans. E. R. A. Sewter，London，1969

Doukas，*Decline and Fall of Byzantium to the Ottoman Turks*，trans. Harry J. Magoulias，Detroit，1975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vol. 5，Paris，1870

Gilles，Pierre，*The Antiquities of Constantinople*，London，1729

Gunther of Pairis，*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The Hystoria Constantinopolitana of Gunther of Pairis*，ed. and trans. Alfred J. Andrea，Philadelphia，1997

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3 vols.，trans. Franz Rosenthal，London，1958

Ibn Taghribirdi，Abu al-Mahasin Yusuf，*History of Egypt*，*Part 6*，*1382-1469 A.D.*，trans，W. Popper，Berkeley，1960

Khoja Sa'd-ud-din，*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aj-ut-Tevarikh*，trans. E. J. W. Gibb，Glasgow，1879

Kritovoulos，*Critobuli Imbriotae Historiae*，ed. Diether Reinsch，Berlin，1983；（in English）*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trans. Charles T. Riggs，Westport，1970

Leonard of Chios，*De Capta a Mehemethe II Constantinopoli*，Paris，1823

Mihailovich，Konstantin，*Memoirs of a Janissary*，trans. Benjamin Stolz，Ann Arbor，1975

Nestor-Iskander，*The Tale of Constantinople*，trans. and ed. Walter K. Hanak and Marios Philippides，1998

Procopius，*Buildings*，London，1971

Pusculus，Ubertino，*Constantinopoleos Libri IV*，in Ellissen，*Analekten der Mittel-und Neugriechischen Literatur III*，1857

Spandounes，Theodore，*On the Origin of the Ottoman Emperors*，trans. and ed. Donald M. Nicol，Cambridge，1997

Sphrantzes，George，*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A Chronicle by George Sphrantzes 1401-1477*，trans. Marios Philippides，Amherst，1980

——，*A Contemporary Greek Source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1453*：*The Sphrantzes Chronicle*，trans. Margaret Carroll，Amsterdam，1985

Tafur，Pero，*Travels and Adventures*，*1435-1439*，trans. Malcolm Letts，London，1926

Theophanes Confessor，*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trans.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Oxford，1997

Tursun Beg，*The History of Mehmet the Conqueror*，trans. Halil Inalcik and Rhoads Murphey，Minneapolis and Chicago，1978

Modern Works

Ak，Mahmut and Başar，Fahameddin，*Istanbul'un Fetih Günlüğü*，Istanbul，2003

Akbar，M. J.，*The Shade of Swords*：*Jihad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Islam and Christianity*，London，2002

Armstrong，Karen，*Holy War*：*The Crusades and Their Impact on Today’s World*，London，1992

Atil，Esin，*Levni and the Surname*：*The Story of an Eighteenth-Century Ottoman Festival*，Istanbul，1999

Ayalon，David，*Gunpowder and Firearms in the Mamluk Kingdom*，London，1956

Aydın，Erdoğan，*Fatih ve Fetih*：*Mitler ve Gerçekler*，Istanbul，2001

Babinger，Franz，*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Princeton，1978

Bartusis，Mark C.，*The Late Byzantine Army*：*Arms and Society，1204-1453*，Philadelphia，1992

Baynes，Norman H.，*Byzantine Studies and Other Essays*，London，1955

Bury，J. B.，*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395-800*，2 vols.，London，1889

Cahen，Claude，*Pre-Ottoman Turkey*，trans. J. Jones-Williams，London，1968

Carroll，Margaret，“Notes on the authorship of the Siege Section of the Chronicon Maius，” *Byzantion* 41，1971

Chatzidakis，Manolis，*Mystras*：*The Medieval City and the Castle*，Athens，2001

Cipolla，Carlo M.，*European Culture and Overseas Expansion*，London，1970

Clark，Victoria，*Why Angels Fall*：*A Journey through Orthodox Europe from Byzantium to Kosovo*，London，2000

Coles，Paul，*The Ottoman Impact on Europe*，London，1968

Corfis，Ivy A. and Wolfe，Michael（eds.），*The Medieval City under Siege*，Woodbridge，1995

DeVries，Kelly，*Guns and Men in Medieval Europe*，*1200-1500*，Aldershot，2002

Dirimtekin，Feridun，*Istanbul'un Fethi*，Istanbul，2003

Emecen，Feridun M.，*Istanbul'un Fethi Olaytı ve Meseleri*，

Istanbul，2003

Encyclopaedia of Islam，Leiden，1960

Esin，Emel，*Ottoman Empire in Miniatures*，Istanbul，1988

Freely，John，*The Companion Guide to Istanbul*，Woodbridge，2000

Gill，Joseph，*The Council of Florence*，Cambridge，1959

Goffman，Daniel，*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2002

Goodwin，Godfrey，*The Janissaries*，London，1994

Goodwin，Jason，*Lords of the Horizons*：*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London，1999

Granville Browne，E.（ed.），*A History of Ottoman Poetry*，London，1904

Guilmartin，John F.，*Galleons and Galleys*，London，2002

Haldon，J. and Byrne，M.，“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Greek Fire，”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70，pp. 91-99

Hall，Bert S.，*Weapons and Warfare in Renaissance Europe*：*Gunpowder*，*Technology and Tactics*，Baltimore，1997

Hattendorf，John B.，and Unger，Richard W.，*War at Sea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Woodbridge，2003

Heywood，Colin，*Writing Ottoman History*：*Documents and Interpretations*，Aldershot，2002

Hogg，Ian V.，*A History of Artillery*，London，1974

Howard，Michael，*War in European History*，Oxford，1976

Imber，Colin，“The Legend of Osman Gazi，” *The Ottoman Emirate 1300-1389*，Rethymnon，1993

——，“What Does Ghazi Actually Mean，” *The Balance of Truth*：*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Geoffrey Lewis*，Istanbul，2000

——，*The Ottoman Empire*：*1300-1650*，Basingstoke，2002

Inalcik，Halii，“Mehmet the Conqueror and His Time，” *Speculum* 35，pp. 408-427

——，*Fatih Devri üzerinde Tetkikler and Vesikalar I*，Ankara，1987

——，*The Ottoman Empire*：*Conquest*，*Organization and Economy*，London，1978

——，*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London，1973

Istanbul：*Everyman Guides*，London，1993

Kaegi，Walter Emil，*Byzantium and 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Cambridge，1992

Kazankaya，Hasan，*Fatih Sultan Mehmet'in Istanbul'un Fethi ve*

Fethin Karanlık Noktaları，2 vols.，Istanbul，1995

Keegan，John，*A History of Warfare*，London，1994

Keen，Maurice（ed.），*Medieval Warfare*：*A History*，Oxford，1999

Kelly，Laurence，*Istanbul*：*A Traveller’s Companion*，London，1987

Khadduri，Majid，*War and Peace in the Law of Islam*，Baltimore，1955

Kinross，Lord，*The Ottoman Centuries*，London，1977

Koran，*The*，trans. N. J. Dawood，London，1956

Levey，Michael，*The World of Ottoman Art*，London，1971

Lewis，Bernard，*Istanbul an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Norman，1968

——，“Politics and War” in J. Schacht and C. E. Bosworth（eds.），*The Legacy of Islam*，Oxford，1979

——，*Islam from the Prophet Muhammad to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2 vols.，Oxford，1987

——，*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London，1982

Mackintosh-Smith，Tim，*Travels with a Tangerine*，London，2001

Mango，Cyril，*Studies on Constantinople*，Aldershot，1993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Oxford，2001

Mansel，Philip，*Constantinople*：*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1453-1924*，London，1995

Massingnon，Louis，“Textes Prémonitoires et commentaires mystiques relatifs à la prise de Constantinople par les Turcs en 1453，” *Oriens* 6，pp. 10-17

Matar，Nabil，*Islam in Britain 1558-1685*，Cambridge，1998

Mathews，Thomas F.，*The Art of Byzantium*：*Between Antiquity and the Renaissance*，London，1998

McCarthy，Justin，*The Ottoman Turks*：*An Introductory History to 1923*，Harlow，1997

McNeill，William H.，*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Chicago，1990

Mijatovich，Chedomil，*Constantine Palaiologos*：*The Last Emperor of the Greeks*，*1448-1453*，London，1892

Morris，Jan，*The Venetian Empire*：*A Sea Voyage*，London，1980

Murphey，Rhoads，*Ottoman Warfare 1500-1700*，London，1999

Nicol，Donald M.，*Byzantium and Venice*，Cambridge，1988

——，*The Immortal Emperor*：*The Life and Legend of Constantine Palaiologus*，*Last Emperor of the Romans*，Cambridge，1969

——，*The Last Centuries of Byzantium*，*1261-1453*，London，1972

Nicolle，David，*Armies of the Ottoman Turks 1300-1774*，London，1983

——，*Constantinople 1453*，Oxford，2000

——，*The Janissaries*，London，1995

Norwich，John J.，*A History of Byzantium*，3 vols.，London，1995

Ostrogorsky，George，*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trans. Joan Hussey，Oxford，1980

Parry，V. J.，*Richard Knolles'"History of the Turks*，" ed. Salih Özbaran，Istanbul，2003

Parry，V. J. and Yapp，M. E.（eds.），*War*，*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London，1975

Partington，J. R.，*A History of Greek Fire and Gunpowder*，Cambridge，1960

Pears，Edwin，*The Destruction of the Greek Empire and the Story of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London，1903

Rose，Susan，*Medieval Naval Warfare*，*1000-1500*，London，2002

Runciman，Stephen，*The Eastern Schism*：*A Study of the Papacy and Eastern Churches during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ies*，Oxford，1955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Cambridge，1965

Schwoebel，Robert，*The Shadow of the Crescent*：*The Renaissance Image of the Turk*，*1453-1517*，Nieuvvkoop，1967

Setton，Kenneth M.，*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1204-1571*），*vol. II*：*The Fifteenth Century*，Philadelphia，1978

Shaw，Stanford，*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 I*：*Empire of the Gazis*，Cambridge，1976

Sherrard，Philip，*Constantinople*：*The Iconography of a Sacred City*，London，1965

Simarski，Lynn Teo，“Constantinople's Volcanic Twilight，” *Saudi Aramco World*，Nov./Dec.，1996

Stacton，D.，*The World on the Last Day*，London，1965

Tsangadas，B. C. P.，*The Fortifications and Defense of Constantinople*，New York，1980

Vakalopoulos，Apostolos E.，*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Nation*：*The Byzantine Period*，*1204-1461*，New Brunswick，1970

Van Millingen，Alexander，*Byzantine Churches in Constantinople*，London，1912

——，*Byzantine Constantinople*，London，1899

Vassilaki，Maria（ed.），*Mother of God*：*Representations of the Virgin in Byzantine Art*，Turin，2000

Ware，Timothy，*The Orthodox Church*，London，1993

Wheatcroft，Andrew，*Infidels*：*The Conflict between Christendom and Islam 638-2002*，London，2003

——，*The Ottomans*：*Dissolving Images*，London，1995

Wintle，Justin，*The Rough Guide History of Islam*，London，2003

Wittek，Paul，*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London，1963

Yerasimos，Stephane，*La Fondation de Constantinople et de Sainte-Sopbie dans les Traditions Turques*，Paris，1990

——，*Les Traditions Apocalyptiques au tournant de la Chute de Constantinople*，Paris，1999

译后记

《1453》是我和“甲骨文”合作的第一本书。我也就这样走进了克劳利的海洋世界。

我陆续翻译了他的四本历史著作《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这于我而言是一段愉快的旅程。克劳利的作品不是学术前沿，也没有高深的理论，却是精彩绝伦的叙述史，也是大众读者了解历史的绝佳窗口。

对我来讲，翻译是非常难得的深度学习的机会。人都有惰性，读书的时候，不太明白的地方经常就略过了，不影响理解大意就行。翻译却不容许偷懒，必须把每一个地方都完全弄懂。要对读者负责，首先得对自己负责。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相继出版之后，得到许多读者的热情支持，同时也有许多读者通过各种途径提出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批评。借这次精装版推出的机会，我重新审视和修改了自己的译文。修改历时近半年，我刻意做得很慢。首先是知识性错误的修正，比如将阿提拉的部族称为“匈奴”是不妥的，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现在改为“匈人”；其次，修正了少量译名，希望能在“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再次，修正了地图标示的一些瑕疵和少量错别字及前后不一致的问题；最后，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也是修改最多的，是删去冗字，提高密度，希望做到更精炼。当然，新版本最终需要的是读者的检验。我衷心希望，在过去的四年里我的水平有所提高；新版本会是一个更好

的版本，是给克劳利先生的一份新礼物，也是给读者朋友的新礼物。

最后衷心感谢“甲骨文”品牌直接参与克劳利作品编辑出版的编辑们，没有他们的悉心帮助与辛勤工作，这几本书在中国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

陆大鹏

2017年7月，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英）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著；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9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精装珍藏版）

ISBN 978-7-5201-0792-1

Ⅰ.①1… Ⅱ.①罗… ②陆… Ⅲ.①拜占庭帝国-战争史 Ⅳ.①K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1706号

1453

——君士坦丁堡之战

著者/〔英〕罗杰·克劳利

译者/陆大鹏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董风云 冯立君

责任编辑/段其刚 周方茹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3.375 插页：0.625 字数：279千字

版次/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0792-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7-5950号

定价/258.00元（全三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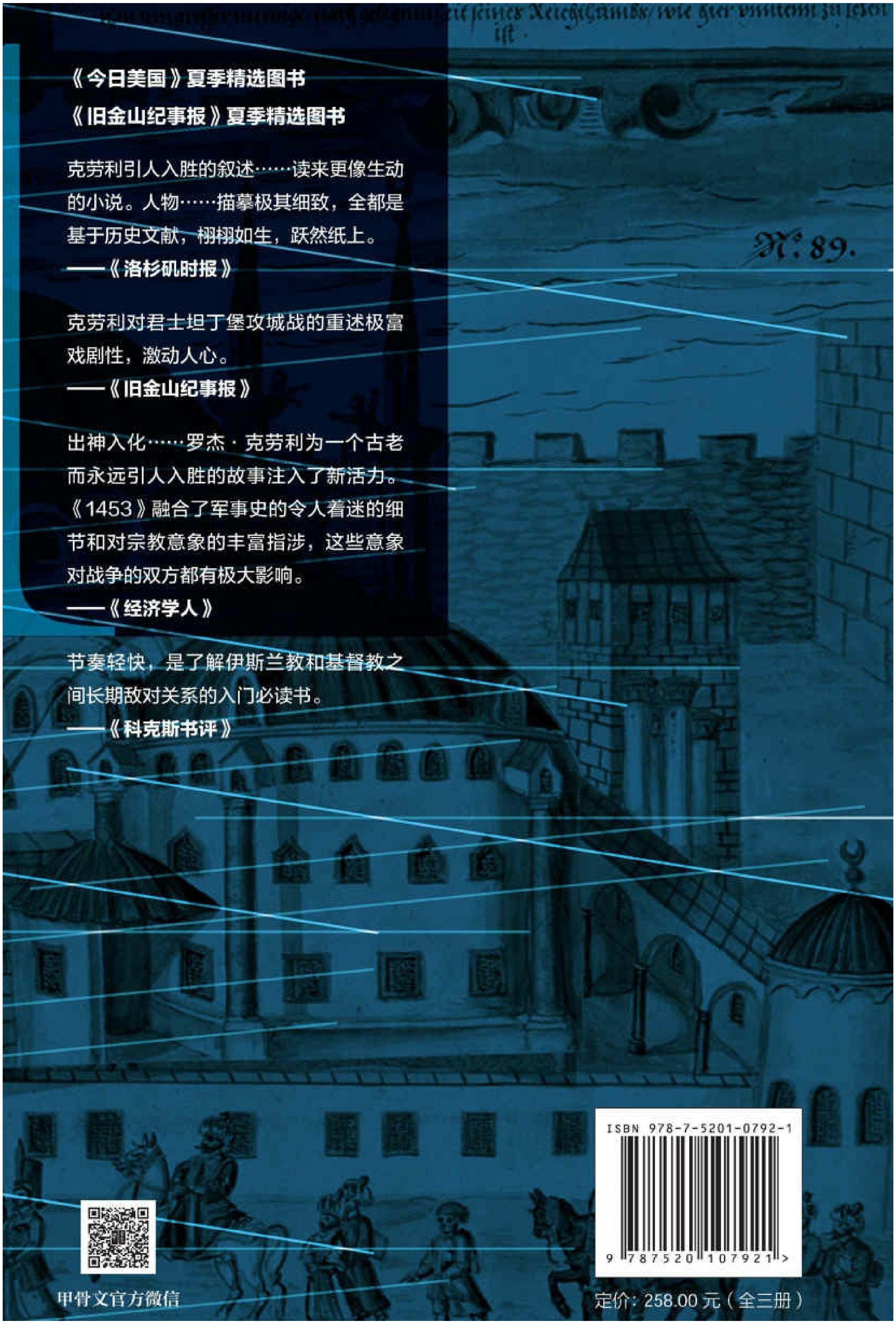
译者简介 /

陆大鹏，英德译者，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热爱一切 long ago 和 far away 的东西。代表译作“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阿拉伯的劳伦斯》《金雀花王朝》《伯罗奔尼撒战争》《伊莎贝拉：武士女王》《恺撒：巨人的一生》《奥古斯都》等。

豆瓣、新浪微博：陆大鹏 Hans　微信公号：ldphans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 / 宋　涛



《今日美国》夏季精选图书

《旧金山纪事报》夏季精选图书

克劳利引人入胜的叙述……读来更像生动的小说。人物……描摹极其细致，全都是基于历史文献，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洛杉矶时报》

克劳利对君士坦丁堡攻城战的重述极富戏剧性，激动人心。

——《旧金山纪事报》

出神入化……罗杰·克劳利为一个古老而永远引人入胜的故事注入了新活力。《1453》融合了军事史的令人着迷的细节和对宗教意象的丰富指涉，这些意象对战争的双方都有极大影响。

——《经济学人》

节奏轻快，是了解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长期敌对关系的入门必读书。

——《科克斯书评》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5201-0792-1

9 787520 107921 >

定价：258.00 元（全三册）

伯罗奔尼撒战争

THE PELOPONNESIAN WAR

〔美〕唐纳德·卡根 / 著
（Donald Kagan）
陆大鹏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

耶鲁大学古典学与历史学斯特林教席教授，获得2002年美国全国人文奖章。他著有多部作品和文章，涉猎广泛。他最新一部作品《修昔底德》由维京出版社出版。

译者简介

陆大鹏，英德译者，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热爱一切long ago和far away的东西。代表译作“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阿拉伯的劳伦斯》《金雀花王朝》等。

豆瓣、新浪微博：陆大鹏Hans

微信公号：ldphans

伯罗奔尼撒战争

唐纳德·卡根／著

陆大鹏／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书获誉

目前为止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佳叙述。

——《洛杉矶时报书评》

一部新鲜、明晰而快节奏的叙述史。

——《纽约时报书评》

唐纳德·卡根是一位古典学家、国际关系学家和军事史学家。凭借在这些领域无与伦比的渊博学识……他撰写了这个一卷本，引导我们进入那段关于算计失误、狂傲、过度战略扩张的历史史诗，并对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进行补充评论和修正……有足够毅力走过前5世纪希腊世界迷宫的战略家和史学家将会惊叹于卡根的睿智和博学。

——《华盛顿邮报》

卡根对希腊史诗般的权力斗争的细致阐释，为今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教训，包括关于外交政策和争夺全球霸权将会导致何种后果的教训。

——《沃思堡星辰邮报》

要写这样一本书，没有比卡根先生更好的人选了……他无疑是目前在世的最顶尖的修昔底德专家。

——《华盛顿时报》

卡根……称，他的目标既是提供知识上的愉悦，也是提供智慧源泉。很多人通过研究这场战争来追寻智慧。他的两个目标都圆满达成了，成果显著……但本书的终极价值在于，卡根为这场战争（它结束了古典希腊的光荣）带来了深刻而权威的评判。

——《出版商周刊》

卡根的史书为我们描绘了整个战争的宏观场景，并提供了敏锐的分析和评论……读了本书之后，读者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一个伟大帝国的兴衰，同时获得一些智慧，这种智慧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发生在自己时代的事件。

——《Bookpages书评月刊》

最终，他以详尽的细节证实了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的描述：战争“是一个凶暴的教师，让大多数人的品格都堕落到当前的这种状态”。权威的历史学表明，虽然武器装备增多了，但领导人和社会在战时的反应并没有发生很多变化。

——《科克斯书评》

令人肃然起敬，对希腊三十年大战的叙述全面而精练、渊博且流畅易读……以客观、精细的视角观看这场战争戏剧……卡根的史书出类拔萃。

——《书单》杂志

致谢

我撰写本书的灵感来自路易维尔大学的John Roberts Hale，他是我的老友，曾是我的学生。在一次漫长的飞行旅途中，他说服了我，应当有一部供非专业读者阅读的单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并且我就是写作这样一部书的人选。我很享受写作本书的过程，我感谢他阅读了手稿，欣赏他的才华、热情和友谊。我也很感谢我的编辑Rick Kot，他的审读非常仔细，给我帮助很大，提高了本书的水准，而且他是个非常友善的人。我还要感谢我的儿子Fred和Bob，他们都是历史学家。他们的著作给了我很多教益，我与他们的无数次妙趣横生的交流也对我帮助极大。最后，感谢我的太太Myrna，感谢她抚育了这么优秀的孩子，并且帮助他的父亲达成了目标。

目录

- 引言
- 第一部 通往战争的道路
  - 第一章 激烈的竞争（前479～前439年）
  - 第二章 “发生在一个遥远国度的争吵”（前436～前433年）
  - 第三章 雅典登场（前433～前432年）
  - 第四章 战争的抉择（前432年）
- 第二部 伯里克利战争
  - 第五章 战争的目标与资源（前432～前431年）
  - 第六章 底比斯人进攻普拉蒂亚（前431年）
  - 第七章 瘟疫（前430～前429年）
  - 第八章 伯里克利的最后时光（前429年）
  - 第九章 雅典帝国内部的叛乱（前428～前427年）
  - 第十章 恐怖和冒险（前427年）
- 第三部 新的战略
  - 第十一章 德摩斯梯尼和新战略（前426年）
  - 第十二章 皮洛斯和斯法克特里亚岛（前425年）
  - 第十三章 雅典的攻势：墨伽拉与德里昂（前424年）
  - 第十四章 伯拉西达的色雷斯战役（前424～前423年）
  - 第十五章 和平降临（前422～前421年）
- 第四部 虚假的和平
  - 第十六章 和平瓦解（前421～前420年）
  - 第十七章 雅典与阿尔戈斯的联盟（前420～前418年）
  - 第十八章 曼丁尼亚战役（前418年）
  - 第十九章 曼丁尼亚战役之后：斯巴达和雅典的政治与政策（前418～前416年）
- 第五部 西西里岛的灾难
  - 第二十章 决策（前416～前415年）
  - 第二十一章 本土战线和最初的战役（前415年）

- 第二十二章 第一次进攻叙拉古（前415年）
- 第二十三章 叙拉古攻防战（前414年）
- 第二十四章 围城者被围（前414～前413年）
- 第二十五章 战败与毁灭（前413年）
- 第六部 雅典帝国与雅典城的革命
  - 第二十六章 灾难之后（前413～前412年）
  - 第二十七章 爱琴海的战火（前412～前411年）
  - 第二十八章 革命运动（前411年）
  - 第二十九章 政变（前411年）
  - 第三十章 “四百人”掌权（前411年）
  - 第三十一章 “五千人”（前411年）
  - 第三十二章 赫勒斯滂海峡的战火（前411～前410年）
- 第七部 雅典的陷落
  - 第三十三章 民主制的恢复（前410～前409年）
  - 第三十四章 亚西比德归来（前409～前408年）
  - 第三十五章 亚西比德的垮台，小居鲁士和吕山德（前408～前406年）
  - 第三十六章 阿吉纽西战役（前406年）
  - 第三十七章 雅典陷落（前405～前404年）
- 结局
- 资料来源
- 大事年表
- 译名对照表


希腊和小亚细亚西部
黑海
色雷斯
上马其顿
亚得里亚海
大希腊
莫罗西
克基拉岛（科孚岛）
伊奥尼亚湾
琉卡斯
凯法利尼亚岛
扎金苏斯岛
伯罗奔尼撒半岛
爱琴海
萨莫色雷斯岛
因布罗斯岛
利姆诺斯岛
斯基亚索斯岛
帕加塞湾
莱斯博斯岛
希俄斯岛
萨摩斯岛
安德罗斯岛
蒂诺斯岛
米科诺斯岛
提洛岛
帕罗斯岛
凯阿岛
基斯诺斯岛
塞里福斯岛
锡夫诺斯岛
米洛斯岛
西拉岛
莱罗斯岛
科斯岛
卡里亚
吕基亚
罗德岛
喀帕苏斯岛
克里特岛
基西拉
科林斯湾
墨伽拉
雅典
阿提卡
地中海
地中海
0 英里 50 100 150
0 千米 100 150
© 2003 Jeffrey L. Ward

引言

前5世纪的后30年中，雅典帝国与斯巴达联盟进行了一场可怕而残酷的战争，永远地改变了希腊世界及其文明。就在这场战争爆发的仅仅50年前，希腊人在斯巴达和雅典的领导下，同仇敌忾，打退了强大的波斯帝国的进攻，将波斯的陆海军逐出欧洲，并从波斯手中收复小亚细亚沿海的一些希腊城邦，从而保全了自己的独立。

这场令世人震惊的胜利在希腊开启了一个发展、繁荣和自信的骄傲年代。雅典强盛起来，人口增多，建立了一个殖民帝国，获得了财富和荣耀。雅典年轻的民主制逐渐成熟，哪怕是最低微的公民也能参与政治，获取机遇和政治权力。雅典新颖的民主政体继续在其他希腊城邦生根发芽。同时，这也是一个超乎寻常的文化繁荣的黄金时代，其独创性和丰富程度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无与伦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这样的戏剧诗人将悲剧与喜剧提升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水平。建筑和雕塑大师们设计建造了雅典卫城上的帕提农神庙和其他建筑，以及位于奥林匹亚和整个希腊世界各地的诸多精美建筑，强有力地影响了西方艺术的发展轨迹，其影响至今仍然清晰可辨。阿那克萨哥拉[1]和德谟克利特[2]等自然哲学家借助纯粹的理性去探索和理解物质世界，而普罗泰格拉[3]和苏格拉底等伦理与政治哲学的先驱则在人类事务领域做了相同的探索。希波克拉底及其学派在医学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希罗多德则创立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历史编纂学。

伯罗奔尼撒战争令这个辉煌时期戛然而止，而且亲身参与战争的人们也认为它是一个关键的大转折。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告诉我们，

他在战争爆发后便开始记录其历史，因为他相信：

> 这场战争的规模和重要性将远远超过此前的所有战争。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是，雅典和斯巴达双方当时都处于最佳战备状态，方方面面都已经蓄势待发，并且其他希腊人也加入了两大阵营中的一方，有的立即参加，有的正在打算加入。因为这是曾经震撼了希腊人的最宏大的动荡，还影响到了一些蛮族，或者我们可以说，影响了人类的很大一部分。（1.1.2）[4]

从前5世纪希腊人的视角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确是一场世界大战，对人类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极大损失，激化了派系斗争和阶级矛盾，使希腊各城邦内部四分五裂，各城邦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极不稳定，最终削弱了它们抵御外敌的能力。战争还逆转了希腊政治向民主制发展的趋势。雅典如日中天、春风得意的时候，它的民主政体对其他城邦有着磁铁一般的吸引力，但雅典的失败对希腊的政治发展来说具有决定性影响，将希腊推向了寡头统治的方向。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残暴也是史无前例的，一度管束着希腊战争行为的粗糙法则遭到悍然违背，文明与野蛮之间脆弱的分界线被突破了。随着战事延续，愤怒、挫折和对复仇的渴望变得愈加强烈，导致残忍暴行一再升级：战俘遭到摧残和屠戮，或被扔进深坑里饥渴至死，或因日晒雨淋、严寒酷暑而死，或被投入大海溺死。成群结队的袭掠者杀害无辜婴孩，整座城市被踏平，男人遭到杀戮，妇女和儿童被变卖为奴。在克基拉岛（今称科孚岛）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引发了内战，胜利者屠杀其同胞竟达一周之久：“儿子被父亲杀死。苦苦哀求饶命的人被从祭坛拖走或者被杀死在祭坛上。”（3.81.5）

随着暴力冲突的扩散，作为文明生活基础的习惯、体制、信仰和约束都土崩瓦解。人们变得凶残好斗，词语的含义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鲁莽的蛮勇现在被认为是忠诚盟友的勇敢；审慎的犹豫被当作似是而非的怯懦；克制被看作缺乏男性气概。”宗教丧失了约束人的力

量，“但用冠冕堂皇的花言巧语来达成罪恶目标的做法，却得到颂扬”。真理和荣誉灰飞烟灭，“社会分裂成若干阵营，任何人都不敢信任自己的伙伴”（3.82.1，8；3.83.1）。就是这样一场战争，让修昔底德尖刻地评论道，战争“是一个凶暴的教师，让大多数人的品格都堕落到当前的这种状态”（3.82.2）。

尽管伯罗奔尼撒战争在2400年前就宣告结束，但它仍然令后世每一个时代的读者心醉神迷。曾有作家用伯罗奔尼撒战争来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常见的做法是用它来解释一战的起因。但在冷战时期，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冷战主宰了20世纪的下半叶，并且像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将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都有自己的强大领袖。将帅、外交官、政治家和学者都曾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与北约和华约之间的竞争做比照。

但是，2500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它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是什么，这些是很难把握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了解这场战争的最主要资料是生活在那个时期并亲身参加战争的修昔底德所撰写的史书。他的作品被非常公正地评为史书编撰的杰作，并且阐发了很多关于战争性质、国际关系和大众心理的睿智观点，因而受到仰慕。它还被认为是历史学研究和政治哲学的基石。但说到底，它不是一部令人完全满意的战争史，它能够给予我们的教训也有所欠缺。它最明显的缺点是不完整，写到战争结束的七年前就戛然而止。要想了解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必须依赖那些才华远远比不上修昔底德、对战争没有多少第一手知识（或根本没有第一手知识）的作家。至少，为了理解战争的结局，我们需要现代史学家进行规模合适的分析叙述。

但即便是对于修昔底德写到的时期，现代读者若想全面理解其复杂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意义，也需要对修昔底德的文本做一番解释。近两个世纪里人们发现并研究了其他古代作家的著作和当时的碑铭文献，这

已经填补了一些空白，而且有时还对修昔底德讲的故事提出了质疑。最后，若要撰写一部令人满意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们还需要对修昔底德本人进行批判性的研究。他的头脑超乎寻常、极具独创性，比古典时期的任何其他史学家都更注重史实和客观性。但我们不能忘记，他毕竟是肉体凡胎，有着人类的情感和弱点。他的希腊文原著常常高度精练和佶屈聱牙，所以任何翻译都必然是一种阐释。他本人也是战争的参与者，这对他的判断产生了影响，我们必须审慎地评估这种影响。若是简单接受他的诠释而不做批判，就会很有局限性，就像全盘接受温斯顿·丘吉尔的历史著作以及他对两次世界大战（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理解一样。

本书是一部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的意图是满足21世纪读者的需求。它以我的四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5]（主要以学术界为受众）为基础，但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创作一部可读性强的单卷本叙述史，能够让大众读者从中获得乐趣和智慧，毕竟有很多人研究这场战争是为了获得一些教益。我尽量避免将这场战争中的事件与后世事件做比较（尽管很多这样的比较常跃入我的脑海），因为我希望给出的是流畅连贯的叙述，让读者们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四卷本付梓多年之后，我之所以创作了本书，是因为我比以往更加坚信，伯罗奔尼撒战争有着强大的张力。它是一部非同寻常的人类悲剧，讲述了一个伟大帝国的兴衰沉浮、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人类历史中智慧与机遇的交互作用、卓越的个人和广大的群众（他们受到自然与命运的局限，也互相约束）在决定历史走向时扮演的角色。我也希望展示这一点：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能够给予我们智慧，教导我们去理解人类在战争、瘟疫、内乱的巨大压力之下会做出何种行为，以及领导人的潜力和他们必然受到的局限。

---

[1] 阿那克萨哥拉（约前510～前428年），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出生于

小亚细亚，第一个将哲学带到雅典。他是伯里克利的朋友，曾因此受到政治迫害。阿那克萨哥拉以“精神”（Nous）的概念解释自然变化，“精神”超然独立、纯净无瑕，引发变化。科学方面，他探索了日食、月食、彩虹、流星等自然现象。（本书除了标明“作者注”之外，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

[2] 德谟克利特（约前460～前370年），古希腊哲学家，是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古代唯物思想的重要代表。他是“原子论”的创始者，很多人认为他是“现代科学之父”。

[3] 普罗泰格拉（约前490～前420年），古希腊哲学家，被柏拉图认为是诡辩学派的一员。他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据第欧根尼说，普罗泰格拉的不可知言论招来怒火，导致雅典人将他驱逐出境，并在市场焚毁其著作抄本。

[4] 改编自Richard Crawley的译文（Modern Library，New York，1951）。本书所有引文除非特别说明，均引自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数字指的是传统划分法的卷、章、节。（作者注）

[5] 卡根的四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四卷分别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1969年）、《阿希达穆斯战争》（1974年）、《尼基阿斯和约与西西里远征》（1981年）和《雅典帝国的覆灭》（1981年）。（作者注）

第一部 通往战争的道路

按照某些人的说法，伟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目的是给希腊人带来自由。然而，它并非以正式的宣战开始，也不是通过骄傲地、公开地攻击雅典帝国本土而拉开战争大幕，而是这样爆发的：在和平时期，一个强国鬼鬼祟祟、背信弃义地袭击比自己弱小得多的邻国。开启战争的不是威武雄壮、隆隆开进的斯巴达重步兵方阵——我们可以设想，他们的鲜红色斗篷在阿提卡的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们引导着强悍的伯罗奔尼撒军队——而是数百名底比斯人在一个乌云笼罩的夜晚，在黑暗的掩护下，偷偷溜进小小的普拉蒂亚城，城里有内奸与这些底比斯人里应外合。这个不光彩的开端预示了这将是一场怎样的战争：希腊人的传统作战方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传统作战方式以拥有公民身份的重步兵为基础，重步兵组成排列密集的方阵，遵照固定的、世人皆知的规则来作战，而这种规则制约希腊的战争已经超过两个半世纪。希腊人一度相信，唯一一种光荣而体面的作战方式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步兵方阵与步兵方阵正面对垒。更勇敢、更强大的一方自然会得胜，控制战场，并建立胜利纪念碑，占领有争议的土地，然后胜利回国。被打败的一方也会返乡。因此，典型的战争是在一天之内、在一场战役中决定胜负的。

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事件发生在遥远的地方，远离希腊文明的中心。斯巴达人或雅典人也许会说，战争的导火索是“在一个遥远国度，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的人们之间的争吵”[1]。在阅读修昔底德著作的希腊人当中，很少有人知道导致战争爆发的那座城市在哪里，也不知道那里生活着什么人。更没有人能预见，希腊世界边缘的偏远地区的一场内部争吵竟然引发了极其恐怖、破坏性极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2]。

[1] 这句话是内维尔·张伯伦说的，用来描述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这种局势很快就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见：B.B.C.Archives；record no.1930.Cited by C.Thorne，in *The Approach of War 1938-39* ，London，1982，p.91。（作者注）

[2] 当然，从雅典人的角度讲，这是“伯罗奔尼撒战争”。若是从斯巴达人的角度讲，无疑就是“雅典战争”了。（作者注）

第一章 激烈的竞争（前479～前439年）

希腊世界向西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最西端、西班牙南部沿海的一些分散城邦，向东一直到黑海东岸。[1] 一些分布集中的希腊城邦主宰着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岛的绝大部分沿海地区，但希腊世界的中心是爱琴海。绝大多数希腊城邦，包括其中最重要的城邦，都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也就是现代的希腊）、爱琴海东岸、安纳托利亚（现代的土耳其）、爱琴海诸岛和爱琴海北岸。

战争爆发时，希腊世界的一些城邦保持中立，但很多城邦，包括最重要的城邦，都已经臣服于斯巴达或雅典的霸权。斯巴达和雅典很可能是整个希腊世界里最为迥异的两个城邦，并且互相猜忌。它们之间的竞争塑造了希腊的国际体系。

斯巴达及其联盟

斯巴达领导的联盟比较古老，是前6世纪建立的。斯巴达人在自己的领地拉科尼亚统治着两个臣属族群。黑劳士的地位介于农奴和奴隶之间，耕种田地，为斯巴达人提供粮食；庇里阿西人拥有人身自由，但臣服于斯巴达的控制，是手工业者或商人，为斯巴达人提供各种物资。只有斯巴达人不需要谋求生计，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军事训练。因此，他们能够发展出希腊世界最强大的陆军，他们的公民士兵拥有专业化的技能，训练有素，与众不同。

但斯巴达的社会结构有着潜在的危险。黑劳士的人数大约是他们的斯巴达主子的七倍，而且用一个熟悉斯巴达的雅典人的话说，“黑劳士对斯巴达人恨不得寝皮食肉”（Xenophon，*Hellenica* 3.3.6）。黑劳士不时掀起暴动。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斯巴达人设立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政

体，建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迫使个人和家庭服从国家的需要。他们只允许健康状况良好的婴儿生存下去；男孩在七岁时被从家人身边带走，在军事学校里接受训练和磨砺，直到二十岁。从二十岁到三十岁，他们生活在兵营里，帮助教育新一代的年轻新兵。他们可以结婚，但只能偷偷溜去见自己的妻子。三十岁的时候，斯巴达男子成为真正的公民，一个“平等的人”。一名斯巴达男性公民与另外十四名战友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饭，饮食非常简单，往往只喝一种令其他希腊人震惊的黑汤。男性公民要服兵役到六十岁。这整个制度的目标是培养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无论在体能、训练还是纪律方面都是最顶尖的。

尽管军力上具备优势，斯巴达人却通常不愿意打仗，主要是因为他们害怕军队离家期间，黑劳士会趁机造反。修昔底德指出，“斯巴达人的大多数机构都是为了防备黑劳士而建立起来的”（4.80.3）。亚里士多德说，黑劳士“坐等灾难降临，然后趁机去攻击斯巴达人”（*Politics* 1269a）。

前6世纪，为了保护自己的独特社会，斯巴达人发展出了一个永久性联盟。现代学者通常将斯巴达领导的联盟称为“伯罗奔尼撒联盟”，但事实上它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包括斯巴达和一系列盟邦，这些盟邦都各自通过单独的盟约与斯巴达建立关系。在受到召唤时，这些盟邦要在斯巴达的指挥下作战。每个盟邦都宣誓要在外交政策上服从斯巴达，斯巴达则要保护它们，并承认它们的领土完整和自治权。

决定联盟内部关系的阐释原则是实用主义，而不是空洞的理论。斯巴达人会在对自己有利或者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援助盟邦，并在必须和可行的情况下强迫其他盟邦加入冲突。只有在斯巴达人决定召集大家的时候，整个联盟才会聚集起来。这样的召集是很少的。发挥主要作用的规则是由军事、政治或地理形势决定。斯巴达的盟邦可以非正式地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足够小、距离斯巴达足够近，因而能够被斯巴达轻松控

制的国家，比如弗利奥斯和奥尼伊。第二类盟邦包括墨伽拉、厄利斯和曼丁尼亚，它们比较强大，或者距斯巴达比较远，或者既强又远，但如果对斯巴达不忠顺，斯巴达仍然能够对其施加最严酷的惩罚。第三类盟邦只有底比斯和科林斯，它们距斯巴达很远，而且自身足够强大，因此它们的外交政策很少屈从于斯巴达的利益（见地图1）。

阿尔戈斯是一个大国，在斯巴达东北方，是斯巴达的传统宿敌，不是斯巴达联盟的成员。斯巴达人始终担心阿尔戈斯与斯巴达的其他敌人联手，尤其害怕阿尔戈斯援助黑劳士起义。任何对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完整性构成威胁，或者动摇任何一个成员国忠心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对斯巴达人的潜在致命威胁。

理论家将斯巴达的政治秩序视为“混合政体”，因为它包含了君主制、寡头统治和民主制的元素。君主制元素表现在斯巴达有两位国王，分别来自不同的王族。元老院代表了寡头统治元素，它包括28名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男子，全部从少数特权阶层的家族中选举产生。公民大会（包括全体三十岁以上的斯巴达男子）和5名监察官（每年由公民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则代表了民主制元素。

两位国王是终身制的，他们指挥斯巴达的军队，履行重要的宗教和司法职能，并享有极大的威望和影响力。由于两位国王常有分歧，为了某个问题常在他们周围发展出不同派系。元老院和国王一起，组成了国内的最高法庭，国王若被指控犯罪，需要接受元老院的审判。斯巴达社会尊重家族人脉、年高德劭的老人和经验，因此元老院拥有极大的威望，而当选元老后的莫大荣誉也给了他们很大的非官方影响力。



1. 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半岛

监察官也有很重要的权力，尤其是在外交方面。他们接见外国使者，进行条约谈判，在宣战之后下令出征。他们也召集和主持公民大会，列席元老院，并且是元老院的执行官员，还有权指控国王叛国。

关于条约、外交关系、战争与和平的正式决定是由公民大会做出的，但公民大会的实际权力是有限的。只有在官员传唤的时候，公民大会才会召开。公民大会上很少有辩论，发言者一般是国王、元老或监察官。投票通常要靠口头表决，很少分组表决和计票。

在300年中，没有发生过任何足以改变这种政体的法律、政变或革命。尽管政体固若金汤，但斯巴达的外交政策却常常摇摆不定。国王之间的矛盾、监察官与国王的矛盾，以及监察官内部的矛盾，再加上每年监察官的重新洗牌，有时会削弱斯巴达对其盟邦的控制力。盟邦可能会利用斯巴达内部的纷争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实践自己的政策。斯巴达的

强大军队和对联盟的控制给了斯巴达人极大的力量，但如果他们用这种力量去对付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的强大敌人，就要冒黑劳士起义或者遭阿尔戈斯攻击的风险。但如果较为重要的盟邦召唤斯巴达帮忙，斯巴达却不出兵，盟邦就可能背弃它，联盟就可能瓦解，而斯巴达的安全依赖盟邦和联盟的存在。在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危机中，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将影响斯巴达的决策。

雅典及其殖民帝国

雅典帝国源于希腊人打赢希波战争之后建立的一个新同盟。雅典起初是这个同盟的领导者，后来成了它的主宰。雅典有着独特的历史，在它建立民主制和成为霸主之前很久，它的个性就已经被塑造出来了。阿提卡是从希腊南部向东南方延伸的小小的三角形半岛，而雅典是阿提卡半岛上的主要城邦。阿提卡的面积大约有1000平方英里，大部分地区都崎岖坎坷，多山峦丘陵，无法耕作，因此早期的阿提卡人即便按照希腊的标准也算是很穷的。虽然地理上处于劣势，但有时却可以因祸得福。入侵者从北方席卷而下，占领了土地更为肥沃的伯罗奔尼撒半岛[2]，放过了阿提卡，认为不值得费工夫去征服它。与斯巴达人不同，雅典人声称自己起源于目前所占据的这块土地，在月亮诞生之前就生活在这一地区了。因此，他们不需要承受征服者的负担，也不需要时刻面对一个受压迫、非我族类、心怀不满的下等阶级。

由于雅典很早就统一了整个阿提卡地区，因此不会与阿提卡的其他城镇发生争吵和战争。这些城镇都变成了雅典城邦的一部分，所有在本地出生的自由民都成了平等的雅典公民。或许就是因为没有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雅典的早期历史比较安宁、稳定，并于前5世纪崛起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制国家。

前5世纪，民主雅典的力量和繁荣主要依赖于它对其航海帝国的控制。雅典的航海帝国以爱琴海、爱琴海诸岛和沿海城市为中心。雅典帝

国最初是“雅典人及其盟友”的组织，现代学者称之为“提洛同盟”。这是希腊各城邦自发组成的一个同盟，邀请雅典领导它们继续开展反对波斯的解放战争，并向波斯复仇。提洛同盟逐渐演变成一个受雅典人控制的殖民帝国，主要是为了雅典的利益而运作（见地图2）。提洛同盟的几乎所有成员国都渐渐放弃维持自己的舰队，而改为向集体金库支付钱款。雅典人利用这些资金来扩充自己的舰队，并向桨手支付报酬（桨手每年有八个月要待在桨位上），所以最终雅典海军成了古希腊史上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海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提洛同盟的大约150个成员国中只有2个岛国——莱斯博斯岛和希俄斯岛——拥有自己的舰队，也享有相对的自主权。但就连它们也不大可能违逆雅典的命令。

雅典人从其帝国产业中获取了极大利润，并将这些利润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尤其是用于庞大的建筑工程，来美化他们的城市，为人民提供就业机会，以及积累一大笔储备资金。雅典海军保护着雅典商人，使他们在整个地中海乃至更远的地方经商致富。海军还保障着雅典的食品供应，确保乌克兰小麦和黑海鱼类的供应。雅典本土的食品生产不足，需要进口这些外国食品来补充。一旦发生战争，需要放弃自己的农田时，雅典还可以用帝国的资金来进口食品，以进口完全取代本土的农业生产。前5世纪中叶，环绕雅典的城墙以及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3]设防港口的长墙竣工，此后的雅典几乎是不可攻破的金城汤池。

在雅典，所有政策，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军事还是民政，全都由公民大会定夺。通过抽签从雅典公民中选出的五百人议事会[4]负责准备法案，供公民大会审议，但完全服从于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年开会多达四十次，均为露天举行，地点是卫城[5]旁的普尼克斯山，从那里可以俯瞰阿哥拉（市场和民政中心）。所有男性公民均可参加公民大会、提案和辩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有4万雅典人享有参加公民大会的资格，但实际参会的人数很少超过6000人。因此，战略决策需要在数千

人面前讨论，每一项行动的具体细节都需要得到多数人的批准。每一次出征、参战船只和人员的数量、资金预算、指挥军队的将领和这些将领得到的具体指示等相关事务，都要经过公民大会的投票表决。

雅典国家最重要的职位，而且是少数由选举而非抽签产生的职位之一，当属十位将军。他们负责指挥雅典的陆海军作战，因此他们必须是军人。因为他们的任期只有一年，而且可以无限制地再次当选，所以他们也必须是政治家。这些领导人在作战时可以施行军法，但在城内没有这个权力。每年他们必须接受至少十次的审查，看是否有人对他们担任公职期间的行为提出检举和指控。将军在任期结束时还需要详细报告自己的军事和财政举措。若他们受到指控，就会受到审判；如果被定罪，就会受到严惩。

十位将军加起来并不算是一个内阁或政府，公民大会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但有时优秀的将军会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和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成为雅典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如果在法律上还不算的话）。在前479～前462年的十七年间，客蒙就是这样一位最高领导人，他似乎每年都当选为将军，指挥了每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并且说服雅典公民大会支持他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客蒙去世后，伯里克利取得了类似的成功，甚至掌权的时间更久。



修昔底德在史书中将他描述为“伯里克利，科桑西普斯之子，当时雅典的领导人，无论在言辞还是行动上都是最精明强干的人”（1.139.4）。修昔底德的读者对民主雅典最著名和最杰出的领导人的了解比这多得多。伯里克利出身于贵族豪门，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将军，是希波战争的英雄。他母系的一位祖先是克里斯提尼的侄女，克里斯提尼就是雅典民主制的奠基人。但他的家族倾向于支持平民利益，伯里克利在其政治生涯早期便成为民主派的重要人物。大约三十五岁时，他成为民主派政治团体的领导人，这是一个非官方的位置，但影响力很大。他毕其一生都享有这个地位。

他将超乎寻常的、优秀的沟通和思考能力运用于自己的政治生涯。作为当时最顶尖的演说家，他的演讲说服了大多数公民支持他的政策，他的言辞在雅典人耳边萦绕数十载，此后则被记录和保存了数千年。很少有一位政治领导人受过这样高水平的知识教育，拥有这样的人脉和高

雅品位。从青年时代起，伯里克利便热衷于当时正在改变雅典的启蒙运动，赢得了一些人的仰慕，但也招致更多人的猜疑。

据说，他的教师阿那克萨哥拉影响了他讲话的习惯和风格。伯里克利学到了：

> 高尚的精神和高雅的演讲格调，没有蛊惑人心的政客演说家的粗俗和奸诈花招；他表情庄重，从来不会纵情大笑，仪态富有尊严，服饰得体有节，他说话的时候不受任何情感的影响；他的嗓音控制得当，非常平稳；还有其他此类的特点，令听众肃然起敬。
> （Plutarch，*Pericles* 5）

这些品质使他赢得了上层阶级的好感，而他的民主政策和其他演说技能使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坚定拥护。他非同一般的品格帮助他在三十多年间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使他成为战争爆发前雅典最强大的政治领导人。

在这个时期，他似乎每年都当选为将军。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他不曾拥有超过其他将军的正式权力，也不曾试图改变民主政体。他仍然受到宪法规定的细致审查的约束，每次要采取行动都必须先在公开而不受控制的公民大会上得到投票批准。伯里克利并不总是能够成功地为自己的计划获取支持，而且有的时候他的政敌会说服公民大会投票反对他的意愿。但是，战争前夜的雅典政府的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民主政府，由其首席公民领导。但如果像修昔底德那样说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只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正在变成首席公民的独裁统治，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该时期的雅典在每个方面都算得上真正的民主国家。但在引发战争的危机时期，在制定战略时，以及一直到战争的第二年，雅典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遵从他们伟大领袖的意见。

雅典与斯巴达的对抗

在提洛同盟早期，雅典人似乎仍然在继续开展反对波斯人、解放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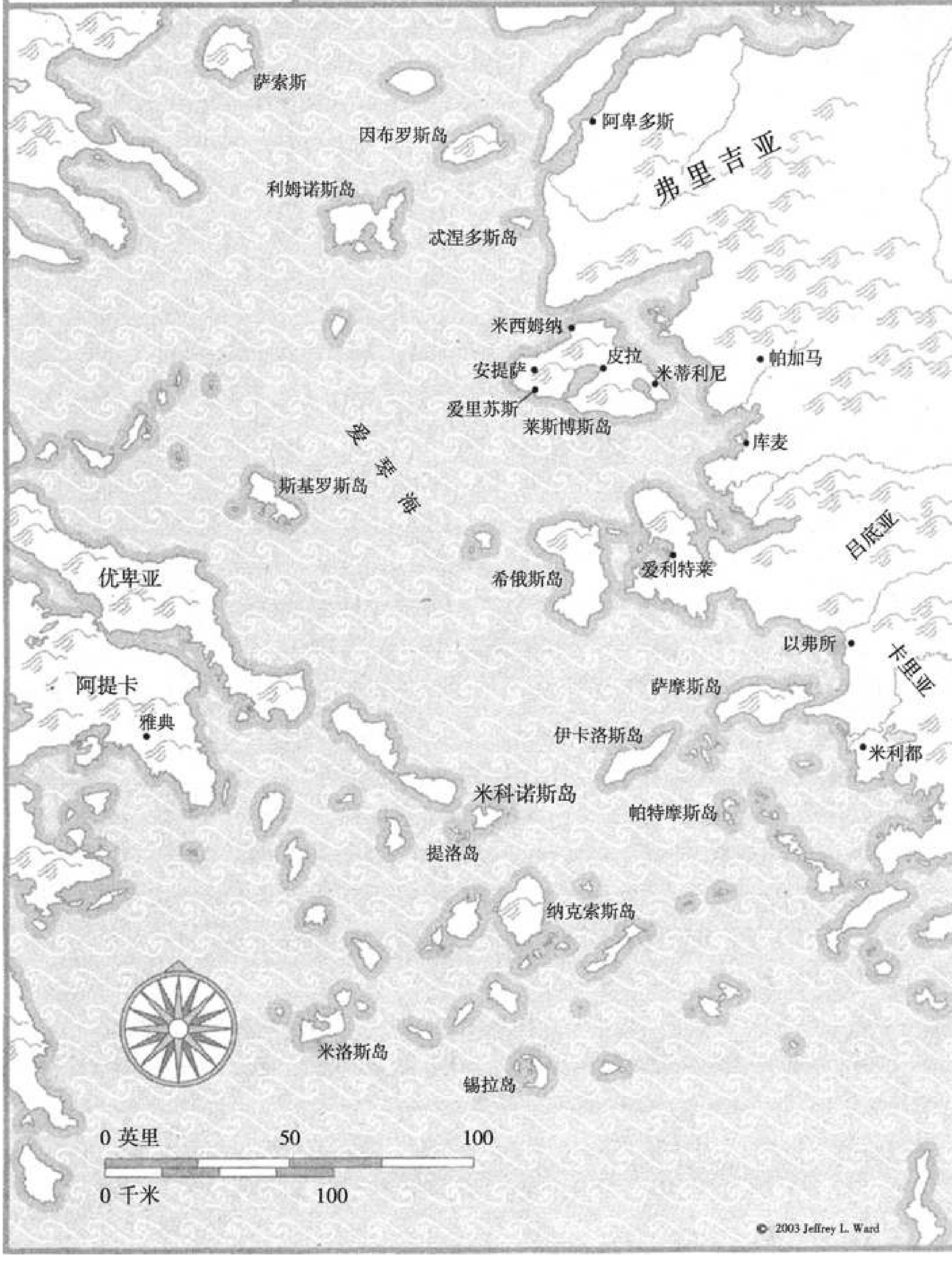
体希腊人的正义战争，而斯巴达人常常卷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内部的战争。在希波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提洛同盟越来越春风得意，越来越富裕强大，逐渐显露出了它的帝国主义野心。雅典和斯巴达的竞争也开始了。在希波战争结束不久之后，雅典人计划重建雅典城墙。斯巴达的一个派系表示反对，体现出了对雅典人的猜忌和怨恨，因为波斯人已经败北，雅典人修建城墙是要对付谁呢？雅典人勇敢地驳斥了斯巴达人的猜忌，斯巴达人没有正式发出抱怨，“但他们私下里很恼怒”（1.92.1）。前475年，斯巴达国内有人提议发动战争，消灭雅典的新同盟，并控制大海。在激烈辩论之后，这个提议被驳回了。但斯巴达国内始终存在敌视雅典的派系，在局势对其有利时，这个派系就夺取了政权。

前465年，雅典人攻打爱琴海北部的萨索斯岛（见地图3），遭到顽强抵抗。斯巴达人曾秘密地向萨索斯人承诺，将入侵阿提卡，以此援助他们。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斯巴达人打算兑现这个承诺”（1.101.2）。不料伯罗奔尼撒半岛发生了一次可怕的地震，随后又爆发了大规模的黑劳士起义，于是斯巴达人未能出兵。此时雅典和斯巴达在表面上仍然是盟友关系，因为它们都是前481年反对波斯的希腊联盟成员，于是雅典人前去救援遇到麻烦的斯巴达人。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做什么，斯巴达人就请他们离开（在斯巴达人的所有盟友当中，只有雅典人受到了这样的冷遇），理由是斯巴达不需要雅典帮忙。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斯巴达人这么做的真实动机是，“斯巴达人害怕雅典人的勇敢和革命精神，担心……如果让雅典人留下，他们或许会改变阵营……就是由于此次行动，斯巴达人和雅典人首次发生了公开的争吵”（1.102.3）。

此事确凿无误地证明，许多斯巴达人对雅典抱有猜忌和敌意。这场风波在雅典引发了一场政治革命，最终在整个希腊引发了一场外交革命。斯巴达人如此怠慢雅典人，导致雅典内部亲斯巴达的客蒙政权垮台。反对出兵伯罗奔尼撒半岛和支援斯巴达的反斯巴达派系将客蒙赶出了雅典，退出了与斯巴达的旧联盟，并与斯巴达的宿敌阿尔戈斯订立了

新盟约。

3. 爱琴海



萨索斯
因布罗斯岛
利姆诺斯岛
忒涅多斯岛
阿卑多斯
弗里吉亚
米西姆纳
安提萨
皮拉
米蒂利尼
帕加马
爱里苏斯
莱斯博斯岛
库麦
爱琴海
斯基罗斯岛
吕底亚
优卑亚
希俄斯岛
爱利特莱
以弗所
卡里亚
阿提卡
萨摩斯岛
雅典
伊卡洛斯岛
米利都
米科诺斯岛
帕特摩斯岛
提洛岛
纳克索斯岛
米洛斯岛
锡拉岛
0 英里
50
100
0 千米
100
© 2003 Jeffrey L. Ward

起义的黑劳士遭到围攻，再也坚持不下去时，斯巴达人与其停战，允许他们离开伯罗奔尼撒半岛，条件是永远不可以再回来。雅典人“由于已经对斯巴达人非常憎恶”（1.103.3），于是将这些黑劳士全部安置在科林斯湾北岸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雅典不久前刚获得的纳夫帕克托斯城。

随后，斯巴达的两个盟邦科林斯和墨伽拉因为边界争端而发生了战争。前459年，墨伽拉觉得自己面临失败，而斯巴达人不肯干预，于是墨伽拉人打算脱离斯巴达联盟，转而加入雅典阵营，条件是让雅典帮忙攻打科林斯。就这样，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矛盾在希腊世界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这两个霸主关系融洽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各自的盟邦；任何一方的盟邦若是受了委屈，都无法找到别的出路。如今，两方霸主关系恶化，对自己的霸主心怀不满的国家可以寻求另外一方的支持了。

墨伽拉在雅典西面，与其接壤，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见地图4）。墨伽拉西部的港口佩加直通科林斯湾。雅典人若想进入科林斯湾而不经过佩加，就只能绕过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那样的话路途太遥远，也太危险。墨伽拉东部的港口尼萨亚位于萨龙湾岸边，敌人可以取道那里攻击雅典的港口。更重要的是，如果雅典人控制了墨伽利斯[6]山脉隘口（若是没有一个友好的墨伽拉的帮助，这是不可能办到的），那么伯罗奔尼撒军队就很难，甚至完全没有办法入侵阿提卡。因此，与墨伽拉结盟对雅典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但会让雅典卷入针对科林斯的战争，或许可能还会与斯巴达和整个伯罗奔尼撒联盟发生战争。即便如此，雅典人还是接纳了墨伽拉，“主要就是出于这个原因，科林斯开始燃起了对雅典人的极大仇恨”（1.103.4）。

4. 阿提卡、墨伽拉、玻俄提亚



尽管斯巴达人要在几年后才正式卷入冲突，但上述事件标志着现代史学家所谓的“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持续了超过十五年，其间有一些停战和间歇的时期，雅典人的兵锋曾一度远至埃及和西西里岛。战争的结局是，墨伽拉从雅典同盟中叛变，重返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怀抱，于是斯巴达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率领一支伯罗奔尼撒军队攻入阿提卡。决战似乎迫在眉睫，但在最后关头，斯巴达人却放弃了战斗，班师回朝。古代作家声称伯里克利贿赂了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及其谋臣，劝诱他们放弃攻击。起初，斯巴达人对军队的两位指挥官大为光火，对他们施加了严惩。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伯里克利向斯巴达人提出了后者可以接受的和平条件，因此双方无须交锋。事实上，几个月后，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确缔结了和约。

《三十年和约》

《三十年和约》于前446～前445年冬季生效。根据和约，雅典人同意放弃在战争中占领的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土地，而斯巴达人事实上正式承认了雅典帝国的地位，因为斯巴达和雅典各自代表自己的盟邦，宣誓批准和约。和约的一个关键条款正式将希腊世界分为两个阵营，禁止任何一方的成员国改弦易辙，就像墨伽拉之前做的那样，正是这种变节行为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但和约允许中立国加入任何一方。这个条款看似无害，后来却出人意料地制造了许多麻烦。另一个条款则要求双方在未来发生纠纷时，接受有约束力的仲裁。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条约来维持长期和平的尝试，说明双方都确实希望避免在未来发生武装冲突。

历史上的和约有很多种。第一种和约的情况是，战争的一方被消灭或者被彻底打败，比如罗马与迦太基的最后一场战争（前149～前146年），于是和约宣告战争结束。第二种和约旨在向虽然败北但并未灭亡的敌人施加严酷的惩罚，比如1871年普鲁士强加给法国的和约，或者按照普遍的看法，1919年的胜利者在凡尔赛强加给德国的和约。这种和约

往往会播下新的战争种子，因为它羞辱和激怒了失败者，却没有剪除它复仇的能力。第三种和约的情况是，战争已经打了很久，却不分胜负，战场上不曾出现一个无可争议的胜利者。交战各方都意识到漫长战争的代价和危险以及和平的可贵，于是缔结和约，结束冲突。1648年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缔结的结束拿破仑战争的和约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种和约的主旨不是消灭或者惩罚敌人，而是寻求一种稳定局面，防止新的冲突。这种和约若想取得成功，必须准确地反映真实的军事和政治局势，并且必须依赖于双方维护和平的真诚意愿。

前446～前445年冬季的《三十年和约》就属于第三类。在漫长战争中，双方都损失惨重，但都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海军强国无法在陆地上维持自己的胜利，陆军强国在海上处于下风。此项和约是妥协的结果，包含了能够确保它成功的关键要素，准确反映了两个竞争对手（及其联盟）之间的力量平衡。和约承认斯巴达在大陆的霸权，以及雅典在爱琴海的主宰地位，并接受希腊世界已经一分为二的事实，因此有希望缔造长期和平。

但与任何和约相同，《三十年和约》也包含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每个国家内部都有少数派对和约耿耿于怀。有些雅典人主张开疆拓土，而有的斯巴达人则不甘心和雅典平分秋色，并且由于未能取得全面胜利而倍感挫折。其他人，包括斯巴达的一些盟邦，害怕雅典人有领土扩张的野心。雅典人知道对方的这些猜忌，也担心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只是在等待有利时机以重启战端。科林斯人仍然怨恨雅典出手援助墨伽拉人。墨伽拉现在由寡头政权统治，统治者为了控制城邦，屠杀了驻扎在墨伽拉的雅典人。此后，墨伽拉对雅典特别敌视，雅典对墨伽拉也非常憎恨。玻俄提亚及其主要城邦底比斯也处在寡头统治之下，他们怨恨雅典人之前在玻俄提亚培植民主政权的做法。

这些因素的任何一个或者所有因素加起来，都足以威胁和平。但缔结和约的人已经对战争感到厌烦，因此非常审慎，决心维护和平。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双方都需要排解自己的疑忌，建立互信，确保主和派（而不是主战派）在各自国内掌权，并控制自己的盟邦，防止它们惹是生非、制造不安定局面。在和约得到批准的时候，人们有理由相信，和平大有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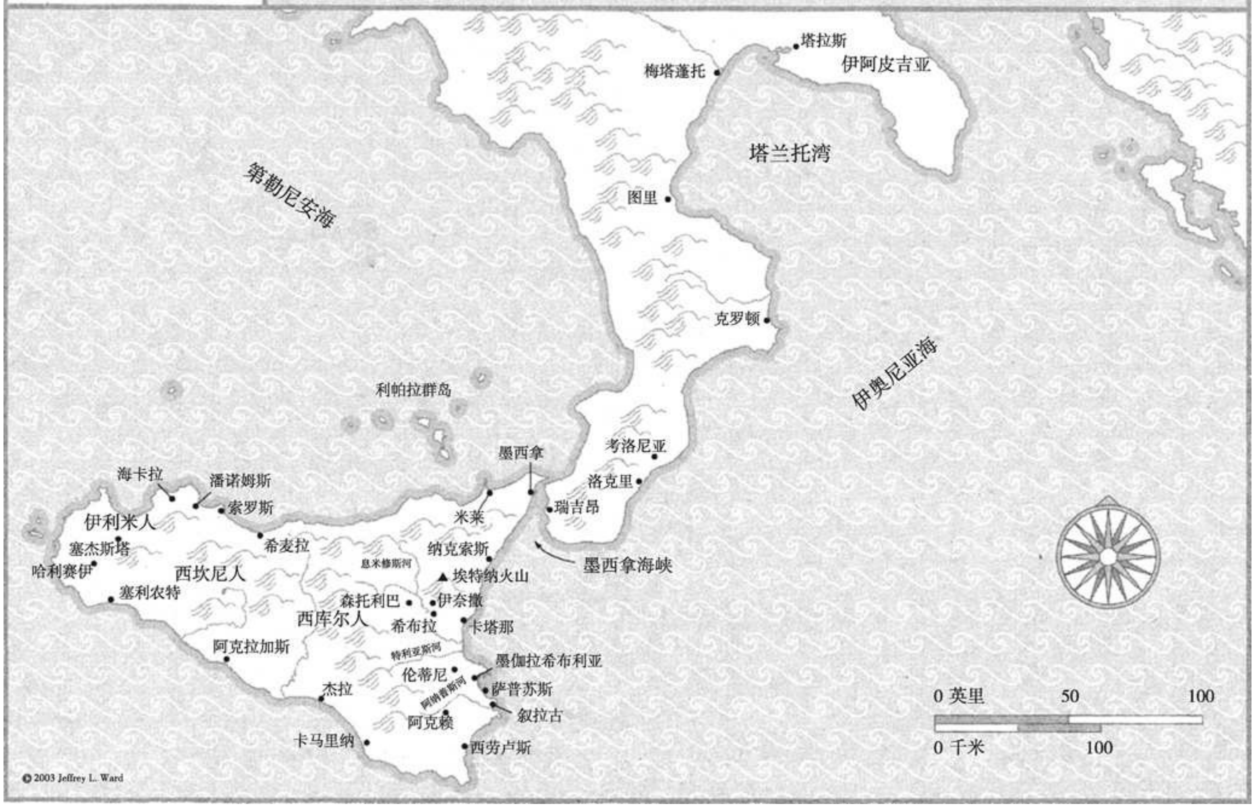
和平受到威胁：图里

无法预见的意外很快就开始考验前445年的和约及其缔造者。前444/前443年，斯巴达和雅典都收到了锡巴里斯殖民地[7]（不久前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一些前公民的请求。锡巴里斯由于争吵和内战而损失惨重，于是派人前往希腊本土，希望有人可以援助他们，在锡巴里斯附近一个叫作图里的地方（见地图5）建立新殖民地。斯巴达人对此不感兴趣，雅典人则同意帮助这些求援者，不过方法很不寻常。雅典人派使者到希腊全境，征募愿意到新殖民地定居的人。但新的殖民地不会成为雅典的殖民地，而将是一个泛希腊的殖民地。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颖想法。伯里克利和雅典人为什么会想出这个主意呢？

有些学者相信，雅典人是贪得无厌的扩张主义者，建立图里殖民地的计划只不过是雅典持续不断的帝国主义扩张（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的一部分。但是，在《三十年和约》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岁月里，除了图里之外，雅典人并没有寻求任何新领土或新盟友。因此，检验这种假说的关键一定在于图里本身。但定居图里的十个部落中只有一个部落是雅典人，而最大的群体则是伯罗奔尼撒人，所以雅典没有任何希望控制图里。图里的早期历史也表明，雅典从来就没有打算控制它。图里建城不久之后就与斯巴达的少数殖民地之一塔拉斯[8]发生了战争。图里打输了，胜利者在奥林匹亚建立了纪念碑，制作了铭刻，让聚集在那里的所有希腊人都能看得到："塔拉斯人将他们从图里人手中夺得的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奉献给奥林匹亚大神宙斯。"如果雅典人打算让图里

成为雅典帝国在西方的中心，那么他们应当采取行动去保护图里，但他们无动于衷，任凭斯巴达殖民地在希腊最公开的集会场所炫耀自己的胜利。

5.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



十年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危急时刻，图里发生了一场争论：它究竟是谁的殖民地。德尔斐[9]的祭司解决了这个争端，宣布图里的创建者是阿波罗，于是再次确认了它的泛希腊性质。图里与雅典的关系被如此否认，雅典却依旧袖手旁观，尽管德尔斐的阿波罗对斯巴达友好，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图里殖民地对斯巴达人有很大价值。雅典人确实将图里视为一个泛希腊殖民地，而且自始至终都如此看待它。

雅典人原本完全可以拒绝参与图里的创建。大家根本不会注意到这样的不作为，但伯里克利和雅典人却发明了泛希腊殖民地的理念，并且让图里处于雅典势力范围之外。他们这么做可能是在发出一个外交讯

号。雅典要让图里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证据，昭示天下：雅典放弃了建立殖民地的机会，因为雅典在西方没有任何帝国主义野心，将会继续奉行和平的泛希腊政策。

萨摩斯叛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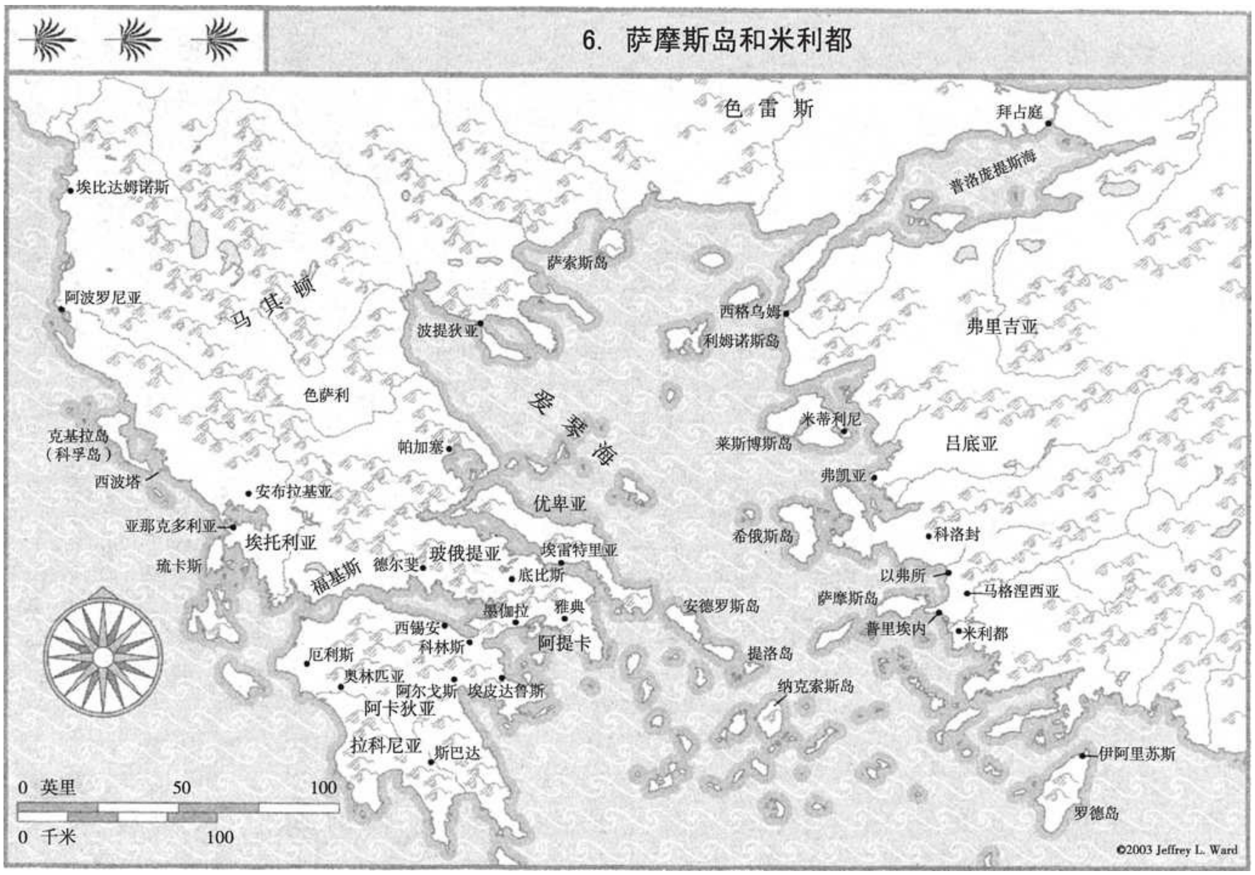
前440年夏季，萨摩斯岛和米利都为了争夺普里埃内（位于两者之间的一个城镇）而爆发了战争（见地图6）。萨摩斯岛拥有自治权，是提洛同盟最早的成员之一，也是同盟中仅存的三个不向雅典纳贡、拥有海军的国家之一，而且是最强的一个[10]。米利都也是提洛同盟最早的成员之一，曾两次反叛，均遭到镇压，被剥夺舰队，并被强迫纳贡和接受民主政体。米利都人向雅典人求援，雅典人不能坐视同盟中的一个强大成员向另一个无助的弱小盟邦强加自己的意志。但是，萨摩斯人拒绝接受雅典人的仲裁。雅典人不能对挑战自己领导地位和权威的行为置之不理。伯里克利亲自率领舰队攻打萨摩斯岛，推翻了原先的寡头政权，以一个民主政府取而代之，索取了高额罚金，扣押了一些人质以确保萨摩斯人忠顺听话，然后留下一支雅典军队驻守该岛。

萨摩斯领导人原先是挑战雅典，现在干脆掀起一场革命。他们说服波斯在小亚细亚的总督皮苏特尼斯支援他们，共同反抗雅典。皮苏特尼斯允许萨摩斯人在他的领地征募雇佣军，救出了被雅典人扣押的人质，于是萨摩斯人得以进一步行动。他们打败了雅典扶植的民主政府，俘虏了雅典驻军，并将这些俘虏和其他雅典官员押送到波斯总督那里。

萨摩斯叛乱的消息传到拜占庭（雅典人去往黑海采购粮食途中的重要城市，占据着关键的地理位置），引发了一场新叛乱。莱斯博斯岛的主要城市米蒂利尼是雅典另一个拥有海军的自治盟邦，准备在得到斯巴达的援助后就加入反对雅典的叛乱。导致雅典在后来宏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北的两个因素现在已经出现了：帝国内部的反叛和波斯的干预。但是，如果没有斯巴达的参与，叛乱就会被镇压下去，波斯人也会

撤离。斯巴达是否参战的决策肯定受到科林斯的影响，因为一旦发生针对雅典的战争，科林斯将是斯巴达最重要的盟邦，因为科林斯拥有海军。

6. 萨摩斯岛和米利都



斯巴达将做出何种反应？这是自和约缔结以来，和约与雅典政策受到的最严峻考验。如果雅典的政策，尤其是在西方的政策，被斯巴达和科林斯视为侵略性的、野心勃勃的，那么现在就是斯巴达乘虚而入、进攻雅典的良机，因为雅典的海军力量目前被牵制在其他地方（萨摩斯岛）。斯巴达人召集伯罗奔尼撒联盟商议，这至少说明斯巴达人对此事的态度非常严肃。科林斯人后来告诉雅典人，是他们的干预决定了斯巴达的政策："在其他伯罗奔尼撒人为是否援助萨摩斯而意见不一的时候，我们没有投票反对你们。"（1.40.5）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最终决定是不攻击雅典，于是雅典得以粉碎萨摩斯叛乱，并阻止其他盟邦在波斯援助下掀起广泛的叛乱。如果发生那样的情况，必然会导致一场有可能毁

灭雅典帝国的战争。

科林斯是雅典的不共戴天之敌，双方已经有了二十年的血仇。在最终导致战争爆发的危机中，科林斯人就是煽动战争的主要力量。那么，在前440年，他们为什么主张和平？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理解了雅典人在图里事件中传达的讯息；图里被建成一个泛希腊殖民地，后来雅典又表现得很克制，这都让科林斯人感到放心。

萨摩斯危机的结局加深了人们对和平的期望。自前446/前445年的和约以来，双方都表现出了很强的自制力，不肯追求有可能危及和约的好处，因此和平的前景一片大好。不料，在埃比达姆诺斯发生了一次争吵，制造出了新的意想不到的问题。

---

[1] 古希腊地理非常复杂，阅读本书时最好仔细参考地图，否则很容易陷入一大堆地名的旋涡。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在此介绍古希腊地理的大致情况。
古希腊大致可分为七大地区。
一、伯罗奔尼撒半岛，可分为7个小地区：阿开亚（Achaea）、阿卡狄亚（Arcadia）、阿尔戈利斯（Argolis或Argolid，主要城邦为阿尔戈斯）、科林西亚（Corinthia，主要城邦为科林斯）、厄利斯（Elis，主要城邦为厄利斯）、拉科尼亚（Laconia，主要城邦为斯巴达）和美塞尼亚（Messenia）。
二、希腊中部，可分为10个小地区：埃尼亚尼亚（Aeniania）、阿提卡（Attica，主要城邦为雅典）、玻俄提亚（Boeotia，主要城邦为底比斯）、多利斯（Doris）、优卑亚（Euboea）、洛克里斯（Locris）、马利斯（Malis）、墨伽利斯（Megaris，主要城邦为墨伽拉）、奥塔（Oetaea）和福基斯（Phocis）。
三、希腊西部，可分为4个小地区：阿卡纳尼亚（Acarnania）、埃托利亚（Aetolia）、阿佩兰提亚（Aperantia）和多罗皮亚（Dolopia）。
四、色萨利（Thessaly）。
五、伊庇鲁斯（Epirus）。
六、马其顿（Macedon）。
七、海外殖民地，包括在意大利南部的“大希腊”（Magna Graecia）和小亚细亚的诸多殖民地。

[2] 所谓“多利亚人的入侵”。这是研究古希腊历史的学者为了解释南希腊的原住民和他们的语言为何消失，以及古典希腊文化如何形成，而发明的一种理论，目前有很大争议。根据古希腊神话传说，赫拉克勒斯的后裔重返伯罗奔尼

撒半岛，夺回了赫拉克勒斯理应享有的土地，他的这些后裔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多利亚诸王。有些史学家相信，这个传说反映了多利亚人从巴尔干南下入侵希腊，消灭了一些原住民，并占领了希腊许多地区的史实。

[3] 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如今依然是希腊的造船和工业中心，距离雅典市中心约14公里。

[4] 在下文中简称“议事会”。

[5] 在雅典、底比斯、科林斯等古希腊城邦，卫城是城市中地势较高、易守难攻的部分，可能筑有军事要塞，做防御之用。

[6] 墨伽利斯是以墨伽拉为首都的地区。

[7] 古典时代的殖民地大多是与母邦（metropolis，英语中“大都市”一词来源于此）领土不接壤的海外殖民城邦。殖民城市与母邦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但与近代的殖民主义不同的是，这种联系并不以母邦直接控制殖民城市的形式存在。母邦与殖民地也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8] 也在意大利南部，图里的东北方。

[9] 德尔斐在希腊中部的福基斯地区，是一处重要的“泛希腊圣地”，即所有古希腊城邦共同的圣地。这里主要供奉着“德尔斐的阿波罗”，著名的德尔斐神谕就在这里颁布。现在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

[10] 另外两个是莱斯博斯岛（主要是米蒂利尼）和希俄斯岛。萨摩斯岛叛乱被雅典镇压之后，一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就只剩莱斯博斯岛和希俄斯岛这两个盟邦拥有独立海军了。

第二章 **“发生在一个遥远国度的争吵”**（前**436**～前**433**年）

埃比达姆诺斯

“当你驶入伊奥尼亚湾的时候，埃比达姆诺斯城[1]就在你的右侧。道兰底人就居住在附近，他们是一个野蛮的伊利里亚[2]民族。”（1.24.1；见地图7）修昔底德在开始叙述战争的导火索事件时，先做了这样的解释，因为他的希腊同胞中很少有人知道埃比达姆诺斯在何处，绝大多数人对其一无所知。前436年，埃比达姆诺斯爆发了内战，贵族派被驱逐出去，于是他们与居住在附近的非希腊血统的伊利里亚人联合，进攻他们的城市。埃比达姆诺斯城内的民主派遭到围攻，于是向克基拉求援。因为埃比达姆诺斯是克基拉人创建的殖民地，而克基拉原先是由科林斯人创建的。克基拉人奉行孤立政策，与科林斯殖民者的组织以及其他联盟保持距离，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因此他们拒绝援救埃比达姆诺斯的民主派。然后，埃比达姆诺斯民主派转而向科林斯求救，表示他们愿意成为科林斯的一个殖民地。按照惯例，在克基拉建立埃比达姆诺斯的时候，科林斯作为克基拉的“母亲”，也向埃比达姆诺斯的创立者提供了帮助。但科林斯和克基拉的关系非常恶劣，这是很独特的现象。数百年来，这两个城邦争吵不休，打了一系列战争，往往是为了争夺一些殖民地。

7. 埃比达姆诺斯和克基拉岛



科林斯人热情洋溢地接受了埃比达姆诺斯民主派的邀请，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干预此事将会激怒克基拉人，或许会引发一场战争。科林斯人派遣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去支援埃比达姆诺斯城内的民主派，还派去了许多永久性定居者，以便将埃比达姆诺斯改建为自己的殖民地。这支军队走的是比较艰险的陆路，“因为他们担心克基拉人会在海上拦截他们”（1.26.2）。科林斯参与这场争斗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学者们无法给出一个显而易见的、务实的、可靠的解释，但修昔底德从其他角度给出了解释：科林斯人此举的主要动机是对犯上作乱的殖民地克基拉的憎恨。“在共同的节日里，克基拉人不按照规矩给科林斯应得的特权，也不像其他殖民者那样，请一位科林斯人开启最初的献祭，而是对科林斯百般怠慢。”（1.25.4）

科林斯的决定无疑是它与克基拉争夺殖民地的长时间斗争的一部分，这种帝国主义竞争很像19世纪末欧洲列强的争斗。我们早就明确地知道，欧洲很多大国的殖民帝国事业从经济角度看是亏本的，而且它们为自己建立殖民帝国的辩解只是借口，并不能令人信服。真正的动机往往是心理上的、非理性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和务实的。也就是说，事关荣誉和威望。

科林斯人也是这样，他们决心在希腊的西北部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他们与克基拉发生了冲突。克基拉蒸蒸日上，而科林斯正在衰落。克基拉人拥有多达120艘战船的舰队，海军实力仅次于雅典。许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挑战科林斯人在该地区的霸权。科林斯人在公共集会时受到克基拉人的侮辱，这对科林斯人来说一定是不堪忍受的最后挑衅。他们抓住了埃比达姆诺斯人邀请进行干预的机会。

科林斯的干预使克基拉人对埃比达姆诺斯局势不再冷眼旁观。克基拉舰队立刻向埃比达姆诺斯发出了傲慢无礼的最后通牒：民主派必须让科林斯派来的驻军和殖民者离开，并重新接纳被放逐的贵族。科林斯不

可能接受这样侮辱性的条件，而埃比达姆诺斯的民主派为了自身安全，也不可能放弃科林斯派来的援军。

克基拉如此自负据傲，是因为它目前拥有很强大的海军，相反科林斯没有多少战船。克基拉人派遣40艘战船去攻打埃比达姆诺斯，而流亡贵族及其伊利里亚盟军则从陆地包围了埃比达姆诺斯。但克基拉人的自信是个错误，因为他们忽略了这样的事实：科林斯是个富庶的强国，现在非常愤怒，与斯巴达是盟友，还是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成员国。在过去，科林斯人曾利用盟邦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现在打算故伎重演，对付克基拉。

于是，科林斯宣布在埃比达姆诺斯建立一个崭新的殖民地，并邀请希腊全境的人去定居。定居者被送到那个地区，30艘科林斯战船和3000名士兵护送着他们。其他几个城邦，包括墨伽拉和底比斯这两个大国（都是斯巴达联盟的成员）提供了更多的船只和资金。斯巴达人哪怕只派出少量象征性的兵力，也足以威慑克基拉人，但斯巴达人没有为科林斯提供任何援助，或许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科林斯此次远征的内在危险。

科林斯人的反应让克基拉人大受震动，他们派人去科林斯谈判，“还邀请了斯巴达和西锡安使者一同前往”（1.28.1）。斯巴达人愿意参加这些讨论，显然说明他们希望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在会议上，克基拉人重申了让科林斯人撤军的要求；如果科林斯人拒绝撤军，克基拉愿意将此次争端交给任何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伯罗奔尼撒国家来仲裁；或者，如果科林斯人愿意，也可以请德尔斐神谕来仲裁。克基拉人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之前低估了科林斯的潜在力量，因此真诚地希望解决争端。他们也不必担心仲裁的结果，因为无论是伯罗奔尼撒国家还是德尔斐神谕，其仲裁结果肯定都会受到斯巴达的影响，也肯定会要求科林斯人撤出军队和殖民者，这对克基拉人来说自然是有利的。但是，假如科林斯人拒绝和解而坚持战争，克基拉就必须到其他地方寻求支

援。克基拉人发出的威胁是清楚明白的：如果有必要，他们将寻求与雅典结盟。

科林斯

希腊世界偏远角落的小纠纷制造了一场危机，开始威胁到整个希腊世界的稳定。只要此事的参与者仅限于埃比达姆诺斯和克基拉，这就只是个地区性问题，因为这两个城邦都不属于主宰希腊的两个国际联盟中的任何一个。但是科林斯卷入了此事，还将斯巴达联盟的一些成员国拉了进来，促使克基拉向雅典求援，于是大规模战争的威胁就变得很真切了。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个危险，斯巴达人同意与克基拉谈判者联手，并大力支持解决争端。

但是，科林斯人不肯让步。他们不好意思在斯巴达人眼皮底下断然拒绝克基拉的建议，于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果克基拉舰队从埃比达姆诺斯撤离，并且伊利里亚人也撤退，那么科林斯人可以考虑克基拉的建议（让科林斯人撤军）。

如果科林斯人的这个建议得到遵从，科林斯军队将在埃比达姆诺斯获得战略优势，他们可以更稳固地控制城市、从外界获取补给，并加强防卫，以抵御围攻。科林斯人的建议显然没有诚意，但克基拉人即便在此时也没有中断谈判，而是敦促双方都撤军，或者双方暂且停战，以便继续谈判。科林斯人又一次拒绝对方的提议，这一次以武力回应，派遣了75艘战船和2000名步兵前往埃比达姆诺斯。这支舰队在途中遭到80艘克基拉战船的拦截，在琉基姆尼战役中惨败。同一天，埃比达姆诺斯向攻城的克基拉人投降了。克基拉现在控制着大海和有争议的城市。

科林斯人报仇心切，在随后两年内建造了他们历史上最大的舰队，并从希腊全境（包括雅典帝国的城市）征募有经验的桨手。雅典人仍然希望置身事外，所以没有反对科林斯人在雅典势力范围内招兵买马，这

让科林斯人更加相信，克基拉得到雅典帮助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克基拉人的虚张声势被识破，最终派了使团去雅典，希望与雅典结盟，共同反抗科林斯。科林斯人得知此事后，也派了使者去雅典，“以阻止雅典舰队与克基拉舰队联合，因为那样的话，科林斯人就很难取胜了”（1.31）。最初的危机仅仅是蓝天中的一小朵云，仅限于希腊世界的偏僻西北角，不过是克基拉殖民者与其科林斯母邦漫长争吵的一个小插曲，如今却发展到了更危险的境地。希腊世界的超级大国中至少有一个会置身其中了。

---

[1] 埃比达姆诺斯城（Epidamnus），即今天阿尔巴尼亚的城市都拉斯（Durrës）。罗马人称之为狄拉奇乌姆（Dyrrachium），恺撒曾在此大战庞培。中世纪长期被威尼斯人控制，意大利语称之为杜拉佐（Durazzo）。

[2] 伊利里亚地区位于今巴尔干半岛西部、亚得里亚海东岸。大约包括今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黑山和阿尔巴尼亚等地。此时期的伊利里亚人不属于希腊民族。

第三章 雅典登场（前433～前432年）

前433年9月，雅典公民大会在普尼克斯山召开，听取克基拉和科林斯双方使者的申诉。在公民大会上，各方的观点都得到了表达、聆听和讨论。不管发生怎样的战争，将要参战的就是这些雅典公民，如今他们对局势做了辩论，并通过投票来决定国家的策略。

克基拉人面临一个艰巨任务。他们和雅典之前不曾有过友谊，而且雅典在此次争端中没有任何利益纠葛。雅典凭什么与克基拉结盟呢？如果与克基拉结盟，雅典就至少需要与科林斯交战，还可能与整个伯罗奔尼撒联盟交恶。克基拉人争辩说，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提议的与雅典结盟也是合法的，因为《三十年和约》明确允许雅典与中立国结盟。但和大多数人一样，雅典人更关心安全和利益问题。克基拉人在这些方面也打算满足他们："我们的海军力量仅次于你们。"（1.33.1-2）换句话说，这支力量可以与雅典海军联合，巩固雅典人的势力范围。

但是，克基拉人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恐惧。他们辩称，雅典人需要与克基拉人结盟，因为此时雅典和斯巴达联盟之间的战争看起来已经不可避免了："斯巴达人害怕你们，所以渴望战争；而科林斯人对斯巴达有很大影响力，所以是你们的敌人。"（1.33.3）因此，出于最务实的考虑，雅典应当接受克基拉为盟友："希腊有三支值得一提的舰队，你们的、我们的和科林斯的。""如果科林斯先控制了我们的舰队，那么两支舰队就合二为一了，你们就将不得不同时与克基拉舰队和伯罗奔尼撒舰队作战；如果你们接受我们，你我双方的舰队就可以联合起来对付他们。"（1.36.3）

科林斯发言人的任务越来越困难了。毕竟科林斯侵略了埃比达姆诺斯，并且拒绝了每一项和平提议，甚至不肯听从自己盟邦的意见。他们

最有利的论据是质疑雅典与克基拉结盟的合法性。从技术上讲，《三十年和约》确实允许缔结这样的联盟，因为克基拉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但科林斯人辩称，这样的联盟违背了和约的精神，也违背常识："尽管和约里说，任何一个中立国可以自愿加入任一阵营，但此条款的本意不是允许中立国为了伤害其中一方而加入另一方。"（1.40.2）当年参加和约谈判或者宣誓批准和约的人绝不会允许一个与斯巴达联盟交战的中立国与雅典结盟。科林斯人以一个简单的威胁强调了这项原则："如果你们与他们联手，那么我们在对他们复仇时，就必须将你们也视为敌人。"（1.40.3）

科林斯人驳斥克基拉人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说法。他们还提醒雅典人，科林斯过去可是帮过雅典的忙，尤其在萨摩斯叛乱期间，是他们劝说斯巴达和伯罗奔尼撒联盟不要乘人之危地攻击雅典。科林斯人相信，在萨摩斯叛乱期间，他们已经确认了两大联盟关系的关键准则，这也是维护和平的关键原则：任何一方不得干涉另外一方的势力范围。"请不要与克基拉人结盟反对我们的意愿，也不要帮助他们作恶。按照我们的请求行事，才是恰当的行为，也最符合你们自己的利益。"（1.43.3-4）

但科林斯人的论点不是很有说服力。克基拉不是科林斯的盟邦，而萨摩斯岛是雅典的盟邦，这两件事情不能简单地类比。对和约的最宽泛阐释也不会禁止雅典人援助一个遭到科林斯攻击的中立国。雅典若接受克基拉的结盟建议，是完全合法的。但在更深层次上，科林斯人是正确的：如果两大联盟都去帮助互相交战的中立国，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

雅典人自前445年以来的一举一动，以及在整个危机期间的表现都明确地证明，他们希望避免战争。但是，克基拉给他们出了一个独特的难题。如果克基拉被打败，它的舰队落入伯罗奔尼撒联盟手中，那么就会出现一支足够强大、有能力挑战雅典海上霸权的伯罗奔尼撒舰队。而

雅典及其殖民帝国的力量、繁荣，乃至生存，都依赖于海上霸权。尽管雅典人面临如此巨大的威胁——几乎是一夜之间，力量平衡就可能发生致命的变化——但科林斯人似乎确信，雅典一定会拒绝与克基拉结盟，或许甚至会与科林斯联手对付克基拉（科林斯人厚着脸皮向雅典提出了这个建议）。科林斯人为什么犯下如此大错？对他们来说，克基拉仅仅是个地区事务。科林斯人追逐着自己的狭隘利益，并且长期被一个小国（克基拉）羞辱，因而怒火中烧，所以低估了自己的行动对整个国际体系力量平衡的影响。科林斯人没有努力去确认在他们攻打克基拉的时候，雅典人会不会袖手旁观。他们对危险置若罔闻，一头猛冲上去，寄希望于时事会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坐在山坡上开会的雅典人现在面临着最艰难的抉择。公民大会的绝大多数辩论都是在一天之内进行的，但关于是否与克基拉结盟的辩论却持续了很长时间，需要第二次开会。第一天，大家的意见倾向于拒绝与克基拉结盟。我们可以推断，这一夜也是在激烈的讨论中度过的。第二天，出现了一个新计划：不与克基拉缔结完整的攻守同盟（symmachia，希腊通常的联盟形式），而仅缔结防御性同盟（epimachia），这是希腊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此类同盟关系。富有创新精神的伯里克利很可能是这个主意的发起人。在整个危机期间，他表现出了影响雅典政策的强大能量。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正是伯里克利“说服人们去援助正在与科林斯人交战的克基拉人，并与这样一个拥有海军的强大岛国结盟”（*Pericles* 29.1）。

修昔底德认为，雅典人投票决定与克基拉结盟，是因为他们相信与伯罗奔尼撒人迟早必有一战。但是，很多反对与克基拉结盟的人都不会认同这一判断。他们一定会问，雅典还没有受到威胁，而且这威胁是否存在也成问题，那么雅典为什么要为了克基拉而冒打仗的风险？雅典人的行动说明，他们的政策目标不是备战，而是通过威慑防止战争：在两条道路（要么拒绝克基拉人，于是克基拉舰队有可能落入伯罗奔尼撒人

之手；要么与克基拉缔结攻击性同盟，那么有可能会引发一场不受欢迎的冲突）之间，雅典人选择了中间道路。

因此，防御性同盟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外交手段，目的是促使科林斯人恢复理智。为了尽到新同盟的义务，雅典人派遣了10艘战船开赴克基拉。如果他们的目的是参战并打败科林斯人，他们可以从自己庞大的海军中轻松抽调200艘战船。再加上克基拉人的战船，就足以迫使科林斯人放弃作战计划，或者大败科林斯人、歼灭科林斯舰队，并彻底消除科林斯可能构成的威胁。因此，雅典人派去的区区10艘战船是象征意义的，而没有多少军事价值，目的是让世人看到，雅典是在非常认真地威慑科林斯人，阻止它的行动。雅典人挑选客蒙之子拉刻代蒙尼厄斯作为舰队指挥官之一也绝非偶然，这显然是要消除斯巴达人的疑心。拉刻代蒙尼厄斯是一位有名的骑兵指挥官，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任何海战经验。他的名字其实就是“斯巴达”的意思，表明了他父亲与伯罗奔尼撒联盟的主导国家的亲密关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雅典10艘战船的指挥官们接到了这样的命令：除非科林斯舰队驶向克基拉岛本土或其领地之一，并企图登陆，否则不得与其交战。“发布这样的命令，就是为了不违反和约。”（1.45.3）这种命令对任何海军指挥官来说都是噩梦，因为在混乱的海战中，谁能说得准敌人的意图是什么？如果谨小慎微、耐心等待，就可能无法及时干预；若对敌人的佯动做出快速反应，或者误解敌人的意图，就可能导致没有必要的冲突。

用现代语言讲，这就是“最低限度威慑”政策。雅典舰队的出现表明雅典决心阻止海军力量平衡发生变化；但这支舰队规模如此之小，说明雅典人并不打算重创或消灭科林斯势力。如果雅典人的计划奏效，科林斯人就会开船回家，危机就算解除了。如果科林斯人果真打算交战，雅典人仍然有希望置身事外。或许克基拉人没有雅典人的援助也能打败科

林斯，就像在琉基姆尼那样。一些雅典人还希望“让克基拉和科林斯互相厮杀、消耗力量，如果雅典将来需要和它们交战，就会轻松许多”（1.44.2）。不管怎么样，雅典人都可以避免冲突。

西波塔战役

前433年9月，科林斯舰队与克基拉舰队终于在西波塔群岛交战。实力薄弱的雅典舰队（10艘战船）不足以威慑科林斯人。相信自己的行动在将来某个时间可能造成不愉快后果，以及敌人排山倒海的力量极可能对自己造成毁灭性打击，这二者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在之前的琉基姆尼战役中，科林斯的每一个盟邦都出兵援助它；但在西波塔（见地图8），只有两个盟邦——厄利斯和墨伽拉——支援科林斯。其他盟邦可能因为科林斯之前的失败而退缩不前，或者被克基拉与雅典的新联盟吓倒。也有可能是斯巴达采取措施，让它的盟邦不要卷入冲突。科林斯舰队以150艘战船（其中90艘是他们自己的，60艘是殖民地和盟邦提供的）攻击克基拉的110艘战船，而雅典人暂且在一旁观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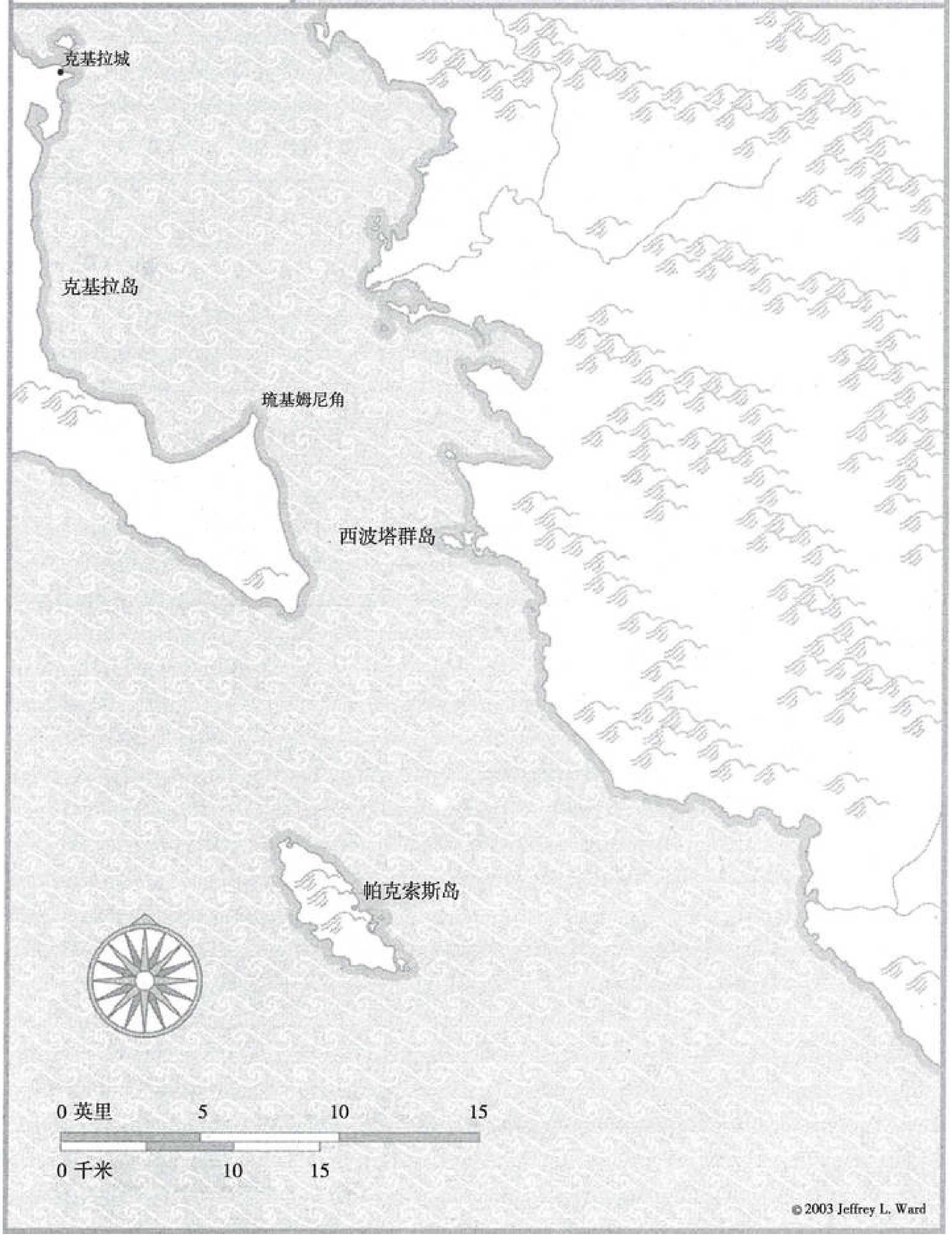
但是，眼看克基拉人很快就要溃败了，雅典人再也不能袖手旁观。“局势发展到这种地步，雅典人不得不和科林斯人互相厮杀起来。”（1.49.7）

克基拉和雅典的舰队开始准备防御克基拉岛时，已经发动了最后总攻的科林斯人却突然退去了。第二支雅典舰队突然出现在海平线上。激战正酣时，科林斯人误以为这是一支兵力远胜于自己的庞大舰队的先遣部分，可以轻松地打垮自己，于是退出了战斗。克基拉得救了。

事实上，赶到的雅典战船仅有20艘，是几天前被派来增援之前的10艘战船的。普鲁塔克告诉我们，第一批10艘战船起航后，伯里克利的政敌批评了他的计划：“他派去10艘战船，对克基拉人没有多少帮助，但给了敌人极大的口实。”（*Pericles* 29.3）此种策略能够取得的最好结果

也只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妥协。但战争之神是变幻莫测的，勇敢往往能够取得比理智预测的更好的结果。谁能预想到，第二批20艘战船在海上航行了几天之后，并且与处在克基拉外海的舰队没有任何通信联系，竟能恰好在千钧一发之际赶到，挽救了克基拉，使其免于被科林斯征服？

8. 西波塔战役


克基拉城
克基拉岛
琉基姆尼角
西波塔群岛
帕克索斯岛
0 英里 5 10 15
0 千米 10 15
© 2003 Jeffrey L. Ward

次日，在得到30艘完好无损的雅典战船的支援后，克基拉人向敌人发起挑战，但科林斯人不肯迎战，因为他们害怕雅典人会将第一天的小规模交锋视为针对科林斯战争的开端，并抓住这个机会摧毁科林斯舰队。而雅典人也放任科林斯舰队驶离。双方都小心地避免承担破坏和约的责任。科林斯意识到，若是没有斯巴达及其盟邦的支持，它是打不赢雅典的。但是，斯巴达人已经努力使科林斯保持克制，因此如果科林斯人被指责为破坏和约的罪魁祸首，就不能指望得到斯巴达人的支持了。而且，雅典也小心地避免给斯巴达一个参战的借口。

在作战层面，雅典人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克基拉及其舰队得以挽救。但在战略层面，“最低限度威慑”政策失败了，因为雅典人的到来并没有威慑住科林斯人，令其不敢作战，雅典人的干预也未能消灭科林斯人的战斗力。科林斯人倍感挫折，甚至更加恼火，现在下定决心要把斯巴达人及其盟邦拖进战争，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向敌人报仇雪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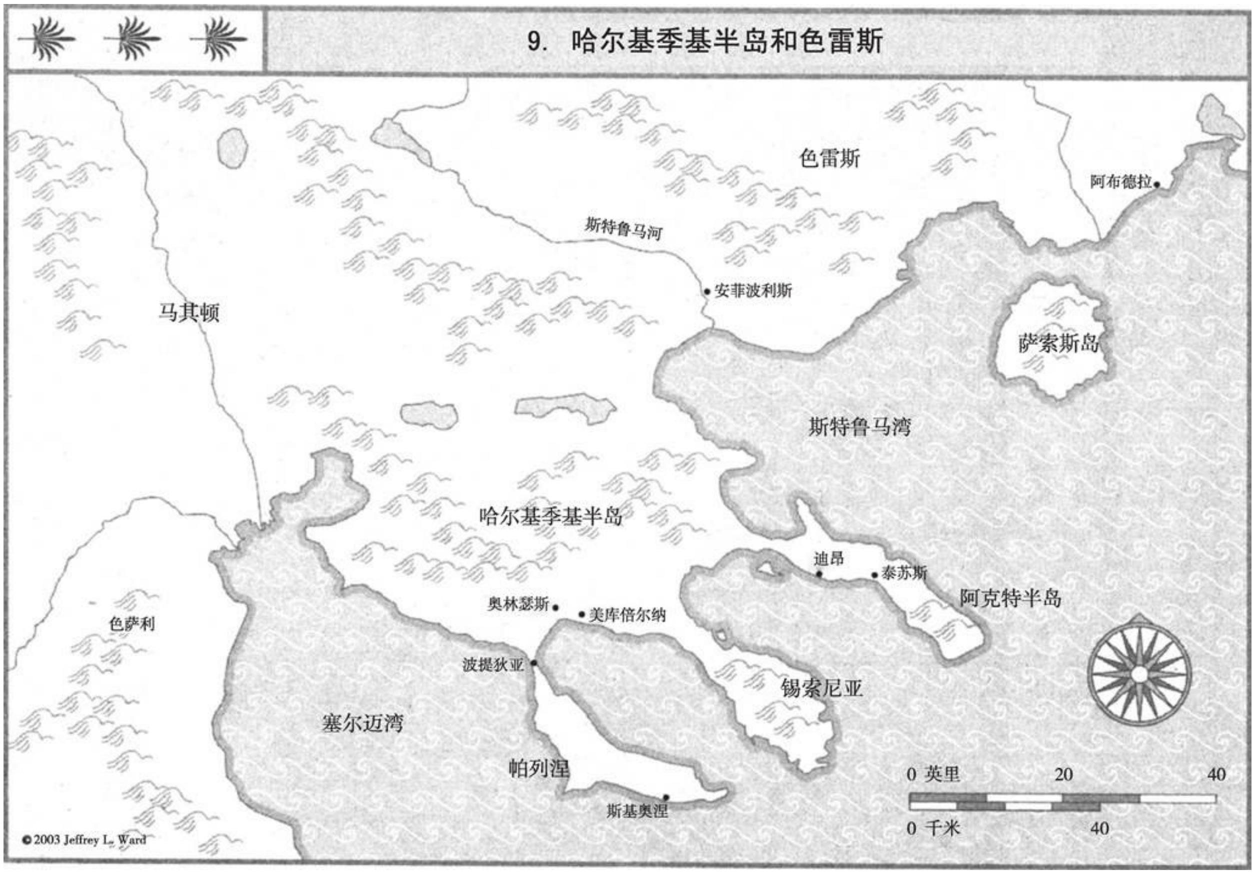
波提狄亚

雅典人现在认识到他们必须备战，至少要与科林斯对抗。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努力避免将伯罗奔尼撒联盟卷进来。在西波塔战役之前，雅典人就已经中止了他们宏大的建筑工程，以节约财力，为战争做准备。西波塔战役之后，他们开始采取行动，巩固自己在希腊西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据点。次年冬天，他们向爱琴海北部的城市波提狄亚（见地图9）发出了最后通牒。波提狄亚是雅典同盟的成员，但同时也是科林斯的殖民地，并且与其母邦的关系十分紧密。雅典人知道科林斯人在准备复仇，因此担心科林斯人与敌视雅典的马其顿国王联手，并在波提狄亚掀起叛乱（马其顿领土距离波提狄亚不远）。叛乱的火焰可能从波提狄亚蔓延到其他国家，并在雅典帝国内部造成严重问题。

波提狄亚并未做出任何具体的挑衅行为，雅典人却命令波提狄亚人拆毁其面向大海的城墙，送走科林斯每年派来的行政长官，并向雅典交

出一定数量的人质。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消除科林斯对波提狄亚的影响，并使其处于雅典控制之下。这一次，我们仍然应当将雅典的策略理解为对严重问题的外交回应，是两难之间的温和解决方案。如果雅典对波提狄亚坐视不管，它可能叛变；而如果派遣军队去控制波提狄亚，虽然能让雅典牢牢掌控它，却可能激怒伯罗奔尼撒联盟。然而，雅典的最后通牒作为一种温和的解决方案，向波提狄亚的潜在叛乱者发出了强有力的讯息，并且仍然属于帝国内部的管理，是《三十年和约》明确允许的。

不足为奇的是，波提狄亚人拒绝了雅典的要求。辩论持续了整个冬天，最后雅典人命令一支此前被派往马其顿的远征军的指挥官“从波提狄亚人那里强行扣押人质、拆除其城墙，并对附近的其他城市予以严密监视，以防其兴风作浪”（1.57.6）。雅典人的疑心被证明是很有道理的。波提狄亚人在科林斯人的支持下，已经秘密地请求斯巴达援助他们的叛乱。斯巴达监察官的回复是，假如波提狄亚人发动叛乱，斯巴达将入侵阿提卡，以示支持。斯巴达的政策为何发生了这番逆转？



墨伽拉禁运

在前433～前432年冬季（具体时间与雅典向波提狄亚发出最后通牒接近，但无法确定是在它之前还是之后），雅典人颁布了一项命令，禁止墨伽拉人使用雅典帝国的港口和雅典的阿哥拉。现代世界有时用经济禁运作为外交武器，这是除了战争之外的一种强制手段。但在古代世界，之前的和平时期里还不曾有过贸易禁运。

这肯定也是伯里克利的发明，因为当时的人们责怪这道禁令导致了战争爆发，并怪罪发布禁令的伯里克利，尽管他一直到最后都固执地为禁令辩护，即便在似乎战争与和平完全取决于禁令的时候也不嘴软。雅典领导人为什么要实施禁运？他和大多数雅典公民为什么又批准并坚持禁运？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经济上的帝国主义行为，或者是旨在刻意挑起战争；或者是向伯罗奔尼撒联盟示威，激怒斯

巴达人，促使其违反和约；或者它甚至是战争的第一场行动。雅典官方对禁运的解释是，墨伽拉人耕种了雅典人认为的神圣土地，侵犯了两国边境，并且藏匿逃亡奴隶。

但只要仔细审视一番，我们就可以发现，现代人的上述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而古人的抱怨也仅仅是借口而已。对墨伽拉实施禁运的真正目的是稍稍加大外交压力，确保曾在琉基姆尼和西波塔两场海战中支持科林斯的墨伽拉受到惩罚，从而防止科林斯的盟邦加入冲突。科林斯人要想取胜，就必须说服其他伯罗奔尼撒联盟国家，尤其是斯巴达，站到他们那边。在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大多数成员国都反对战争的时候，墨伽拉出兵援助科林斯，并参加了琉基姆尼和西波塔海战，这既让雅典恼怒，也违抗了斯巴达的意愿。假以时日，这些国家有可能会与科林斯人联手，在另一场冲突中对抗雅典；如果有足够多的盟邦走了这一步，斯巴达人就再也不能袖手旁观，否则他们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和自身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这一次，雅典人的行动仍然算得上中间道路。如果他们不采取任何行动，就可能鼓励墨伽拉和其他国家去帮助科林斯。如果武力进攻墨伽拉，就违背了和约，会促使斯巴达向雅典开战。相比之下，禁运不会让墨伽拉屈服，也不会造成严重损害。禁运会给大多数墨伽拉人造成一些不便，并对那些通过与雅典及其殖民帝国做生意而发财的人——其中肯定有一些就是统治墨伽拉的寡头议事会的成员——造成损害。这种惩罚也许能说服墨伽拉，将来不要再来瞎搅和；同时对其他的贸易国发出警告：即便在和平时期，雅典也可以对其施加报复。

但对墨伽拉实施禁运也是有风险的。墨伽拉人肯定会向斯巴达人抱怨，斯巴达人或许会援助他们。不过，斯巴达人也可能拒绝援助他们，因为禁运并没有违反和约（和约里不曾提到贸易或经济关系）。另外，伯里克利与斯巴达目前的唯一一位国王阿希达穆斯二世有私交（另一位

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于前445年被流放）。伯里克利知道，阿希达穆斯二世是主和派。伯里克利希望，斯巴达领导人能够理解他的和平用意与禁运的有限目标，并帮助其他斯巴达人理解这些。伯里克利对阿希达穆斯二世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他低估了自雅典与克基拉结盟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在一些斯巴达人胸中激起的怒火。

第四章 战争的抉择（前432年）

斯巴达选择战争

斯巴达监察官向波提狄亚人做出的入侵阿提卡的承诺是秘密的，而且没有得到斯巴达公民大会的批准。波提狄亚人于前432年发动叛乱时，斯巴达人没有兑现承诺。他们的国王和大多数公民都还没有做好发动战争的心理准备，但有一个影响力很大的派系急于改变民意。

被派去阻止波提狄亚叛乱的雅典军队兵力不足，而且到得太晚，没有发挥多少作用。科林斯人不敢派遣正式的远征军去援助波提狄亚叛军，因为那样做就正式违反了和约。他们的办法是组织了一支“志愿军”，由一名科林斯将军指挥。这支部队包括科林斯人和伯罗奔尼撒雇佣兵。与此同时，雅典人与马其顿媾和，以便将自己在马其顿作战的兵力抽回，用于镇压波提狄亚，并从雅典派出了增援部队。到前432年夏季，强大的陆军和战船包围了波提狄亚，开始攻城。这场围攻持续两年多，并造成极大的经济开销。

波提狄亚遭到攻打，墨伽拉人愤怒地抗议雅典人的禁运，于是科林斯不再是唯一一个反对雅典的国家。[1] 它们鼓励所有对雅典心怀不满的国家向斯巴达人施加压力。最后，前432年7月，斯巴达监察官召开了公民大会，邀请所有对雅典有怨言的盟邦来斯巴达畅所欲言。这是我们知道的唯一一次盟邦受邀在斯巴达公民大会发言的情况，因为除此之外都只是斯巴达联盟聚集起来开会。斯巴达人诉诸如此不寻常的程序，说明他们在前432年夏季仍然非常不愿意打仗。

墨伽拉人是此次会议上最怒气冲冲的参与者，科林斯人则是最有成效的。他们努力让斯巴达人相信，斯巴达谨慎避免冲突的传统政策在活

力十足的雅典面前是灾难性的；另外，他们对雅典和斯巴达两个民族的性格做了区分，以支撑自己的论点。

> 他们（雅典人）具有革命性，能够快速制订计划并实施；而你们（斯巴达人）墨守成规，不曾有过任何创新发明，而且你们行动起来的时候，总是半途而废。他们的勇敢大胆超过了他们的能力，冒险到了愚蠢的地步，在危险中还乐观向上；而你们的习惯是做事不超过自己的力量范围，对自己最有把握的判断也不信任，悲观地以为自己遇到任何危险都会完蛋……
>
> 只有对他们来说，想要什么，马上就能实现，因为他们制订计划之后，会特别迅速地执行。就这样，他们一生都冒着风险……因为他们认为，与痛苦的活动相比，安宁的和平更不堪忍受。……他们的本性就是自己不愿意安享和平，也不肯让别人安生。（1.70.2-9）

不管这些慷慨陈词多么有效，对雅典和斯巴达的两方面比较的确是夸大其词的。如果斯巴达人真的像科林斯人描述的那样迟钝、懒惰，怎么可能建立起自己的伟大联盟？又怎么可能以盟主身份领导希腊人战胜波斯人呢？另外，雅典完全遵守了《三十年和约》的条款和精神。科林斯人自己其实也承认这一点，毕竟在萨摩斯叛乱的时候是科林斯人约束了自己的盟邦。雅典在近一年中令人不安的行为显然是对科林斯近期行动的反应，科林斯人对这一点讳莫如深。

科林斯人以威胁结束了自己的发言：斯巴达人必须援助波提狄亚和科林斯的其他盟邦，并入侵阿提卡，“否则你们就是背叛了自己的朋友和亲戚，将他们出卖给最凶残的敌人，也会让我们当中其余的人转投其他联盟”（1.71.4）。这个威胁是空洞无力的——因为没有其他联盟可以转投——但由于斯巴达的安全和生活方式依赖于联盟的完整性，所以哪怕是关于背叛的一点点暗示都会让斯巴达大为警醒。

下一位发言者是雅典使团的一名成员。据修昔底德说，此人“碰巧在斯巴达，因为他之前在处理别的事务”（1.72.1）。我们不知道“别的事务”究竟是什么，这显然只是个让雅典人表达自己观点的借口。伯里

克利和雅典人不愿意派遣一名官方发言人去斯巴达回答大家的抱怨，因为那样就等于承认斯巴达有权批判雅典人的行为，而和约规定分歧应当由仲裁解决。但他们希望阻止斯巴达听信其盟邦的论点，还希望阐明雅典是通过正当手段获得力量的，并向大家证明雅典的力量是何等强大、多么令人生畏。雅典使者指出，雅典帝国的扩张是出于恐惧、荣耀及合理的自身利益要求，斯巴达人应当很理解这些东西。他的语调不卑不亢，没有安抚对方的意思，而是非常公事公办。他发言结束时，坚持要求双方严格遵守和约：一切分歧都应当通过仲裁解决。如果斯巴达人拒绝仲裁，“你们带着大家走向战争，我们将努力向那些挑起战争的人复仇”（1.78.5）。

雅典使者的发言是故意挑衅，刻意要激怒斯巴达人，促使其违背誓言、开启战争吗？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它以为获得和平的唯一办法是安抚怒火，用一团和气的方式解释分歧并做出让步。但有的时候，阻止战争的最好办法是威慑对方，展现己方的力量、自信与决心。这种策略如果能给对方一个体面的台阶下，比如为斯巴达人提供仲裁选项，就会特别有效。至少最可靠的同时代亲历者告诉我们，此时雅典人还不希望发生战争：“他们想明确地展示自己城市的力量，使那些年纪较长的人记起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并且告诉年纪较轻的人所不知道的东西。雅典人认为，听了他们的论点后，斯巴达人会倾向于和平，而非战争。”（1.72.1）

考虑到斯巴达国王一般对战争与和平的决策很有影响力，雅典人的策略似乎特别合理。前432年，斯巴达唯一一位掌权的国王是阿希达穆斯二世，他是伯里克利的私人朋友，“一个以睿智和审慎闻名的人”（1.79.2），他很快就会表达对武装冲突的反对。外邦人发言之后，斯巴达人全都离开了会场。尽管公民大会敌视雅典，并自信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打败雅典，但阿希达穆斯二世不敢苟同。他坚持认为，雅典的实力比斯巴达习惯面对的那种力量要强，而且性质完全不同。雅典是一座

有城墙的城市，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是一个海洋帝国，拥有制海权，它能够打一场斯巴达人闻所未闻的战争。阿希达穆斯二世告诉大家，他担心“这场战争会一直打到我们儿女的时代”（1.81.6）。

但公民大会的情绪非常激昂、好战，因此阿希达穆斯二世不能简单地提议接受雅典人的建议。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温和的替代方案：斯巴达人应当姑且满足于发表正式的投诉；与此同时，他们应当为谈判破裂的局面做准备，准备迎接实际上可能发生的那种类型的战争，也就是说，他们应当从蛮族（主要指波斯人）和其他希腊人那里寻求船只支援。如果雅典人妥协，斯巴达就不采取任何行动。如果雅典人不妥协，那么两三年之后，在斯巴达人准备更充分的时候再开战也不迟。

不足为奇的是，国王的提议遭到了科林斯人、其他怨恨雅典城邦的人以及急于采取行动的斯巴达人的反对。他们相信，要挽救波提狄亚，务必火速行动起来。尤其是科林斯人想要的不是解决纠纷，而是自由行动、一劳永逸地消灭克基拉；他们还想向雅典人复仇，甚至打算消灭雅典帝国，斯巴达的主战派也同意这个目标。将过去五十年里的一些事件，如克基拉、波提狄亚和墨伽拉的事件综合起来考虑，大多数斯巴达人似乎相信科林斯人描述的画面：雅典人的傲慢令人不堪忍受，他们的实力日益增长，对其他人构成了威胁。

好战的斯巴达监察官斯提尼拉伊达发出的简短而直言不讳的回应非常有代表性：

> 我不理解雅典人的长篇大论。他们自吹自擂，但也不否认，他们损害了我们的盟邦和伯罗奔尼撒的利益……其他人或许有很多金钱、船只和马匹，但我们拥有优秀的盟友，我们不能把盟友出卖给雅典人。我们也不应当屈服于法庭或言辞的裁判，因为伤害我们的不是言辞。我们应当调动全部力量，快速向敌人复仇。我们受到了极大冤屈，任何人都不要说我们需要时间慢慢斟酌；那些打算伤害我们的人倒是要多花点时间，好好想想。那么，斯巴达人，用无损于斯巴达荣耀的方式，投票支持战争吧！不要让雅典人发展得更强大，不要背叛

你们的盟友！让我们在诸神佑助下，出征讨伐那些伤害我们的人！（1.86.1-5）

监察官声称无法判断辩论中哪一方的呼声更高，但“希望通过公开表达他们的意见，使斯巴达人更加渴望战争”，于是要求分组表决。表决结果是，多数人认为雅典人违背了和约；这实际上是要求开战的表决。

斯巴达人此时并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不能指望从战争中获得什么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也没有受到任何直接的伤害和挑衅。那么，他们为什么决定打一场可能会非常漫长而艰难的战争，并且面对的是一个有着独特优势的强大敌人？正常情况下非常保守、主张和平的斯巴达多数派（在谨慎而德高望重的阿希达穆斯二世的领导下）被什么打败了？修昔底德相信，斯巴达人投票选择战争，不是因为他们被盟邦的论点说服了，“而是因为他们担心雅典人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他们看到，希腊的大部分已经落在了雅典人手里”（1.88）。他对战争起因的一般解释是：“我认为，战争真正的起因——不过很少被人提及——是雅典人实力的壮大，这让斯巴达人心生恐惧，迫使他们选择战争。”（1.23.6）

但事实上，雅典的实力在签订和约与西波塔战役之间的十几年里并没有增长，而且雅典的外交政策也不是侵略性的。即便是科林斯人，也早在前440年就承认这一点。雅典实力唯一的增长是前433年与克基拉的结盟，而且这次结盟也是为了对付科林斯的行动，况且科林斯是不顾斯巴达的反对而悍然行动的。证据很明显，雅典人在此事件中的表现并非心甘情愿，而且是防御性的，目标仅仅是阻止科林斯人极大地改变国际力量平衡。

但在危机中，人们会因为害怕未来的威胁而受到影响。斯巴达人也是这样，他们看到“雅典人的力量开始彰显出来，并影响斯巴达的盟邦”，大为震惊。“然后这种局势变得难以忍受了，斯巴达人决定必须尽

其所能，无比坚定地消灭雅典人的力量，打响这场战争。”（1.118.2）修昔底德解释战争起因的上述三个版本全都支持他对主宰国际关系的根本动机——恐惧、荣耀和利益——的分析。斯巴达人最深层次的利益要求他们维护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完整，以及他们对联盟的领导权。他们担心，雅典人的实力和影响越来越强，会继续骚扰斯巴达的盟邦，最终导致这些盟邦放弃斯巴达联盟、开始全力自卫，于是联盟就瓦解了，斯巴达的霸权也就垮台了。斯巴达人的荣耀和自我认识不仅取决于盟邦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可，还依赖于他们独特政体的维持，而这个政体的安全则依靠上述因素，即恐惧、荣耀和利益。斯巴达人创建联盟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因此，为了维护这个同盟，他们愿意冒战争的巨大风险。要这么做，就意味着维护盟邦的利益，即便这些利益威胁到斯巴达人自己的安全。这并非历史上最后一次出现这种局面：一个联盟的领袖被势力较小的盟邦牵制，不得不去采纳自己原本不会采纳的政策。

根据公民大会的决定，斯巴达监察官要求召开斯巴达联盟会议，对战争问题做正式投票。直到8月，各盟邦才聚集起来，而且也不是全都来开会了；我们估计那些没有前来开会的盟邦并不赞成此次会议的目标。在到会的盟邦中，大多数（但不是绝对多数，这与修昔底德记载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情况不同）盟邦支持战争。因此，不是所有盟邦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场战争师出有名，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场战争会很轻松或者必胜无疑，也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场战争是必须的。

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完全可以立刻发动入侵，在向波提狄亚人许诺仅仅几个月后就兑现诺言。这样的入侵准备起来很简单，只需要几周时间，而且9月和10月的天气也有利于作战；如果雅典人不肯迎战，也可以破坏他们的财产。虽然雅典的粮食早已收割完毕，但还有足够时间去破坏雅典城墙外的葡萄园、橄榄园和农庄。如果雅典人像斯巴达人预计的那样渴望交战，那么在9月入侵阿提卡就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计划。

但是，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在此期间，斯巴达人派了三个使团去雅典，其中至少有一个确实致力于避免战争。过了很久之后，武装冲突才正式爆发，而且斯巴达人继续努力进行谈判，这说明在辩论的激情消退之后，阿希达穆斯二世谨慎而冷静的论点产生了效果，斯巴达人的情绪恢复为惯常的保守。或许还有机会避免战争。

雅典选择战争

斯巴达的第一个使团可能于8月底抵达雅典。他们要求雅典人“祛除女神的诅咒”，这指的是两个世纪前伯里克利母系家族一位成员犯下的渎神罪行。人们普遍将伯里克利与其母亲的家族联系起来。斯巴达人希望世人会因此事责怪伯里克利，认为是他给雅典带来了麻烦，借此打击伯里克利的公信力，因为“作为那个时代最强有力的人和国家领袖，他事事反对斯巴达人，不允许雅典人妥协，并不断驱使他们奔向战争”（1.126.3）。伯里克利的确始终反对在没有仲裁的情况下向外国妥协；在斯巴达人及其盟邦投票决定参战后，伯里克利拒绝继续与其进行谈判，认为这只不过是打击雅典人决心的策略而已。

伯里克利炮制了雅典人的回应，要求斯巴达人为不是一桩，而是两桩宗教罪行赎罪、驱逐责任人。第一桩渎神罪行是，斯巴达人曾杀害躲避在神庙中的黑劳士。这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到，斯巴达人尽管打着“为希腊人的自由而战”的旗号，但实际上在自己的国土上残暴地统治着数量极多的希腊人。第二桩渎神罪行是，曾有一位斯巴达国王对自己的希腊同胞施以暴政，最后叛变，投奔了波斯人。

斯巴达人还派遣了其他使团，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要求，但最后执着于一个要求——“他们公开地、非常明确地宣布，如果雅典人撤销对墨伽拉的禁运，就不会有战争。”（1.139.1）这与斯巴达之前的激进立场相比，是很大的让步，显然说明在投票决定参战之后，斯巴达的政治气

候发生了变化。普鲁塔克说，阿希达穆斯二世“努力以和平手段解决盟邦的投诉，平息他们的怒气”（*Pericles* 29.5），但国王和他的政敌都不能牢牢掌握斯巴达的局势。阿希达穆斯二世的力量显然足够强大，能够继续与雅典谈判，但他的政敌也能持续地要求雅典在不经过仲裁的情况下做出让步。因此，国王和他的政敌达成的妥协是，仍然拒绝接受仲裁，但将对雅典的要求减少到一条。

如此的让步事实上是背叛了科林斯的利益，并且斯巴达支持墨伽拉人而拒绝接受仲裁，展现了自己作为联盟领袖的力量和值得信赖，于是孤立了科林斯。如果科林斯人在这种情况下威胁要脱离联盟，那么阿希达穆斯二世和大多数斯巴达人都丝毫不会担心。斯巴达人现在是冒着一定的风险，非常努力地避免战争。但是，决定大局的将是雅典。

斯巴达人的提议说服了很多雅典人。他们质疑雅典仅仅为了对墨伽拉实施禁运而开战是否明智，因为对墨伽拉实施禁运原本仅仅是战术上的策略，肯定不值得为之作战。但伯里克利仍然很坚定，坚持要求根据和约进行仲裁，但他也不能忽视要求他回复斯巴达人的压力。他做出的回应是，向墨伽拉和斯巴达发出了正式文书，作为对雅典行动的辩护。“这道文书是由伯里克利提议的，包含了对禁运政策的合理、人道的辩解。”普鲁塔克这样写道（*Pericles* 30.3）。伯里克利解释说，他之所以拒绝撤销禁运，是由于雅典的一部晦涩的法律禁止他拆除铭刻着禁运法令文本的石板。斯巴达人反驳道：“那么不要把它拆掉，把它翻过来挡住文字就行了，因为没有法律禁止那么做。”（*Pericles* 30.1-3）但伯里克利固执己见，而且大多数雅典人都支持他。

最后，斯巴达人发出了一道通牒：“斯巴达人渴求和平，而且只要你给希腊人自治权，就会有和平。”（1.139.3）这等于是要求拆解雅典帝国。伯里克利希望雅典公民大会的讨论聚焦于这个显然不可能接受的要求，但他的政敌们给出了他们自己的和平条件。雅典人“深思熟虑之

后，决定给出一个答复”。发言的人很多，有人辩称战争是有必要的；其他人则认为“墨伽拉禁运不应当阻碍和平，因此应当撤销禁运”（1.139.3-4）。

伯里克利为其政策所做的辩护表面上是以一个法律上的技术问题为基础，但实际上有着更根本的道理。斯巴达人始终不肯按照和约要求接受仲裁，而是企图通过威胁或武力来占据上风。“他们希望用战争，而不是商讨，来解决纠纷。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是请求，而是命令我们了。……只有断然地、明确地拒绝这些要求，才能让他们明白，你们与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1.140.2，5）伯里克利愿意就任何具体问题做出让步；如果斯巴达人接受仲裁，那么伯里克利就不得不接受仲裁结果。但他绝不能容忍斯巴达直接干涉雅典帝国的利益（比如在波提狄亚和埃吉那岛的利益），也不能忍受斯巴达影响雅典人的商业和帝国政策（如墨伽拉禁运）。如果在这些方面妥协，就等于承认雅典在爱琴海的霸权和对其帝国的控制需要得到斯巴达的许可。如果雅典人现在受到威胁就让步，那么就放弃了自己与斯巴达的平等地位，将来斯巴达会变本加厉地讹诈雅典。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的演讲中仔细阐明了这种危险：

> 诸位不要以为，你们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投入战争。他们特别要求我们撤销墨伽拉禁运，声称这样就可以避免战争。诸位不要前思后想，不要顾虑，不要责备自己为了小事而打仗。因为这“小事”能够确认和考验你们的决心。如果你们现在让步，他们会马上要求你们做出更大的让步，因为你们胆战心惊地做出了第一个让步。（1.140.5）

很多斯巴达人，以及一些雅典人，一定很难理解，雅典为什么要因为墨伽拉禁运这样的小事而投入战争。雅典这么做算是师出有名吗？目前的纠纷实际上只对当事人双方（雅典和墨伽拉）显得重要。如果雅典满足了斯巴达的唯一一条不可磋商的要求（结束墨伽拉禁运），实际上也不会对雅典造成什么物质上或战略上的影响。如果雅典人撤销了墨伽拉禁运，危机说不定就避免了，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就可能使和平得以

延续。斯巴达在这件事情上背叛了科林斯，肯定会导致这两个国家关系冷淡或者引发一场严重的对立，使斯巴达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科林斯，而不是雅典。伯罗奔尼撒半岛或许会出现一些其他问题，就像过去发生的那样。但长期和平将得到维护，所有国家极有可能会满足于现状。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斯巴达有一个至少有五十年历史的派系，始终嫉妒和猜忌雅典人，并且对雅典帝国深怀敌意。雅典人的让步或许能让大多数斯巴达人在一段时间内放下心来，但斯巴达的反雅典派系始终是一支破坏性力量。如果雅典在前431年让步，或许只能让斯巴达人更加冥顽不灵，于是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虽然这些考虑是伯里克利最为重视的，但他的决定也建立在他设计的战略基础之上。战略与战术不同，不仅仅是军事计划。各民族和领袖在别无他途的时候会运用战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相信自己设计的战略可以帮助他们借助武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在战争爆发之前，不同的战略会对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而这种决策将决定是否会爆发战争。前432/前431年的危机中，斯巴达和雅典选择的战略都在不经意间推动了战争的爆发。

希腊各城邦通常的作战方式是，一个步兵方阵开进敌境，与敌人的步兵方阵交锋。两军厮杀一番，使问题争端在一天之内解决。由于斯巴达的陆军实力比雅典强得多，所以斯巴达人有理由相信，如果两国以惯常的方式作战，斯巴达必胜无疑。大多数斯巴达人也毫不怀疑，战争的打法一定是这个样子。斯巴达人确信，假如雅典人采取了不同的战法，那么只要对雅典领土加以袭掠和破坏，一年、两年或三年之后，必然会促使雅典人前来决战或者投降。在战争开始时，斯巴达人以及其他希腊人都确信，这种简单的攻势战略必然能带来快速的、无疑的胜利。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将要打一场漫长、艰难、代价高昂而且前途未卜的战争

（雅典人和阿希达穆斯二世都努力劝说斯巴达人，战争的确会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们的行动或许就不同了。

但是，伯里克利设计了一种新颖的战略。正是由于雅典力量的特殊性质和宏大规模，这种战略才能奏效。雅典的海军使雅典人能够主宰一个帝国，这个帝国为雅典人提供金钱，他们可以用金钱来维持自己的海上霸权，以及通过贸易和收购来获取自己需要的物资。尽管阿提卡的土地和庄稼很容易遭到破坏，但伯里克利建造了连接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的港口、海军基地的长墙，于是雅典几乎变成了一个岛屿。当时希腊的攻城战术还很落后，这些长墙只要有人防守就几乎是不可攻破的，所以雅典人可以撤退到墙内，在那里自由自在地生活；而斯巴达人没有办法攻击他们，更不可能打败他们。

伯里克利在世的时候，雅典一直执行他的这种战略。它在根本上是防御性的，尽管包含有限的进攻性元素。他相信，“如果雅典人不动声色，照管好自己的舰队，在战时不要企图扩张自己的帝国（因为那样会让他们的城市陷入危险），他们就能胜利”（2.65.7）。因此，雅典人应当拒绝在陆地上交战，放弃自己的乡村，撤到城墙之内。不管斯巴达人怎么破坏他们的田地，都不会有什么效果。与此同时，雅典海军将向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地区发动一系列袭掠，这不是为了给敌人造成严重伤害，而仅仅是骚扰敌人，令其苦恼，让他们尝尝滋味，知道如果雅典人愿意的话，能够给他们造成怎样的打击。海军袭掠的目标既是向斯巴达人及其盟邦证明，他们没有力量打败雅典；也是从心理上拖垮敌人，而不是用武力或物资优势打败敌人。斯巴达联盟是个松散的组织，其内部存在着天然裂痕，比如在代价高昂的争斗中，那些较脆弱的沿海国家和较安全的内陆国家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浮现出来。伯罗奔尼撒人很快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是赢不了的，于是两国就可以通过谈判缔结和平。斯巴达的主战派会丧失公信力，自前446/前44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护和平的较为理智的派系就会掌权。然后，雅典就能期望一个更稳定的和

平年代。由于敌人认识到自己没有办法取胜，这样的和平会更可靠。

这个计划比步兵方阵对抗的传统战法更适合雅典，但它的确有着严重缺陷，而且雅典人依赖于这个计划，也是伯里克利的威慑外交策略失败的原因之一。它的第一个缺陷是，它在根本上难以令人信服。后来的事实证明，伯里克利的确能够说服雅典人采纳他的计划，并且在他担任雅典领导人期间，始终坚持这个计划，但很少有斯巴达人，甚至很少有希腊人，在亲眼看到它实施之前相信它是可行的。比如，敌人会在城墙下羞辱雅典人，谩骂他们是懦夫。雅典人不得不忍耐这些。忍受这种屈辱意味着违背了整个希腊文化理念，因为英雄的希腊传统将英勇作战奉为希腊美德的巅峰。而且，大多数雅典人居住在乡村，他们将不得不躲在城墙后，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摧毁他们的庄稼、破坏他们的果树和葡萄藤、洗劫和焚烧他们的家园。任何有哪怕是一点点反抗机会的希腊人都不会愿意干瞪眼看着。就在十多年前，雅典人还选择了出城作战，而不是允许敌人如此放肆。

伯里克利计划的第二个缺陷是，很难说服雅典人以此种战略投入战争，一旦战争开始，就更难让雅典人坚持这种战略。斯巴达人入侵的时候，雅典人“沮丧而愤怒，因为他们不得不抛弃一直属于他们的家园和神庙、古老城邦的祖先遗物，并且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实际上就等同于每个人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家”（2.16.2）。在入侵者逼近城市的时候，许多雅典人，尤其是青年男子，坚持要求出城应战，狂怒地反对伯里克利，“因为他不率领他们出城作战，于是他们将自己的所有苦难都怪罪于他”（2.21.3）。最后，伯里克利不得不运用他的特殊影响力来阻止公民大会的召开，“因为他害怕，一旦群众聚集起来，就会酿成大错，被愤怒冲昏头脑，感情用事，而不是用他们的理智”（2.22.1）。

除了伯里克利，没有任何人能够劝服雅典人，让他们采纳这样的计划并坚持下去。他已经六十五岁了，如果危机快速平息下去，但在他死

后复燃，那么这种战略就不可能实施了；而如果不使用这种战略，雅典必败无疑。或许就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伯里克利在外交政策上才愈发固执。

伯里克利计划还有另外一个缺陷。乍看上去，它的手段似乎特别合适：因为雅典的目标是防御性的，所以它的战略也应当是防御性的。但由于最理想的结局是通过威慑来避免战争，所以防御性的计划并不合适。威慑的目的是让敌人非常害怕，不敢打仗，而伯里克利的战略并不能让斯巴达人恐惧。例如，如果雅典人拒绝正面交锋，那么斯巴达人唯一的成本就是进驻阿提卡一个月左右并开展大规模破坏行动的开销。如果雅典军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除非他们在那里建造要塞并长期驻守，否则就无法造成多少破坏。如果他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造要塞，就会被敌人包围并因断粮而屈服。如果他们在海岸上建造要塞，就可能被孤立起来，无法对敌境造成任何破坏。而斯巴达人要对付他们并不困难，代价也不大。更有洞察力的人或许能预见到，假以时日，雅典人至少可以通过袭掠沿海国家并阻滞其贸易活动，对其造成相当程度的破坏，而斯巴达无力保护它们。因此，斯巴达对联盟的领导权会受到损害，有的国家也许会叛变，这对斯巴达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但很少有人拥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能够看到晦暗不明的未来中竟有这样的前景。

如果雅典人能设计出这样的计划（袭掠沿海国家并破坏其贸易，打击斯巴达的领导权）并预见到这样的结局，他们或许就根本不会选择战争了，但伯里克利没有想到这样的办法。他的威慑外交策略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令人信服的进攻性威胁，因此有着很大缺陷，必然会失败。

如果伯里克利相信自己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攻势来威慑敌人，进而避免战争，那么他或许就不会对墨伽拉实施禁运，或者在斯巴达人要求他撤销禁运的时候就满足他们，并接受未来出现麻烦的风险。但伯里克利确信自己的防御性战略一定会胜利，所以他坚定不移。他说服了雅典

人，在给斯巴达人的最终回复中使用了他自己的措辞：“雅典人绝不接受别人的颐指气使，但他们愿意根据和约，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仲裁来解决争端。”（1.145.1）

---

[1] 埃吉那岛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被迫加入雅典同盟。它秘密地与科林斯人一道抱怨自己受到雅典的虐待，并煽动其他伯罗奔尼撒人对雅典的仇恨。但我们不知道埃吉那对雅典不满的具体原因。（作者注）

第二部 伯里克利战争

史学界习惯于将战争的最初十年称为“阿希达穆斯战争”，用的是领导早期入侵阿提卡行动的斯巴达国王的名字。但在这场战争的起源及主宰战争的战略方面，阿希达穆斯二世只是个次要人物。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十年战争”，但它的最初阶段也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伯里克利战争”，因为是这位雅典领导人主宰着战争的开端及其最初阶段。尽管伯里克利外交政策的目标是避免与斯巴达及其盟邦发生战争，但于前431年爆发的冲突应当以他的名字来冠名。他的有限威慑手段未能奏效，导致战争爆发，而他设计和坚持实施的战略影响了战争在早期阶段的走向。直到他去世几年后，雅典人才背离了他的战略，开始寻找新的求胜之策。即便在他死后，他仍然影响着战争的进程以及许多主要人物的行为举止。

第五章 战争的目标与资源（前432～前431年）

斯巴达

斯巴达在这场战争中的口号是“为希腊人的自由而战”，这意味着消灭雅典帝国，并解放雅典统治下的各国。修昔底德看透了斯巴达为影响民意而炮制的这种宣传；他告诉我们，斯巴达人的真正动机是，他们害怕雅典越来越强大，“斯巴达人决定，他们必须尽他们的全部力量去消灭雅典，于是发动了战争”（1.118）。有些斯巴达人也希望恢复斯巴达之前的地位，即希腊世界的唯一霸主，并获得相应的荣耀和光辉。

要达成这些目标，就必须消灭雅典的关键资源：城墙，它保护雅典城，令斯巴达军队无从下手；舰队，它使雅典能够掌控大海；雅典的殖民帝国，它提供了维持海军所需的资金。如果让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完好无损，那么胜利的价值就会很有限，所以斯巴达必须采取攻势。

斯巴达联盟囊括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在联盟的东北部，有墨伽拉；在希腊中部，有玻俄提亚、北洛克里斯和福基斯；在西部，有科林斯的殖民地安布拉基亚、琉卡斯岛[1]和阿纳克托里翁（见地图10与地图11）。在西西里岛，有斯巴达的盟邦叙拉古和除了卡马里纳之外的所有的多利亚人[2]城市；在意大利，有洛克里[3]以及斯巴达自己的殖民地塔拉斯。但是，联盟的骨干是由伯罗奔尼撒人和玻俄提亚人组成的威武雄壮的重步兵。这支重步兵部队的兵力是雅典重步兵方阵的两倍到三倍，并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强的陆军。斯巴达人坚信，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能够战胜任何敌人，他们的战略就建立在这个信念之上。

战争开始时，伯里克利承认，在任何一场单独的战役中，伯罗奔尼

撒军队都足以与希腊其他所有国家的联军匹敌。前446年，斯巴达军队入侵阿提卡的时候，雅典人没有选择作战，而是媾和，放弃了自己在希腊中部的陆地帝国，并将对希腊大陆的主宰权拱手让给斯巴达。这段历史能够解释，斯巴达的主战派为什么没有被阿希达穆斯二世的谨慎论点说服。在这些主战派看来，传统的战法必胜无疑：斯巴达人只需要在农作物生长的季节入侵阿提卡。雅典人要么会像前446年那样做出让步；要么，如果他们有勇气的话，会出来迎战，但肯定会被击败。不管怎样，战争一定很短暂，斯巴达一定会取胜。



10. 伯罗奔尼撒半岛、皮洛斯、斯法克特里亚岛、基西拉岛

但斯巴达的自信建立在旧思维之上，并且忽略了以下事实：雅典帝国已经建立起来了，它的财源、庞大且训练有素的海军、雅典城墙以及将雅典城与比雷埃夫斯港口连接起来的长墙，都意味着军事方面的一次革命。所以，雅典人可以运用一种新的战法，而传统战法对其没有效力。但是，斯巴达人不能或不愿根据军事上的新现实做出调整。

有些斯巴达人相信，雅典和希腊的其他城邦不一样，或许会既不出战，也不立刻投降。但大多数斯巴达人坚信，即便是雅典人，也不可能长时间忍受被包围的状况。战争爆发时，斯巴达人相信，“如果他们蹂躏雅典人的土地，那么雅典人在几年内就会被消灭”（5.14.3）。大多数希腊人都同意：如果伯罗奔尼撒人入侵阿提卡，“有些人认为雅典能够坚持一年，有些人认为是两年，但没有人认为雅典能坚持三年以上”（7.28.3）。

至少阿希达穆斯二世知道，雅典可以既不出战，也不投降，就这样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因此斯巴达在步兵方阵上的优势并不能保证一定胜利。但如果要煽动雅典帝国内部的叛乱，就需要一支足以在海上击败雅典人的海军，那样的话就需要充裕的资金。但阿希达穆斯二世指出，伯罗奔尼撒人的“集体金库完全空虚，也无法通过赋税来征收资金”（1.80.4）。战争爆发时，伯罗奔尼撒人拥有约100艘三列桨座战船[4]，但他们缺少拥有先进海战经验的桨手、舵手和船长，而雅典人的海战战术已经臻于完美。在任何海战中，伯罗奔尼撒人的船只数量、水手素质和战术都处于劣势。

科林斯人努力驳斥阿希达穆斯二世悲观而务实的判断，但科林斯人的大多数建议都是无法实践的。这些建议说到底都只是异想天开，因为它们依赖于“目前还无法预见的其他装备”（1.122.1）和战争的不可预测性，然而“战争的轨迹完全由它自行决定”（1.121.1）。

雅典

在希腊历史上，伯里克利提议的那种防御性计划还从来没有被尝试过，因为在雅典的帝国主义民主制出现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足以实践此种计划的手段。虽然它有很多困难，但仍然优于传统的作战方式。因为伯罗奔尼撒人占据极大的兵力优势，所以在陆战中与敌人正面交锋是非常愚蠢的做法。战争爆发时，雅典人拥有1.3万名适龄（二十

岁至四十五岁）且状态良好的步兵。另外，还有1.6万名年龄较大或较小的男子可以在步兵方阵中服役，这些人可以被用来防守边境要塞、环绕雅典与比雷埃夫斯的城墙，以及将它们连接起来的长墙。普鲁塔克告诉我们，于前431年入侵阿提卡的斯巴达陆军有6万多人（*Pericles* 33.4）。这个数字太夸张了，但斯巴达军队的兵力一定是雅典可动用的步兵兵力的两到三倍。

雅典的力量和希望在于它无比强大的海军。雅典的船厂里停泊着至少300艘适航的战船，以及一些若有需要便可修复并投入使用的船只。雅典的自由盟邦——莱斯博斯岛、希俄斯岛和克基拉岛也能提供船只，或许一共有100多艘战船[5]。面对这样庞大的舰队，伯罗奔尼撒人只能拿出约100艘战船，而且他们水手的技艺和经验无法与雅典人相提并论。战争的最初十年将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这一点。

伯里克利知道，海战的关键是拥有足够的资金去建造和维护舰队，并为船员发饷。在这方面，雅典也拥有巨大优势。在前431年，雅典的年收入为约1000塔兰同[6]白银，其中400塔兰同来自国内税收，600塔兰同是各附庸国与殖民地的贡金和其他从海外帝国获取的收入。尽管每年可调用约600塔兰同作为军费，但这个数字还不足以支撑伯里克利的计划。雅典还需要动用自己的储备资本，在这方面，它的实力也非常雄厚。战争开始时，雅典国库拥有6000塔兰同银币和500塔兰同未铸币的金银。另外，卫城上的雅典娜神像覆盖着相当于40塔兰同的金箔，在紧急情况下，这些金箔可以被拆除并熔化。伯罗奔尼撒人在财力上无法与雅典人相媲美。伯里克利告诉雅典人“伯罗奔尼撒人无论公私都没有钱”（1.141.3）是正确的。斯巴达的大多数盟邦也很穷，虽然科林斯人比其他盟邦要富裕一些，但他们也没有储备资金。

要评估伯里克利计划在财政上的可行性，我们就需要知道，他预计斯巴达人能够坚持多久。大多数学者都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推测

伯里克利应当没有想到战争可能持续十年之久。这种推测的部分理由是，伯里克利在战争前夕致雅典人的演讲中坚称，伯罗奔尼撒人“没有在海外作战或者长期作战的经验；他们只能短期厮杀，因为他们很贫穷”（1.141.3）。伯里克利正确地判断认为，伯罗奔尼撒人缺乏足够的资源，因此无力发动能够对雅典帝国构成危险的那种大规模长期战争，不过他们可以每年都来入侵阿提卡一次。这种战役不会超过一个月，唯一的成本就是士兵们消耗的口粮。

我们可以通过审视战争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里克利牢牢掌控着雅典，他的计划得到非常彻底的落实），来估算伯里克利战略的年度成本。在雅典仍然状态良好、拥有很强战斗力的时期，这个代价不算高昂。前431年，伯罗奔尼撒人入侵阿提卡，雅典人派遣了100艘战船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去作战。另有一队，共计30艘战船，被派去防卫关键的优卑亚岛。还有一队，共计70艘战船，已经在封锁波提狄亚，所以当年雅典一共投入了200艘战船。每艘船出海1个月的开销是1塔兰同，一年中战船一般可以出海8个月（不过负责封锁波提狄亚的战船可能要整年待在那里）。根据这些估算，海军一年的开支为1600塔兰同。除此之外，还有陆军军事行动的开支，其中大部分用于波提狄亚。围攻波提狄亚的部队始终维持在至少3000名步兵，有时则会更多；比较保守的平均数字是3500人。陆军士兵的军饷是每人每天1德拉克马，仆役每天的薪水也是1德拉克马，所以这支陆军每天的开销至少有7000德拉克马，也就是一又六分之一塔兰同。如果一年算是360天，那么全年开销就是420塔兰同。肯定还有其他的军事开支，此处不再赘述，但即便我们只算海军和攻打波提狄亚的陆军的开支，总数也达到了2000多塔兰同（我们根据不同种类的数据，做了另外两项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差不多的）。

那么，伯里克利一定是打算为三年的战争花费约6000塔兰同。

在战争第二年，雅典人投票决定从6000塔兰同的储备资金中拨出

1000塔兰同，仅在“敌人从海路进攻城市，需要守城的时候”（2.24.1）使用，任何人若胆敢建议将这笔钱挪作他用，将被处以死刑。于是，国库中可用的储备资金就只剩下了5000塔兰同；如果我们算上三年中从殖民帝国获得的收入，即1800塔兰同，那么全部可用的军费就是6800塔兰同。这可以让伯里克利维持战略长达三年，但到第四年就不够了。

伯里克利知道这些局限，所以他不可能打算打一场十年的战争，更不可能想到战争会持续后来实际发生的二十七年之久。他的最终目标是，让伯罗奔尼撒联盟的真正决策者斯巴达的政策发生变化。要说服斯巴达人考虑和平，只需要争取到五位监察官中的三位。要让三位监察官和斯巴达公民大会接受和平，雅典人只需要帮助恢复斯巴达主和派的地位。主和派总的来讲还是多数派，所以斯巴达长期以来一直很保守，待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内部，恪守和平。

如果这样看，伯里克利的战略的确非常有道理。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二世已经警告过他的臣民（尽管他的警告被当成耳旁风），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性质做了错误判断：雅典人不会在陆地迎战斯巴达并乖乖吃败仗，而斯巴达人除了陆战之外没有别的可以迎接挑战的策略。伯里克利的战略目标是向斯巴达人证明，他们国王的意见是正确的。

伯里克利在自己的人民当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必须约束他们，阻止他们在阿提卡与斯巴达人正面交锋，因为任何大规模的攻势行动都与他的战略相矛盾。若与敌人正面交锋，不仅不会得胜，还会激怒敌人，使阿希达穆斯二世的理智政策在斯巴达国内不能占上风。但如果雅典在国内外都保持克制，就有可能让斯巴达的主和派上台。

伯里克利可能期望斯巴达的政策会比较快地发生这样的变化，肯定不会拖过三个作战季节，因为斯巴达不可能持续不懈、徒劳无功地敲打雅典的石墙。但是，在国家及其人民投入战争时，理智很少能占上风，而对双方资源的比较和计算也很少能预测出长期冲突的进程。

[1] 今称莱夫卡斯岛。

[2] 多利亚人是古希腊的四大部族之一，另外三个部族是伊奥尼亚人、埃奥利亚人和阿开亚人。约公元前12世纪～前11世纪，多利亚人从巴尔干半岛北部迁来，大多分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克里特岛、罗德岛以及西西里岛东部一带，之后逐渐扩散到希腊各地。定居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多利亚人建立了斯巴达、科林斯、阿尔戈斯等城邦。雅典人属于伊奥尼亚部族。

[3] 洛克里是洛克里斯人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殖民地。洛克里斯人自己的领地在希腊本土、玻俄提亚的西北方。

[4] 三列桨座战船是古代地中海航海文明（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等）中的一种桨帆船。战船每边有三排桨，一个人控制一支桨。此种战船在希波战争和雅典帝国兴亡中起到重要作用。

[5] 前文说，克基拉人拥有多达120艘战船，想必需要部分船只来保卫本土和做其他用途，能够支援雅典的船只应该没有这么多。

[6] 塔兰同是白银的重量单位。我们无法确定1塔兰同相当于现代的多少钱，但我们知道一艘战船所有船员一个月的军饷是1塔兰同；1塔兰同相当于6000德拉克马；雅典一名熟练工匠的日薪是1德拉克马。（作者注）

第六章 底比斯人进攻普拉蒂亚（前**431**年）

斯巴达三个使团的努力都宣告失败后，战斗终于在前431年3月打响，地点是玻俄提亚，此时距双方宣战已经过去7个月。但挑起战端的不是斯巴达，而是它的强大盟邦底比斯。几个世纪以来，底比斯人与他们南面的邻居雅典人争吵不休。底比斯人一直寻求统一和主宰整个玻俄提亚，但常被一些玻俄提亚国家的抵抗挫败，雅典有时会帮助这些国家抵抗底比斯。

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打败了底比斯，在大多数玻俄提亚城镇建立了民主制政府，并统治底比斯本土数年之久。底比斯与雅典之间的边界线比较长，一旦发生战争，底比斯希望占领普拉蒂亚，这个小城镇的公民不到1000人。但是对底比斯来说，这既是危险，也是机遇。普拉蒂亚的民主制政府始终拒绝加入由寡头制底比斯主宰的玻俄提亚联盟，而且自前6世纪以来，普拉蒂亚人一直是雅典的忠实盟友。普拉蒂亚的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它离底比斯不到8英里，并且就在从底比斯通往雅典的最佳道路的两边（见地图11）。雅典人可以以普拉蒂亚为基地，进攻底比斯和玻俄提亚；而底比斯军队若是企图攻入阿提卡，普拉蒂亚就是一个威胁。或许更重要的是，唯一一条不经过雅典领土的、将底比斯与墨伽拉和伯罗奔尼撒半岛连接起来的道路也穿过普拉蒂亚。如果普拉蒂亚被雅典人控制了，那么希腊中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与雅典敌对的城邦之间就很难沟通了。战争的爆发也给了底比斯人一个独特的机遇，趁着雅典人被伯罗奔尼撒人缠住的时候，去消灭自己的宿敌普拉蒂亚。出于这些原因，底比斯人企图通过偷袭夺取普拉蒂亚。

前431年3月初的一个乌云压城的夜晚，三百多名底比斯人在诺克里

底（普拉蒂亚内部主张寡头统治的派系领导人）及其同谋（都是一些卖国贼）的引导下，偷偷潜入普拉蒂亚，希望消灭掌权的民主派，然后将普拉蒂亚交给底比斯。底比斯人原以为，毫无防备的普拉蒂亚人会乖乖投降，于是打算邀请城镇的所有居民加入他们，并保证不会对其进行报复行动。底比斯人希望看到一个由亲底比斯寡头政府统治的、与底比斯结盟的普拉蒂亚，而不愿意让普拉蒂亚因为大批公民被处决、流亡者等待复仇而变得麻烦重重。但普拉蒂亚的卖国贼们却坚信他们的同胞会顽强抵抗，因此希望立刻杀死他们的民主派政敌。底比斯人对这些卖国贼置之不理。果然，普拉蒂亚人最初因为底比斯人的偷袭而措手不及，但在惊慌情绪平息之后开始进行抵抗。他们凿穿了房屋之间的墙壁，聚集起来，筹划反击。黎明前不久，他们开始袭击底比斯人。就这样，底比斯人在一个陌生的城镇，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攻击。

这时下起了大雨，普拉蒂亚妇女和城里的奴隶高喊着杀敌，爬上屋顶，向入侵者投掷石块和瓦片。晕头转向的底比斯人四散逃命，被熟悉地形的普拉蒂亚人追击砍杀。很多底比斯人被俘虏并被处死，很快剩下的人也被迫投降。

底比斯主力部队原计划与潜入普拉蒂亚城的三百人里应外合，但这计划搞砸了。大雨使作为底比斯与普拉蒂亚领土分界线的阿索波斯河水位暴涨，而底比斯军队抵达时，城内的底比斯入侵者已经被俘虏。但由于很多普拉蒂亚人仍然在乡间农场上，他们仍处于危险之中。底比斯人打算抓住这些人作为人质，以便交换在城内被俘的底比斯人。但普拉蒂亚人威胁道，如果底比斯不立即撤军，他们就处死俘虏。尽管底比斯军队撤退了，普拉蒂亚人还是处决了180名俘虏。按照希腊战争的传统标准，这是一桩暴行，而随着战争一年年持续下去，暴行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骇人听闻。不过，底比斯人在和平时期趁夜色偷袭的行为也违背了重步兵武士的荣誉法则，偷袭者似乎不配得到保护。

与此同时，雅典人得知了底比斯人的袭击行动以及部分普拉蒂亚人被扣为人质，并很快认识到底比斯俘虏的价值。希腊城邦从来不会无视自己公民的损失，何况俘虏包括统治底比斯的派系重要人物、地位很高的政治家欧律马科斯。有了这些俘虏作为人质，或许就可以让玻俄提亚人放弃入侵阿提卡的念头，就像在前425年雅典人俘虏了数量差不多的斯巴达人就使斯巴达不再敢入侵阿提卡一样。雅典人向普拉蒂亚发去消息，请他们刀下留人，但这消息抵达得太晚了。激情压倒了理性计算。底比斯人现在可以无所顾忌地复仇了。雅典人向普拉蒂亚送去了粮食和80名雅典重步兵，帮助当地人抵挡必然会到来的底比斯攻势。为了迎战，雅典人和普拉蒂亚人撤走了大部分妇女、儿童和除重步兵之外的所有男人。留在普拉蒂亚的守军有480人，还有110名负责烤面包的妇女。

斯巴达入侵阿提卡

底比斯对普拉蒂亚的袭击显然违背了和约，于是斯巴达人命令其盟邦将全部军队的三分之二集结到科林斯地峡，准备入侵阿提卡。剩余三分之一留在本土，以防备雅典人的登陆。大军将由国王阿希达穆斯二世指挥，爱国主义精神和荣誉感促使他竭尽全力。

即便在行军途中，国王的行动也表明，他仍然没有放弃避免冲突的希望。他派遣使者去询问，如今强大的伯罗奔尼撒军队已经在进军阿提卡的途中，雅典人是否打算妥协。但是，伯里克利发布了一项命令，在伯罗奔尼撒军队出兵期间，禁止雅典人与敌人的任何传令官或使者接触。于是，雅典人赶走了斯巴达使者。这名使者在跨越边境的时候，带着非常不符合斯巴达风格的戏剧口吻说道：“这一天将是希腊人诸多灾祸的开端。”（2.12.3）

现在，阿希达穆斯二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进。从科林斯地峡出发，最便捷的路线是沿着滨海道路，通过墨伽利斯，途经厄琉息斯和埃加琉斯山，进入肥沃的雅典平原。但阿希达穆斯二世在地峡耽搁了一段

时间，慢悠悠地行军，在通过墨伽拉之后并没有立即转向南方开赴雅典，而是北上攻打欧伊诺耶镇，这是玻俄提亚与雅典边境附近的一座雅典要塞（见地图4）。欧伊诺耶是一个小而坚固的要塞，有石墙和塔楼保护，但它对如此庞大的军队不会构成威胁，也不大可能干涉伯罗奔尼撒军队的计划。要攻克它并不轻松，需要长时间的围困并放弃此次远征的主要目标（蹂躏阿提卡）。

攻打欧伊诺耶在战略上没有意义；阿希达穆斯二世此举的动机是政治上的，因为他仍然希望避免战争。一年前，他曾主张，斯巴达人在蹂躏阿提卡土地时应当动作非常缓慢。他说："应当把他们的土地看作'人质'，土地状况越好，就越是有价值的'人质'。"（1.82.4）斯巴达人已经在责怪国王的耽搁使雅典人能有时间为迎战做准备并将其牛群和财产转移到安全处，于是开始怀疑他此次偏离行军路线的真正动机。

最后，阿希达穆斯二世不得不放弃对欧伊诺耶的围攻，转而回到伯罗奔尼撒大军入侵的主要目标：蹂躏和破坏阿提卡。在底比斯人进攻普拉蒂亚的八十天之后，即5月底，阿提卡的庄稼成熟，伯罗奔尼撒军队大举南下，开始蹂躏厄琉息斯和色莱西亚的平原，破坏庄稼，砍倒葡萄藤和橄榄树。

阿希达穆斯二世随后东进，前往阿卡奈，而不是更显而易见的目标——土地肥沃的雅典平原和雅典贵族的土地，在那里能够对雅典造成最大破坏。雅典平原就在雅典城的正前方，斯巴达联盟的军队若是开进那些地区，将会是最具挑衅性的战术，对伯里克利的克制政策施加最大的压力。阿希达穆斯二世还在希望，雅典人能在最后关头理智起来；他希望尽可能久地保住雅典人最珍贵的农田并将其作为"人质"，而不是毁坏那里的庄稼。

与此同时，雅典人也在执行伯里克利的计划，撤离他们心爱的乡村。妇女和儿童被送往雅典城，牛羊则被运往阿提卡东海岸附近的优卑

亚岛。曾在前480年目睹薛西斯一世的军队践踏雅典土地的雅典人大多已经不在人世，因此很多人对自己不得不背井离乡而感到怨恨。起初，难民都被安置在拥挤的雅典城内。所有空闲的地方都被占据了，连神庙也挤满了人；甚至卫城脚下的佩拉季孔神庙也安置了难民，尽管皮提亚的阿波罗[1]曾发出神谕的诅咒禁止此种做法。这无疑让虔诚的人们感到震惊。后来，雅典难民被疏散到比雷埃夫斯和长墙保护下的领土，但目前他们的生活条件是非常恶劣的。

伯里克利遭到攻击

起初，很多雅典人希望伯罗奔尼撒人会很快撤走，就像前445年那样，于是就不会发生战争。但当敌军开始蹂躏距离卫城仅7英里的阿卡奈土地时，雅典城内的情绪变成了愤怒，群众的发怒对象既包括斯巴达人，也包括伯里克利。人们指控他怯懦，因为他不愿意率军出城与敌人作战。

攻击伯里克利的人当中最突出的是克里昂，他反对伯里克利已经很多年了。克里昂属于雅典一个新的政治家阶层：不是贵族，而是通过贸易和手工业（而非传统的财富来源：土地）发家致富的人。在此之前，雅典固然奉行民主制，但对贵族仍然抱有极大敬意；根据主宰雅典政治的贵族法则，贸易和手工业是低贱的。阿里斯托芬讥讽克里昂是鞣革匠和皮革贩子、窃贼和爱吵嚷的人，他的嗓音“像激流一般咆哮”，听起来像一头被开水烫了的猪。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里，克里昂的形象总是怒气冲冲、不断掀起仇恨的好战分子。修昔底德说克里昂是“公民当中最凶暴好斗的人”（3.36.6），也说克里昂的演讲风格是粗野和霸道的。亚里士多德评论道，克里昂“野蛮地攻击他人，他似乎是对人民毒害最大的人；他是第一个在公民大会发言时大喊大叫的人，第一个在大会上口出恶言的人，第一个向群众发言时提起自己的短裙（并走来走去）的人。相比之下，其他发言者的行为举止都很得体”（Aristotle，*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28.3）。在喜剧《命运女

神》（创作时间可能是前430年春）中，诗人赫尔米普斯对伯里克利说：“萨堤尔[2]之王，你打仗时为什么从不举起一支长矛，却用可怕的言辞？你为何扮演懦弱的特勒斯的角色？但如果用磨刀石磨快一把小刀，你就咆哮起来，仿佛被凶猛的克里昂咬了一样。”（Plutarch，*Pericles* 33.8）这些嘲讽的描述都是克里昂的政敌给出的，但他在公民大会上的确是个强有力的人物，后来在战争进程中会起到重要作用。克里昂只是攻击伯里克利的人之一，甚至伯里克利的一些朋友也敦促他出城应战。

但到了前431年，伯里克利的个人威望已经如日中天，以至于修昔底德说他是“雅典人中的佼佼者，无论在言辞还是行动上都是最精明强干的人”（1.139.4），而雅典“只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实际上是首席公民的独裁统治”（2.65.9）。伯里克利能够取得这样的地位，靠的不仅仅是他的智慧和演讲才华，或者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廉洁清正。他还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这么多年来已经扶植了一大批军人、官员和政治家；这些人组成了一个群体，与他的政治立场相同，并与他一起担任将军，同时接受他的非正式领导。

这些人的支持使伯里克利能够抵抗他所遭到的暴风骤雨般的攻击，并约束许多敦促他攻击伯罗奔尼撒军队的雅典人。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伯里克利拒绝召开雅典公民大会，就连非正式集会也不愿意召开，因为他害怕这样的会议“铸成大错，被愤怒冲昏头脑，感情用事，而不是运用他们的理智”（2.22.1）。任何人都无权阻止公民大会的召开，所以一定是伯里克利受到的极大尊重，再加上他对其他将军的影响力，使公民大会的轮值主席没有召开大会。

伯里克利的战略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挑战，于是他得以自由地实施自己的战略，他对斯巴达人破坏行动的唯一回应是派遣骑兵部队威慑敌人，阻止伯罗奔尼撒人过于接近雅典城。侵略军在阿提卡已经待了一个

月了，补给物资已经消耗殆尽。阿希达穆斯二世意识到，雅典人既不会出战也不会投降，于是放弃了自己的营地，率军东进，去蹂躏帕尼萨山和彭代利孔山之间的地区，然后取道玻俄提亚回国了。他又一次避免破坏肥沃的阿提卡平原，坚持他尽可能久地将这个地区作为“人质”加以保护的做法。斯巴达人对战局很不满意，因为他们的战略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挥效用。雅典人在根本上毫发未伤，而且已经开始对斯巴达人的破坏展开报复了。

雅典的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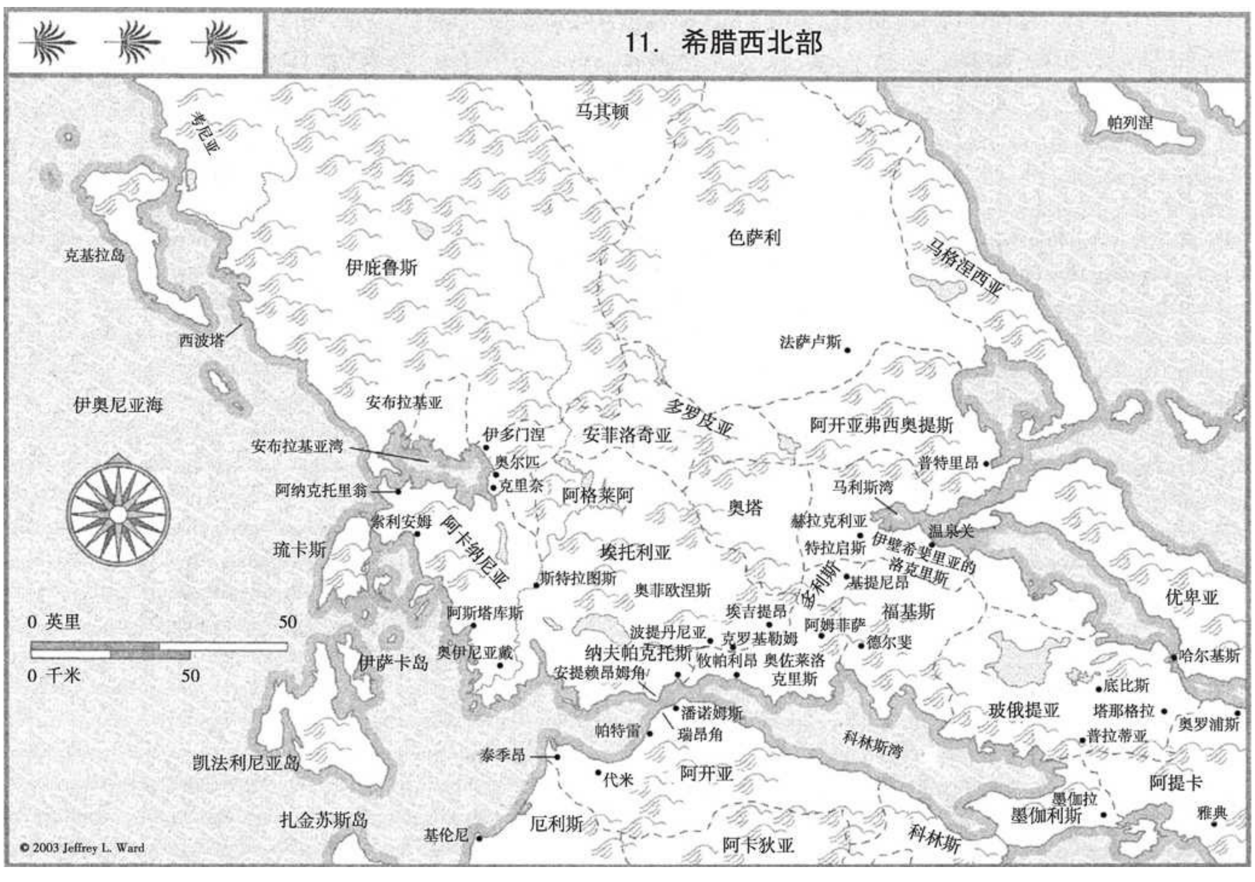
伯罗奔尼撒军队还在阿提卡的时候，雅典人开始加强城市的防御，安排了永久性岗哨，以警戒敌人从陆路或海路发动突然袭击。他们还派出了一支100艘战船的舰队，运载着1000名重步兵和400名弓箭手，再加上了克基拉派来的50艘战船和西方其他一些盟邦的船只。如此强大的舰队可以轻松地打败或驱逐在海上遇到的任何敌军舰队，可以在敌境登陆、蹂躏敌国领土，甚至攻占和劫掠小城市。此次远征的目标是为阿提卡遭受的侵略报仇，并让伯罗奔尼撒人看清楚，他们选择的这样一场战争将让他们付出何等代价。

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地区登陆，可能是在埃皮达鲁斯和赫尔米奥尼地区，然后在拉科尼亚的墨托涅（见地图1）登陆。他们蹂躏了墨托涅地区，袭击了防御薄弱的设防城镇，可能还洗劫了城镇。墨托涅能够得救，要感谢一位叫作伯拉西达的勇敢的斯巴达军官，他利用雅典军队兵力分散的弱点，冲进城镇，增援了那里的驻军。斯巴达人投票决定对他予以感谢。随后的战事将证明他或许是整个斯巴达历史上最伟大的指挥官，他是一位勇敢、大胆而卓越的军人，是一位聪明、技艺娴熟且说服力极强的演说家，还是一位精明而备受尊重的外交家。

袭击墨托涅之后，雅典人驶向伯罗奔尼撒半岛西海岸的腓伊亚（在厄利斯地区，见地图1）。一队雅典士兵占领了腓伊亚镇，但后来放弃

了它，乘船离去了，“因为整个厄利斯军队都来援救腓伊亚了”（2.25.5）。这支雅典远征军的规模还不足以守住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任何一个沿海城市并抵挡敌军的猛攻，何况他们也不打算这么做。

随后舰队北上，驶往阿卡纳尼亚（见地图11）。这已经不是伯罗奔尼撒人的领土，而属于科林斯的势力范围，因此雅典人的对策也不同。雅典人攻占了索利安姆（一座属于科林斯的城镇），然后将它托付给一些亲雅典的阿卡纳尼亚人驻守，一直到战争结束。雅典人还占领了阿斯塔库斯镇，将其并入自己的联盟。最后，他们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凯法利尼亚岛，它的位置对阿卡纳尼亚、克基拉岛和琉卡斯岛（属于科林斯）来说具有战略意义。舰队随即返航，因为它已经完成了目标有限并受到严格控制的任务。



同时，一支较小的雅典舰队（30艘战船）驶向希腊中部的洛克里

斯，以保护对雅典来说具有关键意义的优卑亚岛。这支雅典军队蹂躏了敌国的一些领土，击败了洛克里斯人的一支军队，并占领了特罗尼昂镇，此地的地理位置对优卑亚岛的防御很重要，而优卑亚岛如今是雅典人的牧场和避难所。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身安全，雅典人又驶向宿敌埃吉那岛，伯里克利称其为“比雷埃夫斯的眼中钉”（Aristotle，*Rhetoric* 1411a 15）。埃吉那岛位于萨龙湾，距伯罗奔尼撒半岛海岸不远，可以控制通往比雷埃夫斯的航道。如果伯罗奔尼撒海军以埃吉那岛为基地，就可以扰乱雅典的贸易，威胁比雷埃夫斯，并将大量雅典战船牵制在防御战中。因此，雅典人驱逐了岛上的全部居民，将自己的殖民者安顿到岛上。斯巴达人则将被驱逐的埃吉那人安置到泰里亚（拉科尼亚和阿尔戈利斯之间的一个边境地带）。斯巴达人可以仰仗这些埃吉那人帮他们严密监视民主制的阿尔戈斯，并抵挡雅典人在该地区登陆。

雅典人还加强了其帝国东北角（意义重大）的安全，争取到了之前敌视雅典的阿布德拉（爱琴海北岸的一座城市，见地图9）王子尼姆佛多鲁斯的支持。雅典人请尼姆佛多鲁斯担任他们在该地区的外交代理人。王子果然创造了奇迹。在他的帮助下，他的姐夫——强大的色雷斯国王西塔尔克斯——与雅典结成了同盟。雅典在该地区的主要问题是波提狄亚围城战，它不断地消耗国库资金。尼姆佛多鲁斯许诺，他会说服西塔尔克斯借给雅典人一批骑兵和轻步兵，以便结束波提狄亚围城战。他还帮助雅典人与马其顿国王柏第卡斯二世达成了谅解，柏第卡斯二世立即开始帮助雅典军队攻击波提狄亚在当地的盟友。

将近前431年秋季的时候，伯里克利亲自率领1万名雅典重步兵、3000名由常住雅典的外邦人[3]组成的重步兵和大批轻装部队[4]（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支雅典陆军）去蹂躏墨伽利斯。雅典人计划破坏墨伽拉的农田，希望这种破坏行动加上墨伽拉已经遭受的贸易禁运，能够迫

使墨伽拉人屈服。其实雅典人派遣一支规模较小的军队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但伯里克利深知，他的防御战略令雅典人士气低迷，于是他发动了这次规模宏大的入侵，既是为了鼓舞雅典人的斗志，也是为了展示雅典的强大力量。

伯里克利发表葬礼演讲

此次报复行动重新确立了伯里克利在雅典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雅典人为战争头一年的阵亡将士举行葬礼时，选择伯里克利“作为最睿智和最德高望重的人”，发表演讲（2.34.6）。他的演讲稿被保存至今，展现了伯里克利是如何用他循循善诱的才华让雅典人支持他的战略，尽管这种战略给雅典人带来了痛苦。

伯里克利的演讲与标准的雅典葬礼演讲迥然不同，就像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与同一天爱德华·埃弗里特[5]发表的冗长而乏味的演讲不同一样。和林肯一样，伯里克利的意图也是在艰难的战争时期向人们解释，他们忍受的苦难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以及他们为什么需要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演讲中，他用最光辉和最诱人的色彩描绘了雅典民主制（这是我们今天能读到的对雅典民主制最美好的描摹），以及它相对于斯巴达生活方式的优越性。他还呼吁雅典人为他们的城市各尽其能：

> 你们每天看到自己城邦的力量，必然会对它无比热爱。你们理解了它的伟大，那么想一想，创建这座伟大城邦的人们是多么勇敢和正直。行动时刻到来时，你们会知道需要做什么。如果他们的努力曾有失败，他们至少也会下定决心，永远用自己的勇气捍卫他们的城邦，并为它呈上最美丽的供奉。因为他们为集体福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2.43.1-2）

他许诺，烈士会获得不朽。他解释道，那些为雅典战斗而牺牲的人：

> 为集体的福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为自己赢得了不朽的颂扬和最高贵的坟墓，不是他们的躯体所安息的坟墓，而是他们的荣耀将

永垂青史，永远激励人们的言辞和行为。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名人的墓地；纪念他们的不仅有他们家乡纪念碑上的铭文，其他国度的人们即便不曾用文字记录，也会通过记忆来缅怀他们。他们的精神远远胜过他们的躯体，能够在每一个人心中永存。现在你们应当以他们为榜样；你们知道，幸福需要自由，而自由需要勇气。那么，不要在战争危险前畏缩！（2.43.2-4）

战争的第一年：总结

战争的第一年以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讲结束。在振奋人心的演讲的鼓舞下，雅典人坚定信念，要继续奋战。在很多人看来，战局似乎进展顺利，但真实情况并没有那么光鲜。

在消耗战中，对敌人造成更大破坏的一方最终一定会胜利。雅典人对伯罗奔尼撒人的攻击，除了对处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的墨伽拉的攻击之外，相对来讲都是隔靴搔痒，令敌人恼火，但实际危害很小。斯巴达本土不曾受到影响；它在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的全部领土只有墨托涅遭到了短暂袭击。科林斯人损失了阿卡纳尼亚的一个小镇，而且科林斯人虽然被排除在爱琴海贸易之外，但他们主要的经商区域是在不受战争影响的西方。墨伽拉人仍然被排除在爱琴海各港口之外，他们的土地也遭到严重摧残，但即便是在战争打了十年之后，他们蒙受的损失也不足以迫使他们求和。

但对雅典来说，战争第一年的代价高昂。雅典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庄稼被摧毁、葡萄藤和橄榄树被砍伐、房舍被拆毁或烧掉。因此，被用来维持贸易平衡的出口商品——橄榄油和葡萄酒——产量骤减，同时雅典仍然需要进口大量粮食，于是雅典同盟的资源和雅典城坚持作战的力量都遭到削减。对波提狄亚的持续围攻从储备资金中吸走了2000塔兰同，也就是可动用军费的四分之一还多。[6]

最糟糕的是，伯罗奔尼撒人毫无灰心丧气的迹象，他们在第二年会精神抖擞地杀回来，摧毁之前不曾触及的阿提卡的很大一部分。没有证

据能够表明，伯罗奔尼撒联盟内部出现了分裂，斯巴达主和派的影响力也没有增强的迹象。但在雅典，紧张气氛已经开始浮现。克里昂对伯里克利战略缺乏效力的抱怨或许还只是喜剧诗人的主题，但这种抱怨表明雅典内部出现了异议，而随着苦难的继续，这种异议必然会更加强烈。在当下，占领埃吉那岛的成功、对墨伽利斯的进攻以及伯里克利的雄辩或许还能压制反对派，但如果战局没有好转，反对的声音迟早会爆发。

---

[1] 这是阿波罗的称号之一。传说德尔斐地方原有名为“皮同”（Python）的巨蟒，守护该地的神谕场所，因此德尔斐地区也叫“皮提亚”（Pythia）。阿波罗希望用自己的神谕来指导人们，因而用弓射杀了皮同，用圣地取而代之。于是他被称为“皮提亚的阿波罗”或“德尔斐的阿波罗”。

[2] 希腊神话里的一种生物，一般被视为潘（牧神）与狄俄倪索斯（酒神）的复合体。萨堤尔拥有人类的身体，同时亦有部分山羊的特征，例如山羊的尾巴、耳朵和阴茎。一般来说，他们是酒神狄俄倪索斯的随从。有时，萨堤尔被视为最低级的树林之神，跟随着潘或宁芙仙女在森林中游逛。萨堤尔的形象往往是淫荡好色的。

[3] 常住雅典的外邦人（metic）主要是来自其他希腊城邦的移民（民主制雅典鼓励外邦人移民到雅典，以促进贸易、产业等）或前奴隶。他们不享有雅典公民权，但可以完全融入雅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还要承担一些义务，如服兵役。有的常住外邦人很富裕，有很大的影响力。

[4] 古希腊的轻装部队（psiloi）与重步兵（hoplite）相对应，轻装部队由贫困公民组成，装备轻甲或无甲，通常没有盾牌，使用镖枪、弓箭、投石器等，也配有短剑或匕首。轻装部队通常被部署在主力的前方，作为前卫部队，作用是扰乱敌人。等到两军一接近，他们就退到主力的后方或侧翼。下文讲述的斯法克特里亚战役是轻装部队战胜重步兵的经典战例。

[5] 爱德华·埃弗里特（1794～1865年），美国政治家、牧师、教育家、外交家和演说家，曾任参议员、马萨诸塞州州长、美国驻英国大使、美国国务卿、哈佛大学教授和校长。1863年11月，他受邀在葛底斯堡军事公墓发表演说，洋洋洒洒地讲了两个小时。随后，林肯总统发表了著名的仅两分钟的葛底斯堡演讲。

[6] 原文如此。根据作者之前的计算，雅典可动用的军费应为6800塔兰同。2000塔兰同是一年之内，海军军费与攻打波提狄亚的陆军军费之和。所以，第一年的军费开支应当是全部可用军费的三分之一还多。

第七章 瘟疫（前430～前429年）

前430年5月初的时候，阿希达穆斯二世再次率军入侵阿提卡，将战争第一年开始的破坏行动继续开展下去。这一次，伯罗奔尼撒人蹂躏了雅典城前方的大平原，然后进攻阿提卡东西两面的沿海地区。原先的战略——将阿提卡土地作为“人质”——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了，因为雅典人显然不愿投降，也不愿出战。伯罗奔尼撒军队在阿提卡停留了四十天，这是整个战争期间他们在阿提卡停留时间最久的一次，直到给养耗尽才撤退。

埃皮达鲁斯

5月底，伯里克利亲自率领100艘雅典三列桨座战船和50艘来自希俄斯岛与莱斯博斯岛的战船出征了。这支舰队运载着4000名重步兵和300名骑兵，步兵的数量与前415年远征西西里的兵力相当，也是雅典人曾用船只运输的最大规模部队之一。有些学者认为，出动兵力如此之多，说明雅典的战略从守势转向了攻势。他们相信，这支远征军的目标是占领埃皮达鲁斯城，在那里驻军并守住该城。那样的话，雅典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就会拥有一座要塞，很适合骚扰和威胁科林斯，鼓励阿尔戈斯加入反对斯巴达人的战争。

如果伯里克利此举的目标真的是这样，那么他的战略的确发生了大转变，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此次远征的目的并非如此。首先，修昔底德不曾提及伯里克利的战略发生了变化。一直到伯里克利去世前，修昔底德都这样描述他的战略：“雅典人不动声色，照管好自己的舰队，在战时不要企图扩张自己的帝国（因为那样会让他们的城市陷入危险）。”（2.65.7）另外，如果雅典人的确打算攻克和据守埃皮达鲁斯，那么他们的实际操作就太糟糕了，因为他们大肆蹂躏埃皮达鲁斯人的领

士，让敌人早早就知道他们即将杀到，并做好了相应准备。

我们最好将这次远征理解为最大规模地执行雅典战略。在战争最初两年里，雅典人从海上登陆，袭击了一系列敌城，包括墨托涅、厄利斯的腓伊亚、特洛伊曾、赫尔米奥尼、哈雷斯和普拉西埃（见地图1），就是在执行这种战略。在每一次行动中，雅典人开始时都蹂躏敌城周边地区，如果那里的防御薄弱，偶尔还会企图洗劫城镇。对埃皮达鲁斯的进攻仅仅是同一计划的升级，或许是因为雅典国内呼声很高，要求对敌人造成更大伤害，所以当权者受到了很大压力。

洗劫埃皮达鲁斯能够提升雅典人的士气，并帮助伯里克利继续开展他在政治上的斗争，或许还能让邻近的伯罗奔尼撒城邦不敢出兵加入正在入侵阿提卡的伯罗奔尼撒军队；也许还能让一些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沿海城市从斯巴达联盟中叛逃，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雅典人的第二次海上远征说明，伯里克利自己也开始意识到，他原先的战略没有奏效。斯巴达人仍然在蹂躏阿提卡，雅典国库资金也因为波提狄亚出人意料的顽强抵抗而不断流失。他认识到，必须采取更咄咄逼人的措施，以说服敌人议和，尽管他还没有放弃根本上属于防御性质的战略。

前430年，雅典远征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岸只前进到普拉西埃，没有继续征讨。无疑此时雅典远征军已经得到消息，伯罗奔尼撒军队已经从阿提卡回国，这意味着雅典人在半岛的登陆行动可能遭到优势敌人的冲击，因此雅典人必须离开伯罗奔尼撒半岛。即便如此，雅典远征军还可以继续前往西北方，就像前一年做的那样，因为他们的兵力足够强大，可以对科林斯及其在西方的殖民地造成很大破坏。那么，强大的舰队为什么没有取得多少战绩就返航呢？

雅典的瘟疫

伯里克利之所以中断了远征，是因为他得到消息称，本年度作战季节开始时，雅典的瘟疫造成了严重后果。据说，此次瘟疫源自埃塞俄比亚，随后传播到埃及、利比亚和波斯帝国大部分地区，然后蔓延至雅典。修昔底德自己也染上了疫病，他仔细描述了症状，它与肺鼠疫、麻疹、伤寒和其他多种疾病的症状相似，但与我们所知的任何一种疾病都不完全吻合。这次瘟疫一直到前427年才渐渐消失，在雅典导致4400名重步兵、300名骑兵和数量不详的下层阶级成员死亡，夺走了雅典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

远征军在6月中旬之后的某个时间返回了雅典，此时瘟疫已经肆虐了一个多月。伯里克利的政策使雅典城内非常拥挤，所以瘟疫特别容易传染，它夺去了一些人的生命，打击了所有人的士气。人人自危，惊慌失措，最神圣的文明纽带也崩溃瓦解，以至于很多人竟不为死者举办恰当的葬礼（在希腊宗教里，葬礼是最庄重的仪式）。雅典人忍受了战争第一年的苦难，但“在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入侵之后，雅典人的土地第二次遭到蹂躏，再加上瘟疫和战争施加的极大压力，于是他们改变了主意，责怪伯里克利劝说他们投入战争，要求他为他们遭到的不幸负责”（2.59.1）。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雅典人将刚刚从伯罗奔尼撒半岛返回的部队派去执行一次新的远征，由伯里克利的盟友哈格农和克里奥滂浦斯指挥，目标是粉碎波提狄亚的抵抗，并镇压哈尔基季基半岛[1]的叛乱。波提狄亚仍然负隅顽抗，而原先在波提狄亚的雅典军队不曾受到瘟疫影响，如今却被前来增援的哈格农部队传染了。40天后，哈格农率领残余部队回到雅典，他原先的4000人中已经损失了1050人。

两面受敌的伯里克利之所以决定让哈格农和克里奥滂浦斯出征，主要是因为受到了雅典政治的压力。我们用来描绘希腊城邦政治群体的任何标签都只是为了方便研究，这些群体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差别很大。

雅典的政治群体瞬息万变，往往是围绕着一个人，有时是围绕一件事情，偶尔两者兼有，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党内纪律。虽然这些群体的延续性很有限，但在十年战争的最初岁月里，雅典民意似乎主要分为三派：希望立即与斯巴达议和的派系，我们称其为主和派；决心积极对外作战、为了在战场上打败（而非慢慢拖垮）斯巴达而甘冒风险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主战派；愿意支持伯里克利政策，即避免正面交锋、企图拖垮斯巴达人并根据战前局势通过谈判得到和平的人，我们称之为中间派。自斯巴达第一次入侵以来就占上风的主和派再次要求与敌人媾和。主战派指出，阿提卡受到了极大伤害，而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进攻没有取得多少效果。波提狄亚围城战仍然占用了很大比例的军费预算，这场战争不可能以现在的开支水平维持下去。雅典需要一场大胜利来节约军费、鼓舞士气。而事实上，雅典遭受了痛苦的失败。

伯里克利遭到猛烈攻击

前430年夏末，瘟疫还在肆虐，雅典人转而反对他们的领导人。他们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的瘟疫，它对城市的沉重打击此时已经大大削弱了伯里克利的地位，人们对其战略的信心动摇了，责怪他的顽固导致了这场战争。人们不愿意将战争继续下去。

在民意的转变中，传统宗教也起了重要作用。希腊人一直相信，瘟疫是诸神为了惩罚激怒他们的人类而降下的灾难。最著名的例子是荷马的《伊利亚特》开篇的那场瘟疫，阿伽门农侮辱了阿波罗的祭司，于是阿波罗降下瘟疫惩罚他。希腊人往往认为，瘟疫的起因是人们忽略了神谕或者宗教上的玷污行为。瘟疫降临雅典的时候，年纪较长的人回忆起了过去的一条神谕，它预言“将会发生一场多利亚人的战争，并将暴发瘟疫”。这其实是对伯里克利的指责，因为他最坚决地主张以战争反对多利亚人（伯罗奔尼撒人），并且人们都知道，他相信理智，喜欢结交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的人。虔诚的人们指出，在雅典大开杀戒的瘟疫不曾传播到伯罗奔尼撒半岛。

其他人则指责伯里克利是造成战争的罪魁祸首，并且雅典人原本是散居于阿提卡各地的，若不是伯里克利的战略将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内，疫情也不会这么严重。普鲁塔克向我们解释，伯里克利的政敌们说服了人们，是挤在城内的农村难民造成了瘟疫："他们说，这一切都是伯里克利的责任；由于战争，他将农村的大批暴民迁往城市，并且让这么多人无所事事。"（*Pericles* 34.3-4）斯巴达人撤军和伯里克利率领的雅典远征军从伯罗奔尼撒半岛返回后，伯里克利已经无法阻止公开辩论，因为必须召开公民大会，以便投票决定远征波提狄亚的军费开支和指挥官人选。这支远征军及其将军的离去使伯里克利丧失了更多政治上的支持。我们可以肯定，在远征军及其将军不在雅典期间，政敌们对伯里克利的攻击终于取得了成功。

和谈

雅典公民大会不顾伯里克利的意愿和建议，投票决定派遣使者去斯巴达议和。这个决定比该时期的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驳斥了修昔底德的说法——"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只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或者正在变成首席公民的独裁统治。"弄清雅典与斯巴达的这些谈判的性质对于理解后来的战争进程非常关键，但古代作家对雅典人提出了什么样的和平条件、斯巴达人又如何答复，都缄默不语，所以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复原这些谈判。

斯巴达人可能重申了他们在战前向雅典人提出的建议：撤离波提狄亚，恢复埃吉那岛的自治权，并撤销对墨伽拉的禁运。前430年的局势对斯巴达有利，所以他们或许还增加了最后一个使团提出的条件：恢复希腊各邦的自治权，这意味着瓦解雅典帝国。

这些条件是不可接受的，会让雅典在敌人面前束手无策；而斯巴达坚持这些条件，就等同于拒绝雅典的议和请求。谈判的结果恰恰证明了

伯里克利的判断：雅典人要想获得令人满意的和平，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斯巴达人确信，雅典既不会投降，也不会被打败。但雅典的主和派仍然将伯里克利视为和平的主要障碍，他们决心让他出局。

斯巴达拒绝雅典的和谈建议，说明了阿希达穆斯二世及与他持有相同政见的人在斯巴达同胞当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雅典人拒绝出城应战以保护自己的家园和庄稼，这让大多数斯巴达人愈发坚信，雅典人都是懦夫，只要斯巴达继续施加压力，雅典人迟早会屈服。雅典人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进攻没有造成严重损害，但非常烦人，令伯罗奔尼撒人更加愤怒。雅典的瘟疫是新的鼓励因素，因为它令雅典衰弱，轻松的胜利似乎很快就会降临到斯巴达人那边。

但斯巴达的主战派严重误判了形势，尽管瘟疫削弱了雅典人，却没有摧毁他们继续战斗的能力。若对当前局势做更理智的分析，斯巴达人就会发现，他们在一场漫长战争中的胜算也不大。雅典人从瘟疫中恢复之后，在舰队和城墙的保护下仍然是坚不可摧的，而且斯巴达人还没有想出战胜对方的办法。更温和的办法或许是，劝说雅典人解除墨伽拉禁运、放弃克基拉岛，或甚至交出埃吉那岛和波提狄亚。这至少能够分裂雅典民意，但由于大多数斯巴达人相信敌人已经走投无路，所以他们提出了敌人哪怕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接受的苛刻条件。

与此同时，在雅典，伯里克利的政敌们对其进行了集中攻击，直到他最后不得不为自己和自己的政策辩护。在民主制国家里，他这样的领导人是罕见的：他在奉行有争议甚至不得民心的政策的同时，仍然对人民坦诚相待。伯里克利始终直言不讳，让那些恼怒的听众无法反驳，因为他们不能说伯里克利没有告诉他们实情，也不能说伯里克利欺骗他们。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责任既是他的，也是大家的。他对雅典人说：“你们当初觉得，我拥有必要的领导能力，至少我的领导能力比其他人要强一些，所以被我说服，投入了这场战争。那么，你们现在就不

应当责怪我做得不对。”（2.60.7）

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了一个新论据，主张坚持原战略。他赞颂了雅典帝国和海军力量的伟大和强盛。海军是帝国的基石，使它能够主宰整个海洋。他认为，与这相比，损失一些土地和房屋根本不值一提，它们“不过是伟大财富的小小点缀罢了。若雅典能够保全自由，就能轻易地重新得到这些东西。但如果雅典丧失了自由，其他东西就会全都丢掉”（2.62.3）。

尽管他之前劝雅典人不要扩张帝国，但在此次演讲中，他似乎在鼓励扩张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他此时的演讲是为了应对新形势：之前攻击他的那些人，比如克里昂，想要的是更积极地作战；而如今攻击他的人是那些根本不想再打下去的人，所以他需要新的侧重点。他指出，雅典人拥有独特的力量，所以他们不必担心输掉战争，他们只需要担心缔结的和约对自己不利，以及担心失去自己的帝国。雅典人抓住了一只老虎的尾巴：“到目前为止，你们控制的帝国是对他人的暴政，拥有这个帝国似乎是不道德的，但如果放弃它，肯定会很危险，”因为“之前被你们统治的那些人将仇恨你们”（2.63.1-2）。

伯里克利的这一席话表明，反对派再次拿出了这样的论点：雅典的帝国主义和这场战争是不道德的。伯里克利没有反驳“帝国主义本身是不道德的”，而是用这个观点作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政策。他指出，考虑道德与否的时间早已过去了，现在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呼吁雅典人不要将自己的眼光仅局限于当下的磨难，而要眺望未来：

> 当世的光辉和未来的荣耀会永垂青史。你们可以预知，你们将拥有高尚的未来和心安理得的当下，你们会用现今的热情来获得这两样东西，所以请不要派遣信使到斯巴达人那里，不要让他们知道，你们在为当今的磨难而痛苦。（2.64.6）

伯里克利被定罪

尽管伯里克利赢得了关于政策的辩论，雅典人没有再派使者去斯巴达，但他的政敌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没有办法在政坛击败他，于是转向法庭。雅典政治家攻击某人及其政策的手段常常是指控他贪腐。伯里克利的政治生涯就是从指控客蒙开始的。大约在前430年9月，在确认现任行政长官的常规投票表决会议上，伯里克利遭到罢免，并被送上法庭，罪名是侵吞公款。

主和派的力量不足，单靠他们自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当时的局势对他们有利。与斯巴达谈判失败后，哈格农及其残余军队（他们攻打波提狄亚的努力失败了）撤回了雅典。他们的失败促使修昔底德所说的普遍不良状况的出现：雅典人“为自己的苦难而伤心，平民百姓原先的生活条件就不好，如今连那一点点基本的条件都丧失了；富人失去了乡村里的美丽庄园、房屋以及贵重的家具陈设，但最糟糕的是，战争还在继续，和平还没有降临”（2.65.2）。

伯里克利最终被定罪，并被处以大笔罚金。陪审团显然并没有完全确信他有罪，或者不愿意对这样一个领导他们多年的人施加极端措施；因为侵吞公款的罪名一旦成立，被告就可能被处以死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伯里克利很快付了罚金，但他可能从前430年9月～前429年仲夏（下一个行政年度的开始）都赋闲在家。

斯巴达人出海

与此同时，斯巴达人越来越受挫于雅典人的顽固和他们自己战略的无效。雅典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进攻使斯巴达盟邦开始质疑，斯巴达究竟有没有能力保护它们抵御强大的雅典海军。于是，前430年夏末，斯巴达人出动100艘三列桨座战船和1000名重步兵，在斯巴达海军司令[2]克涅姆斯的指挥下，攻击了扎金苏斯岛。扎金苏斯岛位于厄利斯外海（见地图11），是雅典的盟邦。他们的目标是铲除雅典在该地区的基地，从而保护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和希腊西北部的盟邦。但斯巴达人未

能占领扎金苏斯岛，蹂躏了它的领土后就返航了。

形势越来越明朗，斯巴达人要想获得一场决定性胜利，就需要新的进攻战略。而他们自己的海军实力不足，也没有资金去建造更多的战船和配备相应人员，于是他们派遣使者去觐见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寻求与他结盟。途中，斯巴达使团在色雷斯国王西塔尔克斯的宫廷稍事停留，请求他放弃与雅典的同盟关系，加入伯罗奔尼撒阵营，希望他派遣军队援救被围困的波提狄亚。当时恰好有两名雅典使者也在那里，他们劝说西塔尔克斯的儿子萨多库斯逮捕了斯巴达使者，将他们押往雅典。斯巴达使者到达雅典之后，未经审判，立刻被处死，他们的尸体没有得到恰当的安葬，而是被扔进一个深坑。这场令人发指的报复行动发生时，伯里克利已经下台。因此，这桩暴行可能是主战派做的，他们在前430年秋季掌权，当时中间派失势，而主和派不被信任。修昔底德相信，雅典人之所以犯下这桩暴行，是因为害怕伯罗奔尼撒使者之一阿里斯特乌斯；他是个科林斯人，之前在防卫波提狄亚的作战中起到的作用最大。雅典人担心这个勇敢聪明的人一旦逃跑，会对雅典造成更大伤害。雅典官方的解释是，这次草率的处决是为了报复斯巴达人的暴行。从战争爆发以来，斯巴达人就将在海上抓到的所有俘虏，不管是雅典人、雅典的盟友还是中立国公民，一律处死。双方的残酷暴行预示着未来更恶劣的罪行，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战争是一个凶残的教师。”（3.82.2）

雅典人攻陷波提狄亚

为了回应斯巴达人对扎金苏斯岛的进攻，以及安布拉基亚人对安菲洛奇亚的阿尔戈斯[3]的进攻，雅典的主战派（其领导人可能包括克里昂）派遣将领弗尔米奥率领20艘战船开赴纳夫帕克托斯，保卫那里的港口，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并封锁科林斯湾。他们还尝试通过扩充帝国境内的税收来增加收入，但他们的最大成就是在前430/前429年冬季占领了波提狄亚。经历了两年半的围城之后，波提狄亚的存粮终于耗尽，

城内发生了人吃人的暴行。围攻城市的雅典军队暴露在寒风之中，受到疾病的困扰，而且其中一些士兵可能自部队于前433/前432年冬季抵达那里以来就一直远离家乡。为了攻打这座城市，雅典人已经花费了2000多塔兰同，每天的开支至少还有1塔兰同，国库已经流失了大量金钱。雅典将军们——色诺芬[4]、赫斯提奥多鲁斯和法诺马库斯——向波提狄亚人提出了虽然不算很慷慨但还可以接受的条件：“他们可以带着妇女、儿童和雇佣兵撤离，每名男子可以带一件衣服，每名妇女可以带两件衣服，并可携带规定数量的旅费。”（2.70.3）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算得上合理的解决方案，雅典人肯定会欢迎它；但主战派却抱怨称，将军们应当只接受敌人的无条件投降，于是在法庭上审判了这几位将军。他们受审的罪名似乎是：未与雅典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商议，便逾越了自己的权限，擅自与敌人媾和。但无疑政治在此案中也起了作用，因为这几位将军都是在前一年冬天与伯里克利一起当选的，当时伯里克利的影响力还很大。起诉这几位将军相当于起诉伯里克利和中间派，但起诉失败了。雅典人为漫长而代价高昂的围城战终于结束而感到欣慰，不愿意为了技术细节而争吵不休。将军们被无罪开释，这也许说明群众对伯里克利的不满情绪开始淡化了。最终，一群殖民者被派去驻守空荡荡的波提狄亚，从此它成了雅典人在邻近色雷斯地区的一个关键基地。

战争的第二年结束时，雅典比一年前虚弱了许多。在斯巴达人的两次入侵中，雅典人保持克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田园和房屋被摧毁。但是，整个阿提卡都已经遭到破坏，斯巴达人没有理由相信，新的入侵会带来更好的结果。而且，雅典舰队已经证明它可以相对轻松而安全地骚扰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国家。按照伯里克利的计划，现在斯巴达的主战派应当已经失势，应当向阿希达穆斯二世及其温和派同僚屈服，并以合理的条件与雅典讲和了。

然而，斯巴达人比以往更加坚定不移。他们无法在陆地决胜，于是转向海上攻势，威胁到雅典对希腊西部海域的控制，甚至威胁到纳夫帕克托斯的安全。他们的成功对伯里克利自信满怀的预测，即伯罗奔尼撒人“会被排除在大海之外”，发起了挑战。尽管斯巴达派往波斯的使团遭到了拦截，但未来的使者未必就不能顺利抵达波斯。由于雅典人的衰弱，波斯国王也许会被斯巴达说服。如果波斯与斯巴达结盟，那么所有以雅典在船只和资金方面占据优势为基础的谋略都会变得一钱不值。斯巴达人受到这种前景的鼓舞，明确表示只有雅典完全服从他们的条件，他们才愿意议和。

与此同时，瘟疫仍然在狠狠地打击雅典的人力和士气，雅典的财政状况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战争开始时可动用的5000塔兰同储备资金（不包括1000塔兰同的紧急预备金），已经花掉了近2700塔兰同[5]，也就是一半以上。虽然代价高昂的波提狄亚围城战已经结束，它也不再吸取国库资金，但斯巴达人在海上的活动意味着，雅典人为了配备舰队人员和保护盟邦，可能仍然需要继续承担大笔开支。按照前两年花钱的速度计算，他们只能再支撑两年。即便是主战派也应当认识到，他们的城邦在下一年没有资本去开展一场大规模战役，但消极无为的政策是很危险的。尽管斯巴达人的顽固让雅典人恢复了斗志，尽管雅典的城墙、舰队和殖民帝国仍然完好无损，但是雅典的未来险象环生。

---

[1] 在希腊东北部，靠近色雷斯与马其顿。

[2] 海军司令（Navarch）是古希腊某些城邦（尤其是缺乏历史悠久的海军传统的城邦，如斯巴达）的舰队指挥官的头衔。雅典的陆海军指挥官均称“将军”（Strategos）。而在斯巴达，根据吕库古的《大公约》（*The Great Rhetra*）的规定，只有国王才能掌控军队，然而他们通常无法包揽职责。虽然有的行动可以全权由国王委派的长官指挥，但这些都是调动兵力较少的小行动，无法应对大规模作战。因此海军司令的职位就应运而生，以缓解这种局面。从前43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开始，斯巴达城邦系统地任命海军司令，人选可能是由元老院选举产生，同时参考监察官的推举，但不经过国王。该职位是年度性的，每人只能担任一次，但存在某些折衷的方案。后来的希腊化国家、罗马和拜占

庭也有这样的头衔。

[3] 注意不要与更著名的阿尔戈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混淆。

[4] 注意不是那个最有名的色诺芬（约前430～前354年，史学家、军人、雇佣兵和苏格拉底的弟子）。

[5] 卡根对雅典军费开支的计算当然都是根据史料推测的概述，但很难完全吻合起来。

第八章 伯里克利的最后时光（前**429**年）

尽管雅典人民蒙受了许多苦难，尽管他们灰心失望，并且伯里克利的战略显然已经破产，但他们还是在前429年春选举伯里克利为将军。毕竟他的才干世人皆知，而且雅典人民对他长期以来非常信任和尊重，这是他再次当选的部分原因，军事和政治上的现实也支持他们的这一选择。斯巴达人拒绝和谈后，雅典主和派在随后几年内就没有任何影响力了。但由于瘟疫仍然在蔓延，国库渐渐空虚，所以雅典人也不可能像克里昂等人敦促的那样发动攻势。唯一的替代方案似乎就是继续执行原先的政策，让伯里克利继续担任雅典的领导人。

伯里克利大约于前429年7月再次上任，但他的生命已经只剩下几个月了。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最终夺去伯里克利生命的疾病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久病不愈，“缓缓地耗尽了他身体的元气，摧毁了他高尚的精神”（*Pericles* 38.1）。在这期间，不管是伯里克利，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牢牢地掌控雅典的政策，也不能鼓舞和约束雅典人民。许多年来，雅典人第一次体会到了真正的民主政府在战时的种种不便，这也是民主制的内在缺陷。

斯巴达攻打普拉蒂亚

斯巴达人已经彻底破坏了阿提卡，并且他们害怕染上瘟疫，于是在前429年5月决定不去雅典本土，而是入侵普拉蒂亚。这个小小的玻俄提亚城镇其实对斯巴达来说没有任何战略意义，而且它也不曾惹恼过斯巴达。斯巴达的这个决定是底比斯人煽动起来的，他们热切地希望利用伯罗奔尼撒联军达到自己的目的。底比斯人强大、野心勃勃（在战争期间，他们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了自己的野心），而斯巴达需要底比斯的继续支持，所以不能完全忽视底比斯的意愿，于是同意了。在主宰前5

世纪下半叶的联盟政治中，管理国与国关系的旧规则越来越让位于新型战争的急迫需求。修昔底德看破了外交上的虚情假意，解释了斯巴达的真实动机：“在整个普拉蒂亚事件中，斯巴达对雅典的敌对态度完全取决于底比斯人，因为斯巴达人觉得，在刚刚开始的战争中，底比斯对斯巴达来说有用。”（3.68.4）

前490年，普拉蒂亚是唯一一个出兵帮助雅典人在马拉松打退波斯人的城邦。在前479年的普拉蒂亚战役（希波战争的最后一战）之后，斯巴达人向全体参加此役的希腊人宣誓，要向普拉蒂亚人返还“他们的土地和城市，让其保持独立”，并发誓要确保“任何人不得非正义地攻击普拉蒂亚，或者为了奴役普拉蒂亚人而攻击他们；若有任何人攻击普拉蒂亚，在场的盟邦将尽全部力量保卫普拉蒂亚”（2.71.2）。因此，斯巴达对普拉蒂亚的攻击不仅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也是一个残酷的讽刺。

阿希达穆斯二世给普拉蒂亚人的选择是要么自由、自主地加入反对雅典的战争，因为雅典企图奴役希腊人；要么至少保持中立。但中立是不可能的，因为底比斯人对普拉蒂亚虎视眈眈，而普拉蒂亚的妇女和儿童都在雅典，所以普拉蒂亚人不可能“将两边都当作朋友”。然后，阿希达穆斯二世建议普拉蒂亚人撤离城市，战后再回来；斯巴达人会代他们保管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向他们支付租金，来使用这些土地和财产，并在战后将其恢复原状。这个建议是显而易见又荒唐可笑的幌子：一旦普拉蒂亚城落到伯罗奔尼撒联盟手里，底比斯人绝不会允许它物归原主。

普拉蒂亚人最后的回应是请求暂时停战，好让他们从雅典人那里获得投降的许可。他们的困境体现了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的无助。在这种国际联盟的世界里，人们珍视的独立只是海市蜃楼，小国顶多能指望得到霸主之一的保护和善意。普拉蒂亚人希望雅典人会允许他们与斯巴达人达成某种协议，因为只有通过重步兵交战才能拯救普拉蒂亚城，而雅

典在这样的交战中不可能获胜。此时在雅典可能是主战派暂时占了上风，雅典人敦促普拉蒂亚人信守与雅典的盟约，并许诺“绝不会坐视不管，一定会尽全力支援他们”（2.73.3）。

于是普拉蒂亚人别无选择，只得拒绝斯巴达的建议。阿希达穆斯二世的回答是，斯巴达人绝没有违背保护普拉蒂亚的誓言，错在普拉蒂亚人拒绝了所有合情合理的建议。斯巴达人其实是很笃信宗教的民族，“害怕神祇的恶意；大神宙斯会特别惩罚背誓者”。但国王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论点也是政治宣传，是在努力为斯巴达（它自诩为“希腊人自由的捍卫者”）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和对自治原则的悍然违背做辩解和开脱。

斯巴达人做了一系列努力，希望避免漫长而代价高昂的围城战，比较轻松地拿下普拉蒂亚，但都失败了。到9月，他们不得不开始在普拉蒂亚周围建造一道包围壁垒，并派兵守卫壁垒。普拉蒂亚守军只有400名普拉蒂亚人和80名雅典人，以及负责做饭的妇女，但其拥有稳固的城墙，而且地理位置特别好，即便小股守军也能成功抵抗整个伯罗奔尼撒联军。

斯巴达人攻打普拉蒂亚的同时，将近5月底的时候，雅典人在希腊东北部转入了攻势。即便在波提狄亚陷落之后，哈尔基季基半岛的叛乱仍未停息，吸走了雅典帝国的财政收入，并鼓励各地掀起类似的叛乱。于是，雅典人派遣色诺芬和另外两名将军率领2000名重步兵和200名骑兵，去镇压哈尔基季基半岛的叛乱。他们攻击了斯巴托拉斯城（见地图16），指望城内民主派会与他们里应外合。希腊各地的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这种斗争被雅典和斯巴达利用。这种情况将在整个战争期间不断重现。偶尔爱国主义会战胜派系的利益，但如果对党派的忠诚超过了对独立的爱，民主派就会将自己的城邦出卖给雅典，寡头派也会将自己的城邦出卖给斯巴达。

在斯巴托拉斯还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当民主派寻求雅典人的支持时，寡头派也在寻求外界的援助，他们找的是邻近的城邦奥林瑟斯。奥林瑟斯提供了一支军队，它在骑兵和轻步兵上的优势使他们打败了雅典的重步兵。雅典人在此役中损失了全部3位将军、430名士兵和在哈尔基季基半岛的主动权。在此后的战争中，重步兵还将多次被其他类型的部队击败。

斯巴达在希腊西北部的作战

当雅典人在希腊东北部恢复秩序的努力落败时，伯罗奔尼撒人开始努力在西北部自卫。此次军事行动是由斯巴达在当地的盟友考尼亚人和安布拉基亚人煽动起来的，他们希望将雅典势力排除在该地区之外，好让他们自己控制该地区。于是，他们提议让斯巴达人从联盟的成员国中调集一队船只和1000名重步兵，来进攻阿卡纳尼亚。他们说，这只是阻止雅典人攻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宏伟战略中的一步：阿卡纳尼亚很快就会陷落，接着是扎金苏斯岛和凯法利尼亚岛，或许纳夫帕克托斯也会陷落。

在这里，斯巴达人被其盟邦的利益指引到了危险的行动中，这样的例子还会有很多。但这个计划在表面上的确很诱人：雅典人在西部海域只有20艘战船，驻扎在纳夫帕克托斯；而安布拉基亚人和考尼亚人是斯巴达人的忠诚盟友，并且熟悉该地区。科林斯人也支持他们的殖民地安布拉基亚的建议，因为雅典人在西部的军事存在对科林斯的威胁最大。

斯巴达又一次任命海军司令克涅姆斯为伯罗奔尼撒军队的指挥官。在纳夫帕克托斯，克涅姆斯从弗尔米奥舰队的眼皮底下溜过，驶向琉卡斯岛（见地图11），在那里与来自琉卡斯岛、安布拉基亚和阿纳克托里翁的盟军，以及来自伊庇鲁斯、对科林斯友好的蛮族会合。然后他走陆路，通过安菲洛奇亚的阿尔戈斯[1]，洗劫了途中的一个村庄，在没有得到增援的情况下攻打了阿卡纳尼亚最大的城市斯特拉图斯，因为他相信

这座城市是此次战役的关键所在。阿卡纳尼亚人避免与斯巴达人正面交锋，利用自己对地形的熟悉和使用投石器的高超本领，打败了克涅姆斯。克涅姆斯不得不返回伯罗奔尼撒半岛。

弗尔米奥登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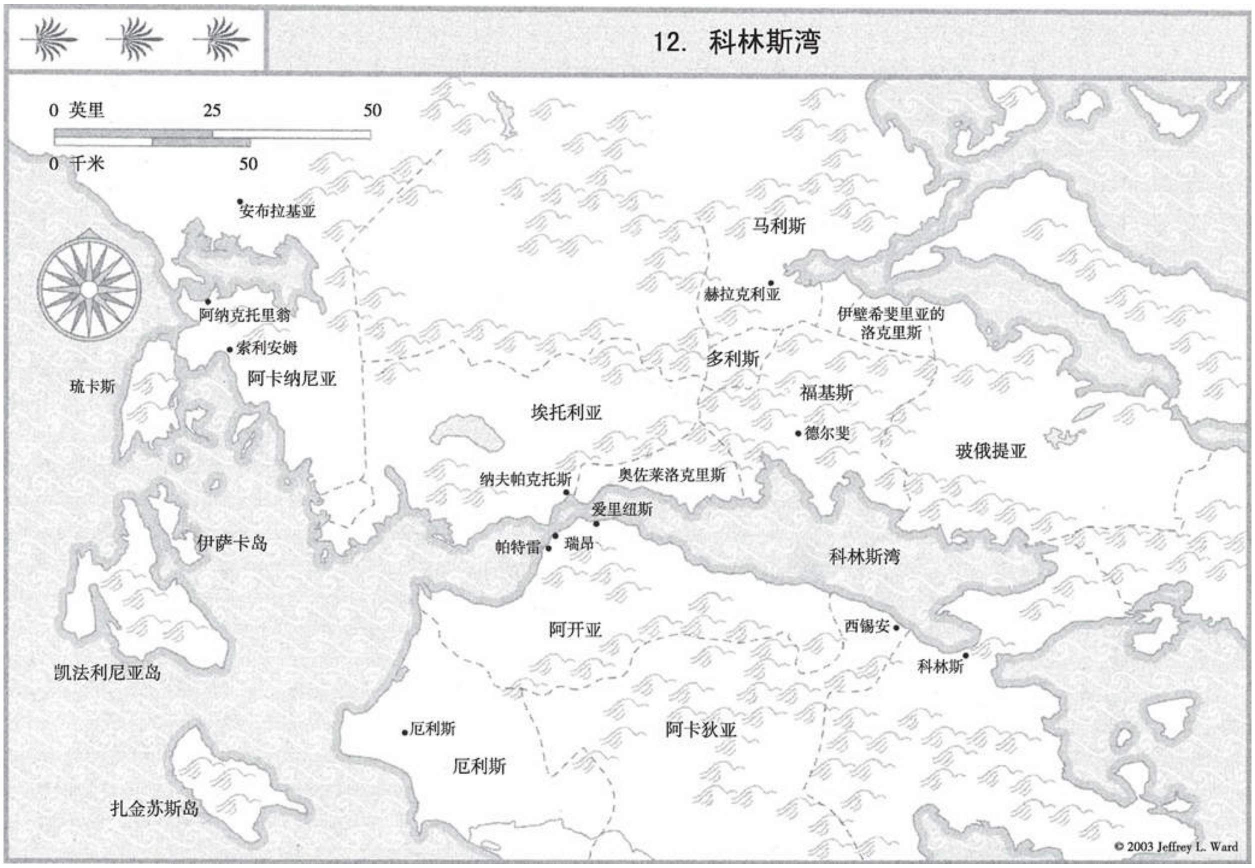
克涅姆斯刚刚抵达斯特拉图斯，阿卡纳尼亚人就向弗尔米奥求援，但这位雅典将军不能大举调遣兵力而让纳夫帕克托斯无人把守，因为科林斯和西锡安的舰队仍然在科林斯湾。他的任务是切断伯罗奔尼撒人的援军，令其无法与克涅姆斯会合。弗尔米奥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优秀将领。十一年前在萨摩斯岛，他曾与伯里克利和哈格农一起指挥舰队。前432年，在攻打波提狄亚的时候，他曾率领重步兵打了一场漂亮仗。但他最大的才华是指挥海军作战，他很快就会展现出自己的本领。

克涅姆斯率军逼近斯特拉图斯的时候，前来增援他的部队乘船驶入了科林斯湾。弗尔米奥只有20艘船，而敌人有47艘，所以伯罗奔尼撒人相信，雅典人的兵力处于劣势，一定不敢出战。但伯罗奔尼撒人的船只运载着许多重步兵（他们要去阿卡纳尼亚支援克涅姆斯），速度必然比雅典战船慢，所以不适合海战。雅典战船的机动性更强，船员和桨手也更训练有素。雅典人在这些方面的优势能够抵消敌人的数量优势。

当敌军舰队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北岸向西航行的时候，弗尔米奥没有骚扰他们，而是耐心等待敌人通过瑞昂角和安提赖昂姆角之间的狭窄海峡，抵达更为开阔的海域（见地图12）；他的战术在那里会更有效。最后，在伯罗奔尼撒舰队企图从帕特雷穿越开阔水域前往大陆时，雅典人发动了进攻。敌军打算在夜色掩护下溜走，但被弗尔米奥拦在海峡中间，于是不得不与雅典人交战。

伯罗奔尼撒舰队虽然占据数量优势，却摆开了防御阵型：一个大圆圈，船首向外，队形紧密，足以防止雅典人突入防御圈。防御圈的中间

是5艘最快速的战船，随时准备援救防御圈可能出现的缺口。弗尔米奥将自己的战船一字排开，绕过敌军的防御圈。于是雅典战船脆弱的侧面暴露了出来，伯罗奔尼撒人若是迅速发起攻击，或许能够撞击雅典战船，将其撞沉或重创。



弗尔米奥指挥他的战船以越来越小的圆圈绕着敌人航行，迫使伯罗奔尼撒人挤进越来越小的空间，“雅典人总是从敌船近处掠过，就好像他们随时要发起冲锋一样”（2.84.1）。他判断，在拥挤的情况下，伯罗奔尼撒人没有办法保持阵型，会互相碰撞、撞断船桨。他还知道，在将近黎明的时候，通常会有风从海湾吹来，在它制造的风浪中，伯罗奔尼撒人会很难操控船只，因为他们的船上载了很多士兵、负担很重。修昔底德对随后发生的海战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

> 风吹起来的时候，原先已经非常拥挤的伯罗奔尼撒船只愈发乱作一团，这既是由于风力的作用，也是由于小船（这些轻型船只不是战

> 船，被安排在防御圈当中，以便对其加以保护）制造的混乱。一艘船与另一艘相撞，人们努力用木杆将它们分开，互相呼喊和提醒，大声咒骂。所以，他们既听不见指挥官的命令，也听不见船长的叫嚷。最后，缺乏经验的桨手无法在很高的波涛中控制自己的船桨。就在这时，弗尔米奥发出讯号，雅典人发动了攻击。首先他们击沉了一名将军的船，然后消灭了所有与他们交战的敌船，将敌军打得落花流水，没有一艘船能够自卫，全都狼狈地逃往阿开亚的帕特雷和代米。（2.84.3）

雅典人俘虏了12艘战船及其大部分船员，建立了胜利纪念碑，然后返回纳夫帕克托斯。在基伦尼，幸存的伯罗奔尼撒人遇到了从斯特拉图斯败退的克涅姆斯。伯罗奔尼撒人第一次两栖登陆攻势以耻辱的失败告终了。

伯罗奔尼撒舰队被兵力不如自己的雅典人击溃的消息让斯巴达人目瞪口呆。他们责怪指挥官们，尤其是克涅姆斯，酿成了大祸。作为海军司令，克涅姆斯必须为整个战役负责。为了处理问题，他们给他派去了三位“顾问”，其中包括闯劲十足的伯拉西达，并命令克涅姆斯努力作战，“不要被几艘船从海上赶走”（2.85.3）。

与此同时，弗尔米奥派遣了一名信使前往雅典，宣布自己的胜利，并请求增援。公民大会却给出了一个奇怪的回答：他们派出了20艘战船的增援部队，却命令它先去占领克里特岛上的基多尼亚，这与去往弗尔米奥驻地的最快捷路线相比，向南偏离太远。在这个时间开辟一个新战场似乎很奇怪，但雅典人一定是希望斯巴达的克里特岛盟友制造麻烦，以便分散斯巴达人的兵力。雅典的这个时机选择也不是随便做出的，因为克里特岛有人邀请他们去攻打基多尼亚，对这个邀请必须立刻接受或拒绝。尽管雅典人在克里特岛的努力失败了，并且此次行动说到底也许是个错误，但我们不能说这个决定是荒唐的，况且其代价也不大。即便如此，雅典人为什么仅仅给弗尔米奥送去了20艘战船？即便加上了这20艘船，弗尔米奥的兵力仍然远逊于敌人，何况雅典此时拥有很多战船，完全可以向纳夫帕克托斯派去一支更大的舰队，并同时向克里特岛派去

另一支舰队。最合理的解释是雅典仍然受到人员和资金匮乏的限制。

在纳夫帕克托斯，弗尔米奥仍然只有20艘船，却要面对斯巴达人的77艘船。这一次，伯罗奔尼撒舰队没有重步兵的负担，急于求战，而且指挥官也比前一次战役更娴熟有力、更足智多谋。他们从厄利斯的基伦尼出发，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北岸向东航行，直到在潘诺姆斯（科林斯湾最狭窄的地段）与步兵会合。

伯罗奔尼撒舰队的兵力差不多是弗尔米奥的四倍，如果弗尔米奥拒绝迎战，伯罗奔尼撒舰队就可以自由西进，打破雅典的封锁线并将弗尔米奥舰队堵死在纳夫帕克托斯。那么雅典的海上霸主形象就幻灭了，它那些蠢蠢欲动的臣属也许会起来造反。但弗尔米奥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停泊在安提赖昂姆，即科林斯湾最狭窄处以西不远的地方，与瑞昂（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只隔了不到1英里的距离。

在一周的时间里，两军隔着狭窄的海面怒目而视。雅典人没有首先发难的动机，因为他们的力量远逊于敌军，而且他们必须防守纳夫帕克托斯（雅典在科林斯湾的基地）。于是斯巴达人主动起来，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北岸向东行驶。他们奔向纳夫帕克托斯，右翼是他们最好的20艘战船。弗尔米奥别无选择，只能紧跟上去，返回海湾较狭窄的部分。他前进的时候，美塞尼亚人（雅典人的盟友，居住在纳夫帕克托斯）的重步兵[2]在陆地上跟随行进。斯巴达人看到雅典战船沿着北岸以一字长蛇阵匆匆前进，于是掉转过来，将其中9艘雅典战船切断，并把它们驱赶到岸边。此时，雅典人还剩11艘战船可以与伯罗奔尼撒人的20艘精锐战船对抗。即便雅典人能够打败这些敌船，或者从其手中溜走，也还需要对付余下的57艘敌船。灾祸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11艘雅典战船利用自己的高速度从敌人身侧冲过。它们抵达了纳夫帕克托斯，在那里摆开阵势，船首向外，准备迎战很快就要抵达的优势敌人。最后1艘雅典战船还在入港的过程中，伯罗奔尼撒人穷追不舍，

已经开始高奏凯歌。正好有1艘商船停在纳夫帕克托斯外海的深水区。就是因为它的存在，战局发生了惊人的逆转。最后落单的那艘雅典战船没有奔向纳夫帕克托斯的安全处，而是转了四分之三圈，利用停泊在那里的商船保护自己暴露的侧翼，然后猛撞最前面的那艘追击它的敌船，将它撞沉了。伯罗奔尼撒人原以为必胜无疑，现在却陷入了混乱。由于他们不熟悉水文状况，有的战船搁浅了。其他船上的人看到这般景象大吃一惊，于是将船桨插入水中以便让船停下来，等待其他战船。这是个可怕的错误，因为它们在机动灵活的敌人面前一动不动、枯坐等死。

其余的雅典战船被这意想不到的逆转大大鼓舞了，冲了上去，攻击敌人，尽管敌人的数量仍然是他们的两倍。这时伯罗奔尼撒人已经丧失了斗志，逃往潘诺姆斯，抛弃了他们之前俘获的9艘雅典战船中的8艘，自己还损失了6艘。双方都建立了胜利纪念碑，但很显然雅典才是胜利者。雅典人保全了自己的舰队、纳夫帕克托斯的基地和海上的自由行动。伯罗奔尼撒人害怕雅典的增援部队，于是狼狈地败退了。雅典的增援部队果然很快就从克里特岛赶来了，虽然没有赶上参战，但足以震慑敌军，令其不敢再次进攻。

如果弗尔米奥在此役中被打败，雅典人就不得不放弃纳夫帕克托斯，于是就再也不能阻碍科林斯和其他伯罗奔尼撒国家与西方的贸易了。如果雅典人在海战中失败，还会极大地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并鼓励敌人开展更大胆的海上行动。那样的话，雅典帝国内部就可能发生叛乱，波斯国王也可能加入斯巴达那边。因此难怪雅典人如此热忱地爱戴弗尔米奥，在卫城竖立了纪念他的雕像。他去世后，雅典人还将他安葬在通往学院的路边的国家公墓，让他在伯里克利墓旁长眠。

斯巴达人进攻比雷埃夫斯

克涅姆斯和伯拉西达不愿意带着自己战败的噩耗回国，而是准备加大赌注、做更大胆的尝试。他们同意了墨伽拉人的建议：进攻比雷埃夫

斯。这个主意大胆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墨伽拉人指出，比雷埃夫斯港口既没有封闭，也没有人把守；而且雅典人过于自信也准备不足，此时已是11月，航海季节已经结束，谁能想到新尝败绩、狼狈逃离科林斯湾的伯罗奔尼撒海军竟会大胆地进攻比雷埃夫斯呢？伯罗奔尼撒人的计划是打雅典人一个出其不意，他们打算将舰队的桨手经陆路送往墨伽拉在萨龙湾的港口尼萨亚。那里停泊着40艘没有船员的墨伽拉三列桨座战船，桨手们将驾驶这些船只立刻开赴毫无戒心、无人防备的比雷埃夫斯。计划的第一步顺利完成，但到了尼萨亚之后，斯巴达指挥官们“被巨大的风险吓坏了，据说风向也对他们不利”（2.93.4）。于是，他们没有去比雷埃夫斯，而是先攻击和劫掠了萨拉米斯岛[3]，这就让雅典人产生了警觉。雅典得到了烽火警报，城里很快恐慌起来，因为雅典人相信斯巴达人已经占领了萨拉米斯岛，正在杀向比雷埃夫斯。修昔底德相信，如果斯巴达人真的就这么冲过来，是能够成功的，但胆怯让他们付出了巨大代价。黎明时分，雅典人鼓起勇气，派出一支步兵部队守卫港口，还派了一支舰队去萨拉米斯岛。伯罗奔尼撒人刚看到雅典战船的影子，就逃跑了。雅典安全了，雅典人采取措施，以保证未来类似的奇袭不会成功。

伯里克利之死

伯罗奔尼撒人对纳夫帕克托斯和比雷埃夫斯的攻击失败了，海战经验不足导致他们犯下了在战斗中前怕狼后怕虎的错误，并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伯里克利曾预言敌人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但他没能活着看到自己的预言成为现实。前429年9月，也就是战争爆发两年六个月之后，他与世长辞了。他的最后时光并不愉快。雅典的“首席公民”遭到了罢免、定罪和处罚。他的很多朋友在瘟疫中丧生，他的妹妹及合法儿子科桑西普斯和帕拉鲁斯也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失去了继承人之后，他请求雅典人使其不受雅典公民权法律的限制。正是他自己在二十年前推出了这部法律，将雅典公民局限于父母双方都是雅典人的人。他与心爱的长期情

人阿斯帕齐娅——一个米利都女人——生下了儿子小伯里克利。现在他请求授予小伯里克利公民权。雅典人同意了他的请求。

在伯里克利最后的时光里，国家大事仍然压在他的肩头。他的温和威慑政策导致了战争的爆发，而他的保守战略似乎无法赢得战争。因瘟疫而死的雅典人数量远远超过任何正面作战可能导致的人员损失。人民责怪他是引发战争的人，并怪罪他的战略所造成的严重疫情。在他临终前不久，侍奉他的一些朋友以为他睡着了，于是开始讨论他的伟大、力量和功业，尤其是他为雅典赢得的许多胜利。伯里克利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对他们颂扬他的业绩表示惊讶，因为他相信，这些事情往往是偶然所致，很多人都取得过这样的成功。“但他们没有说到最伟大和最美丽的事情。在世的雅典人没有一个因为我的缘故而戴孝。”（Plutarch，*Pericles* 38.4）这就是一个内心不安的人向雅典人民做出的回应，这些人民指控他刻意引发了一场原本可以避免的战争。

伯里克利的去世让雅典失去了一位具有独特品质的领导人。他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拥有罕见才华的卓越政治家。他能够做出决策，说服雅典人采纳他的政策并坚持不懈；他能够制约雅典人做出雄心勃勃而不切实际的行动，而在他们灰心丧气的时候，又可以鼓舞他们。重新上台的伯里克利或许拥有足够的力量，迫使雅典人坚持一贯的政策，而其他任何一个雅典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在最后一次被记载下来的演讲中，伯里克利列数了一位政治家必备的品质：“知道必须做什么事情，并且能够解释它；爱自己的国家，清正廉洁、不可腐蚀。”（2.60.5）在这些品质上，没有人比伯里克利更突出。即使他犯了错误，他也是雅典人当中最有可能改正错误的人。他的同胞将会非常怀念他。

同一年，色雷斯国王西塔尔克斯（雅典的盟友）攻击了柏第卡斯二世治下的马其顿王国和邻近的哈尔基季基半岛上的城市[4]。他攻占了一

些要塞，但遭遇了顽强的抵抗。尽管西塔尔克斯拥有15万大军（其中三分之一是骑兵），但按兵不动，没有去进攻哈尔基季基半岛，因为那样的话就需要雅典舰队的配合，但雅典舰队始终没有抵达。或许雅典人看到西塔尔克斯雄壮大军的行动，害怕西塔尔克斯会进攻这一地区的雅典领地。而且，自这个海陆并进的计划制订以来，斯巴达人从海上进攻了纳夫帕克托斯和比雷埃夫斯，尽管这些攻击都失败了，但其很可能动摇了雅典人的信心，让他们觉得此时不宜在离家如此遥远的地方开展大规模行动。雅典人的谨慎以及前429/前428年秋冬雅典在人力和资金上的困窘或许也能解释，雅典为何没有兑现诺言，没有出动舰队去支援西塔尔克斯。

色雷斯军队的庞大规模让北方所有的希腊人都心惊胆寒，但这支大军很快就耗尽了粮草，没有取得多少成绩就撤退了。在战争的第三年，阿提卡没有遭到入侵，并避免了海上的失败，但雅典人的储备资金继续流失，估计可用资金只剩下1450塔兰同。如果按照前两年的资金消耗速度，战争还能维持一年；如果资金消耗速度降到之前的一半，那么可以维持两年。原先的取胜战略已经失败，雅典人还没有制定出新的战略。他们若是继续按照之前那样打下去，资金必然会耗尽，但他们也没有办法迫使敌人接受和平。

---

[1] 安菲洛奇亚的阿尔戈斯是安菲洛奇亚地区最重要的城市。

[2] 这些居住在纳夫帕克托斯的美塞尼亚人可能就是第一章“雅典与斯巴达的对抗”一节中讲到的反抗斯巴达后被雅典安置在纳夫帕克托斯的黑劳士。

[3] 萨龙湾中最大的一个岛屿，距离比雷埃夫斯西南海岸约2公里，距离雅典约16公里。前480年，希波战争期间，雅典军队在此大败波斯帝国舰队。

[4] 柏第卡斯二世此前也是雅典的盟友，于前429年背叛了雅典。

第九章 雅典帝国内部的叛乱（前428～前427年）

雅典的“新政治家”

伯里克利的去世使雅典政坛发生了很大变化。修昔底德写道，“那些曾经追随他的人，互相之间实力均衡”（2.65.10），所以无法提供战时必需的统一、连贯的领导。在过去，将军都是贵族。但是，一群新的政治家渐渐崛起了，他们的家族通过贸易和手工业致富。这样的人至少与贵族地主同等富裕，常常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政治才干不逊于之前的贵族们。

现在出现了两个互相竞争的派系，领导人分别是尼基拉图斯之子尼基阿斯和克里埃涅图斯之子克里昂。修昔底德和他之后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两个人的秉性迥然不同：尼基阿斯虔诚、正派、保守，是一位绅士；克里昂则是伯里克利的长期反对者、主战派、蛊惑民心的政客和粗俗之徒。其实两人都来自“新人”阶级，没有贵族血统。尼基阿斯通过将奴隶出租给阿提卡银矿做工而发财；克里昂的父亲拥有一家生意兴隆的制革厂。尼基阿斯和克里昂都没有显赫的身世，我们除了他们的父亲之外，对他们更早的家族成员一无所知。

尽管很少有两个人在性格、品质和对战争的态度等方面如此截然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差别其实没有如一般描写的那么夸张。他们都不主张与斯巴达谈判，并且都在伯里克利去世后的岁月里努力打赢战争。在前425年之前，没有文献记载表明他们之间存在分歧。在前428年，他们的立场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必须保护好雅典的殖民帝国，雅典人必须振作起来，把战争打下去；必须开源节流，设计出新战略来继续发动攻势，最终赢得战争。两人有足够的动机去达成合作，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没有合作。

莱斯博斯岛的阴谋

前428年5月中旬前后，斯巴达人再次入侵阿提卡，在大肆破坏了一个月之后撤退了。但对雅典来说，这个喘息之机很短暂，因为莱斯博斯岛上发生了一起阴谋，威胁着雅典的帝国基业，乃至它的生存。提洛同盟变成雅典帝国的时候，只有两个重要岛国保全了自治权，它们是希俄斯岛和莱斯博斯岛。莱斯博斯岛的主要城市米蒂利尼在雅典的盟邦当中是比较罕见的一个，因为它由寡头政权统治。另外，莱斯博斯岛的各城镇也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们向雅典同盟提供船只，而不是金钱，来作为贡礼。尽管享有这个有利地位，但米蒂利尼人甚至在战前就考虑退出雅典同盟。由于伯罗奔尼撒人拒绝接纳他们进入自己的联盟，所以只得罢手。伯罗奔尼撒人的拒绝发生在和平时期，但在战时，莱斯博斯岛若是变节，一定会受到雅典敌人的欢迎。

阴谋的主使是米蒂利尼，它反叛雅典的主要动机是希望主宰全岛。此时发动叛乱，时机最佳。世人皆知，雅典遭到了瘟疫的惨重打击，缺少人力和金钱；叛乱很可能会引发更多变节，使雅典愈发虚弱。阴谋要想成功，依赖于得到雅典敌人的帮助。在前428年，这种帮助似乎是必然会到来的，因为玻俄提亚人和斯巴达人都参与了此项阴谋。在奥林匹亚举行的伯罗奔尼撒人集会上，米蒂利尼人发表了演讲，请求援助。他们声称自己反叛雅典的主要动机是，他们担心雅典人将来会剥夺他们的自治地位，将他们变为和雅典其他盟邦（希俄斯岛除外）一样的臣属。他们掩盖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即在米蒂利尼的领导下，统一莱斯博斯岛上的城邦，而雅典绝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一般来讲，雅典人总是反对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立较大的政治实体，所以一般会努力将它们分割成更小的实体。莱斯博斯岛上有一个民主制城邦米西姆纳敌视米蒂利尼，所以米蒂利尼一旦反叛，雅典人肯定会出兵干预。

但米蒂利尼人还是开始建造城墙、封锁港口、扩充海军，并从黑海地区获取粮食和雇佣兵弓箭手。不过在他们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前，他们

的企图已经被泄露了出去，敌视他们的邻国与一些代表雅典人利益的米蒂利尼人合作，匆匆向雅典发出警报。这些亲雅典的米蒂利尼人可能是民主派，敌视寡头政府，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行动。反叛者的计划既已泄露，他们不得不在万事俱备之前就开始行动。

雅典的反应

6月，雅典派出舰队，实施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军事行动。为了节约资源，这次雅典只出动了40艘战船，而不是前431年的100艘。在得知米蒂利尼人正在企图统一莱斯博斯岛之后，舰队改为开赴莱斯博斯岛。他们原打算趁着一次宗教节日的时机奇袭叛军，但在民主制的雅典，保守秘密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每一项政策决定都必须在普尼克斯山上的公民大会做出。一名信使预先向米蒂利尼人发出了警报。雅典舰队抵达莱斯博斯岛，命令叛军交出船只并拆毁他们的城墙，遭到拒绝后雅典人发动了进攻。

尽管米蒂利尼人的补给物资和雇佣兵弓箭手尚未到位，尽管他们的防御工事还没有竣工，而且与伯罗奔尼撒人和玻俄提亚人的联盟还没有正式缔结，雅典人还是认识到了自己的舰队和预备队的相对劣势，并担心“他们不够强大，无法与整个莱斯博斯岛对抗”（3.5.4）。米蒂利尼人“若有可能，希望先除掉雅典人的战船”（3.4.2），同时等待自己的盟军，于是便请求休战。为了拖延时间，他们还向雅典派去了一个使团，承诺如果雅典人将舰队撤走，他们就对雅典保持忠诚。他们没有提及自己对全岛的武力统一，此时这项工作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所以，米蒂利尼人实质上是在请求雅典认可他们对莱斯博斯岛的主宰，并以未来对雅典保持忠诚作为条件。雅典人当然不会将米西姆纳拱手让给米蒂利尼。如果雅典不保护米西姆纳，它就失去了对各盟邦施行帝国主义统治的合法性。米蒂利尼人知道雅典人一定会拒绝，因此同时还秘密派使者去找斯巴达人，寻求斯巴达盟友的援助。

米蒂利尼向伯罗奔尼撒人求援

7月，两个米蒂利尼使团先后前往斯巴达，时间相隔一周，但都没有成功。斯巴达人仅仅建议米蒂利尼人在奥林匹亚节日的伯罗奔尼撒联盟集会上陈述自己的故事。斯巴达拒绝进一步参与这场冲突的一个原因是，米蒂利尼反叛的主意最初是玻俄提亚提出的，不是斯巴达的想法；另一个原因是，斯巴达认识到，若要援助米蒂利尼，就需要一支规模庞大且代价不菲的舰队，并在海上作战。被弗尔米奥打败的可耻记忆一定使斯巴达人对海战非常冷淡。

8月，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后，伯罗奔尼撒联盟在位于奥林匹亚的宙斯圣所召开了会议。米蒂利尼发言人的任务是说服伯罗奔尼撒联盟，告诉联盟干预米蒂利尼局势对捍卫希腊人自由的伟大事业，以及伯罗奔尼撒联盟自己的利益都有利，而不仅仅是符合米蒂利尼人的私利。他谈到了雅典人对其盟邦自治权的侵犯；除非米蒂利尼的反叛成功，雅典人必将奴役米蒂利尼。他指出，此次反叛的时机非常合理："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好的机遇，因为雅典人由于瘟疫和资金消耗而元气大伤。他们的一部分舰队正在绕着你们的海岸航行（弗尔米奥的儿子阿索皮乌斯于7月起航，开始了此次远征），其他部分舰队正在对付我们。如果你们在今年夏天海陆并进、发动进攻，他们不大可能还有任何船只可供调用。他们要么不抵抗，要么从你们的领土和我们的领土撤走舰队。"（3.13.3-4）米蒂利尼人的最后一个论点是，决定战争结局的不是阿提卡，而是雅典的海外帝国，因为那里是雅典的军费来源。

> 如果你们全力支持我们，你们就会得到这样一个盟邦：它拥有强大的海军，而你们最需要的就是海军。你们将雅典人的盟邦吸引到自己的阵营，就能更轻松地打败雅典人；因为在你们援助我们之后，大家都会更勇敢，更敢于反叛雅典。因此，你们也能避免受到不支持反叛雅典人士的指责。如果你们更公开地表现出自己的解放者角色，就肯定能胜利。（3.13.5-7）

伯罗奔尼撒联盟立即接纳了米蒂利尼人，斯巴达人命令各盟邦在科

林斯地峡集结，准备入侵阿提卡。斯巴达人自己则准备将他们的船只从陆路拖过地峡，进入萨龙湾，以便海陆并进、攻打雅典。但是，各盟邦“集结的动作很迟缓，因为他们正在收割庄稼，不愿意打仗”（3.15.2）。

在这场危机中，雅典人表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正是这种决心和精神让他们保全了自由，开辟出了一个大帝国。尽管他们有40艘战船正在封锁莱斯博斯岛，但还是投入了100艘三列桨座战船的舰队，像战争第一年那样去袭掠伯罗奔尼撒半岛。这种展现自信和力量的大胆行为让雅典的资源几乎到了告罄的边缘。除了通常的来自下层阶级的桨手外，这一次他们还动用了一般仅作为重步兵作战的中层阶级；为了应对紧急情况，还强征了常住雅典的外邦人担当桨手。这些船员的素质比不上弗尔米奥麾下的将士，但斯巴达人还是会因为前429年的失败而心惊胆寒。

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各处随意登陆，以展示自己的力量，让斯巴达人相信，米蒂利尼人夸大了雅典的弱势。于是斯巴达人放弃了进攻，回家了。米蒂利尼人和他们在莱斯博斯岛上的支持者不得不再一次独自面对雅典人。

没了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帮助，他们未能攻占米西姆纳，只能满足于加强对臣属城邦安提萨、皮拉和爱里苏斯的控制，于是莱斯博斯岛的形势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但斯巴达的退却让雅典人决定施加更大压力，他们派遣帕基斯将军率领1000名重步兵前往米蒂利尼。帕基斯在米蒂利尼周围建造了一堵围墙，从海陆两面将它封锁起来。围城和封锁不仅能保护米西姆纳，或许还能迫使米蒂利尼投降。

米蒂利尼围城战

米蒂利尼围城战于这年初冬正式开始，它对雅典资源的消耗超过了

伯里克利在战争开始时所做的预估。到前428/前427年冬天，可用的储备资金已经不到1000塔兰同。财政危机迫在眉睫，一点喘息之机也没有了。

于是，雅典人采纳了两项伯里克利当初公开宣布的计划中未曾包含的特别措施。前428年夏末，他们要求各盟邦缴纳更多贡金。在正常缴纳贡金期限的前几个月，他们就派了12艘战船去收缴新评估出来的税金。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收缴了多少钱，但雅典人在卡里亚[1]遇到了抵抗，吕西克利斯将军为了收缴新税而丧命。

即便提高赋税和加强收缴工作，也满足不了雅典的财政需求。随着米蒂利尼围城战的展开，雅典对金钱的需求飙升起来。于是，雅典人决定采取一项绝望的方案："由于围城战需要资金，他们自己首次征收了直接税，税额为200塔兰同。"（3.19.1）不管修昔底德说的"首次"是历史上首次，还是本次战争期间首次，雅典都很久没有征收过直接税了。现代的纳税人或许会感到奇怪，其实自文明诞生以来的大多数人都会难以理解；但希腊各城邦的公民憎恨直接税，认为它侵犯了个人自主权，并侵害了他们的财产所有权，毕竟他们的自由就建立在财产之上。新的征税对有产阶级（包括自耕农，而自耕农是陆军重步兵的主干）的打击特别大，直接税的负担完全落在他们肩上。

向盟邦增加税收是一种危险的策略，可能引发叛乱，从而破坏雅典力量的根基；向公民征收直接税则会降低人民对战争的热情。不足为奇的是，伯里克利在公开讨论雅典资源时从来没有提及这些应急手段，但我们没有理由说，前428年的这两项措施完全是克里昂及其派系的主意。雅典在海陆两面面临危机，帝国内部也存在叛乱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鼓舞雅典人做出如此巨大努力的人，一定主要是雅典的将军们，包括尼基阿斯和帕基斯等人。他们和克里昂及其支持者一样清楚地认识到，雅典的安全取决于尽快镇压米蒂利尼叛乱，防止它扩散到帝国

全境、耗尽雅典的国库资源。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不是出于政党政治或阶级斗争，而是出于爱国主义精神，目的是应对紧急情况。

在这期间，斯巴达人也没有忽略莱斯博斯岛上的局势发展。冬末，他们秘密地将一名斯巴达使者萨莱苏斯派往米蒂利尼，去告诉当地的叛乱者，原计划于前428年展开的两栖作战将于前427年实施。斯巴达人将入侵阿提卡，并派遣40艘战船前往米蒂利尼（指挥官是斯巴达人阿尔基达斯）。这个好消息让米蒂利尼叛军大受鼓舞，他们决心坚守下去；萨莱苏斯将留在米蒂利尼，负责协调岛上的行动。

冬天快要过去了，雅典人面临着战争爆发以来的最大危机。他们必须镇压一个强大盟邦的叛乱，同时他们自己的土地也面临着入侵的危险。他们必须快速行动，因为像波提狄亚围城战那样漫长的战争可能最终会耗尽他们的储备资金、剥夺他们的防御能力。

斯巴达在海洋和陆地的行动

前427年斯巴达人入侵阿提卡的目标是向雅典人施压，以阻止他们向米蒂利尼派出更大规模的舰队。伯罗奔尼撒大军悉数出动，但阿希达穆斯二世第一次没有指挥作战，他可能已经时日无多。他的儿子阿基斯二世可能被认为缺乏经验，于是流亡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的弟弟克里昂米尼负责指挥事务。与此同时，斯巴达人派遣海军司令阿尔基达斯率领42艘三列桨座战船开赴莱斯博斯岛，希望雅典人会忙于防卫自己的土地而顾不上拦截阿尔基达斯舰队。

斯巴达主战派素来相信只要入侵阿提卡，同时派海军攻击爱琴海地区，必将引发雅典盟邦的普遍反叛，最终摧毁雅典帝国，但一直没有好的时机。前440年的萨摩斯岛叛乱可能是个好机会，但科林斯人不同意向雅典开战，于是机会被浪费了。现在，时机终于到了。

从时长和造成破坏的程度来看，此次入侵阿提卡的行动仅次于前

430年那次。之前几次入侵未曾触及的东西，这次全被摧毁；上次入侵之后又种植的农作物全被铲除。在海上，由于伯罗奔尼撒海军不能指望从雅典海军中杀出一条路，所以成功取决于速度。但是，阿尔基达斯在“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航行途中浪费了时间，在航行的余下时间里也是慢悠悠地行进”（3.29.1）。即便如此，在抵达提洛岛之前，他还是避开了雅典舰队。这耽搁是致命的，因为他到达伊卡洛斯岛和米科诺斯岛时得知，米蒂利尼已经投降了。

为了决定下一步行动，伯罗奔尼撒人召开了一次会议。即便到了这个阶段，如果他们勇敢、果断地行动，仍然能够取得很大成就。勇敢的厄利斯人指挥官泰乌提阿普鲁斯提议立即进攻米蒂利尼，他确信雅典人刚刚得胜必然轻敌，伯罗奔尼撒人能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但谨慎的阿尔基达斯拒绝了他的建议。伊奥尼亚[2]流亡者提出了更好的建议。他们敦促斯巴达人用舰队去支持目前臣服于雅典的伊奥尼亚各城邦反叛。他们的计划是，阿尔基达斯应当占领小亚细亚沿海的一座城市，然后以它为基地，煽动伊奥尼亚城邦的普遍叛乱。曾于前440年支持萨摩斯岛叛乱者的波斯总督皮苏特尼斯或许会再一次支持雅典的敌人。如果叛乱成功，那么雅典人会在最脆弱的时候丧失从该地区获取的收入。即便不能完全成功，叛乱也会迫使雅典人抽调兵力去封锁伊奥尼亚的叛乱城邦。最理想的结果是，将斯巴达联盟、造反的雅典附庸国和波斯帝国的力量联合起来，这样的组合将来必然能够打败雅典。

伊奥尼亚人希望借助斯巴达的力量来支持自己的反叛，他们的建议非常好。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小亚细亚大陆上的伊奥尼亚人看到船只时，“没有逃跑，而以为那是雅典人。因为他们绝对想不到，在雅典统治大海的时候，伯罗奔尼撒战船竟然能接近伊奥尼亚”（3.32.2）。有了这样一支舰队的支持，肯定至少有一座城邦会反叛雅典。这样的行动在打破雅典在海上不可战胜的神话之后，更多的城邦会加入叛乱，波斯总督也许会抓住机会，将雅典人逐出亚洲。

但是，阿尔基达斯不愿意听取这样的建议。“之前他到得太晚，没来得及挽救米蒂利尼，因此现在他脑子里的头等大事是尽快返回伯罗奔尼撒半岛。”（3.31.2）他害怕被雅典舰队拦截，于是火速返航。他担心在小亚细亚抓的俘虏会拖累自己，于是将大部分俘虏处决了。在以弗所，亲斯巴达的萨摩斯人警告他，屠杀战俘的行为与斯巴达解放希腊人的宣传相悖，会让那些原本对斯巴达有好感的希腊人疏远斯巴达。阿尔基达斯做了让步，释放了还活着的俘虏，但此事已经严重损害了斯巴达的声誉。帕基斯得知斯巴达舰队的位置后，一直追踪到帕特摩斯岛，然后才放弃追击。阿尔基达斯安全返回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正如修昔底德后来所说的：“对雅典人来说，斯巴达人是最容易对付的民族。”（8.96.5）

米蒂利尼的命运

伯罗奔尼撒舰队未能及时赶到，于是米蒂利尼的叛军注定要灭亡了。围困使城内存粮迅速耗尽，被派到当地鼓舞叛军士气的斯巴达人萨莱苏斯筹划发动一次铤而走险的袭击，以突破雅典军队的包围圈。要想取得成功，他就需要更多的重步兵，而米蒂利尼人拿不出这么多重步兵来，于是萨莱苏斯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向下层阶级的人提供重步兵装备。米蒂利尼的寡头政府同意了这个计划，这说明他们相信平民百姓是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但新兵得到武器之后，就要求将存粮也分发给全体公民；他们威胁说，如果寡头政府不同意，他们就会把城市交给雅典，并与雅典单独媾和，不管上层阶级的死活。

我们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表明，米蒂利尼政府能否满足这个要求，以及满足了这个要求之后平民是否就会保持忠诚。说不定粮食已经所剩无几，不可能分发给全体公民。不管怎样，米蒂利尼的寡头政府向帕基斯投降了，并且相当于无条件投降：雅典人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处置米蒂利尼人”（3.28.1）。帕基斯承诺，允许米蒂利尼人派遣使者去雅典，协商出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在此之前不会监禁、奴役或杀害任何米蒂

利尼人。

雅典军队进城后，与斯巴达人比较亲近的米蒂利尼寡头派心惊胆战，逃到了神祇祭坛前避难。帕基斯向恳求他饶命的人保证，他不会伤害他们，并将他们送往附近的忒涅多斯岛保护起来。随后，他控制了莱斯博斯岛上其他曾反叛雅典的城市，并捕获了藏匿起来的萨莱苏斯，将他和忒涅多斯岛上亲斯巴达的米蒂利尼人，以及“在他看来对叛乱负有责任的所有人”（3.35.1）押往雅典。

前427年夏季，雅典人召开大会来商讨如何处置米蒂利尼。要理解此时雅典人的情绪，我们必须考虑他们当时的处境。在战争的第四年，他们已经被入侵和瘟疫打击得元气大伤，原先的战略已经破产，现在还没有设计出有希望的替代方案。米蒂利尼的叛乱和斯巴达舰队渗入伊奥尼亚预示着雅典面临的可怕灾难。在普尼克斯山上开会的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忧心忡忡，并且对那些威胁他们生存的人十分愤怒。

在这些情绪的推动下，他们很快决定不审判萨莱苏斯，直接将他处死，尽管萨莱苏斯提议由他说服斯巴达人放弃对普拉蒂亚的围攻，以换取他的性命。但如何处置米蒂利尼，却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修昔底德没有记载此次会议的细节，也没有记录会上的演讲，但告诉了我们足够多的信息，所以我们可以还原当时的会议进程。米蒂利尼的使者，既有寡头派也有民主派，可能先发了言。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两派就谁应当为叛乱负责的问题争执不下。寡头派相信雅典人不会消灭全体米蒂利尼人，于是坚持说所有米蒂利尼人都应对叛乱负责；民主派则说责任完全在寡头派身上，是他们强迫普通民众参加叛乱。

克里昂提议处死米蒂利尼所有的成年男子，并将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这成了辩论的焦点。他的主要反对者是攸克拉底斯之子狄奥多图斯，如果不是因为此事，我们对这个人简直一无所知。公民大会在这个问题上分裂成了不同派系。以狄奥多图斯为代表的温和派奉行伯里克利

的审慎政策，而以克里昂为领导人的派系则更激进。但是，所有雅典人都很愤怒，因为米蒂利尼人享有特权地位，却忘恩负义地犯上作乱；他们的叛乱持续很久，且早有预谋；最重要的是，这次叛乱将一支伯罗奔尼撒舰队带到了伊奥尼亚海岸。在这种气氛下，克里昂的提议得以通过，成为法律。于是，一艘三列桨座战船被派去命令帕基斯立即执行公民大会的决定。

关于米蒂利尼的辩论：克里昂与狄奥多图斯的对抗

但是，雅典人很快就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一些雅典人在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后，意识到自己的决定是多么可怕。米蒂利尼使者及其在雅典的朋友——无疑包括狄奥多图斯和其他温和派——利用这种情绪转变，说服了将军们（我们知道，所有将军都是温和派），并要求在次日召开特别会议，重新商讨如何处置米蒂利尼的问题。

在修昔底德对此次会议的记载中，克里昂首次在修昔底德的史书中登场，被描述为“公民当中最凶暴好斗的人，在那时也是对群众影响最大的人”（3.36.6）。克里昂指出，米蒂利尼人的叛乱是不值得辩护的，无法预见的好运气（像惯常那样）变成了恣意妄为的暴力活动；公正的裁决就是迅速而严酷的惩罚。他坚持认为，不应当将普通民众和寡头统治者区分开，因为他们全都参加了叛乱。此外，克里昂还相信，若对米蒂利尼心慈手软，只会鼓励更多叛乱，而不加区分的严刑峻法则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我们原本就不应当给予米蒂利尼人和其他人不同的待遇，否则他们就不会膨胀到今天这种傲慢的程度。一般来讲，人的天性就是鄙视奉承却仰慕坚定的手腕。”（3.39.5）他的意思是，雅典人早就应当剥夺米蒂利尼的自治权，而没有这么做只是雅典人过去的许多错误之一。“考虑一下你们的盟邦吧。如果对那些被敌人强迫而反叛的盟邦，和那些主动造反的盟邦，施加同样的惩罚，那么谁都会抓住一点小事就开始兴风作浪。毕竟一旦成功就能获得自由，就算失败了，后果也不是不能挽回的。”（3.39.7）

如果雅典人继续奉行软弱、错误的宽大怜悯政策，“各邦会前赴后继地起来造反，我们的生命和财产都将受到威胁。就算我们成功地将叛军镇压下去、收复城邦，它也已经被摧毁了，我们丧失了它未来的赋税，毕竟那才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如果我们无法镇压叛乱者，那么除了我们现在的敌人之外，还会增添新的敌人，我们用来与现在的敌人作战的时间将不得不被用于镇压我们曾经的盟友”（3.39.8）。克里昂的演讲相当于对伯里克利及温和派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全面攻击。他的建议是以精心策划的恐怖政策来震慑叛乱者，至少在战时要杀一儆百。

克里昂和狄奥多图斯分别代表着两个极端，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许多人发言。其他“表达了各自意见”（3.36.6）的人一定谈到了正义和仁慈，因为克里昂的演讲就是为了反驳这些观点，而且召开第二次会议就是为了审视一些雅典人的态度，即对米蒂利尼的惩罚“太残忍、太过分”（3.36.4）。

克里昂的态度是假如大家否决了他建议的严酷惩罚，而改为接受温和的惩罚，就至少表现出了他们自己的软弱，或是腐败，甚至是叛国。于是，狄奥多图斯精明地敦促雅典人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去支持他的提议，而不是为了宽大仁慈。狄奥多图斯真诚地希望对米蒂利尼网开一面，但他更深层次的目的是捍卫温和的帝国主义政策，将其继续执行下去。他提出，因为叛乱者总是期望成功，所以任何惩罚的威胁都无法阻止叛乱。而当前较为温和的政策能鼓励叛乱者“与雅典达成协议，将来向雅典缴纳罚金和贡金”（3.46.2）。若采纳克里昂的严刑峻法路线，只会让叛乱者“在遭到围攻时死战到底”，使雅典“花费大量金钱去攻打不肯投降的顽敌，并丧失未来的赋税……即我们对抗敌人的力量源泉”（3.46.2-3）。

狄奥多图斯还指出，“如今所有城邦的人民对雅典都很友好，不会跟随寡头统治者一起反叛雅典；若是被强迫造反，也会对叛乱者抱有敌

意。因此雅典人打仗的时候，敌邦的大多数民众其实是雅典的盟友”（3.47.2）。有证据表明，他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即便是下层阶级的民众对雅典也并不友好；但他感兴趣的不是确定真相，而是明确自己的政策。他继续指出，在叛乱者中，雅典人应当责怪尽可能少的人，因为若是将普通百姓与煽动叛乱的贵族一并处死，只会鼓励民众在将来的叛乱中反对雅典。“即便民众是有罪的，你们也应当假装事实并非如此，免得唯一仍然对你们友好的群体也转而敌视你们。”（3.47.4）

在狄奥多图斯看来，米蒂利尼是个孤例，所以克里昂提议的精心策划的恐怖政策不仅令人反感，而且最终效果也会适得其反。狄奥多图斯的建议是，仅仅将帕基斯送到雅典的那些人定罪。然而这个建议并不像它表面上看起来那样人道，因为帕基斯逮捕的“罪责最深者”有一千多人，差不多相当于莱斯博斯岛上各叛乱城镇全体男性公民的十分之一。

最后，公民大会举手表决的时候，两种建议的支持者数量几乎持平，但狄奥多图斯的建议最后通过了。克里昂立刻提议将“有罪”的一千多人处死，也通过了。这些莱斯博斯人没有得到正常审判的机会，没有作为一个集体受审，也没有单个受审。公民大会仅仅根据帕基斯的意见就推断他们有罪。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在决定是否对犯人处以死刑时，雅典人持正反两方面意见的人数是接近的。这是雅典人对叛乱臣属的最严厉惩罚，但不管恐惧、挫败和苦难让他们多么愤怒和冷酷，他们仍然不肯接受克里昂提出的更残暴的计划。

在第一次会议后被派往莱斯博斯岛去传达处死米蒂利尼全体男子命令的那艘船已经航行了整整一天，第二艘船立刻被派去撤销前一道命令。在雅典的米蒂利尼使者为第二艘船的桨手们提供饮食，并承诺他们若是抢先抵达莱斯博斯岛，必有重赏。在救人善举和得到赏赐的催动下，水手们迅速起航，甚至拒绝按照常规停船吃饭和休息。第一艘船上的人并不着急去完成可怕的任务，但他们还是先抵达了米蒂利尼。修昔

底德以非常戏剧性的口吻讲述了故事的剩余部分：“帕基斯刚刚读完命令，正要实施，第二艘船就赶到了，阻止了大屠杀。米蒂利尼就这样虎口逃生。”（3.49.4）

---

[1] 在今天土耳其西南部地区，是雅典同盟的成员国。

[2] 伊奥尼亚指的是今天土耳其安纳托利亚西南海岸的一个地区，此外还包括希俄斯岛和萨摩斯岛等近海岛屿。得名自聚居于此的伊奥尼亚部族（希腊人四大部族之一，雅典人也属于伊奥尼亚部族）。

第十章 恐怖和冒险（前427年）

雅典人对米蒂利尼叛乱的反应表现出了一种新的更为积极主动的精神，它开始挑战伯里克利留下的旧温和策略。在前427年的选举中，两位新将军欧律墨冬和德摩斯梯尼[1]上台了。他们很快就开始实施更大胆的政策。即便是温和派也觉得需要采取攻势，哪怕是非常谨慎的攻势。前427年夏季，尼基阿斯占领了墨伽拉外海的小岛米诺亚，在那里建造防御工事，以便加强对墨伽拉的封锁。

普拉蒂亚的命运

但大约在雅典人进攻米诺亚岛的同一时间，普拉蒂亚守军投降了。只有为数不多且饥肠辘辘的一些人在守城，所以斯巴达人完全可以强攻得手，但他们禁止任何人强行攻城。他们的想法是“假如将来与雅典缔结了和约，并且双方都同意将在战争中征服的地盘物归原主，那么斯巴达仍然可以保留普拉蒂亚，因为普拉蒂亚是自己投降的”（3.52.2）。

斯巴达人的这种诡辩式的刻板想法表明，他们在前427年已经认为与雅典和谈不是不可能的了。雅典人虽然受到瘟疫打击但仍然非常顽强，而且轻松镇压了帝国内部的叛乱，再加上斯巴达在海上的无能，这些都让斯巴达人深思。不过，他们仍在苛求全面胜利，还没有和谈的打算。

为了劝说普拉蒂亚人投降，斯巴达人许诺，将委派五名来自斯巴达的法官对守军进行公正的审判，但守军受到的这种待遇是对司法正义的歪曲。普拉蒂亚人没有受到任何指控；法官只是问他们每个人，在战争期间有无尽心为斯巴达人或其盟友效力。普拉蒂亚人的自我辩护非常有力且令人信服，让审讯者十分窘迫，以至于底比斯人担心斯巴达人会被

说动，于是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演讲。然后，斯巴达法官向普拉蒂亚人重复了原先的问题，普拉蒂亚人当然只能回答没有。于是，至少200名普拉蒂亚人和25名雅典人被处死，留在城内的妇女被卖为奴隶。斯巴达人的动机完全是政治上的自私自利："斯巴达人对底比斯人的态度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对底比斯人的考虑，因为斯巴达人觉得，在刚刚开始的战争中，底比斯将会是对斯巴达有价值的盟友。"（3.68.4）所以，斯巴达人实际上是在为一场漫长的战争做准备，在这样的战争中，玻俄提亚势力会成为关键因素，而公平正直的名誉没什么用。

最终，斯巴达人将普拉蒂亚交给了底比斯人，而底比斯人将这座城镇夷为平地。他们将这些土地租给了有功的底比斯人，租期十年。到前421年时，底比斯人已经将普拉蒂亚视为自己的领土。普拉蒂亚消失了，而雅典人没有努力施加干预。这两方面其实都是不可避免的。普拉蒂亚在战略上是守不住的，但它遭受了这样的命运，雅典人有理由感到尴尬，甚至羞耻。普拉蒂亚是雅典的忠实盟友，在遭到斯巴达进攻时，原本能够以合理的条件投降，雅典却要求普拉蒂亚坚持作战，并许诺提供援助。雅典人向幸存的普拉蒂亚人授予了雅典公民权，这是极少给予外邦人的特权，但这也不足以弥补他们丧失家园的痛楚。

克基拉的内战

不久之后，雅典在西方的盟友克基拉遭遇了新的威胁。那里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雅典的敌人即将掌权，使雅典丧失了克基拉强大海军的支持。在前433年西波塔战役中被科林斯人俘虏的约250名克基拉人得以回国，麻烦就从这里开始。科林斯人给俘虏的待遇很好，赢得了这些人的忠诚。前427年初，科林斯人释放俘虏回国，让他们颠覆本国的政策和政府，而在那个时候，伯罗奔尼撒人正满怀希望，觉得雅典的各盟邦很快就会普遍倒戈。

克基拉人没想到这些归国的同胞竟然已经变成了外国势力的代理

人，回来反对自己的政府。这些人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安全回国，是因为被800塔兰同巨款赎回了。回国之后，他们就开始敦促同胞结束与雅典的联盟，恢复传统的中立地位，而隐瞒了自己的真实目的，也就是将克基拉带入斯巴达联盟。尽管这些人上蹿下跳，民主制的克基拉公民大会还是选择了中间道路，再次确认与雅典的防御性同盟，但也投票决定“像过去一样，与伯罗奔尼撒人保持友好关系”（3.70.2）。

这次投票对寡头派密谋者来说仍然是一次胜利，是他们切断克基拉与雅典关系的第一步。之后，他们指控亲雅典的民主派领导人培西亚斯企图让克基拉人变成雅典人的奴隶。但克基拉的普通民众并不认为与雅典结盟就是叛国，于是将培西亚斯无罪释放。培西亚斯随后成功起诉了指控他的人当中最富裕的五个人，控诉他们犯下了所谓的宗教亵渎罪行。被告没办法付出巨额罚金，于是躲在神庙内。

寡头派害怕胜利的培西亚斯会乘胜追击，促使克基拉与雅典缔结完整的攻守同盟，于是准备用暗杀和恐怖手段阻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他们拿着匕首冲进议事会的一次会议，杀死了培西亚斯和其他六十人。培西亚斯的一些民主派同僚逃到了停泊在港内的一艘雅典三列桨座战船上。这艘船立刻起航前往雅典，那些难民向雅典人讲述了这些故事，敦促他们进行报复。

在这种恐怖气氛下，刺杀培西亚斯的寡头派召集了公民大会，但克基拉人民仍然拒绝改弦易辙。密谋者转而提议仅仅保持中立，但即便是这样的措施，也只有在强迫之下才得以通过。寡头派害怕雅典的进攻，于是派遣使者到雅典，解释说克基拉不是要反对雅典的利益。雅典人没有听信，将这些使者当作“革命党”逮捕了。其实，寡头派向雅典派遣使者也仅仅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与斯巴达谈判。在有希望得到斯巴达支持的鼓舞下，寡头派向平民百姓开战，在正面交锋中将其打败，不过未能消灭所有的民主派人士。民主派占领了卫城和城内其他地势较高的区

域，以及朝向外海的港口，而寡头派控制着市场周围区域和朝向大陆的港口。次日，两派都给予奴隶自由，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大多数奴隶都加入了民主派，但寡头派从大陆征募了800名雇佣兵，于是克基拉爆发了内战。

两天后，民主派在第二次战役中取胜，寡头派抱头鼠窜才保住了性命。次日，驻纳夫帕克托斯的雅典军队指挥官尼科斯特拉图斯率领20艘战船和500名美塞尼亚重步兵赶到了。他的行为非常克制，没有向失败的寡头派报复，而仅仅要求克基拉人与雅典缔结完整的攻守同盟，以便让雅典安全地保住这个岛屿。寡头派当中只有10名被认为对煽动革命责任最大的人受到审判，其他克基拉人则被敦促达成和解。

但克基拉人的情绪已经非常激昂，如此温和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实施的。即将受审的10人逃跑了。民主派领导人劝说尼科斯特拉图斯留下5艘雅典战船，以5艘克基拉战船作为交换，船员将是由民主派挑选的寡头派人士，也就是他们的敌人。被选中的寡头派人士害怕自己被送到雅典后会遭遇不测，也逃到神庙里避难。尽管尼科斯特拉图斯努力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仍然躲在那里不肯出来。民主派则开始准备将寡头派杀掉，但尼科斯特拉图斯阻止了这种鲁莽的举动。

就在这时，伯罗奔尼撒人施加了干预。在阿尔基达斯的指挥下，从爱琴海匆匆返航的40艘战舰在基伦尼与13艘战船会合，然后带上作为顾问的伯拉西达，抢在雅典大舰队抵达之前，来到了克基拉。克基拉民主派不顾雅典人的意见，出动了60艘战船迎战敌人，但秩序混乱、纪律性差。伯罗奔尼撒舰队轻松得胜，由于在克基拉的12艘雅典战船阻止他们扩大战果，于是伯罗奔尼撒舰队带着俘获的克基拉船只，返回了大陆。次日，伯拉西达敦促阿尔基达斯趁着克基拉人手足无措、心惊胆战的时候攻打克基拉，但怯懦的海军司令拒绝了，而这一番耽搁是致命的。消息传来，一支60艘战船的雅典舰队在苏克利斯之子欧律墨冬的指挥下，

正从琉卡斯岛赶来。伯罗奔尼撒人闻风而逃。

克基拉安全了，于是民主派开始疯狂地报复政敌。在内战中，这种愤怒和仇恨是非常强有力的动机。对政敌的处决很快演变成不分青红皂白的谋杀；为了报私仇和获得金钱，人们互相杀戮；不虔诚和渎神行为已经司空见惯。“儿子死在父亲手里，人们被从神庙里拖出，然后杀死在神庙附近，有些人被关在狄俄倪索斯神庙里死去。”（3.81.5）这些恐怖行为给了修昔底德一个机会去描绘战时内乱所引发的恶果，这是他的雄壮史书中最富含忧郁和预言性智慧的章节。

他告诉我们，这些暴行只是个开端，伯罗奔尼撒战争还将引发一系列内战，造成更多的残忍暴行。在某些国家，民主派可以寻求雅典人的帮助来对付他们的敌人，而寡头派则会请求斯巴达人的援助。“在和平时期，他们没有借口，也没有意愿去寻求雅典或斯巴达的帮助；但既然两个大国在交战，不同城邦内的政治派系如果想要推翻现政权，就可以轻松地寻求两个大国之一的支持。”（3.82.2）“由于派系斗争，各城邦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修昔底德写道，“只要人性不变，这样丑恶的事情就一直会发生，永远会发生。”（3.82.2）在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行为都很理智，因为物质财富与安全的纽带（它们将文明与残暴野蛮分隔开）还没有被撕裂，人民还没有受困于残酷的自然法则。“但战争使人们无法轻松地满足日常需求，所以战争是一个凶残的教师，它让人们的秉性根据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3.82.2）

对党派忠诚被认为是最高尚的道德，压倒了其他所有伦理，使放弃传统道德观的一切约束变得合理化。狂热的过激行为和背后捅人一刀的想法都同样被认为是值得仰慕的；若是不敢做出这样的恶行，反而会被认作畏敌怯战、破坏自己派系的团结。誓言丧失了含义，变成了奸诈骗人的工具。

派系斗争爆发之后，往往会出现贪婪、野心和争权夺利的恶欲，正

是这些东西营造出了恐怖的气氛。尽管每个派系的领导人都动用冠冕堂皇的口号——一派鼓吹“人民享有政治平等”，另一派吹嘘“精英人士的温和统治”——但各派都是阴谋诡计频出，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谋杀那些不属于任何派系的人。“要么是因为中立派不肯加入斗争，要么是他们嫉妒中立派会最终生存下去。”（3.82.8）随着革命风潮的到来，这种新型邪恶在希腊各国蔓延开来。“一般来讲，智力较低的人会得胜。他们害怕自己的短处以及对手的聪明才智，为了不在理智的辩论中失败或被机智的对手奇袭，他们大胆地采取行动。而他们的敌人蔑视智力较低的对手，自信能够预料到对方的行动，认为自己只需要动动脑子就能战胜对方，而无须采取行动。”（3.83.3-4）

尼科斯特拉图斯在克基拉的指挥权后来被移交给雅典将军欧律墨冬。与他的前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律墨冬一连七天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坐视屠杀发生。他显然与克里昂的意见相同，反对温和派路线，因为这种路线似乎既无效力，又鼓励叛乱。欧律墨冬作为指挥官来到克基拉，说明新当选的将军们已经就职，而他在那里的行为说明一种新的精神正在雅典取得进展。

雅典第一次远征西西里岛

这种精神使雅典人在9月派遣了一支20艘战船的远征军，在拉齐斯和卡罗阿德斯的指挥下，前往未被战火触及的西西里岛。西西里岛东部城市伦蒂尼与雅典有着传统同盟关系，当地人抱怨称，岛上的主要城市叙拉古在攻击他们，企图吞并整个西西里岛。战争很快从西西里岛蔓延出去，跨越狭窄的海峡，到了意大利。敌我分野在于部族差异，多利亚人和伯罗奔尼撒人支持叙拉古人，而伊奥尼亚人和雅典人反对叙拉古人。伦蒂尼人眼看就要失败，于是向盟友雅典求援。

雅典人原本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为什么还要远征一个遥远且显然与战争的主要战略无关的地方？修昔底德解释称，雅典人的真实

目的是“阻止伯罗奔尼撒半岛从西西里岛进口粮食，也是因为雅典人想初步尝试一下，看能否控制西西里岛事务”（3.86.4）。

一般认为，煽动此次远征的完全是克里昂及其党羽，即“激进派”“民主派”或主战派，但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没有证据表明此次远征在雅典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就像前427年年初为了决定米蒂利尼的命运而发生的分歧，或者像前433年决定是否与克基拉结盟而形成的争议那样。远征的指挥官不是欧律墨冬或德摩斯梯尼那样的“鹰派”，而是拉齐斯（尼基阿斯的朋友）那样的人。一定很少有人反对发动此次远征。

还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不能忽视的：雅典人在前427年远征西西里岛，因为他们收到了请求，并且得知那里存在的潜在危险可能变得严重。战争开始时，伯罗奔尼撒人曾打算从西西里岛获取一支庞大舰队，如果这个计划得以落实，那将对雅典构成极大威胁。同样，如果让叙拉古（科林斯的殖民地）征服了西西里岛上的其他希腊城邦，它们就可能向其母邦和伯罗奔尼撒联盟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援。每一个雅典人都能认识到此种威胁。阻止西西里岛粮食抵达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意愿是一个新的情况，反映了局势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斯巴达对阿提卡破坏的时长和严重程度取决于斯巴达入侵者的粮食供应情况。若斯巴达失去了西西里岛的粮食，在将来也许就无法那么猖狂地入侵阿提卡。从这个角度看，向雅典在西方的盟友送去有限的军事援助，以切断敌人的粮食供应，是很有道理的。

但任何征服西西里岛的企图都显然违背了伯里克利的建议，即在战时不要寻求扩张。雅典人当中肯定有鲁莽的扩张主义分子，其中有些人认为西方是不错的征服对象。但没有证据表明，克里昂是这些扩张主义分子中的一员，他也从来不曾主张仅仅为了扩张而扩张。他和德摩斯梯尼与欧律墨冬那样的人一样希望控制西西里岛，以阻止粮食被送往伯罗

奔尼撒半岛，并阻止被叙拉古主宰的西西里岛向敌人提供援助，但他们的目标或许不仅仅是恢复之前的格局。雅典若是施加了干预又撤走，叙拉古就会再次尝试主宰全岛，到那时雅典或许就没有能力阻止它了。寻求“控制西西里岛事务”的意思只能是雅典人希望主宰西西里岛，或许在西西里岛驻军和建立海军基地，以阻止此地在未来出现麻烦。

20艘战船的远征军出航后，雅典就暴发了第二次瘟疫。远征军的任务使雅典出现了新的政治现实。由于局势的新变化，激进派得以影响甚至塑造政策，而温和派也不能完全挫败对手的政治企图。

在西西里岛，雅典远征军虽然规模不大，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伦蒂尼是一座岛屿城镇，不能作为海军基地，于是拉齐斯和卡罗阿德斯在亲雅典的意大利城市瑞吉昂[2]（与墨西拿隔海相望，见地图13）建立了一个基地。雅典人打算完全控制墨西拿海峡，以阻止粮食按照正常路线从西西里岛抵达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计划占领墨西拿城，作为西西里岛的希腊人，尤其是伊奥尼亚人，以及敌对叙拉古的土著西库尔人[3]的集结地。雅典人或许还能在土著军队的帮助下打败叙拉古人，并获得当地人的更多支持。这样一场胜利至少能阻止叙拉古人主宰西西里岛。

13. 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



最初的努力没有取得多少成果。雅典人抵达瑞吉昂不久之后便兵分两路，探索西西里岛沿海，并摸清当地人的态度。拉齐斯沿着卡马里纳南海岸航行，而卡罗阿德斯奔赴东海岸，即叙拉古海域，在那里遭遇了一支叙拉古舰队，不幸阵亡。雅典计划的基础是制海权，尤其是控制墨西拿海峡附近海域，于是拉齐斯攻击了利帕拉群岛（在海峡西部入口处）上的叙拉古盟邦，但利帕拉人不肯屈服。

虽然经历了这些挫折，但拉齐斯还是攻占了墨西拿，于是雅典人控制了海峡，鼓励叙拉古人倒戈，并威胁了叙拉古在西西里岛的地位。许多之前被叙拉古人统治的土著西库尔人投奔到雅典这边。在他们的帮助下，拉齐斯维持攻势，击败了洛克里斯人，攻击了希麦拉，不过未能将其占领。

拉齐斯的成就是很重要的。他阻止了叙拉古人征服伦蒂尼，占领了

墨西拿和海峡，将叙拉古的许多臣属城邦争取到自己这边，并开始威胁叙拉古本土的周边地区。雅典人在海上的地位难以撼动，雅典舰队规模虽小，叙拉古人却不敢与之交战。他们完全理解自己面临的危险，看到“墨西拿控制着通往西西里岛的通道，担心雅典人将来会将它作为基地，以更大规模的舰队发动进攻”（4.1.2）。于是他们开始扩建自己的舰队，准备迎战雅典人。

作为对策，雅典将军们请求增援。公民大会派出了40艘战船，供3名指挥官调度，“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在西西里岛可以更早地打赢战争，部分原因是想让舰队练练手”（3.115.4）。皮索多鲁斯立即带领几艘战船前往西西里岛，从拉齐斯那里接过指挥权，而索福克勒斯[4]和欧律墨冬将率领主力舰队随后跟进。增援舰队带着满心的期望，扬帆起航了。

---

[1] 注意，不要与那个最有名的德摩斯梯尼（前384～前322年，雅典演说家和政治家，曾痛斥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扩张野心）混淆。

[2] 今天的雷焦卡拉布里亚。

[3] 在前11世纪前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对西西里岛殖民之前，西西里岛上有三个土著部族：伊利米人（Elymi）、西坎尼人（Sicani）和西库尔人（Sicels）。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这三个土著部族已经处于弱势，很快将被希腊人同化。

[4] 注意不是著名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

第三部 新的战略

十年战争的第一阶段是由伯里克利的目标和战略所决定的，即便在他去世之后，他也仍然左右着雅典的政策。不管伯里克利的战略有什么优点，事实依然证明在应对新的局势变化上，它是远远不够的。庞大的开支令国库空虚，帝国境内爆发了叛乱，斯巴达人没有议和的意向。伯里克利若是还活着，或许能够根据新形势调整战略，修改战争计划。但到前427年的时候，雅典出现了新的将军和领导人，其中有些人的理念与已经去世的伯里克利截然不同。在随后几年内，雅典人努力寻找办法生存下去并打赢战争。于是，他们大大背离了原先的战略。

第十一章 德摩斯梯尼和新战略（前**426**年）

斯巴达人在希腊中部

前426年，阿希达穆斯二世驾崩，他的儿子——年轻的阿基斯二世——登基。普雷斯托阿纳克斯结束了流亡，于是斯巴达再一次拥有了两位国王。阿基斯二世最早的正式行动之一就是率军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出发，入侵阿提卡，但他们走到科林斯地峡的时候发生了地震，于是不得不返回。像斯巴达人这样虔诚的民族或许会将地震理解为神谕，是神在警告他们坚持打下去是个错误。但就像人在受挫时常做的那样，他们反而下定了决心，要借助新的手段执行原先的计划。但有些斯巴达人，就像有些雅典人一样，认识到原先的战略已经失败，若想胜利，需要制定新的战略。

于是，前426年夏季，斯巴达开始在希腊中部开辟一个新战场。那里的特拉启斯人和邻近的多利斯城（根据传说，它是斯巴达和其他多利亚人的母邦）请求斯巴达的援助，共同抵抗与其交战的奥塔人（见地图14）。于是斯巴达人建立了他们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殖民地之一，地点在特拉启斯附近的赫拉克利亚。“在他们看来，这个城市对于反抗雅典的战争特别有利。因为可以在那里装备一支舰队去攻打优卑亚岛，航程很短，而且那个地方也适合用作基地，发动对色雷斯海岸的远征行动。简而言之，他们很热切地想在那里建立殖民地。”（3.92.4）



14. 希腊中部

伯拉西达很可能是斯巴达这个决定的煽动者，因为这与他的秉性和想象力很吻合，他在几年后将会利用这个新殖民地。考虑到斯巴达舰队前不久刚被雅典舰队打得落花流水，从海路向优卑亚岛发动全面进攻是个非常大胆的计划，绝大多数斯巴达人都不愿意冒这么大风险。但新的殖民地可以作为基地，以海盗式袭击破坏雅典的航运，并向优卑亚岛发动小规模的特种作战。入侵雅典帝国北部的计划甚至更有希望实施。要赢得战争，斯巴达人需要向雅典帝国发动一次全面进攻，但斯巴达海军的规模和质量都不如雅典，因此斯巴达只能攻击可以从陆路抵达的地区：爱琴海北岸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如果斯巴达军队能抵达那里，就能煽动雅典的附庸国倒戈，减少雅典的收入，并煽动其他地方的人反叛雅典。另外，斯巴达还能以色雷斯为基地，占领赫勒斯滂海峡沿岸被雅典人占据的各个城市。

袭击雅典的侧翼不是一项轻松的冒险行动，也不完全安全。要达成

此目标，斯巴达人必须首先将军队从希腊南部调到敌视斯巴达的色萨利。到达那里之后，他们必须建立后勤体系，并努力劝说当地的雅典盟邦倒戈。在作战的每个阶段，都可能损失之前拉拢过来的人马。斯巴达人不愿意在前426年冒这样的风险，但对于未来的任何工作，在赫拉克利亚建立殖民地都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除了作为北上的基地之外，赫拉克利亚令人非常失望。斯巴达人在离温泉关约5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座有围墙的城镇，建造了通往海边的壁垒（穿过一个隘口，而这个隘口控制着从希腊中部去往色萨利的道路），并开始建造一座船坞，作为进攻优卑亚岛的海军基地。但色萨利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边境上出现一个斯巴达殖民地，于是不断攻击它。该地区的斯巴达行政长官将斯巴达人与其他希腊人打交道时的弱点暴露无遗："他们自己毁了此次行动，使城镇沦落到空城的境地。他们严酷而有时很不明智的命令把大多数人都吓走了，所以他们的邻居能够更轻松地打败他们。"（3.93.3）

雅典的计划

与此同时，雅典人继续执行他们的有限攻势，派遣尼基阿斯率领60艘战船和2000名重步兵去攻打米洛斯岛。他未能占领该岛，后来在玻俄提亚登陆，在塔那格拉与另一支雅典军队（在希波尼库斯与欧律墨冬的指挥下，从雅典城出发）会合。希波尼库斯与欧律墨冬蹂躏了此地的乡村，在正面交锋中打败了塔那格拉人和一些底比斯人，最后返回雅典。尼基阿斯的部下回到船上，蹂躏了一些洛克里斯人的土地，然后也回家了。

这些行动有何意义？米洛斯岛是爱琴海上唯一一个不属于雅典同盟的岛屿，尽管它在前426年名义上是中立国，但它是斯巴达的殖民地。据修昔底德说，雅典人之所以进攻米洛斯岛，是因为"米洛斯人尽管是岛民，却不愿意臣服于雅典，甚至不愿意加入同盟，而雅典人希望将他

们拉到自己这边”（3.91.2）。我们不知道，雅典人在之前的五十多年中一直没有注意到米洛斯岛的存在，如今为什么突然行动起来。部分原因可能是雅典人持续的财政压力，而一份时间不详的铭文也证明，米洛斯人在前427年向斯巴达舰队提供了资金支持。如果的确如此，雅典的进攻或许是对资敌的多利亚人“中立国”的惩罚。

如果能够以轻微代价拿下米洛斯岛，雅典人会很高兴，他们不能打一场耗资巨大的围城战。他们可不想与底比斯的重步兵军队发生陆战，因为那样的话可能遭到伯罗奔尼撒军队的背后袭击。雅典人的整个行动，包括对洛克里斯的袭掠，都没有很大风险，开支也不多。这是转向更积极战略过程中的一个谨慎且具尝试性的步骤。

雅典人还派了30艘战船，在德摩斯梯尼和普罗克利斯的指挥下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每艘雅典战船仅运载了惯常的10名海军步兵，没有额外的重步兵。尽管他们得到了一些西方盟邦的支持，但他们并不期望取得任何决定性的成果。虽然雅典表现出了新的积极精神，但人员不足和资金短缺决定了他们军事行动的规模仍然是有限的。

这支部队蹂躏了琉卡斯岛，它是通往克基拉岛、意大利和西西里岛道路上的一个关键停留地，并且是科林斯的忠实殖民地，为伯罗奔尼撒舰队提供了船只。若占领琉卡斯岛，雅典就能独占伊奥尼亚海。阿卡纳尼亚盟友敦促雅典人攻打并占领琉卡斯岛，但来自纳夫帕克托斯的美塞尼亚盟友希望德摩斯梯尼去攻击埃托利亚人，因为后者正在威胁美塞尼亚人的城市。美塞尼亚人向德摩斯梯尼保证，打败那些凶悍又原始的埃托利亚部落民众（他们居住在分散而不设防的村庄内）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埃托利亚人的作战方式与重步兵不同，只有轻型护甲，其中有些人非常野蛮，以至于吃生肉。对付这些野蛮人，可以在他们联合起来之前轻松地各个击破。

德摩斯梯尼的埃托利亚战役

此时德摩斯梯尼在其第一届将军任期内，他得到的命令可能非常含糊，大致是“援助雅典在西方的盟邦，并尽可能打击敌人”。安全的行动方案当然是攻打琉卡斯岛，避免激怒阿卡纳尼亚人；他得到的命令肯定没有提及去讨伐居住在内陆且在盟邦领土以东很远处的蛮族。如果这位新指挥官答应纳夫帕克托斯人的请求，那么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很危险的，但他终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德摩斯梯尼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他希望取悦美塞尼亚人，毕竟他们对雅典来说是更重要的盟友，因为他们占据着科林斯湾的关键位置；若失去了那个位置，对雅典而言将是一场灾难。但他是个勇往直前且想象力丰富的人，在他看来，此次行动不仅仅是简单地防卫纳夫帕克托斯。他以一往无前的大胆风格制订了宏伟的计划。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这种勇敢始终是他标志性的作风。他打算在来自阿卡纳尼亚和纳夫帕克托斯的部队的协助下，快速征服埃托利亚，并将落败的埃托利亚人吸纳进自己的军队。然后，他将经过洛克里斯西部，前往位于多利斯地区的基提尼昂；他会从那里进入福基斯。福基斯人是雅典的传统盟友，一定会加入他的阵营。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之后，他将从背后袭击玻俄提亚。

尼基阿斯、希波尼库斯和欧律墨冬的联军从东面进军，如果德摩斯梯尼能与他们同时抵达玻俄提亚的西部边境，那么几支部队联合起来，或许能为雅典赢得一场大胜，迫使玻俄提亚（斯巴达的最强大盟友）退出战争。玻俄提亚的民主派在过去曾与雅典合作过，如今也能帮得上忙。德摩斯梯尼希望自己不需要雅典陆军的支持就能完成这一切。他的想法是成就尽可能大的业绩，而给雅典带来尽可能小的风险。他这么做是自作主张，没有得到雅典公民大会的批准，也没有与其他人商议。

德摩斯梯尼差不多刚刚动手就遇到了麻烦。阿卡纳尼亚人不肯与他一起前往埃托利亚，而15艘克基拉战船也返航了，因为他们不愿意在本土海域之外作战，何况还是打一场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战役。可能在次年，赫尔米普斯的一部喜剧中有个人物说：“愿波塞冬消灭那些乘着空

荡荡船只的克基拉人，因为他们如此奸诈。”[1] 但事实上，德摩斯梯尼放弃琉卡斯岛而选择讨伐埃托利亚人的决策一定令所有盟友产生了怀疑。

失去了陆军的一大部分和海军的三分之一，或许会让一名不太自信的将军畏缩不前，但德摩斯梯尼固执己见，继续前进。雅典的洛克里斯盟友与埃托利亚人是邻居，使用相同的甲胄和武器，也熟悉敌人及其乡村。德摩斯梯尼的计划是，洛克里斯全军将进逼内陆，与他的横穿埃托利亚人领土、攻城拔寨的军队会师。但是，他的计划开始瓦解了。按照计划，洛克里斯人应当带着援军赶来，然而他们根本没有出现。阿卡纳尼亚人和克基拉人的拒绝合作没有让德摩斯梯尼担忧，但洛克里斯人的临阵脱逃却让他紧张起来：在埃托利亚的崎岖山地，他此次战役的成功和部队的安全都需要投掷标枪、轻装行进的洛克里斯人。但美塞尼亚人向他保证，只要他能抢在分散的埃托利亚人集结之前快速行动，获取胜利仍然是很轻松的。

在这个时代，军事情报主要依赖信使口头传达的报告，德摩斯梯尼计划的风险其实比看上去还要大。美塞尼亚人的建议已经过时了，因为埃托利亚人已经听到了风声，正在准备抵抗。德摩斯梯尼还不知道，埃托利亚全境的部落族民正在赶来抵抗他。缺少了洛克里斯人的增援部队，德摩斯梯尼理应暂缓前进，但他不是个优柔寡断或谨小慎微的人，于是他决定立刻前进，攻击埃托利亚人。

他轻松占领了埃吉提昂城，但它的迅速投降其实是个陷阱：雅典人及其盟军进城后，埃吉提昂居民和增援部队埋伏在城镇周边山地，从四面八方发动伏击。这些伏击者是轻装士兵，擅长投掷标枪，能够对雅典人造成严重伤害，并在雅典人的重步兵方阵赶来之前迅速撤退。雅典人现在意识到，他们是多么需要洛克里斯盟友许诺的标枪手。雅典弓箭手或许可以抵挡敌人，但当弓箭队长阵亡后，弓箭手们四散逃跑，把重步

兵丢在那里孤立无援，被更为迅捷的埃托利亚轻装士兵的持续攻击拖垮了。雅典重步兵转身逃跑时发生了最后一件不幸的事情，使这次溃败变成了一场大屠杀。原本有可能带领他们撤到安全地带的美塞尼亚向导克洛蒙阵亡了，于是雅典人及其盟军被困在崎岖不平、林木繁茂而完全陌生的地方。很多人在森林里迷了路，于是埃托利亚人放火烧了森林。雅典盟军损失惨重，雅典人的300名海军步兵损失了120人，普罗克利斯将军也战死了。吃了败仗的雅典人与埃托利亚人休战，收回了死者的遗体，撤到纳夫帕克托斯，然后乘船返回了雅典。

由于德摩斯梯尼“害怕雅典人因为这次惨败而责罚他”（3.98.5），于是他留在了纳夫帕克托斯。他的害怕是很有道理的。他放弃了一次大有希望成功的行动，却开展了一场没有得到上级批准的战役。他的计划或许很有前瞻性和创造性，却是仓促之中设计出来的，执行也非常糟糕。计划若要成功，兵贵神速；但如果动作太快，就无法进行仔细的准备和协调，而如此复杂的行动必然需要精心安排。另外，德摩斯梯尼并不熟悉作战地形与轻步兵战术。面对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他却刚愎自用地推动作战，而当局势明显不利的时候仍然不知悔改，或许他应当承担责任。但是，害怕冒险的谨慎将军不可能建立奇功，若没有勇敢大胆的领导人，大规模战争也很少能够打赢。最后，我们不应当忘记，德摩斯梯尼冒的风险其实相对来讲是很小的，因为雅典只损失了120名海军步兵。这样的代价虽然令人遗憾，但考虑到行动可能带来的巨大收益，也不算过分。德摩斯梯尼是那种非常罕见的军人，能够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此次失败的经验将让他成长，助其在未来建功立业。

斯巴达人进攻西北方

德摩斯梯尼战败的消息鼓舞了斯巴达人，于是他们接受了埃托利亚人的邀请，打算从雅典人手中夺走纳夫帕克托斯。斯巴达人率领一支3000人的伯罗奔尼撒军队进入了希腊中部，迫使洛克里斯人投奔到他们那边。在纳夫帕克托斯附近，斯巴达人与埃托利亚人会合，然后一起蹂

躏了乡村，占领了纳夫帕克托斯郊区。在得知伯罗奔尼撒军队入侵的消息之后，德摩斯梯尼勇敢地去向阿卡纳尼亚人求援，尽管他之前因拒绝听从他们的建议而激怒了他们。他说服阿卡纳尼亚人派出了1000名士兵乘坐阿卡纳尼亚船只及时赶到，挽救了纳夫帕克托斯。斯巴达人判断自己无法攻下纳夫帕克托斯，于是撤回了埃托利亚。

斯巴达将军欧律罗科斯被安布拉基亚人说服，同意用伯罗奔尼撒军队去攻打安布拉基亚人在当地的敌人——安菲洛奇亚的阿尔戈斯，以及整个安菲洛奇亚和阿卡纳尼亚。“如果征服了这些地方，”安布拉基亚人说，“就能让整个大陆与斯巴达人结盟。”（3.102.6）于是欧律罗科斯解散了埃托利亚人，安排在安菲洛奇亚的阿尔戈斯附近与安布拉基亚人会面。

秋季，3000名安布拉基亚重步兵入侵安菲洛奇亚，占领了奥尔匹，这是一座滨海要塞，距阿尔戈斯不到5英里。为了应对这个威胁，阿卡纳尼亚人命令他们的军队抢在由欧律罗科斯指挥的正在北上的斯巴达陆军与南下的安布拉基亚人会合之前，拦截住欧律罗科斯。阿卡纳尼亚人还派人去纳夫帕克托斯，请求德摩斯梯尼指挥他们的军队。德摩斯梯尼已经不再是将军了，并且可能仍然没有得到雅典人的谅解，因为他在任期结束后没有返回城市去做报告。但阿卡纳尼亚人请求他指挥军队，说明他们对他仍然非常看重。

与此同时，欧律罗科斯从敌军身旁溜过，在奥尔匹与安布拉基亚人会师。两军合二为一，北上进入内陆，并在一个叫作麦特罗波利斯的地方扎营。不久之后，20艘雅典战船抵达，封锁了奥尔匹港。德摩斯梯尼带着200名忠诚的美塞尼亚人和60名雅典弓箭手赶来了。阿卡纳尼亚人撤到阿尔戈斯，让他们自己的将领服从德摩斯梯尼的指挥。德摩斯梯尼在阿尔戈斯和奥尔匹之间宿营，他与斯巴达营地仅隔着一道干河床。两军在那里对峙了五天。

德摩斯梯尼军队的兵力逊于敌人，但他制订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计划来克服人数上的劣势，这足以证明他的才华，以及他多么迅速地从之前的错误里吸取了教训。可能成为战场的地域是一条长着灌木的洼陷道路。在道路的一侧，他部署了400名重步兵和一些轻步兵。为了防止自己的重步兵方阵遭到侧翼包抄，他命令他们埋伏起来，等到战斗打响，再冲出来袭击敌人背后。这远远算不上重步兵的常规作战，而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打法，后来被事实证明起了决定性作用。

两军在交战之前等了五天时间，原因可能是雅典人希望斯巴达人主动进攻，落入德摩斯梯尼布下的陷阱，而斯巴达人则在等待安布拉基亚盟军的抵达。欧律罗科斯最后决定主动进攻。后来有人对他的这个决定进行严厉批评，但他的任务毕竟是占领阿尔戈斯，所以他不能无限期地等下去。按计划将要抵达的增援部队未必能真正赶到，而且即便没有这些增援部队，他的兵力也超过雅典人。况且也不可能让一支军队，尤其是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军队，在敌人视线之内长时间保持克制。不管怎么说，增援部队不可能改变结局，因为战役不是由数量而是由优秀的战术决定的。

两军最终交锋时，伯罗奔尼撒军队左翼在欧律罗科斯的指挥下，包抄了德摩斯梯尼统领的雅典军队右翼和美塞尼亚人。在欧律罗科斯正要包围对方右翼的时候，德摩斯梯尼的陷阱突然发挥了效力。阿卡纳尼亚人从埋伏点冲了出来，猛击欧律罗科斯背后，将其军队的后半部分杀得落花流水。他们被打得措手不及、四散逃命，惊慌情绪迅速蔓延。德摩斯梯尼麾下的美塞尼亚人打得最精彩，很快就开始追击大部分敌军。在战线的另一端，安布拉基亚人（修昔底德说他们是该地区最优秀的战士）击溃了对方，将其追杀到阿尔戈斯城。但安布拉基亚人从阿尔戈斯城返回时，看到己方的主力部队正在溃败，然后迎头撞上了得胜的阿卡纳尼亚人。安布拉基亚人杀出一条血路，撤到了奥尔匹，损失惨重。夜幕降临后，德摩斯梯尼控制了战场。遍地是敌人的死尸，包括两名斯巴

达将军欧律罗科斯和马卡里乌斯。

次日，斯巴达军队的新指挥官麦涅代乌斯被包围在奥尔匹。陆地上有敌人围困他，雅典舰队则从海上封锁奥尔匹。他不知道安布拉基亚增援部队会不会来，以及究竟什么时候来；而目前没有办法逃脱，于是他要求休战，以便收回死者遗体，商讨让他的军队安全撤离的条件。德摩斯梯尼安置了己方死者，并在战场上竖立了胜利纪念碑，但做出了一个不符合常规的新举动：他没有按照惯例允许被打败的敌军安全撤离，而是缔结了秘密协定，允许麦涅代乌斯、曼丁尼亚部队和其他伯罗奔尼撒部队的指挥官，以及“最优异的”士兵离开，假如他们能够快速离开的话。据修昔底德说，德摩斯梯尼允许这些人离去，“是为了打击斯巴达人和伯罗奔尼撒人在该地区全体希腊人心中的公信力，揭露他们是背信弃义和自私自利之徒”（3.109.2）。在希腊历史上的冲突中，还不曾有过这种政治战和心理战。

这种令人不快的协定执行起来并不容易。被围困在奥尔匹的士兵们得知了此项协定，开始以搜集柴火为由偷偷溜走。被选中的伯罗奔尼撒优异人士没有向普通士兵保守秘密，大多数士兵似乎都逃走了。非伯罗奔尼撒人的其他士兵看到这种情况后，也加入了逃跑队伍。阿卡纳尼亚军队开始追击的时候，他们的将军努力阻拦士兵，在混乱的局势下解释协定条款，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伯罗奔尼撒人被允许逃跑，而追击的阿卡纳尼亚人杀死了他们能抓住的所有安布拉基亚人。

与此同时，安布拉基亚增援部队抵达了伊多门涅（奥尔匹以北几英里处），在它附近两座陡峭山丘中较低的一座过夜。德摩斯梯尼得知这支敌军正在逼近，于是派遣一支前卫部队去埋伏，并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这支前卫部队控制了较高的那座山丘，而不知道他们下方的较低山丘上驻扎着安布拉基亚人。德摩斯梯尼已经做好准备，要把他学到的关于山地作战和非常规策略的知识付诸实践。

他在夜间行军，派遣一支部队走直接路线，其余部队则穿过山地。他在天亮之前抵达敌军驻地，这时安布拉基亚人还在睡觉。德摩斯梯尼利用了每一个天然优势，自己还创造了一些优势。为了加强出其不意的效果，德摩斯梯尼让美塞尼亚人（他们说的多利亚方言与安布拉基亚人的方言类似）打头阵，这样他们也许能混过敌人的前哨阵地而不打草惊蛇。这计谋非常成功，被惊醒的安布拉基亚人起初还以为攻击者是他们自己人。大多数安布拉基亚人当场就被杀死，少数企图从山地逃跑的人也被德摩斯梯尼的预备队抓住了。混乱之下，而且是在陌生地域，这些安布拉基亚轻步兵面对敌军重步兵，没有任何胜算。有些人慌乱之中奔向海边，游向雅典战船，宁愿被雅典水手杀死，也不愿意死在“野蛮的、可恨的安菲洛奇亚人”手中。安布拉基亚人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修昔底德记录了安布拉基亚人的死亡人数，因为安布拉基亚城的总人口不多，死者数量与之相比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修昔底德写道：“这是本次战争中，在同等时间内，单一城市遭到的最惨重灾难。”（3.113.6）

德摩斯梯尼希望在屠杀安布拉基亚人之后乘胜追击，占领他们的城市，但阿卡纳尼亚人和安菲洛奇亚人不愿意，因为“他们现在害怕，若雅典人与他们直接接壤，会比安布拉基亚人更难对付”（3.113.6）。他们将战利品的三分之一给了雅典人；多达300套甲胄被送给德摩斯梯尼，这个数字非常惊人。有了这些战利品和它们所代表的荣耀，他现在可以回家了。他非常精明地将自己得到的战利品全部献给神祇，将战利品存放在神庙内，自己一点也没保留。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手段，公开表示了自己的虔敬、谦卑和无私。20艘雅典战船返回了纳夫帕克托斯，让雅典西北方的盟友松了一口气。阿卡纳尼亚人和安菲洛奇亚人允许被困的伯罗奔尼撒人安全回家，也允许幸存的安布拉基亚人撤退，并与安布拉基亚人订立了为期一百年的条约，以结束宿怨，让该地区不再参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安布拉基亚的母邦科林斯派去了300名重步兵，为其城防提供一支小小的驻军；一度强盛的安布拉基亚如今需要这样的驻军，说明它已经变得十分羸弱。

但这支科林斯队伍能够抵达安布拉基亚，也说明雅典人未能完全控制希腊西北部。此次战役阻止了伯罗奔尼撒人控制该地区，于是雅典船只得以安全地沿着希腊西海岸航行和在伊奥尼亚海航行，但雅典人的投入毕竟有限，因此无法取得更大的战绩。雅典没有投入任何重步兵，只投入了20艘战船和60名弓箭手，以及一位卓越的将领，不过他毕竟只是一名普通公民，没有正式的官职。在西北部的作战很有代表性，雅典人在一整年中的努力都是这样：更为勇敢和积极进取，但也受到谨慎心态和有限资源的限制。前427/前426年的军费开支与战争初期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国库仅支出了261塔兰同，相当于战争最初两年平均年度开支的五分之一[2]。即便有了新战略，雅典人也没有办法打赢战争，除非他们能解决财政问题或者拥有出人意料的好运气。

---

[1] J.M.Edmonds，*The Fragments of Attic Comedy*，Leiden，1957-1961，304-306.

[2] 最初两年一共花了约2700塔兰同。

第十二章 皮洛斯和斯法克特里亚岛（前425年）

雅典在西方的行动

前425年春，雅典人派出了一支40艘战船的舰队，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这支舰队的指挥官是索福克勒斯和欧律墨冬，任务是增援西西里岛的皮索多鲁斯。但在他们抵达西西里岛之前，麻烦就出现了。叙拉古人和洛克里斯人夺回了墨西拿。而在意大利，洛克里斯人还攻击了瑞吉昂，它是雅典人在该地区的作战基地和主要盟友。每一次失败都减少了雅典人争取新盟友的机会，而缔造联盟正是雅典西方战略的核心。雅典人若是派出援兵，就可以恢复西西里岛的原有秩序；消息传来时，舰队已经起航，所以它们徐徐前进，并不着急。

克基拉岛也出现了麻烦。欧律墨冬允许克基拉的民主派屠杀其对手，随后欧律墨冬乘船离开了。500名寡头派分子逃到大陆，在那里占据了一些要塞，作为反攻克基拉的基地。他们的袭击使克基拉城内发生了饥荒。寡头派向科林斯和斯巴达求援，未能如愿，于是自己开始征募雇佣兵。这支队伍在克基拉岛登陆，然后烧毁了自己的船只，以彰显破釜沉舟的决心，并在伊斯通山设防，以那里为基地控制乡村。受到他们成功的鼓舞，伯罗奔尼撒人派来60艘战船，尝试占领克基拉。很多雅典人还不知道伯罗奔尼撒人的干涉，他们仍然认为，派舰队去挽救克基拉是比远征西西里更有价值的行动。

对于如何使用正在西进的雅典舰队，德摩斯梯尼提出了第三种方案。他在阿卡纳尼亚的辉煌胜利已经驱散了在埃托利亚惨败的阴云。他当选为下一年的将军，任期从前425年仲夏开始。尽管他目前只是个普通公民，并无指挥职务，但他制订了一个计划：在美塞尼亚[1]海岸登陆，然后在那里狠狠打击敌人。他的这个计划也需要一支舰队。

每一种方案都有优点，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用三支舰队同时执行三个方案，但雅典人没有足够的资金，或许也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同时执行三个方案。在近期勇敢情绪的感染下，他们给舰队下达了若是在其他时候一定显得很奇怪的命令。索福克勒斯和欧律墨冬奉命驶往西西里岛，“但在经过克基拉时，也要支持城内的人，他们正遭受山里寡头派的攻击”。索福克勒斯和欧律墨冬还应允许德摩斯梯尼“使用这些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战船，如果他打算这么做的话”（4.2.3）。

德摩斯梯尼的计划：皮洛斯的要塞

两位雅典将军直到抵达拉科尼亚海岸才得知，一支伯罗奔尼撒舰队正停在克基拉岛。索福克勒斯和欧律墨冬急于驰援克基拉，但德摩斯梯尼有别的想法。出海之后，他可以自由地向同僚们透露自己计划的细节，之前在雅典公民大会上他之所以不敢公布计划，是因为害怕被敌人刺探。他打算在被斯巴达人称为科里法西昂（荷马史诗中的皮洛斯）的地方登陆，在那里建立一座永久性要塞。德摩斯梯尼一定是在之前的航行中注意到了这个地区，并且咨询了他的美塞尼亚朋友的意见。皮洛斯作为一个永久性基地，拥有很多天然优势，可以让美塞尼亚人蹂躏拉科尼亚的土地，并煽动黑劳士起义。皮洛斯对海上作战也特别有价值，因为它拥有该地区最大的安全港口（今称纳瓦里诺湾）。当地有许多木材和石料可供修建要塞工事；周边地区空寂无人，而且离纳瓦里诺的直线距离有约50英里；斯巴达陆军若要进攻，路途差不多有75英里，因此也能有足够的时间抢在斯巴达军队杀到之前巩固防御工事。德摩斯梯尼相信“此地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利”（4.3.3）。他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但索福克勒斯和欧律墨冬更担心克基拉的安全，没有被德摩斯梯尼富有想象力的大胆计划说服。他们认为，他的计划只不过是鲁莽地偏离正题，并讥讽地说：“若想浪费国家的资金，伯罗奔尼撒半岛还有很多荒凉的海岬可以占领。”（4.3.3）德摩斯梯尼反驳说，他并不打算让舰队在皮洛斯长期作战，而只是请求舰队在那里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便

建造要塞，留下一小支部队守卫，然后就可以继续驶向克基拉。他坚信，雅典人成功地在美塞尼亚海岸登陆之后，伯罗奔尼撒舰队就必然会撤离克基拉，这个计划能够让雅典人以最小的代价和最轻松的方式一石二鸟。

这时，命运施加了干预。尽管德摩斯梯尼未能说服两位将军在皮洛斯登陆，但一场风暴将雅典舰队吹到了皮洛斯。当两位将军在那里等待风暴平息时，德摩斯梯尼绕过他们，不顾上级的意愿，直接呼吁士兵们支持他。他的努力仍然没有成功。但随着风暴持续下去，无所事事的士兵们终于同意德摩斯梯尼的请求。他们受到冒险精神的激励，抢在斯巴达人赶来之前在最脆弱的地点设防，六天之内就完成了防御工事。风平浪静之后，将军们将德摩斯梯尼、一小支队伍和5艘战船留下防守新建立的要塞，随后起航前往克基拉。

与此同时，斯巴达人在庆祝一个节日，而且他们的军队正在阿提卡，所以没有把这当回事。毕竟雅典人在过去也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而且还是以更大的兵力，但从来都没有长时间停留以迎战斯巴达的大军。即便雅典人企图在皮洛斯设立永久性基地，斯巴达人也坚信自己可以将它攻下。然而，按照惯例在春季率军入侵阿提卡的阿基斯二世却更为警觉。他缺少粮草，并且受到了恶劣天气的困扰，于是在阿提卡仅仅待了十五天就撤退了。这是到目前为止最短的一次入侵行动。

斯巴达人还将雅典人在皮洛斯建造要塞的消息报告给了在克基拉的海军司令特拉西米里达斯，他和阿基斯二世一样很快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立刻率舰队返航。他从正在北上的雅典舰队身旁溜过，安全抵达了皮洛斯。阿基斯二世的陆军此时也从阿提卡回国了，并且斯巴达人还要求伯罗奔尼撒盟友们派兵支援。由未参加入侵阿提卡行动的斯巴达人和庇里阿西人（他们的领土离皮洛斯最近）组成的一支先头部队立刻出发，去攻击雅典人的皮洛斯要塞。

斯巴达人在斯法克特里亚岛

在斯巴达人调兵遣将之时，德摩斯梯尼派遣2艘战船去拦住索福克勒斯和欧律墨冬，告诉他们，他遇到了危险。这2艘战船在扎金苏斯岛找到了雅典舰队，于是舰队立刻赶往皮洛斯，去支援那里的守军。斯巴达人坚信自己可以轻松占领这样一座草草搭建起来而且只有少量兵力防守的要塞，但他们也知道，雅典舰队很快就会赶到。于是，斯巴达人决定立刻从海陆两路同时发动进攻，如果失败的话，就堵住进入港湾的入口，以阻止雅典舰队前来支援。他们还将在斯法克特里亚岛及附近的大陆部署军队，以阻止雅典舰队登陆或建立基地。斯巴达人相信“他们应当可以攻下皮洛斯，且不至于发生海战，因为皮洛斯的守军在被围困时准备得很不充分”（4.8.8）。原则上，这种策略很有道理，却无法实践，因为斯巴达人没有办法封闭海湾水道。[2]（见地图15）纳瓦里诺湾南部的水道宽约1400码，深约200英尺。即便伯罗奔尼撒舰队全部出动，也不可能将其完全封锁。斯巴达人要想防守港口，只能在南部水道以自己的60艘战船与雅典的40艘战船打一场海战。这样一场对抗正中雅典人的下怀，没有证据表明斯巴达人愿意打一场这样的海战。我们对他们用来阻止雅典人的计划仍然一无所知，但这个计划一定要么设计得很糟糕，要么执行得很蹩脚。斯巴达人在斯法克特里亚岛上部署了420名重步兵及其黑劳士仆役，由爱皮塔达斯指挥。除非斯巴达人能够阻止雅典舰队进入纳瓦里诺湾，否则爱皮塔达斯的队伍将困守斯法克特里亚岛，孤立无援。我们知道，斯巴达人是没有办法阻止雅典舰队进入纳瓦里诺湾的。


15. 皮洛斯和斯法克特里亚岛
阿吉奥尼
科洛山
沃伊西奥基里亚湾
港口
（今天的奥斯敏阿迦澙湖）
雅典人的护墙
沙洲
皮洛斯
雅典人的护墙
西吉亚水道
史前要塞
纳瓦里诺湾
斯巴达营地
井
斯法克特里亚岛
0 英里 1
0 千米 1
© 2003 Jeffrey L. Ward

与此同时，德摩斯梯尼将他的3艘三列桨座战船拖上岸，并用栅栏保护起来，以防遭到敌军舰队袭击。在这荒凉的敌境没有办法搞到常规的重步兵武器装备，于是他用柳条编织的盾牌将水手（一共不到600人）武装起来。但很快有一艘美塞尼亚私掠船抵达，运来了武器和40名重步兵，这一定是德摩斯梯尼事先安排的。他现在可能有至少90名重步兵，包括原先5艘船上的50名重步兵，但要塞的雅典守军的兵力和装备依然远逊于敌人。

德摩斯梯尼将大部分兵力部署在面向内陆的工事后面。他自己带领60名重步兵和一些弓箭手，承担了更艰难的任务，即防守海岬的西南端，那里面对敌军登陆的防守最为薄弱。他们就在海边严阵以待。

雅典人的海战胜利

在战前演讲中，德摩斯梯尼向士兵们介绍了古代两栖作战的一条简单真理："只要防守海岸的人不因恐惧而退缩，敌人就没有办法从船上强行登陆。"（4.10.5）斯巴达人在德摩斯梯尼预计的时间里果然发动了进攻，伯拉西达的勇气鼓舞了斯巴达人。但伯拉西达负了重伤，丢失了自己的盾牌。雅典人岿然不动，斯巴达人在激战两天后撤退了。第三天，在斯巴达人的进攻开始之后，索福克勒斯和欧律墨冬率领舰队从扎金苏斯岛赶来了，而且他们舰队的实力增加到了50艘三列桨座战船，因为一些希俄斯战船和几艘来自纳夫帕克托斯的战船也加入了他们。斯巴达人在港湾内等待，准备在那里交战。在随后爆发的海战中，雅典海军取得了辉煌胜利，而斯巴达人则遭受了灭顶之灾。斯巴达人的勇气主要表现在他们驶进激浪，努力阻止雅典人将被击败的斯巴达三列桨座战船拖走。雅典人设立了纪念碑，自由地绕过斯巴达重步兵，将其切断和封锁在斯法克特里亚岛上。

雅典此次海战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斯巴达人意识到无法救援自己的士兵后，立即决定请求在皮洛斯休战，以商讨订立和约，

并收回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部队。像斯巴达这样尚武的国家居然为了收回420名士兵而愿意求和，或许令人惊讶。但这群士兵相当于斯巴达陆军的十分之一，而且其中至少180人来自斯巴达贵族世家。斯巴达奉行严格的优生政策，将身体有缺陷的婴儿杀死，在生殖力最强的岁月里将男女分开以便保证有效的生育控制，斯巴达的荣誉法则要求士兵们宁愿死也不蒙羞，而且统治阶层只在内部通婚。因此，对仅仅180名斯巴达人安全的关心不仅仅是多愁善感的姿态，而是极其务实的必要之举。

此次休战使雅典人可以继续封锁斯法克特里亚岛，但他们没有去攻击岛上的斯巴达人。雅典人还允许斯巴达人向被困在岛上的人输送粮食和饮水。作为回报，斯巴达人承诺不去攻击皮洛斯的雅典壁垒，也不秘密派船去斯法克特里亚岛，并同意交出自己的60艘战船作为抵押。1艘雅典三列桨座战船载着斯巴达使者去雅典开展和谈；休战将一直持续到使者返回，那时雅典人必须完好返还斯巴达战船。若发生任何违反这些条款的行为，休战都将终止。这给雅典人带来了极大的优势：假如和谈失败，他们可以轻易地声称斯巴达人违反了休战协定，将斯巴达船只占为己有。尽管休战协定对斯巴达十分不利，但斯巴达人没有办法拒绝它。

斯巴达的和平建议

斯巴达使者向雅典公民大会提出了自己的和平条件，承认雅典人占了上风，但提醒他们，雅典的胜利不是由于双方力量平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雅典人最好趁着局势对自己有利，赶紧议和。为了收回被困在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士兵，斯巴达人提议与雅典订立攻守同盟。由于双方未曾提及任何领土变更，雅典人应当可以保留埃吉那岛和米诺亚岛，于是雅典在西北方有了一个立足点。作为交换，他们应当彻底放弃收复普拉蒂亚的企图。

雅典人似乎应当接受斯巴达的建议，因为这似乎就是战争开始时伯

里克利设想的那种和平了。但事实是否如此，还很难说。伯里克利的目标大体上是心理上的，他希望让斯巴达人确信自己没有打败雅典的实力。但斯巴达人对雅典公民大会的讲话却清楚地表明，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继续相信，雅典的优势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运气随时可能发生逆转。“我们此次蒙受的不幸并非由于我们的力量不足，而是由于我们太强盛，变得狂妄自大。但我们的资源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盘算失误，而任何人都可能犯下这样的错误。”（4.18.2）

雅典人一定认识到，斯巴达在收回自己的受困士兵之后随时可能再次发动战争。在前425年，雅典人知道只要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士兵还在雅典手中，雅典就等于拥有了和平的保障。但正如修昔底德所说，“雅典人伸手去要更多的东西”（4.21.2），他的意思是贪婪、野心和扩张帝国的宏图在驱动着雅典人。这样的结局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雅典人完全有理由去要更多的东西，而非仅仅满足于斯巴达空口白舌的承诺（在未来的联盟中与雅典保持友好，而这样的联盟依赖于两国友好关系的维系）。即便这些提议和平的斯巴达人是真诚的，他们或许也不会永远掌权。斯巴达国内政治的风云变幻是促使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同样在前430年，斯巴达的主战派足够强大，拒绝了雅典的和平建议。局势稳定之后，主战派完全可能再一次占上风。任何理智的雅典人都会希望得到比斯巴达人的提议更稳固的保障。

不足为奇的是，反对接受斯巴达建议的派系是由克里昂领导的，他提出的替代方案是迫使被困于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斯巴达人投降，并将其押至雅典，扣为人质。他还要求，斯巴达人应当交出墨伽拉的港口尼萨亚和佩加，以及特洛伊曾和阿开亚，因为这些地方不是斯巴达在战争期间从雅典手中夺走的，而是雅典“由于之前的一次不幸而缔结的协定，当时雅典人急于缔结条约”（4.21.3）而交给斯巴达的（他指的是前445年，强大的斯巴达陆军进逼阿提卡平原的时候）。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雅典人才会交还人质和同意缔结长期和平。

斯巴达使者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这些不受欢迎的条件，而是要求雅典人指定一个委员会，好让斯巴达使者继续与其进行私下谈判。克里昂凶暴地谴责斯巴达人心怀不轨：如果斯巴达人有诚实体面的话要说，那就在公民大会上公开发表好了。但斯巴达人肯定不能公开讨论背叛自己盟友的事情，于是他们放弃谈判，回家了。

有人说，是克里昂破坏了谈判，因为私下里商谈对雅典人不会造成什么损害，或许还能得到很大好处。但务实地看，雅典人在秘密谈判中能得到什么呢？假设雅典人投票决定指派一个委员会与斯巴达人秘密谈判，鉴于雅典的政治形势，尼基阿斯及其支持者一定会主宰谈判。这些人渴望和平，真诚地希望与斯巴达缔结友谊，并倾向于相信斯巴达会信守承诺。他们也许能与斯巴达人达成对雅典人非常有诱惑力的条件，或许包括两国结盟、永续友谊、收复普拉蒂亚，甚至斯巴达放弃墨伽拉。斯巴达人或许只会要求释放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士兵和雅典人撤离皮洛斯，而这样的要求是很难拒绝的。

但斯巴达人可能愿意放弃墨伽拉（或至少放弃其港口）的想法是非常不现实的。斯巴达可能会放弃西北方，也可能不理睬科林斯关于克基拉和波提狄亚的要求，但放弃墨伽拉就等于允许雅典势力进驻地峡，将斯巴达与玻俄提亚和希腊中部切断。如果那样的话，斯巴达作为盟主和各盟邦保护者的公信力就消失殆尽了。科林斯、底比斯和墨伽拉一定会反对。要让雅典人满意，斯巴达就将不得不放弃它的主要盟邦，甚至根据斯巴达自己建议的与雅典形成攻守同盟，还要与雅典并肩反对这些盟邦。因此，斯巴达不可能与雅典达成这样的协议。因此，私下谈判反而会激怒斯巴达，很快导致新的冲突和战争，而斯巴达的战斗力并未减弱。克里昂和支持他的雅典人有充足的理由去反对与斯巴达秘密谈判。

如果说雅典人从秘密谈判中得不到什么东西，那么他们的确有可能损失一些东西：拖延时间对斯巴达人有利，在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斯巴

达人有可能找到逃走的办法。雅典人不可能在冬季封锁这个岛屿，如果两国未能达成和约，被困在岛上的人可以逃走。休战期间，斯巴达人可以向岛上输送粮食，休战的每一天都意味着岛上的人可以多坚持一天，雅典失去这张制胜王牌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克里昂看到了这种危险，大多数人也支持他。

此次辩论标志着雅典政治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从前430年斯巴达拒绝雅典的和平提议到前425年的皮洛斯事件，雅典存在着普遍共识，即应当尽最大努力作战，以迫使斯巴达人求和。雅典人共同努力，以求达成这一目标，而没有去讨论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和平。皮洛斯的胜利和随后斯巴达的求和改变了局势。在此之前，主张与斯巴达达成协议会被视为叛国；在此之后，爱国人士也可以良心坦荡地鼓吹这种路线了。伯里克利的战争目标、恢复战前状况、保住殖民帝国、斯巴达停止对雅典帝国的攻击，现在全都指日可待了。有些雅典人或许会争辩，这样的和平还不够安全，伯里克利本人一定会坚持要求更多的保障。但审慎的人可以回答说，聪明的办法还是信任斯巴达，并铺设长期和平的道路。在前425年，尼基阿斯的立场可能就是这样。

但是，克里昂有着截然不同的目标。他实际上要求恢复前445年《三十年和约》之前的理想状况，那时雅典控制着墨伽拉、玻俄提亚和希腊中部的其他一些地区，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些沿海城邦。他相信，正是由于某些“不幸”，雅典人被迫签署了《三十年和约》，被迫放弃了这些领土。克里昂指出，由于皮洛斯和斯法克特里亚岛发生的事件，雅典人必须坚持要求恢复《三十年和约》之前的状况，即和平不取决于斯巴达政治的心血来潮，也不依赖于斯巴达自说自话的善意表达，而是得到这样的有力保障：雅典控制着具有战略防御意义的地点。

克里昂反对尼基阿斯

斯巴达使者返回了皮洛斯，于是休战结束了。雅典人声称斯巴达破

坏了休战协定，拒绝返还扣押的船只。从此以后，斯巴达人不得不只在陆地上作战，不过因为他们的海军之前表现很差，所以没了海军也不算特别大的损失。雅典人现在致力于俘虏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斯巴达人，于是派遣了新一批20艘战船去封锁斯法克特里亚岛。他们估计很快就能成功，因为这是个荒岛，没有粮食，只有带咸味的水，而且雅典舰队完全掌控着通往该岛的所有通道。但斯巴达人面对这些挑战，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聪明才智。他们悬赏鼓励人们突破雅典封锁线，为被困人员输送粮食和饮用水，有功的自由人将得到赏赐，黑劳士将得到自由。许多人冒着风险，利用风力和夜色，来到斯法克特里亚岛。在没有港口的朝向大海的海滩上，有一些小船因此失事，还有人潜水游过海湾为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人提供粮食。所以，岛上的人在雅典人估计他们应当投降的时间之后很久还在坚持着。

最终，雅典人自己也受到缺粮缺水的折磨。他们有1.4万人以上，却只能依赖皮洛斯卫城上一个小小泉眼的水，以及他们在海滩上能找得到的少量适于饮用的水。他们挤在很小空间内，由于这场围困的时间太久，他们的士气也遭到了消磨。他们开始担心，冬天到来之后，补给船无法定期抵达，他们就不得不放弃围困。随着时间流逝，斯巴达人没有派来新的使团，雅典人越来越担心斯巴达人自信一定能救回他们的人，而雅典可能在这个僵局中白忙一场，既没有得到重大的战略优势，也无法议和。很多雅典人开始感到他们犯了一个错误，而促使他们拒绝斯巴达和平建议的克里昂应当受到责怪。

雅典公民大会得知皮洛斯的严峻形势后，克里昂和他的政策才终于遭到了公开攻击。此次会议的目的可能是讨论德摩斯梯尼的请求，即派遣援兵进攻斯法克特里亚岛。克里昂肯定与德摩斯梯尼保持着紧密联系，也知道他攻击斯法克特里亚岛的计划。辩论发生的时候，雅典城已经在集结攻击斯法克特里亚岛所需的轻装部队，而德摩斯梯尼也已经开始做进攻准备，向附近的盟邦索要更多部队。德摩斯梯尼索要的一定是

能够俘获斯法克特里亚岛上守军的那种受过特殊训练的部队。

克里昂是支持德摩斯梯尼的天然人选。他是最大张旗鼓、直言不讳地主张拒绝斯巴达和平提议的人，如果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人逃跑了，克里昂很可能会被要求对此负责。他也是一位本领高强的政客，特别能捕捉到德摩斯梯尼大胆计划中的成功前景。尼基阿斯此时已经主张与斯巴达议和，并担心俘获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斯巴达人会使雅典人燃起咄咄逼人的攻击性精神，那样的话就没办法议和了。因此他急切地希望尽可能久地拖延攻势，以便在一切都太晚之前与斯巴达达成协议。由于他没有德摩斯梯尼那样的经验（用轻装部队在崎岖地形作战），也没有直接的情报可以帮助他判断成功概率，他本性的谨慎可能使他高估了在一个重步兵把守的岛上强行登陆的危险性。无论如何，他肯定反对派遣增援部队去攻打那个岛屿。

克里昂指责从皮洛斯带来坏消息的信使没有说明真相，于是信使们请雅典人指定一个委员会去核查他们报告的准确性。雅典人同意了，并选举克里昂为这个委员会的代表之一，但他说此时去岛上调查只是浪费时间，会让雅典丧失一个良机。他认为假如公民大会相信这些坏消息，就应当立刻派遣增援部队去攻打岛屿，并俘获岛上守军，因为“克里昂看到，现在雅典人比较希望发动一次远征”（4.27.4）。

公民大会一定是投票决定派遣增援部队并指定尼基阿斯为指挥官，因为克里昂用一根手指指着尼基阿斯，坚持说假如将军们果真勇敢的话，率领足够的部队去皮洛斯并俘获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斯巴达人，应当是易如反掌之事。“如果他（克里昂）自己是将军的话，他就自己去了。”（4.27.5）

现在雅典人被克里昂的招数吸引住了，问他假如他相信此次行动很容易，他自己为什么不去。尼基阿斯看到了群众的情绪并“注意到克里昂的嘲讽”，回答说将军们会很乐意让克里昂率领任何部队去尝试此次

行动。起初克里昂打算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他觉得这项提议只是个把戏”；后来“他认识到尼基阿斯当真要将指挥权让出来”，于是又拒绝了，声称毕竟担任将军的是尼基阿斯，而不是他。尼基阿斯看到对手的窘迫，再一次表示愿意将指挥权让给他，希望借此让克里昂在公众面前出丑。群众开始起哄，有的是认真的，有的则是出于对克里昂的敌意，还有人只是为了取乐。

尼基阿斯没有权力将自己的指挥权交给克里昂，更没有权力将其他将军的权力交给克里昂。但公民们开始呼喊支持他的时候，很显然，雅典人愿意接受他的提议。起初克里昂“没有任何办法逃脱自己的建议所造成的后果”，于是同意指挥增援部队。他将仅仅带领一支此时正在雅典城、来自利姆诺斯和伊姆布罗斯[3]的部队，一些来自埃努斯[4]的轻装部队，以及来自其他地方的400名弓箭手。他承诺将用这些士兵和已经在皮洛斯的士兵，在20天内“要么将斯巴达人抓回来，要么将他们当场处死”（4.28.4）。

克里昂承诺在20天内成功，并且无须动用雅典重步兵，这并非浮夸吹嘘，也不是蛮勇无谋。由于德摩斯梯尼的计划是立刻发动进攻，现在既然手头已经有了所需的轻装部队，就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克里昂知道，他要么失败，要么一定能在20天内完成任务。但是，修昔底德笔下“谨慎的人们”（雅典公民）表现出的态度让人既难以理解，也无法原谅。爱国的雅典人竟然同意将雅典远征军的指挥权，以及盟军士兵和雅典水手的生命交给一个他们认为愚不可及（更不用说多么无能）的人，这表明前425年的事件在雅典人当中造成的分歧是多么危险。

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斯巴达人投降

克里昂任命德摩斯梯尼为他的同僚指挥官，并向他发去信息，告诉他援军即将抵达。在皮洛斯，德摩斯梯尼仍然犹豫不决，不想去攻击林木繁茂的斯法克特里亚岛（数目不详的斯巴达重步兵隐藏在那里）。就

在这时，命运又一次支持了勇敢者。一队雅典士兵因为皮洛斯太拥挤，没办法做一顿热饭，于是来到斯法克特里亚岛上，其中一人偶然引发了一场森林火灾。很快，大多数树木都被烧掉了，德摩斯梯尼可以看到岛上的斯巴达人比他想象的还要多。另外，之前由于树木遮挡而看不清的一些适合登陆的地点现在也完全显露出来。他认为大火除掉了敌人最大的战术优势。在克里昂带领精神抖擞的特殊部队赶到之后，德摩斯梯尼已经准备好将他在埃托利亚学到的宝贵经验付诸实践。

黎明前，他率领800名重步兵，在岛上面向大海的一侧和面向港口的一侧分别登陆。德摩斯梯尼现在可以看到，大多数敌人集中在岛屿中心附近，保卫着水源；另一支队伍则在岛屿北端附近，就在皮洛斯对岸，只有30名重步兵把守着岛屿南端的登陆点。这30名斯巴达重步兵这么多天来一次次地看到雅典船只从他们眼皮底下无所作为地驶过，因此毫无戒备。他们还在睡觉时就被雅典人迅速消灭，就像一年前在希腊西北部的伊多门涅战役中雅典人被打得措手不及一样。黎明时，雅典人将其他部队——重步兵、轻步兵、弓箭手，甚至大部分舰队桨手（他们几乎毫无武装）——送上了岛。将近8000名桨手、800名重步兵、800名弓箭手和超过2000名轻步兵面对着420名斯巴达人。

德摩斯梯尼将部队分成若干支200人的队伍，占领了岛上所有的制高点，所以无论斯巴达人在何处作战，背后或侧翼总会有敌人。策略的关键是轻步兵的运用，因为“他们是最难对付的，他们在远距离之外用弓箭、标枪和投石器作战。敌人根本没有办法攻击他们，因为即便在逃跑的时候，他们也仍然占据上风；追击者转身的时候，又会遭到他们的袭击。德摩斯梯尼最初对登陆作战的计划就是这样的，在实践中他也是这样部署部队的”（4.32.4）。

起初斯巴达人摆好阵势去对付雅典重步兵，但雅典的轻装部队从侧翼和后方用远程投射武器如倾盆大雨般地攻击他们，雅典重步兵只是站

着观望。斯巴达人尝试向折磨他们的敌人冲锋，但这些轻装部队轻松逃到了斯巴达重步兵无法接近的崎岖高地。斯巴达人多次徒劳追击之后，疲惫不堪，并且遭受了一些伤亡。于是雅典轻装部队转而发起冲锋，一边呐喊，一边用投射武器攻击斯巴达人。出人意料的吵闹让斯巴达人乱了方寸，无法听清自己军官的命令。他们逃到岛屿北端，大多数躲在防御工事后方，抵挡雅典人的进攻。

美塞尼亚人的将军科门来找克里昂和德摩斯梯尼，请求他们提供弓箭手和轻步兵去寻找一条绕过陡峭海岸的小路，以便从背后攻击敌人。斯巴达人不想浪费兵力守卫这样难走的道路，因此科门的士兵出现时令他们大吃一惊。斯巴达人被重重包围，兵力远逊于对方，由于劳累和饥饿而变得虚弱，无路可逃，因此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活着的战俘比死尸更有价值，于是克里昂和德摩斯梯尼给了他们投降的机会。斯巴达人接受了一次休战，以便商议如何应对。岛上的斯巴达指挥官拒绝承担投降的责任，于是派遣了一名传令官去斯巴达，请求权力人物下命令。斯巴达的权力人物也不肯承担责任，说“斯巴达人民命令你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不准做任何有损名誉的事情”（4.38.3）。于是，岛上的人投降了。当初有420人来到斯法克特里亚岛，现在已有128人死亡；余下的292人（其中有120人是斯巴达人）被作为俘虏押往雅典，此时还远远没到克里昂承诺的20天限期。雅典人的伤亡很少。修昔底德写道：“克里昂的承诺虽然疯狂，却实现了。”（4.39.3）

这个结局让整个希腊世界大为震惊。“在希腊人眼里，这是战争中最意想不到的事情”（4.40），因为没有人相信，斯巴达人竟然会投降。雅典人在皮洛斯要塞派驻了卫戍部队，纳夫帕克托斯的美塞尼亚人派去了一支部队，以它为基地袭掠斯巴达的岛屿，黑劳士也开始从斯巴达叛逃。雅典人还威胁若斯巴达人再次入侵阿提卡，他们就杀死人质。斯巴达人目瞪口呆，派了多个使团去谈判，希望讨回皮洛斯和战俘，但都没有成功。

雅典人向大英雄克里昂表达了感激（德摩斯梯尼似乎留在了皮洛斯，以确保它的安全）。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授予克里昂最高荣誉：由国家出钱请他在圣火会堂[5]用餐，就好像他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一样，并在剧场为他保留前排座位。大约两个月之后，公民大会做了新的评估，提高了向各盟邦征收的贡金数量。大多数学者正确地判断这是克里昂促成的，这体现了他对各盟邦的严厉态度，以及他在当时主宰着雅典政治。从前425年仲夏开始，至少到前424年春季（克里昂在那时当选为将军），克里昂在雅典拥有主导地位，只要是他支持的议案，一般都会在公民大会顺利通过，不会受到任何挑战。

对盟邦贡金的新评估是为了征收更多资金，以便把战争打下去，这次收到的总金额似乎是1460塔兰同，相当于上一次总金额的三倍多。新的法令要求严格而高效地征收贡金，一些很久没纳贡的地区和一些从未纳贡的地区，比如米洛斯岛，如今都需要纳贡。皮洛斯和斯法克特里亚岛事件使雅典的威望飙升，而斯巴达的威望大大受损。在此之前，上述旨在增加雅典收入的措施都难以实施，也过于危险，现在却可以落实了。这些措施体现了克里昂的决心：恢复雅典帝国的霸业，紧紧掌控臣属和附庸国，尽可能多地榨取财政收入。雅典人急需金钱，而克里昂的伟大胜利使他们有底气去向臣属城邦索要金钱。

在同一个夏季，尼基阿斯和另外两位不知名的将军发动了一场战役，古代作家没有解释他们这个举动的目的。他们以80艘战船、2000名雅典重步兵、200名骑兵和一些盟军士兵入侵了科林斯领土。这支部队在索利吉亚村（距科林斯六七英里）附近登陆，但已有奸细向科林斯人通风报信。科林斯重步兵攻击了雅典人，但被击败，损失了212人，雅典人只伤亡50人。雅典人建立了胜利纪念碑，但无法扩大战果，因为原先留在科林斯城内的年纪较大的人冲出来援助己方败北的部队。尼基阿斯以为这些人是伯罗奔尼撒的增援部队，于是迅速撤回自己的船上。

随后，雅典人驶向科林斯的城镇克隆米昂，蹂躏了其领土，但没有尝试攻打城镇本身。次日，雅典人在埃皮达鲁斯停留，然后前往迈萨纳（埃皮达鲁斯和特洛伊曾之间的一座半岛）。尼基阿斯在迈萨纳半岛的狭窄咽喉处建造了壁垒，在那里留下一支驻军，这支驻军后来袭掠了特洛伊曾、哈雷斯和埃皮达鲁斯的领土，这三座城镇都在其攻击范围之内。这可能就是整个远征的目标。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海岸建立一座要塞的想法，可能受到了西岸的皮洛斯胜利的影响。从迈萨纳发动袭掠或许可以迫使特洛伊曾和哈雷斯等城镇转投雅典阵营。雅典人或许还能威慑或占领埃皮达鲁斯，然后把阿尔戈斯拉拢过来。在皮洛斯-斯法克特里亚岛大捷之后春风得意的日子里，似乎一切皆有可能。

雅典人在西部依旧很活跃。索福克勒斯和欧律墨冬率领舰队从皮洛斯赶往克基拉岛，伊斯通山上的寡头派仍然在骚扰城内的亲雅典民主派。索福克勒斯和欧律墨冬舰队的抵达扭转了局势。在盟军的支持下，雅典人攻克了伊斯通山地要塞，迫使寡头派投降，但条件是他们只向雅典人投降，并且要在雅典接受审判。战俘被关押到附近的一座岛上，以便保护他们，但克基拉民主派想要杀掉这些战俘。他们诱骗寡头派逃跑，雅典人宣布休战协定已经被破坏，于是将战俘交给了杀气腾腾的克基拉民主派。不少战俘被极其残忍地处死，其他人自杀，他们的妻女则被奴役。索福克勒斯和欧律墨冬放任这些可怕暴行的发生。“就这样，山上的克基拉人被民主派消灭了，持续了许久的党争以这种方式结束，至少从战争的角度讲是这样，因为再也没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寡头派了。”（4.48.5）

作战季节行将结束，雅典的盟邦在希腊西北部赢得了又一场胜利。纳夫帕克托斯的驻军和阿卡纳尼亚人以欺骗手段占领了阿纳克托里翁（希腊的围城战往往以欺骗手段取胜），随后阿卡纳尼亚人将科林斯人逐出阿纳克托里翁，将这座城市转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对科林斯人来说，失去阿纳克托里翁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它让他们原本就逐渐暗淡

的威望在这样一个重要地区愈加受损。

在整个战争期间，双方都在努力获取“蛮族”国家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波斯。阿里斯托芬于前425年创作的《阿卡奈人》中提到一个令人捧腹的场景：波斯国王派来的一名使臣——“国王之眼”——出现在雅典的舞台上，这表明雅典人在与波斯联系，或许早在战争初期就已经相互联络了。斯巴达人也在拉拢波斯人。前430年，斯巴达派往波斯宫廷的一个使团被雅典人截获。前425/前424年冬季，雅典人抓获了另一名使者，此人携带着波斯国王给斯巴达的回信。“国王陛下不清楚斯巴达人的诉求是什么。尽管有许多使者抵达，他们传达的信息却不尽相同。如果他们想明确表达意见，应当派人与波斯信使一同觐见国王。”（4.50.2）斯巴达人的含糊不清或许是由于波斯要支持斯巴达的话，提出的价码至少是吞并亚洲的希腊城邦，而斯巴达人打着“为希腊人自由而战”的旗号，因此在道义上不能将亚洲的希腊人拱手交给波斯。雅典人将抓获的信使连同自己的使者一起送到波斯国王那里，希望从这局势中获利。但当他们抵达以弗所时却得知，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国王已经驾崩。他们判断此时与波斯谈判不是个很好的时机。雅典和斯巴达双方都没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得到波斯的帮助。

前425年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战争进程。僵局被打破了，雅典人在各地都占了上风。对各臣属城邦征收的新一笔贡金缓解了他们的财政困难。在缴获敌人舰队之后，他们解除了敌人在海上的威胁，消除了雅典帝国海洋部分发生叛乱的可能性。西北部的敌人几乎已经完全肃清。近期没有波斯干预战争的直接危险，而雅典在西西里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西方的希腊人没有办法去援助他们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多利亚亲戚。最后，在斯法克特里亚岛抓获的俘虏被安全地关押在雅典，作为人质，保证斯巴达人不敢入侵阿提卡。雅典人有理由感到满意，他们也急于扩大战果以获得全面胜利。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而答案取决于他们希冀的究竟是怎样的胜利。

有些人希望与斯巴达议和，让斯巴达承认雅典帝国的完整性，并与雅典结盟。这些人主张有限的战略。他们希望避免大规模陆战；牢牢控制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要塞，若有可能，占领更多据点；以这些要塞为基地去骚扰、挫败和拖垮敌人。换句话说，就是将伯里克利的政策继续下去或做适度的扩展。

克里昂和与他持相同政见的人提出，这样的和平并不安全，因为说到底它取决于斯巴达的承诺和善意。因此，他们坚持要求必须要有切实可见的安全保障，以确保战火不会再次燃起。他们的目标是控制墨伽拉和实现玻俄提亚的中立化，斯巴达人在谈判中也许会向雅典承诺这两点，但他们不可能真正兑现诺言。此时敌人虚弱且斗志低迷，雅典力量处于巅峰，因此在此时与敌人议和是愚蠢的。正确的战略是进攻墨伽拉、玻俄提亚以及其他合适的地点。在征服了这些地方之后，和谈的时机才可能真正成熟，才可能真正获得持久的和平。克里昂及其朋友的想法一定是这样的。不足为奇的是，雅典人果然选择遵照他们的建议。

---

[1]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

[2] 关于皮洛斯和斯法克特里亚岛的地理状况，存在很大争议。有些学者为了解释这些困难，提出此次战役涉及的海湾不是整个纳瓦里诺湾，而是皮洛斯南端的一个较小的海湾，或者附近的另一个小海湾。但其中一位学者承认："尽管这个小海湾符合修昔底德对战场的部分描述，并且能够解释他的故事的一部分，却与另一部分描述相矛盾。并且在很多人看来，这个小海湾也太小了，修昔底德描述的战役不可能在那里发生。"Robert B.Strassler，ed.，*The Landmark Thucydides*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6），p.228 note.（作者注）

[3] 利姆诺斯和伊姆布罗斯是爱琴海北部的两个岛屿，是雅典的盟邦。

[4] 在希腊中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

[5] 古希腊的每一个国家、城市或村庄都有自己的圣火，代表集体的团结和活力。圣火由统治者或其家人照管，保持常年燃烧。圣火所在的场所即圣火会堂。早期的酋长或国王可能以圣火会堂为宅邸。圣火会堂是一个社区的宗教和政治中心，是全体人民的"家"。当一个城邦的人在外地建立殖民地时，要用母

国的圣火来点燃新城市的圣火。外国使节和有功的公民在圣火会堂受到款待，这是极大的荣耀。

第十三章 雅典的攻势：墨伽拉与德里昂（前424年）

克里昂在斯法克特里亚岛的成功使他在前424年春当选为将军，另外两位积极进取的主战派人士德摩斯梯尼和拉马库斯也成为将军。其他将军包括尼基阿斯、尼科斯特拉图斯、阿乌托克利斯和奥洛鲁斯之子修昔底德（他将来会撰写这场战争的历史），这四人都反对克里昂及其政策。雅典人开始准备发动他们在战争期间最大胆的军事行动，这并不说明将军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化，而是表明大多数雅典人在近期胜利的鼓舞下，决心采纳更加积极主动的战略。

基西拉岛与泰里亚

5月初，三位温和派人士——尼基阿斯、尼科斯特拉图斯和阿乌托克利斯——带领60艘战船、2000名重步兵、一些骑兵和盟军出发了，目标是占领拉科尼亚南端外海的基西拉岛（见地图1）。此次入侵是新战略的一部分，以在皮洛斯和迈萨纳的行动为蓝本，目标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周边建立要塞，攻击、骚扰和挫败敌人，打击敌人的士气。基西拉岛是斯巴达与埃及之间的一个贸易基地，为斯巴达提供粮食和其他商品，同时也是防卫伯罗奔尼撒半岛海岸的前哨。一旦基西拉岛被雅典人控制，那么斯巴达与埃及的贸易就会被切断。基西拉岛将不仅成为雅典人袭掠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跳板，还将成为雅典人去往西方途中一个便利的停留地。

尼基阿斯以10艘战船和一小队重步兵，迅速占领了基西拉岛的沿海城市斯坎代亚，而主力部队则径直冲向岛屿内部的基西拉城，将敌军驱赶到岛屿北部。尼基阿斯说服基西拉人投降，并给出了宽大的条件：基西拉人可以留在岛屿上，保留自己的土地，只需每年纳贡4塔兰同，并同意在岛上驻扎雅典军队。

基西拉岛的陷落对斯巴达人的打击几乎与丢失皮洛斯和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俘虏一样严重。斯巴达人的反应是向伯罗奔尼撒半岛许多地方派驻军队，并第一次组织了400名骑兵的部队和一支弓箭手队伍。修昔底德生动地描绘了斯巴达人此时的心理：

> 他们百般戒备，因为他们害怕发生反对现行秩序的革命，因为他们在基西拉岛上遭受的灾难非常严重且出乎意料。皮洛斯和基西拉岛被占领了。他们四面受敌，战局发展既迅捷又难以防备……在军事上，他们变得比以往更加胆怯，因为他们卷入了一场海战，他们的日常战备无法帮助他们应付战局，而且在这陌生的战场上他们的敌手是雅典人，而雅典人屡战屡胜。与此同时，斯巴达人遭到的意外灾祸如此之多，在如此之短的时期内接踵而至，令他们心惊胆寒。他们担心像基西拉岛上那样的灾难，也许会再一次降临。所以，他们不再大胆地投入战斗，觉得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好结果。他们没有自信，而这是由于他们之前很少尝到败绩的滋味。（4.55）

随后，雅典人进攻了泰里亚（在基努利亚地区）。这是斯巴达和阿尔戈斯的边境地带，长期以来一直是两国冲突的根源；有些史学家说它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尔萨斯-洛林。斯巴达人将这座城镇交给了埃吉那人（埃吉那人在战争开始时被雅典人从其故国岛屿驱逐了出去）。斯巴达人和埃吉那人一起在海边建造一座要塞的时候，雅典舰队杀来了。若是斯巴达人坚决抵抗，或许能阻止雅典人登陆，但斯巴达人斗志涣散。雅典人未遇到任何抵抗，径直冲进泰里亚，烧毁了城市，掠夺了战利品，杀死许多埃吉那人，并抓了许多俘虏，其中包括来自基西拉岛的难民。雅典人将这些基西拉人分散羁押到爱琴海诸岛，但将所有的埃吉那人处死，“因为他们在过去始终是雅典的敌人”（4.57.5）。战争令宿怨愈发激化，现在又增添了这么一桩战争暴行。

令人失望的西西里岛局势

在西西里岛，雅典人未能取得同等程度的成功。墨西拿失陷和瑞吉昂被包围使他们在墨西拿海峡两岸都没有一个基地（他们最终收复了瑞吉昂，但墨西拿一直在敌人手中）。前425年，雅典人没有在西西里岛

上作战，而是任凭岛上的希腊人自相残杀，未曾施加干预。索福克勒斯和欧律墨冬抵达西西里岛后，发现他们的盟友已经厌战，并且怀疑雅典人有没有足够的意志和能力，在希腊大陆激战的同时还能为捍卫他们的利益而继续作战。前424年，叙拉古的盟邦杰拉和雅典的盟邦卡马里纳单独媾和了。随后，这两个城邦邀请西西里岛的其他城邦到杰拉开会，寻求达成共同协约。这可以算是一次外交大会，在希腊历史上是很罕见的。在向与会者讲话时，叙拉古的赫莫克拉提斯声称自己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城邦发言，而是代表整个西西里岛。他指控强大的雅典对西西里岛心怀不轨。他敦促西西里岛的希腊人停止多利亚人和伊奥尼亚人之间的冲突，因为那样只会让外人轻松渔利。他提出的愿景是西西里岛的希腊人联合起来，岛上所有的希腊城邦之间维持永久和平，西西里岛的命运由西西里人掌控。

> 总的来讲，我们是邻居，一起居住在这片被大海环绕的土地上，并被称为西西里人。我设想当局势需要时，我们便去打仗；我们之间通过共同磋商来达成和平。但如果我们聪明的话，当外邦人入侵时，我们应当一致对外。因为如果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城邦受到伤害，那么所有城邦都会处于威胁之中。我们再也不应当召唤外邦人来当盟友或者调停者。如果我们停止召唤外邦人，在当前对西西里岛就有两个好处：摆脱雅典人和结束我们的内战。至于未来，我们将在一个自由国家里生活，不像现在这样受到外界的威胁。（4.64.3-5）

赫莫克拉提斯的讲话常被认为是真诚而无私的，是在呼吁集体的福祉，但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的动机。毕竟，如果西西里岛上较弱的希腊城邦承诺不再寻求希腊大陆上强国的支援，那么最大的受益者是叙拉古。另外，在前424年，叙拉古是西西里岛上最强大、最具侵略性的国家，它受到雅典的威胁。赫莫克拉提斯后来的所作所为也让我们怀疑他的诚实。前415年，为了抵抗雅典人的入侵，他敦促叙拉古人寻求外界援助，不仅向科林斯和斯巴达这样的希腊城邦求援，甚至还向迦太基求援。他还敦促西西里人加入伯罗奔尼撒人反对雅典人的战争，尽管那时雅典人已经被逐出西西里岛了。

但在前424年，被战争折磨得筋疲力尽的西西里人在杰拉听信了赫莫克拉提斯的雄辩，再加上叙拉古将摩根提那[1]割让给卡马里纳以展示自己的信誉，于是大家同意以现状为基础缔结和平协约。雅典人在西西里岛的盟友将此事告知雅典人，并邀请他们加入协约。雅典人在西西里岛没有基地，自己的盟友又不愿意继续作战，而且雅典人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征服该岛，于是他们接受了和平，起航回家。

雅典的几位将军或许对这个结局感到满意，因为他们的使命就是保护雅典在西西里岛的盟友，阻止叙拉古控制整个西西里岛，或许还有调查在当地获益的前景。杰拉的大会可以说是达成了雅典人的所有目标。但返回雅典之后，这些将军很快遭到起诉，罪名是在接受了敌人的贿赂后撤军，而他们原本可以征服西西里岛。失败的指挥官常常受到这样的指控；即便那些得胜的指挥官，若是被认为没有获得完整的胜利，也会遭到指控。几位将军可能的确从西西里岛的朋友那里收了一些礼物，但没有他们受贿的证据。不过，他们仍然全都被定了罪：索福克勒斯和皮索多鲁斯被流放，欧律墨冬被罚款。修昔底德对此案的解释如下："由于雅典人此时正春风得意，他们认为自己的一切行动都会顺利成功，不管他们的力量充足与否，不管任务是轻松还是困难，都一定会胜利。他们之所以这样自信，是因为他们在之前的大多数行动中都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这给了他们希望和力量。"（4.65.4）

到前424年，在皮洛斯和斯法克特里亚岛、迈萨纳半岛和基西拉岛的胜利之后，雅典人比以往有了更高的期望，或许的确抱有一种不现实的乐观主义，但他们确实有理由对将军们的表现不满意。毕竟，前427年以20艘战船第一次远征西西里岛的行动阻止了叙拉古人得胜，占领了墨西拿，赢得了西西里岛上希腊人和土著西库尔人的支持，并让这些岛民热情高涨，以至于他们派遣使者到雅典请求更多的援助。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前424年雅典人为什么自信只需要再投入40艘战船就能快速结束西西里岛战争，并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当将军们告诉雅典人，西

西里岛战争已经按照“西西里岛的命运由西西里人掌控”的原则结束了（这毕竟是叙拉古一位主要贵族政治家的口号），而且雅典人实际上是被盟友请出去的时候，雅典人必然是万般震惊。雅典人完全有理由怀疑赫莫克拉提斯的口号不过是幌子，掩盖着“西西里岛的命运由叙拉古人掌控”的真相。雅典人也有理由担心西西里岛会在一个对雅典之敌友好的多利亚人国家的领导下实现统一。他们也有理由怀疑以前20艘战船就差一点征服西西里岛，现在60艘战船怎么可能把它丢掉了！

事实上，索福克勒斯、欧律墨冬和皮索多鲁斯表现出的积极主动精神极少，取得的成绩也极少。他们在皮洛斯有所耽搁，让来自克基拉岛的斯巴达舰队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到西西里岛又太晚，没有办法取得多少成果，因为他们被迫参与持续了几乎整个夏季的对斯法克特里亚岛的封锁。他们若是更警醒些，就能尽早在西西里岛登陆，极大地影响战局。在这样令人失望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将这些军官免职。但在这件事中，雅典人的反应并非缺乏理智，而是有些过分理智了。

雅典人进攻墨伽拉

前424年夏季，雅典人几乎完全抛弃了伯里克利的战略，对邻国发动了积极攻势，目的是剥夺斯巴达人的关键盟友，保障阿提卡的安全，防止再次遭到入侵。7月，他们尝试控制墨伽拉，并终结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入侵威胁。自战争爆发以来，受苦最多的就是墨伽拉人，禁运毁掉了他们在爱琴海的贸易，每一年雅典军队都会蹂躏他们的土地。前427年，雅典人占领了米诺亚岛，于是墨伽拉人连一艘小船都没有办法溜出尼萨亚港再进入萨龙湾，墨伽拉脖子上的绞索被勒得更紧了。这苦难使派系之间发生冲突，一群民主派将极端寡头派政府驱逐了出去。墨伽拉的政权更迭令斯巴达及其许多寡头制盟邦大为警觉，在尼萨亚派驻了军队，以监视墨伽拉人，同时将被流放的墨伽拉寡头派安置在普拉蒂亚城原址。一年后，这些寡头派离开普拉蒂亚，占领了佩加（墨伽拉的西部港口，在科林斯湾岸边），从那里封闭了墨伽拉的最后一个入海口

（见地图4）。到前424年，墨伽拉人要想获取粮食和其他补给物资，只能取道科林斯，经陆路去往伯罗奔尼撒半岛。但由于伯罗奔尼撒盟邦不喜欢也不信任墨伽拉民主派，因此并不与其合作。

面对如此大的压力，墨伽拉人从佩加召回了流亡的寡头派，希望他们停止攻击，以恢复使用西部港口。与此同时，民主派领导人害怕寡头派归来之后会让墨伽拉恢复寡头统治并将民主派流放或处死，于是密谋将自己的城市交给雅典。他们与雅典将军希波克拉底[2]和德摩斯梯尼一起，计划让雅典人控制连接墨伽拉与尼萨亚的长墙，阻止伯罗奔尼撒军队进入墨伽拉。然后，民主派会把城市出卖给雅典人。如果一切顺利，墨伽拉将加入雅典同盟，结束雅典对其一年一度的入侵以及长期的贸易禁运和封锁。在雅典人的帮助下，墨伽拉人还可以将流亡的寡头派从佩加驱逐出去，收复自己的两个港口，恢复昔日的繁荣。他们可以驻防南部边境上的要塞，永久阻止伯罗奔尼撒人进入墨伽利斯。

对身处险境的民主派领导人来讲，这个计划的好处远远胜过坏处，但大多数墨伽拉人不是这么想的。墨伽拉人与雅典人至迟从前6世纪开始就互相敌视。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两国为了利益暂时联合，最后以墨伽拉人屠杀雅典驻军告终。而在两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的年月里，两国发生了边界纠纷、渎神谋杀的指控和后来的禁运风波。雅典是墨伽拉人恨之入骨的死敌，纵然现在与其结盟比较有利，但墨伽拉人民还是很难接受。因此，民主派不能公开同意与雅典结盟，只能秘密勾结雅典人。

雅典人占领尼萨亚的计划非常复杂，风险极大。希波克拉底率领600名重步兵趁夜色出航，在尼萨亚城墙附近的一条壕沟内隐蔽起来。与此同时，德摩斯梯尼带领一些轻装的普拉蒂亚人和一小群雅典重步兵，取道厄琉息斯，从陆路前进，在更靠近尼萨亚的恩亚琉斯设下埋伏。他们的成功取决于出其不意的袭击和保守秘密，“在整个夜间，除

了负责人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4.67.2）。

与此同时，墨伽拉民主派也在参与对城墙的三面夹击。每天夜里，伯罗奔尼撒人都允许墨伽拉人打开尼萨亚的城门，用大车运出一艘小船（墨伽拉人称要用这艘船去袭击雅典航船），然后将其运回城内。在约定的那天夜里，墨伽拉民主派会让雅典人藏在船内从这座城门进城。

当夜，墨伽拉民主派杀死了城门的哨兵，希波克拉底带领部下进入了尼萨亚城。拂晓时，雅典人控制了长墙。在约定的时间内，4000名雅典重步兵和600名骑兵抵达那里，以便保卫他们在那里的阵地。

即便到了这个阶段，墨伽拉民主派仍然没有公开宣布改换阵营，而是对他们的同胞耍了一个可怕的花招，以便达到目的：他们提议率领墨伽拉人冲出城去，进攻严阵以待的雅典军队，密谋者们将带有标识，好让雅典人在战斗中饶过他们；其他人若不投降，将被雅典人屠杀。但其中一位密谋者良心发现，将阴谋泄露给寡头派，寡头派劝服了其他的墨伽拉人，让他们紧闭城门。假如民主派打开了城门，那么雅典人一定能占领墨伽拉，而斯巴达人根本来不及派兵干预。

雅典人仍然有机会迫使墨伽拉投降，但不幸的是，伯拉西达登场了。他碰巧在科林斯和西锡安附近，为了别的事情在征募一支军队。他得知了墨伽拉事态，请求玻俄提亚人支援，与他会合。此时，伯拉西达手中有3800名盟军和数百名斯巴达士兵。他希望用这支力量挽救尼萨亚，但为时已晚，于是他率领300名士兵，努力营救墨伽拉。

但是，墨伽拉人不愿意让他进城。民主派知道，斯巴达人会消灭他们、恢复寡头派流亡者的统治，而流亡者的寡头派朋友们也害怕斯巴达人的抵达会引发内战，给雅典军队占领城市的机会。民主派和寡头派都确信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军队之间必有一战，他们都希望静观其变。

玻俄提亚人知道，如果雅典人控制了墨伽利斯，玻俄提亚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了，玻俄提亚人将遭到攻击。于是，他们派遣了2200名重步兵和600名骑兵去支援伯拉西达。此时雅典的重步兵不到5000人，而敌人却有6000人。雅典人没有强行与墨伽拉人交锋，而是在尼萨亚静候。伯拉西达也选择等待，因为他相信自己的阵地坚固，雅典人若是进攻必然吃亏；他的军队的存在或许能让雅典人胆怯地撤退，这样他就能不战而胜地挽救墨伽拉。果然如此，雅典人撤到了尼萨亚城墙之后，而伯拉西达返回墨伽拉，这一次墨伽拉人允许他进城。雅典人在尼萨亚留下驻防部队，主力撤回了阿提卡，算是承认了失败。在墨伽拉，民主派的叛国罪行被揭穿，他们逃离了城市。寡头派流亡者再度掌权，一心复仇。他们惩处了仍然留在城内的所有政敌，建立了一个非常狭隘的政权，政治权力被掌握在一小群人手中。从此以后，墨伽拉始终是斯巴达的忠实盟友，对雅典则更加憎恨。

雅典入侵玻俄提亚

大约8月初，雅典人向玻俄提亚发动了一次大胆而复杂的行动，与之前攻击墨伽拉有相似之处。这说明这两次进攻可能是同时谋划出来的，是同一场大规模行动的组成部分，旨在改变战争走向。墨伽拉的行动虽然失败了，但德摩斯梯尼和希波克拉底并不气馁，开始尝试实施计划的第二部分，即攻击玻俄提亚。

在玻俄提亚，好几个城镇的民主派都在私下里与雅典人密谋，好让自己的派系掌权，而德摩斯梯尼与希波克拉底很乐意与他们合作。在玻俄提亚西部，民主派准备将西弗艾（泰斯皮亚的港口）和喀罗尼亚出卖给雅典人。与此同时，在玻俄提亚东部，雅典人计划占领位于德里昂的阿波罗圣所，此地距离雅典边境很近（见地图4）。和在墨伽拉的情况一样，要想成功，需要同时发动进攻，以阻止玻俄提亚人集结大军来对付德里昂的雅典主力部队。要想让内奸成功地将西弗艾与喀罗尼亚交给雅典，保守机密就至关重要。雅典人希望同时占领上述三个地方，这也

许能削弱底比斯人的决心，使玻俄提亚全境发生民主的、反底比斯的叛乱。即便不能达成这样的目标，至少雅典也能在玻俄提亚边境拥有三座要塞，可以将它们作为袭掠作战的基地和逃亡者的避难所。后一种想法是雅典人新战略的一部分，这种新战略就是在敌境建立永久性的设防基地，其在拉科尼亚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假以时日，这三座要塞的压力或许能迫使玻俄提亚人投降。

对德里昂发动主攻需要一支大部队，在西弗艾的登陆作战需要一支较小的部队。派遣这么多军队意味着更多士兵将面临风险，雅典人不愿意这样冒险，德摩斯梯尼则期望从希腊西北部的盟邦征募士兵。然而集结这些士兵需要一定的时间，泄露计划的风险也就更大了，毕竟这种危险是无法避免的。德摩斯梯尼带领40艘战船去了西北部，征募到了他需要的士兵，然后静候进攻西弗艾的日子。从他启程离开雅典到他抵达西弗艾，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月，这或许是因为玻俄提亚的民主派需要如此长的时间来准备起事。

11月初，当德摩斯梯尼的军队终于乘船进入西弗艾港时，一切都变得不对劲了。民主派反叛者当中有人向玻俄提亚人告密，玻俄提亚人派遣军队占据了喀罗尼亚和西弗艾。但是，如果雅典人的两场攻势（分别针对西弗艾和德里昂）准确地同时发动，那么希波克拉底在东方对德里昂的攻击或许能转移玻俄提亚军队的注意力。不幸的是，雅典人的行动时间没有安排好。因为德摩斯梯尼太早到达西弗艾，玻俄提亚人得以自由地集中力量对付他。德摩斯梯尼没有办法强行攻入防卫牢固的地区，于是雅典人在玻俄提亚西部的计划失败了。

在德里昂，希波克拉底拥有约7000名重步兵、10000多名外邦和盟军士兵，以及许多前来帮助建造要塞的雅典平民。雅典军队在此的目的仅仅是保护建造要塞的劳工，恫吓任何敢于侵犯的玻俄提亚军队。要塞竣工之后，只需少量士兵即可守住它。德摩斯梯尼和希波克拉底始终没

有打算冒险和任何兵力与自己相当的敌军交战。

在占据这个地区之后，雅典人还占领了阿波罗神的圣所，这严重违反了希腊禁忌。这种犯禁行为是表明这场血腥而漫长的“现代”战争违背传统规则的又一典型例证。

德里昂

希波克拉底没有受到玻俄提亚人的干扰，三天内便建成了要塞，然后准备带着自己的部队回国。他不认为自己会遇到麻烦，因为他不知道玻俄提亚西部发生了什么。他的大部分部队南下，直接返回雅典。重步兵在距离德里昂约1英里的地方停下等候希波克拉底将军，此时他还在德里昂做最后的安排。与此同时，玻俄提亚人在几英里外的塔那格拉集结起来，拥有7000名重步兵（和雅典人兵力相当）、10000人的轻装部队、1000名骑兵和500名轻盾兵[3]。尽管玻俄提亚军队的实力更强，而且雅典人的新要塞就建在玻俄提亚的领土之上，但玻俄提亚联盟的行政长官中有九人投票反对与雅典人交战。仅有的两名主张交战的行政长官都是底比斯人。

玻俄提亚军队的指挥官是埃奥里达斯之子帕冈达斯，一位过了花甲之年的显赫贵族。他察觉到雅典人的薄弱，于是劝服玻俄提亚人坚持作战。在希腊重步兵的交锋中，防卫领土一方的胜算高达75%，因为组成步兵方阵的农夫和军人在保卫土地和家园时会比进攻时更加勇猛。双方的将军在战前演讲中都提到了这种倾向。帕冈达斯敦促士兵们全力厮杀，尽管敌人正在撤往国境以内。通常来讲，自由意味着捍卫自己的土地，但此次的敌人是雅典人。“他们企图奴役无论远近的人民，我们除了死战到底，还有别的路可走吗？”（4.92.4）希波克拉底则告诉他的雅典士兵，不要害怕在外国土地上作战。他解释说此次战斗实际上是在保卫雅典，并阐明了此次战役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胜利，伯罗奔尼撒人就会失去玻俄提亚的骑兵，就再也不能入侵阿提卡。此次一战，我们

将征服他们的土地，解放我们自己的土地！”（4.95.2）

帕冈达斯的演说强调了德里昂战役的独特性质。这不是通常的边境冲突，而是“死战到底”。也就是说，目标是歼灭雅典军队和结束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而实际上德里昂战役只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帕冈达斯率军前进到一个位置上，这里的一道山脊将两军隔开。他在排兵布阵时发挥了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他在两翼部署了骑兵和轻装部队，以抵抗敌人的侧翼包抄。在重步兵方阵的右翼，他集中了底比斯人的力量，纵深达到非同寻常的二十五排，而不是通常的八排。来自其他城邦的重步兵则根据自身意愿布阵，但可能是按照标准的战术。这是第一次有史料记载的大纵深侧翼的重步兵方阵，这种战术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将被底比斯的伊巴密浓达[4]和马其顿的腓力二世与亚历山大大帝运用，发挥极大的杀伤力。玻俄提亚人的右翼几乎一定可以打败敌军左翼，而雅典人按照八排纵深来布阵，战线会更长，由于两军的重步兵数量是相当的，雅典人可能对玻俄提亚人实施侧翼攻击。因此，玻俄提亚人能否取得胜利取决于右翼的底比斯人能否迅速压垮对方并将其击溃。与此同时，玻俄提亚人左翼的骑兵和轻装部队必须阻止雅典人形成突破。底比斯人还投入了300名精锐重步兵，他们显然受过特殊训练，而且来自最富裕的阶层。这也是史册记载的第一次有专业部队得到不同于普通士兵的特殊训练，而当时普通的步兵方阵成员都是民兵。这证明了希腊战争的复杂程度在不断提高，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这种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

帕冈达斯率军开始从山脊顶端向下推进时，希波克拉底的战前演说还没有结束，才刚刚到达战线中路。为了让所有士兵都听得到他的演说，他需要沿着战线走，多次重复自己的演说。此时他正在己方右翼，很快意识到自己可以包抄敌军方阵的左翼。他也一定注意到，战场两侧的溪谷会阻碍敌军两翼骑兵与轻装部队前进，而他自己的两翼兵力弱于敌军。于是，他命令部下冲锋上山。

雅典人的右翼迅速击溃了玻俄提亚人的左翼（那里是来自泰斯皮亚、塔那格拉和奥尔霍迈诺斯的士兵）。在战场的另一端，底比斯人表现不佳，因为与他们对阵的雅典人非常坚韧不拔，仅仅是一步一步地缓慢后退，没有发生阵脚大乱、一哄而散的现象。这对玻俄提亚人来说是极其危险的时刻，对雅典人而言则是充满希望的时刻。因为若是战局继续发展下去，雅典右翼将抢先突破玻俄提亚战线，而底比斯右翼还没有办法击溃雅典战线。随后底比斯人将遭到钳形攻势，玻俄提亚军队将会溃败，甚至被歼灭。

就在这时，帕冈达斯表现出了他的战术天才，扭转了战局。他派遣两队骑兵从右翼出发，从山的背后绕出去，那是雅典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们最终杀到得胜的雅典人背后，发起了出其不意的攻击，这令雅典人恐慌起来，因为他们以为敌人的生力军赶到了，在袭击他们的后方。雅典人冲锋的势头被遏制了，底比斯右翼有了时间去突破对面的雅典人，将其击溃。雅典军队现在开始乱哄哄地逃跑，遭到玻俄提亚和洛克里斯骑兵的追击。由于夜幕降临，雅典人才没有遭到更大规模的屠戮。在漫长而复杂的谈判之后，雅典人终于被允许收回己方死者遗体。他们发现，己方除了损失许多轻装部队和非战斗人员之外，还损失了近1000名重步兵，包括将军希波克拉底。到目前为止，这是雅典人在十年战争中遭遇的最严重损失。为了摧毁雅典人在德里昂建造的要塞，玻俄提亚人建造了一种巨型喷火器，点燃了要塞的城墙，将守军逐出。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催生了一些新技术，以便解决军事上的问题。

古典时代的战役中很少有比德里昂战役更有名的，主要是因为苏格拉底作为一名重步兵参加了此次战役，而亚西比德也作为一名骑兵参战。在战场上，帕冈达斯的指挥非常精彩，他的战略革新也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此次战役在军事上有着重大意义。雅典人未能迫使玻俄提亚退出战争，这鼓舞了斯巴达联盟。在此之前，他们以为胜利是不可能的，德里昂战役给了他们希望。在雅典，战败和惨重的伤亡打击了主

战派，对那些主张议和的人有所帮助。有些批评家指责是雅典人的战略导致了德里昂的灾难；有些人批评它不符合伯里克利的精神，攻击性过强；也有人批评雅典人没有选择直截了当的进攻，而是采用过于复杂而迂回的战法。但到前424年，事实已经证明伯里克利战略不具有可行性，采纳新战略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雅典人的兵力和士气都逊于敌人，决战决胜、正面对垒的战略也不合适。

说到底，雅典人尝试迫使玻俄提亚退出战争的想法是很有道理的。雅典在重步兵、骑兵和轻装部队上都逊于斯巴达联盟，因此依靠奇袭和分而治之的战略也是正确的。而且，原先计划的风险并不大。根据计划，德摩斯梯尼必须等到西弗艾民主派发动革命之后才在西弗艾登陆，雅典人也不曾打算在德里昂或其他任何地方与敌军交战。即便在这些地方出了麻烦，回家的道路仍然是安全的。即便保守机密失败或行动的时机配合出了问题，如果希波克拉底从德里昂撤退而不是留下来作战，也不会发生那样的灾祸。如果运气好一点的话，雅典人的此次行动很可能赢得一场重大胜利。但在前424年，在一连串了不起的成功之后，雅典人的好运气快要耗尽了。

---

[1] 西西里岛中部一座小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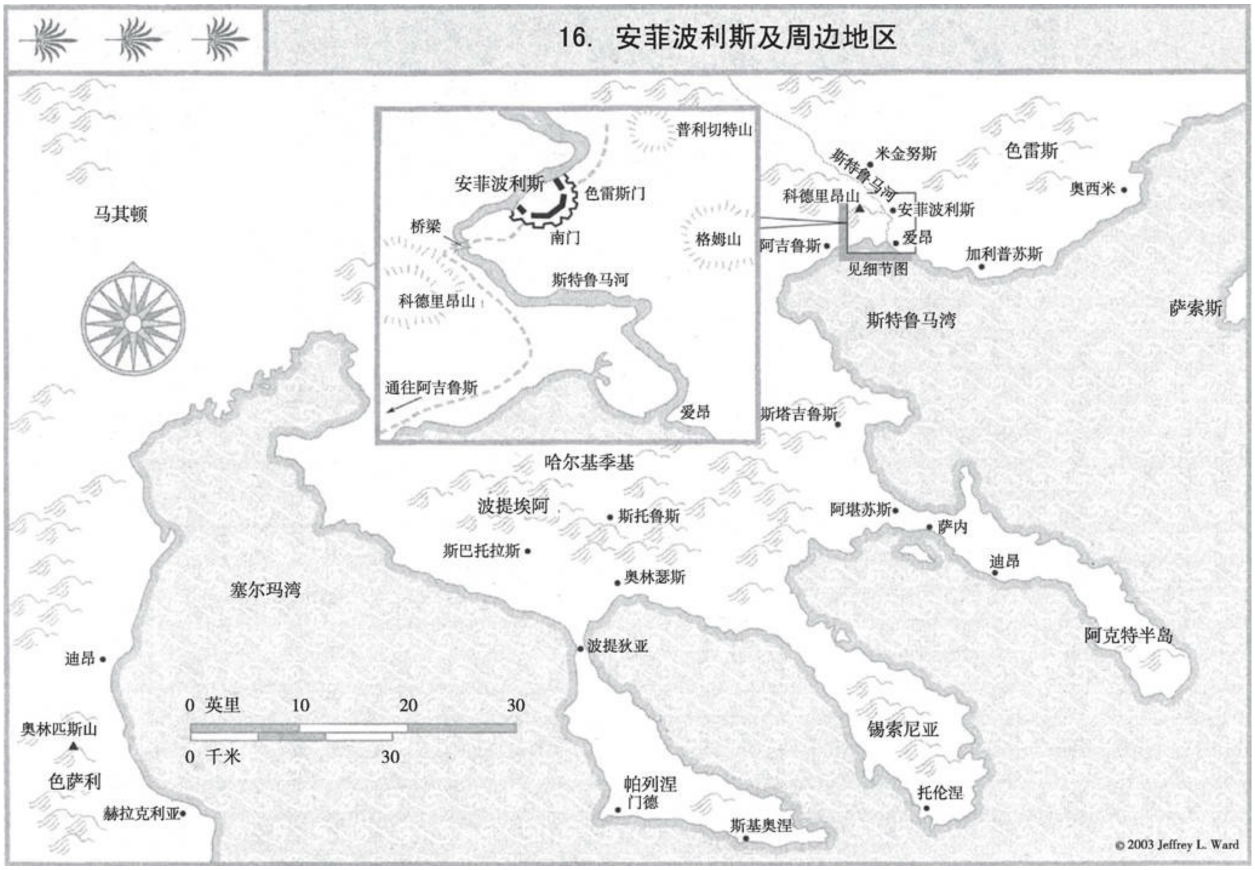
[2] 注意不是那个最有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

[3] 轻盾兵（peltast）是古希腊轻装部队的一种，源自色雷斯，得名自他们手持的轻型月牙形柳条盾，主要武器是标枪和剑。

[4] 伊巴密浓达（约前418～前362年），底比斯将军与政治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斯巴达着手在希腊世界建立霸权统治，遭到之前的盟邦反对。底比斯联合雅典、科林斯与阿尔戈斯等国与斯巴达对抗，多年战争后打败了斯巴达。底比斯跃升为一等强国，伊巴密浓达重塑了希腊政治版图，使旧的同盟解体，创立新的同盟，并监督各城邦的建设。他也具有很大的军事影响力，为底比斯赢得了数场主要战役的胜利。不过底比斯建立的霸权没有持续多久，后来被马其顿消灭。

第十四章 伯拉西达的色雷斯战役（前**424**～前**423**年）

前424年8月中旬，甚至在雅典人入侵玻俄提亚的灾难发生之前，伯拉西达已经在用更大胆的计划将战局扭转到有利于斯巴达的方向。他率军北上，奔向色雷斯，这是斯巴达人从陆路能够接触到的雅典帝国的唯一部分。他的这支军队包括700名按照重步兵标准武装起来的黑劳士和1000名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雇佣军重步兵。雅典人攻击墨伽拉的时候，伯拉西达的这支军队正好在科林斯附近集结，于是他挽救了墨伽拉。到前424年，雅典人以皮洛斯和基西拉岛为基地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骚扰已经令人无法忍受，为了缓解局势，斯巴达人愿意做一切尝试。伯拉西达的计划能够让斯巴达摆脱700名勇敢而身体强健的黑劳士，因为此时在皮洛斯的雅典人和美塞尼亚人正在鼓励黑劳士叛逃。唯一承受风险的斯巴达人就是这支军队的指挥官——伯拉西达自己。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安菲波利斯，此地是战略物资的来源，木材资源丰富，有金银矿；此地也具有战略意义，控制着斯特鲁马河上的通道和向东去往赫勒斯滂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道路，对雅典至关重要的运粮船就是经这两个海峡前往雅典城的（见地图16）。



通往安菲波利斯和位于马其顿与色雷斯之间的雅典臣属领地的道路是非常危险的。在它们和斯巴达的新殖民地（在赫拉克利亚）之间，隔着雅典曾经的盟友色萨利。色萨利是一块平坦广阔的土地，重步兵军队若是在这里遭遇了战斗力极强的色萨利骑兵，就很难安全通过。斯巴达人在希腊北部也没有朋友可以为他们提供兵员。即便如此，伯拉西达仍然热切希望发动一次攻击，前424年的事件似乎给了斯巴达一个良机：波提亚[1]人和哈尔基季基人（他们从前432年起就在反叛雅典），以及马其顿国王柏第卡斯二世（尽管他有时与雅典保持和平或与其结盟，但内心里一直是雅典的敌人）邀请斯巴达人派遣军队去色雷斯。反叛雅典的人们担心，因为胜利而勇气大增的雅典人很快会派遣一支军队清剿他们，而柏第卡斯二世由于与林凯斯提斯人[2]的国王阿拉巴尤斯发生了争吵，所以希望将伯罗奔尼撒军队拉拢到自己这边来。敌视雅典的希腊城邦或许值得信赖，可以支持斯巴达在希腊东北部作战，于是伯拉西达劝

服自己的政府批准了他的计划。

他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发生在色萨利，那里的平民百姓对雅典很友好。另外，没有一个希腊人愿意一支外国军队穿过自己的领土。修昔底德曾说：“色萨利通常是由一小群寡头统治者执掌政权。如果色萨利是民主制国家的话，伯拉西达绝对不可能率军穿过。”（4.78.3）来自法萨卢斯[3]的亲斯巴达人士派遣向导带领伯拉西达安全通过，而伯拉西达的外交手腕和机智敏锐使得他的军队抵达了法萨卢斯。从那里，色萨利向导引领他继续前进，抵达了柏第卡斯二世的领土。

雅典人得知伯拉西达抵达了希腊北部，于是宣布柏第卡斯二世是雅典的敌人，并开始对可疑的盟邦进行更严密的监视。为了继续获得柏第卡斯二世的支持，伯拉西达同意帮助他攻击其邻国。但是，伯拉西达与柏第卡斯二世之间很快就出现了纠纷。伯拉西达接受了阿拉巴尤斯的提议（以仲裁解决争端），并退出战斗，这让马其顿国王十分恼火。柏第卡斯二世的反应是减少了对伯拉西达部队的支持，原先为其一半兵力提供给养，现在只提供三分之一兵力的给养。

伯拉西达断定哈尔基季基半岛上的阿堪苏斯城将是攻打安菲波利斯的良好基地，于是在8月底率军前往阿堪苏斯（见地图16）。尽管阿堪苏斯内部有着激烈的派系斗争，伯拉西达并没有尝试猛攻或奸计。他努力劝说阿堪苏斯公民投降。修昔底德用冷嘲热讽或居高临下的贬抑口吻说，伯拉西达“虽然是个斯巴达人，却不是个糟糕的演说家”（4.84.2）。阿堪苏斯人允许他孤身一人进城。他以温和的言辞讲述斯巴达是希腊人的解放者，承诺让阿堪苏斯自治、不偏袒任何一个派系，并保护阿堪苏斯人抵抗雅典人的报复。最后，他威胁说如果他们不从，他就摧毁阿堪苏斯人正要收割的庄稼。阿堪苏斯人投票决定反叛雅典，接纳伯罗奔尼撒人，“因为伯拉西达巧舌如簧，而且阿堪苏斯人害怕自己的庄稼受损”（4.88.1）。附近的斯塔吉鲁斯镇也加入了反叛。这

一轮成功为斯巴达的事业积累了干劲。

攻克安菲波利斯

12月初，伯拉西达向安菲波利斯开进。一旦他占领了安菲波利斯，这整个地区必然会爆发普遍的反雅典叛乱，并为斯巴达人打开通往赫勒斯滂海峡的道路。安菲波利斯位于斯特鲁马河一个河湾处，三面有河水的保护（见地图16）。从西面可以通过河上桥梁进城，敌人若是从那个方向逼近，会遇到一堵环绕山丘的城墙，而安菲波利斯城就建在山丘之上。城东的城墙实际上将城市变成了一座岛屿。一支小舰队便足以抵挡从西方来的任何进攻。

安菲波利斯城内的雅典人不多，居民主要是修昔底德所谓的“混杂人群”，包括一些来自邻近的阿吉鲁斯的定居者。阿吉鲁斯人私下里敌视雅典，所以安菲波利斯城内的阿吉鲁斯人不是雅典的可靠盟友。一旦安菲波利斯遭到攻击或围困，它将会内外交困。

在一个漆黑的飘雪夜晚，伯拉西达率军抵达阿吉鲁斯，后者立刻宣布脱离雅典同盟。黎明前，伯拉西达抵达了斯特鲁马河上的桥梁，这是他的计划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暴风雪还在肆虐，他出其不意地袭击桥上哨兵，其中有一些人是内奸。伯罗奔尼撒人轻松占领了桥梁和城墙之外的所有土地，将许多大吃一惊的安菲波利斯人俘虏。在城内，不同民族的定居者之间立刻争吵了起来。修昔底德相信，如果伯拉西达选择立刻攻城，而不是劫掠周边乡村，他一定能轻松攻克城市。但用这么少的兵力猛攻一座有城墙的城市，必然会造成重大伤亡，并且可能失败，于是伯拉西达决定依赖计谋。但安菲波利斯人很快恢复了勇气，把守着城门，严防内奸。

雅典在安菲波利斯驻军的指挥官攸克利斯派人去爱昂（距安菲波利斯不到3英里，在斯特鲁马河口附近），请求修昔底德（当时是色雷斯

地区雅典舰队的指挥官）的救援。但修昔底德本人并不在爱昂，而是在半天航程之外的萨索斯岛。修昔底德的史书中没有解释他为什么不在爱昂。或许他在集结军队以便增援安菲波利斯（不过没有证据说明这就是他的目的），或许他的这趟旅行与安菲波利斯无关。不管原因是什么，他的姗姗来迟是导致安菲波利斯结局的一个关键因素。

修昔底德说，伯拉西达害怕他会很快驰援赶到（安菲波利斯人会更加顽强地抵抗），于是向安菲波利斯人提出了非常慷慨的投降条件。不管这种说法是真是假，若是有一支雅典舰队赶到，安菲波利斯人投降的概率会大大减少。于是，伯拉西达快速行动，以温和的条件劝降。但攸克利斯和安菲波利斯人知道修昔底德手中的战船不多，而且伯拉西达过桥之后，这些战船也没什么用。如果让斯巴达人强行攻破了城市，那么民众的命运会很悲惨，可能会被流放、奴役甚至处死。于是安菲波利斯人接受了伯拉西达提出的条件：安菲波利斯的任何居民都可以留下，保留自己的财产，享有平等权利；也可以在五天之内带着自己的财产自由离开。未曾明言的条件是安菲波利斯必须投靠斯巴达联盟，“这与他们害怕的遭遇相比，还算公平”（4.106.1）。伯拉西达的条件被公布之后，城内的抵抗瓦解了，居民们接受了投降条件。

伯拉西达进入安菲波利斯几个钟头之后，修昔底德带着他的7艘战船抵达了安菲波利斯。他的动作很快，将近50英里的路程仅用了约12小时。他可能是得到了旗语消息，“桥梁陷落，敌人到了”。这样的消息能够解释修昔底德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反应：“修昔底德特别希望能及时赶到，在安菲波利斯投降之前挽救它；但如果办不到这一点，那就尽量早到，以便挽救爱昂。”（4.104.5）他的确来得太晚，无法挽救安菲波利斯，但他确实阻止了斯巴达人占领爱昂。

修昔底德在安菲波利斯

安菲波利斯的陷落令雅典人恐惧而愤怒，他们认为这是修昔底德的

罪过。于是他遭到审判，被判处流放。他流亡了二十年，一直到战争结束。记述修昔底德生平的古代传记家们写道，是克里昂指控了修昔底德，罪名是叛国；这个罪名和侵吞公款一样，常被用来攻击失利的将军。克里昂仍然是雅典势力最大的政治家，也的确最有可能是克里昂向修昔底德发起了指控。法庭的决议是否公正，是史学家们长期以来争论的话题。令问题愈发复杂的是关于整个事件的唯一有用的史料记载是修昔底德自己写的，而这记载本身也令人困惑。尽管修昔底德始终没有直接讨论他遭到的判决，而是用一种显然很客观的态度来描述事件，但他简练而不加渲染的叙述是最有效的辩词。支撑这种评价的证据是，我们能够轻松地将他的叙述转化为对指控（修昔底德是导致安菲波利斯陷落的罪人）的直接回答。他或许会说："伯拉西达向斯特鲁马河上的桥梁发动突然袭击，这是一个紧急情况。桥上的守卫人数不多，有的人不忠诚，而且毫无防备，于是伯拉西达轻松占领了桥梁。守卫桥梁的责任属于城防司令攸克利斯。城市没有防御准备，但及时振作起来，阻止内奸，并向我求援。我当时在萨索斯岛，得到消息后立刻出发，希望尽可能挽救安菲波利斯，如果办不到的话，至少要保住爱昂。我知道被叛徒出卖的危险极大，我的到来有可能扭转局势，所以我轻装急进，速度极快。如果攸克利斯能多坚持一天，我们就能挫败伯拉西达。但是，攸克利斯没有坚守下去。我的快速行动和远见挽救了爱昂。"

无论修昔底德在法庭上陈述了怎样的辩词，都未能说服雅典陪审团，尽管他史书中暗含的自我辩护成功地说服了许多现代史学家。不过，假如他在法庭上的辩词与他在史书中记载的根本上相同，那么我们也能理解它为什么不能为他脱罪：它没有回答关键的问题，即事发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在爱昂，而是在萨索斯岛。

修昔底德去萨索斯岛无疑有正当的理由，但这不能洗脱他的罪责，即他未能预料到伯拉西达远征军的抵达，而且在错误的时机处于错误的地点。但修昔底德遭受的处罚过于严苛了，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伯拉西

达大胆而出人意料的战术，以及看着桥梁被占领和安菲波利斯人投降的攸克利斯似乎并没有受到审判和定罪。如果缺乏理智的公民们要寻找一个替罪羊，为什么仅仅抓住了修昔底德？我们不知道雅典陪审团会不会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将修昔底德和攸克利斯区别对待。雅典人不会自动地将所有受到指控的将军都定罪，也不会对被定罪的人施加同样的惩罚，而是要考虑案情的具体细节等。

不管究竟谁应当为此次失败负责，安菲波利斯的陷落鼓励了色雷斯其他地区的人民起来反抗雅典，不同地区的派系都秘密派遣使者，请求伯拉西达将他们的城邦拉到斯巴达阵营。在安菲波利斯被占领之后，斯特鲁马河上游不远处的米金努斯，以及爱琴海沿岸的加利普苏斯和奥西米相继变节，随后阿克特半岛[4]的绝大多数城邦都投奔到了斯巴达那边。

哈尔基季基半岛各城镇的公民寄希望于得到斯巴达的大力支持，并且低估了雅典的力量。他们在这两方面都大错特错。雅典人立刻派遣军队，加强他们对色雷斯地区的控制。尽管伯拉西达请求增援，并在斯特鲁马河上建造船只，斯巴达政府却拒绝了他的求援，“因为领导人们嫉妒他，还因为他们更希望收回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人，结束战争”（4.108.7）。

嫉妒肯定在斯巴达政府的决策中起了作用，但真实存在的政策分歧却是更重要的因素。自从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士兵被俘之后，主和派就在斯巴达占了上风，劝说斯巴达人派使团去雅典商讨和平条件，不过一次又一次地被雅典人拒绝。他们现在觉得伯拉西达的胜利对他们争取和平特别有帮助，因为占领了安菲波利斯和其他城镇之后，斯巴达处在一个特别有利的谈判地位，可以用这些城镇换回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俘虏、皮洛斯和基西拉岛。

我们很容易同情这些主和派，毕竟柏第卡斯二世也表现得不像个可

靠之人。派遣第二支军队穿过色萨利是非常危险的。雅典人仍然控制着皮洛斯和基西拉岛，而黑劳士蠢蠢欲动，此时很少有斯巴达人愿意派遣任何部队到远离家乡的地方。与此同时，雅典人在墨伽拉、玻俄提亚和安菲波利斯遭受的一连串失败已经打击了雅典主战派的公信力，雅典人也在考虑议和了。这一年开始之时，雅典人极度膨胀，希望取得全胜；到年底的时候，他们已经谦逊了不少，做好了妥协的准备。

停战

前423年春季，雅典人终于准备与斯巴达人议和，并同意停战一年以便商谈和平条件。根据停战协定，斯巴达人承诺允许雅典人去往德尔斐的圣所，并同意不再派遣战船出海。雅典人宣誓不接纳逃往皮洛斯的黑劳士。雅典将保留皮洛斯和基西拉岛，但在皮洛斯的驻军不得离开皮洛斯的狭小地界，基西拉岛的驻军不得与伯罗奔尼撒半岛有任何接触。在尼萨亚、米诺亚岛、阿塔兰塔岛的雅典驻军也要遵守同样的约束。根据之前与特洛伊曾人签订的协议，雅典人被允许留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的特洛伊曾。

为了促进和谈，双方的传令官和使者都得到了自由通行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双方还同意，任何分歧都将由仲裁解决。停战协定的最后一个条款体现了斯巴达人希望和平的真诚意愿：“这些条件对斯巴达人及其盟邦来说是很好的，但你们若发现有其他更好、更公正的条件，请到斯巴达来，告诉我们。斯巴达人及其盟邦绝不会拒绝你们提出的任何公正的建议。不过，请一定派遣拥有谈判全权的使者前来，就像你们对我们的要求一样。停战为期一年。”（4.118.8-10）

前423年3月底，雅典公民大会接受了停战协定，但很快就出了麻烦。玻俄提亚人（他们因在德里昂的胜利而扬扬自得）和福基斯人（与雅典有着宿怨）拒绝接受停战。由于他们控制着雅典人去往德尔斐的陆上通道，所以这相当于破坏了停战协定中允许雅典人去德尔斐的条款。

科林斯人和墨伽拉人也反对允许雅典人保留从他们那里夺去的土地的条款。但到目前为止，和平的最大障碍是在色雷斯统领着斯巴达军队的那位任性的军事天才。正在缔结停战协定的时候，哈尔基季基半岛的斯基奥涅镇反叛了雅典，伯拉西达立刻乘船前去利用这个新机遇。他将那些起初并不支持反叛雅典的人也争取过来，统一的斯基奥涅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公开姿态，授予伯拉西达一顶金冠，以褒奖这位“希腊的解放者”（4.121.1）。他很快将自己的军队驻扎在这座城镇，打算以它为基地，袭击位于同一半岛上的门德和波提狄亚。

伯拉西达如此雄心勃勃，在得知停战的消息后一定很难接受，尤其是斯基奥涅被排除在斯巴达控制区之外，因为它是在停战协定签署之后才反叛雅典的。为了保护斯基奥涅免遭雅典的报复，伯拉西达故意撒谎，坚持说反叛是在停战协定签署之前发生的。斯巴达人相信了他的话，宣示了对斯基奥涅的控制。但伯拉西达的谎言被揭穿后，等待他的只有倒霉。

雅典人已经知道斯基奥涅叛乱发生在停战协定之后，于是拒绝将它交付仲裁。一怒之下，雅典人同意了克里昂的建议，即摧毁斯基奥涅，屠杀其公民。这一次，雅典人不会再三思了。安菲波利斯、阿堪苏斯、托伦涅和希腊东北部其他一些城镇的叛变令伯里克利温和的帝国主义政策进一步丧失了公信力，雅典人现在愿意试一试克里昂的恐怖威慑政策。

与此同时，伯拉西达不理睬斯巴达政府的意愿，自行其是，旨在获得胜利而非和平。在停战期间，门德城反叛雅典，伯拉西达接纳了这些反叛者。愤怒的雅典人立刻准备派兵去攻击斯基奥涅和门德这两座兴风作浪的城市，而伯拉西达出兵保护它们。不幸的是，恰恰在他需要斯巴达军队在哈尔基季基半岛快速行动的时候，柏第卡斯二世却要求斯巴达军队与他一同攻击林凯斯提斯人。因为伯拉西达的军事补给依赖于马其

顿国王，所以没有办法拒绝他。

柏第卡斯二世的伊利里亚盟友的背信弃义迫使他撤退，但他与伯拉西达发生了争吵，因此两人无法合作对付雅典。马其顿人三更半夜撤走，将伯拉西达的部队留在脆弱的位置上，独自面对着强大的林凯斯提斯军队和改换阵营的伊利里亚人。但一贯机智精明的伯拉西达还是将他的部队带到了安全地带。这个事件之后，斯巴达与柏第卡斯二世的联盟就破产了。柏第卡斯二世“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在考虑如何尽快与雅典人议和及摆脱伯拉西达”（4.128.5）。

尼基阿斯远征色雷斯

尼基阿斯和尼基拉图斯负责指挥从帕列涅[5]出发、镇压斯基奥涅与门德叛乱的雅典远征军，但不会去讨伐托伦涅，因为托伦涅反叛的时间更早；根据停战协定，托伦涅属于斯巴达。他们决定不管伯拉西达做什么，都绝不违背停战协定，因为他们真心渴望和平。但他们也急于收复斯基奥涅与门德，因为伯拉西达违背停战协定的行为激怒了雅典人。尼基阿斯及其朋友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也必须尽快收复叛乱城镇，恢复到缔结停战协定时的状态。

在伯拉西达从北方的军事行动返回之前，雅典人在波提狄亚扎营。他们发现，防守门德的是当地人、300名斯基奥涅人和700名伯罗奔尼撒人，指挥官是斯巴达将军波利达米达斯。波利达米达斯不是像伯拉西达那样头脑灵活的人，而是身处异邦时严守上级命令的、典型的斯巴达人。他正准备进攻雅典人，这时门德的一些民主派拒绝作战。波利达米达斯训斥并逮捕了一名民主派抗议者，导致门德人开始攻击伯罗奔尼撒人和门德的寡头派，然后打开城门，迎接雅典人。雅典军队冲进城，恢复了门德的民主制政府，将门德拉回雅典同盟。

伯罗奔尼撒军队逃到了斯基奥涅，使当地人坚守了整个夏季。尼基

阿斯和尼基拉图斯在斯基奥涅城外建造了包围它的壁垒，然后与柏第卡斯二世结盟。这是非常有价值的策略，因为斯巴达人正打算为伯拉西达派遣援军，希望能够为和谈抢得最有利的砝码。和雅典的主和派一样，斯巴达的主和派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为了使和平成为可能，不得不加剧战争程度。若是有一支斯巴达援军抵达伯拉西达那边，或许会摧毁一切和平解决问题的希望，但马其顿国王运用他在色萨利的强大影响力，迫使斯巴达人放弃了这个努力。

色萨利人尽管不准斯巴达陆军进入，但允许三位斯巴达将军北上。其中的领导人伊斯卡哥拉斯属于主和派，不是伯拉西达的朋友。他带来的两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克里阿利达斯和克利奥尼穆斯——是要来当总督的：克里阿利达斯要担任安菲波利斯总督，克利奥尼穆斯是托伦涅总督。这两人的职位是斯巴达政府任命的，完全忠于政府，因此会服从上级的命令。他们被任命为总督，也使伯拉西达对安菲波利斯、托伦涅、阿堪苏斯和他争取的其他城市的承诺（给它们自由和自治）成了笑话，损害了伯拉西达的名誉，将来不大可能有城邦叛离雅典阵营了。

春天快到了，停战期也马上要结束了，各地处于混乱之中。在色雷斯地区之外，停战仍然有效。但伯拉西达违反停战协定，雅典人满腹猜疑与愤怒，使局势无法向稳定与和平的方向发展。

---

[1] 马其顿中部地区。

[2] 当时马其顿的一个部族。

[3] 色萨利南部城市。公元前48年，恺撒在此打败庞培。

[4] 阿克特半岛是哈尔基季基半岛东南角的一部分，见地图16。

[5] 帕列涅是哈尔基季基半岛的三个海岬（或者说是半岛）中最西面的一个，见地图16。

第十五章 和平降临（前422～前421年）

虽然斯巴达和雅典双方都有冤屈，但双方都不愿意破坏停战协定，于是在之前约定的停战期（前422年3月）结束之后，双方仍然保持停战状态，一直到夏天。但到8月，雅典人终于失去了耐心。斯巴达人拒绝遗弃伯拉西达并惩罚他，而是努力给他派遣援兵，并派总督去管理他违反停战协定时占领的城市。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巴达人同意停战时就没有诚意，只想着为伯拉西达争取时间，好让他取得更大成功、煽动更多叛乱。这样在和谈时斯巴达就有更强大的砝码，也有资格提出更多要求。于是，雅典人派遣了30艘战船、1200名重步兵、300名骑兵和数量更多的优秀的利姆诺斯与伊姆布罗斯轻装部队，去收复安菲波利斯和其他失陷城市。

克里昂指挥作战

克里昂当选为这一年的将军，他很高兴地接过了此次战役的指挥权，但他和同僚们（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集结的军队不够强大，不能保证必胜。伯拉西达除了在斯基奥涅和托伦涅驻防的士兵之外，还有相当多的部队，与克里昂的兵力相当，此外伯拉西达还有据守设防城镇的优势。雅典一定寄希望于从柏第卡斯二世和色雷斯的一些盟邦那里得到帮助，而伯拉西达实际上孤立无援，无法得到来自斯巴达的支持。如果运气足够好的话，克里昂完全可能赢得又一场重大胜利，恢复色雷斯地区的安全，使雅典在和谈中的地位更强势；或者如克里昂希望的那样，鼓励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南部继续进攻，最终赢得战争。

克里昂起初很顺利，在显而易见的目标斯基奥涅虚晃一枪，却进攻了托伦涅，即斯巴达在该地区的主要基地。当时伯拉西达不在托伦涅，

留在那里的部队不是雅典人的对手。克里昂安排了一场罕见的海陆协同作战，将守军吸引到城墙下，同时他的战船航行到无人把守的岸边。斯巴达指挥官帕西特里达斯走进了陷阱，等到他摆脱克里昂的攻击、逃回托伦涅时，发现雅典舰队已经占领了城市，于是帕西特里达斯束手就擒。克里昂将托伦涅的成年男性公民全部俘虏，押解到雅典，将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托伦涅陷落时，伯拉西达的援军已经到达距离城市不到4英里的地方。

克里昂从托伦涅出发，前往爱昂，建立一个基地，以便进攻安菲波利斯。他进攻哈尔基季基半岛的斯塔吉鲁斯，不幸失败，但他攻克了加利普苏斯。雅典帝国对前422/前421年征税的评估计划也表明，该地区的许多其他城市都被收复了，这一定也是克里昂的功劳。在外交方面，他与柏第卡斯二世和马其顿人，以及色雷斯的奥多曼提人国王波列斯缔结了盟约。

克里昂打算在爱昂等待这些新盟军的抵达，将伯拉西达围堵在安菲波利斯，然后将其拿下。但是，伯拉西达已经预料到这个威胁。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率军来到安菲波利斯城西南方的科德里昂山（那里是阿吉鲁斯人的领地），而授命克里阿利达斯留下统领安菲波利斯（见地图16）。在科德里昂山，伯拉西达可以居高临下地观察各个方向，跟踪克里昂的一举一动。

修昔底德说，伯拉西达之所以占据了这个位置，是因为他判断克里昂会只用自己的军队发动进攻，以此表达对斯巴达部队兵力薄弱的鄙夷。但伯拉西达的兵力差不多与敌人相当，克里昂一定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继续等待援军。克里昂很快将他的部队调到安菲波利斯东北方的一座山上。修昔底德认为这个决定没有军事意义，只是为了安抚发牢骚的雅典士兵。修昔底德说，雅典士兵们因为无所事事而恼怒，对他们将军的领导力也不信任，将他的无能和怯懦与伯拉西达的经验丰富和勇敢

无畏做对比。但即便是克里昂的批评者，也不大可能会指责他无能和怯懦，修昔底德也曾说克里昂过于大胆和乐观。事实上，伯拉西达判断克里昂会不等待盟军而鲁莽地发动进攻。指控克里昂无能也是没有道理的：克里昂兑现了占领斯法克特里亚岛的诺言，在托伦涅也表现出了精明的头脑、娴熟的指挥技艺，并取得了成功。事实上，那些在安菲波利斯对克里昂表示不信任的士兵，恰恰就是在他的指挥下攻克了加利普苏斯，也收复了该地区的其他城镇。

对克里昂这个举动的更合理解释是，他打算等待色雷斯人抵达，包围安菲波利斯，然后通过猛攻将其拿下。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就需要准确地了解安菲波利斯的面积、布局、海拔、城墙牢固程度、城内守军和居民的分布，以及城外的地形。这就需要进行一次侦察行动，就像修昔底德描述的那样："他来了，将他的部队部署在安菲波利斯前方的一座易守难攻的山上，他亲自检查了斯特鲁马河沼泽丛生的地段，以及安菲波利斯城相对于色雷斯的位置。"（5.7.4）士兵们可能的确焦躁不安，但此次行军无疑是必要的，而为了防止遭到城内守军的袭击，必须大举出动。

克里昂到达山顶之后，发现安菲波利斯城墙上没有部署士兵，也没有守军从城里冲出来攻击他。修昔底德说，克里昂承认自己没携带攻城器械是个错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若有攻城器械，现在就可以打进城去。至于修昔底德怎么会知道克里昂的打算，这就很难说了。克里昂在此次战役中阵亡了，因此不可能是他直接告诉修昔底德的；在差不多二十年后修昔底德著书立说时，可能为他提供信息的雅典军人知道克里昂的想法，但也很可能带有偏见。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克里昂的推测，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低估了伯罗奔尼撒军队的实力，并愚蠢地将自己的军队置于危险之中。事实上，当伯拉西达看到克里昂从爱昂北上并与安菲波利斯城内的克里阿利达斯交手时，伯拉西达不敢进攻，因为他判断自己的部队即便数量上不输于敌人，质量上也不如对方。克里昂完全有理由相

信自己一定能够顺利地完成侦察任务，并安全返回爱昂。

安菲波利斯战役

伯拉西达希望速战速决，因为他无法得到斯巴达或柏第卡斯二世的财政和物质支持，所以他的地位一天天衰弱下去，而克里昂很快将得到色雷斯和马其顿部队的支援，力量将会猛增。伯拉西达将部队留给克里阿利达斯指挥，自己挑选了150人，“打算抢在雅典人撤走之前即刻发动进攻，因为他觉得等到敌人的增援部队抵达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攻击孤立的敌军了”（5.8.4）。作为诱骗克里昂落入陷阱的计划的一部分，他开始大张旗鼓地执行大战之前的献祭，并派遣克里阿利达斯的部队到安菲波利斯最北面的城门，也就是色雷斯门（见地图16）。伯拉西达威胁着要从那座城门攻击克里昂，这样就可以迫使克里昂南下前往爱昂，从而经过安菲波利斯东面的城墙。雅典军队从城墙边上经过时，因为看不到城内的情况，所以会误以为自己很安全。事实上，伯拉西达打算用自己精挑细选的精锐部队从南门出发，攻击敌人。雅典人遭到出乎意料的袭击后，会推断斯巴达全军都跟着他们从北门到了南门，因此就会集中力量对付面前的敌人。与此同时，克里阿利达斯将率领主力部队从色雷斯门赶来，包抄雅典人的侧翼。

克里昂似乎率领了一支小部队去侦察安菲波利斯北方或东北方的地形。他得知敌军集中在色雷斯门，而大多数雅典人已经在那个位置的南面，于是决定谨慎地撤往爱昂，因为他从未打算在援军尚未抵达的情况下与敌人正面交锋。

据修昔底德记载，在斯巴达人发动进攻之前，克里昂判断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撤退，于是发布了撤军的命令。为了保障撤退队伍的安全，需要其左翼做一个复杂的调动，但这个调动需要一点时间。克里昂自己待在右翼最危险的地方，催促右翼调转方向以便向左推进，因此右翼的右侧没有遮挡，非常脆弱。这个动作，或者说是没能将其与左翼运动协调

起来的错误，导致了混乱，行军秩序被打乱了。伯拉西达放任雅典人左翼前进，抓住了对方的这个战术失误，发动了进攻。他率军从南门狂奔而出，猛攻雅典人中路，将其打得措手不及。雅典人“被他的大胆惊得目瞪口呆，看到己方秩序混乱，转身就逃”（5.10.6）。就在这个时刻，克里阿利达斯率军从色雷斯门杀了出来，猛扑雅典人侧翼，使其陷入了更大的混乱。

左翼的雅典士兵们加紧奔向爱昂，而右翼的士兵们（克里昂亲自指挥这一翼）勇敢地坚守着。据修昔底德说，始终不曾打算留下作战的克里昂“拔腿就跑”，但被一名米金努斯轻盾兵用标枪杀死。尽管有人指控克里昂怯懦，但证据却不足以支持这样的控诉。克里昂并没有和左翼一起逃跑；他留在了后方（那是一支败退军队里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他是被一支从一段距离之外投掷的标枪杀死的，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后背中枪。正如斯巴达人在他们的士兵被困斯法克特里亚岛时所说：“若是一支标枪便能摧毁勇士的斗志，那一定是非常了不得的标枪。”至少与克里昂同时代的雅典人相信他在安菲波利斯打得非常英勇。他和那些与他并肩作战的士兵们后来被安葬在凯拉米克斯[1]，即享有荣誉的阵亡将士的长眠之地。既然他的同胞们都不怀疑他的勇气，我们也不应当怀疑。

尽管克里昂捐躯沙场，但他的部下坚守下来，勇敢地拼杀。敌人在投入标枪兵和骑兵之后，才将他们击溃。雅典骑兵似乎被留在了爱昂，因为克里昂不曾打算或预料到会与敌交战。约有600名雅典人阵亡；斯巴达方面仅有7人死亡，但其中包括伯拉西达。伯拉西达被抬离战场时还有呼吸，在得知自己赢得了最后一场战役之后才合上了眼。

伯拉西达与克里昂之死

安菲波利斯战役中，修昔底德所谓的“两个阵营中最反对和平的人”（5.16.1）都丢了性命。安菲波利斯人将伯拉西达埋葬在城内一个面

向阿哥拉的地点，为他建造了纪念碑，称颂他为城市的奠基人，并将他作为英雄顶礼膜拜，每年举行体育竞技和献祭来纪念他。他生前致力于摧毁雅典帝国和恢复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霸权。如果他没有死，那么北方的战争会继续打下去，他的死亡对于那些希望继续作战直到胜利的斯巴达人来说是个严重挫折。

和伯拉西达一样，克里昂也奉行积极主动的政策，因为他真诚地相信这是最适合雅典的路线。他在公共场合的行为风格无疑降低了雅典政治生活的格调，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要赞同他对叛乱盟邦的严酷态度，但克里昂的确代表着广泛群体的意见。他总是精神抖擞、勇敢无畏地宣扬自己的政治立场，并直率而诚实地表达自己。他并不比伯里克利更喜欢哗众取宠，而是以同样严厉、挑战和务实的方式向群众讲话。他置生死于度外，亲自参加自己建议的军事行动，并在最后一次行动中献身。

不管修昔底德所谓的“理智的人”是怎么想的，在克里昂死后，雅典的形势并没有得到改善。他的观点被其他人继承下来，并为之努力。其中有些人缺乏他的才干，有些人不像他那样爱国，还有些人没有他的勇气。但修昔底德的论断是正确的：克里昂与伯拉西达的死亡使和平真正成为可能。现在雅典的当权派中没有人拥有足够的声望和地位，去反对尼基阿斯所倡导的和平。

和平降临

安菲波利斯的胜利鼓舞斯巴达人向色雷斯派遣援军，但在伯拉西达阵亡的消息传来后，援军就调头回去了。援军指挥官兰斐亚斯非常了解斯巴达城内民众的情绪：“他们之所以调头返回，是因为他们出发的时候就知道，斯巴达人更趋向于和平。”（5.13.2）东北方的新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总体形势。自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士兵被俘以来，斯巴达人就再也没有蹂躏阿提卡，以防那些关押在雅典的战俘被处死。伯罗奔尼撒海军已经不复存在，而且之前它也未能有效支持雅典臣属的

反叛。伯拉西达的大胆战略需要投入强大兵力，但斯巴达不能也不愿意投入这么多人。而且在雅典主宰大海、柏第卡斯二世与其色萨利盟友在陆地上敌视斯巴达的时候，斯巴达的增援部队也无法到达伯拉西达身边。

斯巴达也很害怕战争持续下去。雅典人仍然能从皮洛斯和基西拉岛发动袭击。越来越多的黑劳士逃离斯巴达国境，斯巴达人害怕他们煽动一场新的黑劳士大起义。斯巴达与阿尔戈斯的《三十年和约》快要到期了，因此一个新的威胁迫在眉睫。阿尔戈斯人坚持要求斯巴达归还基努利亚，以此作为再续和约的条件；这是斯巴达人不能接受的，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斯巴达人就将面临阿尔戈斯与雅典结盟共同反对斯巴达的致命危险，而斯巴达的盟邦可能继续叛逃，使局势变得更加难以把控。例如，斯巴达近期与曼丁尼亚和厄利斯发生了争吵，这两个城邦都是民主制国家，由于害怕斯巴达的报复，它们很可能加入阿尔戈斯阵营。

另外，很多斯巴达领导人也有私人理由去寻求和平。斯巴达的名门望族急于帮助那些被关押在雅典的亲戚回家。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国王“非常渴望达成协议”（5.17.1），因为和平肯定有助于缓解他的困难处境：他的政敌永远不能原谅他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未能入侵和消灭阿提卡，指控他贿赂了德尔斐神谕以恢复自己的地位；正是因为他非法恢复了王位，才导致了斯巴达人的每一次失败和灾难。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希望缔结和约以便让这些针对他的攻击平息下来。

客观地讲，雅典人希望和谈的理由比斯巴达人的要少。他们的领土已经三年多不曾遭到蹂躏，战俘仍然在他们手上，而这些战俘能够保障阿提卡不会遭到入侵。尽管雅典的国库储备金持续减少，但他们仍然有足够的资源支撑前421年的战争，并且可以持续作战至少三年。不过，大多数雅典人不愿意继续打下去。他们在墨伽拉和玻俄提亚的失败，以

及色雷斯的叛乱令他们灰心丧气，而他们在德里昂的损失也是非常惊人的。他们还害怕帝国境内发生更多的叛乱，不过这种担心有些过度，因为只要雅典掌握海权，爱琴海或小亚细亚就基本上不可能发生叛乱。就连哈尔基季基半岛的叛乱也不大可能继续扩大了。但对雅典人来说，这些担忧是真真切切的，于是他们也倾向于和平。

近期的一连串失败和主战派领导人的死亡使尼基阿斯与主和派在雅典占了上风。修昔底德又一次提出，尼基阿斯的私人动机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因为他作为当时雅典最成功的将军，希望“自己的名望——从来不曾给城邦带来损害的人——能够流芳千古”（5.16.1）。尼基阿斯的天性也比较谨慎，信奉伯里克利的政策，即坚定而克制地作战。皮洛斯的胜利使伯里克利设想的和平成为可能之后，尼基阿斯一直在努力说服雅典人接受伯里克利的计划；因为他真诚地相信，这是对他们最有利的路线。

对战争进程的失望、财政问题和主战派领导人的死亡都能解释雅典人为什么倾向于选择和平，但我们仍然不太理解在经历了这么多牺牲之后，雅典人为什么恰恰在自皮洛斯战役以来对自己最有利的时候要求停战。他们只需要等待阿尔戈斯终止与斯巴达的和约并加入雅典阵营。那时可以让由阿尔戈斯、曼丁尼亚、厄利斯，或许还有其他城邦组成的联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缠住斯巴达人，而雅典人则可以从皮洛斯和基西拉岛同时发动进攻，并努力煽动黑劳士造反。这些袭击能让伯罗奔尼撒人焦头烂额，这样雅典就可以自由地入侵墨伽拉。伯罗奔尼撒联盟很有可能会瓦解，斯巴达的力量可能被消灭，因而雅典能够自由地对付孤立无援的玻俄提亚。至少斯巴达会被大大削弱，被迫接受对雅典有利的和平。

但这样的理性分析忽略了前421年雅典人感受到的对战争的厌倦。他们在战争和瘟疫中损失惨重，浪费了多年积攒起来的资金，目睹自己

在乡村的家园被摧毁，橄榄树和葡萄藤被砍倒。富人和农民是最愿意接受和平的，阿里斯托芬在前425年年初创作的喜剧《阿卡奈人》中以幽默的笔触明确表达了这一点。他笔下的主人公狄凯奥波利斯代表着典型的阿提卡农民，其被迫挤进雅典城，急于返回自己的农场。

在和谈进行的同时，人们“渴望旧时不曾被战争玷污的安宁生活”；欣喜地聆听欧里庇得斯的剧作《埃里克修斯》中的合唱歌词，“让我的矛枪无用武之地，被蜘蛛网覆盖”；回忆起这样的话语，“和平年代，唤醒睡眠者的不是军号，而是鸡鸣”（Plutarch，*Nicias* 9.5）。阿里斯托芬的《和平》是在前421年，也就是此次和约缔结不久之前创作的。这部剧里充满了同样的渴望，对结束战争的前景有着喜悦的憧憬。这部喜剧的主人公特里伽俄斯唱了一曲和平赞歌：

> 想想吧，战友们，
>
> （和平曾给）我们带来的千般喜悦；
>
> 很久以前她赋予我们的
>
> 舒适与安逸的生活；
>
> 无花果与橄榄，葡萄酒和桃金娘，
>
> 香甜的、烘干的果脯，
>
> 一排排沁人心脾的紫罗兰，
>
> 心在渴望，
>
> 那些我们曾经拥有的愉悦，
>
> 战友们，和平又回来了，
>
> 载歌载舞，迎接她吧！

（571～581）

尼基阿斯是主和派的卓越领袖，他的军事成就和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的虔敬使他在雅典颇得民心。世人都知道他倡导和平，而他对战俘的仁慈也赢得了斯巴达人的信任，所以尼基阿斯应当是最理想的谈判者。但雅典人继续抵制和谈，或许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局势将很快转为对己方有利。于是斯巴达人冒险赌了一把，以促进和谈。将近初春时，“斯巴达人进行了初步的准备工作”，似乎要在阿提卡建造一座永久性要塞，以迫使雅典人“更趋向于倾听”（5.17.2）。在恐惧和愤怒之下，雅典人完全可能处死手里的俘虏，使和平的希望彻底破灭，但斯巴达人的虚张声势奏效了。雅典人终于同意按照恢复战前状态的基本原则缔结和约，但底比斯将保有普拉蒂亚，雅典将保有尼萨亚及位于希腊西部的、原属于科林斯的索利安姆和阿纳克托里翁。

《尼基阿斯和约》

此次和约的期限为五十年，允许各方自由前往共同的圣所，确立了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独立性，并规定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根据和约中涉及领土的条款，雅典人将收复边境要塞帕那克敦，它是前422年被内奸出卖给玻俄提亚人的。斯巴达也承诺将安菲波利斯返还雅典，但这座城市及其他城市的公民可以自由携带财产离开。斯巴达人还放弃了托伦涅、斯基奥涅和其他一些已经被雅典人收复或尚在攻打的城镇。对斯基奥涅人来说，这意味着死亡，因为雅典公民大会已经宣判了他们的命运。色雷斯的其他叛乱城市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安菲波利斯和雅典已经收复的城市，它们全都被雅典人重新纳入囊中。然而，阿吉鲁斯、斯塔吉鲁斯、阿堪苏斯、斯托鲁斯、奥林瑟斯和斯巴托拉斯这类城市却令斯巴达人感到尴尬，因为他们曾以解放希腊人的口号鼓励这些城市反叛雅典。为了让斯巴达挽回颜面，雅典人允许这些城市仅仅向雅典缴纳传统数额的贡金，而不是前425年增加后的数额。这些城市将成为中立国，不属于任何一个联盟，但雅典人被允许用和平的劝导手段将它们争取到自己这边。根据这些令人糊涂的法律规定，斯巴达人实质上是背叛了自

己的北方盟友。

雅典人也做出了重要让步，赋予哈尔基季基人超乎寻常的独立性，并同意交出他们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边缘的基地：皮洛斯、基西拉岛和迈萨纳。雅典还同意交出阿塔兰塔岛和普特里昂（可能是阿开亚沿海的一座城镇）。交换战俘的条款使雅典人失去了威慑斯巴达的重要砝码，但这对达成和平是必不可少的。和约的最后条款明确表示，雅典和斯巴达还将勒令各自的盟邦遵守和约。“如果任何一方在任何方面、任何问题上有任何疏漏，应遵守双方的誓言，通过公平协商，对和约做适当修改，让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感到满意。”（5.18.11）

雅典人可能是在前421年4月12日正式批准和约的，此时离阿提卡首次遭到入侵已经过去了十年零几天。和约令绝大多数雅典人、斯巴达人和全体希腊人欢欣鼓舞。在雅典，“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已经摆脱了灾祸，人人对尼基阿斯交口称赞，颂扬他是神祇的宠儿，因为他的虔敬，诸神赐予他极大的荣耀，让最伟大、最美好的事冠以他的名字”（Plutarch，*Nicias* 9.6）。

此次和约一直被称为《尼基阿斯和约》，它的顺利签署，尼基阿斯的确功不可没。表面上看，阿希达穆斯战争的结局似乎是雅典获得了伯里克利之前追寻的那种和平，但事实并非如此。伯里克利的目标是让前445年确立的国际秩序更加稳定、安全。他的手段是告诫斯巴达人他们没有办法强迫雅典，雅典人地位巩固、坚不可摧，雅典帝国是一个永久性的现实；纠纷必须通过协商、谈判或仲裁解决，而不能用威胁和武力。

《尼基阿斯和约》没有达成伯里克利的目标，也没有恢复战前的领土格局。安菲波利斯和帕那克敦被敌视雅典且不臣服于斯巴达的人控制着，因此这两座城市能否回到雅典阵营还很难说。普拉蒂亚（雅典在马拉松战役中的战友和一如既往的忠实盟友）则落入底比斯人手中。安菲

波利斯丢掉了，但雅典获得了尼萨亚，因此算是平衡了。然而，假如伯里克利看到雅典与哈尔基季基半岛上各叛乱城市的解决方案，一定会无比震惊。这些城市的未来地位，甚至它们需要交纳的贡金数额，居然不是由雅典人确定的，而是由雅典和斯巴达达成的条约规定的。这违背了伯里克利投入战争的原则：捍卫雅典帝国的合法性、完整与独立。

至于获得和平的方式，甚至更加无法令人满意。没有证据表明，斯巴达人已经认可雅典是不可战胜的，或者雅典帝国已经是永久性的事实。迫使斯巴达人接受和平的主要力量是斯巴达暂时的困难：收回俘虏的愿望、阿尔戈斯与雅典结盟的威胁。斯巴达的主战派并未被消灭或永久性地丧失公信力，也没有任何条件能够保障在恢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秩序之后，斯巴达人不会寻求报复和霸权。和平给了他们恢复元气的喘息之机，让他们将来有能力报复，而并未让他们相信自己没有能力打赢战争。雅典人接受和平则是因为受到了军事威胁。说到底，十年战争没有给任何一方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它既没有摧毁雅典帝国、给希腊人带来自由，也没有消除斯巴达对雅典势力的恐惧，更没有给雅典带来安全的保障（伯里克利之所以冒险选择战争，就是为了获得这种保障）。牺牲的生命、莫大的苦难和消耗的金钱最终都白费了。

《尼基阿斯和约》和当年终结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三十年和约》一样，暂时中止了一场双方都没有办法打赢的战争。但是，两次和约的相似之处也就只有这么多。前445年和约中的领土条款是务实的。前421年和约对领土格局的安排却很不现实，因为它建立在一个无法令人信服的基础之上：斯巴达承诺将安菲波利斯和帕那克敦归还雅典，但几乎不曾提及尼萨亚、索利安姆和阿纳克托里翁，这肯定会让墨伽拉和科林斯不满，因此对和平构成了威胁。接受《三十年和约》的雅典处于伯里克利的稳定领导下，他真诚致力于严格遵守和约的文字与精神，斯巴达人也有理由对条款感到满意。

前421年的雅典缺少稳定的领导，其政策在近些年里多次发生变化，而反对和平的派系之所以被压倒，主要是因为他们暂时缺少有影响力的发言人。在斯巴达，很多有权威的斯巴达人不赞同此次和约。新的监察官可能会将政治权力授予反对和约的人士，而且即便是缔造了和约的监察官们也不是十分情愿地执行全部条款。前445年，斯巴达的各盟邦一声不吭地接受了和约；但在前421年，玻俄提亚、科林斯、厄利斯、墨伽拉和色雷斯的盟邦都拒绝与斯巴达合作。前445年，阿尔戈斯人受到条约的约束，站在斯巴达一边；前421年，他们不属于任何联盟，并且热切希望恢复自己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旧霸权，并利用希腊世界的分裂追逐自己的利益。所有这些障碍都使和平的前景从一开始就显得十分可疑。

雅典人对战争已经非常厌倦和感到疲惫。前421年，在大狄俄倪索斯节上观看阿里斯托芬的《和平》而捧腹大笑的雅典人很少考虑到上述这些问题。伯拉西达和克里昂（阿里斯托芬称他们为“战争的臼和杵”）已经不在人世，而战神自己也被迫离开舞台。特里伽俄斯和雅典农夫的合唱队现在可以自由地将和平女神厄瑞涅从她被掩埋了十年的坑里拉出来了。

---

[1] 凯拉米克斯（Cerameicus或Kerameikos）是古雅典的陶工区，位于雅典卫城的西南方。凯拉米克斯被分为内外两区，外区用作坟场，埋葬为国捐躯的士兵；雅典的广场（阿哥拉）位于内区。英语陶器（ceramic）一词便源自“凯拉米克斯”。

第四部 虚假的和平

《尼基阿斯和约》仅仅维持了八年。签约没过多久，和约精神就遭到违背。在和约于前414年寿终正寝之前，发生了多件违背和约精神的事情。这一时期，雅典的核心人物是尼基阿斯，他是伯里克利去世之后影响力最持久的雅典领导人。他的强项和弱点将对局势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他是缔造和制定和约的关键力量，他也决心让它得到执行。

第十六章 和平瓦解（前421～前420年）

困扰重重的和平

不足为奇的是，和约墨迹未干，它的严重缺陷就暴露出来。双方抽签决定谁先开始执行和约规定的最初步骤。雅典人运气不错，斯巴达人需要首先返还他们控制的雅典战俘。斯巴达人还命令克里阿利达斯将安菲波利斯交给雅典人，并强迫周边其他城市接受和约。斯巴达在色雷斯的盟邦拒绝这个要求，克里阿利达斯声称自己没有办法强迫它们服从。事实上，他自己也不愿意这么做。他匆匆返回斯巴达，为自己辩护，并想看看有没有办法修改和约。斯巴达人果然对和约做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实则关系重大的修改：克里阿利达斯应“若有可能，将安菲波利斯交还给雅典；若无可能，将在安菲波利斯城内的所有伯罗奔尼撒人撤出”（5.21.3）。

雅典人之所以缔结和约，主要目标就是收复安菲波利斯，而斯巴达人对和约的这个修改相当于阻止雅典人收回安菲波利斯，并将它留给了雅典的敌人们。因此，斯巴达人在履行和约义务的最初阶段，就违背了和约的文字和精神。

那些与斯巴达关系更悠久、地理位置更临近的盟友也从一开始就破坏了和约；尽管斯巴达苦口婆心地劝导它们，它们仍然拒绝接受和约。墨伽拉对雅典保有尼萨亚勃然大怒，因为这阻碍了墨伽拉与东方的贸易。厄利斯由于和斯巴达的一次私下争吵而不肯接受和约。玻俄提亚人则在底比斯人的领导下，拒绝将边境要塞帕那克敦（他们于前422年占领了这座要塞）还给雅典，也不肯返还战争期间抓获的雅典战俘。自前431年以来，底比斯人的势力和威信有了极大增长。他们害怕雅典从伯罗奔尼撒战争脱身之后会使底比斯丧失业已取得的进展，于是和雅典人

缔结了一系列为期十天的停战协定，以免独自与雅典人作战。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让斯巴达人再开战端，摧毁雅典势力。

科林斯人对和约甚至更加不满，因为他们在波提狄亚的殖民地又一次被雅典人牢牢掌控了，波提狄亚的公民被驱逐出境，四海飘零。雅典还占据了位于索利安姆和阿纳克托里翁（都在希腊西北部）的科林斯殖民地。

斯巴达-雅典同盟

面对这些巨大障碍，雅典的反应可能是拒绝履行和约，也可能拒绝交还皮洛斯和基西拉岛，或者不肯返还在斯法克特里亚岛抓到的俘虏。如果雅典拒绝履行和约，那么阿尔戈斯可能会受到鼓舞，并与雅典结盟；厄利斯和曼丁尼亚等对斯巴达心怀不满的城邦也可能会加入阿尔戈斯-雅典同盟。那样的话，其对斯巴达人而言简直就是个噩梦，他们现在不得不寻求外交手段来摆脱这个危险局面。最终，他们提议与雅典结成五十年的防御同盟，其中一方遭到第三方攻击时，另一方必须施以援手，并视第三方为共同敌人。因此，如果黑劳士发动起义，雅典有义务帮助斯巴达镇压黑劳士。条约的最后条款允许双方通过协商对盟约的条件进行修改。雅典人同意了同盟条约。在签约的时候，为了表达自己对新盟友的信任和诚意，雅典人返还了自前425年以来一直关押着的斯巴达俘虏。

这些俘虏是保障雅典不受斯巴达侵犯的砝码，只要雅典手握着这些俘虏，斯巴达的任何盟邦就不敢攻击雅典，因为它们不敢在没有斯巴达的支持下单独行动。然而，在斯巴达人还没有履行自己的和约义务的情况下，雅典人为什么接受与斯巴达结盟？

尼基阿斯及其支持者之所以同意与斯巴达结盟，为的是巩固正在动摇的和平，同时他们也很欢迎这项盟约本身。与斯巴达结盟的前景让雅

典人回想起希波战争之后几十年里，客蒙的亲斯巴达政策所带来的幸福时代。那个时期对雅典很有利，维持了希腊人之间的和平，使雅典人得以扩张其爱琴海帝国，并生机勃勃地发展。但到前421年，客蒙的路线已经不再可行。现在两国人民脑子里最主要的记忆是漫长而残酷的内战，而不是一致对外的团结努力，这意味着双方都没有多少善意去缔造长期和平。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不能想当然地信任对方，只能努力赢得互信。从这个角度看，斯巴达-雅典同盟或许会危害和平，因为它允许斯巴达继续无视自己的和约义务，增加了雅典人的疑虑。

但是，尼基阿斯及其盟友不是这么看问题的。对他们来讲，墨伽拉战役和玻俄提亚战役的失败，以及在德里昂和安菲波利斯的失败只能证明一点：继续打下去是非常危险的。雅典人应当大度，迈出建立互信的第一步。

若是拒绝与斯巴达结盟，雅典人还有什么其他办法？事实上此时他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雅典人可以鼓励阿尔戈斯建立一个由阿尔戈斯主导的新联盟，让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其他民主制城邦，如厄利斯和曼丁尼亚，加入进去。然后雅典可以加入这个新联盟，派遣一支军队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与斯巴达交战，那时雅典的胜算会比以往更大。雅典人还可以鼓动黑劳士以皮洛斯为基地袭扰斯巴达，并从海上袭击斯巴达沿海城镇，从而进一步增加自己的胜算。雅典若是在这样一场战役中得胜，就可能终结伯罗奔尼撒联盟、消灭斯巴达势力。但由于雅典人民仍然非常厌战，尼基阿斯仍然是雅典政治的主导人物，所以这样的路线是不大可能实现的。

如果雅典人在前421年无法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他们可以拒绝与斯巴达结盟，不违反《尼基阿斯和约》，静观其变。这样的话，雅典无须拿任何人的生命冒险，也无须投入更多资源，并可以对斯巴达保持压力。雅典仍然控制着斯巴达战俘，而且阿尔

戈斯对斯巴达构成了新的威胁，所以可以保证雅典不会遭到攻击。只要雅典与斯巴达保持距离，阿尔戈斯人就会觉得自己在不久的将来有希望与雅典结盟。黑劳士可以逃向皮洛斯，或许雅典还可以在美塞尼亚与拉科尼亚煽动新的叛乱。斯巴达盟邦的叛变给伯罗奔尼撒联盟制造的混乱只会对雅典有利，而雅典人拒绝与斯巴达结盟将会使斯巴达更加动荡不安、面临更大的危险。雅典人完全可以采纳这种温和、安全且前景良好的政策。然而，他们却偏偏选择与斯巴达结盟。

阿尔戈斯联盟

雅典和斯巴达的新盟约不可避免地在对《尼基阿斯和约》持有异议的国家当中起了反作用。科林斯人私下里与阿尔戈斯的行政长官会晤，警示他们雅典和斯巴达的联盟无疑要“奴役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并敦促阿尔戈斯人领导一个新的联盟来捍卫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自由。科林斯人的意思似乎是建立一个新的与两个旧势力集团保持距离的联盟，并抵抗这两个旧集团联合起来的力量。

科林斯的计划要想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斯巴达内部各派系之间的争吵。在斯巴达，接受和约、支持与雅典结盟的派系主要是担心阿尔戈斯对斯巴达不利，而只要这种担忧还在，斯巴达就不会热衷于战争。科林斯人若是没有向阿尔戈斯提出建议，那么阿尔戈斯就会被雅典-斯巴达联盟吓倒，恢复到惯常的不作为状态。因此，斯巴达就不必害怕阿尔戈斯，尽管经验表明，这种恐惧是促使斯巴达投入大规模战争的根本动机之一。科林斯人在前431年曾经利用斯巴达人对雅典人的焦虑和恐惧，推动斯巴达参战。十年后，科林斯人打算利用斯巴达人对阿尔戈斯的类似恐惧，再次推动斯巴达人投入战争，尽管这次科林斯人的任务更复杂也更困难。在过去，科林斯曾威胁退出斯巴达领导的联盟，改为与阿尔戈斯结盟，这是科林斯的一个有效武器。但这一次要想成功，科林斯必须让斯巴达相信，阿尔戈斯成为新盟主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

阿尔戈斯人任命了十二名全权代表，让他们有权与除雅典和斯巴达之外的任何国家结盟。雅典或斯巴达若想加入阿尔戈斯领导的联盟，必须得到阿尔戈斯公民大会的同意。阿尔戈斯有很好的理由（既有旧理由，也有新理由）努力建立一个新的联盟体系。它与斯巴达的敌对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而且它从未放弃夺回基努利亚。因为阿尔戈斯不肯在不收回基努利亚地区的情况下与斯巴达再续和约，所以战争几乎是必然的。为了备战，阿尔戈斯人动用国库资金训练了1000名“身强力壮、家境富裕”（Diodorus 12.75.7）的青年，使他们成为战斗力极强、足以对付斯巴达方阵的精锐部队。阿尔戈斯人既有这样的手段，也有赢得伯罗奔尼撒半岛霸权的野心，因此很高兴地采纳了科林斯人的建议。

最先加入阿尔戈斯阵营的是曼丁尼亚人，因为他们有理由害怕遭到斯巴达攻击：曼丁尼亚人侵犯了多个邻国的土地，攻击了泰吉亚人并在拉科尼亚边境建造了一座要塞。阿尔戈斯似乎是有能力保护曼丁尼亚的“老大”，于是曼丁尼亚人热情地与阿尔戈斯结盟。另一个原因是，曼丁尼亚和阿尔戈斯都是民主制国家。曼丁尼亚从斯巴达联盟叛逃到阿尔戈斯阵营，这在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盟邦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它们得出的结论是曼丁尼亚人“知道的比它们多”（5.29.2），所以才会这么着急地投奔阿尔戈斯联盟。

斯巴达人得知阿尔戈斯联盟的事情之后，指责科林斯人闹出了这整场风波，并指出科林斯若与阿尔戈斯结盟，就违背了科林斯与斯巴达的盟约，还违反了科林斯接受伯罗奔尼撒联盟多数意见的承诺。斯巴达人还指出，科林斯人拒绝接受《尼基阿斯和约》的做法已经背弃了自己的誓言。科林斯的活动家们在一次会议上回应了斯巴达的这些指控。其他对斯巴达不满的盟邦也参加了此次会议。科林斯人掩饰了自己的真实目的（收复索利安姆和阿纳克托里翁），而“以不愿意背叛他们在色雷斯的盟友为借口”（5.30.2）。他们的论点大致是这样的：“我们曾向波提

狄亚人和色雷斯地区的其他哈尔基季基朋友发誓。他们现在还处于雅典人的奴役之下。如果接受《尼基阿斯和约》，我们就违背了自己对神祇和英雄们发出的誓言。另外，我们曾经许下的接受伯罗奔尼撒联盟多数意见的诺言包括这样的条款：‘除非有违神祇和英雄们的意志。’要背叛哈尔基季基人，就必然违背神祇和英雄们的意志。不是我们，而是你们放弃了自己的盟友，与奴役希腊的恶人合作，从而背弃了自己的誓言。”

这种狡猾而很有吸引力的驳论将阿尔戈斯的新联盟描绘为继续反对雅典暴政、对盟友信守（正是斯巴达自私地抛弃了这些盟友）诺言的手段。斯巴达人当然没有被科林斯人说服。

此次会议之后，阿尔戈斯使者敦促科林斯人立刻加入他们的联盟，但科林斯人继续拖延时间，并请求阿尔戈斯人来参加他们的下一次公民大会。他们如此拖延的最可能的理由是：科林斯的保守派仍然持观望态度，在等待更多寡头制国家加入。

下一个加入阿尔戈斯联盟的国家是厄利斯，它的正式政体是民主制的，但社会体制和风俗却是寡头制的。厄利斯人在到阿尔戈斯缔结条约之前，先“按照科林斯人的指示”（5.31.1）与科林斯人结盟。厄利斯加入新联盟，有助于新联盟的起步。直到那时，科林斯人才加入了阿尔戈斯联盟，并把忠诚而坚决地反对雅典的哈尔基季基人也拉了进来。

但墨伽拉人和玻俄提亚人仍然拒绝接受阿尔戈斯的拉拢，因为他们不喜欢阿尔戈斯这个民主制国家。随后科林斯人转而劝说泰吉亚，这是个拥有战略地位的、稳固的寡头制国家。科林斯人相信，若能将泰吉亚从斯巴达阵营拉到阿尔戈斯那边，就能把整个伯罗奔尼撒联盟都拉过去。但泰吉亚人拒绝了，这对科林斯人的计划是一次沉重打击。“科林斯人在此之前都非常热情、非常努力，这时开始松懈和冷淡了，担心没有其他国家加入他们。”（5.32.4）

科林斯活动家们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来挽救他们的计划。他们请求玻俄提亚人加入阿尔戈斯联盟，“在其他方面采取一致行动”。他们还请求玻俄提亚人帮助他们与雅典交涉，与雅典达成为期十天的停战协定（就像玻俄提亚人与雅典的停战协定那样）；同时要求玻俄提亚人保证，假如雅典人拒绝与科林斯停战，玻俄提亚也要放弃与雅典的停战，并绝不在没有科林斯人的情况下，单独与雅典达成进一步的停战协定。

科林斯人的计谋是很明显的：雅典人肯定会拒绝，玻俄提亚人随后将毫无防护地面对雅典，并且与科林斯绑在一起，于是只能加入阿尔戈斯联盟。因此，玻俄提亚人对科林斯的回答是友好而谨慎的，他们拖延着不做出是否加入阿尔戈斯联盟的决定，不过的确派人去了雅典，请求雅典与科林斯停战。雅典人当然没有同意，回复说假如科林斯人真的是斯巴达人的盟友，那么已经与雅典处于停战状态了。玻俄提亚人继续与雅典保持停战状态，这让科林斯人很恼火。科林斯人宣称玻俄提亚人食言了，但没有任何结果。

在这些复杂的外交谈判进行之时，雅典人终于攻破了斯基奥涅，按照克里昂在前423年提出的法令，他们屠杀和奴役了斯基奥涅的全部幸存者。或许是为了提醒他们自己和其他人，是斯巴达人首先采取了这样的恐怖手段，雅典人将普拉蒂亚的幸存者安置到了斯基奥涅。但即便是这样的恐怖震慑行动，也未能恢复属于雅典帝国的哈尔基季基半岛和色雷斯地区的秩序。安菲波利斯仍然在敌人手中，在这年夏末，狄亚人占领了哈尔基季基半岛的泰苏斯城（位于阿索斯海岬[1]上）。尽管它是雅典的盟邦，但雅典没有采取行动。要想收复安菲波利斯，就需要一场难度不亚于波提狄亚攻城战的大规模战役。似乎没有雅典人敦促向叛乱的殖民地发动攻击，但雅典人一定因为斯巴达人未能交还安菲波利斯而产生了极大的挫折感和越来越强烈的愤慨。

斯巴达的问题

在科林斯人忙着建立阿尔戈斯联盟的同时，斯巴达人开始攻击他们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敌人。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国王率领斯巴达军队开进帕拉西亚，这是曼丁尼亚以西的一个地区，曼丁尼亚人在战争期间征服了这里（见地图10）。曼丁尼亚人的阿尔戈斯盟友派遣了一支部队去保卫曼丁尼亚本身，但曼丁尼亚人保护受到斯巴达威胁的帕拉西亚地区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在恢复了帕拉西亚的独立并摧毁曼丁尼亚人的要塞之后，斯巴达人便撤退了。他们随后派遣了一支队伍去控制列普里昂，这是厄利斯与美塞尼亚之间的地区，也是斯巴达与厄利斯争端的根源。

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斯巴达边境和黑劳士乡村的安全，但斯巴达人内部出现了问题。克里阿利达斯将伯拉西达的部队从安菲波利斯带回国，这支部队包括700名黑劳士，服役为他们赢得了自由和在任何地方居住的权利。700名黑劳士在拉科尼亚自由行动，这让斯巴达人感到紧张也是可以理解的。新的阶级即“解放黑劳士”的出现也让他们感到不安。这是斯巴达历史上第一次提到这个阶级，他们是获得自由的黑劳士，似乎能够自由居住；他们可能是凭借卓越的战功而获得解放的。另外，斯巴达总人口的持续减少也使兵源不断萎缩。由于各种原因，在前5世纪和前4世纪，有资格成为斯巴达重步兵的“平等公民”的数量从前479年普拉蒂亚战役时的5000人不断下降。不过，在列普里昂驻军的需求使斯巴达人能够一石二鸟地解决这两个问题，他们将伯拉西达的老兵和“解放黑劳士”安置在厄利斯与斯巴达的边境地带。

他们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那些在斯法克特里亚岛投降、后来在雅典当了多年俘虏的人回来了。起初，这些俘虏恢复了原先在斯巴达社会所享有的地位，而且往往是非常崇高和有影响力的地位，其中有些人甚至担任公职。然而，斯巴达人开始害怕这些归国俘虏会制造麻烦（因为他们的投降带来了耻辱），于是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但是，这些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群体被允许留在斯巴达境内。上述这些内部威胁能够解

释，为什么大多数斯巴达人仍然继续支持谨慎的和平外交政策。前不久厄利斯和曼丁尼亚边境形势的好转、阿尔戈斯联盟威胁的减小，以及雅典人的和平行为，都支持了斯巴达的主和派。

然而，雅典人仍然因为斯巴达人未能履行和约义务而怨恨他们。尽管斯巴达人不断承诺要帮助雅典迫使科林斯、玻俄提亚和墨伽拉接受和约，但每一次要兑现承诺时，斯巴达人都未能采取行动。斯巴达人在安菲波利斯的举动更是让雅典人恼火。斯巴达人没有用自己的军队迫使安菲波利斯回到雅典人的控制下，而是将自己的军队撤离，这显然违反了和约条款。雅典人越来越相信，斯巴达人是故意欺骗他们的。雅典人“怀疑斯巴达人心怀不轨”，拒绝交还皮洛斯，“甚至后悔自己返还了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俘虏，于是继续保留着其他（按照和约应当归还斯巴达的）地方，等待斯巴达人兑现诺言”（5.35.4）。

斯巴达人的回应是不断催促雅典归还皮洛斯，或至少将目前居住在那里的美塞尼亚人和逃亡的黑劳士撤走。斯巴达人声称自己为了将安菲波利斯还给雅典已经尽力了，并向雅典人保证他们将会履行自己的其他承诺。总而言之，斯巴达人没有拿出任何东西，只是在不曾兑现的旧诺言之外许下新诺言。但雅典的主和派依旧很强大，还有力量迫使雅典公民做出更多让步。于是，雅典人将居住在皮洛斯的美塞尼亚人和黑劳士撤走，并把他们安置在凯法利尼亚岛。

尽管雅典人做出了维系和平的努力，斯巴达人的和平诚意却越来越受到质疑。前421年初秋，斯巴达的新监察官就职了，其中森纳里斯和克里奥布鲁斯两人“热切希望撕毁和约”（5.36.1）。他们遵循的路线是再次开启对雅典的战争，这样的机遇很快就来了。仍然掌权的斯巴达主和派最近在斯巴达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雅典人、忠于斯巴达的盟邦，以及玻俄提亚人和科林斯人），致力于让大家接受和约。这次会议彻底失败了，森纳里斯和克里奥布鲁斯或许因此受到鼓舞，开始尝试

他们的复杂计谋。

科林斯人努力用阿尔戈斯联盟吓唬斯巴达人，迫使他们破坏和约，而好战的监察官们采纳的却是相反的策略。他们认为斯巴达人之所以与雅典议和并结盟，主要是因为阿尔戈斯的威胁，以及斯巴达人希望收回斯法克特里亚岛的俘虏和皮洛斯。他们推断一旦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斯巴达就可以继续打仗。因此，他们需要收复皮洛斯，并终结阿尔戈斯联盟。两位监察官秘密地向科林斯和玻俄提亚使者提出建议，认为他们两国应当合作，玻俄提亚人应当与阿尔戈斯结盟，然后推动阿尔戈斯人与斯巴达结盟。他们指出，若与阿尔戈斯人达成协议，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作战就比较容易。他们还请求玻俄提亚人将帕那克敦交给斯巴达人，以便斯巴达人用它换回皮洛斯，“那样就能更方便地向雅典开战”（5.36.2）。

科林斯人的诡秘政策

科林斯和玻俄提亚使者在回国途中，被阿尔戈斯的两名高级行政长官拦下了。他们请求玻俄提亚人加入阿尔戈斯联盟。这一次，阿尔戈斯人的措辞比较含糊：“只要奉行共同政策，他们就可以向斯巴达人开战，或者与其达成条约，或者与其他任何国家达成条约。”（5.37.2）阿尔戈斯人仍然想取代斯巴达，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主。但是，他们模棱两可的提议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不至于让阿尔戈斯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玻俄提亚人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因为幸运的是，阿尔戈斯人要求他们做的恰恰也是他们的斯巴达朋友指示他们做的”（5.37.3）。在玻俄提亚本土，玻俄提亚联盟长官对这消息也很满意。但斯巴达人和阿尔戈斯人的要求仅仅在表面上是相同的，他们的根本目标是截然相反的。即便如此，玻俄提亚联盟长官仍然同意派遣使者到阿尔戈斯去商谈结盟，同时等待玻俄提亚联盟议会的批准。

随后事态发展的背后一定有科林斯人在捣鬼：“玻俄提亚联盟长

官、科林斯人、墨伽拉人和色雷斯使者决定先互相宣誓为任何需要保护的一方提供帮助，并仅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决定作战或议和；只有在这之后，玻俄提亚人和墨伽拉人（因为他们奉行同样的政策）才与阿尔戈斯人缔结条约。”（5.38.1）色雷斯的哈尔基季基地区是科林斯的卫星国，墨伽拉则是玻俄提亚的卫星国。玻俄提亚人自己不需要这样的协议，因为他们已经打算加入阿尔戈斯联盟，而科林斯已经是阿尔戈斯的盟友，所以上述的共同协议对玻俄提亚没有好处。说到底，这次联合行动的计划只是科林斯人先前提出的计划的扩大版。

科林斯人知道玻俄提亚人不信任他们，因为玻俄提亚人拒绝了科林斯上一次的提议，将科林斯人视为脱离斯巴达联盟的叛贼，并担心自己与科林斯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会激怒斯巴达。玻俄提亚联盟长官向玻俄提亚联盟议会（玻俄提亚的主权机构）提交了与墨伽拉、科林斯和色雷斯的哈尔基季基人缔结协约的决议。他们的秘密计划被隐藏起来，没有在决议中体现，因为一旦他们与森纳里斯和克里奥布鲁斯的秘密谈判被斯巴达人知道，这两人就有大麻烦了。玻俄提亚联盟长官一直依靠自己的权威来促使决议通过，但这并不适用于特殊时期。议会驳回了决议，“因为他们担心，与脱离斯巴达联盟的反叛者一同宣誓，就侵害了斯巴达人的利益”（5.38.3）。玻俄提亚联盟长官或许没有想到决议会被驳回，不过科林斯人或许已经料到了这一点。不管怎么说，讨论到此为止。科林斯人和哈尔基季基人回家了。玻俄提亚联盟长官不敢再提与阿尔戈斯结盟。他们没有派遣使者去阿尔戈斯商谈条约，“整个事情稀里糊涂，完全是浪费时间”（5.38.4）。

玻俄提亚人

与此同时，斯巴达的主和派也急于收复皮洛斯。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能说服玻俄提亚人向雅典人交还帕那克敦和仍然在押的雅典俘虏，雅典人就会将皮洛斯返还给斯巴达。在与雅典人商谈多次之后，斯巴达主和派仍然抱有此种想法，他们一定是受到了雅典谈判者（可能是尼基阿

斯及其盟友）的鼓励。斯巴达主战派和主和派都支持此种想法，于是斯巴达人向玻俄提亚派遣了官方使团，请求他们向雅典让步。玻俄提亚人的回答表明他们的主战派此时已经构想了一个新的计划。他们说，除非斯巴达单独与玻俄提亚缔结一个与斯巴达-雅典条约类似的条约，否则他们不会将帕那克敦还给雅典人。斯巴达人知道，如果答应这个要求，就违背了与雅典的条约。因为根据斯巴达-雅典联盟的规定，双方只能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开战或缔约。但与雅典决裂正是斯巴达主战派想要的，于是他们支持与玻俄提亚人结盟。由于主战派不占多数，所以需要主和派的支持。斯巴达人非常希望收复皮洛斯，但他们为什么会相信雅典人能将其交还呢，尤其是在斯巴达人阴险地与玻俄提亚结盟的情况下？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斯巴达人寄希望于雅典的主和派能够无限地忍让，并继续主宰雅典的政策。前420年3月初，斯巴达人与玻俄提亚签订了条约，承认保护玻俄提亚人不受雅典人的攻击。

玻俄提亚人欢迎与斯巴达的条约，认为这是对斯巴达-雅典同盟的打击，但玻俄提亚人却开始准备欺骗自己的斯巴达盟友。他们立刻开始拆除位于帕那克敦的壁垒，使雅典丧失了这座重要的边境要塞。斯巴达人可能不知道这个阴谋，科林斯人或许也参与其中，因为这与他们的信念（冲突和恐惧而不是舒适和安全，将促使斯巴达投入战争）相一致。

与此同时，阿尔戈斯人在等待玻俄提亚使者与他们商谈之前约定的结盟事宜，但玻俄提亚没有派使者来。阿尔戈斯人得到的消息却是帕那克敦要塞被拆除了，斯巴达与玻俄提亚缔结了条约。阿尔戈斯人推断自己遭到了背叛，斯巴达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幕后指使。斯巴达让玻俄提亚加入了斯巴达-雅典联盟，因此劝说雅典人接受了摧毁帕那克敦的事情。阿尔戈斯人开始恐慌起来。他们现在不仅无法和玻俄提亚或雅典结盟，还害怕自己的联盟瓦解、盟邦投奔斯巴达。他们最大的担忧是自己很快将面对一个由斯巴达、玻俄提亚和雅典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心惊胆战的阿尔戈斯人于是“火速”派遣使者去斯巴达，努力“与斯巴达缔

结条约，不管条件如何，以便得到和平”（5.40.3）。

阿尔戈斯寻求与斯巴达结盟的谈判反映了双方的急切情绪。阿尔戈斯希望由第三方对基努利亚纠纷进行仲裁。斯巴达人希望对旧条约做一个简单的续约，以保留有争议的土地。阿尔戈斯人提议暂时接受五十年和约，条件是双方在未来的任何时间均可要求进行一场规模有限的军事对抗，以决定基努利亚的归属。斯巴达人起初觉得这个建议太荒唐，但仔细考虑之后还是同意了，并与阿尔戈斯签订了条约，“因为不管怎么样，他们急于获得阿尔戈斯的友谊”（5.41.3）。将近6月底时，阿尔戈斯谈判者获得了他们政府的正式批准，准备返回斯巴达，但他们的耽搁使局势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

[1] 也就是阿克特半岛，见地图16。

第十七章 雅典与阿尔戈斯的联盟（前420～前418年）

雅典与斯巴达决裂

为了履行与玻俄提亚人的条约，斯巴达人前去接收帕那克敦和玻俄提亚人手中的雅典战俘，以便交还给雅典人。斯巴达人发现，帕那克敦要塞已经被摧毁；他们接收了雅典战俘，并动身前往雅典，尝试收复皮洛斯。他们指出，尽管帕那克敦已经被拆毁，但也算是正式还给雅典了，因为它再也不能为雅典的敌人所用。然而，雅典人希望完好无损地收回他们的要塞，斯巴达与玻俄提亚的条约也让他们怒火中烧；因为它不仅违背了斯巴达的诺言（在缔结任何新盟约之前，要先和雅典商量），还揭露了斯巴达另一项誓言（迫使持异见的盟邦接受和约）的虚假。于是雅典人“愤怒地回答了斯巴达使者，让他们离去”（5.42.2）。

雅典的主战派自克里昂阵亡以来就处于低谷，斯巴达的所作所为使雅典主战派再度活跃起来。安提法奈斯之子希帕波鲁斯曾是克里昂的竞争者。古代作家称他为“群众的领袖”；在前421年上演的《和平》中，阿里斯托芬说希帕波鲁斯是主宰公民大会的人。他是一位三列桨座战船船长和富人，也是公民大会的活跃分子，常常提出动议、修改法令。他可能既是议事会成员，也是一位将军。有些古代作家将他描述为一个荒唐可笑、一无是处的恶棍，甚至比其他蛊惑民心的流氓政客更低贱。阿里斯托芬说希帕波鲁斯有着极其远大的帝国主义野心，甚至想扩张到迦太基。这或许有些夸张了，但希帕波鲁斯的确反对前421年和约，也反对随后与斯巴达的盟约。他是个训练有素、技艺高超的演说家，但既没有克里昂那样的军事声望，也没有富裕且虔诚的尼基阿斯那样的个人名誉和强大影响力。若不是出现了一个强大而出人意料的竞争对手，希帕波鲁斯或许能成为主战派的领导人。

前420年，克雷尼亚斯之子亚西比德当选为将军时是三十岁到三十三岁的年纪（三十岁是竞选将军的最低年龄）。他非常富裕，有资格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赛车竞技；十分英俊潇洒，以至于“许多贵妇名媛疯狂地追求他”，“也有男人追求他”（Xenophon，*Memorabilia* 1.2.24）；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说家，曾师从当时最优秀的教师。他的聪明才智受到广泛的赞誉和仰慕，他与苏格拉底的友谊更令他扬名四海，并且他在与苏格拉底交往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辩论水平。他的缺点似乎对他也有助益。他的口齿不太流利，大家却觉得这非常有魅力。他非常任性骄纵，是个被宠坏的孩子，行为举止常常出人意料、无法预测，令人火冒三丈。然而他的哗众取宠虽然让许多人嫉妒和不赞同，却也赢得了许多人的仰慕。他超乎寻常的张扬个性为他赢得了世人的瞩目和极高的名望（尽管可以说是臭名），使他得以轻松进入政坛。

对亚西比德的政治和军事生涯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家族，凭借祖先的名望，他在雅典以非同一般的速度崛起，很早就取得了卓越的地位。“亚西比德”这个名字源自斯巴达，至少在前6世纪就出现了。当时雅典与斯巴达建立了一种关系，使亚西比德家族成为斯巴达常驻雅典的代表，尽管这种角色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已经消失了。他父亲那边属于高贵的萨拉米斯氏族。他的高祖父是克里斯提尼的盟友。克里斯提尼是雅典的解放者和民主制的奠基人。亚西比德的曾祖父在希波战争期间是一位三列桨座战船船长，自费装备了一艘战船。他的祖父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曾遭到陶片放逐[1]。他的父亲是伯里克利的盟友，于前447年在喀罗尼亚战役中牺牲。

亚西比德的母亲属于地位显赫的阿尔克马埃翁氏族，伯里克利的母亲也属于这个氏族，所以在亚西比德的父亲阵亡后，伯里克利担任了亚西比德和他的弟弟阿里弗隆的监护人。大约从五岁开始，亚西比德和他狂野不羁的弟弟就在雅典顶尖政治家的宅邸内成长。在亚西比德的童年时期，伯里克利拥有几乎不受任何挑战的最高地位，是雅典最有影响力

的人。亚西比德是个才华横溢的孩子，他的雄心壮志已经受到了激励，其父亲家族的传统提升了他对自己的期望，而终日目睹监护人的权力与荣耀，也使他产生了更大的野心。

但对亚西比德来说，仅仅取得辉煌的成就还不够。有许多阿谀奉承之徒不断怂恿他的大胆狂想。正如普鲁塔克所说："腐蚀他的那些人，利用了他对卓越地位和名望的酷爱，促使他过早地开始放肆地谋划；他们劝他，只要他进入政界，就能立刻让所有普通的将军和领导人黯淡无光，甚至能够在希腊人当中获得胜过伯里克利的权力与名望。"（*Alcibiades* 6.4）在前5世纪，民主制的雅典对贵族仍然抱有敬意，亚西比德高贵的家族背景给了他战胜竞争对手的巨大优势，但他自己也的确很有实力。到前420年，亚西比德已经从弗尔米奥那里获得了一项表彰作战勇敢的嘉奖，并且在波提狄亚和德里昂作为骑兵参战，表现出色。

斯巴达人在斯法克特里亚岛投降之后，亚西比德妥善照顾斯巴达俘虏，借此恢复自己家族与斯巴达的传统关系。十年战争结束后，他希望代表雅典与斯巴达谈判，并获得缔造和约的功绩，但斯巴达人更愿意与资历深、可靠且影响力大的尼基阿斯对话。亚西比德认为自己受到了怠慢和侮辱，于是改变立场，反对雅典与斯巴达结盟，理由是斯巴达人缺乏诚意。他坚持说，斯巴达与雅典结盟仅仅是为了腾出手来对付阿尔戈斯；解决了阿尔戈斯之后，斯巴达会再次攻击孤立的雅典人。亚西比德真诚地希望雅典与阿尔戈斯结盟，而不是与斯巴达。他对斯巴达动机的分析与森纳里斯、克里奥布鲁斯及其派系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

帕那克敦被拆除和斯巴达与玻俄提亚结盟严重打击了尼基阿斯的地位。这时，亚西比德"在公民大会大做文章，攻击尼基阿斯，并用令人信服的指控来诽谤他。尼基阿斯本人曾……拒绝抓捕被困在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敌军，而其他人俘虏这些敌人之后，他将俘虏释放，交还给拉

刻代蒙[2]人，因为他想讨好他们。他是这些拉刻代蒙人久经考验的好友，他没有劝阻他们与玻俄提亚人或与科林斯人单独结盟。当任何希腊人想成为雅典的朋友和盟邦时，他都大力阻挠，除非拉刻代蒙人同意”（Plutarch，*Alcibiades* 14.4-5）。与此同时，亚西比德私下里敦促阿尔戈斯的民主派领导人与厄利斯及曼丁尼亚使者一起与雅典人结盟：“时机已经成熟，他将尽全力配合。”（5.43.3）

亚西比德的邀请很及时，阻止了阿尔戈斯与斯巴达结盟，而阿尔戈斯之所以曾经想与斯巴达结盟，也是因为错误地相信雅典与斯巴达正在合作。现在得知真相后，阿尔戈斯人立刻放弃了与斯巴达结盟的想法，欢欣鼓舞地期待与雅典结盟，“想着雅典城在过去始终对阿尔戈斯很友善，而且雅典和阿尔戈斯都是民主制国家；雅典的海上力量很强大，如果战争爆发，雅典将与阿尔戈斯并肩作战”（5.44.1）。发现阿尔戈斯人的立场改变之后，斯巴达人努力补救。他们向雅典派去了三位极受雅典人尊重的人士——列昂、腓洛卡里达斯和恩狄乌斯（其中恩狄乌斯与亚西比德有亲戚关系），力图阻止雅典人与阿尔戈斯结盟，请求雅典归还皮洛斯，并向雅典人保证，斯巴达与玻俄提亚的联盟绝不是为了威胁雅典。

斯巴达使者来到雅典议事会，自称拥有解决一切分歧的全权。亚西比德担心一旦斯巴达使者在雅典公民大会面前做出了同样的宣言，雅典人民就会拒绝与阿尔戈斯结盟，于是劝说斯巴达使者在雅典公民大会面前不要说自己拥有这样的全权。作为交换，他答应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皮洛斯归还斯巴达，并解决其他争端。然而，在公民大会上，亚西比德问斯巴达使者们是否拥有谈判全权，他们回答说没有，他却斥责他们不诚实，这令斯巴达使者大吃一惊。雅典公民大会很快决定与阿尔戈斯结盟，但由于地震，未能当场缔结盟约。斯巴达使者没有机会抱怨亚西比德的花招，并且肯定很快就启程返回斯巴达，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参加了次日的公民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尼基阿斯寻求推迟投票。他坚持认为，对雅典来说，斯巴达的友谊比阿尔戈斯的友谊更珍贵。他提议派遣使团去弄清楚斯巴达的意图，因为亚西比德阻止了斯巴达使者发言。尼基阿斯还指出，此时雅典的好运气和安全都在最高点，和平只会对他们有益；而斯巴达此时受到威胁，处境不安全，但打一场快仗就有可能扭转他们的劣势，所以战争对雅典不利。对尼基阿斯的观点其实可以这样反驳：斯巴达奸险歹毒，对雅典抱有敌意，若是给斯巴达一段时间来恢复元气，那它对雅典人的威胁就更大了；现在正是斯巴达虚弱的时候，受到一个强大联盟的威胁，正好可以把它彻底干掉，消除这么多年来它对雅典的威胁。但雅典人仍然不愿意继续打仗，于是推迟了决定是否与阿尔戈斯结盟的投票，并派遣尼基阿斯作为使团成员去斯巴达。雅典使者要求斯巴达完好无损地归还帕那克敦，返还安菲波利斯，并放弃与玻俄提亚人的盟约，除非玻俄提亚人接受《尼基阿斯和约》；使者还宣布，如果斯巴达不肯放弃与玻俄提亚人的盟约，雅典将与阿尔戈斯结盟。

这些要求使和解的希望破灭了，因为斯巴达人拒绝了这些要求。尼基阿斯要求斯巴达再次宣誓遵守《尼基阿斯和约》，“因为他担心两手空空地返回雅典，可能会遭到攻击。后来果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被看作雅典与斯巴达和约的责任人”（5.47.4）。斯巴达人不愿意重开战端，于是同意再次宣誓，但保留了与玻俄提亚的联盟。正如尼基阿斯所预料的，雅典公民大会得知消息后暴跳如雷，立即与阿尔戈斯、厄利斯和曼丁尼亚缔结了盟约。这是互不侵犯条约和防御性盟约，一方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三个民主制国家及其附庸国，另一方是雅典及其附庸国，为期一百年。这份条约是亚西比德的一大胜利，它使雅典走上了不同于《尼基阿斯和约》的道路。

尽管矛盾重重，雅典和斯巴达都至少在表面上遵守和约，因为双方都不想承担破坏和约的责任。与此同时，科林斯人可以不必隐瞒意图地行动了。他们“脱离了自己的盟友，又一次倒向斯巴达人那

边”（5.48.3）。他们的诡计消解了阿尔戈斯联盟的力量，使它当中没有任何寡头制国家，因此成为一个与雅典结盟的民主制国家联盟。科林斯人希望这样的威胁能促使斯巴达再次投入战争。科林斯人还小心保留了他们与阿尔戈斯、厄利斯和曼丁尼亚签订的防御同盟，因为斯巴达政治的不稳定性可能需要他们在将来制定新的战略对策。此外，与伯罗奔尼撒半岛民主制国家的暧昧关系也使他们在将来的关键时刻能够施加干预。

斯巴达受辱

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半岛民主制国家的结盟不仅改变了雅典政治的方向，还鼓励斯巴达的敌人做出新的大胆举动。在前420年夏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斯巴达人遭受了一次严重的公开侮辱。厄利斯人对斯巴达人做出了可疑的指控，控诉他们违反了举行运动会时的神圣休战规定，于是不准斯巴达人参加竞技，也不允许他们进行惯常的献祭。斯巴达人要求法庭裁决，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法庭由厄利斯人组成，裁决结果为斯巴达人有罪，并对其处以罚款。厄利斯人提议，他们可以免除一半罚金；如果斯巴达人将列普里昂归还厄利斯，他们还可以替斯巴达人支付另一半罚金。斯巴达人拒绝了，于是厄利斯人提出了羞辱性的要求：斯巴达人需要在奥林匹亚大神宙斯的祭坛前宣誓，将来如数缴纳罚金。斯巴达人又一次拒绝了，因此被禁止进入神庙、举行献祭和参加竞技。厄利斯人竟敢做出如此挑衅的行为，就是因为他们与雅典和其他的伯罗奔尼撒民主制国家是同盟关系。为了防备斯巴达人攻击圣所，厄利斯人部署了自己的军队，另外阿尔戈斯和曼丁尼亚各出兵1000人相助，雅典也派出了一支骑兵。

但是，有一位斯巴达人拒绝忍气吞声地接受这些侮辱。在斯巴达人当中，阿开西劳斯之子利卡斯凭借其家族的财富和名望而享有突出地位。他的父亲曾两次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他本人曾参加赛车竞技，还作为东道主款待一群到斯巴达观摩吉姆诺排狄埃节庆的外邦人。

他是阿尔戈斯人在斯巴达的荣誉领事[3]，与玻俄提亚人也有着亲密关系。他可能支持森纳里斯和克里奥布鲁斯的政策，而且再也没有比他更适合在斯巴达人、阿尔戈斯人和玻俄提亚人之间搞秘密谈判的人了。不管怎样，他在前42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举动表现出了极大勇气和坚强不屈的精神。

他是斯巴达人，因为被禁止参加竞技，所以他正式将自己的战车送给底比斯人，然后代表底比斯人参加了比赛。利卡斯的战车获得了第一名，他大踏步走进赛场，为得胜的驾车手佩戴冠冕，以明确表示这是他的战车。厄利斯人大发雷霆，让参赛者用鞭子抽打他，将他逐出赛场。尽管人们担心斯巴达军队可能会赶到现场，但斯巴达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给人的印象是，他们被雅典及其伯罗奔尼撒盟友吓倒了。运动会结束不久之后，或许是因为看到斯巴达受辱而感到振奋，阿尔戈斯人又一次邀请科林斯人加入新联盟，这个联盟如今已经包括了雅典人。斯巴达代表来到科林斯，可能想劝阻科林斯加入阿尔戈斯联盟，但由于地震，会议被迫终止，没有任何结果。

人们普遍觉得斯巴达人很软弱，很快斯巴达人又遭遇了新的尴尬。前420/前419年冬季，斯巴达在赫拉克利亚的殖民者遭到邻国攻击（见地图14），那里的斯巴达总督被杀。底比斯人派去了1000名重步兵，表面上要去救援那座城市，但在3月却将其据为己有，赶走了斯巴达派去的新总督。修昔底德说，底比斯人这么做是因为害怕雅典人占领赫拉克利亚，也因为斯巴达人身陷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麻烦之中，无力保卫赫拉克利亚。我们可以推测，底比斯人看到斯巴达已经软弱无力，于是抓住机遇，削弱斯巴达在希腊中部的影响力，以加强自己的实力。“不过斯巴达人对他们很恼火”（5.52.1），这些事件使斯巴达与底比斯这个重要盟友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雅典与阿尔戈斯、厄利斯、曼丁尼亚的联盟虽然并没有对斯巴达造成多少实质性的伤害，但在雅典采取任何重要行动之前，联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亚西比德在伯罗奔尼撒半岛

前419年初夏，雅典人开始加强新联盟，并利用了斯巴达丧失威信的机会。亚西比德再次当选为将军，率领一小队雅典重步兵和弓箭手进入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他在这次远征的筹划阶段便与阿尔戈斯人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其他盟友做了协调。亚西比德迂回战略的最终目标是科林斯，若能让它脱离斯巴达联盟，对斯巴达联盟将是一次沉重打击。雅典人横跨伯罗奔尼撒半岛，从阿尔戈斯开赴曼丁尼亚和厄利斯，然后奔向阿开亚沿海的帕特雷（在科林斯湾之外）。亚西比德将帕特雷拉拢到雅典阵营，并说服那里的人民建造海墙，以便与雅典保持通畅的联络，准备抵抗斯巴达的攻击（见地图10）。雅典人企图在瑞昂（在科林斯湾最狭窄处，与纳夫帕克托斯隔海相望）建造一座阿开亚要塞，但科林斯人、西锡安人和该地区的其他人及时赶到，阻止了雅典人。

雅典人这一切的举动不仅是炫耀武力，而且是向科林斯和斯巴达的其他盟邦施加压力的计划的一部分。雅典与帕特雷的盟约，以及在瑞昂修建壁垒，能够有效地封锁科林斯湾入口，使科林斯、西锡安和墨伽拉的船只无法通行。亚西比德到帕特雷时只带了一小队士兵，没有海军，如果帕特雷人想抵抗他，可以轻松做到。他们同意与雅典结盟，这表明在世人眼中斯巴达已经衰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然而，更能证明斯巴达弱势的事情是，亚西比德一路穿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竟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亚西比德在这年夏天的第二个目标是占领埃皮达鲁斯，阿尔戈斯人最终将其付诸实践。据修昔底德记载，阿尔戈斯人以惯常的借口（亵渎神明）指控埃皮达鲁斯并发动了进攻，但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开辟一条较短的连接雅典的交通线，并且最重要的是“让科林斯闭嘴”（5.53.1）。

亚西比德在阿开亚和埃皮达鲁斯的行动都是一个计划的组成部分，都是为了威胁和孤立科林斯。雅典与帕特雷的盟约有助于切断科林斯人

与其西方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和交通线，而占领埃皮达鲁斯后便可以从两面威胁科林斯，并证明阿尔戈斯和雅典有能力击败与斯巴达结盟的伯罗奔尼撒国家。占领埃皮达鲁斯之后，阿尔戈斯人便可以从南面进攻科林斯，而雅典人可以同时在科林斯沿海登陆，就像尼基阿斯在前425年做的那样。这样的威胁很可能促使科林斯人脱离斯巴达联盟。就算科林斯保持中立，也能阻止玻俄提亚人与斯巴达人合作。假以时日，墨伽拉或许还有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其他国家，都会选择中立，而不是站在衰弱的斯巴达一边去对付越来越强大的新联盟。

这是一项务实的战略，有希望给雅典人带来很大的成功，而无须冒太大的风险，更不用投入很多人员和资金。亚西比德仅仅将武力用作施加压力的外交手段，既不是为了迫使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敌人与自己交战，也不是为了消耗敌人的资源，而仅仅是迫使敌人改变行动策略。

斯巴达人对抗阿尔戈斯

阿尔戈斯对埃皮达鲁斯领土的入侵果然达到了目的，促使斯巴达人采取行动。年轻的阿基斯二世国王率领整个斯巴达陆军奔赴阿卡狄亚地区，从那里他可以去往西北方的厄利斯、北方的曼丁尼亚，还可以去往东北方的阿尔戈斯。“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向何方行军，就连派遣他们的城邦也不知道。”（5.54.1）

阿基斯二世没有公布自己真实目标的原因是，他在边境献祭时，征兆不吉。斯巴达人打算回家，并向各盟邦传话，在即将到来的卡内奥斯月[4]（对多利亚人来说是一个神圣的月份）结束之后再出兵。尽管斯巴达人非常虔诚，但前419年夏季连续发生的两次类似事件，还是引起了民众的怀疑。一次是阿基斯二世指挥的斯巴达军队因为征兆不吉而放弃攻击阿尔戈斯人或其盟友。另一次是这个夏季晚些时候，斯巴达人害怕伯罗奔尼撒联盟崩溃，所以即便遇到了不吉利的征兆，还是采取了行动。这就更加让人怀疑他们了。因此证据表明，阿基斯二世在边境遇到

的不吉征兆仅仅是个借口。

阿基斯二世奉命出兵，所以即便遇到了不吉利的征兆，也不能两手空空地撤退。埃皮达鲁斯人（斯巴达盟邦当中真正忠于斯巴达的朋友）和许多求战心切的斯巴达人再也不可能被约束住了。阿基斯二世命令在卡内奥斯月结束之后再集结，无疑是用一个虔诚的借口来拖延时间，并让寡头派有机会控制阿尔戈斯。统治阿尔戈斯的民主派（他们敌视斯巴达）也使用了他们自己的宗教花招。他们在卡内奥斯月前一个月的27日入侵埃皮达鲁斯，随后将他们停留在埃皮达鲁斯领土的每一天都称为这个月的27日，于是避免了亵渎卡内奥斯节日。埃皮达鲁斯人请求他们的伯罗奔尼撒盟友进行援助，但有的盟邦以神圣月份不利动兵为借口拒绝支援，有的盟邦的军队则在抵达埃皮达鲁斯边境后就止步不前。

在阿尔戈斯联盟抓住这个机会攻击埃皮达鲁斯之前，雅典人在曼丁尼亚召开了一次会议来商讨议和事宜。亚西比德又一次运用军事压力和外交手段，而不是重步兵交锋。他打算利用阿基斯二世的犹豫不决，劝说科林斯人在自己被斯巴达抛弃之前先抛弃斯巴达。但在这次会议上，同样狡猾的科林斯人指控阿尔戈斯联盟虚伪，因为阿尔戈斯人嘴里谈着和平，背地里却在攻击埃皮达鲁斯人。于是科林斯人要求先解散两支军队（阿尔戈斯人和雅典人），再继续开会。或许科林斯人以为阿尔戈斯人会拒绝，于是就有了终止会议的理由。但即便在阿尔戈斯人被说服撤军之后，会议仍然毫无成果。科林斯人一定知道如果他们退出斯巴达联盟，雅典就可能得胜，所以当亚西比德努力迫使科林斯人加入反对斯巴达的新联盟时，科林斯人拒绝了和平条件。这次会议无果而终，亚西比德获得一次外交胜利的企图也破灭了。

阿尔戈斯人迅速返回蹂躏埃皮达鲁斯，斯巴达人再一次出兵前往斯巴达-阿尔戈斯边境方向，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确定无疑的。雅典人的回应是派遣1000名重步兵去保护自己的阿尔戈斯盟友，而阿尔戈斯人则

撤回去保卫自己的城市。但是，阿基斯二世的献祭又一次产生了不吉利的征兆，于是斯巴达军队撤退了。即便如此，斯巴达攻击阿尔戈斯的威胁缓解了埃皮达鲁斯的压力，使阿基斯二世及其同党避免了与阿尔戈斯人发生正面冲突。亚西比德带着他自己的部队返回了雅典。前419年的军事行动就这样结束了，科林斯仍然是斯巴达的盟友，这明确表明要想摧毁伯罗奔尼撒联盟，仅凭外交手段是不够的。这个令人失望的结果不仅在新联盟中形成了压力，还反映了雅典政坛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

在随后的冬季，斯巴达人派遣300人走海路去增援埃皮达鲁斯。他们的路线经过雅典人在埃吉那岛与迈萨纳的基地（见地图1），这让阿尔戈斯产生不满和抱怨。因为阿尔戈斯与雅典的条约要求雅典人阻止任何敌军穿过其盟邦的领土，而雅典人尽管拥有制海权，却让斯巴达人顺利完成了这次调动。阿尔戈斯人要求雅典做出补偿，将纳夫帕克托斯的黑劳士和美塞尼亚人送回皮洛斯，让他们以那里为基地去骚扰斯巴达人。这个要求的目的是促使雅典人明确地投入反对斯巴达的战事。

作为回应，亚西比德说服雅典人在铭刻着《尼基阿斯和约》条文的石头上记录道，是斯巴达人背弃了和约誓言。雅典人将黑劳士送回皮洛斯，然后他们从那里出发，蹂躏美塞尼亚乡村。但是，雅典人还不肯正式地抛弃和约，这也表明雅典的政治局势非常微妙。虽然大多数雅典人支持阿尔戈斯联盟，但并没有稳定的多数派来主张再次开启与斯巴达人的战事。亚西比德可以说服他的同胞加入一个联盟，让其他国家承担大部分作战任务，但他无法说服雅典人投入一场让许多雅典士兵冒生命危险的战争。雅典人的分歧和暧昧使他们无法执行连贯一致的政策。

斯巴达人同样没有一致的意见，有的人甚至没有拿定主意。尽管从技术上讲，雅典人的这些行动都没有违反和约，但每一次行动都令人担忧；斯巴达人实在无法对雅典人支持阿尔戈斯攻击埃皮达鲁斯的行为视若无睹。即便如此，斯巴达人既没有公开宣布和约已经失效，也没有正

式回应雅典的宣言（斯巴达背弃了和约誓言）。有些斯巴达人坚决要维持与雅典的和平；有的人则希望继续打下去，但主张采纳一种不同的策略。有些人希望直接攻击阿尔戈斯及其盟友（包括雅典）；有的人则希望先通过外交手段和收买内奸来切断阿尔戈斯与其盟邦的关系，然后再次向雅典开战。最后，雅典和斯巴达都避免参与埃皮达鲁斯战役，于是这个冬季相安无事地过去了。

亚西比德的战略未能即刻取得决定性成果，再加上雅典人民害怕又一次与斯巴达交战，这导致雅典领导层发生了一次命运攸关的洗牌。雅典人将尼基阿斯和他的几位朋友选为前418年的将军，而拒绝选举亚西比德。这次选举实际上表明雅典人选择了谨慎而非冒险，不愿意向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战场投入雅典军队。但由于雅典人并未放弃与阿尔戈斯的联盟，他们仍然致力于帮助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盟友。或许他们希望自己军队的领导人是更为保守的人士，却不曾认识到雅典与斯巴达是盟友关系，雅典与阿尔戈斯也是盟友关系，而斯巴达与阿尔戈斯是敌对关系。雅典身处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是多么矛盾的现实。

阿尔戈斯平原的对抗

前418年仲夏，阿基斯二世国王率领8000名重步兵（包括整个斯巴达陆军、泰吉亚人和其他仍然忠于斯巴达的阿卡狄亚人），去攻打阿尔戈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内外的其他盟友则奉命在弗利奥斯集结。在弗利奥斯的军队加起来一共有约1.2万名重步兵、5000名轻装部队和1000名来自玻俄提亚的骑兵和乘骑步兵。这次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就是斯巴达对亚西比德政策威胁的回应。斯巴达人发动了此次军事行动，“因为他们的盟友埃皮达鲁斯人受苦受难，而他们的其他伯罗奔尼撒盟友有的在造反，有的对斯巴达不友好。他们觉得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麻烦会更多”（5.5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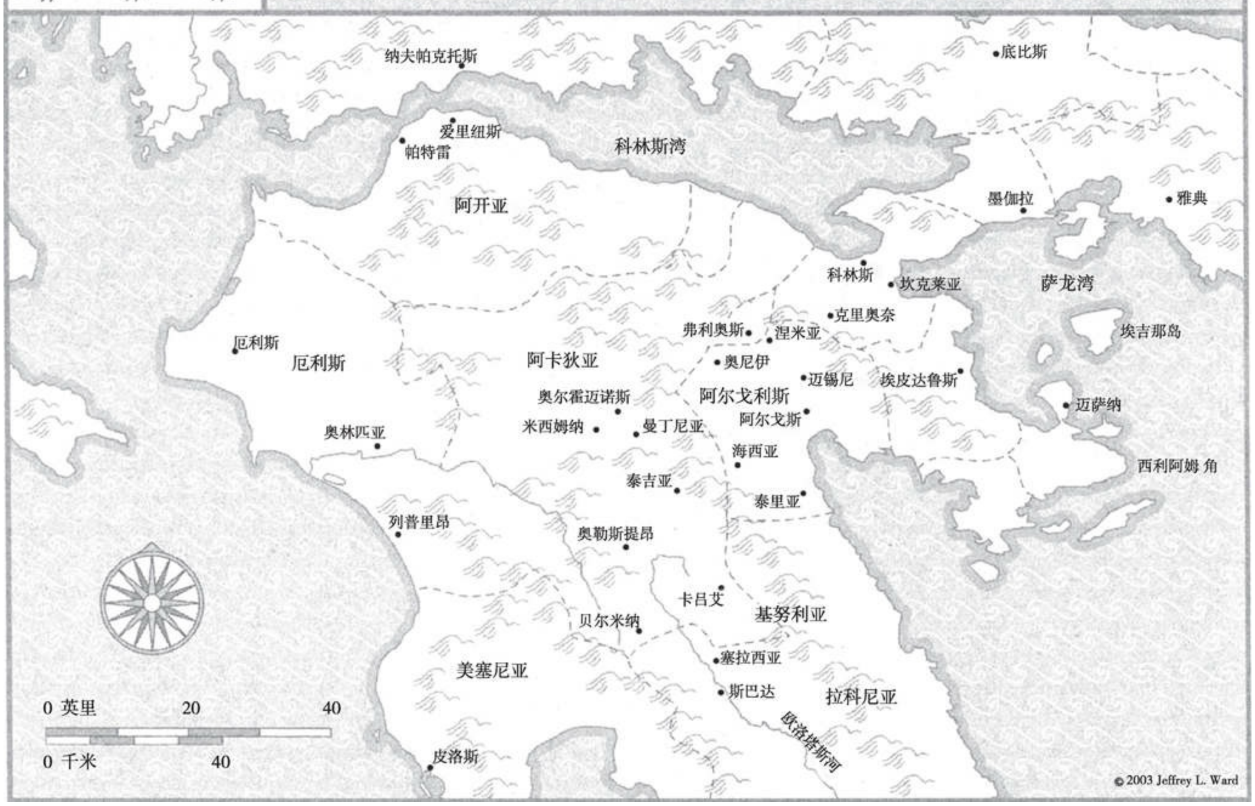
为了应战，阿尔戈斯人集结了约7000名重步兵，3000名厄利斯人，

约2000名曼丁尼亚人及其阿卡狄亚盟友，因此总兵力约1.2万人。雅典人同意派遣1000名重步兵和300名骑兵，但这些部队尚未抵达。如果阿尔戈斯人允许两支敌军会师，就会让自己处于寡不敌众的境地：斯巴达联盟有2万名重步兵，阿尔戈斯一方仅有1.2万人；斯巴达联盟有1000名骑兵和5000人的轻装部队，而阿尔戈斯一方完全没有骑兵和轻装部队。因此，阿尔戈斯必须抢在阿基斯二世的军队与北面的弗利奥斯军队会合之前拦截阿基斯二世。于是，阿尔戈斯人向西开进了阿卡狄亚（见地图17）。

从斯巴达到弗利奥斯的直接路线需要经过泰吉亚和曼丁尼亚，但阿基斯二世不能冒险走这条路线，因为在与北方军队会合之前必须避免交战。于是他选择了一条通往西北方的道路，穿过贝尔米纳、麦塞德里昂和奥尔霍迈诺斯。在麦塞德里昂，他遇到了阿尔戈斯人及其盟军，后者在山上的据点挡住了斯巴达人的去路。他们还阻塞了通往曼丁尼亚和阿尔戈斯的道路，这意味着如果阿基斯二世企图东进，他的军队就会被孤立在敌境，并被迫独自与优势敌人对抗。阿尔戈斯人的此次机动在战术上是一次极大的成功，阿基斯二世别无他法，只得占据面对敌人的另一座山丘。夜幕降临时，阿基斯二世的处境越来越令人绝望：他要么在不利于己方的情况下作战，要么屈辱地撤退。

但天亮之后，斯巴达军队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阿基斯二世在夜间从阿尔戈斯人眼皮底下溜走，已经在去往弗利奥斯的路上了。在弗利奥斯，他接过“当时最精锐的希腊军队”（5.60.3）的指挥权。大约17英里之外就是阿尔戈斯城及其守军。阿尔戈斯人在麦塞德里昂错失机会之后便匆匆赶回了家园。两军之间隔着崎岖的山地，只有一条可供骑兵行动的道路，被称为特雷图斯隘道。它的入口在涅米亚以南，经过迈锡尼附近（见地图18）。但另一条更直接的道路通往特雷图斯以西，经过科路撒山，向南进入阿尔戈斯平原。这条路不适合骑兵，但步兵可以利用它抵达阿尔戈斯。阿尔戈斯人一定知道这条经过科路撒山的道路，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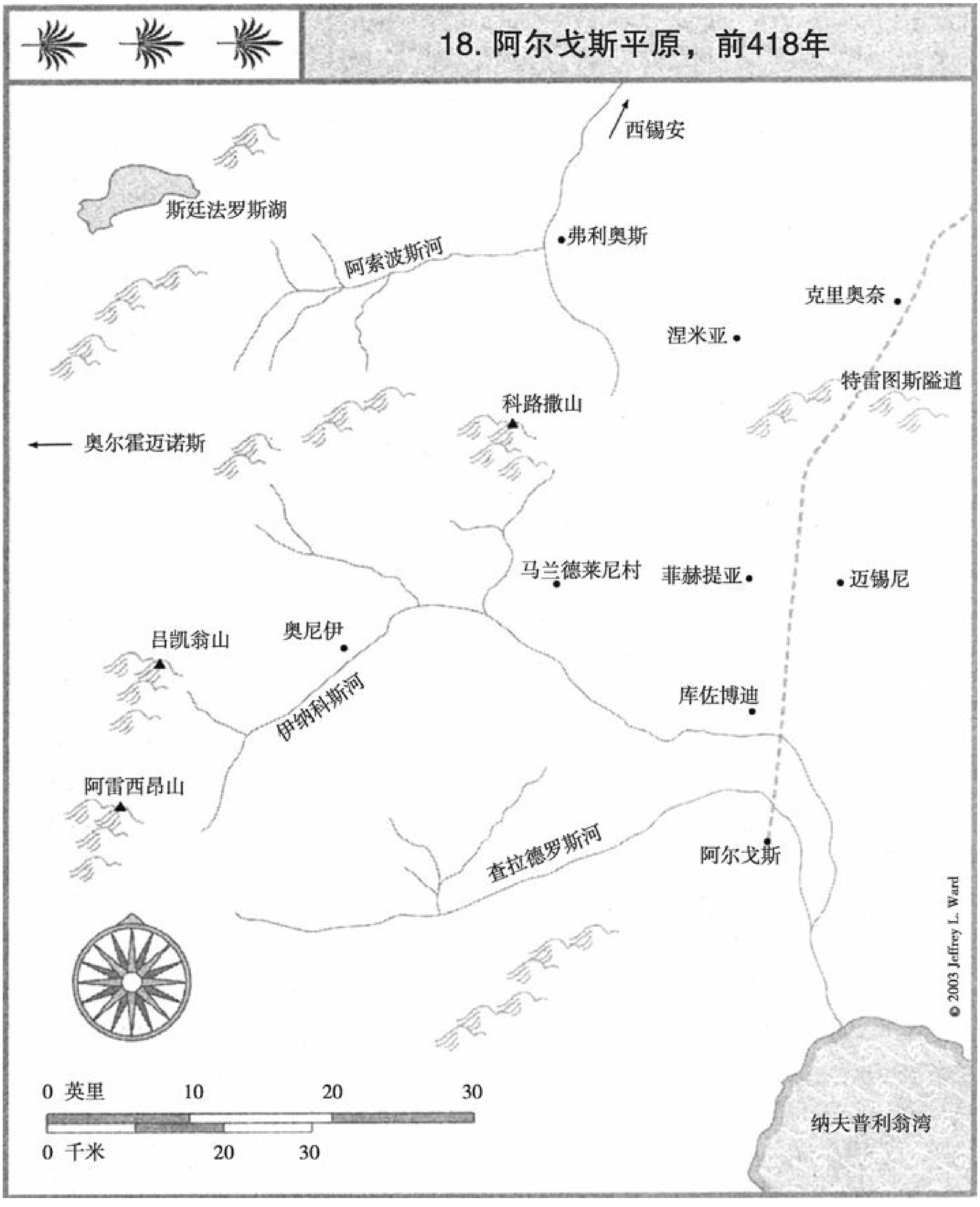
们的将军却率军径直奔赴涅米亚，以抵挡敌人通过特雷图斯隘道的正面进攻，并没有防备敌人可能取道科路撒山发动侧翼包抄。这是阿尔戈斯人在几天之内犯下的第二个错误，虽避免了交锋，却让敌人抵达了作战目的地。或许这一次阿尔戈斯将军们仍然在争取时间，以便与斯巴达取得和解。



17. 通往阿尔戈斯的道路，前418年

阿基斯二世兵分三路。玻俄提亚人、西锡安人、墨伽拉人和全体骑兵通过特雷图斯隘道。来自科林斯、培林尼和弗利奥斯的部队则取道科路撒山，可能抵达了现代的菲赫提亚村附近的平原。阿基斯二世亲自率领斯巴达人、阿卡狄亚人和埃皮达鲁斯人走了第三条道路，这条路同样险峻难走，但能把他带到现代的马兰德莱尼村附近。无论如何，阿基斯二世到达了阿尔戈斯军队后方较远处。他又一次成功地在夜间行军。次日早上，在涅米亚的阿尔戈斯军队得到消息，阿基斯二世已经到达他们后方，正在蹂躏萨明苏斯镇及其周边地区（可能在现代的库佐博迪附

近）。阿尔戈斯人匆匆奔回自己的城市，途中遭到弗利奥斯人和科林斯人的袭扰，耽搁了一些时间，但最终突破了敌人阻挠，来到阿基斯二世与其盟军部队之间。“阿尔戈斯人中路被切断：在平原那一边，斯巴达人和盟军阻挡住了阿尔戈斯人去往城市的道路；在阿尔戈斯人北面，科林斯人、弗利奥斯人和培林尼人拦住他们的去路；在涅米亚那一边，有玻俄提亚人、西锡安人和墨伽拉人。阿尔戈斯人没有骑兵，因为他们所有的盟友当中唯独雅典人没有来。”（5.59.3）



斯巴达人夹在阿尔戈斯军队和阿尔戈斯城之间，阿尔戈斯人准备作战。就在两军即将交锋之际，两个阿尔戈斯人——斯拉苏卢斯和阿尔基

弗隆——走上前来与阿基斯二世交谈。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他们与斯巴达人缔结了四个月的停战协定，于是这一天没有发生交战。两支军队的反应更是奇怪：双方都因为失去了作战机会而恼怒。阿尔戈斯人从一开始就相信“战局可能对他们有利，因为斯巴达人被阻滞在阿尔戈斯的土地上，并且与阿尔戈斯城只有咫尺之遥”（5.59.4）。他们返回阿尔戈斯城之后，没收了斯拉苏卢斯的财产，几乎将他用乱石打死。斯巴达人则“责怪阿基斯二世，因为尽管胜算比以前大得多，他却未能征服阿尔戈斯”（5.63.1）。

雅典人最终抵达的时候，兵力不多，而且来得太晚，阿尔戈斯行政长官（他们一定是寡头派）让雅典人回去，不准他们在阿尔戈斯公民大会上发表言论。亚西比德以使者的身份陪同雅典军队前来。他以令人震惊的大胆，不仅没有为雅典人的迟到而道歉，还抱怨说阿尔戈斯人没有权利在未与盟友协商的情况下与敌人停战。他坚持说，联盟应当继续作战，因为雅典人已经到了。厄利斯、曼丁尼亚和其他盟友被轻易说服了，于是整个联盟决定进攻阿卡狄亚的奥尔霍迈诺斯。那是一个关键地点，可以阻挡任何军队从科林斯地峡和更远的地方去往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和南部。在耽搁一段时间之后，阿尔戈斯人也加入了对奥尔霍迈诺斯的围攻，这座城市没有坚持多久便加入了阿尔戈斯联盟。亚西比德虽然没有正式的指挥权，却挫败了他的雅典竞争对手，令四方（雅典、阿尔戈斯、厄利斯、曼丁尼亚）联盟获得了新生。

奥尔霍迈诺斯的陷落令斯巴达人怒火中烧，也促使他们谴责了阿基斯二世接受停战的决定。他们决心摧毁他的宅邸，并对其处以1万德拉克马的罚金。直到阿基斯二世承诺下一次出征时一定洗雪耻辱，他们才肯罢手。尽管如此，斯巴达人还是实施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法律，任命了10名顾问陪同阿基斯二世出征，并“辅佐”他；若没有顾问们的同意，他无权率军出城。斯巴达人感到不满的并非他的军事表现，因为如果他们想惩罚他在军事行动上的失败或者怯懦，那么他一定在返回斯巴达之后

就立刻遭到惩罚，而不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认为他的错误是政治上的，因为阿基斯二世的意图是让阿尔戈斯的寡头派将他们的城市交给斯巴达，而无须动武。奥尔霍迈诺斯的陷落证明他的计划失败了，阿尔戈斯联盟仍然很有力量。

奥尔霍迈诺斯陷落之后，阿基斯二世放弃了与阿尔戈斯和解，决心对奸诈的阿尔戈斯人施以报复。泰吉亚城出现的麻烦给了他机会。阿尔戈斯联盟的成功和斯巴达人的踌躇不决使泰吉亚的一个派系备受鼓舞，他们热切希望将泰吉亚交给阿尔戈斯人及其盟友。斯巴达人得到消息：如果他们不尽快采取行动，泰吉亚就会倒向阿尔戈斯。若是让敌人控制了泰吉亚，斯巴达人就会被困在拉科尼亚，进而丧失对伯罗奔尼撒联盟的领导权，妨碍他们与美塞尼亚的联系。泰吉亚在前6世纪加入伯罗奔尼撒联盟，象征着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开端和斯巴达的崛起；如今，它若是倒戈，伯罗奔尼撒联盟和斯巴达的霸权就都会结束。阿基斯二世和斯巴达人别无选择，只能北上去挽救泰吉亚。

---

[1] 陶片放逐是古代雅典城邦的一项政治制度，由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于前510年创立，因用碎陶片投票而得名。雅典人民可以通过投票强制将某个人放逐，目的在于驱逐可能威胁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遭到陶片放逐的人往往是非常有才干和名望的人。放逐期限为10年（一说为5年，但都可以因城邦需要而随时被召回）。被放逐者无权为自己辩护，须在10天内处理好自己的事务，然后离开城邦。放逐期间，被放逐者保留公民权和财产权，回到城邦后自动恢复。遭到陶片放逐并不意味着此人犯了罪，一般也不被视为耻辱。

[2] 拉刻代蒙即斯巴达。

[3] 荣誉领事（Proxenos）是古希腊的一种外交安排。A城邦的一名公民（由城邦选出）自费招待B城邦的外交使节，由此获得荣誉领事的头衔。荣誉领事应当运用自己在A城邦的影响力来代表、保护和促进B城邦的利益，并增进两个城邦的友谊。荣誉领事会竭力避免两个城邦发生战争，但如果的确发生战争，他仍然效忠于A城邦，因为他是A城邦的公民。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雅典的客蒙就是斯巴达在雅典的荣誉领事，他对斯巴达非常有好感。荣誉领事的头衔往往在一个家族里世袭。

[4] 斯巴达历法的卡内奥斯月大致相当于现代公历的8月。

第十八章 曼丁尼亚战役（前418年）

前418年8月底，斯巴达人在得知泰吉亚受到威胁后，立刻召唤阿卡狄亚盟友在那里与他们会合。他们还要求在科林斯、玻俄提亚、福基斯和洛克里斯的北方盟友尽快赶到曼丁尼亚。部队能否及时赶到是个问题，因为奥尔霍迈诺斯陷落之后，这些国家大多数的南下道路都处在敌人的控制之中。为了安全通过，这些北方盟友必须先集结自己的军队，可能是在科林斯集结，然后以数量优势压倒任何阻挡他们的敌人。即便尽了最大努力，北方盟军在收到斯巴达人的指示之后仍至少需要十二至十四天才能抵达曼丁尼亚。另外，修昔底德的记载表明其中一些北方盟国对斯巴达的召唤不悦，而玻俄提亚人和科林斯人可能还在为他们上次进军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毫无成效而恼怒。这种不情愿和怨恨情绪也可能使他们耽搁了更长时间。

阿基斯二世进军泰吉亚

阿基斯二世估计自己在曼丁尼亚遇到的敌军兵力和他之前在阿尔戈斯遇到的差不多，也就是约1.2万人。他在阿尔戈斯的军队约8000人。如今他又得到了一些解放黑劳士，再加上泰吉亚人的城内军队，他的总兵力可能多达1万名重步兵。即便如此，敌军兵力仍然超过他。

阿基斯二世还有另一个问题，即斯巴达人对他的指挥信心不足。他曾两次率军入侵阿提卡。第一次发生了地震，他未能进入阿提卡。第二年入侵时，阿提卡的庄稼尚未成熟，士兵无法获得口粮，而猛烈的暴雨更是增加了饥饿将士的苦难。这次入侵只持续了十五天，是整个战争期间最短的一次。雅典人在皮洛斯建造要塞的消息迫使阿基斯二世率军返回了斯巴达，虽然吃尽苦头却毫无建树。在这两次入侵中，他都没能获得多少作战经验，而且两次的运气都特别糟糕。前418年远征阿尔戈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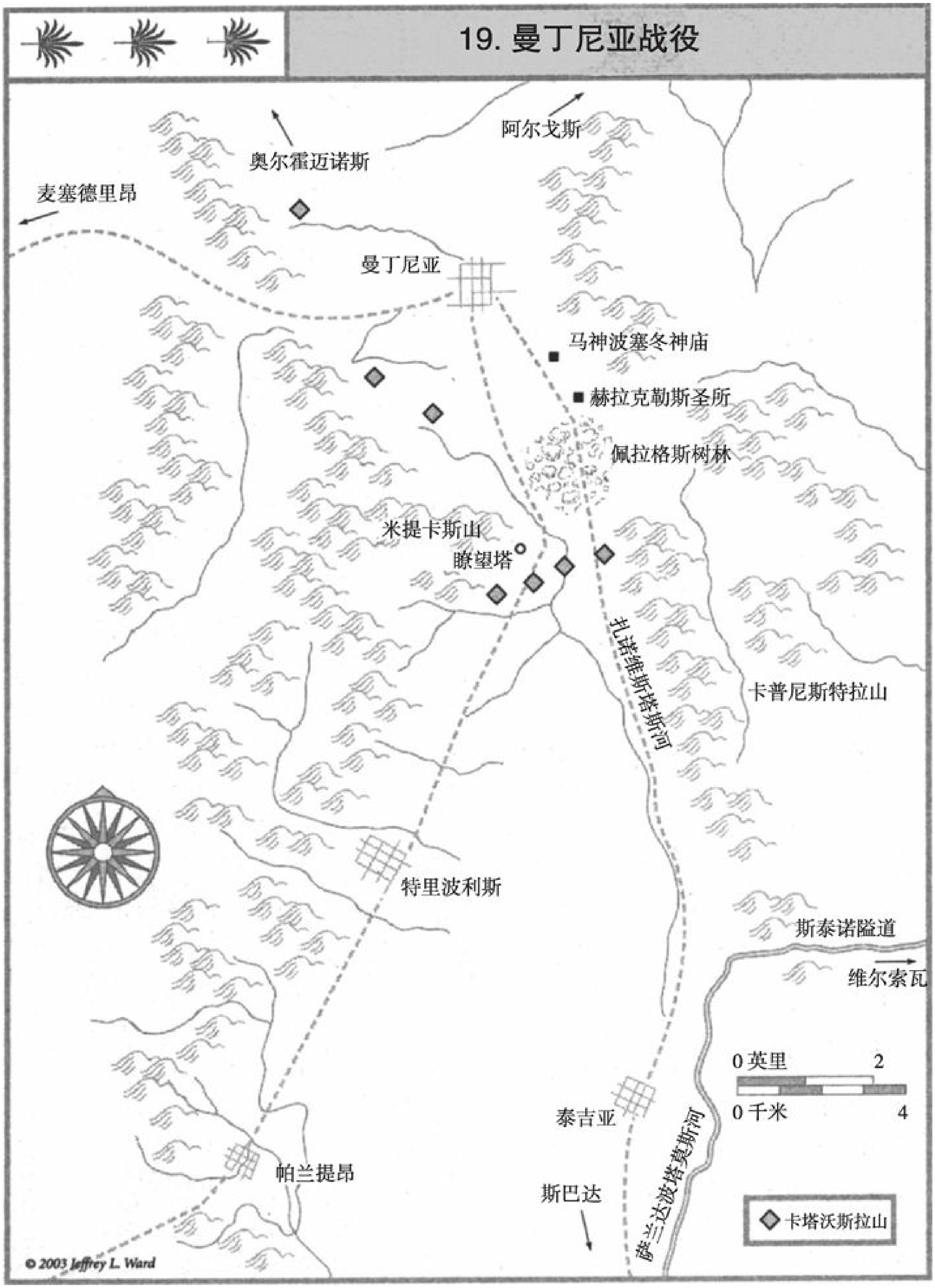
的行动同样也没有增加这位年轻国王的公信力。他两次到达边境之后又返回，据说是由于征兆不吉。当他最终有机会与一支被包围的弱势敌人交战时，他又没有交锋。他选择了外交手段而不是战争，这或许能得到一些同情。但在阿尔戈斯人及其盟军后来占领奥尔霍迈诺斯之后，他的形象再次遭到攻击。泰吉亚传来的坏消息一定令斯巴达人更加不悦。仅仅因为他们的另一位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完全没有公信力，他们才允许阿基斯二世再次指挥军队；尽管他们采取了谨慎的措施，用10名顾问来约束他。曼丁尼亚行动是阿基斯二世最后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若是成功，他的名誉将得以挽回；若是失败，他就彻底身败名裂了。

阿基斯二世执行此次行动时，遇到了一个棘手的策略问题：为了防止泰吉亚发生政变，他必须尽快抵达那里；但到达那里之后，为了等待北方盟军，他必须等待至少一周，因而他不得不在等待期间独自面对优势敌人。别的斯巴达领导人或许可以选择待在泰吉亚城内，在盟军抵达前拒绝交战，任凭敌军蹂躏泰吉亚土地、摧毁农舍、逼近城市并辱骂斯巴达人及其统帅的怯懦。但是，阿基斯二世绝不能让别人觉得他害怕作战。他知道自己将面对优势敌人，所以他不得不冒险将整个斯巴达陆军都带走，而让斯巴达本身无人防守，尽管此时美塞尼亚人以皮洛斯为基地，威胁要煽动黑劳士起义。

在去往泰吉亚的途中，阿基斯二世得到一个好消息：厄利斯人没有加入曼丁尼亚盟军。曼丁尼亚人希望攻击泰吉亚，因为泰吉亚是曼丁尼亚的邻国和宿敌，而厄利斯人则主张进攻列普里昂。与此同时，雅典人和阿尔戈斯人认识到了泰吉亚的战略意义，因此都支持曼丁尼亚人的观点。厄利斯人大为不满，将自己的3000名重步兵撤走了。阿基斯二世利用敌人内部的分歧，将自己军队的六分之一[1]遣回保卫国家。但即便少了这500～700人，他仍然拥有超过9000名斯巴达和盟军士兵，比阿尔戈斯联盟的约8000人多。

迫使敌人交战

厄利斯人的脱离解决了阿基斯二世策略上的困难，但厄利斯人肯定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并重新回到阿尔戈斯联盟的军队中，说不定在斯巴达的北方盟军抵达之前就能回来。形势紧迫，阿基斯二世必须在厄利斯人回来之前，迫使敌人与自己正面交战。阿基斯二世收纳了在泰吉亚的盟军，前进到距曼丁尼亚城东南不到1英里处的赫拉克勒斯圣所（见地图19）。泰吉亚和曼丁尼亚这两座城市所在平原的海拔约为2200英尺，周围都是山丘。这块平原在南北方向上最长处约18英里，东西方向最宽处约11英里。平原由南向北略微倾斜，曼丁尼亚的海拔比10英里之外的泰吉亚低约100英尺。


19. 曼丁尼亚战役
阿尔戈斯
奥尔霍迈诺斯
麦塞德里昂
曼丁尼亚
马神波塞冬神庙
赫拉克勒斯圣所
佩拉格斯树林
米提卡斯山
瞭望塔
扎诺维斯塔斯河
卡普尼斯特拉山
特里波利斯
斯泰诺隘道
维尔索瓦
0 英里 2
0 千米 4
泰吉亚
萨兰达波塔莫斯河
帕兰提昂
斯巴达
卡塔沃斯拉山
© 2003 Jeffrey L. Ward

在曼丁尼亚以南3英里多一点的地方，平原的宽度突然收紧，两座山岭（西面的米提卡斯山和东面的卡普尼斯特拉山）之间有一个宽约2英里的缺口。两国的边境可能就在这个缺口，或者在它南面不远处。在离泰吉亚不远的地方，今天称为扎诺维斯塔斯的小河向北流淌，注入曼丁尼亚平原西端、米提卡斯山北部的一个沉洞[2]。另一条小河萨兰达波塔莫斯途经泰吉亚向北流淌，通过一个隘道向东急转弯，然后注入现代的维尔索瓦附近的三个沉洞，那里还是泰吉亚领土。曼丁尼亚有两条道路向南延伸：一条向西南方通往帕兰提昂；另一条在上述的缺口东端附近，向南通往泰吉亚。在曼丁尼亚以东矗立着一座山，古人称之为阿雷西昂。通往泰吉亚的道路经过阿雷西昂山，山在那里渐渐变为平原，那里坐落着一座马神波塞冬神庙。在阿雷西昂山以南，有一片被称为佩拉格斯的橡树林，差不多一直延伸到卡普尼斯特拉山和米提卡斯山。通往泰吉亚的道路穿过这片树林，通往帕兰提昂的道路则经过树林边缘，向西方延伸。赫拉克勒斯圣所（斯巴达人的营地就在这里）位于平原东部、阿雷西昂山南部。

阿基斯二世发起了攻势，蹂躏敌人的土地，迫使敌人与他交战以便保卫家园。但斯巴达人到达时，收割季节已经差不多结束，因此这种战术没有对敌人形成压力。曼丁尼亚的庄稼在6月中下旬和7月底之间已经收割完毕，庄稼和一切可以移动的值钱东西都已经被存放到安全处，所以斯巴达人不可能造成什么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阿尔戈斯联盟的成员在阿雷西昂山的低矮山坡上占据了强大的防御阵地，那里“陡峭而难以接近”。此时厄利斯人已经同意重新加入联盟军队，正在赶回来的路上。雅典派来的增援部队也在途中。阿尔戈斯联盟的将军们可能已经知道这些动态。援军抵达后，只要战斗在斯巴达的北方盟军抵达之前打响，阿尔戈斯人将拥有兵力优势，可以自行选择交战时机。但在增援部队抵达之前，阿尔戈斯联盟有充分的理由避免交战，除非阿基斯二世鲁莽愚蠢地向他们发起进攻。

阿基斯二世正是这么打算的：命令他的士兵攀登阿雷西昂山坡，攻击居高临下的敌人。这是一个绝望之人的疯狂之举，因为即便他拥有稍许兵力优势，仰攻重步兵方阵是注定失败的。斯巴达人推进到距离敌人“投石之遥或标枪射程之内”，然后突然停止前进。“一个年纪较大的士兵”判断己方不可能获胜，于是向阿基斯二世呼喊，说他的计划是“用一件坏事去补救另一件坏事”（5.65.2）。这个睿智的长者可能是顾问之一，他知道年轻国王发动如此鲁莽的行动，是为了消除他在阿尔戈斯的举动的恶劣影响。阿基斯二世听从了他的警示，迅速率军撤退，没有与敌人发生冲突。所幸阿尔戈斯联军不肯下来追击他，他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此时，阿基斯二世一定比之前更加心急，因为敌人据守高地，在他们的增援部队抵达之前不肯下来。于是他派人去斯巴达，请求将他之前撤回斯巴达的士兵再派回他身边，因为他承认如今他必须冒险在时机和地形都由敌人选择的不利条件下作战。为了降低风险，他必须赌一把，让全部斯巴达军队都参与作战，让斯巴达在一段时间内无人防守。

在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国王率领阿基斯二世要求的部队奔向泰吉亚时，阿基斯二世想出了一个办法：抢在敌人增援部队抵达之前，将敌人吸引到平原上，在那里与其交锋。多年来，泰吉亚人和曼丁尼亚人一直在争夺流经平原的水道。该地区的所有溪流和雨水都注入土壤下方的沉洞。如果降雨量特别大，沉洞注满了水，那么由于土地坡度，曼丁尼亚城可能遭受水灾。在雨季，泰吉亚人可以堵住沉洞或者挖掘沟渠，将溪流引到其他方向，将过剩的积水引向曼丁尼亚领土。另外一个办法是将水量较多的萨兰达波塔莫斯河引入扎诺维斯塔斯河，放水淹没曼丁尼亚平原，破坏其庄稼和城市。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是在两条小河最接近处挖掘一条约1.5英里长的沟渠。在过去，泰吉亚人可能就这么干过，并保留了挖出来的沟渠，希望在萨兰达波塔莫斯河回到正常水道时建造水坝。在泰吉亚与曼丁尼亚的持续冲突中，泰吉亚人可以轻松地拆除水

坝，放水淹没曼丁尼亚的土地。

阿基斯二世率军返回泰吉亚，可能就是打算将萨兰达波塔莫斯河引入扎诺维斯塔斯河；他可能还派人去堵塞两国边境上的沉洞，或者去挖掘引水沟渠。但这些努力还不足以达成阿基斯二世的目标，因为“他希望山上的人在得知这些事情后会下来阻止引水，进而迫使敌人在平原上交战”（5.65.4）。因为沉洞距离阿雷西昂山（阿基斯二世的敌人就在那里）有一段距离，离曼丁尼亚更远（阿基斯二世希望斯巴达军队撤离阿雷西昂山后，敌人会撤往曼丁尼亚），而且佩拉格斯树林位于沉洞和阿雷西昂山之间，所以阿尔戈斯人可能不会很快发现斯巴达人的新策略。但一天之内，通往曼丁尼亚领地的干河床上就会出现水流。苦痛的经验会告诉曼丁尼亚人，泰吉亚人及其盟友又一次来放水淹他们了。除非曼丁尼亚人在雨季开始之前（雨季几周内就要开始了）将萨兰达波塔莫斯河引回正常水道，否则他们的土地将被淹没。

阿尔戈斯联军的行动

阿基斯二世的计划对他这样一个绝望之人来说是胜算最大的赌博。他估计愤怒和恐惧会迫使敌人立刻寻求决战（对敌人来说，更理智的办法当然是避免交战，继续等待援军）。在泰吉亚附近待了一天之后，他又一次率军开往曼丁尼亚的赫拉克勒斯圣所，急于将他的部队部署在最有利的位置上，等待阿尔戈斯军队的推进。但阿基斯二世始终未能抵达赫拉克勒斯圣所，因为敌人并没有像他预计的那样行动。阿尔戈斯联军内部政治上的互相猜忌和不信任正中了阿基斯二世的下怀。

斯巴达人从阿雷西昂山撤离后，阿尔戈斯的盟军开始抱怨指挥他们的阿尔戈斯将领无所作为：“上一次，斯巴达人被围困在阿尔戈斯附近，最后却被允许逃走了。现在，他们逃走的时候，却没有人追击他们。斯巴达人就这么大摇大摆地逃到安全处，而我们却遭到了出卖。”（5.65.5）“出卖”这个词很能说明问题：心怀不满的部队并没有指

责他们的领导人怯懦，而是控诉其“出卖”了他们。这些将领一定来自阿尔戈斯的贵族千人精锐部队，他们上一次的举动已经让阿尔戈斯的民主派公民产生了怀疑；这一次则招致了更多怀疑，迫使他们下山去准备作战。

阿基斯二世在离开泰吉亚时不管看到了还是没看到什么，都必须走到缺口以北。如果敌人在曼丁尼亚，他就必须等到扎诺维斯塔斯河床的水迫使敌军下山。只要敌人在平原上，他就能立即与其交战。当他的军队从树林里出来时，他震惊地发现敌军近在咫尺、远离山丘，而且已经严阵以待。原来，阿尔戈斯联军于夜间在平原上扎营，他们安置在高地的瞭望哨一定通知了阿尔戈斯将领阿基斯二世正在靠近。因此，他们得以在斯巴达人从树林出来的地方附近，按照自己的意愿摆好阵势，准备迎战。阿基斯二世一头栽进了陷阱。

战斗

斯巴达国王此时的头等要务是抢在敌人发动进攻之前，把己方以行军队形走出树林的部队部署成一排排作战阵型。斯巴达陆军无可匹敌的严明纪律和娴熟技能发挥了作用，阿基斯二世只需要向六支斯巴达队伍的指挥官发布命令，命令就会被一级一级地传达和执行。与希腊的其他军队不同，斯巴达陆军“有多个级别的军官，所以执行命令的责任由很多人分担”（5.66.4）。阿尔戈斯的将军们显然不打算在敌人刚从树林走出来的时候发动进攻，也没有在斯巴达人布阵完毕之前进攻。如果他们用这两种办法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迫使斯巴达人撤退，再一次避免交战。但在士兵们心怀不满的压力下，将军似乎决心要在这一天打一仗。

阿尔戈斯联军将最强大的部队——为保卫家园而战的曼丁尼亚人——部署在右翼，他们的左侧是有着类似动机的其他阿卡狄亚人，再往左是受过特别训练的阿尔戈斯精锐千人部队。这个右翼的任务是发动进攻，承担最具决定性的战斗。他们的左侧是普通阿尔戈斯重步兵，再往

左是奥尼伊人和克里奥奈人。左翼是1000名雅典重步兵及雅典骑兵。左翼的任务是保持守势，避免敌人包围，防止己方溃退，等待右翼发起决定性攻击。

斯巴达人的部署体现不出什么特别的作战计划。按照惯例，左翼是斯基里提人，他们是阿卡狄亚人，通常作为侦察兵作战或者与骑兵配合。他们的右侧是曾于色雷斯在伯拉西达的指挥下作战的部队，以及一些解放黑劳士。斯巴达陆军主力占据中军，他们的右侧是来自赫赖亚和麦那里亚的阿卡狄亚盟军。泰吉亚人在右翼，得到一些斯巴达人的支持，他们占据了战线的最右端。骑兵分成两队，分别保护两翼。斯巴达人的部署是很传统的防御阵型，这样一支遇到意外情况的军队采用此类部署是很正常的。主动权在阿尔戈斯将领手中。

阿尔戈斯联军约8000名重步兵的正面长约1公里，伯罗奔尼撒人约9000名重步兵的正面比对方长近100米。右翼的泰吉亚人和一小群斯巴达人的战线超出了阿尔戈斯联军左翼的雅典人战线，但兵力稍呈劣势的阿尔戈斯联军并不打算向那里派遣部队以弥补这个缺陷。相反，他们将自己的右翼拉得很长，远远超出敌军左翼的斯基里提人。斯巴达人以惯常的缓慢速度开始推进，根据笛声的节奏来控制步伐以保持方阵秩序，但联军“热切地、鲁莽地向前冲”（5.70）。联军将领显然希望抢在己方左翼或中路败退之前，用自己右翼的最精锐部队发动决定性攻击并击溃敌人。

阿基斯二世看到自己的左翼有可能被包围，于是命令左翼的斯基里提人和伯拉西达老兵与其他部队脱离，向左前进，以便与曼丁尼亚人的战线齐平。这就在伯罗奔尼撒军队的战线上制造出了一个很危险的缺口，所以他命令军官希波诺伊达斯和阿里斯托克里斯带领他们的连队（可能一共有1000名斯巴达士兵）离开斯巴达主力的右端，去填补这个缺口。

在希腊战争史上还不曾有过类似的机动方法。在两军即将交锋之际改变作战阵型，刻意在己方战线上打开一个缺口，打开第二个缺口以便腾出兵力去填补第一个缺口：这些战术都是闻所未闻的。其实，令阿基斯二世警惕的敌军右翼超出己方的情况在所有军队中都是常见的，因为重步兵方阵有一个天然趋向，那就是向自己没有盾牌防护的方向运动。他应当预想到这一点，但他缺乏经验，所以才做出了上述决定。

阿基斯二世最好的办法是保持队形，然后派遣右翼去包抄和攻击敌军左翼，用自己强大的斯巴达陆军去打击敌军中路战斗力平平的普通阿尔戈斯部队，并寄希望于自己的左翼（他们承受着敌军的主要攻击）能够坚持足够长的时间，等待他去救援。此种战术的风险在于，伯罗奔尼撒军队的左翼可能很快就被敌人包抄和消灭掉。但在斯巴达人所处的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任何其他办法的风险都更大。在这种情况下，阿基斯二世需要具备一位经验丰富的统帅的判断力、自信和决心；但正如他之前的行为所表现的那样，他还没有获得这些品质。因此，他下达了上述不寻常的命令。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如果阿基斯二世的命令得到了执行，战局将如何发展。左翼服从了他的命令，向左移动，以阻止敌人包抄，于是斯巴达部队的中路与左翼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但中路右端的士兵没有堵上这个缺口，因为负责指挥这个行动的军官希波诺伊达斯和阿里斯托克里斯拒绝执行命令。这种抗命不遵的行为和阿基斯二世的命令一样，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两位指挥官后来被以怯懦罪名定罪和流放，所以斯巴达法庭似乎相信阿基斯二世的战术是可行的。然而事实上，这两位指挥官虽然拒绝服从统帅的命令，但他们让自己的连队仍然留在方阵中的原位置（中路），事后也没有逃亡或寻求庇护，而是返回斯巴达接受审判。懦夫可不会这么做。

即便如此，仍然需要解释斯巴达军官为何在战场上拒绝服从上级的

直接命令。他们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兵相信，指挥他们的是一个无能之徒。自第一次遇见敌人以来，国王指挥部下发动了一次鲁莽的登山仰攻，又在距离敌人只有标枪射程那么远的时候率军撤退，最后被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而且战场和阵型都是由敌人决定的。两位指挥官抗命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阿里斯托克里斯是普雷斯托阿纳克斯（阿基斯二世的同僚国王）的兄弟，他或许认为自己的兄弟能够有效保护自己，并说服希波诺伊达斯寄希望于普雷斯托阿纳克斯的保护。说到底，他们一定是认为阿基斯二世的命令太愚蠢，因此努力阻止他将斯巴达军队置于可怕的危险之中。

最后，尽管这两位指挥官拒绝服从阿基斯二世的命令，斯巴达人还是打赢了。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的抗命不遵，斯巴达人才赢得了这场战役。他们坚守原阵地，斯巴达阵型中路的右端没有出现缺口。他们加强了斯巴达中路，胜利正是源于此处。斯巴达人得胜的另一个原因是敌人犯了错误。阿基斯二世得知自己无法运用中路右端的部队去填补左翼制造的缺口，于是撤回了先前的命令，指示左翼封闭缺口，但为时已晚。曼丁尼亚人击溃了斯巴达左翼，然后在阿尔戈斯精锐部队的支持下冲进了斯巴达左翼与中路之间的缺口。

对阿尔戈斯人及其盟军来说，这就是战役的关键时刻，也是得胜的大好机会。如果他们不管敌军左翼凌乱的斯基里提人、解放黑劳士和伯拉西达老兵，或者派遣一支小部队去牵制他们，然后用己方的主力左翼去打击斯巴达中路的侧翼和后方，那么几乎一定可以取胜，因为斯巴达中路还在与它面前的敌人厮杀。然而，阿尔戈斯联军转向右侧，歼灭了斯巴达左翼，所以与良机失之交臂，最后失败了。曼丁尼亚人和阿尔戈斯精锐部队杀入斯巴达战线的缺口后，做出了自然而轻松的决定：他们转向右侧而不是左侧，因为右侧是敌人没有盾牌防护的一边，而左侧是有着盾牌防护的斯巴达人，因此右侧肯定是更有诱惑力和更安全的目标。另外，阿尔戈斯联军在接近敌军方阵时看到出现了一个缺口，或许

很吃惊，因为在他们开始推进的时候敌阵还没有这个缺口。联军将领一定是命令己方右翼集中力量攻打敌军左翼，迅速将其歼灭；因为只有吃掉了敌军左翼，他们才能转向敌军中路。对于斯巴达中路左端突然出现的缺口需要联军调整策略，但在步兵方阵已经冲杀出去之后，就很难（如果并非不可能的话）修改作战计划了。阿基斯二世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如果是一位优秀的统帅，而且他的兵员来源相同、训练娴熟并且统帅与部队互相熟悉的话，也许能够完成这样的机动；但我们不知道阿尔戈斯联军将领的身份，而且他的士兵来自不同国家。因此，联军做了它最有可能做的事情，最终输掉了这场战役。

在联军无谓追击斯基里提人和解放黑劳士之时，阿基斯二世和斯巴达中路击退了他们面前战斗力平平的部队：年龄较大的“五个连队”阿尔戈斯人和来自克里奥奈与奥尼伊的重步兵。事实上，“大多数人在看到斯巴达人逼近时，根本没有停下来作战，而是抱头鼠窜；有些人甚至在敌人尚未接近时就匆忙逃跑、互相踩踏”（5.72.4）。

此时，斯巴达右翼已经开始包围联军左翼遭到侧翼包抄的雅典人。雅典骑兵奋力作战，阻止了己方的溃散，但形势仍然非常严峻，因为联军右翼未能利用优势，战局已定，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战局扭转之后，阿基斯二世发布了一些命令，决定了这场胜利的性质。他没有允许自己的右翼歼灭正在败退的雅典人，而是命令全军去支援被击败而处境艰难的左翼，于是雅典人和一部分阿尔戈斯普通部队得以逃走。阿基斯二世的决定可以从纯粹的军事角度理解，因为斯巴达国王肯定希望避免更大的伤亡和歼灭敌军的骨干——曼丁尼亚人和精锐的阿尔戈斯部队，但这个决定也有政治上的价值。虽然说起来很奇怪，但从技术角度看，雅典和斯巴达此时仍然处于和平状态。如果他在曼丁尼亚歼灭了雅典军队，那么雅典敌视斯巴达的派系一定会势力大增；斯巴达的克制或许会说服雅典人采纳温和政策、维持和平，尽管斯巴达正在

恢复元气和威望。

政治的干预

在战场的另一端，曼丁尼亚人和阿尔戈斯精锐部队看到己方溃败，于是逃跑了。曼丁尼亚人损失惨重，但“阿尔戈斯精锐部队的大部分得救了”（5.73.4）。我们很难理解这两支部队是并肩作战的，为什么其中一支几乎被全歼，而另一支几乎保全了实力。修昔底德记载说，阿尔戈斯精锐部队逃跑时没有遭到敌人的猛烈追击，敌人也没追多远，“因为斯巴达人的惯例是长时间战斗，岿然不动，直到敌军溃败；但敌人溃散之后，斯巴达人不会追多久，而且只追很短距离”（5.73.4）。但这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曼丁尼亚人被屠戮，而阿尔戈斯人却得以逃跑。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求助于狄奥多罗斯，一位生活在较晚近时代的史学家。他给出了不同于修昔底德的解释：

> 斯巴达人在击溃敌军的其他部分、杀死许多人之后，转向一千名精锐的阿尔戈斯人。斯巴达人以优势兵力将其包围，希望全歼。阿尔戈斯精锐部队虽然兵力逊于敌人，却非常勇敢。斯巴达人的国王在前排作战，不顾危险，他想把这些阿尔戈斯人斩尽杀绝，因为他急于兑现自己对同胞的诺言——成就伟大功业来补偿之前的耻辱。但是，他没有被允许实现自己的心愿。因为斯巴达人法拉克斯（国王的顾问之一）在斯巴达享有极高声望，他命令国王放阿尔戈斯精锐部队一条生路，不要冒险与这些已经穷途末路、被命运抛弃的亡命之徒厮杀。于是国王在压迫之下，遵照法拉克斯的判断，允许这些阿尔戈斯人逃跑。（12.79.6-7）

顾问法拉克斯显然已经着眼未来，考虑了此次战役的政治影响。大多数普通的民主派阿尔戈斯人逃跑了，如果斯巴达全歼阿尔戈斯贵族精英人士的话，阿尔戈斯将来一定会记恨在心，继续与其他民主制国家结盟。然而，如果阿尔戈斯贵族精英在反斯巴达政策破产后得以回国，他们就能控制城市，并将它拉到斯巴达联盟中，对敌人的联盟施加致命打击。一心报复、缺乏经验的阿基斯二世决心要恢复自己的荣誉，所以在激战正酣时无法预见这一点。事实证明，斯巴达人给他指派顾问的决定

是非常明智的。

曼丁尼亚战役的意义

在曼丁尼亚战役中，斯巴达虽未能歼灭落败的对手，但这场战役仍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对斯巴达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输。如果阿尔戈斯精锐部队好好利用了斯巴达战线上的缺口，并击败斯巴达人及其盟军，那么斯巴达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主宰或许就此结束了。如果阿尔戈斯联军在曼丁尼亚取胜，就必然能占领泰吉亚，那么斯巴达的战略位置就被毁掉，它与所有盟邦和美塞尼亚的联系将被切断。斯巴达威望遭到的打击对维持它的霸权地位而言将是致命的。如果阿尔戈斯联军在曼丁尼亚取胜，那么几乎可以肯定雅典及其盟友将赢得整个战争。斯巴达的胜利恢复了它的自信和声望："由于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灾难和其他一些事件，希腊人指控斯巴达人怯懦、判断错误和迟钝。而曼丁尼亚一役既成，这些指控被一扫而光。现在看来，斯巴达人之前受辱是因为运气不好，他们一如既往地坚定。"（5.75.3）

斯巴达的胜利也是寡头派的胜利。如果阿尔戈斯联军在曼丁尼亚获胜，阿尔戈斯、厄利斯和曼丁尼亚的民主派统治将得到巩固，使民主制威望大增，或许会鼓励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其他民主派。而他们的战败使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民主派对其国家的控制力减弱，并损害了民主派的普遍影响力。这次战役使整个希腊的政治潮流从民主制转向了寡头制。

直到战役结束后，3000名厄利斯人和1000名雅典人组成的增援部队才赶到曼丁尼亚。如果他们及时赶到，加强联军的中路，那么战役结果会大不相同。现在，这些增援部队能做的仅仅是攻击埃皮达鲁斯，并应对曼丁尼亚战役期间埃皮达鲁斯人对阿尔戈斯的攻击，最后满足于在埃皮达鲁斯周围建造包围圈壁垒，并留下一支部队驻防。

民主联盟生存了下来，不过非常脆弱，因为他们士气低沉。11月，

在阿尔戈斯联军撤退后，斯巴达军队开赴泰吉亚，但他们打算用外交手段而不是武力来获得胜利。他们派遣利卡斯（阿尔戈斯人在斯巴达的荣誉领事）去阿尔戈斯提议和平。甚至在此之前就有一些阿尔戈斯人对斯巴达表示友好，并“希望消灭民主制”。一千人的精锐部队一定属于这些亲斯巴达分子。他们从曼丁尼亚逃脱后就成了阿尔戈斯唯一重要的武装力量，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行为也增加了他们的威望。与此同时，雅典人在曼丁尼亚三心二意的表现令阿尔戈斯民主派感到尴尬和丧气。“此次战役之后，斯巴达人的朋友们更容易劝说群众与斯巴达达成协议。”（5.76.2）

利卡斯来到阿尔戈斯公民大会提出和平条件的时候，发现亚西比德也在那里。后者此时还是雅典的普通公民，没有担任公职，他来劝说阿尔戈斯人继续与雅典合作。但即便他巧舌如簧，还是无法与曼丁尼亚战役造成的新现实以及斯巴达陆军顺利挺进泰吉亚的局面相抗衡。阿尔戈斯人接受了斯巴达提议的条约。条约要求阿尔戈斯人交还所有人质、放弃奥尔霍迈诺斯、撤离埃皮达鲁斯，并与斯巴达人一起迫使雅典人做同样的事情。此外，自信的寡头派还劝说阿尔戈斯人放弃了与厄利斯、曼丁尼亚和雅典的盟约，转而与斯巴达结盟。这是寡头派的重大胜利。

阿尔戈斯人的变节对民主联盟而言是一个致命打击。当阿尔戈斯人要求雅典人撤出埃皮达鲁斯时，他们不得不服从。曼丁尼亚虚弱不堪，于是也和斯巴达缔结了条约，放弃了对一些阿卡狄亚人城市的控制权。阿尔戈斯的千人精锐部队与1000名斯巴达人一起远征西锡安，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寡头制政府。最后，这支联军返回并镇压了阿尔戈斯民主制政府，建立了寡头制政府。

到前417年3月，斯巴达人通过战争和颠覆粉碎了阿尔戈斯民主联盟。不过，尽管曼丁尼亚战役的胜利帮助斯巴达避免了灾难，却不能保证它未来的安全。雅典人仍然很强大，亚西比德继续主张积极而咄咄逼

人的政策。雅典仍然控制着皮洛斯，这持续刺激着黑劳士逃亡或暴动。厄利斯也不在斯巴达的控制之下，而且后来的事件证明，阿尔戈斯寡头派政府的统治远远谈不上稳固。最后，关于政策路线，斯巴达人内部仍然没有一致意见。曼丁尼亚战役的最终意义还很难说。

---

[1] 指的应当是斯巴达军队的六分之一，不是全军（上文说的约1万名重步兵）的六分之一。

[2] 沉洞，亦作岩溶塌陷、动摇洞、吞口，是一种自然现象，一般出现于有水流经的石灰岩岩层。当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溶解在雨水里，就会令雨水变成弱酸性；但当这些弱酸性的雨水从土表渗进地下，植被及地表中的植物物质可能令这些弱酸变成强酸，使雨水流过石灰岩岩层时，会慢慢地把石灰岩岩层侵蚀成小洞。小洞日渐扩大，可能会令地表突然塌陷，形成沉洞。

第十九章 曼丁尼亚战役之后：斯巴达和雅典的政治与政策（前418～前416年）

阿尔戈斯恢复民主制

在希腊人当中，只要民主制植根下来，人民就不会愿意接受寡头统治，而是努力恢复民主制。在阿尔戈斯，新近上台的寡头派对人民的压迫加快了这个进程："寡头派抓住那些惯于担任民众领袖的人，将他们处死；然后，他们威吓其他阿尔戈斯人，摧毁了法律，并开始独揽公共事务。"（Diodorus 12.80.3）前417年8月，在斯巴达庆祝吉姆诺排狄埃节期间，阿尔戈斯的民主派发动了起义，杀死和放逐了许多寡头派分子，重建民主政府。幸存的寡头派发疯似的向斯巴达求助，但斯巴达人没有终止自己的节庆活动。最后他们派遣了一支军队到阿尔戈斯，但没有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

在被斯巴达人抛弃之后，阿尔戈斯民主派采纳了亚西比德的建议，在厄利斯人的帮助下，修建了将阿尔戈斯与大海连接起来的长墙。他们还寻求与雅典结盟，长墙还将保障阿尔戈斯与雅典的海路畅通。到夏末，阿尔戈斯人完成了这项工程。斯巴达人对此大为警觉，派遣阿基斯二世率领一支军队去攻打阿尔戈斯，摧毁了长墙。阿基斯二世还占领了阿尔戈斯的城镇海西亚，杀死了俘获的所有男性自由民，最后结束了行动并返回斯巴达。这种暴行越来越司空见惯，修昔底德没有对此做任何评论。

在斯巴达人撤军之后，复辟的阿尔戈斯民主派采取措施防范内奸，他们攻打了弗利奥斯，绝大多数阿尔戈斯寡头派流亡者定居在那里。前416年，亚西比德又一次当选为雅典的将军，他率领一支舰队来到阿尔戈斯，逮捕了300名被怀疑亲近斯巴达的人士，将他们分散安置在各个

岛屿上。当年晚些时候，阿尔戈斯人逮捕了更多的嫌疑分子，还有一些嫌疑分子在被捕之前就逃走了。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阿尔戈斯人在面对斯巴达人的攻击时还是很脆弱，于是他们敦促雅典人更积极地保护自己。对雅典来说，此时与阿尔戈斯的盟约只会带来更多危险，而不是机遇。

雅典的政治

前417年春季，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都当选为将军，这突出体现了雅典政治持续不断的分歧与混乱。亚西比德坚持不懈地鼓励他在阿尔戈斯的朋友，但失去了厄利斯和曼丁尼亚，便没有希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开展新的积极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尼基阿斯的政策是暂时搁置伯罗奔尼撒半岛，而去收复位于哈尔基季基半岛和马其顿的领土。该地区是金钱和木材的来源，对雅典来说非常关键，雅典也需要在附庸国的叛乱蔓延之前收复自己丧失的领土、臣民和威望。自前421年和约缔结以来，哈尔基季基半岛上越来越多的城镇叛离雅典阵营，如今马其顿国王也构成了新的威胁。

前418年，斯巴达人在阿尔戈斯寡头派的陪同下，说服柏第卡斯二世宣誓与他们结盟，尽管柏第卡斯二世仍然非常谨慎地避免与雅典彻底决裂。大约在前417年5月，雅典人筹备了一场针对哈尔基季基人和安菲波利斯的军事行动，由尼基阿斯指挥，这就迫使柏第卡斯二世采取行动。他拒绝配合，雅典人不得不放弃了此次行动。雅典人的回应是对马其顿海岸实施封锁，不过效果不佳。雅典人无法就任何政策达成一致，两位主要领导人努力推行不同的政策，因此只能造成失败和僵局。

希帕波鲁斯遭到陶片放逐

希帕波鲁斯打破了僵局，他使用了古老而被人遗忘的陶片放逐手段。陶片放逐似乎非常适合用来解决雅典在前416年面临的问题，因为

它能让雅典人明确地在尼基阿斯与亚西比德的政策和领导之间做出选择。已经有二十五年不曾使用陶片放逐了，因为失败的代价太高（流亡十年），所以只有自信拥有绝大多数民众支持的人才会使用如此极端的措施。在伯里克利去世之后没有一个雅典人拥有这样的自信，而且在前416年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势均力敌，所以他们都不愿意采用这种赌博的策略。

希帕波鲁斯似乎不怕失败，输了对他也没什么损失。亚西比德成为主战派领导人其实使希帕波鲁斯“脱离了陶片放逐的适用范围”，因为在过去只有主要的政治人物才会遭到陶片放逐投票。希帕波鲁斯“希望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当中有一个人被放逐之后，他会成为剩下那个人的竞争对手”（Plutarch，*Nicias* 11.4）。古代作家对希帕波鲁斯口诛笔伐，但他这么做或许不只是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他也许真诚地相信陶片放逐能够给雅典带来更稳定的政策。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希帕波鲁斯是说服雅典人启用陶片放逐的主要人物。在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别无选择，只得准备应对它的危险。最后，亚西比德向尼基阿斯建议，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希帕波鲁斯。于是，他们联手确保了成功。希帕波鲁斯遭到放逐，在流亡中死去。

前416年3月的陶片放逐揭示了雅典政治体制的一个致命缺陷：它可以确认得到大多数民众支持的领导人或政策；但民意不明确时，它就毫无用处。或许就是因为人民普遍认识到了这种缺陷，所以后来雅典再也没有执行过陶片放逐。现在看来，若是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当时做一番正当的竞争，雅典城或许会受益良多。但是，对希帕波鲁斯陶片放逐之后，雅典仍然没有连贯的政策或领导。不久之后，雅典人又一次将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选为将军，这反映了他们两人之间的政治斗争持续僵持不下。

雅典人在这些年里的行为体现了他们莫大的挫折感。斯巴达不肯履

行和约义务，粉碎了尼基阿斯的希望（两个大国能够真诚和解）。亚西比德通过与伯罗奔尼撒国家结盟以打败斯巴达的计划已成为泡影；而尼基阿斯的规模较小的计划，即收复在色雷斯和哈尔基季基半岛的失地，还只停留在筹划阶段。但是，和平使雅典人恢复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到前415年，储备资金可能多达4000塔兰同。与此同时，新一代青年长大成人了，他们没有战争的苦痛经验，对斯巴达的入侵也没有深切的记忆。尽管雅典拥有无可匹敌的海军和强大的陆军，它却不能运用自己的力量去确保真正的和平，也无法打赢战争。前416年春季，针对米洛斯岛的一次军事行动给了雅典人一次发挥能量和发泄挫折感的机会。

雅典人征服米洛斯岛

在基克拉泽斯群岛[1]各国中，只有米洛斯人拒绝加入提洛同盟，所以他们能够享受雅典帝国的好处，而无须承担任何负担。米洛斯人属于多利亚民族，是斯巴达人的殖民者，在阿希达穆斯战争期间似乎曾援助过斯巴达人。他们在前426年打退了雅典人的一次进攻，并顽强地捍卫自己的独立，尽管雅典人在前425年征税评估时将他们也算在内。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了，因为雅典人不可能长时间允许自己的意志和权威受到这样一个基克拉泽斯小岛国的挑战。米洛斯人的安全依赖于他们与斯巴达的特殊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该因素促使了雅典人在这个时机发动进攻。

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武力征伐和在北方的外交手段令雅典人备受挫折，他们或许急于证明至少在海上，斯巴达人对雅典无计可施。雅典人派遣了30艘战船、1200名重步兵、300名弓箭手和20名骑射手到米洛斯岛。他们的盟邦（可能大多数是岛国）则出动了8艘战船和1500名重步兵。盟军和岛民参与的比例如此之高，说明此次进攻并没有被认为是师出无名，我们也没听说雅典人在决定执行此次入侵时有过分歧。由于这次远征不是特别重要，所以没有让尼基阿斯或亚西比德参加。指挥联军的是提西亚斯和克里奥米德斯。他们先派遣使者去劝说米洛斯人

投降，被拒绝后才开始蹂躏米洛斯岛的田地。

米洛斯的行政长官不准雅典使者向米洛斯人民讲话（可能是害怕群众会愿意臣服于雅典），并安排雅典使者在行政长官以及寡头制议事会成员面前发言。雅典人的目的是劝说米洛斯人不战而降，或许他们认为威胁比其他任何手段都更容易达成这个目标。无论如何，威胁手段与他们近期在斯基奥涅的做法是一致的，他们在处置斯基奥涅时放弃了温和态度，转而施行恐怖统治。雅典人对米洛斯岛的直言不讳和严厉言辞在他们的政治对话中并非孤例。在公开演讲中，伯里克利和克里昂都很愿意将雅典帝国描述为“暴政”；前432年在斯巴达的雅典发言人也曾使用过严苛的措辞，与雅典人和米洛斯人对话时使用的措辞类似：“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个帝国，随后拒绝放弃它，这绝对不是令人震惊的事情，也不违背人类天性，因为我们屈服于最强有力的动机——荣誉、恐惧和私利。我们也不是第一个如此行事的民族，因为天意注定弱肉强食，历来如此。”（1.76.2）

但米洛斯人拒绝屈服，既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诸神一定会保佑他们，也是因为他们相信斯巴达人一定会来保护自己。雅典人轻松驳斥了斯巴达人援助米洛斯人的说法，也对神祇相助的说法嗤之以鼻。他们说：“据我们所知，在所有民族中，斯巴达人相信符合自身利益的事情就是高贵的，对他们有利的事情就是正义的。”这对米洛斯人来说不是个好兆头。斯巴达人只有在己方力量占优势的时候才会行动，“所以，只要我们控制着大海，他们就不大可能会千里迢迢地到一个岛上来”（5.109）。

雅典人继续攻打米洛斯城，直到饥饿、沮丧和对内奸的恐惧最终迫使米洛斯人举手投降。雅典人投票决定杀死米洛斯的所有男子，将妇女和儿童全部变卖为奴。据说亚西比德提出并支持了这道法令，但没有证据表明尼基阿斯或其他人反对它。到此时，雅典人已经完全放弃了伯里

克利的温和帝国主义政策，而选择了克里昂的强硬路线，希望能够以此震慑其他国家潜在的抵抗和反叛。这是对他们新路线的理智的解释，但情感一定起到了至少与理智同样重要的作用。修昔底德说战争是“是一个凶暴的教师”时，一定也想到了米洛斯岛事件。

尼基阿斯对抗亚西比德

在雅典，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在民主政治中运用了新的高明手段和技巧，这让现代读者联想起我们时代的政治拉票：候选人的个性比他们的政治主张起到更大作用，每一位政治家都努力通过非同寻常的作秀来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这样的新颖手段需要竞争者拥有并花费巨额金钱。前417年，尼基阿斯大打宗教虔诚牌，展示了他对诸神的虔敬。他利用雅典人对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的虔诚，大肆作秀，举行奢华壮观的合唱游行活动。拂晓时，他带领雅典的队伍从附近的里尼亚岛通过由船只搭建的浮桥。这座浮桥就是他建造的，连接着里尼亚岛和提洛岛，并且装饰着富丽堂皇、多姿多彩的挂毯。衣着光鲜的合唱队一边歌唱，一边在浮桥上行进。在提洛岛上的人们看来，合唱队仿佛走在水面上，走向东升旭日。然后，尼基阿斯向阿波罗奉献了一株青铜棕榈（它很快变得人尽皆知），并向神祇奉献了一块价值高达1万德拉克马的土地，这块土地的收入将被用于举办献祭宴会，以便祈求诸神赐福于捐赠这块土地的人。普鲁塔克记载道：“这一切当中，有许多庸俗的夸耀，旨在提高他的名望和满足他的野心。”（*Nicias* 4.1）但大多数雅典人对这种景观肃然起敬，相信诸神一定会宠幸如此虔诚的人、保佑他领导的城市。次年，亚西比德也举办了自己的表演，虽然不同，但同样辉煌壮丽。在前41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他赞助了七队选手参加赛车竞技，这比任何普通公民赞助的都要多，而且其中三队选手分别获得第一名、第二名和第四名。亚西比德后来毫不尴尬地解释了自己在一次宗教节日上如此靡费和浮夸的政治动机。他说，他希望展示雅典的权势。由于这次壮丽的财富展示，“希腊人相信我们的城市比过去更加强盛……尽管他们

之前以为我们已经被战争拖垮了”（6.16.2）。他更直接的目标是吸引雅典的选民。尼基阿斯的形象是虔诚的成熟男子，而亚西比德展示的则是充满活力、勇敢和积极进取的年轻一代。这些奢靡的表演是持续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但目前两位竞争者还没有分出高低。

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都不渴求财富，他们也都不愿意将政权交给群众。他们都野心勃勃地想成为雅典的领导人，却都缺乏客蒙或伯里克利所具备的极高的政治才华。雅典的不幸在于，尽管两人都希望成为奥林匹亚大神一般的伯里克利，但他们能做的仅仅是干扰对方的计划而已。

---

[1] 位于希腊本土东南方，在希腊本土与小亚细亚之间。

第五部 西西里岛的灾难

有人曾将前415年雅典远征西西里岛的行动与1915年英国军队企图夺取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或者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相提并论。这些行动的目标和可行性都是有争议的，并且以不同程度的失败和灾难告终。雅典远征西西里岛的行动造成了最恐怖的结果：人员和船只损失惨重，引发了帝国内部的叛乱，以及强大的波斯帝国参战反对雅典。这都让世人感到，雅典人已经垮台了。这场灾难如此深重，以至于修昔底德惊异于雅典后来居然还能支撑差不多十年。这样的灾难性行动总会引发激烈的争论：为什么要采取这些行动，它们为什么失败，以及谁应当为失败负责。雅典远征西西里岛的行动也是这样。

第二十章 决策（前416～前415年）

雅典与西西里岛的联系

前416/前415年雅典第二次远征西西里岛的起因并非来自雅典，而是来自西西里岛。那里有两个世代友好的希腊城邦——塞杰斯塔和伦蒂尼——请求雅典人的援助，反对它们的邻国塞利农特及其保护者叙拉古。在前424年的杰拉会议上，叙拉古的赫莫克拉提斯提议拒绝外国干预西西里岛事务。自那以后，雅典就一直特别关注西西里岛局势。拒绝外国干预的政策对叙拉古人的好处很快就显而易见了：雅典人被排除在外，叙拉古人干预了伦蒂尼的内战，并发动一场战役，控制了这座城市。

前422年，雅典人对叙拉古的日渐强大深感不安，于是派遣埃拉西斯特拉图斯之子腓亚克斯去评估那里的形势。他的目标是敦促雅典在西西里岛的盟邦和其他西西里岛希腊人团结起来反对叙拉古，以保护伦蒂尼。尽管腓亚克斯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一些城市获得了支持，但杰拉会议的严词拒绝使他的努力都白费了。他只带了2艘船到西西里岛，于是刚刚得到负面回应就立刻放弃了自己的任务。但雅典人对西西里岛事务仍然兴趣浓厚，这可能促使叙拉古的对手在将来寻求雅典的帮助。

前416/前415年，塞杰斯塔在与塞利农特的战争中吃紧（塞利农特得到叙拉古的援助），于是向雅典求援。塞杰斯塔人的主要论点是：“叙拉古人已经消灭了伦蒂尼，如果不惩罚他们，他们在消灭剩余的盟邦之后，会控制整个西西里岛。到那时，他们就可能与伯罗奔尼撒人联合，因为叙拉古人和伯罗奔尼撒人都是多利亚民族，而且叙拉古人是伯罗奔尼撒人的亲戚和殖民者。因此他们可能集结一支强大的力量，

摧毁雅典势力。”（6.6.2）塞杰斯塔人还表示愿意承担军费，请求雅典人考虑他们与塞杰斯塔人的传统联系和对盟邦的义务，应该还强调了防备敌人未来侵略的重要性。但修昔底德相信雅典人对这些事情不是特别感兴趣，他们只是将此事作为出兵的借口而已。他解释说，雅典人迎合塞杰斯塔人的“真正动机”是“他们希望统治整个西西里岛”（6.6.1）。

修昔底德从第一次谈及西西里岛开始，就坚持认为雅典人一向打算征服和主宰它。他将雅典人民描绘为贪婪、渴求权力，并且对敌人很无知。他写道：“广大群众对西西里岛的面积和居民，不管是希腊人还是蛮族，都一无所知。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投入这场战争的规模不亚于针对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6.6.1）

但在前427～前424年，多达1.2万雅典人曾在去往西西里岛的舰队服役，并且在西西里岛和周边地区活动。他们肯定对西西里岛的地理和人口有不少了解，也一定会将这些知识与亲友分享。另外，在前415年的时候，这些曾去过西西里岛的雅典人大多还在雅典。雅典人对塞杰斯塔的请求谨慎考虑，也很少表现出鲁莽的兴奋。他们小心地派遣使者“去看是否确实如塞杰斯塔人所说，他们的国库和神庙内储藏着金钱，还去考察针对塞利农特人的战争情况”（6.6.3）。塞杰斯塔人肯定使出了复杂的花招来欺骗雅典人，让他们相信塞杰斯塔人的确拥有很多财富，更令雅典人信服的是，塞杰斯塔人很快奉上了60塔兰同银币，作为60艘战船一整个月的费用。雅典使者带着这笔钱返回之后，公民大会才又一次认真地考虑干预西西里岛局势。

雅典的辩论

前415年3月，雅典公民大会又一次讨论了是否答应塞杰斯塔的请求，这一次投票决定派遣60艘战船远征西西里岛，指挥官是亚西比德、尼基阿斯和拉马库斯。他们拥有全权去帮助塞杰斯塔反对塞利农特；若有可能，收复伦蒂尼，并“以最有利于雅典的方式处理西西里岛事

务”（6.8.2）。尼基阿斯被选为远征总司令，“尽管他自己不愿意，因为他认为城邦做出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6.8.4）。

与他相比，甚至在此次公民大会召开之前，亚西比德就煽动了雅典人民的想象，他们“三五成群地坐着，绘制西西里岛及其周边海洋和港口的地图”（Plutarch，*Nicias* 12）。他是远征的主要倡导者，所以他理应是总司令的自然人选，但雅典有很多人猜忌、嫉妒和憎恶他。虽然没有办法把他完全排除，但让尼基阿斯参与指挥，可以用这位年长政治家的经验、谨慎、虔诚和好运气去平衡亚西比德的青春活力与雄心勃勃。尼基阿斯一定明确表达了自己不愿意担任总司令，但如果他拒绝接受任命，就会显得不爱国或怯懦。

两位将军对筹备中的军事行动的意见完全不一致，让他们两人联合指挥肯定是行不通的，于是公民大会指派了第三名指挥官——色诺芬尼之子拉马库斯。约五十岁的拉马库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阿里斯托芬在《阿卡奈人》中将他描述为年轻的吹牛军人[1]，并嘲笑他的贫困。拉马库斯可以支持此次行动的目标，同时也尊重尼基阿斯的意见。

修昔底德论断，西西里远征的公开目标仅仅是幌子，真实目标更为野心勃勃，但参加远征的雅典军队规模却与他所谓的宏大目标不相称：舰队规模与前424年第一次远征西西里岛时相同。在前424年用60艘战船无法征服西西里岛，而且当时也没有这个打算。前415年3月派出了相同数量的战船，说明雅典人的目标仍然是有限的。

但自前424年以来叙拉古势力的增长可能会促使雅典人扩大目标。若不对叙拉古加以遏制，它可能会控制西西里岛的大部分地区，并使希腊世界的天平向有利于伯罗奔尼撒人的方向倾斜。第一次公民大会上的许多或者大多数雅典人或许都相信，按照符合雅典利益的方式解决西西里岛问题可能需要击败甚至征服叙拉古。仅用60艘战船从海上向叙拉古城发起奇袭，也许能成功；或者可以在西西里岛征募盟军，震慑或击败

叙拉古人。不管怎么样，雅典承受的风险会比较小。雅典人没有派遣陆军，所以可以让西西里岛士兵从陆路攻打叙拉古。即便是海路进攻也不一定会有很大危险，因为舰队若是觉得敌人严阵以待而且非常强大，完全可以撤退。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即使整个远征军全军覆灭，这也只能说是非常倒霉，而不算战略灾难。很多水手是盟军，不是雅典人，船只也可以补充。公民大会投票决定的远征规模无论如何都不会导致足以威胁雅典生存的灾难，然而后来竟然确实发生了这样的大祸。

重新考虑是否远征的辩论

第一次公民大会几天之后，又开了第二次会议，商讨“如何尽可能快速地装配舰队，并投票决定将军们此次远征需要的其他东西”（6.8.3）。尼基阿斯在此次会议上的目的是转换议题，不讨论执行战役的具体方法，而是迫使大家重新考虑是否真的要发动此次远征。所以，他一定是第一个发言的。提议撤销几天前刚刚由公民大会通过的法令，虽然并不违法，但似乎确实非同寻常，可能给尼基阿斯本人和大会主席带来一些法律上的麻烦。大会主席批准了他的请求。但尼基阿斯相信兹事体大，为它冒风险是值得的，于是敦促主席“像医生一样治疗这个做出糟糕决定的国家”（6.14）。

尼基阿斯对雅典当前的外交和军事形势做了非常消极的评估，这让人不禁质疑他与斯巴达议和并结盟的政策是否明智。他提出雅典人没有发动攻势的条件，因为他们在本土也有强大的敌人。和约名存实亡；斯巴达人是被迫接受和约的，现在仍然对条款提出争议，而斯巴达的一些盟邦干脆拒绝接受和约。若是远征西西里岛失败，不仅会削弱雅典，还可能将更多的西西里岛军队推向斯巴达阵营。斯巴达人正在等待最佳时机发动进攻以夺取胜利，而雅典人还在医治战争创伤。他说：“在保障了我们目前的帝国安全之前，绝不能伸手去攫取一个新帝国。”（6.10.5）这句话很像当年伯里克利的警示。他还提醒听众，迦太基人尽管比雅典强大，却无法征服西西里岛。

远征的倡导者显然认真考虑了西西里岛盟邦的诉求，因为尼基阿斯花了很大力气去贬低和攻击这些盟邦，说他们是“野蛮民族”，把雅典人拉进了麻烦当中，却不能以提供帮助作为回报。但在上一次公民大会上，叙拉古的威胁肯定是主要议题，因为尼基阿斯在第二次公民大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弱化叙拉古的威胁，但他能提出的仅仅是空洞无力、貌似有理实则不然的反驳，如：“西西里岛……若是被叙拉古人控制了，危险性比现在还会降低。因为他们现在若是攻击我们，完全是出于对斯巴达人的感情，而当他们自己成为一个帝国之后，就不大可能会攻击另一个帝国。”（6.11.3）他的另一个错误观点是，雅典人根本不去西西里岛是威慑西西里岛上的希腊人的最好办法，因为如果发动了远征却失败，那么西西里人就会蔑视雅典的实力，于是加入斯巴达阵营。他的结论是，最好不要发动远征，但如果非去不可，雅典应当仅仅短暂地炫耀一下武力，然后立刻回家。

尼基阿斯演讲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忽略了哪些东西，因为他没有明确提及任何征服或吞并该岛的提议，却向远征计划的主要设计者发动了一场人身攻击。他说亚西比德是野心勃勃、高度危险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荣耀和利益竟置国家于危险之中。

他攻击的对象做出了回应。修昔底德借此机会生动地描绘了他的形象：“克雷尼亚斯之子亚西比德是最渴望远征的人……他渴望当上将军，希望占领西西里岛和迦太基。如果他成功的话，就能大大增加他的私人财富和威望。”（6.15.2）这样的欲望最终会产生致命的结果：“主要就是这一点，后来摧毁了雅典国家。因为广大群众对他无法无天的自我放纵感到担忧，对他参与的每一件事情的目的感到害怕；他们敌视他，因为他企图成为僭主[2]。尽管在公共事务中，他尽其所能地履行军事职能，他的私生活却让所有人愤怒，于是他们将国家的领导权交给了其他人，没过多久就让国家垮台了。”（6.15.3-4）

亚西比德自豪地为自己奢靡的生活方式和导致了曼丁尼亚战役的政策辩护："我将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强大的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既没有给你们造成很大威胁，也没让你们花费多少。我让这些国家在一天之内拿自己的全部去冒险。由于那一天的事件，它们直至今日仍然不能自信满怀地行事。"（6.16）

关于远征的实际前景，亚西比德和他的对手一样，充满了偏见。但是，他的论辩更有力。他说，西西里岛的希腊城邦极不稳定，而且缺乏爱国主义决心。他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即雅典的外交手段一定能将这些城邦以及仇恨叙拉古的西库尔蛮族争取过来。亚西比德分析希腊大陆局势，说斯巴达人毫无希望也缺乏主动性。斯巴达人没有舰队可以挑战雅典的庞大舰队，所以他们对阿提卡能够造成的伤害不会超过之前的历次入侵。除非在海上发生了天大的灾难，战略平衡绝不会向不利于雅典的方向倾斜，而目前他们拿去冒险的仅仅是60艘战船而已。

亚西比德强调了支持盟邦的必要性。"我们有什么说得过去的借口，可以让自己畏缩？我们如果不去援助西西里岛的盟邦，如何为自己辩护？我们必须援助他们，因为我们发过誓。"（6.18.1）随后他对雅典及其帝国的性质做了一个新颖的分析。他提出，即便仅仅为了维持自己现有的成果，雅典人也需要为了自己的盟邦而采纳积极主动的政策。"我们就是这样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其他拥有帝国的民族也是这样建立了他们的帝国，即总是积极援助那些向我们求救的人，不管他们是希腊人还是蛮族。"（6.18.2）采纳目标有限的和平政策和专断地对帝国边界设定限制，这样做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亚西比德随后讲到了他设想的西西里远征的更大目标。他坚持认为，在西西里岛的胜利将有助于雅典人主宰整个希腊。在战争的第二年，伯里克利曾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但他这么说是为了恢复"灰心沮丧到了非理智地步"的雅典人的自信，以便鼓励他们去打一场他们输不起

的战争，而不是为了发动远征、开疆拓土。

亚西比德结尾的论点带有诡辩学派的印迹。诡辩学派是修辞学和其他技艺的教师，向当时的富裕青年传授这些本领，他们将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习俗的差别看得很重。他说，雅典与其他一些国家（很显然，斯巴达是与雅典截然相反的例子）不同，天性活跃，因此不可能采纳消极政策。长时期的和平与无所事事会消磨那些令雅典如此伟大的技能和品质，但违背天性的结果会更加严重。“一座活跃的城市若是转变为消极和无所作为，就会很快被消灭掉。对这些人民来说最安全的做法是，与自己的性格和习俗保持和谐，如此行事。”（6.18.7）这是一种了不起的修辞巧计，给一项大胆的冒险事业涂上了保守的色彩。

尼基阿斯意识到，亚西比德的演讲增强了雅典人对远征的渴望，于是不再诚实地辩驳，而是直截了当地欺骗。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用同样的论点劝阻他们参加远征，但他觉得如果他夸大远征所需的兵力，群众也许会知难而退”（6.19.2）。这让人联想起他在前425年的诡计，当时一群斯巴达士兵被围困在斯法克特里亚岛，尼基阿斯提议把将军职位让给克里昂，因为他相信克里昂会拒绝并丧失公信力。在前415年的公民大会上，他的目的是让雅典人清醒，手段则是让他们理解此次行动规模之巨大，以便打击亚西比德。尼基阿斯的两次花招都失败了，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他用尖刻的嘲讽批判了亚西比德所描绘的羸弱而内斗不休的西西里岛形象，转而描绘了一个强盛、富裕、军力强大、敌视雅典且严阵以待的对手。敌人占据极大的兵力优势，本地有粮食可以供养军队，并且有充足的马匹可供骑兵使用；而雅典人投票决定派遣的小舰队没有粮食和马匹。他指出，敌人的骑兵可以轻松地将缺乏给养的雅典远征军困在海滩上。冬天到来之后，远征军与雅典城之间的通信联络可能需要四个月之久。雅典若想得胜，就需要数量庞大的战船和补给船、大量重步兵，

以及许多轻装部队以便对付敌人的骑兵。他还坚持说，远征还需要巨额军费，因为塞杰斯塔人承担远征军费的承诺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尼基阿斯继续说，即便雅典人确实投入了这么大的军力，胜利也不会轻松得来。派遣远征军就像是派人到遥远的敌境开辟殖民地一样。这样的冒险需要周密的计划和好运气，但既然运气不是凡人能掌控的，就需要依赖谨慎而仔细的筹划。“我认为，我提议的这些准备工作能够为国家和那些参加远征的人提供最大的安全保障。但如果有人不同意，我愿意把我的指挥权交给他。”（6.23.3）

尼基阿斯做出了如此悲观的分析和如此晦暗的预测，他或许是希望有人来反驳他，于是他就有借口辞去总司令职务。或许他相信，既然远征领导班子中经验最丰富、最虔诚和最幸运的指挥官员做出了这样的姿态，公民大会就能够谨慎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又一次判断失误了。公民大会并没有知难而退，反而更加积极了，“结果与他所期望的恰恰相反”（6.24.2），因为人民坚信他给出的都是很好的建议。

一个叫德摩斯特拉图斯的人（他是贵族，但也是赞成远征和再开战端的激进派政治家之一）此时提出了一个令尼基阿斯窘迫的问题：具体需要增加多少兵力？尼基阿斯不得不回答，于是提议100艘三列桨座战船、5000名重步兵和相应的轻装部队。在辩论的激烈关头，他忘记了索要骑兵，尽管他刚刚讲过，敌人因拥有骑兵而占据重大优势。雅典人随后投票决定授予将军们全权去决定远征的规模，并“自行斟酌，以最有利于雅典的方式行事”（6.26.2）。

事与愿违，尼基阿斯在第二次公民大会上竟然把目标有限、风险不大的中等规模远征军扩大成了承载着雄心和期望的庞大舰队。若是失败，必将招致灾难。雅典的其他政治家都不敢提议如此庞大的军队，也没有其他人在两次公民大会上提出。尼基阿斯在第二次公民大会上讲话之后，雅典人才将一次谨慎而有限的冒险变成了风险极大、筹划不周、

毫无约束的宏大事业。若不是他的干预，雅典人无疑在前415年就已经出征西西里岛了，那样的话他们也就不会遭遇弥天大祸。

---

[1] 吹牛军人（miles gloriosus）是古希腊喜剧中常见的一类人物，后世的典型例子有普劳图斯的喜剧《吹牛军人》中的主人公和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等。

[2] 僭主（tyrant）是古希腊一种君主制的变体。他们不是通过世袭、传统或是合法民主选举程序，而是凭借个人声望与影响力获得权力，成为城邦的统治者的。此类统治者被称为僭主。

第二十一章 本土战线和最初的战役（前**415**年）

渎神

据修昔底德记载，前415年春季，雅典人对西西里岛战役翘首以盼："他们全都激情满怀，急于起航。年纪较大的人认为他们要么能胜利，要么这样庞大的一支军队也不可能受到什么伤害。正值壮年的人则渴望远方的景致，自信一定会安全无虞。广大群众和士兵希望能够发财致富，并为他们的帝国增添新的产业，从中获得永不枯竭的财源。"（6.24.3）

不过，远征并非没有争议。一些祭司发出了警告，其他人报告说发现了凶兆。但亚西比德和远征的支持者也搞出了吉利的征兆和神谕。即便是非常严重的凶兆也未能阻止准备工作，但在预定出发时间前不久，更糟糕的事发生了，引起了人们的普遍警觉。

前415年6月7日早上，雅典人一觉醒来之后，发现全城各处赫耳墨斯石像的面部都被捣毁了，它们突出的阳具也被砍掉了。这场可怕的渎神行为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和恐惧，但有细节表明，此番渎神罪行还有着政治层面上的意义。渎神者是在一夜之间、在广大的地域范围内进行犯罪活动，这表明这些人不是一些醉醺醺的狂欢者，而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组织严密的群体。赫耳墨斯是旅行者的保护神，所以对神像的攻击显然是为了阻止西西里远征。雅典人"对此事非常重视，因为它似乎是关于远航的征兆，是一群密谋分子做的，目的是发动革命、颠覆民主制"（6.27.3）。

公民大会展开了调查，悬赏缉拿罪犯，并向能够对此次或任何渎神罪行提供证据的目击者授予豁免权。议事会组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其

中包括显赫的民主派政治家。在讨论远征的最后计划时，一个叫作皮索尼克斯的人做出了令公民大会目瞪口呆的指控：有人发现亚西比德及其朋友在戏仿嘲弄厄琉息斯秘仪[1]。一名奴隶在得到豁免保证之后作证，他和其他人曾看到普利提翁家中举行厄琉息斯秘仪，并指认亚西比德和另外九人参加了秘仪。

尽管此事与赫耳墨斯神像被毁没有关系，但雅典的气氛原本就高度紧张，再加上亚西比德被指认参与其中，于是它成了大众关心的主题。但很少有雅典人会怀疑，亚西比德和他那些狂野的朋友们能够做出嘲讽宗教仪式的事情来。他的政敌们兴高采烈地抓住这个机会，指控亚西比德不仅参与亵渎秘仪，还破坏了神像，并补充说他想要“消灭民主制”（6.28.2）。

亚西比德否认了所有指控，并要求接受审判。他希望可以避免在自己不在雅典城的时候举行听证会，因为如果支持他的士兵和水手们远在征途，他的政敌就能恣意攻击他，不会遇到多少反抗。这些政敌为了同样的原因，也希望暂缓审判。“让他现在带着好运气起航吧，”他们说，“等战争结束了再让他回来为自己辩护。到那时法律也不会有什么变化。”（Plutarch，*Alcibiades* 19.6）公民大会同意了，于是亚西比德就这么离开了雅典，指控仍然悬在他头顶上。

6月中下旬，雅典军队终于踏上了前往西西里岛的征途。他们计划先在克基拉停靠，在那里与盟军会合。这是“有史以来由单独一个城邦派出的完全由希腊人组成的代价最高昂和最光辉的军队”（6.31.1）。除了国家出资之外，三列桨座战船的船长们还自掏腰包，让他们的船只不仅迅捷和坚固，还非常美观，甚至重步兵们也争芳斗艳，看谁的装备最精美。舰队出航时，全体雅典人和在城内的外国人都去比雷埃夫斯观看这一壮丽景象。“这更像是在其他希腊人面前展示力量和财富，而不是出征讨伐敌人。”（6.31.4）喇叭吹响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按照惯例做了

祷告，目送舰队出海。“他们唱完赞歌、结束奠酒之后，就出发了，开始呈纵队，行驶到外海后便争先恐后地赶往埃吉那岛。”（6.32.2）远征军被尼基阿斯的失策扩大至危险的规模，划着桨离去了，他们仿佛是去参加一次划船比赛，而不是一场遥远而危机四伏的冒险。

大搜捕

在远征舰队安全出海之后，调查委员会开始积极地研究近期的丑闻。泰乌克鲁斯——曾经逃往墨伽拉的常住雅典的外邦人——在得到豁免承诺之后返回了雅典，给出了轰动性的证词：他自称参加了亵渎秘仪的活动，并且能够指认破坏赫耳墨斯神像的人。他指认了11名亵渎秘仪的人和18名破坏神像的人。亚西比德并不在这两个名单上。委员会逮捕并处决了其中一名嫌疑犯，但其他人全都逃之夭夭。

随后有一个名叫迪奥克雷戴斯的人对破坏神像事件做了指证。他说在案发当晚，他在散步时看到约300名密谋者聚集在卫城南坡的狄俄倪索斯剧场主厅。次日早上，他确定这些人就是破坏神像的罪犯，于是去其中一个他能认得清的人家里，企图勒索钱财。这人承诺给他一笔封口费，但没有交付，于是迪奥克雷戴斯指认了其中42人，包括2名议事会成员和好几个富裕的贵族。这些指控令雅典民众更加害怕，担心城内寡头派在酝酿一个反对民主制的阴谋。随后群众的恐慌情绪愈演愈烈，以至于议事会暂时中止了一项禁止刑讯雅典公民的法律。派桑德是提议这项措施的人。他打算对嫌疑犯严刑拷打，以便尽快让他们招供。被指控的2名议事会成员承诺接受审判，因而逃脱了刑讯，但他们后来逃到了墨伽拉或玻俄提亚。随后一支玻俄提亚军队兵临雅典边界，于是雅典人民愈发警觉，他们除了害怕发生革命（不管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寡头统治还是僭主统治）之外，现在还担心内奸出卖和外敌入侵。

当夜，雅典人枕戈达旦，彻夜无眠。为了安全起见，议事会搬到了卫城。雅典人感激迪奥克雷戴斯的告密，于是投票决定授予他英雄的花

环和在圣火会堂免费用餐的权利（这种待遇一般是保留给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的），然而他没有得意多久。安多吉德斯是被指控的犯人之一，后来成为雅典的一位著名演说家。他也同意作证。在获得议事会授予的豁免权之后，他揭露他所在的政治宴饮俱乐部[2] 就是破坏神像的责任者。他供出了一个罪人名单，所有人都同时出现在泰乌克鲁斯供出的名单上；除了四个迅速逃跑的人之外，所有这些人要么已经死亡，要么流亡在外。议事会随后审讯了迪奥克雷戴斯，他承认自己的证词是假的，但声称自己是按照亚西比德的堂弟（菲格斯之子亚西比德）和另外一人的指示这么做的。这两个指使者已经逃跑了。那些被他的伪证牵连的人得以洗脱罪名，迪奥克雷戴斯被处决了。

雅典人松了一口气，相信赫耳墨斯神像事件现在已经令人满意地澄清了，他们逃脱了“许多灾祸与危险”（Andocides，*De Mysteriis* 66）。罪犯显然只是一小撮人，都是同一个俱乐部的成员，很少有重要的政治家。这不是一起严重的大阴谋。亵渎神圣秘仪的事情还没有解决，于是调查继续进行。

雅典社会最高层有人做出了新的指控，那就是阿尔克麦奥尼德斯的妻子阿佳丽斯特。这两人都与雅典最尊贵的名门望族之一有关联，雅典民主制的创始人克里斯提尼就属于这个家族，伯里克利也是。阿佳丽斯特报告称，亚西比德、他的叔叔阿克西库斯和他的朋友阿迪曼图斯在一位贵族家中亵渎了秘仪。亚西比德的政敌又一次利用这个证词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声称亵渎神圣仪式是“反对民主制的阴谋”（6.61.1）的一部分。此时敌军蠢蠢欲动，大约一百人被指控犯下了这种或那种渎神罪行，而且就在远征遥远国度的前夜，还有政治家、贵族，尤其是亚西比德本人卷入其中，这一切都只会令群众再次心惊肉跳，因阴谋、叛变和威胁而恐惧。“各个群体的人都怀疑亚西比德。”（6.61.4）正式指控他的人是伟大客蒙的儿子帖撒鲁斯，他血统高贵、家世显赫，所以他的指控特别有力。何况他的讼词特别详细具体。形势非常严峻，于是议

事会派遣三列桨座战船“萨拉明尼亚”号接回亚西比德和远征军的其他几位成员。他们都受到了指控，必须回雅典受审。

在这个关头，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究竟是谁犯下了渎神罪行以及为什么。亵渎秘仪的罪行无疑是一个宴饮俱乐部做出的，这种俱乐部在雅典的富裕贵族青年当中很常见。但前415年的亵渎秘仪行为并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因为它是私下里进行的，不可能影响这群狂欢者之外的任何人，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个打算。

破坏赫耳墨斯神像的行为更严重，不仅仅是醉汉的恶作剧。要在一夜之间破坏雅典各地的神像，需要组织、计划和相当多的人手。多方史料证明，安多吉德斯的叙述最为可信。据他说，他所在的俱乐部犯下了这个罪行，领导者是欧菲列图斯和梅列图斯。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渎神行为是推翻民主政体、企图建立寡头或僭主统治的阴谋的一部分。所有告密者，不管诚实与否，都不曾给出这样的说法。古代史料也没有证据能支持这种说法。

但渎神行为发生的时间是西西里远征军即将开拔之前不久，这不是巧合。它无疑是有政治动机的。有的雅典人认为幕后黑手是科林斯人，他们希望阻止雅典进攻西西里岛。不管有没有外国人参与渎神罪行，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设计这个阴谋的雅典人肯定有阻止远征的企图。他们知道尼基阿斯已经被任命为远征的指挥官之一，他不仅是雅典最为人熟知的虔诚之人，而且以高度谨慎和反对远征而闻名。雅典人像绝大多数希腊人一样，也是非常迷信的，曾多次因为自然事件（如雷暴雨和地震）而停止公共会议。密谋者渎神行为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尼基阿斯看到在规模最大的远征前夜竟然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侵犯旅行者保护神的罪行，一定会大为警觉。

密谋者应当不会预料到，亵渎秘仪案发之后竟会造成这样的混乱。他们只是希望破坏神像可以造成强烈的恐惧和震惊，使人们普遍质疑神

像遭破坏的意义以及此事与远征的关联。两起渎神事件造成集体恐慌的一个意外后果是，尼基阿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再也不能承担人们原本期待他承担的角色了。他的两个兄弟在被指认的罪人名单上，其中一人似乎确实有罪。他们的名字被公之于众后，尼基阿斯就不能以神像遭亵渎为由取消远征了，因为如果他这么做，人们就会立刻怀疑他是密谋者之一，自己的政策失败就使出渎神这一招。出人意料的第二起渎神事件消除了第一起诡异阴谋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亚西比德参与秘仪事件的影响也与人们的期望相反。尽管他没有参与破坏赫耳墨斯神像的罪行，他的政敌却利用群众恐慌，在他正要起航的时候打击他的公信力。他的各方敌人后来将他召回雅典受审，他最有力的支持者当时都不在雅典，所以他不可能在审判中全身而退。反对西西里远征的人虽然无法阻止远征，但他们采取的行动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最终推动远征向灾难性失败的方向发展。

雅典的战略

从比雷埃夫斯起航的雅典舰队包括134艘三列桨座战船（其中60艘属于雅典）和数量不详的运兵船，运载着5100名重步兵（其中1500人是雅典人），这是战争期间除了蹂躏墨伽拉之外，雅典人投入重步兵数量最多的一次战斗。雅典还提供了700名雇工阶层公民[3]，他们在三列桨座战船上担任海军步兵。其余绝大部分兵员来自各附庸国，也有一些属于自由盟邦，如阿尔戈斯和曼丁尼亚。此外，还有约1300名形形色色的轻装部队士兵。1艘马匹运输船运载着30人和他们的马匹，这是远征军中仅有的骑兵。还有30艘运输船载着粮草、给养、面包师、石匠、木匠和用于建造壁垒的工具。

在克基拉岛，每一位将军接过了舰队三分之一的指挥权，以便各自独立行动，并缓解补给困难。然后，整个舰队渡海前往意大利南部海岸，在那里遇到了意料之外的抵抗。他们原指望从那里的一些城市获得

补给和基地，这些城市却紧闭大门，拒不接纳他们。具有关键意义的城市塔拉斯和洛克里斯甚至不允许他们停船补充饮用水。其中最重要的城市是瑞吉昂，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可以从那里向西西里岛北部和东部海岸登陆，并攻击西西里岛的主要港口——海峡对岸的墨西拿。在前427～前424年雅典人第一次远征西西里岛的时候，瑞吉昂是他们的盟友，曾全力支持他们，然而瑞吉昂人这一次却宣布中立，并禁止雅典人进城，只允许他们靠岸停船、在城墙外扎营以及购买补给物资。瑞吉昂人的态度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最合理的解释是，瑞吉昂人发现雅典第二次远征的规模极其庞大，所以他们觉得雅典人这一次是为了征服西方而来的，就像他们已经征服了东方一样，而非像他们嘴上说的那样，是为了帮助盟友在区域性争端中不吃亏和遏制叙拉古的野心。如果远征舰队只有雅典人原先投票决定的60艘船，或许就不会给瑞吉昂人这样的印象了。雅典大舰队失去了预想的基地，这对远征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次打击。

塞杰斯塔传来的消息更是让雅典人灰心丧气。塞杰斯塔人只能拿出30塔兰同作为军费。尼基阿斯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但他的同僚们惊得目瞪口呆。形势的这些变化迫使他们重新考虑行动的目标和战略。于是，尼基阿斯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路线：雅典人应当去塞利农特，并要求塞杰斯塔人为全军支付费用。如果塞杰斯塔人同意（尼基阿斯知道这是极不可能的），雅典人“就继续考虑下去”（6.47）。如果他们拒绝，雅典人就要求他们支付塞杰斯塔人原先要求的60艘船的费用，然后停留在那里，直到塞杰斯塔与塞利农特议和。两国缔结和约后，雅典舰队就沿着西西里岛海岸航行，展示雅典的力量，然后返航回家，“除非他们找到快捷而意想不到的办法去帮助伦蒂尼人，或者将若干城邦拉到雅典阵营。但他们不应当消耗自己的资源，因为那样就将国家置于危险之中了”（6.47）。援助伦蒂尼人和拉拢一些城邦到雅典阵营的计划纯粹是幻想，因为尼基阿斯的真实目的是以某种方式解决塞杰斯塔的问题，然后立刻返回雅典。

这样的计划对亚西比德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若是两手空空地返航，不仅会让他这个远征倡导者丢脸，还会对雅典的威望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会让雅典在西西里岛的盟友任凭敌人摆布，并增加叙拉古人主宰全岛的可能性。亚西比德提议让雅典舰队努力与西西里岛的希腊城邦和土著西库尔人交好，这些人能够提供粮食和军队。得到这样的支持之后，雅典舰队就可以攻击叙拉古和塞利农特，“除非塞利农特与塞杰斯塔达成协议，并且叙拉古允许他们将伦蒂尼人的土地物归原主”（6.48）。

拉马库斯则希望径直驶向叙拉古，“趁着叙拉古城尚无防备，尽快在叙拉古城附近打一场战役”（6.49.1）。最理想的情况是，叙拉古人会不战而降；若他们不投降，拥有优势兵力的雅典人也可以在一场重步兵交锋中打败叙拉古人。最糟糕的情况是叙拉古人拒绝交战，退守城墙。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雅典人也可以快速地在城市附近登陆，将很多叙拉古人及其财物拦截在城墙保护范围之外。雅典人随后便可以占领他们的农场，并从中获取补给。

拉马库斯的战略肯定不是最初的那种，因为最初的计划是只投入60艘三列桨座战船，那样是不可能进攻叙拉古的。拉马库斯可能是在瑞吉昂拒绝接纳雅典舰队和塞杰斯塔人的谎言被揭穿之后才制订了这个新计划。不管这个计划是怎样被制订出来的，它都有一些缺陷。拉马库斯知道，若要围攻叙拉古，肯定需要在附近有一个基地，于是他推荐占领墨伽拉希布利亚，这座城镇拥有一个良港，而且距离叙拉古不远（见地图20）。但这座城镇已经被废弃几十年了，既没有农庄也没有市场，因此无法提供任何补给物资。况且雅典人缺少骑兵（用于保护重步兵方阵的侧翼，或者保护建造围城壁垒的劳工），叙拉古人却有很多骑兵。如果对叙拉古城的攻击不能迅速取胜，那么这些问题就会变得很严重。

尽管拉马库斯的计划有缺陷，卓越的将领德摩斯梯尼仍然认为他的

计划是最好的。修昔底德自己的评判则是，叙拉古人会抵抗雅典人对其城市的攻击，随后叙拉古会战败，那么他们就无法阻止雅典人从海陆两路封锁他们的城市，只能投降。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做出确凿的评估，但拉马库斯的战略是完全可能奏效的。不过他的建议不可能被采纳，因为他的意图与尼基阿斯的意愿相去甚远，而亚西比德固执己见，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拉马库斯不愿意接受尼基阿斯的消极策略，于是支持亚西比德的计划。就这样，雅典人采纳了亚西比德的战略。



前**415**年夏季的战役

雅典人现在需要一个规模较大、安全且便捷的基地，以便发起外交活动和海军远征。瑞吉昂不能为他们所用，于是墨西拿成为最有可能的选择，但墨西拿人也禁止亚西比德进入他们的城镇，仅允许雅典人使用他们的市场。于是他不得不从舰队（仍然停泊在瑞吉昂城外）中抽调了

60艘战船，到沿着海岸较远处的纳克索斯碰碰运气。纳克索斯人是叙拉古的宿敌，于是他们接纳了雅典人。但纳克索斯以南的卡塔那处于亲叙拉古派别的统治下，拒绝接纳雅典人。

雅典人在伦蒂尼附近建立了一个营地，从那里派遣了10艘战船驶入叙拉古港，但发现那里没有任何舰队停泊。雅典人向叙拉古人发出了近似最后通牒的宣言，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在对港口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详细勘察之后，他们安然无恙地驶出港口，但实际上已经正式向叙拉古宣战。叙拉古舰队之所以不在港口，是因为叙拉古人不愿意相信他们收到的情报，即雅典的庞大舰队即将向他们发起挑战。叙拉古富裕而强大，是一个温和的民主制城邦。他们对得到的警报高度重视。但直到雅典人到达克基拉岛，他们才进行公共讨论。在公民大会的冗长辩论中，赫尔蒙之子赫莫克拉提斯（就是前424年杰拉会议的主导人物，那次会议将雅典人逐出了西西里岛）坚持说，雅典庞大舰队的目标是征服叙拉古及整个西西里岛。他敦促叙拉古人向西西里岛、意大利甚至迦太基（西西里岛希腊人的传统敌人）求援，并请求科林斯和斯巴达帮助。与此同时，他们还应当派遣一支舰队到意大利南部，在雅典舰队抵达西西里岛之前与其对抗。

赫莫克拉提斯掌握的情报是准确的，但他的战略建议却值得商榷。叙拉古海军无论在数量还是技能上都不是雅典舰队的对手，而雅典舰队正在逼近西西里岛。无论如何，叙拉古人绝没有足够的时间建造一支足够强大的舰队，并为其配备人员，再将舰队派遣到意大利及时堵截雅典人。他一定知道这一点。他提出这种建议的目的可能是想用快速而轻松取胜的虚假希望来战胜同胞们的呆滞和消极。

叙拉古人仍然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所以他肯定需要耍一点花招。一位名叫雅典那哥拉的流氓政客坚持宣称，雅典人不会真的来攻打叙拉古，因为他们这么做就太愚蠢了。他说那些相信雅典人即将杀到的人其

实是想制造混乱，趁机推翻民主政权。无论如何，叙拉古人的普遍共识是，他们可以轻松地打败进攻的雅典人。一位极其理智、务实和拥有极高个人权威的叙拉古将军（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指出，准备防御总不是坏事，最好防备雅典人的确前来进攻；叙拉古人应当派遣使者到合适的国家求援。他承认，将军们已经采取了这个措施。他承诺将了解到的新情况汇报给公民大会，但对派遣远征军去意大利的想法只字不提。随后公民大会就休会了。

他们得知雅典人已经在瑞吉昂登陆之后，终于开始采取一定程度的防御措施，“他们推断战争正在迅速逼近，事实上已经快要兵临城下”（6.45）。这些措施并不包括准备一支舰队，雅典人驶入空荡荡的港口时便发现了这一点。

雅典人从叙拉古返回了卡塔那。这一次，他们与卡塔那城内的奸细里应外合，占领了卡塔那，将其拉到自己的阵营。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基地，可以进攻叙拉古或执行亚西比德计划的外交策略。这时传来的虚假消息称，此刻是占领卡马里纳的好机会，以及叙拉古人建造了一支舰队。这些假消息促使他们选择进军这两座城市，却没有明确的目标。但为了不白跑一趟，他们袭掠了叙拉古领土。在他们撤退时，一些落单的轻装部队被叙拉古骑兵杀死。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亚西比德逃亡

三列桨座战船“萨拉明尼亚”号抵达了卡塔那，打算将亚西比德和其他被指控破坏神像或亵渎秘仪的人押回雅典受审。普鲁塔克相信只要他愿意这样做，亚西比德本可以煽动士兵哗变。然而到目前为止远征的成绩都令人失望，所以亚西比德的威望可能受到了损害，于是他安静地屈服了。他承诺搭乘自己的三列桨座战船跟着“萨拉明尼亚”号，但他一定从水手那里得知了雅典的真实形势，于是决定逃跑。在意大利的图里，他逃入内陆，随后去往伯罗奔尼撒半岛。

在雅典，他遭到缺席审判并被定罪。他和其他嫌疑犯都被判处死刑，财产被没收充公，名字被镌刻在卫城竖立的耻辱柱上。雅典城邦还悬赏1塔兰同，鼓励人们杀死逃亡者。另外一道法令要求厄琉息斯祭司诅咒亚西比德，也许还诅咒了其他罪犯。流亡中的亚西比德的反应据说是：“我会让他们看到，我活得好好的。”（Plutarch，*Alcibiades* 22.2）

亚西比德出局后，尼基阿斯便成了远征军事实上的领导人。他当然想执行自己原先的消极战略，尽快返回雅典。但已经无谓地损失了这么多时间、金钱和生命，现在怎么可能退出了。他的部队和雅典人民都不会对这样的结局满意，于是尼基阿斯将全军调往塞杰斯塔和塞利农特（正是这两国的纠纷将雅典人带到了西西里岛），看看如何应对那里的局势。

他渡过墨西拿海峡，前往西西里岛西北部，“尽可能远离叙拉古敌人”（Plutarch，*Nicias* 15.3）。希麦拉（这是主要由迦太基人控制的地区内唯一一个希腊城邦）不准雅典人登陆，雅典人攻击了海卡拉[4]（这是土著西库尔人的城镇，与塞杰斯塔为敌），并将其交给塞杰斯塔人，将“蛮族”居民变卖为奴。尼基阿斯亲自去塞杰斯塔，收缴塞杰斯塔人承诺给雅典的军费，并试图解决塞杰斯塔与塞利农特的纠纷。结果一定是彻底失败，因为他在塞杰斯塔只收缴到30塔兰同，这可能是他能找到的全部资金。然后，他回到卡塔那与大军会合。此时，雅典人已经与西西里岛上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取得了联系。据我们所知，雅典人没有去杰拉或阿克拉加斯[5]，可能因为觉得向它们示好也是白费力气。亚西比德的战略也失败了。雅典人随后向卡塔那附近的一座小城镇发起进攻却遭遇失败，这很能代表整个战役的局势。

在西西里岛的第一个作战季节令雅典人大失所望。亚西比德的离去使整个行动落入了一位根本不相信行动目标能成功的领导人手中，而且他也没有自己的战略去达成这些目标。普鲁塔克对形势做了如下描

述：“尼基阿斯尽管在理论上是两位领导人之一，实际上独揽大权。他一直枯坐闲逛、四处航行、前思后想。士兵们的强烈希望已经变得软弱无力，而敌人最初目睹他的雄壮军力时的震惊与恐惧也渐渐消失了。”（*Nicias* 14.4）由于尼基阿斯还不敢离开西西里岛，他和他的部下们将不得不面对在叙拉古的主要敌人，尽管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

---

[1] 厄琉息斯是位于雅典西北约30公里的一个小镇，主产小麦和大麦。厄琉息斯秘仪是崇拜谷物女神得墨忒耳及其女珀耳塞福涅的一种宗教信仰和秘密仪式，可能属于一个与女神崇拜、极乐世界相对应的原始宗教体系。这个秘仪的崇拜内容和仪式过程处于严格的保密之中，全体信徒都参加的入会仪式则是一个信众与神直接沟通的重要渠道，以获得神力的佑护及来世的回报。

[2] 政治宴饮俱乐部（Hetairia）：古希腊某些城邦的一些社会和宗教群体的男子，尤其是青年男子，由于一起用餐，逐渐形成联系纽带较强的团体。

[3] 民主制的雅典按照财产多少，将公民分成四个阶层，雇工阶层（Thetes）是财产最少的一类。前三类分别为五百桶户（Pentacosiomedimni）、骑士（Hippeis）、有轭牲阶层（Zeugitae）。不同阶层的人拥有不同的政治责任和权利。雇工阶层的人一般担任轻装部队士兵和战船桨手。

[4] 今称卡里尼，在西西里岛西北部沿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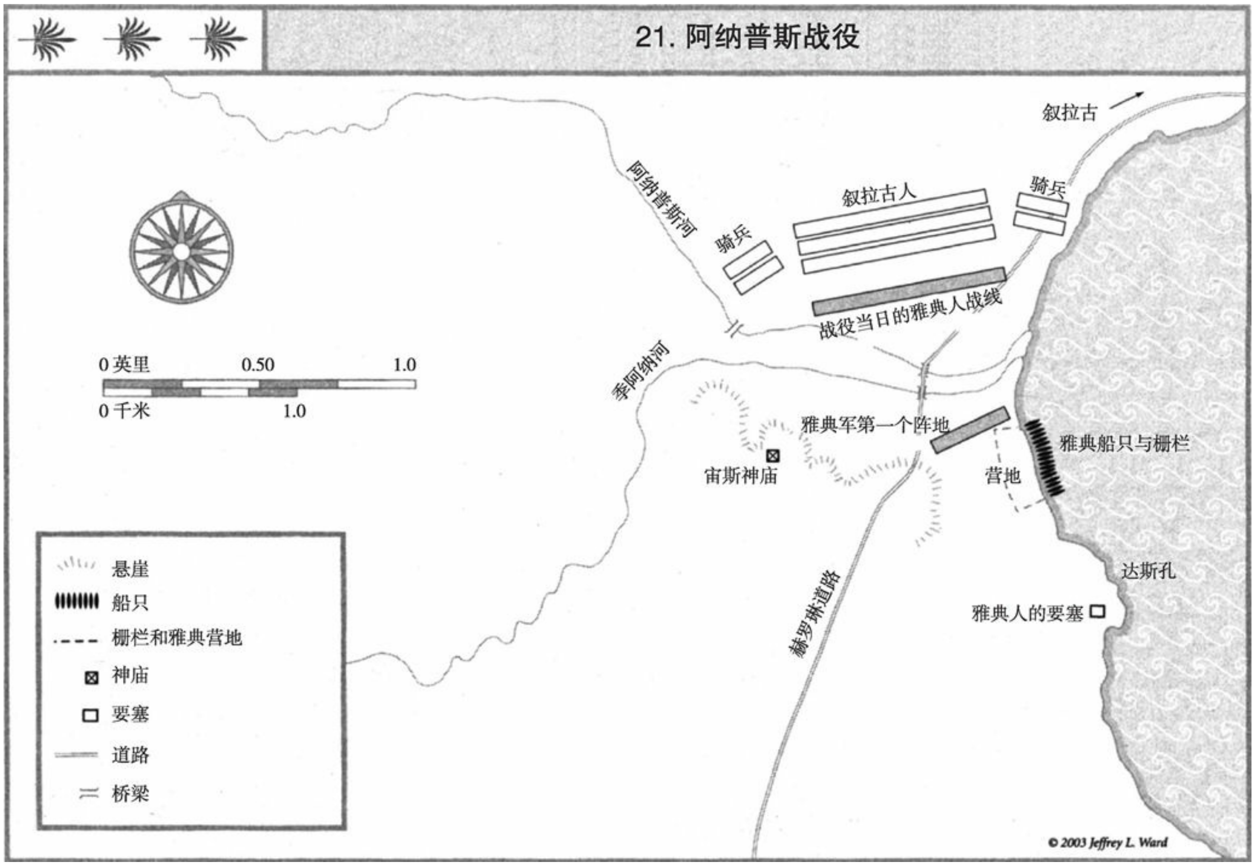
[5] 今称阿格里真托，在西西里岛南部沿海。

第二十二章 第一次进攻叙拉古（前**415**年）

尼基阿斯左顾右盼，迟迟没有与叙拉古正面对抗，这让叙拉古人恢复了自信。他们坚持要求将军们率军在卡塔那与雅典人交锋。叙拉古骑兵冲到雅典军队阵前，辱骂地问道："你们是来我们的土地定居，还是帮助伦蒂尼人收复家园？"（6.63.3）尼基阿斯再也不能瞻前顾后了，但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军队摆好阵势以准备进攻叙拉古。敌人已经全副武装地做好了战斗准备，所以雅典舰队不能直接登陆。虽然重步兵能够安全地向叙拉古开进，但雅典人还有许多轻装部队和一大群面包师、石匠、木匠和随军人员，而且没有骑兵保护他们。叙拉古却拥有强大的骑兵部队。

雅典人在叙拉古

于是雅典人诉诸诡计，利用一名双面间谍去欺骗叙拉古将军，将敌人全军诱骗到卡塔那。叙拉古人开往卡塔那的时候（从叙拉古到卡塔那的路程是40英里），雅典人在叙拉古港口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登陆地点就在阿纳普斯河以南的海滩上，在奥林匹斯大神宙斯的神庙对面（见地图21）。他们占据了一个有利阵地，房屋和天然障碍物能保护他们的两翼，所以不用害怕叙拉古骑兵的侧翼包抄。他们还建造了更多的防御工事，以抵御敌人的正面进攻或从海上发起的进攻。



上当受骗的叙拉古人怒气冲冲地返回之后，发现雅典人已经在叙拉古城前方盘踞下来，于是向他们发起挑战。但雅典人就是不上钩，于是叙拉古人别无他法，只能扎营过夜。次日清晨，雅典人发动了进攻。他们的一半军队排成八排，阿尔戈斯人和曼丁尼亚人在右翼，雅典人在中路；其他盟军在左翼，那里受到敌人骑兵的威胁最大。在这些部队的后方较远处，另外一群雅典士兵组成了一个中空方阵，将运载补给物资的平民保护在中间。他们留在雅典营地附近，担当预备队。雅典人渡过阿纳普斯河，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一些叙拉古士兵在前一晚回到城里过夜，现在匆匆赶回来，在己方阵线上尽可能地找到一个位置。叙拉古人及其盟军的战线与雅典战线的正面长度相当，但纵深是其两倍，此外他们还有1500名骑兵，而雅典人没有骑兵。为了弥补这样的劣势，雅典人一定是将自己的阵型部署在与河流成一个角度的地方，利用河流保护自己战线的左端，利用沼泽保护右端，所以能够有效地防止敌人包抄他们

方阵的两翼。雅典人还将弹弓手、弓箭手和投石手[1]部署在两翼，他们有助于打退敌人骑兵。尽管叙拉古方阵的纵深很大，他们的一些士兵也很英勇，但雅典人及其盟军的纪律性更强，经验也更丰富，因此获得了胜利。

双方激战时，倾盆大雨和电闪雷鸣令叙拉古人恐惧万分，这可能也是他们士气瓦解的原因之一，但训练有素的雅典人安之若素。阿尔戈斯人很快将敌军左翼逐退，雅典人打退了敌军中路，于是敌军战线崩溃了。叙拉古人及其盟军抱头鼠窜。此刻对雅典人来说是一个获得决定性胜利的良机。如果他们积极追击并大力杀伤敌人，那么他们或许能粉碎叙拉古人的抵抗，或者至少让敌人丧失抵抗围困的斗志。然而要追击敌人，就需要骑兵，因为骑兵可以比重步兵追得更快和更远，但雅典人没有骑兵。叙拉古骑兵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进而得以遏制住雅典人的追击，掩护己方部队重整旗鼓，并派遣一支队伍去宙斯神庙那里保护财宝，最后叙拉古军队安全地撤回了城墙之后。对雅典人来说，此役是一场战术胜利，却没有战略结果：叙拉古城岿然不动，做好了继续战斗的准备。雅典人必须想办法迫使敌人屈服。但雅典人没有立刻攻城，而是在战场上建造了纪念碑，与敌人停战，返还敌人的死者遗体，埋葬了己方的阵亡将士（雅典一方有50人死亡，而敌方有260人死亡），随后起航返回卡塔那。

修昔底德对尼基阿斯此番举动的解释是，此时作战季节已经快结束了，而且雅典军队需要补充粮食，并从雅典城和其他地方获取资金，尤其是“要求雅典送来骑兵，并在西西里岛征募一些盟军，以免己方完全被敌军骑兵压倒”（6.71.2）。尼基阿斯的同时代人责怪他优柔寡断，没有果断行事。在此役之后不久上演的喜剧《鸟》中，阿里斯托芬嘲弄了“尼基阿斯的耽搁”。普鲁塔克则记载了雅典的普遍民意：“他盘算得过于精细，延误太多，谨慎过头，浪费了行动时机。”（*Nicias* 16.8）

尼基阿斯针对己方缺乏骑兵而做出的反应并非不合理，因为己方没有骑兵保护，就没有办法派人去叙拉古城外挖掘堑壕或者建造围城防线。但是，决定战争结局的往往是物质之外的东西。德摩斯梯尼是一位比尼基阿斯优秀得多的将军，他认为如果尼基阿斯在前415年冬季更勇敢一些，叙拉古人就会与其决战并失败，在向外界求援之前就会发现自己的城市被壁垒层层围住，于是不得不投降。不过，在没有骑兵保护的情况下，雅典人极不可能成功修建一道包围城市的壁垒。而只要这样的壁垒不存在，叙拉古人就可以自由地寻求外界援助，并充分利用这些援助。总而言之，尼基阿斯选择了正确的计划，并以纯熟的技艺执行。他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不应当受到责备。

但他不是一位优秀的战略家，他在战略上的一个错误是导致本次远征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想占领叙拉古，骑兵是必需的。如果雅典人从一开始就拥有骑兵，那么叙拉古人就会被迫投降，外界任何援助都救不了他们。尼基阿斯自己在远征前的一次雅典公民大会上曾强调骑兵的重要性："相对于我们，叙拉古人最大的优势是他们拥有许多马匹，而且他们的粮食是本地产的，不是进口的。"（6.20.4）既然已经知道这一点，雅典人却没有准备骑兵，这尤其令人震惊。尼基阿斯在列举远征需要的部队种类时单单忘了骑兵。尽管在起航之前他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在随后的一次公民大会上弥补这个缺陷，他却始终没有这么做。即便在瑞吉昂的会议上，当时形势已经很明朗，有可能需要攻打叙拉古，他仍然有时间向本土索要骑兵。

或许，这种忽略是出于他的目的，而不是他的错误判断。我们已经看到，尼基阿斯始终不希望进攻西西里岛，他是被迫参与此次战役的，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少地作战，避免任何大规模冲突。他或许一直拒绝考虑进攻叙拉古这样的大规模战争，但形势发展迫使他不得不这么做。这时他又发现自己没有达成目标所需的骑兵。

尽管要等几个月，在从雅典获取金钱和骑兵之后再攻打叙拉古，但他们没有理由浪费前415/前414年冬季的时间。于是雅典人前往墨西拿，希望借助当地内奸的力量控制这个深陷于派系斗争的城镇。但是，亚西比德在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途中泄露了雅典人的这个计划。除此之外，亚西比德还做了许多事情来证明他还活着。在雅典舰队抵达墨西拿之后，反对雅典的派系阻止他们进城，于是他们撤到了纳克索斯，在那里建造了一个新基地。

叙拉古的抵抗

与此同时，赫莫克拉提斯在叙拉古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改革。为了扩充军力，他们向较贫穷男子发放武器，以便他们能作为重步兵作战；引入了义务军训制，这在当时的希腊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希腊的绝大多数军队都是由作为业余军人的公民组成。叙拉古将军的人数从15人减少到3人，其中之一便是赫莫克拉提斯。将军们拥有自行决断的全权，无须征求公民大会的意见，这就保障了更有效的领导和计划的机密性。在极端危急时期，叙拉古人自愿限制了自己的民主制。

在外交战线上，他们不仅请求科林斯和斯巴达帮助他们保卫城市，还请求斯巴达人“更公开地持续与雅典人作战，那样雅典人也许会撤离西西里岛，或者无法向西西里岛输送大批援军”（6.73.2）。与此同时，他们还扩建了城墙，将更多领土纳入城墙之内，这将迫使雅典人建造更长的围困防线，以将叙拉古包围。叙拉古人还向墨伽拉希布利亚和宙斯神庙派驻军队，并在可能被雅典人用作登陆场的海岸地带建造了木栅栏。

赫莫克拉提斯得知雅典人在努力拉拢卡马里纳，于是去了那里；对卡马里纳人说，雅典人到西西里岛不是为了援助其盟友，而是为了征服全岛。雅典的代言人欧菲姆斯则辩称，叙拉古才是西西里岛各希腊城邦自由的真正威胁。卡马里纳人对雅典人有好感，“但觉得雅典人将要奴

役西西里岛”。因此，他们的正式答复是“由于他们与交战双方都有盟约，所以最符合他们誓言的办法是保持中立，不支持任何一方”（6.88.1-2）。这种中立对叙拉古有帮助，对雅典人没有好处，因为雅典人需要尽快在西西里岛获得一些盟友。雅典舰队的庞大规模可能影响了卡马里纳人的决定，这又一次与雅典人原先的战略背道而驰。

雅典人在与非希腊血统的西库尔人结交时取得了好成绩。一些西库尔人自行来到雅典阵营，带来了粮食和金钱，而其他一些西库尔人则在雅典人的强迫之下为其效力。为了更好地与西库尔人联络，雅典人将基地迁往卡塔那，并向遥远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2]和非洲的迦太基求援，这两个国家之前都曾与叙拉古为敌。前413年，一些伊特鲁里亚城邦向西西里岛派遣了一些船只去帮助雅典人，但雅典向迦太基的求助却完全失败了。不过，向迦太基求助的举动削弱了亚西比德、赫莫克拉提斯和修昔底德的观点——雅典此次远征的目标包括征服迦太基。

亚西比德在斯巴达

叙拉古人在寻找盟友时的运气较好。他们的母邦科林斯很乐意支持这些殖民者，并派遣使者和叙拉古使者一起去劝说斯巴达人。但斯巴达领导人并不打算在西西里岛投入大规模兵力，于是决定不做实质援助，而只派遣一个使团去敦促叙拉古坚持抵抗雅典人。不过，叙拉古人和科林斯人在斯巴达找到了一个有价值的盟友——亚西比德。这个雅典变节者做了很大努力去适应斯巴达的生活方式。他参加严苛的体育锻炼，洗冷水澡，按照斯巴达的风尚留长发，和斯巴达人一样吃粗面包和黑粥。但是，他不大可能打算一辈子都待在斯巴达。他决心返回雅典，要么是以领导人和回归英雄的身份，要么是以复仇者的身份。

因为他目前还是一名逃犯，在雅典法令有效的所有地区都被悬赏通缉，所以他的首要目标是在斯巴达人当中扬名立威，获得足够的影响力和权力。要达成这些目标，他的手段是劝说斯巴达人击败西西里岛的雅

典人，然后继续在希腊本土作战。他在斯巴达公民大会发表演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减少斯巴达人对他的不信任感和敌意。他曾经是得到雅典暴民支持的蛊惑人心的政客，是斯巴达之友尼基阿斯的主要对手，是促使雅典与阿尔戈斯、曼丁尼亚与厄利斯结盟的始作俑者，是曼丁尼亚战役和西西里远征的间接推动者，还是背叛自己城邦的变节者。显然，斯巴达人不会信任他能给他们奉上良策。

亚西比德轻描淡写地解释了自己的过去或否认自己过去的言行，以此为自己辩护，并将自己逃离雅典的行为描绘为从民主制中得到解放，还说民主制是“人所共知的愚行”（6.89.6）。他揭穿了雅典人向西远征的“真实动机”：此次远征绝不局限于援助盟友、攻击叙拉古，而是要将整个西西里岛据为己有，甚至吞并更多的土地。除了西西里岛，雅典人还想占领意大利南部、迦太基及其帝国，甚至遥远的伊比利亚[3]。完成这一切之后，雅典人将利用从这些征服中获得的庞大资源，去攻击伯罗奔尼撒半岛，“然后他们将统治整个希腊民族”（6.90.3）。他坚持说，虽然他本人已经不在雅典，但雅典的将军们将继续执行这个计划。

他指出，斯巴达人必须抢在叙拉古人投降之前尽快行动起来。他说：“你们不要认为这是在决定西西里岛事务，此事关系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命运。”（6.91.4）他建议，斯巴达人应当立刻派遣一支军队到西西里岛，由一名斯巴达人指挥，同时还应当继续在希腊大陆作战，以鼓励叙拉古人和分散雅典人的军事力量。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必须采取雅典人最害怕的行动，即在阿提卡的狄凯里亚建造一座永久性要塞。从那里，斯巴达人可以彻底将雅典人与其家园、庄稼和苏尼昂的银矿切断，并煽动雅典帝国内部的抵抗和叛乱，进一步削弱雅典的财力。

变节者亚西比德知道，他需要维护自己的公信力。“在不公正地被家园抛弃之后而不攻击它的人，不是真正的爱国者。真正的爱国者出于对家园的热爱，会想尽一切办法努力恢复它。”（6.92.4）我们不知道这

种诡辩是否打动了斯巴达人，但亚西比德在演讲结束时敦促他们忘记过去，看重他在未来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如果我作为你们的敌人，给你们造成了很大损害，那么作为你们的朋友，我可以给你们带来极大的好处，因为我对雅典人的计划很熟悉，对你们的计划却只能猜测。"（6.92.5）

亚西比德是个流亡的叛徒，被雅典悬赏通缉，并以狡黠和擅长欺诈而闻名。斯巴达人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他。他的一个说法理应让斯巴达人对他的所有话产生怀疑，因为这个说法是明目张胆的谎言："雅典将军们会尽力执行原计划，不做任何改动。"（6.91.1）斯巴达人熟悉和尊重尼基阿斯，他们绝不会相信尼基阿斯会继续执行亚西比德描述的那种宏大的征服计划。亚西比德在这一点是赤裸裸地扯谎，斯巴达人也有很好的理由怀疑他所揭露的雅典的所谓宏伟计划其实是他自己一手捏造的，为他自己的目的（用恐惧来促使斯巴达继续与雅典作战）服务。

要理解亚西比德在斯巴达的表演，我们需要审视他在前415/前414年时的经历和成就。那时他还没有成为一个传奇，无论在海上还是陆地都不曾指挥雅典人取得任何胜利，他的所有计划都只是导致了战略失败。他领导的军事行动有着鲜明的特色，通常依赖他个人的外交手腕和说服力，以及利用盟军来承担主要作战任务，因此雅典承担的风险很小。这种手段或许显得聪明和安全，但不能带来决定性成果。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战略最终导致了前418年的曼丁尼亚战役，要想在那里取胜，雅典人应当投入更大兵力，但真正参战的雅典人比实际需求要少得多。他一直不愿意在战斗中拿大量雅典军队冒险，所以他在当时也未必愿意投入足够的兵力，尽管他在那一年担任将军。

他没有亲自参加曼丁尼亚战役，这突出了他作为雅典领导人的另一个缺陷：一位将军要想执行连贯一致的政策，就需要得到民众的长期支持，连续多年当选为将军，而他做不到这一点。他在前415年设计的西

西里岛战略不算新颖，大体上是前427～前424年那次失败远征的重演。无疑，他相信自己的个人领导力和说服力能够帮助他成功（尽管索福克勒斯和欧律墨冬在上一次远征西西里岛时失败），但他没有办法阻止尼基阿斯扩大远征的规模，于是庞大的雅典军队让西方的希腊城邦胆战心惊，纷纷保持中立或者反对雅典。在瑞吉昂，扩大远征规模的代价清楚地体现了出来，但他也没有修改自己的计划去适应新的现实。最后，同胞们对他的不信任使雅典政敌得以将他放逐。斯巴达人眼前的亚西比德就是这个样子：一个被挫败、被追捕的亡命徒。他急需让斯巴达人相信，他们面临巨大的危险，而如果他们接受他的辅佐和帮助，就能得到极大的好处。他的勇敢大胆、超强想象力和虚张声势，的确令人惊叹。

斯巴达人果然派遣了一位将军去西西里岛，不过他指挥的部队仅有2艘科林斯船只和2艘拉科尼亚船只。没有一名斯巴达士兵被派往西西里岛，而这位将军古利普斯也不是真正的斯巴达人。他的父亲克里安德里达斯是一个因为受贿而被判处死刑的流亡者，他的母亲据说是一个黑劳士，所以他是一个地位较低的莫萨克斯阶层成员[4]。因此，前往西西里岛的斯巴达远征军从兵到将都是死不足惜的。而且，雅典人若是做足了防范措施，就能阻止这样一支可怜兮兮的部队抵达西西里岛。

---

[1] 投石手用的是一种叫作机弦（也叫投石带、撂抛子）的兵器，由一个兜子和两端连接的绳子构成。使用时，把石块或土块放在兜子里面，一根绳子末端固定在手上，另一根绳子末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然后甩动兜子，在适当的时刻松开拇指和食指，石子或者土块就会沿切线飞出，这样可以比用手扔石头远得多。经过一定的训练，可以将石子或者土块准确地射向目标。历史上机弦被用于打猎、战斗、放牧等。在《圣经》里，大卫就是用机弦投石击倒巨人歌利亚。《圣经·撒母耳记上》17章记载："大卫用机弦将石子击中歌利亚的额头，歌利亚就扑倒，面伏于地。大卫将歌利亚的刀从鞘中拔出来，用刀割了他的头，将他杀死。"

[2] 伊特鲁里亚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拉齐奥和翁布里亚。前9世纪，伊特鲁里亚文明在这一地区兴起，出现许多城邦。前650年前后达到极盛，影响力超过意大利半岛上的其他各民族。罗马早期受到伊特鲁里亚文明的极大影响，前509年之前有多位伊特鲁里亚国王统治罗马。但是，伊特

鲁里亚最终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完全被罗马同化。

[3] 主要包括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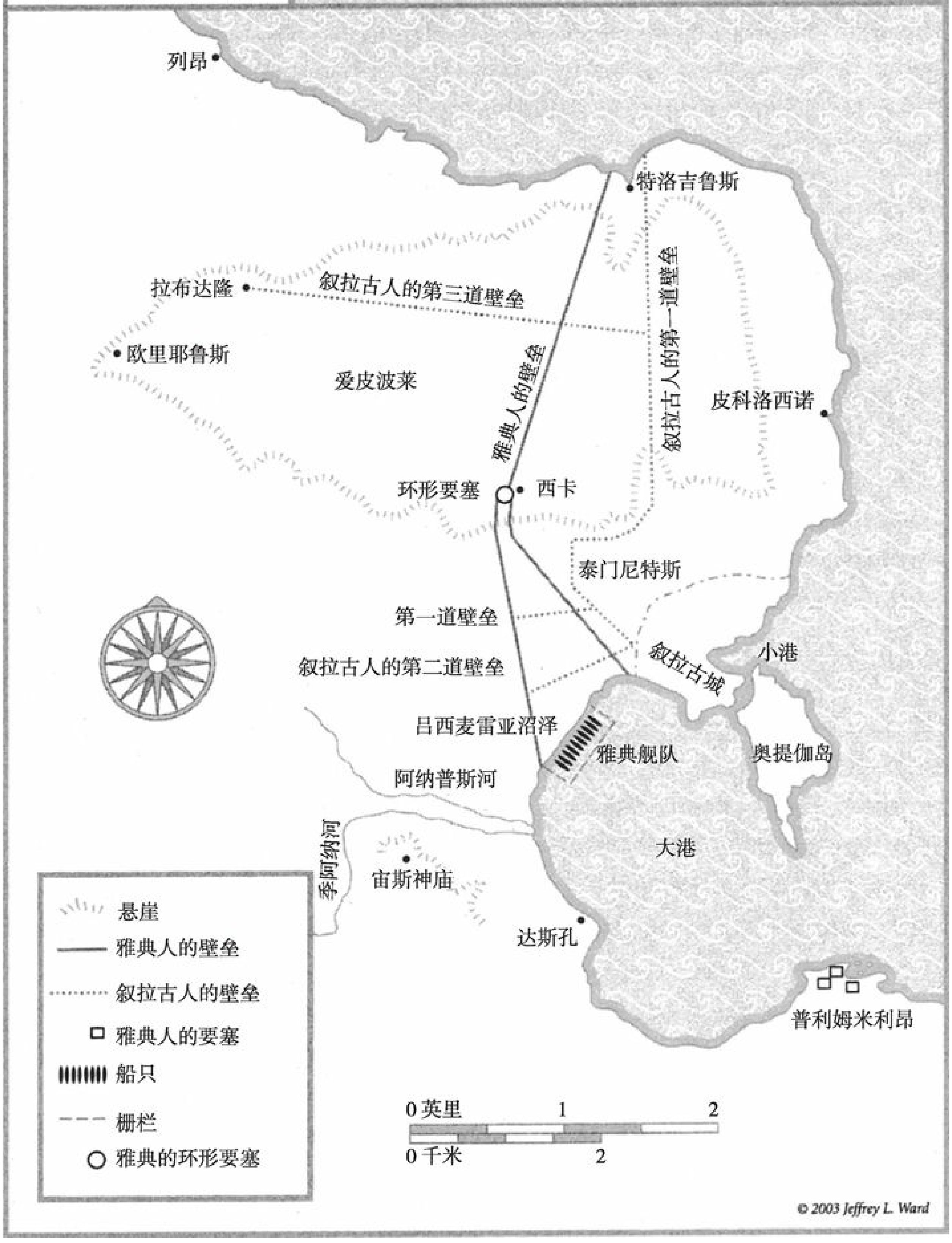
[4] 莫萨克斯（Mothax）是希腊语多利亚方言的一个词，字面意思是“继兄弟”，即继父或继母在另一段婚姻中所生的孩子。莫萨克斯在斯巴达是一个较低的阶层，其成员要么是斯巴达父亲与黑劳士母亲的孩子，要么是穷苦斯巴达人。莫萨克斯是自由人，但不算斯巴达公民。一般由斯巴达富户抚养长大，和斯巴达公民的孩子一起成长，并被允许和斯巴达公民并肩作战。一些莫萨克斯成员崛起成为有名望的人。

第二十三章 叙拉古攻防战（前**414**年）

在前5世纪，要想占领一座拥有牢固城墙和戒备森严的城市，就需要开展一场谨慎且执行得力的围城战，切断城市的补给线，用饥饿迫使它屈服，或者与城内的奸细里应外合。前414年春季，雅典人掌握制海权，有足够的部队可以从海陆两路包围叙拉古城。雅典送来资金和骑兵之后，便可以开始攻城。环绕叙拉古的围城防线竣工之后，保持警惕的雅典舰队便可拦截伯罗奔尼撒人为叙拉古送来的任何援助。

雅典骑兵抵达的消息促使叙拉古人在通往爱皮波莱的道路上部署了警卫。爱皮波莱是俯瞰叙拉古城的一块高地（见地图22）。“他们认为，如果雅典人不能控制爱皮波莱，那么即便在战场上打败了叙拉古人，也不能轻松地将叙拉古城包围起来。”（6.96.1）但是，他们行动得太晚了。在叙拉古军队抵达爱皮波莱之前，尼基阿斯已经将雅典陆军用船运到列昂，那里距爱皮波莱北部的悬崖不远。在叙拉古人动手之前，雅典军队便登上了爱皮波莱高地，从那里可以轻松打退企图驱逐他们的叙拉古人。雅典人随后在拉布达隆（爱皮波莱北部的悬崖）建造了一座要塞，用来储存补给物资、装备和资金。

22. 叙拉古围城战


列昂
特洛吉鲁斯
拉布达隆
叙拉古人的第三道壁垒
欧里耶鲁斯
爱皮波莱
雅典人的壁垒
叙拉古人的第一道壁垒
皮科洛西诺
环形要塞
西卡
泰门尼特斯
第一道壁垒
叙拉古人的第二道壁垒
叙拉古城
小港
吕西麦雷亚沼泽
雅典舰队
奥提伽岛
阿纳普斯河
季阿纳河
宙斯神庙
大港
达斯孔
普利姆米利昂
悬崖
雅典人的壁垒
叙拉古人的壁垒
雅典人的要塞
船只
栅栏
雅典的环形要塞
0 英里
1
2
0 千米
2
© 2003 Jeffrey L. Ward

马匹很快被运抵前线，雅典的西西里岛盟军也送来了额外的骑兵。雅典人现在可以用重步兵和650名骑兵保护修建围城防线的人员。在一个叫作西卡的地方（在叙拉古城西北方，距爱皮波莱高地边缘不远），雅典人建造了一座要塞，修昔底德称之为“环形要塞”。这将是他们围城期间的行动中心。

叙拉古人出城挑战敌人，但叙拉古将军看到自己的部队纪律涣散、秩序紊乱，便很快撤回城墙之后，将部分骑兵留在城外，以阻止雅典人继续建造壁垒。雅典人用自己的骑兵和一队重步兵击溃了叙拉古人，成功保护了修建要塞的人员。次日，雅典人开始从环形要塞向特洛吉鲁斯延伸自己的壁垒。除非叙拉古人迅速行动，否则他们很快就会在陆路被封锁起来，但他们的将军仍然不敢出兵与雅典人交战。他们决定用石料和木材建造自己的壁垒，以切断雅典人即将建成的包围圈，并在己方壁垒沿线建造塔楼。雅典人继续在高地上建造壁垒，他们没有去攻击叙拉古人的壁垒，而是将注意力转向被围困的叙拉古城的饮水供应，摧毁了向叙拉古城输送淡水的地下管道。

很快，叙拉古人的粗心大意就给了雅典人一个表现勇气的机会。在正午骄阳下，叙拉古人懒洋洋地闲逛，壁垒守备兵力不多，而且人心非常涣散。300名雅典重步兵在一队轻装部队（为了这次作战换上了重型甲胄）的配合下，向壁垒发动猛攻。尼基阿斯和拉马库斯率领其余部队跟在后面，两人各指挥一翼。雅典的突击队将敌人壁垒上的哨兵驱赶到泰门尼特斯（叙拉古的一个郊区）周围的城墙处。随后追击的雅典军队冲进了城门，但无奈人数太少，守不住阵地。雅典人虽然没能占领泰门尼特斯，但摧毁了敌人的壁垒，并竖立起又一座纪念碑。

尼基阿斯患病，拉马库斯阵亡

大约在这个时期，尼基阿斯的肾病发作了，这种疾病将一直折磨

他，直到他去世。上一节讲述的突袭还在筹划时，他可能就已经身体不适，因为此次突袭的大胆和勇猛带有拉马库斯的风格。次日，雅典人开始修建围城防线的南段，从爱皮波莱高地上的环形要塞向叙拉古城以南的大港延伸。这段防线完工后，叙拉古的一个关键部分将被包围，雅典人可以将舰队从萨普苏斯转移到大港的安全锚地。在此之前，雅典人必须将补给物资从萨普苏斯走陆路拖运到爱皮波莱。若没有壁垒的保护，停泊在大港的雅典舰队就需要一支陆军部队的掩护，那样就会分散陆军兵力，所以是很危险的事情。

雅典人的新工事令叙拉古人大为惊恐，他们立刻开始建造横亘吕西麦雷亚沼泽的又一道壁垒，企图截断雅典人的防线。与此同时，雅典人将他们的壁垒拓建到了悬崖边缘，并已经在准备发动新的攻势了，这一次将海陆并进。他们将舰队转移到大港，并从爱皮波莱高地下来。他们在沼泽中地面最坚实的部分铺上木板和门板，又一次打得叙拉古人措手不及。叙拉古人将军队分割成两个部分，右翼逃回城内，左翼则奔向阿纳普斯河。看到敌军左翼逃向桥梁，300名雅典突击队员冲上去想切断他们，但叙拉古骑兵已经在河边等候。在重步兵的配合下，叙拉古骑兵击溃了这300人，并开始攻击雅典主力部队右翼。步兵方阵的右翼是它最脆弱的部分，尤其是在遭到骑步兵混编部队攻击时。雅典右翼最精锐的部队也陷入了恐慌。勇敢无畏的拉马库斯当时正在左翼，他立刻奔来支援右翼。他稳住了右翼战线，但被孤立到一条壕沟后，身边只有少量士兵。他英勇地战死了。叙拉古人渡过河向宙斯神庙要塞撤退，将拉马库斯的遗体也带走了。雅典人虽然得胜，却付出了巨大代价，因为他们只剩下一位患病的尼基阿斯司令，并且丧失了拉马库斯的军事技艺和勇猛精神。

叙拉古人看到雅典军队出现在城市前方的平原上，于是派遣一支部队牵制雅典人，派遣另一支部队去攻击高地上的环形要塞。他们占领并拆毁了从环形要塞向西南延伸、未竣工且无人把守的壁垒。尼基阿斯此

时就在环形要塞内。虽然他身体有恙，但足够警醒，命令部下纵火，击退了敌人。大火还向平原上的雅典军队发出了警报，显示要塞处于危险之中。这个时机对雅典人来说很幸运，因为叙拉古城下的雅典人已经驱散敌人，雅典舰队也驶入了港口。现在他们可以安全地及时赶回爱皮波莱，去保护壁垒和他们的最后一位将军。叙拉古人逃回了城内。

现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雅典人继续修建通向海边的壁垒了。如果他们再建造一道穿越爱皮波莱高地的北方壁垒，再加上他们舰队的制海权，就等于完成了对叙拉古的合围；他们只需要保持适当的警戒，就能迫使敌人投降或者饿死。叙拉古人陷入绝境的消息很快传开，于是之前那些保持中立的西库尔人加入了雅典一方，意大利的一些城邦给雅典军队送来补给物资，遥远的伊特鲁里亚也派来了3艘船。

叙拉古人“不再觉得自己能打赢战争，因为伯罗奔尼撒半岛没有派来任何援助”（6.103.3）。叙拉古人免去了将军们的职务，代之以三位新人。这是叙拉古人打算投降的诸多迹象之一。他们内部先讨论了投降条件，甚至与尼基阿斯也开始谈判。有谣言称，城内有奸细要开门献城。尼基阿斯和以往一样拥有极好的情报，雅典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叙拉古城很快将放弃战斗、举手投降。

然而在这个时候，尼基阿斯变得粗心和自负，忽视了对雅典人来说晴朗天空中一朵遥远的乌云：4艘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船只，其中一艘载着斯巴达将军古利普斯。尽管尼基阿斯在一段时间以前就已经得知斯巴达人抵达了意大利，但由于这支斯巴达部队实力薄弱，他没有对其采取任何行动。正确的办法应当是尽快完成对叙拉古的合围；派遣一队战船去墨西拿海峡或意大利，阻止伯罗奔尼撒人通过；封锁叙拉古的两个港口，防止哪怕是一艘伯罗奔尼撒船只溜过了前一道封锁线；守卫通往爱皮波莱的道路，尤其是欧里耶鲁斯隘道，防止伯罗奔尼撒人抵达西西里岛并从陆路前往叙拉古。尼基阿斯没有做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

于是导致了灾难性后果。

雅典违反和约

在这整个时期，《尼基阿斯和约》名义上仍然有效，但低烈度的武装冲突仍在继续。斯巴达和阿尔戈斯继续袭掠和侵犯对方领土。雅典经常从皮洛斯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其他地方出发，袭击美塞尼亚，但拒绝了阿尔戈斯人提出的进攻拉科尼亚的请求。根据双方默认的对《尼基阿斯和约》的解读，这些行动不算违反和约，但如果雅典人直接进攻拉科尼亚，那就算违约了。但到前414年，雅典人再也不能拒绝盟邦提出的更积极援助他们的请求了，因为有阿尔戈斯士兵在西西里岛为雅典的事业效力，于是雅典人派遣了30艘战船，向拉科尼亚沿海的几个地方发动了海上攻击。于是，西西里远征对整个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雅典人“以最明目张胆的方式违反了与斯巴达人的和约”（6.105.1）。

与此同时，古利普斯和科林斯海军将领皮森各自指挥2艘伯罗奔尼撒战船前往西西里岛。他们以为雅典人已经完成了对叙拉古的合围，但到了意大利南部的洛克里之后，他们得知了真相，于是前去援救叙拉古。他们先驶往希麦拉，以避开雅典舰队。尼基阿斯得知伯罗奔尼撒人抵达洛克里之后，决定派遣4艘战船去拦截他们，但为时已晚。希麦拉人加入了伯罗奔尼撒远征军，为其船员提供了武器。塞利农特和杰拉提供了更多的援助。西库尔人也改换了阵营，因为他们的亲雅典国王驾崩了，而且古利普斯的热情说服了他们。古利普斯动身前往叙拉古的时候，已经手握一支有约3000名步兵和200名骑兵的部队了。

援军抵达叙拉古

更多援军已经出发。科林斯人及其盟友派出了11艘三列桨座战船。其中一艘战船在科林斯将军冈吉鲁斯的指挥下溜过了雅典人的封锁线，抵达了叙拉古。此时古利普斯还在陆路行军，尚未抵达。冈吉鲁斯来得

正是时候，因为叙拉古人正打算投降。他说服他们不要举行决定投降的公民大会，告诉他们更多船只正赶来救援，而且斯巴达人古利普斯即将前来指挥作战。毫无疑问，这个消息振奋了叙拉古人，他们决定改变计划，派遣全军去迎接斯巴达将军。

古利普斯从西面进逼爱皮波莱，通过了欧里耶鲁斯隘道，也就是雅典人走的那条路线，所以我们很难理解雅典人为什么没有派兵驻守欧里耶鲁斯隘道。古利普斯在千钧一发之际赶到了，此时雅典人即将修好他们通往大港的两道壁垒，只需要完成靠近海边的一小段即可。“通向特洛吉鲁斯和其他海中礁岩的大部分壁垒已经完工了，有些部分完成了一半，而其他部分已经竣工。叙拉古距危险只有一步之遥。”（7.2.4）

在雅典人的围城防线之外，古利普斯傲慢地提出，如果雅典人在五天之内离开西西里岛，他就同意停战。雅典人懒得理他，但叙拉古人一定对古利普斯的大胆肃然起敬。但是，不管古利普斯多么虚张声势，他的部队纪律涣散、缺乏训练。两军排兵布阵的时候，古利普斯发现己方士兵稀里糊涂、秩序混乱，若雅典人发动突然袭击就大事不妙了。如果古利普斯在这个时刻失败，斯巴达新将军的声誉就完蛋了，叙拉古人会更加灰心丧气。但是，尼基阿斯不是能够把握住机会的人。古利普斯率军撤往乡间开阔地带时，尼基阿斯放过了追击他的机会，留在原地。

次日，古利普斯发动了攻势，佯攻雅典人的壁垒，同时派遣另一支部队去爱皮波莱（雅典人在那里还没有修建好壁垒）和拉布达隆的雅典要塞。他占领了这座要塞，缴获了其中的全部物资，并杀死了所有留在那里的雅典人。尼基阿斯竟然没有派兵保护好这座要塞、补给站和金库，这实在是个可怕的错误。古利普斯继续利用尼基阿斯的另一个错误。尼基阿斯理应尽快完成包围叙拉古的防线，因为仅仅海上封锁是不足以孤立这座城市的，但他在完成爱皮波莱的北段单层壁垒（从环形要塞通往特洛吉鲁斯）之前，竟然先去建造通往大海的南段双层壁垒。虽

然在南段修建第二道壁垒能够提供更好的防护，但既然北段壁垒尚未竣工，尼基阿斯就不应当在南段投入这么多时间和人力。古利普斯开始建造自己的壁垒，切断了雅典北上通往特洛吉鲁斯的壁垒。

尼基阿斯转往普利姆米利昂

但到此时，尼基阿斯已经放弃了所有征服叙拉古的计划。他病痛缠身，并且首次遭遇英勇坚定且咄咄逼人的对手，他目前主要担心的是军队安全和撤离西西里岛。他没有及时阻止古利普斯建造壁垒并建好雅典通往特洛吉鲁斯的壁垒，反而决定在普利姆米利昂（位于大港入口以南）建造三座新要塞，作为自己新的海军基地和物资储存点，以取代拉布达隆。但普利姆米利昂这个地点有一些缺陷：水源和取暖木材离普利姆米利昂较远，因此被派去搜罗这些资源的雅典巡逻队很容易遭到叙拉古骑兵的袭击。叙拉古骑兵在宙斯神庙附近建立了一个基地，从那里袭击雅典人。“尤其是由于这些原因，从那时起，雅典船员们的处境开始恶化。”（7.4.6）

转移到普利姆米利昂也分散了尼基阿斯的兵力，这是非常危险的。爱皮波莱高地上的主力部队远离补给物资，敌人可以随时进攻普利姆米利昂的要塞，迫使爱皮波莱的主力部队不得不下来援救普利姆米利昂。尼基阿斯对他的新战术提不出有说服力的辩护，这反映了他的目标与战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为拉布达隆的丢失切断了雅典人走陆路向北撤退的路线，所以尼基阿斯将部队转往普利姆米利昂，将其作为最安全的基地，因为从那里可以走海路逃跑。直到雅典军队在普利姆米利昂安顿下来，他才派遣了20艘战船去拦截正从意大利逼近西西里岛的科林斯舰队。

与此同时，古利普斯继续建造壁垒，利用了雅典人为建造壁垒准备的石料。他定期向雅典人发起挑战，因为他深知决定战局的将是面对面交战，而不是建造壁垒的竞赛。他正确地判断出尼基阿斯不愿意卷入任

何武装冲突。雅典将军的怯战打击了雅典士兵的斗志，而鼓舞了敌人。但古利普斯为第一场交战选择的地形不利于发挥他的骑兵优势，他被打败了，因此形势转为对他极为不利。他将此次失败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并向叙拉古人保证，他们绝对不比雅典人差。他很快将亲自带领他们作战，以证明这一点。就这样，他赢得了叙拉古人的尊重和忠诚。

古利普斯的壁垒与雅典通往特洛吉鲁斯的壁垒终于相交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机遇。尼基阿斯此时必须出战，否则包围叙拉古的全部工程就会前功尽弃。此次交战发生在开阔地上，古利普斯的骑兵和标枪兵对雅典重步兵有很大优势。骑兵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将位置暴露的雅典左翼逐退，导致雅典军队普遍溃败，雅典人拼命逃到环形要塞的安全处才避免了全军覆灭。此次战役给古利普斯带来了极大的战略胜利：叙拉古人的壁垒穿透了雅典人的围城防线。

当雅典人将注意力集中在爱皮波莱高地时，科林斯舰队在爱拉辛尼德斯的指挥下安然无恙地驶入叙拉古港口。这支舰队为古利普斯增加了2000多人，有助于完成壁垒，或许还能将壁垒扩建到围绕整个爱皮波莱，将爱皮波莱的雅典人孤立在那里，切断他们与平原和北面大海之间的联系。雅典人以现有兵力包围叙拉古并以饥饿迫使其投降的全部希望被彻底粉碎了。

有才干且干劲十足的古利普斯在欧里耶鲁斯隘道建造了一座要塞，在那里部署了600名叙拉古人，以守卫通往爱皮波莱的道路，并将叙拉古人及其盟军安置在爱皮波莱高地上的三座营地内。随后他乘胜巡视了西西里岛，征募中立群体并获取盟友的帮助，这些盟友在雅典人似乎必胜无疑的时候都退缩了回去。他还派人去斯巴达和科林斯要求增援船只和兵员。尽管雅典人仍然掌握制海权，但古利普斯的胜利给了叙拉古人在海上的斗志和勇气，他们开始训练水手，准备与强大的雅典舰队交战。

尼基阿斯给雅典的信

到夏末，尼基阿斯相信雅典远征军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必须撤退或者得到大力增援。他当然更愿意撤退，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不主张发动远征，对其前景也没有信心，况且近期的局势也令人沮丧。作为三位司令中仅存的一位，他拥有雅典公民大会授予三位司令的全部权力，所以他有权下令撤退，并且雅典海军主宰大海，一定能够安全返回。

但他仍然没有放弃远征，因为如果那样做，就会给他带来耻辱，甚至更糟糕的后果。在远征西西里岛之前，尼基阿斯的履历十分光彩，获得过许多胜利，未尝败绩，但若是两手空空地撤离西西里岛，就注定会被认为是一场失败。在整个战争期间，雅典人对辜负了他们期望的将军抱有严苛的态度，就连伟大的伯里克利也曾因政策和战略的结果令民众失望而遭到羞辱和惩罚。雅典人民审判了两位经历漫长且代价高昂的围城战后终于占领波提狄亚的将军，因为他们与波提狄亚缔结的和约被公民大会认为对雅典不利。前424年缔结《杰拉和约》（雅典人此后放弃了他们的第一次西西里远征）的将军索福克勒斯、皮索多鲁斯和欧律墨冬也被判犯有受贿罪。但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这三位将军实际上是因为表现不佳而被处罚的。欧律墨冬只判处罚金，但另外两人被流放了。同一年，修昔底德自己也因安菲波利斯陷落而被放逐。

尼基阿斯确信自己返回雅典之后一定会遭到严厉批评，因为斯巴达和科林斯军队在西西里岛发挥重要作用的消息一定会让雅典人大吃一惊；他们也不大可能会相信，尼基阿斯之所以撤军，是因为他们强大的远征军陷入了险境。此次远征中许多满腹怨气的老兵一定会抱怨，尽管他们的舰队并未战败，仍然掌握制海权，而且陆军仍然完好，尼基阿斯却下令撤退。尼基阿斯的错误、延误和粗心一定会被人们知晓，进而成为讨论的主要话题。在没有得到雅典公民大会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命令撤退，尼基阿斯以毕生心血培植的声望就有毁于一旦的风险，更不要说他自己的财产甚至生命了。

于是他又一次尝试狡黠的欺骗手段。他的正式报告于前414年秋季送抵雅典，还附有一封致公民大会的信。信中讲到了雅典人遭受的挫折（但没有讨论原因），并描述了当前局势：雅典远征军已经停止攻打叙拉古，转入守势；古利普斯在招兵买马，打算海陆并进地攻击雅典人；雅典远征军的处境已经举步维艰。他没有批评自己的指挥表现，解释说由于作战时间太长和封锁战的要求，船只和水手始终待在海上，作战状态不佳。敌人不需要维持封锁线，所以可以轻松地将船只拖上岸检修保养，并训练水手。但如果雅典人放松了戒备，他们的补给线就会被切断，因为所有补给物资都必须走海路从意大利途经叙拉古运来。雅典人在西西里岛的运气发生逆转，还遭到了其他麻烦。离开营地去搜寻饮水、木柴和草料的水手常遭到敌人骑兵的攻击而丧命。奴隶、雇佣兵和志愿者纷纷逃离，因此缺乏有经验的桨手，导致雅典舰队丧失了它一贯的战术优势。尼基阿斯警告说，他们在意大利的盟友很快就会觉得叙拉古人可能得胜，进而停止为雅典舰队提供粮食，那样的话这次远征就彻底完蛋了。他强调说，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将军或部队的错。雅典人“必须允许军队撤离西西里岛，或者增援一支同样强大的军队，包括步兵和舰船，以及大量资金”（7.15）。他还以患病为由请求辞职。他坚持说，不管公民大会如何打算，都必须在西西里岛敌人变得更强大之前尽早决断。

尼基阿斯的信将形势描绘得比实际情况更糟糕。雅典人实际上仍然掌握海上优势，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很快就会缺乏补给。他将雅典人的挫败解释为命运作祟，这更不准确。形势恶劣的主要原因是尼基阿斯自己的懒散、自负和粗心。他竟放纵叙拉古从投降的边缘迅速恢复了斗志、抢夺了主动权并且看到胜利前景。他未能拦截古利普斯小得可怜的船队，让他们溜过了封锁线。他没有保护好通往爱皮波莱的道路，而且在北段壁垒尚未完工时，浪费了大量时间去建造高地以南通往海边的双道壁垒和普利姆米利昂的三座要塞。他没有保护好拉布达隆的补给

站和金库，导致被敌人占领。他未能阻止科林斯舰队抵达叙拉古，还将自己的舰队转移到了普利姆米利昂无险可守的位置。雅典海军状态不佳不是不可避免的，是尼基阿斯的疏忽造成的：他完全可以在古利普斯抵达之前的几个月里将船只轮流拖上岸干燥保养。即便真的有雅典水手死亡和逃离，也是因为他们的船只被部署在普利姆米利昂这个糟糕地点。

尼基阿斯这封言辞乏力、自我辩解但欲盖弥彰的信的真实目的在于劝说公民大会下令远征军撤退。如果公民大会拒绝做这个决定，他也希望自己能够体面地辞职，由他人接替。如果他诚实地承认胜利的希望极其渺茫，那么雅典人或许会同意撤军。如果他仅仅解释说自己身体太糟糕，无法胜任，那么雅典人或许会将他召回，另择身体健康的将军去指挥作战。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反而给了雅典人两个选项。他过于关心自己的名誉和利益，于是要求雅典人要么按照他的建议撤军，要么派遣第二支远征军，并且要和第一支同样强大。尼基阿斯似乎在故伎重演，当初他为了阻止远征就用了类似的伎俩，误以为雅典人会不愿意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尼基阿斯显然没有从经验中吸取教训。

雅典人的回应

雅典人又一次与尼基阿斯的期望背道而驰，投票决定派遣第二支舰队和陆军，同时不准他辞职。他们还临时指派米南德和欧西德莫斯（他们此时已经在叙拉古前线）为尼基阿斯的同僚将军。第二支远征军的指挥官是德摩斯梯尼（斯法克特里亚岛战役的英雄）和欧律墨冬（他曾在前427～前424年指挥远征西西里岛的雅典军队）。这两人与尼基阿斯会师后将与他共同承担指挥责任。欧律墨冬率领10艘战船，携带120塔兰同白银立即动身前往西西里岛，并带去振奋人心的消息：德摩斯梯尼将率领更多部队随后赶到。

雅典人的这个决定只能让人惊愕。原先主张远征的人做出的承诺和期望大多被事实证明是没有根据的，而反对远征的人提出的意见则被证

明是有道理的。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并没有欢呼雀跃地大批加入雅典阵营，伯罗奔尼撒人已经插手西西里岛战事，叙拉古人则士气大振并坚持抵抗。我们或许会期待雅典人应当已经觉得自己上了乐观者的当，应当认同那些质疑远征人士的智慧，并召回远征军及其悲观而疾病缠身的司令。

大多数历史学家同意修昔底德的意见，认为西西里岛战役之所以持续下去，是由于雅典直接民主制政权的贪婪、无知和愚蠢。历史学家常常认为雅典民主政权反复无常且优柔寡断，但雅典人这一次的表现却恰恰相反。尽管遇到了挫折和失望，他们仍然打算将已经开头的事情做到底，表现出了坚韧和决心。事实上，不仅是民主制国家，任何政体的强国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强国在预计敌人虚弱且不堪一击，却出乎意料地被弱国挫败时，往往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它们可能认为撤退会损害自己的威望，会让世人质疑它们的力量和决心，进而会威胁它们的安全。对类似西西里岛战役这般冒险的支持一般会维持很强的力度，直到胜利的希望彻底消失。

但雅典人为什么坚持让患病且灰心丧气的尼基阿斯继续指挥战斗？原因可能是雅典人对这位将军抱有独特的尊重。这种尊重不是对伯里克利的非凡想象力和雄辩天才的敬畏，伯里克利的聪明才智似乎总是能够设计出一个计划或者构建一种计谋，来应对任何挑战，然后非常有说服力地向群众解释。雅典人民在尼基阿斯身上看重的是他的性格、生活方式，以及始终与他相伴的成功和好运气。他非常有代表性的特点是，他努力效仿传统贵族政治家的尊贵仪态，但没有贵族令人生厌的傲慢。“他的尊严不是严峻而令人讨厌的那种，而是混合了一定程度的审慎；他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因为他似乎畏惧他们。”奇怪的是，他拙劣的辩论技能却为他赢得了群众的同情：“在政治生活中，他的怯懦……甚至使他像是一位广受爱戴的民主派人士。”（Plutarch，*Nicias* 2.3-4）

他曾在科林斯附近打赢了一场战役。战后，他发现自己没有注意到两名雅典士兵的遗体，未能将他们埋葬。请求敌人允许自己安葬死者是承认失败的象征，但尼基阿斯还是回去向敌人提出请求，而不是让己方将士的遗体无人照管，因为那将是渎神的恶行。普鲁塔克说：“他宁愿放弃胜利的荣耀与光辉，也不愿意让两名公民暴尸荒野。”（*Nicias* 6.4）普鲁塔克批评尼基阿斯总是非常小心地选择耗时最短、最轻松、最容易成功和最安全的任务，他的这个批评或许是正确的，但雅典人只记得尼基阿斯从来没有战败过，他的合唱队在狄俄倪索斯节的戏剧竞赛中也不曾失败。甚至他的名字（Nicias）也与希腊语中的“胜利”（nike）有关联。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在亵渎秘仪和破坏赫耳墨斯神像的渎神罪行发生不到两年之后，雅典人不肯让最受诸神恩宠的人离职，他就是雅典人的胜利吉祥物。他生病了，也会痊愈；在此期间，健康而活力充沛的同僚可以协助他。他凭借原先的远征军已经几乎成功占领了叙拉古；有了增援部队和精明强干的同僚之后，他的本领和好运气一定能够帮助他很快取胜。

第二十四章 围城者被围（前**414**～前**413**年）

斯巴达发动攻势

在雅典人被西西里岛事务缠身的同时，斯巴达人正在准备结束令人神经紧绷的虚假和平。当前局势中两个重大的实际变化促使他们继续开展战争，入侵阿提卡，并在雅典本土建造一座永久性要塞。第一个实际变化是西西里岛战略平衡的变化，雅典人此时已经快要输给叙拉古人了。雅典人没有立即让他们的大舰队撤退，以便回国作战，反而向西西里岛战役投入了更多资源和力量。第二个关键事件是雅典人决定向斯巴达领土发动报复性袭击。近段时间以来，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周边发动了许多袭击，但他们一直避免进攻拉科尼亚本土。斯巴达人没有将这些恼人的袭击视为违反和约，但在前414年夏季，雅典人攻击了拉科尼亚沿海地区，极大地改变了局势。他们的这些行动“以最明目张胆的方式违反了与斯巴达人的和约”（6.105.1），并帮助斯巴达人摆脱了自战争爆发以来一直纠缠着他们的内疚。斯巴达人深知，战争的导火索是他们的盟友底比斯人违反停战协定并进攻普拉蒂亚，斯巴达人在前432～前431年拒绝接受仲裁也是不对的，而且他们还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违反了《三十年和约》。“由于这些原因，他们相信自己遇到厄运也是活该，这厄运指的是他们在皮洛斯遭遇的灾难和其他灾祸。”（7.18.2）

但如今是雅典人违反了和约，背弃了誓言。前几年，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与盟友并肩作战时，斯巴达人请求以仲裁解决纠纷，是雅典人悍然拒绝。“因此，在这个时候，斯巴达人觉得虽然之前是他们自己违反了和约，但如今罪责在雅典人那边，所以他们热切希望开战。”（7.18.3）

狄凯里亚的要塞

前413年3月，阿基斯二世国王率军蹂躏了阿提卡，此时他还开始在狄凯里亚镇（位于雅典东北约14英里处，距玻俄提亚差不多也有14英里）附近居高临下的山丘上设防和驻军。此举对雅典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斯巴达人之前的历次入侵均不超过四十天，最短的一次仅有十五天。但自此之后，雅典城与城外房舍和农田就被完全隔断了。“雅典不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座驻军要塞。”（7.28.1）不分昼夜，各个年龄层的士兵轮流站岗，警戒斯巴达人的进攻。这种高度戒备状态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不分寒暑。每天都有雅典骑兵出击遏制斯巴达人，这使雅典人困马乏。雅典需要骑兵保卫城市，因此无法向急需骑兵的西西里岛前线投入骑兵。

在多个方面，斯巴达人占领狄凯里亚的行动与雅典人占领皮洛斯颇有相似之处。例如，在斯巴达人占领狄凯里亚后的第一年，有约2万名奴隶从雅典逃亡，其中很多人是从劳里昂银矿逃走的，因此雅典人也丧失了这些银矿的收入。此外，牛群和役畜也被伯罗奔尼撒军队掳走。底比斯人与斯巴达人一同袭掠阿提卡。底比斯是斯巴达所有盟友中最擅长抓住机会也最热衷于掠夺雅典财产的一个。前4世纪的一位史学家告诉我们，底比斯人“以低价收购了战俘和所有其他战利品，而且因为他们居住在邻国，所以也将阿提卡的建筑材料，包括房屋的木料和砖瓦等，全都运到了自己国内”（*Hellenica Oxyrhynchia* 12.4）。

在狄凯里亚驻防的斯巴达人还封锁了途经奥罗浦斯去往优卑亚岛的陆路通道。自战争爆发以来，雅典的大多数牲畜都被赶到优卑亚岛放牧，雅典人还从优卑亚岛获得了一些关键的补给物资，此外优卑亚岛还是某些出口商品的重要集散地。狄凯里亚被占领后，雅典人不得不依靠较远的绕过苏尼昂海岬的海路接收和输送物资，这条路线的运输成本较高。这一切都对雅典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资金短缺引发了整个战争期间最恐怖的一起暴行。雅典人在为西西

里岛前线集结增援部队时，从色雷斯雇用了一些专业的轻装部队。但1300名手执刀剑的蛮族士兵抵达雅典的时候，为时已晚，无法参加西西里岛作战。为了节约金钱，雅典人让他们回国，并派遣一个名叫狄爱特雷菲斯的雅典指挥官担任他们的向导。狄爱特雷菲斯得到的命令是，利用这些部队在沿途尽可能地给敌人造成破坏。一天黎明，他们攻击了玻俄提亚的小镇米卡列苏斯，此地的居民手无寸铁。“色雷斯人冲进米卡列苏斯，洗劫了那里的房屋和神庙，屠戮那里的居民，不分老少，见人就杀，连妇孺也不放过，甚至杀死了牲畜，凡是活的东西都被他们杀掉了。”（7.29.4）他们还袭击了一所男童学校：“孩子们刚刚进来，他们就将孩子们全部杀死。”（7.29.5）

双方的增援部队

在雅典人准备加强西西里岛军力的同时，古利普斯的成功也说服了伯罗奔尼撒人向西西里岛派遣更多部队。他们打算派去三支队伍。第一支由600名黑劳士和解放黑劳士组成，指挥官是斯巴达将军爱克里图斯。第二支包括300名玻俄提亚人，由他们自己的将军指挥，将从南方的泰纳鲁姆海岬[1]出发，一同渡海。第三支部队是700名重步兵，由科林斯人、西锡安人和阿卡狄亚雇佣兵组成，将渡过科林斯湾，从纳夫帕克托斯的雅典基地经过，由25艘科林斯三列桨座战船护航。

与此同时，在雅典，欧律墨冬带着资金和一支小部队出发了，而德摩斯梯尼则在准备增援部队的主力。前413年初春，两支舰队分别在卡里克利斯和德摩斯梯尼的领导下从比雷埃夫斯起航；他们没有直接驶向西西里岛，而是在阿尔戈斯人的配合下攻击了拉科尼亚。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基西拉岛对岸的一个海角，他们在那里登陆，并在地峡处建造了防御工事。这个基地将承担皮洛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扮演的角色，即接纳逃亡黑劳士的庇护所和袭掠拉科尼亚的出发阵地。但这个新基地离美塞尼亚太远，所以吸引不到多少逃亡黑劳士，而雅典人从未从那里发起过攻击，于是他们在次年放弃了这个基地。

卡里克利斯返回了雅典，但德摩斯梯尼沿着海岸航行去往西西里岛，给科林斯人制造了一些麻烦，并在沿途招兵买马。在阿卡纳尼亚，德摩斯梯尼遇见了欧律墨冬，后者告诉他雅典人受挫，需要尽快派去增援部队。但在他们起航之前，在纳夫帕克托斯的雅典海军将领科农来了，他抱怨称自己手里只有18艘三列桨座战船，因此没办法与科林斯25艘战船的护航舰队对抗。科农后来证明自己是希腊最伟大的海军将领之一，所以他此刻的犹豫说明纳夫帕克托斯船只的水手和桨手素质不高，因为最优秀的人员已经被送往西西里岛了，或者在赶往西西里岛的援军当中。为了帮助科农，德摩斯梯尼和欧律墨冬将自己最好的船只留给了他，然后匆匆赶往西西里岛。

普利姆米利昂陷落

尽管古利普斯赢得了一系列重要胜利，但一支新的雅典大军在西西里岛登陆还是很可能让他的成绩付之东流。叙拉古人已经承担着多达7000名外籍士兵的军饷，因此缺乏资金，而雅典人的封锁虽不严密，却也成功掐断了叙拉古公民的财源，并阻断了为叙拉古国库提供重要关税收入的贸易。此外，建造、装配战船并配备人员的开支对叙拉古人来说也是额外的负担，因为没有海外殖民地为其提供维持舰队的资金，而且他们的盟友也拿不出钱来。因此，雅典增援部队的到来很可能促使叙拉古人又一次开始考虑投降。

于是，古利普斯迅速开始打击雅典人最薄弱的环节，即普利姆米利昂。他计划发动一次海上佯攻，以掩护针对敌人基地的陆地攻势。要让叙拉古人去对抗令人生畏的雅典海军（虽然仅仅是为了调虎离山），古利普斯需要仰仗赫莫克拉提斯的帮助。赫莫克拉提斯已经不再担任公职，但仍然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赫莫克拉提斯的雄辩说服了叙拉古人，他们热情地登船准备作战。在夜色的掩护下，古利普斯率军开往普利姆米利昂。与此同时，80艘叙拉古三列桨座战船从海上逼近普利姆米

利昂的不同地点。

雅典舰队迅速做出反应，投入了60艘三列桨座战船，虽然数量不如敌人，但仍然与敌人打得难解难分。然而，陆地上的局势就不同了。因为雅典陆军不知道敌人在逼近，只是在岸上观看海战。破晓时分，古利普斯攻击了防守松懈的三座雅典要塞，将其全部占领，尽管有许多雅典士兵逃之夭夭。与此同时，雅典海军的优势体现了出来，叙拉古战船误击了友军，“将胜利拱手让给雅典人”（7.23.3）。雅典人击沉了11艘敌船，自己仅损失3艘，夺回了制海权。但他们蒙受了不少伤亡，而且他们在要塞内的粮食和海军补给物资（40艘三列桨座战船的船帆和索具，以及3艘停放在岸上的三列桨座战船）全被敌人缴获了。对雅典人来说，普利姆米利昂失陷在战略上的代价甚至更为沉重。雅典人再也不能获取补给物资，“普利姆米利昂的失陷令雅典军队惊慌失措、灰心丧气”（7.24.3）。

叙拉古人将自己的胜利喜讯送到他们的伯罗奔尼撒朋友那里，请求他们加强对雅典的作战，并派遣一支舰队到意大利，以切断雅典的补给线。他们还在西西里全岛宣扬了普利姆米利昂的陷落，并利用来自科林斯、斯巴达和安布拉基亚的使者来增强宣传的公信力。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极大成功，因为“几乎整个西西里岛……那些之前旁观的人，现在都加入他们，前来支持他们，共同反对雅典人”（7.33.1-2）。

大港的战斗

叙拉古人征募了一支由西西里岛希腊人组成的军队，去讨伐在叙拉古的雅典人。但他们没走多远就遭到了尼基阿斯的伏击，于是叙拉古人抢在雅典增援部队抵达之前从陆路袭击雅典人的希望破灭了。因此，叙拉古人需要在海上取得一场胜利。科林斯湾最近传来的消息增加了他们成功的希望。此时在纳夫帕克托斯的雅典人指挥官狄菲卢斯拥有33艘战船，而科林斯指挥官波利安提斯掌握着30艘。为了克服雅典人在经验和

训练上的一贯优势，波利安提斯对他的三列桨座战船做了一个小而重要的修改，以便运用新战术。他在每艘三列桨座战船的船首安装了一块横木，从船首两侧突出，就像现代帆船上的吊锚架，可以从那里将船锚抛出去。在三列桨座战船上，吊锚架是舷外撑架的终端，舷外撑架被固定在船两侧的舷缘，而顶层桨手的木桨基座就固定在舷缘上。

在一般的海战中，三列桨座战船会避免迎头撞击对方，因为那样虽然能击伤敌船，但自己也会受损，己方未必能占到便宜。波利安提斯极大地加固了他的吊锚架，所以当雅典战船冲上来的时候，他的加固吊锚架能够击碎较为脆弱的雅典吊锚架，并将连接在己方吊锚架上的舷外撑架带出去，严重击伤雅典船只。在这场海战中，3艘科林斯船只沉没，7艘雅典船只被波利安提斯的新战术打得丧失战斗力。这场战斗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双方都建立了胜利纪念碑，但战略胜利属于伯罗奔尼撒人。雅典人未能歼灭敌军舰队，也未能彻底消灭敌军为西进商船和运兵船护航的能力。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伯罗奔尼撒舰队与占据数量优势的雅典舰队对抗，最后打了个平手。如果在开阔的外海，并且雅典人有所防备的话，科林斯人的新战术未必能奏效。但在狭窄海域，而且雅典人毫无防备，于是新战术取得了成功。

科林斯湾的胜利鼓舞了叙拉古人，他们决定再一次挑战雅典舰队，这是一次复杂的海陆并进攻势的一部分。叙拉古战船也使用了加粗加厚的吊锚架，并在船内外都以梁木支撑。在叙拉古港口的狭窄空间里，雅典人既没有办法轻松突破叙拉古舰队的战线，也没有办法绕过它，所以叙拉古人的战术（用沉重的横梁撞击雅典船只较轻的木梁）应当能够取得成功。叙拉古人控制着大港周围的陆地（除了雅典要塞之间的一小段海岸线以及奥提伽岛[2]和普利姆米利昂之外），所以他们也控制着通往大港的道路（见地图22）。正因如此，雅典人若是在那里落败，很可能就会大难临头，因为败退的船只无法靠岸，也无法从海路逃跑。雅典人此时已经得知伯罗奔尼撒人在科林斯湾迎头猛撞战术的功效，但他们对

自己的海军优势十分自信，而且非常鄙视敌人的无能。因此，他们判断这种新战术不是敌人精心筹划的结果，只是偶然的无心之举，是素质低劣的伯罗奔尼撒舵手造成的。

在攻势的陆战方面，古利普斯率军进逼面向叙拉古城的雅典壁垒，而驻扎在宙斯神庙的叙拉古部队，包括重步兵、骑兵和轻装部队，则从相反方向逼近雅典壁垒。雅典人将注意力全部集中于防御壁垒，对叙拉古舰队的逼近毫无防备。有些雅典人奔向一段壁垒，有的冲向另一段，还有的匆匆赶往战船。他们最后成功投入了75艘战船，应付前来挑战的80艘敌船。第一天的战斗相持不下。次日没有发生交战，于是尼基阿斯利用这个间歇准备抵御新的进攻。雅典人在距岸边一段距离的水中建造了木栅，插在水底沙子当中，用来保护被拖到岸上的船只。为了更好地保护撤出战斗的船只，尼基阿斯在木栅的每一个入口前停放了一艘商船，间隔200码。每艘商船载有一台吊车，其荷重物是沉重的金属块，形状像海豚。吊车可以将“海豚”投掷到追击过来的敌船上，将其击沉或使其丧失战斗力。

第三天，叙拉古人发动了进攻，这又演变成一场漫长的小规模冲突，直到最后叙拉古人撤退、上岸休息和用餐。商贩在岸上设立了食品市场，招待饥肠辘辘的水手。雅典人同样也上了岸，相信这一天的战斗应当是结束了。不料在雅典人吃饭的时候，叙拉古人突然又发动了一次袭击。疲惫、饥饿且措手不及的雅典人差点没能驾船出海。雅典指挥官确信，长期在海上机动和作战的压力将很快拖垮他们的水手，使其无力对抗养精蓄锐的叙拉古人。但在狭窄海域一字排开的敌军战船面前逃跑非常困难，也不安全。何况，雅典海军将领从来没有在遇到与己方兵力相当的敌人时拒绝应战，于是他们下令立即进攻。

叙拉古人使用了迎头猛击的战术和一些新招数。他们在甲板上载满了标枪兵，杀伤了许多雅典桨手。载着更多标枪兵的小船划到雅典三列

桨座战船的桨座下方，杀死了更多桨手。这种不循常规的战术再加上双方水手身体状态的差距，使叙拉古人赢得了胜利。雅典人逃到商船和木栅之后的安全地带，才避免了灾祸。两艘追击得过于鲁莽和凶猛的叙拉古战船被“海豚”摧毁了。雅典人有7艘战船沉没，很多船只受损；许多雅典水手阵亡，还有很多人被俘。叙拉古人控制了大港，建立了胜利纪念碑。他们现在相信自己的海军实力已经超过了雅典人，很快在陆地上也能打败他们。于是叙拉古人开始为海陆两路攻势做准备。

第二支雅典舰队：德摩斯梯尼的计划

但是，叙拉古人没能高兴多久。因为大港战役过后不久，雅典的增援部队就在德摩斯梯尼和欧律墨冬的指挥下抵达了，军容十分威严齐整，这既有军事上的目的，也有心理意义。这支增援舰队“装饰布置得十分华丽壮美，武器的装点和三列桨座战船的旌旗……或许能震慑敌人”（Plutarch，*Nicias* 21.1）。这支舰队的规模和第一批远征军差不多，包括73艘战船，近5000名重步兵，数量众多的标枪兵、投石手和弓箭手，以及为所有部队准备的补给物资。尽管斯巴达人在狄凯里亚要塞控制了阿提卡，雅典人还是派出了如此雄壮的增援部队，令叙拉古人震惊和胆寒，他们不知道自己城市的危险到何时才是头。

德摩斯梯尼对目前为止雅典人在西西里岛的行动做了研究，结论是只需一次突袭和围攻便能迫使叙拉古人在向伯罗奔尼撒半岛求援之前投降。他思路清晰、勇敢无畏，计划立刻弥补之前的错误。“他知道此时敌人最怕他，于是希望尽快利用敌人当前的恐慌”，立刻发动进攻（7.42.3）。

他坚信自己的舰队可以从海上封锁叙拉古城。最关键的任务是占领爱皮波莱高地上的叙拉古壁垒，正是这道壁垒使雅典人无法从陆路合围叙拉古城。虽然通往爱皮波莱的道路由令人生畏的斯巴达将军古利普斯把守，德摩斯梯尼仍然打算冒这个险，因为即便失败也比白白浪费雅典

的资源和拿官兵的安全冒险要强。如果他能占领爱皮波莱，就能击败叙拉古，并有很大的胜算去控制西西里岛。即使他失败了，也可以率领远征军返航，来日再战。不管此役胜负，西西里岛战事都将结束，雅典远征军将大体完好地回国。

夜袭爱皮波莱

德摩斯梯尼对爱皮波莱高地上叙拉古壁垒的第一次正面进攻失败了，这表明白天的任何进攻都必然失败。他不受失败影响，依然头脑灵活，筹划了一次大胆的夜袭。8月初，他率领约1万名重步兵和相同数量的轻装部队，在月亮升起之前的夜色掩护下，来到欧里耶鲁斯隘口，也就是高地西端。他们打得叙拉古驻军措手不及，占领了他们的要塞。逃脱的叙拉古士兵将消息传播出去：雅典人大举出动，到了高地上。但是，最先赶来救援的叙拉古精锐部队被迅速击溃。现在雅典人快速推进，扩大战果。先头部队开辟道路，第二支部队则快速奔向敌人的壁垒。守卫壁垒的叙拉古人抱头鼠窜，雅典人最终占领了壁垒，并将其部分拆毁。

古利普斯及其部队都被雅典人大胆而出其不意的战术惊呆了。他们尝试阻挡横冲直撞的雅典人，却被击退。雅典人继续在爱皮波莱高地上东进。雅典人过于急切地想要利用敌人的措手不及，不料自己的秩序却混乱起来，最后被一支玻俄提亚重步兵部队击溃了。这是整个战役的转折点，因为在一支雅典部队向西逃跑之后，全军都开始混乱起来。在昏暗的月光下，雅典人无法辨认向自己跑来的是敌是友。雪上加霜的是，将军们似乎没有在隘口安排任何人去指挥交通。不同的连队来到高地之后，发现有的雅典部队不受阻挡地向东猛冲，有的士兵则向欧里耶鲁斯方向败退，还有些人刚刚从隘口上到高地，没有开始行动。没有人告诉那些刚刚抵达高地的人，他们应当加入哪个群体。

叙拉古人高声呐喊和欢呼，更增添了混乱。叙拉古人渐渐感到胜利

将属于他们，于是和盟友们（也属于多利亚部族）按照多利亚人的风俗，开始吟唱赞歌。从黑暗中呼啸而出的战斗口号令雅典人毛骨悚然。尽管雅典部队主要是伊奥尼亚人，但也包括重要的多利亚人队伍，如阿尔戈斯人和克基拉人；这些人也开始唱自己的赞歌，与敌人的赞歌无法区分，于是雅典人愈发恐惧，因此也更难辨敌友。“最后，他们陷入混乱，在战场的许多地方发生了误击友军的事情，朋友之间互相厮杀，公民同胞之间互相打斗；他们不仅张皇失措，甚至互相扭打起来，费了不少力气才分开。”（7.44.7）

雅典方面没有一个人像叙拉古人那样熟悉高地的地形地貌，那些最近才在德摩斯梯尼和欧律墨冬的指挥下抵达西西里岛的人对高地更是一无所知。在黑暗中，胜利变成了失败，前进变成了撤退，撤退变成了溃散。对地形的无知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很多雅典士兵在逃跑时跳下了悬崖，粉身碎骨，且一定有很多人是意外坠落的。尼基阿斯部队的士兵较有经验，最终逃回了营地的安全处，但增援部队的新人则四处游荡，直到天亮后叙拉古骑兵将他们全部猎杀。此役是雅典人目前为止遭受的最严重灾难：2000～2500人死亡。在叙拉古迅速取胜的希望破灭了。

撤退还是坚持？

为了攻打雅典人的要塞以获得最终胜利，春风得意的叙拉古人开始征募更多的西西里岛盟军。雅典人的士气则愈发低落。除了因为战败而沮丧之外，他们的营地位于沼泽地带，在西西里岛夏末暴发了疟疾和痢疾，使他们的精神更加委顿。“在他们看来，形势已经无比绝望。”（7.47.2）德摩斯梯尼主张趁着雅典人还掌握海军优势，尽快返航。“他说对雅典而言，打击已经在雅典领土建造要塞的敌人比打击叙拉古更有用，因为雅典再也不能轻松地制服叙拉古，而且继续攻城要消耗大量金钱，那也是无谓的。”（7.47.4）这是明智的建议，因为形势已经清楚地表明雅典人没有办法攻克爱皮波莱高地上的叙拉古壁垒，攻城也没有胜算，也不会有更多的增援部队。现在有必要止损，在令人失望

的失败蜕变成灾难之前脱身。

尼基阿斯却不同意，这一定让德摩斯梯尼大吃一惊。尼基阿斯知道雅典人的处境不妙，但他自己还没有拿定主意，还不愿意坚决地选择撤退，因为他担心敌人在得知情况后会切断雅典人的退路。他还从自己的私人渠道获悉，敌人的处境或许比雅典人更艰难，因为掌握优势的雅典舰队仍然能够阻止敌人从海上向叙拉古输送补给物资。最让他心怀希望的是，据说叙拉古城内有一个群体仍然在鼓吹向雅典投降。尼基阿斯与这个群体有联系，他们持续敦促他坚持作战。

但这两个理由都不是很有说服力。即便海路被切断了，叙拉古还能从陆路获取补给物资，而希望叙拉古内奸与雅典里应外合更是异想天开。那些想要投降的叙拉古人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持，而且在叙拉古近期的胜利之后，这些人不大可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冈吉鲁斯和古利普斯的抵达已经终结了叙拉古投降的可能性。

在雅典将军们的辩论中，尼基阿斯克服了自己的踌躇不决，坚持留在西西里岛继续作战。他的论述旨在反驳德摩斯梯尼提出的强有力的经济考虑。尼基阿斯坚持认为，叙拉古人的处境比雅典人更糟糕；海军军费和数量众多的雇佣兵已经让叙拉古人耗费了2000塔兰同，他们不得不去借钱；为了给雇佣军支付军饷，他们的资金很快就会耗尽。

叙拉古人的确囊中羞涩，但他们的胜利一定能够使他们变得更值得信赖，让盟友和其他人愿意借钱给他们，帮助他们取得全胜。而且他们在本土拥有资金来源，在当前的紧急情况下可以增收税款。除非从海陆两路将叙拉古彻底封锁起来，否则它能够无限期地坚守下去，但雅典人已经没有机会将城市包围起来了。

尼基阿斯在演讲的剩余部分揭示了他的真实动机：他害怕回到雅典之后，他的士兵会转而反对他，让公民大会相信失败的责任全在他一人

身上。士兵们会抱怨“他们的将军收了敌人的贿赂，背叛了官兵，不得不下令撤退。无论如何，他自己熟知雅典人的秉性，不愿意被雅典人以可耻的罪名处决。如果形势急迫，他更愿意冒险赌一把，死在敌人手里”（7.48.4）。

尽管德摩斯梯尼和欧律墨冬反对尼基阿斯继续留在西西里岛的意见，但米南德和欧西德莫斯（被选出来辅佐患病的尼基阿斯的两位军官）支持他们德高望重的司令，于是以多数票击败了德摩斯梯尼和欧律墨冬。在米南德和欧西德莫斯的支持下，尼基阿斯还驳回了德摩斯梯尼和欧律墨冬提出的妥协方案，即让雅典人至少撤离叙拉古城外的沼泽地，到萨普苏斯或卡塔那附近更卫生、更安全的地方扎营。从那里袭击西西里乡村，就地取食；离开叙拉古港口之后，他们还可以在开阔海域作战，那样的话叙拉古人的新战术就会失效，雅典人更丰富的海战技能和经验将给他们带来优势。尼基阿斯之所以拒绝这个提议，可能是因为他害怕一旦军队登船离开叙拉古港口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把雅典人留在西西里岛了。

与此同时，古利普斯征募了一大群西西里人，并且得到了一支增援部队。这支增援部队包括600名伯罗奔尼撒重步兵、黑劳士和解放黑劳士。他们先前因为风暴而受阻，如今抵达了西西里岛，可以参加再次攻击雅典人的行动了。沼泽引发的疾病继续削减雅典军队的人数，消磨他们的斗志。尼基阿斯的态度也软化了，终于同意撤退。他唯一的要求是不举行公开投票以决定撤退，因为那样可能会走漏风声，让敌人知晓。雅典人逃生的道路此时仍然是敞开的。然而就在这时，命运、诸神或者偶然，干预了局势。

月食

前413年8月27日夜间9：41～10：30，发生了月全食。迷信的雅典人吓得魂飞魄散，士兵们认为这是神祇在警告他们，不要立刻起航。尼

基阿斯咨询了一名占卜师，他建议雅典人等待“三九二十七天”再离开。但即便是轻信的人，对月食也可以做出不同的阐释。前3世纪的历史学家斐洛考鲁斯也是一位预言家，他给出的解释就截然不同：“这个迹象对正在逃跑的人并非不吉，恰恰相反是大吉大利；因为恐惧时的行动需要隐秘，而光亮是隐秘行动的敌人。”（Plutarch，*Nicias* 23.8）指挥官若是希望逃跑，大可以设计和利用这种阐释，进而产生很好的效果。但是，尼基阿斯毫不质疑地接受了占卜师的说法，坚信这个征兆是不吉利的，众神要插手证实他的判断。他“拒绝继续讨论撤军事宜，而要按照占卜师的建议，先等三九二十七天”（7.50.4）。

雅典人的辩论和留在西西里岛的决定还是被泄露了。雅典逃兵告诉叙拉古人，雅典人正在计划起航回国，但因为月食耽搁了下来。为了阻止他们逃跑，叙拉古人决定立刻在叙拉古港口内迫使敌人再打一场海战。在雅典人耐心地遵从占卜师的指示等候之时，叙拉古人正在操练海军将士。不过他们的第一次攻击是在陆地上，他们从城内发起的突击将一队雅典重步兵和骑兵诱骗出了营地大门，进而将其击溃，迫使其撤退。主攻在次日发起。在叙拉古陆军攻击雅典要塞的同时，叙拉古海军派遣了76艘三列桨座战船去攻打雅典人的基地，雅典人派出了86艘战船迎战。

雅典人拥有数量优势，欧律墨冬的右翼战线比叙拉古的左翼要长，于是他下令机动包围敌人。他开始南下，奔向达斯孔外海的海湾，但似乎离岸边太近，无法全速前进。他还没来得及绕过敌军战线的一端，叙拉古人就突破了米南德指挥的雅典舰队中路战线。此时，科林斯海军将领皮森决定不追击在自己面前逃跑的雅典战船，而是向南加入对欧律墨冬的攻击。叙拉古人迫使雅典右翼退到岸边，摧毁了7艘战船，并杀死了欧律墨冬。这是此役的转折点，整个雅典舰队被击溃并向岸边败退，很多逃下船的人被困在己方防御栅栏之外，远离自己的壁垒保护范围。逃窜的雅典人将船停靠在岸边或者游上岸，遭到古利普斯的屠杀。叙拉

古战船则将被抛弃的雅典三列桨座战船拖走。古利普斯部队企图攻克雅典营地时，遭到了雅典的伊特鲁里亚盟军出其不意的打击。伊特鲁里亚盟军得到雅典人的支援，成功地保住了大多数船只。即便如此，雅典人也损失了18艘三列桨座战船，船员全部遇难。

叙拉古人建立了纪念碑，宣扬自己在陆地和海洋的胜利。雅典人也建立了胜利纪念碑，纪念自己在海墙处成功击退古利普斯，但这是个可悲的姿态。雅典军队虽然得到了强大的增援部队，却仍然在陆地和海洋遭到重大失败。修昔底德相信雅典人犯了两个主要错误：他们不仅低估了叙拉古战船和骑兵的力量，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叙拉古是一个民主制国家，雅典很难打破叙拉古人的团结一致。如果要将雅典远征军的困境归咎于雅典公民大会（它投票决定派出庞大的远征军，后来又派出强大的增援部队），那就不太公平了，因为它的两次决定都是听从了尼基阿斯的建议。如果将雅典人的第二个错误归咎于公民大会，那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公民大会曾寄希望于叙拉古发生革命或有内奸拱手将城池交给雅典人。只有尼基阿斯一个人抱有这样的想法，他未能及时封锁城市，而在与叙拉古内奸里应外合的希望破灭之后还对此痴痴幻想，因此给雅典人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灾难。他们终于明白胜利是不可能的了。“即便此前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也不曾想到自己的舰队居然也会战败。在此之后，他们就更迷惘了。”（7.55.2）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逃跑。

---

[1] 今称马塔潘角，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本土的最南端。

[2] 奥提伽岛是叙拉古的一个岛屿，又称为叙拉古老城，有许多历史建筑，尤其是精美的巴洛克建筑。奥提伽岛位于叙拉古的东端，由一条狭窄的水道与城市分开。荷马史诗在说到提洛的阿波罗时，说女神勒托停留在奥提伽岛，先生下了阿耳忒弥斯，然后阿耳忒弥斯帮助勒托穿过海洋，到达提洛岛，勒托在那里生下了阿波罗。

第二十五章 战败与毁灭（前**413**年）

叙拉古人在港口取得的惊人胜利鼓舞了他们的斗志，他们决心不仅要保障自己城市的安全，还要彻底消灭雅典远征军，并解放所有被雅典统治的希腊人。他们相信这样的丰功伟业将给他们的城市带来荣耀和美誉："世界上其他人会无比仰慕他们，甚至后世也将敬仰他们。"（7.56.2）于是，他们开始将三列桨座战船和其他船只停泊在大港入口，将雅典舰队围堵在港内，并在己方船只上铺设木板，然后用铁链将船只锁起来。而雅典远征军要想逃回雅典，就需要他们自己的船只；唯一可行的逃跑路线是海路，所以雅典人决定努力从港口突围，不管这个任务有多么艰巨。

最后的海战

此时，准备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奋力一搏的雅典舰队早已不是那支从比雷埃夫斯起航、仿佛去参加划船比赛的威武之师了，而变成一支凌乱涣散的队伍，看上去非常老式，船上装载了许多重步兵、标枪兵和弓箭手，打算用老旧的作战方式（依赖投射武器、用铁钩子抓住敌船和近距离肉搏战），而不是那种令雅典称霸四海的撞击战术。为了应付敌人用加强吊锚架迎头冲撞的战术，雅典人发明了"铁手"（抓钩）用来抓住正在攻击的敌船，使其撞击雅典船只的船首后无法后退。这样缠住敌船之后，雅典的许多步兵就可以在港口的封闭海域里占上风，而在这样的环境里，精妙的海战策略是没有用武之地的。但又有逃兵向敌人泄露了雅典人的策略，于是叙拉古人在船首和船体上方铺设了兽皮，使雅典人的抓钩不能发挥作用。

尼基阿斯负责指挥陆地部队，但他在向全军做了战前动员之后，又搭乘一艘小船，穿过雅典舰队，在每一艘三列桨座战船前停下，指名道

姓地向每一位船长讲话，呼唤对方的名字、他父亲的名字和他所在部落的名字，并感召人们古老的家族观念。尼基阿斯讲完话之后，提醒大家是他们的家园为公民提供了自由；尼基阿斯并没有讲得特别高尚，而是“人们在每一个类似场合，用大体上相同的语言说到的东西，关于他们的妻儿和祖先神祇。但由于当前局势危急，这些话应当会有用”（7.69.2）。尼基阿斯虽然没有高贵的出身、聪颖的头脑和伯里克利的政治才干，但他凭借朴素而传统的风格与平易的态度仍然在民主制雅典有着自己的强大力量。

其他雅典将军率领舰队驶入海港，驶向港口的出口，他们希望从那里杀出一条血路。叙拉古人以一队战船守卫出口，并将其他船只部署在出口周边，摆开了阵势，时机成熟时就可以从各个方向一同攻击雅典舰队。西坎努斯和阿伽萨库斯指挥两翼，皮森统领中路。叙拉古步兵在港口岸边的大部分地段排兵布阵，而雅典人只占据着他们控制的一小块地盘。叙拉古战士们的亲眷已经占据了所有能看到战场的高处，就像一大群观众在楼座上观看体育竞赛一样。战斗就在这众目睽睽之下打响了。

雅典舰队驶向叙拉古人为了方便己方船只出入而在障碍物处留下的小缺口。雅典舰队的数量优势使它成功突破了这个缺口。当他们开始砍断封堵港口出口的船只之间的铁链时，剩余的叙拉古战船从各个方向发动了攻击，压迫着雅典人的侧翼和后方。在港口的封闭海面上，近200艘战船近距离厮杀起来，因为空间太小，无法使用冲撞战术。雅典人在多年的实践和海战中积攒了经验和技能，这是他们的优势。然而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各种条件都阻止他们发挥出这些优势。雅典士兵向敌人射箭和投掷标枪，但他们之前总是在坚实的陆地上作战，而不是在快速移动、随波浪上下起伏的船上，因此射击和投掷的精准度很差。叙拉古人却在狡猾的科林斯指挥官阿里斯同（他在此役中阵亡）的建议下，向敌人投掷石块。对这场战斗而言，投掷石块更轻松，也更有效。战斗的大部分都是两军的海军士兵强行登上敌船，随后展开白刃战。由于空间狭

小，有的船只正在攻击敌船的时候，自己的另一侧也遭到攻击或者登船。士兵们的呐喊声非常响亮，以至于桨手们听不清命令，也无法轻松地保持划桨的节拍，这使雅典人的另一项重要优势发挥不出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船长们的杀敌情绪越来越高涨，向部下呼喊鼓劲，这干扰了桨手们的划桨拍子。

双方士兵和叙拉古平民从岸上的不同地点目击了这场戏剧性的海战。随着战局变化，双方观众轮流欣喜或哀痛。这是一个扣人心弦且令人胆寒的场面，它的结果对观众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叙拉古人击溃了雅典人，后者惊慌失措地逃到岸上，丢下了船只，逃回营地，寻找安全处。他们的秩序和士气已经瓦解，大多数人只想着保住自己的性命。他们甚至没有请求停战以掩埋己方死者，这个忽略着实令人震惊。他们不允许任何事情耽搁自己逃命，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奇迹才能拯救他们。

有一个雅典人在这可怕的时刻保持了机智和冷静。德摩斯梯尼看到雅典人仍然拥有60艘可用的战船，而敌人只有不到50艘，于是建议收容残兵败将，第二天拂晓再次尝试突围。这个计划也许能成功，因为叙拉古人不会想到雅典人将再次突围；而且战斗人员的减少应当腾出了足够的空间，可以让雅典人发挥战术优势。尼基阿斯也被说服，同意做这样的努力。但这太晚了，因为士兵们的士气已经土崩瓦解。他们拒绝服从将军们发出的登船命令，坚持要求尝试从陆路逃跑。

最后的撤退

叙拉古人的纪律也瓦解了，不过是出于相反的原因：他们欢庆自己的胜利和得救，纵情豪饮狂欢，完全忘记了被击败的敌人。但是，还有一个叙拉古人在做战略上的思考。赫莫克拉提斯知道雅典人仍然是危险的对手，并认识到如果雅典人成功逃到西西里岛的另一个港口，就有可能恢复斗志，卷土重来，再次威胁叙拉古。他打算趁着自己还有机会，

就在此时此地歼灭雅典军队，于是建议封锁叙拉古通往外界的道路和隘口。古利普斯表示同意，但他和其他将军认为，士兵们此刻正在狂欢，不大可能会服从命令。于是赫莫克拉提斯耍了一个花招。黄昏时分，他派了一些骑兵到雅典营地外。他们假装自己就是那些希望将城市交给尼基阿斯的叙拉古内奸，站在雅典营地一定距离之外，呼喊了几个事先选择的雅典人名字，敦促他们告诉尼基阿斯，在当夜撤退不安全，因为叙拉古人把守着道路。雅典人自己也害怕在夜间穿越敌境，所以他们可能已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于是他们决定暂缓撤退。随后他们又停留了一天时间，让士兵们收拾行装，此时敌人已经有了充裕的时间来阻断雅典人的逃跑路线。

参加此次撤退的约有4万人，其中大约一半是军人，其他的则是非战斗人员。“这看上去像是整整一座城市的居民，而且还是一座相当大的城市，在遭到围攻之后偷偷溜走。”（7.75.4）雅典人因为没有掩埋战死的士兵，并且抛弃了伤病员（他们凄惨地呼唤亲友，在后者撤退时抱住他们的腿），而感到万般内疚和自责，这是严重的渎神行为。“军人们痛哭流涕、秩序混乱，没办法干脆利落地离去，尽管他们急需逃离敌境，而且他们已经忍受了令人悲恸的苦难，并且对将来未知的祸患忧心忡忡。”（7.75）

疲惫、患病且忍受着极大痛苦的尼基阿斯向士兵们讲话，希望鼓舞士气和化解他们的焦虑。他敦促他们不要因为失败和灾祸而自责，鼓励他们心存希望，他们的命运或许很快就会逆转。他提醒他们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军队：“你们应当认识到不管你们在何处安顿下来，就会立刻形成一座城市，西西里岛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够轻松抵挡你们的进攻或者将你们驱逐出去，不管你们选择在哪里安营扎寨。”（7.77.4）因此，只要他们保持高昂的士气和良好的纪律，并秩序井然地快速行动，就还有得救的希望。“了解全部事实吧，士兵们，”尼基阿斯说道，“你们一定要勇敢，如果你们是懦夫，那么附近没有一个地方将是安全的避难所；

如果你们现在从敌人手中逃走，那么你们所有人都有机会再一次看到你们最渴望的东西，而你们当中的雅典人将再一次振兴你们的城邦，不管它现在多么衰败。因为构成一座城邦的是人，而不是城墙或船只。”（7.77.7）

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卡塔那，这座城市忠于雅典，将会欢迎雅典军队并为其提供补给物资，然后雅典人可以将卡塔那作为进一步行动的基地。去往卡塔那的道路通常需要绕过爱皮波莱，如果选择这条道路，雅典人将遭到叙拉古骑兵的攻击。于是雅典人计划沿着阿纳普斯河向西前进，在高地某处与友好的西库尔人会合，然后在某个合适地点转向北方的卡塔那。这样的行军路线在爱皮波莱以西很远的地方，能够远离叙拉古军队。尼基阿斯和德摩斯梯尼分别指挥一个空心方阵，将非战斗人员保护在方阵中间。在距叙拉古差不多4英里的地方，沿着阿纳普斯河的一个地点，他们突破了一支叙拉古人及其盟军的队伍，但叙拉古骑兵和轻装部队穷追不舍，不断袭击他们，并用雨点般的投射武器骚扰他们。次日上午，雅典人向西北方行进了约2英里，花了一整天寻找粮食和饮水。

克里米迪山阻挡了他们的去路，这是一片宽阔的高地，其末端是一座高高的悬崖，在叙拉古西北8英里处。雅典人希望通过一条大溪谷（今天的卡斯特卢乔采石场）翻越克里米迪山，然后前往卡塔那的安全地带。但这一次他们的耽搁又造成了恶果，因为叙拉古人有充足的时间在大溪谷上建造了一座壁垒，具体位置在当时所谓的阿克赖裸岩以东。在雅典人于次日上午出发时，叙拉古人及其盟军用骑兵和标枪兵发动进攻，迫使雅典人退回营地。随后的一天，他们企图强行攀登克里米迪山，攻击敌人的设防阵地和军队，但只前进到叙拉古人壁垒前方。标枪和箭矢从大溪谷两侧的高处如倾盆大雨一般向他们射来，雅典人再次被迫撤退。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打乱了山地隘道上的雅典军队，这是一个危险而令人恐惧的事件，很多雅典人相信这是众神在对他们表示不

满。在敌人投射武器的袭扰下，雅典人胆战心惊、精疲力竭，但没有办法休息，因为古利普斯已经在他们身后建造另一道壁垒。如果这道障碍完工，雅典人将被包围起来、当场歼灭，于是他们快速派遣了一支部队去阻止古利普斯完成壁垒，并将全军撤往平地上的营地，以远离叙拉古军队。

他们的新计划是沿着阿纳普斯河向西北方前进（克里米迪山在他们的右侧），然后前往卡塔那。在撤退的第五天，他们抵达了今天称为孔特拉达普利加的平地，叙拉古骑兵和标枪兵又一次冲到雅典军队的前方、侧翼和后方，避免与雅典重步兵直接交锋，在一段距离之外用投射武器攻击他们。叙拉古骑兵阻隔了雅典的一些落单士兵，并将他们杀死。如果雅典人发动进攻，叙拉古人就撤退；雅典人撤退的时候，叙拉古人就冲锋。他们集中力量攻击雅典人后方，希望使雅典部队的其余部分形成恐慌。雅典人打得很勇敢，纪律也不错，前进了超过半英里，随后被迫停下来扎营和休息。

尼基阿斯和德摩斯梯尼现在打算转向东南方的大海，沿着注入大海的河流之一，前往山区里的河流源头，在那里要么与西库尔人会合，要么选择一条更为迂回曲折的道路前往卡塔那。为了从叙拉古人身边溜走，雅典人点燃了尽可能多的营火，作为幌子，然后在夜色掩护下调头赶往海岸，奔向小镇卡西比莱。尼基阿斯率领先头部队穿过了令人胆寒的黑暗敌境，德摩斯梯尼率领剩余部队跟进。黎明时分，他们在海岸附近会合，前往卡基帕里斯河（今称卡西比莱河），打算沿着河岸进入内陆，与友好的西库尔人会合。叙拉古人再一次拦截了他们，但雅典人经过一番激战之后过了河，向南前往他们路途上的下一道河流——爱里纽斯河。

雅典人的命运

尼基阿斯在距爱里纽斯河不远处安营扎寨，德摩斯梯尼在他身后约

6英里处。叙拉古人继续骚扰德摩斯梯尼的部队，拖慢了他的行军速度。来自克里米迪山营地的叙拉古主力部队，包括骑兵和轻装部队，于雅典人撤退的第六天中午前后抵达。他们在卡基帕里斯河以南不到1英里处切断了雅典人，将其包围在一座橄榄园内。橄榄园有围墙，两侧各有一条道路。叙拉古人可以从四面八方向雅典人射箭和投掷标枪。雅典人在整个下午蒙受了很大伤亡。古利普斯和叙拉古人企图分化敌人，于是准备劝降雅典人的盟军，许诺给他们自由。雅典的盟军中只有很少人投降，但当形势彻底无望之后，德摩斯梯尼终于按照如下条件投降了：如果雅典人交出武器，“就不会被暴力处死，也不会在战俘营里被折磨致死，更不会因为被剥夺生存必需品而死亡”（7.82.2）。叙拉古人俘虏了6000人，不到一周前开始撤退的2万名雅典军人现在只剩下这么多了。叙拉古人缴获的战利品铺满了四面盾牌。德摩斯梯尼企图拔剑自尽，但俘虏他的人阻止了他。

次日，叙拉古人追上了尼基阿斯，告诉他德摩斯梯尼已经投降，并命令他也举手投降。尼基阿斯提议让雅典支付这场战争的全部开支，而放他的军队一马，每1塔兰同军费以一名士兵为抵押。叙拉古人拒绝了，因为他们看到此时就是歼灭可憎敌人获得全胜的机会，不愿为了任何数量的金钱而丧失这个机会。他们包围了尼基阿斯的部队，用投射武器杀死了很多人，就像之前包围德摩斯梯尼部队那样。雅典人又一次企图在夜间逃跑，但这一次叙拉古人早有防备。不过，仍然有300名雅典人勇敢地成功突围，其他人则放弃了逃跑。

在撤退的第八天，尼基阿斯企图从重重包围他的敌人当中杀出一条血路，奔向下一道河流，即南面约3英里处的阿西纳鲁斯河。雅典人已经没有计划可言了，仅仅是盲目地横冲直撞，希望能够逃出一条性命，去河边喝水解渴。在投射武器肆虐、骑兵冲锋和重步兵攻击之下，他们抵达了阿西纳鲁斯河。每个人都狂奔过去，争先恐后地渡河，部队秩序早已土崩瓦解。军队变成了一群乱哄哄的乌合之众，堵塞了道路，使敌

人能更轻松地阻止他们过河。“因为他们是一大群人，不得不拥挤着前进，不少人跌倒在地或者互相踩踏。有的人当场死亡，被己方的长矛刺死；其他人则被自己的装备和战友羁绊，被河水卷走。叙拉古人站在河对岸（河水很深），向下方的雅典人投掷标枪，大多数雅典人在浅水的河床处贪婪地喝水，乱七八糟地挤作一团。伯罗奔尼撒人也冲下来屠戮雅典人，尤其是那些在河里的人。河水立刻就被污染了，但雅典人仍然拼命喝水，尽管河水里夹杂着泥沙和血污。大多数人甚至为了争抢喝水而斗殴起来。”（7.84.3-5）

曾经雄壮的雅典大军在阿西纳鲁斯河遭到全歼。在整个战役中给雅典人造成极大麻烦的叙拉古骑兵杀死了少数成功渡河的人。尼基阿斯投降了，不过是向古利普斯投降的，因为他“更信任古利普斯，而不信任叙拉古人”（7.85.1）。直到这时，斯巴达指挥官才下令停止杀戮。尼基阿斯的部队只有约1000人幸存。其中有些人从阿西纳鲁斯河逃出，也有一些人在被俘之后逃脱，他们全都逃往了卡塔那。

得胜的叙拉古人抓获了大批俘虏，缴获了战利品，剥去了敌军死者身上的甲胄，将这些甲胄悬挂在河边最高最美的树上。他们为自己戴上了胜利花冠，装饰了战马。返回叙拉古之后，他们举行了公民大会，投票决定将雅典人的仆役及其帝国盟军卖为奴隶，而将雅典公民和他们的西西里岛希腊人同盟者关进叙拉古城的采石场。有人提议处死尼基阿斯和德摩斯梯尼，这引发了更多辩论。赫莫克拉提斯表示反对，他的理由很高尚，即对落败敌人开恩，但公民大会的呼喊声压过了他的声音。古利普斯的理由则更为务实：他想要获得将雅典将军们押回斯巴达的荣耀。德摩斯梯尼是他的死敌，因为德摩斯梯尼曾在皮洛斯和斯法克特里亚岛大败斯巴达人，而尼基阿斯是斯巴达的朋友，曾经主张释放斯法克特里亚岛的战俘，后来又和斯巴达议和结盟。但叙拉古人拒绝了他的请求，科林斯人也表示反对，最终公民大会投票决定将两名雅典将军处死。

对尼基阿斯的盖棺论定

修昔底德为尼基阿斯写了一份非同寻常的悼词：“出于这个原因或者说与之非常类似的原因，他被杀死了；至少在我的时代，在所有希腊人当中，他最不应当落得这样极端的悲惨结局，因为他一生都奉行美德。”（7.86.5）雅典公民们的观点却不同。古文物研究者保萨尼亚斯[1]曾经在雅典公墓看到一座石碑，上面刻着所有在西西里岛战死的将军的名字，唯独没有尼基阿斯的名字。他从西西里岛史学家菲利斯托斯那里了解到雅典人忽略尼基阿斯名字的原因：“德摩斯梯尼为他的残余士兵缔结了停战协定，仅仅将自己排除在协定之外。他在企图自杀时被俘。尼基阿斯却是主动投降的。出于这个原因，尼基阿斯的名字没有被铭刻在石碑上：他被谴责为一个屈膝投降的人，是一个卑劣的军人。”（1.29.11-12）

目前，叙拉古人在他们的采石场里关押了超过7000名战俘，这些俘虏聚集在恶劣的环境中，白天被烈日炙烤，夜间被秋季冷风侵袭。每名战俘每天可以得到约半品脱[2]水和1品脱食物，这比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斯巴达战俘得到的少得多。雅典战俘饱受饥渴之苦。他们因伤痛、疾病和风吹日晒而死，死尸被胡乱地摞在一起，产生了令人无法忍受的恶臭。七十天之后，除了雅典人、西西里岛希腊人和意大利希腊人之外，所有战俘都被变卖为奴。普鲁塔克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些奴隶因为能够背诵欧里庇得斯的诗句而获得了自由，因为西西里人酷爱他的诗歌。但诗歌或其他任何东西都救不了仍然留在采石场的战俘，他们在那里被关押了八个月，直到全部死亡。我们推测没有人活得更久。

修昔底德称西西里远征为“战争期间最宏大的行动，而且至少据我所知，是希腊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此役对胜利者来说极其光荣，对失败者来说则是灭顶之灾。失败者方方面面都遭到惨败，他们遭受的苦难是非常可怕的。失败者被彻底歼灭，他们的军队、船只和一切都灰飞烟灭了，只有极少数人得以返乡”（7.87.5-6）。在大多数希腊人

看来，战争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对于这恐怖的灾难，谁是最终的罪魁祸首？亚西比德是西西里远征计划的始作俑者，但尼基阿斯起到了更为核心的作用。修昔底德认为，此次远征是缺乏指导和误入歧途的民主制的一大错误。他没有怪罪尼基阿斯，而是以最美好的语言赞颂他，尽管修昔底德的记述使读者对尼基阿斯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印象。说到底，西西里远征最初只是一次小规模行动，风险很小，后来变成了大规模战役，让雅典人觉得征服西西里岛是完全办得到的，也是很安全的。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大转变，就是因为尼基阿斯失败的花招。他在列举战役所需兵力时，还犯了一个关键性的技术错误，即没有提及骑兵。

在西西里岛统率全军时，他昏着迭出，既有执迷不悟的主动犯错，也有因为粗心大意而酿成的错误，使远征陷入毁灭深渊。他耽搁了单层壁垒的建造，未能及时将叙拉古彻底包围。他与叙拉古的异见人士商谈，浪费了更多时间。他没有派遣一队战船去拦截驰援西西里岛的古利普斯；他没有维持有效的封锁线，以阻止冈吉鲁斯和科林斯舰队从海路抵达叙拉古；他也没有在爱皮波莱高地设防把守，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因此，他给了敌人恢复元气的喘息之机，于是敌人将雅典人逐出了易守难攻的有利阵地。然后他将雅典海军、补给站和金库全部转移到普利姆米利昂的无险可守之地，导致舰队将士的士气和状态迅速恶化。古利普斯成功地将雅典人从普利姆米利昂逐出，缴获了他们的金钱和物资。

在前414年夏季之后，尼基阿斯没有放弃注定失败的远征，而是拒绝撤退，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声望受损和丢掉性命。他请求雅典人在撤军和派遣庞大的增援部队之间选择，并解除他的职务。若他能对危险的局势和自己的无能做出直率和诚实的评估，或许雅典人就会选择撤军，进而避免后来发生的大灾祸。即便在爱皮波莱高地失败之后，尼基阿斯仍

然拒绝撤军。为了挽救自己的名誉并避免受到惩罚，他抓住了月食的最后机会，努力逃避那不可逃避的结局，于是白白浪费了雅典人最后的逃生机会。

---

[1] 保萨尼亚斯，生活在公元2世纪罗马时代的希腊地理学家、旅行家，著有《希腊志》十卷，书中内容多为后世考古学发现所引证。生平不详，估计生于小亚细亚的一个城市。据学者推测，他到过希腊、马其顿、意大利、亚洲、非洲等地，约在174年定居于罗马，并在当地写成《希腊志》。书中详细记述多个希腊城市的环境、名胜、传说，以及城中所藏的艺术品，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2] 1品脱约合568毫升。

第六部 雅典帝国与雅典城的革命

前413年，希腊人普遍相信，在西西里岛战役之后，雅典很快就会垮台，但这些预测为时过早。不过，这样的预测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随后的几年中，雅典帝国境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叛乱，雅典城也动荡不安，所以雅典的确很可能灭亡。只有凭借坚忍不拔和顽强努力，雅典才得以坚持下去，继续战斗。

战争的剩余阶段受到了波斯帝国的极大影响。雅典人的帝国和战争努力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料的那样土崩瓦解，于是形势就明朗了：斯巴达人及其盟邦若是不能建造一支舰队并在海上击败雅典，就不可能彻底战胜雅典。而要获得舰队和在海上取胜，斯巴达就只能求助于波斯人。只有波斯人能够提供必需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尽管斯巴达人和波斯人都希望摧毁雅典势力，但波斯的目标与斯巴达的野心是相抵触的。雅典人也需要金钱来重建他们元气大伤的舰队，最重要的是还要阻止波斯人帮助雅典的敌人。因此，在西西里岛战役之后，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东方，聚焦到波斯国王和他西部各行省的总督们身上。

第二十六章 灾难之后（前413～前412年）

西西里岛灾祸的噩耗可能是在前413年9月底传到雅典的。据说在比雷埃夫斯，一个外国人将这则消息告诉了他的理发师，理发师将消息送到雅典，但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后来有一些士兵从西西里岛逃回来，讲述了灾难的严重性。在一段时间之内，雅典人甚至连这些士兵的话也不相信。雅典群众最终接受了真相，怒火中烧并且胆战心惊。他们将怒火发泄到他们认为应当对西西里远征负责的政治家们身上，“就好像他们（群众）自己没有投票支持远征似的”（8.1.1），还向曾预言胜利的占卜师泄愤。

他们哀悼牺牲的同胞，计算了己方的损失和敌人的收益，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他们估计帝国境内会爆发大规模叛乱，伯罗奔尼撒人还将攻击雅典；他们也知道雅典城的防御多么薄弱，难以应对这样的危险。首先，他们急缺能够作战的人员。瘟疫杀死了雅典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使剩余人口身体孱弱，而且西西里岛战役中还损失了至少3000名重步兵、9000名雇工阶层公民以及数千名常住雅典的外邦人。到前413年，雅典各个年龄段的重步兵共计约9000人，或许有11000名雇工阶层公民和3000名常住外邦人，这比战争开始时的一半还少。他们还损失了216艘三列桨座战船，其中160艘是雅典自己的。雅典只剩下约100艘三列桨座战船，而且并非全部状态良好、可以出海。

雅典还缺乏资金来修理船只和建造新船。前431年可供动用的近5000塔兰同只剩下不到500塔兰同了。在狄凯里亚要塞的斯巴达军队帮助了2万多名雅典奴隶逃亡。狄凯里亚要塞对雅典而言是一个长期威胁，使雅典人无法耕作农田。玻俄提亚袭击者还掳掠了雅典人的房屋，夺走了他们的牲畜。很多雅典人不得不从乡村搬到城市。在城市里，人

们对各种物资的需求飙升，促使物价猛涨。雅典需要更多进口物资，而且不得不从更远地方运来，运输成本也越来越高。慈善事业进一步给国库造成了压力，因为国家必须供养阵亡将士的遗孀和孤儿。

雅典人蒙受的损失也削弱了他们为国家提供船只的能力。在过去，富人们承担着这项公共义务；轮到他们效力的时候，一位富人可以独立装配一艘战船，如今，却需要两个人分担一艘战船的费用。而且，即便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富裕的雅典人也无力承担许多直接税。

贤哲

西西里远征还夺去了雅典人最优秀和最有经验的将军们：德摩斯梯尼、拉马库斯、尼基阿斯和欧律墨冬已经不在人世，亚西比德在流亡，而在前413/前412年任职的另外四位我们知道的将军此前都没有指挥经验。在政治领导人当中，不仅尼基阿斯和亚西比德已经出局，希帕波鲁斯也在流亡。为了填补这个空缺，雅典人决定“选举一群年纪较长的男子担任‘贤哲’，为应对当前局势提供建议和提出立法”（8.1.3）。他们选举了十位贤哲，每个部落选出一名年龄超过四十岁的男子。贤哲可能被授予了向公民大会提出方案的权力，因此在这一职能上取代了议事会。不管贤哲的正式权力是什么，也无论他们的资历如何，贤哲的任期都不受限制，而且职能也很模糊和笼统，因此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和权威。

我们只知道两位贤哲的名字：哈格农和索福克勒斯（那位伟大的悲剧诗人）。哈格农在前440年的萨摩斯战役中是与伯里克利平级的将军，所以在前413年他可能已经超过六十岁了。他曾为伯里克利辩护，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公众人物。索福克勒斯当选为贤哲的时候可能已经八十多岁了，他也曾担任将军，还曾当选为雅典同盟司库的高位，但他最有名的还是连续五十多年来不断赢得悲剧大奖，所以他是希腊最有名和最受爱戴的人物之一。和哈格农一样，索福克勒斯也曾与伯里克利一起

工作过。哈格农和索福克勒斯都很富裕，经验丰富、广受尊重，并且在前413年的环境下算是比较保守的，不过他们都曾与伯里克利交好，这能够保证他们既不是寡头派，也不是民主制的敌人。

修昔底德忍不住要挖苦一下后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制：“在危急时刻，雅典人民像往常一样，愿意纪律严明地去做任何事情。”（8.1.4）雅典公民大会的确表现出了伯里克利式的节制和谨慎，向一群受到尊重和信任的、符合伯里克利风格的温和派授予极大权力，从而对自己加以限制。贤哲的最早行动之一是“他们决定，只要形势允许，绝不投降；准备一支舰队，从各地获取木材和金钱；确保同盟的安全，尤其是优卑亚岛的安全；削减公共开支”（8.1.3）。

除了筹建新战船之外，雅典人还在阿提卡南端的苏尼昂建造了一座要塞，以保护从那里驶过的运粮船。他们放弃了在拉科尼亚的要塞，因为它的代价太大，效果不佳：“如果他们判断某一行动支出没有效用，就对其加以削减，以节省开支。”（8.4）他们严密监视盟邦，“免得它们谋反生事”（8.4），并改革了税制。以往是对每个盟邦进行评估，然后征收贡赋，现在改为对一切从海路进口或出口的商品征收5%的统一关税。这项措施是为了尽可能从正处于叛乱边缘的臣属盟邦那里征收更多的金钱。新税制将纳税的负担从地主转移到了商人身上，商人从雅典帝国获益，也许更愿意缴纳税金，并且可能对雅典更友好。但是，“雅典的盟邦虽然力量不足，但依然打算反叛雅典”（8.2.2）。一年之内，主要的地区，如优卑亚岛、希俄斯岛、莱斯博斯岛、罗德岛、米利都和以弗所，全都揭竿而起；尽管若是没有斯巴达及其盟友的支持，它们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

斯巴达的野心

雅典人在西西里岛的惨败给了斯巴达人新的自信，他们想出了一套更加野心勃勃的战争目标。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投入这场战争，

原先是为了“解放希腊人”，现在却相信在战胜雅典之后，“他们可以安全地控制全希腊的霸权”（8.2.4）。越来越多的斯巴达人开始希望“他们能够享有巨额财富，斯巴达会变得更伟大、更强盛，普通公民的家庭也能变得更富裕”（Diodorus 11.50）。

这个赞同武力扩张的派系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一是因为军事上的成功，二是因为斯巴达社会发生了变化。享有完整公民权的斯巴达人的数量在下降：前479年在普拉蒂亚作战的斯巴达重步兵有约5000人，但前371年留克特拉战役[1]中的重步兵就只有约1000人；前418年的曼丁尼亚战役中，参战的斯巴达重步兵不超过3500人。斯巴达人的一些风俗习惯，如在青壮年男女生育能力最旺盛时将男女分隔的做法和娈童恋，持续遏制着后代数量的增长。而且斯巴达人为了使自己能够得到的遗产最大化，也刻意节制生育。他们还努力获取尽可能多的私有土地和其他财富，以便补充政府向公民发放的补助金。

随着斯巴达公民数量的减少，拉科尼亚的非斯巴达公民的自由人比例增高了。前421年，该地区有1000名解放黑劳士，即曾经在斯巴达陆军中作战并获得自由和一块土地的黑劳士。到前396年，至少有2000名解放黑劳士。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有希望获得完整的斯巴达公民权，因为“解放黑劳士”的称呼暗含一定程度的公民权。另外一群非公民自由人是所谓的“低等人”，他们似乎主要出身于斯巴达公民阶层，有资格获得斯巴达公民权，但特别贫困，无法为公共餐食出资出力[2]，于是他们被排除在公民团体之外，不能享有公民的荣誉。

还有一群被排除在斯巴达公民群体之外的自由人是所谓的莫萨克斯。其中有些人似乎是斯巴达男子和黑劳士女子的私生子，也有些人的父母都是斯巴达公民，但因为贫困，无法为公共餐食出资出力。不同的是，莫萨克斯可以接受斯巴达人的训练，也会被选到某个公共食堂，他们的膳食由富裕的斯巴达恩主提供。这个阶层有三个人——古利普斯、

卡利克拉提达斯和吕山德——在战争期间晋升到高级军事指挥职位。这些出身卑微的人能够攀升到这样荣耀和尊贵的地位，意味着其他人会努力效仿他们。效仿他们的人也许只能获得足够的财富，以便有资格进入一个公共食堂，从而获得完整公民权。那些没有办法获得公民权的人也可以通过战利品、征服和斯巴达霸权来获得财富和公民权。这些人自然会向国家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执行比斯巴达惯常更具侵略性的政策。

前413年，斯巴达的野心家派系受到的抵制比战争期间任何时候都要小。阿基斯二世凭借在曼丁尼亚战役赢得的荣耀而备受尊重。他率军驻扎在狄凯里亚，拥有比斯巴达历代国王一般情况下大得多的权力，他也热切希望增加斯巴达和他自己的声望和力量。反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冒险的传统派那边没有一个同样强有力的人物。威望受损的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只能置身事外，默默地祈祷和平。

即便如此，迅速赢得战争对斯巴达人来说还是很困难的。除非在海上击败雅典人，否则就不可能彻底战胜他们，但斯巴达人仍然缺乏船只、训练有素的水手，以及建造船只和向水手发饷所需的资金。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他们极度依赖自己的盟友。尽管战争严重损害了各盟邦的经济，斯巴达人在前413年还是给它们下达了建造船只的具体任务指标：斯巴达人自己建造25艘，玻俄提亚人建造25艘，科林斯人负责15艘，洛克里斯人和福基斯人一起负责15艘，阿卡狄亚、培林尼和西锡安共同完成10艘，墨伽拉、特洛伊曾、埃皮达鲁斯和赫尔米奥尼一起建造10艘。与战前的造船能力相比，这是很低的数字，而且总计100艘三列桨座战船也远远不足以击败雅典人。不过这个任务指标也未能完成，到前412年春季时只有39艘战船整装待发。在战争余下的时间里，斯巴达的希腊大陆盟邦为它建造的战船数量仍然不多。尽管斯巴达人对西西里岛的盟邦寄予了很大期望，但到前412年叙拉古和塞利农特只派来了22艘战船，前409年叙拉古又派来了5艘。

考虑到斯巴达联盟的经济现实，要想获得足够强大的海军，唯一的希望就是波斯，但要获得波斯的支持并不容易。因为斯巴达人打这场战争的口号就是“解放希腊人”，他们致力于消灭雅典帝国，并恢复其附庸国的自治权，然而其中很多国家也曾在不同时期被波斯控制过。

波斯人希望恢复对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的统治，因此这与斯巴达的目标相矛盾。使形势愈加复杂的是，一些有影响力的斯巴达人已经在打算将被“解放”的城邦占为己有。尽管在战争最初十年里波斯人和斯巴达人定期保持着联络，但他们的关系始终不是建设性的，毕竟他们的目标是互相矛盾的。前425年，雅典人截获了一名波斯信使，他携带着波斯国王的信，信中表达了对斯巴达发出的五花八门信息的困惑。

与此同时，雅典人也尝试与波斯人谈判，但还没有取得任何成绩，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国王就驾崩了。他死后，波斯爆发了争夺王位的斗争，最终的胜利者是大流士二世。他是前任国王的十七个私生子之一，因为另外十六个兄弟还活着，所以他的王位并不稳固。前424/前423年，雅典人和波斯人缔结了《爱皮利库斯条约》，“确立了两国间的永久友谊”（Andocides，*On the Peace* 29）。伯拉西达在安菲波利斯周边作战对雅典构成了威胁，所以雅典急于阻止波斯向斯巴达提供援助。随后几年内，新国王大流士二世受到了一些叛乱的挑战，他很高兴自己与雅典人达成了上述协议。

《尼基阿斯和约》签订后，大流士二世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政策。因为雅典海军控制着大海，出资维护这些船只的雅典国库得到了更多的盟邦贡金，同时也没有其他大的军事开支，所以大流士二世没有理由去改变现状。西西里岛的灾难打破了这个平衡，但即便在波斯人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去收复之前丧失的希腊领地的时候，他们也很难与斯巴达人达成协议来实现这个目标。

阿基斯二世指挥大军

在西西里岛战役之后，“双方都在积极备战，就好像战争刚刚开始似的”（8.5.1）。斯巴达人又一次发动攻势，但这一次雅典人只有防御力量。在战前，阿希达穆斯二世曾警告说，斯巴达人会把这场战争传给他们的儿子。果然，在前413年，他的儿子阿基斯二世统领着在狄凯里亚的斯巴达军队。他拥有全权，“可以按照他的心愿，向任何地方调兵遣将，可以随意征募部队和资金。这一时期，盟军比在斯巴达城内的那些人更对他俯首帖耳。因为他拥有一支大军，可以迅速出现在任何地方，震慑世人”（8.5.3）。

现在，阿基斯二世的作战目标是扩张斯巴达的势力和为自己收获更多荣耀。他率军进入希腊中部，这个行动揭示了斯巴达的更具侵略性的新计划。秋末，他率军开进了马利斯湾附近的奥塔地区（见地图14），目的是收复附近特拉启斯地区的赫拉克利亚殖民地。斯巴达人在前426年建立了这个殖民地，但玻俄提亚人在前420/前419年以防止它落入雅典人手中为借口，占领了它。前413年，斯巴达人觉得它很有用，能够以它为基地，煽动爱琴海上的雅典附庸国反叛。到前409年，斯巴达又一次控制了赫拉克利亚。但阿基斯二世有着更宏大的计划，他开始从当地人那里勒索钱财，并扣押人质，希望借此迫使他们加入斯巴达联盟。这些行动代表了斯巴达势力在希腊中部的扩张，他们在战后继续执行此项政策，以建立现代学者所谓的“斯巴达霸权”。

波斯的行动

在返回狄凯里亚之后，阿基斯二世同意帮助优卑亚人反抗雅典，但在他开始行动之前，莱斯博斯岛派来了使团，请求斯巴达人帮助他们反抗雅典。阿基斯二世决定支持莱斯博斯岛，派遣了10艘战船和300名解放黑劳士，玻俄提亚人还提供了10艘三列桨座战船。这时，另外两个代表团（都有波斯在背后撑腰）直接来到斯巴达，也请求斯巴达人帮助他

们反抗雅典。其中一个代表团来自希俄斯岛和爱利特莱[3]，萨第斯[4]的波斯总督提萨弗涅斯派了使者陪同他们；另一个代表团是波斯帝国的赫勒斯滂行省总督法那巴佐斯派来的。代表波斯人发言的希腊使者敦促斯巴达人支持赫勒斯滂海峡地区的希腊城邦反抗雅典。波斯的两位总督得到了波斯国王的授权，波斯也已经准备加入反对雅典的战争了。

近一段时间以来，大流士二世给他的行省总督们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对波斯于前479年丧失的那些希腊城邦收缴贡金和欠账。这个举动不仅违反了他与雅典的条约（在不到十二年前缔结的），还颠覆了波斯自前5世纪中期以来的一贯政策，即与雅典保持和平。波斯国王为什么又一次愿意与雅典交战呢？有学者指出，雅典与总督皮苏特尼斯的私生子阿摩基斯结盟（具体时间不详），而阿摩基斯在卡里亚谋反，与波斯国王分庭抗礼，令国王颇为不悦。但关于波斯政策发生变化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雅典在西西里岛遭受的灾难预示着雅典的灭亡。波斯国王现在有机会加入战争，去打倒一个元气大伤的对手，并重获失地、金钱和荣誉。

到达斯巴达的两位波斯总督的使者实际上是竞争对手，他们都努力说服斯巴达支持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城邦叛乱，并借此赢得促使斯巴达人与波斯国王结盟的功劳。斯巴达人在外交事务上更是存在严重分歧。最明显的是，斯巴达城的人士与狄凯里亚的阿基斯二世持不同意见。尽管阿基斯二世已经决定支持莱斯博斯人，但斯巴达城内“意见不一，有的人努力说服公民大会首先向伊奥尼亚和希俄斯岛派遣陆海军，而有的人则主张出兵到赫勒斯滂海峡”（8.6.2）。实际上，上述四种建议（分别是出兵到优卑亚岛、莱斯博斯岛、伊奥尼亚和希俄斯岛、赫勒斯滂海峡）都有不错的理由。雅典人的牲畜都养在优卑亚岛上，他们的补给物资依赖优卑亚岛。在优卑亚岛于前411年反叛时，雅典人甚至比经历西西里岛灾难之后更加恐惧，因为“雅典人从优卑亚岛比从阿提卡获得更多收益”（8.96.2）。莱斯博斯岛是一个面积较大、富饶且人口众多的岛

屿，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可以用作行动基地，切断雅典与黑海之间的生命线。法那巴佐斯的建议也很有吸引力，其不仅可以让斯巴达人去往赫勒斯滂海峡，还可以得到波斯的财政支持，这是额外的诱惑。

斯巴达人选择希俄斯岛

但最后，斯巴达人选择答应希俄斯人和提萨弗涅斯的请求，因为优卑亚岛和莱斯博斯岛不能为斯巴达提供一支希腊舰队，也不能得到波斯人提供支援的承诺。法那巴佐斯的建议在表面上似乎是最有吸引力的，因为若能在赫勒斯滂海峡取胜，就一定能迅速打败雅典，而且法那巴佐斯的使者随身带来了25塔兰同现金。但提萨弗涅斯在波斯帝国西部与雅典的战争中的地位似乎更高，而且希俄斯人自己拥有一支相当强大的舰队。斯巴达人的决定还得到了亚西比德的赞同，他需要向对他抱有猜忌的东道主（这种猜忌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希俄斯岛叛乱引发的伊奥尼亚战役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他在伊奥尼亚地区有一些位高权重的朋友，他或许能让斯巴达人觉得，他在伊奥尼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斯巴达人小心地检查，看希俄斯海军是否真的像希俄斯人宣称的那样强大，希俄斯城的实力是否真的像他们自夸的那样雄厚。在得到满意的结果后，斯巴达人便投票决定让希俄斯人和爱利特莱人（他们居住在与希俄斯岛隔海相望的地方）加入自己的联盟。他们决定派遣40艘三列桨座战船（其中10艘在海军将领麦兰克利达斯的指挥下立刻出发了）去与希俄斯岛的60艘战船会合。但在他们起航之前，发生了地震。恐惧之下，他们将第一批远征军缩减到了5艘战船，由卡尔基丢斯指挥。即便如此，他们的动作依旧非常缓慢，直到前412年春季仍然没有出征。

斯巴达人的确非常重视地震和征兆，但他们如此耽搁也有战略和政治上的因素。阿基斯二世看到自己的计划被推翻，斯巴达人选择了别的计划，一定不会开心。斯巴达人在发动任何海军行动之前必须征询伯罗

奔尼撒联盟的意见，因为大多数船只属于盟邦，而且出于安全考虑，都停泊在科林斯湾。伯罗奔尼撒联盟终于在科林斯开会的时候，决定派遣卡尔基丢斯去希俄斯岛，但派遣另一支舰队去莱斯博斯岛（这满足了阿基斯二世的意愿），由阿尔卡美涅斯指挥，“阿基斯二世看中的也是他”（8.8.2）。第三场行动是在莱斯博斯岛战役开始之后，克里阿库斯将率军攻入赫勒斯滂海峡。这个过于复杂的兵分三路战略很可能也反映了斯巴达政治形势的复杂。

伯罗奔尼撒联盟投票决定，让各部队立即出发，不必遮掩行踪，“因为他们鄙视雅典人的无能，而且海上还没有出现规模较大的雅典舰队”（8.8.4）。但他们仍然非常谨慎，因为他们对过去被雅典海军打得屁滚尿流的屈辱经历还记忆犹新。随后，科林斯人又坚持要求等地峡运动会[5]开完之后再出动。尽管阿基斯二世建议由他亲自指挥去往希俄斯岛的远征军，好让科林斯人待在家里开完运动会，但科林斯人拒绝了他的建议，并得到了很多盟国的支持，于是称心遂愿。

无疑，伯罗奔尼撒人的耽搁给了雅典人足够时间去发现对方的阴谋。雅典人指控希俄斯人（雅典同盟中最后一个拥有自己舰队的盟邦）犯上作乱，并要求他们将部分船只交给雅典帝国舰队，作为守信的保证。希俄斯岛的寡头派害怕反叛计划遭到希俄斯岛普通民众和亲雅典的民主派人士的反对，而且伯罗奔尼撒人的踌躇不决也让他们开始怀疑伯罗奔尼撒人的援助能否真正落实，于是他们服从了雅典人的命令，将7艘战船交给了雅典人。

伯罗奔尼撒人的耽搁还使雅典人参加了地峡运动会，他们在那里了解到了更多关于希俄斯岛反叛阴谋的情报，以及伯罗奔尼撒人计划的细节。前412年7月，当阿尔卡美涅斯终于率领第一批21艘伯罗奔尼撒战船出海时，已经有一支兵力相同的雅典舰队严阵以待。于是阿尔卡美涅斯立刻率军返回了港口，雅典人则撤往比雷埃夫斯以征募增援部队，将战

船数量增加到37艘。阿尔卡美涅斯企图沿着伯罗奔尼撒半岛海岸线向南溜走，但雅典人紧追不舍。当看到雅典舰队时，阿尔卡美涅斯逃到了已经废弃的斯皮赖昂港（埃皮达鲁斯边境以北不远处），只损失了1艘掉队船只。其他船只虽然抵达了斯皮赖昂港，但依然没有逃出生天，因为雅典人从海陆两路进攻，将阿尔卡美涅斯的大部分船只摧毁在海滩上，并杀死了阿尔卡美涅斯本人。雅典人在附近建立了一个营地，并增援了舰队，以便监视敌人。他们决心不让任何伯罗奔尼撒船只驶入爱琴海。

在斯巴达，监察官们在等待消息。他们之前命令阿尔卡美涅斯起航之后立刻派人给他们送信，以便派遣卡尔基丢斯的5艘战船与他会合。斯巴达人斗志高昂，士兵们热切等待登船。这时消息传来，阿尔卡美涅斯兵败身死，斯皮赖昂港遭到封锁，于是斯巴达人的情绪立刻变了。“他们在伊奥尼亚战役中的第一场行动出师未捷，所以他们不打算再派出船只，甚至想把已经出海的船只召回。”（8.11.3）

亚西比德的干预

伯罗奔尼撒人的损失原本可能彻底断送希俄斯岛叛乱，但在这个关头，亚西比德似乎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斯巴达再次行动起来。他说服了监察官们在伯罗奔尼撒人战败的消息传到伊奥尼亚之前，将卡尔基丢斯的5艘战船直接派往伊奥尼亚，他本人也参加此次远征。亚西比德会告诉伊奥尼亚人，雅典的弱点是什么，并向他们保证斯巴达援助他们的热忱。因为他对雅典和斯巴达都了然于胸，而且对伊奥尼亚领导人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伊奥尼亚人会相信他的话。他给监察官恩狄乌斯的私人信件表明，争夺个人荣耀和派系利益的斗争在斯巴达决策中仍然起到很大作用。“让亚西比德煽动伊奥尼亚反叛雅典，并使波斯国王成为斯巴达人的盟友，而同时不让这成为阿基斯二世的功劳。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亚西比德有理由去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他碰巧与阿基斯二世不和”（8.12.2）。亚西比德与阿基斯二世不和的原因是斯巴达发生了一起非常有名的丑闻。大约在前412年2月底，斯巴达发生了地震，亚西比德

从阿基斯二世妻子的卧室逃了出来，被世人看得一清二楚。到7月，阿基斯二世应当已经知道了此事，并且很快就要展开复仇。亚西比德的最好出路是取得一场辉煌的胜利，那样的话即便是阿基斯二世也不能动他一根汗毛。如果不成功，他就只能逃到他最后的避难所——波斯帝国。远征伊奥尼亚的行动无论成功与否都对他有利，成功了便不必害怕阿基斯二世，失败了也可以趁机逃往波斯。

为了保守机密，卡尔基丢斯指挥的小舰队在渡海前往希俄斯岛途中扣押了他们遇到的所有人。他们的寡头派盟友已经做了安排，让斯巴达人恰好在希俄斯岛议事会召开会议的时候抵达。与会者当中既有密谋反叛的少数派，也有对阴谋不知情的多数人。看到斯巴达舰队抵达，多数人“瞠目结舌、手足无措”（8.14.2）。亚西比德在斯巴达战船和士兵的支持下，告诉希俄斯人，更大规模的部队正在途中。这鼓舞了希俄斯人，于是他们发动了叛乱，把爱利特莱也拉了进来。亚西比德的政治手腕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只有区区几艘船，却凭借令人眼花缭乱的诡计，夺得了60艘战船和一个安全的行动基地，并成功推动了雅典帝国境内第一起关键的叛变。在此事中，他对雅典造成的伤害甚至比以往更大，他又一次以戏剧性的方式告知雅典人，他还活着。

亚西比德和卡尔基丢斯在附近的几座城市迅速煽动了叛乱，很快希俄斯岛这一先例就鼓动大陆上的爱利特莱、克拉左门奈、海莱和列别多斯也揭竿而起，泰奥斯则成为一座开放城市。在更南方，大城邦以弗所也加入了叛乱，阿纳伊亚（一座小城邦，在萨摩斯岛对岸，毗邻米利都，地理位置有战略意义）也步其后尘。现在亚西比德准备把“伊奥尼亚的珠宝”——米利都——也拉拢过来。他将船上的伯罗奔尼撒水手换成希俄斯人，因为他“希望抢在伯罗奔尼撒船只抵达之前，拉拢米利都人；进而像他曾承诺的那样，让希俄斯人、他自己和派遣他们前来的恩狄乌斯，夺得争取到最多倒戈城邦的功劳”（8.17.2）。亚西比德与卡尔基丢斯来得时间正好，在雅典人阻止叛乱之前，煽动米利都加入了叛

乱。变节的米利都成为一个将叛乱扩展至伊奥尼亚南部和卡里亚及沿海诸岛的基地。

提萨弗涅斯的条约草案

在斯巴达人控制米利都之后，提萨弗涅斯去了那里，与斯巴达人谈判，希望代表波斯国王与斯巴达缔结条约。这份一边倒的条约文本要求悉数归还大流士二世及其祖先曾经占据的希腊领地和城邦，并且波斯人和斯巴达人还同意合作，共同阻止这些地区继续向雅典纳贡。斯巴达人同意帮助波斯国王镇压谋反的臣民，波斯国王则承诺帮助斯巴达人镇压任何胆敢反对他们的盟邦。两国将共同作战，反对雅典，绝不单独与雅典媾和。事实上，当时斯巴达人并没有受到盟邦反叛的威胁，而波斯人正与阿摩基斯厮杀，并且有可能将他们自前480年以来丧失的所有希腊城邦均视为反贼。若从字面解读此条约，波斯人将收复他们在萨拉米斯岛战役之前曾经控制的所有希腊土地。然而，条约却没有规定，波斯人将为斯巴达提供何种支持，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其他形式的。后来，一位斯巴达显贵对条约的全部隐含意义表达了愤怒。“太可怕了，”他说道，“波斯国王居然现在仍然对他和他的祖先曾经占有过的土地提出主权要求，因为那样的话，所有岛屿、色萨利、洛克里斯和远至玻俄提亚的全部地区，都将被波斯奴役。斯巴达人给希腊人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波斯的主宰。”（8.43.3）不足为奇的是，斯巴达人没有向其盟邦披露此条约的存在。

斯巴达人竟然愿意接受这样一份不平等条约，亚西比德无疑在背后起到了关键作用。作为身经百战的谈判老将，他是斯巴达在此次谈判中的主要代表，卡尔基丢斯遵从他的意见。亚西比德的论点一定是，快速缔结条约能够给卡尔基丢斯带来与波斯结盟的功劳；细节不重要，以后可以更改。亚西比德的主要目标是抢在其他斯巴达人（或许是阿基斯二世派系的一员）抵达并夺走功劳之前，获得波斯人的承诺。这些论点肯定符合亚西比德自己的意愿，因为他也需要立刻取得极大的成就。

不管它的最终命运如何，《卡尔基丢斯条约》在前412年被认为是一次极大的成功，尽管促成它的那个雅典流亡者被怀疑给一位斯巴达国王戴了绿帽子，因此无时无刻不是如履薄冰。伊奥尼亚的叛乱和与波斯国王的条约兑现了亚西比德对监察官恩狄乌斯和斯巴达做出的承诺。尽管时间会揭示此条约的缺陷，但亚西比德打消了斯巴达人的怯懦和怠惰，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

---

[1] 前371年，在底比斯与斯巴达的战争中，前文讲到的底比斯名将伊巴密浓达运用大纵深侧翼的斜线战术，决定性地击败斯巴达。

[2] 在斯巴达，所有公民男子都必须在一个公共食堂（Syssitia）用餐，国王也不例外，没有充足的理由是不能不到场的。每个公民必须为公共食堂出钱。这是为了加强亲属之间的纽带关系。在战斗中，同一个公共食堂的人往往要并肩作战。

[3] 与希俄斯岛隔海相望的一座伊奥尼亚城市。

[4] 萨第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在今天的土耳其西部，曾是古国吕底亚的首都，也是波斯帝国的重要城市之一。

[5] 地峡运动会是古希腊的四大泛希腊运动会（另外三个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涅米亚运动会和皮提亚运动会）之一，由科林斯地峡得名，在科林斯举办。时间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一年和后一年。

第二十七章 爱琴海的战火（前412～前411年）

雅典的反击

对雅典人来说，希俄斯岛的反叛是一个非常可怕而危险的事件，因为他们知道“最大的城邦反叛时，其他盟邦不会风平浪静”（8.15.1）。于是，在前412年夏季，雅典人投票决定动用1000塔兰同的预备资金，这是他们在战争初期拨出来仅在极端的紧急情况下使用的资金。他们召回了封锁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的战船，将其派往希俄斯岛，并计划再派遣30艘。叛乱持续的每一天都吞噬着雅典的国库资金，每一天都增加了波斯人干预的可能性，敌人舰队也就多一天时间来操练。

19艘雅典战船从萨摩斯岛驶往米利都，企图阻止那里的叛乱，但到得太晚。尽管数量不及敌人的25艘战船，它们却成功封锁了米利都城。雅典人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能赶到并抢夺优势，于是负责指挥伯罗奔尼撒舰队的卡尔基丢斯没有发动攻击，甚至拒绝了愿意为其效劳的希俄斯人的建议。和大多数斯巴达指挥官一样，他不愿意冒险在海上交战，尽管对面的雅典舰队兵力比他的少。如果他同意接受希俄斯人的帮助，斯巴达战船的数量就会增加至35艘，那时他就不好意思拒绝出战了。从后来的形势发展看，我们不应当指责他愚蠢或怯懦；后来在基诺塞马和库济库斯爆发的战役将有力证明，雅典人仍然掌握着海上优势。

但是，由于卡尔基丢斯拒绝出战，雅典人得以向爱琴海派遣增援部队，并将萨摩斯岛发展为他们在爱琴海的主要海军基地。在他们如此行动的时候，萨摩斯岛爆发了一场内战，被强烈的阶级仇恨激化。平民百姓在雅典水手的帮助下揭竿而起，反对寡头政权的贵族，杀死两百名萨摩斯贵族，放逐了四十人，分配了这些贵族的土地和房屋，剥夺了贵族的公民权，包括与较低阶层通婚的权利。

与此同时，希俄斯人驶向莱斯博斯岛，在米西姆纳和米蒂利尼（见地图23）煽动叛乱。在此期间，一支伯罗奔尼撒陆军沿着小亚细亚大陆海岸北上，通过克拉左门奈、弗凯亚和库麦，将这些重要城市拉到了他们那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受困于斯皮赖昂的斯巴达舰队终于突破封锁，在新任海军司令阿斯泰奥库斯（他奉命接过整个伯罗奔尼撒舰队的指挥权）的率领下驶向希俄斯岛。他在莱斯博斯岛与希俄斯岛主力舰队会合，然后在皮拉登陆，次日开往爱里苏斯[1]。就在几个小时之前，25艘雅典战船在列昂和狄奥墨冬这两位将军的指挥下驶入了莱斯博斯岛，在港口内击败了希俄斯战船，在陆地上赢得一场胜利，并且一举夺得莱斯博斯岛上的主要城市。阿斯泰奥库斯煽动了爱里苏斯的叛乱，然后沿着莱斯博斯岛北岸航行，企图挽救米西姆纳的叛军，并鼓动安提萨[2]反叛，但是“莱斯博斯岛上的一切都和他对着干”（8.23.5），于是他返回了米利都。没有舰队的支持，伯罗奔尼撒陆军不得不从去往赫勒斯滂海峡的道路上返回，每个盟邦的部队各自回家。伯罗奔尼撒人迅速结束战争的第一次努力宣告失败。



在牢牢控制了莱斯博斯岛之后，雅典人动身前往希俄斯岛，收复克拉左门奈之后才离开。在列昂和狄奥墨冬的指挥下，雅典人占领了希俄斯岛东北角外海的一些岛屿和大陆上与希俄斯岛隔海相望的两座设防城

镇，作为封锁希俄斯岛并从海上发动进攻的基地。雅典人现在主宰着这片海域，可以在任何地方登陆。他们还用重步兵（而不是通常的雇工阶层公民）担任海军步兵，所以他们在陆战中也有优势。雅典战船屡次击败希俄斯人，于是希俄斯人拒绝在海上交战，之后雅典人登上希俄斯岛，蹂躏了富饶兴旺、物产丰富的希俄斯岛土地。到此时，一些希俄斯人已经在企图推翻政府、恢复与雅典的盟约，以便结束战乱，但统治希俄斯岛的寡头派却寻求阿斯泰奥库斯的援助，并考虑“如何以最温和的手段结束这些亲雅典的阴谋”（8.24.6）。阿斯泰奥库斯扣押了希俄斯岛的一些人质，这使局势暂时安宁了一段时间。但希俄斯岛仍然处于雅典的包围之中，不断遭到攻击，并且这里已经不是伊奥尼亚叛乱的关键所在，而是濒临失败。

雅典人在米利都的决定

雅典人的下一个目标是米利都，即除了希俄斯岛之外仍然处于叛乱中的唯一一个伊奥尼亚城邦。10月，普律尼科司、奥诺麦克利斯和斯基罗尼德斯三位将军率领48艘船只从萨摩斯岛起航。其中有一些是运兵船，载着3500名重步兵，其中1000人来自雅典，1000人来自雅典的爱琴海盟邦，还有1500人来自阿尔戈斯。这在西西里岛惨败不久之后，算得上一支相当强大的舰队。他们面对的敌人包括来自米利都的800名重步兵、数量不详的伯罗奔尼撒人、为总督提萨弗涅斯效力的雇佣兵以及提萨弗涅斯亲自指挥的骑兵部队。

阿尔戈斯人的冲锋过于鲁莽，打乱了雅典这边的秩序，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战败和损失300人的代价。雅典人及其伊奥尼亚盟军表现较好，击溃了伯罗奔尼撒人，打退了波斯人及其雇佣军，此后米利都人明智地逃回城内。雅典人控制了大海和陆地，于是欢庆伟大的胜利。剩下的工作就是筑墙包围城市，迫使其投降，他们确信米利都的陷落将使叛乱彻底终结。

但就在他们的胜利之日，有消息称55艘战船在斯巴达人泰里蒙涅斯的指挥下正赶往米利都，其中有22艘西西里战船，指挥官是赫莫克拉提斯，即雅典人的那位叙拉古克星。当这支舰队驶入伊阿苏斯湾[3] 并在推丘萨扎营时，亚西比德亲自骑马赶来，告诉他们雅典人在米利都取得了胜利，并说："如果他们（斯巴达人）不愿意毁掉自己在伊奥尼亚的地位和事业，就应当尽快援救米利都，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它被雅典人筑墙包围起来。"（8.26.3）

尽管其他雅典将军希望留在米利都作战，普律尼科司却反对，他指出："在他们（雅典人）遭受灾难之后，除非绝对必须，否则没有道理主动采取任何攻势；而在并无形势逼迫的情况下自愿冲向危险，就更没有道理了。"（8.27.3）普律尼科司的观点被采纳，雅典人起航去往萨摩斯岛，"他们的胜利并不完整"（8.27.6），米利都既没有遭到围攻，也没有被封锁起来。阿尔戈斯人对此深感不满，一怒之下回家了，此后就退出了战争。

雅典人的撤退产生了另一个代价高昂的后果。提萨弗涅斯到了米利都，劝说伯罗奔尼撒人去伊阿苏斯攻击阿摩基斯。伊阿苏斯人不知道雅典人已经撤军，还以为驶来的舰队属于雅典人，因此没有任何防备。伯罗奔尼撒人活捉了阿摩基斯，将他交给提萨弗涅斯，收纳了阿摩基斯的伯罗奔尼撒雇佣兵，并洗劫了伊阿苏斯，将其居民卖给提萨弗涅斯，将城镇残余部分也交给他。结果雅典人又丧失了一个盟友，波斯人除掉了一个恼人的麻烦，斯巴达人与波斯人的第一次合作赢得了胜利。

有些人赞扬普律尼科司及其战略，"在这件事情当中，以及后来所有他参与的事情当中，他都显得相当聪明"（8.27.5），但他的大多数雅典同胞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在次年正式起诉他丢失伊阿苏斯和阿摩基斯的罪过。我们有理由同意雅典人对普律尼科司的裁决。有些现代学者为普律尼科司辩护，理由是在西西里岛惨败之后，雅典海军曾经的军威已

经不复存在，丧失了战术优势，因此不能冒太大风险在海上与敌交锋。但是，这些判断与事实并不符。尽管弗尔米奥的光荣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西西里岛的灾难并未消除雅典海军的战术优势。之前在前412年，雅典人成功地迫使伯罗奔尼撒舰队在一个荒废的、不便利的基地[4]登陆。在希俄斯岛和莱斯博斯岛，他们风卷残云般地击溃了敌军战船。前411年春季，尽管雅典丧失了整个伊奥尼亚沿海地带，但斯巴达人仍然非常害怕雅典舰队，所以派遣一支军队经陆路去往赫勒斯滂海峡。同一年，在赫勒斯滂海峡的基诺塞马，雅典人用76艘战船击溃了伯罗奔尼撒人的86艘战船。

普律尼科司观点的缺陷在于，雅典人遵从了他的建议，就永远不能确认自己有无能力与敌交战。斯巴达人完全可以拒绝海战，而派遣军队在陆路行动；即便他们选择走海路，也可以避开雅典海军，煽动更多叛乱。雅典人迫使敌人在海上与其交锋的最大希望在于，用一支表面上处于弱势的舰队引诱敌人进攻。普律尼科司若是没有摈弃机遇，就有可能迫使泰里蒙涅斯为了挽救米利都而在海上与雅典人交战。雅典人若是留在米利都作战，整个战争的轨迹都可能发生变化。雅典人的撤退不仅给了叛军喘息之机和新的希望，在国内还使十位贤哲的温和民主制政权失去了一次胜利。若是有了这次胜利，民主制政权就能获得莫大的威望和公信力，雅典也就能抵御正在酝酿的寡头派阴谋。

斯巴达人目前在海上占据数量优势，他们可以用舰队解除雅典人对希俄斯岛的围困，而希俄斯岛是伊奥尼亚叛乱的关键所在，也是通往赫勒斯滂海峡的战略要地。但是，斯巴达人动作太慢了。他们仍然害怕在宽阔海域与雅典海军对抗，并且缺乏有经验和有才干的领导人。他们承担的与波斯人合作的义务也很有问题，因为他们与波斯人各自心怀鬼胎，目标不一致，必然导致延误与迟滞。

亚西比德投奔波斯人

在伊阿苏斯攻击阿摩基斯之后，泰里蒙涅斯回到了米利都。斯巴达海军司令阿斯泰奥库斯还在希俄斯岛，他和他的舰队之间被萨摩斯岛的雅典舰队阻隔。大约在前412年11月初，提萨弗涅斯来到米利都，带来了他承诺的军饷：每名水手日薪1阿提卡德拉克马，发放一个月的薪水。但他宣布，他将来只会付这个标准的一半。脾气火爆的叙拉古指挥官赫莫克拉提斯迫使他做了妥协，将未来的军饷标准提高了一点点。

亚西比德没有参加这些讨论，因为在米利都战役之后他又一次改换阵营，离开了斯巴达人，投奔提萨弗涅斯。“在卡尔基丢斯死亡和米利都战役之后”（8.45.1），伯罗奔尼撒人普遍对他产生了猜忌。这位雅典变节者曾与卡尔基丢斯紧密合作，但卡尔基丢斯在一次袭击中阵亡，于是亚西比德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大约同一时期，恩狄乌斯的监察官任期结束了，于是亚西比德在最需要靠山的时候失去了另一位位高权重的朋友，此时“他是阿基斯二世的私敌，而且由于别的原因，得不到斯巴达人的信任”（8.45.1）。他的出身、个性和履历一直让斯巴达人对他抱有怀疑，但古代作家没有解释为什么在伊奥尼亚的伯罗奔尼撒人突然相信他参与了叛变阴谋，并敦促给海军司令阿斯泰奥库斯送信，让他杀掉亚西比德。

原因或许是亚西比德在斯巴达鼓吹的计划失败了。雅典人似乎很快就镇压了帝国境内的叛乱；希俄斯岛不再是叛乱的中心和策源地，而是遭到围困并消耗着伯罗奔尼撒联盟的资源。亚西比德似乎还说服了斯巴达人与波斯合作。波斯人承诺向斯巴达军队支付军饷，但拖了很久才支付，如今还打算削减军饷。在亚西比德的建议下，卡尔基丢斯与波斯人缔结了对斯巴达不利且似乎认可大流士二世奴役希腊人的条约。在米利都，雅典人在一场陆战中击败了伯罗奔尼撒人，提萨弗涅斯的雇佣兵在此役中没有给伯罗奔尼撒人带来多少益处。提萨弗涅斯利用泰里蒙涅斯指挥的伯罗奔尼撒军队，不是为了打败雅典人，而是为了攻击阿摩基斯和伊阿苏斯。

亚西比德可能是在得知要求处死他的信件之后改换阵营的，所以当提萨弗涅斯于11月初到米利都时，亚西比德应当已经在他麾下有几周了。修昔底德说，亚西比德成了总督“大小事务的顾问”，提萨弗涅斯“对他十分信任”（8.45.2；46.5）。但这个波斯人自己也是个非常精明世故的家伙，他接纳了这个两次变节的逃亡者。

无论对提萨弗涅斯还是对斯巴达人，双方的合作都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叛乱并没有在雅典帝国境内迅速蔓延并很快带来胜利，所以战争还会继续下去，需要大量兵力和巨额资金，至少一部分资金需要由提萨弗涅斯提供。亚西比德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大阵营中都有价值很高的联系人，可以担当提萨弗涅斯的代言人，有效地帮助他与两大阵营打交道。亚西比德则需要波斯总督的保护，也需要他顾问身份的地位：波斯总督是有可能决定战争结局的人，而他是深得总督信任、与其过从甚密的人，总督非常需要他，所以他也许有一天能够重返雅典。在此之前，他始终待在提萨弗涅斯身边，似乎能够影响后者的决策，这对他十分有利。当然提萨弗涅斯之所以允许这种局面存在，也是因为它对自己有利。

亚西比德能够为提萨弗涅斯提供战略意见。他建议提萨弗涅斯“不要太急于结束战争，不要将陆地和海洋都交给同一个国家，所以不要将他正在准备的腓尼基[5]船只调来，也不要增加他雇佣并发饷的希腊人数量”。最好的办法是“让希腊人自相残杀，将他们全部拖垮”（8.46.1-2）。亚西比德这么说可能是在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波斯人在爱琴海没有海军，没有办法赢得战争。至于腓尼基舰队，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有关它的计划。提萨弗涅斯是否真的打算借力腓尼基舰队，我们不知道；但在前412年初冬，并没有一支腓尼基舰队可供他调用。

亚西比德还建议提萨弗涅斯与斯巴达决裂，与雅典拉近关系。他指出，雅典人是玩世不恭的帝国主义者，会轻易放弃在小亚细亚的希腊

人，任凭他们被波斯人统治，并且“是波斯帝国更合适的伙伴”，而斯巴达人是希腊人的解放者，会继续支持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所以，提萨弗涅斯应当“首先拖垮斯巴达与雅典双方，然后尽可能削弱雅典人的力量，最后将伯罗奔尼撒人从他的领地驱逐出去”（8.46.3-4）。这个建议从根本上讲是荒唐的，严重歪曲了斯巴达与雅典双方的秉性，但它符合亚西比德的需求。目前，对他来说最大的危险来自斯巴达人。另外，如果他能使波斯人与斯巴达人分道扬镳，就能获得雅典人的感激，或许还能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提萨弗涅斯没有上亚西比德的当，而是执行对他自己合适的政策。他给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饷比第一批少了一些，而且也不按时发放，并不断向他们许诺，腓尼基舰队很快就会抵达，以让伯罗奔尼撒人留在自己身边但无所作为。

斯巴达与波斯的新协定

在前412年的最后三个月，伯罗奔尼撒舰队停留在米利都，而雅典人在萨摩斯岛集结了104艘船只，继续控制着大海。他们派遣舰队执行了各种任务，但斯巴达人仍然拒绝在海上应战，即便是他们拥有数量优势的时候。只有在希俄斯岛的阿斯泰奥库斯比较有进取心。上文已经讲到，他扣押了一些希俄斯人作为人质，以防止岛上发生革命；他还在这个地区发动了攻势，但他对大陆上雅典要塞的攻击失败了，最后由于天气恶劣而终止了行动。莱斯博斯岛派来使者，请求他帮助他们反抗雅典。他打算与莱斯博斯人合作，但斯巴达的盟邦在科林斯人的领导下拒绝接受，因为他们之前在莱斯博斯岛吃过败仗。过了一段时间，莱斯博斯人再次发出请求，这一次阿斯泰奥库斯敦促佩达里图斯（希俄斯岛的斯巴达总督）与他一起发动远征，“他们要么能够得到更多盟友，要么虽然不能得到盟友，却能打击雅典人”（8.32.3）。但佩达里图斯在希俄斯人的支持下拒绝参与。阿斯泰奥库斯愤怒地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在离开希俄斯岛的时候发誓说，如果希俄斯人将来需要他的帮助，他绝不会来援助他们。

随后阿斯泰奥库斯前往米利都，去接管斯巴达主力舰队的指挥权，但在他抵达之前，斯巴达人和波斯人开始修改他们的第一份条约草案。斯巴达人提出开展新的谈判，以修改之前的不平等条约，谈判由泰里蒙涅斯执行，随后签订的条约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在某些方面，他对条约做了修改。一个新条款按照通常习惯，规定两国互不侵犯，而不是像之前那样规定亚洲的希腊城邦“属于”波斯国王。要求两国互相帮助以镇压叛乱的条款只对波斯有利，因此被删除了。新条约具体规定了波斯国王的义务，即支付他召唤的希腊军队的军饷，并明确规定两国的盟约为“友好条约”（8.37.1）。但这些修改只能算是文字游戏，因为波斯已经达到了目的，即利用伯罗奔尼撒军队来俘获阿摩基斯、占领伊阿苏斯，它近期内不再需要伯罗奔尼撒人的帮助了。

斯巴达却又一次做出了重大让步。卡尔基丢斯谈出来的条约要求两国阻止雅典人从其附庸国那里收缴贡金，新条约却禁止斯巴达人收缴任何贡金，这等于禁止建立一个斯巴达帝国以取代雅典帝国。波斯人答应为希腊军队支付军饷，但仅限于波斯国王传唤的那些部队，然而其他部队也需要吃饭。条约没有讲到波斯人应当支付的酬金具体数额。条约的主要变化在第一条：“对于大流士二世国王、国王父亲或其祖先曾拥有的任何领土和城市，斯巴达人或其盟邦都不得攻击和伤害。”（8.37.2）提萨弗涅斯近期害怕斯巴达会攻击他自己的领地，并试图从被波斯人视为自己领土的城市征集资金。泰里蒙涅斯谈出来的条约要求斯巴达人不得采取这些行动。

斯巴达领导人为什么又要缔结一份对自己不利的条约？泰里蒙涅斯既不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也不是经验丰富的谈判者，但即便是绝顶聪明、身经百战的老外交家在当时的环境中也很难做得比他更好，因为斯巴达人的处境很糟糕，没有资格讲条件。提萨弗涅斯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如果斯巴达人对他不满，他也无所谓，因为是斯巴达人急需波斯的金钱和支持来对付恢复了元气的雅典人。与波斯人缔结条约之后，泰里

蒙涅斯正式将他的舰队交给海军司令阿斯泰奥库斯，然后乘坐一艘小船离开了，从此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对他后来的命运一无所知。

尽管在米利都的时候阿斯泰奥库斯占据数量优势，他有约90艘三列桨座战船，而雅典人在萨摩斯岛只有74艘，但他拒绝交战，即便雅典舰队多次出动袭扰他。他的水手们开始抱怨，他这种避免交战的政策会有损伯罗奔尼撒联盟的事业，他一定是收了敌人的贿赂，“他为了一己私利……听命于提萨弗涅斯”（8.50.3）。实际上很容易解释阿斯泰奥库斯的无所作为，这并非由于他腐化和叛变。和绝大多数斯巴达海军指挥官一样，他天性谨慎，不愿意与雅典人交锋。而且说不定他相信提萨弗涅斯的诺言，即提萨弗涅斯将借腓尼基舰队来击败敌人，所以他在耐心等待腓尼基舰队的到来。

雅典人转向希俄斯岛，在该岛的东海岸登陆，开始在德尔菲尼昂设防，这是希俄斯岛首府以北的一个战略要地，拥有良港。与此同时，佩达里图斯处决了那些被怀疑同情雅典的分子，将温和派政权换为一个由小团体执政的寡头政权，他的严厉措施似乎把岛内支持雅典的活动镇压下去了。希俄斯人人人自危、心惊胆战、互相猜忌，并对雅典人非常畏惧。在这种困境中，他们请求阿斯泰奥库斯的帮助，但他仍然拒绝帮助他们。佩达里图斯返回斯巴达去检举海军司令行为不端，但他的努力在当下还没有收到任何成效。在德尔菲尼昂的雅典要塞对希俄斯人的危害就像狄凯里亚的斯巴达要塞对雅典人的危害一样，在某些方面更甚。希俄斯人拥有数量非同一般的奴隶，且对他们非常严酷。许多奴隶逃到德尔菲尼昂的安全地带，他们愿意以任何方式帮助雅典人。由于雅典人仍然掌握制海权，所以希俄斯人无法进口任何生活必需品。绝望之下，他们又一次哀求阿斯泰奥库斯“不要坐视不管，不要眼睁睁地看着伊奥尼亚最伟大的盟邦在海上被切断、在陆地遭袭击”（8.40.1）。

但阿斯泰奥库斯仍然不为所动，而且他有很好的理由：他和希俄斯

人之间隔着101艘雅典战船，其中74艘在萨摩斯岛，27艘在希俄斯岛。不过，斯巴达盟邦被希俄斯岛的求救感动了，敦促阿斯泰奥库斯去援救他们。面对这种压力，同时或许还害怕遭到斯巴达国内的批评或甚至更糟糕的反应，他终于做出了让步，同意起航。

斯巴达的新战略

但在阿斯泰奥库斯出航之前，有消息称安提西尼正率领一支舰队前来，并带来了11名顾问，这些顾问奉命“分担指挥事务，斟酌最有利之途径”（8.39.2；41.1）。这群顾问的领导人是富裕、有名且颇具影响力的利卡斯，奥林匹克运动会赛车竞技的胜利者和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一个人就能压倒海军司令。利卡斯和其他顾问拥有一项史无前例的权力：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可以罢免阿斯泰奥库斯，并以安提西尼取而代之。无疑是佩达里图斯的检举信促使斯巴达政府派出了这个顾问团，但也是由于斯巴达国内对阿斯泰奥库斯表现的不满。顾问们还有一项使命是集结尽可能多的船只，将其交给兰斐亚斯之子克里阿库斯指挥，并将这支舰队送到赫勒斯滂海峡的法那巴佐斯处，以封锁海峡、切断雅典的商路。

这是斯巴达战略的根本性转变，肯定受到了原计划失败的影响，也反映了政治上的新动态。原先支持远征希俄斯岛计划的是恩狄乌斯和亚西比德，如今监察官恩狄乌斯已经离职，而雅典变节者也已经跑到提萨弗涅斯麾下。希俄斯岛遭到围攻，雅典人卷土重来，伯罗奔尼撒军队表现不佳或无所作为，与波斯的谈判仅得到了无法令人满意的协议和不可靠的支持，所以现在斯巴达人相信应当改换战略了。佩达里图斯的检举信在很大程度上是催化剂，促使斯巴达人重新考虑正在执行的政策。

为了避开雅典舰队，安提西尼的船只选择了非常迂回曲折的路线，在小亚细亚南海岸的考努斯登陆。他们在那里要求阿斯泰奥库斯派船只护送他们到米利都（目前伯罗奔尼撒联盟在伊奥尼亚的主要基地），因

为他们预计米利都将遭到雅典人的挑战。阿斯泰奥库斯立刻抛弃了驶往希俄斯岛的念头，“他觉得没有什么比护送这样一支大舰队更重要，他们合兵一处便可以主宰大海，将受命前来调查他的斯巴达人安全送过来”（8.41.1）。这意味着放弃希俄斯岛和那里的斯巴达军队，但来自考努斯的传唤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借口去避免远征希俄斯岛，即便那些心急如焚的盟友也不得不接受现实。

雅典人在得知安提西尼抵达考努斯后，派遣了20艘战船南下去拦截他，而阿斯泰奥库斯率领64艘战船去为安提西尼护航。雅典人毫不犹豫地仅派遣了20艘战船去抵挡兵力远胜于己的敌人，在萨摩斯岛仅留下54艘战船对付米利都的90艘敌船。南下的20艘雅典三列桨座战船应当会途经米利都，但指挥官卡尔米努斯似乎对斯巴达人的攻击威胁不以为意。

阿斯泰奥库斯率军南下，希望尽快与安提西尼会合。途中，大雨和浓雾打散了他的舰队，混乱中他撞上了雅典舰队。尽管卡尔米努斯也吃了一惊（他对阿斯泰奥库斯的计划一无所知，以为自己只会遇上安提西尼的27艘战船，而不是阿斯泰奥库斯的64艘），但还是决定进攻。在大雾掩护下，雅典人重创阿斯泰奥库斯左翼，但令他们瞠目结舌的是，整个斯巴达舰队将他们包围了。他们成功突围，损失了6艘战船。阿斯泰奥库斯没有追击他们，而是去了克尼多斯，在那里与考努斯的部队会合。随后，合兵一处的大舰队才驶往西米岛[6]，在那里建造了纪念碑，以宣扬战胜卡尔米努斯20艘战船的胜利。

但雅典人没有让斯巴达人长时间地享受胜利。尽管他们在萨摩斯的舰队加上卡尔米努斯的船只一共不到70艘三列桨座战船，而阿斯泰奥库斯有90艘战船，但雅典人还是主动出击为自己的“失败”复仇。然而这不过是徒劳一番。阿斯泰奥库斯虽然占据了这样大的数量优势，却仍然不肯出战。伯罗奔尼撒舰队合兵一处之后，顾问们开始调查阿斯泰奥库斯受到的指控，最终将他无罪开释，并确认了他的职务。

现在舞台搭好了，斯巴达人可以将他们的满腹怨言倾诉给提萨弗涅斯了，为他们发言的是威望极高的利卡斯。尽管斯巴达指挥官们的所作所为似乎表明他们与波斯的两份条约是有约束力的，但实际上斯巴达政府始终没有正式批准条约。利卡斯现在对两份条约表达了蔑视。“这太不像话了，”他说道，“波斯国王居然仍然自称统治着他和他的祖先曾经占领的土地，因为这意味着所有岛屿、色萨利、洛克里斯和远至玻俄提亚的所有地方将再次被他奴役；斯巴达人给希腊人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波斯帝国的桎梏。”他警告道，除非修改条约，否则“斯巴达人不会遵守条约，也不会以此为条件寻求支持”（8.43.3-4）。

利卡斯如此愤愤不平，很难说他是真的热爱希腊人的自由，以至于对波斯义愤填膺，因为不久之后他就参加了第三份条约的谈判。而根据此份条约，亚洲的希腊城邦将被交给波斯，并且倒霉的米利都人“和其他所有位于波斯疆域内的城市都将成为波斯国王的奴隶，不过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8.84.5）。或许利卡斯相信前两次条约的谈判者受到波斯的恫吓，过于温顺，所以采用更强硬的路线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更好的结果包括：关于希腊城邦地位的措辞不要让“希腊的解放者”斯巴达那么尴尬，以及波斯对斯巴达的财政支持的具体条件应当得到明确和改善。如果利卡斯这么想，就要失望了，因为提萨弗涅斯听了他的话，大发雷霆，拂袖而去。他清楚地认识到，斯巴达人需要他胜过了他需要斯巴达人，所以他完全可以等待，直到斯巴达人理解这一点。

对利卡斯的举动，我们还有一个解释，即他从斯巴达政府那里收到的命令是要求斯巴达指挥官们将战场从伊奥尼亚转往赫勒斯滂海峡，离开提萨弗涅斯辖区，改到法那巴佐斯辖区，因为法那巴佐斯或许是一个更好相处的搭档。或许利卡斯希望法那巴佐斯知道他与提萨弗涅斯谈判的基调，这也许能够有效地警示法那巴佐斯，斯巴达人进入了一个新战区。

罗德岛的叛乱

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耽搁了斯巴达人北上的行动。罗德岛的一群寡头派来到克尼多斯，希望说服斯巴达领导人支持岛上民主制城邦反叛雅典、培植寡头政权，并将罗德岛的丰富资源和充沛人力交给伯罗奔尼撒联盟。

斯巴达人很快就同意了，希望这次强有力的财富和人力输入能够帮助他们维持舰队，而无须向提萨弗涅斯要钱。他们的94艘战船驶往罗德岛西岸的卡米鲁斯，打得这座城市措手不及。前411年1月，罗德城、林都斯[7]和伊阿里苏斯[8]投奔了伯罗奔尼撒人。

现在，雅典未能占领米利都的错误酿成了恶果。他们从萨摩斯岛抵达罗德岛时，为时已晚，已经无法阻止叛乱。普律尼科司声称雅典人“已经有充裕时间做妥善准备……可以择日再战”，但罗德岛形势证明了他的判断是多么荒谬。75艘雅典三列桨座战船停泊在罗德岛岸边，向94艘斯巴达战船发起挑战，要求到外海交战。斯巴达人拒绝应战，于1月中旬将他们的船只拖到了罗德岛岸上，直到春季才将船只再次入水。

雅典人终于认识到，前一年没有在米利都与伯罗奔尼撒舰队交战是多么严重的错误，于是罢免了普律尼科司和斯基罗尼德斯，代之以列昂和狄奥墨冬。两位新将军立刻攻击罗德岛（此时伯罗奔尼撒人的船只还停放在岸上），击败了一支罗德岛陆军，然后转向附近的哈尔基岛[9]，从那里继续袭击和监视伯罗奔尼撒人。

此时，佩达里图斯向罗德岛上无所事事的斯巴达人呼救，求他们支援希俄斯岛。他解释说，雅典人在希俄斯岛的防御工事已经竣工，除非伯罗奔尼撒舰队全体火速赶来援救，否则希俄斯岛必将失陷。在等待伯罗奔尼撒舰队的时候，佩达里图斯自己用雇佣兵和希俄斯人攻击了岛上的雅典要塞，缴获了几艘停在岸上的船只，但雅典人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反击，将佩达里图斯杀死。希俄斯人“在海陆两面，受到比以往更严密

的封锁，发生了严重的饥荒”（8.56.1）。

罗德岛上的斯巴达指挥官不能无视希俄斯岛的求援，准备起航去援救，尽管此时发生了另一件十万火急的事情。玻俄提亚人占领了与优卑亚岛仅隔一条狭窄海峡的奥罗浦斯，优卑亚人大受鼓舞，掀起了叛乱，并请求伯罗奔尼撒舰队援助。任何地方的叛乱对雅典形成的威胁都比不上优卑亚岛，然而罗德岛的伯罗奔尼撒舰队却忽视了优卑亚人的求救，于3月前往希俄斯岛。途中，他们发现了从哈尔基岛北上的雅典舰队，但雅典人并不寻求与之交战，而是“继续前往萨摩斯岛”。然而仅仅是瞥见了雅典人，就足以让斯巴达人胆战心惊地撤回米利都，“因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完全避免交战而成功地救援希俄斯岛”（8.60.3）。

优卑亚岛的重要性

双方在此事中的行动都需要解释。斯巴达人因为害怕雅典舰队而将船只在罗德岛岸上停放了一整个冬天，现在却出航北上，朝着雅典舰队的方向前进，那样必然与之发生冲突。但在看到敌人之后，斯巴达人又逃回了港口。雅典人前往哈尔基岛就是专门为了在海上捕捉斯巴达人，迫使其与己方交战。但机会终于出现时，他们却将机会白白放过了。

了解双方这些怪异行为的关键是，优卑亚岛对各参战国的重要性。一方面，优卑亚岛对雅典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年晚些时候优卑亚岛发生叛乱，“雅典人比以往恐慌得多。不管是当时特别严重的西西里岛灾难还是其他事件，都不曾让他们如此魂飞魄散”（8.96.1）。由于优卑亚岛“对雅典人的价值超过阿提卡”（8.96.2），在爱琴海的雅典指挥官的首要任务一定是立刻起航去保卫优卑亚岛，尽管这样会使罗德岛的斯巴达舰队兴风作浪、掀起新叛乱、援救希俄斯岛、威胁萨摩斯岛和莱斯博斯岛，并前往赫勒斯滂海峡，威胁雅典人的生命线。但是，雅典人并没有去优卑亚岛，而是去了萨摩斯岛，因为从那里可以迅速行动，要么赶往优卑亚岛，要么切断斯巴达舰队。雅典人在北上途中并不寻求与斯巴

达人交战的原因是，他们希望尽快抵达萨摩斯岛，以做好准备受命赶往优卑亚岛。

另一方面，斯巴达人在得知奥罗浦斯被占领和优卑亚岛的叛乱后，推断雅典人会立刻起航，使斯巴达人北上的路途畅通，于是斯巴达人就能去救援希俄斯岛。但当他们看到雅典舰队恰恰就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时，便放弃了希俄斯岛，选择返回米利都的主基地，因为那条道路是安全的。

与此同时，爱琴海发生的事情已经改变了提萨弗涅斯对局势的判断。他与斯巴达拉开距离，因为斯巴达看起来是两个大国中更强的那个，而他的战略是将两国都拖垮。利卡斯的强硬言辞或许使提萨弗涅斯觉得雅典人是更好的合作伙伴，但这年冬季的事件证明他的判断是错误的：雅典人虽然数量较少，却仍然控制着大海，而斯巴达舰队显然不敢与雅典人交战。提萨弗涅斯不再关心斯巴达能否取胜，而是关注斯巴达人的绝望可能促使他们做出什么事情来。斯巴达人从罗德岛征集的资金不足以维持伯罗奔尼撒舰队一个月的时间，更不用说他们在那里实际停留的八十天了。提萨弗涅斯担心斯巴达人在资金耗尽后，“会被迫打一场海战，并且一定会失败或者水手大量逃亡，使斯巴达船只空空荡荡，雅典人在不需要提萨弗涅斯帮助的情况下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除此之外，他最害怕的是斯巴达人会为了寻找粮草和金钱而蹂躏（亚洲）大陆”（8.57.1）。他希望斯巴达舰队留在米利都，接受他的管制；舰队可以保卫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免遭雅典人攻击，他也可以监视舰队的一举一动。

与波斯的新条约

斯巴达人至少同样急切地希望与波斯人和解。波斯人与雅典人的谈判令斯巴达人越来越紧张，斯巴达人缺乏资金；这个冬季的事件也表明，他们若希望在海上击败雅典，就需要依赖波斯人的大规模援助。于

是，斯巴达领导人于2月在考努斯与提萨弗涅斯谈判，缔结了一份新条约。和之前的条约一样，它当中包含一个互不侵犯的条款，提及波斯给斯巴达的经济援助，以及无论战争还是和平都共同进退的承诺，但这份最新条约与之前版本的差别具有关键意义。这将是一份正式条约，需要两国政府的批准。大流士二世国王一定批准了条约的第一条——“亚洲的全部属于波斯国王的领土将为波斯国王所有；波斯国王对如何处置其领土可以自行决断。”（8.58.2）虽然这种说法非常冠冕堂皇，却放弃了之前条约中涉及的关于欧洲土地的内容，这是对利卡斯做出的让步。但是，大流士二世对亚洲的绝对主宰是非常明确的。

这份条约与之前几次的最重要差别之一在于，它提到建议动用“国王的船只”。前几次条约的意思基本都是，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将承担作战任务，波斯国王仅有经济义务。但根据新条约，大流士二世的海军将承担取得军事胜利的使命和重担。波斯代表现在同意，仅在国王的船只抵达之前，出资维持伯罗奔尼撒军队；国王的船只抵达之后，伯罗奔尼撒军队可以自费继续留在战区，或者从提萨弗涅斯那里接受金钱，但这不是无偿资助，而是要在战后偿还的贷款。波斯与斯巴达两国将并肩作战。

实际上，波斯战船对希腊战船的战例很不光彩，而且波斯人始终没有投入一支自己的舰队。不管波斯海军的战斗力究竟如何，波斯人投入增援部队的承诺促使利卡斯和其他斯巴达领导人批准了新条约，尽管它实质上比前几次条约好不了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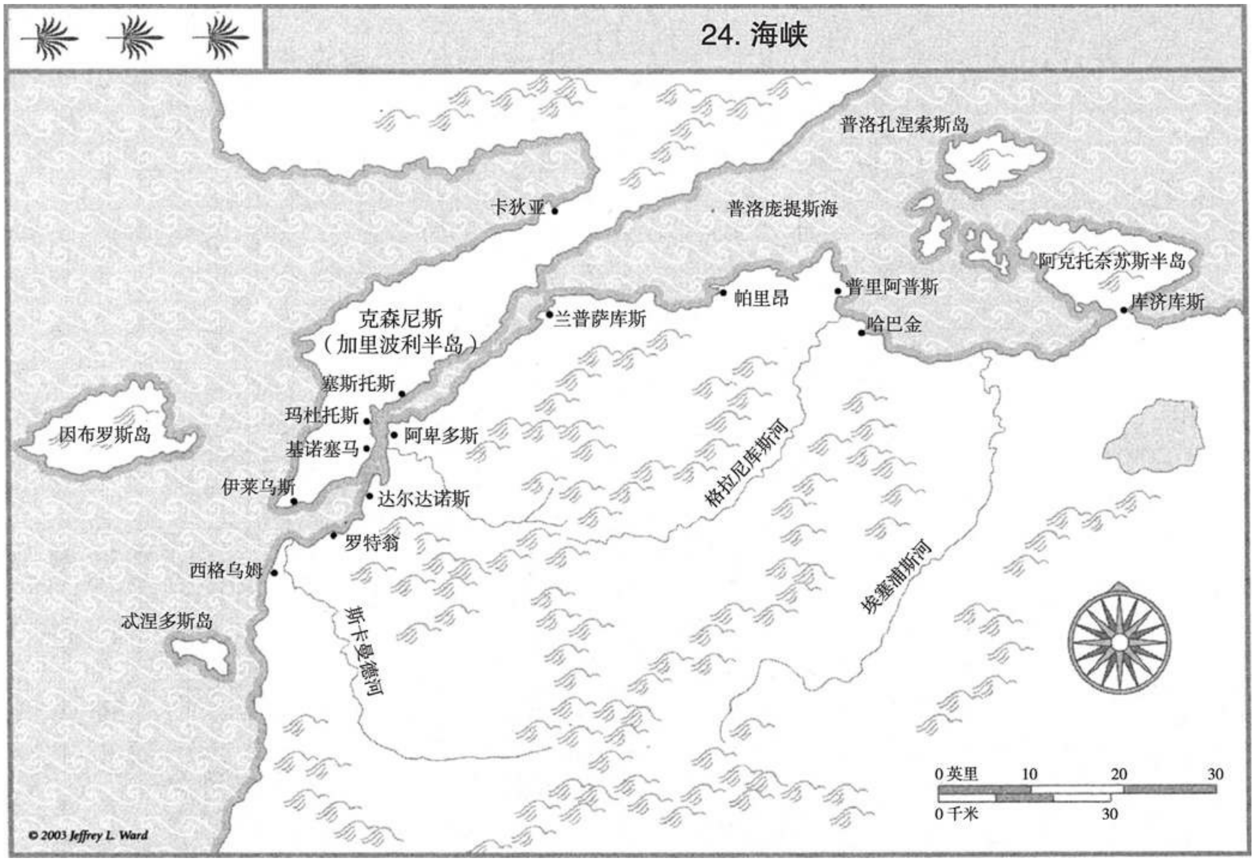
就连波斯人放弃亚洲之外领土的宣言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波斯人在这一条上并无诚意。但是，斯巴达人正式放弃了在亚洲的希腊领土，还放弃了他们作为希腊民族解放者的身份，这是新条约中令斯巴达人非常窘迫的让步。自雅典在西西里岛的灾难以来，斯巴达人对雅典的屡次作战均告失败，所以他们相信要赢得这场战争，除了与波斯人合作

之外，别无他法。

斯巴达人在赫勒斯滂海峡

尽管波斯人始终没有派来舰队，波斯的金钱的确帮助斯巴达人恢复了主动权，而波斯与斯巴达和解的消息甚至受到了一些小亚细亚希腊人的欢迎。因为斯巴达人没有能力在海上挑战雅典，他们现在选择了除此之外的唯一办法：派遣一支陆军，在德尔库利达斯将军的统领下，从陆路去往赫勒斯滂海峡。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米利都的殖民地阿卑多斯（在亚洲海岸），但他们抵达海峡之后，又希望在这整个地区煽动反对雅典的叛乱，并切断雅典的贸易路线和粮食补给线。伯罗奔尼撒军队出现在赫勒斯滂海峡至少能迫使雅典人将其舰队从爱琴海往北调动，使各附庸国有机会反叛。

前411年5月，德尔库利达斯抵达了赫勒斯滂海峡，很快就煽动了阿卑多斯及其附近的兰普萨库斯（见地图24）的叛乱。雅典将军斯特罗姆比基德斯率领24艘船只（其中一些是载着重步兵的运兵船）收复了兰普萨库斯，但无法夺回阿卑多斯。在赫勒斯滂海峡欧洲一侧的塞斯托斯，他建立了“一座要塞和监视整个赫勒斯滂海峡的瞭望哨”（8.62.3），但他无法将斯巴达人从这个关键水道的据点逐出。



斯巴达的新战略很快就对爱琴海战区产生了影响。一段时间以前，斯巴达人派遣军官列昂去接替佩达里图斯的希俄斯岛总督职位。列昂带着12艘战船从米利都出发，与24艘希俄斯三列桨座战船会合，组成了一支36艘战船的舰队。雅典人派遣了32艘船只去拦截他，但其中一些是运兵船，它们在海战中没有用。尽管伯罗奔尼撒舰队占了上风，却无法在天黑之前赢得一次决定性胜利。雅典人对希俄斯岛的封锁仍在继续，但伯罗奔尼撒人及其盟友已经证明，他们在海战中完全可以打得很出色。

随后，斯特罗姆比基德斯被迫将雅典舰队的大部分调到赫勒斯滂海峡，只留下8艘战船守卫希俄斯岛周边海域。这让阿斯泰奥库斯鼓起勇气，从萨摩斯岛旁溜过，抵达希俄斯岛。然后，他率领从希俄斯岛和米利都征募的100多艘战船从希俄斯岛出发，前往萨摩斯岛，与雅典人争夺制海权。他鼓起勇气，而敌人却越来越怯懦，雅典人不肯应战。修昔底德解释说，雅典人没有出来与阿斯泰奥库斯交战，是因为“他们互相

猜忌”。这指的是前不久雅典国内爆发的一场冲突，将雅典公民分成了互相敌对的派系，对雅典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突然间，整个局势发生了逆转：雅典丧失了制海权和战争主动权，并且受到内斗的困扰。

---

[1] 爱里苏斯是莱斯博斯岛西南部的一个村庄。

[2] 安提萨是莱斯博斯岛西端的一个港口城镇。

[3] 在今天土耳其的西南角，当时属于卡里亚地区。

[4] 斯皮赖昂。

[5] 腓尼基文明的发源地在今天地中海东部，大致在今日黎巴嫩一带，是重要的航海和商业文明，在地中海周边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和城邦。前539年，腓尼基本土被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征服，从此沦为波斯的附庸国。许多腓尼基人逃往迦太基和其他腓尼基殖民地。在波斯统治下，腓尼基本土发展繁荣，为波斯帝国提供船只和水手。

[6] 在罗德岛北面不远处的一个小岛。

[7] 罗德岛东部滨海城镇。

[8] 罗德岛东北部城镇。

[9] 在罗德岛以西约6公里处。

第二十八章 革命运动（前**411**年）

自前431年战争爆发以来，雅典人民在二十年的热战和冷战中表现出了令人称赞的团结。他们无法自由使用乡村的农场和房屋，被迫挤进拥挤的城市中心，遭受严重的瘟疫，最后还在西西里岛蒙受了惨重损失，经历了可怕的苦难，但他们仍然团结一心。自一百年前雅典驱逐僭主以来，雅典人一直保持着这值得称道的团结统一。西西里岛灾难之后，雅典人出人意料地迅速夺回了制海权，似乎能消除那次蹩脚行动的恶果，收复帝国境内的失地，也似乎能重获胜利的希望。然而，波斯的参战使这些前景都暗淡下来。前411年，潜伏已久的敌视民主制的力量开始在雅典复苏，其利用波斯的严重威胁和亚西比德的野心，去攻击民主制政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前411年是雅典从僭主统治中获得解放（此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制政权）的一百周年纪念。在这一百年里，雅典发展得繁荣强盛，雅典人民渐渐将民主制视为雅典理所应当的政体。不过，民主制在希腊各城邦当中还是很少见的，大多数城邦都由寡头政权统治，有的寡头统治集团人数较多，有的则较少。雅典的上层阶级也接受了民主制，参与争夺领导权的竞赛，或简单地置身事外，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雅典几乎所有的主要政治家都是贵族出身。

贵族传统

有些贵族从来没有抛弃对民众统治的鄙夷，这种偏见在希腊传统中根深蒂固。在荷马史诗里，贵族做出决策，发布命令；普通百姓安于自己的位置，服从贵族。前6世纪时的墨伽拉诗人泰奥格尼斯是贵族，但他的世界被政治和社会变革颠覆了，他的诗歌带有愤恨，他的思想一直到前4世纪仍然对反对民主制人士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泰奥格尼斯根据

出身将人类分为两种：善良且高贵的人和恶劣且卑贱的人。只有贵族拥有判断力和虔敬，只有他们能做到温和、克制和公正。广大群众缺乏这些美德，因此是无耻而傲慢的。另外，好的品质是无法传授的："生养一个人容易，教他理智却很难。从来不曾有人找到一种办法，让一个蠢货变聪明，也不能让坏人变善良……如果能够炮制思想并将其灌输给一个人，那么一个好人的儿子永远不会变坏，因为他会听从好的建议。但永远没有办法通过教导让坏人变好。"（Theognis 429-438）

前5世纪中叶时底比斯诗人品达的观点受到雅典上层阶级的极大推崇。他的思想与泰奥格尼斯如出一辙：出身高贵的人天生就在智力和道德上比广大群众优越，而这种差距是不能通过教育来消除的。

光辉血统的意义重大。

一个人可以学习，却仍然昏聩无能，

东摇西晃，始终步履蹒跚，

他的头脑粗陋，

吸收了一千种美德的碎片。

（*Nemea* 3.40-42）

只有天生睿智的人才能理解：

我臂弯下的

箭筒里

有许多锋利的箭。

它们对理智者发言；

大多数人需要译员。

睿智的人凭借血统便懂得许多事情；

粗陋的人需要被教导。

他们什么都说。他们无聊地喋喋不休，

像乌鸦，与宙斯的圣鸟形成对比。

（*Olympia* 2.83-88）

在被这种思想塑造的人看来，即便说得好听些，民主制也是愚蠢的，它也可能变得不公正和不道德。前5世纪20年代一位佚名作者（常被称为“老寡头派”）写的小册子《雅典政制》[1]揭示了一些雅典人在战争期间的不满情绪。“至于雅典人的政制，我不会赞扬他们选择了这种政制，因为他们这么做就是将大部分权力交给了粗鄙民众，而非善人。”（1.1）那些安全而有薪水的职位给了群众；那些危险的职位，如将军和骑兵指挥官，则由选举产生，给了“最有资格的人”（*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1.3）。

“老寡头派”这样的人的愿望是，他们的国家能成为一个“欧诺弥亚”[2]。这是斯巴达人给他们的政体取的名字，品达也用这个说法来称呼科林斯的寡头政权。在这样的政体下，最优秀和最有资格的人制定法律，好人惩罚坏人；好人“不会允许疯子出席议事会或者在公民大会发言。但由于这些好的措施，人们当然会陷入奴役”（1.9）。作者希望群众通过奋斗来保持民主制这种“恶政”，因为这对他们有好处。“但任何更愿意居住在寡头制城市而不是民主制城市的人，就要做好变得不道德的准备，因为他们知道，坏人在民主制城市比在寡头制城市更容易潜伏、不引人注意”（2.19）。不足为奇的是，抱有这种信仰的人将把推翻民主制视为道德义务。

民主制与战争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对民主制的敌视不仅仅是哲学思考，还变成了实际问题。漫长的战争、苦难和匮乏，无法赢得决定性胜利的所有

战略，以及西西里岛灾难，人们很容易将这些归罪于政权的性质和领导政府的人。雅典长期缺少像客蒙和伯里克利那样强势且受尊重的贵族领导人，也缺乏民主制和反对者之间的缓冲地带。前411年，领导权的真空似乎增加了政治俱乐部的权力，这些俱乐部在雅典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增加了民主制敌人的力量。这些俱乐部的成员和其他有产阶级人士为了维持战争，承担了史无前例的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在战争期间，纳税人群体也萎缩了不少，从战前的大约2.5万名成年男子减少到战争后期的约9000人。

到前411年时，许多雅典人（不仅仅是寡头派）开始考虑对民主制进行一些改良，甚至改换政权。此项运动的肇始者是流亡海外的亚西比德。和以往一样，他这么做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个人私利。他非常精明地认识到，提萨弗涅斯对他的保护是转瞬即逝的，他们发生利益分歧只是时间问题。亚西比德不可能返回阿基斯二世统治下的斯巴达，所以他准备利用他对提萨弗涅斯的暂时影响力，赢得安全返回雅典的机会。

亚西比德的第一个步骤是与萨摩斯岛上“最重要的雅典人”（可能是将军、三列桨座战船船长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在“精英人士”（8.47.2）面前提到他的名字，并告诉他们如果“精英人士”愿意以寡头统治取代民主制，那么他将返回雅典，并带来提萨弗涅斯的支持。这个计谋奏效了，“因为在萨摩斯岛的雅典士兵感到，亚西比德确实能对提萨弗涅斯产生影响”（8.47.2），于是开始通过使者与亚西比德对话。修昔底德有一段非常重要但很少引起人们注意的话，他认为寡头派运动的始作俑者是雅典领导人：“即便没有亚西比德的影响和诺言，在萨摩斯岛的三列桨座战船船长们和最显赫的雅典人也热切希望推翻民主制。”（8.47.2）

修昔底德此处说在萨摩斯岛的所有雅典领导人都抱有这样的动机，

肯定是错的，因为有一位我们知晓名字的三列桨座战船船长——斯泰里亚的吕库斯之子色拉西布洛斯——从来就不是民主制的敌人。从一开始，萨摩斯人得知有寡头派图谋推翻他们的民主制政权时，便来找色拉西布洛斯和其他人，这些人“似乎始终特别敌视那些密谋者”（8.73.4）。色拉西布洛斯和他的同僚集合起来，保卫萨摩斯民主制政权，镇压了寡头派叛乱。他们迫使所有士兵宣誓忠于民主制。完全支持民主制的军队罢免了将军们，选举了可靠的民主派人士为将军，其中就有色拉西布洛斯。在战争的余下时间里，他一直是一位忠诚的民主派领导人，在战后则是抵抗和最终推翻三十僭主寡头统治、恢复雅典民主制的英雄。如果修昔底德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或者得到的信息有误，那么他在其他地方可能同样是错误的。因此，我们绝不能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他的观点，而需要对每一个事件做出自己的分析。

色拉西布洛斯与温和派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色拉西布洛斯忠于民主制，他却是萨摩斯岛上支持亚西比德重返雅典阵营的人之一。所以，其他人欢迎这位变节者回来的原因也可能不是他对民主制政权的敌视，而是另有缘由。从一开始，萨摩斯岛上的雅典领导人就分成至少两个派系。其中之一是色拉西布洛斯的派系，修昔底德说他的“观点始终一致，即应当召回亚西比德”（8.81.1）。但这意味着在前412年年末，这位毕生忠于民主制的领导人愿意对民主制加以限制，至少是暂时的限制，因为只要当前体制还在运转，就不可能恢复亚西比德的地位。亚西比德本人起初公开表明他对寡头统治的支持，但色拉西布洛斯和其他真正的民主派可能迫使他淡化了自己的措辞。亚西比德在与萨摩斯岛的一个代表团会晤时，已经使自己的立场温和了不少，承诺“如果雅典人不处于民主制统治之下”（8.48.1），就可以将提萨弗涅斯拉到雅典同盟当中。他措辞的微妙变化是对色拉西布洛斯等人的妥协，后者愿意修改政体（贤哲的出现就已经改变了政体），但不愿意走得更远——改为寡头制。

色拉西布洛斯在说服萨摩斯岛的雅典军队授予亚西比德豁免权并选举他为将军之后，便亲自乘船去往提萨弗涅斯营地，接回亚西比德。正如修昔底德解释称："他把亚西比德带回了萨摩斯岛，因为他认为对雅典来说唯一安全的办法就是让提萨弗涅斯离开伯罗奔尼撒人，将其拉拢到雅典阵营。"（8.81.1）色拉西布洛斯相信，如果波斯和斯巴达仍然保持盟友关系，那么雅典就完蛋了。要赢得战争，雅典就必须争取波斯的支持，而只有亚西比德能办到这一点。

前411年夏季，最死硬的寡头派排斥亚西比德，认为他"不适合"参加寡头制政府，此后亚西比德向在萨摩斯岛的雅典人做了一些提议，从中可以窥见色拉西布洛斯可以接受的对民主制的限制是什么。当时亚西比德的建议是在四百人议事会通过暴力建立寡头政权之后，将其解散，并恢复旧的五百人议事会；他还要求停止向为公共机构服务的人发饷，这意味着贫穷雅典人不能再担任官职；另外还要建立五千人的政治实体，将完整、积极的公民权仅限于重步兵阶层或地位更高的人。

因此，色拉西布洛斯在当前一定愿意接受这些条件，但不接受更狭隘的四百人议事会。最适合描述色拉西布洛斯立场的是"温和派"这一传统说法。这个词在前411年指的是将战争胜利视为高于一切的人，即便胜利需要雅典民主制做出让步。

真正的寡头派

但其他一些与亚西比德谈判的人就是真正的民主制之敌了。他们也有很多种类，都希望以某种形式的寡头统治永久地取代民主制。这个阴谋集团的两位成员是普律尼科司和派桑德，他们都曾是蛊惑民心的流氓政客。战争结束几年后，一位雅典演说家指控这两人之所以协助建立寡头统治，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因对雅典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而遭到惩罚。但我们不能确定，私人的考虑是否也是让这些先前取悦民众的民主制政客参与寡头派阴谋的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他们不愿意为了赢得战争而将亚西比德召回。普律尼科司始终反对他回国，“并且表现出他自己是最希望实行寡头统治的人……他开始工作后便表现出他是最可靠的人”（8.63.3）。派桑德很快开始反对亚西比德，并成为最凶暴、思想最狭隘的寡头派领导人之一。他提议建立四百人的寡头政府，并在推翻帝国境内各民主制城邦和雅典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寡头统治倒台之后，他投奔了斯巴达人。

当在萨摩斯岛的“三列桨座战船船长和最重要人士”派代表去找亚西比德的时候，派桑德和色拉西布洛斯可能都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在会议上，亚西比德承诺“如果他们不保留民主制，波斯国王会非常信任他们”（8.48.1），就可以将提萨弗涅斯和波斯国王拉到雅典阵营。亚西比德运用他的巧言善辩消除了温和派的犹豫不决。“不保留民主制”可以用既适合温和派也适合寡头派需求的方式来阐释，而“以寡头制代替民主制”则不能做这样弹性的解读。

领导人们下一步应当做的是让“合适之人”宣誓合作，组成一个可以正常运转的政治实体。这个群体可能包括参与米利都军事行动的重步兵，但色拉西布洛斯也在其中，说明这不仅仅是一个寡头派密谋。这个新群体将萨摩斯岛的雅典人召唤起来，“公开告诉大家，如果他们召回亚西比德，并不再由民主制政权统治，那么波斯国王将成为他们的朋友，为他们提供金钱”（8.48.2）。普通士兵不知道这个群体的某些成员在密谋建立一个狭隘而永久性的寡头政权，群体内部的色拉西布洛斯等人也不知情。

修昔底德将集结起来的士兵和水手称作“暴民”，这些“暴民尽管在当时对这样的局面有些恼怒，但还是陷入了沉默，因为从波斯国王那里得到报酬听起来很诱人”（8.48.3）。修昔底德对雅典士兵和水手做如此描述是不公平的。就像他对前415年群众普遍支持远征西西里岛的解释一样，他在这里也声称贪婪是雅典人的唯一动机，尽管事实上肯定有更

复杂的情感和考虑在起作用。前412年和前411年，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的城市已经受到威胁；在随后的年月里，他们的行为也一再证明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雅典民主制的忠诚。

普律尼科司反对亚西比德

正式决定此事的时间到了之后，在领导人会议上，除了普律尼科司之外，大家都愿意接纳亚西比德。普律尼科司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亚西比德或其他任何人能够将波斯人拉拢到雅典阵营。他也不认可这样的说法，即放弃民主制有助于保全雅典帝国。他不认同阶级斗争和关于政体形式的内部争端的重要性，而认为自治权压倒一切。他警告说，雅典的任何盟邦“都不愿意被奴役，不管奴役它的是寡头政权还是民主制政权；而是希望得到自由，不管给它自由的是寡头政权还是民主制政权”（8.48.5）。

除了这些考虑之外，普律尼科司坚持主张亚西比德是不值得信任的。政体的安排对亚西比德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关心的仅仅是安全返回而已。他回到雅典城之后会引发内战，导致雅典毁灭，因此绝不能允许他回国。即便遭到了这样的强烈反对，雅典领导人毕竟急于找到改变城邦命运的办法，因此这次会议还是决定接受亚西比德的建议。他们指派派桑德领导一个使团去雅典，在那里尝试就迎接亚西比德归国的问题进行谈判，并消灭现行的民主制政府，争取提萨弗涅斯的支持。

普律尼科司现在发现自己处于很大的危险当中，因为当他反对亚西比德归国的消息传到后者那里，亚西比德一定会很快寻求报复。绝望之下，普律尼科司设计了一个计划去阻止亚西比德归国以保全自己。随后发生的复杂事件令学者们长期为之困惑，虽然我们不能百分百确定，但下面是一种可能的事件还原：对于普律尼科司在此事中的行为，最好的解释是他长期对亚西比德抱有强烈敌意，因而孤军奋战地反对恢复亚西比德的地位。他未能左右萨摩斯岛上的会议，害怕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

威胁，便写信给斯巴达海军司令阿斯泰奥库斯（此时在米利都），将自己知道的和盘托出，即雅典人打算将亚西比德接回来，以及这位变节者答应争取提萨弗涅斯和波斯人支持雅典人。普律尼科司此时不知道亚西比德已经不在斯巴达阵营，所以推断阿斯泰奥库斯收到此信后会立刻逮捕亚西比德，于是雅典人的计划就破产了。阿斯泰奥库斯虽然再也没有办法逮捕亚西比德，却不能无视这个警告而让雅典人得逞。

他的解决办法是写信给提萨弗涅斯（此时在马格涅西亚[3]），与他直接对质。总督一定大为震惊，因为他肯定没有向亚西比德做出任何形式的承诺。亚西比德的计划被挫败了，他在总督那里当即垮台。

亚西比德怒火中烧，写信给萨摩斯岛，将普律尼科司的书信告知他的朋友们，要求处死普律尼科司。普律尼科司原以为阿斯泰奥库斯会杀死亚西比德，雅典人的计划会当即完蛋，却不曾料到阿斯泰奥库斯会将他的信件泄露出去，于是他在恐慌之下赶紧写信给阿斯泰奥库斯，为其打败萨摩斯岛的雅典人出谋划策。现代学者很难相信，在阿斯泰奥库斯泄露了第一封信之后，普律尼科司竟莽撞地写了第二封信，即便第二封信的情况与之前大不相同。第一封信无意中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请求，因为亚西比德已经离开斯巴达阵营，斯巴达人没办法逮捕他。而第二封信给了斯巴达海军司令一个机会，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有希望取得重大胜利，也许能一举结束战争。亚西比德不是唯一一个头脑灵活、擅长随机应变且野心勃勃的雅典政治家，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为了自身安全和晋升而甘愿出卖自己的城邦。

但阿斯泰奥库斯害怕这是雅典人的陷阱，而且为了挫败雅典人的阴谋（其目的是劝说波斯改换阵营），他将第二封信的内容告知了亚西比德和提萨弗涅斯。与此同时，普律尼科司已经得知阿斯泰奥库斯又一次泄露了他信中的内容，于是设下了阿斯泰奥库斯所害怕的那个陷阱。普律尼科司警告雅典人，阿斯泰奥库斯将要进攻萨摩斯岛。而这进攻恰恰

就是普律尼科司自己煽动起来的。亚西比德后来写了一封信给萨摩斯岛的雅典人，告诉他们普律尼科司叛变通敌以及斯巴达人即将发动进攻，雅典人不再相信他，认为他是“不值得信赖的人”（8.51.3）。狡猾的雅典变节者被比他更聪明的骗子打败了。亚西比德的信不仅没有对普律尼科司造成不利，还让雅典人证实了普律尼科司警告的真实性，整个事件至少在短期内加强了普律尼科司的地位，使雅典人对亚西比德越来越不信任。此事还导致了提萨弗涅斯与亚西比德决裂，使他没有机会兑现向萨摩斯岛的雅典领导人做出的承诺。雅典人与提萨弗涅斯谈判的失败使寡头派密谋者不再对召回亚西比德感兴趣，还导致斯巴达与波斯又缔结了一份新条约。反对雅典民主制的第一次阴谋破产了。

---

[1] 与亚里士多德的同题文章是截然不同的两部作品。（作者注）

[2] 欧诺弥亚得名自希腊神话中司管明智法律与良好秩序的女神，是时序三女神荷赖之一。赫西俄德的著作《神谱》中记载，她是宙斯和忒弥斯的三个女儿之一，主要是维护社会的司法、纪律与安定。正义女神狄刻与和平女神厄瑞涅（另外两位荷赖）是她的姐妹。

[3] 伊奥尼亚地区的一座城镇，在今天土耳其西海岸。

第二十九章 政变（前411年）

派桑德前往雅典的使命

前412年12月底，萨摩斯岛上企图改变雅典民主制的人们派遣派桑德带领一个使团前往雅典。他们还不知道亚西比德已经失去了雅典人的信任，所以执行了原先的计划，即将亚西比德迎接回国，请他从中调停，帮助雅典与波斯结盟。因为像色拉西布洛斯那样的温和派仍然支持亚西比德建议的修改政体，并且努力在这当中起到重要作用，所以真正的寡头派需要淡化言辞，以遮掩自己的真实目的。

使者们向雅典公民大会传达的信息是，国家的生存和胜利取决于波斯的援助，而只有亚西比德能获得波斯援助，因此需要恢复他的地位。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民主制加以限制。他们向公民大会保证，雅典人只需要“采纳另一种形式的民主政府”（8.53.1）。不管措辞多么巧妙，他们提议的两个方面都遭到了强烈反对。很多人反对以任何形式对民主制做任何改动，而亚西比德的各色敌人则反对将他召回。大会上群情激愤、吵吵嚷嚷，发言者不断地被抱怨声和嘘声打断。虽然这次群众大会混乱而不友好，派桑德的讲话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他的优势是他此前是一位激进的民主派政治家，因此被视为“左翼分子”，所以其比保守派政治家更容易得到群众的信任。他利用了自己的这个优势。他询问那些起哄的人，斯巴达的船只数量和雅典的一样多，但盟邦比雅典多，再加上从波斯获得的金钱，雅典人是否有办法解救雅典城？除了召回亚西比德、获得波斯援助之外，他们是否有其他的希望？没有人能回答他，喧嚣的人群沉默下来。随后派桑德给出了不可避免的结论，即对民主制加以限制：必须改变政体，才能召回亚西比德并得到波斯的支持。

他的两个问题都是骗人的。我们已经看到，亚西比德没有办法让波斯支持雅典，也没有证据表明波斯人关心雅典的政体究竟是什么。革命运动中的寡头派就只是希望改变政体而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愿意接纳亚西比德。一些温和派希望对民主制加以某些特定的约束，其他人则希望保持民主制当前的模样。但他们全都相信亚西比德是赢得波斯支持的关键所在，而要让他回国就需要改变政体，他们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派桑德精心选择他的措辞，不仅要符合温和派同僚的意愿，还要满足听他发言的民主派群众。他警示道，“除非我们的统治更为理智，并在更大程度上将官职交给少数人”（8.53.3），否则雅典人不可能达成目标。这意味着民主制将会大体保持原样，只是对官职人选做一些限制。很多人可以接受这个，视其为温和与务实的举措，是不得已而为之。雅典国库空虚，没有办法支付官员的薪水，所以干脆将官职仅限于那些不需要薪水的人。他指出，危机时期不适合探讨政体的形式。他向大家保证，如果对新政体不满意，随时可以恢复旧政体。

尽管公民大会对派桑德“关于寡头统治”（8.54.1）的话颇为不悦，但他还是劝服了大多数人：要想得到安全，别无他途。所以，出于恐惧以及相信他们的行动是可逆的，雅典民众接受了他的论断。公民大会派遣派桑德和其他十人去与亚西比德和提萨弗涅斯谈判，“自行斟酌最佳途径”（8.54.2）。

为了开辟道路，派桑德指控普律尼科司出卖了伊阿苏斯和阿摩基斯，于是消灭了普律尼科司这个潜在的绊脚石。从技术上讲，这个指控是诬陷，但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普律尼科司应当对在米利都逃避交战负责。如今人们都已经认识到，在米利都逃避交战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在此事上他肯定有罪，于是雅典人投票决定罢免普律尼科司和同僚斯基罗尼德斯的将军职务，以狄奥墨冬和列昂代之。因此，派桑德利用公众

的愤恨情绪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离开雅典之前，他拜访了各俱乐部（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寡头派分子），以便“共谋大计，推翻民主制”（8.54.4）。对于这些听众，他可以直抒胸臆，直言不讳地敦促大家建立狭隘寡头制，不需要为了符合温和派盟友的意愿而再三思量自己的用词。

寡头派与亚西比德决裂

派桑德和其他使者随后乘船前往提萨弗涅斯的宫廷，在那里他们看到亚西比德坐在总督身旁，代表他发言。但亚西比德表面上的自信和强大影响力是虚假的，因为此时“亚西比德在提萨弗涅斯身边的地位已经不是很稳固”（8.56.2）。在此之前，修昔底德一直将亚西比德描绘为得到总督真诚的尊重、享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当亚西比德写信给萨摩斯岛的朋友，说他能够将波斯拉到雅典阵营时，他一定相信自己有这个能耐。但是现在，修昔底德却告诉我们，提萨弗涅斯在继续执行拖垮斯巴达与雅典双方的计划，于是亚西比德与他的关系也变得岌岌可危了。

普律尼科司和阿斯泰奥库斯之间的通信已经揭示，亚西比德在瞒着总督，为自己的利益而活动；他在秘密筹划返回雅典，丝毫没有考虑提萨弗涅斯的意愿。在此事被揭穿之后，总督对这位奸诈顾问的信任一定动摇了，于是不再打算支持雅典（如果提萨弗涅斯真的曾有过这个打算的话）。目前提萨弗涅斯将恢复中立政策，他一定在接见派桑德及其同僚之前将这个决定告知了亚西比德，所以才让这个雅典流亡者担任他的代言人。

因此，在这次会议上，亚西比德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兑现诺言，提萨弗涅斯的要求是雅典人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他所能做的仅仅是继续假装自己得到总督的宠信，并让大家觉得雅典与波斯谈判失败是因为雅典人不讲道理，而非亚西比德无能。会议拖得很长，中间休会两

次，提萨弗涅斯要求将小亚细亚西海岸的所有城邦、“邻近岛屿及其他土地”（8.56.4）全部交还波斯。这包括罗德岛、萨摩斯岛、希俄斯岛和莱斯博斯岛等富饶且重要的地点。雅典使者同意将这些地方割让给波斯。但在最后一段讨论中，亚西比德传达了总督的要求，即雅典人必须允许“波斯国王在任何地方建造任何数量的船只，并在他自己的海岸沿线航行”（8.56.4）。

事实上，自波斯人于前479年被希腊人击败以来，波斯人就被禁止派遣战船进入爱琴海或赫勒斯滂海峡，因为雅典及其帝国的安全需要将波斯舰队排除在这些海域之外。现在，波斯国王的总督却坚持要求恢复希波战争之前的局面。自由的雅典公民大会绝不会接受这一点，于是派桑德及其同僚拒绝了这个要求。愤怒的雅典使者相信亚西比德欺骗了他们，并且与提萨弗涅斯沆瀣一气。但亚西比德在一个方面取得了成功：雅典人没有想到他其实没有能力兑现诺言，而是相信他出于某种原因，故意不兑现诺言。于是，关于亚西比德权势和影响力的神话得以继续传扬下去。

修改雅典民主政体的运动此刻出现了危机。亚西比德不愿或不能将波斯拉到雅典阵营，于是他的计划对色拉西布洛斯等温和派的吸引力就消失了。色拉西布洛斯与修改政体运动下一次发生接触时，就成了它的不共戴天之敌，不过他一定将该运动的一些成员拉到了反对派。那些仍然赞成修改政体的人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亚西比德，此后就决定“放弃亚西比德，因为他拒绝加入他们，另外他也不适合参与寡头制政府”（8.63.4）。他们放弃了获取波斯支持的打算，但他们比以往更坚定地希望消灭民主制，因为他们为这个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开始让自己处于危险境地。

密谋集团内部的分歧

此时，修改政体运动的成员已经公开宣布，他们打算改变政体。他

们若在此时以亚西比德欺骗了他们，或者亚西比德没有能力兑现诺言为由放弃计划，还是安全的。三列桨座战船船长色拉西布洛斯和其他温和派在与亚西比德和提萨弗涅斯的谈判失败之后，就是这么做的。

在仍然赞成修改政体的人当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寡头派，他们想要的是革命本身，而不是为了争取波斯支持而发动革命。也有一些人的立场不是这么极端，但可能已经对充满弊病的激进民主制不抱希望，并且害怕民主制会犯下更多错误。他们也可能意识到国家需要开源节流，而这与现行体制（继续向官员和公共服务支付薪水）是不相符的。

但是，留在修改政体运动中的这两个群体都处于岌岌可危的位置。他们再也不能宣称自己的目标是获得波斯的支持。色拉西布洛斯脱离运动也一定会让他们的敌人逐渐认清他们的真实面目；色拉西布洛斯将会成为这些反对派的优秀领导人，因为他对运动内情很了解，也非常有才干。在得到波斯援助的希望完全破灭之后，仍然继续坚持改变政体的人会逐渐被视为民主制的敌人和潜在的僭主。但他们仍然决心保持运动的生命力，自掏腰包，并绝不向斯巴达屈服。

运动现在必须转入地下，变成一个密谋集团。他们明确了取得彻底胜利所需的三个目标：控制萨摩斯岛的海军基地；在帝国各地煽动寡头派革命；在雅典建立寡头制政权。于是，他们开始在萨摩斯岛争取重步兵和农民的支持，这些人不像舰队桨手那样热忱地支持激进民主制；他们还与岛上的“显贵要人”合谋在岛上建立寡头政权。

与此同时，派桑德带着曾参与提萨弗涅斯谈判的一半使团成员，乘船前往雅典，以便在帝国境内建立寡头政权。另外五名使者则分散到爱琴海各地，去做同样的事情，但在这一过程中遇到了麻烦。密谋者之一狄爱特雷菲斯将军起初成功推翻了萨索斯岛的民主制政权，建立了寡头统治。但不久之后，尽管雅典也建立了寡头统治，萨索斯寡头派却与其他流亡的寡头派联手，在岛上设防，抵御雅典人可能的进攻，并召来了

科林斯将军提莫劳斯率领的一支舰队。萨索斯岛的寡头派不再需要雅典人强加给他们的“贵族统治”，因为他们可以与斯巴达人结盟，从而享有“自由”。

萨索斯岛事件支持了普律尼科司的论点，即用寡头制代替民主制未必能让各附庸国接受雅典的统治。修昔底德指出：“各城邦有了温和政府和自由之后，就自行其是，转为绝对的自由化，根本不管雅典所谓的寡头政权。”（8.64.5）

民主制被推翻

尽管经历了这次失望，派桑德仍然对自己的使命充满希望。在雅典，他征募的那些极端派贵族青年已经刺杀了一些民主派领导人，其中包括安德罗克利斯，他是当时受民众欢迎的主要政治家，寡头派杀他不仅因为他是擅长煽动民众的政客，还是为了取悦亚西比德。这些寡头派显然还不知道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不晓得密谋集团领导人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他们仍然鼓吹温和派的纲领，公开提议不再为服兵役的人支付军饷，并将公民权仅限于重步兵阶层或地位更高的五千人。

与此同时，这些贵族青年还在刺杀其他一些被选定的政敌，这不是温和派能够赞同的做法。除安德罗克利斯之外，他们“以同样的方式，秘密杀死了其他一些对他们造成不便的人”（8.65.2）。这些谋杀事件是恐怖政策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削弱反对派，以便更轻松地推翻民主制。公民大会和议事会仍然召开会议，但现在寡头派运动的成员控制了会议议程，也只有他们发言，因为他们的对手都因为恐惧而陷入沉默。“若有人胆敢反对他们，他们便立刻以某种方便的手段杀害他。”（8.66.2）谋杀犯得到容忍，不曾受到调查、逮捕、指控和审判。民主派成员不敢公开地互相交流，互不信任，因为即便是有名的民众煽动家派桑德和普律尼科司也曾摇身一变，成了寡头派领导人。

密谋者就这样制造了恐怖气氛，在合法性、正当程序和民众认同的假象掩护下控制了国家，而无须直截了当地动用武力。在公民大会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建议任命一个三十人委员会（包括十名贤哲），委员会拥有全权，将在“指定日期”起草“治国良方”。这简直就是授权他们起草新宪法。受到恫吓的公民大会未提出质疑便通过了这个建议。

三十人委员会在指定日子做了报告，但不是按照惯例在雅典的普尼克斯山，而是在城外约1英里处一座叫克罗诺斯西比乌斯的山上。选择这个地点，可能是为了让下层阶级更加畏惧；虽然一队武装重步兵出现在会场，可以理解为对城墙之外的集会提供保护，但将开会地点转移到一个不寻常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三十人委员会没有为国家安全或管理国家提出建议，而仅提出一项动议：“允许任何雅典人提出任何建议，而不对其施加惩罚。”（8.67.2）这意味着，宪法中禁止提出非法动议的条例被暂时搁置了。

在此次会议的紧张气氛（群众受到恫吓，会议受到严格控制）下，这样的措施不是为了允许大家自由发表意见，而仅仅是为那些筹划革命的人提供法律保护。只有派桑德一个人发言，阐述了密谋者的计划。与战争无关的公共服务人员将不再得到报酬，但九位执政官[1]和五百人议事会的执行官员除外，他们的薪水是每人每天半个德拉克马。派桑德提出的计划的核心部分是组建一个四百人议事会，“拥有全权，按照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治国理政”（8.67.3）。四百人议事会成员将通过一种复杂而间接的方式选出。在如此杀气腾腾的环境下，四百人议事会的成员无疑是密谋者内定的人选。此外，计划还指定了一个包括重步兵阶级及以上人员在内的五千人名单。四百人议事会得到授权，在自己认为必要时召集五千人会议。

公民大会通过了这些措施，没有反对意见，随后便解散了。政变成功了。在雅典统治了近一个世纪的民主制政府被一个新政权取代了。新

政权将下层阶级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将统治权交给了一个狭隘的寡头制集团。

尽管规定五千人的条款是骗人的，但对前411年的雅典人而言，这些建议大体上与温和派的计划相一致。为了打仗，必须节约经费，所以削减公务人员的薪水；在战争期间，激进民主制必须让位于一个更受限制、温和的政权。因此，四百人议事会也可算作一个临时性的执政团体，仅仅在五千人大会接管权力之前有效。

余下要做的就是处理亚西比德和他的诺言（将提萨弗涅斯和波斯人拉到雅典阵营）。尽管派桑德知道这已经不可能办到，但我们不知道温和派此时有没有得知与提萨弗涅斯的谈判已经破裂。雅典的温和派继续支持政变，或许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听说与提萨弗涅斯谈判破裂的消息，但即便听说了，他们仍然有理由保持原路线。萨摩斯岛上的温和派即便在得知关于亚西比德和波斯的希望破灭之后，仍然支持政变；和他们一样，雅典的温和派也继续坚持下去，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身处险境”，因此更安全的办法就是继续前进。或许，他们仍然真诚地希望节约国家资金以便投入作战，并且相信将公民权局限于有产阶级是帮助雅典生存下去并赢得战争的最好办法。

寡头派领导人

推翻民主制运动的领导人是派桑德、普律尼科司、安提丰和塞拉门尼斯。前两位，像“四百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仅仅是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者，为了个人野心而行动。但安提丰的谋划却不同。普律尼科司和派桑德是高度活跃和为人民熟知的政治家，安提丰却在幕后活动。他可能是雅典最早的一位专业的演讲稿撰写人，赢得了修昔底德的仰慕，被誉为“最有才干帮助别人在法庭或公民大会斗争的人”。但他不是民主制的朋友，并且“由于他危险的聪明，而成为群众怀疑的对象”。正是他“设计了整个计划，并确定了此事发展到当前阶段的方法”（8.68.1）。我们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安提丰认为雅典最好的前途就是推翻民主制和建立一个真正的狭隘寡头政权。他愿意为了实现这个前途而努力工作，也愿意为了达成目标而不择手段。修昔底德说“在他所处的时代，安提丰的勇气和美德不逊于任何人，他最擅长构建一种思想，并用演讲将其表达出来”（8.68.1）。

但在前411年起到最大作用的却是塞拉门尼斯。他也是四个人当中最有争议的一位，有些人指控他是寡头派，是民主制的敌人，他的敌人称他为“对左右脚都合适的悲剧靴子”。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表明，他是一位爱国者和真正的温和派，真诚地忠于将权力交给重步兵阶级的政体，不管是受限制的民主制，还是执政基础较宽泛的寡头制。

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受到不同哲学思想和目标的驱动，这四个人“开始剥夺一个民族的自由。这个民族不仅自己不曾臣服于其他人，并且在半个世纪以来习惯于统治其他人”（8.68.4）。

派桑德没有为新政权接管政府定下确定的日期，许多雅典人一定认为，他们的掌权会推迟到大约一个月之后，那时本届议事会年度就结束了。但密谋者行动迅捷，在前411年6月9日，也就是克罗诺斯会议结束仅仅几天之后，就夺取了政权。当雅典人去往他们在城墙和操练场的军事哨所时，密谋者们采取了行动。他们之前为了政变特地从蒂诺斯岛、安德罗斯岛、卡利斯图[2]和埃吉那岛征募了四五百名武装人员，这次将其派上了用场。

“四百人”的长袍下藏着匕首，在120名令雅典心惊胆战的年轻贵族的帮助下，冲进了议事会大厅。他们向议事会的民主派成员支付了当年余下时间的薪水，然后命令他们出去。议员们拿了钱，不加抗议地乖乖离去了，没有其他人施加干预。“四百人”抽签任命了议事会执行人员和主持会议的官员（这是旧时议事会的惯例），然后举行了就职仪式上惯常的祈祷和献祭。他们尽一切努力保全体面，让大家觉得他们是延续前

一届议事会的正常的、合法的机构，但很少有人上当。自前510年庇西特拉图僭主家族被驱逐以来，雅典国家第一次被威胁和暴力手段控制了。

---

[1] 执政官（Archon）的字面意思是统治者或领主，是古希腊许多城邦最高长官的职衔。雅典早期的共和国体制中，每年有九位执政官，掌管政治、军事和宗教事务，分别为名年执政官（Eponymos Archon，他掌权的那一年以他的名字命名）、军事执政官（Polemarch）、宗教执政官（Archon Basileus）及六名立法者。执政官从富裕阶层选举产生，起先任期十年，前683年后改为一年。前487年后，执政官在公民当中抽签产生，军事执政官的职责被每年十位将军（Strategos）的制度取代，十位将军每天轮流担任军事执政官，军事执政官仅在名义上是十将军的上级。名年执政官在名义上是民主制雅典的国家元首，但政治意义已经弱化很多。

[2] 优卑亚岛上的一座城镇。

第三十章 **“四百人”**掌权（前**411**年）

最积极地建立“四百人”政权的人并非温和派，但由于他们需要温和派的支持，便隐藏了自己的真实目的，承诺将来会走温和派路线。为了这个目的，克罗诺斯西比乌斯山上的会议指定了一个登记委员会，以确定“五千人”的名单（这个名单始终未能完成），并组建了另一个委员会，起草未来的永久性宪法。这些措施是为了说服温和派，“四百人”的统治是临时性的，危机结束后便会让位于“五千人”的新政体。

因为极端寡头派的目的是让“四百人”仅仅暂时掌权，最终建立一个统治基础更狭隘的寡头政权，所以他们被迫采用了一些欺骗手段。于是，草拟宪法的委员会达成了“妥协”，提议了两种新宪法，其中一种被立刻采纳，另一种则将在未来采纳。即刻生效的宪法是对极端寡头派的正式授权，给予“四百人”议事会合法地位，允许它“自行决断，便宜行事”（Aristotle，*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31.2）。雅典人必须接受“四百人”议事会在宪法问题上颁布的任何法律，同意不对其做任何修改，并赞成不再引入新法律。这些措施实际上就是允许“四百人”随心所欲，想掌权多久就掌权多久。

为了维持温和派的效忠，“四百人”还为将来制定了一部宪法草案。它从根本上讲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司法，但它提议了一个没有薪水的议事会，其成员来自“五千人”里年龄超过三十岁的人，分成四个群体，轮流代表整个议事会执政一年。将军和其他主要官员将从正在任职的议事会中选拔，所以他们在每四年中只能任职一年。这种安排是为了阻止民众领袖的崛起。然而，这部草案的可行性和文件细节实际上都无关紧要，因为寡头派根本不打算让这部宪法生效，它也始终不曾生效。目前，温和派对将来有一部温和宪法的前景感到满意，觉得具体细

节可以慢慢敲定。

夺权八天之后，“四百人”正式建立了新政权。宪法起草委员会颁布了两部新宪法，声称它们已经得到“五千人”的批准。这个说法是觍颜的扯谎，因为“五千人”的名单根本不存在。但大多数雅典人太害怕、太糊涂也太无知，所以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在这个公共事件之前与之后，大多数人相信“五千人”可能已经选好了。“四百人”当中的温和派知道真相，但他们不声张，相信这样的欺骗手段是他们所期望的转型的一个必要部分。他们的目标是得到萨摩斯岛上雅典军队的忠诚，新政权的合法建立与将来广泛而温和政府的前景都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步骤。

寡头势力的崛起是因为战争中的一次危机，而它的革命性诞生却导致了国内的另一场危机，所以它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当务之急是保障雅典城的安全。“四百人”随后要争取萨摩斯岛雅典军队的忠诚，并将雅典人民团结在他们的统治下。此外，“四百人”还要做出决策，决定如何处置雅典的各附庸国，以及如何将战争继续打下去。他们应当继续作战吗？如果是这样，应当采纳何种战略？如果不继续作战，应当寻求怎样的和平条件？雅典政府在长远的未来应当采取何种形式？对于这些问题，“四百人”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分歧。

为了给民众留下温和、合法与延续的印象，“四百人”通过抽签选拔议事会的主席，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样。为了恢复对雅典武装力量的直接控制权，他们匆匆任命了一些新将军、一名骑兵指挥官和十名部落领袖，而没有遵循宪法所要求的合法程序。我们知道名字的将军当中有四位是极端寡头派，塞拉门尼斯和另外一人是温和派，这个比例可能与“四百人”中极端寡头派与温和派的比例相似。“四百人”中的极端寡头派希望召回被民主制政府放逐的那些人，其中大部分是民主制的死敌。如果将流亡者一概召回，就会包括亚西比德，而他们不信任他、畏惧他。但如果大赦单单排除亚西比德一人，就会疏远温和派（其与亚西比

德仍有紧密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实施大赦。

从一开始，政变的表面目的就是为了赢得战争，但“四百人”上台之后很快就开始与斯巴达议和。尽管新的寡头政权一再保证将继续作战，但是人们应当很清楚地认识到，消灭民主制和继续战争是不能并行的。雅典人获得胜利的唯一希望是舰队的强大，这意味着必须和下层阶级及其民主派领袖合作。只要城市的安全依靠他们来维护，对民主政府的攻击就不可能长期不受阻挠。然而，与斯巴达达成和约，哪怕只是短期和约，就能让大多数船只停放在码头，让水手们分散开。在这种情况下，寡头派就能够通过恐怖手段和争取重步兵的支持来强行建立一个新政权。到那时，他们就可以通过谈判缔结永久性和约，并让雅典处于寡头统治之下。

但这条路线也不会走得轻松，因为温和派完全有可能坚持要求继续作战，或者提出斯巴达人不大可能接受的条件。虽然大多数极端寡头派也希望得到比较合理的条件，但他们愿意“以任何可以忍受的条件”接受和平，即便那意味着放弃雅典的城墙、舰队和自治权。正是为了防止这种结局出现，塞拉门尼斯不久之后便领导了一场运动，推翻了“四百人”的统治。他和温和派愿意与斯巴达缔结和约，条件是雅典保持独立，保留其帝国和权力，哪怕维持现状（一些附庸国已经反叛）也可以，但不愿意放弃更多。虽然极端派愿意做出更多让步，但至少在谈判的最初阶段他们与温和派是一致的。

于是，“四百人”派遣使者去狄凯里亚拜见阿基斯二世国王，提出和平建议：双方保留当前控制的土地。阿基斯二世立刻拒绝了，表示“除非雅典人放弃海洋帝国”（Aristotle，*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32.3），否则绝不议和。斯巴达国王认为雅典人的议和建议表明他们很虚弱，于是从伯罗奔尼撒半岛调集一支大军，派到雅典城墙附近与他在狄凯里亚的部队会合。但是，雅典人还没有准备屈服。在斯巴达军队逼

近城墙时，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武装力量——骑兵、重步兵、轻步兵和弓箭手——发动袭击，将斯巴达军队打退了。

雅典人的坚决使阿基斯二世明白，胜利不会那么轻易地获得。此役之后，“四百人”继续寻求和谈，而清醒过来的阿基斯二世敦促雅典人派遣使者直接去斯巴达。他不愿意让别人觉得他阻碍和平，但也不愿意亲自参与和谈，免得他谈出来的条件不被斯巴达政府接受。

萨摩斯岛的民主制政权

现在，“四百人”将注意力转向萨摩斯岛上正在恶化的问题。他们的原计划是让该岛成为寡头制国家，但这个计划很快遇到了麻烦。派桑德说服一些机会主义的萨摩斯政治家组建一个“三百人”密谋集团，这个集团使用了与“四百人”在雅典的恐怖策略相类似的手段。“三百人”谋杀了希帕波鲁斯（他自前416年遭到陶片放逐以后便生活在这个岛上），作为效忠于雅典寡头派的证据，但这样的暴力活动在萨摩斯岛没有收到先前在雅典的效果。作为回应，萨摩斯民主派寻求最受信赖的雅典民主制支持者的支持，包括将军列昂和狄奥墨冬、三列桨座战船船长色拉西布洛斯和斯拉苏卢斯（此时只是一名普通重步兵），这些人“似乎始终反对寡头派密谋者”（8.73.4）。

萨摩斯岛局势也足以证明，变革雅典政府的密谋从一开始就成分复杂，包括好几个不同的群体。列昂和狄奥墨冬既不是寡头派也不是激进民主派，他们看到国家大祸将至。尽管他们对这个计划并不满意，但也一定接受了这样的主张，即召回亚西比德、修改雅典的民主政体。他们是将军，因此密谋者不能将他们排除出“四百人”核心圈子，这个圈子还包括派桑德这样货真价实的寡头派。因此，在外人看来，列昂和狄奥墨冬似乎也是寡头派成员，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萨摩斯岛的雅典民主派后来驱逐了他们，另外还驱逐了被认为不可靠的将军和三列桨座战船船长。

更令人惊异的是，民主派信任三列桨座战船船长色拉西布洛斯，他是亚西比德的强烈支持者，也是寻求波斯援助计划的创始人之一。他被选为四名受命拯救萨摩斯民主制政权的雅典领导人之一，说明参与此事的人已经认识到，“四百人”并不都是一路货色，其中也有民主制的真正朋友。

被选中的四位雅典人开始向可靠的雅典士兵发出警报，尤其是向雅典的通信船“帕拉鲁斯”号发警报，这艘船的船员以支持民主制和仇恨寡头制而闻名。列昂和狄奥墨冬在出航执行任务时总是谨慎地留一些船只守卫萨摩斯岛，并确保“帕拉鲁斯”号是留下的船只之一。因此，萨摩斯寡头派发动政变时，雅典水手得以阻止他们，尤其是“帕拉鲁斯”号的船员。得胜的萨摩斯民主派将政变的三十名主谋处死，将另外三人放逐，但大赦了其他人。按照当时的标准，这算是了不起的自我克制，而且这个努力很快得到了报偿。“从此以后，萨摩斯人作为公民同胞，生活在民主制之下。”（8.73.6）

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在雅典政变不久之后，所以萨摩斯岛上的人还不知道雅典城已经建立了寡头统治。因此，当“帕拉鲁斯”号抵达雅典，宣布萨摩斯岛民主派得胜的重大消息时，船员们立即遭到逮捕。只有一位特别热忱的民主派人士凯利亚斯孤身逃脱，匆匆返回萨摩斯岛。他对雅典形势的描述比实际情况更恶劣：人民遭到鞭笞的惩罚；寡头制政府不容许任何批评的声音；妇女和儿童遭到虐待；寡头派企图监禁萨摩斯岛上不支持他们事业的人的亲属，并威胁将他们杀死。据修昔底德记载，“他还撒了许多谎”（8.74.3）。凯利亚斯的话令雅典士兵大为光火，“他们抓住了寡头统治的主谋分子”以及“其他参与其中的人”，打算将他们乱石打死，但“立场比较温和的人”制止了士兵们（8.75.1）。“寡头统治的主谋分子”应当是派桑德和普律尼科司的亲信，而“其他参与其中的人”一定包括列昂和狄奥墨冬这样的温和民主派，因为士兵在群情激愤之下将他们的将军职位罢免了。“立场比较温和的人”肯定包括色拉

西布洛斯和斯拉苏卢斯，因为他们成了这些民主派事件的领头人物。他们还阻止了暴力活动，赦免了那些参与寡头派运动早期阶段的人，前提是这些人向雅典和萨摩斯武装部队宣誓：“接受民主制，和谐地生活，努力奋战反对伯罗奔尼撒人，敌视‘四百人’，绝不与其议和。”（8.75.2）此后，岛上的雅典人和萨摩斯人将并肩作战，共同反对雅典的“四百人”以及伯罗奔尼撒敌人。

萨摩斯岛的雅典士兵推选色拉西布洛斯和斯拉苏卢斯等人来取代被罢免的将军。这个选举将军的举措相当于宣布主权，即宣布自己的合法性，拒绝承认雅典国内寡头制政府的合法性。新领导人宣布，代表大多数人的不是雅典城的寡头派，而是广大将士和海军，只有他们才能控制帝国及其收入。这么说鼓舞了士兵们的斗志，是雅典城造反并背叛了他们，不是他们背叛了雅典城。以萨摩斯岛为基地，他们可以打退敌人，并迫使寡头派恢复雅典的民主制。无论如何，只要仍然拥有强大的舰队，他们就是安全的。

与此同时，在距离萨摩斯岛不远的米利都，伯罗奔尼撒人自己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在怒气冲冲的叙拉古人的带领下，很多士兵公开反对他们的领导人。他们抱怨称，雅典人内乱时，伯罗奔尼撒联盟的领导人却无所事事、错失良机。他们指责海军司令阿斯泰奥库斯消极避战、错误地信任提萨弗涅斯。他们对总督本人也很愤怒，因为他许诺带腓尼基舰队来，却始终不见舰队的影子；他给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饷数量不足，还经常拖欠。他们还指控他故意耽搁，企图消磨他们的力量。在士兵们的攻击下，阿斯泰奥库斯不得不召开会议，决定迫使雅典人与他们打一场大规模战役。在得知萨摩斯民主派对寡头派的攻击之后，他们希望趁敌人深陷内战之时发动攻击。

于是，他们于6月中旬率领整个舰队（112艘战船）前往萨摩斯岛。萨摩斯岛上的雅典人只有82艘战船，但他们及时得知了敌人的动向，向

正在赫勒斯滂海峡的斯特罗姆比基德斯发布命令，要他赶回来参战。伯罗奔尼撒人出现的时候，雅典舰队在萨摩斯岛隐蔽起来，等待斯特罗姆比基德斯返回。伯罗奔尼撒人则在米卡列（在大陆上，与萨摩斯岛隔海相望）扎营，准备于次日出航。但他们得知斯特罗姆比基德斯已经回来了，雅典战船的数量增加到108艘，于是阿斯泰奥库斯下令撤回了米利都。雅典人追击敌人，希望能够打一场决定性战役，但阿斯泰奥库斯拒绝出港。尽管雅典人内部出现纷争，他们还是将力量对比恢复到上一年冬季时的状态：雅典战船虽然数量略少一些，却又一次掌握了制海权。

法那巴佐斯与赫勒斯滂海峡

从萨摩斯岛撤退使伯罗奔尼撒士兵和水手愈发恼火，他们加大了对阿斯泰奥库斯施加的压力，要求他采取有效的行动，但提萨弗涅斯未能兑现诺言、支付军饷，所以海军司令很难继续维持舰队。而另一方面，安纳托利亚北部的波斯总督法那巴佐斯答应，如果阿斯泰奥库斯将伯罗奔尼撒舰队转移到赫勒斯滂海峡，他就支持他们。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拜占庭的公民也请求阿斯泰奥库斯去帮助他们反抗雅典人。此外，阿斯泰奥库斯还没有执行斯巴达政府给他的命令，即派遣一支部队在克里阿库斯将军的指挥下去援助法那巴佐斯。他的政策——留在伊奥尼亚、努力与提萨弗涅斯合作——显然已经破产，他再也不能耽搁了。

7月底，克里阿库斯率领40艘战船向赫勒斯滂海峡挺进。他害怕萨摩斯岛的雅典舰队，于是向西偏离直接路线很远，进入了更开阔的海域，但在那里遭遇了爱琴海上常见的突如其来的风暴，这种风暴对三列桨座战船的打击是致命的。他放弃了自己的目标，溜回米利都，那边的大海比较平静。与此同时，10艘战船在更勇敢或者说更幸运的墨伽拉将军希里克苏斯的指挥下，进入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成功煽动了拜占庭的叛乱。不久之后，博斯普鲁斯海峡另一岸的迦克墩，以及库济库斯和塞利姆布里亚[1]也加入了叛乱。

这些事件极大地改变了战略局势，因为叛乱分子和斯巴达舰队进入了两条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威胁着雅典的粮食供应，同样也威胁着它继续作战的能力。伯罗奔尼撒人进入法那巴佐斯的势力范围也是个重大事件，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只能依赖于提萨弗涅斯零星而不可靠的支持，并且受制于他的阴谋诡计。现在法那巴佐斯成了盟友和金主，他们可以期望得到更大的成功，尤其是他们现在横跨在雅典至关重要的补给线上。

亚西比德的回归

萨摩斯岛上的雅典人迅速认识到伯罗奔尼撒人与法那巴佐斯结盟对雅典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积极采取措施来应对。色拉西布洛斯从来没有放弃敦促召回亚西比德（他认为这是赢得战争的关键），最后终于得到了大多数士兵的支持。于是颁布了法令，召回亚西比德，并授予其不受起诉的豁免权。色拉西布洛斯本人则乘船陪同亚西比德到萨摩斯岛，“他认为唯一能救雅典的办法，就是将提萨弗涅斯从伯罗奔尼撒阵营拉到雅典这边”（8.81.1）。

但亚西比德得以回国的条件却不是他想要的那样。雅典人普遍不信任他，有些人则憎恨他。他不能返回雅典，只能来到萨摩斯岛；豁免权能暂时保护他，但未来仍然可能遭到清算。他想要的理想情况是，作为一个广泛联盟的领导人，光荣地返回雅典城，成为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然而，只有一个温和民主派的派系，在其领导人色拉西布洛斯的坚持下，将他带到了萨摩斯岛，而且萨摩斯岛还与雅典城不和。他的成功依赖于和色拉西布洛斯维持良好的关系，更不用说他的未来了。色拉西布洛斯虽然是一位忠实的朋友，但也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强势人物，绝不会受任何人操纵。因此，亚西比德抵达雅典营地后必须服从他的领导。

亚西比德在抵达萨摩斯岛之后，向那里的雅典公民大会讲了话，他

的话也是说给雅典寡头制领导人和伯罗奔尼撒人听的。修昔底德将他的意图描绘为：希望赢得萨摩斯岛上雅典军队的尊重，恢复他们的自信心；增加伯罗奔尼撒人对提萨弗涅斯的猜忌，进而让伯罗奔尼撒人失去胜利的希望；让控制雅典的寡头派人士畏惧他的卷土重来，最终削弱极端寡头派的影响力。在演讲的核心部分，他继续撒谎，假装他仍然对提萨弗涅斯有很大影响力，而且总督也愿意帮助雅典人。提萨弗涅斯将把曾承诺给伯罗奔尼撒人的腓尼基舰队带给雅典人，但条件是雅典人必须恢复亚西比德的地位，以示诚意。雅典士兵们热切地相信安全与胜利终于要降临了，于是立刻选举他为将军，“将他们的全部事务都交给他管理”（8.82.1）。

事实上，亚西比德的演讲实在是太成功了，以至于热情洋溢的雅典军队希望直接驶向比雷埃夫斯，攻击“四百人”。但亚西比德还需要时间与提萨弗涅斯会晤，让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是没有祖国的亡命徒，不是依赖总督的保护才能苟活，而是萨摩斯岛雅典军队的新将军，一个不容小觑的人。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他“利用雅典人去吓唬提萨弗涅斯，利用提萨弗涅斯去吓唬雅典人”（8.82.2）。但要达成目标，他必须在雅典人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先抵达总督那里。

与此同时，在米利都，伯罗奔尼撒人与提萨弗涅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他以伯罗奔尼撒人无所事事为借口，扣住他们更多军饷。此时连军官们也表示不满，他们攻击的对象主要是消极避战的海军司令阿斯泰奥库斯。他们觉得阿斯泰奥库斯对提萨弗涅斯太纵容，怀疑他收了总督的贿赂。图里人和叙拉古人激发了部队的不满情绪，向阿斯泰奥库斯索要军饷。指挥外国军队的斯巴达指挥官素来非常居高自傲，他傲慢而严厉地回答他们，甚至举起手杖威胁多利尤斯（指挥图里人的伟大运动员）。阿斯泰奥库斯若不是逃到祭坛前避难，多利尤斯的水手们会用乱石打死他。米利都人利用伯罗奔尼撒人的内斗，占领了提萨弗涅斯之前在城内建造的要塞，将其驻军驱逐出去，并且得到了盟军，尤其是叙拉

古人的赞许。就在这个关头，8月，新任海军司令明达鲁斯前来接替了阿斯泰奥库斯。

这样的动荡一定让亚西比德很高兴。在动荡的部分时间里，他在米利都和提萨弗涅斯待在一起。他返回萨摩斯岛不久之后，雅典的“四百人”派来一个使团，尝试处理萨摩斯岛的局势。当使者们企图在大会上发言时，愤怒的士兵们高声咆哮，压倒他们的声音，甚至威胁杀死那些推翻了民主制的人。但过了一会儿，士兵们温和了一些，使者们传达了讯息。他们解释道，革命的目的是挽救雅典城，而不是出卖它。新政府不会是一个永久性的狭隘寡头制政权，“四百人”最终会让位于“五千人”。凯利亚斯的指控是假的，士兵们在雅典的亲属很安全。但这些说法依然没能让听众平静下来。立刻攻击比雷埃夫斯和雅典城寡头派的建议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修昔底德指出：“在这个关头，除了亚西比德，没有人能够控制这群暴民。他做到了。”（8.86.5）修昔底德在此处和在许多其他地方一样，夸大了亚西比德的影响力（亚西比德可能是修昔底德史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因为色拉西布洛斯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士兵，“参与其中，大声呼喊，因为据说他是雅典人当中嗓门最大的”（Plutarch，*Alcibiades* 26.6）。

亚西比德在答复使者们时，坚持要求采纳色拉西布洛斯及温和派的施政方针。“他不反对‘五千人’的统治，但要求他们罢免‘四百人’，并恢复五百人议事会。”（8.86.6）他赞同为了支持武装部队而节约经费的措施，并鼓励他们不要屈服于敌人，因为只要雅典城还安全地掌握在雅典人手里，和解的希望就存在。广大士兵和水手无疑更希望恢复完全的民主制，但他们的领袖仍然希望建立他们从一开始就想要的温和派政权，于是士兵和水手们服从了他们的意愿。

亚西比德演讲的主要靶子可能是雅典的执政团体。他的话是为了加强温和派的决心，去抵抗极端派正在筹划的任何过激行为，或许还能让

温和派掌握政权。亚西比德演讲的更重要目标是威慑“四百人”，让他们不敢单独与敌人媾和并将城市出卖给敌人。这种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在萨摩斯岛的军队很快就拿到证据，证明“四百人”又一次企图与斯巴达人议和，尽管“四百人”的使者始终未能抵达斯巴达。运载这些使者的船只的水手们起来反抗他们，将这些“对颠覆民主制负有主要责任”（8.86.9）的人交给了阿尔戈斯人，阿尔戈斯人则将这些人押解到萨摩斯岛。

前411年夏季快结束了，希望在雅典建立永久性寡头统治的人未能达成任何目标。他们原想通过建立寡头制来增强帝国的安全，不料却引发了更多叛乱。他们未能在萨摩斯岛扶植一个友好的寡头政权，却激怒了广大雅典军人，后者差一点就起航去攻击雅典城的寡头派。寡头派还疏远了色拉西布洛斯——改变政体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使他变成了寡头派的危险敌人；他们的朋友亚西比德曾经是寡头派计划成功的主要因素，如今也反对他们。色拉西布洛斯和亚西比德现在都要求解散“四百人”，他们还对雅典“四百人”内部的一些温和派朋友施加影响。寡头派与斯巴达议和的努力也失败了，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说服斯巴达人在一切太迟之前挽救他们。

---

[1] 拜占庭以西的一座城镇，今称锡利夫里（Silivri）。

第三十一章 “五千人”（前411年）

寡头派的使者从萨摩斯岛返回雅典后，只将亚西比德的部分信息传达给了“四百人”。使者们告诉“四百人”，亚西比德坚持要求雅典人继续作战，不要屈服于斯巴达人；他希望与寡头派和解并赢得战争胜利。但使者们隐瞒了这些事实：亚西比德支持“五千人”，反对“四百人”继续统治，并且要求恢复旧的五百人议事会。如果使者们把这些情况如实相告，必然会加深运动内部的裂痕，但即便是这个经过修改的版本也令温和派颇受鼓舞，他们“是参与寡头统治的大多数，在此之前就已经很不满了，非常乐意用任何办法摆脱此事，只要办法是安全的”（8.89.1）。

“四百人”内部的分歧

“四百人”内部异见人士的领导者是塞拉门尼斯和斯基利里斯之子阿里斯托克拉特斯。塞拉门尼斯在这段时间的行为预示着他未来代表雅典温和派政权的大胆而活跃的政治生涯。阿里斯托克拉特斯是一位雅典显贵，曾经是一位重要的将军，有资格在《尼基阿斯和约》和与斯巴达的盟约上签字，并且还是前414年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嘲讽的对象。和塞拉门尼斯与色拉西布洛斯一样，阿里斯托克拉特斯曾支持遏制雅典民主制的运动，后来又反对“四百人”；他也作为亚西比德的同党，在复苏民主制政权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四百人”内部心怀不满人士的讨论中，塞拉门尼斯和阿里斯托克拉特斯宣布，他们不仅害怕亚西比德和萨摩斯岛的军队，还畏惧“那些向斯巴达派遣使者的人，担心这些人不与大多数人磋商，就做出危害城邦的事情来”。但塞拉门尼斯和阿里斯托克拉特斯等人小心地避免使用反革命言辞，免得引发更多恐怖镇压和公开内乱，那样会使雅典城被斯巴达轻松征服。于是，他们坚持要求“四百人”兑现诺言，“切实指定‘五

千人’（而不是仅仅拉出一个名单来），并建立更平等的政体”（8.89.2）。

除了特定个人的野心外，塞拉门尼斯和阿里斯托克拉特斯等人受到了恐惧和爱国主义的驱动。随着局势恶化，极端派完全可能转而反对“四百人”内部的异见分子，而且极端派已经表现出铲除对手的意愿。另外，如果萨摩斯岛上的雅典民主派控制了局面，他们就不大可能对“四百人”的创始人宽大为怀。时间一天天过去，极端派为了挽救寡头统治和自己的性命而将城市出卖给斯巴达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雅典的温和派决心保卫城市独立，坚持作战直到胜利。后来的事实证明，民主派公民同胞认可他们的贡献，多次任命他们为军事指挥官。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温和派尽快行动起来。

寡头派出卖雅典的阴谋

尽管使者们小心翼翼地没有把亚西比德的全部信息都传达给“四百人”，萨摩斯岛传来的消息还是让极端派领导人大为警惕，以至于他们开始在比雷埃夫斯港口附近的爱提奥尼亚（这是一块海岬，从港口入口处向南延伸）建造一座要塞。建造新要塞的公开目的是让一支小部队控制港口，抵御内部敌人从陆地一面发起袭击。但塞拉门尼斯和温和派立刻认识到，这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他们抗议道，新要塞的真实目的是“在任意时间从海陆两路接纳敌人”（8.90.3）。亚西比德归国的消息也让极端派更加害怕。他们“看到大多数公民和他们内部一些之前被认为可靠的人，都在改变主意”（8.91.1）。虽然他们更愿意保有自治权、在雅典建立寡头统治、保卫帝国的领土完整，但如果丧失了帝国，他们就会寻求自治，而不是接受民主制复辟。“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他们愿意引入敌人，放弃船只和城墙，代表他们的城市以任何条件与敌人讲和。”（8.91.3）于是他们加快了爱提奥尼亚的建设，并派遣十几个人，包括安提丰和普律尼科司，“以任何可以忍受的条件”（8.90.2）向斯巴达人求和。

对于这些谈判的具体情况，我们只能做一番猜测。这些雅典人可能要求维持现状，就此议和，但斯巴达人拒绝了。于是雅典使团从斯巴达返回，未能缔结协定，但他们与斯巴达人谈了帮助极端派逃亡的问题：安提丰及其同僚做了安排，为了保证自身安全，他们将出卖城市。

新要塞的护墙一天天升高，塞拉门尼斯也越来越公开、强烈和勇敢地对此表示不满，尽管反对极端派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被告发或被暗杀。但一起性质完全不同的暗杀，终于促使“反革命”爆发了。普律尼科司离开议事会大厅后，在拥挤的阿哥拉被人杀死。杀手逃跑了，一个曾陪同杀手的阿尔戈斯人即便遭受毒刑拷打，也不肯揭发暗杀密谋者。与此同时，消息传到雅典，一支伯罗奔尼撒舰队打算援助优卑亚人的叛乱，在埃皮达鲁斯登陆了，随后袭击了埃吉那岛。这不是去往优卑亚岛途中的停留，而是径直开往比雷埃夫斯。塞拉门尼斯、阿里斯托克拉特斯和“四百人”内外的其他温和派，召开了紧急会议。塞拉门尼斯近期一直在发警报，伯罗奔尼撒舰队的真实目标不是优卑亚岛，而是雅典的港口。他现在要求采取行动。

阿里斯托克拉特斯指挥着比雷埃夫斯的一个重步兵团，他立刻逮捕了亚利西克利斯——“寡头派的一位将军，与俱乐部成员特别亲近”（8.92.4）。一位温和派下令铲除一名极端派将军，这受到了重步兵部队的欢迎。重步兵是武装部队的核心，如果极端派想要执行卖国求荣的计划，就必须先控制重步兵。当起义的消息传到雅典时，“四百人”正在议事会大厅内开会。极端派迅速反对显而易见的嫌疑犯——塞拉门尼斯。但他做出了令他们吃惊的事情，提议愿意参加援救亚利西克利斯的行动。极端派大吃一惊，不清楚塞拉门尼斯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也不愿意在关键时刻撕破脸皮，于是接受了他的提议，允许他带走了一位与他观点相同的将军。极端派能够采取的唯一反制措施就是，派遣极端派分子阿里斯塔库斯作为第三位将军陪同他们。

一支军队从雅典出发，去应对比雷埃夫斯的另一支军队，内战似乎是不可避免了。但比雷埃夫斯的军队指挥官是温和派，而从雅典出发的三名将军中有两名也是温和派，所以随后出现的不是一场决定性战役，而是一场滑稽表演。阿里斯塔库斯愤怒地要求重步兵奋力作战时，塞拉门尼斯假装训斥这些士兵。大多数重步兵犹豫地问塞拉门尼斯："正在建造的防御工事是对我们有利，还是应当被拆毁？"他答道，如果他们觉得最好把它拆掉，他就同意他们的意见。重步兵们立刻开始拆除防御工事，呼喊着："谁想要'五千人'统治，不要'四百人'，就来拆吧！"（8.92.10-11）

怂恿肯定是温和派计划的一部分，这是对"群众"的呼唤，鼓舞他们拆毁防御工事、挫败极端派向斯巴达人出卖城市的阴谋；也是向"群众"保证，新政权将依法治理国家。呼喊口号的士兵们若是有时间思考，或许会更希望直接恢复完全的民主制；但在塞拉门尼斯及其同僚的领导下，他们满足于推翻"四百人"的寡头统治，阻止极端派叛国投敌。

领导此次活动的温和派领导人不希望发生内战，所以他们的目标是迫使极端派屈服，而不是交战。次日，在军队彻底拆毁了防御工事并释放亚利西克利斯之后，他们便向雅典开进，但在一个操练场停了下来。"四百人"派的代表到达这里，与他们会面。这些代表承诺公布"五千人"名单，并允许以它决定的任何方式从"五千人"中选拔"四百人"议事会成员。代表们敦促士兵保持冷静，不要危害国家和人民，并说服他们在某个指定日子在狄俄倪索斯剧场举行一次公民大会，以讨论恢复和平的问题。

至少极端派对这个建议不是诚心实意的，因为他们相信"让这么多人参与政府事务，就等于是民主制了"（8.92.11）。他们的目标是争取时间，等待斯巴达人来救他们。几天后，消息传来，斯巴达舰队正向萨拉米斯岛前进，打算进入比雷埃夫斯的防御工事，却不知道这些工事已

经被拆毁了。斯巴达人的此次远征可能是和雅典寡头派串通好的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在比雷埃夫斯登陆：如果他们发现爱提奥尼亚落在友好人士手中，就能夺取港口或封锁其入口，用饥饿迫使雅典人屈服。如果幸运的话，他们抵达时雅典人说不定正陷入内战、港口无人把守。如果敌对势力控制着爱提奥尼亚，斯巴达人总可以撤退，驶往优卑亚岛。

由于爱提奥尼亚的防御工事已经被毁，斯巴达人的处境很棘手。在得知敌人舰队逼近后，雅典人奔去保卫港口。斯巴达指挥官阿吉山德里达斯和他的42艘战船从雅典城旁经过，南下去往苏尼昂，进而驶向优卑亚岛。在温和派与民众的努力下，雅典得救了。

优卑亚岛受到威胁

对困守雅典城、比雷埃夫斯和两地之间长墙封闭区域的人们来说，优卑亚岛“至关重要”，于是雅典人临时拼凑了一支舰队，令其在泰摩卡里斯（一位温和派将军）的指挥下匆匆去保护防御薄弱的优卑亚岛。在7英里之外、海峡对岸的奥罗浦斯，阿吉山德里达斯的舰队拥有42艘战船，雅典人只有36艘。此外，阿吉山德里达斯的船员更有经验，事先演练过作战计划，并且得到了埃雷特里亚人[1]的支持。他们战略的一部分是在登陆之后剥夺雅典人的一个市场，迫使雅典人分散开，到内陆腹地去寻找粮食。当雅典人果然这么做的时候，埃雷特里亚人发出了讯号，阿吉山德里达斯开始发动进攻。雅典人不得不逃回他们的船只，立刻起航，因为没有时间整装列队，所以很快被驱赶回岸边。优卑亚人杀死了许多逃命的雅典人，但有些人逃到了哈尔基斯[2]的安全地带，也有一些人逃到了优卑亚岛上的雅典要塞。雅典人最终损失了22艘战船及其船员，伯罗奔尼撒人建造了胜利纪念碑。除了优卑亚岛北端的希斯提亚之外，全岛都加入了叛乱。

雅典人在此次失败后比西西里岛灾难之后更加惊慌失措。他们囊中羞涩，船只不多，并且丧失了通往城墙之外阿提卡的道路，一直作为被

占领土替代品的优卑亚岛也丢失了。城市内部分歧严重，随时可能被内奸出卖。内战一触即发，萨摩斯岛的雅典舰队可能进攻城市。民众最害怕的是，伯罗奔尼撒人会回来进攻比雷埃夫斯，那里缺少足够强大的舰队的保护。修昔底德相信，斯巴达人可以封锁或攻打比雷埃夫斯港，促使萨摩斯岛的雅典舰队回来救援亲属和城市，于是从赫勒斯滂海峡到优卑亚岛的所有附庸国就会全都丢失。按照他的说法，斯巴达人是“所有民族中雅典人打起来最方便的一个”（8.96.5），因为斯巴达人此次和之前许多次一样，白白丧失了良机。

不过后来的事件表明，即便伯罗奔尼撒人这一次更大胆地行动，也未必有好果子吃。斯巴达攻击的威胁并没有在雅典城引发内战，而是导致了“四百人”的垮台和雅典在温和派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斯巴达若是发动了进攻，恐怕只会加快这个进程。在外部，斯巴达人若是封锁或攻打比雷埃夫斯，一定会招致萨摩斯岛雅典舰队的进攻，那么阿吉山德里达斯麾下数量较少的舰队很可能会被歼灭，进而让雅典的附庸国不敢叛变。结果必然是在色拉西布洛斯等温和派的指挥下，雅典舰队合兵一处；雅典则由塞拉门尼斯和阿里斯托克拉特斯等温和派领导。新统一的雅典之后便可以寻求与伯罗奔尼撒舰队决战，并大有希望击败敌人、收复失地。因此，斯巴达人有理由不去冒险攻击雅典的港口。

“四百人”垮台

雅典人当然不知道前景究竟如何，于是采取了必要的行动来自卫。他们为20艘战船配备了人员，以便尽可能地保卫港口；然后在普尼克斯山上开会，这是民主制下召开公民大会的常规地点。这传达了一个明确的讯息，即寡头统治已经结束了。他们正式罢免了“四百人”，“将国家大事交给‘五千人’”（8.97.1），并禁止向任何公职人员发放薪水。

这实际上是批准了温和派的计划，因为舰队主力（桨手主要是下层阶级的人）仍在萨摩斯岛，参会的大部分人是重步兵阶级，他们投票赞

同这个举措，并对此感到十分满意。有些人认可这样的政体，也有些人认为它是恢复完全民主制的一个步骤，因此对其表示支持。温和派领导人的警觉和勇敢挽救了城市，使之免遭出卖和内战，并阻止了倒向寡头统治的运动。塞拉门尼斯和阿里斯托克拉特斯凭借在此次危机中的行动，或许比萨摩斯岛上那位魅力十足的变节者更有资格享受这样的赞誉：他们“对国家的价值超过其他任何人”（8.86.4）。

“五千人”政体

新政权统治下，在公民大会投票、担任陪审员和担任公职的权力仅限于重步兵阶层及以上的人享有。权力中心由“四百人”议事会变为公民大会，但这个大会实际上有多大呢？“五千人”实际上只具有象征意义，不是具体的数字，因为它包括了所有能够自费配备重步兵武器装备或在骑兵部队服役的人。前411年9月，这个数字可能高达一万人。

另外还有一个议事会，大约有五百名成员，他们可能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不是被任命的，其权力比旧时民主制议事会要大。在其他方面，新政体似乎和旧时的民主制一模一样。法庭系统似乎仍然按照传统方式运作，尽管现在的陪审团不包括下层阶级成员。总的来讲，除了阶级限制之外，“五千人”政府与之前的民主制非常相似。

最后，“五千人”政府维持了不到十个月，就和平地被完全民主制取代，因为“人民迅速从‘五千人’手里夺走了国家控制权”（Aristotle，*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34.1）。虽然“五千人”政体的延续时间不长，但修昔底德将其描述为“精英的少数与广大群众的温和混合”（8.97.2），并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雅典政府。亚里士多德指出，雅典人“当时似乎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因为战争还在继续，国家被那些手执兵器的人掌控”（*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33.2）。

新政体的主要缺陷是它拒绝赋予下层阶级（他们是舰队的主力）常

规的公民权利，而在以海战为主要形式的战争时期，这样的举措必然使政府遭到强有力的挑战。要想成功，新近掌握政权的温和派必须将城内的重步兵、骑兵和更重要的萨摩斯岛舰队团结起来；一旦他们这样做了，桨手坚持要求恢复其完整公民权利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温和派面对着一个两难处境：他们的未来和城邦的未来均取决于各阶层的团结，而这种团结必然使他们赞许的政体走向终结。

“五千人”的运作

作为促使雅典城与舰队这两个阵营和解的第一步，“五千人”投票决定召回亚西比德和陪伴他的那群流亡者。塞拉门尼斯和其他温和派一直想让亚西比德回到雅典，并利用他无与伦比的外交和军事才干。作为雅典的敌人，亚西比德险些给它带来毁灭；如今得以回归，他也许能力挽狂澜。亚西比德接到召回令之后的行动表明，这道法令既没有申明他无罪，也没有完全赦免他。法令确认了舰队官兵选举亚西比德为将军的决定，所以一定废止了他作为不法之徒的旧身份，解除了缉拿和惩罚他的威胁。然而，法令可能让他处于前415年秋季的境地，即遭到指控但未受审：他必须返回雅典，才能获得完全赦免和恢复地位。尽管他的主要政敌要么死了，要么失势，他却没有像一个完全洗脱了罪名、不再受到任何威胁的人那样，立刻返回雅典并接受群众的欢迎；他又等了将近四年，直到前407年夏季才返回雅典。普鲁塔克解释道：“他觉得自己不应当两手空空、没有任何成绩，仅凭群众的虔诚和恩德而回国，应当要带着光荣归来。”（*Alcibiades* 27.1）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之所以迟迟不回国，是因为害怕遭到起诉。

新政权远远谈不上稳固。尽管一些极端寡头派立刻逃离了城市，城内局势依然不稳定，很多极端寡头派分子选择了留在城内，甚至希望重新夺权。温和派必须谨慎行事，因为尽管他们在推翻“四百人”的行动中起了领导作用，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是“四百人”成员。他们不仅需要防备极端派恢复寡头统治或出卖国家，还必须与他们的前“四百人”同僚

划清界限。但是，温和派最初的官方举措之一却很奇怪：公民大会对已经死去的普律尼科司颁布了一道法令，指控他叛国。被定罪之后，他的遗骸被从地下挖掘出来，运到阿提卡边界之外；他的住宅被摧毁，财产被充公，对他的判决和惩罚被刻在青铜碑上。这道法令之所以攻击一个树敌甚多但已经死去、不会再惹麻烦的人，显然是要试试水，了解民意。即便如此，阿里斯塔库斯和亚利西克利斯都有为普律尼科司辩护，说明这两个极端分子仍然感到很安全，能够为其同党辩护。

在这个试水的控诉成功之后，温和派开始攻击在世的极端派。派桑德在遭到审判之前逃走了，但三位寡头派领导人——阿耳刻普托勒摩斯、奥诺麦克利斯和安提丰——遭到了起诉，被指控为勾结斯巴达人“危害国家”。之后奥诺麦克利斯逃之夭夭，但阿耳刻普托勒摩斯和安提丰却留下为自己辩护；因为“四百人”的一位成员波利斯特拉仅仅被处以罚金，已经获释，另外很多人也被无罪释放。但阿耳刻普托勒摩斯和安提丰被判死刑，身败名裂，死后也遭到了普律尼科司那样的羞辱处置。他们遭到的判决和处罚被刻在青铜碑上，碑则竖立在普律尼科司的青铜碑附近；他们的宅邸也树立了石碑，上面写着：“两个卖国贼阿耳刻普托勒摩斯和安提丰的土地。”（Plutarch，*Moralia* 834A）

阿耳刻普托勒摩斯和安提丰的命运一定促使剩下的极端派分子逃亡，于是国家被内奸出卖的威胁消除了。这两人的处决或许为温和派赢得了公众支持，并增强了自信心。泰摩卡里斯保留了他的海军指挥权，塞拉门尼斯则胸有成竹地驶往赫勒斯滂海峡，与色拉西布洛斯和亚西比德会合。温和派现在可以将注意力转向如何打赢战争了。

---

[1] 埃雷特里亚是优卑亚岛上的一个城镇。

[2] 哈尔基斯是优卑亚岛的首府。

第三十二章 赫勒斯滂海峡的战火（前**411**～前**410**年）

一支小规模的伯罗奔尼撒舰队抵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兵家必争之地——拜占庭，煽动那里和邻近城镇加入叛乱，威胁了雅典的粮食供应和城市生存。这对雅典的新政权来说是致命的挑战。小亚细亚北部总督法那巴佐斯敦促斯巴达人立刻派遣一支更大规模的舰队，抓住这个机遇，但明达鲁斯没有迅速做出反应。

幽灵般的腓尼基舰队

斯巴达仍然受到条约的约束，有义务在伊奥尼亚地区与提萨弗涅斯合作。这位总督依旧断断续续地为斯巴达人提供少量海上军饷，他曾承诺将腓尼基舰队带入爱琴海，和伯罗奔尼撒舰队联合起来就足以帮助斯巴达人打赢海上战争。所以，尽管提萨弗涅斯的诺言仍然没有兑现，斯巴达人还是谨慎地对他保持耐心。拥有147艘战船的腓尼基舰队实际上已经抵达了小亚细亚南岸的阿斯蓬都斯，但没有继续前进，因为总督仍然决心将两个阵营的希腊人都拖垮。

明达鲁斯在米利都等了一个多月，最后得知提萨弗涅斯实际上是在欺骗斯巴达人，腓尼基船只已经在回国途中了。斯巴达人的期望破灭了，他们也不必再遵守与提萨弗涅斯的条约，可以自由地到赫勒斯滂海峡与法那巴佐斯合作了。

要抵达那里，斯巴达海军司令必须率领他的73艘船只从萨摩斯岛旁溜过，而萨摩斯岛的75艘雅典三列桨座战船阻拦着他的去路。明达鲁斯更愿意在赫勒斯滂海峡的狭窄海域与敌交战，因为那里始终离陆地很近，舰队可以得到波斯军队的支持。萨摩斯岛地区雅典舰队的指挥权被交给了经验不足的斯拉苏卢斯，他似乎从来没有指挥过一艘战船或一个

团的步兵。他从普通重步兵擢升为将军，主要是因为他在平定萨摩斯岛寡头派叛乱的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成功平定那次叛乱之后，他很快就遇到了另一个挑战：莱斯博斯岛上的两个城镇——米西姆纳和爱里苏斯——叛变了。莱斯博斯岛上的雅典军队不足以应对米西姆纳，而色拉西布洛斯已经率领一支小舰队去处置爱里苏斯了。尽管斯拉苏卢斯理应立刻起航去希俄斯岛，以阻止明达鲁斯前往赫勒斯滂海峡，他却率领55艘战船匆匆赶往莱斯博斯岛，将余下的船只留在萨摩斯岛守卫基地。他的战略是攻击爱里苏斯，在莱斯博斯岛的两端和大陆上设置瞭望哨，以确保明达鲁斯仍然在希俄斯岛。他打算在莱斯博斯岛停留较长时间，以这个岛为基地，打击希俄斯岛上的斯巴达人。

斯拉苏卢斯太急于求成，导致他的主要任务失败了。明达鲁斯在希俄斯岛只停留了两天，以便装载补给物资，然后狡猾地奔向莱斯博斯岛与大陆之间的狭窄水道；雅典人没想到他会选择这条路线。他安全地通过了这条水道，于午夜时分抵达了赫勒斯滂海峡入口。他在近20小时内航行了约110英里。他不仅转移了战区，还改变了战争进程，因为雅典人未能阻止他大胆而充满想象力的行动，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对雅典的生存构成了威胁。

基诺塞马战役

雅典人匆忙追击，但到得太迟，未能阻止明达鲁斯与阿卑多斯（这是伯罗奔尼撒舰队在赫勒斯滂海峡的基地，见地图24）的伯罗奔尼撒舰队会合。在色拉西布洛斯的指挥下，雅典人随后花了五天时间制订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然后将75艘战船摆开一字长蛇阵，在靠近加里波利半岛海岸的地方进入赫勒斯滂海峡。色拉西布洛斯没有多少选择，只能发动攻势，因为至关重要的粮食供应路线如今已经受到了威胁。斯巴达人不会进入开阔海域，雅典人不得不迫使敌人在赫勒斯滂海峡的狭窄海域交战。

斯巴达人拥有86艘战船，占据数量优势，而且他们可以停留在自己基地附近，自由选择出战的时间和地点。凭借这些优势，明达鲁斯将他的船只部署在阿卑多斯和达耳达诺斯之间7.5英里宽的海面上，将叙拉古船只安排在右翼，也就是最深入赫勒斯滂海峡的那一翼，而他自己指挥左翼，最靠近海峡的入口。当雅典舰队中路抵达基诺塞马（意思是“母狗的坟墓”，此地海峡最窄）海岬正前方时，明达鲁斯发动了进攻，希望将雅典人驱赶到岸边，那样他的海军步兵的战斗力优势就能发挥出来。他本人承担了艰巨的任务，即包抄敌人以切断其退路，打算将雅典舰队一举全歼。如果斯巴达中路顺利完成任务，那么雅典右翼就要迅速援救处境困难的雅典中路，这样明达鲁斯就能插入他们和赫勒斯滂海峡入口之间，有效地将雅典人堵在海峡内。雅典中路的余下兵力和注意力被转移的右翼将被夹在斯巴达中路和明达鲁斯之间。如此一来就很容易消灭位于赫勒斯滂海峡更北面的雅典左翼。

斯拉苏卢斯指挥着雅典舰队的前锋，在左翼对付叙拉古人，而色拉西布洛斯统领右翼，面对着明达鲁斯。主动权在斯巴达人那边，所以雅典人必须做好准备、随机应变。色拉西布洛斯或许是猜到了明达鲁斯的战略，他做出了精彩的回应。雅典中路抵达海峡最狭窄处时，伯罗奔尼撒人发动进攻，取得了很大成功。斯拉苏卢斯的左翼与叙拉古人交战，由于一块海岬阻断了他的视线，所以他看不到己方中路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雅典人是胜利还是失败，取决于他们的右翼，即色拉西布洛斯的部队。如果他像斯巴达人预估的那样冲过去援救自己的中路，就会不得不面对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被敌军中路和左翼困住，那么整个雅典舰队就会像明达鲁斯计划的那样全军覆灭。

但色拉西布洛斯发现了敌人的圈套，意识到明达鲁斯正在切断他的退路，于是利用雅典船只更快的航速，将己方战线延伸得比敌方更长。然而，他这么做就使己方遭到沉重打击的中路更加薄弱，使伯罗奔尼撒人将很多雅典船只驱赶到岸边搁浅，并将自己的部队送上岸。伯罗奔尼

撒人既缺乏海战经验，纪律也很涣散，这使他们丢失了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如果他们重整己方战线并加入明达鲁斯的左翼，追击色拉西布洛斯的船只，就可能击沉或俘虏许多雅典船只，至少能歼灭斯拉苏卢斯的部队并牢牢控制赫勒斯滂海峡。然而，有一些船只脱离了战线，去追击落单的雅典三列桨座战船，最后伯罗奔尼撒舰队的战线自动打乱。色拉西布洛斯抓住最佳时机发动了进攻，调转船头去面对正在逼近的明达鲁斯船只，将其击溃。然后他猛击混乱的敌军中路，伯罗奔尼撒舰队未加抵抗便逃往塞斯托斯。当他们绕过基诺塞马的弯曲处时，叙拉古人看到战友在逃跑后，也匆匆败退，于是整个伯罗奔尼撒舰队争先恐后地逃往阿卑多斯的避难所。

在这一时期的史书里，对希腊海战的描写通常选取海军将领的视角，从指挥官高高在上的位置俯视整个战场，调遣两翼、中路和整个舰队。但在赫勒斯滂海峡的这些战役中，史学家狄奥多罗斯给了我们非常罕见的观察战船甲板的机会，从个别三列桨座战船船长的视角来描写战局。因为伯罗奔尼撒人的海军步兵更强，所以他们在中路较为成功；中路的战斗主要是近距离白刃战，用抓钩咬住敌船并登船近战是更为人们青睐的战术。当雅典战船被驱赶到岸边的时候，海战就变成了陆战，伯罗奔尼撒人占了上风。但到最后，雅典的舵手“由于经验远远比敌人丰富，对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Diodorus 13.39.5）。这个因素也能解释，起初被敌人三列桨座战船打得很窘迫的色拉西布洛斯为什么后来却能击溃同一群敌船。伯罗奔尼撒中路的混乱使他改变了战略。他不再努力防止被封锁，而是迅速寻求与明达鲁斯决战，以便利用敌人的混乱，避免被敌人两道有组织的战线夹住。当伯罗奔尼撒人企图以整个舰队发起攻击时，技艺娴熟的雅典水手便驾驶船只与敌人迎头相撞，冲角对着冲角。受挫之后，明达鲁斯将他的战船组织成若干小群，发动若干次小规模攻击，但雅典舵手仍然能够凭借更高超的技术和更丰富的经验挫败这些攻击，撞击敌船，剥夺其战斗力。（Diodorus 13.40.2）

尽管雅典人只俘获了21艘敌船，自己损失了15艘，但色拉西布洛斯的水手们赢得了在基诺塞马海岬建立胜利纪念碑的资格。国内的雅典人得到捷报，认为这是“意想不到的好运气”，这次胜利来得正是时候。在丧失优卑亚岛和经历推翻“四百人”所带来的冲突之后，此次胜利鼓舞了雅典人：“他们受到了莫大鼓励，觉得只要努力奋斗，他们的事业仍然有希望成功。”（8.106）

此次胜利对战争的余下部分有着重大意义。在基诺塞马，色拉西布洛斯原本可能在一个下午输掉整个战争，因为如果明达鲁斯在前411年10月初的这一天击败了雅典舰队，雅典人可能很快就会被迫投降。他们没有资金去建造一支新舰队，而且优卑亚岛失败之后，再次战败就会引发更多的附庸国叛变。基诺塞马的胜利阻止了这种局面，使雅典有能力继续打下去，并且还有希望荣耀体面地结束战争。

基诺塞马战役之后，双方都把握机遇，发动了一些小规模袭击。双方都努力扩大舰队规模，以便迎接下一次重要冲突。明达鲁斯深知下一次战役就可能决定整个战争的胜负，于是命令叙拉古指挥官多利尤斯（他正在镇压罗德岛的一次叛乱）调动舰队北上，去往赫勒斯滂海峡。

大约在同一时间，亚西比德从小亚细亚南海岸（提萨弗涅斯去阿斯蓬都斯与腓尼基舰队会合后，亚西比德便去了小亚细亚南海岸）返回了萨摩斯岛。尽管他对总督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他仍然吹嘘是他阻止了腓尼基人来援助斯巴达人，这是他的功劳；事实上，他只是从卡里亚各城市及周边地区征募了一些资金，于9月底将这些资金交给萨摩斯岛的雅典部队，赢得了他们的赞许。

色拉西布洛斯在基诺塞马为生存而奋斗，双方都在寻求增援以备战下一回合；与此同时，亚西比德留在萨摩斯岛，监视着多利尤斯舰队，后者仍然威胁着雅典人的南方领地。但如果说这就是亚西比德的任务，那么他最终并没有完成任务。因为在他率领舰队去增援赫勒斯滂海峡的

雅典人时，多利尤斯早已溜过他的监视，到了他前头。

此时海峡已经成为该地区的焦点，就连提萨弗涅斯也开始从阿斯蓬都斯赶往海峡。伯罗奔尼撒舰队已经驶离他管辖的海域，并与法那巴佐斯达成合作，因此提萨弗涅斯担心他的竞争对手法那巴佐斯会完成自己没有完成的任务，即击败雅典人，并因此赢得荣耀和大流士二世的恩宠。但是，他也有其他动机。克尼多斯和米利都这两个希腊城邦起来反抗他，并且取得了成功，而安坦德鲁斯[1]在斯巴达的帮助下也背叛了他。斯巴达人向其国内政府抱怨提萨弗涅斯，而且不再依赖他并开始反对他。“盟友”斯巴达人不知道将来还能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多利尤斯的抵达引发了下一轮冲突。11月初一天的黎明前，多利尤斯企图在黑暗掩护下，让他的14艘战船溜过雅典人的瞭望哨，进入赫勒斯滂海峡。但一名警卫向在塞斯托斯的雅典将军发送了警报，这位将军将多利尤斯的船只驱赶到罗艾特昂附近海岸。在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多利尤斯得以向位于阿卑多斯的斯巴达基地进发，但在达耳达诺斯又被一支雅典舰队驱赶到岸边。明达鲁斯在得知多利尤斯遇险后，匆匆从特洛伊[2]赶回他在阿卑多斯的基地，并向法那巴佐斯发送消息。明达鲁斯率领84艘船只奔去援救多利尤斯，而法那巴佐斯带来一支陆军，从陆地上支援多利尤斯。雅典人登上战船，准备开启一场海战。

阿卑多斯战役

明达鲁斯的97艘战船从达耳达诺斯一直排到阿卑多斯。他亲自指挥右翼，部署在阿卑多斯附近；叙拉古人在左翼。明达鲁斯的对面是指挥雅典左翼的斯拉苏卢斯，色拉西布洛斯则指挥雅典右翼。双方指挥官发出视觉信号后，号手吹响冲锋号，战斗便打响了。战斗很激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双方都势均力敌，直到傍晚时分海平线上出现了18艘船只。双方都觉得这是自己的增援部队，因此大受鼓舞；直到增援舰队的指挥官亚西比德升起了红旗，这相当于告诉雅典人，他们的援兵到了。

这不是运气问题，这个信号一定是事先约定的，雅典人早就知道亚西比德会来支援他们。不过他赶到的时机很幸运。虽然他没能参加此役的战前筹划，并且到得太晚，没有出多少力气，但他的到来决定了战局。

明达鲁斯意识到正在靠近的船只属于雅典人后，便率领自己的船只奔向阿卑多斯。伯罗奔尼撒舰队前后拉得很长，许多船只被迫在岸边停靠，船员们努力在陆地上进行自卫。法那巴佐斯将骑兵和步兵调来支援，总督本人亲自纵马奔入海边浅水，抵挡敌人。总督的干预和夜幕的降临阻止了斯巴达人的彻底失败，但雅典人仍然俘获了30艘伯罗奔尼撒船只，并收复了他们在基诺塞马丢掉的15艘船。明达鲁斯带着剩下的舰队，在夜色掩护下逃到了阿卑多斯，雅典人则撤到塞斯托斯。次日，雅典人悠闲地返回前一天的战场，收回自己的受损船只，并建立了又一座胜利纪念碑，距离在基诺塞马的第一座纪念碑不远。雅典人再一次主宰了赫勒斯滂海峡。

在明达鲁斯修理船只、向国内求援并与法那巴佐斯筹备下一次行动的同时，雅典人理应调来增援部队，并尝试逼迫敌人决战，以歼灭赫勒斯滂海峡的伯罗奔尼撒舰队余部。如果明达鲁斯拒绝出战，雅典人就应当安排一支舰队封锁海路，阻止敌人的海军援兵抵达，同时收复赫勒斯滂海峡、普洛庞提斯海[3]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反叛雅典的各个城市。但雅典人没有办法完成这些行动中的任何一项，因为他们的国库已经空虚，甚至没有足够的资金让整个舰队在赫勒斯滂海峡过冬。另外，在基诺塞马和阿卑多斯战役中，由于赫勒斯滂海峡十分狭窄，伯罗奔尼撒人的三列桨座战船若是不敌雅典舰队，便可以靠岸以避免失败，但雅典舰队缺少重步兵，没有办法应对敌人的这种策略。最后，雅典在更靠近本土的地方也需要海军支持，因为优卑亚岛的叛乱还没有平定。

为了应对优卑亚岛的挑战，塞拉门尼斯率领30艘战船去镇压叛军。

这些叛军在新盟友玻俄提亚人的支持下，正在哈尔基斯和奥利斯[4]之间建造一座堤道，将优卑亚岛与大陆连为一体。塞拉门尼斯的舰队太小，无力击败保护修建堤道工人的敌军，于是塞拉门尼斯蹂躏了优卑亚岛和玻俄提亚海岸的敌境，搜罗了不少战利品。然后他继续绕过基克拉泽斯群岛，镇压了“四百人”在那里建立的寡头政权，收集了急需的资金，并为“五千人”新政权赢得了威望。

塞拉门尼斯在爱琴海取得了他能力范围之内的最大战果之后，便驶向马其顿，帮助新国王阿基劳斯攻打皮德纳。马其顿仍然是希腊造船业的主要木材来源地，阿基劳斯似乎为雅典提供了木材，也许还提供了资金。随后塞拉门尼斯与色拉西布洛斯会合，后者之前在劫掠寡头统治下的萨索斯岛和色雷斯的其他地方，以便收集资金。两支舰队在色雷斯会合，若出现紧急情况，便可迅速赶往赫勒斯滂海峡。

与此同时，亚西比德正在塞斯托斯的舰队中，这时提萨弗涅斯抵达了赫勒斯滂海峡。亚西比德以密友和恩主的姿态欢迎了总督。雅典人仍然相信这两人的关系很融洽，而且亚西比德说服提萨弗涅斯将腓尼基舰队遣返回国了。亚西比德隐瞒了真相，带着礼物乘船去见提萨弗涅斯，但他对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总督并无与雅典交好的意思。斯巴达人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提萨弗涅斯，他们的抱怨一定传到了波斯国王耳里。波斯国王一定对提萨弗涅斯感到不满，因为提萨弗涅斯将腓尼基舰队停在阿斯蓬都斯，开销很大，却无所作为；结果雅典人仍然在赫勒斯滂海峡，波斯国王收复失地的计划没有任何进展。

提萨弗涅斯有理由害怕“国王因为当前的局势而怪罪他”（Plutarch，*Alcibiades* 27.7）。于是他逮捕了亚西比德，将他送到萨第斯羁押，但不到一个月，这个聪明的雅典人便逃走了。这个事件让雅典人看清了，亚西比德对提萨弗涅斯再也没有任何影响力。从今以后，亚西比德的权威将取决于他的实际成就，而不是他许诺利用他与波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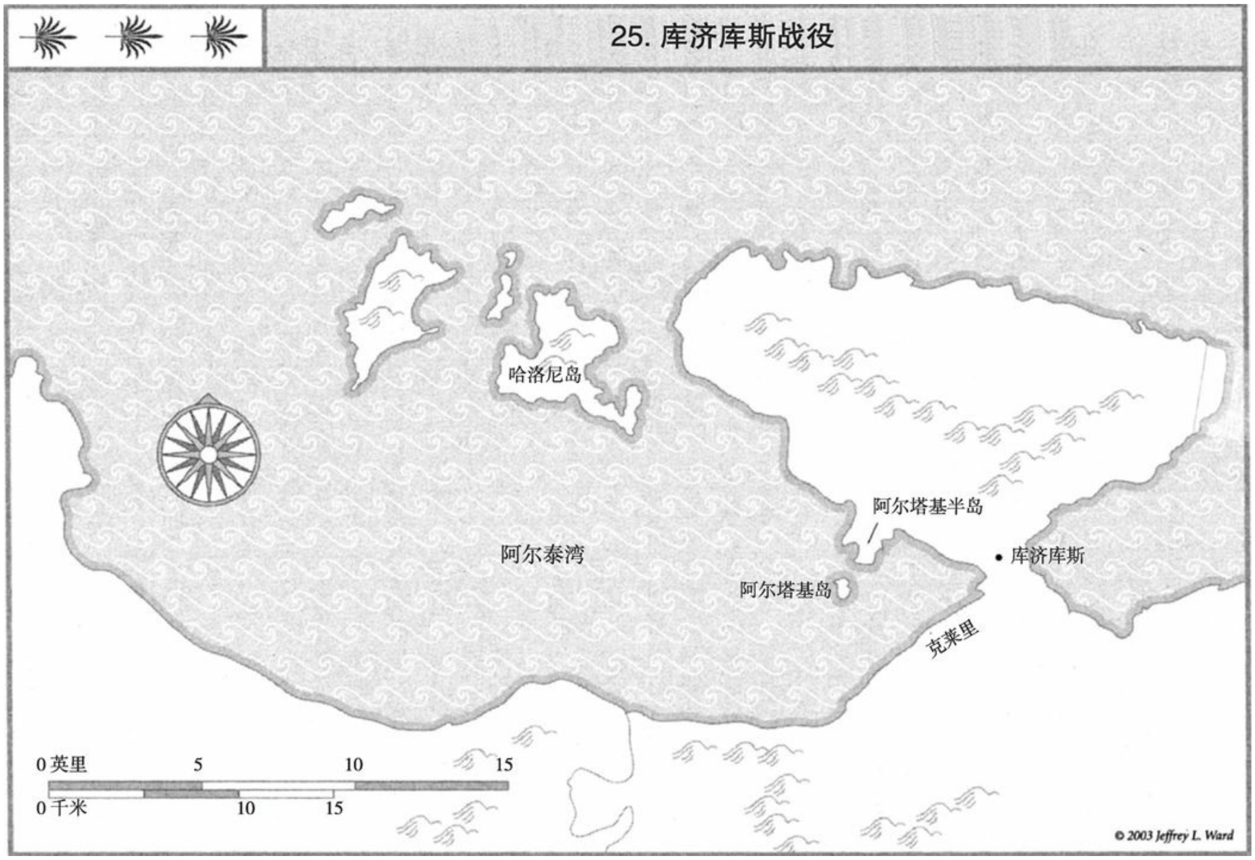
关系能够带来的利益。

库济库斯战役

到前410年春季，明达鲁斯集结了80艘三列桨座战船。雅典指挥官仅率领40艘战船，趁夜色从塞斯托斯出发，驶往加里波利北岸的卡狄亚。在色雷斯的色拉西布洛斯和塞拉门尼斯，以及在莱斯博斯岛的亚西比德匆匆赶去与这支舰队会合。卡狄亚的雅典舰队船只增加到了86艘，“将军们急切地希望决战”（Diodorus 13.39.4）。与此同时，明达鲁斯和法那巴佐斯围攻了普洛庞提斯海南岸的库济库斯（见地图25），并将其占领。雅典将军们出发去收复这座城市，为了躲避敌人的视线而选择在夜间行动，来到了普洛孔涅索斯岛[5]。这个岛屿就在库济库斯所在的阿尔塔基半岛西北方不远处。

在普洛孔涅索斯岛，亚西比德告诫士兵和水手，“在海上作战，在陆地上作战，攻打敌人的防御工事，因为敌人从波斯国王那里得到了很多金钱。雅典人除非赢得一场全胜，否则就什么都没有”（Xenophon，*Hellenica* 1.1.14；Plutarch，*Alcibiades*，28.2）。舰队在瓢泼大雨中向库济库斯开进，波涛汹涌的大海虽然对舰队有一定威胁，但也可以掩护他们接近，让敌人无法看清他们的实际规模。舰队沿着阿尔塔基半岛西海岸南下，半岛位于大陆与哈洛尼岛之间。在阿尔塔基半岛和离海岸不远的同名岛屿，他们兵分四路：凯利亚斯和他的重步兵上岸向库济库斯前进；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分别率领一支队伍（共计46艘战船），隐藏在阿尔塔基半岛以北的小港内；亚西比德带领剩余的40艘战船径直奔向库济库斯。明达鲁斯一定觉得雅典人只有40艘战船（就是在赫勒斯滂海峡的那支），而不知道雅典人的兵力究竟有多大，于是急切地率领全部80艘三列桨座战船去迎战亚西比德。他认为自己占据二比一的兵力优势，必胜无疑。雅典战船佯作恐慌，向西逃窜（朝阿尔塔基岛的方向），但在明达鲁斯的船只追进港口后，亚西比德调转船头，直面追击敌人。与此同时，塞拉门尼斯将队伍从半岛北面调

出来，开向库济库斯，以阻止伯罗奔尼撒人返回城市或抵达城市附近的海滩。色拉西布洛斯率领他的队伍南下，切断敌人从西向东的退路。



明达鲁斯很快就发现敌人设下的陷阱，及时调头，阻止色拉西布洛斯和塞拉门尼斯封闭包围圈。明达鲁斯向唯一对他敞开的方向逃跑，也就是朝向克莱里（库济库斯城西南的一处海滩），法那巴佐斯的陆军就驻扎在那里。伯罗奔尼撒人将他们的三列桨座战船拖到了岸上，亚西比德则用抓钩企图将它们重新拖回海里。法那巴佐斯率军前来救援，他们人多势众，站在陆地上对付在浅滩中蹒跚蹚水的雅典人。雅典人打得很好，但没有得到援助，因此前景不妙。在海上，色拉西布洛斯看到了这个场景，于是传令给塞拉门尼斯，让他与库济库斯附近的凯利亚斯陆军会合，前来支援陷入激战的雅典人，而他率领海军步兵则从西面援助他们。看到色拉西布洛斯接近，明达鲁斯派遣克里阿库斯带领部分兵力和一队属于法那巴佐斯的雇佣兵前去阻击。色拉西布洛斯手里只有不超过

25艘战船及船上的重步兵和弓箭手，兵力远逊于敌人；正要被包围和歼灭的时候，塞拉门尼斯连同凯利亚斯的部队及时赶到。这支援军接替了色拉西布洛斯精疲力竭的士兵，随后展开了一场激战，直到法那巴佐斯的雇佣兵和斯巴达人最终逃离战场。

色拉西布洛斯的部队安全之后，塞拉门尼斯就去援助亚西比德，后者仍然在岸上为争夺船只而奋战。明达鲁斯发现自己被夹在了亚西比德和塞拉门尼斯的部队之间，这两支部队相向而行，直逼明达鲁斯。斯巴达指挥官镇定自若，派遣一半部队去迎战塞拉门尼斯；他自己则率领另一半部队排成战线，抵抗亚西比德。明达鲁斯在舰船之间奋勇作战，直至阵亡。他的士兵和盟军手足无措，四散逃跑，后来依靠法那巴佐斯的骑兵才抵挡住了雅典人的追击。

雅典人撤回普洛孔涅索斯岛，伯罗奔尼撒残军逃到了法那巴佐斯营地的安全处。他们后来放弃了库济库斯，于是这座城市回到雅典人手中。雅典人抓获了众多俘虏，缴获大量战利品和除了叙拉古船只之外的所有敌船。叙拉古水手为了防止自己的船只落入敌手，纵火焚毁了。雅典人建立了两座胜利纪念碑，以宣扬他们在海洋和陆地的两场胜利。

亚西比德在库济库斯待了二十天，征集资金，然后前往普洛庞提斯海北岸，即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方向，袭掠沿途城市，掳夺金钱。在与拜占庭隔海相望的克里索波利斯，他建造了一座要塞作为基地和海关。从此之后，雅典人就在那里，向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商船征收十分之一的关税。

据普鲁塔克分析，库济库斯战役的主要结果是“雅典人不仅牢牢控制了赫勒斯滂海峡，还将斯巴达人从大海的其余部分驱逐了出去”（*Alcibiades* 28.6）。同样重要的结果或许是斯巴达人士气受到了沉重打击。此役之后，雅典人截获了明达鲁斯的秘书希波克拉底的一封信，信里以拉科尼亚式的简练描述了伯罗奔尼撒人的困境：“船损失

了。明达鲁斯阵亡。官兵挨饿。我等不知如何是好。”（Xenophon，*Hellenica* 1.1.23）

库济库斯战役的胜利还暂时解除了雅典粮食供应受到的威胁，恢复了雅典胜利的希望。色诺芬和普鲁塔克都将此次胜利归为亚西比德的功劳，但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至少有同等的功绩。我们不知道库济库斯的绝妙海战策略是谁设计出来的，但我们可以确定亚西比德没有参与基诺塞马和阿卑多斯战役的战前筹划，因为他没有参加基诺塞马战役，而在阿卑多斯战役快结束时才姗姗来迟。亚西比德在库济库斯表现出色，完美地完成了任务；塞拉门尼斯的表现也非常突出，正是他率领援军赶到，才最终保证了雅典人的胜利。

对这些事件做一番仔细审视，我们就能发现色拉西布洛斯又一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色拉西布洛斯既是整个舰队的领导人，也是基诺塞马战役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指挥官；他或许就是制订了阿卑多斯作战计划的人，在库济库斯战役中也是主要的策略设计师。不管库济库斯战役的海战部分多么精彩，决定战局的其实是陆战。亚西比德遭到明达鲁斯和法那巴佐斯军队攻击的时刻就是关键时刻。若是没人援救亚西比德，他肯定会被打退，并不得不放弃他企图拖走的大部分斯巴达船只，法那巴佐斯的步兵和骑兵就能够控制和保护这些船只。但在千钧一发之际，色拉西布洛斯率领一支小部队登陆，牵制住敌人的部分兵力，挽救了亚西比德。他给塞拉门尼斯下达的命令同样是至关重要的，确保了雅典人的胜利。作为一位战略家、战术家和优秀的一线指挥官，色拉西布洛斯理应被视为库济库斯战役的英雄。我们应当尊重罗马传记家科尔内利乌斯·尼波斯对他的评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色拉西布洛斯在没有亚西比德的情况下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胜利；亚西比德在没有色拉西布洛斯的情况下却毫无建树，然而他凭借某种天生的本领，夺取了所有胜利的功劳。”（Cornelius Nepos，*Thrasybulus*，1.3）

---

[1] 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部的特洛阿德地区，距赫勒斯滂海峡不远。

[2] 这一时期的特洛伊城原为雅典同盟成员，雅典发生寡头派革命后，丧失了对特洛伊的控制力。此后被波斯总督法那巴佐斯的附庸控制。

[3] 马尔马拉海，北端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南端是赫勒斯滂海峡。

[4] 玻俄提亚的一座城镇，与优卑亚岛之间隔着尤里普斯海峡。根据希腊神话传说，希腊人就是从奥利斯出发，去远征特洛伊的。

[5] 位于马尔马拉海中，今称马尔马拉岛（Marmara），属于土耳其。

第七部 雅典的陷落

在西西里岛之后，前411年肆虐雅典城的内乱原本可能是压断雅典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复苏的雅典民主制凭借顽强的意志，继续坚持奋战了七年。即便在敌人得到波斯帝国的支持之后，雅典人仍然掌握制海权，并迫使斯巴达人又一次求和。复苏的民主制政权从“五千人”赢得的胜利中获益不少，解决了城邦的实际问题，并使民众的忠诚和能量发挥了作用，而正是这种忠诚和能量使雅典如此伟大。

第三十三章 民主制的恢复（前410～前409年）

库济库斯战役结束时，伯罗奔尼撒人在几个月内损失了135～155艘船只。雅典控制着各处海域，以及连接黑海周边重要产粮区的通道。波斯的金钱和狄凯里亚的要塞似乎都不能给斯巴达人带来胜利，他们也没有其他战略可用。而且，雅典人抓获了大批俘虏，迫使敌人就像在前425年那样急于求和，以便救回这些俘虏。

斯巴达的和平建议

于是，斯巴达人违背了他们与波斯的条约，向雅典求和。他们的主要谈判者恩狄乌斯（他曾是亚西比德的密友）提出了斯巴达的建议："雅典人，我们希望与你们议和，双方各自保留现在实际控制的城市，但放弃在对方领土上驻防的据点，并交换俘虏，一名雅典人交换一名拉科尼亚人。"（Diodorus 13.52.3）

停止战事、用皮洛斯交换狄凯里亚和交换俘虏，这些对雅典人而言肯定是值得欢迎的条件，但维持帝国现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斯巴达人仍然控制着爱琴海上的罗德岛、米利都、以弗所、希俄斯岛、萨索斯岛、优卑亚岛、色雷斯的一些地方和赫勒斯滂海峡的阿卑多斯，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拜占庭和迦克墩。一般的观点认为，"最理智的雅典人"主张接受这些条件，但公民大会"受到一群好战分子的蛊惑，这些人大发国难财"（Diodorus 13.53），因此拒绝接受。

根据这种观点，雅典人拒绝和平的原因是他们愚蠢地让鲁莽的民主领袖操控自己，其中最主要的是克里奥丰，"当时最大的煽动家"（Diodorus 13.53.2）。克里奥丰是讽刺诗人最喜欢攻击的目标，也是受到严肃作家鄙夷和憎恨的人。喜剧家说他是制作里拉琴的工匠（就

像他们污蔑克里昂是鞣革工、吕西克利斯是牛贩子、攸克拉底斯是亚麻贩子、希帕波鲁斯是制作灯的工匠一样），一名低贱的手工匠人，没有任何家世背景。据说他的母亲是蛮族，他自己则是一个贪婪的外邦人。严肃作家描述他为醉鬼、杀人犯和在公共场合疯疯癫癫的狂人。尽管他的行为举止可能确实比较激烈和不文雅，但这样的描述既不公正，也不准确。克里奥丰是雅典人，他的父亲曾在前428/前427年担任将军。他自己也可能担任过将军，而且还是一名财政官员。他死后，一位演说家公正地评价道，克里奥丰“多年来处理国家的各种事务”（Lysias 19.48）。他一定拥有一座作坊或工厂，所以他是一个富人，他的父亲也很富裕。

斯巴达的和平建议是在“五千人”掌权时提出的，而克里奥丰参与了辩论，所以他至少属于重步兵阶层，不过地位可能还要更高。有人指责他反对议和的动机是私利，但我们不知道有任何指控他侵吞公款或贪腐的控诉。在当时，政治家遭到这样的指控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过有证据表明，他死时已经很潦倒。

克里奥丰的确对雅典的战争前景抱有比较乐观的看法，并主张坚持战斗，直到完全胜利。他一定很有说服力。很多雅典人受到库济库斯战役辉煌胜利的鼓舞，热情洋溢地将功劳归给亚西比德，相信在他的领导下“一定能很快恢复他们的海外帝国”（Diodorus 13.53.4）。但除了陶醉于胜利并对未来非常乐观之外，雅典人也有更理智的理由去拒绝斯巴达的和平建议：如果这次和平再次破裂，就像前421年那样，雅典人的处境会比上一次更加危险。

目前，雅典人在库济库斯成功歼灭了斯巴达舰队，保障了海峡畅通，使商船能够从黑海向雅典城输送至关重要的粮食。

但是，法那巴佐斯完全可能给伯罗奔尼撒人建造一支新舰队，甚至比之前更强大。他们控制着拜占庭和迦克墩，扼住了雅典人的运粮通

道，可以用饥饿来威胁雅典人。雅典人仍然缺少资金，海外领地的很多财源都控制在斯巴达手中，所以敌人可以用更高的价钱从雅典帝国各地征募经验丰富的桨手。雅典将不得不再次派遣一支舰队去赫勒斯滂海峡击败敌人，但雅典很难筹措到足够的资金来维持这样一支舰队并为其配备人员。何况他们未必能再次打赢，而一旦失败，就可能输掉整个战争。

然而，若是迅速采取行动，就能夺取敌人在去往黑海沿途的基地，并保障海峡的安全。雅典人也会有很大的把握去收复爱琴海的失地，并利用库济库斯大捷鼓舞朋友，震慑敌人。在收复了之前丧失的附庸国并再次控制大海之后，雅典人的财政就能恢复到之前的水平，进而有财力提高舰队的战斗力，并促使有经验的桨手不选择投敌。

雅典人也有理由去希望，斯巴达与波斯的盟约维持不了多久。首先，提萨弗涅斯激怒了斯巴达人，失去了他们的信任。法那巴佐斯则为库济库斯惨败而震惊，若雅典人继续进攻他的土地，就可能促使这位波斯总督以及波斯国王放弃干预希腊事务。其次，波斯国王统治的是一个庞大且经常受到叛乱骚扰的帝国。如果其他地方发生严重叛乱，波斯国王也许会被迫放弃西部边疆的战争。最后，斯巴达人与雅典人单独媾和的提议违背了他们与波斯的条约，这本身就可能导致斯巴达与波斯决裂。考虑到这些现实和可能性，雅典人拒绝议和的决定不能算是愚蠢，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民主制恢复

在雅典人拒绝接受和平建议不到两个月之后，“五千人”让位于纯粹的民主制，即前413年雅典设立“贤哲”制度以前的那种民主制。这个过渡可能是逐步进行的，但肯定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五千人”的专有权力被废止，全体公民重新获得完整的政治权利。这个决定性时刻可能发生在拒绝斯巴达的和平建议之后。不管库济库斯战役的胜利给雅典带来

了多么大的凝聚力量，斯巴达的和平建议却让雅典人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温和派一定属于主张接受和平建议的“最理智的雅典人”，但大多数人并不这么认为。关于和平的辩论是我们知道的库济库斯战役之后、民主制恢复之前这段时间发生的唯一重要事件。这场辩论可能是促使“五千人”政权垮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做出继续作战的决定之后，雅典人就很轻易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些希望和平的人不再值得信赖，不再适合领导国家取得全胜。因此，拒绝斯巴达的和平建议就等于“五千人”政府丧失了民众的信任。

在最终导致民主制恢复的争议当中，民主派也占据了许多优势。他们拥有一位有才干且效率高的领导人，即克里奥丰；而温和派的最佳发言人塞拉门尼斯正在克里索波利斯执行公务，具有催眠般魔力的亚西比德当然也不在雅典城。更为根本的是，任何在雅典赞同民主制的人自动占据了道德高地。民主制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热情支持，他们视其为自然而然、符合传统的政体。任何形式的寡头统治都是革新，雅典仅仅在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无路可走之时才屈从于寡头统治。于是，民主派政治家迅速抓住机会，努力恢复传统政体。到前410年6月，有人提议废除“五千人”，恢复传统的民主政体；7月底，旧式民主制已经稳固，颁布了严厉的法律以捍卫自身。

新近恢复的民主制政权的政策是连续、协调和全面的，要求在一个完全民主和高效政权的领导下，把战争打下去。前410/前409年颁布的法律涉及政体、司法、财政、社会和思想等方面，指引这样一座刚刚从失败和绝望中恢复的城邦，完成事业、取得成功。

民主制政权恢复后的第一份为我们所知的公文以民主制惯常的格式开始：“由议事会和人民制定。”（Andocides，*On the Mysteries* 96）“人民”指的是公民大会，“议事会”则是旧时的五百人议事会，参会名额分配给各阶层公民。在体验过寡头制的议事会之后，民主派对非常民主的

五百人议事会也施加了限制。五百人议事会似乎失去了判处死刑的权力，以及未经公民大会或民众法庭同意处以500德拉克马以上罚金的权力。另一项新法律要求议事会成员抽签决定座次，这是为了防止朋党分子坐在一起，进而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从“四百人”到“五千人”再到完全民主制的快速变化，对法律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混乱。“四百人”和“五千人”这两个短命政权都指定了一些理事会来检查、修改和颁布新法律，这让民主派十分警觉，所以热切希望确认传统法令。他们指定了一个登记理事会去发表梭伦法律和德拉古处置杀人犯的法律的权威版本。

但旧的规则未能保护民主制免遭颠覆，于是雅典人制定了一些新法律，规定任何参与推翻民主制或者在敌视民主制的政权内任职的人，在敌视民主制的政权被推翻后，都将被视为雅典的公敌；对这样的人，财产充公，人人皆可诛之。人民被要求宣誓遵守此项法律，其条文被镌刻在议事会大厅入口处的石碑上，一直到前4世纪都有效。

前409年，雅典人向两年前杀死普律尼科司的人授予公民权，奖励他们金冠和其他福利。在随后几年内，涌现了许多对“四百人”前成员、曾在“四百人”政权当官和曾为其效力的人的控诉，尽管身为“四百人”成员并不违法。这样的人若被定罪，处罚将包括放逐、罚款和剥夺公民权。有些指控无疑是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因此引起上层阶级的一些成员对民主派的严厉批评。但与其他国家的内战胜利者（他们常将失败的派系成员处死或大批放逐，哪怕这些人唯一的罪过就是曾属于被击败的团体）相比，雅典民主制政权表现出了相对克制。新民主制政权没有镇压“四百人”成员，其中一些人在新政府中担任很高的职务，甚至成为将军。新政府没有颁布任何溯及既往的法令，采取的行动也是针对具体个人和具体罪行的。新政府统治下的雅典没有发生大规模处决或流放现象，处罚一般也是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而决定的。

民主制恢复之后，在议事会任职或担任陪审员的人，以及其他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可以再次领到薪水。战争给穷人带来了巨大苦难，让许多战前生活水平尚可的人坠入贫困线之下，于是克里奥丰发放了一种新的公共补贴，称为“两奥波勒斯补贴”，因为补贴的接收者每人每天可获得2奥波勒斯（相当于三分之一德拉克马）。如果政府手中有可动用的资金，这些补助可能会被发放给贫困公民。

后来有批评者谴责“两奥波勒斯补贴”是一种贿赂和腐败手段，它怂恿了人类低贱的胃口，因为人们开始满足于少量金钱，但胃口必然会越来越大。然而，“两奥波勒斯补贴”政策开始实行时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开支也不算大。

即便如此，雅典人仍然需要大量金钱，才能把战争打下去。虽然国库几乎已经空空如也，但雅典势力的复兴和库济库斯大捷之后的威望或许能给他们带来新的收入。尽管各附庸国已经在拖欠税款，但新近变得自信满怀的雅典人依旧恢复了旧的贡金制度，取代贸易税，希望能够借此收到欠款和当前的贡金。民主制政权还打算征收另一种直接战争税，这个税种是在前428年开始征收的，但似乎在战争结束之前只征收了一次。穷人不需要缴纳这些税，但大多数希腊人，包括雅典人，觉得任何形式的直接税都很讨厌，尽管民主政权仅仅是在形势所迫的时候才不得不恢复直接税的征收。

自西西里远征以来，雅典卫城的建设工程就被暂时中止了。这时政府重启了工程，这是一个新的财政负担。重启工程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为穷人提供工作和口粮的慈善活动，但新工程与战前的伟大工程相比其实规模很小，仅仅包括雅典娜尼刻[1]神庙的一堵新胸墙，以及城邦守护者雅典娜的神庙（今称厄瑞克忒翁神庙）。工程不需要多少工人，工期也很短。记录此工程的碑铭表明，71名工人中只有20人是公民，其他人是奴隶和常住外邦人。这绝不是那种民主派政治家为了给选民工作机

会而开展的建筑工程。我们应当推想，此工程有着更广泛的目标，即努力恢复伯里克利辉煌时期蓬勃向上的精神。新的宏伟建筑可以给人民带来自信、希望和勇气，帮助他们在遭受了可怕灾难之后战胜强大的敌人、赢得最终的胜利。

修建胸墙可能是为了纪念库济库斯战役的伟大胜利，但建造厄瑞克忒翁神庙似乎是一种表现公民虔诚的姿态。伯里克利时期是启蒙和质疑传统的时代，而战争苦难、瘟疫和失败使雅典人回归源自国外的神秘主义的、狂欢式的宗教崇拜。虽然崇尚理想和科学的希波克拉底医学学派正处于巅峰，雅典人却从埃皮达鲁斯引入了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这位神祇的象征物是一条蛇，能够通过神迹来医治人们的伤病。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恢复民主制之后的政府决定动用宝贵资金，去完成城邦守护者雅典娜的神庙，这是雅典城的守护女神和卫城保护者的最古老神庙。厄瑞克忒翁神庙区还包括卫城最古老的圣所。这些圣所与生育崇拜、土地神祇和英雄崇拜有关联，这些崇拜的起源可以上溯到青铜时代。传说中的上古君王陵寝、雅典娜的神奇橄榄树、波塞冬留下的三叉戟印迹和咸水泉、孩童神厄里克托尼俄斯以蛇的形象捍卫卫城时置身的裂缝，以及其他一些名胜古迹，都位于厄瑞克忒翁神庙区。

因此，修建厄瑞克忒翁神庙的目的是很传统的，就像公布德拉古和梭伦的古代法律一样。这两项措施都是为了赢得诸神的恩宠，并赋予雅典人民自信和勇气，以帮助他们面对未来的任务。

战争继续

7月时，阿基斯二世企图利用雅典的政权更迭来攻击雅典城。但是，团结一心的雅典人已经严阵以待。阿基斯二世看到雅典军队在城墙外操练的景象，便撤回了狄凯里亚。但在他撤退之前，雅典人消灭了一些掉队的敌兵。这些成功的小规模袭击增强了雅典新政权的信心。同一

年夏季，反斯巴达势力控制了希俄斯岛，色雷斯海岸的尼阿波利斯城打退了萨索斯人和一些伯罗奔尼撒军队的攻击，仍然忠于雅典。前410/前409年冬季，斯巴达人还遭受了一次挫折。他们在特拉启斯的赫拉克利亚殖民地被其邻国击败，约700名斯巴达殖民者和当地的斯巴达总督死亡。更大的危机是，迦太基于前409年夏季加入战争，反对叙拉古。他们的入侵迫使叙拉古人将其舰队从爱琴海和赫勒斯滂海峡撤走，于是斯巴达人失去了最能干、最勇敢和最坚决的海上盟军。

虽然发生了这些事情，但雅典人在前410/前409年的损失多于收获。在前411/前410年冬季，即恢复民主制之前，克基拉岛爆发了一场新内战，使这个岛屿退出了战争，这对雅典而言是一个沉重打击。更严重的损失是，斯巴达人占领了皮洛斯的雅典要塞，拔去了斯巴达的眼中钉，使雅典失去了一个有价值的筹码。

第二年夏季，墨伽拉人从雅典手中夺走了尼萨亚。尽管决定性的战场在海上，雅典人在爱琴海和两条海峡也遭到了一些挫折。一支斯巴达舰队在新任海军司令克拉特西皮达斯的指挥下夺回了希俄斯岛；对雅典人来说更严重的是，他们未能在海峡妥善利用库济库斯战役的辉煌胜利。那次胜利固然了不起，却让一些关键城市，如塞斯托斯、拜占庭和迦克墩，仍然处于敌人手中。库济库斯战役之后，法那巴佐斯给斯巴达人资金建造了一支与先前同等规模的舰队，所以雅典人不得不再次去争夺赫勒斯滂海峡的制海权，除非他们能阻止敌人占领关键港口。在爱琴海，雅典人如果想收复叛乱城市和财源，也需要快速行动。但从前411年12月到前409年4月或5月，回国收拢援兵的将军斯拉苏卢斯却一直待在雅典。从前410年春季到前409/前408年冬季，在赫勒斯滂海峡的雅典将军也没有发动任何重要的军事行动。

雅典人直到前409年才向赫勒斯滂海峡派遣新部队，其实雅典有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这次拖延。这支新部队包括50艘三列桨座战船，其中

5000名桨手获得了轻盾兵和轻步兵的装备，再加上1000名重步兵和100名骑兵，共计1.2万人。西西里岛战败之后军饷下降了一些，每人每天领取3奥波勒斯，因此这样一支远征军一个月的军饷高达近30塔兰同。所以，在准备好几个月的军饷之前，舰队不能出动。运兵船和运载马匹的船只也会产生额外的开销，而且国家必须为轻盾兵提供武器。但国库空虚，多处资金收入未能送抵国库，而且雅典人在前409年之前似乎也没有足够数量的三列桨座战船。

斯拉苏卢斯终于在这年夏季出发，不过他取道萨摩斯岛去了伊奥尼亚，而非赫勒斯滂海峡。尽管雅典人此时已经丧失了库济库斯大捷所带来的优势，但短期内也没有危险。伊奥尼亚能够带来极好的机遇。没有一支斯巴达舰队保护着伊奥尼亚地区，提萨弗涅斯的势力被米利都、克尼多斯和安坦德鲁斯（后者属于他的总督辖区）的叛乱削弱了；大多数伊奥尼亚城邦内都潜伏着雅典的朋友，等待时机将城邦献给雅典。在伊奥尼亚取得胜利便能获得威望和急缺的金钱，为赫勒斯滂海峡的更重要行动搭好舞台。斯拉苏卢斯奉命在完成伊奥尼亚的任务后，前往赫勒斯滂海峡。

斯拉苏卢斯于前409年6月抵达萨摩斯岛，随后迅速在伊奥尼亚大陆登陆，收复之前丧失的附庸国，骚扰提萨弗涅斯的领地，搜集战利品。在取得了一些小规模胜利（包括收复科洛封）之后，他在以弗所吃了一次败仗，于是不得不放弃在伊奥尼亚的军事行动。他沿着海岸北上，在冬天到来之前抵达了赫勒斯滂海峡。

斯拉苏卢斯在伊奥尼亚的失败表现出他作为一位将军的缺陷。他曾两次因为蹂躏乡村而浪费了时间，使敌人有机会准备进攻。如果他迅速进攻以弗所，雅典人或许能像占领科洛封那样轻松地占领以弗所。在争夺以弗所的战斗中，他的战术有误，分散了己方兵力，造成了严重后果。尽管新民主制政权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失败了，但斯拉苏卢斯的主力

部队完好无损。假以时日，这支主力部队在更有经验、水平更高的将军的指挥下，还有机会赢得重要胜利。

---

[1] 尼刻是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在传统的描述中，尼刻常带有翅膀，拥有惊人的速度。她不仅象征战争的胜利，而且代表着希腊人日常生活许多领域的胜利，尤其是竞技体育的胜利。尼刻经常与雅典娜一起受到崇拜，雅典的帕特农神庙中供奉的雅典娜神像据信也刻画了尼刻。

第三十四章 亚西比德归来（前**409**～前**408**年）

雅典尝试肃清海峡

当斯拉苏卢斯指挥的雅典援军于前409年年末抵达赫勒斯滂海峡之时，已经驻扎在那里的部队并没有迅速接纳斯拉苏卢斯。亚西比德努力将这两支部队合二为一，但在海峡作战的老兵却不肯接纳斯拉苏卢斯的人马，因为他们刚刚吃了败仗，正是丢脸丧气的时候。尽管如此，两位将军还是将他们的全部兵力转移到赫勒斯滂海峡亚洲一侧的兰普萨库斯，从这个基地出发很适合向法那巴佐斯发动袭击，以及进攻位于阿卑多斯的斯巴达主基地。雅典海军处于无可匹敌的领先地位，再加上他们的陆军，因此其可以沿着海岸南下，从海陆两路威胁敌人。前409/前408年冬季，雅典人在兰普萨库斯建造防御工事，并向阿卑多斯发动了一次袭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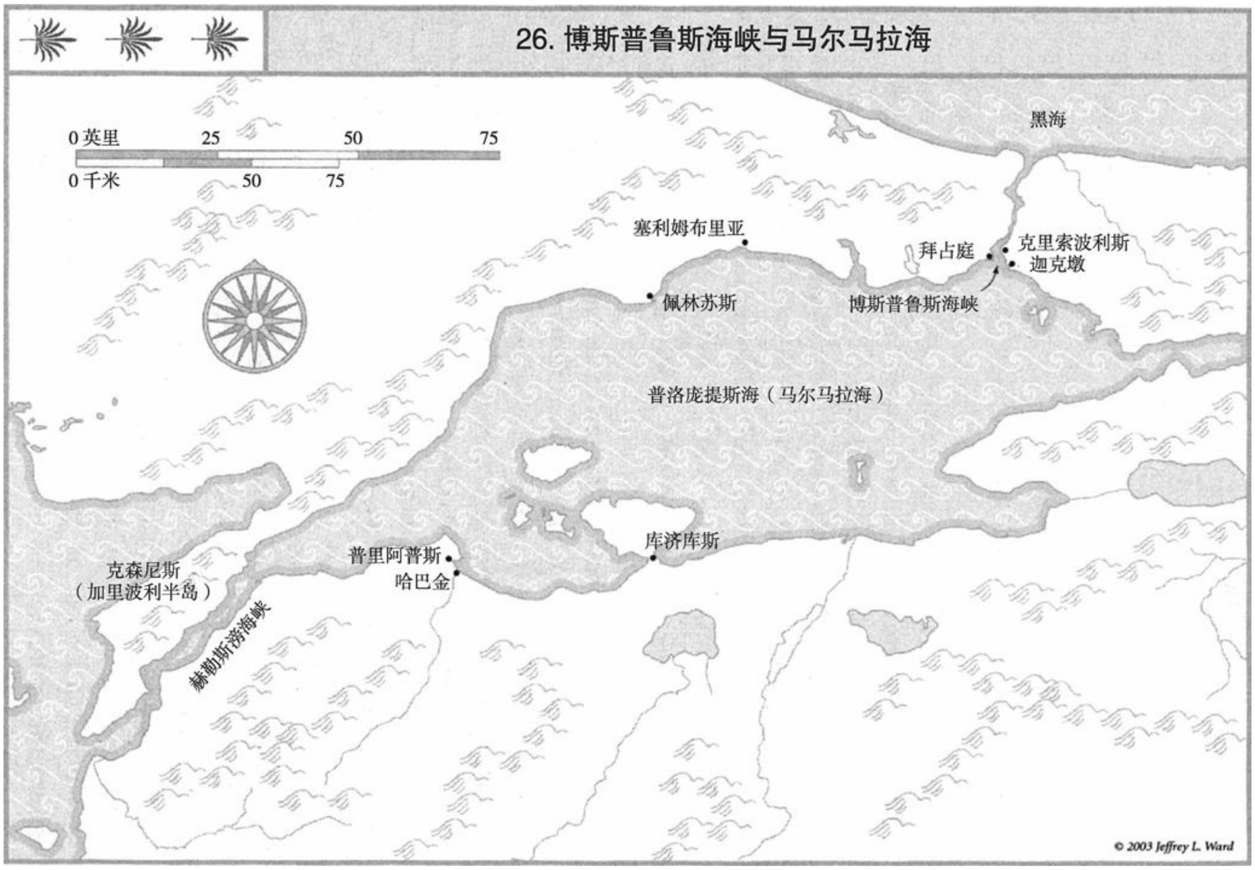
斯拉苏卢斯率领30艘战船在阿卑多斯附近登陆。法那巴佐斯率领步骑兵前来援救，但此时亚西比德已经率领雅典骑兵和120名重步兵从陆路逼近阿卑多斯了。在总督与斯拉苏卢斯部队交战的同时，亚西比德正好也对他发动了攻击。雅典人击溃了波斯人，建立了胜利纪念碑，并袭掠了法那巴佐斯的领地，掳走了不少战利品。法那巴佐斯的快速反应挽救了阿卑多斯，它仍然在斯巴达手中，所以雅典人的胜利在战略上其实是一次失败。不过，这次胜利弥合了雅典陆军内部的裂痕："两支部队联合了起来，互相带着善意和喜悦，一同回营。"（Plutarch，*Alcibiades* 29.4）

前408年春季，团结一致的雅典人开始将敌人逐出博斯普鲁斯海峡，并控制通往黑海的海路，先是攻打亚洲一侧的迦克墩（见地图26）。克里阿库斯在差不多两年前对迦克墩的防御做了一些改良。迦克

墩的斯巴达驻军指挥官是总督希波克拉底。塞拉门尼斯以克里索波利斯为基地，开始蹂躏迦克墩土地，很快亚西比德和斯拉苏卢斯率领约190艘战船前来支援。

为了攻打高墙环绕的迦克墩城，雅典人建造了自己的木墙，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延伸到马尔马拉海。这就将迦克墩包围在了一个三角形地域之内，雅典军队和木墙阻隔着迦克墩人和波斯人。雅典舰队控制着大海，所以迦克墩被围得水泄不通。斯巴达陆军出来迎战，斯拉苏卢斯率领重步兵与其交锋。木墙阻挡着法那巴佐斯的步骑兵，使他们无法前来交战。在战斗打响一段时间之后，亚西比德率领他的骑兵和一小队重步兵投入作战，终于打垮了斯巴达人的抵抗。希波克拉底阵亡，但他的部队逃进城中，紧闭城门，继续坚守。除了围困战术之外，攻克一座城市总是很困难的任务，雅典人又一次失败了。亚西比德离开迦克墩，去赫勒斯滂海峡沿海搜寻金钱，让他的同僚主持战役。

尽管海陆两路都被包围，迦克墩守军并非全无希望，因为法那巴佐斯的大队人马就在不远处，他们仍然有希望突破木墙，袭击雅典人的后方。或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雅典将军们与法那巴佐斯按照以下条件缔结了一项条约：迦克墩人按照之前的标准向雅典缴纳贡金，并缴纳之前积累下来的欠款；法那巴佐斯向雅典人支付20塔兰同，并向波斯国王引见雅典使者；雅典人则宣誓在使者返回之前，不攻击迦克墩人或法那巴佐斯的领地。



与收复叛乱附庸国的一般安排不同，雅典人这次不能进入迦克墩，但可以得到贡金和欠款，以及法那巴佐斯代表迦克墩支付的一笔赔款。这为雅典人提供了急需的资金，并且未来也有希望在此地获得收入，不仅节省了围城战的开销，还使他们可以自由地攻击拜占庭。然而，此项条约是临时性的，仅仅在与波斯国王的谈判结束前有效。它使法那巴佐斯保住了迦克墩，而无须守城和野战，他自己也希望能避免交战。与波斯国王的谈判或许能让战争没有必要继续打下去，或者其他事件能阻止雅典人取胜。与此同时，他仍然控制着迦克墩，这座城市的价值肯定超过20塔兰同和一个奇怪的妥协。

尽管这份特别条约让迦克墩依然处于敌人手中，但雅典的战略要求他们最终收复两条海峡上的所有沿海城市。于是亚西比德从加里波利半岛征集了资金和色雷斯部队，攻击了普洛庞提斯海北岸的塞利姆布里亚。他避免了围城或者强攻，而是与城内的亲雅典派系勾结，后者在夜

间为他打开了城门。他向塞利姆布里亚提出了合理的条件，并严格管束部队。塞利姆布里亚城及其公民都没有受到任何伤害；雅典人仅仅在那里派驻了一支部队并征收了一些金钱。亚西比德的这些行动节省了时间、资源和生命，并且达成了目标。亚西比德最擅长的作战方式就是这样。

塞利姆布里亚以东就是拜占庭，这是能够打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黑海连接之门的最后一把钥匙。亚西比德快速行动，与塞拉门尼斯和斯拉苏卢斯会合，后两位已经离开了迦克墩，去往拜占庭。尽管雅典人掌握制海权，并且拥有相当强大的陆军和维持这些陆军的充足资金，但他们又一次发现，攻打拜占庭这样的设防城市很不容易。雅典人故伎重演，建造壁垒以便从陆路包围城市，同时用舰队在海上封锁城市。指挥拜占庭防务的是克里阿库斯，一位坚韧不拔的斯巴达总督。他手里有一队庇里阿西人、一些解放黑劳士、来自墨伽拉和玻俄提亚的队伍，以及一群雇佣兵。他是守军中唯一一个斯巴达人。

由于雅典人攻打拜占庭未果，克里阿库斯便将拜占庭防务交给部下，自己到亚洲海岸寻找法那巴佐斯，以为其部队获取军饷。他还想集结一支舰队，攻击海峡上的雅典盟邦，以便将雅典舰队诱离拜占庭。但拜占庭城内的情况比克里阿库斯了解到的差得多。市民们饥肠辘辘，而克里阿库斯是一位典型的斯巴达式总督，严酷而傲慢。他的行为最后激怒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拜占庭人，他们开始与亚西比德共谋起事。亚西比德承诺像对待塞利姆布里亚那样，对拜占庭人宽大为怀，说服他们在指定的某个夜间放雅典人入城。在散播雅典人去往伊奥尼亚的假消息后，他在预定入城的当天下午率领雅典全军离开了拜占庭，似乎真的要去伊奥尼亚。

当夜幕降临之后，雅典人溜了回来，奔向拜占庭的城墙；舰队也回到港口，攻击在那里停泊的伯罗奔尼撒船只。守军放弃了自己的岗位去

救援船只，让城市的大部分地方无人把守。于是拜占庭密谋者在无人防守的城墙地段搭设梯子，让在城外等待的亚西比德和塞拉门尼斯部队进了城。但忠于斯巴达的拜占庭人打得很勇敢也很有效，亚西比德于是宣布将保障他们的安全。这个保证说服了拜占庭公民们，他们转而反对伯罗奔尼撒军队，后者大部分死战到底。雅典人又一次遵守了承诺，没有杀害或流放任何拜占庭人，将拜占庭恢复为雅典盟邦。城市恢复了自治权，伯罗奔尼撒驻军和总督都被驱逐，但雅典人没有设置自己的驻军和总督。伯罗奔尼撒战俘没有被杀，而是被解除了武装，押往雅典受审。这些措施体现了一种公正和解的新政策，旨在收复帝国的失地。

雅典与波斯的谈判

雅典人在迦克墩问题上愿意做出很大让步，这表明他们打赢战争的计划里出现了一个新元素。他们之所以拒绝了斯巴达的和平建议，是因为希望离间斯巴达与波斯，而他们此次率军重返海峡，便获得了一个机会去实现这个目标。现在机会来了，雅典人可以直接与波斯国王会谈，试探波斯的意图。波斯人屡战屡败，损失了大量船只，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绩。这或许能让国王认识到实施其当前政策的高昂代价和徒劳无功。另外，斯巴达人单方面与雅典议和，也违反了斯巴达与波斯的条约。如果雅典与波斯的谈判成功，国王会同意停止对斯巴达人的援助，那么斯巴达人就无力维持海上战争，只能以更加不利于自己的条件议和。

这个战略的问题在于，雅典和波斯的目标是相互抵触的。双方都想控制小亚细亚的城市及其财源。迦克墩的临时安排不能作为永久性解决方案的模板，也很难设想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是什么样子的。不过，雅典人还是觉得试一试总是值得的。他们还听说，有一个斯巴达代表团在比奥提乌斯的领导下去了苏萨[1]，所以他们或许也希望能够挫败比奥提乌斯代表团。无论如何，尝试与波斯谈判并不会对雅典人造成任何损失。

在迦克墩战役之后，法那巴佐斯邀请雅典人派遣使者，并且他亲自陪同使者去苏萨觐见波斯国王。总督和雅典使者以缓慢的速度向内陆进发，到初冬时只走到了弗里吉亚[2]的戈尔狄翁，并在那里停留到第二年春季。随后他们继续向苏萨前进，但很快就遇到了比奥提乌斯的斯巴达代表团。斯巴达代表团已经与大流士二世国王进行了成功的会谈，正在返回的途中。斯巴达人宣布，他们已经从国王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证据是国王的儿子小居鲁士和他们在一起，“前来统治海岸上的所有人民，并与斯巴达人并肩作战”（Xenophon，*Hellenica* 1.4.3）。雅典与波斯达成协议的希望破灭了，因此雅典人不得不设计新的方案。

亚西比德归国

前407年春季，得胜的雅典将军们已经驶离赫勒斯滂海峡，正准备返回雅典，这时却收到了波斯传来的坏消息。在征服拜占庭之后，海峡上就只剩阿卑多斯港口还在敌人手中。尽管大多数雅典士兵和水手已经在外征战多年，但没有人比亚西比德更急切地希望返回雅典，因为这是他长久以来为之奋斗的时刻。自前415年他投奔斯巴达以来使用的复杂手段，使斯巴达和其盟邦以及波斯帝国都不再欢迎他。为了确保安全和实现野心，他必须返回雅典，在军政方面成就一番事业。

虽然他率领着一支得胜的舰队返回，却仍然不会感到完全的安全。他是因为一场政变才来到萨摩斯岛的，他的第一个军职也是驻扎在那里的舰队授予的，而不是通过雅典的正常选举得来的。他结束流亡归国得到了“五千人”的批准，但新的民主制政权未必同意。在雅典，他仍然有形形色色的敌人：民主派怨恨他对民主政府的污蔑，对他的野心保持警惕；宗教保守派；没有忘记他叛变通敌的爱国者；害怕他与自己竞争的其他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亚西比德还需要始终保持警惕，对付他可能遭到的攻击与指控，以免被判处死刑或者再次流放。对他来讲，最好的保护就是军事胜利，那样的话他就能赢得政治上的广泛拥护。但即便在阿

卑多斯胜利和库济库斯大捷（他被誉为此役的主要功臣）之后，他仍然没有决定回国。他或许是想确保自己不在前线期间，自己的光辉不会被其他将军遮盖。虽然在塞利姆布里亚和拜占庭的突出成就增加了他的名望，但让他足够自信地回国的决定性事件可能是在迦克墩签订协议。将军们和法那巴佐斯在那里宣誓，但法那巴佐斯坚持要求亚西比德也宣誓，才肯承认条约有效。于是亚西比德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向雅典人强调自己仍然受到波斯人的特别敬仰。他要求总督再一次只和他本人立誓遵守同样的条约，借此突出了自己的地位，而此时雅典人也正在寻求法那巴佐斯支持他们即将开始的与大流士二世的谈判。前407年春季，从各方面看，亚西比德都不仅是一位恢复了雅典人好运气的伟大将军，还又一次成为唯一有能力使斯巴达人失去波斯援助以此促使雅典赢得战争的人。现在是他返回雅典的好时机。

雅典人留下了一支舰队守卫两条海峡，于是斯拉苏卢斯和塞拉门尼斯也回国了。雅典军队在回国途中利用自己的制海权，收复了更多的失地。色拉西布洛斯肃清了色雷斯沿海地带，该地带最重要的地区是面积较大的萨索斯岛和强大的阿布德拉城。与此同时，亚西比德第一个启程，先去往萨摩斯岛，然后南下去卡里亚，在那里搜集了100塔兰同，然后返回萨摩斯岛。之后他又去了基赛阿姆[3]，即斯巴达在拉科尼亚的主要海军基地。他在那里看到斯巴达人正在建造船只，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为什么要耽搁这么久，绕这么多路，而不是直接凯旋雅典呢？

亚西比德在基赛阿姆停留的原因是为了“观察雅典城对他和他的回归的态度如何”（Xenophon，*Hellenica* 1.4.11）。他离开赫勒斯滂海峡之后的所有行为都可以这样解释。他希望等到前407年夏季将军选举的结果出来。选举结果对他一定是很大的鼓舞，因为新将军当中有他最有力的支持者——色拉西布洛斯——和其他朋友，而不包括他的政敌。

尽管如此，亚西比德还是保持了谨慎。在法律上，他仍然没有洗脱

罪名，而且被指控侵犯了最庄严神圣的宗教仪式，卫城上还立着谴责和诅咒他的碑。甚至在比雷埃夫斯落锚之后，他仍然在船上徘徊。“他害怕他的敌人。他爬上甲板，去看他的朋友在不在。他看到自己的堂兄弟——培西阿纳克斯之子欧里普托勒摩斯——和其他亲友，于是上了岸，在一队保镖的护卫下进城，这些保镖随时准备保护他抵抗任何可能发生的袭击。”（Xenophon，*Hellenica* 1.4.18-19）但他不需要这些保护，因为聚集在岸边的人群，欢呼着祝贺他。他上岸之后，群众跟在他身旁奔跑，为他欢呼，为他戴上桂冠以庆祝他的胜利。很多人谈到亚西比德远离雅典，给雅典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也有许多人认为如果是亚西比德指挥西西里远征，雅典人就能胜利了。他将雅典从绝望的状态中抽离了出来，“不仅恢复了雅典的制海权，甚至在陆战中击败各地敌人”（Plutarch，*Alcibiades* 32.4）。

虽然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但他还是前往议事会和公民大会，正式地为自己辩护，反驳过去受到的指控。他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并未犯下渎神罪行，并抱怨自己命途多舛。他很有技巧，没有指责任何个人或广大民众，只怪罪自己的坏运气和纠缠他的恶灵。他讲到了未来的美好前景，贬低和蔑视敌人，就像过去一样，为雅典人鼓足了信心。

他取得了极大成功。没有一个人追溯他过去的麻烦，也没有人反驳他和他的朋友们提出的任何意见。雅典人撤销了对他的所有指控，归还了他被没收充公的财产，命令祭司撤销对他的诅咒，并将记载他受到的判决和处罚的碑投入大海。人民投票决定授予他金冠，并任命他为总司令，统领陆海军。

但即便在这个春风得意的时刻，在他最受群众欢迎的时期，亚西比德也并非万事如意。秘仪的总祭司西奥多罗斯非常不情愿地撤销了对他的诅咒，并说道：“如果他没有危害城邦，那么我就没有诅咒他。”（Plutarch，*Alcibiades* 33.3）他的保留意见无疑说明，一些雅典人

仍然对亚西比德充满猜忌和敌意。在前407年，这些人是少数派，但他们能够提醒亚西比德：仅仅在成功的时候，他才能维持自己的地位。亚西比德是在举行普林特里亚仪式（城邦守护者雅典娜木制神像的袍子被取下来清洗，神像则被藏起来，不让公众看到）的那天返回雅典的，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凶兆。这一天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是一年中最不适合采取重大行动的日子。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有些人觉得，似乎女神不愿意用友好的姿态欢迎亚西比德，而是躲起来，拒绝见他。色诺芬说一些雅典人认为，亚西比德回国的时机对他自己和对国家都是不吉利的。尽管只有少数雅典人注意到了这个时间巧合，亚西比德的政敌却牢记此事，以便将来以此为由反对他。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是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事实：亚西比德那么谨慎小心地安排自己的回归，却忘记了这个神圣日子。他的老对手尼基阿斯是绝对不会犯这种错误的。

亚西比德回归后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可能就是为了消除这种负面印象。与厄琉息斯秘仪相关的节日可能是雅典宗教日历中最庄严的典礼了。根据传统，每年这个节日时会有神圣的游行队伍徒步14英里，从雅典城前往阿提卡西北边疆附近的厄琉息斯。新入教的教徒扛着得墨忒耳的圣物和伊阿科斯神像。伊阿科斯是一位年轻的男性神祇，手持火炬，侍奉着得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新教徒佩戴香桃木花冠，祭司们穿着华丽的长袍，成群的笛手和里拉琴演奏者以及唱着圣歌的歌手也会参加仪式。但近些年里，由于狄凯里亚出现了斯巴达要塞和驻军，所以不可能再举行这种游行活动了。前413年，新教徒们不得不乘船去往厄琉息斯，而放弃对这种仪式来说非常重要的盛大排场。

亚西比德特别敏感，他认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凭借一次大胆的行动，彻底终结他在宗教上遇到的难题。在向相关祭司征询意见之后，他准备按照传统方式参加盛大游行。在哨兵和武装士兵的保护下，他护送庆祝节日的人群沿着圣道前进。他们安然无恙地抵达了厄琉息斯，并从原路徒步返回。这景象有助于虔诚人士解除对亚西比德的怀疑。作为

军事上勇敢和强势的展示，它证明政府授予他超乎寻常的权力是多么合理，并鼓舞了雅典军队的士气。在政治上，这也是一出精彩表演。亚西比德与尼基阿斯的宣传竞争中不曾有一次表演是这样的及时和富有成效。亚西比德重返雅典就是这般高调和强势。

---

[1] 苏萨是位于今天伊朗西部的古城，可能建于前4000年，是古代埃兰王国、波斯、帕提亚的重要都城。除了是现代考古的重要地点之外，此地也因什叶派穆斯林与犹太人先知但以理而闻名。

[2] 位于小亚细亚中西部地区。

[3] 今称吉雄（Gytheio）。

第三十五章 亚西比德的垮台，小居鲁士和吕山德（前408～前406年）

雅典人在赫勒斯滂海峡的胜利使他们得以将注意力转向伊奥尼亚和爱琴海战区，战争的最后阶段可能在那里展开。光荣地在厄琉息斯游行之后，公民大会投票决定将100艘三列桨座战船、1500名重步兵和150名骑兵的军队交给亚西比德指挥。他的同僚将军为阿里斯托克拉特斯、阿迪曼图斯和科农，这三人都是他亲自挑选的。10月，他们率领这支强大的军队进入爱琴海，去收复仍然在敌人手中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米利都和以弗所这样重要的伊奥尼亚城市，希俄斯岛等重要岛屿，以及蒂诺斯岛等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能够恢复帝国基业，增加财政收入，或许还能击溃蒂诺斯人，说服波斯退出战争。

小居鲁士王子取代提萨弗涅斯

在雅典人无所作为的几个月里，斯巴达人忙碌地重建舰队，他们的三列桨座战船恢复到了70艘。敌人领导层的变化也很重要。大流士二世国王罢免了提萨弗涅斯（他因为与斯巴达人决裂和政策失败而丧失了国王的信任），代之以他的次子小居鲁士，将提萨弗涅斯改任为较小的卡里亚行省的总督。这是个很值得一说的决定，因为小居鲁士还不到十七岁，而国王完全可以任用更有经验的人，包括小居鲁士的哥哥。波斯国王派遣这个未曾经受战火考验的少年去萨第斯，并任命他为安纳托利亚西部行省的统治者，除了在伊奥尼亚的指挥权之外，吕底亚、大弗里吉亚也都由他管理。大流士二世之所以做出这个令人意外的任命，是受了妻子帕丽萨提斯的影响，帕丽萨提斯不喜欢她的长子阿萨息斯。

年轻的王子和他母亲的目标是取代阿萨息斯，登上波斯王位。早至前406年，小居鲁士就表现出了傲慢与野心。他处死了两名王亲国戚，

仅仅因为他们不肯像尊崇国王一样尊崇他。但即便得到母亲的帮助，小居鲁士要想登基也很困难。他在国内有强大的政敌，在国外有恢复了元气的雅典人与他为敌。他需要有效的帮助，以便在时机成熟时打赢争夺继承权的战争。

他的头等大事是击败雅典人，但只有和斯巴达人及其伯罗奔尼撒盟邦合作，他才能成功；然而不管波斯人为斯巴达及其伯罗奔尼撒盟邦提供多少船只和资金，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在海上打赢。要想胜利，就需要一位优秀的海军将领。小居鲁士还需要在斯巴达为他的私人野心找到军事支持，这将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因为斯巴达人和波斯人的利益仍然是相互冲突的。小居鲁士不能指望斯巴达国王、监察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运用权力扶植他登上波斯王座，即便他们能找到打赢战争的办法。因此，他需要找到一个具有罕见军事才华的派系或者个人，而这个派系或个人必须有理由与他合作，并且有足够的权威将整个斯巴达拉到他麾下。小居鲁士的运气特别好。当他于前407年夏季前往萨第斯的时候，已经有这样一个军事奇才在等待他了。

吕山德的崛起

前407年的新任斯巴达海军司令是吕山德，他是一个莫萨克斯人，也就是说他的父亲是斯巴达人，母亲是黑劳士，或者他的父亲是一个因为贫困而丧失公民地位的斯巴达人。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吕山德都应当是由一位家境殷实的斯巴达公民抚养长大，和这位恩主的儿子一起成长，接受斯巴达式教育，并得到了非常罕见的土地赏赐，因而有资格获得完整的公民权。

这样一个边缘人能够攀升到这样高的职位，需要解释一番。吕山德的父亲虽然穷，却拥有贵族血统，所以年轻的吕山德在莫萨克斯人当中是很不寻常的。另外，在战争末期，斯巴达人任命了三个莫萨克斯人为海军司令：叙拉古的英雄古利普斯、吕山德及其继任者卡利克拉提达

斯。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巴达的海军指挥官面对雅典人的表现都很差。随着海战变得越来越重要，斯巴达人愿意采取任何措施去打赢海战，甚至可以将斯巴达合法公民圈子之外的有军事才干的人任命为海军最高指挥官。

吕山德无疑在作战中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才干，可惜我们没有关于他的那些战绩的文献资料，不过他的崛起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位高权重者的恩宠照拂。斯巴达少年一般在十二岁时会接受一位年龄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男子作为自己的导师和情人。古代作家一般强调这种关系的教育、道德和精神方面，但其中无疑也包括肉体关系。吕山德是年轻的阿格西莱的情人，而阿格西莱是阿基斯二世国王的同父异母兄弟。

这种关系也可能具有政治意义，因为成年男子和少年之间的爱恋关系是注定要结束的，但在许多年中，这种关系会在两人间产生一种强有力的纽带。吕山德后来在阿格西莱登上斯巴达王位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且在前396年说服这位年轻国王发动了一次针对波斯的大规模战役。

吕山德与阿基斯二世似乎也保持着亲密关系，他们两人都希望消灭雅典帝国并代之以斯巴达霸权，但很多斯巴达人并不这么想。两人还在战争末期的战略设计中有过合作。我们有理由支持这种观点，即吕山德在获得显著地位之后，便与阿基斯二世成了政治盟友。我们很容易相信，吕山德从这种关系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因为他为了满足个人的政治野心，孜孜不倦地加强自己与有影响力的斯巴达人的私人关系。“他似乎天性热衷于关注有权势的人，这超过了一般斯巴达人的习惯。并且他为了获得好处，很乐意忍受有权势者的过分行为。”（Plutarch，*Lysander* 2.3）即便在斯巴达人当中，他的竞争意识和野心勃勃也很突出。

吕山德想要的是荣耀，但他的动机也包括追逐权力。根据一种可信的传统说法，他在自己政治生涯的后期曾企图改变斯巴达宪法，以便称王。前407年他接过海军指挥权时，无疑就已经有了这样的野心。他强烈的个人愿景驱动着他，让他表现出独特才华，使斯巴达人觉得他是个不可或缺的奇才；但如果他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抵触，那他是不会顾及后者的。

前407年春季，吕山德率军穿过爱琴海，开赴伊奥尼亚，沿途收拢战船，在抵达小亚细亚时已经拥有了70艘三列桨座战船。他没有像之前的海军司令那样将基地设在米利都，而是在更北方的以弗所。米利都作为基地的缺点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它位于萨摩斯岛以南，这意味着任何前往海峡的斯巴达舰队都会被雅典人拦截。以弗所位于萨摩斯岛以北，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它还有其他优点：它离波斯行省的首府萨第斯更近。以弗所深受波斯文化影响，带有波斯风情；波斯官员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吕山德可以更方便地运用个人才华去影响盟友和出资人。吕山德还觉得以弗所的贵族“既友好也热忱地支持斯巴达的事业”（Plutarch，*Lysander* 3.2）。

与他的几位前任不同，吕山德懂得一个合适港口的重要性。这个港口必须有适宜的规模、条件、人口和地理位置，足以维持一支舰队和一支陆军。以弗所符合这些要求，所以他立刻着手将它转变为一个商业中心和重要的船坞。但完成这些事情需要一些时间，吕山德利用了雅典人的耽搁，改良了伯罗奔尼撒人在三列桨座战船战争中的战术和技能。他很乐意让时间这么流逝，不寻求交战，而是准备自己的舰队，建造自己的基地，训练自己的水手。他需要水手的军饷，而小居鲁士的到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野心勃勃的年轻王子与同样野心勃勃的斯巴达指挥官会面，是历史的关键时刻之一，在这一时刻个人对重大事件的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

用。吕山德是小居鲁士的完美人选，他也非常擅长赢得野心勃勃的青年王室成员的信任。他擅长不露声色和玩弄诡计，并因此而闻名。他“用距骨[1] 欺骗孩童，用誓言耍弄成年男子”（Plutarch，*Lysander* 8.4）。吕山德是斯巴达人当中唯一一个能和小居鲁士愉快相处并从他那里获得胜利所需的支持的人。

小居鲁士与吕山德的合作

从一开始，两位领导人的相处就特别融洽。吕山德将之前的失败和误会都归咎于提萨弗涅斯（他是帕丽萨提斯的死敌），并请求王子改变波斯的政策，全面支持斯巴达人，反对共同的敌人。小居鲁士答道，他愿意为了胜利尽一切努力。他带来了500塔兰同，并许诺自掏腰包帮助斯巴达人，如果这还不够，就打碎他的宝座（用金银制成）。小居鲁士只是在故作姿态，并非真心诚意。因为当吕山德要求小居鲁士将桨手的军饷翻倍以诱使雅典舰队的桨手投诚时，年轻的王子不得不承认，他只能按照条约规定，支付每人每天3奥波勒斯的军饷。

但吕山德发挥了他作为廷臣的本领，“通过谈话时奴颜婢膝的尊崇”（Plutarch，*Lysander* 4.2）赢得了年轻王子的欢心。两人告别时，小居鲁士询问怎么做才会让吕山德最高兴。吕山德答道：“如果你给每一位桨手的军饷增加1奥波勒斯。”（Xenophon，*Hellenica* 1.5.6）小居鲁士不仅同意了，还偿付了军饷欠款，并给了吕山德一个月的军饷作为预付金。只有王室王子和王后宠儿才能无须向上级申请，就提高斯巴达人的军饷。

不过，吕山德还是完全依赖波斯王子的善意。为了增强他自己的势力，他在以弗所召集伊奥尼亚各城邦最有权势的人开会，敦促他们组成政治团体，并向他们保证，如果他打赢了战争，会将城市的控制权移交给当地贵族。这个承诺为他赢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大量的财政援助。他这么做当然是让这些富人效忠于他本人，将来就可以利用他们达到自己

的目的。如普鲁塔克所说，他卖人情给他们，“在他们当中播下了斯巴达霸权的种子，后来他真的将种子培植为参天大树”（*Lysander* 6.3-4）。

雅典人对小居鲁士与吕山德会晤的结果很担忧，于是企图利用提萨弗涅斯做外交中间人。尽管这位前任总督显然不适合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他招致了王室的敌意，并且受到斯巴达与雅典双方的憎恨与不信任，但他还是敦促王子奉行旧的政策，即游离于两个希腊对手之间，将它们都拖垮。小居鲁士最后选择了不同的路线，不仅排斥他的建议，还拒绝接见雅典使者。雅典人企图与波斯缔结外交协定而结束战争的努力，在大流士二世和小居鲁士那里都失败了，于是战争将继续下去。

诺提昂战役

战略形势让雅典人尝试在以弗所迫使吕山德与其交手，因为在那里取胜能使雅典人主宰爱琴海和海峡，不受任何阻挠，并能收复叛乱的附庸国及其财政收入。消灭敌人又一支舰队也许能说服斯巴达人按照可以接受的条件议和；如果不行，至少波斯人会更愿意考虑停止对斯巴达的支持。不过，雅典人必须快速采取行动，因为伯罗奔尼撒人开出的军饷标准比他们高，每一天都可能有水手叛变投敌。

但是，亚西比德没有直接驶往位于以弗所的斯巴达基地。优卑亚岛此时还在敌人手中，亚西比德打算先拿下安德罗斯岛，这是从赫勒斯滂海峡来的运粮船必经的一个岛屿。尽管他在陆地上击败了敌人，却无法占领这个岛，于是留下一支部队继续攻打，然后离开了。他在雅典的政敌后来会利用这个失败去攻击他。

他从安德罗斯岛去往东南方的科斯岛和罗德岛，寻找金钱和战利品来给他的水手发饷。雅典国库仍然空虚，如果吕山德选择留在港内，亚西比德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将他的舰队长时间留在海上。在对抗斯巴达

舰队之前积攒尽可能多的金钱固然有道理，但这个耽搁却给了敌人更多时间来改善舰队并刻苦训练。

亚西比德随后驶往萨摩斯岛，然后是诺提昂，即科洛封的港口，其位于以弗所西北方的沿海地带。虽然诺提昂不是主要的海军基地，却是进攻以弗所不错的出发阵地，雅典人从那里可以切断以弗所和希俄斯岛之间的斯巴达航线，并阻止他们逃往赫勒斯滂海峡。在诺提昂，亚西比德指挥着80艘战船（他之前把20艘留在了安德罗斯岛），而吕山德的兵力增加到了90艘战船。吕山德虽然占据优势，却没有出来应战，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足够多的时间，拖延下去对他有利。他的舰队接受操练之后战斗力有所提高，而小居鲁士提供的更高军饷“使雅典船只的人员锐减。因为大多数水手都投奔到出钱更多的一方，那些没有逃亡的水手则士气低落、心怀不轨，每天都给他们的指挥官制造麻烦”（Plutarch，*Lysander* 4.4）。

任何一位雅典指挥官都会认识到，必须快速行动。出于同样的原因，吕山德可以慢悠悠地等待时机。另外，亚西比德也有个人原因迫使他快速行动。普鲁塔克对他个人动机的分析是很到位的：“如果曾有人被自己的声望毁掉，那就是亚西比德。因为他看上去如此英勇无畏、绝顶聪明，似乎常胜不败，所以当他失败时，大家就怀疑他没有努力，不肯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他办不到的事情。大家觉得，只要他努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Alcibiades* 35.2）尽管他得到了特别大的权力和雄厚的兵力，在安德罗斯岛却失败了，而且现在也没有办法诱使吕山德冒险出来打一场海战。除非他很快取得成功，否则有可能会招致雅典人的猜疑，让他的政敌得到更多口实。

亚西比德在诺提昂待了大约一个月，但到前406年2月，他将舰队主力留在那里，自己乘船加入色拉西布洛斯攻打弗凯亚的战役。这可能是诱使吕山德出来交战的计策的一部分：如果雅典人成功占领了伊奥尼亚

各城邦，吕山德就不能长期闲坐，必须与雅典人交战。对这个计策而言，弗凯亚是一个很好的攻击目标，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很适合向库麦、克拉左门奈甚至希俄斯岛发动新的进攻。亚西比德此次只带了运兵船，将他的三列桨座战船留在以弗所，以便监视力量不断增长的斯巴达舰队。他留在以弗所代他指挥的人是安条克斯，一名士官和舵手，而且是亚西比德旗舰的舵手。这项任命在雅典海军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从古代到现代一直遭到批评。一般来讲，一支如此庞大的舰队应当被交给一名或多名将军指挥，但亚西比德的同僚似乎都在外执行其他任务。如果是这样，常规的做法是指派一位有海战经验和立过战功的三列桨座战船船长。在诺提昂有很多船长，其中肯定能找到这样一位人选。但亚西比德的做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舵手一般是经验特别丰富、在海战策略上特别有才干的人，并且参加过许多战役，往往比船长更有经验。这样的舵手对于保持雅典海军的优势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亚西比德这一次并不认为他外出期间会发生交战，甚至也不希望发生交战，于是给了安条克斯一条简单明确的命令："不要攻击吕山德的船只。"（Xenophon，*Hellenica* 1.5.11）与级别更高、有独立头脑的军官相比，一位士官更有可能坚定不移地服从这道命令。在当时的情况下，亚西比德需要的是一个他能信任的人，而安条克斯是他多年的下属，看上去似乎是完美人选。

但亚西比德看错了他的部下：安条克斯渴求荣耀，于是设计了一项策略，发动了进攻。他的计划可能参照了库济库斯战役中让雅典人赢得辉煌胜利（这可能是三列桨座战船时代最伟大的海战胜利）的那个计划。但库济库斯战役的策略依赖隐蔽和欺敌，充分利用了地形、地貌和天气来掩藏舰队的抵达、规模和位置。这些元素在诺提昂都是没有的；雅典人在诺提昂不可能隐藏自己，也没有必要去尝试类似的计谋。另外，吕山德已经研究雅典舰队一个多月，通过逃兵的口供已经对雅典舰队的规模和行动有充分的了解。他对库济库斯战役和雅典人的战术也很熟悉。

然而，安条克斯还是在开局模仿了亚西比德在库济库斯的计谋。安条克斯以自己的战船打头阵，率领10艘三列桨座战船径直奔向以弗所，并指示其他战船在诺提昂严阵以待，“直到敌人离开陆地很远”（*Hellenica Oxyrhynchia* 4.1）。他的想法是诱骗吕山德追击他的小队伍，进入朝向诺提昂的开阔海域。当吕山德舰队离开陆地足够远的时候，雅典舰队将努力切断其退回港口的路线，迫使其打一场大规模海战，或者追击逃回港口的敌人。

吕山德知道亚西比德已经远离以弗所，而雅典舰队被一个此前从未有过大舰队指挥经验的人掌控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吕山德决定“做一件足以让斯巴达骄傲的事情”（Diodorus 13.71.3）。他以自己的3艘三列桨座战船追击雅典人最前方的那艘船，将其击沉，杀死了安条克斯。剩下的9艘雅典战船立刻逃跑，遭到整个斯巴达舰队的追击。吕山德认识到他让雅典人大吃一惊，并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于是匆匆利用雅典人的混乱。诺提昂的雅典舰队主力还在等待，直到看到己方前锋向自己奔来，后面较远处跟着敌人的追兵，于是也起航了。他们看到小股雅典先头部队在慌乱逃跑，而整个斯巴达舰队在猛烈追击。雅典人没有时间排好作战阵型，也没有一位将领指挥全军，于是每一位三列桨座战船船长各自尽快起航。因此，前去援救先头部队的雅典主力舰队“毫无秩序可言”（Diodorus 13.71.4）。他们被打得落花流水，最终损失了22艘战船，而吕山德控制了大海，在诺提昂建立了纪念碑以庆祝这意料之外的胜利。

三天之后，亚西比德带着色拉西布洛斯的30艘三列桨座战船抵达，将诺提昂的雅典战船数量提高到88艘（不包括已经损失的22艘）。他急于转败为胜，于是奔向以弗所，希望将吕山德再一次引诱出来。但这一次吕山德觉得没有理由冒险，因为双方兵力相当，而且雅典人由一位威名赫赫的骁将指挥。亚西比德没有办法，只能返回萨摩斯岛，前一次失败的耻辱未能洗雪。

尽管吕山德在此役中表现出了极高才华，并且完全配得上他得到的赞誉，但他取胜的主要原因还是雅典人犯下了可怕的错误。雅典人愤怒地将此次失败归咎于亚西比德，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不管他去弗凯亚的目的是什么，他都不应当将全部三列桨座战船留在一个没有指挥经验的人手里，去面对优势敌人。尽管雅典人在诺提昂的伤亡不多，而且在爱琴海仍然有108艘三列桨座战船，还占据数量优势，但诺提昂战役在战略上是一次重大失败，逆转了自库济库斯战役以来一直对雅典人非常有利的战局。雅典人在短期内无法恢复在伊奥尼亚的地位，也无法占领安德罗斯岛。萨摩斯岛基地中的雅典士兵和水手的士气受到了负面影响，逃兵肯定会增多。

亚西比德之后夺回主动权的努力也没有成功。这一次，他率领全军前往库麦，开始蹂躏库麦城周边的土地。但整个库麦陆军突然出现，将雅典人赶回了船上。这离诺提昂的失败没过多久，使亚西比德的政敌有了更多理由去指控他。

亚西比德垮台

亚西比德不在雅典城期间，城内发生的事情给他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阿基斯二世利用大量雅典重步兵和骑兵远离本土的机会，率领一支由伯罗奔尼撒和玻俄提亚重步兵、轻装部队和骑兵组成的大军，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杀到雅典城下。虽然他们被击退了，但在退却之前蹂躏了阿提卡，这让雅典人在得知诺提昂和库麦的失败后更加恼火。亚西比德的政敌看到，攻击他的时机已经成熟。与此同时，亚西比德的一位死敌——特拉索之子色拉西布洛斯——从萨摩斯岛的营地返回了，带回了军中的极大怨气。他在雅典公民大会宣布，亚西比德指挥作战就像在进行豪华旅游观光一样，将舰队托付给一个只会喝酒和吹牛的人，“好让他自己自由地到处转悠、搜罗金钱，以便在阿卑多斯和伊奥尼亚酗酒嫖娼，尽管敌军舰队就在咫尺之外”（Plutarch，*Alcibiades* 36.2）。随后，库麦的使者指控亚西比德攻击“一个没有任何过错的盟邦”（Diodorus

13.73.6）。与此同时，一些雅典人指责他没有努力占领库麦，并声称他收了波斯国王的贿赂。也有人指责他过去的不端行为，谴责他帮助斯巴达人，与波斯人合作，据说波斯人在战后将扶植他成为雅典僭主。新仇旧恨和真假指控全部向亚西比德袭来，直到有一个人，可能是克里奥丰，提议罢免他的职务。这个提议被通过了。

雅典人任命科农接替亚西比德来指挥在萨摩斯岛的舰队，而亚西比德再一次被放逐了。他知道自己不能回雅典，因为他的诸多敌人正在那里等着用一大堆私人申诉和公共指控来对付他。他也必须离开萨摩斯岛，因为那里的部队也开始敌视他了。同样，他在斯巴达和波斯领土上也都不会受到欢迎。但他已经料到自己可能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早在赫勒斯滂海峡服役的几年间就已经在加里波利半岛建造了一座设防城堡当作避风港，于是他就去了那里。

很多人认为，亚西比德的最后离去和他最终被解除雅典军队的指挥职务，是战争最后阶段的一个转折点；对雅典来说，是个灾难。在前411年和前408年时，虽然海洋和陆地上的最初成功确立了他的地位——一位优秀的骑兵指挥官和能干的海军指挥官，但在海峡历次战役中表现最优秀的指挥官不是他，而是吕库斯之子色拉西布洛斯。和以往一样，亚西比德的个人野心对他自己而言也是一个严重的障碍。他树敌过多，令敌人对他的憎恨与日俱增。他们热切等待机会攻击他，这迫使他去努力取得超乎寻常的功绩，并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以便获得和维持群众的爱戴，而只有群众的爱戴才能保护他。因此，他选择去冒险，而这必然会给雅典带来灾难。

亚西比德在政治上也是个争议极大的人物。有人非常仰慕他，有人非常讨厌他，他始终不能赢得一大群公民的稳定支持。他不能争取到一个可靠的大多数来支持自己的政策，他也不愿意为了国家利益而听从其他人发号施令。与此同时，他能够阻止其他人取得领导地位，因为在大

祸临头之时，雅典人依然会寻求他的帮助，认为他的魅力和诺言能够挽救他们。在诺提昂战役不到一年之后，一部喜剧中的一个人物说道："他们渴求他，他们憎恨他，但他们希望他回来。"（Aristophanes，*Frogs* 1425）他的倒台也拖累了色拉西布洛斯和塞拉门尼斯这样有才干的朋友，使雅典在最需要这些将才的时刻失去了最精明强干的将领。这可能是斯巴达在诺提昂的胜利给雅典造成的最严重后果。

---

[1] 掷距骨或称掷羊拐骨、掷髀石，用羊的后胫距骨作为玩具，是历史悠久的儿童游戏，也有的用其他动物的距骨。古埃及人、古希腊人与古罗马人都会用距骨玩抛掷游戏。玩法通常是将跖骨上抛，用手接下，同抓布包游戏一样考验小孩的反应能力。跖骨因能掷出四面，可作为骰子游戏，也被认为是六面骰的前身。

第三十六章 阿吉纽西战役（前406年）

亚西比德的垮台把他的朋友们也拖垮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色拉西布洛斯和塞拉门尼斯，他们在前406年春季的选举中没有当选为将军。但在选拔新将军时，派系利益倒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选民主要选择与亚西比德没有亲密联系的有经验的海军指挥官，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派系。

前406年年初，科农取代亚西比德，成为萨摩斯岛上雅典舰队的总司令。吕山德开出的更高军饷和雅典舰队在诺提昂的损失使科农手下的水手数量不足，只能满足100艘战船中能有效地操作70艘的人员需求，所以他没有能力执行任何重大行动。此时，吕山德的情况与雅典人截然相反。他的资金很充裕，舰队实力在不断增强，水手斗志高昂。他的道路上只有一个障碍：斯巴达法律规定，海军司令任期仅一年，不能连任。吕山德不得不将舰队交给他的继任者——卡利克拉提达斯。

新的海军司令

新任司令也是个莫萨克斯人，但与他的前任在多个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他获得这个高位时十分年轻，可能不超过三十岁，尽管勇敢无畏，却缺少吕山德的个人雄心。狄奥多罗斯说他“没有诡诈、性格直率”，“对和外国人打交道没有经验”，是“最公正的斯巴达人”（13.76.2）。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认同前任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及其继位的儿子保萨尼亚斯的观点。普雷斯托阿纳克斯主张和平、与雅典修好；保萨尼亚斯则成了吕山德强有力的对手，领导着一个被某位学者称为“温和的、传统的”派系，反对斯巴达建立海外帝国。他们害怕海外帝国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奢靡的生活方式会腐蚀斯巴达，因此希望重返吕库古[1]宪法严苛朴素的原则。我们推测，吕山德与小居鲁士的亲密友谊和在亚洲各城邦结党营私的做法，引起了保萨尼亚斯派系的猜疑，

因此保萨尼亚斯以卡利克拉提达斯取代了吕山德。

前406年4月前后，新任海军司令抵达以弗所之后，很快与吕山德产生了摩擦。吕山德移交舰队时自诩为“大海的统治者，在海战中旗开得胜者”（Xenophon，*Hellenica* 1.6.2）。卡利克拉提达斯立刻挑战这些吹嘘之词，敦促吕山德率军从萨摩斯岛的雅典人那里驶过，并将舰队派往米利都，以证实他的自吹自擂。这个举动强调了吕山德战功的局限性，定下了两人互相竞争的基调，并为年轻司令设定了取得更大胜利的目标。

吕山德没有上钩，而是直接乘船回国了，将这刺痛抛在脑后。吕山德在部队里的支持者立刻开始和卡利克拉提达斯作对，说他无能和缺乏经验。年轻的海军司令直面这些嘲讽，以斯巴达式的朴素和直率向集合起来的官兵讲话。他宣布，“如果吕山德或其他任何人相信自己更精通海军事务”，他愿意交出自己的指挥权。但既然政府已经命令他领导舰队，他就必须尽其所能。他要求舰队官兵自行判断，调查他的目标，评估他受到的批评以及斯巴达政府因任命他为司令而受到的指摘，然后告诉他“应当留下，还是乘船回国将这里的情况汇报上去”（Xenophon，*Hellenica* 1.6.4）。这次讲话让反对他的议论都平息了，因为没有人敢要求他违抗政府的命令，也不愿意看到他回国将他们的哗变行为报告上去。

但是，吕山德还是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更严重的麻烦。他离岗的时候手中还有小居鲁士给的一笔金钱，他理应将这笔钱交给继任者，然而他却将钱还给了小居鲁士。因此，卡利克拉提达斯就缺乏维持舰队所需的资金，而吕山德仍然拥有波斯王子的欢心，能够羞辱和阻碍他的竞争对手。卡利克拉提达斯不得不去找小居鲁士索要金钱以便支付军饷，但王子刻意羞辱了这位年轻的海军司令，迫使他等了两天才接见他。会议很不顺利，因为小居鲁士拒绝了他的要求。斯巴达司令怒气冲冲地离去

了，对吕山德的政策更加敌视。“他说希腊人处于最凄惨的境地，因为他们为了金钱，竟向蛮族阿谀奉承；如果他能安全回国，会尽最大努力让雅典人与斯巴达人和解。”（Xenophon，*Hellenica* 1.6.7）这是传统派斯巴达人的声音；这番话是斯巴达脱离波斯控制的宣言，表达了他的决心，即拒绝波斯支持，奉行与之前不同的政策。

于是，卡利克拉提达斯将斯巴达基地从以弗所调回米利都，放弃了地理上的战略优势，以便执行新计划。米利都曾经反对波斯人，所以是他为舰队征集资金的更好地点。在米利都的一次公民大会上，他表明了自己的新计划，要求当地人提供资金以便继续作战。“在诸神佑护下，让我们告诉蛮族，不用向他们卑躬屈膝，我们也能惩罚自己的敌人。”（Xenophon，*Hellenica* 1.6.11）当地希腊人的反应非常积极热烈，就连吕山德的朋友也不敢不出钱。

卡利克拉提达斯拥有140艘战船，兵力是科农的两倍，但他知道雅典人已经准备调来大量援兵。因为他曾经批评吕山德在诺提昂战役之后无所作为和不敢直面萨摩斯岛的雅典舰队，所以他现在需要证明自己敢于这么做。另外，若赢得一次重大胜利，会鼓励小亚细亚和各岛屿的希腊人拿出更多钱来支持他。因此，他急于与敌人交锋。他攻击并占领了位于德尔菲尼昂（在希俄斯岛上）和泰奥斯的雅典要塞，以此向科农的舰队（此时在萨摩斯岛以北）发出讯号。随后卡利克拉提达斯占领了莱斯博斯岛上的米西姆纳，抓了很多俘虏，但拒绝将这些俘虏全部卖为奴隶以获得现金。他回想斯巴达曾宣称的开战理由（解放希腊人），于是宣布：“只要是我指挥，在我权限范围之内，绝不容许有希腊人被奴役。”（Xenophon，*Hellenica* 1.6.14）这样的政策和口号既是鼓励仍然在雅典人桎梏下的城邦起来反抗，也是为了赢得那些已经解放的城邦的支持。这是斯巴达在没有波斯的帮助下打赢战争的唯一办法，也是兑现“解放希腊人”承诺的唯一办法。

科农受困于米蒂利尼

卡利克拉提达斯传话给科农，说他打算结束他的敌人“与大海的奸情”（Xenophon，*Hellenica* 1.6.15）。他的意思是雅典的海洋帝国是不合法的，他要向其发起挑战。尽管科农利用两次冲突之间的间歇将他的舰队恢复到最佳状态，“为备战付出的努力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位将军”（Diodorus 13.77.1），他的兵力仍然远逊于敌人，所以他不肯出港应战。但莱斯博斯岛受到了威胁，它是阻挡伯罗奔尼撒舰队重返赫勒斯滂海峡的主要屏障，于是科农不得不将舰队调到米西姆纳以东的赫卡托奈西群岛。卡利克拉提达斯率领170艘战船（而且水手素质也是一流的）追了上来，科农立即逃往米蒂利尼，但穷追不舍的伯罗奔尼撒人在米蒂利尼港口入口处咬住了雅典人，俘获了30艘雅典三列桨座战船。科农勉强把剩余40艘战船带到了安全地带，但这些战船很快就遭到了封锁，因为卡利克拉提达斯从海陆两路围攻米蒂利尼城。科农被包围得水泄不通，面临断粮的危险，而且城内有很多亲斯巴达分子，有可能与敌人里应外合。科农费了很大力气才将1艘船送出港口，向雅典报告他的处境。

不过，他逃到米蒂利尼使卡利克拉提达斯失去了一次完胜的机会，不然后者可能就打赢整个战争了。如果雅典舰队遭到全歼（它几乎全军覆没），斯巴达人就可以不受阻挡地占领莱斯博斯岛和萨摩斯岛（雅典基地，且无人把守），然后进入同样没有防守的赫勒斯滂海峡，封锁雅典的粮食供应路线。但卡利克拉提达斯缺乏资金，不得不打一场耗时甚久的围城战，于是雅典人有时间派出增援部队，与他争夺制海权。不过对他来说幸运的是，小居鲁士看到了他的成功，相信他正处于全胜的边缘。如果斯巴达人在一位敌视波斯的指挥官的领导下，在没有波斯帮助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那么这对小居鲁士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于是他便宜行事，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向斯巴达舰队送去了资金，包括给司令本人的礼物。卡利克拉提达斯出于形势所迫，接受了小居鲁士送来的军饷。但与吕山德截然不同的是，他个人对波斯仍然保持冷淡和超然的态

度。他解释道，“他本人与小居鲁士之间没有必要存在私人友谊，波斯与全体斯巴达人缔结的条约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Plutarch，*Moralia* 222E）。这位海军司令希望得到的那种胜利需要一场速战速决的战役，而这样的战役必须发生在雅典人恢复元气和波斯的金钱发挥决定性作用之前。

雅典重建海军

科农派去求援的船只于前406年6月中旬抵达雅典。雅典人此时可动用的船只有约40艘，但经过努力，在一个月内就将他们的舰队实力恢复到110艘三列桨座战船。缺少船只还不是全部问题，因为此时国库已经空空如也。为了支付造船费用和水手的薪金，雅典人不得不熔化卫城的胜利女神尼刻的金像，用这些黄金铸币。他们用这些钱币和储藏在圣山上的金银，筹集了2000多塔兰同，解决了军事开支问题。人力是另外一个问题。最好的水手已经驻扎在米蒂利尼，因为科农之前为自己的任务精心挑选了水手。即便征召那些素质略逊一筹但还算有经验的桨手，也只能为一小部分船只配齐人员。因此，雅典人不得不让缺乏经验的人担当桨手，包括农民、可以在骑兵部队服役的有产者，甚至奴隶（他们将得到自由和雅典公民权）。“他们让所有达到服兵役年龄的人上了船，既有自由人也有奴隶。”（Xenophon，*Hellenica* 1.6.24）这是整个战争中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在海战中，雅典人的战术素质逊于敌人；雅典军中倒戈的技艺娴熟、经验丰富的水手增强了敌人的实力。

与战争中其他任何一支雅典舰队都不同的是，这支舰队有八位将军。但据我们所知，八位将军中没有一位是凌驾于其他人的最高指挥官。这样的安排应当不算理想，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位年轻勇敢的斯巴达指挥官，并且他已经击败了雅典最好的海军将领科农。这支雅典舰队于7月驶往萨摩斯岛，从盟军获取了另外45艘战船，因此一共拥有155艘三列桨座战船。卡利克拉提达斯担心被夹在科农舰队（在米蒂利尼港口）和逼近的雅典增援舰队之间，于是留下50艘战船监视科农，自己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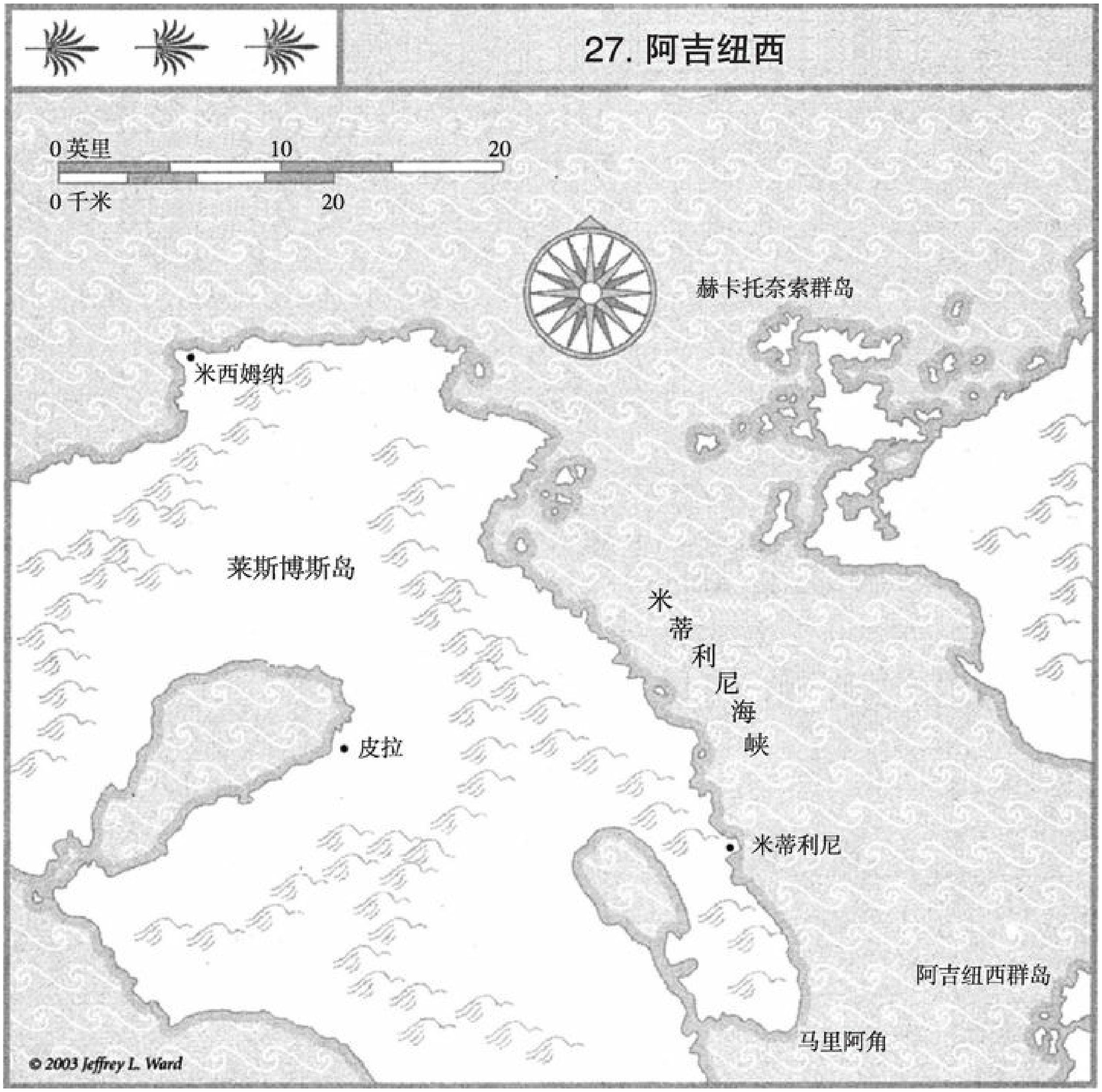
率领余下的120艘战船前往莱斯博斯岛东南端的马里阿角，准备切断敌人。在那里，他可以看到雅典增援舰队抵达了阿吉纽西群岛，距离大陆不远，在自己位置以东约2英里处（见地图27）。不管他是否知道自己的兵力少于对方，他都坚信己方水手的战术素质更高，因此必胜无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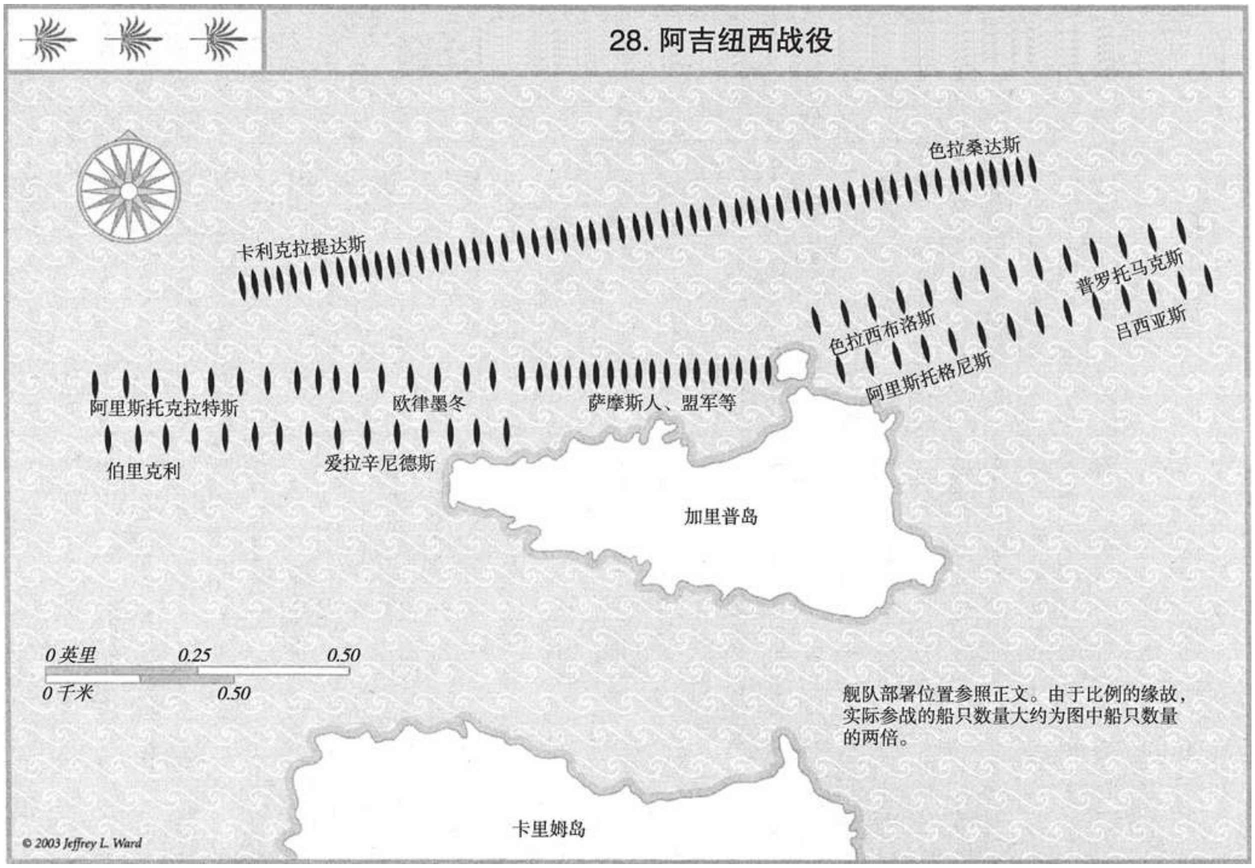
阿吉纽西战役

卡利克拉提达斯打算再一次运用帮助他打败了科农的奇袭战术，即在夜间进攻，但遇到了风暴，因此未果。拂晓时分，他迎着旭日，奔向阿吉纽西群岛。斯巴达舰队齐头并进地攻击雅典战线。斯巴达人的120艘战船排成一线，战线长度约2400码（见地图28）。每两艘相邻的三列桨座战船之间间隔约20码。他们摆好了阵型，准备运用包抄战术（雅典人使这种战术日臻完美，并因此占据海上优势），即己方航速更快，因此可以绕过敌军战线的一端，从侧翼或后方攻击敌人；或者突破战术，即一艘战船迅速行驶到两艘敌船之间，然后迅速转头去攻击其中一艘的侧翼。

雅典人也知道自己在战术素质上处于劣势，于是相应地调整了阵型，并且是以希腊海战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方式。他们将己方战船分为三队，即两翼和中路。两翼各有60艘战船，分成前后两排，后一排的每艘船对应前一排两艘船之前的缺口。中路有35艘战船，仅排成一排，但中路的位置在加里普岛（阿吉纽西群岛两个主岛中偏西的那个）前方不远处。加里普岛的地理位置使斯巴达舰队无法对雅典中路实施突破战术，而雅典两翼犬牙交错的双排阵型也使斯巴达人无法对其实施突破战术。雅典两翼相邻两艘战船的间距是常规的两倍，因此，如果前排较大的缺口诱使一艘斯巴达战船尝试突破战术，后排的战船就可以上前阻止敌船，并允许敌船两侧的己方战船冲撞它。两倍的间距使雅典人的战线更长，既能帮助他们对付敌人的包抄战术，也能让他们包抄敌人的侧翼。雅典人对阵型还做了一个改进，即将两翼分为八个独立单位，每个单位由一名将军指挥。这种安排在进攻时特别有利；进攻将在更开阔的海域

进行，每个单位的独立行动能力会带来益处。





卡利克拉提达斯开始前进的时候，“雅典人出来迎战，将左翼向开阔海域的方向展开”（Xenophon，*Hellenica* 1.6.29）。雅典左翼已经包抄了斯巴达右翼，并继续向南（对雅典人来说是向左）运动，威胁要包围斯巴达右翼。这样的策略会将一支分队从己方战线分离出去，进而在战线上制造一个缺口，容易被敌人利用。但雅典人在阿吉纽西群岛运用的双排战线使最左端前排分队的将军伯里克利[2]（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和情妇阿斯帕齐娅的儿子）转了一个大弧线，让左翼后排的指挥官阿里斯托克拉特斯能够封闭缺口。不管卡利克拉提达斯在这个海域打算运用何种进攻动作，都会面临被包围的危险（这是个非常严重且显而易见的危险），斯巴达人将被迫转入守势。雅典右翼可能采取了同样的动作，但我们不知道它具体是怎样的动作。但即便雅典右翼只是径直前进，也已经处于可以包抄敌人侧翼的位置。雅典中路似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停留在原地，即加里普岛前方。

卡利克拉提达斯亲自指挥右翼，他看到的景象非常令人担忧。旗舰舵手墨伽拉的赫尔蒙敦促他停止战斗，“因为雅典三列桨座战船比斯巴达多得多”。然而，年轻的海军司令不肯退缩：“如果他死了，对斯巴达不算什么损失，但如果临阵脱逃，就太耻辱了。”（Xenophon，*Hellenica* 1.6.32）他的坚定勇敢符合斯巴达的伟大传统，也体现了他的大无畏品格，但在当前这个战略环境下，却显得不审慎。无论如何，己方处于战术劣势的时候与兵力强于自己的敌人交战，总是不明智的，何况斯巴达人此次没有理由非打不可。拖延时间对他们有利；雅典人没有资金，不可能让舰队长期留在海上。只要拖延下去，雅典人那边可能会出现更多逃兵。一位谨慎的指挥官会在兵力对比有利于斯巴达人的时候，让雅典人在斯巴达人选择的地点主动进攻。

然而，拖延对卡利克拉提达斯自己不利。他希望在更加依赖波斯资金之前和在作战季节结束之前，尽快赢得一场胜利，免得丧失得胜的机会。而且，如果他听从赫尔蒙的建议而取消战斗，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将不得不去米蒂利尼，努力消灭科农，而雅典舰队也肯定会追击到米蒂利尼。他会以170艘战船去面对雅典人的155艘，而科农的40艘战船将处于他的后方。这样的话，他的战船数量会比雅典人少25艘，而在阿吉纽西群岛则比雅典人少35艘。不过，在米蒂利尼，他在兵力上的些许改善很可能会被腹背受敌的窘境抵消。不管他有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都不能说，卡利克拉提达斯的决定仅仅是因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太鲁莽、没经验。

面对侧翼受到的威胁，卡利克拉提达斯尽其所能地去应对。因为他没有办法将自己的战线延伸去挫败敌人的策略，“于是他将舰队分为两支，两翼各自为战”（Diodorus 13.98.4）。这样他就没了中路，容易遭到停在加里普岛前方的那一排雅典战船的攻击。但在形势逼迫下，他不得不在战术上做一些妥协，毕竟受到的主要威胁（可能被敌人包围）实在是太严峻了，不能忽视。事实上，雅典中路在战役的第一阶段（时间

很长，也很激烈）停留在原地。“起先作战井然有序，后来就乱七八糟了。”（Xenophon，*Hellenica* 1.6.33）雅典人对斯巴达侧翼的袭击起初集中在中路，让斯巴达人几乎没有机会去尝试他们如今更具优势的机动动作。随着战斗继续，未参战且毫发未伤的雅典中路，对疲惫的斯巴达人的威胁越来越大。卡利克拉提达斯的战船撞上一艘敌船，他阵亡了。此后，斯巴达左翼败退了，企图逃跑。斯巴达阵型终于被打乱，雅典中路投入杀戮和追击，摧毁了许多逃跑的敌船，自己却没有任何损失。在斯巴达右翼，战斗持续了很久，非常残酷，最后与海军司令一起作战的拉科尼亚战船损失了十分之九，其他船只则全部逃走。雅典右翼阻止了对方向北逃跑，侥幸逃出的少数船只南下去了希俄斯岛、库麦和弗凯亚等地。米蒂利尼的斯巴达指挥官在得知此役结局后也逃走了，于是科农得以与雅典主舰队会合。

据狄奥多罗斯说，阿吉纽西战役“是希腊人对抗希腊人历史上最伟大的海战”（13.98.5）。斯巴达人损失了77艘战船，即全军战船的64%，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基诺塞马、阿卑多斯和诺提昂三次战役中，失败一方的平均损失为28%。在库济库斯，雅典人运用欺骗、奇袭和多个单位独立指挥将敌人诱骗到开阔海域并将其包围，最后击溃整个斯巴达舰队。阿吉纽西发生了一场可以与库济库斯战役相提并论的溃败，由于雅典人的出色谋略，斯巴达人又一次遭到包围，与附近陆地的联系被切断。仅仅因为雅典左翼无法封闭缺口，才有一些斯巴达船只得以逃脱。

雅典人的155艘战船只损失了25艘，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他们若是在这场战役中失败，就必然会输掉整个战争，但凭借一支匆匆拼凑而成的舰队，他们歼灭了由吕山德准备和训练的优势敌人，并杀死了接替吕山德的勇敢的年轻海军司令。雅典又一次统领大海，雅典人有理由期望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生存下去，甚至赢得最终胜利。

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

阿吉纽西大捷挽救了雅典人，但他们没有高兴多久，因为他们很快就为了这场战役的结局而大吵起来。战役结束后，雅典舰队分散在越来越汹涌的大海上，大约是4平方英里的海域。他们在战役中损失的25艘船当中有12艘的残骸还漂浮着，可能有1000人在挣扎求生，其中很多人抓着船只残骸，大量死尸也附着在残骸上或漂浮在周围的海面上。三列桨座战船的船长们在得胜后没有停下来营救幸存者，也没有收回死者遗体以便安葬，而是迅速返回了阿吉纽西，商讨下一步策略。

对希腊人来说，收回死者遗体几乎和营救幸存者一样重要。在史诗中，奥德修斯来到冥界，妥善安排一位阵亡战友的葬礼。在古典悲剧中，安提戈涅[3]拒绝服从国王的命令，宁愿自己丧命，也不愿意让她死去的兄弟暴尸荒野。雅典人为何忽视了这么神圣的义务？

部分原因是这场战役出乎雅典人的预料，舰队比通常情况更加深入开阔海域，并且分散在面积很大的海面上（前411年以来的其他海战都发生在靠近陆地的狭窄海域）。按照标准程序，战斗结束后，胜利者的舰队会靠岸，然后决定如何营救幸存者和收回死者遗体，以及谁具体负责这些事情。在正常情况下，每次战役后都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无疑这也是雅典人预期的战役结果，因为雅典人两面包围敌人的计划会使己方的全部船只进入离阿吉纽西群岛不远的较小海域。但最后很多敌船逃到了很远之外，雅典人不得不追击敌船，这样一来通常的做法就无法实现了。

船长们最终将舰队撤回阿吉纽西群岛时，出现了第二个问题。科农还在12英里之外，被斯巴达人封堵在米蒂利尼港口。米蒂利尼的斯巴达指挥官爱特奥尼库斯得知战役结局之后，肯定会逃跑并与希俄斯岛的斯巴达舰队会合。那么，斯巴达舰队就有超过90艘战船，这会成为一支新舰队的骨干力量，以便将来再次挑战雅典人。这些战略考虑迫使雅典人将舰队调往米蒂利尼，以切断斯巴达人的退路；尽管雅典人肯定是左右

为难，不知道是先截断斯巴达人的退路，还是先履行对幸存者与死难者的义务。最终他们选择了妥协：舰队三分之二的船只及全部8位将军匆匆赶往米蒂利尼，而47艘战船则被留下实施搜救，由三列桨座战船船长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指挥。

这个决定受到了很多批评，但它很有道理。去往米蒂利尼的舰队如果成功切断了爱特奥尼库斯部队的退路，肯定要发生交战，所以派遣将军们（正是他们筹划和执行了在阿吉纽西的作战计划并取得辉煌胜利）去收拾残敌是很有道理的。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不是普通船长，而是具有突出才干和丰富经验的前任将军。他们开始着手完成自己的使命，但遇到了一个新的困难：海上刮起了风暴，惊涛骇浪，奉命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的人们心惊胆战。

在爱琴海航行过的人都知道，那里的风暴有多么难以预料、狂野暴虐，甚至现代船只也可能遇险。三列桨座战船远远不如现代船只坚固可靠，风暴对它们的威胁一定更大，因为它们无法应对这种糟糕的海况。在阿吉纽西群岛，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麾下的水手们拒绝服从命令，“因为他们在战斗中吃了很大的苦头，而且风浪太大”（Diodorus 13.100.2）。船长们尽力说服水手们，但海况很快就变得非常恶劣，再争论也是无济于事了。

在风暴的威胁下，去往米蒂利尼的主舰队也被迫返回，于是和搜救舰队合兵一处。此刻一定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将军们看到自己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一定很生气，并责怪了两名负责搜救的船长。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一定觉得这是不公正的指控，怒火中烧，或许还认为将军们原本应当在风暴变得严重之前就开始搜救。

当天气好转后，整个舰队前往米蒂利尼，但途中遇到了科农，后者带来的消息称爱特奥尼库斯及其50艘三列桨座战船已经逃走了。在米蒂利尼停留后，雅典人追击至斯巴达舰队的希俄斯岛基地，但爱特奥尼库

斯不会蠢到冒险出战，于是雅典人只得返回萨摩斯岛。他们伟大的胜利被玷污了，即未能执行搜救任务，而且在搜救上没有尽到全力。将军们在考虑如何向雅典公民大会报告时，一定会因为这些因素而感到沉重。起初他们打算汇报战役的全部细节，包括两位船长未能执行搜救任务，但后来被说服了，决定闭口不提这个事件，而仅仅说一切问题都是风暴造成的。他们一定意识到，向任何人提出指控都必然会导致争吵，而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广受爱戴，是本领高强的演说家，而且拥有强大的政治支持，所以一定会是非常难以对付的对手。

将军受审

胜利的喜讯让雅典人松了一口气，欢欣鼓舞；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赞扬了指挥此役的将军们。但与此同时，正如海军将领们预想的那样，人民对他们未能搜救幸存者和收回死者遗体感到愤怒。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立刻从萨摩斯岛返回了雅典，这或许是为了自我辩护。城内没有人知道阿吉纽西群岛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受到指控，将军们也没有。

然而，雅典人的怒火熊熊燃烧起来，人们开始质疑将军们的举动。在雅典人看来，将军们应当为战役的每一个方面负责。当民意传到萨摩斯岛之后，将军们自然觉得两名船长是让他们丢脸的罪魁祸首，于是又一次写信给雅典。这封信揭露了真相，即搜救任务事实上是由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领导的。

将军们的这个举动是严重的形势误判，因为这样的话两位船长就别无选择，只能捍卫自己。他们不否认风暴的严重程度，但指责将军们应当为搜救失败负责。两位船长一定还抱怨将军们在无谓的追踪上浪费了宝贵时间，他们原本可以用这些时间来搜救士兵，而且在将军们下达搜救命令之前，阿吉纽西群岛的辩论还耽搁了不少时间。两位船长接到搜救命令时，风暴已经变得太猛烈，导致任务根本无法执行。他们的自我

辩护很有效：将军们的书信在公民大会宣读之后，群众立刻对两位船长愤怒起来，“但两人做了自我辩护之后，群众的怒气又转向了将军们”（Diodorus 13.101.4）。公民大会于是通过了一项决议，罢免了将军们，并命令他们返回雅典受审。其中两人闻讯立刻逃走，流亡海外；其他人接受的调查程序可能就是每一位将军任期结束后都会接受的常规审查，从他的财务报告开始，也包括他在任职期间行为的方方面面。

第一个受审的是爱拉辛尼德斯，他被定了贪污罪和行为不端罪，被监禁起来。他第一个被起诉，或许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容易对付的靶子；或者因为人们得知，他曾建议抛弃幸存者和遇难者遗体而将整个舰队调往米蒂利尼。另外五名将军也在“五百人”议事会面前做了报告，他们故伎重演，再次将发生的一切都解释为风暴所造成的结果。也许在得知两名船长未受指控之后，将军们就希望恢复最初的统一口径。如果是这样，那就太晚了，因为议事会投票决定羁押这五名将军，并交给公民大会审判。在公民大会上，塞拉门尼斯宣读了将军们最初的信件（仅仅责怪风暴），并和其他人一起，要求将军们对幸存者的最终死亡和未能入土为安的死者负责。

我们可以推断，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一定对将军们非常恼火，因为将军们竟然改口并转而攻击他们俩。两人也一定担心，现在重新使用原先的借口（一切全怪风暴）已经太晚了。雅典人民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一定会寻找罪人，并对其进行严惩。现在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谁是罪人。塞拉门尼斯主动采取攻势，占了上风，公民大会在他的诱导下猛烈地反对将军们。群情激愤，压倒了为将军们辩护的人的声音，并且不给将军们足够的时间为自己辩护。在这样的压力下，将军们很自然地开始攻击指控他们有罪的人，坚持说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是搜救幸存者和收回死者遗体的责任人：“如果一定要为了搜救的事情找出罪人，那么除了奉命执行搜索任务的人，就没有别人了。”但即便到了这时，将军们还没有放弃原先的辩词，坚持说“恶劣的

海况阻止了搜救行动”（Xenophon，*Hellenica* 1.7.6）。他们找到一些舵手和水手来佐证自己的说法，这产生了强有力的效果。公民大会可以轻易地相信，将军们始终坚持一种说法，刻意没有提及搜救任务细节，这既是因为将军们的正直，也是因为风暴既然这么大，不管谁负责结果都是一样的。

色诺芬写道：“他们说了这些话，几乎已经说服群众了。”（*Hellenica* 1.7.6）整个事件似乎就要以温和与理智的结局画上句号了，不料命运又一次加以干预。此时天已经黑了，不能投票，于是公民大会决定推迟至次日再进行裁决，并命令“五百人”议事会提议一个执行审判的程序。

碰巧的是，几天之后就是阿帕图里亚节，这是庆祝出生、成年和婚姻的节日，阿提卡各地的家庭会齐聚一堂。一般来讲，这是一个欢歌笑语、喜气洋洋的节日。然而，这一年的家庭团聚只能让人们痛苦地想到，有不少年轻人死在了阿吉纽西战役中，并让人们再一次对应当对此事负责的人强烈地怨恨起来。次日，当公民大会按计划召开的时候，死者的亲属（为了表示哀悼，他们剃了头发）要求复仇，“哀求人民惩罚那些罪人，因为他们没有掩埋为保卫祖国甘愿牺牲的勇士的遗体”（Diodorus 13.101.6）。

作为回应，“五百人”议事会的成员卡里克塞诺斯向会议提议了一种对将军们非常不利的程序，即不进行辩论，只投票决定有罪或无罪。投票表决内容的措辞非常有倾向性：将军们是否犯有“未能营救打赢海战的士兵们”的罪行（Xenophon，*Hellenica* 1.7.9）。被确认有罪的人将被判处死刑，财产充公。将军们是一同受审的，公民大会的一次投票将决定他们所有人的生死。议事会批准了这项提议，尽管它非常不寻常和有倾向性，使将军们没有机会去改变这次公民大会里对他们充满敌意的气氛。

公民大会上的辩论非常情绪化。一名男子自称是阿吉纽西战役的幸存者，回忆了在他身旁溺死的人曾请求他告诉雅典人，“将军们没有营救那些为国尽忠的人”（Xenophon，*Hellenica* 1.7.11）。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亚西比德的堂兄弟和亲密盟友欧里普托勒摩斯大胆地为被指控的人辩护。他指控卡里克塞诺斯提出的是非法动议，而要求执行“违法法令诉讼”，这是雅典一种相对较新的捍卫宪法的程序。

这种措施要求在执行卡里克塞诺斯提出的动议之前，先对卡里克塞诺斯提出非法动议的问题加以审判，若证明他无罪，才能执行他的动议。公民大会上的很多人称赞欧里普托勒摩斯的举动，但很多人持有不同意见。一名公民建议将欧里普托勒摩斯和支持他的人也作为被告，同将军们一起受审。这个建议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于是欧里普托勒反对卡里克塞诺斯的动议被撤销了。

公民大会重新考虑了原先的动议，即以一次投票决定所有将军的生死。但公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由抽签选出，每天轮流任职，负责主持公民大会）拒绝用投票表决来决定这个问题，理由是这样做是非法的。他们有两个有力的论据：首先，将被告作为一个集体来审判，违背了公民大会的传统做法，更具体地讲，也违反了《坎嫩诺斯法令》，该法令明确规定任何一名被告都将单独受审；其次，将军们没有时间和机会来自我辩护，而根据法律，他们应当有这样的时间和机会。这两个论据是很难反驳的，但卡里克塞诺斯感到群众对将军们的敌意，甚至没有尝试去反驳。他建议将表示异议的公民大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也算作被告，与将军们一同受审。群众高声疾呼地赞同他。

这让执行委员会成员们大为惊恐，赶紧撤回了自己的异议，同意用投票表决来决定。巧合的是，苏格拉底被抽签选为这一年的议事会成员之一，这也是他一生中担任过的唯一一个公职。另外，他所在的部落凑巧是这个月的公民大会执行委员会。更巧的是，在这一天，苏格拉底担

任公民大会的主席。在执行委员会成员当中，他是唯一一个坚持己见、拒绝投票表决所有将军生死的人。一些年后，柏拉图记述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对自己这些行为的解释，当时苏格拉底正在雅典法庭上为自己辩护："那时候，我是公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中唯一反对此种违法行为的人，我也投票反对你们（雅典人民）了；演说家们威胁要指控和逮捕我的时候，你们也坚持这样做并大声呼喊。我决定我必须冒险，站在法律和正义那边，而不是因为害怕坐牢或者死亡，就站在你们那边，去损害正义。"（*Apology* 32b-c）。即便面对这样有原则性、正义性的反对，公民大会还是十分狂热，于是会议继续进行。

欧里普托勒摩斯又一次勇敢地站起来，建议采用不同的程序对被告加以严惩，但允许他们各自单独受审。他显然相信，事件激起的强烈情感（受到了阿帕图里亚节的影响和演说家们的煽动）在过了哪怕一点点时间之后也会冷却下来，单独受审能够给被告们一个机会为自己辩护，让理智占上风。他做了一次精彩演说，警告人们不要接受非法程序，并提醒公民大会，被指控的将军们赢得了多么伟大的胜利。他差一点就说服大家了，对将军们进行单独审判的提议赢得了多数票。但到最后，会议程序被暗中操纵，他的胜利白费了。大会进行了第二次投票表决，这一次通过了议事会的建议：将全部八名将军，包括两名始终不曾回国的人，一律处死。

欧里普托勒摩斯只差一点就挽救了他们，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即雅典人的怒火不会一直维持下去。"不久之后，雅典人追悔莫及，投票决定指控那些欺骗了人民的人。"卡里克塞诺斯是五名受到这项指控并遭逮捕的人之一。这五人都在审判之前逃走了，但卡里克塞诺斯在后来返回雅典城之后，"受到所有人的憎恶，穷困潦倒而死"（Xenophon，*Hellenica* 1.7.35）。

雅典人处死将军的做法，古往今来受到了理所应当的批评。但从古

到今的批评者们的论点——这样的错误是民主制的典型特点——却很不到位。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形式的政权都犯下过暴行。而此次背离常规的行为之所以如此臭名昭著，恰恰是因为民主制雅典通常遵守法律和尊重正当程序。我们已经看到，雅典人很快就后悔了自己的错误行为，但这将成为一个永恒的污点，此后民主制的敌人将不断用它来攻击雅典政府和雅典人的生活方式。

雅典人几乎旋即遭受了处决将军们带来的严重后果。任何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都少不了八位有经验且成功的军事领导人。除了前406/前405年的将军们之外，雅典还失去了另外两位有经验的指挥官，因为他们也与阿吉纽西丑闻有关联。色拉西布洛斯在前405年的选举中没有当选为将军，塞拉门尼斯虽然当选，却被负责审查新提名官员的委员会剥夺了资格。丧失了最优秀将领的雅典现在不得不面对斯巴达与波斯的挑战，而当选为将军的那些人一定也会因为前任将军的命运而感到惶恐不安。

---

[1] 吕库古是传说中为斯巴达立法的英雄和领导人，大约生活在前8世纪，据说是斯巴达政治改革、教育制度以及军事培训制度的创始人。他建立的社会制度强调斯巴达公民的平等、军事技能和严苛简朴的生活方式。

[2] 根据图28，最左端前排分队的指挥官是阿里斯托克拉特斯，后排才是伯里克利。

[3] 安提戈涅是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与其母乱伦后生下的女儿。当俄狄浦斯因弑父娶母的罪行而被迫出走（一说是被他的两个儿子放逐）时，安提戈涅自愿陪在父亲身边，随他四处流浪。安提戈涅的两个哥哥波吕尼刻斯与厄忒俄克勒斯为争夺底比斯统治权而发生冲突，双双死去。安提戈涅的舅父克瑞翁继承了忒拜王位。克瑞翁用对待英雄的方式安葬了厄忒俄克勒斯，而宣布攻打忒拜的波吕尼刻斯是叛徒，将他的尸体抛弃在野外，任其腐烂和被野兽吃掉。安提戈涅认为这不公正、不道德，违反了神意。因此，她不顾克瑞翁的禁令，埋葬了哥哥的尸体。根据索福克勒斯的传说版本，克瑞翁下令将安提戈涅用围墙困在波吕尼刻斯的墓中，安提戈涅在墓中自杀。

第三十七章 雅典陷落（前405～前404年）

虽然雅典人在阿吉纽西战役之后遭遇许多不幸，但这场战役毕竟是一次大胜，斯巴达舰队损失惨重。尽管斯巴达人还有90艘三列桨座战船，却没有钱给水手支付军饷。为了避免饿死，士兵和水手们不得不在希俄斯岛上当雇佣劳工，替人种地。他们的穷困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以至于其中一些人打算进攻希俄斯岛的首府城市，尽管它是斯巴达的盟邦。胆战心惊的希俄斯人暂时同意出钱供养这些部队，但若没有波斯的资助，斯巴达依然没办法在爱琴海继续作战。斯巴达国内的很多人看到己方被一支如此缺乏经验的雅典舰队击败，不禁灰心丧气。另外，与卡利克拉提达斯持相同政见的斯巴达人认为，与波斯人合作去攻击希腊人是非常丢脸的事情，而吕山德的政敌也害怕他重返指挥岗位、实现个人野心。

斯巴达再次提议和平

出于这些原因，斯巴达人再一次寻求议和。他们这一次提出的条件是：斯巴达军队撤离狄凯里亚，双方保留当前控制的所有土地。对雅典人来说，这次的和平条件比他们在库济库斯战役之后拒绝的条件要好。尽管雅典在前410/前409年丢掉了皮洛斯，但斯巴达人愿意放弃他们在阿提卡的要塞，并无须雅典拿什么东西来交换。自前410年以来，斯巴达人还不得不放弃了对拜占庭和迦克墩的控制，使雅典人得以再次畅通无阻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前往黑海，以便获得黑海沿岸的粮食供应。此时，斯巴达控制的唯一重要区域是赫勒斯滂海峡的阿卑多斯，伊奥尼亚沿海重要的希俄斯岛，以及大陆上的重要城市库麦、弗凯亚和以弗所。虽然这样的和平条件还没有给予雅典人想要的一切，但已经比库济库斯战役之后的和平条件强了不少。从其他方面来看，新的和平条件对雅典人也应当是有吸引力的。如果斯巴达决定继续作战，并且得到波斯

的新一轮支持，就能很快恢复舰队兵力的优势，并持续用更多的军饷将雅典的桨手诱惑到他们那边。另外，不管雅典人在阿吉纽西的胜利多么光荣，它其实是个奇迹，而继续打下去的话，雅典人的资源很快就会耗尽。相反，和平能使雅典人保障帝国的安全，征收贡金，充实国库。斯巴达人撤出狄凯里亚也会让雅典农民重返农田，再一次开始粮食生产。

虽然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雅典却拒绝了。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一些古代作家责怪民主制必然会产生的鲁莽和愚蠢，尤其是“煽动家”克里奥丰，他“阻止了和平的实现；穿着军人的胸甲醉醺醺地走进公民大会，声称除非斯巴达人交出所有的城市，否则他绝不允许缔结和约”（*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34.1）。这种说法肯定是有偏见的，但不管它是否准确，事实仍然是参加公民大会的数千名雅典人中的大部分拒绝议和。最合理的解释是，在斯巴达人违反了《尼基阿斯和约》之后，他们仍然不信任斯巴达人：无论是执行和约条件的誓言，还是批准盟约的誓言，都不足以保证伯罗奔尼撒人信守诺言。在前406年，雅典人担心敌人会又一次将和平仅仅视为一次休战，以便争取时间来重整旗鼓、恢复元气，再次与波斯人谈判以获取资金，继续打下去并最终战胜雅典。雅典人一定认为，趁着斯巴达人实力虚弱、灰心丧气并且与波斯关系紧张，继续对其施加压力以获得全面胜利，才是更安全的路线。

吕山德归来

雅典人这个计划的问题在于，小居鲁士仍然是行省总督，并且铁了心要利用斯巴达军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吕山德在等待时机，与小居鲁士合作。前406/前405年冬季，爱琴海和亚洲大陆的斯巴达盟邦在以弗所召开了一次会议。自斯巴达在阿吉纽西群岛战败以来，各盟邦无力阻挡雅典人的进攻，损失惨重。他们和小居鲁士的使者一道，劝说斯巴达人重新任命吕山德为司令。这个要求遇到了两个障碍，即斯巴达的政治和宪法。但在卡利克拉提达斯死亡、雅典拒绝议和之后，斯巴达人别无办法，于是轻松地逾越了这两个障碍，因为战争必须进行下去，斯巴

达也不能拒绝盟邦（希腊人和波斯人）的请求。对野心勃勃的吕山德的任何反对，都必须在形势逼迫下让步，宪法的限制也必须被搁置。斯巴达法律规定，任何人一生中只能担任一次海军司令，所以斯巴达人任命阿拉库斯为名义上的海军司令，而任命吕山德为他的秘书和副司令。所有人都明白，这仅仅是法律上的障眼法。

斯巴达的海战天才立刻开始发挥作用，他在以弗所的旧基地集结了船只，并下令建造新船只。随后他迅速拜见小居鲁士，索要目前急需的资金。虽然王子私下里和吕山德关系极好，但他只能告诉吕山德，波斯国王拨给的资金和他的私人资金都已经耗尽。尽管如此，他还是许诺，即便波斯国王拒绝拨款，他也会继续自掏腰包支持吕山德。为了兑现诺言，他当场就提供了一大笔钱。

小居鲁士需要吕山德的支持，不仅是为了他未来的野心，还是为了解决他当下的难题。他杀害王亲国戚的行为遭到了受害者父母的谴责，于是，大流士二世命令他返回位于苏萨的朝廷。

年轻的王子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但他不信任任何波斯人代他统治行省，于是采取了一个不寻常的措施：他将吕山德召唤到萨第斯，指派这个斯巴达人作为他的代理人来统治波斯帝国的这个行省。他将手头的全部资金都给了吕山德，还授权他收缴所有贡金。他信任这个忠诚的斯巴达人，但对他的鲁莽不太放心，于是要求吕山德在他返回之前不要攻击雅典人。这个要求对吕山德来说也算合理，因为在未来几个月里他的舰队在数量上逊于敌人，他也需要时间来操练水手，将其素质提升到他要求的高水平。

在小居鲁士不在期间，吕山德的个人目标要求他消除已故的卡利克拉提达斯的影响，后者唤醒了一种强有力的泛希腊、反波斯的情绪，这对吕山德获取该地区希腊人的政治支持很不利。在米利都尤其如此，那里执政的民主制政府对他很不友好，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推翻这个政

府。由于这座城市仍然忠于斯巴达，因此他不能简单地攻击它，而是运用欺骗手段。欺骗始终是他的一件重要政治武器。尽管他在公开场合称赞米利都派系斗争的结束，私下里却鼓励他的支持者去反对民主制。这些人使用谋杀手段，将约340名反对派杀死在家中或市场上，并驱逐了1000多人。推翻民主制之后，他们自己的派系掌权。这是一个寡头制政权，不效忠于斯巴达，而忠于吕山德本人。他在米利都的行动预示着他未来的一些手段。吕山德吹嘘自己能"用距骨欺骗孩童，用誓言耍弄成年男子"。对批评他使用奸诈手段的人，他冷冷地为自己辩护道："狮皮不能盖住的地方，必须用狐狸皮缝补。"（Plutarch，*Lysander* 7.4；8.4）

为了抵达米利都，吕山德必须向南航行，经过萨摩斯岛的雅典舰队。他的水手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所以雅典人（兵力仍超过斯巴达人）原本应当提高警惕，捕捉迫使敌人在海上交战的机遇，但他们没有努力去拦截吕山德。雅典人犹豫不决的部分原因是，在阿吉纽西获胜的将军被处决和流放之后，新的将军经验不足，也缺乏只有胜利才能赋予的自信心。他们当中没有出现一位优秀的领导人，他们胆怯且满腹猜忌，对前任的悲惨命运念念不忘。

谨小慎微让他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因为吕山德从米利都出发之后，很快就将战略形势转为对他有利。在卡里亚和罗德岛，他猛攻了雅典的盟邦，杀死男人，奴役妇女和儿童。这是蓄意的、杀一儆百的恐怖行为，旨在震慑雅典的其他盟邦，令其不敢抵抗。他的政策与卡利克拉提达斯相反，没有泛希腊主义的元素。敌我双方不再是希腊人和波斯人，而是吕山德的朋友和敌人。他必须在海峡里打赢战争，因为驻扎在萨摩斯岛的优势雅典舰队阻挡着道路，他必须绕过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快速西进，跨过爱琴海，占领了一些岛屿，袭掠了位于雅典本土海域的埃吉那岛和萨拉米斯岛，最终在阿提卡登陆。即便是最胆怯的雅典指挥官也不能允许这样的攻击不受阻挡地继续下去，于是雅典舰队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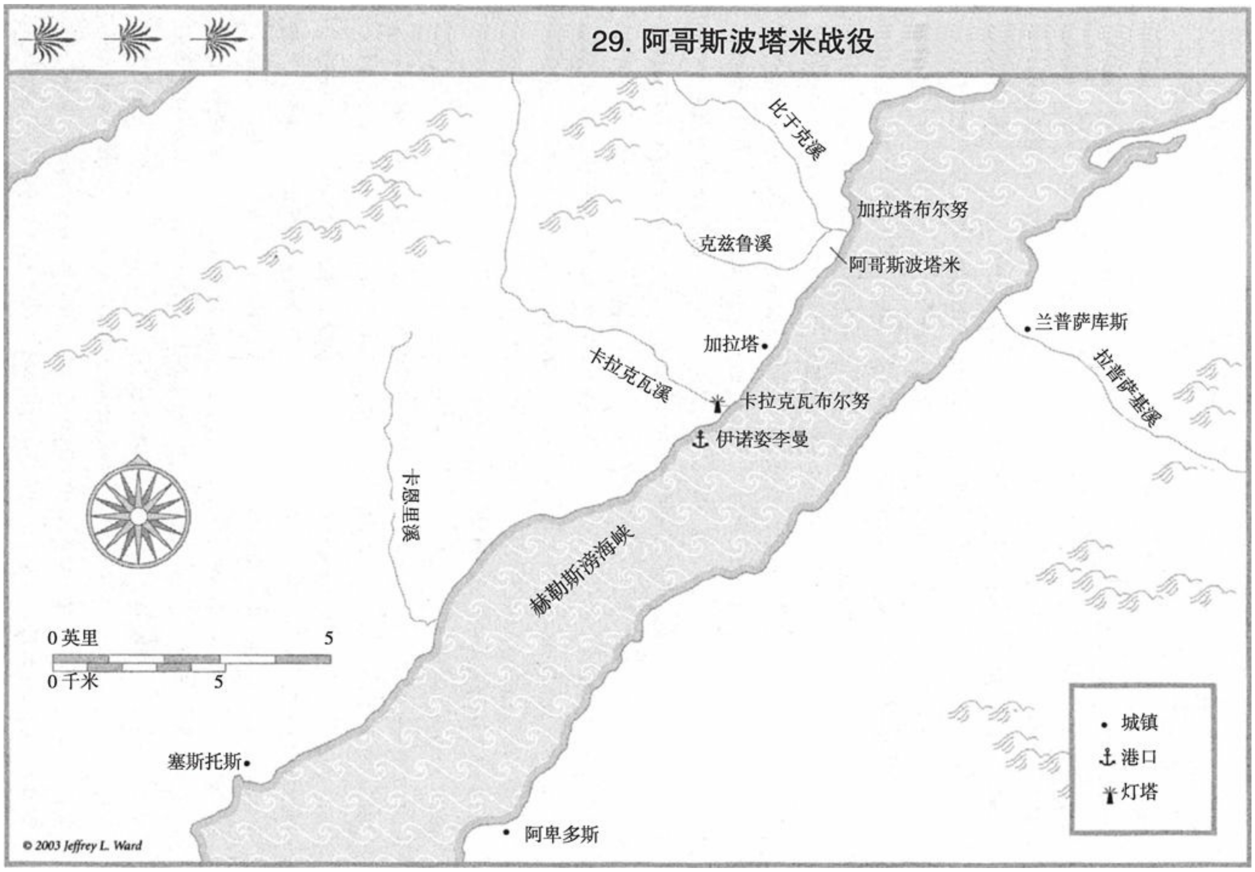
始追击敌人。吕山德避开了雅典舰队，快速返回，穿越爱琴海南部，抵达罗德岛。他从那里又沿着海岸匆匆北上，安全驶过了萨摩斯岛（雅典舰队此时不在那里），然后去往赫勒斯滂海峡，“以便阻止商船通过，并攻击那里反叛斯巴达人的城市”（Xenophon，*Hellenica* 2.1.18）。一支强大的斯巴达舰队，在一位有胆识的指挥官领导下，再一次威胁了雅典的生命线。

阿哥斯波塔米战役

吕山德在阿卑多斯（见地图29）基地集结了一支陆军，任命斯巴达人瑟莱库斯为指挥官，然后海陆并进，攻打关键城市兰普萨库斯，将其一举拿下。这次成功让斯巴达人逼近了普洛庞提斯海的门户，打通了去往拜占庭和迦克墩的道路，得以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扼杀雅典与黑海地区的贸易。雅典人知道他们在基诺塞马、库济库斯和阿吉纽西的胜利付之东流了，而且若不能迫使吕山德交战并将其决定性地击败，雅典的生存也成了问题。于是他们来到了塞斯托斯基地，从那里率领舰队沿赫勒斯滂海峡北上约12英里，到了一个叫作阿哥斯波塔米[1]的地方，它与兰普萨库斯隔着约3英里的海峡。

将雅典舰队部署在那里的决定从一开始就是有争议的，因为那个地区只有海滩，没有合适的港口。附近的小镇根本无法为船上约3.6万人提供粮食和饮水，所以雅典人为了获取补给，不得不多次将部队拆分，返回塞斯托斯主基地，往返路程为24英里。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在塞斯托斯扎营，以规避这么大的风险？答案是，战略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如此。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牵制吕山德，阻止他驶入普洛庞提斯海、去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第二个目标是在己方资金耗尽前，尽快迫使敌人交战。若以距离吕山德12英里的塞斯托斯为营地，就不能达成第一个目标，而且实现第二个目标也会更困难和更危险。另外，若以塞斯托斯为基地，去挑战位于兰普萨库斯的斯巴达舰队，雅典人将不得不逆水逆风地航行，士兵抵达战场时就会十分疲惫，使敌人以逸待劳。这些理由能

够解释雅典人的营地选址，但不能解释他们随后的行动。



阿哥斯波塔米的雅典舰队由六名将军指挥。和在阿吉纽西一样，没有一位最高统帅，将军们每天轮流担任最高领导人。但与阿吉纽西的指挥官不同的是，他们没有设计出一个出色的策略，而是依赖显而易见的办法，即每天上午率领舰队逼近位于兰普萨库斯的港口，向吕山德发出挑战。我们没有精确的数字，但斯巴达人的船只数量似乎与对方相当。一连四天，他们的指挥官将舰队留在港内。随着时间流逝，雅典人似乎没有办法迫使吕山德出来交战。

就在这个时候，亚西比德戏剧性地出场了。之前，他似乎在加里波利半岛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过着流亡生活，从自己的城堡观察着战局。他骑马去了雅典营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表示愿意帮忙。他敦促将军们将基地转移到塞斯托斯（理由是不言自明的），并宣布色雷斯有两位国

王已经承诺给他一支军队，以便打赢战争。我们已经知道，他的建议其实没有他自认为的那样有价值，但若能获得地面部队的支持，的确会很有帮助。如果雅典人能从陆路占领兰普萨库斯，吕山德就只得冲出港口，面对地理位置更有利的雅典舰队，并且交战的时间和地点都由雅典人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巴达人几乎必败无疑，而且由于陆地已经在雅典人手中，斯巴达舰队将会像在库济库斯一样遭到全歼。

但是雅典将军们有理由怀疑，亚西比德承诺的部队能否真的应召而来，因为他们深知亚西比德过去许下的类似诺言都是一场空。而且亚西比德提出了令人无法接受的条件，即分享雅典军队的指挥权。将军们无疑会猜疑他的动机，怀疑他“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做出某种重大贡献，并通过他的成绩重新获得人民的爱戴”（Diodorus 13.105.3）。不管雅典将军们担忧什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将部分指挥权交给一个曾两次遭到雅典人民谴责的流亡者；他们更不愿意接受亚西比德这样一个人的建议，因为担心“如果失败，他们自己会被怪罪；而一旦成功，就是亚西比德的功劳了”。最后，他们告诉他，“现在他们是将军，他不是”（Diodorus 13.105.4），命令他马上离开。[2]

将军们重新回到原先的策略，但之前的耽搁和无所作为对部队的纪律和士气产生了不利影响。士兵们变得漫不经心，船一靠岸他们就去寻找粮食和饮水，而没有采取恰当的安全措施，指挥官也没有批评他们。局势很困难，何况让水手们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原本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将军们的怯懦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第五天轮到菲劳克里斯指挥，他似乎有一个计划去打破僵局、迫使敌人交战。他率领30艘战船开往塞斯托斯方向，并命令舰队其余部分的船长们在恰当时间跟随他。他似乎是要诱使吕山德相信：雅典人终于厌倦了在阿哥斯波塔米徒劳无功的驻扎，正在前往下游的主基地。他希望用这样一支队伍（它足够小，可以轻易被打败；但又足够大，是个值得

追击的目标）引诱斯巴达人出战。事实上，吕山德在诺提昂尝试过类似的策略，他攻击了安条克斯的先遣部队，在其他雅典人赶来救援时赢得了一场大胜。菲劳克里斯或许注意到了这种策略，打算在阿哥斯波塔米试一试。这一次，先遣部队是一个诱饵，主舰队将会在吕山德咬钩时猛扑上去。

这是个颇有希望的计划，但需要娴熟和自信的指挥、严明的纪律和各分队之间极好的时间配合，才能成功。但在这一天，雅典舰队缺少这些素质。而敌军舰队训练有素，并且受单一领导人指挥；这位领导人拥有突出的才华，有理由感到自信。吕山德知道，雅典人最终会要么撤退，要么用某种花招吸引他交战，他已经为这两种情况做好了准备。于是，他耐心地严密监视敌人，并确保自己的舰队状态良好、保持警惕、严阵以待，在机遇降临时就能发动攻击。他发现菲劳克里斯离开之后，就迅速动身，在菲劳克里斯的分队航行到下游之前将它切断。吕山德以优势兵力攻击菲劳克里斯，击溃了他的分队，然后掉头迎战跟随菲劳克里斯的雅典主力舰队。他动作太快，打乱了雅典人的计划。雅典人设想吕山德舰队会追击菲劳克里斯南下，于是吕山德的尾部就会暴露在雅典主力舰队的攻击范围之内。然而，阿哥斯波塔米的雅典人震惊地发现，菲劳克里斯分队的残部向他们逃来，而吕山德的得胜舰队正穷追不舍。雅典人恐慌之下呆若木鸡，很多船只还停在海滩上，水手们还没来得及登船应战，战船就被俘获了。

雅典人的混乱鼓舞了吕山德，他命令一队士兵在爱特奥尼库斯的指挥下登陆，去占领雅典营地，而他自己的战船已经开始将停在岸上的雅典三列桨座战船拖走。措手不及的雅典人没有组织有序的地面部队来抵抗敌人的两面攻势，而是向四面八方抱头鼠窜；大多数人奔向塞斯托斯，逃之夭夭。伟大的雅典海军舰队除了10艘战船之外，其余全被击沉或俘虏。吕山德逆转了库济库斯战役的结局，但战败的雅典人没有盟军帮助，而且雅典国库已经空虚，他们没有办法再建造一支新舰队。于

是，他们输掉了战争。

战役结果

吕山德迅速向斯巴达发送捷报，并在兰普萨库斯抓获了3000～4000名雅典战俘，这相当于敌人全军人数的十分之一。尽管他之前对战败的敌人非常严酷，但我们说不准，如果由他一个人做决定的话，他会不会杀死或者奴役战俘。吕山德被记录在案的暴行都不是情绪所致，而是冷酷算计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仁慈有助于实现他的目的的话，他也可以做到仁慈。

但做决定的人没有他那么冷静和精于算计，急于报复的盟军坚持要求处死战俘。在这场延续了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争中，科林斯、墨伽拉和埃吉那等城邦的土地被蹂躏，贸易被切断，经济被破坏，财产和地位遭到永久性打击。他们在战斗中蒙受损失，随着战争延续，受到越来越残酷的对待。战争双方的暴行越来越令人发指，但雅典人对斯基奥涅和米洛斯等城邦的屠杀和奴役尤为臭名昭著。胜利者一般倾向于原谅（如果不是遗忘）自己的过激行为，而为自己遭受过的暴行愤愤不平。就在前不久，雅典人还因为己方有水手叛变通敌而愤怒，于是投票决定砍断所有战俘的右手。出于同样的愤怒，菲劳克里斯还命令将两艘敌船上的船员全部投入大海。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对雅典人的这些暴行记忆犹新，于是投票决定处死所有的雅典战俘。

色诺芬当时可能在雅典城，记述了雅典民众听到阿哥斯波塔米消息时的反应：

> “帕拉鲁斯”号（两艘承担特殊任务的快船之一）于夜间抵达了雅典，宣布了灾难的消息。比雷埃夫斯发出的哀号穿过长墙，传到了城市，噩耗被口口相传，这一夜无人入眠。他们不仅为那些被杀的人哭泣，更为自己哭泣，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一定会遭受他们向米洛斯人施加的那种命运（米洛斯人是来自斯巴达的殖民者，雅典人攻下米洛斯城后屠杀和奴役了那里的居民），以及他们向希斯提亚人、斯基奥涅

人、托伦涅人、埃吉那人和其他很多希腊人强加的命运。（*Hellenica* 2.2.3）

阿哥斯波塔米战役中雅典战俘的命运只会让雅典人愈发坚信，投降只会带来死亡、奴役或者至少是流放，于是他们选择抵抗到底。公民大会投票决定采取一切措施来保卫城市。雅典人为不可避免的围城战做了准备。

在海峡，吕山德很快就恢复了控制权，于是屠杀停止了。他向与雅典结盟的城邦提出了合理的条件，这些城邦不再抵抗、举手投降。他甚至允许在这些城邦的雅典驻军和官员安全离开，条件是他们只能返回雅典。这个姿态表面上对雅典人有好处，而实际上是一个狡猾的策略：吕山德知道雅典城固若金汤，不能强攻，因此只能长期围困；他希望城内饥饿的人数越多越好，以便缩短城市坚持的时间。为了这个目的，他还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拜占庭和迦克墩驻扎了军队，并下令对任何向雅典输送粮食的人格杀勿论。

他在这两座城市做的安排是一个模板，并打算在他控制的所有地方都建立这样的体制。他在这两座城市派驻军队，由总督指挥。“总督的人选不是根据贵族出身或财富，他让自己政治派系的人和那些与他有私交的人掌权，他还让他们负责奖惩。”（Plutarch，*Lysander* 13.4）不管在何地，他总是将民主制政府推翻，代之以由他的党羽组成的寡头制政府，这些政府往往包括所谓的“十人委员会”，都由他的亲信组成。没过多久，“希腊人的解放者”就开始从他控制的城市收缴贡金了，斯巴达政府批准了所有这些安排。

随后，吕山德航行到爱琴海，占领了雅典帝国的许多城市。只有萨摩斯岛反抗他。在那里，统治城邦的民主派对雅典忠心耿耿，杀死了贵族反对派人士，并准备抵抗斯巴达的围攻。吕山德留下40艘船攻打萨摩斯岛，然后率领150艘战船奔向阿提卡。途中，他将米洛斯人和埃吉那

人（他们此前被雅典人逐出了家园）重新安置到他们自己的岛屿。如果解放者的角色对吕山德的个人事业无害的话，他也不会拒绝扮演这样的角色。

雅典的命运

前405年10月，吕山德终于抵达阿提卡，在雅典城墙外不远处的学院区与整个伯罗奔尼撒军队会合。阿基斯二世没有按照常规将每个城邦兵力的三分之一留在本土，率领三分之二的兵力出征，而是将在狄凯里亚的全部军队都带到了雅典城下。与此同时，国王保萨尼亚斯率领其余的军队从伯罗奔尼撒半岛赶来了。这是五十多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斯巴达的两位国王同时在前线作战。他们的目的是恐吓大受震慑的雅典人，迫使他们立即投降，但即便是如此雄壮的武力展示也未能让雅典人投降。

至少部分雅典人还心存侥幸，害怕投降的后果，所以不肯投降。尽管敌人因对雅典帝国的共同仇恨而团结起来，但他们的目标未必一致。例如，底比斯和斯巴达在战争期间已经发生了一些冲突。若是彻底摧毁雅典，对雅典邻国底比斯就会非常有利，它可以占领因雅典灭亡而产生的权力真空地带，但底比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盟邦的扩张对斯巴达而言没有好处。假以时日，斯巴达人也许能看清，给雅典人较为宽大的条件对斯巴达是有利的，并且斯巴达人自己对如何处置落败的敌人也没有一致意见。吕山德奉行野心勃勃的政策，目标是用他控制下的斯巴达帝国取代雅典帝国。阿基斯二世对此的意见不太明朗，但保萨尼亚斯和他的父亲普雷斯托阿纳克斯一样，很快就会表现出较为保守的政策倾向，即斯巴达人的活动仅限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并与一个失去了强大力量和海外帝国的雅典保持比较适当的关系。保萨尼亚斯国王的影响力最终或许会压倒吕山德暂时的威望，所以斯巴达或许会和雅典取得和解。因此，雅典人打算尽可能久地坚守下去。

斯巴达人看到雅典人近期内不会投降，于是将保萨尼亚斯的部队送回了国，而吕山德率领舰队的大部分兵力去攻打萨摩斯岛，只留下足够的船只维持对雅典的封锁。在分头行动之前，斯巴达人召集盟邦开会，讨论雅典的命运。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底比斯和科林斯建议摧毁雅典，阿基斯二世和吕山德也支持这个建议，“他们发表的是个人意见，没有得到斯巴达公民大会的批准”（Pausanias 3.8.6；注意这是2世纪的一位作家，不是我们故事中的斯巴达国王保萨尼亚斯）。雅典人或许是得知了这个决定，胆战心惊，于是送信给阿基斯二世（他返回了狄凯里亚），提议如果他们可以保留城墙和比雷埃夫斯，就愿意加入斯巴达联盟。按照这样的协议，雅典人就等于放弃了对所丧失的帝国的权力主张。但阿基斯二世说自己没有权限进行和谈，要求雅典人去斯巴达商议。他显然不愿意和宽大处理雅典扯上关系。

当雅典人派遣使者到斯巴达讨论此事的时候，监察官们不准他们进城，而是在拉科尼亚边境的塞拉西亚接见他们，要求他们呈上建议。但在听了雅典人向阿基斯二世提过的条件之后，监察官们没有讨论就拒绝了，并命令雅典使者“迅速离开；如果想要任何形式的和平，就带着更好的建议来”（Xenophon，*Hellenica* 2.2.13）。他们说，雅典人至少应当同意拆毁长墙1英里以上的地段，以便让长墙无法防守。这预示着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前景：只要斯巴达人愿意，他们随时都能从海上封锁雅典，用饥饿迫使雅典屈服。

斯巴达人甚至根本不愿意就雅典人提出的和平条件进行讨论，这给雅典人带来了可怕的困难，因为雅典人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在和谈所需的时间内，很多雅典人就会饿死。一个叫阿切斯特亚图的人在雅典议事会站了起来，提议接受斯巴达开出的条件。但即便在这样绝望的情况下，雅典人还是不肯完全屈服。他们因此将阿切斯特亚图投入监狱，并通过了克里奥丰的动议，即禁止任何人提出类似的建议。对斯巴达人的不信任产生了非常极端的反应，因为雅典人相信，不管斯巴达人说什么

或许下什么诺言，一旦他们有一丁点机会，就会将雅典人全部杀死或奴役。

塞拉门尼斯议和

但即便是克里奥丰也不能将和谈无限期延迟。过了一段时间，饥馑变得无法忍受。这时，塞拉门尼斯（在前411年参与挽救雅典的人之一；在“四百人”要把城市出卖给斯巴达人的时候，也是他站起来推翻了“四百人”）冒着危险，又一次努力去避免灭顶之灾。他提出的是非常典型的温和建议，避免了两个极端，即接受斯巴达的条件和干脆拒绝谈判。他建议与吕山德谈谈，看看斯巴达人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了解他们是否打算彻底摧毁雅典、消灭雅典人民。与此同时，他告诉公民大会，他发现了“一些对雅典来说价值极大的东西”（Lysias 13.9），并请求人民投票授予他谈判的全权。人们敦促他公布价值极大的东西是什么，他拒绝回答并要求大家信任他。雅典人一定认识到，如果他们的谈判代表有成功的希望，保守机密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人们此时也渴求达成协议，于是批准了塞拉门尼斯的动议。

塞拉门尼斯在萨摩斯岛找到了吕山德，在那里和他一起待了大约三个月。前404年3月，塞拉门尼斯返回雅典，将他的长时间停留解释为吕山德将他扣留在那里，后来才放他回来，让他传达与阿基斯二世相同的信息，即吕山德没有权力谈判；雅典人要想和谈，必须去斯巴达找监察官。这个解释简直荒唐透顶，即使是古代作家也不会相信。他们认为，塞拉门尼斯刻意在萨摩斯岛停留了那么久，以便让雅典人更加饥肠辘辘，能够接受斯巴达人提出的任何条件。但这种观点是不合理的，也没有证据可以支撑它。塞拉门尼斯的长时间耽搁更有可能让雅典人抵抗得更久，因为使者还在努力获得更有利的和平条件，他们就不会那么倾向于投降了。如果想促使雅典人投降，塞拉门尼斯只需要回来告诉大家，斯巴达人并不打算摧毁雅典，但吕山德仍然坚持之前的和平条件。另外，雅典人如果相信塞拉门尼斯故意在吕山德那里待了那么久以便让人

民受苦，然后两手空空地回来，就不会选择他担任去斯巴达谈判的代表团团长了。他一定说服了雅典人，他在与吕山德长时间的谈判中取得了很大进展，现在有条件获得更令人满意的和平了。

后来的事实就是这样，因为斯巴达人最终同意了一种和平协定，即让雅典保持完整，雅典人民虽然不是完全自治，但保住了生命和自由。塞拉门尼斯是如何说服吕山德放弃之前的打算（摧毁雅典）的？他自称发现的“价值极大的东西”又是什么？古代作家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可以做一些合理的推测。塞拉门尼斯希望尽可能从当前糟糕的形势中挽救一些东西，但他一定明白，雅典必须放弃它的海外帝国、舰队和城墙，因为斯巴达不会容许它保留其中任何一项。他的目标是挽救城市、人民和人民的自由，以及尽可能多的独立。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他需要和吕山德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吕山德同样也需要时间去反驳希望摧毁雅典的派系的论据。

最狂热追求摧毁雅典的群体是底比斯人和科林斯人。一个叫作阿里安索斯的底比斯人正式提议：“将雅典城夷为平地，将其乡村化为牧羊草场。”（Plutarch，*Lysander* 15.2）塞拉门尼斯应当能够轻松说服吕山德，将雅典夷为平地只会让其领土落入底比斯手中，而底比斯是斯巴达在北方的竞争对手，并且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和野心勃勃。底比斯在战争期间经常给斯巴达制造麻烦，不仅增强了它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而且目前处于一个对斯巴达不友好的派系领导下，已经在要求获得更大份额的战利品。让这样一个底比斯变得更加强大，既不符合斯巴达的利益，也不符合吕山德的利益。塞拉门尼斯可以指出，对斯巴达来说更聪明的办法是，保留一个友好而不构成威胁的雅典，让它作为斯巴达与底比斯之间的缓冲地带，并遏制底比斯的野心。

吕山德希望战后的雅典由一个狭隘的寡头政权统治，其统治者全部是他的亲信，或许是一个十人委员会，得到斯巴达驻军的支持，就像他

之前在雅典海外帝国安排的那样。那么，塞拉门尼斯究竟以何种论据说服他，让他给雅典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呢？事实上，吕山德的成功和许多城市授予他的超乎寻常的荣誉已经让斯巴达国王们和其他显贵对他产生了担忧和嫉妒。“各城邦为他建造祭坛，向他献祭，仿佛他是神祇。他是第一个得到这种荣誉的希腊人。”（Plutarch，*Lysander* 18.3）例如，复辟的萨摩斯寡头派将他们主要节日的名字从赫赖亚节改成了吕山德节。斯巴达的两位国王很快都将对吕山德的野心表达出敌意，并取消他强加于雅典人的政权。这样的敌意肯定早就存在了，所以塞拉门尼斯可以指出，在雅典建立一个由吕山德控制的狭隘寡头政权，会让两位国王和他的其他政敌联合起来反对他的计划。而且这样的政权会让大多数雅典人心怀敌意（因为他们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习惯了民主制），或许还会促使他们发起令吕山德窘迫的反抗。塞拉门尼斯或许还指出，建立一个更广泛、更温和的政权会更稳定、更安全。

塞拉门尼斯还有另外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也就是他向雅典人提及的“价值极大的东西”。吕山德的力量如此强大，一个关键的支持因素是他与波斯王子小居鲁士的亲密关系。他在财政、军事和政治上都依赖小居鲁士的支持。正是小居鲁士的帮助使胜利成为可能，并将吕山德提升到这么高的位置，但如今小居鲁士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回到苏萨后，发现父亲大流士二世已经在弥留之际。大流士二世驾崩后，小居鲁士的哥哥登基为王，史称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对小居鲁士很不友好。新国王至少会终结小居鲁士在西方的指挥权，于是他就没有力量帮助吕山德了。如此一来，力量平衡就会发生变化，新国王可能恢复旧政策，即阻止希腊出现任何单一的超级大国，所以他可能会支持雅典、反对斯巴达。他的支持或许不能扭转战争结局，但能够让雅典在城墙之后坚守，直到获得更有利的和平条件，而且还会鼓励吕山德的斯巴达政敌给他穿小鞋。塞拉门尼斯可以指出，更符合吕山德利益的做法是，抢在大流士二世去世和这消息传到希腊之前，与雅典缔结条件合理的和平，在雅典培植一个友好的政权。

上述的推测可以解释塞拉门尼斯为什么能够在3月初返回雅典，并告诉大家，吕山德打算支持对雅典人来说可以接受的和平条件，并且雅典人推选塞拉门尼斯为去斯巴达和谈的代表团领导人。吕山德也向斯巴达监察官发去信件，报告了他与塞拉门尼斯的会谈。他的正式报告称，他给雅典人的回复和阿基斯二世之前的回复一样，即只有监察官和斯巴达公民能够决定此事。他一定在私下里通知监察官们，他已经改变了主意。吕山德的新想法（与雅典宽大议和）顺利通过，没有受到国王或监察官的反对，他们似乎争先恐后地寻找合适的措辞来描述自己的高尚动机。他们向雅典人提出的和平条件是：长墙和比雷埃夫斯城墙必须拆除；吕山德将决定雅典可以保留多少船只（当然是很少的）；雅典人必须放弃他们控制的所有城市，但可以保留阿提卡土地；他们必须允许所有流亡者回国（其中大多是亲斯巴达的寡头派）；雅典人需接受古老的政体（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并不清楚，很快将成为激烈争论的主题）；雅典人必须与斯巴达人保持攻守一致，不管后者去哪里，都必须跟随（这等于将雅典外交政策置于斯巴达控制之下）。

这些条件看起来似乎严苛，但与雅典人害怕的前景（雅典必须无条件投降，雅典城被摧毁，人民被屠杀或奴役）相比，已经温和了许多。塞拉门尼斯报告了斯巴达人提出的条件之后，他的一些同胞无疑表示反对。主要的反对者是那些坚定不移的民主派，如克里奥丰，他们知道投降意味着民主制的灭亡，满腹怨恨的寡头派流亡者会杀回来，民主派领导人将性命难保。这些民主派的影响力非常大，以至于主张议和的人相信必须除掉这些人。塞拉门尼斯返回雅典后，发现克里奥丰已经受审并被处死了。即便如此，有影响力的雅典人仍然向塞拉门尼斯抱怨。主张议和的人现在已经占了大多数，向主要的反对派提起诉讼，并将他们监禁起来。塞拉门尼斯返回的第二天，雅典人开会商议斯巴达的建议，尽管有些雅典人一直到最后都反对，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决定接受和平。

在前404年3月的这一天，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大战终于结束，历时

二十七年多一点。这个月晚些时候，吕山德抵达雅典，执行了和约。与他一起抵达的雅典流亡者希望这将是雅典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斯巴达的盟友身披花环、载歌载舞。“他们热情洋溢，在吹笛女郎的乐声中开始拆毁城墙，认为这一天将是希腊人自由的开始。”（Xenophon，*Hellenica* 2.2.3）

前431年，阿希达穆斯二世曾预测，斯巴达人会将这场战争传给他们的儿子。这个预言成了现实，不过他假如知道战争结束的方式（斯巴达人赢得了一场伟大的海战胜利，与“蛮族”结盟，而他们曾在前479年无比自豪地打败这些“蛮族”），一定会震惊不已。伯里克利对战争进程的预测早就丧失了公信力。事实上，没有人预见到，这场战争会如此漫长、残酷且代价高昂，损失了这么多生命、财产，摧毁了希腊人的古老传统和制度。如修昔底德所说，战争是一个凶残的教师，希腊历史上没有一场战争如此残暴。文明让人类体面地生活，实现其伟大的潜能。但文明与野蛮之间只隔了薄薄一层纸，它多次被撕裂，将参战者投入残酷与恶毒的深渊，只有最凶恶、最不开化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恶行。胜利者自我鼓吹的目的，即解放希腊人，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就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此后的和平也没有维持多久。这场战争，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是“震撼了希腊人的最宏大的动荡，还影响到了一些蛮族，或者我们可以说，影响了人类的很大一部分”（1.1.2）。它是希腊历史上最宏大的一场战争，也是最可怕的一场悲剧。

---

[1] 字面意思是“山羊溪”。

[2] 亚西比德的结局很凄惨。关于他死亡的具体细节有很多说法，比较流行的一种是：亚西比德隐居在弗里吉亚某地，吕山德派人去找法那巴佐斯，后者派人包围了亚西比德的房子并纵火。亚西比德手持匕首冲了出来，被乱箭射死。古代作家和现代学者对他的评价都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赞扬他，有的人批评他。

结局

结果，斯巴达的胜利并没有给雅典之前的臣属国家带来自由，因为吕山德占领了小亚细亚的许多希腊城邦[1]，而波斯人也收复了许多城邦。斯巴达人用自己的海外帝国取代了雅典的海外帝国，在“被解放的城市”培植狭隘的寡头制政府，安插斯巴达驻军和总督，并重新向这些城邦收缴贡金。

在雅典，斯巴达人扶植了一个寡头制的傀儡政权，这些领导人的残暴很快为其获得“三十僭主”的恶名。新政权开始了恐怖统治，大肆没收财产和进行处决，起初是镇压著名的民主制领导人，然后是为了金钱而镇压富人，最后是打击温和派，甚至攻击他们内部抗议这些暴行的人。随着敌意和反抗增加，三十僭主不得不召来斯巴达军队，以保护自己免遭公民的攻击。

斯巴达人在控制了先前的雅典帝国之后，就主宰了希腊世界，到处镇压民主制政权，以寡头制的卫星国取而代之。在被外敌占领的雅典，哪怕仅仅是被怀疑同情民主制的人也会被处死。但雅典人找到了一位领袖来挑战这种局面，那就是吕库斯之子色拉西布洛斯。勇敢的色拉西布洛斯不愿意在三十僭主的统治下生活，逃到了底比斯。底比斯先前敌视雅典，但现在与斯巴达疏远了。在底比斯，流亡的雅典民主派和爱国者聚集在色拉西布洛斯周围，组建了一支小规模军队，驻扎在雅典北部边境山区的一座要塞内。三十僭主的军队企图镇压这些起义军，但都失败了；更多雅典人受到鼓舞，逃出城来，加入抵抗。最后色拉西布洛斯的实力足够强大，率军占领了比雷埃夫斯，与一支斯巴达陆军打了个平

手。斯巴达人放弃了雅典，色拉西布洛斯及其部下在前403年恢复了雅典的完全民主制。

雅典又一次成为自由的民主制国家，但危险还没有消失。人们对三十僭主犯下的累累罪行义愤填膺，很多人希望追捕和惩罚这些罪人及曾与他们合作的人，这个过程会导致审判、处决和放逐。雅典会再次陷入派系斗争和内战，而正是这些毁掉了希腊许多城邦的民主制。色拉西布洛斯和其他温和派一起宣布大赦，保护了除极少数罪大恶极者之外的人。重整旗鼓的民主制雅典坚决奉行温和与克制的政策，这种行为后来赢得了亚里士多德的极大赞誉："雅典民主派对之前灾难的反应，无论是私下里还是公开的反应，似乎都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和最符合政治家风度的行为。"他们不仅宣布和实施了大赦，甚至征集公共资金，向斯巴达人偿还了三十僭主镇压民主派时的贷款。"因为他们认为，这才是恢复和谐的办法。在其他城邦，民主派上台之后，绝不会想到要花自己的钱，而是没收和重新分配反对派的土地。"（*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40.2-3）前403年，民主派的温和政策收到了回报：各阶级和派系之间成功地和解了，雅典民主制得以繁荣地发展下去，没有发生内战或政变，几乎一直延续到前4世纪末。

值得注意的是，雅典输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候，面临灭顶之灾：雅典及其人民似乎要被消灭，民主制政体要瓦解，它再也没有能力主宰其他国家，甚至不能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但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或者说没有持续多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雅典人就恢复了完全的民主制。不到十年的时间，他们就重建了舰队、城墙和独立地位，雅典成为一个多国联盟的核心成员，该联盟致力于阻止斯巴达干预希腊其他地区的事务。二十五年之内，雅典人就重新获得了之前许多盟邦的支持，恢复了实力，以至于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雅典帝国"。

斯巴达人当然成了希腊的主导力量，但胜利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宁，

反而制造了许多麻烦。战争结束几年后，他们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帝国和贡金。大量金钱流入斯巴达，导致其传统的纪律和体制受到了损害。斯巴达人很快就不得不面对内部阴谋，这些阴谋威胁了他们的政体和生存。在国外，他们不得不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对手是他们的前盟友和前敌人组成的联盟。斯巴达人被遏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内。仅仅由于波斯的干预，斯巴达才从这场战争中全身而退。在一个短时期内，斯巴达人对希腊同胞维持了一种霸权统治，但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做，仅仅是因为波斯国王允许他们这么做。在打赢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不到三十年，斯巴达人便在一场大规模陆战中被底比斯人击败，他们被永久性地摧毁了。

漫长而凶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让参战各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员损失是前所未有的，在有些地方甚至是毁灭性的。米洛斯岛和斯基奥涅的全体男性居民都被消灭了，普拉蒂亚也损失了很大一部分男性公民。战争结束十年后，雅典成年男性的数量差不多是战争开始时的一半。雅典的人员损失比其他国家更严重，因为只有雅典遭到了瘟疫的打击，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瘟疫。但战争对土地的破坏和对贸易的干预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贫困、营养不良和疾病。雅典人毁坏了墨伽拉的农作物，在很多年里切断了它的贸易，导致墨伽拉人口锐减、陷入贫困，为了恢复城市的繁荣而不得不更加依赖奴隶劳动。前479年，科林斯人派出多达5000名重步兵去普拉蒂亚迎战波斯人。但在前394年，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却只能出动3000人去涅米亚，而且这肯定是他们的全部兵力。战争期间由贸易遭到扼杀而导致的贫困使很多人失去了担任重步兵所需的财富，但仅仅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如此大幅度的兵力下降。如果这个下降幅度中有一半是由于总人口的下降，那么仍然说明科林斯成年男性的数量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减少了约20%。在整个希腊世界，从西西里岛到博斯普鲁斯海峡，战争的苦难造成了相应的人口减少，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在很多地方，战争带来的经济破坏即便不会造成生命损失，其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雅典失去海外帝国之后，就丧失了前5世纪那种庞大的公共财富，也失去了各种各样的建筑工程。遭受打击的农业也需要很多年时间来恢复。不仅墨伽拉，爱琴海诸岛也遭到了经常性的掳掠。对科林斯、墨伽拉和西锡安等地峡国家来说，商业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与爱琴海的贸易被阻断了差不多三十年，而且在这期间，它们与西方的贸易也遭受了沉重打击。在希腊的很多地方，尤其是伯罗奔尼撒半岛，贫困问题非常严重，以至于很多男子不得不以当雇佣兵为生，往往为外国军队效力。

在城邦内部，战争的危险与苦难使原本就存在的派系斗争愈发激化。修昔底德、色诺芬、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都写道，内战司空见惯，随着各地民主派和寡头派之间血雨腥风地厮杀，内战的恐怖也逐渐变成家常便饭。战争一天天打下去，愤怒、挫折和复仇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导致战争暴行越来越普遍和严重，而在这场战争之前，类似的战争暴行是极其罕见的，甚至闻所未闻。

在漫长战争的压力下，就连强有力的家庭纽带和最神圣的宗教法规也破碎了。战争使人们去质疑传统的价值观（它们是古典希腊社会的基础），于是进一步分裂了社会。有些人的反应是拒绝一切信仰，主张一种怀疑论的、愤世嫉俗的理性，其他人则努力回到更古老、非理性的虔诚信仰上去。

雅典的战败对其他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前景来说是个打击。一种政治体制对外国人的影响与战争胜负有着紧密联系。强大而成功的雅典民主政体是磁石和榜样，吸引着其他城邦，甚至吸引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些城邦。雅典被斯巴达击败，被认为是雅典政治体制缺陷的证明。雅典的失败被视为民主制的错误；凡人皆有的错误和不幸，被评判为民主制造成的特别后果。前418年，斯巴达在曼丁尼亚战胜民主制联盟，是希

腊向寡头制而非民主制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但雅典的最终战败强化了这种趋势。

尽管战争似乎有了决定性结局，但其实并没有建立一种稳定的力量平衡，以来取代希波战争结束后的那种紧张不安的均势。战争没有创建一种新秩序，为一代人或几代人带来普遍和平。斯巴达对雅典的胜利只是让斯巴达的影响力暂时超过了它的一般实力。斯巴达人缺少人力、物质和政治资源去维持帝国，也没有力量长时间地控制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的事务。他们努力去这么做，却只能给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希腊的其他国家带来纷争和弱势。

说到底，前404年的解救方案既不是永久性摧毁雅典势力的“布匿式和平”，也不是旨在平息敌意的经谈判产生的和平。另外，雅典虽然暂时失败了，但它的真实力量和潜能超过它的表象，假以时日注定会重新崛起。雅典人在获得自由之后立刻开始计划恢复帝国基业、权力和荣耀，并反抗斯巴达对希腊各城邦的主宰。前404年的雅典被解除了武装，但并没有平息对斯巴达人的愤恨。如果要让雅典保持无武装状态，战胜国斯巴达就需要投入力量、决心、合作和团结一致，而事实上斯巴达并不具备这些素质。底比斯的野心已经膨胀起来，要求与主要大国平起平坐，后来还要求获得霸权。斯巴达主宰希腊的努力只能削弱它自己，很快就让希腊人丧失了主宰地位，被外来者控制：首先是受到波斯的干预，后来被马其顿征服。

有一位学者将我们所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称为“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大战”。这么想很有道理，也很有启发性，因为它就像1914～1918年的欧洲大战一样（比我们更早的那一代人只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将其称为“大战”），是一个悲剧性事件，是历史的重大转折，也是进步、繁荣、自信和希望的时代的终结，以及一个更黑暗时代的开始。

[1] 吕山德的结局：在战后，吕山德仍然很有影响力。前401年，阿基斯二世驾崩。吕山德帮助阿格西莱当上国王，史称阿格西莱二世。他推动斯巴达支持小居鲁士与其兄阿尔塔薛西斯二世争夺波斯王位（小居鲁士最终失败身死）。前396年，吕山德推动斯巴达攻击波斯。但阿格西莱二世开始怨恨和猜忌自己的前导师和好友。前395年，斯巴达与底比斯和其他一些城邦发生战争，史称科林斯战争。吕山德在攻击玻俄提亚时阵亡。他死后，阿格西莱二世“发现”吕山德生前曾觊觎王权。不过，这究竟是真的，还是阿格西莱二世的捏造，有很大争议。

资料来源

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主要史料是奥洛鲁斯之子修昔底德撰写的史书。他是雅典人，生于约前460年，可能一直活到约前397年。虽然他是贵族出身，却非常仰慕雅典民主派的领导人伯里克利。修昔底德于前424年当选为将军，这一年是克里昂和较激进的民主派掌权。修昔底德奉命指挥驻扎在色雷斯的安菲波利斯附近的舰队。安菲波利斯被斯巴达人占领之后，修昔底德被认为是责任人，遭到审判、定罪和流放，在战争的余下二十年里一直过着流亡生活。

修昔底德的著作很快赢得了世人的敬仰。两千多年来，他对细节的一丝不苟和客观公正赢得了人们最深切的尊重。他认为尽可能准确地记载事实，对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他的目标是理解和阐明人性的运作方式，尤其是在政治、国际关系和战争领域。但他的阐释和任何史学家（尤其是深深介入他所记载事件的史学家）的阐释一样，需要我们做一番认真的检查和评估。

有三份文献可以补充修昔底德的著作，其中两份是在战争期间写下的。《雅典政制》（*Athenaion Politeia* ）一般被归入色诺芬的作品之中，不过学者们现在认为这不可能是他写的。这部作品的写作时间可能是前5世纪20年代，它的不知名作者有时被称为“老寡头派”，尽管我们不知道他在写作此书时的年龄。他对寡头统治的同情是毋庸置疑的。这本小册子做了一番务实的分析，主张雅典民主制虽然不道德，但是有效。另一部《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创作于前4世纪末，作者是亚里士多德或其学派的某个人。这部作品简要叙述了从上

古到作者时代（约前330年）雅典政治的发展历程。它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阶段的记载特别重要，尤其是前411年的寡头派革命。1906年，在埃及的俄克喜林库斯[1]发现了一部写在纸莎草纸上的《希腊史》。它的大部分是对前396～前395年事件的叙述，水平很高，很有洞察力；此外，它也记述了战争末期底比斯人对阿提卡的破坏。这部书似乎是续写了修昔底德的著作，具有重大意义，可能是后世史学家，如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的史料来源。

修昔底德的叙述到前411年秋季就戛然而止了，这离战争结束还有大约六年半时间。古代作家认为他的著作是关于那个时期历史的权威，因此有三位史学家从他停止的时期开始，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续写下去。克里提普斯是一个生活在同时代的雅典人，他将希腊世界的历史写到了前394年。希俄斯岛的塞奥彭普斯生于约前378年，也写了一部类似的史书。但这两位的作品都没有保存至今，我们只能从后世史料片段化的引用中知道他们作品的存在。格律鲁斯之子色诺芬生于约前428年，是修昔底德的同时代人，不过比他年轻。色诺芬也写了一部《希腊史》，把希腊历史一直写到前362年。这部作品被保存至今。色诺芬是苏格拉底圈子中的一员，非常亲斯巴达，曾在强大的斯巴达国王阿格西莱二世麾下效力。他的作品虽然缺乏修昔底德的分析力，却是战争最后几年事件的主要记载。

两位晚近得多的作家提供了额外的信息，这些信息的可靠性和价值不一。西西里岛的狄奥多罗斯是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的同时代人，他在前1世纪，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约四个世纪，写了一部通史。他的著作的可靠性取决于他采用的史料。他参考了修昔底德的著作和其他一些现已遗失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似乎是库麦的埃福罗斯，他属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那一代人，可能与许多战争亲历者交谈过。另外，埃福罗斯似乎使用了俄克喜林库斯史书的一些段落（现已遗失），而后者的可靠性往往高于色诺芬。因此，我们必须重视

狄奥多罗斯的作品，尤其是对修昔底德著作中未涉及的那些年的历史记载。

最后是喀罗尼亚的普鲁塔克，他大约生活在公元50～120年，距离他所记述的那些事件更遥远。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不是历史著作，而是传记，其宗旨是从往昔伟人的生活中汲取教训。这让很多人否决其著述的可靠性，但我们如果这么做，就有很大风险。他拥有一座藏书极其丰富的图书馆，包括很多如今我们已经读不到的书籍。他引用和提及了前5世纪的一些喜剧诗人（其作品现已遗失）、修昔底德的同时代史学家“叙拉古的菲利斯托斯”和“莱斯博斯岛的赫拉尼库斯”的史书，以及续写修昔底德著作的埃福罗斯和塞奥彭普斯。普鲁塔克还引用了前5世纪的碑铭，描述了他亲眼看见的建筑、绘画和雕塑。下面这句话选自他的《尼基阿斯传》（1.5），能让我们领略一番能在他作品中找寻到的瑰宝：“修昔底德和菲利斯托斯记载的那些事迹……我对其做了简要概述，剔除了非必需的细节，以便逃避懒散粗心的指责；但那些被大多数作家遗漏的细节，以及其他一些作家漫不经心地提及的细节，或者那些出现在古代祭品或公共法令中的细节，我都努力收集起来，不是将无用的研究材料堆积起来，而是提供有助于读者理解人物性格与秉性的资料。”在努力达成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他为我们提供了珍贵而可靠的信息，我们绝不能忽视。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人们发现了一些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同时代的珍贵证据，主要是石刻碑铭。希腊碑铭研究在发现、复原和编辑重要史料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或许最重要的成就是，复原和阐释了雅典人从前454年到帝国覆灭期间对各附庸国征收年贡评估资料的铭文。由此产生的伟大作品*The Athenian Tribute Lists*（4 volumes，I，Cambridge，Mass.，II-IV，Princeton）于1939～1953年出版，作者是B. D. Meritt，H. T. Wade-Gery和M. F. McGregor。除此之外，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相关的碑铭被收集在这部著作中：*A Selection of Greek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by R. Meiggs and D. M. Lewis，revised edition，Oxford，1992）。许多铭文的英语译文以及一些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古代史料，载于Charles Fornara的*Archaic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second edition，Cambridge，1983）。

19世纪一些学者的研究大大增进了我们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理解，他们的开拓性作品仍然值得一读。其中最伟大的是学识渊博的George Grote，他是我们今天古希腊史学的奠基人。他的12卷本*History of Greece* （London，1846-1856）是一部仔细而深刻的研究巨著，为我们挑战一些固有观念提供了坚实基础。Grote的杰作发人深思，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回应，其中最优秀的回应包含在三位德国学者的多卷本史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也最有价值的是Georg Busolt的*Griechische Geschichte* （Gotha，1893-1904）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的第二部分。这部著作中涉及丰富而深刻的古代证据和现代研究成果，并力求客观、不偏不倚。另外两部著作是K. J. Beloch的*Griechische Geschichte* （第二版，四卷八部，Leipzig，1912-1927）；Eduard Meyer，*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fifth edition，4 volumes，reprinted in 1954 and 1956 in Basel）。这两部作品均于19世纪首次出版。

在20世纪时也出现了一些重要文献。其中最有帮助的或许是*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由A. W. Gomme，A. Andrewes和K. J. Dover先后共同完成（Oxford，1950-1981）。R. Meiggs的 *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1972）和G.E.M. de Ste. Croix的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Oxford，1972）也很有价值。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研究和相关文献汗牛充栋，其中大部分都列举在我的四卷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9-1987）每一卷结尾的参考文献中。

---

[1] 古埃及城市，位于开罗西南约160公里，是重要的考古遗址。20世纪，

俄克喜林库斯地区被不断发掘，因而发现大量纸莎草纸的古文书。这些出土文书，可以被追溯至托勒密和古罗马时期的埃及，其中包括米南德的剧作和早期基督教文书《多马福音》的经文碎片。

大事年表

一 战前

前6世纪：斯巴达建立伯罗奔尼撒联盟

前511～前510年：雅典人驱逐庇西特拉图僭主家族

前508年：克里斯提尼为雅典立法，建立民主制

约前495年：伯里克利出生

前492～前490年：波斯（大流士一世在位）第一次入侵希腊

前490年：马拉松战役，雅典和普拉蒂亚人击败波斯军队

约前484年：希罗多德出生

前480～前479年：波斯（薛西斯一世在位）第二次入侵希腊

前475年：斯巴达国内有人提议发动战争，消灭雅典的新同盟，被驳回

约前470年：尼基阿斯出生

前465年：雅典人攻打萨索斯岛，斯巴达人企图援助萨索斯，由于地震，未果；斯巴达发生地震和黑劳士起义

约前460年：修昔底德出生

前460～前445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结束后签订《三十年和约》，斯巴达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被放逐

约前450年：亚西比德出生

前440年：萨摩斯岛反叛雅典

前436年：埃比达姆诺斯爆发内战

前433年：雅典出兵支持克基拉；9月，西波塔战役，雅典与克基拉击败科林斯舰队

前432年：雅典对墨伽拉实施禁运

二 阿希达穆斯战争（十年战争，前**431**～前**421**年）

前431年3月：底比斯攻打普拉蒂亚，战争爆发；阿希达穆斯二世率军入侵阿提卡；雅典人扫荡敌境

前430年：雅典暴发瘟疫；雅典向斯巴达求和失败；伯里克利被免职

前429年：雅典攻陷波提狄亚；伯里克利恢复职位，去世；雅典海军将领弗尔米奥在纳夫帕克托斯两次大败斯巴达海军

前427年：雅典瘟疫消退；雅典镇压叛乱的米蒂利尼城，放弃对其市民进行报复；普拉蒂亚被斯巴达占领；克基拉发生内战，民主派战胜寡头派；雅典第一次远征西西里岛

前426年：阿希达穆斯二世驾崩，阿基斯二世登基；雅典将军德摩斯梯尼在埃托利亚战败；德摩斯梯尼击败斯巴达将军麦涅代乌斯

前425年：德摩斯梯尼在皮洛斯建立要塞；斯巴达受困于斯法克特里亚岛；克里昂俘获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斯巴达人

前424年：雅典人占领基西拉岛；雅典人受挫，退出西西里岛；雅典人进攻墨伽拉失败；德里昂战役，雅典人被玻俄提亚人击败；斯巴达将领伯拉西达进攻色雷斯，煽动当地城邦反叛雅典；伯拉西达占领安菲波利斯；修昔底德被免职

前423年：停战；尼基阿斯远征色雷斯

前422年：安菲波利斯战役，克里昂阵亡，伯拉西达阵亡，雅典人失败

前421年：签订《尼基阿斯和约》

三 战争间歇（前**421**～前**414**年）

前421年：雅典与斯巴达结盟；阿尔戈斯联盟建立

前420年：亚西比德当选将军；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斯巴达遭到厄利斯的羞辱

前419年：亚西比德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作战

前418年：阿基斯二世攻击阿尔戈斯；曼丁尼亚战役，阿尔戈斯战败；寡头派在阿尔戈斯上台

前417年：阿尔戈斯恢复民主制

前416年：希帕波鲁斯遭到陶片放逐；塞杰斯塔与塞利农特交战

前415年：雅典出兵支援塞杰斯塔，发动第二次西西里远征；渎神

丑闻；亚西比德逃亡；尼基阿斯进攻叙拉古城，小胜，未取得决定性胜利

四 战争第二阶段（前**414**～前**404**年）

前414年：雅典袭击拉科尼亚，撕毁《尼基阿斯和约》；雅典人攻打叙拉古城；拉马库斯阵亡；斯巴达将领古利普斯援救叙拉古；尼基阿斯多次战败

前413年：斯巴达人在狄凯里亚建立要塞，威胁雅典本土；雅典人向西西里增派部队；普利姆米利昂陷落；德摩斯梯尼两次进攻爱皮波莱高地，失败；月食；在西西里岛的雅典人撤退，遭全歼；尼基阿斯和德摩斯梯尼被俘，被处死

前412年：雅典选举“贤哲”，以应对危机；斯巴达人与波斯人开始合作；爱琴海战火燃起

前411年：亚西比德投奔波斯人；罗德岛反叛雅典；雅典发生革命，寡头派上台；“四百人”掌权；萨摩斯岛的雅典舰队成为民主派基地；亚西比德回归雅典阵营；“五千人”取代“四百人”，在雅典掌权；基诺塞马战役，色拉西布洛斯击败明达鲁斯；阿卑多斯战役，色拉西布洛斯和斯拉苏卢斯击败明达鲁斯；库济库斯战役，色拉西布洛斯、塞拉门尼斯和亚西比德击败明达鲁斯

前410年：斯巴达向雅典求和，被拒绝；雅典恢复民主制；雅典与波斯谈判，失败；亚西比德归国

前408年：小居鲁士王子介入战争

前407年：吕山德就任斯巴达海军司令

前406年：诺提昂战役，吕山德击败安条克斯；亚西比德垮台；阿吉纽西战役，雅典八位将军击败卡利克拉提达斯；八位将军倒台

前405年：斯巴达再次提议和平，未果；吕山德再次执掌斯巴达海军军权；阿哥斯波塔米战役，雅典大败

前404年：塞拉门尼斯代表雅典与斯巴达议和，雅典有条件投降，战争结束；斯巴达在雅典建立“三十僭主”傀儡政权；亚西比德遇刺

五 战后

前403年：色拉西布洛斯推翻“三十僭主”，恢复民主制

前401年：阿基斯二世驾崩，阿格西莱二世即位

前395～前387年：科林斯战争，底比斯、雅典、科林斯和阿尔戈斯四国在波斯的支持下对抗斯巴达，各有胜负，波斯影响力增强

前395年：吕山德阵亡

前371年：留克特拉战役，底比斯将军伊巴密浓达击败斯巴达军队，结束斯巴达霸权

前362年：曼丁尼亚战役，底比斯获胜，但损失惨重，且伊巴密浓达阵亡，底比斯霸权结束

前338年：喀罗尼亚战役，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击败雅典与底比斯的联军，建立马其顿在希腊的霸权

译名对照表

Abdera阿布德拉

Abydos阿卑多斯

Acanthus阿堪苏斯

Acarnania阿卡纳尼亚

Achaea阿开亚

Acharnae阿卡奈

Acharnians （Aristophanes）《阿卡奈人》（阿里斯托芬）

Acragas阿克拉加斯

Acropolis卫城

Acte peninsula阿克特半岛

Adeimantus阿迪曼图斯

Aegean Sea爱琴海

Aegina埃吉那岛

Aegitium埃吉提昂

Aegospotami阿哥斯波塔米

Aeolidas埃奥里达斯

Aeschylus埃斯库罗斯

Aetolia埃托利亚

Agariste阿佳丽斯特

Agatharcus阿伽萨库斯

Agesandridas阿吉山德里达斯

Agesilaus阿格西莱

Agis，king of Sparta阿基斯二世国王

Alcamenes阿尔卡美涅斯

Alcibiades亚西比德

Alcibiades（son of Phegus）亚西比德（菲格斯之子）

Alcidas阿尔基达斯

Alciphron阿尔基弗隆

Alcmeonides阿尔克麦奥尼德斯

Alesion，Mount阿雷西昂山

Alexander Ⅲ（the Great），king of Macedonia亚历山大三世（大帝），马其顿国王

Alexicles亚利西克利斯

Ambracia安布拉基亚

Amorges阿摩基斯

Amphilochia安菲洛奇亚

Amphipolis安菲波利斯

Anactorium阿纳克托里翁

Anaea阿纳伊亚

Anapus阿纳普斯河

Anatolia安纳托利亚

Anaxagoras阿那克萨哥拉

Andocides安多吉德斯

Androcles安德罗克利斯

Andros安德罗斯岛

Antandrus安坦德鲁斯

Antiochus安条克斯

Antiphanes安提法奈斯

Antiphon安提丰

Antissa安提萨

Antisthenes安提西尼

Aracus阿拉库斯

Arcadia阿卡狄亚

Archelaus，king of Macedonia阿基劳斯，马其顿国王

Archeptolemus阿耳刻普托勒摩斯

Archesilaus阿开西劳斯

Archestratus阿切斯特亚图

Archidamus，king of Sparta阿希达穆斯二世，斯巴达国王

Argilus阿吉鲁斯

Arginusae阿吉纽西群岛

Argive League阿尔戈斯联盟

Argos阿尔戈斯

Ariphron阿里弗隆

Aristarchus阿里斯塔库斯

Aristeus阿里斯特乌斯

Aristocles阿里斯托克里斯

Aristocrates里斯托克拉特斯

Ariston阿里斯同

Aristophanes阿里斯托芬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

Arrhabaeus，king of the Lyncestians阿拉巴尤斯，林凯斯提斯人的国王

Arsaces阿萨息斯

Artaxerxes I，Great King of Persia阿尔塔薛西斯一世，波斯国王

Artaxerxes II，Great King of Persia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波斯国王

Asclepius，cult of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

Asia Minor小亚细亚

Asopius阿索皮乌斯

Aspasia阿斯帕齐娅

Aspendus阿斯蓬都斯

assembly，Athenian雅典公民大会

Astacus阿斯塔库斯

Astyochus阿斯泰奥库斯

Atalante阿塔兰塔岛

Athenagoras雅典那哥拉

Attica阿提卡

Aulis奥利斯

Autocles阿乌托克利斯

Axiochus阿克西库斯

Belmina贝尔米纳

Birds （Aristophanes）《鸟》（阿里斯托芬）

Boeotia玻俄提亚

Bosporus博斯普鲁斯海峡

Brasidas伯拉西达

Byzantium拜占庭

Callicratidas卡利克拉提达斯

Callixeinus卡里克塞诺斯

Camarina卡马里纳

Camirus卡米鲁斯

Cannonus，decree of《坎嫩诺斯法令》

Cappadocia卡帕多细亚

Cardia卡狄亚

Caria卡里亚

Carthage迦太基

Carystus卡利斯图

Catana卡塔那

Caunus考努斯

Cephallenia凯法利尼亚岛

Cerameicus凯拉米克斯

Cerdylium科德里昂

Chaereas凯利亚斯

Chaeronea喀罗尼亚

Chalce哈尔基岛

Chalcedon迦克墩

Chalcideus卡尔基丢斯

Chalcidice哈尔基季基

Chalcis哈尔基斯

Chamberlain，Neville内维尔·张伯伦

Chaonians考尼亚人

Charicles卡里克利斯

Charminus卡尔米努斯

Charoeades卡罗阿德斯

Chios希俄斯岛

Chromon克洛蒙

Chrysopolis克里索波利斯

Cimon客蒙

Clazomenae克拉左门奈

Cleandridas克里安德里达斯

Clearchus克里阿库斯

Clearidas克里阿利达斯

Cleinias克雷尼亚斯

Cleisthenes克里斯提尼

Cleobulus克里奥布鲁斯

Cleomedes克里奥米德斯

Cleomenes克里昂米尼

Cleon克里昂

Cleonae克里奥奈

Cleonymus克利奥尼穆斯

Cleophon克里奥丰

Cleopompus克里奥滂浦斯

Cnemus克涅姆斯

Cnidus克尼多斯

Colonus Hippius克罗诺斯西比乌斯

Colophon科洛封

Comon科门

Conon科农

Corcyra克基拉岛

Corinth科林斯

Coronea喀罗尼亚

Cratesippidas克拉特西皮达斯

Crete克里特岛

Crommyon克隆米昂

Cydonia基多尼亚

Cyllene基伦尼

Cyme库麦

Cynossema基诺塞马

Cynuria基努利亚

Cyrus小居鲁士

Cythera基西拉

Cyzicus库济库斯

Decelea狄凯里亚

Delian League提洛同盟

Delium德里昂

Delos提洛岛

Delphinium德尔菲尼昂

Democritus德谟克利特

Demosthenes德摩斯梯尼

Demostratus德摩斯特拉图斯

Dercylidas德尔库利达斯

Dieitrephes狄爱特雷菲斯

Diocleides迪奥克雷戴斯

Diodorus狄奥多罗斯

Diodotus狄奥多图斯

Diomedon狄奥墨冬

Diphilus狄菲卢斯

Dorians多利亚人

Dorieus多利尤斯

Draco德拉古

Eccritus爱克里图斯

Eetioneia爱提奥尼亚

Egypt埃及

Eion爱昂

Eleusis厄琉息斯

Elis厄利斯

Endius恩狄乌斯

Enyalius恩亚琉斯

Epaminondas伊巴密浓达

Ephesus以弗所

Ephors斯巴达监察官

Epidamnus埃比达姆诺斯

Epidaurus埃皮达鲁斯

Epilycus爱皮利库斯

Epipolae plateau爱皮波莱高地

Epirus伊庇鲁斯

Epitadas爱皮塔达斯

Erasinides爱拉辛尼德斯

Erechtheum厄瑞克忒翁神庙

Erechtheus （Euripides）《埃里克修斯》（欧里庇得斯）

Eresus爱里苏斯

Eretria埃雷特里亚

Erianthus阿里安索斯

Eristratus埃拉西斯特拉图斯

Erythrae爱利特莱

Eteonicus爱特奥尼库斯

Etruria伊特鲁里亚

Euboea优卑亚

Eucles攸克利斯

Eucrates攸克拉底斯

Euphemus欧菲姆斯

Euphilitus欧菲列图斯

Euripides欧里庇得斯

Euryalus欧里耶鲁斯

Eurymachus欧律马科斯

Eurymedon欧律墨冬

Euryptolemus欧里普托勒摩斯

Euthydemus欧西德莫斯

First Peloponnesian War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

Five Hundred，council of五百人议事会

Five Thousand，council of五千人议事会

Four Hundred，council of四百人议事会

Galepsus加利普苏斯

Garipadasi加里普岛

Gela杰拉

gerousia，Spartan斯巴达元老院

Gongylus冈吉鲁斯

Gylippus古利普斯

Gytheum基赛阿姆

Haerae海莱

Hagnon哈格农

Halieis哈雷斯

Hekatonnesi Islands赫卡托奈西群岛

Helixus希里克苏斯

Hellespont赫勒斯滂海峡

Helots黑劳士

Liberated Helots（neodamodeis）解放黑劳士

Heraclea赫拉克利亚

Heracleum赫拉克勒斯圣所

Heraea赫赖亚节

Hermione赫尔米奥尼

Hermippus赫尔米普斯

Hermocrates赫莫克拉提斯

Hermon of Megara墨伽拉的赫尔蒙

Herodotus希罗多德

Hestiodorus赫斯提奥多鲁斯

Hetairiai（political clubs）政治俱乐部

Himera希麦拉

Hippocrates（general）希波克拉底

（将军）

Hippocrates（governor of Chalcedon）希波克拉底（迦克墩总督）

Hippocrates（Spartan secretary）希波克拉底（斯巴达秘书）

Hipponicus希波尼库斯

Hipponoidas希波诺伊达斯

Homer荷马

Hoplite重步兵

Hyccara海卡拉

Hyperbolus希帕波鲁斯

hypomeiones class低等人

Hysiae海西亚

Ialysus伊阿里苏斯

Iasus伊阿苏斯

Iberia伊比利亚

Idomene伊多门涅

Illyria伊利里亚

Ionia伊奥尼亚

Ischagoras伊斯卡哥拉斯

Isthmian Games地峡运动会

Istome，Mount伊斯通山

Italy意大利

Kapnistra卡普尼斯特拉山

Kelussa，Mount科路撒山

Labdalum拉布达隆

Lacedaemonius拉刻代蒙尼厄斯

Laches拉齐斯

Laconia拉科尼亚

Lamachus拉马库斯

Lampsacus兰普萨库斯

Laurium劳里昂

Lebedus列别多斯

Leon列昂

Leontini伦蒂尼

Lepreum列普里昂

Lesbos莱斯博斯岛

Leucas琉卡斯

Leucimne琉基姆尼

Leuctra留克特拉

Lichas利卡斯

Lindus林都斯

Liparian Islands利帕拉群岛

Locris洛克里斯

Lycus吕库斯

Lydia吕底亚

Lyncestians林凯斯提斯人

Lysander吕山德

Lysicles吕西克利斯

Macarius马卡里乌斯

Macedonia马其顿

Maenalia麦那里亚

Mantinea曼丁尼亚

Marathon，battle of马拉松战役

Marmara Sea马尔马拉海

Megara墨伽拉

Megara Hyblaea墨伽拉希布利亚

Melanchridas麦兰克利达斯

Meletus梅列图斯

Melos米洛斯

Menander米南德

Mende门德

Menedaius麦涅代乌斯

Messenia美塞尼亚

Messina墨西拿

Methana迈萨纳

Methone墨托涅

Methydrium麦塞德里昂

Methymna米西姆纳

Metropolis麦特罗波利斯

Miletus米利都

Mindarus明达鲁斯

Minoa米诺亚

Monte Climiti克里米迪山

mothakes class莫萨克斯阶层

Mycale米卡列

Mycalessus米卡列苏斯

Mycenae迈锡尼

Myrcinus米金努斯

Mytikas米提卡斯山

Mytilene米蒂利尼

Nauclides诺克里底

Naupactus纳夫帕克托斯

Naxos纳克索斯岛

Neapolis尼阿波利斯

Nemea涅米亚

Nepos，Cornelius科尔内利乌斯·尼波斯

Niceratus尼基拉图斯

Nicias尼基阿斯

Nicostratus尼科斯特拉图斯

Nisaea尼萨亚

Notium诺提昂

Nymphodorus尼姆佛多鲁斯

Oenoe欧伊诺耶

Oesyme奥西米

Oeta奥塔

“Old Oligarch，The”“老寡头派”

Olorus奥洛鲁斯

Olpae奥尔匹

Olympic Games奥林匹克运动会

Olympieum宙斯神庙

Olynthus奥林瑟斯

Onomacles奥诺麦克利斯

Orchomenus奥尔霍迈诺斯

Orneae奥尼伊

Oropus奥罗浦斯

Paches帕基斯

Pagondas帕冈达斯

Panactum帕那克敦

Panhellenism泛希腊主义

Paralus“帕拉鲁斯”号

Parrasia帕拉西亚

Parysatis帕丽萨提斯

Pasitelidas帕西特里达斯

Patrae帕特雷

Pausanias，king of Sparta保萨尼亚斯，斯巴达国王

Peace （Aristophanes）《和平》（阿里斯托芬）

Pedaritus佩达里图斯

Pegae佩加

Peisander派桑德

Peisianax培西阿纳克斯

Peithias培西亚斯

Pellene培林尼

Perdiccas，king of Macedon柏第卡斯二世，马其顿国王

Persian Empire波斯帝国

Phaeax腓亚克斯

Phanomachus法诺马库斯

Pharax法拉克斯

Pharnabazus法那巴佐斯

Phegus菲格斯

Philip II，king of Macedon腓力二世，马其顿国王

Philistus菲利斯托斯

Philocharidas腓洛卡里达斯

Philochorus斐洛考鲁斯

Philocles菲劳克里斯

Phlius弗利奥斯

Phocaea弗凯亚

Phocis福基斯

Phormio弗尔米奥

Phrygia弗里吉亚

Phrynichus普律尼科司

Pindar品达

Piraeus比雷埃夫斯

Pissuthnes皮苏特尼斯

Plataea普拉蒂亚

Plato柏拉图

Pleistonax，king of Sparta普雷斯托阿纳克斯，斯巴达国王

Plemmyrium普利姆米利昂

Plutarch普鲁塔克

Plynteria ceremony普林特里亚仪式

Pnyx普尼克斯山

Polles，king of the Odomantian波列斯，奥多曼提人国王

Polyanthes波利安提斯

Polydamidas波利达米达斯

Polystratus波利斯特拉

Potidaea波提狄亚

Prasiae普拉西埃

Priene普里埃内

probouloi贤哲

Procles普罗克利斯

Proconnesus普洛孔涅索斯岛

Propontis普洛庞提斯海

Protagoras毕达哥拉斯

Pteleum普特里昂

Pulytion普利提翁

Pydna皮德纳

Pylos皮洛斯

Pythen皮森

Pythodorus皮索多鲁斯

Pythonicus皮索尼克斯

Ramphias兰斐亚斯

Rhegium瑞吉昂

Rheneia里尼亚岛

Rhium瑞昂

Rhodes罗德岛

Sadocus萨多库斯

Salaethus萨莱苏斯

Salaminia“萨拉明尼亚”号

Salaminioi，clan of萨拉米斯氏族

Salamis萨拉米斯

Saminthus萨明苏斯

Samos萨摩斯岛

Sarandapotamos（stream）萨兰达波塔莫斯（溪流）

Sardis萨第斯

Scandeia斯坎代亚

Scelias斯基利里斯

Scione斯基奥涅

Scironides斯基罗尼德斯

Sciritae斯基里提人

Segesta塞杰斯塔

Selinus塞利农特

Sellasia塞拉西亚

Selymbria塞利姆布里亚

Sestos塞斯托斯

Sicanus西坎努斯

Sicyon西锡安

Siphae西弗艾

Sitalces，king of Thrace西塔尔克斯，色雷斯国王

Socrates苏格拉底

Sollium索利安姆

Solon梭伦

Solygeia索利吉亚村

Sophocles索福克勒斯

Sphacteria斯法克特里亚岛

Spiraeum斯皮赖昂港

Stagirus斯塔吉鲁斯镇

Sthenelaidas斯提尼拉伊达

Stolus斯托鲁斯

Stratus斯特拉图斯

Strombichides斯特罗姆比基德斯

Sunium苏尼昂

Susa苏萨

Sybota西波塔

Syngrapheis三十人委员会

Syracuse叙拉古

Tanagra塔那格拉

Taras塔拉斯

Taulantians道兰底人

Tegea泰吉亚

Ten Generals of Athens雅典十将军

Tenos蒂诺斯岛

Teos泰奥斯

Teucrus泰乌克鲁斯

Teutiaplus泰乌提阿普鲁斯

Thasos萨索斯岛

Thebes底比斯

Theodorus西奥多罗斯

Theognis泰奥格尼斯

Theramenes塞拉门尼斯

Therimenes泰里蒙涅斯

Thespis泰斯皮亚

Thessalus帖撒鲁斯

Thessaly色萨利

Thirty Tyrants三十僭主

Thorax瑟莱库斯

Thrace色雷斯

Thraso特拉索

Thrasybulus（son of Lycus）色拉西布洛斯（吕库斯之子）

Thrasybulus（son of Thraso）色拉西布洛斯（特拉索之子）

Thrasyllus斯拉苏卢斯

Thrasymelidas特拉西米里达斯

Thronium特罗尼昂镇

Thucles苏克利斯

Thucydides修昔底德

Thurii图里

Thymochares泰摩卡里斯

Thyrea泰里亚

Thyssus泰苏斯城

Timolaus提莫劳斯

Tisias提西亚斯

Tissaphernes提萨弗涅斯

Torone托伦涅

Trachis特拉启斯

Tretus Pass特雷图斯隘道

Troezen特洛伊曾

Ukraine乌克兰

Vienna，Congress of维也纳和会

Westphalia，Peace of《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Xanthippus科桑西普斯

Xenares森纳里斯

Xenophanes色诺芬尼

Xenophon色诺芬

Xerxes薛西斯

xymbouloi（advisers）顾问

Zacynthus扎金苏斯岛

Zanovistas（stream）扎诺维斯塔斯（溪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伯罗奔尼撒战争/（美）卡根（Kagan，D.）著；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097-7754-1

Ⅰ.①伯… Ⅱ.①卡…②陆… Ⅲ.①伯罗奔尼撒战争 Ⅳ.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2815号

伯罗奔尼撒战争

著者/〔美〕唐纳德·卡根

译者/陆大鹏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周方茹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9.25 字数：430千字

版次/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754-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5-1551号

定价/7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宋　涛

目前为止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佳叙述。

——《**洛杉矶时报书评**》

一部新鲜、明晰而快节奏的叙述史。

——《**纽约时报书评**》

卡根称，他的目标既是提供知识上的愉悦，也是提供智慧源泉。很多人通过研究这场战争来追寻智慧。他的两个目标都圆满达成了，成果显著……但本书的终极价值在于，卡根为这场战争（它结束了古典希腊的光荣）带来了深刻而权威的评判。

——《**出版商周刊**》

最终，他以详尽的细节证实了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的描述：战争“是一个凶暴的教师，让大多数人的品格都堕落到当前的这种状态”。权威的历史学表明，虽然武器装备增多了，但领导人和社会在战时的反应并没有发生很多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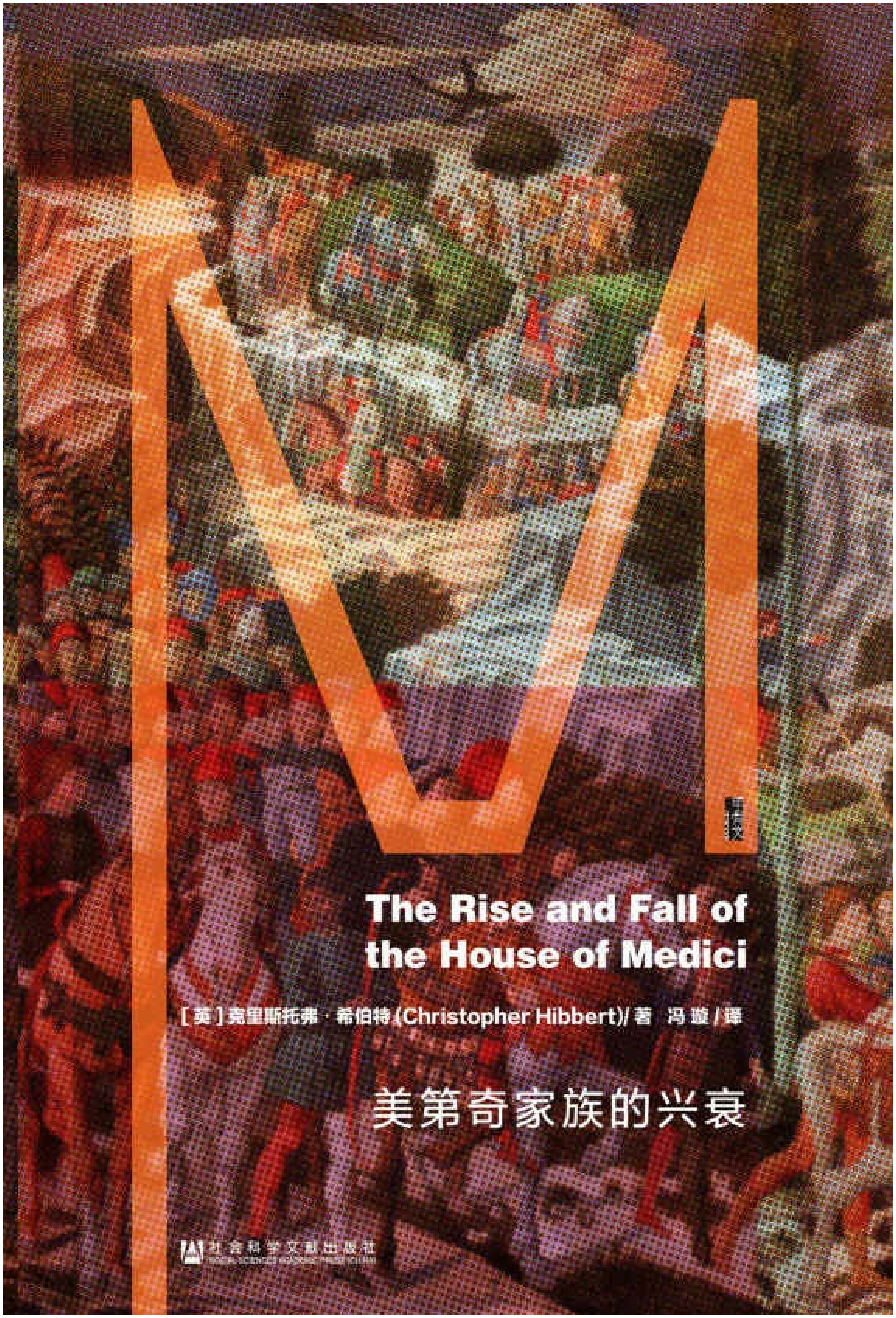
——《**科克斯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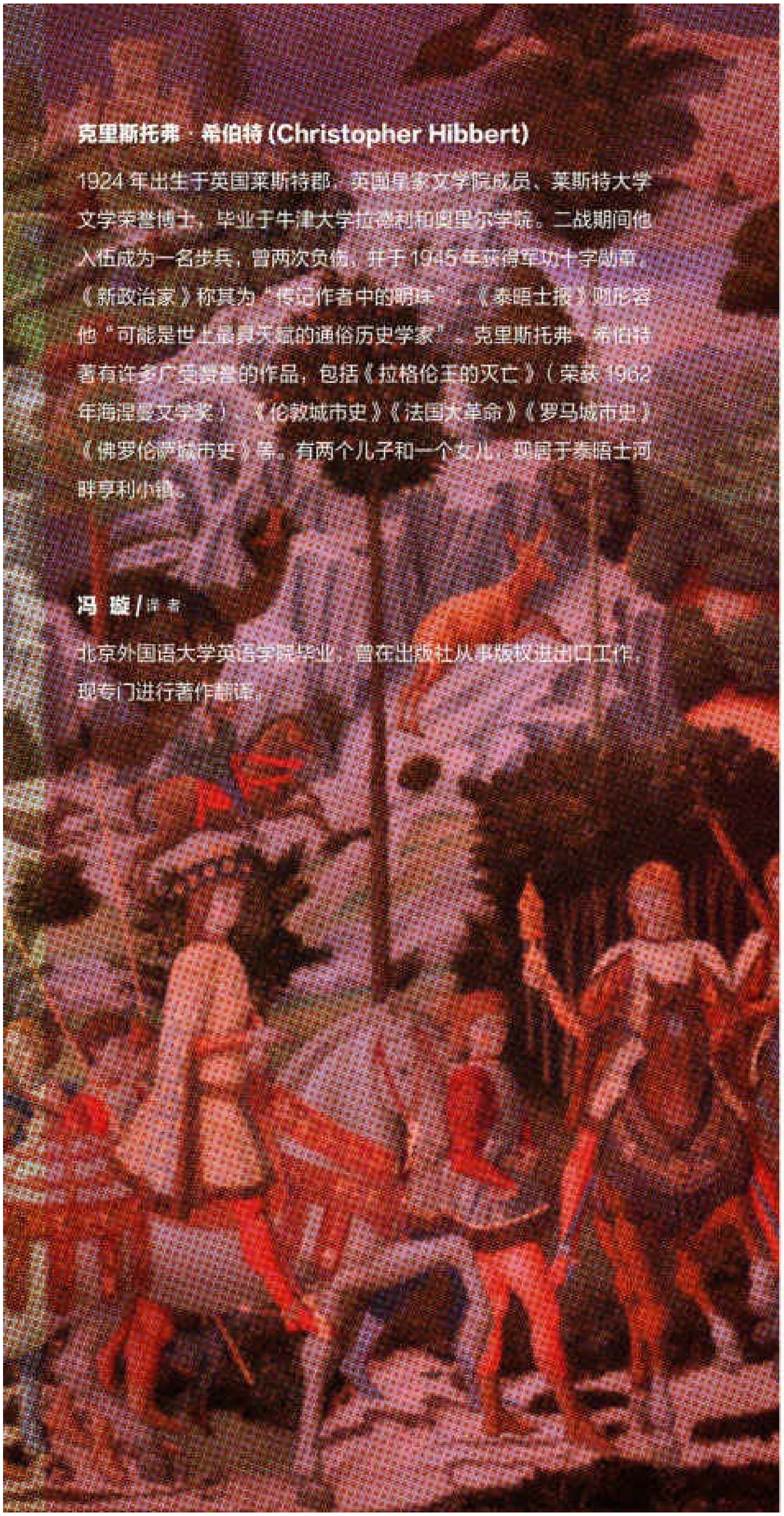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97-7754-1

9 787509 777541 >

甲骨文官方微信

定价：79.00 元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ouse of Medici
[英]克里斯托弗·希伯特(Christopher Hibbert)/著 冯璇/译
美第奇家族的兴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克里斯托弗·希伯特（Christopher Hibbert）

1924 年出生于英国莱斯特郡，英国皇家文学院成员、莱斯特大学文学荣誉博士，毕业于牛津大学拉德利和奥里尔学院。二战期间他入伍成为一名步兵，曾两次负伤，并于 1945 年获得军功十字勋章。《新政治家》称其为“传记作者中的明珠”，《泰晤士报》则形容他“可能是世上最具天赋的通俗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伯特著有许多广受赞誉的作品，包括《拉格伦王的灭亡》（荣获 1962 年海涅曼文学奖）、《伦敦城市史》《法国大革命》《罗马城市史》《佛罗伦萨城市史》等。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现居于泰晤士河畔亨利小镇。

冯　璇／译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毕业，曾在出版社从事版权进出口工作，现专门进行著作翻译。

美第奇家族的兴衰

〔英〕克里斯托弗·希伯特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录

- 作者自序
- 地图
- 第一部分 1400
    - 第一章 佛罗伦萨和佛罗伦萨人
    - 第二章 美第奇家族的兴起
    - 第三章 阿尔比奇家族的敌人
    - 第四章 被流放者与国家的主人
    - 第五章 大主教们与建筑师们
    - 第六章 战争与和平
    - 第七章 艺术家与哀悼者
- 第二部分 1464～1492
    - 第八章 痛风病人皮耶罗
    - 第九章 年轻的洛伦佐
    - 第十章 教皇与帕奇家族
    - 第十一章 佛罗伦萨的救世主
    - 第十二章 意大利指南针上的指针
    - 第十三章 洛伦佐：资助者、收藏家和诗人
- 第三部分 1492～1537
    - 第十四章 皮耶罗·迪·洛伦佐·德·美第奇和费拉拉的修道士
    - 第十五章 驱逐令
    - 第十六章 美第奇的回归
    - 第十七章 教皇莱昂内！
    - 第十八章 向罗马进军
    - 第十九章 围困与谋杀
- 第四部分 1537～1743
    - 第二十章 公爵科西莫一世
    - 第二十一章 科西莫的继承人
    - 第二十二章 费尔迪南多二世和法国公主

    - 第二十三章 科西莫三世和王子费尔迪南多
    - 第二十四章 最后一个美第奇
- 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主要画像、半身像和雕塑
- 参考文献
- 美第奇家族成员图谱
- 索引

作者自序

尽管描写美第奇家族及其所处时代的作品很多，但直到1909年G.F.杨上校的两卷本著作出版，我们才有了第一部全面描写整个美第奇家族的英文著作。该书从十四世纪美第奇银行在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的领导下崛起写起，直到1737年美第奇家族的最后一位托斯卡纳大公吉安·加斯托内去世为止。基于当代研究的成果，本书意在对这一课题做出进一步研究并为杨上校的著作——被费迪南德·谢维尔评价为“一个多愁善感的作者凌驾于历史上的主观离题”——提供一个可靠的补充。

本书涉及的范围极广，我不敢在这些领域中妄称专家，但是我参考了许多作家和学者的著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我的写作帮助极大。在此我想特别感谢哈罗德·阿克顿爵士、伊夫·博苏克女士、埃里克·科克伦教授、文森特·克罗宁先生、J.R.黑尔教授、乔治·霍姆斯博士、劳罗·马丁内斯教授、艾里斯·奥里戈侯爵夫人、里多尔菲侯爵、雷蒙德·德鲁弗教授、尼古拉·鲁宾斯坦教授和费迪南德·谢维尔先生。我尤其感激利兹大学意大利语系的布赖恩·莫洛尼博士和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的乔治·霍姆斯博士为本书进行审校并提出不少宝贵的改进意见。法比奥·纳尔迪先生就本书中关于托斯卡纳地区地形及建筑方面内容提供的参考也给我带来了很大帮助。我在佛罗伦萨工作期间，法比奥·纳尔迪先生和帕特里齐娅·纳尔迪夫人以及国立中央图书馆和佛罗伦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为我提供了很多便利。

在此我还要感谢罗伯托·布鲁尼博士、毛瑞斯·希尔夫人、杰拉尔丁·诺曼夫人、弗朗切斯科·帕帕法瓦伯爵、约翰雷夫人、琼·圣乔治·桑德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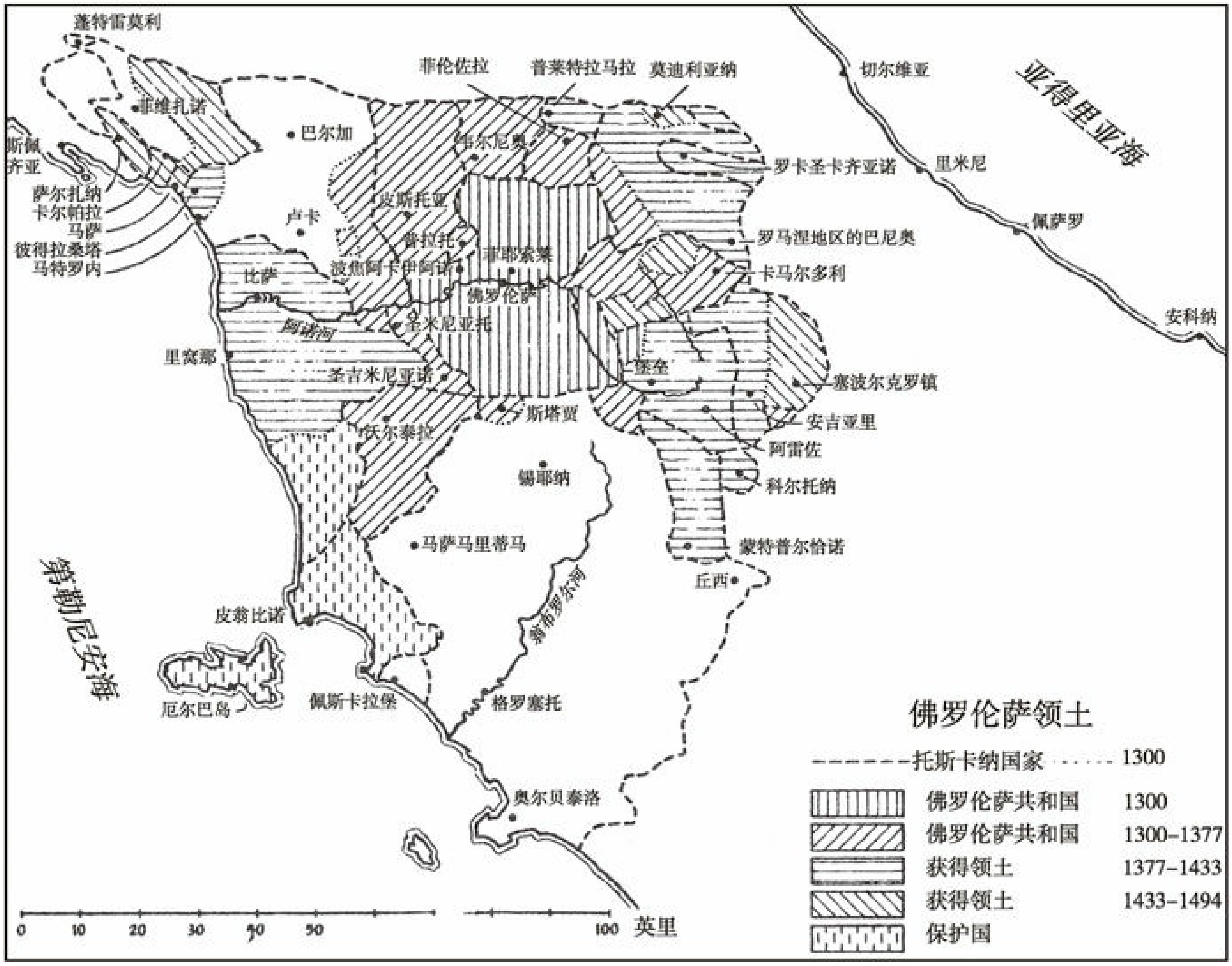
夫人、米博·斯塔尼兰先生，以及不列颠博物馆、伦敦图书馆和牛津博德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最后我想要再一次感谢我的朋友哈米什·弗朗西斯和乔治·沃克审校此书。感谢我的妻子编制本书索引。

地图



约1490年时的意大利地图



佛罗伦萨领土
托斯卡纳国家 1300
佛罗伦萨共和国 1300
佛罗伦萨共和国 1300–1377
获得领土 1377–1433
获得领土 1433–1494
保护国
蓬特雷莫利
菲维扎诺
巴尔加
斯佩齐亚
萨尔扎纳
卡尔帕拉
马萨
彼得拉桑塔
马特罗内
卢卡
比萨
阿诺河
里窝那
圣吉米尼亚诺
沃尔泰拉
皮翁比诺
厄尔巴岛
佩斯卡拉堡
第勒尼安海
菲伦佐拉
音莱特拉马拉
莫迪利亚纳
韦尔尼奥
皮斯托亚
普拉托
波焦阿卡伊阿诺
菲耶索莱
佛罗伦萨
圣米尼亚托
斯塔贾
锡耶纳
马萨马里蒂马
翁布罗尔河
格罗塞托
奥尔贝泰洛
罗卡圣卡齐亚诺
罗马涅地区的巴尼奥
卡马尔多利
堡垒
塞波尔克罗镇
安吉亚里
阿雷佐
科尔托纳
蒙特普尔恰诺
丘西
切尔维亚
里米尼
佩萨罗
安科纳
亚得里亚海
0 10 20 30 40 50 100 英里

第一部分 **1400**

第一章 佛罗伦萨和佛罗伦萨人

“不经商的佛罗伦萨人……无论如何也抬不起头”

1433年9月的一个清晨，一个长着鹰钩鼻、面色灰白的清瘦男人走上了通往佛罗伦萨市政厅（Palazzo della Signoria）的台阶。[1] 这个人就是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edici），据说是世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科西莫走进大门，一个官员让他在院子里等候，说会议室里的会议一结束就带他进去。几分钟后，侍卫队长让科西莫跟随自己上楼，但他们走的楼梯并不通向会议室，而是通向钟楼上一间狭小的牢房。科西莫就这样被关进了这间被戏称为“小旅馆”（Alberghettino）的牢房里。据科西莫后来回忆，他就是透过牢房里仅有的一个窄小的窗户缝隙俯瞰整个城市的。

当时的佛罗伦萨城里有广场和高塔；有曲折、狭窄的繁忙街道；有用巨石垒墙、阳台突出的碉堡模样的宫殿；有古旧的教堂，外墙上画着黑色、白色、绿色和粉色的几何图形；还有修道院、女修道院、医院和拥挤的住宅区。城市的四周有用砖块和石头建造的带雉堞的高耸城墙，城墙之外围绕着村庄，村庄之外则是有绿树覆盖的山峦。佛罗伦萨城墙之内的人口超过5万，虽不及巴黎、那不勒斯、威尼斯和米兰，但是足以超越包括伦敦在内的其他欧洲城市。况且这里的人口统计也没那么精确，甚至是非常随意的，记录新生儿数量的方法是往罐子里放豆子，一个男孩儿出生就放一粒黑豆，一个女孩儿出生就放一粒白豆。

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整个城市被分为4个大区（quartieri），每个大区又被分为4个小区，每个小区依其纹饰徽章命名。4个大区各具特色，取决于该区主要进行的商业活动和居住在该区的富人家的宫殿。富人家的孩子，还有他们的仆人、家臣和侍卫经常在这些有柱廊的室外敞廊（loggie）中说笑嬉闹，甚至谈论生意。

城里最繁忙的区域包括维奇奥桥（Ponte Vecchio，又译作旧桥）及其周边地区，这是一座横跨阿诺河（Arno）最窄一段的石桥，两岸有许多屠夫的肉店；[2] 奥尔圣米凯莱教堂（Orsanmichele）附近和公共粮仓一带也很热闹，到了夏天，银行家们会在这里支起铺着绿色桌布的桌子，丝绸商人则在这里搭建帐房；[3] 还有就是老市场（Mercato Vecchio）所在的大广场，那里曾经是古罗马广场。[4] 此时的老市场上有服装商人和倒卖二手衣服的店铺，有鱼贩的货摊，有面包师傅和果蔬商贩，有卖皮革制品和文具的商店，还有制作蜡烛的作坊，里面因为点着遮盖蜡味的熏香而总是雾气缭绕，妓女们就在这里为客人提供服务。市场里开放的摊位都加了顶棚来遮蔽烈日的炙烤，成捆的丝绸、整桶的谷子和玉米，还有各种皮革制品就摆在这里供买主挑选。空地上还有理发师给顾客剃须剪发；裁缝在门廊的阴凉里给客人缝制衣物；仆人和家庭主妇们则聚在卖熟食的货摊前采购；面包师傅把一盘盘的面团推进公共烤箱；做家具的木匠和做首饰的金匠也都把自己的商品展示出来；街头公告员来往于广场之上，一边发布当天的新闻，一边替人做做广告；衣衫褴褛的乞丐举着木碗乞讨。夏天，孩子们在石板上掷骰子玩；到了冬天，他们则会用雪堆出狮子的形状，因为狮子就是佛罗伦萨的纹饰象征。城市里还有各种动物随意穿行：戴着银项圈的狗，在门廊和过道上吃食的猪和鹅，甚至连山上的野鹿或羚羊也会跑进城市，带着清脆的蹄声一路穿过广场。

在前几年，虽然但丁谴责了佛罗伦萨人奢侈浪费的作风，但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会对各种炫富行为嗤之以鼻。佛罗伦萨人的衣着都很简朴，

除工匠阶层以外的男性都穿着长及脚踝的长袍，正面一排扣子从上到下，有点儿像教士穿的教士袍（cassock）。佛罗伦萨人的房子也装饰得很低调。哪怕是那些富有的家族，用的也是最简单的木桌子和一点儿都不舒服的床。家里的墙壁也是一白到底，挂毯都被收进柜子，只在特殊的日子里才展示出来；地板就是光秃秃的石面，除了芦苇编成的草垫子外什么也不铺；窗户也大多是用油纸糊的。玻璃和陶制装饰品很是少见，就算有也要被小心翼翼地保管起来；银器要么放在餐具柜里，要么锁在主人房间的橱柜里，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有资格使用；而且那时也没几个家庭买得起叉子。可是近些年来，虽然佛罗伦萨人还会被称赞简朴，但是他们已经明显不再那么节省和克制了。富裕人家的石头房屋，从街面上看还是一副严苛冷峻的样子，可是楼上房间的窗户都镶了玻璃或挂着帘子，房间内部更是另一番风景。大多数房间里铺满了地毯，墙上装饰着壁画、挂毯和宗教图片，偶尔也挂凹面镜，用来把光线反射到桌子和写字台上。壁炉就更是常见了，在寒冷的冬夜里，人们不再像从前一样需要靠平底暖床炭锅和装着热炭的陶土手炉（scaldini）来取暖了。大部分家具表面都以镶嵌工艺装饰。床也被摆放在架高的平台上，还加了顶棚，四周有踏足板。这些床都相当大，通常能达到12英尺宽，至少可以容纳4个或者更多人并排睡在上面。人们睡觉时不穿衣服，喜欢让皮肤直接接触亚麻质地的床单和被套。他们还喜欢在床顶上吊挂一些放有熏香或草药的镂空香炉，呼吸着从中缓慢释出的甜香空气入睡。

在宽松马裤和夹克上衣之外，男人们还要套上一种长及脚踝的猩红色长袍（*lucco*），这种长袍袖子宽大，领子上连有兜帽；年轻一些的男士们会偏爱活泼的颜色，比如绸缎上衣外面配一件粉色斗篷，穿一双有银色蕾丝花边的白色短袜，戴边沿上插一根羽毛的天鹅绒帽子或有香味的手套，还可以佩戴金戒指、金项链和镶着珠宝的匕首和长剑。尽管佛罗伦萨和当时欧洲其他城市一样有禁奢法令，但是没有人真正遵守，女人们更是对此不屑一顾。下面是一个负责监督女人们遵守禁奢法令的官员提交的报告，里面提到的他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就很典型：

> 依据您的指令，我到街上巡视了妇女佩戴违禁饰物的情况，但总会遭到抗议，因为每种情况都确实无章可循，难判对错。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女人在头巾边缘镶了一圈蕾丝花边，于是我的助手问她：“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头巾上有花边。”结果这个女人立马摘下头巾，拆掉了用别针固定在上面的花边，还说那只是个花环。再往前走，我又碰到了一个女人，她穿的裙子前面缝了好多纽扣。我的助手对她说：“女人的衣服上禁止有纽扣。”她却辩称：“这些不是纽扣，是装饰扣，你看，我衣服上既没有扣环也没有扣眼。”最后，我的助手终于遇到了一个他认为确凿无疑的违禁者，于是掏出记录簿准备写下她的名字，他对这个女人说：“你穿的是貂皮。”结果这个女人却抗议道：“你不能记我的名字，这不是貂皮，是幼兽的皮毛。”“那你说的幼兽指什么？”“就是一种动物。”

让很多简朴的教士感到郁闷的是，佛罗伦萨商人妻子们的奢侈是出了名的，同样出名的还有她们的典雅高贵和白肤金发。深色头发的女人会给头发染色，或者戴白色、黄色丝绸做的假发；肤色红润的女人则会抹粉让自己变白。她们走在街上风情万种，服饰艳丽，还要佩戴珠宝首饰和银质纽扣。春夏的裙子都是丝质或者天鹅绒做成的，冬天的衣物则换成织锦或皮草。女人们骄傲地炫耀自己的衣物首饰，因为她们衣橱里的家当往往比丈夫的房产还值钱得多。当然，未婚的年轻姑娘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她们平时闭门不出，只有在去做弥撒的时候才可以戴着厚厚的面纱出门。更有些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则是完全不曾出过家门，她们只能在自己的卧室里做弥撒，在父亲的花园或是院内的敞廊里活动活动腿脚。到了适婚年龄，她们的父母或监护人会全权替她们安排，当然她们的嫁妆也是极其丰厚的。

很多新娘的嫁妆里都要包括几个外国奴隶。奴隶进口是在1336年正式被合法化的，原因是瘟疫暴发导致本地仆人数量锐减。这些外国奴隶大多是希腊人、土耳其人或俄国人、切尔克斯人或鞑靼人。一些家庭偏爱鞑靼人，因为干活最卖力；而另一些家庭则更喜欢切尔克斯人，因为样貌俊秀、脾气温和。所有奴隶都必须起早贪黑地工作，锡耶纳的云游传教士贝尔纳迪诺（Fra Bernardino）叮嘱家庭主妇，为她们自己好就一定要做到：

> 有房间要打扫？让你的奴隶去扫。有瓶瓶罐罐要刷？让你的奴隶去刷。有蔬菜水果要削皮？让你的奴隶去削。有衣服要洗？让奴隶去洗。让她帮你照看孩子，帮你打理一切。要让她们习惯不停地工作，否则她们会变得又懒又笨。不要给她们一点儿闲暇时间，只要你不停地指使她干活，她就没空靠着窗子看热闹打发时间。

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市场上买个奴隶很便宜。这些奴隶通常都是年轻的女孩儿，被买去做奴隶就意味着一辈子都要受主人的束缚。主人对奴隶享有绝对的权力，可以“拥有、保留、出卖、冷落、交换、玩弄、租借或退租、随意处置、判定过错及实施自己或自己的继承人想要采取的任何举措，直至永远，其他人无权干涉”。事实上，奴隶被归入主人的动产，在财产清单中和家禽家畜列为一类。很多女奴会怀上主人的孩子：不仅在当时人们的往来书信中经常见到此类麻烦引发的争执，连接收弃婴的医院也是人满为患，肤色黝黑或斯拉夫人样貌的弃婴源源不断地被送到这里。

奴隶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但她们的伙食还算不错。尽管从法律意义上讲奴隶没有任何地位，也几乎不享有任何权利，但她们会被当作家人一样对待。赶上艰苦的年景，她们的生活反而比最贫穷的佛罗伦萨市民要好过一些。有时候，穷人一天的食物就只有一点儿无花果和栎树皮做的干面包。而一个小康之家的女奴却可以分享主人家的晚餐：蒜香意面、意式肉汤饺子、肝泥香肠或血肠、羊奶酪、水果和葡萄酒，到了周日还可能有鸽子肉或是羊羔肉。富商家里的餐食自然更有异国风情。虽然法令禁止过度奢侈，但是人们就如同在服饰上一样，在饮食上也公然抛弃了法律的约束，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可能的漏洞。比如法令规定主食不能有烤肉和馅饼之外的东西，那么人们就把能想到的所有美食全填进馅饼里，包括猪肉、火腿、鸡蛋，还有大枣和杏仁等。一个富有人家在款待尊贵的客人时，可能会先奉上一个甜瓜；接着是意式饺子（ravioloi）、意式馄饨（tortellini）或意式千层面（lasagne）；然后是一种用面粉、鸡蛋和糖做成的蛋糕（berlingozzo）；还要再来几片煮阉

鸡、烤鸡或珍珠鸡肉；还有辣牛肉或猪肉冻、画眉肉、丁鲷、梭子鱼、鳗鱼、鳟鱼、鸽子、鹧鸪、斑鸠、孔雀和煮小山羊肉。至于蔬菜，常见的选择有蚕豆、洋葱、菠菜、胡萝卜、韭葱、豌豆和甜菜根。最后还有配着糖或蜂蜜吃的杏仁奶蒸的米饭，或者是用藏红花色素调过色，被做成了动物或人形的松子布丁和松仁蛋糕（pinocchiato）。所有的食物都用料十足、味道浓郁。一碗鸡肉蔬菜浓汤（minestra）里要加姜汁、杏仁碎、肉桂、丁香，还要撒上奶酪或糖。鱼肉馅饼里则要加橄榄油、橙汁和柠檬汁、辣椒、盐、丁香、欧芹、肉豆蔻、藏红花、大枣、葡萄干、月桂叶粉末和马郁兰。有一种特别的红酱（savore sanguino），里面不仅有肉、葡萄酒、葡萄干、肉桂、檀香，甚至还有漆树这种现在只被用来制革的染料。夏天的时候，大多数富户一天最主要的正餐是在傍晚之前吃的。桌子和凳子都被摆在敞开的花园门口附近，只有客人能坐在直背椅子上，更多时候则是坐在板凳上或箱子盖上，房间远处的角落里还有乐手在吹奏舒缓的音乐。

那些统治整个佛罗伦萨的人就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理论上说，城里几个行业协会的所有会员在政府中都有发言权，但实践中却并非如此。行业协会的总数是21个，包括7个大行会和14个小行会。7个大行会中，又以律师业行会（*Arte dei Giudici e Notai* ）地位为最高。位居其次的是羊毛业行会（*Arte della Lana* ）、丝织业行会（*Arte di Por Santa Maria* ）和毛织业行会（*Arte di Calimala* ），这些行会的名字来源于他们存放货物的仓库所在大街的街名。[5] 尽管银行家依然被教堂斥责为放高利贷的，以至于他们不得已用俗语或委婉语来掩饰自己真正的生意，但是崛起的银行业行会（*Arte del Cambio* ）已经成了在财力和重要性上都能够与前述大行会相匹敌的力量。医药香料业行会（*Arte dei Medici，Spezialie Merciai* ）的会员包括医生、药剂师，以及香料、染料和药品等货物的经销商，同时也包括一些艺术家和手工艺者。举例来说，画家既是向经销商买染料的客人，也是隶属于这个行会的会员。最后一个大行会是皮革皮草业行会（*Arte dei Vaccai e Pellicciai* ）， 它代表的是皮

革、皮草商人和皮革手工匠的利益。

剩下那些小行业协会里的会员则是一些普通的生意人，包括屠夫、制革工人、皮匠、铁匠、厨师、石匠、木工、酒商、旅店老板、裁缝、甲胄师及面包师傅等。一个羊毛业行会的会员可以看不起铁匠行会（*Arte dei Fabbri*）里的铁匠们；但是铁匠也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时候，就是相比于成千上万的羊毛工人、布料工人、织工、纺纱工、染工、梳刷工和打浆工，以及车夫、船夫、苦力和小商贩这类没有固定营业场所的普通劳动者。尽管这些劳动者的数量占到了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他们却无权组建自己的行业协会。这样的不公在过去多次引发不满，有时候甚至会发生暴动。1378年夏天，梳毛工们就发动了一次起义。这些工人被称作“琼皮”（*ciompi* 这一名称来源于他们在洗毛车间工作时所穿的木底鞋的名称），是羊毛工人群体中最卑贱的一类，他们的工资还不够让家人吃饱饭。于是梳毛工们大喊着“和让我们挨饿的叛徒同归于尽”的口号，把那些被他们视为压迫者的商人的店铺洗劫一空。商人和他们选举出的头目吓得不得不逃跑保命。梳毛工们还提出要成立三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行会。迫于这样的形势，所有要求都被满足了。只可惜好景不长，其他行业的工人们出于嫉妒，依靠他们雇主私下里的权钱支持，很快就联手摧毁了梳毛工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行会。到1382年，原有的21个行会重新掌握了对城市无可争议的控制权。根据《1293年正义法令》的规定，佛罗伦萨为独立的共和国，行会通过重新修订这一法令，实现了对政府的操纵。

当时政府官员的组成方式是这样的：21个行业协会中年满35岁的会员都有资格参选政府官员，他们的名字会被写下来并分别放进8个皮质的袋子（borse）中。袋子被放置在圣十字教堂（Church of Santa Croce）的圣器收藏室里，[6] 每两个月拿出来一次，在简短的仪式后，从中随机抽取当选者。任何想要观看选举仪式的市民都会获得许可。有负债或已就任上一届政府官员的人，以及与已当选人有亲属关系的人不

能够作为候选人。当选官员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将担任执政官（*Priori* ），由这些执政官组成的政府被称为执政团（*Signoria* ）[7] 。执政团成员最多不超过9个人，其中6个人代表大行会、2个人代表小行会，最后一人则作为首席执政官（*Gonfaloniere* ），[8] 负责持有和保管城市的旗帜——白色底面上有一朵红色百合图案的佛罗伦萨旗。执政官一旦当选，就必须马上离开自己的家，统一住进市政厅，直到两月任期届满。执政官们的工资不高，但是可以享受的待遇不低。市政厅里面不但有大批身着绿色制服的仆人为他们服务，在他们享用丰盛晚餐的时候，还有小丑（*Buffone* ）在旁给他们讲笑话、唱歌助兴。所有执政官都穿着深红色的长袍，领口和袖口镶着貂皮边。为了显示区别，只有首席执政官的长袍上绣着金星。

如果执政团想要颁行法律或制定外交政策，他们必须征求另外两个也是经选举建立的委员会（*Collegi* ）的意见，分别是十二贤人团（*Dodici Buonomini* ）和十六旗手团（*Sedici Gonfalonieri* ）。除此之外，还有十人战争委员会、八人安全委员会和六人商贸委员会，不过这些委员会都是依共和国形势需要临时通过选举组建的。也有一些职务是永久性的，比如总理大臣通常是由优秀的学者来担任；[9] 执政团公证员（*Notaio delle Riformagioni* ）主要负责宣布执政团的法案；最高行政长官（*Podesta* ）是个类似于首席大法官的职务，往往由出身高贵的外国人担任，他居住的宫殿既是法院又是监狱，后来被更名为巴杰罗宫。[10]

一旦危难来临，执政官们会敲响市政厅钟楼里的大钟。因为钟声低沉，像牛叫的哞哞声，大钟因此得名牛钟（*Vacca* ）。当钟声响彻整个佛罗伦萨的时候，所有年满14岁的男性市民都要集中到自己所属的小区，然后跟随在代表小区的旗帜后面统一行进到市政厅前，组成市民议会（*Parlamento*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团要先确认到场人数已超过市民总数的三分之二，然后才能请求他们批准组建最高司法委员会

（*Balia* ）的提议，最高司法委员会成立后将代表人民全权处理城市面临的危机。

佛罗伦萨人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感到无比骄傲，并标榜它为实现他们所吹嘘的自由的保障。佛罗伦萨人坚信其他意大利邦国的政府都比不上他们的。威尼斯虽然也是公认的共和国，但是正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威尼斯所谓的共和是由各个贵族家族在政府中就职；而按照佛罗伦萨的法律，这样的特权是不被许可的。佛罗伦萨的另一个主要竞争对手——米兰——还处于专制公爵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的完全掌控之下。至于从罗马到亚得里亚海沿途分布的各个独裁者统治的小教皇国，都还是近乎无政府的状态。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则因安茹（Anjou）和阿拉贡（Aragon）两大家族的争斗而长期分崩离析。

与这些国家相比，佛罗伦萨能有如此稳定、民主、受拥护的政府确实是一大幸事。不过事实上，政府的实际运作也难称民主。在组建政府的过程中，社会下层民众（*Minuto Popolo* ）被成功拒于门外，贵族（*Grandi* ）也很难进入各种共和国委员会。整个选举过程实际上被少数几个最富有的商人家族控制着，他们的目的是确保只有可信的家族支持者的名字被放入存放候选人名条的皮袋里。如果这其中出现任何差池，他们就可以召集市民议会，通过组建最高司法委员会来“变更”皮袋里的候选人，这样就可以防止不受自己信赖的执政官被选入执政团。所以实际上，政府几乎就是富人完全依据自己的利益而组建的。

对于佛罗伦萨的商人们来说，钱的意义非同一般。有钱就是有地位，没钱就是没尊严。作为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诗人、运动健将、画家、音乐家和建筑家，出身佛罗伦萨历史最悠久的古老商人家族之一的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1] 就曾说过：穷人很难“靠美德获得尊重和名誉”，贫穷“会让美德蒙上阴影”，

并“让美德沦为隐蔽而晦涩的哀愁”。另一位同样出身商人世家的佛罗伦萨哲学家马泰奥·帕尔米耶里（Matteo Palmieri）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只有做大买卖的商人才值得受人瞩目和尊重，社会下层民众只要吃饱饭就不应该再奢望什么。还有一位名叫格雷戈里奥·达蒂（Gregorio Dati）的佛罗伦萨丝绸商人的观点更绝对，他说：“不经商的佛罗伦萨人，没有周游过世界、见识过他国风土人情，然后衣锦还乡的佛罗伦萨人，无论如何也抬不起头。”

人们普遍认定，商人的财富应当是通过“体面而重要的”交易获得的。一夜暴富会受到严重质疑，而通过“丑恶的交易”、“下流的手艺”或“挣薪水的下等职业”赚钱也同样不被看好。规模庞大、货物高档的交易不但能让经营它们的商人受人信赖，也会使从中受益的共和国信誉提升。

挣了大钱的商人自然也不能吝啬小气，他们必须拥有气派的宫殿和宽阔的家庭敞廊，还要有美丽的乡村别墅和私人小教堂。他们还必须给自己的家人购置得体的衣物，就算不雍容华贵，也起码要价格不菲。商人们还得给女儿准备好丰厚的嫁妆。为建造教堂和修道院捐款时必须慷慨大方，这不仅仅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更是给自己的后代和佛罗伦萨增光。如果某个商人足够富有，他还可以借钱给共和国政府，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威望。乔瓦尼·鲁切拉伊（Giovanni Rucellai）靠经营一种著名的佛罗伦萨红色染料——苔红素（*oricello* ）——而积累了巨额财富，甚至连他的家族姓氏都是从这种染料的名字衍生而来的。他曾宣称“把钱花好比挣到大钱本身带来的荣耀还要多”；花钱还能让他得到更多的满足感，他斥巨资建造的宏伟的鲁切拉伊宫就是由阿尔贝蒂设计的。[12]

不过，对于一个富有而慷慨的商人来说，想要在佛罗伦萨的社会上获得名望，光靠经营体面的生意是不够的。缔结好的姻亲关系是非常理

想的方式；而在共和国政府就职、服务大众的家族传统则是另一个重要的方式。事实上，没有哪个不曾在政府就职的商人可以自称拥有多高的社会地位。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富商们的下一代。他们年纪尚轻就已经懂得：如果自1282年起的执政官名录上没有自己家族的姓氏，那么就根本算不上什么名门望族。尼科洛·达·乌扎诺（Niccolo da Uzzano）是一位德高望重、富可敌国的显贵。他家墙上就挂了这样一份执政官名录，一旦出现了某个他闻所未闻的候选人，他就可以立刻查出此人是出身于古老家族，还是新近的暴发户。[13]

美第奇家族自然不算暴发户，不过和它的竞争者相比，他们也称不上历史悠久。在随后的许多年中，所有形式的传奇都成了赚取钱财的资本。

---

[1] 佛罗伦萨市政厅，亦译为领主宫、旧宫、维奇奥宫，是佛罗伦萨政府所在地。该建筑始建于1299年，后经多次扩建与改造，直至十六世纪末。米开罗佐·米凯洛齐于十五世纪四十年代对其庭院进行了重建。萨沃纳罗拉时期为容纳大议会而修建了大会议厅（Sala del Maggior Consiglio）。科西莫一世公爵于1540年从美第奇宫搬来了这里，并由乔焦·瓦萨里对此处重新进行修缮和装饰。后来科西莫公爵入住皮蒂宫，并将市政厅赐给了自己的儿子弗朗切斯科。为了致敬弗朗切斯科的妻子——奥地利女大公约安娜，整个庭院又被修饰一新。

[2] 维奇奥桥所在的位置从罗马时代起就建造过桥梁。现存的维奇奥桥修建于1345年，取代的是于十二世纪建造，但是在1333年被洪水冲毁的那座桥梁。当时维奇奥桥两侧的店铺以皮革店和皮包店为多，后来变成了屠夫的肉店。到十六世纪末，依照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的指令，又换成了金店和珠宝店。

[3] 奥尔圣米凯莱教堂的名字是从古老的圣米凯莱教堂衍生而来的。圣米凯莱教堂建在奥托（Orto），它的位置被奥尔圣米凯莱教堂取代。现存的教堂是1336年修建的，本来是打算作为公共粮仓和小教堂。建筑外墙壁龛里的雕塑是由城市中的行业协会订制的。多纳泰罗创作的圣乔治大理石雕是由甲胄师行会订制的，被放置在教堂北墙最西侧的壁龛里的是一个仿品，真品被移到了巴杰罗国家博物馆。

[4] 老市场在十九世纪末被拆毁了，是为了给当时要建造的共和国广场（Piazza della Repubblica）腾出地方。

[5] 卡利马拉街（Calimala）字面上的意思是恶名之街，但其实可能是罗马将军卡利斯（Roman Callis Major）名字的讹用。

[6] 圣十字广场上的圣十字教堂和圣十字修道院修建于1228～1385年。到1863年，又修建了独具特色的十七世纪风格的大理石教堂正面。米开朗琪罗以及科西莫·德·美第奇的好朋友莱昂纳多·布鲁尼、卡洛·马尔苏皮尼和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的墓都设在这里。当时佛罗伦萨几个重要家族的家族教堂也都建在这里，其中就包括与科西莫联姻的巴尔迪家族的家族教堂。由米开罗佐为科西莫建造的见习教士堂建于1445年左右。

[7] 又译为长老会议，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最高行政机构。——编者注

[8] 又译为正义旗手。——编者注

[9] 总理大臣（Chancellor of Florence）是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最重要的官僚政府职位。虽然总理大臣既不是经正式选举产生，如九人执政团成员或首席执政官，也不等同于现今一些国家政府首脑，但他可以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担任这一职位的人大多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些著名的学者、政治思想家和人文主义者。——编者注

[10] 巴杰罗宫在十五世纪被称为波德斯塔宫（Palazo del Podesta），始建于1254年至1255年，最初是作为市政大厅。庭院中的楼梯是在十四世纪中期重建时增加的。到1574年这里成为警察总长的官邸。现在这里成了国家博物馆（Museo Nazionale），收藏了众多美第奇家族人员的雕像和半身像以及他们订制的其他艺术作品。

[11] 阿尔贝蒂宫位于本奇街6号，这里现在变成了霍恩博物馆（Museo Horne）。阿尔贝蒂家族曾经负责打理圣十字教堂的高坛。

[12] 鲁切拉伊宫于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建造完成，现在的地址是德拉维尼亚诺瓦街18号。它由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设计，由贝尔纳多·罗塞利诺（Bernardo Rossellino）主持建造。阿尔贝蒂还为乔瓦尼·鲁切拉伊设计了多明我会的圣玛丽亚诺韦拉教堂的正面，该教堂里有鲁切拉伊家族的家族教堂。从火车站和普拉托门之间可以看到一部分修复后的鲁切拉伊宫的花园，即奥里切拉里园（Ortioricellari）。

[13] 尼科洛·达·乌扎诺在巴尔迪街上的宫殿现在改名为卡波尼宫（36号）。

第二章 美第奇家族的兴起

“时刻远离公众的视线”

据说美第奇家族的祖先叫阿伟拉多（Averardo），是一名英勇的骑士，曾效忠于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有一次，阿伟拉多在去罗马的途中经过托斯卡纳地区，在佛罗伦萨以北的一个叫穆杰洛（Mugello）的地方遇到了一个野蛮的巨人，当地的贫苦农民深受其害。阿伟拉多与巨人交战并最终将其杀死，但是他的盾牌上留下了多处巨人挥舞狼牙棒猛击的凹痕。查理曼大帝为了奖励阿伟拉多的英勇行为，许可他将盾徽制成金底饰以红色小球的样式，象征着盾牌上的凹痕，以此纪念他伟大的胜利。从那以后，这也成了美第奇家族的标志。[1] 另外一种不那么戏剧化、可信度更高的说法则是红色小球象征着药丸或拔火罐。正如他们的名字所示，美第奇家族很可能是医生或药剂师，祖上则有可能是从穆杰洛迁到佛罗伦萨来的烧炭人。不过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红色小球代表钱币，是当铺的传统标志。

起码可以确定的是，在后来这些年里，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一直是受人敬仰的家族。他们随着这个城市的繁荣而发展壮大，而且偶有家族成员在政府里担任官职。第一个成为首席执政官的美第奇家族成员是阿尔迪戈·德·美第奇（Ardingo de’Medici），他在1296年当选这一要职。而他的兄弟古乔（Guccio）不但在三年后也当选为首席执政官，还获得了死后入殓四世纪石棺并被安葬在圣乔瓦尼巴蒂斯塔黑白八角教堂（San Giovanni Battista）外的殊荣，这个教堂也被称作洗礼堂（Baptistery）。另一位美第奇家族成员阿伟拉多，也就是科西莫的曾曾祖父于1314年当选首席执政官。然而自那以后，美第奇家族似乎经历了一段衰落期。阿伟拉多的一个孙子菲利诺·迪·孔特·德·美第奇（Filigno

di Conte de’Medici）在一本写给子孙的短小回忆录中就哀伤地提到了这段时期。他庆幸他的家族在佛罗伦萨还有几处不大的房产及两座宫殿、一个旅馆，以及在穆杰洛的卡法焦洛（Cafaggiolo）地区有“周围围绕着房屋的半个宫殿”。他们依然生活富足，但是和以前相比就相差甚远了；至于社会地位，则是“依然重要，但本可以更高”。曾经，人们会说“你看起来像个美第奇”，并且人人敬畏他们，然而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萨尔韦斯特罗·德·美第奇（Salvestro de’Medici）是菲利诺的一个堂兄弟，他在1370年和1378年先后两次当选首席执政官，重新恢复了家族的荣耀。梳毛工起义那一年，萨尔韦斯特罗对起义团体的同情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在起义成功的那段时间里，他的声誉也获得了大幅提升。不过最终起义失败，萨尔韦斯特罗和美第奇家族也受到重创。从那时起，美第奇的名字就和遭主宰这座城市的领袖家族忌讳的起义分子们联系在一起了。

科西莫的父亲，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Medici）一直想要打消对他家族的质疑。他可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阔少爷：他父亲留下的那点儿可怜的遗产要分给一个遗孀和五个儿子。所以，乔瓦尼自己挣到钱之后就发誓绝不让这份财富再受到任何威胁。乔瓦尼像他的父亲一样对社会下层民众充满同情，所以也受到下层民众的爱戴。但乔瓦尼本身是个极其谨慎的人，他十分清楚佛罗伦萨人对野心过度的市民是出了名的不信任。所以，他一直尽可能地远离公众视线的焦点，靠自己迅速发展起来的银行生意积累财富。

乔瓦尼被视为一个善良、诚信、通情达理且有人情味的人，他本人也乐于接受这种名声。不过，人们也不会忽视他那总是微眯着的双眼中透出的精明世故，以及那宽阔的下巴显示出的坚毅决绝。乔瓦尼从来不会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言语中偶尔闪烁的智慧火花也往往被其苍白

脸上天生的哀怨表情所掩盖，从而让人对他放松警惕。乔瓦尼本就富有，他的妻子皮卡尔达·布埃利（Piccarda Bueri）更是带来了丰厚的嫁妆，但是起初乔瓦尼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科西莫和洛伦佐（Lorenzo）——一直住在拉尔加街（Via Larga）上一栋不大起眼的房子里，后来才搬到了主教堂广场（Piazza del Duomo）一所略大一些但依然简朴的房子，这里靠近当时尚未完工的圣母百花大教堂（Santa Maria del Fiore）。[2] 不少低级别的商人会故作姿态地远离公共生活，如果可以的话乔瓦尼倒真愿意完全避开公众的视线，待在佛罗伦萨的房子和他的乡村别墅中，待在主教堂广场的办公室和红门街（Via Porta Rossa）[3] 上离现在的诺沃市场（Mercato Nuovo）[4] 不远的银行里。但是在佛罗伦萨，如他的孙子日后所说的那样：不在政府里就职的富商是不能获得成功的。

尽管不情愿，乔瓦尼还是在1402年接受了执政官一职，并在任职的两个月中被选为首席执政官。后来他又两次当选，分别是在1411年和1421年。除了这几次经历之外，乔瓦尼很乐意躲在账房里，为公共基金和私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或者投资附近乡村的土地。他乐意给不再享有政治权利的失势贵族们代理财产业务，却委婉地反对他们要求重获公民权利的政治诉求，而这也是他唯一明确持有的政治立场，除此之外就任由富有的阿尔比奇（Albizzi）家族通过他们的朋友和执政官候选人来掌控政府。

不得不说，即便是阿尔比奇家族的敌人们也没有在这一家族的统治时期有什么不满，这段时期恰好也是佛罗伦萨相对繁荣发展的好时期。阿尔比奇家族的统治非常严苛：反对者一律要被逮捕、流放、没收财产，甚至处决。佛罗伦萨的边界不间断地向外扩张。到阿尔比奇家族当政时，他们掌管的地域早就超越了城墙围起的这个城市。此时的佛罗伦萨包含了皮斯托亚（Pistoia）和沃尔泰拉（Volterra），以及1351年从那不勒斯女王手里购得的普拉托（Prato）等乡镇。鉴于阿尔比奇家族成功

地控制了政府，他们不仅占据了阿雷佐（Arezzo），还在1406年通过占领比萨（Pisa）及比萨港（Porto Pisano），开通了一条能让佛罗伦萨直接通向大海的通道。后来，阿尔比奇又于1421年从热那亚人手中买来了里窝那（Leghorn）。

佛罗伦萨的第一艘武装战船就是在比萨港举行的下水仪式。购买港口这一做法大大增加了共和国的财富，也给长期以来作为支柱产业的羊毛和布料交易增添了助力。世世代代以来，大批的羊毛都是从英格兰、低地国家及托斯卡纳的山丘和山谷地区运到佛罗伦萨进行加工和染色，然后再出口。在黑死病降临之前，这一行业养活了近三万人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羊毛和布料商人的行会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长久以来都在佛罗伦萨的政府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城市里一些最豪华的建筑也是在他们的授意之下建造起来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就是委托羊毛业行会的官员管理的，该协会的象征——羔羊图案——也醒目地出现在了教堂的墙上。

乔瓦尼拥有两家羊毛工厂，所以他是羊毛业行会的会员。但是，由于他最主要的生意是银行，所以他也是银行业行会的会员。银行业行会的声誉从1252年开始有所提高。当时城市里的银行家们发行了一种美丽的小金币。金币背面是佛罗伦萨的拉丁文名称（Florentia），正面则选用了百合花的图案，百合正是这座城市的象征。[5] 这种货币就是著名的弗罗林金币（*fiorino d’oro*），它在世界上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花朵币（the flower），也叫佛罗伦萨币（florence）或弗罗林币（florin）。一枚弗罗林币里含有54格令[6] 的纯金，在十五世纪三十年代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英镑。一个年收入150弗罗林币的人可以生活得很宽裕。当时城里一栋带花园的小房子一年的租金大概是35弗罗林币；一栋豪华宫殿大概能卖到1000弗罗林币；一个女仆一年的薪水超不过10弗罗林币，购买一个奴隶也不过50弗罗林币。很快，弗罗林币就受到了广泛认可并在全欧洲流通起来，这完全是出于对发行它的城市和在那里营业

的银行的信任。到1422年，流通中的弗罗林金币的数量达到了两百万枚；仅在老市场广场周围，就有72家银行和证券交易行，其中最兴旺、发展最迅速的，无疑就是美第奇的银行。

乔瓦尼的一个远房堂兄，维耶里·迪·坎比奥·德·美第奇（Vieri di Cambio de’Medici）于14世纪就在罗马开设了分行。威尼斯和热那亚、那不勒斯和加埃塔（Gaeta）也都有美第奇的分行。乔瓦尼·德·美第奇起初就是在他堂兄维耶里的分行里做学徒，后来在日内瓦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分行，接着又在罗马开了第二家。后来随着比萨港口的业务激增，他又在布吕赫（Bruges）和伦敦分别设立了代理行。不过与其把乔瓦尼业务的蒸蒸日上归因于佛罗伦萨羊毛交易的繁荣，倒不如说是他与教皇的密切关系。

对于乔瓦尼这样一个保守、谨慎的银行家来说，1410年当选教皇的巴尔达萨雷·科萨（Baldassare Cossa）绝对不是一个典型的可结交之人，他们之间建立友谊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科萨是一个感观至上、热爱冒险、无所顾忌而且极度迷信的人。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那不勒斯家族，曾经当过海盗。当他决定投身圣职的时候，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都坚信，他这么做绝不是为了服侍上帝，而是为了寻找新的冒险，而他的人生也的确称得上一次大冒险了。

当时，教会正因为阿维尼翁（Avignon）的教皇与罗马的教皇分庭抗礼而陷于困境。为了终结这场将整个欧洲分化为几个阵营的“教会大分裂”，各方于1409年在比萨召开会议，会议达成的决议是罢黜阿维尼翁教皇本尼狄克十三世（Benedict ⅩⅢ）和意大利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Gregory Ⅻ），同时选举了新的教皇亚历山大五世（Alexander Ⅴ）。结果亚历山大五世刚刚当选就宣布会议终止，而被罢黜的两个教皇也都拒不承认会议的决定。这样一来，不但情况没有好转，竞争的教皇反而从两个变成了三个。亚历山大五世去世后由科萨继位，他选择的称号是

约翰二十三世（John ⅩⅩⅢ）。为了化解这一僵局，德国君主西吉蒙德（Sigismund）尝试在康斯坦茨（Constance）召开新会议。到1414年年底教皇约翰前往康斯坦茨时，就有美第奇银行的代表随行，他们俨然已经成了教皇的金融顾问。

至此为止，美第奇家族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教皇御用银行家的地位。以阿尔比奇、里齐（Ricci）和斯皮尼（Spini）家族为主的其他佛罗伦萨银行在过去也曾作为教廷的财务代理机构；相对于他们来说，即便是乔瓦尼在1386～1397年大幅提高了银行业务量之后，美第奇家族在罗马的业务依然算少的。然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位期间，美第奇家族却成了最主要的教廷业务代理者。据说美第奇银行是为教皇筹集了一万达科特金币（ducats）的买官钱才获得了教廷代理的美差。不过，1403～1410年间，科萨还在博洛尼亚（Bologna）任教皇使节一职时，他就已经与乔瓦尼保持通信并有大量业务往来，他还称乔瓦尼为“非常亲近的朋友”。

科萨当选教皇后，美第奇家族就开始利用与教皇办公室之间有利可图的关系，因为教廷的收入和开支都是由这个办公室负责的。同时美第奇银行还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与那不勒斯国王拉迪斯劳斯（Ladislaus）交战时最主要的支持者。那不勒斯国王支持的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也就是教皇约翰的两个竞争者之一。最终教皇约翰与那不勒斯国王于1413年握手言和，依照停战条约的规定，教皇须向那不勒斯国王支付95000弗罗林币，这笔款项自然也是由美第奇家族主要负责筹集的。作为抵押，教皇向美第奇银行旗下的一家罗马分行交付了两顶宝贵的主教法冠和大量的主教板。这样的交易其实并不符合乔瓦尼的品位，但是成为教廷财务代理便可以获得巨额利润，这一点小小的代价总是要付的。至于与教廷财务相关的业务到底有多大的利润，从一点就足以见得，那就是当时美第奇银行全部利润的一半都是由罗马的两家分行贡献的。

不过在召开康斯坦茨会议时，美第奇家族的地位有所动摇。教皇约翰于1414年10月底抵达康斯坦茨，迎接他的是一连串指控，包括传播异端邪说、买卖圣职、专制暴政、毒杀前教皇亚历山大五世，以及引诱至少两百名博洛尼亚女子。教皇约翰不得不装扮成一个背着弓箭的平民才得以逃出康斯坦茨，可是他很快就被出卖并带回康斯坦茨听候处置。最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本尼狄克十三世都被罢黜。会议还接受了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的辞职，并选举了新的教皇马丁五世（Martin V）。

此时的教皇约翰已是贫病交加，他在海德堡城堡里被关押了三年，直到美第奇家族再次对他伸出援手。通过他们在威尼斯的分行，美第奇家族筹集了38500莱茵盾的赎金来换取约翰的自由。被罢黜的教皇在获得释放之后，由巴尔托洛梅奥·德·巴尔迪（Bartolomeo de’Bardi）（很快他就将成为美第奇罗马分行的经理）陪同来到佛罗伦萨，并受到了乔瓦尼·德·美第奇的欢迎。在他仅剩的几个月的生命里，美第奇不但为他提供了住所，还出面向马丁五世求情，最终为他谋得了图斯库鲁姆（Tusculum）枢机主教的职位。

当时马丁五世也住在佛罗伦萨，他在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Santa Maria Novella）住了两年。[7] 马丁五世是一个温柔单纯的人，但是他与美第奇家族的关系并没有乔瓦尼所盼望的那么亲近和友好。他们曾经因为一个珍珠镶嵌的主教法冠而发生过矛盾。这个法冠是教皇约翰逃出康斯坦茨时抵押给美第奇的，后来马丁五世威胁将美第奇家族逐出教会，才最终迫使他们将法冠交还给教堂总管。在执行教皇约翰的遗嘱时，双方又出现了分歧，因为约翰在遗嘱中规定要将自己保有的施洗者圣约翰的一根手指留给美第奇家族。教皇约翰对圣物的信仰是无限的，所以一直把它带在身上。随后，他们还为洗礼堂外教皇约翰坟墓上的刻字而争执不下，因为墓碑基座上刻着“教皇约翰二十三世”（Ioannes Quondam Papa ⅩⅩIII），而这样的碑文让现任教皇马丁五世认为受到了冒犯。

1420年9月9日，教皇马丁离开佛罗伦萨，启程前往罗马，随行的还有12名枢机主教。佛罗伦萨的官员、各个行会和院校的代表，还有统一着装的旗手组成的长龙，护送教皇到达圣皮耶尔·加托里尼门（Porta di San Pier Gattolini），在那里教皇向众人赐予祝福。此后教皇途经圣加焦（San Gaggio）的女修道院——依据当时一位编年史记录者的记录——“他下了马，要求女修道院里所有的修女都到他面前来，他逐个祝福她们，并隔着面纱亲吻了她们的额头”。

乔瓦尼·德·美第奇也在送行的队伍之中，他被选为有权使用金色马刺的四骑士（*Cavalieri* ）之一。看着教皇离去，乔瓦尼心中只有担忧，因为他的家族银行与教会的关系已经如履薄冰。虽然美第奇家族没有被完全排除在教廷业务之外，但是他们已经不再享受任何在教皇约翰二十三世时期曾拥有的特权。此时最受教廷偏爱的变成了美第奇家族的老对手——斯皮尼家族。[8] 然而到了1420年年底，斯皮尼公司突然宣告破产。在此之后不久，美第奇在罗马的经理就接手了斯皮尼的生意，他的分行也很快恢复了曾经的显赫地位。没过几年，美第奇家族的银行不仅成了意大利最成功的商业公司，更是一举成为全欧洲最能赚钱的家族事业。对于这样的成果，乔瓦尼作为父亲当然功不可没，而他的长子也同样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科西莫出生于1389年9月27日，他的生日正好也是基督教殉道者科斯马斯（Cosmas）和达米安（Damian）的纪念日。这两个人被认为是医师的守护神，在科西莫订制或是为向他致敬而创作的油画作品中就经常出现这两个人的身影。科西莫年幼时在卡马尔多利会（Camaldolese）的安杰利圣母修道院（Santa Maria degli Angeli）[9] 接受教育，在那里他学会了德语、法语、拉丁语，同时对希伯来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也有涉猎。后来，和佛罗伦萨其他富商家的少爷们一样，他也开始聆听罗伯托·德·罗西（Roberto de’Rossi）的讲座或课程。罗西本人也出身于一个古老富有的佛罗伦萨家族，他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在罗伯托

·德·罗西极具启发性的教导下，以及和安杰利圣母修道院同学们的交谈中，科西莫获得并发展出了一份对古典知识和古典理念的尊敬和对人们现世生活的兴趣。他参与讨论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中年，而对人类的兴趣则一生未变。科西莫绝对称得上一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

和这个圈子里其他人文主义者相比，科西莫算不上最博学的，但是就连教皇庇护二世（Pius Ⅱ）都对他称赞有加。佛罗伦萨人在这位教皇眼里都是“利欲熏心的奸商，听不进一点儿高尚的东西”，只有科西莫是个有文化、有智慧、有见识的人，“比一般商人更有修养”。确实没有几个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手稿的了解能超过科西莫，因为他年纪尚轻时就已经开始收藏了；更没有什么人像他一样在公共生活中坚持人文主义理想的重要性。虽然他一直没有学会演讲和雄辩等人文主义者们必备的技能，但他从不质疑那些靠这些技能在佛罗伦萨社会担当重任的人文主义者。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其实都有着和科西莫类似的家庭背景，但科西莫和他们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如他的父亲一直教导的那样，科西莫迫切地想要远离公众视线。

科西莫很少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就算有必要，他也从不会带一名以上的随从。他的穿着总是很低调，小心地把靠墙的路让给老年人走，并“最大限度地遵守治安法官的要求”。科西莫还总是把扮演英雄、出风头的机会留给其他大家族的后裔们，比如1428年在圣十字广场上举办的大型比赛中，[10] 伟大的帕拉·斯特罗齐（Palla Strozzi）[11] 的儿子洛伦佐赢得了胜者的桂冠，而科西莫以及美第奇家族其他成员的出席都未被提及。若是有人就生意上的问题向科西莫寻求帮助或征求他的建议，科西莫会认真聆听来访者的问题，然后简短直率地给出见解，让人觉得他好像吝于结交朋友似的。不过，老百姓们依然爱戴他、信任他。在他年老之后，本就灰黄的脸色加上岁月的痕迹，让他看起来总是带着一副讽刺的神情，他那总是简短模糊的评论又加重了话语中嘲笑的意味。但即便如此，他的言行举止依然让人觉得可亲而非可惧。

科西莫与乔瓦尼·德·巴尔迪（Giovanni de’Bardi）的长女孔泰西纳·德·巴尔迪（Contessina de’Bardi）结婚时只有二十几岁。巴尔迪是他父亲在罗马分行的合伙人之一。巴尔迪家族曾经也是佛罗伦萨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但是和佩鲁齐（Peruzzi）、阿恰尤奥利（Acciaiuoli）家族一样，他们借给包括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和那不勒斯的安茹国王罗伯特（Robert，the Angevin King）在内的各个君主的贷款比收回的还款多太多，以至于他们的生意经常难以为继。孔泰西纳结婚时给丈夫带来的嫁妆算不上多，尽管其中包括坐落在巴尔迪街（Via de’Bardi）上的巴尔迪宫（Palazzo Bardi），这条街上所有的房产原本都是属于巴尔迪家族的。[12] 科西莫夫妇随后搬进了巴尔迪宫，所有房间也随之低调地换上了美第奇家族的纹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皮耶罗（Piero）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正如给科西莫的祝福中所写的那样：“上帝保佑你，让你与高贵、杰出的新婚妻子在新婚之夜就能孕育出一个男孩儿。”

孔泰西纳是一个缺乏想象力、挑剔且爱管闲事的女人，热爱美食，身材肥胖，但是也很能干，天性乐观、一心顾家、不善交际。她的受教育程度远不及其孙女们将来所能接受的那样，所以和其他佛罗伦萨人的妻子们一样，她是不被许可进入丈夫的书房的。科西莫很喜欢妻子，但也谈不上如胶似漆，那些因公事与妻子分开的日子并不难熬，他也极少写信给她。

他们第一次分开是在1414年。据他的朋友——书商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Vespasiano da Bisticci）说，时年25岁的科西莫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一起去参加康斯坦茨会议，一走就是两年。教皇被废黜之后，科西莫从阿尔卑斯山脉向北游历了很多城市，也访问了美第奇家族在德国、法国和佛兰德斯地区的分行。教皇约翰去世后，科西莫回到了佛罗伦萨，但是没过多久他又作为罗马分行的经理动身前往罗马了，而他的妻子则留在巴尔迪宫照顾大儿子皮耶罗和小儿子乔瓦尼。

科西莫在担任罗马分行经理的三年多时间里，只偶尔回佛罗伦萨探望家人，其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位于蒂沃利（Tivoli）的房子中，由一名叫马达莱娜（Maddalena）的女奴照看。这名女奴是科西莫的一个代理从威尼斯替他买来的，并且确认她是“一个健康的处女，大约21岁，没有任何疾病”。科西莫很迷恋她，与她同床共枕。马达莱娜为科西莫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卡洛（Carlo）。这种事在当时也是司空见惯，卡洛和孔泰西纳生的儿子们一起生活，同样接受正规、全面的古典教育。卡洛的外貌有明显的切尔克斯人特征，他长大后进入了教会，并且借助他父亲的影响当上了普拉托教区牧师（Rector of Prato）和教廷最高书记（Protonotary Apostolic）。[13]

科西莫在罗马成功避免了引起佛罗伦萨敌人的嫉妒，可是回到佛罗伦萨没多久，他出众的才能及所谓支持社会下层民众（*Popolo Minuto*）、反对大领主（*Magnati*）的观点就重新引起了阿尔比奇家族的怀疑。

科西莫的父亲一生谨慎小心，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谦逊温和的印象。当阿尔比奇家族试图拉拢他参与加紧对共和国政府的控制、稳固寡头政治的计划时，他拒绝了；阿尔比奇家族的对头们听闻此事，立刻跑来拉拢乔瓦尼加入更激进的抵制寡头政治的活动，乔瓦尼给出的答复是他没有任何想要改变政府现状的意愿，不论发生什么，他都只想专注于自己的生意，对政治活动分身乏术。与之类似，当阿尔比奇家族提议通过设立一种新的收入和财产税（*catasto*）来改革佛罗伦萨不公平的税制时，乔瓦尼也是在极其慎重地考虑了整个提议之后才表示支持，但是仍附加了各种各样的保留条件，以至于谁也琢磨不透他的真实态度。

乔瓦尼一生克己，从不给人嫉妒的理由，总是避免做出承诺，临死前还在病榻上叮嘱两个儿子要效仿他的做法：对富人和权贵不冒犯，对穷人和弱者要永远慷慨。

> 不要表现得像是在给出建议，而是要在对话中谨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除非是受到召唤，否则不要前往市政厅；即使被召唤前往，也只要完成被安排的任务就好；得到了认可也不要表现出骄傲……避免法律诉讼和政治争议，时刻避免进入公众的视线……

后来科西莫也给自己的儿子们留下了类似的忠告，但是抛开谦逊的外表和沉默寡言的举止不谈，科西莫其实远比他父亲更有野心，他立志要让自己的财富发挥不同的作用，而阿尔比奇家族也对科西莫的每一步举动都充满疑虑和关切。

---

[1] 美第奇家族标志上的小球从来没有确定的数量。最初是12个；到科西莫·德·美第奇时代则以7个为常见，比如美第奇宫东南角的盾牌上就是7个，可是在圣洛伦佐教堂高坛一角的韦罗基奥制作的圆盘上却是6个。圣洛伦佐教堂老圣器收藏室的天花板上是8个，公爵科西莫在王室祭堂（Capella dei Principi）的坟墓上是5个，大公费尔迪南德的观景城堡入口的盾徽上是6个。

[2] 圣母百花大教堂，也被称为杜奥莫教堂，其修建工程始于十三世纪末，由阿诺尔福·迪·坎比奥（Arnolfo di Cambio）设计。布鲁内莱斯基的圆顶直到1436年才完工，而外部的装饰在十年之后他去世时都没有完成。新哥特式正面是十九世纪末建造的。

[3] 红门街当时属于达万扎蒂宫（Palazzo Davanzati）（9号），属于达维奇家族，是他们在1330年前后建造的，现在这里变成了博物馆。

[4] 诺沃市场现在被称为稻草市场，是乔瓦尼·巴蒂斯塔·德尔·塔索（Giovanni Battista del Tasso）在1547年至1559年间建造的。

[5] 佛罗伦萨建筑物上的佛罗伦萨百合标志没有美第奇的小球多，在佣兵敞廊（Loggia dei Lanzi）后面老造币厂（old Mint）的十五世纪门廊上可以看到佛罗伦萨百合标志。

[6] 英美最小的重量单位，1格令约等于0.0648克。——译者注

[7] 圣玛丽亚诺韦拉的多明我会教堂和修道院是从十三世纪中期开始修建的，到十六世纪完工。从为教皇马丁五世修建的房间可以俯瞰整个大庭院。十六世纪六十年代瓦萨里对教堂内部进行了重新装修。鲁切拉伊、巴尔迪和斯特罗齐家族都在这里修建了家族教堂。大庭院里的一个小教堂于1515年由雅各布·卡鲁齐·蓬托尔莫（Jacopo Carrucci Pontormo）和里多尔福·吉兰达约（Ridolfo Ghirlandaio）进行重新装修，为的是迎接教皇莱奥十世乔瓦尼·迪·洛伦佐·德·美

第奇的来访。

[8] 斯皮尼家族十三世纪晚期冷峻风格的宫殿，现在被称作斯皮尼费罗尼宫，位于托尔纳博尼街和天主圣三桥边的阿恰尤奥利河滨大道的交会处。向下游方向的下一个宫殿就是十四世纪的吉安菲廖齐宫。再向下游走隔几个门是十七世纪的科尔西尼宫（科尔西尼河滨大道，10号），这里的画廊偶尔会向公众开放。

[9] 安杰利圣母修道院现在成了圣玛丽亚诺瓦医院的一部分。其中人们所知的阿尔法尼街（Via degli Alfani）上的安杰利圣母八角形小教堂（Rotonda di Santa Maria Angeli）是1434年起按照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建造的。

[10] 圣十字广场会举行传统的锦标赛，包括战车赛和足球比赛。一块写着1565年2月10日字样的牌匾标记了足球场地的中心。

[11] 帕拉·斯特罗齐雇佣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来创作自己父亲的家族教堂的祭坛装饰品《贤士来朝》。这个奥诺弗里奥·斯特罗齐的家族教堂就在圣三一教堂里。这幅祭坛装饰画里描画了多位斯特罗齐家族成员，现在收藏于乌菲齐美术馆。多明我会的圣玛丽亚诺韦拉教堂中的斯特罗齐堂里有一幅安德烈亚·奥尔卡尼亚（Andrea Orcagna）创作的祭坛装饰画以及纳尔多·迪·乔内（Nardo di Cione）创作的壁画。斯特罗齐家族的波焦阿卡伊阿诺别墅后来归属了伟大的洛伦佐。

[12] 巴尔迪街几乎全是由巴尔迪家族重建起来的。在他们修建巴尔迪宫（现已不存在）之前，这里就是一片叫作蚤窝（Borgo Pigiglioso）的贫民窟。圣十字教堂里的十四世纪巴尔迪家族教堂里有乔托及其助手创作的壁画。

[13] 卡洛·迪·科西莫·德·美第奇也是一位谨慎的收藏家。罗杰·范·德·韦登（Roger van der Weyden）的《埋葬》（*Entombment* ）就是他的收藏品之一，现在收藏于乌菲齐美术馆。

第三章 阿尔比奇家族的敌人

“连修道士的厕所里都装饰着他的纹饰”

阿尔比奇家族的领头人里纳尔多·迪·梅塞尔·马索（Rinaldo di Messer Maso）曾经是一名军人，也做过外交官。他是一个自大、骄傲、容易冲动的人，而且故步自封、反对改革。[1] 他对内坚定地维护寡头政治，如果有必要，甚至不惜将次要行会的数量减半；对外则主张通过武力在战场上打败佛罗伦萨的敌人们。那时他已经迫使执政团陷入了与米兰毫无结果的征战；在1429年他又极力鼓动向与米兰联手的卢卡（Lucca）宣战。佛罗伦萨和卢卡的恩怨由来已久，他们是彼此在丝绸贸易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击败卢卡的想法在佛罗伦萨城内受到欢迎，连科西莫本人后来也哀叹卢卡凭其从山脉地区延伸至海边的广阔疆域，战胜了各种征服它的尝试，屹立不倒。不过科西莫并不认为此时是加入战争的好时机，而且尽管他同意在紧急成立的十人战争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却仍带有明显的不情愿，并且暗示在阿尔比奇家族的领导之下佛罗伦萨军队不可能取胜。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卢卡人向米兰寻求援助，应他们的要求，公爵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向卢卡派出了伟大的雇佣军（*condottiere* ）指挥官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佛罗伦萨的雇佣军根本无法和斯福尔扎的队伍抗衡，于是佛罗伦萨的执政团花了五万弗罗林币将其收买；然而米兰公爵又为卢卡找到了一个有才能的将领尼科洛·皮奇尼诺（Niccolo Piccinino）。十人战争委员会随即又想出了更复杂的退敌之计，他们想引塞尔基奥河（Serchio）的河水冲垮卢卡搭建的防御壁垒。不过，这个计策也如反对者们所预计的那样失败了：卢卡驻军趁夜色冲出卢卡，推倒了佛罗伦萨人的水坝，河水倾泻而下，反而灌入了佛罗伦萨人的营地。到1430年秋天，科西莫认定再与这个损失惨重、耗资巨大的战争有任何瓜葛都是不明智的，于是就以希

望别人也有机会为战争委员会出谋划策为由，退出了委员会，离开佛罗伦萨前往维罗纳（Verona）。

在科西莫缺席的情况下，他的敌人开始散布谣言，称科西莫妄图利用自己的巨额财富收买雇佣军首领入侵佛罗伦萨共和国并推翻政府。有些人相信了这样的谣言；有些人虽然不信，却也乐于利用这样的谣言来解决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伙儿心存不满的贵族和大领主们一起去拜访了长者尼科洛·达·乌扎诺（Niccolò da Uzzano），他是佛罗伦萨最受敬重的政治家。这伙人的目的不仅是探询尼科洛如何看待他们攻击科西莫的提议，更是想获得他的支持。尼科洛在自己位于巴尔迪街的家中接待了这些人，虽然礼貌地倾听了他们的提议，但态度却是谨慎且不支持的：就算真的有可能除掉美第奇家族，让阿尔比奇家族势力更加壮大也未必就是好事，他们很可能会变成像米兰的维斯孔蒂一样的专制暴君。再说，最后的结果更有可能是，谁也无法彻底除掉美第奇家族。如果对两大家族的支持者做一番比较的话，阿尔比奇一方不见得能占到多少优势。而且念及以往美第奇家族的恩惠，社会下层民众肯定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此外，美第奇的支持者还包括城中几个最显赫的家族，如托尔纳博尼家族（Tornabuoni）和波尔蒂纳里家族（Portinari）都与美第奇家族有各种密切的生意往来；其他家族也从美第奇那里贷了款或收了礼物；还有一些则是通过联姻与美第奇家族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科西莫的妻子孔泰西纳所属巴尔迪家族，以及科西莫的弟弟洛伦佐的妻子吉内夫拉·卡瓦尔坎蒂（Genevra Cavalcanti）背后的卡瓦尔坎蒂家族[2] 和马莱斯皮尼家族（Malespini）。除此之外，在关系密切的人文主义者圈子内部，科西莫也有数不清的好朋友；相反，公然指责新古典知识与基督教信仰相对立的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则在这个圈子中树敌无数。

尼科洛·尼科利（Niccolo Niccoli）、卡洛·马尔苏皮尼（Carlo Marsuppini）、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和安布罗焦·特拉韦尔萨里（Ambrogio Traversari）

都是科西莫的密友，而这几位杰出的人物在佛罗伦萨的社会里都已经有相当的影响力。风流倜傥的尼科洛·尼科利是一个富有的佛罗伦萨羊毛商人的儿子，此时他已经六十六岁了，是这几个人中年纪最长的。他总是衣冠楚楚，是一个相当挑剔、吹毛求疵的业余艺术家。他从不关心家族生意，而是把继承来的财富都用在了他美丽的豪宅和了不起的收藏上。他的收藏品包括图书、手稿、勋章、钱币、凹雕玉石、浮雕和花瓶，“没有哪个到佛罗伦萨来的尊贵客人会错过参观他的藏品的机会”。科西莫比尼科洛小二十五岁，尼科洛开始收藏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科西莫深受尼科洛的影响，也开始进行类似的收藏。两人曾经计划一起去圣地（Holy Land）寻找古希腊手稿，但是这一行动并没有得到科西莫的父亲乔瓦尼·德·美第奇的支持。他可不想让儿子跟尼科洛一样“不务正业”，在科西莫被尼科洛其他奇思妙想引诱之前，乔瓦尼就把他安排到家族银行里工作了。尼科洛收藏的书籍超过八百本，这一数字直到他去世时还在不断增加，算得上当时最大的藏书规模了。他对收藏古董的痴迷程度至死不减，为此不惜卖房卖地，甚至向科西莫借钱。他本人从未创作过一本著作，因为他写的每段话都不能满足自己严苛的要求；不过他倒是创造了一种手写体，能够让抄写员更快、更整齐、更美观地抄写手稿，这种字体后来成了早期意大利印刷界使用的斜体字的基础。尼科洛甚至成为来佛罗伦萨的游客们好奇的对象，他们在街上追寻他经过时优雅高贵的身影，但是又被提醒他其实脾气不好，有时甚至会唐突无礼。唯一能让尼科洛感到惧怕的人是他那泼辣的情妇，这个女人曾经还是他另外五个兄弟之一的旧情人。这件事让他的家人都很反感，直到有一天他的两个兄弟实在忍受不了她的傲慢无礼，直接把她捆起来鞭打了一顿。对噪音敏感到连“被困住的老鼠发出的吱吱声”都听不得的尼科洛在听到情妇的尖叫时，竟然被吓哭了。

尼科洛的大部分手稿都是由他的朋友波焦·布拉乔利尼搜集来的。波焦·布拉乔利尼被认为是一位学者、演说家、散文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他还写过一个名为《波焦·布拉乔利尼笑话集》的系列作品，内

容都是些诙谐低俗的小故事。波焦1380年出生在佛罗伦萨附近一个小乡村里，父亲是个贫穷的药剂师。波焦年纪轻轻就赤手空拳地来到佛罗伦萨闯荡，他想尽办法获得了一个进入菲奥伦蒂诺学院（Studio Fiorentino）[3] 学习的机会。这所大学是1321年教皇被逐出博洛尼亚后创办的。作为该校的董事之一，科西莫极力推动这里的学科扩建，除了已有的语法、法学、逻辑学、占星学、外科学和医学等学科外，又聘请了伦理学、修辞学和诗歌学方面的教授。波焦学习的是法学，后来加入了律师业行会，并进入教廷负责撰写宗座牧函。波焦也陪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参加了康斯坦茨会议，几年之后他又和科西莫一起前往奥斯蒂亚（Ostia）度假，并在那一地区进行了一些考古研究。波焦足智多谋、有魅力、乐观、好享乐、幽默、智商极高，而且为达目的不惜使用贿赂修道士之类的手段。他作为尼科洛·尼科利的代理到德国、法国和瑞士寻找失传的手稿最终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但找到了各式各样隐藏的珍宝，更发现了一些失传已久、据说只有部分残存于世的手稿的完整版本。有一次，他到瑞士的一个修道院，那里的藏书室就设在塔楼底部昏暗、肮脏的地牢里。波焦在那里发现了卢克莱修（Lucretius）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 ）和阿比修斯（Apicius）的烹饪书，以及昆体良（Quintilian）的一本罗马教育方面的重要书籍。

至于那些不能够用钱买下的文本，波焦就亲自用一种优美、易识、间隔适度的手写体抄写下来。他参考的样式是十一世纪的卡洛林手写体，而非后来取代它的令人疲倦又粗笨的哥特式。科西莫看过波焦的抄本后，决定把自己所有的藏书都按类似的字体重新抄写。这种字体也同样受到早期意大利印刷界的青睐，并将其作为罗马字体的基础，就如他们将尼科洛·尼科利的手写体作为斜体字的基础一样。波焦的手抄本实际上成了现代手写体和印刷体的起源。

然而，波焦并不像有些人文主义者那样因醉心于学术而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他纵情于声色犬马，连工作的时候也喜欢有漂亮的姑娘陪伴

左右。他给尼科洛·尼科利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他正在拓写碑文，却被两个观看他工作的姑娘吸引住了，结果把正事抛到了一边。尼科洛听了感到非常惊讶，可是波焦却回答说：工作的时候，他更愿意有窈窕可人的姑娘，而不是“长着长角的水牛”陪伴左右。波焦有好几个情妇，仅他承认的私生子就有十四个之多，但是他完全有能力供养他们。凭借他的经济头脑和在教廷里的人脉，波焦挣了很多钱。他直到五十五岁才决定结婚，对方毫不意外又是个只有十八岁的美人，还带着丰厚的嫁妆。波焦用这笔钱买了一栋大宅，和妻子又生了六个孩子。

和波焦一样，科西莫的另一个人文主义者朋友——莱昂纳多·布鲁尼——刚到佛罗伦萨时也是个穷小子。他也在菲奥伦蒂诺学习法律，在教廷任职并且积累了不少的财富；但是比起波焦，莱昂纳多绝对是个严肃认真的人。他长着一个尖鼻子，给人感觉很机警，有些傲慢，其他人文主义者认为他有“绝顶的口才”。莱昂纳多强烈反对尼科洛·尼科利包养情妇的事，而波焦在他看来根本就是堕落腐化的典型。莱昂纳多为了和一位受人尊敬、极度富有的年轻姑娘结婚而放弃了在教会里继续发展的念头。婚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与翻译中，并且在政府里为佛罗伦萨的公共事业鞠躬尽瘁。他极力宣扬佛罗伦萨是古代共和国体制的继承者，并最终成为佛罗伦萨的总理大臣并长期任职。他的美名传扬甚广，甚至连西班牙国王的使节都曾拜倒在他高贵的红袍之下。

科西莫的另一位挚友，安布罗焦·特拉韦尔萨里同布鲁尼一样受人尊敬，但是他比后者更加谦虚圣洁，是个连肉都没吃过的苦行僧。特拉韦尔萨里从罗马涅地区（Romagna）来到佛罗伦萨。他的家族在罗马涅地区拥有大片的地产，他也刚刚当上苦行的卡马尔多利会（Camaldolite Order）的代理主教（Vicar-General）。特拉韦尔萨里还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学者，他自学了希伯来语，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事实上，他可以随口把希腊语翻译成通畅、优美的拉丁语，其速度之快，连尼科洛·尼科利这位佛罗伦萨城里写字最快的人都跟不上他口述的速度。特拉韦尔萨

里比科西莫小三岁，他为科西莫翻译了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的所有著作，包括那些他诚实的精神所无法苟同的不洁段落。科西莫经常出入特拉韦尔萨里在安杰利圣母修道院的房间，而面对即将发生的美第奇家族与阿尔比奇家族的冲突，他更是对特拉韦尔萨里感激不尽。

另一个经常出入修道院的是卡洛·马尔苏皮尼。他来自阿雷佐的一个贵族家庭，也是一名学者，并被任命为大学的修辞学和诗歌学讲师。他当时只有三十二岁，是科西莫的人文主义者圈子里最年轻的朋友，但是他的学识已经名声在外。在其最著名的一堂课上，他引用了所有已知的希腊和拉丁学者的论述。马尔苏皮尼在著书立说方面不如布鲁尼多产，但也不像尼科洛·尼科利那么苛刻挑剔。他把一两本希腊著作翻译成了拉丁文，还写了一些诗歌警句，并为科西莫母亲的葬礼创作了一篇演讲词。

马尔苏皮尼在大学中的死对头是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名叫弗朗切斯科·费勒夫（Francesco Filelfo）。费勒夫的父母都是佛罗伦萨人，但他却是在安科纳（Ancona）附近的托伦蒂诺（Tolentino）出生的，当时他的父母就居住在那里。费勒夫不到二十岁就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古典主义学者了，并且被威尼斯委以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重任。在那里，他娶了自己希腊语老师约翰·克里索卢拉斯（John Chrysoloras）漂亮的女儿。而克里索卢拉斯的兄弟伊曼纽尔·克里索卢拉斯（Emmanuel Chrysoloras）之前是佛罗伦萨大学的希腊语教授。后来费勒夫受尼科洛·尼科利的邀请来大学授课。起初，尼科洛很满意费勒夫的才华和活力。费勒夫的课一堂接一堂，从早讲到晚，对什么内容他都能侃侃而谈，他讲西塞罗（Cicero）和泰伦斯（Terence），荷马（Homer）和李维（Livy），修昔底德（Thucydides）和色诺芬（Xenophon）；此外，他还教授伦理学课程，每周要到教堂做一次关于但丁的公开讲座；所有这些活动之外，他还能挤出时间创作无数的警句、颂歌、演说词和历史故

事，甚至还会翻译，只要有钱可赚。过了一段时间，尼科洛·尼科利就后悔邀请这个留着拜占庭式络腮胡的浮躁年轻人来佛罗伦萨了。事实证明，费勒夫是一个虚荣、粗暴、无礼、贪财、挥霍无度且爱记仇的人。科西莫的朋友们都避免与他接触，当他与马尔苏皮尼争论时，他们都选择支持后者。于是费勒夫转而投靠了阿尔比奇家族，替他们做舆论攻击的差事。费勒夫刚来佛罗伦萨时，科西莫不但热情款待了他，还替他付了房租；而现在，费勒夫反过头来对科西莫加以最无情的攻击。

只要佛罗伦萨的这些人文主义者还是科西莫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只要尼科洛·达·乌扎诺还活着，科西莫就不用担心阿尔比奇家族有足够的力量来毁灭美第奇家族。尽管尼科洛·达·乌扎诺总体上认同阿尔比奇家族的政治观点，但是他也一直很尊重美第奇家族，甚至在科西莫父亲的葬礼上还伤心落泪。可是到1432年，尼科洛·达·乌扎诺也去世了，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反对美第奇家族的阴谋迅速成熟起来。城里到处流传着关于美第奇家族的恶毒谣言，毋庸置疑大部分是由费勒夫传播的。这些谣言说道：科西莫穿着简朴是为了避免引起民众对他通过不法途径聚敛的财富的注意；他所谓的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心不过是追求私利者挂在口头的掩饰之词；不是有人听到他亲口说“除非是有利可图或是出于恐惧之心，否则没有人会做诚信之事”？他向慈善事业和建筑项目的捐款更是伪善，不过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花钱买良心上的安慰而已，更何况哪一笔善款不是大肆宣传，哪一座由他出资的建筑上没有把美第奇的纹饰放在醒目的位置？“连修道士的厕所里都装饰着他的纹饰！”就是在这种舆论的作用下，1433年年初的一个夜晚，有人往科西莫家的大门上泼洒了鲜血。

像1430年退出战争委员会前往维罗纳一样，此时的科西莫选择再次离开佛罗伦萨，这次他到自己在穆杰洛的特雷比奥（il Trebbio）的房产里待了几个月。[4] 与此同时，他将自己在佛罗伦萨银行里的巨额财产悄悄转移到了罗马和那不勒斯的分行里，还将成袋的钱币寄存在圣米尼亚

托主教堂（San Miniato al Monte）的本笃会隐士和圣马可（San Marco）的多明我会修道士那里，这样如果阿尔比奇家族开始行动，这些财产就可以免于被没收。

科西莫不在城里的这段时间，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控制了执政团在九月的选举。他的操控非常隐蔽，结果九名当选的执政官中，七名都是明确支持他的。另外两名据称有可能是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他们分别是巴尔托洛梅奥·斯皮尼（Bartolommeo Spini）和雅各布·贝林吉耶里（Jacopo Berlinghieri）。当选首席执政官的是贝尔纳多·瓜达尼（Bernardo Guadagni），为了确保他的参选资格，阿尔比奇家族不得不先免去了他所有的债务。[5]

九月的第一周，科西莫还在穆杰洛。在这里他收到瓜达尼的紧急召唤，要求他马上回到佛罗伦萨，并被告知“有重大事项需要做出决定”。科西莫决定直面自己的命运。

1433年9月4日，科西莫回到了佛罗伦萨。当天下午他就到市政厅拜见了首席执政官贝尔纳多·瓜达尼。但是贝尔纳多·瓜达尼言辞闪烁，不谈正题，只是说这个需要科西莫从穆杰洛回到佛罗伦萨的“重大决定”，要到三天后执政团正式召开会议时才能被正式讨论，同时对于城中过去几天要出大事的传言他也无可奉告。

离开市政厅后，科西莫去拜访了他认为还是朋友的在任执政官之一，但是得到的回答同样是一些模棱两可的安慰之词。随后他又去了自家的银行，毫无疑问是去转移更多的财产。在此之后，他再无他法可想，只能坐等即将召开的执政团会议。

7日上午，科西莫到达市政厅的时候，执政团会议已经开始了。在侍卫队长的押送下，科西莫登上楼梯，经过紧闭的会议室大门，被关进了牢房。很快便有人通知他说“有充分的理由对其进行关押，会尽快向

其说明”。

两天后，也就是9月9日，科西莫所在牢房顶上的钟楼里，巨大的牛钟发出隆隆的响声，召唤所有佛罗伦萨人到市政厅前的广场上参加市民议会。低沉的牛叫一般的钟声响彻整个城市，市民们纷纷响应前往。但是广场入口有武装的阿尔比奇家族支持者把守，所有明确或有可能支持美第奇家族的市民都被拦在了广场之外。科西莫后来回忆说，他当时从牢房的窗口向下望，广场上被允许进入的市民最多不超过23人，他们就站在执政官们所在的位于宫殿一层的围栏（*ringhiera* ）前。执政团秘书代表执政团询问到场的公民是否同意设立一个由200人组成的最高司法委员会来“代表人民的利益进行改革”。在场公民们恭顺地给出了许可，于是这个最高司法委员会得以顺利组建。

尽管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看似掌控了政府并强烈建议判处科西莫死刑，但是最高司法委员会的成员们却没有痛快地接受他的提议。委员会里的讨论十分激烈，迟迟无法达成共识。一些成员同意判处科西莫死刑，另一些则坚持流放就足够了，甚至有一两个委员提议应当将科西莫无罪释放。很多委员不愿意顺从阿尔比奇对科西莫处以极刑的原因显而易见：对成千上万支持他的市民来说，科西莫依然是他们心中的英雄，虽然这些人暂时被威慑和压制，但是委员们害怕死刑判决会引发强烈的反对；除此之外更令他们担忧的是，科西莫的被捕已经引发了外国势力的激烈抗议。费拉拉（Ferrara）侯爵是美第奇银行的客户，他已经代表科西莫的利益提出干涉。威尼斯共和国在财政方面也受科西莫关照颇多，此时派出了三位大使前往佛罗伦萨全力确保科西莫被释放；如科西莫本人所说，就算大使们与里纳尔多谈不拢，他们的到来也足以“给那些本来支持判处死刑的人施加巨大的影响”。科西莫的老朋友，同时也是卡马尔多利会代理主教的安布罗焦·特拉韦尔萨里此时也拜访了里纳尔多；甚至据说还有一位更有影响力的美第奇银行客户——欧金尼乌斯四世（Eugenius Ⅳ）——也向他打了招呼。欧金尼乌斯四世是一个威

尼斯商人的儿子，他于两年前继任马丁五世成为教皇。此时里纳尔多已经严刑拷打了科西莫的两名支持者，成功给科西莫扣上了叛国的罪名。其中一个支持者尼科洛·蒂努奇（Niccolo Tinucci）是一位有名的公证人，也是一位业余诗人。他被刑讯官严刑逼供，最终屈打成招，指认科西莫有意召集外国势力在佛罗伦萨进行革命。无论是特拉韦尔萨里还是威尼斯大使都不相信这份供述，佛罗伦萨的大多数市民也不相信。渐渐地，里纳尔多也被迫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判处流放要比他的亲信弗朗切斯科·费勒夫坚持要求的死刑更明智。

科西莫在关押他的市政厅钟楼牢房里获许会见了特拉韦尔萨里及少数几个经过挑选的访客。因为怕被下毒，科西莫还被批准食用巴尔迪宫送来的饭菜。但是看守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避免科西莫与外界交换任何消息，更不允许他和银行之间有任何通信。给科西莫的食物从制作到送达全程都有官员监督，他与访客谈话时也必须有守卫在场监听。不过，这个叫费代里戈·马拉沃尔蒂（Federigo Malavolti）的守卫对科西莫怀有同情之心，再加上一点贿赂，科西莫的信息还是被顺利传出了牢房。连穷困的首席执政官贝尔纳多·瓜达尼本人都欣然接受了1000弗罗林币的贿赂，如果他狮子大张口，美第奇家族无疑会全力满足，科西莫事后嘲讽地评价他是个软弱无能的人。不过，贝尔纳多·瓜达尼在收受“价格合理”的贿赂之后，就宣布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再参与委员会的审议工作，并将自己的投票权委托给另一位执政官马里奥托·巴尔多维内蒂（Mariotto Baldovinetti）。而这位与贝尔纳多·瓜达尼一样穷困的执政官自然也是美第奇金库早就打点好的。

原本的支持者都被对方收买并倒戈，美第奇银行强大的外国客户团也不断地施加压力；再加上美第奇家族忠诚的朋友们日益直白的表态，就连帕拉·斯特罗齐这样有影响力的温和派也逐渐脱离自己的阵营；除此之外，阿尔比奇家族甚至还面临着出现武装起义的危险。科西莫的弟弟洛伦佐一听到哥哥被捕，就马上和美第奇家族的其他一些成员赶往穆

杰洛集结军队准备救人；与此同时，卡法焦洛的小部分美第奇家族支持者也集结了队伍；据说连雇佣军指挥官尼科洛·达托伦蒂诺（Niccolo da Tolentino）也被科西莫的朋友内里·卡波尼（Neri Capponi）收买，已经带着一队雇佣兵从比萨前往拉斯特拉（Lastra）准备参战。尼科洛·达托伦蒂诺的队伍在拉斯特拉按兵不动，因为他们担心进一步逼近会引发佛罗伦萨城内的骚乱，难保科西莫不会在混乱中被暗杀。即便没有交战，还是不得不承认，尼科洛·达托伦蒂诺的存在是促使阿尔比奇最终放弃将这个令他头疼的囚犯处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9月28日，科西莫被判流放帕多瓦（Padua）10年，而他诡计多端的堂兄弟阿伟拉多（Averardo）也被判流放那不勒斯10年。至于他那不怎么抛头露面、也不那么有威胁的弟弟洛伦佐则被判流放威尼斯5年。整个美第奇家族，除了维耶里一支外，全被划定为贵族阶级，永远不得在政府中就职。他们在佛罗伦萨的组织领导者普乔·普奇（Puccio Pucci）和乔瓦尼·普奇（Giovanni Pucci）也被判流放到阿奎拉（Aquila）10年。[6] 执政团里两名没有追随阿尔比奇家族的执政官没有受到其他执政官所得的利益和嘉奖。

科西莫拥有诸多美德，但刚勇血性似乎是他一直缺少的。所以当被召唤到市政厅面前听取审判结果时，他表现得有些可怜巴巴。他辩解说除非受到召唤，他本人从来没有主动和执政团接触过，也“一直不愿担任官员职务”，而且不但没有煽动托斯卡纳地区的任何城市反抗政府，还曾经帮助政府筹集资金组建军队打击地方势力。尽管如此，科西莫还是在执政官面前郑重声明：

> 既然判决我流放帕多瓦，我在此声明我会遵从判决前往，并且按照你们的命令待在那里。别说是到特雷维佐地区（trevisian state），就是判我流放到阿拉伯或者其他任何完全陌生的国度，我也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你们的命令对我而言是灾难，但我依然心存感激，宁愿把这看作恩赐而非祸患……只要知道我的敌人能为这座城市带来和平与幸福，我受什么苦难都是值得的……我只恳求你们一件事，长官大人

> 们，既然你们免我不死，就请你们保障我的性命不会丧于邪恶的市民之手，否则那将是你们的耻辱……请确保那些手握尖刀、等在广场之外迫切想伤我性命的人不会得逞。我死事小，只怕你们会背上永久的恶名。

其实执政团像科西莫担忧自己的性命一样惧怕无法控制的暴乱，因此他们下令犯人应当乔装打扮，连夜穿过圣迦尔门（Porta San Gallo）离开佛罗伦萨。全副武装的侍卫一直护送他至边境，然后才由科西莫自行取道费拉拉，最终到达帕多瓦。

---

[1] 阿尔比奇家族的中世纪塔楼位于阿尔比奇镇。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建造的宫殿已经不复存在。现在这个位置是88号阿尔托维蒂宫（Plazzo Altoviti）。

[2] 卡瓦尔坎蒂家族小教堂里由多梅尼科·韦内齐亚诺（Domenico Veneziano）创作的《圣人弗朗西斯和施洗者圣约翰》（*Saints Francis and John the Baptist* ）现在收藏于圣克罗切歌剧博物馆（Museo dell’Opera di Santa Croce）。卡瓦尔坎蒂家族的由多纳泰罗创作的《圣母领报》（*Annunciation* ）则被收藏在圣十字教堂。

[3] 菲奥伦蒂诺学院后来升级为大学。现在位于圣马可广场附近的建筑是由托斯卡纳大公的马厩改造而来。北侧的植物园名叫草药园（Giardino dei Semplici），面向拉马尔莫拉街（Via Lamarmora），是在十六世纪中期根据科西莫一世的指示建造的。

[4] 美第奇家族世代拥有卡法焦洛这片土地，特雷比奥就在离卡法焦洛大约一英里外的一座山顶上。据瓦萨里称，原本的中世纪堡垒经米开罗佐为科西莫进行了改造，重修了庭院，加入了敞廊，还把堡垒和塔楼四周的防御壁垒改建成了带顶棚的通道，整座建筑不再那么荒凉冷峻。1644年这里被出售给朱利亚诺·塞拉利（Giuliano Serragli）。1864年又被卖给王子马尔坎托尼奥·博尔盖赛（Prince Marcantonio Borghese）。后来又被恩里科·斯卡雷蒂（Dott.Enrico Scaretti）买走并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重新修复。他的遗孀，也是格拉德温勋爵（Lord Gladwyn）的妹妹一直居住在这里，至此书创作之时依然如此。

[5] 瓜达尼宫位于圣神教堂广场（7～9号），是在十六世纪初期为代家族（Dei）建造的。1684年被多纳托·瓜达尼（Donato Guadagni）买下。

[6] 十六世纪的普奇宫位于普齐街（2～4号）。赛尔维街拐角处的盾徽是乔瓦尼·迪·洛伦佐·德·美第奇，即教皇莱奥十世的。普奇家族支付了圣母领报大殿

敞廊的修建费用，该敞廊是由卡奇尼设计并于1601年修建完工的。普奇家族的家族教堂在圣母领报大殿内的许愿小院（Chiostrino dei Voti）东墙侧面。韦罗基奥创作的伟大的洛伦佐的雕像在洛伦佐逃脱帕奇家族的暗杀后就在这里展示，但现已丢失。据瓦萨里称，波提切利的圆形浮雕《贤士来朝》就是由普奇家族订制的，现在陈列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

第四章 被流放者与国家的主人

“他就是无冕之王”

在去流放地的路上，科西莫受到的多是赞誉而非斥责。费拉拉侯爵热烈欢迎并盛情款待了他；到了帕多瓦，科西莫也被当成尊贵的客人，受到当地官方的接待，一位身份如此显赫又腰缠万贯的人物被流放到本地显然使他们感到无比喜悦。可以确定的是，科西莫依然富有，在他被关押期间，阿尔比奇一切想要让他破产的尝试都失败了。里纳尔多沮丧地告诉自己的朋友：“如果没有万无一失的把握，就不要挑战强大的敌人。”他现在才被迫认清了这一点，虽然暂时把美第奇家族赶出了佛罗伦萨，但是他自己在城里的位子并没有坐稳。

在帕多瓦待了两个月之后，科西莫获许离开这里到威尼斯和弟弟团聚。威尼斯的圣乔治马焦雷修道院（San Giorgio Maggiore）给他提供了住处。他在这里把一切安排妥当，并且宣布出资为修道院修建一所急需的藏书室。[1] 当然这主要是因为他得知教皇欧金尼乌斯四世曾在这里做过修道士，对这座修道院颇有感情。他委托了年轻的佛罗伦萨建筑师米开罗佐·米凯洛奇（Michelozzo Michelozzi）来设计藏书室。米开罗佐是陪同科西莫一起来威尼斯的，因为他在佛罗伦萨为科西莫设计建造的房子现在暂时停工了。

虽然身在威尼斯，科西莫对佛罗伦萨的时局变迁依然了如指掌，因为他的支持者们无时无刻不在策划推翻阿尔比奇家族的大业。1434年2月初，口才出众、学识过人的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Agnolo Acciaiuoli）[2] 因为指责阿尔比奇家族的独裁统治而遭逮捕，并被判处流放科森扎（Cosenza）10年。短短几周之后，科西莫的一个远房亲戚马里奥·巴尔托罗梅奥·德·美第奇（Mario Bartolommeo de’Medici）也因

涉嫌破坏阿尔比奇家族的外交政策而被逮捕并判处流放10年。

科西莫小心避免了被扣上与他们同谋的罪名。他知道阿尔比奇在佛罗伦萨的地位每况愈下，而威尼斯和罗马都支持美第奇家族的回归。更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自从美第奇家族离开以后，其他银行“连一个开心果”都不能提供给政府。1434年夏天在伊莫拉（Imola），佛罗伦萨军队在一场决定性战斗中输给了米兰雇佣兵，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随之达到了高潮。重新选举的结果是一批众所周知的美第奇家族支持者当选执政官，他们中的尼科洛·迪·科科（Niccolo di Cocco）还被选为首席执政官。

如果不是因为帕拉·斯特罗齐的反对，里纳尔多可能会直接用暴力来阻挠这次选举。自从尼科洛·达·乌扎诺去世后，富可敌国的帕拉·斯特罗齐就成了佛罗伦萨寡头政治体系中最受尊敬也最有影响力的温和派。在他的劝说下，里纳尔多同意当选的执政官们就职，但前提是谁要提议把美第奇家族请回佛罗伦萨，谁就会被强行驱逐出市政厅。可惜，执政团已经决心不再受他的恐吓，他们抓住九月里纳尔多暂时不在佛罗伦萨的机会，发出了这份令他恐惧的邀请。里纳尔多一回到佛罗伦萨就被执政团召唤前往市政厅，但是因为担心自己会像科西莫一样被逮捕并关进“小旅馆”，并以为拥有帕拉·斯特罗齐、乔瓦尼·圭恰迪尼（Givoanni Guicciardini）[3]、里多尔福·佩鲁齐（Ridolfo Peruzzi）[4]和尼科洛·巴尔巴多里（Niccolo Barbadori）[5]的支持，里纳尔多决定无视执政团的召唤，而是直奔宫室，召集自己的支持者武装起来，下令让五百人组成的侍卫队去占领市政厅对面的圣彼尔谢拉吉奥教堂（San Pier Scheraggio）[6]，并时刻准备攻占市政厅。宫殿门口的守卫已经被重金收买，就算执政团下令锁紧大门，他也会让里纳尔多的军队自由进入。

9月25日早上，里纳尔多的军队开始部署位置，但是执政团对此并非毫无准备。他们也把自己的军队部署到了广场之上，还安排士兵在街

上来回巡视。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围困，他们已经向宫殿里运送了必需品。然后他们就关闭了宫殿的大门并设置了壁垒，同时继续从周边区域调集力量作为支援。为了给集结增援力量争取时间，执政团派出两名执政官前去与阿尔比奇谈判，而他们请来的另一位更有影响力的中间人——教皇欧金尼乌斯四世——此时也已经到达了佛罗伦萨。

欧金尼乌斯四世的前任马丁五世来自极有权势的科隆纳（Colonna）家族。但是欧金尼乌斯四世刚刚和这个家族发生了争执，并被一群张狂的暴徒赶出了罗马逃往佛罗伦萨，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为他提供了庇护之所。这里的人都知道欧金尼乌斯四世曾经表达过他对美第奇家族的同情，并且希望在美第奇家庭财力的支持下，一个强大的佛罗伦萨政府能够和威尼斯联手，帮助他重回罗马。9月26日下午，教皇的代表——枢机主教维泰斯基（Vitelleschi）——离开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去找里纳尔多，为的是说服他到修道院与教皇面谈。

至此时，里纳尔多正变得孤注一掷。他成功占领了圣阿波利纳雷广场（Piazza Sant’Apollinare）并且关闭了所有出口，下一步就要围困巴杰罗宫，攻打市政厅，烧毁所有美第奇家族和他们主要支持者的房屋。不过，虽然他从佛罗伦萨以外召集了无数的雇佣兵，但都只是承诺他们可以掠夺战利品而非向他们支付确定的报酬，更何况这些军队至今迟迟无法赶到佛罗伦萨；而城内的军队渐渐开始背弃他。最糟糕的是，里纳尔多要想取胜，几大家族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但此时的情况是：乔瓦尼·圭恰迪尼宣称他能做的只有保证不让自己支持美第奇家族的兄弟皮耶罗（Piero）向执政团提供支援；之前暗示可以提供500人武装队伍供里纳尔多差遣的帕拉·斯特罗齐现在也改变了注意，只带了两个随从来到圣阿波利纳雷广场，和里纳尔多简单交谈了两句就匆匆离开了；里纳尔多最主要的支持者里多尔福·佩鲁齐也开始动摇，并且接受了执政团的召唤，但是这次会面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于是里多尔福·佩鲁齐转而敦促里纳尔多接受枢机主教维泰斯基的邀请去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

和教皇面谈。

在佩鲁齐和巴尔巴多里的陪同和一个临时组建的支持者武装队伍的护送下，里纳尔多在当晚六点多出发前往修道院。途中他们经过马特利（Martelli）家族的住处，而这一家族中的长者一直都是美第奇的好朋友，有时还会有生意上的合作，所以他们试图阻拦里纳尔多前进。双方爆发了打斗，好几个人受了重伤。马特利家族的侍卫终于被逼回房子里后，里纳尔多又费了好大劲才阻止了护卫们冲进马特利宫洗劫财物并说服他们继续跟随他向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前进。[7] 一行人马怨声载道地抵达了修道院，并在前面的广场上休息，不过显然已经没有人愿意长时间留在外面等待。

里纳尔多从修道院出来的时候，夜已经深了，确实没有多少护卫留下等他。他只找到一小拨儿还坐在广场上的人。他的精神显然已经崩溃了。在刚刚的谈话中，教皇的神情举止是那么高高在上，说话又那么富有技巧。里纳尔多被告知教廷的意愿与执政团的意愿是一致的，继续抵抗也只是徒劳。虽然教皇表示会尽己所能保护阿尔比奇家族不受敌人的报复，但是这并没有给里纳尔多带来多少安慰，他只能就这么回去了。

两天之后，钟楼上的牛钟被敲了整整一个小时来召唤市民参加议会。市民们集中到广场上之后，军队从外面将他们围了起来。枢机主教维泰斯基及教皇的另外两位代表最先出现在围栏之内，伴随着响亮的号角声，全体执政官和共和国的官员们很快也都到齐了。执政团秘书依照传统向市民们大声提问："佛罗伦萨的市民们，你们是否许可成立最高司法委员会来代表人民的利益进行改革？"人群顺从地表示同意，一个由350名市民组成的最高司法委员会随即被选举出来。对于美第奇家族的流放判决立刻被撤销了，他们还因为流放期间的良好表现而受到了赞扬，并被正式邀请回到佛罗伦萨。

1434年9月28日，也是科西莫被流放整整一年之际，他在300名威尼

斯士兵的护送下离开威尼斯返回佛罗伦萨。几天后，他在晚餐时间到达了位于卡雷吉（Careggi）的乡村别墅。[8] 一路上经过的村庄，到处都是向他欢呼致敬的农民。通往佛罗伦萨的道路上也满是欢迎的民众，连佛罗伦萨城内的街道上也聚满了翘首以盼的市民，等着目睹美第奇家族荣耀的回归。为了避免发生骚乱，执政团紧急通知科西莫等天黑再进城。日落之后，科西莫在弟弟洛伦佐的陪同下，带着一个仆人，跟随一个城里派来的执仗官，从巴杰罗宫附近的一个小通道重新进入了佛罗伦萨。他在市政厅一个特意为他准备的房间里过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先去拜见了教皇并感谢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然后才回到巴尔迪宫。迎接他的群众聚集在街上喧闹地欢呼，仿佛他是“取得大胜凯旋”的英雄。

此时对他敌人的判决已经被公布出来。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和他的儿子，甚至后代都不得进入佛罗伦萨，其他几个家族也受到了同样的判决，有的甚至是整个家族都被流放，因为依照佛罗伦萨的习惯，有时犯罪被认定为既是个人罪行也是集体同谋。在被流放人员名单中还包括佩鲁齐、瓜斯科尼（Guasconi）、瓜达尼和圭恰迪尼家族的成员，以及尼科洛·巴尔巴多里和马泰奥·斯特罗齐（Matteo Strozzi）。事实上，被流放的总人数超过了70人，其中很多是众所周知的大家族。所以，也有人抱怨科西莫把佛罗伦萨的大家族都赶走了，而科西莫则以他一贯的嘲讽口吻反击道：“在佛罗伦萨，扯七八码红布就可以造就一个新市民。”

科西莫回归之后，弗朗切斯科·费勒夫并没有留在这里接受和阿尔比奇一样的判决，而是早早逃到了锡耶纳（Siena）去效忠维斯孔蒂家族。费勒夫写了一系列诽谤美第奇的文章来煽动佛罗伦萨人起义，甚至可能还协助雇用了一个希腊杀手刺杀科西莫。没什么人为这个令人厌烦、脾气乖戾又爱慕虚荣的学者离开佛罗伦萨感到可惜，倒是有很多人为值得尊敬、诚实守信的帕拉·斯特罗齐被流放帕多瓦而难过。然而科西莫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富可敌国又容易受人影响的帕拉·斯特罗齐必

须离开佛罗伦萨，这样才能保证他自己在佛罗伦萨的位置更稳固。当被请求看在旧时情分上帮助美言几句的时候，科西莫还是摆出了他标志性的模糊态度，对最终判定的流放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他显然有理由安慰自己说，政治从来不是帕拉·斯特罗齐的强项，在帕多瓦那个没有政坛纷争侵扰的地方，他的生活反而会更幸福。事实也证明，帕拉·斯特罗齐在帕多瓦安顿下来，过上了平静祥和的日子，终日忙于研究、讨论和收集藏书。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科西莫不止一次希望自己能过上那种简单的生活。在其他一些意大利邦国里，死刑是比流放更常用的刑罚，统治者背后也都有强大的军队在支持和保护。但死刑和军事独裁都不是佛罗伦萨的传统，而佛罗伦萨的传统是不容被质疑的。科西莫想成功地统治佛罗伦萨，就必须做得像他根本没有在统治佛罗伦萨一样；如果想要改变现有的政治结构，就必须精心计算，把可能产生的对传统的冒犯降低到最小。如果不依靠政治影响力就能控制并扩大自己的银行事业，那么科西莫一定愿意隐于幕后，远离这些纷争。银行事业才是他最大的成就感来源，就算有一根点石成金的魔杖在手，科西莫也会选择继续做一个银行家。然而，像他父亲被迫认清的现实一样，佛罗伦萨的富商想避免参与政治，绝对是不明智的。即便如此，科西莫还是成功扮演了一个单纯的、成功的银行家角色。表面上他乐善好施、平易近人，时刻准备好接受共和国委派给他的任何政治或外交任务，并且协助制定财政政策，而实际上他才是佛罗伦萨最有权势的人。他以极其精妙的技巧维持着自己的权势地位，他的朋友书商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写道：“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嫉妒，科西莫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时，会想方设法让这个提议看起来是由别人而非他提出的。”至于多得无法掩饰的巨额财富，科西莫会按照比别人高很多的标准缴税。不过同任何精明算计的富人一样，科西莫也会做假账，通过夸大坏账的数额来降低需纳税部分的数额，使实际缴纳的税款远低于其真正收入应缴纳的数额。没有人真正清楚科西莫到底有多富有。他一生中被选举为首席执政官的次数不超过三次，也从不

考虑担任什么永久性的政府职务，更不会冒佛罗伦萨人之大不韪去建议从本质上改动现行的并不完善的宪法。他唯一的提议是建立一个“大委员会”（*Consiglio Maggiore* ），全权负责国家安全和税务，这个机构是后来的“百人团”（*Cento* ）的前身。科西莫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形式的炫富，他选择骑骡子而不是高头大马。待时机成熟后，他甚至故意让众人以为那个虚荣、健谈、奢侈且充满野心的卢卡·皮蒂（Luca Pitti）才是佛罗伦萨最有权势的人。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它表面呈现出来的样子。尽管宪政机构和部门都像原来一样存在，但是在遇到政治压力或军事威胁的时候，美第奇家族总可以委托精心挑选的选举官（*Accoppiatori* ）来操控候选人名单，防止美第奇家族的敌人当选执政官。大部分选举官都与美第奇一派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比如同样是从被流放地召唤回来的显赫市民阿尼奥洛·阿恰沃利就支持美第奇一派；精明、能言善辩的组织家普乔·普奇，不仅是科西莫从工匠阶层中提拔起来的人才，也是公认的美第奇一派的经理人。美第奇一派的根基无时无刻不在扩大。在普奇的建议下，贵族被重新定性为平民（Popolani），这样他们理论上就拥有了竞选政府职务的资格。这一举措也赢得了下层民众的欢迎，他们选择将其理解为一个值得赞扬的民主决定。那些出身卑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在佛罗伦萨历史上第一次被视为有能力担任政府职务的人，这更让民众感到无比满足和自豪。然而事实上，当权者早就想好了措施以避免这一政策偏离他们的意愿。古老的贵族家庭依然是被排除在实权之外的，而超过四分之三人口的劳动者依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以圣玛丽亚诺韦拉区域为例，该区新获批准的159个有资格作为候选人的市民中，超过145人是依据1449年规定本来就有竞选资格的人的儿子、孙子或兄弟。

短短几年间，表面上松散的美第奇一派，其势力根基已经相当稳固，而且他们被坚定地视为代表佛罗伦萨整体的利益，所以科西莫不再需要费心去压制什么反对声音。他的老朋友内里·卡波尼（Neri

Capponi）是个传统的共和派，他偶尔会表达一些对科西莫暗中发展势力的担忧；另一位有同样担忧的是詹诺佐·马内蒂（Giannozzo Manetti），他是一位富有而博学的商人，时常会被委以外交任务。不过这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强大的背景，而且很快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卡波尼在1455年就去世了，而马内蒂则抗议说佛罗伦萨野蛮的重税几乎让他破产，最终选择离开这里去了那不勒斯。

尽管实际情况可能不如科西莫的批评者们后来所说的那么严重，但是科西莫一派以操控佛罗伦萨的税收体系为手段来打压敌人是绝对存在的。以普乔·普奇为代表的税务官员们在计算批评者的应缴税款时可没什么公平公正的念头。普乔·普奇作为美第奇一派的经理人，免不了要替科西莫干一些不怎么光彩的勾当。这其中就包括低价购买被流放人员的地产或通过买卖政府债券来聚敛个人财富等。

就是因为这些，尽管少有公开的指责，但美第奇一派绝不是广受爱戴的，甚至有些时候，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事实上，在1458年，美第奇一派几乎濒临瓦解的边缘。当年1月，在经历经济长期停滞之后，佛罗伦萨的商人和地产拥有者们惊闻又要加征新税。到初夏的时候，就出现了要修改宪法的声音，随后又有传言说反对修宪的人已经被逮捕，严刑拷问之后交代了同谋。佛罗伦萨城里的不满情绪此刻已经十分高涨，科西莫不得不通过他在米兰的银行租下帕维亚（Pavia）的一套房子，一旦佛罗伦萨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他就打算和妻子一起搬到那里去。他的儿媳已经带着孙子们躲到了卡法焦洛的别墅里，科西莫已在别墅四周修建了围墙和高塔，为的就是应对危急情况。

到8月10日这一天，首席执政官卢卡·皮蒂认为有必要召开一个平和的市民议会。开会时，市政厅前的广场上已经谨慎地部署好雇佣兵军队和武装支持者。执政官们身着深红色长袍和镶皮边的斗篷出现在围栏之内。执政团秘书大声宣读了决定建立新的最高司法委员会的法律条文，

之后又按照传统询问广场上的市民们是否认可这一提议。他“反复问了三遍，但是由于声音太小，只有几个人听懂了他的话，而且也没有什么人回答同意”。尽管如此，仅有的几个同意声就足够走完形式，最高司法委员会被批准建立，然后“执政官们回到了宫殿，市民回到作坊，雇佣兵则回到兵营”。

新建立的最高司法委员会马上通过了美第奇一派提议的各种措施。选举官的权力也被确认延长十年，所以抽签选举依然只是形式而已。首席执政官的权力也大大增加了。卢卡·皮蒂的任期即将结束，于是他和科西莫的大儿子皮耶罗·德·美第奇（Piero de’Medici）以及另外八人一起被选为选举官。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又一次在街上摇旗呐喊，科西莫的家人也全都回到了佛罗伦萨。美第奇一派至高无上的地位被重新树立起来，而科西莫本人也成了无可争议的佛罗伦萨元老，他就是“国家的主人”，1458年当选教皇庇护二世的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德·比科罗米尼（Aeneas Silvius de’Piccolomini）说：“政治问题在他的家中解决，他选定的人在政府任职……他决定战争还是和平，连法律也在他的控制之中……除了缺一个名号，他就是真正的帝王。”如果外国使臣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们会被建议直接找科西莫本人面谈，因为找其他任何人都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佛罗伦萨史学者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对此评论说：“从罗马灭亡至今时今日，再没有普通市民能拥有科西莫所享有的声望了。”

---

[1] 威尼斯的圣乔治马焦雷修道院的藏书室已经被毁了，但是修道院的宿舍也能体现出米开罗佐的设计风格，很可能也是由他最初设计修建的。

[2] 阿恰尤奥利在圣使徒镇（Borgo Santi Apostoli）有多处房产，包括阿恰尤奥利宫（3～10号）。他们在阿诺河畔的宫殿毁于1944年，当时撤退的德国人为阻止追兵炸毁了附近的桥梁，同时也毁坏了这栋建筑。

[3] 圭恰迪尼宫就在圭恰迪尼街上。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就是在蒙蒂奇的圣玛格丽塔街（Via di Santa Margherita a Montici）（75号）的拉维亚别墅中写

出了《意大利史》（*History of Italy* ）。

[4] 佩鲁齐家族的房屋和宫殿都建在佩鲁齐广场上，有几处建筑上有他们家族的标志——梨。他们在圣十字教堂里的家族教堂里有乔托及其助手创作的壁画。

[5] 在圣费利奇塔教堂（Santa Felicita）里的卡波尼堂是为巴尔巴多里家族修建的，他们在1525年把对该小教堂的权利移交给了卡波尼家族。

[6] 为了建造乌菲齐，圣彼尔谢拉吉奥教堂被拆掉了。

[7] 马特利家族教堂在圣洛伦佐教堂大殿，其中有一件祭坛装饰品出自菲利波·利比之手。

[8] 卡雷吉的乡村别墅是科西莫·德·美第奇的弟弟洛伦佐在1417年购买的，并由米开罗佐为科西莫进行扩建。后来朱利亚诺·达·圣加洛又为伟大的洛伦佐修建了南边的敞廊。洛伦佐的儿子皮耶罗从佛罗伦萨逃走后，这里遭到了洗劫，还被大火烧毁了。韦罗基奥的《大卫》和陶土作品《复活》（*Resurrection* ）（现在均陈列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还有小男孩手捧喷水的鱼的喷泉作品（现在陈列于市政厅）都是为美第奇的这座别墅而制作的。大公科西莫一世修复了这些作品，但是随后又失修破损并被美第奇家族的后人卖给了伯爵温琴佐·奥尔西（Vincenzo Orsi）。现在这里是卡雷吉医院（Ospedale di Careggi）的员工招待所。

第五章 大主教们与建筑师们

“为上帝奉献多少都不能让我变成他的债主”

科西莫掌权的最初几年，让他赚足美名的事莫过于说服他的朋友教皇欧金尼乌斯四世于1439年将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大会（General Concil）改在佛罗伦萨召开。

由于教义上的明显分歧，基督教两大派别已经对立了六个世纪，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特别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士兵在他们威尼斯雇主的煽动下洗劫了君士坦丁堡，自此两大教派之间的争论日益激烈，不过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已经连续几代都在蚕食东罗马帝国的领土，此刻几乎已经逼近君士坦丁堡城门之外。教皇欧金尼乌斯四世认为这是与东正教和解的最佳时机。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约翰·帕莱奥洛古斯（John Paleologus）已经以基督的名义向他请求帮助，甚至做好了只要西方基督教世界愿意派士兵和水手拯救东罗马帝国免于即将来临的灾难，他们就愿意从此服从罗马天主教领导的准备。于是教皇决定立即在意大利召开大会商讨此事，不能再有半分耽搁。

然而，教皇心中想的可不只是教派统一这一件事。当时在巴塞尔（Bâle）还有另一个会议正在进行。这一会议是由德国君主召集的，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教皇尚不能接受的教会改革措施和教义学说。教皇想要解散这个会议，可是那些固执的参会团体并不愿意就此作罢，反而宣称他们不但会对教廷财务进行激进改革，还打算与东罗马帝国教会达成协议。教皇根本没有耐心听取那些致力于减少他收入的改革计划，至于与东罗马帝国的和解，他更不允许任何其他人插手。于是，为了防止东罗马帝国与巴塞尔会议之间再有什么来往，教皇直接向东罗马帝国皇帝发出邀请，让他到费拉拉来与自己会面。

1437年底，约翰·帕莱奥洛古斯乘船来到威尼斯，随行的是一个7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包括君士坦丁堡牧首和他的随从主教们，还有神学家、学者、译员和官员等。1438年1月8日，大会在费拉拉召开。当时天寒地冻，城里人满为患，双方在争取优先地位和举行宗教仪式的问题上又存在诸多争议。天主教的主教们还禁止东正教人员在天主教教堂里按照东正教的方式做弥撒；东正教牧首则对这一禁令表达了强烈不满。教皇此时也焦躁不安，有消息说他的敌人正在邻近的博洛尼亚谋划推翻他。博洛尼亚本来是教廷国，后来宣告独立，现在处于本蒂沃利奥（Bentivoglio）家族的统治之下。更令教皇担心的是他此时囊中羞涩，不得不把自己在阿西西（Assisi）的中世纪高塔古堡抵押出去以借到巨额款项。即便如此，他还是被迫停止继续为他的大批希腊客人承担开销。

科西莫幸灾乐祸地观望着在费拉拉发生的这些麻烦事。本来他就因为教皇选择费拉拉而不是佛罗伦萨作为会议举办地而感到不快。如果一个城市能被选为这么重要的会议的举办地，那么它无论在财政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必将受益匪浅。如果两大教派真能达成共识，那么作为基督教重新统一见证地的城市也必将获得无上的荣耀。更何况，能与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加强联系，也会给佛罗伦萨的银行家、贸易者和商人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而与君主周围的希腊学者交流探讨也一定是一段轻松愉悦的经历。当年年底，费拉拉又暴发了疫情，科西莫的愿望终于有机会实现了。他派弟弟洛伦佐到费拉拉向教皇保证佛罗伦萨绝对是个健康的城市，而且愿意免费提供食宿，同时还许诺在会议期间每月提供1500弗罗林币的贷款供会议代表使用。教皇立刻接受了洛伦佐的提议并着手安排离开费拉拉。

遗憾的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和他庞大的代表团进入佛罗伦萨城的仪式并不如佛罗伦萨官员们期望的那样令人印象深刻。冬日的一场狂风暴雨把成千上万翘首以盼的市民逼回了家中，他们本应该聚集到大街上、

房顶上观看壮观的行进队伍。窗台下悬挂的各种旗帜标语都被雨水打湿了；庆祝的喇叭声也被狂风淹没了。为了主持这次盛事而特意让自己当选为首席执政官的科西莫也承认，直到客人们全都安全到达住处之后，他才算松了一口气。

教皇和他的随从们被安排到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牧首被安排到博尔戈·平蒂（Borgo Pinti）的费兰蒂宫（Palazzo Ferranti）；东罗马帝国皇帝和随从则被安排住到已被流放的佩鲁齐家族的宫殿和房屋中。这些住所还向客人提供葡萄酒、蜡烛、蜜饯、杏仁软糖和其他糖果。小型委员会议就在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里进行，而全体人员出席的大会则在圣十字教堂举行。

作为观察员旁听了这些会议的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对译员进行希腊语和拉丁语互译时博学的论述和娴熟的技巧印象深刻。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讨论没有带来任何成果，而且与会双方的耐心也都要被磨尽了。争论焦点是三位一体中第三位格的根源和性质。希腊方面的观点遭到了教皇发言人兼首席顾问安布罗焦·特拉韦尔萨里的强烈质疑。古典经文被搬出来考证，希腊方面的辩词混乱不清，其中一个代表团成员突然发现经文中有一段对本方观点不利的论述，就决定把那段文字划掉，可是情急之下紧张过度反而划掉了另外一段。东罗马皇帝为了缓和因己方的欺诈行为而引发的骚乱，提议派人去君士坦丁堡取来更多其他的权威经文。不过他的提议遭到了罗马枢机主教盛气凌人地反驳："陛下，一个人去打仗的时候应当带好武器，而不是到了战场上再派人回去取。"

对于佛罗伦萨的市民来说，这场会议无疑是一次盛事。留着胡子的君士坦丁堡男人们衣着艳丽、头饰奇特，再加上跟随着他们的摩尔或蒙古仆人，更别说那些一同到来的奇怪动物，无不让佛罗伦萨人感到新奇有趣。这些场景更为佛罗伦萨的画家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创作素材，从

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Gentile da Fabriano）到贝诺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许多人都受到了影响。

最终，在特拉韦尔萨里和耐心、智慧的尼西亚（Nicaea）大主教约翰内斯·贝萨里翁（Johannes Bessarion）单独商议之后，双方终于在圣灵这一敏感问题上妥协，也打开了解决其他问题的通路，诸如教皇对东罗马帝国教会的部分权威。涉及全基督教和解条款的关键文件最终于1439年7月5日庄严签署；次日在教堂举行的庆祝活动上，这个戏剧性的声明被正式公布："愿上天喜乐、众生欢欣，为这阻隔东西方教会的高墙已经倒塌，平静与和谐重降人间。"

枢机主教切萨里尼（Cesarini）先用拉丁文宣读了声明，接着大主教贝萨里翁又用希腊文宣读，之后意大利枢机主教与希腊大主教拥抱庆贺，其余高阶神职人员及东罗马帝国皇帝也同他们二人一起在教皇面前下跪致敬。后来为庆祝理智的胜利，他们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传达的信息还被刻在了支撑教堂穹顶的石柱上。

然而，人们庆贺的和谐统一并没能维持多久。代表团一回到君士坦丁堡，佛罗伦萨就收到了协议因强烈抗议而不得不被废止的消息。东罗马帝国皇帝还发现，他在意大利获得的声援和协助抵抗土耳其人的承诺都不过是一纸空文。14年之后，苏丹的禁卫军就翻过了君士坦丁堡硝烟弥漫的城墙，而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人头则被征服者嘲讽地悬挂在斑岩石柱的顶端。

对佛罗伦萨而言，正如科西莫预见的那样，会议带来了更乐观的结果。它不但让城市贸易因此获利，更给此时人们已经开始谈论的文艺复兴（*Rinascimento* ）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如此之多的希腊学者出现在佛罗伦萨，迅速激发了人们对古典文本、古典历史、古典艺术和哲学的兴趣，尤其促进了对柏拉图的研究。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英雄，长期以来一直被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光辉掩盖。贝萨里翁的住处每天晚上都聚

集着许多希腊和意大利学者，他本人也被说服留在意大利，并被封为枢机主教和西旁托（Siponto）的大主教。陪同贝萨里翁一起从君士坦丁堡来到意大利的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mistos Plethon）是研究柏拉图的权威，他也同意留在佛罗伦萨，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落叶归根回到祖国。

科西莫也对卜列东关于柏拉图的演讲十分感兴趣，从中受益匪浅，他甚至决定要在佛罗伦萨建立柏拉图研究院，并且把自己有限的私人时间都用来研究柏拉图。卜列东的回国和科西莫的事务缠身一度使这一计划被迫推迟，直到几年之后，科西莫领养了他的一个私人医生的儿子——名叫马尔西利奥·菲奇诺（Marsilio Ficino）的年轻医学院学生，这些计划才重被提起。菲奇诺对柏拉图的强烈兴趣不但促使科西莫资助他继续深造，后来还安排他在位于宁静乡村的蒙特维奇欧（Montevecchio）别墅里学习希腊语，并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翻译成拉丁文。[1] 菲奇诺热切地接受了这个工作，随着其年龄和学识的增长，科西莫还会邀请他到邻近的卡雷吉别墅里，要么两人，要么与其他朋友——包括听从科西莫的劝说，于1456年来到佛罗伦萨的希腊学者约翰·阿基罗保罗斯（John Argyropoulos）——畅谈哲学问题直至深夜。柏拉图研究院就在这些积淀上慢慢成长起来，并对以后欧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次会议不仅点燃了科西莫心中建立柏拉图研究院的希望之火，还使得他有机会为自己的藏书室增添不少珍贵的作品。他的藏书室已经被视为当时世界上最宝贵的藏书室之一。在过去多年中，科西莫的代理人一直按照他的指示在欧洲各地乃至近东地区搜集一切能找到的珍稀手稿，特别是在德国的修道院——因为那儿的修道士们似乎对这些作品的价值一无所知。1437年尼科洛·尼科利去世时，把自己的800多册藏书都送给了科西莫，作为对他长久情谊的回报。科西莫把宗教方面的书籍都送给了圣马可修道院，其余的自己留下。科西莫的藏书室对于所有想要

阅读的朋友都是开放的，这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开放性藏书室，后来在罗马的梵蒂冈藏书室也承袭了这样的模式。在科西莫及其继承人的不断扩充下，藏书室最终收藏了超过一万册（*codices* ）拉丁及希腊作者创作的书籍，还有数以千计的但丁和彼特拉克（Petrarch）时期的珍贵手稿及佛罗伦萨更早时期的作品。[2]

除了为藏书一掷千金外，科西莫和他的父亲一样，在装饰佛罗伦萨的建筑上也慷慨大方得很。乔瓦尼·迪·比奇从来不是什么爱书之人，事实上，从1418年的一次财产盘点来看，他总共只有三本书：一本拉丁语的《圣玛格丽特的一生》，一本教士乔瓦尼的拉丁语布道词和一本意大利语《福音书》。但是乔瓦尼·迪·比奇一直认定，一座城市的荣耀，以及城市中在乎荣耀的富有市民的个人声誉，都需要通过对公共建筑的资助和修缮来实现。

乔瓦尼参与的第一个重要项目是为圣乔瓦尼巴蒂斯塔洗礼堂建造新大门。这个洗礼堂被但丁称为“我尊敬的乔瓦尼堂”（il mio bel Giovanni），在当时已有250多年的历史了。[3] 洗礼堂的南门装饰是1330年由安德烈亚·皮萨诺（Andrea Pisano）设计的，描绘该教堂所致敬的圣人乔瓦尼的生活景象。1402年瘟疫暴发，人们决定重修教堂北门作为对上帝的献祭，以祈求1348年那场从那不勒斯向北席卷整个欧洲、千万人丧生的可怕灾难不要重降人间。新大门由青铜制成，并请技艺最精湛的工匠操刀，共有七名当时顶尖的艺术家被邀请提交设计方案参加竞选，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可能也是评委之一。

青铜板的设计主题是以撒的献祭。所有作品提交后，三位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获得了评委们的青睐。这三个人当时都只有二十多岁，雅各布·德拉·奎尔查（Jacopo della Quercia）来自锡耶纳，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和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都来自佛罗伦萨。经过漫长的讨论后，吉贝尔蒂和布鲁内莱斯基最终胜

出。但是当评委告诉两人希望他们合作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脾气火爆的布鲁内莱斯基无法接受，一气之下离开佛罗伦萨去罗马学习建筑了。临走之前他把自己的青铜板留给了科西莫，后来科西莫把它摆到了圣洛伦佐教堂的圣器收藏室中，展示在圣坛之后。

最终建造大门的任务落在了吉贝尔蒂一个人身上。他多才多艺，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具备的素质之一。他本来是学习做金匠的，但同时也是一名画家、建筑家和雕塑家。他设计过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窗户以及马丁五世和欧金尼乌斯四世的三重冕。他为乔瓦尼·德·美第奇设计了一个红玛瑙镶金浮雕，描绘的是阿波罗（Apollo）和玛尔叙阿斯（Marsyas）；还为科西莫设计了一个圣物箱，用来存放三位已不为人知的殉道者的遗骨。接受建造洗礼堂大门的工作时，吉贝尔蒂只有23岁，待他完成所有工作时，已经快73岁了。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总是不断地修改重做，直到浮雕的成品达到他能实现的最完美程度为止。他对“最大限度地还原自然本来样貌”的极致追求让助手感到疲惫不堪。大门经过了22年的打磨才终于完工。为了庆祝此等大事，执政官们列队从市政厅前往教堂，向艺术家和伟大的作品致敬。[4] 要知道，只有为了最庄严神圣的事件，执政团官员才会被允许集体离开市政厅。然而，庆祝仪式刚结束，吉贝尔蒂就马上回到布法利尼街（Via Bufalini）上与圣玛丽亚诺瓦医院（Santa Maria Nuova）[5] 相对的铸造厂，着手设计洗礼堂的东门了。抱着建造出无法超越的杰作的决心，又经过了28年的精心雕琢，已经垂垂老矣的吉贝尔蒂才不得不承认他不可能再对作品做出什么改进了。于是描述《旧约》中故事情节的镀金铜板最终于1456年被安装到了洗礼堂的东门上。后来，米开朗琪罗就是被这扇门上的雕刻深深打动，并惊叹它们“配得上作天堂之门”。[6]

乔瓦尼·德·美第奇在吉贝尔蒂的第一扇门完工之前就已经是一位老人了，那时他还和科西莫一同安排了洗礼堂中另一件建筑杰作的建造，也就是为他的朋友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修建纪念碑。[7] 乔瓦尼还非常关心

育婴堂（Ospedale degli Innocenti）的筹款和修建。育婴堂是丝绸业行会为佛罗伦萨的弃婴们修建的医院。[8] 除此之外还有圣洛伦佐教堂的扩建，这个教堂是公元393年由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为神建造的，如今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圣洛伦佐教区的8位代表人物都同意出资在此建造家族小教堂；乔瓦尼更是承诺不但要建造家族教堂，还会承担圣器收藏室的建造费用。圣洛伦佐教堂和育婴堂的工程都被委派给了从罗马学成归来的布鲁内莱斯基。他迫切地想要展示学到的新技法，以此向吉贝尔蒂证明艺术可不只是铸造铜雕版而已。布鲁内莱斯基建造的圣洛伦佐教堂也不愧为文艺复兴早期的杰出建筑作品之一，它后来成了美第奇家族的家族教堂，美第奇家族成员的墓也大都设在这里。[9]

然而，布鲁内莱斯基最杰出的作品还要数大教堂的巨型穹顶。当时人们几乎认定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穹顶跨域的直径达到了138英尺。布鲁内莱斯基通过对万神殿和罗马其他一些建筑的仔细研究，坚称自己可以建造出不需要任何支架支撑的完美结构。泥瓦匠行会指定的委员会认为他的说法不可信，而布鲁内莱斯基则还和以前一样暴躁易怒，不愿向委员会就他的建造计划做出任何说明。他强调整个项目必须由他全权决定，不允许任何没受过专业培训的官老爷干涉他的设计。甚至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布鲁内莱斯基带着一个鸡蛋去参加了委员们毫无建设意义的讨论会，他声称只有自己知道如何让鸡蛋立住。当所有委员都承认他们做不到之后，布鲁内莱斯基把鸡蛋的一头在桌上磕破，于是鸡蛋就立在了桌子上。委员们抗议说：“早知道这样，我们也能让鸡蛋立住。”而布鲁内莱斯基则回答道：“是的，就好比如果我告诉你们我将怎样建造教堂的穹顶，你们也会说出同样的话。”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中，布鲁内莱斯基表现得更加嚣张狂傲，以至于委员们下令把他赶出会议现场。侍卫们把布鲁内莱斯基带出宫殿，直接扔到广场之上。布鲁内莱斯基仰面倒地。从那以后人们在街上看到他都会指指点点地大喊：“疯子来了。”

后来，无数建筑家为穹顶的建造献计献策，比如用浮岩建造穹顶之类，但是都被否决了。直到1420年，委员会最终做出了让步，这项艰巨的任务还是落到了布鲁内莱斯基肩上。但让他非常恼怒的是，他还是被要求与吉贝尔蒂合作。事实上，吉贝尔蒂在穹顶建设初期给布鲁内莱斯基提供的帮助有多重要，可能是布鲁内莱斯基永远不愿承认，后世也永远无法估量的。

16年后，穹顶建成了。它不仅仅是一个建筑杰作，也是工程学上的壮举。1436年3月25日，在圣母领报日庆典当天——依据古怪的佛罗伦萨历法，这天也是新年的第一天——穹顶正式建成，盛大的敬神仪式持续了五个小时之久。[10] 人们特别修建了一条架高的木质通道，将教皇在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的房间和大教堂门口连接起来，通道上面不但挂满了旗帜和花环，还装上了深红色的顶棚。到了指定的时间，身着白衣的教皇戴着嵌有珠宝的三重冕走出住处，缓慢地走过铺着地毯的木质通道。他的后面跟着7位枢机主教、37位主教和大主教，以及由首席执政官和执政官们带领的城市主要官员们。伴随着唱诗班吟唱的赞美诗，不少围观者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父亲去世以后，科西莫继续为修建、改造和装饰佛罗伦萨及其周边乡村里的教堂、修道院和慈善机构而慷慨解囊，仿佛是要在整个托斯卡纳地区都留下自己的标记。“我知道这座城市可以有多讽刺”，他有一次对朋友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说，“也许过不了五十年，我的家族就会被驱逐，但是我修建的建筑却能屹立不倒。”作为银行业行会指定的四人委员会成员之一，科西莫也为雇佣吉贝尔蒂制作圣马太雕像出了资。圣马太被视为银行家的保护神，他的雕像要被供奉在奥尔圣米凯莱教堂墙外侧的壁龛里，这里全部14个壁龛已分别被各个行会认领。[11] 在出资比例上，科西莫比别人出得都多，以与自己的财富相称；但是只比别人略多一点，这是他惯有的谨慎态度，以免引起他人的不满。除了奥尔圣米凯莱教堂，还有圣十字教堂的见习教士宿舍和小教堂[12]，圣

母领报大殿（Santissima Annunziata）的唱诗班席位[13]，现已被毁的圣巴尔托罗梅奥（San Bartolommeo）教堂的藏书室，位于菲耶索莱的被称作拉巴迪亚（La Badia）的圣多明我会修道院（科西莫在此还有一个专属房间）[14]，以及菲耶索莱的圣吉罗拉莫内蒙蒂教堂（San Girolamo nei Monti）都得到了科西莫的慷慨捐助。而且他丰富的建筑知识甚至让领头的工匠和设计者们都心服口服。此外，为在巴黎的佛罗伦萨学子重建学院、翻新耶路撒冷的圣神教堂（Santo Spirito）及扩建阿西西的方济会修道院，科西莫也都重任在肩。在大教堂穹顶建成一年之后，科西莫无疑又为米开罗佐重建圣马可修道院提供了资金。据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的说法，这项慈善事业是科西莫受教皇欧金尼乌斯四世劝诱而接手的。有一次在科西莫良心受到困扰的时候，他向教皇征求意见，最终决定花费四万达克特的巨资重建这座多明我会修道院。这座修道院的院长名叫安东尼奥·皮耶罗齐（Antonio Pierozzi），因为他实在太瘦小而被戏称为安东尼诺（Antonino）。此人严苛、禁欲且令人生畏，后来在1445年成为佛罗伦萨的大主教，到1523年被追封为圣徒。安东尼诺是科西莫的密友，经常有人看到他俩单独或与别人一起在科西莫宽敞的专属房间内畅谈。每当科西莫感觉需要安静地反思时，他都会一个人来到这里寻找平静。据说他们总是在一起谈论高利贷以及时刻困扰着银行家的如何赎罪的问题。教会的说法是放高利贷者要想获得宽恕，必须在有生之年或去世之时偿还所有经非正当渠道赚取的不义之财。忏悔的银行家去世时在遗嘱中做出让继承者惊恐不已的规定，即对他们资产收取的第一笔费用就是悉数归还全部财产，这种案例广为人知。按理说，仅为慈善事业捐款是不够的；但是现实的教会人士很快改口称，这也是非常有效的办法，科西莫无疑也更愿意相信这样的说法。他为慈善一掷千金，他的孙子后来发现科西莫在1434～1471年这三十八年间，“仅建筑、慈善和税款上的开销就达到了惊人的663755弗罗林币”。事实上，科西莫在修建圣马可修道院的时候太过慷慨，以至于修道士们“本着谦虚的心”不得不提出反对。但是科西莫完全没把他们的抱怨当回事，他曾说

过："为上帝奉献多少都不能让我变成他的债主。"重建工程完工之后，科西莫又给修道院捐献了善款，给修道士们购买了法衣、圣杯和配有插图的弥撒书，还把尼科洛·尼科利的大部分藏书赠送给修道院，又雇用了无数的抄写员抄写更多副本以丰富修道院的藏书。[15]

待圣马可修道院完工之后，科西莫决定要为自己修建一座新宫殿。几年前他就已经从巴尔迪宫搬出，住进了他父亲在主教堂广场的房子。尽管他已经对这处家族老宅做了一些改进和扩建，能够满足一家人的生活需要，但是对于他的生意来说，这里显然已经太小了，他急需更多的储藏室和账房。于是，他选定在城里最宽阔的拉尔加街（Via Larga）和圣乔瓦尼诺德利斯科洛皮教堂（San Giovannino degli Scolopi）北墙外的戈里街（Via de Gori）交叉口，修建新房子。[16] 他选中的建筑师是才华横溢但脾气暴躁的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此时他为附近的圣洛伦佐教堂修建中殿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可是当看到布鲁内莱斯基的修建计划和木质模型时，科西莫觉得他的设计太过奢华绚丽，于是委婉地否决了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方案。科西莫会像建筑师一样把订制的建筑视为自己的作品，而他订制的所有建筑一直以来都保持着低调、内敛、沉静而不刻意的风格，他当然希望自己的住处也能如此。将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搁置一旁，科西莫转而选中了年轻的建筑师米开罗佐·米凯洛齐。这个决定让布鲁内莱斯基怒不可遏，甚至将自己的模型"打了个粉碎"。

米开罗佐生于佛罗伦萨。他的父亲是个裁缝，老家在勃艮第（Burgundy）。米开罗佐在还是多纳泰洛（Donatello）的学生的时候，就因为优秀的雕塑天赋而小有名气，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为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洗礼堂中建造的墓碑。米开罗佐的设计没有布鲁内莱斯基那样富丽堂皇，但他简约大方和用色内敛的风格更符合科西莫的品位。科西莫常说嫉妒就像野草，千万不能提供水分和养料供其生长，所以科西莫一直谨慎避免让修建美第奇宫这件事冒犯到批评者们。然而，这座宫殿既要给美第奇家族事业提供办公室和账房，又要满足私人生活之用，所以

必定面积可观，科西莫的敌人自然要抓住机会大肆渲染科西莫修建豪宅的用意，谴责这座宫殿就是其贪欲的象征。“他要建造的这座宫殿要宏伟到让罗马圆形竞技场都黯然失色，”有人写道，“用别人的钱盖房，谁都会想盖多豪华就盖多豪华。”事实上，和之后二十年间建造的其他宫殿——比如鲁切拉伊宫和令人敬畏的皮蒂宫（Palazzo Pitti）——相比，美第奇宫绝对称不上富丽堂皇。这座宫殿在十五世纪中期的估价是五千弗罗林币。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科西莫的后代还是最终购得这座宫殿的里卡尔迪家族（Riccardi）都对这里进行了改造和扩建，让它变得更加宏伟壮观；但是在它建成之初，这座宫殿最显著的特点是新颖独特，而绝非富丽堂皇。虽说把房子修建成碉堡一样四角带高塔、墙上开堞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直到米开罗佐开始修建美第奇宫殿为止，佛罗伦萨才算有了第一座融合了意大利早期哥特风格的精妙和古典品位的沉稳的精美建筑。[17]

宫殿一层外墙使用的是巨大的粗凿石料，为了获得一种粗放、简约（*rustica*）的效果。米开罗佐认为这种设计能“在意大利艳阳的照耀下获得光和影所带来的美感，表现出坚固和强悍”。起初，宫殿一层面向拉尔加街的一面是类似碉堡的完整墙体，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巨大的拱形通道。但是在用于居住、位于通道之上的楼层，这种严肃的气氛因为加装了成排的拱窗而变得柔和不少，二层两侧还有多利克式圆柱（Doric），三层两侧则是科林斯式圆柱（Corinthian）。整座宫殿之上延伸出一圈常见于古典罗马建筑的飞檐，飞檐的高度达到了8英尺，线条简洁有力、高耸威严。而面向戈里街的一侧则是一条开放式的敞廊。敞廊的拱门上后来又加装了弯曲的有铁栅栏的窗子，这种窗子也是米开罗佐设计的，被称为“跪窗”（Kneeling Windows）。在敞廊的一角还有一盏美丽的铁质壁灯，是由尼科洛·格罗索（Niccolo Grosso）制作的，这位制作者有个外号叫“收押金的人”（*il Caparra*）。[18] 在壁灯之上，有石刻的美第奇家族盾徽，同时还有科西莫的私人纹饰——盾牌上伸出三根孔雀羽毛，分别代表着节制、审慎和坚韧这三种科西莫最看重的美

德。

在美第奇宫完全建成之前，米开罗佐就着手设计科西莫在穆杰洛的乡村别墅了。科西莫从来不会对田园生活感到厌倦。只要有机会，他就会离开佛罗伦萨到特雷比奥或他钟爱的卡雷吉别墅里，住上尽可能长的时间。在这里他可以安静地读书，甚至到花园里修剪一下葡萄藤，打理打理橄榄树，或是栽种桑树、杏树。哪怕只是和在田间劳作的村民闲聊几句，也能给他带来莫大的安慰。有时他还会从和村民的聊天中学到一些谚语和寓言，回到城里之后再将它们用到自己跟别人的谈话中，给语言增加不少趣味。在卡雷吉，他可以尽情地和朋友畅谈而不必担心被打断；还可以召唤门徒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来做伴。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是个矮小、丑陋，但聪明绝顶的年轻人，就住在蒙特维奇欧的乡村别墅里。两人会一起吃饭、下棋。下棋也是科西莫唯一会参与的游戏。他在一封于1462年写给菲奇诺的书信中说：

> 我昨天来到了卡雷吉，主要是为了让自己放松一下。我想尽快见到你，马尔西利奥。来的时候带上我们最喜欢的柏拉图的作品，我相信你已经如你承诺的那样，将它翻译为拉丁文了。没有什么是比发现通往幸福的道路更让我投入的事业了。所以快点来吧，别忘了带着你的俄耳甫斯七弦琴。

科西莫当然没有废弃卡雷吉的意思，不过他还想再要一个位置更加偏远的乡村别墅。在遇到变故或瘟疫之类的情况时，那里就可以充当避难所，还可以拉近美第奇家庭与穆杰洛地区村民的关系，可谓一举多得。他最终选定了卡法焦洛的一片土地，这里世代都是他家族的财产。经米开罗佐设计，一栋新的乡村别墅在1451年就初具雏形了。[19]

几年之后，米开罗佐又开始为美第奇建造另一座别墅。这次是在菲耶索莱，科西莫的儿子乔瓦尼想要重建一座像城堡一样的别墅，并称之为贝尔坎托（Belcanto）。[20] 别墅四周陡峭而多岩石，根本不可能进行耕种。尽管科西莫不赞成儿子的选择，批评他花费巨资只为欣赏窗外的

风景，但是乔瓦尼辩称这独特的景色就是菲耶索莱的精髓所在：在夏日的傍晚，可以与家人及朋友们坐在阴凉的阳台上俯瞰整个佛罗伦萨。

不过儿子描述的美景并不合科西莫的口味。如他告诉乔瓦尼的那样，他更偏爱从卡法焦洛的窗口向外望，满眼都是属于他的土地。再说，此时的科西莫年事已高，对新房子已经提不起兴趣。当1463年菲耶索莱的美第奇别墅建成时，科西莫已经74岁了。三十年来掌控整个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压力已经令他身心俱疲。

---

[1] 菲奇诺所在的别墅就是现在人们所知的勒方坦那酒店（Le Fontanelle）。

[2] 科西莫的藏书室一开始设在卡雷吉，后来移到了美第奇宫。1494年藏书室被执政团没收的时候，不立即归还所借图书的人会被处以50弗罗林币的罚金。在萨沃纳罗拉的建议下，藏书都被转移到了圣马可修道院。到1508年，藏书室被教皇莱奥十世重新买回并带到了罗马。后来又由克莱门特七世带回佛罗伦萨，并于1532年安置在圣洛伦佐教堂修道院里的一栋建筑中，直至今日。

[3]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怀疑圣约翰洗礼堂曾经是一座罗马神殿，大概建于十二世纪。装有皮萨诺设计的南侧青铜大门是由洛伦佐·吉贝尔蒂的儿子维托里奥（Vittorio Ghiberti）建造的。

[4] 洛伦佐·吉贝尔蒂设计的北侧青铜大门上刻画的是基督和四个福音传道者以及四个教堂神父在一起。

[5] 圣玛丽亚诺瓦医院是1286年由福尔科·波尔蒂纳里（Folco Portinari）建造的，他就是但丁笔下的贝亚特丽切（Beatrice）的父亲。

[6] 洛伦佐·吉贝尔蒂的东侧镀金铜门上有艺术家自己的肖像。人们可以看到他光秃秃的脑袋从一个圆孔中探出。

[7] 洗礼堂中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之墓是由多纳泰罗设计的，但铜制雕像是米开罗佐的作品。

[8] 育婴堂正对着圣母领报大殿广场。布鲁内莱斯基在助手弗朗切斯科·德拉·卢纳（Francesco della Luna）的帮助下建造了中间的九个拱门，其他的是在十六、十七世纪修建的。襁褓中的婴儿的圆形浮雕是安德里亚·德拉·博比亚（Andrea della Bobbia）的作品。

[9] 圣洛伦佐的四世纪大殿在十一世纪重建。布鲁内莱斯基的文艺复兴早期代表作——圣洛伦佐教堂——1421年开始动工。其中安葬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的老圣器收藏室是在1429年建成的。布鲁内莱斯基于1446年去世时工程还没有彻底完成。他的死引发了佛罗洛萨多个工匠之间的激烈纷争，谁都想接手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思路。他们到科西莫面前表达各种冲突的诉求。依照科西莫的思路，最后由乔瓦尼·迪·多梅尼科（Givovanni di Domenico）和安东尼奥·马内蒂（Antonio Manetti）负责完成了这一工程。

[10] 布鲁内莱斯基一直严密保守的秘密就是为圣母百花大教堂建造两个穹顶，也是全欧洲最大的穹顶，一个穹顶里面再建一个穹顶。每个穹顶都由一个鼓座支撑，同时又捆绑在一起。每块石头都以燕尾榫的方式小心地串联起来，所以整个屋顶几乎是自己支撑起来的。

[11] 吉贝尔蒂在奥尔圣米凯莱教堂的圣马太雕像是1419～1422年完成的，占据了西墙最北边的一个壁龛。铜制的施洗者圣约翰和圣史蒂芬也都是吉贝尔蒂的作品。

[12] 见习教士堂由米开罗佐于1445年左右建造。光滑的陶制祭坛装饰品出自安德烈亚·德拉博比亚的工作室。在大公费尔迪南多二世的安排下，1642年伽利略被安葬于此。

[13] 圣母领报大殿的唱诗班席位，也被称为圆形大厅（Rotonda），是由米开罗佐在1445年开始修建的，直到十五世纪七十年代才由阿尔贝蒂建造完成。

[14] 直到1018年，菲耶索莱的巴迪亚修道院就是菲耶索莱的大教堂。1456～1469年一直由美第奇家族出资重建。

[15] 米开罗佐于1437～1444年一直在圣马可为科西莫工作直到他的藏书室修建完成。藏书室走廊尽头的两个房间由科西莫使用，萨沃纳罗拉的房间在西边走廊尽头。

[16] 拉尔加街现在被称为卡武尔街（Via Cavour）。圣乔瓦尼诺德利斯科洛皮教堂在十六、十七世纪分别由巴尔托洛梅奥·阿曼纳蒂及朱利奥·帕里吉、阿方索·帕里吉兄弟重建。

[17] 美第奇宫是在1444～1460年建造的。德戈里街一面的跪窗后来被单调的方形栏杆取代，这是一种毫无装饰性的设计。窗子两边都可见的铁质横档是用来支撑旗杆、烛台或者拴马用的。窗户下面的石凳不仅供仆人和访客使用，任何路过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小坐休息，算是美第奇家族的一份微薄的好客之礼。根据乔瓦尼·阿弗拉多（Giovanni Avogrado）不太可靠的证据，宫殿本来有一个艳丽的正面，包含红色、白色和绿色。1527年罗马陷落，美第奇家族被迫逃出佛罗伦萨的时候，这座宫殿也差点被毁掉。狂热的共和主义者米开朗琪罗

提议将宫殿夷为平地，在这里建一个广场并取名为骡子广场，竖立克莱门特七世的肖像，以此暗示教皇作为美第奇家族私生子的身份。宫殿最终得以保留下来，但是由政府托管，直到1550年美第奇家族重返佛罗伦萨时，这座宫殿才又回到美第奇的名下并一直传到大公费尔迪南多二世，他把宫殿出售给了马尔凯塞·加布里埃莱·里卡尔迪（Marchese Gabrielle Riccardi）。（里卡尔迪扩建了这个宫殿，上层在本来10个窗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7个。）1814年宫殿由大公国政府买下，现在被称为美第奇-里卡尔迪宫，并成为一个辖区。

[18] 如果想在宫殿的墙壁上加装这些巨大的带尖的灯，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尼科洛·格罗索的外号“收押金的人”得自他总是坚持要收预付款。

[19] 卡法焦洛更像个堡垒而非别墅。瓦萨里称其“拥有成为一座出众的乡村豪宅的全部必要条件”。这里有漂亮的花园、果林和喷泉，也有高塔和城垛拱，四周还围绕着壕沟和吊桥。后来这里和特雷比奥一起被博尔盖赛王子买下。他推倒了中心的高塔，填平了四周的壕沟。现在这里呈现一幅萧条景象，连花园里也只剩下蒲公英和野鸡。

[20] 美第奇别墅，之前叫贝尔坎托，本来是属于巴尔迪家族的。为乔瓦尼·德·美第奇进行的重建是在1461年完工的。1671年大公科西莫三世将其出售。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嫂子奥福德伯爵夫人（Countess of Orford）进行了翻新。到十九世纪又被英国画家和收藏家威廉·布伦德尔·斯彭斯（William Blundell Spence）买走，并改名为斯彭斯别墅。现在它属于西比尔·卡廷夫人（Lady Sybil Cutting），她的女儿马尔凯萨·艾丽斯·奥里戈（Marchesa Iris Origo）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第六章 战争与和平

“伦琴？伦琴？伦琴是什么地方？”

科西莫作为佛罗伦萨外交政策决策者的至高地位从未被质疑过。尽管官方通信都是由执政团完成，但是没有哪个重要决定是未经美第奇首肯而做出的。人们时常可以见到各国大使穿过美第奇宫的拱门；而佛罗伦萨的大使们赴任前也必然要先去拜会科西莫。

多年来，米兰一直是科西莫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他耐心而坚定，尽其所能地说服佛罗伦萨人相信，他们对于米兰公国一贯的敌对态度是错误的，如果佛罗伦萨能够与米兰结盟，对这个城市来讲绝对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哪怕为此得罪传统盟友威尼斯也是值得的。15世纪初期，威尼斯打败了维罗纳、维琴察（Vicenza）、帕多瓦、贝卢诺（Belluno）和费尔特雷（Feltre），后来又击败了土耳其舰队，并把共和国的疆域扩大到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海岸。而米兰的公爵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在阿尔比奇家族的怂恿下，与佛罗伦萨的关系不断恶化，那时的佛罗伦萨最该感谢的就是威尼斯这个强大而富有的同盟者。

很多人都相信维斯孔蒂是个精神错乱的疯子，他们听说他会在夏天脱光衣服，赤裸着肥硕肮脏的身体在花园里打滚。因为样貌太丑陋，所以他从不允许别人为他制作肖像；他的腿因为畸形而瘫软无力，以至于没有侍者的搀扶就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总是神经兮兮的，连看到出鞘的宝剑都会发出惊叫；他非常惧怕雷声，为此在自己的宫殿里设置了一间完全隔音的房间；他热衷于恶作剧，和毫无防备的臣子说话时会突然从袖子里拿出一条蛇。除此之外，他还是个狡猾、神秘、极端多疑的人。尽管如此，不可否认，他也是个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在长达35年之久的统治中，他成功收复了伦巴第（Lombardy）地区——本来是他父亲

征服的领地，但在维斯孔蒂年幼时失守。他还一心想要把公国疆域向南扩展到托斯卡纳地区，尽管阿尔比奇家族和其他被流放的佛罗伦萨人保证，他只需要派军队到那里摆摆样子，人民就会拿起武器反抗美第奇这个压迫者，但事实上维斯孔蒂的愿望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1437年他的侵略军在巴尔加（Barga）战役中被击败，1438年又再一次被挫败，直到1440年，在阿诺河上的安吉亚里（Anghiari）附近一场残酷的战斗中，连维斯孔蒂手下最善战的雇佣军指挥官尼科洛·皮奇尼诺都被佛罗伦萨的雇佣军击溃。战败的皮奇尼诺带着残兵败将迅速撤出了托斯卡纳地区，跟在他们后面的阿尔比其家族也彻底打消了重归佛罗伦萨的美梦。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心灰意冷地骑马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开始了他的朝圣之旅，而佛罗伦萨人则趁机占领了切塞纳蒂诺山区（Cesentino）的大片领土，这里本来是一位落后的封建君主的领地，无奈他错误地选择了与米兰人结盟。

安吉亚里之战发生时，菲利波·玛丽亚·维斯孔蒂已经48岁。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娶了他父亲的雇佣军指挥官的富有遗孀，这个指挥官因为犯通奸罪被处决了；第二次他娶了一位年轻的女士，但是因为有只狗在新婚之夜狂吠不止，维斯孔蒂就把新婚妻子关进了牢笼。这两任妻子都没有生下孩子，只有他的一个情妇生了个女儿，取名比安卡（Bianca）。比安卡有无数的追求者，其中最执着的莫过于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

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本人也是私生子，他的父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来自罗马涅地区，名叫贾科莫·阿腾多洛（Giacomo Attendolo）。阿腾多洛被迫加入一群冒险者，原来的首领去世以后，他却成了这伙人的新头目，并把姓氏改为斯福尔扎。他领导自己的队伍为那不勒斯和教皇打过仗，后来因为救助一个落水的年轻侍者而不幸淹死在佩斯卡拉河（Pescara）。1424年，年仅22岁的弗朗切斯科继承了父亲的位置，开始领导这支当时意大利最训练有素的雇佣军队伍之一。他很

快就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替维斯孔蒂、威尼斯和教皇打过仗，任何愿意满足他开出的高价的人都可以获得他的服务。弗朗切斯科身强体壮、和蔼可亲、脚踏实地、心直口快、待人真诚，习惯了风餐露宿的艰苦生活。教皇庇护二世后来这样描述他：

> 他很高大，而且极具威严。他的表情总是很严肃，说话的声音也不大，谈吐和蔼可亲，总体来说他就像个王子一样，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受命运眷顾的人。他天资聪慧，健壮威武。他的妻子不仅容貌美丽、身份高贵、品行优良，还给他生了8个优秀的孩子（他还有11个私生子）。他甚至都不怎么生病，生活中没有什么是他想要而得不到的。

时常令斯福尔扎的雇主——米兰公爵——感到担忧的是，斯福尔扎在边界的马尔凯地区（Marches）已经建立了一个小王国，而且他的野心还远不止于此。如果能够娶到比安卡，那么一旦她的父亲去世，斯福尔扎就将继承米兰公国。

维斯孔蒂不怎么想让一个农民的私生子来当女婿，但此时的斯福尔扎不仅仅是意大利最好的军人，更代表了一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于是，1441年维斯孔蒂许可了女儿的婚事，并把蓬特雷莫利（Pontremoli）和克雷莫纳（Cremona）作为嫁妆献给新郎，至于米兰爵位的继承问题，则只是做了一些模糊的许诺。

维斯孔蒂言而无信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六年后他去世时又指定那不勒斯的阿拉贡国王阿方索（Alfonso）为其继承人也并没让人感到震惊。此时整个意大利都卷入了这场喧嚣，奥尔良（Orleans）公爵宣称自己作为瓦伦蒂娜·维斯孔蒂（Valentina Visconti）的儿子对米兰公国可以提出利益诉求，德国皇帝也宣称自己对米兰自古就享有权利，连威尼斯也不容忍任何干涉其对伦巴第行使权利的行为。就在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准备带兵进入米兰夺回他认为本就属于他的合法继承权时，米兰人则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他们最满意的决定——重建米兰共和国，让人民

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

在佛罗伦萨，科西莫机警而焦虑地关注着危机的发展。他几年前见过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一面，对他的谈吐举止和人格魅力印象深刻。自那以后他们之间的友谊日益深厚，尤其是财力不济的斯福尔扎总是能在捉襟见肘之时接到美第奇银行慷慨的贷款，这更巩固了他们的关系。除了为斯福尔扎提供贷款并保证他可以收到佛罗伦萨纳税人的额外补贴之外，科西莫还用上了自己所有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来帮助斯福尔扎。事实上，正是依靠科西莫的全力以赴，斯福尔扎才能在三年的战争和外交谈判之后，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入主米兰，并于1450年成为米兰公爵。

科西莫对斯福尔扎不懈的支持为他在佛罗伦萨城内招来了不少指责，有两位地位显赫的市民——内里·卡波尼和詹诺佐·马内蒂——尤其不满。前者曾经在安吉亚里大败皮奇尼诺一战中做出过重要贡献，后者则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令那不勒斯和威尼斯极为不满的是，科西莫在其他国家都没有表态之时，率先承认斯福尔扎为米兰的合法领主，这让当时科西莫面对的反对之声更加响亮。反对美第奇统治的人说：科西莫的所作所为令人震惊。为了支持一个以前的雇佣兵头子、一个自封的公爵，不仅佛罗伦萨的市民要被征税，连传统的盟友都变成了敌人。而科西莫之所以支持斯福尔扎，难道不是因为害怕已经借给他的巨额贷款打了水漂？而且与一个专制统治下的米兰打交道不是显然比与一个共和国打交道更有利可图吗？

科西莫一直认定威尼斯已经不能再被视为一个可靠的盟友。一方面，在黎凡特（Levant），威尼斯的利益与佛罗伦萨的利益存在冲突；威尼斯在东地中海地区的领土扩张使它成了土耳其的敌人，但是佛罗伦萨与土耳其却有着互利的贸易关系；此外，威尼斯的商船队对于佛罗伦萨正在发展的舰队来说，也是个难缠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让对佛罗

伦萨感激涕零的斯福尔扎入主米兰，不仅有利于对抗不断入侵的威尼斯，也可以帮助佛罗伦萨实现图谋已久的占领卢卡的野心。最重要的是，只有佛罗伦萨与斯福尔扎结盟才能真正给意大利带来和平；没有和平，经贸就不可能繁荣发展。科西莫的理论得到了米兰驻佛罗伦萨大使尼科代莫·特兰凯迪尼·达·蓬特雷莫利（Nicodemo Tranchedini da Pontremoli）强有力的支持；他受斯福尔扎派遣而来，非常聪明、善于说服别人，在佛罗伦萨一直待了17年。

然而，科西莫的争辩在很长时间里依然没有得到支持，直到威尼斯人为了反对科西莫的政策决定与那不勒斯国王结盟并威胁入侵托斯卡纳地区时，科西莫才看到了彻底打破佛罗伦萨人偏见的机会。科西莫极其少见地亲自来到市政厅，威尼斯的大使正在那里抗议与米兰结盟的提议并发出威胁，科西莫直接打断了威尼斯大使的发言并指责威尼斯政府才是侵略者。虽然科西莫不是天生的演说家，但是他的发言吐字清晰、掷地有声。到了八月，佛罗伦萨和米兰就正式签署了盟约。

盟约签署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迅速的。威尼斯敦促德国皇帝来破坏这对新的盟友，东罗马帝国皇帝被说服取消了佛罗伦萨商人的一切特权，他们随即被驱逐出那不勒斯和威尼斯。威尼斯人甚至花钱雇人在佛罗伦萨城内煽动反对美第奇家族的情绪。作为回应，科西莫关闭了他在威尼斯的分行，转而在米兰开了一家新分行。同时，他还通过那些负责东方贸易的经理人争取到了与土耳其的贸易特权，以弥补希腊人废除佛罗伦萨商人特权而带来的损失。科西莫还不忘主动拜访佛罗伦萨的老朋友法国，希望借此来抵消威尼斯和那不勒斯通过拉拢德国皇帝而获得的优势。

在法国宫廷谈判非常需要技巧，因为无论是科西莫还是斯福尔扎都不希望挑起法国干涉意大利事务的心思，他们认为一旦法国和英国的争端平息，法国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要转向意大利，所以他们宁愿到巴黎

去迎合法国国王查理七世（Charles Ⅶ），模棱两可地承诺：一旦法国决定捍卫安茹家族对那不勒斯的权利主张，佛罗伦萨和米兰都会提供帮助。这次重要的微妙交涉最终是由科西莫的朋友——迷人又有才华的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完成的。凭借满口的甜言蜜语、阿谀奉承，以及夸大修辞却没有任何实质性承诺这一文艺复兴时期最为内行推崇的外交手腕，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把这个自视甚高、野心勃勃、有点古怪的法国国王哄得喜笑颜开。1452年4月，各方签订了条约，内容包括：法国保证在佛罗伦萨和米兰受到攻击时出兵相助；法国承认斯福尔扎为米兰公爵；作为回报，佛罗伦萨和米兰向查理七世承诺，如果法国向那不勒斯宣战，佛罗伦萨和米兰均不会做出干涉。

这一条约的签署引发了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担忧，为了破坏这个新联盟，趁法国忙于和英格兰的战争，威尼斯和那不勒斯双双向佛罗伦萨与米兰宣战，并由阿方索国王的私生子堂·费兰特（Don Ferrant）带兵向托斯卡纳地区进军。佛罗伦萨市民听到军队逼近的消息，惊恐万分；大批市民冲到科西莫的宫殿要求他说明如何防止佛罗伦萨城遭受攻击；甚至有一个疯狂的商人冲进科西莫的房间大喊：“伦琴陷落了！伦琴陷落了！”科西莫装作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位于托斯卡纳地区边界小镇的样子，冷淡地回答说：“伦琴？伦琴？伦琴是什么地方？”

科西莫尽力表现得冷静自信，但他心中难免充满担忧。城市中反对他的情绪越来越高涨，事实证明与米兰结盟是一个充满危险且代价高昂的实验。佛罗伦萨不但要为斯福尔扎提供资助，更要为自己本身的防御做准备，所以正如斯福尔扎驻佛罗伦萨的代表汇报的那样，沉重的赋税使得科西莫的敌人每天都在增加。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被十万火急地派往法国向查理七世寻求帮助，但是因为忙于应付英国人在波尔多（Bordeux）的暴乱，法国此刻根本无暇分神开辟另一个战场。

科西莫最终也病倒了，只能卧床休息。和平的呼声持续不断，连他

的一些主要支持者也不得不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避免出入他的宫殿了。就在此时，从法国传来了让美第奇一派如释重负的好消息，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成功说服了安茹家族的勒内（Rene of Anjou）派兵来解救盟友，以换取盟友支持他将阿方索的阿拉贡家族赶出那不勒斯。法国军队粗暴、劫掠式的干涉让他的盟友比敌人还心惊胆战。随后在1453年5月，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为意大利最终实现和平带来了希望。1454年4月在洛迪（Lodi），和平终于变成了现实。四个月后，鉴于土耳其的威胁愈发严重，佛罗伦萨、米兰、教皇和威尼斯联合在一起组成了“最神圣联盟”（a Most Holy League）：对内保证意大利维持现状，对外共同抵御侵略者。

和平对科西莫而言来得有点晚。“市民对新税收意见非常大，”威尼斯大使汇报道：

> 而且现在还可以听到以前从没出现过的辱骂科西莫的各种言辞……两百来个受尊敬的大家族本来可以靠他们拥有的财产所带来的收入生活，现在却因为难以承担财产税而不得不将其变卖。征收这项新财产税时，科西莫不得不宣布将由他先垫付这笔税款，在所有相关的人找到解决之道以前，也不会再要求任何人补缴。为了重获民心，他不得不每天分发很多蒲式耳[1]的谷物给穷人，因为他们都在抱怨粮食涨价买不起。

然而，科西莫这一沉着、有远见的政策最终获得了成功。威尼斯因为受困于土耳其而忧心忡忡，根本无暇再对托斯卡纳地区施加任何威胁；斯福尔扎这个佛罗伦萨坚定的盟友已经被各国承认为米兰公爵。包括签约国那不勒斯在内的这份合约为意大利在此后五十年里实现大体上的和平，第一次真正带来了希望。

科西莫这样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当然不会天真地相信，依靠这样一个松散的合约，意大利邦国联盟就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但是至少对佛罗伦萨来说，在科西莫的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发生任何损失惨重、无利可图的战争。

君士坦丁堡被攻占以后，佛罗伦萨人当然也听到了教皇狂热的鼓吹，要求他们参与讨伐土耳其的圣战。既是广受认可的意大利外交事务决策者，又是教廷银行家的科西莫自然是最先收到教皇呼吁的人之一。教皇要求佛罗伦萨为他提供两艘配有装备和人员的大船，用来向土耳其发起攻击。作为回报，佛罗伦萨人会拥有永恒的灵魂。科西莫巧妙而谨慎地回复了教皇的要求，他找的借口对他自己及其后代都极为有用：

> 当您庄严地谈及我们即将来临的永生之时，哪个人能不因为您的话语而获得提升？哪个人不是仿佛瞥见了自己获得永生时的光辉荣耀？……至于您提出的要求，我最可称颂的神父啊，……您给我写信的时候并没有把我看作一个满足于普通市民身份的普通人，而是把我看成统治佛罗伦萨的王子……您明明知道在一个政府广受拥护的共和国里，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的权力是多么有限。

其他意大利邦国给教皇的回复也同样含糊其词。只有威尼斯人挺身而出，相信圣战的胜利会给他们此生甚至死后带来福音。没有被困难阻挠的教皇毅然决然地扛起十字军的大旗出发了，可是战船还没下海，教皇自己就染上疟疾去世了。美第奇银行正式表达了哀悼，然后就把注意力转向了下一位继任者。

作为一个银行家，科西莫和他的父亲一样足智多谋。在他的领导之下，家族生意不断壮大。他以过人的组织才能和惊人的记忆力而闻名，为了这个让人费神的行业，他有时甚至工作到深夜。科西莫更为人所知的一个特质是他与分行经理们之间相互的绝对忠诚。每个分行经理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的工作都受到严格的监督，必须定期向佛罗伦萨提交长篇报告说明做了什么工作、见了什么人；而他们的报酬自然也是极为丰厚的。在发现父亲的助理巴尔迪工作方法古板、跟不上新变化之后，科西莫提拔了两名年轻的合伙人，分别是罗马分行的经理安东尼奥·迪·梅塞尔·弗朗切斯科（Antonio di Messer Francesco）和日内瓦分行的经理乔瓦尼·德·阿梅里戈·本奇（Giovanni d’Amerigo Benci）。在他们的帮助下，银行业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长，美第奇银行的标志“ȸ

”、美第奇银行的座右铭“以上帝和好运的名义”（*Col Nome di Dio e di Bona Ventura* ）以及美第奇银行的代表，遍布欧洲所有重要的首都和商业中心，包括伦敦、那不勒斯、科隆（Cologne）、日内瓦、里昂、巴塞尔、阿维尼翁、布吕赫、安特卫普、卢贝克（Lubeck）、安科纳、博洛尼亚、罗马、比萨和威尼斯。这些分行规模都很小，其他一些则更是临时性的机构，专为短时间的集市或会议上的交易提供服务。分行也都不会雇用很多人手。在1470年，平均一个分行的雇员人数也就是九名到十名。出纳员一年的工资大概是40弗罗林币，学徒则只有20弗罗林币。即便如此，很多分行在其所在的城市里也算得上最大的企业之一了。而这些分行的经理不仅是精明的生意人，更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代理人。比如说，美第奇米兰分行就类似于一个金融管理部门，他们的办公地点在一座由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提供的宫殿里。后来这里由米开罗佐设计、科西莫出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再比如罗马分行，因为要经常跟随教廷一起出行，所以他们不但能享受相当的特权，而且获得的盈利也更多。就像他的父亲扶植巴尔达萨雷·科萨，也就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一样，科西莫选择扶植托马索·巴伦图切利（Tommaso Parentucelli）。巴伦图切利是一个托斯卡纳医生的儿子，后来当上了博洛尼亚的主教，最终成了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巴伦图切利年轻时因为贫穷被迫辍学，他离开大学后在佛罗伦萨给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奇和帕拉·斯特罗齐的孩子做家庭教师。他在佛罗伦萨委员会中表现突出，后来又在扩充美第奇藏书室上给科西莫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他是一个友善、风趣、学识渊博的人。他的朋友，同样是人文主义者的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德·皮科洛米尼曾经说：“连巴伦图切利都不知道的事情一定是人力可知范围之外的事情。”科西莫看出巴伦图切利是一个值得支持之人，看重他条理清晰的头脑，谨慎而有目的性的处事方式；每次巴伦图切利找科西莫贷款，科西莫都会毫不犹豫地满足主教的一切要求。主教继任教皇之后，他与美第奇银行的紧密联系便成为对双方都更加有利的互惠关系。尼古拉五世的朋友比科洛米尼在1458年当选

教皇并选择了庇护二世的称号，他也延续了教廷与美第奇家族的传统友谊，继续将教廷的财务事宜委托给美第奇银行。1469年庇护二世来到佛罗伦萨的时候，甚至理所当然地住进了美第奇宫，在这里他和科西莫变得非常亲近。当教皇离开时，科西莫

> 想要亲吻教皇的脚，但是由于痛风，他已经无法弯腰。于是他大笑起来并讲了个笑话："两个从乡下返城的佛罗伦萨人，一个叫帕帕，一个叫卢波，在广场上相遇，他们伸出手臂想跟对方握手，但是因为两个人都胖得出奇，以至于太多的肉体（恕我使用这个词）阻隔在二人中间，只能用自己的肚子碰到对方的肚子。肥胖让他们失去了握手的能力，就像我的痛风剥夺了我致敬的能力一样。"

除了各种传统的银行业务之外，美第奇银行还接受客户的各种代购委托，无论是织锦挂毯，还是神圣遗骸；无论是马匹和奴隶，还是安特卫普修道士画的版画；甚至帮助拉特兰的圣约翰教堂寻找来自杜埃（Douai）和康布雷（Cambrai）的唱诗班男孩儿；还有一次竟然是一只长颈鹿。美第奇银行还是各种香料、丝绸、羊毛和布料的进出口商。他们买卖辣椒和糖、橄榄油、柑橘类水果、杏仁、皮草、刺绣、染料、珠宝，然而最重要的商品其实是一种透明的矿物盐——矾。它是生产上色快、颜色艳丽的染料必不可少的原料，在玻璃和皮革的制造过程中也十分常见。到1460年，几乎整个欧洲使用的矾都是从小亚细亚（Asia Minor）进口的，士麦那（Smyrna）附近产量丰富的矿藏一直被热那亚人控制，1455年以后又被土耳其人接管。但是到了1460年，在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附近的托尔法（Tolfa）的教廷国境内发现了新的储量丰富的矿藏，成千上万吨的矾随着死火山中的蒸汽喷了出来。美第奇抓住了这个价值连城的发现，这是一个再正确不过的商业决策。到了1466年，银行与教皇签订了合约，许可美第奇和铝业协会的合作伙伴们一起开采这个利益丰厚的矿藏并把产品销往海外。

几年后，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德·康米尼（Philippe de Commines）称，美第奇银行不但是欧洲最能赚钱的组织，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

伟大的商号。“光是美第奇的名字就可以让他们的仆人和代理人们享受无尽的优厚待遇，”康米尼如是写道，“我在佛兰德斯和英格兰见到的景象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

[1] 在英国1蒲式耳约等于8加仑，约36升。——译者注

第七章 艺术家与哀悼者

“房子这么大，家人却一个个离我而去了”

美第奇宫的访客们只要穿过拉尔加街上的敞廊，就可以进入一个优雅别致的内院，院子（*cotile* ）呈方形，四周是由柱子支撑的一圈拱廊，圆拱上方还有八个圆形大理石浮雕，其中几个是依照美第奇收藏的浮雕作品雕刻的，也有美第奇收集的勋章背面的图像。拱顶之下有古典的半身像、石像、圆柱、铭文和罗马石棺，其中就包括科西莫的曾曾曾曾祖父的堂兄弟、1299年任首席执政官的古乔·德·美第奇使用的公元四世纪石棺。当时院子里已经有或者后来增添的雕像还包括多纳泰罗的《大卫》（*David* ）[1] 和《朱蒂斯斩贺婪尼》（*Judith Slaying Holfernes* ）[2] 。

多纳泰罗1386年出生于意大利，他的父亲是尼科洛·迪·贝托·巴尔迪（Niccolo di Betto Bardi），一个因为支持阿尔比其家族而最终身败名裂的商人。像吉贝尔蒂一样，多纳泰罗原本是金匠学徒，而且还在吉贝尔蒂的工作室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不过他并没有留下来一起制作洗礼堂的大门，而是追随布鲁内莱斯基去了罗马。在那里，他一边在金店里打工，一边学习古典艺术。他回到佛罗伦萨之后，乐于尝试任何形式的作品：不论是制作壁炉架上的盾徽装饰，还是在铜版上雕刻浅浮雕，他都一样满怀热情。他还受雇为大教堂、乔托（Giotto）钟楼、奥尔圣米凯莱教堂和圣洛伦佐教堂制作艺术品，后来他还为圣洛伦佐教堂修建了铜质讲坛。尽管他的作品广受赞美——他为奥尔圣米凯莱教堂创作的大理石雕像《圣乔治》（*St George* ）尤其被认为是一项杰作——但直到完成铜像《大卫》之后，人们才开始真正理解他的绝世才华和独特创意。他的其他雕塑作品，如同他所处时代里的其他雕塑一样，往往被放在建

筑物里的指定位置来表现建筑主题或起装饰作用。但《大卫》不仅是精美至极、充满感情的艺术作品，更是令人震惊的创新设计，它是自古典时期以来，第一个无支撑物站立的人物铜像。

多纳泰罗同时期的一些人认为他惊世骇俗。多纳泰罗本人作为同性恋者就已经不被认可了，更让这些人气愤的是他喜欢把年轻男性的雕塑制作得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且充满肉欲。对科西莫来说，这样的反对意见完全没有道理，只能说是对激发了多纳泰罗创作灵感的古希腊理念的愚钝不解。出于对人文主义精神的钟爱，科西莫接受了安东尼奥·贝卡德里（Antonio Beccadelli）以《赫马佛洛狄忒斯》（*Hermaphrodutus* ）向其致敬。这一作品以卡图卢斯（Catullus）的方式赞颂了同性之爱的愉悦。也正是出于这样的人文主义精神，科西莫尊重多纳泰罗的才华，也尊重激发了这样才华的古典艺术。

科西莫对多纳泰罗的感情日益加深，甚至形成了一种慈父般的责任心。他会确保多纳泰罗从不缺少订单，要么是他直接向多纳泰罗订制，要么是把多纳泰罗推荐给自己的朋友。作为美第奇家族的收藏品，多纳泰罗制作的各种铜像从来没让科西莫失望过，其中就包括孔泰西纳·德·美第奇的铜质头像。正如乔焦·瓦萨里（Giorgio Vasari）说的那样：“多纳泰罗真心喜爱科西莫，对于他的喜好再了解不过，所以从来不会让他失望。”不过对于别的出资人来说，多纳泰罗就算不上幸运的选择了。曾经有一位热那亚商人在科西莫的推荐下，向多纳泰罗订制了一个铜制头像。但是作品完成之后，商人抱怨多纳泰罗要价太贵。于是，两人到科西莫面前让他评理。科西莫命仆人把铜像抬到美第奇宫的房顶上，放在碧蓝天空和充足阳光之下，然后他评定商人出的价钱低了。热那亚商人反驳说自己的出价已经相当慷慨了，鉴于多纳泰罗仅用一个月就完成了这个作品，他支付的工钱计算下来已达到一天半个多弗罗林币。这样的说法让多纳泰罗怒不可遏，他指责商人只会像买豆子一样讨价还价，根本不懂艺术。多纳泰罗甚至将铜像推出围栏，掉到街上“摔了个粉

碎”。窘迫的商人提出支付双倍价钱请他重新制作一个铜像，可惜无论是商人的重金还是科西莫的恳求，都没能说服多纳泰罗答应这件事。

多纳泰罗其实是一个完全不看重金钱的人。他把挣来的钱都放在一个柳条篮子中，篮子就用一根绳子吊在他工作室的天花板上。无论是他的工匠、学徒还是朋友都可以随意取用而无须征求他的许可。多纳泰罗对穿着也不讲究。科西莫不忍看他穿着简朴甚至破旧的衣服走在街上，就在一次过节的时候送给他一身精神的套装、一件红斗篷和一顶帽子。不过多纳泰罗没穿两天就又换回了旧衣服。待他年事渐高无法继续工作之后，科西莫就把卡法焦洛附近、属于美第奇产业的一个小农场赠送给他。但是，多纳泰罗一点儿也不喜欢那里的生活。农场的账目让他头昏脑涨；佃农们的抱怨更是让他心烦意乱：今天这个说大风掀翻了他们家鸽舍的顶棚；明天那个说因为没有交税，所以政府没收了自己的黄牛；后天又有一个说大雨毁了自己的果园和葡萄树。多纳泰罗恳求美第奇家族收回农场的所有权，科西莫不但照做了，而且依然把农场的收入记在多纳泰罗名下。“多纳泰罗对这样的安排再满意不过了，”瓦萨里说，“作为美第奇家族的家臣和朋友，多纳泰罗余生都过得衣食无忧、舒心惬意。”

在多纳泰罗为美第奇宫制作铜像和圆形浮雕的同时，菲利波·利比（Fra Filippo Lippi）也受雇为美第奇宫创作图画。菲利波比多纳泰罗小二十岁，就出生在佛罗伦萨。他的父亲是个屠夫，在菲利波还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他的妈妈也死了，所以年仅十六岁的菲利波被安置在了卡尔米内圣母大教堂（Santa Maria Del Carmine）[3] 的加尔默罗修会做一名修道士。可是菲利波对于修道院的生活完全不感兴趣，他在加尔默罗修会期间唯一的收获就是有幸看到了伟大的马萨乔（Masaccio）在布兰卡契堂（Brancacci）创作壁画，并立志成为像他一样的艺术家。事实上，在其他修士眼中，菲利波对艺术的热衷恐怕是他拥有的唯一美德了。他撒谎成性、嗜酒好色，根本不配做一名修道士，所以当他抛弃了

入会誓言，决心离开修道院的时候，他的上级们都感觉如释重负。离开修道院的菲利波不幸在安科纳海岸附近被巴巴里海盗（Barbary）劫持，当时他正和几个朋友一起乘船出海。成功逃脱的菲利波辗转来到了那不勒斯，又从这里回到了佛罗伦萨。他为圣安布罗焦修道院（Sant’Ambrogio）修女们创作的精致的祭坛装饰画让科西莫·德·美第奇注意到了他杰出的才华。尽管菲利波在别人眼中是个嫖客和扒手，但科西莫还是请他来为自己工作。菲利波的一些早期杰作都是在美第奇宫创作的，包括《圣母加冕》（*Coronation of the Virgin* ）[4] 。后来科西莫又帮助菲利波获得了在普拉托工作的机会。在创作圣史蒂芬教堂（St Stephen）主祭坛壁画的过程中，菲利波还把教堂院长，也就是科西莫儿子卡洛的肖像画了进去。

就是在为普拉托的圣玛格丽塔修道院（Santa Margherita）的修女们创作祭坛装饰画的过程中，好色的菲利波盯上了一个新入会的年轻修女——佛罗伦萨人弗朗切斯科·布蒂（Francesco Buti）的女儿卢克雷齐娅（Lucrezia）。菲利波巧言引诱，说服小修女做他壁画中女神的模特。修女受到引诱并跟他私奔，还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菲利皮诺（Filippino）。科西莫觉得已经成为父亲的菲利波应该安定下来，于是通过巧妙地向教皇展示了几件菲利波的小作品，就成功帮他获得了教皇特许他结婚的恩赐。

菲利波的好色已经在佛罗伦萨给科西莫招来了好多麻烦。每当有不可抑制的欲念袭来时，菲利波就无法专心创作。他曾经无数次溜出在美第奇宫的工作室，急匆匆地穿过花园，消失在拉尔加街上，天知道去什么地方找女人了。最终，习惯于要求艺术家在规定时间以商定的价格完成作品的科西莫忍不住把菲利波锁在屋子里，并告诉他不完成画作就不许出来。菲利波于是找了把剪刀，把床单全剪成布条系成绳子，顺着它爬下楼逃走了。菲利波被找到后在科西莫的劝说下同意回来工作，这令科西莫感到十分欣慰，并“下定决心今后只靠感情和善意留住菲利波，

许可他自由出入”。在那之后人们经常会听到科西莫说，对待艺术家应当充满尊重，而不应如那时期很多出资人一样视他们为雇佣工。

有一位艺术家是让人无法不敬重的，他就是被常称为安杰利科（Fra Angelico）的乔瓦尼·达·菲耶索莱（Giovanni da Fiesole）。这个矮小的修道士受雇于科西莫创作了圣马可教堂会规室、回廊和走廊墙壁上的壁画。安杰利科1387年出生在穆杰洛的维基奥（Vicchio），被取名为圭多（Guido）。后来他成为菲耶索莱的圣多梅尼科修道院（San Domenico）的教士时，改名为乔瓦尼。他在科尔托纳（Cortona）待过一段时间，并为那里的多明我会修道院创作了壁画。1418年他回到菲耶索莱，但直到1436年年近五十岁的时候，他才回到佛罗伦萨并接受科西莫的邀请重拾画笔。从此以后，科西莫对他的作品大为关注，给了他“许多关于《耶稣受难像》（*The Crucifixion* ）[5] 这幅画细节方面的帮助和建议”。这幅画是为会规室创作的，美第奇专属房间的壁画主题则是《贤士来朝》（*Adoration of the Magi* ），描绘的是贤士将王冠置于伯利恒马槽的事迹，科西莫喜欢“时刻看着这幅壁画，以贤士为榜样指导身为统治者的自己”。[6]

每天清晨，在开始创作《耶稣受难像》以及后来其他宗教主题的作品之前，安杰利科都会跪地祈祷。每当描绘耶稣基督受难于十字架上的画面时，他都会特别激动，以至于泪水夺眶而出，沿着面颊不断淌下。他是最淳朴、最诚实、最神圣的人。其他修道士从未见过他发怒。科西莫曾经说：“每个画家都是在画自己。”看看安杰利科作品中那些人物的脸庞和神情，你无法质疑这个说法的正确性。

安杰利科在1455年去世。他死后，科西莫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严重的关节炎和痛风让他几乎丧失了行动能力，哪怕是在家里转转也要靠仆人抬着才行。有时走到接近门廊的地方他还会大声叫喊，好像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似的。一次，妻子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叫喊？”科西莫竟

然答道："什么也不为。要是真有事情发生了，叫也没有用。"

随着年龄增长，科西莫变得越来越喜欢讽刺，越来越惜字如金，也越来越刻薄。据说有一次他的老朋友大主教向他请教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把修道士赌博定为违法行为，科西莫不无讽刺地回答说："最好先禁止他们玩灌铅的骰子。"来佛罗伦萨的访客都会发现他形容枯槁、疾病缠身并闷闷不乐，因为在他身体状况衰退的晚年里，科西莫确实遇到了不少伤心事。他的大儿子皮耶罗此时已经四十岁了，一直体弱多病，人们甚至怀疑他活不过自己的父亲。正因如此，科西莫一直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偏爱的二儿子乔瓦尼身上，也就是那个让米开罗佐在菲耶索莱的峭壁上修建美第奇别墅的人。

1458年别墅开工时，乔瓦尼只有37岁，是个精明能干、开朗愉悦的人。他的样貌称得上丑陋，有一个美第奇家族典型的大鼻子，眉毛之间还有一个大肿块，皮肤上布满了湿疹。乔瓦尼沉迷于女色和美食，身材肥胖。他很懂绘画，也热爱音乐，尤其喜欢听一个叫布尔基耶洛（Burchiello）的佛罗伦萨理发师讲的下流笑话，哪怕是在布尔基耶洛将其讽刺矛头转向了美第奇家族之后，乔瓦尼还不忘在去彼得罗洛（Pietrolo）接受硫黄浴治疗时邀请他来为自己讲笑话。乔瓦尼心宽体胖、无忧无虑，但他一直都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公民和精明能干的生意人。乔瓦尼是他父亲一手培养出来的，在银行总经理乔瓦尼·达·梅里戈·本奇去世之后，在银行生意问题上，他更是越来越受父亲的倚重。

乔瓦尼在费拉拉分行工作过一段时间，在1454年当选过执政官，后来又多年作为佛罗伦萨在教廷的大使，不过任大使时他似乎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和更世俗化的主教们一起吃吃喝喝上了。乔瓦尼也和他父亲一样从威尼斯买了一个切尔克斯女奴，她"容貌姣好，十七八岁……有一头乌黑的秀发和精致的五官，还聪明伶俐"。不过，乔瓦尼显然也很迷恋自己的妻子吉内夫拉·德利·阿尔比奇（Ginevra degli Albizzi），并且

十分喜爱他们唯一的儿子科西米诺（Cosimino）。科西莫也非常疼爱这个小男孩。同一时期生活在费拉拉的洛多维科·卡博内（Lodovico Carbone）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科西莫正在与卢卡大使代表团探讨国家大事，科西米诺拿着一把树枝走进来，打断了大人的谈话，让祖父给他做一个哨子。让代表团烦扰的是，科西莫真的马上中止了会议去帮小男孩儿做哨子，而且是直到把哨子做得完全符合他的心意才回来。代表团主席在被通知继续开会时认为有必要对科西莫提出抗议："先生，我不得不说，对于您的行为我们感到无比震惊，我们代表我们的民众来和您商讨国家大事，而您竟然抛下正事去陪一个孩子。"

"哦，大使阁下，"科西莫伸手搂住大使的肩膀，不带一丝窘意地回答道，"难道您本人不是一位父亲和祖父吗？我去做哨子您完全不应惊讶。幸好我孙子没让我给他吹上一段呢，因为如果他要求，我肯定也会照办的。"

但是，让这位祖父陷入无尽悲伤的是，他疼爱的小孙子在1461年过六岁生日之前不幸夭折了。仅仅两年之后，一直拒绝节食减肥的乔瓦尼也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科西莫再也没能从这些打击中恢复过来。每当仆人抬着他经过美第奇宫宽敞的房间时——在他事业的顶峰时期，这里曾经住着五十多人——他们都会听到科西莫低声哀叹："房子这么大，家人却一个个离我而去了。"在卡雷吉的别墅里，科西莫会独自静坐数小时。妻子问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待着，跟谁都不说话。"我们以前要出远门的时候，你总会提前两个星期就开始做准备，"科西莫回答道，"所以，现在我就要去另一个世界了，你难道不明白我有多少事情需要考虑吗？"还有一次，妻子问他为什么静坐的时候一直闭着眼睛，科西莫回答得更加简短和消极，他说："是为了适应永远地闭上。"

1464年初夏，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在佛罗伦萨的使者尼科代莫·特兰凯迪尼前去拜访科西莫。尼科代莫·特兰凯迪尼过去常常来美第奇

宫，有一次刚巧遇到科西莫和他的两个儿子同时卧病在床，都因痛风的困扰而变得脾气暴躁。而如今再看到科西莫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易怒，而是身心俱疲，甚至是彻底绝望了。除了痛风和关节炎之外，他还要忍受“因小便不畅而引起的持续发热”。科西莫对访客说：“我的尼科代莫啊，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能感觉到生命正在消逝，我已经准备好离开人世了。”两个月后的8月1日，科西莫去世了，享年76岁。在去世的前几天，他坚持要离开病床，穿上最正式的衣服，到圣洛伦佐教堂向院长忏悔。科西莫“还请院长做了弥撒”，儿子皮耶罗告诉他的两个孙子说：

> 他表现得好像完全健康似的。让他阐明信仰时，他逐字逐句地念诵了教义并重复了自己的忏悔，最后接受了圣餐。在整个过程中他都全神贯注，最先祈求的就是所有他错待过的人的原谅。

科西莫知道，对待有些人他太过严苛了。但是他如果仁慈一些，宽容一些，就永远不会获得他所拥有的这些权力和财富。他从来不认为允许那些在1434年被执政团驱逐出境的对手们回到佛罗伦萨是什么明智之举；他在面对威胁自己家族的敌人时也从来不会手软；他还一直小心确保家族成员和朋友都被安排到报酬丰厚又风光荣耀的位置上，而敌人则不能有半点机会。但是，对于佛罗伦萨人来说，对于那些深受他的恩惠、感激他为这个城市所做的贡献的人来说，他是值得尊敬的，他的去世是沉痛的，他的慷慨、政治敏感和繁多而广泛的成就都是被人们称颂的。作为他的朋友，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这样描写科西莫：他的渊博知识、良好品位和多才多艺绝对是卓越非凡的。

> 当旁听了某个学者的讲座后，他会给他们写信探讨相关的问题；在和神学家相处时，他也能对神学问题品评一番；他在研究任何一个学科时都充满兴趣，对哲学也是如此。占星家发现他对占星学颇为了解，因为他对此坚信不疑，并运用占星学指导个人生活。音乐家同样能够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精通，音乐也总能给他带来巨大的乐趣。雕塑和绘画更是他最了解的两种艺术，他向来偏爱有才华的工匠。在建筑方面，他算得上一位完美的评判家，没有哪一处重要的公共建筑是不考虑他的意见和建议就开工或完成的。

几年前，还不是执政团成员的科西莫被执政团描述为“共和国领袖”（*Capo della Repubblica* ）；此时执政团正式通过了授予他“国父”（*Pater Parriae* ）称号的法令，并下令将这一称号刻在他的墓碑之上。另一个曾经获得这一称号的人是西塞罗。

人们本想为科西莫建造宏伟的墓葬，至少要像他的家族为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洗礼堂中建造的那样。但是，科西莫在临终之时要求他的葬礼不需要任何“浮华的仪式”。

科西莫的父亲临终时也做了类似要求，不过它们被忽略了。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的遗体被放在敞开的棺材里抬到圣洛伦佐大教堂，一路上他的儿子们和28名美第奇家族成员跟随着，还有大批的外国使臣和佛罗伦萨官员。遗体最终被葬在老圣器收藏室中心的墓室中，其豪华程度绝对超过了乔瓦尼本人的期望。[7] 科西莫的葬礼相对低调，但足够壮观。圣洛伦佐教堂的大殿里点燃了繁星般的蜡烛，烦琐而庄严的仪式之后，科西莫的遗体被埋在了圣坛尽头的大理石纪念碑下，纪念碑顶上有蛇纹石和斑岩装饰，还刻有美第奇家族的盾徽。由于圣洛伦佐教堂是圣安布罗斯的教堂，而且圣坛下供奉着很多殉道者的遗骨，所以教堂规定不得有遗体葬在纪念碑下方的中殿里。于是遗体被安葬在地下墓穴中，但是为了将墓穴和蛇纹石、斑岩纪念碑连接起来，二者中间又修建了一个8英尺见方的巨型石柱。柱子上刻着“皮耶罗谨以此柱纪念他的父亲”。[8]

---

[1] 多纳泰罗的《大卫》（约1430年）现在陈列在巴杰罗国家博物馆。大议会在1494年将皮耶罗·德·美第奇驱逐出佛罗伦萨后没收了这座雕塑，并下令将其摆在市政厅花园的一根柱子上。

[2] 美第奇家族1494年逃出佛罗伦萨后，执政团下令将多纳泰罗的《朱蒂斯斩贺棼尼》（约1460年）从美第奇宫移至市政厅的栏杆前。它现在仍然矗立在宫殿之前，雕塑底座上的铭文是对所有暴君的警示：“给出了一个社会安全很好的例证。1495年。”（Exemplum.Sal［utis］

Pub［licae］.Cives.Pos［uere］.MCCCCXCV）。原本的铭文大意是："王国毁于骄奢，城市兴于美德。那些骄傲的人看吧，你们的头颅将被谦逊之人砍下。皮耶罗·迪·科西莫·德·美第奇谨以此女子雕塑致敬赐给这座城市自由和坚韧的市民们无敌永恒的精神。"

[3] 卡尔米内圣母教堂大部分已经毁于十八世纪朱塞佩·鲁杰里（Giuseppe Ruggieri）和朱利奥·曼纳约尼（Giulo Mannaioni）重建时发生的大火。但是布兰卡齐堂幸免于火灾。马萨乔和马索利诺（Masolino）创作的环形壁画由菲利波·利比的儿子菲利皮诺·利比完成。

[4] 菲利波·利比的《圣母加冕》现在收藏于里卡索利街（Via Ricasoli）52号的学院美术馆（Museo dell' Accademia）。

[5] 安杰利科的《耶稣受难像》收藏在圣马可教堂的会规室里。回廊另一面的圣马可博物馆里面有圣马可的主祭坛，还有科西莫的守护神科斯马斯和达米安跪在地毯上。

[6] 圣马可所有的房间都是由安杰利科及其助手负责装饰的。安杰利科的《圣母领报》被放置在通向宿舍走廊的楼梯顶端。

[7] 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在圣洛伦佐教堂老圣器收藏室中的石棺是由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布贾诺（Andrea Cavalcanti Buggiano）制作的。石棺上面的大理石上有代表美第奇家族的七颗红球。

[8] 在圣洛伦佐教堂的高坛上有科西莫的大理石纪念碑，也是那里唯一竖立的纪念碑。由韦罗基奥设计，上面的碑文如下：
这里安葬的是
科西莫·美第奇
依公共法令
尊称其为国父
享年
75岁3个月零20天

第二部分 **1464～1492**

第八章 痛风病人皮耶罗

“只要是为了购买珍贵或稀有的物件，他从来不在乎价钱”

皮耶罗成为美第奇一家之长时已经48岁。成年初期就伴随他的不健康状态让他有了“痛风病人”（*il Gottoso* ）这个绰号。这也是为什么他不能像一个美第奇财富继承人被期望的那样活跃于家族生意或佛罗伦萨国事中。不过，皮耶罗在1448年当选过执政官，也做过佛罗伦萨驻米兰、威尼斯和巴黎的大使。到1461年，他还当选首席执政官，也是美第奇家族中最后一个担任这一职位的成员。

皮耶罗的眼皮下垂，总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脖子上还有腺体肿块。尽管如此，他还是比弟弟乔瓦尼好看一些。他有一个坚毅的下巴和薄而紧绷的嘴唇，这显示出他长期忍受痛风和关节痛折磨以及湿疹侵扰的坚毅性格。事实上，皮耶罗的本性并不是他受慢性病折磨时所表现出来的暴躁易怒。他是个体贴、有耐心、有礼貌的人。有的人认为他的举止过于冷淡，质疑他拥有像他父亲一样统治佛罗伦萨的权威，但真正了解他的人都觉得他是可敬可爱的。

在银行业务方面，他虽然没有父亲那样的天分，但是非常严谨并讲究方法和系统。对于父亲葬礼的花销，皮耶罗秉承了一贯的细致入微，比如选择哪一种弥撒，给家族里的女眷们多少黑色布料做面纱和手帕，花多少钱给仆人和奴隶们做服丧衣物以及买多少蜡烛等。这种对细节和质量的关注使他具备了成为一个优秀外交家的素质。事实上，他在法国

的时候，法国国王路易十一（Louis XI）和他交情极深，以至于皮耶罗刚成为美第奇一家之长，路易十一就许可他用瓦卢瓦王朝（House of Valois）的三支百合标志装饰美第奇盾徽上的一个小球。

大部分佛罗伦萨人都已准备好给予皮耶罗像给予他父亲一样的权力和尊重，其中部分是缘于他的妻子及他们5个健康美丽的孩子。卢克雷齐娅·托尔纳博尼（Lucrezia Tornabuoni）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充满魅力、生气勃勃，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并且多才多艺。她原本的家族姓氏是托尔纳昆齐（Tornaquinci），是个贵族，但为了规避贵族出身所带来的限制，他们不仅把姓氏改了，把家族纹饰换了，连贵族的自负也抛弃了。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依然富有。这个家族的宫殿气势恢宏，位于当时佛罗伦萨最主要的大街上。在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唱诗班席位上，由多梅尼科·比戈尔迪·基兰达约（Domenico Bigordi Ghirlandaio）创作的描绘施洗者圣约翰和圣母生活场景的美丽壁画就是由托尔纳博尼家资助的。[1]

卢克雷齐娅不仅是艺术的资助者，也是一位能力出众的诗人。她最大的兴趣是神学，所以其大多数诗文也都是赞美诗或是改编自圣经的韵文。她的作品表现出这类创作中少见的深沉情感和极高的文学性。不过，无论是经文改编还是文学兴趣都没有妨碍她成为一名广受爱戴的妻子和母亲。她的丈夫、孩子们以及公公都非常爱她。

卢克雷齐娅有三个女儿，她们是玛丽亚、比安卡和通常被唤作南妮娜（Nannina）的卢克雷齐娅。她们后来都嫁入了门当户对的大家族。玛丽亚嫁给了莱奥佩托·罗西（Leopetto Rossi），比安卡嫁给了古列尔莫·德·帕奇（Guglielmo de’Pazzi），卢克雷齐娅嫁给了有学问的贝尔纳多·鲁切拉伊（Bernardo Rucellai）。卢克雷齐娅的两个儿子分别是哥哥洛伦佐和弟弟朱利亚诺（Giuliano）。在祖父去世时，他们分别是15岁和11岁，但是已经可以预见将来都会成为优秀杰出的男人。

洛伦佐很早就显示出了过人的天赋。虽然他没有父亲和弟弟那样在美第奇家族中少见的俊朗外表，但是他枯黄的脸色和不规则的五官充满力量、引人注目。虽然动作总是有些突兀和不雅，但是他高大强壮、身形矫健。洛伦佐从小接受了全面深入的教育。他的启蒙老师是拉丁语学者和外交家真蒂利·贝奇（Gentile Becchi），后来换成了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者和但丁作品评论家克里斯托弗罗·兰迪诺（Cristoforo Landino），还有祖父科西莫的追随者和朋友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洛伦佐的父亲皮耶罗在科西莫去世后也一直向他支付津贴。洛伦佐15岁时已经被委任了各种会令其他同龄孩子感到恐惧的重任。他曾带着外交任务被派往比萨会见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Ferrante）的二儿子费代里戈（Federigo）；代表父亲前往米兰出席国王费兰特长子与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女儿伊波利塔（Ippolita Sforza）的婚礼；到博洛尼亚与市民领袖乔瓦尼·本蒂沃利奥（Giovanni Bentivoglio）会谈；到威尼斯接受总督的召见；到费拉拉与埃斯特（Este）家族相处；到那不勒斯拜见国王费兰特。1466年，洛伦佐去罗马参加新教皇保罗二世（Paul Ⅱ）的就职典礼，并和他商讨了托尔法的矾矿合同问题；同时为了弥补他所接受的人文主义教育在商业研究上的欠缺，他还趁此机会同罗马分行经理乔瓦尼·托尔纳博尼（Giovanni Tornabuoni），也就是他的舅舅，讨论了银行业务。他在罗马期间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而信件内容完全像是写给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的。

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支持者看来，皮耶罗本人其实和洛伦佐一样需要别人的帮助和建议。自科西莫去世后，野心勃勃、善于逢迎、花言巧语的卢卡·皮蒂就一心想要在佛罗伦萨获得与他的才华相称的权力和影响力。他认为皮耶罗完全不配成为伟大的科西莫的接班人。持同样看法的还有杰出的外交家、科西莫以前的朋友，驻法国大使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在科西莫生命的最后几年中，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不断批评美第奇家族，认为高龄折损了科西莫的能力，就如疾病影响了他儿子的能力一样，他们“胆小懦弱，哪怕能招来一丁点儿麻烦或担忧的事也要

尽力避免”。这两个人对美第奇家族的攻击越来越公开化之后，佛罗伦萨大主教的兄弟迪奥蒂萨尔维·内罗尼（Diotisalvi Neroni）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迪奥蒂萨尔维·内罗尼曾经是佛罗伦萨第一个常驻威尼斯的大使，后来还做过驻米兰大使。这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反美第奇家族阵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佛罗伦萨渐渐被分化成两大阵营：高山派和平原派。高山派是卢卡·皮蒂的支持者，因为他在维奇奥桥另一侧的奥尔特拉诺（Oltrarno）高地上建造的宏伟宫殿此时已经接近完工；平原派则是仍然忠诚于美第奇家族的一派，因为美第奇家族是位于低地拉尔加街上美第奇宫的主人。高山派后来又获得了商人阶层的大力支持，起因是皮耶罗为了了解“自己站在多深的水里”，下令彻查自己的银行业务，之后的报告让他十分担心，以至于错误地追缴了一些他父亲科西莫授意忽略的欠款，虽然他已经尽其所能地帮助了几个受冲击最大的人，但由此而来的一连串破产自然都被归罪到了皮耶罗头上。尽管如此，高山派此时还没有强大到把皮耶罗赶走，就像四十几年前把科西莫驱逐出佛罗伦萨一样。直到一个更有活力、更有决心的美第奇反对者加入之后，局势才发生了变化。

这个高山派最强有力的加盟者就是尼科洛·索代里尼（Niccolo Soderini），他是个演说家，出身于佛罗伦萨最古老、最荣耀的家族之一。索代里尼激烈地抨击选举官制度，因为美第奇家族就是通过这种办法让自己的朋友和支持者都成为执政官的。索代里尼积极鼓吹恢复共和国早期采用的抽签办法，他的理想主义和雄辩最终获得了胜利。选举官制度被废止了，紧接着在1465年11月的选举中，尼科洛·索代里尼被选为首席执政官。他在成群支持者的簇拥下入主市政厅，还有人将一个橄榄叶做成的花环戴在他的头上。

不过除了这次得意扬扬的入职典礼，索代里尼的首席执政官任期称得上虎头蛇尾，令他颜面扫地。他承诺并积极推动的改革引发了委员会的反感，他们对此全无兴趣并将其搁置一旁。到了1466年1月，这批执

政官短暂的任期结束，沮丧地离开了市政厅，还有人嘲讽地在那里贴了张标语，上面写着“九个傻子滚出去”。索代里尼回到自己的住处，此时的他已经如皮蒂、阿恰尤奥利和内罗尼一样深刻地意识到，想要战胜美第奇家族，唯有武装起义这一条道路了。

几周过去了，美第奇的敌人们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然而在3月8日这一天，美第奇伟大的盟友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在米兰去世了。斯福尔扎有好几个儿子，其中年纪最大的加莱亚佐·玛丽亚（Galeazzo Maria）是一个喜怒无常、品位怪异并且举止反常的年轻人。不过皮耶罗仍然坚称，与米兰的盟友关系对佛罗伦萨未来的繁荣至关重要。相反，高山派则坚持认为佛罗伦萨应当重新与老朋友威尼斯结盟。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中，一场政变悄然酝酿起来。

皮蒂、索代里尼和他们的朋友们暗中与威尼斯人接洽，请求他们协助将美第奇赶出佛罗伦萨。他们还向费拉拉的大公、友善但好卖弄的博尔索·德·埃斯特（Borso d’Este）发出邀请，后者最近刚刚在费拉拉最主要的广场上竖立了一尊自己的雕像。博尔索·德·埃斯特同意提供帮助，他让自己的兄弟埃尔克莱（Ercole）带领军队穿过边界向佛罗伦萨进发。这支军队主要负责攻打佛罗伦萨，而其他力量则负责抓捕皮耶罗和他的两个儿子，然后随便给他们安个方便的罪名就马上处决。到了8月，实施这一计划的机会终于来了：皮耶罗因为生病，坐着轿子离开佛罗伦萨去卡雷吉的别墅休养了。

皮耶罗刚到卡雷吉，就有信使送信，说他的朋友、博洛尼亚的乔瓦尼·本蒂沃利奥警告他有危险迫近。皮耶罗马上命令仆人扶他下床并抬着他赶回佛罗伦萨，同时他还让洛伦佐先行一步为回归佛罗伦萨做好准备。洛伦佐一路策马飞奔，在回城的路上，发现有一些全副武装的叛乱者游荡在大主教的别墅附近。幸好没有被叛乱者认出，洛伦佐才得以通过。刚走出那些人的视线范围，洛伦佐就立刻派人掉头回去给父亲送

信，让他选择另一条鲜有人经过的小路回佛罗伦萨。

8月27日下午在佛罗伦萨，美第奇一家的突然出现让叛乱的领导者惊慌失措，立刻就丧失了胆量。卢卡·皮蒂马上来到美第奇宫乞求皮耶罗的原谅，并发誓以后要与美第奇家族“同生共死”；另外几个集结了武装支持者的人，却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皮耶罗看起来胸有成竹，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他先是召集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然后向米兰派出信使请求帮助，同时着手准备即将在9月2日举行的新一届由美第奇家族坚定的支持者组成的执政团的就职典礼。

这次的执政团是遵照美第奇的倡议，召集市民议会后选举出来的。几百名对美第奇怀有好感的市民进入由三千名士兵列队守卫的广场上，洛伦佐骑着马在中间往来巡视。议会同意组建最高司法委员会，这场风波就这么结束了。共和行动失败了，美第奇家族的权力却得到了巩固。

索代里尼、内罗尼和阿恰尤奥利都被驱逐出了佛罗伦萨。年事已高、颜面扫地的卢卡·皮蒂因为投降而被免于处罚。考虑到他曾是科西莫的朋友，美第奇希望他能够重新与自己结盟，这一期望后来也的确实现了。卢卡·皮蒂的女儿嫁给了乔瓦尼·托尔纳博尼，也就是皮耶罗的妻子卢克雷齐娅的一个近亲。然而，即便是被流放到了威尼斯，卢卡·皮蒂的两个同谋内罗尼和索代里尼仍然在策划着反对美第奇的阴谋。他们成功说服了那里的总督和议会，让他们相信在佛罗伦萨城内，反对美第奇家族的呼声高涨，只要威尼斯派军队攻打佛罗伦萨，城里的反美第奇阵营就会揭竿而起、配合威尼斯军队。带着这样的认识，1467年5月，著名的雇佣军指挥官巴尔托罗梅奥·科莱奥尼（Bartolommeo Colleoni）被任命为威尼斯共和国终身大将军，受雇带兵向托斯卡纳地区进发；然而这个巴尔托罗梅奥·科莱奥尼曾两次弃威尼斯于不顾，选择为米兰而战。皮耶罗这一次的反应依然很快，他召集了米兰和那不勒斯的援军，同时集结了佛罗伦萨的军队来阻截科莱奥尼的进发。佛罗伦萨的雇佣兵

在伊莫拉这个小邦国的地域内与威尼斯军队相遇，果断地将他们打败了。皮耶罗对佛罗伦萨政府的控制自此彻底稳固了。

皮耶罗在保护自己家族不受佛罗伦萨城内敌人的危害和保护自己的城市不受外来入侵的同时，还延续了美第奇家族慷慨大方的传统。他出资打造了圣米尼亚托教堂里为摆放十字架受难像的精致神龛。[2] 他为圣母领报大教堂制作的神龛更加华丽，底座上甚至刻有虚荣的铭文：“光这块大理石就花了四千弗罗林币。”[3] 与此同时，他还为父亲的古币收藏增添了无数的新藏品，为美第奇藏书室购买了大量稀有手稿，并且将许多手稿重新抄写并配上精美的插图。有人对安东尼奥·阿韦利诺·菲拉雷特（Antonio Averlino Filarete）说，皮耶罗会花几个小时来看这些书，翻书页时都十分小心，“好像那是一摞黄金”：

> 第一天，皮耶罗觉得看看这些书就会让他愉悦，目光扫过一个个书卷，任时间流逝，对眼睛而言都是一种享受。第二天，他想看看自己收藏的那些古代君王和杰出人物的雕像，有的雕像是用金子制成的，有的是用银子，有的是用铜，还有的是用宝石、大理石或者其他任何值得赏玩的珍贵材质……第三天，他又会想要看看数量巨大、价值连城的珠宝和宝石，有些刻了图案，有些没有。他特别喜欢一边赏玩宝贝，一边谈论它们各自的精彩之处。再过一天，他可能又会去欣赏金质、银质或其他什么宝贵材料制成的花瓶，并且赞赏它们极高的价值和制作者精良的工艺。总而言之，只要是购买珍贵或稀有的物件，他从来不在乎价钱。

和他的父亲一样，皮耶罗希望艺术家们把他看作出资人和朋友。安东尼奥·阿韦利诺·菲拉雷特还写道：科西莫在多纳泰罗的创作活跃期“授予了他许多荣耀和无穷的酬劳”，皮耶罗在这位雕塑家年老之后以及去世之时，依然供养他的生活并尊重他的遗愿。多纳泰罗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被安葬在圣洛伦佐教堂里靠近科西莫的地方。皮耶罗答应会完成他的心愿，并且承担了葬礼及将他葬在科西莫旁边墓穴的全部费用。多纳泰罗的棺材被抬到教堂下葬时，美第奇家族和成千上万悲恸的佛罗伦萨市民都来送他最后一程。

在长长的送葬队伍里，还包括很多为皮耶罗工作的或即将为他工作的艺术家。其中卢卡·德拉·罗比亚（Luca della Robbia）很快将被选为雕塑家行会的主席。卢卡出生于1400年，1428年为大教堂完成的优美的唱诗班唱台（singing-gallery）已经为他赢得了持久的赞誉。[4] 随后他又受执政团的雇佣来完成由乔托和安德烈亚·皮萨诺开启的钟楼北面的浮雕系列。[5] 皮耶罗还让他为自己制作了一些椭圆形的陶土浮雕，悬挂在美第奇宫书房的墙面上，此外还有一些铺地的地砖。这些物件都“新颖独特并且很适合夏天”。[6]

去圣洛伦佐教堂的送葬队伍中还有一位老艺术家，他就是当时已经69岁的保罗·迪·多尼（Paolo di Doni）。他也是佛罗伦萨人，害羞内向、沉默寡言，但是一位对动物，特别是鸟类，充满热情的艺术家。他房间里到处都是鸟类的图画，所以他也得了个绰号“乌切洛”（Uccello，在意大利语中是“鸟”的意思）。他有几幅用蛋彩画颜料创作的鸟类和其他动物的图画就被美第奇买走，挂在了美第奇宫的墙上。在多纳泰罗去世前几年，皮耶罗还曾邀请乌切洛创作以圣罗马诺（San Romano）溃败为主题的三版画，来纪念1432年阿尔比奇家族统治时期佛罗伦萨打败锡耶纳的历史。在这幅画中，马似乎主导了作战行动。后来这幅画被挂在了洛伦佐的卧室中。紧挨着它的是乌切洛的另外两幅作品，一幅描绘了巴黎传奇中的场景，另一幅画的是狮子与龙在争斗。[7]

《罗马诺之战》完成后不久，皮耶罗就又为美第奇宫向另一位佛罗伦萨艺术家订制了三幅大型画作。这位艺术家就是安东尼奥·迪·雅各博·本奇（Antonio di Jacobo Benci），因为他的父亲是个鸟贩子，所以他也被称为波拉尤奥洛（Pollaiuolo，在意大利语中有“鸡舍”的意思）。波拉尤奥洛既是雕塑家，雕刻家、珠宝和珐琅商人，也是一位画家。他向皮耶罗毛遂自荐，展示了自己精湛的人体画技艺。这种技艺是他长时间解剖观察尸体获得的。皮耶罗向他订购了《赫拉克勒斯的苦差》（*Labours of Hercules* ）中的两幅，分别是斩杀尼密阿巨狮和摧毁勒拿

九头蛇，此外还有一幅描写后来赫拉克勒斯击败利比亚巨人安泰俄斯的作品。[8] 赫拉克勒斯正是执政团印章上的图案，他象征着勇气。这些图画中的赫拉克勒斯被描绘得“英勇无畏”，与其说是希腊神话中的天神，倒不如说是一名穿着闪光铠甲的古代战士。

如何用古典神话故事来赞颂佛罗伦萨及其统治者的美德与成就？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哪个艺术家比亚历山德罗·迪·马里亚诺·菲利佩皮（Alessandro di Mariano Filipepi），也被称为波提切利（Botticelli），更契合皮耶罗的想法了。多纳泰罗去世时，波提切利只有22岁。他父亲是佛罗伦萨的一位皮革商人，在新镇的圣人街上（Via Nuova Borg’Ognissanti）经营着一家生意清淡的小店。他的哥哥以加工画框上的金箔（*batiloro* ）为生，并且替代父亲承担了抚养波提切利的责任。波提切利从小体弱多病，波提切利这一昵称（意思是小木桶）可能来源于他的哥哥。波提切利离开学校后，做过菲利波·利比的学徒，但是没多久他就应邀住进美第奇宫了。在那里，皮耶罗和卢克雷齐娅像家人一样对待他。多纳泰罗去世后不久，波提切利完成了《圣母颂》（*Madonna of the Magnificat* ）这幅画。画中他把美第奇家的两个儿子都描画成了跪在圣母面前的天使。朱利亚诺有天使一般的面容和浓密卷曲的迷人秀发，还有一缕正好垂下来挡住了他的眉毛；洛伦佐则略显黝黑，他只比画家小5岁，侧面、阴影的描绘手法让他的形象更加理想化。[9]

《三贤士朝圣》（*Adoration of the Magi* ）是波提切利为美第奇家创作的另一幅家庭群像，同样采取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所推崇的以宗教主题表现世俗人物的方法。这幅画中的洛伦佐——如果我们接受传统鉴定的话——被安排在明亮的光线下，而不再遮遮掩掩。这幅画是皮耶罗的朋友瓜斯帕尔·迪·扎诺比·德尔·拉马（Guaspare di Zanobi del Lama）为圣玛丽亚诺韦拉教堂绘制的，可能也是为感恩美第奇家族躲过1466年阴谋、避免暗杀或流放之灾。[10] 虽然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似乎占据了更

重要的位置，但是这幅画看起来显然是在向洛伦佐致敬。就如波提切利后来为商业行会委员会（Arte *della Mercanzia* ）创作的《坚韧》（*Fortitude* ）一样，那幅画其实也更像是致敬皮耶罗的。

《坚韧》是商业行会为他们的大厅订制的六幅版画之一，代表慈善、公正、信仰、节制和坚韧的美德。起初打算请安东尼奥·波拉尤奥洛的弟弟皮耶罗来画，但是皮耶罗·德·美第奇怂恿托马索·索代里尼（Tommaso Soderini）说服了委员会里的同事们至少让波提切利完成其中一幅。波提切利于是创作了这幅被认为暗喻了他的朋友和资助者坚毅的性格的画作。[11]

波提切利完成作品后不久，另一位艺术家又开始在美第奇宫一层的小教堂设计壁画。这位艺术家名叫贝诺佐·戈佐利，也是佛罗伦萨人，曾经在吉贝尔蒂的领导下协助建造洗礼堂的铜制大门，后来又做了安杰利科的助手。贝诺佐·戈佐利在美第奇教堂里没日没夜地工作了数月，渐渐完成了高坛周围墙壁上的壁画。在美第奇的标志图案钻戒和“永恒”（semper）箴言之上有装饰的花边，再上面是两幅巨大的描绘天使庆贺基督诞生的图画，天使们正好可以俯视下方摆在圣坛之上的菲利波·利比创作的《圣母与圣子》（*The Virgin Adoring the Child* ）。[12]

教堂主体的墙壁上，戈佐利画了纪念美第奇家族历史的内容，不过是用传说的三贤士去伯利恒的故事表现的，其中一些人物以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为圣三一教堂（Santa Trinita）的奥诺弗里奥·斯特罗齐（Onofrio Strozzi）家族小教堂创作的圣坛装饰物《贤士来朝》（*Adoration of the Magi* ）为原型。[13]

人们曾经坚定地认为艺术家是为了纪念1439年那次让佛罗伦萨成为欧洲文化中心的天主教大会而创作此画，所以将画中三位贤士的原型分别定为：东罗马帝国皇帝约翰·帕莱奥洛古斯——从他特别的长袍、长满络腮胡子的忧郁面容和独一无二的头巾式王冠可以辨别；君士坦丁堡

大牧首——神态庄严的白胡子老人，也戴着与众不同的头饰，骑在一匹骡子上；年仅10岁的美第奇家族继承人洛伦佐·德·美第奇。他穿着盛装，骑在装饰华丽的马背上，马饰上也装点着美第奇家族七个红色小球的纹饰。正是他的祖父让这些伟大的人物从东方来到了佛罗伦萨。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更有可能的解释是，对皮耶罗而言，这幅画描绘的其实是每年主显节当天在佛罗伦萨的三国王大游行。美第奇家族一直会参加这一活动，1446年科西莫本人就现身由米开罗佐帮助设计的贤士游行纪念活动。显然很多参加这次盛大游行的人都被戈佐利画到了作品中，他们大多数人戴着当时学者喜欢的平顶圆帽；在国父科西莫的肖像里，他也戴着这样的帽子。还有一些留着胡须的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学者，比如阿尔吉罗波洛斯和查尔康迪拉斯（Chalcondylas），则都受到了美第奇家族的游说并接受了他们的资助而留在佛罗伦萨。在这两人中间，戈佐利画了他自己，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他在画中人物的帽子上大胆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他前面是美第奇家族的其他成员：皮耶罗的小儿子朱利亚诺，有一个黑人举着弓箭走在他前面；国父科西莫，他骑的马上装饰着美第奇家族的纹饰以及他本人三根孔雀羽毛的徽标；科西莫的弟弟洛伦佐，戴着一顶锥形的帽子骑在骡子上；当然还有画家的资助者皮耶罗，就像他在其他画像中表现的那样，依然没有戴帽子。除此之外，画中还有三个漂亮的姑娘坐在马背上，穿着类似的衣服，帽子上插着羽毛，这显然代表着皮耶罗的三个女儿。[14]

同他预订的其他画作一样，皮耶罗对这幅图画的创作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指示戈佐利把服装画得越艳丽越好。戈佐利同意了他的提议，并提出因需要大量的金色和天青色染料，皮耶罗能否预支工钱。当图画快要完成时，皮耶罗说画中的天使似乎过于突出，但是戈佐利并不认同他的说法：

> 我总共画了两个六翼天使，其中一个遮掩在角落的云彩中，只能看到他的翅膀尖端，一点儿也不会喧宾夺主，只会增强图片的美感；而另一个天使则是在圣坛的远端，以同样的方式被云彩遮挡着。鲁贝

托·马泰利（Ruberto Martegli）看到这个布局的时候也说完全不会觉得突出。不过，如果您要求修改，我还是会遵照您的意愿，再多画两朵云彩。

皮耶罗可能没有活到壁画完成的那一天。他从1469年年初就一直疾病缠身，而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也麻烦不断。一些市民冒充他的名义在街上日夜抢掠作恶，并对被他们认定为美第奇反对者的路人施暴并勒索金钱。有人自以为是地认为皮耶罗的病体摧毁了他的意志，也有人将皮耶罗对共和国宪法的尊重误解为软弱可欺。但是皮耶罗又一次展现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强大决心，他下令把罪魁祸首带到他的房间，在病榻上斥责了他们的恶行；他还警告他们，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他会把已逐出佛罗伦萨的家族成员都召回来整治他们。这之后，城市里的暴行和掠夺马上就停止了，但是没到这一年年底，皮耶罗就去世了。圣洛伦佐教堂老圣器收藏室中，他被置于他弟弟乔瓦尼的旁边。在他及叔叔的遗体之上，皮耶罗的儿子们放置了斑岩石棺，还装饰了叶形图案，这些都是由多纳泰罗最杰出的学生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为美第奇家族设计的。[15]

---

[1] 在圣玛丽亚诺韦拉的马焦雷礼拜堂有基兰达约的壁画，资助者托尔纳博尼家族的女儿卢克雷齐娅·托尔纳博尼也被画进了《施洗者的诞生》（*Birth of the Baptist*）这幅画中，就是右数第三位女性人物。

[2] 圣米尼亚托主教堂的十字架神龛是为圣乔瓦尼·瓜尔贝托（San Giovanni Gualberto）的十字架制作的。他在圣三一教堂的小教堂是由卡奇尼设计的。毛织业行会负责圣米尼亚托主教堂的维护和装饰，并同意在这里修建神龛，前提是只有毛织业行会的标识可以被刻在上面。但是皮耶罗·德·美第奇坚持要把他的盾徽——一只鹰隼抓着刻有美第奇座右铭“永恒”的钻戒及三支羽毛——也刻在上面，最终两个盾徽都刻在了上面。

[3] 圣母领报大教堂的十字架神龛大约在1450年制作。就像圣米尼亚托主教堂的神龛一样，也是为皮耶罗设计的，设计者很可能是米开罗佐。

[4] 卢卡·德拉·罗比亚的《唱诗班唱台》现在被陈列在大教堂歌剧博物馆（Museo dell’Opera del Duomo）（主教堂广场9号）。多纳泰罗的作品也在这里展出。它们都是在1688年被从大教堂里移出来的，目的是大公王子费尔迪南多

和公主维奥兰特·贝亚特丽切在此举行婚礼时能有空间容纳下更多的歌手。

[5] 钟楼是从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修建，当时乔托是大教堂建造工程的总指挥（*Capomaestro* ）。卢卡·德拉·罗比亚的浅浮雕是在十五世纪三十年代完成的。

[6] 卢卡·德拉·罗比亚的釉面陶砖是为装饰皮耶罗·德·美第奇的书房而设计的，其中一部分现在陈列于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7] 乌切洛的三幅铜版画《圣罗马诺的溃败》散落到了各处。一幅在乌菲齐美术馆，一幅在罗浮宫，第三幅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伦敦的这幅画描绘的佛罗伦萨指挥官就是尼科洛·达·托伦蒂诺。他在主教堂广场的衣冠冢由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塔尼奥（Andrea del Castagno）设计建造。在它旁边的另一个衣冠冢是纪念英国雇佣军首领约翰·霍克伍德（John Hawkwood）的，由乌切洛设计建造。

[8] 波拉尤奥洛的《赫拉克勒斯的苦差》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他的《赫拉克勒斯和安泰俄斯》（*Hercules and Antaeus* ）展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

[9] 波提切利的《圣母颂》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

[10] 波提切利的《三贤士朝圣》是为圣玛丽亚诺韦拉创作的圣坛装饰物，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根据乔焦·瓦萨里的观点，画中将手伸向圣子的脚的国王就是科西莫；穿着白袍跪在旁边的是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在他后面，对“圣子表现出无限喜爱之情”的是科西莫的二儿子乔瓦尼。在画正中前景最显著位置跪着的就是皮耶罗·德·美第奇。而在画面最右侧、穿着橘色袍子的人则是波提切利本人。穿着黑色长袍、肩部有一条红色带子的人物可能是一个理想化的伟大的洛伦佐的画像。

[11] 波提切利的《坚韧》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

[12] 菲利波·利比的《圣母与圣子》于1814年被移出美第奇家族教堂，现在这幅画在柏林。现在美第奇堂里展示的是内里·迪比奇（Neri di Bicci）临摹的仿品。

[13] 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的《贤士来朝》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

[14] 在队列前方穿着蓝色衣服的年轻男子骑着神气的高头大马，马上还有一只豹子，这个人物通常被认为是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尽管有人说戈佐利可能是想以取笑的方式展现令人畏惧的、冷酷的卢卡领主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德利·安泰尔米内利（Castruccio Castracani degli Antelminelli），也是佛罗伦萨在十四世纪最强大的敌人。豹子就是卡斯特拉卡尼的象征。按照那一时代的习

惯，戈佐利应描画人们一眼就能想到的象征，而不是直接刻画与真实人物相似的形象。

[15] 韦罗基奥设计的圣洛伦佐教堂老圣器收藏室中的皮耶罗和乔瓦尼之墓是一座由蛇纹石、铜、斑岩和大理石建造的宏伟建筑，于1473年完工。

第九章 年轻的洛伦佐

“天生愉悦的性格”

洛伦佐此时年方二十，身强体壮、英气勃发、天资聪颖，好像有着永远使不完的精力，是美第奇家族杰出的领导者。这个家族从未有过一个像他这样的继承人。洛伦佐有一头顺直、浓密的中分黑发，长及肩膀；他的鼻子扁平，完全没有嗅觉，看起来像被打坏以后没有修复好一样；他宽大的下巴向前突出，使得下嘴唇几乎包住了上嘴唇；他的眉毛又粗又黑，眼球凸出，目光极具洞察力。洛伦佐实在是丑得吓人，连声音也是嘶哑的，带着鼻音，音调很高。不过一旦他开口说话，他的整个表情都鲜活了起来，举止让人着迷，细长的手指有丰富的表达动作，以至于让人忽略了他的缺陷。

他做每一件事都带着一种极具感染性的热情。如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所言：“他有一种天生愉悦的性格。”洛伦佐还对足球（*calcio* ）和手球（*palloni* ）充满兴趣。当时的足球与现在的足球运动类似，但是一方可以有27名队员；当时的手球则是一种在场地内戴着手套玩的球类游戏。洛伦佐还会出去打猎或带鹰行猎。虽然有些五音不全，他却很喜欢唱歌，无论是在饭桌边还是马鞍上都会高歌一曲；他的一个朋友说，有一次洛伦佐又说又唱地走了30英里，让所有随行的人都和他一样兴致高昂。洛伦佐唱的大部分歌曲都是他自己创作的，其中不乏一些不堪入耳的淫词浪调。他尤其喜欢听下流、低俗、有性暗示的笑话。他还和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喜欢恶作剧，有些玩笑在后人看来可以说是无情甚至冷酷的。据说有一次，一个无趣又嗜酒的医生喝得烂醉如泥，于是洛伦佐让两个朋友把医生绑了并偷偷送到乡下，关在一个偏远的农舍里，然后散布谣言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人们很快便相信了谣言，所以当医生逃

脱拘禁跑回家时，他的妻子还以为面前这个面色苍白、衣衫褴褛的人是鬼魂，说什么也不肯让他进门。

然而，洛伦佐的善良和体贴在他的朋友中也是出了名的。他是一个有求必应、重情重义、和蔼可亲（*simpatico* ）的人，善于结交朋友。洛伦佐特别喜欢动物，尤其是马。他的马名叫莫雷洛（Morello），一般由他亲自喂养。每次看到他，莫雷洛都会高兴地嘶叫、跺脚，欢迎主人；要是洛伦佐不能来，莫雷洛会焦躁、忧郁，甚至生病。洛伦佐乐于在乡下骑马打猎，在卡雷吉料理花园，在穆杰洛打理农场；或是养牛放牛，培育参加赛马节（*palio* ）的赛马；抑或在卡雷吉养卡拉布里亚（Calabrian）猪，在波焦阿卡伊阿诺（Poggio a Caiano）养西西里雉鸡、兔子，甚至尝试自制奶酪。但是，洛伦佐同样喜爱他在佛罗伦萨的生活，读书、写作、讨论、研究柏拉图、弹奏七弦竖琴、设计建筑图纸，还会纵情于声色。他是个令人惊讶的全才，而且希望让别人都认识到这一点。不得不承认的是，洛伦佐非常虚荣，争强好胜，要是在竞技或智力项目里输给别人，他会特别生气。

洛伦佐19岁的时候，家里人决定给他选定一门亲事。新娘是蒙特罗顿多（Monterotondo）的雅各布·奥尔西尼（Jacopo Orsini）16岁的女儿，罗马女继承人克拉丽切·奥尔西尼（Clarice Orsini）。洛伦佐的母亲以探望她的两位负责管理美第奇罗马分行的兄弟——乔瓦尼·托尔纳博尼和弗朗切斯科·托尔纳博尼为由，前往罗马了解女方的情况。卢克雷齐娅第一次看到克拉丽切时，她和母亲正走在去圣彼得大教堂的路上。当时克拉丽切披着罗马风格的罩衣（*lenzuolo* ），所以卢克雷齐娅没有看清她的情况，不过觉得“她好像很漂亮、白皙，而且个子很高”。卢克雷齐娅第二次见到克拉丽切时，依然没能如愿看清楚她的身材，“因为罗马女人总是把自己遮掩得很严实”；但是通过对方穿的紧身上衣，她判断她的胸部发育良好，而且有一双“修长而精致”的手。她的脸庞“有点圆，但也不乏吸引力，她的脖颈非常优雅，但是有点太细了”。她

的“皮肤很好”。卢克雷齐娅这一次还注意到，她的头发不是金色，而是红色的，毕竟罗马女人很少能够有幸天生金发。

“她不像我们佛罗伦萨的姑娘一样昂着头，而是略微向前伸，”卢克雷齐娅观察后得出了结论，“我想她应该有点害羞……不过总体上我觉得她是大大胜过普通人的。”当然，她还不忘强调说克拉丽切比不上她自己的三个女儿，因为她们不仅比她漂亮，还接受过任何罗马女孩儿不敢想的良好教育。不过卢克雷齐娅认为克拉丽切生性质朴、举止得当，希望她很快就可以适应佛罗伦萨的习俗。

佛罗伦萨人并不都认可这门亲事。一直以来，哪怕是城市里最有钱的商人家族也不会与托斯卡纳地区以外的家族联姻；而美第奇家族此前也一直选择与自己类似的家族结盟。洛伦佐就是这种安排的受益者。他的姐妹们全都嫁给了有钱有势的佛罗伦萨人；后来他自己的女儿们也效仿此道，一个嫁入了里多尔菲家族（Ridolfi）[1]，另一个嫁入了萨尔维亚蒂家族（Salviati）[2]。洛伦佐的第三个女儿路易贾（Luigia）从小就被许配给了她叔父皮耶尔弗兰切斯科（Pierfrancesco）的小儿子乔瓦尼。本来洛伦佐和父亲还曾因为分配科西莫的遗产而与皮耶尔弗兰切斯科一系产生过分歧，虽然所有的争议在定下这门亲事时已经解决了，但洛伦佐还是决心通过联姻的方式加强家族内部的联系。尽管这门亲事并没能结成，因为路易贾不到12岁就去世了，但是家族两大分支间的稳固关系在洛伦佐有生之年再未被破坏过。

尽管洛伦佐明白与佛罗伦萨家族联姻结盟的重要性，他也同样意识到突破常规与奥尔西尼家族联姻的好处。这不仅可以避免引起佛罗伦萨城内被他拒绝的各个有适婚女儿家族的嫉妒，还可以让他与一个拥有更大影响力的家族结盟。奥尔西尼家族世代都是军人或神职人员，在那不勒斯王国和罗马北部有大片的地产；他们不但能筹钱，还能征兵。此外，通过克拉丽切的舅舅——枢机主教拉蒂诺（Latino），奥尔西尼家

族在教廷也可以发挥稳固的影响力。洛伦佐本来想娶个更漂亮、更有文化、不是出身于这种封建封闭家庭的新娘，但是在一次弥撒上看到克拉丽切之后，他认为这门亲事是可以接受的；谈妥六千弗罗林币的嫁妆之后，洛伦佐就由他的远房堂兄比萨大主教菲利波·德·美第奇（Filippo de’Medici）代理在罗马与克拉丽切结婚了。

为了让佛罗伦萨人更好地接受这门不受欢迎的亲事，美第奇家族在1469年2月7日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锦标赛。这场锦标赛预计耗资一万达科特，并且将会成为佛罗伦萨人见过的最壮观的盛景之一。十五世纪诗人路易吉·浦尔契（Luigi Pulci）还为此写下了《洛伦佐·德·美第奇赛马节》（*La Giostra di Lorenzo de’Medici* ）这一迷人的意大利语诗篇。

比赛场地设在圣十字广场，在二月暖阳的照耀下，观众纷纷聚集到屋顶和阳台上，从窗户和栏杆的缝隙向下张望。他们可以看到美丽的卢克雷齐娅·多纳蒂（Lucrezia Donati）被护送到专为“锦标赛女王”准备的华丽宝座上；还能看到18名来自佛罗伦萨上流社会的金甲青年（*jeunesse doree* ），他们将作为骑士参赛。在传令官、旗手、吹笛人、鼓手依次进场之后，骑士们在男仆和重骑兵的陪同下游行穿过广场，接受成千上万名支持者热情的欢呼。每个骑士都穿着华丽的服饰，连铠甲和头盔也是为了比赛精心制作的。对于意大利人来说，虽然曾发生过费代里戈·达·蒙泰费尔特罗（Federigo da Montefeltro）在比赛中弄瞎一只眼的意外，但是他们的锦标赛可没有德国人所喜欢的那种野蛮血腥的场面；在佛罗伦萨，展现美好比炫耀鲁莽的勇气和力量更受推崇。

没有哪个骑士能比洛伦佐更加光彩照人。他披着一件镶着红边的白色丝绸斗篷，斗篷下面是一件天鹅绒外衣，还戴着一条绣着玫瑰图案的丝巾，玫瑰栩栩如生，有的凋谢了，有的正盛开着，旁边还用珍珠绣上了励志箴言：LE TEMPS REVIENT（时光倒转）。他的黑色天鹅绒帽子上也装饰着珍珠和红宝石，还有一颗用金线缠绕的大钻石。他骑的白

色战马是那不勒斯国王送的礼物，马身上也披着镶满珍珠的红白相间天鹅绒；另一匹他准备在长枪对决时骑的战马是费拉拉的博尔索·德·埃斯特赠送给他的；而他穿的铠甲则是米兰公爵的贺礼。他的盾牌正中也镶着一颗巨大的钻石；头盔顶上插着三根长长的蓝色羽毛；旗帜上画着一棵月桂树，树的一侧已经枯萎，另一侧则绿意盎然，旁边也用珍珠绣着和丝巾上一样的箴言。最后，包括著名的雇佣军首领罗伯托·达·圣塞韦里诺（Roberto da Sanseverino）在内的评委们将第一名授予了洛伦佐，颁给他一个镶银、头顶上有战神造型装饰的头盔。当然这多少是出于对赛事组织者继承人的褒奖，而非真心承认他无人可及的英勇善战。

4个月后，也就是1469年6月，这场精彩的锦标赛所致敬的克拉丽切·奥尔西尼来到了佛罗伦萨准备举行结婚庆典。美第奇宫至少要办5场盛大的宴席。过去几周中，鸡鸭鱼肉、葡萄酒和蜡、蛋糕和果冻、蜜饯、杏仁甜面包、糖衣杏仁就源源不断地从托斯卡纳的各个地方送往美第奇宫。宫外的敞廊和宫内的院子及花园里也摆上了一排排的桌子。庆典于周日早上开始。新娘由朱利亚诺从罗马护送来到佛罗伦萨，她要骑着那不勒斯国王赠送给新郎的白马从圣皮耶罗镇（Borgo San Piero）的亚历山德里宫（Palazzo Alessandri）出发前往美第奇宫。[3] 新娘穿着白色和金色相间的刺绣礼服骑在马上，后面跟随着长长的伴娘和仆人队伍。在佛罗伦萨，有喜事的家庭都要在门口挂上橄榄枝，新娘伴着院子里乐队吹奏的喜庆音乐通过拱道时，橄榄枝会被降至她头顶的高度。依照佛罗伦萨的传统，参加婚礼的宾客要按照年龄和性别分配座位。从敞廊上可以看到花园的是克拉丽切所在的桌子，这里坐的都是年轻的已婚女士；洛伦佐的桌子在大厅里，同桌的都是年轻的男士；敞廊上方的阳台上则是由卢克雷齐娅主持的、为年长女士们准备的宴席；而皮耶罗的同辈和长辈则在院子里另坐一桌。院子里还有一些巨大的铜质冷柜，里面装满了托斯卡纳葡萄酒。每上一道菜之前，都要先吹号示意，尽管“饭菜和酒水都是简单朴素的适合婚礼的种类”，但是宴席过后有统计称，到宴席结束，宾客们总共吃掉了5000多磅蜜饯，喝掉了超过300桶葡萄酒

——主要是棠比内洛（*trebbiano* ）和维奈西卡（*vernaccia* ）。宴席结束后，宾客们还可以欣赏音乐和舞蹈，整个舞台都装饰着挂毯，四周还围着绣了美第奇家族和奥尔西尼家族纹饰的帘子。

宴会、歌舞、展览和戏剧表演整整持续了三天。到星期二早上，新娘前往圣洛伦佐的大殿听弥撒，手里还拿着“一本《圣母书》，这本书精美无比，每个字都是用金子在深蓝色纸张上写成，封面则用水晶和烫银装饰”。

洛伦佐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 年轻多么美好；
>
> 可惜她短暂易逝；
>
> 让我们抓住这大好时光，及时行乐；
>
> 因为明天充满了未知。

洛伦佐的同龄人们都迫不及待地采纳了他的建议。他们白天参加舞会，晚上去焰火派对。洛伦佐有时在拂晓时分就起床，骑着马，挎上弓，到森林里去打猎；天黑之后，他又会和朋友们一起伴着月光在街上漫步，对着宫殿窗口的姑娘吟唱诗歌和小夜曲。还有一次，在一个寒冷冬夜［洛伦佐这次并没有在场，他当时去比萨访问了，是他的朋友菲利波·科尔西尼（Filippo Corsini）后来给他讲述的］，洛伦佐的一大堆朋友们冒着雪聚到了玛丽埃塔（Marietta）的宫殿外面，她是洛伦佐·迪·帕拉·斯特罗齐（Lorenzo di Palla Strozzi）的女儿，也是一个可爱、任性、父母双亡的姑娘。这一伙儿人在窗下举着明亮的火炬，吹着喇叭和笛子，又唱又叫，甚至还往她的窗户上扔雪球。玛丽埃塔打开窗子看；

> 结果一个小伙子的雪球砸到了玛丽埃塔雪一样白皙的脸上，围观者乐不可支……不过人们眼中的大美女玛丽埃塔对这样的情景已经见怪不怪，她优雅而巧妙地给自己解了围，不失一点颜面。

洛伦佐继承家族之初就成就显赫，那时佛罗伦萨举办了一系列娱乐活动：露天表演、锦标赛、化装舞会、展览和游行、音乐节、狂欢节，以及各种舞会和娱乐游戏。事实上，佛罗伦萨世代都因丰富的节庆活动而闻名欧洲，再没有哪个城市能拥有比这里更多更精彩的公众娱乐活动了。受惠于行会规章，这里的人每年的工作日不多于275天，所以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享受生活。在老市场举办嘉年华会、赛马节、足球赛和舞会；在圣十字广场模拟战斗；在阿诺河的各个桥下进行水上表演。有时候市政厅广场也会作为马戏团的表演场，甚至变成狩猎场。人们用长矛激怒到处乱跑的野猪；还把狮子从广场后面的笼子里放出来，想尽办法激起狮子的野性，尽管总是不太成功，但足以刺激它们去攻击猎狗。这种不顾后果的冒失行为不止一次地带来失控的局面，曾经一头狂暴的水牛夺去了三个人的性命。那之后，人们又把一匹母马和一群公马放到一起，有市民认为这个场景“是适合姑娘们的精彩娱乐”，然而另一位更受人尊重的日志作者则认为这个场景“令思想正派、行为得体的人感到不快”。

每年5月1日的五朔节（Calendimaggio）是最受欢迎的佛罗伦萨节日之一。每逢这一天，佛罗伦萨的年轻男子们都要起个大早，把由缎带和糖衣果仁装饰的开花灌木摆到他们心仪的姑娘家门口；而姑娘们则会穿上漂亮的长裙在圣三一教堂广场伴着鲁特琴的音乐翩翩起舞。除此之外，还有施洗者圣约翰日，纪念这座城市的守护神。每到这一天，所有商铺都会挂起彩带和横幅，还会举行无骑手的赛马比赛：参赛马匹在身体两侧驮着带穗子装饰的铁球，沿葡萄园街（Via della Vigna）的普拉托门（Porta al Prato），经老市场和科尔索街（the Corso），一路跑到克罗切门（Porta alla Croce）。大规模的游行队伍中有教士和唱诗班歌手，有装扮成天使和圣人的市民，还有装饰华丽的巨大战车穿行于街道，车上载着大教堂的圣物，包括神圣王冠上的一根荆棘、圣十字架上的一个钉子以及圣约翰的一根手指。主教堂广场上会支起巨大的有银色星星图案的蓝色顶棚，顶棚下面摆满了虔诚信徒们送来的彩绘蜡制供奉

品，这些都要被送到洗礼堂去。在市政厅广场上，载有镀金城堡模型的马车要依次通过彩旗飘舞的市政厅阳台，每个精致的镀金城堡代表一个附属于佛罗伦萨的市镇。

四旬斋节（Lenten festivals）的庆祝仪式自然要严肃得多。在受难周的星期三，大教堂会举行黑暗晨祷。整个教堂不亮一盏灯，只在圣坛上点着一根蜡烛；黑暗之中，神职人员和集会教众仪式性地用柳树杖敲击地面。到了星期四，也就是濯足节，大主教会为穷人施洗足礼。星期五是耶稣受难日，在下午三点整，所有教堂和修道院的执事都要到街上去，用木质的响板召唤人们，无论身处何地，此刻都要停下手中事，跪下来虔心祈祷。随后还会重演基督的葬礼，整条街上都要挂起黑布以示哀悼。修道士组成的长队沿街行进，他们拿着谴责的标语、荆棘编成的王冠、长矛和海绵，以及《耶稣受难记》中提到的所有物品，从锤子、钉子到紫色长袍和骰子，应有尽有。他们后面是象征死去的基督的形象，还要为他支起黑色和金色相间的顶棚；再后面是一身黑衣的圣母玛丽亚，手里拿着一条白色的手帕。星期六是复活节前夕，所有的灯都会被重新点亮。大教堂里圣坛上的黑布也都换成了金色。大主教要唱起《荣归主颂》（*Gloria in Excelsis* ）；大教堂放飞的鸽子会一直飞过主教堂广场的屋顶，钟楼里的钟也会敲响令人振奋的钟声，响彻整个佛罗伦萨。

洛伦佐和朱利亚诺很享受这些节日，他们帮助设计舞台、布景和猎捕陷阱，还有雕塑和铠甲、表演者的戏服，以及精美的马具和用来掩盖动物气味的香薰。他们还乐于创作戏剧和露天表演，剧情里充满了当时人们最热衷的典故；他们也喜欢和学者、诗人一起讨论演讲、歌曲以及带着隐喻的假面剧本中夸张的台词。

任何来佛罗伦萨的尊贵客人都会受到盛情款待。因此，1473年6月22日，一支护送那不勒斯国王的女儿埃莱奥诺拉（Eleonora）去与费拉

拉的公爵埃尔克莱（Duke Ercole）完婚的庞大贵族队伍向北行至佛罗伦萨时，佛罗伦萨人就不失时机地按照风俗热情地迎接了他们。公主穿着黑色和金色相间、“镶着数不清的珍珠和宝石”的礼服，骑马经罗马娜门（Porta Romana），穿过维奇奥桥到市政厅，沿途都有市民向她欢呼鼓掌。她在市政厅接受了执政官们的致敬之后，继续前往美第奇宫同洛伦佐、朱利亚诺和其他无数客人共进晚餐。第二天还举办了假面舞会及焰火表演。6月24日，在普拉托延伸到阿诺河河岸的草地上还举行了一个花园派对（*fête champêtre* ），客人们可以吃着草莓，沿着河岸在绿草地上散步，也可以像充满活力的佛罗伦萨人一样在阳光下尽情舞蹈，随意跳跃嬉戏。

这些节日盛大而激动人心，但也算不上多与众不同。不过所有人都承认，1475年佛罗伦萨举办的锦标赛堪称绝无仅有的一次盛事，其规模甚至超过了1469年的赛马节（*giostra* ）。这次锦标赛是以朱利亚诺的名义举办的，他当时22岁，一头乌发，高大健壮，广受爱慕。朱利亚诺的赛马节也在圣十字广场举办，美丽的卢克雷齐娅·多纳蒂也如1469年一样又一次被奉为“锦标赛女王”，而另一位更加美丽的西莫内塔·卡塔内奥（Simonetta Cattaneo）则坐在了“美貌女王”的宝座上，她是马尔科·韦斯普奇（Marco Vespucci）的妻子，据说朱利亚诺深深地爱着这位因肺病而不久于人世的年轻女士。朱利亚诺来到她的面前，身上戴着她的信物。他穿着一套量身订制的礼服，据说这套衣服花费了至少八千弗罗林币。朱利亚诺的旗帜是由波提切利设计的，描绘的是智慧和战争女神帕拉斯（Pallas）穿着金色的长袍，手持长矛和盾牌，低头俯视着站在橄榄树旁边的丘比特，后者脚下还有弓和折断的箭。如他的兄长一样，朱利亚诺也获得了第一名，他戴着头盔接受了颁奖，这个头盔是韦罗基奥为预料之中的胜利而特意设计的。

这次著名的锦标赛还是安杰洛·安布罗吉尼（Angelo Ambrogini）早期文学作品的灵感来源。安杰洛·安布罗吉尼也被人们称作波利齐亚诺

（Poliziano），这是他的出生地的名字。他的父亲是一位优秀的托斯卡纳律师，也是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后来被设计暗杀皮耶罗的阴谋者们杀害。父亲去世后不久，波利齐亚诺就被带到了佛罗伦萨，由美第奇家族承担他的教育费用：他曾先后跟随克里斯托法罗·兰迪诺学习拉丁文，跟随阿尔吉罗波洛斯和安德尼可士·卡里斯托斯（Andronicos Kallistos）学习希腊语，跟随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学习哲学。美第奇家族让他想在这里住多久就住多久，后来还赠送了一套乡村别墅给他。他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令人震惊的学识和与他年龄不符的文学素养。他创作的《朱利亚诺·美第奇赛马节的房间》（*Stanze della Giostra di Giuliano de’Medici* ）树立了他继薄伽丘之后最杰出的意大利诗人的地位。

波利齐亚诺对朱利亚诺和洛伦佐的致敬可不是任何一个慷慨的资助者都理应享有的隐喻奉承而已，因为洛伦佐的确是“为托斯卡纳春天欢畅的鸟儿们提供栖息之地的月桂树枝”。洛伦佐经常邀请艺术家、作家和学者到他在菲耶索莱、卡法焦洛和卡雷吉的乡村别墅中一起畅谈、朗读、欣赏音乐或探讨古典文本与哲学谜题。有时他们也会在卡马尔多利修道院（Abbey of Camaldoli）[4] 见面，1468年时，洛伦佐和朱利亚诺曾经连续四天和柏拉图研究院的多位成员讨论人类最高的使命、至善（*summum bonum* ）的本质，以及《埃涅阿斯纪》（*Aeneid* ）中的哲学理念等，这些人包括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克里斯托法罗·兰迪诺、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以及三位学术修养颇高的商人：阿拉曼诺·里努奇尼（Alamanno Rinuccini）、多纳托·阿恰尤奥利（Donato Acciaiuoli）和皮耶罗·阿恰尤奥利（Piero Acciaiuoli）。

洛伦佐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城市里一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都来到我家悼念他，并且鼓励我像父亲和祖父一样挑起治理国家的重担。”来访人员中领头的托马索·索代里尼和阴谋策划推翻皮耶罗的尼科洛·索代里尼是亲兄弟，但他一直都反对家人的阴谋。此

外，因为他娶了托尔纳博尼家的女儿，所以洛伦佐也算是他的外甥。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几名皮蒂家族的成员。他们在吊唁的前一天参加了一个在圣安东尼奥修道院（Sant’Antonio）举行的有七百多名现任政府支持者出席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皮蒂家族成员为卢卡·皮蒂在那次阴谋中的行为做出了补偿，他们坚定地支持索代里尼请求洛伦佐继任的提议。洛伦佐谦逊地听取了来访人员的陈述，但是“他们的提议有违我年轻人的天性，”他反驳说，

> 尤其是考虑到即将面临的巨大的重担和危险，我十分不情愿地同意了。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朋友和财产；因为在佛罗伦萨，不在政府任职的富人往往会遇到磨难。

洛伦佐的不情愿是可以理解的。此时他还不满21岁，刚结婚不到6个月，当然想将更多的时间用在那些他投入极大热情的享乐上，可是新责任却不允许他这样做。洛伦佐是一个谨慎而有野心的年轻人，他深知拒绝公共职责不仅是自私的而且是不明智的。即使没有母亲的建议，他也不会置家族的责任于不顾，更何况他那有责任心、理智且有才华的母亲深刻地影响着他。虽然谦称自己还没有父亲那样的权威，但是他已经写信给米兰公爵要求斯福尔扎家族将从祖父科西莫时期开始的对美第奇家族的支持延续下去。

公爵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继承者加莱亚佐·玛丽亚·斯福尔扎（Galeazzo Maria Sforza）此时在米兰已经地位稳固。他是一位有才能的统治者，但是他令人发指的邪恶和残忍行径也招来了越来越多的恶名。他的敌人声称他强奸过无数米兰贵族的妻子和女儿；他发明酷刑来惩罚冒犯了他的人并借此满足自己的虐待欲；他亲自监督犯人受刑，甚至亲手砍断他们的四肢；将死之人痛苦的呻吟和残破的尸体都能让他感到愉悦。支持与米兰结盟的一方驳斥说这些故事都是子虚乌有的恶意中伤，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位公爵是个极度奢侈与虚荣的人。1471年他访问佛罗伦萨时，带来了数量惊人的顾问、随从、仆人和士兵，其中包括

500名步兵、100名骑士和50名穿着银色制服的马夫，每个马夫牵着一匹配了金色锦缎马鞍、金质马镫和丝绣缰绳的战马。公爵还带了他的号手和鼓手，以及猎人、养鹰人和猎犬。他的妻子、女儿及侍女进城时足足坐满了12顶用金色锦缎覆盖的轿子。

佛罗伦萨人承认排场盛大，但是没有过分地崇拜。只要愿意，他们完全能创造出比这更壮观的场面。连米兰公爵也不得不承认，尽管美第奇家族的生活方式简朴得多，尽管洛伦佐穿的都是低调、深颜色的衣服，但是米兰的财富和美第奇宫四墙之内聚集的财富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虽然自以为是、残暴成性，加莱亚佐·玛丽亚·斯福尔扎却是一个有学问、有品位的鉴赏家，他认为洛伦佐的艺术和学术声望名副其实，而且这位年轻的主人为资助艺术和文化所做的贡献也令他肃然起敬。

然而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他们想要的则是分享属于美第奇家族的尊重和权势。皮耶罗刚去世，一个摧毁美第奇家族影响力的新阴谋就开始筹划了。1466年因推翻皮耶罗的阴谋失败而被流放的那批人，想要利用美第奇家族新领袖的年轻和缺乏经验卷土重来。他们在迪奥蒂萨尔维·内罗尼的领导下集结军队，占领了普拉托。不过这是他们能取得的最大战果了。洛伦佐和坚定支持他的执政团像当年皮耶罗面对威胁时一样果断出击，立即派出一支雇佣兵队伍夺回了普拉托，密谋者们本来指望的来自佛罗伦萨内部同谋者和费拉拉的增援也随之失去了。阴谋最终未能得逞，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再一次获得巩固。

此时，洛伦佐的个人地位其实还没有获得公开的认可。举个例子来说，第二年教皇保罗二世（Paul Ⅱ）去世时，执政团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到罗马向继任者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Ⅳ）表示祝贺，洛伦佐也是这个代表团中的一员，但是他并没有享受到任何优待或比其他使节更高的地位：毕竟，佛罗伦萨在名义上依然是共和国；而佛罗伦萨的市民们也更希望维持现状。尽管如此，洛伦佐还是凭借出身而受到了一定的特殊

对待。年轻的他本不能进入百人团，不过百人团的成员们通过了一项特殊法案许可他加入。他同时也被许可加入最高司法委员会，并且像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一样处理关乎国家的重要事务，他给各国使节和王储们写了不计其数的信函，还在各种委员会的议事进程中充当领导角色。

1472年，沃尔泰拉地区出现了动乱，在应对动乱过程中，洛伦佐的个人影响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沃尔泰拉一直是托斯卡纳地区最不稳定的市县之一，因为尽管有自治政府，每年却还要向佛罗伦萨缴纳贡金。这次动乱的起因是沃尔泰拉附近一处矾矿的开采合同问题。依据合同，开采权由一个财团获得，这个财团包括三个佛罗伦萨人、三个锡耶纳人和两个沃尔泰拉人。但是沃尔泰拉地区的居民普遍认为这个财团是通过欺诈的手段获得了利益丰厚的合同，所以他们选举出地方法官来控制矾矿并且赶走了正在作业的工人。洛伦佐本来不是这个财团的成员，也不负责财团的事务，但是沃尔泰拉的工会要求他对争议进行仲裁。洛伦佐支持财团的意见并判定应当马上将矾矿的控制权交还给财团。受到这一判定的鼓励，财团中的两个沃尔泰拉人因吉拉米（Inghirami）和里科巴尔迪（Riccobaldi）立即带领一支武装护送队伍回到矾矿，以合法拥有者代表的地位自居并宣示所有权。这样的行为招致了武力冲突，场面十分血腥，多人丧生，因吉拉米的尸体被从窗口扔到了下面的广场上，佛罗伦萨派驻沃尔泰拉的地方长官（*Capitano*）庆幸自己没有和他一起被扔出去。

此时的洛伦佐认定必须武力镇压暴动。不过他的命令没有立即得到遵从。虽然他宣称支持者被无情杀害，而且沃尔泰拉暴乱者们与被驱逐出佛罗伦萨的流亡者们相互勾结准备攻击美第奇家族，但是大部分执政官认为以武力解决冲突反而会激化矛盾，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沃尔泰拉的主教也持相同观点。不过，洛伦佐此时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沃尔泰拉人向来爱闹事，这次必须让他们受点教训；如果他们没有受到惩罚，其他托斯卡纳市县也许就会效仿他们的做法。最终，洛伦佐的意见

还是被采纳了。一支由乌尔比诺伯爵（Count of Urbino）费代里戈·达·蒙泰费尔特罗领导、由佛罗伦萨出钱的雇佣军队伍被派往沃尔泰拉。沃尔泰拉的市民疯狂地想要寻找同盟，他们甚至向那不勒斯国王提出，如果他派兵协助抵御佛罗伦萨的攻击，沃尔泰拉就将归顺于他。可是除了锡耶纳和皮翁比诺（Piombino）提供了一点点帮助之外，没有什么人愿意来拯救沃尔泰拉。经过了一个月的围城战，沃尔泰拉最终还是投降了。洛伦佐写信说这一事件的顺利解决令他感到欣慰，可惜这封信写得太早了。

这封信抵达沃尔泰拉时，整座城市已经被抢掠一空。谁也不知道投降条约为何会被公然践踏。有人说实际上沃尔泰拉人自己雇用的雇佣兵为乌尔比诺伯爵的军队打开了城门，为的是一起洗劫沃尔泰拉。不管伯爵的队伍怎样进城，反正他们很快便展开了掠夺，这些人闯进民宅和店铺，杀人强奸，无恶不作。有人甚至说伯爵本人不但没有阻止这些行为，还偷走了一本稀有的多语种《圣经》；也有人说伯爵虽然处罚并吊死了几名作恶的士兵，但完全没有起到警示作用。总之，暴乱持续了数小时，成百上千人或死或伤，每条街道上都是抢掠和破坏的痕迹。现场的惨状又因为随后大雨引发的塌方而更加令人心惊胆战。

得知这一切后，洛伦佐马上赶到了沃尔泰拉。他尽己所能地向沃尔泰拉人民表达了佛罗伦萨市民对暴行的无比遗憾。他显然是真诚的；但是人们无法忽视正是他鼓吹暴力镇压，正是他雇用了乌尔比诺伯爵，正是他把矾矿的所有权判给了最初的特许经营者（*concessionarires* ），正是他强行收回了沃尔泰拉人的自治权。在沃尔泰拉，这些事情至今依然被人们铭记在心。

---

[1] 里多尔菲家族不久之后在马焦街（现在的马焦雷街）和马泽塔街（Via Mazzetta）的交叉路口修建了宫殿。现在宫殿被称为圭迪故居（Casa Guidi）。1861年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就是在这里去世的。

[2] 十四世纪的萨尔维亚蒂宫建在德拉维尼亚韦基亚街（Via della Vigna Vecchia）和帕尔米耶雷街（Via Palmiere）的交叉口。

[3] 圣皮耶罗镇就是现在的阿尔比奇镇。

[4] 卡马尔多利修道院，即卡马尔多利的仁爱修会是在十一世纪初由圣罗穆阿尔多（St Romualdo）创建的。它的名字来源于马尔多利园（Campus Maldoli），是一片面积达3000英亩的森林。一个叫马尔多卢斯（Maldolus）的阿雷佐富商向修会提供了这片地产。药房是十六世纪建造的，其他房屋大多是十七、十八世纪建造的。

第十章 教皇与帕奇家族

“除了杀人，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Francesco Della Rovere）1471年当选教皇，称西克斯图斯四世，当时洛伦佐代表佛罗伦萨向他致以祝贺。西克斯图斯四世身材魁梧、性格粗暴。他的脑袋特别大，还有一个塌鼻子，牙齿也都掉光了，所以总是显得很吓人。他出生于萨沃纳（Savona）附近一个贫穷的渔民社区，很小就加入了方济会。凭借着卓越的讲道才能、好学、虔诚，还有一点点个人魅力和野心，他在不到50岁时就成为方济会的会长，三年之后又当上了枢机主教。自那以后，他就不停地为自己众多的亲戚谋求各种福利，包括恩惠、职位、金钱、土地和权力，其中尤以教皇的姐姐一家受惠最多。至于这些亲戚是否具备相匹配的才能则十分值得怀疑。教皇的外甥中有六个被封为枢机主教，至于那些没有投身教会的亲属，教皇也是想尽办法为他们在各个教廷国中谋求有利可图的官职和爵位。

皮耶罗·里亚里奥（Piero Riario）是教皇的外甥之一，他机智幽默、和蔼可亲，但喜欢浮夸炫耀。在教皇的帮助下，他当上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圣安布罗斯修道院院长，特雷维索（Treviso）、芒德（Mende）、斯帕拉托（Spalato）和塞尼加利亚（Senigallia）的主教以及佛罗伦萨的大主教。另外一个叫吉罗拉莫·里亚里奥（Girolamo Riario）的外甥更是贪得无厌，很多人相信他其实是教皇的私生子。这个肥胖、粗野、聒噪的年轻人看上了伊莫拉这片地区，认为以此为基础可以在罗马涅地区逐步获取更多的地产。伊莫拉这个位于博洛尼亚和弗利（Forli）之间的小镇最近被塔代奥·曼弗雷迪（Taddeo Manfredi）卖给了米兰公爵，而教皇恰好认为后者的亲生女儿卡泰丽娜·斯福尔扎（Caterina Sforza）是吉

罗拉莫新娘的不二人选。于是双方随即展开了协商，而美第奇银行在罗马的分行也被下令负责筹集四万达科特的资金用来购买伊莫拉。

对于这个要求，洛伦佐感到非常不安。到目前为止，他和教皇的关系依然非常亲密，罗马对他的态度还是“十分尊敬”的，而且教皇也向他保证美第奇银行仍然是教廷的御用银行和托尔法矾矿的代理人。教皇还赠送给洛伦佐两个大理石头像雕塑，一个是奥古斯都（Augustus），另一个是阿格里帕（Agrippa）。除此之外，洛伦佐还获得了以最优惠的价格购买教皇保罗二世收藏品的机会，其中的珍宝种类繁多，包括凹雕、浮雕、花瓶和半宝石级的酒杯，等等。洛伦佐当然迫切地希望自己与新任教皇的友好关系不受破坏；另外，他也明白伊莫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个小镇是从里米尼（Rimini）到博洛尼亚最主要的通道，洛伦佐一直希望将其买下归佛罗伦萨所有，所以无论如何不能让它落到教皇手里。当贷款申请被交到自己面前时，洛伦佐找各种借口不批准这笔贷款。但是教皇仍不死心，又去找了美第奇银行在罗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帕奇家族。后者欣然接受了这个为教皇服务的机会，并希望借此夺走垂涎已久的作为教廷银行的美差。

在帮助吉罗拉莫如愿购得伊莫拉之后，教皇又把注意力转向了侄子乔瓦尼·德拉·罗韦雷（Giovanni Della Rovere）。虽然他已经当上了罗马的地方行政长官，还是皮德蒙特（Piedmont）的蒙多维（Mondovi）的领主，但是他依然想像表亲一样在罗马涅地区立足获益。西克斯图斯于是热心地为乔瓦尼安排了与乌尔比诺公爵费代里戈（Duke Federigo of Urbino）长女的婚事。这样一来，不仅教皇的势力范围空前地向佛罗伦萨逼近，而且佛罗伦萨失去了一个原本听命于它的成功的雇佣军首领。

至此，洛伦佐与教廷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张；当教皇竭力要将尼科洛·维泰利（Niccolò Vitelli）赶出卡斯泰洛城（Città di Castello）时，佛罗伦萨和教会开战已经迫在眉睫。卡斯泰洛城是佛罗伦萨的前哨圣塞

波尔克罗镇（Borgo San Sepolcro）附近的一个小镇，科西莫在世时，用从一个犹太当铺老板那里没收来的资金购买了这里的所有权。现在为了保卫教皇眼中最厚颜无耻的维泰利，洛伦佐集结了6000人的兵力。即便如此，维泰利也没能躲过投降的结果，但是他逃亡到佛罗伦萨后受到了体面的接待，这不禁让西克斯图斯怒火中烧。

麻烦到此远未结束。1474年皮耶罗·里亚里奥因为长期沉迷于他舅舅赐予的奢侈生活而耗尽了生命；于是佛罗伦萨大主教的职位空缺出来。洛伦佐成功帮助自己的姐夫里纳尔多·奥尔西尼（Rinaldo Orsini）成为里亚里奥的继任者；不过他也没能阻止教皇提名弗朗切斯科·萨尔维亚蒂（Francesco Salviati）成为比萨的大主教。教皇曾保证任命共和国内神职职位之前必须征得执政团的认可，现在教皇出尔反尔，洛伦佐自然也不会承认萨尔维亚蒂在托斯卡纳的地位。所以萨尔维亚蒂不得不在罗马苦等三年而无法上任，失意、苦闷的他愿意为一切旨在推翻美第奇统治的阴谋提供全力支持。

洛伦佐在罗马还有更加危险的敌人。为了确保意大利北部岌岌可危的和平，他曾提议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三方建立同盟关系。但是，这一提议不但没有带来和平，还几乎挑起了另一场战争，因为教皇怒不可遏地谴责这一联盟是针对他的。而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也因为没有被征求意见而对结盟产生了怀疑，并且担心自己在亚得里亚海（Adriatic）的利益会受到影响。那不勒斯国王对教会长久以来的敌对情绪本因他的一个私生女嫁给了莱昂纳多·德拉·罗韦雷（Leonardo della Rovere）——教皇数不胜数的侄子之一——而有所缓和，现在他们的关系因为对佛罗伦萨年轻领袖的不信任而变得更加紧密。

到了1476年，洛伦佐面临的困境又进一步恶化。他最坚定的盟友加莱亚佐·玛丽亚·斯福尔扎在圣史蒂芬日（St Stephen’s Day）去做弥撒的路上被三个年轻的刺客暗杀了。加莱亚佐·玛丽亚的儿子此时只有7岁，

所以孩子的母亲宣布自己为摄政王；但是一群叔叔们却不认可这个决定，为王位继承权争吵不休。王位之争一日不了结，洛伦佐就一日不能指望米兰来与他共同抵御正在聚集的谋求推翻他的叛乱者们。

1477年年初的几周内，三个主要谋划者聚集到了罗马：第一个是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他的野心可不是成为一个伊莫拉领主就能满足的；第二个是弗朗切斯科·萨尔维亚蒂，郁郁不得志的比萨准大主教盼着借此机会更上一层楼，拿下佛罗伦萨大主教一职；第三个则是弗朗切斯科·德·帕奇（Francesco de’Pazzi），是帕奇家族在罗马的银行经理，一个矮小、阴郁、“极端自负和高傲”的年轻人，他认为帕奇家族替代美第奇家族成为佛罗伦萨统治者的机会已经到来了。

帕奇家族是一个比美第奇家族历史更加久远的家族。[1] 他们的一位祖先曾经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并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Holy Sepulchre）带了一些燧石回到佛罗伦萨。这些燧石后来被存放在圣使徒教堂（Sant’Apostoli）[2]。直到十三世纪初，这个家族还对商业贸易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是到了1342年，他们却宣布与历史悠久的家族血统决裂，以获取平民身份来参选政府官员。后来，他们在银行业赚了大钱。到了十五世纪早期，当时的家族领袖安德烈亚·德·帕奇（Andrea de’Pazzi）斥巨资雇用布鲁内莱斯基在圣十字教堂旁边建造了帕奇堂。[3] 安德烈亚的儿子皮耶罗用在建精美藏书室上的钱远多于他父亲建帕奇堂的开销。后来接替他成为家族主人的弟弟雅各布（Jacopo）却更喜欢攒钱而不是花钱。

雅各布绝对是一位非常吝啬的老人，但是好赌成性。全佛罗伦萨的人都知道他一输钱就发脾气。他认为政变成功的概率极其渺茫，所以当年轻的亲戚弗朗切斯科来向他通报正在罗马筹划的阴谋之时，他的态度“比冰还冷”。另外，他十个侄子之一的古列尔莫是洛伦佐的姐夫，他本人和洛伦佐的关系一直不错，尽管洛伦佐的统治意味着帕奇家族永远

不可能在佛罗伦萨拥有任何实权，但是他倒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和其他家庭成员一样，他当然也为洛伦佐干涉乔瓦尼·博罗梅奥（Giovanni Borromeo）的财产一事感到不悦：帕奇家族的一员娶了乔瓦尼·博罗梅奥的女儿，并希望将来能够继承妻子家族的财产；但是当老博罗梅奥去世后，一项据称是美第奇家族推行的新法律刚好获得通过，于是本来应由帕奇夫妇继承的财产转而被乔瓦尼·博罗梅奥的侄子继承。众所周知，这个侄子是美第奇支持者，而帕奇夫妇则不是。尽管如此，雅各布·德·帕奇并不认为博罗梅奥事件足以严重到要策划一次政变。

弗朗切斯科以为如果能证明自己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也许老帕奇就会被说服。于是他又找上了吉安·巴蒂斯塔·达·蒙泰赛科（Gian Battista da Montesecco），后者是一个多次为教廷提供优良军事服务的雇佣军指挥官，也是一个不熟悉阴谋诡计的粗勇武夫。起初他并没有明确表态，只解释说自己是受雇于教皇和他的外甥伊莫拉领主吉罗拉莫·里亚里奥的，非经他们许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弗朗切斯科向他保证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教皇的利益；至于吉罗拉莫·里亚里奥本人，更是此次行动的策划者之一，参与其中的还有比萨大主教弗朗切斯科·萨尔维亚蒂。此时的蒙泰赛科还是没有被说服，后来弗朗切斯科和萨尔维亚蒂一道再次向他施压时也依然不起作用。第二次两人来访时对蒙泰赛科说：洛伦佐对教皇大不敬；只要洛伦佐活着，吉罗拉莫·里亚里奥对伊莫拉的统治就“连个豆子都不值”；佛罗伦萨人都憎恨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只要给一点儿鼓励，他们就会奋起反抗现在的统治者。

然而，蒙泰赛科充满疑虑地说：“大人们，做事前请三思，佛罗伦萨可不是什么小事呀。”

“对佛罗伦萨的情况我们比你了解的多得多，”大主教显然已经对这个顽固的军人失去了耐心，他反驳道，“我们的计划必将成功，就像我们三个人坐在这里一样真切。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争取雅各布·德·帕

奇先生的支持……只要获得他的支持，事情就十拿九稳了。”

渐渐地，蒙泰赛科开始动摇，最终提出只要得到教皇的许可，他就加入叛乱者的阵营。因此，弗朗切斯科和萨尔维亚蒂答应带他去见教皇西克斯图斯。

在随后的接见中，教皇告知蒙泰赛科，立即解决“佛罗伦萨的问题”确实是他的意愿。

“但是，圣父啊，如果洛伦佐和朱利亚诺不死，这个问题恐怕没法解决。”

“杀人与教会的宗旨不符，我不希望也不同意任何人在这件事中丧命。尽管洛伦佐是个恶棍，并且对我不敬，但是我并不是要他死，而是希望更换政府中的执政者。”

“我们会尽一切可能保他不死，”吉罗拉莫说，“但是如果他必须死，教皇陛下能否赦免杀他之人的罪过？”

“你真是个傻子。我告诉你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伤及他的性命，只要实现政府更迭就好。而且我再对你说一遍，吉安·巴蒂斯塔，我非常希望更替政府，洛伦佐这个恶棍、这个卑鄙的无赖（*furfante* ）从来不尊重我，只要把他赶出佛罗伦萨，我在共和国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我会非常满意。”

“教皇陛下说得极是。请放心，我们会尽一切可能实现您的愿望。”

“去吧，除了杀人，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圣父，您是否满意由我们来负责执行此次计划？您是否相信我们会取得成功？”萨尔维亚蒂问教皇。

“我很满意。”

教皇于是起身，再一次向他们保证会提供“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的任何可能需要的协助”，然后就让他们退下了。

三个人离开时仍然和来时一样确信：若要计划成功，就必须杀了洛伦佐和朱利亚诺；不论教皇怎么明令禁止，到非走这一步不可的时候，教皇也一定会赦免杀人者。

受到这次接见的鼓舞，蒙泰赛科开始招募所需的士兵并亲自前往罗马涅，与托伦蒂诺、伊莫拉和卡斯泰洛城的雇佣军首领们一起商讨战术。之后又骑马翻过亚平宁山脉直奔佛罗伦萨，向洛伦佐转达吉罗拉莫·里亚里奥的友好和善意。

当蒙泰赛科到达卡法焦洛时，洛伦佐正在为克拉丽切的一位亲属服丧；但他还是如以往一样亲切、健谈并且充满魅力。他提起里亚里奥时就像提到好朋友一样友善；蒙泰赛科完全为他的个人魅力所折服，开始后悔自己暗中执行的任务。在洛伦佐的陪同下，蒙泰赛科回到了佛罗伦萨，来到了他在坎帕尼亚（Campagna）的住处，雅各布·德·帕奇也如约前来，因为蒙泰赛科就是来给他递送里亚里奥和大主教的信件的。

雅各布像往常一样阴郁、易怒而且消极。“他们会为此折断脖子的，”他对蒙泰赛科说道，“我比他们更了解这里的情况。我不想听你说什么，我不想听任何关于你们阴谋的事。”

然而当雅各布听蒙泰赛科复述了被教皇接见的过程之后，他的态度便完全转变了，很快他就成了一位虽说不上狂热坚定，但也是全心全意的阴谋支持者，甚至准备随着事态发展而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他建议说，执行暗杀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些理由让美第奇家的两兄弟分开，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同时杀掉两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定邀请洛伦佐去

罗马并在那里将其暗杀，朱利亚诺则在佛罗伦萨找机会解决掉。不过洛伦佐拒绝了前往罗马的邀请，所以阴谋计划者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在两兄弟的地盘上杀掉他们，最稳妥的办法自然是在他们参加娱乐活动、身边没有护卫的时候下手。

在娱乐活动中执行暗杀的机会果然出现了。教皇十七岁的甥孙拉法埃拉·里亚里奥（Raffaele Riario）原本就读于比萨大学，如今刚刚被封为枢机主教。他应邀来佛罗伦萨并暂住在位于蒙图盖（Montughi）的雅各布的乡村别墅里。拉法埃拉写信告知洛伦佐自己的到来。此时的洛伦佐和朱利亚诺一起住在菲耶索莱的美第奇别墅里。阴谋计划者们相信一定能找到用匕首或毒药暗杀两人的机会，不是在蒙图盖，就是在菲耶索莱。

洛伦佐收到年轻的枢机主教的信件之后，立刻邀请他来菲耶索莱。到了约定好的那天，洛伦佐带着儿子皮耶罗，与波利齐亚诺一起骑马到蒙图盖，准备亲自陪同枢机主教及其随从返回菲耶索莱参加宴会。洛伦佐先为自己的弟弟没能前来迎接枢机主教而致歉，因为他在一次意外中摔断了腿，现在只能卧床休养，很遗憾不能参加宴会。鉴于此，阴谋者们决定改变计划，等朱利亚诺伤好以后再想办法。

此时阴谋者们已经决定到佛罗伦萨去执行暗杀。因为枢机主教拉法埃拉·里亚里奥询问洛伦佐是否可以去参观慕名已久的美第奇宫的珍宝，并且提议下周日是个合适的日子，这样他就可以参加大教堂的大弥撒时顺路去参观美第奇宫。洛伦佐立刻表示同意并且开始为尊贵的客人安排宴席，还向佛罗伦萨的各界名流，以及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和费拉拉的大使们发出了请帖。与此同时，他的敌人们也在为席间暗杀美第奇两兄弟做着准备。可是到了最后一刻，阴谋者们的计划似乎又要被迫改变，因为朱利亚诺的健康状况仍不允许他出席这次宴会，除了伤腿之外，“他的眼睛也发炎了”。

获悉暗杀计划的人太多了，帕奇家族觉得如果再一次推迟，难保消息不被泄露。更重要的是，蒙泰赛科的军队集结在各个战略要塞，黄昏时分就能抵达城墙下了。如果不能在宴会上同时杀了美第奇兄弟，他们就必须在大教堂弥撒期间除掉二人。暗杀者觉得这个计划也很理想。弗朗切斯科·德·帕奇可以在贝尔纳多·班尼迪·巴龙切利（Bernardo Bandini Baroncelli）的帮助下用刀刺杀朱利亚诺。巴龙切利是一个投机商人，他不但把家产挥霍一空，还欠了重要的生意伙伴帕奇家族一大笔钱，所以急于借此机会大赚一笔。在他们刺杀朱利亚诺的同时，蒙泰赛科可以去刺杀洛伦佐，但是后者非常反对这个安排。在见到洛伦佐之前，蒙泰赛科对自己说杀死他是在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但是自从和洛伦佐交谈过，他就越来越厌恶自己接受的这个任务。此时他看到了逃避任务的机会，他的良心不允许自己“犯下谋杀这样亵渎神明的罪行”；他不能在“上帝可以看到自己的地方”冷血地夺取一个人的生命。让阴谋者们庆幸的是，有两个不怎么小心谨慎的教士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暗杀任务。这两个身材瘦削、怒火中烧的教士分别叫安东尼奥·马费伊（Antonio Maffei）和斯特凡诺·达·巴尼奥内（Stefano da Bagnone）。安东尼奥是沃尔泰拉人，因为不久前在家乡发生的起义被洛伦佐镇压而一直怀恨在心；斯特凡诺则是雅各布·德·帕奇一个私生女的家庭教师。作为教士，他们用刀的技术肯定不如蒙泰赛科那样让人放心，但毕竟是以二敌一，如果攻其不备，趁洛伦佐反抗之前给出致命一击，应该也不是完全没有胜算。

暗杀者们预计大钟会在弥撒主持者起立之时敲响，而教堂钟声响起之时就是同时袭击两兄弟的最好时机。这个时间点非常理想，因为暗杀者们既可以看到弥撒主持者的动作，也可以听到钟声，这些都能成为不会被错过的行动信号。此外，在那一刻，无论是暗杀目标还是其他会众都会垂下目光以示敬意，而暗杀者正好可以借此出击。一旦暗杀成功，大主教萨尔维亚蒂会和雅各布·迪·波焦·布拉乔利尼（Jacopo di Poggio Bracciolini）——一个充满野心、奢侈无度以至于穷困潦倒的男子，他

的父亲还是科西莫的一个人文主义学者朋友——以及大批武装支持者一起冲进市政厅，杀死任何胆敢反抗他们的执政官。

1478年4月26日星期日上午接近11点的时候，年轻的拉法埃拉·里亚里奥骑马从蒙图盖来到佛罗伦萨，他在美第奇宫的院子里（*cortile* ）下马，然后被领到了二层一间专门为他准备的房间里，他在这里换上了枢机主教的法衣。准备妥当之后他走下楼去，在楼梯底端见到了洛伦佐，后者陪同他一起前往大教堂。路上他们还遇到了大主教萨尔维亚蒂，然而萨尔维亚蒂并没有和他们一起进入大教堂，理由是要去探望自己病重的母亲。洛伦佐带着枢机主教走到主祭坛之后就自行走到了站在回廊上的一群朋友中间。因为中殿里没有椅子，大批的会众可以随意走动。

朱利亚诺此时还没有出现，所以弗朗切斯科·德·帕奇和巴龙切利赶回美第奇宫接他，却发现他因为腿伤的困扰最终决定不去参加弥撒了；不过最后他们还是说服他改变了主意。朱利亚诺一瘸一拐地沿拉尔加街向大教堂走去，弗朗切斯科·德·帕奇亲热地用胳膊揽着他，说他自受伤以来好像胖了不少，边说边假意在朱利亚诺身上摸索，其实是为了察看他衬衣下面有没有穿铠甲。除了证实朱利亚诺没有穿铠甲之外，帕奇还高兴地发现他也没有带佩剑。

进入大教堂之后，弗朗切斯科·德·帕奇和巴龙切利径直走向了唱诗班的北侧。朱利亚诺礼貌地跟随在他们身后。一直走到朝向赛尔维街（Via de’Servi）的大门前二人才停下。而此时洛伦佐依然站在主祭坛一边的回廊上，在吉贝尔蒂用来分隔唱诗班与人群的木制屏风的另一侧。洛伦佐身边最近的是他的朋友波利齐亚诺，此外还有其他四个朋友，分别是菲利波·斯特罗齐（Filippo Strozzi）、安东尼奥·里多尔菲（Antonio Ridolfi）、洛伦佐·卡瓦尔坎蒂（Lorenzo Cavalcanti）以及美第奇银行里昂分行的前任经理弗朗切斯科·诺里（Francesco Nori）。而那两个准备暗杀他的教士安东尼奥·马费伊和斯特凡诺·达·巴尼奥内则紧挨着站到了

他的身后。

钟声一响起，两名教士就拔出了藏在袍子下面的匕首。马费伊非常不专业地先用手扶住洛伦佐的肩膀，似乎是为了让自己稳住或是为了稳住目标。洛伦佐回头时已经感觉到匕首的尖端贴近了自己的脖子。马费伊用力刺出匕首，但只划破了绷紧的肌肉。洛伦佐一边跳开躲避，一边扯下斗篷迅速缠绕在手臂上作为简易的盾牌。另一只手则拔出佩剑，朝两个教士砍去。那两个教士见他反应如此迅速已经吓破了胆，洛伦佐毫不费力地就将他们击退了。随后他奋力一跃翻过圣坛围栏，埋头冲向新圣器收藏室。

在圣坛另一侧，朱利亚诺残破的尸体已经倒在了地上。钟声敲响时他顺从地低下了头，巴龙切利一边大喊着“叛徒，受死吧！”一边用力将匕首垂直地插进了朱利亚诺的头顶，他用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几乎将朱利亚诺的头劈成了两半。弗朗切斯科·德·帕奇随后还疯狂地将匕首反复刺入已经毫无反应的尸体，甚至连匕首尖端误扎进自己的大腿都没有知觉。朱利亚诺倒地之后，两个暗杀者竟然还对尸体施以暴行，最终在他身上留下了多达19处刀伤。

朱利亚诺倒在血泊中后，巴龙切利跨过他的尸体向新圣器收藏室冲去，途中不仅一刀要了弗朗切斯科·诺里的性命，还划伤了洛伦佐·卡瓦尔坎蒂的手臂。不过等他赶到收藏室厚重的铜质大门时，洛伦佐已经冲了进去，波利齐亚诺在其他几个朋友的帮助下将大门紧闭。洛伦佐不断地询问：“朱利亚诺呢？他安全了吗？”但是没有人能回答他。安东尼奥·里多尔菲帮洛伦佐吸出了他脖子伤口处的血，以防刀上有毒；与此同时，另一个和他们一起躲进收藏室的朋友西吉斯蒙多·德拉·斯图法（Sigismondo della Stufa）则爬上了通往德拉·罗比亚（della Robbia）唱诗班阁楼的梯子，从那里俯瞰大教堂中的情景。

此时教堂中的会众已经乱作一团，有人大喊穹顶要塌了。洛伦佐的

姐夫古列尔莫·德·帕奇大声呼喊着自己是无辜的。朱利亚诺的尸体还躺在原地。拉法埃拉·里亚里奥呆若木鸡地站在主祭坛旁边，已经完全吓傻了。那两个袭击洛伦佐的教士和朱利亚诺的暗杀者们显然都已经逃跑了。洛伦佐在朋友们的护送下急匆匆地回到了美第奇宫。

此时，大主教萨尔维亚蒂和其他密谋者已经按照计划带着武装支持者来到了市政厅，其中大部分是假扮主教随从但依然面露凶相的佩鲁贾雇佣兵。萨尔维亚蒂通知首席执政官切萨雷·彼得鲁齐（Cesare Petrucci）说，教皇有紧急谕令要传达给他，当时正在吃饭的彼得鲁齐因而下令允许萨尔维亚蒂及其随从进入宫殿。萨尔维亚蒂本人被领到了一间接待访客的房间里，那些佩鲁贾人被安排在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并关上了门，而包括雅各布·迪·波焦·布拉乔利尼在内的其他随从则被拦在了走廊外。

彼得鲁齐吃完饭后来会见萨尔维亚蒂，后者此时已经紧张得全身发抖。他向彼得鲁齐传达所谓的教皇口信，不但声音含混不清、断断续续，脸色也变来变去，还不时地瞥向门口的位置。彼得鲁齐只听了几句，就扬声召唤侍卫，萨尔维亚蒂见此立刻冲出房间，向自己的人大喊行动的时机到了。然而，回应他的只是一些听不清的叫嚷声和砸门声。原来彼得鲁齐当选首席执政官之后，马上对市政厅里的各个房间进行了改装，房间内的人无法从里面打开房门，所以那些佩鲁贾人实际上已经被有效地控制住了。

当里面的人开始砸门的时候，雅各布·迪·波焦·布拉乔利尼就冲向了首席执政官，不过后者却抓着他的头发把他掀翻在地。然后身强力壮的首席执政官随手抄起一个烤肉叉作为武器，一边大声召唤执政官跟随他去敲响牛钟，一边追上大主教及其同伙，毫不费力地把他们全打倒在地。此时钟声已经响彻整个城市，所有人都涌向广场。帕奇家族的成员和一小撮支持他们的人骑着马沿街大喊："自由！自由！人民的自由！

打倒美第奇！打倒小红球！自由！自由！”尽管也有少数人应和他们的叫喊，但是大部分人还是用坚定的声音回应他们：“小红球万岁！小红球万岁！小红球！小红球！小红球！”

此时，一支由50名全副武装的美第奇支持者组成的队伍已经冲进市政厅，在宫殿守卫的配合下向佩鲁贾人发动了进攻，并将其全部剿灭，然后还把他们滴着血的头颅挂在长矛和宝剑顶端带回到广场。朱利亚诺遇害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市政厅。雅各布·迪·波焦的脖子上拴着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绑在一条横木上，被直接抛出了市政厅的窗口。大主教萨尔维亚蒂也是这个下场。剩下的弗朗切斯科·德·帕奇被发现躲藏在帕奇宫里，大腿的伤口还在不停流血。人们扒光了他的衣服，把他拽到广场，按照和雅各布·迪·波焦一样的方式处置。大主教的另两个同谋被勒死后，尸体也被这样拴着抛出了窗外。五个人就这么被吊在半空，下面就是骚动的群众。宫殿北侧雉堞墙投下的阴影中，奄奄一息的身体还在挣扎扭动。此时已经来到广场上的波利齐亚诺记录下了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在绳子末端不断挣扎的大主教，眼睛已经突出眼眶，狠狠地咬住了他旁边弗朗切斯科·德·帕奇赤裸的身体。

受市政厅处决的强力刺激下，成百上千的人们走上大街小巷，寻找其他同谋者或是任何可以借机扣上共犯罪名的不受欢迎的市民。这些人聚到美第奇宫的窗口下要求面见洛伦佐。洛伦佐于是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的脖子上缠着绷带，锦缎马甲上满是血污。他向大家说明自己只是受了一点轻伤，并且请求大家不要仅仅因为怀疑谁参与了谋杀就肆意报复。他还敦促人们暂时养精蓄锐，准备好应对策划了这起阴谋的共和国的敌人们，因为他们在阴谋被挫败之后必然还要向这座城市发动新的进攻。

人民也许为洛伦佐的话而欢呼，却完全没有按他说的去做。他们不但袭击阴谋策划者，也袭击那些他们想要扣上同谋者帽子的人。这些受

害者中有些直接被杀死了，有些则受了重伤，人们甚至拖着他们的尸首沿街示众。这样的暴乱持续了好几天，连附近农村的人都蜂拥进城，期待着有什么热闹可看，或是有什么好处可捞。最终大约共有80人被无情地杀害了。

参加这次政变的人几乎都没能逃脱惩罚。年轻的枢机主教拉法埃拉·里亚里奥在暗杀发生时完全被吓傻了，站在大教堂的主祭坛上不知所措，直到有人把他带到了安全一些的老圣器收藏室里。后来还是洛伦佐派仆人护送他回到了美第奇宫。暴乱结束后，也是洛伦佐派人护送乔装打扮的枢机主教回到了罗马。据说，终其一生，枢机主教因为目睹这个可怕的事件而留下的惨白面色从未褪去。那个想要谋杀洛伦佐的教士的兄弟拉法埃拉·马费伊（Raffaele Maffei）以及大主教的亲戚阿韦拉尔多·萨尔维亚蒂（Averardo Salviati）也都是在洛伦佐的干涉下才没有受到暴民的伤害。除了无法证实一个叫纳波莱奥内·弗兰切西（Napoleone Francesi）的人是否参与了阴谋之外，所有已知的阴谋者中没有一个能逃脱公开的或是暗中的复仇。雅各布·德·帕奇因为阴谋失败而深受打击，愤怒绝望地满地打滚，甚至疯狂到割下了自己的耳朵装进盒子。他后来设法逃到了卡斯塔尼奥（Castagno）的村子里，但是村民认出了他并把他带回佛罗伦萨。在城里他不仅受到严刑拷打，后来还被扒光衣服，从窗口抛出去并吊在了大主教的尸体旁边。雅各布的尸体起初被埋在了圣十字教堂。但是不久后恰逢连日暴雨，人们认为这是他邪恶的灵魂招来的祸患，于是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扔到了一个苹果园的水沟里。不过这还不是他的归宿，后来又有一个暴民拖着他的尸体沿街示众，还大喊着：“快为伟大的骑士让路！”这个低俗到令人发指的恶作剧后来发展到更加不堪的地步：人们把他的遗骸支在帕奇宫门口，用已经腐烂的头颅拍着门喊道：“开门来，你的主人要进去！”之后，已经腐烂的尸体被扔进了阿诺河，可是又被一群孩子捞了上来，挂在一棵柳树上鞭打，最后又重新扔回了河里。

至于那两个教士，安东尼奥·马费伊和斯特凡诺·达巴尼奥内都在躲藏的过程中被抓住了。他们先是受了阉割，然后被送上了绞刑架。雅各布的弟弟雷纳托·德·帕奇（Renato de’Pazzi）被发现躲在穆杰洛的一栋房子里，人们并没有证据证明他参加了密谋，却还是无情地把他吊死了。他死的时候穿着一身农民才穿的破烂工作服，“好像是去参加化装舞会一样”。他的家人虽然逃过了死刑，但被判处了监禁，被关押在沃尔泰拉的地牢里。洛伦佐的姐夫古列尔莫·德·帕奇似乎是无辜的，所以只被幽禁在他自己的乡村别墅里。

最后几个被抓到的主要密谋者中就有蒙泰赛科，他直到5月1日才被捉拿归案。在严刑拷打和秘密审判之下，他详细供述了整个阴谋的经过以及教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审判官问出了所有有用的信息之后，作为军人的蒙泰赛科被判处了砍头的刑罚，并于5月4日在巴杰罗宫的院子里被处决了。

协助杀害朱利亚诺的巴龙切利起初成功逃出了佛罗伦萨的领地并一直跑到了君士坦丁堡；不过在那里他还是被认了出来，洛伦佐向苏丹王提出了正式的请求，于是逃犯被一路押解回到了佛罗伦萨，最后也是在巴杰罗宫的院子里被处决了。

帕奇家族的耻辱并没有随着家族成员的处决而终结。执政官们颁布了一个法令，永远禁止任何人使用这个家族的姓氏及纹饰图案。他们的财产都要被没收，他们的家族宫殿也更换了新的名字，整个城市里任何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地方也都要改名。象征他们家族的海豚图案不论出现在哪里，都要被剔除或磨平。娶了帕奇家族女儿的男人永远不能担任共和国政府官员，所有与这个古老家族相关的仪式都要被废除，其中就包括在复活节前夜将神圣的燧石抬到帕奇宫的仪式。[4] 按照佛罗伦萨的传统，帕奇家族叛徒及其同谋者的画像还要被画到巴杰罗宫的墙上。这些画像是由波提切利创作的，酬劳是一个人像40弗罗林币。每个人像的脖

子上都缠着绳子，代表着他们被处决的方式，只有纳波莱奥内·弗兰切西是被绳子拴住脚踝吊起来的，暗示他还在逃。每个图像下面还刻有洛伦佐写的恰当评论。

乔焦·瓦萨里记录说，与这些侮辱性图案相对的是：

> 洛伦佐的朋友和亲属们为感谢上帝保他度过劫难，下令在城市各处竖立起他的雕塑。于是在韦罗基奥的帮助和建议下，（一个技艺高超的蜡像艺人）制作了三尊真人大小的蜡像。蜡像内部有木制框架作支撑，外面是腊制的服装，连衣服上的褶皱都描绘得真实鲜活。然后他又用更厚的蜡层，依照洛伦佐本人的样貌特征制作头和四肢，最后用油彩画上头发和饰物。完成后的蜡像是如此精致自然、栩栩如生，到今天看来也还是如此。三尊蜡像之一陈列在圣加洛街上的基亚里托修女堂（Chiarito），就摆在十字架受难像之前，这尊蜡像身上的衣服是完全按照洛伦佐脖子上扎着绷带、站在美第奇宫窗口向人民讲话时的穿着来制作的……第二尊蜡像穿着普通佛罗伦萨市民穿的长袍，被陈列在圣母领报教堂里，摆在卖蜡烛的桌子旁矮门的上方。第三尊蜡像被送到阿西西的圣母安杰利教堂，摆在了圣母像之前。

---

[1] 帕奇家族宫殿现在称为帕奇夸拉泰西宫（Palazzo Pazzi-Quaratesi），始建于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可能是由朱利亚诺·达·圣加洛设计的，现在位于普罗孔索卢街（Via Proconsolo）10号。在帕奇谋划叛乱后，该宫殿被美第奇接管，后来又转给了奇博和斯特罗齐家族。

[2] 圣使徒教堂和洗礼堂是同一个时代修建的。十六世纪的大门由贝尔代托·达·罗韦扎诺（Benedetto da Rovezzano）设计建造。木质彩绘房顶建于十四世纪早期。

[3] 布鲁内莱斯基去世后，帕奇堂由朱利亚诺·达·马亚诺负责完成，教堂的木门也是他制作的。陶瓷装饰是卢卡·德拉·罗比亚设计的。圣安德鲁的彩绘玻璃是真品的仿制品，真品及其他许多珍宝现在被收藏在圣克罗切歌剧博物馆，本来都是属于修道院的。

[4] 焰火节已经被复兴。以前是在复活节周日午夜弥撒时举行，现在改为在复活节当天中午举行。燧石都是从圣使徒教堂取来的，人们会在指定的时间，在大教堂的圣坛前用燧石打出的火花点燃鸽子型的火箭，诚挚地希望鸽子型火箭能沿着拴好的线射向外面广场上堆满烟花爆竹的货车，将其引燃之后再沿着线落回到大教堂。如果仪式顺利成功，就预示着这一年会有好收成。

第十一章 佛罗伦萨的救世主

“那个邪恶之人的儿子和毁灭之人的养子”

1478年的耶稣升天节（Ascension Day）这一天，朱利亚诺·德·美第奇被安葬在圣洛伦佐教堂老圣器收藏室的斑岩石棺中。这个石棺也是他和他的兄弟为纪念父亲和叔叔而建造的。朱利亚诺遇害时年仅25岁，还没有结婚，不过在这一年年初，他的一个情妇菲奥雷塔·戈里尼（Fioretta Gorini）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朱利奥（Giulio）。[1] 没过多久，孩子的母亲也去世了，洛伦佐于是收养了他，并把他当作亲生骨肉一样看待。

至于他自己的三个儿子，洛伦佐是这样评论的：大儿子呆，二儿子灵，小儿子善。不过洛伦佐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对女儿们也一样疼爱有加。他喜欢和他们一起做游戏，马基雅维利后来评论他的这一习惯时隐约带有一丝惊讶和不满。洛伦佐曾经为孩子们写了一个剧本，名字叫作《圣乔瓦尼和圣保罗》（*San Giovanni e San Paolo* ）。剧本不仅给每个孩子都安排了一个角色，连他自己也有一个。洛伦佐让孩子们记住，无论他有多少国家大事要去处理，也无论他们有多少课程要去学习——孩子们的教育一直是他非常重视的一件事——他都会挤出时间和他们谈心。“如果连凶猛的野兽都关爱自己的幼仔，”洛伦佐写道，“那我们对孩子的宠爱岂不是应该多得多。”

洛伦佐与孩子们分离的时候总是会想念他们，而孩子们也会像他想念他们一样想念自己的父亲。“洛伦佐什么时候来？”孩子们总是这样问自己的老师或母亲。在帕奇家族阴谋之后那段不稳定的时期内，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一起被送到了皮斯托亚，暂住在他们的朋友潘恰蒂基（Panciaticchi）家中。同行的还有波利齐亚诺，他是年长的几个男孩儿

的家庭教师。波利齐亚诺当然不愿意离开佛罗伦萨，不过他并没有在写给洛伦佐的信中抱怨什么。波利齐亚诺会向洛伦佐讲述孩子们的情况，说潘恰蒂基一家以“极大的善意”接待了他们，请他放心；还说克拉丽切一切安好只是心情不畅，除了从佛罗伦萨来的哪怕是只言片语的好消息外，什么也不能让她高兴起来。“她几乎连门都不出。我们什么也不缺，很多人送来礼物都被我们拒绝了，只留下了沙拉、无花果、几小瓶葡萄酒和一些烤鱼卷（*beccafichi* ）。这里的人不会拒绝我们的任何要求……我们一直很警惕，还安排了侍卫把守大门。等你有时间了一定要来看看家人，他们一心盼着你来。”

1478年的整个夏天，洛伦佐的家人都住在皮斯托亚。冬天临近的时候，他们搬到了卡法焦洛的更加安全的别墅里。寒冷的冬天让这里的生活变得更加单调，波利齐亚诺越来越难以忍受这样无聊的日子，但是他在写给洛伦佐的信中还是没有过多抱怨；不过在面对洛伦佐的母亲卢克雷齐娅的时候，波利齐亚诺可没有掩饰自己的不快。这里的天气冷得吓人，所以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只能穿着拖鞋和大衣坐在火炉前；这里还总是下雨，孩子们根本没法到户外去，波利齐亚诺只好为他们设计一些可以在房间里玩的游戏。为了让游戏更有意思，输了的孩子会被罚吃饭时少吃一道菜，不过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自从有了这项措施之后，输了的孩子们往往会哭闹起来。更糟糕的是，波利齐亚诺和克拉丽切相处得并不愉快，这让本就艰苦的日子变得更加难熬。

依照克拉丽切缺乏想象力又古板的罗马思维，年幼的乔瓦尼学习拉丁文时诵读的竟然是古典文本而非祷告诗令她惊骇不已。而波利齐亚诺知道洛伦佐会认可他的教育方法，所以也不愿做出改变。由此引发的争吵被不断扩大，最后克拉丽切把波利齐亚诺赶出了别墅。虽然洛伦佐觉得可以原谅妻子解雇了他的朋友，并且重新指定了温和一些的马蒂诺·达·科梅迪亚（Martino da Comedia）作为孩子们的教师，但他还是要让妻子明白自己并不认可她的行为。克拉丽切反过来责备他不该许可令人

讨厌的波利齐亚诺使用菲耶索莱别墅里的私人房间，说他这样宽恕一个被自己扫地出门的人让她成了所有人的笑柄。洛伦佐忍无可忍地给克拉丽切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来训斥她的行为。他还提醒说，她没有按照自己的要求把波利齐亚诺的书籍送还给他，并且要求她当天就把书送出。

尽管这次争吵很激烈，但这是洛伦佐和克拉丽切仅有的一次严重争吵。克拉丽切自然是远远配不上洛伦佐的。洛伦佐的母亲当年在这个年轻的罗马姑娘身上发现的害羞、诚实和讨人喜欢虽然还在，但克拉丽切实际上一直没能融入佛罗伦萨的生活。在内心深处，她还是个罗马人，过于自负和任性，为自己古老的血统而骄傲，为她丈夫和教皇之间的纠纷而担忧，丈夫和机智、诙谐、玩世不恭的朋友们之间她根本听不懂的谈话更是让她如坐针毡。

洛伦佐对自己的妻子肯定是不忠的，不过她对此似乎并不怎么介意，毕竟在那个时代没有几个丈夫会对妻子忠诚。而且洛伦佐在这个问题上也很谨慎。他对卢克雷齐娅·多纳蒂的迷恋仅仅停留在罗曼蒂克的层面，他们在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认识了，虽然他在锦标赛上佩戴了她的信物，还写诗赞美她美丽的眼睛和双手，以及她精致脸庞上不断变化的表情，但是克拉丽切了解佛罗伦萨的风俗，也知道洛伦佐绝不会让卢克雷齐娅这样富有的多纳蒂家族的女儿做自己的情妇。况且，克拉丽切也很喜欢卢克雷齐娅，她们相识的时候，卢克雷齐娅已经结婚了。克拉丽切还非常高兴卢克雷齐娅能成为自己长子的教母。洛伦佐和其他女人的风流韵事也没有引起克拉丽切多少关注。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说，“风流多情”的洛伦佐在40岁的时候疯狂爱上了多纳托·本奇（Donato Benci）的妻子巴尔托洛梅亚·代·纳西（Bartolommea dei Nasi），并经常在她的别墅过夜，直到破晓前才回到佛罗伦萨。如果确有此事，那要么是他对克拉丽切隐瞒了实情，反正克拉丽切并不在乎这种事；要么是这件事发生在克拉丽切去世之后。洛伦佐与其他女人的关系从来没有影响

过他与妻子之间的感情。虽然克拉丽切和洛伦佐没有什么共同的喜好，她既不懂艺术，也不懂文学，更不用说政治或哲学了，但毫无疑问他们是深爱着彼此的。每次给丈夫写信的时候，除了引用一两句布道时牧师讲到的劝诫或说说孩子们的健康状况之外，克拉丽切就写不出别的了。不过她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丈夫的关爱，她的丈夫也同样如此。在他们之间的一封书信中，洛伦佐写道：

> 我已经平安到达了目的地，我想这是除了我的平安返回之外最能让你高兴的消息了。我也是这样思念着你和家。你要好好陪着皮耶罗，祖母孔泰西纳（洛伦佐年事已高的祖母，按照当时的习俗在1473年去世之前他们一直住在一起）和母亲卢克雷齐娅（也和洛伦佐一家住在一起直到1482年去世）。为我向上帝祈祷。如果有什么需要在我离开（米兰）之前带回去的就跟我说。你的洛伦佐。

克拉丽切全心全意地关爱着孩子们，尤其是女儿马达莱娜（Maddalena）。她总共生了10个孩子，其中3个没有活过婴儿期；而11岁路易贾的去世，更是加速了她生命的终结。当时克拉丽切已经患上肺结核有一段时间了，当病情有所好转之后，同样也生着病的洛伦佐决定去菲莱塔（Filetta）接受药浴治疗。然而他刚走9天，克拉丽切就离开了人世。这个消息让洛伦佐痛不欲生，他写道："没有任何事能让我从这沉重的苦痛中解脱，这已经超过了我能承受的范围。祈祷上帝赐予我平静，并祈求我主让我在有生之年内免于承受最近接连发生的考验。"

费拉拉驻佛罗伦萨大使三天后才写信向公爵通报克拉丽切·德·美第奇的死讯。他说之所以没有及时通报，是因为他觉得这事不怎么重要。

正如洛伦佐担心的那样，帕奇家族阴谋的失败，再加上佛罗伦萨人对参与阴谋之人严厉的报复行为引发了罗马的狂怒。吉罗拉莫·里亚里奥带着300名长戟兵冲进了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多纳托·阿恰尤奥利的家并逮捕了他。要不是威尼斯和米兰大使强烈反对这种严重违反外交豁免权的行为，吉罗拉莫·里亚里奥就要将多纳托·阿恰尤奥利直接关进圣安

杰洛城堡（Sant’Angelo）的地牢了。没能成功处置自己选定的替罪羊之后，吉罗拉莫·里亚里奥只得竭力鼓动舅舅用尽职权内的一切办法报复佛罗伦萨人，尤其是美第奇家族。教皇本人和外甥一样怒不可遏，根本不需要旁人煽风点火。他先是下令逮捕罗马境内所有主要的佛罗伦萨银行家和商人，不过想到枢机主教拉法埃拉·里亚里奥还被扣押在佛罗伦萨，又只好把这些人都放了。然后他又没收了所有他能掌握的美第奇银行的资产和美第奇家族的财物。他还免除了教廷金库对银行欠下的所有债务，并派一名罗马教廷大使去佛罗伦萨要求将洛伦佐交给教廷审判，并下达了一份冗长的针对“洛伦佐·德·美第奇——那个邪恶之人的儿子和毁灭者的养子——及其所有共犯和教唆犯”的驱逐令。所谓共犯包括了首席执政官和整个执政团，所有成员都被“认定为有罪、亵渎神明、受到诅咒、声名狼藉、不被信任、应被逐出教会并且无权立下遗嘱的人”。文件里还写道：“他们所有的财产都应由教会没收；他们的房子应当被夷为平地；他们的住所应当被废弃，成为无法入住的荒地。让永恒的废墟来见证他们永恒的耻辱。”教皇威胁说如果这些判决没有在两个月内执行，就要切断佛罗伦萨和外界的全部联系。然而光凭这些还是不能让教皇解气，他又正式向佛罗伦萨宣战，并且毫不费力地说服那不勒斯的国王费兰特也向佛罗伦萨宣战。

那不勒斯本来就巴不得将阿拉贡家族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托斯卡纳地区，国王费兰特的儿子卡拉布里亚公爵（Duke of Calabria）阿方索立即带着军队穿过了边境，占领了蒙特普尔恰诺（Montepulciano）周边的地区。然后他派信使到佛罗伦萨冷酷地宣告了这座城市即将迎来的毁灭，同时还转达了教皇比之前驱逐令措辞更恶毒的口信。

对于这些以及后续的所有威胁恐吓，执政团给出了一份充满挑战的回复：

> 您说洛伦佐是暴君并要求我们将他驱逐，但是大多数佛罗伦萨人称他为人民的守护者……请记住您尊贵的职位是基督的代表，请记住

> 交到您手中的圣彼得的钥匙不是为了让您能够如此滥用职权……佛罗伦萨会坚决地捍卫它的自由，我们相信基督知晓我们这一事业的正义，因此也必不会抛弃我们这些信主之人；我们还相信我们坚定的盟友会将我们的事业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我们尤其相信最坚定的基督徒法国国王路易，他一直是佛罗伦萨的庇护者和保护人。

虽然佛罗伦萨人大谈对盟友的信任，不过他们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去期待盟友的帮助。法国国王确实给洛伦佐写了一封充满友谊和同情的信，就教皇对洛伦佐的处理提出了抗议；除此之外还模糊地威胁要组建新的大议会，并重申安茹家族对那不勒斯的所有权。法国国王派遣菲利普·德·科米纳作为特使前往意大利，不过就如科米纳自己所言，他们能给佛罗伦萨人的只有同情而已："路易对佛罗伦萨人的偏爱也许在某些层面上是有影响力的，但实际上并不如我希望的那么多，除了随从，我没有军队可为佛罗伦萨人提供支持。"

要是早几年，佛罗伦萨人也许还可以期盼米兰提供军事协助，但是自从加莱亚佐·玛丽亚·斯福尔扎被谋杀之后，他的遗孀——也是他们年幼的儿子吉安·加莱亚佐（Gian Galeazzo）的监护人——与去世丈夫的弟弟们之间的王位之争一直没有停止，这使得米兰无法再成为意大利政治中一支有效的力量。最后由吉安·贾科莫·特里武尔奇奥（Gian Giacomo Trivulzio）领导的一支军队被派到了佛罗伦萨，可惜军队的人数太少，起不了什么作用。美第奇在罗马的亲戚奥尔西尼家族派来的雇佣军队伍人数也十分有限；同样人数有限的还有博洛尼亚的军队，是由乔瓦尼·本蒂沃利奥提供的。多年前洛伦佐曾经代表父亲拜访过乔瓦尼·本蒂沃利奥，并且从那以后双方一直维持着密切的友好关系。事实上，当所有东拼西凑的兵力集结到长官埃尔克莱·德·埃斯特（Ercole d’Este）手中时，包括这位高大英俊、精明谨慎的费拉拉公爵在内的大多数人都确信，佛罗伦萨这一次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已经抵达基亚纳河谷（Chiana valley）的那不勒斯军队即将要发起的猛攻了。

然而，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军队还不是佛罗伦萨所面临的唯一威胁。

此时，教皇又鼓动锡耶纳和卢卡加入了他的阵线，并把自己军队的控制权委托给了令人敬畏的军人——乌尔比诺公爵费代里戈·达·蒙泰费尔特罗。看看教皇阵营的军队实力，再对比一下佛罗伦萨的杂牌军，菲利普·德·科米纳不得不相信，佛罗伦萨的独立即将终结。

佛罗伦萨人比科米纳乐观得多，他们仍然拒绝遵从教皇提出的任何要求。托斯卡纳地区的主教们对教皇驱逐令的回应尤其大胆，他们在佛罗伦萨的大教堂里举行会议，并全体一致认定执政团截至目前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完全正当。依据这一决定，他们还颁布了对教皇的驱逐令。前一年由贝尔纳多·琴尼尼（Bernardo Cennini）在佛罗伦萨建立起来的印刷厂印制了很多对教皇的驱逐令，并把它们散发到整个欧洲，每个标题都足够吸引眼球，比如《佛罗伦萨教士怒斥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檄文》（*Contrascommunica del clero Fiorentino fulminate contro il summon Pontifice Sisto* Ⅳ）。而这种态度也获得了其他神职人员、会众以及洛伦佐本人的完全支持。

至此，洛伦佐已经毫无争议地树立了他作为佛罗伦萨大业领导者的地位。他召集佛罗伦萨的重要人物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洛伦佐用带着鼻音的尖细声音向大家保证，如果他一个人，甚至是他一家人的流放或死亡能够换来佛罗伦萨的救赎，那么他甘愿牺牲。而雅各布·代·亚历山德里（Jacopo dei Alessandri）则代表大家向洛伦佐表示，他们一致决定坚决支持洛伦佐直到最后一刻。同时他们还指定了一个12人的侍卫队来保障洛伦佐的安全，并选举他加入紧急成立的十人战争委员会，专门处理佛罗伦萨的防务事宜。

这次战事之所以没有像科米纳预料的那样以佛罗伦萨的惨败终结，主要归功于运气和十五世纪意大利独特的战争传统，而非佛罗伦萨军队的战斗力或他们指挥官的卓越能力。费拉拉公爵似乎不愿意挑战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军队实力，后者不但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人，还碰巧是他妻

子的哥哥。费拉拉公爵的军队一直与敌军保持着两日行军距离，所以他的队伍用了三周才走完从比萨到萨尔扎纳（Sarzana）短短50英里的路程。佛罗伦萨人催促他快些行进时，他嘲笑说这些建议都是“完全不懂战争的学究们”提出来的。佛罗伦萨的一位药材商卢卡·兰杜奇（Luca Landucci）评论说：“意大利军人的体系是这样的，只要你方把注意力转向掠夺那里的财物，我方就去掠夺这里的财物。短兵相接才不是我们真正想做的。”所以直至1478年11月，双方还没有打过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就各自退回驻扎地过冬去了。

转到来年，形势对佛罗伦萨更加不利了。首先，年幼的公爵吉安·加莱亚佐·斯福尔扎在争夺王位的斗争中取胜，不甘失败的叔叔们逃到了那不勒斯，在国王费兰特的怂恿下，又带着军队回到米兰打算以武力夺取政权。敌人卷土重来逼近伦巴让公爵夫人极为不安，所以她调回了支援佛罗伦萨的队伍去保卫她在米兰的政府。

公爵夫人尤其忌惮洛多维科·斯福尔扎（Lodovico Sforza）的回归。后者有个外号叫“摩尔人”。（il Moro），一方面是因为他受洗时取的名字是毛罗（Mauro），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肤色像摩尔人一样黝黑。其实洛多维科的样貌看上去有些脂粉气，嘴巴尤其小，头发也带着精致的卷曲。他是个虚荣自大、胆小懦弱，但也聪明绝顶的人。他在艺术和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但识人用人却很糟糕。他玩世不恭，没有是非观，但是彬彬有礼、体贴入微。他不仅有行政和外交的天赋，还有着非凡的记忆力。总之是一个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敌手。

到了9月，洛多维科与公爵夫人达成协议，成了米兰的统治者。他认定米兰公国不宜再把处于覆灭边缘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当作盟友。与此同时，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军队一路冲杀，已经抵达埃尔萨谷地（Val d’Elsa），并攻下了波焦因佩里亚莱（Poggio Imperiale）的堡垒。要不是在佛罗伦萨以南30英里的小镇科莱（Colle）受到了持续两个月的殊死

抵抗，公爵早就兵临佛罗伦萨城下了。11月4日，科莱最终还是失守了。卢卡·兰杜奇在日记中写道：公爵的大炮共朝科莱“发射了1024枚炮弹”。此时已经入冬，那不勒斯的军队无法在埃尔萨谷地继续前行，于是卡拉布里亚公爵只得再一次撤回锡耶纳过冬。尽管又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此时佛罗伦萨已然处在了前所未有的危急时刻。七拼八凑的雇佣军首领之间争吵不断；费拉拉公爵因为斯福尔扎的撤离而乱了阵脚；一群乌合之众组成所谓的突击队，实际上是去托斯卡纳地区的乡村里为非作歹；佛罗伦萨城里还暴发了瘟疫；战时委员会为了保证军需而加征各种重税，人民也开始怨声载道。除此之外，佛罗伦萨的经济开始衰退，部分是因为英国人开始自己制造布料，所以几乎停止了对意大利的羊毛出口。成百上千的工人被工厂拒之门外，因为商人已经没有订单可供他们生产。洛伦佐清楚地意识到佛罗伦萨不可能再撑过新一轮的进攻，也知道他的盟友们都支持总体的和平，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让佛罗伦萨人认为意义非凡、勇气可嘉的决定：他要亲自前往那不勒斯，把自己送到敌人的宫廷之上。洛伦佐把管理城市的重任交给了刚当选的首席执政官托马索·索代里尼，然后就骑马向海岸进发。在去比萨的路上，他在圣米尼亚托泰代斯科镇（San Miniato Tedesco）给执政团写了一封信：

> 当我们的城市面临这样的危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深思熟虑了，必须马上行动……我已经决定，在诸位的许可之下，马上起航前往那不勒斯。我知道敌人的行动主要针对我一人，希望我此去将自己交由他们处置，就能让我的市民们重获安宁……既然我享有比任何一个市民都多的荣誉和责任，我也理应为我们的国家做出最多的贡献，哪怕是为此献出生命。我将抱着这样的决心前行。也许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愿，这场由我弟弟和我的鲜血引发的战争，也必须由我来终结。我的心愿是，无论代价是我的生存或死亡、灾难或兴旺，我都能为这座城市带来福祉……我的心中满怀希望，我祈祷上帝的恩赐助我履行任何一个市民都应时刻准备好为他的国家而履行的义务。我任凭执政团阁下们的差遣。劳伦蒂乌斯·德·美第奇（Laurentius de Medici）

根据菲利波·瓦洛里（Filippo Valori）的记录，当这封满怀感情的信

在执政团里被当众宣读的时候，没有一个执政官不感动地潸然泪下。没有人相信国王费兰特的为人，据说他会把敌人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后展示在私人博物馆里，所以大家此时都以为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洛伦佐了。然而所有人也明白，除了他的牺牲，恐怕没有第二个办法能够挽救共和国了。因此执政团也只能任命他为驻那不勒斯大使，并祝福洛伦佐一切顺利。接到执政团回信的第二天，洛伦佐从瓦达（Vada）起航，并在1479年圣诞节前夕抵达了那不勒斯，当时他29岁。

站在码头上迎接他的是国王费兰特的二儿子费代里戈，洛伦佐还是个小男孩儿时就见过他，也很喜欢他。他们热情地相互问好。洛伦佐也受到了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妻子、天资聪颖的伊波利塔·斯福尔扎的热情接待，他们也是多年的朋友了。同样欢迎他的还有国王费兰特的主要顾问之一迪奥梅德·卡拉法（Diomede Carafa），他是一位年事已高的作家、鉴赏家和收藏家。过去洛伦佐帮过他很多忙，每次他有朋友前往佛罗伦萨都会受到洛伦佐的接待和照顾，洛伦佐还送给他一个精致的铜马头雕塑，那也是卡拉法收藏的最好的罗马古董之一。事实上，洛伦佐的随从们很快就发现，此行远没有他们以为的那么有勇无谋，更没有洛伦佐在给执政团的那封信中所描述的那么命悬一线。

写那封信之前，洛伦佐就开始秘密与那不勒斯宫廷通信，并确保他的前往不会受到冷遇。他搭乘的这艘船实际上也是那不勒斯人派来接他的。他知道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军队已经控制了托斯卡纳南部大片的土地，并且反对任何不以承认他的胜利为前提的和解方案；但是洛伦佐也知道国王费兰特对于法国国王不断重申安茹家族对那不勒斯统治权的威胁非常担忧，更不用说在南亚得里亚海沿着意大利海岸来来回回的土耳其舰队又抱着多少危险的企图。

不过，国王费兰特也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达成协议的人。他不但机敏狡猾、精于政治，更是个冷酷无情、报复心强、善于掩饰真实想法的

人。要想猜出这样一个面色阴沉、臃肿肥胖、时不时就闹脾气一言不发的人到底喜欢什么，或者到底在想什么几乎是不可能的。科米纳就评论说："没有人能知道他到底是生气还是高兴。"不过他和洛伦佐一样的是，他们都喜欢乡村生活、驯鹰术以及打猎。他们对诗歌的品位很相近，对新知识和古典时期的看法也很相似。在他们漫长的对话中，洛伦佐不是只谈眼下的战争和统一意大利的理想，而是多次转弯抹角地提到古典时期那些通过实现和平而创立伟业的伟大统治者。关于实际的协议，他强调尽管教皇近来扶植那不勒斯，尽管教皇封费兰特的儿子乔瓦尼为枢机主教，尽管教皇的侄子为费兰特的女儿办了一次举世无双的奢华婚宴，尽管教皇免除了那不勒斯对教皇例行的年贡，但是教皇永远不可能像佛罗伦萨一样成为真正对那不勒斯有利的朋友。西克斯图斯只是在利用那不勒斯来实现个人目的。

费兰特显然没有被说服，于是谈话不断延长，洛伦佐越来越灰心，他在卡拉布里亚公爵夫人的海边别墅花园中忧心忡忡地散着步，一名随行人员描述说"他仿佛是一个人在扮演两个角色，"

> 白天他表现得非常轻松、优雅、乐观和自信，但是到了晚上就会为自己和佛罗伦萨的悲惨处境而愁眉不展，反复强调他根本不在乎生死，但是无法挽救自己的国家于危难之中让他痛苦不堪。

在努力说服费兰特的同时，洛伦佐成功地用自己的慷慨给那不勒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这次行程，他通过抵押卡法焦洛和穆杰洛的土地筹来了六万弗罗林币。一到那不勒斯他就赎买了100名船上奴隶的自由，还给他们每人10弗罗林币和一套体面的衣服。然后他又为一些穷苦人家的女儿提供了丰厚的嫁妆，又向多个慈善事业捐赠了大笔善款。瓦洛里说他从保罗·安东尼奥·索代里尼（Paolo Antonio Soderini）那里听到洛伦佐出访那不勒斯总共的开销之后，吓得不敢把这个数字写下来。

即便如此，费兰特还是不愿谈协议。最终，洛伦佐在那不勒斯待了将近十周之后，不得不把问题摆上桌面，声称自己不能再继续等下去

了，佛罗伦萨有紧急的事务待他回去处理。在匆匆告别之后，洛伦佐就骑马离开那不勒斯向北启程了。而国王费兰特只好急忙起草和平协议，派人追着给洛伦佐送去。

战争终于结束了。和平协议的条款对佛罗伦萨来说不算很有利。佛罗伦萨不但要向卡拉布里亚公爵支付赔偿款，还不得不在教皇的坚持下释放在押的帕奇家族人员；此外佛罗伦萨还必须同意托斯卡纳南部一些地区继续由外来势力控制；不过至少战争结束了，和平得到了保障，教皇的野心没能得逞，而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重新成了朋友和盟友。

---

[1] 波提切利创作的这幅古板又没有什么魅力的《年轻女子肖像》（*Portrait of a Young Woman* ）是挂在皮蒂宫里的。画中人物一度被认为是克拉丽切·奥尔西尼，被认为是西莫内塔·韦斯普奇的可能性更小。最有可能的身份应该就是菲奥雷塔·戈里尼。

第十二章 意大利指南针上的指针

“如果佛罗伦萨注定要被暴君统治，那绝对找不到比他更优秀、更令人愉快的人选了”

1480年3月洛伦佐回到佛罗伦萨时，受到了比他祖父1434年从流放地返回时更热烈的欢迎。战争期间，推翻他的努力反复上演。里亚里奥家族不断筹划他的毁灭，吉罗拉莫·里亚里奥更是两次试图找人暗杀洛伦佐。现在，尽管支付给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巨额赔偿款引发了一些抱怨，但洛伦佐在佛罗伦萨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了，而且他还会抓住一切机会让自己的位置更加稳固。

直到此时为止，如米兰大使所说，洛伦佐已经“下定决心以祖父为榜样，用尽一切宪法允许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事实上，他还决心不做任何会刺激佛罗伦萨人敏感神经的事。不过他在那不勒斯逗留了这么长的时间，已经让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面临危机，这让洛伦佐意识到只有为自己的统治提供更稳固的基础，才能让它提升至新的层次。洛伦佐从那不勒斯回来后不到一个月，应对战争带来的经济困局便成了组建一个新的最高司法委员会的绝好理由。最高司法委员会立即批准成立一个七十人委员会，当选委员任期5年。新委员会接管了选举官选举执政团官员的权利，执政团将来则不再享有提起重要法案的权利。委员会还可以从内部成员中选举成立两个政府机构，一个是负责外交政策的八人外交军事事务团（*Otto di Pratica* ），另一个是负责内政和金融的十二行政长官团（*Dodici Procuratori* ）。执政团和百人团的权力都被极大限制了，七十人委员会成为实质上的佛罗伦萨政府。

此时的洛伦佐并不能完全控制这个政府。波利齐亚诺称他是佛罗伦萨的领袖（*caput* ）；其他人则用曾经授予其祖父的“国父”称号来敬称

他。不过七十人委员会出于嫉妒往往会死守自己的政治独立，并不总是愿意顺着洛伦佐的心意。他不得不向那些搞不清楚状况的外国使节解释为什么他不能决定国家的某项政策，因为他“只是一个市民，而不是佛罗伦萨的执政团官员”。他承认自己享有比自己身份多得多的权力，但即使是他“也不得不耐心地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让别人以为他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是对他有好处的，这样既可以避免向朋友兑现昂贵的人情——就像他的祖父被教皇加里斯都三世（Calixtus Ⅲ）要求资助十字军东征一样，又可以反驳反对者阿拉曼诺·迪·菲利波·里努奇尼（Alamanno di Filippo Rinuccini）称他为独裁者的指责。事实上，洛伦佐的影响力是广泛、有说服力的，且通常是决定性的。当洛伦佐告诉某个委员或官员他想要如何处理某件事的时候，他的意见都会被遵照执行；当他提议某人应当被选入某个部门的时候，这个人通常也会按他的意思当选。他可能永远不会接受“共和国领袖”之类的正式头衔，但是在他去世后，一份官方文件中称他为“第一市民”（*vir primarius nostrae civitatis* ），这一点是无人能否认的。他的敌人当然会毫不犹豫地给他贴上暴君的标签，但是如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承认的那样，“如果佛罗伦萨注定要被暴君统治，那绝对找不到比洛伦佐更优秀、更令人愉快的人选了”。这个观点在佛罗伦萨城里绝对不乏支持者，特别是那些相对贫困的人们。对他们而言，洛伦佐是不是专制者并不重要。在他的统治下，他们能吃饱饭，能有激动人心的公共节日，而且能享受到——或者说大部分人能享受到——公平正义。兰杜奇就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个可怜人受到的不公待遇：

> 在1480年10月15日这一天，一名隐士（被指控曾试图刺杀洛伦佐）死在了圣玛丽亚诺瓦医院里，他已经被各种酷刑折磨得不成人形。他们说行刑者削掉他的脚底后将他的脚拿到火上烤，直到上面的脂肪都化去了，然后又让他站起来到结晶的粗盐上走，他就是这样被折磨致死的。然而，最终也没有关于他是否有罪的定论，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

虽然洛伦佐在佛罗伦萨的地位稳固了，但美第奇银行的财富却迅速

缩水。洛伦佐并不像祖父那样善于经营；他给了分行经理们太多的权限，而且过分依赖于那位趋炎附势、阿谀逢迎的总经理弗朗切斯科·萨塞蒂（Francesco Sassetti）的不明智建议。当被人提醒要提防萨塞蒂的许多政策时，洛伦佐往往会承认自己“并不是很明白这些事情”，然后就把别人的建议抛到脑后了。因为管理失误和在玫瑰战争期间过度贷款给爱德华四世（King Edward Ⅳ），美第奇伦敦分行被迫关门，布吕赫分行随后也崩溃了；然后是米兰分行，当年由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赠送给科西莫的营业场所也被卖给了“摩尔人”洛多维科。里昂、罗马和那不勒斯的分行在经营上也都遇到了困难，一方面是因为管理失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整个佛罗伦萨银行业的崩坏，在随后的12年中，它将彻底走向没落。

帕奇家族阴谋不仅想要推翻美第奇家族的统治，还要摧毁美第奇银行。而整个美第奇银行体系在这次阴谋发生之前其实就已经濒临破产了。正是因为预料到美第奇银行很快会破产，而洛伦佐也会随之身败名裂，雷纳托·德·帕奇才不愿意参与那次阴谋。阴谋虽以失败告终，但是洛伦佐依然面临财务上的窘境。不过，洛伦佐从来不允许道德上的顾虑阻碍他的政治前途和个人野心，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打起了那些不属于他的基金的主意。他先是挪用了指定他为监护人并委托他代管的两个堂弟的基金，总数超过五万五千弗罗林币。到1485年这两个男孩儿成年向他索要欠款时，洛伦佐却无力偿还，只好把自己在卡法焦洛的别墅和穆杰洛的一些地产过户给他们作为补偿，但是堂弟们仍声称这并不足以完全弥补他们的损失。除此之外，洛伦佐还私自动用国库的钱财。在他去世后，他的继承人被判定要归还超过七万五千弗罗林币的债务，都是洛伦佐“未经任何法律和官方许可就私自支取而给公众造成的损失”。

除了财务上的困扰，洛伦佐回到佛罗伦萨后还要为共和国前线持续的不稳定而费神。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热那亚人夺下了萨尔扎纳的堡垒。此后，吉罗拉莫·里亚里奥也把自己在罗马涅的势力范围扩张至

托斯卡纳地区边境；而卡拉布里亚公爵则利用锡耶纳发生暴乱之机建立了对该地区的统治权。最糟糕的是，因为洛伦佐和那不勒斯达成了和平条约，教皇的其他同盟者也就放弃了对教皇的继续支持，这又大大加深了教皇对他的厌恶感。教皇虽然无力自行组织对洛伦佐的宣战，但是他仍然拒绝撤销之前的禁令和驱逐令。

不过随后的局势又朝着对洛伦佐有利的方向发展了，时机之巧使得人们甚至怀疑是不是他本人安排了土耳其人发起攻击的时间：1480年8月，7000人的土耳其军队在奥特朗托海峡（Otranto）登陆，在意大利的靴子形版图的“鞋跟”处建立起了稳固的桥头堡，并威胁要穿过那不勒斯，直逼罗马。长久以来的担心变成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卡拉布里亚公爵不得不从锡耶纳火速赶回南方，国王费兰特也被迫将那不勒斯军队占领下的一些托斯卡纳地区市镇还给了佛罗伦萨。他们还说服教皇，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都面临危机的时刻，意大利内部各国更不应该发生内讧。各方最终商定，佛罗伦萨派遣一个由佛罗伦萨主要家族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到罗马，为自己城市的错误行为做出模糊的道歉，而教皇方面也答应赐予原谅和宽恕。于是代表团在12月3日这一天来到圣彼得大教堂。为了接见他们，中殿里特意摆放了带华盖的御座。教皇坐在御座上，代表团跪在教皇面前。路易吉·圭恰迪尼（Luigi Guicciardini）作为代表团团长，含含糊糊地说了一段道歉之词，声音甚至盖不过旁观者的议论。同样，教皇也嘟囔了几句听不清楚的斥责之词，并用忏悔杖轻敲了他们的肩膀，表示禁令被正式解除，随后教皇还给他们赐了福。代表团使节们也向教皇承诺提供15艘配有装备的舰船来协助抵抗土耳其军队，然后就回到了佛罗伦萨，并向洛伦佐汇报一切都顺利完成了。几个月后，土耳其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Mahomet the Conqueror）在盖布泽（Gebze）突然去世。他在奥特朗托海峡的军队也被召回土耳其，意大利的和平似乎重新得到了保证。

在洛伦佐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尽一切可能维护着意大利的和平，

不仅要全力防止教皇为贪婪的家人谋利而使意大利陷入小规模的冲突，还要打造一个统一、强大的意大利，既能抵挡土耳其人的进攻，又能挫败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对它的各种图谋。这样的政策本来就需要巨大的耐心和最老到的外交手腕，而吉罗拉莫·里亚里奥把他在罗马涅的领地范围扩大到托斯卡纳地区的野心更是让洛伦佐的工作难上加难。这一地区曾两次爆发战争，都是依靠洛伦佐的亲自调停才重归和平。在第二次战争之后，也就是1484年8月，教皇的使节回到罗马向他汇报，说和平条约拒绝了他的外甥对切尔维亚（Cervia）和拉韦纳（Ravenna）各镇的领地要求。这次战争本就因为争夺对这些地方的权力而起，结果竟一无所获。因痛风的折磨而异常暴躁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在听到这一消息时，先是气得话都说不出来，然后又狂怒地大叫自己永远不会承认这种耻辱的条约。然而在第二天，教皇就一病不起，几个小时之内就断气了。

西克斯图斯的继任者英诺森八世（Innocent Ⅷ）是一个随和亲切的人。他骄傲地承认自己有孩子，会为他们谋利，却不像西克斯图斯四世那样把这作为自己政策的核心。洛伦佐的一个代理用“兔子”这个词来指代教皇。不可否认，他那略微斜视的忧郁眼神和谦逊的举止确实有几分像兔子。洛伦佐对他的选举过程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并且有理由相信自己在适当的时候一定可以对新教皇施加一些有利的影响。此时，英诺森的首席顾问还是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粗野、好战的枢机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Giuliano della Rovere）。他在罗马教廷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皇英诺森的当选。不过因为大力怂恿教皇国加入与那不勒斯的昂贵却徒劳的战争，枢机主教渐渐失宠了。后来一个叫博科利诺·古佐尼（Boccolino Guzzoni）的海盗自封为奥西莫（Osimo）——安科纳南部教廷国里的一个小镇——的领主。枢机主教作为罗马教皇的使节前往那里，意欲将古佐尼驱逐出去，可是他没能完成任务。洛伦佐不失时机地利用了枢机主教的失败，只花了相当于这次失败征讨费用一小部分的钱就收买了古佐尼。

洛伦佐抓住一切机会让教皇对他日益敬重，并获得了教皇的友情，甚至是钟爱。洛伦佐还费尽心思地打探教皇的品位并投其所好。他会定期向教皇赠送蒿雀，还有一桶桶教皇最喜欢的葡萄酒和上好的佛罗伦萨布料。洛伦佐还会给教皇写一些礼貌又讨喜的书信，有的信上说如果教皇身体抱恙，他也会担心忧虑；还有的信上，他会鼓励说“教皇就应当是敢作敢为”，然后看似无意地加入自己对于恰当的教廷政策的看法。洛伦佐的关心让英诺森非常高兴，对于他的观点教皇也深信不疑，并且觉得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英诺森受洛伦佐的影响之深，用最为不满的费拉拉大使的话形容就是“教皇连睡觉都逃不过伟大的洛伦佐的眼睛”。而在那不勒斯的佛罗伦萨大使也确信如此，并向洛伦佐保证“整个意大利都知道，你对教皇的影响力之大，实际上是佛罗伦萨大使在‘以某种方式’（*quodammodo* ）掌控罗马的政策”。

到了1488年，这种影响力又进一步扩大了。洛伦佐的女儿马达莱娜嫁给了弗兰切斯凯托·奇博（Franceschetto Cibo），他是教皇加入教会之前生的儿子之一。新郎当时已经年近四十，身材魁梧、了无情趣、嗜酒如命，据说一辈子没表达过一个有意义的观点；马达莱娜当时是个天资平平、五官鲜明、肩膀圆润的16岁少女，她对这门亲事自然没多少期待，更不用说视女儿为掌上明珠的母亲了。洛伦佐曾形容马达莱娜是他母亲“头上的眼睛”（*occhio del capo* ）。不过，马达莱娜是个顺从的孩子，她的母亲也是个顺从的妻子，于是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再说，除了无趣、酗酒和好赌成性外，弗兰切斯凯托据说是个非常善良的人。而洛伦佐更是慷慨大方。虽然他当时正处于又一次财务危机中，不得不向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承认一时很难凑够四千达科特的嫁妆，因为还有很多其他“亏空要补”。不过最终他还是想办法凑够了这笔钱，并且将佛罗伦萨的帕奇宫和蒙图盖的帕奇别墅，还有阿雷佐附近斯帕达勒托（Spedaletto）的一片不错的地产都送给了弗兰切斯凯托。

教皇对此非常满意。洛伦佐对他的控制也更加稳固和严密了。整个

欧洲都接受了未来教廷的政策将由佛罗伦萨直接决定这个事实。如科西莫时代一样，美第奇又一次成为意大利实质上的决策人。欧洲的统治者们向他寻求建议；穆斯林君主们给他送来厚礼。洛伦佐一次又一次地调停斡旋，阻止教皇出于自己顽固的反阿拉贡家族的偏见而发动对那不勒斯的攻击，通过保证中小国家的独立来维持亚平宁半岛上微妙的均势，保住了意大利的和平。现在看来，洛伦佐的伟大的外交家的名声绝对是言过其实的，因为他是个轻率鲁莽、目光短浅的人，会为了眼前利益而冒无谓的风险；意大利之所以没有陷入内战，更多是源于运气而非他的英明治理；而外来势力没有在这一时期入侵也完全是因为这样更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不管怎样，洛伦佐在他有生之年作为国务政治家的至高地位鲜有质疑：他就是“意大利指南针上的指针”。他为从热那亚人手中接手彼得拉桑塔城（Pietrasanta）找到了合理的理由；还夺回了萨尔扎纳的堡垒，彻底弥补了他在帕奇叛乱中受到的耻辱，这些都极大提升了他在佛罗伦萨的声誉。虽然不情愿，但他还是出现在了彼得拉桑塔和萨尔扎纳的战场上，鼓励士兵们英勇奋战，并指引他们通过被攻破城墙的缺口。

根据希皮奥·阿米拉托（Scipio Ammirato）的描述，在他从萨尔扎纳凯旋之后：

> 佛罗伦萨共和国凭借洛伦佐的威名，摆脱了一切困扰，意大利的邦国间也鲜有冲突。在外无战事、内无忧乱的环境下，佛罗伦萨可以尽情地享受艺术与和平的美好，吸引更多的文人墨客来这里著书立说，人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繁荣城市、发展农业上。简而言之，佛罗伦萨全心投入对艺术和其他所有美好事物的追求，让人们把这个时代视作幸福的代名词。

第十三章 洛伦佐：资助者、收藏家和诗人

“他通晓一切事情”

在他不断地被请去调停意大利邦国之间令人厌倦的冲突的那些年里，洛伦佐说过他渴望能有机会回到托斯卡纳地区，躲进某个听不到一句国家大事的与世隔绝的地方。他还渴望有更多时间在乡村别墅里和那些杰出的学者、作家、艺术家朋友们相聚。他们可以去菲耶索莱；或是卡雷吉，每年的11月7日，这里都会举办纪念柏拉图诞辰的宴会；还可以去佛罗伦萨西北12英里之外的波焦阿卡伊阿诺，这里的旧别墅是由朱利亚诺·达·圣加洛（Giuliano da Sangallo）重建的；[1] 他还可以去位于穆杰洛峡谷通往皮斯托亚途中的卡法焦洛别墅，那里离城市更远，也更像一座森严的堡垒。尽管偶尔也会有随行人员因为小事争吵的烦扰，但是在这些乡村别墅里度过的时光通常是轻松惬意、令人愉悦的。用餐时，客人可以随便选择自己喜欢的座位，而洛伦佐和那些亲密的朋友们也是这样随性地加入宾客之中，比如安杰洛·波利齐亚诺；或是另一个风趣、爱嘲讽的诗人路易吉·浦尔契，通常被洛伦佐唤作“吉吉”（Gigi）；还有乔瓦尼·皮科（Giovanni Pico）及米兰多拉和孔科尔迪亚伯爵（Count of Mirandola and Concordia），后者是一位聪明、诚实的贵族，他的作品非常有影响力——其中一部深受洛伦佐的喜爱——但是一直受到教会的严厉抨击。来这里的宾客可能还会遇到风趣的书商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马尔西利奥·菲奇诺，他的作品《柏拉图神学》（*Theologica platonica* ）就是献给洛伦佐的；真蒂莱·贝基，洛伦佐曾经的家庭教师，现在是阿雷佐的主教；伟大的音乐家安东尼奥·斯夸尔恰卢皮（Antonio Squarcialupi），他是大教堂的管风琴演奏家，洛伦佐曾帮助他的唱诗班招募演唱者；还有艺术家菲利波·利比、多梅尼科·基兰达约和波提切利，他们都曾受雇于洛伦佐，为他装修斯帕达勒托的乡村

别墅；以及安东尼奥·波拉尤奥洛，洛伦佐评价他是“佛罗伦萨城里最伟大的大师”；此外，在洛伦佐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年轻的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也是这里的座上客。

米开朗琪罗的父亲虽出身于贵族家庭，但只是个清贫的托斯卡纳地方法官。米开朗琪罗七八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佛罗伦萨的弗朗切斯科·乌尔比诺（Francesco Urbino）学校，随后又到多梅尼科·基兰达约在佛罗伦萨经营的大画室里当学徒。米开朗琪罗的这个选择让父亲非常失望，因为后者认为这是一个低下的行当。但是米开朗琪罗少年老成的天赋从一开始就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当他看到米开朗琪罗十三岁时创作同伴们在圣玛丽亚诺韦拉的托尔纳博尼家族教堂里工作的情景时的画作忍不住惊呼：“天啊，这个男孩儿懂的比我还多！”后来洛伦佐让基兰达约推荐一些有前途的学生到他新创办的学校学习，基兰达约毫不犹豫地把米开朗琪罗的名字写进了推荐名单中。

根据乔焦·瓦萨里的说法，洛伦佐创办这座学校的目的，不仅仅是训练男孩子们掌握一门具体的手艺，更是为了让他们有机会接受比在其他地方能接受到的更广泛的教育。洛伦佐把美第奇宫和圣马可之间的一个花园布置了一下，并且雇用老朋友——师从多纳泰罗的贝托尔多·迪·乔瓦尼（Bertoldo di Giovanni）——担任学校的校长。洛伦佐还把自己收藏的无数油画作品和半身古董塑像借给学校，摆在画室和花园周围。[2] 据说米开朗琪罗就是在仿制畜牧之神法翁的半身像时第一次被洛伦佐注意到。瓦萨里是这样记录的：

> 尽管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大理石雕刻，米开朗琪罗仿造的法翁像却是那么传神，连洛伦佐都惊呆了。后来当他看到米开朗琪罗脱离了样本，发挥想象力给法翁雕刻了嘴巴、舌头和满口牙齿的时候，洛伦佐忍不住大笑起来，并以他一贯的迷人风度对米开朗琪罗说：“难道你不知道老人是不可能有满口牙齿的吗？总会掉几颗的。”

洛伦佐一离开，米开朗琪罗就凿掉了法翁的一颗牙，

> 他还特意在牙床上凿了个坑，让那里看起来好像是真的掉了一颗牙一样；然后他就一直盼望着洛伦佐再来。后来洛伦佐看到了米开朗琪罗对雕塑做出的修改，他精湛的技艺和单纯朴实的性格令洛伦佐每每想起都忍俊不禁，洛伦佐还给自己的朋友们讲过这件趣事，他们也无不感到惊讶。洛伦佐于是决定帮助和培养年轻的米开朗琪罗。他先是派人把他的父亲洛多维科请来，询问他是否同意让米开朗琪罗留下来，并且补充说会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他。洛多维科当然欣然许可。然后洛伦佐就在美第奇宫为米开朗琪罗安排了房间，像照顾自己的家人一样关照他。米开朗琪罗可以和洛伦佐的孩子或是其他任何尊贵的客人同桌吃饭，洛伦佐对待他也总是十分尊敬……为了让米开朗琪罗可以帮父亲贴补家用，他每个月的薪水高达5个达科特；洛伦佐还送了米开朗琪罗一件紫罗兰色的斗篷，连他的父亲也被安排到海关工作。事实上，所有在圣马可花园学习的男孩子们都有数目不等的薪水可领，尊贵而伟大的洛伦佐在他的有生之年一直没有停止资助这些学生。

米开朗琪罗在美第奇宫住了四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每天都会向洛伦佐展示自己的创作成果”。[3]

洛伦佐的财富远远不及自己的父亲或祖父，所以他没有订制那么多的雕塑和绘画作品，而那些跟他有关系的作品，也大多已经损毁或丢失了，比如斯帕达勒托的壁画就已遭破坏。还有一些不久前还被认为是洛伦佐订制的艺术品——比如波提切利最著名的作品《春》（*Primavera* ）[4] 和《维纳斯的诞生》（*Birth of Venus* ）[5] ——现在则被确认是洛伦佐那个与他同名且年轻富有的堂弟洛伦佐·迪·皮耶尔弗兰切斯科·德·美第奇（Lorenzo di Pierfrancesco de’Medici）订制的。画作被挂在了卡斯泰洛别墅的墙上，这座别墅也是美第奇家族的年轻分支在1477年买下来的。[6] 波提切利的《帕拉斯和肯陶洛斯》（*Pallas and the Centaur* ）也挂在这里。虽然这幅画的内容是庆祝洛伦佐挫败了帕奇家族的阴谋，终结了佛罗伦萨的战争，但是它很可能是由洛伦佐·迪·皮耶尔弗兰切斯科订制的。[7]

不过，就算洛伦佐本人没有向波提切利订制很多作品，他也帮助他获得了很多其他佛罗伦萨出资人的订单，而且似乎也帮助他得到了在罗

马西斯廷小教堂（Sistine Chapel）工作的机会。洛伦佐也为菲利波·利比、安东尼奥·波拉尤奥洛和朱利亚诺·达·马亚诺（Giuliano da Maiano）争取过许多工作机会：利比被他送到了罗马，波拉尤奥洛去了米兰，而马亚诺则被推荐给了卡拉布里亚公爵。他还帮助基兰达约获得了在圣玛丽亚诺韦拉和圣三一教堂工作的机会，[8] 后来又推荐他到西斯廷小教堂工作。至于被瓦萨里描述为“一刻不停地专注于绘画和雕刻”的韦罗基奥，洛伦佐也让这位艺术家获得了在托斯卡纳各个地方工作的机会。洛伦佐向他订制了《大卫》[9] 的铜像和陶质的《复活》（*Resurrection*）[10] ，摆放在卡雷吉乡村别墅里，不过雕塑家的兄弟声称洛伦佐没有付工钱。在洛伦佐的学校花园里有一尊被严重毁坏的红色石像，雕刻的是被剥皮之后的玛尔叙阿斯的身体。洛伦佐让韦罗基奥修复并完成这座石像，以便与科西莫在罗马购买的玛尔叙阿斯白色大理石雕像配成一对。瓦萨里记录说：

> 韦罗基奥用红色大理石重新雕刻出了腿和胳膊，其技艺之精湛让洛伦佐大喜过望，并且把修复后的红色雕塑和白色雕塑分别摆放在了大门两边。这尊古老的石雕展现的是玛尔叙阿斯被剥皮后的身体，从中可以看出创作者的细致入微和精准的判断力。他还巧妙利用了红色大理石上的白色纹理，让它们看起来像是人类身体被剥皮后显示出来的细小筋脉。

当韦罗基奥离开佛罗伦萨的时候——他将前往威尼斯去创作最后一幅传世之作，矗立于圣乔瓦尼和圣保罗广场（Piazza di Santi Giovanni e Paolo）的雇佣军首领巴尔托罗梅奥·科莱奥尼纪念碑，洛伦佐祝他一路顺风。与米开朗琪罗一样，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也在洛伦佐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当达·芬奇决定前往米兰时，洛伦佐同样亲切地祝他好运。达·芬奇是个私生子，来自一个名叫芬奇（Vinci）的托斯卡纳村庄。可以确定的是，从他12岁来到韦罗基奥在佛罗伦萨的工作室工作时起，洛伦佐就十分关注这个已经展现出过人天赋的少年；后来达·芬奇决定前往米兰谋求发展，以展现他那令人震惊的多才多艺，正好公爵洛多维科·斯福尔扎在寻找一位艺术家来雕刻他父亲骑马的塑

像。一向善于利用这种政治交情的洛伦佐就给公爵送去了一把达·芬奇制作的马头形状的银质竖琴，并以此向他推荐了达·芬奇。

洛伦佐肯定希望别人知道他是个艺术鉴赏家，就像他逐渐积累起作为建筑评论家的显赫名声一样。事实上，在修建重要的建筑物之前先来征求他的意见已经成了一种惯例。比如圣神教堂正面的设计方案之争就被提交到他的面前；[11] 菲利波·斯特罗齐也曾就斯特罗齐宫的比例问题向他咨询。[12] 洛伦佐还被邀请为皮斯托亚的圣雅各布教堂在建的福尔太圭里墓（Forteguerri tomb）挑选最终的模型，而两个备选方案分别是由韦罗基奥和皮耶罗·德尔·波拉尤奥洛（Piero del Pollaiuolo）提交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人们觉得“他通晓一切事情”。后来圣神教堂要画一幅新的圣坛版画，接手这一任务的基兰达约被告知作品的“风格、标准和形式都要”让洛伦佐满意。

到1491年，大教堂的正面仍然没有建成。洛伦佐本人也提交了一份设计方案。鉴于韦罗基奥、波提切利、基兰达约和菲利波·利比以及其他一些大师都加入了竞争，评委们觉得有些难以抉择。为了逃避这个难题，评委们请洛伦佐来决定使用哪个设计。但是，洛伦佐在盛赞了所有方案之后，说自己没法做出决定，这个问题还是延后再议吧。[13]

虽然洛伦佐在画作和雕塑上花的钱比他的祖父少得多，而且也没有坚持完成一些由他祖父发起修建的工程——比如菲耶索莱的巴迪亚教堂，但是洛伦佐终其一生都未曾停止扩充他在其他方面的惊人收藏，包括铜像、勋章、钱币、古陶器、古董珠宝，还有罗马、拜占庭、波斯和威尼斯的花瓶。很多花瓶是用亚宝石雕刻制作的，而且大多数花瓶上都加刻了他名字的缩写“LAUR.MED”作为标记。事实上，他宁愿花费比买一幅巨幅油画多得多的钱来购买一块精雕细琢的珠宝，因为在他看来这才是更合理的投资。他收藏的很多珠宝价值高达几千弗罗林币，而一件波提切利或波拉尤奥洛的画作最多也就值几百弗罗林币。

洛伦佐在资助作家和学者上也一直是毫不吝啬的，更不用说购买书籍和手稿来扩充美第奇的藏书室了。他要求代理们永不停歇地为他寻找珍贵的书源。在他的资助下，乔瓦尼·拉斯卡里斯（Giovanni Lascaris）两度前往东方寻找遗失的手稿，终于在第二次探寻之旅后带回了超过两百册的希腊书籍，其中近一半作品都是此前无人知晓的。

尽管活字印刷术在十五世纪中期的德国美因茨（Mainz）已经出现，但是这一技术起初在意大利并未得到迅速发展，很多学者认为它是“一些德国城市中的野蛮之人”采用的粗俗工艺，很多收藏家甚至拒绝收藏印刷出来的书籍。那不勒斯于1465年才建立了第一家印刷厂，罗马是1467年，威尼斯和米兰是1469年，维罗纳、巴黎和纽伦堡则是1470年。到了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在紧挨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西门的地方建起了英国第一家印刷厂，并以中间一条红色垂直纹线的盾形徽作为标志。至于佛罗伦萨的第一家印刷厂则到1477年才由贝尔纳多·琴尼尼建立起来。在这之前，甚至是在有了印刷厂之后的很多年里，洛伦佐还是遵循这座城市根深蒂固的传统，雇用大批抄写员、插画家和代笔人来抄写他收藏的手稿，好让这些作品能够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并且为托斯卡纳地区内外，尤其是比萨的图书馆提供更多的副本。

洛伦佐清楚比萨和沃尔泰拉一样抵触归属于佛罗伦萨这件事，所以他一直花大力气改善佛罗伦萨与这两座城市的关系，并且树立了美第奇家族作为这些城市庇护者的形象。他开发了比萨的港口，在比萨城外买地，在城里的河边买房，还常带家人来此暂住。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树林茂密的亚平宁山脉阻挡了从罗马涅一路刮来的凛冽东风，所以这里的气候相对温和。最重要的是，洛伦佐为了缓和比萨人、佛罗伦萨人以及美第奇家族的关系，设法复兴了名噪一时但如今已经败落的比萨大学。1472年，洛伦佐把这座大学打造成了托斯卡纳地区最重要的大学，并提供了两倍于政府每年资助的六千弗罗林币的捐款。

洛伦佐给佛罗伦萨大学基金会的捐款同样慷慨。佛罗伦萨大学是欧洲唯一一所有能力开设正规的希腊语课程的大学。这里的教师和讲师包括约翰内斯·阿尔吉罗波洛斯（Johannes Argyropoulos）、泰奥多鲁斯·加扎（Theodorus Gaza）和迪米特里厄斯·查尔康迪拉斯（Demetrius Chalcondylas），其中迪米特里厄斯·查尔康迪拉斯还和迪米特里厄斯·克雷泰恩西斯（Demetrius Cretensis）一同于1488年在佛罗伦萨发行了最早的印刷版荷马作品集。全欧洲的学生都来到这里学习希腊语。后来成为英国国王亨利八世（King Henry Ⅷ）的专属医生以及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创立者之一的托马斯·利纳克尔（Thomas Linacre）于1487年来到佛罗伦萨并在这里待了3年，他还有幸和洛伦佐的儿子们一起上了查尔康迪拉斯的课程。利纳克尔的朋友、后来成为最早在牛津大学教授希腊语的教师之一的威廉·格罗辛（William Grocyn）是1488年来到佛罗伦萨的。到1489年，他们的另一个朋友威廉·拉蒂默（William Latimer）也来到了佛罗伦萨，正是他帮助格罗辛和利纳克尔将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翻译为拉丁文。

洛伦佐和这些学者一样对古希腊哲学家和拉丁文诗歌充满热情，但是他无法容忍那些轻视意大利语或者贬低托斯卡纳诗人的艺术成就的人文主义学者。每当洛伦佐想通过创作诗歌来摆脱生意上和生活中的烦扰时，他效仿的不是那些拉丁语诗人，而是但丁和薄伽丘。他不想用拉丁语，而是更愿意用孩提时就学会的简单又美丽的托斯卡纳方言（Tuscau）。洛伦佐对这种语言充满忠诚和热情，他和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一样坚信，只要诗人潜心钻研语言的用法，只要人们摒弃尼科洛·尼科利的无稽之谈——但丁的诗歌只适合没有文化的羊毛工人和面包师傅阅读，托斯卡纳方言就一定可以变得更加含蓄和圆润。如果洛伦佐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来发展语言天赋，再加上对托斯卡纳方言的深沉感情，那么他用托斯卡纳方言创作矫揉造作的诗文就一定能有质的提高。尽管如此，他仍然称得上十三世纪晚期诗人的合格继承者，也是彼特拉克的先驱。

洛伦佐的诗歌称得上丰神俊逸、多姿多彩：有的忧伤、有的振奋、有的充满希望，但更多是发人深省的，既包含了宗教情绪，也包含了凡人的情感欲望。他能写出其母亲曾经创作的那些虔诚的赞美词句，也能写出让母亲担忧的亵渎神灵的改编诗文；他还会写打猎歌、情歌、欢快的舞曲（*canzoni a ballo* ），以及天马行空的滑稽戏和情色的狂欢节歌曲（*canti carnascialeschi* ），比如《卖冷杉松果的人》（*Song of the Fir Cone Sellers* ）就是一首关于肉欲激情和物欲之爱的赞歌。不过，洛伦佐在作品中表达最多的还是他对托斯卡纳的美丽风景以及农民生活中的幸福与艰辛的深刻感情，这些作品中往往充满了非凡而生动的细致描绘。羊群咩咩叫着穿过高地上的草场，刚学会走路的小羊蹒跚地追随着妈妈的脚步，而牧羊人则把刚出生的羊羔和跛足的绵羊扛在肩上；到了夜里，羊群会被圈在用杆子和网子围起来的羊圈里，牧羊人吃过面包和羊奶做的晚饭，此时已经在黑夜中呼呼大睡；苍鹭向着落日的方向飞去，猎鹰向地面的猎物俯冲；海边有橄榄树林，树叶在吹过海岸的清风中拂动；燧石的火星落在秋日的枯叶上，点燃了草丛，火势向森林蔓延开去，火苗烧过草丛和洞穴，受惊的鸟儿和动物四散奔逃，到处是扇动翅膀和蹄子蹬地的声音；到了冬天，高大的杉树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黝黑，冰冻的树叶被脚步踩碎；躲避猎捕的野鹿绝望地逃命；任劳任怨的公牛奋力拖动沉重的石料；筋疲力尽的飞鸟宁可坠入海洋，也不敢在船只的桅杆上停留歇脚；翁布罗尔河（Ombrone）发了洪水，浑浊的河水沿着山坡奔涌而下，连粗壮的冬青树干和农民搭建木屋的厚木板都被卷走，冲到了开阔的平原之上；还有农民的妻子背着号啕大哭的婴孩儿，赶着他们的牲畜躲避这可怕的洪水。

到1492年年初，仅43岁的洛伦佐显然已经时日无多。多年来他一直受到痛风的困扰，疼痛日益加重，已经渐渐失去了行动能力；此外他的总体健康状况也在迅速恶化。每年去泡温泉成了他的习惯。他可以去斯帕达勒托或波雷塔（Porretta），或是维戈内（Vigone）——圣凯瑟琳（St Catherine）就是在此处温泉里忍受灼人的温度，以此来为坠入炼狱

做好准备；他还可能去沃尔泰拉南部的莫尔巴温泉（Bagno a Morba），他的母亲在那里修建了一处迷人的温泉疗养地。每次泡温泉回来，洛伦佐都断言说自己已经恢复健康了，可是过不了几个月他就又会操劳过度、疲惫不堪。他要被人抬着才能前往自己最喜欢的波焦阿卡伊阿诺的乡村别墅。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进行什么活动，只能在这里读读书，欣赏一下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Andrea del Sarto）创作的壁画，监督一下领地周边农民的耕作，或是去有各种外国动物的动物园里看看动物，这里还养着一只巴比伦苏丹送给他的美丽的长颈鹿，它的性情极其温顺，还会“吃孩子用手递给它的苹果”。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里，不时暴发的烦躁和怒气掩盖了他曾经的风度翩翩。痛风引发的越来越严重的疼痛让他变得唐突无礼甚至出言不逊。对一个无情地批评音乐家斯夸尔恰卢皮品格的人，洛伦佐尖锐地说：“要是你知道达到艺术上的完美有多艰难，你就不会抓住这点儿短处不放了。”对另一个同情他视力下降并评论说佛罗伦萨的空气对眼睛不好的锡耶纳人，他则反驳说：“看来锡耶纳的空气对脑子不好。”当他的一个懒散邋遢的堂兄弟得意扬扬地夸耀自己乡村别墅丰沛的水源时，他答道：“那你就可以多洗洗手了。”

到1492年2月，洛伦佐无法继续管理生意和事务；他已经不能走路，甚至拿不住一支笔。波利齐亚诺写道：持续不断的发烧折磨着他“整个人，不仅伤害了他的动脉和血管，也侵蚀着他的四肢、内脏、神经、骨头和骨髓”。3月初，他的小儿子乔瓦尼向他告别，离开佛罗伦萨到罗马去了。洛伦佐不得不站在卧室的窗口来回应外界说他已经去世的谣言。两周之后，他被抬着送到了卡雷吉的乡村别墅，然后就再也没能回到佛罗伦萨。

波利齐亚诺和其他一些朋友陪他一起去了卡雷吉，他们会坐在床边陪他说话；如果他太累了，他们就轮流大声朗读他最喜欢的托斯卡纳诗

人的作品精选。他对波利齐亚诺说，要把余生都用来创作诗歌和研究学问，佛罗伦萨的政务则交给儿子皮耶罗处理。但是波利齐亚诺回答说：“人民不会同意你离开的。”

没过几天，两只佛罗伦萨的狮子在它们位于狮子街（Via di Leone）的笼子里打架，最后双双丧生。紧接着第二天，也就是4月5日夜里，闪电击中了大教堂的灯笼，教堂顶部一个大理石球掉下来砸到了广场上。洛伦佐问是教堂哪一侧的石球，听到别人的回答后，他说：“是临近我家的一侧，看来我要死了。”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不祥之兆出现：母狼在夜里嚎叫；天上出现了奇怪的光亮；一个女人在圣玛丽亚诺韦拉做弥撒时突然发起疯来，边跑边大喊有一头愤怒的公牛，牛角上还冒着火，就要把教堂顶翻了；连马尔西利奥·菲奇诺都说他看到鬼一样的巨人们在他的花园里打斗并发出吓人的哀号。

洛伦佐的私人医生皮耶罗·莱奥尼（Piero Leoni）与洛多维科·斯福尔扎派来的一位来自伦巴第的医生拉扎罗·迪帕维亚（Lazaro di Pavia）一起来到卡雷吉。这个伦巴医生给洛伦佐开了一副把珍珠和珍贵宝石研磨后混合的药方。他在洛伦佐卧室旁边的房间里制作这种药时，发出了巨大的噪音。洛伦佐呼喊道：“安杰洛，你在哪儿？”波利齐亚诺很快来到他的身边。洛伦佐问他那个医生到底在干什么。听到波利齐亚诺的回答之后，洛伦佐有那么一刻似乎相信这副怪异的药剂也许真能治好他的病，他紧紧握住波利齐亚诺的双手，充满期待地望着他的脸，而波利齐亚诺只能侧过脸避开他的注视，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忍不住痛哭失声。

当天晚些时候，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来探望洛伦佐。洛伦佐又说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虽然声音越来越微弱，但是米兰多拉还是听到洛伦佐所说的：“我只希望能多活几天，那样就能帮你的藏书室多挑选一些好书。”

医生的怪药让洛伦佐愈加虚弱，他让人去请神父来听他最后的忏悔并赐予圣餐。他坚持要从床上起身，穿戴整齐。可是这对他而言还是太难了，很快他就被抬回床上并倒在了枕头上。

皮耶罗经常来探望父亲，波利齐亚诺记录说，每当此时，洛伦佐都会“强撑出一副坚强的样子，为了不加重儿子的哀伤，忍住眼泪不让儿子看到”。

4月8日，洛伦佐陷入了类似昏迷的状态，一个卡马尔多利教士把眼镜的镜片举到洛伦佐嘴边察看他是否还有呼吸并判定他的大限已经来临，于是开始宣读耶稣受难的故事。此时洛伦佐已经说不出话，只能动动嘴唇表示他听懂了，他的眼睛盯着举在他面前的银质十字架，并偶尔亲吻一下十字架，直到彻底停止了呼吸。

皮耶罗·莱奥尼一直认为洛伦佐的疾病不会致命。他不赞成同行们那些近似妖术的药剂，而是坚称只要保证病人时刻处于温暖、干爽的环境，夜里不要受凉，不要吃梨和葡萄籽就不会有事。洛伦佐的离世以及外界指责他使用巫术和下毒，都让莱奥尼心灰意冷。他离开卡雷吉后，就跳进圣杰尔瓦西奥（San Gervasio）别墅的井里自杀了。

洛伦佐的遗体被送到圣马可修道院，后来被带回圣洛伦佐教堂，和弟弟朱利亚诺一起葬在了老圣器收藏室里。

---

[1] 洛伦佐在1479年买下了波焦阿卡伊阿诺别墅。朱利亚诺·达·圣加洛在次年将其改造成了一座纯文艺复兴式建筑，但是直到十六世纪才又加入了三角楣饰和有人字屋顶的敞廊。外部的楼梯是十七世纪才修建的。敞廊内部的壁画是菲利波·利比创作的。原本的庭院修建为一间豪华会客厅（*Salone* ），墙上装饰的都是弗朗切斯科·克里斯法诺·弗兰恰比焦（Francescodi Cristofano Franciabigion）、亚历山德罗·阿洛里（Alessandro Allori）、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和雅各布·卡鲁齐·蓬托尔莫的画作。除了这个房间外，这栋建筑的内部装潢都有了很大的变动。现在这栋建筑属于国家，并被改建成为博物馆。

[2] 根据瓦萨里的说法，洛伦佐的学校位于圣马可广场附近的一个花园，曾经属于菲耶索莱的巴迪亚教堂，后来成了克拉丽切·奥尔西尼嫁妆的一部分。当时的文献中对此没有记录，它的具体位置也不为人所知。

[3] 在吉贝利纳街（Via Ghibellina）70号的博纳罗蒂故居（Casabuonarroti）能看到许多米开朗琪罗早期的作品，故居是由博纳罗蒂的侄子在这块一直属于他家的地产上建造的。《楼梯上的圣母》（*Madonna of the Stairs* ）大约是1490年完成的。《半人马之战》（*Battle of the Centaurs* ）大约是1492年完成的。

[4] 波提切利的《春》（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中充满了古典及文学的暗示，也一直存在着最复杂的解释。有的作家认为维纳斯和弗罗拉的原型都是莫内塔·韦斯普奇，她的亲戚阿梅里戈·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是个航海家，后来以自己的名字为美洲命名。而画作左面的墨丘利的形象则与波提切利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肖像》（*Portrait of Giuliano de'Medici* ）（现存于米兰的克雷斯皮收藏馆）有相似之处，后者创作于二三年以前，也就是大约1475年。

[5] 也有人说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中维纳斯的原型是西莫内塔·韦斯普奇。这幅画（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创作于约1485年。

[6] 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春》和《帕拉斯和肯陶洛斯》都曾经悬挂在美第奇的卡斯泰洛别墅。这个别墅是1477年由洛伦佐·迪·皮耶尔弗兰切斯科·德·美第奇购置的。那里的花园是由尼科洛·佩里科利·特里博洛（Niccolo Pericoli Tribolo）和他的继任者贝尔纳多·布翁塔伦蒂在公爵科西莫一世时期建造的。池塘和洞穴里的各种石像和铜制雕像是由特里博洛、阿曼纳蒂、詹波隆那和佩利诺·达·芬奇（Pierino da Vinci）创作的。其他一些由詹波隆那创作的动物铜像被移到了巴杰罗宫。这座别墅后来经过萨瓦家族的改造和重新装修，现在被修复并作为克鲁斯卡学会的总部。

[7] 据称波提切利的《帕拉斯和肯陶洛斯》（陈列于乌菲齐美术馆）大约创作于1482年，是为了庆祝洛伦佐与国王费兰特的谈判成功。画面背景的月桂树被认定为那不勒斯的月桂树；毫无疑问帕拉斯的裙子上绣着的是美第奇家族的标志——连环相扣的钻戒。

[8] 在洛伦佐的推荐下，基兰达约于1485年开始受雇装修圣玛丽亚诺韦拉的马焦雷礼拜堂。他创作的壁画最后是由其助手们完成的，彩绘玻璃窗也同样如此。他的圣坛装饰画在十九世纪初受到损毁，并且被运到了德国。洛伦佐还帮助基兰达约获得了创作圣三一教堂里萨塞蒂堂的壁画和圣坛装饰画的工作机会。弗朗切斯科·萨塞蒂是美第奇银行的总经理。他和他的四个儿子都被画进了圣坛后面的壁画中。站在菲利波旁边的是洛伦佐本人。还可以看到洛伦佐的儿子们和他们的家庭教师路易吉·浦尔契、阿尼奥洛·波利齐亚诺（Agnolo Poliziano）一起走在台阶上。

[9] 韦罗基奥的《大卫》制作于约1474年，现陈列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

[10] 韦罗基奥的《复活》制作于约1479年，现陈列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

[11] 中世纪的圣神教堂除了食堂之外，都在1471年的大火中被毁，从1434年到1487年，一直在根据布鲁内莱斯基的设计重建。这里的教士们在半个世纪里不得不靠每天少吃一顿饭来省钱支付工程费用。布鲁内莱斯基去世后，人们对是否继续执行他关于教堂正面的设计存在分歧，朱利亚诺·达·圣加洛主张坚持，其他工匠则希望修改。后来他们还去寻求了洛伦佐的意见，但是这个教堂正面最终也没能建起来。在洛伦佐的鼓励下，朱利亚诺·达·圣加洛制作了一个圣器收藏室的模型。

[12] 位于托尔纳博尼街和斯特罗齐街交会处的宏伟的斯特罗齐宫是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为菲利波·斯特罗齐建造的。原本的设计可能由朱利亚诺·达·圣加洛完成，但是大部分建造工作是由贝尔代托·达·马亚诺（Benedetto da Maiano）、西蒙内·德尔·波拉尤奥洛（Simone del Pollaiuolo）和朱利亚诺的兄弟监督完成的。
菲利波·斯特罗齐的儿子讲述了他父亲如何避免可能出现反对建造如此宏伟的宫殿的故事，那就是让大家觉得这是洛伦佐建议的结果。一开始他先是拒绝了他雇用的各个建筑师和工匠的方案，理由就是他们的设计都太富丽堂皇，而他想要简朴一些的宫殿。但得知洛伦佐希望这座城市能够在各个方面都被装点得卓越非凡后，他同意去征求一下洛伦佐的意见。于是洛伦佐被请来评议各个设计方案，最后他选中了最雄伟壮观的一个。然而斯特罗齐一边惺惺作态地称自己想要简朴的风格，一边又奉承洛伦佐的高雅品位。他说不知道自己这样的地位建造这么宏伟的宫殿合不合适，又说不得不承认洛伦佐对空间和风格的理解远胜于他。最后斯特罗齐如愿地建成了自己真正想要的宫殿。按当时的风俗，他还找占星师选了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作为奠基日，也就是1489年8月6日。

[13] 据说大教堂的正面一直没有完工。1515年为了迎接教皇莱奥十世的到来，修建起了一个临时的正面（详见本书第十七章）。到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时期，人们想要重新设计一个合适的正面。于是布翁塔伦蒂、詹波隆那和洛多维科·卡尔迪（Lodovico Cardi）提交了模型。科西莫一世的私生子、极有天赋的堂·乔瓦尼·德·美第奇（Don Giovanni de’Medici）也提交了设计模型，他还参与过设计圣加埃塔诺教堂（San Gaetano）、圣洛伦佐教堂中的王室祭堂，以及观景城堡。然而，最终教堂正面的提议没有实质性进展，只是用一个帆布帘遮挡了起来。当帆布帘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被吹坏之后，公爵科西莫三世到博洛尼亚找来了工匠，在棕色石头上画上了壁画。后来壁画也渐渐被磨损侵蚀了。直到十九世纪晚期才被换成了大理石和马赛克图案，并一直保留至今。

第三部分 1492～1537

第十四章 皮耶罗·迪·洛伦佐·德·美第奇和费拉拉的修道士

“看吧！是上帝在领导这支军队”

22岁的皮耶罗完全没有他父亲那样的人格魅力。他身强体壮、行动敏捷，有一头浓密的淡棕色头发，长及肩膀，额前还垂着一缕刘海。皮耶罗的外貌并非毫无吸引力，但是他的性格和举止绝算不上讨人喜欢。他和洛伦佐一样冷酷无情，却没有洛伦佐的机智老练；他和洛伦佐一样对敌人睚眦必报，却不像洛伦佐一样对朋友永远忠诚。从他小时候写的书信中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任性骄躁的孩子。5岁时在给祖母的信中这样写道：“给我送点无花果来，因为我喜欢吃，而且我只要红色的那种；再给我送点带核的桃子和其他我喜欢的东西，你知道的，比如糖果和蛋糕之类的。”皮耶罗还让父亲给他买一只“世上最好的猎犬”；可是当猎犬送到他手上之后，他又迫不及待地想要一匹矮种马，还抱怨说：“你答应给我的矮种马我还没有收到，别人都笑话我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耶罗的脾气越来越火爆，举止也越来越狂妄自大。也许是为了避免被拿来与常被嫉妒但广受爱戴的父亲相比较；也许是因为他认为美第奇家族的地位已经稳固到可以完全不顾及支持者的意见，任其为所欲为。总之，皮耶罗对生意和公共事务不闻不问，把时间都花在户外游玩和诗歌创作上，就连他写的诗也不过是对洛伦佐生动风格的拙劣模仿而已。国家大事被交给他的秘书皮耶罗·多维齐·达·比别纳（Piero Dovizi da Bibbiena）处理，已经濒临瓦解的银行生意则全交给了

那位其实不能胜任的叔祖父乔瓦尼·托尔纳博尼。皮耶罗在佛罗伦萨不得民心的窘境因妻子阿方西娜（Alfonsina）而更加恶化。这个奥尔西尼家族的女儿傲慢无礼、心胸狭窄，她将宁愿留在罗马与真正的贵族（*nobilita* ）为伴的想法表露得十分明显，这让大多出身为乡野村夫的佛罗伦萨人尤其感到厌烦。

皮耶罗和两个堂兄之间的摩擦也是他在佛罗伦萨名声受损的原因之一。洛伦佐和乔瓦尼都是皮耶尔弗兰切斯科·迪·美第奇的儿子，都比皮耶罗年长，也更富有。洛伦佐在作为他们的监护人期间侵吞了部分本属于他们的遗产，所以他们并不掩饰对家族主要一支的怨恨，甚至不掩饰在下一次权力争斗时抛弃皮耶罗的打算。事实上，这样的争斗即将重现。早在几年前，一位来自费拉拉的口才出众、充满激情的多明我会苦行僧就已经用警示性的布道让聚集在大教堂里的会众们心中充满了羞愧、悔恨和恐惧。

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年出生于费拉拉，从小在祖父的教育下长大。他的祖父是一位医生，来自帕多瓦，在温泉治病的疗效功用方面是公认的专家，也是长期大量饮酒有助于长寿这一理论的支持者。祖父依靠理论和名望赢得了在费拉拉宫廷里担任公爵御用医师的肥差，他的儿子在他去世后继任了这一职位。不过，他的孙子对宫廷生活就不那么憧憬了，只去了一次公爵的城堡之后就发誓再也不要回到那个地方了。吉罗拉莫是一个内向的男孩儿，阴郁、苍白、沉默寡言，热衷于创作忧郁的诗歌，用鲁特琴弹奏忧伤的、近似挽歌的乐曲以及研究圣经经文。据说在他爱上拉奥达米娅·斯特罗齐（Laodamia Strozzi）之后，行为举止变得更加消沉沮丧，因为这位佛罗伦萨流放者的女儿傲慢地拒绝了他的求爱；不过吉罗拉莫一直坚称自己从来没想要娶她。他后来的生活则遵行了最严格的禁欲主义。除了布道的时候，他几乎从不和任何女性说话；他吃得很少，更是坚决不会品尝祖父收藏的大量烈酒；他穿的衣服都很破旧且打着补丁；他睡觉的床也

不过是一块铺了一层稻草的木板。

1475年的某个宗教节日当天，吉罗拉莫一声不响地离开了父亲的家，到博洛尼亚的圣多梅尼科修道院做了一名见习教士，在那里一待就是七年。他给父亲写信解释自己的突然出走：

> 你需要感谢上帝的比你要向上帝抱怨的多。因为上帝赐给你一个儿子，并且选定他成为自己的战士。能有一个作为耶稣基督的骑士的儿子难道不是莫大的恩典吗？……我再也不能忍受漫不经心的意大利人的所有恶行了……我也是血肉之躯，所以我要用全部的力量来抵制与理智相违背的身体本能，这样才能避免被恶魔附身。

为了帮助别人战胜恶魔，萨沃纳罗拉被博洛尼亚的多明我会派往意大利各地传教，包括费拉拉、布雷西亚（Brescia）、热那亚以及托斯卡纳和伦巴第的各个城镇。1481年，他被任命为圣马可修道院的诵经员来到佛罗伦萨，并受邀到圣洛伦佐教堂做四旬斋节布道。1489年，他在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安定了下来。

一开始，他根本算不上一个称职的布道者。在后来号称能用布道感动“整个意大利”的日子里，他承认了在最初的几年里，他连“一只母鸡都感动不了”。根据吉诺齐（Ginozzi）的记述：“他的动作和发音都让人不舒服，留下来听他布道的人都是妇女和孩子，而且不超过25人。他非常沮丧，甚至想过要彻底放弃布道的工作。”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讲道时语调僵硬、动作笨拙，更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难以给人留下好感的人。吉罗拉莫身材瘦小，样貌丑陋，有一个巨大的鹰钩鼻和肥厚的嘴唇，唯一能体现出他非凡性格的就是浓眉下的一双绿眸，目光炯炯有神，甚至“有时会放出红光”。

当时大多数佛罗伦萨人更倾向去听奥古斯丁修会的教士马里亚诺（Fra Mariano）所做的更优雅、更有文化、更精炼的布道，连洛伦佐都依他的要求在圣加洛门外修建了一座修道院。然而萨沃纳罗拉这个笨拙

的多明我会教士渐渐也赢得了一批坚定的支持者，因为略过所有的缺点，人们开始感受到他布道中精彩的内容、满满的激情和迫切的真诚。到1491年，来听他布道的会众人数大幅增长，以至于圣马可教堂都容纳不下了，所以当年的四旬斋节布道是在大教堂里进行的。

这些布道在佛罗伦萨引起了轰动。萨沃纳罗拉甚至开始认为自己是上帝选定的先知，他的话都是受神灵启示的，质疑他就是质疑上帝的智慧。按照他的说法："不是我本人在传教，而是上帝通过我在布道。"在长时间的斋戒和冥想之后，他还会被赐予关于未来的景象。他知道教会将受到斥责与摈弃，但是能够浴火重生，而且这一切很快就会成为现实。他还知道如果意大利人——尤其是佛罗伦萨人——不改进他们的处事方式，将会受到极其可怕的惩罚。只有回归基督教会最初的简朴才能拯救他们。人们必须抛弃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这两个人肯定已经坠入地狱永劫不复；人们还必须抛弃腐蚀他们灵魂的奢华和物欲；禁止赌博、纸牌游戏以及荒淫放荡的狂欢节和赛马节，更不用说华服、熏香和粉黛；人们还要把囤积的钱财捐赠给穷人；把那些邪恶的油画全都涂抹遮盖，因为画家甚至"把圣母玛丽亚也描画得如娼妓一般"；人们还要严惩卖淫之人，她们只是长着眼睛的行尸走肉，至于鸡奸者则应该被活活烧死；对于政治机构也要进行改革，科西莫宣称国家不应受制于祈祷和经文是大错特错的，因为除此之外，根本没有治理好国家的其他方法。萨沃纳罗拉在大教堂的神坛上向众人宣告："首先你要顺从上帝之法，因为没有哪部好的法律不是遵循这永恒之法的。"佛罗伦萨人为了一个暴君描画给他们的景象而放弃了自己古老的自由。他们必须重新构建一部宪法。"我认为威尼斯人的宪法是最好的宪法，你们可以效仿他们的宪法，但是要抛弃其中不好的部分，比如总督统治。"

对这种指责美第奇统治的言论，洛伦佐一直给予了耐心和宽容。他的朋友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向他保证萨沃纳罗拉是一位虔诚的伟人；其他一些朋友，比如波利齐亚诺和波提切利也对萨沃纳罗拉有类似的评

价，言语中不乏尊重和敬畏之意；米开朗琪罗年老之时还说，自己仍能感觉到神父的话语萦绕耳际；当萨沃纳罗拉被提名为圣马可修道院的院长时，洛伦佐没有提出任何反对；甚至是在萨沃纳罗拉拒不承认美第奇家族与圣马可修道院之间的渊源以及他们捐献的巨额资助时，洛伦佐也没有表示出一点儿不快。有一次，一些资深的美第奇家族支持者在拜访萨沃纳罗拉时建议他“不应这样布道”，他却回答说：“回去告诉洛伦佐，他应当好好忏悔自己的罪责，否则上帝定会让他受到惩罚。”然而洛伦佐临死之前，还派人请来了萨沃纳罗拉和马里亚诺。根据波利齐亚诺的说法，当时两位教士都祝福了洛伦佐。

洛伦佐去世后，萨沃纳罗拉对灾难将至的可怕警告及对美第奇统治的批判都更加强烈而明确了。到了1492年，他在布道中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景象，比如：“上帝的宝剑”悬于佛罗伦萨黯淡的天空之上；可怕的大风暴、瘟疫、战乱、洪水和饥荒；一个黑色的十字架在罗马徐徐升起，上面刻着“上帝之怒”几个大字，十字架的横梁不断延伸，穿过整片大地，带来狂风骤雨；在耶路撒冷则立着另一个金色的十字架，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高耸入云。

来听布道的会众们仿佛被他描述的逼真景象吓呆了，萨沃纳罗拉向他们大声召唤道：“噢！忏悔吧，佛罗伦萨！趁现在还有时间，穿上纯洁的白色衣服。不要再等了，否则连忏悔都来不及了。”萨沃纳罗拉向众人说明了这景象预示着什么：除非他们追随金色的十字架，否则灾祸将至。到时会有瘟疫和战乱；还会有外来敌人跨过阿尔卑斯山，像“拿着巨大剃刀、全副武装的理发师”，不但带来像琉璃苣菜肴一般苦涩的不幸，还要强行实施冷酷无情的改革，“仿佛要把智慧也研磨成面粉一般”。

“我是上帝派来这里的，”萨沃纳罗拉宣称，“主对我说我把你安排在意大利的中心，你要像个看守一样为我巡视，你会听到我的话，然后

把我的话传达给所有人。”人们听着他的话，心里满怀恐惧。圣马可修道院的院长预言了洛伦佐的死，然后洛伦佐就去世了；他又预言了教皇英诺森八世和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的死讯，他们不久也都去世了；他还预言，在很多会众的有生之年内，土耳其人会改信基督教，尽管他们现在还是伊斯兰教徒，但萨沃纳罗拉这么说了，他们的改宗就算生效了。所以，上帝之剑指向佛罗伦萨和外国君主的军队打过阿尔卑斯山也一样会变为现实。

据说教皇英诺森在听到洛伦佐的死讯时大呼：“意大利的和平时代要终结了！”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也已经去世，他的死让人联想到可能爆发的战争。他的继承人查理八世是个充满活力和野心的年轻人，梦想着完成可与罗兰（Roland）相媲美的丰功伟绩，通过出神入化的用兵，统领他父亲建立的曾经击溃法国国内一切敌人的常备军队，为自己赢得荣耀。不过查理绝对不是什么将才或英雄。佛罗伦萨人第一次听到“上帝之剑”预言的那一年，查理年方二十。他是个身材瘦小、目光短浅的人，而且丑得出奇，不但有一个比萨沃纳罗拉的鹰钩鼻更大更尖的鼻子，还有一副永远闭不严的肥厚嘴唇，部分被一小撮散乱的红色胡须挡住了。他的头和手时常会痉挛；偶尔他嘴里嘟哝的几个词也总是让人听不清；他走路时总是曲着膝，一瘸一拐的；他的脚特别大，以至于有传言说他脚上有六个脚趾；他的暴饮暴食和荒淫无度也是出了名的，其无知更是达到了让人震惊的程度。也许是出于天真或天生的坏脾气，他的焦躁、任性和不知天高地厚让他身边的人不得不时刻提防着。他父亲在位期间已经极大地扩张了法国的领土范围，但是始终没有作为安茹王朝继承人宣称对那不勒斯王国享有权利。不过现在看来，只要时机允许，查理很有可能会起兵跨过阿尔卑斯山。这个年轻人可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想当初年轻美貌的布列塔尼女公爵安妮（Duchess of Brittany Anne）已经和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订婚，而查理却横刀夺爱，娶了人家作王后。

查理等待的开战机会终于来临了，而提供这个机会的人正是人称“摩尔人”的米兰公爵的叔叔洛多维科·斯福尔扎。公爵吉安·加莱亚佐在1490年就已经到了正式继位的年龄，但是他的叔叔却不愿交出摄政王的权力。其实吉安·加莱亚佐本人对此倒毫不介意，因为他是个懒散的年轻人，未必有胆量跟自己的叔叔争权，而且比起政治，他更喜欢去养狗、骑马和享受美食。不过，他的妻子伊莎贝拉（Isabella）却是一个比他积极得多的人。她反复向自己的祖父、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抱怨，要求他帮忙让丈夫的叔叔及其傲慢专横的妻子弄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起初国王费兰特不愿意插手，不过最终还是决定尽己所能帮助孙女。

为了防止那不勒斯或意大利其他任何地方对自己采取行动或挑战，洛多维科决定先发制人。他建议查理八世重申安茹家族对那不勒斯的所有权，如果那不勒斯胆敢拒绝，他就有理由出兵进军意大利，届时米兰公国将助他一臂之力，而且会在意大利为他筹集战争所需要的任何款项。事实上，洛多维科也确实成功地从一家热那亚的银行里以14%的利息借到了十万法郎的贷款。

查理对此求之不得，尤其是在1494年国王费兰特去世后，他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不但宣称对那不勒斯和耶路撒冷享有主权，还准备出兵入侵意大利，要将国王费兰特的继承人阿方索二世（Alfonso Ⅱ）赶下王位。当年9月，法国入侵意大利，超过三万人的大军在绣着法国纹饰和“*Voluntas Dei*”（神的旨意）字样的白色丝绸大旗的引领下，跨过阿尔卑斯山，缓慢地进入了伦巴第。先遣部队在这里受到洛多维科的热烈欢迎。查理国王随后到帕维亚向自己的表亲、无实权的公爵吉安·加莱亚佐表示敬意。此时吉安·加莱亚佐已经因病卧床不起，可是他的医生却说查不出病因。公爵夫人跪在法国国王脚边泣不成声地请求他不要带兵攻占那不勒斯，但是查理此时根本不打算回头，洛多维科就更不用说了。查理刚刚离开帕维亚向南朝皮亚琴察（Piacenza）行进，米兰公爵的病情就急转直下，显然是毒药导致的病情恶化。没过几天，他就去世

了，他的遗孀和四个孩子都被逮捕并囚禁，而洛多维科则宣布自己成为米兰公爵。

庞大的法国军队及后面由随军平民、厨师、马夫、赶骡人、教士、乐师、小贩、营妓和侍臣组成的零散队伍拖拖拉拉地继续前行，一路畅通无阻。所有教廷国都没有进行任何阻拦，威尼斯则宣布中立。查理离托斯卡纳边界越来越近。他派信使去要求皮耶罗·德·美第奇承认安茹家族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并许可法国军队通过托斯卡纳地区。皮耶罗让法国信使等了五天才宣布佛罗伦萨中立，而其间他还越权向那不勒斯国王承诺将支持其统治。然而法国根本不允许佛罗伦萨保持中立，他们需要托斯卡纳地区的堡垒作为后方的安全保障，这样才能安心地继续向南前进。于是，查理借口不满佛罗伦萨给信使的无礼待遇，进攻了菲维扎诺（Fivizzano）的托斯卡纳堡垒，不但将堡垒洗劫一空，还惨无人道地屠杀了全部守军。

这件事让皮耶罗展现出了令其他市民惊讶的能量，他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来阻止法国军队深入托斯卡纳地区。皮耶罗召集了所有雇佣军首领，把雇佣军派遣到托斯卡纳边境的堡垒，连皮耶罗的妹夫保罗·奥尔西尼（Paolo Orsini）也被派到了萨尔扎纳。皮耶罗本人准备动身去彼得拉桑塔，但是他的积极应对并没有得到佛罗伦萨其他主要市民相称的回应。萨沃纳罗拉似乎从预言成真中获得了一种沮丧的满足，又继续做出更多的预言，整个城市都笼罩在国之将亡的氛围中。曼图亚的信使在写给自己主人的信中说："一个多明我会教士就让整个佛罗伦萨陷入了恐慌，所有人都放弃了希望，渴望通过虔诚获得救赎。一周里面有五天都在斋戒，人们前三天只吃面包、喝白水；后两天吃面包、喝葡萄酒。所有的女孩和大多数少妇都躲进了修道院避难，所以街上只能看到男人、少年和年长的妇女。"

"看吧！"萨沃纳罗拉大喊道，

> 上帝的宝剑已经降下，灾难已经来临，预言已经实现。看吧，是上帝在领导这支军队……看吧，我将要放水淹没大地……这不是我而是上帝的预言。它就要成真。它已经成真了！

他的声音响彻整个大教堂，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全身打起了冷战，连头发根都竖了起来。洛伦佐·伦齐（Lorenzo Lenzi），这位即将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的富有的外交家也感到了同样的惶恐。当皮耶罗·德·美第奇向他索要更多的资助来保卫佛罗伦萨时，伦齐辩驳说这个城市就要毁了，抵抗是没有意义的。皮耶罗的堂兄弟们也是这样认为的。洛伦佐和乔瓦尼·迪·皮耶尔弗兰切斯科·德·美第奇为了不受牵连，已经派信使到查理国王的大营中送信，表示不支持皮耶罗的行动。他们不但完全理解法国的入侵行为，而且会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提高佛罗伦萨人的认同感，若有必要，还会出资支持。他们的信在途中就被拦截了，然后两兄弟都被软禁在了美第奇家族的别墅中。洛伦佐被关在卡法焦洛，乔瓦尼被关在卡斯泰洛，但是两人很快就逃了出来，并立刻加入了查理在维杰塔诺（Vigetano）的指挥部。他们向查理保证，只要处理掉皮耶罗，佛罗伦萨就会立即加入法国攻打那不勒斯的阵营。

到了10月底，美第奇一派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弃皮耶罗而去。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处于绝望的境地。无论是教皇、威尼斯还是那不勒斯，都不可能给他提供任何帮助，迪克·德·蒙庞西耶（Duc de Montpensier）带领的左翼侵略军在罗马涅地区已经瓦解了那不勒斯的部分军队；而法军右翼则绕过萨尔扎纳，距离比萨不过几英里之远。在这样的情况下，皮耶罗未与执政团商议就自行来到查理国王在圣斯特凡诺（San Stefano）的大营。他认为此时唯一能拯救佛罗伦萨的办法就是向法王卑微地投降，并努力赢得他的友谊，那样佛罗伦萨也许还有一线生机。显然，皮耶罗希望此行能够像父亲当年前往那不勒斯一般，取得巨大的外交成就。他还仿照父亲当年在前往比萨途中写的信，写了一封类似的送回了佛罗伦萨。

查理轻蔑地接见了皮耶罗，不但索要了一笔巨额贷款，还提出要继续占领萨尔扎纳、彼得拉桑塔、萨尔扎纳罗（Sarzanello）和利布拉弗拉塔（Librafratta）的堡垒以及比萨和里窝那两座城市，直到他所谓的“事业”成功为止。皮耶罗的反应让法国人感到不可置信。他们事后向菲利普·德·科米纳描述这一场景时都“忍不住大笑”：皮耶罗简直荒唐地在所有问题上让步，迫切地同意了法王的所有要求，然后在11月8日返回佛罗伦萨向执政团汇报他的所作所为。

第二天一早，皮耶罗带着佩剑，在一群全副武装的保镖的陪同下来到市政厅进行汇报。已经得知投降协定内容的执政官们在皮耶罗面前关闭了宫殿正门，公开声明他们对这种卑怯行径感到愤怒，其实私下里他们都在欢喜终于为自己的绝望处境找到了一个替罪羊。执政团给皮耶罗传信，说他可以从宫殿旁门进入，但是所有侍卫必须留在宫殿之外。皮耶罗拒绝进入，于是几位执政官走出宫殿对他进行规劝，然而皮耶罗依然不肯遣散侍卫，于是执政官们回到宫殿之内，再一次将皮耶罗拒之门外。没过多久，执政团敲响了牛钟，大批民众迅速集结到广场之上，他们对着皮耶罗叫骂和发出嘘声，甚至向他扔石头。皮耶罗依然站在那里，不过已经把剑握在了手中。他没有表现出惧怕，但是显然开始担忧要如何收场，直到随从说服他先回到美第奇宫再做打算。他的弟弟乔瓦尼本来一直来回骑着马大喊“小球！小球！小球！”来鼓动民众对其家族的支持，却没有什么效果。他在拉尔加街上遇到了从市政厅回来的皮耶罗，两人一起回到了美第奇宫。后来卢卡·兰杜奇还看到乔瓦尼跪在窗前祈祷。

夜幕降临以后，皮耶罗和妻子、两个年幼的孩子及堂兄弟朱利奥经圣加洛门逃出了佛罗伦萨，取道博洛尼亚前往威尼斯。他们把家族收藏中拿得动的值钱的小件宝贝都带走了。乔瓦尼乔装成多明我会教士的模样，偷偷地把美第奇藏书室中的不少财物转移到了圣马可修道院，然后也逃出了佛罗伦萨。他们逃走后，执政团立即颁布法令宣布美第奇家族

被永远逐出佛罗伦萨，并且悬赏4000弗罗林币捉拿皮耶罗，2000弗罗林币捉拿乔瓦尼。他们的堂兄弟皮耶尔弗兰切斯科家的儿子们也匆忙把姓氏改为波波拉诺（Popolano），并把美第奇家族的纹饰从自家宫殿墙上撤了下来。

皮耶罗本打算用美第奇宫中的一些房间来接待法国国王；美第奇家族逃出佛罗伦萨的消息一传出，法国国王就以“美第奇银行里昂分行拖欠巨款为由，宣告了对这些房间的所有权并掠夺了许多财物”。按照菲利普·德·科米纳的汇报，“在被掠夺的财产之中，法国国王从几件精美的宝物中抓起了一只完整的独角兽的角（其验毒和催情的功效卓著），尽管旁边还有两只更大的角；其他人也都效仿他。美第奇家族最精美的家具已经被转移到城中的另一座房子里，但是依然被暴徒们抢夺一空。执政团也抢到了皮耶罗的一些贵重珠宝、在佛罗伦萨分行的两万达科特现金、一些珍贵的玛瑙花瓶、数不清的雕刻精美的浮雕、总重约40磅的3000枚金银勋章”以及大量画作和雕像。[1]

这边掠夺者们在大肆抢掠，那边法国军队已经直逼比萨，查理八世立刻宣称比萨已经脱离共和国暴君的统治。为了抗议法王的这一举动，也为了尽可能地更改皮耶罗·德·美第奇同意的条约，佛罗伦萨派出了一个由4名外交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比萨，等待查理国王的接见。这四人之中就包括萨沃纳罗拉，与其说他是来抗议的，不如说他是来传达上帝神圣的意志的。据记录，他对法国国王说：

> 国王陛下，你终于来了。你作为上帝的执行者、公正的执行者来到这里。我们为你的到来而欢欣鼓舞……我们希望耶和华会借着你让骄傲的人变谦卑，让谦卑的人受赞扬，除恶扬善，矫曲为直，去旧换新，拨乱反正。

萨沃纳罗拉还为佛罗伦萨被上帝选为惩罚对象而祈求上帝的仁慈，他请求国王宽恕那些反抗他的到来的人们；因为他们本无意冒犯，只是还不知道查理是“上帝派来的”。查理被这些话打动了，同意宽容地对待

佛罗伦萨，不过他依然决心要带领一支人数众多、有足够威慑力的军队浩浩荡荡地进城。

---

[1] 美第奇家族的收藏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丰富的收藏，尽管一度被散到各处，但是其中一些真品后来都被寻回了。比如，有四个精美的花瓶，其中两个是碧玉做成的，一个是玛瑙做成的，一个是水晶做成的，并且都配有金制或银制的底座，上面还镶有珍贵的宝石并在瓶底刻了洛伦佐的名字。1502年，伊莎贝拉·德·埃斯特（Isabella d’Este）听说有人出售这四个花瓶，就派莱昂纳多·达·芬奇代表她去验货。最后由于某些原因，可能是价格太高，她并没有买下这四个花瓶。而是由公爵科西莫一世买了回来。很多雕塑最终也回到了奥里切拉里园。

第十五章 驱逐令

“有人已经在地狱为自己准备了位置”

国王查理八世在1494年11月17日这一天经圣弗雷利阿诺门（Porta San Freliano）进入佛罗伦萨。他穿着镀金的铠甲和金线缝制的斗篷，头戴王冠，像个得胜的英雄一样。按照当时军队统领进入被攻占城市的方式，他手中还握着长矛，横在身侧。4名骑士为他举着豪华的顶棚，他的左右各有一位将军，身后则跟随着100多名衣着华丽的皇家保镖；再后面是200多名步行的骑士；骑士后面则是拿着钢戟的瑞士护卫和穿着用繁复羽毛装饰的铠甲的官员们。另有5000名加斯科涅步兵和5000名瑞士步兵步行前进，他们后面是3000名穿着刻花铠甲和刺绣斗篷，举着用金线刺绣的天鹅绒旗帜的骑兵。骑兵后面还有4000名布列塔尼弓箭手和2000名石弩手。最后是各种武器和大炮，由骏马而不是牛或骡子拉着前进，这可是佛罗伦萨人从来没见过的景象。

> 胸甲骑兵的形象有些凶恶吓人，他们胯下战马的耳朵和尾巴都被剪得很短，看着像怪物一样。后面的弓箭手都来自苏格兰或其他北欧国家，个子高得出奇，与其说是人，不如说他们更像未开化的野兽。

太阳下山时查理国王抵达了主教堂广场，从他巨大的黑色战马上跳了下来。夹道欢迎的人一直在欢呼致敬，因为他们被萨沃纳罗拉说服了，认为法国国王是来解放他们的；然而当人们惊讶地注意到他矮小的身材和笨拙的动作时，欢呼声渐渐小了。不过据观察者说，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很快就恢复了先前的欢呼声势。之前一些佛罗伦萨市民的房子被用粉笔做了标记，作为法国军需官们指定的接待士兵的住处。当国王的士兵们忙着在这些焦虑的市民家中安顿下来的时候，查理则去做了弥撒，然后骑马直奔美第奇宫，沿途“法国万岁”（*Viva Francia* ）的喊声不绝于耳。

事实证明，不情愿的接待者们对这些北方士兵的疑虑是没有必要的。在一万二千名法国士兵驻扎佛罗伦萨的11天里，只发生过几次骚乱，不超过10个人丧生。总体来说，这段时间平静得出奇；直到法国军队准备离开但不肯承担这段时间的吃住开销时，才引发了广泛的不满情绪。

同样也是因为钱的问题，查理国王和执政团之间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本来查理要求执政团许可他继续使用其军队已占领的堡垒，同意他暂时占领比萨直到“事业”获得成功，同意向他支付十五万达科特的赔款以补偿这次远征的开销。但是查理在11月25日与佛罗伦萨的代表会面时，宣令官当场宣读的合约条款中赔款数额变为十二万达科特。查理愤怒起身打断了宣令官，并威胁说赔款必须维持原定的十五万达科特，否则他就要让军号手吹号集结军队，把整个城市洗劫一空。查理的叫嚣让皮耶罗·迪·吉诺·卡波尼（Piero di Gino Capponi）怒不可遏。曾经作为佛罗伦萨驻法国大使的皮耶罗在查理幼儿时就认识他了，如今却被这个不招人喜欢的年轻人如此威胁。皮耶罗一怒之下抢过宣令官手里的条约，撕了个粉碎。按照圭恰迪尼的形容，皮耶罗用“因愤怒而颤抖的声音”毫不畏惧地朝着查理大喊：“如果你吹号，我们就敲钟！”这句话后来成为佛罗伦萨的一句谚语。

考虑到为了这点儿钱财而冒险攻城不太值得，查理国王决定让步，于是不疼不痒地开个玩笑说：“卡波尼呀卡波尼，你可真是个铁公鸡。”说完就签了条约，离开佛罗伦萨前往罗马去了。

查理离开两天后，市政厅广场上召开了一次市民议会，多数票通过建立一个最高司法委员会。之后人们又任命了20名选举官取代各个美第奇委员会，并负责选举今后的执政团成员。不论宪法上有什么变动，萨沃纳罗拉的支持者们迫切想让大众知晓，佛罗伦萨的统治权现在属于圣马可修道院的院长，一个教会控制的神权政府即将建立，这个国家实质

上将要依照经文来管理。

萨沃纳罗拉本人对此直言不讳，在12月21日的布道中他宣称：

> 上帝已经把我的船推进了大海，海风吹着我向前。上帝不允许我退缩。昨天晚上我与上帝交谈时说："主啊，请您怜悯我吧，让我回到我的避风港去。"但是主回答说："这不可能。你难道看不出风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吹吗？""我可以布道，但是为什么让我参与佛罗伦萨的政务呢？""如果你要让佛罗伦萨成为一座圣城，你就必须把她建立在坚实的基石之上，并且为她组建一个看重美德的政府。"

萨沃纳罗拉为遵循主的意愿而义无反顾。在布道中，他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指出了前路的方向，而信众们也坚定地追随着他。萨沃纳罗拉手中握着十字架，敦促人们将所有鼓吹美第奇家族复兴的人赶尽杀绝。上帝命他改革这个城市和教会，上帝的意愿一定会实现。斋戒必须延续下去；无论是金质的装饰物和闪闪发亮的手抄本，还是银制的圣杯和烛台，还有珠宝装饰的十字架都必须从修道院中搬走。"受神佑护"的孩子们必须剪短头发，在街上唱着圣歌游行，为穷人收集救济品，并且搜查违禁的胭脂盒和镜子，还有淫秽的画作和邪恶的图书；因为此类"虚荣之心"就是魔鬼诱人向恶的请帖。这些孩子一定要让成人体会到耻辱，这样他们才能抛弃赌桌，走进忏悔室；孩子们还要向当局报告所有违法行为、所有不适当或招摇卖弄的穿着以及那些扔石头的坏孩子。

将来的节庆必须是赞颂上帝荣耀的宗教盛典，所有"虚荣"都要以上帝的名义投入献祭的篝火。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一次被人们深深铭记的庆典中，穿着白袍的孩子们在街上游行，手里举着橄榄树枝和红色的十字架，唱着圣歌翩翩起舞，在奇诺齐（Cinozzi）看来"仿佛是天使降临人间与人类的孩子一起庆祝"。多纳泰罗制作的一座少年耶稣手举荆棘王冠的雕塑被从一座教堂抬到另一座教堂。后来在市政厅对面还搭起了巨大的金字塔形脚手架，底部堆着各种过分华丽的服装、镜子、天鹅绒软帽、假发、面具、扇子、项链、手镯和各种小饰品。在这些东西上面

是一摞摞可能诱发淫秽思想的亵渎神灵的图书和画作；还有棋盘和骰子盒，一副副的纸牌和魔术指南；名媛的半身像和画像；连洛伦佐·迪·克雷迪（Lorenzo di Credi）、波提切利和教士巴尔托罗梅奥（Fra Bartolommeo）这些被改造了的艺术家也把自己以前创作的充满肉欲的画作送来销毁。而在这堆东西的最顶端，是一个威尼斯商人花20000斯库多银币（*scudi* ）订制的雕塑作品，现在它们全都要被扔进火中。堆积如山的物品周围有侍卫把守，执政团从他们宫殿的阳台上看着这些东西被点燃，在合唱团的诵经声、小号声和铃声中熊熊燃烧。

当然也有人反对这种表示虔诚的方式，他们谴责萨沃纳罗拉忠诚的支持者是“跟屁虫”（*masticapaternostri* ）或“伪君子”（*piagnoni* ）。每当萨沃纳罗拉布道时，反对者们会用敲鼓等方式制造“各种噪音”来压过萨沃纳罗拉说话的声音，他们还怂恿淘气的小孩子们向萨沃纳罗拉的追随者扔石头。不过，更多的人还是把萨沃纳罗拉视为伟大的改革家；他们认同他关于重建一个质朴纯洁的世界的梦想，相信人们都会信仰基督，他们也认可奇诺齐关于那时的佛罗伦萨将是个“荣耀之地”的说法；他们像卢卡·兰杜奇一样为自己的孩子能加入那些“受神佑护的孩子的队伍并受到所有改邪归正之人的尊敬”而无比骄傲；他们也像航海家的叔叔乔焦·韦斯普奇（Giorgio Vespucci）和斯特罗齐兄弟一样渴望有一天佛罗伦萨将成为“新的耶路撒冷”。

查理八世一路向南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阻挠。罗马未做抵抗就沦陷了；而费兰特的儿子，国王阿方索二世，受到各种噩梦和预言的惊吓，被因自己的无情和残暴而受到残害的鬼魂追索，甚至听到脚下的石头都在呼喊着：“法国！法国！”他于是选择退位并逃进了西西里岛上的一家修道院。法国军队跨过了那不勒斯的边境，屠杀了圣乔瓦尼山（Monte di San Giovanni）的居民并且放火烧了整个镇子，以此警告反对者。整个王国都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中，如圭恰迪尼所说，法国人作战的方式是“意大利人几个世纪来都不曾见识过的”。那不勒斯人也选择将

查理视为帮助他们脱离阿拉贡家族统治的救星，于是向佛罗伦萨人一样热烈欢迎他的到来。事实上，那不勒斯人的盛情款待和这座城市的美好令查理如此陶醉，以至于将继续进军耶路撒冷的打算完全抛到了脑后。法国国王在自己的新领地乐不思蜀，终日玩乐享受，和无数佳人厮混，甚至还把她们的画像收集起来装订成册。不过当法国国王在那不勒斯的艳阳下玩物丧志时，北方的敌人们则忙着筹划推翻他的大计。

查理的所有敌人中，最积极的莫过于新教皇罗代里戈·博尔贾（Roderigo Borgia），即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他是个秃顶的大胖子，其貌不扬，喜欢奢华炫耀，对女人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富有和权势，更因为他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和充沛的精力，甚至在他的放荡和挥霍中都带着一种孩子气的热切，这为他赢得了无数情妇的钟爱。和众多前任一样，博尔贾也决心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的六个儿子谋取福利。在所有儿子当中，邪恶而迷人的切萨雷·博尔贾（Cesare Borgia）最具才干和野心。教皇意识到要想实现这些野心，就必须先让整个意大利团结起来抵抗外国侵略者。于是他打算建立一个致力于将法国人赶出意大利的联盟，并且自作主张地称其为神圣联盟。

洛多维科·斯福尔扎迫切地想要加入这个联盟。现在他已经为自己唆使法国入侵意大利而产生不良后果感到悔恨，因为奥尔良公爵嫉妒查理八世占领那不勒斯，进而也主张自己对米兰公国的权力。和米兰一样，威尼斯也加入了教皇的神圣联盟，此外还有君主马克西米利安及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国王费迪南德（King of Aragon and Castile，Ferdinand）。尽管法国军队在那不勒斯的驻扎已经受到了威胁，他们却没有立即撤出这座城市。事实上，直到神圣联盟成立7周之后，查理才在留下一支庞大的驻军镇守那不勒斯的前提下，带领军队重新向北行进。

这真是一段漫长的行军过程。5月过去了，6月也过去了，直到进入1495年7月，法国军队竟然还没有翻过亚平宁山脉。因为满载着各种财物，每两个人就需要一头骡子拉的货车。与此同时，神圣联盟已经组建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由面相凶猛、双眼突出的曼图亚侯爵（Marquis of Mantua）弗朗切斯科·贡扎加（Francesco Gonzaga）带领。两支军队越来越靠近，战事一触即发。这次他们可不会像以前文艺复兴风格的战争一样，有什么灵巧地避免对抗一说了。按照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的观察，法国人的入侵彻底终结了以前的雇佣军首领所钟爱的那种拖延、迂回的作战方式。雇佣军首领雅各布·皮奇尼诺（Jacopo Piccinino）就曾经承认，这样拖延作战时间的策略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报酬；为了保护自己人马的安全，他们作战时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退回河边或壕沟的安全地带”；即便是不得不交战之时，他们也是以俘获而不是杀死敌人为目标。当然，把法国入侵以前的意大利战争描绘成一滴血都不流的大行军也未免夸张了些。比如1440年的安吉亚里战役中就有大约900人被杀，而不是如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只有一人丧命”。不过，几千人交火的大战斗中，无一人战死沙场，靠两军将领握手言和就结束战争的情况倒也并不稀奇。意大利军人在需要的时候自会英勇迎战；但是在更多情况下，将领会让他们忙于掠夺财物而不是短兵相接，让他们用长矛赶牛放羊而不是用石弩射击敌人。那一时期的编年史中偶有提及穿着无袖上衣和颜色艳丽的紧身裤，随着鼓乐声行军的步兵，偶尔喊喊支付他们酬劳的王公贵族的名号，与其说是去打仗，不如说是巡游演出。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查理八世的军队。他的士兵训练有素、身经百战，上阵就是为了杀敌。“他们面对敌人时像一堵无法攻破的墙。”最重要的是，如圭恰迪尼所说，

> 他们配备了意大利人见都没见过的先进武器，能让之前所有用于攻击的武器都相形见绌……这种武器就是火炮，它用炮弹而不是石头为弹药，而且口径和威力都是以往的武器不可比拟的。除此之外，这些大炮还都是放在马车上而不是像意大利的传统那样用牛车来拉……它可以以惊人的速度被安置在城墙下并做好开火准备。而且，这种可

怕的武器不仅可以用来攻城，还可以用于战场之上。

1495年7月，法意两军终于在塔罗河（Taro）河岸上正面交锋了。神圣联盟的雇佣兵根本不是查理国王的炮手和骑兵的对手。交战时间短暂，场面残酷，比意大利十三世纪末以来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更野蛮和血腥。意大利一方的伤亡非常惨重。当人数明显占优的法国军队继续向北前进时，落在后面的数以百计的法国随军人员竟然还拿着尖刀和斧头跑到战场上砍杀已经受伤、痛苦尖叫的意大利士兵。不过后来意大利人还是收复了战场，并且拦截了法国人的行李车，收缴了据说是属于查理曼大帝的宝剑和铠甲，还有珠宝、银盘、皇室印玺、一个神圣的十字架、一根神圣的荆棘、一件圣母的背心、一段圣丹尼斯（St Denis）的肢体和一本女子裸体画册——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描绘的……各个城市里面淫乱交媾的素描”。曼图亚侯爵就此宣布战争获胜。到了8月底，查理和他那支虽然疲惫但仍不乏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已经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安全地回到了法国。意大利人才震惊地发现，凭着他们的美德、才干、财富、曾经的辉煌和经验以及所有的军事技能，竟然完全阻挡不了北方军人的无情践踏。

佛罗伦萨人并没有加入这场惨痛的战役。萨沃纳罗拉对自己作为“上帝旨意执行者”的身份坚信不疑，不愿与神圣联盟有半点儿瓜葛。一个多明我会的无名小卒竟然能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这令教皇感到惊讶；而他在布道中支持入侵者以及自称是上帝选定的代言人的说法更让教皇愤怒。于是教皇要求萨沃纳罗拉到罗马来向他做出解释，而萨沃纳罗拉却回复说佛罗伦萨离不开他，他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他远行，最重要的是前往罗马是违背上帝意愿的。自此双方之间通信的言辞越来越激烈，最后教皇直接禁止萨沃纳罗拉继续布道。起初萨沃纳罗拉遵守了教皇的命令，改由他虔诚的门徒，多梅尼科·达·帕夏（Fra Domenico da Pescia）代他登上神坛传教。但是到了1496年2月，萨沃纳罗拉认为教皇的禁令已经失去效力，于是又开始每天在大教堂布道直到4月3日。

教皇用尽所有办法强迫萨沃纳罗拉服从他的命令。他先是下令将本来获许可独立的托斯卡纳地区的多明我会重新收归罗马教廷统治，这样他就有权将萨沃纳罗拉派遣到一个远离佛罗伦萨的修道院去，但是萨沃纳罗拉拒绝承认教皇在这一问题上的管辖权。亚历山大甚至承诺只要他肯放弃布道，就封萨沃纳罗拉为枢机主教，但是萨沃纳罗拉回复说，另一种红帽子才更适合我，即“用鲜血染成的”。

最终，在1497年6月，教皇采取了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将萨沃纳罗拉逐出教会。萨沃纳罗拉花了6个月的时间思考自己的处境，每天斋戒祈祷，直到上帝指引他做出最终的决定——他要违背教皇的命令。在圣诞节这一天，萨沃纳罗拉公开在大教堂主持大弥撒。亚历山大要求执政团要么把“萨沃纳罗拉这个邪恶之子”遣送到罗马，要么将他关押在佛罗伦萨。如果执政团不照办，教皇将下令封锁整个城市。

对此萨沃纳罗拉回复教皇：

> 你根本没有听取我的陈述，我已经不能再把我的信仰寄托于教皇您，而是要把我自己完全地交付给我主，是他决定了弱小也可以挫败强大。我建议教皇您也快为自己的救赎做准备吧。

至于执政团，萨沃纳罗拉认为他们对教皇威胁的反应太温和，给他们的警告也更加严厉。“告诉那些追求伟大和赞颂的人，他们的座位已经准备好了，不过是在地狱里……告诉他们惩罚已经降临，有人已经在地狱为自己准备了位置。”

不过，这次教皇算好了发出威胁的时机。萨沃纳罗拉的支持者们在佛罗伦萨越来越失去根基，而最主要的原因甚至不是政府内部的人员变动。当年托斯卡纳地区的收成很差；到处都是饥民，甚至有人饿死街头，还暴发了瘟疫。萨沃纳罗拉口中的英雄查理国王也没有按他承诺的那样把比萨还给佛罗伦萨，而是将控制权交给了当地的居民，比萨人借机拿起了武器守护自己的独立。随后发生的战争也都是由报酬不高的雇

佣兵打的，自然又是无限期地拖延了下去。因为这些灾难的发生，反对萨沃纳罗拉的声浪越来越高，对他统治的批评也越来越直白。一群斗志昂扬的年轻人还组建了一个被称作“一百五十人政团”（*Compagnacci* ）的组织，成员大多是富人家的孩子。为了示威，他们往大教堂的神坛上抹油，在神坛四周悬挂腐坏的驴皮，还在萨沃纳罗拉布道时把一个笨重的柜子砸到大教堂中殿的石头地板上，把正在听布道的会众吓得四散奔逃。

那也是萨沃纳罗拉最后几次布道之一了。佛罗伦萨考虑到教皇的警告，决定禁止萨沃纳罗拉继续传教。萨沃纳罗拉同意先停止传教，条件是给他机会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打算把3月18日这一天的布道用来为自己正名，在布道中他坚持说自己有权反抗不合法的当权者，还提及自己的预言都已经实现，并谴责教会是一个邪恶的机构，因为他们助长了通奸和恶习。他还说自己不是因为想要传教而传教，而是因为受到了深入骨髓的熊熊火焰的驱使：“我感到整个人都燃烧了起来，而上帝的精神就是这火焰。哦，心中的精神啊！你像风掀起海面的波涛一样，你的经过也会带来风暴。除了服从我别无他法。”

在这最后一次布道之后，方济会教士们——一直挑战声称与上帝存在特殊关系的多明我会——又一次提出让萨沃纳罗拉提供证据证明他受到了上帝的特殊偏爱。方济会教士弗朗切斯科·达·普利亚（Fra Francesco da Puglia）坚称萨沃纳罗拉收到神圣的启示是假的，因为他没有任何证据。为了揭穿萨沃纳罗拉的谎言，他愿意与萨沃纳罗拉一起从火焰中穿行，以证明这个多明我会教士根本没有受到上帝的保护。萨沃纳罗拉拒绝参加这种严酷的考验，辩驳说自己的存在是为了更高贵的工作。不过他同意让自己坚定的支持者多梅尼科·达·帕夏代替自己参加考验。多梅尼科热切地接受了挑战，然而弗朗切斯科则拒绝与萨沃纳罗拉之外的任何人一起挑战，于是他也安排了另一个方济会教士朱利亚诺·隆迪内利（Fra Giuliano Rondinelli）代为参加。

执政团的大多数成员为采用这种过时的野蛮方式而感到惊骇，甚至说祖先要是听到他们竟然还在讨论这种严酷考验的可行性，也会感到羞耻；还有成员提出，看谁能从阿诺河河面走过而不沾湿衣角也是一个“同样能证明真伪的奇迹”。然而，人们此时已经被烈火考验的计划挑起了兴趣，如果取消很可能会让民众失望。最终的决定是，如果多明我会教士多梅尼科死了，那么萨沃纳罗拉要被驱逐出佛罗伦萨；如果方济会教士隆迪内利丧身火海而多梅尼科没有死，则弗朗切斯科·达普利亚要被逐出佛罗伦萨。考验将于1498年4月7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在市政厅广场上进行。届时所有外乡人必须离开佛罗伦萨，街上要设置路障，通往广场的道路也要由带武器的侍卫把守。

佣兵敞廊前面一条30码长、10码宽的走道被布置出来。走道两边堆积着大量浸了油的木柴，中间留下大约3英尺宽的空间让两个教士通过。整个佣兵敞廊被划分成两个区域，供双方的支持者预订位置。

方济会教士们率先进入了场地，并在那里等待多明我会教士们的到来。领头的多明我会教士举了一个十字架，其他人排成两队跟随在十字架后面，一路颂唱着应景的圣歌来到场地。队伍最后面是多梅尼科，他旁边是萨沃纳罗拉。让方济会教士们愤怒的是，这个“被驱逐出教会之人的手中”还拿着圣饼。而当多梅尼科要举着十字架走进火场时，众人更是难掩惊愕之情。最终他被说服不举十字架，但坚持不放下神圣的圣饼。众人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直到一场暴雨倾盆而下，只好宣布当天的考验取消。

人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第二天正好是棕枝主日（Palm Sunday），一伙愤怒的暴徒们攻击了聚集在大教堂准备听萨沃纳罗拉的门徒之一布道的会众。一百五十人政团的成员们手持木棒追打会众，还向他们扔石头，口中还念着各种诅咒。会众们从大教堂里仓皇逃散，纷纷躲进圣马可修道院寻求庇护。虽然萨沃纳罗拉宣扬应当靠祈祷来寻求

主的保护，可是这里的教士们却背着他储备了一些武器以防遭到围攻。一些教士把修道院教堂的塔尖拆下，扔向下面广场上的暴徒；另一些教士则把长矛掷向那些企图点燃修道院外墙的人。在攻击者们翻过修道院的围墙进入唱诗班席位之前，就已经有一些暴徒和修士丧生了。萨沃纳罗拉躲在藏书室中，但是很快就被执政团派来的侍卫们逮捕了。他被押着穿过大街，一路上都有民众对他嘲笑讥讽。最后他被关进了市政厅钟楼上的“小旅馆”里，也就是65年前科西莫·德·美第奇被关押的地方。

萨沃纳罗拉受到了严刑拷打，在吊刑刑具（*strappado* ）的可怕折磨下，承认了所有安在他头上的罪名，可是一旦把他从刑具上放下来，他又会立即改口否认，然后拷问就会从头再来。最后，萨沃纳罗拉、多梅尼科以及另一个他最坚定的门徒西尔韦斯特罗（Fra Silvestro）一起被判定犯下了邪教异端和分裂教会罪并被处以死刑。市政厅广场上搭起了一个脚手架，上面还缠着各种易燃物。萨沃纳罗拉和两个同伴被链子吊在上面烧死了。初夏的天空下，火焰熊熊燃烧，有人大声喊道：“哦，先知啊，现在正是需要奇迹的时候！先知啊，救救你自己吧！”

“几个小时之内，几个受刑之人就被燃烧殆尽了，他们的胳膊和腿渐渐开始掉落到地上。”兰杜奇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 受刑者身体的一部分还被链子吊着，于是人们不断朝尸体扔石头，想让尸体掉进火里，因为他们担心会有人想要保存他们的遗骸。最后行刑人不得不砍断吊杆才让尸体都掉到地上，人们又往火堆里加了很多柴草并不停搅动，直到尸体彻底化为灰烬。然后有人在执权杖者的陪同下用马车把最后剩下的骨灰全部拉走并投进维奇奥桥附近的阿诺河中，这样就没有人能找到他们的遗骸了。

第十六章 美第奇的回归

“已经拿下普拉托，虽然难免出现一些伤亡”

万贯家财已经散尽，宫殿和别墅也都被没收，现在的美第奇家族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部落一样在欧洲四处游荡。皮耶罗还留在意大利，靠偶尔当掉一块宝石或浮雕度日。他为共和国的敌人效力，还加入了切萨雷·博尔贾的阵营，不断尝试通过武力重返佛罗伦萨执政。切萨雷·博尔贾在罗马涅建立了一个王国，他认为帮助美第奇重返佛罗伦萨能为自己创造一个有价值的盟友。皮耶罗真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人马抵达了罗马娜门，却发现佛罗伦萨人完全不支持他的回归和重新当政，于是只好带着队伍奔向锡耶纳。最后他决定为法国国王效力，以换取一些含糊的关于支持他重返佛罗伦萨的承诺。

此时查理八世已经去世，死因是他的头重重地撞到了昂布瓦斯（Amboise）城堡中的房梁；不过继任者路易十二（Louis Ⅻ）重申了他的家族对那不勒斯王位的权力，并且以他的祖父娶了瓦伦蒂娜·维斯孔蒂为理由，宣称对米兰公国也享有权利。不过这两项主张都受到了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的强烈质疑。虽然在1500年的时候，费迪南德和路易达成了共享那不勒斯的协议，但是双方在利益分割上总是争吵不休，很快就重新开战了。

1503年12月，英勇善战的西班牙将领贡萨尔沃·德·科尔多瓦（Gonsalvo de Cordoba）率军大败法军。当时皮耶罗·德·美第奇也在法国军队中，在试图穿过加里利亚诺河（Garigliano）逃往加埃塔的时候，船不幸倾覆，他本人淹死在了河水中。后来他的尸体后被寻回，埋葬在了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上的修道院里。[1] 皮耶罗有两个孩子，女儿叫克拉丽切，儿子叫洛伦佐，当时11岁。他们的叔叔乔瓦尼，

一位公认的杰出人物，则在皮耶罗死后成了这个家族的领袖。

乔瓦尼于1475年12月11日出生在美第奇宫，此时是28岁。他年幼时，父母就对他寄予厚望。在他出生前一晚，母亲做了一个十分奇怪且异常生动的梦。她看见自己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在大教堂里分娩，可是生出来的却不是一个人类婴儿，而是一头巨大的狮子。

洛伦佐受到这个梦境的鼓舞，认为让儿子成为教会的王子会让美第奇家族受益匪浅，于是决心为儿子铺设一条神职之路。在这个孩子刚刚显示出足以在教会立足的才能时，里昂分行就接到了密切关注神职空缺的命令，因为在法国获得神职要比在意大利容易一些。乔瓦尼很早就接受了神职。他8岁的时候就受了削发礼，在法国国王的引荐下加入了丰杜斯修道院（abbey of Fontdouce），后来法国国王还想任命他为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Aix）大主教，却发现那里的大主教仍然在世。为了补偿乔瓦尼的失望，法国国王又任命他为沙特尔（Chartres）附近的圣热梅修道院（Saint-Gemme）院长及托斯卡纳地区所有大教堂的教士会成员，此外还有包括帕西尼亚诺修道院（Passignano）院长和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在内的二十多个受人尊敬且报酬不菲的职务。在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去世后，乔瓦尼·巴蒂斯塔·奇博（Giovanni Battista Cibo）被选举为英诺森八世，于是又有更高的职位出现了空缺。为了避免教皇在满足自己的愿望之前就去世，洛伦佐尽其所能地说服他尽早封乔瓦尼为枢机主教。在教皇的儿子弗兰切斯凯托·奇博娶了自己的女儿马达莱娜之后，洛伦佐更是指示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要不失一切时机地敦促教皇满足乔瓦尼的要求。洛伦佐还受到另外两位枢机主教切萨雷·博尔贾和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Ascanio Sforza）的帮助，他们两人在教廷里都有巨大的影响力；除此之外，他不断地给教皇写私人信件，提醒他那是“自己最大的愿望”。到1489年3月，英诺森终于让步了，但是附加了两个条件：升职之后乔瓦尼必须离开佛罗伦萨去比萨学习教会法，以及他升职之事要先保密，3年之后才可以公布。洛伦佐对第一项要求没有

任何意见，但是对于第二项却一直非常担心，他怕一旦英诺森在3年保密期满之前去世，继任的教皇有可能会宣布这个不合常规的任命无效，所以他试图将儿子升职立即公布于众，但是一直没能成功。虽然老教皇的健康状况一月不如一月，但就是不肯撒手而去。洛伦佐后来也承认自己没有一天不担心会收到教皇离世的可怕消息。英诺森是在1492年7月25日去世的，不过在他去世之前洛伦佐的野心就已经得到了满足。1492年3月，也就是教皇去世前3个月和洛伦佐去世前3个星期的时候，乔瓦尼在菲耶索莱古老的巴迪亚教堂接受了正式的任命，教廷的简短公告也被正式宣读。

乔瓦尼穿着斗篷，戴着红色帽子和蓝宝石戒指走进教堂。这个16岁少年的外表其实并不讨人喜欢。虽然他个子不矮，看起来和蔼聪慧，但是脸色灰白、皮肤松弛、极度肥胖，而且视力也明显衰退了。他的鼻子短而上翘，嘴也总是半张着。不过外貌并不代表本质，乔瓦尼所有的老师都认可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性情也称得上乐观慷慨。不过他们也都发现他非常懒散，好吃嗜酒，贪图享乐。他在罗马时放任自己沉迷于这些嗜好，毫无节制。他的一个教师说："他早上不肯起床，晚上又不肯按时就寝，我对此非常担忧，这样不规律的生活习惯恐怕会影响他的健康。"

父亲非常清楚儿子的这些缺点，于是决定给儿子写一封长信，试图说服他选择一种更符合其高贵地位的生活方式：

> 我想提醒你的第一件事是，你要对上帝心怀感激，永远记住今日的荣耀不是缘于你自己的美德或才干，而是靠着上帝的恩惠。你应当通过选择神圣、模范、洁净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你的感激……让我欣慰的是，在过去几年中，虽然没有人要求你，你也能经常自觉自愿地去忏悔和参加圣餐礼。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坚持这样做更能让你继续保有上帝的恩赐了。我也十分清楚，在罗马那样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里生活，会让你觉得遵循我的建议很难，因为那里会有很多人想要让你堕落或怂恿你沾染恶习，你年纪轻轻就被提升为枢机主教这件事更是会激起别人的嫉妒……因此，你必须更加坚定地抵制这些诱惑……同

> 时，你还一定要避免被冠以虚伪的名声，对话中既不要假装节俭朴素也不要过分严厉。等你年长一些的时候就会更明白这些道理了……你很清楚用你的表现为别人树立一个枢机主教中的榜样有多么重要。如果所有枢机主教都能尽忠职守，这个世界肯定会比现在美好得多，因为如果枢机主教都变好了，就能选出一个好的教皇，那么世界也会宁静得多……
>
> 你不仅是如今罗马教廷中最年轻的枢机主教，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枢机主教。因此，当你与其他枢机主教集聚一堂时，你一定要表现得最恭顺、最谦逊……生活要尽量有规律……丝绸和珠宝并不适合你这种地位的人，收藏古董和精美的书籍是更好的选择。你住的地方也没必要太豪华，但是要井井有条、满室书香。邀请别人来你家的次数要比你接受别人邀请的次数多，但是也不要太过频繁。三餐应当简朴，还要勤于锻炼身体……对别人不要毫无保留地倾诉过多。最重要的一条，也是我要求你一定遵守的一条：早晨要早起！这不仅是为了身体健康，也是为了让你有时间安排和推进一天的工作……
>
> 关于你在枢机主教会议上的发言，我觉得毕竟你还年轻，现在对你有利的方法就是把提交给你的任何东西都先送给教皇过目，因为你还没有经验。你会发现有人为各种小事请你到教皇面前说情，起初要尽量避免这种事情，不要为了不值当的事情让教皇费心。因为越是不去打扰他，反而越会受到他的关注，这是教皇的本性……别了！

洛伦佐称罗马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并不过分。据估计，在这个人口不足50000的城市里，妓女的人数竟接近7000。她们大部分是在教廷机构许可经营的妓院里接客。本韦努托·杰利尼（Benvenuto Cellini）称妓女们多数染有梅毒这种“在教士之中极为常见的疾病”，他本人也不例外。在罗马，罪犯的人数差不多和妓女一样多。他们大多靠贿赂来避免刑罚。据称当时平均每天发生14起谋杀；被绞死的犯人的尸体要吊在圣安杰洛城堡的护城墙外，散发出腐败的恶臭，从城墙下面的桥上走过都变成了一件可怕的事。即便如此，很多杀人犯就算被抓住了也会很快放出来。枢机主教中最富有的罗代里戈·博尔贾在被问到为什么这么多作恶之人都逃脱了绞刑时回答说：“上帝并不想要罪人的性命，而是希望他们付出代价后继续活着。”在英诺森八世去世后，这位罗代里戈·博尔贾正是通过向自己的竞争者和潜在支持者大方地赠送各种礼物来确保自

己成为亚历山大六世的。人们确信有5头驴拉着载满黄金的货车进入了另一位枢机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的后院——不论是从富有程度还是影响力上，他都是最有可能击败罗代里戈·博尔贾的人。

年轻的枢机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早年在罗马生活得春风得意；但是当佛罗伦萨政府为他的人头定了价钱之后，他意识到暂时离开意大利才是明智的。于是，在获得许可他到阿尔卑斯山外游历之后，乔瓦尼就启程经威尼斯前往巴伐利亚了，陪同他的还有堂弟朱利奥，朱利奥当时在比萨大学读书。他们又从巴伐利亚去了布鲁塞尔，然后前往佛兰德斯海岸并打算乘船去英格兰。不过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骑马向南去了鲁昂（Rouen），然后又到了马赛并由此乘船前往热那亚，住在了乔瓦尼的姐姐马达莱娜家中。最后他们从热那亚回到罗马，此时亚历山大六世本人与佛罗伦萨的关系已经恶化了，所以依然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乔瓦尼等人在城中的一座宫殿里安顿了下来，虽然他的财富已经大不如前，但乔瓦尼还是决心享受生活。他的身边终日围绕着慷慨的朋友和络绎不绝的宾客。除了堂弟朱利奥，跟他们一起住在宫殿里的还有一位贝纳尔多·多维齐·达·比别纳（Bernardo Dovizi da Bibbiena）。他是皮耶罗·多维齐的哥哥，一个精明、幽默且诡计多端的人。贝纳尔多·多维齐·达·比别纳比乔瓦尼大五岁，曾经是他的家庭教师，很快又成了他的秘书。经常出现在这里的还有乔瓦尼的弟弟朱利亚诺，一个友善有礼的年轻人，表面上有些软弱无能，但未必没有丝毫野心。他的乐观性格使他深得乌尔比诺公爵和曼图亚侯爵家族的喜爱，他们也是朱利亚诺被流放期间的收留者。另一个常客是教皇最宠爱的外甥枢机主教加莱奥托·弗兰乔托（Galeotto Franciotto）。起初乔瓦尼出于自私的考虑才去培养与加莱奥托的友谊，但是后来他越来越喜欢这位朋友，在加莱奥托不幸早逝之后，乔瓦尼几乎一提起他就忍不住热泪盈眶。

有了弗兰乔托和多维齐做他的左膀右臂，还有朱利亚诺和朱利奥，

以及他一直努力讨好的众多枢机主教和无数来自佛罗伦萨的访客，再加上仍然对美第奇这个名字崇拜不已的无数艺术家们，乔瓦尼慷慨奢华地款待他们，所以他总是欠着一屁股债。客人们都习惯了他那些珍贵银器的反复消失和重现，它们如果不是在乔瓦尼的餐厅里，就肯定是在哪家罗马当铺里。

乔瓦尼会与宾客把酒言欢直至深夜；也会在上午与艺术家谈论他感兴趣的艺术作品；还会把整个下午都用于在坎帕尼亚平原上放鹰打猎——这项活动并不符合枢机主教的身份，乔瓦尼于是找借口说对于身材肥胖的人而言，打猎是必不可少的锻炼。这样的生活虽然享受，但是乔瓦尼显然还不满足。他那双目光黯淡、视力微弱的眼睛似乎在时刻瞟向刚刚当选的新教皇，关注着他那清瘦、留着胡子、烦躁不安的身影。

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Ⅱ）在1503年11月当选教皇。此前，年迈的庇护三世（Pius Ⅲ）在接替亚历山大六世之后，只当了26天教皇就去世了。尤利乌斯是一个渔民的孙子。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粗犷健谈，但是脾气暴躁，还染上了梅毒。他总喜欢提及自己贫困的童年时期跟着船在利古里亚海（Ligurian）沿岸运送洋葱的经历；他还喜欢谈论自己在学问上的无知以及对军旅生活的向往。当被问及该为米开朗琪罗给他创作的雕像选取什么象征物时，他回答说“我不是学究，我可不要举着一本书，我手里要有一把宝剑。”

尤利乌斯非常喜欢剑。当选教皇不久，他就强令24名极不情愿的枢机主教随他一起前往佩鲁贾和博洛尼亚镇压叛乱，发誓要让它们重归教会的领导。佩鲁贾的统治者吉安-保罗·巴廖尼（Gian-Paolo Baglioni）听到教皇亲临的消息时就已经吓得浑身发抖，不但直接投降交出了整座城，还跪在教皇面前请求宽恕。教皇原谅了他，但是还不忘补充一句：“再敢造反我就吊死你。”随后，没给枢机主教们一点儿休息时间，教皇又率队穿过罗马涅的沼泽地向博洛尼亚前进。乔瓦尼·本蒂沃利奥

已经弃城而逃了。教皇的队伍于1506年11月11日抵达，所有人都因为精疲力竭而格外暴躁，手上和脸上也满是被蚊子叮咬的大包。

在为教会成功收复了佩鲁贾和博洛尼亚之后，尤利乌斯又下定决心要收复被威尼斯夺走的里米尼、法恩扎（Faenza）和拉韦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皇成立了康布雷联盟（League of Cambrai），不仅将法国国王路易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拉拢进来，连打算分享部分威尼斯控制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也成了盟友。对于威尼斯的军队而言，这样的联盟太过强大，1509年5月14日，他们在克里莫纳附近的阿尼亚德洛（Agnadello）被彻底击败。教皇虽然成功地扩大了教会的控制区域，但是也给外国势力在伦巴第扎下根基创造了机会。他决心要把它们赶走，反复宣称“我绝不允许这些野蛮人控制意大利”。他号召整个意大利团结起来把外国势力赶出阿尔卑斯山，第一个目标就是法国人。他骑着马把法国驻军赶出米兰多拉时说：“让我们看看到底谁更有胆识，是法国国王还是我。”在他坚定自信的感召下，他的军队占领了米兰多拉，他顺着木梯爬上了已经破败的城墙。不过这之后的几个月里，他的军队再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的大胜，因为包括佛罗伦萨在内的大多数意大利邦国都不太愿意响应他的号召。

法国一直是佛罗伦萨的传统盟友。虽然查理八世在位时两国的友谊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法国人挑拨的佛罗伦萨与比萨之间的战争此时已经结束。当靠山威尼斯在阿尼亚德洛战败之后，比萨人就不得不向佛罗伦萨求和了。所以此时，佛罗伦萨人宣布中立。虽然教皇生气地称其为“一个不好的榜样”，但是其他意大利邦国却认为效仿佛罗伦萨的选择是明智的。尤利乌斯号召意大利人加入抗击法国的行动不成，只好转而联合已经牢牢掌控了那不勒斯的西班牙。这次教皇和西班牙人建立了一个新的神圣联盟，并率领军队一路向北到博洛尼亚，这里曾在法国的帮助下被费拉拉的阿方索·德·埃斯特（Alfonso d’Este）公爵占领，现在又被本蒂沃利奥家族夺了回去。尤利乌斯宣布一旦教会重新夺回博洛尼

亚，将任命枢机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为该地区的教皇使节。乔瓦尼对艰苦的行军毫无怨言让尤利乌斯印象深刻，后者不但将阿马尔菲的教会统治区封赏给他，还许诺了今后的晋升。在佛罗伦萨，执政团听到乔瓦尼的节节高升时感到非常担忧。

然而，神圣联盟的军事行动并不怎么成功。他们不但没有拿下博洛尼亚，还在1512年的复活节这一天，在去夺取拉韦纳的路上被阻拦在了龙科（Ronco）河岸。两军随即展开了残酷的战斗。法国和西班牙的火炮一刻不停地向对方保持着阵形的重骑兵们投掷炮弹。双方的伤亡都非常惨重，在此前的欧洲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次战争像这次一样，在战场上留下如此多的尸体。据说神圣联盟有一万名士兵丧生，而法国军队的死亡人数也与此相近。

枢机主教乔瓦尼在战斗开始前骑着白色驯马随着西班牙军队一路行进，勉励他们奋勇杀敌，并向上帝祈祷胜利。他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为将死的士兵提供最后的安慰，却不幸被俘。他被押送到了博洛尼亚，平民们看到他穿着红袍子的肥硕身体和流苏宽边帽下布满汗水的脸时都嘲笑他，但是本蒂沃利奥却对他非常友善。他被送到摩德纳（Modena）时也受到了善待，比安卡·兰戈内（Bianca Rangone）还卖掉了自己的珠宝来为他换取食物和衣服。最终他被送到了米兰，枢机主教费代里戈·圣塞韦里诺（Federigo Sanseverino）为他提供了舒适的住宿。

乔瓦尼当时确信法国人在拉韦纳之外获得了不可否认的胜利，并迫使受到重创的神圣联盟军队撤退。佛罗伦萨人也是这么以为的，他们还点燃了巨大的篝火庆祝教皇战败，就如他们曾经庆祝威尼斯人在阿尼亚德洛的溃败一样。不过事实证明，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斗，所谓的胜者也没有占到丝毫的便宜。在战斗进入尾声时，法国军队年轻有为的将领加斯东·德·富瓦（Gaston de Foix）被一颗流弹击中摔下马来，满身鲜血，脑浆迸裂，还被西班牙步兵补了几刀。不仅如此，此时法国本身也

面临着英国和西班牙入侵的双重威胁，一支人数众多的瑞士军队抓住时机，趁乱夺去了本由法国人占领的一些地区。法军补给不足，只好从拉韦纳和博洛尼亚撤出，后来连米兰也放弃了，最终完全撤出了伦巴第。

枢机主教乔瓦尼这个重要的人质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走的，所以法国人强迫他随他们一起离开。不过他在到达阿尔卑斯山之前就已经决心逃跑了。撤退到波河（Po）岸边的一个小村庄时，乔瓦尼用装病的办法让一个陪同他的教士躲过法国侍卫的看守，拉拢了两个当地地主帮助他逃脱。第二天早上当枢机主教正要踏上法军停在河边的驳船时，一支由这两个地主田里的农民组成的武装小队突然从芦苇丛中蹿了出来，一番混乱之后，他们成功地将枢机主教掳走了。以乔瓦尼的身材，他显然无法扮成士兵，只好藏在地主亲戚的城堡后院的鸽房里，后来转移到戈迪亚斯科（Godiasco），再后来又到了曼图亚。此时他意识到，没有了法国人，依靠神圣联盟的军队强行改造佛罗伦萨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来曼图亚，为的就是确保改革后的政府形式能如他所愿。

自从萨沃纳罗拉被行刑之后，佛罗伦萨已经不再被视为一个重要的邦国，也一直没能恢复伟大的洛伦佐当政的黄金时期所拥有的活力和愉悦。一连串的金融危机使得多个行业协会接近崩溃。因为狡诈的雇佣军首领们出工不出力，和比萨耗时耗力的狼狈之战更是榨干了执政团的所有资源。法国国王在托斯卡纳地区的代表罗贝尔·德·巴尔扎克·昂特赖格（Robert de Balzac Entragues）已经把萨尔扎纳卖给了热那亚，把彼得拉桑塔卖给了卢卡。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这种惨淡的气氛也体现在波提切利晚期的绘画作品中。他此时已经过早得衰老了，腿脚也不好，“没有拐杖就无法站直或走动”。[2]

萨沃纳罗拉去世4年之后，人们试图通过任命一位终身首席执政官来强化城市政府的统治力。当选者是皮耶罗·索代里尼（Piero Soderini），诚信、勤劳但没有什么行政才干，但凡重大事件他都要咨

询另一位小官员的意见，这个人就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他的名气已经完全盖过了索代里尼。

马基雅维利身材瘦削、举止优雅、面色苍白，稀疏的黑发梳向脑后，露出骨骼凸出的高耸额头。在他仅有的一幅留存下来的画像中，他用一种含着愉悦、质疑和嘲讽的眼神回应着观者的注视。马基雅维利出身于托斯卡纳地区一个古老的家族，他的父亲是个律师。萨沃纳罗拉被处决后，30岁的马基雅维利就担任了他此时担任的政府职务。他一直鄙视萨沃纳罗拉的理念和管理方式，他最主要的关切之一就是战争，马基雅维利如他之前的莱昂纳多·布鲁尼一样，坚决主张抛弃雇佣军队为共和国打仗的传统，认为共和国必须组建自己的民兵。在过去的经历中，雇佣军首领经常被发现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时他们不肯与其他受雇的军队合作；有时他们不肯与和自己有友好条约的雇佣军开战；有时他们同时接受交战双方的雇佣；最主要的是，他们永远不会拿自己和手下的生命冒险，因此总是贻误战机、浪费雇主的钱财。索代里尼同意将组建民兵的计划提交给执政团审议并委任马基雅维利负责组织。马基雅维利对这一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情，到1506年2月，他第一批招募的士兵在市政厅广场上举行了一次阅兵仪式。兰杜奇对这一情景的记录如下：

> 大部分应征的士兵都是来自偏远乡村的农民。每个人都穿戴着白色的背心、红白相间的长袜、白色的帽子和鞋，还穿着铁质的胸甲。大部分人手里拿着长矛，有一些举着火绳钩枪。他们虽然是士兵，但可以住在自己家里，只在需要的时候才会集结起来。以后城外乡村里的人都应当如此装备，这样我们就不需要雇用外国人来为我们打仗了。这也被视为为佛罗伦萨做出的最好安排。

兰杜奇对民兵的信心并未因为神圣联盟中西班牙军队的逼近而动摇。在雷蒙德·德·卡多纳（Raymond de Cardona）的率领下，西班牙军队已经从博洛尼亚出发向佛罗伦萨边境进发。西班牙人反复要求佛罗伦萨改组政府，他们的队伍已经抵达巴贝里诺（Barberino）并向坎比

（Campi）发起了进攻，把当地的农民吓得纷纷从山上逃进城里避难。即便如此，在兰杜奇看来，也是在其他所有“有智慧的人”看来，佛罗伦萨“没什么可担忧的，相反倒是我们的敌人应该感到恐惧，因为一旦进入平原地区，他们的气数就要尽了。大批的民兵部队已经动员起来，我们的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迎接敌人的准备”。

马基雅维利一直忙着组织穆杰洛的防御，他对当前形势有一个更客观的判断，然而佛罗伦萨城中的索代里尼则和兰杜奇一样自信满满。他已经拥有九千人的民兵武装，他知道西班牙军队的人数远不及这个数目。尽管佛罗伦萨城内的美第奇一派趁着西班牙军队的逼近又有复苏壮大之势，但是索代里尼相信他们想要在佛罗伦萨搞革命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

卡多纳本人并不确定，如果神圣联盟不提供协助的话，他的军队是否足够强大到可以攻陷佛罗伦萨。他本来就不愿意进军托斯卡纳。教皇的侄子，脾气火爆的乌尔比诺公爵也不认同这次远征。但是枢机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非常坚持。当乌尔比诺公爵拒绝为卡多纳提供军火时，乔瓦尼自掏腰包购置了两门火炮。当卡多纳抱怨补给不足时，也是乔瓦尼出钱为他补足。当佛罗伦萨的代表团带着合理的停战条约来与卡多纳谈判时，也是乔瓦尼坚持拒绝了一切不以恢复美第奇家族地位为前提的和谈。枢机主教让一个农民把秘密的信函藏在圣玛丽亚诺韦拉墓地的围墙里，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与佛罗伦萨城中美第奇的同情者们取得了联系。枢机主教的堂弟朱利奥还在一座乡村别墅里秘密安排了与安东弗朗切斯科·德利·阿尔比奇（Antonfrancesco degli Albizzi）的会面，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美第奇支持者之一。他向朱利奥保证，虽然索代里尼摆出了一副抗争到底的面孔，但是他的支持者们一听到西班牙火炮的轰鸣就会崩溃。

面临着枢机主教让他交出佛罗伦萨的要求，索代里尼下令逮捕城中

所有已知的美第奇支持者；然后又在市政厅广场上向所有集会的市民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讲。在他的讲话中，索代里尼严正地警告市民，提醒他们允许美第奇家族重回佛罗伦萨的危险。还说虽然美第奇家族自称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回归，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根本不可能只满足于普通市民，他们一定会重新恢复独裁者的地位。索代里尼还说，伟大的洛伦佐从来没有炫耀过自己的权势，而是以个体平等的名义掩饰其本质，而他的儿子却不再掩饰；现在由枢机主教代表的年幼的洛伦佐，也就是伟大的洛伦佐的孙子，更是不会记得任何家族的优良传统。“因此，你们才有权决定我是应当辞去公职（你们要求的话，我会高兴地照办），还是继续执政带领你们顽强地保卫国家。”民众大声地表达了对索代里尼的支持，重整旗鼓又投入到保卫佛罗伦萨的战斗中。

马基雅维利的民兵镇守在城市的各个据点，而西班牙的士兵则逼近了佛罗伦萨西北仅12英里外的普拉托的大门，饥饿的士兵们还被告知城里有充足的食物。20年前乔瓦尼来普拉托的时候，人们为了欢迎他修建了一个凯旋门，但是那个拱门坍塌了，还砸死了两个为了向他致敬而打扮成天使的小孩儿。人们至今没有忘却这一悲剧，此时枢机主教再次到来，难怪站在土褐色破损城墙下的老者预言有更多可怕的事将要发生。

很快，城墙就被卡多纳的火炮炸出了一个洞。据雅各布·纳尔迪（Jacopo Nardi）的记录，其实那个洞口还没有一扇窗户大。城墙后面还有修道院的高墙，高墙后面还站着长枪兵和弓箭手，他们完全可以把洞口堵严实。但实际上一看到西班牙步兵接近，这些人“全都四散奔逃，甚至连武器都丢在地上，好像敌人已经跳到了他们的背上”。圭恰迪尼的记录里也提到：

> 西班牙人看到当地的民兵和毫无经验的市民竟然如此胆怯懦弱，缺乏作战技巧，都感到无比惊讶。他们几乎没受到任何阻挡就轻易攻破了城墙，然后迅速穿过了城镇，所有人都放弃了抵抗，只知道哀号和逃窜，而他们的敌人则尽情地施暴、抢掠和杀戮。吓破胆的佛罗伦萨士兵都扔掉了武器向胜利者投降。

整整两天的时间里，西班牙人在城中无恶不作，强暴妇女，在圣坛上杀死教士，洗劫教堂，焚烧或强行闯入修道院，对里面的人施加酷刑来逼迫他们说出装有宝物的箱子藏在何处。即使这些人说了实话，他们依然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他们的尸体还会被扒光衣服扔进已经填满了被砍下的四肢的臭水沟或水井。“没有什么能躲过入侵者的贪婪、淫欲和冷酷无情。要不是枢机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派人把守着主教堂，躲在里面的女人也难逃被玷污的命运。超过两千名男性丧生，而且都不是在战斗中牺牲（因为根本没有人奋起反抗），而是在哭喊逃命时被杀死的。”

然而，枢机主教对后来被马基雅维利形容为“惨绝人寰、令人震惊”的景象并不知情，也没能阻止其发生。1512年8月29日，他在给教皇写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

> 今日下午4点我军已经拿下普拉托，虽然难免出现一些伤亡……如此迅速决绝地占领普拉托虽然让我心痛，但至少可以给其他人一个警示和震慑。

这个警示和震慑显然非常有效。普拉托沦陷的消息还没有传到佛罗伦萨，就已经有一群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来到市政厅要求索代里尼辞职，索代里尼也已经做好了辞职准备，而且觉得在还能脱身的时候离开也不错。于是在派遣马基雅维利去为自己谈妥一条安全通路之后，他就在护送之下离开了佛罗伦萨并前往被流放之地达尔马提亚海岸。

后来佛罗伦萨人被迫同意了美第奇家族的回归，还要加入神圣联盟并选举一名新的首席执政官。民兵制度也被废止了。在清洗索代里尼旧部的过程中，马基雅维利的职位被一个美第奇取代了，其实他本来是欢迎美第奇回归的。他想继续为美第奇家族工作的机会很快被拒绝了。最后马基雅维利离开了佛罗伦萨回到位于佩库西纳（Percussina）的圣安德烈亚（Sant’Andrea）的乡村宅邸，并在第二年写出了《君主论》（*The Prince* ）。

[1] 卡西诺山大教堂里的皮耶罗·迪·洛伦佐·德·美第奇之墓是由安东尼奥·达·圣加洛和弗朗切斯科·达·圣加洛（Antonio andFancesco da Sangallo）兄弟共同设计的。位置是在老教堂的唱诗班席位。

[2] 波提切利特别提到过《流浪的女人》（*Derelitta*，现存于罗马的帕拉维奇尼收藏）、《弗吉尼亚的故事》（*Story of Virginia*，现存于贝尔加莫的卡拉拉学院画廊）和《卢克雷齐娅的悲剧》（*The Tragedy of Lucrezia*，现存于波士顿的伊莎贝拉嘉纳艺术博物馆）中的佛罗伦萨悲剧。后两幅可能是为韦斯普奇家族创作的，他们当时住在赛尔维街。

第十七章 教皇莱昂内！

“既然上帝让我成为教皇，那我们就好好享受吧！”

1512年9月1日，也就是索代里尼离开佛罗伦萨的这一天，枢机主教乔瓦尼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进入了佛罗伦萨。他剃掉了流放期间蓄起的络腮胡，穿了一件不太起眼的长袍，也没有带任何侍从，一个人走在佛罗伦萨的街道上。工人们已经开始忙着撤下城市建筑上替代美第奇纹饰的深红色十字架，在拉尔加街围观者的欢呼声中，泥瓦匠们正忙着修复美第奇家族宫殿上的家族纹饰。不过朱利亚诺并没有回美第奇宫，而是去拜访了安东弗朗切斯科·德利·阿尔比奇。他似乎非常想通过自己简朴低调的行为举止向别人证明他只想做一名佛罗伦萨的普通市民，对管理政府毫无兴趣。

不过，这样的态度和他哥哥的计划恰恰相反。枢机主教历尽艰辛、费尽周章，可不只是为了给美第奇找个家。他本人进入佛罗伦萨的时候，有1500名士兵随行，而且摆足了与他职务相称的排场，大张旗鼓地回到了原本的家族宫殿，他表现出来的气势足以说明他是以统治这座城市为目的而回到这里的。

起初，他似乎满足于让共和国的政府机构在表面上维持原貌。不过盛大的入城仪式结束两天后，有人在市政厅广场上组织了一场示威，参与者们大喊着“小球！小球！小球！”，并要求召开市民议会。示威者的要求被采纳，执政团召集了市民议会，所有权力被移交给由40人组成的最高司法委员会，而且几乎所有当选的都是美第奇一派的成员。

毫无疑问，佛罗伦萨人现在有了一位新主人，但是枢机主教乔瓦尼似乎已经准备好向大家保证他不会严苛地统治，也不会征收沉重的苛捐

杂税。他的个人标识——一个牛轭——的意思显而易见，但标识下面却刻着：“因为我的轭很松”（*Jugum enim meum suave est* ）。事实上，从一开始，枢机主教就在小心地说服佛罗伦萨人，美第奇家族的回归是要带领他们重新过上洛伦佐统治时期的美好生活，而不是萨沃纳罗拉执政时那种苦闷的日子。现在，娱乐活动和宗教节日都受到鼓励；那些洛伦佐喜爱却被萨沃纳罗拉禁止的节日颂歌又重新响彻街头巷尾。而留在城里的枢机主教的弟弟、和蔼可亲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则似乎是一种保证，证明这个政府是善解民意、仁慈高尚的。

在美第奇家族重掌佛罗伦萨大权不足六个月后，枢机主教得到通知说他的恩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病危了。此时年仅37岁的乔瓦尼自己也在病中，但是为了出席教皇选举大会，他让仆人用轿子抬着他去罗马。

旅途让乔瓦尼精疲力竭，更不用提胃溃疡的剧痛和肛瘘带来的麻烦了。1513年6月，他终于到达了罗马。哭泣的妇女们亲吻教皇从太平间的格子窗露出的脚。枢机主教乔瓦尼已经错过了教皇选举大会的开幕仪式和圣灵弥撒。由于圣彼得大教堂正在改建中，所以弥撒是在圣安德鲁小教堂（St Andrew）里举行的，从墙壁裂缝里进来的风总是把圣坛上的蜡烛吹灭。起初几天，乔瓦尼病得太重根本无法起床，闷闷不乐地接受痛苦的治疗。而此时，其他的枢机主教们已经开始分化成各个小团体，不断地争论和密谋。争论持续了一周还没有结果，为了迫使他们尽快做出决定，会议改为每天只给枢机主教们提供一顿引不起食欲的饭食，再加上依照惯例门窗封闭的房间里挥散不去的骚臭气味，新教皇的人选果然马上就出炉了。

在讨论初期，并没什么人提起枢机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的名字。不过随着讨论深入，所有人都承认他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教皇人选（*papabile* ）。乔瓦尼和善可亲、广受爱戴、圆滑机智、善于交际又平易近人。他虽然相对年轻，但已经做了20多年的枢机主教，所以绝不缺

乏经验。他也很恪守宗教职责，每周还会斋戒两次。显然在家族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会毫不留情地反击，不过哪个教皇不是这样呢？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好，就算事实证明选举他为教皇是个错误，他在位的时间恐怕也不会很长。来自主要统治者家族的年轻一些的枢机主教们，比如费拉拉的伊波利托·德·埃斯特（Ippolito d’Este）、曼图亚的吉西蒙多·贡扎加（Ghismondo Gonzaga）和锡耶纳的阿方索·彼得鲁齐（Alfonso Petrucci）都迫切想要选举一位和他们一样出身的教皇，他们可不希望再有一位像尤利乌斯二世那样的乡野村夫带着他们来一趟疲惫不堪的行军。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索代里尼（Francesco Soderini），也就是皮耶罗·索代里尼的弟弟当然反对乔瓦尼当选。不过乔瓦尼的秘书贝纳尔多·多维齐向枢机主教索代里尼提起，枢机主教美第奇的侄子洛伦佐或许可以迎娶索代里尼家的某位小姐，由此渐渐说服他支持乔瓦尼。于是在3月11日这一天，枢机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作为高级执事亲自负责计算投在骨灰瓮里的选票，这也让他有机会亲自宣布自己的当选。然后，他谦逊地宣布如果教会同意他的选择，他希望称自己为莱奥十世（Leo X）。

美第奇当选教皇的消息传到佛罗伦萨，让所有被称为“帕莱斯奇”（*Palleschi* ）的美第奇支持者都欣喜若狂。狂欢持续了整整四天。到处都是铃铛声、烟花爆竹的爆炸声、城市外围远山上传来的隆隆炮声，熊熊燃烧的篝火里添加的柴火都是之前萨沃纳罗拉的支持者们的家具，不时还会有喝醉的人们大喊：“小球！小球！教皇莱昂内（Leone）！小球！小球！”“诺沃市场的年轻人把丝绸商人和银行家店里的房顶和门板都拆下来扔进了火里，所以到第二天早上，这些人的房顶都被烧光了。如果不是当局介入，恐怕这一整片地区的所有人家都没有门和屋顶了。”在市政厅的围栏内，市民们可以喝到免费的甜葡萄酒，都装在一排排的镀金木桶里。美第奇宫门外自然也支起了桌子，上面堆满了各种食物来款待举着神奇的圣母雕像的游行队伍，他们都穿着金色的衣服，从因普鲁内塔（Impruneta）来到这里。[1]

罗马的庆祝活动则有节制得多，但正式入主梵蒂冈的仪式（*Sacro Possesso*）仍然堪称华丽壮观，绝对能够满足一贯喜爱盛典的教皇本人的所有愿望。不过不得不承认，教皇本人的形象实在不怎么威风。他侧骑在阿拉伯白马上，头顶上是由八个出身高贵的罗马人为他举起的顶棚，即便如此，谁都能看出来教皇的脸因为炎热几乎变成了紫色。人们不会看不到他的身材多么肥胖，肚子多么凸出，短短的脖子上有多少肥肉，下巴堆积多少层，视力微弱的双眼有多么外凸。而那些负责近身侍奉他的人更是无法忽略马鞍上那肥硕屁股下面不时散发出的难闻气味。不过，教皇显然非常享受这场盛典：因为视力不好，他看不清凯旋柱上的刻字，当侍从念给他听时教皇一直满意地点头；对沿路欢呼致敬的群众，他也一直保持着和善可亲的表情，还让侍从把钱袋里的钱币抛撒给围观者；他向众人赐予教皇的祝福时，脸上也挂着友好的微笑；教皇还不忘向人们挥手致意，他最骄傲的就是这双肉乎乎但形状美观、皮肤白皙的手，尽管此时这双手上戴着洒了香水、缝了珍珠的手套。教皇的欣喜溢于言表，无人能不受其感染。被流放的贫苦日子已经结束了，现在他要享受权势和财富带来的好处。据称他对弟弟朱利亚诺说：“既然上帝让我成为教皇，那我们就好好享受吧！”

当然，教皇莱奥享受生活的决心并不影响他同样坚定的目标——让美第奇家族重新成为意大利政治中的决定性力量并将外国势力赶出意大利领土。为了达到第一个目标，教皇打算把意大利中部的费拉拉和乌尔比诺两个公国，以及包括帕尔马（Parma）、摩德纳和皮亚琴察在内的几个城市合并到一起，组建一个强大的邦国。这个新邦国最终将由一个美第奇来统治，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教皇的侄子，也就是皮耶罗的儿子洛伦佐，一个相貌英俊、充满活力和野心的年仅20岁的青年。此时的洛伦佐已经作为莱奥的代表，在秘书的陪同下被派往了佛罗伦萨。秘书的职责是每天向罗马汇报年轻主人的情况。与此同时，教皇打算通过外交手段而非战争把曾经帮助其家族夺回佛罗伦萨的西班牙人赶出米兰和那不勒斯王国。而那不勒斯王国则有可能最终被交给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统

治，在哥哥当选教皇之后，朱利亚诺已经被召回罗马并受封为教会的首席执政官，显然已经准备好在新的伟业上施展身手。

1515年的头一天，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去世，可能是被他那年轻而有活力的英国新娘，亨利七世（Henry Ⅶ）的女儿玛丽公主（Princess Mary）花样繁多的要求折腾死了。即位的新王是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教皇莱奥有信心控制住这个年轻人，尤其是当他的姨妈萨瓦的菲利贝尔特公主（PrincessPhiliberte of Savoy），也就是已经丧夫的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妹妹，与教皇迷人的弟弟朱利亚诺结为夫妻之后。这也似乎成了教皇所提倡的政策要获得成功的预兆。

然而，事实证明法国新王并不像教皇希望的那样易受控制。高大英俊、永不满足的弗朗索瓦一世兼具智慧与魅力，立志要重新掌握查理八世在位期间曾经对意大利短暂拥有的权力。对弗朗西斯的一意孤行及对意大利的野心，教皇深感不安，他向自己的顾问们寻求建议，他的顾问们也向更多的人寻求建议，被咨询的人中就包括马基雅维利。依照他合理的论断，意大利应当与法国结成同盟，但是教皇不愿采纳，并最终决定和西班牙的费迪南德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瑞士结盟。

这样的联盟完全没有让法国国王有所退缩，反而让他鄙视。弗朗西斯率领着近十万人的大军翻过阿尔卑斯山南下至皮德蒙特。教皇的联盟匆匆集结了一支人员混杂的队伍，既有卡多纳带领的西班牙军队，也有凶恶暴躁的锡永（Sion）枢机主教马修·斯金纳（Mathew Schinner）带领的瑞士雇佣军，还有洛伦佐·德·美第奇亲自挂帅、枢机主教朱利奥为教廷代表的佛罗伦萨军队。意大利人其实根本不想打仗，尤其是在看到洛伦佐与朱利奥已经开始和弗朗西斯谈判之后，可是法国军队随后横扫了佛罗伦萨军队，又在马里尼亚诺（Marignano）重创了瑞士军队，给他们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处理掉这些根本不是对手的敌人之后，弗朗西斯留下一支队伍驻守米兰，其余人马则继续向博洛尼亚进军。教皇

将在那里与他举行和谈。

教皇前往博洛尼亚途中要先经过佛罗伦萨。他的侄子洛伦佐现在已经巩固了美第奇家族在那里的统治。几个月之前，洛伦佐去了一次罗马，把佛罗伦萨留给自己的两个舅舅雅各布·萨尔维亚蒂（Jacopo Salviati）和皮耶罗·里多尔菲（Piero Ridolfi）管理。他在罗马获得了使用佛罗伦萨统帅这一称号的许可。回到佛罗伦萨之后，执政团也顺从地授予他这一称号。自那以后，洛伦佐就越来越独裁，要求在美第奇宫而不是政府的办公地点召开会议，拒绝那些稳健温和、更有经验的市民的建议，身边围绕的尽是一些弄臣一般的年轻花花公子。

为了迎接教皇的到来，洛伦佐和皮耶罗·里多尔菲下令举办盛大的接待仪式，皮耶罗还被指定为仪式的首席执政官。两千名工人加入了准备工作，负责制作装饰物、方尖碑、奖杯、徽章、古典神明的雕像以及刻满了经文引言的凯旋门。据称总花费超过了七万弗罗林币。雅各布·圣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巴乔·班迪内利（Baccio Bandinelli）和安德烈亚·德尔萨托负责监督所有的工作，连教堂都被改作工匠们的临时工作场地。为了创造出开阔的远景，还拆除了几栋房子。圣三一教堂广场上建造了一座由22根柱子支撑的城堡，诺沃市场则竖起了一座50英尺高的彩绘方尖碑。大教堂也临时修建了一个正面：

> （这个教堂正面让）所有人都赞叹。上面有那么多图画和装饰；所有人都对它很满意，实际效果也令人赞叹和喜爱，所以永久的教堂正面也将以此为模型。

事实上，佛罗伦萨的改造工程如此浩大，以至于当教皇早于预计时间达到时，人们不得不请求他不要直接进城，而是到马里尼奥（Marignolle）的吉安菲廖齐（Gianfigliazzi）别墅暂住几天，等待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2] 教皇从来不会让自己的仰慕者失望，也从来不会婉拒参加盛典的邀请，所以他欣然接受了这样的安排，转道前往马里尼奥，直到最后一个凯旋门建好，最后一道屏风做好了装饰，并画好了充

满寓意的人物，还有雅各布·圣索维诺用木头和石膏做成、由安德烈亚·德尔萨托绘制的教堂正面也被立在了教堂朝西的一面。

一切准备就绪后，教皇在1515年11月30日圣安德鲁日这一天，头戴镶有珠宝的三重冕，身穿耀眼夺目的长袍从罗马娜门进入佛罗伦萨，后面还跟着一大长队的侍从、护卫和枢机主教们。当看到圣费利切教堂（San Felice）外的屏风前立着自己父亲的半身像，并通过望远镜看清雕像下面写着“这是我挚爱的儿子”时，教皇忍不住热泪盈眶。教皇肯定还想到了他刚刚去世的妹妹孔泰西娜，所以她的丈夫，也就是负责这次接待的首席执政官才被许可“穿着镶有黑貂皮的黑色绸子斗篷”站在一片穿着红色袍子的人中间，“尽管他这样的身份在这样的日子里是禁止哀悼服丧的”。当教皇通过马焦街（Via Maggio），穿过天主圣三桥进入市政厅广场时，他的脸上再一次扬起了笑容，并且抬手向欢呼的群众点头赐福，还让侍从向围观人群抛撒钱币。教皇会不时停下欣赏路边的装饰。在大教堂里，为了让会众们更清楚地看到教皇，中庭里还建起了一个巨大的讲坛。教皇穿着白色织锦法衣，披着深红色的披肩，戴着无边帽站在讲坛上，左右看了看之后才开始祈祷。

相较于在佛罗伦萨度过的如此荣耀的一天，教皇在博洛尼亚受到的接待就悲惨寒酸多了。他的队伍通过时，街道上全无欢呼喜悦之声，倒是偶尔有人喊出支持最近被流放的本蒂沃利奥的口号。教皇到市政厅（Palazzo Pubblico）等候法国国王，很久之后对方才姗姗来迟，还对被派往城门迎接他的朱利奥·德·美第奇简略地说自己“根本不在乎什么排场”并且希望谈判马上开始不要延误。法国国王与教皇见面问候时还算得上亲切有礼，但之后很快就露出了不退让的本色。他坚持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两个城市必须投降法国，因为他作为米兰的征服者有权这样要求。他还坚持让教皇把最近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手中得来的雷焦（Reggio）和摩德纳还给法国的盟友费拉拉公爵阿方索。面对国王不肯退让的态度，教皇仍不愿放弃将弗朗切斯科·玛丽亚·德拉·罗韦雷

（Francesco Maria della Rovere）赶出乌尔比诺的打算，他还拒绝支持弗兰西斯宣称对那不勒斯拥有权力的说法，至少目前是这样的，理由是在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还活着的时候根本没必要谈论这个问题。

不过，教皇的本性还是不喜争吵的。最终他同意将雷焦和摩德纳还给费拉拉公爵，不过他其实完全没有要遵守这个协议的打算。教皇还暗示他很可能会改变帮助弗朗西斯对那不勒斯宣称主权的主意，而且后来他也确实改变了主意。教皇还大方地册封法国国王的私人教师为枢机主教；作为回报，弗朗西斯也加封朱利亚诺·德·美第奇为内穆尔公爵（Duke of Nemours），这令教皇非常满意。甚至当弗朗西斯蛮不讲理地要求教皇把最近在罗马发现的拉奥孔（Laocoon）大理石群像送给他时，教皇依然对他摆出笑脸，要知道这可是教廷收藏中最有价值的宝物之一。[3]

根据教皇的一个陪同人员的说法，教皇虽然表面上和颜悦色，其实心里对于这次与法国国王的谈判非常不满意。回到佛罗伦萨后，教皇发现阿诺河发洪水，佛罗伦萨的市民们正遭受着严重的食物短缺；而且他的弟弟朱利亚诺也因为肺痨在美第奇宫卧床不起。尽管他的病已经到了药石罔效的地步，教皇还是派人把朱利亚诺送到菲耶索莱休养。他看起来“整个人都枯萎耗尽了，仿佛马上就要燃尽的蜡烛”。教皇时常去探望自己的弟弟，这总能给朱利亚诺带来短暂的安慰。知道教皇仍有将弗朗切斯科·玛丽亚·德拉·罗韦雷驱逐出乌尔比诺的打算，朱利亚诺乞求教皇不要这么做，因为朱利亚诺很喜欢德拉·罗韦雷，而且他的妻子在美第奇流放时期也善待过他。但是教皇总是对弟弟的请求避而不谈，只是说：“亲爱的朱利亚诺，不要为政治费心了，你现在需要的是专心把病养好。”

然而朱利亚诺的病情急转直下，最终在3月17日这天不幸去世了。他的妻子萨瓦的菲利贝尔特并没有为他生过孩子，不过与同名的叔叔一

样，朱利亚诺也有一个私生子，名叫伊波利托（Ippolito）。

朱利亚诺去世前一个月，教皇离开了佛罗伦萨，并且从此再没有回去过。他是被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的死讯以及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大公查理（Archduke Charles）继位的消息召回罗马的。这是件极端重要的大事，不但终结了一系列原本由康布雷联盟发起的战争，也让洛伦佐和教皇有了对付乌尔比诺公爵的机会，他们本来就是因为费迪南德和朱利亚诺在世，才迟迟没有动手的。

第一步，他们翻出了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可怕丑闻：5年前，脾气暴躁的公爵曾在拉韦纳的大街上袭击并杀死了死敌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阿利多西（Francesco Alidosi）。教皇为此案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团，他本人也是成员之一。虽然最终的结论认为惹人讨厌的阿利多西——据推测可能是尤利乌斯二世的娈童——挑衅公爵而丧命是自作自受，但调查团还是通知公爵无论他的杀人行为是否情有可原，他都不适宜再以教会的名义统治乌尔比诺了。同时调查团还重提了当初他拒绝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协助恢复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地位的要求，以及后来拒绝帮助保卫意大利抵抗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侵略军的事。为此公爵被召唤到罗马就自己不光彩的行为做出解释。

公爵并没有应召前往罗马，于是教皇将他驱逐出了教会，并让洛伦佐从佛罗伦萨带兵直接从他手中夺走乌尔比诺。洛伦佐的行动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公爵被迫从曼图亚逃走。5月时洛伦佐进驻了乌尔比诺，但是不到一年之后，被剥夺了爵位的公爵就带着西班牙的军队卷土重来，要夺回自己的公国。在乌尔比诺的多山地区艰苦战斗的时间虽短，却耗费了佛罗伦萨和教皇巨额的军费。这场战争不但激发了持久的反对声浪，还使洛伦佐受了严重的枪伤，他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意志都因此渐渐磨灭了。不过，在那段时间里，教皇曾一度感到非常满足。洛伦佐被宣告为乌尔比诺公爵和佩萨罗领主（Lord of Pesaro），莱奥梦想的

由美第奇主宰的、团结强大的意大利中部邦国似乎已经成型，而洛伦佐正向着成为一国之主的方向前进。

在意大利还没有陷入战乱、美第奇家族在乌尔比诺扎根发芽的那段时间里，莱奥欣慰地在梵蒂冈安定下来，开始享受生活。他的花销相当惊人。据说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他不但花光了节俭吝啬的前任留下的所有积蓄，还用光了自己及继任者的所有收入。“让教皇积攒1000达科特，简直比让石头飞起来都难。”马基雅维利的朋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Francesco Vettori）如此评价道。很快教皇就欠下了罗马几乎所有银行的债，有的银行甚至要收他40%的利息。可是教皇却完全没有考虑过削减自己庞大的仆人数量或是取消那些几乎从不停歇的奢侈娱乐和宴会。

枢机主教们也都效仿了教皇。曼图亚侯爵的妻子派秘书通知丈夫说：

> 枢机主教里亚里奥昨天款待我们的宴席太丰盛了，恐怕用来款待全世界的王后都富富有余。我们在餐桌前坐了整整4个小时，和最可敬的枢机主教们一起有说有笑。

威尼斯大使形容在另一个枢机主教科尔纳罗（Cornaro）家里举办的宴会时则写道：

> 食物都太精致了。菜品源源不断地被送上来，我们总共吃了65道菜，每道菜里至少包括三盘食物。而且上菜的速度快得惊人，我们往往一道佳肴还没吃完，就又有新盘子摆在面前了。所有的食物都是用最精致的银器盛放的，主教大人有足够的餐具供所有人使用。这一餐结束时，我们都要被丰富的食物撑爆了。我们的耳朵也快被持续不断的音乐演奏震聋了，大厅内外都有人奏乐，似乎所有罗马能见到的乐器这里都有，横笛、拨弦钢琴、四弦琴，除此之外还有唱诗班的歌声。

枢机主教和罗马贵族之类的人物争相举办无可比拟的盛大娱乐活动。富可敌国的锡耶纳银行家阿戈斯蒂诺·基吉（Agostino Chigi）连浴室用具都是纯银的。一次他邀请教皇来吃饭，豪华的餐厅里挂着各种精

致的挂毯。客人用的餐具都是专门订制的，上面还有每位客人的家族饰章。撤下最后一道菜之后，教皇赞扬了基吉丰盛的晚餐和精致的新餐厅。然而基吉却回答说："教皇陛下，这并不是我的餐厅。"他示意仆人们扯下那些精致的挂毯，露出了后面的一排排马槽，然后说："这不过是我的马厩而已。"另一次，基吉宴请整个罗马教廷。然后为每位枢机主教呈上了他们家乡的特色菜。人们还听说，基吉下令让仆人在每道菜之后把用过的银质餐具扔进台伯河，以此显示他的银器多到同一件不使用第二次。不过后来有人看到他的仆人在河上拉了个大网，把被丢弃的银器都又捡了回去。

教皇本人的宴会以珍稀的食材而闻名，比如孔雀舌之类他自己都舍不得吃的菜肴。教皇的宴会还因滑稽幽默而闻名，比如从糕点里飞出一只夜莺，或者从布丁里钻出一个赤裸的婴儿之类的。矮人、小丑和弄臣更是他餐桌旁必不可少的内容。宾客们被他们滑稽的动作和残酷的恶作剧逗得哈哈大笑——比如，有一次，他们在已经腐坏的肉上撒满味道极重的酱汁掩盖臭味，然后欺骗几个智商有欠缺的矮人说这是专为他们准备的佳肴，饥饿的矮人们真的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教皇本人尤其偏爱弄臣马里亚诺·费蒂（Fra Mariano Fetti）。这个多明我会的教士曾经是个理发师，后来竟然被封为教廷印玺保管者。这位机智、狡猾、无比低俗的教士最能博得教皇的开怀大笑，所靠的不仅是他粗俗的幽默，还有他出了名的能一次吃下40个鸡蛋或20只鸡的本事，以及他对特殊小菜和糕点的喜爱——有时主人会出主意在派里面放一整只带着喙和羽毛一起下锅的乌鸦。

在莱奥担任教皇期间，似乎没有比戏耍可怜的巴拉巴洛（Baraballo）更让他开心的恶作剧了。这个来自加埃塔的老教士好像认定了自己那点滑稽蹩脚的诗歌创作是什么天赋奇才。有人建议他应该要求在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山上（Capitol）公开受赏，彼特拉克也受到过这样的礼遇。教皇热情地认可了这个要求，向巴拉巴洛保证说他的诗歌完

全配得上这样的特别嘉奖，并且提出让他骑着自己非常喜爱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赠送的大象汉诺（Hanno）去参加典礼。大象不久前才刚刚运来，现在被养在美景宫（Belvedere）里。典礼当天，巴拉巴洛身穿大红色带金流苏的宽外袍，骑着同样盛装打扮过的大象，神态庄严地从梵蒂冈前往卡比托利欧山。教皇的首席传记作家保罗·焦维奥（Paolo Giovio）描述此情此景时写道："若不是亲眼看见，我永远不会相信竟有这样可笑的事情。一个年过花甲、受人尊敬的老者，头发花白、仪态庄严，却是骑在大象上，周围还吹着喇叭。"

不过响亮的吹奏声和围观人群的欢呼叫嚷让大象受了惊吓，它站在圣安杰洛城堡的吊桥前嘶叫，不肯过河。巴拉巴洛不得不从装饰豪华的鞍具上爬下来，这场闹剧也就草草结束了，至少对于坐在不远处阳台上愉快地通过望远镜看热闹的莱奥来说是结束了。

虽说这样大型的活动不可能经常举办，但是教皇在自己宫殿里举办的戏剧表演、假面舞会、芭蕾舞、哑剧和摩尔人的舞蹈表演（*moresche*）等则是尽如他意地从来不曾停息过，为他提供了无尽的乐趣。最早的两部无韵诗历史悲剧——乔万尼·鲁切拉伊（Giovanni Rucellai）的《鲁斯蒙达》（*Rosmunda*）和吉安-乔焦·特里亚诺（Gian-Giorgio Trissino）的《索福尼斯巴》（*Sophonisba*）——都在教皇面前上演过。不过教皇显然更偏爱通俗喜剧以及阿里奥斯托（Ariosto）、马基雅维利和枢机主教贝纳尔多·多维齐·达比别纳创作的或多或少有些下流的滑稽剧。阿里奥斯托的《卡萨利亚》（*Cassaria*）和《交换者》（*Suppositi*），还有马基雅维利的《曼陀罗花》（*Mandragola*）都是1519年为教皇上演的，都令他非常满意，而所有作品中教皇最钟爱的莫过于多维齐的《百灵鸟》（*Calandria*）。这部剧是关于一个愚蠢的年轻人爱上了一个姑娘，而这个姑娘却喜欢和自己的双胞胎哥哥假扮对方来戏耍自己的情人，由此上演了各种甚合教皇口味的桥段。

教皇有时会花好几个小时观看这些表演，或者坐在赌桌上玩没什么难度的纸牌游戏（*primiero* ），输了钱也不生气，赢了钱还会赏给大家。到了节庆之日，教皇更是会整天外出观赏斗牛，参加宴席舞会，看他的枢机主教在化装舞会上和女士们跳舞，或去观看罗马人热衷的各种运动，还有他们的赛舟会、游行、扔橘子大赛及充满暴力和危险的滚酒桶比赛——巨大的木桶从泰斯塔乔山（Monte Testaccio）的陡坡上极速滚落，山脚下聚集的农民们则冒着断手断腿的危险抢夺装在桶里面的猪。

当然莱奥的生活中也不是只有浮华。如果说他在举行娱乐活动、购买法国猎犬和克里特猎鹰，添置皮草和金饰，以及供养不断壮大的家族人员上花费了巨资的话，那么他在对罗马的改造和修缮上也同样毫不吝惜。他修建的里佩塔街（Via Ripetta）为拥堵的旧城提供了一条通向人民广场（Piazza del Popolo）的新路；他修缮了多尼卡（Domnica）的圣玛丽亚教堂，还为它加装了一个带门廊的宏伟正面；除了以上这些，他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梵蒂冈宫（Vatican Palace）和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中。他留用了尤利乌斯二世的建筑师——被称为布拉曼特（Bramante）的多纳托·德·安杰洛·拉扎里（Donato d’Angelo Lazzari），并由其从1505年起主持修建新教堂。教皇莱奥还有一个更具野心的设想，就是抽干蓬蒂内沼泽（Pontine Marshes），并且要求莱昂纳多·达·芬奇设计一个可行的方案。

为了将罗马打造成全欧洲最具文化气息的城市，教皇采用了各种措施来吸引有才华的艺术家、作家和学者来罗马生活，还将自己的藏书室免费向他们开放，并不断收集珍贵的手稿来扩充本就十分丰富的藏品。教皇自己是爱书之人，爱读书也爱藏书，对于喜爱的作者的作品，他甚至能够大段背诵和引用。即便是在财力不济之时，他也会想尽办法——通常是出售有俸圣职和枢机主教之职——来资助那些求助他的作家、学者、诗人和剧作家们。教皇大力资助了罗马学院；协助重组大学，增加

了教学设施和教授数量；教皇鼓励学习和使用拉丁文，并且设法资助拉丁文作家和诗人；把拉斯卡里斯带回罗马并建议由其编辑和印制自己收藏的希腊手稿。

但不得不承认，教皇本人的品位还称不上完美。他少有的一些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完全比不上其父亲的文学造诣。他尝试谱写的音乐作品更不成功。尽管他为西斯廷小教堂招揽了欧洲最好的唱诗班，但是他自己最喜欢听的，也会挥着丰满白皙的手哼唱的那些音乐都被认为是平凡陈旧的。同样，他对于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没什么鉴赏力。除了会观看他们创作的喜剧之外，教皇并不看重马基雅维利或阿里奥斯托；他也不崇尚圭恰迪尼。事实上，那些从他的慷慨资助中受益最多的反而是一些低等得多的作家，比如贝尔纳多·阿科尔蒂（Bernardo Accolti），莱奥对其作品的认可程度几乎跟阿科尔蒂本人对自己的认可程度一样高了。

至于教皇对米开朗琪罗的忽视，与其说是他没有能力欣赏伟大的才华，倒不如说是他没有耐心容忍艺术家暴躁的脾气。米开朗琪罗是受尤利乌斯二世的鼓励来到罗马的，他是个阴郁、易怒、独立且固执己见的人，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进行创作，尤其不愿无条件遵从资助者的要求或是给创作设定时间表。教皇虽然公开表示对米开朗琪罗有很深厚的感情，而且每每想到两人年少时一起生活的经历就“几乎感动地落泪”，但实际上他们相处得一直不好。教皇鼓励米开朗琪罗做一名建筑师，并督促他回到佛罗伦萨为布鲁内莱斯基的圣洛伦佐教堂修建新的正面。[4]相比之下，教皇更喜欢和年轻顺从、谦虚有礼的拉斐尔·圣齐奥（Raffaello Sanzio）打交道。

拉斐尔是乌尔比诺人，布拉曼特把他推荐给尤利乌斯二世，后者于是指定拉斐尔装饰自己在使徒宫（Apostolic palace）的办公室。后来教皇莱奥要求拉斐尔留下来继续工作，在他们的共同指导下，完成了拉斐

尔敞廊（Loggie di Raffaello）和拉斐尔厅（Stanze di Raffaello）的建造。[5]

---

[1] 神奇的圣母雕像（miraculous statue of the Virgin）在圣玛丽亚德尔因普鲁内塔教堂。这座教堂始建于十三世纪，十五世纪重建，战争中损毁严重，现已被复原。圣母的大理石祭坛由多纳泰罗的一名追随者制作。

[2] 菲利波·斯特罗齐的第二任妻子是塞尔瓦吉娅·德·吉安菲廖齐（Selvaggia de’Gianfigliazzi）。吉安菲廖齐家族的家族教堂在圣三一教堂里。吉安菲廖齐宫位于科尔西尼河滨大道（2号）。“小王位觊觎者”（the Young Pretender）的妻子奥尔巴尼（Albany）伯爵夫人就居住在这里，拜伦（Byron）和司汤达（Stendhal）也曾在这里居住过。霍勒斯·曼爵士（Sir Horace Mann）的房子也在附近。查尔斯·哈德菲尔德（Charles Hadfield）的著名旅馆就在阿诺河对岸的圭恰迪尼河滨大道，十八世纪成百上千名热衷于留学欧洲（Grand Tour）的英国人来佛罗伦萨时都住在这里。他们之中很多人在这里的时候都让托马斯·帕奇（Thomas Patch）画过像，这位画家从1755年到1782年去世为止都住在佛罗伦萨。

[3] 佛罗伦萨雕塑家巴乔·班迪内利被要求以最快的速度雕刻出一套可以乱真的拉奥孔大理石群像。真正的拉奥孔群像是1506年1月，由特拉亚浴场（Trajan）附近的一个农民在自家葡萄园挖地时发现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花了4140达科特买下了这套雕塑作品，并把它们运到了梵蒂冈。运送过程中，沿途都要撒上鲜花。

[4] 米开朗琪罗在和朱利亚诺·达圣加洛、雅各布·圣索维诺及巴乔·德·阿尼奥洛（Baccio d’Agnolo）的竞争中获胜，但是他的获胜方案最终并没有被付诸实践。他在卡拉拉的采石场里花了两年时间试图解决各种技术难题，结果圣洛伦佐教堂的新正面建造计划却被搁置了。

[5] 拉菲尔厅中有很多歌颂教皇莱奥十世与美第奇家族的暗示。比如在赫利奥多罗斯厅（Stanza of Heliodorus）中，拉菲尔被授意用匈奴王阿提拉（Attila）和圣莱奥（St Leo）的会面来隐喻拉韦纳战役。画中的圣莱奥骑着一匹白马，其实他代表的就是教皇莱奥十世，因为教皇在很多场合的坐骑都是一匹白马。教皇莱奥十世的形象还出现在了火灾厅（Stanza dell’Incendio）中，这幅画是由拉菲尔的助手于1514～1517年为教皇的餐厅创作的。这里的画作展现了八、九世纪两任教皇莱奥三世和莱奥四世的生活情景。窗户对面墙上的壁画展示的是公元847年的那场大火，据说火势已经猛烈到要烧毁圣彼得大教堂了，但是教皇莱奥四世对着火焰画了个十字手势，大火就熄灭了。如同在赫利奥多罗斯厅的壁画中一样，莱奥四世也象征着莱奥十世。

第十八章 向罗马进军

“给教皇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教皇莱奥一有机会就会骑马离开罗马，前往坐落于通往波尔图（Porto）道路上的玛丽亚纳（Magliana）别墅。在这里他仍然以遵从医嘱为借口公然违反教廷法令，尽情地沉醉于带猎犬、猎鹰甚至雪雕打猎。别墅周围的广阔区域都被圈定为教皇的专有猎场。场地里还有一个巨大的用网围起来的罩子，里面都是鸽子、松鸡和苍鹭，是专为猎鹰捕猎用的；同样还有一个兔笼（*conigliare*），里面养的兔子是专为雪貂准备的。

有时教皇在玛丽亚纳别墅会暂住六周之久，在这里他不穿圣衣和白色法衣，更让教宗礼典长惊愕的是，教皇甚至“穿着长筒马靴，这是非常不合礼法的，因为人们无法亲吻教皇的脚了”。因为视力不济，教皇并不能参加最初阶段的打猎活动，他只是骑着最喜欢的白马到高坡或特别建造的平台上，用望远镜观看最后的猎杀环节。

猎场四周用绑着帆布的杆子围得严严实实。为了防止围栏中的猎物跑到临近的灌木丛或沼泽里，还安排了瑞士卫兵和骑着马的猎场看守在农民的帮助下列队将围栏围起来。当猎场内牵着猎犬和獒的马夫们做好准备，教廷的枢机主教、绅士和他们的朋友们也都就位之后，教皇会举起白手绢作为吹响号角的信号。然后猎场管理员就会进入围栏，大声喊叫着，吹着喇叭，甚至通过放枪来把猎物们驱赶到帆布围栏前的缺口处。很快狂奔的动物们就会冲进开阔的猎场里，有牡鹿、野猪、野兔、家兔、狼、山羊和豪猪。等待已久的猎手们此时会迫不及待地开始猎杀他们选定的猎物，有的人用长矛或剑，有的人用斧子或戟，还有的会带着猎狗在那些侥幸逃脱的猎物后面紧追不舍。

通过望远镜观看这些杀戮场面时，教皇常常会被马里亚诺的滑稽动作惹得捧腹大笑，尽管他其实是故意让自己陷入各种无厘头的麻烦来取悦教皇的；教皇还不免会羡慕身材魁梧的枢机主教圣塞韦里诺，后者在这种场合里总是会在肩上披一张狮子皮，甚是威风。如果有猎物已经被网或绳子困住，教皇就会走近它，将眼镜举到左眼上，手持长矛，亲自杀死挣扎不休的动物，然后还要高高兴兴地接受随从的祝贺。

据诗人圭多·西尔维斯特（Guido Silvester）的记录，有一次打猎经历让教皇尤其欢畅。当天发生了各种意外。先是一个教廷成员把猎犬当成狼猎杀了，展示成果时他的愚蠢似乎让教皇觉得很有趣。接着又有两个人为了争夺一只被猎杀的野猪而打了起来，涉事一方还在争斗中伤了一只眼睛。再后来，枢机主教科尔纳罗的一名养狗场管理员，也是一个出了名的酒鬼，举着长矛刺杀一只已经受伤、正向森林逃跑的野猪，结果却失手刺死了自己最喜欢的猎犬。一怒之下养狗人扑向野猪想要扭住它的脖子将其扼死，结果却被野猪从背上甩下并用獠牙刺死了。同行的人员把养狗人的尸体抬到了枢机主教面前，枢机主教命人用最好的葡萄酒洗掉尸体上的血污，还即兴创作了一段诗文祭奠他的悲惨命运。最后教皇骑着马返回别墅，仆人们抬着各种被猎杀的动物尸体跟随其后，有人听到教皇评价这一天时赞道："这真是极好的一天。"

除了对这些血腥场面的描述之外，圭多·西尔维斯特还评论说，在一天成功的狩猎之后，教皇一定会心情大好，和颜悦色，以至于此时提交到他面前的任何提议都能轻松通过，任何文件都会被顺利签署，任何要求都会获得满足；相反，要是这一天的狩猎不成功，教皇则会咆哮和抱怨。所以那些想要向教皇讨些优待的朝臣或教士都会识趣地等待时机，比如在坎帕尼亚的狩猎成功之后，或是从奥斯蒂亚的人工咸水湖垂钓归来之时，又或者是等他去枢机主教法尔内塞（Farnese）在维泰博（Viterbo）的领地里游玩尽兴，在那里他可以用袋子抓捕雉鸡、鹧鸪和鹌鹑，以及在鸟棚（*uccellari* ）里设机关诱捕蒿雀、画眉、百灵鸟和金

翅雀。

教皇当然受到了很多人的爱戴，比如那些在他外出狩猎、钓鱼的途中得到慷慨赏赐的农民，或者是那些在宫廷中野心得到了满足的教士和宠臣们；但是在罗马，还是有一些枢机主教对教皇的种种行为颇有微词。与乌尔比诺耗资巨大的战争并不是唯一将教会财力消耗殆尽的美第奇事业；当教皇想让侄子洛伦佐迎娶法国公主的计划不再是秘密时，弗朗切斯科·索代里尼也不是唯一因为教皇的失信而怒火中烧的枢机主教。

枢机主教拉法埃拉·里亚里奥永远不会原谅教皇为了给卑鄙的洛伦佐谋得封地而把自己的亲戚赶出乌尔比诺的行径；枢机主教阿方索·彼得鲁齐也无法把自己心中的愤怒搁置一旁，因为正是在莱奥的帮助下，他的兄弟博尔盖塞·彼得鲁齐（Borghese Petrucci）才被夺去了锡耶纳的总督一职。当莱奥把自己亲密的朋友都封为枢机主教，却拒绝其他枢机主教家庭中更符合条件的人选时，更是大大地冒犯了这些枢机主教。莱奥在当选教皇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就加封了贝纳尔多·多维齐和另一个托斯卡纳老乡洛伦佐·普奇（Lorenzo Pucci）为枢机主教，第三个受加封的则是他的外甥洛伦佐·奇博（Lorenzo Cibo）。虽然他已经任命朱利奥·德·美第奇为佛罗伦萨的大主教，但是为了让朱利奥也能升格为枢机主教，教皇授意组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他堂弟的出身，并且明示希望调查结果是自己的叔叔朱利亚诺曾经与西莫内塔·戈里尼（Simonetta Gorini）[1] 秘密结婚，因此朱利奥是他们的合法婚生子。而委员会不负教皇的托付，“查出了”这样的结果。如果朱利奥本就受人爱戴，也许还没什么人对此提出异议，不过根据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的观察：

> 他是个阴郁、孤僻的人，不乐于助人，被普遍认为是个贪婪、行事极其谨慎小心的人。非常有自制力，如果不是因为胆小怕事，也许本能成就一番事业。

在罗马教廷之中，最憎恨朱利奥的人非阿方索·彼得鲁齐莫属。他

是个英俊、高傲、风流成性的枢机主教，此时只有22岁。因为教皇干涉了其家族在锡耶纳的事务而一直心存不满。他在选举教皇时曾投票给莱奥，但现在他开始公开指责莱奥，其言论在罗马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包括枢机主教里亚里奥和索代里尼，还有富有的朋友、年轻的枢机主教绍利（Sauli），以及以前做过英格兰枢机主教保护者的阿德里亚诺·卡斯塔莱斯（Adriano Castellesi）。虽然卡斯塔莱斯与教皇之间并无家族恩怨，但据说他非常迷信一个算命先生的预言，那个算命先生曾对他说下一任教皇叫“阿德里安（Adrian），是一个有着卑微出身的清瘦男子”。所以卡斯塔莱斯一直将尽快实现这个预言视为自己最神圣的使命。

起初大家商定解决现任教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趁他出去打猎时雇人将其暗杀。不过，大家很快又设计出了一个更隐蔽的方案：找一个从韦尔切利（Vercelli）来的江湖郎中，在彼得鲁齐的秘书和一个锡耶纳朋友的帮助下，以治疗肛瘘为借口把有毒的绷带绑在教皇身上。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彼得鲁齐于是前去与被驱逐的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玛丽亚·德拉·罗韦雷讨论后续行动了，却没想到在自己离开的时候，一个男侍从的不谨慎行为导致阴谋败露，江湖郎中、彼得鲁齐的秘书和那个锡耶纳朋友都被移交给教廷的刑讯师一并处置。

很快，彼得鲁齐也被勒令即刻返回罗马与教皇商谈一些事情。教皇向他承诺会保证他的安全。也许是相信了教皇的承诺，抑或是以为教皇已经为以前对待自己家族的做法感到后悔，天真的彼得鲁齐马上回到了罗马，并且与枢机主教绍利一起到梵蒂冈认罪。两个人立刻遭到逮捕，并被关进了圣安杰洛城堡中“最可怕的地牢”。彼得鲁齐声嘶力竭地痛斥出尔反尔的教皇莱奥，绍利也在狂怒之下把自己的白色法衣撕成了碎布。和他们的手下一样，这两个人也受到了酷刑的折磨，最后不但招了供，还交代了同党。枢机主教里亚里奥被逮捕时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不得不被抬着送到了关押的地点。

在抓捕彼得鲁齐阴谋的其他支持者之前，教皇召集了一次枢机主教会议。在所有枢机主教面前，教皇展现了从未有过的震怒，以至于在场的人都怀疑教皇是不是在演戏吓唬他们。教皇肥硕的身体不断颤抖，声音大到连临近的走廊上都可以听到。他要求其他参与阴谋的罪人马上坦白。于是枢机主教索代里尼和卡斯塔莱斯都承认了自己知晓这一阴谋并跪在教皇脚下卑微地忏悔。

卡斯塔莱斯最终设法逃出了罗马并从此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而索代里尼则缴纳了巨额的罚款，帮助教皇解决了一些不还不行的债务，之后他觉得还是效仿卡斯塔莱斯销声匿迹为好。里亚里奥被释放后去了那不勒斯，他交的罚款数额甚至比索代里尼的还要高。绍利凭借自己在法国和意大利一些有权势的朋友而得以离开地牢，却被下令软禁于罗通多山（Monte Rotondo）的房子里，第二年就神秘地去世了。彼得鲁齐在地牢里被教皇的穆斯林刽子手执行了死刑，有可能是被吊死的，也有可能是直接砍了头。至于那位韦尔切利的江湖郎中以及彼得鲁齐的秘书和朋友则被拖在马后在罗马游街，他们身上的肉还要被用钳子一块块撕下来，最后才吊死在圣安杰洛城堡前的桥栏杆上。

尽管从里亚里奥和索代里尼那里收来的巨额罚款暂时缓解了教皇的囊中羞涩，他还是觉得有必要通过加封更多的枢机主教来为金库带来更多收入，也正好填补罗马教廷中的空缺。与此同时，教皇还要求比较富有的已当选的人为他提供更多的捐赠。其实钱并不是莱奥加封31个枢机主教的唯一原因。他希望自己能够创造一个比前任留下的更加稳固可靠的罗马教廷，一个不会对任何符合美第奇家族利益的行动有异议的教廷。因此，在教皇的名单中尽管确有一些人是配得上这个职位的，但更多的人是因为教皇的私心才当选的。在这些人当中，既有法国和葡萄牙皇室的王子；又有摩德纳的比安卡·兰戈内的儿子埃尔克莱·兰戈内（Ercole Rangone），她也是莱奥以前重要的女恩人；还有一向无法无天的蓬佩奥·科隆纳，也许一顶枢机主教的帽子能让他有所收敛；此外

还有他的两个佛罗伦萨外甥尼科洛·里多尔菲（Niccolo Ridolfi）和乔瓦尼·萨尔维亚蒂；而第三个佛罗伦萨亲戚则是路易吉·罗西（Luigi Rossi）。

现在罗马教廷中尽是一些美第奇家族的朋友和亲戚，以及那些受过美第奇恩惠的人，教皇觉得让侄子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堂妹马德莱娜·德拉图尔·奥维涅（Madeleine de la Tour Auvergne）结婚的时机也成熟了。于是在1518年3月，洛伦佐带着一支人数众多的红衣侍从队伍北上翻越阿尔卑斯山去迎娶新娘，当然还少不了带着他叔叔慷慨准备的聘礼，包括36匹宝马以及用龟壳制作并镶嵌着珠母和宝石的婚床之类的珍品。

尽管被美第奇家族的富有所震惊，但是法国宫廷上下对于乌尔比诺公爵本人可称不上有多满意，他傲慢的性格以及对于一个25岁青年来说有些可怜的身材和外形让人难生好感。事实上，婚后不过几个月人们就看出公爵必将不久于人世，而他的妻子竟比他还要短命。1519年4月底，她生下女儿后没多久就去世了，而这个被取名为凯瑟琳（Caterina）[2] 的女婴将来则会成为法国王后。又过了几天，洛伦佐因为梅毒导致的肺结核加重而去世。洛伦佐人生中的最后几个月都是在卡雷吉和波焦阿卡伊阿诺的乡村别墅里度过的，陪在他左右的是一位皮斯托亚人秘书及另一个名声不太好的男性朋友，似乎没有人为他的离世感到哀伤。

洛伦佐从法国回来后，佛罗伦萨人已经对他满怀怨言了，他的贵族做派日益明显，衰弱的健康没能使他的政治野心有一丝减退，而且他对城市财政的处理不当，再加上那个傲慢、贪婪又专横，心里只有儿子的阿方西娜的影响。洛伦佐去世后8个月，他的母亲也在罗马去世了，不过她的死讯同样没有引起任何伤感的情绪。

枢机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非常清楚佛罗伦萨人的不满，于是匆匆

从罗马赶回来稳固美第奇家族对城市的控制，同时小心翼翼地不冒犯任何人。他赶在洛伦佐的死讯还没有彻底传开之前到达佛罗伦萨，确保了没有发生任何动荡，同时也将整个共和国的管理大权转到自己和一些重要家族手中，他巧妙地向这些家族征求意见，直到教皇为佛罗伦萨设定好新的计划为止。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一派是幸运的，朱利奥处理事务的方式婉转而机智，在他谨慎认真的财政管理之下，佛罗伦萨经历了一段繁荣时期。教皇一直无法决定如何处理佛罗伦萨或乌尔比诺的问题，因为此时美第奇家族的正统继承人只剩下一个有一半法国血统的女婴，男孩子们则都是私生子：伊波利托是内穆尔公爵朱利亚诺与一个佩萨罗的性感女郎生下的，而亚历山德罗（Alessandro）虽然名义上是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的儿子，但是有传言说他实际上是枢机主教朱利奥和一个那不勒斯的摩尔人女奴或一个罗马坎帕尼亚的农家女的儿子。

最终，教皇决定封凯瑟琳·德·美第奇为乌尔比诺女公爵（Duchess of Urbino）并将其公国附属为教廷国，还要求佛罗伦萨贡献了一大笔赞助以支付将德拉·罗韦雷赶出去的花销。作为补偿，教皇把圣莱奥（San Leo）堡垒和占领下来的蒙泰费尔特罗地区（Montefeltro）划给了佛罗伦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佛罗伦萨的共和国政府。而这一问题在1519年之后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当年年初，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去世，随后查理五世（Charles V）经选举继位。

无论是法国国王还是教皇都曾极力阻挠这位充满野心的年轻人当选，因为他不仅是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国王，还是荷兰君主和奥地利大公。既然没能阻止其当选，莱奥在百般踌躇、万般推脱之后，决定抛弃与法国的联盟，转而与查理五世私下达成秘密协议。因为此时此刻，教皇不得不依靠查理五世来解决一个已经无法忽视的麻烦——令他苦恼的奥古斯丁修会教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多年来教皇一直竭力对路德思想和德国人改革教会的要求置之不理，希望这个问题可以依靠德国教士们的诡辩解决，最终能够不了了之。然而路德却始终没有退缩，以至于教皇不得不将他驱逐出教会。而现在教皇希望查理五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能够处决马丁·路德这个异教徒，从而帮他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皇帝本人倒是不反对处死路德，但是那些带着同情听了路德的激情宣言的德国王子们则不赞成这种做法。查理当然可以否决他们的意见，而且他也是这么跟教皇承诺的，但是作为交换条件，教皇必须支持他夺取包括米兰在内法国占领的意大利地区的打算。教皇同意了这个条件，前提是将法国从这些被占领地区赶走之后，教廷有权拿回弗朗索瓦一世在1515年博洛尼亚会议上拒绝归还的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两个城镇，而且查理要协助他们夺取费拉拉。最终双方达成了协议，皇帝的军队也整装待发。

枢机主教朱利奥的加急信件传来了皇帝打败弗朗索瓦一世的捷报，还有米兰被攻破、法国军队朝那不勒斯逃窜的消息也都传到了正在玛丽亚纳别墅的教皇耳中。尽管刚刚接受了治疗肛瘘的手术，教皇还是出去打了一天的猎。这个时节白天潮湿闷热，晚上却寒冷多风。莱奥坐在卧室里的壁炉前，背后的窗子却没关，他时不时会走过去观看下面院子里点起来的庆祝篝火，结果染上了重感冒，还发起了高烧。两天后他被人抬着回到了罗马，并被告知他们已经夺回了皮亚琴察和帕尔马。

> （1521年）12月1日大约早上7点的时候，教皇因重感冒去世了，之前没有任何人警告他这次感冒会有生命危险，所有的医生都说这只是在玛丽亚纳着凉造成的轻微不适而已。

枢机主教朱利奥一接到教皇突然离世的信息，就马上奔赴罗马去参加当月28日的教皇选举大会，显然是抱着要成为堂兄继任者的打算。不过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索代里尼赶在朱利奥之前回到了罗马，并且在枢机主教蓬佩奥·科隆纳（Pompeo Colonna）的帮助下，结成了强大的反朱利奥联盟。于是朱利奥退而选择支持阿德里安·德代尔（Adrian

Dedel）参选，他是查理五世曾经的老师，一位籍籍无名、道德高尚、节俭朴素的佛兰德斯枢机主教。很多罗马教廷中的大人物甚至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为了挫败像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和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这样有权势的枢机主教的当选野心，朱利奥一手导演的谦虚学者当选教皇的结果也在众人的意料之中；感到意外和愕然的恐怕只有新教皇本人，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几乎是惊慌失措的。新教皇选择了阿德里安四世（Adrian Ⅵ）的称号，极不情愿地前往罗马就职。他的当选也算是应了那个让枢机主教阿德里亚诺·卡斯塔莱斯激动无比的算命先生的预言。新教皇很不习惯在罗马的新生活，他每天只花1达科特，三餐都是由一个佛兰德斯老妇人负责准备的，教皇对这个脾气暴躁的仆人似乎格外宠爱。教皇对教会做出的改革都以失败告终。此外，他为限制教会奢侈之风而做出的努力，以及那些因他的节俭而失去了往日奢华生活的人的憎恨和敌意，最终都超过了教皇的承受能力。他染上了一种肾病，再加上人们难免猜测可能被下了毒，没过一年时间，教皇就去世了。罗马人终于不用再忍受一位非意大利籍的教皇了。他们甚至在教皇医生家门口摆放了节日花环，并称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美第奇家族的两个私生子伊波利托和亚历山德罗，以及凯瑟琳·德·美第奇现在都居住在佛罗伦萨。在确认这里完全处于美第奇一派的控制下之后，枢机主教朱利奥在罗马安顿了下来。他居住的豪华宫殿是从枢机主教里亚里奥手里没收而来的，作为其参与谋害教皇莱奥十世的代价。朱利奥在这里的生活不算过分奢侈，但是也少不了美第奇家族一贯阔绰的样子。他是艺术家和音乐家的资助者，是穷人的守护神，也是慷慨大方的主人。按说以他冰冷的态度和阴郁的外貌，还真不适合这样一个角色，不过朱利奥却做到了，因为在阿德里安四世死后冗长沉闷的教皇选举大会上，他需要发动所有可以召集的朋友。起初他看起来毫无希望当选。法国表示强烈反对，此外许多其他的反对者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其中最想要阻挠朱利奥当选的莫过于有权有势的枢机主教蓬佩

奥·科隆纳，因为他本人也同样对教皇的位置虎视眈眈。几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选举仍然没有结果。罗马甚至发生了示威行动和暴乱。在人们的记忆中，历史上从没有过持续这么长时间的选举大会。最终，依靠各种贿赂和收买换来的承诺，再加上为了避免僵局使宿敌枢机主教奥尔西尼渔翁得利，枢机主教科隆纳放弃了对朱利奥的反对。查理五世和亨利八世也赞同让一个美第奇当选，而弗朗索瓦一世之所以没有反对，是因为相信美第奇家族肯定不会永远效忠德国皇帝。最终，枢机主教在持续了60天的选举大会中脱颖而出，成为教皇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Ⅶ）。这一年他25岁[3]。选举大会上曾经与他为敌的人没有几个转投他的阵营，但是在罗马，还是有很多人看好他，并且“相信接下来会看到一个繁荣昌盛的教廷，一个开明的教皇；在前任教皇阿德里安野蛮统治下被废弃的文学和艺术也会得到复兴”。

教皇克莱门特绝对是一个慷慨且有眼光的资助者。虽然他本不是慷慨之人，更绝对不是爱热闹、善交际之人：他更喜欢在闲暇时间里听听音乐，而且他比莱奥十世更热衷于讨论神学和哲学问题。不过他也明白慷慨的重要性以及可能带来的回报。克莱门特在救济和施舍上像莱奥一样大方，作为资助人也毫不吝惜。他延续了美第奇家族对拉斐尔的资助，并邀请他设计准备在马里奥山（Monte Mario）松柏覆盖的峭壁上修建的别墅。[4]教皇还向最具才艺也最爱争论和吹嘘的佛罗伦萨艺术家本韦努托·杰利尼订制了作品。教皇还鼓励了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的研究，他还让朱利奥·罗马诺（Giulio Romano）和吉安·弗朗切斯科·彭尼（Gian Francesco Penni）到梵蒂冈工作，并在那里为莱昂纳多·达·芬奇提供了私人住处。莱奥十世打算在佛罗伦萨的圣洛伦佐教堂中建造一个礼拜堂作为父辈朱利亚诺和洛伦佐及他们的两个堂兄弟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和内穆尔公爵朱利亚诺的安葬之地，[5]并已经把这项工作指定给了米开朗琪罗。克莱门特不仅对此工作进行了确认，还让米开朗琪罗在圣洛伦佐另外设计一个藏书室，为的是有朝一日能将美第奇家族的藏书重新送回佛罗伦萨。[6]

正如弗朗索瓦一世收回对教皇克莱门特的反对时所预见的那样，教皇很快就表现出了不再忠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迹象。到1524年年底，在几经辗转变化之后，教廷重新与法国结盟，法国军队也重新出动。然而克莱门特做出这个决定以后，却一天比一天犹豫不定，并且后悔做出了这个决定。他的这种烦恼是有理由的，1525年2月，消息就传到了罗马，说皇帝和米兰公爵结成联盟，在帕维亚打败了法国军队，还俘虏了弗朗索瓦一世。教皇此时的处境与查理的囚徒无异。为了摆脱这样不利的困境，教皇像任何理智尚存的人都会选择的一样，与皇帝达成了协议，可是背地里，他又与已经被释放的弗朗西斯同样达成协议，支持他卷土重来再次越过阿尔卑斯山。

虽然教廷的特使们尽全力不让秘密协议泄露，但最终还是没能瞒住皇帝。查理五世非常清楚教皇的目的，于是决定先发制人，以防止他们建立起一个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联盟。1526年9月，在唐·乌戈·迪·蒙卡达（Don Ugo di Moncada）的唆使下，皇帝的特使枢机主教蓬佩奥·科隆纳带领着一支家臣和雇佣武装护卫组成的强大队伍来到罗马，占领了圣彼得大教堂附近的郊区，并洗劫了教皇宫殿，此前教皇已被迫逃往更安全的圣安杰洛城堡。最后，教皇被迫在圣安杰洛城堡签订了条约，条约规定他必须放弃针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结盟，还要赦免科隆纳的无理攻击。

克莱门特当然根本不打算遵守这个条约。签字之后没过几周，他便派遣教廷的军队开赴科隆纳的领地，下令要攻破要塞和城堡，威吓科隆纳的佃农并通告科隆纳家族他们已经被认定为不法之徒，所有的封号和职务都将被免除。盛怒之下的枢机主教科隆纳此时提到教皇克莱门特的名字都会气得浑身颤抖，于是他带着能召集的所有人力投靠了查理·德·拉努瓦（Charles de Lannoy），也就是查理五世在那不勒斯的总督，后者已经在加埃塔驻扎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准备“给教皇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此时，一个更加严峻的威胁来自德国。老当益壮的勇士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Georg von Frundsberg）已经集结了一支大军，主要是由巴伐利亚（Bavaria）和法兰克尼亚（Franconia）的路德教派教士（*Landsknechte* ）组成，他们心中满怀着宣教的热忱，发誓要向罗马的反基督教会复仇，而他们另一个更实际且同样强烈的要求则是剥夺教皇的巨额财产。这支令人惧怕的队伍完全没有被阿尔卑斯山区的风雨和暴雪阻挡，一路南下来到伦巴第。即便是当教皇的其他敌人，比如科隆纳和拉努瓦的人马在弗罗西诺内（Frosinone）受阻时，冯·弗伦茨贝格带领的强悍德国人依然能勇往直前。

英勇的战士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Giovanni delle Bande Nere），也是伟大的洛伦佐的孙女婿，曾经尝试阻挡德国人毫不留情的进击，但是他不但没能阻止他们穿过波河，还在战斗中被隼炮的炮弹击中了右腿。在医生为他截去已经被压碎的腿时，乔瓦尼还要忍痛帮医生举着火炬照明，然而这个医生使用锯子的技术实在不济，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终因伤势过重于11月30日去世。被任命为教皇军队将领的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曾多次警告乔瓦尼不要冒险激进，并且也在给克莱门特的信中督促他给乔瓦尼同样的建议：“他太重要了，显然敌人就是决心要夺他性命的。如果失去他，我们的损失就太大了。”现在圭恰迪尼为这些警告终究没有起作用而悔恨不已。他哀悼乔瓦尼时说：“在我们最需要勇气的时候，上帝却将最英勇的战士召去了。”

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死后不久，冯·弗伦茨贝格又接受了奥朗日王子菲利贝尔特（Philibert，Prince of Orange）的帮助，后者也是效力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于是德国人的队伍中又增加了一大批来自米兰的西班牙士兵。合并后的军队人数超过三万，继续往南向博洛尼亚行进。

现在教皇终于认清脱离可怕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尽力达成停战条约，而且敌军领袖似乎也正有此意，只是路德教派教士可不是长途跋涉

来换一个空手而归的。他们叫嚣要将罗马掠夺一空，除非得到一笔让他们满意的补偿。此时体形肥胖又已经上了年纪的冯·弗伦茨贝格熬不住艰苦的军旅生活突发中风，虽然主将被抬回了费拉拉，军队向罗马逼迫的脚步并没有停。在波旁公爵夏尔（Charles，Duke of Bourbon）迟疑不决的领导下，德国人已经表明了如果满足不了他们的目的，他们是不会遵从这个新长官的命令的。

如果换一个比波旁公爵坦率得多的将领，肯定会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很难掌控这支加速向罗马逼近的军队了。军队里的士兵们忍饥挨饿、衣衫褴褛，脏污的身体接受倾盆大雨的冲洗，在山间奔流的溪涧中步履蹒跚，需要手拉手才能勉力维持平衡。到5月4日，他们终于到达了伊索拉法内塞（Isola Farnese），仅距罗马7英里之遥。波旁公爵从这里派人传信到罗马，通知他们只有支付一笔让手下士兵满意的补偿才能免于劫难。

教皇并不想和敌人达成协议。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停滞已久的城市防卫措施。许多高阶神职人员和贵族们都清楚意识到了他们所面临的危险，早就逃走避难去了。其余的则忙着把自家财物隐藏好，或者是加强宫殿的防御，抑或是雇用更多的守卫来保护安全。然而教皇本人仿佛“陷入麻痹状态”一样，直到4月26日才开始向公众募集款项以支持罗马的防御；直到5月3日，在反复督促无效之后，他才以同意加封六名富人为枢机主教的方式筹集了二十万达科特。如圭恰迪尼说的那样：“教皇在痛苦中煎熬，筹钱这件事比毁掉教会和整个世界”更令他良心不安。5月4日，教皇最终召集了罗马大议会，并敦促人民在伦佐·达·切里（Renzo da Ceri）的带领下保卫城市。

然而，罗马人其实并不打算这样做。他们宁愿相信，逼近的敌人如果占领罗马，自己“也许能够和在教士统治之下享有一样的好处，甚至可能会过得更兴旺”。所以人们不但阻止了伦佐·达·切里炸断台伯河上的

大桥的想法，更有甚者，要不是被伦佐阻拦下来，市民们就要派遣信使去和波旁公爵达成单独的协议了。当卡比托利欧山上的大钟被敲响时，几乎没什么人响应钟声走出家门。最终伦佐集结了不足八千名士兵，其中还包括两千名瑞士卫兵和两千名乔瓦尼·德·美第奇黑衣军团（Black Bands）的成员。广阔的罗马城墙就要靠他们来守卫了。

---

[1] 此处与前文不符，应为菲奥雷塔·戈里尼。——译者注

[2] 又译作卡泰丽娜。——编者注

[3] 原文似有误，朱利奥1478年出生，应为45岁。——译者注

[4] 拉菲尔为克莱门特七世设计的别墅位于马里奥山上台伯河转弯处的莫雷桥边（Ponte Molle）。但是别墅在建成之前就被教皇的敌人枢机主教科隆纳在1527年罗马陷落时炸毁了。后来奥地利的玛格丽特重建了这座别墅并将其命名为马达马别墅（Villa Madama）。

[5] 圣洛伦佐教堂的新圣器收藏室，也就是人们所知的美第奇堂，是1534年由米开朗琪罗完成建造的。洛伦佐和朱利亚诺都被安葬在靠近入口处的《圣母和圣婴》（*Madonna and Child* ）旁边。内穆尔公爵朱利亚诺的石棺在右，公爵被塑造为教堂的神职人员，倚在他脚下的是被称为《昼》的男性雕像和被称为《夜》的熟睡的女性形象。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的墓葬在左，这位被马基雅维利以《君主论》致敬的公爵被描绘为一位军人，目光低垂，若有所思。他的脚下是名为《晨》与《昏》的雕塑。米开朗琪罗1534年离开佛罗伦萨时，美第奇堂的装饰还没有完成。为伟大的洛伦佐和朱利亚诺以及教皇莱奥十世建墓的计划后来也一直未能实现。十七世纪时，丹麦王子来到佛罗伦萨并参观了这座教堂，称其为“世界上最华丽壮观的艺术品之一”。

[6] 米开朗琪罗为劳伦齐安图书馆（Biblioteca Laurenzian）设计的华丽入口和楼梯在他离开佛罗伦萨时已经大体完工，未完成的部分由巴尔托洛梅奥·阿曼纳蒂和乔焦·瓦萨里依据米开朗琪罗留下的指示收尾。图书馆于1571年向公众开放。

第十九章 围困与谋杀

“温和的手段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1527年5月6日黎明时分发起的第一波进攻被教皇的枪手们击退了，不过没过多久，台伯河上升起了浓雾，在雾气的笼罩下，波旁公爵的士兵们沿着葡萄藤做的梯子爬上了城墙。波旁公爵本人被火绳枪的流弹击中，奥朗日王子把他抬到了附近的小教堂里。公爵最终不治身亡，此时进攻的军队已经跟着科隆纳领地一心要报仇的那批人以及其他一些劫掠者攻破了城池的守卫，并且扬言要攻入城市中心区。尽管守卫者们拼尽全力、英勇反击，但终究敌不过帝国军队巨大的人数优势。很快就有大批守军开始向圣安杰洛城堡的吊桥慌忙撤退，护城河吊桥上挤满了要抢着躲进城堡里的人，以至于很多人摔倒甚至被踩踏。

教皇此时也在逃向城堡。诺切拉（Nocera）主教发现教皇的时候，他还犹豫不决。于是他巧言说服教皇从连接教皇宫殿和圣安杰洛城堡的石头走廊逃走。路上大主教帮教皇提着圣袍的下摆以便让他能跑快点，同时还不忘用紫色的斗篷把教皇的头和肩部严实遮住，“以免下面的人群中有什么野蛮歹徒认出教皇的白色法衣，在他经过窗口时妄图行凶”。

确实有一些西班牙士兵向教皇开火了，不过教皇最后还是平安躲进了城堡。这里总共有三千多名难民，包括13名枢机主教，其中一个还是躲在篮子里被从高处拉进城堡的。从吊桥拉起的那一刻起，除了那些躲进防卫坚固的宫殿中的大家族，其余留在罗马城中的民众若还想有一丝生机，恐怕就只能寄希望于入侵者的仁慈了。结果证明，没有任何人受到了仁慈的对待。在当天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入侵者都在忙着抢占食物储备和寻找过夜之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5月7日这一天，入侵者血

洗了整个城镇，杀害甚至肢解了所有的居民，其残忍程度令人震惊。暴徒们还砸坏了教堂和修道院的大门，把避难的人赶到街上，把里面的铃铛和钟表、圣杯和烛台摔个粉碎，珍贵的宝藏被毁坏殆尽，连神圣的遗物都被用来做火绳枪射击的靶子，古代的手稿甚至被用来铺马圈。无价的祭祀礼服被随意地披在烂醉的妓女肩上；纯洁的修女被当作赌博的筹码几经倒手。马丁·路德的名字被用长矛刻在拉斐尔厅的壁画上。商店和房屋被抢劫得最为彻底，甚至连百叶窗上的合页以及门上的把手都被拆下来拿走了。有钱人被抓来做人质换取赎金，而穷人一旦被抓，就只能遭受折磨和屠杀。教士们被扒光衣服参与恶意歪曲的弥撒，还要被迫念诵亵渎神明之词，若不遵从就只有死路一条。圣坛之上溅满了血迹和酒渍，更有暴徒在此行淫秽或赌博之事，连十字架都被扔到了街上。为了戒指切掉一根手指，为了手镯砍断一条胳膊，为了耳坠割下一对耳朵之类的事不止一两件。一个商人因为付不起赎金被绑在一棵树上，每天被拔掉一个指甲，直到最终丧命。据统计，仅仅这第一天，就有超过八千人被残忍杀害。

在圣安杰洛城堡之内，有一位名叫本韦努托·杰利尼的不知疲倦、英勇无畏、积极振奋的神枪手，从他言过其实、自吹自擂的记述中看，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 我当时就在城堡里，正要去找一个负责管理枪械的炮兵领取武器，却发现他在凝望城墙之外他本来居住的地方，那里有他的房子以及还留在里面遭受欺凌的妻小。因为担心殃及家人，他不敢贸然向那里开炮，所以只能踩灭了导火线悲痛地哽咽出声。其他炮兵也都处于类似的两难境地。看到此情此景，我只好抓起一个导火线，在另几个不那么沉浸于悲痛之中的士兵的帮助下，摆好一些重型火炮和隼炮，向我认为有必要的地方开火。借此我打死了不少敌人……我不断地向敌人开火，一些枢机主教和贵族都在旁边给我祝福和叫好。在他们的激励下，我迫使自己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总之，我想说是因为有我的壮举才保住了城堡的安全……我就这么一直坚守着直到夜晚降临。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杰利尼“以无法想象的能量和热情”协助了“被

教皇指定来管理炮兵的罗马贵族安东尼奥·圣克罗切（Antonio Santa Croce）”。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杰利尼的行为。他先是和两个枢机主教“结下了深仇”，他命令这两个人从布置了火枪的高台上下来，因为他们“丑陋的红色四角帽从远处就能被发现”；接着他又因为用大炮投掷石头时打中了城堡的阳台，差点儿误杀了正好站在那里的另外两名枢机主教。不过据杰利尼自己说，教皇对他只有百般赞誉。他“没有一天不立下赫赫战功，在教皇心中的分量也与日俱增”。因此当他要求教皇赦免他所有的杀戮之罪时，

> 教皇在城堡中的教堂里举行了仪式，他举起自己的右手，小心地在杰利尼头上比画了一个大十字，然后祝福他，并原谅他已经犯下的和今后为教廷效力时可能会犯下的所有杀人罪行。

杰利尼还继续写道：

> 离开教皇后，我又爬上塔楼继续向敌人开火，几乎弹无虚发……如果我把在如地狱般的残酷战场上的所有壮举一一列举出来，恐怕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惊……所以我就略去大部分细节不谈，直接说教皇克莱门特因为担心属于教会金库的三重冕和大量珍贵的珠宝落入贼手……下令让我去把这些珍贵的宝石从镶嵌着它们的金质底座上取下，然后用纸包好，一起缝进教皇及其信任的仆人卡瓦列里诺（Cavalierino）的衣服内衬里。完成之后，教皇又把剩下重约200磅的金子交给我，让我偷偷地将它们熔掉。

每天天亮之后，教皇都会向北眺望，期盼着能有援兵来解救罗马于危难之中，然而这样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到了6月初，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围困之后，教皇不得不向皇帝的特使投降。与他一起避难于城堡中的难民们因为饥饿和疾病已经逼近死亡的边缘，而他期盼的援军也已经被逼退回维泰博了。教皇不得不将奇维塔韦基亚、奥斯蒂亚和摩德纳以及帕尔马和皮亚琴察的统治权移交给帝国军队，同时他还被要求交纳一笔巨额赔偿金，用于补偿科隆纳家族的损失，最后还要释放7名重要的人质，其中就包括雅各布·萨尔维亚蒂和洛伦佐·里多尔菲（Lorenzo Ridolfi）。

虽然教皇已经投降，但是在交纳全额赎金之前，他仍不被允许离开圣安杰洛城堡，现在这里成了囚禁他的监狱。转眼春夏已过，而教皇依然被扣留此地。帝国军队因为瘟疫和饥荒不得不撤出罗马，但留下了一支两千人的队伍镇守城池，以防被囚禁者伺机逃脱。到了12月初，德国和西班牙军队把城市附近的乡镇劫掠殆尽之后又回到罗马，扬言如果得不到拖欠的赔偿款，他们就要吊死守军长官，将教皇大卸八块。不过教皇得到消息说，看守愿意放他一条生路，所以在12月7日早上，教皇穿着他男管家的衣服，在少数几个人的陪同下逃出了城堡，朝奥尔维耶托（Orvieto）去了。那里有一座防卫坚固的主教宫殿，位置极其偏僻，只有帕利亚（Paglia）峡谷中的一条骡马道可走。教皇决定就在这里开始他复兴权势和名誉的大业。

这座位于奥尔维耶托的老城堡“已经破旧不堪，连房顶都坍塌了，只有30来个乌合之众听其差遣”。亨利八世的特使就是在这里向教皇寻求与阿拉贡家族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的许可的。克莱门特巴不得有这样一个可以获得亨利友谊的机会，但凯瑟琳又是查理五世的姑姑，所以现在身无分文的教皇能做的无非就是给英国国王一些模糊的承诺，说只要自己能回到罗马就一定会批准他的请求。事实上，教皇此时所想的是一些对他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没有什么比佛罗伦萨问题更令他担忧，因为罗马被屠城和他自己被囚禁已经在佛罗伦萨引起了极为不利的反应。

佛罗伦萨人非常厌恶居住在美第奇宫的教皇代表——那个无礼又贪婪的外国枢机主教西尔维奥·帕塞里尼（Silvio Passerini），陪同他的还有另外两名教廷代表，分别是枢机主教因诺琴佐·奇博（Innocenzo Cibo）和尼科洛·里多尔菲。佛罗伦萨人对于帕塞里尼的被监护人——两名年纪尚轻的美第奇私生子——也没有什么好感，不讨人喜欢的亚历山德罗更是不受爱戴。这两个男孩都在公共场合受过洛伦佐的孙女克拉丽切·斯特罗齐（Clarice Strozzi）的斥责，她曾经愤怒地指责他们根本

配不上美第奇这个伟大的姓氏，还说克莱门特本人也不配做教皇，就像帕塞里尼不配做教皇代表一样。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曾写信给教皇汇报市政厅附近的一起暴乱，在书信中他写道：

> 这样的事在我来这里不长的时间内就看到一千次了，这都是因为（帕塞里尼）这个阉人整日无所事事，忽略了重要的事情……他尽其所能地让自己和所有人看起来更值得怀疑，让所有人都感到绝望，而且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无能。

圭恰迪尼还认为，帕塞里尼的两个被监护人和他一样应当受到斥责。

毫无疑问，佛罗伦萨人都同意圭恰迪尼的观点。当罗马陷落的消息传到佛罗伦萨之后，人们纷纷涌上街头，高喊着口号、唱着感恩歌曲以示庆祝。帕塞里尼和两个被监护人刚一逃走，人们就把圣母领报教堂里的教皇雕像扔到广场上砸了个粉碎，并且大声宣布要订立新宪法，重建大议会和民兵组织，选举反美第奇的尼科洛·卡波尼（Niccolo Capponi）为首席执政官，组建政府并任职一年。美第奇宫虽然有重兵把守以防止暴徒们冲进去抢劫，但是他们还是没能阻止吉贝尔蒂的一个后人在宫殿正面墙壁上画了一幅教皇沿着梯子爬上绞刑架的壁画。

教皇尽管目前势力衰微且财力不济，但还是决定不再放任局势恶化下去。法国军队的帮助是指望不上了，虽然他们又一次出兵意大利，并且一度前进到那不勒斯，但是瘟疫摧毁了他们的战斗力，法国人不得不又一次向西班牙人投降。鉴于此，教皇最终决定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达成协议，并于1529年6月29日在巴塞罗那正式签署。该协议规定，教皇将承认皇帝在意大利的地位，并在皇帝到达之后为他举行加冕仪式，而查理则保证让美第奇家族重掌佛罗伦萨，如有必要不惜提供武力协助。

一些年长的也更谨慎的佛罗伦萨市民觉得，鉴于教皇以前对佛罗伦

萨政府的安排也不是太过分，所以接下来应当考虑如何与教皇达成协议，他们还提出了一些互相妥协的条款。然而年轻一些的市民则拒绝接受这种懦弱的建议，他们的爱国热情也代表和鼓动了更大部分的佛罗伦萨人。这些人组建了民兵队伍，筹资雇用更多兵士，又把郊外一些可能为帝国军队提供庇护的乡村别墅拆除了，另外还加固了自己城市的防御设施。这些武装力量的指挥权最后被交给了佩鲁贾的雇佣军首领马拉特斯塔·巴廖尼（Malatesta Baglioni），他的父亲就曾经参与过针对美第奇的战斗，这次他为佛罗伦萨效力就是要顺势回到自己的城市重掌大权。与此同时，最具独创性的米开朗琪罗被指定监督防御工程，他那充满启发性的雕塑《大卫》此时就竖立在市政厅。[1]

根据米开朗琪罗的建议，城市的防卫城墙应当延伸至将圣米尼亚托山也包括进来，而教堂的钟楼应当加装混凝土垫层以抵挡炮火的攻击。在这些工程将近完工之前，米开朗琪罗突然失去了勇气，逃出了佛罗伦萨。虽然没过几天他又回来了，但是并没有重新承担起丢下的责任。他的这种表现后来被归因为艺术家的古怪脾气而非临阵脱逃，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原谅。

到此时为止，教皇已经获得了奥朗日王子的协助。当初这个冒险家带领帝国军队攻陷了罗马，现在又是他，带领着一支同样目无法纪、主要由西班牙人组成的队伍来攻打佛罗伦萨了。这支队伍于1529年初秋时节抵达了佛罗伦萨外围的山坡。据说当时他们对城内大喊："佛罗伦萨，把你们精美的锦缎都搬出来吧，我们要用长矛丈量你们的布料。"尽管这支军队有四万人之众，王子仍然不认为他的手下强大到能够听从命令打赢一场攻坚战，所以最后还是决定采取围城的策略，把佛罗伦萨耗到弹尽粮绝、主动投降。

多亏了有军事才能且英勇无畏的佛罗伦萨将领弗朗切斯科·费鲁齐（Francesco Ferrucci）[2] 组织突击队保证了城内供给线路的畅通，佛罗

伦萨才能在围困之下坚持十个月之久。不过到了1530年8月3日，费鲁齐在皮斯托亚附近山区里一个叫加维纳纳（Gavinana）的村子中陷入一队西班牙士兵的包围，最终被乱刀砍杀了。他的牺牲也导致佛罗伦萨的彻底崩溃。没过几个星期，投降似乎成了必然的选择。虽然马拉特斯塔·巴廖尼走在街上时还戴着写有“自由”（*Libertas* ）字样的帽子，但是背地里他已经和敌人达成了秘密协定。市民们都在遭受着瘟疫和饥饿的折磨；有些沿街乞讨的可怜人甚至叫喊着只有美第奇回归才能不再挨饿。贝尔代托·瓦尔基（Benedetto Varchi）记录说：

> 所有人都要被恐惧和困惑逼疯了。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或是去哪里。有些人想要逃跑，有些人开始躲藏，还有些人则到市政厅或教堂里寻求庇护。大多数人选择听天由命，过一个小时算一个小时，等待他们的可能只有死亡，而且是最可怕、最残酷的死法。

弗朗切斯科·费鲁齐牺牲几周后，一个由佛罗伦萨市民组成的代表团同意接受皇帝和教皇代表提出的投降协议。他们被迫交出50名人质作为如约支付巨额赔偿款的保证；把仍由佛罗伦萨占领的堡垒都移交给帝国军队；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美第奇支持者；只有满足这些条件，城市的自由解放才会获得保障。同时教皇还承诺宽恕所有“市民带来的伤害”，教皇会以“他一贯的关爱和仁慈之心”来对待他们。虽然没有哪一方会指望教皇遵守这一承诺，后来事实也证明，教皇的确再一次食言了。

查理五世的代表进入佛罗伦萨一个星期之后，市民们被召唤到市政厅广场上举行市民议会，内容是投票决定建立最高司法委员会。随后一个由美第奇控制的最高司法委员会组建了起来，教皇的一名坚定支持者被任命为首席执政官。而在帝国军队逼近佛罗伦萨之前就逃离这里的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也被请回来负责监督“改革”和报复措施的执行。

圭恰迪尼在9月24日到达时就发现：

> 这里的人民已经疲惫不堪，资源也已经消耗殆尽，佛罗伦萨城外几英里之内的乡镇都被摧毁了，很多佛罗伦萨辖属的乡村里，农民数

量锐减，几乎没有多少老百姓能幸存下来。

连圭恰迪尼自己的乡村别墅也被毁了。他很快就下定决心，如果这个国家还想重新“振兴起来，温和的手段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所以，他后来也不再采取什么温和的手段了。一个被称作“愤怒者”（*Arrabbiati*）的极端反教会团体的首领弗朗切斯科·卡波尼（Francesco Capponi）受到了酷刑的折磨，并最终被处决。他的一些支持者也落得相同的下场。新当选的首席执政官拉法埃拉·吉罗拉米（Raffaele Girolami）也被判处了死刑，不过最终减轻为终身监禁。还有大批市民领袖被判处了永久流放。

为了取代这些人在城市政府中的位置，教皇让此时已经19岁的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Alessandro de’Medici）回到佛罗伦萨。教皇不但从查理五世手中为这个有着浓黑卷曲头发的年轻人买下了彭内公国（Dukedom of Penne），还希望他将来可以迎娶皇帝的亲生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

教皇余生再也没有回过佛罗伦萨，然而这个城市的未来就这样被他果断粗略地确定了下来。教皇又把另一个美第奇家族的私生子伊波利托封为枢机主教——虽然这个乐观、爱交际、奢侈纵欲的年轻人并不喜欢这样的安排——然后就开始把全部的精力投到了这个家族最后的资源上——年仅12岁的凯瑟琳·德·美第奇——一个苍白、瘦弱，长相平平但意志坚定的小女孩儿。教皇对她寄予厚望。有传闻说，教皇之所以封伊波利托为枢机主教，就是为了让他无法成为凯瑟琳缔结婚约的对象，因为凯瑟琳似乎对这个男孩儿表现出了过分的喜爱，而克莱门特绝对不会允许这个女孩儿选择一门无论是对美第奇家族还是对教皇本人都没有什么利益可图的婚事。实际上，他已经打算让她嫁给法国国王的儿子了。

如此有野心的计划当然需要极为精巧的策划。教皇既不能表现得太热切，又不能不征求帝国皇帝的许可。他把这样一个角色扮演得出神入

化。威尼斯的大使就完全被教皇骗到了，根本没想过教皇其实早已暗中认定这门亲事；而皇帝则以为法国宫廷一定不会同意这样的安排，所以当教皇到博洛尼亚寻求他的许可时，他完全没有把这当成什么大事就随口同意了。然而，令皇帝非常意外的是，法国人丝毫没有反对这门亲事。于是在1533年10月28日这一天，教皇在马赛亲自主持了14岁的乌尔比诺女公爵凯瑟琳·德·美第奇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二儿子——奥尔良公爵亨利·德·瓦卢瓦（Duke of Orleans Henri de Valois）的婚礼。

这次婚礼也是克莱门特的最后一次成功了。他在前往马赛主持典礼之时就已经病了；而婚礼之后，满载着最终由罗马和佛罗伦萨的纳税人埋单的昂贵礼物回到梵蒂冈时，教皇已经是个将死之人。此时的他骨瘦如柴、形容枯槁，本来就有一点斜视的右眼几乎完全失去了视力，肝病又使他的皮肤总是苍白中透着蜡黄。让他烦忧的还有来自各方的麻烦事：英国在与他争论罗马教廷至高无上（the Holy See）的地位问题；皇帝因为对美第奇家族与法国结亲不满而对教皇敌意日盛，重新提出组建教会大议会（General Council of the Church）的要求；而最令教皇发愁的，莫过于伊波利托和亚历山德罗之间持续的不和，以及由此可能招致美第奇家族再一次失去佛罗伦萨的危险。

1534年9月22日这天，当本韦努托·杰利尼去向教皇展示自己为他设计的模型时，发现教皇躺在床上，病情急剧恶化：

> 教皇命人取来眼镜和蜡烛，即便如此他依然无法看清楚我的作品。于是他改为用手指触摸模型的方式来鉴别。抚摸了半天之后，教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对自己的一个朝臣说觉得对不起我，如果上帝能恢复他的健康，他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报酬。又过了三天，教皇就去世了。

杰利尼承认当他亲吻去世教皇的双脚时，眼中不禁充满了泪水，可是除他之外没有人为教皇哀悼。相反，罗马为此而欢庆。像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形容的那样，教皇是“费了很大力气才从一个伟大且受尊敬的枢

机主教变为一个渺小而不被尊敬的教皇”。每天夜里都有人闯进圣彼得大教堂，教皇的尸体被用剑钉在棺材板上；暂时的墓碑上被涂抹了污物，连下面篆刻的碑文“至尊克莱门特教皇”（*Clemens Pontifex Maximus*）也被恶意涂改为“至恶的教皇”（*Inclemens Pontifex Minimus* ）。[3]

教皇的死讯让佛罗伦萨有一种更加不祥的预感。人们认为教皇死后，这个被很多人怀疑是教皇私生子的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会迫不及待地抛开所有约束，组建一个更符合他心意的专制政府，尽管到目前为止他一直表现得小心翼翼。进入佛罗伦萨9个月以来，他公开承袭了公爵的头衔，但是为了安抚由此引发的共和派的愤怒和质疑，他一直被要求征询和考虑佛罗伦萨市民议会的意见和建议，而他也确实照做了一段时间。所以人们渐渐感到安心了，甚至愿意勉强地认可，这个脾气暴躁、举止粗鲁的年轻人等成熟一些之后，身上没准也是有一些优点的。

此时教皇的死讯传来，人们又重新开始担心起来，而冬季结束之前，人们的担心似乎就要变为现实了。亚历山德罗连假装征求市民议会建议的样子都不再做了，不但变本加厉地实行独裁统治，在私生活上也越来越放纵淫乱。而他让佛罗伦萨人出离愤怒的行径绝不止这一桩：市政厅钟楼上的大钟依他的命令在市政厅广场上当众砸毁，以此象征共和制度的终结；然后他又让人把大钟的金属熔掉重铸成象征他家族荣耀的奖章；刚刚扩建的位于阿拉朱斯蒂齐亚门（Porta alla Giustizia）的堡垒大门上也被刻上了美第奇家族的纹饰；[4] 任何武器都要被收缴扣押，即便悬挂在教堂里的作为敬献的武器也不例外；他还修建了一座巴索堡垒（Fortezza da Basso）[5] ——“威尼斯、锡耶纳、卢卡和热那亚已经证明，它对于一个自由城市而言完全没有必要”。有人偷偷谈论着暗杀暴君的计划，但是反对用暴力脱离目前困境的人则主要担心招致帝国军队的武力干涉，毕竟不久前的围城惨状还历历在目。有一段时间人民寄希望于嫉妒心强的伊波利托能够出面解决佛罗伦萨人的麻烦；而且伊波利托也确实同意要将亚历山德罗的行径报告至查理五世的宫廷之上；不过

伊波利托还没有采取行动，就于1535年8月10日在伊特里（Itri）去世了，死因有可能是疟疾，但也有可能是被毒害死的。他的尸体被一些强壮健美的运动健将抬回了罗马——其中有摩尔人、鞑靼人、土耳其人、黑人摔跤手和印度潜水员，因为他曾经幻想着和这些人一起远游。

被佛罗伦萨驱逐的流亡者领头人们在查理五世面前列举了亚历山德罗的种种劣迹。他们的代表，历史学者雅各布·纳尔迪，讲述了公爵种种令人惊骇的恶行，还说佛罗伦萨此时笼罩在巨大的恐惧中，震慑住她的是“一座阴森的堡垒，一座用她悲苦人民的血汗为其不幸市民建造的囚笼和刑场”。不过，皇帝虽然承诺“要伸张正义”，但是比起纳尔迪的指控，他更愿意相信亚历山德罗的首席幕僚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强词夺理、混淆视听的辩驳。圭恰迪尼甚至这样恬不知耻地总结自己的陈述：“对方那些关于女性、强奸及类似行为的污蔑我们无意一一驳斥；但是公爵大人的美德、名望，城市中人们对他的看法，以及其审慎和良好的品行就是对此最好的回击。”

确认了自己未来女婿的优良品德，皇帝自然不愿意承认那些对他的控诉。亚历山德罗与14岁的玛格丽特的婚礼也如期举行了，回到佛罗伦萨之后，他对城市的控制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他也志得意满地准备利用好运大展宏图。不过短短几个月之后，他就一命呜呼了。

洛伦扎乔·德·美第奇（Lorenzaccio de’Medici）是皮耶尔弗兰切斯科的儿子，也是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的远房亲戚。这个清瘦、平凡、愁容满面的年轻人因为有一些怪癖而一直名声不佳。在过去几年中，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罗马，但是因为他一喝醉酒就喜欢乱砍古董雕塑的脑袋，所以被人赶了出来。于是他来到佛罗伦萨投靠亲戚，年长三岁的亚历山德罗，并成了后者的一名陪同。他们两人花天酒地，纵容自己男扮女装的嗜好；有时两人同骑一匹马在街上狂奔，对过往行人大喊大骂；有时他们还会同床共寝。亚历山德罗也不知道该拿洛伦扎乔怎么办，但

是他显然非常喜爱这个亲戚。后者神秘的微笑和精妙模糊的言辞总会勾起亚历山德罗的兴趣，他甚至还给洛伦扎乔取了个昵称叫“哲学家”。不过，洛伦扎乔显然不是真心喜欢亚历山德罗的，他嫉恨他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总幻想着自己能成为一个英雄，甚至是枭雄也好，只要有名，美名或恶名都没关系。最终，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诛戮暴君的角色。

为此洛伦扎乔设计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计划。他有一个貌美的亲戚卡泰丽娜·索代里尼·吉诺里（Caterina Soderini Ginori）。她是一位目空一切的傲慢女士，因优雅的举止和对年老无趣的丈夫忠贞不渝而备受赞赏。洛伦扎乔对亚历山德罗说：只有能把卡泰丽娜勾引上床，才能算得上真正的风流人物。如果亚历山德罗愿意试试自己的运气，他可以找个借口安排两人独处。时间就定在了星期六晚上，正好是主显节之夜，这样的公共节日里，没人会注意卡泰丽娜或亚历山德罗去了洛伦扎乔的房子里。亚历山德罗高兴地同意了，并在指定的时间如约前往洛伦扎乔的房子。他把侍卫都留在了室外，解下了佩剑，脱光了衣服躺在床上等待卡泰丽娜的到来。当房门发出轻响时，亚历山德罗已经快睡着了。然而进来的人并不是卡泰丽娜，而是洛伦扎乔和他雇佣的杀手斯科龙科洛（Scoroncolo）。洛伦扎乔接近床边，一边低声问“你睡着了吗”，一边用尽全身的力气猛刺亚历山德罗的腹部。当他伸手捂住亚历山德罗的嘴以免他叫喊的时候，亚历山德罗狠狠地咬住了他的手指，伤口深得露出了骨头，另一边的斯科龙科洛则直接把刀捅进了亚历山德罗的喉咙。带着满身的血迹，把被严重咬伤的手用手套包起来之后，洛伦扎乔跑了出去，一路狂奔经斯卡尔佩里亚（Scarperia）逃向了博洛尼亚。至于佛罗伦萨人在发现亚历山德罗被刺杀之后会做何反应，就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吧。

洛伦扎乔逃跑时还拿走了自己房间的钥匙，为的就是保证在他逃出佛罗伦萨边境之前，没人会发现他家中的尸体。他也没有让政府中的敌对势力知道自己的计划，防止他们第一时间利用这一事件。因为依照贝

尔代托·瓦尔基的观点，当时如果有一个人立即站出来领导一场革命的话，美第奇一派可能就会被彻底推翻。意识到这了一点，“圭恰迪尼，也是毫无争议的帕莱斯奇领袖，以及枢机主教奇博和亚历山德罗之前的朝臣们无不感到惊恐万分……市民们大多是对他们怀有敌意的，而他们现在手里又没有任何武装力量”，因为此时公爵的侍卫亚历山德罗·维泰利（Alessandro Vitelli）带领着几名手下都到卡斯泰洛城去了。

枢机主教奇博是第一个意识到亚历山德罗可能有危险的人。星期天早上，亚历山德罗的侍卫去向他询问还要在洛伦扎乔的房子外面站岗多长时间。奇博一边命令他们继续站岗，原地待命，一边警告他们不许对任何人提及在这里站岗的原因。奇博随即确认了亚历山德罗确实没有偷偷回到自己的住处，然后就对外宣布公爵昨晚操劳过度仍在卧床休息。直到当天晚上，洛伦扎乔的卧室房门才终于被砸开，而亚历山德罗遇害的消息则是第二天才传到反对者们的耳朵里。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错过了，维泰利已经回到了佛罗伦萨，帕莱斯奇们也已经控制住了局面。一群有意进行革命的人士向弗朗切斯科·韦托里寻求建议，因为他被认为是反对美第奇统治的市民中最德高望重的代表。尽管韦托里给出了一些愿意支持革命的模糊承诺，但是他心中清楚起义的时机已过。这边众人刚走，他就匆匆赶去拜访了圭恰迪尼，打算把自己的运气赌在帕莱斯奇上。

星期一早上，帕莱斯奇们都聚集到了市政厅，这里现在已经被更名为旧宫（Palazzo Vecchio）。他们是来讨论继承者的人选的。枢机主教建议由亚历山德罗4岁的私生子朱利奥（Giulio）继承公爵的头衔，并由他本人担任摄政王。不过这个建议被其他人否决了。他们建议把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deici）请回来。科西莫是伟大的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和玛丽亚·萨尔维亚蒂（Maria Salviati）的儿子，而玛丽亚又是伟大的洛伦佐的外孙女。这个年轻人品德优良，没有什么执政经验，绝对不会成为像亚历山德罗那样邪恶的统治者。事实上，圭恰迪尼不仅

想通过控制科西莫来实现自己控制政府的愿望，更是打着把女儿嫁给科西莫的如意算盘。所以圭恰迪尼早已派人去穆杰洛的特雷比奥别墅，马不停蹄地将这位17岁的少年请回佛罗伦萨。

第二天，这一提议被提交到委员会以求通过，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一做法。反对者之一的帕拉·鲁切拉伊（Palla Rucellai）就勇敢地宣称“共和国不需要公爵，不需要领主，也不需要王子”。他还把一颗白豆子扔进了桌上的骨灰瓮中，同时补充道：“这就是我的投票，同意不可能，要命有一条！”

圭恰迪尼机敏地还击道：“没有人能够容忍再让一群暴徒来管理佛罗伦萨的政务。”他并不是提议让科西莫世袭公爵，而只是选举他为共和国领袖，并且遵从宪法的规定和约束，同时也接受“顾问团”（magnificent Counsellors）的建议。争论持续了数个小时，要不是护卫队长维泰利果断干涉，可能还会持续更久。为了收买他对科西莫的支持，圭恰迪尼已经承诺日后封他为圣塞波尔克罗镇的领主。于是在讨论陷入僵局之时，维泰利故意安排手下去会议室窗口下面扭打吵闹，还有人大喊：“科西莫，伟大的乔瓦尼之子，他就是佛罗伦萨的公爵！科西莫！科西莫！科西莫！科西莫！”然后另一个充满权威的声音传来：“快点决定吧，我们快要抵挡不住要冲进来的士兵了！”

事情最终有了结果。科西莫的当选得到了通过，圭恰迪尼期待借着他的名义行使权力。而那些了解科西莫的人则难免怀疑圭恰迪尼是否真的能把科西莫控制在自己手中。就像本韦努托·杰利尼评论的那样：

> 他们给一个年轻人一匹好马，然后告诉他只能在划定的圈子里面走走。那么谁能告诉我，当这个年轻人想要到圈子外面策马狂奔的时候，谁又能拉得住他呢？你怎么可能给你的主子立规矩呢？

---

[1] 米开朗琪罗的《大卫》是1501年皮耶罗·索代里尼当选首席执政官后向他订制的，米开朗琪罗于1504年完成了雕像的创作。波提切利想将雕塑摆在佣

兵敞廊，也有人认为放在大教堂的台阶上更合适，最终它被摆在了市政厅前方。1527年的暴乱中，雕塑的一条胳膊被损坏了，但是它仍然立在这里直到1873年才被替换为仿品。在风吹日晒雨淋的侵蚀下，雕塑头发和胸前衣带上的镀金都已经磨损了，真品现在陈列在学院美术馆。
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复制品左侧（挨着多纳泰罗的《朱蒂斯和贺棼尼》）是象征着佛罗伦萨的《狮子像》（*Marzocco* ）。这里摆的也是复制品，真品是多纳泰罗在1418～1420年创作的，现陈列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十四世纪时，城市里养的狮子从圣乔瓦尼广场迁走后被安排在了市政厅广场；到了十六世纪，公爵科西莫一世占据了市政厅，因为嫌弃狮子的气味，把它们都迁走了。现在的莱奥尼街（Via Dei Leoni）就是当初养狮子的地方。《大卫》右边的《赫拉克勒斯和卡库斯》（*Hercules and Cacus* ）由巴乔·班迪内利在1534年完成。本来赫拉克勒斯的雕塑也是计划由米开朗琪罗创作的，但是教皇莱奥十世显然担心米开朗琪罗会借此机会用雕塑来赞美已覆灭的共和国的美德，所以下令把大理石料交给巴乔·班迪内利进行创作。克莱门特七世也认可这一决定，不过他的目的是让米开朗琪罗全心全意为美第奇家族工作。

[2] 弗朗切斯科·费鲁齐的出生地是圣神教堂街32号。如同其他许多佛罗伦萨英雄一样，每年都会有人在这里摆放花环以示怀念。

[3] 克莱门特七世最终被放在了一个出自罗马万神殿的精致的斑岩骨灰翁里，埋葬在拉特兰的圣约翰教堂大殿的科尔西尼堂。

[4] 阿拉朱斯蒂齐亚门是现在的皮亚韦广场（Piazza Piave）。

[5] 令人敬畏的专制象征巴索堡垒，面积达到了12万平方米，是佛罗伦萨最大的历史遗迹。这一工程的奠基日是1534年7月15日，这是由当时高明的博洛尼亚占星师挑选的吉日。为了清除障碍，连本来位于这里的圣乔瓦尼埃万杰利斯塔修道院都被拆毁了。

第四部分 1537～1743

第二十章 公爵科西莫一世

“从人们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喜悦”

科西莫出生在佛罗伦萨的萨尔维亚蒂宫（Palazzo Salviati）。这座巨大而阴郁的宫殿是他母亲玛丽亚的家族宫殿。玛丽亚的父亲是贾科莫·萨尔维亚蒂（Giacomo Salviati）[1]，他娶了教皇莱奥十世的姐姐卢克雷齐娅。玛丽亚的儿子出生时，教皇莱奥十世作为教父给孩子取名为科西莫，说是为了“重新唤起对美第奇家族有史以来最智慧、最勇敢、最审慎的祖先的怀念”。

玛丽亚非常喜欢自己的教皇舅舅，而且连长相上都遗传了舅舅的一些特点。她的眼睛又大又黑，脸圆乎乎的，因为使用了过多的化妆品，所以肤色白得有些不自然。她这么做无非是为了能对丈夫多一分吸引力，可事实上，她丈夫更喜欢外面的女人，这件事对她而言根本不是秘密了。起初她还黯然神伤，后来就只剩下愤怒和怨恨。玛丽亚几乎见不到自己的丈夫，因为他总是出去打仗，偶尔回到佛罗伦萨也不会在家多做停留。有一个关于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回家探望的故事是这么讲的：一次，他骑着战马从科尔索（Corso）回到佛罗伦萨，经过自己宫殿时，乔瓦尼看到保姆抱着儿子站在楼上的窗口边，于是就对保姆喊道：“把他扔下来！”保姆自然不敢遵从这样冒险的指令，于是乔瓦尼又喊道：“把他扔下来！我命令你扔。”保姆只好伸着胳膊把孩子送出窗口，闭着眼睛狠下心松开手。乔瓦尼接住孩子亲了亲。孩子没有因为被

从高处扔下或被久违的父亲亲近而哭闹，这样平静的表现让乔瓦尼很是满意，他甚至大声宣布道：“好！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王子！这是你的命运。”

科西莫见到父亲的机会不多，所以对他也没有很深的感情。科西莫的家庭教师描述说，当听到乔瓦尼在为了阻止德国人跨过曼图亚附近河流的战役中受了致命伤的消息时，科西莫“并没怎么哭泣，而只是说了句‘其实我已经猜到了’”。当时科西莫年仅7岁，身体健康、样貌英俊，在同龄孩子里面算高个子，总是喜欢把栗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由于亚历山德罗和伊波利托以克莱门特七世门徒的身份来到佛罗伦萨后时局并不稳定，所以科西莫一家迁到了威尼斯生活。后来他们来到了博洛尼亚，从博洛尼亚又到了乔瓦尼在特雷比奥的别墅，然后离开这个别墅回到了博洛尼亚。在那里，他的祖父雅各布·萨尔维亚蒂（Jacopo Salviati）监督他断断续续受到影响的学业。过了一段时间，科西莫又从博洛尼亚去了热那亚，之后他回过一次佛罗伦萨，然后就离开去了那不勒斯。

科西莫的一位家庭教师就曾暗示，这样漂泊不定的生活对科西莫没有什么益处，反而让他变得心绪不稳，无法把精力集中到学业上，他总是想扔下书本跑到乡间玩乐或是去士兵的营帐中寻求刺激。事实上，科西莫一心想要成为一名军人。教皇克莱门特接到的汇报中说，科西莫14岁时就已经“在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上都像一名骑士一样”。汇报中还说科西莫身边总是围绕着一批曾经在他父亲麾下效力的军官。这些信息令教皇极为忧心，于是他派人传话给科西莫，要求他换掉“奇装异服”改穿普通的佛罗伦萨长袍。科西莫虽然生气，但也只能不情愿地服从教皇的命令。

不过，科西莫并不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愚笨青年。他举止优雅、态度冷淡，精明而不多言。虽然学问上难免有薄弱缺漏之处，但他乐于弥

补改进，而且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那些知识一旦补上了就不会忘掉。有些人已经发现了他性格中的一个隐秘特点，而这个特点后来给他带来了恶名；也有些人憎恶他的冷酷无情，这种本性使他对残忍和暴行无动于衷；还有些人则有理由坚信科西莫会成为一个严厉独裁的暴君。然而，按照贝尔代托·瓦尔基的说法，人们对科西莫的普遍看法是这样的：

> 科西莫享有一万二千达科特的私人收入，他本可以把时间都消磨在打猎、捕鸟、钓鱼这些他最热衷的玩乐上，让圭恰迪尼和其他少数几个人掌控佛罗伦萨政府，直到把这个国家的资源用光耗尽为止。然而背着主人算计他的利益可不是什么好事，一直被认为不乏常识但反应迟钝的科西莫此时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理解力。整个佛罗伦萨的人民奔走相告，原来科西莫不仅仅是获得了一个国家，他还拥有上帝赐予的智慧。

科西莫不相信任何人。他不相信枢机主教奇博，也不相信亚历山德罗·维泰利，更不相信圭恰迪尼。他觉得这些人都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他，而他已经决定不受任何人摆布。科西莫愿意听取才华横溢的秘书弗朗切斯科·坎帕纳（Francesco Campana）的建议，还可以从母亲那里获得一切关于佛罗伦萨主要家族的信息；然而即便是对这两个人，他也不会表露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所有的决定都最终由他一人做出。

他的反对者们就远没有他这么果敢坚决了。社会底层民众之所以选择支持科西莫，是因为之前的共和国并没有给这一群体带来什么好处；还有一批人是因为愿意支持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的后人而团结在一起的；除此之外重新组建起来的民兵组织和佛罗伦萨几个最重要的贵族家庭也都是支持科西莫的，这样科西莫的势力就渐渐压制住了他的敌人们。科西莫在西班牙军队的帮助下，化解了被流放者团体（*Fuorusciti*）的威胁。那些被从佛罗伦萨驱逐出去的人团结在一起，打算策划推翻科西莫的统治。1537年7月，被流放者军队在普拉托附近的蒙泰穆尔洛

（Montemurio）被彻底击溃。据当时一个锡耶纳人的观察记述，这场战役胜利之后，“小球！小球！胜利！胜利！”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佛罗伦萨。“欢乐的气氛充满大街小巷。科西莫宫殿一层的窗口处不断有人向外抛掷面包。还有两根木质的管子伸出窗外，里面不停地流出葡萄酒。”

这样的免费娱乐其实是精心策划的结果，所谓的欢庆并非真的如那个锡耶纳人看到的那样源自全体群众自发一致的感受。被流放者军队中有许多年轻人都是佛罗伦萨最卓越家族的后人，而带领他们的则是皮耶罗·斯特罗齐，也就是伟大的菲利波（the great Filippo）的儿子。皮耶罗虽然得以逃脱，但是他的一大批同伴都被俘虏，在经历了耻辱的全城游街示众之后，又被判处了严酷的刑罚。16人被判处死刑，还有很多人死在了牢狱中；侥幸逃亡他国避难的，也都被追查出来暗杀了。

流放者叛乱中被俘虏的四个领导者被处以砍头的极刑，连续四天，每天在市政厅广场上当众斩首一人。处理完了流放者，科西莫又把注意力转向了如何将仍占据着托斯卡纳地区堡垒的西班牙驻军赶走的问题。起初帝国皇帝不肯批准科西莫的要求。他打算承认科西莫的佛罗伦萨公爵身份，但前提是佛罗伦萨公国必须成为帝国的封地。皇帝既不同意将西班牙军队撤出意大利，也不同意科西莫与亚历山德罗年轻的遗孀玛格丽特的婚事，而是把女儿改嫁给了奥塔维奥·法尔内塞（Ottavio Farnese），也就是克莱门特七世的继任者新教皇保罗三世（Paul III）的孙子，因为皇帝觉得此时拉拢教廷比联姻佛罗伦萨更重要。不过科西莫还是设法为自己敲定了一门在政治上有利可图的婚事。他娶了堂·佩德拉·德·托莱多（Don Pedro de Toledo）的女儿埃莱奥诺拉。托莱多不但富可敌国，而且是那不勒斯的西班牙总督。[2] 科西莫结婚后没过多久，皇帝与教皇的关系就出现了紧张。皇帝开始意识到获得佛罗伦萨公爵的支持对自己来说十分重要，于是同意了将西班牙军队撤出托斯卡纳地区。

摆脱了外国势力之后，科西莫也差不多排除了政府中各个大臣对他的干涉。虽然执政团和首席执政官办公室已经依法裁撤了，但还是有各种委员会和顾问团存在。不过公爵作为所有组织的主席，可以很轻易地确保他们不会做出任何他不认可的决定。久而久之，科西莫甚至都不再费事与他们协商。圭恰迪尼和韦托里被“晾在一边”；而根据路易吉·阿尔贝托·费拉伊（Luigi Alberto Ferrai）的说法，枢机主教奇博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并且“是以一种极其高明的手段，既孤立了他，又不刺激到他”。

然而，科西莫本质上毕竟不是一个圆滑机智的人。恰恰相反，有时他唐突直率的程度甚至到了粗暴苛责的地步，而且常常没有礼貌，无故出言不逊。至于他处置反对者时表现出来的严厉无情更是不会因为反对者的歉疚和悔恨而有丝毫动摇。无论是把真正的或假想的敌人投入最可怕的沃尔泰拉地牢，还是雇佣杀手暗杀难缠的持异议者或危险的敌对者，都不会让他有丝毫良心上的不安。科西莫曾像被放逐者一样经历了颠沛流离的十年，其间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辩护书》（*Apologia* ）的作品来庆祝暴君被诛，以显示自己的无私和美德。然而刺杀亚历山德罗的洛伦扎乔最终在威尼斯的圣托马桥（Ponte San Toma）附近被人找到，并且被用抹了毒药的匕首刺死了。同样，为了摆脱圣马可的多明我会教士，科西莫指责他们“公开反对国教”，然后毫不犹豫地将他们驱逐出了修道院。对于教士们的强烈抗议，科西莫冷酷地回答道：“我的神父们，请问是谁修建了这座修道院？是你们自己吗？”

“不是。”

“那是谁允许你们居住在这里的？”

“是过去的佛罗伦萨人民和我们永远怀念的长老科西莫。”

“那就对了。如今是现在的佛罗伦萨人民和科西莫公爵要把你们赶

出去。”

佛罗伦萨的主人科西莫在经历了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战争之后，又成了锡耶纳的主人。这场战争从1554年开始，但是直到1557年，将这里作为西班牙封地由科西莫及其后人占有的权力要求才被批准。此时，锡耶纳已经受到了战争的重创，人口从一万四千锐减到六千，连附近的区域也遭受了毫不留情的掠夺和破坏。他们对佛罗伦萨人的仇恨自此深植于心中，历经几代都未曾消退。科西莫在佛罗伦萨的敌人们则用嘲笑和鄙视的口吻指责他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只为了在一个千疮百孔、年收入不超过五万达科特的锡耶纳封侯。

科西莫本人当然不满足于只得到一个锡耶纳。他想要的是大公的头衔，而这是只有教廷才有权力加封的爵位。事实上，科西莫实现这一野心的欲望已经强烈到近乎疯狂，他不间断地向有权加封他的机构提出要求，直到最终实现愿望。教皇庇护五世（Pius V）在1569年赐予了科西莫大公的头衔。

这一年的12月，当佛罗伦萨敲响钟声、点燃篝火、鸣响礼炮庆祝科西莫的新头衔时，有人却注意到“人们的脸上看不出多少真心的喜悦”。然而，仅仅两年之后，佛罗伦萨又一次敲响钟声，点燃庆祝篝火，教堂里的人们发自内心地唱起了赞美诗（Te Deums）。这种喜悦才是自发的、真挚的；所有人都认可他们尊贵的大公——现在已经被敬称为“殿下”（*Altezza* ）和“阁下”（*Serenissimo* ）——这一次理应受到赞美。在勒班陀之战（Lepanto）中，佛罗伦萨的船队为把土耳其舰队彻底赶出东地中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西莫正是由于坚持保卫自己的海岸线不受土耳其强盗和野蛮海盗的劫掠，同时也为了让自己和托斯卡纳地区在西班牙眼中更加坚不可摧，才一手打造出了这样一支胜利之师。

很多年前，科西莫就对威尼斯大使说过：“只有当一个人在海上和在陆地上一样强大的时候，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强大。”为了实现这种强

大，科西莫下令大力建造船只。他和造船师一起商讨设计图，监督招募水手和购买外国奴隶的事宜，亲自下达航行指示，并给船只配备必要的武器装备。科西莫还创立了一个新的作战骑士组织——“圣斯特凡诺骑士团”（Kinghts of Santo Stefano）——后来被公认为与其说是一个圣战军团，倒不如说是一群涣散的海盗。他的两个私生子科西莫和洛伦佐都被封为骑士，同时还有亚历山德罗的私生子朱利奥。科西莫还在厄尔巴（Elba）岛上新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这个岛屿是皮翁比诺公爵（Duke of Piombino）割让给他的，此外还加固了岛上的首府并命名为大都会（Cosmopolis）。[3] “我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投入到海军事务，我已经造好了一些船，还有一些正在建造之中。我还会为所有的船配备必要的设备。”科西莫毫不夸张地向威尼斯大使保证道。

科西莫说话算话。最先造好的两艘船“萨埃塔”号（La Saetta）和“皮萨纳”号（La Pisana）在1550年下水开始了处女航；随后是“圣乔瓦尼”号（San Giovanni）。到1565年，又有更多的船投入到营救被困在马尔塔（Malta）的圣约翰骑士团的远征中；到1571年，也就是勒班陀之战中，教皇庇护五世真该好好感谢科西莫此时规模已经相当可观的强大舰队，以及他为支持伟大的基督教事业而捐赠的六万斯库多银币。[4]

科西莫虽然容易晕船，但还是非常喜欢亲身登上战船航行。他会伴着“号角声、鸣枪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从莱里奇（Lerici）起航，要么向上游航行至塞斯特里（Sestri），要么沿着海岸线航行到里窝那，然后登陆去钓鱼、捕鸟或是打一天猎。

科西莫从来没有对这些运动失去兴趣。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离开佛罗伦萨到特雷比奥的别墅，或是波焦阿卡伊阿诺、卡斯泰洛或卡法焦洛，抑或是其他小一点的乡村别墅，比如切雷托（Cerreto）、莱切托（Lecceto）或蒙泰卢波（Montelupo）。每当此时，科西莫就会穿上红色马裤、西班牙高筒皮靴和鹿皮短上衣，戴着镶有宝石的黑天鹅绒帽

子，与猎手、养鹰人、男仆和侍臣们一起骑马进入附近的森林和山谷。他们追捕野猪和雄獐，或跟在追兔子的猎犬后面策马狂奔，或放鹰和塞特犬去捕猎，还会用袋子抓野雉和鹧鸪。卡布里亚纳（Cabriana）记录说：

> 公爵能在最终汇入穆杰洛山谷的锡耶韦河（Sieve）里抓到鳟鱼之类各种各样的鱼。然后他还会把自己的成果分给侍臣们，而他自己则躺在草地上高兴地看他们在附近烤鱼、吃鱼。

对于侍臣们来说，在公爵身边的日子可不是每天都这么轻松愉快的。公爵是个非常严厉的主人，哪怕是最微小的错误也要加以指责，任何时候都要求流程和服饰上的统一，比如所有的男仆必须在冬天戴红帽子，夏天戴紫帽子。而且公爵对于私人生活就像与大臣们打交道时一样过分地神秘兮兮。他的仆人从来都不知晓一次出行会持续多少时间，甚至连去哪儿都不知道。他们中有人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大公阁下对于他要去哪儿这样的事越来越保密。”另一个侍臣则觉得公爵对恶作剧的热衷和他的神秘兮兮一样让人难以忍受，他抱怨说：“今天早上，公爵去看为捕鸟而布置的网子，然后从里面抓了几只鸟，还让其中一只来啄我，而且是我的右手，当时真的很疼。别人说这是公爵的恩宠，不过对我而言是严重的疼痛。”

如果公爵不是这么任性妄为、无法预料的话，也许人们还能忍耐一下，可是他的喜怒无常是出了名的。有些场合，他似乎愿意与人亲近，甚至可以允许别人无拘无束；另一些时候，则连哪怕最细微的不敬都不能容忍。一个威尼斯使节记录说：

> 有时他会抛开所有的威严和尊贵同每一个人开非常亲密的玩笑，并且似乎也鼓励别人同样随意地对待他；但是一旦玩闹的兴致过了，他会翻脸不认人，好像根本不认识你一样。如果还有人胆大到做出哪怕一丁点儿随意的行为，公爵会马上摆出平时惯有的严厉模样。所以在佛罗伦萨，人们都说公爵就像有一套戏服，他高兴穿就穿，高兴脱就脱。

对于他的妻子，人们也有类似的抱怨。

公爵夫人埃莱奥诺拉·达·托莱多（Eleonora da Toledo）和她丈夫一样严厉。侍从每天在信件中写满了公爵夫人的各种要求——将未能按时到达的商品立刻送来或替换某些她不满意的货物，比如“立刻把公爵夫人喜欢的西班牙咸鱼送来，现在收到的这批不新鲜，而且已经损坏了”，或者“马上把大公阁下的斗篷和紧身上衣送来，不得有误”，又或者是“给大公阁下做两双长袜，但是不能像别的那样又短又紧”。

然而，尽管埃莱奥诺拉严厉苛责、喜怒无常、傲慢自大，但侍从们还是很爱戴她的。对科西莫而言，她是个好妻子，如果说科西莫还会爱什么人的话，那么他最爱他的妻子。婚后不久，科西莫就举家搬出美第奇宫，住进了改造为公爵官邸的旧宫。公爵夫人的房间在楼上，公爵的房间在楼下，而公爵母亲则住在中间一层。无论是公爵还是公爵夫人，与她的关系都不怎么好，一是因为她本来就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二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公爵母亲越来越懒散邋遢。至少有一次，她把自己的儿子气得暴跳如雷。当时公爵卧病在床，母亲小题大做地管这管那，这比医生的无能更让公爵火冒三丈。最终公爵对她大发脾气，她抹着眼泪离开了公爵的房间；第二天两人都不愿和对方说话。科西莫和妻子之间倒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不但没抱怨过妻子的赌博嗜好，对她还很纵容，对于妻子过分的善变也从没表现出一丝厌烦。作为他的妻子，公爵夫人则容忍了公爵的神秘兮兮和坏脾气，当然还有长时间的面色阴沉和沉默不语。他们似乎只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才出现过不同意见。

他们共有5个儿子——弗朗切斯科是指定的继承人；乔瓦尼在17岁时就被封为枢机主教，两年后死于“恶性热病”；费尔迪南多（Ferdinando）也被封为枢机主教，后来成了托斯卡纳大公（Grand Duke of Tuscany）；加尔恰（Garzia）17岁时去世，与他哥哥乔瓦尼的

离世仅相差两周；最小的是彼得罗（Pietro），出生于1554年。此外，他们还有3个女儿，分别是玛丽亚、伊莎贝拉和卢克雷齐娅。所有的女儿都是严格按照西班牙人的方式养育的，除了去做弥撒，她们几乎从不被许可迈出家门一步，除了神父、医生和家庭教师外几乎没见过别的男性。玛丽亚和卢克雷齐娅很早便夭亡了。玛丽亚只活到17岁；卢克雷齐娅则是16岁，去世时与费拉拉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结婚还不到一年。伊莎贝拉则嫁给了保罗·焦尔达诺·奥尔西尼（Paolo Giordano Orsini），婚后他们住在美第奇宫，她虽然没有因病早逝，却最终死于丈夫的谋杀。科西莫没有活到悲剧发生的这一天。当他听到玛丽亚死于疟疾的时候，他们正在里窝那的城堡里。科西莫独自一人走上堡垒，这样就没人看到他放任自己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样子了。科西莫哀怜地说着："她的体质和我一样，要是让她多呼吸点新鲜空气就好了。"回到佛罗伦萨之后，科西莫还在哀悼女儿，他会对着挂在墙上的女儿的肖像，在房间里独坐几个小时。

科西莫似乎从来不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即便在不那么悲哀的情境下，他似乎也没怎么享受过生活的乐趣，只有打猎除外。科西莫很少笑，他吃得也很少，对食物没什么要求，到晚年更是每天只吃一顿简单的饭菜。他也不爱喝葡萄酒，在室内常常穿一件黑天鹅绒长袍，而且还说更愿意穿一件简单的佛罗伦萨长袍。他在旧宫的房间虽然装饰豪华，他却选择睡在一间墙上挂着深绿和深蓝烫金压花皮子的昏暗房间里。感觉上，就算睡在像修道院房间那样简朴的地方——比如秘书那只有"三张桌子、两盏黄铜灯、两个板凳和四个墨水台"的房间——他也觉得很满足似的。

这些秘书的工作时间非常长，而科西莫自己也和他们一样，有时到黎明都还没有更衣休息，他要亲自审阅和回复那些他不许可别人知晓的信件，标注文件，编辑报告，撰写指示让秘书誊抄。他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出门，遇到雨天无法出门就会抱怨："我坐在这里就像猎鹰站在栖木

上一样。”做完了书面工作，他会去做弥撒，通常是在大教堂，有时也去圣母领报教堂；之后他会打一会儿网球、散散步或骑骑马，不是因为喜欢，而是为了锻炼身体。如果步行，他总是走得很快，在短上衣里面穿一套软甲，腰带上挂着一把宝剑和一把匕首，还在剑鞘里插了“许多像针一样尖利的短剑（stileti），就像把针插在针盒里一样”。当然他的身边还要有瑞士保镖时刻陪伴。

科西莫绝对有必要考虑被暗杀的风险。已经不止一次有人企图要他的命而没有成功。虽然对这些暗杀者的惩罚极其严厉，却依然没能让其他想要暗杀他的人望而却步。计划从窗户里射杀科西莫的朱利亚诺·博纳科尔希（Giuliano Buonnaccorsi），不但被烧红的钳子折磨，还被拖着脚踝游街，最后被开膛破肚扔进了阿诺河。即便如此，科西莫的手下很快就又发现了一个暗杀计划，有人企图把宝剑和铁蒺藜插在阿诺河河底，因为科西莫夏天会在那个地方游泳。

早在1546年的时候，科西莫就开始计划在旧宫附近找一栋建筑，将散落在佛罗伦萨各处的司法和行政机构，以及几个主要的行业协会都集中到一起，以便他更近距离、更亲力亲为、更有效地控制一切。于是他任命乔焦·瓦萨里为设计师，着手建造这栋巨大的新建筑，即1559年动工的乌菲齐宫（Uffizi）。[5] 一年之后，公爵及其家人从旧宫搬到了阿诺河对面的皮蒂宫，也就是卢卡·皮蒂在100年前建造的那座巨大的宫殿。1549年公爵夫人用九万弗罗林币从皮蒂家族手中买下了这座宫殿，并指示巴尔托洛梅奥·阿曼纳蒂（Bartolommeo Ammanati）负责扩建和修缮工作。[6] 到公爵一家入住之时，无论是巨大的庭院，还是一层正面新建的“跪窗”都没有彻底完工。但是公爵夫人拒绝推迟搬离旧宫的时间。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来享受皮蒂宫的宽敞和宏伟，在景色宜人、视野开阔的花园中散步。在旧宫的时候，她只能把自己的奇花异草都种在一个封闭的小阳台上，从那里看到的风景也极其有限。

皮蒂宫——此时它应被叫作大公爵宫——的后面是一大片向南延伸至圣乔焦（San Giorgio）高地，向西到达罗马娜门的开阔土地。这些土地是从不同的家族手中买来的，其中就包括波戈利家族（Bogoli）。他家的花园被称作波波利花园（Boboli），其实就是波戈利的误读。在1550年尼科洛·佩里科利·特里博洛（Niccolo Pericoli Tribolo）去世前的十年里，这座花园一直属于他，他还在这里设计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圆形阶梯剧场和一个被称作内普丘恩（Neptune Pond）的池塘。当时这项工程是由布翁塔伦蒂（Buontalenti）、朱利奥·帕里吉和阿方索·帕里吉（Giulio and Alfonso Parigi）主持的。巴乔·班迪内利则在公爵夫人的建议下修造了一个精巧且有乡土气息的人工洞穴。[7]

公爵夫人入住新宫殿的愿望因为她日益衰弱的身体状况而更加迫切。按照威尼斯大使的汇报，此时的公爵夫人“总是感到身体不适”，因为患有慢性咳喘，她“每天早上都会呕吐”。公爵夫人担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种担心确实不无道理。搬出旧宫两年后，她最疼爱的儿子加尔恰去世了，她当时“悲痛而绝望，不再像从前一样遵从医生的建议”，仅两周后，公爵夫人就去世了。在她生命最后的时刻，科西莫一直陪着她，把她抱在怀中。就如玛丽亚去世时公爵拒绝别人的安慰一样，妻子死后他也把自己与所有人隔离开来，独自哀伤。他命令长子弗朗切斯科不要试图来安慰他，那样只会让痛苦变得更加无法承受。科西莫再也没能从这次打击中彻底恢复过来，到1564年，他已经把大部分的公务都转交给继承人处理。

有传闻说，每当科西莫陷入无法自拔的伤痛中，为了分散注意力，他“观看了上千部时事讽刺剧，这既不符合他的身份，也不符合他的年纪（43岁）……他还和很多女人发生了关系，尤其是那些在佛罗伦萨地位显赫的夫人们”。科西莫还把年轻貌美的埃莱奥诺拉·德利·阿尔比奇（Eleonora degli Albizzi）收为情妇，还跟她生了一个儿子。人们都猜想科西莫也许会娶她为妻。公爵有一个最喜欢的仆人叫斯福尔扎·阿尔门

尼（Sforza Almeni），这个仆人警告弗朗切斯科他的父亲可能会考虑再婚，这使得父子二人大吵了一通。最后科西莫把自己的仆人痛斥了一顿，他说："滚出我的眼前。现在就滚。永远别再指望我会给你一点儿好处。"

阿尔门尼想着公爵的怒火很快就会过去，自己会获得原谅，所以根本没有离开佛罗伦萨，甚至还斗胆回到了皮蒂宫。科西莫一看见他就控制不住脾气，他一面大喊着"叛徒！叛徒！"（*Traditore*），一面把一支打猎用的长矛狠狠刺向阿尔门尼，矛尖甚至穿透了他的身体。而事后，让公爵感到遗憾的竟是杀死这么一个"卑劣的小人"弄脏了自己的手。

阿尔门尼说的没错，公爵确实是打算再婚的，只不过他要娶的并不是埃莱奥诺拉·德利·阿尔比奇，而是另外一名年轻的情妇卡米拉·马尔泰利（Camilla Martelli）。卡米拉也为科西莫生了一个孩子。她是一个高挑、贪婪、自私、脾气暴躁的女人，而且对丈夫索求无度。为了躲避她，科西莫要么把自己和学者们关在一起，听他们给他念书；要么就到美第奇宫去和女儿伊莎贝拉·奥尔西尼一起消磨晚间时光。有一晚他在美第奇宫时突发中风；第二次发作之后他的胳膊和腿就都不听使唤了，最后连说话的能力也失去了。从那以后，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一天晚饭后，他决定要坐着马车去看一场足球比赛。那天很冷，还下着雨，在两个小时的观赛过程中，科西莫坐在场边，只是偶尔看一眼场上的选手们，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近乎昏迷的状态。之后他又拖了两个多月，经常连续几天都处于意识不清的状态，直到1574年4月21日，科西莫去世，享年55岁。遗体穿着全套大公服饰，被安放在皮蒂宫大厅里。教堂敲响了悼念的钟声。第二天，"所有商店都没有营业……不管走到哪里，都会看到黑色的悬挂物，直到皮蒂宫广场"。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为科西莫的去世而感到惋惜。近些年来他反而比年轻时更受拥戴一些，据威尼斯大使的观察，科西莫已经可以"独

自坐着马车，只带一个仆人在街上走过”。人们知道他是圣马蒂诺兄弟会（San Martino）的活跃成员，这个兄弟会是一个致力于匿名救助穷人的组织；人们也感谢他鼓励并资助佛罗伦萨传统的流行娱乐活动，比如露天表演、赛马和足球。他还创立了圣玛丽亚诺韦拉广场的战车赛，那里至今还有标记赛道的标杆。他最受赞颂的功绩是让佛罗伦萨摆脱了对西班牙的依附，以及组建了一支小而善战的船队并拓展了佛罗伦萨的领土范围。不过，尽管此时政府稳定，司法严苛却不失公正，财政状况也较为良好，科西莫受到的赞颂却并不比指责多。人们只看见他剥夺了佛罗伦萨曾有的自由，却看不到他带来的稳定。人们更愿意控诉他的间谍和监狱、他的重税和对私人贸易的肆意垄断，却不愿提及在他的倡导下托斯卡纳地区农业、排水和灌溉方面的进步，更不用说他为促进橄榄种植和银矿开采而开凿的运河，还有对比萨和里窝那的开发，以及实现托斯卡纳地区城市之间的政治团结。也许有人会提起：1557年那场毁灭性的洪水之后，是科西莫鼓励巴尔托洛梅奥·阿曼纳蒂建造了美丽的天主圣三桥[8]，并且重建了阿拉卡拉亚桥（Ponte alla Carraia）[9]；也是在科西莫的资助下，乔焦·瓦萨里彻底修缮了旧宫；还有佛兰芒人乔瓦尼·罗索（Giovanni Rosso）和尼科洛·菲亚明戈（Niccolo Fiamingo）也是在科西莫的资助下，在佛罗伦萨城里建起了挂毯工厂；还有科西莫出钱向阿尼奥洛·布龙齐诺（Agnolo Bronzino）订制的那些肖像、壁画和寓意油画；或是他向本韦努托·杰利尼订制的《珀尔修斯》（*Perseus*），多亏了他的耐心等待，才能最终在1554年完工并竖立于佣兵敞廊。[10]肯定也有人会抱怨他重修皮蒂宫耗费了大量钱财；或是在皮蒂宫和旧宫之间修建私人走廊时因为赶工而使五名工人丧生；为装点波波利花园而花费的巨资；圣洛伦佐教堂里巴洛克式陵墓的宏大设计，为的只是把美第奇家族成员埋葬于这个阴森的豪华地府；[11]还有彭托尔莫（Pontormo）装饰的卡斯泰洛别墅和蒂雷博洛（Tirbolo）的华丽花园喷泉；[12]以及修建在波焦阿卡伊阿诺的花园和修建围绕被称作皮内塔（Pineta）的巨大林地的围墙所花费的巨资。如果一个仰慕者要赞扬科

西莫对比萨大学和菲奥伦蒂诺学院的提升，还有他邀请贝尔代托·瓦尔基这样有天赋的人回到佛罗伦萨生活；鼓励意大利的音乐家、科学家和植物学家，以及支持伊特鲁里亚（Etruscan）的考古研究；改进佛罗伦萨草药园及他建立的比萨植物学院；将美洲地区的药草和东藩的作物引入托斯卡纳；对古董、奖牌及伊特鲁里亚手工艺品的鉴赏力，那么一个诋毁者则无疑会拿伟大的洛伦佐治下的共和国黄金时代，与接下来必然来临的弗朗切斯科大公治下的黑暗时代相对比。

---

[1] 家族成员表上及后文中为雅各布·萨尔维亚蒂。——译者注

[2] 那不勒斯的总督护送女儿去佛罗伦萨，到达后他和他的随从被安排住在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里。从那以后，格林回廊（Green Cloister）上建于十四世纪的会规室就改称为西班牙堂，也成为佛罗伦萨的西班牙侨民教堂。

[3] 大都会在一个多世纪以后变成了费拉约港（Portoferraio）。据说科西莫和他的建筑师就是在雷奇佐山丘（Colle Reciso）脚下的公爵府（Casa del Duca）监督工程进展的。杰利尼创作的科西莫半身像曾经被摆在斯泰拉堡垒（Forte Stella）的入口，现在陈列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

[4] 市政厅的大型内普丘恩喷泉（Neptune Fountain）就象征着公爵科西莫在海军上的成就。喷泉的设计工作本来是委托给了班迪内利，但是还没有开工他就去世了。经过一轮新的竞争，最终这个工程被交给了阿曼纳蒂。1575年喷泉建设完成，广场现在已更名为德尔格兰杜卡广场（Piazza del Granduca），并在1543年重新铺筑。

[5] 乌菲齐宫是由多个曾经在这里办公的政府机关出资建造的。它们的名字或座右铭也都被刻在了大门的柱廊上。1574年瓦萨里去世之后，建造乌菲齐宫的工作由贝尔纳多·布翁塔伦蒂和阿方索·帕里吉继续进行。这里曾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中作为欧洲最伟大的艺术品展览馆之一。美第奇收藏中的很多精品都曾被收藏在乌菲齐宫的一间八角展室里。佐法尼（Zoffany）在1772～1778年在夏洛特女王（Queen Charlotte）的资助下曾经在这里创作了大批画作，其中包括大批知名的英国鉴赏家、外交家和收藏家们的肖像。有一幅画中就画了霍勒斯·曼爵士站在美第奇的维纳斯雕像下面，这个雕塑是仿制希腊原作的罗马时期复制品，它是在蒂沃利的哈德里安（Hadrian）的别墅中发现的，大概是大公科西莫三世时期被带回佛罗伦萨，如今还陈列在这个展室中。佐法尼的其他画作中出现的画中画，比如提香（Titian）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Venus of Urbino*），是依照他的意愿从乌菲齐的其他房间或是从皮蒂宫搬来供他作画之用的。

[6] 皮蒂宫始建于十五世纪五六十年代。卢卡·皮蒂建造这座宫殿时收到了科西莫两万弗罗林币的资助，作为他对美第奇一派进行政治服务的回报。这座宫殿可能是卢卡·凡切利（Luca Fancelli）设计的。阿曼纳蒂在1562年为公爵科西莫一世和托莱多的埃莱奥诺拉完成了花园改建。后来十七世纪时又由朱利奥·帕里吉和阿方索·帕里吉进行了正面的加宽改建。再后来十八世纪时又由朱塞佩·鲁杰里修建了两个新的侧翼。那时这里被称为大公爵宫（Grand Ducal Palace）。复兴运动（Risorgimento）之后，皮蒂宫归属于萨瓦家族，又由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三世（King Victor Emmanuel Ⅲ）捐献给了国家。现在这里共有五个博物馆。一层的阿尔真蒂博物馆（Museo degli Argenti）中有许多美第奇家族收藏的珍宝。

[7] 波波利花园里面仍然保存有多位艺术家的作品，包括詹波隆那、凡切利、乔利（Cioli）、彼得罗·塔卡（Pietro Tacca）、卡奇尼和罗莫洛·德尔·塔达（Romolo del Tadda）。圆形阶梯剧场是依罗马模型建造的。为庆祝大公科西莫三世的婚礼，这里上演了《欢乐的世界马术芭蕾》（*Il Mondo Festeggiant* ）。骑士花园（Giardino del Cavaliere）的位置就是1529年围城期间米开朗琪罗建造堡垒的地方。下面的阳台则是为枢机主教莱奥波尔多·德·美第奇（Leopoldo de’Medici）建造的。

[8] 最初的天主圣三桥建于十三世纪。阿曼纳蒂建造的桥上有诸多雕像是为了庆祝大公科西莫三世的婚礼于1608年制作的，包括乔瓦尼·卡奇尼的《春》和《秋》、彼得罗·弗兰克维拉（Pietro Francavilla）的《夏》和塔代奥·兰迪尼（Taddeo Landini）的《冬》。1944年这座桥被炸毁了，但是战后人们按照原型将其复原，为保证原汁原味，石匠们都是使用与十六世纪时一样的工具进行作业。圣三一教堂的正面是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雇佣布翁塔伦蒂修建的，于1594年完工。

[9] 阿拉卡拉亚桥始建于十三世纪初，后三次被洪水冲毁。1304年，因为来这里庆祝河神节的人数过多，桥身又被压垮。1559年，阿曼纳蒂对这座桥进行了第五次重建。1944年该桥又毁于战火，所以今天人们看到的桥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建造的。

[10] 佣兵敞廊原本被称为执政官长廊（Loggia dei Signori），是十四世纪末由西蒙内·塔伦蒂（Simone Talenti）设计作为有顶棚的公共庆典场地而建造的。它现在的名字来源于公爵科西莫一世的瑞士雇佣兵（Landsknechte），他们的营房就在这附近。公爵科西莫时期，这里变成了开放的雕塑展览场地并一直延续至今。杰利尼的《珀尔修斯》是1554年被摆在这里的。詹波隆那的《强掳萨宾妇女》（*Rape of the Sabines* ）是1583年被摆在这里的，当时本来摆在市政厅前面栏杆内的多纳泰罗的《朱蒂斯和贺棼尼》被摆回了广场。在这两座雕塑的后面是詹波隆那的另一件作品——希腊雕塑《墨涅拉俄斯扶着帕特罗克洛斯的尸体》（*Menelaus Supporting the Body of Patroclus* ）的罗马仿品以及皮奥·费迪

（Pio Fedi）的《强夺波吕克塞娜》（*Rape of Polixena* ）。最后一排还有六个罗马雕塑，都是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从罗马的美第奇别墅带回来的。

[11] 王室祭堂的建造工作从1605年就开始了，最初是由费尔迪南多一世授意的，他希望能够实现科西莫一世建造巨大的王室祭堂的计划。祭堂的主体结构直到1737年才建成，而圆形屋顶的装饰更是直到1836年才完工。鉴于祭堂直到科西莫三世统治时期才建成，所以大公及其妻子和儿子们的遗体只能暂时安葬在新老圣器收藏室中。彼得拉·杜拉的几代工匠们断断续续地为三位科西莫、两位费尔迪南多和大公弗朗切斯科修缮围绕在四周墙壁上的精致墓碑。
祭堂地面上嵌入了16个用大理石、珊瑚、碧玉、玛瑙、珠母贝和青金石雕刻的盾徽，都是大公国属地城市的标志。所有的大公死后都被埋葬在陵墓下面的地下室中。公爵们都是戴着皇冠、握着权杖下葬的。公爵夫人们也都埋葬于此，唯独弗朗切斯科一世的遗孀比安卡·卡佩洛除外。当布翁塔伦蒂询问费尔迪南多一世应当将他的嫂子藏于何处时，一向厌恶她的大公回答说：“随便任何地方，总之她不能和我们葬在一起。”比安卡·卡佩洛的埋葬地点至今无人知晓。

[12] 卡斯泰洛别墅花园的复杂而有创意的建造计划是由贝尔代托·瓦尔基为公爵科西莫一世设计的，并由特里博洛、阿曼纳蒂和布翁塔伦蒂实施。但是最终这一计划并未完全实现。特里博洛、阿曼纳蒂和布翁塔伦蒂的作品至今还在园中，但是詹波隆那的《拧头发的维纳斯》（*Fountain of Venus Wringing out her Hair* ）被移到了彼得拉亚，他制作的岩洞中的动物铜像现在陈列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

第二十一章 科西莫的继承人

“这样的娱乐前所未见”

弗朗切斯科既没有父亲的生意头脑，也没有父亲的勤勉精神。他不负责任、任性妄为、沉默孤僻。威尼斯大使在汇报中不满地评价他是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有一头黑发，肤色偏深，性情忧郁”。另一位大使则写道：“他的着装没有一丝品味，举止也毫不优雅。”他还是个“喜欢沉默思考的人”，说话“非常谨慎”。“过分沉迷于女色”，“没有什么美德可被称赞”。

弗朗切斯科的妻子是奥地利女大公约安娜（Joanna of Austria）。她和丈夫一样苍白、瘦削、缺乏魅力。她嫁到托斯卡纳之后极度思乡。约安娜从未把佛罗伦萨当成自己的家，她在这里水土不服，心情沮丧，丈夫对她不闻不问，连佛罗伦萨的人民也讨厌她的奥地利式傲慢，只有公公尽己所能地关照着她。科西莫为了欢迎约安娜的到来把旧宫的花园特别修缮了一番：弧形壁画上画着奥地利乡村和城镇，这些壁画都是由瓦萨里的学生创作的。伟大的洛伦佐放置在卡雷吉别墅花园里、有小童和喷水的鱼装饰的华丽喷泉也被搬到旧宫来。[1] 即便如此，约安娜依然没能得到多少安慰。她在1578年就去世了，年仅30岁，她在去世前一年生下的同样病恹恹的儿子菲利波在她死后没多久也死了。弗朗切斯科显然对妻子的死无动于衷，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迎娶情妇比安卡·卡佩洛（Bianca Capello）了。

比安卡是一位充满魅力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威尼斯贵族，然而令她的家族失望的是，她秘密嫁给了一个佛罗伦萨公司的职员。被迫离开威尼斯后，比安卡随丈夫来到佛罗伦萨。一日弗朗切斯科骑马经过比安卡的窗下，对美人一见钟情，秘密安排了一次私会之后，比安卡便成了佛朗

切斯科的情妇。弗朗切斯科还在家中给比安卡的丈夫安排了一个收入丰厚的肥差，并且在皮蒂宫附近给他提供了豪华的住处，这样自己就可以方便地去与情妇见面了。[2] 弗朗切斯科还为比安卡修建了一座乡村别墅，这座普拉托利诺（Pratolino）别墅有一个景色极美的花园，1581年蒙塔伊涅（Montaigne）到此做客时对这个花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 这里不但有詹波隆那（Giambologna）制作的铜像和阿曼纳蒂设计的喷泉，还有贝尔纳多·布翁塔伦蒂（Bernardo Buontalenti）的带有可移动景致的人造洞穴。除此之外，这里还有风琴、音乐瀑布和各种机械形象，有种满柏树和冬青的散步场所，有修剪成各种奇妙造型的黄杨树篱构成的迷宫和喷水形成的拱形游廊，水流会越过行人的头顶，分别落在道路两边的小溪中。转过一个拐角，穿过巨大的鸟舍和迷宫，游览者就会看到一个人造洞穴，里面站着火神伏尔甘（Vulcan）及其家人，石壁上覆满了珊瑚和贝壳，还有“铜质和大理石的野兽雕塑在水力的作用下不断移动变换，展现出狩猎的场景”。在花园另一角的草坪上，虽然看不到水源，却有水柱喷出，一个牡羊女从墙上的壁龛走出来，到水井前用篮子打水，同时还有森林之神萨梯（satyr）在旁吹着风笛。

佛罗伦萨人对弗朗切斯科的情妇比安卡·卡佩洛充满憎恨，人们说她其实是个女巫，长着一双邪恶的眼睛，就是她毒死了可怜的约安娜。待解决掉她的丈夫之后，弗朗切斯科就娶了比安卡为妻，据说他们的婚礼耗资三万多弗罗林币，这让人民的愤怒之情更加难以抑制。

弗朗切斯科的行为已经让佛罗伦萨人义愤填膺，这个家族里其他成员的无耻行径更让他们厌恶。其中最过分的就是弗朗切斯科的弟弟彼得罗。弗朗切斯科继承爵位之时彼得罗20岁，不但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还是一个游手好闲、放荡不羁的寄生虫。他不仅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妻子埃莱奥诺拉，甚至在公共场合对她出言不逊。而埃莱奥诺拉则从众多的情人那里寻求安慰，贝尔纳迪诺·安蒂诺里（Bernardino Antinori）就是其中之一。贝尔纳迪诺·安蒂诺里因为在一场决斗中杀死了对手而被软

禁在自己的宫殿中，但是埃莱奥诺拉为了看他一眼而在他窗前的大街上来回踱步，导致他直接被发配到了厄尔巴岛。[4] 后来他被带回佛罗伦萨受审，结果被判死刑，并被绞死在巴杰罗宫的囚室中。埃莱奥诺拉听到情人的悲惨结局后显露出的烦闷和哀伤让彼得罗火冒三丈，他命令埃莱奥诺拉前往卡法焦洛，并在那里把她也勒死了，而他的行为显然是得到了大公的默许。

这并不是弗朗切斯科家里发生的唯一一次谋杀。妹妹伊莎贝拉的婚姻和兄弟们的一样不幸福，而且她还和自己丈夫的堂兄弟特洛伊洛·奥尔西尼（Troilo Orsini）成了情人。她的丈夫保罗·焦尔达诺·奥尔西尼是个非常暴力且有仇必报的人。他疯狂地爱上了弗朗切斯科·阿科兰博尼（Francesco Accoramboni）年轻热情的妻子维多利亚，于是这两个人决定要解决掉各自的配偶好双宿双飞。于是，维多利亚雇用了一个职业杀手在内格罗尼（Negroni）别墅杀死了丈夫。奥尔西尼先是雇用杀手杀死了自己的堂兄弟特洛伊洛，然后又在恩波利（Empoli）附近的切雷托圭迪别墅（Ceretto Guidi）谋杀了妻子。[5]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的手段极其狠辣：奥尔西尼先是与妻子共进了晚餐，饭后他示意四名帮凶到他们头顶上的房间去，从天花板上的一个窟窿里顺下一根绳子。奥尔西尼装作要亲吻妻子的样子，实际上是抓住绳子勒住她的脖子，再由帮凶向上收回绳子，直至把她勒死为止。事后，奥尔西尼宣布妻子是死于突发中风引起的癫痫。尽管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以教廷名义下令禁止奥尔西尼的这门婚事，他还是没过多久就迎娶了维多利亚，然后带着她去了布拉恰诺（Bracciano）的城堡。如果不是因为格列高利十三世去世，这桩耸人听闻的事件也许会就此被人遗忘，但是教皇的继任者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不会轻易罢休，因为他不仅是一位严厉无情的教皇，下定决心要整顿他前任在位时出现的众多无法无天的丑闻，更是被谋杀的弗朗切斯科·阿科兰博尼的叔叔。所以奥尔西尼逃到威尼斯，最后死在了那里。他在遗嘱中把巨额财富都留给了维多利亚，不过后者随后也在帕多瓦被人用尖刀刺死了，杀她的正是她丈夫愤

愤不平的兄弟，他本来希望自己会成为巨额遗产的继承人。

源源不断的丑闻让弗朗切斯科的名誉一落千丈。于是大公选择在普拉托利诺隐居，他在这里喂金鱼，养驯鹿，种植专为他从印度送来的稀有灌木，还和人谈论宇宙构造、化学和自然的秘密。他的余生不是在普拉托利诺别墅里，就是在瓦萨里在旧宫为他修建的实验室中，连和行政长官们开会的地点也被安排在那里，就因为他不愿意离开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化学和科学实验。弗朗切斯科也有一些别的爱好，能够让他偶尔转移一下注意力：在乌菲齐宫的第四层，他开办了一个画廊，还为年轻的艺术家们创办了工作室，这些本来是由瓦萨里设计改建的，瓦萨里去世后，又由贝尔纳多·布翁塔伦蒂和阿方索·帕里吉负责，直到1574年才改建完成。1583年，弗朗切斯科又建立了克鲁斯卡学会（Accademia della Crusca）[6]，即秕糠学会（the Chaff），这个学院旨在去除托斯卡纳地区方言中不纯净的地方，事实上就是想要宣扬佛罗伦萨的至高地位——只有她才能作为意大利文学的最终评判者。这个学院在这方面尤为活跃，比如剧作家吉罗拉莫·吉利（Girolamo Gigli）就因为其关于"锡耶纳的圣凯瑟琳（Saint Catherine）是比佛罗伦萨人最敬爱的乔瓦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更杰出的作家"这种不可原谅的冒犯言论而被驱逐出了佛罗伦萨。不过，弗朗切斯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花在了研究化学、炼金术、熔炼、吹制玻璃、宝石镶嵌和钻石切割上了，而且他还真成了一位专家。他最擅长熔炼水晶和用贵重金属制作花瓶；还发明了一种切割水晶的新方法，以及一种革命性的瓷器制作方法，使得当时托斯卡纳地区的陶艺匠们能够制造出与中国瓷器一样精致的陶瓷制品。[7]除此之外，他还发明了焰火和仿真珠宝的制作方法。然而，这些科学实验给他带来的却不是赞誉而是诽谤：人们说他整天把自己锁在嘈杂的实验室里研制毒药，供女巫比安卡使用。而这样的说法因他们两人在1587年10月突然同时死亡而更加令人深信不疑，事实上，他们都是死于疟疾。

弗朗切斯科死后，他久居罗马的弟弟费尔迪南多一世（Ferdinando

I）继承了爵位，并向人民保证他哥哥的死完全是由于自然原因。费尔迪南多在1563年作为一名年仅15岁的枢机主教去了罗马，在后来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俨然已经成了教廷中极有影响力的一员。虽然他并不真心热爱宗教事业，但还是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有能力的管理者并且创建了信义宣传传道团（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Propaganda Fide）。费尔迪南多还特别钟爱古典雕塑，并且有很多收藏，其中大多数是古希腊雕塑的罗马仿品，包括美第奇的维纳斯雕塑。他在平钦（Pincio）买下了一处别墅专门用于展示这些雕塑。[8] 在哥哥去世之后，费尔迪南多把很多雕塑都带回了佛罗伦萨。由卡拉多里（Carradori）负责修复的六尊罗马女子雕像就被摆放在了佣兵敞廊里。

费尔迪南多继承爵位时38岁，他从来都不怎么喜欢自己的哥哥，而且他是一个比弗朗切斯科亲切友好得多的人。虽然费尔迪南多也喜欢铺张浪费、招摇卖弄，但是他很快就展示出了对佛罗伦萨人民福祉的真切关注，并且决心保持佛罗伦萨的独立地位，哪怕要付诸武力也在所不惜。这一点与弗朗切斯科无限度妥协以避免争议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在费尔迪南多相对温和但更有效率的统治之下，佛罗伦萨政府的腐败问题有了好转，财政也更加稳定，贸易和农业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佛罗伦萨开设了更多的医院，比萨也建立了一座专门面向学者们的大学。他父亲创立的船队此时也壮大了起来。还有被孟德斯鸠称为“美第奇王朝代表作”的里窝那此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人口有了大幅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大公的宗教宽容政策吸引了欧洲各国的人们来此生活，其中不仅有遭受迫害的新教徒，还有很多犹太人，这也是今天里窝那人口中犹太人比例仍高于其他意大利城市的原因。费尔迪南多大公的诸多善举和慷慨宽容赢得了人们的爱戴。他设立的在圣洛伦佐教堂为贫苦人家的女儿提供嫁妆的活动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人们都乐意参加这个庆典，届时费尔迪南多会为穷人们分发财物，这样他们的女儿就可以找到更好的亲事了。除此之外，1589年阿诺河水位暴涨，佛罗伦萨及周边的乡村都受灾严重，费尔迪南多亲自将装有食物的篮子分发给受灾者，

并且冒险乘坐小船去视察灾情，抚慰受灾的群众并承诺一定会为他们提供帮助。

费尔迪南多更喜欢囤积财富而不是把钱拿去投资。他还下令让贝尔纳多·布翁塔伦蒂为他打造一个牢不可破的保险箱，而这个保险箱就被放置在气势威严的观景堡垒（Forte di Belvedere）中，这个堡垒也是由布翁塔伦蒂设计建造的，位于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圣乔焦高地，于1590年开工，到1595年建成。[9] 不过，费尔迪南多在需要炫耀铺张的场合，也绝对是毫不吝惜钱财的。他从萨鲁塔特家族（Salutat）手中买下了一座中世纪城堡彼得拉亚（Petraia），并且指示布翁塔伦蒂将其改造为一座宏伟的乡村别墅，还要配套建造同样豪华壮观的花园。[10] 费尔迪南多还在阿蒂米诺（Artimino）修建了一个豪华的狩猎小屋，并称之为费尔迪南达别墅（Villa Ferdinanda），这里同样也是由布翁塔伦蒂设计的。[11] 他还不断出钱改建皮蒂宫和波波利花园，扩建了乌菲齐宫的画廊并修建了一间八角形展室（Tribuna）。他从波斯和埃及购买了无数稀有的手稿来扩充美第奇藏书室。他还花了一千达科特购买了一个巨大的镀金地球仪，其构造之复杂前所未见，就是用来证明托勒密（Ptolemy）关于太阳、月亮和星星围绕地球旋转的理论，并否认哥白尼的说法。[12] 他还把贝利尼宫（Bellini）[13] 的装饰工作指定给詹波隆那，并让他在锻造厂里打造了科西莫大公的巨型骑马雕塑，用来摆在市政厅广场上。[14] 费尔迪南多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孙女——洛林家族的克里斯廷（Christine of Lorraine）结婚时，开销之巨仿佛是要显示美第奇家族还没有失去往日的荣光，以及放弃兄长支持西班牙的政策也是一件值得以壮观场面来庆祝的盛事。[15]

克里斯廷进入佛罗伦萨时，沿路穿过了一系列为致敬佛罗伦萨、致敬美第奇家族和洛林家族的光辉历史而修建的凯旋门。在婚礼之前的几个星期里，众多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就开始忙于修建这些拱门，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艺术家、手工艺者、厨师、木匠、机械师和缆索工，音

乐家、歌手、士兵、演员、园丁和焰火制作者也投入到繁忙的准备工作中，不但要设计新颖而精致的游行队列，还要安排招待会、宴会、露天庆典、音乐演奏和幕间表演（*intermezzi* ）。不但要佛罗伦萨人前所未见，还要整个欧洲的人也都前所未见。这场盛大的婚礼成为舞台艺术、芭蕾和新兴的音乐剧（*drama per musica* ）发展的新里程碑。最精彩的部分要数在皮蒂宫上演的音乐表演了，舞台上出现了各种新奇的布景设备，会喷发的火山和能吐火焰的恶龙足以让观众惊艳，而真正的高潮则出现在舰队登场时，整个院子里被注入了五英尺深的水，逼真地再现了18艘由英勇的基督教士兵操控的舰船向土耳其堡垒发起猛攻的场景。

这样的娱乐表演给后来在凡尔赛宫为路易十四（Louis ⅩⅣ）举办的诸多庆祝活动带来了启发。费尔迪南多非常善于安排这样的活动，他也从不错过任何利用这些活动来提升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及整个世界的威望并顺势宣传自己政策的机会。在他举办的诸多宫廷盛典中，最成功的莫过于为侄女玛丽亚与纳瓦尔家族的亨利（Henry of Navarre）举办的婚礼。后者能够成功击败天主教联盟并继位为法国国王多半是靠着美第奇家族的雄厚财力支持。除了常见的赛马会和锦标赛、游行和露天表演，以及烟花秀和水滨派对（*water fêtes* ）等，在乌菲齐还上演了朱利奥·卡奇尼（Giulio Caccini）的《切法罗的劫难》（*Il Rapimento di Cefalo* ），该剧的布景也是由布翁塔伦蒂亲自设计；这里还上演了雅各布·佩里（Jacopo Peri）的《尤丽迪茜》（*L’Euridice* ）和《达芙妮》（*Daphne* ），后者被称为历史上第一部歌剧，虽然现已遗失，但当时也都是由费尔迪南多资助创作的。1600年10月5日这一天，玛丽亚·德·美第奇（Maria de’Medici）和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大教堂由代理人履行了婚礼程序。旧宫里举办了盛大的宴会，每一道菜都精心制作和装饰成带有寓意的样式，以此来象征法国国王与美第奇家族联姻是多么明智的选择以及这个家族有着多么出众的美德。

1609年费尔迪南多去世了，他19岁的儿子科西莫二世继承了爵位，

也继承了这个家族奢华挥霍的风格。在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尔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 Ⅱ）的妹妹女大公玛丽亚·马达莱娜（Maria Maddalena）结婚时，阿诺河上举行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观者无不声称这样的表演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识过的。从阿拉卡拉亚桥到天主圣三桥的整段河流都是演出的舞台，为了这一时刻，两岸都装饰着各种雕像。观众们坐在阿诺河河滨大道（Lungarni）的巨大看台上观看了《阿尔戈英雄纪》（*Argonautica* ），讲述了伊阿宋（Jason）如何在围绕人造海岛舞台航行的过程中，击败巨大的海豚、龙虾和会喷火的九头蛇，最终找到了金羊毛（golden fleece）并将它献给了女大公玛丽亚·马达莱娜，同金羊毛一起献上的6个红苹果则是美第奇家族标志红球的象征。

科西莫二世对于建筑的品位也和父亲相似。他扩建了皮蒂宫，重建了阿尔切特里（Arcetri）附近的波焦因佩里亚莱别墅。[16] 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随身带到佛罗伦萨的望远镜就架设在别墅里，后来伽利略本人也住在这里并得到了庇护。

伽利略1564年出生在比萨，他的父亲是一个贫穷的佛罗伦萨贵族后裔。伽利略本来想成为一名画家，但是父亲却不支持他，于是伽利略改为学医，后来又改学数学和物理，因为总是质疑既有的理论，再加上他的疯狂理论和急躁脾气，伽利略在比萨大学里的老师们总是被他气得火冒三丈。虽然后来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教师的职位，但是其他教师却巴不得他快点递交辞呈，因为受不了他的冷嘲热讽和孤僻性格。于是伽利略又去了帕多瓦大学并在那里工作了18年，直到曾经的学生科西莫二世邀请他到佛罗伦萨，这样他就可以远离诽谤者的干扰和教会的指控，安心进行研究和实验了。伽利略接受了这个邀请，在美第奇家族的保护下度过了余生。他在1610年出版的作品中提及了他新发现的木星旁边的卫星，当时他将其命名为“美第奇之星”（*Medicea Sidera* ）。[17] 伽利略的保护者科西莫二世刚刚过三十岁就去世了，也没有做出什么值得赞颂的功绩，而伽利略则是在1642年去世的。他去世时，教会严禁为他立任何

纪念碑，于是科西莫的儿子费尔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 Ⅱ）将他埋在了圣十字教堂的见习教士堂。[18]

---

[1] 旧宫花园中的喷泉上站立的小天使雕塑是韦罗基奥原作的仿品，原作收藏在百合花厅（Sala dei Gigli）的一个房间中。壁画由马尔科·达·费恩扎（Marco da Fienza）、乔瓦尼·隆巴尔迪（Giovanni Lombardi）和切萨雷·巴廖尼（Cesare Baglioni）创作。

[2] 比安卡·卡佩洛的房子位于马焦街（24～26号）。

[3] 普拉托利诺由布翁塔伦蒂设计并建造了15年之久，1822年被拆毁，理由是维护费用太高无力支付。50年后这片地产被王子保罗·德米多弗（Prince Paul Demidoff）买下，并改名德米多弗别墅，属于南斯拉夫王子保罗名下。他将别墅重建后卖出。詹波隆那的巨型雕塑《亚平宁》仍然立在这里。其他雕像则被移到了波波利花园，包括象征大公科西莫一世的雕像《珀尔修斯和龙》（*Perseus and the Dragon* ）。

[4] 在托尔纳博尼街和龙迪内利街连接处的安蒂诺里宫是为博尼（Boni）家族建造的。

[5] 切雷托圭迪别墅本来是属于圭迪家族的。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布翁塔伦蒂为大公科西莫一世将其翻新并在别墅前面加盖了巨大的双斜坡。

[6] 克鲁斯卡学会总部现在位于法官宫（Palazzo dei Giudici），但是很快就会迁到卡斯泰洛城别墅。

[7] 大公弗朗切斯科时期佛罗伦萨人制作的瓷器是当时欧洲最早出现的瓷器，也是现在存世量最稀少的，只有大约70件。其中一件体积娇小、形状不佳的瓷碗于1973年在纽约卖出了180000英镑的高价，创下了欧洲瓷器拍卖的最高成交价。其他的瓷器都陈列在卢浮宫、法国塞弗尔国家陶瓷博物馆（Musee de Sevres）、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及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8] 罗马的美第奇别墅是由安尼巴莱·利比（Annibale Lippi）在1544年为枢机主教里奇设计的。后来在1577年被枢机主教费尔迪南多·德·美第奇买下。他是美第奇家族的枢机主教之中第一位在这里居住的。别墅正面和花园的布局没有被改动过。现在陈列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的《墨丘利》（约1565年）曾经是这座别墅花园中喷泉的一部分。别墅前的喷泉正中原本是一座佛罗伦萨百合的雕塑，而后换成了现在的加农炮弹石雕。这是因为当初克里斯蒂娜女王（Queen Christina）被许可试验安杰洛城堡的加农炮，然而炮弹没有如预期那样射向空中，而是无意击中了美第奇别墅。这座别墅在1803年被拿破仑买下，现在这里

是法兰西学院的所在地。

[9] 观景堡垒，也称作圣乔焦堡垒，现在存放了大量从佛罗伦萨其他建筑中移来的壁画，包括菲耶索莱的巴迪亚教堂阿兰奇修道院（Chiostro degli Aranci）壁画，圣玛丽亚诺韦拉教堂韦尔德修道院（Chiostro Verde）壁画，圣乔瓦尼广场比加洛敞廊（Loggia of the Bigallo）上的［由安布罗焦·迪·巴尔代斯（Ambrogio di Baldese）和罗塞洛·迪·雅各布·弗兰基（Rosello di Jacopo Franchi）创作的］壁画以及彼德拉皮亚纳街（Via Pietrapiana）7号米诺·达·菲耶索莱（Mino da Fiesole）故居中的壁画。这里还陈列着波提切利创作的原属于斯卡拉街上圣马蒂诺教堂的《圣母领报》。

[10] 彼得拉亚别墅是1595年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从菲利波·萨卢塔蒂（Filippo Salutati）的遗孀手上买来的。院子里装饰的壁画是由被称作“沃尔泰拉人”（il Volterrano）的巴尔达萨雷·弗兰切斯基尼（Baldassare Franceschini）创作的，内容是赞颂美第奇家族的历史。壁画是为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的儿子唐·洛伦佐·德·美第奇（Don Lorenzo de’Medici）画的。复兴运动之后，这座别墅归属了萨瓦家族，后来又由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King Victor Emmanuel Ⅱ）进行了改建和装修。

[11] 阿蒂米诺的费尔迪南达别墅位于波焦阿卡伊阿诺西南大约四英里外，修建于1594～1595年。1781年被卖给了侯爵马尔凯塞·洛伦佐·巴尔托洛梅伊（Marchese Lorenzo Bartolommei）。二十世纪初进行了重建，但现在仍然闲置着。

[12] 法官宫临近乌菲齐，可以俯瞰阿诺河的半边现在成了科学史博物馆。此前这座宫殿属于卡斯泰拉尼家族，他们的家族教堂在圣十字教堂里。法官宫的名字来源于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时期在这里建立的司法委员会（Consiglio di Giustizia）。博物馆中收藏了大量地球仪、星盘、钟表和地图，还有米开朗琪罗的指南针和伽利略的望远镜。

[13] 贝利尼宫位于平蒂镇（Borgo Pinti）26号。大门上方有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的半身像。

[14] 市政厅里的公爵科西莫一世雕像是由詹波隆那于1587～1599年在贝利尼宫创作的。圣母领报大殿广场上大公费尔迪南多一世骑在马上的雕像是长寿的詹波隆那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开始创作，并由彼得罗·塔卡于1608年最终完成的。费尔迪南多一世去世后，雕像被移至贝利尼宫。

[15] 费尔迪南多一世认为作为美第奇象征的红色小球容易让人感觉商业气息太重，于是决定将家族标志换成了蜜蜂（古时的蜜蜂象征着为人民的福祉鞠躬尽瘁、贡献一切的统治者），但是他仍不忘想尽办法向美第奇家族财富的奠基者们致敬。1565年，为了纪念送信者给科西莫一世送来蒙特穆洛

（Montemurlo）大捷的喜讯，人们在圣三一教堂广场上信使报信的地方立起了一根巨大的正义之柱。就在柱子底部，费尔迪南多一世建造了四座灰泥雕像，分别代表着奥古斯都、查理曼大帝、科西莫一世及国父科西莫。石柱来自卡拉卡拉浴场（Baths of Caracalla），是教皇庇护四世（Pius Ⅳ）赠送给公爵科西莫一世的。巨石被放置在滚轴上，从罗马一直运到奇维塔韦基亚，再从比萨用船运到佛罗伦萨。1581年建造的石像被认为是罗莫洛·德尔塔达的作品。

[16] 波焦因佩里亚莱别墅曾经属于巴龙切利家族，后来属于萨尔维亚蒂家族。它现在的名字来源于奥地利的大公夫人玛丽亚·马达莱娜，后者在1619年买下这座别墅。后来这里又成为拿破仑的妹妹埃莉莎·巴乔基（Elisa Baciocchi）的家。现在这里是一座女子学校。

[17] 位于染匠大街（Corso dei Tintori）的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里现在存放了三百多卷伽利略的论文，这里同时还保存着波利齐亚诺、米开朗琪罗和马基雅维利的论文。很多手稿和书籍都来自大公的帕拉蒂纳藏书室（The Palatina）。这个藏书室是由费尔迪南多二世和他的弟弟吉安·卡洛、莱奥波尔多共同建立的。

[18] 伽利略的遗体在1737年被移出了圣十字教堂的见习教士堂，并被重新埋葬在了西门的北侧。

第二十二章 费尔迪南多二世和法国公主

“她最惯常的幻想就是说自己屈尊下嫁了”

父亲去世时，费尔迪南多二世只有10岁。他是个随和亲切的男孩儿，从来不给家庭老师们找麻烦，也不给他们任何可以居功的理由。17岁时他周游了欧洲大陆，将佛罗伦萨留给母亲和祖母管理。然而这两个女人之间以及她们和各个委员会之间终日争吵不断，而且她们两个显然既不遗憾费尔迪南多二世的离开，也不期盼他的回归。不过，佛罗伦萨人民对他的了解越深，反而越来越偏爱费尔迪南多了。1630年，费尔迪南多20岁的时候，佛罗伦萨暴发瘟疫，但凡有钱人家全都躲到城外去了，只有他和弟弟坚持留在佛罗伦萨尽全力帮助受难的平民。他的外表看起来可不像个大英雄，从宫廷画师尤斯图斯·苏斯泰尔曼斯（Justus Sustermans）为他画的肖像来看，他有一个圆鼻头，还有哈布斯堡式（Habsburg）肥厚突出的嘴唇，上面蓄着尾部像箭头一样上翘的八字胡，再加上松弛下垂的眼睑，与画像上摆出的贵族统帅姿势形成了滑稽的对比。费尔迪南多体形肥胖，性情尤为温和，比起貌美姑娘，他反而更喜欢年轻俊俏的男子。他还喜欢钓鱼、打猎、玩保龄球，不过前提是别人会让他赢，因为他一输就会发脾气，对比他平日里温和有礼的样子，显得格外吓人。费尔迪南多的生活不算铺张，皮蒂宫门口挂着有柳条包装的瓶子，意思是这里也像其他小一些的宫殿一样对外出售葡萄酒。不过费尔迪南多也绝不是个小气的人，他和前辈一样会花很多钱举办露天表演、化装舞会和奇幻秀；在弟弟莱奥波尔多（Leopoldo）的鼓励下，他还慷慨资助了一些科学家和文人雅士。自1657年起，久负盛名的试验科学院（Del Cimento）的学者们开始在皮蒂宫举办会议。学院秉承“实验再实验”（*Provando e Riprovando* ）的箴言，以一个熔炉和三个坩埚为徽标，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十年就因为学者之间的争吵、嫉妒和不

和而解散，但是它存续期间发表的出版物却做出了巨大的科学贡献。费尔迪南多和莱奥波尔多都是伽利略的学生，他们对伽利略的研究都很感兴趣，还会为他平息外界的争议，签署他的往来信函；他们也密切关注气压计的发明者埃万杰利斯塔·托里切利·达·莫迪利亚纳（Evangelista Torricelli da Modigliana）的著作，还会亲身体验双眼望远镜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并订制温度计、星盘、象限仪、湿度计等，到皮蒂宫的人都会看见大量新奇的机械装置。

虽然兄弟俩痴迷于这些仪器，但是他们的兴趣爱好并不局限于此。尤其是莱奥波尔多，绝对称得上一个博学之人。他每天会花四个小时“埋首于书海之中”。能找到的书他都会读，无论是“评论的、英雄的、讽刺的还是猎奇的作品……或是描述其他国家地理风俗和居民生活的手稿……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试验科学院的秘书在给莱奥波尔多订购书目的代理的信中写道：

> 你可以给我送来关于我送给你的那种鱼的自然历史的内容，或是解释某种奇特受孕的原因……或是关于在甘多尔福（Gandolfo）城堡发现的与人类骨骼相似的骷髅骨的内容；还有关于奖牌、新近发现的雕塑、浮雕和其他古董或者建筑设计的，或是有意思的故事之类的——总之什么书都可以。

莱奥波尔多“就像一个带着一块面包的小男孩儿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口袋里装一本书，一有时间就要读上几页”。

费尔迪南多对于兴趣爱好则更有选择性，也更务实，除了在试验科学院进行一些实验之外，他最感兴趣的是佛罗伦萨用宝石（*pietra dura*）制作马赛克的工艺的发展。宝石工厂里雇用了大量的工匠，每日忙碌于制作装饰物和浅浮雕，或是用大理石、象牙、水晶、金子、彩色矿石和半宝石来装饰家具。[1] 为了能有地方容纳这些作品和不断增添的画作和雕塑藏品，费尔迪南多不得不对皮蒂宫进行了大范围的改建，以便展示自己向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艺术家们订制的壁画作品，包括奇罗·费里

（Cirro Ferri）、弗朗切斯科·富里尼（Francesco Furini）、创作了壁炉厅（Sala della Stufa）中巴洛克式精美壁画的彼得罗·达·科尔托纳（Pietro da Cortona）和在银器博物馆（Museo degli Argenti）工作过的乔瓦尼·达·圣乔瓦尼（Giovanni da San Giovanni），他工作的时候是坐在一个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浴盆里，悬在半空中，因为患有痛风，腿上还缠着绷带。[2] 在如此精心装饰过的画廊里，参观者可以看到大公最新购置的收藏品。[3]

作为一个统治者，费尔迪南多的政策就是尽可能避免一切麻烦和冲突。他曾经被迫卷入和教皇那令人厌烦的巴尔贝里尼（Barberini）亲戚的一次短暂战争，除此之外，所有对佛罗伦萨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都通过缓和与抚慰的方式获得了解决。为了不冒犯教皇，在公爵弗朗切斯科·玛丽亚二世（Francesco Maria Ⅱ）去世后，他甚至不愿意主张自己对乌尔比诺的权利，而是任由公国变成了教廷国。与此类似，他还同意卫生部的官员在教皇面前下跪认错，并为在瘟疫暴发时依法隔离教士和牧师而道歉。对于难以驾驭的众多家庭成员的一些本应严厉谴责的行为，费尔迪南多也同样采取了宽大的态度。他和好脾气的莱奥波尔多向来没有矛盾，在试验科学院解散后，莱奥波尔多就去罗马成了一名枢机主教。费尔迪南多与另一个弟弟马蒂亚斯（Mattias）也相处和睦，马蒂亚斯曾经作为一名将军参加了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并且立有战功。他在战争时期收集的象牙装饰品极其可观，也算得上皮蒂宫展品中的一个小奇观了。[4] 之后，马蒂亚斯又创造了另一种形式的惊人收藏，他集合了一批畸形人，其中包括一个丑陋的侏儒，不但“长着稀疏的尖牙”，还有着惊人的饭量，可以在丰盛的正餐之前吃下40根小黄瓜、30个无花果和1个大西瓜当作开胃菜（*hors d’aeuvres*）。不过费尔迪南多倒确实与另一个弟弟吉安·卡洛（Gian Carlo）关系不睦，后者和莱奥波尔多一样是名枢机主教，却是一个远不如他自律的人。

吉安·卡洛不是一个毫无品位的人，他在罗马认识了萨尔瓦托·罗萨

（Salvator Rosa），于是邀请他来佛罗伦萨，不但向他支付了一笔固定的年金为宫廷作画，还许可他同时接受其他资助者的订制。吉安·卡洛出资为一群演员在佩哥拉街上（Via della Pergola）建造了一座剧院；[5]他还为另一群演员租用了科科梅罗街（Via del Cocomero）上的一座宫殿，并邀请费尔迪南多·塔卡（Ferdinando Tacca）设计舞台布景。[6]不过，真正最让吉安·卡洛感兴趣的并不是油画和戏剧，而是美食和女色。他的这两种欲望似乎永远不会满足。他被逐出罗马的原因就是他在探访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Christina）的时候，拒绝由年长且不那么好色的枢机主教陪同。吉安·卡洛回到佛罗伦萨的时候还很年轻，英俊而富有，穿戴讲究，留着卷曲的长发，一心沉迷于享乐。他搬进了一座美丽的乡间别墅，这座别墅就建在斯卡拉街（Via della Scala）尽头一个景色迷人且充满异域风情的花园中。[7]他在这里整日与情妇厮混，据说经常与多个情妇同时做爱。他还将不止一个令他厌烦的对手溺死在了鲤鱼塘里。有一次，一个女人找吉安·卡洛为自己的丈夫求情，他立刻把这个妇人带上了床，然后下令释放她那臭名昭著的杀人犯丈夫，还威胁治安官说如果不遵照指令放人，他就要砍掉治安官的脑袋。于是治安官请求大公裁定，费尔迪南多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无奈地宣布："遵照枢机主教的命令吧，谁让他是我弟弟呢。"所有人都知道费尔迪南多心中惧怕吉安·卡洛，所以后来当他听到这个弟弟死于中风的消息时，表现出来的显然是宽慰而非哀痛。

大公还发现自己的妻子维多利亚·德拉·罗韦雷（Vittoria dellaRovere）几乎和吉安·卡洛一样令人厌烦。她是一个一本正经还爱管闲事的女人。长相平平、身材肥胖，结婚后更是越来越胖，双下巴比自己丈夫的还厚，而且一直无法生下一名继承人：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儿，不过出生后不到一天就死了；第二个孩子只活了几分钟；1642年8月14日，她终于生下了一个能够活下来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科西莫三世（Cosimo III）。不过小科西莫的出生没能改善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没过多久，维多利亚就撞见丈夫正在爱抚一名男侍从。之后

几个星期她都不愿与丈夫说话。当她终于决定讲和之后，他却不愿与她重归于好，过了差不多二十年他们的关系才终于缓和，1660年他们迎来了第二个儿子弗朗切斯科·玛丽亚（Francesco Maria），不过这段婚姻仍然算不上幸福。

这对夫妇的一个主要分歧就是儿子科西莫的教育方式。大公希望他能接受现代教育，希望孩子对于他自己非常感兴趣的那些科学发现也能有一些认知。相反，大公夫人则坚决反对。她坚持要以传统方式由教士来教育儿子。科西莫最终还是接受了传统的教育。他被灌输的思想是科学实验不但是不信神的邪恶行径，更是不符合王子身份的事情。很快他就形成了一种古板的缺乏宽容精神的人生观，这也成了左右他一生的性格缺陷。到16岁的时候，他已经显示出了一种“极度的虔诚”，如卢卡大使汇报的那样：

> 与他的父亲不同，科西莫的忧郁情绪已经达到了极深的程度。大公费尔迪南多对所有人都很亲切，似乎随时会和你开个玩笑，而王子却几乎从来没笑过。人们将此归因于他傲慢冷漠的性情。

除了教堂圣歌，科西莫不喜欢任何音乐，也不喜欢跳舞；他宁愿去做弥撒，也不愿去剧院看戏。他更愿意和教士们而不是女孩儿或侍臣们谈话。他也会出去打猎，但当猎物从头顶飞过时他却不开枪，口中还喃喃念着“可怜的小东西”（*Poverino* ），不过事后他还是会津津有味地吃别人杀死的猎物。他的父亲认为早点结婚也许会对儿子有好处，而他理想的新娘就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叔叔加斯东·德·奥尔良（Gaston d’Orleans）的女儿玛格丽特-路易丝（Marguerite-Louise）。这样的安排也令巴黎满意，那里的枢机主教马扎林（Mazarin）心中成为教皇的梦想正需要美第奇家族的支持。不过，嫁给这样一个阴沉、肥胖，长着肥厚嘴唇和下垂眼角的意大利人对于玛格丽特-路易丝本人来说可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她是个活泼、敏锐、充满活力、爱玩闹且任性妄为的姑娘。除此之外，她还爱恋着堂兄洛林家族的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 of Lorraine）。她恳求堂兄国王路易十四不要把她送到佛罗伦萨去。她到卢浮宫跪在国王面前，求他把自己从这可怕的命运中解救出来；然而国王只是扶她起身，告诉她此时反悔已经太晚了。所以在1661年4月17日，玛格丽特-路易丝和科西莫在巴黎由代表举行了结婚仪式，当时她年仅15岁，而因为患了麻疹而留在皮蒂宫养病的科西莫则是18岁。

新娘启程前往佛罗伦萨时，“哭声大得所有人都能听到”。途中每经过一个城镇过夜后的第二天，她都会想尽各种办法拖延出发时间。最后她终于到达了马赛，当时下着瓢泼大雨，玛格丽特装病不肯离开用鲜花装饰的大船上的舱房，于是她就乘船一直航行到了里窝那。新郎在恩波利附近的安布罗贾纳（Ambrogiana）别墅等着迎接她。[8] 不过在第一次见到新娘之后，科西莫并没有表现出一点欣喜之情，更不愿意亲吻她；而新娘在听到医生宣布虽然她已经得过麻疹且王子的病已不再具有传染性，但他们还不宜共处一室的时候，也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欣慰。

在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庆典之后，新娘新郎终于圆房，只不过王子一点也不热情，而且很快就睡着了。人们安慰新娘说等他彻底康复之后就会强壮起来，不过玛格丽特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在乎他康复与否。汉诺威（Hanover）公主索菲娅（Sophia）很多年后回忆说其实王子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他一周最多与妻子同床一次，然后就会在医生的监督下离开，以防留在那里时间过长会对他的健康有害”。玛格丽特非常讨厌丈夫，他的彬彬有礼在她看来也是种侮辱。

婚后第二个晚上，玛格丽特就向丈夫索要皇冠珠宝。而他则回答说自己没有权力做这样的决定，于是玛格丽特大发脾气，说自己宁愿住在法国最肮脏的窝棚里也不愿住在托斯卡纳的宫殿里。第二天，她又自作主张地拿走了一些珠宝赏赐给了法国随从们，然后又不得不费了很大的劲要回来。在这之后，她几乎不怎么和丈夫说话，到他们结婚将近一个

月的时候，贝齐耶主教（Beziers）汇报说：“王子只与新娘同房过3次。”主教还说：“每次他不来过夜，就会派自己的贴身男仆去告诉她不用等了。而陪同的法国女士们……都觉得很尴尬，因为她们的女主人每天都很哀伤……她觉得这里的生活令她感到陌生。”

人们希望到了夏天，佛罗伦萨各种精彩纷呈的娱乐活动会让玛格丽特重新高兴起来。旧宫的盛宴、皮蒂宫的舞会、圣三一教堂桥上的烟花秀、马焦街上的赛马、圣玛丽亚诺韦拉广场上的战车赛，还有从铺着地毯的街道穿过的盛装游行等接连不断。在施洗者圣约翰节这一天，市政厅广场上照例举办了献礼节（*Festa degli Omaggi* ）庆祝活动。仅过了一周，将近两万名观众聚集在波波利花园的圆形剧场上观看了《欢乐的世界马术芭蕾》（*Il Mondo Festeggiante* ），这是一个融合了假面剧、活人静态画面、盛装游行、马术芭蕾、音乐剧和魔术效应的综合表演。科西莫本人也参与其中，穿着镶有珠宝的铠甲饰演赫拉克勒斯。又过了短短10天，雅各布·梅拉尼（Jacopo Melani）创作的《赫拉克勒斯在底比斯》（*Hercules in Thebes* ）也在佩哥拉街的剧院里上演了。这些之后，玛格丽特-路易丝又开始了到美第奇家族各个别墅的游玩之旅，从波焦因佩里亚莱到波焦阿卡伊阿诺，从阿蒂米诺到卡斯泰洛和普拉托利诺。尽管如此，公主依然很少再表现出她曾经的开朗活泼。多数时候她都在想家，闷闷不乐、百无聊赖，或是沉浸在幻想中；托斯卡纳的一切她都看不顺眼，因为托斯卡纳不是巴黎；她几乎从不出现在公共场合，即使不得已必须出席也要戴着面具。当有人问她喜不喜欢佛罗伦萨时，她会不高兴地回答要是这儿离巴黎近点儿，也许她还能更喜欢一些。玛格丽特是个奢侈铺张的人，吃穿用度各项费用让一贯节俭的大公咋舌。更糟糕的是，她为人轻率鲁莽。当洛林家族的查尔斯王子访问佛罗伦萨的时候，玛格丽特毫不掩饰自己对堂兄的爱意，还在他离去之后给他写了很多充满感情的书信，即便他的回信都被中途拦截了，她也还会继续写。1663年8月，玛格丽特生下了一个男孩儿，取名费尔迪南多，之后她就因为乳房肿块而一直抱病在身，整个养病期间她除了自己的法国侍从们

谁都不见。科西莫把她的任性妄为都归咎于这些侍从，于是一口气把其中28人替换成了意大利人，结果只是让玛格丽特-路易丝闹得更凶了。

威尼斯大使这样写道："她从不听取任何反对意见，也不尊重任何人。她最惯常的幻想就是说自己下嫁了一个远远配不上她的家族；而这恰恰刺痛了美第奇家族最敏感的神经。"为了躲避丈夫，玛格丽特无所不用其极。她在宫中的卧室换了一个又一个，离丈夫的房间越远越好；她还向公公请求准许她独自去乡村别墅里生活。大公费尔迪南多本来对她充满耐心、体谅和宽容，可是最后连他也忍无可忍地冷硬起来，对玛格丽特说如果她继续这么无法无天，就把她送进修道院去。而玛格丽特对此的回应更加傲慢失礼，她说她的公公一定会后悔把自己送到修道院去，因为她会把整个修道院的修女们都教唆得像猴子一样吵闹聒噪。玛格丽特总是能从恶意中伤科西莫中找到快感。她到处散播他无能的故事，还说他连做个马夫都不配，更别说是做丈夫了。大公对此的报复措施就是所有人去阿蒂米诺打猎的时候，玛格丽特被单独送到了马蒂亚斯的拉佩吉别墅（Lappeggi），并且命人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她去哪儿都要有人跟着，并且绝不允许她收阅任何未经他们许可的信件。她对此的报复则是假装美第奇家族要毒害她，所以每一样食物都只能由法国厨师准备，她吃之前还必须让一个管家先吃一口。她还对外宣称这门婚事是强加给她的，因此不具有法律效力；她的地位就像个小妾，丈夫与别人通奸；她现在不得不进入修道院——当然必须是法国修道院。当她的这些提议被呈递到法王路易十四面前时，他的回答是：如果玛格丽特要回法国，也绝对不是进入法国修道院，而是直接投入巴士底狱。除了这样的威胁之外，路易十四还派一个特使带着他的书信去托斯卡纳，信中他斥责了玛格丽特的"任性妄为"和"固执己见"。

玛格丽特依然拒绝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离开拉佩吉别墅之后，她又被送到了波焦阿卡伊阿诺。科西莫听说她病了之后前去探望，可是她却抓起床头小桌上的瓶子，威胁说他胆敢靠近就要敲碎他的头。病好之

后，玛格丽特恢复了在别墅后面的小山上快速攀爬的运动方式，她在前面走得飞快，不时还会丢石头乱打路边的小鸟，侍从们则辛苦地远远跟在后面，累得气喘吁吁也追不上她。

到了1665年10月，玛格丽特突然厌倦了单调乏味、与世隔绝的乡村生活，于是前往皮蒂宫请求大公准许她回归宫廷生活。费尔迪南多马上向她保证自己对此再满意不过了。科西莫也亲吻了妻子，看到她显然已经准备好做出符合她身份的样子，所有人都很欣慰地欢迎她回来。有一段时间，一切都好了起来：她变得和蔼可亲，打扮得美艳动人，开始跳舞、欢笑，履行妻子的职责与科西莫做爱并且再一次怀孕。可是麻烦又开始出现，怀孕之后她依然坚持骑马狂奔，走路飞快；被劝说后她又开始指责美第奇家族剥夺她的人身自由，把她像个犯人一样囚禁着。怀孕期间她不但坚持剧烈运动，还得了一次重感冒，医生只好给她大量放血，尽管如此，她还是在1667年8月11日生下了一名健康的女婴，取名安娜·玛丽亚·路易莎（Anna Maria Luisa）。孩子出生后，她的乳房脓肿复发了，而且还感染了天花。医生又开始给她大量放血，还剪掉了她的头发。在疾病和苦闷的双重打击下，她对科西莫的抱怨比以往更加恶毒。大公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让科西莫出国也许有好处，于是就把他送到了德国和荷兰，结果发现他回来时玛格丽特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就又把他送到了西班牙，然后又去了英格兰。

---

[1] 宝石加工场（Orificio Delle Pietre Dure）于1796年从乌菲齐内迁出并搬到了阿尔法尼街（78号），至今还有工匠在这里工作或接受培训。

[2] 在皮蒂宫第四号展室的东墙上可以看到乔瓦尼·达·圣乔瓦尼的作品。在“沃尔泰拉人”巴尔达萨雷·弗兰切斯基尼的帮助下，他还在拱顶上创作出了《美第奇和德拉罗韦雷家族的联合的寓言》（*Allegory of the Union of the House of Medici and Della Rovere* ）。北墙上的《洛伦佐在卡雷吉的柏拉图学院》（*Lorenzo and the Platonic Academy at Careggi* ）和《洛伦佐之死的寓言》（*Allegory of Lorenzo’s death* ）是弗朗切斯科·富里尼的作品。南墙上的《伟大的洛伦佐迎接阿波罗》（*Lorenzo the Magnificent Receives Apollo* ）是切科·布拉沃（Cecco Bravo）的作品。窗户之间的《洛伦佐被围绕在艺术家中间》

（*Lorenzo surrounded by Artists* ）是奥塔维奥·万尼尼（Ottavio Vannini）的作品。

[3] 最后一次购入的艺术品中不乏一些精美的雕塑，包括《赫马佛洛狄忒斯》、西塞罗的头像及《伊多利诺》（*Idolino* ）。鲁本斯的《战争的后果》（*Consequences of War* ）是费尔迪南多二世买来的。委罗内塞（Veronese）的《达尼埃莱·巴尔巴罗》（*Daniele Barbaro* ）、《一个男人和与圣巴巴拉一起的神圣家庭的肖像》（*Portrait of a Man and Holy Family with Santa Barbara* ）都是枢机主教莱奥波尔多的藏品。拉斐尔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画像，提香的《斜倚的维纳斯》（*Recumbent Venus* ）、《马格达莱纳》（*Magdalena* ）、《贝拉》（*LaBella* ）和《灰眸贵族男子肖像》（*Portrait of a Grey-eyed Nobleman* ）以及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著名的乌尔比诺公爵费代里戈·达·蒙泰费尔特罗和他妻子巴蒂斯塔·斯福尔扎（Battista Sforza）的肖像都是1634年费尔迪南多与维多利亚·德拉·罗韦雷结婚时购入的。

[4] 大部分象牙装饰品是由马蒂亚斯·德·美第奇从科堡城堡（Castle of Coburg）带回佛罗伦萨的。它们都陈列在第十展室。

[5] 佩哥拉剧院（Teatro Della Pergola，位于佩哥拉街12号）是费尔迪南多·塔卡在1656年建造的。现存的建筑是巴尔托洛梅奥·西尔维斯特里（Bartolommeo Silvestri）设计的，建于十九世纪早期。

[6] 科科梅罗街是现在的里卡索利街。

[7] 吉安·卡洛的花园在斯卡拉街。柏拉图学院的成员们曾经在这里举行辩论会，现在花园的位置已经被建筑物覆盖。

[8] 巨大而威严的安布罗贾纳别墅起初是作为打猎时的临时住所而建造的。大公科西莫三世在这里的墙上挂满了稀有动物和花卉的画作。现在这里是精神病院。

第二十三章 科西莫三世和王子费尔迪南多

“十八年就够了。我活不了那么长”

26岁的科西莫和以前一样阴郁，却比结婚时自信多了。因为暴饮暴食，他现在已经极度肥胖；不过举止也不无魅力，尽管他的言谈间总是过多地使用宗教敬语，但谈论的内容却是广泛而有趣的。科西莫在英国受到了学术圈人士的殷勤款待，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家族曾经庇护过伽利略。佩皮斯（Pepys）还见到他经常出入女王的小教堂，并且形容他是一个“举止得体、肤色黝黑、身型肥胖的人，穿着晨礼服……一个令人愉悦的美男子”。在法国宫廷上，科西莫也给人留下了类似的好印象。国王给玛格丽特-路易丝写信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自然应当好好关照我的堂妹夫。不过和他接触后我发现，仅凭他个人的魅力和美德我就应当对他以礼相待。”根据不太可靠的记述，“科西莫谈论任何话题都令人敬佩。他的身材就年纪来说确实胖了些。但是他的头型很好，留着卷曲的黑发，嘴巴很大，唇红齿白，面色健康红润，才思敏捷，待人接物和蔼可亲”。

科西莫回到佛罗伦萨时，心里还念念不忘这些北方的国家。他回来没多久就感慨地说：“我殷切地盼望有朝一日能再见如天堂般的英格兰，我希望再一次拥抱我所有的老朋友们。”他对法国也抱有同样的热情，而且回国之后他高兴地发现任性的法国妻子已经和自己的公公婆婆相处得融洽多了，所以甚至愿意多给她一些津贴来作为奖励。然而，此时他父亲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医生对水肿和中风的医治给他带来的更多是痛苦而非安慰；到最后，医生们认为放血已经没有任何效果，于是把烧热的铁块放到他头上，还强行把药粉（*polvere capitale* ）从鼻子里灌进去；另外还尝试了把四只鸽子活生生地开膛破肚后放在他的额头

上之类的怪异方法。最终大公费尔迪南多二世于1670年5月27日去世，他和自己的父亲、祖父一样被埋葬在圣洛伦佐教堂中巨大的巴洛克式陵墓中。

科西莫三世在无尽的惶恐中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尽管他父亲为人节俭，还采用了严苛庞大的税收体系，但是托斯卡纳的财政形势仍然没有任何起色。这里的贸易迅速衰败，人口也因为疟疾、瘟疫和农业落后导致的食物短缺而锐减。起初，科西莫还努力地想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已经远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于是他把政务抛给了母亲及其朋友们；他甚至指派自己不满12岁的弟弟替他接待外国大使。科西莫专横的母亲对这样的安排倒是很满意，不过他的妻子就另当别论了，她义愤填膺地抱怨说一个法国王室的女儿竟然要屈尊受一个姓德拉·罗韦雷的人压制。

1671年夏天，玛格丽特-路易丝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吉安·加斯托内（Gian Gastone），这个名字来自他的外祖父加斯东·德·奥尔良。之后，科西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又迅速恶化了。玛格丽特-路易丝认定自己患了乳腺癌，于是请求路易十四给她派来一位法国医生。路易同意了她的请求，但是医生检查过后发现她胸部的肿块“绝对不是恶性的”。尽管如此，医生可怜她迫切想要回到法国的愿望，还是建议大公让玛格丽特-路易丝去勃艮第的圣雷内（Sainte-Reine）药泉疗养，有助于改善她整体的健康状况。科西莫自然不会同意，而他的拒绝也必然引发妻子的激烈抗议。此外，他们还会为他送给她的各种珠宝的成色而争吵，为她的铺张浪费而争吵，为她的仆人们争吵，其中为一位法国男厨师而引起的争吵尤为严重。玛格丽特-路易丝与这位厨师的行为极不检点，她这么做也是为了报复科西莫解雇了她的两个德国马夫和一个法国舞蹈家。有人记录说：

> 这个厨子特别害怕，或者是装作特别害怕被人挠痒。公爵夫人发现了他的这个弱点之后，就特别喜欢挠他的痒……他为了躲避，会又

叫又闹地满屋子跑，然后公爵夫人就会笑得难以自抑。

挠痒玩腻了之后，公爵夫人还会用枕头拍打厨师的头，厨师就会躲到她的床下，不过公爵夫人还是会继续打他直到精疲力竭地坐到椅子上为止。这时她旁边的乐师们就会继续演奏之前被他们的玩闹打断的音乐。有一天晚上，厨子喝醉了，所以当公爵夫人用枕头打他的时候，他叫嚷得格外大声，连大公都被惊动了。他下楼看到发生了什么之后，“立即把厨师赶到了走廊里”——不过后来对他的处罚还是被暂缓了。最终公爵夫人决定彻底解决自己与大公之间的问题。她给科西莫写信说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了：

> 我最终的决定应该不会令你感到意外，你好好想想这12年来是怎么对待我的就明白了……我是你不幸福生活的源泉，正如你是我不幸福生活的源泉一样。我请求你同意我离开，这样我才能获得内心的平和。我会派我的忏悔牧师去与你讨论具体事宜。

大公回信如下：

> 我不知道你的不幸福能否和我的相提并论。谁都能看到这12年来我从未停止给予你尊敬、体贴和关爱，唯独你对此视而不见……我等着听忏悔牧师还有什么可为你辩解的……与此同时，我会下令除了必要的侍从和待遇之外，你（在波焦阿卡伊阿诺）仍然会享有公爵夫人应有的尊重。

听到这段婚姻已经无可挽回之后，路易十四又派马赛主教作为特使到托斯卡纳去。主教发现大公夫人在波焦阿卡伊阿诺别墅里的仆从人数竟多达150名。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到哪儿都必须有人跟随，没有大公的许可也不得接受任何来访。尽管对丈夫抱怨连天，公爵夫人却没有意志消沉。事实上，她又变得“活泼明快，勇敢无畏……风趣开朗了”。主教也觉得像大公这样一个“忧郁阴沉”的人难免会感到和公爵夫人无法相处。不过他还是希望尽可能地调和二人的关系。精力过剩的公爵夫人为款待主教准备了舞会、盛宴、音乐和戏剧等，但是在这歌舞升平的表象背后，主教还是发现了公爵夫人不幸福的真正原因，

哪怕是大公承诺愿意解决问题后，公爵夫人也依然不能满足。“12年来她尝试着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是到现在也没能成功。”除此之外，她再也不能在“不冒犯上帝”的前提下跟他生活在一起了，因为她的婚姻是被强迫的，所以她并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妻子。最后连主教也不得不承认，他此行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了。1673年5月他回国向法王复命了。

路易十四及科西莫都认为，即便他们同意正式分居，为了面子上好看，玛格丽特-路易丝也应当继续留在托斯卡纳，但是公爵夫人坚决要回到法国。1674年12月26日她的请求最终获得了许可。她获准进入蒙马特尔（Montmartre）修道院隐居。玛格丽特确保了自己离开时不会两手空空。她不但会有一份慷慨的年金收入，还有一大笔补贴用来支付这趟旅程的花销，她还被许可带走床和挂毯，以及价值约一万克朗币（crown）的银子。事实上，她真正带走的比这个数量还要多得多。玛格丽特-路易丝还搬走了波焦阿卡伊阿诺别墅里面的一些贵重物品，她还没出发就已经赠送出大笔的赏金，以至于不得不向科西莫索要更多现金，以免自己“身无分文地被晾在半路”。

正如人们预想的那样，公爵夫人在蒙马特尔并不会真正地隐居。起初她表现得还算虔诚顺从，不过没多久她就在路易十四的许可下跑到凡尔赛去了。她还会定期写信到佛罗伦萨索要钱财，要来钱就拿去赌博或者花在买衣服、买胭脂和假发上。她仍和过去一样浮躁多话。有传言说她和许多人发生了婚外情，包括卢维尼伯爵（Comte de Louvigny），卢森堡元帅护卫队中的一个副官，甚至还有他同队的卫兵。后来她又喜欢上了自己的马夫，他会用牙齿帮她咬开坚果，还被许可在玩牌的时候赢她的钱，甚至还服侍她沐浴。玛格丽特欠的债越来越多，于是又向科西莫索要两万克朗币，而科西莫过了好长时间才回复她这封十万火急的信，这让她十分恼怒。此外，她还在蒙马特尔引发过骚乱，当时刚上任的修道院长大胆指责了她的不良行径，她竟然一手挥舞着短柄斧头，一手拿着手枪，怒不可遏地追打年轻的院长。事情发生后，她被批准离开

蒙马特尔到小一点的圣芒代教区（Saint-Mande）去了，在那里她很快又找到了新恋人，这次是一个不守教规的教士。

不过，此时玛格丽特-路易丝已经47岁了，不再那么无法无天。她声称自己对于圣芒代发生的一切感到震惊，这里的修女们会在夜间爬墙跑出修道院，女院长会穿着男人的衣服，一连几个月不见人影。大主教为她的改革热忱所打动，任命玛格丽特-路易丝取代潜逃的异装癖院长，成了圣芒代的新院长。4年之后，她又从自己的妹妹那里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终于不需要再向科西莫伸手要钱了。玛格丽特-路易丝活到76岁才去世，她总是没完没了地谈论自己的过去，还说从来没有后悔离开托斯卡纳："啊！只要我再也看不见大公的脸就行了。"

大公这一方则选择用炫富的方式来庆祝摆脱了这个惹人烦的妻子。公爵的宴会上摆满了异国的新鲜食物；他送给客人们最精美的礼物，似乎是想要显示自己并不是像公爵夫人的支持者污蔑的那般小气，而且美第奇家族还是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富有——尽管这并不是事实。公爵宴会上的侍者都是穿着他们本国民族服装的外国仆人；他吃的阉鸡要先拿到他面前称重，不够20磅重的都要退回厨房；他吃的点心和果冻都要做成城堡和纹饰动物的样子；他喝的葡萄酒也要先放到雪里冰镇。大公的饭量越来越大，身材也越来越胖。他现在的脸色与其说是红润，不如说是红肿了。

在其他方面，大公倒是没有这么毫无节制。他对教义的理解越来越狭隘。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性行为是被严令禁止的。基督教妓女如果向犹太人卖淫的话，会受到鞭刑然后关进监狱，而嫖娼的犹太人则会被处以高额的罚款。基督教徒如果在犹太家庭或店铺做仆人，也会被处以重罚，交不起罚金的就要遭受酷刑或囚禁。科西莫为了遵从宗教法庭的意愿，也不再像美第奇家族之前那样向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提供庇护。比萨大学的教师们都接到了大公本人的命令，要求他们不得"在公开或私

人场合，以撰写文章或讲座的方式，让学生阅读或向他们教授任何宇宙原子学说创始人德谟克里特斯（Democritus）的哲学思想”。而且，为了防止学生们从其他大学接触到这样污染思维的学说，大公又下令禁止托斯卡纳学生到公国边境以外的大学学习。

下决心扫除一切道德败坏与异端邪说的科西莫还禁止了五朔节，因为这个节日起源于异教徒。坚持在街上吟唱五朔节歌曲的姑娘们要被处以鞭刑。科西莫还发公告禁止年轻男女晚间在门口或窗前嬉戏调笑，这样的行为被指责为“强奸、堕胎和杀婴行为的主要诱因”。与被正式规定自己不得婚娶的女子发生关系的男子要受到酷刑的惩罚；鸡奸者则要被砍头；还有一些针对财产实施的罪行也可能被处以砍头的刑罚。于是，行刑的场面变得越来越常见。事实上，短短一年时间里，佛罗伦萨就执行了超过两千次的公开处决。杀人者不但会被处以死刑，还要被分尸。有一次科西莫想用烧红的铁钳对一个杀人犯上刑，但是最终被治安官劝阻了，为的是“不要让这座城市感到厌恶”。

而让这座城市时刻厌恶的是科西莫的重税和其他财政勒索。几乎每个月都在加征新税，而旧税的税率也在不断升高。神职人员大都是免于交税的，正如他们如果犯法也经常能免于刑罚一样，除非是个别极端恶劣的罪行——比如有一个牧师欺骗会众中的年轻姑娘说，在他的帮助下，她们可以生下即将以人形降临人世的圣灵。虽然从神职人员这里收不上来多少钱，但是妓女们却是最有效的税收来源。妓女们必须花钱购买执照，否则就不能在晚间上街拉客，而且她们拉客时还必须举着点燃的火把，否则也要被罚款。妓女每年要缴纳6个克朗币的豁免费，否则就随时可能被社会风化办公室的官员随便找个借口逮捕，他们会以各种微小的违规行为为借口，比如没有按规定在头发或帽子上佩戴黄色丝带之类。被逮捕的妓女要在胸前挂一块写着“卖淫”二字的牌子，由行刑官手持鞭子一路抽打着走到老市场。

科西莫还通过向商人出售食盐和面粉这类基本物资的专营权来敛财。卖出了专营权之后，他又会反过头来向小贩们出售特殊许可，让他们可以不受商人垄断的限制。对于那些想要钻规定空子的人，惩罚是极为严厉的：试图突破面粉垄断的面包师傅可能会被发配到船队上服役；从腌鱼的卤水中提取盐分的行为则可以被判死罪。税收和专营许可费偶尔会被用在一些有意义的地方，比如为大公的藏书室买书，或是为枢机主教莱奥波尔多的收藏购买微缩模型。但更多时候，这些钱被用来购买手套和香薰这类昂贵的礼物，或者向科西莫某位英国朋友赠送成箱的基安蒂酒（Chianti），或购买一些来源不明的所谓圣物，或者被宫廷里其他什么新的奢侈行为挥霍掉了。

这个宫廷中最奢侈的人，莫过于大公的弟弟弗朗切斯科·玛丽亚。他也是这个家族最近受封的枢机主教，一个开朗乐观、无忧无虑的大胖子。他的叔叔马蒂亚斯去世后，弗朗切斯科·玛丽亚就搬进了拉佩吉别墅，不过以他的品位而言，这座别墅还不够宏伟。他要建筑师安东尼奥·费里（Antonio Ferri）为他设计各种装修方案。方案提交后，他毫不意外地选中了最奢华昂贵的一个并且询问这个方案的造价。费里说的钱数远远超出了枢机主教可支配的金额。“如果我只给你三万克朗币，你仍然按照这个设计方案装修，建成的别墅能住多久呢？”费里估计了一下说可以保证在18年以上。枢机主教于是指示他说：“这样的话你就开工吧。18年就够了。我活不了那么长。”[1]

装修工作很快就完成了。花园的布局足以与普拉托利诺的那些花园媲美。弗朗切斯科·玛丽亚在此定居，尽情地享受自己估算的余生。他纵容自己的程度简直是没有底线。他喜欢熏香，所以拉佩吉别墅的一个房间就被改造成了香料房。他喜欢年轻男子的陪伴，于是别墅里总是住满了年轻男子，他让他们用他的钱赌博，还让他们穿着女人的衣服在餐桌边服侍。弗朗切斯科·玛丽亚还特别喜欢吃，他吃完一顿饭之后会喝催吐剂把食物吐出来，这样胃里就有地方再吃第二顿了。他还喜欢恶作

剧，会不惜重金找人给他策划有意思的恶作剧并帮助他付诸实践。他还会在仆人身上花很多钱，比如把一包包的钱币从窗口扔到外面的草坪上，然后看仆人和附近的农民为了争抢钱币而打作一团。仆人会抓住各种机会揩他的油，不过他并不在乎，甚至还鼓励他们顺手牵羊的行为。每到复活节的时候，他就会把所有仆人叫到面前让他们忏悔，然后再赐予宽恕，宣布他们拿走的都是他自愿赠送给他们的礼物。正因如此，他总是钱不够用，于是就持续不断地寻求更多有圣俸和津贴的职位，争取到了就把要做的工作丢给秘书。

有这样一个懒散、奢侈的弟弟，科西莫自然担心他会给自己的继承人费尔迪南多王子带来不好的影响。王子如今已经长成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活泼有趣，聪明智慧，有艺术天分，而且独立自主，与他的法国母亲而不是忧郁的父亲有更多相似之处。费尔迪南多15岁就已经掌握了复杂的象牙雕刻技艺并创作出了不少任何收藏家都会趋之若鹜的作品。除此之外，他还是个有天赋的音乐家，大键琴弹得极好，唱歌的技巧和魅力也出类拔萃。后来他在普拉托利诺别墅的四层专门修建了一个剧场——和叔叔弗朗切斯科·玛丽亚不同，后者会让演员们在拉佩吉别墅的舞台上喋喋不休地吵闹，以防止自己在中途睡着——这里上演的几部精彩作品都有他的参与，其中就包括亚历山德罗·斯卡拉蒂（Alessandro Scarlatti）的五部歌剧，费尔南迪多和他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费尔南迪多还和雅各布·佩里、贝尔纳多·帕斯奎尼（Bernardo Pasquini）以及亨德尔（Handel）有联系，这些人都被邀请到佛罗伦萨与费尔迪南多及其设计者们一起创作，这些作品在全欧洲的音乐圈都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费尔迪南多还是一位露天表演的策划大师。1689年忏悔节（Shrove Tuesday）当天在圣十字广场举行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比武表演就是由他组织策划的。大批观众站在广场四周的木质看台上，欣赏了欧洲和亚洲两支水平相当的骑士队伍之间精彩纷呈的比武表演。除了这些之外，费尔迪南多也是一位艺术品的资助者和收藏家。他对画作极有鉴赏力又不拘于一格，对瓷器的鉴赏力和对画作的一样好。他购买了拉斐尔和安德

烈亚·德尔萨尔托的画作，还买下了帕尔米贾尼诺（Parmigianino）没有完成的《长颈圣母》（*Madonna dal Collo Lungo* ）。当塞巴斯蒂亚诺·里奇（Sebastiano Ricci）和朱塞佩·玛丽亚·克雷斯皮（Giuseppe Maria Crespi）籍籍无名时，费尔迪南多就已经雇佣他们在皮蒂宫进行创作了。费尔迪南多还收集了一些佛罗伦萨教堂里本来不被看中的圣坛装饰画，然后花钱再为教堂画新的。这些被他收购的作品就包括拉斐尔的《巴达齐诺的圣母》（*Madonna del Baldacchino* ）和巴尔托罗梅奥的《圣马可》（*San Marco* ）。在1701年的圣路加日（St Luke’s Day）上，费尔迪南多在圣母领报教堂的回廊上举办了佛罗伦萨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油画展，他不但为画展提供了几幅自己的藏品，还制作了展品目录。

然而，即便有这样的才华和成就，对于父亲来说，费尔迪南多还是让他感到失望。别的都不说，光是他对貌美男歌手的迷恋就让父亲无法容忍。先是他的家庭教师有一天撞见他与一个名叫彼得里洛（Petrillo）的男歌手拥抱接吻；后来又有一个自负的威尼斯阉人歌手（*castrato* ）切基诺（Cecchino）设法成了费尔迪南多的家臣并且对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大公于是决定费尔迪南多必须尽早结婚才行。他需要一个妻子来消除切基诺和枢机主教弗朗切斯科·玛丽亚的不良影响，而且美第奇家族也必须有继承人。更重要的是，大公希望婚姻责任能够唤醒费尔迪南多对政府事务的责任心，反正到目前为止他还没展露出任何这方面的才能。只可惜，大公为费尔迪南多选定的妻子并没能引起他的半点儿兴趣。

巴伐利亚公主维奥兰特·贝亚特丽切（Violante Beatrice）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年轻姑娘，胆小羞怯、没有主见。她第一眼看到丈夫就爱上他了，但是她的丈夫却丝毫不掩饰自己与她结婚只是因为父命难违。婚礼当天奇冷无比，两个在圣加洛港口站岗的士兵甚至被冻死了。16岁的新娘在从大教堂前往皮蒂宫的路上忍不住将脸埋在暖手笼里，可怜兮兮地

说自己一辈子都没有觉得这么冷过。不过她不是一个会不停抱怨的人，因为她知道丈夫本来就对自己没有兴趣，而抱怨只会将没兴趣转化为厌恶。费尔迪南多基本上无视妻子，而且事后证明她没有生育能力。突然有一天他离开佛罗伦萨去了威尼斯，并且从一位贵族夫人那里染上了梅毒。之后，令专横的切基诺惊恐，更让隐忍的妻子伤心的是，费尔迪南多带回了一个年轻的情妇，这无异于在他们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

---

[1] 拉佩吉别墅只维持了18年，枢机主教去世后，别墅的第二层就因为承重墙不稳固，有倒塌砸进花园的危险而被拆除了。本来就不稳固的结构又在1895年的地震中受到严重破坏，剩下的部分估计也随时可能倒塌。

第二十四章 最后一个美第奇

“佛罗伦萨已经不是当初的佛罗伦萨了”

既然费尔迪南多不可能有继承人，大公科西莫只好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二儿子吉安·加斯托内的身上。之前他没怎么在意过这个次子，而吉安·加斯托内也不是一个渴望被关注的年轻人。他内向、孤僻、闷闷不乐，大多时间都是一个人独处，把令他哥哥和叔叔们沉迷的嘈杂、奢侈的圈子隔绝在自己门外。他更喜欢研究植物学和古文物，或者是学习包括英语在内的外语。他样貌端正、温柔体贴，不过没有什么朋友，同性或异性都没有。当然他也没有任何野心，甚至没有成为谁的丈夫的野心，他常常带着深深的恐惧思考将来家族会为他选择一位怎样的新娘。而当他看到新娘的那一刻，恐惧变成了惊骇，因为安娜·玛丽亚·弗兰切斯卡（Anna Maria Francesca）真算得上一位奇丑无比的女人了。她是萨克斯-劳恩堡公爵（Duke of Saxe-Lauenberg）的女儿，也是帕兰帝内伯爵（Count Palantine）纽伯格的菲利普（Philip of Neuberg）的遗孀。她除了样貌丑陋，还很愚蠢，很爱吵架，“身材肥胖，以自我为中心，没有一丁点儿吸引力可言”。她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也不喜欢耗费体力的室外活动，而且似乎对在那个潮湿、丑陋的城堡里了却余生感到心满意足。1697年他们在选帝侯城堡的教堂里举行婚礼之后，吉安·加斯托内和妻子一起回到了位于布拉格附近赖希施泰特村（village of Reichstadt）那令人沮丧的城堡。无论是妻子还是城堡都让吉安·加斯托内感到恶心。他的同性恋倾向比其兄长的还要强烈，所以他在这里就靠和一个狡猾、俊俏的马夫朱利亚诺·达米（Giuliano Dami）偷情来寻求安慰，虽然没太大作用，但至少能让他暂时逃出只有茅舍和莎草床的绝境，这里就像囚禁他的监狱一样。

第二年春天，吉安·加斯托内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微服化名地去了趟巴黎，这让他的父亲大为震怒，斥责说这样的出行有失美第奇家族的身份。从巴黎回来后不久，他又去了布拉格，并且只带了他的马夫情人。为了忘掉在赖希施泰特村的生活给他带来的苦闷，吉安·加斯托内沉迷于赌博、性爱和酒精，穷困的学生和站街的男妓都是他做爱的对象，他还经常在简陋的小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在这里“他自甘堕落，开始抽烟，就着面包嚼荜拨和小茴香籽，这样就能有德国人一样的酒量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重新回到赖希施泰特村的妻子身边，可是这里的生活让他更加绝望。他会一连几个小时独自在房间里，凝望窗外衰败阴沉的景象，忍不住泪流满面。他甚至不愿意去回复信函或签署秘书为他起草好的文件。偶尔，当他不是这样了无生趣的时候，他要么去喝酒，要么和自己的意大利仆从赌钱——他输给别人好多钱，以至于不得不把妻子的珠宝拿去当掉，而当铺给他的价格往往都不及珠宝价值的一半。吉安·加斯托内恳求妻子和他一起去佛罗伦萨，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一个不这么压抑的环境中继续痛苦地生活。可是妻子每天把时间花在“在马厩中与人聊天”上，坚决不肯离开这个不知道她为什么如此留恋的赖希施泰特村。她的忏悔师警告她，如果去了佛罗伦萨，她一定很快就会被谋杀，这是所有美第奇家族的妻子或早或晚都难以逃避的命运。

在佛罗伦萨，科西莫在担忧和失望中一天天衰老。常年以来的暴饮暴食和缺乏运动已经彻底损害了他的健康，医生建议他采取“严格的毕达哥拉斯养生法”（Pythagorean regimen）来应对“胆汁过多”的病症，也就是只吃水果、蔬菜并且参与骑马和打猎等强度大的运动。他遵循了这些建议，不过身体状况的改善并没有提升他的精神。他因为始终无法给自己宠爱的女儿安娜·玛丽亚（Anna Maria）寻找到一个满意的丈夫而格外沮丧。安娜·玛丽亚身材高挑，一头黑发，说话声音很粗，笑起来很大声，甚至有些粗鲁笨拙。西班牙、葡萄牙，还有萨瓦公爵和法国王太子（the Dauphin）已经先后拒绝了他的提亲。最后帕兰帝内选帝侯威廉

（Elector Palatine Willian）同意娶她为妻。他们在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举行了婚礼，之后不久选帝侯就把性病传染给了自己的妻子，这也成了她后来流产的主要原因，她早年的生活也因此变得不幸。

科西莫知道孩子们已经不可能为美第奇家族带来继承人了，绝望之下他只好将目标转向自己的弟弟弗朗切斯科·玛丽亚。枢机主教被这个请求吓得不轻。他压根儿不想娶妻生子，现在这个想法也没有任何改变。更何况结婚意味着要和他在拉佩吉别墅享受的那种放浪生活告别，还意味着放弃枢机主教的职位。他现在已经48岁了，不想再有什么改变，而且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如从前。不过最终他还是拗不过哥哥。为他安排的妻子是瓜斯塔拉和萨比奥内塔公爵（Duke of Guastalla and Sabbioneta）的女儿埃莱奥诺拉公主（Princess Eleonora）。她和自己未来的丈夫一样抗拒这门亲事。人们提醒她这门婚事对她的家族而言是莫大的荣耀，但是比起家族荣耀，她更在意自己要和一个脸上有疤、又丑又胖、患有痛风的老男人同床共枕，更何况谁都知道他其实更喜欢漂亮的男孩儿。事实上，婚后的几周，埃莱奥诺拉怎么也不肯和丈夫圆房；不过最终还是在丈夫的温和与耐心下妥协了。行房的经历让埃莱奥诺拉感到厌恶，也让弗朗切斯科·玛丽亚觉得痛苦而精疲力竭。事实上，这一切对他而言确实已经无法承受了，婚后不到两年，弗朗切斯科·玛丽亚就去世了。

他的侄子费尔迪南多与维奥兰特·贝亚特丽切公主的婚姻也是同样的不幸，而且他余下的时间也不比自己的叔叔长多少。费尔迪南多在威尼斯感染的性病一直没有彻底康复。在弗朗切斯科·玛丽亚结婚时，费尔迪南多就已经失去了记忆，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一种恍惚麻木的状态，时不时还会突发癫痫。他最终在1713年10月底去世。之后不到三年，他的妹夫帕兰帝内选帝侯也去世了，而他的遗孀安娜·玛丽亚则打算搬回佛罗伦萨。

此时，她的哥哥吉安·加斯托内已经回到了佛罗伦萨。他在1708年的时候丢下妻子独自回到了佛罗伦萨，当时他37岁。从那以后他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除了朱利亚诺·达米之外几乎不和任何人来往。他经常醉得连马都骑不稳，差不多每个晚上都是在酒精带来的晕眩中度过。吉安·加斯托内还患有哮喘，他甚至不愿拆开寄来的信件，这样也就不用回信了。一个到佛罗伦萨访问的法国人记录道："有人担心吉安·加斯托内会比自己的父亲先去世，这种担心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大公体质强健而且非常在意健康，相反他的次子却似乎一心想要加速生命的终结。"

科西莫早就不再关心吉安·加斯托内这个儿子了，他一心只想着在托斯卡纳继承权的规定下如何保护女儿安娜·玛丽亚的利益。起初委员会劝他颁布法令让佛罗伦萨的主权像共和国时期一样回归到人民手中，他不愿意接受。不过后来他决定，如果安娜·玛丽亚能够比哥哥长寿，她应当继承爵位成为女大公，之后才可以恢复共和国体制。这样的决定引发了后来持续多年的外交争执：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Charle VI）、埃斯特家族（House of Este），还有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Philip V）和伊丽莎白·法尔内塞（Elizabeth Farnese）全都提出有权继承公国。这个棘手的问题令科西莫忧心忡忡，于是他只好一心埋首于宗教信仰之中来寻求解脱。

几年前他曾经进行了一次罗马朝圣之旅，当时他实现了一个毕生的心愿，就是被任命为拉特兰（Lateran）的圣约翰教士，这样他就有权亲手摸一摸圣荣（*Volto Santo* ），也就是基督在前往加略山（Calvary）的路上曾经用过的手帕。据说自从亲手捧起了这块神圣的布料之后，科西莫就变得比以往更加虔诚了。他还把价值二十万克朗币的油画《圣母领报》送给了教皇。作为回礼，他将一盒子神圣遗骸带回了佛罗伦萨，没过多久他又给这份收藏增添了一段圣弗朗西斯·哈维尔（St Francis Xavier）的小肠。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来访时，科西莫才会带着至高的崇

敬向他们展示这些圣物，还会谦逊地向圣物跪拜。一个英国游客确信：

> 科西莫在自己的房间里安装了一个机器，上面装了日历中圣人们的银质肖像。这个机器会在每个圣人的纪念日展示出这个圣人的肖像，科西莫则会在圣人肖像之前行祷告仪式……他每天至少要去五六个教堂。

科西莫用无限的热忱来规劝别人改信天主教。克拉科夫（Cracow）的主教把三个顽皮捣蛋的哥萨克（Cossack）男孩儿领到他的面前，科西莫会连续几个小时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基督教教义。科西莫还会为改信天主教的外国新教徒提供丰厚的年金。另外，科西莫把同样的执着投入到处理佛罗伦萨现存的他认为会引发人们淫秽想法的艺术作品上。本来展示于大教堂内的巴乔·班迪内利的亚当与夏娃大理石雕塑就被科西莫搬走了；又因为有教士对他说乌菲齐里展示的裸体雕塑都太淫秽，科西莫就打算把它们全都藏到公众看不到的地方去。科西莫自己过着苦行僧一般的日子，他每天吃的都是最简单的饭菜，而且几乎都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进餐。他除了白水什么都不喝，每天早睡早起，甚至不点火炉。他曾经的缺点大部分都随着年岁的增长改掉了，只是固执和偏见还和以前一模一样。尽管如此，他仍然得不到人们的爱戴。现在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人们对他的态度更多是谨慎和尊重，再没有暴徒集结在他的窗口下嚷嚷着乞求食物或是用石灰在宫墙上涂写侮辱性的标语。可是当科西莫偶尔乘坐两匹马拉的马车离开宫殿，在举着长戟的瑞士保镖的护卫和仆从的前呼后拥下缓缓走在街上时，人们虽会行礼，但绝不会欢呼。直到1723年10月31日他去世，也没有什么人为此感到悲伤。

佛罗伦萨有其他更值得悲伤的理由。这个城市此时已经变得愁云遍布、贫穷破败。游客们反映说城里见到最多的是乞丐、流浪汉和修道士。他们成群结队、垂头丧气地在街上游走，两边的建筑也陈旧晦暗，窗户上糊的油纸也都是撕坏的。上一代人哀叹这个城市竟沦落到如此的境地，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的主教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就写道：“佛罗伦萨已经不是当初的佛罗伦萨了，这里的人口还

不足五万……一个人要是在托斯卡纳转转就会发现人口下降得多么严重，这片曾经充满生机的土地已经变得一贫如洗。”之后的游客也都是类似的失望感受，他们中有人这么说：

> 这个国家的衰败是显而易见的，城里大片的空地无人利用，已有的房子也都破败失修、不适宜居住，所以人口并不多；而现有人口也并没有什么用，因为其中大部分都是神职人员……我曾经在一次游行队伍中看到了超过四千名修士和教士。

科西莫向佛罗伦萨人征的税已经够重了，甚至他在将死之时还批准再加征一项新的个人所得税。即便如此，佛罗伦萨的财政也到了破产的边缘。同样捉襟见肘的还有城市中的贵族们，回想他们前辈的富足和好客，而现在被邀请去打打牌或者开个茶话会（*conversazione* ）就算最令人兴奋的活动了，主人能拿来待客的无非就是柠檬水、咖啡和茶，偶尔能有点冰淇淋。贵族们现在吃的也是从附近小饭馆里买来的普通饭菜，而且他们连饭钱都快凑不出来了，更别说供养那些怀揣着对美好年景的遐想而在门口游荡的仆人们了。

52岁的吉安·加斯托内接替了他父亲的位置之后，人们就更不指望能有什么起色了，根本没人相信他能克服自己的懒散、酗酒和放荡淫乱。一开始他还挺像回事，展现出了对人民福利的真诚关切，并且鄙视大多数亲戚奢侈炫耀的行为。他把税赋降到了人们可以忍受的程度，并且降低了谷物的价格；他终止了公开处决犯人的习俗，并且给城市里的乞丐们设立了像样的济贫院；他把政府从科西莫三世时期被教会严格控制的状态下解放了出来；他还恢复了科学家和学者们近年来被剥夺的自由；他也取消了针对犹太人的法令。可是，不久之后，他懒散的本质重新占据了上风，大部分时间里，他甚至都不肯离开自己的床，任由圆滑狡诈的朱利亚诺·达米替他将不想见的客人拦在门外，其实就是打发那些工匠和古董商们，他们指望着把其他有鉴赏力的收藏家根本不会要的作品推销给懒散随意的大公。

朱利亚诺·达米还会为吉安·加斯托内招募一批乱七八糟的年轻男女来供他消遣，其中还是以粗鲁吵闹的年轻男孩儿居多，这些人被统称为“鲁斯潘蒂”（*Ruspanti*），因为他们都是以领取鲁斯皮币（*ruspi*）为酬劳的。这些鲁斯潘蒂多是来自佛罗伦萨贫穷人家的漂亮年轻人，他们娱乐大公的方式就是在他的房间里玩耍吵闹，甚至对骂一些污言秽语，大公心血来潮时，也许还会加入他们的恶作剧中。有些时候，大公会摆上一桌丰盛的晚宴，让鲁斯潘蒂们假装成他的大臣或是其他一些佛罗伦萨最重要的领袖市民们，然后大公会为这些假扮的名流们致祝酒词。宴会结束后，他则劝说这些年轻人互相做爱供他观赏。鲁斯潘蒂的数量每个月都在增长，到1731年年底，已经达到了近四百人之多。随着人数的增长，鲁斯潘蒂变得越来越暴力和难以管控，他们不但在波波利花园中发动暴乱，被拖欠薪酬时还会去抢劫附近的饭馆和市场里的货摊。

吉安·加斯托内的嫂子维奥兰特在她的丈夫费尔迪南多去世后选择继续留在佛罗伦萨生活。她试图为吉安·加斯托内寻找一些不那么堕落的娱乐来取代鲁斯潘蒂，于是她经常安排一些宴会并邀请了最有意思、最有学问的人来为大公助兴。然而吉安·加斯托内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吃饭的时候不是咒骂就是打嗝，有时还会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粗俗评论。最让人难堪的一次，他不但在饭桌上呕吐，还拽下了自己的假发擦嘴。

其实，很多时候大公都是在床上用餐的。午餐是在下午5点，晚餐是在凌晨2点。午餐之前，他会同意接待几个重要的访问者，但是依然不会离开他的床，只是靠着枕头坐起来，四周还要摆满新摘的玫瑰，主要是为了掩盖房间里霉臭的气味。在这些时候，大公只是穿着沾满鼻烟的衬衫，戴着长领带和睡帽。他几乎不怎么离开房间，偶尔出现在众人眼前也只是为了打破他已经去世的传言。他倒是出席了1729年的施洗者圣约翰日庆祝活动，不过在活动开始之前就已经醉了，这样他就不会觉得冗长的仪式那么难熬了。他懒洋洋地坐在马车上，时不时从车窗探头

出去呕吐。到了普拉托门，他摇摇晃晃地去看赛马，整个过程中还不停地辱骂自己的男仆和身边的女士们；最后他干脆睡着了，被用轿子抬回了皮蒂宫。从那之后他几乎再没有离开过皮蒂宫，除了一次坐着轿子去声名狼藉的圣斯佩兰迪诺（San Sperandino）公共浴室，以及另外一次戴着草帽、穿着睡衣坐在轿子里前往波焦因佩里亚莱别墅。1737年6月，克拉翁王子（Prince de Craon）代表洛林公爵弗朗西斯（Duke of Lorraine Francis）——也是玛丽亚·特雷莎（Maria Theresa）的丈夫——拜访吉安·加斯托内，发现他已经是个将死之人了。欧洲的其他大国自行选定洛林公爵作为大公的继承人，甚至都没费心征求一下他本人的意见。王子向洛林公爵汇报说："大公的情况很可怜，他下不了床，胡子已经长了好长；床单很脏，他的视力非常微弱，他说话的声音很低而且模糊不清。总体来说，他剩下的时间超不过一个月。"王子说的一点儿也没错。吉安·加斯托内在1737年7月9日去世了，享年65岁。

新政权控制的六千人大军此时已经进入了佛罗伦萨的边境；政府中所有重要的位置也都被指派给了外国人。托斯卡纳成了奥地利帝国的一个属国，而美第奇家族的最后一个代表，帕兰帝内选帝侯夫人安娜·玛丽亚则被许可一直生活在皮蒂宫中她的房间里。

这位高挑、尊贵，甚至有些粗鲁、高傲的老妇人一直强烈反对自己弟弟的行为，虽然她费尽苦心的劝阻总是以被辱骂驱逐结束，但她最终还是在弟弟临死前说服他接受教会的仪式。安娜·玛丽亚本人也是极为虔诚的，她很少离开宫殿，偶尔坐着"有侍卫随行的八匹马拉着的"马车驶出宫殿的庭院，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确认她要么是去做弥撒，要么是去向她最爱的慈善事业捐款，要么是去视察圣洛伦佐教堂里家族陵墓工程的进展。之前这项工程一度停摆，现在也是由她本人承担费用才得以继续。她偶尔有几个访客，据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观察，她房间里的家具都是银质的，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温馨舒适，她在这里接待客人时会不苟言笑地站在一个黑色华盖下面。安娜·玛丽亚一直很清

楚自己是这世上最后一个美第奇的事实。

佛罗伦萨人也知道这个事实。人们为自己的国家再一次被外国势力占领而感到愤恨与羞愧，占领者的大炮被放置在这个城市的堡垒中，炮口却对准了人民。此时回想美第奇曾经的荣耀让他们感觉既骄傲又感伤。当公共建筑上象征美第奇家族的红球被取下，由装饰着鸢尾花（fleurs-de-lis）、雄鹰和十字架的洛林家族盾徽取代时，佛罗伦萨人感到深深的遗憾。当他们听说国父科西莫的生日、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当选纪念日、科西莫一世受封公爵纪念日等所有与美第奇家族有关的公共庆祝节日都要被废止时，人们更是义愤填膺。法国学者查理·德·布罗斯（Charles de Brosses）在这一时期探访了托斯卡纳地区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佛罗伦萨人愿意付出自己全部家当的三分之二来换取美第奇家族的回归；然后付出剩下的三分之一赶走洛林家族……他们憎恨洛林家族。"1743年2月，75岁的安娜·玛丽亚去世了，整个佛罗伦萨都沉浸在失去她的悲伤中。英国特使的助手汇报说：

> 普通人都认定她是被飓风带走了；今天早上刮起了一场极为强烈的飓风，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而现在却又晴空万里了——这就是证明。除此之外，约翰·加斯东（John Gaston）去世时也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情。人们坚信自己就是目击者，没有人能打破这种信念……周一早上，人们找了个借口请来了她的忏悔师，因为安娜·玛丽亚坚持不同意叫他来……忏悔师被要求告诉安娜·玛丽亚她很快就要死了，但是她还不太高兴地反问："谁告诉你的？"忏悔师则说："是你的医生。"
>
> "好吧，那我们就把该做的都做了吧，要抓紧。"就这样他们给她吃了圣餐……她的意识到最后都是清醒的，但是去世前最后大约一个半小时里，她一句话也没说过……从周四起她的遗体就被停放在宫殿的大厅里供人们瞻仰，今天晚上将被正式下葬……美第奇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也要去和她的祖先们团聚了。

然而，圣洛伦佐教堂的陵墓并不是人们真正记住她的原因。在她的遗嘱中，安娜·玛丽亚把美第奇家族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新任大公和他的继承人，包括所有的宫殿和别墅，所有的画作和雕塑，所有的珠宝和

家具，还有书籍和手稿——美第奇家族世代收藏的所有艺术品。她做出如此决定只有一个条件：任何一样东西都不能离开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全部财富要永远留在这里供全世界人民欣赏。[1]

---

[1] 最后是由一直不受爱戴的洛林家族和大公弗朗切斯科精力充沛的儿子彼得罗·莱奥波尔多（Pietro Leopoldo）的部长们来重振这个资源枯竭、饱受压迫的国家的。混乱的立法和过度开发的乡村是晚期的美第奇家族统治留下的社会和经济困难。但是他们留下的光辉灿烂的艺术和文化遗产——佛罗伦萨巴洛克艺术繁荣而精妙的工艺在科西莫三世的雕塑家乔瓦尼·巴蒂斯塔·福吉尼（Giovanni Battista Foggini）的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却是近年来才逐渐获得承认。1974年在底特律和皮蒂宫举办的名为“美第奇家族的暮光”的展览——当然贝尔纳多·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对此是毫不感兴趣的——是第一次举办此类型的展览。

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主要画像、半身像和雕塑

主题	类型	艺术家	现存地点
乔瓦尼·迪·比奇	去世后创作的画像	布龙齐诺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乔瓦尼·迪·比奇	画像	扎诺比·斯特罗齐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国父”科西莫	去世后创作的画像	彭托尔莫	乌菲齐宫
“国父”科西莫	画像（布鲁内莱斯基向其展示圣洛伦佐教堂模型）	瓦萨里	佛罗伦萨旧宫
洛伦佐·迪·乔瓦尼	去世后创作的画像	布龙齐诺	乌菲齐宫
皮耶罗·迪·科西莫	半身像	米诺·达菲耶索莱	巴杰罗宫
乔瓦尼·迪·科西莫	半身像	米诺·达菲耶索莱	巴杰罗宫
伟大的洛伦佐	去世后创作的画像	瓦萨里	乌菲齐宫
伟大的洛伦佐	壁画（与萨塞蒂家族成员一起）	基兰达约	圣三一教堂的萨塞蒂家族堂
伟大的洛伦佐	壁画（坐在枢机主教乔瓦尼前面）	瓦萨里	佛罗伦萨旧宫
伟大的洛伦佐	画像	佛罗伦萨画派，15世纪初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伟大的洛伦佐	死者面部模型	/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皮耶罗·弗朗切斯科·迪·洛伦佐	画像	瓦萨里	佛罗伦萨旧宫

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主要画像、半身像和雕塑-续表**1**

主题	类型	艺术家	现存地点
皮耶罗·迪·洛伦佐	画像	布龙齐诺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皮耶罗·迪·洛伦佐	半身像	韦罗基奥	巴杰罗宫
朱利亚诺·迪·洛伦佐	壁画（儿时与家庭教师波利齐亚诺在一起）	基兰达约	圣三一教堂的萨塞蒂家族堂
（?）孔泰西纳	半身像	多纳泰洛	巴杰罗宫
（?）菲奥雷塔·戈里尼	画像	波提切利	皮蒂宫
教皇莱奥十世	画像（与枢机主教朱利奥·德美第奇和路易吉·德罗西在一切起）	拉斐尔	乌菲齐宫
教皇莱奥十世	壁画（途经佛罗伦萨）	瓦萨里	佛罗伦萨旧宫
教皇莱奥十世	壁画（任命30个枢机主教）	瓦萨里	佛罗伦萨旧宫
教皇克莱门特七世	画像	布龙齐诺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公爵亚历山德罗	画像	瓦萨里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伊波利托	画像	提香	皮蒂宫
凯瑟琳	画像(21岁时)	/	波焦阿卡伊阿诺
凯瑟琳	画像(40岁时)	波布斯	乌菲齐宫
乔瓦尼·迪皮耶尔弗兰切斯科	画像	瓦萨里	佛罗伦萨旧宫
卡泰丽娜·斯福尔扎	画像	瓦萨里	佛罗伦萨旧宫
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	雕像	班迪内利	圣洛伦佐教堂广场

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主要画像、半身像和雕塑-续表**2**

主题	类型	艺术家	现存地点
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	画像	提香	乌菲齐宫
玛丽亚·萨尔维亚蒂	画像	瓦萨里	佛罗伦萨旧宫
科西莫一世	画像(12岁时)	通常被认为由里多尔福创作 基兰达约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科西莫一世	画像(青年时期)	彭托尔莫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科西莫一世	画像(当选)	弗兰切斯科和雅各布·利戈齐兄弟	佛罗伦萨旧宫
科西莫一世	画像	瓦萨里	乌菲齐宫
科西莫一世	画像(穿着铠甲)	布龙齐诺	乌菲齐宫
科西莫一世	骑马雕像	詹波隆那	佛罗伦萨旧宫
科西莫	半身像	切利尼	巴杰罗宫
科西莫一世	画像(戴着公国的王冠,穿着公国的王袍)	布龙齐诺	乌菲齐宫
埃莱奥诺拉·德·托莱多	画像	布龙齐诺	佛罗伦萨旧宫,弗朗切斯科一世的实验室中
埃莱奥诺拉·德·托莱多	画像(与乔瓦尼在一起)	布龙齐诺	乌菲齐宫
伊莎贝拉	画像	布龙齐诺	乌菲齐宫
加尔恰	画像	布龙齐诺	乌菲齐宫
枢机主教乔瓦尼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波焦阿卡伊阿诺
彼得罗	画像	布龙齐诺	乌菲齐宫
弗朗切斯科一世	画像	委罗内塞	皮蒂宫
奥地利的约安娜	画像(与菲利波在一起)	/	乌菲齐宫

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主要画像、半身像和雕塑-续表3

主题	类型	艺术家	现存地点
比安卡·卡佩洛	画像	布龙齐诺	皮蒂宫
埃莱奥诺拉(弗朗切斯科一世之女)	画像	普尔佐尼	皮蒂宫
费尔迪南多一世	画像	亚历山德罗·阿洛里	皮蒂宫
洛林家族的克里斯廷	画像	希皮奥内·普尔索内·迪加埃塔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洛林家族的克里斯廷	画像(55岁时)	苏斯泰尔曼斯	科尔西尼宫画廊
克劳迪娅(费尔迪南多一世之女)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乌菲齐宫
科西莫二世	画像(12岁时)	苏斯泰尔曼斯	波焦阿卡伊阿诺
科西莫二世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科尔西尼宫画廊
科西莫二世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乌菲齐宫
玛丽亚·马达莱娜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科尔西尼宫画廊
玛格丽塔(科西莫二世之女)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波焦阿卡伊阿诺
弗朗切斯科(科西莫二世之子)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波焦阿卡伊阿诺
安娜(科西莫二世之女)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皮蒂宫
费尔迪南多二世	画像(14岁时)	苏斯泰尔曼斯	皮蒂宫
费尔迪南多二世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波焦阿卡伊阿诺
马蒂亚斯	画像	苏斯泰尔曼斯	皮蒂宫
枢机主教莱奥波尔多	画像	/	乌菲齐宫
枢机主教莱奥波尔多	半身像	/	乌菲齐宫

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主要画像、半身像和雕塑-续表**4**

主题	类型	艺术家	现存地点
维多利亚·德拉罗韦雷	画像(青年时期)	卡洛·多尔齐	皮蒂宫
维多利亚·德拉罗韦雷	画像(中年时期)	卡洛·多尔齐	皮蒂宫
科西莫三世	画像(作为拉特兰的教规)	/	美第奇里卡尔迪宫
玛格丽特–路易丝	画像	/	乌菲齐宫
安娜·玛丽亚·路易莎	画像(与帕兰帝内选帝侯在一起)	G. F. 杜文	皮蒂宫
安娜·玛丽亚·路易莎	画像(与枪支和狗)	G. F. 杜文	皮蒂宫
维奥兰特·贝亚特丽切	画像	/	乌菲齐宫
吉安·加斯托内	画像	/	乌菲齐宫
吉安·加斯托内	半身像	/	乌菲齐宫

参考文献

The Last Medici，Methuen，1932；rev. edn，1958；reprinted，1973.

Tuscan Villas，Thames & Hudson，1973.

Ady，Cecilia M.，*Lorenzo dei Medici and Renaissance Italy*，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1955.

Allodoli，Ettore，*I Medici*，Florence，1928.

Andriani，Giovanbattista，*Istoria de' suoi tempi*，1583.

Antal，Friedrich *Florentine Painting and its Social Background*，Routledge & Kegan Paul，1948.

Anzilotti，*La costituzione interna dello Stato Fiorentino sotto il Duca Cosimo I de' Medici*，1910.

Armstrong，Antonio Edward *Lorenzo de' Medici and Florenc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1911.

Baccini，Giuseppe，*see* Orlando

Barfucci，Enrico *Lorenzo de' Medici e la società artistica del suo tempo*，Florence，1945.

Baron，Hans *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rev. ed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

Baroni，Costantino *Bramante*，Bergamo，1944.

Bayley，C.C.，*War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Toronto，1961.

Becker，Marvin B.，'The Republican City State in Florence' in *Speculum* XXXV，January 1960，pp. 39-50.

Biagi，Guido，*The Private Life of the Renaissance Florentines*，Florence，1896.

Booth，Cecily，*Cosimo 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1.

Borsook，Eve，*The Companion Guide to Florence*，Collins，1966.

The Mural Painters of Tuscany，1960.

Bossi *see* Roscoe

Bow■ Maurice. 'Songs of Dance and Carnival' in *Italian Renaissance Studies*，ed. Jacob.

Bracciolini，Poggio，*Istoria dall'origine di Firenze al 1454*，Florence，1598.

Brandi，Karl，*The Emperor Charles V*，trans. C. V. Wedgwood，Jonathan Cape，1965.

Brion，Marcel，*The Medici*：*A Great Florentine Family*，trans.

Gilles and Heather Cremonesi，Elek，1969.

Brown，Alison M.，‘The Humanist Portrait of Cosimo de’ Medici Pater Patriae’ i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XXIV，1961.

Brucker，Gene A.，‘The Ciompi Revolution’ in *Florentine Studies*，ed. N. Rubinstein.

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Princeton，1962.

‘The Medici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n *Speculum*，XXXII，January 1957，pp. 1-26.

Renaissance Florence，Wiley，1969.

Burckhardt，Jacob，*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trans. S.G.C. Middlemore，1890，new edn，2 vols.，introduction by Benjamin Nelson and Charles Trinkaus，Harper Torchbooks，1958.

Burke，Peter，*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Batsford，1972.

Burnet，Gilbert，*Some letters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what seemed most remarkable in travelling through Switzerland*，*Italy*，*etc.*，1689.

Caggese，Romolo，*Firenza dall decadenza di Roma al Risorgimento d’Italia*，Florence，1912-13.

Camugliano，G. Niccolini di，*The Chronicles of a Florentine Family 1200-1400*，1933.

Cantagalli，Roberto，*La Guerra di Siena*，Siena，1962.

Capponi，G.A.，*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Firenze*，2 vols.，Florence，1875.

Carden，R.W.，*The Life of Giorgio Vasari*，1910.

Catalogue of the Medici Archives，Christie，Manson & Woods，1919.

Cavalcanti，Giovanni，*Istorie Fiorentine*，2 vols.，Florence，1838-9.

Cecchi，Emilio，*Lorenzo il Magnifico*，Rome，1949.

Cellini，Benvenuto，*Autobiography*，trans. George Bull，Penguin Books，1956.

Chabod，Federico，*Machiavelli and the Renaissance*，trans. David Moore，Bowes & Bowes，1958.

Chamberlin，E.R.，*Everyday Life in Renaissance Times*，Batsford，1965.

Chastel，André，*Art et Humanisme à Florence au temps de Laurent le Magnifique*，Paris，1961.

‘Vasari et la légende Médicéene：L’école du jardin de Saint Marc’ in *Studi Vasariani*，Florence，1952.

Cochrane，Eric，*Florence in the Forgotten Centuries 1527-1800*，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3.

The Late Italian Renaissance， Harper & Row，1970.

‘The Florentine Background of Galileo’s Work’ in *Galileo*：*Man of Science*， ed. Ernan McMullin，Basic Books，1967.

Commines，Philip de，*The Memoirs of Philip de Commines*，*Lord of Argenton*， ed. Andrew R. Scobie，2 vols.，1906.

Conte，Giuseppe，*Firenze dai Medici ai Lorena*， Florence，1907.

Cronin，Vincent，*The Florentine Renaissance*， Collins，1967.

The Flowering of the Renaissance， Collins，1969.

Cruttwell，M.，*Verrocchio*， 1904.

Dami，Brunetto，*Giovanni Bicci dei Medici*， Florence，1899.

Dati，Gregorio，*Istoria di Firenze dal 1380 al 1450*， Florence，1735.

Deiss，Joseph Jay，*Captains of Fortune*：*Profiles of Six Italian Condottieri*， Gollancz，1966.

Delaborde，H.F.，*L’Expédition de Charles VIII en Italie*， Paris，1888.

Dini-Traversari，A.，*Ambrogio Traversari e i suoi tempi*， Florence，1912.

Doren，Alfred，*Le arti florentine*， trans. Klein，2 vols.，Florence，1940.

Dorini，Umberto，*I Medici e i loro tempi* ，Florence，1947.

Ehrenberg，Richard，*Capital and Finance in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 ，trans. H.M. Lucas，1928.

Einem，Herbert von，*Michelangelo* ，trans. Ronald Taylor，Methuen，1973.

Ewart，K.D.，*Cosimo de' Medici* ，1889.

Ferrara，Mario，（ed.），*Savonarola*：*Prediche e scritti* ，Florence，1952.

Ferrai，Luigi Alberto，*Cosimo I de' Medici*，*Duca di Firenze* ，1882.

Fischel，Oscar，*Raphael* ，trans. Bernard Rackham，2 vols.，Kegan Paul，1948.

Gadol，Joan，*Leon Batista Alberti*：*Universal Man of the Early Renaiss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

Gage，John，*Life in Italy at the time of the Medici* ，Batsford，1968.

Galluzzi，Riguccio，*Istoria del Granducato di Toscana sotto il governo della Casa Medici* ，7 vols.，Florence，1820-1.

Gaye，G.，*Carteggio inedito d'artisti dei secoli XIV*，*XV*，*XVI* ，Florence，1839-40.

Gilbert，Felix，'Florentine political assumptions in the period of Savonarola and Soderini' i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XX，1957，pp. 187ff.

‘Guicciardini，Machiavelli and Valori on Lorenzo Magnifico’ in *Renaissance News*，IX，1958，pp. 107-14.

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

Gill，Joseph，*The Council of Flor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

Goldthwaite，Richard A.，*Private Wealth in Renaissance Flo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

Gombrich，E.H.，‘The Early Medici as Patrons of Art’ in *Italian Renaissance Studies*，ed. Jacob.

Grayson，Cecil，‘Lorenzo，Machiavelli and the Italian Language’ in *Italian Renaissance Studies*，ed. Jacob.

Guarini，Elina Fasano，*Lo stato mediceo di Cosimo I*，1973.

Guicciardini，Francesco，*Carteggi*，ed. P.G. Ricci，Rome，1954-62.

Storia d’Italia，ed. Costantino Panigada，5 vols.，Bari，1929；English edition，ed. Sidney Alexander，Collier-Macmillan，1969.

Gutkind，Curt S.，*Cosimo de’ Medici*：*Pater Patriae*，*1389-1464*，Clarendon Press，Oxford，1938.

Hale，J.R.，‘The End of Florentine Liberty：The Fortezza da Basso’ in *Florentine Studies*，ed. Rubinstein.

Florence and the Medici，Thames and Hudson，1977.

Machiavelli and Renaissance Italy，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1961.

Renaissance Europe 1480-1520，Fontana，1971.

'War and Public Opinion in Renaissance Italy' in *Italian Renaissance Studies*，ed. Jacob，

Hay，Denys，（ed.），*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its Historical Sett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1.

The Renaissance Debate，Holt，Rinehart & Winston，1965.

Higgins，John R.，*A Historical Guide to Florence*，Robert Hale，1973.

Holmes，George，*The Florentine Enlightenment*，*1400-50*，Weidenfeld & Nicolson，1969.

'How the Medici became the Pope's Bankers' in *Florentine Studies*，ed. Rubinstein，

Hook，Judith，*The Sack of Rome*，*1527*，Macmillan，1973.

Horne，Herbert，*Alessandro Filipepi Commonly Called Sandro Botticelli*，*Painter of Florence*，1908.

Horsburgh，E.L.S.，Girolamo Savonarola，1901.

Hyett，Francis A.，*Florence*：*Her History and Art to the Fall of the Republic*，1903.

Imbert，G.，*La vita Fiorentina nel Seicento*，Florence，1906.

Jacob，E.F.，（ed.），*Italian Renaissance Studies*，Faber，1960.

Janson，H.W.，*The Sculpture of Donatello*，2 vol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Joannides，P.，‘Michelangelo’s Medici Chapel：Some new Suggestions’，*Burlington Magazine*，CXIV，pp. 542-6.

Krautheimer，Richard，*Lorenzo Ghiberti*，Princcton University Press，2 vols.，1970.

Landucci，Luca，*A Florentine Diary from 1450-1516*，trans. Alice de Rosen Jervis，1927.

Laven，Peter，*Renaissance Italy*，*1464-1534*，Batsford，1966.

Lettere di Lorenzo il Magnifico al Sommo Pontefice Innocenzo VIII，Florence，1830.

Lorenzino de’ Medici，*Opere*，ed. Simioni，2 vols，Bari，1913.

Scritti e documenti，Milan，1862.

Lucas-Dubreton，J.，*Daily Life in Florence in the Time of the Medici*，trans. A. Lytton Sells，Allen & Unwin，1960.

Lungo，Isodoro del，*I Medici Granduchi*，1896.

Lyall，Archibald，*Companion Guide to Tuscany*，Collins，1973.

McCarthy，Mary，*The Stones of Florence*，Heinemann，1959.

Machiavelli，Niccolò，*Istorie Fiorentine*，*Opere*，ed. Antonio Panella，vol. 1，Milan，1938.

Macinghi negli Strozzi，Alessandra，*Lettere di una gentildonna fiorentina del secolo XV ai figliuoli esuli*，ed. Cesare Guasti，Florence，1877.

Maguire，Yvonne，*The Private Life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936.

The Women of the Medici，1927.

Mallett，Michael，*Mercenaries and Their Masters*：*Warfare in Renaissance Italy*，Bodley Head，1974.

'Pisa and Florenc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Florentine Studies*，ed. Rubinstein.

Marks，L.F.，'The Financial Oligarchy in Florence under Lorenzo' in *Italian Renaissance Studies*，ed. Jacob.

Martines，Lauro，*Lawyers and Statecraft in Renaissance Flo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Florentine Humanists 1390-1460，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Masson，Georgina，*Companion Guide to Rome*，Collins，1965.

Italian Villas and Palaces，Thames & Hudson，1959.

Mattingly，Garrett，*Renaissance Diplomacy*，Jonathan Cape，1955.

Minor，Andrew C.，and Mitchell，Bonner，*A Renaissance Entertainment*：*Festivities for the Marriage of Cosimo I*，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68.

Morassi，Antonio，*Il Tesoro dei Medici*，Milan，1963.

Morisani，Ottavio，*Michelozzo architetto*，Einaudi，1951.

Müntz，E.，*Les Collections des Médicis au XVe Siècle*，Paris，1888.

Murray，Peter，*The Architecture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Thames & Hudson，1969.

Murray，Peter，with Linda Murray，*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Thames & Hudson，1969.

Nagler，Alois Maria，*Theatre Festivals and the Medici*，*1539-1637*，trans. G. Hickenhoyer，Yale，1964.

Nardi，Jacopo，*Istoria della città di Firenze*，1888.

Nitti，Francesco，*Leone X e la sua politica*，1892.

Noble，Mark，*Memoirs of the Illustrious House of Medici*，1797.

Origo，Iris，'The Domestic Enemy：The Eastern Slaves in Tuscany in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ies'，*Speculum*，1955，pp. 21-66.

The Merchant of Prato，Jonathan Cape，1957.

Orlando，Filippo，and Baccini，Giuseppi（eds.），*Bibliotechina Grassoccia*，Florence，1886-98.

Palmarocchi，Roberto，*Lorenzo de’ Medici*，Turin，1941.

La politica italiana di Lorenzo de’ Medici，Florence，1973.

Pampaloni，Guido，*Palazzo Strozzi*，Rome，1963.

Panella，Antonio，*Storia di Firenza*，Florence，1949.

Partner，Peter，‘Florence and the Papacy in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 in *Florentine Studies*，ed. Rubinstein.

Pastor，Ludwig von，*History of the Popes from the Close of the Middle Ages*，ed. R.F. Keir，1899-1910.

Pellegrini，F.C.，*Sulla repubblica fiorentina al tempo di Cosimo il Vecchio* Pisa，1880.

Perrens，F.-T.，*Histoire de Florence depuis la domination des Médicis jusqu’à la chute de la république*，9 vols.，Paris，1877-88.

Piccolomini，Aeneas Silvius，*Memoirs of a Renaissance Pope*：*The Commentaries of Pius II*，trans. Florence A. Gragg，ed. Leonora C. Gabel，1959.

Picotti，Giovanni Battista，*La giovinezza di Leone X*，Milan，1927.

Pieraccini，Gaetano，*La Stirpe de’ Medici di Cafaggiolo*，3 vols.，Florence，2924；2nd edn，1947.

Plumb，J.H.，*The Horizon Book of the Renaissance*，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Co.，1961.

Pope-Hennessy，John，*Italian High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Sculpture*，Phaidon，1963.

Paolo Uccello，Phaidon，1950.

Prescott，Orville，*Princes of the Renaissance*，Allen & Unwin，1970.

Randolph，G.，*Florentine Merchants in the Age of the Medici*，1932.

Reumont，Alfred von，*Lorenzo de' Medici*，Leipzig，1874; London，1876

Ricchioni，Vincenzo，*La costituzione politica di Firenze ai tempi di Lorenzo il Magnifico*，Siena，1913.

Richards，Gertrude R.B.，*Florentine Merchants in the Age of the Medici*，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2.

Ridolfi，Roberto，*The Life of Francesco Guicciardini*，trans. Cecil Grays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7.

The Life of Girolamo Savonarola，trans. Cecil Grayson，1959.

The Life of Niccolò Machiavelli，trans. Cecil Grayson，1963.

Robiony，Emilio，*Gli ultimi dei Medici*，Florence，1905.

Rochon，André，*La Jeunesse de Laurent de Médicis*，Paris，1963.

Rodocanachi，E.，*Le Pontificat de Léon X*，Paris，1931.

Roeder，Ralph，'Lorenzo de' Medici' in Plumb，*The Horizon Book*.

Roover，Raymond de，‘Labour Conditions in Florence around 1400：Theory，Policy and Reality’ in *Florentine Studies*， ed. Rubinste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Medici Bank，*1397-149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Roscoe G.，and Bossi，L.，*Vita e Pontificato di Leone X*， Milan，1816-17.

Roscoe，W.，*Life of Leo X*， 1846.

Life of Lorenzo de’ Medici， new edn，1872.

Ross，Janet，*Florentine Villas*， 1901.

Florentine Palaces and Their Stories， 1905.

Lives of the Early Medici as told in their correspondence， 1910.

Roth，Cecil，*The Last Florentine Republic*， 1925.

Rubinstein，Nicolai，‘Florentine Constitutionalism and Medici Ascendanc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Florentine Studies*， ed. Rubinstein.

（ed.）*Florentine Studies*：*Politics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Faber，1968.

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1494， Clarendon Press，new edn，1968.

‘Politics and Constitution in Florence at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Italian Renaissance Studies*， ed. Jacob.

Rud，E.，*Vasari's Life and Lives*，London，1964.

Salvini，R.，*Botticelli*，Milan，1958.

Scaife，Walter，*Florentine Life During the Renaissance*，1893.

Schevill，Ferdinand，*History of Florence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City through the Renaissance*，Harcourt Brace，1936.

The Medici，Harcourt Brace，1949.

Segni，Bernardo，*Storie Fiorentine*，1728.

Shepherd，William，*The Life of Poggio Bracciolini*，1837.

Sinibaldi，Giulia，*Il Palazzo Vecchio di Firenze*，Rome，1950.

Sismondi，J.C.L.，*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publics during the Middle Ages*，ed. William Boulting，n.d.

Solerti，Angelo，*Musica*，*Ballo e Drammatica alla corte Medicea dal 1600 al 1637*，Florence，1905.

Spini，Giorgio，*Cosimo I de' Medici e la indipendenza del Principato Mediceo*，Florence，1945.

Strong，Roy，*Splendour at Court*：*Renaissance Spectacle and Illusion*，Weidenfeld & Nicolson，1973.

Symonds，John Addington，*The Renaissance in Italy*，1875-86.

Tenenti，Alberto，*Firenze dal Comune a Lorenzo il Magnifico*，Milan，1970.

Tolnay，Charles de，*Michelangelo*，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3-60.

Ullman，B. L.，and Stacker，P. A.，*The Public Library of Renaissance Florence*，1972.

Valori，Niccolò，*Laurentii Medicei vita*，Florence，1756.

Varchi，Benedetto，*Storia fiorentina*，3 vols.，1838-41；new edn，Florence，1963.

Vasari，Giorgio，*Le vite dei più eccellenti pittori，s？？ltori ed architetti*，9 vols.，Florence，1906.

The Lives of the Artists，trans. George Bull，Penguin Books，1965.

Vaughan，Herbert M.，*The Medici Popes*，1908.

Vaussard，Maurice，*La Vie quotidienne en Italie au XVIIIe Siècle*，Hachette，1959；trans. Michael Heron，Allen & Unwin，1962.

Vespasiano da Bisticci，*Vite di Uomini Illustri*，ed. D’Ancona and Aeschlimann，Milan，1951.

The Vespasiano Memoirs，trans. George & Waters，1926.

Villani，Giovanni，*Chronica di Giovanni Villani*，ed. Dragomanni，4 vols.，Florence，1844-5.

Villani，Matteo，*Chronica di Matteo Villani*，ed. Dragomanni，2 vols.，Florence，1846.

Villari，P.，*La storia di Girolamo Savonarola*，Florence，1877.

Wadia，Bettina，*Botticelli*，Hamlyn，1968.

Weil-Garris Posner，Kathleen，‘Comments on the Medici Chapel and Pontormo’s Lunette at Poggio a Caiano’ in *Burlington Magazine*，CXV，pp. 641-9.

Weinstein，Donald，‘The Myth of Florence’ in *Florentine Studies*，ed. Rubinstein.

Savonarola and Flo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Savonarola，Florence and the millenarian tradition’ in *Church History*，1958，pp. 291-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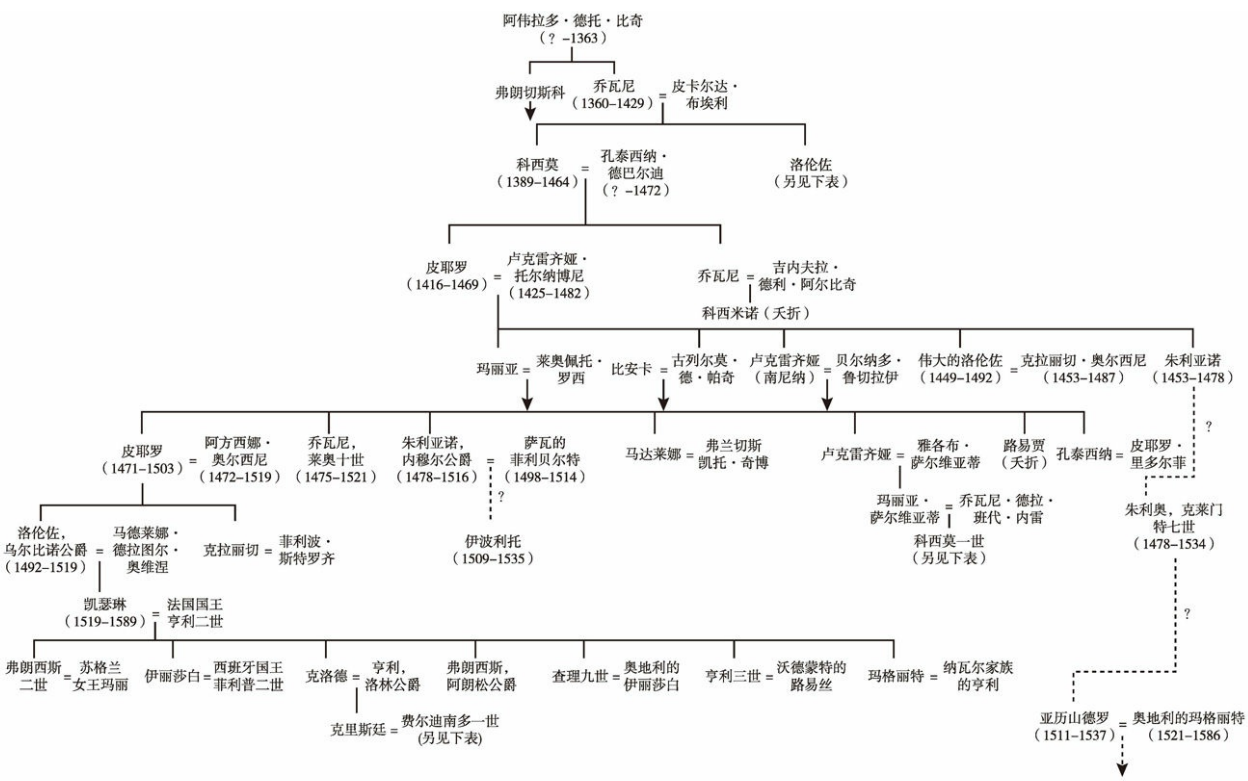
Weiss，Roberto，*The Renaissanc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ntiquity*，Blackwell，1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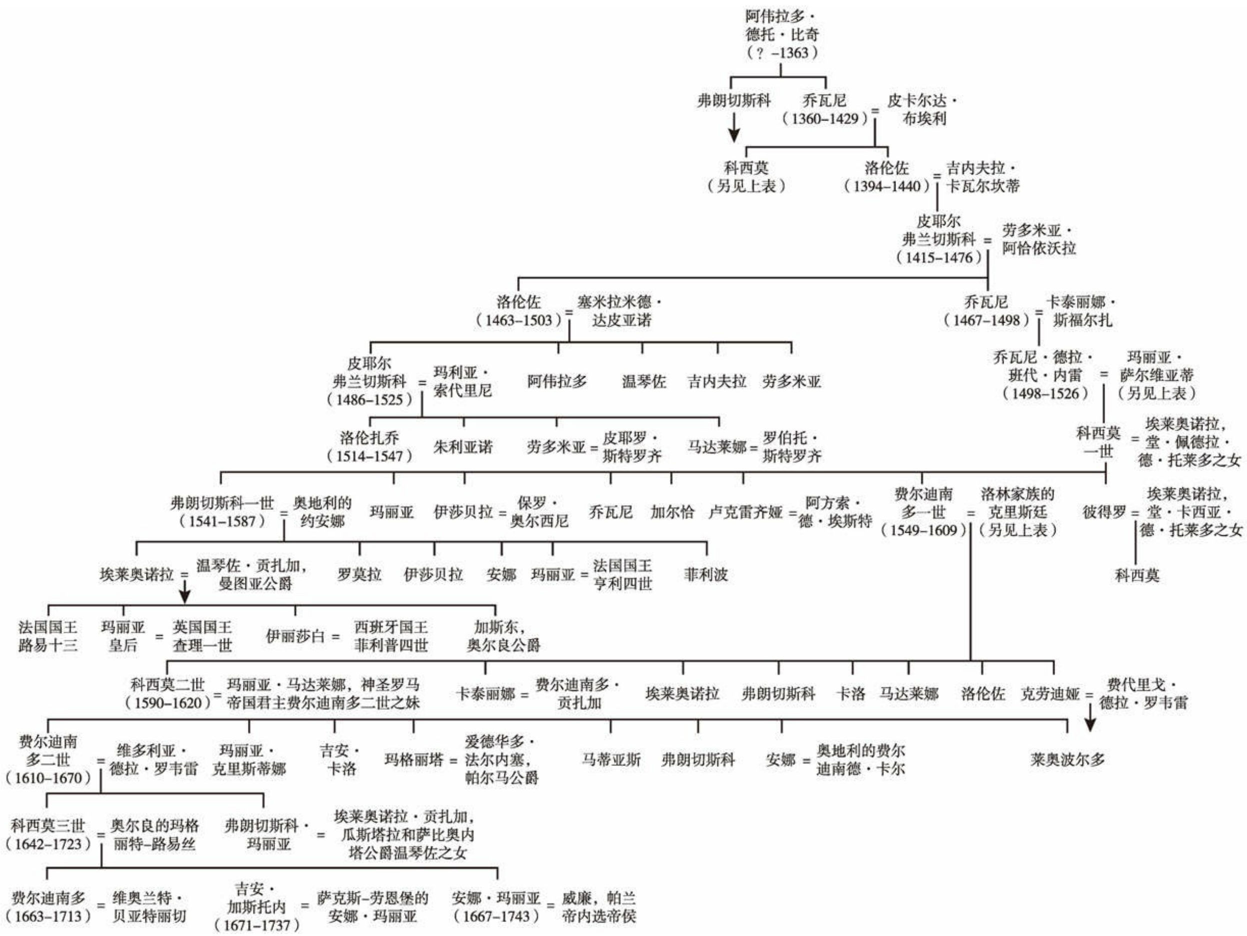
Winspeare，F.，*La congiura dei cardinali contro Leone X*，1957.

Young，G.F.，*The Medici*，2 vols.，1909.

美第奇家族成员图谱

科西莫·迪·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的后代




阿伟拉多·德托·比奇（？-1363）
弗朗切斯科
乔瓦尼（1360–1429）
皮卡尔达·布埃利
科西莫（另见上表）
洛伦佐（1394–1440）
吉内夫拉·卡瓦尔坎蒂
皮耶尔弗兰切斯科（1415–1476）
劳多米亚·阿恰依沃拉
洛伦佐（1463–1503）
塞米拉米德·达皮亚诺
乔瓦尼（1467–1498）
卡泰丽娜·斯福尔扎
皮耶尔弗兰切斯科（1486–1525）
玛利亚·索代里尼
阿伟拉多
温琴佐
吉内夫拉
劳多米亚
乔瓦尼·德拉·班代·内雷（1498–1526）
玛丽亚·萨尔维亚蒂（另见上表）
洛伦扎乔（1514–1547）
朱利亚诺
劳多米亚
皮耶罗·斯特罗齐
马达莱娜
罗伯托·斯特罗齐
科西莫一世
埃莱奥诺拉，堂·佩德拉·德·托莱多之女
弗朗切斯科一世（1541–1587）
奥地利的约安娜
玛丽亚
伊莎贝拉
保罗·奥尔西尼
乔瓦尼
加尔恰
卢克雷齐娅
阿方索·德·埃斯特
费尔迪南多一世（1549–1609）
洛林家族的克里斯廷（另见上表）
彼得罗
埃莱奥诺拉，堂·卡西亚·德·托莱多之女
埃莱奥诺拉
温琴佐·贡扎加，曼图亚公爵
罗莫拉
伊莎贝拉
安娜
玛丽亚
法国国王亨利四世
菲利波
科西莫
法国国王路易十三
玛丽亚皇后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
伊丽莎白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
加斯东，奥尔良公爵
科西莫二世（1590–1620）
玛丽亚·马达莱娜，神圣罗马帝国君主费尔迪南多二世之妹
卡泰丽娜
费尔迪南多·贡扎加
埃莱奥诺拉
弗朗切斯科
卡洛
马达莱娜
洛伦佐
克劳迪娅
费代里戈·德拉·罗韦雷
费尔迪南多二世（1610–1670）
维多利亚·德拉·罗韦雷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
吉安·卡洛
玛格丽塔
爱德华多·法尔内塞，帕尔马公爵
马蒂亚斯
弗朗切斯科
安娜
奥地利的费尔迪南德·卡尔
莱奥波尔多
科西莫三世（1642–1723）
奥尔良的玛格丽特-路易丝
弗朗切斯科·玛丽亚
埃莱奥诺拉·贡扎加，瓜斯塔拉和萨比奥内塔公爵温琴佐之女
费尔迪南多（1663–1713）
维奥兰特·贝亚特丽切
吉安·加斯托内（1671–1737）
萨克斯-劳恩堡的安娜·玛丽亚
安娜·玛丽亚（1667–1743）
威廉，帕兰帝内选帝侯

索引

（索引中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cciaiuoli，Agnolo，banished，55，106；and the Medici，61，103-4，105；diplomacy with France，84，85

Acciaiuoli，Donato，122，148

Acciaiuoli，Piero，122

Accoramboni，Francesco，277

Accoramboni，Vittoria，277-8

Agnolo，Baccio d’，325

Albany，Louisa，Countess of，325

Albert II，German Emperor （d. 1439），64

Alberti，House of，35

Alberti，Leon Battista （1404-72），on poverty，28；and Palazzo Rucellai，29，313；at Camaldoli Abbey，122；and Tuscan poetry，171；and Santa Maria Novella，313

Albizzi family，power and achievements of，32-3；and the Medici，

40，41，43，47；Uzzano and，48；and the anti-Medicean plot，50，52；growing unpopularity of，54-5；and the Duke of Milan，79，80；lose hope of returning to power，80

Albizzi，Antonfrancesco degli，212，215

Albizzi，Ginevra degli，*see* Medici，Ginevra de’

Albizzi，Eleonora degli，272

Albizzi，Rinaldo di’ Messer Maso degli，32；personality，42；and humanism，43-4；and the anti-Medicean plot，48，49，50，52；on conflict with the mighty，54；takes up arms，55-6；loses support，56-7；and Eugenius IV，57；banished，58；goes on pilgrimage，80；Parentucelli and，87

Alfonso I，King of Naples，81，84，85

Alfonso II，King of Naples，183，184，193

Alidosi，Francesco，Cardinal，223

Allori，Alessandro （1535-1607），322

Almeni，Sforza，272

Ambrose，St，71，98

Ammanati，Bartolomeo （1511-92） and the Pitti Palace，271，328；Cosimo I and，274；and the Villa Pratolino，276；and San Giovannino degli Scolopi，317；and the Villa of Castello，323，329；and the Neptune Fountain，327；and the Ponte alla Carraia，329

Ammianus Marcellinus，45

Ammirato，Scipio，163

Angelico，Fra，*real name* Guido di Pietri，*monastic name* Giovanni da Fiesole （1387-1455），his history，94；his nature，94；Gozzoli and，110；his *Crucifixion* ，319；his *Annunciation* ，319

Anna Maria，Electress Palatine，*née* Anna Maria Luisa di Cosimo de’ Medici，（1667-1743），291；her marriage，304；widowed，304；and the Tuscan succession，305；the last of the Medici，309；death of，310；her bequest，310-11

Anna Maria Francesca of Saxe-Lauenberg，*see* Medici，Anna Maria Francesca，de’

Anne，Duchess of Brittany，*and later* Queen of France，183

Antelminelli，Castruccio Castracani degli，320

Antinori，Bernardino，277

Antonio da Sangallo，325

Apicius，Marcus Gabius，45

Argyropoulos，John （1416-*c* . 1486），69，111，122，170

Ariosto，Ludovico （1474-1533），227

Aristotle，68

Arno，river，water displays on，119，282；Pazzi’s corpse in，

141；Savonarola’s remains thrown into，200；in flood，223，279-80；Buonnacorsi’s corpse in，270-1；Acciaiuoli palace on，315

Assisi，65，74，143

Astrology，97-8，324，327

Avogrado，Giovanni，317

Baglioni，Cesare，330

Baglioni，Gian-Paolo，207

Baldese，Ambrogio di，331

Baldovinetti，Mariotto，52

Bande Nere，Giovanni delle，*see* Medici，Giovanni di Giovanni de’

Bank，Medici，branches of，34；and the Papacy，35，36，37，88，89，129；Cosimo *Pater Patriae* and，49，59-60；and the Florentine government，55；Sforza. and，82；and alliance with Milan，83；under Cosimo *Pater Patriae* ，86-8；and Sixtus IV，128-9，148；and Città di Castello，129；declining fortunes of，158

Banquets，at the wedding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17-18；given by Giovanni di Lorenzo as cardinal and Pope，206，225-6；given by the cardinals under Leo X and by Agostino Chigi，224-5；Leo X’s，225；for wedding of Maria de’ Medici，281；in the Palazzo Vecchio，289；of Cosimo III，297

Baraballo，Fra，226-7

Barbadori family，316

Barbadori，Niccolò，55，57，58

Bardi family，bankers，39；and the Medici，43，87；their chapel in Santa Croce，313；and the Via de’ Bardi，314；and the Villa Medici，318

Bardi，Bartolomeo de’，36

Bardi，Contessina de’，*see* Medici，Contessina de’

Bardi，Giovanni de’，38

Bardi，Niccolò di Betto，90

Baroncelli，Bernardo Bandini，135-6，137，138，142

Bartolommeo，Fra，*prop* . Baccio della Porta （1475-1517），192，301

Battles，

Agnadello （1509），207，208，209

Anghiari，（1440），80，194

Barga（1437），80

Fornovo（1495），195

Imola（1434），55

Imola （1467），107

Lepanto （1570），266，267

Marignano （1515），220

Montemurlo （1537），263

Pavia （1525），240

Ravenna （1512），208，209

Beccadelli，Antonio，*Hermaphroditus* ，91

Becchi，Gentile，Bishop of Arezzo，103，165

Benavieni，Antonio，107

Benci，Giovanni d’Amerigo，87，95

Benedetto da Rovezzano，321，323

Bentivoglio family，65，209，222

Bentivoglio，Giovanni，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03，149-50；warns Piero di Cosimo，105；and capture and recapture of Bologna，207，208

Berlinghieri，Jacopo，49

Bernardino of Siena，St （1380-1444），23

Bessarion，Johannes，Archbishop of Nicaea （*c* . 1395-1472），67，

Bicci，Neri di，320

Bisticci，Vespasiano da，165；and Cosimo *Pater Patriae*，39，73，74；on Cosimo *Pater Patriae*，60，97-8；and Council of Florence，66；his tomb，313

Boboli Gardens，origin of the name，271；Cosimo I and，274；Ferdinand。I and，280；*Il Mondo Festeggiante* in，289，328；*Ruspanti* in，308；historical note on，328；*Perseus and the Dragon*，330

Boccaccio，Giovanni （1313-75），278

Bogoli family，271

Bologna，excommunication of，45；rumours of plots in，65；Medici office in，87；Bishop of，87；Savonarola a novice in，179；taken and retaken，207，208；Cardinal Giovanni di Lorenzo in，209；French forces withdraw from，209；Leo X and Francis I in，222

Borgia，Cesare （1476-1507），193，201

Borgia，Roderigo，Cardinal，*later* Alexander VI，Pope，*q.v.* 203，205

Borromeo，Giovanni，132

Botticelli，Sandro，*prop*. Alessandro Filipepi （1444-1510），165，168；his works，109-10，166，167，315，320，322，323，331；designs Giuliano di Piero’s standard，122；and the Pazzi conspirators，142；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67；cost of his work，169；and

Savonarola，181；his pictures burned，192；and the tragedy of Florence，325；and Michelangelo’s *David* ，326

Bourbon，Charles，Duke of （1490-1527），242-3，244

Bracciolini，Jacopo di Poggio，136，139-40

Bracciolini，Poggio，44，45-6，136

Bramante，*prop* . Donato d’Angelo Lazzari （1444-1514），228，229

Bravo，Cecco，332

Bronzino，Agnolo （1502-72），274

Brosses，Charles de，310

Browning，Elizabeth Barrett，321

Brunelleschi，Filippo （1377-1446），and bronze doors for the Baptistery，70；Giovanni di Bicci commissions，71；and basilica of San Lorenzo，71-2，317；and the Cathedral dome，72，313；Cosimo *Pater Patriae* and，75；Donatello and，90；and the Pazzi chapel，131；and the Rotonda di Santa Maria Angeli，314；and the Ospedale degli Innocenti，316；and Santo Spirito，323

Bruni，Leonardo （1369-1444），44，46，47，211，313

Bueri，Piccarda，*see* Medici，Piccarda de’

Buggiano，（Andrea Cavalcanti），319

Buonnaccorsi，Giuliano，270-1

Buontalenti，Bernardo，and the Boboli Gardens，271；and the Villa Pratolino，276，330；and the Uffizi palace，278，328；and Forte di Belvedere，280；and *Il Rapimento di Cefalo* ，281；and the Cathedral façade，324；and Santa Trinità，328；garden of the Villa of Castello，323，329；and Cereto Guidi，330

Burchiello，*the barber* ，95

Burnet，Gilbert，Bishop of Salisbury，306

Buti，Lucrezia，93

Byron，George Gordon，Baron Byron，325

Caccini，Giulio （1550-1618），281，328

Caccini，Giovanni，315，319

Calabria，Alfonso，Duke of，*later* Alfonso II，King of Naples，*q.v.* ，and Florence，148-9，150，155；and Duke of Ferrara，151；progress of his forces，152；in Siena，159；and the Turkish invasion，159；Maiano and，167

Calabria，Duchess of，*née* Ippolita Sforza，103，153

Camaldoli，Abbey of，122，321

Cambio，Arnolfo di （1232-1301），313

Cambrai，League of，207，223

Campana，Francesco，263

Capello，Bianca，*see* Medici，Bianca de’

Capponi family，316

Capponi，Francesco，251

Capponi，Neri，52，61，82

Capponi，Piero de Gino，190-1

Carafa，Diomede，153-4

Carbone，Lodovico，96

Cardi，Lodovico，*called* Cigoli （1559-1613），324

Cardona，Raymond de，211，212，213，220

Carnivals，*see* Festivals

Castagno，Andrea del，320

Castellesi，Adriano，Cardinal，233，234，238

Catherine de’ Medici，Queen of France，*see* Medici Caterina di Lorenzo de’ （1519-89）

Catherine of Aragon，Queen of England （1485-1536），247，248

Catherine of Siena，St （1347-80），172，278

Cattaneo，Simonetta，*see* Vespucci，Simonetta

Catullus，Valerius，91

Cavalcanti family，43

Cavalcanti，Ginevra，*see* Medici，Ginevra de’

Cavalcanti，Lorenzo，137，138

Caxton，William （*c* . 1422-*c* . 1491），169

Cellini，Benvenuto （1500-71），on syphilis，205；Clement VII and，240，246-7，253；on his prowess as a gunner，245-6；on Cosimo I，258；his *Perseus* ，274，329；his bust of Cosimo I，327

Cennini，Bernardo，150，169

Cesarini，Cardinal Julian （1398-1444），67

Chalcondylas，Demetrius （1434-1511），111，170

Charlemagne，King of the Franks，*and* Roman Emperor，30

Charles V，Holy Roman Emperor （Charles I，King of Spain；1500-58），succeeds Ferdinand the Catholic，223；succeeds Emperor Maximilian，237；Leo X and，237；takes Milan，238；and Clement VII，239，240-1，249，251，252；Imperial army marches on Rome，241，242-3；and Catherine of Aragon，248；Imperial forces besiege Florence，250；and Cosimo I，264

Charles VI，Holy Roman Emperor （1685-1740），305

Charles VII，King of France （1403-61），84

Charles VIII，King of France，*called* the Affable （1470-98），his ambitions，182；his appearancc，182，190；his personality，183；and the invasion of Italy，183-4，185；Piero di Lorenzo and，186；Savonarola greets，188；enters Florence，189-90；and Capponi，190-1；in Naples，193；and his army，194，195，196；and Pisa，197；death of，201；and Franco-Florentine friendship，208

Charlotte of Mecklenburg-Strelitz，Queen of England，328

Chigi，Agostino，225

Christina，Queen of Sweden （1626-89），286，330

Christine of Lorraine，*see* Medici，Christine de’

Chrysoloras，Emmanuel （*c* . 1355-1415），47

Chrysoloras，John，47

Cibò，Franceschetto，162，203

Cibò，Giovanni Battista，*see* Pope Innocent VIII

Cibò，Innocenzo，Cardinal，248，256，257，263，264

Cibò，Lorenzo，232

Cibò，Maddalena，*née* Maddalena di Lorenzo de’ Medici，162，203，205

Cicero，Marcus Tullius，98

Cimento，*Del* ，284，285，287

Ciompi，25-6，31，257

Cione，Nardo di，314

Clothes，the *lucco*，21，215，262，270；of 14th century Florentines，21；of 15th century Florentines，21-3；of *Priori* and *Gonfaloniere*，26-7；of Bruni，46；of *Signoria*，62；of the Constantinopolitans，67；ceremonial attire of Eugeni us IV，73；of Donatello，92；scholars’ caps，111；of Roman women，114；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16-17，124；of Clarice Orsini，117；of Princess Eleonora of Naples，121；of Charles VIII，189；of Italian soldiers，195；of national militia，211；of Leo X，221，222；of *Gonfaloniere* Ridolfi，221；of Fra Baraballo，226；of Cosimo I，267，270；uniform of pages of Cosimo I，268-9；of Grand Duke Gian Gastone，308，309

Cocco，Niccolò di，55

Colonna family，56，241，247

Colonna，Cardinal Pompeo，235，238，239，241，326

Commines，Philippe de （1445-1509），89，149，150，151，186

Compagnacci，197，199

Condottieri，and early Renaissance warfare，194；and Pisan-Florentine war，210；untrustworthiness of，211

Baglioni，Malatesta，249，250

Colleoni，Bartolommeo （1400-75），106，167

Hawkwood，Sir John，320

Montesecco，Gian Battista，132-4，135，136，141-2

Niccolò da Tolentino，52，320

Piccinino，Jacopo，194

Piccinino，Niccolò，42，80，82

Sanseverino，Roberto da，117

Sforza，Francesco，*see separate entry*

Trivulzio，Gian Giacomo，149

Urbino，Federigo da Montefeltro，Duke of，*see separate entry*

Constantinople，64，85

Copernicus，*prop* . Nicolaus Koppernigk （1473-1543），240，280

Cornaro，Cardinal，225，231

Corsini，Filippo，118

Cosmas，St，37

Cossa，Baldassare，Cardinal，*later* Pope John XXIII，*q.v.* （*c* . 1370-1419），35，87

Council of Bâle （1431-49），64-5

Council of Constance （1414-18），34，35-6

Council of Florence （1438-45），64，66-8，69，87，110

Council of Pisa （1409），34

Craon，Prince Marc de，309

Credi，Lorenzo di （1459-1537），192

Crespi，Giuseppe Maria （1665-1747），300

Cretensis，Demetrius，170

Crusades，preached by Calixtus III，86；Pazzo de’Pazzi and，131

Curia，the，95，129

Dami，Giuliano，303，305，307

Damian，St，37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70，171

Dati，Gregorio，28

Del Cimento，284，285，287

Democritus，297

Diogenes Laertius，47

Domenico da Pescia，Fra，196，198，199，200

Domenico，Giovanni di，317

Donatello，*prop* . Donato di Betto Bardi （1386-1466），Michelozzo and，75；his history，90；his works，90-1，192，312，315，318，329；Cosimo di Giovanni and，91，92，108；and the Genoese merchant，91-2；attitude to money，92；in old age，92；Piero di Cosimo and，107-8；and the tomb of John XXIII，316；his gallery，320

Donati，Lucrezia，116，121，146

Doni，Paolo di，108

Dovizi da Bibbiena，Bernardo，206，217，227，232

Dovizi da Bibbiena，Piero，178，206

Duomo，the，*see* Florence，Santa Maria del Fiore，Cathedral of

Edward III，King of England （1312-77），39

Edward IV，King of England （1442-83），158

Eleonora，Princess of Naples，121

Eleonora of Toledo，*see* Medici，Eleonora de’

Elizabeth，Queen of Spain （1692-1766），305

Entragues，Robert de Balzac，210

Este，Alfonso d’，*see* Ferrara，Duke of

Este，Borso d’，*see* Ferrara，Duke of

Este，Ercole d’，*see* Ferrara，Duke of

Este，Ippolito d’，Cardinal，217

Este，Isabella d’，324

Fancelli，Luca，328

Farnese，Alessandro，Cardinal，*later* Pope Paul III，*q.v.* （1468-1549），238

Farnese，Elizabeth，*see* Elizabeth，Queen of Spain

Farnese，Ottavio，Duke of Parma and Piacenza，264

Federigo，Prince of Naples，103，153

Fedi，Pio，329

Ferdinand the Catholic，King，V of Castile，II of Aragon and Sicily，*and* III of Naples （1452-1516），joins the Holy League，194；and Louis XII，201；and Leo X，220，222；death of，223

Ferrai，Luigi Alberto，264

Ferrante，Don，84

Ferrante，King of Naples （1423-94），103；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17，154；and Sixtus IV，130，154；and Florence，148，159；and the Sforzas，151，183；the *Signoria* distrusts，153；and the Turkish invasion，159；Savonarola and，182；death of，183

Ferrara，Cosimo di Giovanni at，54；disastrous Council of，65-6；Savonarola’s forebears at court of，178；Leo X and，237

Ferrara，Alfonso d’Este （I），Duke of （1476-1534），208，222

Ferrara，Alfonso d’Este （II），Duke of （1533-97），269

Ferrara，Borso d’Este，Duke of，105，117

Ferrara，Duchy of，219

Ferrara，Ercole d’Este，Duke of，150，151，152

Ferrara，Lucrezia d’Este，Duchess of，*née* Medici，Lucrezia di Cosimo de’ （1544-61），269

Ferrara，Marquis of，50，54

Ferri，Antonio，299

Ferri，Cirro，285

Ferrucci，Francesco，250，327

Festivals，pageants of the Magi，111；tournament to celebrate wedding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16；Florence famous for festivities，119；*Calendimaggio*，119，297；of St John the Baptist，119-20，289；Lenten and Easter，120；for Princess Eleonora of Naples，121；Savonarola’s orders on carnivals，192；encouraged under Cardinal Giovanni，216；for the election of Leo X，217-18；reception of Leo X in Florence，220-2；celebrations for title of Grand Duke，266；Cosimo I encourages，273；for the wedding of Ferdinand I，280-1；for the wedding of Maria de’ Medici and Henry IV，281；for the wedding of Cosimo II，282；for the wedding of Cosimo III，289；Grand Prince Ferdinand arranges a joust，308；abolition of Medici public holidays，310；*Scoppio*

del Carro，321-2

Fetti，Fra Mariano，226，231

Fiamingo，Niccolò，274

Ficino，Marsilio （1433-99），Cosimo *Pater Patriae* and，68-9，77；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03，113，122，165；Poliziano and，122；his villa，316

Filarete，Antonio Averlino，107

Filelfo，Francesco （1398-1481），47-8，51，59

Florence，in 15th century，19-21；government of，25，26-7，28，32；banner of，26；territorial expansion，32；trade，33；the florin，33；Martin V in，36；Cosimo *Pater Patriae* returns to，58；taxation in，61-2；and the Council of Florence，65-6，68；entry of Eastern Emperor into，66；Medici generosity for adornment of，69；Cosimo *Pater Patriae* on，73；Cosimo *Pater Patriae* and foreign policy of，79，82-4；and Milan，79-80，83，84，105，130；war declared on，84，148；Party of the Hill and Party of the Plain，104，105；return of the Medici，105-6，212，214，249，251；and Venice，106，130；pageants and festivities in，111，118-19，217-18；Florentine wedding customs，117-18；lions of，119，173，327；Milanese state visit to，124；and the Papacy，129，130，159-60；rioting in，140；War of the Pazzi Conspiracy，149-50，151，152，155；and Naples，155；Cennini’s printing press in，169；Savonarola and，179，180，181，182，191，193，197；attitude to French invasion of Italy，184；Charles VIII enters，189-90；Cinozzi on，193；and France，208；in decline，210，306-7；national militia of，

211，213，214；reception for Leo X，220-2；flood and famine in，223；Cardinal Giulio’s administration，236；problem of government of，237；resentment against Passerini and Clement VII in，248-9；organization of defence of，249；siege of，250；surrenders to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250-1；resentment against Alessandro de’ Medici，254；Florentine navy，266-7；under Ferdinand 1，279

Accademia della Crusca，323，330

Baptistery，the，*see* San Giovanni Battista，church of

Bargello，the，*Podestà* at，27；Albizzi intends to seize，56；executions in，142，277；Botticelli’s paintings of the Pazzi conspirators in，142；Donatello’s works in，312，318，327；historical note on，313；Verrocchio’s works in，316，323；Pollaiuolo’s work in，320；Giambologna’s bronzes in，323，329；bust of Cosimo I in，327

Borgo degli Albizzi，321

Borgo Pinti，66，331

Borgo San Piero，117，321

Borgo Sant’ Apostoli，315

Campanile，the，90，320

Casa Buonarroti，322

Casa Guidi，321

Corso，the，120

Corso dei Tintori，332

Duomo，the，*see* Santa Maria del Fiore，Cathedral of

Forte di Belvedere，280，313，324，330

Fortezza da Basso，254，327

Fortezza di San Giorgio，330

Giardino dei Semplici，315

Loggia dei Lanzi，199，314，329

Lungarni，282

Lungarno Acciaiuoli，314

Lungarno Corsini，314，325

Lungarno Guicciardini，325

Mercato Nuovo，32，217-18，221，313

Mercato Vecchio，20，34，119，120，312

Ospedale degli Innocenti，71，316

Orti Oricellari，313

Palazzi，*see separate entries*

Piazza dei Pitti，273

Piazza del Duomo，32，75，120，189

Piazza della Repubblica，312

Piazza della Signoria，*Parlamento* and，27，50，57，62，191，251；*Signoria* troops in，56；circuses in，119；and festival of St John the Baptist，120；fighting in，139；conspirators’ corpses hang in，140；ordeal by fire in，199；Savonarola burned in，200；national militia parade in，211；Soderini speaks in，212-13；Medici supporters in，214，215-16；Leo X in，221；rioting in，248；Michelangelo’s *David* in，249；executions in，264；statues in the Loggia dei Lanzi，274，279，280；*Festa degli Omaggi*，289；the city’s lions in，327；Ammanati’s Neptune Fountain in，327；statue of Cosimo I in，331

Piazza Piave，327

Piazza Peruzzi，315

Piazza San Marco，322

Piazza Sant’ Apollinare，56

Piazza Santa Croce，312；tournaments in，38，116，121，314；mock battles in，119；joust in，300

Piazza Santa Maria Novella，57，273

Piazza Santo Spirito，315

Piazza Santa Trinità，119，221，331

Piazza Santissima Annunziata，316，331

Ponte alla Carraia，274，282，328-9

Ponte Santa Trinità，221，274，282，289，314，328

Ponte Vecchio，20，121，200，312

Porta al Prato，120，308，313

Porta alla Croce，120

Porta alla Giustizia，254，327

Porta di San Pier Gattolini，36

Porta Romana，121，221

Porta San Gallo，53，187

Porta San Freliano，189

Prato，the，121

Rotonda di Santa Maria Angeli，314

San Bartolommeo，church of，73

San Gaetano，church of，324

San Gaggio，convent of，36-7

San Giovanni Battista，church of （the Baptistery），31，321；tomb and monument of John XXIII in，36，75；bronze doors of，70-1，110，316；Dante on，70；votive offering taken to，120；historical note on，

316

San Giovannino degli Scolopi，75，317

San Lorenzo，Brunelleschi’s works in，70，75，326；Giovanni di Bicci and，71，98，319；Medici chapel，71，326；Donatello’s work for，90；Cosimo *Pater Patriae’s* monument in，98，319；Donatello buried in，108；the Medici tombs in，112，144，174，274，293，309，321，329；Savonarola preaches at，179；Michelangelo and，229，240，325；Capella dei Principi，274，293，309，313，324，329；Duke Ferdinand I inaugurates a ceremony at，279；Medici emblems in，313；Martelli chapel，316；the Medici Library in，316；historical note on，317

San Marco，convent of，Cosimo *Pater Patriae* and，69，74；Lorenzo the Magnificent’s body at，174；Savonarola at，179，180，181；treasures from Medici Library lodged at，187，316；refuge sought in，199；Cosimo I and the Dominicans of，265；historical note on，317；Fra Angelico’s *Crucifixion* and *Annunciation* in，319

San Martino，church of，331

San Miniato al Monte，church of，107，319

San Pier Schieraggio，church of，55，316

Sant’ Ambrogio，church of，93

Sant’ Antonio，convent of，123

Sant’ Apostoli，church of，131，321

Santa Croce，church and convent of，131；*borse* kept at，26；

meetings of Council of Florence in，66；Cosimo *Pater Patriae* and，73；Jacopo de' Pazzi buried in，141；Galileo buried in，282，317，332；historical note on，312-13；Bardi chapel，314；Donatello's *Annunciation* in，315；Peruzzi chapel，315；novices' chapel，317

Santa Felicità，church of，316

Santa Maria degli Angeli，monastery of，37，47，314

Santa Maria del Carmine，convent of，92-3，319

Santa Maria del Fiore，Cathedral of （the Duomo），32；*Arte della Lana* and，33；and Council of Florence，67；Ghiberti's windows for，70；Brunelleschi's dome，72，317；Donatello and，90，320；Della Robbia's singing gallery，108，320；Matins of Darkness，120；Holy Saturday in，120；and the Pazzi conspiracy，135-6，137-8；façade of，168，221，324；lightning strikes，173；Savonarola preaches in，178，180，185，196，197；*Compagnacci* in，197；congregation attacked in，199；Leo X in，222；Cosimo I in，270；proxy marriage of Maria de' Medici in，281；ceremony for Ferdinand III and Marguerite Louise in，288；historical note on，313；cenotaphs in，320；*Scoppio del Carro*，321-2

Santa Maria Novella，church and convent of，Eugenius V in，56，57，66，73；meetings of Council of Florence in，66；Ghirlandaio murals in，102，167，319，323；Botticelli's *Adoration of the Magi* in，109；Tornabuoni chapel，165；mad woman in，173；secret messages left in，212；Alberti designs façade of，313；historical note on，314；Strozzi chapel，314；Capella Maggiore，319，323；Botticelli's work for，320；Viceroy of Naples lodged at，327；Spanish chapel，327

Santa Maria del Impruneta，325

Santa Maria Nuova，hospital of，71，314，316

Santa Trinità，church of，167，319，328；Onofrio Strozzi chapel，110，314；Sassetti chapel，323；Gianfigliazzi chapel，325

Santissima Annunziata，church of，Cosimo *Pater Patriae* and，73；Piero di Cosimo’s gift to，107；wax effigy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in，143；Clement VII’s effigy thrown out of，248；Cosimo I in，270；exhibition of paintings in，301；Caccini’s loggia in，315；Pucci chapel，315；the choir of，317；the tabernacle，320

Santo Spirito，church of，168，323

Straw Market，313

Teatro della Pergola，332

Uffizi，the，316；function of，271；art gallery in，278，327-8；Ferdinando I enlarges，280；the Tribuna，281；opera at，281；nude statues in，306；pictures in，314；Uccello’s work in，320；Pollaiuolo’s work in，320；Botticelli’s works in，320，322；Gentile da Fabriano’s work in，320

Via Bufalini，71

Via Calimala，312

Via Cavour，317

Via de’ Bardi，39，43，313，314

Via de’ Benci，313

Via de’ Gori，75，76，317

Via de’ Pucci，315

Via de’ Servi，137，315，325

Via degli Alfani，314，332

Via dei Leoni，173，327

Via del Cocomero，286，332

Via della Pergola，286，289，332

Via della Scala，286，331，332

Via della Vigna，120

Via della Vigna Nuova，313

Via della Vigna Vecchia，321

Via di San Gallo，143

Via di Santa Margherita a Montici，315

Via Ghibellina，322

Via Guicciardini，315

Via Lamarmora，315

Via Larga，Medici home in，32；Palazzo Medici in，75，76，90，215；Filippo Lippi in，93；Pazzi and Giuliano di Piero in，137；renamed，317

Via Maggio，221，289，321，330

Via Maggiore，321

Via Mazzetta，321

Via Nuova Borg’ Ognissanti，109

Via Palmieri，321

Via Pietrapiana，331

Via Porta Rossa，32，313

Via Proconsolo，321

Via Ricasoli，319，326，332

Via Rondinelli，330

Via Santo Spirito，327

Via Strozzi，323

Via Tornabuoni，314，323，330

Florence，Archbishops of，Antonio Pierozzi，74，95；Piero Riario，128；Rinaldo Orsini，130；Giulio de’ Medici，232

Florentines，clothing of，21-3；women，22-3；Dation，28；Pius II on，38；and the Medici，50，82；in fear of Don Ferrante，84；Medici marriages with，115；Mantuan envoy on Savonarola and，185；celebrate defeats of Venice and the Pope，209

Foggini，Giovanni Battista，333

Foix，Gaston de （1489-1512），209

France，and Florence and Milan，84，85；Piero di Cosimo ambassador to，102；and battle of Ravenna，208，209；and Florence，209

Franceschini，Baldassare，‘il Volterrano’，331，332

Francesco da Puglia，Fra，198，199

Francesco da Sangallo，325

Francesco II，Duke of Lorraine，*later* Francis I，Holy Roman Emperor （1708-65），309

Francesi，Napoleone，141，142

Franchi，Rosello di Jacopo，331

Franciabigio，*prop* . Francesco di Cristofano Bigi （1482-1525），322

Franciotto，Galeotto，Cardinal，206

Francis I，King of France （1494-1547），252；Leo X and，219，

222；his appearance and ambition，219；invades Italy，220；and Parma and Piacenza，237；Charles V defeats，238，240；and Clement VII，239，241

Frundsberg，Georg von （1473-1528），241-2

Fuorusciti，263-4

Furini，Francesco，285，332

Galilei，Galileo （1564-1642），292；his history，282；burial of，282，317，332；Ferdinando II and，282，284，317；his telescope，331；his papers in Biblioteca Nazionale，332

Gaza，Theodorus （1398-1478），170

Genoa，Medici office in，34；and Smyrna alum mines，88；and Florence，159，163；buys Sarzana，210

Gentile da Fabriano （1370？-1427？），and the Constantinopolitans，67；*Adoration of the Magi*，110，314，320

Ghiberti，Lorenzo （1378-1455），and bronze doors for the Baptistery，70-1，316；and the Cathedral dome，72；his statue of St Matthew，73；Donatello and，90；Gozzoli and，110；his wooden screen in the Cathedral，137；his bronzes in Orsanmichele，317

Ghiberti，Vittorio，316

Ghirlandaio，Domenico Curradi （1444-94），168；his murals in Santa Maria Novella，102，167，319，323；Michelangelo and，165

Ghirlandaio，Ridolfo （1483-1561），314

Giambologna，*prop* . Jehan de Boulogne （1529-1608），328；bronzes by，276，323；equestrian statue of Cosimo I，280，331；and the Cathedral façade，324；his *Rape of the Sabines* ，329；*l'Appenino* ，330；equestrian statue of Ferdinando I，331

Gianfigliazzi，Selvaggia de'，325

Gigli，Girolamo，278

Ginori，Caterina Soderini，255，256

Giotto di Bondone （1267-1337），108，314，315，320

Giovanni，Bertoldo di，165

Giovanni da San Giovanni，285，332

Giovio，Paolo，226

Girolami，Raffaelo，251

Giuliano da Maiano，167，321

Giuliano da Sangallo，164，316，322，323，325

Giulio Romano，*prop* . Giulio Pippi de' Giannuzzi （*c* . 1492-1546），240

Gonsalvo de Cordoba （1453-1515），202

Gonzaga，Eleonora，*see* Medici，Eleonora de'

Gonzaga，Francesco，Marquis of Mantua，194，195-6，206

Gonzaga，Ghismondo，Cardinal，217

Gorini，Fioretta，144，322

Government，trade guilds and，25，26；organization of，26，27；Albizzi family control，32；Ten of War，42-3，151；and the Albizzi plot，49，50

Accoppiatori，60-1，62-3，104，191

Balìa，106，191；and the anti-Medici plot，50；and the Medici，58，216；confirm powers of *Accoppiatori*，62-3；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dmitted to，125；creates Council of Seventy，156；after the siege of Florence，251

Cento，125

Collegi，27，105

Council of Seventy，156-7

Dodici Procuratori，157

Gonfalonieri，office of，26；dress of，27；holders of the office of，30-1，32，55，60；62，90，104，152，220，251；increase in power of，63；Cosimo *Pater Patriae*，66；in procession，73；Piero di Cosimo，101；Cesare Petrucci，138-9；excommunicated，148；Soderini appointed for life，210；Capponi appointed for a year，248-9；a pro-Medicean，251；abolition of the office，264

Parlamento，27，106，191，216

Priori，selection of，26；dress of，26-7；prestige，29；holders of the office，32，95，101，104；and the anti-Medici plot，49，52，56；in procession，71，73；and the Pazzi Conspiracy，139；and Piero di Lorenzo，186

Signoria，method of forming，26；organization，27；and the 15th century Albizzi-Medici conflict，32，42，49，52-3，55-8；manipulation of elections，60；and foreign affairs，79；honour Cosimo *Pater Patriae*，98；and the Medici，106，187；seal of，109；and the Volterran riots，126；and ecclesiastical appointments，130；and the Pope，148，149；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153；its authority limited，157；Piero di Lorenzo and，186；get Medici jewels，187；Charles VIII and，190；*Accoppiatori* and，191；watch the bonfire of vanities，192；Alexander VI and，197；and Savonarola，198，200；and Cardinal Giovanni，208；war drains the resources of，210；and a national militia，211；and Lorenzo di Piero’s title，220；abolition of，264；and the Medici library，316

Gorini，Simonetta，233

Gozzoli，Benozzo（*c*. 1420-97），67，110-12，320-1

Grandi，and government of Florence，28；and Cosimo di Giovanni，43；Medici declared to be，52；become eligible for election to office，61

‘Great Schism’，the（1378-1417），34

Greek Orthodox Church，64，65，67

Grocyn，William （*c* . 1446-1519），170

Grosso，Niccolò，76，318

Guadagni family，58

Guadagni，Bernardo，49，51-2

Guasconi family，58

Guicciardini family，58

Guicciardini，Francesco （1483-1540），315；on Cosimo *Pater Patriae* ，63；on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46，157；on Capponi and Charles VIII，190；on the French in Naples，193；on French artillery，195；on the sack of Prato，213-14；on Giulio de’ Medici，233；on Giovanni delle Bande Nere，242；on Clement VII，243；on Cardinal Passerini，248；on the aftermath of the siege of Florence，251；eulogizes Alessandro de’ Medici，254；leader of the *Palleschi* ，256，257；and Cosimo I，257，258，264；Varchi on，263

Guicciardini，Giovanni，55，56

Guicciardini，Luigi，160

Guicciardini，Piero，56

Guilds，trade，Florentine，25-6；and *Signoria* ，26；doth and wool，33；*Arte del Cambio* ，33，73；*Arte di Por Santa Maria* ，71；and the Cathedral dome，72；commission statues for Orsanmichele，73；and number of working-days per year，119；on verge of ruin，210；of the Calimala，319-20

Hadfield，Charles，325

Handel，George Frederick （1685-1759），300

Hanno，*elephant belonging to* Pope Leo X，226

Henry VIII，King of England （1491-1547），239，247-8

Henry II，King of France，*see* Orléans，Henri de Valois，Duke of

Henry IV，King of France （1553-1610），281

Holy Leagues，Florence，Milan，the Pope and Venice，85；Alexander VI’s，194；mercenaries in battle，195；Savonarola and，196；League of Cambrai，207，223；Julius II’s，208，209，211-12，214

Humanists，Cosimo *Pater Patriae* ，37-8；Albizzi and，43-4；friends of Cosimo *Pater Patriae* ，43，46，47；Piccolimini and Parentucelli，88；and vernacular poetry，170

Imola，107，128，129，131，132

Insignia，of Florence，26，33，313；of the Medici，30，48，102，111，313，319，323；of *Arte della Lana* ，33；of Cosimo *Pater Patriae* ，76，111；of the Medici bank，87；Valois lilies，102；seal of the *Signoria* ，109；standard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17；of citizens of Florence，215；Cardinal Giovanni’s personal device，216；of *Del Cimento* ，284；Peruzzi family emblem，315；arms of Piero di Cosimo，320；the Castracani leopard，321；Francesco I and the Medici emblem，331

Jews，129，279，297，307

Joanna，Archduchess of Austria，*see* Medici，Joanna de’，Grand Duchess

John VII Paleologus，Emperor of the East （*c* . 1425-48），83；and the Pope，64；enters Florence，66；and the Council of Florence，67，68；and the Florentine-Milanese alliance，83；Gozzoli and，110

Kallistos，Andronicus，122

Knights of St John of Jerusalem，267

Knights of Santo Stefano，266

La Badia，monastery of，73

Ladislaus，King of Naples，35

Lama，Guaspare di Zanobi del，109

Landini，Taddeo，328

Landino，Cristoforo，103，122

Landucci，Luca，on Italian warfare，151；on the attack on Colle，152；on an alleged assassin，158；and the influence of Savonarola，193；on the burning of Savonarola，200；on the national militia，211；his confidence，211-12

Lannoy，Charles de，241

Lascaris，Giovanni，*called* Rhyndacenus （*c* . 1445-1535），169，

Latimer，William，170

Latino，Cardinal，116

Lenzi，Lorenzo，185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168，228，240，324

Leoni，Piero，173，174

Libraries，of San Giorgio Maggiore，Venice，54，315；the Medici，69，88，107，169，187，240，299；Vatican，69；of San Bartolommeo，73；*Biblioteca Laurenziana* ，240，326；Biblioteca Nazionale，332；the Palatina，332

Linacre，Thomas （*c* . 1460-1524），170

Lions of Florence，119，173，327

Lippi，Anniballe. 330

Lippi，Filippino （*c* . 1458-1504），165，168，319；his birth，93；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167；his mural at Poggio a Caiano，322

Lippi，Fra Filippo，*called* Lippo Lippi （*c* . 1406-69）；his history，92-3；his behaviour，93；Cosimo *Pater Patriae* and，93-4；Botticelli and，109；*The Virgin Adoring the Child* ，110，320；his altarpiece in San Lorenzo，316；*Coronation of the Virgin* ，319

Lombardi，Giovanni，330

Lorraine，Charles，Prince of，288，290

Lorraine，Francesco II，Duke of，*later* Francis I，Holy Roman Emperor （1708-65），309

Louis XI，King of France （1423-83），102，149，182

Louis XII，King of France （1462-1515），201，207，208，219

Louis XIV，King of France （1638-1715），281；Marguerite-Louise and，288，291，293-4，295，296；and Cosimo III，292

Lucca，42，83，150，210

Lucretius，*prop* . Titus Lucretius Carus，45

Luther，Martin （1483-1546），237，245

Machiavelli，Niccolò di Bernardo （1469-1527），and the battle of Anghiari，194；appearance，210；organizes national militia，211；on the sack of Prato，214；*The Prince* ，214，326；his advice sought，219；*Mandragola* ，227；his papers，332

Maddalena，Cosimo’s *slave-girl* ，39-40

Madeleine de la Tour d’ Auvergne，*see* Urbino，Duchess of

Maffei，Fra Antonio，136，137-8，141

Maffei，Raffaele，141

Mahomet II，‘the Conqueror’，Sultan of Turkey （1430-81），160

Malavolti，Federigo，51

Malespini family，43

Manetti，Antonio，317

Manetti，Giannozzo，61，82

Manfredi，Taddeo，128

Mann，Sir Horace，325，328

Mannaioni，Giulio，319

Mantua，Francesco Gonzaga，Marquis of，194，195-6，206

Manuel I，King of Portugal （1469-1521），226

Marco da Fienza，330

Margaret of Parma，*see* Medici，Margaret de’

Marguerite Louise of Orléans，*see* Medici，Margaret Louise de’

Maria Maddalena，Archduchess of Austria，*see* Medici，Maria Maddalena de’，Grand Duchess

Maria Theresa，Empress of Austria （1717-80），309

Mariano，Fra，180，181

Marie de’ Medici，Queen of Francc （1573-1642），281

Marsuppini，Carlo，44，47，48，313

Martelli family，57

Martelli，Camilla，*see* Medici，Camilla de’

Mary，Queen of France，219

Masaccio，*prop* . Tomasso Guidi （1401-28？），92，319

Masolino da Panicale （1383-1447），319

Maximilian I，Holy Roman Emperor （1459-1519），and Anne of Brittany，183；joins the Holy League，194；and Julius II，207；Leo X and，220；death of，237

Mazarin，Jules，Cardinal，*orig* . Giulio Mazarini （1602-61），288

Medici，the，origins of，30；insignia of，30；public service，30-1；the Albizzi and，43，55，212；the Martelli and，57；sentence of banishment revoked，58；opposition to，104；Gozzoli and，110；and Poliziano，122；and the Pazzi，131，132；*Signoria* declares them banished，187；Savonarola and，191；restoration of，212，214，216；election of a Medici Pope，217；the Sacred College and，235；and Henry of Navarre，281；and the Inquisition，297；the Medici holidays abolished，310；bequest of the Medici treasures，310-11；and the Palazzo Medici，317-18；the Medici collections，324，332

Medici，Alessandro de’，*illegitimate son of* Lorenzo，Duke of Urbino *or of* Cardinal Giulio，239，257，262；his parentage，236；his unpopularity，248；Clement VII’s plans for，251；and Ippolito，252-3；

Florentine resentment against，253-4；his marriage and death，254-5；and Lorenzaccio di Pierfrancesco，255；assassination of，256

Medici，Alfonsina de’，*née* Orsini，178，187，236

Medici，Anna Maria Francesca de’，*née* Anna Maria Francesca of Saxe-Lauenberg，302-3

Medici，Anna Maria Luisa di Cosimo de’，*see* Anna Maria，Electress Palatine

Medici，Ardingo de’，30

Medici，Averardo de’，31

Medici Bank，*see* Bank，Medici

Medici，Bianca de’，*née* Capello，275-6，278，329，330

Medici，Bianca di Piero de’，*see* Pazzi，Bianca

Medici，Camilla de’，*née* Martelli，272-3

Medici，Carlo de’，*illegitimate son of* Cosimo *Pater Patriar*，40，93，314

Medici，Caterina di Lorenzo de’，Duchess of Urbino *and later* Queen of France （1519-89），239，280；birth of，235；created Duchess of Urbino，236；her marriage，252

Medici，Christine de’，*née* Christine of Lorraine （1565-1636），280，283

Medici，Clarice de’，*née* Orsini，Lucrezia de’ Medici on，114-15；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116，145-7；her wedding celebrations，117-18；at Pistoia，145；and Poliziano，145；her temperament，146；and her children，147，162；her death，147；and Giovanni’s birth，202；and Botticelli’s *Portrait of a Young Woman* ，322

Medici，Clarice di Piero de’，*see* Strozzi，Clarice

Medici，Contessina de’，*née* de’ Bardi，43，47；marriage，38；personality，39；Donatello’s bronze head of，91

Medici，Contessina di Lorenzo de’，*see* Ridolfi，Contessina

Medici，Cosimino di Giovanni de’，96

Medici，Cosimo de’，*illegitimate son of* Cosimo I，266

Medici，Cosimo di Ferdinando de’，*later* Cosimo II，Grand Duke of Tuscany （1590-1620），281-2

Medici，Cosimo di Giovanni de’，*Pater Patriae* （1389-1464），32；imprisoned，19，50，51，200；education，37；and humanism，37-8；his personality，38，41；his marriage，38，39；and his slave-girl，39-40；and war with Lucca，42-3；his friends，44，45-7；and Filelfo，48；and the Albizzi plot，48，49-52；commissions a library for San Giorgio Maggiore，54；in exile，54-5；returns to Florence，58；banishes his enemies，58-9；in politics，59-60，61-3；his unostentatious behaviour，60，73；Vespasiano da Bisticci on，60，97-8；Pius II on，63；Guicciardini on，63；and Council of Florence，64，65-6；his interest in philosophy，68-9；and Ficino，68-9，77；his library，69，88；a generous patron，69，71，73；and Brunelleschi，70；and Ghiberti’s

reliquary，70；his munificence，73-4；his new palazzo，75-6；his love of country life，77；and his villas，77，78，316；and Florence’s foreign policy，79，82-6；and Francesco Sforza，82；the Venetian ambassador on，85；and Calixtus III，86，157；the banker，86-8，104，129；and Pius II，88；and Donatello，91，92；and Filippo Lippi，93-4；his respect for artists，94；and Fra Angelico，94；on painters，94；in old age，94-5，96；and his grandson，96；death of，97；his funeral，98，101-2；memorial to，98，319；in the Magi pageant，111；Gozzoli and，111；Savonarola and，180；Leo X on，261；Novices’ Chapel，Santa Croce，313；and Botticelli’s *Adoration of the Magi*，320；and Luca Pitti，328；statue to，331；and the old sacristy of San Lorenzo，317

Medici，Cosimo di Ferdinando de’，*later* Cosimo III，Grand Duke of Tuscany（1642-1723），his temperament，287；his appearance，288，292，297；his marriage，288-9，290，291，294-5，328；in *Il Mondo Festeggiante*，289；travels abroad，292；economic problems，293，296；a bigot，297-8，306；punishment under，298；levies taxes，298-9，307；and Grand Prince Ferdinand，301；worried and ill，303-4；and the Tuscan succession，305；his religious zeal，305-6；death of，306；and the Villa Medici，318；and the Cathedral façade，324；and the Villa Ambrogiana，333

Medici，Cosimo di Giovanni de’，*later* Cosimo I，Grand Duke of Tuscany（1519-74），312；elected to power in Florence，257-8；Cellini on，258；and his father，261-2；his appearance，262；his childhood，262；his nature，262-3，267-8，270；Varchi on，263；and the *Fuorosciti*，263-4；and Charles V，264；his marriages，264，273；his ruthlessness，264-5；his ambition，265-6；Grand Duke，266；creates the Florentine navy，266-7；his pleasures，267；and his wife，269，272；

the children of，269；and the death of his daughter，269-70；his austerity，270；attempted assassinations of，270-1；and his son Francesco，272；his mistresses，272-3；death of，273；his achievements，273-4；and his daughter-in-law，275；Giambologna’s equestrian statue of，280，331；and the Giardino dei Semplici，315；and his villas，316，330；and the lions of Florence，327，Pitti Palace altered for，328；his *Landsknechte* ，329

Medici，Don Giovanni de’，*illegitimate son of* Cosimo I，324

Medici，Eleonora de’，*daughter of* Don Garzia of Toledo （1556-76），277

Medici，Eleonora de’，*née* Eleonora Toledo （1522-62），264，268-9，271，272，328

Medici，Eleonora de’，*née* Gonzaga，304

Medici，Ferdinando di Cosimo de’，Cardinal，*later* Ferdinando I，Grand Duke of Tuscany （1549-1609），Grand Duke，279-80；his lavish expenditure，280；wedding celebrations for，280-1；and Ponte Vecchio，312；his arms，313；and Santa Trinità，328；and Bianca Capello，329；and Villa Medici，Rome，330；erects monuments in Piazza Santa Trinità，331

Medici，Ferdinando di Cosimo de，*later* Ferdinando II，Grand Duke of Tuscany （1610-70），and Galileo，282，317；his appearance，283；his temperament，283，285；and *Del Cimento* ，284；his interest in mosaic，285；and his brother Gian Carlo，286；and his son Cosimo，287，288；and Marguerite-Louise，290，291；death of，293；and the

Grand Ducal Library，332

Medici，Ferdinando di Cosimo de’，Grand Prince （1663-1713），290，300-1，304，320

Medici，Filigno di Conte de’，31

Medici，Filippo di Francesco de’，275

Medici，Francesco di Cosimo de’，Grand Duke of Tuscany （1541-87），269；his nature and appearance，275；and his mistress，275，276；his second marriage，276；and his brother Pietro，277；his interests，278；and Palazzo della Signoria，312

Medici，Francesco Maria di Ferdinando de’ Cardinal （1660-1710），299-300，304

Medici，Garzia di Cosimo de’ （1547-62），269，272

Medici，Gian Carlo di Cosimo de’，Cardinal （1611-63），286，332

Medici，Gian Gastone di Cosimo de’，Grand Duke of Tuscany （1671-1737），birth of，293；his marriage，302-3；his unhappiness，303；returns to Florence，304-5；Grand Duke，307；his disreputable behaviour，308-9；death of，309，310

Medici，Ginevra de’，*née* degli Albizzi，96

Medici，Ginevra de’，*née* Cavalcanti，43

Medici，Giovanni di Bicci de’ （1360-1429），his personality，31-2，40；his appearance，31；in public life，32；his business，33，34，

35；and John XXIII，34，36；and Martin V，36；and his son Cosimo，38，44；advice to his sons，40-1；a generous patron，69，71；and the Baptistery bronze doors，70；his cornelian cameo，70；his funeral，98；his tomb，317；his sarcophagus，319

Medici，Giovanni di Cosimo de’（1421-63），39，101；and Villa Belcanto，77-8；and his father，95；character and appearance，95；public servant，95；his slave-girl，95-6；death of，96；his tomb，112，321；and Botticelli’s *Adoration of the Magi*，320

Medici，Giovanni di Cosimo de’（1543-62），269

Medici，Giovanni di Giovanni de’，*called* Giovanni delle Bande Nere（1498-1526），242，257，261-2，263

Medici，Giovanni di Lorenzo de’，*later* Pope Leo X，*q.v.*（1475-1521），his education，145；and his father，147；and his brother，187；flees from Florence，187；his early preferment，202-3；his appearance，203；his nature，203，217；advice from his father，204-5；travels abroad，205；his pleasures，206；Julius II impressed by，208；military matters，209-10，212，214；returns to Florence，215-16；ill，216；Pope，217

Medici，Giovanni di Pierfrancesco de’，115，178，185，187

Medici，Giuliano di Lorenzo de’，Duke of Nemours（1478-1516），his personality，206，216，219；enters Florence，215；*Gonfaloniere* of the Church，219；his marriage，219；created Duke，222；his death，223；his bastard，236；his tomb，240，326

Medici，Giuliano di Piero de’（1453—78），102；Botticelli and，

109，320，322；Gozzoli and，111；and Clarice Orsini，117；delights in festivities，120-1；his *giostra*，121-2；and the Pazzi Conspiracy，133-7；assassinated，138；his illegitimate son，144；his tomb，240，326；and Gozzoli's fresco，321

Medici，Giulio de'，*illegitimate son of* Alessandro de' Medici，257，266

Medici，Giulio de'，*illegitimate son of* Giuliano di Piero；*later* Pope Clement VII，*q.v.*（1478-1534），237；his birth，144；flees to Venice，187；and his cousin Giovanni di Lorenzo，205，206；and Albizzi，212；and Francis I，220，222；Leo X and，232-3；Guicciardini on，233；and election of Adrian VI，238；his mode of living，239；Pope，239

Medici，Guccio de'，30，90

Medici，Ippolito de'，*illegitimate son of* Giuliano di Lorenzo，239，262；his birth，223，236；his unpopularity，248；created cardinal，252；and Alessandro，252-3，254；death of，254

Medici，Isabella di Cosimo de'，*see* Orsini，Isabella

Medici，Joanna de'，Grand Duchess of Tuscany，*formerly* Archduchess of Austria，275，276，312

Medici，Leopoldo di Cosimo de'，Cardinal（1617-75），284-5，328，332

Medici，Lorenzaccio di Pierfrancesco de'，*also called* Lorenzino（1514-47），255-6，265

Medici，Lorenzo de’，*illegitimate son of* Cosimo 1，266

Medici，Lorenzo di Giovanni de’（1395-1440），32，43；and the Albizzi anti-Medicean plot，52；returns to Florence，58；and the Council of Florence，66；Gozzoli and，111；and Villa of Careggi，316

Medici，Lorenzo di Pierfrancesco de’，178，185，187，323

Medici，Lorenzo di Piero de’，*calle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449-92），102，212，257，274；his appearance，103，113；his education，103；on diplomatic missions，103；and the anti-Medici plot，105-6；Botticelli and，109；Gozzoli and，111；his happy temperament，113；his enjoyment of life，114，118；his versatility，114；his marriage，114，115；his wedding celebrations，116-18；his delight in festivities，120-1，216；patron of artists，writers and scholars，122，164-8，170，322，323；Poliziano on，122，174；and public office，123，125；respect for，124；and Volterra，125-7；the banker，129，158-9；and Sixtus IV，129-30，148，150，159；and the Pazzi Conspiracy，131-8，140；wax effigies of，142-3，315；and his children，144，162；and his wife，145-7；relationships with women，146-7；the *Signoria* on，149；and the defence of Florence，150-1；his mission to Naples，152-5；his generosity，155；his authority and influence，156-7，160，162；and Innocent VIII，161-2，202-3；his prestige，162-3；connoisseur of architecture，168；collector，169；poet，170-2；dying，172-4；death of，174；and Savonarola，181，182；and his son Giovanni，202-5；his tomb，240，326；Verrocchio’s fountain，275；and Poggio a Caiano，314；and Botticelli’s *Adoration of the Magi*，320；Filippo Strozzi and，323-4

Medici，Lorenzo di Piero de’，Duke of Urbino（1492-1519），

202，212；and the election of Leo X，217；the Pope’s representative in Florence，219；and Francis I，220；his new title，220；takes Urbino and assumes title，224；Leo X and，232；marriage and death of，235；his unpopularity，236；his bastard，236；his tomb，240，326

Medici，Lucrezia de’，*née* Tornabuoni，123；poet，102，170；wife and mother，102；and Botticelli，109；on Clarice Orsini，114-15；at Lorenzo’s wedding banquet，117；and Lorenzo，123；Poliziano confides in，145；and Bagno a Morba，172；portrayed by Ghirlandaio，319

Medici，Lucrezia di Cosimo de，*see* Ferrara，Lucrezia d’Este，Duchess of

Medici，Lucrezia di Lorenzo de’，*see* Salviati，Lucrezia

Medici，Lucrezia di Piero de’，*see* Rucellai，Lucrezia

Medici，Luigia di Lorenzo de’，115

Medici，Maddalena di Lorenzo de’，*see* Cibò，Maddalena

Medici，Margaret de’，later Margaret of Parma，251，255，264

Medici，Marguerite-Louise de’，Grand Duchess of Tuscany，*née* Marguerite-Louise of Orléans （1645-1721），her reluctance to marry，288；and Ferdinand III，288-9；and the crown jewels，289；bored and unhappy，289-91；pregnancy and illness，290，291，293；her indiscreet behaviour，290，294，296；and her mother-in-law，293；asks for a separation，294；retires to a French convent，295-6

Medici，Maria de’，*née* Salviati，257，261，263，269

Medici，Maria di Cosimo de’，269

Medici，Maria di Francesco de’，*see* Marie de Medici，Queen of France

Medici，Maria di Piero de’，*see* Rossi，Maria

Medici，Maria Maddalena de’，Grand Duchess of Tuscany，*formerly* Archduchess of Austria，282，283，332

Medici，Mario Bartolommeo de’，55

Medici，Mattias di Cosimo de’，Prince （1613-67），285-6，290，332

Medici，Piccarda de，*née* Bueri，32

Medici，Pierfrancesco di Giovanni de’，115，159，255

Medici，Piero di Cosimo de’ （1414-69），birth，39；*Accoppiatori*，63；his poor health，95，101；on his father，97；and his father’s monument，98；his appearance and character，101；the banker，101-2，104；and Ficino，103；and the plot against the Medici，105-6；and government of Florence，107；his munificence，107；Filarete on，107；friend and patron of artists，107-12；Botticelli’s *Fortitude*，109-10；his tomb，112，321；and Donatello’s *Judith Slaying Holofernes*，319；and San Miniato al Monte，320；and Botticelli’s *Adoration of the Magi*，320

Medici，Piero di Lorenzo de’ （1471-1503），135，173，212；and his father，174；his appearance，177；his temperament，177-8；and his cousins，178；and the French invasion，184，185；and Charles VIII，

186；flees to Venice，187；hopes to reinstate himself，201；death of，202；bis tomb，324-5

Medici，Pietro di Cosimo de’，269，277

Medici，Salvestro de’，31

Medici，Vieri di Cambio de’，34

Medici，Violante Beatrice de’，*née* Princess Violante Beatrice of Bavaria，301，304，308，320

Medici，Vittoria de’，Grand Duchess of Tuscany，*née* Della Rovere，287，293

Melani，Jacopo，289

Mercenaries （*see also Condottieri* ），42，56，125，126，139

Michelangelo，*prop* . Michelangiolo Buonarroti （1475-1564），168；on Ghiberti’s bronze doors，71；‘kneeling windows’，76；his history，165；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66；and Savonarola，181；and Julius II，207，229；Leo X and，229，240；Clement VII commissions，240；*Biblioteca Laurenziana* ，240，326；and the defences of Florence，249-50；his tomb，312；and the Palazzo Medici，318；his early work，322；and the new sacristy at San Lorenzo，326；his *David* ，326；and the commission for a *Hercules* ，327；and the Boboli Gardens，328；his compasses，331；his papers，332

Michelozzi，Michelozzo di Bartolommeo （1396-1472），and San Giorgio Maggiore，Venice，54，315；monastery of San Marco，74；

Cosimo *Pater Patriae* commissions，75；and Palazzo Medici，75，76；and the Medici villas，77，95，315，316；and Medici bank in Milan，87；and the pageant of the Magi，111；and Palazzo della Signoria，312；and the Novices’ Chapel，Santa Croce，313，317；and the tomb of John XXIII，316；and the tabernacle of Santissima Annunziata，320

Milan，Medici bank in，87，158；artists in，167，168；printing presses in，169；Cardinal Giovanni in，209；French troops occupy，220；fall of，238

Milan，Duchy of，government of，27；Florence and，42，79-80，83，84，106，130，149，151；battle of Imola，55；Venice and Naples declare war on，84；Duke of Orléans and，194；Spaniards and，219；Francis I and，222；Charles V and，237

Milan，Dukes of，*see the* Sforzas *and* Visconti，Filippo Maria

Mino da Fiesole，331

Mirandola，Pico della，*see* Pico della Mirandola，Count Giovanni

Moncada，Don Ugo di，241

Montaigne，Michel Eyquem de （1533-92），276

Monte Cassino Abbey，202，324-5

Montefeltro，Federigo da，*see* Urbino，Federigo Montefeltro，Duke of

Montesquieu，Charles，Baron de la Brède et de，279

Montpensier，Anne-Marie-Louise d’Orléans，Duchesse de，*called*

Mademoiselle，292

Morello，*the horse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14

Museums and galleries，

Galleria dell’ Accademia Carrara，Bergamo，325

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Boston，325

Metropolitan Museum，New York，330

Musée de Sèvres，330

Musée du Louvre，Paris，320，330

Museo degli Argenti，328

Museo dell’Accademia，319，326

Museo dell’Opera del Duomo，320

Museo dell’Opera di Santa Croce，315，321

Museo Horne，313

Museo Nazionale，313

Museo Nazionale di Storia della Scienza，331

National Gallery，London，315，320

Pallavicini collection，Rome，325

Uffizi，*look under* Florenc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London，320，330

Naples，34，87，158，169

Naples and Sicily，Kingdom of，strife in，27-8；Sforza a *condottiere* for，81；Florentines expelled from，83；France and，84，183，186；declares war on Florence and Milan，84；and Florence，106，150，152，155；Orsini estates in，116；Lorenzo the Magnificent’s mission to，152-5；Sixtus IV and，159；Charles VIII in，193；Spain and，208；Leo X’s plans for，219；Francis I and，222

Napoleon I，Emperor of France，330

Nardi，Jacopo，213，254

Nasi，Bartolommea dei，146

Nemours，Duchess of，*see* Philiberte of Savoy，Princess

Nemours，Duke of，*see* Medici，Giuliano di Lorenzo de’

Neroni，Diotisalvi，104，105，106，124

Niccoli，Niccolò，his personality and interests，44-5；and Bracciolini，45，46；Bruni disapproves of，46；and Traversari，47；and Filelfo，47，48；his books，69；and Dante’s poetry，171

Nocera，Bishop of，244

Nori，Francesco，137，138

Orange，Philibert，Prince of （*r* . 1502-30），242，244，250

Orcagna，Andrea，*prop* . Andrea di Cione （*c* . 1308-68），314

Orléans，Henri de Valois，Duke of，*later* Henry II，King of France （1519-59），his marriage，252

Orsanmichele，church of，commerce in the neighbourhood of，20；Ghiberti's *St Matthew* for，73，317；Donatello's work commissioned for，90；historical note on，312；Ghiberti's bronzes in，317

Orsini family，116-17，149

Orsini，Alfonsina，*see* Medici，Alfonsina de'

Orsini，Clarice，*see* Medici，Clarice de'

Orsini，Isabella，*née* Medici，Isabella di Cosimo de'，269，273，277

Orsini，Jacopo，114

Orsini，Paolo，184

Orsini，Paolo Giordano，269，277-8

Orsini，Rinaldo，Archbishop of Florence，130

Orsini，Troilo，277

Orvieto，episcopal palace of，247

Pageants，*see* Festivals

Palazzi，

Alessandri，117

Altoviti，314

Antinori，330

Bardi，39，58，75

Bellini，280，331

Capponi，313

Corsini，314

Davanzati，313

degli Acciaiuoli，315

dei Giudici，330，331

della Signoria （*later renamed* Palazzo Vecchio，*q.v.* ），Cosimo *Pater Patriae* in，19，49，51，58，83；*Alberghettino* ，15，19，200；*Priori* live in，26；the *Vacca* ，27，50，57，139，186，254；Albizzi plans to attack，55-6；Soderini at，104；and festival of St John the Baptist，120；Princess Eleonora of Naples at，121；and the Pazzi conspiracy，138-40，141；Piero di Lorenzo at，186；the bonfire of vanities opposite，192；celebrations for the election of Leo X，218；re-named，257；historical note on，312；Donatello’s works in，318；Michelangelo’s *David* in front of，326

Ferranti，66

Gianfigliazzi，314，325

Guadagni，315

Guicciardini，315

Martelli，57

Medici，building of，75-6；courtyard of，90；Donatello，91-2；Filippo Lippi，93；Della Robbia，108；Uccello，108；Pollaiuolo，108；Botticelli，109；Gozzoli，110；Lorenzo the Magnificent’s wedding celebrations，117-18；Princess Eleonora of Naples entertained at，121；and the Pazzi Conspiracy，135，136；Michelangelo at，166；plundered，187；Charles VIII at，190；Giovanni di Lorenzo born in，202；celebrations for the election of Leo X，218；council meetings in，220；Duke of Nemours dying in，223；picture of Clement VII on façade of，249；murder in，269；Cosimo I taken ill at，273；Medici shield on，313；Medici Library kept at，316；historical note on，317-18

Medici-Riccardi，318

Pazzi，141，162

Pazzi-Quaratesi，321

Pitti，104，274；grandiose，76；the Ducal Palace，271；Cosimo I dies in，273；Ferdinando I and，280；Cosimo II extends，282；wine sold at，284；*Del Cimento* meets at，284；Ferdinando II extends，285；Sala della Stufa，285；the collection of ivories，286；Marguerite-Louise at，

291；Grand Duke Gian Gastone dies at，309；Electress Palatine at，309；historical note on，328；murals in，332

Pucci，315

Rucellai，29，76，313

Salviati，261，321

Spini-Ferroni，314

Strozzi，168，323

Tornabuoni，102

Vecchio （*formerly* Palazzo della Signoria，*q.v.* ），274；the *Palleschi* at，257；the Ducal Palace，269；decoration of the courtyard，275；laboratory of Duke Francesco in，278；Ferdinand I’s banquet in，281；historical note on，312；the fountain and murals at，330

Palleschi ，217，256，257

Palmieri，Matteo，28

Panciaticchi，Andrea，145

Papacy，the，the ‘great schism’，34；and the Medici bank，35，36，37，88，89；and the Eastern Church，67；Sforza a *condottiere* for，81；and the French invasion of Italy，186；Leo X enjoys，218；a pro-Medici Sacred College，235

Papal States，near-anarchy in，*27*； Bologna and，65；alum deposits

in，89；and the French army，184；Urbino becomes part of，285

Parentucelli，Tommaso，Bishop of Bologna，*later* Pope Nicholas V.，*q.v.*，87，88

Parigi，Alfonso，271，278，317，328

Parigi，Giulio，271，317，328

Parma，219，222，237，238，247

Parma，Duke of，*see* Farnese，Ottavio

Parmigianino，*prop*. Girolamo Francesco Maria Mazzola （1503-40），300

Pasquini，Bernardo （1637-1710），300

Passerini，Cardinal Silvio，248

Patch，Thomas，325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65，66，110

Pavia，Lazaro di，173

Pazzi bank，129，131

Pazzi Conspiracy，the，131-42，158

Pazzi family，their history，131；after the Conspiracy，141，155；publicly disgraced，142

Pazzi，Andrea de’，131

Pazzi，Bianca，*née* Medici，Bianca di Piero de’，102

Pazzi，Francesco de’，and Pazzi Conspiracy，131，132，135，137；executed，140

Pazzi，Guglielmo，102，131，138，141

Pazzi，Jacopo di Messer Andrea de’，131-2，134，141

Pazzi，Pazzo de’，131

Pazzi，Piero di Messer Andrea de’，131

Pazzi，Renato di Messer Andrea de’，141，158

Penni，Gian-Francesco，240

Pepys，Samuel （1633-1703），on Cosimo III，292

Peri，Jacopo （1561-1633），281，300

Peruzzi family，58，66，315

Peruzzi，Ridolfo，55，57

Petraia，castle of，280

Petrarch，Francesco Petrarca （1304-74），227

Petrucci，Alfonso，Cardinal，217，232，233，234

Petrucci，Borghese，232

Petrucci，Cesare，138-9

Philibert，Prince of Orange，*see* Orange，Prince of

Philiberte of Savoy，Princess，Duchess of Nemours，219，223

Philip V，King of Spain （1683-1746），305

Piacenza，219，222，237，238，247

Piccolomini，Aeneas Silvius，*later* Pope Pius II，*q.v.*，on Cosimo di Giovanni，63；on Parentucelli，*later* Nicholas V，88

Pico della Mirandola，Count Giovanni （1463-94），164-5，174，181，185

Pierino da Vinci，323

Piero della Francesca （*c* . 1420-92），332

Pierozzi，Antonio，Archbishop of Florence，74，95

Pietro da Cortona，285

Pietro Leopoldo，Grand Duke of Tuscany，333

Pisa，conquest of，33，34；Archbishop of，130；Lorenzo di Piero and，169-70；and France，186，187；Savonarola greets Charles VIII in，188；Florence and，197，208；School of Botany at，274；college for scholars at，279

Pisano，Andrea （*c* . 1270-1349），70，180，316

Pitti family，123

Pitti，Luca，his personality，60；*Gonfaloniere*，62；*Accoppiatore*，63；and the Medici，103-4，105，106，123，328；pardoned，106；his palace，271，328

Plague，in Ferrara，66；and new doors for the Baptistery，70；in the Imperial army，247；in the French forces，249；in Florence，250，283；in Tuscany，293

Plato，68，164

Platonic Academy，69，332

Plethon，Giorgios Gemistos（*c*. 1355-1450），68

Poliziano，Angelo，*prop*. Angelo Ambrogini，（1454-94），his history，122；on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22；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35，137，157，164，173-4；and the Pazzi Conspiracy，137，138；and the execution of Salviati，140；tutor to children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45，323；Clarice de' Medici and，145，146；and Savonarola，181；his papers，332

Pollaiuolo，Antonio，*prop*. Antonio di Jacobo Benci，（1429-98），110，165，167，320

Pollaiuolo，Piero，*prop*. Piero di Jacobo Benci，（1443-96），108-9，168

Pollaiuolo，Simone del，*called* il Cronaca（1457-1508），323

Pontormo，Jacopo Carrucci da（1494-1557），274，314，322

Popes，

Adrian VI （*r* . 1522-3），238-9，240

Alexander V （*r* . 1409-10），34，35

Alexander VI （*r* . 1492-1503），193，194，196-7，205

Benedict XIII，*Antipope at Avignon* ，1394-1417，34

Calixtus III（*r* . 1455-8），86

Clement VII，*né* Giulio di Giuliano de’ Medici，*q.v.* （*r* . 1523-34），election of，239；a generous and discriminating patron，240；his indecision，240，244；his foreign policy，240-1，242；urges defence of Rome，243；and Cellini，246-7；surrenders，247；escapes，247；and Henry VIII’s divorce，247-8；his effigy torn to pieces，248；and the surrender of Florence，251；and Alessandro de’ Medici，251，254；and Caterina de’ Medici，252；illness and death of，252-3；the marriage of his daughter，255；and the boy Cosimo I，262；and the Medici Library，316；Michelangelo and，318，327；Raphael and，326；his tomb，327

Eugenius IV （*r* . 1431-47），succeeds Martin V，51；and San Giorgio Maggiore，54；and the Medici，56；Rinaldo degli Albizzi and，57；Cosimo *Pater Patriae* and，58，74；and Council of Florence，64，66，67；and Council of Bâle，64-5；his golden tiara，70；and completion of the Cathedral dome，73

Gregory XII （*r* . 1406-15），34，35，36

Gregory XIII （*r* . 1572-85），277

Innocent VIII （*r* . 1484-92）， succeeds Sixtus IV，160；‘a rabbit’，161；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61，182，202-3；Savonarola and，182；and Giovanni di Lorenzo，203

John XXIII *né* Baldassare Cossa，*q.v. Antipope to* Popes Benedict XIII *and* Gregory XII，（1410-15），background and personality，34；and King of Naples，35；accusations against，35-6；last years，36；his will，36；Cosimo *Pater Patriae* and，39；and Bracciolini，45；his monument，71，75，98，316；Giovanni di Bicci and，87

Julius II （*r* . 1503-13），217，228；appearance and temperament，207；his military exploits，207-8；and Giovanni di Lorenzo，208；dying，216；and the Duke of Urbino，223；and Michelangelo，229；and Raphael，229，332；and the Laocoön，325

Leo III，326

Leo IV，326

Leo X，*né* Giovanni di Lorenzo de’ Medici，*q.v.* （*r* . 1513-21），election of，217；his appearance，216；his enjoyment of the papacy，218，224；and the House of Medici，219；his reception in Florence，220-2，314，324；and the Duke of Urbino，222，223-4；and Francis I，222-3；and his brother Giuliano，223；his extravagance，224，227；Vettori on，224；his dinners，225-6；his amusements，226-7，230-2；his expenditure on Rome，227-8；a generous patron of writers and scholars，228；and Michelangelo，229，240，327；makes enemies，232-3；attempted assassination of，233-4；creates a pro-Medici Sacred College，235；and Charles V，237：and Luther，237；godfather to Cosimo I，261；his coat of arms，315；and the Medici Library，316；Raphael and，

325，326

Martin V （*r* . 1417-31），36，37，56，70，314

Nicholas V，*né* Tommaso Parentucelli，*q.v.* （*r* . 1447-55），87

Paul II （*r* . 1464-71），103，125，129

Paul III （*r* . 1534-49），264

Pius II，*né* Enea Silvio Piccolomini，*q.v.* （*r* . 1458-64），on Florentines，38；on Cosimo *Pater Patriae* ，38，63；on Francesco Sforza，81；and the Medici bank，88；and Cosimo *Pater Patriae* ，88

Pius III （*r* . and *d* . 1503），207

Pius IV （*r* . 1559-65），331

Pius V （*r* . 1566-72），266，267

Sixtus IV，*né* Francesco della Rovere （*r* . 1471-84），125；his appearance，128；nepotism，128-9；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29，130，159；and the Pazzi Conspiracy，132，133，155；and Florence，148，159；Tuscan bishops excommunicated，150；and Naples，154，159；and the Florentine deputation，160；death of，160

Sixtus V （*r* . 1585-90），277

Portinari family，43

Portinari，Folco，316

Prato，32，124，125，213-14

Printing，44，46，169

Processions，Martin V leaves Florence，36；to celebrate completion of the Baptistery bronze doors，71；to celebrate completion of the Cathedral dome，73；escort of Princess Eleonora of Naples，121；Charles VIII enters Florence，189-90；Leo X enters Florence，221；Francis I and，*222*； Christine of Lorraine enters Florence，280

Pro paganda Fide ，279

Ptolemy，*prop* . Claudius Ptolemaeus，280

Pucci，Giovanni，52

Pucci，Lorenzo，232

Pucci，Puccio，52，61，62

Pulci，Luigi （1432-84），116，164，323

Quercia，Jacopo della （*c* . 1367-1438），70

Quintilian，*prop* . 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45

Rangone，Bianca，209，235

Rangone，Ercole，Cardinal，235

Raphael，*prop* . 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Leo X and，229，325；Clement VII and，240，326；*Madonna del Baldacchino* ，300-1；his portrait of Julius II，332

Relics，holy，finger of St John the Baptist，36；belonging to the

Cathedral，120；*Volto Santo*，305；Cosimo Ill’s sacred collection，305

Renaissance，Council of Florence and，68；versatility of artists of，70；Brunelleschi’s church of San Lorenzo，72

René I，Duke of Anjou（1409-80），85

Renzo da Ceri，243

Riario，Girolamo，and Sixtus IV，128；at Imola，129；and the Pazzi Conspiracy，131，132，133；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134，156；seeks vengenace on Florence，148，159；his ambitions，160

Riario，Piero，Archbishop of Florence，128，130

Riario，Raffaele，Cardinal，and the Pazzi Conspiracy，134-5，148；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135，140-1；at Palazzo Medici，136-7；and assassination of Giuliano di Piero，138；his pallor，141；his dinner party，224；and Leo X，232，233，234；his palace confiscated，239

Riccardi family，76，318

Ricci，House of，35

Ricci，Sebastiano，300

Ridolfi family，321

Ridolfi，Antonio，137，138

Ridolfi，Contessina，*née* Medici，Contessina di Lorenzo de’，115，

Ridolfi，Lorenzo，247

Ridolfi，Niccolò，Cardinal，235，248

Ridolfi，Piero，220，221

Rinuccini，Alamanno，122，157

Riots，*Ciompi*，25-6，31；in Volterra，125-7；after the Pazzi Conspiracy，140；after cancellation of ordeal by fire，199

Robbia，Andrea della（1435-1525），317

Robbia，Luca della（*c*. 1400-82），108，138，320，321

Robert，King of Naples，39

Roman Catholic Church，and Council of Florence，64；and Greek Orthodox Church，65，67

Rome，Medici offices in，34，35，36，87，114，158；Cosimo *Pater Patriae* in，39-40；Eugenius IV driven from，56；artists in，70，72，90，167；Lorenzo the Magnificent in，103，125；Lorenzo the Magnificent's proxy wedding in，116；anti-Medici conspirators in，131；and the Pazzi Conspiracy failure，148；printing presses in，169；falls to Charles VIII，193；Lorenzo the Magnificent on，204；crime and corruption in，205；Giovanni di Lorenzo in，205，206；conclave in，216-17；celebrations for the election of Leo X，218；under Leo X，228；Charles V's forces advance on，241-3；sack of，244-5

Belvedere，226

Castel Sant’ Angelo，241；executions at，205，234；Clement VII takes refuge in，241，244；fugitives in，244-5；the attack on，246-7；Queen Christina at，330

Monte Testaccio，227

Piazza del Popolo，228

Santa Maria in Dominica，church of，228

St Peter’s Basilica，Florentine deputation in，160；under reconstruction，216，228；corpse of Clement VII desecrated in，253；threatened destruction by fire，326

St John in Lateran，church of，88，305，327

Via Ripetta，228

Romualdo，St，321

Rondinelli，Fra Giuliano，198

Rosa，Salvator（1615-73），286

Rossellino，Bernardo，313

Rossi，Leopetto，102

Rossi，Luigi，235

Rossi，Maria，*née* Medici，Maria di Piero de’，102

Rossi，Roberto de’，37

Rosso，Giovanni，274

Rovere，Francesco della，*see* Pope Sixtus IV

Rovere，Francesco Maria della，*see* Urbino，Francesco Maria I and II，Dukes of

Rovere，Giovanni della，129

Rovere，Giuliano della，Cardinal，*later* Pope Julius II，*q.v.*，161

Rovere，Leonardo della，130

Rovere，Vittoria della，*see* Medici，Vittoria de’

Rubens，Peter Paul （1577-1640），332

Rucellai family，314

Rucellai，Bernardo （1449-1514），102

Rucellai，Giovanni，29，227，313

Rucellai，Lucrezia，*née* Lucrezia di Piero de’ Medici，102

Rucellai，Palla，257

Ruggieri，Giuseppe，319，328

Ruspanti，308

St Stephen，Prato，church of，93

Salutati，Antonio di Messer Francesco，87

Salviati，Averardo，141

Salviati，Francesco，Archbishop of Pisa，waits in Rome，130；and the Pazzi Conspiracy，131，132，133，136，137，138-9；executed，140

Salviati，Giacomo，261

Salviati，Giovanni，Cardinal，235

Salviati，Jacopo，220，247，262

Salviati，Lucrezia，*née* Medici，Lucrezia di Lorenzo de’，115

Salviati，Maria，*see* Medici，Maria de’

San Domenico Fiesole，convent of，73，94，317

San Leo，fortess of，236

Sanseverino，Federigo，Cardinal，209，231

Sansovino，Jacopo，*prop* . Jacopo Tatti （1486-1570），220，221，325

Santa Croce，Antonio，246

Santo Spirito，Jerusalem，church of，74

Sarto，Andrea del，*prop* . Andrea Vannucchi （1486-1531），172，220，221，300，322

Sassetti，Francesco，158，323

Sauli，Cardinal，233，234

Savonarola，Girolamo （1452-98），178-82，216；his effect on Florentine morale，185；and Charles VIII，188；his power in Florence，191；differing attitudes to，192-3；and the Holy League，196；and Alexander VI，196-7；and the proposed ordeal by fire，198，199；tortured，hanged and burned，200；Machiavelli’s contempt for，210；his cell at San Marco，317

Scarlatti，Alessandro （1659-1725），300

Schinner，Matthew，Cardinal，220

Scoroncolo，*assassin of* Alessandro de’ Medici，256

Sforza，Ascanio，Cardinal，203，205

Sforza，Bianca，*née* Visconti，80，81

Sforza，Caterina，128

Sforza，Francesco，Duke of Milan （1401-66），and war between Florence and Lucca，42；his birth，80；personality and appearance，81；Pius II on，81；marriage，81；and Cosimo *Pater Patriae* ，82；Duke of Milan，82，85；and Florence’s foreign policy，83；and France，84；and the Medici bank in Milan，87，158；death of，105

Sforza，Francesco Maria，Duke of Milan （*d* . 1535），240

Sforza，Galeazzo Maria，Duke of Milan （1444-76），his

instability，105；his cruelty and extravagance，123-4；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24；his daughter's marriage，128；assassinated，130

Sforza，Giacomo Attendolo （1369-1424），80-1

Sforza，Gian Galeazzo，Duke of Milan （1469-94），130，151，181，183，184

Sforza，Ippolita，*see* Calabria，Duchess of

Sforza，Isabella，Duchess of Milan，183，184

Sforza，Lodovico，Duke of Milan，*called* il Moro （1451-1508），appearance，151；character，151-2；in power，152；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168，173；and Charles VIII，183，184；proclaims himself Duke，184；joins the Holy League，194

Sieges，Lucca （1429-30），42-3；Rome （1527），244-6；Florence （1529-30），249-51；Volterra （1472），126

Sigismund，Holy Roman Emperor （1368-1437），34

Silvester，Guido，231

Silvestri，Bartolommeo，332

Silvestro，Fra，200

Slaves，23-4，33，39-40，95，266

Soderini，Francesco，Cardinal，217，232，233，234，238

Soderini，Niccolò，104-5，106，123

Soderini，Paolo Antonio，155

Soderini，Piero，210-11，212-13，214，215

Soderini，Tommaso，110，123，152

Spain，and Julius II’s Holy League，208；and battle of Ravenna，208；Spanish forces advance on Florence，211-12；and sack Prato，213；Leo X and，219

Spini，Bartolommeo，49

Spini，House of，35，37

Squarcialupi，Antonio，165，172

Stefano da Bagnone，Fra，136，137-8，141

Stendhal，*pseud. of* Marie Henri Beyle，325

Strozzi family，314

Strozzi，Clarice，*née* Medici，Clarice di Piero de’，202，248

Strozzi，Filippo the Elder （1428-91），137，168，323-4

Strozzi，Filippo the Younger （1489-1538），262，323

Strozzi，Laodamia，179

Strozzi，Lorenzo di Palla，38

Strozzi，Marietta di Lorenzo，118-19

Strozzi，Matteo，58

Strozzi，Palla （1372-1462），38，and the Albizzi，52；and Rinaldo degli Albizzi，55，56-7；banished，59；Parentucelli and，87；commissions Gentile da Fabriano，314

Strozzi，Piero，263-4

Stufa，Sigismondo della，138

Sumptuary laws，22，24

Sustermans，Justus，283

Switzerland，Swiss army in Lombardy，209；Leo X and，220

Tacca，Ferdinando，286，332

Tacca，Pietro，328，331

Tadda， Romolo del，328，332

Talenti，Simone，329

Tasso，Giovanni Battista，313

Tinucci，Niccolò，51

Titian，*prop* . Tiziano Vercelli （*d* . 1576），328，332

Tornabuoni family，43，102

Tornabuoni，Francesco，114

Tornabuoni，Giovanni，103，106，114，178，319

Tornabuoni，Lucrezia，*see* Medici，Lucrezia de’

Trade，in 15th century Florence，20；guilds，25-6；merchants and，28-9；wool，33，34，152；silk，42；in decline，293

Tranchedini da Pontremoli，Nicodemo，83，97

Traversari，Ambrogio，44，47，51，66，67

Treaties，

Barcelona （1529），249

Lodi （1454），85

Montil-les-Tours （1452），84

Tribolo，Niccolò Pericoli，271，274，323，329

Trissino，Gian-Giorgio，227

Turkey，and Constantinople，64，68，85；Venice and，79，83；Florence and，83；and Italy，84，159，160；and Smyrna alum mines，88；Savonarola’s prediction about，182；battle of Lepanto，266

Uccello，Paolo，*prop* . Paolo di Dono，108，320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315

University of Florence，45，46，47-8，170，274

University of Padua，282

University of Pisa，274，282，297

University of Rome，228

Urbino，Battista da Montefeltro，Duchess of，*née* Sforza，332

Urbino，Caterina，Duchess of，*see* Medici，Caterina di Lorenzo de’

Urbino，Duchess of，*née* Madeleine de la Tour d’Auvergne，235

Urbino，Duchy of，219，222，224，285

Urbino，Duke of，*see* Medici，Lorenzo di Piero de’

Urbino，Federigo da Montefeltro，Count of，later Duke of，loses an eye，116；attacks Volterra，126-7；and Eugenius IV，129；papal troops under，150

Urbino，Francesco，165

Urbino，Francesco Maria （I） della Rovere，Duke of，212，222，223-4，233

Urbino，Francesco Maria （II） della Rovere，Duke of，285

Uzzano，Niccolò da，29，43，48，313

Valori，Filippo，153，155

Vannino，Ottavio，332

Varchi，Benedetto，250，256，263，274，329

Vasari，Giorgio （1511-74），328；on Donatello and Cosimo *Pater Patriae* ，91；on Donatello in old age，92；on the wax effigies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142-3；and Lorenzo the Magnificent’s school，165，322；on Michelangelo，165-6；on Verrocchio，167；architect of the Uffizi，271；and the Palazzo Vecchio，274，275，278，312；death of，278；and Santa Maria Novella，314；and Il Trebbio，315；and the Pucci，315；on Cafaggiolo，318；and Botticelli’s *Adoration of the Magi* ，320

Vatican，Library，69；Sistine Chapel，167；entry of Leo X into，218；Palace，228；Loggie di Raffaello，229；Stanze di Raffaello，229，245，325-6；Clement VII commissions artists for，240

Veneziano，Domenico，315

Venice，Medici office in，34，87；slave-market in，39，95；Medicean exiles in，52，54；San Giorgio Maggiore，54，315；Cosimo *Pater Patriae* leaves，58；Neroni and Soderini in，106；Verrocchio’s bronze of Colleoni in，167；printing presses in，169；Lorenzaccio stabbed in，265

Venice，Republic of，government of，27；and Cosimo *Pater Patriae* ，50-1，82-3；and Fourth Crusade，64；and Florence，79，82-3，105，106，130，186；conquests by，79；Sforza a *condottiere* for，81；and Lombardy，82；declares war on Florence and Milan，84；and France，184；joins the Holy League，194；League of Cambrai designed against，207；and battle of Agnadello，207，208，209

Veronese，Paolo，*prop* . Paolo Cagliari （1525-88），322

Verrocchio，Andrea del （1435-88），168；and the Medici tomb，112，321；and Giovanni di Piero’s helmet，122；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167，315；Vasari on，167；his bronze of Colleoni，167；Leonardo da Vinci and，168；his fountain，275，316；and the Medici emblem，313；*David* and *Resurrection* ，316，323；memorial to Cosimo *Pater Patriae* ，319；his *Putto* in Palazzo Vecchio，330

Vespucci family，325

Vespucci，Amerigo （1451-1512），193，322

Vespucci，Giorgio，193

Vespucci，Marco，121

Vespucci，Simonetta，*née* Cattaneo，121，322

Vettori，Francesco，224，257，264

Victor Emmanuel II，King of Italy，331

Victor Emmanuel III，King of Italy，328

Villas，

Ambrogiana，288，333

Belcanto，318

Cafaggiolo，164，267；a place of refuge，62，145；Michelozzo designs，77；Cosimo *Pater Patriae* and，78；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t，122，134，145；Montesecco at，134；mortgaged，155；and the sons of Pierfrancesco，159，185；fortress，318

Careggi，Cosimo *Pater Patriae* at，58，69，77；Piero di Cosimo at，105；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t，114，122，173；annual banquet at，164；Verrocchio’s works for，167，275，316；Duke of Urbino at，235；historical note on，316

Castello，267，274；Giovanni di Pierfrancesco at，185；historical note on，323；garden of，329；Accademia della Crusca and，330

Cereto Guidi，277，330

Demidoff，330

Ferdinanda，280，331

Gianfigliazzi，Marignolle，221

Il Trebbio，77，257，267，315，318

Lappeggi，290，299，300，304，333

Lecceto，267

Le Fontanelle，316

Madama，326

Magliana，230，238

Medici（Fiesole），completed，78；Michelozzo and，95；Poliziano at，122，146；and the Pazzi plot，134-5；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

164；historical note on，318

Medici （Rome），330

Montelupo，267

Montevecchio，68，77

Negroni，277

Petraia，280，331

Poggio a Caiano，322；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114，164，172，314；Duke of Urbino and，235；Cosimo I and，267；the park at，274；Marguerite-Louise at，291，295；Strozzi family and，314；architecture and artists of，322

Poggio Imperiale，282，309，332

Pratolino，276，278，300，330

Ravia，315

Spedaletto，165，166

Violante Beatrice，Pricess of Bavaria，*see* Medici，Violante Beatrice de’

Visconti family，59，81

Visconti，Bianca，*see* Sforza，Bianca

Visconti，Filippo Maria，Duke of Milan （1392-1447），27；and

war between Florence and Lucca，42-3；and war with Florence，79；personality and appearance，79-80；his marriages，80；and Francesco Sforza，81

Visconti，Valentina，201

Vitelleschi，Cardinal，56，57

Vitelli，Alessandro，256，257，263

Vitelli，Niccolò，129-30

Volterra，sack of，126

War of the Pazzi Conspiracy，149-50，151，152，155

Weyden，Roger van der （1400-64），314

Wolsey，Cardinal Thomas （*c* . 1475-1530），239

Zoffany，John，32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第奇家族的兴衰/（英）克里斯托弗·希伯特（Christopher Hibbert）著；冯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

书名原文：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OUSE OF MEDICI

ISBN 978-7-5097-9718-1

Ⅰ.①美… Ⅱ.①克…②冯… Ⅲ.①美第奇（Medici，Lorenzo de 1449-1492）-家族-史料 Ⅳ.①K835.4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3089号

美第奇家族的兴衰

著者/〔英〕克里斯托弗·希伯特

译者/冯璇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周方茹 刘杰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4.125 插页：1 字数：310千字

版次/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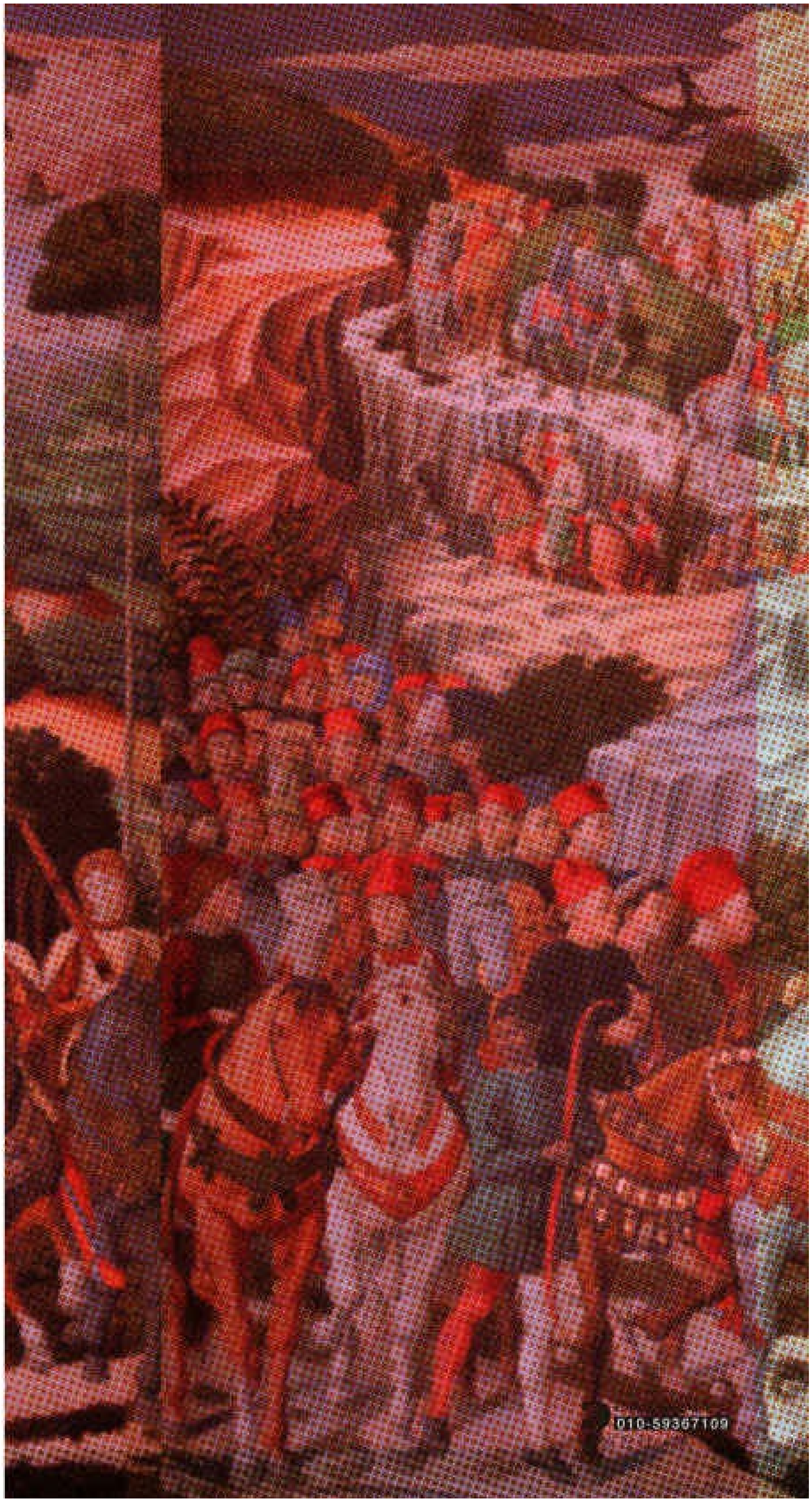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978-7-5097-9718-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5-6681号

定价/6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010-59367109

精彩至极、可读性强……浪漫唯美又不乏戏剧性和血腥杀戮。

——萨谢弗雷尔·斯特维尔爵士（Sir Sacheverell Sitwell）

（克里斯托弗·希伯特）不愧为大师，他的这部作品研究深入，可读性强。

——《每日电讯报》

克里斯托弗·希伯特先生是一位相当多才多艺的作家。

——雷蒙德·莫蒂默（Raymond Mortimer）

ISBN 978-7-5097-9718-1

甲骨文官方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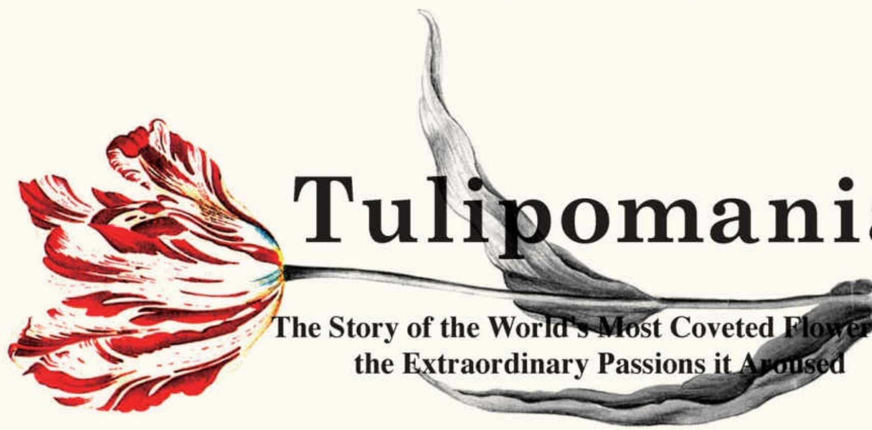
定价：69.00元

迈克·达什（Mike Dash），于英国剑桥大学修习历史，并于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系专职作家，除了《郁金香热》之外，还著有另外两本非文学作品《极限》（*Limit*, 1995 年）与《边疆》（*Borderland*, 1997 年）。



世界上最受人追捧的花朵及其掀起的非凡热潮的故事

郁金香热



Tulipomania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Coveted Flower and the Extraordinary Passions it Arous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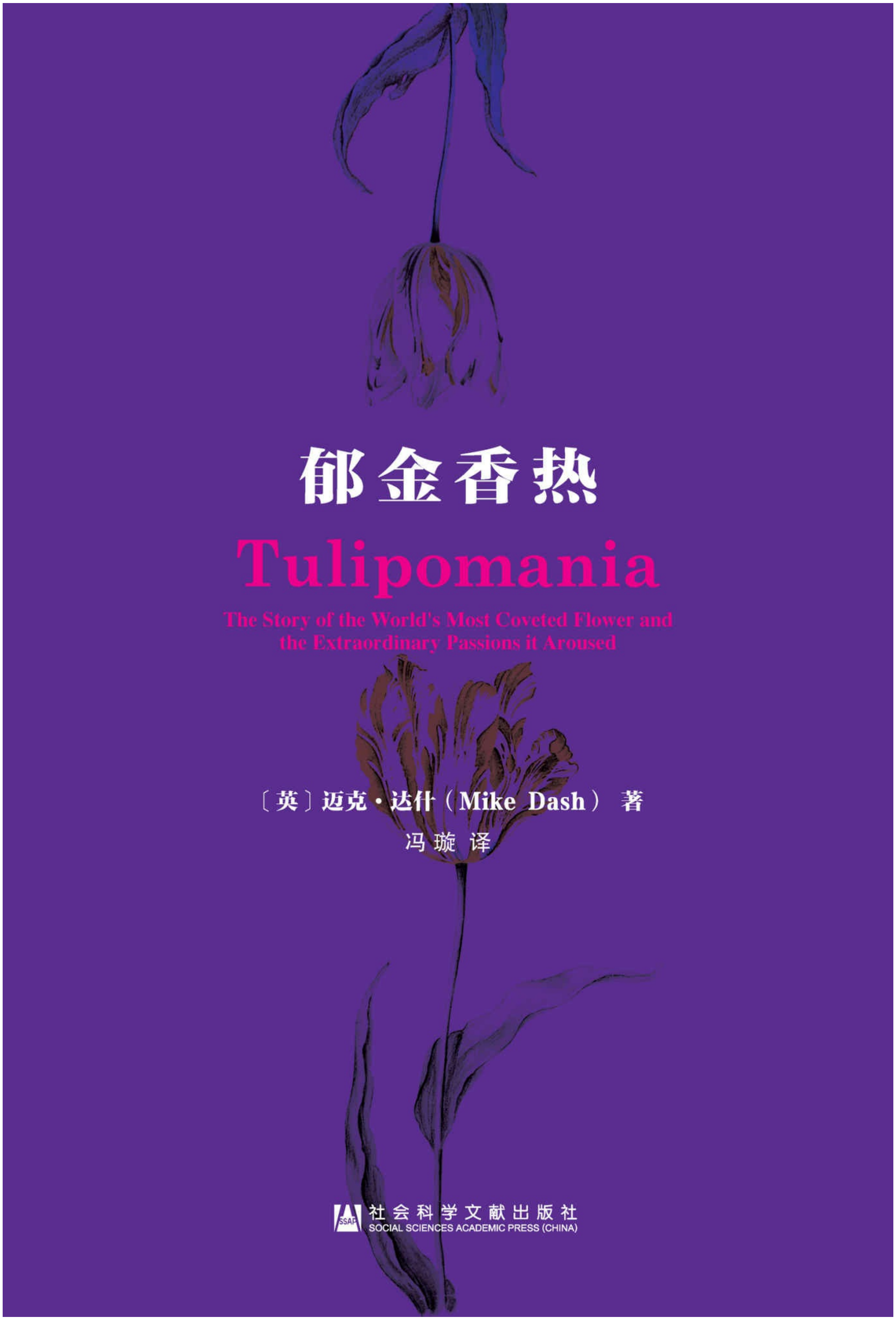
〔英〕迈克·达什（Mike Dash）著

冯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opyright © Mike Dash 199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nville&Walsh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郁金香热

Tulipomania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Coveted Flower and the Extraordinary Passions it Aroused

〔英〕迈克·达什（Mike Dash） 著

冯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永远的奥古斯都』，即最美的荷兰郁金香。据称，这种极度稀有的鲜花世上仅存不超过十二株，一个花球转手的价钱就可以买两栋房子。



一株公元1725年左右的郁金香，花型似杏仁，花瓣成针状，是当时最受土耳其人喜爱的品种。



土耳其苏丹的首席园丁，同时也是土耳其宫廷的首席刽子手。



托普卡匹皇宫，也是奥斯曼帝国权力的根基所在。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苏丹们就是在这座皇宫中最隐秘的私人郁金香花园里抛开国事的纷扰，享受难得的清静。



卡罗吕斯·克劳修斯在公元1585年前后的肖像。克劳修斯是16世纪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也是为将郁金香从土耳其边境推广到法国南部做出最大贡献的人。



康拉德·格斯纳，瑞士自然学家。他在1559年所画的郁金香素描是

据人们所知欧洲最早的记录郁金香花朵样子的素描。



阿德里安·波夫，他是富甲天下的商人，也是权倾一时的政客，更是位众所周知的郁金香鉴赏家。画中的波夫坐在他的马车里，正是他带领的这个使团让荷兰最终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



“范·德·艾克司令”，最昂贵的红色系郁金香品种之一。在1637年，一个“范·德·艾克司令”球根的价值可以高达一个阿姆斯特丹木匠全年工资的6.5倍。



“莱顿的红与黄”，它是黄色系郁金香里最受人喜爱的品种之一。黄色系郁金香是一种红黄相间的郁金香品种，受追捧程度逊于红色系郁金香。

郁金香狂热时期荷兰酒馆内部的景象。旅店就是郁金香交易的中心



紫色系郁金香“总督”，也是排名仅次于“范·德·艾克司令”的郁金香品种。在郁金香狂热达到最高峰时，一株“总督”的价值可超过4500荷兰盾。



郁金香狂热时期荷兰酒馆内部的景象。旅店就是郁金香交易的中心

场所。这幅图画的作者扬·施特恩本人就是一个酒馆老板。



小扬·布罗海尔创作的《郁金香狂热的寓言》。在这幅作品中，画家把倒霉的郁金香交易者描绘成了类人猿。



土耳其苏丹在骄傲地展示他珍贵的郁金香（图中前景）。每株郁金香都被单独地插在一个金丝装饰的玻璃花瓶里，花瓶上这种加工技艺在当时被称为“夜莺的眼睛”。



伦勃朗的名作《杜普教授的解剖课》（“杜普”在荷兰语中就是郁金香的意思）。画中人即为荷兰黄金时代最时髦的医生，原名克莱斯·彼得森。后来出于对郁金香的热爱，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了杜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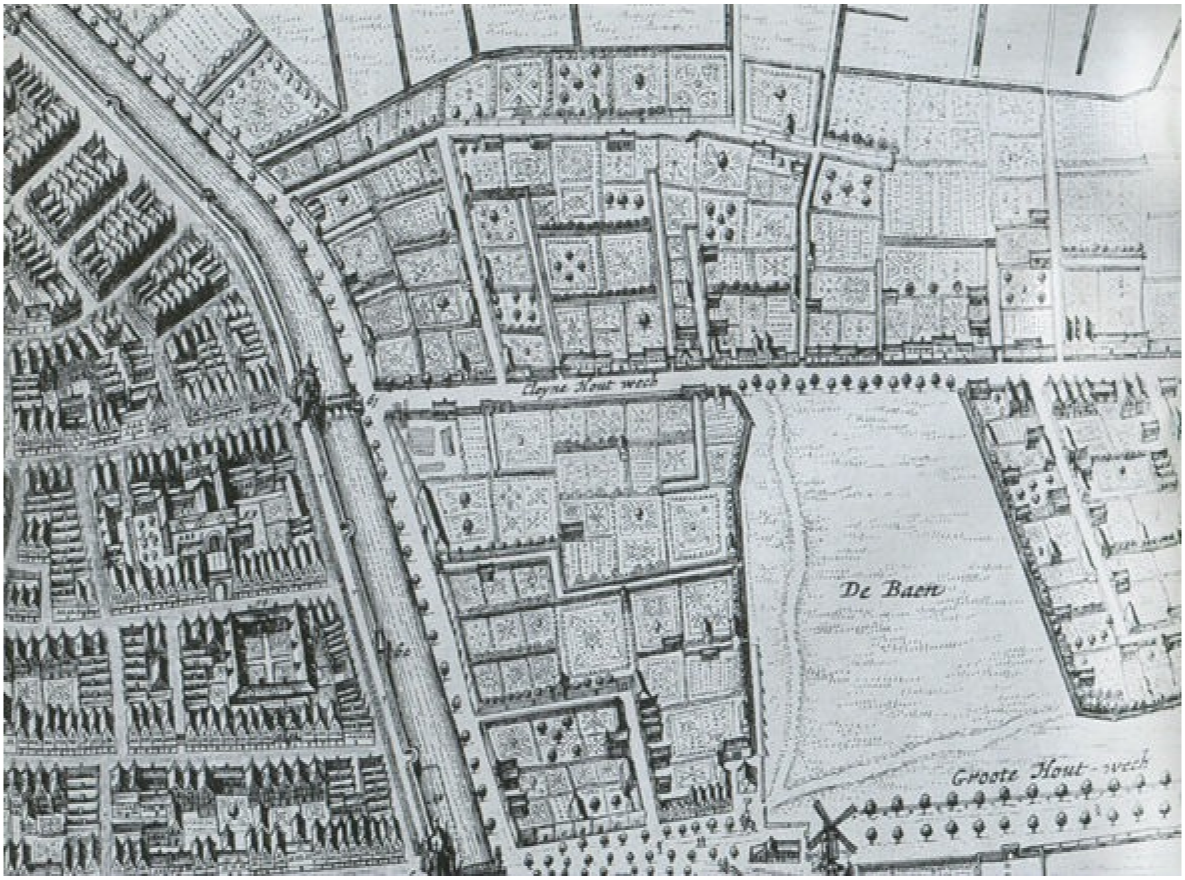
历史上最狂热的郁金香爱好者——艾哈迈德三世在1722年下令建造的“幸福的宫殿”。图为该宫殿中的休闲花园。



亨里克·波特创作的《花神和傻瓜》，画中的花神弗洛拉和她的崇拜者——也就是郁金香交易者们坐在沙滩艇上加速冲向毁灭。克里斯·范德帕斯后来据此创作了一副内容更具体、讽刺更尖锐的铜版画版本。



1646年版本的哈勒姆地图中的一部分，显示的是城墙外的花园区域。这里就是第一批专业郁金香种植者培育球根的地方。


De Baen

世界上最受人追捧的花朵及其掀起的非凡热潮的故事

献给菲恩

那些人被狂热冲昏了头脑，更确切地说，

是对鲜花的渴望，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只为一朵满足他们所有幻想的郁金香。

这种疯狂就像一种疾病，摧毁了不少富有的家庭。

德·布兰维尔先生，《游历荷兰》

（伦敦1743）1，28

Monsieur de Blainville，*Travels through Holland*

（London 1743）1，28

目录

- 插图目录
- 价格说明
- 引言
- 序言 为郁金香而疯狂
- 1 天山山谷
- 2 在极乐家园里
- 3 来自东方的稀罕物
- 4 克劳修斯
- 5 莱顿
- 6 胸前的装饰
- 7 镜中的郁金香
- 8 花商
- 9 繁荣
- 10 金葡萄指示牌
- 11 沃特·温克尔的孤儿
- 12 崩盘
- 13 娼妓女神
- 14 郁金香国王的宫廷
- 15 迟来的花期
- 注释
- 参考文献
- 致谢
- 索引

插图目录

“永远的奥古斯都”，出自1643年的《尤迪特·莱斯特的郁金香画册》*Tulip Book of Judith Leyster*，（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哈勒姆）。

一株土耳其郁金香，出自一本土耳其的郁金香画册，约1725年（克里斯蒂图片社提供）

“园丁”，出自1802年《土耳其服饰》*The Costume of Turkey*，奥克塔维安·达尔维玛特（Octavian Dalvimart）创作的插图（大英图书馆）。

“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根据纪尧姆·约瑟夫·格雷洛特（Guillaume Joseph Grelot）创作的《航行于君士坦丁堡》*Relation d’un voyage de Constantinople*，1689年出版（大英图书馆）。

夏尔·德·莱克吕兹（卡罗吕斯·克劳修斯）的肖像，约1585年。

康拉德·格斯纳的木刻雕像，由路德维希·弗里（Ludwig Fry）创作，插图由格罗斯汉斯·托曼（Grosshans Thomann）创作，约1564年。

Einzug des Gesandten Adriaen Pauw in Munster，格拉尔德·特尔·博尔希（Gerard Ter Borch）和the monogrammist G.V.H.，约1646（明斯特市立博物馆）。

“范·德·艾克司令”，出自1643年的《尤迪特·莱斯特的郁金香画册》（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哈勒姆）。

“莱顿的红与黄”，出自1643年的《尤迪特·莱斯特的郁金香画册》（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哈勒姆）。

“总督”，出自1643年的《尤迪特·莱斯特的郁金香画册》（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哈勒姆）。

酒馆内部，由扬·施特恩（Jan Steen）创作，约1660年（约翰尼·范海腾画廊，布里奇曼艺术馆）

关于郁金香狂热的寓言，由扬·布罗海尔二世（Jan Brueghel II）创作，约1640年（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哈勒姆）。

花神弗洛拉的马车mallewagen，亨里克·格里特森·波特（Hendrick Gerritsz.Pot），约1640年（弗兰斯·哈尔斯博物馆，哈勒姆）。

彼得·威尔斯的1646年哈勒姆地图上的细节，显示了“Groote”和“Cleyne Hout-wech”（哈勒姆肯内墨兰档案馆）。

伦勃朗创作的《杜普教授的解剖课》，1632年（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海牙）。

“幸福的宫殿”，根据W.H.巴特利特（W.H. Bartlett）创作的绘画作品雕刻，出自茱莉娅·S.H.·帕多的《博斯普鲁斯的美景》（*The Beauties of the Bosphorus* ），1874年（大英图书馆）。

“伟大的领主，阿卜杜勒-艾哈迈德”，出自《游历希腊》*Voyage pittoresque de la Grece* （第二卷，1809），作者玛丽·加布里埃尔·奥古斯特·弗洛伦特·德舒瓦瑟尔·古菲耶（Marie Gabriel Auguste Florent de Choeseul-Gouffier）（大英图书馆）。

价格说明

郁金香在荷兰共和国黄金时代的价格和它在今天的价格是无法作比较的。根据黄金或其他必要的食物的相对价格，当然可以计算出数字，但是这样的数字无法体现出当时社会与现今社会的一些重要区别，比如生存最低标准包括什么（在很多方面，现在被视作穷人的人也比17世纪最富有的荷兰人过得舒适），又比如像郁金香球根这样的奢侈品在黄金时代意味着什么。

最好的比较方法大概就是对比不同的薪水和收入。下面列举了荷兰共和国在17世纪上半叶消费水平的一些典型例子。

荷兰共和国的货币基本单位是荷兰盾。1荷兰盾等于20个荷兰币。

0.5荷兰币：一大杯啤酒的费用

6.5荷兰币：在1620年可以买一块12磅重的面包

8荷兰币：在1601年，一个技术娴熟的哈勒姆漂洗工一天的工资（相当于110荷兰盾每年）

18荷兰币：在1633年，一个阿姆斯特丹剪羊毛工人一天的工资（相当于250荷兰盾每年）

13荷兰盾：在1636年按照荷兰的重量单位，购买一吨鲱鱼的价钱

60荷兰盾：在1636年购买40加仑法国白兰地的价钱

250荷兰盾：17世纪30年代，一个木匠一年的工钱

750荷兰盾：1592年，克劳修斯在莱顿大学一年的工资

1500荷兰盾：17世纪30年代，一个普通商人正常的收入

1600荷兰盾：伦勃朗最伟大的杰作《夜巡》的酬金

3000荷兰盾：17世纪30年代，一个成功的大商人正常的收入

5200荷兰盾：经证实确定的，1637年购买球根的最高价格

资料来源：van Derusen，Hunger，Posthumus，Zumthor。

引言

1637年早春的一天，一个叫弗朗索瓦·科斯特（François Koster）的商人以6650荷兰盾的天价购买了几十个郁金香球根。

在一个300荷兰盾能够满足一家人全年开销的年代，这样一笔交易显然是极其不平常的。更让人意外的是，科斯特购买郁金香球根并不是为了种植，而是打算转卖。他坚信这笔投资是稳赚不赔的。

即便是在当时，也有很多人认为，像科斯特这样成百上千个为了争夺购买郁金香球根的机会而不惜任何代价的荷兰人都疯了。但事实是这些郁金香商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为购买郁金香花再多钱都是值得的。首先，最值钱的球根是非常稀少的，用它们培育出的郁金香极其美丽、受人追捧。其次，郁金香的价钱已经连续快速上涨了两年了，谁敢说它不会升得更高？

尽管如此，这些商人们还是打错了如意算盘。科斯特的一掷千金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历史上最令人匪夷所思也最令人难以遗忘的1633～1637年郁金香狂热的最高峰。这笔交易后来被证实为这次狂热的最后一次体现。科斯特买下球根之后不到一个星期，郁金香的价格就毫无预兆地下跌了。几天之内，郁金香的价格狂跌至原来的1/10甚至更低。至1637年2月底，荷兰曾经最富有的——起码从账面上看最富有的——人们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其他在郁金香上大笔投资的商人也面临着血本无归的下场。弗朗索瓦·科斯特只付了820荷兰盾的定金，但无力支付5830荷兰盾的尾款，最终被愤怒的卖家无情地告上了法庭。

郁金香狂热的故事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它完全颠覆了我们对17世纪历史的印象。在那样一个战乱不断、物资稀缺的年代，人们怎么会为郁金香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事物而疯狂？在那样一个视成功为美德，公开宣扬最严格的加尔文主义，连教堂风琴都被当作不实之物而禁用，对在婚礼宴席上跳舞也要皱眉鄙视的年代，人们怎么会容忍这种主要是由醉汉们在小酒馆的单间里进行的、贪婪奢侈的交易？交易的对象又为什么偏偏是郁金香，而不是其他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商品？

当时的人们就隐约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了。从狂热的最高峰到价格暴跌的整个期间，荷兰人自己印制过各种小册子，内容大多是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或是对郁金香交易的嘲讽。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境外（即当时所谓的荷兰联合省之外）的人更是对这股狂热小心警惕。在他们看来，一个以严厉阴沉、了无生趣、爱好说教，更重要的是以对钱财极其精打细算而闻名欧洲的民族似乎完全抛弃了他们的传统，毫无缘由地为郁金香而疯狂了。

经历过郁金香狂热的人后来也觉得无法解释狂热由何而来。现代人在很多方面也未必比古人聪明多少，所以时至今日，在狂热过去360多年之后，我们仍然找不到什么适当的关于这段历史的档案材料。仅有的一些原创作品最晚也是在1934年写就的，而且大多只有荷兰语版本。在那之后，若有哪个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对郁金香狂热略加分析，也不过是照搬了早期作品中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也未见得可靠。尽管如此，郁金香狂热这样一段出现了就无法再被遗忘的历史，任谁都觉得值得研究。

多少年来，普通读者对郁金香狂热的了解来源于19世纪苏格兰记者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于184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这本书至今还可以买到，全书725页，共六章，

涉及了丰富的内容，从圣战历史到政治与宗教对发型胡须的影响都涵盖其中。然而最为人们所铭记的是其中短短8页的关于郁金香狂热的内容，提出了郁金香狂热是想象力在作用的奇怪理论。不幸的是，尽管麦凯的理论非常有影响力，但他所依据的许多事实却是有误导性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几乎所有的分析都被这些错误影响了，只要提起狂热，就无一例外地带着困惑和质疑的色彩，这个国家发疯了、商人们癫狂了、事情就这样无从解释地发生了。

经济学家和市井商贾对郁金香狂热的认识往往也是肤浅的。正如一位教授写道："刚入学的新生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围坐在营火边一起听老师讲述荷兰郁金香的故事，从此树立了对投机性市场的怀疑态度。郁金香球根的价格可以攀升到如此之高然后下跌得如此之快，就是资本市场不稳定性和无理性实际体现的最有力证明。"但是金融家和经济学者像历史学家们一样，把自己的结论建立在了一个可疑的基础上（甚至有传言说，华尔街上一些有修养的投资银行仍然给新雇员发放麦凯的书，并且要求他们仔细研读关于金融灾难起因的章节之后才能走进交易大厅）。对他们而言，郁金香狂热是第一次巨大的疯狂，是金融危机最初的表现，像南海泡沫事件（这个与南美交易的骗局让伦敦最显贵的大人物们损失惨重）一样具有惊天动地的影响。从纸币诞生，再到股票、期货的出现，直到1989年的大崩盘为止，历史上有过无数次的经济繁荣与衰落，而郁金香狂热则是这所有泡沫中的第一次。任何时候只要债券价格比实际价值高（比如靠网络挣钱的公司的股票），有关金融的评论就会拿郁金香狂热来做比较。因为金融学家不能光靠理解和印象分析问题，而是要靠事实和数据说话，但郁金香狂热的相关数据却很难找到，所以比起历史学家来，经济学家可能更不容易适当地分析郁金香的故事。这也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人们在对狂热的实质认定上仍有各种不同看法。有些学者把它视为泡沫经济的经典案例，也就是不值钱的东西价格疯长；而另一批学者则认为球根价格高是供给远少于需求的合理反映。

生活在郁金香狂热时代的人们在很多方面已经有着趋于现代的价值观，但在另一些方面，他们又与现今的荷兰人看法不同。今天人们提起荷兰人时想到的字眼——宽容、迟钝、喜欢啤酒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在17世纪时就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了。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对郁金香的狂热刚好发生在荷兰黄金时代的最高峰，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荷兰联省共和国不仅掌握着全球范围的经济霸权（阿姆斯特丹之于17世纪的重要性就相当于伦敦之于19世纪），更创造了令人震惊的丰富文化。伦勃朗（Rembrandt）和维梅尔（Vermeer）都经历过那段时期，其他历史上最伟大的荷兰艺术家们也都曾以郁金香为题材作画。

除此之外，比起如今平淡无奇的变异品种，当时的郁金香美得令人无法抗拒。它的花瓣上生长着复杂的纹路，颜色丰富而耀眼，其美丽程度不但史无前例，而且已经永远绝迹，后世再也见不到了。

这本书要讲的是真实的郁金香狂热。这种花卉是怎么离开其原本生长的东方，不远万里来到联省的；它是怎么在这里生根发芽，成就了自己的地位；以及为什么狂热会发生在彼时彼刻？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还原郁金香狂热的历史真相，并且解读它背后的金融现实。

这本书里介绍了两种不同的郁金香狂热。荷兰上演郁金香狂热的同时，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也在为郁金香疯狂。在奥斯曼帝国，人们不是将郁金香当作观赏花卉，而是视其为圣物。最有权势的苏丹王族，用他们的军队威慑着半个欧洲，一句话就可以决定百余人的生死。他们可以买下上万个叙利亚郁金香球根，只把它种植在宫殿神圣腹地的秘密花园中，专供帝王赏玩。比起荷兰更偏重于金融层面的郁金香狂热事件，土耳其的郁金香狂热则更偏重于文化和艺术层面。这种对比令人着迷，更发人深省。

关于郁金香狂热，一直没有多少有益的研究成果，更糟的是仅有的这些还都错误百出。上至腰缠万贯的商人，下至食不果腹的乞丐，是不

是每一个生活在联省共和国的人都意识到自己已深陷于这股狂热？真的有人花相当于数十万英镑的价格买一个郁金香球根吗？当郁金香价格狂跌之后，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增长速度最快的荷兰经济就开始衰退了吗？真的有个权倾天下的土耳其苏丹因为迷恋郁金香到疯狂的程度而丢了王位吗？

对以上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但是这并不影响郁金香狂热的研究价值。它真真切切地出现过，确实有人挣了大钱，确实有人一败涂地。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像郁金香一样，让织工比香料商人还有钱，让孤儿富有到一辈子不用工作，哪怕它只是昙花一现，哪怕它并不是奇迹的真正原因，它也足以让人心驰神往。

序言 为郁金香而疯狂

这些人来自荷兰的各个角落，从头到脚一身乌鸦黑，披着风衣裹着毯子以抵抗刺骨的寒风。他们经过的小道已经被无数的马蹄和细窄的轮子倾轧的沟沟坎坎。最富有的人坐在没有安装弹簧的马车上，像没有经验的水手在飓风中行船般一路颠簸。其他的人更是只能骑在马上，埋着头顶风前行，或独自一人或三两结伴，穿过贫瘠的阿姆斯特丹北部的土地，向着海边的阿尔克马尔镇前进。

这些商人都是身材结实的中年人。他们在商业贸易中获利不少，深知如何让钱生钱，同时不吝享受钱财带来的富足生活。大多数商人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脸色红润。他们身上穿的衣服，纵然颜色单调，但都是上好的布料裁制而成，贴身的钱包里更是装着满满的钱币。商人们在傍晚时分到达小镇，穿过阿尔克马尔狭窄的街道，在忙乱的市场附近寻找客栈入住。吃喝完毕，再用他们的陶土烟袋抽上一袋烟。之后还要再点上好酒和烤肉，靠在硬木椅子上，就着壁炉里泛黄的炭火，夸夸其谈直到午夜。

这些富有的荷兰商人经营的可不是谷物、香料、木材和水产之类的普通货物，他们倒卖的其实是郁金香球根。这些看起来像葱头一样棕褐色的球根，不管看起来多么不起眼，此时的价值可是比阿姆斯特丹港口堆放的最值钱的货物都要高。有的郁金香，因为数量稀少和品质上乘，甚至可以抵得上是它本身重量几百倍的黄金，所以成功的郁金香商人是很能挣钱的。当时，在整个荷兰联合省，最富有的人祖祖祖辈辈积攒下的财富也就40万荷兰盾，而一个郁金香商人买卖一个郁金香就能收入成

百或上千荷兰盾，一两年间就可以聚积40万荷兰盾甚至60万荷兰盾的账面财富。

郁金香商人到阿尔克马尔是为了参加一个史无前例的拍卖会。镇上一个小孤儿院的院长有一些整个共和国里最抢手的郁金香。对他来说，欣赏鲜花的美丽远不如卖掉球根的钱来得有吸引力。也是为了能照顾孤儿院的孩子们，院长决定拍卖球根。尽管天气又阴又冷，商人们还是一大清早就聚集到拍卖地点——新市民卫队大楼（Nieuwe Schutters-Doelen）。这座位于小镇中心的人字屋顶建筑装饰华丽，同时也是阿尔克马尔市民卫队的总部所在地。

虽然房间很大，可是来参加拍卖会的商人挤满了各个角落，对财富的渴望让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一般。拍卖师出现后，竞价马上开始并且很快升级到疯狂的地步。一个球根就叫价200荷兰盾，然后400，然后600，然后上千。大概百余个球根中，有四个卖出了单价2000荷兰盾以上的高价。到最后一个球根被卖出为止，拍卖总额达到了9万荷兰盾，这在当时真算得上一笔巨大的财富了。

这次拍卖的时间是1637年2月5日，在这一天，联省人对郁金香的狂热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曾经不值一文的郁金香球根，如今作为人们垂涎的对象，其价格甚至超过了贵重金属。到这一天，郁金香自几百年以前、几万里以外开始的旅程真正圆满了。

1 天山山谷

郁金香并不是荷兰当地的植物，它最初生长在东方，生长在中亚不可思议的广袤大地上。它的家乡在沿着北纬40°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北。据记载，郁金香最早是在1570年传入联省共和国的。而在那之前百余年，郁金香就已经开始了自己游历的旅程。

植物分类学家认为最早的郁金香盛开于帕米尔高原山坡上的低矮树丛中，一直蔓延到天山脚下和山谷之中，即中国西藏和俄罗斯、阿富汗接壤的地区。这里也被视为世界上环境条件最恶劣的地方之一。所以那里生长的郁金香为适应环境也有一些变异。比如花瓣要比荷兰郁金香的更窄小，植株高度也比现在的郁金香矮得多，花朵离地面不过几英寸，但是适应能力强，生命力旺盛，能抵抗中亚地区的酷暑严寒。因为郁金香以红色为最常见的颜色，像鲜血或者士兵的制服颜色，所以尤其被生性好战的当地居民所崇尚。而事实上，没有什么植物是比大片大片生长在山脉地区贫瘠土地上的郁金香更自由、更没有暴力气息的植物了。郁金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花瓣的形状还是颜色，每一朵都有着精妙的区别。这种花不是征服者，而是诱惑者，用它的美丽慢慢占据人的灵魂。

此时的郁金香还未达到尽善尽美。它还没有后来让奥斯曼帝国为之着迷、让荷兰人为之抛弃谨慎和理智的那种耀眼的色调搭配。那种对比鲜明的纹路和耀眼的颜色，能让每一朵盛开的郁金香成为一幅灵动的油画。此时的郁金香也还缺乏一定高度，没有它们后代具有的那种随意的优雅。这些优点都是后来才具有的，但不可否认，此时的郁金香已经相

当美丽了。

在已知的120种郁金香中，几乎一半都生长在这片禁地。帕米尔高原（俄国人称之为“世界屋顶”）和沿中国西部边界走向的天山山脉（意为“天空中的山脉”）一起组成了亚洲的支柱，一个纵横延绵数千里、不可攻破的天然屏障。几千年前，这道屏障让古老的罗马文明和中国文明互不知晓对方的存在。而此时，这里依然是地球上最鲜有人探索的地方。直至1900年英国占领印度、俄国控制了西伯利亚，欧洲人仍无法涉足这片亚洲腹地。东方有无法穿越的极干沙漠，北边有贫瘠的针叶林，西边有好战而不好客的可汗们，南边有神秘又不开放的西藏，这个天山崎岖峭壁上的堡垒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难以到达。这里就连山谷的海拔也相当高，外来人先要适应山区让肺部灼烧的空气稀薄程度。而从这里通往环境适宜国家的关卡每年有八九个月时间都是因严寒关闭的。就算到夏天最热的时候，依然只有最无畏艰险的旅者才有可能穿过，因为天山的雪化了，露出山上的变质岩和花岗岩，寸草不生，滴水不含。这里除了干燥就是贫瘠，不可能孕育任何植物，也没有供动物生存的养料。

然而，即使是在天山山脉和世界屋顶这样的地方，也还是会有水草丰美的绿洲和山麓小丘偶尔存在。以天山山脉为例：山谷主要在山脉北边，绿洲和聚居地以及因人而产生的交易集市沿着向南的小丘分布。这些小镇对土耳其游牧民很有诱惑力。从有历史记载开始，土耳其人就居住在西伯利亚草原。每年夏天，他们在北边水草丰美的地方放牧马匹，偶尔也会穿过山脉上鲜有人使用的通道南下到城市里偷袭抢夺，还有些时候会与绿洲人交易，获取他们的知识和丝绸。

土耳其人在天山山谷中放牧的时候，肯定能看到在那里肆意开放的郁金香；土耳其人穿过山上通道往南去的途中，也必然会看到在高海拔地区大片大片开放的郁金香，因为这种花朵可以在贫瘠的山地上，甚至

是冬天白雪覆盖下依然盛开。这是一种毫不矫揉造作的简单之美。或黄或橙或朱红的花瓣，在阴冷荒芜的环境中，愈发被衬托得娇艳美丽。对于又熬过了一个恶劣冬天的游牧民来说，每年的第一束郁金香可不是荒野中一点色彩那么简单。它的出现代表着生命和丰饶，预示着春天的来临。

郁金香后来成了土耳其一个重要的象征。当他们向西穿过无尽的西伯利亚大草原，发现整个中亚平原上疯长着郁金香。从天山到里海，再向西延伸到黑海岸边，向南沿高加索山脉生长。几千年前，郁金香生长的范围就在自然地向西蔓延。至公元10～11世纪时，土耳其人已经大批迁徙至中东地区。此时的郁金香也开始被人工栽培在花园中供观赏之用。

人类究竟从何时起人工培育郁金香至今还是个谜。我们确切知道的是，在1050年前后，波斯人已经开始崇尚郁金香，并且把它种植在古波斯首都伊斯法罕和巴格达的花园中。郁金香还出现在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ám）最为人所熟知的诗句中，用来比喻完美的女性之美，所以后来很多诗人都用郁金香作为完美的象征。大约在公元1250年，有一位穆斯林阿丁·萨迪（Musli Addin Sa’adi）形容他心中理想的花园应该是由“流水潺潺，鸟鸣果香，色彩艳丽的郁金香和芬芳馥郁的玫瑰”共同组成的人间天堂。还有一个叫哈菲兹（Hafiz）的诗人，将郁金香花瓣闪耀的光彩比作他情人脸颊上绽放的青春。

事实上，郁金香的精巧细致与其血红为主的颜色对波斯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对波斯人而言，郁金香象征着永恒，当地还流传着一些传说，都是为了证明其不同寻常的美丽。有一个传说这样说道：曾经有个叫法哈德的王子深深地爱上了他的侍女诗琳。突然有一天王子得到了错误的通报，以为自己的爱人死于非命。因为这样不可承受的伤痛，法哈德用一把斧子自杀了。鲜血从狰狞的伤口流出，滴落到贫瘠的土地上。

每一滴鲜血结出一朵血红的花朵，象征着他完美的爱情。这个故事流传了几百年，野生的红色郁金香也一直被波斯人视为忠贞不渝的爱情的象征。依17世纪旅行者约翰·查丁（John Chardin）的记述："年轻男子向情人献上郁金香，意思是红色的花朵象征着他的心为她而燃烧，黑色的根茎象征着他的心已被爱情燃烧殆尽。"对于在大草原上生活着的更多的不能识文断字的土耳其人来说，也没有什么比欧玛尔·海亚姆时代更早的关于郁金香的历史记载。直到11世纪末，一个土耳其人称为塞尔柱的部落向西进发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安纳托利亚高原，郁金香才第一次出现在游牧民族艺术中。塞尔柱人要么是一开始迁徙时就携带了郁金香种子，要么是在驻扎地发现了野生郁金香花田。现在挖掘出的最早的有郁金香图案的瓦片，是13世纪苏丹阿拉丁·凯库巴德（Alaeddin Kaikubad）一世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贝依谢希尔湖边建造的宫殿所用的。

到此时，土耳其人已经丧失了一些游牧民族的特征。塞尔柱人在他们夺来的土地上定居下来，成立了罗姆苏丹国，因为他们自认为是罗马人的后代。他们也确实继承了罗马风格的帝国建筑品味，即使是罗姆苏丹国在14世纪初被蒙古击溃之后，塞尔柱人的新君们又开始在废墟上重建新的王国。

在众多土耳其的统治者之中，瑟于特的奥斯曼和他建立的以他名字命名的王朝（阿拉伯人称其为奥斯曼帝国，欧洲人称其为奥托曼帝国）成了土耳其漫长历史中最辉煌的一段。这个皇室盛产征服者和暴君，不但统治了亚洲的大片地区，还横扫了欧洲，直到维也纳的城下。世世代代的帝王们不但掌握着自己臣民的生死，而且不惮使用这个权力。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君王们又从小培养出了精致的品位和对美丽的热情。他们穿的是锦缎，吃的是鸣禽，奖赏一个书法家都可以像奖赏一个战胜的将军一样。奥斯曼人更是知识渊博的园艺家，正是他们把郁金香推上了它从未享有过的显赫地位。

1345年，奥斯曼皇室跨过了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骑兵也踏上了欧洲。他们本来是应拜占庭君主的要求前来帮助镇压篡位者的，结果奥斯曼帝国借机夺取了希腊和色雷斯地区，以及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拜占庭君主实际上成为傀儡君主，势力不及自己伟大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城墙外几里地。

我们无法准确得知，15世纪上半叶蜂拥到巴尔干半岛的土耳其人中有多少人崇尚郁金香。这时的土耳其人大多遵从伊斯兰经典中禁止公开使用有生命之物形象图案的规定。[1] 鉴于此，那一时期的奥斯曼手稿中都没有郁金香。就算有过什么关于郁金香的现代绘画作品、郁金香图案装饰的花瓶或瓦片的话，也都没能流传下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至少能确定当时的人崇尚花园，并且视郁金香为神圣的花朵。

土耳其人用这样一个故事来解释为什么花园对他们如此重要。曾经有一位著名的苦行僧叫哈桑·芬迪（Hasan Efendi），他被公认为是个圣洁的人。有一天他在讲道，听众中有人给他递上一张纸条问他是不是所有的穆斯林死后都能上天堂？哈桑结束布道后，询问现场听众中有没有谁是园丁？有一个园丁站了起来，哈桑于是指着他说，这个人会上天堂。

马上有一群人围着僧人要他解释为什么园丁肯定能上天堂。但是哈桑解释说他只是引用了《圣训》——即《穆罕默德言行录》的内容：人死后会继续做他们生前最喜欢做的事情。因为鲜花属于天堂，园丁当然要去天堂继续他生前的工作。

事实上，花园就是穆斯林对天堂的核心想象。基督教牧师会告诉他的信众，天堂是闪光的城市和山坡；而伊斯兰教这种发源于沙漠之中的宗教，它的阿拉伯创始人们则希望天堂是美丽的花园，有亭子有喷泉，遍地是人世间见不到的美丽鲜花。虔诚的穆斯林们对待鲜花几乎像对待圣物一样，而且喜欢在头巾上佩戴花朵。

此时在波斯和土耳其生长的郁金香本质上还是野花，虽然有些被栽植在花园中，但依然没有被系统化地培育或采取杂交等其他人工干预以改进其品质。直至16世纪初，土耳其军阀巴布尔（Babur）向南穿过阿富汗时，采集了33种不同的郁金香，都没有发现其中有一例杂交品种。这位攻占了印度北部并建立了莫卧儿帝国的君王，这位当人们提到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奢华和富裕的君王，在其不计其数的正规花园中种下的，依然是野生的郁金香。

在穆斯林花园盛开的所有鲜花中，郁金香被认为是最圣洁的。土耳其人对其的热情已经远远不是为了欣赏它的美丽这么简单。对奥斯曼人和波斯人而言，郁金香不但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更是连字面上都有神的花朵之意。根据在阿拉伯经典中的记述，土耳其语中的郁金香（*lale*），和土耳其语中的“安拉”是一个词。郁金香同时还代表着在神面前谦卑的美德：因为每当鲜花盛开之时，花朵会向下弯垂，仿佛低头致敬。到15世纪至16世纪初，禁止使用有生命之物形象的禁令被废除后，郁金香经常在奥斯曼插图中用于描画伊甸园，它就盛开于夏娃偷尝禁果的树下。土耳其人相信在战斗中为伊斯兰信仰献身，死后就一定可以上天堂。他们相信天堂会有满地的郁金香盛开，会有女神为他们奉上他们在世间无福享受的美酒。因此对于一个奥斯曼园丁来说，郁金香是最珍贵的花朵，只有玫瑰、水仙、康乃馨和风信子配得上与它种在一起。其余的花朵，就算再稀少、再漂亮，也只能叫野花，只能偶尔种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土耳其人一路向西扩张的过程中，一定是有郁金香随行的。

---

[1] 这条禁令的初衷是认为人类不能完美地呈现神创造出的完美之物，因此是对神的侮辱。

2 在极乐家园里

荷兰人在拍卖会上为郁金香竞价之250年前，郁金香来到了塞尔维亚边境地区的科索沃平原。这里有片地方叫黑鸟域，15000人的基督教军队在塞尔维亚亲王拉扎尔一世（Prince Lazar）的带领下，与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一世（Murad I）带领的人数两倍于他们的土耳其军队对峙。交战双方在1389年圣维特日这一仗，决定了巴尔干半岛以后500年的命运。

开局对塞尔维亚人很不利，最骁勇善战的基督教骑士被对方击退，连拉扎尔本人也在混乱中被俘。相反，就土耳其一方而言，穆拉德本人30多年不断征战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在土耳其军队的核心地位牢不可破。他前面有三排用铁链拴在一起的骆驼开道，既可以给对方骑兵造成无法穿透的障碍，又可以有效地震慑敌人，就像汉尼拔用大象这种敌人从未见过的异国生物来吓退敌人一样。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基督教战士设法刺杀了苏丹。据传言，这个战士在前一天晚上还被拉扎尔公开指责变节，于是便以刺杀苏丹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他用了极大的力气将匕首插入苏丹的心脏，以至于匕首刺透了整个胸腔，又从苏丹的背后穿了出来。

苏丹受了致命伤，但仍一息尚存，他在弥留之际不忘传令立即将被俘的拉扎尔处死。就这样，基督教军队的将领和土耳其人的苏丹双双毙命，和成千上万死于战斗的士兵一样，永远地留在了黑鸟域。这场战争伤亡惨重，死尸堆叠，被割下的头颅滚了一地，上面还围着颜色鲜艳的穆斯林头巾。有编年史记录者回顾当时情景如此写道：明艳的穆斯林头

巾正如艳红和明黄的花瓣，让我想到大片的郁金香花海。

事实上，郁金香在科索沃战役中是有更多象征性的。除了编年史记录者关于穆斯林头巾的诗意描述外，郁金香更被视为一种护身符。14世纪的奥斯曼人用这种最神圣的花朵来保佑自己免遭噩运，但是是用一种比较奇怪的方式。可能部分是源于保护的目的，部分是由于禁止使用有生命之物的宗教限令还未解除，所以郁金香图案不是被绣在旗帜或外衣上，而是绣在内衣上的。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和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中展示的文物里，有一件从奥斯曼帝国将军的坟墓中发掘出来的穿在铠甲下面的普通棉布衬衫。衬衫的正面绣满了古兰经的经文，而背面则绣着郁金香的图案。这个衬衫的主人也参加了科索沃一战，他是穆拉德的二儿子，名叫巴耶济德（Bayezid）。当时他甚至还未成年，却已经带领部队对抗拉扎尔。巴耶济德也是历史上第一个确定与郁金香有关的人。

巴耶济德大概是要穿上这件衬衫作为护身符，保佑他不受邪恶侵害，看来这也确实起效了。穆拉德死后，战斗继续激化。他的二儿子就地继承了王位，继续在黑鸟域与塞尔维亚人交战。巴耶济德称王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下令杀死自己的哥哥雅库布（Yakub）——最有威胁的王位竞争者。依照巴耶济德的旨意，这个倒霉的王子很快就被用丝质弓弦绞死了。新苏丹在紧迫的环境下由此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巴耶济德确实是个精力无限又充满野心的统治者。他加强了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地区的统治，并于1396年在保加利亚的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彻底打败了最后一批16000人的十字军。在胜利后，巴耶济德亲临监督了对3000多名基督教战俘的斩首。那之后他的臣民称它为“霹雳”（Yildirim）也就一点也不为过了。

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巴耶济德几乎战无不胜。他镇压了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徒的反抗，又向东打败了波斯人。但是到了1402年，他的护身符似乎终于耗尽了能量。巴耶济德在安卡拉附近对阵比他更伟大、更

冷酷无情的帖木儿（Tamerlane）时，他的好运终于到了头。帖木儿这个跛脚的蒙古人出生于帕米尔高原的隐蔽处，像他的祖先成吉思汗一样善战，而且更加嗜血。巴耶济德的军队被打得七零八落，他自己也在逃跑过程中被蒙古弓箭手俘虏并带至帖木儿的帐篷中，匍匐于他的战胜者的脚下。

郁金香帝王没有得到一点怜悯。帖木儿把巴耶济德的后宫佳丽占为己有不说，还强迫他的妻子德斯皮娜（Despina）赤身裸体地在餐桌边服侍自己。蒙古军队行进时，还要把苏丹关在铁笼子里带着走；在一些正式的庆典上，帖木儿甚至把曾经不可一世的巴耶济德拉来当脚凳踩着。

巴耶济德在这样的对待下只活了八个月，但他的死因却不是很清楚。有人说他死于中风。在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作品《帖木儿大帝》（*Tamburlaine the Great* ）中，巴耶济德在绝望中一头撞向囚禁自己的铁笼，脑浆迸裂而亡。无论如何，他已经再也看不到1403年的郁金香盛开了。

苏丹的被俘使郁金香西进的脚步暂时停滞了。刚刚兴起的奥斯曼帝国也陷入一片混乱，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渐渐恢复。这场混乱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在苏丹之前统治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国家的残余势力，尤其是拜占庭的希腊人。巴耶济德曾经的最大梦想就是攻占君士坦丁堡，让这个地方成为自己王国的新中心。在14世纪末，巴耶济德曾将君士坦丁堡围困了五年之久，但是最终仍无法攻破包围着它的层层防线。

1400年，君士坦丁堡已经成了一个傀儡城市。它的衰落正反映了拜占庭统治者的失势。这个城市几乎半空了，7英里长的城墙围绕出的区域，人口不足5万，分布在相对较大的村落里种植粮食和果树，村落之间以废墟为分隔。尽管如此，就面积和声望而言，君士坦丁堡仍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也最配得上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以及郁金香的新

家园。

巴耶济德的死亡并没能解救拜占庭，只是延后了它的终结而已。不到半个世纪之后，奥斯曼帝国卷土重来。这次它的新苏丹正是巴耶济德的曾孙穆罕默德（Mehmed）。此时的君士坦丁堡已经更加衰弱，而土耳其军队却人数众多，装备精良，还配有当时最先进的大炮和石弩。经过不到两个月不顾一切的围攻，穆罕默德的军队强行突破了城墙，土耳其人涌入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最后一个君主扔掉了自己的皇室徽章，希望在乱战中无名地死去。在残酷的大屠杀之后，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即便是依之前各位奥斯曼苏丹们的惊人标准来衡量，被后世尊称为征服者的穆罕默德也算是个相当复杂的角色了。他好战但是有教养，感性却又不可撼动，既是个冷酷无情的独裁者，又是个虔诚谦逊的人。君士坦丁堡被攻占的这天，穆罕默德在拜占庭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感谢真主赐予他胜利。他双膝跪地，手捧泥土撒在自己的头巾上，以示对神的顺从。穆罕默德还很有文采，写过这样的双行体诗：

侍从，再为我斟上美酒，反正郁金香花园终将被毁；

秋天就快来了，春天将一去不返。

穆罕默德也许是个现实主义者，但他绝没有放弃对奥斯曼新首都进行控制的打算。相反，在他的统治下，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伟大城市又恢复了生机。新的建筑拔地而起。圣索菲亚教堂四周树立了四个巨型尖塔，教堂也变成了清真寺。城墙被修复，新的宫殿也开始修建，在拜占庭时期被置之不理的废墟，土耳其人把它们变成了不计其数的花园。

伊斯坦布尔占据着世界上最优越的地理位置之一，但它仍然渴望被妆点。这座城市是依欧洲最东边的七座大山而建，三面环水。拜占庭帝国虽然灭亡了，但这个城市依然美丽，甚至可以说是一步一景。土耳其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城市的空旷，栽种了各种树木和花草，用自然的美

丽弥补和完善新旧建筑。在战争胜利后的几十年内，奥斯曼苏丹一人就拥有60多个私人花园，散布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之间。他还有几十个果园为他的皇宫提供蔬菜和水果。也有的奥斯曼人建造下沉的花园，这样夏天炎热时就可以乘凉；还有阶梯式花园可以种植各种葡萄树；也有公共场所的休闲花园；更有在住所内建造的仅供私人享受的天堂花园，里面种满了鲜花。

在来自欧洲其他城市的游客眼中，正是这种充沛的绿植让伊斯坦布尔与众不同。这里的居民在自家花园种花的方式让西方的园艺家感到震惊。土耳其人讨厌那种在英格兰、法国和意大利宫廷流行的严谨拘束的花园形式。相对而言，土耳其的花园更有一种印象派的、壮观的风格。种花不单要有精准的几何空间美感，更要追求繁茂和丰富的美。奥斯曼人要把花园设计成避开俗世纷扰的世外桃源，或是炎炎夏日里的避暑胜地。土耳其人还在自家花园种植一些无核的小水果，修建喷泉听流水的歌唱。对他们而言，花园就是在人间的天堂。

穆罕默德和他的继任者为伊斯坦布尔的完善不遗余力。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来这里游历的欧洲人无不感到惊奇，不仅仅是因为这座城市的规模和富裕，更是因为这座城市的主人有良好的风格和品位。这是一座充满文化气息和休闲气质的城市，对其中不同宗教信仰的居民有包容的气度，这在欧洲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土耳其人是残酷和贪婪的，土耳其军队是惨无人道的，当然还有对土耳其苏丹私藏的后宫妻妾的好奇。事实上，土耳其人有多残暴，就有多么懂得欣赏美。

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个体。他继位之初的一道旨意就是下令在城市最东边建造一座宫殿，并且给这个宫殿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极乐家园，也就是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托普卡匹皇宫。这座宫殿建立的宗旨就是要超越拜占庭千年来建造的任何建筑。以一个编年

史记录者的话说，就是要同时具备多样、美观和富丽堂皇的特点。从任何角度，由内到外，都要金光闪耀，镶嵌上珍贵的宝石和珍珠，极尽奢华。穆罕默德本来就非常热衷于园艺，不但从他王国的各处收集稀有的植物品种，而且经常亲自在花园中忙碌。在他的监督之下，极乐家园的四周围绕着“巨大而美丽的花园，园中种上所有能想到的植物和果树，每一面都有丰沛的流水，新鲜清澈，甚至可以直接饮用；树上有鸟儿欢快鸣唱，地上有家禽成群可供食用”。然而有一天，这个有涵养的君王发现他名贵的黄瓜被人偷了，他竟然把所有的皇宫园丁抓来开膛破肚，只是为了查出到底是谁吃了他的黄瓜。

之后的奥斯曼统治者们在残忍程度和对精致皇宫、花园的狂热程度上，比穆罕默德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最有成就的就是穆罕默德的曾孙苏莱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他1520年登上王位，其间他将帝国的疆域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范围：从维也纳城下到波斯湾；从直布罗陀海峡到里海。欧洲人称他为“最伟大的土耳其人”，不过之后的苏丹们也多沿用了这个称号。在苏莱曼的众多称号中，最有名的是“掌握生死之人”。在那些不幸与他的军队交手的基督徒心中，苏莱曼就是冷酷无情的代名词。然而苏莱曼大帝的臣民则敬称他为“立法者”，同时他还是个虔诚的教徒。作为一个奥斯曼人，非常意外的是他并不沉迷于声色，而是与他最爱的妻子过着贞洁的生活。

在苏莱曼统治时期，也就是16世纪上半叶，郁金香已经树立了自己作为土耳其代表花朵的地位。此时它虽还不为欧洲人知晓，但在土耳其苏丹和他的仆人们中间如此流行，再加上使用有生命之物形象的古老禁令已经放开，以致郁金香成了最受奥斯曼艺术家和工匠们钟爱的图案，被广泛使用于花瓶和瓦片上。郁金香还让苏丹的长袍更加美丽，这时也不像巴耶济德时期那样只绣在内衣上。有一件苏莱曼大帝的乳白色锦缎皇家礼服得以保存至今，那上面就满满地绣着上百朵郁金香花朵图案。除礼服之外，贵族的铠甲上也有郁金香图案。一个征战于匈牙利和波斯

的贵族的铠甲上就装饰有一朵9英寸长的郁金香图案。苏丹的头盔更是铠甲工艺的杰作，上面有用金子做成的郁金香造型，旁边还镶嵌着珍贵的宝石。

到16世纪中期，郁金香图案在奥斯曼帝国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除苏丹外，其他人对郁金香图案的使用也越来越多样化。新娘把郁金香图案绣在祈祷时用的地毯上给自己当嫁妆；还有的画在盛水的瓶子上，也有的编织到土耳其马鞍上的精致天鹅绒盖布上。正如土耳其园丁种植郁金香以保佑自己的灵魂能升入天堂一样，土耳其帝国的女人们缝制成千上万的郁金香图案作为宗教符号献祭，以祈祷自己的丈夫从战场上平安归来。似乎也是在苏莱曼治下，土耳其人开始培育郁金香并繁殖更符合他们审美的新品种。在穆罕默德时期，生长在伊斯坦布尔的野生郁金香植株较矮，花朵成圆形，接近鸡蛋的形状，与今天仍然流行的品种不无相似。可能早在16世纪晚期，奥斯曼人开始偏爱自己首都的园丁培育出的新品种[1]，这一品种也被称为“伊斯坦布尔郁金香”。这种郁金香可能是用土耳其人在北部黑海海岸和他们的盟国克里米亚鞑靼斯坦发现的品种培育而来的。伊斯坦布尔郁金香最终发展出1500多个品种。与野生的品种相比，这个品种的郁金香更加精致而优雅，花瓣无比纤长，尖端如针。最受推崇的一类品种形如杏仁，被片（tepal）似匕首，多为朱红色、黄褐色或硫黄色。

第一批完全投身于培植郁金香事业的园丁就出现在苏莱曼时代，正是他们栽种出了最早的培育品种。其中一个叫艾布萨德·艾芬迪（Ebusuud Efendi）的伊斯兰教长拥有一种叫作“天堂之光”（Nur-i-Adin）的极其美丽的品种。其他品种也都被赋予了类似的能够反映它们的美丽和价值的名字，比如“无可比拟的珍珠”（Dur-i-Yekta）、“愉悦的增强剂”（Halet-efza），还有“激情的注入器”、“钻石也嫉妒”、“破晓的玫瑰”等。

首先，这些郁金香是极其稀有的，即使是教长本人，一生也只有几个天堂之光的球根，要知道他活到了84岁高龄，这在1574年算得上极其长寿了。其次，那个年代的人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培育植物品种的知识。他们还以为要栽出深红色的花朵往郁金香花床上浇深红色葡萄酒就行了。所以当时并没有多少土耳其园丁对培育新品种这种见效慢、结果又充满偶然性的事业感兴趣。大部分奥斯曼品种的产生是靠机缘巧合，而非有意计划。

不管怎样，奥斯曼的苏丹们不断地积攒着球根，并用郁金香和其他花朵来装点他们的皇宫和花园。一部分花朵是在伊斯坦布尔本地种植的，到17世纪30年代，这里有大概80个花店，300多名职业花商。也有一部分花朵是从别处引进的，有时甚至是大批量的引进。奥斯曼人在哪里打了胜仗，然后就强行把新的郁金香品种从黑海沿岸、克里特岛或是波斯运来。苏莱曼的儿子塞利姆二世（Selim II）也是个园艺爱好者。他另一个爱好是喝酒，所以得到了“酒鬼塞利姆”的称号。他在1574年下令让当时土耳其叙利亚省阿齐兹的治安官给他的皇家花园提供5万个郁金香球根。这位苏丹还特别指示：“我命令你不得有任何延误，一切事宜都要迅速周到，不得让我有丝毫不满。”尽管塞利姆明说要从临近的阿勒颇的国库支付费用，但这样的命令必然会如他所愿地给接令之人造成极大恐慌。在土耳其苏丹众多的花园中，那些深藏在托普卡匹宫殿高墙之内的花园才是最宏大的。极乐家园中的任何事物无不体现着奥斯曼皇族传承的品位、富有和伟大。即使是对外开放的区域也是按照最高级别建造的，更不要说只有最高级别的王族和他们的贴身侍从才能进入的私人区域，其面积和复杂程度更是西方世界无法匹敌的。

若要进入展示苏丹独赏郁金香的圣地，游客要先经过圣索菲亚大教堂前的大道到达皇宫外的广场，在那里能看到宫殿的外墙，上面密布防御工事和守卫，城墙中间嵌有一个巨大的石门，门上方用金子刻着苏丹冗长的正式封号。由此进入便到了宫殿四个大庭院中的第一个，它也是

进入内部区域的必经之路，越往里面的庭院越比前一个神圣。这个最外面的庭院对苏丹所有子民开放。任何土耳其人都有权在此请愿要求纠正自己受到的不公待遇，所以这里总是人声鼎沸。每天有好几百人在接待处围着不耐烦的书记员，要他记下自己的诉求。这个庭院里其他地方还有军械库和弹药库，还有奥斯曼政府造币厂和存放各种兵器的场所，以及一个养着3000匹马的马厩。庭院里还有一对白色大理石的柱子，柱子上放置着砍下来的人头，都是那些不知怎么得罪了苏丹而被赐死的贵族的。被行刑之人生前若是维齐尔之类的高官，人头里则填上棉花，若是地位一般的，则塞满稻草。还有苏丹偶尔下令大规模行刑的证明也会堆在大门入口处，这些割下来的鼻子、耳朵和舌头无不显示着苏丹的权威。

穿过这片可怕的地方，经过一道厚重的双重门就进入了第二个庭院。这里要安静一些，只有奥斯曼的官员、军人和重要的来访者才可进入。这个庭院里有个大厅，就是土耳其的议事厅。里面有舒适奢华的躺椅，有闪耀的绿色丝绸帘子可以阻隔来者探寻的眼光。苏丹就坐在躺椅上面，听取重要官员的汇报，或是接见重要的外国使节。这第二个庭院之后，穿过第三道门，又叫吉兆之门，就到了君王的寝宫，以及他的后宫，由从非洲带来伊斯坦布尔的黑人宦官守卫。第三个庭院如此神圣以至于在它修建完成后的近一百年里，没有西方人，甚至事实上没有奥斯曼人踏入一步。最后，第四个锁着的双层门通道，联通了后宫和第四庭院里的皇家花园。这也是整个宫殿庞杂建筑群的最尽头。从这里可以尽览博斯普鲁斯海峡熠熠闪耀的流水。花园被设置在象征着奥斯曼最高权力的宫殿的最核心位置，由此可见植物和花朵在土耳其人心中的重要性。

整个托普卡匹宫殿不但气势宏伟，而且面积巨大。这个复杂的建筑群结构中包含了各式各样的花园，到处是花坛、喷泉、池塘和果树。第二个庭院尤其壮观，土耳其精英部队每个月都要在第二庭院中集合，从

大麻布袋中领取现金报酬。这里甚至还有一片巨大的林地，里面有小鹿在柏树间穿越，在树荫下漫步。往宫殿的北方，地势向下延伸，形成著名的金角湾。花园就依势而下，延伸至宫墙之外，直到海边。

花圃主要种植在第四庭院里，只有苏丹一人可以观赏。唯一可以俯瞰花园的窗户在国库和储藏室的大楼上，里面存储着皇家的食物和餐具。一旦帝王下令，这些窗户都必须挡起来。第四庭院的花园是帝王抛开国家事务休闲玩赏的最重要的地方。每一个继任者又竞相把花园布置得越来越漂亮。玫瑰、康乃馨、风信子和兰花，以及必不可少的郁金香种满了整片地方。特别是北边尽头的小丘，不仅是整个托普卡匹皇宫的最高点，也是最好的饱览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的地方。在这个制高点上，以及花园里其他一些地方，奥斯曼人修建了木质凉亭（kiosks），既可以作为约会的地点，又可以作为节庆典礼的中心。每个亭子里还摆放了单独的长椅，可以坐在上面感受清风拂面，还可以纵览园中鲜花盛开时令人屏息的美景。对一个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吵闹与暴力中的苏丹来说，这里可以让他真正感受到清静与平和。

极乐家园里的每一处设计都旨在让见者感受到土耳其势力的强大程度。宫殿的范围巨大，建筑威严，房间装饰极尽奢华。即使是欧洲见识最广的商人也为土耳其皇宫日常供给需要感到震惊：整车的大米、食糖、豌豆、扁豆、辣椒、咖啡、葡萄酒和马卡龙源源不断地由托普卡匹宫殿大门运进皇宫，更有储存在柠檬汁里的梅子和每年19.9万只母鸡和780马车的积雪。

在苏莱曼时期，四大庭院需要的仆人不下5000名——从最低下的看门人到来自异国的专职人员，比如叠头巾总管和餐巾总管，他们手下甚至还有专门负责泡菜的仆人。苏丹的仆人中，有一个团体人数众多，几乎有千人之多，他们就是园丁（*bostancis* ）。除了给苏丹的郁金香除草之外，园丁的职责丰富而多样，远不止除草这么简单。他们同时还是守

卫、行李搬运工，还负责清理垃圾。此外，另有5000名士兵在托普卡匹宫殿外轮流执勤，他们既是皇宫的守卫，又是首都的警察和税官。

最不寻常的是，园丁还充了当苏丹的刽子手。就是这些皇家园丁把被定罪的女囚缝进装有重物的麻布袋里再扔进博斯普鲁斯海峡。更有一批特殊的园丁，戴着红头巾、穿着他们传统的制服——白色的马裤和毛边的上衣——裸露着肌肉发达的前胸和手臂，执行仪式化的绞刑，年复一年，结果了成千上万的奥斯曼臣民。

如果被判死刑的是个高级官员，则会由苏丹的首席园丁（*bostancis-basha* ）来行刑。所以他实际上也是苏丹的首席刽子手，同时他还要在一个历史上少有的特殊习俗里扮演重要角色：被判刑贵族，即被罢黜的维齐尔或首席宦官与将要对他们行刑的刽子手赛跑。一旦判决传达下来，会允许被定罪之人以他最快的速度跑半英里，或是穿过花园跑到皇宫最南端的鱼屋大门。如果死刑犯比首席园丁跑得快，那么死刑就可以降格为流放；相反，若是犯人跑到终点发现首席园丁已经在那里等着自己，那么就会被立刻处死，连尸首都会被扔进大海。[2]

园丁的另一个不那么可怕的职责是采摘鲜花来装饰皇宫的生活区。总体来说，土耳其人很少把花剪下来，而是更愿意让它在花园里自然生长。但是在极乐家园里却流行这样。有画作显示，苏丹最喜欢的房间里，到处摆满了单支的花朵，极偶尔也有小簇的花束。这种摆设的主角当然是郁金香，它们被插在精致的有金丝装饰的玻璃花瓶里，摆放在各个矮桌上。花瓶上这种加工技艺在当时被称为“夜莺的眼睛”（*Cesm-i-Bulbul* ）。

因此，很可能西方人最早就是这样发现人工培育的郁金香的。苏丹王在战场上惊人的胜利让西方人不得不派使节来到苏丹的王宫。1522年土耳其军队从基督教骑士手中夺下了看似不可攻破的罗得岛，然后在1526年粉碎了匈牙利国王的军队，并在三年之后围困了维也纳。这一系

列耀眼的胜利提升了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实力排名，更迫使欧洲的基督教君主们不得不与土耳其讲和。随后，雇佣兵和商人也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希望应征加入土耳其军队或是获得与他们通商的许可。奥斯曼帝国崛起的一个不怎么重要的后果就是在苏莱曼去世时，也就是1566年，成百上千的西方人来到了土耳其——这个几世纪以来对西方而言完全封闭的地方。

西方人在这里发现了诸多意外。关于奥斯曼帝国的一切都充满了异域风情，无论是集市上的嘈杂热闹，还是伊斯坦布尔清真寺的感性与优雅。土耳其人对花朵的热情，以及料理花草的惊人技艺，也让西方人感到新奇。对16世纪的欧洲人而言，花草的首要用途还是作为食物或草药，所以土耳其人单为欣赏其美丽而种花的行为让他们感到惊奇。

纤细、色彩浓郁的郁金香以各种形式展示在花园里，总是能成功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无论驻足于花前的是大使还是军官，无论他是爱花之人还是对花草漠不关心，都很容易发现土耳其人对郁金香的热爱超越了一切。

起码在16世纪中期，郁金香终于引起了欧洲人的注意。它已经准备好向西进发了。

---

[1] 即系统化培育和改良出来的鲜花品种。

[2] 最后一个通过赢得生死赛跑救了自己一命的人是1822～1823年间的大维齐尔哈吉·萨利赫·帕夏（Haji Salih Pasha）。

3 来自东方的稀罕物

1529年10月底，一艘帆船一路颠簸地来到果阿，这里是葡萄牙在印度领地的首都。帆船到达时，境况已经非常糟糕，船身各处受到撞击。在从里斯本来到这里的漫长航行中，已经有2000名船员死于发烧和饥饿，活下来的也是骨瘦如柴。这个小型船队的指挥官是一名叫努尼奥·达·库尼亚（Nunho da Cunha）的贵族，他的到来对印度葡萄牙领地的地方长官洛波·瓦斯·德桑帕约（Lopo Vaz de Sampayo）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达·库尼亚是由葡萄牙国王任命的取代洛波·瓦斯的新地方长官，而洛波·瓦斯本人将被召回葡萄牙。这可不是什么光荣的卸任。他被召回是因为这个地方长官的职位本来是要封给一个皇室里的红人，结果被瓦斯取而代之在此统治了两年之久。洛波·瓦斯是作为囚犯被押送回国的。他先是被流放到非洲，囚禁于在那里的监狱，直到1532年才等来了最终的特赦。

前面讲了这么多都是因为有人说洛波·瓦斯就是第一个把郁金香带回欧洲的人。园艺家夏尔·德·拉·谢内·蒙斯特里尔（Charles de la Chesnee Monstereul）在他1654年出版的《弗朗索瓦》（*Le Floriste Francois* ）中提到瓦斯回国时从锡兰带了郁金香，另有几个17世纪的权威也做过同样的声明。

事实上，洛波·瓦斯很难与这样的功绩联系在一起。首先，锡兰没有郁金香；其次，锡兰这个岛屿离当时葡萄牙船只返航的路线有几百英里远。就算合理假设果阿的葡萄牙人是在海湾与波斯人交易时，或是从

那些在北方次大陆的巴布尔花园得来种子的印度人手中获得的郁金香，可是从这里回里斯本的航行却是极艰险的，顺风顺水时也要六个月，不顺利就可能要两年半之久。

如果洛波·瓦斯的故事是真的，那他肯定是个为郁金香疯狂到做出以下行为的人：先是说服押解他的人允许他把球根带上船，还要在已经人满为患的船上把球根种到小罐里。这在当时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有身份的罪犯的待遇还不错，瓦斯当然也不是被链子锁回国的。但是这些疑点足以让我们怀疑这个没有什么特质又很倒霉的贵族怎么会是第一个把郁金香带回欧洲的人。

事实是：没有人能确切知道郁金香是什么时候离开亚洲的。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种了那么多郁金香，郁金香的球根又特别便于携带，所以要硬说没有个把球根早在中世纪就被带到了欧洲岂不是太奇怪了？可是若确有此事，那么当时的编年史或插画中为什么完全没有郁金香的影子？所以我们能肯定此时郁金香还没有大量种植，传播的地区范围也很小。同理也适用于从印度到达葡萄牙的郁金香。所以在16世纪60年代欧洲园艺家刚刚看到郁金香时，仍然认为它是种稀罕物。

能证明郁金香在16世纪中期以前存在于欧洲的证据时有发现，但似乎没有一个不存在疑点。举个例子：至今仍生长在萨沃伊的红色和黄色野生郁金香品种*T.silvestris* 和*T.australis* 据称就是欧洲本土生长的野生郁金香品种，就是源于亚洲巴尔干地区的郁金香。但是萨沃伊郁金香的分布地区较为奇怪，大多出现在耕地上，这足以证明其祖先们是人为种植的，而非野生。有一幅名为《怀孕的圣母》的画作，画中的玛丽转头看向花丛，其中就有郁金香。人们一度认为这是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作品，但现在确定真正的作者应为其学生穆埃基（Melzi），而穆埃基是1572年才去世的。所有示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梵蒂冈博物馆中展示的一块公元430年的马赛克，上面画的毫无疑问是一篮宽花瓣的红色

郁金香。但是花朵的摆放方式明显是18世纪的风格，所以这块马赛克肯定是18世纪初从罗马郊区的别墅里被移走后经历过重大修补。

所以，第一个懂得欣赏郁金香之美的人，很可能是一个叫奥吉耶·吉兰·德·比斯贝克（Ogier Ghislain de Busbecq）的人。他是一个佛兰德贵族的私生子，多年来一直是奥地利宫廷里最有影响力的荷兰人。人们普遍认为就是他将郁金香带回了西方。比斯贝克是1554年11月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到伊斯坦布尔的，并在那里生活了近8年，中间偶尔回过几次家乡。当他终于彻底回归故土的时候，皮肤已被土耳其的烈日晒成了棕色，但还是留着当时流行的浓密粗犷的胡须、眉毛。他在1581年出版了一本作品集，主要以书信的形式，描述了他在土耳其的经历，内容不乏各种私密和八卦。比斯贝克在当时就因为这本书为人们所铭记，甚至后世的历史学家也从他的作品中寻找奥斯曼统治最高峰的日常生活特色。比斯贝克就是在这本书中描述了他首次看到郁金香的情景。

比斯贝克是经陆路从维也纳到伊斯坦布尔的，在他离开阿德里安堡的色雷斯城向首都伊斯坦布尔行进的途中看到了这种遍地生长的野花。他在自己的一封信中写道：

> 自我们出发后已经到达了接近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程，目的地已经触手可及。在这最后一段路上，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大片大片的鲜花：水仙、风信子，还有郁金香，至少土耳其人是这么称呼这些花的。我很诧异怎么这些花在冬季还能盛开，这实在不是什么宜人的季节。
>
> 在希腊有很多水仙和风信子，这些花香气浓郁，对于不习惯这种气味的人，一大捧花就可能引发头痛。郁金香则只有一点或完全没有香气，但其美丽和丰富的颜色一样备受推崇。土耳其人本来就生活奢侈，更是不会为花几个艾斯普瑞币[1]买鲜花而犹豫的。

事实上，比斯贝克抵达首都之后，迎接他的主人送了他一些高级的郁金香作为礼物，但是比斯贝克抱怨说：“这些鲜花虽然是礼物，但是我不得不赠送一些回礼，也花费了不少钱。”［另有一位旅行家叫乔治·

桑兹（George Sandys），是约克大主教的儿子，他也同样发现土耳其人喜欢向陌生人赠送他们视为宝贝的鲜花，显然他比比斯贝克更不喜欢这份礼物。这个英国人抱怨道："在国外不好惹恼别人，但是伊斯兰教苦行僧和土耳其近卫士兵会送你郁金香和松糕。"]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比斯贝克描述的是他最初到伊斯坦布尔的情形，也就是1554年的冬天。但近年来人们发现组成这本书主体内容的这些信件其实都是在事后编造的，最晚的可能已经是16世纪80年代初，郁金香已经为欧洲人知晓以后了。而且他描述的这次行程也不可能是他第一次去伊斯坦布尔的情形，因为第一次才是在深冬，而他却说有郁金香盛开，土耳其的郁金香应该是3月盛开才对，所以比斯贝克一定是把他1558年3月第二次去土耳其的细节错记成了第一次。

考虑到这点修正，那么即使大使先生描述的细节是正确的，比斯贝克也不可能是第一个把郁金香介绍到欧洲的人。因为有确切证据表明1559年4月在德国的一个花园里就已经种植郁金香了。要说这是比斯贝克的成就，那除非他是回国后几个月内就把球根送到这儿，并且当年秋天马上种下。虽有可能，但不太现实。比斯贝克的确从伊斯坦布尔向欧洲寄送过珍贵的球根，但是无法确定那是在1573年以前的事。把某一朵郁金香的出现归功于比斯贝克是不可靠的。

另一个让人疑惑的事是关于比斯贝克是否是给郁金香取名字的人。很多人相信他称郁金香为"tulipan"，因为郁金香的花瓣让人想起土耳其人折叠的头巾，头巾在土耳其语中是*dulbend*，在荷兰语中则是*tulband*。这样的比较很好地解释了"tulip"是怎么进入英语词汇的，但这并不能说明这就是比斯贝克的功劳。这个词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至1578年翻译出版的一本原为拉丁语的植物学著作中，所以肯定是大使先生出版他著名的信件之前，这个词就已经在使用中了。任何情况下，要让人广泛接受"tulip"这个新词肯定是需要时间的，在16世纪末的欧洲，植物学家提

到郁金香时仍然惯用“百合科水仙”之类可以体现其与类似球状根植物关系的名称。直到1559年，第一批在欧洲绽放的郁金香确切出现了，是在一个叫约翰·海因里希·赫尔瓦特（Johann Heinrich Herwart）的人的花园中长出来的。这个人是巴伐利亚州奥格斯堡的一个议员，这个城镇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这片引人注目的德国城镇聚集区域熬过了黑暗的中世纪，后来在拿破仑手里解体了。只有伏尔泰的一句名言最值得被人铭记：“这里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帝国。”所以赫尔瓦特的花园成了这里另一个为人所知的主要事件，能让这里闻名到足够吸引远方游客。

来赫尔瓦特花园看新奇花朵的人里有一位自然学家叫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他居住在苏伊士。和那个年代许多学者一样，格斯纳是个博学的人，同时研究动物学和植物学，还是医学博士。他最著名的病例是一种奇特的流行病，症状是刚去世的人肚子里会爬出蛇和蝾螈。在16世纪50年代，他已经开始编辑整理重要的自然历史著作并因此而出名，他整理的作品中就有一部著名的综合植物学著作，名为《植物目录》（*Catalogus plantarum* ）。总之，格斯纳完全有能力意识到在赫尔瓦特的花圃里发现的这种美丽的进口植物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格斯纳后来回忆道：“我是1559年4月看到这株植物的，据说种子是从拜占庭[2]或者卡帕多细亚[3]带来的。一株只开一朵花，红色，很大，与百合相似，有八个花瓣，外面四个，里面四个。花朵给人感觉甜蜜柔弱，还有隐约的香气稍纵即逝。”格斯纳为这朵红色短茎植株画的素描得以保留至今，上面连边边角角都布满了潦草的笔记和疑问，无声地证明着他博学善问的思维。画中的花朵圆润可人，花瓣紧紧抱在一起，尖端向外微微卷曲。（在这幅水彩画上的郁金香只有六个花瓣，这也是郁金香通常的花瓣数，而格斯纳的文字描述中却说是八个花瓣。这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这朵郁金香的先锋，究竟是畸形还是变种？）格斯纳称此花为*Tulipa turcarum* ，以示其起源于奥斯曼领

土。

这位瑞士科学家在1559年春天完成他的素描时，郁金香却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为自己开疆拓土了。格斯纳本人就看到过另一品种的素描，花朵颜色为黄色，可能是生长于意大利北部。这幅素描是格斯纳的一位笔友寄给他的，这个笔友叫约翰·肯特曼（Johann Kentamnn），是一位艺术家，1549～1551年生活在帕多瓦、威尼斯和博洛尼亚等地。以此为基础，或者可能还有别的什么缘由，这种花迅速传遍了各个国家。它的新颖、精致和美丽让它在各处都备受欢迎，它流传甚广也要归功于球根的便于携带。

当时对于郁金香来说是个好时机。由于发现了美国的银矿，以及开通了与印度的贸易航线，欧洲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裕，而富人们也正在寻找花钱的新去处。文艺复兴重新激发了人们对科学的兴趣，而印刷技术的出现也让新发现和旧知识得以广泛传播。这种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使植物学和园艺在社会精英阶层中流行起来。很多最有影响力和富裕的欧洲市民开始建造他们自己的私人花园，并且希望在里面种上稀有的、令人艳羡的植物。即使是在奥格斯堡，赫尔瓦特议员花园里的品种比起富格尔家族的花园来也只算是小巫见大巫。富格尔是当时巴伐利亚一个富可敌国的银行之家，这个家族在15世纪的地位就相当于罗斯柴尔德和洛克菲勒在20世纪的一样。富格尔在16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在奥格斯堡种郁金香了。

到1572年，郁金香又出现在了维也纳；1593年来到了法兰克福；1598年更向南到达了法国（有可能更早）。球根也被寄往英国，最早可追溯到1582年，并在那里很快开始大片地种植。至16世纪结束前，越来越多的杂交品种涌现出来，每一个都比以往更鲜艳夺目。当时有一个叫詹姆斯·加勒特（James Garret）的英国人，花了20年时间培育新的品种，培育出的品种不计其数。他的好朋友约翰·杰勒德（John Gerard）

——系伦敦医师学院的草药花园馆长，在其1597年出版的著作《植物志》（*Herbal* ）中——说：“逐一描述每一个品种和科林斯王推石头或是数清沙粒的数量一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加勒特是佛兰德移民，他在英国的工作是药剂师，并在城墙上开辟了一个花园。正如杰勒德提到的，加勒特种过黄色、白色、红色和淡紫色的郁金香，但这种花朵的美丽并不如其药用价值一样为人所看重。三十几年后，还有一个叫约翰·帕金森（John Parkinson）的英国植物学家在其著名的论文中提到，可将郁金香碾碎加入到红酒中喝下，可治疗“痛性痉挛”。以这些品种为基础，更多的新品种被培育出来，再加上从东方进口的品种，到查理一世统治时期（1625～1649），皇家花园中栽培的郁金香品种已经超过50种。

杰勒德当时还不能给所有郁金香分类，但是终归有人要做这件事。郁金香新品种之多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植物。每个品种之间的不同可能涉及植株高矮、叶子的形状、开花时间的早晚等。这种植物现在最需要的，莫过于有一个人能够将纷繁复杂的品种厘清。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分类，这个种属就可能永远混乱，无法融入植物学体系。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一种评价体系来衡量哪些郁金香更稀有和令人垂涎，哪一种又比较普遍和没有价值，郁金香交易就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

幸运的是，这样的人是存在的。他就是16世纪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植物学家，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植物学家之一。从一些重要的角度来说，他即将成为郁金香之父，这个人就是卡罗吕斯·克劳修斯（Carolus Clusius）。

---

[1] 一种土耳其钱币。

[2] 即Byzantium，也就是奥斯曼帝国。

[3] 即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的一个省份，当地至今仍有大片野生郁金香花

海。

4 克劳修斯

1562年秋天，一艘载满织物的货船从伊斯坦布尔出发驶进了安特卫普的港口。船上一捆捆的东方布料都是运给本市最大的商人的，其中不知怎么混进了一些郁金香球根，这可能也是欧洲北部的这片地区最早出现的郁金香球根了。

订购这批织物的佛兰德商人很惊讶地发现他托运的货物中还有一包球根。也许是出售这船货物的土耳其人获利不菲，所以在布料当中塞进了一包球根作为礼物以示感谢。不管怎样，收货人既不知道会有这些球根，也根本不想要这些东西，甚至连这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商人猜想这大概是种特别的土耳其葱头，就加油加醋烤了做晚餐，剩下一些则种在自家菜园里的卷心菜旁边。

这就是为什么到1563年春天，几朵奇怪的花从一个安特卫普厨房菜园里施过肥的岩屑土地上探出了头。菜园主人反而很失望，他本以为会再结出几个土耳其葱头供他美餐几顿的。话说这几朵花，花瓣呈鲜亮的红色或黄色，在周围生长着的一片颜色单调的根茎类蔬菜的围绕下，尤其显得精致优雅。这几朵逃过成为布料商人盘中餐噩运的郁金香很可能就是在荷兰最早绽放的郁金香了。连佛兰德商人也看出他的菜地上长出的这种植物肯定是个不同寻常的稀罕物。他此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植物，好奇心驱使下，没过一两天，他就把自己的一个客人领进了菜园，问他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个访客叫约里斯·赖伊（Joris Rye），据商人所知是个非常热衷于园艺的人，就住在临近的梅赫伦市。赖伊自然也不认识这是什么花。这

个时候，欧洲北部的人还没见过郁金香，而格斯纳对郁金香的描述此时也还未发表。不管怎样，织物商人的访客是安特卫普少有的几个能够意识到一定要保留好他今天见到的这种新鲜的红黄色花朵的人。赖伊本人是个狂热的植物学者，他在梅赫伦市的花园里种满了稀有的品种，而且他与这个时期很多最著名的园艺家有大量的通信往来。经商人朋友的许可，赖伊把这几株存活下来的郁金香移植到了梅赫伦。他不但精心培育这些花，而且还给他的科学家朋友们写信说明他发现的这种花，并且寻求他们的建议和帮助。

赖伊的回复者中最热情的一个，就是卡罗吕斯·克劳修斯。这个杰出的植物学家当时还不到四十岁，而且多年来遍访欧洲各地寻找稀有名贵的植物品种。如果赖伊想要跟谁讲述自己的新发现的话，他无疑是最佳人选。所以克劳修斯很可能就是在1563年第一次听说郁金香的。克劳修斯的本名是夏尔·德·莱克吕兹（Charles de L’Escluse），1526年2月出生于法国城市阿拉斯。他母亲是金匠的女儿，父亲是瓦坦（Watenes）一个级别极低的贵族，穷到要靠在圣瓦斯特的修道院里做一份行政工作来维持家人生计。后来的事却证明，对年轻的夏尔来说，清贫反而是种好运。因为当时年轻的贵族们把时间都花在了打猎比武而不是学习知识上，所以在修道院学校上学的夏尔反而接受了更全面的教育。

德·莱克吕兹果然学业有成，从圣瓦斯特毕业后，又考入了在根特备受敬仰的拉丁学校。之后他又去了卢万，那里有当时荷兰唯一的一所大学。他在那里学习了佛兰德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了遵从父亲的意愿，他还学习了法律，并于1548年获得学位。在卢万的日子里，德·莱克吕兹并不是单单在学习司法判例，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他的追随者们已经传播到欧洲北部的新教异端思想。尽管是在修道院里长大，或者也正是因为是在修道院里长大，德·莱克吕兹接受了路德的理论并抛弃了天主教信仰。这就意味着他继续在卢万生活已经不安全了。这也成了他人生中第二个重要的转折

点。

现在的人很容易低估德·莱克吕兹当时转变宗教信仰的意义。要知道在16世纪中期，宗教仍然是公共和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核心。人们从小被灌输说，异教徒只能下地狱。背弃罗马意味着不但要承受教堂的怒火，还要面对欧洲的天主教君主们的迫害。在宗教法庭的帮助下，他们总会竭尽所能把新教徒们送上断头台。卢万正是受神圣罗马帝国国王查理五世的统治，他的权力极大，德国到西班牙都是他的领地。查理五世还是一个极端虔诚的信徒，以至于他最终选择退位去做天主教修道士。所以说，德·莱克吕兹继续待在卢万是会有性命之忧的。他的叔叔就是在宗教迫害时期，因为接受了新教理论而被绑在木桩上烧死了。现在德·莱克吕兹也宣称信奉新教，所以他决定要离开卢万，到新教统治的地方去。

德·莱克吕兹不敢告诉他身为坚定的天主教徒的父亲自己的去向。他去了马尔堡，黑森的领主，也是德国幼君——宽宏的菲利普，在当地刚刚建立了一所大学，专门录取迅速发展的路德教会的精英。德·莱克吕兹入学时本打算继续学习法律，但在马尔堡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沉迷于植物学研究，并且开始走访当地乡村寻找稀有的植物品种。

在当时，植物学还没有被视为一门值得单独研究的学科，而是被归为医学下面的一个分支，而且目的只是为了辨识药用植物和草本植物。为了跟从自己对植物学的兴趣，德·莱克吕兹不得不放弃法学而转投医学。这就是1549年夏天他做出的决定，也是在此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拉丁文的克劳修斯。

从德·莱克吕兹变成克劳修斯的决定有力地证明了他拥护路德教的原因，与其说是对新观念的信仰，还不如说是对天主教的厌恶。拉丁文名字在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中非常盛行，也就是那些反对守旧封闭的宗教权威、倡导重新发现古典时期世俗理想的人们。克劳修斯对植物学的热

爱，以及他从天主教领地迁移至新教领地，又为了研究自己热爱的植物而甘愿回到天主教领地的决心充分证明了他本质上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

克劳修斯在之后的人生中几乎不间断地游历于各地。他先后在蒙彼利埃、安特卫普和巴黎学习，长期穿行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各省寻找新的植物。他还到过英格兰，并在那里遇到了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就是在这一时期，克劳修斯树立了自己作为科学家的声望，还出版了医学和药剂学方面的著作，并且开始了与全欧洲众多植物学同行长期且大量的通信往来。据统计，克劳修斯一生写了4000封书信。在当时邮政尚不发达，缓慢且没有保障，而且费用极高。以植物学家微薄的工资收入来说，4000封真的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所以，赖伊会写信给他寻求帮助也就毫不奇怪了。

赖伊的第一株郁金香是在1564年盛开的，而克劳修斯当时正在西班牙进行一次旷日持久的实地考察。一年之后他回到荷兰，大概这一次就是克劳修斯第一次看到郁金香。对此并无从确认，因为他最早提到郁金香的作品是1570年才出现的，但克劳修斯见到郁金香的时间最晚不会超过1568年，当时他已经搬到了赖伊的家乡梅赫伦，与自己的朋友让·德·布朗雄（Jean de Brancion）住在一起。克劳修斯马上就意识到了赖伊的发现有多么不寻常，他称此花“以其迷人的变化为我们的眼睛带来愉悦”。但不论如何，克劳修斯首先是一位科学家，所以当他听说郁金香本来的所有者把它配小菜吃掉了时，还是断定先把郁金香作为食品着手研究。它让一个叫米勒（Müler）的法兰克福药剂师把一些球根腌在糖里当果脯吃了，证明比兰花球根好吃得多。

即使是在饱经战乱、食物匮乏的欧洲，人们似乎从来没把郁金香当成美食看待，可能也是因为它有点苦、有点像洋葱的味道（不过在二战后期的那个“饥饿的冬天”里，荷兰人确实把大量的郁金香球根吃掉

了）。在郁金香的历史中，克劳修斯起到的核心作用当然不是因为和米勒进行的腌制试验，而是因为他习惯于把自己发现的样本分发给全欧洲与其通信的人们。以当时欧洲邮件寄送速度之慢，郁金香球根也能不腐坏。多亏了克劳修斯和他广泛的圈子，郁金香得以被带到欧洲各个地方的花园中，从耶拿到维也纳，从匈牙利到黑森。

此时的克劳修斯正处于他职业的巅峰期，从一幅他当时的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脸型略长、充满智慧、目光坚定而有穿透力的绅士。照片中的克劳修斯英俊不凡，头发向后梳露出额头，唇鬓浓密，下巴上的胡须较短，整齐修剪到蓬松的飞边（ruff）之上的长度，正是那个年代流行的样式。依一个终身未娶，且多年来与家人都极少联系的人来说，克劳修斯的朋友数量相当惊人。他为人诚实，经常疾病缠身，郁郁寡欢，但他身上却有什么东西让人无法抗拒。这种魅力使他与不少背景迥然不同的先生女士都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这其中肯定有他的语言天赋起的作用。克劳修斯至少会讲九种语言，包括法语、佛兰德语、意大利语、英语、西班牙语、德语和拉丁语。但归根结底，还是他对植物的热情和渊博的植物学知识让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期望读到他的下一封来信，并期盼着包裹中寄来的新的奇迹。他的通信人之中有一位玛丽·德·布雷莫伊（Marie de Brimeu），这位住在海牙的希迈公主似乎对这位单身老学者怀有一种特别的母性之爱，会给他寄去无数的礼物和一包包的食物。玛丽对克劳修斯的赞誉可能是他一生最感欣慰的。公主在给植物学家的信中称他是“世上每一个美丽花园的父亲”。

克劳修斯并不是当时唯一一位通过邮寄散发球根的植物学家。他自己在梅赫伦花园中种下的郁金香里就有他的朋友托马斯·雷迪阁（Thomas Rehdiger）从帕多瓦寄给他的。但不可否认克劳修斯是最活跃的一位学者，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反复不断地长期在外考察，他本人不太可能照料一个花园。但是朋友们花园里丰富的物种一样让他欣喜满足，而且他们会轮流给他提供做实验的苗圃，好让他进一步研究他

新发现的植物的特性。

克劳修斯充分利用了朋友们提供的花园，他后半生倾注全部心血的一些重要的植物学研究就是这样实现的。这些著作中包含了对西班牙、奥地利、普罗旺斯的植物群的精细研究，也是当时第一批提出植物不是单纯的药剂成分，而是应当成为专门研究对象这一观点的学术著作。克劳修斯一直被认为是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开创了一套依植物特性分类的系统。这种理论后来被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采用，并最终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石。1573年5月，当克劳修斯还在梅赫伦忙着给整个欧洲分发郁金香球根和其他植物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的君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提出让他到维也纳负责建立一个皇家植物园（*hortus* ）。这个建议非常诱人，当时克劳修斯的父亲刚刚去世，他本来一直在供养他父亲，现在少了一个巨大的负担。再加上500荷兰盾的年薪，足够让他生活得舒适宽裕了（多年来他都是尴尬地依靠朋友们的施舍勉强度日的）。马克西米利安想要建造一个让其他皇室贵族都无法比拟的植物园。克劳修斯由于贫穷和身份的低下本来一直有些自卑情结，现在君王的关注和对他贵族身份的正式认可让他有些受宠若惊。此外，他对自己未来的资助者也是有一点了解的。他是少有的对新教信仰保持宽容的君王之一，而且克劳修斯的通信人之一约翰内斯·科拉脱·冯·克拉夫西姆（Johannes Crato von Krafftheim）曾经是马克西米利安的私人医生，他的回信也给克劳修斯吃了定心丸。再加上建造植物园的工作也是他非常感兴趣的，所以他最终接受了这个提议。

今天的维也纳是位于欧洲中心的文化名城。而在克劳修斯的时代，这里只是个边境城市。尽管它是神圣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同时还是皇室宫廷所在地。但是这里距离奥斯曼帝国边境仅50英里，是众所周知的“基督教国度的最前线”。在1529年的苏莱曼时期，土耳其就曾派遣25万人围攻维也纳。到1683年，土耳其人还会卷土重来。所以，为了皇家豪宅的优雅，为了华丽的美泉宫，为了宽阔的多瑙河，为了城市中

心喧哗吵闹的细窄街道，城墙和大门的坚固程度远比额外添些花圃重要得多。较之安全，花园实在是一种奢侈。

从克劳修斯到达的一刻，他就发现，尽管为君王工作有这样那样的好处，但也少不了有让人备感挫折的事出现。由于马克西米利安非常忙碌，克劳修斯等了两个月才有机会向君王描述自己的计划，之后又等了一年多，也没看到选定的地点上有开工的迹象。更糟的是，负责为植物园项目拨款及支付克劳修斯薪酬的财政大臣是个严格的天主教徒。对他来说，想尽办法让信奉新教的植物学家的日子越难过越好。好的一方面则是，克劳修斯开始定期收到皇家大使从伊斯坦布尔寄回来的各种植物的球根和种子，他还与此时正好回到宫廷的比斯贝克建立了基于植物学的友谊。他们互相交换了各种植物作为礼物，尤其是1573年比斯贝克回法国前，给他的朋友留下了大量的种子。

又过了两三年，克劳修斯依然没有机会种下这些种子，此时比斯贝克留下的种子都枯萎得很厉害了，克劳修斯甚至担心这些种子已经死了，可是它们最终还是破土发芽，并且开出了茂盛的花朵。这也算得上是郁金香历史上两位功臣之间友谊最合适的写照。

尽管如此，兴建植物园的计划越来越无望实现。到1576年夏天，克劳修斯的薪水已经拖欠了11个月。然后马克西米利安的突然去世更是雪上加霜。新君鲁道夫二世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遣退了所有在他宫廷中服务的新教徒。更糟的是，他对花花草草一点兴趣也没有，还是雏形的植物园也被拆毁改建骑术学校了。克劳修斯此时处于深深的恐惧之中，尽管宫廷对园艺师总是有需求的，但克劳修斯此后再也没为任何君王工作过。

克劳修斯在维也纳逗留了一段时间，他在这里还有一个私人花园，但是不断有人窃取他园中珍贵稀有的植物。克劳修斯饱受困扰，终于不再对此地抱有任何幻想。在那时候，真正稀有的植物可能全欧洲才能找

到一两棵，而有组织的盗窃植物的窃贼们，就算没有特别研究，也绝对不是对植物一无所知的人。就像今天的古董窃贼一样，干这一行的人十有八九也是行家，清楚地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那些真不懂的人，也可以通过贿赂工资不高的花园仆人来获取有用的信息）。雇佣植物窃贼的人大多是贵族或富商，他们想让自己的花园惹人羡慕又不愿为寻找稀有品种而劳神费力。这群无耻之徒甚至都无意掩饰自己的卑鄙行径，可是也没有警察会调查此类案件，官员们也无意为了这类小偷小摸而得罪八面亨通的大人物们。至少有一次，一个维也纳贵族夫人就骄傲地向克劳修斯展示自己花圃中栽种的、从克劳修斯的花园中偷来的植物，而他能做的只有咬牙忍耐而已。

当时的克劳修斯已年逾花甲，因为在浴室里狠狠地摔了一跤而几乎半残，还有诊断不出原因的肠胃病，牙齿也掉光了。皇室给他的工资被停发之后，他再一次处于穷困之中，仅靠贵族身份那点可怜的收入和朋友们间歇寄来的食物包裹度日。他迫切需要一个能维持生计的方法，更渴望自己一生的心血能得到学术上的认可。最后，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的到来。

5 莱顿

1592年1月，一个有封印的大包裹寄到了克劳修斯所居住的公寓。里面有一封他的朋友玛丽·德·布雷莫伊写给他的信，信中说莱顿大学医学系希望邀请克劳修斯来就职。

莱顿当时是荷兰联合省的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大城镇。一般情况下克劳修斯可能不会考虑到这样的地方去，但是德·布雷莫伊的书信来得很是时候。自从离开维也纳，年迈的植物学者就隐居到了法兰克福，为的是距离既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赞助人的黑森领主近一些。但是领主刚刚去世了，而他的继承人取消了克劳修斯赖以生存的那一笔数目可怜的年金。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他急需找到一份工作。莱顿大学的工作不但是对他毕生学术工作的认可，还有每年750荷兰盾的工资和去莱顿的路费。再加上有好几位与他长期通信的人已经在这所大学工作，其中就有提议授予克劳修斯教授职位的这位约翰·范·霍格兰德（Johan van Hoghelande），他们彼此间交换球根已经很多年了。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顾虑，但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克劳修斯还是决定接受范·霍格兰德的邀请。

至此，这个为郁金香的流行做出了无人可及的贡献的人，踏上了他去往荷兰共和国的旅途。在那里，郁金香将真正成为闻名遐迩的植物。克劳修斯是在1593年10月19日到达莱顿的，同时也带上了他最珍贵的植物，其中就有他收集的丰富的郁金香球根——现在来看，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植物学家的新归宿是一个有近两万人口的大城镇，位置大约处于联

省共和国的中心。这个城市是在中世纪城堡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并且是当时著名的纺织品交易中心。但是在克劳修斯来到这里时，当地人的地域自豪感还很淡薄。莱顿在荷兰可以算个大城镇，而莱顿大学也是当地人的骄傲和自豪，但这个地方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停滞后，刚刚开始兴盛和快速发展起来，而且有可能会成为基督教国家中首屈一指的纺织品贸易城市。对于普通的观察者来说，还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让荷兰之外的人注意到莱顿。不过克劳修斯也许已经意识到，在16世纪最后几年，莱顿已经变成欧洲最著名的城市之一了。

莱顿的名声是因它在荷兰革命中扮演的英雄角色建立起来的。荷兰革命称得上是这个世纪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之一。在1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组成低地国家的所有17个省份，无论是位于南方的，也就是如今的比利时和卢森堡；或是位于北方的，也就是后来的联省和现在的荷兰，都属于西班牙国王的领土。西班牙国王（指菲利普二世，他在1556～1598年派遣无敌舰队与英格兰开战）是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之一，他统治的帝国幅员辽阔，还包括美洲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他还曾与土耳其在地中海地区交战，与英国在加勒比海交战，在欧洲大陆与法国开战。荷兰南部省份是重要的贸易中心，而且在与法国的战争中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北部地区对西班牙的意义则小得多。西班牙国王当然不愿意听取荷兰人的抗议：比如为了供他打仗而加诸荷兰人民身上的重税；再比如由荷兰人承担的大量军队的吃喝开销。作为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甚至根本不能接受新教主义在他的领土内发展，在16世纪50年代，全部17个省中都出现了相当多的宗教迫害事件。

到16世纪70年代，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思想开始在荷兰大部分地区盛行，尤其是在瓦尔河和马斯河以北的七个省市，即荷兰省、泽兰省、海尔德兰省、乌特勒支省、格罗宁根省、上艾瑟尔省和弗里斯兰省。这些省市较之于它们南方的另外十个城市虽然贫困一些，但是它们所在地区的地势易守难攻，所以到1572年公开的革命终于爆发时，连自诩无敌的

西班牙军队也没能攻破这七个省市。

革命的星星之火，最初其实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皇无意中挑起的。她曾多年允许一群自称为海上乞丐的荷兰新教徒海盗在她的峡港停泊，后来迫于西班牙的压力，才在1572年4月将海盗驱逐。无处可去的海上乞丐们沿着荷兰海岸线一路激战，直到到达一个叫布里尔的小港口。海盗们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于是占领了这里，终于暂时摆脱了西班牙卫队的追击。5天之后，乞丐又沿泽兰省海岸南下，成功夺取了弗拉辛这个极具战略意义的港口。控制了这里，就控制了安特卫普的出海口。

自此以后，革命迅速蔓延至整个荷兰。到7月，荷兰除阿姆斯特丹外都已经由革命军掌控。而在莱顿，人民完全支持海上乞丐，以至于在没有任何新教士兵来到这里组织部队之前，人民就已经自发地参与到革命中来了。当地人把效忠西班牙国王的人都赶出了城，还彻底洗劫了天主教堂，这些举动对西班牙人来说无疑是永世难忘的深仇大恨。

最早响应革命的人之中有一位沉默者威廉，他是奥朗日的王子，属于加尔文教派，后来成了革命中的灵魂人物。他宣称自己是荷兰省执政（*stadholder* ），也是整个荷兰的保护者。很快他又成了大批军队的领袖，并且带领他们迎战必然出现的西班牙镇压。

西班牙人的镇压不到年底就开始了，他们采取的策略是以恐怖和暴力让荷兰人屈服。一些小城镇被摧毁，人民被屠杀，有时候甚至不留一个活口，所以不少原本宣誓效忠威廉王子的小城市屈服于西班牙人的暴行。很快就只剩下荷兰省和泽兰省仍坚持革命。西班牙人集结了一大批人马向北方最后的革命根据地推进，欲将革命的星火彻底扑灭。这次挡在他们北上道路中间的就是莱顿。

围攻莱顿是整个革命战争中战斗最艰难、损失最大也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行动之一。如果莱顿被攻下，西班牙人可能会彻底消灭所有的荷兰

革命者，重新掌握对北方各省的统治。那样的话，荷兰共和国的计划将胎死腹中，所有的贸易和商业活动仍然集中在南方，靠海外贸易产生的财富就永远不会流向荷兰，那么郁金香狂热也就根本不会出现了。

在经历了持续四个月的让人绝望的围攻之后，莱顿迎来了最终的胜利。当时城里的人已经弹尽粮绝，为了拯救这个城市，威廉决定做最后一搏。他下令拆除马斯河沿岸的河堤，让洪水淹没城镇周围的土地，逼走驻扎的敌军。虽然水位确实上涨了一些，但还是没能如他所愿解除重围。之后发生的事，被虔诚的荷兰人认作是万能的上帝显灵：风向突然改变了，在狂风暴雨的作用下，河水暴涨，波涛奔涌向前，西班牙军队被迫逃命，而海上乞丐却得以在前几天还是田地的地方乘风破浪，驾驶他们的船只解救了莱顿。

莱顿这次史诗般的抗争拯救了荷兰革命，第一阶段的起义以成功告终。七个由革命军控制的地区联合起来建立了荷兰联省共和国，奥朗日王子任荷兰执政暨最高指挥官。但是西班牙的威胁仍然切实存在了几十年，他们又有几次入侵荷兰领地的行为，最后一次是在1628年。所以荷兰人不得不承担保留军队的开支，以防西班牙持续的威胁和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发生的下一次攻击。除了1609～1621年出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战外，这种不间断的冲突一直持续到1630年。后来在1648年签订《明斯特条约》，西班牙被迫承认联省共和国的地位时，所有的威胁才算差不多结束，用于维持大批陆军和海军的开销得以节约下来并用于发展荷兰的经济。1630年起，荷兰的经济以超越以往任何时期的速度发展了起来。在那场戏剧化的围攻二十多年之后，克劳修斯来到了莱顿。莱顿大学成立于1575年春天，到此时也不过十几年，它也是当时联省唯一的一所大学。对于这个同样成立不久的国家来说，建立一所核心学府是必须采取的措施之一。一方面，它是一个从文化层面上从西班牙统治下彻底独立的宣言；另一方面，这个国家也急需培养年轻人才以满足教堂和政府的需要。在当时的欧洲，其他大部分高等院校都将宗教学习作为教学

的重点。事实上，很多大学都是由教堂直接控制的，所以教育内容涉及的广度有很大局限。荷兰政府认定莱顿大学不应当走这样的老路。除了神学之外，这里还开设了法律、医学、数学、历史及其他人文主义学科。对学校的管理由七位院长共同负责。这七位院长都不是由教会，而是由省议会和莱顿市长任命的。

所有这些，都很合克劳修斯的心意，但是这所新兴大学的人文主义政策却引发了意外的结果。从1575年到16世纪90年代初，莱顿的自由主义名声使得新教教会的领导们总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莱顿神学院的毕业生们。所以想要谋求神职的学生们通常会选择到德国南部更严格的新教大学去学习。而时时存在的联省是否会被西班牙再度攻击的疑虑也使其他学科的学者对莱顿望而却步。所以在最初的十几年里，莱顿总共招收了不到130名神学学生，其他人文学科则更少。直到荷兰在战场上取得了几次戏剧性的大捷，以及到16世纪90年代战争状态缓解之后，莱顿大学才开始对有志青年们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克劳修斯决定入职的这所大学，虽然名义上已建立二十几年，但事实上，是在年迈的植物学家终于到达荷兰共和国之时才刚刚踏上正轨。

这个时候加入莱顿确实是个好时机。突然间，大学有了充足的资金来改善设备，雇佣更多员工，买更多的书，甚至是给更多年轻学者提供研究资助。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在校学生人数提高了4倍，从100人上升到500人。图书馆也拥有比任何地方都丰富的综合性藏书。莱顿大学的解剖学院因为实际解剖人类尸体而尤为著名。在那个时代，人体的谜题才刚刚开始被研究，解剖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学科之一。在莱顿，人们对解剖学的兴趣如此之大，以至于经常会举办允许观众观看的解剖试验课。大学还鼓励来访者参观它们的解剖学博物馆，那里展览着许多惊人的展品，比如埃及木乃伊、老虎标本、巨大的鳄鱼以及巨型的鲸鱼阴茎。在克劳修斯到达后的50年里，莱顿这种卓越的表现，使它成了可能是全欧洲最好，而且肯定是全欧洲最受欢迎的大学。越来越多的学生选

择这里，数量超过了去剑桥大学或是莱比锡大学的，这也是在新教控制的北方第二和第三大的两所大学。而且比起这两所大学，莱顿的学生也更加国际化。

和别人一样，在突然的自信与资金的大膨胀中，克劳修斯也受益匪浅。他最主要的任务是在莱顿建立一座“学术植物园”（*hortus academicus*），要可以媲美1543年在比萨大学建立的欧洲第一座植物园。在比萨大学之后，很多类似的植物园在各地的大学里涌现，比如帕多瓦、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莱比锡，但是联省共和国里却一个也没有。所以即将在莱顿建立的植物园不但是莱顿大学的重要标志，也对整个荷兰共和国意义重大。建立植物园的资金非常充足，而且占地面积极大，至完工后，其面积接近三分之一英亩，内部分为四个区域，每一个区域里都包含大约350个独立的花圃。

在维也纳时让人沮丧的经历深深地刻在克劳修斯的记忆中，所以在莱顿一切进展如此之快让克劳修斯非常满意。此时的他已经年老体弱到不可能亲自参与任何体力劳动了，但是大学为他提供了一名得力的助手。助手的名字叫德克·克鲁伊特（Dirck Cluyt），是个来自代夫特的药剂师。在克鲁伊特的监督下，植物园的修建在1594年9月就完工了，距克劳修斯到达莱顿还不足一年，这与马克西米利安和皇家宫廷的拖延相比，真是个令人愉快的反差。

植物园的迅速建立和粗具规模减轻了克劳修斯对荷兰生活的其他困难的介意。1593年到1594年的冬天非常寒冷，老鼠咬坏了他私人珍藏的150多个球根。1594年整年的天气都很不好，不停地刮风下雨，植物园里好多的植物都被损坏了，更不用说这种坏天气对一个68岁老人的健康有多么不利了。

克劳修斯在莱顿的职责是管理植物园，并且在夏天的每个下午要到植物园里回答学生或是重要访客的问题。他固执地拒绝了学校要求他教

授植物学课程的要求，而是把时间都花在了管理他的私人花园上。这个花园也是他执意要求院长为他提供的，因为植物园里大部分地方种植的是草药、医用植物和从国外引进的新物种，比如土豆。那时的土豆还是刚刚从新世界引进试种，人们还认为它很可能有毒。克劳修斯在自己的私人花园里种的是他从他在法兰克福的花园里带来的郁金香。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停止对郁金香谜题的钻研。克劳修斯于1609年去世，享年83岁，在当时绝对算得上非常长寿了。

卡罗吕斯·克劳修斯毫无疑问是他那个年代的植物学第一人。他是个真正的科学家，更是这个学术领域的先驱。他的研究成果：比如对奥地利和西班牙地区植物的调查在其后的一个世纪里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标准教材；他在1601年发表的关于杆菌的简史的文章差不多是第一次有人就这一题材做出研究。在他生命最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从来没有间断自己广泛的通信交流，对欧洲的植物学家和花卉爱好者来说，他就是一部活的指南。再加上他对球根类植物的特殊兴趣，才让郁金香能以最快的速度传遍欧洲。由此看来——借用另一句他非常珍视的评论，就是葡萄牙的埃马努埃尔王子（Prince Emanuel）在信中写下的——“克劳修斯是花朵们真正的君王”。

然而，在莱顿生活的最后几年里，克劳修斯的突出贡献不仅限于他把球根带到了这所大学，更重要的是他如何研究这种植物。老植物学家并不是第一个在联省种植郁金香的人。根据一个可靠的编年史作者说，这个荣誉应当属于阿姆斯特丹一个叫瓦利希·兹沃特森（Walich Ziwertsz.）[1] 的药剂师。他是一个狂热的新教徒，唯一被人记住的是他曾谴责12月25日庆祝圣尼古拉斯节的习俗。据说兹沃特森1573年以前就在他的花园里种植了郁金香，而当时克劳修斯还在维也纳。植物园的主人甚至不是第一个在莱顿种植郁金香的人，因为他的朋友约翰·范·霍格兰德在他到来之前就已经在大学里种下了球根，也是从赖伊那里收到的样品。但是克劳修斯绝对是联省，乃至欧洲唯一一个有资格描述、分类

和理解郁金香的人。

克劳修斯第一次提到郁金香是在他描述西班牙植物生命的作品里，也就是1576年发表的《历史》（*Historia* ）。随后几年他不断修订和补充早年的作品，并在1583年发表了加长版的论文。其后，1601年他在莱顿时发表了他的代表作《杆菌简史》（*Rariorum Plantarum Historia* ），其中也提到了郁金香。多亏了他的这些作品，我们才能知道这么多早期郁金香在欧洲的历史。克劳修斯还在论文中细致描述了他自己见过的，或是从他的通信人那里听说的郁金香的情况。像当时任何对种属感兴趣的植物学家一样，他为郁金香能够轻易培植出新品种而感到惊奇无比。据他的观察，可能除了罂粟，没有什么植物能像郁金香一样多变。

多亏了伊斯坦布尔的园丁们辛勤的努力，欧洲人见到的郁金香变种数量在克劳修斯时代就已经相当巨大了。克劳修斯依据颜色的搭配、花瓣、叶子的形状和位置将郁金香分成至少34个不同的类别。他还是第一个将郁金香分为早花类、中花类和晚花类的人。早花类的花期在3月，而晚花类则要到5月。

在克劳修斯提供的坚实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后来的植物学家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郁金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的郁金香是和其他球根类植物，如鸢尾花、番红花和风信子一样归入百合科。至今已有大约120个品种的郁金香被植物学家编目分类，若更具体地划分，则不计其数。

在科研作品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即将郁金香划分为“植物学郁金香”，也就是野生的郁金香，和“培育品种”，也就是人工培植的杂交品种。在克劳修斯的时代，联省种植的郁金香既有野生品种，又有不断出现的培育品种。早期培育品种的出现也都是两种植物学郁金香意外交叉的结果。植物学家当时可以辨识14种野生郁金香。这些品种成了用来培育后来妆点17世纪的大批培育品种的基础。不是每个品种在创造新变种的过程中都能起到相同的作用。有些植物学郁金香就比另一些

更适合于杂交。这些来到荷兰共和国的郁金香中，最具可塑性的品种就包括波斯的郁金香，也就是人们所知的克氏郁金香（*T.clusiana*，为纪念克劳修斯而得名）；锥形郁金香（*T.schrenkii*）和火焰郁金香（*T.praecox*）。后来让荷兰人激动赞美的那些培育品种郁金香中，大多含有以上这些品种郁金香的基因。事实上，荷兰郁金香实际上是由从克里特岛到库尔德斯坦的东方各地引进的郁金香杂交的。这就是郁金香的种类如此之多的秘密所在。

无论是植物学品种还是培育品种，郁金香既可以从种子发芽，也可以用球根培育。用种子种植是一种偶然性很大的培育方式。从一朵花上采集的一小捏种子，种出来的植物可能展现很多种变化，所以完全无法预测开出的郁金香会是什么样子。色彩、纹路这些重要的细节都只能靠猜想，这对于想追求一致性的人来说是个令他们非常沮丧的过程。更何况把种子陪育成能开花的球根需要六七年时间，在一个平均预计寿命只有40年的时代，这实在是件耗时漫长的工作。

从种子发育的郁金香，一旦成熟开花，球根还会结出副产品，也称子球。这种迷你球根是母体的有效克隆，能够开出与母体一模一样的郁金香。子球可以直接用手从母球上掰下来，经过一两年就可以长成能开花的球根。无论是对于追求一致性的商业种植者，还是不愿等上7年才能看到它开花的园艺爱好者，子球繁殖远比种子培育好得多。不过，子球繁殖也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大多数郁金香球根每年只能结出两到三个子球，而且几年之后，母球枯萎就不能再结出子球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郁金香新品种最初产生得非常缓慢。一个种植者发现了一个新品种，认定它可以有很好的市场，在他的精心栽培之下，就算一切顺利，第二年最多有2个球根，第三年4个，第四年8个，第五年16个。若是其中再有一些球根没有被继续培植，那么新品种能繁殖出的数量就更加有限了。显而易见，一种新的郁金香要想有一定数量

规模，没有十几年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在黄金时代的荷兰，花卉繁殖还是个不为人所理解的谜题，所以实际产出的球根数肯定比理论计算得更少。稀有的、令人垂涎的品种必然是常年供不应求的，即使是最聪明的球根种植者也无计可施。

后来人们把不同种类的郁金香种在同一个花园里，昆虫会在不同的花朵之间传播花粉。这就使得出现杂交品种的几率大大提升了。还有的郁金香和其他花卉品种杂交，产生的新品种就更加复杂化了，可以同时具有不同花朵的特点。因为在野生环境中，很少有不同种类的郁金香生长在一起的情况，所以野生郁金香很少出现复杂的杂交现象。严格意义上说，杂交品种是一种畸形。但是它们不像野生品种那样单一，而且比野生品种精致，所以仍然深受鉴赏家们的追捧。

最受欢迎的郁金香是那种花瓣如雕刻般匀称统一，有抓人眼球的花纹的。事实上，因为它们体现出的复杂性和狂放的颜色，荷兰黄金时代的培育品种在荷兰之外都备受赞誉和珍视。到17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至少培育出13种不同的郁金香，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颜色搭配。最简单的品种是单色花（*Couleren* ），其花朵呈单一的红色、黄色或白色；较为稀少的品种是多色花（*Marquetrinen* ），这种郁金香开花时间较晚，每朵花上至少能呈现四种颜色。单色花应该是植物学郁金香，或者起码是非常接近植物学郁金香的培育品种。而多色花则肯定是非常复杂的杂交品种。后者多生长于佛兰德和法国，后来在郁金香狂热时期也没有再出现。

在荷兰共和国，这13个品种中，最受欢迎的是红色系（*Rosen* ）、紫色系（*Violetten* ）和黄色系（*Bizarden* ）三种郁金香。红色是数量最多的一种，主要是白色为底色，有红色或粉色纹路。在17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人们培育出并命名了大概400种红色系郁金香。每一种都有很大区别，有的花瓣颜色丰富生动，色彩面积很大，几乎遮蔽了白色

底色；也有一些则只有丝丝缕缕的粉色或红宝石色花纹若隐若现。鉴赏家们仔细研究各种珍贵的郁金香品种，相比那些被红色浸透的郁金香，他们更偏爱那些只在花瓣上有极细微颜色痕迹的种类。同样的等级分化也适用于其他品种。紫色系郁金香有大概70个品种，顾名思义，紫色系郁金香就是白色底色上有紫色或淡紫色纹路的郁金香；而黄色系郁金香就是黄色底色上有红色、紫色或棕色纹路的郁金香。黄色系郁金香只有大概二十多种，也是相对最不受追捧的品种。与以上种类标准颜色搭配相反的品种也是存在的，但一般也归入该种类。比如莱肯（*Lacken* ）郁金香就是紫色花瓣周围长有一圈较宽的白边的郁金香，它依然被归为紫色系郁金香；而一种红色花瓣带黄边的达肯（*Ducken* ）郁金香则同样仍被归为黄色系郁金香。

真正让园丁们无比激动的就是这种巨大的颜色反差组成的花纹。要想真正理解后来发生的事，首先要知道郁金香培育品种与其他17世纪园艺家见过的花朵有多么不同。比起普通的花卉，郁金香花朵上的颜色格外浓郁和集中，单纯的红色可以变成明亮的艳红；暗淡的紫色则体现出一种近似于黑色的让人着迷的变化。此外，郁金香的颜色变化清晰分明，而不是像其他非单一色花朵一样，每个花瓣上的颜色界限是渐变浑浊的。

荷兰培育品种的颜色尤其特别。无论是红色系郁金香上的红色还是紫色系郁金香上的紫色，有的如羽毛，有的如火焰，时而出现在花瓣正中，时而围绕花瓣轮廓形成色边。这些丰富的颜色不仅出现在花瓣上，有时也会斑斑点点地长在花茎上，但是却从来不会出现在花冠内部，花冠内部只有白色（有的发一点淡淡的蓝）和黄色两种颜色，依不同品种而定。每朵花的纹路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属于同一品种的两株郁金香可能彼此相似，但绝不会是完全一样的。

人们刚刚开始为球根疯狂的时候，荷兰的郁金香专家们以非常严格

的标准衡量花朵的颜色和纹路之间细微的变化，并以此评定郁金香的级别。最值钱的郁金香，等级为“上上等”的是一种几乎完全为白色或黄色，只在花瓣中心或边缘有一丝一缕的紫色、红色或棕色条状花纹的品种。鉴赏家们把颜色过分妖娆艳丽的郁金香归为“粗俗”一级，所以这类品种也就不怎么被人看好了。

植物学郁金香本来的特点是粗犷和单一的色调，那么备受人们喜爱的荷兰培育品种郁金香是怎么变成有这么多复杂颜色搭配的呢？答案很简单但也很令人困扰，那就是：这些色彩复杂的花朵是患有疾病的。郁金香狂热最大的讽刺就在于，那些让人们趋之若鹜、为其一掷千金的郁金香，其实是感染了一种只有郁金香才会感染的病毒。也正是这种病毒让郁金香的颜色能够如此浓郁和富于变化，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整个花园中，只有郁金香一种植物呈现出这种让收藏家们极度向往的美丽颜色。

即使是在克劳修斯的时代，人们也已经意识到，在莱顿和其他地方生长的郁金香很奇怪。一个今年开出单色花朵的球根，第二年可能就会开出红色系或紫色系的杂色花朵。这个现象被称为“杂色”，出现这种现象的球根就叫作“杂色球根”，而另外那些没有出现颜色变化的球根则称为“饲主球根”。整个杂色的过程完全无法预测和控制，人们不知道球根是否会或什么时候会发生杂色；春天开花时，一株郁金香可能突然就开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花色，而种在它旁边的同一品种却没有任何变化。有些年份杂色出现得频繁，有些年份则不怎么常见。一个已经出现杂色的球根上，极其偶然地也会结出没有颜色变化的饲主球根；同样，也没有一个种植者敢保证饲主球根就不会在哪天变成杂色球根。唯一确定的是，从种子培养出的球根肯定是饲主球根，而一旦母球变成杂色球根，就无法再开出单一花色的郁金香了。

要探寻这种疾病的本质还是有一些线索的，而克劳修斯又是一位非常有洞察力的观察者。他发现杂色的郁金香植株相对较小，而且比由饲

主球根长出的郁金香更娇弱。但由于当时压根没人知道疾病是可以传播的，所以这种杂色现象被大多数人当作魔法了。尽管人们想尽各种办法，种植者还是没办法人为地让球根杂色。有的人试图用鸽子粪炼制灵丹妙药；也有的人直接把球根切成两半，再把不同种类的半个和半个绑在一起种，盼望种出的花能同时具有两种花的颜色。然而这些办法几乎从未结出过令人满意的成果。

郁金香具体是什么时候感染病毒的，人们也不得而知。最早发现这种现象的时间，大约是在1580年，但其实这种疾病可能在那之前就有了。事实上，自从郁金香被引入人类花园开始，它就愈发容易感染病毒了。任何由人工培育的植物都要面临一些大自然中没有的威胁。人类容易喜新厌旧，有些培育品种可能得不到精心的照料，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其实是，野生环境下粗放生长的郁金香自身可以对某些病毒形成抗体，或者至少是病毒在野生环境中传播的速度缓慢得多。

杂色的谜团直到20世纪才被揭开。在英国的约翰·英尼斯园艺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最终发现了这种引发杂色的介质，并称之为“马赛克病毒”。研究者先让蚜虫咬食杂色球根，然后再把他们放到饲主球根上，实验证明，有蚜虫的饲主球根和对照样品一样两次杂色。这同时证明了这种疾病确实是由病毒引起的，也演示了病毒在植株之间传播的原理。进一步实验还证明，马赛克病毒既可以感染在花园中种下的花，也可以感染尚未栽种的储存的球根。好笑的是，可能约翰·英尼斯园艺研究所的研究员就是因为过去有荷兰种植者把切开的球根绑在一起刺激杂色发生的实践在前，才采用把半个杂色球根嫁接到饲主球根上的方法来让蚜虫交替啃食杂色球根和饲主球根的。

在克劳修斯去世前很久，他在莱顿自己的私人花园中种下的杂色郁金香就已经引起了各种鉴赏家的注意，他们无不想把这些独一无二的品种据为己有。年迈的植物学家很快就发现自己无法承受络绎不绝的索要

郁金香球根的要求。他知道这其中很多人只是追随潮流，根本不是对植物研究有兴趣，也根本不懂得如何培植球根；而另一些则完全是为了高价转卖来牟利。不论如何，他的私人收藏都不可能满足这么大的需求。克劳修斯在给他的朋友、也是莱顿大学奠基人之一的人文学家尤斯图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的书信中写道："这么多人都想要球根，我要是每个要求都满足，我的收藏就被彻底掏空了，而别人却可以借此致富。"

非常不幸的是，有些向克劳修斯索要球根的人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和他以前在维也纳时一样，窃贼开始不断光临他的花园。两次是在1596年夏天，还有一次在1598年春天。窃贼们趁他不在家时偷走了他的郁金香球根，失窃的数目非常之大。在留存下来的克劳修斯的信件中提到，仅一次偷窃盗走的球根就超过一百个。老人为此深受打击，更为莱顿警察与维也纳警察同样的漠不关心而气愤，他就此发誓再也不种花了，还把剩下的球根都分送给了朋友们。

一个当时的编年史作者称盗窃是因为克劳修斯为自己的球根开出天价，不见钱不交货。这让克劳修斯的名誉受到很大损害。然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在克劳修斯的整个职业生涯中，这位植物学家对他的朋友显示出了无比的慷慨。他从不吝于将自己发现的样本无偿分发给朋友们；只有那些被他怀疑根本不懂得他礼物价值的人才会被拒绝。这些雇佣窃贼去他花园窃取球根的人正属于后者，克劳修斯也完全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动机。

尽管如此，窃贼的行为倒是有一点积极的意义。克劳修斯当然不是16世纪90年代联省唯一一个种植郁金香的人，但他的藏品绝对是最好也是最多样的。正是窃贼的行为，让这些珍贵的球根从北到南广泛分布到整个荷兰，而且越来越兴旺。有的球根在新地方成了新杂交品种的始祖，并且繁衍生息，不断壮大。正是他们的后代成了下个世纪球根交易

的主力军。莱顿球根正是因此成了后来被交易球根的祖先。借用编年史作者的话说："17省储存的球根足够丰富了。"

---

[1] 16世纪到17世纪初，在联省共和国，姓氏还不是非常普遍的概念。大多数人仍沿用父亲的名字——比如Ziwertsz.很可能就是Ziwert或Sievert之子的意思。一般父名不用完全拼出，此处如果全拼的话应为Zewertszoon（即Zerert's son），拼写时一种常见的缩写方式是将表示儿子的zoon省略为z.，但在口语中，会按完整拼写发音。

6 胸前的装饰

郁金香从其被发现时起，就以其美丽的颜色和无尽的变化独树一帜。不止是土耳其人和荷兰人，各国的植物学家对于这一点也都是认可的。到1600年，整个欧洲都对郁金香赞赏有加。法国园艺家蒙斯特里尔（Monstereul）后来写道：就如人类能掌管世间万物，钻石能让所有宝石黯然失色，太阳能统治整个星系一样，郁金香也是所有花朵中最高级的品种。如果人类是上帝选中的生灵，那么郁金香绝对就是上帝选中的花朵。

因为这种新花卉受到了极大的追捧，园艺爱好者们竞相培育新的品种，谁都希望自己的郁金香比别人的更加艳丽多彩。多亏了克劳修斯以及与他通信的人们的努力，大量的杂交品种现在已经可以为人们所有。有荷兰的郁金香品种，有英国的詹姆斯·加勒特培育的十几种郁金香品种，还有法国植物学家洛贝尔留斯（Lobelius）编目整理确认的41种郁金香培育品种，更有其他地方没有办法计算的品种，总之在1600年，郁金香的品种肯定超过了100种。到17世纪30年代，则达到了1000种（其中至少500种是荷兰人培育出来的）。考虑到18世纪中期也才有约2500种，如今也才有5000种人们可以识别的培育品种，17世纪的品种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了。

不管怎样，在16、17世纪之交的时候，球根的供应数量还是有限的。有些新品种还只能结出个把球根。也正因为如此，对郁金香的热情也是局限于少数特权阶层之内。一些富有的鉴赏家们对此尤其狂热，他们特别看重郁金香的美艳和浓郁的颜色。这些有钱人相互之间会交易郁

金香，但是因为他们本身都已经非常富有了，所以他们之间的这种交换也都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到16世纪末，欧洲到处都出现了小规模的鉴赏家群体，比如意大利北部城市、英格兰和神圣罗马帝国。但是由于郁金香最早出现在荷兰南部，所以最大规模的郁金香爱好者自然集中在低地国家，尤其是佛兰德的上层贵族之间。这些鉴赏家中有很多人是从克劳修斯或者他的同伴那里第一次得到郁金香球根的。克劳修斯的同事马蒂亚斯·洛贝尔留斯（Mathias Lobelius）在1581年出版过一份名录，其中就包括玛丽·德布雷莫伊，她在海牙的家里有个特别漂亮的花园；名单里还有梅赫伦的约里斯·赖伊，以及克劳修斯一生的好朋友让·德布朗雄。

郁金香从荷兰兴起后，一路向南发展到法国，皮卡第的土壤尤其适合培育球根。在1610年前后，巴黎贵族阶层兴起了一种向宫廷里的女士赠送鲜花的热潮。贵族之间互相攀比，都想找到最稀有最美丽的品种。送花的礼仪形成之初，人们赠送的都是玫瑰，这一传统沿用了几个世纪，玫瑰也一直是花园里最受欢迎的品种。但是此时的法国贵族发现，郁金香足以超越玫瑰这个统治花园的女皇。郁金香的精致和优雅，更不用说它的新颖和稀少，很快就使它成为法国宫廷的新宠。郁金香的流行至少持续到了1615年，在年轻的国王路易十三的婚礼上，贵族女士们都穿着领口极低的礼服，把剪下来的鲜花别在乳沟处。据说当时最美丽的品种被看作像钻石一样珍贵。荷兰园艺家亚伯拉罕·蒙廷（Abraham Munting）在17世纪后期他所著的作品中记录了法国宫廷为郁金香疯狂的巅峰时期的景象。为了一朵特别美丽的郁金香，请注意，这里说的不是球根，而只是这一朵剪下的鲜花，竟有人愿意支付相当于1000荷兰盾的价钱来购买。

当然，宫廷贵族们没过多久就又去追求别的新鲜了，但是他们对郁金香的狂热还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为在17世纪，巴黎社会的优雅和

时尚在整个欧洲享有盛誉，巴黎宫廷流行什么，其他的地方都会纷纷效仿。这边法国人已经开始流行另一种新鲜风潮的时候，上一个流行的内容可能才刚刚传播到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所以如果有人到爱尔兰西部或是立陶宛林地去，发现那里的女士还穿着巴黎十年、二十年前流行的服饰，完全不必感到惊讶。所以，郁金香在路易十三的宫廷里流行几年，就意味着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它在全欧洲都会流行起来。

第一批追随法国皇室流行风潮的是法国的普通民众。郁金香在巴黎流行后不久，法国北部就也兴起了对郁金香的狂热追捧。很遗憾现在找不到当时关于这件事的记录，但据说这也是后来在联省共和国发生的狂热的先兆。如果后来的报道是可信的话，那么足可见当时人们对郁金香的喜爱就已经近乎疯狂了。据报道称在1608年，有个磨坊主用他的磨坊换了一种叫“棕色之母”（Mere Brune）的郁金香品种。另有一个狂热的郁金香爱好者用价值三万法郎的啤酒厂换来一个叫“啤酒店”（Brasserie）的杂交郁金香球根。第三个关于这个时期的事例是有个新娘全部的嫁妆就是一个红色系郁金香球根。这个球根是新娘父亲培育出的新品种，并且被他父亲命名为“女儿的婚姻”（Marriage de Ma Fille）（据猜想新郎对这个有重大意义的礼物相当满意）。这些故事可能不完全真实，但是当时郁金香确实迅速风靡了整个欧洲。到1620年，再没有什么地方比联省更着迷于郁金香，它已经让那里的人们将百合、康乃馨之类的鲜花全都抛诸脑后了。荷兰人为郁金香疯狂的最初推动力，其实是源于荷兰革命期间，从荷兰南部涌入联省边境的大批难民。本来居住在西班牙控制地区的成千上万的新教徒为了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得不向北逃亡，以躲避时不时发生的宗教迫害。因为移民的涌入，有的荷兰城市规模甚至扩大了不止一倍：1581～1621年，有28000名难民来到莱顿，那里的人口从12000人升至45000人；在阿姆斯特丹，整个17世纪期间，绝大部分在这里结婚定居的男子都不是出生在这里的本地人。移民们不但辛勤劳动，而且手里有可用于投资的钱财，正是他们为荷兰的繁荣注入了大量的资本。移民中的一大部分是有能力的工

匠，可以凭借自己的手艺谋生。后来闻名世界的阿姆斯特丹钻石贸易，最初就是由这一时期从安特卫普来到这里的工匠发展起来的。移民中还有一部分是从布鲁塞尔或安特卫普这样的大城市来的有钱的商人。这些人中有不少就是最早的郁金香狂热爱好者。他们把郁金香球根也带到了这里，让联省人见识了一些之前没见过的新品种。难民们大批培育郁金香，也使得联省郁金香的供应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大增加了。

当然，郁金香不只在移民之间流行，很多荷兰人也越来越钟情于这种花朵。从南边的鹿特丹到北边的格罗宁根省，整个共和国的人都开始广泛种植郁金香。越来越多的鉴赏家们开始赞美郁金香的美丽，郁金香的数量也出现明显增长。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联省的郁金香鉴赏家们并非贵族出身，他们更多属于共和国的新兴统治阶级：一群被称为“执政者”的有钱有势的普通市民。

荷兰城市的执政者们通常包括一些富裕商人家族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还包括一些律师，或者一两个医生。他们通常足够富裕，以至于有钱可以投资债券或海外贸易。简单些的，但同样也是获利颇丰的一种行当是填海造地，或者把湖泊、沼泽抽干变成农地。这些人告别了每天工作赚钱养家的模式，形成了一种新的自我延续的统治阶层，并且占据了省议会和城市委员会中的要职。

少数一些荷兰鉴赏家虽然不是执政者，但至少也是同样富有的商人，只不过他们还需要花时间经营自己的事业。这类人大多会在名字前加一个能够显示他独特身份的敬称。比如一个叫德容（de Jonge）的渔业商人，会被称为“鲱鱼领主德容”。他们赚来的钱里大部分还是要投资到自己经营的事业上，也不像执政者们一样有那么多时间用于照料自己的花园。即便如此，也还是有几个最富有的商人成了著名的郁金香爱好者。

事实上，郁金香也特别适宜在联省种植。郁金香不但比花园里其他

的花朵更受欢迎、颜色更丰富，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园艺家还是初入门者都能把它种活。即便是在联省到处可见的贫瘠、沙质的土壤里，球根也能蓬勃生长。在阿姆斯特丹以西，从莱顿向哈勒姆的方向，最北到达阿尔克马尔的北端，有一条与海岸线平行的极干土壤带。就算是在这片地区，郁金香也照样能生根发芽。

然而，真正的原因其实是：郁金香的新地位是一种财富和品位的象征。大概从1590年起，联省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巨额的财富涌入这个国家，商人们个个富得流油，这使他们有资本在美好事物上任意挥霍自己的钱财。

当时有一批作家记录了一些荷兰鉴赏家的名字。这些人都是在17世纪最初十年就开始收集郁金香的。荷兰一些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物全都榜上有名。比如哈勒姆的帕卢斯·范·贝尔斯腾（Paulus van Beresteyn），他曾经是当地麻风病收容院的院长，在城里种植了许多郁金香；再比如雅克·德·盖恩（Jacques de Gheyn）这名来自海牙的画家，他是一个显赫的贵族，也是克劳修斯的老熟人。盖恩极度热爱园艺，并且以花朵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画作，其中一本22页的画册就被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王鲁道夫二世买走了。盖恩还是少有的几个身价财富可以被明确计算的鉴赏家之一。在1627年，也就是他去世两年前，他给自己的资产做了评估。审计结果显示，他当时的身价在四万荷兰盾以上。

另一个在古老记录中出现的名字是吉利莫·巴特罗蒂·范·德·霍伊费尔（Guillemo Bartolotti van de Heuvel），他也是个郁金香专家，一个土生土长的荷兰人。他的名字如此特别是因为他被他在博洛尼亚的一个没有孩子的叔叔收养了。范·德·霍伊费尔算得上是全阿姆斯特丹最富有的两个人之一，身价总计达到令人咋舌的40万荷兰盾，他很可能也是郁金香交易历史中最富有的个人了。凭借生意上赚的钱，巴特罗蒂可以有足

够的闲暇时间投身于他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建造的著名的花园。从流传下来的文献中寥寥数语的描述可知，这个花园的设计是完全对称、极度正式的，一个属于真正的鉴赏家的花园，里面的花朵布局都是根据当时流行的方式，即一个花圃中只种一株郁金香，这样人们才能不受影响地好好欣赏它独特的美丽。

让范·德·霍伊费尔发家致富的大批流入资金主要是荷兰革命带来的成果。在前一个世纪，共和国最大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并不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为荷兰南方的安特卫普才是当时最大的港口，也是全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从波罗的海、西班牙和美洲运来的大批货物都要从这里通过，再转往神圣罗马帝国和欧洲北部其他国家。但是弗拉辛在革命之初被海上乞丐夺取，荷兰人于是堵住了斯海尔德河的河口，也就切断了安特卫普的入海口，自然就阻断了这个城市的贸易。对于这个佛兰德省的城市而言，这无疑是晴天霹雳，大部分的贸易往来向北转移到了荷兰省，阿姆斯特丹也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与此同时，荷兰还开通了与东印度的贸易联系，由此打破了之前由西班牙人垄断的商贸活动。对17世纪的欧洲人而言，印度称得上是不可限量的财富之源。那里盛产各种奢侈品、香料、陶瓷等别处没有的货物。在东方购买这些货物的价格相对便宜，体积不大也不笨重，绝对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一货船的香料，比同样吨位的木材、谷物或者食盐这类以往荷兰人一直倒卖的货物的价值贵上好几倍，而且只要能平安返航，就不愁卖不出好价钱。荷兰商人很快就意识到了与东方贸易往来的巨大潜力。到1610年，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岛屿上建立了多个前哨站，尽管受到西班牙攻击的可能性一直存在，但是满载着干胡椒、肉豆蔻、肉桂、丁香、糖、丝绸和染料的舰队依然定期驶向联省。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管这些新商品叫“富贸易”是完全有理由的，来自印度的一船货物就能产生大概400%的利润。

涌入共和国的过剩财富影响了成千上万荷兰人的生活。到1631年，荷兰最有钱的300个市民中，至少5/6都投资于“富贸易”。无论是荷兰商人阶级还是在他们背后投资他们公司的执政者们都富裕得很。平均水平比同时代的英格兰、法国和罗马帝国的人们都要富裕。

以当时的标准衡量，最成功的荷兰商人富得让人震惊。在17世纪上半叶，一个中等级别的贸易商每年赚1500荷兰盾就可以丰衣足食；挣到3000荷兰盾以上就算非常富裕了。在他之下的社会阶层，比如职员、小店主或其他什么自称“绅士”的一类人，每年收入大概能达到中等级别贸易商的1/5到1/3，也就是500～1000荷兰盾。但是像巴特罗蒂这样手握大量富贸易股票的人，每年就可能收入一万、两万甚至三万荷兰盾。当时最富有的人叫雅各布·波彭（Jacob Poppen），他是个德国移民的儿子，通过与印度和俄国的贸易赚了大钱。在1624年他去世时，他的资产达到了50万荷兰盾。另一个叫阿德里安·波夫（Adriaen Pauw）的执政者——后来成了荷兰的总理[1]，也是联省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政客——他通过成功的投资，积累了35万荷兰盾的财富。到17世纪30年代，又有10个阿姆斯特丹人的资产超过了30万荷兰盾。

在今天，有钱人喜欢把钱花在高档服装、私人飞机和豪华轿车上。但是即使是在荷兰黄金时代最高峰，到联省共和国的人也会发现，你实在很难一眼看出谁是平头百姓，谁又是执政者或富商。即便是最有钱的人也只是遵从当时朴素的衣着习惯，带着巨大的宽边帽子，穿紧身的裤子和厚重的短外套。外套里面可能会穿件紧身上衣和马甲，也全都是黑色的。领口和袖口装饰着蓬松的白色飞边。脚上穿着及膝的长袜和紧窄的黑色鞋子。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们同样穿着颜色单调的紧身上衣和及地的长裙，通常会带个蕾丝的围裙。到了冬天，为了抵抗低地国家无孔不入的严寒，人们会在最外面披上一件皮毛镶边的长袍外衣，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习惯上，有钱人反而尽量避免可以显示其富有身份的东西。女人们甚至不愿露出自己的头发，而是喜欢戴个又紧又小的白色帽子把

头发都盖住。男人们的发型则是一种类似骑士风格的、长及肩膀的卷发，留着唇髯，下巴上的胡子修剪成小小的三角形。整体上而言，这个国家的穿衣风格是绝对的清教徒式。

尽管服饰是这么朴素，荷兰的执政者和富商们也不是对炫富的诱惑完全免疫的。赚进商人和他们的股东口袋里的大把大把的钱财已经要撑爆保险箱，亟须找到一个被挥霍的出口。所以，有的人把钱花在美食和好酒上，或是用来购买乡下送进城的农产品。这可以让社会底层的人民也能赚到点钱，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就普遍提高了。但更多的钱财当然还是用来储蓄或者再投资了。毫无疑问，富贸易为各种形式的奢侈消费提供了动力，从豪宅到名画再到郁金香，经济发展是1600～1670年荷兰黄金时代的根本原因。

这一时期同时还是一个文化飞速发展的时期。艺术品创作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蓬勃兴盛，不仅因为莱顿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建立，还得益于原本在南方的大批画家和作家的到来。这么多的艺术家需要工作机会，使得人们能够以比之前低很多的价格买到画作或剧本。来到联省的游客总是会对如此丰富的艺术作品留下深刻的印象：种类繁多的画布、富丽堂皇的织锦、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矗立的雕像等。与此同时，一些极富才华的艺术家们也在探索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绘画技巧，这种艺术形式后来由伦勃朗（Rembrandt）（莱顿的一个磨坊主的儿子）和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从安特卫普来的一个难民）完善并走向巅峰。新共和国还着手建造了一些宏伟壮观的公共建筑，所以建筑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复兴。书籍、宣传册和学校也比以前更多了。

荷兰人在此时还产生了一种修建房屋的兴趣。郁金香得以持续流行的原因之一就是荷兰富商和贵族们开始热衷于在乡下建豪宅，这其实也是一种炫耀他们迅速增长的财富的方式。富裕的荷兰大城镇的郊区是最佳地址：比如莱顿郊区的莱德多普乡村（Leiderdorp）中，或是沿着哈

勒姆以西海岸起伏的沙丘上，抑或是从乌特勒支流向阿姆斯特丹的费赫特河沿岸，一栋栋豪华的宅邸拔地而起。这些建筑通常采用经典的建筑风格，功能齐备，面积充足。建筑外面的部分占地更是可观，有正式的花园和开阔的草坪。对于业务繁忙的商人和日理万机的执政者们而言，这些乡村别墅就是他们躲避俗世纷扰的世外桃源。

社会历史学家认为，这种修建房屋的热情其实是联省统治阶级思想变化的表现。在荷兰黄金时代，曾经理智、敬神的荷兰人；一个鄙视卖弄炫耀行为、对在教堂开个最微不足道的笑话的牧师都要罚款的、彻底的加尔文主义社会，开始慢慢喜欢上了炫耀和展示。从这个观点上看，建房风潮中最有意思的杰作应该就是一个叫雅各布·卡茨（Jacob Cats）的声名显赫的执政者为自己建造，并命名为“抛开纷扰”（Zorghvieit）的乡村别墅了。

卡茨是个温文尔雅但极度虔诚的人。他不但是政客，更是个作家，而且是当时荷兰当之无愧的最受敬仰的作家。他的财富就源于他在整个共和国无比畅销的道德诗集。下面是一段典型的卡茨诗句，内容是警告年轻漂亮的姑娘不要滥用她的美貌换取好处。诗中这样说道：

闪耀的金发终将黯淡；

无忧无虑的日子必然走向终点；

红唇失色；丰颊枯黄；

敏捷的身躯渐渐僵硬；

灵活的双脚步履蹒跚；

丰满的身体变得瘦削；

光滑的肌肤布满皱纹。

人们习惯称卡茨为神父，他创作了十几本诗集，里面都是类似上文

的诗篇。他的诗句全集在荷兰卖出了大概五万套。一个荷兰寻常家庭里，除了圣经之外唯一拥有的书籍很可能就是卡茨的诗集。无数荷兰家庭衷心热爱他的智慧，并将他的诗句作为指导日常道德生活的指南。如果诗人雅各布认为修建乡村别墅不是问题，谁还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呢？

建造华丽乡村别墅的风潮必然导致乡村别墅花园里大规模种植花卉。荷兰人对于园艺的热情在前一个世纪就已经盛行起来，在此时也完全没有消退的迹象。奥芬比克勋爵（Lord Offerbeake）在莱顿附近的阿尔芬的宅邸［1634年英国国会议员威廉·布里尔顿爵士（Sir William Brereton）造访过此地］里面就建造了“空间广阔的花园，面积巨大的果林和充实的鱼塘”，此外还有12个不同种类的灌木篱墙、一个迷宫、一个木制人行道和无数的花圃。毋庸置疑，奥芬比克的花园曾是联省最宏伟一个，但其他有钱人之后纷纷效仿，对花园的投入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花园不再被看作是休闲放松的场所，而更多的变成了主人展示自己植物收藏的平台。

尽管荷兰社会中残留的加尔文主义元素时不时还会发出一些责难郁金香的奢侈的声音，但是像卡茨神父这样的道德家对它的默认则足以助长鉴赏家们对郁金香的狂热。毕竟如此美丽的生物只能是上帝的杰作，何况培育郁金香是需要在花圃间辛勤劳作的（卡茨本人就强烈建议人们在户外劳作）。郁金香很快成了许多有钱的新居民的显著标志。其中有一个叫“德国战壕”（Moufeschans）的花园尤其为人所知，因为后来在1621年时，一个叫彼得吕斯·洪迪思（Petrus Hondius）的反对西班牙统治的神父在他长达16000多字的长篇史诗名作中对这个花园赞赏有加。“德国战壕”是建造在荷兰革命时期一个德国防卫工事的遗址上，这个花园也由此得名。这个花园的主人叫约翰·瑟里彭斯（Johan Serlippens），是泰尔讷曾市的市长。他曾邀请他的朋友洪迪思与自己一同居住。在此期间，牧师开辟了一个花园，里面有六个花圃的郁金

香，在当时已经算是数量非常惊人了。洪迪思手里的一些球根很可能就是克劳修斯给他的，另一些则来自他的另一个药剂师朋友、莱顿的克里斯蒂安·波里特（Christiaan Porret）。

洪迪思对郁金香并不痴迷。他在瑟里彭斯的花园里种植了各种花草，还有康乃馨、风信子和水仙。他看不起那些独独偏爱郁金香的人，在他的诗句中，他用尖刻的语句嘲讽了那些深陷于郁金香狂热而无可自拔的人：

那些傻瓜只想要郁金香；

心心念念就这么一个愿望；

不如我们把球根吃了，心里反而更舒畅；

尝尝这道菜是不是苦的难忘。

诗句虽然这么说，可作者本人也并非完全对郁金香的美丽无动于衷。在他的作品《关于“德国战壕”花园》（*Of de Moufe-schans* ）中，他就叫板当时的画家们，就是为证明郁金香的美丽是无法用笔墨描绘的。洪迪思还写道，仅他花园中的郁金香呈现出的颜色，就比所有画家知道存在的颜色还多。他的长诗巨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让很多名人都慕名来到瑟里彭斯的家。我们知道的就包括拿骚的莫里斯（Maurice of Nassau），他是奥朗日的新王子，也是率领荷兰军队与西班牙人交战的将军，他称得上是当时最著名的军人。莫里斯一定非常喜欢他在洪迪思的花园里看到的一切，因为自那之后，他在自己海牙的宫殿里也种满了郁金香，后来因为种得太多，不得不拿出去卖给大众（威廉·布里尔顿爵士十几年后来到莫里斯王子的宫殿时，就以区区5荷兰盾买走了一百多个球根）。

到1620年，郁金香已经成了荷兰精英阶层最喜爱的花卉品种，更是共和国最有权势的人们的热情所在。正如莫里斯王子的故事显示的那

般，此时的郁金香还远没有广泛流传到联省共和国每个平民都可以赏玩的程度。即便是此时，郁金香仍然是一种相对稀少的品种，有些最受追捧的品种是花钱都买不到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将真正体会到这种稀少代表着什么。

---

[1] 一个相当于当今国务卿的职位。

7 镜中的郁金香

一般的执政者都有自己的乡村别墅。而阿德里安·波夫，这位最显赫的荷兰总理拥有一座城堡。

所谓城堡，实际上是个废弃的遗址，但是它处于一块面积极大的地产的中心。这个地方就叫海姆斯泰德，波夫是1620年买下这个地方的，于是便拥有了北部海岸和阿姆斯特丹之间唯一的一片高地。波夫尤其享受从破损的城墙之上俯瞰整个荷兰共和国腹地的景象。碰上天气好的时候，他可以看清阿姆斯特丹每个建筑的屋顶，即便有乌云遮盖，他也能看到北面不足一英里之外，哈勒姆城墙上树立的绞架，上面有摆荡的尸体格外醒目。

在海姆斯泰德的时光成了波夫最大的享受。总理在这一产业上很舍得花钱。他拆掉了废弃的城堡，在原地重新修建现代风格的豪宅，不光用它来宴请共和国最重要的要员们，甚至还分别接待过英格兰女王和法国女王。宅邸的内部装饰也极尽奢华，波夫为自己的新家添置了昂贵的家具、上等的织锦和最好的画作。这里有一个专门的纪念品陈列室，里面摆满了擦得闪闪发亮的盔甲。还有一个藏书室，里面收藏了16000册图书，在当时而言绝对是不可思议得丰富了。

这座豪宅还在建设中时，波夫就开始着手改进周围的领地了。作为一个狂热的土地开垦项目投资者，波夫把领地上数以吨计的表层土铲走，好露出下面更肥沃的土层便于耕种。而在领地外围的地区，他鼓励农耕和轻工业，使得海姆斯泰德的人口渐渐上升到1000多人。

但是，阿德里安·波夫最大的乐趣不是他的豪宅，而是他的花园。花园的位置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根据当时的潮流，就建在宅邸的前面。周围有装饰的草坪和花圃，花圃里种满了玫瑰、百合和康乃馨。它们艳丽的颜色与精准几何方形篱墙相辅相成，其间还有绿树掩映的甬道引领来访者通往完美境界。在花园的正中心最显著的位置，海姆斯泰德的新主人为郁金香单独建造了一个花圃。

波夫的豪宅向来大方地对公众开放，尤其当他在阿姆斯特丹公务缠身的时候，还会允许游客在花园中漫步游玩。波夫的花园还有一点非常特别，来访者也许并不会一眼就意识到。事实上，很多人到离开时都没注意到那个东西的存在。这其实没什么奇怪的，毕竟波夫也不希望游客看到那个东西。

海姆斯泰德花园的秘密就是郁金香花圃中心一个奇怪的装置。这个装置是由木头和镜子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而成，用处就在于可以把镜子前面的景象重叠成多个，造成明明一朵花，看起来却有很多花的幻象。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发明的帮助，从远处看去，唯一的郁金香花圃里仿佛盛开着几百朵娇艳的郁金香。只有当一个好奇心强或者独具慧眼的欣赏者走到很近的地方仔细观察才能发现这样的美景不过是一种光学幻象。正是小柜上的镜子把波夫的郁金香从寥寥几朵变成了花团锦簇。

对于海姆斯泰德的主人来说，镜子小柜实在是个无奈之举。即便是尊贵富有如他也有花钱买不到的东西。荷兰总理实在找不到能种满他整个花园的郁金香，哪怕是全国最好的园丁，也无法让球根如他所愿的迅速繁殖。

波夫的烦恼在当时是无解的。越好的品种数量越稀少，而波夫收集的都是一些极好的品种，需要经过长期的挑选和培育才能修成正果。从荷兰郁金香第一次绽放于瓦利希·兹沃特森在阿姆斯特丹的花园时起，

鉴赏家们就开始精心挑选最精致的品种，加倍精心地培育，把它们和其他优良球根杂交以创造更美丽的品种。最初颜色单一浓郁的郁金香经过几十年不断的繁殖和变异，才变成具有如今这样醒目配色的珍贵花朵。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们问世的时间都很短，数量也极少，以至于连阿德里安·波夫也无法拥有。

在所有达到“上上等”的郁金香品种中，最为人所推崇的是一种叫作“永远的奥古斯图斯”的郁金香。它是公认的17世纪全荷兰最负盛名、数量最稀少、最美好、自然也是最昂贵的郁金香。“永远的奥古斯都”属于红色系郁金香，但是如果只用红白相间来描述这种花，那就无异于管红宝石叫红石头，管绿宝石叫绿石头了。所有见过这种花的人无不认可其无与伦比的美丽。这种郁金香花茎纤细，枝叶分明，所以特别能突出顶上的花朵及其美丽的颜色。花茎与花冠连接的部分呈蓝色，花冠则完全转变为纯白的底色。在全部六朵花瓣的中心，从底部向外放射出鲜血般红艳的细长纹路。在花瓣的四周，也有同样浓郁颜色的花边。那些有幸看到“永远的奥古斯都”盛开的人都认为，它就是生命的奇迹，如阿佛洛狄忒一样引人遐想。

事实上，见过这种郁金香盛开的人极少。虽然有无数的鉴赏家对它献上溢美之词；虽然以它为内容的插画比任何其他品种的插画都更多地出现在书籍里；虽然它在郁金香狂热中被如此频繁地提及以至于它的名字几乎成了狂热的同义词。但“永远的奥古斯都”从未被真正交易过，因为它的数量实在太稀少，根本没有球根可供倒卖。

这神秘的“永远的奥古斯都”就是郁金香狂热的最初预兆。这种花是如何来到联省的至今依然无人知晓。荷兰编年史作者尼古拉斯·范·沃森内尔（Nicolaes van Wassnaer）差不多是在这个问题上唯一一个可靠的信息来源。根据他的记述，最早是法国北部的一个花商用种子种出了“永远的奥古斯都”，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花朵的价值，所以

低价处理了。这大概发生在1614年前后，短短十来年之后，郁金香就会达到艳冠群芳的地位，无数的鉴赏家们于是从荷兰向南，到佛兰德、布拉班特和法国北部的温室和花园里寻找“永远的奥古斯都”的其他品种。这是个艰巨的工作，而且毫无成果。虽然也发现过一些有类似花纹的品种，有一种甚至被命名为“小奥古斯托”，以证明这两种花朵之间明显的亲属关系。但最终，人们还是没有找到足以媲美这位花中帝王的其他品种，因为谁也无法超越它那鲜活的颜色和纯粹的形态。

荷兰的鉴赏家们既然不能拥有“永远的奥古斯都”，就干脆改变战略，转为把自己拥有的最美丽的品种宣传成可以与“永远的奥古斯都”抗衡的对手。关于这一时期，范·沃森内尔提到过一些品种，包括：“克劳修斯的见证”（Testament Clusii）、“库恩赫特的见证”（Testament Coornhert）、莫塔拉姆·范·沙斯特雷（Motarum van Chasteleyn）和尤弗肯·范·马腾堡（Jufferkens van Marten de Fort）。但是这些品种美则美矣，却无一种能够引起同人们对花中帝王的红色火焰一样的钦佩与赞美；而像“科隆花园里种植的一种郁金香比奥古斯都还要美丽”这种传言也从未被当真过。

对于“永远的奥古斯都”这个品种最早的描述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据范·沃森内尔记述，到1624年，只有不超过12株“永远的奥古斯都”存活于世，而这全部12株郁金香都归一个人所有。据说这个人居住在阿姆斯特丹，他的真实身份后来成了整个郁金香狂热时期的一个谜。范·沃森内尔在其作品中很小心地没有提及这个人的名字，再加上没有其他证据资料的支持，这个人的身份恐怕永远不能被揭开了。编年史作者明确指出，这样做是为了遵从这位隐姓埋名的鉴赏家的心愿，因为他已经决定无论什么价钱都不会出售自己的郁金香。

这位不知名的鉴赏家手里的球根一旦出售，必然非常抢手。在当时，虽然郁金香培植的数量和范围都在迅速增长，但是“上上等”品种的

数量却不过十几个，这种极度匮乏的结果就是：一个“永远的奥古斯都”的球根不论标价多少都肯定卖得出去。但是，这位鉴赏家却拒绝了所有的求购者。

整个17世纪20年代，郁金香的狂热爱好者们为了求购一个球根，不惜对这位鉴赏家连续不断地开出越来越离谱的价格。他们愿意为球根所支付的价格不仅是高得离谱，根本就是天文数字：据范·沃森内尔记录，在1623年，12000荷兰盾都买不到10个球根；而花中帝王的所有者自己种植这种花就是单纯为欣赏其美丽，并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然而，球根主人的拒绝只是让求购不得的人更加疯狂地提高价位。到第二年夏天，价格升到了2000荷兰盾，甚至3000荷兰盾一个球根。但是，这些购买的要求同样立刻被拒绝了。

即便如此，到最后的结果竟然是，这位神秘拥有者采取的一切控制“永远的奥古斯都”供应量的措施都变成了无用功。范·沃森内尔曾经解释了这个问题。事实上，发现这个品种的这位鉴赏家早年曾经以1000荷兰盾的高价出售过一个球根。但是当这株郁金香被从土里挖出来时，主人震惊地发现母球上已经长出了两个子球。早知是这种情况，他完全可以开价3000荷兰盾。而对买主来说，这无疑是天大的好运。他完全可以卖出一个子球以收回购买的成本，然后手里还拥有了继续培育这种昂贵品种的根源。

从这个意外开始，那仅有的一些买得起“永远的奥古斯都”的人逐渐有花可买了。但是这种最受人追捧的品种还是极少能结出子球的，几十年后，仍然只有少数几个球根存世。难以繁殖也是上上等郁金香的一个共有的特点，很可能是因为这类花朵感染马赛克病毒比一般单色品种更严重。当然，“永远的奥古斯都”持续稀少的情况不但没有让追求他的鉴赏家们却步，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的热情，而这不过是荷兰共和国此时开始萌发的为球根疯狂的一个缩影。在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数量的稀

少是催生狂热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一个黄金时代的荷兰人来说，郁金香可不是像今天一样平常可见的、随处可买的花卉。它在当时还是奇妙的新兴品种，充满了来自东方的异域风情，而且数量极其有限。因为好的品种极为稀少，所以格外引人垂涎；因为引人垂涎，所以价格极其昂贵；因为价格昂贵，种植郁金香就更加有利可图。

少有的几位郁金香鉴赏家们经常亲自培育郁金香，他们本身就是热衷于园艺且深谙此道的园艺家。比如巴尔塔扎（Balthasar）和达尼埃尔·德·纳维尔（Daniel de Neufville）兄弟，是一对来自哈勒姆的富有的亚麻商人。他们就培育出了两种新品种郁金香，一种是红色系，另一种是紫色系。这些新品种就种在他们在城里的私人花园里。他们还给花园取名为“应许之地”。而与他们同时期的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的技术了，所以到17世纪20年代，对郁金香的需求迅速增长，已经不能靠一小部分鉴赏家之间的少量交换来满足了。新加入的郁金香狂热爱好者们，家里有巨大的花园等着播种上各种各样的郁金香，可是他们既没有自己培育新品种的能力，又不能靠传统的交换方式获得郁金香，只好被迫寻找新的途径来获得球根。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那些专门培育时尚的新品种的专业园艺家们。这是郁金香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如果没有园艺家们的努力，就不会有那么多新品种的产生，可供流通的球根数量也会少得多，郁金香传遍联省的速度也会降低许多。

到1630年，荷兰共和国的每个城镇上几乎都出现了专业的郁金香种植者。他们之中并没有人能成规模地生产球根，大多数还只是在小花园里种植。为了应付激增的需求，他们不得不到当地的小酒馆，甚至修道院里雇人帮忙。大多数种植者还是会广泛经营各种花卉植物，但也有一些，比如豪达的亨里克·波特贝克（Henrilk Pottebacker）——红色系郁金香“波特贝克戈夫拉姆”（Pottbacker gevlamt）和波特贝克司令

（Admirael Pottebacker）郁金香的创造者，他已经开始专门种植郁金香了。这些人不但是园艺方面的专家，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对于什么会值钱、什么能大卖有着敏锐的嗅觉。

在最高端市场上，“永远的奥古斯都”最有力的竞争者是名为总督（Viceroy）的一种紫色系种郁金香，它花型硕大，有紫色火焰花纹。这种花也被公认为紫色系郁金香之王。而作为黄色系头名的，是一种叫作“莱顿的红与黄”（Root en Gheel van Leyde）的郁金香。在低端市场，最便宜也是最不受追捧的是单色郁金香，一般是黄色、红色或白色。这些品种是最初进入荷兰的郁金香品种，所以也是数量最多最常见的。

像波特贝克这样的园艺家们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的技术是从在16世纪末郁金香市场还未兴起之时的种植者那里学来的。那批种植者数量不多，技艺娴熟，而且不那么追求商业利益，只是凭手艺勉强糊口而已。克劳修斯和他的贵族朋友圈对这批种花者没有什么好感，指责他们对植物学的漠视，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是出于运气而非计划地培育出新品种，然后又不顾植物学规范，给这些品种取不适当的纯民粹派的名称。但不管怎么说，这些种花者是真的投身于种植，且不断学习进步。

在17世纪初，较早开始种植郁金香的一批花农（主要集中在布鲁塞尔城外的乡村）还不得不与另一批更加不可靠的流动花贩竞争。这些活跃的个体花贩大多是在法国农村寻找不同寻常的品种，然后主要转卖给荷兰收藏家们。他们给自己取了个希腊语绰号，叫“拔根人”（rhizotomi）。克劳修斯在年老体衰，不能进行野外考察以后，也曾经把个体花贩作为获取球根的途径之一。

个体花贩中也有少数一些是正直的人。克劳修斯就认定巴黎的尼古拉·勒·基耶（Nicolas le Quilt）和吉耶莫斯·博艾留斯（Guilielmus Boelius）是稀有球根的可靠供应商。但总体而言，个体花贩的名声不怎么样。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拿普通品种的种子和球根冒充稀有品种，

然后收取高额费用，因为他们知道等到郁金香开花，骗局暴露之时，自己早已逃之夭夭，跑回法国境内了。鉴于即便是克劳修斯这样的植物学家也无法断定一个不起眼的棕色球根将来会开出什么样的郁金香，个体花贩的交易方式就注定是存在各种争议和弊端的。

在17世纪初，不只是个体花贩在乡间寻找稀有植物。在采集草药的过程中，药剂师们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野生郁金香，并且将它们采集回去。其中有三个荷兰人就因为丰富的球根收集而闻名，他们是乌特勒支的威廉·范·德·肯普（Willem van de Kemp）、阿姆斯特丹的彼得吕斯·加勒特（Petrus Garret）和莱顿的克里斯蒂安·波勒特（Chirstiaan Porret）。

药剂师在17世纪的数量之多就如化学家在今天一样。这些早期的药剂师主要是向那些穷得看不起医生的人兜售一些有用没用的便宜药品。他们穿着和医生一样的制服：黑袍子、黑外套、宽边领和尖帽子。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容易被辨识的传统标志，就是一个挂在柜台上方天花板上的鳄鱼标本。

部分药剂师还是很自重的人，但在17世纪最初几年，药剂师们像个体花商一样背着机会主义者的恶名。几个世纪以来，药材都是被归入杂货、食品之列，药材店里还是唯一能买到水果馅饼的地方。直到此时，药剂师才刚刚被归入医师的行列。但是药剂师们很快就发现了更好的赚钱门路。他们的营业场所通常也是秘密的酒窖，很多甚至偷偷提供本来由医师垄断的医疗诊治服务。药剂师很乐意出售球根以满足市场需求，来这里购买球根的客户大多是纯粹的花朵爱好者和鉴赏家，后来还出现了更加寡廉鲜耻的药剂师把球根当催情药推销。

从1600年到1630年，明抢豪夺的个体花贩和药剂师们逐渐被一个新的更专业更受尊敬的群体所取代，这就是专业的花草培养人。这些专业的种植者主要集中在哈勒姆，这里是荷兰省第二大城市，虽然土质贫

瘠、沙化，但是却特别适合种植郁金香。种植者尤其偏爱城门外不远处步行可到的小片出租土地。根据哈勒姆的传统，大多数郁金香花园就在被称为“大木门”（Grote Houtpoort）的城门之外，这个城门是从南面进城的两个入口之一。但是，哈勒姆最好的小片花圃其实在南面的另一道大门外，沿着灌木丛生的“小木板路”（Kleine Houtweg），一直延伸到今天仍然被称为玫瑰田的区域，再继续延伸进入哈勒姆树林。这里也是这座城市著名的美景之一。有二十多个培养人在这条路上设立了培植基地，其中就有一位叫大卫·德·米尔德（David de Mildt）的郁金香种植人，后来留存于世的许多关于郁金香狂热的记录中都重点提到过他。他的花园就在这条路上一个叫麻线街（Twijnderslaan）的地方。德·米尔德去世时年仅33岁，当时正是狂热的最高峰，他的花圃被另一个著名的郁金香种植人贝伦特·卡多斯（Barent Cardoes）接管，并改名为“花神园”。在卡多斯的管理下，这里成了荷兰省最被认可的球根农场之一。

贝伦特·卡多斯的经营之道是从另一个哈勒姆种植人彼得·博尔（Pieter Bol）那里学来的。博尔是紫色系郁金香“安特卫普的博尔”（Anvers Bol）和其他几种上上等品种的创造者，很可能也是那个时期最富有的郁金香种植人。与其他种植人不同，博尔更像一个贵族和鉴赏家，他雇佣卡多斯这样的专业园丁来负责种植、培养球根这类实际工作。从哈勒姆再往南，在菲亚嫩爵爷（Vianen）的领地上，住着一个出身卑微的种植人，名叫弗朗西斯科·戈梅斯·达·科斯塔（Francisco Gomes da Costa），他也许是整个联省最勤勉的园艺家。

达·科斯塔是一个葡萄牙人，他因为自己培育出的郁金香品种而闻名。他的荷兰语一直说得不好，所以他受委任创作的园艺手册上，为了自用方便，将所有郁金香的名字都按照发音做了标注。但是，在花园中，达·科斯塔绝对是个无人可比的创意家。最少有8个品种的郁金香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也是以自己名字命名郁金香最多的人。他最著名的创造是一种叫“完美的科斯塔”（Paragon da Costa）的郁金香。它被普

遍认定为是对既存郁金香品种的改进，它的颜色比原来更加美丽和浓郁。从这个基础上说，弗朗西斯科·戈梅斯·达·科斯塔最骄傲的作品莫过于“完美的总督科斯塔”（Paragon Viceroy da Costa），也就是总督的改良品种。而在此之前，总督被认为是不可能再改良的。

对于像达·科斯塔这样的移民来说，种植郁金香吸引他的原因和吸引其他荷兰人的原因是一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投资，一小块土地和一些种子或球根就够了。郁金香生命力顽强，对土质要求不高。种植郁金香的人也不需要像荷兰共和国其他贸易和职业的从业者一样，必须先加入严格、昂贵的行业协会，然后受其摆布控制。

对于那些根本无心于园艺的人来说，郁金香交易潜在的利益才是最大的吸引力。个体种植者确实变得非常富有。彼得·博尔就是因郁金香生意获利致富的代表，但是他跟哈勒姆的花商扬·范·达梅（Jan van Damme）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1643年达梅去世时，他留下的资产主要就是球根。这些球根加起来的价值相当于42000荷兰盾。这样的身价足以让他与那些在富贸易中发家的富商们平起平坐。

这么多的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像范·达梅这样成功的种植者成功的秘籍之一就是努力开发任何潜在的客户。大多数人是向鉴赏家和华丽乡村别墅所有者们销售球根，但是他们也同样乐意把球根卖给新兴商人阶层。最早至1610年，已经有少数聪明的园艺家把自己的球根卖到神圣罗马帝国，更不用说那些卖到荷兰南部和法国北部的了。这种起初非常不起眼的出口贸易却慢慢扩大，在18世纪前四分之一的时间里，荷兰的郁金香已经远销到北美、地中海甚至是奥斯曼帝国。

第一个开展出口业务的荷兰球根交易者可能是埃马努埃尔·斯沃茨（Emanuel Sweerts），他也是克劳修斯的老朋友，在阿姆斯特丹开了一间古玩店，而且在17世纪头十年里非常活跃。他不仅从欧洲各地进口球根，还把这些球根拿到法兰克福每年举办一次的博览会上去兜售（即法

兰克福国际书展，每年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出版商到这里，实际上是由中世纪一个大规模的集市演变来的）。

球根贸易越来越专业化，这也给埃马努埃尔这样的人提出一个问题：郁金香的花期每年只有短短几天，靠平凡不起眼的球根是激不起人们的购买欲望的，因为球根完全显示不出花朵盛开之后所能展现的惊世之美。斯沃茨于是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制作一本郁金香画册，里面用插图的形式把郁金香盛开时的形象展现出来。埃马努埃尔说服了他最著名的客户——神圣罗马帝国君主鲁道夫二世出资印制画册。这个鲁道夫二世就是那个曾经把克劳修斯赶出他的宫廷的人，但如今他却在沉迷于他最热衷的炼金术之余，涉足郁金香行业。在他的帮助下，埃马努埃尔在1612年去世前不久在法兰克福出版了这本郁金香画册《花谱》（*Florilegium*）。《花谱》一书类似当代植物标本集，文字很少。每一种郁金香只有一段简明的描述。描述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主要介绍的是郁金香的花形和颜色。

《花谱》出版仅仅两年后，一个叫克里斯·范·德·帕斯（Chrispijn van de Passe）的荷兰艺术家就出版了一本类似的作品《植物花卉》（*Hortus Floridus*）。克里斯是一个佛兰德雕刻师的儿子，出版此书时他才17岁。《植物花卉》后来被证明是当时最成功的植物学作品，并且很快被从拉丁文翻译成法语、英语和荷兰语。荷兰语版本中还加入了一个17世纪初主要的郁金香爱好者名单，之后的版本中又收录了完全关于郁金香的附录，其中内容说明当时联省和德国之间的球根贸易已经出现并且相当活跃。

《植物花卉》很快就成为郁金香培养人的通用手册，显然不是谁都能找到富有的赞助商愿意为自己花园里的郁金香品种专门制作一本《花谱》一样的画册。但当时，每个种植人都是在出售自己独有的品种，所以使用通用画册就有重大的局限。这个问题后来也被解决了，而且还演

变成了郁金香狂热中最著名的传统之一。解决的办法就是郁金香书，这种书其实就是插图为主的画册，由私人委托定制，多由荷兰的个体园艺家制作。为后世所知晓的就有将近50本。一本画册大概有500页之多，通常每页一幅插图，用水彩或水粉做颜料。每幅插图边上有这种郁金香的名字，但极少标价，我们有理由怀疑当时的郁金香种植者也像现在的古董商一样，善于根据客户的富有程度开价。

顾客总是发现实际购买郁金香花的钱比预算多，而他们也不是唯一被画册主人占便宜的。制作画册的艺术家们也没有获得合理的报酬。有一些甚至是比较有名气的画家，一页插图也只能赚得一点小钱。在一本大部分由莱顿的雅各布·范·斯旺波奇（Jacob van Swanenburch）画就的图册上，页面边角的标注证明，他总共完成了122幅花朵的插图，每幅图的工钱只有6荷兰币，要知道，范·斯旺波奇可是伦勃朗·范·莱因（Rembrandt van Rijn）的老师。

雅各布·范·斯旺波奇并不是唯一一个为郁金香画册做出贡献的有名望的艺术家。黄金时代的联省中唯一一位以作画为生的女画家尤迪特·莱斯特（Judith Leyster）也曾经创作过两幅红色系郁金香的插图。尽管这本书中其余的插图是由其他作家创作的，但是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女画家，这本画册还是被称为《尤迪特·莱斯特的郁金香画册》。另一位画家小彼得·霍尔斯特金（Pieter Holsteijn the Younger）为一位叫科斯（Cos）的种植者创作了一本画册，上面标记日期为1637年，这本画册不同寻常的一点是不仅标记出了花朵的名字（有的是以谜语或画谜的形式），还列出了价格和每个球根种植时的重量。画册中包括了53幅水粉画郁金香，12幅其他的图片，还有一些水彩画康乃馨。

仔细研究这些花朵图册就会发现，参与创作的画家们大多创造出了一种制作画册的生产线模式，也就是花朵的叶子和根茎部分由助手完成（画风陈腐，顶多算是能与实物有一点相似性的素描），而难度最大的

部分，也就是花瓣由画家亲自完成。另有一些插图是临摹的早期画册里的稀有品种图片。有些品种因为太稀有根本不可能买卖，但画家还是会出于画册完整性的考虑也将其收录其中。对于荷兰培育人来说，郁金香画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销售工具，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新客户，也有助于鼓动老客户购买新品种。但是就留存下来的郁金香画册来看，一页一页无非都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红色系、紫色系和黄色系郁金香，无形中也反映出17世纪郁金香贸易的混乱情况。

让种植者和鉴赏家都非常头疼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分辨出极其相似的两个种类。即使是知识最丰富的商人和种植者也都觉得，想要把一朵红色系郁金香从另一种花纹几乎一致的其他品种郁金香中分辨出来，就算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而这两种不同的郁金香的价格可能相去甚远。在现存记录中提到了几次关于郁金香贸易的重大争议，其根源也就在此。

同一种类的郁金香，每朵花之间都是有区别的，每一代之间也是有区别的。但这一点对于分辨它们的帮助不大，更不用说新品种的创造者给郁金香取的那些类似的名字造成的混乱。外行人认为荷兰郁金香的命名法让人无从理解。在早期是因为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没有统一的权威机构来制定郁金香命名的相关规则。任何创造了新品种的人都有权给花朵命名。而通常，这些人都会选择一些过分渲染该品种出类拔萃品质的词语，或是用他们自己的名字给花朵命名。更常见的是两种方式的合并。

掀起取名热潮的始作俑者是哈勒姆和北海之间一个沿海小镇柯南内姆兰（Kennemerland）的地方长官。他培育出一种红色系郁金香，苦思冥想选定了一个能显示这个品种优点的名字，叫“司令”（Admirael）。没过多久，司令就成了所有郁金香都渴望得到的最高级别的绰号。其他郁金香种植人纷纷效仿，给自己的郁金香取类似的名字，比如利夫肯司

令（Admirael Liefkens）、克雷亚司令（Admirael Krijntje）、范·恩奎岑司令（Admirael van Enkhuizen）等，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范·德·艾克司令（Admirael van der Eijck）。外国人经常会弄错，以为这些花朵是以荷兰革命中的海军司令们命名的，但毫无疑问，这些名字不是为了纪念海军而是致敬培育这些品种的园艺家的。到郁金香狂热时期，有50多个品种的名字中带有司令一词，另有30来种与之相竞争的品种，使用的名号是“将军”（Generael）。将军系列中也包括一种名为范·德·艾克将军（Generael van der Eijck）的，可能就是为了让购买者认为这种花完全可以和司令系列郁金香媲美。

司令和将军的名号流行起来之后，种植人必然走出的下一步则是寻找新的更好的品种，然后将其命名为“总司令”“大元帅”系列。于是就有了以古典英雄人物命名的郁金香品种，比如亚历山大大帝和西庇阿郁金香。命名热潮继续升级，最终两种来自豪达的郁金香，狂妄自大地取名为“司令中的司令”和“将军中的将军”。不过这两种郁金香倒也配得上这样的名字，因为它们花型硕大，还有燃烧的火焰般艳红的花纹。

这种取名方法的结果是，一些不太优良的品种也用上了司令和将军的名号，购买者根本无法从名字上分清自己购买的是什么品种。以将军系列为例，一般应是红色系郁金香，但是至少有三种紫色系郁金香也给自己冠名为将军；更夸张的是，还有一些紫色系甚至黄色系的郁金香给自己冠名为司令。所有这些都证明，种植者为了推销自己培育的新品种，已经用尽了各种办法。一位当时的作家如此解释这种奇特的现象：

> 若是一种郁金香出现了变异，主人要马上去告诉某个花商，很快人们就会开始谈论这件事。所有人都焦急等待着鲜花盛开一见分晓。如果确实是新品种，大家纷纷品头论足。有人用这种花作比；有人用那种花作比。若是这种花看起来像个司令，那就给它取名将军，或是任何主人设想的名字，最后别忘记给朋友们送上薄礼，好让他们想着到处去宣传你的新品种。

人们对郁金香的事津津乐道。到1633年，在种植人和鉴赏家，还有拔根人和药剂师们的共同努力下，郁金香供应稀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整个荷兰都可以买得到郁金香了。仅在荷兰共和国就种植有500种不同的品种。虽然有些上上等的品种依然稀少，但其他一些也很美丽的品种则较容易获得。再加上球根的供应在稳步增加，郁金香的美丽开始吸引新的关注者，之前可能是买不起或是没有产生兴趣的那些到荷兰共和国进行贸易和工作的人，也开始购买郁金香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主要是种植人的功劳。他们最重要的客户——鉴赏家们追求的都是最好最稀少的品种，种植者就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老品种和低等品种低价处理，否则就会积压库存。于是他们把这些品种低价卖给新兴客户群体，也就是那些以前只能听别人畅谈郁金香的美丽，现在终于可以梦想成真拥有郁金香的人。有些更有野心的种植者甚至把没人购买的球根卖给小商贩，让他们到各个城镇的集市上贩卖。这些人把郁金香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让农民、劳工和拓荒人都认识了普通的郁金香，并将关于郁金香的赞美发扬光大。

从更大的角度来说，荷兰人对发展郁金香贸易这件事的极大热情，与其说是因为郁金香本身的美丽，倒不如说更多的是源于意识到倒卖球根可以挣钱。这才是真正值得投资的事业。尽管已经有源源不断的金钱流入共和国，但它的市民们仍然觉得钱还是太少了。

8 花商

外国人惊讶于黄金时代荷兰人享受的物质财富，并且从未停止质疑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联省的执政者和富商们可能确实很有钱，但是他们生活的这片地方却是全欧洲自然资源最匮乏的地区之一。没有哪个国家比荷兰共和国更缺少富饶的耕地、美丽的乡村以及宜人的气候。从被战争蹂躏破坏的南方，到泥潭沼泽遍野的北方各省，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算得上充满生机和希望。

有个英国人曾经轻蔑地形容这个国家为“沼泽遍地……地球上最不美好的地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城市——阿姆斯特丹，其实就是建立在一片沼泽之上，要想到达这里，就要先穿过须德海。它是一个50英里长的内陆海，里面布满沙洲和危险的浅滩。英国大使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这样形容这里的空气和气候：“若不是有森林净化，将成天雾气弥漫”“气候恶劣而无常”。荷兰的天气变化无常，空气因阴冷、潮湿，不利于健康，还容易传播热病和瘟疫。

对于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们而言，有足够的金钱让自己过得舒服。对于农场主们（至少是那些幸运的拥有马尔河和马斯河沿岸仅存的富饶土地的农场主）来说，黄金时代的日子也过得不错。不但整个共和国的国内市场需要他们的产品，神圣罗马帝国也需要进口他们生产的粮食，因为1618年到1648年之间30年的北部新教徒与南方天主教徒之间的战争给当地的农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然而，对于织工、木匠、铁匠、鞋匠以及市井商贩这类生活在城镇里的手工业阶级来说，生活却是非常贫苦的。

在17世纪，几乎整个手工业阶级都处于工作时间超长、工资微薄的状态。在一天漫长的工作结束后，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但家不过是一个狭窄的小房子，顶多有一两个房间，连家具都没有几件。即使是这样，依然因为供不应求而租金很高。这个国家连饮食也是很单调的。对于在这样的艰难生活中痛苦挣扎的穷人们来说，播种球根，坐等它们开花就可以丰衣足食的日子确实是令人无法抗拒的。

很多年来，荷兰手工业者都是天不亮就开始工作，到日落西山才可以休息。到1630年，因为城市里的小工厂下半夜就开工发出的噪声过大，一些城市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漂洗工深夜两点以前开工；禁止帽子商人凌晨四点以前营业。铁匠受到的限制最严格，因为铁匠铺的噪声最大，所以他们被要求黎明钟声敲响之前都不得开张。

在这样漫长、辛苦的一天里，荷兰手工业者就靠芝士点心、冷腌鱼和每天中午的一顿正餐维持。这顿正餐通常也只有一个菜，也就是一种叫作"全家福"（*hutspot*） 的传统炖菜，里面有切碎的羊肉、萝卜、醋和梅子干，一起加上油脂煮沸。按理说这道菜应该慢炖3个小时以上才行，但要赶上困难时期，工作又繁忙，很可能炖不到1小时就端上桌。用惊骇的法国游客的话说，这时的炖菜就是"一锅加了盐和肉豆蔻的水，里面飘着羊杂和碎肉，一丁点食物的香味都没有"。

然而，对于荷兰人自己来说，就连欠火候的全家福也是偶尔奢侈一次才能吃得上的佳肴。那些连肉都买不起的人只能靠蔬菜和黏黏的黑麦面包度日。这种面包体型巨大，一个最少也有12磅重。对于清苦的家庭来说，一个面包就是全家一天的口粮。荷兰人的饮食风格总体比较单调。比如，所谓海鲜就仅限于鲱鱼和鳕鱼。贝类虽然很多，但却被认为是最糟糕的食物。曾经有家大宅子里的女佣因为被要求吃大马哈鱼而不能忍受，并且恳求主人每周最多吃两次。

正餐之后，马上又要开始工作，并且会一直持续到日落之后。如果

灯光足够，甚至要到更晚。在整个黄金时代，每天工作14个小时是司空见惯的。1637年在莱顿，连续工作16个小时的纺织工人因为需要挣钱，甚至还主动要求加班。当时的假期也很少，每周工作6天，宗教改革的一个不那么受欢迎的结果是，不少本来需要庆祝的天主教节日也被取消了。

手工业阶层从不抱怨工作时间太长，因为他们的工钱是按时计算的，所以他们能挣多少钱跟每周可以工作多少小时息息相关。一个在夏天看来报酬还行的工作，到冬天白昼变短以后，可能就只够提供勉强糊口的工资。即便是赶上市场景气、白昼又长的时候，每小时的工资也就在半个荷兰币到两个荷兰币之间，成百上千的荷兰穷人每天长时间辛苦工作才挣不到一荷兰盾。最终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周日不允许工作的年代，一个五口之家最少要280荷兰盾才能维持生计，而一个荷兰手工业者每年的收入一般不会超过300荷兰盾。

而那些挣得略多的人，日子未必就能好过多少。手工业者认为有利可图的买卖都被控制在行业协会手里。这些协会向会员收取高额的会费，用以支付经常举办的表彰协会卓越贡献的宴会和招待会。很多手工业者在完成了漫长的低薪学徒生涯之后，又因为交不起会费而不得不一辈子打短工。即使是在黄金时代的最高峰，当大笔的投资和富贸易带来的财富流入执政者们的保险箱里时，共和国的手工业者们却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加入协会，加入的结果往往是钱都拿去交了会费，连学徒都雇不起了。

由此可见，尽管联省共和国非常富有，但是富有的人却屈指可数。确实，有些手工业者挣得不少，即使是穷人挣的工资也相当于其他国家穷人的两倍，但是相对的，联省的税收和物价也普遍偏高。即便是有工作的人也要日日为钱发愁，而他们的妻子们大多也要被迫工作以贴补家用。

那时一个典型的荷兰家庭，几乎没有任何闲钱可以支配，更没有什么像样的财产。如果这家人是手工业者，生活在人口总和占了共和国总人口四分之一的那几个大城市里，那么他们很可能是住在拥挤街道两边整齐的小房子里，橡木的大门上了蜡或是刷成绿色。房子内部极其干净，因为反复的打扫擦拭而总是潮气不散。荷兰人对洁净的苛求让外国人印象深刻。访客都必须先在户外穿的鞋外面套上稻草编的拖鞋才能进门，以免把尘土带到屋内。干净整洁的同时，难免也觉得空落。手工业者家里顶多能有张桌子，有个空荡荡的碗柜和一些餐具，还有几把直背椅，大概也就1荷兰盾一把。而最贵的家具莫过于床。攒够床钱可是要颇费些时候的。最便宜的一种叫橱柜床，为了保暖要嵌进墙里面。这种床非常小，以至于在这个床上睡觉根本不能完全躺平。即便如此，也要10～15荷兰盾才能买到一张。只有商人阶层的成员才能买得起可以自主站立的现代样式的床，价格要高达100荷兰盾。在普通手工业者家里，小孩子就睡长椅或木板，再不然就睡父母床下的抽屉里。一旦年满14岁，他们就要出去找工作为家里挣钱了。

此外，到1630年，手工业者阶层本就不稳定的生计又受到从南方不断涌入的新教难民的威胁。从前一个世纪起，联省人就意识到城市人口已经趋于饱和了。因为所有的耕地，都集中在三个相对富饶的省份，即位于联省中心位置的荷兰省、海尔德兰省和乌特勒支省。自然的，人口也都往这些地方集中（另一个比较兴旺的南方地区是泽兰省，那里的人们以渔业为主，而其他几个省份几乎都不能供养太多人口）。加上从荷兰南部涌入的成千上万的移民，人口一下膨胀至大约200万。新移民们也都需要找工作，虽然有些移民本身很有钱，但是仍然不足以缓解就业和生存的压力。城市人口过多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些本来就不富有的人，更是发现自己的生存空间越来越有限了。

然而，17世纪上半叶的联省共和国在更高层面上具有一种其他欧洲国家都不具备的重要的国家特质，即人们相信社会的流动是每个荷兰人

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一个农民认定无论发生什么，自己只能是个农民；就如一个人是店主，他的父辈肯定也是店主，他的后代也必然还是店主。但是在联省则不同。一个移民的儿子可以变成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里最富有的人，甚至还可以进入统治阶层，没有人会在乎他卑微的出身；一个小村子里的农民可以到大城市里闯荡；一个中等阶级的手工业者，偶尔买上一张驶向波罗的海的货船的股票，收到的分红用来再投资，有一天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货船。在当时，机会确实是存在的，人们看得到，也迫切地想要抓住。正如一位佛兰德的牧师威廉·博达尔缇厄斯（Willem Baudartius）在1624年说的那样："有一分钱可挣的地方，会有十双手来抢。"如果你很穷，如果你想在黄金时代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上挣口饭吃，你很可能只会愈加沦落，而不是飞黄腾达。

黄金时代对荷兰人来说，还是一个孕育着希望和变化的时代。穷人和富人一样心怀期待，所以他们比谁都更渴望到球根贸易中试试手气。随着对郁金香需求的增长，以及个别品种售价的年年攀升，这个行业可能带来的巨大利润也越来越显而易见。17世纪30年代初，一个新兴的购买团体开始把触角伸向荷兰共和国的花房。这批新人既不是鉴赏家，也不懂培植球根的事。他们管自己叫"花商"，他们唯一感兴趣的只是靠郁金香挣钱。

最初的花商可能是想做种植者。靠一个简单的球根，一个冬天就转手变现显然是个非常吸引人的主意，尤其能吸引游商、无业者和机会主义者的眼球。荷兰社会中这些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的人，尤其看好这个看起来很容易的挣钱机会。那些拼命工作却挣不到种植者收入零头的手工业者们也逐渐发现了郁金香贸易的吸引力。相对而言，对于那些已经收入不菲，或者是已经有固定职业，生活富裕的人来说，郁金香贸易则没有那么诱人。

很多花商自然都会有建造一个小花房的打算。到17世纪30年代，原本流行于执政者、富商阶层的园艺时尚已经风靡整个荷兰。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的许多手工业者都在城外购置了小片的土地。在郁金香狂热兴起前，这些土地多是用来种植蔬菜的，而且有些小花园还是惊人的精致复杂的。威廉·布里尔顿爵士就曾观察过莱顿的一个穷人的花园，花园中的灌木修剪成各种造型，“有的是士兵的形象，有的是骑在马上的将军的形象”。另外一个英国旅行家彼得·芒迪（Peter Mundy）认为，侍弄一小片花园能够帮助阿姆斯特丹人应对在沼泽气候中生活带来的阴郁情绪。他在自己的游记中写道：“其他国家的人民能拥有的田野和草坪让荷兰人无比羡慕，于是他们用在小花园里种下奇花异草来弥补这种空虚……”

不光是城市里的手工业者，连小村镇里的农民也同样享受园艺带来的乐趣。在黄金时代的高峰，哪怕是最小的村子里也会有种植者俱乐部；每个俱乐部还有自己的章程和庆祝活动。大多数俱乐部会举办春季赛花会。就像今天一样，不同品种的花卉被展示在一起，相互比较后评选出优胜者并颁发奖励。比赛结束后还有以祝贺获胜花卉为名义的宴会（有外国观察者挖苦说这不过是为大吃一顿找个借口）。无论如何，园艺已经成为荷兰一个全民投入的热情所在。

1635年之前，第一批花商对球根的第一笔实验性投资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消息由此传开，一些新来的人也开始加入投资郁金香的行列。当时的作者和小册子写手们一致指出，加入的这些人大多是织工，他们比别的手工业者占优势的一点在于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纺织机器典当或抵押，这样就有了投资球根贸易的第一笔资金。但是很快，其他行业的人也加入了投资的行列，其中不乏固定职业的中等阶层中的律师和牧师。

所有手工业者都在做这个发财梦。有一部分人拿得出一小笔资金投资郁金香，机会主义者能投入的钱则少一些，但是却更敢于冒风险，甘

愿倾其所有。荷兰社会中两种最明显的特质在这时起了重要的作用：强烈的攒钱欲望和忘我的赌博精神。这两种特质看起来互相矛盾，但是却共同作用，成为郁金香狂热最大的驱动力。

联省人民对于入不敷出有一种极大的恐惧。这令来访的外国人非常诧异。要知道1600年到1630年间，联省人收入普遍增长，也就意味着大部分荷兰家庭是有存款的（这在当时的欧洲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当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银行，我们也就无法知晓在共和国普遍的存款数字大约是多少。但是威廉·坦普尔爵士显然想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简朴的荷兰人可能会将收入的五分之一用于储蓄。如果我们以这个推断为基础计算，一个生活水平一般的手工业者一年收入300～500荷兰盾，那么一年有60～100荷兰盾可用于投资。坦普尔的估算是基于商人阶层，而手工业者阶层的生活要比他们更接近于贫困线。所以，他的这种粗略估计可能过于乐观。即便如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父母都在工作挣钱的家庭，在景气的年份里，简朴度日，一年到头也能攒下20～50荷兰盾。平常时候，这些钱可能就用来奢侈一把，买些亚麻、家具和瓷器。但是，即使是在郁金香价格自始至终居高不下的17世纪20年代，这笔积蓄也足够买几个球根的了。

正如攒钱的欲望一样，赌博精神也同样感染着荷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生意人威廉·于塞尔林克斯（Willem Usselincx）曾经说过，只要钱能生钱，就没有一个荷兰人会把钱藏在旧袜子里。对于有钱人而言，赌博可能意味着在他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投资一艘有些风险的去印度的商船；对社会里其他阶层而言，赌博通常是艰难生活的必然结果。很多荷兰人在这个人口过多的国家里挣扎度日，努力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在黄金时代，彩票在荷兰就已经像今天一样流行了。对很多人来说，赢得赌注是最诱人的赚钱方法。

荷兰人有好赌成性的坏名声。法国旅行家夏尔·奥吉耶（Charles

Ogier）就写道，在鹿特丹几乎都没法找到一个行李搬运工，因为只要你选定一个，就会有另一个走上前来跟他打赌，胜者才能得到生意。当代记录中也提到一个叫贝伦特·贝克（Barent Bakker）的人赢得了一个有生命危险的赌局，赌的是他可以坐在和面机里，从泰瑟尔岛穿过须德海到达维灵根。还有一个叫亚伯拉罕·范·德·施特恩（Abraham van der Steen）的旅店主人因为打赌罗马一根特定的柱子的外观而输掉了自己的房子。还有荷兰士兵在战役正在进行的同时打赌战役的输赢。

与这些疯狂的赌局相比，郁金香还像个合理的投资。种植球根比每周工作80个小时钉马掌或是织布轻松多了。再加上对郁金香的需求持续增长，优良品种的价格不断攀升，也难怪荷兰人认为自己遇到了每个赌徒梦寐以求的机会：一场只赢不输的赌局。

9 繁荣

在荷兰共和国北方各省与须德海之间，有很多低洼的岛屿，岛屿包围之中的避风海湾里有个中等大小的镇子叫霍伦，在弗里斯兰省的西部，南面就是须德海。须德海是个岛屿众多的大海，几乎把联省共和国拦腰切断。直到16世纪50年代，这里一直是荷兰一个重要的港口，因为与波罗的海的贸易而兴盛。谁知不到100年后，那些载满烟草、木材的大船全都驶向了阿姆斯特丹。霍伦市于是走向衰落，而且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了。

17世纪上半叶，在这个几近毁灭的小镇的镇中心有一栋大房子，门前竖立着三座郁金香的石头雕塑。除了后来被改建为天主教堂之外，这栋建筑本身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里却是郁金香狂热的发源地。

立在门前的郁金香石雕就是为了纪念这座房子是在1633年夏天用三株稀有的郁金香换来的。一个当地的历史学者泰奥多罗斯·费留斯（Theodorus Velius）在他记录的编年史中提到，就是在这一年，西弗里斯兰省郁金香的价格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三株郁金香换房子的消息流传开不久，又有人用一包球根换得了弗里西亚的一个农舍连带它周边的土地。

这些令人震惊的交易都发生在联省一个衰退凋敝的小镇上，这也是有不幸的事要发生的最初征兆。30年来，郁金香爱好者们还都是用钱在买花。而现在，第一次出现了把郁金香当钱用，而且还能顶好多钱的情况。

在不知道被交易的郁金香是何品种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知晓这桩买卖到底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就算西弗里斯兰省霍伦市的房价比不得阿姆斯特丹，一处体面的房产也起码能卖到500荷兰盾左右，而土质优良的农田则售价更高。由此可知这些球根的价钱按当时的标准算是很高了。确实，1633年以前，球根的价钱就已经持续增长好多年了。类似的惊人交易也可能之前就有只不过没有记录留存下来。更有可能那个农田换球根的交易是发生在两个拥有不止一处地产的鉴赏家朋友之间，而不会是某个农民为了几株鲜花抛弃自己维持生计的唯一源泉。即便如此，这些交易的分量仍然远远超过17世纪20年代的其他交易。

郁金香交易也是在时时变化的。17世纪30年代的球根买卖不再局限于“永远的奥古斯都”那样极稀少、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品种。其他一些上上等的品种，还有一些稍低级的郁金香，虽然也是数量有限，但是只要你出得起价钱，还是能从专业种植人手中买到的。由于想买球根的人不断增多，那些最受欢迎的品种的价格也开始上涨。起初比较缓慢，到1634年底就开始加速，整个1635年都在持续加速，直到1636年冬天，有的球根价格一周多就能翻倍。

郁金香狂热在1636年12月至1637年1月达到了最高峰。在那短短几周内，人和钱都一股脑儿地扎进了郁金香交易。整个联省的人纷纷投资球根，需求的急剧增长将价格不断推向新高。有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所有人都挣钱了，所以又吸引了更多的新手加入了贸易的大军。

一个当时的编年史记录者如此形容价格在两三个月中疯长的情形：花15荷兰盾买入的“总司令”（Admirael de Man）以175荷兰盾的价格转卖；黄色系的“莱顿的红与黄”价格增长了11倍，由原来的45荷兰盾涨至550荷兰盾。“大元帅”（Generalissimo）更从原来的95荷兰盾暴涨至900荷兰盾。另一种上上等的郁金香，也就是众人垂涎的豪达的“将军中的将军”，后来简称为豪达。这是一种花型硕大，花瓣为白底有红色火焰

花纹的郁金香。从1634年12月到1635年12月，它的价格涨了2/3；再到1636年5月短短半年间又长了50%；从1636年6月到1637年7月，价格更是上涨了2倍。所以这种起初就已经很昂贵的球根，从狂热时期最初的100荷兰盾涨到750荷兰盾只用了两年时间。

最著名的郁金香“永远的奥古斯都”当然更是疯涨。1633年球根的价格是5500荷兰盾，到1637年1月则是令人咋舌的10000荷兰盾。整个荷兰共和国也只有十几个人付得起这个价。这笔钱足够解决一个家庭半辈子的衣食住行；或者是买下阿姆斯特丹最繁华的运河边上最豪华的房子，还连带马车房和80英尺的花园。要知道当时阿姆斯特丹的房产可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便宜。

这样的盈利是惊人的。那些投身球根事业并获利匪浅的人忍不住要向亲朋好友吹嘘自己好运气的源泉；靠鲜花赚钱这种新鲜又让人不敢相信的故事更是一传十、十传百，而且所有故事里绝对没有赔钱的情节。以至于到1635年，郁金香能挣钱已经成了整个荷兰都在谈论的话题。

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人用斯海默的围垦田里的一块地换了六株郁金香；另一个故事说有个男人因为太痴迷于郁金香，结果连未婚妻都改嫁他人了。第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富有的阿姆斯特丹商人买到了一个珍贵稀有的红色系郁金香球根。他把球根放在他库房里一个柜台上，可是一转眼的工夫球根竟然消失了。他的仆人们把整个仓库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球根，后来他想到肯定是当时在仓库里的一个水手把球根拿走的。这个水手是一艘去东印度的船上的，这船航行3年了，所以水手一点儿都不知道郁金香狂热的事，他还以为自己只是拿了个洋葱。等商人终于在码头上找到他时，他正坐在一捆缆绳上，球根已经被吃得只剩一小块儿了。愤怒的商人于是把水手抓起来送进了监狱。第四个故事里有个英国旅行家，他也对郁金香一无所知。他在富有的荷兰朋友家做客时，发现温室里有个球根，于是就用随身的折叠小刀把球根切开了。非常不幸

的是，被他切开的是一个范·德·艾克司令球根（一种红色系郁金香，花瓣上有粗直的血红色条纹），价格不低于4000荷兰盾。这个手欠的英国人于是也被押送到地方官面前，最后被判为自己的破坏行为赔偿损失，至少故事里是这么讲的。

事实上，这些关于郁金香交易的故事，也包括当时流传的其他一些故事里的离奇情节，往轻了说是不可信，往重了说根本就是不可能。大多数故事都是小道传闻，其他一些则是起源于一些神职人员的布道，想要警告世人郁金香交易的危险性。但是，如果这些故事的本意是旨在打消人们涉入郁金香领域的念头，那可真是泛滥且无用。事实上，这些故事更让人觉得郁金香是人人渴望的，也是像进口一船肉豆蔻或一批瓷器一样能挣大钱的。关于郁金香交易挣钱的令人兴奋的谈论让越来越多的人忍不住要亲身体验。

究竟是什么，能让如此之多来自不同行业的人，都热切地投入到一项他们完全不了解的交易中来试试手气？利润的诱惑肯定是原因之一，人们期望可以挣到以前从没挣到过的那么多钱。原因之二，则是因为当时的联省刚刚从17世纪20年代漫长的经济萧条中恢复起来。这次萧条几乎贯穿了整个20年代，也是整个17世纪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萧条。导致萧条的主要原因是与西班牙的再度开战和西班牙的海上封锁。危机之后，荷兰经济整体迎来了强势复苏。经济形势从1631年或1632年开始好转，在整个30年代都保持着稳步增长。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荷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足。荷兰本地的一些因素也对人们加入郁金香交易有一定影响，比如在离阿姆斯特丹几英里之外的哈勒姆，很多织工都改行倒卖郁金香。因为虽然经济形势复苏了，但是莱顿开始成为荷兰纺织业的主导，哈勒姆的纺织业依然无可避免地衰落了。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1633年到1637年间在荷兰多个城市爆发的严重的黑死病疫情。编年史记录者泰奥多罗斯·费留斯当时就生活在哈勒姆。

据他记载，从1635年10月瘟疫爆发到1637年7月疫情彻底结束，共有8000市民因为瘟疫丧命，其中5700人是在1636年8月到11月间去世的；也就是说，在哈勒姆，每8个人中就有1个人染病去世。因为死人太多，都没有足够的坟墓安葬。这场可怕的瘟疫带来了两个主要后果。第一是劳动力紧缺，雇主们只能提高工资以争抢劳动力，所以工人们也开始能有点闲钱投入郁金香交易；第二是，或者说可能是，瘟疫让人们惧怕宿命，球根交易者也感染了绝望的情绪，所以才在球根交易上疯狂无度的投入。

不管是乐观主义者还是宿命论者，想用郁金香交易试试手气的花商新手们根本不敢奢望拥有豪达或范·德·艾克司令这样的名贵品种。他们最初只能倒卖一些最便宜、存量最多的球根。历史学家西蒙·沙曼（Simon Schama）指出，这些新手在一个价格很高的交易市场中能够立足主要是因为，在1634年，资深专业种植人刚好从国外引进了一批数量巨大的新品种，这有效地控制住了郁金香的价格。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能够支持这一说法，而且鉴于这些引进品种是最新的，所以也是最稀少的，那么也应当是最昂贵的。更合理的原因可能是，有些时间比较久远、人们比较熟知的郁金香品种在这一时期经过不断繁殖，数量已经足够满足需求，所以价格也就比较合理了。新手们主要就是以倒卖这类郁金香作为进入市场的敲门砖的。

进入郁金香市场并不难。只要有一笔小钱，找一个温室就够了。在1635年上半年，整个联省的球根市场前所未有地兴旺了起来。哪里有郁金香可买，哪里就有市场。鉴赏家和种植人已经颇具规模的城镇里又出现了大批花商：无论是哈勒姆还是阿姆斯特丹，豪达还是鹿特丹，乌特勒支或者代夫特，莱顿和阿尔克马尔，还有恩克赫伊曾、梅登布利克和霍伦市。

种植人和鉴赏家们不只是向新入行者销售库存的人，他们更是创造

这种交易，并且将其带入正轨、走向成熟的人。没有晦涩难懂的行规，也没有难以克服的障碍。买卖郁金香的规则就是建立在常识之上，在第一批花商出现之前，就已经被众人了解和认可了。

最早的郁金香交易中买卖的是球根。当郁金香的数量增长之后，这一点就有变化了。好像在1610年，就有一些不怎么值钱的郁金香是按“一花圃”卖出的。这种计量单位无法精确定义。哈勒姆的法律文件档案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买卖：在1611年，一个叫约斯（Joos）的药剂师把自己种植的四个花坛的郁金香卖给一个叫扬·布兰茨（Jan Brants）的人，买主为此支付了200荷兰盾。第二年，布兰茨又花了450荷兰盾买下了由达米斯·彼得森（Dammis Pietersz.）和哈勒姆啤酒厂主奥格斯汀·斯泰恩（Augustijn Steyn）共有的两个花圃。

这之后的某个时候（无法确切认定），人们又开始倒卖子球。这一步是符合逻辑的必然趋势。因为子球很快就会发育成球根，它们自然也应当有一定的价值。尽管如此，这一发展起初是备受争议的。首先是因为谁也不能保证子球能成活，其次是根本无法确定子球开出的花会不会和母球一样。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子球交易中存在一定风险。这一交易形式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才被接受。1611年春天，一个叫安德里斯·马修（Adries Mahieu）的鉴赏家被问到是否愿意向一个亚麻商人朋友出售一些子球，他反问他的朋友是不是真的想买“一只装在袋子里的猫”。他对子球的这种评价使另一位旁观者印象深刻，这位旁观者就是园丁马腾·德福特（Marten de Fort），于是他把这句话记录在了交易的法律档案里。

交易子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克劳修斯和其他早期的郁金香种植人已经发现，球根类植物在花期结束后就应当从土里挖出来，放到通风的架子上晾干储存至秋天，这样第二年才能长得更好。因此，球根的买卖就只能在夏天球根被挖出，球根能够实际交付的这几个月时间里进

行。子球则不同，主人们倾向于一结出来就卖掉，而实际上子球要等几年才能发育成熟。

销售子球成了让郁金香交易摆脱季节性限制的第一步。这意味着以前集中的短短4个月之内的交易期变为了现在的全年无休。球根子球往往在成熟前就被从母体上分离，这种零散的交易对稳定的郁金香交易其实没有什么威胁。但是它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特别是随着涌入郁金香市场的花商越来越多，要求郁金香全年交易的压力越来越大。

对于鉴赏家而言，只能在当年6月到第二年4月之间买卖球根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们希望在买花之前看到植物的样子，并且希望所有交易在种花时节到来前结束。但是这对于新兴的郁金香交易群体来说就太有局限性了。因为他们的球根根本不是用来种植的。传统的种植季和储存季的区别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他们不像自己的前辈一样希望欣赏到郁金香的美好，但是却比前辈们更看重郁金香带来的金钱利益。这些新入行者只想从花里榨出钱，而且是越多越好。虽然也有个别花商会把球根种下，然后销售长出来的子球，但更多的还是只专注于买入卖出赚取差价。从1635年秋天开始，球根贸易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不断壮大的花商队伍已经完全抛弃了鉴赏家们建立起来的传统的交易方式，他们不再满足于出售他们实际拥有的郁金香，而是开始销售还长在土中的郁金香。球根不再作为商品交换的单位。从这时起，人们交易的凭证变成了期票——其实就是一张纸片，上面写着被卖出的郁金香的情况。至于球根挖出的时间和提货时间等则一概没有。为了避免混乱，花田里每个球根边上也会插个牌子，写明郁金香的品种、重量和买家。

这种新体系有它自身的优势，即让郁金香交易在春天、秋天和冬天也成为可能。对于郁金香球根从土里挖出来之前就可以交易的这种方式，那些既无技术又无愿望参与种植的花商格外感兴趣。但是这种形式也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危险。购买人既无法检查他们购买的球根，也不能

看到花开的样子，所以球根质量根本没有任何保障。花商也无法确定自己购买的球根是否真的属于卖家所有，甚至无法确定货物是否真正存在。

荷兰人将郁金香狂热的这一阶段称为“风中的交易”（*windhandel*）。这个荷兰语词语本身有着非常丰富的含义。对水手而言，它指的是在风中掌舵行驶的困难；对股票经纪人来说，这个词是提醒他们，无论是郁金香交易者的股票还是他们所谓的获利，都脆弱得如一张随风飘舞的纸片；然而对花商而言，这个词则意味着郁金香交易的简单易行，既无规则限制，又无组织约束。

也正是这种交易形式的创新，为郁金香狂热的更加肆无忌惮创造了条件。期票的引入不仅让郁金香交易成为全年无休的生意，更让这种交易变成了一种投机买卖。因为球根实物要几个月之后才能真正交付，所以人们买卖甚至再转卖的已不再是球根，而是期票。

花朵之美在这里已经完全抽象化了，交易者在乎的只有背后的利益。反复转手造成所有权归属的混乱和可疑也成了这一时期球根交易最主要的特点。没多久，连本来固守的道德观念也被抛诸脑后。明知自己不可能实现交付，却还是把所谓的郁金香卖给没有现金可支付或是本来也不打算种植的买家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

购买的不是实物，而是几个月之后才能实现交付的球根。郁金香交易者们创造出的这种交易形式，其实类似于现在我们所称的期货市场。简言之，就是一种投机形式。商人投机的对象可以是球根，也可能是石油，他要承诺在将来某个确定的时间里支付确定的价款，实际上就是在赌这种货物在将来的价格到底是涨是跌。这是一件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事件。在17世纪30年代，期货的概念还是新鲜事物。20多年前，第一个期货市场首先出现在阿姆斯特丹。期货交易的内容也只是木材、烟草和香料。郁金香是第一种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以外被买卖的货物；郁金香交

易也是第一种不是由高级别商人和证券交易专业人士进行的期货交易。

这当然是郁金香贸易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到1635年，联省的执政者和大商人们可选择的投资项目已经越来越丰富。他们可以购买有保证利息的政府债券，或是把钱存入不断涌现的新兴银行里。若是他们更有冒险精神，则可以在交易所买股票、投资城市排水系统项目，或是投资与美洲的海运贸易。当然，投资这类贸易都需要巨大的资本，而共和国里的手工业者、小商贩或是农场佃户们关心的则是如何找到一个用他们手里仅有的一点小钱盈利的机会。17世纪没有建房互助协会，没有信托投资公司，没有私人股权计划，没有廉价股份，也没有税收减免和合法避税。对于一个哈勒姆的织工而言，投资的意义只是买些亚麻或支付购买新织布机的定金。突然之间，出现了一条看起来额外诱人的赚钱新路子，操作简单、获利又有保障，最重要的是，几乎不需要多少启动资金。

期货交易其实是一种高度投机的商业形式，但是也有明显的优势。举例来说，一个卖家可以在等待自己的货船从海外归来，或是因其他什么原因还没有实际占有他所卖之物的时候就将货物卖出，实际上是卖出了货物会在他实际占有时降价的风险。卖家可以要求买家支付一部分押金，大约10%左右，再约定一个确定的日期支付一个确定的数字，然后就可以据此安排自己的财务了。对买家来说，只要猜对价格走向，期货交易同样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比如一个花商出价100荷兰盾购买一张期票获得一株四个月后出土的豪达郁金香的所有权，他当然是笃定在球根出土之前自己可以以更高的价钱卖出。如果到时候他只能以80荷兰盾的价格卖出，那么显然他就损失了20荷兰盾。但是在当时郁金香价格持续疯长的市场情形下，预计市场走向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而对大批涌入郁金香市场的新手来说，赔钱的可能是想都没想过的。

事实上，期货市场根本不是这么简单的事，而且是比它最初显现的

更具风险，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危险的。假设一个只有50荷兰盾资金的花商认定市场价格会走高，把小心谨慎抛诸脑后，一口气买下5个单价100荷兰盾的豪达郁金香，他的钱刚好可以支付每个球根10%的预付款。如果到球根出土时，郁金香价格翻倍，那么50荷兰盾实际上变成了价值1000荷兰盾的郁金香。以此时的高价卖出郁金香后，他不但可以付清欠款，还可以净赚500荷兰盾。因此，如果郁金香贸易保持上涨的势头，贫穷的手工业者确实可以靠郁金香赚大钱。但是一旦郁金香价格跌落，就是毁灭性的灾难，破产将不可避免。还是上面那个例子，若出土时郁金香价格仅为原来的一半，那么压上自己全部家当的花商面临的是200荷兰盾的损失，对他而言是怎么也支付不了的。

荷兰政府对“卖空”的风险实际上是深感忧虑的。事实上，政府一直判定买卖双方都不实际占有货物的这种交易不仅非常危险，更是本质上不道德的行为。自1608年这种形式出现之后的两年内，政府多次立法禁止。在1621、1623、1624、1630年和1636年都不断有禁止期货贸易的法律被通过。所以在17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郁金香期货贸易理论上根本是不合法的，不过从联省议会六次颁布法案禁止郁金香交易的实践上也可以看出，这些法令的执行有多么不成功。

卖空确实是非常危险的，即使当涉及的货物是不那么虚无缥缈的波罗的海木材时也是一样。就算是以期货交易这样弹性较大的标准来说，郁金香也是一种极不稳定的货物。一个买木材的商人至少明确地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而一个购买到出土时才交付的球根的花商却不能确定自己将来会得到什么。他是在拿一件有生命的事物打赌。要想成功，不但要有对几个月后球根价格的精明判断，还要了解球根在土里生长时发生了什么。

最划算的买卖是购买即将发育出子球的球根，这样子球很快也可以分割开来独立销售。所以，能够快速生长的球根比那些还不成熟的小球

根或是已经完全成熟结不出太多子球就要死去的老球根更有价值。但是，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种植者也无法判断出一个特定种类的球根能够发育成什么样子。所以对新手而言，球根交易更是一种完全投机性质的交易。

为了让郁金香交易者们能够对郁金香长出来的样子有个大致的猜测，实践中渐渐形成了说明球根种下时的重量的习惯。重量是以“分”（*azen* ）为单位的，这是一种从金匠工作中引进的极小的重量单位。一分大概略少于两千分之一盎司（二十分之一克）。一个成熟的球根重量可以从50分到1000分不等，主要取决于球根种类。除重量外，还要说明球根可以出土的时间，所以花商们交易的期票上都写着球根种下时的重量，而买主在自己的账簿上也通常会标注出一栏用以记录自己购买的球根重量。

至此，球根依重量而非个数买卖的交易方式已经呼之欲出。一方面，这样的方式让交易更公平。旧有的依个数买卖球根的情况下，一个重100分还未发育成熟、可能一两年内还结不出子球的球根和一个重400分发育完好的成熟球根卖一样的价格显然是不尽合理的。依重量买卖的价格则可以更准确地体现球根的发育状况。但是这种新体系也意味着球根价格的增长速度比以往更快了。很多球根在土里生长时，重量变化非常大，所以就同一种类而言，即使每分的价格从九、十月份球根下种到第二年六月球根出土时都没有变化，但是因为球根生长、重量增加，球根的总价值也毫无疑问会大幅度升高。

郁金香交易的记录可以用来说明投资一个球根可以产生怎样惊人的效益。一个阿尔克马尔的葡萄酒商人格里特·博施（Gerrit Bosch）在城外自家花园里种下了一株总督郁金香。1636年秋天种下时的重量为81分，到1637年秋天出土时，增长了4倍达到416分。同一个花园里还有一株利夫肯司令，种下时是48分，出土时是224分，另一株“完美的利夫

肯”（Paragon Liefkens）从131分长到了434分。即使这三种花每分的单价没有变化，短短九个月里，博施的客户也能够赚到330%到514%不等的利润。整个联省大概都找不出比这盈利更快、更惊人，而且稳赚不赔的交易了。一艘商船来往联省和印度之间要2年左右，而且在海上的东印度公司商船还面临着疾病、失事、海盗和西班牙袭击的风险。即使是富贸易也会让荷兰少数有资格投资其中的特权阶层面临荷兰花商们根本不知晓的风险。

最早的关于依重量交易的记录开始于1634年12月。当时一个哈勒姆种植人大卫·德·米尔德和一个亚麻工人扬·奥克森（Jan Ocksz.）一起到扬·范·达梅在“小木板路”上的花园里，在德·米尔德的建议下，奥克森购买了两个红白豪达，重量分别是30分，价格为30荷兰币——也就是1.5荷兰盾每分。奥克森还买了两个范·德·艾克司令，但不是按重量，而是按132荷兰盾一个球根的价钱买的。这个记录说明，到1634年旧有的按个数销售球根的方式也仍然在施行。然而到1635年，所有留存下来的记录中都已经改为依重量销售的方式了。

随着郁金香交易的发展壮大和复杂化，花商有时会在这种买卖体系的基础上加入新的条件。比如说，买卖双方可以约定购买球根的条件是，在出土时球根必须达到某一特定的重量。在另一个涉及德·米尔德的交易记录中就显示，1635年10月底，有一个木鞋制造者亨利克·卢卡森（Henrick Lucasz.）在一个由约斯特·范·哈弗比克（Joost van Haverbeeck）组织的拍卖会上购买了两种郁金香，一个是红色系的塞依布洛姆·范·科宁（Saeyblom van Coningh），一个是紫色系的拉图尔郁金香（Latour）。在德·米尔德作为见证人的情况下，卢卡森承诺为这两个球根分别支付30荷兰盾和27荷兰盾的价款，但条件是出土时的重量分别不得低于7.5分和16分。而事实上，出土时的重量仅为2分和13分。所以卢卡森要求范·哈弗比克退还他已经支付的定金，而以脾气暴躁闻名的范·哈弗比克愤怒地拒绝了，最后事情还闹到了法务官面前（要说卢卡

森算是走运的了，当时的记录显示范·哈弗比克和他同样暴躁的父亲曾多次向客户发出暴力威胁，而且他们还是1635年冬天德·米尔德的花园遭肆意毁坏的头号嫌疑人）。

其他的买卖形式也是有可能的。对于昂贵的球根，贫穷的花商开始合资购买，约定每人占有球根的一定比例。有一个叫扬·阿德莫里尔（Jan Admirael）的阿姆斯特丹种植人就把三个球根的一半所有权卖给了一个叫西蒙·范·珀尔齐（Simon van Poelenburch）的客户。阿德莫里尔还与一个叫马腾·克里瑟（Marten Creitser）的商人达成了一项复杂的交易，同意用一些球根和180荷兰盾的现金交换克里瑟拥有的11幅油画和一个雕刻品。

然而，按重量销售的方法并不意味着同一品种的郁金香在荷兰共和国的价格是统一的。在一个无论多重要的信息也只能靠人骑马传递的时期，根本不可能及时准确地把郁金香价格的变化从一地传达到另一地。因此，郁金香没有统一的市场，每个城镇郁金香的价格都有所差别，有的地方整体价高，有的地方则便宜一些。

另一个让本就混乱的定价体系更混乱的原因是，定价不仅受个体花商个人偏好的影响，还要受哪些郁金香刚刚买入、哪些刚刚卖出、哪种花朵最近比较流行、哪种球根产量增多等因素的影响。还有大个的球根每分的单价通常比小个球根便宜些，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在同一地同一天买的球根，价格差别都会很大。在阿尔克马尔方圆一到两个小时路程的范围内，7个豪达球根售出的价钱从6荷兰盾3荷兰币每分到10荷兰盾2荷兰币每分不等。这也就意味着，总价款为765～1500荷兰盾每个球根不等。还有一种叫“完美的范·代夫特”（Paragon van Delft）的郁金香，3个球根在几分钟之内，单价先从1荷兰盾14荷兰币每分涨到2荷兰盾4荷兰币每分，然后又涨到4荷兰盾2荷兰币每分。而重量分别为92分、214分和446分的范·德·艾克司令，则分别以710荷兰盾、

1045荷兰盾和1620荷兰盾的价格售出。1635～1636年上半年，球根价格疯长带来的后果是，本来只把球根卖给鉴赏家或圈子内部流通的种植人和交易者们也意识到新的赚钱机会来了。他们开始把自己的球根卖给涌入这个市场的花商们。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就是，一些种植人联合起来好让资金和库存达到最大化，有的还成立了一些专门经营球根的公司。在1635年9月，一个叫小科内利斯·博尔（Cornelis Bol the Younger）的商人和一个叫扬·库珀（Jan Coopall）的种植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其中博尔出资8746荷兰盾2荷兰币作为公司的资本。1636年12月，又有两个哈勒姆人亨利克·雅各布森（Henrick Jacobsz.）和罗兰德·维尔罗斯雷腾（Roeland Verroustraeten）联手阿姆斯特丹的菲利普·杨森（Philips Jansz.）和马缇斯·布勒姆（Matthijs Bloem）共同做起了生意。公司的章程里面说明了生意如何运作的一些细节。35岁的维尔罗斯雷腾本来就是个有经验的贸易商，他是唯一被授权可以对外交易球根的，还可以使用另外三个股东筹集的资金买卖郁金香。同时4个股东都保证只能以公司的名义，而不能以个人名义进行交易。

到1636年秋天，无论是郁金香交易公司还是专业种植人都不得不慎重思考一下，该把哪些库存种植下去以备来年。最值钱的品种——司令、将军、大元帅及它们同属的品种——因为过于昂贵，根本不是普通花商买得起的。所以市场最底层贫穷的交易者们都要求供应一些相对不那么出名但是数量巨大，因此价格也能便宜得多的品种。17世纪30年代初，上上等郁金香的交易是整个郁金香贸易的主要内容，这些郁金香被称为“单件货”，也就是按每个球根单独计价出售的品种。而那些价格便宜的球根则甚至都不按每分计价，而是按每千分。当时以这种方式销售的品种中还包括一些后来变得知名的品种，比如红色花纹的“大雁”（Rotgans）和“奥德内”（Oudenaers），还有罕见的白纹紫底的莱克·范·莱恩（Lack van Rhijn）。这些花因为它们相对强烈、普遍的颜色搭配而不受当时的鉴赏家和种植人的喜爱，但是却比那些稀有的、花纹清浅的上等郁金香更为今天的园丁们所熟知。

一些有野心的手工业者在1634年或1635年就开始倒卖郁金香了，但似乎有记录的法律文件显示直到1636年夏天，大部分的郁金香还是由种植人直接卖给以种植为目的的客户。到当年秋天，整个市场就被以倒卖盈利为目的的花商占据了，而且到1936年12月和1637年1月，还有大批新的花商加入。

这些新加入的花商来自各行各业。根据当时的一个小册子作者的列举（可能考虑到诗句押韵的需要），花商们的本行包括玻璃工、伐木工、水管工、拆房工、木匠、铁匠、鞋匠、铜匠、泥瓦匠、卖肉的、卖糖的、磨咖啡的、酿酒的、看门的、制皮的和制革的，更别提还有农民、商人、小贩、理发师、老师和磨坊主。

没有什么关于1636年底两三个月，郁金香交易达到疯狂地步的记录留存至今。但是有一个短系列小册子里面讲到了酒馆交易的内容。这个作品虽然是小说化的，但是内容比较可信而且能够代表当时的现实。这三本小册子叫《讲真话和贪婪鬼之间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Samenspraecken tusschen Waermondt ende Gaergoedt*），这部作品是1937年初出版的，作者的真实姓名未知，出版者是阿德里安·罗曼（Andriaen Roman），也是当时哈勒姆最主要的出版商。

书中的贪婪鬼原本是一个织布工，他抛弃了自己的手艺成了一名花商，靠抵押自己的工具筹集了买花的资本，然后一个城镇一个城镇地倒卖球根。偶然一次他回到家里，遇见了以前的老同行讲真话。讲真话还没有被卷入郁金香交易的风潮，他用葡萄酒和啤酒热情地招待这位老朋友。贪婪鬼企图说服讲真话也加入买卖郁金香的行列，这样他们就可以同样变得富有。他跟讲真话说，你辛辛苦苦经营自己的生意才能挣到10%的利润，但是买卖郁金香能挣100%甚至更多：“没错，十倍、百倍，还有时千倍。”

《对话》对于郁金香交易的观点是有预见性和教育性的。贪婪鬼是

个极端傲慢的形象，而且愚蠢地坚信球根的价格会永远上涨。他吹嘘自己已经靠倒卖郁金香挣了一大笔钱，足可维持生计。而他的朋友们——其他的织工和园丁们——也都很有钱，都可以乘坐华丽的马车走村串乡，到各个酒馆中谈买卖。

讲真话则被作者塑造为困惑但是诚实的入门者，他不相信一个织工能挣到那么多钱。在他的一再追问下，贪婪鬼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交易虽然达成了，但是却并不能拿到钱，而是要等到第二年夏天郁金香再出土时才能兑现。但是他还是坚称“这项交易很稳定”，再做一两年，他就可以挣到足够的钱让自己一辈子衣食无忧。最后他还说，要用挣到的钱买一个啤酒厂，一个地方官的职位，甚至是一个贵族身份。

讲真话并没有轻信贪婪鬼的话。他觉得这整件事好得过分，肯定有问题。他不明白那些感染上郁金香狂热的人们为什么敢于把全部家当甚至是借来的钱都押在郁金香交易上。尽管那些关于利润的描述很诱人，他还是告诉他的朋友自己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在1636年秋天，一定有很多荷兰人像讲真话一样认为郁金香交易好到不真实。但是也有成千上万的人不这么认为，他们倾尽所有存款、押上全部财产，只为了加入这喧嚣躁动的球根交易。

很多新手根本没什么闲钱，但是已经进入市场的花贩和花商正好可以抓住机会把他们的存货卖给这些对郁金香的价值完全不懂行的人。很快。交易就演变成卖方不但接受现金，还接受实物。对于那些没什么钱财的花商而言，他们全部的财产不过就是自己手头有的那点东西，也就意味着，为了买球根，只能有什么就给什么。小说里的贪婪鬼就用了够做一件大衣和一套套装的布料，还有一夸脱的李子代替押金。而现实里的花商，如果是手工业者，可能会用工具、布料和家庭生活物品交换；如果是农民，可能会用牲畜或谷物；如果是富裕一些的人，可能会用油画或其他奢侈品来代替押金。余额只有到球根实物交付时才支付，也就

是到球根出土的时候。有时候，支付时间还可以更灵活：曾经有一个协议里就规定，一个哈勒姆小店主埃特·杜森（Aert Ducens）以1600荷兰盾的价格把自己整个花园卖给了当地的一个叫泽维林·范·德·霍伊费尔（Severijn van de Heuvel）的绅士，同时约定支付费用的期限为1638年元旦，距协议达成日期有一年之久。

《对话》里面还有其他一些例子，讲的也是当用实物代替押金成为习惯之后，一些没有经验的郁金香商人达成的各种各样的协议。贪婪鬼在给讲真话介绍自己账本上标注的与别人达成的协议时就提到，一次他以525荷兰盾的价格卖出了一包“白王冠”（Witte Croon）球根，得到的押金就是4头牛。还有一次，他买了一大批根滕（Genten）球根，付出的押金是“我最好的一件短外套，一个玫瑰勋章，和一个连着银链子可以挂在孩子颈上的钱币”，并且答应球根实际交付时再支付1800荷兰盾现金。还有一些协议比这些更复杂。不过，在《对话》中提到花商有时会用一个品种的球根交换另一个品种的球根。贪婪鬼最奢侈的一次交易就是用一个价值60荷兰盾的银餐具，一批“黄王冠”（Gheele Croonen）和200荷兰盾现金换来了同等数量的白王冠郁金香、马匹和一辆马车、两个银碗和150荷兰盾的现金。

1636年秋冬交替之际，郁金香交易形势良好。花商的数量和流通中的球根的数量都在不断增加，价格稳步上升，产生了巨大的利润。然而现实是，花商们打造的交易建立在一个最不稳定的基础上。

这不仅仅是市场能否支撑球根价格如此快速增长的简单问题。当一个花商无法检查他所购买的球根时，所有的问题都出现了。首先，没人保证球根在种植过程中能得到适当的照料。哈勒姆档案中就记录了一个案例，当地有一个叫耶鲁恩·扬森（Jeuriaen Jansz.）的面包师傅。1636年他在马腾·克里瑟在阿姆斯特丹的花园里看到了一种美丽的利夫肯司令郁金香。杨森于是与主人达成协议要购买一个子球。几个月后，面包

师在酒馆喝酒的时候遇到一个花商，并被告知他预定的球根还没长好就被从土里挖出来，很可能已经损坏了。杨森不得不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才让克里瑟免除他依原约定购买子球的义务。

即使是富有的鉴赏家也可能买到损坏的商品。科内利斯·居尔登维根（Cornelis Guldewagen）曾经是哈勒姆的市议员，他从海牙的安东尼·范·弗洛赖（Anthony van Flory）手里买了1300多个郁金香，并且雇佣贝伦特·卡多斯把这些花种在护城河畔城门附近的花园里。但是给球根拆开包装后，卡多斯和他的助手却发现这些球根被从土里挖出来时一定是非常随意的，至少有一半都被严重损坏了。

再有就是当时还不被理解的杂色现象也引发了严重的问题。任何购买子球的人都要冒的一种风险，就是可能买到的是不能杂色的繁殖球根，而不是他想要的已经出现杂色的郁金香。在1633年5月，阿姆斯特丹一个著名的郁金香商人亚伯拉罕·德·戈耶尔（Abraham de Goyer）在一个拍卖会上买了两个“完美的席尔德”（Paragon Schilder）。这个拍卖会就是由创造出这一品种的亚伯拉罕·德·席尔德（Abraham de schilder）本人组织的。“完美的席尔德”在当时是个新品种，非常受追捧。由席尔德举办拍卖会的日期来看，德·戈耶尔肯定是在那之前几天已经见到过这种郁金香盛开的样子并且深深为它着迷。反正以当时的标准，德·戈耶尔是花了不菲的价钱购买了两个球根，分别是50荷兰盾和41荷兰盾。德·戈耶尔把球根种在自己城外的花园里。在9个月漫长的等待之后，郁金香终于在1634年春天盛开，然而被寄予厚望的郁金香开出的根本不是德·戈耶尔期待的样子，席尔德的花园中让他着迷的纯白花瓣和生动的红色花纹完全不见踪影。他花了90荷兰盾买来的不过是颜色浑浊的低等单色郁金香。不过这个倒霉的种植者在18个月之后依然可以要求卖家退款，因为当时普遍认为，若子球不能达到母球的质量，一个有良好声望的球根交易者应当认定交易无效。

最严重的是一些明目张胆的诈骗行为，这在一个利润如此丰厚而管理又极其不规范的市场中肯定是难以避免的。就算是同一种类的球根，外表上也可能完全不一样。一个名贵的总督球和一个不那么值钱的紫色系球根看起来就没什么差别，比如范·英格兰司令（Admirael van Engeland）的球根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要判断到底是蓄意的欺骗还是无心的错误是很难的。荷兰共和国的法律档案中记录的案子里没有几个是被确切证明了的。在《对话》中，贪婪鬼就曾经听自己也有郁金香交易经历的表兄说，有人以为自己买到的是白王冠，实际得到的却是根本不值钱的普通郁金香。当然，因为所有球根看起来都很像，所以诈骗也都是到第二年春天郁金香开花了才能被发现。

尽管这些问题让一些保守、谨慎的荷兰人担忧，但是1636年秋天蜂拥加入交易市场的那些花商眼里依然只能看到交易带来的利润。因为对球根的需求每天都在增长，价格也上升得越来越快。当时的编年史作者莱乌韦·范·艾策马（Lieuwe van Aitzema）就记录道：但凡可以被称作郁金香的东西，即使是几个月前还因为毫无价值被扔到粪堆里的球根，现在也变得值钱了。

从各个层面上说，让郁金香价格疯涨至巅峰的所有因素都已经齐备了。很多不同的新品种被创造出来，其他品种不那么受欢迎但是易于买到。一小拨专业园丁致力于创造新的品种，同时供应少量既存品种。一大批有能力有热情的业余爱好者，数量绝不低于几百人，在自己的花园里种植郁金香，几乎每个城镇都可以看到郁金香的踪影。交易原则初步建立，还制定了评定花朵价值和级别的标准，由上上等至下等。主导市场的交易者和种植人之间由数以千计的花商衔接，他们愿意为了球根舍弃全部家当。最后，价格终于涨到了从来没有的高度。万事俱备，只差一个能把这些有抱负的郁金香交易者聚集到一起交易的地方。

10 金葡萄指示牌

在阿姆斯特丹市的核心位置，也就是这个城市以之为名的大坝上，有一个讲究的四方形4层建筑。这栋建筑是依佛兰德式样修建的，顶上还加盖了一个细高的钟塔。它对面就是中央银行，旁边则是市政大厅。这样的地理位置更能凸显它在这个城市乃至整个联省的中心角色。这就是阿姆斯特丹的新骄傲——市证券交易所。

短短几年前，现在在证券交易所的123间办公室里进行证券交易的这些人，还是在室外的阿姆斯特丹新桥上交易的。若赶上阴天下雨，则只能到圣奥拉夫教堂或城里的老教堂里。由于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初期迅速扩张，再加上海外贸易涌入，证券交易自然需要有一个不受天气影响的固定场所。于是新的证券交易所应运而生，于1610年开门营业。一些多疑、保守的阿姆斯特丹市民本来认为证券交易是种让人不放心的事，但是交易所大楼仅凭它宏伟的外观，就让阿姆斯特丹人折服了。

当时在证券交易所里进行交易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每天只有正午到下午两点一个时间段开放，一天的交易都要在这短短两个小时里完成。钟塔上的时针一指向12点，交易所里就会爆发出吵闹喧天的疯狂景象，难怪市民对证券交易颇有微词。因为交易时间仓促，几年前商人之间达成协议时还要仪式性地握手以示庄重，现在则变成了随便的、粗鲁的相互击个掌，然后就各自奔向下一个客户。

不少交易者都拿到了在交易所里进行交易的执照。到17世纪30年代，大概有400个正式的交易所交易员。另外还有800多个没有执照的自由交易者，可以在这里做一些低价、小额的证券交易。当代作家约瑟夫

·德·拉·维加（Joseph de la Vega）在对证券交易的记述中这样描写过一个自由交易者：“（这个交易者）一会儿咬指甲，一会儿拽手指，一会儿又闭上眼睛，踱了四步，还四次自言自语，以掌抚颊，好像牙痛似的，同时不断神秘兮兮的咳嗽出声。”维加没有说他描述的这个无关紧要的交易员凭自己仅有的那点钱是想买还是想卖。依1636年的情况而言，他的选择不可谓不丰富：至少有360种货物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交易，从贵金属到法国白兰地，应有尽有。然而郁金香却不在其中。

这点可能会令人感到惊讶，尤其是那些主观认定，像郁金香狂热这样著名的金融灾难肯定不只是程度深、范围广，还应该对当时的股票市场、贸易和整个荷兰经济都有重大的影响的人。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郁金香投资顶多只算荷兰经济生活的边缘地带。进行郁金香交易的都是业余新手，而不是专业的贸易商。郁金香交易也从来不遵从于股票交易的规范或习惯。事实上，郁金香交易是对交易所中正规交易的一种粗劣的模仿。这些人本来就是穷乡僻壤的村夫或生活拮据的市民，既不是金融家，也不了解交易，他们开始贩卖球根以前，大概连股票是什么都不知道。

郁金香虽然不在交易所里进行交易，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规矩的。事实上，它很快就发展出一套复杂甚至有些仪式化的流程，买卖双方都要在见证人的见证下进行交易，承担各自的义务，并以书面形式留存证明。像以前的交易员都聚集到新桥上交易一样，郁金香交易者们也需要一个供他们交易的场所。也还是像以前的交易员们一样，有些花商选择在教堂，尤其是狂热爆发后，当地教堂更是成了所有人的普遍选择，不论是花商交易还是结婚仪式都在教堂。还有好多人则觉得，在酒馆交易是个更舒适方便的选择。郁金香交易的主要场所就是当地的酒吧，除非你真正理解了球根交易的情景——深更半夜的酒馆，醉醺醺的酒鬼，烟熏雾绕的房间——否则郁金香狂热将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谜。旅馆在联省是非常普遍的。1613年，阿姆斯特丹的旅馆数量就已经很多，约合每

100人就拥有5家旅馆。到1636年，哈勒姆城里的旅馆数量大约有两百多，要知道这个城市的面积比海德公园大不了多少。喝酒的地方也很多，从设施齐全的酒馆地窖，到药剂师的店铺都可以。这些场所中大概五分之一是没有执照也不合法的，而且想尽办法逃避加在啤酒上的重税。这些税收是为了和西班牙打仗用的。当局不得不经常采取突击检查，以确保了解这些场所的情况。

但是，只有规模大名声好的旅馆才能提供郁金香交易者需要的那种私人包间。一些有名的大旅馆包括：魔王、喜鹊、狮子和链锁撒旦等。这类旅馆是城内城外都有的。

在哈勒姆，很多酒馆都聚集在城市南边，在树林间的空地和小路上，因为这里离城外最早的郁金香花圃比较近。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有些酒馆组织过花商团体交易活动。如果是这样，酒馆里肯定还有其他旅客或闲杂人等。卖淫在哈勒姆城里是法律所禁止的，至少表上面上是。于是在哈勒姆树林的酒馆经常私下充当妓院的角色。声名狼藉的妓院很容易辨识，当时的记录里就说是“城外路口的红房子”[1]。

我们无法弄清在1636年，哈勒姆有多少酒馆曾经接待过为郁金香而疯狂的商人们，但至少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基本确定的，就是一家规模和名气都很大的名叫“金葡萄”（De Guld Druyf）的旅馆。金葡萄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就位于集市广场和城里最主要街道的交汇处。这里的主人是奎克尔家的两个兄弟扬和科内利斯，不过这两人并不管理日常营业。他们的父亲叫科内利斯·格里特森·奎克尔（Cornelis Gerritsz.Quaeckel），也是以开旅馆为生的，他也是荷兰省里最重要的种植郁金香的先锋之一。他在17世纪前25年就至少培育出了5种郁金香新品种，并且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的成就。其中就包括白色和紫罗兰色相间的“白紫色奎克尔”（Lack van Quaeckel），黄色和锈色相间的黄色系郁金香“奎克尔的奇迹”（Mervelye van Quaeckel）。老奎克尔1632年去世时

已年近七十，他最小的儿子扬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在郁金香生意上非常活跃，经历了整个郁金香狂热期，高峰之后也不曾放弃。他会在自家酒馆包间里接待郁金香交易者真是再顺理成章不过了，他的酒馆不但位置绝佳，同时也是哈勒姆城里最受欢迎的酒馆之一。

假设，有个人在1636年秋天打算到阿姆斯特丹，光临金葡萄并且看看进行中的郁金香交易，那么他会看到什么呢？

午后从阿姆斯特丹出发，沿着新开掘的运河航行——这也是联省第一条专门连接两个城市的运河——大概黄昏时刻就可以到达哈勒姆了。这段行程只需要两个小时零一刻钟，正是因为快速又方便，新潮的阿姆斯特丹人把需要清洗的脏衣服都送到哈勒姆的洗衣店去而不再自己劳动。坐在船上的人们可以相互谈天论地，或者翻阅一下专为渡船乘客准备的叫《话两船》（*schuitepraatijes* ）的小册子来打发时间。在1636年秋冬，这种渡船绝对是人们谈论郁金香狂热新发展的好地方。随着渡船靠岸，游客第一眼看到的哈勒姆，就是一条长长的红棕色屋顶连成的线，当然还有无数烟囱中冒出的一缕缕白烟和城市周围的大片牧草。接下来就会看到低矮的砖砌城墙围绕着城市，外面还有一条护城河围绕着，河上总共有九座吊桥。向溪边远望，在城市屋顶之外，可以看到远处起伏的巨大沙丘，几乎与荷兰特色的灰暗天空连成一片，那里也是荷兰北部的海岸线。向南看，就能看到巨大、丑陋的哈勒姆滩地。一大片让人看着就不舒服的浅滩，暴露在剧烈暴风雨下，不断受到海水的侵蚀，河岸耕地面积越来越缩减，仅剩下了距离哈勒姆城墙不到几英里的这片地方。这片水域还以危险著称，已经吞噬了太多鲁莽地航行于其中的船员的生命，所以哈勒姆人管这里叫“水狼”。

从渡船上下来就到了城墙脚下。从阿姆斯特丹来的人会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叫“阿姆斯特丹关口”的大门前。哈勒姆的执政者们在这里树立了一个令人恐怖的装置。它由三根砖垒的柱子加上铁质的横梁和一些木制

的杆子组成，上面捆着最近行刑的罪犯的尸体。荷兰省的行刑官就居住在哈勒姆，他的完整头衔是“荷兰省高级事务长官”，负责从阿姆斯特丹遣送来的和哈勒姆本地的罪犯，所以这个装置上总是不缺少尸体。1634年威廉·布里尔顿爵士从这里经过时，就看到了这个装置。当时上面不但有两副已经不见血肉的骷髅架子——是两个被绞死的罪犯的，还有一个已经残缺不全的女人尸体——她的罪名是谋杀了自己的孩子；最后还有一个已经发黑的乞丐的尸体，他是因为差点把整个村子点着而被绑在木桩上烧死的。

由“阿姆斯特丹关口”进入城中，游客会首先注意到哈勒姆独特的气味。酪浆和麦芽的臭味混合着漂白厂和啤酒厂的香气。漂白和酿酒是哈勒姆的两大支柱产业。这里生产了荷兰省五分之一的啤酒。城墙之外的亚麻漂白厂也非常著名，每天要使用成百上千加仑的酪浆来漂白布料，全欧洲的人都把布料送到这里染成漂亮的白色。酪浆注满了西边城墙外几个巨大的染坑，每天晚上，用过的酪浆被排到护城河里，最后流入斯帕尔纳河（River Spaarne），甚至把河水都染白了。

在深秋时节的荷兰共和国，夜晚来得很早，城外来的游客不得不摸黑找到去集市广场的路。哈勒姆的街道像迷宫一样，异常狭窄，有的甚至窄到街两边的住户可以相互握手的地步。为了抵抗严寒而拉上的百叶窗缝隙中透出的油灯微光或炉火的光亮就成了唯一的照明。这个城镇已经太过拥挤，白天喧嚣吵闹，晚上倒是安静很多。除了例行巡逻的民兵队经过时咔嗒咔嗒的脚步声，大多数街道上都空无一人，偶尔看到赶着去酒馆喝酒的人，也都是埋着头快步穿过小巷。

每每有客人走进金葡萄，迎面而来的温暖还在其次，最强烈的感觉其实是呛人的浓重烟雾。17世纪的酒馆都是这样烟熏雾绕，让人忍不住流泪，连房间里有什么都看不清。一方面，开放式的壁炉是当时唯一的取暖方式，壁炉栅栏里面的泥炭被堆成中空的金字塔形状，熊熊燃烧的

炉火可能是导致烟雾的原因之一（黄金时代泥炭的开采量巨大，但是荷兰人消耗的速度也同样惊人，不得不继续挖掘新的沼泽）。但是像彼得·芒迪这样的游客认为，荷兰的泥炭燃烧时“芳香清洁”，尽管其中的硫黄使得聚在一起的火苗“暗淡灰白，像鬼火一样”。所以，金葡萄里面的烟雾，主要还是来源于客人烟斗的吞吐。

1636年，抽烟斗在荷兰特别盛行，几乎成了一种民族特色。烟草大多是从美洲进口的，但也有联省人开始自己种植。烟斗都是烟管细长的陶制烟斗。吸烟者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吞云吐雾，不单单是因为这时期的医生们把烟草宣传成包治百病的灵药，不但能够预防瘟疫，还能治牙疼、蠕虫。事实上，关于烟草会吸收人体里重要液体，导致男性失去生育能力的说法完全没有让吸烟的人们退缩。走进金葡萄，就像是走进一个使用过度的、变味的房间，就像是20世纪的公司因为工作场所禁烟后，单独开辟的吸烟室的味道。

等你的眼睛终于适应了这种阴暗的环境，就会发现其实屋子里面非常拥挤而活跃。有些细节在现代人看来会觉得奇怪，但是在当时的哈勒姆人看来却再寻常不过了。举例来说，进店时，身上有武器的要交出来放在门口，这是由于当时有太多持刀斗殴事件发生（黄金时代的荷兰人对于这一类的搏斗有一种危险的热情——“一百个荷兰人身上就有一百把刀”，连谚语都这样直接地警示当时的人）。另一点特别的，就是墙上展示的画作质量之高。艺术作品在荷兰黄金时代极其常见，而且价格极低，不过几个荷兰币或一两个荷兰盾一幅。所以酒馆墙上的精美油画或挂毯，在烟熏火燎的环境里变黄变黑都没有人心疼。

然而，最让人惊讶的其实还是酒馆里面纵情酒色的程度。虽然饮酒在当时是非常普遍，醉酒也是司空见惯的，但荷兰的酒鬼在整个欧洲都是出了名的。啤酒很便宜，畅饮一个晚上也花不了一个荷兰盾。威廉·布里尔顿爵士说他去过的酒馆里，几乎找不到一个清醒点的人。不算嗜

酒的英国人会抱怨荷兰省人对啤酒的沉迷，还指责他们把醉酒的坏习惯出口给了英国。

事实上，每个荷兰人都是这个或那个酒馆的常客。甚至连一些没什么家世教养的女人和孩子也会光顾酒馆。酒馆里的气氛是愉悦和包容的，但是在一些不怎么正规的地方，欺诈顾客的嫌疑也是有的。最常见的，有给烂醉的顾客少找钱，或是在啤酒里兑水，还有的会用向日葵给葡萄酒染色，或是在客人的酒罐底部放上一团布料以减少盛酒量。

来访者总是对荷兰人喝酒的一套流程感到诧异。荷兰人很少有一个人独自喝酒的。他们要么是结伴而来，要么是加入到某个已经开始喝起来的人群里。通常，每轮酒上桌之后要先来上一段祝词，这也是后来郁金香商人们积极地继承下来的仪式。一个叫蒂奥菲力·德·维奥（Theiphilef de Viau）的法国人在观察了一个他造访的酒馆之后写道："这些绅士们喝醉前还要有这么多规矩和仪式，这种繁文缛节和过度饮酒都让我受不了。"

无论如何，在17世纪不喝啤酒是不可能的。漂白工厂的废水导致河水不适宜饮用，尤其是在哈勒姆地区更是如此。茶和咖啡在当时还是没什么人知晓的奢侈品，葡萄酒则相对较贵，所以人们几乎餐餐要喝啤酒：早餐时喝的是加热的啤酒，里面还要撒上香料和糖；中午和晚上则是单独饮用。并不是所有哈勒姆人喝的啤酒都是酒精浓度很高的。这里的啤酒分为"低度"和"高度"两种，前一种是解渴用的，后一种才是会上瘾的，但是无论哪一种，喝多了的话都是会醉的。在16、17世纪之交，哈勒姆的人口才3万人，其中还包括女人、孩子甚至是还在襁褓中的婴儿。然而当时啤酒的消耗量却达到每天12万品脱，即550万加仑每年。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量是在酒馆里消费的。为了满足人们对啤酒的需求，哈勒姆本地就有上百家酿酒厂，其中50家是具有相当规模的。事实上，酿酒厂不仅能赚钱，还是城市中的一种政治力量，一个由21个酒厂

主组成的团体实际上从1618年起，连续多年控制着哈勒姆的政府。

城市里的花商们每周会约定在金葡萄的包间里见两三次面，这里既能享受安静的环境，又能避开这个城市和酒馆里难闻的气味。在郁金香贸易初期，这类约见通常不会超过一两个小时。但是随着郁金香狂热的发展，村民们在一起谈论的时间变长了，有时甚至从前一天早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每谈成一笔生意，都免不了点上红酒庆祝，这在一个以喝啤酒为主的省里，当然也是为了炫耀财富。因为在荷兰人的酒馆里，红酒都是用灰白色的大罐子装着送上来的，容量从2品脱到1.5加仑不一，所以郁金香交易也难免都是在醉醺醺的朦胧状态下达成的。毋庸置疑，就是朋友间的互相吹捧，加上持续到深夜的纵情谈笑，使本来解释不通的狂热交易机制，看起来也在情理之中了。

在一些重要的方面，酒馆里聚集的团体看起来做的是一种完全独立于其他郁金香交易的生意。他们交易的多是便宜的和容易买到的球根。而且这个群体里，虽然也有少数几个商人或是富裕的参与者，但最多的还是来自劳动阶级。这些人和鉴赏家或是有成就的种植者们完全打不上交道，甚至连他们掌握的关于郁金香、理财、股票交易，或是执政者和大商人们如何做买卖的知识也都是二手的。

乡村里的客户群体似乎是有意模仿股票交易的形式。可能是因为这种交易让花商们觉得能提升自己的重要性，让他们自以为是在进行一种真诚的、有规范可依的商业活动。球根还被拿到拍卖会上拍卖，有名的种植者和交易者也会参加这类拍卖会，而且会到律师或法务官那里对自己的交易进行公证，以避免任何纠纷的可能。而花商们则偏爱快捷廉价的交易方式，把交易记到自己的大账本上就完了。每个村子还会选出一位秘书，记录提交到他面前的交易情况。

在酒馆里进行买卖的郁金香，就算不是绝对，也是极少会有让亚伯拉罕·德·戈耶尔这样的大鉴赏家或富商们钟爱的品种。最初可能还有一

些二等品种的球根，再后来，当需求进一步扩大，连二等球根都变得稀少之后，村民们就开始贩卖那些最不受追捧的也最常见的品种。这些品种被戏称为“破布”（*vodderij* ），好听点的说法是“普通商品”（*Gemeene Goed* ）。这些花大多是单一颜色或杂色斑驳的郁金香，是最早进入荷兰的郁金香品种的后代。因为时间长，而且没有富商们争抢，这类郁金香在1636年底很容易买到。

“破布”类的球根不是按分销售，而是放在筐里，按半磅或一磅销售的（在哈勒姆，一磅等于9728分，在阿姆斯特丹，一磅等于10240分）。花商们的行话管这叫磅货，以区别按分或千分记重销售或按件单独销售的球根，那样的叫作单件货。一磅重的一个篮子里，球根数量能有50甚至上百个。所以即使在郁金香狂热的最高峰，最贫穷的交易者也能买得起几个球根。

成百上千的新手花商在1636年到1637年的秋冬涌入郁金香市场。他们开始都是从交易少量的磅货开始入手，不久球根价格出现了惊人的膨胀，这无疑是郁金香贸易活力和郁金香狂热席卷酒馆乡村的体现。一包最便宜的磅货球根，比如“黄王冠”在1636年9、10月的价格最低可以到20荷兰盾，到次年1月底竟然要价1200荷兰盾。比“黄王冠”更受欢迎一些的“斯维策”郁金香（Switsers），其实也属于颜色单调乏味的品种，在1636年秋天的价钱是60荷兰盾每磅，到1637年1月15日的价格是120荷兰盾每磅，到1月23日则是385荷兰盾每磅，再到2月1日则是1400荷兰盾每磅。这个种类的价格峰值依记录为2月3日的1500荷兰盾每磅。

尽管郁金香的历史一直以来都是不平常的，但是直到1636年12月至1637年1月，人们对球根的狂热真正达到了顶峰，郁金香交易升级为郁金香狂热。不幸的是，没有留下亲身经历1636年这个非凡冬天的人记录的当时郁金香酒馆交易团体的情况，或是关于郁金香球根究竟是怎样买卖的描述。事实上，三部《对话》的作者似乎对乡村酒馆的了解非常深

入，而且在他的作品里生动地描写了郁金香狂热最高峰时的情景。

在第一本小册子里，就是那个变成花商的织工贪婪鬼，试图说服他的朋友讲真话也改行做郁金香生意。他表示会教授讲真话所有酒馆交易的秘密，并且承诺会告诉他如何加入一个酒馆交易团体并且做成第一笔买卖。随后，贪婪鬼又邀请讲真话和他一起喝酒。他吐露道：“郁金香这种生意就是要喝醉了谈，而且是越离谱越好。”要想用一句话形容郁金香狂热时期的价格疯涨，真是没有能比这句更恰当的了。

贪婪鬼是这样向讲真话传授经验的：你要先找一个有花商聚会的酒馆，问问店主能不能带你去郁金香交易者的包间。因为你是个来抢生意的新人，所以已入伙的花商可能会讥讽几句，甚至说你是妓院里的新妓女，对他们的话不用在意。

一旦进入了这个团体，你就可以开始交易球根了。首先，你要知道没有人是非常正式地拿出球根叫卖的。相反，花商们喜欢说一些模棱两可的暗示。比如你可以这么说：“我的黄色郁金香太多了，想要弄点白色的。”当你确定交易能够达成了，这时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这取决于你是要买还是要卖。无论哪种情况，被选为乡村秘书的人会记录所有交易，每一笔生意的达成，都意味着买家要贡献一笔“葡萄酒钱”（*wijnkoopsgeld* ）给卖家。

第一种方法是“价格板”（*met de Borden* ），这种方法是买家应当选用的。买卖双方各自拿到一个木质背面的石板，想要买花的花商要在板子上写下自己愿意出的价钱，他通常会写一个比自己看中的球根应有价格低得多的数字。卖家同样要在自己的板子上写下他愿意出卖的价格，自然也会是比合理价格高得多的数字。两份出价会同时交由双方提名的中间人，中间人则会商定出一个他们认为公平合理的价格。这个价格肯定是介于两方出价之间，但不必须是绝对的中间。中间人把这个折中之后的价格写在板子上，再交还给花商。到此时，买家和卖家既可以接受

也可以拒绝这个仲裁结果。如果接受，就算双方以此价格成交，这笔交易也会被登记在村里的交易记录中。买方还应当按成交价支付每荷兰盾1荷兰币的手续费，若成交价是120荷兰盾或更多，手续费最高限3荷兰盾。这就是所谓的“价格板”的方式。但是，若买卖双方中有一方不认可指定的价格，他可以把板子上的字擦掉，以此作为拒绝交易的表示。若双方都拒绝，则交易失败；若只有一方拒绝，则此方需要支付2～6荷兰币不等的罚金。所以，“价格板”的交易方式是可以鼓励交易实现的。

对于卖家而言，则可以采取另一种略微不同的交易方式，叫作“在O里面”（*in bet ootje* ）。这个词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荷兰俚语，表示拖某人后腿的意思。但是在郁金香狂热时期，它指的是一个粗略的图形，是拍卖时乡村秘书用来记录出价是否有效的一个符号，大致如下：



用此种方法出售球根时，每个人的板子上都写着同样的数字。想要卖花的花商会在符号下端的O里写下他愿意支付给买家的回扣或者说手续费。这个数字是卖家依据对自己的球根的估价决定的，可能在2～6荷兰币不等，大概就是喝一轮到两轮的酒钱。有意的花商则会提出愿意支付的价格，秘书在符号上记录竞价的结果。超过1000荷兰盾的报价写在靠上的半圆里，过百的写在靠下的半圆里，个位数的，写在竖线下面。竞价结束后，秘书会在符号上画三条线，再用一个大O把整个内容圈起

来，这个过程就和现代拍卖师喊的“出价、成交”差不多。拍卖结束后，卖家可以选择是否接受最高价成交，如果他拒绝，他也还是要按自己写下的数字支付手续费给出价最高的买家作为罚金。这种交易球根的方法显然也是鼓励卖家不要拒绝适当的报价。

到此为止都还不错，而且很显然酒馆俱乐部为郁金香交易提供了交易的场所，这里有温暖舒适的环境，还能让交易在酒醉的糊涂和冲动中完成。若是没有别的帮助，那至少也是确保了郁金香价格的疯涨，接下来的郁金香狂热也就顺理成章了。事实上，酒馆交易的方式还有其他重要的影响。

首先，如我们所见，村民们愿意交易的不仅仅是实体的花朵，还包括对还生长在地里的球根的所有权。因此就避免了郁金香交易的季节局限性，使它从一种只在出土后几个月内可以进行的交易变成了全年可以进行的交易。别忘了，很多交易者根本没有花园，购买球根也不是为了冬天种花，他们在意的只是如何使球根的利润最大化。而且交易活动还能保证时刻有“葡萄酒钱”流入每个人的口袋。其次，村民们完全没有意识去核实他人是否有能力偿还欠款，或是否真的对交易中的球根有所有权。酒馆俱乐部因此纵容了无约束的投机，而对破产和诈骗行为则没有任何防范措施。所以，一个根本没有球根可卖的花商，也可以加入交易，只要能在他需要支付之前，把购买球根的义务转卖给别人，就可以用赚来的利润进行新的买卖。同样，一旦郁金香价格下跌，这个本来赚钱的人瞬间就会倾家荡产。

在《对话》中，贪婪鬼吹嘘自己靠郁金香交易，在4个月内就挣了6万荷兰盾。在1636～1637年的这个冬天，真正的郁金香狂热者完全有机会实现这个小说中的情节。

---

[1] 在荷兰语中是Cruyspoort。

11 沃特·温克尔的孤儿

郁金香狂热使沃特·巴特尔米森·温克尔（Wouter Bartelmiesz.Winkel）成了阿尔克马尔市最有钱的人之一。他不过是个酒馆老板，是镇中心一家叫作“老市民警卫室”（oude schutters-doelen）的旅馆的房东。比他富有的市民，一只手就数得出来。但是和其他郁金香商人一样，他们共同的困扰都是，对于自己的钱财，他看不着也摸不到，因为它们还以球根的模样埋在地里。

沃特·巴特尔米森的老家好像是温克尔村。这个村子在阿尔克马尔以北大约10英里，是荷兰省的最北端。他的父母即使称不上富有，也算得上衣食无忧。他的哥哥劳里斯（Lauris）完成了学徒期之后成为一名金匠，这也是手工业里面收入最高的一个行当了。1621年沃特和伊丽莎白·哈曼斯（Elisabet Harmans）结婚。他许诺自己的新婚妻子他能养得起一大家人。他们有7个孩子活过了婴儿期，到1636年，只有最大的威廉，到了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年纪——14岁。所以，可以想象，这一家人都是靠酒馆和温克尔的球根交易养活的。

阿尔克马尔在联省算是较小的市，但是对于从温克尔来此的村民来说，这里无疑就是大都市了。这里是荷兰省北部地区的集市所在地，相类似的还有霍伦市和恩克赫伊曾，这几个城市之间自古就是竞争关系。阿尔克马尔一直以来都以其独立性闻名，不愿意追随整个联省共和国的趋势。例如，阿尔克马尔的女人们是荷兰唯一不戴麻布小帽的。她们有自己独特的流行风格，就是把头发编成辫子交叉缠绕在一起，看起来有点像头盔。

自中世纪起，阿尔克马尔周边的乡村面积大幅缩小了。此前它还有效地控制着荷兰省北部大片地区甚至是须德海中的一些岛屿。不过如今它周围依然围绕着富饶的农田，还把南边几个湖泊里的水抽干了改造成耕地。阿尔克马尔人特别擅长制作牛肉制品和乳制品，他们生产的大个轮子型奶酪让联省在整个欧洲都以此闻名。

这个温克尔家庭在阿尔克马尔过了一段好日子，但是也如当时其他的荷兰家庭一样，随时都可能遭遇不幸。即使是在其黄金时代，17世纪的荷兰共和国也要经历那些让其他欧洲国家同样头疼的问题。那一时期战乱不断，人们的预期寿命很短，还有周期性出现的瘟疫和过高的婴儿死亡率。当时的医生数量也少，而且他们对于一些常见的疾病也束手无策。他们开出的药方本身可能比他们要治疗的小病症还要致命。当时没有哪个家庭敢奢望不会过早失去某个家庭成员，可能是一两个孩子，也可能是丈夫或妻子。

在这个温克尔家庭中，最先离开的是妻子伊丽莎白·哈曼斯。她是在1631年到1635年之间去世的，可能是由于疾病或难产，留下她的丈夫独自抚养3个儿子和4个年幼的女儿。温克尔没有再婚的记录，他最年长的儿子会帮忙照顾弟弟妹妹，或许还有一个仆人，或是有旅馆的服务员们帮忙。

当时，荷兰的孩子们7岁开始上学，所以整个家里，只有最小的儿子——6岁的克莱斯（Claes）还没入学。这说明，温克尔不一定需要雇人看孩子。即便如此，无论是财务上还是感情上，失去妻子的损失还是显而易见的，本来由伊丽莎白承担的缝纫、打扫和做饭现在不得不雇人来做，所以郁金香交易的利润对这家人来说就更加重要了。

沃特·巴特尔米森算是较早加入球根交易的人。可以确定1635年他是在进行球根买卖的。那时离市场真正爆发还有一年多，而且可能他开始交易的时间还要比这再早一两年。正是由于加入早，再加上一点运气

和对花卉交易的充分了解，使得他攒下了一批绝对高质量的郁金香。

到1636年春天，酒馆老板已经拥有了70多个上等甚至是上上等的郁金香，涵盖40多个品种。此外还有超过3万分的价格稍低的单件货球根。他的郁金香里还有一些整个联省最值钱的品种，比如一种非常稀有的紫色系郁金香范·恩奎岑司令，还有两个总督和五个不同种类的布拉班森（Brabanson）；另外还有三个著名的红色系郁金香范·德·艾克司令球根，一个利夫肯司令，一个“棕紫郁金香”球根（Bruyn Purper），一个“完美的席尔德”和7个以上越来越受追捧的豪达郁金香。在狂热最高峰，以上这些球根里随便哪个的交易价格都不会少于1000荷兰盾，而且实际成交价通常还会高得多。能够收集如此之多的高质量郁金香，在整个联省范围内都算得上让人震惊的壮举。这绝对是共和国数一数二的球根收藏，因为再没有相关记录能证明谁的球根在数量和种类上哪怕是接近沃特·巴特尔米森的了。

然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温克尔的收藏不仅种类多、质量高，而是他是切实地拥有球根实物。沃特既不是鉴赏家，也不是花商，而是种植者。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大部分交易者而言，他的资产是实实在在的，而其他人拥有的不过是一纸期票，上面写着价格和理论上的交货时间，根本不能保证球根的质量甚至是存在与否。而温克尔的资产就是实实在在的球根，就种在离他旅馆不远的花园里。

不幸的是，沃特也没能活到他精明的郁金香交易为他挣来巨大利润那一天。1636年春天郁金香盛开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到初夏却不知是因病还是因事故去世了。他去世时可能只有三十几岁，或者最多刚过四十。他去世不久，当地孤儿院派来的一群面目阴沉的代表就来到“老市民警卫室”，把酒馆主人的孩子都带回了阿尔克马尔的孤儿院。

从某些方面说，孩子们的处境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可怕。在17世纪，父母双亡的孤儿并不少见，而在照顾孤儿的问题上，联省共和国也算做

得比较好的。不论地方大小，各地都有自己的孤儿院。这些孤儿院是城镇政府出钱设立的，并组建董事会代表孩子的利益进行管理，还有全职的工作人员负责资金的募集和机构的顺畅运行。有孤儿院的地方通常也有养老院，男女是分开的，符合一定条件的老人都可以入住。这种早期的社会服务是荷兰独有的，让很多外国人看了都羡慕不已。

尽管如此，如果沃特·温克尔的孤儿们留在阿尔克马尔孤儿院生活，他们将会面临未知的未来。孩子们的监护人是他们的叔叔劳里斯·巴特尔米森（Lauris Bartelmiesz）和菲利普·德·克勒克（Philip de Klerck）。虽然他们都愿意尽己所能帮助孩子，而且政府在一两年内也会免费负责他们的吃住和上学，但是这种免费的食宿只能持续到他们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年纪。之后他们就会被送到某些工厂、磨坊或是小作坊里学习谋生的手艺，以确保他们今后不再成为政府的负担。孩子们几乎不能选择自己被送到哪里，虽说这样的结果也不见得比别的手工业者家的孩子差多少，但是，温克尔家的孩子们还有另一个办法可以确保自己过上更宽裕的生活，那就是卖掉父亲的郁金香。

迫在眉睫的举措是先要确保郁金香的安全。这一点非常有必要。由于价格不断上升，每个种植者都很担心自己的球根会被偷走，有些人已经开始采取复杂的预防措施。有的人和自己的郁金香睡在一起；还有一个布洛克村（Blokker）的人，在球根四周缠上线，线上再挂一个铃铛直接吊在自己床前。由于父亲去世，孩子们又被带到了孤儿院，温克尔的球根就特别危险。好在不久就是出土时节，一两天内，球根都被收集好，锁在了孤儿院里安全的地方，由孤儿院管理者指定的托管人负责考虑如何进行下一步。

以上是发生在1636年7月的事。一个叫彼得·威廉姆森（Pieter Willemsz）的园丁负责把所有球根仔细分类并称重，之后又种到了地里。直到12月，托管人才终于开始授权销售球根。

不知道这种延迟是由于孤儿院繁杂的官僚作风所致，还是某个董事看出了价格增长的趋势，打算等到最好的时机再出售温克尔的球根。总之不管是故意还是巧合，拍卖直到1637年2月5日才最终举办，地点是阿尔克马尔的新市民卫队大楼。这真是最好不过的时机了。从沃特去世后，郁金香的价格已经不知翻了几番。新加入市场的买主众多，这些珍贵的球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追捧。

孤儿院管理者指定的托管人在销售宣传上做足了工作。2月份的最初几天，阿尔克马尔的旅馆里住满了蜂拥而至的花商和种植者，旅馆老板们的生意都异常红火。准备竞标的人都被邀请参加预览为本次拍卖特别制作的宣传图册。这本图册是由孤儿院管理者定制的，里面包含郁金香水彩画124幅，百合、银莲花和康乃馨共44幅。这本图册既可以被看作一本拍卖品目录，又可以被视为对竞标人的承诺：只要你竞拍成功，一两个月后，如此的美景就将盛开在你的花园中。

阿尔克马尔的这次拍卖正赶上郁金香狂热的最高峰。被吸引来的竞标人可不是什么平民百姓，拍卖成交后也别想交点定金就把球根拿走。这个拍卖会是专为鉴赏家和富商们举办的，拍卖的是实实在在的球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拍卖会开始前，就有坚决的买主计划私下里找董事交易，目标当然是本次拍卖的大热门——紫色系的范·恩奎岑司令郁金香。这朵郁金香在前一个夏天从土里挖出来时，母球上已经结出了一个小的子球，到新一年它就能长成可以独自繁殖的母球。这个子球为本来就已经十分珍贵的母球又增色不少，董事们给它的定价是惊人的5200荷兰盾，几乎接近了1636年“永远的奥古斯都”的价格。此外，这位富有的买家还以3200荷兰盾的价格买入了一对越来越受欢迎的淡紫色火焰纹的布拉班森，以及其他一些稀有的郁金香、百合、康乃馨和银莲花。这些各种各样的珍品又花了他12467荷兰盾。仅这一笔生意的成交额就达到了令人咋舌的

21000荷兰盾。这笔钱足够在阿姆斯特丹的凯泽舍夫买两套大房子了。

这笔获利颇丰的私下交易为即将开始的拍卖奠定了基调。不知是郁金香画册起了作用还是温克尔的名声在外，竞标者都认定此次拍卖的球根肯定是质量最好的，所以这也是在联省难得一遇的买到最受追捧的郁金香球的最好机会。竞价进行得非常激烈，除极个别交易外，阿尔克马尔拍卖会上的成交价都成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价。

最好的品种都被安排在拍卖会一开始竞价。第一个拍卖的是中等级别、红白相间的博特曼（Boterman），重量为563分，成交价为263荷兰盾，约合0.5荷兰盾每分。第二个拍卖的是一个很小的西庇阿球根，重量仅为82分，价格被推至400荷兰盾，合5荷兰盾每分。之后的“完美的范·代夫特”成交价为605荷兰盾。温克尔著名的“棕紫郁金香”——一种淡紫色花纹中夹杂一缕棕色的精致品种，成交价为2025荷兰盾，合6荷兰盾7荷兰币每分。

随着拍卖会的进行，一个又一个最高价不断出现。拍卖会第一阶段，70件拍品中仅有2件的成交价没有超过100荷兰盾；超过1000荷兰盾的有19件。最昂贵的球根是两个大个头的总督球根，重量分别为658分和410分，售价分别为4203荷兰盾和3000荷兰盾。若论每分单价最高的，则是红色系利夫肯司令球根。这个球根的重量只有59分，是当天重量最轻的一个球根，比一个子球大不了多少，而成交价却达到了1015荷兰盾，相当于17荷兰盾4荷兰币每分。

到最后，当所有上等郁金香都以高价成交之后，便宜的单件货才开始被拍卖。500分的紫色系“大雁”以805荷兰盾和725荷兰盾的价格分别被两个买主买走。一个哈勒姆的种植者扬·卡斯特勒恩（Jan Casteleijn）在坎普巷（Campeslaen）南边一个花园里种出的1000分的球根被以1000荷兰盾的价格买走。

旁观者不难看出，即使以当时郁金香狂热时期的标准来看，沃特球根的拍卖价也算很高了。除了拍卖会之前私下交易的21467荷兰盾之外，前70个郁金香拍卖的总价款达到了52923荷兰盾，另外22种按重量拍卖的球根拍卖总额达15610荷兰盾。整个拍卖会和私人交易的最终所得达到了9万荷兰盾。

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沃特家的孩子们从清贫的孤儿一跃成为格外富有的先生和小姐。我们不知道拍卖会筹来的这笔巨款是怎样收齐的，又有多少手续费和税费产生，但是最终，七个兄弟姐妹每人可以得到总额的1/7，大约13000荷兰盾。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普通手工业者家庭年收入的40倍还多。一个有雄心的男孩儿可以用这笔钱开始任何他想做的事业；要是安于现状的话，也足够一辈子日常生活所用。若是哪个姑娘有这么一笔巨额嫁妆，绝对可以找到相当好的婆家。

荷兰的郁金香商人们无疑都认为阿尔克马尔的这次拍卖绝对是值得纪念和庆祝的大事件。拍卖之后没几天，一个一页纸的宣传单就出现了，题目取得倒还算低调，叫《1637年2月5日拍卖成功的郁金香名录》。内容是简单介绍拍卖会的情况和细节，并列出了99个拍品的成交价格。有些作者本来建议将这篇传单作为避免过度涨价的警示，但它实际的作用其实是助长了郁金香交易的自信，让尽可能多的人关注球根达到的惊人价格。

这个传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即它的流通量之大使得其上列出的价格被视为某种官方甚至是典型定价。当时一些关于郁金香的书籍也将阿尔克马尔拍卖的价格视为不同种类郁金香的成本价，而事实上这些价格是远远高于狂热初期的实际成交价格的（据推测，那些作者都是为了说服潜在购买者以更高的价格购买郁金香）。这就是为什么当次拍卖中每分单价最高的利夫肯司令，在1636年6月时每分价格仅为6荷兰盾12荷兰币；而另外3个在拍卖会上卖出了7荷兰盾14荷兰币每分的

范·德·艾克司令，前一年7月的每分单价还是2荷兰盾10荷兰币。在1637年1月最后一周到2月第一周这段时间，整个联省的郁金香狂热都到达了最高峰。在这非凡的14天之内，人们为球根一掷千金。哈勒姆有一个叫亨德里克·彼得森（Hendrick Pietersz.）的面包师，以100荷兰盾的价格买了一个仅重7分的豪达球根，每分单价高达14荷兰盾，这也是有记录的交易中，每分单价最高的郁金香。阿尔克马尔市的法律档案中保存了一份账本摘要。这个账本是属于一个叫巴托洛梅乌斯·范·根纳普（Bartholomeus van Gennep）的哈勒姆商人的。摘要中显示，他在1月底向另一个交易商亚布拉罕·费尔斯赖（Abraham Versluys）支付了3200荷兰盾购买一批二流球根。其中甚至根本没有一样是狂热期间受追捧的品种，具体价目如下：

2磅黄王冠和红王冠	385荷兰盾
1磅斯维策郁金香	280荷兰盾
3000分 森腾（Centen）	380荷兰盾
0.5磅奥德内	1430荷兰盾
1000分 大郁金香（Le Grands）	480荷兰盾
1000分 飞翔的库恩哈特（Gevleugelde Coornharts）	220荷兰盾
70分基斯特美克（Kistemaecker）	12荷兰盾
410分 飞翔的纽兰特（Gevlamde Nieulant）	54荷兰盾

总计3241荷兰盾

对球根交易的热情主要还集中在几个重要城市，如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但是也开始向荷兰省外甚至是西弗里斯兰省蔓延，肯定还发展到了乌特勒支省和格罗宁根省，更有可能其他省也有。事实上，在园艺家亚伯拉罕·蒙廷（狂热期间他还是个孩子）的记录中，虽无具体细节，但是也提及在法国北部还兴起过第二轮郁金香投机狂热。

整个联省参与郁金香买卖的人数肯定要以千计。留存下来的具体文件中有一个就提到，像乌特勒支这种根本算不上球根交易中心的地方，在1637年2月已经有至少40多个专业的种植者。这就意味着会至少有几百个依附于他们的花商在这个地方交易。从北边的梅登布利克到南边的豪达，仅荷兰省和邻近的西弗里斯兰就有十几个城市和地区盛行球根和花卉交易。据此可以估计，在荷兰中部，被卷入郁金香狂热的人数至少超过3000。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荷兰共和国200万人口中，郁金香狂热最高峰时期，种植者和花商的人数大约为5000人，而且这个估计还是比较保守的。

如此众多的交易者买入卖出的郁金香总价必然是令人惊愕的。某些地方权威指出，在狂热最高峰，一天之中一个球根就可能倒手10次之多，价钱也必定是一手比一手高。因此，虽然球根老老实实地待在地里，但是它的拥有者已经从织工变成玻璃工，又变成漂洗工，再变成书记员了，整个过程就发生在24小时之内。一个球根从种下到出土也要增值5～10倍。据阿尔克马尔拍卖的结果，一个最珍贵的球根可以价值4000荷兰盾或5000荷兰盾，就算在新市民卫队大楼拍卖的价格是例外得高，那么说一个上上等的球根可以卖几千荷兰盾也不为过。有记录证明略逊一筹的品种，如红白相间的森腾郁金香可以卖到1000分350荷兰盾；更流行的黄色系“莱顿的红与黄”则可以卖到750荷兰盾。就连最不

值钱的磅货也能卖到250荷兰盾～1500荷兰盾每磅不等。因此，按最保守的估计，在一个郁金香交易的中心城市，比如哈勒姆或阿姆斯特丹，按我们之前推算的400个花商，每周四次聚在村子里交易，那么一个城市里在狂热流行的3到4个月之间的交易额就能达到7位数。就算一个普通的花商以250荷兰盾的平均价，1天只买入1磅球根，那么1636年10月初到1637年1月底这段时间里，一个城镇的交易总量就可以达到700万荷兰盾。

还有些花商交易更活跃。在12月至次年1月这段狂热顶峰时期，一个叫彼得·范·罗斯文（Pieter van Rosven）的哈勒姆郁金香交易者在短短6周内，购买了价值2913荷兰盾的球根，其中大部分是从阿尔克马尔的沃特·塔尔科恩（Wouter Tulckens）手中购得的。塔尔科恩是给几个种植者做经纪人。他卖给范·罗斯文的球根中，有一个就种在一个叫科内利斯·费尔沃尔（Cornelis Verwer）的种植者的花园里；另一个种在一个加尔文教牧师亨里克斯·斯沃米厄斯（Henricus Swalmius）在哈勒姆南边的球根巷里的一小片花田中；第三个则原属于一个叫弗兰斯·格雷贝尔（Frans Grebber）的画家。以上这些信息能在阿尔克马尔的法律档案中留有记录，是因为塔尔科恩因为没有如期交付球根而被范·罗斯文告上了法庭。而在这一短暂的时间里，他买卖的球根可能远不止这些。

范·罗斯文的例子绝不是个案。在《对话》里，贪婪鬼就讲了一个他去过的酒馆交易团体的事。因为球根大卖，而且价格又都很高，庆祝达成交易的葡萄酒钱——超过120荷兰盾的交易扣的3荷兰盾——就像“下雨天茅草覆盖的房顶上落下的水滴一样密集”，“我常常去旅馆吃大鱼大肉”，“有鸡肉，兔子肉，还有美味的点心。从早上就开始喝酒庆祝——红酒、啤酒——一直喝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到回家时，反而比来之前更富有”。当时的编年史作者莱乌韦·范·艾策马猜测，在一个荷兰城镇，在狂热期间有共计价值1000万荷兰盾的郁金香被交易。可以说，他是低估了当时贸易的疯狂程度。

人们很难不如此认为：在当时严峻的经济条件下，郁金香狂热达到了一个无可匹敌的高度，至少以联省标准而言是这样的。若我们认为范·艾策马的推断是正确的，那么在1633年到1637年间，在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大概有价值2000万荷兰盾的球根被买卖。假设在其他10个交易中心，每个中心的交易额总计大约为这两个城市交易额的1/10，那么荷兰球根贸易在这四年里，纸面上的总交易额也可以达到将近4000万荷兰盾。如果荷兰省的花商真的如批评球根交易的人所说的那么冲动和不负责任，再假如参与交易的人不是以千计而是以万计的话，那么这个交易总额可能就要翻一倍或更多。相比之下，在1636年到1637年间，富商们在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储蓄额才只有大约350万荷兰盾，最有权势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是当时全欧洲最大的贸易组织，其资本才不过650万荷兰盾。

当时的小册子作者在1636年12月还发表了一个生动的价目单，能让人对郁金香价格的意义有形象的认识。作者指出，一朵花的价格是3000荷兰盾，看看这些钱能买下多少东西吧：

8只肥猪	240荷兰盾
4头公牛	480荷兰盾
12只肥羊	120荷兰盾
24吨小麦	448荷兰盾
48吨黑麦	558荷兰盾
2大桶葡萄酒	70荷兰盾
4桶8荷兰盾的啤酒	32荷兰盾

2吨黄油	192荷兰盾
1000磅奶酪	120荷兰盾
1个银酒杯	60荷兰盾
1包衣服	80荷兰盾
1张附赠床垫和寝具的床	100荷兰盾
1艘船	500荷兰盾
	总计 3000荷兰盾

从这个角度说，在1636～1637年秋冬时期，荷兰省的郁金香贸易是健康而蓬勃发展的。随着狂热达到顶峰，酒馆交易团体里面才开始出现一些令人担忧的坏事将至的征兆。

第一个警示就是花商们无止境地追求新奇品种。只有一两种像总督这样的品种是公认的顶级，而对于哪些品种属于第二档则众说纷纭，而且这种争议随着越来越多相似品种的出现变得更加严重了。即使是郁金香专家也无法分辨出哪个是范·英格兰司令，哪个又是范·霍伦司令（Admirael van Hoorn）。一个村庄或城镇偏爱这一品种；另一个地方又偏爱另一品种，潮流和观点时时都在变化，再加上新品种不断涌现，挑战已有品种的地位。正因为如此，球根贸易不仅仅是不稳定，而且先天性缺乏逻辑。没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市场是不可能永久昌盛的。而荷兰的郁金香交易就是两种要素都不具有的典型。

一个花商疯狂寻找新品种的著名例子就是对黑色郁金香的追求。这种传说中的稀有品种若是能找到哪怕一株，也肯定比“永远的奥古斯

都”还要昂贵。法国小说家大仲马写了一部名著就叫《黑色郁金香》，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年轻的医师，名叫科内利斯·范·巴尔勒（Cornelis van Baerle），他因为第一个培育出黑色郁金香而赢得了一笔巨额奖金。大仲马似乎是从一个偶然听说的狂热巅峰时期的传说而得来的灵感。而这个荷兰悠久传说的另一个版本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哈勒姆的花商财团听说，在海牙有一个补鞋匠成功培育出一株黑色郁金香，于是下定决心要将其买下。他们来到补鞋匠的店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鞋匠终于同意以1500荷兰盾的价格出售自己的黑色郁金香。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是，当他把球根交给花商之后，花商却把球根摔在地上踩了个粉碎，一边踩一边大喊：“你这个白痴。我们也有一株黑色郁金香。现在你的被毁了，我们的就是世上仅有的了。你想要的话，我们可以1万荷兰盾卖给你。”哈勒姆的花商成功确保了自己的黑色郁金香是独一无二的，自然也是可以漫天要价的之后，满意地回家去了。而倒霉的补鞋匠，因为自己丧失的财富捶胸顿足，当晚就因为精神上的打击去世了。

关于黑色郁金香的故事当然只是传说。类属生物学已经证明，就是如今也根本不可能培育出纯黑色花瓣的郁金香，即使有几个所谓的“黑色”品种，也不过是极深的紫色显示的效果。无论如何，黑色郁金香的传说在狂热时期流传如此之广，可能也让一些敏锐的花商警觉到：市场需求的品种、有限的培育时间内能够引入市场的新品种、荷兰种植者们能够用来培育新品种的植物学意义上的郁金香数量，这三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不断拉大。

更让人担忧的是，在1636年秋天，磅货开始畅销。这些之前一文不值的球根在1637年初却以惊人的价格被买卖。这本应当足以让花商们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上等郁金香的价格升得再高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狂热时期，仅存的一些真实的需求就是老派鉴赏家对真正上等郁金香的需求。他们是唯一会把郁金香种在土里，但不是为了交易的人。但对于磅货则完全没有任何市场需求。鉴赏家们对这些品种不屑一顾，而酒馆

花商们更是从来没有种植的打算。这些磅货被交易只是因为它们存在，而当1月过完2月来到之时，连最疯狂的郁金香交易者也开始不安地意识到这个市场已经失去控制了。

阿尔克马尔拍卖的成功让人们相信球根价格依然很高，但即便如此，一些谨慎的交易者也开始怀疑郁金香的价格还能持续上升多久。开始有零星的花商在出售了手中的球根后就不再投资。在遍布荷兰省的酒馆交易团体里，竞争的交易者们都怀疑卖家是不是知道什么他们还没掌握的信息。他们可能在想，也许自己也应该出售一两个球根了。

此时是1637年2月的第一周，市场的繁荣已经走到了尽头。

12 崩盘

2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一群花商集中到哈勒姆的酒馆准备像往常一样开始交易，郁金香价格暴跌就是从此时此地开始的。

当天的交易照例由一位资深的花商起头，这第一笔交易也主要是为了探探市场的行情。他打算卖的是一磅白王冠或斯维策，开出的价钱也是比较保守的1250荷兰盾。在通常情况下，立刻会有几个热切的买家竞相出价，他们都会领到石板和粉笔写下报价，最终价高者购得球根，一天的交易也随之火热开场。然而在这一天，竟然没有人愿意以1250荷兰盾的价钱购买这一磅球根。拍卖师不得不以1100荷兰盾的价格重新起拍，可是依然无人问津。第三次起拍时价钱已经降至可笑的1000荷兰盾，竟然还是卖不出去。

很容易想象当时令人尴尬的寂静对这些围坐在酒桌前的花商们而言是多么突然的打击。随着这次滑稽的拍卖继续往下进行，举着半杯啤酒的手僵在半空，端到嘴边的酒杯也放下了。花商们突然意识到发生在他们面前的这一幕有多么可怕。交易者们紧张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沉默只持续了一两秒，就被爆发的喧哗取代了。每个在场的花商都开始紧张得议论起来。

这些花商在过去几天内十有八九花过类似的价钱购买类似的球根，并且期望着转手卖出就能大赚一笔。然而现在，不过一两分钟的时间内，他们的期望就被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个最严峻的问题：球根交易将何去何从？显然，当天的交易不可能再正常进行下去了。可能还有少数一些人仍然试图销售其他球根，但也都没有成功。酒

馆里的人几乎是马上停止了所有交易。所有人都处于困惑之中，但个别人已经跑去通知所有亲戚朋友了。没过多久，哈勒姆的所有酒馆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城里城外所有花商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就是：卖！

恐慌弥漫整个联省只用了几天时间。一个接一个的酒馆、一个接一个的城镇，花商们发现一两天前还价值上千荷兰盾的球根，现在却一文不值。少数几个交易者试图通过举办假拍卖会刺激市场让价格回升，但是他们的努力毫无成效。在很多地方，酒馆交易崩溃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价格跌至狂热时期的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郁金香交易的市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不少花商发现自己和书中的贪婪鬼处于一样的困境中。《对话》的作者是这样描写这位原织工的境况的。意料之外的价格暴跌出现后，贪婪鬼的第一反应是出去继续自己的买卖。他强自镇定地对自己，也对讲真话说："花神只是病了，但绝不会死。"而他自己的妻子已经开始痛哭流涕地埋怨他不该变卖了织布机和其他纺织工具。贪婪鬼来到酒馆，却发现市场已经崩溃，所有交易都停止了，一个买主也找不到了。终于清醒的贪婪鬼意识到自己为了购买球根、开辟花园欠下的高额债务，不禁惊慌失措。倒霉的织工只好向自己的朋友讲真话求助，讲真话的建议一针见血：郁金香交易已经彻底完蛋了，没有任何办法让它重新复活。花商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捡起自己的老本行，回到自己本来的生活中。唯一能期盼的就是有机会体面地还上欠账。

在一个繁荣的市场中，参与者对市场的信心就意味着一切，而郁金香市场崩溃得如此之快恰恰证明，一些不那么乐观的花商肯定是在市场崩溃前几天，就已经对连续上涨的球根价格感到不安了。狂热发生的年代还没有报纸，人们无法确切知道1月最后一个星期到2月最初几天之间所有事件发生的确切顺序，但是球根交易肯定不会是在完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停止的；也不会因为一个哈勒姆酒馆里的一桩拍卖失败就彻

底停止了。在此之前一周甚至更长，在荷兰省任何地方交易球根肯定已经开始变得困难了。拍卖师发现无法再像以前一样迅速地把价格推高，一些种类的价格已经达到峰值，所以很多交易者迫切希望在此时将其抛出，这就使得想要抛售的卖家人数开始多于想要买入的买家人数。在哈勒姆这次决定性的拍卖之前一两天，人们肯定已经开始感受到一种担忧和恐慌，就像须德海上弥漫的湿冷浓雾一样蔓延在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的酒馆里。其实郁金香交易者们都知道终有一天会有大事发生，现在大事真的发生了。

在2月3日哈勒姆的这次决定性的拍卖会之前，已经有传言说郁金香的价格已经没有上升空间了。某些卖家对于投入的收益也不再抱有信心。最早至前一年的12月底，有一名住在格罗宁根的药剂师兼球根种植者，名叫亨里克斯·蒙廷（Henricus Munting），他做了一笔大买卖，以7000荷兰盾的价钱把几个球根卖给了一个阿尔克马尔人。为了让买家放心，他承诺若是1637年夏天以前价格下跌，买家可以取消这笔交易，只需支付全部价款的10%。市场崩溃前两天，哈勒姆的彼得·维恩森（Pieter Wynants）在家中举办宴会，他的弟弟亨里克（Henrick）对一位客人软磨硬泡，企图说服人家花1350荷兰盾买下一磅的斯维策郁金香。亨里克的目标是一个名叫格特鲁伊特·舒特（Geertruyt Schoudt）的富有的老寡妇。老人起初没有答应，直到另一个客人，也是当地的一名染工雅各布·德布洛克（Jacob de Block）愿意提供担保，保证价格8天之内不会下跌之后，老人才同意购买球根。

2月3日之后的价格暴跌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没有留存下1637年春天球根价格相关的文件。看起来市场上唯一仍愿意购买郁金香的只剩下鉴赏家和少数几个不以郁金香交易为主业的富有花商，而且他们会购买的也只是最稀有和珍贵的品种。根据当时的记录，一个在价格暴跌之前价值5000荷兰盾的郁金香，之后只需要50荷兰盾就可以买下；到了5月，一花圃的郁金香仅售6荷兰盾，而它在1月时的价格曾达到600荷兰盾～

1000荷兰盾；在狂热时期能够卖到400荷兰盾的一套球根，现在才值22荷兰盾1荷兰币。这些价格变化显示，就算还有能卖得出去的郁金香，其价格最高也不过是过去的5%，大多数连1%都不到。

这次的价格暴跌绝对是一个惊人的事件。每个感染狂热的城镇就算不是完全同时地经历价格暴跌（也很有可能就是同时的），整个下跌的过程最多不超过3个或4个月，这比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金融灾难——1929年华尔街股灾和随后的大萧条还要来得迅速和彻底。华尔街的股票是用了两年时间才跌至最低点，而且其最低点至少也维持在原价值的20%。各种各样的困惑围绕着所有人，似乎没有哪个花商明白为什么球根交易会以这样惊人的方式急转直下。而纵观整个事件，不难看出价格暴跌从一开始就是无可避免的。太阳之所以燃烧得明亮而稳定是因为有持续不断的燃料供给，同样的，郁金香狂热要想持续下去，也必须不断有球根供应到市场中来。在1636～1637年冬天，对郁金香的需求全方位迅速增长，速度远胜过球根供给的增长速度，再加上狂热的爆发，最终的结果就是，人们用尽了所有可用的资源。连磅货和单一颜色的郁金香也被拿来贩卖，且在此之前无人问津的斯维策和白皇冠之类都能卖到1000荷兰盾每磅的高价。荷兰省的花商们已经把能找到的所有球根都用来交易了。

当这些“破布”都被用来交易之后，市场上再没有新的品种能以人们可承受的价格进入市场了。低价球根的断货就意味着，没有新的花商可以加入到这个市场中。因为即使最便宜的球根也动辄成百上千荷兰盾，谁能买得起呢？再说，已经有一小部分交易者开始出售他们的球根以获取利益。一个数量上不断缩小的花商群体，掌握着有限的资金，不知怎么竟维持了这么久的价格急速上升。即使是那些还相信郁金香交易本质上是一种健康的交易的人或早或晚也终将无法承受新一轮的价格上升，并且犹豫还要不要继续投入。因此，到了2月初，无论是资金还是球根，这两种郁金香狂热发生的根本动力，都已经完全被耗尽了。如同燃

烧尽最后一滴燃料的太阳，郁金香狂热也成了超新星，以最疯狂的交易爆发引领即将到来的大崩盘。

这就是狂热覆灭的原因，但还不是价格暴跌程度如此彻底的原因。后者的原因在于，在狂热最高峰，球根转手速度过快。在牛市中，有一些人会保留自己的资金等待价格下跌时再购入，这样他们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买入价值很高的股票。但是在郁金香狂热的最后一两个月里，主要交易的都是磅货或一些以1000分计的品种，这些东西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对这些品种并不存在真正的需求，鉴赏家永远不会种植它们，只有在交易此类货物的人眼中它们才是有价值的，所以这个市场中根本没有熊市买家想要利用的机会。

更糟糕的是，郁金香狂热把每一个酒馆交易团体中的人都榨干了。本来就没有几个花商是靠手头的闲钱加入郁金香交易的，现在又全被卷入一个甚至多个郁金香买卖的复杂交易链中。大部分人是靠出卖或抵押自己的家当来筹集资金的。现在这些处于绝望境地的人们面临的不仅仅是金钱的损失，更是彻底的毁灭。在17世纪，即使是在荷兰共和国，毁灭不仅意味着穷困，更意味着终生被工厂奴役或者饿死，早逝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结果。人们最不想做的就是再为一株郁金香竞价，所有人此时都成了卖家。当然也不是说整个联省郁金香交易的价格是同时瞬间跌破的。个别花商会走乡串镇，但大多数还是只固定在一个地方交易。所以价格下跌的消息也需要一两天时间传播。不管怎么说，荷兰球根交易事实上有多个分离的市场，每个被郁金香狂热影响的城镇都是一个市场。一个城市的价格变动可能落后于另一个城市；不同城市的花商交易的球根品种也有所不同；在这个酒馆里进行交易的一拨人，也可能和另一个酒馆中的一拨人不同。

因此，在哈勒姆的郁金香交易已经崩溃之后，别的地方还继续兴盛了很短的时间。灾难的消息大概是周三传到阿姆斯特丹的，但是到2月6

日周五那天，交易仍然火爆，在一个叫门诺婚礼（Mennonite Wedding）的酒馆里，还有人以1065荷兰盾的高价买下一磅斯维策郁金香。但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月7日，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交易似乎也达到了与哈勒姆类似的危机顶点。一个叫约斯特·范·盖克（Joost van Guyck）的花商在从一个叫安德里斯·德·博斯赫（Andries de Bosscher）的人手里购买价值1100荷兰盾一磅的普通斯维策时，他开始犹豫这样的交易是否明智，并且要求德·博斯赫担保价格不会下跌。德·博斯赫于是请了一个叫彼得·范·德·克鲁伊斯（Pieter van de Cruys）的人承诺将来以1200荷兰盾的价格购买这一磅斯维策。但是这依然不能让范·盖克放心，他怀疑这个范·德·克鲁伊斯到时是否真的能够信守承诺。于是在2月11日，他和德·博斯赫一起到当地一个公证处把整个协议书面记录并公证了。在哈勒姆花商无法再以1000荷兰盾每磅的价格出售球根8天之后，在阿姆斯特丹还有这样的交易生效，这就意味着，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在最早的崩溃出现之后依然坚持了至少一周。即便如此，范·盖克的担忧至少证明，当哈勒姆的坏消息传到阿姆斯特丹后，恐慌已经开始破坏人们对这个还在运行的市场的信心。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南部。在海牙，2月4日的时候交易还能顺利进行。其中一笔就涉及著名的画家扬·范·戈延（Jan van Goyen）。他是联省最有影响力的风景画作家。范·戈延的父亲是个鞋匠，他作为画家成名后，过上了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富裕生活。他的父亲也是艺术的业余爱好者，不算富有但至少拥有自己的房子。后来因为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不得不住进了莱顿的收容所。年轻时候的扬曾经给哈勒姆的画家埃萨亚斯·范·德·费尔德（Esaias van de Velde）当学徒，后来靠画沙丘和河景出了名。尽管从来算不上富有，但是他把挣来的钱都花在了置产和郁金香上。在1637年1月27日，戈延从一个叫阿尔伯特·范·拉文斯泰恩（Albert van Ravensteyn）的海牙市长手里买了10个球根，8天之后又买了另外40个球根，总共花了912荷兰盾外加他的两幅画作。范·戈延的第二笔交易，也是更大的一笔，实际付出了858荷兰盾，就是在哈勒姆崩

盘后第二天达成的。画家同意购买后不久，海牙的球根价格也迅速下跌，他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非常绝望的财政困境。

市场崩盘已经够球根交易者绝望了，但是雪上加霜的是，像《对话》中的贪婪鬼一样，大部分花商仍然有义务履行他们签订的购买合同。基本上每一个交易者都面临着同样的窘境：他们已经支付了定金，买到的郁金香变得一钱不值，可他们却有义务在球根出土时支付巨额的尾款。对很多人来说，除了拖延别无他法。

郁金香交易的崩溃对于那些在价格暴跌前已经售出球根，看起来获利不菲的人也是有严重影响的。这些被影响的人里面就包括沃特家的孤儿们。阿尔克马尔拍卖至少导致了两起法律纠纷。其一是与一个叫格里特·阿姆斯特丹（Gerrit Amsterdam）的当地交易者，他声称自己花263荷兰盾买下的563分改良版博特曼球根实际上只是普通的博特曼球根，所以根本不值这个价钱。其二是与一个叫威廉·罗利森（Willem Lourisz.）的人，他是哈勒姆附近的海姆斯克（Heemskerk）的花商。罗利森花了512荷兰盾购买了红色系“安特卫普维图斯”（Anvers Vestus）球根，说好球根开出令买家满意的花朵之后才付钱，而实际上，拍卖一年半之后，罗利森依然没有付清欠款。所以，孩子们在孤儿院的监护人雅各布·范·德·梅尔（Jacob van de Meer）和雅各布·范·德·吉斯特（Jacob van de Gheest）最终只得将罗利森告上法庭。罗利森给自己找的蹩脚的辩护理由是：他曾经与范·德·梅尔约定，1637年5月的某日清晨，双方在种植此郁金香的花园外见面，但是监护人没有到场，他等了半个小时还没见到人就离开了。范·德·梅尔愤怒地反驳说花商从未约见过他，而且郁金香开出的美艳花朵持续了数周，随时都可供查验，因此花商理应按约定付款。

相比于花商，种植者的境况稍好一点。即便在酒馆交易停止以后，依然有鉴赏家愿意支付大价钱购买郁金香。在1637年3月17日，一个叫

迪克·博尔滕（Dirck Boortens）的哈勒姆商人就卖出了不少高质量的球根，包括利夫肯司令和塞依布洛姆。买家名叫彼得·范·威尔森（Pieter van Welsen），他为这些球根总共支付了11700荷兰盾。在4月中旬他去验货时发现有些球根的质量不好，于是博尔滕同意少收300荷兰盾。范·威尔森并不太担心郁金香价格崩溃的事，他仍然乐意支付余下的11400荷兰盾并且同意分三次结清：6月支付4000荷兰盾，8月底支付3700荷兰盾，剩下的3700荷兰盾在1638年2月第一天支付。这笔交易是两个纯粹的郁金香爱好者之间的交易。他们可能压根没关注过什么郁金香狂热，而且他们完全有能力为这种只能开花几星期的植物支付上万荷兰盾或更多。不过，就算是在富有的和上流阶层的郁金香交易者中，也难免有人对市场的情况过于乐观。金葡萄的主人，也是富有的种植者的扬·奎克尔在哈勒姆郁金香价格下跌的第二天还去参加了阿尔克马尔的一个拍卖，并且很有信心地花了3260荷兰盾购买了沃特·温克尔的一些好球根。扬·阿德莫里尔也是一位时髦的阿姆斯特丹交易者。他住在王子运河边，在房子后面的私人花园里种植郁金香。1637年5月，他跟自己的一个客户帕卢斯·德·霍格（Paulus der Hooge）保证说，从自己花圃里卖出的郁金香，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至少增值20%。

酒馆交易的崩溃不仅让花商破产，还影响了一大批种植球根的农民。这些人不但卖花给花商，也卖给鉴赏家。任何在狂热期间抵挡不住诱惑扩大经营的人都受到了影响。这次危机严重到让专业种植人不得不以史无前例的最快速度来应对这一事件。最早在2月7日，也就是价格下跌后第四天，荷兰省和乌特勒支省的种植者就在阿姆斯特丹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会议，来探讨如何将价格暴跌引发的损失最小化。即使是以联省的大小而论，有些城镇之间至少也是两天的路程，所以种植者们能够如此快速地做出反应已经非常惊人了，而原因当然是出于对他们自己未来的严重担忧。

此次会议上只缺少鹿特丹的代表，但是那里的种植者们送信来说愿

意遵守会议上由多数意见达成的决定。受影响最严重的十几个城镇和地区都自行集会，并选派了代表来参加这次大会。一些著名的大种植者都来到了阿姆斯特丹，比如菲亚嫩的弗朗西斯科·达·科斯塔、哈勒姆的贝伦特·卡多斯和威廉·舍瑙（Willem Schonaeus）、乌特勒支的弗朗索瓦·斯沃茨（Francois Sweerts）。还有一些不那么有名的种植者，比如莱顿的W.J.斯罗廷（W.J.Sloting），以及作为施特雷克（Streeck）地区代表的克莱斯·黑尔腾（Claes Heertgens）——这个地区是一片特别适于种植球根的狭长地带，位于霍伦、恩克赫伊森和梅登布利克这三个西弗里斯兰省城市之间。

这次种植者大会是在2月23日举行的。当时各地的郁金香交易都已经彻底混乱了。起初代表们还在考虑如何使郁金香交易复苏，但显然只是浪费时间，于是他们直接转移到了探讨如何减少损失的议题上。

在某些方面，种植者面临的问题和花商面临的几乎一样严重。他们其中大部分人在过去的一年中都投入了大量金钱购买球根和子球，然后种在自己的花圃里精心培育。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基本也都扩大了种植面积。而现在，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很多购买球根的人只付了一小部分定金，而且之后球根肯定又多次转手。很多交易中，由于狂热时期交易者们创造的长而复杂的交易链，所有权的归属已经弄不清楚了。只要这个链条中任一环节上的花商无力支付，整个链条就会崩溃，那么最起点的种植者们想在6月拿到欠款就根本不可能了。

在阿姆斯特丹的大会上，这些问题肯定都被讨论到了。种植者最终达成的解决方案的核心思想就是：假装狂热从未发生过。随着大会接近尾声，大多数人支持的方案是：认定上一次播种前达成的交易仍然有效。而1636年11月30日以后达成的协议，买家可主张取消交易，但仍应支付价款的10%作为赔偿。阿姆斯特丹的代表是唯一没有在决议上签字的。

种植者们悲观地推行这一妥协办法，以期盼能尽量减少损失。他们知道，大部分在11月30日之前卖出的球根是由付得起钱的鉴赏家和富商买走的。只有12月和次年1月的交易，才是贫穷的花商大批涌入市场之后带来的，也直接导致了郁金香交易爆炸式发展，最终造成郁金香狂热爆发。想让这些花商付钱几乎是不可能的，阿姆斯特丹大会的决议也证明了人们都看到了这个事实。

在《对话》中，讲真话向贪婪鬼解释种植者的计划在现实中如何实行。如果一个球根本来卖30荷兰盾，然后三次转手，价格分别是60荷兰盾、100荷兰盾和200荷兰盾。那么花200荷兰盾的买主要交钱拿花。如果他想取消交易，可以支付20荷兰盾的罚金给他的卖主，则两人之间的交易就算取消。球根的所有权于是回归到花了100荷兰盾购买球根的花商手里，他可以选择付全款留下球根，或是交10荷兰盾的罚金把球根再退给花了60荷兰盾购买球根的人。讲真话没有说下去，但是可以推断种植者的意图是如果链条上所有人都按约定全额付款，那么作为根源的种植者也可以拿到自己那份；如果没有一个花商还想占有球根，那么球根的所有权就会回归到种植者手中，他可以拿到10%的赔偿，还可以把球根再卖给别的想要的人。

我们还不知道阿姆斯特丹的代表为什么拒绝批准这一决议，但是可以想象他们对于种植者其他建议的解决办法中做出的重大牺牲感到震惊。毕竟，依据当时的法律，球根种植者完全有权利要求买家支付全款。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是：无论谁对谁错，通过法院追究成百上千已经失去偿还能力的债务人的法律责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只有彻底的实用主义才能说服大部分种植者认可这个决议，并自愿放弃本来可以属于他们的几千荷兰盾的欠款。决议中的10%指的是最初购买价格的1/10，而不是狂热时期价格顶峰的1/10，这已经是种植者们认为能在灾难中挽回一点损失的唯一办法了。

种植者的问题是，虽然他们的要求已经很低了，却依然无法照此执行。他们可以建议自己的客户考虑这种选择，但是却无法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建议。事实上，大多数花商的情况是，如果他们收不回转卖的货款，那他们连1/10的罚金都付不起。所以除非万不得已，没有哪个花商愿意选择这个解决办法。就像《对话》中的贪婪鬼敷衍自己的债主时说的："只要我的买主付了钱，我就可以付你钱了。只不过我连他的人都找不到了。"

这就是为什么，球根交易的困境无法由球根交易本身来解决，而只能靠权威来判定。1637年2月以前成交的这几千个球根究竟归属于谁？更重要的是，谁应该为它们埋单？不论什么样的折中办法，最终要靠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实现。

狂热最终成了法院的问题。但是当郁金香的案子开始审理时，郁金香的评论家们又有话要说了。

13 娼妓女神

在联省，没有人比阿姆斯特丹的克莱斯·彼得森（Claes Pietersz.）更热爱郁金香。他大概是共和国里最时髦的医生了。其他人可能只是种花、卖花，甚至因此发家，但没有人像彼得森一样，把自己的姓氏都改成了杜普，也就是荷兰语郁金香的意思，于是他成了名副其实的郁金香博士。

从1621年起，克莱斯·彼得森改名为尼古拉斯·杜普。当时，郁金香才刚刚在荷兰最富有的上流社会阶层中兴起。他用郁金香的图形作为个人徽章。当他在1622年当选为市议员之后，依惯例要选择盾徽，杜普先生自然选择的是用精致的、大红火焰颜色的红色系郁金香图形来装饰自己的盾牌。他的郁金香图形议员印章在他批准的上百封官方文件中留下了红色的郁金香蜡印。当他为这个城市操劳了一天，终于回到家中之后，迎接他的是一幅郁金香为主题的画作，画的是一朵最上等的司令，据说，这幅画就装饰在他王子运河边豪宅大门的名牌上。

当时，年轻的杜普博士（他改姓的时候还不到30岁）就已经居于高位。后来他又成了伦勃朗的朋友，并且还是伦勃朗的名作《杜普教授的解剖课》中的人物。画中的杜普是一位杰出的医生，又高又瘦，蓄着唇髭和胡须，正忙着解剖一个刚被行刑的罪犯。杜普先生当时的身份是一位植物学家，他极力宣扬茶的药用功效，并将其作为缓解疲乏和痉挛病等症状的良药。杜普还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曾4次当选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众所周知，这位坚定的加尔文教徒尤其鄙视荷兰传统婚礼上的醉酒狂欢，于是他发起了一项让人们至今还会偶尔谈起的立法，即《1655

年禁奢令》，其中规定婚宴宾客人数不得超过50名，婚宴持续时间不得超过两天。

杜普博士会厌恶酒馆团体的过度饮酒当然毫不令人意外。他1652年从医师行业协会退休时，向他的老同事们赠送了一个银质的酒杯。杯子的形状是一朵郁金香，花茎上还趴着一只蜥蜴。杜普希望他们在以后的协会宴席上，能用这只杯子做最后的祝酒。私下里，他直到晚年都是一名鉴赏家。而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1637年之后，尼古拉斯·杜普不愿人们将他和这种著名的、他用来作姓氏的鲜花联系在一起。他在王子运河边的豪宅大门上的郁金香标识被撤下了，盾型纹章也被放置在不那么显眼的地方。杜普博士为郁金香狂热的荒唐无度感到惭愧。

和杜普博士有同感的人并不在少数。接替克劳修斯在莱顿的职位的阿多夫·福斯蒂斯（Adolphus Vorstius）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他的植物园中每周教授两堂植物学课程。福斯蒂斯教授厌恶商人们对球根的歇斯底里和露骨贪婪，所以他和助手骑马出门时，只要发现球根，他就要把它毁掉。即使是那些没有加入郁金香狂热的人也多少继承了鉴赏家们对花商的恶评。在狂热的最后阶段，很多普通人开始嘲弄地称酒馆团体中的花商为“呆子”（*kappists* ）。这是一种相当严重的蔑称了，对于黄金时代的荷兰人来说，这个词让人想到的就是带着小丑帽子的傻瓜。

并非所有对郁金香狂热的批判都停留在笑话和羞辱上。荷兰社会中一些更具有宗教性质的团体则采取了更严厉的态度，指责球根商人将基督教义中的慈善和谦卑抛诸脑后。即使是在郁金香市场彻底崩溃之前，就有不少激烈的反对者把自己对球根交易的批判印刷出版。他们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小册子。从1636年12月起，整个荷兰省泛滥着各种关于郁金香狂热的册子。

这些作品的内容大多是对郁金香狂热的粗俗不堪的嘲讽，无一例外的都以罗马女神弗洛拉为主角。她一向被视为最放纵的天神。传说弗洛

拉是罗马时代早期一个声名狼藉的交际花，但是她靠这种不道德的营生积攒了大量财富，在她去世时，这笔钱财就留给了罗马。罗马人为了感谢她，就把她奉为神灵崇拜。从此她便成了花之女神，也是妓女们的守护者。荷兰人的小册子里喜欢拿这个罗马妓女和珍贵的郁金香作比。在狂热高峰时期，这种小册子的传播速度极快。作者警告他的读者们，弗洛拉总是把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她的价格不断地上涨，以至于没有一个人承担得起长久拥有她的开销。尽管她的每一个爱人都比上一个更富有、更大方，但弗洛拉总是有更荒淫的要求要他们来满足，这样才能证明对她的忠诚。即便是她已经升入拉丁神殿、嫁给了泽费罗斯风神，依然难改旧习，没多久就背叛了她的丈夫，与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打情骂俏去了。

无信的伴侣、贪婪的情人——在小册子作者的眼中，荷兰省的球根交易商们就是弗洛拉石榴裙下拜倒的最新一批傻瓜，为了妓女之神抛家舍业，最终换来的只是她无情的背叛。很多小册子的题目都暗示了花商们的财务困境，比如《花神的病榻》；也有更直白一些的，如《花园中的妓女倒下了》和《恶毒女神弗洛拉》。其他还有一些小说化的作品，比如交易者发现自己被异教偶像迷惑以致陷入困境后的抱怨。有一个题材就是，一个织工气愤地指责花神如何色诱他。另一个题目为《异教和土耳其郁金香球根的罪名》的文章中写道，花神和其他精灵判定郁金香和其他一些花草都必须回到创世时设计好的地方，否则痛苦和疾病以及恶劣天气就将降临世上。所有作品的基调是尖刻和充满敌意的，指责许诺了一切的女神最后却让傻得相信她的人一无所有。

随着小册子上嘲讽诗句的流行，漫画作品也开始涌现。最初一些值得记住的艺术作品，对郁金香狂热的描写都是入木三分的，显示了对狂热过后失去一切的花商的嘲讽。有一副彼得·诺尔普（Pieter Nolpe）的画作［这幅作品后来还被一个叫科内利斯·丹克特斯（Cornelis Danckerts）的艺术家改编成了铜版画］，题目很拗口，叫作《花神的傻

瓜的小帽，或1637年一个傻瓜孵出另一个傻瓜的奇特景象，无聊的有钱人失去了财产，聪明人失去了理智》。诺尔普的作品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球根交易者聚集在一个酒馆里，酒馆门口有一个巨大的小丑帽形状的招牌，上面写着酒馆的名字“愚蠢的球根”。而酒馆门口，还有两个人在打架。画作最显著位置是一个人提着一篮、还推着一车已经一文不值的球根去扔到粪堆上；旁边有三个花农在看着，而他们后面则是《圣经》中的魔王别西卜举着钓竿，等着毫无价值的郁金香交易合同上钩。在他右手边，撒旦手里拿着一个沙漏，显示郁金香交易的时间已经快走到尽头了。画的背景是一座废弃的房子，花神骑在一头驴上经过，示意不远处愤怒的人群不要靠近。画作下面的解释说明文字是：“花神因为她淫荡的恶行而被驱逐了。”类似的对于球根交易过度的尖锐攻击到几年之后还时有出现，所以这些艺术作品就支持了郁金香狂热对于那些没有真正加入交易的人也有巨大影响的观点。在1640年，克里斯·范·德帕斯（也就是20年前，为郁金香做画册《植物花卉》从而推动了郁金香风尚的那个人）创作了一幅著名的插画，名为《花神和傻瓜》。画中的花神是一位健康的年轻姑娘，穿着领口开得很低的连衣裙，坐在一辆装饰华丽的沙滩艇上，里面坐满了喧闹畅饮的戴着小丑帽子的傻瓜。这些有讽刺意味的形象都带着自己的标签，比如“空想”“醉鬼”和“囤积货物”。画中的沙滩艇正穿过哈勒姆城外的沙滩，艇上还挂着狂热期间当地一些作为主要集会地点的酒馆的招牌，比如“白衬衫”“小母鸡”及另外四五家酒馆。一只猿猴爬上桅杆，在花商们头顶上方便。花神坐在船尾，手里拿着一捧曾经最抢手的郁金香：左手是博尔将军、范·霍伦司令和必不可少的“永远的奥古斯都”；右手是豪达和珍贵的总督，眼睛则看向车轮下碾压过的沙石。这个奇特的组合直直地向着海中驶去，后面还有成群的想要成为花商的人紧追不舍，急于加入通往毁灭的短暂冲刺。这些人都是织工，而且因为跑得太急，把老本行的工具都扔到地上踩坏了。在这幅作品的四个角上，画家还画了四幅小插图。一个是球根种植者亨里克·波特贝克在豪达的著名的花园，其他三个都是哈勒姆和霍伦的酒馆

交易场景。画面中间的核心——快速移动的沙滩艇是一个强有力的暗喻，预示了风中的交易必将走向灭亡。

范·德帕斯创作《花神和傻瓜》的同一年，一位更年轻的画家小扬·布罗海尔（Jan Brueghel）也创作了一幅宏大的作品，名为《郁金香狂热的寓言》。布罗海尔是黄金时代涌现的以花朵为创作主题的最有影响力的画家之一。尽管有些当代评论家认为的他的画风有一些僵硬，但他画的花朵总是鲜艳明快，尤其是微小细节的处理，比如叶子上爬行的小昆虫，仿佛给画中的鲜花也赋予了生命。《郁金香狂热的寓言》是一幅格外生动的作品，内容非常丰富，像克鲁克香克和吉尔雷的卡通一样充满各种插曲。画家描画了二十多个类人猿花商在进行球根交易中的各种仪式。一个花商指着一片盛开的郁金香；另一个一手捧着郁金香，另一手则拿着一袋钱；在他们后面，是一群猴子正在为谁应该为现在一文不值的郁金香付钱而打作一团，还有一个年轻的投机者被抬进他的坟墓。在画面的右边，一对猿猴在分享花商的传统宴席，而另一个则因为拖延债务，被拉到地方官面前受审。在另一个角落，一个尤为不满的猴子正在对着一花圃的郁金香球根撒尿。

这些羞辱性的讽刺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效应。100年之后，郁金香狂热仍然是所有荷兰人精神上一碰即疼的新鲜伤口。多亏了黄金时代大量的小册子作者和漫画家，球根可以卖出高价的想法在今天看来完全是可笑的。无论如何，关于狂热的小册子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其物质价值，这种东西使用寿命短，用劣质的木刻印版在劣质的纸上印刷，只为快捷和便宜。印好的册子就由小贩们随便沿街兜售，不过几个荷兰币一份；小册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促使它产生的原因。只有少数人是纯粹为了娱乐目的而创作这些小册子的。在荷兰共和国，识字率是较高的。对于阿德里安·罗曼这样的哈勒姆政府印刷机构来说，印刷小册子是一种成功且有利可图的副业。出版一般的市井民谣，一般可以卖出1000～1250册，而罗曼出版的《讲真话和贪婪鬼的三次对话》是当时的畅销

书，多次重印，读者数量可能达到15000人。

大多数人出版小册子的目的当然还是专门为了影响民意。这一类小册子通常是由缺乏文采的有钱人出钱找人代笔创作的。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表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所以他们花钱雇佣写手来把他们的看法转化为诗句，然后再由出版商出版，以达到散播观点的目的。这些作品实际的作者，比如史蒂芬·范·德·拉斯特（Stephen van der Lust），是哈勒姆的专业剧作家，他写了4本关于狂热的小册子。另一个扬·泽特（Jan Soet），是一个笔风犀利的讽刺作家，他也写了两本小册子。像他们这样的作家，一般都是出身清贫，靠写诗写剧本，在酒馆里向听众宣读为生；相反，他们背后的资助者则多为执政者和有权势的贵族。

这样看来，1637年春天在荷兰共和国出版的很多小册子都是具有宗教启发性的作品。暗中出资出版这些册子的贵族们认为球根交易违反了教义而且是不道德的。他们借此谴责那些为了贪图暴利而被卷入狂热的商人。另有一小部分小册子似乎旨在为老牌种植者和鉴赏家们正名，认为他们也和最严厉的狂热批判者一样为这疯狂的景象所震惊。这类的作品一般选择叙述性和辩解式的题目，比如《关于鉴赏家的新歌：他们不去酒馆，应当把他们与花商区别开来》。这类小册子试图说明郁金香爱好者和狂热的发生没有关系，他们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总体看来，对那些对球根交易充满恐惧和厌恶之情的人来说，他们的这种辩解听起来比较空洞。而且不由你不信，越是尖酸刻薄的讽刺作品，销量往往越大。随着联省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极尽所能地挖苦那些因为郁金香狂热而失去一切的人，共和国的政府则开始慢慢着手处理问题，以挽救这次金融灾难。

第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数以千计的巨额郁金香交易合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大部分协议将做无效处理。几乎在所有案例

中，原本的买家都失去了购买的意愿，更重要的是，失去了购买的能力。但是将合同作废的前提是依照种植者建议的条件——也就是支付原售价的10%，还是按照花商希望的那样（一分钱都不付），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在通常情况下，应当由每个发生狂热的城镇的执政者来判定适用哪一方的建议，或是提出他们自己的判定意见。但就这些相关城镇的实际情况来说，情况往往过于复杂，远远超出了管理者解决的能力。

在我们最熟悉的哈勒姆，市议会在短短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连续出台了三部法案，每个法案里提出的解决花商之间纠纷的办法都各不相同。第一个法案是在3月7日颁布的，宣布凡属于本市管辖的、在前一年10月以后的合同全部无效，买家不需要给卖家任何补偿。不到5周之后，第二个法案又公布生效，实际上推翻了前一个法案。这一次，议员们的决议是，凡是在酒馆和饭馆里达成协议的买卖，买方仍有义务向卖方支付费用（但是议员们没能解答数以千计的名义上已经破产的花商该去哪里筹钱）。这第二个法案颁布后不到一周，哈勒姆的执政者们再次改变了主意。这次他们干脆不再提供解决方案，直接撒手不管了，新法案建议所有纠纷当事人到上一级协调机关，也就是位于海牙的荷兰省议会解决争议；同时他们还建议纠纷双方参考采用2月23日种植者大会上提出的折中建议。

这种犹豫不定绝不是哈勒姆政府的一贯风格，而且他们的朝令夕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利益各方组成的游说团体轮番轰炸的结果：种植者要求行使他们的权利，收取全额价款；花商们则乞求免除债务。整个1637年的春天，议员们无穷无尽地争论探讨这个问题，郁金香交易各方都企图说服议员采用对自己有利的解决方案。议员们对这个状况也是不胜其烦，这从他们3月17日颁布的法令上就可以看出：该法令禁止印刷和销售以狂热为题材的有煽动性内容的小册子，并且要求书商和印厂上

交此类作品的库存集中焚毁。议员们决定把这个问题推给上级机构解决，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出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万全之策了。

类似的抗议行动在其他地方可能也发生了，所以包括哈勒姆在内的一些城市联合向荷兰省政府请愿，希望省政府能够找出一个让花商和种植者的损失都最小化的解决办法。到3月中旬，霍伦市的市长通知他们在海牙的代表，要尽一切可能加快解决办法的出台。但是省政府像各市的执政者们一样，很快意识到郁金香狂热是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问题，需要慎重考虑。而且省政府缺乏第一手资料作为提出解决办法的基础。以哈勒姆为例，1636～1637年，54个执政者中，仅有两人介入了郁金香狂热，更是没有一人亲自介入球根交易。一些城市提交的关于事件情况的只言片语的总结，根本无法给在海牙的官员们提供足够的信息。因此省政府也倾向于由省最高司法机关——荷兰省法院来裁决。补充调查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裁决做出前，官员们又去各忙各的了。

3月中到4月底这一个多月的等待，对于所有卷入狂热之中的花商和种植者而言都是煎熬。几个星期以前价值不菲的郁金香此时正处在盛放之季，鲜艳的色彩让联省遍地单调枯黄的土地都靓丽了起来。然而数以百计的花商们却被对破产的恐惧折磨着，还有成千上万悬而未决的买卖合同，涉及金额超过百万荷兰盾。

对于那些陷入狂热的人而言，他们最担忧的无疑是如何度过这次财政灾难。同时，他们也对市场为何突然崩溃充满疑问。当然，几乎没人愿意承认他们自己就是造成现在困境的推动力之一。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是受害者，而像任何地方的受害者一样，他们为自己找各种理由开脱。

很多人选择相信球根热其实是一种诈骗。有人甚至极端地猜想自己是被花商同行或是拍卖师欺骗了。另有一小群人坚信，郁金香交易本身

就是个阴谋。一位匿名作者称，整个郁金香交易市场是被一个由二三十个最富有的种植者和交易者组成的阴谋团体控制的，他们恶意操纵价格以从中牟利。但是作者却无法解释，这个团体如何能同时协调控制全国十几个被狂热感染的城市的郁金香市场。

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对狂热的指责。上面那个怀疑有阴谋团体的作者同时还提出郁金香交易的荒唐过度是破产者、犹太人和门诺派教徒操纵的结果。这三个群体是荷兰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因此也是最方便拿来当替罪羊的。破产者被认为是没有坚持量入为出这一神圣的荷兰准则，而且被迫为他们的罪行负责，所以想要伺机报复。犹太人在荷兰得到的对待比在德国或法国好一些，但是依然习惯性地被与高利贷或其他不正当牟利行为联系在一起，而且长久以来被禁止与本地人自由融合，犹太男子与当地荷兰女人对话都会被阻止，犹太人若雇佣基督徒为仆人则是违反法律的。门诺派教徒也是同样的弱势群体。他们从着装上很容易被辨识（通常是一身黑的长外衣和宽松的裤子），他们属于再洗礼教派，反对婴儿受洗礼。而笃信正统东正教派的荷兰人则认为婴儿受洗不仅是道德上的义务，也是在当时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采取的必要措施。此外，门诺派教徒还是和平主义者，他们拒绝随身携带武器。由于当时联省还处于与西班牙交战的状态，这点也成了门诺派教徒不受欢迎的原因。

以上这些谴责都经不住仔细推敲。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有除了花商本身之外的任何团体推动或影响了球根热的整个过程。确实有一些门诺派教徒也加入了交易的大潮。一个叫雅克·德·克勒齐（Jacques de Clercq）的商人，曾经在波罗的海和巴西做生意。他在1635年冬天就已经在买卖400荷兰盾左右的球根了。但是很多教派的成员对郁金香交易都是持批评意见的，而且劝阻那些进行交易的人尽早停止。类似的，联省的犹太人人数很少，有记录表明的，唯一确实参与了郁金香交易的，就是著名的葡萄牙种植者弗朗西斯科·达·科斯塔。而他

的名声一向很好。至于破产者，就更没有任何记录证明他们与郁金香狂热有半点关系。

大概只有极少数的花商会相信这种阴谋论。但是有不少人确实怀疑个别交易者有人为哄抬市价的行为以牟取暴利。通过举办假拍卖的方式垄断价格是个由来已久的惯用伎俩。一些狡猾的商人会通过假拍卖的形式，把自己的球根“出售”给同伙，为的是把高价记录在案，以刺激别人以这样虚高的价格购买球根。

还有很多花商把责任推给种植者，指责有些种植者囤积球根，或是在出售时许诺第二年会以更高的价格回购球根。还有的种植者被指责销售时以次充好。一个阿姆斯特丹的种植者就被怀疑有这类的欺诈行为。他为了避免郁金香开出花来暴露自己的骗局，会先用针把球根里面破坏掉，让球根根本不能发芽。最后他的行为还是暴露了，因为一个愤怒的购买者仔细检查了自己的球根，并且发现了球根表面细小的针眼。

不可否认这些行为都是存在的，但是这类事件都是偶有出现，肯定没有达到能够实质性地影响球根价格的地步。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捏造什么复杂的阴谋论来解释球根热的荒唐过度。考虑到当时的需求和有限供给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些贪婪的、没有经验的花商就是把郁金香交易激发成郁金香狂热的最主要原因。在4月的最后一周，荷兰法院最终给出了解决郁金香狂热的意见书。此时距阿姆斯特丹种植者大会提出他们的解决建议已经过去了八周；距花卉交易在全省范围内的崩溃已经过去了三个月。但是，当博学的法官们最终做出决定之后，他们仍然不得不先承认，即便是他们也没有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引发了球根热，又是什么让它彻底失控。

不过荷兰省法院的法官们十分确定的一件事是：他们希望尽可能地不插手狂热引发的这些纠缠不清的棘手问题。所以，他们建议存在争议的买卖双方，即花商和种植者，应当回到自己所在的城镇，在当地解决

纠纷。法院还建议，城市的管理者应当开始收集关于郁金香交易的具体信息。只有当他们足够了解发生的事情之后，他们才有可能开始着手判定纠纷。在收集必要信息的这段时间，所有购买球根的合同应当视为暂缓执行。若有个别案例无法在地方解决，可以再提交至海牙，但是暗示这是一种机会渺茫的救济方式。法院的判决非常明确：每个城市的问题，应当由每个城市自己解决。

法院意见书的最后还给出了一些明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荷兰省政府在执行法院的建议上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到4月27日，即法院提出法律意见两天后，各地在海牙的代表也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综合了法院提出的关于解决办法的建议，并且使之对各城市都有约束力。就这一决议的说明信以最快的方式送到了全省各城。因此，到4月29日，每个受狂热影响的城市的市长都收到了指导他们如何解决摆在面前的上百起争议的办法。

荷兰省法院的判决书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求在对郁金香狂热进行彻底的调查之前，所有买卖合同都要中止，但这个建议是暂时的，事实上，法院也认可，一旦获得足够的信息，各地政府就可以决定是否强制执行已经签订的买卖合同。意见书中还说，如果判定应当履行，还应当允许卖家追究买家延迟支付的责任。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被卷入郁金香狂热的这些城市一直没能像法院要求的那样收集到足够的信息，而海牙也没有再采取任何后续措施。荷兰省的执政者们为自己不用接管这个烫手的山芋而暗自欢喜。一个本来打算作为暂缓之计的措施，最后反而成为清算狂热的根本办法。

对花商而言这是个好消息。大多数城市中，执行荷兰省决议的措施就是命令当地法官或地方官对狂热相关的事管得越少越好。比如在哈勒姆，管理城市的执政者们指示律师和公证员不得再向郁金香交易者颁发许可状；连接受抗议和送达传票的信使也被指示不要接收与球根热相关

的任何文件。在豪达和三个弗里斯兰省城市——恩克赫伊森、梅登布利克和霍伦的管理者也向下属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那些认为自己除了拖延抵债没有任何其他路可走的花商，现在可以无所畏惧、名正言顺地拖延了。成百上千的手工业者里，有一半人以为自己难逃破产的命运了，现在凭着这个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又有了喘息的机会。还有一些卷入郁金香狂热的人，本来算得上是富人，有能力支付自己的债务，这其中就包括那个花了7000荷兰盾购买亨里克斯·蒙廷的球根的阿尔克马尔人。他提议支付700荷兰盾的罚金然后取消合同，并且将球根退还给卖家。但是，如哈勒姆的律师阿德里安·范·博斯维尔特（Adriaen van Bosvelt）观察到的，诚实守信的花商几乎一个不存在。范·博斯维尔特写道：整个荷兰省里有大批的人不愿支付罚金。即使那些提议部分清偿债务的人都不愿前来支付理应付给种植者的10%的罚金。仅有的一些愿意赔偿的人，只愿意支付1%、2%、3%、4%，最多5%的费用。

对郁金香交易的一律禁止很快达到了理想的效果。种植者和花商们不得不自行和解，执政者们则不必再被狂热的后遗症烦扰。但是即便是如此，纠纷的彻底解决还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据我们所知，在哈勒姆，各种清算过程甚至拖到了1938年之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一些郁金香交易者不愿依照荷兰省法院的建议解决纠纷。而且在哈雷姆以外的其他城市，情况恐怕也是如此。

在这次事件中，很多被卷入狂热的人是按执政者们希望的那样自行寻找解决之道的。不少协议即便是没有达到各方赞同，也起码是协商终止了。在阿尔克马尔，所有的郁金香合同实际上都被视为无效了。种植者们为了尽量挽回自己的损失，把成千上万根本没有出土售卖的球根都储存起来了（不难想象，已经没有什么人再有兴趣购买球根了，但是还是有少数很稀有的品种仍然以不低的价格出售给了鉴赏家）。那个倒霉

的哈勒姆染工雅各布·德·布洛克就被要求兑现他为格特伊特·舒特做的担保，全价支付已经不可能再转卖出去的一磅斯维策郁金香，所以他把球根拿到阿姆斯特丹，盼望能在那里把球根处理掉。

也有一些人下定决心要为找回失落的财富而战。最走运的是那些在阿姆斯特丹酒馆里做交易的人。阿姆斯特丹是唯一允许就郁金香相关案件到法院起诉的城市。几周之内，就有不少种植者利用了这种有利的情势，把以前的买主都告上了法庭。

最活跃的诉讼当事人中，有一个叫亚伯拉罕·德·戈耶尔的。他出生自一个古老的执政者家族，他本人是个种植者，至少有两个花园，一个在阿姆斯特丹城外雷居里门（reguliersppoort）附近的辛格尔（cingel），另一个在城墙边上的沃尔帕茨（walepadt）。6月10日他起诉要求亚布拉罕·瓦赫特敦克（Abraham Wachtendonck）支付前一年秋天购买4个晚花型布莱波奇（Late Bleyenburch）球根和一磅奥德内的950荷兰盾欠款。第二天，德·戈耶尔又对利贝尔·范·阿克塞尔（Lieber van Acxel）提起诉讼，要求他按照双方10月1日达成的协议支付货款。两人的协议内容是，范·阿克塞尔愿意支付1100荷兰盾购买一个“最好的尤雷”（De Beste Juri）子球和一个“棕紫郁金香”，另外还愿意支付750荷兰盾购买一个“紫白范·奎克尔”（Purper en Wit van Quaeckel）球根（它属于老科内利斯·奎克尔培育的紫色系品种）。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德·戈耶尔请一个叫B.J.弗比克（B.J.Verbeeck）的公证员到他在沃尔帕茨的花园里，在他的公证下，出土了两个球根，并确认每个球根上都发育出了两个子球。德·戈耶尔似乎对与另一个买主之间可能发生的纠纷也早有预料，这次涉及的球根是种植在一个叫威廉·威廉森（Willem Willemsz.）的人的花园里。德·戈耶尔出土这个利夫肯司令的时候，也要求弗比克在旁进行公证，以确认球根上长出了一个子球。

其他一些在阿姆斯特丹有生意的种植者也都利用这个机会主张自己

的权利。一个叫汉斯·贝尔特（Hans Baert）的哈勒姆卖家就要求他的阿姆斯特丹买家亨德里克·范·贝戈姆（Hendrick van Bergom）为他所购买的2000分的格鲁特·格普马塞尔德（Groote Gepumaseerde）支付140荷兰盾。曾经苦口婆心劝说帕卢斯·德·霍格购买自己球根的扬·阿德莫里尔在德·霍格无法付款后立刻变了脸色，并向自己的律师咨询。另一个哈勒姆人威廉·舍瑙要求弗朗索瓦·科斯特支付6000荷兰盾的欠款。倒霉的科斯特是在2月3日购买了大量“破布”和一些单件货时欠下的这笔债务，具体内容如下：

4磅 斯维策郁金香	6000荷兰盾
2000分 马克森（Maxen）	400荷兰盾
1000分 波斯梅克（Porsmaeckers）	250荷兰盾
	总计6650荷兰盾

并不是所有花商对于禁止就郁金香交易的纠纷提起诉讼这条规定都欣然接受，尤其是在哈勒姆这样的城市，不少花商找各种借口、搞各种伪装也要到法院解决。在1637年11月就有这样一个案子：一个叫彼得·卡卢瓦尔特（Pieter Caluwaert）的当地种植者，故意等到球根不得不下种的最后时节，把1磅白皇冠、2磅斯维策、5个奥德内和3个马克森球根送到了雅克·德·克勒齐的家中。这是德·克勒齐在将近一年之前答应购买的，后来就一直在躲避卖家——同时也是他以前的同行。所以卡卢瓦尔特开始提起诉讼，理由是德·克勒齐拒收货物。

总之，即使是在阿姆斯特丹，也只有极少一部分郁金香案例能够有机会在法庭上解决。原因非常简单：花商们已经破产，打赢了官司也拿不到钱。德·戈耶尔、阿德莫里尔和贝尔特起诉的都是富有的买主，能

够付得起欠款。而大部分深陷在狂热里的花商则没有什么钱，所以把他们拽到法庭里也没有意义。

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接受赔钱的现实。他们拒绝废止过去的郁金香交易合同。在1638年1月，也就是价格暴跌1年之后，还有成百上千的纠纷没有解决。这些纠纷通常都是具有破坏性的，不但让亲人朋友反目成仇，而且就像一条丑恶的伤疤，时刻提醒人们郁金香狂热时的荒唐过度，而这恰恰是荷兰人最迫切想要忘记的噩梦。如果当地政府不采取进一步措施，这些纠纷将永远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所以到1月30日，哈勒姆当地政府组建了一个仲裁委员会来审议未解决的案件。此类专家组在整个联省一直都有，仲裁员通常被称为“朋友制造者”，而且就像威廉·布里尔顿爵士在他1634年游历荷兰省时发现的那样：在大多数荷兰城市里都可以发现仲裁员，这些人的当选主要是因为他们正直诚信和通情达理。布里尔顿还发现，朋友制造者“有权力要求询问与案件有关的任何人；他们以友善的方式调解和仲裁，并且处置和解决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另一大好处就是，不同于传统的法院判决，仲裁是完全免费的。

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类似的仲裁庭审理的一些案件的记录留存了下来，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朋友制造者是如何决断的。有一个案子，争议双方分别是扬·阿德莫里尔和威廉莫斯·蒂博尔留斯（Wilhelmus Tyberius）。后者是阿尔克马尔一所拉丁语学校的校长。仲裁员判定阿德莫里尔支付蒂博尔留斯375荷兰盾以达成和解，但是仲裁决议的条款是比较公正宽缓的，给了阿德莫里尔10个月的时间筹措欠款，然后纠纷到此为止。

起初，哈勒姆的市长们给朋友制造者的权力很有限，只能解决最突出的郁金香案例。而新成立的专家组有5名成员，每周集会两次，可以传唤任何不愿蹚浑水的证人到场询问。但是仲裁结果却没有约束力。而

且很多敌对的花商也不愿接受仲裁机构建议的妥协方案。从留存下来的证据来看，仲裁团在解决哈勒姆积存的争端上没有太大进展。

直到1638年5月，城市里的执政者们才终于决定彻底解决他们面前的难题。这也是种植者大会决议流产后18个月以来第一次有针对解决争议的明确的指导文件出台。市议会判定，买主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但需要支付合同规定原始价款的3.5%作为补偿。买卖合同终止后，球根的所有权回归种植者。这项建议是截至此时最可能实现也最可以执行的和解方案，同时议会还判定自此以后仲裁员的仲裁决议对所有案件都是有约束力的。

这个折中办法的出台意味着即使是身背几千荷兰盾债务的花商也可以只付100荷兰盾甚至更少的罚金，这个数目是最贫穷的荷兰人也能够通过分期付款还清的。同时，虽然这个解决方案在本质上对种植者不甚公平，但是至少保证他们可以获得最低限度的支付，基本上可以抵消他们的成本，所以他们与狂热爆发之前的水平相比，也只是亏了一点。

郁金香狂热于是就这么结束了。正如荷兰省法院所希望的，通过强行和解，避免了昂贵的诉讼活动。事实上狂热不过是穷人和野心家们的一次疯狂，根本没有像流行理论鼓吹的那样给荷兰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它的出现也没有引发后续的经济衰退，而且那些在狂热中为清偿债务挣扎求生的花商，比起狂热之前也未见得更贫穷了多少。他们纸面上的亏损和盈利基本持平，即便是最富有的花商也没有因为拖延债务而被正式追究责任。

事实上，到此为止，最令人震惊的其实是那些提交到省市法务官面前的案件却没有留下任何著名的庭审或判决、定罪的记录。这说明种植者和他们的买家们无一例外地还是要通过庭外和解来了结纠纷。即便是在阿姆斯特丹，与狂热相关的债务清偿实际上也只是花商之间和解和妥协的过程。

最后一个由球根热引发的案件是在1639年1月24日开庭的，此时几乎已经是价格崩溃的两年之后了。一个叫布鲁伊恩·登·杜波尔登（Bruyn den Dubbelden）的种植者要求阿尔克马尔的买家扬·科沃尔（Jan Korver）支付2100荷兰盾的货款，因为他们曾承诺购买800荷兰盾一磅的“黄王冠”和1300荷兰盾2磅斯维策。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判决记录。可以推断杜波尔登如其他种植者一样，会被迫接受3.5%的赔偿金，然后一个价值哈勒姆普通手工业者7年工资的天价合同，靠73荷兰盾10荷兰币协商解除了。

即便到此时，极小一部分案件因为无可追究的历史问题而依然无法解决。不走运的画家扬·范·戈延就是仍然在为投入球根交易而饱受折磨的倒霉鬼之一。他此后的一生都在被债主讨债。市长范·拉文斯泰恩从未停止要求倒霉的画家全额支付自己所欠的货款，尽管范·戈延如约交付了自己的画作，但是他几乎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到了郁金香上，所以郁金香价格暴跌后，他再也无力回本。整整三年的时间里，画家一直专注于球根市场，几乎没有什么创作，而现在，他不得不重拾画笔谋生。

养活一家人的压力让范·戈延几乎无力还清他拖欠范·拉文斯泰恩的所有债务，直到1641年市长去世之时也没有还清。范·拉文斯泰恩的继承人们继续向范·戈延催债。范·戈延一直挣扎在破产的边缘，至少有两次都是因为急于用钱，而不得不仓促拍卖自己的作品。

范·戈延是1656年去世的，也就是那场毁了他一生的球根热覆灭20年之后。他到去世时都是资不抵债的状况，留下了897荷兰盾的欠款和一大批优秀的风景画作品。要是他当初在郁金香贸易中赚了大钱的话，这些作品可能根本不会被创作出来。

范·戈延也是为人们所知的最后一个郁金香狂热受害者。

14 郁金香国王的宫廷

1639年初，关于郁金香狂热的资产清算进入了尾声。很多荷兰人从此对郁金香产生了一种轻微的厌恶。然而这个插曲并没有阻止那些真正富有的收藏家对稀有品种的热情。在此之后的100多年里，他们仍然愿意为了一个球根一掷千金。在联省，人们对郁金香的热情渐渐淡去了，此时已经不可能靠倒卖花卉迅速地赚钱了。

但是，郁金香狂热并非从此就绝迹了。就像黑死病这种奇怪的疾病一样，它可能爆发一阵，然后表面上好像结束了，但事实上它只是进入了休眠期。可能几十年后，在另一个地方，就又会卷土重来，剧烈程度甚至不逊于以往。

狂热的这次重生就发生在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上半叶，郁金香在土耳其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光辉。大概1595年前后，新苏丹穆罕默德三世（Mehmed Ⅲ）即位。他是一位沉迷于女色而非花草的君主，更愿意把精力花在与后宫佳丽共度春宵上。继他之后的几位君王，先是极其厌恶女人的穆斯塔法一世（Mustafa Ⅰ），他下台以后，被他的敌人关在了地牢里，并且安排了两名女奴每天裸体相伴作为对他的惩罚。后来有倒霉的奥斯曼二世（Qsman Ⅱ），他的结局也非常凄惨，据说是被他自己的士兵捏爆睾丸而死。总体来说，历任君王不是无能就是残暴，鲜有兴趣关照他们在恩赐之地里的花园。

直到穆罕默德四世（Mehmed Ⅳ）即位，奥斯曼帝国才又重新建立起稳定的局面。他在位的时间是1647～1687年。尽管他的父亲——疯王易卜拉欣（Ibrahim the Mad）（这个行为放荡的国王曾为了能遴选新欢

而下令将自己后宫已有的280名妃子全部淹死）也是著名的郁金香爱好者，但是穆罕默德才算得上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对园艺全身心投入的国王。穆罕默德是第一个在第四庭院全部种植郁金香的国王，他让郁金香在今后的一个世纪里都能在这里繁盛绽开。他还是第一个颁布法令要求所有郁金香的新品种必须经过注册和分类的君主。为了监督这个过程，苏丹组建了一个正式的花卉专家委员会来专门评定新品种，记录他们的特点并且为最珍贵无瑕的品种定名。他们选取的都是为土耳其人所热爱的具有诗意的名字，比如“石榴长矛”和“风姿绰约的女人”。这个委员会在穆罕默德去世后仍然继续存在，并且在之后的100年里一直负责鉴定郁金香新品种。不幸的是，穆罕默德的帝国可比他的花园难打理得多。在他执政末期，在巴尔干半岛出现的一系列军事祸患，严重削弱了他的统治。同样糟糕的是，伊斯坦布尔的面包价格上涨为原来的四倍，导致首都动荡不安。到1687年底，这位苏丹被自己的大臣们密谋罢免，并由一个比他愿意受摆布的异母兄弟取而代之。

在整个17世纪，土耳其人像是被诅咒了一样总是遇到疯狂的或恶劣的足以导致奥斯曼帝国覆灭的苏丹，原因就在于苏莱曼大帝之后，伊斯坦布尔的情况发生了改变。土耳其皇族不再依靠古老的方式决定帝王之位的传承，他们曾经的活力也渐渐消散了。在巴耶济德时代之后，科索沃地区的胜利者——伊斯兰教的君主之位的继承变成了谁有本事抢到就归谁。前有巴耶济德的血腥例证，新苏丹们更是为了争夺地位不惜屠杀自己所有的兄弟以避免他们觊觎自己的皇位。在征服者穆罕默德之后，这个致命的传统实际上被编入了法典，所以在1597年穆罕默德三世即位之后，有不下19名兄弟被用丝巾绞死。这其中甚至有还在襁褓中的婴儿，他们被处死之前，先要受割礼，以确保死后能够进天堂。正是这种残忍至极的制度造就了一系列果决无畏的苏丹，他们同时也以冷酷无情而闻名。然而到了1607年，当时在位的艾哈迈德一世（Ahmed Ⅰ）实在无法任由一个自己深爱的孩子谋杀其他自己同样深爱的孩子，于是他决定修改这一法定许可谋杀兄弟的旧政策，将其改变为允许苏丹将其不需

要的兄弟囚禁在后宫里的一小片区域中，这个地方被称为“鸟笼”（*kafes*）。

鸟笼其实是第四庭院里靠西边的一栋套房，那里能够勉强看到无花果树林、奥斯曼天堂花园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景色。套房里只有宦官和一些无生育能力的妾侍陪同，不受宠的王子们在这里的生活并不美好，除了一成不变的无聊之外，还有对可能依然躲不过的死刑的恐惧与忐忑。当一个奥斯曼统治者去世后，他的长子就可以离开自己一直生活的牢笼，继承王位。而其他的皇室血脉则依然只能继续他们平淡绝望的生活，靠仅有的一些许可他们进行的活计来打发时间，比如刺绣或是制作象牙戒指。

到18世纪初，王位传给了穆罕默德四世的儿子艾哈迈德三世（Ahmed III）。他人生的前29年都是生活在鸟笼里。他即位之后，不仅成为继苏莱曼大帝之后最老练、最文雅的苏丹，更是历史上最狂热的郁金香爱好者。艾哈迈德对郁金香的喜爱是受他父王的启蒙。在漫长的牢笼生活时期，他经常站在大理石阳台上充满渴望地凝视着不远处奥斯曼帝国最美艳的花园。本来他是根本不被允许走进这个花园的，可是艾哈迈德现在当上了帝王，突然之间拥有了无限的资源来满足自己曾经的幻想。

哪怕是哈勒姆酒馆团体里最热切的交易者，也没有艾哈迈德对郁金香狂热。新苏丹简直是沉醉于这种花卉，以至于郁金香成了他长久的统治时期的最突出的特点。土耳其历史学家艾哈迈德·雷菲克（Ahmed Refik）将土耳其历史上的这一段时期命名为“郁金香时代”（*lale devri*）。从艾哈迈德三世即位的1703年起，郁金香狂热在伊斯坦布尔又一次爆发了，并且在土耳其首都持续了近30年。

事实上，这个郁金香的时代同时也是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的时代。无论是在非洲沿海地区，还是在战乱不断的巴尔干地区，土耳其在各地

的势力都在逐渐衰落。1699年签订的《卡尔洛夫奇条约》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都割让给了奥地利，不但让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扩张脚步停滞不前，还让帝国前线边界退回了离伊斯坦布尔只有几百英里的地方。成为郁金香时代标志之一的郁金香花卉节和它的盛况不过是苏丹的大臣们在作秀，为的就是转移人民对政治现实的注意力，也好让他们的君主能暂时逃避对这个衰落帝国的担忧。

公正地说，艾哈迈德不是一个只知道赏玩郁金香的统治者。他带领军队打败了俄国人，而且还是一个藏书家。他在位期间派遣了第一批土耳其使节到欧洲收集信息和知识。他还在托普卡匹皇宫外建立了艾哈迈德三世喷泉，这也是帝国首都最华丽、最为人们喜爱的建筑作品之一。无论如何，他统治的时期是一个即便在土耳其历史上也算得上非常独特的享乐主义至上的时代。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原本好战的土耳其人沉迷在数不胜数的节日庆典中。这些庆典都是由君王和大臣们主办的，有的庆典会持续几天甚至几周时间，人们尽情歌唱、大摆宴席。艾哈迈德的密友，也是宫廷诗人的奈迪姆写下的诗句可以作为这一时期通俗哲学最好的诠释："欢笑吧，玩耍吧，让我们尽情享受世界上的一切美好。"

逃出了"鸟笼"的囚禁并不意味着自由，艾哈迈德不得不开始享受权力的囚禁。他发现作为帝王中的帝王也不是一点不便没有的。有一次艾哈迈德就抱怨说他的寝殿里有太多私人侍从，他不得不谴退了至少35个人，只留下三四个人之后才觉得换衣服不那么尴尬。当然，当苏丹也有当苏丹的好处。艾哈迈德为自己最喜欢的女儿办婚礼时，让宫廷糖果师用糖果搭建出了可食用的凉亭，每个都有18英尺高，婚礼客人坐在凉亭里就可以拿装饰的叶子吃。在其他一些场合，游客穿过花园，也可以随处看到杂耍表演、摔跤表演、侏儒以及奥斯曼帝国独有的人造树木（*nahils* ）——高度约60英尺，是用蜡和金属丝做成的，树上挂满了镜子、花朵和珠宝。

最需要大肆庆祝的奥斯曼节日首先是苏丹继承人们受割礼的仪式。通常在仪式前一年甚至更早就要开始筹划，庆祝活动可能持续数周之久，活动的高潮就是将王子被割下的包皮放在金盘里呈现给王子的母亲。在1720年，艾哈迈德三世为他四个儿子受割礼以及两个女儿结婚而举办的庆祝仪式总共持续了15个日夜。他不仅为每个小王子建造了44棵人造树，还组织了全国5000个土耳其男孩儿与他的王子同时受割礼。此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聚集了许多前来参加庆典的船只，船与船中间挂了绳索，还有驾车走钢索的表演。后来国王的女儿都出嫁了，儿子也都受过割礼了，于是艾哈迈德和他的大臣们就把全部热情都投入到了在托普卡匹宫殿最深处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郁金香花卉节上。

郁金香花卉节在每年4月举办，因为此时正是郁金香盛开之时。节日定在满月的两个夜晚，届时，鲜花将被精心地展示出来。在第一个夜晚，苏丹会坐在花园中建造的凉亭里，听着树上悬挂的鸟舍里鸟儿的鸣叫，接受大臣的敬拜。而其他客人则可以在花圃间漫步赏花，但必须穿着能与郁金香颜色和谐映衬的服装。花圃间有烛光闪烁映照，这些蜡烛都是被固定在移动缓慢的乌龟身上的。在第二个夜晚，是没有男性宾客入内的。苏丹在这晚会与后宫佳丽一起娱乐，在花丛之间藏宝寻宝，可能是糖果，也可能是宝石。在每一晚的最后，主管宫廷财政的基督徒白人宦官总管与主管后宫的阿比西尼亚黑人宦官总管会将锦袍、珠宝和钱财等礼物分发给苏丹喜欢的客人和妃子。

艾哈迈德对郁金香的热情极高。但是苏丹喜欢的品种并不是荷兰人追捧的那些，而是修长、花瓣成尖状的伊斯坦布尔郁金香。受苏丹的影响，首都各个阶层很快也追随效仿。连理发师和鞋匠都开始培育球根。还有奥斯曼帝国最高级的牧师——伊斯兰教主也加入了这一潮流。人们对稀有球根的需求很大，一个“爱人”球根可以卖到1000个金币。但是可能是因为有荷兰人的教训在前，艾哈迈德颁布法令限制可以在首都经营的花商数量，并固定最受追捧的品种价格，以此来避免交易狂热的出

现。在奥斯曼帝国其他省份，采取的措施更加严格，就是为了降低投机出现的可能。最后，在伊斯坦布尔以外买卖球根一律被视为犯罪，犯罪之人甚至可以被判处流放。

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到艾哈迈德时期，郁金香的品种已经极其丰富。当时一份关于最著名培育品种的指定价格表里面列举出的品种就超过820种。他在位期间，还有新的杂交品种不断被培育出来。人们对郁金香的兴趣如此之大以至于每当有新品出现，就会作诗以示纪念，并且采用以大写拉丁字母表示年代的方法将这一吉时写入诗篇的最后一句。

然而，在一些重要的层面上，土耳其的郁金香还是太有限、太落后了。在17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郁金香都是被忽略的东西，以至于到艾哈迈德登上王位的时候，土耳其人早就失去了自己在培育郁金香上的领先地位。郁金香最初是从土耳其传入欧洲的，而现在土耳其每年却要从荷兰和法国进口成千上万的郁金香球根。无论如何，土耳其人对于什么是完美的花朵有着相当固定的认知。由艾哈迈德的首席园丁谢伊赫·穆罕默德·拉雷扎里（Seyh Mehmed Lalezari）编写的一本《花卉手册》中，就列举了20条评判郁金香美丽程度的标准，其中包括：花茎应当长而茁壮；6瓣花瓣应光滑、牢固并且大小统一；叶子不能掩盖住花朵；花朵应当直立坚挺；不能被自己的花粉沾染；若非单一花色，那么底色应当是纯白色。

这种刻板的描述当然不能满足奥斯曼人对诗意语言独一无二的迫切需求。拉雷扎里的另一份留存至今的手稿现在被保存于柏林的一家档案馆里，题目是“合格的美丽”，其中是这样形容完美的郁金香的：

> （花瓣）弯曲如新月，颜色的分配恰到好处、干净且比例协调；形如杏仁，末尾成尖状，花瓣上有美丽的放射性花纹。里层的花瓣像井，外层的花瓣略张开，白色花瓣是最完美的。这就是花中的珍品。

毋庸置疑，那些满足这些标准的郁金香都可以在艾哈迈德的花园里

见到。

苏丹的仆人很快就被君主的热情所感染，不少人也成了郁金香爱好者。奥斯曼舰队司令穆斯塔法帕夏（Mustafa Pasha）就培育出了44种新品种。有野心的小官吏发现可以用上好的郁金香买通升职的途径。而拒绝向君王中的君王献上他想要的花卉则不是明智之举。有一次，一个欧洲使节赠送给君王的稀有球根丢失了，当时的大维齐尔派遣传令官走遍伊斯坦布尔最窄小的街道，公告将重赏找到球根的人。

艾哈迈德三世在位初期曾效仿他的前一辈，依靠替换频繁的维齐尔来辅佐料理国事。法兹尔帕夏（Fazil Pasha）就是其中之一：他为人诚实，工作努力，而且祖辈都服务于皇室；但是他也是个怪人，他总认为自己的鼻尖上落着一只苍蝇，赶走之后又会飞回来。在1718年，苏丹任命了一个名为易卜拉欣的帕夏（Ibrahim Pasha Kulliyesi）为奥斯曼的大维齐尔，易卜拉欣是个精明的善于控制皇室阴谋的人，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如何拉近自己与苏丹的关系上。他最成功的妙计就是与艾哈迈德的长女结婚，之后他就有了“驸马”这一绰号。在一个出任维齐尔等于任期短甚至有可能惨死的国家里，驸马易卜拉欣却掌权长达十几年。

驸马做事的政策是小心谨慎、缓慢推动。这正是这个已经开始衰落，但仍十分保守的帝国所需要的。正是易卜拉欣说服了艾哈迈德向西方派遣使节学习先进的理念。易卜拉欣还建立了土耳其第一支消防队，建立了官方印刷局出版科学和地理方面的图书。他还征缴了新税，补充了皇室财政，并且保证了大部分帝国领土的和平。最重要的是，大维齐尔通过纵容艾哈迈德对珍贵花卉的沉迷而获得了他对自己推行改革政策的支持。

当时一位法国大使让·索旺·德·维尔纳夫（Jean Sauvent de Villeneuve）这样描述一个在易卜拉欣自己的郁金香花园中举办的娱乐活动：

> 每四朵鲜花旁边都立着一根蜡烛，高矮与花冠持平。通道上挂着鸟笼，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鸣禽。棚架上装饰着无数的鲜花，都是装在瓶子里的。还有数不尽的各色玻璃灯照射着鲜花。玻璃灯是挂在为了此次宴会专门从临近树林里移植过来的灌木的绿色枝干上的。灌木就摆在棚架的后面。这些景物的颜色，加上无数面镜子映射出的灯光组成了一幅美不胜收的画面。

维尔纳夫还说道：只要郁金香没有凋谢，这样的灯光就会整晚亮着，所有开销都是易卜拉欣自己承担的。

依据土耳其赴法国使节对法国枫丹白露宫令人兴奋的描写以及参考了路易十五在马利的城堡样式，大维齐尔为自己也建造了一座准欧洲风格的别墅。别墅就坐落在伊斯坦布尔北边的博斯普鲁斯海峡。1721年的春天，驸马易卜拉欣在这里款待了艾哈迈德之后，印象深刻的苏丹立即下令在附近建造一座类似的皇家宫殿。选定建造的宫殿的位置处于两条溪流交汇之处，它们被称为欧洲的甜水河，河水从这里穿过大草原流入海洋。在这里，艾哈迈德的建筑师们为他建造了一座专为奢侈享乐的宫殿，名为“幸福的宫殿”（Sa’adabad）。宫殿的施工只用了短短三个月时间，也就是1722年一个夏天就建好了。花园的样式是完全的欧洲风格，由林荫道通向整齐规划的郁金香花圃。甜水河两边也修上了大理石河岸，河水被引入喷泉和小瀑布，在中心形成了装饰性的小湖泊。

通过确保伊斯坦布尔低廉的粮食价格以及充分满足苏丹对节日庆典的要求，驸马易卜拉欣在整个18世纪20年代都能稳居高位。但是最终他的好运也走到了尽头。在幸福的宫殿花园之外发生的事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各种滥征的税收，不仅仅是维持宫廷光鲜外表的必须，还要支撑18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土耳其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再加上饥荒引发了各省动乱。更糟糕的是奥斯曼军队在东部前线的迅速溃败以及充满仇恨的波斯人收复了18世纪初土耳其人从他们手中抢走的大片土地。当帝国战败的消息传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曾经的市井流言升级为了对变革的巨大呼声。

即使是大维齐尔也无法阻止这些坏消息传到苏丹的耳朵里了，而艾哈迈德三世也再不能坐视不理了。到了1730年秋天，一个阿尔巴尼亚旧衣服收购商帕托纳·哈里尔（Patrona Halil）领导伊斯坦布尔民众围攻了托普卡匹皇宫，要求惩办罪魁祸首。艾哈迈德知道自己的统治正面临被推翻的巨大危险，如果他不能平息群众的怒火，恐怕连性命都要不保。在这次突发危机中，郁金香国王采取的权宜之计就是下令让园丁行刑者卫队，也就是首席园丁砍下了驸马易卜拉欣和穆斯塔法帕夏的人头，他们也是最主要的两个推行不受认可的西化改革政策的大臣。

至此，艾哈迈德和他的郁金香时代都开始走向终结了。刽子手们在大维齐尔的官邸里找到了他，将他绞死并斩首。之后，首席园丁又赶往穆斯塔法在幸福的宫殿附近的海滨别墅。他们到达的时候，大司令正在他的花园里愉快地移栽郁金香，对突然发生在首都的政治危机全然不知。可能前去处死帕夏的园丁迟疑了一下，让即将赴死的将军最后再看一眼自己创造出的40多个品种。如果他确实这样做了，他们肯定也不会想到，随着丝质弓弦在大将军的颈项上收紧，穆斯塔法就这么离开了他现实里的天堂花园而升入天堂里的花园，而郁金香的时代也彻底结束了。

艾哈迈德做得太少也太迟了，他终于没能拯救自己的王位。愤怒的民众拒绝解散，苏丹的王位已经岌岌可危。如果换做另一个果断的君主，一个军事能力强于组织花卉节日能力的君主，他也许还有能力集结皇室军队解救自己。但是艾哈迈德不是一个好将军，而且他在两天之内已经牺牲了最受重用的两员大将。随着暴乱者逐渐包围伊斯坦布尔，君王也失去了对首都的控制，苏丹开始相信自己想保命的唯一出路就是退位。

艾哈迈德的侄子马哈茂德（Mahmud）于是被从鸟笼里抓出来按到了王位上。他的继位无论对于帝国还是对于郁金香都是一个转折点。虽

然很快他就残暴地镇压了这场罢黜了他叔叔的失控的暴动，焚烧了象征着艾哈迈德统治的郁金香凉亭，但新苏丹的兴趣显然是在别处。他是个有强烈偷窥欲的人，最喜欢的就是躲在后宫的栅栏门后监视宫廷里的妃子们。有一次，他甚至把妃子们沐浴时穿的淡薄的浴衣上的缝线拆掉，然后用胶水固定，这样在充满蒸汽的浴室里，胶水就会融化，方便他窥视每个女人的裸体。

这样一个君主永远不可能像艾哈迈德三世一样对花卉过分憧憬。尽管每年春天仍然会庆祝郁金香节，但是规模要比郁金香时代小得多，郁金香在土耳其的地位也自马哈茂德统治时期开始第二次衰退。这次衰退非常彻底，以至于全部1300多种伊斯坦布尔郁金香慢慢地从帝国的花园和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了。至今，没有一个品种留存下来。

而那个统治了郁金香最后繁茂时期的国王有怎样的结局呢？他勉强逃过一死，又被重新关进了鸟笼，在那里凝望着奥斯曼的无花果林，只能在梦里重温匕首一样的花瓣沐浴在满月的光辉中，将针尖一样的影子投射在恩赐之地的秘密花园中。

15 迟来的花期

以上就是郁金香狂热的结局。当奥斯曼鸟笼的大门最后一次在艾哈迈德面前关闭，郁金香也从历史书上彻底消失了。属于郁金香的巅峰时期已成过往，它再也没能如此俘获某个帝王的心，或是让半个国家沉迷于它带来的简单快速的赚钱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反而开始思考，这样的疯狂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不过就算郁金香已经不再是一种广泛的热潮，它仍然可以是私人的钟爱。如果认为球根贸易的崩溃终结了人们对于郁金香的一切兴趣；或是认为郁金香价格下跌至谷底并从此一蹶不振的话，就大错特错了。与此正相反，对于一些稀有和极受推崇的品种，球根需求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荷兰球根交易从崩溃到恢复平稳只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投机者消失了，但是花卉的市场仍在。剩下的购买者都是贵族收藏家，他们本就不属于酒馆团体之流，他们购买郁金香也是出于纯粹的对美好的追求。即使是在1637年夏天，距离球根价格暴跌六个月之内，一位哈勒姆的鉴赏家艾尔特·许博森（Aert Huybertsz.）仍然以850荷兰盾的价格购买了一个优质的红色系玛娜席尔（Manassier）球根。而向他出售这个球根的卖家雅克·贝尔滕（Jacques Bertens）之前是花710荷兰盾买到这个球根的。也就是说他凭借这次交易获得了140荷兰盾的利润，相当于当地普通手工业者6个月的工资。

后狂热时期的郁金香鉴赏家之间流行的是种植品种数量越多越好，每一品种只种植一株。这就使得对于很多优良品种多少都是存在一定数

量的市场需求的。而狂热的恶名反而给郁金香帮了忙，因为现在全欧洲都听说了这件事，很多人想要亲眼见识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鲜花能引发这样的热情。荷兰种植者们在国内市场受的损失现在可以通过出口贸易弥补一些。甚至有一部分种植者的出口生意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荷兰花卉出口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从17世纪上半叶就建立了起来。

对于哈勒姆的种植者而言，这种稳定的生意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尤其是当他们已经在狂热中流失了大量的客户之后。各种消息都说明，种植者尽一切可能将一些受人欢迎的品种的供应量保持在低位，所以他们才能长达几年都让价格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他们特别小心地抵挡住了增加产量的诱惑，就是为了避免仅剩的有限市场出现饱和。

1637年以后关于郁金香成交价格的记录留存下来的相对较少。一个叫彼得·芒迪的人在1640年游历联省时发现，仍然有人在以“惊人的价格”购买他称之为郁金香“花根”的球根，但是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例子。芒迪本人也是个富有的商人，但是他所谓的惊人的价格比起1636年到1637年间的价格还是低得多的。以前一个范·德·艾克司令球根每个平均售价约是1345荷兰盾，而在1643年的拍卖会上仅拍出了220荷兰盾的成交价。一个“大雁”以前能卖到805荷兰盾，此时也只能卖到138荷兰盾。鉴于我们不知道具体的球根重量，所以很难确切地说这个价格有比较的意义，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球根的价格都跌至了狂热顶峰时期价格的1/6，合每年下跌35%。

如果稀有品种都是这样的境况，那不难想象，便宜球根的价格肯定下跌得更多。这样的品种是在狂热末期才开始升值的，而且完全是因为优良品种已经完全供不应求了。这些普通郁金香的颜色单调根本引不起鉴赏家们的兴趣。以白皇冠为例，在1637年1月的售价是半磅64荷兰盾，然后在阿尔克马尔急蹿至1668荷兰盾，再到5年之后售价仅为37荷兰盾10荷兰币。这个跌幅达到了惊人的年均76%。

这样的价格根本不可能让所有投身郁金香种植业的人都维持下去。在狂热后接下来的一年，粗具规模的花卉产业就缩水了，大多数冲着郁金香的暴利而新加入的没有经验的花商要么放弃了这项生意，要么是维持不下去不得不被迫改行。郁金香培育行业实际上收缩到了它最初兴起的根源，也就是哈勒姆周围富饶的沙质土壤。事实上，这个城市此时反而真正确立了自己在球根交易上的主导地位，这是它在郁金香狂热时期人人都种植郁金香的时候所不具有的。到17世纪末，本来属于土耳其强项的郁金香种植业已经敌不过哈勒姆的温室栽培，尤其是在艾哈迈德三世统治时期，哈勒姆的花农每年要向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宫廷销售成千上万的球根。于是哈勒姆就成了高档花卉的代名词。以至于少数一些不在这里经营的花商，在散发品种目录和价格表时，也会循惯例在自己的地址前写上“临近哈勒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这么写就将自动被认为是低档品种。

此时的球根交易已经理性得多了。狂热之后到17世纪末都一直还有高级的球根被拿到哈勒姆的拍卖会上拍卖。能上拍卖会的一般都是刚培育出的新品种，因为稀少，才有可能卖出高价。用不了几年，这些新品就会失去吸引力，鉴赏家们则会把注意力转移至更新的品种。届时，曾经流行的球根就变成了相对普通的品种，种植者们也会开始向普通顾客销售或是卖给通过品种目录邮购的客人。从留存下来的此类拓展性球根交易的价目表中可以发现，有一个叫查尔斯（Charles）的德国郁金香爱好者，他是巴登-杜拉赫的侯爵，曾在1712年按品种目录订购球根。尽管少数一些品种的价格仍然能达到10荷兰盾、20荷兰盾甚至40荷兰盾，但平均下来，每个球根的价格只有1荷兰盾。而到后一个世纪，球根的品种和数量将更加丰富。侯爵的一份藏品清单上就显示，在1736年他已经拥有4796个品种的80000多个球根。

人们对郁金香的审美到此时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侯爵的郁金香就属于狂热时期培育的郁金香的后代。人们此时依然没有发现马赛克病毒的

奥秘，亮丽的颜色和火焰纹路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花色。人们最钟爱的花朵必须具备的要素与17世纪30年代的花卉交易者追求的差不多。亨利·范·奥斯腾（Henry van Oosten）[1] 的作品《荷兰花园》中就指出了完美的郁金香应当是什么样子的：

> 花瓣顶部圆润，不能卷曲……至于火焰纹，应当从花瓣底部开始长出，从花瓣底部向上延伸至整个花瓣，在花瓣边缘停止成贝壳形……至于花瓣底部，应当是美丽的天蓝色，雄蕊应当看起来接近黑色，但是实际上只是很深很深的蓝色。

《荷兰花园》是尼古拉斯·范·坎彭（Nicholas van Kampen）在1763年翻译为英文的，里面又加上了一句“上等郁金香需要具备的条件”是修长的茎、比例适当的花冠和鲜活生动的颜色，花瓣底色以白色为最佳。

没有什么植物能够妄想永远流行，即便是郁金香也不可能。人们的品味时刻在变，其他花朵有其他花朵的美丽之处。尽管在18世纪的法国和19世纪的英国，人们依然对郁金香饶有兴致，但是郁金香已经基本降格为二流的花卉，而其他花卉则偶有风靡一时，甚至也能掀起迷你的狂热来。[2] 此类事件中最令人惊讶的大概就是18世纪前30年在联省发生的风信子交易了。像郁金香一样，风信子也是在16世纪从奥斯曼帝国传入西方欧洲国家的。克劳修斯认识这种植物并且将球根分发给了别人。风信子在荷兰被小范围地培育了几十年，一直没有引发花卉爱好者的特别关注。然后，运气降临了。很多年来，种植者们一直试图培育出新的品种，结果碰巧长出了一种双头风信子——就是有两个花冠的风信子。因为这种植物没有种子，所以大多都被例行处理了，而风信子在花商心中的地位也一直是排在郁金香和康乃馨之后的。到了1684年，一个叫彼得·沃尔海姆（Pieter Voorhelm）的哈勒姆花农因为生了重病，有一段时间没能打理自己的花园。他康复以后正想处理本来就打算扔掉的一些风信子，却发现其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双头风信子已经开花了，而且还有顾客愿意支付比单头风信子更高的价钱购买这种新奇的双头风信子。

沃尔海姆于是继续培植这种新品种，而且销路越来越广。其他种植者也纷纷效仿，直到1720年前后，风信子成了当时最流行的花卉，让郁金香都黯然失色了。

接下来发生的风信子热潮与郁金香狂热不无相似之处，而且是在郁金香流行大约刚好100年之后。风信子价格也在1736年升到了顶峰，也就是沃尔海姆首次培育出双头风信子半个世纪之后。较早一些的时候，一个球根的价格最多30荷兰盾或40荷兰盾。到了热潮高峰时期，一种名叫“大不列颠之王”（Koning van Groot Brittannie）的双头风信子（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奥朗日的威廉）——相当于风信子界的“永远的奥古斯都”——价格已经高达1000荷兰盾一个球根。

风信子的流行与郁金香的流行其实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要养成一个可开花的球根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意味着流行的新品种球根的可供应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会非常稀少。而新品种的花色可能是丰富多样的，有无尽的色彩搭配可能，以蓝色和紫罗兰色为主。一个叫埃格伯特·范·德·韦尔特（Egbert van der Vaert）的交易者在形容风信子的美丽时夸张地说道：若是宙斯见识过他刚买到的风信子有多美丽，那么他离开奥林匹斯山去引诱丽达的时候一定会化身为风信子而不是天鹅。

在18世纪20年代，球根的价格开始上涨。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在18世纪，球根培植相较100年前已经发展为一个相当专业的行当了，新品种的双头风信子很快就大量生产并且充斥了市场，总共生产的数目达到了2000株。这足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并且足以避免真正的狂热发生。但是哈勒姆的球根种植者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生意经，他们知道如果控制市场上最受追捧的球根的数量，就可以将价格推高，以赚取更多的利润。

到1730年，风信子的价格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让种植者们非常欣喜。沃尔海姆的球根花园此时是由他的孙子约里斯（Joris）经营的。

这里仍然是球根贸易最繁盛的地方，但是其他的哈勒姆种植者也依靠风信子赚了不少钱。1733年到1736年间风信子的价格到达了最高峰，然后在1737年陡然下跌：价格最高时，最贵的球根达到了不可能有人买得起的地步；而次一等的品种也升值到价格严重超过实际价值，以至于没有哪个真正的花卉爱好者愿意购买。价格最高峰两年后出版的球根品种目录中显示：像“国之将领”（Staaten Generaal）这样值钱的双头风信子曾经卖到210荷兰盾，而此时只需要20荷兰盾；曾经卖到141荷兰盾一个球根的“镜子”（Miroir）现在只需要10荷兰盾。“红色格兰特”（Red Grannats）从原来的66荷兰盾降到了现在的16荷兰盾，而“所罗门的珠宝”（Gekroont Salomon’s Jewel）从80荷兰盾降到了仅3荷兰盾。

从这些数字上可以看出，风信子热时期的风信子价格比郁金香狂热时期郁金香的价格低得多。一个“国之将领”价格在200荷兰盾上下，而一个范·德·艾克司令曾经的价格是2000荷兰盾。有记录的价格最高的双头风信子售价为1600荷兰盾一个球根，这也不过是一个世纪前最受追捧的郁金香价格的1/3。除此之外，这时的个体投机者似乎也比他们的先辈谨慎一些。风信子热时期的一个突出的创新在于，购买某个特定高价球根的股份的实践形式散步极广。这一定是种非常伤神的生意，因为股份持有者必须等上一年甚至更久，才能等到母球产出子球，然后他们才能得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球根，但这至少是一种能够低价买入风信子的办法。有一首荷兰长诗名为《花神的花间漫步》（*Flora’s Bloemwarande*），其中就描写了这种新型的交易方式，还提到一个叫扬·博尔特（Jan Bolt）的花商把自己拥有的对一个球根的一半股权卖给了一个不大情愿的客人，只降价了10%。

风信子交易之所以没有达到郁金香狂热的高度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风信子的培育过程要比郁金香之类的顽强山地野花困难得多，所以也就限制了园艺爱好者们购买的愿望；这就导致对风信子的市场需求相比郁金香狂热时期对郁金香的市场需求水平低得多；再加上风

信子引发的关注远不如郁金香大，所以吸引的投机者数量也极少。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关于风信子期权交易的记录，最多只有一两例购买球根后转卖给第三方的案例，仅此而已。

不管怎么说，在哈勒姆和海牙至少有一些个体狂热者似乎彻底地被卷入了风信子热，他们是以牟利为目的种植风信子的。在最高峰时期有相当多的人对这种新潮流表示不认同。人们对于郁金香狂热的悲惨经历记忆犹新，还有出版企业再版印制了《对话》，并重新作序批判当今的投机者与他们的先辈一样贪婪、一样被那个俗艳狡诈的弗洛拉欺骗了。还有人制作了新的小册子以警告世人避免风信子交易的过度。郁金香狂热的深刻教训还历历在目，人们可能会说，这次新热潮最让人惊讶的其实是此类事件怎么还会发生。从郁金香狂热之后到如今的情况可以用几句话概括。荷兰种植者经营并且主导了这种生意。事实上，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哈勒姆的一个花商团体实际上控制了整个行业。尽管这种寡头垄断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被打破了，但是荷兰花农的盛名还是无人可及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将打理花园当成一种爱好，全球范围对花卉的需求飙升。哈勒姆周围用于培育球根的面积也随之增长。第一个花卉农场出现在哈勒姆以西的布罗门代尔和奥威尔维恩（Overveen）；然后培育行业向南扩展到西里格姆（Hillegom）和里斯（Lisse），这里属于中部的哈勒姆滩地，本来是沼泽，在19世纪被排干转变为农地。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私人的花卉农场规模开始扩大，形成了巨大的郁金香花海，也成为荷兰省最受欢迎的明信片图画。随后，哈勒姆周边所有的可耕作土地都用来种花了，还有一部分球根交易不得不转移到别处。如今，更多的郁金香其实出产于荷兰省北部的农场而非哈勒姆。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重大的变化。球根种植者现在已经掌握了保证郁金香全年供应的培植技术。低温可以防止球根发芽，这样就可以让鲜花在任何人们希望的时间开放。曾经让无数花卉爱好者抓狂的漫长等待就不会出现了，所以郁金香狂热发生的先决条件就不存在了。

最根本的是，郁金香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在狂热平息后的250年里，荷兰种植者引进了一些与原来的郁金香有本质区别的品种。包括鹦鹉郁金香，它有扭曲的叶子和鸟嘴一样的大花瓣；还有双郁金香，它有额外的花瓣；还有达尔文郁金香，它是19世纪培育的一种杂交的巨型郁金香。曾经红极一时的杂色郁金香现在已经几乎绝迹了。这种原始的品种因为被马赛克病毒感染而比较脆弱，像总督和“永远的奥古斯都”这样的品种，都避免不了存活时间短的弊病，即使是这些品种的后代也都已经消失不见了。英国的几个郁金香俱乐部里还保有一些真正的杂色品种，而其他花园里多年来绽放的火焰纹郁金香则顶多只是杂交培育的仿品。

球根产业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消除马赛克病毒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就像花商们消除了花卉界的天花一样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同样很难否认的是，这场战争的胜利不是没有代价的。每一种杂色郁金香可能体现的无穷的变化随着病毒一起消失了，同样带走的还有郁金香那让人为之神魂颠倒的魅力。

今天，球根交易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繁多的郁金香品种。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停的增加。在克劳修斯的时代，人们能欣赏到的郁金香不过几种，而现在，人们已经培育、描述并编目分类的郁金香接近6000种。

这样让人眼花缭乱的选择范围本身是很惊人，但不可否认这种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体品种的重要性。当代流行的大面积同类同色郁金香的画面肯定会让那些在小片花圃里种植多种郁金香的17世纪鉴赏家们觉得粗俗。肯定也不会有哪个现代园丁能像过去的郁金香迷一样，对自己的每一朵花都了如指掌。

而郁金香狂热则是一种永远不会彻底消失的病毒。它是一种纯粹的人性疾病。人类对美好的追求和对金钱的贪婪是这种疾病发育的温床，一旦时机成熟，随时可能爆发。举例来说，在1838年的法国，大丽花热

兴起。就像两个世纪前，郁金香对欧洲人来说很新奇一样，大丽花是在1790年前后才从墨西哥引入的。园艺家们很快就开始培育这种新奇花卉，而它的美丽也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甚至被用来反驳卢梭的“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的论点。大丽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升到了很高的价格，一花圃的大丽花可以卖到7万法郎，而一朵美丽的大丽花也可以兑换一颗上好的钻石。然而，流行总是多变的，大丽花也像郁金香一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到1912年，荷兰唐菖蒲又一次引发热潮，但同样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散了。

这种痼疾最近一次出现是在1985年的中国，整个事件的发展几乎与郁金香狂热一模一样。这次人们投机的对象变成了君子兰，或者叫石蒜。这种兰花体积不大，花朵成漏斗形，一簇一簇聚集在一起像一团缠绕的毛线。雄蕊极长，向外伸展超过花瓣，整体有一种精美之感。君子兰原产于非洲，但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长春广泛培育。起初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最爱，种植君子兰一度成为彰显贵族家庭的标志。中国共产党执政后，40年代末期才形成的小范围的球根交易市场被叫停，但是君子兰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并且被指定为长春的市花。到1980年大概长春一半的家庭里都有君子兰。

短短几年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君子兰狂热就爆发了。在长春的情形与17世纪30年代的荷兰省十分相似。经营活动在此时是受鼓励的。但是虽然人们有饱满的致富热情和高涨的精力，可投资的机会却少之又少。在这样的环境下，长春的君子兰种植者抓住了周边群众对君子兰需求增大的机会，价格不可避免地迅速上涨了，投机君子兰球根的行为便随之而来。[3]

在1981年和1982年，君子兰的价格是100元人民币，约合15英镑一个球根。考虑到当时中国人的年均工资收入，这已经是相当高的价格

了。但是到了1985年，有报道称最贵品种的球根交易价达到了天文数字的20万元，约合3万英镑。这个数字让郁金香狂热时期的巅峰价格都自叹弗如。一个“永远的奥古斯都”球根最高价为5000～10000荷兰盾，相当于当时一个富有商人收入的4～8倍。而君子兰狂热时期的最高价，则相当于一个中国大学毕业生年收入的300倍还多。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在这样的情况下，君子兰热持续的时间即使以花卉狂热的标准来衡量也算很短了。1985年夏天价格就下跌了，一些重要报刊上将此类投机行为描述为疯狂之举，这显然影响了一些投机者对这个新兴市场的信心。

君子兰市场里很快就挤满了急切出售球根的卖家，球根价格急转直下。正如君子兰热的疯狂程度超越了郁金香狂热一样，其崩溃的程度也更加剧烈。到价格最终稳定下来时，价格跌幅普遍超过了99%。

长春位于中国北部，北纬四十度略北。距天上山谷仅2000英里。狂热病毒终于又回到了它的家乡。

---

[1] 英国人认为作者的姓名是这样拼写的。而正确的拼写应当是Henrik van Oosting，这显然不符合英国出版商的发音习惯。

[2] 还有一些是与花卉狂热类似的对其他商品的热潮。在过去的400年中，类似的泡沫繁荣在世界各国都发生过（泡沫的意思是，商品价格飙升，但是对于除投资者之外的人都没有实际价值）。投资的标的各有不同，既有常见的股票和债券、土地、石油，也有一些不太常见的。比如1630年在联省兴起了投资运河摆渡系统的热潮，实际上有效地推动了运输系统的发展，很多人因此致富。到17世纪70年代，又出现了在公共场所立钟的泡沫繁荣，因为商人们认为立钟可以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所有的泡沫繁荣中，与郁金香狂热最相似的可能要数1925年的佛罗里达土地投机热潮。像郁金香一样，当时的佛罗里达对美国人来说是充满异国情调的一片地区，但是由于气候差加上沼泽湿地过多一直很难进入。然而，随着公路和铁路的修建以及湿地抽干等举措，再加上那里温和的冬季气候都让这片地区越来越充满吸引力。一些美国人开始在这里的迈阿密地区投资建房作为假日别墅。连穷人也纷纷效仿，当地的地产商很快就抓

住了不动产需求增长这一机遇并加以利用。关于在佛罗里达买卖土地可以赚大钱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时一位著名的律师威廉·詹宁斯·布莱恩1912年的时候在迈阿密买下了一套过冬用的房子，到1920年转手卖出，挣了25万美元的利润。随后，1200美元购买的小块土地几个月就可以以5000美元卖出。2500美元买入的可以7800美元卖出，后来又卖到1万美元，再后来17500美元，最后甚至卖到35000美元。最后这个以35000美元买入的人，其实就是最初以2500美元将这块地卖出而且一直后悔不已的人。1913年鳄鱼溪水渠附近的土地价值是15美元一英亩，到了1925年竟涨到了2000美元一英亩。在迈阿密中部，曾经价值为30美元一英亩的土地要卖到75000美元。最终，迈阿密的土地变得比纽约第五大道上的房产还要值钱。这些土地其实都是投机者支付一小笔定金买下的，他们都是指望在付款期限到来之前就能转手卖出。大量的钱财涌入佛罗里达。从1924年秋天开始的短短12个月里，迈阿密的银行里票据交换涉及的数目从21.2万美元上升为100万美元，土地交易量是原来的3倍。1925年发行的一期《迈阿密每日新闻报》全长达到504页，几乎全部都是不动产广告。这份报纸也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据说当时迈阿密有2000多家房地产代理，雇佣的销售人员多达25000人。然而到了秋天，市场崩溃如约而至。投机者们高估了对土地的真实需求量。到这里过冬的人只有预计的1/10。人们开始拖延偿还贷款，一个以12美元一英亩价格售出土地的人曾经眼红地看着这块地又以17美元、30美元甚至60美元一英亩的价格卖出，但是到头来，高价购买的人都付不起欠款，这块地的所有权最终又回到了最初的所有者手里。从1926年秋天开始，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导致佛罗里达一些银行倒闭。因为结算的总额从1925年的10亿狂降至6.33亿每年，到1928年则只剩1.43亿。再下一年，《国家周报》报道称："迈阿密将成为美国最便宜的地方……最自命不凡的海滩大厦，曾经月租250美元，现在只要35美元……"

[3] 在特定的条件下，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东西也可以变成稀有珍贵的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军队补给是首要前提，美军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领到瓶装可口可乐。在通常情况下一瓶饮料的价格是5美分，而在意大利前线，一瓶可乐可以拍卖到4000美元。

注释

概述

人们对郁金香历史的了解程度惊人得深入。一方面是由于郁金香的名气之大；另一方面则得益于郁金香盛行之时也正是园艺写作开始盛行的初期。此外还有一些优秀的早期简述作品，如 Sir Daniel Hall，*The Book of the Tulip* 。以及其他十分稀少但是非常珍贵的区域研究成果，比如著名的Michiel Roding and Hans Theunissen，*The Tulip*：*A Symbol of Two Nations* 。此外还有Sam Segal，*Tulips Portrayed*：*The Tulip Trade in Holla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然而，所有作品中最重要的综合概述性作品无疑是Anna Pavord，*The Tulip* 。

适合于对17世纪荷兰历史感兴趣的读者的作品数量也很丰富。比如近期出版的Jonathan Israel，*The Dutch Republic*：*Its Rise*，*Greatness and Fall*，*1477-1806* 。这本书是对17世纪荷兰历史的综述，获得了很好的评价。而对于社会历史学家来说，则有一些更具争议性的作品可以参考，如Simon 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和A.T.van Deursen，*Plain Lives in a Golden Age*：*Popular Culture*，*Religion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Holland* 。

然而，关于郁金香狂热的历史仍然谜团重重。至今仍然没有人就这一题材，充分利用荷兰档案馆庞大的原始资料，进行详尽的学术研究。很多对于这一问题的简略研究依据的往往是存在重大缺陷的流行结论，其中最主要的莫过于Charles Mackay，*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这本书于1841年首次出版，至今仍可买到，虽然有趣易读，但是具有误导性（这本书实际上以Joseph Bulgatz，*Ponzi Schemes*，*Invaders from Mars and More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为基础，原著并未引起多少关注，而麦凯加入了现代的分析，虽然也是依据二手资料的研究，但相对可靠）。

除了在E.H.Krelage，*De Pamfletten van den Tulpenwindhandel 1636-1637* 中收录的当时一些小册子之外，最有价值的荷兰语资料就是当时的法律文件。很多被卷入郁金香狂热的城市都留存了类似的记录，不光有购买郁金香球根的买卖文件，还有1637年价格暴跌之后导致的各种诉讼的记录。已出版的一些案例摘要类作品都算不上全面系统。比如最著名的汇编A.van Damme，*Aanteekeningen Betreffende de geschiedenis der bloembollen*：*Haarlem1899-1903* （这是一本对世纪之交时期杂志文章的汇编，最终于1976年在莱顿出版），以及Nicolaas Posthumus在 *Economisch-historisch jaarboek* 上发表的小册子及“De Speculatie in tulpen in de jaren 1636 en 1637” parts1-3中的一些资料来源。范·达梅自己都说他出版的汇编作品与其说是系统研究的成果，还不如说是意外的发现。

迄今为止，最详尽的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要数Krelage，*Bloemenspeculatie in Nederland*：*De Tulpomanie van 1636-37 en de Hyacintenhandel 1720-36* 。这部作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是本书最主要的研究依据。在仔细审读了所有可以收集到的资料之后，作者个人认为，即便是在宣告了尊重事实的重要性之后，历史学家和某些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还是难免过分地宣扬了郁金香狂热的重要性和涉及范围。

引言

Success synonymous with virtue Paul Zumthor *Daily Life in Rembrandt’s Holland* ，p.137.

“Gathered around the campfire…”引自 Peter Garber，“Tulipmani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I），June 1989，p.535。

序言 为郁金香而疯狂

1637年2月举行的阿尔克马尔拍卖会的相关信息主要来源于A.van Damme，*Aanteekeningen Betreffende de Geschiedenis der Bloembollen* 。关于荷兰郁金香交易者衣着外貌、言谈举止的描写，参考Zumthor或较晚出版的、分析更透彻的A.T.van Deursen，*Plain Lives in a Golden Age* 。

暴跌：Geoffrey Cotterell，*Amsterdam*：*The Life of a City* p.48。

郁金香的价值：Peter Garber，“Tulipmania”，p.537n，指出在1637年每个荷兰盾中含有0.865克黄金。所以1克黄金的价值相当于1.17荷兰盾。一个总督球根在2月5日的阿尔克马尔拍卖会上的成交价达到了146荷兰盾每克，相当于每克黄金单价的125倍。

最富有的人：Jonathan Israel，*The Dutch Republic* ，p.348。

郁金香财富：Garber，p.550。

1 天山山谷

郁金香的早期历史很多是模糊不清的。它的亚洲起源问题的探讨参考Turhan Baytop，“The tulip in Istanbul during the Ottoman period”，以及Michiel Roding and Hans Theunissen（eds），*The Tulip*：*A Symbol of Two Nations* 。Wilfrid Blunt，*Tulipomania* ，其中简要介绍了波斯对野生郁金香的狂热。

郁金香的亚洲发源地：Baytop，pp.50-6。

早期对郁金香的喜爱：公元前2000年控制着小亚细亚地区的希泰人已经懂得欣赏球根类野花之美。根据古代铭文的记录，在希泰人的领土内，人们每年都要举行仪式庆祝春天的到来，这个节日叫作*An.tah.sum-sar*，意为“球根节”，节日的时间恰巧也是红番花每年初次盛开的时候（到今天仍有很多安纳托利亚人保留了类似的传统，在每年5月都有名为*Hidrellez*，即庆祝春天到来的节日，人们会出门野餐，传统的节日食品是用保加利亚小麦制作的蒸粗麦米饭配上捣碎的红番花球根）。对于生活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人来说，他们经历的冬天比小亚细亚地区要严酷得多，所以肯定更加渴盼春天的到来，因此郁金香大概也有类似的象征意义。见Baytop，p.51。

波斯的郁金香：Daniel Hall，*The Book of the Tulip*，p.44；Blunt，pp.22-3；Valerie Schloredt，*A Treasury of Tulips*，p.62。

土耳其历史：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郁金香历史较之早期有更完善的档案记载。关于这一时期的土耳其历史可以参考Halil Inalcik，*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1453年以前土耳其历史中的郁金香：Yildiz Demiriz，“Tulips in Ottoman Turkish culture and art”，in Roding and Theunissen，pp.57-75。

哈桑·芬迪的故事：Demiriz，p.57。

巴布尔和土耳其的园艺传统：Alexander Pallis，*In the Days of the Janissaries*，p.198。

郁金香作为宗教象征：土耳其人并不是唯一将郁金香视为宗教象征的民族。17世纪到美国东海岸的德国移民，即“德裔宾州人”就用有三个花瓣的郁金香代表“三位一体”。这个图形经常被用于重要文件的纹饰，

比如出生证明。见Schloredt，p.43。

2 在极乐家园里

园艺学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占据过核心地位，在其他传统历史中也不被重视。关于土耳其郁金香时代历史最好的参考文献是伊斯坦布尔人的作品。其中最出色的要数Philip Mansel，*Constantinople*：*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1453-1924* 。对于研究奥斯曼宫殿的人来说，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包括Barnette Miller，*Beyond the Sublime Porte*：*The Grand Seraglio of Stambul* 。该书作者米勒教授可能是第一个获许进入托普卡匹宫殿内花园的西方人，她在20世纪初有幸成行。当时的托普卡匹宫殿与原貌更相似。经过大量的工作，米勒教授尽可能地还原了宫殿本来的布局——包括后宫和花园——这些地方已经不再被使用而且年久失修。她的研究成果也成为后来奥斯曼宫廷生活研究的基石。

科索沃会战：Noel Malcolm，*Kosovo*：*A Short History* ，pp.58-80。关于编年史，参考Anna Pavord，*The Tulip* ，p.31。

巴耶济德：Halil Inalcik，*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 ，pp.14-18；John Julius Norwich，*Byzantium*：*The Decline and Fall* ，pp.343-5，364-9。

巴耶济德的衬衫：关于巴耶济德的衬衫的实际年代存在一些争论。土耳其和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中陈列的藏品标记年代为大约公元1400年，而根据Yildiz Demiriz，“Tulips in Ottoman culture and art”，及Michiel Roding and Hans Theunissen，*The Tulip*：*A Symbol of Two Nations* ，p.71，由衬衫的样式可推断出其年代应为大约公元1550年。至今还无法确切证明衬衫的年代，但即使Demiriz的理论是正确的，巴耶济德也完全有可能穿过类似的衬衫。

君士坦丁堡和苏丹穆罕默德：Mansel，chapter 1。

苏丹穆罕默德的花园：Andrew Wheatcroft，*The Ottomans*：*Dissolving Images*，pp.26-9，Mansel，pp.57-8。

苏丹苏莱曼和伊斯坦布尔郁金香：Arthur Baker，“The cult of the tulip in Turkey”，p.240；Baytop，in *Roding and Theunissen*，pp.52-3；Demiriz，pp.57-8，74-5。某些权威人士认为伊斯坦布尔郁金香是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培育出来的（比较Pavord，pp.39，45），但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伊斯坦布尔的花商：Baytop，p.51。

苏丹塞利姆及波斯和叙利亚的球根：同上，p.53；Baker，pp.238-40。

苏丹的皇宫与花园：Demiriz，pp.59，67；Mansel，pp.60-1，71，73-5，221-2；Miller，pp.4-21，151-6；N.M.Penzer，*The Harem*，pp.40，252-60；Lavender Cassels，*The Struggle for the Ottoman Empire，1717-1740*，pp.53-4，57-8。

园丁：Mansel，pp.74-5，221-2；Cassels，p.53；Penzer，pp.62，185。

首席园丁的赛跑：现在还不能明确认定这种怪异的习俗是从何时产生的。见Miller，pp.145，250，n31。

3 来自东方的稀罕物

郁金香在欧洲的早期历史——无论是已知的或推测的，最早做出综述性整理的是Hermann，Grafen zu Solms-Laubach，*Weizen und Tulpe und*

deren Geschichte，英文整理版本是Sir Daniel Hall，*The Book of the Tulip*。最新的研究结果是Sam Segal，*Tulips Portrayed*：*The Tulip Trade in Holla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洛波·瓦斯·德桑帕约：瓦斯与郁金香的关系在Wilfrid Blunt，*Tulipomania*，p.8n中有所提及。而他的事业信息参考了R.S.Whiteway，*The Rise of Portuguese Power in India 1497-1550*，pp.208-13，221-3。努尼奥·达·库尼亚（Nunho da Cunha），恰巧是特里斯唐·达·库尼亚（Tristao da Cunha）的儿子，他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大西洋上的小岛，达·库尼亚岛至今还是不列颠帝国最遥远的前哨站。

蒙斯特里尔：他的书是最早关注郁金香话题的，因此在研究花卉的历史学家中非常有分量。

前往葡萄牙的航行时间：Whiteway，p.46。

郁金香作为新鲜事物：Hall，p.36。

16世纪之前欧洲已经有郁金香的证据：Hall，pp.17，36-7。

比斯贝克：Baytop；*Roding and Theunissen*，p.52；Z.R.M.W.von Martels，*Augerius Gislenius Busbequius*，pp.152，440-52。关于比斯贝克第一次发现郁金香的恰当时间，参考von Martels，pp.449-50。

乔治·桑兹：引用自Anna Pavord，*The Tulip*，pp.35-6。

比斯贝克的书信：原书名为*Legationis Turciace epistolce quatuor*（Antwerp，1581），此书在当时是畅销书。

比斯贝克及介绍郁金香的人：另一个支持大使不是将郁金香带回欧洲的人这一结论的理由是他本人经常吹嘘自己是第一个将白菖蒲带回西

方的人。鉴于在1591年他去世之时欧洲已经有了郁金香，很难想象但凡他与这样的发现有一点关系，他怎么会不大肆宣扬。见Von Martels，pp.450-2。

英语中的郁金香一词：根据Hall，p.17，这个词首先出现于Lyte翻译的、克劳修斯的朋友Rembert Dodoens于1568年在安特卫普首次出版的*Florum et Coronarium Odoratumque Nonnularum* 。

加勒特和杰勒德：Wilfrid Blunt，pp.10-11；Pavord，pp.104-5。

康拉德·格斯纳：Hall，p.39；Sam Segal，p.3；E.H.Krelage，*Bloemenspeculatie in Nederlan* ，pp.15-16；Hans Fischer，*Conrad Gesner 1516-1565* ；青蛙的故事参考Jan Bondeson，“The bosom serpent”，in *A Cabinet of Medical Curiosities* 。*Catalogus plantarum* 是在格斯纳去世两个世纪之后才出版的。他对郁金香的描述最早出现在另一本书的附录里，那本书是他一个叫Valerius Gordus的朋友在1561年出版的。

“*In the month of April…* ”引自Hall，p.39。

Tulipa turcarum ：虽然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在奥格斯堡发现的郁金香是以格斯纳（Gesner）的名字命名的，但是根据W.S.Murray，“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ulip，and the tulipomania”，p.19，在赫尔瓦特的花园里发现的其实是*T.Suavenolens* ，而非*T.gesneriana* 。

肯特曼在意大利见到的郁金香：Segal，pp.3，21 n6。肯特曼将此花标记为*T.Turcica* ，但它实际上似乎是*T.silvestris* 的品种。

富格尔的花园：R.Ehrenberg *Grosse Vermögen* ，p.38。另见G.Freiherr von Polnitz，*Die Fugger* 。此处的富格尔（Fugger）是富格尔帝国创建人之子，他为格斯纳和克劳修斯提供过工作职位（富格尔为镇

压新教改革的活动提供资助，尽管这与克劳修斯的宗教信仰相冲突，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

在英格兰和欧洲的早期郁金香：Hall，p.40；Joseph Jacob，*Tulips*，p.3；Blunt，pp.10-11。

4 克劳修斯

本章大部分材料来源于克劳修斯的最全面的两卷本传记F.W.T.Hunger，*Charles de L'Escluse*（*Carolu Clusius*），*Nederlandsche Kruidkundige 1526-1609* 。关于植物学家早年生活的一些细节参考了另一本很受欢迎的传记Johan Theunisz，*Carolus Clusius*：*Het Merkwaardige Leven van een Pionier der Wetenschap* 。克劳修斯的一些关于郁金香的作品，虽然不是他植物学文集中的经典力作，但是其英语版本也被收录成书W.van Dijk，*A Treatise on Tulips by Carolus Clusius of Arras* 。

佛兰德商人趣事：这个故事起初是由克劳修斯记录的，后来在van Dijk，p.8.中也有提及。

“Thus it was in the spring of 1563…”：这一部分是作者本人的推理，但是作者本人认为实际上可能性不大。就算商人一开始真的将郁金香球根当成洋葱，那么到开花之后也不会还这么认为。

被执行死刑的叔叔：这里的叔叔指的是马蒂厄·德·莱克吕兹（Mathieu de L'Escluse），他确实是在1567年4月被烧死的。当时阿尔瓦的公爵在荷兰的哈布斯堡镇压新教活动，Hunger I，p.97。

克劳修斯的通信人范围：4000封信的数字是根据Hunger I，p.98中的计算估计出的结果。

克劳修斯研究郁金香：克劳修斯在1576年出版的关于西班牙花卉的一本书的附录中首次提及郁金香，*Historia stirpiu per Hispanias observatorum*（pp.510-15），尽管郁金香并不是西班牙的本土花卉，但是这可能也间接说明了他是在西班牙考察时期接到了赖伊关于郁金香的来信。克劳修斯在1583年出版的关于澳大利亚花卉的另一本书中对郁金香做了更详尽的描述：*Historia stirpium Pannonice*（pp.145-60）。再之后，又在他1601年出版的代表作中继续研究这种花卉，*Rariorum Plantarum Historia*（pp.137-52）。

在法兰克福的经历：指的是1593年。参考W.S. Murray，“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ulip and the tulipomanin”，p.19。

克劳修斯的性格和为人：Hunger，I，p.323。

玛丽·德布雷莫伊的称赞：同上，II，p.217。

克劳修斯的清贫：同上，I，pp.III，122。

奥斯曼帝国和维也纳之间往来的球根和种子：Theunisz，p.68。

克劳修斯和比斯贝克：1569年克劳修斯就给冯·克拉夫西姆写信请求他帮忙获取比斯贝克的植物样品。Hunger，I，pp.108，139。

比斯贝克的种子：van Dijk，p.32。

植物窃贼：Hunger，I，p.158；II，pp.115，135；Theunisz，pp.50，78。

“…lost all his teeth”引自Hunger，I，pp.180，240。

5 莱顿

再次重申，上一章参考的Hunger和Theunisz的两本传记是克劳修斯在莱顿工作内容的主要资料来源。关于莱顿大学、荷兰革命事业和郁金香狂热时期历史背景的内容参考Joanathan Istael，*The Dutch Republic*：*Its Rise*，*Greatness and Fall*，*1477-1806* 。关于莱顿大学和那里著名的解剖学学院，在许多外国来访者的游记中都有所提及，尤其是Sir William Brereton，*Travels in Holland*，*the United Provinces etc… 1634-1635* ；John Evelyn，*The Diary of John Evelyn* ，II。郁金香的植物学理论参考了Daniel Hall，*The Book of the Tulip* ；E.van Slogteren，“Broken tulips” in *The Daffodil and Tulip Yearbook* 。

克劳修斯在法兰克福：Hunger II，pp.153-4，164-5，167，172-5。

到达莱顿：Hunger I，pp.210-13。

莱顿：Israel，pp.308，328；Paul Zumthor，*Daily Life in Rembrandt's Holland* ，pp.8，12，23，239。

荷兰革命：Israel，pp.169-75，181-2。

莱顿大学：Israel，pp.569-72，Schama，pp.57，175；Brereton，pp.41-2；Evely，pp.51-4；Zumthor，p.154。

莱顿植物园：Hunger I，pp.189-94，214-18；Hunger II，p.4；Israel，pp.571-2，1043；Brereton，p.42。

“True monarch of the flowers” 1602年2月28日的一封书信中的内容，引自Hunger I，p.269。

Walich Ziwertsz . Nicolaes van Wassnaer，*Historisch Verhael* IX，section April-October 1625，p.10；A.Hensen，“De vereering van St Nicolaas te Amsterdam in den Roomschen tijd” in *Bijdragon voor de*

Geschiedenis van het Bisdom Haarlem，43（Haarlem 1925），p.187.

克劳修斯研究郁金香：W.van Dijk，*A Treatise on Tulips by Carolus Clusius of Arras*，pp.7-32。

郁金香的植物学：Sam Segal，*Tulips Portrayed*，pp.5-12；Hall，pp.99-110；W.S.Murray，“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ulip，and the tulipomania”，pp.21-3。

子球：John Mather，*Economic Production of Tulips and Daffodils*，p.44。

红色系、紫色系和黄色系郁金香：E.H.Krelage，*Bloemenspeculatie in Nederland*，p.33 中指出以上分类术语是到19世纪才提出的，但是因为明确易懂，所以在此使用便于理解。Violetten（紫色系）品种有时也被称为*bybloemen* 郁金香。

“上上等”和“粗俗”的分级：同上，p.21。

培育杂色郁金香的尝试：Anna Pavord，*The Tulip*，p.11。

杂色问题的解决之道：Hall，pp.104-6。

克劳修斯和对球根的需求：Hunger I，pp.214，237。

球根窃贼：Theunisz，p.120；Hunger I，pp.237-8，241；Hunger II，p.197。

“The seventeen province were amply stocked”引自Wilfrid Blunt，*Tuilpomania*，p.9。

6 胸前的装饰

郁金香在联省和法国的历史没有特别完好的记录。本书参考的基础是Krelage的作品及当时一些园丁如Abraham Munting的作品。W.S.Murray，*Waare Oeffening der Planten*；“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ulip and the tulipomania”；Sam Segal，*Tulips Portrayed*；最后一本书中同时包含了关于17世纪郁金香书的有益讨论。

玫瑰是花园中的女王：Paul Zumthor，*Daily Life in Rembrandt’s Holland*，p.49。

蒙斯特里尔的悼词：Segal，p.4中引用。

洛贝尔留斯：Mathiasdel’Obel的拉丁语姓名，他关于郁金香的作品于1581年出版在一本发育草药书中。Segal，p.3。

郁金香的不同种类：Segal，p.4；Murray，p.21。这里的总数不包括土耳其品种。土耳其郁金香在18世纪的种类已经超过了1300种。早期的郁金香爱好者：E.H.Krelage，*Bloemenspeculate in Nederland*，pp.23-4；Drelage，*Drie Eeuwen Bloembollenexport*，pp.6，17。

法国的郁金香：Krelage，*Bloemenspeculatie*，p.29；Abraham Munting，*Naauwkeurige Beschryving der Aardgewassen*，pp.907-11；Peter Garber，“Tulipmania”，p.543。尽管有一些当时的园艺作家们的作品资料，但是早期法国郁金香狂热的情况还是非常模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郁金香鉴赏家：Chrispijn Van de Passe，*Een Cort Verhael van den Tulipanen ende haere Oefeninghe…*，contemporary pamphlet，np，nd（c.1620？）in Stadsbibliotheek，Haarlem，p.4；Krelage，*Drie Eeuwen Bloembollenexport*，p.6。

帕卢斯·范·贝尔斯腾：E.A.van Beresteyn and W.F.del Campo

Hartman，*Genealogie van het Geslacht van Beresteyn*，p.134。

雅克·德·盖恩：L.Q.van Regteren Altena，*Jacques de Gheyn*：*Three Generations* vol.I，pp.2-3，14，38，40，59，66，69-70，131-2，153。

范·德·霍伊费尔：G.Leonhardt，*Het Huis Bartolotti en zijn Bewoners*，pp.14-15，39-40；Israel，p.348。

黄金时代：J.L.Price，*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Dutch Republic During the* 17 *th Century*；Joanthan Israel，*The Dutch Republic*，pp.547-91。

奥芬比克勋爵的花园：William Brereton，*Travels in Holland*，*the United Provinces etc…1634-1635*，pp.44-5。

荷兰乡村别墅：Simon 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pp.292-5；Krelage，*Bloemenspeculatie*，pp.7，27-8。

教堂里的笑话：Geoffrey Cotterell，*Amsterdam*：*The Life of a City*，p.119。通常每个笑话的罚款是6荷兰币。

《关于"德国战壕"花园》：Petrus Hondius，*Dapes Inemptae*，*of de Moufe-schans*。关于"德国战壕"花园的所有权，经常被误说成是洪迪思的家，见*Nieuw Nederlandsch Biographisch Woordenboek*，VIII，pp.812-13。

"All these fools want…" Segao，p.16中内容的英文译文。

奥朗日王子的花园：Brereton，pp.34-5。

7 镜中的郁金香

本书作者关于“永远的奥古斯都”的讨论的依据是Nicolaes Jansz.van Wassenaer的编年史。他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名医师之子，在哈勒姆的拉丁学校学习，1612年以后到阿姆斯特丹成了一名职业作家（兼职医师）。他的编年史作品*Historisch Verhael aller Gedencwaerdiger Wheschiedenissen*，总体上是最确实可靠的，也是郁金香相关信息的主要来源。

关于郁金香狂热发展过程的段落首先是依据E.H.Krelage的作品，补充参考了Nicolaas Posthumus，“Die speculatie in tulpen in de Jaren 1636 en 1637” parts 1-3；“The tulip mania in Holland in the years 1636 abd 1637”，W.C.Scoville and J.C.LaForce（eds），*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urope*；Peter Garber，“*Tulipmania*”，pp.535-60。关于这一时期荷兰花园的信息参考Paul Zumthor，*Daily Life in Rembrandt’s Holland*；Simon Schama，*Embarrassment of Riches*。

关于郁金香书的信息参考Sam Segal，*Tulips Portrayed*；E.H.Krelage，*Bloemenspeculate in Nederland*。同时作者也参考了Chirispijn van de Passe，*Hortus Floridus*，见 Spencer Savage，“The‘Hortus Floridus’of Crispijn vande Pas”，pp.181-206；Eleanour Rohde，*Crispian Passeus’s “Hortus Floridus”*。Savage的作品在20世纪70年代被翻译成英文：*Hortus Floridus*：*The Four Books of Spring*，*Summer*，*Autumn and Winter Flowers*，*Engraved by Crispin van de Pas*。

阿德里安·波夫：Jonathan Israel，*The Dutch Republic*，pp.159，319，458-9，518-19，522-33；H.W.J.de Boer，H.Bruch et al.，*Adriaan Pauw*（*1585-1653*）：*Staatsman en Ambachtsheer*，pp.20-7。现在的海姆斯泰德遗址只有一部分还健在，其余的划入了哈勒姆，成为哈勒姆最南部郊区的一部分。

波夫的镜子花园：Van Wassenaer V，p.40 and verso. 在E.H.Krelage，*Bloemenspeculate in Nederland*，p.138中提到的紫色系波夫郁金香很可能就是由波夫培育出来的，或者至少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永远的奥古斯都”：Van Wassenaer V，p.40 veros and 41；p.111 and verso；IX p.10；Krelage，*Bloemenspeculatie*，pp.32-3，68；Garber，p.537；Segal，pp.8-9。

“永远的奥古斯都”的所有权：近年来，有一些权威确信地宣称阿德里安·波夫就是“永远的奥古斯都”的唯一所有人，但这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仔细研读Van Wassenaer的作品。事实上，尽管编年史作者确实见到了这种品种的郁金香，而且确实造访过海姆斯泰德的花园，但是这两件事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编年史作者也描述了波夫唯一的花圃，像“永远的奥古斯都”这样珍贵的品种，肯定会被单独种在特别的地方以突出其珍贵，而不是和别的郁金香种在同一个花圃里。

还有一些不知出处的奇闻轶事中提到，有一些“永远的奥古斯都”的球根在市面上销售，但是除非有当时的记录证实这些被销售的球根确实是“永远的奥古斯都”，否则我们很难判断传闻的可靠性。根据Krelage，p.65n 中的内容：一个阿姆斯特丹人向一个哈勒姆人出售了一个“永远的奥古斯都”球根，条件是双方承诺谁都不得在没有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再向别人出售这个品种的球根。后来，有人愿意出价3000荷兰盾附加一个价值10000荷兰盾的橱柜，阿姆斯特丹人贪图高价，没有通知哈勒姆人就卖出了球根。当哈勒姆人发现阿姆斯特丹人违约之后，也同样开始出售球根，而且卖出了3个球根30000荷兰盾的高价。类似的，郁金香狂热过去大约35年之后，在Munting的作品中，引用了一个不知出处的会计员登记的内容：“买家N.N.购入“永远的奥古斯图斯”球根，球根重量123分，成交价为4600个弗罗林币[1]。”除了这个数目的货币要马上付清之

外，还要附加赠送一辆全新的精致马车和两匹斑点灰马，配件齐全，两周之内交付使用。Munting还提到了另一个公开的拍卖会以5500弗罗林币的价格售出了“永远的奥古斯都”的球根。见Abraham Munting，*Naauwkeuringe Beschryving der Aardgewassen*，pp.907-11。

巴尔塔扎兄弟和达尼埃尔·德纳维尔：D.M.van Gelder de Neufville，“De oudste generatics van het geslacht de Neufville” in *De Nederlandsche Leeuw*，pp.6-8；Krelage，pp.129，140。这些种类的郁金香被蔑称为“新品种”。

郁金香种植者：F.W.T.Hunger，*Charles d’Elscluse*（*Carolus Clusius*）I，p.241；II，p.251。

亨里克·波特贝克：Segal，p.8；Krelage，pp.127，138。

“拔根人”和药剂师：Hunge I，p.303-06；Krelage，*Drie Eeuwen Bloembollenexport*，p.17。关于不可靠的药剂师的内容，参考Zumthor，pp.73，157。

将郁金香当作催情药：Sam Segal and Michiel Roding，*De Tulp en de Kunst. Verhaal van een Symbool*，p.22。当时的英国园艺作家提到了郁金香可能具有的催情效用，John Parkinson，*Paradisus terrestris*（1629），但作者还说“我没有吃很多球根……不能说它一定具有催情的作用”。引用自Wilfrid Blunt，*Tulipomania*，pp.10-11。

郁金香交易的参与者：Nicolaas Posthum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p.11-15。

哈勒姆之外的花园：J.J.Temminck et al，*Haarlemmerhout 400 Jaar. “Mooier is de Wereld Nergens.”*，pp.98-9。

郁金香术语：Krelage pp.33-7，128.

“If a change in a Tulip is effected…” W.S.Murray，“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ulip，and the tulipomania”，p.24中引用。

彼得·博尔和贝伦特·卡多斯：Krelage，p.42；Schama，p.356。卡多斯是1657年底去世的（Haarlem Burial Registers 72，fol.100），但他创立的事业一直存续到18世纪。

弗朗西斯科·戈麦斯·达·科斯塔：不出意料，达·科斯塔的生意运行顺利，并且抵御住了郁金香狂热的影响，一直存续到1645年。Krelage，pp.42-3，55；Krelage，“Het manuscript over den tulpenwindhandel uit de verzameling Meulman”，p.30。

球根出口：如今，荷兰有2/3的球根是用于出口的。荷兰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郁金香制造商Germaco每年出口3500万个球根，大部分是销往英国的超市销售链。

埃马努埃尔·斯沃茨：Krelage，p.25。

郁金香书：最早的郁金香书是法语写成的，完成于1603年。随着郁金香狂热的发展，专门描绘郁金香的画册才开始出现，最早的大约是在1635年。Segal and Roding，pp.78-81；Segal，*Tulips Portrayed*，pp.17-20；Paul Taylor，*Dutch Flower Painting 1600-1720*，pp.10-12。

范·斯旺波奇的郁金香书：这本书现在保存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经济史档案馆（Nederlandsche Economisch-Historisch Archief）中。其中关于价格的记录似乎是由这本书的匿名的所有者写下的。

科斯的郁金香书：这本手稿正确的标题应当是*Verzameling van een Meenigte Tulipaanen…*，创作于1637年［很奇怪的是，市政档案里并没

有任何其他关于这个叫科斯（Cos）的花商的记录，尽管Krelage确实注明了有一种郁金香品种名字叫Kos］。这份手稿现在保存于瓦赫宁恩大学图书馆。

流动球根商人：Anna Pavord，*The Tulip*，p.53。

8 花商

关于联省在黄金时期的社会历史可参考A.T.van Deursen，*Plain Lives in a Golden Age*：*Popular Culture*，*Religion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Holland*。日常生活细节参考Paul Zumthor，*Daily Life in Rembrandt’s Holland*。在当时的作品中，最具权威的大概就是Sir Willian Temple，*Observations Upon he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可惜这本书是在1673年狂热结束之后才出版的。该书篇幅不长，依据的是作者在1652年游历荷兰的亲身经历。他曾经是英国驻荷兰大使，因此对荷兰的成功经验有浓厚的兴趣。他的作品不仅仅是肤浅的游记，更有从专业角度深刻全面的分析。

对于荷兰地理情况的描述：Temple，pp.95，113-14；Zumthor，p.277；Jonathan Israel，*The Dutch Republic*，pp.1-3，9-14。

“An universall quagmire…”说这番话的是一个英国的政治宣传者Owen Felltham。他的作品正是在17世纪英荷对抗达到顶峰时期出版的。Fellthan对荷兰的观点应当在上下文语境中综合理解，Simon Schama，*The Embaraasement of Reiches*，p.44中有引用。

英国大使……：Temple，pp.95，113-14。

荷兰社会阶层：Israel，pp.330，337-53，630-8；van Deursen，pp.4-8，13，32，47-8，194；Zumthor，pp.232-41；Schama，pp.19-21，316，579-81。

协会和工作日：Van Deursen，pp.5，11；Zumthor，pp.5-6，53。

食物：Van Deursen，pp.4，19-20，82；Schama，pp.162-4，169-70，230；Zumthor，pp.67-74；Geoffrey Cotterell，*Amsterdam*：*The Life of a Cithy*，pp.24，48；William Brereton，*Travels in Holland*，*the United Provinces etc… 1634-1635*，p.6。

整洁：Van Deursen，pp.19，41；Zumthor，pp.137-9，169；Brereton，p.68。

人口：Israel，p.328。

博达尔缇厄斯及人口过剩的压力：Van Deursen，pp.3-4，8。

园艺在荷兰开始流行：Cotterell，pp.88，131；Brereton，p.38；Perter Mundy，*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vol.IV，p.75；Segal p.8；Joseph Bulgatz，*Ponzi Schemes*，p.86。

荷兰人的储蓄：Temple，p.102。

赌博的冲动：Van Deursen，pp.67-8，105-6；Schama，pp.306-7，347；Zumthor，p.76。

9 繁荣

对郁金香狂热最好的解读是E.H.Krelage，*Bloemenspeculatie in Nederland*。该书是对这一事件的概括总结。如果需要更深层的解析，可以参考Nicolaas Posthumus，“The tulip mania in Holland in the years 1636 and 1637”，in W.C.Scoville and J.C.LaForce（eds），*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urope*，pp.138-49。

霍伦：Jonathan Israel，*The Dutch Repulic*，pp.317-18。

郁金香别墅：A.van Damme，*Aanteekeningen Betreffende de Geschiedenis der Bloembollen*，pp.23-4。作者认为郁金香别墅于1755年翻新过，当时雕刻了郁金香形状的石头以示纪念。但是此别墅在19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被拆除了。郁金香石雕被J.H.Krelage买走，他是当时哈勒姆最主要的郁金香种植者之一，也是郁金香历史学家E.H.Krelage的父亲。这件石雕被镶在了他家图书馆的墙上。Van Damme提及过他书中细节主要的资料来源是Velius的编年史，但实际上Velius的编年史截至1630年。因此Van Damme指的应当是原本的编年史的接续作品，但该作品的可靠性不十分清楚。根据编年史作者提到郁金香别墅的上下文判断，这一段落可能不是同一时期写下的。

郁金香狂热的发展过程：pp.140-2；Krelage，pp.42，49-52。

“A contemporary chronicler…”，Lieuwe van Aitzema，*Saken van Staet en Oorlogh*，p.504.研究郁金香狂热的历史学家们引用的价格大多是参考了小说化的*Samenspraecken*，即1637年出版的记录一个郁金香交易者和他的朋友的对话的三册系列书。具体见以下及第十一章注释。

豪达的“将军中的将军”：Krelage，pp.35，49。Schama称豪达是一种最便宜最普通的品种是错误的。

“永远的奥古斯都”后来的价格：Krelage，pp.32-3，68；Garber “Tulipmania”，p.537；Sam Segal，*Tulips Portrayed*，pp.8-9。

风靡荷兰的致富故事：比较Israel，p.347。

斯海默的围垦田和商人的情人：Krelage，p.30，引用郁金香狂热时期出版的小册子。

水手和英国旅者的故事：水手的故事是J.B.Schuppius记录的他在荷兰的童年记忆，参考Hermann，Grafen zu Solms-Laubach，*Weizen und*

Tulpe und deren Geschichte，p.76。这个故事还被著名的查尔斯·麦凯转述过，见*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p.92。麦凯同时也讲到了英国旅者的故事，但没有说明出处。Peter Garber在自己的作品中指出了这些故事的不合理性，“Tulipmania”，p.537&n。

荷兰的经济萧条：Israel，pp.314-15。

织工：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参与郁金香狂热的主力军是织工，Posthumus，p.143。

按球根和按花圃销售：同上，p.141。

扬·布兰茨和安德里斯·马修的交易：Posthumo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 in de Jaren 1636 en 1637” part 2（1927），pp.13-14。

4月到8月之间的销售：早期的关于郁金香交易日期的记录都是在每年4月到8月之间的。Posthumous，同上，pp.11-15；Posthumous，“The tulip mania in Holland”，p.141。

风中的交易：Schama，pp.358-9。

期权交易：Marjolein‘t Hart，Joost Jonker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eds），*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pp.53-4；Schama，pp.339，349-50；Jan de Vries and Ad van der Woude，*The First Modern Economy*：*Success*，*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815*，p.151；Schama，pp.338-9；Paul Zumthor，*Daily Life in Rembrandt’s Holland*，p.262。

期权交易的限令：‘t Hart et al.，p.55。

按分计价的交易：Krelage，pp.46-8。

格里特·博施：Alkmaar notarial archive vol.113 fol.71vo-72vo，23 July 1637（copy in the Posthumus Collection，Netherlads Economic History Archive）。

海运香料的利润：Israel，p.320。

大卫·德·米尔德：Posthumo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16。

亨利克·卢卡森和约斯特·范·哈弗比克：同上，pp.19-20。

扬·阿德莫里尔：同上，pp.17-18，21-2。

球根的价值：最准确的数据来源是1637年2月举办的阿尔克马尔拍卖会上的成交价。当天几个同一种类、不同重量的球根由同一竞价者购得。见van Damme，pp.92-3。

郁金香公司：Posthumo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p.26，32-6。

球根的每分价格和每千分价格：对比van Damme，pp.92-3。

买来种植和交易的球根：Posthumo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p.24-5。

“They came from all walks of life…”同上，（1926），pp.3-99。

《对话》：Posthumous在*Economisch-historisch jaarboek*（1926），pp.20-99 上转载的三本重要的小册子的内容。在其他一些作品中对此内容也有提及，见Krelage，*Bloemenspeculatie in Nederland*，pp.70-3；*De*

Pamfletten van den Tulpenwindhandel 1636-1637，pp.2-4；W.S.Murray，“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ulip，and the tulipomania”，pp.25-7，Joseph Jacob，*Tulips*，pp.10-12，Sam Segal，*Tulips Portrayed*，pp.13-15，Zbigniew Herbert，*Still Life with a Bridle*，pp.57-8，Schama，pp.359-60。以上各位作者对应当如何解读这三本小册子从未达成一致，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三本册子内容本身存在不清楚的地方。

支付方式：所有例子都来源于*Samenspraecken*。对比Joseph Bulgatz，*Ponzi Schemes*，p.97。

埃特·杜森：Posthumo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38。在1643年，范·德·霍伊费尔的妻子在公证员面前确认在郁金香价格暴跌之后，此合同已经作废。

耶鲁恩·杨森：Posthumous，同上，pp.27-8。在此案例中卖家的姓名为“Cresser”，但狂热时期的记录中经常会出现拼写错误，此处应当指的是“Creitser”。

科内利斯·居尔登维根：同上，pp.61-5，72-4。

亚伯拉罕·德·戈耶尔：同上，（1934），pp.231-2。

“Null and void…”：同上，（1927），p.85。

欺诈案例：Segal，p.12；W.S.Murray，p.25。

“Everything that could be called a tulip…” van Aitzema p.504.

10 金葡萄指示牌

本书作者对于酒馆生活的了解是基于许多零散的二手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A.T.van Deursen和Simon Schama的作品。英国旅者Fynes

Moryson，William Brereton和Peter Mundy也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了相关内容，而且他们的个人经历也为社会历史学家的概略评述增色不少。哈勒姆的酿酒产业参考S.Slive（ed），*Frans Hals*（The Hague：SDU，1990）。哈勒姆的酒馆在以下作品中有所提及，S.Groenveld，E.K.Grootes，J.J.Temminck et al，*Deugad Boven Geweld.Een Geschiedenis van Haarlem 1245-1995*，该书的内容比书名简单的英文译名丰富得多（“Virtue Above Violence”）。另一本书名更没有吸引力的作品是J.J.Temminck et al，*Haarlemmerhout 400 Jaar. “Mooier is de Wereld Nergens”*（“400 Years of Haarlem Wood：Nowhere in the World Is More Beautiful”），其中关于哈勒姆的妓院，被作者有意略去了。庆幸的是，在另一本历史趣闻作品中，作者介绍了一些说明食物和酒在荷兰生活中重要角色的有趣细节，Geoffrey Cotterell，*Amsterdam*：*The Life of a City*。

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Marjolein ‘t Hart，Joost Jonker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eds），*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pp.53-6；Cotterell，pp.85-6；Schama，pp.348-50；Brereton，pp.55-6。

约瑟夫·德·拉维加关于自由交易者的描述：Schama，p.349中有引用，其中关于交易者行为的描述是在郁金香狂热之后的，准确地说是17世纪80年代，所以在17世纪30年代的情况并不一定如此夸张。

遍地旅馆：Van Deursen，pp.101-2。

酒吧的名称：Schama，p.202；Zbigniew Herbert，*Still Life with a Bridle*，p.58。

卖淫：Van Deursen，pp.97-100。

寡廉鲜耻的妓女：Brereton，p.55。作者指的是阿姆斯特丹的妓

女。

酒馆交易的兴起：Posthumo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19。

卷入郁金香狂热的酒馆：哈勒姆的旅馆肯定都参与了郁金香狂热，包括Van de Sijde Specxs（腌培根），De Vergulden Kettingh（镀金项链），‘t Oude Haentgen（小小老母鸡），the Toelast in the Grote Markt and De Coninck van Vranckrijck（法国国王）。在阿姆斯特丹，有De Mennoniste Bruyloft（门诺婚礼），也是作为一个郁金香交易的中心场所。Posthumo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p.24，83 and（1934），p.233。

奎克尔一家：老奎克尔出生于1563年，1587年迎娶了苔恩或凯瑟琳娜·科内利斯朵·杜伊克（Trijn or Catharina Cornelisdr.Duyck）。他从1609年开始在哈勒姆的克鲁斯街（Kruisstraat）经营一家名为Bellaert的酒馆，同时也在Janspoort附近种庄稼和郁金香，同时他还租了布雷德罗德领主（Brederode）在Huis ter Kleef城堡附近的土地。通往这两块地的小路因此以奎克尔巷命名。似乎没有什么记录能证明奎克尔的大儿子科内利斯参与了郁金香交易，但是在1627年，他曾经在对据称是异教徒的画家Torrentius的审判中，提供对其有利的证词。科内利斯一直到1626年都是哈勒姆的肥皂税税官，他至少活到了17世纪50年代。他的兄弟扬·奎克尔是个郁金香交易者，出生于1601年或1602年，1661年1月10安葬于哈勒姆。G.H.Kurtz，“Twee oude patriciershuizen in de Kruisstraat”，*Jaarboek Haerlem*，1961，p.20；Haarlem Municipal Archives，Notarial Records vol.129 fols.72；vol.123vo；vol.139 fol.27vo-28；vol.149，fol.210；vol.150 fols.273-273vo，394vo；Haarlem burial registers vol.73 fol.100vo。E.H.Krelage，*Bloemenspeculatie in Nederland*，pp.134-6中列举了老奎克尔培育的郁金香品种。

哈勒姆：Groenveld et al，pp.144.172-4，177。

街灯：照明设备——依靠燃烧植物油点亮上百盏路灯的方法——1670年传入阿姆斯特丹，这一成功经验又很快传遍了荷兰其他城市，进而整个欧洲。Jonathan Israel，*The Dutch Republic*，p.681。

泥炭火：Mundy，*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pp.664-5；Monsieur de Blainville，*Travels Through Holland* …（London，1743）I，44。

烟雾：Schama，pp.194-8；van Deursen，pp.103-4。

武器：Van Deursen，pp.110-11。1589年荷兰省政府发布了对武器的限令，随后很多地方的立法机关也纷纷判定了支持的案例。

油画：John Stoye，*English Travellers Abroad，1604-1667*，p.294中记录了英国旅行家Sir Dudley Carleton（1616）和Robert Bargrave（1656）对在荷兰酒馆中发现的精美油画的评论。

醉鬼和酒：同上，p.162；Cotterell，p.73；Brereton，pp.11-12.

哈勒姆的啤酒消费数量：Paul Zumthor，*Daily Life in Rembrandt's Holland*，p.72 引用了J.van Loenen，*De Haarlemse Brouwindustrie voor 1600*（Amsterdam，1950），p.53。

每天晚上喝酒的花费：Fynes Moryson 1592年在荷兰旅行时，每餐大约花费12～20荷兰币，他抱怨说花费这么高是因为与他同行的旅伴每晚都在壁炉边吵着喝酒。Moryson，*An Itinerary*，pp.89-90。

酒精消耗：Zumthor，p.175；Schama，pp.191，199。

蒂奥菲力·德·维奥：Zumthor，p.173 中引用。

酒厂数量：Groenveld et al.，p.176；H.L.Janssen van Raaij，*Kroniek der Stad Haarlem van de Vermoedelijke Stichting der Stad tot bet Einde van het Jaar 1890*，entry for 1628。

酒馆交易：Posthumo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6），pp.20-99；Zumthor，p.175。

葡萄酒：Zumthor，pp.173-4。

11 沃特·温克尔的孤儿

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沃特·温克尔的所有信息来源于位于阿尔克马尔的市档案馆（Stad Archief）。这些资料由A.van Damme发现并收入其整理的法律文件和郁金香狂热时期小册子的汇编。这一系列整理资料曾经在19世纪初时发表在一个球根种植者期刊上。随后Van Damme的这些文章又被收录并重新出版成书的形式，即*Aanteekeningen Betreffende de Geschiedenis der Bloembollen*：*Haarlem 1899-1903*。Van Damme和Posthumus的档案作品是后世研究郁金香狂热的基石，连E.H.Krelage也参考了他们的成果，而近代的研究成果则乏善可陈。

沃特·温克尔：Van Damme，pp.91-3。

阿尔克马尔：Jan de Vries，*The Dutch Rural Economy in the Golden Age*，*1500-1700*，pp.157-9；Paul Zumthor，*Daily Life in Rembrandt’s Holland*，pp.29-30，55。

入学年龄：Simon 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p.538。

温克尔的收藏：留存下来的记录显示，温克尔有一个或多个生意伙伴，但是他们在1636年8月对郁金香存货进行了分配。在阿尔克马尔拍卖会上拍卖的是他个人所有的部分。Van Damme，p.92。

温克尔是名种植者：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但还是不能完全确定温克尔是否培育了郁金香。阿尔克马尔孤儿院的代管人肯定是在球根出土后实际占有了球根，也是他们做出指示将球根重新种回土里。因为球根是交付后才付款，一个酒馆老板又怎么可能随时有几千荷兰盾的流动资金来购买这样昂贵的商品？所以本书作者认为说各处的球根种植人把准备好的球根送来温克尔的酒馆，他又能在秋天之前全卖出去是说不通的。

荷兰的孤儿院和养老院：Zumthor，pp.100-1。

布洛克村的种植者：E.H.Krelage，*De Pamfletten van den Tulpenwindhandel 1636-1637*，p.30。

阿尔克马尔拍卖会竞拍人的情况：我们确切知道的竞拍人有阿尔克马尔的格里特·阿姆斯特丹，哈勒姆的扬·奎克尔，还有彼得·范·威尔森。他们都是有钱有势的郁金香种植人。Posthumo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81。详情见下一章注释。

拍卖会：Van Damme，pp.91-3。

“Thus Admirael Liefkens…” E.H.Krelage，*Bloemenspeculatie in Nederland*，p.49。

亨德里克·彼得森：Posthumous（1927），pp.40-1。

范根纳普的账簿：同上，pp.39-40。

乌特勒支省和格罗宁根省：来自乌特勒支的代表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为控制球根交易价格暴跌的会议（详情见下一章注释）。药材商亨里克斯·蒙廷（1583～1658）在郁金香狂热时期也是在格罗宁根做球根交易的，后来还在格罗宁根大学建立了草药学花园。参考他的儿子Abraham Munting，*Naauwkeurige Beschryving der Aardgewassen*，

p.911；见第十三章；另见*Nieuw Nederlandsch Biographisch Woordenboek*，vol.VI，pp.1044-5。

法国的郁金香投机：Munting，p.911。

乌特勒支省的参与人数：1637年2月7日有39个花圃主人聚集在一起选举代表参加即将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会议。39人的名单见于Posthumo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44。

郁金香交易的中心：Krelage，pp.83-4。

球根一日之内转卖十次：同上，p.77。

价格顶峰：Lieuwe van Aitzema，p.504；Posthumus，p.79；Krelgage，p.52。

1000万荷兰盾：Van Aitzema，p.503。

阿姆斯特丹的银行：1375个账户，平均每个账户存款2500荷兰盾。对比Marjolein ‘t Hart，Joost Jonker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eds）*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pp.46-7。

荷兰东印度公司：同上，p.54。

黑色郁金香：Alexandre Dumas，*The Black Tulip*；Wilfrid Blun，*Tulipomania*，p.17。

磅货交易：Krelage，pp.51-2。

12 崩盘

价格暴跌的主要参考资料是哈勒姆和阿姆斯特丹的律师文件，收录

于Nicolaas Posthum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 in de Jaren 1636 en 1637” parts 1-3，*Economisch-historisch jaarboek*，1926，1927，1934。这些材料几乎全是关于鉴赏家和种植者之间纠纷的，使用时需仔细审读。

价格暴跌：E.H.Krelage，*Bloemenspeculatie in Nederland*，p.80；Posthumus，“The tulip mania in Holland in the years 1636 and 1637”，in W.C.Scoville and J.C.LaForce（eds），*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urope*，pp.144-5。

贪婪鬼的困境：Posthumous，“Di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p.33-9。

亨里克斯·蒙廷：Abraham Munting，*Naauwkeurige Beschryving der Aardgewassen*，p.911；*Nieuw Nederlandsch Biographisch Woordenboek* vol.VI，pp.1044-5；W.S.Murray，“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ulip，and the tulipomania”，p.29。

格特伊特·舒特：Posthumous，“Di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p.48-9。

“According to one contemporary…”：这里指的是亚伯拉罕·蒙廷，他是格罗宁根的亨里克斯·蒙廷的儿子，他的价格数据出现于*Naauwkeurige Beschryving der Aardgewassen*，p.910。

1637年5月的价格情况：这些例子来自*Samenspraecken*，因此应谨慎使用。Posthumo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p.80-1&n。

“Some florists did travel…”：小说中的贪婪鬼就是这样的例子。Posthumo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6），p.24。

门诺婚礼：同上，（1934），p.233-4。

范盖克：同上，p.235。

范戈延：Krelage，pp.65-6；A.van Damme *Aanteekeningen Betreffende de Geschiedenis der Bloembollen*，pp.21-2；C.Vogelaar，*Jan van Goyen*，pp.13-20。

格里特·阿姆斯特丹：Posthumo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81。

威廉·罗利森：Van Damme，pp.94-7。

博尔滕和彼得·范威尔森：Posthumo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53-5。

扬·奎克尔在阿尔克马尔：Municipal Archives，Haarlem，Notarial Registers vol.149 fol.210，1 September 1639。

扬·阿德莫里尔：Posthumo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p.69-70；（1934），pp.236-7。

乌特勒支会议：Krelage，p.81。

阿姆斯特丹会议：Posthumo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49；Krelage，pp.83-4；Joseph Bulgatz，*Ponzi Schemes*，*Invaders from Mars*，p.103。

“An ominous caveat…”：对比Wilfrid Blunt，*Tulipomania*，p.16。

13 娼妓女神

关于荷兰的郁金香小册子，参考E.H.Drelage，*De Pamfletten van den Tulpennwindhandel 1636-1637*，其中包含了除已经由Posthumous于1926

年发表在*Economisch-historisch jaarboek* 上的*Samenspraecken* 之外所有已知的作品。各种关于郁金香狂热的阴谋论，参考Krelage，“Het manuscript over den tulpenwindhandel uit de verzameling Meulman”。关于清算，参考Posthum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 in de Jaren 1636 en 1637”，这是关于当时资料整理的合集，共三部分，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杜普博士：T.Beijier et al，*Nicolaes Tulp.Leven en Werk van een Amsterdamse Geneesheer en Magistraat* ，pp.15-19，49-51；E.Griffey，“What’s in a name？Forging and identity：portrits of Nicholaes Tulp（1593-1674）” in Dutch Crossing 21（1997），pp.3-43；Geoffrey Cotterell，*Amsterdam*：*The Life of a City* ，pp.125-6；Simon 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pp.171，186-7。

阿多夫·福斯蒂斯：关于福斯蒂斯憎恨郁金香的故事有其他几个作者也转述过。尽管并没有什么权威意见能确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见Wilfrid Blunt，*Tulipomania* ，p.15，and Zbigniew Herbert，*Still Life with a Bridle* ，p.60。关于福斯蒂斯本人，见William Brereton，*Travels in Holland the United Provinces etc… 1634-1635* ，pp.40-1。福斯蒂斯的父亲是莱顿的一位教授，还在克劳修斯的葬礼上致过悼词，*Nieuwe Nederlandsche Biographisch Woordenboek* ，vol.IV，p.1411。

“呆子”：Joseph Bulgatz，*Ponzi Schemes*，*Invaders from Mars* ，p.99。

“A steady stream of broadsides”：在1636年12月到1637年3月之间发表的各种抨击作品中，有大约45个留存下来，考虑到此类作品难以保存的属性，能够保存至今就能说明当时的印刷数量肯定是相当大的。

小册子的作用：尽管留存下来的这些抨击作品大多称不上原创、内

容也是老生常谈，但实际上还是很能够揭示真相的。尤其是与相对温和的早期小册子相比，到1637年1月狂热最高峰时期出版的作品则越来越偏向尖锐的讽刺。这种变化是相当有启发性的，它说明直到1636年底，郁金香交易还是维持在较为清醒和负责的层面的，只是在1636年底的几周之内才升级为郁金香狂热。关于小册子的概述，见E.Craig Harline，*Pamphlets*，*Printing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Dutch Republic* and Tessa Watt，*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1550-1640*，pp.264-6。

鉴赏家和种植者委托印刷的小册子：对比Krelage的小册子第9、14、33和36号。

小册子中的花神：Krelage，*Pamfletten*，pp.88-91，109-11，149，160，164-7，187-8。

花神的传说：在Samenspraecken tussche Waermondt ende Gaergoedt中第一次谈话里讲述了花神的传说。见Posthumo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6），p.24。另见Sam Segal and Michiel Roding，*De Tulp en de Kunst*，p.23 and Segal，*Tulips Portrayed*，p.15。

关于郁金香狂热的艺术描述：Segal，pp.12-15；Schama，pp.363-6；Bulgatz，pp.106-7。

Resolutions of Haarlem City Council Aanteekeningen van C.J.Gonnet Betreffende de Dovestalmanege in de Grote Houststraat，*de Schouwburg op het Houtplein*，*het Stadhuis in de Farse Tijd*，*Haarlemse Plateelbakkers en Plateelbakkerijen en de Tulpomanie van 1637-1912*，Municipal Archives，Haarlem；Posthum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p.51，57；Krelage，*Bloemenspeculatie in Nederland*，p.93.

霍伦向荷兰省政府请愿：Posthumus，同上，p.52。

“Only two of the 44…”：这两个人是市长扬·德沃尔和议员科内利斯·居尔登维根。Posthumus，同上，pp.61-4，73-4。*Heerenboek* I，Municipal Archives，Haarlem。

“One anonymous pamphleteer…” Krelage，“Het manuscript over den tulpenwindhandel”，pp.29-30.

对破产者的指责：*Jews and Mennonites*，同上；A.T.van Deursen，*Plain Lives in a Golden Age*，pp.32-3；Krelage，*Pamfletten*，pp.287-302。

雅克·德·克勒齐：感谢阿姆斯特丹的Daan de Clercq博士提供的信息。

“A grower from Amsterdam…” Krelage，“Het manuscript over den tulpenwindhandel”，pp.29-30.

扬·布罗海尔：Wilfrid Blunt and William Stearn，*The Art of Botanical Illustration*，p.128。

荷兰省法院及政府决议：Posthum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p.56-60；Posthumus，“The tulip mania in Holland in the years 1636 and 1637”，p.146；Krelage，*Bloemenspeculatie in Nederland*，p.93；Bulgatz，pp.104-5。

如果荷兰省法院当真受理过郁金香案件的话，那么就是以下这个案例。帕卢斯·范·布里斯泰恩（Paulus van Bresteyn）曾经是哈勒姆最杰出的法务官之一。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有钱有势，尽管公开宣称信仰天主教，仍然成了哈勒姆的执政官，同时还是公民卫队的中尉和拉丁学校的校长，专门培养准备上大学的统治阶级的子弟。范·布里斯泰恩非常富有，他的总资产超过12000荷兰盾，而且他还投资了哈勒姆的一些地

产。他对郁金香也很有兴趣，但更应算是个鉴赏家而非花商。他住在Wijngaerderstraat街的一栋大房子里，还在贯穿城市两座大门的Dijcklaan路上的私人花园里种植郁金香。这个案件的原告方是范·布里斯泰恩的遗孀。

范·布里斯泰恩去世时只有48岁，当时正是郁金香狂热的顶峰时期，也就是1936年12月，即价格暴跌两个月之前。在他去世八周之前，范·布里斯泰恩将自己花园中6个花圃的郁金香卖给了一个当地的书商集团，托伊尼斯·卡斯（Theunis Cas）和扬·泽尔（Jan Sael）。这笔交易是在9月29日达成的，当时球根价格还没有出现疯狂的上涨。书商集团买下6个花圃总共才花了312荷兰盾，附赠一套自己书店里的地图集。不久之后，范·布里斯泰恩将刨除已出售的6个花圃之外的整个花园卖给了当地一个名叫尼古拉斯·范·德·伯格（Nicolaes van der Berge）的漂洗工。之后漂洗工又找到书商，表示愿意支付362荷兰盾买下他们已经买走的6个花圃。协议内容是漂洗工支付书商集团50荷兰盾的定金，同时替他们向范·布里斯泰恩支付312荷兰盾的价款。到了2月6日，就是哈勒姆郁金香价格暴跌的第二天，卡斯和泽尔到当地公证处确认他们继续履行原有协议的意愿，声明郁金香在荷兰省其他地区的价格依然很高，而且漂洗工在夏天球根出土的时候就已经实际占有了所有球根，却没有如约替他们向卖家支付欠款。最终范·布里斯泰恩家族采取了行动，将漂洗工和书商集团都告上了法庭。

为什么那么多关于郁金香的案例中只有这一个被受理，原因并不为人知，但是这个案例确实有几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它显示出判断狂热时期交易的郁金香球根的所有权有多么困难，即便是如这个案例这样关系链较短、来龙去脉也比较清楚的情况。很明显，哪怕只是交易链中短暂的享有所有权的一方也很容易被卷入纠纷和诉讼。这个案例还说明，在酒馆交易销声匿迹了不短的时间之后，富商和鉴赏家仍然视郁金香为拥有升值潜力的投资。Civiele proecsstukken II B 44，records of the Court of

Holland，Algemeen Rijks Archief，The Hague；Index to Heerenboek，p.12，Municipal Archives，Haarlem；Posthum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82；E.A.van Beresteyn and W.F.del Campo Hartman，*Genealogie van het Geslacht van Beresteyn*，pp.133-6，219-22。

荷兰省各城市决议：Posthum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60。

蒙廷：Abraham Munting，*Naauwkeurige Beschryving der Aardgewassen*，p.911。

范·博斯维尔特：Resolution of 5 November 1637，*Aanteekeningen van C.J.Gonnet*，Municipal Arcives，Haarlem；Bulgatz，p.105。

众多无效的合同：Posthum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69。

阿尔克马尔的案例：同上，（1934），p.240。

德·布洛克：同上，（1927），pp.48-9。

亚伯拉罕·德·戈耶尔：同上，pp.65-7。

汉斯·贝尔特：同上，p.76。

阿德莫里尔和德霍格：同上，p.68。

威廉·舍瑙：科斯特虽然在评判郁金香上水平不高，但是他却是个乐观主义者。价格暴跌之后，他依然愿意继续执行原合同条款，并且到5月25日还支付了820荷兰盾的预付款，相当于总价款的12%。可是到了秋天之后，他显然不再认为这是笔划算的交易，开始拖延支付，最终卖

家只好采取法律行动。Posthum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71，79。威廉·舍瑙（1600-1667）生活在哈勒姆的Grote Markt上一栋最著名的大宅De Hoofdwacht里。G.H.Kurtz，“De geschiedenis van ons vereeningsgebouw de Hoofdwacht”，pp.37-8。

哈勒姆的案例：对比Posthum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71.79。

德·克勒齐：同上，pp.77，79。

“朋友制造者”：Brereton，pp.8-9，22；Posthum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27），p.80；*Aanteekeningen van C.J.Gonnet*，Municipal Arcives，Haarlem；Posthum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1934），pp.239-40。

杜波尔登：Posthumus，同上，（1927），p.84-5。

范·戈延的破产：我们不知道范·戈延为什么没有按照对其有利的支付3.5%的方案进行和解，那样的话他只需支付30荷兰盾就可以了。可能海牙的执政者没有如他们哈勒姆的同事们一样建立仲裁小组解决本地纠纷。

14 郁金香国王的宫廷

第三章内容参考的资料对本章也非常有价值，尤其是Philip Manse和Barnette Miller。很意外的是，关于艾哈迈德三世竟然没有什么非常好的传记，但是关于他著名的郁金香节的二手资料却非常丰富，其中最有价值也是最原始的资料要数Arthur Baker，“The cult of the tulip in Turkey”，及Michiel Roding and Hans Theunissen（eds），*The Tulip：A Symbol of Two Nations*。相关历史背景还参考了通史文献如Alan Palmer，*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及专题研究，包括

Lavender Cassels，*The Struggle for the Ottoman Empire*，*1717-1740* 。

穆罕默德四世和郁金香：Palmer，pp.10，14-15，37；Thurhan Baytop，“The tulip in Istanbul during the Ottoman period”，in Roding and Theunissen，pp.50-6；Barnette Miller，*Beyond the Sublime Porte* ，p.124。

疯王易卜拉欣：在他长达八年的统治中，他每个周五都要夺取一名少女的贞操。Palmer，p.19：Norman Penzer，*The Harem* ，pp.188-91。

郁金香时代：Fatma Müge Göçek，*East Encounters West*：*France and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10。

诗人奈迪姆：Palmer，p.36；Andrew Wheatcroft，*The Ottomans* ，pp.77，79；Mansel，p.181。

“execution might after all still be their lot…”：据说当宫廷官员进入鸟笼召唤苏莱曼二世（1687-1691）作为穆罕默德四世的继承人登上王位的时候，新苏丹崩溃地叫喊道：“如果我的死期到了就痛快地告诉我。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牢笼中，已经担惊受怕了40年。我宁愿死个痛快也不想再这样一天天一点点地耗尽生存的愿望。我们每一口呼吸的不是空气，而是惊恐。”Halil Inalcik，*The Ottoman Empire* ，p.60。

苏丹艾哈迈德的郁金香花卉节：Noel Barber，*The Lords of the Golden Horn*：*From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to Kamal Ataturk* ，pp.109-10；Mansel，pp.76-8，180-1；Palmer，pp.37-8；Miller，pp.124-6；Penzer，pp.258-60。

艾哈迈德统治时期人们对郁金香的普遍钟情：Yildiz Demiriz，in *Roding and Theunissen* ，pp.57-8；Baytop，pp.55；Baker，p.235。

18世纪人对完美郁金香的定义：Baytop，p.53；Demiriz，pp.57-8；W.S.Murray，“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ulip，and the tulipomania”，p.20。

奥斯曼帝国官员的鲜花和用郁金香行贿：Mansel，p.182；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p.234。

法兹尔帕夏：Mansel，p.147。

驸马易卜拉欣：Palmer，pp.33-5，38。

幸福的宫殿：同上，p.34；Shaw，p.234；Mansel，pp.180-1；Göçek，pp.51，79；Alexander Pallis，*In the Days of the Janissaries*，p.199。

驸马易卜拉欣和艾哈迈德三世的下台：Palmer，pp.38-9。

马哈茂德一世和郁金香在土耳其的衰落：Barber，p.110；Wheatcroft，pp.80-1。

15 迟来的花期

球根交易后来的历史在现代历史文献中有可靠的记载。风信子交易在E.H.Drelage，*Bloemenspeculatie in Nederland*：*De Tulpomanie van 1636-37 en de Hyacintenhandel 1720-1736* 中有详细的描述。郁金香后来的历史参见 Krelage，*Drie Eeuwen Bloembollenexport* 及Daniel Hall，*The Book of the Tulip*。

郁金香交易的延续：Krelage，*Bloemenspeculatie in Nederland*，pp.97-110；Krelage，*Drie Eeuwen Bloembollenexport*，pp.15-18；Sam Segal，*Tulips Portrayed*，p.17；Peter Mundy，*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vol.4，p.75；Peter Garber，“Tulipmania”，pp.550-3。

艾尔特·许博森：Nicolaas Posthumus，“De speculatie in tulpen in de Jaren 1636 en 1637”（1927），pp.82-3。

哈勒姆成为后来的球根交易中心：Krelage，*Bloemenspeculatie in Nederland*，pp.102-4；*Drie Eeuwen Bloembollenexport*，pp.9-11。

范·奥斯腾和范·坎彭衡量完美的郁金香：Segal p.11中有引用；Hall，pp.48-9。

风信子交易：Krelage，*Bloemenspeculatie in Nederland*，pp.142-96；Krelage，*Drie Eeuwen Bloembollenexport*，pp.13，645-55；Garber，pp.553-4；Joseph Bulgatz，*Ponzi Scheme*，*Invaders from Mars*，pp.109-14。

郁金香近期历史：Krelage，*Drie Eeuwen Bloembollenexport*，pp.15-18。

大丽花热：Bulgatz，pp.108-9。在这一历史时期，也有关于培植蓝色大丽花的传说——其实从植物学角度，是和培植黑色郁金香一样不可能实现。

菖蒲热：Posthumus，“The tulip mania in Holland in the years 1636 and 1637”，p.148。

中国的君子兰热：Burton Malkiel，*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pp.82-3。

可口可乐拍卖：Mark Pendergrast，*For God*，*Country and Coca-Cola*，p.211。

---

[1] 一个弗罗林币等同于一个荷兰盾。

参考文献

1.UNPUBLISHED MATERIAL

Municipal Archives，Haarlem

Notarial registers，vols.120—50

Burial registers，vols.70—6

Index to *Heerenboek*

Manuscript entitled *Aantekeningen van C.J.Gonnet Betreffende de Dovestalmanege in de Grote Houstraat，de Schouwburg op het Houtplein，het Stadhuis in de Frase Tijd，Haarlemse Plateelbakkers en Plateelbakkerijen en de Tulpomanie van 1637—1912*

Stadsbibliotheek，Haarlem

Chrispijn van de Passe，*Een Cort Verhael van den Tulipanen ende haere Oefeninghe ...*（contemporary pamphlet，np，nd）

Municipal Archives，Amsterdam

Burial registers

Algeemen Rijks Archief，The Hague

Records of the Court of Holland

Posthumus Collection，Netherlands Economic History Archive

Copies of unpublished acts relating to the tulip mania from the Notarial Archives of Alkmaar and Leiden

2.PUBLISHED MATERIAL

Aitzema，Lieuwe van *Saken van Staet en Oorlogh* （vol.Ⅱ，1633—44）（The Hague：Johan Veely，Johan Tongerloo & Jasper Doll，1669）

Baker，Arthur‘The cult of the tulip in Turkey’，*Journal of the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September 1931

Barber，Noel *The Lords of the Golden Horn*：*From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to Kamal Ataturk* （London：Macmillan，1973）

Beijer，T.，et al *Nicolaes Tulp. Leven en Werk van een Amsterdamse Geneesheer en Magistraat* （Amsterdam：Six Art Promotion，1991）

Beresteyn，E.A.van and W.F.del Campo Hartman，*Genealogie van het Geslacht van Beresteyn* （The Hague：np，1941 and 1954）

Blunt，Wilfrid *Tulipomania* （London：Penguin，1950）

Blunt，Wilfrid，and William Steam *The Art of Botanical Illustration* （Woodbridge：The Antique Collectors Club，1994）

Boer，H.W.J.de，H.Bruch et al *Adriaan Pauw*（*1585—1653*）**：** *Staatsman en Ambachtsheer* （Heemstede：Vereniging Oud-Heemstede-Bennebroek，1985）

Boxhornius，Marcus Zuerius *Toneel*，*ofte Beschrijvinghe des Landts*，*ende Steden van Hollandt ende West-Vrieslandt*（Amsterdam：Hendrik Hondius，1632）

Brereton，William *Travels in Holland*，*the United Provinces etc...1634—1635*（London：Chetham Society，1844）

Bulgatz，Joseph *Ponzi Schemes*，*Invaders from Mars and More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New York：Harmony，1992）

Carswell，John *The South Sea Bubble*（Stroud：Alan Sutton，1993）

Cassels，Lavender *The Struggle for the Ottoman Empire*，*1717—1740*（London：John Murray，1966）

Cos，P. *Verzameling van een meenigte tulipaanen*，*naar het leven geteekend met hunne naamen*，*en swaarte der bollen*，*zoo als die publicq verkogt zijn*，*te Haarlem in den jaare A.1637*，*door P.Cos*，*bloemist te Haarlem*（Haarlem：np，1637）

Cotterell，Geoffrey *Amsterdam*：*The Life of a City*（Farnborough：D.C.Heath，1973）

Damme，A.van *Aanteekeningen Betreffende de Geschiedenis der Bloembollen*：*Haarlem 1899—1903*（Leiden：Boerhaave，1976）

Deursen，A.T.van *Plain Lives in a Golden Age*：*Popular Culture*，*Religion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Hol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Dijk，W.van *A Treatise on Tulips by Carolus Clusius of Arras*（Haarlem：Enschedé，1951）

Dumas，Alexandre *The Black Tulip*（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Eeghen，I.H.van‘Een oude band met gedichten：Gerret Jansz. Kooch’in *Maandblad Amstelodamum* 53（1966）

Ehrenberg，R. *Grosse Vermögen*（Jena：Gustav Fischer，1925）

Evelyn，John *The Diary of John Evelyn*，Ⅱ，Kalendarium 1620—1649（Oxford：Clarendon Press，1955）

Fischer，Hans *Conrad Gesner 1516—1565. Leben und Werk*（Zürich：Leemann，1966）

Garber，Peter M.‘Tulipmani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Ⅰ），June 1989，pp.535—60

Gelder de Neufville，D.M.van‘De oudste generatics van het geslacht de Neufville’in *De Nederlandsche Leeuw*（1925）

Geyl，Pieter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1555—1609*（London：Cassell，1988）

Göçek，Fatma Müge *East Encounters West*：*France and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Goodwin，Jason *Lords of the Horizon*：*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London，Chatto & Windus，1998）

Griffey，E.‘What’s in a name？Forging an identity：portraits of Nicholaes Tulp（1593—1674）’in *Dutch Crossing* 21（1997）pp.3—43

Groenveld，S.，E.K.Grootes，J.J.Temminck et al，*Deugd Boven Geweld. Een Geschiedenis van Haarlem 1245—1995*（Hilversum：Verloren，1995）

Hall，A.Daniel *The Book of the Tulip*（London：Martin Hopkinson，1929）

Harline，E.Craig *Pamphlets*，*Printing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Dutch Republic*（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1987）

‘t Hart，Marjolein，Joost Jonker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eds）*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Hensen，A.‘De vereering van St Nicholaas te Amsterdam in den Roomschen tijd’in *Bijdragen voor de Geschiedenis van het Bisdom Haarlem*，43（Haarlem，1925）pp.187—91

Herbert，Zbigniew *Still Life with a Bridle*（London：Jonathan Cape，1993）

Hondius，Petrus *Dapes Inemptae*，*of de Moufe-schans*，*dat is*，*De soeticheydt des buytenlevens*，*vergheselschapt met de boecken*（Leiden：Daniel Roels，1621）

Hunger，F.W.T. *Charles d’Escluse*（*Carolus Clusius*），*Nederlandsche Kruidkundige 1526—1609*，2 vols（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27 and 1943）

Inalcik，Halil *The Ottoman Empire*：*The Classical Age 1300—1600*（London：Phoenix，1994）

Israel，Jonathan *The Dutch Republic*：*Its Rise*，*Greatness and Fall*，*1477—1806*（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Jacob，Joseph *Tulips*（London：J.C. & E.C.Jaek，1912）

Kindleberger，Charles *Manias*，*Panics and Crashes*：*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New York：John Wiley，1996）

Krelage，E.H. *Bloemenspeculatie in Nederland*：*De Tulpomanie van 1636—37 en de Hyacintenhandel 1720—36*（Amsterdam：Kampen，1942）

——*De Pamfletten van den Tulpenwindhandel 1636—1637*（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42）

——‘Het manuscript over den tulpenwindhandel uit de verzameling Meulman’，*Economisch-Historisch Jaarboek* ⅩⅫ（1943）

——*Drie Eeuwen Bloembollenexport*（The Hague：Rijksuitgeverij，1946）

Kurtz，G.H.‘De geschiedenis van ons vereenigingsgebouw de Hoofdwacht’in *Jaarboek Haarlem*（1942）pp.32—52.

——‘Twee oude patriciërshuizen in de Kruisstraat’in *Jaarboek Haarlem*（1961）pp.112—42.

Leonhardt，G. *Het Huis Bartolotti en zijn Bewoners*（Amsterdam：Meulenhoff，1979）

Lesger，C. and L.Noordegraaf（eds）*Entrepreneurs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Modern Times*：*Merchants and Industrialists Within the Orbit of the Dutch Staple Market*（The Hague，1995）

Mackay，Charles *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Ware：Wordsworth Editions，1995）

Malcolm，Noel *Kosovo*：*A Short History*（London：Macmillan，1998）

Malkiel，Burton *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New York：W.W.Norton，1996）

Mansel，Philip *Constantinople*：*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1453—1924*（London：John Murray，1995）

Martels，Z.R.M.W.von *Augerius Gislenius Busbequius*：*Leven en Werk van de Keizerlijke Gezant aan het hof van Süleyman de Grote*（University of Groningen，1989）

Mather，John *Economic Production of Tulips and Daffodils*（London：Collingridge，1961）

Miller，Barnette *Beyond the Sublime Porte*：*The Grand Seraglio of Stambul*（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

Moryson，Fynes *An Itinerary Containing His Ten Yeeres Travell Through the Twelve Dominions of Germany*，*Bohmerland*，*Sweitzerland*，*Netherland*，*Denmarke*，*Poland*，*Italy*，*Turkey*，*France*，*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4 vols，Glasgow：James MacLehose & Sons，1907）

Mundy，Peter *The Travels of Peter Muundy* （4 vols，London：Hakluyt Society，1907—24）

Munting，Abraham *Waare Oeffening der Planten* （Amsterdam：Hendrik Rintjes，1671）

——*Naauwkeurige Beschryving der Aardgewassen* （Leiden：Pietre Van der Aa，1696）

Murray，W.S.‘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ulip，and the tulipomania’，*Journal of the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March 1909 pp.18—30.

Nieuw Nederlandsch Biographisch Woordenboek vols Ⅳ，Ⅴ，Ⅵ，Ⅶ（Leiden：A.W.Sijthoff，1918，1921，1924，1930）

Norwich，John Julius *Byzantium*：*The Decline and Fall* （London：Viking，1995）

Pallis，Alexander *In the Days of the Janissaries*：*Old Turkish Life as Depicted in the‘Travel-Book’of Evliyá Chelebí* （London：Hutchinson，1951）

Palmer，Ala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London：John Murray，1992）

Parker，Geoffrey *Europe in Crisis 1598—1648* （London：Fontana，1979）

Pavord，Anna *The Tulip* （London：Bloomsbury，1998）

Pendergrast，Mark *For God*，*Country and Coca-Cola* （New York：

Touchstone，1997）

Penzer，Norman *The Harem*：*An Account of the Institution as it Existed in the Palace of the Turkish Sultans*，*with a History of the Grand Seraglio from its Foundation to Modern Times* （London：Spring Books，1966）

Polnitz，G.Freiherr von *Die Fugger* （Tübingen：J.C.B.Mohr，1981）

Posthumus，Nicolaas‘De speculatie in tulpen in de jaren 1636 en 1637’parts 1—3，*Economisch-historisch jaarboek* 12（1926）pp.3—99；13（1927）pp.1—85；18（1934）pp.229—40.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Prices in Holland* （2 vols，Leiden：E.J.Brill，1946）

——‘The tulip mania in Holland in the years 1636 and 1637’，in W.C.Scoville and J.C.LaForce（eds），*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urope* vol.Ⅱ（Lexington，Mass.，1969）

Price，J.L.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Dutch Republic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London：B.T.Batsford，1974）

Raaij，H.L.Janssen van *Kroniek der Stad Haarlem van de Vermoedelijke Stichting der Stad tot het Einde van het Jaar 1890* （Haarlem：Loosjes，c.1894）

Regteren Altena，L.Q.van *Jacques de Gheyn*：*Three Generations* vol.1（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83）

Roding，Michiel，and Hans Theunissen（eds），*The Tulip*：*A Symbol of Two Nations*（Utrecht and Istanbul：Turco-Dutch Friendship Association，1993）

Rohde，Eleanour *Crispian Passeus's'Hortus Floridus'*（London，1928—9）

Savage，Spencer'The "Hortus Floridus" of Crispijn van de Pas'，*Transactions of the Bibliographic Society*，Series Ⅱ，4（1923）pp.181—206

——*Hortus Floridus*：*The Four Books of Spring*，*Summer*，*Autumn and Winter Flowers*，*Engraved by Crispin van de Pas*（London：Minerva，c.1974）

Schama，Simon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London：Fontana，1991）

Schloredt，Valerie *A Treasury of Tulips*（London：Michael O'Mara Books，1994）

Schrevelius，Theodorus *Harlemias of Eerste Stichting der Stad Haarlem*（Haarlem：Johannes Marshoorn，1754）

Segal，Sam *Tulips by Anthony Claesz*：*56 Seventeenth-Century Watercolour Drawings by Anthony Claesz*（*ca.1607/8—1648*）（Maastricht：Noortman，1987）

——*Tulips Portrayed*：*The Tulip Trade in Holla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Lisse：Museum voor de Bloembollenstteek，1992）

Segal，Sam and Michiel Roding，*De Tulp en de Kunst. Verhaal van een Symbool* （Zwolle：Waanders，1994）

Shaw，Stanford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m Turkey* （2 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Slikke，C.M.van der *Tulpenteelt op Kleigrond* （Berlikum，1929）

Slogteren，E.van‘Broken tulips’，in *The Daffodil and Tulip Yearbook* （London：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1960）

Solms-Laubach，Hermann，Grafen zu *Weizen und Tulpe und deren Geschichte* （Leipzig：Arthur Felix，1899）

Stoye，John *English Travellers Abroad，1604—1667* （New York：Octagon Books，1968）

Taylor，Paul *Dutch Flower Painting 1600—1720* （London：Hale，1995）

Temminck，J.J.‘Naar haer spraecke gebooren van Amsterdam. Enkele gegevens over de relatie tussed Haarlem en Amsterdam in vroeger eeuwen’，in *Jaarboek Haarlem* （1981）pp.43—67.

Temminck，J.J.et al *Haarlemmerhout 400 Jaar.‘Mooier is de Wereld Nergens.’*（Haarlem：Schuyt & Co.，1984）

Temple，William *Observations Upon the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

Theunisz，Johan *Carolus Clusius*：*Het Merkwaardige Leven van een Pionier der Wetenschap* （Amsterdam：P.N.Van Kampen & Zoon，1939）

Vogelaar，*C.Jan van Goyen* （Zwolle：Waanders，1996）

Vries，Jan de *The Dutch Rural Economy in the Golden Age*，*1500—1700*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4）

Vries，Jan de，and Ad van der Woude，*The First Modern Economy*：*Success*，*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81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Wassenaer，Nicolaes Jansz. van *Historisch Verhael aller Gedencwaerdiger Gheschiedenissen* ，Ⅴ—Ⅸ（Amsterdam：Iudocus Hondius and Jan Jansen，1624—5）

Watt，Tessa *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1550—164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Weider，E.C.‘De pamflettenverzameling van den Amsterdammer Abraham de Goyer van 1616’，in *Het Boek* 6（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17）

Werner，J.W.K. *Haarlemmermeer. 17e en 18e Eeuwse Voorstellen tot Droogmaking* （Amsterdam：np，1985）

Wheatcroft，Andrew *The Ottomans*：*Dissolving Images* （London：Penguin，1993）

Whiteway，R.S. *The Rise of Portuguese Power in India 1497—1550* （London：Archibald Constable，1899）

Wijnands，O.‘Tulpen naar Amsterdam：plantenverkeer tussen Nederland en Turkije’，in H.Theunissen，A.Abelman and

W.Meulenkamp，*Topkapi en Turkomanie*：*Turks-Nederlandse Ontmoetingen Sinds 1600* （Amsterdam：De Bataafsche Leeuw，1989）

Zumthor，Paul *Daily Life in Rembrandt’s Holland*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62）

致谢

在创作这本作品期间，有许多人需要感谢，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莫过于我不知疲倦的研究助理、阿姆斯特丹的亨克·鲁伊斯泰恩博士（drs Henk Looijesteijn）。他既是一位近代史专家，又是一个历史久远的球根种植者家庭的后代，没有谁能比鲁伊斯泰恩博士更好地帮助我在哈勒姆、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的档案馆中查询资料，并指引我研读大量关于这一题材的荷兰语作品。没有他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创作。

我能有幸认识鲁伊斯泰恩博士是通过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亨克·范·尼罗普（Henk van Nierop）介绍。他本人也是当代卓越的历史学家之一。其他给我提供了帮助的荷兰同事还包括亚普·鲁伊斯泰恩（Jaap Looijesteijn），球根种植者布里灿德（Breezand）和阿姆斯特丹的达恩·德·克勒齐博士（drs Daan de Clercq），克勒齐博士与我分享了有关他的祖先雅克·德·克勒齐的信息。

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经纪人帕特里克·沃尔什（Patrick Walsh），我的编辑莎拉·霍洛韦（Sara Holloway），是他们在我兴起这一创作念头的初期，给予我信心和帮助。还要感谢蒂娜·沃尔什（Tina Walsh）帮助我翻译了一些难懂的荷兰语古老文件。为了完成这本书，最辛苦最劳累的人是我的妻子彭妮（Penny），衷心感谢我的挚爱。这本书是我们共同的成果。

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bode of Bliss *see Topkapi*

Acxel，Liebert van 221

Admirael，Jan 139，198，221—2，224

Ahmed Ⅰ，sultan 230—1

Ahmed Ⅲ，sultan 231—41，245

Aitzema，Lieuwe van 148，182

Alaeddin Kaikubad Ⅰ，sultan 10

Alphen 86

Alkmaar 129，138，177，196，220

description of 169

soil of 79

tulip auction at 1—3，171—5，181—2，190，196，259，271，274

liquidation of mania in 220

Amsterdam ⅹⅸ，61，77，80，98，110，117，125，127，139，147，179，194，200，220—2，267

Bank of 276

gardens of 80

growers of tulips meet in 198—202

growth of 80—1

immigrants to 77

perseverance of tulip trade in 194—5

property prices in 175

scale of tulip trade in 179—83

stock markets of 133，150—2

street lighting in 273

taverns of 153—4，272

Amsterdam，Gerrit 196，276

Anatolia 9

Antwerp 41—2，55，80，84

apothecaries 46，60，61，87，98—9，129，275

Augsburg 37—9，263

Babur（Mogul Emperor）12，32

Baert，Hans 221—2

Bakker，Barent 120

bankrupts 211—14

Bartolotti，Guillelmo 79—80

Baudartius，Willem 116

Bayezid Ⅰ，sultan 230

　wears tulip shirt 15—16，261

　used as footstool by Tamerlane the Great 17

Beresteyn，Paulus van 79，278—9

Berge，Nicolaes van de 279

Bergom，Hendrick van 221

Bertens，Jacques 243

Block，Jacob de 191，217

Blokker（village）173

Bloem，Matthijs 141

Bloemendaal（bulb-growing area）253

Boëlius，Guilielmus 98

Bol，Cornelis 141

Bol，Pieter 100，101

Bolt，Jan 251

booms *see also Florida Land Boom*，*bubbles*

defined 247n

Boortens，Dirck 197

Bosch，Gerrit 138

Bosscher，Andries de 194

bostancis （Ottoman gardeners）28—9

employed as royal executioners 28，239—40

Bosvelt，Adriaen van 219

Brancion，Jean de 46，74

Brants，Jan 129

Brereton，Sir William 86，88，117—18，156，159，223

Brueghel，Jan，the Younger 209

Brill 55

Brimeu，Marie de 47，52，74

Brussels 97

bubbles *see also booms*

defined ⅹⅸ，247n

Busbecq，Ogier Ghislain de 34—6，50，262

Byzantine Empire 9—10，17—18

Cage，the 231，240，242

Caluwaert，Pieter 222

canals 155，247n

Cardoes，Barent 100，199，268

carnations 27，90

Cas，Theunis 279

Casteleijn，Jan 176

Cats，Jacob 85—6

Ceylon 32

Changchun（Manchurian city）255—6

Chardin，Sir John（Jean），Huguenot traveller 9

Charles，Margrave of Baden-Durlach 245—6

China

tulips in 6—8

spider，lily mania in 255

Clerq，Jacques de 215—16，222

clocks，boom in 247n

Clusius，Carolus（Charles de L’Escluse）40，43—53，57—63，68—72，73，74，97—8，103，130，248，263—4

Cluyt，Dirck 60

Coca-Cola，high prices paid for 256n

colleges（Dutch tulip-dealing clubs）*see also taverns* 146，152，157—64，183—4，188—9，190，194

companies，for tulip-trading 141

Constantinople *see Istanbul*

Coopall，Jan 141

Costa，Francisco da 101，198，216，268

Court of Holland 213，217—18，225，278

Creitser，Marten 139—40，146，272，

Crete 64

crocus，festivals celebrating 260

Cruys，Pieter van de 194

cultivars *see tulips*，*varieties of*

Cunha，Nunho da 31—2，262

Cuyck，Joost van 194

dahlias 254—5，282

Damat Ibrahim，Grand Vizier 237—40

tulip festivals of 238—9

ritually strangled by gardeners 240

Damme，A.van 259

Damme，Jan van 101，138

Delft 60，129

Dodoens，Rembert 262

Dubbelden，Bruyn den 225

Ducens，Aert 145

Dumas，Alexandre 184

Dutch *see also Golden Age*，*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artisan class 111—20

attitudes to money and wealth 119—21

clothing 82—3

country houses of 84—8

criteria for assessing tulips 246—7

drinking habits of 158—9，274

food of 112

homes of 114—15

knife fights among 158，274

national character of ⅹⅶ，ⅹⅸ，215

painting and 84，158

passion for gambling among 120

regent class 79—88

and smoking 157—8

trade and wealth of 81—8

wages and earnings of 113—17，119

working day of 111—13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138，183

Dutch Republic *see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Dutch Revolt 53—7，80，127

East Indies 126，138

Emanuel，Prince of Portugal 61

England，tulips in 39，74，247，254

engravings，inspired by tulip mania 207—9

Enkhuizen 129，169

L’Esduse，Charles de *see Clusius*

Escluse，Mathieu d’263

Fazil Pasha，Grand Vizier

delusions of，concerning flies 237

Flora（goddess）205—6

Florida Land Boom 247—8n

Flory，Anthony van 146

Flushing 55

Fort，Marten de 130

France 116

craze for dahlias 254—5

as home of Semper Augustus 92—3

tulips in 39，75—6，179，247

Frankfurt 39，46，52，102

friend-makers（Dutch arbitrators）223—4

Fugger family 39，263

Gaergoedt（tulip trader）*see Samenspraecken*

gardeners，professional *see growers*

gardens *see also Amsterdam*，*Haarlem*，*Topkapi*

Dutch 117—18

European 36—7

Leiden *hortus* 59—60，205

the Lord Offerbeake’s 86

at the Moufe-schans 87

Turkish 11—12，19—21，26—7

Vienna *hortus* 48—51

Garret，James 39—40，74

Gerard，John 39—40

Gennep，Bartholomeus van 178—9

Gesner，Conrad 37—8，262

Gheest，Jacob van der 196

Gheyn，Jacques de 79

gladioli，craze for 255

Goa 31—2

Golden Age，Dutch ⅹⅸ，83—4，113，116，209，

Gouda 96，125，129，180，208，219

Goyen，Jan van 195，226—7，280

Goyer，Abraham de 147，221，222

Grebber，Frans 181

Groningen 77，179，190，275

growers 96—7，99—102，128，198—9，243

Guldewagen，Cornelis 146，272，278

Haarlem 95—6，101，117，129，138，141，145，146，178—9，181，190，194，197，212—13，219，220，221—2，223，250，267，273—4，279

bleaching in 156

brewing in 156，159—60

as centre of tulip trade after mania 250

crash of prices in 187—8

description of 153—7

economy of 127—8，156

environs of 84，155

gallows and gibbets of 89，156

gardens of 95，99—100，176，279

liquidation of mania in 220

map of ｘｉ

plague in 127—8

scale of tulip trade in 182

soil of 79，99

tavern colleges of 157—8，184，208，273—3

Haarlemmermeer 155

Habsburg Netherlands *see Southern Netherlands*

Hafiz，Mohammad Shams od-Din Hafez（poet）9

Hague，The 47，74，146，185，195，212—13，252，280

Haji Salih Pasha，Grand Vizier 29n

Halil，Patrona（Albanian second-hand clothes dealer）239

Hals，Frans 84

Harmans，Elisabet 168—70

Hasan Efendi（Dervish preacher）11

Haverbeeck，Joost van 139

Heertgens，Claes 199

Heemskerk（village）196

Heemstede，lordship of 89—91，267

Herwart，Heinrich 37—8，39

Heuvel，Severijn van de 145，272

Hillegom（bulb-growing area）253

Hittites，bulb-festivals of 260

Hoghelande，Johan van 52—3，62

Holland，province of *see also Court of Holland*，*States of Holland* 56，179，180，198，253

Holsteijn，Pieter，the Younger 104

Holy Roman Empire *see also Vienna* 37，44，74，102，111，116

Hondius，Petrus 87—8

Hooge，Paulus de 198，222

Hoorn 122—3，129，169，208，213，219，270

Huybertsz.，Aert 243

hyacinths 27

Dutch craze for 248—52，282

Ibrahim the Mad，sultan 229，281

Ibrahim Pasha Kulliyesi *see Damat Ibrahim*

Islam 11—12，15

Istanbul *see also gardens*，*Topkapi*，*Ottoman Empire* 11，17—18，19—21，24，230，232，240—1

Istanbul，tulips *see tulips*

Italy 38，74

Jacobsz.，Henrick 141

Jansz.，Jeuriaen 146

Jansz.，Philips 141

Jews 215—16

John Innes Horticultural Institution 69—70

Joos（Haarlem apothecary）129

jun zi lan see spider lily

kafes see Cage

Kampen，Nicholas van 246—7

kappists （Dutch tulip maniacs）205

Karlowitz，Peace of（1699）232

Kemp，Willem van de 98

Kennemerland 106

Kentmann，Johann 38

Khayyám，Omar 8—9

Klerck，Philip de 173

Korver，Jan 225

Kosovo，Battle of 14—15

Koster，François ⅹⅴ—ⅹⅵ，222，280

Krelage，E.H.258—9，265，267，270

Kurdistan 63

lale devri see Tulip Era

Lalezari，Seyh Mehmed 235—6

Lazar，Prince 14—15

Leiden 52—6，70，83，98，127

immigrants 77

siege of 56—7

University of 52，57—60，70，205

Leiderdorp（village）84

Leyster，Judith 104

lilionarcissus 37

lilies *see also spider lily* 90

Linnaeus，Carl 48

Lipsius，Justus 70

Lisse（bulb-growing area）253

Lobelius，Mathias 74 265

Louis ⅩⅢ，King of France 75—6

Louis ⅩⅤ，King of France 238

Lourisz.，Willem 196

Lucasz.，Henrick 139

Lycoris radiata see spider lily

Mackay，Charles ⅹⅶ—ⅹⅷ，258

Mahieu，Adries 130

Mahmud Ⅰ，sultan 240

as passionate voyeur 241

Maurice of Nassau，Prince of Orange 88

Maximilian Ⅱ，Holy Roman Emperor 48—9，50

Mechelen 42，46，48

Medemblik 129，180，219

Meer，Jacob van der 196—7

Mehmed Ⅰ the Conqueror，sultan 230

takes Constantinople 18

builds Topkapi Palace 20

disembowels palace gardeners 21

Mehmed Ⅲ，sultan

sexual habits of 228—9

murders siblings 230

Mehmed Ⅳ，sultan 229，231

Mennonites（Anabaptist sect）215—16

Mildt，David de 100，138—9

Monstereul，Charles de la Chesnée 32，73，262

Moufe—schans（country house）87—8，266

Müler（Frankfurt apothecary）46

Mundy，Peter 118，244

Munting，Abraham 75，179，276

Munting，Henricus 190，219，275

Murad Ⅰ，sultan 14—15

Mustafa Ⅰ，sultan

rabid misogyny of 229

deposed and locked in dungeon with two naked women 229

Mustafa Pasha，Grand Admiral 236

executed whilst transplanting tulips 240

narcissus 27

Neufville，Balthasar and Daniël de 95

Nolpe，Pieter 207

Ocksz.，Jan 138

Ogier，Charles 120

Oosting，Henrik von 246n

orphanages，Dutch 172—3

Osman Ⅱ，sultan

killed‘by constriction of the testicles’229

Ottoman Empire *see also gardens*，*Turkish* ⅹⅹ，10—11，13，14—30，49，228—41

clothing in 15—16，22

eunuchs in 234

festivals in 233—4

glassmaking in 29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ulips in 12—13

western visitors to 29—30

Overveen（bulb—growing area）253

Pamir mountains 5—6

pamphlets，concerning tulip mania 205—7，209—12，277

Parkinson，John 40

Passe，Chrispijn van de 103，208

Pauw，Adriaen 82，89—91

Persia，tulips in 8—9，12，24

Philip the Magnanimous，Landgrave of Hesse 44

Philip Ⅱ，King of Spain 54

Pietersz.，Clause *see Tulp*，*Nicolaes*

Pietersz.，Hendrick 178

Poelenburch，Simon van 139

Poppen，Jacob 82

poppy 62

Porret，Christiaan 87，98

Posthumus，Nicolaas 259

Pottebacker，Henrik 96，208

prices ｘiv

of beer 158—9

of paintings 158

payment in kind 144—5

of tulips

（1608）76

（1612）129

（1615）75

（1623）94

（1624）94

（1633）123，147

（1634）138

（1634—5）125

（1636）125，163，184，190

（1637）2—3，125，163，175—8，179，190，191，192，195，197，244

（after mania）242—6

Quaeckel，Cornelis，Sr 221，273

Quaeckel，Cornelis，Jr 154，273，275

Quaeckel，Jan 154，197，273

Quilt，Nicolas le 98

Ravensteyn，Albert van 195，226

Rehdiger，Thomas 48

Rembrandt van Rijn ｘｘ，104，204

rhizotomi （itinerant bulb—collectors）97—9

rich trades 81—2

Roman，Adriaen 143，210

rose 27，90

as‘empress of the garden’75

Rosven，Pieter van 181

Rotterdam 77，129，198

Rousseau，Jean Jacques 255

Rudolf Ⅱ，Holy Roman Emperor 50，79，102

Rye，Joris 42，46，62，74

Sa’adabad（palace）238—9，240

Sa’adi，Musli Addin（poet）8—9

Sael，Jan 279

Samenspraecken（mania pamphlets）142—4，145，148，163，167，182，189，200，210，252，271—2，278

Sampayo，Lopo Vaz *see Vaz*

Sandys，George 35

Schermer polder 126

Schilder，Abraham de 147

Schonaeus，Willem 199，222，280

Schoudt，Geertruyt 191，220

Schrevelius，Theodorus 127—8

Schuppius，J.B.271

Sea Beggars 55，56，80

Seyh Mehmed *see Lalezari*

Selim Ⅱ the Sot，sultan 24

Seljuks *see Turks*

Serbia 14—15

Serlippens，Johan 87

Seyhulislam Ebusuud Efendi 23

Sloting，W.J.199

South Sea Bubble ⅹⅷ—ⅹⅰⅹ

Southern Netherlands 53—4

tulips in 41—3，77

spider lily，craze for 255—7

States of Holland 212—13，218—20

Steen，Abraham van der 120

Steyn，Augustijn 129

Streeck，the（bulb—growing area）199

Suleyman Ⅰ the Magnificent，sultan 28，49，230

as‘possessor of men’s necks’21

Suleyman Ⅱ，sultan

terrorised by fear of execution 281

Swalmius，Henricus 181

Swanenburch，Jacob van 104

Sweerts，Emanuel 102—3

Sweerts，François 199

Tamerlane，nomad warlord 16—17

taverns *see also colleges* 2，152—4，157—61，163，272—3

tea 204

Temple，Sir William 110—11，119，269

Tien—shan mountains 5—6，7—8，260

Topkapi palace *see also Cage*；*gardens*，*Turkish* 24—9，229，231，232，233，239，261

prunes supplied to 28

severed tongues occasionally displayed in 25

Tulckens，Wouter 181

tulip books 103—5，174，178，268—9

Tulip Era 232，241

tulip festivals 234，238，241

tulip mania *see also tulips*，*prices*

origins of 122—31

heavy involvement of weavers in 118，127，142—4，206，208，271

at peak 178—9

scale of，assessed 180—3

regional nature of 194—5

collapse of 188—98

liquidation of 211—26

tulip thieves 50—1，70—1

tulips *see also colleges*，*prices*

in America 260

as aphrodisiac 99，268

Bizarden varieties 67，97，105，107，124，265

black 184—5

botany of 63—71

broken 68—70，253—4

bulbs of *see also tulips*，*offsets of* 64—5，68

bybloemen varieties 265

colours of 5，15，38，62，66—79，92，97，142

control of prices of，in Ottoman Empire 235

Couleren varieties 66

creation of new varieties 23—4，106—7

Darwin varieties 253

disease *see tulips*，*Mosaic virus in*

distribution of 8—9，23—4

diversity of 62，235

Ducken varieties 67

exports of，from United Provinces 100—1，235，243，245，268

history of，after mania 242—7，252—5

introduced to Europe 29—30，32—6，41—3，73—5

Istanbul tulips 23—4，234—6，261

Lacken varieties *see also tulips*，*Violetten varieties* 67

Marquetrinen varieties 66—7

methods of buying and selling 129—40，160—1，163—7，271

Mosaic virus in 68—70，253—4

Muslims and 11—12

name 36—7

offsets of *see also tulips*，*bulbs of* 64，130—1，146

origins of 5—8

as piece—goods 142，176

as pound-goods 160—2，185—6，192，193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ｘｘ，11—12，73，260

Rosen varieties of 66，76，95，96，105—6，107，126，139，147，265

‘rude’specimens 91

scarcity of 90—1，95

seed of 64—5，92

species of 6，63

T.australis 33

T.clusiana 63

T.gesneriana 263

tulips—*contd*

species of—*contd*

T.praecox 63

T.schrenkii 63

T.silvestris 33，263

T.suavenolens 263

T.turcarum 38，263

‘sports’（mutations）38

‘superbly fine’specimens 67，91，141

taste of 46

value of，in gold 2，259

variable costs of，in different parts of United Provinces 140

varieties of 73—4，100，105—8

Admirael 106

Admirael der Admiraelen 107

Admirael van der Eijck 106，126，138，140，171，178，244

Admirael van Engeland 147，184

Admirael van Enkhuizen 106，171，175

Admirael van Hoorn 184，208

Admirael Krijntje 106

Admirael Liefkens 106，138，146，176，178，221

Admirael de Man 124

Admiral Pottebacker 96

Alexander Magnus 107

Anvers Bol 100

Anvers Vestus 196

Boterman 176

Brabanson 171，175

Bruyn Purper 171，176，221

Centen 179，181

De Beste Juri 221

Delicate Coquette 229

Diamond’s Envy 23

Generael 106

Generael Bol 208

Generael der Generaelen *see Gouda*

Generael van der Eijck 106

Generalissimo 107，124

Genten 145

Gevlamde Nieulant 179

Gevleugelde Coornhart 179

Gheele Croonen 145，162，225

Gheel en root *see Root en Gheel*

Gouda 125，134—5，138，140，171，178，208，270

Le Grand 179

Groote Gepumaseerde 221

Increaser of Pleasure 23

Instiller of Passion 23

Jufferkens van Marten de Fort 93

Kistemaecker 179

Lack van Quaeckel 154

Lack van Rhijn 142

Late Bleyenburch 221

Light of Paradise，The 23

Marriage de Ma Fille 76

Matchless Pearl，The 23

Maxen 222

Mère Brune 76

Mervelye van Quaeckel 154

Motarum van Chasteleyn 93

de Novil 268

Oudenaer 142，179，221，222

Paragon da Costa 101

Paragon van Delft 140，176

Paragon Liefkens 138

Paragon Schilder 147，171

Paragon Viceroy da Costa 101

Parem Augusto 93

Pomegranate Lance 229

Porsmaecker 222

Pottebacker gevlamt 96

Purper en Wit van Quaeckel 221

Roote en Gheel van Leyde 97，124，181

Rose of the Dawn 23

Rotgans 142，176，244

Saeyblom van Coningh 139

Scipio 107，176

Semper Augustus 92—5，124，125，175，184，208，256，267

Switser 163，179，187，191，194，220，222，226

Testament Clusii 93

Testament Coornhert 93

Verbeterde Boterman 196

Viceroy 97，138，147，171，176，208，253，259，

Witte Croonen 145，148，187，222，244

Violetten varieties 66，95，97，105，107，139，147，221，265

vodderij 162，192，216

wijnkoopsgeld and 164，167，

wild 12，23，63

Tulp，Nicolaes 203—5

Turkey *see Ottoman Empire*

Turks

criteria for assessing tulips 235—6

early passion for tulips 7—8

and flowers in Istanbul 19—21

political system of 229—31，239—41

Seljuk tribe of，and tulip 9—10

Tyberius，Wilhelmus 224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see also Dutch* ｘix，ｘｘ—ｘｘｉ，53—4，57，72，76，77—86，88，96，113—14，119，122，124，178，179，194，244，269

geography of 110—11，269

government of 133

impact of tulipomania upon 224—5

literacy in 210

lotteries in 120

society of xvi—xvii，110—21，169

wars with Spain *see Dutch Revolt*

wealth of 78—84，125，131—3

Usselincx，Willem 120

Utrecht 98，129，179，198，275

Vaert，Egbert van der 249

Vaz，Lopo 31—3

Vecht，River 83

Vega，Joseph de la 151，273

Velius，Theodorus 123

Verbeeck，B.J.221

Verroustraeten，Roeland 141

Versluys，Abraham 179

Verwer，Comelis 181

Vianen 100

Vienna 39，48—51

Villeneuve，Jean Sauvent de 237—8

Voorhelm，Joris 250

Voorhelm，Pieter 249—50

Vorstius，Adolphus 205，277

Waal，Jan de 278

Wachtendonck，Abraham 221

Waermondt *see Samenspraecken*

Wall Street Crash 191—2

Wassnaer，Nicolaes van 92—4，266

weavers *see tulip mania*

Welsen，Pieter van 197，275

West Friesland 122—3，179，199

Willemsz.，Pieter 174

Willemsz.，Willem 221

William the Silent，Prince of Orange 55

windhandel （futures trade in bulbs）132，196

Winkel，Claes 170

Winkel，Lauris 168，173

Winkel，Wouter 168—72，274—5

orphans of 172—4，177，196

Wynants，Henrick 190—1

Wynants，Pieter 190—1

Yakub，Prince 16

Zeeland 55，56

Ziwertsz.，Walich 61—2，91

Zuyder Zee 110，120，122，16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郁金香热/（英）达什（Dash，M.）著；冯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097-5888-5

Ⅰ.①郁… Ⅱ.①达…②冯… Ⅲ.①荷兰-历史-通俗读物 Ⅳ.①K56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7167号

郁金香热

著者/〔英〕迈克·达什（Mike Dash）

译者/冯璇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董风云 段其刚

责任编辑/段其刚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1.375 插页：0.5 字数：202千字

版次/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5888-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7068号

定价/4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达什）凭借其讲故事一般的生动文笔，让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喧哗燥热、烟雾缭绕的哈勒姆酒馆……本书无愧于对郁金香这种非凡花朵的一次华丽的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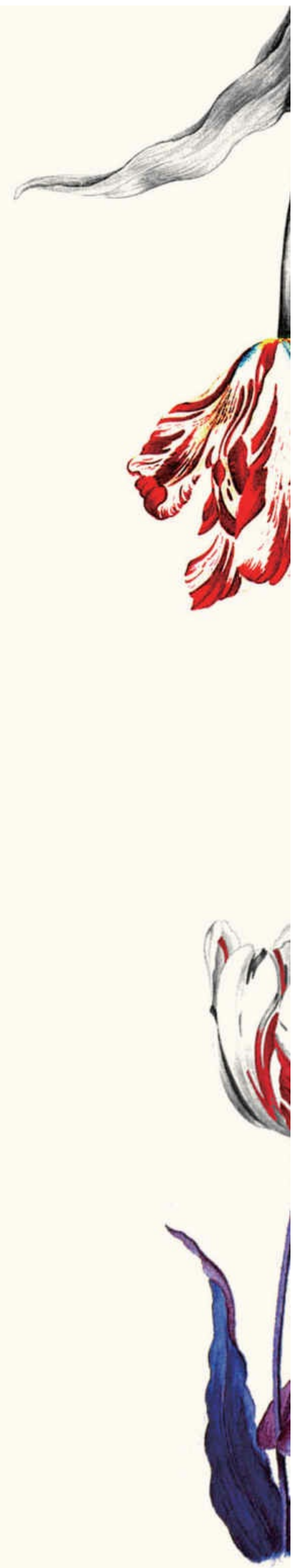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一次对人性中的贪婪无度和自欺妄想的迷人探索，同时也为人们永无止境地追求美好事物而致敬。一部让人不忍释卷的作品。

——德博拉·莫盖茨

扣人心弦……丰富有趣的细节描写。

——《卫报》



出版社官方微信

甲骨文官方微信

甲骨文官方微博

ISBN 978-7-5097-5888-5

9 787509 758885

ISBN 978-7-5097-5888-5

定价：49.00 元

www.ssap.com.cn

A Mad Catastrophe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 the Collapse of the Habsburg Empire

哈布斯堡的灭亡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

〔美〕杰弗里·瓦夫罗／著
（Geoffrey Wawro）
黄中宪／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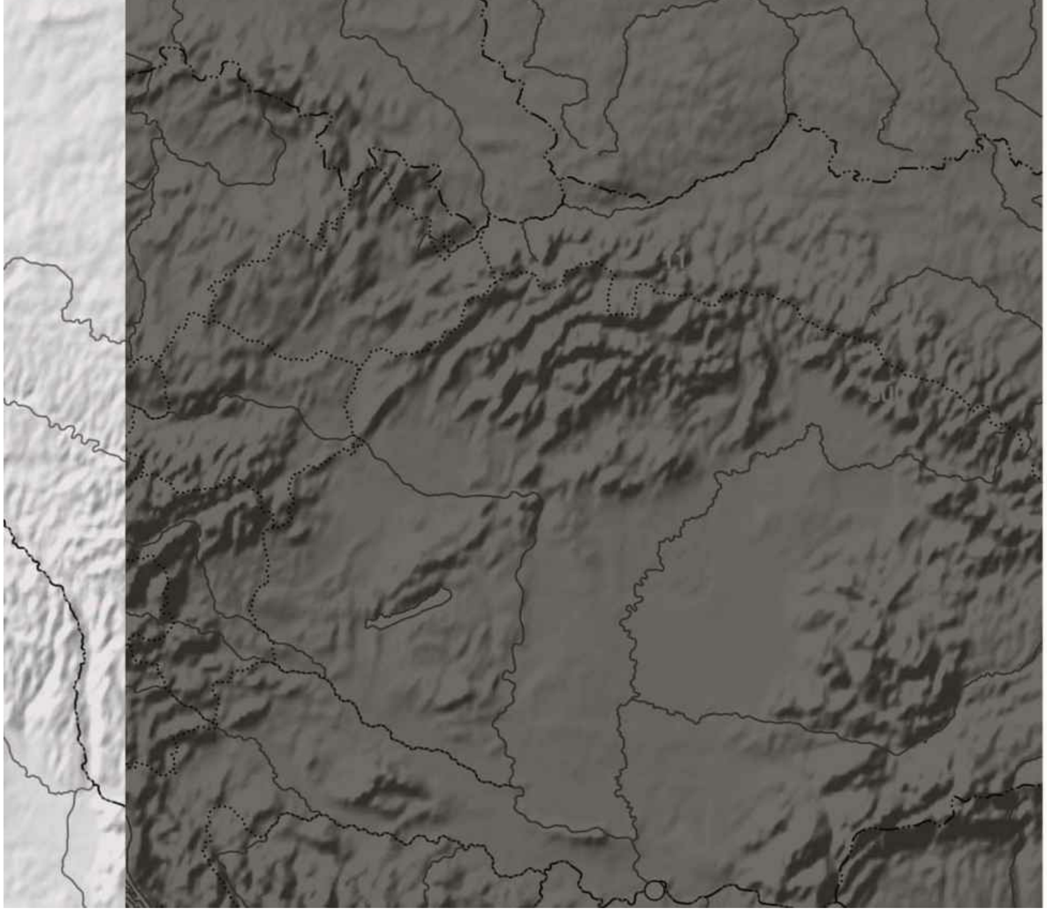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杰弗里·瓦夫罗（Geoffrey Wawro）（1960—）

/ 毕业于耶鲁大学，目前担任北德州大学军事史中心主任，同时在“历史频道”主持 History's Business（讨论企业的历史）和 History vs. Hollywood（讨论历史事实和电影场景之间的差异）等节目。另著有 *Quicksand: America's Pursuit of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和 *The Franco-Prussian*。曾获奥地利文化部颁发奖章，以及军事史学会颁发 Moncado 著作优等奖。/ /

黄中宪 / 译者简介

/ 一九六四年生，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现为专职翻译。译有《天国之秋》《从帝国废墟中崛起》《战后欧洲六十年》《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成吉思汗：现代世界的创造者》《帖木儿之后》《维梅尔的帽子》等。/ /



哈布斯堡的灭亡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

A Mad Catastrophe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Habsburg Empire

〔美〕杰弗里·瓦罗（Geoffrey Wawro）著

黄中宪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录

- 致谢
- 前言
- 导论
- 第一章 欧洲病夫
- 第二章 犯错与愚蠢之间
- 第三章 巴尔干战争
- 第四章 萨拉热窝逞凶
- 第五章 蒸汽压路机
- 第六章 格格不入之人
- 第七章 克拉希尼克
- 第八章 科马鲁夫
- 第九章 伦贝格与拉瓦鲁斯卡
- 第十章 死于德里纳河边
- 第十一章 华沙
- 第十二章 细长的灰线
- 第十三章 以塞尔维亚为献礼
- 第十四章 雪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索引

致谢

一个世纪前，我的奥匈帝国籍祖父母，从加利西亚的塔尔诺波尔（Tarnopol）附近一个到处是尘土的小村子，远渡重洋，登上美国的埃利斯岛（Ellis Island）。当年，大概就是这种令人提不起劲的偏远聚落（我去过那里），使罗思（Roth）或茨威格笔下的维也纳骑兵纵情于饮酒、掷骰子、绝望或三者兼而有之。如果我的祖父母瓦西尔·瓦夫罗（Vasil Wawro）、安娜·瓦夫罗（Anna Wawro），更晚（不管多晚）才愤然离开加利西亚，这两个勤奋的乌克兰农民恐怕已遭第一次世界大战吞噬。瓦西尔将于一九一四年受动员，向奥匈帝国第十五团报到后，大概立即投入惨烈的伦贝格（Lemberg）之役。读过此书后，很难想象这样的他竟能活下来，因为他所属的第三军部署于前头，俄军攻击时首当其冲。俄国的第三、第八集团军于一九一四年八月从安娜的村子一侧通过，安娜当时若还待在那里，即身陷沦陷区。加利西亚自古就是“衣不蔽体、挨饿之国”，粮食始终不足，战时更为短缺。安娜可能会挨饿，或死于战场附近威胁老百姓性命的营地病。本书的灵感大半来自我对祖父母和他们了不起的美国儿子、我的父亲N.威廉·瓦夫罗（N. William Wawro）的记忆。他们已长眠于康涅狄格州某墓地多年，但他们逃亡和在美国奋斗的故事，留给后代子孙许多回忆。

在母亲朱迪丝·瓦夫罗（Judith Stoughton Wawro）九十大寿时，我献上《哈布斯堡的灭亡》。多年来她给了我许多的爱和帮助，晚近，每当德州酷暑正炙时，她总热情地欢迎我们住进她新英格兰的家，以她让人瞠目结舌的愉悦、效率、慈爱照顾我和我的两个儿子温斯洛、马蒂亚斯。也多亏母亲帮忙，我去看了祖父母在东西里西亚老家的村子，她在

维也纳大胆租了辆车，一路载着我走过坑坑洞洞的道路，抵达兹巴拉日（Zbaraz），途中我们一起喝了很淡的啤酒，经历贿赂、遭窃和其他波折（包括在布科维纳某个交叉路口被一辆军用吉普车撞上，差点一命呜呼）。我们一起找到村子，和先人的描述没两样的村子，还找到有许多瓦夫罗族人在场的一块墓地：有活着的瓦夫罗族人（全都长得很像我父亲），有死了的（刻在墓碑上的Babpo，即西里尔语的瓦夫罗）。

读过我先前著作之致谢词的读者，会记得我读研究所时曾和母亲一起开车穿过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走访一八六六年战场的那段惊奇之旅。后来的几趟远行，我们也游历过本书所提的某些战场，从坦嫩贝格（Tannenberg）到普热梅希尔（Przemysl）再到伦贝格诸战场。有一幕她的影像，深印我脑海，无法忘掉。当时她坐在我们租来的欧普汽车乘客座，仔细瞧着有颗粒的旧哈布斯堡参谋部地图复印件，耐心拿它们与今日的地图相对照，然后在我于乡间小路猛然转向，吼道“妈，我第一百遍告诉你，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就是柯尼希格雷茨！”时，她装出没听到的样子。

这些当然只是她诸多贡献里最晚近的部分。父亲于一九七八年早逝（一场让她也差点丧命的事故）后，母亲即承担起养活一大家子的整个重担，把我们七个小孩全拉扯长大。一如管理争吵闹事之部落的奥斯曼贤臣，她以无比的公正宽容管教我们，如今她掌理一个大体上和乐融融的三代大家族。我们刚办过一次家族聚会，庆祝她九十大寿，而每个家族成员流露出的爱意、钦敬，正鲜明说明她的善良、机敏和领导才能。身为七兄弟姊妹中的老幺，我大概是这么多年来最倚赖她的孩子，而她一直是我的支柱，不只给我精神支持，还给我（如上所述）军事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实质协助。她爱旅行、冒险，并让身边的人也热爱此道。我因研究需要而得走访充满浪漫冒险情怀的地方时，她每个地方也都想亲自去看一看。

我于两个夏季前在维也纳完成此书的研究工作。那远不如先前几次研究行程那么开心；我年纪大了；在美国有小孩；孤单一人生活（没有二十年前富布莱特委员会安排给我的活泼、爱交际的室友同住）；而且我白天在丑陋郊区的维也纳新档案机关做研究，那里与维也纳市中心庄严的旧巴洛克式研究场所截然不同。我每天回下榻的公寓，郁郁寡欢地绕奥加唐公园（Augarten）慢跑，用我的简易型瓦斯炉煮顿难下咽的晚餐，然后盯着墙壁发呆。有天晚上，正当我翻弄桌上的笔记，品味这生活的苦闷时，笔记本电脑响起信息提示音，原来是我妈。她看懂我电邮里的弦外之音，安装了Skype（对一个仍把计算机称作“文字处理器”的女人来说，这可不是件小事），打给我。此后，直到我回国，她几乎每晚都这么善解人意地打来，解我一人独居异乡之苦。

玛丽安（Marianne Cook）多年来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为本书手稿做最后修订，且在我得了流感之时，暗笑书中主人翁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将军对流感的过度反应，然后在我出现症状后才几小时，她就带着维生素C、锌、感冒症状缓解剂、开特力运动饮料，甚至她实验室的狗艾比，出现在我床边。好心的她把艾比留在我身边一星期，排解我隔离期间的孤单。她就是这么体贴的一个人，多年来带给我许多开心的回忆。此外，本书中涉及的多趟旅行，有好几趟有玛丽安与我同行。她明显偏爱克罗地亚的岛屿和葡萄园，但还是跟我来了一趟难忘的上山之行，上到黑山的最高峰，走了一趟惊险破表的下山之行（走狭窄的奥地利军用道路），下到壮阔的科托尔湾（Bay of Kotor）。在达拉斯若没有玛丽安的陪伴，我真不知怎么过活。

我的两个儿子温斯洛和马蒂亚斯，也惠我良多。他们精力充沛、充满朝气、兴趣多变，而他们冲动、不服输的青少年特质，总让我想起奥匈帝国某个动辄吵架的司令部，使我一下子感到难堪，一下子又放声大笑。温斯洛和马蒂亚斯都已不是小孩，因而也成为我的好友，能讨论我的和他们的工作、人生许多奥妙之处。我深信我偶尔表现出的（可归因

于单调荒凉的加利西亚故乡的）疲乏无聊，对他们的帮助，就和他们纯真的欢乐、热情对我的帮助一样大。

来自北得克萨斯大学的研究协助，使我得以在欧洲多所档案机关做研究，参观本书中所提及位于波兰、乌克兰、塞尔维亚的战场。多年以前，我拿到奥克兰大学的一笔研究奖金和旅行补助费，为本书做的研究工作，有一部分就靠这笔款子进行。乌克兰（今加利西亚）的道路过去始终崎岖不平，如今依然如此，因此，我在那里时，倚赖Jarek Vitiv与Igor Holyboroda的车子和他们带路。他们两人耐心地开车载着我（以农民迈大步轻松跑的速度），跑遍伦贝格与拉瓦鲁斯卡的所有战场。在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斯顿（Ston）和佩列沙茨半岛（Peljesac Peninsula），Ivo Nanac（耶鲁、萨格勒布两所大学的毕业生）以及他的妻子Andrea Feldman对玛丽安和我非常好，让我们对巴尔干半岛历史和克罗地亚葡萄酒有更深的认识。

维也纳大学的Lothar Höbelt，在我早期某趟研究行程期间让我住在他家，更晚近时，大力协助我在档案机构的研究工作。Lothar也非常好心地介绍我认识奥地利军事博物馆的馆长Christian Ortner。透过Christian，我得以结识该博物馆照片档案室的Peter Enne和Werner Scherhaufer。这两位先生让我一连数日使用他们的办公室，以选出许多照片供此书使用。我要一并感谢几位在基尤（Kew）、万塞讷（Vincennes）、维也纳、帕克学院（College Park）诸地的许多档案保管员，助我从事此书撰写前的研究工作。

我为此书到伦敦做研究时，David Noble、Caroline Noble夫妇，还有Jun Hiraga，非常好心地让我住在他们家。在巴黎的万塞讷做研究时，我受到外甥Marc Bataillon的慷慨招待。在离家较近的地方，我的好友，北得克萨斯大学的军事史中心副主任，Michael Leggiere，以他在该中心的辛勤工作和他的开朗、友谊，对我帮助良多。我还要感谢我的兄

弟姊妹：Peter，David，Mark，Jill，George，以及已故的Robin。在大家庭里长大是件难得的幸事，而我某些兄弟姊妹听到我这么说时，肯定会（假装）惊愕地盯着我。

我的经纪人，William Morris Endeavor公司的Tina Bennett，助我完成本书的写作提案，她一直是个很有眼光的爱书人和很有见地的顾问。《多瑙比亚》（*Danubia* ）一书的作者Simon Winder也在初期协助塑造这份提案，他坚持要我回档案馆更深入钻研东部战线一事，对这方面的帮助尤为关键。我的主编，Basic Books公司的Lara Heimert，挡住了我想插入趣闻轶事来阐明观点的冲动，从而大大提升了本书的质量。若没有Lara高明的插手，这本书的篇幅会增加一倍，但质量则会减半。我还要感谢该公司的Alex Littlefield、Katy O’Donnell和Melissa Veronesi，在本书编辑、制作上的出色付出。Phil Schwartzberg为本书制作了精致的地图，面对种种冷僻的地名，仍耐心完成工作。最后，我要感谢主动揽下本书样稿审阅工作的大学者：Sir Michael Howard、IvoBanac、Niall Ferguson、Dennis Showalter、Norman Stone、Christopher Clark、Brendan Simms和Sean Mcmeekin。感谢美国国防部驻俄罗斯联邦专员Peter B. Zwack准将在莫斯科拨冗读了此书，自多年前我们在海军战争学院初次相遇，他就一直是我的读者，而且——由于他是奥匈帝国名门之后——是个有见地且细心的读者。

前言

一八六六年秋，一位奥地利某将领的侍从武官，在维也纳市中心萨赫饭店（Hotel Sacher）的熟食店，动手打了一名俄国外交官。那一年，普鲁士、奥地利这两个向来相互支持的国家，打了七个星期的战争，最后以那年七月的柯尼希格雷茨（Königgrätz）之役，普鲁士将奥地利打得无力再起，实质性地结束了这场冲突。而在这场为时不长的战争中，俄国一直作壁上观，看它的两个大国级对手厮杀。就是因为这个俄国官员暗暗嘲笑奥地利兵败普奥战争，令这位侍从武官大为恼火，于是对他挥拳动粗。

萨赫饭店那场扭打升级为国际事件，引发俄奥即将一战的揣测。即便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些传言是假，却间接表示奥匈帝国虽溃败于柯尼希格雷茨，但该帝国和其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仍有可能打算独力与俄国在战场上一较高下。

但到了一九一四年，已不再有这可能。那时，奥地利是与匈牙利合组的二元君主国的一部分，已沦为巴尔干强权，只能与意大利争夺“最小大国”的蔑称，且和奥斯曼帝国一样有可能从大国俱乐部被彻底除籍。这一令人瞠目结舌且快速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就和奥地利最后一场战争（从头至尾一场惨烈、鲁莽的大败）的过程一样有趣。

要探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必然要从维也纳开始。吞噬欧洲和世界的大火，就在那里点燃，然后往四面八方扩散。这场惨绝人寰之战争的远因、近因，都可归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奇特世界观和其难以驾驭的中欧领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近因，公认是哈布斯堡大公弗朗茨·斐迪

南（Franz Ferdinand）在一九一四年六月遭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加夫里洛·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暗杀后爆发的七月危机。奥匈帝国怀疑有俄国当靠山的塞尔维亚政府是这一暗杀阴谋的帮凶，在此一猜疑的推波助澜下，紧张情势于七月节节升高，终于在八月爆发战争。一战的远因包括帝国主义——欧洲列强、美国、日本——对以亚洲和非洲境内为主的新市场、原材料、海军基地的争夺；另一个远因是相抗衡之同盟体系的存在——英法俄的三国协约和德奥意的三国同盟。

这些同盟体系本身就充满危险因子，一旦配上侵略性的战争计划、靠强制征兵建立的大军、现代军备（无畏级战舰、急射野战炮、高爆弹、机枪），危险性更暴增。事实上，始于一八九〇年代的欧洲军备竞赛，也是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力推手。一九〇五年，德国出炉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以迅速动员德国、奥匈帝国军队用于攻势作战，并招来法国、俄国推出同样咄咄逼人的战争计划作为响应。一八九〇年代即开始的陆海强大军事工程，赋予这些计划坚实的武力后盾，使本已诡谲凶险的一九一四年更为诡谲凶险。

在此期间弥漫欧洲的普遍反动心态，也是一战爆发的推手。欧洲的心脏地带被喜怒无常、心态保守的君主国（俄、德、奥匈、意）宰制。没有自由主义政府作为安全阀，这些政权惴惴不安地看待当时的新政局、新文化、新作风。誓言废除君主制的社会主义党，一九〇六年成为德国国会里的最大党，促使至少一名德国将领呼吁打“一场痛快的战争以终结到处可见的混乱”。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境内的保守派持类似看法，英国、法国的保守派亦然。战争将使当权者可以名正言顺戒严、痛击工会、镇压“颠覆性”政党；也将强化国家战力，扫除社会中的废物，削弱物欲和色欲，重振爱国精神。对于这场隐隐然即将降临的惨烈战争，最后将造成一千六百万人死亡、两千一百万人受伤的战争，他们竟如此天真以对，至今仍令人费解。

这场涂炭生灵之战争的爆发，奥匈帝国扮演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角色。如今常有人主张，由于盟友奥匈帝国的虚弱，德国才刻意且吊诡地加速这场战争的爆发。身兼政治家和史学家两种角色的丘吉尔，指出此荒谬而危险的状态，即“欧洲的荣耀与安全竟系于其最薄弱的环节上”[1]。身处于现代“民族主义时代”，奥地利正逐渐解体。奥匈帝国是个基本上属封建性质的大国，有十余个民族生存其上的帝国版图，乃是十六世纪时拙劣拼凑而成，然后受到想建立联邦、自治或独立的辖下诸民族攻击，这帝国踉踉跄跄走进二十世纪。

德国对奥匈帝国未来发展的不安，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之一。丘吉尔则在其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东部战线历史的著作中，称这可能是唯一原因：“这一恶性且致命的衰退，使人类的和平与文明取决于交替肆虐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解体过程和短暂复苏时期。”[2] 一九〇五与一九一一年德国人为摩洛哥问题几乎与法国、英国开战，却见到奥地利人最后临阵退缩，于是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机爆发时，德国人把这视为在这君主国还未因其内部分裂对立而垮掉时，或尚未遭周遭的泛斯拉夫强权俄国、塞尔维亚吞并前，使奥匈帝国振衰起敝的最后和最佳机会。

《哈布斯堡的灭亡》谈奥匈帝国一蹶不振的衰退和此衰退对欧洲文明的冲击。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体上遭史学界忽略的一个区块。大部分史学家都提到奥匈帝国的衰弱，但未深究其衰落。还有些史学家将奥匈帝国视为不折不扣的强权来分析其军事关系与对外关系，好似任何不寻常之处都是本该如此。本书说明奥匈帝国在一八六六年打了（且输了）它最后一场欧洲大战后几十年的衰落，阐述它如何踉踉跄跄走过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那关键数年，借此填补这块遭冷落的区域。在那关键数年里，巴尔干半岛骚动不安，维也纳观望、犹疑、再观望，然后疯狂跳入一场没有胜算的大战。

如果说奥匈帝国决定加入这场战争已够鲁莽，那么该帝国一九一四年的攻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研究里另一个受史学界冷落的区块），则更为鲁莽，且是该帝国所做出最为冒进的举动。一九一四年奥匈入侵塞尔维亚、俄国之举早已规划多年，而其一塌糊涂的惨败，则坐实了战前还只是在怀疑层次的奥匈之无能。一九一四年八月在塞尔维亚、俄罗斯的战事，确立了此后直至一战结束的格局：过度扩张的德国、忙得喘不过气的俄国、高举双手而斗志全消的奥匈帝国。

奥匈是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推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上，也起了同样关键的作用。一九一四年的作战计划，十年前就已确立。德国要以气势万钧、攻击侧翼的“右勾拳”穿越比利时消灭法、英军队（施里芬计划的第一阶段），奥地利则要又快又有效率地动员部署于波兰南部与乌克兰西部（哈布斯堡王朝名之为加利西亚的边境地带）的四个奥匈野战集团军，发动凶狠的正面攻击，以削弱、破坏俄国的“蒸汽压路机”（六百万大军）。这一计划指望奥地利的行动挡住行动缓慢的俄国人，为德国打赢西部战线争取时间，然后搞定西部战线的德国挥师三百万向东，与两百万奥地利军队联手，和俄国决一死战。制定计划者认为俄国撑不过这波攻击。俄军兵力庞大，但受制于教育水平低和从外套、靴子、药物到步枪、炮弹等所有物资的短缺，战力有限。塞尔维亚人则被认为不值一虑。奥匈帝国军队将以八个师组成的“最小巴尔干兵团”（Minimal Balkan Group）挡住他们，另外四十个师则对付俄军。解决俄军之后，奥匈才会动手击败贝尔格莱德，将其瓜分。

德国人为何未能在西线获胜，我们知之甚明。有多部探讨马恩河（Marne）战役、伊普尔（Ypres）战役的书籍，还有小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Younger〕设计并督导德国作战计划之落实的主要人物之一）对施里芬计划和其运用的分析，告诉了我们原因。但一九一四年东部战场是怎样的情况？对那里的战事，我们的了解非常粗浅。仍抱着大国身份不放的奥地利，派了二十个师（而非八个师）攻打

塞尔维亚，为何仍落败？东部战线与俄军的交手是什么样的情况？历史著作谈到一九一四年八月奥匈帝国在克拉希尼克（Krásnik）和科马鲁夫振奋人心的大捷，但接下来，在下一页，就令人一头雾水地描写奥地利人从这两地慌乱的撤退，把波兰和乌克兰全留给俄国人，并要求德国派大军来救，从而使德国人打赢西部战线的任何希望注定成为空想。

奥匈帝国焦虑不安于自己大国地位的没落，且不肯面对现实，仍装出大国的身段。这两种特质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因之一，也是其战败的根源。一战随着哈布斯堡王储和其妻子在萨拉热窝遭开枪暗杀而揭开序幕。但这一暗杀原本不该引发一场世界大战。为何会引爆一战，不只与德国的侵略心态大有关系，也与奥匈帝国在一战期间明显可见的那种愚蠢行事大有关系。就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官拟好立场刻意强硬而将使战争变得无可避免的最后通牒时，奥地利军方完全未针对开战做任何准备。事实上，一九一四年七月危机正炽时，奥地利的将领和政治家在度假——为国家受伤害而愤慨不已的大国领导人竟还能悠哉度假——这着实令人匪夷所思。战争爆发时，奥地利人在维也纳的驱策下抱着同样松散的心态出征，派出一支在运输工具、火炮、炮弹、机枪、步枪、战术等各个重要方面都不堪一击的军队。

奥匈帝国领导人才的不足，至少是同样严重。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皇帝，有着慈爱的眼神和羊排络腮胡，乃今日奥地利观光业的宠儿，但在一九一四年却是个恶性十足的人物。这位皇帝虽不如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šek）在其小说《好兵帅克》（*The Good Soldier Svejk* ）中所说的那么老迈昏庸（“让两个奶妈一天喂奶三次，糊涂得大概不知道正有战争在打”），却有多年处于惊人的衰老状态。他洋洋自得地霸着皇位，不肯让作为皇储的他那五十岁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接位，却又不愿善尽皇帝的职责。在一九一四年前的那些年里，哈布斯堡君主国走到每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时，这个昏聩的老人都使这个君主国困在路中央，束手无策。

相对于这位八十四岁的老皇帝，六十一岁的参谋总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将军，是“青年土耳其党人”（Young Turk）一员。康拉德被视为杰出战略家，并被认为若他日后碰上大而笨拙的俄罗斯，还有塞尔维亚，都将克敌制胜，但结果并非如此。他的实际表现为何和外界期望背道而驰，乃是另一个有趣且受冷落的故事。因为康拉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部战场单调乏味，毫无精彩可言。即使就一九一四年的宽松标准来看，他的领导统御和决策都糟得离谱，几星期内就毁掉了奥匈帝国军队。

奥匈帝国的不成器，也拖垮其盟邦德国。不管德国曾对打赢这场大战抱有什么希望，这希望都随着一九一四年奥地利颜面尽失的惨败而破灭。奥地利那几场败仗留下焖烧的土地——敌我争夺的波兰、加利西亚、塞尔维亚——加重了德国的负担，使德国欲在任何重要的战线上赢得胜利，都变得更为困难。若在战争初启时，奥匈帝国的战场表现得不这么糟，即使只是尚可，德国在这点上都会轻松许多。本书为一场通常被人从西边视角来看的战争增添了东边的面貌，有助于说明维也纳和柏林为何落入没有胜算的消耗战，终至落败。

---

[1] Winston S.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32.

[2] Winston S.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32.

导论

从未有哪个帝国垮得如此之快。靠英国的财政援助和海上武力，将拿破仑打得一败涂地的强大的奥地利帝国，一八六六年却败于普奥战争。在遭实力劣于自己的德国彻底击溃前夕，奥地利还让外界觉得几乎是所向无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是统治欧洲的第二大帝国（仅次于俄罗斯），辖有出身、民族身份各异的多种族群。多年来，哈布斯堡王朝还主宰德意志邦联（German Federation）。这是由三十六个独立邦国组成的联盟，版图从北边的新教普鲁士延伸到南边的天主教巴伐利亚，且靠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结合在一块。在这些奉哈布斯堡王朝为共主的邦国中，普鲁士王国的工业化程度最高，野心最大。当普鲁士意图除掉邦联的盟主，在觊觎奥地利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最后据点的意大利支持下，夺取邦联的领导权时，奥地利即集结效忠于它的跟班（大部分德意志邦国），对普鲁士宣战。

没人认为奥地利会败。专家，例如在转攻经济之前靠写军事评论为生的恩格斯，都预料奥地利会胜。奥地利军队的不禁打，让战场记者瞠目结舌。奥地利人看着他们一度壮盛的军队七月败于柯尼希格雷茨（Königgrätz），八月遭逐出意大利，看着普鲁士政治家俾斯麦和参谋总长老毛奇解散奥地利所领导的德意志邦联，将邦联的大部分邦国并入普鲁士名下，准备围攻维也纳，奥军不得不在多瑙河河岸投降。

一八六六年之败所带来的心理创伤之大，不容一笔带过。“奥地利构想”——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不管是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波兰人、捷克人或匈牙利人，各民族得其所哉，就和在其他任何体制的安排

（包括民族国家）下得其所哉一样——就此整个灰飞烟灭。自一七九〇年代法国大革命以来，维也纳一直在对大势所趋的民族国家走向做无望取胜的顽抗。法国大革命把意大利、波兰之类原本遭外来大国（包括奥地利）瓜分、占领的民族，组合为由自己民族当家做主的新国家。为拿破仑战争画下句点的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将这些新民族国家，包括意大利王国和华沙公国，交回给奥地利、普鲁士或俄罗斯统治。此后，维也纳把辖下任何民族脱离其帝国的举动——德意志人投入德国怀抱、意大利人投入意大利怀抱或匈牙利人投入匈牙利怀抱——都视为危及奥地利存亡和统治正当性的叛国行径。

就是这一解体之虞，使一八六六年的战败变得凶险。哈布斯堡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的威信，大部分来自其控制意大利大港威尼斯和其腹地以及其身为德意志邦联盟主的身份。位于意大利的这个异国据点和勤奋的德意志民族属地，为奥地利的多民族性格提供了保证。如果哈布斯堡王朝能在这里守住，则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守住。威尼西亚（Venetia）一落入意大利王国之手（一八六六），德意志诸邦一落入普鲁士（一八七一年改名德意志）之手，这位奥地利皇帝即不得不退而倚赖帝国辖下以斯拉夫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为居民主体的诸州（crown lands），而在日益标榜民族主体性的“民族主义时代”，这些州未来绝对会出乱子。

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后，奥地利辖下诸民族（德意志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及其他六个民族），更强烈质疑“奥地利构想”。奥地利诗人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自忖道，“我出生时是德意志人，但现在还是吗？”在国界另一头已出现一个德意志大国时，一小群德意志人还有必要留在多民族的奥地利吗？德奥合并之说——将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大力推动、最终受到唾弃的目标——这时已开始发酵。在中欧东部、其他非德意志的诸民族里，对自我身份的省思同样深刻。奥地利要这些民族放弃独立和民族

发展，换取在德裔奥地利人的指导下，合并于某奥地利官员所谓的“民族的平底锅”里。但平底锅在柯尼希格雷茨付之一炬，鉴于奥地利战败和国力衰退，各个小民族开始重新思考未来要走的路。

其中，匈牙利人在重新思考未来之路时，想法最为大胆。匈牙利的最大族群马扎尔人是突厥语族，九世纪时与匈奴人一起骑马离开乌拉尔山脉，定居于多瑙河中游平原。身处于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居多的土地上，马扎尔人始终没有安全感。这时，眼见奥地利衰弱，他们开始趁机扩大势力。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后，匈牙利的政界领袖出现于维也纳，强烈要求三十六岁的哈布斯堡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接受一桩浮士德似的交易：只要他承认匈牙利王国的存在，晚至一八四八年仍起事反抗维也纳统治的匈牙利，将会尽释前嫌，倾其庞大人力（匈牙利王国除了有马扎尔人，还有人数较少的克罗地亚人、斯洛伐克人、德意志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为哈布斯堡君主国效力。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生性拘谨审慎，不爱睡他皇宫中的羽毛褥垫，反倒睡在铁制行军床上，每天早上天一亮就起床，前去（短暂）探望跟了他二十年的情妇，然后埋头处理他德语官员呈上来的大量文件。他那漂亮（且可望而不可即）的妻子伊丽莎白，极为同情匈牙利人，而她的这份同情可能和匈牙利人一样，都想摆脱她丈夫的掌控。在伊丽莎白的推动下，弗朗茨·约瑟夫同意匈牙利人的所有政治要求。他的新外长弗里德里希·冯·博伊斯特（Friedrich von Beust），也劝他这么做。博伊斯特是萨克森侨民，对奥地利历史或文化所知甚少。同时兼任奥地利首相的博伊斯特，极力促使皇帝接受匈牙利的所有要求，认为速速解决匈牙利问题，将使其他问题跟着一并解决：一八六七年博伊斯特向匈牙利首相久洛·安德拉希（Gyula Andrássy）使眼色，“你管好你的人，我们会管好我们的人。”

当时人惊讶于哈布斯堡如此积极地讨好匈牙利人，因为匈牙利人虽

然声称人数众多，但只占哈布斯堡君主国人口的七分之一，所以对他们的要求尽可以一笑置之。但一八六六年战败后，弗朗茨·约瑟夫想尽快解决问题，且认为同意帝国治理的二元化——两个首都（维也纳与布达佩斯）、两种“国民”（德意志人与匈牙利人）、两个君主（由他兼任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可确保君主国的长治久安。

至少从理论上看，从奥地利创造出奥匈帝国，有其道理存在。匈牙利人将不再寻求脱离哈布斯堡君主国，而是将他们的心力用于压制想脱离君主国者。将帝国分割为由德意志人治理的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a）和匈牙利人治理的外莱塔尼亚（Transleithania）——两者以蜿蜒流经维也纳与匈牙利肖普朗城（Sopron）之间的浑浊的莱塔河（Leitha River）为界——是把东边的民族问题转包给匈牙利人处理，这在表面上简化了君主国的民族问题，以让德裔奥地利人可在“二元”制度下专心治理西边的民族问题。

但处理问题的手段较温和的德裔奥地利人，因为优柔寡断而比较不会蛮干，但匈牙利人则是强硬、坚决、蛮干到底。一八六七年达成折中方案，创造出奥匈帝国后，匈牙利人大力推动强硬的“马扎尔化”运动。他们的民族平底锅只有一道口味：红灯笼辣椒。德意志人把“国民”标签视为只是让他们得以顺理成章要求内莱塔尼亚的斯拉夫人用德语与哈布斯堡官员打交道，进而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待他们的许可证；匈牙利人则把他们的“国民”身份，视为可放手消灭外莱塔尼亚其他民族的通行证：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将被禁止上他们的教堂、受他们的学校教育、讲他们的语言、维持他们的文化，借此“剥夺掉这些人的民族身份”。在匈牙利王国境内将弗朗茨·约瑟夫称作“皇帝”，等于犯了叛国罪，最好是称之为“国王”；不然，“君主”、“最高统治者”，也可以。

有个一九〇二年来过奥匈帝国的法国人论道，在这帝国里，样样东西，包括钞票，都是“二元并立”。奥匈帝国的克朗纸钞的正反两面以不

同文字印行：奥地利那一面以德文和内莱塔尼亚其他八种语言（波兰语、意大利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罗马尼亚语、乌克兰语）的文字标出币值；匈牙利那一面，则只以马扎尔语标出币值。这位法国人论道："真是令人吃惊，因为对匈牙利官方来说，在匈牙利，其他民族连存在都谈不上。"这样的民族傲慢自然只得到敢怒不敢言的顺服。"面对这一内部的民族消灭运动，这里的非匈牙利人只能噤声，一动不动，尽管他们占人口多数！"这位法国人如此说道。[1]

弗朗茨·约瑟夫亟欲为其衰老的帝国找到振奋人心的新使命，不久就开始为一八六七年的大让步懊悔。[2]由于匈牙利的自由党党员把东奥地利境内抗拒马扎尔化的神父、领袖、作家或政治人物全部逮捕入狱，导致折中方案不但未缓和，反倒激化哈布斯堡君主国里的民族对立。自一八六七年宣布"斯拉夫人做不好治理工作，得受统治"之后，匈牙利首相久洛·安德拉希和此后直至一九一八年为止的历任首相，都以铁腕手段贯彻对斯拉夫人的统治。[3]到了一八八〇年代，已有数百万奥匈帝国人民要移民美国，而留下未走的人，则把生路寄托在奥匈帝国境外——斯拉夫人寄望俄罗斯或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人寄望罗马尼亚。

折中方案的初衷乃是为了解决奥地利的问题，结果反倒使一八六六年恶劣的战略处境更为恶化，因为已遭外敌环伺的奥地利，这时多了个难以根除的内敌。到了一九〇〇年，已有哈布斯堡官员把匈牙利称作"内敌"。一九〇五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和其侄子暨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已在秘密计划入侵匈牙利，关闭匈国议会，将匈牙利人重新纳入维也纳掌控。

入侵匈牙利不是易事。直至一八六七年为止，奥地利帝国都依照历来军人不驻在本籍的方式，将匈牙利团部署于帝国各地，借此淡化民族情感，防止布达佩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折中方案赋予匈牙利人自建

军队——地方防卫军——的权力。严格来讲，匈牙利的地方防卫军只是和奥地利地方防卫军差不多的国民警卫队，而且匈牙利人仍得向奥匈帝国以德语为指挥语言、德意志文化挂帅的“皇帝与国王”联军，提供数个团的强征入伍兵。但由于弗朗茨·约瑟夫从未明确规定拨予帝国正规军和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的强征入伍兵比例，于是，一八六七年后的几十年里，匈牙利议会趁机壮大说匈牙利语的地方防卫军兵力，让说德语的军队逐渐萎缩。

奥匈帝国陆军部想把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的新兵调入帝国正规军，且提出完全合理的理由——每一年从莱塔河以东招募的兵员，不到四成五是匈牙利人——但遭到匈牙利议会不断阻挠。[4] 奥匈帝国预算得经奥地利、匈牙利两国议会批准，因此匈牙利人常常削减或否决会壮大或使正规军现代化的军费，因为他们把正规军——受德意志人训练、可能入侵匈牙利、撕毁折中方案的“马木留克人”（Mamelukes，“奴隶兵”）——视为威胁。匈牙利人不以让联军经费断炊为满足，还打算摧毁其士气；布达佩斯的政治人物要求展开一次有计划且持续不断的行动，以“将正规军中的匈牙利裔成员民族化”，也就是使他们脱离德意志指挥体系和德意志文化，使他们讲匈牙利语。[5]

在这一内斗下，奥匈帝国陆军军力大衰。一九〇〇年，联军只拿到四亿三千九百万克朗的经费，只及英国国防支出的三成五，俄国的四成，德国的四成一，法国的四成五。英国把过半资源投注于皇家海军，但其花在陆军六个师的钱，仍比奥匈帝国花在其四十八个师的钱还要多。[6] 一个如此看重其大国地位的帝国，军费支出竟少到这种程度，着实令人震惊。

或许有人会以为，德国人出于军事、政治考虑应该会反对奥匈军力如此衰退，其实不然。毕竟匈牙利人是他们在维也纳的盟友，自一八六六年就受柏林指导，以力促维也纳采取亲德政策。这是一八六七年后奥

地利面临的另一个显著难题：匈牙利人得到二元制安排，大部分得归功于德国的支持。德国首相俾斯麦担心普鲁士打赢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和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后奥法组成“复仇联盟”，于是在一八七〇年加大其对奥地利境内匈牙利人的支持。柏林和布达佩斯同意，哈布斯堡王朝若想推翻一八六六年的裁定，想以“天主教联盟”盟主身份重新进入德意志民族政治圈，决意削弱（新教）俾斯麦对德国辖下天主教地区的掌控，该王朝将反受其害。[7] 匈牙利人需要德国支持折中方案（没有德国的支持，维也纳说不定早已动手教训布达佩斯），而俾斯麦给予该支持，是因为奥匈折中方案似乎有一石两鸟之效。它将该帝国一分为二，借此从内部牵制奥地利再起，但又确保奥匈帝国，至少帝国西半部，仍保有其德意志的特性和文化，从而使维也纳仍是德国盟邦。俾斯麦担心一八六六年战败而国力衰弱的奥地利走上反普鲁士路线，或受到奥地利境内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等斯拉夫民族泛斯拉夫激情的伤害而彻底支持布达佩斯，从而创造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二元政治。对奥地利不利，就是对德国有利（短期来说），在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后情势紧张的那些年，那是俾斯麦的最高准则。[8]

匈牙利人始终借由反对奥地利来表达其对德国的忠诚：匈牙利人有计划地反对奥匈外交部重拾“旧奥地利”政策（即独立政策），对奥、俄修好之事扯后腿。匈牙利人也竭力阻止奥地利人脱离一八八二年所创立的奥德意三国同盟。意大利人毫不掩饰其对奥地利南蒂罗尔（South Tyrol）、的里雅斯特（Trieste）、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觊觎，但凡是军事预算里含有为奥地利受威胁的土地构筑防御工事或派驻部队的经费，该预算都会遭匈牙利人否决。有位法国官员推断道，奥地利人被二元制困住，被外交部里为德国利益服务而非为奥地利利益服务的“普鲁士-马扎尔小集团”困住，动弹不得。[9]

一度大受吹捧的奥地利陆军，一九〇〇年后渐渐衰败。一八六六年时它是世上最庞大的陆军之一，一九一四年时已落入末段班，只有三十

五万五千兵力，野战炮、炮弹、机枪（现代战争的新宠儿）少得可怜。这些令人泄气的数据，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巴尔干战争期间，取得超乎统计学上的意义。一八六六年遭逐出德意志区域和意大利后，奥匈帝国转而拥抱巴尔干强权（Balkanmacht）这个新角色，冀望借此重振声威。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把目光转向南边，打算开辟一条穿越塞尔维亚与马其顿直抵萨洛尼卡（Salonika）与爱琴海的奥地利走廊。重振雄风的奥匈帝国将承继奥斯曼帝国的欧洲诸省，从地中海的新港口发散支配力和势力。为此，维也纳于一八七八年占领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九〇八年将其吞并，冒着与俄国、塞尔维亚开战的危险强行画出其势力范围。这时，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弗朗茨·约瑟夫一脸惊骇地看着自认比奥地利更名正言顺继承土耳其在欧洲之领土的塞尔维亚，把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先后赶出曾是奥斯曼帝国的省份，且横亘在通往萨洛尼卡之路上的科索沃、马其顿。外界认为维也纳会大举干预这些战争，以免贝尔格莱德利用土耳其人的溃败大幅扩张其势力；维也纳的确这么做了，但未成功。塞尔维亚人在马其顿恣意搜掠，肆无忌惮地穿过奥地利所治理的新帕扎尔区（Sanjak of Novipazar），以夺取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塔里（Scutari，阿尔巴尼亚语称斯库台/Shkodër）和都拉佐（Durazzo，阿尔巴尼亚语称都拉斯/Durrës）两港，其狂妄行径令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怒不可遏，于是下令动员五个军，以让塞尔维亚人心生恐惧，自行撤退。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匈牙利议会不肯为这一冒险行动提供资金，而充斥着亲塞尔维亚之斯拉夫人的奥地利议会，以长达一个月的冗长辩论瘫痪议事，也拒绝为此行动的拨款放行。



无计可施的皇帝转而找上华尔街的库恩勒布公司（Kuhn Loeb and Co.），借到两千五百万美元支应军队动员所需资金，结果许多新兵向所属的奥匈帝国团报到时，唱着塞尔维亚国歌，嘴里骂着自己的君主。在奥地利的捷克诸省，后备军人的妻子、母亲卧轨，以阻止火车将他们的丈夫、儿子载往前线。拥有高度发展之文化的捷克人，已成为这个君主国最薄弱的一环。十七世纪时遭撤除的政治特权从未被恢复，加上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两省境内屈居于德意志人之下，捷克人对此怨恨甚深。在二十万塞尔维亚部队迅速占领巴尔干半岛西部时，一万两千名士气荡然的奥地利人渗入波斯尼亚，根本谈不上吓阻效果。维也纳一地的麻烦，使这一行动的效果更打了折扣。在危机最严重的关头，参谋总长被迫（因不够强势积极）辞职，不久，奥匈帝国陆军部长跟进辞职——他被指控拿他打算赏予军事合同的商行的股票做投机买卖。接任者才刚

出炉，即发生举国震惊的雷德尔丑闻（Redl Affair）——有消息传出四十七岁的阿尔弗雷德·雷德尔（Alfred Redl）上校，自一九〇五年起一直将德、奥的军事机密卖给俄国人。

奥地利出兵阻止塞尔维亚扩张的行动失败，帝国似乎危如累卵。奥匈帝国参谋部研究塞尔维亚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的吞并行动，推断塞尔维亚靠着新取得的领土、人力和资源将迅即大增贝尔格莱德的实力，以使塞尔维亚陆军兵力随之增长一倍，由二十万增加为四十万，换言之，将比承平时期哈布斯堡王朝的建制兵力还多。即将离职的参谋总长布拉修斯·舍穆瓦（Blasius Schemua）惨然推断道，奥匈帝国连考虑和俄国、塞尔维亚一战都没资格——“我们的军力不再顶得住这两国”，这肯定是对一九一三年情势最轻描淡写的描述。[10]

一九一四年前夕维也纳一地的激昂言词，让人想起一八五九年和一八六六年哈布斯堡王朝对来自皮埃蒙特（Piedmont）、普鲁士之威胁的痛斥。这时塞尔维亚被说成南斯拉夫的“普鲁士”或“皮埃蒙特”，一个矢志于巴尔干半岛实现其天定命运的新兴地区性强权，一如皮埃蒙特统一意大利、普鲁士统合德意志民族。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的领土野心很大，想把奥匈帝国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斯洛文尼亚、南匈牙利，也就是所有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地方，都纳入其版图。雪上加霜的是，奥匈帝国内部人民普遍同情塞尔维亚人。奥匈帝国的斯拉夫人被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当成二等公民，把塞尔维亚的民族统一视为他们自身民族统一的先声。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怒冲冲说道：“我们君主国得从昏睡中醒来，以强势昂扬之姿前进，不如此，会完蛋。”

到了一九一三年，没有哪个国家比德国更希望一个强势的奥匈帝国。英、法、俄已于一九〇七年达成反德的三国协约，德国人夹在这三国的现代化海陆军之间，只剩奥匈帝国这个真正的盟友。没有奥地利，

德国的处境将不堪设想，因此柏林开始规划一场欧洲大战，以击溃塞尔维亚和俄国，扶助维也纳。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于波茨坦召开的作战会议中，德国皇帝建议以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攻城略地为借口，立即向塞尔维亚、俄罗斯、法国开战。德皇于波茨坦会议前向奥匈帝国武官保证，“德国随时可出剑，包在我们身上。”

但一如以往，奥地利人无法指望匈牙利人相助。一九一三年维也纳竭力要求匈牙利投票赞成扩编海陆军、扩建通往俄国的战略性铁路、增建野战炮兵连，但匈牙利人再度拒绝。凡是有利于联军的事，或就新建铁路来说，凡是可能让奥地利经济受惠，而非让匈牙利经济受惠的新铁路，匈牙利人都不会投票赞成。

虽然匈牙利固执己见——或可能因为这样——但到一九一四年时柏林已准备好豁出去大干一场。法、俄两国排定的强军计划，要到一九一六年后才会完成。德国的强军计划则已快完成。奥匈帝国于一九〇五和一九一一年两次摩洛哥危机期间都不愿参战，此刻德国得想办法逼它代德国出手。巴尔干半岛无疑就是理想地点。奥地利的报界哀叹奥国于巴尔干战争期间的无能，正是德国所乐见。一九一四年六月中期，《奥地利评论报》（*Österreichische Rundschau*）把塞尔维亚的扩张说成是“第二场柯尼希格雷茨之役”，忧心忡忡地指出：“一八六六年，我们被赶出德意志邦联和意大利；这一次我们被赶出巴尔干半岛。”[11]

这一趋势必须止住，而当两星期后萨拉热窝响起致命的枪响，杀害哈布斯堡王储和其妻子时，德国领袖心中窃喜。他们觉得哈布斯堡王储遇害和一名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刺客被捕，必然会使胆怯的奥地利人不得不开战。

---

[1]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EMA，7N 1128，Autriche，June 2，1902，2ème Bureau，“Magyarisme et pangermanisme.”

[2] A.J.P.Taylor，*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London：Penguin，1948），140.

[3] A.J.P.Taylor，*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London：Penguin，1948），142.

[4] SHAT，AAT，7N 1129，Vienna，March 29，1905，“La langue de commandement dans les troupes hongroises.”

[5] SHAT，AAT，7N 1129，Vienna，Feb. 8，1905，“La politique hongroise et l’Armée.”

[6] Norman Stone，*World War One*：*A Short History*（New York：Basic Books，2009），50.

[7] James Stone，*The War Scare of 1875*（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10），184-185.

[8] Taylor，*Habsburg Monarchy*，140-141.

[9] SHAT，AAT，EMA，7N 1128，Vienna，April 22，1902，“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Austro-Hongrois”；Taylor，*Habsburg Monarchy*，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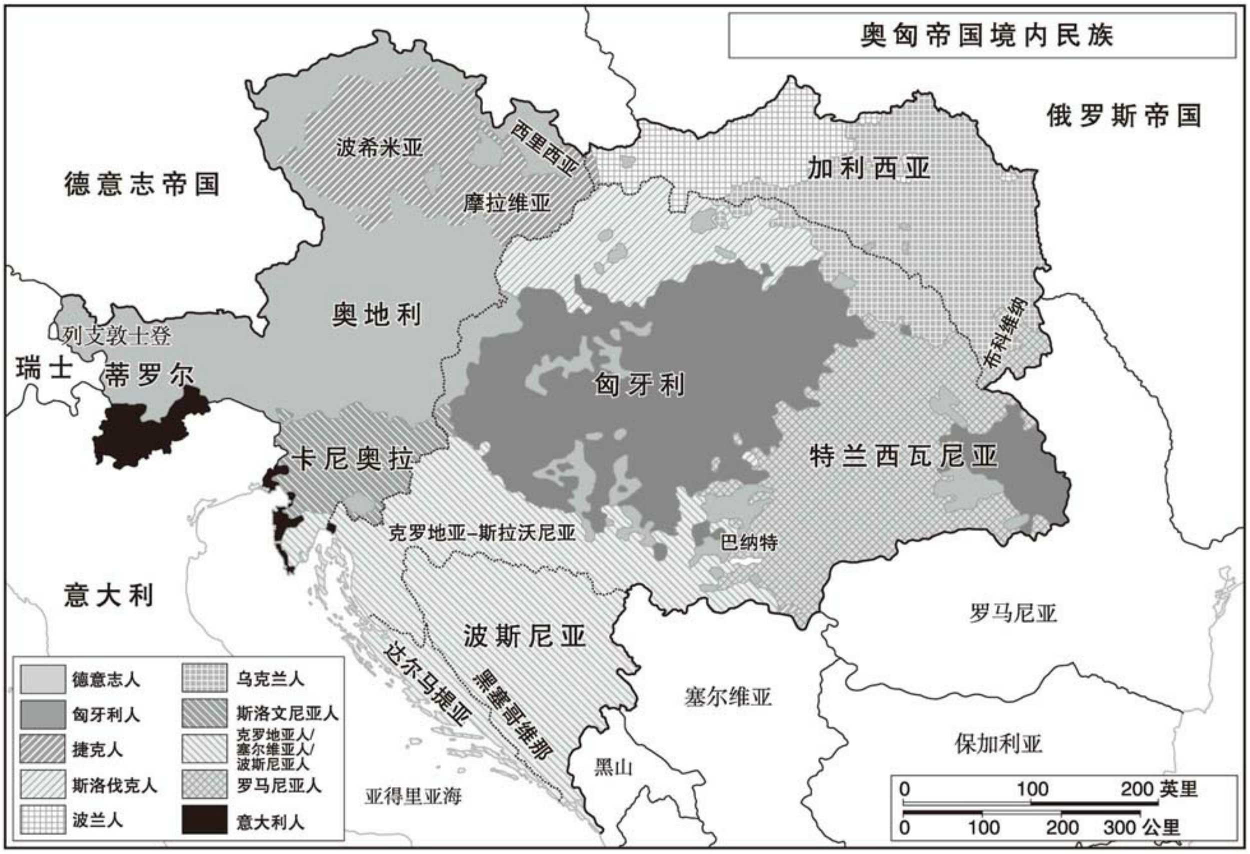
[10] David G. Herrmann，*The Arming of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178.

[11] Österreichische Rundschau，June 15，1914，Politicus，“Imperialismus.”

第一章 欧洲病夫

“奥地利是欧洲的窝囊废，”有份维也纳报纸于一九一三年二月如此嘲笑道，“没人喜欢我们，只要有灾难，我们都躲不过。”只有“欧洲病夫”——刚被饥饿的新强权夺走位于北非和巴尔干半岛之省份的衰老奥斯曼帝国——能和奥地利争夺“世上最大窝囊废”这个头衔。[1] 事实上，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人正在比赛谁先沉沦到最底下，把欧洲病夫的头衔抢到手上。何谓欧洲病夫？最有可能在世人有生之年衰亡的大国是也。

奥地利的积弱不振，肇因于其境内龃龉不断且对统治当局心怀不满的诸民族。“奥地利”一词意味着清一色的德意志民族，但这个辽阔的帝国，其领土远非只有以维也纳、格拉茨（Graz）、萨尔茨堡、因斯布鲁克（Innsbruck）的说德语的核心地区。一九一三年，奥地利是欧洲第二大国（仅次于俄国），欧洲第三人口大国（次于俄国和德国）。但五千两百万奥地利人中，只有一千两百万是德意志人，问题就出在这里。一九一三年，奥地利的最大族群是斯拉夫人。这个西起瑞士边界、东抵俄国边界的君主国，有八百五十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五百五十万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五百万波兰人、四百万乌克兰人、一百三十万斯洛文尼亚人，斯拉夫人占奥地利人口五成；此外还有人数几乎和德意志人相当的匈牙利人（一千万），占人口一成九。



这些匈牙利人九世纪就从中亚移居至此，说着独特语言马扎尔语，孤处于与己大不相同的诸民族之间。他们始终没有安全感，担心遭德意志人支配或遭斯拉夫人吞没。这使匈牙利人产生霸道心态，决意把周遭的人全“马扎尔化”，以壮大他们的小族群，消弭族群竞争。首当其冲者是奥地利的罗马尼亚人。他们有三百多万人（占帝国人口的百分之六），与匈牙利人一起居住于喀尔巴阡山盆地，匈牙利人不断逼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改说马扎尔语。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漫步于霍夫堡宫中

维也纳若有强有力的领导阶层且行事公正，或许能缓和这些问题，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始终予人软弱、敷衍的印象。他唯一一次御驾亲征，是一八五九年攻打法国人，战败收场，然后，在下一场战争，一八六六年的普法战争，他把兵权交给一位看起来能征善战结果是个庸才的将领，于是再败。这使弗朗茨·约瑟夫变得悲观，失去自信。他不想听不中听的话，不想让需要做出棘手抉择的问题缠身，于是一八六六年后他身边全是一些受他信任的唯唯诺诺之徒和愚忠之人，例如效力他已久的朋友暨参谋总长弗里德里希·贝克（Friedrich Beck）将军。这群人执行皇帝唯一不变的政策，即推迟问题，但绝不解决问题。诚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他们是“奇怪的一个小集团，古代的一帮幸存者，具有明显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作风，坚贞不移”，但与时代脱节得可悲。[2] 为防哪个人试图与现代搭上线，弗朗茨·约瑟夫不给他们有此机会：他要维

也纳与布达佩斯的哈布斯堡王廷施行欧洲最严格死板的礼仪，任何人都没有机会向皇帝进言，除非皇帝先找那人谈话。“那就像没有音乐的音乐喜剧，”有位美国旅人论道。[3]

一八五九年对法之战和一八六六年对普鲁士之战，改变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地位。在那之前，它是个不折不扣的强国，与英格兰、法国、俄国并列四强，比普鲁士或意大利还要强大。但在这两场战争中，奥地利将领白白浪费掉机会，仗仗皆输。自此，这个君主国虽不至于成为世人的笑柄，却也相去不远。

一八五九年的战败，激励维也纳深刻自省弊病。弗朗茨·约瑟夫的信心动摇。他首度同意成立议会，即一八六〇年的帝国议会，然后拿不定该采取哪种政体。在一八六〇年代，奥地利开始认真处理民族主义问题（该给国内的非德裔民族多大的权力和多大程度的代议民主），而直到一九一八年底，奥国才摆脱这问题的缠扰。其处理方法之一，乃是“集权”，即由首都将帝国权力一把抓，并透过一高压的说德语的行政系统在各省贯彻帝国权力。另一个方法是建立“联邦”，即放宽皇帝和首都官员对地方的控制，让各省以本地人、本地语言管理自己。在一八六〇年代，这大体上意味着不只透过贵族——即这一君主国的“百户”，例如奥地利的温迪施格雷茨（Windischgrätz）氏族、匈牙利的埃斯特哈吉家族（Esterházys）、波希米亚的施瓦岑贝格家族（Schwarzenbergs）——来治理，还透过地方议会和各地的民族社团（包括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的捷克人、匈牙利的马扎尔人、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人、加利西亚的波兰人、的里雅斯特的意大利人、卢布尔雅那的斯洛文尼亚人）来治理。

多年来，皇帝和其统治集团在联邦、集权两种方法之间焦虑不安地摆荡，忽而此法，忽而彼法，但不管是哪种方法，都未能奏效。集权之路引发非德意志民族的众怒。在工业化、自由主义发端的近代，要透过

贵族施行联邦制，已走不通，而若要透过“青年捷克党”（Young Czechs）之类的中产阶级民族社团来施行联邦制，必然导致地方脱离自立和解体。在奥匈帝国的十七个主要地区中，只有六个地区由单一民族组成；其他地区都是潜伏着民族冲突的火药库，例如波希米亚境内，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为语言、就业、地位的问题在城镇、乡村互斗。[4] 弗朗茨·约瑟夫三十岁时（他活到八十六岁且至死才退位），奥地利就已无法运作，已如同一只太胖、太笨重而飞不起来且行动太迟缓、太无自卫能力而无法在地面存活的渡渡鸟。

一八六〇年代的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立即注意到这点。自一八五〇年代俾斯麦说“中欧不再容许两强并立”之时起，他就看奥地利很不顺眼。一八六六年他把矛头对准弗朗茨·约瑟夫，要求自拿破仑战争结束起即由维也纳宽松领导的德意志诸邦改奉普鲁士为主子。弗朗茨·约瑟夫以其一贯乱无章法的作风，权衡妥协开战的利弊得失，最后决定开战以“保住奥地利的颜面”。他不够深谋远虑，总是为虚无缥缈的“面子”而战，而非为具体可见的利益而战——一九一四年时他又这么干。一八五九、一八六六年时，一如一九一四年时，若以战争之外的手段来保住颜面，会远更符合帝国的利益，将既能保住奥地利的大国身份，同时又能免除两个历来交好之国的毁灭性冲突。

毛奇将军的普鲁士陆军，一八六六年六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入侵奥地利，在几次交手中连连击败奥地利陆军，并于七月三日在波希米亚易北河边的柯尼希格雷茨要塞，打出最辉煌的战果。普军挺进波希米亚时，一支意大利军队入侵威尼西亚，拿下该省，兵威逼近的里雅斯特。奥地利输得一塌糊涂：开战前，奥国外交官未能以让步打消普鲁士或意大利的进攻；开战后，奥国将领未能抓住良机打赢两战线。

拿破仑战争期间，奥地利军队是反拿破仑阵营的中流砥柱，但一八六六年竟如此落败，其震撼无疑如石破天惊。罗马教廷外长听到普军在

柯尼希格雷茨大胜、奥军溃败的消息，惊讶地说道：“世界垮了。”此后的政局发展更令人震惊。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一八七一年二月向下议院议员演说时，说出了欧洲其他地区人民的心声，判定俾斯麦将把三十六个德意志邦国一统于普鲁士统治之下，“彻底打破了均势”，并说此举如同一场“德意志革命”，其政治意义比前一个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还要重大。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成立了由奥地利领导的德意志邦联，以免德意志民族的财富、工业、剧增的人口被单一强权所把持。随着那些资源突然落入普鲁士之手，欧陆的均势彻底翻转。一个以柏林为中心且雄心勃勃的新强权，一统了俄国与法国之间原本小国林立、四分五裂的局面，且决意大展身手，让世人刮目相看。[5]

奥地利比欧洲其他任何强权更努力解决一八七一年德意志革命带来的冲击。“没有哪个外交传统未遭扫除，”迪斯累利于普鲁士打赢普法战争后严正表示，“新的世局，新的势力，新且未知的东西，有待处理的危险。”但新世局不利于奥地利。随着其他强权认知到奥地利在柯尼希格雷茨的战败和其不知为何未能插手普法战争借以收复一八六六年失土一事所代表的意义，维也纳在国际上长久享有的尊重渐渐消失。有位奥地利将领低声说，“我们已沦落到和土耳其同级”，证实了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是一对欧洲病夫。[6]

法国大使馆在评估过一八七八年奥匈帝国的情况后，推断只有维也纳、格拉茨两地周边的地区仍属“可靠的德意志人地区”。其他地方全都受到其他民族的包围——匈牙利为马扎尔人所包围，的里雅斯特为意大利人所包围，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为克罗地亚人所包围，卡林西亚（Carinthia）和卡尼奥拉（Carniola）为斯洛文尼亚人所包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为捷克人所包围，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所包围。法国人论道，在“由诸民族像镶嵌画拼接成”的奥匈帝国里，犹太人脱颖而出，成为“奥地利境内唯一可靠的族群”。在

俄国，犹太人受到严重歧视和集体迫害，而在奥地利，犹太人则受到较大的包容，是奥匈帝国里少数几个积极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的族群之一。法国大使馆于一八七八年记载道："他们的人口在东方成长的速度，远大于其在总人口所占比例下应有的速度，且透过放高利贷掠夺广大农民；在城市，他们控制报业、需要专门知识的行业、银行。"犹太人在乡村放款和在城里经商有成，在奥地利境内激起俄国式反犹浪潮，但还未满五十岁的奥匈皇帝并不怎么把他最忠贞的子民受到的攻击放在心上。法国人写道："他有同情心且很受喜爱，为人却乏善可陈；他没有中心思想，在不同制度间摆荡；他没有真正的朋友或心腹；他什么人都不信任，也未得到谁的信任，甚至连他自己都怀疑。"[7]

这一对弗朗茨·约瑟夫的扼要陈述非常贴切，而一八六六年战败后，他未思索太久，就决定了一个解决德国、意大利统一所带来之危机的办法。军事上，他师法普鲁士（但只及于皮毛）。一八六六年战败的奥地利陆军，原靠贵族军官和长期服役的农民兵打仗，因而，一开始打了几次败仗后，奥地利军队就陷入没有受过训练之后备士兵或军官可用的困境。奥匈皇帝的新陆军部长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将军，施行义务役制度，要奥匈帝国所有男子都得当三年兵，且用考试遴选军官。不到五年，这一君主国的军事贵族即大部分离开军队，且一去不复返，以抗议库恩取消他们原有的特权（主要是不必接受考试或其他任何"能力评定"的特权）。若非一八五九、一八六六年的惨败令弗朗茨·约瑟夫颜面尽失，这个自命不凡且因循旧制的皇帝绝不会同意这样的改革。不幸的是，不到五年，大部分最优秀的中层军官也离开军队，因为一八七〇年代是镀金时代（Gilded Age），最有能力的人都会离开苦哈哈的军队，到金融界找发财机会。哈布斯堡王朝的军官圈子，渐渐走上它一九一四年时将呈现的面貌：只有穷苦的中下阶层子弟报考军官。他们的父亲看上一流军事院校——例如维也纳的工学院（Technical Academy）或位于维也纳新城的军校——所提供的免费教育机会，于是把儿子送去从军。[8]

从组织上讲，一八六六年后的哈布斯堡陆军实行类似普鲁士的军区制。整个君主国，从西边的因斯布鲁克到东边的伦贝格（乌克兰语称利沃夫/Lviv），从北边的布拉格到南边的拉古萨（Ragusa，杜布罗夫尼克），划分为十五个军区，每个兵团均从本地征得其四个营的兵员，并入最近的军。这套制度极为合理，但奥地利此前从未想过施行，因为在民族主义时代，奥地利当局认为跨国性民族不可靠。若让他们留在本籍所在地区，他们可能与心有不满的当地人勾搭在一起，把枪口转向皇帝，因此，一八六六年战败之前，奥地利团每三年就在君主国各地搬风换位——捷克人到布达佩斯，匈牙利人到布拉格，克罗地亚人到威尼斯，德意志人到克拉科夫，乌克兰人到维也纳，诸如此类。这一“不驻在本籍”的做法，在承平时期是作为反革命措施施行，但在战时那使奥地利的军队动员变复杂，因而一八八〇年代时已大部分废除。但这一新的军区制度并非全无问题。有位奥地利将领于一九一四年二月写信给另一位将领：“请用脑筋较灵光的参谋换掉我那批参谋。”对方回道：“不行，将就着用你那批较不聪明的人。”这位将领希望找德意志人组成他的参谋班子，却奉命拿塞尔维亚人凑合着用。[9]

从战术上看，哈布斯堡陆军也试图效仿普鲁士。奥地利的规划人员扬弃突击战术（一八六六年被普鲁士火力撕碎的连纵队密集队形冲锋战术），换成普鲁士的火力战术。一八七五年受邀至特鲁特诺夫（Trautenau）古战场参观奥地利军事演习的一位法国军官报告道，奥地利教官以如下讲话为演习开场：“大家都知道一八六六年在此发生的事；我们的任务乃是清除并永远忘掉让我们流了那么多血却只得到些许成就的那些观点和战术。我们用散开的单位，速射的火力，取代那些老办法。”[10]

这个新战法无懈可击，但却从未真正施行。哈布斯堡王朝在取得最新科技和训练出能有效使用最新科技且足敷需求的人员上，总是慢半拍。如果未大量征募兵员，且训练他们估算射程、瞄准射击，士兵就无

法发出快速且分散的火力；届时士兵将得组成受军官、士官指导的密集队形，成为敌人的现成靶子，如一八六六年时所见。在一八九〇年代的科技革命（连发枪、机枪、急射炮）之前，奥匈帝国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就表现出一种令人痛心的倾向，即总是做错事或至少未能把对的事贯彻到底的倾向。他相信为他效命甚久的参谋总长弗里德里希·贝克的意见，批准大体上流于形式的演习。一八六六年后，他有多年时间公开拥护他的骑兵队（陆军中最后一块只有贵族能参与的领域），对于一八六六年他最能干的骑兵队队长利奥波德·埃德尔斯海姆（Leopold Edelsheim）欲扬弃长矛和马刀、代之以卡宾枪和手枪的作为，一律反对。[11]

政治上，这位皇帝的作为同样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解决一八六六年战败导致的政治危机，他与国内最难缠的对手匈牙利人，坐下来谈，提出了匈牙利人千载难逢的好交易。他提议，只要匈牙利人忠于哈布斯堡王朝，他愿把五成二的奥地利领土和四成的奥地利人口，交给只占这君主国人口一成九的匈牙利人掌管。作为只占有这一半奥地利领土的匈牙利人来说，他们只需负担帝国中央政府税收的三成。[12]

马扎尔人于一八六七年实质上脱离了一元化的奥地利帝国，在外莱塔尼亚重振将与维也纳没有直接关联的“匈牙利王国”。根据这位奥地利皇帝的实际头衔，他是匈牙利国王（也是波希米亚、克罗地亚、加利西亚和帝国其他地区的国王），但在一八六七年折中方案之前，这些头衔始终被视为百分之百的虚衔，因为它们名下的领土只是省份，而非王国。但这时这位皇帝则不得不认识到，匈牙利王位比其他王位都重要，连奥地利王位都比不上。布达佩斯能向维也纳提出各种要求，但维也纳不得向布达佩斯提出任何要求。自一五二六年维也纳取得匈牙利这块领土开始，奥皇就是匈牙利国王，属于他名下的奥地利建筑和固定物，一直都以k.k.这一缩写来表明为他所有。k.k.为kaiserlich königlich的首字母组合词，意为皇帝暨国王的。但这局面不再：一八八九年，匈牙利人要

求在两个k之间加上一个u（“和”），使两k不再如胶似漆地紧挨在一块。匈牙利人认为kaiserlich und königlich（皇帝的和国王的），比kaiserlich königlich，更彰显奥地利与匈牙利的分隔，更合他们的意。[13]

连这样的枝微末节都要这么讲究区分，令维也纳大为惊骇。这位皇帝原以为透过一八六七年的折中方案，他已用匈牙利的自治换取到统一的奥地利大国，以为让匈牙利人在其内政上完全当家做主，他们会真诚参与“共同的”或“联合的”k.u.k.陆军部、外交部、通商部、财政部。匈牙利人似乎过河拆桥，背弃双方的协议：他们从这个联合君主国得到很大的好处（五分之二的奥匈帝国人口，却只需负担帝国每年税收的三分之一），却一再阻挠军事、外交政策、财政、通商方面统归中央指导，此举别说是不知感恩，根本形同暗中扯后腿。住在维也纳美景宫（Belvedere Palace）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愤愤说道，奥地利会垮，不是会垮在敌对大国手里，而是会垮在“内敌——犹太人、共济会员、社会党人、匈牙利人”手里。[14]

弗朗茨·约瑟夫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心力放在应付维也纳、布达佩斯这两个互争高下的首都上，以确保哈布斯堡王朝的存续和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是件易事，因为哈布斯堡王朝，即使就较放任开放时代的宽松标准来看，都不具威严。一八八九年，弗朗茨·约瑟夫的独子暨皇储，三十岁的鲁道夫大公，爱上某男爵未成年的女儿，然后在他位于维也纳森林的狩猎用的住屋梅耶林（Mayerling）里，开枪杀了她再自杀。这一杀人、自杀事件，不仅使不苟言笑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不久后成为新皇储，也切断了皇帝和皇后之间本就没什么往来的联系。这时，皇后正在维也纳之外四处旅行，直到一八九八年遇刺身亡，才结束这一云游四海的习惯。

皇室成员发生丑闻时，采取措施控管其对皇族威信或形象的伤害，乃是当时的一贯做法。人人都知道这皇帝有个情妇——女演员卡塔丽娜

·施拉特（Catharina Schratt）——跟了他三十年，但没人在报纸上谈论此事。皇帝的弟弟路德维希·维克托（Ludwig Viktor）一九〇四年两度在公共澡堂与男伴一起被捕（第一次在维也纳，第二次在意大利）时，该丑闻遭掩盖。没有一家奥匈帝国报纸提及此事；想将此事曝光的报纸则遭罚款、没收。路德维希·维克托本人被诊断得了“忧郁症”，被关在他的乡间宅邸，不得出门。[15] 在柯尼希格雷茨之役中，中产阶级出身的将领，败得和贵族出身的将领一样惨。于是，经过此一败仗之后，弗朗茨·约瑟夫开始安插诸大公（哈布斯堡家族的亲王）出任每个指挥要职，以捍卫帝权，但这些人都未有出色的表现。法国大使馆于一八九七年品评其中居首的两位大公时论道：“弗里德里希，欠缺将领的基本要素；欧根，苦干实干，但没有天赋。”[16] 而这两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是整个家族里最优秀之人。哈布斯堡王朝无疑存活了下来，但这个身为大国的君主国已开始步上死亡之路。

匈牙利是让哈布斯堡家族丧命的病毒。一八六七年后匈牙利的阻挠，啃蚀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基础与行政根基。一八七八年，叛乱席卷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维也纳认为正可趁机从土耳其手里夺走这两个省份，并入奥地利，进而达成一八六六年奥地利遭意大利和德国驱逐后，奥匈帝国一直追求的新使命——使奥地利称霸巴尔干半岛。不幸的是，连占领这两省都遭匈牙利人反对，更别提将它们并吞，因为匈牙利人担心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百万左右的斯拉夫人加入后，会使本已是少数民族的匈牙利人在这君主国里更为少数。在柏林会议上，俾斯麦想把土耳其这两个省送给奥匈帝国，以在俄国于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对土战争扩大领土后，重新平衡欧洲诸大国的势力，结果发现这一可笑的情况：“我听过有人不肯吃他们的鸽子，除非有人把鸽子射杀，替他们烤好，但我从没听过有人非要人把他的嘴掰开，把鸽子强行塞进他喉咙，他才肯吃。”[17]

在内莱塔尼亚境内，也没有一个联合起来对付马扎尔人的亲哈布斯

堡集团。弗朗茨·约瑟夫在位期间，这位皇帝始终依违于德意志自由主义中间派和斯拉夫封建体制联邦派之间。从一八七九年至一八九七年为止，皇帝把内莱塔尼亚的政事交给爱德华·塔弗（Eduard Taaffe）伯爵的“铁环”（Iron Ring）内阁处理。这个内阁的最高目标，乃是使帝国的诸多民族处于“轻微不满的平衡状态”中。[18] 但这个让皇帝享有某种程度控制权的办法，在民族主义与大众通信发端的现代，却变得较无效。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为了一些次要但被民族社团和报纸大做文章的问题（例如某小镇小学的教学用语），奥地利几度更换内阁；若在十九世纪初期，则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奥地利十七个省里，德语始终是规定的学校教学用语，而地方语言的学习只列为选修课；这一安排在过去得到接受，这时却激怒日益要求自身权益的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等民族。捷克裔历史学家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Frantisek Palacky），一八四八年主张“如果未曾有奥地利帝国，也该把它造出”，以防俄国宰制。这一为帝国张扬的言谈，五十年后引来讪笑。奥地利诸民族不想要奥地利或俄罗斯，他们要的是自由。

在奥匈帝国，一八九七年是生存出现危机的一年。为帝国二元制给予匈牙利人的优惠暗暗不满多年的捷克人，终于起事反对内莱塔尼亚的官方德意志文化，要求让捷克语享有同等地位。新任奥地利首相卡西米尔·巴德尼（Casimir Badeni），让捷克语与德语在说捷克语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两省境内享有同等地位，想借此平息捷克人的怨气（并巩固塔弗的旧“铁环”）。从此，官员得通晓这两种语言，但捷克人已从学校教育习得德语，因此受此一改革影响者只有德意志人。在这之前，只有少数德意志人特意去学捷克语。结果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愤怒的德意志人打断维也纳帝国议会的运作，推倒议员座席，丢掷墨水瓶，在布拉格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两地的其他城镇动用暴力。[19] 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从萨克森跨越边界，嘴里唱着德国爱国歌曲《看守莱茵河》（*Wacht am Rhein*）和《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 über Alles*），誓言阻止他们的“奥地利兄弟”失势。

有位外交官写下令人震惊的心得，说：“德意志元素，始终是奥地利境内最强的胶黏物，如今却已成为促成奥地利分解的最有力东西。”[20] 德意志人担心自己的地位在奥地利衰微，于是强烈捍卫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背弃传统自由主义政党，改投向民族主义政党的怀抱，例如格奥尔格·冯·舍纳勒尔（Georg von Schönerer）所创立，极力主张民族主义“比忠于王朝重要”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党（Pan-Germans）。[21] 就连德意志族奥地利人都破天荒开始主张将哈布斯堡君主国分割为数个民族国家。舍纳勒尔谈到他的“德意志心”，把德国（而非奥地利）皇帝称作“我们的皇帝”。巴德尼当政时，帝国议会的德意志族下议院议员，每听到有人提到霍亨索伦一名时即欢呼叫好，表明其对声势蒸蒸日上的普鲁士统治家族的支持，摆明其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不以为然。这类的颠覆性看法，扼杀了哈布斯堡王朝长久以来的多民族特质。

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所领导的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的壮大，反映了新的思想状态。[22] 奥地利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党，在一八九〇年俾斯麦下台后和舍纳勒尔因多项丑闻被起诉后势力衰退，却在巴德尼当首相期间，在卢埃格尔掌旗之下声势复振。舍勒纳尔提及德意志帝国时总是语多赞赏，因而他在奥地利始终无法打入主流社会。卢埃格尔完全不玩这一套，表态效忠于哈布斯堡王朝，但保留民粹元素：反犹和鄙视居奥地利人口过半数的斯拉夫人。维也纳曾以其超越民族或地域的开阔心胸而自豪，维也纳人喜欢在日常言谈中穿插来自帝国各地民族的语言，但这时，在德意志沙文主义者眼中，这意味着堕落性的言语混杂。既是地道的德意志人，在咖啡馆里还可以用意大利语将送饮料来的侍者称作piccolo？还可以随兴用波兰语的chai来点茶？还能在日常言谈中讲到“另一个”时随意用匈牙利语来表达，例如在Geb’n wir auf die maschikSeite（“我们到另一边去吧”）中所见？德意志人还可以用意第绪语将糟糕的商业交易称作meschunge？[23] 奥地利蓬勃的犹太文化尤其是受攻击的靶子。随着反犹心态（“傻瓜的社会主义”）高涨，意第绪语衰落。《犹太问题》（*Die Judenfrage* ）之

类的书籍，指出犹太人阴谋推翻、摧毁哈布斯堡君主国：内莱塔尼亚境内的报社，有三分之二在犹太主编手中，而据反犹主义者的说法，在匈牙利境内，情况更严重，“犹太裔马扎尔人”主宰报业、需专门知识的行业、艺术、商业、工业，担任“舆论的参谋”。[24]

随着唯我独尊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在奥地利政局里得势，对多元性的包容乃至赞赏，成为明日黄花。感受到德意志人这一压力的斯拉夫人——在捷克人帮他们打头阵下——强力申明他们本身的利益，扬言要瓦解内莱塔尼亚的德意志行政体系和德意志氛围。奥地利领袖苦恼地绞拧双手，却没什么因应作为，巴德尼则认为这些内部仇恨和帝国军事安全两者有着谁都看得出却遭忽视的关联：“多民族国家发动战争，必会危及自身。”[25]

随着皇帝渐老，角色更显重要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认为奥地利的匈牙利民族是最大的隐患。他惊骇于弗朗茨·约瑟夫一九〇三年向匈牙利人做出的新一轮重大“民族让步”，认为那无异于向君主国已然受损的军力发出致命的一击。

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在奥匈帝国所发挥的社会、政治作用，乃是其他任何地方所未见。在这君主国里，每个男子都有义务服兵役，因此军队隐隐然是一所“国家学校”，透过这学校将帝国的十余个民族去民族化，教他们学德语、尊敬皇帝（皇帝玉照到处悬挂）、看重自己身为多民族“奥地利人”的身份。匈牙利人所攻击的，就是这一趋同化异的作用，为此他们大删军事预算（即使在帝国面临危机和科技变迁迅速的时期亦然），并为说马扎尔语的匈牙利地方防卫军，而非为正规军，竭尽所能挑选最好的新兵。[26] 自一八八九年起，匈牙利一直粗暴拒绝让帝国每年的征兵员额与内、外莱塔尼亚两地的人口增长同步调升，因此，多年来，k.u.k.陆军兵力逐渐萎缩。就在帝国人口已超过五千万时，陆军仍根据先前人口普查得出的三千七百万人口征募新兵。一九〇〇年，在奥

地利每一百三十二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相较之下，在法国是每六十五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在德国是每九十四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在俄罗斯是每九十八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这使帝国陆军的兵力只有法国或德国的一半，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就连意大利在每十万居民里强征、训练的男丁人数都高于奥地利。

匈牙利不同意增加新兵征募员额或预算，使得火炮——在急射枪炮和化学爆裂物时代最有威力的作战武器——数量无法增加。在这方面，奥地利人也落后，每三百三十名士兵才拥有一门（落伍的）火炮，相较之下，德国和法国是每一百九十五名士兵有一门火炮。[27] 这一不足将在一九一四年时产生重大影响，届时奥匈帝国才赫然发现本国火炮的质和量都逊于对手。

最后，一九〇三年，匈牙利人终于大发慈悲同意每年征兵员额增加两万四千名，但附带令人咋舌的条件：从此，凡是在匈牙利境内征集的奥匈帝国部队，都要挂匈牙利旗帜，从而打击了“联军”概念；在匈牙利参谋部和匈牙利团服务的奥地利军官则会被“遣返”奥地利，好似把奥地利当成外国；匈牙利语将从此是设在匈牙利境内之奥匈帝国军校和军事法庭的官方语言；匈牙利地方防卫军将终于获准拥有自己的火炮。一八六七年起，维也纳一直不愿给予匈牙利上述最后一项特权，以确保其与匈牙利人内战时占上风。更让奥地利难堪的是，从此之后，奥地利纳税人不只得支付他们自己奥匈部队的经费，还得支付四分之一匈牙利部队（一百九十六个匈牙利步兵营中的五十二个、一百零八个匈牙利炮兵连中的二十八个、一百零八个匈牙利骑兵中队中的二十八个）的费用，为此奥地利人每年得多付四千万克朗，而且这笔花费往后肯定会逐年增加。而由于匈牙利为二元帝国负担的军事开销如此低，奥地利人更觉辱上加辱；匈牙利的人口是巴尔干小王国罗马尼亚三倍之多，每年为奥匈共同军承担的费用却和罗马尼亚差不多。[28]

凡是客观的观察家都把奥匈帝国军力的衰落归咎于匈牙利，维也纳的统治者也不例外。一九〇三年让步之后，身处于昏庸、易受骗之帝国核心政治圈外的人士，开始打算对付匈牙利这个绊脚石。四十二岁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一九〇五年在奥地利众多的作战计划之外悄悄添加了一个U计划（U指Ungarn，即德语的匈牙利）。如果匈牙利人继续阻挠奥地利重振哈布斯堡君主国，奥地利将透过铁路和多瑙河将大军送入匈牙利，占领布达佩斯，扶立一哈布斯堡军事行政长官。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认为，位于外莱塔尼亚的五个奥匈军中，只有一个军，即在布达佩斯周遭征集的第四军，会在内战时为匈牙利而战；其他四个军，由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组成，会为皇帝而战。据法国大使馆的说法，一九〇〇年代初期，奥匈帝国避掉一场“类似一八四八年”时奥地利部队入侵匈牙利以敉平该地革命的内战，乃是因为匈牙利人知道打仗他们会输，而奥地利人则担心意大利人会趁奥匈内战的机会入侵主权归属有争议的哈布斯堡王朝领土，例如的里雅斯特、特伦蒂诺（Trentino）和南蒂罗尔。[29]

一九〇三年的军事让步，羞辱奥地利太甚，以致弗朗茨·约瑟夫的首相、陆军部长、参谋总长都递出辞呈（全遭挽留）。法国大使馆谈到“奥地利皇帝全然怠惰、愚昧、绝望的心灵”：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为何会与匈牙利达成这一“糟透的协议”？“皇帝把他君主国最大、最富裕、人口最多的那一半视若无物，”法国大使馆惊叹道，“若不收回这一做法，后果将不堪设想。”[30] 语言与旗帜上的这一让步，让每个人都推断下一次匈牙利人会以此为先例，要求完全废除德语。而捷克人受到这一让步的鼓舞，要求让他们军队以捷克语为指挥用语，挂他们自己的波希米亚旗，对此要求，皇帝——没道理地——连讨论都不愿。捷克民族主义者软土深掘；从此，军官点名时，捷克籍新兵大胆打破既有规矩，答以zde（有），而非hier。

向来靠德语维持团结的多民族军队，崩解速度愈来愈快。原本所有

军官均得说一口流利德语，所有新兵都得记住八十个指挥用的德语词。皇帝所做出最令人震惊的让步，乃是替这份协议锦上添花，让匈牙利语在匈牙利的军校和军事法庭享有崇高地位：从此匈牙利军官可以不必学德语、说德语，能把这件苦差事丢给他们的士官。弗朗茨·约瑟夫的陆军部长对此一姑息作为写了篇尖刻（但匿名）的评论，人在科诺派斯特（Konopischt）之波希米亚乡间宅邸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得知后击节赞赏："写得好！立刻发布。一切后果由我承担。"[31] 这时，维也纳的军方领袖用触及层面甚广的"军队问题"一词来指称，因为一切（语言、旗帜、歌曲、武器装备）似乎都没个准，匈牙利人终于拿到自行添置火炮的权利。更糟糕的，诚如弗朗茨·约瑟夫的亲信顾问卡尔·巴尔道夫（Karl Bardolff）上校所指出的，与匈牙利人进行的这些累人的谈判，每一场都暴露了奥地利陆军有多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受过训练的奥地利步兵连编制较小，奥地利每个营所拥有的机枪较少，奥地利的火炮较少。[32] 由于资金、兵员太缺，有个奥匈新军区，位于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的第十六军区，配属的部队不是新征集的营，而是厨子、乐师、店员和从其他十五个军勉强拨出的士兵。一九一〇年，匈牙利人试图阻挠奥匈帝国建造两艘无畏级战舰的计划，最后在皇帝答应于匈牙利的阜姆（Fiume，克罗地亚语称里耶卡/Rijeka）造船厂建造第三艘战舰后才软化立场。[33]

一九〇七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终于找到向匈牙利人施压的办法，或者说他认为他已找到办法。他会发布敕令，让奥地利、匈牙利境内的所有男子都享有投票权，借此让非匈牙利人，也就是外莱塔尼亚境内可能亲奥的人民，享有权力。但匈牙利人无视皇帝的敕令长达三年，然后，在匈牙利一九一〇年的议会选举时，拒绝实行该法令，且只让外莱塔尼亚境内有钱、受过教育的马扎尔人享有投票权。内莱塔尼亚则立即依照敕令，让所有男子享有投票权，结果招来一场皇帝所始料未及的灾难。社会民主党拿下帝国议会五百一十六席中的八十六席，蛮不讲理的斯拉夫人、德意志人集团拿下其他席次，使议会从此瘫痪于他们的吵

闹争执。原先分裂为中间派、联邦派两派的帝国议会，从此以阶级和族群为分界线分为不同阵营。社会民主党抨击皇室、富人、教会的特权。大部分下议院议员加入院内二十多个“民族社团”的其中一个。到了一九一三年，每年与匈牙利代表团会晤一次以协调政策和批准预算的奥地利代表团，已沦为胜选政党酬庸支持者的东西，有七名德意志人、七名波兰人、四名捷克人、五名社会民主党人、七名基督教社会党人、三名克罗地亚人、三名斯洛文尼亚人、两名乌克兰人、两名意大利人等，直到将四十个名额填满为止。[34] 在外莱塔尼亚，代表团的成员没这么多元，因为一族独大的马扎尔人，以“抵触匈牙利国策根本原则”为由，压下罗马尼亚人和其他弱势民族要求在学校或官方机构讲自己语言的努力。沙文主义的马扎尔人，例如阿尔贝特·阿波尼（Albert Apponyi）伯爵，自豪地谈到文化上的“殖民化政策”。[35]

一九〇七年在为扩大选举权后选出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主持的开议仪式时，弗朗茨·约瑟夫恳请议员“把他们对帝国的职责更加放在心上”，把他们各自所属的民族放在其次，但在民族主义时代，这样的呼吁几乎无异于对牛弹琴。[36] 由于禁不住奥地利德意志人施压，皇帝已于一八九九年废除巴德尼的开明语言法，而新爆发的德意志人-斯拉夫人暴力活动，一九〇八年十一月迫使皇帝的内阁阁员集体请辞。接着布拉格戒严，该城两万捷克、德意志暴民相互攻击长达两天，在基本上实行族群隔离制的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捷克人大举涌出说捷克语的院系，德意志人大举冲出说德语的院系。三百人丧命，六百人受伤——承平时期骇人的伤亡。[37] 接着，在莱巴赫（Laibach，斯洛文尼亚语称卢布尔雅那/Ljubljana）、特罗保（Troppau，捷克语称奥帕瓦/Opava）、维也纳、布隆（Brünn，捷克语称布尔诺/Brno），为教育问题发生类似冲突，愤怒的奥地利斯拉夫民众扯下哈布斯堡旗，高唱俄罗斯、塞尔维亚国歌。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从国际观点评断这场最新的内部危机，认为那“表明族群情感已在奥地利多个地方走到极端”。奥匈帝国因无力解决丛生的问题而逐渐崩解，皇帝不得不将其最可靠的士

兵，波斯尼亚穆斯林，安置在卢布尔雅那之类城镇的街头和广场上，以防德语学校、剧场、社团遭攻击。诚如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所说，在非德意志人区域，德意志人机构已成为眼中钉，这些城镇“有过去，甚至有张脸，但眼睛和嘴巴不搭，或下巴和头发不搭”。[38]

于是，人尽皆知的奥匈帝国行政系统取代代议机构，负起治理这君主国之责。[39] 为吸收人数日增的大学毕业生，国家行政机关广设耗掉不少税收的职位。罗伯特·穆西尔在家乡克拉根福特下船登岸后，参观了“省级总部、中小学校与大学、兵营、法院大楼、监狱、主教府邸、会议室与剧场，并由掌理它们所需的人陪同”。那是个“庞大的帝国行政机器”，主要由“数百年前移植到斯拉夫土地上的德意志自治市镇居民构成”，而这些移居者在这君主国各处兴旺滋长。[40] 这一赞助的开销——每年花在行政官员上有二十亿克朗，大约是这位皇帝的军事支出的五倍——彻底压垮国家预算，一九一三年光是哈布斯堡文职机关就耗去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总税收。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弗朗茨·约瑟夫的陆军部长在向奥匈两代表团讲话时透露，光是匈牙利一地（不断抗议哈布斯堡陆军规模过大之地），就雇用了三十二万名公务员，换句话说匈牙利的行政官员人数，比整个奥匈帝国陆军的士兵还要多。[41] 即将降临的全民战争将需要有效的民众治理，而奥匈帝国本身的条件无法应付这一挑战。一九一四年总绾奥地利兵符的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在战前痛批奥匈帝国“备忘录、许可条、公章、请愿书、议事录、报告”的自挖墙脚文化。[42] 地位、头衔、级别、形式始终被看得比效率还重要，导致这一帝国乱无章法、屡屡出错，而在平时这危害就颇大，战时则会毁掉国家。

哈布斯堡王朝希望其陆军的运作会比行政系统更有效率，并消弭帝国里日益严重的民族差异，结果却事与愿违。在这个原本自豪于其“超民族性”的包容和活力的军队里，懂得多种语言之人，例如一九〇六年

出任参谋总长、能讲奥匈帝国十五种语言中之七种的康拉德，乃是异数，而非常态。在匈牙利，马扎尔语之外的语言遭禁。在奥地利，外国武官注意到，多民族理想实际上很少实现；理论上，举斯洛文尼亚团为例，团里的士兵彼此交谈会用斯洛文尼亚语，但长官指挥他们时用德语。因此，士兵学会几十个德语短语，但在这样的团里，军官被认为该说流利的斯洛文尼亚语，以便说明复杂事物，与其士兵打成一片。事实上，德意志籍军官占大多数的军官团，会极度倚赖《军用斯洛文尼亚语手册》（*Military Solvenian*：*A Handbook* ）之类的速查卡，里面有“闭嘴”、“除非找你谈否则别开口”、“在我办公室等我”、“马厩里不准抽烟”、“还是不懂？”之类的实用短语。团军官得懂他们部下的语言，或至少得懂这些实用的短语，但参谋不必。这导致演习时出现可笑场景（战时就没那么好笑）：参谋快马驰抵前线部队，用德语厉声质问（“敌人在哪里，兵力如何？”），前线部队一脸茫然地盯着参谋。[43]

对一个建立在地区合作、族群合作理念上的帝国来说，这些语言争议表明情势非常不妙。大部分奥匈军官除了懂德语，其实只懂本族语言（陆军本身的统计数据显示，不到一成军官会讲斯洛文尼亚、乌克兰或罗马尼亚之类语言），因而把他们说成是他们的鲁里坦尼亚（Ruritania）世界的热情积极公民，乃是种迷思。无法精通如此多种重要语言，令军官苦恼，同样令军官苦恼的，是败坏士气的政治作为。例如，根据未成文规定，共同军里的匈牙利籍军官，对其他语言的掌握可以不必到流利的程度，因为皇帝急欲取得马扎尔人的“输诚效忠”。这使未能免除这要求且痛恨得利用闲暇时苦记捷克语或波兰语语法或乌克兰字母的奥地利军官怒不可遏。[44] 捷克人在陆军军官里所占比例甚高，但很少出将领；他们也常因彼此用捷克语交谈，乃至在咖啡馆里用捷克语对女士讲话，会被上级叱责。这种会以用捷克语写明信片为由惩罚军官的军队，显然已失去该军队过去所一贯拥有的超民族性活力。[45]

语言只是哈布斯堡军队所面临的诸多难题之一。决意遏制维也纳独

大的匈牙利，使帝国陆军自一八六七年起一直维持如此小的规模，从而使军官对士兵的比例高得离谱。一九一三年时三十三万五千人的陆军有两万名军官，军官对士兵的比例高居诸大国之冠，而且这些军官的素质在变。首先他们逐渐老化，也就是说有一些已显老态的指挥官和一个由享有丰厚退休金的退役人员组成而吃掉大量现役陆军经费的庞大组织。哈布斯堡陆军把那些过度膨胀的退役人员团体称作pensionopolis。[46] 例如，一九一〇年，有三十三名现役三星将领，更有人数是这三倍的退役三星将领。两星将领的情况同样糟：九十一名现役，三百一十一名退役。就一星将领来说，退役是现役的四倍之多。

剩下的真正现役军官，诚如莫里茨·冯·奥芬贝格（Moritz von Auffenberg）将军在一九一〇年谈奥匈军官团的报告所表明的，情况同样令人惊愕。至一八六六年为止，奥匈陆军的最高阶军官均由贵族充任，下层军官则均由乡绅和靠己力翻身的有钱农民子弟——奥芬贝格所谓的“保守、冷静、安稳的上流社会人士”——充任。这些人是能把一排排农民出身的步兵团结在一块，并让他们心甘情愿忍受艰苦行军、接受死伤的那类人。但二十世纪的新军官，已跟着社会其他行业一起变动。奥芬贝格发现，贵族已“几乎完全不投身军旅”，且乡绅和有钱农民子弟所占比例也在衰退（据奥芬贝格估算，降到四成或更低）。这时，大部分军官是“铁路职员、旅店老板、店员、基层小官员、老师、商店老板”出身。他们缺乏旧式军官的“吃苦耐劳、勇气、冲劲”，当旧式军官统领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军队时，好似天生就属于那军队。但这时，陆军里有农村出身的兵，也有城里来的兵，把他们交给庶民军官带领，庶民军官很容易受到正撕裂君主国的民族主义政治主张的影响，且不大挺得住敌人的猛攻。即便有八成军官和过半数的士官是德意志人，但也不利于军队战斗力，因为这些德国军士官普遍才能平庸，面对军中人尽皆知的低薪和升迁缓慢，甘之如饴。狄俄尼索斯·加布伦茨（Dionysus Gablenz），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时唯一从普鲁士人手里拿下一场胜仗的那位奥地利将军之子，一九一四年，六十岁时官拜少校，仍在特莱西

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捷克语称泰雷津/Terezin）的要塞行政当局服役（如果那叫作服役的话）。

奥匈帝国的入伍兵中的大部分非德意志人，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都不会听命于这些军官太久。[47] 奥匈帝国军官对士兵所讲语言的精熟程度受到大力赞扬，但在这点上，奥芬贝格也觉得没什么特别。他认为由于当时的“民族沙文主义”，奥匈帝国所需要的军官，远不只是个结结巴巴说捷克语或斯洛文尼亚语的德意志籍军官，而是需要会说德语且能激励自族士兵的捷克籍或斯洛文尼亚籍军官，但这样的人才老早就离开军职，投入其他行业。

奥芬贝格也慨叹军中缺少富裕中产阶级出身且受过教育的军官，这类人全涌向金融业和需要专门知识的行业，“追逐富与贵”。自一八五九、一八六六年两场战败之后，奥匈帝国陆军已失去其社会威望，且未再找回，而要和现代“易得手的钱财”和“物质主义精神”相对抗，注定没有胜算。在平时，中尉要升到上尉，平均要花上十六年，而到了上尉这个官阶，普通军官大概会退役，且还是单身，没有女朋友（择偶条件高的女人不会嫁这种男人），靠微薄退休金过日子，把大部分储蓄挥霍在养马、制服、赌博、上妓院、上舞厅，以及为上述消费欠下的债上面。有幸于熬了二十五年后升上少校者，一年薪水将只有三千六百克朗（五百美元），连小学老师、电车车长乃至水电工都还不如。而这些人还算命好，只需烦恼升迁缓慢和微薄薪水的问题（匈牙利代表团将薪水冻结在一八六〇年代水平，使有意从军者打退堂鼓）。那些没这么好命者，则在更早时就因伤、病或违反军纪而被迫离开军队，过着苦不堪言的穷日子。

奥芬贝格于一九一〇年报告道，奥匈帝国军官团里的这些社会性变化，产生了一种“强烈且危险的自满心态，而且只有在土耳其陆军军官身上才能找到比这更自满的心态”。还存有一种不悦，即对奥地利军中

食堂的不悦。奥芬贝格以陆军督察身份走访了数十个军中食堂后指出，“走进食堂，你会发现餐桌上连葡萄酒都没有”。在场众人个个为葡萄酒的昂贵发愁。过去，“快乐战士精神”将晚上喝醉、狂笑的奥地利军官团结在一块，此刻，那一精神已成明日黄花。[48]

俭省挂帅的哈布斯堡陆军里，还存有贪污歪风。一九一〇年奥芬贝格揭露这一歪风，而在他拿军火承包商的股票搞内线交易后，他本人也因贪污于一九一五年受罚。“为了提升社会地位、改善经济状况、逃离卑微的边境岗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沮丧、愤怒、怀疑、烦乱，使我们的军官作奸犯科，”他如此论道。奥芬贝格尖锐地谈到陆军军官教育程度的低下，“他们大部分人连一场像样的交谈都做不来”。[49] 那些擅于交际者发动猛烈的地盘争夺战，以使自己更接近维也纳和该地有钱有势者的圈子。

虽然一八六六年败于普鲁士之手，却也使奥地利参谋部咸鱼翻身。直到一八六六年为止，职责为情报搜集、动员、拟定作战计划的参谋一职，都被视为可鄙、死气沉沉的职务；走参谋这条路，不会使人更快出人头地，只会妨碍人出人头地。但普鲁士毛奇将军的优秀参谋部，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中所拿下的数场漂亮的胜利，已使各国陆军（包括奥地利的陆军）相信应该扩编参谋部员额，并赋予他们权力。这样的转变并不容易，即使对普鲁士来说都是如此。一八六六年柯尼希格雷茨之役时，毛奇向某军军长下了一道命令，军长回道，“这好倒是很好，但毛奇将军是谁？”他当然知道毛奇将军是谁，只是装作不知道，以免参谋部连他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管。

一度困扰普鲁士陆军的那种人事政治，这时在奥匈帝国扎根。参谋官与团军官钩心斗角，而军方的新作风更加剧这暗斗。哈布斯堡参谋部以让军队更能打、“更普鲁士”为名，持续增加团参谋官的人数，于是到一九一〇年时，每个团有十或更多参谋官，每个营有两个参谋官。但野

战部队认为此举意在扩大权倾一时的参谋总长的影响力和职务任命权，而非使野战部队更有战斗力。派系分立，人尽皆知。曾任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之参谋总长达二十五年（一八八一至一九〇六）的弗里德里希·贝克将军，乃是唯一被这位老皇帝称作“我朋友”之人。老狐狸贝克透过这一深厚交情集大权和庞大财富于一身，因而被人畏称为“副皇帝”。[50] 贝克变得日益懒散，生活舒适讲究吃喝，却坚持不肯退休，靠下属代劳他的职务。其中最可靠的下属，乃是人称“贝克的皇储”，将在一九一四年时扮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角色的奥斯卡·波蒂奥雷克（Oskar Potiorek）将军。在日益萎靡的贝克终于被逼退休时，派系现象更为严重，因为新的派系不择手段谋取贝克超过二十五年来所积聚的权力（贝克被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逼退时，难过的皇帝给了贝克一份工作清闲而报酬优厚的闲差作为补偿）。[51]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身为武装部队督察长和皇储，经营一有力派系，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和其副官（军事办公室主任）阿瑟·博尔弗拉斯（Arthur Bolfras）将军，也有自己的派系。贝克自一八六六年起一直是皇帝的亲信，因此皇帝和博尔弗拉斯自然打算让“贝克的皇储”波蒂奥雷克接任参谋总长。但弗朗茨·斐迪南不想看到贝克下台后透过代理人继续呼风唤雨，于是想到了他在一九〇一年匈牙利境内的帝国军事演习时遇过的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52] 派系分分合合，叫人眼花缭乱。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年担任奥匈帝国陆军部长的弗朗茨·舍奈赫（Franz Schönaich）将军，利用陆军部结党营私，提拔自己门生。他与皇帝和博尔弗拉斯结盟对付康拉德，但也对付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其超级干练的军事文书署署长亚历山大·布罗施·冯·阿雷瑙（Alexander Brosch von Aarenau）上尉（后来升少校，再升上校，这在这些有权有势的小圈圈里升迁不慢）。

一九一一年的舍奈赫危机，使这些派系对立之事曝光。那一年，两派系达成一重大交易：皇帝愿意将舍奈赫解职，换取斐迪南大公将康拉

德解职，他因鼓吹战争、高谈匈牙利之不是而令皇帝极为反感。斐迪南大公瞧不起舍奈赫对匈牙利人不够强硬，动不动就让步以安抚匈牙利人的不满。法国大使馆眼中“冷漠、乏味、时时紧张且性情不定”的波蒂奥雷克，极力想夺下参谋总长之位，他具有足以和这个“舍奈赫圈子”联手对付康拉德的资深地位和分量。法国人指出，“他极想坐上参谋总长的宝座”。这一次，波蒂奥雷克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他继续耍阴谋施诡计，直到一九一四年一次大战爆发为止，乃至爆发之后。[53]

为遏制持续侵权的斐迪南大公，凸显帝国大政仍由他当家做主，这位老迈的皇帝坚持每年由他，而非由弗朗茨·斐迪南，发布升迁令和交付任务。奥匈帝国军官抱着嫉妒心态看谁拿到“最好的驻地”和职位，谁被流放到偏远落后的地方。参谋官把野战军官斥为“前线野兽”，而这些“野兽”则痛批参谋官在灰屋（‘das graueHaus’位于维也纳的参谋部总部）无休无止的阴谋诡计。在贝克、康拉德领导下，受冷落的“前线野兽”老年化，饱受呵护的参谋官则年轻化。一九一二年，有位军官哀叹军队里他所谓的“令人苦恼的不搭调现象”，即既有欧洲最老的野战军官，又有最年轻的参谋。[54] 奥芬贝格于一九一〇年建议打开灰屋的窗子，好让“光线、空气、清新微风进去，吹走维也纳的派系、爱泡咖啡馆者、整天窝在办公室的头头”。[55] 布罗施上校于一九一三年示警道，康拉德（斐迪南大公的早期门生）已在参谋部作战局建立自己的派系。这时的参谋部作战局被人称作Feldhernngestüt，即将领的种马场。如果康拉德不让某军官到那个机关历练，那人绝无机会出掌军或集团军。一如他之前的贝克，“康拉德权力已太大，凌驾整个军官团，且安插自己人填补最好的职缺，从而摧毁了士气”。“在咖啡馆这个流言蜚语的渊薮生出”的中伤传言，引发派系对立。

有斐迪南大公这条人脉当护身符的布罗施上校，在一战前的几年里不断暗地诉说康拉德的不是，也抱怨钱的事。有钱军官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收入不足以温饱的军官，服役和退役期间都得忍受穷苦生活，两

者间的反差使整个军官团气氛紧张。执掌陆军部某部门的乌尔班将军（General Urban），虽在一九一一年拿了全额退休金退役，却在一九一三年重回陆军部任职，“因为发现在外面过不了好日子”。[56]

在这气氛下，唯利是图和贪污之风大行其道。布罗施上校在美景宫任职许久之后，弗朗茨·斐迪南安排他前往博岑（Bozen，意大利语称博尔扎诺/Bolzano）享有盛名的第二皇家步兵团，然后布罗施从博岑写信给奥芬贝格，感叹“即使人在温泉疗养镇，还是无法放轻松”。他为已计划好与妻子搭船前往希腊、西西里一事发愁：“我要怎样用我那一点小钱玩个尽兴？”他们夫妇俩挑“并不是海上航行之最佳季节”的冬天搭船出游，因为“那时搭船、在船上吃住较便宜”。安全舒适的客轮，例如汉堡-亚美加利公司或奥地利洛伊德公司的客轮，票价较贵，因此他选择了票价便宜的老爷船以省下更多钱，那艘船“又小又挤，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颠得人想吐”。布罗施得意地说道，他把价钱砍到九十五克朗，因为“军官和其眷属可打五折！”这一趟出游省下的钱还不只这些，因为这次出游将使他离开博岑，从而可以不必参加为军官、士官、退伍老兵办的多场嘉年华舞会，可让薪水微薄的他少花一些钱。要在军中闯出一番事业，必得有团长资历，而布罗施能掌管这个著名的团和为其军中资历镀金的驻地，得归功于他的人脉，但他显然错过了取得他所谓维也纳之“肥缺”的机会。[57]

在哈布斯堡军队四处找钱或省钱以维持生计时，哈布斯堡帝国巍巍颤颤走在灭亡边缘。一八六七年折中方案的经济、军事条款，每十年得重订，而一九〇七年的重订争辩比以往更为激烈。这些条款已与男性普选权这个令人忧心的问题牢牢挂钩，无法分割。为使老迈的帝国更有活力，皇帝已同意让奥地利、匈牙利境内的成年男子都享有投票权，但只有奥地利这一边落实这道法令。匈牙利人向来不屑维也纳所发出令其困扰的指示，这一次亦不例外，仍只让其百分之七的人口享有选举权，摆明不把他们的人民和君主放在眼里。直到迟迟未有动作的皇帝终于扬言

要用武力（而非只是下命令）在匈牙利落实男性普选权时，马扎尔人才在一九〇七年重订折中方案，让这一体制得以再走十年。马扎尔人要能继续主宰匈牙利，有赖于使该王国内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在其现有体制下——占匈牙利人口五成五的匈牙利人占去议会席位（四百零五个）的九成八——不敢妄动。就连厚脸皮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这时都觉得这一中世纪的安排让其在国际上颜面挂不住。牛津大学学者塞顿-华森（R. W. Seton-Watson）一九〇八年出版的《匈牙利的民族问题》（*Racial Problems in Hungary* ）一书，详述布达佩斯对外莱塔尼亚境内非匈牙利裔人民的种种不当对待，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令弗朗茨·约瑟夫大为不快。为挽回颜面，说服匈牙利议员照奥地利人已做的（和奥地利人所希望匈牙利照做的）行事，皇帝破天荒于一九〇八年秋将其皇廷搬到布达佩斯，以就近督导选举改革的落实。

七十八岁的皇帝兼国王从伊舍（Ischl）坐了十小时颠簸的火车来到布达佩斯，欲解决男性选举权的问题，结果吃了闭门羹。马扎尔人靠选举舞弊保住其独大地位，匈牙利的“自由党人”认为没理由改变现状，即使皇帝兼国王下令亦然。于是，一九〇八年匈牙利的选举权“改革”成了这副模样：占人口超过四分之一的文盲，只有十分之一有投票权（其他十分之九则无权投票）；高中毕业生（全以马扎尔语受教育者），每次投票可领两张选票；大学毕业生和有钱纳税人可投三次票。投票也非秘密不公开，但选票得公开示众，以使“投票人不至于在秘密投票的掩护下违反自己的承诺”。有了这些规定在手，说马扎尔语的乡绅和有专门知识的专业人员，将可以几乎毫无阻碍地永葆其在匈牙利的支配地位，无视较弱势之匈牙利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的心声。[58]

简而言之，匈牙利人要把哈布斯堡帝国拖到悬崖之外。在识字率、自由化、民族意识都日益高涨的时代，这个帝国唯一的指望是逐渐放松“支配性民族”的控制权。奥地利人愿意，匈牙利人不愿意。他们不给予男性普选权，甚至以延展折中方案为人质，勒索到较低的税率，从而

使奥地利人负担六成四的“共同”税，匈牙利人只负担三成四。对匈牙利人享有特权深恶痛绝的奥地利纳税人，愈来愈认清自己在替匈牙利的建设出钱。在匈牙利境内征集的部队，高达四分之一由奥地利纳税人在养。原来一直由奥地利境内Skoda厂制造的火炮，从此将改在匈牙利迪欧斯捷尔（Diosgyör）的新厂制造。

一战爆发的前几年，匈牙利人对联合君主国一直是口惠而实不至。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五年担任首相的国民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s）党魁伊斯特万·蒂萨（István Tisza），一九一〇年将这老政党改头换面，将其改名为国民劳动党（National Party of Work），一九一〇年再当首相。蒂萨表面上支持折中方案，但对于维也纳欲加强奥匈合并的程度，乃至欲使奥、匈公平分摊合并成本的举动，一律抵制。[59] 意大利时事评论家把弗朗茨·约瑟夫打趣称作“匈牙利皇帝”，倒也颇有道理，影射这个君主国的大权实际掌握在布达佩斯手上。[60]

在为选举权和延展折中方案而争辩期间，奥地利欲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个面积不大的东部地区彻底纳入掌控，奥地利、匈牙利两者影响力的日益悬殊，随之清楚地呈现在世人眼前。一九〇八年，由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撼动君士坦丁堡政局，由于亲俄的塞尔维亚王朝觊觎位于奥匈帝国与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维也纳认为该将其于三十年前柏林会议上单纯只是占领的这些土地并吞。这激发了匈牙利人另一波暴露其居心的阻挠，布达佩斯不会同意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入君主国，不管是并入奥地利，还是并入匈牙利。匈牙利人会坚持实行又一个没什么实际用处的折中办法。这些新省份将被视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领地”，但统治它们者，其实不会是皇帝，而是奥匈帝国的财政部长。[61] 财政部长将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厘清如何与其下属沟通上，因为皇帝已同意波斯尼亚与奥匈帝国部长的往来公函一律以德文书写，与匈牙利办公室的往来公函一律以匈牙利文书写，与克罗地亚官员的公函往来一律以克罗地亚文书写。[62] 这些荒谬的安

排，意在使皇帝在巴尔干半岛取得的这些新土地，永远处于“特别行政区”这个不上不下的状态里；布达佩斯既担心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使内莱塔尼亚更为强大，也担心外莱塔尼亚境内的斯拉夫人因此变多，特别是担心多了后可能与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联手对付马扎尔人的南斯拉夫人。[63]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这样不苟言笑、办事有条不紊的人，当然看到军事、政治上受到这种种掣肘的愚蠢之处。一九一三年，这位五十岁的皇储誓言，等他当上皇帝，会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入奥地利；他指出依长远来看至为荒谬之事，即不断操纵这些省份（和软弱皇帝）的匈牙利实质上欲“使奥地利与巴尔干半岛隔绝”，他还说巴尔干半岛是“奥地利未来前途所在”。他要往南扩张，使这个君主国的势力直抵萨洛尼卡，要吸并土耳其放弃的领土，要在地中海开辟新港口，要使这个君主国成为推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乃至塞尔维亚这些巴尔干新王国贸易与发展的引擎。[64]

但这一计划，一如其他所有计划，若要能实现，有赖于匈牙利的配合，而到了一九一三年，匈牙利人已几乎完全退出奥匈帝国体制。他们连奥匈帝国国歌——海登的《主佑君皇》（*Gotterhalte* ）——的歌词，都不愿唱出口，因为国歌里有他们所痛恨的字Kaiser（皇帝）。他们会哼着曲子，或不出声，乃至发出嘘声。由于匈牙利人坚持以日益烦琐的文书工作和礼仪，来将两首都、两议会（一在维也纳，一在布达佩斯）、弥合两政府之歧见的两代表团联结在一块，所以向来不彰的奥地利行政效率每况愈下。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一体制都如某外国观察家所说的，是个欠缺最高权威的“不完整联邦制”。[65] 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一体制则如外国另一观察家所说的，是个由匈牙利掌管的“恐怖、勒索”体制，“弗朗茨·约瑟夫始终屈服于匈牙利人的要求；这时，一个较强势、较睿智的君主，大概会反击人口和比利时一样少的这个小国。”[66]

这个想反击的较强势之人是弗朗茨·约瑟夫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一八八九年鲁道夫大公自杀后，二十六岁的弗朗茨·斐迪南熬过结核病的荼毒，然后于一八九八年获指定为奥匈皇储和皇位接班人。他的干劲、独立、好斗性格为人所津津乐道；他爱打猎成痴，一生射杀了二十七万五千只野兽；他挑妻子时，不挑旁人为他选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堂姐妹，而是挑中担任女官的伯爵千金苏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从而引发一场“贵庶通婚”的轩然大波。贵庶通婚代表斐迪南大公的子女将来无权继承皇位。[67] 斐迪南大公是哈布斯堡家族某大公和那不勒斯某公主所生，没有幽默感且一板一眼，人缘不佳，尤其不讨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喜欢。事实上，每个人原都认定皇帝会再娶，再生个儿子，使弗朗茨·斐迪南继承不了大位——直到一八九八年大家才不再这么认为。但皇帝钟情于施拉特女士，从未想过再娶，所以这个君主国注定要由弗朗茨·斐迪南接掌。

弗朗茨·约瑟夫把折中方案视为君主国不容怀疑的根基，弗朗茨·斐迪南却视之为得割除的肿瘤。就像缠着老狗不放的小狗，弗朗茨·斐迪南一九〇四年在下美景宫（Lower Belvedere Palace）建立自己的军事文书署，把它当成影子政府来经营，署里设了职能如同陆军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内政部部长的职务，而充任这些职务者大部分是曾和弗朗茨·约瑟夫意见冲突者。[68] 弗朗茨·约瑟夫满足于坚守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二元结构时，弗朗茨·斐迪南却想把君主国彻底拆除再重建。皇储与皇帝，一年轻一老迈，两者差异悬殊，不由使众人开始思索退位之事：老态龙钟的皇帝主动下台，让位给法国大使馆所谓的“原生液——坚毅、精力充沛的皇储，如果还未太迟，这人或许能挽救这君主国”。[69] 一九〇七年，皇帝命弗朗茨·斐迪南前去布达佩斯庆祝折中方案施行四十周年时，斐迪南答应得很不情不愿：“我得告诉陛下真相，即对于这一庆祝活动，外界其实充斥着不同的想法，折中方案施行四十周年庆的此时，正值这些人居支配地位的时期，而这些人，我只能称之为叛徒，他们不断鼓动抵制任何东西，王朝、帝国、陆军诸如此类的任何东西。”

[70]

鉴于皇帝老迈，鉴于斐迪南大公雄心勃勃、斐迪南幕僚长布罗施·冯·阿雷瑙熟练的权力斗争手腕，忠于弗朗茨·约瑟夫的大臣和官员愈来愈不得不两边下注。布罗施于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年担任弗朗茨·斐迪南的副官，一九一一年，即老皇帝去世的五年前，就开始筹划帝位接班之事。布罗施的计划郑重宣告要将奥地利的投票权引进匈牙利，要终结马扎尔化的不当行径，要解决各地行政用语的问题，要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身份地位正常化，要把奥匈联军摆在坚实的基础上，要把奥匈改名为“奥地利君主国”，并只有一面国旗：黑黄底色，上有哈布斯堡双鹰。最重要的，弗朗茨·斐迪南承诺消除维也纳一贯予人的“胡乱应付了事”印象。[71] 总的来说，他要执行“公平高压政策”，取代弗朗茨·约瑟夫吃力不讨好的偏匈牙利政策。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对哈布斯堡家族没有好感，但对弗朗茨·斐迪南却也只保有勉为其难的尊敬。在他眼中，斐迪南不同于弗朗茨·约瑟夫，“从不迎合维也纳人善变、低俗、虚情假意的天性，甚至连博取民心都无意一为”。这位大公是“福丁布拉斯型的人物，不是哈姆雷特型的人物”，是这个君主国赖以“成为秩序井然之国、赖以拨乱反正”的最后、最大指望。[72]

弗朗茨·斐迪南或许是这个君主国的最大指望（除了他，没有可让人寄予重望的出色人物），但他的宏图大计不可能实现：民族问题太棘手，这位大公本身充斥着种种矛盾。比起弗朗茨·约瑟夫，他的确较能干，有较明确的奋斗目标——谁不是如此？——但他没有调和相龃龉之诸民族的计划，而且身边除了净是逢迎拍马之徒，还有个信教惊人虔诚，拿天主教信仰的虔诚程度作为将领、部长之选拔标准的妻子。他是恃强凌弱之人（逢迎上意的奥地利体制使他得以恃强凌弱），而且他把自己愚昧的成见化为方针，如一九〇九年他评论奥地利大使门斯多夫伯爵（Count Mensdorff）与英国官员诺埃尔·巴克斯顿（Noel Buxton）的某场交谈时所表明的：“门斯多夫十足无能。他娶了匈牙利人，已忘了

自己是奥地利人。巴克斯顿，一如所有英格兰人，盲目且愚蠢。你可以把这些观感告诉康拉德将军。”[73]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

就像缠着老狗不放的小狗，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下美景宫创设了影子政府，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霍夫堡的政府公开争夺帝国控制权。“我们不只有两个议会，还有两个皇帝，”有位奥地利高官在这一争权白热化时如此抱怨道。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有这样的上级，难怪奥匈帝国参谋总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以爱说大话、行事鲁莽不计后果而著称。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弗朗茨·斐迪南在一九一三年接任哈布斯堡武装部队督察长后，逐步侵夺皇帝仅存的权力。那一年，他和康拉德撤换掉奥匈帝国十六个军的军长，拔掉皇帝的人，换上自己的人马。[74] 报界以隐晦、拐弯抹角的口吻将斐迪南大公称作“能干官署”或“极高层”。每个大国的大使馆都在申布伦（Schönbrunn）夏宫和霍夫堡冬宫安插了线人，以了解皇帝在接受何种药物治疗、体重多少、平常疾病的病情。渐渐地，皇帝完全不去霍夫堡，整年留在申布伦夏宫，以免去搬迁之苦。[75] 大部分观察家认为他随时会死。弗朗茨·斐迪南的崛起和老皇帝大权的旁落，使这个本已四分五裂的帝国的内部对立更为严重。“我们不只有两个议会，还有两个皇帝”，有位高官不悦地说道。[76] 人称“美景宫之斯芬克斯”（Sphinx of the Belvedere）的斐迪南大公，乃是一九〇六年阿洛伊斯·莱克萨·冯·埃伦塔尔（Alois Lexa von Aerenthal）出任奥匈帝国外交部部长和一九一二年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Leopold von Berchtold）伯爵接任埃伦塔尔外长职务这两项人事案的推手。[77] 一九一一年在斐迪南大公力促下出任陆军部长的莫里茨·冯·奥芬贝格将军，哀叹皇帝不愿“解决匈牙利问题”，不愿挽救萎靡不振的陆军士气。[78] 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也支持斐迪南大公的政策，一九〇六年他五十四岁时获晋升为参谋总长。[79]

康拉德失望于有五千万人口的君主国，其外交、财政、军事却受制于一千万匈牙利人，且从未掩饰这份失望之情。就像曾说过“陆军的主要职责不是保卫祖国防御外敌，而是防御所有内敌”的弗朗茨·斐迪南，康拉德深信这个君主国的使命乃是“团结欧洲的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一起防止俄国、德国或匈牙利的称霸。[80] 一如埃伦塔尔，他深信在巴尔干半岛采取前进政策，乃是激励奥匈帝国衰颓的民心和吓阻君主

国之敌人蠢动所必需。

为使帝国的巴尔干策略不致流于纸上谈兵，康拉德于一九〇六年后重拟了奥匈帝国作战计划。针对为入侵匈牙利而拟定的U计划，增补了三个可能情况：I计划（I指意大利）、B计划（B指巴尔干）、R计划（R指俄罗斯）。I计划以奥地利的名义伙伴意大利为对象，严格来讲自一八八二年结成德、奥、意三国同盟起，意大利就是奥地利的盟邦，但谁都很清楚意大利骨子里与奥地利为敌。意大利人与法国人常为北非殖民地发生争端，意大利人加入三国同盟，只是为了在发生这类争端时取得外交掩护。比起取得利比亚或突尼斯，他们更想得到奥地利的里雅斯特、达尔马提亚、特伦托（Trento）周边的蒂罗尔地区。因此，被外交界称作“结盟之敌人”的奥地利、意大利两国，很有可能兵戎相向。

维也纳拟定俄罗斯、巴尔干半岛作战计划，则一点也不让人惊讶。若与俄罗斯开战，八九不离十肇因于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冲突，因此康拉德的B计划、R计划在两个战线都采取守势，并保留一个可能足以决定战局的四个军的梯队作为预备队，以备需要时介入其中某个战线。如果俄罗斯人缩手，塞尔维亚会被击溃；如果俄罗斯人坚持不退，会在加利西亚打成僵局，然后在波兰受到奥、德联军包围。至少，计划如此想定。[81]

---

[1] “Der Schlemihl，” *Die Zeit*， Feb. 6，1913；R.J.W.Evans，*The Making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 1550-1700*：*An Interpret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2] Winston S.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24.

[3] Arthur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A Year of the War on Many Fronts—and Behind Them*（New York：Scribner’s，1916），232.

[4]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7N 1127，Vienna，Oct. 1，1889，“La question des nationalités dans l’armée Austro-

Hongroise.”

[5] Geoffrey Wawro，*The Franco-Prussian Wa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305-306.

[6] Geoffrey Wawro，*The Austro-Prussian Wa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281.

[7] SHAT，7N 1124，Vienna，Aug. 20，1878，Cdt. Tour de Pin，“Aperçu politique.”

[8] SHAT，7N 1124，Vienna，Mar. 1878，Capt. de Berghes，“Composition et recrutement du corps d’officiers dans l’Armée Austro-Hongroise.”

[9] Kriegsarchiv，Vienna（KA），Militärkanzlei Franz Ferdinand（MKFF）206，Sarajevo，Feb. 7，1914，FZM Potiorek to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10] SHAT，7N 1123，Vienna，July 15，1875，Capt. Brunet，“Voyage tactique de l’infanterie en Bohème.”

[11] SHAT，7N 1123，Vienna，May 28，1873，Col. de Valzy.

[12] SHAT，AAT，EMA，7N 851，Vienna，Jan. 1923，Gaston Bodart，“Etude sur organisation générale，politique et administrative.”

[13] 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 （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09.

[14] 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 （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41-142.

[15] SHAT，AAT，EMA，7N 1129，Austria，Feb. 8，1904，“Les scandales de la Cour de Vienne.”

[16] SHAT，EMA，7N 1128，Vienna，Oct. 14，1897，Cdt. Berckheim，“Notes sur le haut commandement en Autriche.”

[17] Otto Pflanze，*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vol. 2，*The Period of Consolidation*，*1871-1880*，2nd e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376.

[18] Christopher Clark，*The Sleepwalkers*：*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New York：Harper，2013），66-73；Lothar Höbelt，“‘Well-Tempered

Discontent'：Austrian Domestic Politics，" in Mark Cornwall，ed.，*The Last Years of Austria-Hungary*（Exeter：Exeter University Press，2002），48；A.J.P.Taylor，*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London：Penguin，1948），157.

[19] SHAT，AAT，EMA，7N 1128，Austria，April 30，1902，"Les allemands d'Autriche."

[20] SHAT，AAT，EMA，7N 1128，Vienna，May 20，July 14 and 30，1897，Cdt. Berckheim to Minister of War.

[21] 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21.

[22] Carl E. Schorske，*Fin-de-Siècle Vienna*：*Politics and Culture*（New York：Vintage，1981），128-140.

[23]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Washington，DC（NARA），M695，roll 22，Vienna，Sept. 10，1924，Carol Foster，"The Culture of Austria."

[24] *Die Judenfrage*（1908），5-22.

[25] 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28.

[26] 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78，85.

[27] *Der"Militarismus"in Österreich-Ungarn*（Vienna，Seidel，1902），9.

[28] Norman Stone，"Army and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1900-1914，" *Past and Present* 33，no.1（1966）：96-97.

[29] 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32-136，162；KA，B/677：0-10，4（Auffenberg），Sarajevo，Nov. 1910，"Stellung und Aufgaben eines nächsten Kriegsministers"；SHAT，EMA，7N 1129，Austria-Hungary，Dec. 22，1903，"L'armée austro-hongroise：indications relatives à sa force de cohesion et à sa fidélité."

[30] SHAT，AAT，EMA，7N 1129，Autriche，2ème Bureau，July 18 and Aug. 14，1903，"L'Autriche et le conflit hongrois."

[31] KA，B/232，Karton 514，"Baron Pitreich und die Armee."

[32] KA，B/677：0-10，4（Auffenberg），Sarajevo，Nov. 1910，"Stellung

und Aufgabeneinesnächsten Kricgsministers"；Carl Freiherr von Bardolff，*Soldat im alten Österreich*：*Erinnerungen aus meinem Leben*（Jena：Eugen Diederichs，1938），93.

[33] SHAT，EMA，7N 1129，Autriche-Hongrie，2ème Bureau，"Le victoire du parti politique hongrois—Sa répercussion en Autriche"；Samuel R. Williamson Jr.，*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St. Martin's，1991），46-47，52；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30，150；Stone，"Army and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103-104.

[34] *Das Vaterland*，Nov. 18，1910.

[35]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Kew（BNA），Foreign Office（FO）371/1899，Vienna，Mar. 26，1914，Bunsen to Grey.

[36] NARA，M 862，roll 568，Vienna，June 22，1907，Charles Francis to Root.

[37] SHAT，EMA，7N 1128，Vienna，Dec. 20，1898，Cdt. Berckheim，"Attitude de l'Armée en Bohème."

[38] NARA，M 862，roll 568，Vienna，Nov. 17，1908，Rives to Root；Dec. 3，1908，Francis to Root. Also，roll 942，Vienna，Sept. 23，1908，Rives to Root，"Racial Riots in Austria"；Reichenberg，Sept. 26，1908，Harris to Asst. Sec. of State，"Demonstrations of Germans Against Bohemians in Reichenberg"；Prague，Oct. 21，1908，Joseph Brittain to Asst. Sec. of State. Also，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30；Robert Musil，*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New York；Vintage，1996[1930-1933]），2：730.

[39] Manfried Rauchensteiner，*Der Tod des Doppeladlers*：*Österreich-Ungarn und der Erste Weltkrieg*（Graz：Verlag Styria，1993），28-33.

[40] Musil，*Man Without Qualities*，2：730.

[41] In 1913，770 million crowns were spent in Cisleithania alone for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Salzburger Volksblatt*，Jan. 23，1914；Österreichische-Ungarische Heeres-Zeitung，Feb. 1，1913，"Der Moloch Staatsbeamtentum"；KA，B/677：0-10（Auffenberg），Sarajevo，July 1910，"Geist und innere Verfassung der Armee 1910"；SHAT，7N 1131，Vienna，Jan. 2，1912，"Les delegations austro-hongroises."

[42] BNA，FO 120/907，Vienna，Aug. 9，1913，Cuninghame to

Cartwright，F C v H，Bocr，7；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Aus Osterreichs Ho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

[43] SHAT，7N 1127，Vienna，Oct. 1，1889，“La question des nationalités dans l’armée austro-hongroise”；Josef Pfeiffer，*Slovenische Militär-Sprache*：*Ein Handbuch*（Vienna：Seidel，1896）.

[44] SHAT，EMA，7N 1129，Vienna，Nov. 18，1903，“La pénurie d’officiers hongrois pour l’encadrement de l’armée hongroise—les causes de cette pénurie.”

[45] *Fremden-Blatt*，Dec. 18 and 19，1913，“Österreich ohne die Nationalitäten nicht Österreich wäre.”

[46] *Wien Zukunft*，Oct. 1，1913；*Die Zeit*，Oct. 28，1910.

[47] SHAT，EMA，7N 846，2ème Bureau，Rome，April 13，1916，Col. François，“Cohesion de l’armée austro-hongroise”；7N 1124，Vienna，Mar. 1878，Capt. De Berghes，“Composition et recrutement du corps d’officiers dans l’armée austro-hongroise.”

[48] The queue of officer aspirants was so long and promotion so slow that Auffenberg in 1912 recommended creation of a new rank in the army，*Majorleutnant* or *Vizemajor*，i.e.，a senior captain. KA，B/677：0-10，4（Auffenberg），Vienna，Jan，1，1913，“Memorandum nach meiner Demission als Kriegsminister.”

[49] KA，B/677：0-10（Auffenberg），Sarajevo，July 1910，“Geist und innere Verfassung der Armee 1910.”

[50] Bardolff，*Soldat im alten Österreich*，72.

[51] Bardolff，*Soldat im alten Österreich*，88-89.

[52] 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Aus Meiner Dienstzeit 1906-1918*（Vienna：Rikola，1921-1923），1：37-38.

[53] SHAT，EMA，7N 1129，Vienna，June 28，1903，Cdt. Laguiche；Rudolf Jerabek，*Potiorek*（Graz：Verlag Styria，1991），27-45.

[54] KA，MKFF 199，“Generalstab und Beförderungsvorschrift von einem Truppenoffizier.”

[55] KA，B/677：0-10，4（Auffenberg），Sarajevo，Nov. 1910，“Stellung und Aufgaben eines nächsten Kriegsministers.”

[56] KA，B/677：0-10（Auffenberg），Bozen，Dec. 9，1913，Brosch to Auffenberg.

[57] KA，B/677：0-10（Auffenberg），Bozen，Oct. 28，and Dec. 9，1913，Brosch to Auffenberg：“...die gut dotierte Stelle.”

[58] NARA，M 862，roll 568，Vienna，Sept. 8 and Nov. 16，1908，Rives to Root.

[59] SHAT，AAT，EMA，7N 1129，July 18 and Aug. 14，1903，“La politique austrohongroise”；“L’Autriche et le conflit hongrois”；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14.

[60] KA，MKFF 199，copies of *La rivincita di Lissa*，an illustrated Italian weekly；KA，B/677：0-10，4（Auffenberg），Vienna，Jan. 1，1913，“Memorandum nach meiner Demission als Kriegsminister.”

[61] NARA，M 862，roll 940，Vienna，Oct. 7，1908，Rives to Root.

[62] KA，B/1503：3（Potiorek），1913，“Regelung der Amts-und Unterrichtssprache Bosnien und der Herzegovina.”

[63] KA，B/l503：4，Sarajevo，Nov. 20，1914，Ein hoher bosnischer Funktionär，“Promemoria über die actuelle Behandlung der serbischen Frage in Bosnien”；Vladimir Dedijer，*The Road to Sarajevo*（London：MacGibbon and Kee，1967），127-130.

[64] Dedijer，*Road to Sarajevo*，129.

[65] SHAT，AAT，EMA，7N 1124，Vienna，Oct. 22，1878，Tour de Pin；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14.

[66] SHAT，AAT，EMA，7N 1128，Vienna，May 15，1902，2ème Bureau，“L’Hongrie et la dynastie.”

[67] Matthias Schulz，“Diary Rediscovered：Franz Ferdinand’s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Spiegel Online*，Mar. 1，2013；SHAT，AAT，7N 1129，Autriche-Hongrie，May 1，1905，“Nouvel aspect du problème de la Succession”；Dedijer，*Road to Sarajevo*，98-99.

[68] Clark，*Sleepwalkers*，107-108；Auffenberg-Komarów，*Aus Osterreichs*，228-229.

[69] SHAT，AAT，EMA，7N 852，“Organisation politique et administrative de l’Autriche-Hongrie”；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41；Auffenberg-Komarów，*Aus Osterreichs*，226-227.

[70] Dedijer，*Road to Sarajevo*，121.

[71] KA，B/232：119-22，Karton 516，“Programmfür den Thronwechsel，1911.”

[72] “Franz Ferdinand und die Talente，” *Die Fackel* 7，no. 400（July 10，1914）：1-4；Dedijer，*Road to Sarajevo*，124；Stone，“Army and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108.

[73] *Deutsche-Tageszeitung*（Berlin），Sept. 22，1913；*Vorwärts*（Berlin），Sept. 28，1913；KA，MKFF 206/19，Jan. 12，1909，“Bericht der k.u.k.Militäratttché in London über Unterredung Graf Mensdorff mit Mr. Noel Buxton.”

[74] SHAT，7N 1131，Vienna，Feb. 2，1913，“Le commandement des corps d’armée en Autriche-Hongrie.”

[75] SHAT，7N 1128，2ème Bureau，Autriche-Hongrie，Aug. 2，1902，“L’empereur d’Autriche et l’heritier présomptif du trone.”

[76] 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21；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42.

[77] 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37，46.

[78] KA，B/677：0-10，4（Auffenberg），Sarajevo，Nov. 1910，“Stellung und Aufgaben eines nächsten Kriegsministers.”

[79] Hötzendorf，*Aus Meiner Dienstzeit*，1：43；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42-143；Oedijer，*Road to Sarajevo*，122-123.

[80] 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29.

[81] Norman Stone，“Moltke-Conrad：Relations Between the 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General Staffs 1909-1914，” *Historical Journal* 9，no.

2（1966）：211；Hotzendorf，*Aus Meiner Dienstzeit*，1：13-15，53；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50-51.

第二章 犯错与愚蠢之间

俄罗斯人比大部分人更敏锐嗅闻到奥匈帝国的腐败味。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中遭击溃后，俄罗斯人对腐败有了颇为深切的体会。先前俄罗斯人一意往东亚扩张，从而与日本兵戎相向，这时则看准时机把目光转回欧洲。沙皇尼古拉二世受到泛斯拉夫主义（认为所有斯拉夫人该团结为一并由俄罗斯领导的一种意识形态）鼓舞，誓言推进巴尔干半岛，扶植塞尔维亚之类的斯拉夫王国，并吞通往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陆桥，收复往日的东正教首府，透过土耳其海峡连接黑海和地中海。若如愿，俄国将一雪败于亚洲的耻辱，逃出黑海的“牢笼”，以欧洲最强国之姿宣告他们的到来。[1]

俄国在这一战略转向中选择塞尔维亚作为其重要盟友，对奥匈帝国来说大为不妙。塞尔维亚易受摆布且亲奥地利的奥布廉诺维奇（Obrenovic）王朝，一九〇三年遭亲俄且走强势民族主义路线的彼得·卡拉乔尔杰维奇（Peter Karageorgevic）推翻。国王彼得和其首相尼科拉·帕希奇（Nikola Pasic），看出欧洲两大病夫（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都积弱不振。一八七八年的柏林会议，在旧政策（扶持奥斯曼帝国）和新政策（承认从该帝国的巴尔干半岛诸省脱离自立的新国家，如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之间达成痛苦的妥协，由于会议本身没有一以贯之的原则，从而为各种改变打开了大门。塞尔维亚觉得可以放手蚕食周边仍属奥斯曼帝国领土的省份，包括马其顿、新帕扎尔区（Sanjak of Novipazar）、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甚至觉得可以放手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匈牙利、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境内受奥地利统治的两百一十万塞尔维亚人纳入管辖。[2] 塞尔维亚人决意借与俄

罗斯结盟之势往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境内扩张，开辟一条穿越新帕扎尔区抵达黑山和海滨的走廊，并开始摧毁哈布斯堡君主国，即塞尔维亚人所戏称为“由借来之羽毛制成的华丽俗气之鸟”。[3]

那些借来的羽毛，有许多拔自塞尔维亚的旧版图。一八六七年奋力脱离土耳其统治独立建国，以贝尔格莱德为首都的塞尔维亚，领土涵盖了十四世纪时遭土耳其人消灭的旧塞尔维亚帝国将近一半之版图。塞尔维亚人决意于二十世纪重建该帝国，为此，他们要收复马其顿（塞尔维亚古都史高比耶的所在地区）、科索沃（黑鸟平原的所在，十四世纪时塞尔维亚在黑鸟平原输掉一场大战役，从此沦为亡国之民，受土耳其统治），还要竭尽所能夺取奥匈帝国领土。[4] 这时塞尔维亚自称“巴尔干的普鲁士”，打算一统所有南斯拉夫人，建立一更大的塞尔维亚王国，一如俾斯麦一统德意志人。一九〇三年巴尔干半岛上有一千万南斯拉夫人，但其中只有三百五十万居住在塞尔维亚或黑山境内，其他南斯拉夫人住在奥斯曼帝国或奥匈帝国境内。塞尔维亚想把他们全纳入自己辖下，且准备为此一战。[5]



弗朗茨·约瑟夫和弗朗茨·斐迪南察觉到这危险：如果塞尔维亚人真的一统所有南斯拉夫人，他们会建立一个由塞尔维亚主导的“南斯拉夫”，进而把奥匈帝国挤出巴尔干半岛。这一由贝尔格莱德治理的“南斯拉夫”，会把奥地利的军事占领区和土耳其即将不保的诸省，全纳入一信仰基督教的斯拉夫人势力底下[6]，情况就和一八六〇年代皮埃蒙特人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普鲁士人把奥地利人赶出德国类似。这时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开始把塞尔维亚人称作多瑙河的皮埃蒙特，并于一九〇六年说服皇帝任命阿洛伊斯·列克萨·冯·埃伦塔尔伯爵为外长，冀望借此让在前两任平庸外长领导下死气沉沉的哈布斯堡外交部展现冲劲。[7]前两任外长有气无力地推动奥、俄两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友好协议，新外长埃伦塔尔则想打掉既有的协议，从头开始。奥匈帝国无力重组巴尔干半岛，但他不觉得这是个问题。诚如妙语如珠的维也纳人卡尔·克劳斯所写的，“政策是用来隐藏你真正实力的东西”。[8]奥地利是个弱国，但会摆出强国的样子。

在日俄战争期间担任驻圣彼得堡大使后，埃伦塔尔即认定俄罗斯人无力反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实行的新侵略性政策。他从未想到情况可能与其认定的背道而驰：在东亚吃了败仗后，俄罗斯人禁不起在欧洲也吃败仗。埃伦塔尔的认定完全未考虑到奥匈帝国军力的薄弱，却洋洋自得于自己的真知灼见，于是放手在巴尔干半岛施行强硬政策，决意击退俄罗斯人，把哈布斯堡王朝的诸民族团结起来支持重振雄风的王朝，威吓塞尔维亚人，提醒德国人奥匈帝国仍有能力管理其（缩水的）势力范围。埃伦塔尔主张，已该是时候把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三十年犹疑不决的占领转变为大胆的吞并。吞并波斯尼亚将让奥地利有机会拿下其更大的标的：萨洛尼卡。萨洛尼卡曾是马其顿王国的最大城市，后来成为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富裕港口，二十世纪时仍是巴尔干半岛上最有战略价值的要地。埃伦塔尔打算拿下该城，借由一条贯穿马其顿地区与新帕扎尔区的走廊将其与哈布斯堡帝国连接，控制这个爱琴海港口通往中东与亚洲的贸易路线，利用这港口来打开的里雅斯特、阜姆（Fiume，克罗地亚语称里耶卡/Rijeka）这两个位于亚得里亚海滨的奥地利“落后地区”。

埃伦塔尔和其恩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打算用这些新吞并的土地（从波斯尼亚往南直到萨洛尼卡），使哈布斯堡君主国改头换面。对外部形势来说，阻止兴建从维也纳至萨洛尼卡之东部铁路的土耳其人、塞尔维亚人，将被冷落到一旁。诚如弗朗茨·斐迪南的代言人所说，奥地利将成为“欧洲衔接黎凡特地区与中东的桥梁”。[9] 对内，匈牙利将被拿走克罗地亚一地，然后用新征服的巴尔干地区强化克罗地亚的国力，并在奥地利与克罗地亚联手下，打造新体制，使有着狼子野心的匈牙利不再那么猖狂。极无效率的二元君主国将成为较有效率的三元君主国，分别以维也纳、布达佩斯、萨格勒布为首都。如果匈牙利人继续阻挠，将会被奥地利人和克罗地亚人以二比一的投票否决。[10]

小小的塞尔维亚卡住这些宏图大计。过去，塞尔维亚人臣服于奥地

利，但现在，有了俄罗斯这个坚实的靠山，他们能强势申明他们的民族利益，而不大需要担心遭奥匈帝国势不可挡的入侵。过去受共和法国和帝制英国束缚的俄罗斯人，一九〇七年时已和这两个大国结成三国协约。这一革命性的外交转变，使塞尔维亚信心大增，使奥匈帝国不得不投靠维也纳眼中唯一可靠的盟邦德国。但德国并不可靠。柏林已实行名叫“世界政策”（Weltpolitik）的新战略，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开始打造远洋舰队，以挑战法国、英国的海外帝国。德国有庞大人口（六千八百万）、强大陆军（平时有八十万兵力，战时有三百万兵力）、强大工业（欧洲最强大工业），但即便如此，其国力大概还是无法既击败英法且腾出足够力量来助奥地利对抗俄国。除非奥匈帝国打造一支足以吓阻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的强大陆军，否则德国可能得在东部战线和巴尔干战线上独自对抗庞大敌军。

明眼人都看得出，在军事上投注巨资，既是二十世纪的时代需求，也是刻不容缓的要务，但维也纳无意思考此事。一八六六年起，作战方式和科技突飞猛进，欧洲每个国家的军队都得妥为因应，否则就等着败亡。第一项长足的进展——所有男性均得服兵役的制度——几乎造成财政破产，因为过去从未超过三十万人的军队，这时膨胀到平时的将近百万和战时的数百万。不管是实行在狭窄战线上集结大量兵力以突破敌方防线的法国原则，还是实行将兵力分散在广阔战线上以从侧翼包抄的德国原则，都需要庞大兵力来攻打靠征兵组成的敌人大军和现代的大规模防御工事。但奥地利人欠缺经费和政治意志来征召平民并予以武装；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受训练的奥地利人仍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二九，相较之下在法国是百分之零点七五，在德国是百分之零点四七，在意大利是百分之零点三七，在俄国是百分之零点三五。照理光根据这点，维也纳就该有自知之明，绝勿与别的大国开战。若动员所有后备兵力来打一场大战，奥地利受过训练的兵力不到两百三十万，而光是俄国一国的兵力就会是这些的三或四倍之多，国民人数比奥匈帝国少一千万的法国，兵力也会是这些的两倍之多。[11]

即使是屈居末座的奥地利兵力，若要为其配备武器，也得花上庞大资金。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欧洲军事领域，火炮已大幅升级。新的钢材浇铸技术、凿刻来复线技术，使加农炮和榴弹炮能把炮弹投得更远更准。美国内战期间火炮的最大射程是两千码，这时，标准火炮（例如英国的十八磅炮）能把炮弹射到七千码外。由于有弹簧和液压制退复进系统来吸收炮的后坐力，使炮于射击后固定在原位以供下次发射，所以这些火炮的射速也变快。法国著名的七十五毫米加农炮每分钟能发射十五至三十发瞄准目标的炮弹或榴霰弹。化学高爆炸药，例如三硝基甲苯（TNT），取代一八六〇年代的旧黑色火药炮弹，且杀伤力惊人。这些炮弹配上较好的引信，以炮弹碎片、弹丸、震波杀死大量人员。

较轻型武器在此前几十年里也得到大幅改良。用弹盒供弹的连发枪，每分钟发射十二发子弹，使战场变成枪林弹雨，迫使所有步枪手都成为奥地利陆军手册所说的“走动的军火库”，时时吃力背着装有两百颗子弹的粗帆布背包。然后，一八八〇年代出现靠气压装置自动装填子弹的机枪，每分钟能射出六百发子弹，它们使军队火力倍增。单单一支六人机枪队，就能发出等于一个师的步枪火力，每个营配两挺机枪，每个师十二个营，火力惊人。

对这些新式急射武器（步枪、机枪、野战炮）投资的同时，也需要在补给勤务上投入前所未见的庞大资金。一八一三年莱比锡的普鲁士滑膛枪兵，打一场仗平均发射二十发子弹；日俄战争时，步兵通常发射两百发或更多发。士兵最多只能随身携带两百发子弹，而在激战时两百发子弹十五分钟内就会打完，因此陆军需要扩大补给勤务。可为每名士兵补给三百发子弹的营、连弹药车，得推进到射击前线的部队，以维持杀敌火力。[12] 每个步兵师都得带着一百二十辆这些弹药车投入战场，以便有额外的六十万发步枪弹和五万发机枪弹可供使用。

射速和步枪一样快的新式急射火炮，带来同样的成本负担和后勤难

题。十九世纪的战时，军队一周所产炮弹只有七千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军队每天的炮弹产量则得达到那一数目的十倍，乃至二十倍之多。原因不难理解：一八一三年时莱比锡的一门普鲁士加农炮，每天平均发射六十一发炮弹，但一九〇五年时，沈阳的一门俄国加农炮每天发射五百零四发炮弹，促使法国人于一九一四年时配予每门火炮六百发炮弹。若把这些炮弹全运到前线，火炮会被层层堆栈的板条箱淹没，因此，每个炮兵连（制式的野战炮兵团编制有十四个炮兵连，每个连配六门火炮），需要十二辆弹药车，其中六辆密集布设在火炮周边，另外六辆则跟在部队后面，厕身于越拉越长、俨然要将二十世纪陆军吞没的辎重队里。[13] 弹药车也不是现代军队唯一的新式随行装备；新火炮摧枯拉朽的威力，迫使师级部队添备更多车辆来运载反制器物，包括沙包（每个师七千袋）、木头、梯子、铲。[14]

要与这些令人胆寒的新武器抗衡，向来没有远虑的奥匈帝国得淘汰、更换其已过时的装备（来自一八七〇年代的黑色火药步枪和青铜炮），得耗费巨资买进更多一切必要的装备。维也纳还得更新其铁路、公路，以便将部队更快运到前线。在奥地利所打的最近一场大战中（一八六六），动员规模相对较小的陆军，都花上折磨人的五十五天。[15] 而针对下一场战争，德国打算以仅仅四十二天时间，完成从动员、部署军队到消灭英法军队，再将其陆军全部移到东边以击败俄国这整个计划。德国人希望奥地利的行动和其一样迅速利落。

凡是身形庞然、所费不赀的东西，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都敬而远之。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雀跃于所有新发明的东西（“拿破仑绝认不出这个有着铁路、公路、电报、电话、汽车、热气球、罐头食品的世界”），弗朗茨·约瑟夫却对这些东西厌恶至极。一九〇六年军事演习时，有辆还在试验阶段的装甲车轰轰驶过弗朗茨·约瑟夫的住所旁，惹得这位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皇帝老大不高兴，严正表示“这种东西绝不会有军事用处”。[16]

一九〇八年，弗朗茨·约瑟夫在精力过人的埃伦塔尔敦促下，往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之路摇摇摆摆前进，心里对能否成功没什么把握。即使有埃伦塔尔支配巴尔干、地中海的新战略护体，这项任务看来仍会是一场空；这时那里有六十七万四千塞尔维亚人、五十四万八千穆斯林、三十三万四千克罗地亚人，只靠令人瞠目结舌的九千五百名奥地利官员来治理（当年土耳其人只派了一百八十名官员来治理）。这些居民绝大部分认为在奥地利统治下没什么好处，因为匈牙利人坚持奥匈帝国的共同经费不得拨用于这些落后省份的发展。这一地区的维持费用，一律得在当地筹措，也就是得由已然非常贫穷的当地人负担，从而等于使他们必然敌视维也纳。奥地利人在这些新省份推动土地改革的脚步也很缓慢；穆斯林地主基本上将基督徒农奴（kmet）囚禁在他们的大庄园里，但奥地利人迟迟不愿改革这一制度，以免引起富有的穆斯林反感，以免使奥地利人所认定会投向贝尔格莱德而非维也纳怀抱的塞尔维亚籍农奴获得权力。而维也纳不愿助农奴脱离苦海一事，使农奴必然只会投向贝尔格莱德的怀抱。[17]

一九〇八年七月君士坦丁堡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使奥匈帝国不得不有所回应。面对一个带侵略性的新土耳其政权，而非过去那个懒散的苏丹国，维也纳知道它对占领区的掌控和日后夺取马其顿、萨洛尼卡的任何举动，都会遭到青年土耳其党的质疑。这个改革党由两位二十九岁的土耳其陆军军官领导，即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和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凯末尔（日后的“阿塔图尔克”）生于萨洛尼卡；恩维尔的父亲在马其顿谋生，母亲是阿尔巴尼亚人。这两位军官都认为萨洛尼卡百分之百属于土耳其，两人都矢志统一土耳其，不愿见土耳其衰亡。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论道，这个新土耳其“重生于世，带有民族雄心”。可想而知，土耳其会要求立即归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该地五十万已要求施行青年土耳其党体制的穆斯林，以及土耳其在欧洲的其他省份，不愿让它们落入奥地利之类的基督教国家手里。[18] 在埃伦塔尔看来，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似乎不

只是缓解土耳其的威胁，也是缓解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在萨拉热窝等地之统治正当性日益尖锐的抨击，最有效的手段。[19] 但这一拟议中的缓解手段，危害奥匈帝国与英国的关系，因为英国不希望削弱大有可为的青年土耳其党政权。这一手段也可能使奥匈帝国与俄国兵戎相向，因为俄国这时坚定支持彼得·卡拉乔尔杰维奇国王的“大塞尔维亚”计划。[20]

奥匈帝国领导阶层思索并吞之举时，也惴惴不安地看了一眼自己欲振乏力的军队。若爆发大战，奥匈帝国将只能集结出四十八个步兵师，来对抗俄国的九十三个师、法国的八十八个师、意大利的四十六个师、塞尔维亚的十一个师。有位法国军官于一九一三年拉长调子说道，哈布斯堡陆军的四十万兵力，“对一个有五千万人口的帝国来说，实在不多”。有位德国军官持同样见解：“够打一场对付塞尔维亚的战役，但不够打一场欧洲大战。”[21]

奥匈帝国的火炮数量更为不足，每个师只配四十二门炮，相较之下，俄国一个师有四十八门炮，德国一个师有八十门炮。莫里茨·冯·奥芬贝格将军于一九一一年出任陆军部长时，发现在火炮对步兵的比例上，奥地利在诸大国里敬陪末座。奥芬贝格称火炮是奥匈帝国陆军的“罩门”，由于这一弱点和其他弱点，他不愿介入隐隐即将爆发的巴尔干战争。[22] 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确凿无疑证明钢炮优于青铜炮，但一九一四年时奥地利人仍购买青铜炮，因为青铜炮较耐用，而较耐用正合匈牙利会计人员的意，但不合奥地利将领的意。

建设新炮兵团得花二十五万美元购买十六门新野战炮，财政拮据的奥匈帝国于是继续使用旧炮兵团，也就是说他们的炮兵连混用四十五种不同的炮，需要用到数十种不同的炮弹。这使炮弹较难以大量生产，在打长期战争时则几乎必然免不了“炮弹危机”。[23] 就重炮来说，整个哈布斯堡陆军只有五十六门重型榴弹炮。英国武官于一九一三年从维也纳写道：“这支陆军火炮不足，但火炮昂贵。”这时候，大家都很清楚奥地

利财政拮据，为何有此现象也就无须多作解释。在最近几场奥地利军事演习中，这位英国武官惊讶于“火炮比例之低”，推断“如果他们想在真格的战争中做他们在这些演习里所常想做的事，肯定会受到重创”。奥芬贝格评估过所有层面后论道，“你绝不会用有利这个字眼来形容我们的状况”。[24]

奥地利人也未善加利用他们本身的实力。康拉德口头上认同新的火力战术——“现代战争靠火力拼搏”——但他的战法仍固守火力时代之前的战法。康拉德在所有事物上都是半吊子，在这领域亦然。他分析了一九〇三年的英国布尔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持急射武器的布尔战士从壕沟里歼灭来犯的大量英军），断定这类现代战术乃是总动员时奥匈帝国陆军所可能征募的“男学生、农民、店老板、工厂与办公室工作者、工匠”所无法学会的。康拉德偏爱较老式的战术，也就是将使奥匈帝国陆军在大战开打仅仅四个月就全军覆灭的那些战术。他明知这些战术大概不管用，却不以为意。他要找到办法来使火炮、训练都越来越不足的奥匈帝国陆军，在外人眼中仍是支健全的军队。外国武官开始谈论这支陆军如何的不堪一击。

与一八六六年消灭哈布斯堡陆军的那些战术相近的突击战术，似乎提供了某种并不甚理想的解决之道。[25] 康拉德主张，得逼奥地利士兵进攻。取代蓝色旧军服的蓝灰色新伪装服，将能在某种程度上防止遭到敌军射击，但要真正免遭敌人火力攻击，部队得迅速变换位置（尽管有大批车辆和其他累赘），得在紧要时刻取得数量优势（尽管敌人有防御火力），得从侧翼包抄敌人（尽管面对百万敌军，连要找到其侧翼都很难）。就这么简单，或者说康拉德似乎这么认为。外国武官则没这么笃定。卡尔·施瓦岑贝格（Karl Schwarzenberg）亲王在参加了一九〇五年奥匈帝国军事演习后（在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惨烈杀戮后），目睹组成密集队形的奥地利“红”军进攻站在地面上的奥地利“蓝”军，两方都未用铲子挖战壕，他大为惊讶。红军上刺刀冲锋；蓝军则排成整齐横队，

直挺挺站着。施瓦岑贝格转向身旁打过不久前之日俄战争的日本武官，问："你怎么看？"日本武官思索片刻，然后说："不挖壕固守的，死路一条。"[26]

有位奥地利将领把这些弊病归因于奥地利缺乏实战经验。这个君主国自一八六六年起未打过真格的战争，基本上已与现实脱节。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演习，从未测试军官结合步、骑、炮兵以火力和运动夺取阵地的能力，反倒要他们在地图上找出重要地点（高地、树林、村子），然后要他们着手先拿下它们，而这一要求始终意味着要他们以一身花俏装饰的骑兵中队和冲刺的步兵纵队，不顾种种障碍，一径往前猛冲，完全不停下来侦察敌人和开火。[27] 一九一二年，英国武官证实奥匈帝国的军演的确十足背离"战争情况"。小规模战斗经事先安排好，然后派士兵到每个排定的"场景"里。奥地利骑兵队在一场"突击"中——排成横队的骑兵挥舞着马刀，好似时为一八一二年，而非一九一二年——拿下一桥头堡。奥地利步兵以密集连纵队形攻击，上刺刀往一百五十米外的敌人冲，真要打起仗来，跑不到一半距离，就遭全歼。

"奥地利陆军的根本原则，似乎是在完全不开火的情况下尽可能逼近敌人，"这位英国武官惊奇地说道。奥地利炮兵的做法与此背道而驰，但用在炮兵身上又是错得离谱，"不等敌人进入射程，乃至不等目标出现，就狂轰猛炸把炮弹打完"，无法与步兵友军合作，且还可能误杀友军。步兵、炮兵各打各的，主要是因为奥匈帝国陆军的火炮不够多，若要先从远距离炮轰敌军，再从更近距离炮击敌军以支持步兵冲锋，就如这位英国军官所说的，"有可能使步兵在火炮移动的过程中失去支持"。军事演习也未模拟战斗的消耗和为此所必须权衡的得失。在真正的战争中，军官得在多个目标中择一，在不滥用兵力下达成目标。[28]

一九〇八年秋，在本国军力仍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奥匈帝国还是并吞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奥匈帝国用一千一百万美元和归还新帕扎

尔区打发掉土耳其人，但接下来，俄罗斯不满自己和塞尔维亚未得到补偿，引发一场差点引爆战争的危机。[29] 埃伦塔尔原承诺协助俄国海军取得进入达达尼尔海峡（自克里米亚战争起俄罗斯人一直不得进入的海域）的权利，以换取俄国同意上述吞并，但后来食言，使俄罗斯人受到粗暴的外交欺骗和挫败。埃伦塔尔也让塞尔维亚人受到类似的挫败。他信誓旦旦地表示，随着希腊并吞克里特岛和保加利亚宣布独立，违反了一八七八年《柏林条约》，该条约已形同废文，那么奥地利也就无须再遵守该条约要它只能占领而不能吞并波斯尼亚的规定。埃伦塔尔主张，这时，欲“敉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政治动荡”必须将其并吞。[30] 奥地利要达成其“崇高的文化、政治目标”，就得逼贝尔格莱德解散其位于波斯尼亚境内作战动员的正规军和游击队，以及（令塞尔维亚人更觉侮辱的）得逼贝尔格莱德公开表示，愿“在不要求赔偿或无条件的情况下”与维也纳保持“友好关系”。[31] 布加勒斯特引爆危机之后，有位美国外交官称它是“一场引人注目的政治游戏”。塞尔维亚人原以为，哈布斯堡的吞并行动，违反一八七八年条约，会激起国际众怒，使奥地利如这位美国人所说的“彻底失去列强的支持”，乃至与一个亟欲捍卫“力弱但勇敢之塞尔维亚”之权利的诸国同盟交战。[32]

埃伦塔尔奋力逃出困境，但并非毫发无伤。英国外长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痛心于埃伦塔尔的“捣乱行径”，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忧心忡忡指出，埃伦塔尔个人追求“伟大”之举，乃是在“玩火，差点使欧洲陷入一场最终会蔓延多广却无人能预料的战争”。[33] 塞尔维亚就希望战争扩大，因此曾求援于俄国。但俄国败于日俄战争之后国力仍未恢复，俄国的主要盟邦法国则无意为巴尔干半岛打一场大战。[34]

一九〇九年三月德国发给俄国一份照会，即化解了这场危机。德国于照会中要圣彼得堡务必放手让维也纳对付塞尔维亚，不得干预，“否则情况会一发不可收拾”。[35] 俄国身为大国，且是泛斯拉夫主义的旗手，却再度受到羞辱，似乎在与德意志族两强国的意志较量中败下阵

来。康拉德愚蠢地以为是他的局部动员，而非德国的介入，扭转了局势。丘吉尔拉长调子说："他代表了那个最危险的结合体，即专注于外交政策的参谋总长。"[36] 在萨拉热窝，和康拉德一样狂热的战争贩子迈克尔·阿佩尔（Michael Appel）主张，出兵惩罚塞尔维亚和黑山将带来双重好处，既除去奥地利最急迫的外部威胁，又使奥地利得以振奋人心地压制内部威胁："一旦击败位于贝尔格莱德、尼什（Nis）、采蒂涅（Cetinje）的那些家伙并将他们解除武装，我们将往布达佩斯和布拉格进兵，使他们也乖乖听话。"[37] 但阿佩尔，一如康拉德，太不自量力。有气魄而无资源，成不了事，奥芬贝格认为奥匈帝国陆军在每个方面都太弱，打不了战争。政府会计人员看到一九〇八年局部动员的开销，就惊得目瞪口呆：一亿八千万克朗（三千六百万美元），相当于该年军事预算的一半，等于建造四艘新无畏级战舰的成本。

就康拉德来说，他只是惊讶于德国既然已发出最后通牒，奥地利就无须担心得分兵对付俄罗斯，但埃伦塔尔却未利用这机会入侵、瓜分塞尔维亚。但因此次大胆行动有功而获皇帝赠予伯爵之位的埃伦塔尔，没被表面的胜利冲昏头，他清楚理解到这场危机所暴露的一个重要事实：俄罗斯人退缩，完全是因为德国的威胁，而非奥地利的威胁。俄罗斯人会（在德国胁迫下）接受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但不会允许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诚如某美国外交官所说的，埃伦塔尔"能得手，主要归因于虚张声势和德国的支持与影响力"。但德国人不会开出空白支票，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冒险行径照单全收。[38]

但空白支票已在准备。德皇和弗朗茨·约瑟夫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会面，以强化同盟关系。一九〇九年，奥匈帝国与德国两国军方举行自一八九六年以来的首场参谋会谈。上一次两国参谋碰面议事时，主要谈俄罗斯问题，而在这场新的参谋会谈上，毛奇告诉康拉德，他很遗憾一九〇八年未爆发战争，"那时的情势会比几年后的情势更有利于奥地利与德国"。[39] 新情势——和德国人所制订用以利用那些新情势的计划

——的确不同以往。一八九六年参谋会谈后，德国人的打算，原只是在西边挡住法国，在东边与奥地利人联手对俄国发动压倒性攻势。一九〇五年，在施里芬计划——因德国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而得名——影响下，一切改观。德国人的攻守计划彻底翻转，改成要以本身少许的基本兵力和大部分奥地利陆军挡住动员缓慢的俄国人，把德国九成兵力集中对付法国人。照计划想定，德国人于不到六星期击败法国人后，会移师东部战线解决俄国人。[40]

作战计划如此变动，令奥匈帝国大觉不妙，毕竟奥匈帝国战时动员全部兵力，也将只有俄国兵力的四分之一。但康拉德接受这一改变，态度出奇泰然。一九〇六年出任参谋总长之前，康拉德写了一本战术性著作《论战术和步兵的战斗教育》（*Studies on Tactics and The Battle Education of Infantry*），一举成名。在这本书中，他主张战斗成败取决于心理素质更甚于身体素质。他说，“不怕苦且勇敢”，一往无前且不惜牺牲性命的部队，即使面对人数更多且挖壕固守的步兵和炮兵，都会打赢。[41] 大部分奥地利军官同意他这看法；布尔战争、日俄战争、巴尔干战争已证明刺刀冲锋战术已过时，但在奥地利陆军，一如在欧洲其他陆军里，相信这一战术者仍大有人在。有位奥地利军官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写道：“这一原始工具（刺刀）振奋士气的作用，绝不容轻描淡写带过；刺刀是进攻精神的最佳体现，它将士兵的信心与其欲击败敌人的念头绑在一块。”[42]

对政局不满的奥匈帝国士兵，恐怕会是欧洲最不可能为国牺牲性命的士兵之一，但康拉德不以为意。更糟的，他从未催促德国人告知其作战计划细节，他也从未把自己的作战计划详情告诉德国人。两国陆军只是粗略交代各自的战略目标（击败法、英、俄和征服巴尔干半岛），却未在如何达成那些目标上达成一致见解。双方都太想保住自己行动上的独立自主，因而只达成以下共识：奥地利人会在俄罗斯完全动员之前猛攻俄国，德国人会将数量未定的兵力部署于东边，以为奥地利人将兵力

调到东部战线争取时间。

康拉德知道届时他需要时间，因为他打算于进兵俄国途中灭掉塞尔维亚，一个他未告知德国人的计划。康拉德推断，从波斯尼亚与南匈牙利突然奔出的二十个奥匈帝国师，就足以击溃塞尔维亚人。他一味认定，直到他攻破贝尔格莱德，把目光转向东边为止，剩下的奥匈帝国陆军和兵力未定的一支德国陆军，都会在波兰、加利西亚守住战线。这一刻意的含糊，将带给奥地利人灾难。即使在平时，俄国陆军都拥兵一百五十万，那么在战时动员后，会壮大到六百万或更多。奥地利平时有四十万现役军人，战时最多扩增为两百万，且都装备不良，若碰上俄罗斯大军如洪水般袭来，只会灭顶。[43]

埃伦塔尔始终认定，若奥地利在巴尔干采取强势政策，将吓阻俄罗斯，镇住贝尔格莱德，使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不再鼓吹建立南斯拉夫王国。结果情势发展与此背道而驰：塞尔维亚报界激愤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遭吞并，每天痛批哈布斯堡王朝，塞尔维亚政府则鼓励组织爱国会社，例如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有二百二十个分部的民族自卫社（Narodna Odbrana）。[44]一九〇九年，埃伦塔尔的外交部向五十三名克罗地亚人提出诉讼，指控他们与贝尔格莱德往来，阴谋叛国。诉讼案的主要证人是奥地利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弗里德永（Heinrich Friedjung），这一轰动一时的审判因此被称作“弗里德永审判”（Friedjung Trial）。弗里德永、埃伦塔尔和后来的康拉德三人，在这场审判中被确证为叛国证据的那些文件，后来查明是埃伦塔尔的外交部所伪造。这一令人难堪的大挫败，让人窥见已开始席卷这个多瑙河君主国的恐慌。卡尔·克劳斯的讽刺性报纸《火炬》（*Die Fackel* ），以怀疑口吻愤愤说道：“一言以蔽之，奥地利历史就是如此，发生了那么多事，却其实什么都没发生。”这场审判是个“地震，但没有叶子从树上震落”；它代表了“犯错与愚蠢之间的搏斗”。埃伦塔尔的所作所为“不是制定政策，而是破坏政策”。弗里德永的角色很可

悲："他操着一口最漂亮的城堡剧院（译按：奥地利国家剧院）式的德语，圆润洪亮，抑扬有致；他讲话的口吻像是奥托卡尔（Ottokar）——'这个奥地利是个好地方'。"克劳斯提到在维也纳葡萄酒馆里演奏的欢乐音乐，推断"葡萄酒馆音乐骗不了世人，世人还是会了解这场审判的真正含义"。[45]

埃伦塔尔有一更大策略来强化其在巴尔干的前进政策，"弗里德永审判"则是这一更大策略的一环，但塞尔维亚人不接受这一策略。一九一〇年六月，有名塞尔维亚籍刺客朝哈布斯堡王朝的波斯尼亚省长开枪，未击中。一群塞尔维亚陆军军官，以化名阿皮斯（Apis）的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Dragutin Dimitrijevic）为核心，组织了名叫"不统一毋宁死"（Union or Death）的秘密会社，以更利于实现他们的目标。这个以"黑手会"（Crna Ruka）更为人所知的秘密会社，呼吁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塞尔维亚人，包括生活在奥匈帝国境内的塞尔维亚人，集合起来。[46] 阿皮斯于一九〇三年时主导杀害塞尔维亚奥布廉诺维奇王朝的末代国王，这时则鼓吹对奥地利人展开"革命性行动，而非文化性行动"。事实表明，他是维也纳不能等闲视之的威胁。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前景更为黯淡。皇帝已同意让被并吞的居民成立议会，东正教塞尔维亚人、穆斯林波斯尼亚人、天主教克罗地亚人，均得根据本身族群在各省里的相对数量，选出代表参与。皇帝承诺议会将是实际人口组成（四成三塞尔维亚人、三成五波斯尼亚人、两成二克罗地亚人）的"真实翻版"，但不久就食言。不足为奇地，这议会转而与奥地利作对，塞尔维亚人的民心转向塞尔维亚，波斯尼亚人转向青年土耳其党，于是维也纳搬出不公正的选区重划办法（以使塞尔维亚籍选民无法左右选举结果），并有计划地广建教堂以拉拢天主教徒。一八七八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只有一座罗马天主教堂，三十年后有一百七十九座，还有数十座新隐修院、女隐修院、学校。波赫境内诸省的塞尔维亚族青年与穆斯林青年，被调去哈布斯堡君主国偏远

地区的陆军部队服役，比例超乎他们所属族群在人口中的比例。哈布斯堡王朝把这称作“去民族化”。[47] 但除非将民族主义连根拔除，否则奥地利人无法使它俯首称臣。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自一九一一年以来在萨拉热窝执掌第十五军并接任波斯尼亚军事行政长官时，也抱着和康拉德一样的看法，即认为只有向塞尔维亚开战并将它击败，才能减缓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在奥匈帝国境内的扩张。[48]

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意在加固哈布斯堡君主国，但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地位还是每下愈况，这令康拉德大为沮丧。埃伦塔尔的“大胆出招”，随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内部崩溃，看来越来越像是一场徒劳。在这同时，塞尔维亚和其诸盟友声势日壮。一九〇九年俄国派激烈反奥的官员出任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然后俄国沙皇赴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以及俄意同意就巴尔干半岛日后的任何变动商议），使康拉德相信哈布斯堡君主国得趁其诸多敌人尚未联合起来反奥之时将它们各个击破。施里芬（与康拉德）作战计划所依据的那些乐观的前提，正一个个瓦解。法国出资建造的铁路将使俄国在几星期内，而非几个月内，就陈兵于奥地利边界。由于奥地利农民党成员和实业家为与塞尔维亚缔结通商条约之事意见不合，最后虽然取得一致意见，却只是使奥地利与贝尔格莱德的贸易关系陷入两败俱伤的乱局。二十世纪初期，奥匈帝国政府受议会阻挠，不得不以提高猪、牛、李子、小麦、大麦、玉米的关税来平息奥匈地主的不满，“猪战争”一场接一场爆发，而提高这方面的关税，实质上切断了奥匈政府与塞尔维亚国最有可为的联结。[49] 一九〇六年前，自奥地利的进口额，通常占贝尔格莱德总进口额的六成，一战前夕降到两成四。美国驻维也纳大使很惊讶奥地利人竟错过“分化塞尔维亚的保守商界人士与激进好战团体”的机会。英国大使馆同样觉得不可思议：奥地利人未“透过互蒙其利的贸易拔除塞尔维亚对其的危害”，反倒“使塞尔维亚人对其心生敌意，同时未想办法解决他们潜在的分歧”。[50]

事实上，维也纳的政策不但未分化贝尔格莱德商界和好战团体，反倒使他们关系更紧密。一九〇八年，奥匈帝国农民党成员成功将自塞尔维亚进口的粮食，限制在每年消耗量的百分之一点六（且即使对如此稀少的进口量，关税都提高了三倍），塞尔维亚人则回敬以对奥地利制造品课以毁灭性关税：对纺织品是百分之七十，对刀具是百分之百，诸如此类。大为不妙的，塞尔维亚人还取消向奥地利Skoda厂订购火炮的一笔大订单，转向法国的Creusot厂下订，从而使贝尔格莱德与三国协约的军事关系更为紧密。[51] 维也纳每年加诸的这项羞辱，使塞尔维亚政府几度更迭，埃伦塔尔严正表示，“只要塞尔维亚懂得走该走的路，随时可望得到我们的善意对待”。[52]

两国关系冰封，因为奥地利人不只要求让其（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进入塞尔维亚市场，还坚持要贝尔格莱德废除其与保加利亚等邻邦的通商条约[53]。在塞尔维亚，仇恨马扎尔人与奥地利施瓦比亚人（Schwabas）的心态升高，塞尔维亚商人悄悄改赴别地贸易：德国、英国、希腊。康拉德没把这些恶兆放在心上。他不断促请埃伦塔尔和皇帝先发制人打击塞尔维亚人或（把遭奥地利拒买的塞尔维亚猪全买下的）意大利人，且在意大利于一九一一年九月入侵土属利比亚后变得非常狂妄。康拉德不顾埃伦塔尔的反对，要求开战，誓言他宁可“断臂”也不愿退缩。奥匈帝国一九一二年秋季军事演习，排定于匈牙利大平原（Alföld）举行，因为那里的地形“类似北意大利”。[54]

皇帝展现其难得一见（且短暂）的果断，于一九一一年将康拉德解职，坚持要奥地利走“和平政策”（但不久后康拉德即复职）。对康拉德的好战已忍无可忍者，不只弗朗茨·约瑟夫。三年前偷偷答应让意大利取得利比亚，以换取罗马接受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之后，埃伦塔尔即对康拉德的爱说大话很不以为然。就连康拉德的恩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都认为这位将军做得太过火，同意将他解职。康拉德失去他应有的分寸，认为他的“职责大于外长（的职责）”，要埃伦塔尔绝

勿让“外交考虑”凌驾于“军事准备”之上。时任陆军部长的奥芬贝格，如此概括地说明其对康拉德的看法：“他深信帝国必须以行动证明其会出手痛击，否则会被拖入战争。”换句话说，成功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但这一理论上要奥地利向意大利开战以表明自身立场的主张，现实上不可行；简而言之，在一八八二年意大利成为奥地利盟邦之后，这一主张无论何时都行不通。奥地利人不可能为利比亚问题向意大利开战，因为诚如奥芬贝格所说，奥地利入侵意大利，几乎肯定会“引发一场全欧的战争”，使奥地利成为众矢之的。[55] 康拉德在皇帝眼中已成为十足的绊脚石，于是，一九一一年十二月，皇帝将他解职，换上布拉修斯·舍穆瓦将军。弗朗茨·斐迪南厚待卸职后的康拉德，让他出任高薪的陆军督察（奥地利陆军设了许多高薪督察）。康拉德于申布伦宫晋见皇帝时遭皇帝解职，事后他抱怨道，“这”就是“使我们大败于柯尼希格雷茨”的那个政策。[56]

挑在这时撤换康拉德实在不是时候，因为康拉德下台，舍穆瓦接任时，巴尔干半岛的情势正处于爆炸边缘。“舍穆瓦将军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到现在还在了解，”法国武官在从维也纳发出的报告中说道，“似乎大家对他都所知不多。他个性内向，从未在军官俱乐部露面；他在波斯住过一段时间，信了他们宗教的某些东西……军事情报首长说，舍穆瓦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得花几个月时间搞懂这个复杂的新职。”[57] 事实上，舍穆瓦一八七八年曾以军事代表团一员的身份奉派前往波斯。这一代表团的任务是向卡扎尔（Qajar）王朝国王推销奥匈帝国的顾问和军火，但未能如愿；波斯国王选择采用德国顾问和军火，舍穆瓦落得清闲，跟着几名伊斯兰教托钵僧学道，然后，在返回奥地利后，加入秘密的反犹组织“新圣殿骑士会”（New Templar Oder）。这个组织由耶尔格·兰茨·冯·利本菲尔斯（Jörg Lanz von Liebenfels）创立，在多瑙河边某城堡里举行神秘仪式聚会，城堡上飘扬着卐旗。[58]

舍穆瓦新接的任务，似乎和他的波斯之行或他的新圣殿骑士团一样

无望成功，情势不容许他花几个月时间慢慢进入状态。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波斯尼亚并吞危机、巴尔干诸国日益强势申明自身立场这三件事，全与俄国、法国的安全有某种利害关系。这三者的急速合流，意味着在如何保留土耳其辖下欧洲地区上，国际仍未有共识。罗伯特·兰辛从美国国务院写道：“巴尔干半岛是诸民族的战场，是村子熊熊燃烧的地方，是猝然失去性命的地方……‘和平’是遭人遗忘的字眼。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土耳其人争夺这块土地，为此，用他们的血淹没它，使它覆满灰烬。”[59] 俾斯麦曾著名地宣称，说这地区“不值得让波美拉尼亚精锐部队付出性命”，但这一宣示这时看来愈来愈站不住脚。奥匈帝国和其他强权不久后终将躲不掉这场杀伐。

---

[1] Sean McMeekin，*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MA：Belknap Press，2011），6-23；William C. Fuller Jr.，*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 1600-1914*（New York：Free Press，1992），432-451；Bruce W. Menning，*Bayonets Before Bullets*：*The Imperial Russian Army 1861-1914*（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2），222-227.

[2] Charles Emmerson，*1913*（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3），93.

[3] Geoffrey Wawro，*Warfare and Society in Europe 1792—1914*（London：Routledge，2000），212.

[4]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EMA 7N 1128，Vienna，Feb. 25，1897，Cdt de Berckheim，“Péninsule Balkanique”；Barbara Jelavich，*History of the Balk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2：109-110.

[5]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Washington，DC（NARA），M 862，roll 940，Oct. 11，1914，“Interview with Prince Lazarevich-Hraselianovic”；Andre Mitrovic，*Serbia’s Great War 1914-1918*（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2007），59-60.

[6] Mitrovic，*Serbia’s Great War*，62-63.

[7] Hugo Hantsch，*Leopold Graf Berchtold*（Graz：Verlag Styria，1963），2：17-18.

[8] Karl Kraus，“Franz Ferdinand und die Talente，” *Die Fackel* 7，no. 400（1914）：2：“Politik ist das，was man macht，um nicht zu zeigen was man ist.”

[9] *Reichspost*，Jan. 9，1913.

[10] NARA，M 862，roll 940，Mar. 1909，Robert Lansing，“Nationality and the Present Balkan Situation”；M 862，roll 940，Oct. 11，1914，“Interview with Prince Lazarevich-Hraselianovic.”

[11] Norman Stone，“Army and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1900-1914，” *Past and Present* 33，no. 1（1966）：107.

[12] Georg von Alten，*Handbuch für Heer und Flotte*（Berlin：Deutsches Verlagshaus，1909-1914），6：639.

[13] Georg von Alten，*Handbuch für Heer und Flotte*（Berlin：Deutsches Verlagshaus，1909-1914），6：639-640.

[14] Michael Stephenson，*The Last Full Measure*：*How Soldiers Die in Battle*（New York：Crown，2012），234-235.

[15] Georg Markus，*Der Fall Redl*（Vienna：Amalthea Verlag，1984），43.

[16] 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25-127）；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Infanteristische Fragen und die Erscheinungen des Boerenkrieges*（Vienna：Seidel，1903），4.

[17] Kurt Peball，“Der Feldzug gegen Serbien und Montenegro im Jahre 1914，” Österreichische Militärische Zeitschrift Sonderheft I（1965）：20；Samuel R. Williamson Jr.，*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St. Martin’s，1991），63.

[18] NARA，M 862，roll 940，Vienna，Oct. 4，1908，O’Shaughnessy to Root，and Mar. 1909，Robert Lansing，“Nationality and the Present Balkan Situation”；*Boston Herald*，Oct. 9，1908.

[19] Kriegsarchiv，Vienna（KA），B/1503：4，Sarajevo，Oct. 19，1914，Theodor Zurunic，“Promemoria.”

[20] KA，B/232：11，Sarajevo，Feb. 23，1909，FML Appel to Ob. Brosch；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Kew（BNA），FO 120/907，Vienna，Oct.

28，1913.

[21] Norman Stone，*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London：Penguin，1998[1975]），1.22；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44；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ustro-Hungarian Campaign Against Serbia in 1914，”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Apr. 1989，128-129；Conrad，*Infanteristische*，4-5；SHAT，7N 1125，Vienna，July 1，1882，Capt. Blanche，Vienna，Jan. 1914，7N 846，2èmc Bureau，Paris，Mar. 29，1913，Cdt. Girard，“L’Armée Austro-Hongroise”；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Aus Meiner Dienstzeit 1906-1918*（Vienna：Rikola，1921-1923），1：39-40.

[22] KA，B/677：0-10，4（Auffenberg），Vienna，Jan. 1，1913，“Memorandum nach meiner Demission als Kriegsminister.”

[23] Stone，*Eastern Front*，123；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11.

[24] KA，B/677：0-10（Auffenberg），Sarajevo，July 1910，“Geist und innere Verfassung der Armee 1910”；BNA，FO 120/906，Vienna，Jan. 16 and Mar. 14，1913，Maj. Thomas Cuninghame to Cartwright.

[25] Wawro，*Warfare and Society*，205-209；Lawrence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Architect of the Apocalypse*（Boston：Humanities Press，2000），61-77.

[26] Felix Prinz zu Schwarzenberg，*Briefe aus dem Felde 1914-18*（Vienna：Schwarzenbergisches Administration，1953），17.

[27] Alfred Krauss，*Die Ursachen unserer Niederlage*：*Erinnerungen und Urteile aus den Weltkrieg*，3rd ed.（Munich，1923），96-99.

[28] Hötzendorf，*Infanteristische*，1-3，6，14，57-58，89-90；BNA，FO 120/906，Vienna，Jan. 16 and Mar. 14，1913，Maj. Thomas Cuninghame to Cartwright.

[29] NARA，M 862，roll 940，Pera，Jan. 12，1909，Rives to Root.

[30] NARA，M 862，roll 940，Vienna，Oct. 4，1908，O’Shaughnessy to Root.

[31] NARA，M 862，roll 940，Bucharest，Mar. 12 and 17，1909，Hutchinson to Bacon；Vienna，Apr. 3，1909，Francis to Knox；Budapest，Oct.

5，1908，translation of letter from Franz Joseph to Aerenthal.

[32] NARA，M 862，roll 940，Bucharest，Mar. 17，1909，Hutchinson to Bacon.

[33] NARA，M 862，roll 940，Vienna，Oct. 4，1908，O’Shaughnessy to Root；*Boston Herald* ，Oct. 9，1908.

[34] NARA，M 862，roll 940，Paris，Mar. 26，1909，White to Knox；Vienna，Apr. 3，1909，Francis to Knox.

[35] Christopher Clark，*The Sleepwalkers* （New York：Harper，2013），85-87；McMeekin，*Russian Origins* ，28-29，36；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 ，156；Winston S.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 （London；Thornton Butter worth，1931），39-40.

[36] Churchill，*World Crisis* ，28-29.

[37] KA，B/232：11，Sarajevo，Feb. 18，1909，GdI Appel to Col. Brosch.

[38] NARA，M 862，roll 940，Vienna，Oct. 24，1908，Rives to Root；Bucharest，Apr. 1，1909，Hutchinson to Knox；M 862，roll 568，Vienna，Aug. 18，1909，Rives to Knox；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71.

[39] Annika 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18.

[40] Norman Stone，“Moltke-Conrad：Relations Between the 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General Staffs 1909-1914，” *Historical Journal* 9，no. 2（1966）：202-203；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 ，75-76；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 ，157-158.

[41] Wawro，*Warfare and Society* ，145-146；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 ，143.

[42] *Danzer’s Armee Zeitung* ，May 28，1914，“Eine Lanze für das Bajonett.”

[43] Timothy C. Dowling，*The Brusilov Offensive*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8-9.

[44] 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A I，810，Int. LXX/I，Belgrade，July 6，1914，Storck to Berchtold，“Aktuelles über die *Narodna Odbrana* .”

[45] “Dies Österreich，es ist ein gutes Land，” *Die Fackel* 5，293（Jan. 4，1910）and 5，368（Feb.5，1913）.

[46] Vladimir Dedijer，*The Road to Sarajevo*（London：MacGibbon and Kee，1967），20；Jelavich，*History of the Balkans*，2：111.

[47] NARA，M 862，roll 940，Budapest，Oct.5，1908，trans. of letter from Franz Joseph to Burian；NARA，M 862，roll 940，Mar.1909，Robert Lansing，“Nationality and the Present Balkan Situation.”

[48] 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73-74，105.

[49] Mitrovic，*Serbia’s Great War*，57-58.

[50] NARA，M862，roll 940，Vienna，Feb.27，1909，Francis to Bacon；BNA，FO 120/906，Vienna，Jan，1，1913，Maj. Thomas Cuninghame to Sir Fairfax Cartwright.

[51] NARA，M 862，roll 940，Vienna，Oct.16，1908，Rives to Root.

[52] NARA，M 862，roll 940，Vienna，Oct.16，1908，Rives to Root.

[53] *Die Industrie*，Apr.30，1910，“Quo vadis，Austria？”；NARA，M 862，roll 933，Vienna，Sept.2，1908，Rives to Root.

[54] NARA，M 862，roll 940，Vienna，Oct. 7，1908，Rives to Root；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78-79*；*Reichspost*，Jan. 9 and 23，1913；BNA，FO 120/906，Vienna，Jan. 16，1913，Cartwright to Grey；Churchill，*World Crisis*，49-53.

[55]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 Hö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170-174；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45，152.

[56]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07.

[57] SHAT，7N 1131，Vienna，Jan. 16，1912，“Le General Schemua，” and Vienna，Apr. 25，1912，“Notes sur la politique balkanique austro-hongroise”；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04-107.

[58]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17.

[59] NARA，M 862，roll 940，Mar. 1909，Robert Lansing，“Nationality and

the Present Balkan Situation."

第三章 巴尔干战争

巴尔干半岛的杀伐之声即将大幅升高。一九一二年三月，俄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成功打造出旨在阻止青年土耳其党收回巴尔干半岛失地、击退奥匈帝国侵犯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然后俄国出面居中协调，让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达成瓜分马其顿的协议。奥地利始终认定，马其顿曾遭多个外族入主一事（曾先后属于保加利亚帝国、塞尔维亚帝国、拜占庭帝国），加上该地族群、宗教的多元复杂，会使任何巴尔干国家都无法控制它。毕竟土耳其人二十世纪统治马其顿时，凭借的手段包括鼓励居民（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罗马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互相迫害（此举偶尔迫使列强坚持要求土耳其改革，甚至派国际委员会来落实改革）。[1]

但俄罗斯的介入，对土、奥两国大计的威胁，远不只限于马其顿一地。由于俄国的运作，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为共同目标而结盟，说服希腊和黑山加入一起奋斗，然后在一九一二年十月向奥斯曼帝国宣战。这一巴尔干联盟的成员国不久后就会为争夺战利品而大打出手，但当下他们都有志于趁君士坦丁堡充满干劲的新政府尚未巩固其在国内和在其少数仅存的欧洲省份（例如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的权力时，先打败土耳其人。

接着爆发的战争，使奥斯曼帝国失去大片疆土，使其陆军消亡殆尽。开战才三星期，五十万土耳其部队（在色雷斯的二十二万部队和在马其顿的三十三万部队），遭总兵力达七十一万五千人的巴尔干联军击败。希腊人拿下萨洛尼卡；保加利亚人进逼到君士坦丁堡城门；黑山人

攻入科索沃和斯库塔里（斯库台）；塞尔维亚人往南攻入马其顿，远至莫纳斯提尔（Monastir，马其顿语称比托拉/Bitola），然后十一月时挥兵向西抵达海边。由于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占领土耳其的爱琴海沿岸，塞尔维亚人即不客气夺取奥斯曼帝国阿尔巴尼亚境内滨亚得里亚海的四个港口：圣乔凡尼-迪梅杜亚（San Giovanni di Medua，阿尔巴尼亚语称圣金/Shëngjin）、阿莱西奥（Alessio，阿尔巴尼亚语称莱什/Lezhë）、都拉佐（都拉斯）、发罗拉（Valona，阿尔巴尼亚语称夫罗勒Vlorë）。一九一三年五月签署的伦敦条约，为土耳其在其欧洲诸省的统治敲响丧钟，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诸省大部分被转让给巴尔干联盟。奥匈帝国，欧洲的巴尔干强权，一无所获。维也纳的《时代周刊》以无法置信的惊讶口吻说道："这场巴尔干危机使我们的外交遭逢如一八六六年的挫败。"[2]



巴尔干战争，1912~1913年：
塞尔维亚并吞大片土地
布达佩斯
奥匈帝国
俄罗斯
帝国
敖得萨
克卢日（克劳森堡）
特尔古-穆列什
阿拉德
比萨拉比亚
诺维萨德
罗马尼亚
波斯尼亚
贝尔格莱德
布加勒斯特
并入罗马尼亚
的领土
康斯坦察
南多布罗加
多瑙河
塞拉耶佛
黑塞哥维那
塞尔维亚
莫斯塔尔
新帕扎尔
尼什
普列文
瓦尔纳
保加利亚
黑海
黑山
杜布罗夫尼克
索非亚
布尔加斯
科索沃
并入黑山的领土
史高比耶
并入保加利亚
的领土
阿德里安堡
亚得里
亚海
地拉那
并入塞尔维亚
的领土
马其顿
色雷斯
君士坦丁堡
阿尔巴尼亚
布林迪西
萨洛尼卡
埃内兹
布尔萨
阿尔巴尼亚
1913年独立
1913年南马其顿
归希腊
希腊
爱琴海
莱斯沃斯
奥斯曼
帝国
士麦那
爱奥尼亚海
柯林斯
雅典
（与1914年时不同的）
1912年国界线
1914年国界线
奥斯曼帝国因1912~1913年
巴尔干战争失去的领土
佐泽卡尼索斯
罗得岛
1913年
克里特岛归希腊
克里特岛
1912年佐泽卡尼索斯
归意大利
0 50 100 150 英里
0 50 100 150 公里

事实上，奥匈帝国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并不突出。死于危机期间（一九一二年二月）的埃伦塔尔，认为在维也纳准备好可以重新向爱琴海进攻，在途中吞并马其顿之前，不妨让这个省份留在土耳其人手里；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希腊人突然进占萨洛尼卡，塞尔维亚人突然攻入史高比耶、科索沃以及阿尔巴尼亚诸港。从经济上讲，这一发展无异于一场灾难。在土耳其百分之十一的关税下畅销的奥地利制造品，从此再无法打入这些新市场，因为这些市场被筑上进口关税壁垒，从最低的保加利亚的百分之三十三，到最高的希腊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奥斯曼帝国人民所戴的非斯帽（fez），原几乎都是波希米亚的毛纺厂所制，但不久后这些毛纺厂就会失去这笔很有赚头的生意。[3] “头一个亡于巴尔干飞蹿的子弹者，乃是现状，”有位奥地利将领痛苦地指出。原本令维也纳受益的现状，突然间烟消云散。[4] 在奥地利军界，巴尔干危机的解决之道似乎再清楚不过。“就让这件事爆发为战争，”阿佩尔将军从萨拉热窝匆匆写道，“我们有什么好怕的？俄罗斯？他们不会有任何动作，我们得把塞尔维亚一劳永逸地解决。”[5]

但俄罗斯人大概会有动作，而且弗朗茨·约瑟夫和弗朗茨·斐迪南都不想要战争，尽管塞尔维亚就是靠战争并吞掉奥匈帝国主要势力范围里的大片土地的。接埃伦塔尔之位的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因决意阻止战争升级并打造奥俄友好协约，已得到皇帝和皇储的支持。他主张奥匈帝国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以免列强想起它一九〇八年的“侵略性角色”。[6] 由于无意用武力恫吓，贝希托尔德实行没人放在眼里的软弱外交路线。他安排了一个“马其顿代表团”（来自索非亚的两名教授和来自史高比耶的一名土耳其退休官员）访问英国驻维也纳大使馆，让他们在该使馆发出独立而非瓜分的恳求。他们主张，“马其顿理当得到自治，不该被移交给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结果是狗吠火车。[7]

但现实上奥地利人能如何执行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日益萎缩的治理

权？奥地利若掀起大战，德国将不得不充当其后盾，因此德皇以嘲笑口吻说道，他不会“为了一些牧羊草地”大动干戈。[8] 心知为了阿尔巴尼亚的牧羊草地大动干戈，战火会扩及加利西亚的农业区，因此，舍穆瓦将军惊恐万分地响应这场危机，特别是回应一九一二年秋俄国在华沙和基辅两地区的试验性动员。他下令局部动员（在波斯尼亚和加利西亚的五十万奥地利人），但无意动用他们。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忧心忡忡，在布达佩斯召开一场有康拉德、舍穆瓦、弗朗茨·斐迪南参与的军事会议，与会诸人全都同意什么都不要做。[9] 这情况和一九一四年七月奥匈帝国会面临的情况（塞尔维亚挑战维也纳，俄、法两国站在塞尔维亚这一边）几乎一模一样。但一九一二年时奥地利的决定，比两年后会做出的决定，明显更为明智。布达佩斯会议推断，以奥地利如此薄弱的陆军，靠军力解决问题绝对行不通。

R+B作战计划——因应俄罗斯（R）的部队和因应巴尔干半岛（B）的部队，加上在这两者之间策应的一支机动预备队——表面上看来颇能因应新情势，但实际上掩饰了现代战争决定胜负之关键（运输工具、火炮、受过训练之步兵）的严重不足。因此，贝希托尔德把重点放在减少奥地利的损失，尽量保住奥地利的颜面上。基于此考虑，他公布一组不算苛刻且勉强保住面子的要求：领土得到扩大的巴尔干诸国必须“尊重奥地利的经济利益，与维也纳谈定贸易协议，保持通往（爱琴海、亚得里亚海）两海域之铁路、公路畅通无阻”。[10] 贝希托尔德还让人意想不到地成为新独立的阿尔巴尼亚之父（使该地和其四个奥斯曼港口不致落入塞尔维亚之手），坚持要塞尔维亚继续当个内陆国，要靠新帕扎尔区的阻隔使塞尔维亚无法直接进入黑山和亚得里亚海。奥地利人控制新帕扎尔区这个八十公里宽的狭长地带多年，但一九〇八年，作为其吞并波斯尼亚后给予土耳其的补偿之一，已将它归还土耳其。这时奥地利人不由得处于一有点荒谬的处境，即试图捍卫正日渐消失之土耳其辖下欧洲省份的主权。贝希托尔德向奥地利代表团解释道：“我知道‘大家都说’奥斯曼帝国一瓦解，奥地利就该夺取新帕扎尔区，以阻止大塞

尔维亚国的出现，但我们觉得如今这么做，代价会太高。”[11] 一心想着实现其扩张天命的塞尔维亚，刚刚收复其在一三八九年黑鸟平原（Field of the Blackbirds）之役中被土耳其人夺走的所有领土，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让阿尔巴尼亚独立，乃是维也纳所能有的最好作为。[12] 阿佩尔将军行走于波斯尼亚境内时，察觉到鄙夷之意：“在这里，就连村中愚夫愚妇都开始嘟哝‘破烂的老奥地利’——一如这里的报界；每个人都认为这个君主国衰弱、怕得发抖。”[13]

始终把塞尔维亚斥为微不足道的“猪与猪群之地”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这时与舍穆瓦前往柏林，以取得德国保证在奥地利与猪群交战时支持奥国。柏林报界饶有兴味地打量这些忧心忡忡的奥匈盟友：“理论上，欧洲六大国平起平坐；但实际上，在民族特性、财力与经济实力、迅速动员能力、海陆军队素质上，有很大差异。”[14] 民族特性乃是这几个项目里霍夫堡宫能在短期内改变的唯一项目，于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以爱说大话著称的康拉德，在弗朗茨·斐迪南的极力要求下复职，取代舍穆瓦。当初康拉德于“舍奈赫危机”期间遭解职的内情，这时也曝光，原来那是美景宫与霍夫堡宫所达成交易的一部分。弗朗茨·斐迪南原想要撤换外长埃伦塔尔和陆军部长舍奈赫，但皇帝坚持条件交换，以继续将陆军抓在手里。于是，弗朗茨·斐迪南同意康拉德下，舍穆瓦上，前提是皇帝愿意照斐迪南的意思撤掉舍奈赫，换上奥芬贝格。但一九一二年三月，三家匈牙利报纸揭露奥地利拟了最高机密的U计划（斐迪南大公欲入侵匈牙利、关闭其议会的一九〇五年计划），并指出该计划在由奥芬贝格拟定时，奥芬贝格就变成烫手山芋，即使是对斐迪南大公来说亦然。

U计划的曝光引发轩然大波，于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即上述交易谈成才一年，就不得不草草谈定另一项交易。皇帝将奥芬贝格解职，且不尽放心地召回康拉德。布罗施从美景宫指出，如果找别人来当，当然更好，但其他候选人全是“婆婆妈妈之徒”。舍穆瓦未做出一番成绩。

他的声望不够高，压不住阵脚，在战争隐隐然即将爆发之际，必然总绾兵符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将需要康拉德当他的左右手。[15] 法国驻维也纳大使馆觉得这场危机最有趣之处，乃是揭露了霍夫堡宫与美景宫无休无止的暗斗。披露U计划那三家报纸全领皇帝的薪水，这表示弗朗茨·约瑟夫刻意铲除奥芬贝格，“以打击弗朗茨·斐迪南和其党羽”。法国大使馆论道，这类耍阴使计的行径，不只降低奥地利高级军官的战斗力，也降低他们的素质。康拉德果然取代舍穆瓦出任参谋总长，但找不到人接替奥芬贝格。“没有优秀的军官愿意接陆军部长之位，”法国人指出，“近来，帝国陆军部被视为匈牙利的附属机构——事实确是如此——且如今大部分高级军官效忠于弗朗茨·斐迪南，不想冒着被他视为叛徒的风险接掌这一职务，因为皇帝太老，不值得把个人前途押在他身上。”[16] 最后，博尔弗拉斯终于找到一位已快退休因而不在意前途之人：六十三岁，在皮尔森（Pilsen）的Skoda厂督造新火炮的亚历山大·克罗巴廷（Alexander Krobatin），一个无害且无能之人。[17]

斐迪南大公和康拉德两人未拾回过去的友谊。虔诚的天主教徒弗朗茨·斐迪南，痛恶康拉德与已婚女子半公开往来引发的轩然大波，也痛恶这位参谋总长明知奥地利军力不强仍那么不自量力地好战。斐迪南大公始终中意于奥、俄达成保守性协约的构想（且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与塞尔维亚、俄罗斯，很可能还与意大利、罗马尼亚同时交战的难题），因此渐渐转向贝希托尔德与皇帝的和平政策。[18] 但和平政策的可行性似乎也不高——塞尔维亚一心想打仗，俄罗斯想不出与奥地利重启一八七八年已截止的同盟关系有什么好处。更糟的是，弗朗茨·斐迪南认为阿尔巴尼亚的角色，类似于一八六四年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普奥战争就肇因于这个地区的归属争端。普鲁士人从丹麦手中夺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诸公国，将它们与奥地利分掉，然后以分配战利品时必然产生的不和为借口，向哈布斯堡王朝开战，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德意志问题”。

弗朗茨·斐迪南深信俄罗斯人在阿尔巴尼亚玩同样的把戏——打算“缩小阿尔巴尼亚的疆域”，以壮大其“塞尔维亚受保护国”，为剩下的领土挑起与奥地利的战争。[19] 他只能指望德国人会支持奥地利，制止俄罗斯。[20] 如果德国人不愿意，奥地利会垮掉。就连老迈的弗朗茨·约瑟夫都惊醒过来，紧张问道：“陆军已可以作战了吗？”[21]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申布伦宫召开的一场高层首长初步会议，权衡了奥匈帝国不同选择的利弊得失。外长贝希托尔德推测，德国人大概不会支持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军事冒进”。[22] 事实上，德国人会；在三天前于波茨坦召开的德国秘密军事会议中，德皇与其将领就已决定，无论情况如何他们都会保卫奥匈帝国，且应引发战争，以在俄、法两国尚未完成其军事扩张时将它们击败，“愈快愈好”。[23] 一如以往，德国人不认为有必要将此决议告知奥地利人，奥地利人不觉得有必要向其盟邦征求意见。一如一九一四年七月时德奥所会有的作为，这两个大国各搞各的，不知对方的真正意向。奥匈帝国的财长提醒道，不管有没有德国支持，奥地利节节升高的备战成本会搞垮财政。陆军已召集十七万两千后备军人增援现役部队。其中一半部署于加利西亚，另一半部署于波斯尼亚，然后又召集了五万后备军人。在皮尔森、布拉格、柯尼希格雷茨，捷克籍后备军人被派赴驻地时高唱塞尔维亚国歌，而非奥地利国歌，哗变情景令皇帝震惊。在柯尼希格雷茨（捷克语称赫拉德茨-克拉洛韦/Hradec-Králové），两千民众堵住兵营通往火车站的公路，朝试图驱散他们的警察丢石头；还有数百名示威者等在火车站，当局动用上了刺刀的部队才将他们驱离。开拔部队的指挥官在火车车厢里遭愤怒暴民攻击。火车启动时，又有数十平民躺在铁轨上阻止运兵火车离开，当局不得不将他们拖到监狱。[24]

俾斯麦那句老话“奥地利皇帝说‘上马鞍’，人民就上马鞍”，已不再适用于现实情况。在萨拉热窝，波蒂奥雷克估计，为了巴尔干战争危机派到那里的后备军人，至少有三分之一不堪用——政治上心怀不满、身

体不适作战，或两者兼而有之。[25] 这样的局部动员，所费也不赀：这一突发且短暂的活动，耗去两亿七千五百万克朗（五千五百万美元），相当于平时陆海军费的一半。

这样的开销如果持续到真正爆发战争时，有可能使国家破产。反过来说，这个君主国禁得起这样的花费却不动手？康拉德提醒所有听得进去的人，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开始的局部动员（只有加利西亚境内三个军和波斯尼亚境内两个军），每天要花掉两百万至三百万克朗。光是多添购用以运送补给品、火炮和增援骑兵中队的马，就花掉三千多万克朗（六百多万美元），但皇帝找任何地方要钱，都吃闭门羹。对于陆军部长奥芬贝格的紧急拨款请求，匈牙利议会连考虑都不考虑，奥地利议会则用刻意阻挠议事的手段将该请求拒于门外。最后，弗朗茨·约瑟夫动用哈布斯堡王朝典型的利益交换手法，以承诺于伦贝格（乌克兰语称利沃夫/Lviv）设立乌克兰大学，使乌克兰籍议员不再阻挠议事，但已为时太迟：无计可施的财政部已寻求以屈辱性的条件在纽约借款，也打算针对收入、资本利得、不动产、火柴、烟草、烈酒，以及史上头一遭的，针对咖啡馆里侍者的小费，征收不得人心的新税。[26]

似乎只有前陆军部长从这场危机中获益。涉入U计划，只是奥芬贝格十二月离职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拿承包动员事宜之公司的股票内线交易之事。据说是一位名叫海因里希·施瓦茨（Heinrich Schwarz）的低阶军官向证券交易所密告此事，此人后来自杀，留下他与奥芬贝格将军往来的书信。[27] 维也纳显然一筹莫展。丑闻、蓄意抵制议事、次级信贷、示威、哗变——维也纳无法再承受一次这一连串丢脸的事；它宁可冒战争的危险。“奥地利陆军得发动战争，而非只是摆出不惜一战的样子……不计代价追求和平的民众似乎决意用最高昂的成本买得和平，而塞尔维亚则让自己永远处于随时可开战的状态，耗尽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财力，以便战争爆发时，俄罗斯可轻易消灭国力已遭削弱的奥地利。”[28]

但在这场危机中，征召三十万后备军人的俄国头一个打退堂鼓，断定不值得为了替塞尔维亚取得阿尔巴尼亚的港口，与德、奥两国交战。[29] 俄、奥等列强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在伦敦召开大使会议，以阻止危机恶化，避免战争发生。“在此谈判时，（奥斯曼）帝国被摆在砧板上砍成数块，”维也纳《新闻报》驻伦敦记者报道说，“马其顿丢了，古塞尔维亚（Old Serbia）、伊庇鲁斯与其附近岛屿（Epirus and the Islands）、阿尔巴尼亚成了受大国保护的中立区。留给土耳其的，只有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周边的部分色雷斯地区。”[30] 但尽管失去大片领土，青年土耳其党仍熬过了又一波的打击。恩维尔帕夏在君士坦丁堡他挂着拿破仑、米歇尔·内伊（Marshal Ney）肖像的办公室里招待外国记者时解释道，青年土耳其党为保住斯库塔里、阿德里安堡、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四座希腊岛屿之类的地方战斗，把每一次失土视为把土耳其外债转移给巴尔干的机会而予以接受，借此吊诡地展示了他们维护祖国的决心。[31] 这样的说法倒也有其难以反驳的道理；土耳其国土缩水，但长远来看稳住自己，而执着于维护荣誉和历史权利的奥匈帝国人似乎没能耐这样做。国外有个新病夫，那人位在维也纳。

战争未爆发，但差点爆发，且双方都从这一令人惊骇的事件得出错误的结论。弗朗茨·斐迪南的《奥地利评论报》怒冲冲说道，维也纳差一点遭遇“第二次柯尼希格雷茨之败”，差点“被赶出巴尔干半岛”。[32] 布罗施上校惊讶于在人人都已上紧发条准备开打时，“和平意想不到地出现了”。[33] 康拉德认定俄罗斯打退堂鼓，乃是因为他的局部动员，也认定他本可以入侵塞尔维亚和黑山然后全身而退。波蒂奥雷克写道，在下一场危机时，将不得不开战，否则“士兵和军官会认定政治领导人已对军队失去信心”。奥地利不能“像一九〇九、一九一二年那样”第三度征集后备军人，“却不动用他们”。换句话说，若未来再有挑衅，必会引发世界大战，但这个君主国如此不得民心，碰到这样的战争时，大概会有多达三分之一的奥匈帝国军人不愿为它打仗。[34]

奥地利的敌人也对这场危机有错误的解读。俄罗斯推断，奥匈帝国未入侵塞尔维亚，乃是因为害怕俄国军队，而非因为德国人的制止。[35] 塞尔维亚人认为他们带挑衅意味的吞并无伤大雅，把战争恐慌心理归咎于“又老又病的弗朗茨·斐迪南的武力恫吓”。

德国则庆幸奥地利避掉了战争，至少避掉了在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在柏林，德皇像个往巧克力盒里仔细瞧的人，拿捏不定该追求称霸欧洲，还是称霸全球。他把目光盯在“土耳其、中国、南美”境内更美的肥肉，在那些地方，诚如柏林报纸所说，“下一个十年将决定由哪一个经济大国击败群雄而胜出”。[36] 由于这些肥肉已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德皇打定主意不想只因为“奥地利不让塞尔维亚人在阿尔巴尼亚立足”，而卷入对抗俄、法、英的民族生存战中。德国参谋总长毛奇最初判定战争“势不可免”，这时却根据帝国的新形势改弦更张，把处于较边陲地区之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恐慌现象视为“奥地利人的愚蠢行径”。[37]

还有更愚蠢之事会发生。一九一三年五月，巴尔干半岛上空再度战云密布，保加利亚人扬言掀起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以扩大他们在马其顿所瓜分的领土，就在这时奥地利报界报道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四十七岁的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上校，哈布斯堡陆军最有才华、最受肯定的军官之一，在大部分同辈都还在上尉官阶苦撑时就当上上校之人，被人发现死于维也纳某饭店房间里。他把布朗宁手枪塞进嘴巴扣动扳机，轰掉颚部和脑部，左鼻孔喷出大量鲜血，几乎立刻丧命。雷德尔于周六住进饭店，周日早上被人发现瘫在安乐椅上，血已干掉结块，手枪掉在他右手下方的地板上，手枪（显然不是他自己的手枪）的使用手册摊在他身旁的桌子上。书桌上摆了两封信，一封给他的最后一个指挥官上司，布拉格的阿瑟·吉斯尔（Arthur Giesl）将军，另一封给他的兄弟。另外，还有一份简单的自杀短笺：“请求谅解和原谅。”[38]

奥地利报界如饿虎扑羊般拥向这则最新的离奇事件。那是丑闻频发

的一年。首先，爆发无畏级战舰事件，奥地利第一艘全装重型火炮战舰同心协力号（Viribus Unitis）交舰时，发现舰身过重，航速比先前对外宣称的慢了一半。几名海军将军和造船厂主管遭撤职，制造出不符规格之火炮与装甲的Skoda厂遭公开责难。[39] 然后爆发扬德里奇事件（Jandric Affair）。波斯尼亚塞尔维亚裔出身，与参谋总长康拉德之子库尔特（Kurt）交情甚好的奥地利中尉塞多米尔·扬德里奇（Cedomil Jandric），被指控将奥地利火炮的技术资料卖给俄国人，且判定其罪名成立。[40] 陆军调查扬德里奇，结果查出另一个间谍（库尔特·康拉德的意大利女友），这间接表示小康拉德本人可能也涉入其中，从父亲书房偷取最高机密文件卖给俄国人。扬德里奇丑闻之后闹得非常大的奥芬贝格事件，则似乎坐实了哈布斯堡王朝最高阶层贪得无厌、对人性怀疑悲观的印象。这位哈布斯堡前陆军部长遭指控拿国防承包商的股票进行内线交易，最后只受到微惩就脱身。然后，现在，就在那最后一桩丑闻的风波几乎要平息之际，康拉德将军底下极优秀聪明的一位军官，被人发现自杀身亡于饭店房间。

报界推测，雷德尔上校是那种为上司承办大小事，做到累得像狗的人。在弗里德里希·贝克（陪侍皇帝左右且生性很懒惰的皇帝好友）当参谋总长那二十四年期间，这种人到处可见。贝克和其底下的各部门头头，常把自己该做的大小事，都丢给波蒂奥雷克、康拉德和最近身亡这位上校之类积极进取的下属做。吉斯尔将军（典型的奥地利好逸恶劳将领，松垮垮的三层下巴垂在他军装衣领上）把雷德尔调来他麾下，正是因为在维也纳的共事经验，让他知道雷德尔是个从不喊累的工作狂。总而言之，雷德尔工作个不停，早早就来上班，工作到很晚，然后到咖啡馆看报纸，接着回办公室工作到深夜。他离晋升将官只差一小步，但似乎不堪工作负荷而垮掉。另有报道推测，雷德尔说不定是被国外危险的“秘密活动”搞到精神崩溃。

“我们不清楚他为何开枪自杀，”《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

）于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坦承道，“听说他于周六晚上坐轿车来到维也纳，有三名军官来接他。那三人护送他到饭店房间，跟他谈了些事，然后离开。”三名军官离开后，雷德尔离开饭店，在附近一家餐厅用餐，写了短笺和信，走了一会路，午夜时回到他下榻的饭店，在书桌上摆上三千克朗（六百美元），然后开枪自杀。周日早上五点，那三名军官派传令兵去叫醒他，发现他已身亡。[41] 到了那一周中期（那名传令兵也自杀之后），每家报纸都在报道此事，《新维也纳日报》则报道了一场“非常古怪的丧礼”。如此受敬重的军官，为何葬礼如此隐秘低调，没有军方仪仗队，而是由老百姓抬棺，且棺木盖着，然后没有仪式，急匆匆从驻地停尸间送到维也纳辽阔中央公墓一个未标记亡者身份的墓下葬？[42]

到了那个周末，一切真相大白。自那一周中期起，几家八卦报就一直在拿雷德尔的性生活捕风捉影地报道，陆军部在这些报纸催逼下，终于发布一简短声明，说雷德尔自杀，乃是“因为同性恋情使他财务陷入困境，他为缓和此困境，把机密军事资料卖给某外国的特务”。[43] 更简单地说，雷德尔把奥、德军事机密卖给他的俄罗斯爱人，以换取性爱和金钱。每一次他想洗手不干，俄罗斯人就威胁要揭发他。八卦报拿这个腥膻丑闻大做文章时，《新闻报》一直对此不碰不谈，但此时它也屈服：“我们一直以为这个高贵帅气的军官是个喜欢与女人为伍的潇洒迷人男子，其实似乎已‘堕落了’。”[44]

真相是阿尔弗雷德·雷德尔至少从一九〇五年起就替俄罗斯人搜集情报。那一年，他四十一岁，挂上尉官阶，奉派到高加索学俄语，结果却对某些俄罗斯人研究得有点太深入。雷德尔在维也纳军中往上爬时，他当年的俄罗斯东道主一直守着这秘密。[45] 当上维也纳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时，他主持反间谍部门，使他不只能泄漏德、奥的机密，还能泄漏维也纳安插在俄国的最优秀间谍名单。担任布拉格第八军（康拉德之机动预备队的四个第二梯队军的其中一军）参谋长时，雷德尔泄漏了德奥

一旦与俄国开战，两国在波兰、加利西亚的联合作战计划。俄国报纸频频讨论奥匈帝国机密计划一事，终于促使奥地利展开内部调查，进而揪出雷德尔。他会事迹败露，败在一封塞有六千克朗的信。与他接头的俄罗斯人从德国将那封信寄到他位于维也纳的邮政信箱，但他未及时领取，信于是被“退回寄件人”。德国官员收到退回的信，将其拆开，比对了掌握的资料，发现了奥地利人十年来都未发现的秘密。[46]

奥芬贝格忆道，雷德尔事件“带来接二连三的打击”，而最后一个打击堪称最严重。把雷德尔叫到维也纳的参谋官，未讯问雷德尔，查明其叛国程度和接头对象，反倒交给他一把手枪，允许他自裁了事。诚如英国武官所说的，这么做大概是“为了避免令人难堪的丑事曝光”。维也纳的《工人报》问道：“敌人怎么有办法收买如此杰出且有经验的奥地利陆军参谋？”问出了大多数人心中的疑问。[47]《新闻报》觉得“如此干练的军官，得到他上司无限的信任——他甚至是Vertrauensmann（受信任之人），获准进入弗朗茨·斐迪南在美景宫的私室——竟会叛国，实在令人震惊”。雷德尔事件令维也纳颜面无光，无地自容。

事实上，奥地利军方领袖最担心的，乃是雷德尔叛国对军方可能造成的影响。在四月那件涉及自己儿子的间谍丑闻中勉强全身而退的康拉德，不希望雷德尔供出他的恩师（康拉德是其恩师之一）、共犯、方法。[48]要那三个逮人的军官在饭店房间盘问雷德尔，然后给他一把手枪，让他自裁的人，就是在雷德尔被捕时正在环城大道克特纳段（Kärtner Ring）的格兰德饭店用餐的康拉德。康拉德希望借此使雷德尔问题消失，以为报纸只会报道有位杰出军官以奥匈帝国薪水过低的军官所常有的那种出于绝望的自杀了结自己性命，不料反把事情搞砸。

雷德尔接受仓促的盘问时极不合作，把他的秘密大部分带进了坟墓里，但逮捕者从盘问中和后来撬开他位于布拉格住所的保险箱中得到的少许信息，却令人惊骇：雷德尔已把最新版的R计划（一九一二年更新

的计划）卖给俄罗斯人，里面包括所有动员和部署计划、作战命令和行军计划表、德国针对东部边界制定的动员计划（得自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雷德尔本人在柏林与毛奇开会时）、德奥作战装备的技术性说明书、加利西亚一地普热梅希尔（Przemysl）要塞建筑群草图、该要塞群的物资补给计划。雷德尔把参谋部对奥匈帝国军事演习的机密评论卖给俄国人。他常提醒俄国人留意奥匈帝国陆军部正在思考的组织改革或技术性改革，向俄国人泄漏奥国间谍名单，掩护奥地利境内的俄国间谍，诬告无辜的奥地利军官为外国刺探情报（以维系其坚持不懈侦捕间谍的名声），扼要说明必会接掌集团军或军之奥匈帝国将领的长短处。说到康拉德此人时，雷德尔说他“善于出谋划策但无识人之明”，而那桩英国大使馆所谓“令康拉德大为难堪、名誉扫地”的事件，似乎正坐实这评断。[49]

对一再容忍康拉德的狂妄而一径予以保护的弗朗茨·斐迪南来说，这林林总总曝光的内情是压垮他对康拉德之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内情揭露康拉德本身的颟顸无能，为莱塔河两岸批评哈布斯堡陆军的那些人，送上进一步缩减军事预算和特权所需的弹药。曝光的内情中，包括雷德尔布拉格家的保险箱里有一名骑兵中尉的裸照，雷德尔只要人在维也纳，就与那人黏在一块。有份报纸写道：“如今大家说陆军是反常性爱与性欲倒错的温床。”还有一份报纸把焦点放在钱而非性上面：“我们花数百万的钱在陆军上，认定至少不会有叛国之事，如今却爆出这让人难以置信的丑闻：一名最高阶军官，在未遭察觉下侦刺情报十四年。除了说陆军是个瞎眼的傀儡，除了是只有封建领主与资产阶级势利鬼才能参与的地方，除了是场灾难，我们还能说什么。”[50]

康拉德底下参谋部安全意识的松懈，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否则以雷德尔这个加利西亚公务员之子，财产暴增，生活阔绰，雇用五名仆人，在布拉格租下一间豪华公寓，在维也纳买下一间豪华公寓，养了四匹良种马，怎会一直未受到怀疑。雷德尔还在几乎人人都没车的时代，

开着一部三十六匹马力、值一万六千克朗的奥地利-戴姆勒（Austro-Daimler）汽车，一年花掉估计十万克朗，凭着上校的薪水却积聚了两百万克朗的财富。雷德尔光付他仆人的薪水，一年就花掉七千克朗，相当于两名陆军少校的年薪。如此张扬阔绰，怎会没人起疑？

信教虔诚的斐迪南大公，也震怒于雷德尔的同性恋。当时的军官圈子仍把同性恋称作“波茨坦病”（la Potsdamie），谣传这种断袖之癖盛行于普鲁士宫廷，因此而得名。经查明，雷德尔自杀的那间饭店，距霍夫堡宫步程不远的克罗姆泽（Klomser）饭店，就是雷德尔常从布拉格开车来与男友斯特凡·霍林卡（Stefan Horinka）中尉相会的地方，而霍林卡在维也纳约瑟夫施塔特（Josefstadt）区的公寓，据房东太太所说，乃是“狂欢作乐”之地。雷德尔总会顺道过来，和霍林卡云雨一番，告诉房东太太他来“看他的侄子”；她不是傻子，知道怎么回事，但还是纳闷陆军军官怎能穿得这么好、开这么贵的车四处跑。房东太太推断，“他在部里搞见不得人的交易，大概在把缓役证明卖给想让自己儿子缓役的有钱人”，而他对雷德尔的这番认定，正与一般大众对陆军的怀疑相一致。[51]

这是自一九〇四年皇帝将路德维希·维克托大公流放出京以来，维也纳所爆发的最大同性恋丑闻，使哈布斯堡王朝所希望遮掩的种种事物再一次曝光：蒸汽浴、男按摩师、在维也纳市立公园找少年寻欢以及多瑙运河沿线好色的雷德尔常去的所有地方。而这一切全发生在康拉德眼皮底下。雷德尔的戎马生涯始于贝克麾下，但在康拉德麾下开始平步青云，这时，康拉德甚至不愿把雷德尔事件的相干人等解职或惩戒，而只要霍林卡中尉接受三个月的苦役和贬为大头兵。[52] 弗朗茨·约瑟夫对这些曝光的事极为反感，于是把他的兵权大部分转移给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任命他为“联合武装部队督察长”。若非这一连串发展，皇帝绝不会授予他此职。督察长指挥陆海军和掌理参谋部，而此前最后一任督察长是这位老皇帝的堂伯，已于一八九五年去世的阿尔布雷希特大公

（ArchdukeAlbrecht）。[53] 弗朗茨·斐迪南对这些曝光之事的厌恶，至少和弗朗茨·约瑟夫一样强烈，但这位信教虔诚的大公也认为康拉德让雷德尔选择自裁一事违反神的律法。他再次开始要求撤换康拉德，代之以会扫除积弊、重整纪律与道德之人。他提出特尔斯蒂扬斯基（Tersztyánszky）将军与波蒂奥雷克将军两人选，尽管波蒂奥雷克据说也是个同性恋。

整个二元君主国，而不只是奥地利报界和军方，都紧盯着雷德尔事件不放。保守派认为此事再一次揭露正腐化奥地利的“社会弊病”：“对金钱与个人前途的极力追求、自我中心、物质主义、浮夸虚华、道德彻底沦丧。就连k.u.k.军官团都已被这些东西渗入。”[54] 奥地利议会群情激愤，要求陆军将此事交给司部法调查，议场里响起令人难堪的质问：为何雷德尔未被捕，未照规定送交军法审判？他靠什么如此快速升迁，当上陆军部一重要部门主管和军参谋长？他豪奢阔绰的生活作风怎么一直未被注意？他为何获准自己了结性命？既然雷德尔也泄漏了德国的机密，为何未邀德国一起调查？他出卖了哪些机密？未来任何对俄作战计划都已被摸得一清二楚？陆军理不直气不壮的自我辩护——“雷德尔穿皇帝的军装，但其实完全称不上是奥匈帝国军官，因为军官团是纯正的”——是可笑的，隐含反犹意味（雷德尔是犹太人因而不纯正）的，被斥为胡说八道。[55] 匈牙利议会看到他们所已然鄙视的共同军里曝光这些无能、腐败、堕落之事，惊骇万分，无法接受。自一九一二年晚期起，贝希托尔德为了得“一劳永逸地”和塞尔维亚打一仗之事受到康拉德围剿，这时则得到解围，因为抬不起头的康拉德噤了声。[56]

不久后，巴尔干联盟的炮火打破这静默。该联盟所有成员国自一八九〇年代起就蚕食马其顿（保加利亚人袭掠希腊人村庄，阿尔巴尼亚人袭掠塞尔维亚人，每个族群都在袭掠土耳其人），这时则张开口，想尽可能吞下马其顿土地。[57] 在巴尔干战争前，塞尔维亚承诺把马其顿中北部的大部分地方让给保加利亚人，但被列强逼离阿尔巴尼亚后，贝尔

格莱德反悔，不愿割让马其顿领土。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只花一天时间就把保加利亚军队打到萨洛尼卡的希腊人，不愿割让马其顿或色雷斯的任何土地。罗马尼亚人跟着凑上一脚，要求取得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港锡利斯特拉（Silistra）和多布罗加（Dobrudja）南部。奥地利人还是只能窘迫不堪地看着他们在自己主要的势力范围里撒野，插不上手。三月，布达佩斯有份日报写道："奥匈君主国在巴尔干战争中丧失的威信，更甚于在此战争中遭击败的奥斯曼帝国。"[58] 这些新兴的巴尔干国家为统一民族而攻打土耳其人（且彼此攻伐），其初生之犊的冲劲与活力，哈布斯堡君主国里厌倦、消沉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绝对看在眼里。[59]

一九一三年夏在波希米亚举行的一年一度奥匈帝国陆军演习上，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把康拉德拉到一旁，告以他想在一九一四年安排另一组军事演习，也就是想在依例于九月举行模拟和俄国交战的演习之前，在六月于波斯尼亚办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威吓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展示老早就该展示的武力。这位大公甚至已想好日期，六月二十八日，即塞尔维亚纪念一三八九年基督教王国在科索沃的黑鸟平原之役败于土耳其之手的国定假日。[60]

奥地利人暗自筹谋时，保加利亚人掀起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打算纠正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不公平结果。七月，他们遭这时已停止运作的巴尔干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彻底击败。保加利亚之所失，即塞尔维亚之所得：贝尔格莱德的疆土扩增一倍多，人口增加三分之一，取得从史高比耶至北边莫纳斯提尔（比托拉）的马其顿中北部大部分土地。一九一三年八月召开和会，结束此战争，而奥地利人再次以缺席和会引人注目。德国人不顾奥地利反对，批准和约条文，同意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扩大疆域，从而进一步削弱他们奥国盟邦的国力。

维也纳能（如埃伦塔尔那般）把塞尔维亚贬为从奥地利果园偷苹果的"坏小孩"的时代，显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但就在形势如此危蹙之时，

这个二元君主国的两个部分仍无法共体时艰，同心协力。一九一三年，负责联系奥、匈两国政府的两国代表团会晤，以讨论紧急扩编军事预算和年度征兵员额之事，却为了下了班的哈布斯堡王朝军官能不能在匈牙利议会兼差当警卫，或为了是否必须取消他们“外国士兵”资格的问题，而陷入僵局。[61] 整个帝国似乎正逐渐崩解。英国某报刊出一篇名为《奥匈帝国解体》的文章，其副标题为“说不定今日，或许明日，肯定后日”。该文预言这个君主国会于不久后遭德、意、俄、塞、匈瓜分，而最令奥地利人感到羞辱的，乃是瓜分国里有匈牙利。[62]

一九一三年波斯尼亚境内的哈布斯堡陆军演习，反映这一普遍的不安；这些演习引爆康拉德与弗朗茨·斐迪南的公开争吵。康拉德指责斐迪南大公把演习搞砸，然后愤愤然离开演习现场。弗朗茨·斐迪南不甘示弱，骂参谋总长是“华伦斯坦之流”，影射他和三十年战争中带兵得胜、后来阴谋推翻哈布斯堡王朝、最后遭刺杀的奥地利统帅华伦斯坦一样。[63] 康拉德与斐迪南大公争吵的原因，大大透露了奥地利陆军持续未消的难题。贝克当参谋总长时，军事演习的质量就已大不如前。他赶在一两天内完成演习，以配合皇帝日衰的体力和注意力，且使花招营造攻方兵力庞大的假象，以满足皇帝爱看盛大场面的心理。[64] 康拉德较专业，较跟得上时代。他把一九一三年的演习分为两部分。第一阶段四天，要两军（各一万四千兵力）在科林（Kolin）与布杰约维策百威小镇（Budweis）周边丘陵相逼近，陈兵列阵，以测试指挥官的作战能力。第二阶段三天，要测试他们的战术能力。这一次，康拉德抱怨斐迪南大公之事，完全言之有理。弗朗茨·斐迪南缩短演习第一阶段，使指挥官——不久后就会在战场上与俄罗斯人真枪实弹对打的布鲁德曼将军和奥芬贝格将军——没有机会侦察行动中的敌军动静和调度部队攻打敌军。然后斐迪南大公在布鲁德曼的部队已开始溃败时突然中止战斗阶段，下令隔天针对“以旗子代替的敌人”演习。这一把部队抽离守方，在他们阵地里留下旗子，然后要他们加入攻方的做法，曾被贝克大肆使用以营造戏剧化效果，但已遭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陆军扬弃，“因为那导

引出战场上所不会呈现的情况”。一九一三年时，较认真的演习都以没有旌旗飞扬但切合实际的“空荡荡战场”为特色，骑兵下马，步兵和火炮进入壕沟或躲在掩蔽物后。武官把人马拥挤的战场上旗海飞扬的演习称作“表演给姑娘看”，且的确有人在无意中听到，斐迪南大公下令某上校把其参与插旗演习的部队，调到“从山上较容易看到的地方”，而弗朗茨·斐迪南就和他妻子、小孩一起坐在那山上。

看了数千奥地利士兵以紧密队形迅速奔驰于战场上去攻击一排旗子时，法国武官转向他的塞尔维亚同行，问道：“在你们所打的最近两场战争中，有看过守方守得比这还轻松的吗？”这个塞尔维亚人没见过。[65] 但斐迪南大公不以为意；康拉德要求演习更逼真时，有人不小心听到斐迪南大公如此反驳：“承平时期没必要教我们的士兵死。”[66] 奥地利报界报道了在演习场上所远远看不到的阴谋。鲁道夫·布鲁德曼（Rudolf Brudermann）将军，“美景宫的宠儿”，原本就要惨遭因涉及匈牙利人、金钱、女人的丑闻搞坏名声，而欲被借由这场演习扳回颜面的奥芬贝格歼灭时，斐迪南大公不想看到自己的爱将输，于是在布鲁德曼的部队逐渐瓦解之际突然停止演习，然后下令展开插旗演习，以为布鲁德曼保住面子，让奥芬贝格无法如愿挽回名声。[67] 康拉德对此极为反感，当场递出辞呈，遭斐迪南大公驳回。弗朗茨·斐迪南提醒康拉德，陆军禁不起在雷德尔事件后再出丑闻，因为“犹太人、共济会的报纸”会拿他们两人的不和和康拉德的去职大做文章。[68] 匈牙利报纸《布达佩斯》报道弗朗茨·斐迪南与康拉德之间的紧张关系时，表露出事不关己的立场：“对匈牙利大众来说，由康拉德还是别的将领占有这职位，无关紧要，因为他们的陆军与我们国家没有瓜葛。那不是我们的陆军，不为我们的国家目标而战。”[69]

康拉德辞职不成后，在这职位上力求表现。十月十八日在莱比锡与德皇会晤时，康拉德从威廉二世口中索要到一旦与塞尔维亚开战德国会支持奥国的保证。这时，塞尔维亚正侵犯五个月前才由列强扶立的新国

家阿尔巴尼亚。德皇以低沉声音说道："我站在你这边。"同一天，奥地利人向贝尔格莱德发出最后通牒，要其撤出阿尔巴尼亚所有有归属争议的领土，扬言若不从将开战。已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损失九万一千人的塞尔维亚，一个星期后撤兵。

一如在春季时的斯库塔里危机中所见，哈布斯堡扬言开战的举动迫使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从战争边缘缩手。好在威胁奏效，因为奥匈帝国的狂言大话掩饰了陆军武器的严重不足，特别是野战炮和机枪方面的不足。亚历山大·布罗施上校从博岑告知奥芬贝格他的团"样样都缺：火炮、机枪、炮弹、步枪、步枪弹"。[70] 贝希托尔德漠视这些警讯，且如他在十月二十一日写给弗朗茨·斐迪南的信中所夸称的，庆幸他"在没有（德国人）指导下"又打赢塞尔维亚人一回，尽管德皇曾发电报表达其对奥皇的支持，向贝希托尔德表示祝贺之意。威廉二世告诉驻柏林的奥地利武官，"奥地利摆出威胁姿态；我希望她继续这么做"。[71] 贝希托尔德的沾沾自喜，主要得归因于对国际情势过分乐观的解读；贝希托尔德仍认定英国把"强大的奥匈帝国视为欧洲（压制俄罗斯）所不可或缺"，且认定英国协助阻止了塞尔维亚人取得阿尔巴尼亚的海港，以阻止由俄罗斯主导的"大斯拉夫帝国"形成。[72] 就是这些浮夸的认定，使奥国免于和塞尔维亚陷入难以收拾的小冲突（"即使是白痴，有时也会走狗屎运"，布罗施酸味十足评论贝尔希托德此人）。[73]

事实上，维也纳已失去身为大国所拥有的大部分行动自由。在外交政策上国内没有共识，预算赤字达十亿克朗。老皇帝和以往一样疯疯癫癫——十月与英国大使馆官员会晤时，他闲谈巴尔干半岛的整个政局，最后，令款待他的英国人大吃一惊的是，他推断"总的来说，土耳其人是那里最好的人"。[74] 土耳其人当然已不在那里，但这位皇帝似乎未因这一实际情况改变他的看法。

没皇帝那么老朽的奥地利领导们，则非常清楚他们处境的艰险。英

国武官报告了这个君主国开始明白自己国力有多弱时，陆军部和参谋部近乎恐慌的情况。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恐慌已迫使奥地利人思考真打起仗来他们要如何分配兵力，结果发现兵力太少，不管是要对付俄国、塞尔维亚、意大利、罗马尼亚乃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一场叛乱，都无法取胜。圣诞夜康拉德沮丧提笔写道："我愈来愈相信我们的目标只会像艘逐渐下沉的船，体面的没顶。"[75]

对外，奥地利逃不掉德国的拥抱。"他们（两国）原是结盟关系，现在则是铸在一块，"丘吉尔后来如此写道。德国陆军（或德国扬言动用陆军），已成为奥地利唯一的"保命符"。奥匈帝国得趁塞尔维亚还未变得更强大时杀杀它的气焰，但打塞尔维亚人，必然要打俄罗斯人，而没有德国助阵，则打不赢俄罗斯人。贝希托尔德正催外交部内的同仁尽快完成对哈布斯堡外交政策的大幅检讨，而外交部的涉入正证实了上述德国角色吃重的看法。检讨报告的主要结果有两重：塞尔维亚日益受到陆军和"黑手会"（以及其侵略性的新任驻俄大使）的左右，所以不可能安抚得了，只有动武才能压制其野心，而一旦动武，俄罗斯不会退缩。检讨报告指出，圣彼得堡这时正运用其在巴尔干半岛上所能动用的所有手段削弱奥匈帝国的地位。俄国人在煽动塞尔维亚人，试图使罗马尼亚脱离其与奥、德的结盟关系，且有可能用法国人的贷款利诱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也脱离这关系。情况看来似乎已没有什么好谈的——只有一团笼罩巴尔干半岛且悄悄渗入由斯拉夫人占多数的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泛斯拉夫狂热。这使塞尔维亚掌握了主动权。塞尔维亚这时看出，把俄罗斯、塞尔维亚两地民族主义合流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绝不会再抛弃贝尔格莱德；如果再一次抛弃贝尔格莱德，陆军有可能不再挺他，而陆军是沙皇政权的支柱。塞尔维亚因此信心大增，绝不会再因奥地利的放言恫吓而退缩。如果战争爆发，他们会放手一搏，心里认定俄罗斯人会踢开奥匈帝国的东大门，助塞尔维亚征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

柏林这时是左右大局的关键，而德皇有他自己需要认真思考的疑虑。德国人肯定奥地利自一八六七年开始施行的折中方案，却极为担心奥匈帝国即将到来的接班问题；他们知道弗朗茨·斐迪南一旦接位（据认不久就会发生的事），会动手拔除维也纳、布达佩斯之间并不顺利的伙伴关系。一九一四年弗朗茨·约瑟夫已八十四岁，身子虚弱到每次斐迪南大公去他的波希米亚乡村别墅或位于亚得里海滨的府邸，都有一辆专列在那等着，以便皇帝突然驾崩时，可将他迅速送回维也纳。一九一四年五月，斐迪南大公，而非皇帝，为奥、匈两地代表团的开会主持开议仪式，因为弗朗茨·约瑟夫病重，无法主持。皇帝未参加陆军演习已数年，都由斐迪南大公代他参加。[76] 但弗朗茨·斐迪南因立场反匈，为匈牙利人所痛恨。在其他地方，他也不得民心。就连克罗地亚人都在一九〇〇年代初期背弃他，尽管他原想让他们在萨格勒布有自己的都城，且已让他们跻身领导阶层，一同治理这个君主国。[77] 捷克人也背弃他；一九一四年一次大战爆发前那几个月，他们为争夺布拉格议会和奥地利议会的控制权，和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争战不休，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也加入这场争斗，攻击奥地利议会中的“波兰社”（Polish Club）。如果每个民族都要求跻身维也纳、布达佩斯的特权统治阶层，或要求有权完全脱离自立，奥匈帝国还能幸存吗？显然不可能。一九一四年三月，弗朗茨·约瑟夫指示其总理卡尔·冯·施蒂尔克（Karl von Stürgkh）宣布奥地利议会无限期休会，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康拉德和毛奇自一九〇九年起进行过零星几次幕僚会谈，粗略同意一旦爆发大战，德国人会执行其施里芬计划，击溃法国人，奥匈帝国则力挫俄国人在东边的任何早期攻势。一旦打倒法国，德国人挥兵向东，将奥地利救离势不可挡的俄军之手。一九一四年五月他们在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Karlsbad，捷克语称卡罗维瓦利/Karlovy Vary）最后一次开会时，确定这一粗略的协议仍然有效。但在具体做法上，有含糊不明之处。按照康拉德的作战计划，哈布斯堡王朝陆军要分成三个部分，即俄罗斯群（二十八个师）、巴尔干群（八个师）、机动预备队（十二个

师）。欧洲大战几乎肯定会在巴尔干半岛点燃，然后立即扩及俄罗斯，因此，至关紧要的是，德国人得得到奥地利的以下保证：维也纳将只会用其“最小巴尔干群”的八个师守住其南边界，把其他部队（四十个师）全迅速调到东边挡住沙皇军队。

一如德国，奥地利非常清楚其东疆极难守住。弗朗茨·斐迪南的军事文书署于一九一一年所拟的研究报告推断，奥地利根本无力在塞尔维亚、俄罗斯两地同时作战，这么做将使人数居于劣势的奥匈帝国部队孤军深陷华沙与伦贝格之间的广大地区，几乎必然全军覆灭。[78] 二十世纪时俄军兵力已如此庞大（六百万），即使奥匈帝国动用其全部两百万兵力，也难以削弱其攻势。如果抽调部分兵力到塞尔维亚，使迎击俄军的奥匈兵力变少，奥地利八九不离十会落败。

不过，鉴于康拉德不断痛斥贝尔格莱德，他很有可能会先打塞尔维亚。他会试图集结二十个师来对付塞尔维亚的十二个师——从而实质上执行B计划，而非R计划——而这将使奥地利位于东边的二十八个师陷入险境，可能遭兵力三倍或四倍于它的俄军歼灭。德国无视这一显而易见的危险。毛奇最关心的似乎是使康拉德不要再执着于要德国派军队到东边，因而决定略过细节不谈。不讲清楚符合双方的需要，既使维也纳可以视情势发展决定是否要消灭塞尔维亚，也使柏林能保有抽离东线部队，全力进攻法国的选项。[79]

毛奇、康拉德两位将军是行经墓园吹哨子壮胆，其实心里都怕。一九一四年的俄罗斯已不是十年前施里芬计划的初步草案中设想的那个不堪一击的巨人。自败于日俄战争后，俄罗斯力行革新，添置了急射轻炮和重炮，彻底整顿了本国的动员流程。俄国已建造了连接莫斯科、圣彼得堡到华沙的新双线铁路，从此将可随时与敌交战，且配备有比奥地利部队更多火炮的军队，可迅速部署到边疆地区，而不必停下来等姗姗来迟的后备军人报到。俄罗斯人自信满满，因而在一九一一年向法国人保

证，第一道动员令一下达，只需十五天，他们就会把八十万部队部署到其与德国、奥匈帝国的交界处。[80] 没人把俄罗斯人这些保证当一回事（毕竟俄罗斯是个帝国，后备军人一般来讲得跋涉约一千一百公里才能从家乡抵达兵站），但这些声明仍间接表示俄国科技的进步和令人吃惊的乐观。

在这同时，令人忧心的巴尔干半岛情势，使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几乎免不了要一战，尽管这样的战争八九不离十会招来俄国出兵干预，届时，因施里芬计划和俄国可能进攻东普鲁士，而把心力放在别处的德军，将分不出身来施以援手。因此，形势有利于贝尔格莱德。尽管奥匈帝国想方设法围堵，但塞尔维亚人还是扩张一倍版图，使其人口增加到将近五百万。维也纳如临深渊。有家英国报纸示警道，与塞尔维亚、俄罗斯同时对干，“愚不可及”。[81] 但康拉德就在思考这一愚不可及之事。此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想这么干。

---

[1]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Washington，DC（NARA），M 862，roll 940，Constantinople，Nov. 10，1908，Lewis Einstein，“Report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Near East.”

[2] *Die Zeit*，Nov. 15，1912 and Apr. 17，1913，“Dilettanten-Vorstellung.”

[3] *Neue Freie Presse*，Nov. 21，1912，“Die Zukunft des Fez.”

[4] FML Otto Gerstner，“Albanien und die Balkan-Frage，” *Neue Freie Presse*，Nov. 9，1912.

[5] 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 872，The Hague，May 19，1915，Giskra to Burián；Kriegsarchiv，Vienna（KA），B/232：11，Sarajevo，Dec. 2，1912，FML Appel to Col. Brosch.

[6]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7N 1131，Vienna，Jan. 25，1912，Cdt. Levesque；Hugo Hantsch，*Leopold Graf Berchtold*（Graz：Verlag Styria，1963），1：7.

[7]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Kew（BNA），Foreign Office（FO）120/907，Vienna，Aug. 26，1913，Cartwright to Grey.

[8] Winston S.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 （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57.

[9] KA，Armeeoberkommando（AOK），1912，Chf d GS Ev.B.3462，Vienna，Dec. 6 and 17，1912，“Tagesbericht”；Christopher Clark，*The Sleepwalkers* （New York：Harper，2013），266-272；Samuel R. Williamson Jr.，*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St. Martin’s，1991），124，128；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 （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66-167.

[10] *Neue Freie Presse*，Nov. 21，1912，and *Wiener Sonn-und Montagszeitung*，Jan. 6，1913.

[11] *Fremden-Blatt*，Dec. 16 and 18，1913.

[12] *Südslawische Revue*，Feb. 1913，189.

[13] KA，B/232：11，Sarajevo，Dec. 2，1912，FML Appel to Col. Brosch.

[14] KA，Militärkanzlei Franz Ferdinand（MKFF）196，*Berliner Tagblatt*，Sept. 20，1912，“Deutschland，England，Europa.”

[15] KA，B/677：0-10（Auffenberg），Bozen，Oct. 28，1913，Brosch to Auffenberg；SHAT，7N 1131，Vienna，Mar. 16，1912，“Le conflit militaire austro-hongrois”；Lawrence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Architect of the Apocalypse* （Boston：Humanities Press，2000），120.

[16] SHAT，7N 1131，Vienna，Mar. 16，1912，“Le conflit militaire austro-hongrois.”

[17] Rudolf Kiszling，“Alexander Freiherr von Krobatin，” in *Neue Ö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1815-1918* （Vienna：Amalthea，1923-1987），17：202-206.

[18] Horst Brettner-Messler，“Die Balkanpolitik Conrad von Hötzendorfs von seiner Wiederernennung zum Chef des Generalstabes bis zum Oktober-Ultimatum 1913，” *Mitteilungen des österreichischen Staatsarchivs* 20（1967），180-182.

[19] *Reichspost*，Feb. 22，1913；*Die Zeit*，Feb. 13，1914，“Ein neues 1864”；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64.

[20] 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65，168.

[21]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 Hö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250.

[22] David Fromkin，*Europe's Last Summer*（New York：Vintage，2005），90-93；Fritz Fischer，*War of Illusions*（London：Chat to and Windus，1975），161-164.

[23] Annika 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38-144.

[24] *Neue Freie Presse*，Nov.26-Dec. 17，1912.

[25] "Wenn der Kaiser von Österreich reiten lassen will，wird geritten." KA，B/1503：5，Sarajevo，Dec. 21，1912，Potiorek to Conrad.

[26] SHAT，7N 1131，Vienna，Feb. 23，1913，"Notes sur la situation"；BNA，FO 120/907，Vienna，Aug. 9，1913，Chung to Cartwright；*Neue Freie Presse*，Dec. 1.2 and 13，1912，"Weltkrieg wegen des Korridors nach Durazzo？"

[27] *Neue Freie Presse*，Dec. 14，1912；Josef Ullreich，"Mortiz von Auffenberg-Komarów：Leben und Wirken，" phil.diss.，Vienna，1961，148-170.

[28] 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132，139；SHAT，AAT，7N 1131，V，Dec. 18，1912，"Situation militaire"；*Allgemeine Zeitung*（Munich），Jan. 25，1913，"Politischer Morphinismus."

[29] Clark，*Sleepwalkers*，266-272；*Reichspost*，Jan. 10，1913.

[30] *Neue Freie Presse*，Dec. 12，1912.

[31] *Reichspost*，Jan. 27，1913；*Neue Freie Presse*，Feb. 7，1913.

[32] *Österreichische Rundschau* 39（1914），June 15，1914，Politicus，"Imperialismus."

[33] KA，B/677：0-10（Auffenberg），Bozen，Nov. 1913，Brosch to Auffenberg.

[34] KA，B/1503：5，Sarajevo，Dec. 21，1912，Potiorek to Conrad.

[35] Sean McMeekin，*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Belknap，2011），21-22.

[36] *Berliner Zeitung am Mittag* ， Feb. 4，1913；*Das neue Deutschland* ， Jan. 7，1913；*Tagespost* （Graz），Feb. 1，1913.

[37] 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134；BNA，FO 120/906，Vienna，Feb. 11，1913，Cartwright to Grey；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 ，135-136.

[38] *Neuen Wiener Journal* ， May 30，1913.

[39] SHAT，7N 1131，Vienna，June 1，1912，“Le premier dreadnought autrichien inutilisable，” and June 6，1912，“Le dreadnought autrichien.”

[40] Clark，*Sleepwalkers* ，116；BNA，FO 120/906，Vienna，Apr. 18，1913，Maj，Thos. Cuninghame to Cartwright；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 ，128.

[41] *Neue Freie Presse* ， May 26，1913.

[42] *Neuen Wiener Journal* ， May 29，1913.

[43] *Neuen Wiener Journal* ， May 30，1913.

[44] *Neue Freie Presse* ， May 30，1914.

[45] Georg Markus，*Der Fall Redl* （Vienna：Amalthea Verlag，1984），33-53.

[46] Georg Markus，*Der Fall Redl* （Vienna：Amalthea Verlag，1984），188，200-201.

[47] *Arbeiter Zeitung* ， May 29，1913.

[48] BNA，FO 120/906，Vienna，Apr. 18 and June 4，1913，Maj.Thos.Cuninghame to Cartwright. Conrad’s son had been implicated in the Jandric Affair in April，possibly as a spy，and certainly as a gullible enabler. Markus，*Der Fall Redl*，*75*； István Deák，*Beyond Nationali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45.

[49] *Fremden-Blatt* ， May 30，1913；*Neue Freie Presse* ， May 31，1913；*Wiener Mittagszeitung* ， May 31，1913；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25；Markus，*Der Fall Redl*，128-129；BNA，FO 120/906，Vienna，June 5，1913，Maj. Cuninghame to Cartwright；Graydon Tunstall，*Planning for War Against Russia and Serbia*：*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Military Strategies 1871-191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106-107.

[50] *Arbeiter Zeitung*，May 30，1913，"Der Generalstabsobert als Spion"；*Die Zeit*，June 6，1913.

[51] *Neue Freie Presse*，May 31，1913；*Reichspost*，May 31，1913；*Arbeiter Zeitung*，May 31 and June 1，1913；Markus，*Der Fall Redl*，268.

[52] SHAT，7N 1131，Vienna，May 29 and June 12，1913，"L'affaire du Col. Redl，" Markus，*Der Fall Redl*，75，152.

[53] BNA，FO 120/907，Vienna，Aug. 30，1913，Maj. Cuninghame to Cartwright.

[54]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 Hö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232，241-242；FML Johann Cvitkovic in the *Neue Freie Presse*，May 31，1913.

[55] *Budapester Tagblatt*，June 1，1913.

[56] Brettner-Messler，"Die Balkanpolitik，" 213.

[57] SHAT，Vienna，Feb. 25，1897，Cdt de Berckheim，"Péninsule Balkanique."

[58] Arthur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A Year of the War on Many Fronts—and Behind Them*（New York：Scribner's，1916），153-155；Norman Stone，"Moltke-Conrad：Relations Between the 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General Staffs 1909-1914，" *Historical Journal 9*，no.2（1966）：212-213.

[59] NARA，M 862，roll 940，Mar. 1909，Robert Lansing，"Nationality and the Present Balkan Situation"；*Budapest Hirlap*，Mar. 23，1913.

[60] Rudolf Jerabek，*Potiorek*（Graz：Verlag Styria，1991），75.

[61] BNA，FO 120/906 and FO 120/907，Vienna，Mar. 14，1913，Cuninghame to Cartwright，and Vienna August 9，1913，Cuninghame to Cartwright；*Fremden-Blatt*，Dec. 13-14，1913；Clark，*Sleepwalkers*，99.

[62] KA，MKFF 196，Dec. 22，1912，“Übersetzung aus der‘Review of Reviews.’”

[63] “Der Chef des Generalstabes，” *Freudenthaler Zeitung* ，Oct. 4，1913；KA，B/677：0-10（Auffenberg），Bozen，Nov. 1913，Brosch to Auffenberg.

[64] *Wiener Sonn-und-Montagszeitung* ，Sept. 21，1913，“Die Lehren der Armee-Manöver.”

[65] BNA，FO 120/907，Vienna，Dec. 8，1913，Maj. Thos. Cuninghame to Sir Maurice de Bunsen；Georg von Alten，*Handbuch für Heer und Flotte*（Berlin：Deutsches Verlagshaus，1909-1914），6：318-319.

[66] Churchill，*World Crisis* ，30.

[67] *Die Zeit* ，Sept. 24，1913；*Pester Lloyd* ，Sept. 27，1913；*Vorwärts*（Berlin），Sept. 28，1913.

[68]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 ，133.

[69] KA，MKFF 198，*Budapest* ，Sept. 30，1913.

[70] KA，B/677；0-10（Auffenberg），Bozen，Oct. 28，1913，Brosch to Auffenberg.

[71] BNA，FO 120/907，Vienna，Oct. 29，1913，Cartwright to Grey.

[72] KA，MKFF 197，*Wiener Sonntag-und-Montagszeitung* ，Jan. 6，1913；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154-155.

[73] KA，B/677：0-10（Auffenberg），Bozen，Dec. 9，1913，“Der Dumme hats Glück！”

[74] BNA，FO 120/907，Vienna，Oct. 28，1913，Cartwright to Grey.

[75] BNA，FO 120/906，Vienna，Jan. 1，1913，Maj. Thomas Cuninghame to Cartwright；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 ，135.

[76] 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186-187.

[77] SHAT，7N 1129，Vienna，Mar. 29，1905，“La situation politique de la Croatie”；Vladimir Dedijer，*The Road to Sarajevo*（London：MacGibbon and Kee，1967），132-134.

[78] KA，MKFF 202，Vienna，Winter 1910-1911，Brosch，Untertänigstes Referat.

[79] 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181-182.

[80] 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77；Gerhard Ritter，*The Schlieffen Plan*（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79），74；Timothy C. Dowling，*The Brusilov Offensiv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4-5. A Russian corps had 108 field guns in 1914，an Austrian corps 96.

[81] KA，MKFF 196，Dec. 22，1912，“Übersetzung aus der‘Review of Reviews.’”

第四章 萨拉热窝逞凶

一九一三年在波希米亚举行哈布斯堡陆军年度演习时，弗朗茨·斐迪南指示康拉德规划一九一四年两波演习。除了历来固定于九月举行模拟与俄交战的演习外，斐迪南大公希望在一九一四年六月另外在波斯尼亚举办一场动用两个军的大型演习。维也纳希望这场以塞尔维亚人为假想敌的演习，不仅会让塞尔维亚人胆寒，而且可在巴尔干半岛展示奥地利早该展示的武力。

一旦爆发战争即会总绾奥匈帝国兵符的弗朗茨·斐迪南，届时会亲临现场主导军事演习。斐迪南大公即将到访波斯尼亚一事，一九一四年三月受到奥国和外国报纸广为报道，为塞尔维亚恐怖分子提供了一个让人手痒难耐的攻击目标。阿皮斯上校和黑手会想用一场惊人的恐怖主义攻击激怒奥地利人，但也想借由堵死与维也纳的所有协商管道，驱使塞尔维亚总理尼科拉·帕西茨开战。[1] 帕西茨比阿皮斯之类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更为深谋远虑，对于正忙于消化、并吞马其顿、阿尔巴尼亚领土的塞尔维亚王国是否能击退来犯奥军，也远不如他们那么乐观。为迫使帕西茨行动，黑手会于一九一四年春开始在贝尔格莱德培训三名波斯尼亚学生，加夫里洛·普林齐普是其中之一。黑手会为普林齐普三人定好计划，要他们与另外四名刺客连手暗杀斐迪南大公，那四名刺客则会从波斯尼亚找来。

在七名刺客为行刺做准备时，康拉德正努力欲保住他的职位。斐迪南大公在一九一三年陆军演习现场当众叱责康拉德，似乎要当着康拉德的面，为他在雷德尔事件后新接任的“联合武装部队督察长”一职立威。

两人虽然言归于好（康拉德向其情妇吹嘘向来疾言厉色的大公用了“非常窝心的话”安抚他），但布罗施上校一九一三年十、十一月写给奥芬贝格的信，却想当然地认为改变就要发生，会有不像康拉德那样“减损”斐迪南大公威望、惹恼大公的新人接任参谋总长。接替康拉德者，大概会是波蒂奥雷克，或是大公的新副官卡尔·巴尔道夫（Karl Bardolff）将军。前者“渴望接掌此职”，后者“在舍穆瓦任职期间基本上掌理参谋部”。[2]

这两人和其他人选的名字外泄，间接表示换人在即。康拉德听到风声，急急面见皇上以挽救职位。一九一三年十月，这位职位岌岌不保的参谋总长晋见弗朗茨·约瑟夫，相谈甚久，皇帝得知康拉德已失去斐迪南大公的宠信，非常乐于让康拉德改投他旗下。康拉德成为霍夫堡宫与美景宫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中最新的争夺标的。后悔于雷德尔事件期间将兵权大幅授予斐迪南大公的皇帝，这时向康拉德保证不撤换他，且恢复他直接进宫面见皇上的权利，借以削弱弗朗茨·斐迪南的权力。身为斐迪南大公的门生，康拉德与霍夫堡宫的公函往来原都得通过美景宫。如今，他的信函将朝反方向传送。[3] 康拉德想必把大部分醒着的时间花在游移于不同明主间和保卫他日益缩小的地盘上。剩下的时间，他才用来思考奥地利日益紧缩的行动自由。

一九〇五年的施里芬计划要奥匈帝国人做到某些事，即得守住位于加利西亚、波兰的要塞，直到德国人击败法国人为止（据这计划的想定，要六星期），但他们也将得击退塞尔维亚人。在一九〇八年波斯尼亚并吞危机期间，战争差点引爆之时，康拉德拟出一个乍看之下很漂亮的计划来落实上述义务。局部性的奥、塞战争，发生概率不高，万一发生，以B计划（巴尔干计划）因应；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开战，把俄罗斯卷入，发生概率颇高，万一发生，则以R计划（俄罗斯计划）因应。为使哈布斯堡陆军能因应上述任一突发状况，康拉德把陆军分为三群：第一梯队（A-Staffel，九军二十八个师，开赴俄罗斯战线）、巴尔干最小

兵力群（Minimalgruppe Balkan，三军八个师，用于对付塞尔维亚）、第二梯队（B-Staffel，四军十二个师，将作为总预备队在两战线之间机动因应）。如果能将奥塞战争局限于当地，第一梯队将守卫俄罗斯边界，第二梯队则与巴尔干最小兵力群会合，以二十个步兵师和三个骑兵师执行B计划。如果俄罗斯介入（所有人都认为必会发生的情况），则执行R+B计划：第二梯队将立即上火车运往加利西亚增援第一梯队，以四十个步兵师打俄国，巴尔干最小兵力群的八个师则只着重于防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匈牙利的边界。[4]

一九〇八年时，塞尔维亚兵力少且弱，且俄罗斯还未从败于日本之手里恢复元气，这样的计划似乎还管用，但到了一九一四年，情势已不同：一开战，维也纳的四十八个师将立即要面对至少俄国五十个师和塞尔维亚十一个师，且后续还要对付源源而来的许多俄国后备师和准备支持塞尔维亚正规军的数千名游击队员。一九〇八年时，俄国铁路非常原始，因而有施里芬所谓的“广漠无铁路”的俄罗斯之语，但到了一九一四年，那一广漠之地已有法国资助建造的双线铁路贯穿，若奥地利人在运送部队到东边上稍有延迟，就会吃大亏。事实上，到了一九一四年，俄国铁路已好过奥国铁路。俄国有四条单线铁路（单线意味着只能单向运输）和五条双线铁路（意味着能双向运输）；而奥地利只有七条单线铁路，其中两条得奋力穿越高耸的喀尔巴阡山。按照当时客观的估算，这意味着俄国一天能运送两百六十列火车的兵进入波兰、乌克兰战场，奥地利则是一百五十三列。[5]

在几位强悍、久经战火洗礼的将军领导下，塞尔维亚军队兵力成长同时现代化，使奥地利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只需派支小型军队越过多瑙河或德里纳（Drina）河征讨，就能让塞尔维亚学乖。[6] 早在一九一一年，康拉德就在兵棋推演中发现，至少要十四个师才能击败塞尔维亚，而如果同时与俄国交战，根本腾不出这十四师的兵力。为彻底挫败奥地利，塞尔维亚人的办法，就只有把军队从边界撤回，迫使奥地利人深入

多山的塞尔维亚内陆，陷入旷日废时的战事。事实上，一九〇七年奥地利的军事演习和一九一三年维也纳的兵棋推演，已测试并证实塞尔维亚战术撤退会对不善打仗的奥地利军队带来何等毁灭性的压力。陆军部长奥芬贝格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前夕即看出，奥地利任何入侵塞尔维亚的行动，都必须利用摩拉瓦河谷（Morava Valley）这个宽广的通道，而非蚕食没有战略价值、位于德里纳河与萨瓦（Sava）交会处的塞尔维亚王国西北隅。但如此兵分多路的宽正面入侵会需要较多兵力且较耗费时日，而奥地利没有那么多兵力和时间可用。在一九一四年四月走访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时，波蒂奥雷克做了他自己的推演——衍生自棋赛的战况仿真，以铁制对象标示部队和补给，在实际后勤、地形因素下每步限于两分钟内完成。令在场所有人惊愕的是，塞尔维亚人赢。

波蒂奥雷克的四月兵推，预示了八月他入侵塞尔维亚会将面临的景况。实际战况将如纸上谈兵所示——在德里纳河下游和萨瓦河交会处作战的奥匈帝国第五集团军和在更南边越过德里纳河的哈布斯堡第六集团军之间的一个大缺口，使塞尔维亚人得以将这两支军队各个击破。但这场兵推预示的不利情况，康拉德完全未予采纳。他对一九一三年冬兵推的看法，说明了他为何会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做出那些奇怪的决定。用兵塞尔维亚将遇到重重难关，包括道路不良、补给不易、敌人掘壕固守，但康拉德的建议是不计后果地蛮干："由于缺乏补给、交通工具和全盘了解，我们唯一的办法会是疾迅勇猛的进攻。"[7] 如此低估现代火器的威力，始终是康拉德辖下参谋部的一贯特色。他于一九〇八年所拟的对塞尔维亚作战计划，狠批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的"怯懦"，只凭着他本人一股不服输的心态，无凭无据地认为"若有较剽悍的指挥部、较快展开作战行动、较快结束战役，伤亡会降到最低"。[8]

塞尔维亚刺客开始聚集于萨拉热窝时，贝尔格莱德陷入骚乱。七十岁的国王彼得厌烦于居中调解帕西茨与诸将领的外交政策主导权之争和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境内新吞并土地的治理权之争，于一九一四年六月

卸下其大部分职权，任命二十五岁的王储亚历山大为其摄政。[9] 这丝毫无助于安抚为奥地利斐迪南大公即将访问波斯尼亚而愤怒不已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弗朗茨·斐迪南鼓吹建立“大克罗地亚”，即一个包含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斯洛文尼亚，且尽可能吸并塞尔维亚领土的罗马天主教超国家（superstate）。而这样的人就要踏足塞尔维亚人宣称为其所有的那些省份。斐迪南大公的到访日子也挑得特别差，六月二十八日，圣维图斯日（St.Vitus Day）：十四世纪塞尔维亚兵败科索沃并遭奥斯曼土耳其人制服的日子，自那之后令塞尔维亚人既开心又难过的国定假日。弗朗茨·斐迪南若有意以挑衅心态展现他对塞尔维亚的不屑，或他对皇帝谨小慎微作风的不屑，再没有比挑这一天到访更挑衅的了。“别让大公太出风头，”弗朗茨·约瑟夫的副官于这趟访问之行前写信告诉波蒂奥雷克，“我们不希望人民忘了还有皇帝在。”[10] 但这位大公即将大展他从未有过的风头。

在康拉德与波蒂奥雷克的陪同下，斐迪南大公观看了六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在塞拉耶弗西南边山区举行的第十五军（杜布罗夫尼克）、第十六军（萨拉热窝）的演习，然后在二十八日带着他的妻子，大公妃苏菲，参观了萨拉热窝。全规格的奥匈帝国军事演习，一如以往，会在九月举行，模拟俄军入侵加利西亚的情况：这一次的巴尔干演习，用意只是展示武力，警告塞尔维亚勿轻举妄动。萨拉热窝之行不会太久，斐迪南大公会去一个兵营、市政府、一座新博物馆、一间地毯工厂看看，并与波蒂奥雷克共进午餐，而这些行程的用意，全在炫示哈布斯堡王朝的威权，确立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称为其所有之省份的所有权。天黑时，大公一行人将会在离开波斯尼亚的火车上。[11]

六月二十八日，斐迪南大公在伊利扎（Ilidze）的波士纳饭店起床。伊利扎是温泉疗养地，位于萨拉热窝郊外为浓密森林所包围的凉爽开阔地里。他穿着一身骑兵将军的礼服（蓝上衣、黑长裤、带绿羽毛的双角帽），在一间已为了他的造访事先祝过圣的饭店房间里做礼拜（祝

圣花了四万克朗），然后爬上一辆已经在等候着的车的后座。六辆车子排成一列，这辆敞篷跑车排在第三。车队驶往萨拉热窝，沿途弗朗茨·斐迪南与苏菲向伫立于路旁的民众点头、微笑，波蒂奥雷克蹲在可收折的座椅里，面朝他们，一路指出主要景点。七名塞尔维亚刺客，彼此隔着一定距离，分布在这一路线的沿途。第一名刺客拿起布朗宁手枪，隔着九米距离开枪，未射中。弗朗茨·斐迪南转头，看着奥地利警察擒拿这名刺客，阻止民众对他施以拳脚。对皇帝敌意和不良居心深有所感的大公，粗哑喊道："尽快把他吊死，维也纳会颁他一面奖章！"[12] 第二名刺客丢出一枚手榴弹，但大公的司机加速驶过，手榴弹在下一部车底下爆炸，波蒂奥雷克的副官埃里希·冯·梅里齐（Erich von Merizzi）中校受轻伤。



弗朗茨·斐迪南与波蒂奥雷克在波斯尼亚军事演习场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下令于一九一四年六月在波斯尼亚办一场动用两个军的特别演习，以威吓塞尔维亚人。照片中大公在研究地图，替他拿着地图者是军长和波斯尼亚行政长官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

这是斐迪南大公生前所度过的最后一个整天。隔天他就在萨拉热窝街头中枪。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在抵达第一个停留地点，一八九四年建成的仿摩尔式雄伟的市府大楼时，大公怒火中烧。萨拉热窝市长和其诸市政委员排成两列，一边是戴非斯帽、着灯笼裤的穆斯林，另一边是着燕尾服和高顶黑色大礼帽的基督徒。大公硬生生打断市长带着巴结意味的问候："市长先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我来萨拉热窝亲善访问，却有人朝我丢炸弹？太离谱了！"进了市府大楼后，大公的气消了。他向他的随从开玩笑道："留心听着，这个（刺客）大概会按照奥地利的老作风获颁功绩勋章，而不会被'弄成无害'。"[13]

事前，波蒂奥雷克坚持由他一手包办此趟访问的所有安全事宜，结果发生行刺之事，令他非常尴尬。他希望这一天会结束得比开始时完满，向弗朗茨·斐迪南保证必会让大公如预定计划安然完成他在此市的行程。弗朗茨·斐迪南愿意走完预定行程，但坚持改变路线，以便去医院探望受轻伤的梅里齐。斐迪南大公从未打过仗，这是最近似于在战场上救助受伤同袍的经验。眼下他不顾后果，坚持基于人情之常该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波蒂奥雷克同意，但忘了把更改计划之事告诉此刻正按照原安排的路线把车队带离市府大楼的萨拉热窝市长和其司机。大公的司机傻傻跟着市长的座驾开，在拐弯驶进弗朗茨·约瑟夫街时，被波蒂奥雷克猛然叫住。波蒂奥雷克厉声要他停车、倒车，然后继续沿着码头直走，前往军医院。

一九一四年，汽车还很稀少，车队六辆车都是从奥地利汽车俱乐部暂时借来，司机则是骡子脾气，不高兴之下就突然停住车不肯前进。[14] 道路两旁挤满围观民众，大公的司机使劲将车往后退然后转向。弗朗茨·斐迪南在这时拉长调子告诉波蒂奥雷克："说到刺客，人真的得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上帝发落。"大公座驾停住，准备打直，而大公夫妇直

挺挺坐在后座，就在这时，加夫里洛·普林齐普（黑手会在贝尔格莱德征募到的三名波斯尼亚学生之一）挤过人群，近距离开了两枪：第一枪打穿大公的颈动脉，第二枪打进苏菲的腹部。两人都在几分钟后死亡。

弗朗茨·斐迪南与其夫人的遗体摆在附近的旧奥斯曼官邸——围墙环绕的波蒂奥雷克府邸——时，有人发现大公脖子上挂了七个护身符，每个护身符用来防止不同的邪灵近身。苏菲没有血色的脖子上围了一条金链，身上披了一条肩布，肩布里有用来防止疾病或意外上身的圣徒遗物。这两人是据说要把巴尔干半岛从落后与迷信中救出来的现代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在这趟管控糟糕、悲剧收场的访问里，发现更为荒谬可笑之处："皇储在弗朗茨·约瑟夫街和鲁道夫街的街角中枪身亡，正象征了身为奥地利人所代表的含义。"[15]

普林齐普立即被认出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大公的每个随行人员都理所当然认为这名刺客是抗议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已多年的塞尔维亚政府所派。因为疏于小处的安全工作而间接助行刺者得逞的波蒂奥雷克，此刻如某同僚所说的，"竭尽全力"鼓吹战争，"以洗刷他的过错"。[16] 波斯尼亚演习结束后，康拉德打道回府，在萨格勒布换车时，才得知行刺之事。这时，他鼓吹那古往今来常用的解决办法：如贝希托尔德所说的，"战争，战争，战争"。与皇帝和内阁阁员开会时，康拉德要求采取"果断行动"。[17] 陆军部长亚历山大·克罗巴廷向弗朗茨·约瑟夫的副官大施压力，以促使皇帝"立即宣战"。[18] 奥地利大部分高阶将领和他们同声一气，力主向塞尔维亚"暗杀政权"和其"行凶者"报复。"给我一个军和一个后备师，我就可以搞定。"迈克尔·阿佩尔从其位于萨拉热窝的办公室激动说道。[19]

在萨格勒布，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有了将异族杀光的念头。"我们周遭有太多讨厌的塞尔维亚人；从今天起，就把消灭他们当作我们的目标，"报纸《赫尔瓦茨卡》气冲冲说道。"srbe或vrbe"（意为"把塞尔

维亚人吊死在柳树上”），成为流行的口号。[20] 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公使馆——受到“此地低规格哀悼”的公开侮辱，“此地的人在街上和咖啡馆里嘲弄我们的不幸”——也发出同样的激越言语：“得让塞尔维亚再度懂得害怕——我们得趁这机会发出毁灭性的一击，不要有其他顾虑，以为我君主国争取再数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以让加诸我皇上的这一侮辱受到惩罚。”[21]

六月三十日在申布伦宫晋见皇上时，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悲痛，令贝希托尔德印象深刻。皇帝伤心主要是为了君主国的困境，而非为了斐迪南大公。听着贝希托尔德向他陈述他所能选择的路，皇帝流下了泪水。自一八六六年大败之后，弗朗茨·约瑟夫一直避战，但此刻连他都了解到，战争，或最起码的威胁开战，已不可避免。普林齐普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打击太凶残，太侮辱人。但匈牙利能否决奥地利的决定，因此，得等到匈牙利总理伊斯特万·蒂萨前来陈述布达佩斯的看法，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那天更晚时与蒂萨的会晤，结果一如预期。蒂萨反对向塞尔维亚开战，主张只在外交战场上对贝尔格莱德发动谴责战。他担心与塞尔维亚起冲突会招来俄国的介入，而俄军就陈兵于匈牙利边界旁。蒂萨当政数年来刻意削弱奥匈帝国的军力，比大部分人更清楚这君主国军力的虚实。[22]

匈牙利的胆小怕事，令老早就想找借口与塞尔维亚摊牌的德国大失所望。德国参谋总长毛奇，一九一三年二月以德、奥两国人民不会为了阿尔巴尼亚版图之类的小问题与人开战为由，把康拉德从战争边缘拉回来，此刻却在奥地利的不幸中瞥见机会。德国、奥匈帝国人民会为了替哈布斯堡皇储的惨死报仇而战。这正是鼓动德国、奥匈帝国人民所需的“口号”。[23] 德国希望奥地利人抢占这道德高地，立即摧毁塞尔维亚，然后将所有兵力移到东边，但这份希望在炎热的夏季里破灭，原因

不只出于蒂萨的不让步。

在萨拉热窝，七名刺客中已有六人被捕并受审问。有一人自称“塞尔维亚英雄”，但要说塞尔维亚政府是这场暗杀阴谋的共犯，再怎么说证据都不够确凿。米兰·奇嘎诺维奇（Milan Ciganovic），是在位于贝尔格莱德的自家公寓衣橱里存放了炸弹制造原料的政府雇员，他认为这些刺客与他们的军事训练员沃津·坦科西奇（Vojin Tankosic）少校，以及阿皮斯、民族自卫社有关联。但这些塞尔维亚官员是我行我素的无赖，不是政府的代理人，只是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对此重大差异视而不见。[24] 波蒂奥雷克从萨拉热窝警示道，如果维也纳不下重手反击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和在幕后资助他们的国家，就会治理不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康拉德在波斯尼亚的线人，告诉他差不多的看法：得把治理之责从操控维也纳政局的“波兰外交官和宫廷顾问”手里拿走，交给军方。有人告诉他说：“该是时候拿起铁扫把把这里清扫干净了……这里的塞尔维亚人至少有六成是国家的敌人。”[25] 就连主张以和为贵的贝希托尔德都改变立场，六月三十日主张与贝尔格莱德“清算总账”。[26] 同一天，柏林德皇劝奥地利人开战：“机不可失！”[27]

奥地利皇帝原希望于七月三日德皇威廉二世来维也纳参加斐迪南大公葬礼时与他商议因应之道，但德皇担心塞尔维亚刺客行刺，也担心奥地利安全措施不足，决定待在柏林以策安全。在柏林，他收到弗朗茨·约瑟夫的来信，信中斩钉截铁说斐迪南大公遇害是塞尔维亚、俄国两地泛斯拉夫主义分子所为。这一推断使德国得以向其优柔寡断的盟邦施压加温。德国记者和特使维克托·瑙曼（Viktor Naumann）于七月一日在与贝希托尔德的幕僚长亚历山大·奥约斯（Alexander Hoyos）会晤时，告诉奥约斯此刻已该向德国请求大力支持其“消灭塞尔维亚”。瑙曼被德国政府找来当中间人，七月头几天向维也纳传达了这一明确的信息：“奥匈帝国愈早开战愈好；昨天比今天好；今天比明天好。”[28] 贝希托尔德“受惑于军方的魔力和武力，且着迷于军方恐怖机器的隆隆声响和耀

眼夺目”（丘吉尔语），兴高采烈地同意，并告诉德国外长戈特利布·冯·雅戈（Gottlieb von Jagow），柏林和维也纳得“扯断敌人用来织成网子包住我们的绳索”。[29] 德国的响应不会让贝希托尔德失望；德皇震惊于同是皇族成员且与他交情深厚的斐迪南大公遇刺，光是根据这一点，德皇就应该会同意让奥地利全权行事。

与瑙曼会晤四天后，奥约斯以贝希托尔德特使身份来到柏林。他先到德国外交部见了次长阿瑟·齐默曼（Arthur Zimmermann），向齐默曼扼要说明了维也纳的目标：由奥地利和其巴尔干半岛诸盟邦将塞尔维亚瓜分，基本上将它“从地图上抹除”。这场暗杀事件将被用来“编造与塞尔维亚算账的借口”。[30]

但德国所需要的，不是消灭塞尔维亚，而是让它继续扮演骚扰奥地利且与俄国结盟的角色，但要削弱它的国力。在波茨坦，当德皇正为他隔日要动身的一年一度北海之旅做准备时，奥地利大使拉迪斯劳斯·瑟杰尼（Ladislaus Szögyeni），传达了较奥约斯、贝希托尔德温和的主张，承诺不将塞尔维亚从地图上抹除，只会“使塞尔维亚无法在巴尔干政局里兴风作浪”。[31] 这一宣示使德皇愿意放手让奥地利自主行事。维也纳可以放手攻打塞尔维亚，德国会支持奥匈帝国，即使俄国介入，“引爆大战”亦然。[32]

七月三日在维也纳的西火车站（Westbahnhof），为将送往阿茨特滕（Artstetten）安葬的弗朗茨·斐迪南灵柩送行时，康拉德与奥芬贝格附耳交换了看法。康拉德断言这一次绝对得教训塞尔维亚，奥芬贝格同意这看法，但指出入侵塞尔维亚几乎肯定会升级为牵连更广的战争。康拉德说或许会如此，但未必一定如此。奥芬贝格提醒他，奥匈帝国炮兵战斗力一如以往的不足，而在任何“生死搏斗”中这都是陆军非常显眼的罩门。哈布斯堡陆军，每个军只有九十六门火炮，而俄国有一百〇八门，法国是一百二十门，德国是一百四十四门。奥匈帝国火炮也较老

旧、射程较短、准度较差、口径较小。[33] 康拉德有气无力地同意："那我很清楚，但此刻我没办法解决。"[34]

康拉德无法解决火炮问题，除了种种常见的原因，还因为在这关头还养得起情妇的他，打算带着情妇冯·赖宁豪斯（von Reininghaus）赴南蒂罗尔度长假。他会离开维也纳整整三个星期（从七月七日到二十二日），七月十九日回来参加内阁会议，然后迅即回到茵尼辰（Innichen，意大利语称圣坎迪多/San Candido）他情妇的小屋，与她再共度四天。未出门度假的德国驻维也纳武官，从康拉德几乎停摆的办公室，无法得知奥匈帝国陆军究竟打算怎么做：要用火车运多少兵力对付塞尔维亚，要运多少部队到加利西亚。[35] 由于康拉德不在，其他人也都决定请假。克罗巴廷到乡间宅邸度假，就连最重要的参谋部铁路局局长约翰·史特劳布（Johann Straub）上校也出去度假，在南边达尔马提亚的葡萄园和海滩上优哉游哉。陆军十六个军，有七个军休他们的农民兵假，好让他们回家去帮忙夏收，要到七月二十五日才会回营。难怪康拉德的参谋部八月时会要被"技术性难题"搞得手忙脚乱，因为七月时没人解决这些问题。

这时德军里有许多人渴望在法、俄的军备采购和兵力计划还未完成之际来场世界大战，但毛奇依然力主审慎，并指出明眼人都看得出的道理：普林齐普的行径，至少是得到了塞尔维亚政府某种程度的默许，在世人都惊骇于此恶行而同声一气之际，如果奥匈帝国抓住机会，迅速入侵塞尔维亚，一举即打垮这王国，那会比较好。并非奥地利盟友的丘吉尔，也认为这一暗杀行径卑鄙，类似于发动"泛凯尔特计划以一统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并用"都柏林兵工厂所供应的武器"暗杀威尔士王储的爱尔兰。[36] 就连俄罗斯人都觉得很难响应，德皇预测沙皇尼古拉二世不会"站在弑君者那一边"参战。柏林的决策者，就如麦克白夫人，一致相信"要是干完了之后就完了，那还是快一点干"。

换句话说，维也纳得利用这场危机正热的势头和同情心理，取消休假，动手。动员要三个星期：后备军人向团报到要一星期，团加入军要一星期，军加入位于边境的集团军又要一星期。每个人都笃定奥地利人不会干傻事，因而在其他诸大国里，只有少数人取消夏季长休；七月五日，德皇告诉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如果像现今这样有利的时机还不好好把握，（他）会很难过。"那是毫不掩饰地煽动战争之语。隔天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更推波助澜，敦促奥地利人动手，即便"出手对付塞尔维亚会导致世界大战"。[37]

招来战云之后，德皇即搭船出海展开三个星期的挪威峡湾之旅，毛奇回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泡温泉，陆军部长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Falkenhayn）和陆军部、参谋部重要部门主管纷纷奔往湖边、温泉疗养地、海滩、山上度假。[38] 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甚至同意，只要维也纳的讨伐迅速展开，没有必要照三国同盟的规定知会罗马与布加勒斯特。毛奇从其位于卡尔斯巴德的疗养地写道，"奥地利必须击败塞尔维亚人，然后迅速缔和，要求以奥塞结盟为缔和的唯一条件，"且颇不识趣地写道，"就像一八六六年普鲁士对奥地利所做的那样。"德皇已向奥地利大使瑟杰尼表示奥国可自主行事，并认定奥地利人会快速了结对手（越过多瑙河，包围塞尔维亚陆军，攻占塞尔维亚首都），然后造成令世人（特别是俄罗斯人）只能干瞪眼的既定事实。[39]

但"快速"是个从来与奥匈帝国军队扯不上关系的字眼。一九一四年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对决竟迅速升级为世界大战一事，与奥匈帝国政府决策的拖沓和哈布斯堡军队部署的缓慢有很大关系。在七月七日（暗杀事件十天后）的奥匈帝国内阁会议上，匈牙利总理蒂萨仍主张向塞尔维亚人施加纯外交性的压力，不愿支持蓄意羞辱塞尔维亚人而对方肯定不会接受的最后通牒。匈牙利民意大大左右了这位总理的意向，因为大部分马扎尔人基于三个理由不愿打仗。首先，斐迪南大公生前打算缩减匈牙

利的国土和武力；在布达佩斯，没人为他的死而哭。其次，匈牙利人不希望这个君主国里有更多的斯拉夫人，因此，以并吞巴尔干或波兰为目标的战争，在他们眼中并不明智。最后，匈牙利人清楚，打完一场大国战争，结果很可能不是俄国宰制中欧与巴尔干，就是德国宰制这些地区；而不管是上述哪个结果，都不利于布达佩斯。[40]

康拉德对奥匈帝国作战计划的检讨结果，也未提振蒂萨的信心。这位参谋总长太自信，以为只要俄国的意图“在动员的第五日之前”明朗化，他就有办法压得住塞尔维亚，并在需要时顺利将兵力调到对俄战线上。蒂萨最担心的事，乃是罗马尼亚人可能趁奥俄交战时入侵、并吞哈布斯堡王朝的特兰西瓦尼亚，但康拉德不把这放在心上。[41] 内阁会议上似乎无人理解俄国所带来的存亡威胁。只有德国也出兵攻打俄国，才有可能打败罗曼诺夫王朝，但施里芬计划要求先打法国，也就是说俄国大军一旦出击，奥匈帝国将首当其冲。这也说明蒂萨为何不肯轻易附和出兵之议。

与蒂萨争辩，又耗掉整整一个星期。蒂萨坚持认为战争不仅未能改善奥匈帝国的民族问题，反倒会“引爆”那些问题。[42] 匈牙利人拖延不决，康拉德和克罗巴廷干脆以此为借口，不定案作战计划，乐得延长他们的夏季假期。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公使馆痛斥这一延宕，呈文贝希托尔德，表示塞尔维亚人正利用这一空当“完成他们的作战准备，为将会让我们吃不消的俄国介入争取时间”。[43] 正在度假的奥芬贝格将军，七月十日在萨尔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碰到正在度假的奥匈帝国财长舍瓦利耶·莱昂·德·比林斯基（Chevalier Leon de Bilinski），他正在阿尔卑斯山度他例行的夏季长假。虽然身为奥匈帝国财长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行政长官，但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君主国就要转入战争状态。[44]

直到七月十四日，蒂萨的马扎尔族同胞暨外交政策顾问伊斯特万·

布里昂（István Burián）伯爵提醒他，如果对塞尔维亚的恶行丝毫不予制裁，将只会使罗马尼亚人更加敢于在特兰西瓦尼亚（布加勒斯特所欲染指而以罗马尼亚人为最大族群的匈牙利一隅），如法炮制作乱生事，蒂萨这才转而支持多数人所赞同的开战立场。蒂萨主张勿并吞塞尔维亚领土，以免君主国的民族问题更为棘手，与会众人匆匆同意此议。康拉德私下告诉克罗巴廷：“等着瞧！巴尔干战争前，列强也讲要维持现状；战后，没有一个大国担心现状不保。”[45]

维也纳修润最后通牒至定稿，又过了一个星期。七月二十一日，贝希托尔德终于把最后通牒定本带到巴德伊舍（Bad Ischl）的皇帝别墅，给正在该处避暑的弗朗茨·约瑟夫批示。就要八十四岁且绝不是英明统帅的皇帝，过目且批准。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勿再反对奥匈帝国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然后列出十项羞辱人的要求：要贝尔格莱德审查其报纸报道“以移除反奥文章”，移除学校教育中反奥的教材，撤掉反奥的官员和军官，逮捕可疑的陆军军官和政府官员，停止运送非法武器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达尔马提亚，解散民族自卫社之类的秘密会社，以及最贬损国格的，允许奥匈帝国官员（在塞尔维亚境内）主导调查“颠覆运动”和“六月二十八日的阴谋”，等等。[46]

若是早个一个月，行刺事件刚发生后，提出这份最后通牒，大概会受到国际支持，但这时，暗杀事件已过了数个星期，这一外交手段拖了这么久才出炉，奥地利已失去了其在这场危机之初的优势。义愤已消。行刺事件已过了一个月，在这同时，斐迪南大公的遗体已从萨拉热窝运到海岸，搬上一艘无畏级战舰运到的里雅斯特，然后上火车运到维也纳举行葬礼，再转运到位于上奥地利的皇族用的教堂地下室，并在那里长眠已将近三个星期。萨拉热窝的奥匈帝国驻军司令官阿佩尔将军满腔悲愤：“我们已失去两名为奥地利的荣耀丧命的烈士；我们是受辱的帝国；我们的武力随时可将他们打垮，但至今连个动员令都没有！我们希望动员令尽快下达。”[47] 更糟的是，德国人将奥地利要发给塞尔维亚的

最后通牒的内容轻率地透露给意大利人，从而已使整个行动曝光。在圣彼得堡进行国事访问时，法国总统雷蒙·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清楚地表示，他和俄国人都知道怎么回事，还说奥匈帝国欲使这场战争限于局部的企图不会得逞：庞加莱严正表示，塞尔维亚“有朋友”。[48]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六点，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乌拉基米尔·吉斯尔（Wladimir Giesl）将最后通牒送到塞尔维亚外交部。奥地利报纸同时刊出通牒内容，而由其内容可清楚看出，发通牒者不希望塞尔维亚人接受，也不认为塞尔维亚人会接受。塞尔维亚人有四十八小时考虑，而七月二十五日塞尔维亚人答复时，令人跌破眼镜的是，竟同意奥地利的几乎所有要求，只是不接受让奥地利人在塞尔维亚境内调查这一项，并提出转交海牙国际法庭审理作为其替代方案。[49] 塞尔维亚人欲争取国际支持，因此努力营造讲理的形象；但奥地利在德国人和受损尊严的催促下，显得蛮不讲理。吉斯尔看了塞尔维亚人的解释，认为无法接受，于是断绝外交关系，离开塞尔维亚，搭渡船越过多瑙河，来到匈牙利的塞姆林（Semlin，塞尔维亚语称泽蒙/Zemun）镇。这就是战争信号。

但奥地利政策（最后通牒）与行动计划（动员）的落差之大，令人震惊。不久后将接掌一集团军的奥芬贝格将军，仍在上奥地利度假。有个亲人突然骑着脚踏车出现，手里挥着报纸大喊“引信已经点燃；是最后通牒！”时，他正和姊妹共进午餐。后来，奥芬贝格忆起他当时的惊讶：“自萨拉热窝发生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已过了四个星期，我因此以为这场危机也会是虚惊一场。”[50] 哈布斯堡将领的作战准备极为不足，但仍振奋于终于有机会打一仗。驻因斯布鲁克的奥地利第十四军军长维克托·丹克尔（Viktor Dankl）收到这消息时，向其司令部幕僚大喊道，“谢天谢地，要打仗了！”他把驻地乐师叫来，要他们办场音乐会庆祝。英国驻维也纳大使莫里斯·德·邦森（Maurice de Bunsen）爵士看到在奥地利首都有“大批民众游行直到凌晨”，还有在俄国大使馆前带敌意的示

威。邦森表达了他对维也纳战争狂热的惊愕：“民众明显认为这会是一场与塞尔维亚人交手的战争……对萨拉热窝所发生之罪行的迅速报仇……似乎少有人想到一个大国强行介入巴尔干半岛，必然会招来其他大国插手。”[51]

大国间的冲突，正是康拉德照理该防微杜渐却未防微杜渐的不测事件。康拉德理应利用暗杀事件后那一个月时间，做好迅速进攻的准备，以在其他大国还未能插手时把塞尔维亚打得无力还手，而非在阿尔卑斯山与情妇度假。自一八八〇年代起所拟的诸多作战计划，奥地利人都强调必须迅速动员、迅速部署、迅速击败塞尔维亚人，因为战事一旦拉长，俄罗斯八九不离十会介入，而必须强行渡河（渡过多瑙河、萨瓦河、德里纳河或三条河全部）才能入境塞尔维亚，意味着战事只会旷日废时。

七月二十五日，塞尔维亚人撤出贝尔格莱德，把中央政府迁到尼什。由于塞尔维亚把中央政府迁离边境，且把陆军集结于科卢巴拉河（Kolubara River）后面的瓦列沃（Valjevo）、阿兰杰洛瓦茨（Arangjelovac）周边，这时入侵塞国，结果几乎肯定是陷入泥淖，而非迅即得胜。在奥地利人犹豫不决时，塞尔维亚人已速速完成其初步动员（三十万兵力和五百四十二门火炮）。[52] 这说明了当时人为何那么惊愕于奥地利迟迟才响应皇储遇刺事件：维也纳已给了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整整四个星期来备战。

康拉德始终主张，若与塞尔维亚摊牌，时间因素会攸关成败，但尽管他夸夸其谈，事实表明他太被动，未预先因应可能状况。[53] 他批准让现役士兵放假回去帮忙夏收，允许数万士兵于六月回老家帮忙收割。军官也放暑假。因此，当塞尔维亚人对最后通牒给了令奥地利不满意的答复，皇帝于七月二十五日下令局部动员时，康拉德没什么兵力可动员。皇帝于七月二十八日向塞尔维亚宣战时，奥地利军方毫无动静。后

来，一九一五年接替贝希托尔德出任外长的布里昂伯爵，以这一被动消极的姿态为理由，反驳外界对奥匈帝国发动战争的指控：他以猜测的口吻表示，“事实表明奥匈帝国陆军完全未做好作战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在幽暗的作坊里谋划出这场战争？”[54]

康拉德的作坊照理应有更好的准备。这位参谋总长已在七月七日向贝希托尔德保证，只要于动员起的五日内清楚俄国的动向，他就应付得了两面作战。[55] 然后他的确知道俄国的动向：就在塞尔维亚人不接受最后通牒那天，沙皇已下令莫斯科、华沙、基辅、敖得萨诸军区局部动员。法国总统则从俄国首都向奥地利警告，塞尔维亚“有朋友”。显而易见，此刻该R计划，而非B计划上场，但康拉德就是听不进道理，仍想打塞尔维亚人。但这么做越来越没有胜算。奥地利陆军费力局部动员（只动员四成兵力）时，塞尔维亚人已忙着部署他们的全部兵力。到了七月二十五日，塞尔维亚人已征召到四十万人，且已开始集结三个野战集团军。俄国人已开始加快动员脚步，英国人则已开始向德国人施压，要他们逼奥地利人在贝尔格莱德停住（即只教训塞尔维亚但不将其瓜分），透过谈判解决七月危机。[56]

康拉德刻意淡化来自俄国的威胁，仍认为“拿起铁扫把横扫”塞尔维亚较为可取。[57] 他的一味昧于形势，令人吃惊。奥匈帝国的参谋部始终想当然地认为与塞尔维亚开打，只是与俄国开打的另一场更大战争的第一步，而未深入思索此举的严重性。[58] 康拉德把头埋在沙里，看不见周遭情况狂挥乱打。这样的人不只他一个。七月二十八日夜，奥芬贝格将军与皇帝的亲信顾问暨前驻圣彼得堡武官亚历山大·冯·于克斯屈尔（Alexander von üxküll）会晤，当听到于克斯屈尔把俄国的作战准备说成“虚张声势”时，惊讶不已。于克斯屈尔自信满满地说，俄国“不会插手”。[59] 贝希托尔德也在黑暗中摸索，看不到康拉德在做什么。康拉德下令第二梯队十二个师开赴塞尔维亚边界，而非加利西亚，异想天开地认为俄罗斯人会在面临德国具体威胁时打退堂鼓。[60] 奥芬贝格忆

道，“把我们的军队分割为两部，并非我所乐见”，康拉德打算只以二十三个师对付俄国（兵力太少）、十八个师对付塞尔维亚（太多），并以七个师作为总预备队在这两部之间机动支持。

简而言之，照康拉德的部署，奥地利在各个战线都要吃败仗。他的上司，斐迪南大公死后获皇帝任命为总司令的弗里德里希大公，识见不足，无法修正康拉德的决定。与五十八岁的弗里德里希——至交好友口中的弗里茨尔——见面后，奥芬贝格觉得他乏善可陈：“我们简短聊了些琐事；一如这类人所一向予人的印象，这位仁兄让人觉得无可救药的平庸；由他统领两百万大军，叫人生不起信心。”[61] 所幸仍有一条出路可避掉这场即将降临的大灾难。英国大使于七月二十八日拜访贝希托尔德，表示愿意帮忙，并提醒这位外长绝不可再“漠视（维也纳与塞尔维亚争吵的）欧洲层面”。如果贝希托尔德继续漠视，会有一场把所有大国都卷入的世界大战。贝希托尔德告诉英国大使，俄国人不会插手，“因为我们会（向俄国）保证我们无意扩张领土”。[62] 贝希托尔德如此谨慎之人，对世局的看法竟也如此天真。

德国人为开战推了最后一把。七月三十日，德皇要弗朗茨·约瑟夫同意以“贝尔格莱德或其他要塞”的控制权为担保，确保塞尔维亚与维也纳合作调查暗杀阴谋，一时之间似乎支持“在贝尔格莱德停住”这条路，但隔天，威廉二世的立场突然一百八十度翻转，向圣彼得堡和巴黎都发出最后通牒。“勿接受英国为消弭战火所进一步提出的建议，”毛奇指示康拉德，“欧洲战争是挽救奥匈帝国的最后机会。德国愿毫无保留地支持奥地利。”

其实，毛奇应该还要补充一句，欧洲全面战争是挽救德国的唯一机会，因为贝特曼已严正表示，“未来是俄国的天下，俄国越来越壮大，像越来越深沉的噩梦重重压在我们身上”。[63] 只有战争能防患未然阻止俄国壮大，或者说柏林是这么认为。维也纳与柏林之间这些意见的交

换，证实德国和奥地利是掀起这场战争的元凶，而毛奇坦承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事，则提供了更确凿的证据。毛奇写信告诉贝特曼·霍尔维格，说会有一场“世界大战”，诸大国会“相互厮杀”，带来不堪设想的恶果——“几乎整个欧洲的文化会毁于一旦，数十年无法恢复”。[64] 但不要紧。一如奥地利人，德国人觉得他们现今享有的军事优势，会在两或三年内被俄国、法国的大规模军事整备计划压倒。那些计划将使俄法两国拥有更多兵员、火炮、基础设施，使靠着一九一三年的庞大军事支出计划而这时仍占上风的德国，将得在公平的立足点上与他们较量。毛奇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在卡尔斯巴德告诉康拉德：“拖得越久，我们的胜算就越低。”[65]

而一如奥地利人，德国人也苦于国内的政治乱象。贝特曼·霍尔维格当德国首相已有五年，却从未能在国会掌握可靠多数；他的职责已沦为让国会通过庞大的陆海军预算，抵御社会党、阿尔萨斯-洛林党（“法兰西万岁！”），以及那些挑剔在自家地盘上每个说德语的学校和官员的波兰人。推动战争的势力太强，贝特曼想挡可能也是螳臂挡车。这位总理抱怨，“在军事活动方面”，他未“得到充分告知”，“开战的决定是在德皇周边的封闭小圈子里做出的”。[66] 后来奥地利人忆起柏林这些焦虑万分的决策者“害怕、紧张、迟疑、神经质”的特质。他们先后于八月一日、八月三日向俄国、法国鲁莽宣战，缺少了“俾斯麦审时度势的能力”。八月五日英国不情不愿地加入反德同盟一方，在“以防整个西欧为单一强权所宰制”时，德国人的反应是暴怒（且愚蠢）：“多了一个敌人，只是多了一个紧密团结、战斗到底的理由。”[67]

奥匈帝国的宣战行动，完全看不到德国人的这种心态。奥匈帝国八月六日才不情不愿、有气无力地向俄国宣战，而其理由，一如贝希托尔德所说的，“鉴于俄国在奥地利、塞尔维亚冲突里摆出的威胁姿态”。康拉德满怀悲观——将伤害他对整场战事之运筹帷幄的一种悲观——严正表示“若是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胜算大概还不小，但如今，我们

是va banque”。[68] 这番宣示完全未能稳住民心士气，因为va banque是赌徒术语，意指拿庄家的所有赌本对赌，“赢则全拿，输则赔光”。一如以往，康拉德表现得好像他是整个情势的无辜受害者，而非情势的主要推手。蒂萨继续阻挠，主张走德皇最初提出的“在贝尔格莱德停住”路线，坚持要贝希托尔德“打消（奥地利出兵侵略的）妄言”，但为时已太迟。在申布伦宫安静的房间里，老皇帝已无奈接受侵略路线。他一语不发地坐着，如他的副官所说的，相信“我们名正言顺的目标”可成。这位副官，阿瑟·博尔弗拉斯将军，对未来颇为乐观。他在写给人在萨拉热窝的波蒂奥雷克的信中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再次高呼‘许多敌人，好多荣耀。’”[69]

博尔弗拉斯不会欢呼太久。

---

[1] Barbara Jelavich，*History of the Balk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2：110.

[2] Kriegsarchiv，Vienna（KA），B/677：0-10（Auffenberg），Bozen，Oct. 28 and Nov. 1913，Brosch to Auffenberg；Rudolf Jerabek，*Potiorek*（Graz：Verlag Styria，1991），77-78；Lawrence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Architect of the Apocalypse*（Boston：Humanities Press，2000），133.

[3] *Wien Zukunft*，Oct. 1，1913；*Neue Freie Presse*，Oct. 3，1913.

[4] Österreichische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Heereswesen und vom Kriegsarchiv，*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ed. Edmund Glaise von Horstenau（Vienna：Verlag Militätwissenschaftlichen Mitteilungen，1931-1938），1：6-7；Jerabek，*Potiorek*，98.

[5] Graydon Tunstall，*Planning for War Against Russia and Serbia*：*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Military Strategies 1871-191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106.

[6] KA，Neue Feld Akten（NFA）2115，36 I.D.，Vienna，July 20，1914，“Einiges über höhere Kommandos und Personalien der serbischen Armee.”

[7] Jerabek，*Potiorek*，99-105.

[8] KA，Militärkanzlei Franz Ferdinand（MKFF）202，“Studie Sommer 1907：Operationen gegen Serbien.”

[9] Jelavich，*History of the Balkans*，2：111.

[10] Jerabek，*Potiorek*，90.

[11] Vladimir Dedijer，*The Road to Sarajevo*（London：MacGibbon and Kee，1967），9-10.

[12] Jerabek，*Potiorek*，84；Winston S.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64.

[13] Christopher Clark，*The Sleepwalkers*（New York：Harper，2013），367-376；Sean McMeekin，*July 1914*（New York：Basic Books，2013），1-20；Dedijer，*The Road to Sarajevo*，14-16.

[14] Carl Freiherr von Bardolff，*Soldat im alten Österreich*：*Erinnerungen aus meinem Leben*（Jena：Eugen Diederichs，1938）：90.

[15] *Die Fackel* 7，no. 400（July 10，1914）：1-4，“Franz Ferdinand und die Talente.”

[16] Jerabek，*Potiorek*，95.

[17] KA，B/1503：5，Vienna，July 9，1914，Conrad to Potiorek，*sehr geheim*；Clark，*Sleepwalkers*，392.

[18] KA，B/1503：6，Vienna，July 27，1914，FZM Krobatin to FZM Potiorek.

[19] KA，B/232：11，Karton 15，Sarajevo，July 25，1914，GdI Appel to Col. Brosch-Aarenau.

[20] Andre Mitrovic，*Serbia’s Great War 1914-1918*（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2007），17，64.

[21] Haus-，Hof- 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810，Int. LXX/1，Belgrade，June 30，1914，Storck to Berchtold.

[22] McMeekin，*July 1914*，109-116；Samuel R. Williamson Jr.，*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St. Martin's，1991），192.

[23] Annika 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51-152；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68.

[24] Clark，*Sleepwalkers*，381-403；Dedijer，*The Road to Sarajevo*，289-291；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193；Mitrovic，*Serbia's Great War*，5-6.

[25] HHSA，PA I，810，Int. LXX/1，Vienna，July 7，1914，GdI Conrad to Berchtold.

[26] David Fromkin，*Europe's Last Summer*（New York：Vintage，2005），155.

[27] Mitrovic，*Serbia's Great War*，10.

[28] Mitrovic，*Serbia's Great War*，11.

[29] Norman Stone，"Hungary and the Crisis of July 1.914，"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no. 3（1966）：161；Churchill，*World Crisis*，53.

[30] Mitrovic，*Serbia's Great War*，10.Fromkin，*Europe's Last Summer*，157.

[31] Fromkin，*Europe's Last Summer*，157.

[32] Sean McMeekin，*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MA：Belknap Press，2011），42-46；McMeekin，*July 1914*，393-394；Churchill，*World Crisis*，77.

[33] David G.Herrmann，*The Arming of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221.

[34]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 Hö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256.

[35] 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194.

[36] Churchill，*World Crisis*，65.

[37] Mitrovic，*Serbia's Great War*，4.

[38] 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191-192.

[39] Clark，*Sleepwalkers*，517；Fromkin，*Europe's Last Summer*，156；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195；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103.

[40]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AAT，EMA，7N847，Marseille，Mar. 22，1917，2ème Bureau，"2ème Bureau analysé des cahiers de notes d'un officier hongrois prisonnier de guerre."

[41] 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198-199.

[42] Stone，"Hungary and the Crisis of July 1914，" 163.

[43] HHSA，PA I，810，LXX/1，Belgrade，July 8，1914，Wilhelm Storck to Berchtold.

[44]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257.

[45] 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203.

[46] HHSA，PA I，810，LXX/1，Vienna，July 20，1914，Berchtold to Giesl；Stone，"Hungary and the Crisis of July 1914，" 166.

[47] KA，B/232：11，Karton 15，Sarajevo，July 25，1914，GdI Appel to Col，Brosch-Aarenau.

[48] McMeekin，*July 1914*，181；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203.

[49] HHSA，PA I，811，LXX/2，July 25 and 27，1914，"Antwortnote"；Clark，*Sleepwalkers*，423-430，457-469.

[50]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259-260.

[51]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Kew（BNA），Foreign Office（FO）371/1900，London，Sept. 1，1914，Bunsen to Grey.

[52] KA，Armeeoberkommando（AOK）1914，Evidenzbureau（EVB）

3506，Vienna，Aug. 4，1914；Kurt Peball，“Der Feldzug gegen Serbien und Montenegro im Jahre 1914，” Österreichische Militärische Zeitschrift Sonderheft I（1965）：20-21；Jerabek，*Potiorek*，22.

[53] KA，MKFF 202，“Studie Sommer 1907：Operationen gegen Serbien”；General Josef von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Leipzig：Paul List，1921），158.

[54] István Burián，*Austria in Dissolution 1915-18*（New York：George Doran，1925），8-9.

[55] Norman Stone，“Moltke-Conrad：Relations Between the 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General Staffs 1909-1914，” *Historical Journal* 9，no. 2（1966）：215.

[56] McMeekin，*July* 1914，252-255.

[57] HHSA，PA I，810，Int. LXX/1，Vienna，July 7，1914，GdI Conrad to Berchtold.

[58]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24.

[59]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262.

[60] Stone，“Moltke-Conrad，” 216-217.

[61]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264-265.

[62] BNA，FO 371/1900，London，Sept. 1，1914，Bunsen to Grey.

[63] Herrmann，*Arming of Europe*，214.

[64] Capt. B. H. Liddell Hart，*The Real War 1914-1918*（Boston：Little，Brown，1963），31-2；Patricia Clough，“Found：The Secret of World War I，” *Sunday Times*，Aug. 14，1994；Jerabek，*Potiorek*，108；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106-107；Herrmann，*Arming of Europe*，205-206，217-218.

[65] Geoffrey Wawro，*Warfare and Society in Europe 1792-1914*（London：Routledge，2000），200-211；Herrmann，*Arming of Europe*，200-201，212；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172.

[66] HHSA，PA I，837，Munich，Aug. 14，1914，Vélics to Berchtold.

[67] HHSA，PA Ⅲ，171，Berlin，May 16，1914，Szögenyi to Berchtold；PA I，842，Berlin，Oct.6，1915，Hohenlohe to Burián；PA I，837，Munich，Aug. 5，1914，Vélics to Berchtold.

[68] Herrmann，*Arming of Europe*，218.

[69] BNA，FO 371/1900，London，Sept. 1，1914，Bunsen to Grey；HHSA，PA I，819，Vienna，Aug. 2，1914，Tisza to Berchtold；KA，B/1503：6，Vienna，Aug. 6，1914，GdI Arthur Bolfras to FZM Potiorek.

第五章 蒸汽压路机

加夫里洛·普林齐普在萨拉热窝街头刺杀斐迪南大公夫妇的前一晚，六十二岁的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坐下来，写了封一副要慷慨赴难的信给情妇吉娜（他写给吉娜这样的信不只一封）。康拉德写道，战争就要来临，奥匈帝国挨不过这场战争；俄国和塞尔维亚会是“这个君主国的棺材钉”。但康拉德会打到最后一口气，“因为如此古老的君主国和如此古老的军队不能亡得不光彩”。[1]

康拉德的浮夸之词，掩盖了更为不堪的真相：不只这个帝国完全未准备好迎接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康拉德本人亦然。康拉德在当作家和官员时表现得亮眼，但他从未听过现代战场的枪炮声。他以探讨布尔战争和其他冲突的战术性著作名扬国外，但他唯一的作战经验，是来自一八七八年在波斯尼亚某步兵师当基层军官时。康拉德在一九〇一年获弗朗茨·斐迪南赏识后平步青云，短短五年就从一星将领升为三星将领，但现代战争的严酷挑战和那些挑战所带来的痛苦抉择，似乎从未遮暗他熠熠耀眼的军人生涯。大战前卡尔·克劳斯就预料，“只要响的是军号，而非枪炮声，康拉德就一直会是最伟大的指挥官”。克劳斯说得没错，而这就要带来麻烦。

在情妇吉娜眼中是一位地道德意志英雄的康拉德，开始惹恼德国人。俄国有人口一亿七千五百万，比美国人口多了将近一倍，比奥匈、德国、法国三国人口总和还要多，所以除非战事一爆发康拉德就立即将所有火炮调到东部战线，否则奥地利会被俄国的人海淹没。[2] 在德国人击败法国的八十八个师（据作战计划要大约四十二天），把兵力调到东

边打俄国人之前，奥地利的四十八个师——加上顶多德国十七个师的增援——得挺住对塞尔维亚的防线，并力抗俄国的一百一十四个师，守住加利西亚和波兰。俄国兵力如此庞大，一旦俄国参战，维也纳别想奢望对塞尔维亚发动攻势。[3] 从动员第一天起，奥地利人就得把一切人力物力调到东边，以击退俄国“蒸汽压路机”（畏怯的英国报纸所编造的字眼，用以反映俄国看来源源不绝的人力）。这辆蒸汽压路机是挥之不去的幽灵，康拉德每次想根据俄国武力现况来修改他看似漂亮的作战计划时，它就出来骚扰，不让他如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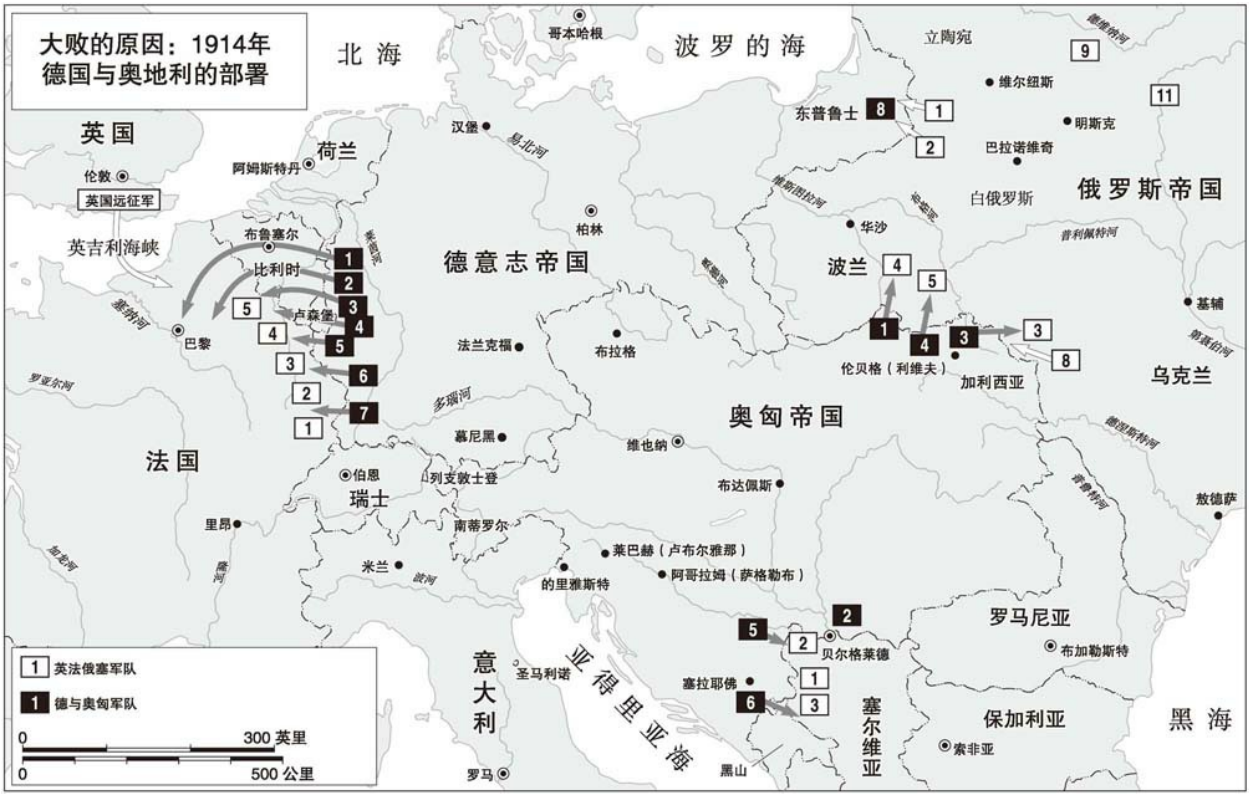
奥地利人将得增加他们不足的兵力，且得早早就把这辆蒸汽压路机打得动弹不得，以免它动员六百万后备军人来增援其一百四十万现役兵力后，对付不了。奥地利人已采取某些做法来扩大他们的可用兵力：一九一二年，奥地利已把役期由三年减少为两年，同时将后备役期由七年拉长为二十七年，借以增加哈布斯堡兵力。从此，只要是未满五十岁的男丁，奥国都能将其召回，投入后备部队。这似乎是五千三百万人口的贫穷帝国，在面对一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另一个贫穷帝国时，唯一的备战之道。[4] 问题——不久后就会显露的问题——在于征集到兵员是一回事，要他们成为可战之兵是另一回事。这个君主国被高昂的训练成本吓倒，每年只对其少部分合格的二十一岁男子施予训练，因而在一九一四年动员时，前来兵站报到的奥匈帝国士兵，大部分没受过什么军事训练。

其他投机取巧的做法，助长了维也纳的盲目乐观心态。到了一九一四年，奥匈帝国已把他们的动员期降为十六天，[5] 也把奥地利、匈牙利两地的地方防卫军各八个师的备战状态，提升到能被动员、能归类为野战部队、能与三十三个正规师整合为十六个军的程度。那当然有利有弊。占总兵力三分之一的地方防卫军，原定位为预备队，现把他们列为一线部队，意味着奥匈帝国陆军不再有受过训练的后备兵力可以填补第一波交战后损失的兵力或保卫突然受威胁的地方。

由于没有多余的预算来建立真正的预备师，康拉德就用有名无实的后备部队将就混充：退役军官、一年期志愿役军官（志愿服一年兵役以免去征兵义务的受过教育的男子）、自一九〇〇年起陆军所征召但其实未入伍的所有未受过训练的男子。这些被排在征兵顺位后段的幸运儿，即所谓的非现役人员，不必入正规军和地方防卫军服役（征兵顺位前段者入正规军，中段者入地方防卫军），但一旦爆发大战，肯定会被征召入伍。但事实上，他们如果被征召，也没地方安置他们，因为匈牙利人连创立有名无实的预备团来容纳他们都予以阻止，因此，一旦总动员，他们将只会四处打转，派不上用场。最后他们会被组成新编队，配予用剩的制服和老旧步枪（最老的步枪为一八七〇年代的东西），在最草率的指示下出征作战。最幸运的“非现役人员”当然老早就移民美国，对横越大西洋千里迢迢送到康涅狄格州工厂、宾夕法尼亚州矿场或密歇根州伐木区新兴小镇的动员令，乐得置之不理。较没这么好命者，也就是未在大战爆发前跑掉者，则被风光编入Landsturm（译按：由三十四至五十五岁男子组成的战时预备队）或Ersatsreserve（译按：由因某些因素免服兵役的男子组成的预备队），凑成火力、装备都不足的行军旅。这些行军旅理论上将提供十一个预备师的兵力，其实是充当炮灰。“当武器和装备发下，样样东西都得解释一番时，士兵和军官都非常吃惊。”有位老兵冷冷忆道。[6]

由于有这类部队问题，照理康拉德或许该采取较步步为营的策略。如果他想在东部战线打赢，得尽快集中他分成三部分的陆军，得完全放弃把第二梯队调到南边增援与塞尔维亚作战之巴尔干最小兵力群的构想；然后该把第一、第二梯队的四十师的兵力联合起来对付俄国，留巴尔干最小兵力群的八个师对付塞尔维亚的十二个师。[7] 到了一九一四年七月，只有狂热分子还会以为能把奥地利、塞尔维亚战争局限于当地，能把第二梯队的十二个师，即爱德华·冯·伯姆·埃尔莫利（Eduard von Böhm-Ermolli）将军之第二集团军的四个军，安然调到塞尔维亚与巴尔干最小兵力群会合。在一九〇八年的并吞危机和两次巴尔干战争后，

奥、俄关系急剧恶化，若还以为俄罗斯人会坐视奥匈帝国入侵塞尔维亚，则几乎是异想天开。但后来的发展表明康拉德就是这么异想天开。



俄奥如已交战，把第二梯队调去打塞尔维亚，即会招来大祸。俄国已改善其铁路，已把数十个预备师改造为能迅速动员、出击的第一线师，从此不必等后备军人召集。这时俄国已有九条新铁路，其中五条是双线，直抵与德、奥接壤的边境。沙皇从此能把九十六个步兵师和三十七个骑兵师（三十个军两百七十万兵力）迅速投入战场，且有来自西伯利亚与亚洲移动较缓慢的两百三十万兵力后备。[8] 每个人都认为意大利的二十五个师最后会投入反奥阵营。胜败全看奥地利能否在东部战线挺得够久，让柏林得以先解决西线战事，再移师东线与俄国一决。但即使是这一先决条件，主事者都没有把握守得住；一九一四年五月最后几次参谋人员会谈时，毛奇只说他希望在六星期内打败英法。如果不成，奥匈帝国就会像用手指头堵住堤坝缺口的荷兰小男童，只能独自力撑。[9]

康拉德根据一个含糊带过、从未获正式认可的条件——毛奇会在战争头几天为东部战线出点力，或许是十二个师——同意独自力撑。事实上，不讲清楚一直是自一八九一年施里芬担任德国参谋总长以来奥、德军事关系的基调。他之前的德军参谋总长都和奥地利人毫无保留地合作；相对地，施里芬以对奥有所提防著称。他不相信奥匈帝国能守住德国机密，也从不相信奥匈帝国会信守承诺攻打俄国。一九〇六年接替施里芬之位的毛奇，承继这一对奥有所猜忌的心态，在与奥地利人沟通时总是不把话讲清楚。一九一四年五月，他似乎同意联合进攻，保证德国会派第八集团军与从加利西亚出击的一支兵力更大上许多的奥匈帝国军队，在彼此保有很大自主性的情况下共同出击。第八集团军只是德国支援的先头部队，待于西线击败英法军后，会在合理的时间内接着派大军到东线。

康拉德对德国人的提防，至少和德国人对他的提防一样深，常在文件上盖上"勿让德国参谋部知晓"的印子，但出于十足的误判，他欣喜于德国含糊的保证。[10] 他相信他能面面俱到，事事兼顾：既尽到他所该尽吃力不讨好的抗俄职责，把大部分的抗俄重任丢给德国人去背，同时仍拿下打败塞尔维亚的光荣胜利。康拉德知道下一场战争会在巴尔干半岛爆发，所以无意把哈布斯堡军队运到到处是尘土的波兰、乌克兰，打得不到掌声的守势作战，拿掉对塞尔维亚人的套锁。一九一三年一月他就稍稍透露他的看法，当时他告诉毛奇，巴尔干危机中"俄国无法预料的态度"，可能促使他视每天情势的变化临时决定他的因应对策。[11] 毛奇未要康拉德具体说明那一令人惊愕的主张，康拉德则于一九一四年春（在未告知德国人的情况下）开始这种没有预定计划的即兴作为。他未把他运到加利西亚的部队推进到俄国边界，摆出奥匈帝国欲入侵俄属波兰的威胁姿态，借以减轻德国所受的压力，反倒决定把那些部队调到遥远南边的桑（San）河、德涅斯特（Dniester）河边——在那里他们可以置身要塞内和河川后面，安全无虞——以便在等待已久的战争终于爆发时更快击败塞尔维亚。

这当然与德国人所认定他们已和康拉德谈妥的方案背道而驰。事实上，一九〇九年康拉德向毛奇提出类似于此的建议时，这位德国参谋总长怒不可遏，指出若奥德击败俄国，“塞尔维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12] 换句话说，德国人认为奥地利人该在布格河边，而非德里纳河边，来决定塞尔维亚的命运。

但就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与俄国开战的可能性更高时，康拉德仍希望在加利西亚维持其安全、不具威胁性的部署态势，以为击败塞尔维亚争取时间。事实上，他正悄悄将四成的哈布斯堡兵力派去打塞尔维亚。[13] 七月三十日，也就是俄国开始其“局部动员”（一百一十万兵力）两天后，康拉德告诉其铁路计划主任约翰·史特劳布上校，即使与俄国开战在即，他仍希望让第二梯队专门用于应对塞尔维亚战事。康拉德甚至在那一天下令紧急修改作战计划。照理在第二梯队要开赴的地点明确下达之前，第二梯队应在兵营里待命，腾出铁路以便将第一梯队快速运送到加利西亚，将巴尔干最小兵力群运到塞尔维亚边境，但此刻康拉德要惊讶不已的史特劳布把第二梯队立即运到塞尔维亚。他甚至从第一梯队抽走一个军，要史特劳布想办法将它也运到塞尔维亚。[14]

柏林对康拉德的自行其是更为震惊。由于俄国已开始总动员，德皇于七月三十一日打电报给弗朗茨·约瑟夫，要他勿“同时进攻塞尔维亚，以免分散你的主力”。毛奇对施里芬计划（迅速击败法国，然后从容击溃俄国）深信不疑，因而在一九一三年四月宣布，德国独立对俄作战的计划，将不再纳入考虑甚至更新。这虽然愚蠢且不负责任，但此刻要奥地利全力应付东线战事的需要还是一样强烈。俄罗斯虽然人多，部队却是部署在欧洲最大湿地区的前面——从白俄罗斯绵延到乌克兰的普里佩特（Pripet）河草原湿地、林间湿地、洪泛区。“集中全力对付俄罗斯，”毛奇从柏林吩咐康拉德，“把（俄罗斯人）赶进普里佩特河湿地，把他们淹死在那里。”[15]

史特劳布上校也抗议运兵到塞尔维亚之事太急迫（他判定“技术上不可行”），要求“宽限数日”，以复位大批火车与四轮马拉货车的行进路线。[16] 斐迪南大公遇刺后已浪费掉一个月，但此刻康拉德还是同意再浪费一星期。他于七月三十一日宣布奥匈帝国对俄动员，但指定于八月四日开始动员。直到八月二日，他才开始与他的集团军司令官会晤。时间越来越急迫，奥地利与敌一战的气势逐渐消竭，奥国还在慢慢来。

在七月三十一日正午俄、德宣布总动员时，康拉德已排定将他一半的兵力运到塞尔维亚，以便与一巴尔干小国交手，从而陷入一完全可预料到的困境。一如以往，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完全在状况外。他向德皇保证，他会把他“大部分”军队调去对付俄国，但一如在大部分事物上所见，他完全不清楚细部运作。德国人则不然——认定第二梯队该在加利西亚稳住奥地利阵地的右翼——因此，当康拉德的真正计划慢慢揭露，显示与他于五月时和毛奇似乎约定的方案背道而驰时，德国人大吃一惊。出现这样的差池，德国人当然也要负部分责任。德国驻维也纳武官八月一日惊愕地发现，尽管一九〇八年起国际危机接二连三，毛奇和康拉德却从未在“如何协调对俄作战”上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双方未敲定任何“密切协议”，只有粗略的口头协议。[17]

康拉德刚若无其事地告诉他的各军军长，“尽管俄国介入，但所有指示仍然有效”，这时却又致电一脸惊讶的史特劳布上校，问是否“能把列为首务的巴尔干动员改为俄罗斯动员”。不好意思的康拉德，问的是能否把他于星期四下令运到塞尔维亚的五个军，改于星期五运到加利西亚。史特劳布吓得往后退；他辖下有一百四十列火车每天行驶在通往加利西亚的七条路线上和通往巴尔干半岛的四条路线上。[18] 他整夜不眠不休执行康拉德先前的运输更动指示，已让载了第二梯队头几批部队的一百三十二列运兵火车驶往塞尔维亚。要撤销最近的操作，几乎不可能；刚从达尔马提亚度假回来的史特劳布表示，若一定要这么做，“火车运行会乱掉，出了事，我承担不起”。即使能把火车止住，要它们驶

回车站，康拉德也知道，要部队如此离谱地调头，已然低落的士气会落得更低。参谋部“俄罗斯群”的主任埃米尔·拉岑霍弗（Emil Ratzenhofer）少校指出，第二梯队继续既定行程，不只可以省去因矛盾命令而火药味十足的电报往返，也可以让部队斗志不致受损：“我们担心士气、政治、纪律方面的损害；若要他们调头，士兵对他们领导人之专业职能的信心会受挫。”[19]

已然想要挽救自己战后名声的康拉德、史特劳布和拉岑霍弗，如果更有见识，应该担心奥国在塞尔维亚、俄罗斯溃败（他们的动员无方是败因之一），会对士兵的信心有何影响。比起打败仗，要火车调转方向根本是小事一桩。后来康拉德声称惊讶且失望于奥匈帝国铁路的死板僵化，但在战时铁路归他统筹运用，而且其实在一九一三年七月（R+B计划已被赌掉）时，他就知道不会有让他变通的余地。他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告诉皇帝，第二梯队可在两战线之间迅速移动；七月，即在七月危机的整整一年前，他的铁路专家即很笃定告诉他，那其实办不到。换句话说，康拉德一开始就该谋定而后动，因为一旦开拔，就很难叫部队调头。[20]

但康拉德从来不是果断之人。他讨厌下决定，因为下决定使他得承担决定的后果。而且，他从来不是谋定而后动之人，在他的政治生涯里，在他的私人生活里，在战争里，都是如此。一如后来他试图把他的每一次挫败归咎于无能外交官或下属一样，他试图把一九一四年的动员失当归咎于史特劳布和拉岑霍弗。但一如战场失利得归咎于他一样，动员失当也得归责于他。他在整个七月危机期间拿不定主意，然后不干不脆地把用兵重点摆在塞尔维亚，最后发现自己犯了个大错，然后决定把用兵重点再摆回俄罗斯，却为时已晚，无法挽回他在俄罗斯战线上已造成的伤害。

追根究底，康拉德精于表演甚于谋略，而此刻，就在他急欲打消其

塞尔维亚计划时，他表现出仍在贯彻该计划的模样。康拉德原打算领军入侵塞尔维亚，但由于俄罗斯战线需要他坐镇，他才不情不愿地将塞尔维亚作战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他的死对头波蒂奥雷克。八月，他增拨一支兵力给波蒂奥雷克打塞尔维亚，但附带条件：康拉德告诉波蒂奥雷克，第二梯队只能供它于多瑙河边的过渡期（一星期）内“佯动之用”。对于康拉德总是能把事情搞砸的作风，第二梯队的参谋不以为然地嘲讽道：“希望迅速击倒塞尔维亚，然后把所有兵力调去对付俄国——只有这点才能说明最高指挥部为何有这古怪的做法。”康拉德的总司令部（简称AOK）向毛奇保证，会怀着只是暂时被削弱的德意志民族忠诚迅即去进攻俄国。[21] 八月二日在陆军部接见他所指派统领加利西亚三集团军的三名将领时，康拉德要他们尽快部署他们的部队，所有欠缺的东西（后备军人、火炮、弹药、补给品），随后会补上。

这三位惊讶的集团军司令官拿到康拉德的作战局给他们的笔记本，还有开拔令：全军从桑河河口往东南部署到伦贝格、德涅斯特河，丹克尔的第一集团军在左侧，奥芬贝格的第四集团军在中间，布鲁德曼的第三集团军在右侧。照原定计划，第二梯队应该推进到布鲁德曼集团军右侧，在伦贝格处保卫该集团军南侧，把自己的右翼摆在德涅斯特河边，借此为对抗俄罗斯蒸汽压路机的奥军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结果却不见踪影，因为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它仍在驶往塞尔维亚的火车上。布鲁德曼集团军因此暴露侧翼，失去掩护，面对人数居于优势的俄军，只有被包围的份。[22]

东部战线的大战还未开始，但瞄一眼地图就可看出，由于康拉德的运筹失当，奥匈帝国会输掉这一战争。八月二日与康拉德开会的情形，令奥芬贝格不安。他说参谋总长正把滋长出雷尔德事件的那种讲究隐秘、不透明的参谋文化（军官圈所谓的康拉德的“日本作风”）注入野战部队里。要率兵开赴俄罗斯的奥地利将领（要前往巴尔干半岛的将领未与会），原以为会上会详细探讨君主国的军事目标、与德军的关系、对

俄与对塞尔维亚作战之奥地利军队的兵力分配，结果完全没有。康拉德要会议短短就结束，只谈到每个集团军要集结的“部署区”。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说——没说部署之后集团军要做什么，没谈俄罗斯的动静，没谈得胜或战败后奥地利的计划。

这些将领所立即注意到的东西，乃是修正过的部署区。按照R+B计划，奥地利陆军要开拔到铁路所能运到的最东边处，开拔到加利西亚东部，然后大军会在那里定位，早早向俄国发出攻击。但康拉德于一九一四年三月悄悄修改了计划，把整个大军“向后移动”拉回到加利西亚西部。他为何认为这是个好点子，不得而知；奥地利与俄国大军交手时，唯一的优势是猝然出手攻击。把奥地利大军拉回到克拉科夫（Cracow）和桑河，其结果若非给予俄国时间来完成其动员，就是奥军得步行走过原本可以搭火车穿过的地区。[23]

康拉德显然把一切都搞砸；为了打他想打而有胜算的对塞尔维亚之战，他完全忽视他所不想打、没有胜算的对俄之战，从头到尾不给予具体明确答复，把所有人搞糊涂。他赫然发现只有八个军，而非十三个军，可对付俄国。史特劳布和拉岑霍弗向他保证，八月二十三日前可把少掉的五个军（第一梯队的第三军和第二梯队的四个军）弄到加利西亚，但其实到了九月八日时，只有其中两个军踉踉跄跄开赴东部战线就位，而他们来得太迟也太累，即使投入关键战役，也无法发挥战斗力，扭转战局。[24]

波蒂奥雷克不知道康拉德部署陡变，因而在八月六日听到参谋总长坦承第二梯队不会在巴尔干逗留，反倒会在铁路一畅通就开赴俄罗斯战线时，大吃一惊。但波蒂奥雷克仍抱着希望。在公开场合，他保证会取得“战术成功”：他会用留给他的两个集团军包围塞尔维亚人。[25] 但在私底下，波蒂奥雷克痛斥康拉德背叛。“我不懂最高指挥部怎么会在决定上有如此突然的改变，”波蒂奥雷克抱怨道，“这大大揭露了这部机器

的运作实情。”[26]

奥匈帝国的动员，要把将近两百万人（现役部队、受过训练的后备军人、未受过训练的后备军人）集合起来并给予装备，然后将他们运到不同地方。这部机器不堪动员的负荷，已开始解体。在部队的集合、给予装备、部署上，奥匈帝国陆军比大部分国家的陆军更费劲。这支陆军在平时保持少得可怜的兵力，因而在弗朗茨·约瑟夫宣战时，有四分之三的士兵连制服都没有。奥匈帝国得找到超过一百五十万的后备军人，并给予他们装备，把他们编成可送到前线的部队。[27] 把未受过训练的后备军人招来后，最初，在一百零六个常备团里，没有地方安置他们，因而，在奥匈帝国全境的驻地城镇里，有数万男子四处游荡数日，甚或数星期，等着发下制服、武器、命令。动员第三天，就有师级部队，例如在布拉格集合、预定开赴塞尔维亚的第九师，报告如下的乱象：“所有马鞍都得替换，我们短少两万五千份咖啡配给、四万份腌肉、一千七百公斤烤干面包。”在布拉格和德里纳河渡河口之间，部队在每个铁路小站都错过火车，据说是“因为他们搞错离站时间”。[28] 如果他们想赶上错过的火车，其实用走的也能追上。军方小心过度，要所有火车的行驶速度都不得超过行驶在君主国最烂铁路上的最慢火车的速度，因而奥匈帝国运兵火车的平均速度，比脚踏车没快多少。整体来讲，哈布斯堡陆军花了一个月才将部队部署到加利西亚和塞尔维亚，远远不符R+B计划中所预想的德意志民族效率。[29]

康拉德仍在维也纳，浑然不察日益扩散的乱象。八月十五日，他赴申布伦宫晋见老皇帝。康拉德要走时，皇帝说了如下叫人泄气的话：“上帝许可的话，一切都会很顺利，但即使事事都不顺利，我也会力撑到底。”隔天早上，康拉德与弗里德里希大公在维也纳北站搭上早班火车，前往东边桑河边的普热梅希尔要塞，即总司令部的设立处。康拉德在月台上与情妇吉娜难分难舍，拖了好久才上车；他紧握住她的双手，要她答应与丈夫离婚，“战后”嫁给他。[30] 火车往东行期间，康拉

德的政治顾问约瑟夫·雷德利希（Joseph Redlich）注意到他们所经过之墙壁和火车车厢上的涂鸦：有幅粗糙的素描，画了只大猩猩，图说写着“一身老百姓打扮的沙皇”；沙皇吊死在绞刑架上，下方写有文字“俄罗斯人和塞尔维亚人，我们要把他们都打败”。[31] 尽管衰落数十年，奥地利人仍自以为在各方面都优于俄罗斯熊。

康拉德试图从桑河边的普热梅希尔督导东部战线和巴尔干战线，力劝波蒂奥雷克不要在少了牛肉、架桥设备、药、电话这些琐事上吹毛求疵，该把重点放在打败塞尔维亚人上。他认定塞尔维亚人会取道乌日采（Uzice）攻向萨拉热窝、黑山人会攻向莫斯塔尔，因此奥地利该先发制人。八月九日，他写道，“兵败巴尔干的后果，绝不是我们所能承受的”。那将使我们颜面尽失，使那些“摇摆不定的国家”（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相信该继续保持中立，乃至加入反奥一方。（康拉德还说，“我刚把保加利亚武官请到我办公室，告诉他保加利亚如果不立即攻击塞尔维亚，就是在自取灭亡”。）

当塞尔维亚人动员完成，二十个奥地利师进抵德里纳河和萨瓦河时，波蒂奥雷克写了数封长信给维也纳的战争档案馆馆长，其中八月八日那封信写道：“我会每天把说明我带兵方法的资料寄给你，让你在今年冬天写正史时用。”波蒂奥雷克的自负，乃是未被康拉德乱无章法的动员伤害的少数事物之一。波蒂奥雷克认定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认定奥国会赢，他会有英雄般的表现。他每天写给战争档案馆馆长二十页的“每日记事”，供未来撰写正史之用，包括如下的直率陈腐之词：“司令官战时、平时的唯一差别，乃是战时司令官花较多时间坐在书桌后讲电话！”[32] 这位司令官怎会知道这一点？毕竟他未经历过战争，未带兵打过仗。

塞尔维亚人未出兵攻击，于是，不知道波蒂奥雷克每天和后人写信的康拉德，八月十四日发文给这位巴尔干方面军司令官，要他在第二集

团军（第二梯队）完全撤走之前动用第五、第六集团军渡过德里纳河攻击："趁它（第二集团军）还在，还能在萨瓦河、多瑙河区佯动，利用一番。"乍看之下，康拉德交付波蒂奥雷克的任务似乎再简单不过。塞尔维亚征集的兵员分成三级，前两级是年轻男子，第三级是年纪较大者。它能在前两级里动员到三十万人，加上第三级征得的兵员，总兵力达四十万人。但兵力可观，武器则不然：全军只有三百八十一门急射野战炮，三级部队里弹药、机枪、步枪都极为不足，影响战斗力甚巨。许多塞尔维亚部队，会有三分之一士兵没步枪可用。第二级师所拥有的野战炮，数量只有第一级师的一半，第三级师则更少。[33] 即使肯定要和俄国交战，奥地利人仍不全然悲观，原因在此。一九一四年八月光是波蒂奥雷克辖下的兵力，就和塞尔维亚总兵力一样多，而且还有五千三百万人口的帝国作后盾，火炮、弹药都多于塞军。[34] 在维也纳，个个信心满满，胜券在握，至少认为在塞尔维亚战线是如此。

在奥地利努力将康拉德的北方面军部署到加利西亚，将波蒂奥雷克的南方面军部署到塞尔维亚时，传来法国战场头几场仗的消息。维克托·丹克尔将军八月十日才来到波兰东南部的塔尔努夫（Tarnow），在那里短暂停留，然后前往热舒夫（Rzeszow），在那里他注意到他的第一集团军什么都缺。[35] 奥芬贝格将军回到他位于桑河边的第四集团军后，抱怨奥地利居民出乎意料地敌视："在雅罗斯劳（Jarolsau）、多布罗米尔（Dobromil）、拉瓦鲁斯卡（Rawa-Ruska）等地，不可靠分子太猖狂。"不可靠分子主要是乌克兰教士和小学老师这些亲莫斯科人士，他们把奥地利部队的驻扎地点和兵力泄露给俄国人。康拉德下令狠狠肃清这些"敌对分子"。煽动者和叛徒一律立即枪毙或吊死。这想必唤醒了自我感觉良好的奥地利，因为这地区的乌克兰人过去一直是奥匈君主国最忠心的子民。[36]

德军挺进速度快过康拉德的奥军，但德国七个集团军在法国的死伤，令德国人震惊。法境德军兵分两路，一路在梅斯（Metz）和佛日山

脉（the Vosges）之间作战，另一路取道默兹峡道（Meuse defile）攻向巴黎。两路军在各战场激战，惨烈程度令德国人大吃一惊。已有数个部队遭从掩蔽阵地里发出的法军炮火整个歼灭，而每次法军攻击，德军也回敬以猛烈炮火予以歼灭。两军都以为这场战争会像普法战争那样，出现巨大但应付得了的死伤，以及猝不及防的侧翼包抄，但这一次，杀戮威力属于工业级，热兵器一开火一下子就是一大群人倒地，而且兵力庞大到不可能遭从侧翼包抄的部队，被逼入壕沟固守。德国军官抱怨，在这场由火炮推动的“机器战争”中，勇武英雄无用武之地。[37] 有位德国骑兵军官哀叹这新时代：“这些战场曾是罗马-哥德军团与阿提拉的骑士厮杀之地，如今，在这些地方，只有从数里外看不见之处、不知何人发出的致命炮火。”[38]

在白俄罗斯尚未经受血之洗礼的俄军总司令部，仍然一派乐观。沙皇的堂叔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kolai），战前任骑兵督察，这时担任俄罗斯帝国军总司令。他一派轻松地谈到要吞并哈布斯堡王朝的加利西亚，要把俾斯麦的帝国打回不会伤人的原形：“德意志帝国必须消失，必须分割为林立的小国，届时每个小国会怡然自得于自己小小的王廷。”在俄军总司令部，有个外交部官员向群集的将领开玩笑道：“你们军人该高兴我们替你们安排了这样一场美好的战争。”有位将领回道：“那会不会真是这样一场美好的战争，我们拭目以待。”[39]

---

[1] 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 （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77.

[2] Charles Emmerson，1913（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3），115.

[3] Alfred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 1914-17* （London：Hutchinson，1921），1：xvii.

[4]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EMA，7N 846，2ème Bureau，Rome，April 13，1916，Col. François，“Cohesion de l’Armée Austro-Hongroise.”

[5] Georg Markus，*Der Fall Redl* （Vienna：Amalthea Verlag，1984），43.

[6] SHAT，EMA，7N 846，May 14，1917，“Armée Autrichienne”；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 ，113-114，173-174，182；Alfred Krauss，*Die Ursachen unserer Niederlage*：*Erinnerungen und Urteile aus den Weltkrieg* ，3rd ed.（Munich，1923），90-91.

[7] 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 ，159.

[8] Kriegsarchiv，Vienna（KA），Militärkanzlei Franz Ferdinand（MKFF）202，Vienna，Winter 1910-1911，Brosch，Untertänigstes Referat；Österreichische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Heereswesen und vom Kriegsarchiv，*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 ，ed. Edmund Glaise von Horstenau（Vienna：Verlag Militätwissenschaftlichen Mitteilungen，1931-1938），1：173；Nikolai N. Golovine，*The Russian Army in the World War*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34.

[9] 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 ，159.

[10] Annika 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14.

[11] Scott W. Lackey，*The Rebirth of the Habsburg Army* （Westport，CT：Greenwood，1995），152；Rudolf Jerabek，*Potiorek* （Graz：Verlag Styria，1991），100-101；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 ，158；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 ，81.

[12] Norman Stone，“Moltke-Conrad：Relations between the 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General Staffs 1909-1914，” *Historical Journal* 9，no. 2（1966）：205-208.

[13] Graydon Tunstall，*Blood on the Snow*：*The Carpathian Winter War of* 1915（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0），15；General Josef von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 （Leipzig：Paul List，1921），23，159.

[14] Graydon Tunstall，*Planning for War Against Russia and Serbia*：*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Military Strategies 1871-1914*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148，170，174；Lawrence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Architect of the Apocalypse* （Boston：Humanities Press，2000），145-146.

[15] Winston S.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 （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137

[16] “Eisenbahntechnisch nicht durchzuführen.” Stone，“Moltke-Conrad，” 219；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 ，102-103.

[17] Norman Stone，“Hungary and the Crisis of July 1914，”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no. 3（1966）：163-164；Stone，“Moltke-Conrad，” 217；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 ，173.

[18]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 ，1：12-13.

[19] Norman Stone，*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 （London：Penguin，1998[1975]），76-77；Norman Stone，“Die *Mobilmachung* der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n Armee 1914，”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 ，1974，70-71.

[20] Graydon Tunstall，“The Habsburg Command Conspiracy：The Austrian Falsification of Historiography on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 27（1996）：192-193.

[21] 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 ，179.

[22] KA，B/3（Dankl）：5/1，Tagebuch（1），Aug. 2，1914.

[23]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 Höb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 （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265；Tunstall，*Planning for War* ，176-177；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 ，135.

[24]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 ，147；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 ，179.

[25] KA，B/1503：6，Aug. 12，1914，Sarajevo，Potiorek to Conrad.

[26] Stone，*Eastern Front* ，77.

[27] SHAT，AAT，EMA，7N 846，Paris，March 3914，“Organisation de l’armée austro-hongroise sur le pied de guerre.”

[28] KA，Neue Feld Akten（NFA）528，9 ID，“Intendanz der k.u.k，9.I-T-D，26 Juli-8 Dez. 1914.”

[29] Stone，*Eastern Front* ，78-79.

[30]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52；Josef Redlich，*Schicksalsjahre Österreichs 1908-19*：*Das politische Tagebuch Josef Redlichs*（Graz：Verlag Böhlau，1953），1：247.

[31] Redlich，*Schicksalsjahre Österreichs*，1：247.

[32] KA，B/1503：6，Sarajevo，Aug. 8，1914，Potiorek to GdI Emil Woinovich.

[33] James M.B. Lyon，"'A Peasant Mob'：The Serbian Army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War，"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1（July 1997）：483-484；Hew 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vol. 1，*To Arm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343；Joseph Schön，*Sabac*！（Reichenberg：Heimatsöhne，1928），12-13.

[34] Lyon，"Peasant Mob，" 501.

[35] KA，B/3（Dankl）：5/1，Tagebuch（1），Aug. 10，1914.

[36] KA，NFA 1372，11. Korps Kdo，Lemberg，Aug. 14，1914，"Abschiebung unverlässlicher Elemente."

[37] 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837，Munich，Aug. 19 and Oct. 8，1914，Vélics to Berchtold.

[38] HHSA，PA I，837，Munich，Oct. 8，1914，Vélics to Berchtold.

[39] Sean McMeekin，*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MA：Belknap Press，2011），22；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43-45.

第六章 格格不入之人

对于蜀中无大将只好要康拉德这个廖化当先锋的奥匈帝国总司令部来说，这场战争看来不会是美好的战争。皇帝已任命弗里德里希（弗里茨尔）大公为哈布斯堡陆军总司令。此职原要留给弗朗茨·斐迪南，但他已死，而新皇储，弗朗茨·斐迪南二十六岁的侄子卡尔大公，在战争爆发时还是个少校，被认为太嫩，不足以承担此重任。脸色红润、蓄着浓髭的五十八岁弗里茨尔，看去有大将之风，且是将门之后（一八九〇年在阿斯珀恩击败拿破仑的更早一位卡尔大公是他的祖父，一八六六年在库斯托扎击败意大利人的阿尔布雷希特大公是他的伯父），但弗里德里希本人是个平庸的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直率但缺乏自信，制不住康拉德的鲁莽蛮干。弗里德里希的带兵作战经验只限于演习，而且在演习里还表现得一塌糊涂，在所有想定情况里都吃败仗。法国人报道在布达佩斯附近举行的夏季演习时论道，"他差劲到被对手绕到后面攻击，致使裁判官不得不出手救他；他辖下的几个军全军覆没"。[1] 奥芬贝格震惊于找弗里德里希担此要职，说："最高指挥官的重任，远非他平庸的能力所能胜任。"[2]

康拉德抓住暗杀事件所提供的机会，开始他已鼓吹多年的战略"提振"过程。他要多达八个军的兵力——鉴于此时已必然要和俄国开战，这一兵力派遣令人费解——攻入塞尔维亚，消灭塞军。七月二十九日，航行于萨瓦河、多瑙河的奥匈帝国浅水重炮舰朝贝尔格莱德开炮暖身，但只带给塞尔维亚人少许损伤，而这主要是因为塞尔维亚中央政府老早就迁到尼什办公，宣布首都为"不设防城市"。[3] 要完成维也纳乐观称之为只是"讨伐行动"的这个任务，需要地面部队，但就在奥地利的第二集

团军下火车，部署于塞尔维亚边境时，康拉德宣布该部队将于不久后移到俄罗斯战线。

爱德华·冯·伯姆-埃尔莫利将军的第二集团军士兵，汗流浃背挤在闷热的火车车厢里（每个车厢塞四十二人或八匹马），前往新驻防地，而弗里德里希大公比他们更早到。康拉德原打算将总司令部设在塞尔维亚战线，但俄国完全在预料之中的动员，使总司令部不得不立即移到加利西亚。于是，侦察过塞尔维亚边界才六天，弗里茨尔就把他的总司令部移到普热梅希尔。《好兵帅克》的主人翁描述了命令改来改去的乱象：“他们总是搞不定要我们进什么洞，上哪个战场。”[4]

“他们”当然指的是奥地利高阶将军，位于加利西亚的弗里茨尔和康拉德，以及位于萨拉热窝的波蒂奥雷克。有第二集团军加入，波蒂奥雷克辖下兵力将达四十万。没有这支大军，他的兵力将只剩二十九万，远不足以击溃塞尔维亚——毕竟塞尔维亚完全动员时有四十万兵力，此外还有四万黑山人和人数不定的游击队员。奥地利已定位的第五、第六集团军，战斗力“弱”，各只辖两个军，而非一般编制的四个军。至八月六日为止，波蒂奥雷克一直相信会有八个军供他指挥。结果，那一天，康拉德通知他，第二集团军的四个军将只供他用于萨瓦河沿线的“当地协同”，且只到八月十八日为止，然后他们就会被调到加利西亚。波蒂奥雷克怒不可遏，在仔细看了真正归他长久统辖的部队之后，他火气更大。又热又累的第五集团军士兵装病，在塞尔维亚边界附近虐待他们所碰到的老百姓，招来司令部的怒斥：“殴打、囚禁无辜奥地利老百姓之事得停止：k.u.k.陆军得赢得敬畏，但得表现出骑士风度，绝不可堕落，干出恶事、没人性的事。”[5]

波蒂奥雷克和康拉德两人似乎把打败对方看得比打败塞尔维亚人来得重要。他们已对立多年，一九〇六年两人争夺参谋总长之职，自那之后彼此猜忌甚深。波蒂奥雷克在贝克的事务部门苦干多年，在贝克追逐

金钱、勋章、女人时，做参谋部的苦差事，满心以为会得到这最高职务作为奖赏，没想到它却落入康拉德手里。[6] 他对这一不公平的安排满怀怨恨，且怨恨从未平息，一九一四年八月，波蒂奥雷克把康拉德决定将第二集团军调到加利西亚一事视为要整他，而非出于战略的调度。波蒂奥雷克认为此举居心叵测，蓄意要让他在巴尔干吃败仗，所以立即向霍夫堡宫疏通（他与霍夫堡宫的博尔弗拉斯将军交情甚好），要求不受康拉德的总司令部节制，在八月二十一日如愿以偿。七十六岁的博尔弗拉斯，一八七八年在波斯尼亚获授勋章，十年后出任皇帝的副官，在军中权力很大。他是皇帝的代理人，因作风温和、以和为贵，人缘很好。[7] 在康拉德、波蒂奥雷克的长期权斗中，他也明显偏袒一方：他对康拉德心怀疑忌，认为重用波蒂奥雷克可有效制衡这位参谋总长。总是选错路的这位霍夫堡宫要人，再一次选错。康拉德有再多缺点，终究是全军最高指挥官。霍夫堡宫不该插手他与其麾下野战将领之间的事，却插了手。波蒂奥雷克获皇帝搭救（至少眼前获搭救）之后，开始研究如何在通讯不良且仅有约二十五万兵力的条件下，在四百多公里的边界线上，完成“讨伐”塞尔维亚的任务。

康拉德与波蒂奥雷克在大部分事情上的看法南辕北辙，在如何对付塞尔维亚上亦然。康拉德设想在八月第二个星期发动迅猛的攻击，由波蒂奥雷克率领第五军越过德里纳河下游扑向瓦列沃，在那里包围、消灭被第二集团军困在贝尔格莱德与马奇瓦（Macva）地区之间的塞尔维亚军，但波蒂奥雷克对这场仗该怎么打，有全然不同的看法。康拉德把第五集团军视为将第二集团军铁砧上的塞尔维亚军击碎的锤子；波蒂奥雷克则把未受过山地战训练，不可能在德里纳河下游取得多大战果的第五集团军，视为堵住塞尔维亚军的铁砧，而由第六集团军将塞军击碎。第六集团军将在维舍格勒（Visegrad）附近越过德里纳河上游，然后插进被第五集团军诱来的塞尔维亚军侧翼。

作战计划之凌乱，叫人直呼不可思议。康拉德要求“强势挺进塞尔

维亚心脏地带”；波蒂奥雷克主张陈兵德里纳河下游，等塞尔维亚人来犯，届时，花上几星期才能横越友善但未被开发的波斯尼亚，并通过位于利姆（Lim）河、德里纳河上游的荒凉山区过来的第六集团军，正可攻击塞军暴露的未设防侧翼。[8] 两个计划都建立在不实的认知和对地形、敌人动静的极度无知上。战前，哈布斯堡军方未把飞机的购置列为要务（买进的飞机数量是德国的五分之一、法国的三分之一、俄国的二分之一），因而缺乏掌握塞军动态的最可靠办法。[9] 康拉德的计划认为，尽管塞尔维亚人（透过俄国情报）知道第二集团军会调离，但这支军队仍会引走大批塞国兵力。波蒂奥雷克的计划认为，尽管位于第五集团军左侧的第二集团军被调走，尽管第六集团军迟迟才会抵达其右侧的山区，但第五集团军不会覆灭。第二集团军大半兵力会在八月十八日开拔前往加利西亚，但第六集团军要等到八月十三日才完成其在萨拉热窝周边的动员，且在八月二十日前到不了德里纳河。霍夫堡宫或许为各集团军司令明定了一个方向，自己却迷失在自己的浪漫幻想里，博尔弗拉斯写信告诉波蒂奥雷克：“我们就要走过暴风雨前的宁静，我仍要高呼：‘更多敌人，更多荣耀！’”[10]

八月十二日，第五集团军开始越过德里纳河。波蒂奥雷克诉苦马奇瓦地区“地形崎岖难行”，且因缺乏架桥设备，使他们更加大叹难行，但他告诉康拉德，他不能只是“静观其变”。第二集团军为他助阵只有不到一星期时间，而在这样的地形里，一星期不够他完成这次任务：林木覆盖，丘陵起伏，还有可让人完全隐身其中的高大玉米田，但这对于塞尔维亚步兵，还有对于塞尔维亚游击队来说，都是绝佳的作战地形。这些游击队在巴尔干战争中就扮演吃重角色，这时则跃跃欲试，想在这场战争中也大显身手。

波蒂奥雷克在整场战争期间都出奇乐观。“办公桌是他偏爱的地形”，有同事如此说六十一岁的波蒂奥雷克，而实情确是如此。坐办公桌出身的他，与副官梅里齐（Merizzi）留在萨拉热窝，未实地去了解德

里纳战线。接掌此任务之前，波蒂奥雷克从未被视为带兵之人。担任贝克副手时，他就以不善与人交际往来而著称。军官同僚注意到他不善骑马，不善与女人打交道。他们称他是女人之敌，而这若非因为他不喜欢女人，就是因为他太爱上班。有人窃窃私语，说他和老友之子、比他年轻二十岁的梅里齐是一对。波蒂奥雷克于一九〇三年挑梅里齐当他的侍从副官，自此两人一直在一起。在阿佩尔看来，他们两人都是与部队格格不入之人，害怕自己麾下的部队，往往窝在办公室里，而不愿去认识他们的部队。诚如阿佩尔在战前所说的，他们在萨拉热窝的行政长官府邸里，打造出完全不关心外面世界的“象牙塔”。所有人都认为波蒂奥雷克自命不凡，以做作和冷淡不语的作风为人所知（非冷淡不语时，只有苦笑和恶意讥讽）。通俗报纸动不动就以夸张搞笑手法将他描写为毛奇作风的完美典型。波蒂奥雷克严肃、不苟言笑，“只要流的是墨水，而非鲜血，波蒂奥雷克就会一直是个战神”。一八九八年，四十五岁时，波蒂奥雷克统领布达佩斯的某个旅，有位下级军官说：“他额头上带有来日将成人中龙凤的印记；他口中所说的，无一不清楚、不真切，任何批评都无法刺穿他话语简省、封闭、孤高的自我。”他生活在“自我构筑的世界里”。这样的人肯定无法胜任在巴尔干半岛统兵打高难度战争的重任，但不知为何，哈布斯堡军方选了他。[11]

波蒂奥雷克认为，以暴制暴，可轻易消灭塞尔维亚游击队。自一八七八年起，奥匈帝国在维持巴尔干半岛治安时就从不吝于采取恐怖手段，在这场战争里，也不会例外。波蒂奥雷克坐镇他舒服的前奥斯曼官邸，鼓励他麾下的军长、师长下手要狠：“对付塞尔维亚游击队的最佳办法，乃是把他们杀光，绝不宽贷；把整支游击队杀光，然后夷平窝藏他们的村子，把此事广为宣传。”[12]

在击溃塞尔维亚正规军上，波蒂奥雷克同样信心满满。尽管没有第二集团军助一臂之力（这时已成定局），但他仍深信能把塞尔维亚大军引来瓦列沃周边攻打第五集团军，然后用姗姗来迟的第六集团军包抄其

右侧予以消灭。他没想过第五集团军要如何来到瓦列沃。它光是要渡过德里纳河就得费很大工夫，行动缓慢的第六集团军无法为其提供侧翼保护，且在穿越德里纳河与塞尔维亚内地之间的丘陵地时，大概会遭遇掘壕固守的塞尔维亚火炮和步兵。



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

波蒂奥雷克以实际工作表现证明了他是出色的参谋官，且除了他的对手康拉德，每个人都这么认定，但他自负且无军事经验。诚如未卜先知的卡尔·克劳斯所说的，“只要流的是墨水，而非鲜血，波蒂奥雷克就会一直是个战神”。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在这同时，塞尔维亚人并非被动等待奥匈帝国来犯。自一九〇八年并吞危机起，他们就积极筹划如何防御此一入侵。塞尔维亚统帅是年轻的摄政王，亚历山大·卡拉格奥尔基耶维奇（Alexander Karageorgevic）王储，但在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ac）的总司令部，真正运筹帷幄者

是陆军参谋长拉多米尔·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将军。他自一九〇三年就主掌塞尔维亚参谋部和陆军部，因慢性阻塞性肺病而不良于行（这场战争里他有许多时候是躺在担架上发号施令），但这位六十七岁的将军却是高明的战略家和受人民爱戴的英雄。

战争爆发时，普特尼克正在奥地利施蒂里亚（Styria）的温泉疗养地巴特格莱兴贝格（Bad Gleichenberg）泡温泉，所幸还是化险为夷安然回到了塞尔维亚。因为七月二十五日在布达佩斯换车时，他病得气喘吁吁，遭到拘留，靠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自认侠义的干预，他才获释。奥芬贝格气得讲不出话："外交关系已经断绝；我们抓到敌军指挥官，一个能干且受崇拜的人物，却把他放了！我们政治、军事的愚蠢，在此又添一明证。"[13] 普特尼克获释之事在布达佩斯谈妥时，他的副官用炸药炸开他在贝尔格莱德办公室的保险箱，取得了唯一一份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作战计划。在这同时，塞尔维亚军方急忙部署军队，为三年内塞国打的第三场战争备战。

奥地利人喜欢嘲笑塞尔维亚"落后"，但塞尔维亚动员却很有效率。塞尔维亚有五个"师管区"，新兵向最近的师管区报到，每个师管区能募集到多达四个师的兵力：一个一级征兵师（二十一至三十一岁男子）、一个二级征兵师（三十二至三十八岁男子）、一个三级征兵师（三十九至四十五岁男子）、一个"最后防御"师（由十八至二十岁和年逾四十五岁男子组成）。塞尔维亚太穷，只有一级征兵师可全面配发制服和现代步枪；第二、三、四级征兵师的兵员穿自己的衣服，大多配发一八七〇年代的单发黑色火药步枪。短时间内连打两场战争，已使每种人力、装备都大量损耗或供给不足：军官、士官、技术兵、火炮、机枪、炮弹、子弹、枪、马、四轮马拉货车、制服、帐篷、炊具。此外，什么时候不挑，就挑在这时从德制七毫米毛瑟步枪转换为俄制七点六二毫米莫辛—纳甘（Mosin-Nagant）步枪，这意味着就连一级征兵师都不会有标准的步枪或子弹。事实上，一九一四年时，塞尔维亚陆军所用步枪的款式、

口径有多种，除了毛瑟枪、莫辛-纳甘步枪，还有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时从土耳其军手中缴获的更老的毛瑟枪，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时从保加利亚人手中缴获的八毫米曼利夏步枪（Männlicher）。奥地利人绕远路取道罗马尼亚，将普特尼克送回国，八月五日普特尼克终于来到位于克拉古耶瓦茨的塞尔维亚总司令部，途中在罗马尼亚时，身患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他又染上肺炎。[14]

普特尼克的副手兹沃因·米西茨（ZivojinMisic），已在主帅不在期间完成塞尔维亚军队的部署。这可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大部分军队得从新近并吞的土属马其顿、科索沃两地北运过来，而这两个地方的铁路由经营不善且腐败的东方铁路会社兴建、维护，铁路状况在欧洲敬陪末座。一九一二年塞尔维亚的火车头和车厢就已不足，一九一四年版图扩大后，更是彻底地捉襟见肘不敷使用，而由于塞尔维亚的煤得从国外进口，且和其他每样物资一样供给不足，铁路运输情况就更为窘迫。塞尔维亚的作战师什么都缺：在每个一级征兵师里，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兵员没有步枪。全军有一半的营没有机枪。军中的骑兵、炮兵、后勤补给队没有马。只有少数士兵拿到制服；其他人只有军帽和军上衣，也只能将就着用。至于靴子，想都别想。事实上，士兵领到的是被称作“Opanci”的鞋子，即巴尔干农民所穿、鞋尖卷翘的无后跟软鞋，少部分为皮革材质，大部分是卡纸板材质。[15]

勉强同意开战的帕西茨总理，看到这没有一点军队样的武装部队，大吃一惊：“没有衣物、鞋子或帐篷。”塞尔维亚军方则没他那么担心。他们若得知英国驻贝尔格莱德武官的如下看法，应会大表同意：那位武官注意到这些穿得破破烂烂的塞尔维亚人“勇敢、能吃苦……在会把一般英国人吓得退避三舍的环境里，几乎不靠任何东西也能过活”。美国公使同样赞佩有加：“给塞尔维亚士兵面包和一颗洋葱，他就心满意足。”[16] 塞尔维亚军方了解这点，自一八七八年维也纳占领波斯尼亚起，塞尔维亚人就以装备较佳的奥地利军队为假想敌排练作战，每年在

德里纳河、萨瓦河、多瑙河战线进行参谋实地战术考察和实兵演习。一九〇八年并吞危机后，塞尔维亚人敲定一明确计划：守住塞尔维亚王国直到更大范围的欧洲情势明朗为止，然后在奥地利将兵力调往其他战线时发兵进攻。[17]

米西茨将军知道俄国的干预使奥地利在塞尔维亚的攻势作战必须速战速决，因此部署了三个集团军来反制奥地利所有可能的攻击。武器短缺使这任务特别难以达成。每个塞尔维亚师照理应有四十八门炮，但一级征兵师鲜少能凑到超过三十门的火炮，二级征兵师幸运的话能弄到十二门，且其中许多火炮是一八八〇年代的过时法国加农炮，没有炮手防护装置或后坐力吸收装置。面对这样的军队，就连波蒂奥雷克的南方面军都变成难对付的劲旅。[18]

普特尼克和米西茨把塞尔维亚三个集团军摆在塞尔维亚北部，沿着从瓦列沃到帕兰卡（Palanka）的单线铁路部署。第二集团军（四个师），由第三集团军的四个师掩护其左翼，被赋予最重的任务：承受奥地利的攻击主力然后反击。如果攻击主力从北边越过萨瓦河而来，第二集团军要击其右翼。如果从西边越过德里纳河而来，则第二集团军要插入其左翼。第三集团军要加入反击，或如果波蒂奥雷克的第六集团军比预期早到的话，要顶住第六集团军。塞尔维亚第一集团军（驻在阿兰杰洛瓦茨的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要充当总预备队，用于抵抗任何进犯的奥军。



波蒂奥雷克于八月十二日开战，或者说试图于此日开战。由于缺乏架桥设备，当利博里乌斯·法兰克（Loborius Frank）将军的第五集团军分成数股兵力缓慢抵达宽阔、湍急的德里纳河时，不得不停下脚步。时

值盛夏，天气热得让人昏昏沉沉。大部分士兵是后备军人，口渴，带着超过身体负荷的二十七公斤装备，其中许多东西（刷子、鞋油、歌本）是累赘。这个地区不利于战术开展：多湿地，靠塞尔维亚那一侧河岸高耸，森林、灌木林、玉米田密集。奥匈帝国第三十六师某旅派半数的营搭小船渡过德里纳河，以建立还堪用的桥头堡，但每艘小船都遭到河岸上塞尔维亚正规军与游击队员开火痛击，死伤惨重。但仍有几个奥地利连渡到东岸，甚至部署了一支团属军乐队。在塞尔维亚的火炮和机枪从附近树林和一直绵延到水边的玉米田开火，猛轰奥匈帝国部队时，这支乐队演奏《欧根亲王进行曲》以提振士气。[19]

照计划奥匈帝国第二集团军应在萨瓦河边的沙巴茨（Sabac）建立自己的桥头堡，以引走大量塞国兵力，却发现匆促动员，忘了带架桥设备。法兰克的第五集团军因此在两翼皆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开始在兹沃尔尼克（Zvornik）与比耶利纳（Bijeljina）之间渡过德里纳河，而此处河面宽阔，有些地方水深五点四米。在塞尔维亚轻度抵抗下，阿瑟·吉斯尔将军的第八军，需要整整两天的时间来架好浮桥并渡河。空中的飞行员和地面的军官描述了奥地利这一边十足混乱的情况。从河对岸飞过来的每一颗塞尔维亚流弹，都在未经战火洗礼的奥地利部队里引起恐慌，士兵不知敌人在何方就猛开火还击，“马儿挣脱，在营地上四处乱跑”。桥终于开通时，没有经验的奥匈帝国士兵同时一拥而上，桥一时堵得无法通行。[20] 保罗·尤里西奇·斯图姆（Paul Jurisic-Sturm）将军的塞尔维亚第三集团军看出敌人的弱点，悄悄移到更接近德里纳河诸渡河点处，部署火炮。

八月十二日，奥地利第二集团军把第二十九师的部分兵力送到萨瓦河对岸的米特罗维察（Mitrovica），隔日又有其他部队越过在克莱纳克（Klenak）仓促搭成的一座浮桥。维也纳一时欣喜若狂，报童大喊“沙巴茨大捷”，奥地利人争相抢购晚报以了解此捷报。[21] 但就在第八军仍在忙于架桥渡过德里纳河时，阿道夫·冯·雷门（Adolf von Rhemen）的

十三军，在只有少许吉斯尔部的兵力掩护其侧翼下，八月十四发兵进攻。官兵立即发觉他们的“蓝灰色”（hechtgrau）伪装服，但其伪装效果不是很好。蓝灰色军服不如德国人穿的绿灰色军服合用，原系奥地利于一九〇八年针对密布大石的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环境所购置，但在该区以外的任何环境里都太亮，在葱绿的马奇瓦地区，就成为显眼的靶子。[22]

奥地利第七十二旅旅长海因里希·豪斯坦因（Heinrich Haustein）将军指出，他的部队“立即被塞尔维亚的步枪火力和敌人十二厘米炮弹摧枯拉朽的威力打得士气涣散”。塞尔维亚人有大量新旧火炮，包括五十四门十二厘米施奈德急射榴弹炮，而豪斯坦因部在这里似乎就受到其中一个榴弹炮连猛轰。饱受惊吓的豪因斯坦旅原应奉命清除从列斯尼察（Ljesnica）往东那条公路沿线的敌人，却畏缩不前。豪斯坦因写道：“由于我部士兵疲惫不堪，不得不让他们休息。”豪因斯坦旅在夏日的高温下坐着喘气，看着他们周边的友军部队快速赶上来，越过他们。傍晚时他们终于开拔，在往筑有防御工事的多布里奇（Dobric）村挺进时，赫然发现没有子弹。他们的弹药车已经不见踪影。[23]

与第七十二旅并肩开进前线的第七十一旅有弹药，但面对普莱茨（Plec）周边数座三百米高的高地，前进不了；奥匈帝国士兵奋力冲向进攻目标，却遭塞尔维亚壕沟机枪的纵射火力和前后左右的炮火击倒。塞尔维亚人甚至想在马车路沿线的树上吊手榴弹，待奥军经过时，开枪将其引爆。有位奥地利军官忆道，“很不舒服”，“我的兵很快就信心全失”。[24] 另一位奥地利军官指出，他的兵“还没与敌交手，就被听来的塞尔维亚游击队、挨饿、口渴、疲累、睡眠不足、陌生战斗声响的故事吓得没了斗志”。第十六团宣告“遭消灭，只见到乌合之众逃离那座小山”。[25] 第七十二旅被从天而降的重炮弹、嗒嗒响的机枪声和咻咻急射的步枪弹吓住，而由于奥军感受到敌军火力猛烈，却只看到空无一物的山坡，不见人影和武器，士气更是降到谷底。“敌人躲进壕沟，掩蔽得

非常好，我们连看都看不到他们，”豪因斯坦报告道。[26]

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四十二师在兹沃尔尼克渡过德里纳河，奉命攻上位于克鲁帕尼（Krupanj）的高地，以利于和位于其右侧的第六集团军接合，并掩护在泰克里斯（Tekeris）的采尔山（Cer Planian）上与敌交手的第八军右翼。鉴于来犯之师武器精良，塞尔维亚部队（来自德里纳区的一级征兵部队）最初避攖其锋，退回到扎夫拉卡（Zavlaka）。但在审问过俘虏的匈牙利地方防卫军士兵后，他们了解对手是支不堪一击的部队。“我们抓到五个人，三名匈牙利人与两名克罗地亚人；他们自称来自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三十二团。关于第三十二团的战斗力，有个匈牙利俘虏说他们士气低落，因为士兵是来自布达佩斯的城里年轻人，只有农民能打。得靠军官拿手枪在后面逼，士兵才肯上场杀敌。他们的军官把所有时间花在威吓自己的兵，而非花在打我们的部队上。”这支匈牙利团来自奥西耶克（Osijek），而光是从该地行军二十公里路去火车站，以便搭火车前往塞尔维亚，该团就有三分之一人倒于热衰竭。[27]

在第四十二师左侧，第八军装备较佳的第九师也于八月十四日渡河投入战斗。吉斯尔将军原希望洗刷他识人不明提携雷德尔上校的耻辱，如今看出那是奢望。他概括说明了他们的困境：“不停地打仗，没水，烤人的高温，极度疲累。”[28] 吉斯尔部第九师辖下的数个旅立即遭到塞尔维亚游击队与正规军夜以继日的攻击。没打过现代战争的奥地利部队，夜间移动时，手持铁路提灯，货车上挂上铁路提灯，以照亮前路，然后当塞尔维亚人开始朝亮晃晃的目标开枪时，他们显露吃惊神色。后来奥地利人发现，塞尔维亚人在数公里外就得知他们来犯，因为他们太吵——士兵与汽车司机高声呼喊对方，未系牢的装备一路哐啷哐啷响。

第五集团军第九师在与塞尔维亚人交手时，士兵不看目标胡乱开枪。长官不得不下令取走战死者和伤者身上所有弹药，因为还活着的人

滥射一通，把子弹打光，且通常什么都没打中。就连用过的弹壳都从地上扫起，运回奥地利再利用。[29] 军官发出的报告痛斥朝四面八方胡乱开枪，痛斥士兵喜欢没看到目标，朝空中开枪。但除非能听到自己士兵连续开枪，不然不管是人仍在萨拉热窝办公室的波蒂奥雷克，还是他的军长、师长，有许多时候都不清楚自己的部队在哪里。如果军官人在电报联络网外（通常如此），往往就不报告位置，这惹来吉斯尔将军一阵怒斥："如果没有电报可联络，派人传个口信，总之要联络上！绝不要让最高指挥部整天在找部队在哪里！"但就连传信的人都会在德里纳河对岸的荒野里迷路。有位传令官八月十五日在科济亚克（Kozjak）写道："我带着参谋部的马在这里，但这里的电报不通，我收不到命令。四周都是炮火。请指示该如何。"[30]

那天，八月十五日，康拉德在维也纳见了保加利亚武官，告诉他"奥匈帝国把兵力全投入塞尔维亚，控制所有关键高地"，但实情并不这么叫人振奋。[31] 现代战争倚赖众多火器和庞大后勤，这的确拖慢行军速度，拿破仑部队一天最多可走二十二公里，到了一八七〇年，老毛奇的部队一天只走约十三或十四公里，但波蒂奥雷克的部队几乎完全不动。列斯尼察到洛兹尼察这段河岸沿线的这些苦战，预示康拉德、波蒂奥雷克的强攻办法不管用。有位军官指出，人数大大劣于我们的"塞尔维亚小部队的顽抗，使我们认识到瓦列沃远非只是五日行军的距离那么近"。[32] 简而言之，包围者很快就沦为被包围。

但波蒂奥雷克仍认为他占上风。他未正视前线令人泄气的事实，反倒理所当然地认为普特尼克会撤退，会把他的部队分为数股纯守势的兵力，以保卫塞尔维亚诸主要城镇。结果，这位塞尔维亚指挥官反倒深入研究了波蒂奥雷克所犯的错误，开始下出几步经过精心计划的险棋。[33] 在沙巴茨，宽阔的萨瓦河构成的天然屏障，使康拉德所批准施行的小活动不可能得手，如果是这样的话，该地的战况也就没什么好担心，普特尼克因此得以把九个师全摆在沙巴茨与瓦列沃之间，用这支大军的

主力对付德里纳河边的第五集团军。若第二集团军仍留在萨瓦河左岸，未渡河投入右岸的战斗，使普特尼克确信该部欲前往加利西亚。[34] 对普特尼克来说，这是发动塞尔维亚长期抗战计划下一阶段的信号——在来犯奥军减少兵力或重新部署后展开反击。这时普特尼克把沙巴茨的战事（挡住第二集团军残部）、克鲁帕尼的战事（抵御第六集团军），与采尔山的战事（尽可能消灭孤立的第五集团军兵力）摆在一起全盘思考。

普特尼克的直觉使他在面对奥地利第五集团军时享有一很大优势。普特尼克把沙巴茨—泰克里斯—克鲁帕尼视为单一场域，把三个战场合为一场"采尔山争夺战"，要他的部队强行军赶到那个险恶的丘陵地。[35] 于是，八月十六日，在奥军第九师往内地推进时，赫然发现有大批塞尔维亚步兵、炮兵守在采尔山上泰克里斯周边的壕沟里。塞军第九师里有许多未受过训练的后备军人，他们从未学过以稀疏的小规模战斗队形用步枪与敌厮杀，于是奥匈军官把士兵编成数个冲锋纵队，要他们攻上有机枪和榴霰弹等着他们的陡坡。不幸的是，奥匈部队也未受过挖战壕的训练（奥匈军官认为掘壕固守是懦夫的行径）。大部分奥匈步兵在行军途中就把挖壕器材丢掉，这时只能用双手挖出浅浅的散兵壕。[36]

但波蒂奥雷克仍向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报告他的部队正往前推进——大概是因为这位南方面军司令官留在萨拉热窝，对着地图追踪战况。战前法国人就认为波蒂奥雷克是纸上谈兵的将军，是"很有学问、窝在办公室的理论家"，而他的表现正证明法国人所言甚是。波蒂奥雷克从其府邸自信满满地写道："我们已击退德里纳河下游列斯尼察一地的塞尔维亚人；他们正溃退。战俘告诉我们他们会在瓦列沃做最后抵抗。"[37] 在这同时，普特尼克已确认哈布斯堡第二集团军的确要前往加利西亚，理解到奥地利第五集团军在无友军支持下渡过德里纳河往瓦列沃挺进，乃是奥匈帝国的主要攻势。他把他的三个集团军往前调，使三者呈梯形配置。[38] 第一集团军在右，能视情势需要往萨瓦河或德里纳

河进击。第二集团军在中，能集结其所有兵力对付在列斯尼察、洛兹尼察周边的法兰克第五集团军。第三集团军陈兵于克鲁帕尼周边，以打击法兰克部的侧翼，同时留意第六集团军的动向。

塞尔维亚上校和将领比奥地利的同级军官年轻十二至十五岁，且都在晚近战争中取得过实战经验。[39] 他们强力挺进，一心想与敌交手，察觉到对手虽然（就巴尔干当地标准来看）装备精良却不会打仗。塞国三个集团军能抽出部分兵力，击退在这弧状地带上奥地利人的任何攻势。[40] 普特尼克在马奇瓦地区原本无法有大作为，因为奥军渡过萨瓦河、德里纳河后，即有两河保护其侧翼，使普特尼克难以溜到第五或第二集团军身后。但这位塞尔维亚参谋总长认为采尔山是成败关键，它由一连数座六百米高的小山组成，俯临位于列斯尼察、洛兹尼察的德里纳河过河处，奥军必得拿下这些高地才能往东推进，保护其补给线和侧翼。

斯捷潘·斯捷潘诺维茨（Stepan Stepanovic）将军的第二集团军，派两个师日夜兼程，赶在奥军能大举抵达之前，先来到位于山顶的泰克里斯村，在八月十六日奥地利地方防卫军第二十一师费力往上爬，欲登上采尔山、拿下泰克里斯时，将其消灭。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因为有些塞尔维亚团还在等从俄国运来但一再遭延期的军火，辖下步枪不足两千支，兵员人数却是步枪数的两倍。[41] 但那不碍事：因为这次出征让奥地利地方防卫军第二十一师（大多是招募自波希米亚的捷克人）犹如掉入炼狱，苦不堪言。他们从布拉格坐了五天火车，八月十四日渡过德里纳河，同一天和隔天顶着烈日，背着满满的背包，没有饮用水，往采尔山顶挺进。那一夜他们没有休息，朝着自己部队的巡逻兵和漆黑中从高大玉米田里放冷枪的塞尔维亚人开了枪。十六日早上十一点，在位于海拔四百五十米处，他们终于遭遇塞尔维亚人。军官拉着他们成群往上冲，他们周遭的德意志族同袍高喊“Hoch das Sieg！Hoch Seine Majestät Kaiser Franz Joseph！”但捷克兵斗志低落，假装受伤，大批倒地。[42]

当地方防卫军第二十一师被困在山坡上时，塞尔维亚人日夜不停反击，切断他们与第九师的联系，击毙他们的军官，最后该师两个群龙无首、与友军联系不上的旅瓦解，往德里纳河溃退。幸存者忆道，塞尔维亚人以夜色为掩护大举涌入，用德语高喊“别开枪，我们是克罗地亚步兵！”，然后拿起毛瑟枪开火。每次法兰克将军接近前线检视他的部队，都注意到在弹药车和野战炊事车周边挤满了想搭便车到后方的奥地利兵；每次有奥地利兵被敌人枪炮打伤，就有十余名未受伤的同袍自告奋勇要护送他到后方。难得抓到塞尔维亚人时，也总会引来一群人将他押回司令部。“铁的纪律！”法兰克吼道，“有太多人浑水摸鱼、装病！”[43]

法国报纸《费加罗报》在巴黎嘲笑道，“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陛下的军队丢人现眼”。[44] 有位奥地利将领对此毫不觉得意外。他写道，塞尔维亚兵是吃苦耐劳的农民；奥匈帝国兵是“工厂工人、工匠、办事员，习惯于喝啤酒、舒服天气、有屋顶遮风避雨的惬意生活”。而在塞尔维亚，这些东西全没有，所以他们根本不想打仗。[45]

在萨拉热窝，波蒂奥雷克似乎浑然没有觉察到德里纳河边这场惨败。他正把心力放在揪出暗杀事件的其他阴谋者上，八月十六日得意地发电报告诉财政部长毕林斯基，说有位目击者“指控另外三人是大公遇害事件的阴谋者，他们分别是贝尔格莱德神学家、波斯尼亚律师、来自巴尼亚卢卡（Banja Luka）的侍者”。[46] 波蒂奥雷克在萨拉热窝提出自己的调查结果时，采尔山争夺战正演变为某种军事法庭，因为虽有某些奥地利人奋勇作战，但大部分奥地利人想方设法逃亡。当第九师某旅奉命出击以为友旅争取喘息空间时，只有一个营照办，该营立即遭火炮和机枪消灭。指挥这场大乱仗的将领，把这场惨败也归咎于“误解”，指出在这一战线上，每一次的战败，都必有个孤立被弃的奥匈帝国部队被组织更完善的塞尔维亚军队包围，陷入其交叉火网里。[47]

奥匈帝国第九师未能好好打场仗就垮掉。渡德里纳河就把士兵搞得

筋疲力尽，先是在炙人的烈日下，然后碰上下了一两天的大雨；他们被困在河岸整整三天，穿着湿透的外套露宿野外，咒骂他们的军官和补给太差。终于在采尔山上与敌交手，却被塞尔维亚火力杀得几乎全军覆没。八月十八日，他们在“如榛果般大的雹块”的空袭下撤退，士兵趴在辎重车底下爬行，以躲避雹块和塞尔维亚炮弹。在军需官奉命烧掉他们带到河对岸塞尔维亚境内的所有物资时，士气才有稍许提振。[48] 战地报告提及多不胜数的奥匈帝国兵装病的事，特别是在伤兵拿“吓人的敌人情事”吓坏未受伤者之后。法兰克将军被某同僚称作“年老糊涂的迂腐之人”，不管有没有友军掩护其侧翼，他都不是最适任的指挥官。他下令官兵交换“英勇故事，不准谈这些可怕的事”。他愤愤地说道，如果再有士兵继续谈可怕的事，会以“懦弱罪”当场处死。[49]

难得抓到的塞尔维亚战俘，给了奥地利人一线希望。有位奥匈帝国军官在讯问过某战俘后推断：“塞尔维亚人筋疲力尽，补给糟糕；军官行事使他们更为慌乱；他们每个营只有一挺机枪。”但在这条战线上的普特尼克部队，至少有一半士兵打过巴尔干战争，且尽管火炮不足，炮弹也开始短缺，但他们坚守阵地，耐心击溃来犯奥军。[50] 命丧塞尔维亚剽悍军队之手者，是奥地利地方防卫军第二十一师师长阿瑟·普日博尔斯基（Przyborski）将军，他绝对称不上身经百战、敢打能打。他的同僚称他是“环城大道将军”——娶了陆军部长舍奈赫的女儿且是坐办公室而非带兵出身的军职官员（译按：环城大道是维也纳气派堂皇的大道，陆军部大楼就位于这条大道上）。面对这场混乱且瞬息万变的战斗，普日博尔斯基从未能跟上脚步。[51]

在亚达尔河（Jadar）和采尔山遭击退后，第五集团军军心动摇。饿坏的奥地利士兵在德里纳河沿岸四处搜寻可吃的东西，他们把还未熟的玉米、瓜吃进肚里。也没什么水可喝；井似乎下了毒，水呈绿色带酸味，喝下两三天后就出现霍乱症状。“我们遥远的（补给）火车，连个影子都没有，”有位军官嘲笑道。[52] 奥地利的补给业务，有许多被转包

给民间业者，而这时法兰克命令麾下军官，“毙掉他们的马，毁掉他们的四轮马拉货车，当场杀掉他们的马车夫”，如果他们不更卖力工作，不表现得更勇敢的话。在这同时，奥地利士兵将只得挨饿，而（吃饱喝足）的师长则向他们训话道，“绝不能以补给品没送来为理由，吃掉你们的战地口粮……战时补给不可能时时都令人满意”。[53]

八月十六日，波蒂奥雷克一副从他的战场冲出来的姿态，请求第二集团军给予更多支持，但康拉德修改了这一请求：他下令，“在不延宕你（第二集团军）开赴（加利西亚）的情况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54]于是，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九师八月十六日于沙巴茨处渡过萨瓦河，与塞尔维亚某师打了煞有其事的一仗，然后于下午撤退。波蒂奥雷克火冒三丈，痛骂康拉德把第二集团军的诸部队“像水滴般”损耗掉，未派他们大举同时进攻。如果波蒂奥雷克真的人在前线，而不是待在他萨拉热窝的办公室（这时他正在那里力促调查三十名塞尔维亚少年），大概会注意到不管是分批次小兵力进攻，还是大兵力大举进攻，奥地利的进攻都不可能得手。[55]

在这次入侵行动的初期，奥匈帝国军队一直未能适应现代火力。德国步兵连已在运用稀疏队形战术（一个排摆出宽间距的小规模战斗队形带头进攻，后面两个排也摆出稀疏队形，呈梯形配置），奥匈帝国连则要众多士兵紧挨在一块，成为敌人活靶一般，一径往前猛冲。“不管是兵还是官，都不知道如何协同进攻，”阿尔弗雷德·克劳斯将军接掌第二十九师后在其日记里如此写道，“不管碰到什么情况，他们都只是上刺刀乱无章法的冲锋；塞尔维亚人看出这点，诱引我们做这些进攻，然后开火把我们撂倒。”在第五、第二集团军间的兵力缺口统率一骑马步兵团的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Felix Schwarzenberg）上校，无意中听到步兵军官“以无比轻蔑的口吻”告诉其部属，“别担心，塞尔维亚人掘壕固守，但我们架上刺刀冲进去时，壕沟救不了他们”。施瓦岑贝格还注意到奥地利野战炮兵爱在开阔地作战，但未考虑到在开阔地自己易被有壕

沟防护的塞尔维亚火炮轰碎，且爱朝塞尔维亚壕沟猛射伤不了对方的榴霰炮，因为手边没有可将他们消灭殆尽的高爆炮弹。炮弹比榴霰弹贵，于是，展现奥匈帝国独有的作风，干脆不买。这是支在打它的上一场战争（一八六六年），而非最后一战（一九一三年）的军队。已然没有斗志的施瓦岑贝格亲王在信中告诉妻子，“为奥地利祷告”。[56]

第二集团军已排定于八月十八日移往加利西亚，于是康拉德只同意暂时借调卡尔·特尔斯蒂扬斯基（Karl Tersztyánszky）的第四军，希望这会有助于击退萨瓦河边的塞尔维亚人，消除德里纳河边第五军所受的压迫。特尔斯蒂扬斯基决意于八月十九日进攻塞尔维亚第二集团军在沙巴茨的兵力。他计划以旗下两个师夺取有一万四千人和重要火车站、河船码头的沙巴茨，然后循着三条平行的公路往南挺进。这一南进行动至关紧要，如果失败，普特尼克将能放心大胆将其全部兵力转向法兰克的第五集团军，将其团团包围。但情况看来不妙：奥地利军方对塞尔维亚军的动向掌握甚少，除了“将沙巴茨桥头堡往南推”，别无明确计划。[57]司令部认为沙巴茨周边的地形类似意大利，有高大玉米田、围栏、树篱、浓密小树林，使他们无法总揽全局，易遭偷袭。

奥地利人轻松拿下沙巴茨，但在往南的公路上推进极为不顺。第九十二团某奥地利下士忆起在湿热的夏季从沙巴茨出征的情形：“玉米长得很高，能把骑在马上的人都完全隐没；事事都变得不顺；我们觉得已有几天没睡；口渴至极；脸上汗流如柱；我们用泥污的手擦汗，然后舔手，以补充水分。”第九十二团编成纵队行军，纵队宽，道路狭小，两侧的士兵不得不走在田里；他们得穿过林立的玉米秆、葡萄藤、土块、波浪般的小麦、南瓜田，自行开路；会有一排又一排的士兵被障碍物绊倒，一趟行军后有一半的人脚底起水泡。各报告主要谈到热、渴、累，以及几乎每一页都出现的“无情的太阳”。[58]

奥地利一旦受到藏身于玉米田和树林里的塞尔维亚部队骚扰，就用

他们一贯的作风猛开枪还击，很快就把子弹打光。塞尔维亚人精于挑起混乱，“他们把帽子、背包放在地上引我们开火，然后迅速转移到新阵地，”有位奥匈帝国军官苦恼报告道。塞尔维亚人把玉米当第五元素来用，排成宽正面的横向战斗队形隐身于玉米田中，又快又准地朝群集的奥地利部队开火。以匈牙利兵为主体的第三十一师，朝背包、帽子等欺敌东西打完子弹之后，步履蹒跚地朝叶夫雷莫瓦茨（Jevremovac）走去，只剩刺刀可防身；然后遭自己炮兵攻击侧翼。遭友军炮火猛轰时，他们也受到塞尔维亚步兵攻击，但未还击，因为子弹已用完，且因为塞尔维亚人离他们侧翼那么近，他们以为是友军。由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组成的一支奥地利团，裂解为惊恐的两股，全部沿着公路北逃沙巴茨。约瑟夫大公所辖师的其他部队跟着北窜，敌军、友军炮弹在他们身边炸开，他们惊慌失措地往部队后方跑，使这个师如同缴械。第三波斯尼亚团欲将塞尔维亚人赶出俯临他们所要行经之道路的树林时，先是主帅遭击毙，然后全团遭歼灭。上校团长、其副官、一名营长丧命于一阵榴霰弹的攻击，然后两名连长、十五名中尉、三百三十二名士兵也丧命。[59]

有个奥地利连被困住，子弹打光；军官也全丧命，于是幸存的士官高呼预备队上前。预备队是支新兵连，以横向小规模战斗队形俯卧于他们后面。但预备队不肯上前。“我们气呼呼向他们高喊‘胆小鬼，过来！’”有位幸存士官忆道，“但他们连把脸抬离地面都不愿意。”先头连撤退，走过后面这些趴在地上吓得半死的人身旁时，赫然发现他们不是吓得半死，而是已经死掉，已在以整齐一列队形前进时被一挺塞尔维亚机枪全部撂倒。[60]

有位少校参谋奉约瑟夫大公之命前去沙巴茨查明奥匈帝国第三十一师溃退的原因，发现“匈牙利第四十四团部分士兵在教堂广场上累到瘫，这个团已形同在慌乱中瓦解”。他们失去三十名军官，四百八十七人受伤，还有数目不详的死者；军医估计这些死伤有四分之三是自己人

所致——后卫部队在慌乱中误朝前方部队开枪。高声下达的命令、号角信号、旗帜挥舞，都未能遏止溃退，逃进沙巴茨的匈牙利人喊“塞尔维亚人要来了！”其实还没有。那天晚上，普特尼克将军从法国参谋部处得知，奥匈第二集团军确定要开赴加利西亚。法国人建议，“现在进攻，他们的部队大部分要离开”。法国人在马恩河边遭德军重击，急欲解除这一压力，于是向塞尔维亚人保证，只要塞尔维亚愿意进攻，他们会免费提供炮弹。[61]

安德烈亚斯·格里斯勒（Andreas Griessler）将军的三十二师渡过萨瓦河，进抵第三十一师左侧，下场更惨。这个师往南行，目的地武科西茨（Vukisic），但被途中穿过的树林和玉米田打乱行军队形，使自家炮兵看不到他们，侧翼和后卫因此遭到自己炮兵猛轰，整个师不得不后撤，以避开自己火炮的攻击。“我们绝不可再朝自己的步兵开火，要朝他们的步兵开火，”法兰克劝道。[62] 塞尔维亚炮弹也又狠又准地落在他们身上，因为塞尔维亚农民在道路两旁点燃干草堆，标示奥军动向。[63] 到处都有人死伤，士兵激动地朝四面八方开火。有牛或小孩误闯入高大的玉米田，发出窸窣响声，奥地利部队就对着发声处举枪齐射。这些兵大部分是未受过训练的后备军人，两天两夜已走了将近六十公里，就快垮掉。

在第三十二师军官试图熄灭燃烧的干草堆，安抚慌乱的部队，要求增援兵力和弹药以填补早上的损耗时，又花费了数小时。他们丢了八门火炮和二十辆弹药车。后来，惊愕的哈布斯堡稽查员列出此师某一团所丢弃的装备总数：八百八十六个背包、一千两百顶帐篷、四百个子弹盒、九十支铲子、两百八十个干粮袋、四百件外套、一千两百五十双鞋子、四十个钢丝钳。[64] 数个野战医院，连同仍躺在野战医院床上的伤兵，整个给弃之不顾，丢给进逼的塞尔维亚人。[65] 军司令部连番下令继续进攻，格里斯勒将军于是上马，走过一群群掉队的士兵和一堆堆弃置的装备来到耶莱尼察（Jelenica），然后报告仍无法进攻：士兵无视

军官命令，继续撤退；有许多部队已解体、混在一块，无法重新整编；而且士兵自天亮起一直未进食。这个师由匈牙利人、德意志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四个民族组成一事，也不利于它重启攻势——民族组成的混杂，使士兵连最简单的命令都往往搞不清楚。但军司令部继续要求进攻，最后，在晚上七点半时，格里斯勒报告，部队已得到相当的重整，足以发动进攻。但由于天色渐黑，格里斯勒下令部队扎营，搁下进攻之事。他们排成纵队走向采罗瓦茨（Cerovac）时，塞尔维亚人躲在漆黑的夜色里，模仿动物叫声嘲弄他们：狗吠、母鸡叫、猫头鹰叫。[66]

后来，特尔斯蒂扬斯基把他的挫败归咎于把他已走离沙巴茨的部队过早叫回的波蒂奥雷克，而非把他的部队摧毁殆尽的那个来自舒马迪亚（Sumadija）的一级征兵师："我们已从沙巴茨往内地走了十公里，忽然奉命退回北岸。"但战前被视为前途大好的特尔斯蒂扬斯基，乃是拿溃败已成定局之时的情势，断章取义做文章。因为不管波蒂奥雷克对他下了什么指令，面对塞尔维亚人如此激烈地反抗，八九不离十都无法扭转败象。[67]

在沙巴茨，奥匈军队所做的，除了暴行，还是暴行。"我们真的得对沙巴茨和其附近的居民施以严厉的镇压，"特尔斯蒂扬斯基轻蔑表示，"他们朝井水下毒，在我们背后放冷枪，我甚至听说有个十二岁女孩朝我们丢了一颗手榴弹。"统领第三十一师的约瑟夫大公坦承，他底下的某个匈牙利团，在塞尔维亚游击队朝他们侧翼开枪后，集拢某村所有村民全部杀掉。[68] 奥匈帝国部队不抢劫时，就睡觉："这些事把他们累惨了，因而一有机会就睡觉，即使只是短得不能再短的停留。他们听话，但已失去斗志。"[69] 谁能怪他们？第二集团军凌乱撤退到萨瓦河对岸，使第五集团军只能任由波蒂奥雷克异想天开地摆弄。由于第二集团军大部分兵力往东转移到俄国，这时波蒂奥雷克认为法兰克那支精疲力竭、千疮百孔的军队（最初被设想为铁砧的一支军队），从此可以扮演

锤的角色，往东南出击，把被第六集团军的铁砧顶住的塞尔维亚军砸碎。

八月十八日，皇帝诞辰那天，波蒂奥雷克的第六集团军终于快完成其在德里纳河上游沿线拿捏不定的部署。波蒂奥雷克原希望在这一天献上征服塞尔维亚为皇帝祝寿，不料奥匈帝国的塞尔维亚战役这时几乎已注定要以失败收场。波蒂奥雷克计划派第五、第六集团军大举攻向流经贝尔格莱德与瓦列沃之间的科卢巴拉河，但就在他如此规划这场战役的下一阶段时，前线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普特尼克已于八月十九日集结五个师的兵力，在第五集团军的两个军之间打开一个十公里宽的缺口。奥匈帝国部队接到反击命令，却抗命。法兰克部的士兵正渡过德里纳河回对岸，无视波蒂奥雷克以电报下达“不计代价坚守”的命令。[70]

在这同时，从军事角度看，第四军拱手让出了沙巴茨。从书面报告看，特尔斯蒂扬斯基将军守住了阵地，他（从开往加利西亚的舒服特等车厢里）坚称他的几个师真的在萨瓦河畔得胜：“我从不觉得我们落败……但我的士兵可能不了解这点，因此我要人简略写下这场仗的经过，好让军官拿给士兵看。”[71] 但波蒂奥雷克可不是傻瓜；他知道塞尔维亚人已拿下协约国在这场战争中第一个无可置疑的胜利。“这欢喜的日子已变成哀痛的日子，”他在日记里写道。他写信告诉法兰克，“不计代价打到底；援军已在路上！”[72] 但没有援军要来：北边的部队要开赴俄国，南边的部队正在高山上跌跌撞撞的前进，他们不知道这里的情势，因为波蒂奥雷克从未告诉他们。第六集团军某上校写道，“我们对整个情势几乎一无所知，真的知道情况时，乃是非常无意中得知，是在本要下给别人的命令误送到我们手上时得知”。[73]

波蒂奥雷克的才干根本担不起南征大任。他调度兵力进攻时太拖沓笨拙，使塞尔维亚人得以在与奥地利人冲突时每次都取得优势。塞尔维亚人也靠奥匈帝国军队丢弃的装备壮大实力，有位哈布斯堡军官注意到

塞尔维亚某师官兵全穿着奥地利的蓝灰色外套。奥地利人每次的倒退，似乎都使塞尔维亚更为强大。[74]

波蒂奥雷克这时以为，他仍能借由将他尚未溅血的第六集团军投入战斗而转败为胜。在波斯尼亚境内，第六集团军纵队误把众多波斯尼亚宪兵当成塞尔维亚游击队而对之开火，造成几场难堪的意外，然后全军终于缓缓进抵维舍格勒处的德里纳河边。[75] 在这个多山的战线上，人人都很清楚第六集团军绝对赶不上第五集团军，或绝对无法深入塞尔维亚。山地旅带着驮负大型柳条篮的骡子缓缓前进，篮子里装满弹药。他们一路拔除筑有防御工事的塞尔维亚前哨基地，前进缓慢且艰难。"我们对这里的敌人动静所知不多，"第四山地旅从利姆河边的奇格拉（Cigla）报告道，"我们于八月二十二日拿下一道壕沟，但那后面还有一道"。每一步前进，即使没遭遇抵抗，都要花上很长时间。军官指出，不受制约的士兵"连（碰到）微不足道的障碍物"都会停下来，休息良久。夜里士兵几乎不睡，因为"枪声不断；士兵觉得每颗石头后面都躲着敌人，整夜紧张兮兮地开火，使每个人无法好好休息，浪费弹药"。[76]

第六集团军的左翼部队在维舍格勒渡过德里纳河，展开被乐观称之为"全面东进"的行动，却立即被困在旷日废时的山地战里。普特尼克寄望靠山地战拖慢波蒂奥雷克的前进速度，使其得以消灭法兰克部。第七山地旅通过维舍格勒，然后八月二十日整日都花在突破附近某山上的塞尔维亚阵地上。奥地利人死伤陡增，担架兵抬不胜抬，干脆在岩石、树木之间施予急救。在奥地利部队往山头推进时——军官洋洋自得于尽管敌方守军火力猛烈，但他们仍发动一波又一波的冲锋——越来越多奥地利步兵遭后方的同袍开枪射中而倒下。塞尔维亚火炮、机枪、枪榴弹使奥地利步兵惊恐万分，因而往山上胡乱开枪，打死自己人。

也有多得让人惊愕的奥匈部队军官，在试图驱赶士兵前进时中枪。

军官被教导要身先士卒，要抬头挺胸指挥射击、观察射击效果，因而很容易就成为塞尔维亚神枪手（或己方惊慌失措士兵）的枪下亡魂。拂晓时开打的战斗，直到薄暮时分塞尔维亚人撤到下一道防线才结束，奥地利人清点死伤：二十三人死，一百二十八人伤，二十六人失踪。军官死伤特别严重。[77] 照原先计划，第六集团军应走弧线往北和第五集团军会合，在瓦列沃完成对塞尔维亚军的大包围，但情势看来这样的会合已是奢望。第六集团军以和第五集团军以同样的方式发泄失利的怨气，他们烧掉塞尔维亚人的小屋，洗劫，偷牲畜，把农田作物拔光，枪毙人质以吓唬当地居民。有位奥地利将军气急败坏地告诫其部队，“这不是文明军队所应为”，但没人听进去。事实表明，波蒂奥雷克的一流作战计划，落实到巴尔干半岛上完全不管用。

在主战前线，第五集团军的第八军已撤回德里纳河对岸，把阿道夫·冯·雷门的第十三军丢在东岸。雷门部从未能统合它辖下各部队。第三十六师从头到尾抱怨，友军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四十二师一直未抵达，使它注定吃败仗。而这支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由萨格勒布周边征集的克罗地亚兵组成），则觉得每次与塞尔维亚人打遭遇战，都注定吃败仗：“他们把外套摆在地上，然后爬上树朝我们开枪”。匈牙利地方防卫军朝外套开枪时，塞尔维亚人朝这些克罗地亚人开枪。[78] 在这同时，已遭击败的奥地利地方防卫军第二十一师彻底瓦解，其装备散落战场。“很遗憾地，我们的武装部队并非全是从同一个冲压工厂冲压出来的，”霍夫堡宫以如此冷淡的话语，评论这支以捷克人为主体的师的“可憎行径”。[79]

更为可憎的行径，在后方继续上演。奥匈帝国军队惊怖于塞尔维亚游击队的攻击，愤怒于自己所受的羞辱，于是对马奇瓦地区的老百姓施予一波暴行。这场巴尔干战争充斥着不合作战常规的行径，使他们觉得施暴老百姓正当合理。部队报告，公路上埋设了饵雷，塞尔维亚平民把饮用水下毒。他们报告，塞尔维亚步兵穿上奥地利军服，用德语高声下

达命令，以把奥匈士兵弄糊涂，或举白旗投降，然后把前去受降的奥地利人射杀。他们报告，有塞尔维亚伤兵从背后射杀奥地利人。他们报告，塞尔维亚前线士兵高喊“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以瓦解奥匈军的斯拉夫人士气，或高喊“嘿，我们是克罗地亚籍的匈牙利地方防卫军”，假装成克罗地亚人（来自奥匈帝国的塞尔维亚人），诱骗奥匈军靠近，然后赏以子弹。而试图以来自奥匈君主国的行军营填补自身庞大兵力损失的奥地利人，则自己把自己搞乱。一八六六年后建立的新式陆军，包含许多德意志人士兵、匈牙利人士兵或说克罗地亚语的奥地利地方防卫军士兵，下达命令时常用错语言，因而如某军官所说的，造成层出不穷的“摩擦和敌意”。[80]

总而言之，把错全怪在塞尔维亚人身上较省事。“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么办？”雷门将军吼道，“他们是文化落后的民族。对付他们时，怎能坚守我们的欧洲文化，继续遵守战争法则？”[81]雷门提醒士兵要区分犯下罪行的塞尔维亚人和无辜的塞尔维亚人，但士兵通常懒得这么做。入侵部队里有这么多克罗地亚人——来自杜布罗夫尼克、萨拉热窝、萨格勒布三个军区——原因之一在于维也纳清楚这是它最后一次在激烈的宗教、文化战争里动用天主教克罗地亚人对付东正教塞尔维亚人的机会。[82]在克鲁帕尼，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四十二师士兵用步枪枪托把一群老汉和青年打倒在地，然后把还有气息者全吊死。在洛兹尼察附近，奥地利士兵抓老百姓当人质，然后在补给线遇袭后，把他们处死报复。有个奥地利步兵在遭割喉夺命后，六十名人质遭杀害，附近几个村子遭杀光。在列斯尼察，奥地利第八军以行刑队施行集体处决。以德意志人为主体的第七十三团洗劫该镇两个小时，杀人、奸淫女人，然后吊死塞尔维亚平民。师部下令“不得再有这种没必要的劫掠、破坏情事”，“因为我们终究是文明之师”，但大抵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而这主要是因为波蒂奥雷克已于八月十三日向所有部队明令展开掳民为质、吊死报复、纵火烧屋的行动。[83]后来有六十八名塞尔维亚人被发现挖掉双眼，有三十四名塞尔维亚人鼻子被割掉。以斯洛文尼亚人为主体的奥

匈帝国第九十七团某士兵报告，他的部队已获批准“在各地烧杀”以压下塞尔维亚人的反抗。[84]

但这些暴行无一能止住奥地利军队的溃败。奥地利地方防卫军第二十一师垮掉，使第九师侧翼失去掩护，从而使该师也受到猛烈攻击。倒霉的是他们攻向泰克里斯时，所在的地方正是平时塞尔维亚人为练习火炮射击已测绘过的地方，因此炮弹落点惊人精准。第九师撤退，把十二门火炮留给追上来的塞尔维亚人。[85] 塞尔维亚人站在采尔山山顶，看着他们所痛恨的说德语的人溃退：“可以看到他们呈纵队往四面八方退去；我们派出由步兵和炮兵组成的数个小分遣队追杀。”[86] 其中某些追杀队，两个营和一个炮兵连，追上奥地利人，出手攻击。在姆拉莫尔（Mramor）东边某峡谷里，塞尔维亚人把第三十六师和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四十二师部分部队逼到走投无路，用步枪和火炮猛击。才几分钟，捷克第二十八团就“死伤数百”。身手矫健得以逃脱者，像蜘蛛般手脚并用爬上峡谷的峭壁寻找生路。有两千人只身或呈小群体窝在丘陵里整整两天，才找到回自己部队的路。[87]

高层提醒奥地利军官应尽的职责：“在集体恐慌或有人发出动摇军心之语时，得当场毙了这些犯罪者。”[88] 但犯罪之人太多，军官不够多（因为已有许多军官受伤或生病），再怎么动用枪毙以儆效尤也无法提振这支军队的斗志。第五集团军带着八万兵力渡过德里纳河进入塞尔维亚；撤回河对岸时已损失高达六百名军官和两万三千士兵。几乎每个部队都失去其最优秀的军官和五分之一的配给兵力。有位奥地利军官在法兰克部逃回德里纳河对岸时不以为然地说道：“在这个国家，我们的部队和我们的装备，打不了正规战役。”[89] 显然奥地利人早该事先想到这点。

八月二十日当第二集团军四个军的第三个军开始从沙巴茨往东开赴加利西亚时，放弃行动将几近完成。伯姆-埃尔莫利的集团军将陷入两

头落空之境，即太早离开塞尔维亚而无法影响该地战局，又太晚抵达加利西亚而无助于该地战事。匈牙利驻维也纳皇廷使节伊斯特万·布里昂伯爵表达了奥地利与匈牙利日益失望苦恼的心情：“在巴尔干诸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带来何等可怕的效应。我们何时才能取得一胜？”[90] 八月二十三日第四军最后一次试图取胜，该军士兵奉命“只带背包”渡过萨瓦河（意味着欲在没有辎重车队拖累下发动又快又狠的进攻），却在摸黑渡河时乱成一团（有些人搭汽船，有些人走桥），因而不得不取消进攻，士兵先是奉命就寝，然后奉命开拔往东。“部队士气大受打击，”约瑟夫大公论道，“他们一有机会就倒地呼呼大睡。”[91]



射杀塞尔维亚村民的奥地利步兵

奥地利步兵射杀塞尔维亚村民。有位奥匈帝国将领在一九一四年连番目睹对塞尔维亚平民的暴行后，反感地写道：“这不是文明军队所应为。”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波蒂奥雷克原指望在敌方防守薄弱的德里纳河上游取得胜利，但在此他也遭败绩。照理该与第五、第二集团军协同作战的第六集团军，因来得太迟，隔得太远，而无法与友军合作。波蒂奥雷克最后终于离开塞

拉耶佛，及时赶到德里纳河上游，而得以亲自带领遭孤立的第六集团军到渡河处，在八月二十、二十一日于维舍格勒、普里博伊（Priboj）打赢无关大局的遭遇战。但他与受重创的第五集团军仍相隔一百零四公里，采尔山上几场仗打下来，第五集团军这时已令人吃惊地失去超过四分之一的兵力和四十二门火炮。[92] 八月二十四日，波蒂奥雷克发出全线撤退令（“再进攻已无意义”），把第六集团军拉回德里纳河对岸。第四军放弃沙巴茨时残害该镇居民，暴行就和第六、第五集团军对德里纳河沿线村镇所为没有两样：数十名塞尔维亚男女老少被关在一教堂里数日，然后在奥地利人撤兵时遭行刑队枪决，使在奥地利欲将塞尔维亚“西欧化”的这场行动中遇害的塞尔维亚平民，达到大约三千五百人。[93] 就在这十天前，波蒂奥雷克力促第六集团军“让塞尔维亚人知道该恭敬归顺奥匈帝国，一如在欧根亲王和拉德茨基（Radetzky）的时代”。[94] 这场撤退丝毫没有拉德茨基当年的作风。为自己的连番挫败和滥杀无辜的恶行感到厌烦的奥地利人，退回到散落自己粪便的污秽营地。“得告诫士兵使用厕所，不要再随地大小便，”有位第八军将领气鼓鼓说道，“也得要求他们碰到长官就要敬礼。”[95]

波蒂奥雷克把错全归在康拉德头上，说：“我从不清楚第二集团军的部队是否会为我留下……我得拥有完全不受限制指挥我战场所有兵力的权力……总司令部不得再与我的下属联系。”但这场挫败毫无疑问是他的挫败。他在萨拉热窝滞留太久，然后又将司令部从后方的某个偏远地点随意转移到另一个同样位于后方的偏远地点，从未掌握这场战争的实情。[96]

匈牙利军官向蒂萨告知波蒂奥雷克的无能之后，蒂萨于八月二十三日写信给皇帝，扼要说明这位巴尔干司令所干的蠢事：“正面强攻筑有防御工事的阵地，未先充分侦察敌情，乃至未备好火炮，导致……彼此拉得很开的各纵队，在沙巴茨—洛兹尼察一线遭塞尔维亚人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伤亡惨重，而整个第六集团军，位于南方，相隔太远，连调

动部署都不可能。”[97] 蒂萨大大嘲笑奥匈帝国可在将军队主力用于对付俄国的情况下击败塞尔维亚的想法，促请皇帝和贝希托尔德正视现实，把塞尔维亚摆到一旁，全力对付俄国。

但霍夫堡宫还不愿对波蒂奥雷克和其巴尔干梦想死心。这位南方面军司令官至少给皇上写了几封信，而康拉德没有。八月二十四日博尔弗拉斯安慰波蒂奥雷克：“我说啊，你的情况会好转；毕竟地球是圆的，得不停地转！”[98] 对七千名死在德里纳河沿线丘陵、森林、村子的奥匈帝国人来说，地球已不再转动。还有三万奥匈人受伤，四千人被俘，四十六门火炮和三十挺机枪落入敌人手里。塞尔维亚的损失相对较低（死三千人、伤一万五千人），士气仍然高昂。塞尔维亚人嘲笑奥匈帝国的挫败，称哈布斯堡军队是“乌合之众”，蒂萨是“条蛇”，哈布斯堡君主国是“反人道的罪人”。[99] 当数千名奥匈帝国伤兵被疏散到奥匈两国境内的医院和自家时，畅谈在塞尔维亚的惨败，招来最高指挥部的驳斥：“必须用他们的母语告诉士兵和军官，不准再拿这一坏消息让老百姓惊恐。他们与敌激烈厮杀，全不具有如实描述情势所必需的综观全局的眼光或冷静心态。”法兰克将军展现他一贯昧于现实的作风，建议一律予以“严惩”。[100]

对外，维也纳试图遮掩挫败，八月下旬向诸中立国保证奥地利会赢。意大利不信；当地报童一再喊着“奥地利大败”，群众示威要求与奥匈帝国开打，部队以整齐队形走过奥地利大使馆和领事馆旁，用口哨吹着《加里波第颂》和《马赛进行曲》。意大利人显得越来越好战。[101] 对内，维也纳在帝国境内诸城镇张贴官方公告，说明战败原因：由于俄国介入这场战争，入侵塞尔维亚只是旨在“削弱、击退”人数多上许多之塞尔维亚军队的一个“穿插的表演”和“痛击”，而且奥地利那些措施成功收场，使奥地利得以“有条不紊地撤离塞尔维亚”。[102] 在霍夫堡宫内，博尔弗拉斯把情势看得很清楚。他提醒波蒂奥雷克，得在塞尔维亚境内打几场胜仗，“以打造会使我们在巴尔干的任务更易于完成的政治情

势”。“接下来呢？”博尔弗拉斯忧心如焚地问道。[103]

---

[1]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EMA，7N 1128，Vienna，Oct. 14，1897，Cdt. Berckheim，“Notes sur le haut commandement en Autriche.”

[2] Rudolf Jerabek，*Potiorek*（Graz：Verlag Styria，1991），110；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 Hö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232.

[3] R. G. D. Laffan，*The Serbs*（New York：Dorset Press，1989 [1917]），190.

[4] Jaroslav Hasek，*The Good Soldier Svejk and His Fortunes in the World War*，trans. Cecil Parrott（London：Penguin，1985 [1923]，433）.

[5] Kriegsarchiv，Vienna（KA），Neue Feld Akten（NFA）529，Bijelina，August 9，1914，9；ITD，FML Scheuchenstuel；Hew 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vol. 1，*To Arm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336；Jerabek，*Potiorek*，108-111；Manfricd Rauchensteiner，*Der Tod des Doppeladlers*：*Österreich-Ungarn und der Erste Welt-krieg*（Graz：Verlag Styria，1993），128.

[6] Carl Freiherr von Bardolff，*Soldat im alten Österreich*：*Erinnerungen aus meinem Leben*（Jena：Eugen Diederichs，1938），72.

[7] SHAT，7N 1127，Vienna，March 10，1889，Capt de Pange.

[8] Strachan，*First World War*，341.

[9] 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75.

[10] Jerabek，*Potiorek*，114.

[11] Jerabek，*Potiorek*，9-45，69-70.

[12] KA，NFA 2115，36 ID，5 Armee Kommando to 36 ID，Brcko，Aug. 2，1914，Op. Nr. 15；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03.

[13] Kurt Peball，“Der Feldzug gegen Serbien und Montenegro im Jahre

1914，” *Österreichische Militärische Zeitschrift Sonderheft* I（1965）：20；Jerabek，*Potiorek*，116-117；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 Hö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264.

[14] James M. B. Lyon，“‘A Peasant Mob’：The Serbian Army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War，”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1（July 1997）：486-478.

[15] James M. B. Lyon，“‘A Peasant Mob’：The Serbian Army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War，”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1（July 1997），495-498.

[16] James M. B. Lyon，“‘A Peasant Mob’：The Serbian Army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War，”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1（July 1997），499-500.

[17]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 Serbiens zur Befreiung und Vereinigung der Serben*，*Kroaten und Slovenen*（Belgrade：Buchdruckerei des Ministeriums für Krieg und Marine，1924-26），1：32-34.

[18] Lyon，“Peasant Mob，” 491.

[19] KA，Gefechtsberichte（GB）24，483 c/2，k.u.k. Warasdiner I.R. 16，“Gefechtsbericht Kurtovica am 12. August 1914”；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Grosze Krieg*，49-50.

[20] KA，NFA 935，k.u.k. 72，Infanterie-Brigade-Kommando，Tagebuch，13 Aug. 1914；NFA 1795，8. KpsKdo，GdK Giesl，“G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Zeit vom 12 bis 20 August.”

[21] Karl Kraus，ed.，*Die Fackel*（Munich：Kösel-Verlag，1968-76），“Die letzten Tage der Menschheit，” 35（1. Szene，1. Akt）.

[22] 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50；Krauss，“Bekleidung，” 33-35.

[23] KA，NFA 935，k.u.k. 72，Infanterie-Brigade-Kommando，GM Haustein，“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am 14 Aug. bei Dobric.”

[24] KA，GB 24，484 b/5，I.R. 16，Col. Budiner，“Gefechts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von Kozjak und Dobric am 14. Aug. 1914.”

[25] KA，GB 24，483 c/2，k.u.k. Warasdiner I.R. 16，“Gefechtsbericht Kurtovica am 12.August 1914”；Joseph Schön，*Sabac*！（Reichenberg：Heimatsöhne，1928），144.

[26] KA，GB 24，36 ITD，GM Haustein，“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am 14. Aug. bei Dobric，”“Gefechts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auf Vk，Gradac und bei Jarebicka crvka am 16. Aug 1914.”

[27]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Grosze Krieg*，1：107，172-173.

[28] KA，NFA 1795，8. KpsKdo，GdK Giesl，“G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Zeit vom 12 bis 20 August.”

[29] KA，NFA 529，Vienna，Aug. 13，1914，GM Kanik，Etappen-Oberkommando-Befehl Nr. 1.

[30] KA，NFA 170，17 Brig.，GdK Giesl，Aug. 25，1914，“Wahrnehmungen während der letzten Gefechte”；NFA 935，72 Inf. Brig.，Kosjak，Aug，15，1914，Ord. Off. Goriany to GM von Haustein.

[31] Haus-，Hof- 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819，Vienna，Aug. 15，1914，Berchtold to Tarnowski.

[32] Schön，*Sabac*，127.

[33] KA，Armeeoberkommando（AOK）1914，Evidenzbureau（EVB）3506，Evidenzbüro des Generalstabes B. Nr. 57./I.

[34]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Grosze Kriege*，1：102-104.

[35]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Grosze Kriege*，1：139-142.

[36] Schön，*Sabac*，29，131.

[37] KA，B/1503：6，Sarajevo，Aug. 14，1914，k.u.k. Armee-Kommando Op. 248；SHAT，EMA 7N 1129，Vienna，June 28，1903，Cdt. Laguiche.

[38]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Grosze Krieg*，1：320.

[39] Schön，*Sabac*，20.

[40] Schön，*Sabac*，133；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Grosze Krieg*，1：142-143.

[41]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Grosze Krieg*，1：320-321.

[42] KA，GB 17（k.k. 21 LITD），Tellovica，Aug. 15，1914，Landwehr

I.R. 6，Capt. Rudolf Kalhous，“Gefechtsbericht über den Angriff und Einnhahme der Cer-Höhe am14.August 1914”；Schön，*Sabac*，99-100；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Grosze Krieg*，1：107-108.

[43] KA，NFA 489，42 Sch. Brig.，Aug. 16，1914，“Tagebuch”；NFA 170，17 Brig.，5 Armee，Op. 402/15，Brcko，Aug. 22，1914，GdI Frank；NFA 528，“9，ITD Abfertigung am 21. Aug. 1914”；GB 17，21 LITD，Kdo. Op. Nr. 75/1 Bijelina，Aug. 22，1914，FML Przyborski，“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am 16. Aug. 1914.”

[44] *Le Figaro*，Aug. 14，1914.

[45] Schön，*Sabac*，25-26.

[46] KA，B/1503：4，Sarajevo，Aug. 16，1914，Potiorek to Bilinksi.

[47] KA，NFA 528，9 ITD，“Kurzer Gefechtsbericht für die Zeit vom 12. bis 20. August 1914”；KA，NFA 935，k.u.k. 72 Infanterie-Brigade-Kommando，Tagebuch，13 Aug. 1914.

[48] KA，NFA 528，9 ITD，“Intendanz.”

[49] KA，NFA，529，Aug. 21，1914，9 ITD，nr. 170，k.u.k. 5 Armee-Kommando，GdI Frank；Jerabek，*Potiorek*，160.

[50] KA，NFA 2115，36 ID，4 Baon to I.R. 16 Commando，Kozjak，Aug. 15，1914.

[51] Jerabek，*Potiorek*，121.

[52] KA，NFA 2159，Sarajevo，Aug. 13，1914，6 Armee-Kommando，FZM Potiorek.

[53] Alfred Krauss，*Die Ursachen unserer Niederlage*：*Erinnerungen und Urteile aus den Weltkrieg*，3rd ed.（Munich，1923），33-34；KA，NFA 528，“9.ITD Abfertigung am 21. Aug. 1914.”

[54] Jerabek，*Potiorek*，121.

[55] KA，B/1503：4，Sarajevo，Aug. 19，1914，Potiorek to Bilinksi.

[56] Krauss，*Die Ursachen unserer Niederlage*，94-98；KA，GB 86，1914-15，“Erfahrungen über den Kampf um befestigce Stellungen：Vorgang der

Deutschen”；Felix Prinz zu Schwarzenberg，*Briefe aus dem Felde* 1914-18（Vienna：Schwarzenbergisches Administration，1953），17.

[57] Schön，*Sabac*，146.

[58] Ströer，15.

[59] KA，NFA 1850，k.u.k. BH IR Nr. 3，Grabovci，Aug. 22，1914，Obstlt. Panic.

[60] Ströer，18.

[61] KA，G-B 21，31 ITD，Aug. 29，1914，FML Eh. Josef，“G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Gefechte am 18. u. 19. August bei Sabac und Pricinovic”；GB 21，Op. no. 15/22，31 ITD，Aug. 15，1914，Maj. Wilhelm Jeskowski，“Bericht über meine Eindrucke in Sabac”；Schön，*Sabac*，78-81；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Grosze Krieg*，1：214-215.

[62] KA，NFA 2115，36 ID，GdI Frank，Op. Nr. 403/20.

[63] KA，NFA 528，G-B 21，32. ITD，Op. Nr. 29/4，“Gefechts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sö Sabac am 18. Aug. 1914.”

[64] KA，NFA 1842，32 ID，Aug. 25，1914，Op. 27/3，“Verluste”；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Grosze Krieg*，1：208.

[65]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Grosze Krieg*，1：323.

[66] KA，NFA 1846，32 ID，Aug. 19，1914，“Tagebuch”；GB 21，32 ITD，Op. 29/4，FML Griessler，“Gefechts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bei Cerovac am 19. Aug. 1914”；Schön，*Sabac*，97；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Grosze Krieg*，1：208.

[67] KA，NFA 1794，4. Korpskdo，Sept. 5，1914，GdK Tersztyánszky，“Bericht über die Kämpfe bei Sabac.”

[68] KA，GB 21，31 ITD，Aug. 29，1914，FML Eh. Josef，“G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Gefechte am 18. u. 19. August bei Sabac und Pricinovic.”

[69] KA，NFA 1813，FML Eh Joseph，Aug. 29，1914，“Gefechtsbericht über den Kampf bei Sabac am 23. Aug.”

[70] KA，B/1503：6，Sarajevo，Aug. 20，1914，Potiorek to Bolfras；NFA 935，36 ITD，Aug. 19，1914，Col. Budiner to 36 ITD-Kommando.

[71] KA，NFA 1787，Sambor，Sept. 4，1914，4 Korps-Kommando to 31 Infanterie-Truppen Division；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42；KA，NFA 1794，4 Korpskdo，Sept. 5，1914，GdK Tersztyánszky，“Bericht über die Kämpfe bei Sabac.”

[72] Jerabek，*Potiorek*，125.

[73] KA，GB 42，Han Glasinac，Aug. 27，1914，Col. Konopicky，4 Geb. Brig.

[74] Schön，*Sabac*，26.

[75] KA，NFA 2116，36 ID，Op. Nr. 77，Brcko，Aug. 5，1914.

[76] KA，GB 42，Han Glasinac，Aug. 27，1914，Col. Konopicky，4 Geb. Brig；NFA 2159，Han Gromile，Aug. 27，1914，4 Geb. Brig.，Abfertigung.

[77] KA，GB 42，7 Geb. Brig.，“Gefechts-Bericht über den Angriff auf die Höhe Panos am 20. Aug. 1914”；NFA 2159，Han Glasinac，Aug. 27，1914，k.u.k. 4 Gebirgsbrigade-Kommando，“Resumée der Auszeichgsanträge.”

[78] KA，GB 24，36 ITD，“Gefechts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bei Zavlaka-Marjanovica am 18-21 Aug. 1914”；GB 74，k.u.k. 42 HID，Op. 200/I，Patkovaca，Sept. 3，1914，“Gefechts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von Krupanj，16. Aug. 1914.”

[79] KA，B/1503：7，Vienna，Sept. 26，1914，Bolfras to Potiorek；NFA 2159，18 ITD，220/10，Aug. 20，1914，FML Ignaz Trollmann，“Äussere Abfertigung.”

[80] Schön，*Sabac*，25；Schwarzenberg，*Briefe aus dem Felde*，15.

[81] KA，NFA 2115，k.u.k. 13 Korps-Kommando，Op. Nr. 194/56.

[82] Andre Mitrovic，*Serbia’s Great War 1914-1918*（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2007），67-68.

[83] KA，MFA 528，9 ID，“ITD Abfertigung am 21. Aug. 1914”；NFA 2159，18 ITD，220/10，Aug. 20，1914，FML Ignaz Trollmann，“Äussere Abfertigung”；NFA 2115，36 ID，k.u.k. XIII Korps Kommando to 36 ID，

Dugopolje，Aug. 13，1914.

[84] R. A. Reiss，*Report on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Austro-Hungarian Forces*（London，1916）；Jonathan Gumz，*The Resurrection and Collapse of Empire in Habshurg Serbia 1914-191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54-55；Laffan，*The Serbs*，191-195.

[85]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Grosze Krieg*，1：218-219.

[86]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Grosze Krieg*，1：245.

[87] KA，GB 74，k.u.k. 42 HID，Op. 200/III，Patkovaca，Sept. 4，1914，“Gefechtsbw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bei Bela-crvka 18. Aug. 1914.”

[88] KA，NFA 475，41 Sch. Brig.，Aug. 22 and 27，1914，FML Przyborski.

[89] KA，NFA，GB 12，k.u.k. 9 ITD Kdo Op. Nr. 221，“Kurze Gefechtsbericht für die Zeit vom 12. bis 20，Aug. 1914”；Peball，“Der Feldzug，” 25.

[90] Holger H. Herwig，*The First World War*：*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1914-1918*（London：Edw. Arnold，1997），88-89.

[91] KA，GB 21，32 ITD，Op. 29/4，FML Griessler，“Gefechts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bei Jevremovac am 23. Aug. 1914”；KA，GB 21，31 ITD，Aug. 29，1914，FML Eh. Josef，“Gefechtsbericht über den Kampf bei Sabac am 23，August.”

[92] KA，B/16（FML Ferdinand Marterer），Tagebuch，Aug. 26，1914.

[93] KA，B/1503：6，Sarajevo，Aug. 20，1914，Potiorek to Bolfras；Gumz，*Resurrection and Collapse*，55-58.

[94] KA，B/1503：6，Sarajevo，Aug. 13，1914，Armee-Kommando-Befehl Nr. 1，“Soldaten der 6. Armee！”

[95] K A，NFA 170，Pratkovica，Aug. 21，1914，k.u.k. 17 Infantrie-Brigade-Kommando.

[96] KA，B/1503：6，Sarajevo，Aug. 21，1914，Potiorek to Bolfras.

[97] Jerabek，*Potiorek*，134-135.

[98] Jerabek, *Potiorek* , 136.

[99] KA, AOK（1914/15）EVB 3510, “Die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 Kanaille, ” Aug. 27, 1914; Jerabek, *Potiorek* , 131.

[100] KA, NFA 2115, 36 ID, Brcko, Aug. 31, 1914, 5 Armee Oberkommando to VIII and XIII Corps.

[101] HHSA, PA I, 819, Sofia, Aug. 21, 1914, Tarnowski to Berchtold; Jenikoj, Aug. 22, 1914, Pallavicini to Berchtold; Sinaie, Aug. 23, 1914, Czernin to Berchtold; PA I, 845, Naples, Sept. 1, 1914, Egon Pflügl to Berchtold; Rome, Sept. 8, 1914, Karl Macchio to Berchtold; Milan, Sept. 30, 1914, Györgey to Berchtold.

[102] HHSA, PA I, 819, “Communiqué vom 22. Aug. 1914.”

[103] KA, B/1503: 6, Vienna, Aug. 25-26, 1914, Bolfras to Potiorek.

第七章 克拉希尼克

康拉德也发出同样的疑问："接下来呢？"他一直夸称自己是英明果断的将材，但在奥匈帝国的东部战线，他一开始的兵力调度就乱无章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与德国人没什么联系，他不喜欢德国人，但德国人更不喜欢他。他对一事无成的塞尔维亚战役置之不理，而那场战役仍在消耗捉襟见肘的宝贵资源。波蒂奥雷克仍抓着两个弱集团军不放——用来保卫奥匈帝国疆土绰绰有余，但用来再次入侵塞尔维亚则兵力不足。就东部战线来说，德、奥已在战前谈到从北、南两线分别出击（德国人从东普鲁士，奥地利人从加利西亚），夺取从俄罗斯帝国本体往西突出的俄属波兰。他们甚至谈到使波兰、乌克兰脱离俄国，将它们合组为一个由奥地利人治理、位于俄国与西方之间的缓冲国，为这场战役画下句点。[1] 但说到入侵俄国，康拉德需要动用他的全部兵力，需要陈兵于俄国边境。结果他却把他已遭削弱的兵力部署在他战区最东边铁道卸除点以西约一百六十公里处，希望借此为击败塞尔维亚多争取一些时间。

康拉德自相矛盾的战略构想和不知打哪儿来的"战争逢凶化吉"的自信，最终被现实打碎。德国人正把重心放在西部战线上，东部战线上连一场象征性的挫败都非他们所乐见，因此他们把他们小兵力的东线部队扣住，防卫东普鲁士，而非与奥地利人联合攻入俄属波兰。[2] 康拉德自己在塞尔维亚战事上的优柔寡断，使奥匈帝国在东部战线的兵力部署，八月二十八日时只有三十一个师，九月四日终于有第二集团军第三个军从沙巴茨开拔过来时（第四个军还留在南部战线以安抚波蒂奥雷克），兵力增加为三十七个师。这些姗姗来迟的奥地利军官里，有一位向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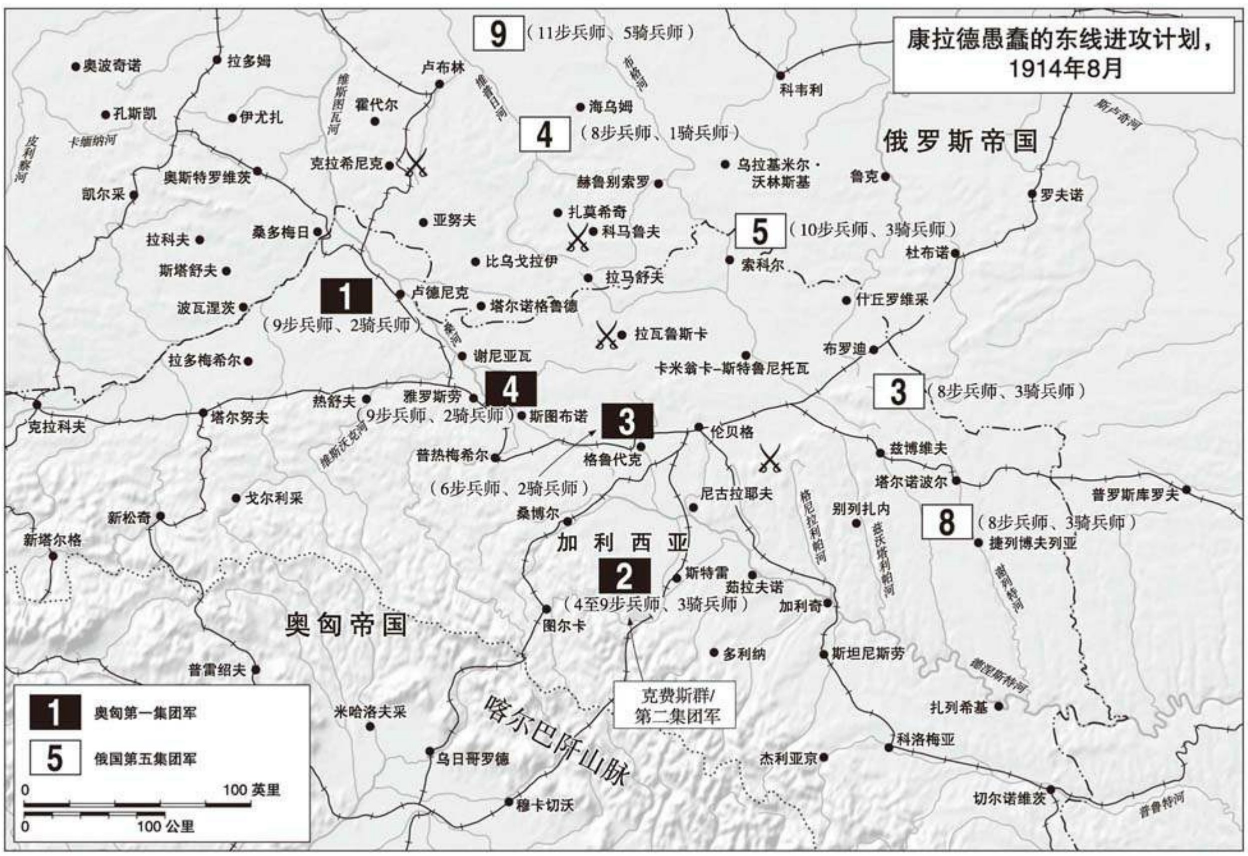
抱怨，塞尔维亚的战事令他极不舒服：“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杀光、毁光，很不人道。”他把奥地利高阶将领称作“土匪”。[3] 他们也是拖拖拉拉的慢郎中，而德国人未掩饰他们对那些人的鄙视。奥匈帝国大使从柏林报告了其在德国政界、军界所感受到，“对我们行动不够积极与迅速，未能”在德国人正于法国与敌厮杀时，“将俄军引离德国”的愤懑。[4]

鉴于柏林不满奥国的表现，弗朗茨·约瑟夫的新任驻德大使戈特弗里德·冯·霍恩洛厄（Gottfried von Hohenlohe）亲王，急忙力劝本国政府“立即攻打俄国，以表明这两个帝国平均分摊这场战争的重任”[5] 。结果，俄国人已在加利西亚动员四十五个步兵师和十八个骑兵师，还有正在华沙集合以会同入侵德国或奥匈帝国的俄国第九集团军十一个步兵师。战前，奥地利预测届时，俄军所部署的兵力只会有二十四个师，但眼前却有超过五十个师陈兵于其与奥、德的边界上，部署速度之快大出奥地利的预料。[6]

奥匈帝国要想在战场上打败俄国，只有一个机会，就是趁俄罗斯人还未能全面动员之时迅速出击，但康拉德已白白丧失那机会。这场战役连第一枪都还没发出，似乎就注定落败，主要原因在于奥地利人弹药已开始不足。他们把大部分弹药工人征召入伍，使得位于维也纳、施泰尔（Steyr）、皮尔森（Pilsen）、布达佩斯的大兵工厂产量大大低于最高产量。到了九月中旬，它们每天只生产三百五十万发步枪弹、九百枚炮弹，而且即使要把如此少量的子弹、炮弹运到前线部队手里，都碰到困难。[7] 奥匈帝国驻慕尼黑公使九月八日发给贝希托尔德一份令人气愤的电报，传达了以下消息：德国人将把先前被斥为“过时的”、“只适合给中国军队使用”的两百五十万发步枪、机枪弹送交奥地利。[8]

奥军部署在桑河、德涅斯特河边，前方没有足够的防御工事保护，且拖了这么久迟迟未有行动，照理这时康拉德对进攻一事应该连想都不要想。运用位于普热梅希尔的据点——自古即是战略要冲，这时为数座

现代堡垒所环绕，有“东方凡尔登”的绰号——康拉德本可以将气势吓人的俄国大军（三百万俄军对付兵力不到那一半的奥军）阻挡于奥匈帝国边境外。俄国六个集团军（三、四、五、八、九、十一）正挺进五百公里长的战线，以将奥匈帝国三个集团军（一、三、四），还有伦贝格周边赫尔曼·科维斯（Hermann Kövess）将军辖下不断在波动的兵力，都包围住。科维斯部包含从塞尔维亚境内伯姆-埃尔莫利的第二集团军零星且缓慢转移过来的部队。俄罗斯人已于一九一三年用五亿美元的法国借款，改善了进入该战场的铁路和公路，使在后勤上原居优势的奥地利反居劣势，使俄国从此能比奥地利运送更多部队进入这个加利西亚边界地区。[9]



康拉德秉持其一贯不服输的精神，尽管没有胜算且没有德国人配合，仍选择进攻。后来弗朗茨·约瑟夫说到康拉德时表示，“对于有着如此宏大计划的参谋总长，我们找不到适合他一展身手的领域”，但在一

九一四年八月时，皇帝表现他的一贯作风，丝毫未阻止康拉德实现其计划。[10] 康拉德以未构筑防御工事的伦贝格为其右翼的依托，大胆假定他能用他的左翼兵力（他的第一、第四集团军的十八个师）往东北强力挺进，包围、消灭集结于卢布林（Lublin）、海乌姆（Chelm）周边的两个俄国集团军。如果康拉德击溃这两个集团军，不必等毛奇打败法国后履行承诺回师东线，他就可宣告在布格河边得胜。

像康拉德这样坏脾气的人，很难抗拒如此美好前景的诱惑，但衡诸现实，他该抗拒住。即使击败卢布林周边的两个俄国集团军，他们后面还有两个作为预备队的集团军（第十一、第九），而康拉德不可能让这两个集团军也称臣，因为他缺乏后备兵力、运输工具、弹药。康拉德在战前拟的作战计划，想以超过三十个师的左翼兵力执行这一攻势，迂回、包围俄国在波兰、加利西亚动员的部队。如今他左翼的兵力却只有十八个师，根本不足以震慑俄罗斯人。至这时为止，俄国已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部署了五十二个师，且俄国师的战斗力大于奥地利师——俄国师下辖的营、机枪数目比奥地利师多，平均来讲战斗力较强六至七成。俄国师在火炮上也拥有摧枯拉朽的优势，野战炮比奥地利师多一倍，重型火炮多两倍。就火炮来说，俄国与德国相比，居于劣势，与奥地利相比，却远远占上风。[11]

康拉德诸师这时得行走约一百六十公里才能抵达他们的进攻点，由此观之，康拉德的冒进更显鲁莽。康拉德想必知道，光是行军就会毁掉他以平民为主的军队。康拉德的青年时代回忆录讲述了他唯一的打仗经验（一八七八年在波斯尼亚），谈到当时夏季酷热带给士兵何等“说不出口的痛苦”，导致造成集体掉队乃至自杀。[12] 康拉德若照原来的部署计划行事，他的部队会坐火车横越这酷热的一百六十公里路，结果，他的部队是在炙人的烈日下，靠双脚吃力开赴前线，一路吃辎重队、骑兵、火炮扬起的尘土。随行的牲畜（将陆续宰杀供奥地利每个军食用的七十头牛、两百头猪、三百只绵羊），一路叫，一路大便，令士兵更为

痛苦。

“酷热”中行军的往事，令来自蒂罗尔的皇家步兵团一员奥托·拉塞兹（Otto Laserz）永生难忘；部队在维也纳上火车，开到名叫卢比恩·维尔基（Lubien Welki）的小村子时被叫下车，改为走到一百四十几公里外的伦贝格。这一趟艰苦行军走了三天，如果搭火车，只需两个小时。走到第二天时，每个人都因虱子、口渴而痛苦不堪。他们在第一个小时就把水壶里的水喝光，然后每隔好几公里才会碰到水井，而一到水井，士兵会按阶级高低排队，等着喝温热、微咸且必然导致痢疾的水。这些皇家山地步兵团——来自维也纳、施蒂里亚、蒂罗尔这三个征兵区的奥地利地方防卫军部队——也不解为何要他们带着绳索、带铁钉的鞋底、冰斧，以及钉有平头钉的靴子，在地势平坦的加利西亚作战。

比起一般的军靴，这种靴子走在加利西亚的沙地上陷得较深。官僚作风在奥地利根深蒂固，因此，若没有照文书作业申辩理由，没有人敢，就连拉塞茨的团长都不敢不带这些不适用的东西，而因循苟且的官员当然未想到去做这种文书作业。于是，士气涣散，“脚扎痛，背和肩发疼”。拉塞茨的一名部下，行军第一天就落队落得很严重，下午才重见人影；拉塞茨指出，“他把所有东西，山区装备，乃至背包和干粮袋，全丢了，这时终于露出笑容。夏天在加利西亚一天行军五十公里，就是这个情景”。[13]

康拉德要他口渴、步履蹒跚的部队往北穿过平坦的加利西亚时，也未费心稳固他的右侧翼。在加利西亚一望无际、空荡荡的平原上，点缀着遍地尘土的村子，村中有陡斜屋顶草屋和三圆顶式教堂。有位好奇的奥地利步兵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对奥地利这个省一无所知，只知道它产油、盐、污秽、虱和许多犹太人”。[14] 不管是八月十五日进入俄罗斯境内侦察敌情的奥匈帝国骑兵，还是奥匈君主国的飞机，都完全未注意到在普罗斯库罗夫（Proskurov）和塔尔诺波尔（Tarnopol）集结和从东

边逼来的俄国第三、第八这两个集团军。奥匈帝国初建的陆军航空兵团，已在八月时被自己人打得几乎全部停飞，因为兴奋的农民兵一看到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就朝它们开火，也不管它们是不是本国的飞机。[15] 最初，军方向不分青红皂白乱开枪的奥地利部队说明了奥、德、俄飞机标志，形状的差异，要他们只能向俄国飞机开火，不久后干脆要他们看到飞机都不准开火。[16]



进入加利西亚某村的奥地利部队

一九一四年八月进入加利西亚某村的奥地利部队。有位奥地利步兵写道，“我们对奥地利这个省一无所知，只知道它产油、盐、污秽、虱子和许多犹太人”。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飞机这项新武器能长程侦察（往返三百二十公里），精确且及时地

掌握敌军动态，理论上应能缩短部署时间，加快战斗的开打，但在这里，一如在塞尔维亚，效用不大。可怜的奥地利人只有五架位于伦贝格的飞机：其中三架不能飞，能飞的两架，有一架于八月十二日在俄国境内坠毁。[17] 出问题总爱放马后炮的康拉德，把错怪在别人头上："我建议为陆军配备一千两百架飞机时，有人说我是傻子；现在他们知道我是对的了。"[18] 身为参谋总长，他本有权力坚持建造飞机，但他没有坚持。于是，他的南、北两方面军仍照着旧式土方法在蛮干。

事实表明，绝对落伍的奥匈帝国骑兵与哥萨克人打边界小规模战斗时，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全线溃退，死伤惨重，抱怨身上的装备、盔甲笨重累赘。奥芬贝格得知他的第六骑兵师在托马舒夫（Tomasow）周边溃败之后写道，"什么都缺"。[19] 许多奥地利骑兵选用阅兵用的重马鞍，把他们未习惯这种马鞍的坐骑擦伤弄痛，因而被马从马背上摔下来。数千骑兵因此跛着脚徒步走回基地，后面牵着他们因疼痛而退缩不前的马。那些得以顺利前进的骑兵，搜索过四百公里宽的前线，深入俄境一百六十公里，却遭遇出其不意的猛烈齐射火力。有位俄国中尉忆道，战争初期，他那些发狂的乡巴佬士兵会"每个人都朝一个奥地利骑兵发射二十发子弹"，使整个部队在下一次补给到达之前形同失去武装。[20]

庞大的奥地利骑兵屏护部队不知为何完全未碰到俄军主力，康拉德因此相信"没有欲从东边不利于其右侧翼的大规模兵力移动的迹象"。[21] 在个人回忆录中，俄国第八集团军的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Aleksei Brusilov）将军，惊讶于他在塔尔诺波尔附近边境遇到的奥军部队之"少"，惊讶于他所遇到的那些奥军投降之干脆和供出情报之迅速。原来，奥地利人深信俄罗斯人正在慢条斯理动员，而非进攻。[22] 奥地利将领赫尔曼·科费斯的兵力群（在第二集团军的余部从塞尔维亚来到之前，屏护西里西亚东部的两个军），早在八月二十三日就示警道，整个俄国第八集团军在普罗斯库罗夫周边集结，要跨过边境。奥地利军方郑

重其事派了架飞机去侦察。有位忧心忡忡的参谋官在那天写道："今天下午会派一架飞机去侦察；军官绝对要告诫士兵勿把它打下来。"[23] 情势比上述警告还要糟糕：俄国两个集团军（第八和第三）正从东边合拢。他们一直利用凉夜行军，炎热的白日则躲在树林里，借此避开空中侦察。[24]

这时康拉德心情较好；吉娜请人送来一个纪念品盒，内有一幅迷你的老毛奇（一八六六年击溃奥军的普鲁士将领）肖像。这位奥地利参谋总长把它挂在脖子上，希望如老毛奇般大败敌人。[25] 但他绝不是毛奇之流的将才，从他愚蠢的用兵决定——用如此薄弱的兵力攻入很容易被敌人从两侧包围吃掉的辽阔地方——可见一斑。从先前的"往后移动"和这时得用行军才能抵达本可以坐火车更早、更容易抵达的前沿阵地来看，这一决定更令人困惑不解。康拉德后来辩称，要保住加利西亚的油井、铁路、公路和该地区首府伦贝格，要乘其不备奇袭俄罗斯人，要先发制人以打消他们对加利西亚其他地方、喀尔巴阡山脉、匈牙利所必然发动的压倒性攻击，这一北攻行动是唯一办法。八月二十日，奥芬贝格将军来到普热梅希尔见康拉德、弗里德里希大公和新皇储卡尔大公。奥芬贝格以为会讨论仗怎么打，结果发现康拉德和弗里茨尔绷着脸坐着，一语不发。波蒂奥雷克原宣告已在塞尔维亚取得大捷作为八月十八日皇上诞辰的贺礼，这时却说他败了。



搜寻俄罗斯人的奥地利骑兵

战前奥地利人把过多心血投注在骑兵上，一九一四年八月时这些长枪骑兵，一如其他奥地利骑兵，虽然搜索过四百公里宽的前线且深入俄境一百六十公里，却未能找出俄军的位置。飞机是更有效的侦察工具。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莫里茨·冯·奥芬贝格将军

莫里茨·冯·奥芬贝格将军是弗朗茨·斐迪南的亲信，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当过陆军部长。一九一四年接掌哈布斯堡第四集团军后，未掩饰他内心的不安。准备入侵俄国时奥芬贝格写道，“我们情况不好。这场战争事前准备不良，开始也没做好”。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康拉德和弗里茨尔都抱怨德国人不守信用，抱怨毛奇太顽固，坚持把重点放在西部战线，尽管弗里茨尔的抗议让奥芬贝格觉得可笑：“即使是最厉害的指挥官，都无法同时追捕两只兔子。”德国人得先解决英、法，才能回头对付东边的俄国。康拉德“对于他自己的作战构想没什么可说的，对于敌人没什么可说的”。弗里茨尔看起来“忧心忡忡”。只有皇储开心，因为没人想要向他说明情势。奥芬贝格还见了总司令部的德国军事代表团——胡戈·弗雷塔格-洛林霍芬（Hugo Freytag-Loringhoven）将军和卡尔·冯·卡格内克（Karl von Kageneck）上校——发现他们心情不好。这两个德国人已对康拉德的拖拖拉拉失去耐心。回到位于雅罗斯劳附近的集团军司令部后，奥芬贝格表示他很沮丧。他在

日记里写道："我们的状况不好。这场战争事前准备不良，开始也没做好。地形不利于我们，全世界也和我们作对。就连日本如今都已向德国宣战！"[26]

德国人仍想借由拿下塞纳-马恩省河边的胜利，打赢布格河边的战争，因此康拉德真正能走的路，就只有等待。奥匈帝国在战争初期享有的优势，已被他一点一滴流失掉。康拉德未调四十个师急赴俄国边界，反倒要不少的兵力绕道到塞尔维亚再转赴东部战线，而且要真的抵达加利西亚的三十个师在离边境还很远处下火车，然后把八月最后一个星期和九月头五天花在把第二集团军的最后几个师运来德涅斯特河边的斯坦尼斯劳（Stanislau）上面。而这时，俄罗斯人已动员两百七十万兵力——九十六个步兵师和三十七个骑兵师。由于兵力如此庞大（且德国人仍把重心放在西战线），俄国总司令部能摆出将小小的奥地利北方面军完全包围的威胁姿态。俄罗斯人在北边卢林布和海乌姆周边部署了两个集团军（第四和第五），在南边杜布诺（Dubno）周边摆了另外两个集团军（第三和第八），使康拉德两侧翼都受到威胁。只要攻向维斯瓦河（Vistula）和伦贝格南边，俄军就能把奥军包围在桑河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盆地里。[27]

俄军实际的推进情况与康拉德日益错乱的构想相抵触，于是康拉德又浪费了宝贵的数日思索该怎么办。吉娜封他为毛奇再世，因此他得表现出毛奇的样子。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康拉德终于向麾下诸将发令。他命令位于雅罗斯劳的莫里茨·冯·奥芬贝格将军的第四集团军与位于其左边的维克托·丹克尔的第一集团军向东北进发，丹克尔进向卢布林，奥芬贝格进向海乌姆。鲁道夫·布鲁德曼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和已从塞尔维亚抵达的第二集团军部分兵力，则要从伦贝格往东攻向布罗迪（Brody）。晚上八点看过康拉德的命令后，奥芬贝格惊讶于那些命令"有非常详细的行军表，却只字未提整体计划，未提我们该怎么做"。命令里完全没有指导思想。[28] 这就是康拉德的作风，不事先计划，但

视情况随机应变，如果成功就在事后把事实塑造为明确的计划，如果失败则把它们撇得一干二净。

康拉德的整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有问题。要攻向卢布林和海乌姆以切断俄国通往华沙、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的铁路，从南边、东边威胁维斯瓦河边诸要塞，只有在德国人从北边、西边威胁它们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才行得通。德国人未做出这样的威胁。他们已在八月二十日败于贡宾嫩（Gumbinnen），正在东普鲁士重整其军队。这意味着康拉德的钳子，最顺利的话，只会抓到空气；最糟糕的话，则反会遭俄国的钳子痛击，挡住其退路，使其无法井然有序退到桑河边（桑河是克拉科夫和往北、往南进入德国、奥匈帝国之道路的屏障）。

康拉德的一九一四年三月计划，预想由丹克尔第一集团军的九个师进攻与奥芬贝格第四集团军的九个师交战的俄军侧翼，并以伯姆-埃尔莫利的第二集团军为预备队。但由于第二集团军的兵力以分批零星的方式从塞尔维亚移入，康拉德于是将其报到的对象，由丹克尔部、奥芬贝格部，改为这时正与俄国第三、第八集团军相对峙的布鲁德曼第三集团军。事实上，俄国兵力集结愈来愈大，第二集团军必须增援奥军右翼，但由于康拉德让这支部队先到塞尔维亚过水，导致它来时已经太迟，对该地的战局也没有帮助。一如在塞尔维亚所见，这意味着奥军的兵力在每个地方都会太弱，在任何地方都打不出决定性的胜仗。丹克尔的日记证实此点：他写道，“我们后面”“空空荡荡”——只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德国一个军往南推进到塔尔努夫（Tarnow）或克拉科夫，以将德奥两军连在一块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没有预备队可用于乘胜追击或解救失败的进攻。

加利西亚境内三个半的哈布斯堡集团军，就是奥匈帝国用以对付俄罗斯蒸汽压路机的所有兵力。这样的兵力不足以令敌人生畏，奥芬贝格不得不在开赴边境的征途中发函麾下诸将，“尽管俄军火炮比我们多上

许多，但我深信我们炮兵向来的优秀表现会抵消那一优势”。他肯定是在开玩笑。俄军的重炮和高爆炸药会把奥地利“向来的优秀表现”一下子打倒在地。奥芬贝格忆道，通过经严密审查的奥地利报纸，比通过康拉德本人，更能清楚了解丹克尔部、布鲁德曼部的动向。康拉德拟定计划时，从未向他的将领透露计划内容。奥芬贝格把这称作康拉德的“秘密系统”，后来这位参谋总长则用它改写一九一四年历史，把自己塑造成受无能下属拖累者。[29] 康拉德事后声称他的三个集团军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大体系的一环，这个大体系的最佳防御之道就是进攻（以加利西亚第三集团军为诱饵引俄军来犯，第一、第四集团军则南进攻击该俄军），但那是厚颜无耻的虚构之词，以为哈布斯堡的野战集团军能在俄军部署越来越密的五百公里战线沿线自由移动，想法太偏离现实。

一九一四年初期康拉德就已在维也纳的某场将领会议上推演过这样的兵力调度，如今他还这么干，就更令人震惊。此刻领兵作战的诸集团军司令官都参与了那场会议，推演过程中有个集团军在普热梅希尔稳住侧翼和后部，三个集团军往东攻以包围俄军。那时东部战线的兵力比现今多了一个集团军，且那场兵棋推演虽有四个集团军投入，但康拉德仍指出令人忧心的障碍：烂泥道路、多雨的波罗的海气候、位于华沙和伊万哥罗德（Ivangorod，波兰语称登布林/Deblin）的俄军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将使奥军无法施展，需要德国大军增援才能将其攻破（而这样的增援大概可望而不可得）。[30]

尽管犯了上述种种差错，但康拉德至少统筹了奥匈帝国全国人力、物力的战争动员。俄国的战争动员则因为诸多权力中心的意见不一而未有定案，在如何打这场战争上，这些权力中心都还未打定主意。兵力部署问题令俄国大为头痛。一八一五年起成为俄罗斯帝国一省的波兰是个突出部，北邻德国东普鲁士，西接德国西里西亚，南邻奥地利加利西亚，乃是从俄罗斯嘴巴伸出的“波兰舌”。如何保卫这个突出部，该向哪个方向进攻去助西方的俄国盟邦一臂之力，成为被沙皇底下诸将领踢来

踢去的政治皮球。

沙皇尼古拉二世于一九一四年任命他五十八岁的堂叔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kolai）为俄军总司令，但这位大公的总司令部并未拥有实权，真正掌有兵权者是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Vladimir Sukhomlinov）。苏霍姆利诺夫自一九〇九年起担任陆军部长，已是公认的军中拉斯普京（译按：Rasputin，因医治了王子的病而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宠臣进而干预朝政的西伯利亚农民），生性爱出风头，且巧妙利用皇后的偏见打进高层成为沙皇心腹。他的治军作为，主要是为了壮大个人权力，而非为了军队的长远发展，在一九一四年前的七年里如走马灯般换掉多位俄国参谋总长，前后换掉的总长人数比德国过去百年里所换掉的还多出许多倍。[31] 苏霍姆利诺夫大搞这种以权谋私的事，无暇顾及建军备战的正务，尽管贪污情事屡遭披露，但仍得到沙皇与皇后保护，因为苏霍姆利诺夫对罗曼诺夫王朝（和拉斯普京）忠贞不贰，因为这位将领追随时代风潮鄙视俄罗斯国会。

这在一九一四年所带来的影响，乃是即使将军队部署到边境，俄军仍无法敲定协调一致的计划，仍无法在南、北两兵力群之间转移预备队。雅科夫·日林斯基（Yakov Zhilinsky）将军统率的西北方面军和尼古拉·伊万诺夫（Nikolai Ivanov）将军统率的西南方面军，都自视为固定不动的建制，不能视外在情势而变动，也不能缩减。两方面军的司令官（和提携他们两人的苏霍姆利诺夫）的威信，与兵力的大小和其兵力所享的优先权息息相关。德国与奥匈帝国的总司令部能将军级部队在不同前线之间调动，以因应实际战况的变动，俄国总司令部做不到。即使尼古拉大公想将某集团军的资源调到另一个集团军，也得征求苏霍姆利诺夫的同意，只要这一调动令他在野战集团军里的哪个门生不悦，他即会予以否决或修正。尼古拉大公的主要助手，尼古拉·雅努什凯维奇（Nikolai Yanushkevich）和尤里·达尼洛夫（Yuri Danilov）两位将军，都是苏霍姆利诺夫（不顾这位大公的反对）亲自挑选派任的，因此向苏

霍姆利诺夫征询意见之事根本不会发生。大公会请求调动，但雅努什凯维奇会表示后勤上根本办不到。



尼古拉大公、苏霍姆利诺夫与沙皇

尼古拉大公（左）、苏霍姆利诺夫将军（中）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右），照片摄于战前不久的俄国军事演习现场。尼古拉将出任参谋总长，但苏霍姆利诺夫得到沙皇宠信，实际掌握兵权。苏霍姆利诺夫和拉斯普京一样狡猾、贪腐，未成为尼古拉大公总司令部的助力，反倒紊乱指挥体系。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当康拉德竭力欲结束塞尔维亚境内战事并攻入俄国时，俄罗斯人正忙着敲定该怎么因应战局。尼古拉大公的新总司令部位于西北、西南两方面军的中途，白俄罗斯巴拉诺维奇（Baranovichi）镇上某条铁路侧线上的一个车厢里，比起位于华沙和基辅，设立已久且固定于一地的俄军司令部，寒碜许多。位于华沙的司令部专门对付德国威胁（俄国战前拟定的G计划），位于基辅者则对付奥匈帝国（A计划）。华沙、基辅两司令部都是苏霍姆利诺夫所扶立，也就是说它们都不大需要俄军总司令

部的协助，且两司令部无意于彼此的合作。华沙的将领知道他们得把既有的枪炮和刺刀全用来对付德国人；基辅的将领想先打败奥匈帝国，原因之一是担心波兰若遭成功入侵，可能不保。几位沙皇压制波兰语言、教会、贵族已五十多年，如果奥地利人或德国人在俄属波兰取得立足点，波兰人可能把他们当解放者来欢迎。英法催俄军总司令部加重对德国的军事施压，以消除西部战线的压力。处于这样的情势下，照理尼古拉大公该解决上述争辩，但他没有。当沙皇任命他为总司令时，这位大公反倒悲痛自己的无能，眼泪夺眶而出。沙皇既不喜欢他，也不信任他，军事上较听信苏霍姆利诺夫的意见。[32]

俄国的战前计划主张把重点放在奥匈帝国，对德国严采守势，但法国请俄国在东边佯攻以牵制德军，要求紧急修正G计划并准备进攻。佯攻行动将由坐镇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司令部，统率西北方面军的日林斯基将军领军。他也是苏霍姆利诺夫的人，战前任华沙军事行政长官，且曾（在一九一一年担任俄国参谋总长期间）承诺部署八十万兵力，以解除法国所受压力。[33] 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国二十五个军大举攻入法国，沙皇同意派伦南坎普夫（Rennenkampf）的第一集团军和萨姆索诺夫（Samsonov）的第二集团军进入遍布湖泊与森林的马祖里（Masuria）地区牵制德军。被委以这项牵制任务的日林斯基，此刻不可能领会该与友军合作对抗奥地利人的道理，或该与友军共享随着俄国的动员而在西北、西南两战线后方积聚的后备兵力的道理。俄军总司令部要日林斯基的两个集团军挺进东普鲁士的命令下得太突然，因而他们于八月十七日出征时，总兵力不到四十万，而非日林斯基先前所承诺的八十万。但他们的兵力仍比东线德军多一倍，因而俄国仍颇乐观。

这时俄国派了三十四个步兵师前往东普鲁士，四十七个步兵师开赴加利西亚。[34] 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所在的罗夫诺（Rovno），被英国武官说成“一个典型的俄罗斯边境城镇，肮脏，到处是尘土，街上充斥目瞪口呆盯着外地人看的犹太人”。尼古拉·伊万诺夫坐镇此司令部，参谋长

是米哈伊尔·阿列克谢夫（Mikhail Alekseev）。[35] 伊万诺夫掌管四个集团军：安东·萨尔扎（Anton Salza）将军的第四集团军和帕维尔·普列韦（Pavel Plehve）将军的第五集团军，从卢布林、乌海姆往西南部署；尼古拉·鲁斯基（Nikolai Ruzski）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和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的第八集团军，从塔尔诺波尔往西部署——鲁斯基部驻扎于塔尔诺波尔镇北边的杜布诺、布罗迪周边，布鲁西洛夫部驻扎于此镇南边。在伊万诺夫部与加利西亚首府伦贝格之间，只有德涅斯特河的两条小支流，兹沃塔利帕河（Zlota Lipa）和格尼拉利帕河（Gnila Lipa）。[36] 与伊万诺夫（前线指挥官）未生口角时，阿列克谢夫（前线参谋长）主张从右边出击，切断奥军往克拉科夫撤退的路线。其他人主张从左边进行侧翼包抄，也就是从南边绕到奥军后面，把奥军困在伦贝格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口袋里。

俄军总司令部的达尼洛夫将军力推这两个计划，主张俄军的优势兵力使其得以从康拉德北方面军的两侧翼进行双重包围。第四、第五集团军将包抄康拉德左侧翼，第三、第八集团则包抄其右侧翼。打过日俄战争、脾气坏但能征善战的伊万诺夫认为，说不定一战就能全歼奥匈帝国军队。康拉德在东部战线只部署了三十六个师，兵力只及俄军的一半，而随着俄国从内地调来更多师，敌众我寡的情势还会更恶化。[37] 如果可以做主，阿列克谢夫大概会要左翼的两个集团军（第三、第八）往前推，以掌控桑河一线并把奥军困在加利西亚，使右翼的两个集团军（第四、第五）得以将奥军团团包围。但由于战争头一个月法国蒙受二十五万人死伤，俄军总司令部决定由右翼的两个集团军打头阵，这两个集团军较靠近德属西里西亚，较可能引来柏林注意。[38]

一场大遭遇战俨然即将爆发，因为双方都深信已准备好一击就将对方击倒（在布格河边将康拉德击倒，在桑河边将伊万诺夫击倒）。伊万诺夫这时已从奥军行军路线沿线的多嘴村民口中了解到当面奥军兵力的薄弱，认为包围康拉德的北方面军指日可待。萨尔扎第四集团军的十五

个师和普列韦第五集团军的十八个师，要西进切断康拉德与克拉科夫的联系，萨尔扎部进攻热舒夫（Rzeszow），普列韦部进攻拉瓦鲁斯卡。鲁斯基第三集团军的十八个师要攻入伦贝格，布鲁西洛夫第八集团军的十五个师则要在伦贝格南边渡过德涅斯特河，以从侧翼包抄想守住该城的奥匈帝国军。普列韦的集团军在这一大调动后面居中策应，视情况协助包围伦贝格，或协助往克拉科夫的攻势。[39] 英国武官忆起快开打时伊万诺夫司令部里的兴奋气氛，还有俄军一名有妻有五个孩子的炮手流露的悲观。有人拍那炮手的背，告诉他不久就可回家与家人团聚时，炮手不以为然地说："有人说通往战争的路很宽，回家的路很窄。"

俄国的第四、第五集团军循着宽阔大马路南进，直指奥匈帝国北进的第一、第四集团军。俄国的第三、第八集团军被加利西亚南部的不良道路、注入德涅斯特河的一连串南北向河川、鲁斯基与其参谋间的争执拖慢速度，致使奥地利得以暂时免遭俄罗斯蒸汽压路机的蹂躏。补给和交通系统仍是俄军的罩门。俄国的摩托化程度比奥地利还低，一个十五万人的集团军只有十辆汽车、四辆摩托车，整个数百万人的大军只有不到七百辆交通工具。[40] 俄国的补给部门糟得令人愤慨，每次都因怠惰、腐败坏事。英国武官九月中旬参观过俄国后勤指挥部华沙总部后，报告了他的所见所闻："整个地方脏得无法形容；每个人都在等……似乎都甘于等。"似乎没有真正称得上补给体系的东西；可供使用的马是"可怕的稻草人"；犯人、逃兵、疗养的伤兵四处游荡没人管。[41]

俄国人不急于将零散分布于边陲地区的兵力统合成骇人武力，使奥地利当下在波兰突出部得以同样的胜算。三十五万奥军部署于该地，对抗同样兵力的俄军。康拉德预期可能得胜，甚至针对即将征服的华沙任命了一位军事行政长官。[42]

头几场大仗之前爆发了长达一星期的小冲突，暴露了奥、俄两军在战术上的重大差异。俄国人对火力有应有的看重；奥地利人则不然。在

八月十五日为争夺俄属波兰境内的贝乌热茨（Belzec）而爆发小冲突时，作为第四集团军先头部队的一个奥地利骑兵师率先与敌厮杀。该骑兵师请求维也纳第四条顿骑士团首领步兵团（位于附近的一营）来援，该营果然现身，但领军者不是个少校或上尉，而是团长路德维希·霍尔茨豪森（Ludwig Holzhausen）上校和其所有参谋。军人总喜欢说，“男人打第一仗的滋味，就像男孩的初吻”，那是军人冲上前接受火的洗礼时，令他们着迷的神秘滋味。

这时，俄国人（哥萨克人和某些步兵）已小心翼翼下马，藏身于房子里、树林里、墙后；他们不敢置信地看着霍尔茨豪森慢悠悠走到奥地利小规模战斗队形的前面，抽出马刀，率全营士兵往前。对于这位上校不可避免的丧命，奥地利官方报告提到他“极勇敢、不怕死的态度”，“激励士兵，驱使他们往前”。驱使士兵往前者，究竟是霍尔茨豪森的姿态，还是把这一营的侧翼士兵一个个撂倒的哥萨克人子弹，我们难以确知，但在为时九十分钟的交火中，霍尔茨豪森立即丧命。“一颗子弹打断他的颈动脉，几秒后他就一命呜呼，”该团某营长指出。该团三十八人跟着他一起丧命，五十一人受伤，在一场小规模战斗里死伤率达一成二。[43] 这种有勇无谋的男子气概，将使一支支奥地利部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失去指挥官。有那么多书面数据畅谈现代火力的杀伤力，却还出现这种蛮勇行径，着实令人不解。

奥地利数个集团军往四面大范围开展，其左翼的第六骑兵师于八月二十二日进入扎莫希奇（Zamosc），赫然发现该地有强大俄军。奥地利第三骑兵师在克拉希尼克遭击退，但不久即注意到有数股庞大的俄军纵队从拉多姆（Radom）、伊万哥罗德（登林尔）过来，换句话说是指向奥地利第一、第四集团军后方。[44] 一架孤零零的奥地利飞机，于八月二十二日从桑河河口起飞，注意到至少有俄国五个军从海乌姆、卢布林往东南急行。东南！这意味着俄罗斯人要集中全力对付位于伦贝格的布鲁德曼部，从而使他们的侧翼门户洞开，为对奥地利丹克尔部、奥芬贝

格部的“北攻”提供机会。粗心的康拉德忽视当面敌军后面的俄罗斯后备集团军，下令发动“北攻”。丹克尔同意“北攻”的确让奥地利有机会——至少从纸上谈兵的角度有机会——“从左侧击溃敌人，把俄罗斯人赶走到东边”。[45] 但这整个行动计划似乎太牵强。在庞大的当面俄军后面肯定还有庞大的后备兵力，而且康拉德不清楚俄军究竟在德涅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间广大地区的何处。八月二十三日，他只告诉他辖下诸集团军下面这点：“我们估计俄国在布格河与维斯瓦河间部署了八到十个师，其中无一个师在九月一日前可执行作战任务。”[46] 但事实上，在那个地区至少有三十四个师，而且那些全可执行作战任务。但没什么能让康拉德收手；诚如奥地利参谋史所指出的，“希冀是意念之父”，而康拉德希冀打出克敌制胜的重大一击。他不顾后果一心想干，因而甚至命令第三集团军，亦即仅存保卫伦贝格与北方面军右侧翼的兵力，准备开拔往北，加入这场“总攻击”。由于布鲁德曼部奉命参与“北攻”，科费斯部得渡过德涅斯特河，在伦贝格与普热梅希拉尼（Przemyslany）村之间地区做守势部署，并在那里等正慢慢移入斯坦尼斯劳的伯姆-埃尔莫利第二集团军的余部到来。[47]

情况已开始不妙。就在第三集团军开始往北移时，普热梅希尔康拉德总司令部收到东边有数大股俄军的惊人消息：从兹巴拉日（Zbarazh）、布罗迪、塔尔诺波尔围上来的步兵大军，以及位于胡夏廷（Husiatyn）的骑兵、步兵部队。配属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军医院的奥地利军官卡斯伯·布隆德（Kasper Blond），描述了被俄国大军包围的感觉：“我们的军队已离开；如今出现老百姓逃难人潮，男女老少，有的徒步，有的坐四轮马拉货车，全都往南边逃，或想往南边逃。老百姓花离谱的高价买兽拉大车，双手拿着一些家当四处乱转。女孩和妇女穿着睡衣行走；偶尔有辆塞满人和家具的敞篷四轮马车，从行走的人潮中穿出。”犹太人挤进这家医院，以躲过已洗劫他们店铺的暴民的伤害。[48]

康拉德拼命想从侧翼包抄俄军，却使自己侧翼门户洞开。但他不死心，八月二十二日再下令“总攻击”。他把他能再抽调的兵力都抽出来投入这一行动，下令第二集团军的第三军（伦贝格以东的几个部队之一）守住该城，击退从东边来犯的任何俄军，但要时时准备好开拔，加入“北攻”。保卫伦贝格的兵力，只剩第十二军、第十一师和已被八月中旬以来的种种作战任务损耗到几乎算不上是战斗部队的三个骑兵师。“我得提醒你，第一骑兵师自战争开打以来作战不断，骑兵人数已从三千八百人减为只有两千人，”阿瑟·佩特阿尼（Arthur Peteani）将军报告道，“我们亟须休息。”[49] 从巴尔干半岛过来的部队，要在斯坦尼斯劳渡过德涅斯特河，朝北部署。

在“北攻”部署就绪准备发动时，康拉德突然泼了一大盆冷水，下令部队八月二十二日休息。部队里有太多后备军人，士兵疲累，行动缓慢。但丹克尔仍然乐观，他在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写道：“俄罗斯人构成威胁，但是个小威胁。”他无知于俄国的真正实力，因而虚妄地认为“除了屈服于我们的优势武力外，他们别无选择”。丹克尔有些许不安，但不是太忧心。集团军开拔，在与萨尔扎部对决时，他觉得胜券在握：“很可惜塞尔维亚的战事不像这里这么顺利。”[50]

塞尔维亚的战事当然已打了两个星期，奥军总司令部把从中学到的一些初期教训，忧心忡忡地传达给北方面军诸将领，其中之一是“绝勿以没必要的行动削弱部队的士气和冲劲”。展开于伦贝格以西约一百六十公里处的北方面军的整个部署，无疑就是个没必要的行动，但还有更糟糕的。“军官绝勿发动正面强攻，得了解地形，得了解敌情，得绕过敌人侧翼，绝勿攻入未受压制的敌人枪炮火力中。”[51] 但刚刚吃力穿过塔内夫河（Tanew River）上游的森林、沙地、湿地，在纳雷夫—泰雷斯波尔（Narew-Tereszpol）一线休整的奥芬贝格集团军，还是准备往未遭压制的敌人枪炮火力网里冲锋。有位军官忆道，通往战斗之路，本身就是场战斗，得战胜一系列困难——及腰深的湿地，使人深陷到膝盖处的

松软沙质路径，然后是满地尘土的道路，炙人的高温，浑浊的水，没东西吃或没水喝（因为补给车比人更难以通过这样的地形）。[52]

八月二十三日，丹克尔的第一集团军在与安东·萨尔扎的俄国第四集团军于桑河东边的克拉希尼克相遇时，也手忙脚乱地投入了战斗。伊万诺夫命萨尔扎前进到桑河一线，守住从该河河口到雅罗斯劳这一段。丹克尔则以包围俄国这支进攻部队为目标配置其兵力，要第十军在右翼往前推进，第五军居中，第一军在左翼押后。两军相遇之前，丹克尔刚在日记里写道，他希望在克拉希尼克以西的这一线连绵的高地与俄军交手，而今果然如愿。[53]

萨尔扎派其第十四军、第十六军和掷弹兵军（精锐部队）上前线，前线拉得很宽，穿越扎克利库夫（Zaklikow）、亚努夫（Janow）、弗兰波尔（Frampol）诸村。丹克尔的左翼部队、第五师和奥地利防卫军第四十六师，在八月骄阳下汗流如注，在深沙地和深湿地踉跄前进，攻击扎克利库夫北边的俄军第十八师。

在中间部位，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三十七师，既要与盘踞亚努夫旁森林高地上的俄军周旋，也要辛苦解决语言麻烦。命令是以德语下达该师，但由于匈牙利人拘泥于细节，要求命令得以马扎尔语转达更下级部队，但往往下达给不会说马扎尔语，乃至看不懂马扎尔文的单位。[54]在右翼，丹克尔能集中五个师的兵力对付沃伊辛第十四军底下的两个师。俄军这两个师凌乱地分布于卢布林南边多沼泽、地势起伏、为森林所覆盖的三十二公里宽的地区上。奥匈帝国军队难得一次在兵力和火炮上居于上风，丹克尔抓住机会冲上前。



维克托·丹克尔将军

“谢天谢地，战争开打了，”奥地利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向塞尔维亚宣战时，维克托·丹克尔将军如此兴奋地表示。他还大胆表示，“俄罗斯人构成威胁，但是个小威胁”。才一个月多一点，丹克尔的奥匈帝国第一集团军就被俄国大军打得溃不成军。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丹克尔深信他与横跨欧洲的一场大胜息息相关，在日记里兴奋写道，“德国人在法国境内也大有斩获！”[55] 但在俄属波兰的西部边缘，战事比法国境内任何战事更为惨烈。第五军带头进攻，为夺下山顶的波利赫纳（Polichna）村，奥地利第七十六团三次强攻，导致六百人死伤或失踪。部队以密集队形攻上无遮蔽物的长长山坡，被火炮和机枪大批撂倒，然后以笨拙的纵队队形踉踉跄跄攻入村子，逐屋打肉搏战，虽然攻下村子，却只是惨胜。

明眼人都看得出，奥匈帝国禁不起和俄罗斯帝国打消耗战，但奥地利祭出这种自损兵力的战术，正是在打消耗战。但似乎没人注意到这点；战场上的奥地利军官写下可笑的战后报告，以粉饰如此可悲的死伤。第七十六团团长得意地表示，“人人都是英雄”。在这样的战术指导下，这些可怜人不得不成为英雄。[56]

从右侧合攻波利赫纳的奥军第三十三师，在仰攻这村子时，好似把这场仗当成十八世纪的战争来打：两个营横向相连当前锋，第三营在他们后面当第二梯队，第四营当预备队。第十四师以同样的方式进攻，四个营共千人组成密集的数个群，汗流浃背往山顶的波利赫纳攻。这个师的战斗任务大部分与救回第七十六团的幸存者有关，而有位奥地利上校写道，“我们自己的火炮”使这一任务较难达成，因为“它们的榴霰弹没打中敌人，反倒打中了我们”[57]。为夺取弗兰波尔和古拉伊（Goraj）两村，故以两面夹击桑河，俄军萨尔扎派其第十六军和榴弹兵军对付右边的奥地利第五、第十军。奥军从高处开火，将他们击退，然后反攻，掳获数百战俘和十九门俄国火炮。萨尔扎下令退往东北，退到数公里外，通往卢布林之路边的下一线高地。[58]



奥匈帝国某场强攻后尸体狼藉的惨状

奥地利军官喜欢把“男人打第一仗的滋味，就像男孩的初吻”挂在嘴上。但打仗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奥匈帝国步兵在刺刀冲锋里大批丧命，留下满地狼藉的尸体。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奥地利的蓝灰色军服，在塞尔维亚未使部队隐蔽，在这里亦然。有位军官写道：“我们一身蓝灰色，始终很醒目，而俄国人穿的土色军服则远没这么醒目。”[59] 康拉德在总司令部向某德国军官说明惨重伤亡时，不只归咎于军服。他怪罪于普奥战争的影响，指出哈布斯堡军队“不合时宜的蛮勇源于一八六六那场战争”，奥地利步兵在那场战争里就是这样进攻。或许康拉德说得没错；一八六六年后的经费不足、承平、升迁缓慢，使一九一四年时奥匈帝国的常备军官年纪都偏大（大部分上尉年逾四十，其中许多人将近六十）、肥胖、变不出新把戏。无法骑马的高阶军官坐汽车，但汽车很快就不能动，因为这个君主国没有进口橡胶可供制造备胎。“在这些烂路上开车要更慢更小心，”康拉德的补给主任低声说，“我们的轮胎没问题，关键在你怎么开。”[60]

伤亡虽然惨重，但奥军终究得胜。他们把俄军赶出波利赫纳之类的重要村落，占领克拉希尼克，挖战壕，度过让士兵和军官都紧张不安的一夜。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尝到打仗的滋味，而那令人胆战心惊。“露宿于遍地尸体和伤兵的战场上，伤兵整夜哭喊、求助，那经验是我们大部分人永远忘不了的，”奥地利第八十三团团长写道。[61]获欣喜的德皇威廉二世颁予铁十字勋章的康拉德，下令让丹克尔与已得到布鲁德曼部三个师增援的奥芬贝格部会合，接着下令这支集结的大军（丹克尔部、奥芬贝格部、约瑟夫·斐迪南大公的第十四军）攻向卢布林。丹克尔的左翼仍然没有掩护，但德国人承诺派一个军的地方防卫军增援。此刻，谁动作快，谁就占上风，但丹克尔却把不少时间浪费在二十五日与弗里茨尔某位副官的对应俗套上：弗里德里希大公从普热梅希尔派这位副官前来祝贺克拉希尼克大捷，丹克尔因此得精心准备他的响应。

丹克尔已得不到后勤支持（他的九个师已把补给品用光而且正往至少十八个俄国师的里面钻），但他似乎浑然不觉。八月二十五日丹克尔写道，他和奥芬贝格接下来能“把俄国人赶回到卢布林和更后面”。他评估了自己的几场胜仗之后吹嘘道，“俄国人正丢掉所有东西（战俘、炮、旗），逃离这区域”。但有份飞机侦察报告证实，数支俄国大军继续沿着维斯瓦河往丹克尔部的左侧翼和后方奔来。拿破仑时代有句老话，“包抄人者反被包抄”，在此就应验：丹克尔愈往前，出现在他身后的俄罗斯人就愈多。康拉德已把丹克尔部的第十军改调去保护奥芬贝格第二军的右侧翼，使丹克尔更难抵御俄军的攻击。由于没有多余兵力可抽调，康拉德此刻在玩骗人的把戏，把各军调来调去补洞，但每次移动都露出新洞。[62] 丹克尔和萨尔扎此时都望着南方苦盼援兵：奥军盼着奥芬贝格第四集团军的四个军，俄军盼着普列韦第五集团军的四个军。一如在一张垫子上互相兜圈子的摔跤选手，奥军和俄军愈靠愈近，双方都准备鼓起最大力气扑向对方。[63]

[1] Haus-，Hof- 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837，Munich，Aug. 14，1914，Vélics to Berchtold.

[2] Hew 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vol. 1，*To Arm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290.

[3] R. G. D. Laffan，*The Serbs*（New York：Dorset Press，1989 [1917]），195-196.

[4] HHSA，PA I，842，Berlin，Aug. 25，1914，Prince Gottfried Hohenlohe to Berchtold.

[5] HHSA，PA I，842，Berlin，Aug. 25，1914，Prince Gottfried Hohenlohe to Berchtold；Holger H，Herwig，*The First World War*：*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1914-1918*（London：Edw. Arnold，1997），92-93.

[6] Österreichische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Heereswesen und vom Kriegsarchiv，*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ed. Edmund Glaise von Horstenau（Vienna：Verlag Militätwissenschaftlichen Mitteilungen，1931-1938），1：12.

[7] Manfried Rauchensteiner，*Der Tod des Doppeladlers*：*Österreich-Ungarn und der Erste Weltkrieg*（Graz：Verlag Styria，1993），140-144.

[8] HHSA，PA I 842，Munich，Sept. 8，1914，Vélics to Berchtold.

[9]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1：176；C. R. M. F. Cruttwell，*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1914-1918*（Chicago：Academy，2007[1934]），52.

[10] Gerard Silberstein，*The Troubled Alliance*：*German and Austrian Relations*，*1914-17*（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0），278.

[11] Ward Rutherford，*The Tsar's Army 1914-1917*，2nd ed.（Cambridge：Ian Faulkner，1992），24；Herwig，*First World War*，89-90；Rauchensteiner，*Der Tod*，135-136，146.

[12] 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Mein Anfang*（Berlin：Verlag für Kulturpolitik，1925），9-18.

[13] Otto Laserz，"Die Feuertaufe von einem Kaiserschützen，der sie August 1914 miterlebte，" unpublished manuscript，Kriegsarchiv，Vienna（KA），Handbibliothek.

[14] Otto Laserz，“Die Feuertaufe von einem Kaiserschützen，der sie August 1914 miterlebte，” unpublished manuscript，Kriegsarchiv，Vienna（KA），Handbibliothek.

[15] KA，Neue Feld Akten（NFA）1787，31 ID，Sambor，Sept. 4，1914，FML Eh. Joseph：“Shooting at planes，whether our own or the enemy’s，is strictly forbidden.”

[16] KA，NFA 909，Aug. 1914，“Instruktion für das Benehmen der Kommandos und Truppengegen über Luftfahrzeugen.” Margin note in red：“Über haupt nicht schiessen！”

[17] KA，NFA 1372，XI Korps Kdo Lemberg，Aug. 12，“Leistungsfähigkeir der Fliegerkomp.”

[18] Lawrence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Architect of the Apocalypse*（Boston：Humanities Press，2000），153.

[19]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 Hö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280-281.

[20] Norman Stone，*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London：Penguin，1998[1975]），80；Arthur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A Year of the War on Many Fronts—and Behind Them*（New York：Scribner’s，1916），283-284；*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66，168.

[21]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168-169；Rutherford，*Tsar’s Army*，46.

[22] General A. A. Broussilov，*Mémoires du General Broussilov*：*Guerre 1914-18*（Paris：Hachette，1929），51.

[23] KA，NFA 1372，11 Korps Kdo，Lemberg，Aug. 23，1914，“Flieger Aufklärung.”

[24] Graydon Tunstall，*Planning for War Against Russia and Serbia*：*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Military Strategies 1871-191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228-234.

[25]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53.

[26]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Österreichs Hö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 （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278，283-284.

[27] Alfred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 1914-17* （London：Hutchinson，1921），1：97；Herwig，*First World War*，90-91.

[28]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286，288；Silberstein，*Troubled Alliance*，253-256.

[29] KA，B/3（Dankl）：5/1，Tagebuch（1），Aug. 2，1914；NFA 909，k.u.k. 4. Armeekommado，Aug. 11，1914，GdI Auffenberg；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265.

[30] KA，B/3：14，Vienna，Jan. 24，1914，Conrad，Generalbesprecbung 1914.

[31] Stone，*Eastern Front*，26；Nikolai N. Golovina，*The Russian Army in the World War*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11-13.

[32] Rutherford，*Tsar's Army*，31，34-35.

[33] Rutherford，*Tsar's Army*，27-28，47.

[34]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175.

[35]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50.

[36] Cruttwell，*History of the Great War*，50；Stone，*Eastern Front*，94；Rutherford，*Tsar's Army*，25-26.

[37] Stone，*Eastern Front*，82-83.

[38] Rutherford，*Tsar's Army*，53；*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177.

[39]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177.

[40] Timothy C. Dowling，*The Brusilov Offensive*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8；Rutherford，*Tsar's Army*，23.

[41]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97-98.

[42] Stone，*Eastern Front*，82，84-85.

[43] KA，NFA 1840，k.u.k. IR Nr. 4，Tarnawatka，Aug. 24，1914，Maj. Nauheim，“Gefechtsbericht über das am 15. August nördlich Podlesina stattgefundene Gefecht”；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271-272.

[44]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166-167.

[45] KA，B/3（Dankl）：5/1，Tagebuch（1），Aug. 13，1914.

[46]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288.

[47]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168-171.

[48] Kasper Blond，*Ein Unbekannter Krieg*：*Erlebnisse eines Arztes während des Weltkrieges*（Leipzig：Anzengruber-Verlag，1931），8-9.

[49] KA，NFA 1836，Wislowa，Aug. 28，1914，GM Peteani，“Tätigkeit der 1. KTD in der Zeitvom 15 Aug bis 27 Aug 1914.”

[50] KA，B/3（Dankl）：5/1，Tagebuch（1），Aug. 23，1914.

[51] KA，NFA 909，Przemysl，Aug. 19，1914，GdI Eh. Friedrich.

[52] KA，NFA 1845/2，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 80-83，Sibiu，Dec. 1930，GM Leopold Hofbauer，“Erinnerungen an meine Regimentskommando-Führung beim k.u.k. I.R. Nr. 83.”

[53] KA，B/3（Dankl）：5/1，Tagebuch（1），Aug. 23，1914.

[54] KA，NFA 1866，k.u. 74 Inf. Brig. Kdo，GM Cvrcek，“Aus führlicher Gefechts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zw. Andrrzejow und Wierzchowiska der 74. LW Inf. Brig. am24. Aug. 1914.”

[55] KA，B/3（Dankl）：5/1，Tagebuch（1），Aug. 24，1914.

[56] KA，NFA 1845/1，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 71-79，Aug. 31，1914，Col. Boeri，“Gefechts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bei Polichna am 23.8.1914.”

[57] KA，NFA 1845/1，Gefechts-Berichte der k.u.k，Infanterie-Regimenter Nr. 71-79，Sept. 2，1914，Col. Felzer，“Gefechtsbericht betreffend das Gefecht bei Polichna am 23.8.1914.”

[58]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182-183.

[59] KA，NFA 1845/2，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 80-83，Sibiu，Dec. 1930，GM Leopold Hofbauer，“Erinnerungen an meine Regimentskommando-Führung beim k.u.k. I.R. Nr. 83.”

[60] Herwig，*First World War*，91；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07-108；KA，NFA 2115，36 ID，Armeeoberkommando（AOK）Etappenoberkommando，Przemysl，Aug. 23，1914，GM Kanik，“Grosser Verbrauch von Pneumatics.”

[61] KA，NFA 1845/2，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80-83，Sibiu，Dec. 1930，GM Leopold Hofbauer，“Erinnerungen an meine Regimentskommando-Führung beim k.u.k. I.R. Nr. 83.”

[62] KA，B/3（Dankl）：5/1，Tagebuch（1），Aug. 24，1914.

[63] KA，Gefechtsberichte（GB）86，Generalstab Nr. 8，069，“Kriegserfahrungen”；Stone，*Eastern Front*，86.

第八章 科马鲁夫

康拉德仍认为他能以大胆的调度打赢东边这场大战，于是这时，在渐渐无力的“北攻”之外，加上南部一击。他从第三集团军抽走约瑟夫·斐迪南大公的第十四军，命其在拉瓦鲁斯卡镇（不久后将声名大噪的一个镇）附近的一片马铃薯田，进攻普列韦部的左侧翼。八月二十六日这个奥地利军由亚历山大·布罗施（Alexander Brosch）上校的第二皇家步兵团打头阵攻进去，他们就要首度体验打仗的滋味。他们的（青铜）加农炮首度开火时，有个军人向同袍说道：“兄弟，这些炮要一路轰到基辅！这下俄国人真的完了。”俄国人当然没完蛋。在这场战斗里，一如在其他大部分战斗里一样，奥地利旧加农炮大部分不管用，未能打中正从遥远某个丘陵后面间接开炮的俄国榴弹炮，甚至找不到那些炮的位置。

这支皇家高山步兵团，编成两个长长的小规模战斗队形，摇摇摆摆穿过马铃薯田，仍受累于随身携带的绳子、镐、冰斧、带钉铁鞋底。他们一接受现代火力的洗礼，立即省悟战争荣耀的虚妄。数十团白色和红色烟雾在头上方发出爆裂声，这些士兵首度感受到榴霰弹的威力。有位名叫约翰·科马罗米（Johann Komaromi）的该团步兵，描述了奥地利人的反应：“我们队形大乱，缩成数个小群体，想尽办法远离如雨落下的弹丸。”但榴霰弹的特色就是弹丸遍地落下，落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立即有六枚炮弹在他们上方爆开，引发恐慌，士兵“四处乱跑”以躲开弹幕。科马罗米在一山丘顶上趴下，往外一看……什么都没有。他写道：“完全不见敌人。”东线战事的一个奇怪之处，乃是未学过西方壕沟挖法的俄军，只往地上挖深沟却未筑矮防护墙，人一躲进壕沟，从外面

看就不见踪影了。奥军行进时，直到俄国农民兵站起身开枪，才注意到有俄军在近旁。[1]

俄军榴霰弹打到上空，弹头装有引信的炮弹落地，把草土炸到十二米的空中，皇家步兵团各排急往山下冲，跑了近百米跪下，以掩护下一批同袍过来。他们在下一个树林里找到俄军，以个别开火回敬俄军齐射的火力。同旅的另一团投入前线时，他们从侧翼包抄，把俄军赶出树林。俄军退到另一个树林继续开火。

几小时后奥军也拿下那片树林，但俄军火炮仍从看不见的远处阵地开炮，炮弹落在他们之间，准度惊人。这是刚开打的科马鲁夫战役的其中一小段，而在这一小段里，奥地利在战术、战略上的缺陷完全呈现。奥地利人抱着基本上属于十九世纪的观念，即战场上坚毅和决心会战胜火力与兵力的观念，来投入这场战争。布罗施的团报告道："俄军藏身壕沟与树林里，使我们的步枪不易找到目标，从而迫使我们上刺刀往前冲锋。"[2]

这当然就是俄国的盘算：把奥地利人赶到开阔地杀掉。俄国步兵团士兵若与奥地利皇家步兵团士兵单挑，绝非后者的对手，但靠着齐射的火力，他们重创敌人，而俄国炮兵安稳地位于步兵团后方约三公里处，不断炸死奥军。拿下第二座树林后，奥地利人本该掘壕固守或退到俄军火炮射程之外，结果却受到军官的糊弄——"你们心里不怕，对不对？"——要他们再度进攻，目标指向远远的炮阵地。这最后一次冲锋，损耗更多精锐兵力却毫无所得。奥军也让自己的军官无端步入鬼门关；科马罗米的营长和连长都在这场战争第一天丧命。他的排长冷冷看淡这些伤亡，开玩笑道"今天还在，明天走掉"，一个星期后他也战死。[3]

对俄军来说，这场战争也不是很顺利。与俄军每次交火，奥地利人都注意到对方火力管控不佳。俄国步兵团不准单兵单独开火，只能照军

官指示一齐开火。但他们总是往高处打，因而被他们打死打伤的前线奥军士兵，不如后方没有提防而被他们打死打伤的奥军士兵来得多。只要曾有俄军待过的地方，地上都散落黑色小弹夹，说明他们开枪浮滥不知节制。这些爱扣扳机的俄国农民兵，可能使俄国步兵团变成没牙的老虎；在俄国每月为全军一百一十五个师生产五千九百万发子弹时，光是俄国一个师打一天仗就能轻松打掉四百万发。换句话说，俄国三座子弹工厂一年生产七亿发步枪弹，而军队一个月就把一年产量打掉。[4]

俄国炮兵已开始感受到炮弹不足，而且此后直至战争结束，都未能摆脱此不足之苦。俄国制定作战计划者把重点放在动员其庞大军队，却未用心思索在战场上如何维持这支大军。达尼洛夫将军忆道，“需求之大怎么也料想不到”。俄军参谋部以为一个月三十万枚炮弹的产量（相当于每炮每天一至两枚炮弹）足敷使用，但实际上显然不够。炮手一天发数百枚炮弹，一个月耗掉两百万枚，使库存迅速耗竭，但由于战争开始时，苏霍姆利诺夫的陆军部已关闭俄国的炮弹工厂，把工厂工人送到前线，所以耗掉的库存根本补不回来。要从国外买也不易，因为俄国的港口遭封锁（土耳其人封闭黑海、德国人封闭波罗的海）。[5]

为善用克拉希尼克之胜的余威追击溃败之敌，丹克尔下令仍归他指挥的两个军于八月二十六日出击。走没多远，他们就发现俄军并未撤退，而是在鲁德尼克（Rudnik）周边的下一排高地上筑起强固阵地，挖了战壕且部署了火炮。此事具体地说明了为何奥地利绝对打不赢这场战争。俄国有更多兵员，更多火炮。奥芬贝格曾得意地表示，奥地利炮兵“向来的优秀表现”会抵消俄国在炮兵和口径上的优势，结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俄国炮兵在八公里的射程内有效打击奥军，而配备青铜加农炮的奥军得逼近到三公里或更近处，炮才打得准。俄国人在每一处的火炮数量也多于奥军，因而，诚如某绝望的奥地利报告所说的，“敌人始终能以其少量火炮消灭我们的进攻步兵团”，用剩下的火炮消灭奥地利的火炮，造成“大量伤亡”。[6]

但火炮只是使奥匈帝国在这场战争中吃瘪的诸多因素之一。奥军为数不多的机枪，因为机枪组员抹猪油防锈导致枪管卡住而故障（康拉德的总司令部吼道，“立刻把每挺机枪的猪油清干净”[7]）。奥地利人没有办法迅速移动、用火炮和机枪为步兵团助阵或将敌人打得一蹶不振。他们再怎么好也只是如同一支没有火炮助阵的小型俄军。俄军步枪射击出了名的不准，但诚如某奥地利军官所说的，俄军众枪齐发的气势（“他们许多人从远距离一齐开火，低沉的枪声轰轰不断”），令奥地利战斗部队胆寒，尤其是因为奥军通常不准还击，“上级严令保住他们仅有的少许弹药”。武器和知识的贫乏，战前就已明显可见，但多年来康拉德粉饰太平，掩盖真相。

酷热的八月天，丹克尔部将领伫立凝望鲁德尼克的俄军壕沟，讨论如何对付。他们把攻击行动延后一天，然后于八月二十七日打入覆盖林木的高地区。每个部队都死伤惨重，奥地利炮兵完全未出手干扰位于掩体里的俄军。奥地利第八十三团攻下一道俄军壕沟，上校团长接受了一名俄军上校和他团里数百人投降。俄军上校挥着白手帕从壕沟里现身，就奥军士兵的“勇敢”向奥军团长道贺。他说，“我的兵绝不会那样子进攻”，而从战场上横七竖八、无法替补的奥地利人尸体来看，这实在称不上是恭维。俄军上校和其他战俘被送到后方，离去时他向奥军上校说：“脱掉你穿的那些黄色军官绑腿；我们远远就看见它们，朝它们开火。”[8]

双方军队仍不清楚对方位置，只能诉诸揣测，但被奥地利参谋部誉为“精明、做事有条不紊之杰出领导人”的伊万诺夫，这时开始理出头绪。[9]他猜丹克尔部的左翼是整个奥地利北方面军的左翼，且认为那左翼位于从托马舒夫到扎莫希奇的道路上，于是命普列韦的第五集团军往西南急走，从侧翼和后方攻打它。萨尔扎要在古拉伊的高地上停住，挡住奥军，让普列韦部打进他们的侧翼。鲁斯基要与俄国第三集团军直直往前挺进。利用伦贝格到拉瓦鲁斯卡的道路，他将能攻击位于伦贝格的

奥地利第三集团军，或从南边逼使奥地利第四、第五集团军往中间移动以便予以包围。

丹克尔未觉察自己可能遭从两侧翼包抄吃掉，仍一味要求进攻，催促其疲累的部队往维兹尼察（Wiznica）溪走，然后渡溪。丹克尔的第一军（第五、第四十六师）吃力往维尔科瓦斯（Wilkolaz）前进。七十一岁的萨尔扎未遵照指示在古拉伊固守，反倒退往卢布林。伊万诺夫当场毙了他，升阿列克谢·埃弗特（Aleksei Evert）接替。

丹克尔的第十军进入古拉伊，发现俄国步枪和其他装备散落一地。[10] 在为期三天的克拉希尼克之役中，奥匈帝国部署一百四十四个步兵营、七十一个骑兵中队、三百五十四门火炮对付兵力约略相当的俄军，俄军失利，损失两万人和二十八门炮。丹克尔虽损失一万五千兵力，但仍获颁玛丽亚·特蕾莎十字勋章（Maria Theresa Cross）表彰其英勇，而皇帝则为终于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感到极为欣慰。在维也纳，有人迅即编出曲子《丹克尔将军之歌》（*Lied vom General Dankl* ）。歌共八节，描述“俄罗斯大军从北方越过干草原而来，如沙滩上的沙粒不计其数”，恣意“杀烧和劫掠”。这首歌唱道，丹克尔把“俄罗斯狗”一路赶回卢布林，他的部队“以有力的喊杀声拼命追击”，厕身其中的丹克尔挥剑砍倒俄罗斯狗，直到“无俄罗斯人可杀”为止。[11]

康拉德的积极进攻，一时之间似乎收到成效。战前他狂妄地预测他会像凿子般把俄军裂成两半，把他们赶进黑海和普里佩特湿地，而当下这预测似乎就要成真。[12] 丹克尔已重创萨尔扎的集团军，奥芬贝格已蓄势待发准备攻打普列韦部。把来自东普鲁士的消息也纳入考虑的话，俄国的情况更显不妙。在东普鲁士，德国第八集团军得到从法国抽调过来的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增援，八月底时投入坦嫩贝格之役（Battle of Tannenberg），击溃俄国西北方面军的两个集团军，死伤俄军三十万，掳获六百五十门炮，威胁挺进波兰，与节节进逼俄国的奥军联手。柏林

贩卖报刊的女人向路人喊道："掳获数千俄国战俘，兴登堡还在算他们人数！"（因为报童都被送上前线）[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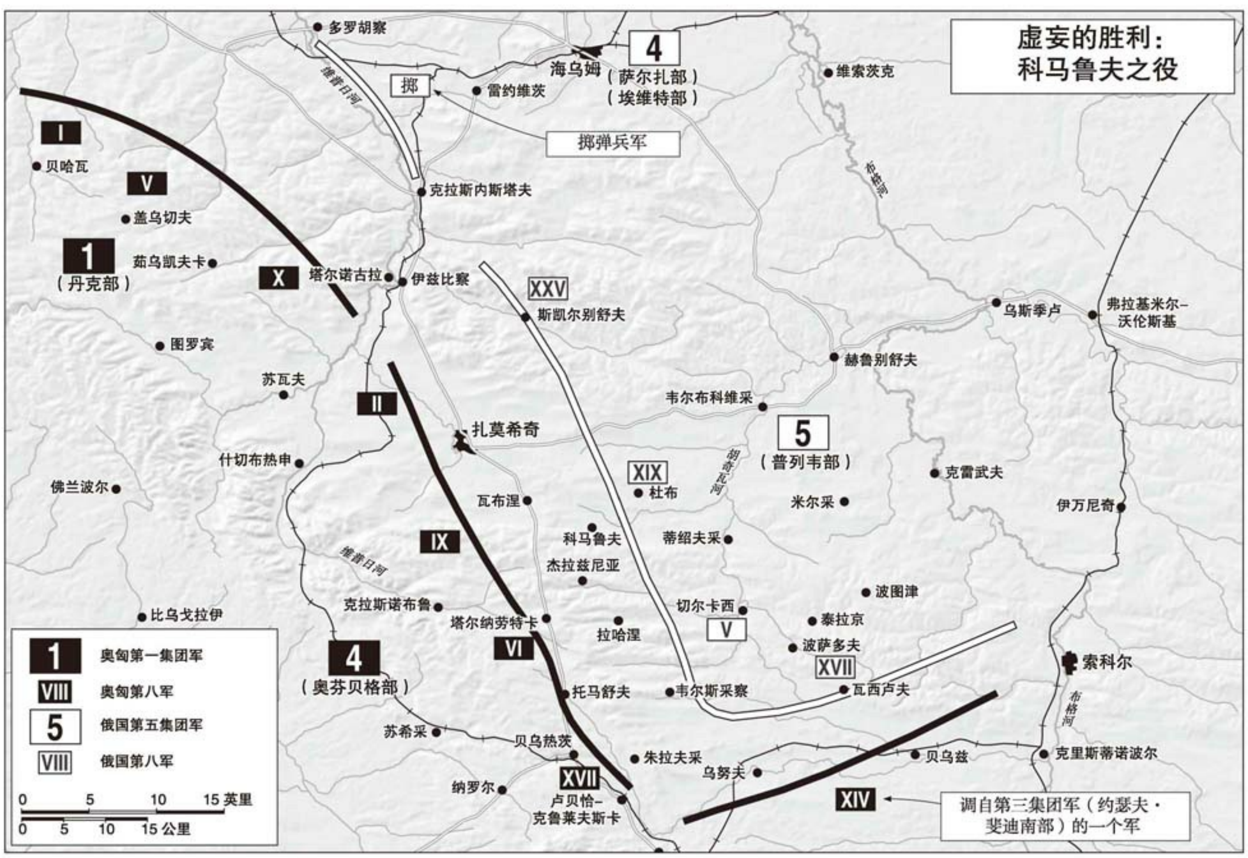
但德国胜利不表示奥地利也会胜利。虽有《丹克尔将军之歌》，但奥地利并未将"俄罗斯狗"解决。他们只是暂时后撤，而且无疑未退到卢布林那么远。能停下休息的少数奥军部队，每个夜里都被哥萨克人（或哥萨克人来袭的传言）惊醒，"向四面八方猛开火"，被自己人打死打伤的奥地利人，远比死伤于哥萨克人之手的奥地利人还要多。[14] 但德皇仍在二十八日颁予老迈的弗朗茨·约瑟夫功勋勋章（Pour le Mérite）——普鲁士最高勋章，又称"蓝马克斯勋章"（Blue Max）——以感谢奥地利拿下的这些初期胜利（如果能把它们称作胜利的话）。

丹克尔于二十九日再度出击，攻进下一道丘陵，死伤殆尽。埃维特的第四集团军正集结更多兵力，欲往西推进找出丹克尔的侧翼。在中间部位，丹克尔的第三十三师从俄国人手里辛苦夺下皮奥特罗科夫（Piotrokow）村，但不久又被敌方枪炮杀死数千人。光是第八十三团在二十九日就损失四百士兵和六名军官。奥地利军官仍傻傻地要部队以营纵队方式前进，以进行长距离冲锋，然后要心怀恐惧的士兵上刺刀，大步跑过那最后一段距离，冲入俄军的步枪、机枪、榴霰弹火网里。

俄国人拥有奥地利人所没有的一种求生本能。他们会背靠壕沟壁的上段躺着，向上了刺刀冲锋的奥军猛烈开火，直到第一批杀红了眼的奥军抵达壕沟边缘为止。这时壕沟里的每个俄国人会同时高举双手投降。有位奥地利上校后来写道："我提及此事，只为证实我们的庞大伤亡不是俄军进攻所致，而是俄军的防御火力所造成的。"奥地利军官身先士卒，大批丧命，俄国军官则偏爱押后；"我们很少在前线附近看到俄国军官；大部分俄国军官在很后面，受到很好的掩护"。俄罗斯人发挥农民的狡诈，打起仗比奥地利人聪明。隔天，兵力耗竭的奥地利第八十三团收到其第一个"行军营"（菜鸟新兵和后备军人）。这个营从该团的特

兰西瓦尼亚兵站派来，以填补死伤的现役兵员。消耗战已开打。[15]

由于俄军犯错，康拉德已不可思议地挺进到布格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区域，挫败了俄军欲渡过桑河、将德国与奥匈帝国军队分开的企图。眼下，他掌握了主动权。但好景不长，俄军总司令部正调拨普列韦的第五集团军和普拉东·利奇茨基（Platon Lichitski）的第九集团军，以包围、剪除康拉德的左翼。位于康拉德右边的伦贝格，就要被俄国蒸汽压路机碾碎。后来康拉德声称他估计威胁伦贝格的俄军只有十个师，但那又只是文过饰非之词。事实上，有充分的警讯要他留意俄军整整两个集团军（第三、第八）十六个师逼近。[16] 但康拉德很想拿下一场大捷，以为只要他更强力推动“北攻”，俄军就会瓦解。但更强力推动“北攻”和从右翼抽调更多兵来强化其左翼，只能使他位于伦贝格的右翼更难抵御敌人进犯。如果俄军击溃右翼或绕过右翼后面，康拉德将失去在北边拿下的所有土地，北边的诸集团军也很可能全军覆没。[17]



康拉德无视于这些应考虑的因素，命奥芬贝格与丹克尔部一起攻向卢布林。奥芬贝格部铺展在百公里宽的前线上，在八月二十六日碰上六十四岁普列韦之第五集团军的侧翼，当时普列韦部正往丹克尔的右侧翼吃力前进。[18] 康拉德从头到尾把心思全放在他的情书上，二十六日把宝贵时间花在与他的政治顾问约瑟夫·雷德利希聊吉娜上。八月炮火在四周隆隆作响之际，雷德利希表达了他的反感；他喜欢康拉德这人，但遗憾于这位将军的“悲观与多情”和其对已婚情妇的执迷。雷德利希震惊于康拉德的忧郁和“无限天真”。在他眼中，这位参谋总长“在人生与世事的判断上像个小孩子……与一般的参谋官没有两样”。要让奥匈帝国军队站得稳走得远，康拉德得深思熟虑，得有果断行动，但被例行公事和他对吉娜“老人般”的溺爱所缚，他办不到。[19]

在未得到康拉德充分指示下，奥芬贝格抓住这一可重创普列韦部的机会，希望能与来自左边的丹克尔部和来自右边的约瑟夫·斐迪南大公部一起包围这支俄军。这又是奥匈帝国军与俄国蒸汽压路机一次难得的旗鼓相当的情况，由奥芬贝格的一百五十六个营、四百七十门炮对抗普列韦部的一百四十四个营、五百二十六门炮。奥芬贝格命其第二军往迷人的文艺复兴风格城镇扎莫希奇挺进，命其第六、第九军往科马鲁夫进发。科马鲁夫是位于高处的市集镇，镇上最高处是一座可扼控周边田野的砖造教堂。约瑟夫·斐迪南大公的第十四军，从伦贝格一路往上打，要在第六军右侧强力挺进，边缘兵力掠过布格河，以完成对普列韦部的包围。

八月二十六日，奥地利第二、第九军的四个师，在扎莫希奇的古帝国道路上与俄国第二十五军交手。厌烦于康拉德不断更动命令的约瑟夫·斐迪南大公，要其部队在维尔基（Wielkie）停脚休息。所幸他做此决定，因为康拉德这时又改变心意，要这位大公勿与奥芬贝格合作，改调头走回伦贝格支持布鲁德曼部。奥芬贝格则得靠自己的兵力完成既定任务。他把他的第六军往右侧部署到远处，以接替约瑟夫·斐迪南大公离

去那一军的位置。于是，倒霉的第六军第十五师不由得得以一个师的兵力执行原计划以五个师执行的任务。

丹克尔部二十六日休兵，受到俄军从克拉希尼克北边射来的炮火才起而应战。针对八月二十七日，丹克尔打算继续进攻；尽管精疲力竭且兵力因死伤而受损，但康拉德仍把第一集团军视为“北攻”的左钳。埃维特的集团军似乎要退到卢布林。二十七日，丹克尔以两个军进攻，从俄军手里夺下几个村子，又有大批人员死伤。但情势看来乐观，因为据观察，俄国三个军在奥军攻击之前就开始撤退。丹克尔于二十七日将其司令部移到克拉希尼克镇上，移入前一日还在顿河哥萨克（Don Cossack）团总部的一栋建筑里，这时则打算移到杜扎（Duza）和贝乌日采（Belzyce）。但经过数日战斗和行军，他的集团军已几乎溃散。他的第一、第六军死伤殆尽，亟须行军旅来填补兵力。丹克尔下令二十八日休兵。

尽管丹克尔部这一钳行动缓慢，但奥芬贝格仍瞥见胜利。调来提振萨尔扎部萎靡之士气的埃维特仍在北撤，使普列韦的第五集团军失去保护。八月二十七日，这场战役的第二天，奥芬贝格要斯维托扎尔·冯·博罗耶维奇（Svetozar Boroevic）将军的第六军在拉哈涅（Rachanie）攻击普列韦部第十九军的侧翼；博罗耶维奇最初有所斩获，但后来碰壁，他的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三十九师遭俄军打掉一半兵力。奥芬贝格在奥莱希采（Oleszyce）的府邸花园里来回踱步，听着远远的隆隆炮声，这时突然有人递上初期死伤名单，奥芬贝格睁大眼睛不敢置信：“这上面说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三十九师死伤一半。我不愿相信，但后来更精确的消息传来，证实有些部队甚至损失过半兵力。”[20]

在右侧，弗里德里希·沃年斯基（Friedrich Wodniansky）将军的第十五师进攻普卡尔舒夫（Pukarczow），但他的士兵已“因为炎热、口渴、没睡觉而萎靡不振”。一如克拉希尼克的丹克尔部士兵，以匈牙利

人居多的这些士兵费力爬上俄军已挖好壕沟的高岭，进入让他们成片倒下的火网里。光是沃年斯基部的第五团，就在这几波攻击里损失八名军官和三百名士兵，而找不到人来操作该团的机枪乃是死伤如此惨重的原因之一。[21] 争夺马沃尼什（Maloniz）附近某个覆林山顶的沃年斯基部某旅，攻到山顶时发现“我们整个小规模战斗编队，两百三十人，全已死亡。”俄军把他们杀光，然后撤到一百米外屠杀另一批人，一个营的波斯尼亚人：“俄罗斯人太会隐藏；每次我们派一个小规模战斗编队前去，都立即被整批撂倒。”拼命往上爬时，军官们（一位少校、几位上尉、几位中尉）想带领士兵进攻，却一个个遭撂倒，无一幸免。少校大喊：“兄弟们，让你们在国内所挚爱的人看看你们是何等的英雄！”然后死在进攻队伍第一排。十一名军官死，七名军官伤，包括写这份报告的上尉。他跑过一挺俄军机枪前面，子弹哒哒哒扫来：左颊（擦伤）、腹部（擦伤）、马刀（解体）、左肩（射穿）。[22] 另一位连长被炮弹炸飞进林间湿地，头昏脑涨，无法动弹。[23]

奥地利兵员不够多，打不赢俄国；哈布斯堡军队渐渐迷失于辽阔地区，与周遭的友军失去联系。这使俄军得以渗透进那些地区，朝奥军侧翼和后方开火。沃年斯基接到继续前进的命令，但他办不到，因为他的前方和他整个右侧翼都有俄军。若要攻到俄军和猛吐子弹的俄军机枪前，他得越过胡奇瓦河（Huczwa）的林间湿地。[24] 回到贝乌热茨（Belzec，一九四二年时成为一恶名昭彰之纳粹死亡营的市集镇），博罗耶维奇将军试图用电话、电报、传令调动他的第六军。数则报告指出俄军从东南过来，奔向科马鲁夫，这意味着奥芬贝格的胜利保不了多久。[25]

后来所谓奥地利在科马鲁夫大胜的说法，从作战记录来看，似乎不大站得住脚。这场战役只打了一天，兵力吃紧的奥芬贝格诸部队，就如某将领所说的：“分崩离析，快要陷入混乱。”士兵已有数日未睡或未好好进食。他们行军时走到睡着，甚至打仗时打到睡着。第十五师已在二

十五日时走了约三十公里，二十六日走了约二十公里，二十七日走了约二十四公里，三天下来没吃过温热的一餐，只睡了六个小时。博罗耶维奇一再保证会让他们多休几天以“补偿”这些天的劳累，但休息日总是遥遥无期的“明日”。这些又累又火的士兵拿下托马舒夫这个战前原是俄国设兵驻防的城镇时，掠夺俄军兵营和军官住所，把能带走的都偷走，带不走的全毁掉。[26] 他们累到一肚子火。

弗里德里希大公从普热梅希尔斥责奥芬贝格（“你得制止这些离谱恶行，那毁掉我军的国外形象、使士兵相信掠夺没关系”）时，康拉德正发动他的另一场离谱的作战行动。普列韦部似乎已被困于科马鲁夫的口袋，但博罗耶维奇无法在右侧封死这口袋，于是，刚刚才打电报告诉奥芬贝格位于伦贝格的第三集团军情况“不妙”的康拉德，这时仍下令约瑟夫·斐迪南大公部把他那个已吃了好久苦头的第十四军（再度）调头，与奥芬贝格部再度会合。[27] 该军士兵已于二十六日往南穿过沙地和林间湿地，这时却奉命调头，往反方向再穿过同样地形，平白浪费掉一整天。这些强行军（没来由的一天走五十公里）渐渐毁掉这个军，每天使将近一成的兵力因“掉队”而流失。[28]

这位大公的参谋长约瑟夫·帕伊奇（Josef Paic）将军，在日记里记载了人在遥远后方办公室的康拉德向前线部队一再更改命令之事。二十六日：“部队辛苦行军以投入第四集团军的战斗；就在我们要下达攻击令时，电话响起，我们接到新命令，要我们折返走回伦贝格，以支持第三集团军在该市东边的战斗。”帕伊奇的参谋忙了四个小时以调整整个军的行进方向，心知“方向变更和新的行军会大大打击部队士气”。四小时后，在二十七日凌晨一点十五分，辎重队和野战炮已上路往南，后面跟着没睡的步兵时，帕伊奇收到康拉德另一组命令：“走往伦贝格之事搁置，执行原计划。”[29]

第十四军徒劳折返时，奥芬贝格有了几天前才组建的新部队，卡尔

·胡因（Karl Huyn）将军的第十七军，加入他麾下，并命令该军第十九师从贝乌热茨前去攻打似乎搞不定自己究竟是猎物还是掠食者的普列韦部。眼下，奥芬贝格仍觉得自己是掠食者；彼得·斐迪南（Peter Ferdinand）大公的第二十五师已在二十七日拿下扎莫希奇，该市一位市政官员遵照传统归服仪式，献上盛放了面包和盐的一只浅银盘向征服军表示归服。彼得·斐迪南的参谋长忆道："士气很高，我们死伤很轻。"但他也指出，在这里，在左中侧，奥匈帝国军队似乎也处于垮掉边缘。他们自二十一日一直行军、打仗，没有休息。"照理我们该追击俄军，但办不到。我们需要休息一天。"他们于二十八日休息，彼得·斐迪南大公住进中央饭店的豪华房间。[30]

奥芬贝格重拾原计划，也就是要博罗耶维奇部迅速往前，把俄国第十七军、第五军钉死在胡奇瓦河的河湾处，然后要从南边折返的约瑟夫·斐迪南大公部攻击他们的侧翼。但博罗耶维奇部累垮了，几乎走不动，更别提打仗。二十七日晚康拉德豪气干云要奥芬贝格部一路攻到海乌姆时，奥芬贝格吃惊得差点说不出话。"去海乌姆？"奥芬贝格结结巴巴地说，"为此他们拿走我三分之一兵力，拨给布鲁德曼？"那些部队最终（第二次）归建，但已无法影响科马鲁夫之役的结局；这些增援部队来得太迟也太累。"这些士兵会怎么想我们？"奥芬贝格在日记里写道，"我们要他们在烈日下沙子路上迂回前进。"[31] 为巩固自己右翼，以迎接约瑟夫·斐迪南大公部的到来，奥芬贝格于二十八日午夜刚过就叫醒他的第十五师，要他们往前，从俄军手中夺下蒂绍夫采（Tyszowce），以稳住第四集团军的右翼。他们跋涉过胡奇瓦河的林间湿地后，黑暗中遭到俄国第五军袭击。未得到充分休整的这支奥地利师立即整个溃散，仓皇撤退，损失四千人和二十门炮。[32]

急欲取得胜利的奥芬贝格，想找出兵力日增的俄军之侧翼。他打算继续往东北走，指向海乌姆，但空中侦察提醒，"在海乌姆—蒂绍夫采一线有强大敌军正往我军右翼合围"。这是鲁斯基的第三集团军，奉命

急奔西北解救普列韦部，趁奥军还未能从侧翼包抄普列韦部时包抄奥芬贝格部。奥芬贝格惊愕，要约瑟夫·斐迪南大公部在胡因第十七军旁靠拢，派一个骑兵师做侵略性侦察，击退鲁斯基或普列韦欲包抄奥芬贝格右翼的任何企图。

约瑟夫·斐迪南大公辖下布罗施上校的第二蒂罗尔皇家步兵团，日夜兼程赶去与奥芬贝格部会合。有位老兵忆起从科马鲁夫部队长途跋涉到伦贝格部队再走回来之事："奥芬贝格在那里，布鲁德曼在这里，我们在炎炎夏日里走在这两地之间，翻越起伏的绿色丘陵，穿越古老森林，走向无边无际的蓝色地平线。"这支三天前在拉瓦鲁斯卡附近打过小冲突的部队奉命开拔，这时已往回走，惊叹于俄罗斯的辽阔和寂静，置身其中只觉得自己渺小。二十八日，布罗施疲累的轻骑兵团无精打采走进贝乌热茨"这个贫穷、受到洗劫、极为肮脏的犹太村"，终于准备从南边大举进攻普列韦部的左侧翼。[33]

人在普热梅希尔的康拉德仍然相信他会打出制胜的一击，八月二十七日打电报告知奥芬贝格，"这场战役的成败，如今系于对左翼这些大有可为的攻击能否圆满达成上"。奥芬贝格大吃一惊。"对第十四军别有什么期望，它已被总司令部不断更改的命令丢在后面"，使该部和丹克尔部（康拉德所提及的"左翼"）易遭普列韦部、鲁斯基部攻击。[34] 康拉德对这些劝诫充耳不闻。后来丘吉尔写道，"机枪和有刺铁丝网已准备好要让这场攻势的诸多鼓吹者，包括他（康拉德），认清许多事实"。[35] 康拉德这时要奥芬贝格以其所有可用兵力大胆挺进：战场上任何一地遭挫，都不得撤退。[36] 在战场上与敌厮杀过的奥地利军官，都已察觉到这场仗已输，这场战争大概也会输，冷冷开玩笑道，"最起码我们都已留了一颗子弹了结自己"。沃年斯基将军不是开玩笑：那天夜里，他拿起手枪顶住头，自杀身亡。[37]

奥芬贝格辖下诸师八月二十八日休息——暴风雨前的宁静——等待

针对二十九日的指示。康拉德帮不上什么忙，因为他的心情已从极度乐观猛然转为忧心忡忡；先前还夸称会打出制胜一击，这时他却与霍夫堡宫翻旧账，声称这场战争打不赢，坚定表示要是皇帝于一九〇九或一九一二年就听进他先发制人的主张，现在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他写了封时机挑得特别不对的信给博尔弗拉斯，信中发牢骚道，“真是造化弄人，如今竟由我承担那一疏忽造成的烂摊子”。[38]

康拉德麾下军官也在思索未来下场；他们知道得趁当面的俄军还未能重整、增强兵力之时，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为安抚正在马恩河边力拒德军的盟邦法国的不满，俄军以不符合稳扎稳打要求的速度行军、作战，因而在前期这几场仗里被打得七零八落、组织涣散，面对丹克尔部、奥芬贝格部的攻击却反应迟缓一事正是明证。当奥地利第十四军（现为奥芬贝格第四集团军右翼）挺进到距该集团军位于扎莫希奇的左翼不到两天的行军距离时，情况似乎表明康拉德那忽而冒出的乐观有其道理。但俄军总司令部终于有所反应，将第九集团军调到西南方面军，以阻止丹克尔部与奥芬贝格部会合和挡住奥军前进。俄国第四集团军的司令部禁不住外部压力而垮掉，集团军司令官萨尔扎以二十三日的惨败为由撤掉沃伊辛，不料伊万诺夫反将萨尔扎本人撤职，让谁都看得出是个庸才的沃伊辛恢复原职。在对面的普热梅希尔，似乎也是无能当道。但俄国两个集团军（第四集团军和作势威胁的第九集团军）足以挡住丹克尔部，而将鲁斯基部调去解救普列韦部，也将挡下奥芬贝格部的攻势。[39]

为在鲁斯基部尚未将普列韦部救离南边之前打败普列韦部，奥芬贝格在奥莱希采花了长长一晚筹谋划策，八月二十九日早上六点半他下达其计划：“第四集团军以所有可用的步兵发动总攻，执行即将到来的决定性一击。”[40] 胡因的第十七军——这时胡因已因“紧张”撤职，由卡尔·克里泰克（Karl Kritek）将军接掌——扮演将第四集团军与约瑟夫·斐迪南大公的第十四军接合的角色。第十七军也要从右侧扫荡普列韦部，将

其困死在科马鲁夫予以歼灭。[41] 奥芬贝格原以为反胡因的兵变（胡因的参谋长致电总司令部，“如果不处置他，我们会自行毙了他”），已稳住他的右翼，这时发现不然。克里泰克接任后，辖下诸师和胡因在任时一样没有进展，它们辖下诸旅在欲渡过胡奇瓦河攻入普列韦阵地的心脏地带时，遭俄军火炮、机枪击退。每次奥军拿下一座山岭，都发现俄军只是拔营到后面的山顶，在那里挖壕沟、架机枪固守。原野上星星点点般散布的小树林都部署了俄军步兵团，每次奥军攻击，他们就朝奥军侧翼开火。奥军一挺机枪开火，就会招来俄军三或四门火炮反击。俄军炮弹落个没停，陆续击毙第三十四团大部分军官和歼灭该师两个皇家步兵营。第十九师投入其最后的预备队，也在俄军火力下撤退。[42]

左侧的情况一样糟。布拉修斯·舍穆瓦将军统率的第二军摸索着前进（舍穆瓦原任参谋总长，一九一二年遭撤换，由康拉德接任后，出掌第二军）。舍穆瓦的第二十五师由彼得·斐迪南大公指挥，而在二十八日休息后，大公于隔日离开扎莫希奇舒适的中央饭店，继续东进。但彼得·斐迪南的第五十旅立即受到俄军来自科马鲁夫的猛烈炮火袭击。就据认为被困在口袋里的部队来说，俄军的积极进攻令人佩服。

彼得·斐迪南大公命第二十五师攻向杜布村（Dub）以封住口袋，而由于俄军反击日益快速，这一目标似乎渐渐变得不合理。这位大公原以为会在其左侧找到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的一个师，不料却发现哥萨克人。他的炮兵一如以往不管用，射出的榴霰弹越过俄军壕沟时，未伤及敌人，而俄军重炮发出的炮弹，则令第二十五师和此师两侧的友师军心恐慌。俄军两个集团军（普列韦的第五和鲁斯基的第三集团军）围住他们，在这条地动山摇的前线沿线，每个奥军部队都以为俄军已突破他们的防线，欲攻向他们的侧翼。在二十九日夜色降临时，精疲力竭的奥军士兵就地睡觉，预备队摆在小规模战斗队形后面百步之处，没有炊火，没有杂音。舍穆瓦的命令透过口耳悄悄传给大公，再传给第十师，要其天一亮就重新进攻，但第十师告诉大公，该师八月三十日得休息一天，

因为“士兵累瘫了”。[43]

康拉德在科马鲁夫周边的失利和他把预备队调去支援该处战事一事，在伦贝格铸下恶果。第十四军被调拨去支持奥芬贝格部，削弱布鲁德曼集团军的兵力，俄国第三、第八集团军看出此点，八月二十六日攻向伦贝格。他们扬言不只要击溃布鲁德曼的中军，还要从两侧翼对他双重包围。不管奥军在科马鲁夫拿下什么短暂的胜利，如今都要在伦贝格被俄军讨回去。到处都是俄军，奥军每个人都觉得兵败在即，军心涣散。陆军部长亚历山大·克罗巴廷将军从维也纳发了封电报到普热梅希尔，督促康拉德平息从他的总司令部和诸集团军沸沸扬扬传出的“骇人、丧气传言”。[44]

但这时已是人人自危，意志消沉。第十四军被拨到奥芬贝格辖下后，布鲁德曼这时得用仅仅两个半军的兵力守住伦贝格：他自己的第十一军，以及第二集团军的第三军和第十二军的一个师。事实表明，要第二集团军到塞尔维亚过一下水再过来加利西亚一事，铸下大错，因为伦贝格所急需的另外三个师，这时仍在从萨巴茨经匈牙利缓缓运送过来的途中。最好的情况下，布鲁德曼或许可靠九个师勉力对付俄军至少十六个师的兵力；他要能撑这么久，只有寄望于烂路和鲁斯基谨小慎微的习性。[45] 下辖四个军的鲁斯基，仍信服雷德尔时代的认定，即认为奥匈帝国的主要作为会是从伦贝格南攻，而非指向科马鲁夫的北攻（这时他仍认为奥军的北攻是佯攻）。鲁斯基认定挡在他前面的奥军有三十个师，而非九个师，因此率部朝奥地利的东都缓缓推进，在他自己的地盘上一天平均只前进八公里，进了奥地利地盘，速度则更慢。

鲁斯基的移动缓慢让康拉德生起不切实际的指望，以为他能在科马鲁夫拿下胜利，即使这么做会削弱布鲁德曼部，使其陷入险境。这时，即使是奥匈帝国的前线部队都渐渐理解到他们与俄军的兵力对比有多悬殊；俄居优势、奥处劣势的传言甚嚣尘上，布鲁德曼不得不下令凡抓到

散播此谣言者一律处死。他吼道："趁还来得及，加强军纪！"[46]

但已太迟。伊万诺夫催促鲁斯基前进之后，终于在八月底开始攻向伦贝格。奥匈帝国军的离谱疏失，让他如虎添翼：伦贝格周边的奥地利将领用不防窃听的电话线讨论计划，让俄国人听得过瘾。康拉德迟迟才得悉俄国人这一监听刺探行为，勃然大怒，要求军官讲电话时用乔伊斯密码。此后提到伦贝格时要说Uzldampf，说到一个军时要说Ulmklotz，说到一个师时要说Ulmtexas，诸如此类。[47] Uzldampf是奥匈帝国第四大城，四条重要铁道的交会点，基于影响力和军事需要，康拉德禁不起丢掉它，但八月三十日时，伊万诺夫所集结进攻伦贝格的兵力，已是布鲁德曼防守该城兵力的三倍之多。鲁斯基将从东边攻打伦贝格，布鲁西洛夫则从南边。

俄军在伦贝格周边这些动作，令奥芬贝格和丹克尔意识到，克拉希尼克、科马鲁夫之胜不是胜利，而是他们自己被兵力大上许多、看来更能打的俄军包围、击败的序曲。这两位奥地利将领接着都猛踩刹车，清楚每往前一步，就只是让自己更深陷俄军的口袋里。在扎莫希奇附近，奥地利第一、第四集团军之间，立即出现一道三十公里宽的缺口，普列韦快马驰过，脱离险境。在北边尝到胜利滋味的康拉德，这时只能沮丧看着战前被蔑称为"病老头"的普列韦逃脱。[48] 奥芬贝格把此事归咎于彼得·斐迪南大公八月三十一日将其第二十五师后撤，"把许多已拿下的地方还回去"。彼得·斐迪南照理该在科马鲁夫"用所有用得上的步枪和火炮"封住包围圈，却在收到报告说他后面有俄军后收手。"令人无比失望，他把胜利果实丢掉，"奥芬贝格如此写道。一九一二年压下的奥芬贝格内线交易丑闻，一九一五年时被重新挖出来大做文章，使他受到难堪的谴责，就此结束戎马生涯。而在上述兵败得找人咎责的情况下，奥芬贝格这样的下场只能说是在劫难逃（毕竟彼得·斐迪南大公是哈布斯堡皇室成员）。[49]

彼得·斐迪南大公的参谋长写下了他自己的科马鲁夫之役报告，把主要过错归在来自奥芬贝格的联系不良上面。战役初期诸集团军司令官就一致认为，由于俄国基础设施简陋且国土辽阔，急报得花上数天才能送达，命令的有效率传达，在这一战场比在其他任何战场都来得重要，但奥芬贝格的命令和目标每一次都迟迟才送达或完全未送达。这一延宕使俄军有时间填补缺口，将后备兵力和火炮送到前线解围。这时奥军的炮弹和子弹已快用尽，却又面对得到增援、有较好补给的俄军部队。欲使奥军各部队翼翼相连，但每次都未能成功——几乎每份报告里都出现“与邻近部队接触因林间沼泽而无法如愿”这行字。

八月三十日下午两点，彼得·斐迪南大公得悉他两翼的部队遭兵力大于己方甚多的敌军攻击，但予以击退。这位大公和第四集团军战线上的每个指挥官这时都清楚，奥芬贝格、康拉德和军方新闻处所正高声要求的将俄军围于科马鲁夫一事，根本不可能。事实上，俄军正企图包围奥芬贝格部。那天下午四点，彼得·斐迪南大公呈报舍穆瓦：“我们得做出选择，不是撤向扎莫希奇，放掉我们目前为止已打下的重大战果，就是今天下午把剩余兵力全投入最后攻击，攻向杜布求胜。”奥芬贝格一心想转败为胜，从司令部派奥埃尔斯佩格亲王（Prince Auersperg）少校快马驰往彼得·斐迪南的司令部，传达“继续前进，在杜布完成对敌包围”的命令。[50] 但这时，就连奥埃尔斯佩格亲王出马，都无法让奥匈帝国第二十五师动起来：它已力气耗尽。奥芬贝格自己的科马鲁夫战役回忆录，证实奥匈帝国士兵不再信杜布包围这一招：“前线士兵的抱怨声越来越大。”他们感觉到四面都是俄军，觉得守不住。在约瑟夫·斐迪南大公部的左侧，第四师未出现，奥地利地方防卫军第十三师（德意志人、捷克人、乌克兰人）已解体为惊慌失措、不愿坚守的数股兵力。约瑟夫·斐迪南大公寄望于右边，恳请第十师为最后一击支持兵力。但第十师回以人、兽、炮、弹药皆匮乏，予以拒绝。从边境行军过来、与敌数场厮杀、缺眠、频频恐慌，把每个人累垮。

但这位大公仍不死心。他搬出自己的哈布斯堡皇室成员光环——和他作为当地最资深师长的身份——命令第十师拿出它最用心、最后的努力，与他的师一起对杜布发动同心圆式的攻击。数小时后，黑夜降临，第十师师长的传令，穿过树林和林间沼泽，送来了对皇族成员那道命令的回复："我军东边一千五百步处是俄军阵地——架设了八挺机枪和火炮的数道壕沟。我军第三十六团和第十二皇家步兵营进攻这一阵地一整日，遭击退，伤亡惨重。在我军火炮摧毁这些阵地之前，再启进攻都是徒劳。"

奥军撤退，嘴里仍夸称他们已在克拉希尼克、科马鲁夫拿下大胜。但把这些胜利称作胜利，就像靠得分拿下第一轮但在第二轮被击倒的拳击手声称已赢得比赛一样，乃是自欺欺人之词。厚颜的奥芬贝格，称科马鲁夫之役是"这场战争里，甚至应该说是这君主国历来打过的战争里，最漂亮的一场机动作战"，也就是说五百年来最了不起的胜利。他认为他在科马鲁夫的战绩，至少和老毛奇在柯尼希格雷茨的战绩一样出色，说"在这两场战役里，战胜者所拿下的战利品差不多：一八六六年是一万八千战俘、一百八十二门炮；一九一四年是两万战俘、两百门炮"。[51] 当然，时移势易，这样的战绩和柯尼希格雷茨之役的战绩完全不能比，因为二十世纪的俄国能以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奥国所办不到的方式迅速填补两万人力。但奥芬贝格仍迅即获皇帝赐予"冯·科马洛夫"（von Komarów）这个尊称和八千克朗的奖赏。局部胜利总是聊胜于无。

---

[1] Kriegsarchiv，Vienna （KA），Neue Feld Akten（NFA）1877，Sept. 28，1914，GdI Eh. Friedrich，"Erfahrungen aus den bisherigen Kämpfen."

[2] KA，NFA 1868，GM Stipek，Bozen，Oct. 7，1914，"Gefechtsbericht u. Belohnungsanträge über das Gefecht am 28. Aug. 1914."

[3] KA，NFA 1868，Johann Komaromi，"Damals bei Budynin."

[4] KA，Gefechtsberichte（GB）86，Generalstab Nr. 8069，“Kriegserfahrungen，Taktik der Feinde，” n.d.；Timothy C. Dowling，*The Brusilov Offensiv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7；Nikolai N. Golovine，*The Russian Army in the World War*（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132.

[5] Golovine，*Russian Army*，126；Dowling，*Brusilov Offensive*，6；Ward Rutherford，*The Tsar’s Army 1914-1917*，2nd ed.（Cambridge：Ian Faulkner，1992），24.

[6] KA，NFA 1878，k.u.k. 2 Korps Kdo，Jan. 21，1915，“Kriegserfahrung.”

[7] KA，NFA 1845/2，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 80-83，Sibiu，Dec. 1930，GM Leopold Hofbauer，“Erinnerungen an meine Regimentskommando-Führung beim k.u.k. I.R. Nr. 83”；NFA 909，Aug. 17，1914，“Einfetten der Wasserjacke vorgeschrieben.”

[8] KA，NFA 1845/2，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 80-83，Sibiu，Dec，1930，GM Leopold Hofbauer，“Erinnerungen an meine Regimentskommando-Führung beim k.u.k. I.R. Nr. 83.”

[9] KA，B/1438：18-28（Paic），Beilage zum Aufmarschbefehl：“Russland—Charakteristik einiger Generale.”

[10] Österreichische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Heereswesen und vom Kriegsarchiv，*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Vienna：Verlag der militärwissenschaftlichen Mitteilungen，1930-1938），1：184.

[11] KA，B/3：14（Dankl），Karl Paumgartten，“Das Lied vom General Dankl.”

[12]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12-13.

[13] Dennis E. Showalter，*Tannenberg*：*Clash of Empires*（North Haven，CT：Archon，1991），318-326；Arthur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A Year of the War on Many Fronts—and Behind Them*（New York：Scribner’s，1916），106-107.

[14] KA，NFA 1807，15 ID，Gefechtsberichte，k.u.k. 15 ITD Kdo，“Gefecht bei Pukarczow am 27. U. 28. Aug. 1914.”

[15] KA，NFA 1845/2，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

80-83 Sibiu，Dec. 1930，GM Leopold Hofbauer，“Erinnerungen an meine Regimentskommando-Führung beim k.u.k. I.R. Nr. 83.”

[16] FML Rudolf Pfeffer，*Zum 10. Jahrestage der Schlachten von Zlocsow und Przemyslany*，*26-30 August 1914*（Vienna：Selbstverlag，1924），42；*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186.

[17] Pfeffer，*Zum 10. Jahrestage*，43.

[18]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vol. 1，190；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 Hö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293.

[19] Josef Redlich，*Schicksalsjahre Österreichs 1908-19*：*Das politische Tagebuch Josef Redlichs*（Graz：Verlag Böhlau，1953），1：254，259.

[20]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295-296.

[21] KA，NFA 1840，k.u.k. IR Nr 5，Innsbruck，May 10，1915，Maj. Koch，“Gefechtsbericht：Ereignisse vom 26-29 August 1914.”

[22] KA，NFA 1850，k.u.k. bh IR Nr. 1，Vienna，Oct. 30，1914，“Gefechtsbericht，” Capt. Nikolaus von Ribicey；Vienna，Oct. 25，1914，Oberlt. Anton Viditz，“Gehorsamste Bitte.”

[23] KA，NFA 1850，Vienna，Dec. 6，1914，Capt. Bruno Brelic，“Gefechtsbericht.”

[24] KA，Militärkanzlei Seiner Majestät（MKSM），MKSM-SR 95，Aug. 30，1914，AOK to MKSM.

[25] KA，NFA 1807，15 ID，Gefechtsberichte，k.u.k. 15 ITD Kdo，“Gefecht bei Pukarczow am 27 and 28. Aug. 1914.”

[26] KA，NFA 1807，15 ID，Gefechtsberichte，k.u.k. 15 ITD Kdo，“Gefecht bei Pukarczow am 27 and 28. Aug. 1914.”；KA，NFA 909，6. Korpskommando，Stubienko，Aug. 19，1914，“Disposition”；NFA 909，Oleszyce，Aug. 28，1914，GM Krauss.

[27]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296-297.

[28] KA，KFA 1878，“Unzulänglichkeit unserer Friedenskader des Heeres.”

[29] KA，B/1438：29-37（Paic），GM Paic，“Auszug aus dem Tagebuche des XIV. Korpskommandos für die Zeit vom 26. August bis 14. September 1914”；*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199.

[30] KA，B/677：11-22，June 1918，“Den Verlauf der Schlacht von Komarów.”

[31]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295-297.

[32] KA，MKSM-SR 95，Aug. 30，1914，AOK to MKSM；*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200.

[33] KA，NFA 1868，Johann Komaromi，“Damals bei Budynin.”

[34]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298.

[35] Winston S.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29.

[36] KA，B/677：ll-22，June 1918，“Den Verlauf der Schlacht von Komarów”；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301.

[37] KA，NFA 1807，15 ID，Gefechtsberichte，k.u.k. 15 ITD Kdo，“Gefecht bei Pukarczow am 27. und 28. Aug，1914.”

[38] Churchill，*World Crisis*，161.

[39] C.R.M.F. Cruttwell，*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1914-1918*（Chicago：Academy，2007 [1934]），40；Norman Stone，*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London：Penguin，1998 [1975]），85-86；Rutherford，*Tsar's Army*，25-26.

[40] KA，B/677：11-22，June 1918，“Den Verlauf der Schlacht von Komarów.”

[41] Rudolf Jerabek，“Die Brussilowoffensive 1916：Ein Wendepunkt der Koalitionskriegführung der Mittelmächte，” dissertation，Vienna，1982，13.

[42] KA，NFA 1868，Lt. Karl Popper，“Das Feldjaegerbattalion Nr. 6 im Weltkrieg 1914.”

[43] KA，NFA 1845/2，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 80-83 Sibiu，Dec. 1930，GM Leopold Hofbauer，“Erinnerungen an meine Regimentskommando-Führung beim k.u.k. I.R. Nr. 83.”

[44] KA，NFA 909，Vienna，Aug. 25，1914，FZM Krobatin，“Mitteilungen über Kriegsereignisse.”

[45] Scone，*Eastern Front*，88；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299.

[46] KA，NFA 1372，3. Armeekdo，Sambor，Aug. 20，1914，GdK Brudermann，to corps，“Festigung der Disziplin”；Lemberg，Aug. 22，1914，GdK Brudermann to corps，“Verbreitung unwahrer Gerüchte.”

[47] KA，NFA 1842，Przemysl，Aug. 30，1914，Op. 1962，GdI Conrad.

[48] KA，B/1438：18-28（Paic），Beilage zum Aufmarschbefehl：“Russland—Charakteristik einiger Generale.”

[49] KA，B/677：11-22（Auffenberg），n.d.，Auffenberg，“Verlauf der Schlacht von Komarów”；Auffenberg，314-316；Golovine，*Russian Army*，143.

[50] KA，B/677：11-22，June 1918，“Den Verlauf der Schlacht von Komarów.”

[51] KA，B/677：11-22（Auffenberg），n.d.，Auffenberg，untitled draft，Vienna，Dec. 1916，“Skizze aus den letzten drei Jabren meiner 43-jährigen Dienstzeit.”

第九章 伦贝格与拉瓦鲁斯卡

抽调布鲁格曼的大部兵力增援奥芬贝格，不仅在科马鲁夫未有任何帮助，反倒造成奥军兵败伦贝格。但康拉德未改其一贯作风，这时试图倚赖不久前才被他削弱兵力的那位司令官挽回颓势。奥芬贝格部与丹克尔部都已几乎败下阵来，康拉德于是命令布鲁德曼部和伯姆-埃尔莫利之第二集团军的残部挽救东部战线的危局。八月二十五日康拉德命布令鲁德曼东进，“击退敌军，借此稳住全军的侧翼和后方”。[1] 换句话说，“北攻”已完蛋，束诸高阁。始终鼓吹进攻的康拉德，试图以从伦贝格发动而未经事先规划的“南攻”取代“北攻”。不消说（克拉希尼克、科马鲁夫两战役已清楚点出奥匈帝国攻势作为的可能下场），这场以配备小规模炮兵的小型军队发动的攻势，大概也不会顺利。服役于第三军第四团的后备军人奥托·拉塞茨，二十六日午夜酣睡时被同袍叫醒，奉命开拔前往伦贝格火车站。这支步兵团带着迷迷糊糊的睡意，鱼贯走过该城漆黑的街道，进入宽阔气派的新艺术风格车站。这座火车站十年前才花费巨资建成，以拓展奥地利的东向贸易，象征哈布斯堡王朝在加利西亚统治地位的永远屹立不摇。

士兵挤进货运列车车厢，向东驶往普热梅希尔。从东边进抵伦贝格，要越过两道天然障碍：格尼拉利帕（“烂酸橙”）河、兹沃塔利帕（“金黄酸橙”）河。布鲁德曼希望在这两条河后面掘壕固守，击退俄军。火车抵达格尼拉利帕河时，睡意未消的士兵奉命下车：“每个人都出去，拿起装备，排好队，移动！”拉塞茨忆起当时的混乱和兴奋，因为这批奥地利士兵还未打过仗：“敌人在哪里？哥萨克人在哪里？”到处都没看到。士兵排成一列走回车站，第一次看到伤兵，那是从兹沃塔利

帕河用兽拉车运回的。“前线情况怎么样？”士兵兴奋喊道。伤兵只是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们或有气无力地挥手。拉塞茨所属部队搭货运列车回来，再转往兹沃塔利帕河，一路开着门，听到隆隆炮声。他们在杜纳尤夫（Dunajov）下车，组成小规模战斗队形。

第四条顿骑士团首领步兵团士兵看着友军在前面山丘上部署的一个炮台；没几分钟，炮台就受到俄军炮弹、榴霰弹的夹叉射击。一枚接着一枚炸开，全以那群炮兵为目标，不时可见红焰和黑烟，被炸上天的泥土，或榴霰弹在上空爆炸释放出的白烟。奥地利炮手开始在自家火炮之间拼命躲避，有一名炮手逃出炮台，尖叫着跑下山，欲投奔拉塞茨的排，最后还是被一枚炮弹炸死。拉塞茨发子弹给他的兵时，看到在伯姆-埃尔莫利率部从塞尔维亚来到之前，统率第二集团军部分兵力的赫尔曼·科费斯将军，站在杜纳尤夫铁路路堤上，往这边、那边看，想弄清楚这场嘈杂的战斗是怎么回事。

拉塞茨这群人穿过一个贮木场，看到一群轻骑兵摊开四肢躺在地上，“筋疲力尽，死气沉沉，一脸疲累和恐惧”。这些来自维也纳的德意志族步兵，在以行军队形走过轻骑兵身旁时，向他们热切地敬礼，用德语喊着“奥地利军队”，但全是匈牙利人的这些轻骑兵，一脸愠怒报告他们。拉塞茨的排走到一片草地，正欲穿过草地时，一支匈牙利军乐队从草地另一头的树林走出来，快步跑过他们身旁，后面拖着他们的号，喊着“炮弹！炮弹！”这支步兵团终于来到兹沃塔利帕河——“一条又深又窄又浊的溪”。他们拆下一道围篱，往溪对岸丢去，架起临时桥，然后渡溪。围篱垮掉，他们掉进溪里，拼命往对岸游，爬过岸边的烂泥上岸。“我们的漂亮新蓝灰军服毁了，湿透，沾满黑色烂泥，”拉塞茨埋怨道。



接受急救的奥匈帝国伤兵

一九一四年八月伦贝格附近的军队急救站。经过的士兵兴奋喊道，“前线情况怎么样？”伤兵只是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们或有气无力地挥手。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黑色烂泥痕迹一路穿过被压平的青草，说明了这群人如何前进，他们以小规模战斗队形匍匐前进，其中大部分人咕哝道，他们的香烟和巧克力都毁于水和淤泥。他们爬进小麦田，俄军步枪弹嘶嘶飞过上方，然后他们碰到“我们的第一具军人尸体：一个穿军服、装备一应俱全的匈牙利人，右侧着地侧躺，一只手臂往外伸，脸色死白，张着空洞的眼睛盯着我们，血从鼻子和嘴汩汩流出”。不久，这些奥地利人爬过更多尸体身旁；他们起身改成蹲姿，往前冲，终于看到约六百米外的树林里有俄军。整个营一齐开火，“一千支步枪同时发射”，然后冲锋。一九一四年奥匈帝国战术的愚蠢，在此展露无遗：俄军位在约六百米外，藏身树林里，奥军起身——耳边响起尖锐哨子声——开始冲刺。这时俄军机枪开火。拉塞茨看到子弹打在他前后左右，士兵倒下，身体被打碎、流

血，地上的尘土往上翻飞。他们与一支匈牙利部队并肩进攻，在他们旁边挤成一团，朝俄军边跑边开枪，而除了看到俄军开枪的火光，仍看不到俄军的人。

奥地利人趴在地上，决意再往前冲以缩短射程，匈牙利人却“像疯子一样”开枪，且不愿停，使奥地利部队无法往前。有位中尉跑过去要匈牙利部队停火，另一位中尉起身带他的排往前。拉塞茨一直记得那张脸：“带着惧意，面如白蜡，右手紧抓着手枪，手指头关节因用力而变白，先看了我们，再看向（俄军盘踞的）树林。”这位中尉立即中弹身亡；事实上，拉塞茨注意到他开始喊“趴下”时，他已经中弹。

号手吹响冲锋号，整个连起身，冲入有去无回的枪林弹雨里。另一名中尉带头冲锋，“挥舞马刀，尖叫，高喊”。连长“拜尔勒上尉像一团白云般冲上前，身上穿着白色亚麻长裤”，赶上中尉。匈牙利地方防卫军部队也往前冲；拉塞茨记得有个人在他旁边跌跌撞撞往前，完全看不见前面，因为他举起他的掘壕工具挡在脸前面当盾牌。他们靠近树林时——左右的人倒下，到处有吼叫声、尖叫声、高声祷告声——一群匈牙利人进入树林，然后又慌张失措地退出树林。拉塞茨抵达树林，发现俄军已撤走。这是俄军的一贯打法，在一地坚守，重创以刺刀冲锋的奥地利人后，就撤离。拉塞茨第一次看到重伤军人，“半裸，浑身是血，痛得尖叫”。

拉塞茨与在树林里迷了路的一些俄国人正面相遇，他猛然举起枪，俄国人——这些“留着白胡子的大鸡”——迅速举手投降。奥地利人打量这些战俘，对俄罗斯人身上充当战斗服的简单农民长罩衣印象最为深刻：“嘿，上面没有纽扣！你相信吗？这些家伙身上没有纽扣！”然后他们拿到他们的第一个作战纪念品，主要是俄罗斯帽和子弹带。拉塞茨一派轻松走回树林边缘，看到一地的死伤——草地上到处是奥地利、匈牙利人尸体，伤兵“呻吟，号哭”，太阳西下，树林渐暗。[2]

拉塞茨所属部队，是支遭大幅削减兵力后的布鲁德曼第三集团军的一小支。已有数个师被派去支援奥芬贝格部，另有三个师在从塞尔维亚过来的火车上。但在接到康拉德进攻令后，布鲁德曼，一如拉塞茨，在兹沃塔利帕河边与俄军遭遇。当第三军第六师迂回穿过青绿、蓊郁的大地时，撞上与他们右边的拉塞茨所属第四条顿骑士团首领步兵团所遇到同样的障碍。有位参谋写道："我们直直走进从未见过的俄军阵地，遭敌人以榴霰弹和步枪近距离平射攻击。"奥军未撤退，反倒进攻，军官以缓慢、郑重而沉闷的语调说："尽管士兵英勇作战，但死伤惨重，一再强攻，仍未有进展。"部队真的攻入俄军防线，呼求侧翼包抄时，但对方告以侧翼包抄做不到，因为每个奥匈帝国部队都正全力与"兵力大占上风的俄军"交手，分不了身。[3] 在这场并未用心打的战斗（后世史家所谓的第一场伦贝格战役）中，布鲁德曼向他以为只是俄国一个孤立军级部队的敌军出击。他被鲁斯基懒洋洋的行进所骗，这时才知道他所攻击的敌军，不是一个军，而是整个集团军（布鲁西洛夫第八集团军的四个军），而己方兵力只有对方三分之一。

在布鲁德曼部左侧，德西德里乌斯·科洛斯瓦里（Desiderius Kolossváry）将军把奥匈帝国第十一军带入前途未卜之境。他所下达的命令反映了康拉德一直以来无意弄清楚俄军实力的作风："在友军第三、第十二军左侧前进，以掩护他们攻击已在布罗迪和塔尔诺波尔越过我们边界的敌人。"[4] 问题是"敌人"这字眼太含糊，康拉德完全未交代俄军兵力或位置。因此科洛斯瓦里从伦贝格东征，打算占领位于布斯克（Busk）的布格河渡河口，攻击正与他右侧的两个友军交手的俄军侧翼。新兵顶着烈日走在土路上，光是行军就使科洛斯瓦里部一天都不想动。他们于八月二十六日休息，在这同时，布鲁德曼把自己当成如当年打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战役的拿破仑般调遣他的其他部队，打算把俄军困死于一地，然后用他两翼的军级部队（例如科洛斯瓦里部）打垮其侧翼。一九一三年哈布斯堡军事演习时，布鲁德曼三两下就遭奥芬贝格打得无力再战，而真枪实弹打，他的表现一样糟。颇为奇怪的是，他

认为两侧翼不会受到威胁，深信往左右侧各调一个师过去，就足以使他不致受到包围，且深信“我们第十二军的两个师会在中间部位联合进攻我们第三军所面对无论多少兵力的敌军，而这场仗会由这一进攻的成败来决定”。他做计划时的不求精确（在已有电话、飞机、汽车的年代还用“无论多少兵力的敌军”这一描述），令人咋舌，而同样令人咋舌的，乃是在那一刻正渐渐包围布鲁德曼部之俄军的攻击。[5]



鲁道夫·布鲁德曼将军

鲁道夫·布鲁德曼将军曾被誉为奥地利“神童”和“未来希望所寄”，甚得皇帝与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宠信，却在伦贝格与拉瓦鲁斯卡栽了个大跟头。这位神童遭解除兵权，送回维也纳。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一百九十二个俄罗斯营，踩着规律的步伐缓缓走向奥匈帝国第十一、第三、第十二军。从伦贝格重新踏上疲累的征途，仍然不察危险渐渐逼近的科洛斯瓦里，发现布斯克已落入俄军之手；他朝南走，以援助他右侧的两个军，要求约瑟夫·斐迪南大公辖下第十四军的奥地利地方

防卫军第四十四师和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十一骑兵师，“攻击”挡在他路上之俄军的“侧翼和后方”。结果未如他所预期：“奥地利地方防卫军第四十四师不愿照办，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的骑兵师一直没回复。”十四军被派去北边的科马鲁夫，然后被召回伦贝格（第三次），体力已达到极限，实质上失去了战斗力。科洛斯瓦里报告道，“由于这些未预见到的情况，我部无法有效地介入这场战役”。他尝试在没有第十四军提供侧翼的保护下，派辖下数个旅进攻位于克拉斯内（Krasne）的俄军阵地，结果，如他所字斟句酌表示的，受到“相当大”的死伤，军官则有“颇大”死伤。他的火炮有一半遭俄军炮火击毁。[6] 虽然奥地利第八十团朝克拉斯内的俄军开火，杀敌效果却比平常差。事后他们才发现，后勤单位误给他们平时演习用的空包弹，而非实弹。[7]

在这同时，俄军大举攻入奥军中央和两侧翼。奥匈帝国参谋——不是靠自家骑兵侦察，而是靠穿过他们防线逃回来的加利西亚难民，了解俄军动态——用蓝色铅笔速速写下忧心忡忡的看法，派人快马加鞭送到伦贝格：“迫于敌军人数甚多，我师撤退；我军伤亡甚为惨重。”[8] 在把第十四军借给奥芬贝格后，布鲁德曼只剩自己九个师和第二集团军两个师守住奥地利在加利西亚阵地的整个右翼。他辖下兵力损失惊人，许多部队失去三分之二有生力量。在中央部位，普热梅希拉尼这个热络的大市集镇东边，埃米尔·科莱鲁斯（Emil Colerus）将军的第三军一再试图以刺刀冲锋战术……击退俄军。这种打法完全不对，每个旅都报告“死伤非常惨重”。俄军藏身于又深又窄的壕沟里，外面看不到他们，榴霰弹也伤不到他们；他们等着奥军每次进攻，然后同时起身，用齐射火力将奥军全数撂倒。奥军逃离俄军的连续齐射时，俄军反击，攻入开口处，打奥军侧翼。[9]

布鲁德曼部和科费斯部后撤约十五公里到下一道河线，即距伦贝格只有四十公里的格尼拉利帕河时，第二集团军更多部队从塞尔维亚驰抵他们右侧，使奥军在这一关键区块的军力增加为十五个战斗力薄弱的步

兵师（总兵力十四万五千）和八百二十八门炮。但面对布鲁西洛夫部和现在的鲁斯基部，那犹如螳臂挡车。鲁斯基正把辖下兵力分为两股，一股打这一仗，另一股打奥芬贝格，也就是共有十六个战斗力甚强的步兵师，总兵力将近三十万，火炮有一千三百零四门。

八月二十七日，不服输的布鲁德曼下令再启攻势。他仍一副拿破仑再世的模样，向麾下将领保证“第四集团军正攻入俄国且取得胜利”，尚待完成的就是由他在伦贝格的部队“施以决定整场战争成败的一击”。他下令三个军从格尼拉利帕河沿线的罗加京（Rohatyn）等几个村子再度进攻，以骑兵掩护侧翼。第二集团军要在右侧往前推进，以吃掉俄军（该集团军司令官爱德华·冯·伯姆-埃尔莫利这时终于来到此战地）。事实上，八月最后一个星期，第三、第二集团军心存怀疑的诸将领，每天晚上都会接到弗里德里希大公和康拉德要他们天一亮即“重启攻击”的命令。[10] 但奥军每次进攻的下场都一样，被俄军防守火力打得动弹不得，然后被俄军反攻部队从侧翼包围。[11] 奥匈帝国每支部队后方都陷入恐慌，辎重队一如以往跑掉，但就连训练有素的部队都相互开火。第六师苦恼地报告道：“我军第四十四野战炮兵团某连，误把我们的波斯尼亚人当成哥萨克人，朝他们炮轰了五分钟，三十二人死，许多人伤。”炮兵开火时，该师师长和其参谋正在一农屋里研究地图，波斯尼亚人在外面休息，司令部差点也被炸掉。[12]

奥军遭击退，弃守且与附近友军失去联系。“自今天大清早就与奥地利地方防卫军第二十师失去联系，”科莱鲁斯将军于二十八日晚报告。[13] 在普热梅希尔，康拉德打电话给布鲁德曼的参谋长鲁道夫·普费弗（Rudolf Pfeffer）将军，他不相信普费弗对前线战况的解释。“但第十一军正在哪里打？”康拉德气得结结巴巴，“第三军在干什么？”普费弗告诉他，他们的进攻已遭撕碎，得退到格尼拉利帕河后面。康拉德反驳：“如果你们当初完全遵照我的指示，现在就不必谈什么撤退的事。”他猛然挂上电话，转向他的副官鲁道夫·昆德曼（Rudolf

Kundmann）吼道：“他们败了。”他开始捏造事实为自己卸责：“他在撤退！因为不听上级指示，才出问题。”[14]

在该地数个奥地利师正寻找掩护以避开从天而降的俄军炮火和烈日时，康拉德这位卓越的“城堡将军”（译按：chateau general，过着舒服日子、不关心底下士兵死活的将军），下令八月二十九、三十日再度进攻格尼拉利帕河。这时有人提醒颇欣赏康拉德的阿弗烈德·克劳斯将军，这位参谋总长“实际上始终是个战术家，不关心战略、实际作战问题，比如作战时如何部署大军，如何移动、喂饱、补给大军，提供大军切实的作战计划”。[15] 康拉德这时的情况正证实这一对他的评判，从战略角度来看奥军已如此明显地完全居于下风，但他仍昧于形势大吼进攻再进攻。科洛斯瓦里报告，第十一军大部分人已无法再征战，八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的征战已把他们累垮。他指出，“我们的战斗力直线下降，已有一段时间称不上具有完整的战斗力”，还说“把只受过些许训练的行军旅当成‘作战部队’来用，并将他们视同受过训练的野战部队，但这显然不管用。但我们会尽力”。[16]

布鲁德曼第三集团军的大部分兵力，挤在几乎不到八公里长的空间里，成为绝佳的攻击目标，易遭到侧翼包抄。第二集团军的第七军白天攻击他们正面的俄军，但发现他们后面有从南边渡过德涅斯特河过来的俄军时，则不再攻击，选择撤退。[17] 康拉德气得大吼。第二、第三集团军为何不进攻？普费弗将军请康拉德亲赴前线看实际战况，但康拉德回以在普热梅希尔太忙。后来普费弗写道，“真令人遗憾”，“只要瞧一眼俄军的火力包围圈，就能治好他的错觉”。[18] 为打消康拉德一意进攻的念头，普费弗提出根本试不得的进攻构想。[19] 俄军每个师配有两个重型榴弹炮连（奥军一个都没有），远远就把奥军消灭。

在第一次伦贝格之役中，两万奥匈帝国士兵和七十门炮落入俄国人之手。绕过布鲁德曼部右侧翼猛扑过来的布鲁西洛夫，惊讶于奥军撤退

时丢下的加农炮、机枪、四轮马拉货车、战俘之多。双方数千名伤兵都惊讶于本国军队对他们死活的不闻不问。布鲁西洛夫的医务长原向他保证，在别列扎内（Berezany）有三千张病床可安置伤兵；但当三千五百名受伤官兵被送到那里时，才发现只有四百张病床，其余伤者得露天躺在地上。[20]

八月三十日当布鲁德曼终于掌握实际战况时，他的表现比较不像拿破仑："在与兵力远大于我方的敌人交手数日之后，我军必须撤退，在新战线重整。"他指出应撤至伦贝格西边的韦列齐察河（Wereszyca River）。[21] 战争打了几乎一星期，康拉德就快要丢掉奥匈帝国第四大城暨加利西亚首府。他的几个集团军，在相隔遥远的地方各打各的——在克拉希尼克和科马鲁夫周边的丹克尔部与奥芬贝格部、在伦贝格的布鲁德曼部与伯姆-埃尔莫利部——但正渐渐被各个击破。俄军的组织若更完善，或许早已消灭奥地利整个北方面军，但他们仍在缓慢移动，而已把司令部移回基辅的伊万诺夫，仍不相信丹克尔部和奥芬贝格部是康拉德的攻击主力。一如鲁斯基，他认为他们只是侧翼防卫部队，因而目光一直瞧着伦贝格，寻找他认为正前来增援布鲁德曼，欲将战事带进俄国的军队。

如果说俄国人无法理解康拉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能耐，康拉德底下的军人则对此知之甚详。这时，奥匈帝国士兵已认清上头指挥官的愚蠢。指挥官一再以下面之类愚蠢的说辞，把他们送进俄军壕沟和炮阵地的虎口："俄国人很少发炮，因为他们的炮弹不会爆炸。"[22] 在这些牺牲流血的士兵听来，那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事实上，真的伤不了人的，乃是奥地利的火炮。奥匈帝国总司令部从俘虏的俄国人口中得知，奥地利炮手把榴霰弹的炸开高度设得太高，使俄国人得以在弹丸纷纷落下时安全跑开。[23] 在这同时，奥地利人在冲向俄军时，根本无法全身而退。有位奥地利上校解释了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在平时的研习和演习时，军官被教导"时时要寻找侧翼，绕过敌人"，但在战斗正激烈时，男

子汉该有的打法是gradaus，即明着对干不搞暗招——没有佯攻，不搞侧翼包抄，只有“干脆的，较符合奥地利‘一直进攻’之传统的放手一搏”。这一本能使哈布斯堡王朝军官的死亡人数惊人，“他们觉得得白白牺牲自己性命以激励下属”。

才几天时间，就连这种英勇行径都失去了激励效果：排长冲向俄军而丧命时，排兵会畏缩不前。这使奥军战术有了微妙转变。此后，中尉把英雄角色派给士官来当，自己在二线跟着，“手里拿着铲子和步枪，只要士兵畏缩不肯进攻，都将其毙命”。[24] 许多奥地利人向最近的俄军投降以躲掉必死的下场，但这么做有时也没好下场。有位奥地利战俘描述他被俘的经历：“我们被缴械，身上的值钱东西，手表、钱、小刀之类的，被抢光，然后把我们关在猪圈里三夜，除了生马铃薯，没其他吃的。第四天，他们放了我们，却逼我们加入俄军小规模战斗编队往前走，向他们指出我们的阵地。”[25]

鲁斯基小心翼翼越过格尼拉利帕河时，已在二十七日拿下塔尔诺波尔；而在二十九日拿下德涅斯特河边加利西亚旧首府加利奇（Halicz）的布鲁西洛夫，转北进向伦贝格，攻入布鲁德曼未设防的侧翼。康拉德的参谋部在战前研究俄军将领时，就特别留意布鲁西洛夫，指出“他火爆、精明、充满活力”。这时布鲁西洛夫以行动证明他的确是这样的人，巧施妙计使布鲁德曼陷入两面夹攻之境，而夹攻者一是他，一是康拉德。八月三十一日，康拉德从他位于普热梅希尔平静无事的办公室下令，“基于政治、经济理由”，得不计代价守住伦贝格。布鲁德曼无奈地照办，要他的部队和伯姆-埃尔莫利的部队在伦贝格周边部署成弧形，以每道小溪和山丘当掩护，但“如果情况吃紧就退到西边”。数个奥匈帝国骑兵师奉命跟位于侧翼的步兵团靠拢，下马，掘壕固守。情况类似十九世纪美国卡斯特（Custer）中校打的小巨角河战役（Battle of Little Big Horn）。[26] 俄军紧逼，迫使侧翼部队往中央靠，奥军不久后撤退。布鲁西洛夫的飞机监视到大批奥匈帝国士兵在伦贝格火车站上了往西开的

火车，其他大批士兵循着公路撤往桑河。[27]

布鲁德曼部溃退，九月二日让出伦贝格，退到格鲁代克（Grodek）阵地，即韦列齐察河后面的一线高地。他把第三军居中摆在格鲁代克，第十一军摆在左边，第十二军和第三十四师摆在右边。布鲁德曼想振奋低落的士气："第三、第二集团军已使人数占上风的西进敌军放慢速度……第四集团军就要转过来支持我们，一起攻打敌军，向这一自大的敌人报仇的时刻已经到来！"但由于俄军炮火声，以及由于奥地利最高指挥官的谎言和夸大不实，他这番话没人听进去。[28]

奥地利的东都，原被视为俄境作战之跳板的伦贝格，如今落入俄军之手，奥匈帝国军中各阶层都不得不对领导阶层的能力，乃至究竟为何而战，生起疑问。后来，布鲁德曼的参谋长把这场大败归咎于康拉德的散漫："这一战败的原因，纯粹是总司令部易出错的动员和对俄国人的全然误判……直到现在，在伦贝格争夺战期间，总司令部才发现俄军主力在这里。"[29] 跟着后撤奥军跑的伦敦《泰晤士报》美籍战地记者斯坦利·华许本（Stanley Washburn），赴伦贝格医院探望了奥地利伤兵，惊讶地发现"奥军中一般的入伍士兵完全不清楚这场战争是为何而战"。这些奥匈帝国伤兵对俄国一无所知，对塞尔维亚了解更少，甚至没人知道英、法投入了这场战争。[30]

时时留意自己形象的康拉德，知道得替伦贝格的失陷找替罪羊。他将布鲁德曼的参谋长鲁道夫·普费弗将军和数名军长、师长、旅长撤职。后来在回忆录中，康拉德把这一挫败归咎于布鲁德曼的"被动"，说他若照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打会得胜，却未这么做。[31] 但根本没有克敌制胜的计划，即使真有这样的计划，布鲁德曼也难以顺利执行，因为奥地利人被俄国的火力和自身差劲的后勤体系弄得几乎动弹不得。一如在塞尔维亚所见，过度庞然的军级部队（每个军有四十五个营）和累赘的辎重队，使整个哈布斯堡军队的移动如同牛步。

奥匈帝国诸集团军以每三名战士一辆四轮马拉货车的比例配备货车。战前本欲打造较轻盈灵巧的军级部队，却受阻于僵化的哈布斯堡王朝官僚，于是部队行军时拖着庞然的累赘。有位满腹牢骚的将领指出，日本军官不带行李打俄国人打了一年半（在中国东北打的那场战役，从头到尾，两名日本军官都共享一个小提箱），而一九一四年时的奥匈帝国将领，每人配发两辆“个人用四轮马拉货车”供装运衣物和其他可搬运之财物，以及三辆这类货车供他们的师部或旅部使用。每个师部或旅部又获配发足够装载五千三百磅额外行李的数辆货车，供仅仅三人（师旅长和其两名助手）使用，而一个营整整五百人所带的行李，只有这些额外行李数量的一半。整个来讲，奥匈帝国一个师拖着一百零五辆供上述用途的四轮马拉货车，以及四十五辆供士兵使用的货车、四十五辆载运弹药的货车、七辆载运粮食的货车，还有野战炊事车、面包烘烤车、救护车各数辆。难怪将领竟把火炮和衣物箱、书、葡萄酒箱、罐头摆在一块运送。[32]



赶赴前线的奥匈帝国第二集团军士兵

一九一四年八月赶赴伦贝格附近前线的奥匈帝国第二集团军的匈牙利人。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拖着这样的累赘，弗里德里希大公这时发电报给德皇，要求德国尽快发动攻势解危和“忠实履行”柏林的盟国义务（不管在这场波及地域辽阔且战局起伏不定的战争里盟国义务究竟何所指），也就不足为奇。八月最后一个星期，康拉德四度打电报给毛奇，要求德国从西战线抽调十二个师（四个军）投入东线战事。[33] 正在马恩河边全力对付百万法军且已在坦嫩贝格和马祖里湖区（Masurian Lakes，位于康拉德之俄罗斯战线西北方）击溃俄国两个集团军的德国，大吃一惊。

在科布伦茨（Koblenz）的德军总司令部，奥匈帝国军事联络官约瑟夫·冯·施蒂尔克（Joseph von Stürgkh）将军，注意到与其盟邦关系的急剧恶化。康拉德所提议的作战行动不可能执行；由于有俄国西北方面军的几个未受到压制的集团军虎视眈眈于兴登堡的第八集团军侧翼，所以毛奇不放心要该集团军赴东南驰援奥军，就连德军总司令部里的奥地利人也这么认为。这些人这时提到相抵触的“党派路线”——康拉德的路线和其他每个人的路线。施蒂尔克和亚历山大·冯·于克斯屈尔将军（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头发日益花白的骑兵卫队司令）看着地图研究，判定康拉德的计划说“行不通”。德皇把施蒂尔克带到一边，热切地说道：“我们在东普鲁士的小规模军队已牵制住敌人十二个军，消灭或击败他们；那未让你们奥军进攻时更轻松吗？”[34]

显然没有。伦贝格周边堆起一堆堆粮食，奥匈帝国工兵（在饿着肚子的士兵拖着脚走过粮食堆时）把汽油浇在粮食上面，在这同时，康拉德正在普热梅希尔的餐桌旁尽情享用早餐，一派轻松地向同事说道，如果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还在世，会为了失去奥地利东都和该地庞大的铁路设施“把我毙了”。多达一千部火车头和一万五千个火车车厢留给了俄国人。那位《泰晤士报》战地记者来到这座大城，看过城里的公园、林荫大道、豪华饭店，认为它是“这场战争打到目前为止交战国所取得的最大战利品”。[35]

战前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就要康拉德留意往边陲战线塞进太多兵力、往主战线放进太少兵力的危险，但决意打垮塞尔维亚人的康拉德不理会这示警。[36] 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这时正为康拉德的雄心与现实间的差距受苦受难。乌克兰人是加利西亚的最大民族，但奥地利领导阶层开始认为他们不可靠，下令乌克兰官员、老师、教士离开该省，与他们的希腊天主教主教一起移居摩拉维亚。在加利西亚西部，有千名乌克兰显赫人物因可能支持俄国而遭关押。奥军参谋手里有上级发予的一张加利西亚少数民族分布图，上头标出这个大省境内几个辽阔的“亲俄”区：从新桑德茨（Neu Sandez）到伦贝格的整个南部边缘、从拉瓦鲁斯卡周边到塔尔诺波尔的东边境地区、内地的数大块孤立地区。[37]

为恢复亲奥势力，弗里德里希大公下令实施暴行：“凡是个人，乃至整个族群，犯下叛国罪者，都该以最残酷手段将其打倒。”[38] 有个杀人如麻的大公在一侧，挥舞皮鞭的俄国人在另一侧，且奥军所到之处都爆发霍乱，加利西亚（奥匈君主国里犹太人最密集的地区）的犹太人，于是收拾起能带走的财产，逃到维也纳，定居于该城的利奥波德斯塔特（Leopoldstadt）区，开始改良面包、面粉、肉、动物油、奶、煤之类官方配给食物的黑市交易机制。维也纳人一边向加利西亚犹太人买民生物资，一边痛斥他们的黑市，开始在暗地里谈“犹太人问题”。[39]

为打击敌人，而非把矛头指向自己人民，康拉德再度改弦更张。奥地利飞行员的报告透露，鲁斯基的第三集团军正转往西北，离开布鲁德曼部，这很可能是为了从侧翼包抄奥芬贝格部。康拉德深信布鲁德曼能在伦贝格西边的一道沿河防线顶住布鲁西洛夫部，于是同意第三、第二集团军应撤离伦贝格，退到韦列齐察河，把俄军引过去。康拉德为何认为一支比原部署在格尼拉利帕河边的兵力还要小的军队，在这条河后面，会比在那条河后面（且面对更大兵力的俄军的情况下）有更好的作为，这是这场大战役的诸多谜团之一。

康拉德命布鲁德曼和伯姆-埃尔莫利在韦列齐察河边顶住俄军，奥芬贝格则在同时率第四集团军往东南走，穿过拉瓦鲁斯卡，打击俄军侧翼。第三、第二集团军要顶住俄军够久，以使这一钳形攻势得以发动。若非有这么多人因康拉德的连番出错而精疲力竭、断手断脚或丧命，他远在战场之外，像在参谋部地图插图钉般调动已被他操纵得战斗力大失的部队之作为，会让人觉得好笑。一如波蒂奥雷克，康拉德的表现显示他完全不懂怎么打真枪实弹的战争。[40] 经过过去这个星期的征战，奥芬贝格部已几乎动不了，更别提与敌厮杀，他有太多马已伤重而死、饿死、累死。博罗耶维奇建议他麾下将领，“把补给部门的马拨给弹药车队用；把弹药车队的马拨给野战炮兵连用”。没打仗时，士兵奉命尽量多抓脱队的军马回来给部队用。配发的枪已丢失或受损者，则被告知到外面地上找枪替补。[41]

奥芬贝格的第四集团军自八月三十日俄军撤离科马鲁夫起一直往北走，这时却奉命调头往南。“军队不是棋子，”奥芬贝格抱怨道。这一次的计划修正毫无道理，主要是因康拉德知道鲁斯基正往北走，而奥芬贝格部往南正迎向鲁斯基部火炮和机枪林立的正面，而非侧翼。[42] 第四集团军第二度走过科马鲁夫战场，第二度被死尸的臭味熏得透不过气。第四集团军诸部队在滂沱大雨中调转向南，大雨“使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在科马鲁夫周边，他们惊骇望着地上的景象：“无数尸体，包括我们的和他们的尸体混在一块，马尸，还有各种战争废弃物。”对于原先催着他们去卢布林，现在却同样急迫地催他们往反方向走的最高指挥部，士兵自然而然开始信心动摇。[43]

在回旋余地如此小的空间里调头，奥匈帝国诸部队彼此相撞乱成一团，也跌跌撞撞和正将他们团团围住的俄军相遇。混乱的小冲突划破夜空的宁静，人人都紧张地朝别人开火。[44] 在韦列齐察河边，将领收到康拉德的电报，口气一如以往火冒三丈。康拉德批评他们接连以窄窄的小河为屏障在后“被动防御”且“不断撤退”。康拉德命令诸将进攻，“以

改善整个局势”。但身在前线的军官发现，再进攻，就如某高阶参谋所说的，“人力不允许。连要再来一次刺刀冲锋，士兵都吃不消；他们已被无休止的行军、战斗、缺乏睡眠打垮”。第八步兵团奉命进攻霍雷涅茨（Horyniec），前进了几步，“第一榴霰弹在上方爆开，就队形大乱，开始往后跑”。[45]



奥地利军队于加利西亚处决的乌克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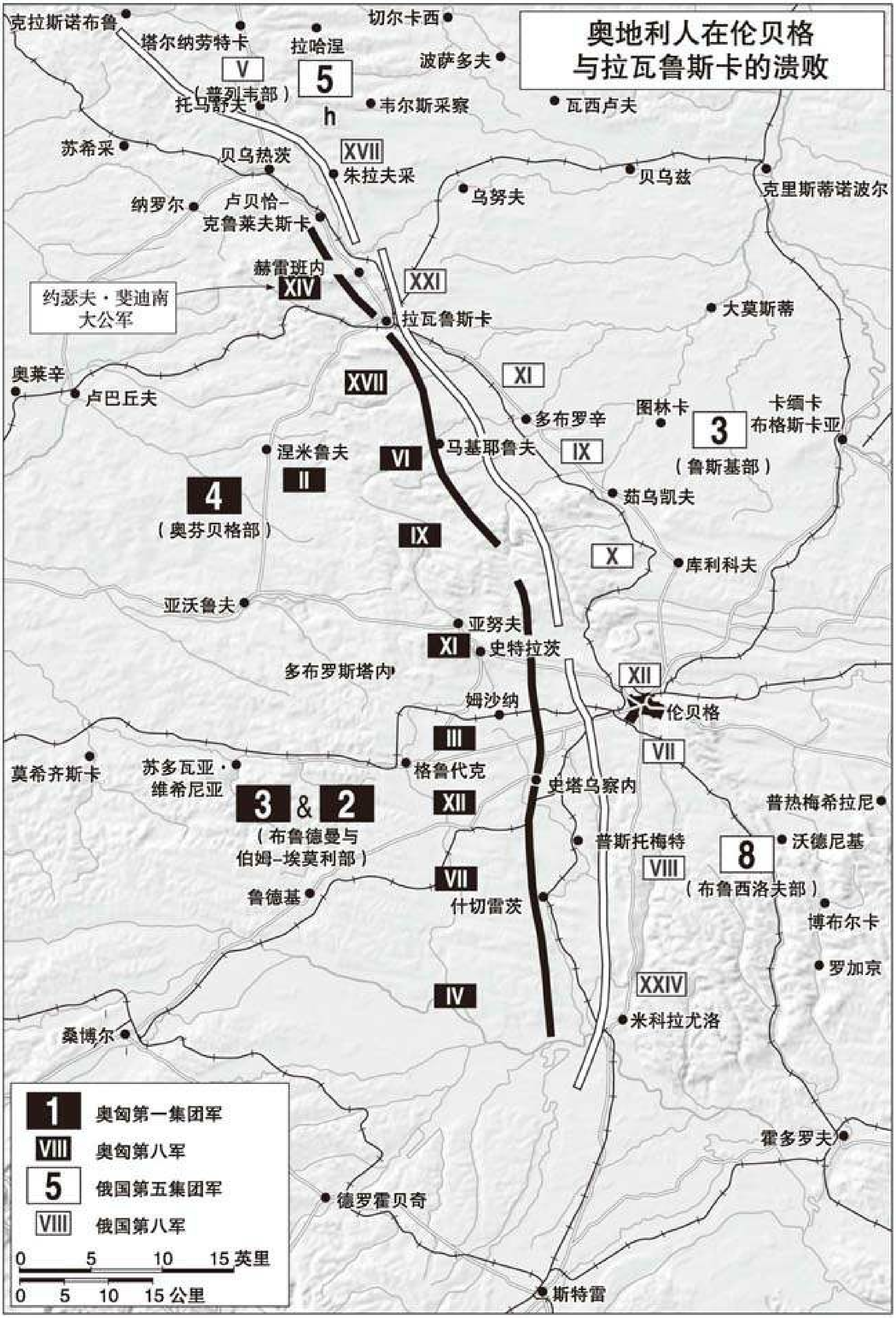
一九一四年八月弗里德里希大公下令，“凡是个人，乃至整个族群，犯下叛国罪者，都该以最残酷手段将其打倒”。图中是因被怀疑站在俄国那一边遭处决的乌克兰人。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奥芬贝格将军八月三十日检视了一群俄国战俘，对他们的黄褐色军服印象非常深刻，说即使在两百步外，他们都和周遭环境融为一体，使他看不出来。他与俄国军官聊天，其中大部分人会说德语。其中一人指出尸体狼藉的战场，然后说，“这一切是为了什么？”[46] 奥芬贝格或许心里有着同样的疑问；他看出他在科马鲁夫取得的胜利就要被打碎。他开始编借口卸责，以免后世招来骂名：“科马鲁夫的隆隆炮声一平息，我们就奉命往南援助受到威胁的友军（第三集团军）。”俄军会“在拉瓦鲁斯卡为血所浸透的战场上投入更多兵力，对付我们心生惧意的第四集团军”。他还在日记里写道，“我已尽力了”。[47]

俄国正在从克拉希尼克往南到伦贝格一线部署更多兵力，奥军挡不住他们。奥军人数较少，而且由于丹克尔部从克拉希尼克退走，他们就要被从两侧包围。奥地利第十四军参谋长约瑟夫·帕伊奇上校忆起在他的战线上发现俄国六个师，还有三个师和一整个俄国骑兵师在他的侧翼。[48] 奥军士兵疲惫不堪且所有物资都用光，奉命捡拾死去同袍的枪，并拿走他们弹药盒里的子弹。炮手接到命令，如果火炮可能落入敌人之手，要他们勿毁掉火炮，只要“取下瞄准器埋起来，以便日后如果夺回火炮时可用”[49] 。

奥芬贝格震惊于他所接到的新命令；他深信唯一明智之道乃是撤退到普热梅希尔的要塞和桑河边。这条宽阔的河流和那些现代堡垒或许能挡住追击的俄军，使奥军得以重新部署，与已开始从西边赶来的德军左右相连成一片（德国派兵赴东线，不是因为已打败法国，而是因为奥地利一直吃败仗）。[50] 但康拉德还不准备撤退。他以含糊笼统的电报把霍夫堡宫蒙在鼓里，而为让近视的皇帝看得清楚，电报以大号铅字排印制成复本，并附上粗比例尺地图。皇帝的副官博尔弗拉斯将军，还在电报边缘加上安抚性的批注，帮康拉德欺瞒皇上，例如八月三十日电报上的这条按语：“皇上，情势没有感觉的那么糟。”[51]


奥地利人在伦贝格
与拉瓦鲁斯卡的溃败
克拉斯诺布鲁
塔尔纳劳特卡
拉哈涅
切尔卡西
波萨多夫
V
（普列韦部）
5
托马舒夫
韦尔斯采察
瓦西卢夫
苏希采
贝乌热茨
XVII
朱拉夫采
贝乌兹
克里斯蒂诺波尔
纳罗尔
乌努夫
卢贝恰-
克鲁莱夫斯卡
赫雷班内
XXI
约瑟夫·斐迪南
大公军
XIV
拉瓦鲁斯卡
大莫斯蒂
奥莱辛
卢巴丘夫
XVII
XI
多布罗辛
图林卡
卡缅卡
布格斯卡亚
3
（鲁斯基部）
涅米鲁夫
VI
马基耶鲁夫
IX
II
4
（奥芬贝格部）
茹乌凯夫
IX
X
库利科夫
亚沃鲁夫
亚努夫
XI
史特拉茨
多布罗斯塔内
XII
姆沙纳
伦贝格
III
VII
莫希齐斯卡
苏多瓦亚·
维希尼亚
格鲁代克
3 & 2
（布鲁德曼与
伯姆-埃莫利部）
XII
史塔乌察内
普热梅希拉尼
普斯托梅特
沃德尼基
8
（布鲁西洛夫部）
VIII
VII
鲁德基
什切雷茨
博布尔卡
罗加京
IV
XXIV
米科拉尤洛
桑博尔
霍多罗夫
德罗霍贝奇
斯特雷
1 奥匈第一集团军
VIII 奥匈第八军
5 俄国第五集团军
VIII 俄国第八军
0 5 10 15 英里
0 5 10 15 公里

但就是那么糟。第三集团军已经垮掉，挡不住一个军，更别提挡住布鲁西洛夫的整个第八集团军。所有人都被叫到前线，发一把步枪，包括工兵、汽车司机，而穿着各种颜色之农民工作衫来到的当地波兰、乌克兰民兵，使局面更加混乱。九月四日，布鲁德曼试图激励其疲累的部队，向士兵保证奥芬贝格已拿下一场“完胜，掳获两万战俘和两百门炮”。[52] 他命令诸将领准备东进，以和从北边下来的第四集团军一起夺回伦贝格。在这批命令中，他提到“我们第三、第四集团军之间的一个缺口”，烦恼于俄军可能趁隙而入。俄军果然这么干。布鲁德曼派三个骑兵师前去封住缺口，但遭推开。康拉德未把这次大败怪罪于己，反倒怪在布鲁德曼头上，宣布他“身体不适”，要他退休。对一个二十年前被誉为奥地利“神童”和“未来希望所寄”的将领来说，这样的下场实是悲惨。[53]

康拉德与弗里德里希大公为自己失败找代罪羔羊的行径，有其卑鄙至极之处。怎么看都是个平庸司令官的弗里茨尔，一直以来同意康拉德的所有奇思怪想，这时则写了封长信给欣赏布鲁德曼的皇上，说明为何这位将军该走人：“在伦贝格东边那场多日战役中，以及往格鲁代克边打边退时，布鲁德曼将军太放任他辖下将领，使那些将领最终在没有统一的指挥下自行其是。”这是瞒天大谎，实际上布鲁德曼完全照康拉德命令行事，纯粹是因为寡不敌众而落败，而俄国的兵力优势始终受到康拉德低估。布鲁德曼认命走人，而皇帝唯一的安慰和以往没有两样：六千克朗的现金赏赐和以“编制外军官”身份继续服现役（和领完整薪水），不退休。[54]

九月五日，在维也纳，一名口无遮拦（且状况外）的亲王夫人，从其马车车窗往外大喊奥芬贝格已夺回伦贝格。这则不实消息传遍维也纳大街小巷，也被晚报拿去刊登。不到一天，这则报道就遭撤回，首都的民心士气更为低落。[55] 康拉德要斯维托扎尔·博罗耶维奇接替布鲁德曼

之位，新司令官立即指出其接掌的集团军欠缺“纪律和服从。全军上下缺乏干劲与信心”。[56] 博罗耶维奇惊讶于俄军每次发射猛烈的掩护炮火后，奥军总是兵败如山倒般垮掉：“目前为止的每一场仗，敌军一开炮，我们就有大批士兵，甚至整个部队，未经上级命令自行撤退。”把后备部队送去援助这些敌前逃亡者也不管用，“因为他们也不会进攻”。[57] 康拉德不为所动，下令九月七至九日再启进攻。第二集团军终于有完整战斗力，他决意用其一搏。

但由于康拉德抽走左翼兵力增援右翼，北边的局势开始变得不可收拾。奥芬贝格部往南走，在他与丹克尔部之间露出一个一百一十公里宽的缺口，俄国第五集团军趁机大举涌入。俄国一新集团军，普拉东·利奇茨基的第九集团军，开始摸索位于克拉希尼克周遭的丹克尔部另一侧翼。这时伊万诺夫看出有机会在丹克尔部三个军以桑河为屏障确保安全之前予以团团包围。俄国老百姓欣然参战，通过敲响教堂的钟以及点燃烟和火的信号，把奥匈帝国部队的位置通知俄军。靠着燃烧的茅草屋顶，俄国炮兵取得精确的炮轰位置。[58]

已于八月底几乎被赶到卢布林的丹克尔，这时几乎被团团包围，见情势不妙，他撤退逃命。信心大增的俄军离开壕沟，竭力截断丹克尔的退路，丹克尔部整路受到俄军骚扰。他一个团在撤退途中损失整整一个千人的营：九月五日该团掘壕以撑过当夜，隔天早上遭俄军一个纵队打垮，在无人伤亡下被俘。[59] 丹克尔于九月六日退到桑河之后，维也纳乐师收起《丹克尔将军之歌》曲谱。“俄罗斯狗”未遭击败。

接掌第三集团军的博罗耶维奇九月九日向其不再相信上级鬼话的士兵保证，“我军诸集团军接下来要从敌人手里拿下重大胜利”。[60] 奥芬贝格若听到此言，大概会说这是闻所未闻的奇谈。他正在伦贝格西北五十公里处的拉瓦鲁斯卡作战，两侧翼都无友军掩护，前方和左侧受鲁斯基第三集团军追逼，后方和右侧受普列韦部两个军追逼。前线诸将领在

辛苦抵御俄国大军时，人在普热梅希尔的康拉德正苦恼于吉娜的问题。九月九日他向其政治顾问雷德利希哭诉：“我如果输了（这场战争），也会失去这个女人，想来就令人害怕，因为以后我得一人度过余生。”[61] 奥匈军总司令部的新闻主任马克西米连·冯·赫恩（Maximilian von Hoen）谈到康拉德日益严重的“年老糊涂”。这位司令官几乎没睡，在他的军队垮掉时，还花掉半个夜晚写长信给吉娜和他九十岁的老母。康拉德逃避现实的心态令雷德利希震惊：“他不相信自己身负成为奥地利抗俄统帅的历史使命。”[62]

拉瓦鲁斯卡之役（又名第二次伦贝格战役）是奥匈帝国在这场战争里的最大战役，投入四个集团军五十二个师五十万的兵力。康拉德的三子（小儿子）赫伯特·康拉德（Herbert Conrad）中尉死于此役。赫伯特的第十五龙骑兵团属于约瑟夫·斐迪南大公四处奔波的第十四军，九月八日（他们的任务和方向已被康拉德中尉的父亲第四度更改之后），在拉瓦鲁斯卡附近遇上大群俄军炮兵和步兵。遭落下的炮弹打乱队形之后，他们进攻俄军。俄军于龙骑兵团纵马奔来时发射榴霰弹，然后从两侧翼向他们开火。龙骑兵团试图骑马进攻机枪、火炮和躲在壕沟里的步兵，却只前进了约三百米就遭击退，造成二十人死、六十人伤，康拉德的儿子就在死者之列。[63]

康拉德为痛失爱子而难过万分，后来也试图针对此役的失利为自己卸责，说他原打算在俄军往西追击博罗耶维奇部时，要奥芬贝格部像把匕首般迅速插进鲁斯基部的胸口；但当时康拉德的命令显示，他知道鲁斯基已停止追击博罗耶维奇，挥军向北以使普列韦部脱离战斗。此举导致奥芬贝格所无望取胜的两军对撞。奥芬贝格部有着一百七十五个疲累且战斗力大失的营，猝然与俄国两个完整的集团军交手，对手包括鲁斯基第三集团军的一百八十个营和普列韦第五集团军的一百八十个营。

战前担任弗朗茨·斐迪南军事文书署署长的亚历山大·布罗施·冯·阿

雷瑙上校，在九月六日这场相撞里首当其冲。他的第二皇家步兵团整个星期被康拉德耍得团团转：先是拨给奥芬贝格，然后在科马鲁夫之役后被派去追击俄军，接着又被叫回伦贝格协防。这时他们从科马鲁夫踉踉跄跄往南，穿过湿地、森林，顶着烈日，冒着寒雨，白天有人类拇指般大的马蝇骚扰，夜里有蚊子和让人搞不清方向的漆黑。布罗施奉命向第十七军靠拢，一再向他们打信号，告诉他的行踪，但没人响应。

布罗施开始理解他正渐渐陷入包围。一如第十四军其余部队，他被俄国第五集团军从北面、第三集团军从南面夹击。约瑟夫·斐迪南大公刚打电报给奥芬贝格："有东西从北方朝我们冲来，但仍不清楚那是什么。"俄军这一侵逼，终于使康拉德收拾心思务起正事。他刚从普热梅希尔打电报给奥芬贝格，命他把第十四军叫回西北，这一次是为支持已经调头而正从克拉希尼克往塔尔努夫撤退的丹克尔第一集团军。该集团军右边有维斯瓦河，而俄国第四集团军则在寻找它的左翼。这时，据康拉德的最新命令，第十四军得走回北边保护那易受攻击的侧翼。

这真叫人哭笑不得，但这一次，第十四军只有一个团可派去执行这徒劳无功的差事，其他兵力被涌入丹克尔部与奥芬贝格部之间越来越大缺口的俄国第五集团军困住。布罗施的士兵在加利西亚卡罗（Karow）这个肮脏的村子准备炊煮过夜，却不得不在晚间离开该村，穿过一浓密的树林，退到位于另一边的另一个肮脏的加利西亚村子胡伊采（Hujcze），以躲避步步进逼的俄军，即约瑟夫·斐迪南大公所提及的那个不详的"从北方冲来的东西"。九月六日晚，这个团无精打采地走到胡伊采旁边树林的南缘，距西南边的拉瓦鲁斯卡只数公里。约瑟夫·帕伊奇将军在总结此役的报告中写道："该地所发生的事，让我们了解到同时碰到黑夜、树林、林间湿地、无法形容的疲累会叫人吃上什么苦头。"即使是精锐部队和其统兵官（此例中的皇家步兵团），也可能被这些东西打垮。[64]

走出树林时，布罗施的士兵发现的不是宁静的村子，而是俄军的营地。这支奥军行军纵队，以一个连为先头部队，然后是一个营，再来是团指挥所，后面是两个营。位于行军纵队中央的布罗施，见到和奥军一样吓了一跳的俄军朝树林发出参差不齐的火力，急忙调兵防守。位于附近的奥匈帝国第五旅旅长施奈德将军，骑马过来和布罗施商议。有位军官无意中听到他们的交谈：那位将军大喊道，“太好了！你做得很好！终于看到隧道尽头的光！”布罗施则回以：“没别的办法，我们得不断移动。”康拉德的猎人非常清楚，他们已成了猎物。

布罗施和施奈德欲将两人的部队并在一块以逃出俄军包围圈，但在布罗施部走出树林后，却进入一处林立着俄军帐篷、四轮马拉货车、马匹、军用汽车的林间空地。俄军猛烈反击以保住他们的营地和通往拉瓦鲁斯卡的道路（拉瓦鲁斯卡已塞满俄军辎重队和火炮），于是布罗施猛然右转，带领其累垮的步兵团穿过原野，往西边打边退，俄军则从奥军刚离开的树林和树林周边的村子出来追了上去。布罗施和他数十名属下丧命。[65]

布罗施的遭遇正是拉瓦鲁斯卡战役的缩影。位于布罗施部正南方的卡尔·克里泰克将军的第十七军，自九月五日起和俄军交手不断。他们碰上下雨，只得穿过湿地，一路踩着泥水行进，在野外露天或在污秽的农舍里抓紧时间睡一两个小时，再于道路和小径旁掘壕，以击退突然从北边、南边、东边或有时从这三面同时来犯的俄军。九月六日一整天，第六皇家步兵营就待在这种仓促挖就的阵地里，承受俄军火炮和机枪攻击，没东西吃，因为粮食送不到这批被围部队的手上。夜色降临时，俄军动用步兵进攻。奥军击退这最后进攻，然后睡了一两小时；不久，九月七日拂晓，俄军又进攻数次。那天结束时，未在科马鲁夫丧命的军官，大部分非死即伤，还有一百五十名士兵死伤；另有数十人“失踪”。这是官方对未能找到尸体者的说法，那些人通常已投降。

奥匈帝国军队在第四集团军战线全线发起反攻，全遭俄军步枪的连续齐射和火炮击退。[66] 约瑟夫大公的第十四军，七天来因为康拉德一再更改命令而在波兰南北来回跑，这时则被告知往南攻击鲁斯基的第三集团军。帕伊奇在九月七日的日记里写道，大公非常气愤于“我们原来一直想做的事一再受阻而无法如愿，如今却在已经太迟时命令我们去做”[67] 。事实上，康拉德计划对鲁斯基部发动侧翼攻击，结果执行这一攻击的部队本身反而遭到侧翼痛击，痛击者就是鲁斯基部。在这同时，普列韦部从北边往南急扑，消灭布罗施部之类部队，从侧翼和后方包围奥芬贝格部。

在杜布未能大胆放手一搏的彼得·斐迪南大公，这时在奥芬贝格部的右翼，使劲抓着后退的第三集团军侧翼，使已将奥芬贝格部和丹克尔部分开的俄军，未能将奥芬贝格部与博罗耶维奇部分开。这里战斗之凶残，一如在更北部布罗施防区里所见，且从奥地利的角度来看，同样无意义。一支仅仅六人的俄军巡逻队，不小心碰上躲在树林里的两个完整的奥军步兵营，立刻举手投降。一名奥军军官用捷克语说，“不，让我们向你们投降”，不敢相信眼前情景的六名巡逻队员带着两千名奥军战俘回俄军营地。[68]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事康拉德竟觉得意外；战前思索现代火力之事时，他就已认同，自普法战争以来，士兵只要碰上难以攻破的防御火力，士气就有可能瓦解。战前访问奥地利的日本军官透露，打日俄战争时他们不得不在许多次强攻时以菜鸟取代老鸟，因为老鸟朝机枪进攻一次后就不肯再干这种事。康拉德本人在研究过普法战争后推断，即使是最有战斗力的普鲁士部队，碰上持续不断的压迫还是会垮掉。[69]

博罗耶维奇对军事史的省思，来自更为切身的体验；置身韦列齐察河后面的格鲁代克阵地里，他得以喘息。这一道连绵的高地从德涅斯特河和韦列齐察河交汇处升起，若非俄军有足够兵力从各方予以侧翼包抄，本会是很强固的阵地。黯然下台的布鲁德曼发给其部队的最后指

示，包括了九月六日这一则：“俄国报纸正兴高采烈地报道他们已大败我们第三集团军。”布鲁德曼严正表示，部队此刻的任务，乃是“要俄国人把这话吞回去”。他接着叱责麾下军官的战术作为未能明辨一重要差异：“我得提醒你们打仗时取得的死伤和蒙受的死伤两者有基本的差异。激烈战斗中取得的死伤，不伤害士气，甚至使部队得胜；因拙劣领导而蒙受的死伤，则令部队灰心，导致败亡。”[70] 俄军完全不在意这差异，一拥而上猛攻。布鲁西洛夫忆道：“那些士兵是我们已被击败的士兵……他们已没有斗志。”[71]

康拉德下令九月八日再启进攻。他似乎终于渐渐理解他挫败的战术原因。他发文给这时已不受指挥的麾下诸将领，“俄罗斯人似乎是这样打仗的：守在壕沟里，背后和两侧翼有火力强大且通常隐藏得很好的炮兵，以在我们发动步兵进攻时取得奇袭效果。他们通常维持这些阵地一天，让我们受到最大死伤，然后退到新阵地重施故技”。[72] 这一“故技”并非俄军的新发明；一八六六年普军打败奥军，用的就是这种打法：与战术守势相搭配的作战攻势。也就是说，敌军会入侵奥匈帝国领土，然后构筑坚强的防守阵地以击垮奥军必然的反击——之所以“必然”，乃是因为形成于滑膛枪时代的奥军传统思维，仍愚蠢地标榜战术进攻，即使已有机枪和急速火炮问世亦然。康拉德终于发现他和他的蓝灰色纵队就要再度受骗上当，但这一发现尽管于九月七日发送给各地部队，却要到九月十日才送到散落各地且已遭击败的大部分奥匈帝国将领手上。他们疲累地瞧了该文一眼，在公文边缘草草写下该写的“已阅”字眼，然后将其归档。

这时，奥地利阵营里人人都已厌烦于这场战争。康拉德命第四集团军会同第三集团军一起进攻，但各部队待在原地不动。[73] 辕马已累得拉不动车子，士兵也累得走不动。奥军在韦列齐察河后面掘壕固守，但军官担心即使有此河当屏障且挖了战壕，部队仍会守不住。哥萨克人在后方的传言令奥匈帝国第二军士兵惊恐，该军随之开始全军后撤。第

三、第八师也开始后撤，四轮马拉货车队挤在一块，造成恐慌。九月九日，康拉德从普热梅希尔大发牢骚，说这些“自行撤退”“毁掉我军原会得手的进攻”。一如以往，他把保护自己渐渐不保的名声，看得比打赢这场战争更为重要。[74]

九月十日，康拉德和弗里德里希大公首度走访前线（战时他们只去了前线三次）。康拉德、弗里茨尔、卡尔大公从普热梅希尔驱车前往韦列齐察河后面的格鲁代克阵地，由博罗耶维奇陪同视察，下令拼死一战，然后迅速返回安全的桑河边。[75] 康拉德表现他一贯的被动性攻击作风，叱责奥芬贝格“昨天，在其他集团军前进得胜之时，他却在他的阵地里休息”，此刻奥芬贝格得“进攻并制服（拉瓦鲁斯卡的）俄军”，一起展开“对伦贝格的同心圆式进攻”，“借此挽回自己的名声”。事实上，“对伦贝格的同心圆式进攻”，也是康拉德所虚构的：它比较像是四个乱糟糟的集团军为保命而拼死一战，而且这四个集团军全都往西走、欲前往安全的普热梅希尔，而非往东走、解救伦贝格。丹克尔的第一集团军受到俄国第九、第四集团军追击，已被赶回到桑河。奥芬贝格部正受到俄国第五、第三集团军猛烈攻击，博罗耶维奇部和伯姆-埃尔莫利部则正受到布鲁西洛夫第八集团军的猛攻。

普列韦部已将丹克尔部、奥芬贝格部分开，准备攻入他们之间的缺口以进抵桑河。如果普列韦部先抵达该河渡河口，他将能包围整个奥地利北方面军，包括位于格鲁代克的第三集团军和位于其右侧、本身快要被布鲁西洛夫的第八集团军包围的第二集团军。九月十一日，即拉瓦鲁斯卡战役进入第六天时，飞机侦察报告显示俄军形成庞大包围圈，康拉德不再说大话，下令奥军退往桑河和普热梅希尔周边呈环形布局的诸堡垒，而他们其实已在这么做。

后来康拉德写道：“从战术上看，情势不坏，但作战方面守不住。”在俄军就要把奥军四个集团军掐死之际，只有位在普热梅希尔要

塞平静办公室里的一人，还能区别作战行动与战术的异同。此外，诚如奥芬贝格所说的：“谁把军队放进这一不利作战的困境里，使所有战术作为和成就都必然落空？”[76] 长达十四天的奥军撤退行动加快，且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从格鲁代克到拉瓦鲁斯卡长达五十公里的一道凸弧线，各集团军和令他们恼火的辎重队全挤在一条已经硬化的道路上和路两旁多沙的小径上。俄军未错过发动典型平行追击的机会，在这一溃乱的奥军撤退队伍两侧跟着移动，不时地冲进去制造更多混乱，掳走奥军士兵、火炮和补给品。

后来奥芬贝格描述了奥地利诸集团军穿过这地区撤离的困难：前进路线到处被火炮、野战医院、弹药与补给车队、电报装置与航空设备、架桥设备挡住，其中许多东西不得不丢掉留给俄国人，以让出地方给逃命的部队。[77] 第四集团军奉命烧掉已弃置于拉瓦鲁斯卡的所有粮食和弹药，然后把该镇也毁掉。在加利西亚铁路附近撤退的奥匈帝国部队，则奉命边走边拆铁轨。[78] 已在进攻普列韦部的行动中耗尽力气的约瑟夫·斐迪南大公第十四军，乃是奥芬贝格保护其后方安全的唯一依靠。这支部队已行军、打仗两个星期，中间没有休息。康拉德命令这位大公打开往西撤到雅罗斯劳的路线（该地已在俄军手里），他置之不理，要部队往南走，也只有哈布斯堡王朝的亲王能这样抗命而没事。

九月十一日，鉴于有被完全包围的危险，奥芬贝格退到西南边。经过三个星期没有休息的作战，奥芬贝格部已惨到只剩一万支步枪。[79] 拉瓦鲁斯卡的死伤令美籍记者史坦利·华许本目瞪口呆，对一个刚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过来的人来说，那似乎是无法想象之事：“双方战死者将近十五万，几乎和盖兹堡之役中李部、米德部兵力的总和一样多。”[80]



难得走访前线的弗里德里希大公和康拉德

九月十日，康拉德（左）和弗里德里希大公（右）首度走访前线（这场战争期间他们只去了前线三次）。照片中，他们站在格鲁代克阵地里，听着战斗声，未拿定主意。他们的德国武官站在他们后面，礼貌性隔着一段距离。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奥芬贝格的第四集团军已有一半军官和大部分士兵死于战场。加利西亚人（乌克兰人、波兰人、犹太人）也死了许多；这时还保住性命者，窝在自家地窖里，听枪炮声在上方响。华许本巡视奥军撤退过后的原野，震惊于竟有约一百万士兵在只比“十英亩地”大一些的地区交战。战事已变成孤注一掷的力拼；他看到“奥地利人甚至想用双手挖浅壕”。他走过这块小小的突出部，“踩过一个又一个炮弹坑，每个坑旁布满蓝军服残布条、被高爆炮弹炸碎的人骨碎肉”。华许本所提到十五万战死者，有十二万人是奥匈帝国人，他们被赶进这个十英亩大的地区，被俄军炮火屠杀。华许本冷冷论道：“战争是不适者生存。没跑而丧命者，始终是最优秀的军官和士兵。”[81] 这时康拉德着手拔除那些不适任的幸存者：他已拔掉布鲁德曼、普费弗和胡因；这时把舍穆瓦也撤职。博罗

耶维奇撤出格鲁代克，留下一堆借口：“（第四）集团军受到无法抵御的攻击，使我们无法利用已在伦贝格赢得的胜利取得战果；总司令部下令全军撤退到桑河。”[82]

到了九月中旬，奥匈帝国北方面军在已安然撤到桑河之后，该地的普热梅希尔要塞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护。康拉德的四个集团军（第一、第四、第三、第二）已混在一块，为了把数千名落伍士兵挑出来，循不同道路送回各自所属部队，还花了数天时间。奥芬贝格忆起试图脱离战区和凶残俄军之魔掌的数长条犹太难民队伍。[83] 在科马鲁夫尝到胜利（或者说看似胜利）的滋味后，康拉德这时满脸愁苦。俄军已拿下约两百三十平方公里的奥匈帝国领土，并威胁将切断康拉德与奥匈君主国和德国的联系。俄国在这场战役中损失二十三万人，远比损失四十四万人的奥地利更禁得起打击。[84]

先前靠奥芬贝格在科马鲁夫的作为受到嘉许的康拉德，这时却反过头来把这次挫败归咎于那些作为：“奥芬贝格在科马鲁夫所采取的进攻方向，使他无法在伦贝格之役迅速援助友军。”[85] 愈来愈爱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的康拉德，也怪罪于德国人：“德国人拿我们当牺牲品，赢得他们最大的胜利，却置我们于困境之中；他们派兵不是要和我们一起打卢布林周边的大战，而是为了保卫（东普鲁士）种马场和猎屋。”[86] 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也跟着起哄：“德国人被他们的胜利错觉蒙蔽，始终低估我们的成就……我们挡住整个俄国大军，使德国人得以在有良好铁路、公路的法国取得了不起且相对较易的胜利。”这些抱怨当然都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德国人两面作战，且尽管西线陷入僵持，但他们仍继续从法国的“良好的铁路、公路”，抽调兵力到东边乌克兰、波兰有车辙的小路上。[87]

同盟国内讧时，布鲁西洛夫集团军的左翼正横扫布科维纳的灌木荒野、狩猎小屋和该地区的迷你首府切尔诺维茨——此城将于此战争期间

易手十五次。布鲁西洛夫的先头部队一路驰抵喀尔巴阡山脉通向匈牙利的最东边山口。康拉德的左翼瓦解、右翼遭侧翼包抄，于是在普热梅希尔的要塞周边，在滂沱大雨中，重新集结他的部队。奥地利诸将领有气无力地劝勉官兵团结抗敌。奥芬贝格的口吻像是个企管顾问：他在九月十五日发文给麾下军官，“成功与斗志高昂的先决条件，乃是每个人愿意全心全意投入当下的任务（行军、战斗），使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有其目标……没有比淡漠、绝望更危险的事。”[88] 但淡漠和绝望就是仅存的东西。哈布斯堡军队已经崩溃；如果说在总司令部笨拙的安排里曾有过“目标”，此时无疑已不再有。有人观察到，被俄军俘虏的奥匈帝国军人，“有病、细瘦、虚弱、较矮小”，似乎“对这场战争一无所悉”。[89] 仍在奥匈帝国军中者，开小差的人数之多前所未见。“为何每次与敌人起冲突后，都有数千落伍士兵在我军后方游荡，而非与敌厮杀？”总司令部愤愤质问，“得找出这个现象的原因，予以纠正。”[90]

谁都知道原因为何：无休无止的败仗。许多士官（自始就是很少有的一类人），因为抗命遭降级。士气跌到谷底，而从奥匈帝国的科技和领导统御现状来看，谁都知道这已经没救。奥军已在撤退中损失数十门炮，而他们所救回的火炮，有许多门没有瞄准器，因为炮组人员照先前的指示拆下瞄准器埋在某处。虽然已经太迟，但康拉德仍要炮手带着瞄准器撤退，而非把它们留在加利西亚的黑土里。在已不会有什么战事时，他还命令诸将领“不要再浪费炮弹；务必按照战斗时每一刻的重要程度酌量使用炮弹”，这着实是令人一头雾水的指示。[91]

除了在撤退和遂行撤退所需的最起码的休息上，博罗耶维奇没有费心去“酌量”调度其他任何事物。他命令诸将领连与追击的俄军打后卫战斗都要避免（“以加快西行速度”），要他们派人去周遭土地上搜寻任何款式或口径的步枪。走在他们前面的奥军，撤退时丢下许多步枪。恐慌已攫住博罗耶维奇的第三集团军；九月十六日晚，他提醒在他两侧后撤的集团军留意他的部队，告诉他们“正有数个完整的团涌入普热梅希

尔；他们饿着肚子，洗劫店铺，犯下暴行”[92]。他还发下一份备忘录，表达其对目前为止所用之战术的震惊，那些战术包括上刺刀正面强攻、掘壕不到位、没用机枪和火炮施以火力压制，好似哈布斯堡王朝军队想自己送死。[93]

由于有布鲁西洛夫的第八集团军骚扰一侧翼，利奇茨基的第九集团军骚扰另一侧翼，奥匈帝国北方面军九月十七日再度开拔，继续令人疲惫的撤退之行。俄军已在桑河下游架了七座桥，使桑河不再是有用的防御屏障，且使普热梅希尔和其外围诸堡垒可能遭包围、围攻，使整个北方面军困在其中。康拉德和弗里茨尔在普热梅希尔留下大兵力防守，带着北方面军其余兵力往克拉科夫和可作为屏障的维斯沃卡河（Wisloka River）撤退。[94]九月第三个星期时，康拉德估算有六十四个或更多个战斗力甚强的俄国师紧逼他兵力甚弱的四十一个师。[95]奥地利人震惊于俄军之兵多将广；不管在何处，奥军在兵力上都处于劣势，单单布鲁西洛夫的集团军兵力就是奥地利第二、第三集团军兵力的总和。才在一年前，弗朗茨·斐迪南的军事内阁还在一篇名为“破产”的专栏文章中嘲笑俄军。对一九〇五年俄军仓皇撤离沈阳的尖酸描述，此刻用在败逃的哈布斯堡王朝军队上同样贴切：“某种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此刻正折磨这支军队；暗示的力量已失灵；一个卑鄙的小秘密曝光。”[96]

九月二十一日，康拉德下令再退，退到维斯瓦河的支流杜纳耶茨河（Dunajec River）。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要在那里掘壕固守。在新桑德茨与兴登堡、德军东线总指挥鲁登道夫会晤之后，康拉德同意调第一集团军前去与维斯瓦河北边的德国第九集团军并肩作战。每个人心里都在担心日益短缺的炮弹——已有太多炮弹被打掉或拱手让给敌人，后面又没有库存。[97]即使有德国相助，奥地利战败似乎已成定局。奥芬贝格部在撤退途中丢掉太多火炮和补给车，此后数个月从空中一直能看到那些遭丢弃的车辆。这时他以艰深的比喻为自己开脱：“布吕歇尔（Blücher）在莱比锡战役之前不也丢掉他整个车队，以改变其作战路

线？但布吕歇尔仍是布吕歇尔。”[98]

奥芬贝格不会这么走运。九月二十九日，康拉德和弗里德里希、卡尔两位大公抵达设于扎克利琴（Zaklycin）的奥芬贝格部营地，授予奥芬贝格利奥波德大十字勋章，转达老皇帝对他的感谢。隔天早上，奥芬贝格在胸前别上红色搪瓷大十字勋章，准备继续撤退时，总司令部派来的一名参谋部信使，带着弗里德里希大公的信，信中写道：“阁下，昨日前去时我推断你的勇气已被近来的事态磨掉不少，推断你不再相信你辖下集团军的力量和潜力。”奥芬贝格奉命自行称“病”，把兵权交给约瑟夫·斐迪南大公，返回维也纳。奥芬贝格惊骇莫名：“此刻，我身为科马鲁夫之役的胜者，却被伦贝格之役的败者拿掉兵权。”康拉德写信劝慰奥芬贝格，但一如其一贯作风，最终却大谈自己的苦处：“这场不幸战争的罪责，会整个落在我的头上，而我除了找个安静的角落躲避同僚的鄙夷，别无选择。”[99]



史维托扎尔·博罗耶维奇将军

布鲁德曼兵败伦贝格后，由史维托扎尔·博罗耶维奇将军接掌奥匈帝国第三集团军。他上任后立即指出该集团军士气的涣散：“我的部队正大批后撤，饿着肚子；他们洗劫店铺，犯下暴行。”这场战争这时才打了一个月。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十月二日，奥芬贝格照谈定的做法称病（关节炎）辞职，离开他的集团军，把指挥权交给约瑟夫·斐迪南大公。[100] 整个军队所受的苦，远更甚于奥芬贝格所受的苦。北方面军已死伤一半兵力，共十万人死、二十二万人伤；许多师已损失三分之二有战斗力的兵员。即使是法国人（身着红长裤、深蓝色上衣、排成密集的强攻纵队），在开战后一个月里，也才损失三分之一兵力。[101] 带有二心的奥匈帝国部队集体投降，加剧兵力的损失，使约十二万未受伤的奥军士兵，连同三百门炮，落入俄军之手。

东线的战事才打了三个星期，康拉德就损失超过三分之一的奥匈帝国兵力，还有最优秀的军官、士官。“我们的正规战术部队已在目前为止的战斗中被打得七零八落，很难指挥得动，”博罗耶维奇于十月报告道，“我辖下的陌生人远多于熟悉的老战友。”[102] 老战友已死或被俄军俘虏；维也纳的第四条顿骑士团首领步兵团，只有七名军官活着逃出加利西亚。[103] 阿瑟·博尔弗拉斯将军从霍夫堡宫论道：“如果说战争曾是骑士般的决斗，如今战争则是卑怯的杀戮。”他写道，亟需更多炮灰，“战神已变得贪得无厌”。[104] 哈布斯堡陆军部在国内各地紧张贴出乐捐布告，呼吁国民捐款成立新基金，救助已战死者留下的大批未得到官方拨款照顾的孤儿寡妇。[105]

博罗耶维奇促请康拉德完全放弃普热梅希尔，以免该地十五万守军也不保，但战前还试图删掉该地要塞经费的康拉德，这时却投入大笔资金强化该地战备，以顶住俄军的围攻。他紧急调派两万七千工人到桑河，加强普热梅希尔的防御工事。他们架起一千零四十公里长的带刺铁

丝网，挖了五十公里长的壕沟，构筑了七条带状的据点，还有两百个炮阵地、二十座堡垒。二十一个村子和约一千公顷的森林遭夷平以辟出火力区。这一工程旷日废时，拜俄军前进缓慢之赐才得以完工。九月下旬俄国六个师终于到达围城位置。[106]

在把总司令部搬到杜纳耶茨—比亚瓦（Biala）阵地里的新桑德茨之后，康拉德赫然发现自己被困在维斯瓦河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没有回旋余地的空间里，而俄军正从四面八方包围。康拉德发觉难以移动剩下的北方面军兵力，甚至连替他们补给都难，因为死掉太多军马。他要诸将领不要再要求补给弹药，因为送不过去。[107] 美籍记者华许本在这支溃散军队周边四处探看，震惊于尸体之多和弃置尸体的随便。“在某村外围，已挖了数道大沟，沟旁有一堆堆尸体；农民用四轮马拉货车把一车车僵硬的尸体运过来，死尸裂开的脸庞斜眼呆视，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就像一堆生铁，从马车上倾泻而下。战争的浪漫在哪里？”[108] 浪漫不复见，霍乱和痢疾正肆虐奥匈帝国士兵。[109] 这时只有德国人能救他们。

---

[1] Österreichische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Heereswesen und vom Kriegsarchiv，*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Vienna：Verlag Militätwissenschaftlichen Mitteilungen，1931-1938），1：187.

[2] Otto Laserz，“Die Feuertaufe von einem Kaiserschützen，der sie August 1914 miterlebte，” unpublished manuscript，Kriegsarchiv（KA）Handbibliothek，n.d.

[3] KA，Neue Feld Akten（NFA）1803，6. ITD，“G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Gefechte bei Gologory und Turkocin in der Zeit vom 26 bis 31. Aug. 1914.”

[4] KA，NFA 1795，Lemberg，Aug. 29，1914，GdK Kolossváry，“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am 26 und 27. Aug. 1914.”

[5] KA，NFA 1367，k.u.k. 3 Armeekommando，Lemberg，Aug. 26，1914，GdK Brudermann to corps and division commands.

[6] KA，NFA 1795，11 Korps Kdo，Lemberg，Aug. 29，1914，GdK Kolossváry，“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am 26 und 27，Aug. 1914.”

[7] KA，NFA 1372，k.k.österreichische Staatsbahndirektion，Lemberg，Aug. 28，1914.

[8] KA，NFA 1794，3 Korpskdo，“G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Gefechte vom 26 bis 31 Aug. 1914.”

[9] KA，NFA 1794，3 Korpskdo，“G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Gefechte vom 26 bis 31 Aug. 1914.”；NFA 529，9 ID，AOK Op.Nr.1996，Sept. 16，1914；KA，NFA 1842，Sept. 7，1914，AOK to 32 ID.

[10] KA，NFA 1794，3 Korpskdo，“G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Gefechte vom 26 bis 31 Aug. 1914，” Fortsetzung des Angriffes.

[11] KA，NFA 1367，Lemberg，Aug. 27，1914，GdK Brudermann to corps and division commanders；Rudolf Pfeffer，*Zum* 10. *Jahrestage der Schlachten von Zlocsow und Przemyslany*，*26-30 August 1914*（Vienna：Selbstverlag，1924），47-49.

[12] KA，NFA 1803，6 ITDskdo，“G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Gefechte bei Gologory und Turkocin in der Zeit vom 26 bis 31.Aug. 1914.”

[13] KA，NFA 1794，3.Korpskdo，“G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Gefechte vom 26 bis 31 Aug. 1914.”

[14] Pfeffer，*Zum 10.Jahrestage*，64；Franz Conrad von Conrad Hötzendorf，*Aus Meiner Dienstzeit 1906-1918*（Vienna：Rikola，1921-23），4：540-542.

[15] Alfred Krauss，*Die Ursachen unserer Niederlage*：*Erinnerungen und Urteile aus den Weltkrieg*，3rd ed.（Munich：1923），99-101.

[16] KA，NFA 1795，Lemberg，Aug. 29，1914，GdK Kolossváry，“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am 26 und 27.Aug. 1914.”

[17] KA，NFA 1795，Vienna，Nov. 14，1914，GdI Meixner，“Die Tätigkeit des Ⅶ Korps.”

[18] Pfeffer，*Zum 10.Jahrestage*，70，89.

[19] Pfeffer，*Zum 10.Jahrestage*，50.

[20] General A.A.Broussilov，*Mémoires du General Broussilov*：*Guerre 1914-18*（Paris：Hachette，1929），55.

[21] KA，NFA 1367，Lemberg，Aug. 30，1914，GdK Brudermann to corps and division commanders.

[22] KA，NFA 1842，Sept.7，1914，k.u.k.AOK to 32 ID，“Kampfweise der Russen.”

[23] KA，NFA 1877，Sept. 28，1914，GdI Eh. Friedrich，“Erfahrungen aus den bisherigen Kämpfen.”

[24] KA，NFA 1845/2，Gefechts-Berichte der k.u.k.Infanterie-Regimenter Nr. 80-83，Sibiu，Dec.1930，GM Leopold Hofbauer，“Erinnerungen an meine Regimentskommando-Führung beim k.u.k. I.R.Nr.83.”

[25] KA，NFA 911，4.Armeekommando，Dec. 14，1914，GdI Eh.Joseph Ferdinand，“Protokoll aufgenommen am 11.Nov. 1914，Gefangennahme und Flucht des Zugsführers Josef Erlsbacher.”

[26] KA，NFA 1367，3.Armee Kdo，Grodek，Aug. 31，1914，GdK Brudermann to corps commanders；Pfeffer，*Zum 10.Jahrestage*，92.

[27] Broussilov，*Mémoires*，56.

[28] KA，NFA 1372，3.Armeekdo，Sept. 4，1914，GdK Brudermann to corps.

[29] Pfeffer，*Zum 10.Jahrestage*，76，95.

[30] Stanley Washburn，*On the Russian Front in World War I*：*Memoirs of an American War Correspondent*（New York：Robert Speller，1982），48-49.

[31] Pfeffer，*Zum* 10. *Jahrestage*，58-9；Hötzendorf，*Aus Meiner* Dienstzeit，4：533.

[32]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 Hö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272，304-305.

[33] Holger H.Herwig，*The First World War*：*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1914-1918（London：Edw.Arnold，1997），91；General Josef von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Leipzig：Paul List，1921），40.

[34]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40-41.

[35] Gunther E.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77；Stanley Washburn，*Field Notes front the Russian Front*（London：Andrew Melrose，1915），61.

[36] KA，Militärkanzlei Franz Ferdinand（MKFF）202，“Die Minimalkriegsfälle Winter 1910/11”：“Zu viel und zu wenig！Es muss nicht immer wie 1866 sein！Dass man gleich den ganzen Aufmarsch auf eine unglückliche Politik basirt，das ist zu dumm！”

[37] Fedor Stepun，*Wie war es möglich*：*Briefe eines russischen Offiziers*（Munich：Carl Hanser Verlag，1929），18-19.

[38] KA，Militärkanzlei Seiner Majestät（MKSM-SR）95，Lemberg，Sept. 6，1914，Statthalter Galizien to Stürkgh. NFA 909，4.Armeekommando，“Nationalitäten Galiziens”；NFA 1877，Sept. 28，1914，GdI Eh. Friedrich，“Erfahrungen aus den bisherigen Kämpfen.”

[39]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Washington，DC（NARA），M 865，roll 22，Vienna，Sept. 10，1924，Carol Foster，“The Culture of Austria.”

[40] Norman Stone，*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London：Penguin，1998[1975]），89；Karl Kraus，ed. *Die Fackel*（Munich：Kösel-Verlag，1968-1976），6：3，“Wenn die Trompete statt der Kanone los ging，er könnte noch immer der tüchtigste Feldherr sein”（*Fackel* 366，Jan.1913）.

[41] KA，NFA 909，k.u.k. 6.Korpskommando，Sept. 3，1914，GdI Boroevic，“Alle drei Divisione.”

[42] KA，NFA 1367，3.Armeekdo，Mosciska，Sept. 3，1914，GdK Brudermann to corps.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339.

[43] KA，NFA 1868，Lt. Karl Popper，“Das Feldjägerbattalion Nr. 6 im Weltkrieg 1914.”

[44] KA，B/1438：29-37（Paic），GM Paic，“Auszug aus dem Tagebuche des ⅩⅣ.Korpskommandos für die Zeit vom 26.August bis 14.September 1914.”

[45] KA，B/1438：29-37（Paic），July 31，1929，“Die Armeegruppe Erzherzog Joseph Ferdinand während der Schlacht bei Rawa-Ruska-Lemberg.”

[46]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307.

[47] KA，B/677：11-22（Auffenberg），Vienna，December 1916，“Skizze aus den letzten drei Jahren meiner 43 jährigen Dienstzeit”；NFA 909，4.Armeekommando，Zakliczyn，Sept. 25，1914，Armeebefehl.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313.

[48] KA，B/1438：29-37（Paic），July 31，1929，“Die Armeegruppe Erzherzog Joseph Ferdinand während der Schlacht bei Rawa-Ruska-Lemberg.”

[49] KA，NFA 1842，32 ID，k.u.k. 2.Armee-Kdo，Dobromil，Sept. 13，1914，GdK Böhm-Ermolli.

[50]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338.

[51] KA，MKSM-SR 95，Tagesberichte AOK 1914.

[52] KA，NFA 1367，3.Armee Kdo，Mosciska，Sept. 4，1914，GdK Brudermann to corps.

[53]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EMA，7N 1128，Vienna，Oct. 14，1897，Cdt. Berckheim，“Notes sur le haut commandement en Autriche.”

[54] KA，B/96：3a（Brudermann），“Brief Sr. Kais，Hoheit des AOK GdI Eh. Friedrich an Se. Majestät Kaiser Franz Josef I.”

[55]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344.

[56] KA，MKSM-SR 95，Sept. 6，1914，AOK to MKSM；Herwig，*First World War*，94.

[57] KA，NFA 1367，3.Armeekdo，Oct. 2，1914，“Folgende Beobachtungen und Erfahrungen aus der Front in den bisherigen Kämpfen.”

[58] KA，Gefechtsberichte（GB）86，Generalstab Nr. 8069，“Kriegserfahrungen，Taktik der Feinde，” n.d.

[59] KA，NFA 1845/2，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 80-83 Sibiu，Dec. 1930，GM Leopold Hofbauer，“Erinnerungen an meine Regimentskommando-Führung beim k.u.k. I.R.Nr. 83.”

[60] KA，NFA 1367，3 Armee Kdo，Mosciska，Sept.9，1914，GdI

Boroevic to corps.

[61] Josef Redlich，*Schicksalsjahre Österreichs 1908-19*：*Das politische Tagebuch Josef Redlichs*（Graz：Verlag Böhlau，1953），1：270，Sept. 9，1914.

[62] Lawrence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Architect of the Apocalypse*（Boston：Humanities Press，2000），159.

[63] KA，NFA 1838，15 Drag. Regt.，Sept.15，1914，"Gefechts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am 8/9 bei M.H.Czana östl. Rzyczki；" SHAT，AAT，EMA 7N 848，2ème Bureau，Section Russe，"Die Stärkeverhältnisse in den bedeutendsten Schlachten des Weltkrieges：Deutschland und Österreich-Ungarn."

[64] KA，B/1438（Paic）：29-37，GM Josef von Paic，"Die Kämpfe des 2.Regiments der Tiroler Kaiserjäger am 6.u.7.September 1914." Most of this exposé has been destroyed or lost—only a few suggestive pages remain.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339-341.

[65] KA，NFA 1868，March 2，1916，Maj. Beck，"Ereignisse am 6.u.7.Sept. 1914"；Plesna，Sept. 28，1914，"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bei Michalovko am 7.Sept. 1914."

[66] KA，NFA 1868，Lt. Karl Popper，"Das Feldjaegerbattalion Nr. 6 im Weltkrieg 1914."

[67] KA，B/1438：29-37（Paic），GM Paic，"Auszug aus dem Tagebuche des ⅩⅣ.Korpskommandos für die Zeit vom 26.August bis 14.September 1914."

[68] KA，Armeeoberkommando（AOK）1914/15，Evidenzbureau（EVB）3510，Cracow，Dec. 17，1914.

[69] KA，NFA 911，4.Armeekommando，Dec. 14，1914，GdI Eh. Joseph Ferdinand，"Protokoll aufgenommen am 11.Nov. 1914，Gefangennahme und Flucht des Zugsführers Josef Erlsbacher"；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75-76.

[70] KA，NFA 1372，3.Armeekdo，Moswiska，Sept. 6，1914，GdK Brudermann to corps.

[71] Broussilov，*Mémoires*，58.

[72] KA，NFA 909，k.u.k. AOK，Sept. 7，1914，"Kampfweise der Russen."

[73] KA，NFA 1813，30 ITD，Gorlice，Oct. 3，1914，FML Kaiser，“G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Zeit vom 6-12 Sept. 1914.”

[74] KA，B/1438：29-37（Paic），GM Paic，“Auszug aus dem Tagebuche des ⅩⅣ.Korpskommandos für die Zeit vom 26.August bis 14.September 1914.”

[75]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55.

[76]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358.

[77]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359.

[78] KA，B/1438：29-37（Paic），GM Paic，“Auszug aus dem Tagebuche des ⅩⅣ.Korpskommandos für die Zeit vom 26.August bis 14.September 1914.”

[79]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363.

[80] Washburn，*On the Russian Front*，51.

[81] Arthur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A Year of the War on Many Fronts—and Behind Them*（New York：Scribner’s，1916），231；Washburn，*On the Russian Front*，51.

[82] KA，NFA 1367，3.Armee Kdo，Mosciska，Sept. 11，1914，GdI Boroevic to corps.

[83] KA，NFA 1367，Przemysl，Sept. 13，1914，Przemysl，GdI Boroevic to corps；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364.

[84] Timothy C.Dowling，*The Brusilov Offensiv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14-16.

[85] KA，B/1438：18-28（Paic），“Der Fall Auffenberg.”

[86] 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842，Berlin，Aug. 25，1914，Prince Gottfried Hohenlohe to Berchtold；Herwig，*First World War*，92-93.

[87] HHSA，PA I，842，Berlin，Aug. 25，1914，Hohenlohe to Berchtold，Sept. 7，1914.

[88] KA，NFA 909，4.Armeekommando，Sept. 15，1914，“Orientierung von Offizieren und Mannschaft über Aufgabe.”

[89] Washburn，*Field Notes*，65.

[90] KA，NFA 910，AOK，Oct.15，1914，GdI Eh Friedrich，“Versprengte—Massnahmen gegen dieselben”；NFA 1367，3.Armeekdo，Przemysl，Sept. 15，1914，GM Boog to corps.

[91] KA，NFA 1367，3.Armeekdo，Przemysl，Sept. 15，1914，GM Boog to corps.

[92]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369.

[93] KA，NFA 1367，3.Armeekdo，Krosno，Sept. 20 and 21，1914，GdI Boroevic to corps.

[94]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370.

[95]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374.

[96] C.R.M.F.Cruttwell，*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1914-1918*（Chicago：Academy，2007[1934]），52；KA，MKFF 189，“Ein Bankerott.”

[97]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377-378.

[98]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366-367.

[99] KA，B/677：11-22，Berlin，n.d.，Freiherr von Schönthan zu Pernwaldt，“Erinnerungen an den Sieger von‘Komarow’”；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380，389.

[100] KA，NFA 910，4.Armee Kdo，Zakliczyn，Oct. 2，1914，GdI Auffenberg，“Offiziere und Soldaten der 4.Armee！”

[101] I.S.Bloch，*The Future of War*（Boston：Ginn，1897），45.

[102] KA，NFA 1367，3.Armeekdo，Oct. 2，1914，“Folgende Beobachtungen und Erfahrungen aus der Front in den bisherigen Kämpfen.”

[103] KA，B/677：11-22，Berlin，n.d.，“Erinnerungen an den Sieger von‘Komarów’”；Winston S.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220.

[104] Herwig，*First World War*，75，95.

[105] KA，NFA 909，k.u.k. Kriegsministerium，Kriegsfürsorgeamt，Vienna，Sept. 20，1914，FML Löbl，“Aufruf.”

[106] Herwig，*First World War*，90.

[107] KA，NFA 1367，3.Armeekdo，Oct. 2，1914，GdI Boroevic to corps. B/677：11-22，Berlin，n.d.，“Erinnerungen an den Sieger von‘Komarów.’”

[108] Washburn，59；Ruhl，*Antwerp to Gallipoli*，231.

[109] KA，MKSM-SR 95，Sept. 29，1914，AOK to MKSM.

第十章 死于德里纳河边

如果说奥匈帝国北方面军全军需要援救，那么它在巴尔干半岛上的部队亦然，而且最需要救的就是该地的全军最高指挥官。自八月大败之后，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就成了笑柄。有人说他“无能”、“饭桶”，还有更难听的说法。[1] 波蒂奥雷克决意让那些批评他的人闭嘴，打算于九月再度入侵塞尔维亚。这有其风险；康拉德正在加利西亚全面撤退，波蒂奥雷克若要动手，就得将就着使用比他八月时还少的兵力：只有战斗力大减的奥匈帝国第五、第六集团军，旧第二梯队已开赴东部战线，帮不上忙。

为了弥合第五、第六集团军之间日益扩大的缺口，波蒂奥雷克把第六集团军北移到德里纳河中游。这使情况更糟：此刻奥军未从两路威胁塞尔维亚人，反倒以单一路线进攻，使普特尼克将军省事许多。这一次奥军的兵力（一百七十四个营）和塞尔维亚的兵力相当，因而战败的概率比八月时更高，[2] 但霍夫堡宫和康拉德的总司令部似乎没察觉这一点。博尔弗拉斯坚持要波蒂奥雷克“不计代价挽回我军名誉”。满脑子只想着加利西亚溃败之事的康拉德则比较扫兴，告诉波蒂奥雷克可以进攻，但别指望增援，且必须“避免再败于塞尔维亚人之手”。那听来无疑像是这场仗必败无疑，但亟欲展现自己能耐且和康拉德一样深信“只有进攻才会成功”的波蒂奥雷克，誓言在冬季到来之前让塞尔维亚人臣服。[3]



康拉德和弗里德里希大公对于波蒂奥雷克欲洗雪前耻的举动始终冷漠以对，直到塞尔维亚第一集团军的四个师，应俄军要塞尔维亚攻进奥匈帝国的要求，九月六日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渡过萨瓦河，开始进入匈牙

利南部，两人才批准此行动。这是场底气不足的实力展示，政治性高于军事性，但贝希托尔德和蒂萨要求拿出成果，而且波蒂奥雷克在朝中仍颇受宠信，博尔弗拉斯和老皇帝都写了恳切的信给波蒂奥雷克，称许他的报告写得翔实，拿他与“搞神秘、说话俭省”的康拉德相比，对他和康拉德一褒一贬。

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位于维也纳的大本营愈来愈像是个养老院，七十五岁的博尔弗拉斯和八十四岁的老皇帝咬牙切齿地谈康拉德的一意孤行（“k.u.k陆军总司令和其参谋竟自以为完全不受朝廷控制，这实在令人无法忍受”）和执拗难搞（“他前往北方无论如何都该每天晚上九点打电报给我们”），但称赞波蒂奥雷克容易打交道（“我们很欣赏你翔实的每日报告，比总是在深夜才送来的总司令部报告好太多了”）。贝希托尔德也站在波蒂奥雷克这一边，认为毅然决然攻打塞尔维亚乃是说服保加利亚之类的中立国靠向奥地利这一边，在奥匈帝国国力弱化之际，防止投机性反奥匈的新巴尔干联盟出现的唯一办法。正努力重拟九月计划的康拉德发现，他八月兵败加利西亚之事，已使他未来可能有大麻烦：“谁主导奥匈帝国战争的整体行动？”他气急败坏地向博尔弗拉斯说，“陛下？军事内阁？还是外交部？”[4]

一直很懂为官之道的波蒂奥雷克，小心缓慢地进入随着康拉德搞砸事情而打开的权力真空。“波蒂奥雷克自视过高，”康拉德仍在普热梅希尔时就愤愤说道，“看着塞尔维亚战役被搁在一边，他不可能咽下这口气。”[5] 但波蒂奥雷克已看出，向霍夫堡宫宣传虚妄不实的希望，乃是使塞尔维亚战役重列当务之急的最有效办法。这位巴尔干司令官的每日报告，针对情势如何大有可为写了许多胡说八道的东西，但霍夫堡宫愿意同意重启这胜算不大的入侵行动，这是原因之一。波蒂奥雷克于八月下旬报告道：“塞尔维亚人已退到尼什……他们的兵力已被消灭殆尽，士气低落。”他们的弹药、火炮、鞋就快用完，他们的伤兵有一半躺在户外没人照料，因为缺乏病床、医生和药物。塞尔维亚的七十五毫米加

农炮每分钟能发二十枚炮弹，但塞尔维亚的工业一天只能生产两百六十枚炮弹。塞尔维亚军队肯定无力再打一场战役。两天后波蒂奥雷克报告，彼得国王已带着他的财宝和档案逃到史高比耶，塞尔维亚于巴尔干战争期间吞并的马其顿地区、阿尔巴尼亚地区“处于叛乱状态”。照波蒂奥雷克的说法，塞尔维亚人已在悬崖边，只要推一下，就能让他们葬身谷底。[6]

但真正的叛乱发生于奥匈帝国军中。惊讶于八月时将领的无能，各战线的士兵都不再向长官行礼，不再听命。九月头几天，军官谈到军中礼节荡然无存，完全管不住兵。在塞尔维亚战线，阿道夫·冯·雷门将军下令采取“严厉措施”恢复纪律，提醒军官要“与士兵同甘共苦”，要强迫每个人，甚至包括病号和伤兵，起身向“较高阶者”行礼。[7] 其他军官思索过八月的战术，建议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奥匈帝国人在这里，一如在加利西亚，正给自己上一堂速成课，课程则是自一八六六年起一直被奉为圭臬的那些战术。雷门将军提醒第三十六师军官，绝勿以步兵、后备军人组成密集人墙进攻，而应“等炮兵削弱敌人战斗力”之后，派人巡逻、侦察敌军阵地，然后“利用地形，以数个小群体的方式，急速进攻”[8] 。

吉斯尔将军劝诫他的军要掩蔽营地，炊煮后要熄火，要挖壕沟和炮阵地，清除周边的玉米和树木以辟出火力区。[9] 克劳斯将军提醒他的部队，有刺铁丝网要是架成既能延迟进攻者的移动，又便于防守者冲出去反击。上级听任步兵团自便，于是他们刻意用铁丝网围住自己，以躲掉进攻塞尔维亚人的差事。克劳斯也痛斥哈布斯堡军官爱在没有火炮火力支持或与侧翼协同下，把士兵赶去做无异于送死的正面攻击：“为何我们的进攻全是从正面发动，而不想办法从侧翼包抄敌人？”[10] 火炮与炮弹仍极为不足，因而雄心勃勃的上级命令由哈布斯堡步兵团代行火炮的重要职能：“此后所有反炮兵的火力都应全由机枪和步兵团发出。”[11] 在后方，奥地利人把枪炮指向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数百名有头有脸

的塞尔维亚人（教士、老师、律师、当地政治人物）遭搜捕，一千三百人遭强制迁居国内他处，八百四十四人遭掳为人质，以吓阻塞尔维亚人在波蒂奥雷克入侵部队后方搞破坏。[12]

博尔弗拉斯终究开始不放心波蒂奥雷克，虽然已经太迟。这位将军八月下旬时还语带不屑地谈到战斗力大减的塞尔维亚军队，这时则提醒那是支无法击败的军队——十六万兵力在瓦列沃、五万兵力在乌日采、一万五千多兵力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第三集团军已把三个师往上推进到位于洛兹尼察（Loznica）、列斯尼察的渡河口，一如他们八月时所为。而由于萨瓦河边或多瑙河边都没有奥军，奥地利并未使塞尔维亚陷入左右为难之境。普特尼克非常清楚奥军会如何入侵，会入侵哪里，波蒂奥雷克则已开始着手降低维也纳对此一行动的期望，说他辖下的部队，第五集团军“极度消沉”，只有第六集团军真有战斗力。一向抓不住重点的博尔弗拉斯，这时把时间浪费在苦思最近一次战败的原因上，而非思索如何避免再战败。八月三十一日博尔弗拉斯发文给康拉德，“波蒂奥雷克为何想在如此艰困的地形上与敌人做个了断，我百思不得其解。那得渡过数条河，得在没有配备山地装备的部队可用的情形下在丘陵上作战。”在这同时，波蒂奥雷克已准备好在更为不利的情势下重蹈八月的蠢行。[13]

由于仍有两个塞尔维亚师在萨瓦河以北，所以波蒂奥雷克临时想出一套防御计划。他拨给阿尔弗雷德·克劳斯将军由四个新组建的旅草草凑成的一个军，命他击退入侵者，同时命法兰克的第五集团军立即渡过德里纳河，切断那些入境袭掠之塞尔维亚人的退路。克劳斯于九月七、八日击退塞尔维亚人，推进到萨巴茨周边的萨瓦河边，先前由第二集团军占领的地区。斯雷姆（Syrmia，多瑙河与萨瓦河之间的肥沃地区）的塞尔维亚裔居民，先前欢欣鼓舞于塞尔维亚人的入侵，洗劫了当地的德意志人、捷克人，这时则自己遭到洗劫，然后被奥地利宪兵放火烧掉房子。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亲王走过苏尔钦（Surcin）冒烟的街头，在费

内克（Fenek）的东正教修道院旁驻足，有感而发说道，“战争绝对不美”。那修道院已遭奥军洗劫、焚烧：“让人无比沮丧又可耻的景象”。[14]

一如八月时，法兰克的第五集团军于九月八日为渡过德里纳河吃尽苦头。第五集团军涵盖了从萨巴茨往南到洛兹尼察这一段的前线，其右翼在洛兹尼察与第六集团军的左翼相接。第五集团军第九师每次欲在河上架桥，都受挫于塞尔维亚人的阻拦，后者以火炮和机枪火力扫射桥梁和工兵。九月八日该师只将两千兵力送到对岸，隔天又送了同样兵力到对岸。三个完整的团最终缩在一狭窄的滩头堡上，摧枯拉朽的塞尔维亚炮弹和榴霰弹从头顶上落下。士兵被猛烈炮火吓到且他们的军官似乎束手无策，于是他们开始走进河里，好似要游回对岸。他们的军官气呼呼大喊：“挺住！挖壕！不准撤退！”但塞尔维亚炮弹继续落下，奥军每次欲离开泥泞的河岸向前进都遭击退，所以只好撤退，退到左岸。[15] 回到对岸，他们发现未渡河的友军正拿当地的波斯尼亚女人作乐。那些女人抱怨遭到性侵，抱怨士兵强行闯入她们家。[16]

面对这种种挑战，奥地利人的响应，一如以往，乃是执迷不悟。法兰克命令部分军官在教士兵认识“伊斯兰的宗教信条”时，其他军官带领他的第三十六师投入这时已司空见惯的杀戮战场，要装备不良且未有心理准备的奥匈帝国士兵冲入塞尔维亚的步枪、火炮阵地，而这些阵地巧妙融入河边村落，在树篱和围墙下伸展，乃至穿过建筑；农舍的茅草屋顶提供遮阴和掩蔽，使奥军的飞机侦察不到。

法兰克辖下许多部队未能渡过德里纳河；他们的小船搁浅在沙洲上，使士兵暴露于塞尔维亚人的枪炮攻击里。官兵溺死或遭左岸友军火力击倒。利用桥梁过河者，得穿过撤退的奥军奋力前进，有位军官指出，九月八日刚架好一座浮桥，以克罗地亚人为主的第七十九团，先前在夜里搭小船辛苦渡到右岸，这时猛然往浮桥冲，想逃回左岸。人在左岸的约翰·萨利斯（Johann Salis）将军带着第三十七团数个连冲上浮

桥，才得以挡住第七十九团士兵从右岸撤退。他发现该团士兵处于常见的恐慌状态，每个人都信誓旦旦说自己是奉命撤退；他们的军官了解到，原来是有大胆的塞尔维亚人悄悄潜到近处，用德语喊“撤退”。光是九月八日一天，第五集团军就损失一百四十三名军官、四千四百名士兵，却在河对岸塞尔维亚境内连一个据点都未拿下。[17]

在萨瓦河边，奥地利地方防卫军第二十一师，这时试图卸除德里纳河边诸师所受的压力。该师部分兵力于九月八日于波洛伊（Poloj）渡过萨瓦河后，立即冲进先前让第二集团军草木皆兵的高大玉米田。他们在玉米田里跌跌撞撞行进，遭到藏身于玉米田里和树林中的塞尔维亚游击队开枪攻击。他们在原地兜圈子，队形被一根根踩到的玉米株打断，开枪还击，却只是互朝着自己人背后开火。这支由捷克人、德意志人组成的步兵团子弹打光且因恐惧而几乎解体，开始朝河的方向往回跑。军官挡住他们的退路——“别想撤退！这个阵地得守住！”——他们于是掘壕固守，但不久后受到自家人火炮攻击，他们再度慌乱撤退，一路退到萨瓦河边。自家人火炮把他们误当成塞尔维亚人，朝他们猛发炮，当他们退到河边时赫然发现没有工兵可划船送他们渡河。奥地利地方防卫军第七团，连一个塞尔维亚人影都没见到，就损失五名军官和一百七十四名士兵。两眼发火的幸存者不再讲什么道理，把能找到的小船都强征来用，要船夫把他们送到北岸。后来因此事遭革职的第八军军长阿瑟·吉斯尔将军，隔天早上对麾下军官发飙：“我军每个指挥官都得更卖力压制懦弱行为，坚定士兵斗志，鼓起全力进攻。”[18]

吉斯尔，一如在这场悲惨战争中的其他每个奥匈帝国将领，不切实际，希望战事出现曙光。由于塞尔维亚人意志坚定而奥匈帝国这一方老是把事情搞砸（这时已司空见惯），所以没有哪次的攻势作战收效。塞尔维亚人已在执行在这场战争期间每个军队都会推行的变革——在前沿壕沟里只部署小规模战斗编队，把步兵团主力留在更后面的预备壕沟里——奥军则仍在狭窄的战线上驱策呈密集队形的士兵前进，使他们成为

己方炮火和塞尔维亚炮火、子弹的活靶。己方炮火常打中自己人而非敌人。[19]

波蒂奥雷克开始为躲不过的战败编借口。他呈报了“洛兹尼察的离谱行径”，即该地两个兵力完整的奥地利军，面对塞尔维亚人的轻度抵抗，却未能渡过德里纳河。他表示这场渐渐呈现的挫败该怪在他们头上，而非他头上，他要军官无论如何不得撤退：“不准撤退；凡是下令撤退的军官都会受军法审判，撤退的士兵则会遭枪毙。”[20] 其他将领则只是指出奥地利战术的无效。在照本宣科的战前演习中，奥匈帝国炮兵只懂得对以插旗表示的敌军发动攻势，从未学过怎么对付这种流动的打法。他们浪费炮弹，只要怀疑某处有塞尔维亚部队，就朝那里乱轰一通，未瞄准经商定的目标，未节省炮弹供反炮兵战之用，或供在塞尔维亚预备队增援前线时打击该预备队之用。[21]

第六集团军照理该助第五集团军过河，却也拼命要渡过德里纳河。一如八月时，丘陵地使行进慢如牛步。有壕沟严密防护，且在俯瞰德里纳河上游、中游的山上有自家的火炮，塞尔维亚人朝下方装备简陋的奥军开火。[22] 一如第一次世界大战里的他国军队，这些奥地利人吃到炮弹严重不足的苦头。节俭的各国陆军部未储备炮弹，因为炮弹放久不用，炮弹的化学成分会变质，而且各国军方没料到一九一四年会爆发大战（法国在战争头一个月就打掉其库存炮弹的一半）。康拉德和波蒂奥雷克这时为自己还可用的炮弹问题激烈争吵，都认为对方在囤积炮弹或浪费炮弹。“炮弹省着点用，”有位军长写道，“不久后我国的工厂就无法再送来炮弹。”[23]

作战用的金属供应吃紧，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不得不呼吁人民尽可能献出金属：火炉用具、垃圾桶、球形门把、烛架、皮带扣、教堂钟、刀具。“我们的军队需要金属，”他如此恳请。的确如此；这时奥军下令只有“出现明显目标”且每个炮兵连长都同意那目标“真实且适当”时才能

开炮，严禁所有炮集体开火。[24] 在这样的火力支持下，奥地利步兵团到处遭打散。来自亚哥德纳（Jagodna）南边第四山地旅的报告，证实奥军炮兵开炮是如何地节俭：“九月十四日整日遭敌火力攻击，我们一再请求位于覆林高地上的炮兵开火，却被告知没有‘适合的目标’。然后我们请第五山地旅用其火炮猛轰该高地，该部也回以‘未出现合适目标’。”[25] 上级既命令士兵节省弹药，却又警告他们，“凡是在这里未立即用掉的东西，都会被送去给俄罗斯战场的友军”，典型的“好兵帅克”吊诡。[26]

第六集团军第一师辖下某个奥地利地方防卫军部队，九月八日夜遭敌人打垮。当时，塞尔维亚人在漆黑中靠近，用德语喊道，“奥地利地方防卫军，不要开枪，我们是第八十四团”，然后冲过来，开火。隔天，塞尔维亚人重创该师，歼灭该师的小规模战斗编队，然后击倒冲上来的每个预备编队。有位团长是克罗地亚人，用克罗地亚语短暂重整溃散的队伍，督促道Dalmatineidojte se！但出现在他后面的德意志人旅长，用德语声嘶力竭大叫“奥地利地方防卫军的兄弟，守住防线！援军就要来！”之后，队伍又溃散。已照着他们的克罗地亚人上校行事的士兵，跑离他们的德意志人将军，开始一拨拨往后面跑；每有军官挡在前面要他们调头，他们就绕过去继续跑。[27]

波蒂奥雷克试图重现八月的局势，以萨瓦河边的克劳斯“综合军”扮演那时第二集团军的角色，第五、第六集团军则强渡德里纳河与克劳斯部会合。但扮演打击角色者只有塞尔维亚人，奥军只有挨打的份。塞尔维亚人让第五集团军部分兵力于九月十三日在列斯尼察过河，然后以旋风般袭去的炮弹、子弹予以消灭。第五集团军余部从左岸眼睁睁看着自家弟兄遭杀戮。[28] 由于在德里纳河边无处可去，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上校带着他的龙骑兵团到米特罗维察（Mitrovica），下马，渡过萨瓦河。龙骑兵在对岸等自己的马过来，就是苦等不到。由于船不够将人和马都运到对岸，这位亲王和龙骑兵只得打消作战念头。“我们所有人平

时都未受过下马作战的训练，也没有充足的装备来执行此任务；我们的卡宾枪只有约五十发子弹可用，没有铲子可用来挖壕沟，而且我们穿戴像野花一样耀眼的红长裤、红帽，还有使我们寸步难行的高统马靴和马刺。”[29] 事实表明，为阅兵而打造的骑兵打不了仗。

重启攻势的头几天，奥地利士兵就表现得非常冷漠。有位上尉参谋巡视第五十三、第九十六团的壕沟，发现壕沟污秽、未有改善，以及弃置的装备（背包、外套、弹带、步枪乃至未爆炸炮弹）散落一地。士兵闷闷不乐坐在土里，不理会说话不清不楚的军官。那些军官讲得流利的德语或匈牙利语，但奥匈君主国的其他十种语言都不在行。这位上尉注意到壕沟和壕沟的土护墙全因炮击而塌掉，但没人费心将其修复。他叫军事警察前来驱使士兵干活：“宪兵露出对我的命令既不懂也没兴趣的神情。”[30]

九月时的补给，一如八月时稀缺，塞尔维亚人派两或三人一组摸黑混进奥地利补给线，丢手榴弹使补给人员窜逃，从而使奥军的补给更为不足。没有定期的粮食补给，士兵掠夺民粮，招来将领更多斥责：“从今以后，凡掠夺者一律由行刑队当场枪毙。”奥地利将领苦苦思索这场战役的吊诡之处；他们的兵会劫掠塞尔维亚民家，然后立即将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家聚拢于一地，基于“人道”理由将他们护送到遥远后方。“不得再护送老人离开战区！”克劳斯将军于九月十九日告诫道，“太多兵这么做，削弱前线战斗力。”

克劳斯也注意到自残情况大增，奥匈帝国士兵朝自己左手开枪，以便成为伤兵，送离战场。在他防区的某个野战医院里，一天内就有十八个人报病号，个个左手都有枪伤。“每个人都说：‘我夜里在壕沟干活时，不小心被同袍射伤’。”克劳斯认为这些说法“不可信”，命令凡是手伤都要立即接受医生检查。凡是自残者一律吊死，以儆效尤。[31]

数千名奥地利人出于程度不一的自愿心态向塞尔维亚人投降，为塞

尔维亚参谋部提供了很有用的情报，但自愿被俘的塞尔维亚人很少。“塞尔维亚人不像大块头孩子气的俄国人那样举手投降。他们只要撑得住就继续打下去，”有位战地记者如此写道。[32] 那些真的投降的塞尔维亚人，一身邋遢样，武器、装备很差，有些人只受过四天的军事训练。[33] 但他们不轻易投降，渴求情报的奥地利将领开始祭出重赏，鼓励生俘塞尔维亚人：抓到一名入伍兵赏两百克朗，一名军官一千克朗。[34] 如此重赏有其必要，因为有一个因素使塞尔维亚人不愿投降：奥地利人处决了他们所抓到的许多塞尔维亚人，因为他们没穿军服。塞尔维亚人不穿军服并非意在欺敌，诚如九月中旬普特尼克发给尼什陆军部那份绝望的电报所表明的：“我们的士兵有很大比例光着脚打仗，只穿衬衣和衬衫，没有军阶识别符号；敌人把他们当叛乱分子射杀。我们急需军服和二十万双鞋。”[35]

外国报纸得悉奥地利在此地、在加利西亚依旧失利的消息，预言这个君主国不久就会垮掉。在这个二元帝国内，许多人把这一不祥的预言归咎于沙皇的宣传机器，而非战场上的实际情势，而其实战场上的情势就是最可怕的宣传。人在布达佩斯的蒂萨，九月十五日打电话给人在维也纳的贝希托尔德，要求他澄清此事：“你得纠正外国报纸上俄国人的不实之言，指出我们一直独力对抗俄国主力，甚至让他们吃了几场大败仗；指出在德里纳河边，我们的部队正攻入塞尔维亚心脏地带且取得战果。”[36]

仍困在德里纳河边的士兵，若听到这说法，应会说是闻所未闻。在前线，奥匈帝国将领费了好一番工夫，才得以将命令下达，乃至取得必要的装备。将领要人将飘着黑黄三角旗的参谋车驶过德里纳河和萨瓦河，以加速前线部队间命令的传达。没人考虑到奥匈帝国哨兵可能会有什么反应，毕竟只有少数哨兵见过乃至听过汽车。汽车驶近时，吓坏了的乡巴佬对其开火。即使是看到汽车时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奥地利兵，也对其开火，因为相信一则传言：法国银行家派汽车满载现金前来支持

塞尔维亚人打仗。“不准再对军车开火，”克劳斯的军需长发火道，“由于汽车引擎声轰轰响，你要驾驶员停车时，但驾驶员听不到你说的。”他还下令不得再传“有汽车载钱从法国来的传言”。哨兵辱骂汽车驾驶员，在他们的机密公文袋里翻找传说中的现金。[37] 补给问题使通信更为不易。前来替补伤亡士兵的奥匈帝国行军营，什么东西都得自行觅得，包括背包和步枪。病号和伤兵的装备遭取走，以让新来者有衣穿，有武器用，就连受轻伤者都立即被卸除武器和军服。维也纳的陆军部长下令各前线的指挥官“卸除所有死伤者的武器和衣物，连衬衣都不放过”[38] 。奥军奉命“开辟‘强击巷’穿过塞尔维亚铁丝网，在两侧翼用沙包稳固靠火力打出的缺口”，借此改善步兵强攻效果，但全军缺铲子、沙包、镐、剪铁丝器，诚如奥斯玛·帕内什（Othmar Panesch）将军所说，这“不是因为它们已给用坏，而是因为士兵不想带着走而把它们丢掉！”[39]



遭奥地利人俘虏的塞尔维亚人

塞尔维亚人很少投降；真的投降者，例如照片中这些人，一身邋

遢样，武器、装备很差，有些人只受过四天的军事训练。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九月底时，奥军第二次入侵塞尔维亚的行动，在亚哥德纳周边数座约三百六十米高的小山上陷入停滞。第一、第六山地旅于九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一再进攻亚哥德纳诸高地。大雨和浓雾遮蔽视线，整个人陷入烂泥巴里，他们在陡峭、覆有林木的山坡上跌跌撞撞往上攻，以密集编队的纵队攻入塞尔维亚人的火力网，结果被打得溃不成军，光是第一山地旅就死三百七十二人、伤一千四百四十五人、失踪七百一十二人。第六团的数个克罗地亚营日夜奋战，该团军官忆起敌军军官用同样的语言向身怀致命武器但相对抗的两群人下达类似的命令，使他们难以指挥部队作战。第一营战死三分之二兵力，约八百人，埋了一千三百具塞尔维亚人尸体。一如在加利西亚的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实行纵深防御，构筑前后数道平行的壕沟，使奥军几乎不可能突破。[40]

九月二十四日，波蒂奥雷克终于把司令部从舒适的萨拉热窝迁走，但也只迁到图兹拉（Tuzla），该地仍在波斯尼亚境内，距最近的战场有约一百六十公里远。或许波蒂奥雷克需要稍事休息，因为他与康拉德的搏斗，激烈程度不亚于他与塞尔维亚人的战斗。他仍能透过博尔弗拉斯向皇上直抒己见，但康拉德正竭力欲堵住这一沟通管道，欲把巴尔干的弹药（和影响力）转拨到东线。九月二十日博尔弗拉斯发放一批炮弹、子弹给波蒂奥雷克时，康拉德开始长达一星期的抗争，最后博尔弗拉斯不争气地甩掉波蒂奥雷克（“这里没有在幕后影响皇上的宫廷小集团”），同意不再让波蒂奥雷克与维也纳直接联系，而是要透过康拉德转呈其报告和要求。[41] 康拉德终于切断巴尔干方面军司令官与皇上直接联系的管道，终于使对俄战事，而非对塞尔维亚战事，在奥匈帝国的军事规划作业里列为优先考虑事项。

西线的战局正好转。德军在西线传来好消息：他们正在瓦兹河边

（Oise）包抄英法军侧翼，在凡尔登止住法军前进的脚步，已开始打掉法国设于东部边界上的堡垒。[42] 在马恩河边受阻之后，德军正试图重启他们失败的八月攻势，欲贯彻作战计划以取得塞纳-马恩省河畔的艰巨胜利，盘算着一旦取得那胜利，东线的胜利也将唾手可得。波蒂奥雷克的第六集团军则没有这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可报：他们终于拿下亚哥德纳诸高地，但付出了又有两万五千人死伤的代价。第六集团军兵疲马困，士气涣散，且因为弹药短缺而几乎失去武装，战斗力不可能强过第五集团军。博尔弗拉斯和皇帝评估过亚哥德纳这场惨败之后，表达了他们一贯慢半拍的惊愕："谁下令干这一荒唐事？""波蒂奥雷克下的令。"[43] 他这场软弱无力的九月战役，留下一个恶果。第二次战败之后，皇帝若要从南战线撤军，势必得跟着放弃他的巴尔干梦想。若如此，奥匈帝国的威信将受到无法承受的伤害。毕竟这帝国想称霸巴尔干半岛，仍对萨洛尼卡不死心。但若要挺住摇摇欲坠的东部战线，得投入奥匈帝国所有火炮。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因此陷入险境：弱得无力再入侵塞尔维亚，且弱得不可能成功反攻俄军。奥匈帝国驻各中立国首都的公使，吵着要本国政府提供讯息。驻布加勒斯特的奥地利公使说："此地的塞尔维亚公报谈到全歼我们数个团，奥军'仓皇'逃到德里纳河对岸，塞尔维亚收复洛兹尼察和列斯尼察。要我否认此说法吗？"驻雅典的奥地利公使说："我需要德里纳河边那几场仗的详情；塞尔维亚人把它们说成是塞尔维亚大胜。"驻索非亚的奥地利公使则示警道，如果再度证实兵败塞尔维亚之事无误，那里的亲奥政府大概会垮台："保加利亚震惊于奥地利于北战场撤退的消息，但塞尔维亚境内形势对此地情势影响更大。"[44]

九月的塞尔维亚战事使奥匈帝国又损失四万人，却一无所获。[45] 十月一日，弗里德里希大公从其位于克拉科夫附近的总司令部发出信心满满的声明，说"整体情势有利"。俄军战斗力正"逐渐垮掉"，德军"深入法境"，"塞尔维亚反抗势力摇摇欲坠"。弗里茨尔推断，这"是实情，要用士兵的母语向他们说清楚"[46] 。

波蒂奥雷克有许多事需要向上面解释，十月四日他正式终止攻势，把进攻失利归咎于炮弹短缺，而非他把事情搞砸："没有先摧毁敌人壕沟，我们进攻不了，但要摧毁敌人壕沟，我们需要长时间的猛烈炮轰。"克劳斯将军同意此说，向波蒂奥雷克表示他并不乏"进攻精神"，但认为"继续埋头撞墙，如此徒劳无功的牺牲数千名我们英勇士兵的性命，令人遗憾"[47]。

这或许是目前为止奥匈帝国这一边所发出最有见地的言语，但诸集团军司令官还不这么认为，仍把进攻奉为无上圭臬。私底下，波蒂奥雷克开始鼓动霍夫堡宫第三次发兵入侵塞尔维亚，令人难以置信地表示，一再让波蒂奥雷克吃败仗的塞尔维亚终于快垮了："塞尔维亚仅存的兵力集中于瓦列沃，几乎不到十八万的有生力量。"塞尔维亚的伤亡（据估计开战迄今六百军官、六万士兵），找不到人员填补。贝尔格莱德的宫廷和政府不久后会移到更南边，从尼什移到史高比耶。波蒂奥雷克报告说，军队士气"低落"，但塞尔维亚老百姓的民心更低落，他们受霍乱、伤寒肆虐苦不堪言，且已开始反抗征兵和军事当局。"再一次进攻，"波蒂奥雷克于十月一日恳请，"再一次进攻就会搞定。"[48]

---

[1] Rudolf Jerabek，*Potiorek*（Graz：Verlag Styria，1991），138-139，151，160-161.

[2] Kriegsarchiv，Vienna（KA），B/1503：7，FZM Potiorek to Armeeoberkommando（AOK）and Militärkanzlei Seiner Majestät（MKSM），"Resüme der serbischen Truppenverteilung 31.August."

[3] KA，B/1503：7，Sept.2，1914，Conrad to Potiorek；Jerabek，*Potiorek*，136，142.

[4] KA，B/1503：6，Vienna，Aug. 14，22，and 25，1914 and B/1503：7，Vienna，Aug. 29，1914，Bolfras to Potiorek；Jerabek，*Potiorek*，133-134.

[5] Jerabek，*Potiorek*，137，

[6] KA，AOK 1914，Evidenzbureau（EVB）3506，k.u.k. 6 Armee-

Kommando，Sarajevo，Aug. 25 and 26 and Sept. 1 and 3，1914，Potiorek to MKSM；NFA 2115，416/28，5 Armee，Sept. 6，1914，“Resumé über feindliche Lage”；James M.B.Lyon，“‘A Peasant Mob’：The Serbian Army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War，”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1（July 1997）：492.

[7] KA，Neue Feld Akten（NFA）2115，13.Korps-Kommando，Bijelina，Sept. 3，1914，GdI Rhemen.

[8] KA，NFA 2115，36 ID，Bijelina，Sept. 3，1914，GdI Rhemen，“Bermerkungen.”

[9] KA，NFA 475，41 Sch.Brig.，Seliste，Sept. 9，1914，GdK Giesl.

[10] KA，NFA 475，41 Sch.Br.，Jarak，Sept. 24，1914，FML Krauss to GM Panesch. Op.Nr.195/40，FML Krauss，“Direktiven für die nächsten Kämpfe.”

[11] KA，NFA 475，41 Sch.Br.，Jarak，Sept. 21，1914，FML Krauss.

[12] KA，MKSM-SR 95，Sarajevo，Sept. 7，1914，Präsidialbureau Bosnien-Herzegovina to Potiorek.

[13] Jerabek，*Potiorek*，140-142；KA，B/1503：6，Op，Nr.453，Sarajevo，Aug. 29，1914，“Fliegermeldung”；KA，B/1503：7，Doboj，Sept. 3，1914，Potiorek to Bolfras；Sept. 4，1914，AOK to Potiorek.

[14] Felix Prinz zu Schwarzenberg，*Briefe aus dem* Felde 1914-18（Vienna：Schwarzenbergisches Administration，1953），23.

[15] KA，NFA 528，9 ID，“Tagebuch Ⅱ，21.Aug-8-Okt. 1914”；GB 30，k.u.k. 17.Inf-Brig-Kdo，Vehino selo，Sept. 11，1914，GM Daniel，“G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Kämpfe an der Drina am 8.bis 9.Sept. 1914.”

[16] KA，NFA 2115，5.Armee-Kommando，Brcko，Aug. 31，1914，Frank to 36 ITD.

[17] KA，Gefechtsberichte（GB）24，36 ITD，“Gefechtsbericht über Drinaforzierung von Megjasi am 8.Sept. 1914”；NFA 2115，36 ID，I.R.Nr. 79，Col. Schöbl，“Gefechtsbericht für den 8.Sept. 1914”；GB 1，Jamena，Sept. 13，1914，GdI Frank，“Gefechtsbericht Raca und Megjasi.”

[18] KA，NFA 475，41 Sch.Brig.，Sept. 10，1914，Oblt. Sappe，“Gefechtsbericht für den 8-9 Sept. 1914”；8 Korps-Kommando，Op.Nr.511，Seliste，Sept. 9，1914，GdK Giesl.

[19] KA，NFA 475，41 Sch.Br.，Op.Nr.195/40，Sept. 1914，FML Krauss，“Direktiven für die nächsten Kämpfe”；NFA 191，18 Inf-Brig.，k.u.k. 18 Inf-Brig-Kdo，Serb. Raca，Sept. 23，1914.

[20] KA，NFA 529，9 ID，Raca，Oct. 2，1914.

[21] KA，NFA 529，9 ID，Oct.10，1914，GM Daniel.

[22] KA，GB 10，k.u.k. 4 Gebirgsbrigadekommando，“Gefechtsbericht 8.und 9.Sept. 1914.”

[23] Jerabek，*Potiorek*，150-151.

[24] KA，NFA 529，9 I.D.，8 Korps-Kdo，Seliste，Sept. 4，1914 and Grk Sept.17，1914，GdK Giesl.

[25] KA，GB 10，k.u.k. 4 Gebirgsbrigade-Kdo，Debelsosaje，Sept. 26，1914，“G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Gefechte vom 13-16 Sept. 1914.”

[26] KA，NFA 170，17 Brig.，k.u.k. 8 Korps-Kdo，Grk，Sept. 18，1914.

[27] KA，GB 10，“Gefechtsbericht Landwehr 37，8.September”；GB 42，1 Geb. Brig.，Jagodna，Sept. 25，1914，“Gefechts-Berichte.”

[28] KA，GB 24，36 ITD，“Gefechtsbericht über Drinaforzierung von Megjasi am 8.Sept. 1914”；Manfried Rauchensteiner，*Der Tod des Doppeladlers*：*Österreich-Ungarn und der Erste Weltkrieg*（Graz：Verlag Styria，1993），133.

[29] Schwarzenberg，*Briefe aus dem Felde*，19.

[30] KA，NFA 2115，36 ID，Megjasi，Sept. 12，1914，Capt. Bubin，“Wahrnehmungen bei eigenen Truppen.”

[31] KA，NFA 475，41 Sch. Brig.，Jarak，Sept. 19 and 24，1914，FML Krauss，“Abfertigung.”

[32] Arthur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A Year of the War on Many Fronts*—*and Behind Them*（New York：Scribner’s，1916），251.

[33] KA，NFA 475，41 Sch.Brig.，Jarak，Sept. 29，1914，FML Krauss，“Abfertigung.”

[34] KA，NFA 2115，36 ITD-Kommando，“Nachrichten über den Feind.”

[35]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 Serbiens zur Befreiung und Vereinigung der Serben*，*Kroaten und Slovenen*（Belgrade：Buchdruckerei des Ministeriums für Krieg und Marine，1924-1926），2：261.

[36] 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905，Budapest，Sept. 15，1914，Tisza to Berchtold *per Telefon* .

[37] KA，NFA 475，5 Armee Etappenkommando，Sept. 9，1914，Col. Ottokar Landwehr；NFA 1787，2 A.K，Sambor，Sept. 6，1914，“Beschiessen von Automobilen.”

[38] KA，NFA 475，41 Sch.Brig.，Sept. 21，1914，FML Krauss，“Beitrag zur Abfertigung”；NFA 529，9 ID，6.Armee-Kommando Op.601/OK，Sept. 23，1914.

[39] KA，NFA 529，9 ID，8 Korps-Kdo，Grk，Sept. 18 and Raca Sept. 27，1914，GdI Frank.

[40] KA，NFA 475，Vienna，Sept.20，1914，Kriegsministerium Erlass；GB 42，6 Gebirgsbrigade-Kommando，Lipnica，Oct. 8，1914，GM Goisinger，“Bericht über die Kämpfe um Jagodna.”

[41] KA，B/1503：7，Vienna，Sept.20 and 26 and Oct. 8，1914，Bolfras to Potiorek，“Hier gibt es keinen Hofkriegsrat.”

[42] KA，NFA 2115，36 ID，Op.663/OK，“französischer Kriegsschauplatz.”

[43] Jerabek，*Potiorek*，155.

[44] HHSA，PA I，905，Sofia，Sept. 26，1914，Mittag to Berchtold；Athens，Sept. 25，1914，Szilassy to Berchtold；Jeniköj，Sept. 24，1914，Pallavicini to Berchtold.

[45] C.R.M.F.Cruttwell，*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1914-1918*（Chicago：Academy，2007[1934]），53；Holger H.Herwig，*The First World War*：*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1914-1918*（London：Edw.Arnold，1997），89.

[46] KA，NFA 2115，Oct.1，1914，AOK to 13 Korps-Kommando，GdI Eh. Friedrich.

[47] Jerabek，*Potiorek*，156-158.

[48] KA，AOK，EVB 3506，96/B，108/B，112B，115/B，123/B，

131B.Sept. 12，20，21，23，25 and Oct. 1，7，1914.NFA 2115，13 Korps-Kdo，Op.Nr.225/7，Sept. 25，1914，“Nachrichten über den Feind.”

第十一章 华沙

奥匈帝国军队在加利西亚境内屡吃败仗，还仓皇后撤几乎退到喀尔巴阡山脉，令德国人惊得目瞪口呆。在西部战线的德军总司令部，奥地利军事联络官指出，康拉德迅速而无能的战败，终于引起德国注意：“他们始终认为对俄之战是‘我们的事’，但我们兵败伦贝格和撤离加利西亚，突然使东边的战争变得对他们和对我们一样重要。”这时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一样深切感受到俄罗斯蒸汽压路机令人战栗的逼近声。马恩河边遭击退之后，毛奇已被撤职，代以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将军。法尔肯海因指出了谁都看得出的一个道理：俄军若穿过喀尔巴阡山脉，将“使整个战局完蛋”，使西里西亚（德国重要的工业区）被俄军包围，使俄军直捣匈牙利心脏。[1]

战争才打了一个月，维也纳似乎就快垮掉。波蒂奥雷克两次兵败塞尔维亚，康拉德三次攻势（分别在克拉希尼克、科马鲁夫、伦贝格）全遭击溃，他的部队被一路逼退到克拉科夫。康拉德的四个集团军，战死者多到掩埋队应付不了，不得不把尸体堆成像柴堆一般，任其肿胀、腐烂、爆开。[2] 光是在加利西亚，哈布斯堡军队就死十万人，伤二十二万人，十二万人被俘，还失去两百一十六门炮和数千个火车车厢、火车头。[3] 加上波蒂奥雷克部的八万一千人伤亡，全军少掉一半兵力，离垮掉已是一线之隔。奥匈帝国已开始征召四十多岁男子，送去填补惊人伤亡所造成的兵力减损。[4] 八月战事的幸存者，挤在东部火车站，想免费搭上载运伤病者的列车返乡，而新来的兵走下火车，许多人穿着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俗艳的剩余军服，没有步枪、铲子、毯子或医疗用品，许多人连枪都没射击过，更别提打过仗。在战前奥地利军队最强盛的时

代，法国人就说该军队“落后西方两或三代”，这时看来落后更多。[5]

根据施里芬计划，德国承诺于开战六个星期后调派大军增援东部战线，但目前看来无此迹象。德国总司令部因九月兵败马恩河边感到难堪，打定主意对康拉德尽量不提这场败仗，甚至未告之参谋总长毛奇已遭撤职，代之以法尔肯海因之事。法尔肯海因获任命一个星期后，康拉德仍在写信、发电报给毛奇。[6]

毛奇、法尔肯海因……谁当德国参谋总长，对康拉德来说没差别。他把奥地利大败怪在他们两人头上。他把德军未能和他协力攻进波兰，归咎于德皇威廉二世想保护他在东普鲁士的“种马场和猎屋”，而没有归咎于德军在法国、比利时投入庞大兵力作战。康拉德于八月上旬就知道，德国人在法国投入七个集团军，在东线不会也采取攻势，但仍装出遭出卖的样子。要替自己的出师不利脱罪，这似乎是最好的办法。他愈来愈把自己视为无辜的代罪羔羊。明明与有夫之妇爱得如胶似漆，但他仍哭诉自己的寂寞：“我没有家，没有女人，往后的日子谁来陪我？”驻新桑德茨奥匈帝国总司令部的德国武官报告，康拉德已“对他的军队完全失去信心”。[7] 他甚至提议甩开盟国单独媾和。康拉德致函外长贝希托尔德：“奥匈帝国为何要流没必要的血？”[8]

九月十四日接替毛奇之位的五十三岁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将军，听到康拉德的抱怨大为惊奇。开战后六个月，德国死伤将近两百万。自负的普鲁士-德意志军队愈来愈像支驳杂的人民军队，因为已把后备部队和第三级部队（译按：Landsturm，由四十至六十一岁男子组成的部队）叫到前线，替补剧增的人员伤亡。职业军官和士官已全数阵亡。德军步兵连由下士指挥。退休将军，包括保罗·冯·兴登堡和莱姆斯·冯·沃伊尔施（Remus von Woyrsch），被叫回军中，应付新挑战。[9] 法国在马恩河边顶住德军攻势，意味着西线的战事到了十月还不会结束。德国人将无法如毛奇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在卡尔斯巴德向康拉德所承诺的，抽

调“压倒性兵力”到东部战线；塞纳-马恩省河畔的胜利将无法开启布格河边的胜利。反倒正如奥地利某外交官所写的：“俄国在兵力上的庞大优势，已成为决定这场战争走向的最大因素。”[10]

鉴于哈布斯堡军队垮掉，德国将不得不派兵前往东部战线。德、奥同盟关系，禁不住柏林、维也纳在首要目标上的冲突拉扯，已开始崩解。奥匈帝国新任驻柏林大使戈特弗里德·冯·霍伦赫亲王，对此一矛盾冲突有简单扼要的说明：“贝特曼·霍尔维格如今说德国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国的未来’；对我们来说，‘安稳的未来’这原则同样适用，但只有透过击败俄国才能达成，而德国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击败法国和英国。”[11] 奥地利人担心德国人被“歇斯底里的仇英心理”所蒙蔽，可能在东边的要命“权力失衡”得到矫正之前，就急着欲与俄国个别媾和。

维也纳认为柏林可能拿奥地利领土换取德国人在比利时、法国想取得的领土。因此，霍伦赫把他的外交任务称作在柏林“营造某种思想倾向”，让德国人认为可“借由在东边的彻底胜利，借由彻底消灭俄国，保障德国的未来”。[12] 那不是柏林的思想倾向，但德国人的确认识到，除了攻入波兰、恢复奥地利信心、击退俄国大军，几乎无别的路可走。如果坚守克拉科夫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狭长地带的奥军被赶到山脉另一边，俄军乘胜追击进入匈牙利，那么德国的西里西亚将受到侧翼包抄，很可能会不保。德国也将失去其唯一的欧洲盟邦，使柏林没有奥军，乃至没有“同盟”这个遮羞布来掩饰其庞然野心。九月中旬，德皇和其将领同意，“直接援助奥地利，乃是现今政治上所必需”。[13]

德国人打算借由入侵俄国来救奥时，俄国人正打算入侵德国来救法。法国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在沙皇、苏霍姆利诺夫和尼古拉大公之间奔走，哀叹俄国把重心放在奥匈帝国，提醒俄国人“击败奥地利的最稳妥办法乃是击败德国”。苏霍姆利诺夫表示，他的军队在坦嫩贝格试图击败德国时损失十一万人，帕莱奥洛格反驳

道，得再接再厉且得尽快。法国已在与德国的头几场仗中损失五十万人，快撑不下去。[14]

经过九月底几场气氛火爆的商谈，尼古拉大公终于同意只要解决掉奥地利人，就立即发兵攻打柏林，但沙皇尼古拉二世推翻他堂叔的意见，坚持立即攻德。对奥地利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对德国人来说则是噩耗。尼古拉大公从加利西亚调走十二个军，增援八个满编的集团军（三个在中间，两侧各有两个，还有一个在东普鲁士）。他要击退德军的任何进攻，执行英法自八月就一直要求的救援行动：俄国两百万大军取道西里西亚攻向柏林。大公的参谋长尼古拉·亚努什克维奇（Nikolai Yanushkevich）下令“准备进攻，最大兵力的进攻，以深入德国为目标，从维斯瓦河中游进到奥得河上游”。这当然是说来容易做来难；战前俄国一直奉行不在华沙以西建造坚实公路和铁路的政策，以放慢德国入侵俄国的脚步。从未想到俄若要入侵德，这政策会有何影响。[15]

虽然鉴于德国只有七个军来对付变得日益庞大的俄国大军，但德国人未呆呆等待尼古拉大公攻打柏林。德国的道路质量好，最起码远至波兰都很好。兴登堡和其参谋长鲁登道夫打算发动一场晚秋战役，横越纳雷夫（Narew）河，攻向华沙，打乱、击退俄军。先前靠着坦嫩贝格之役，德国保住东普鲁士，此刻，兴登堡则想在波兰炮制类似的决定性战果。这一战果将为德国战略的调整——采取东边部署，而非法尔肯海因仍在执行且看来无效的西边部署——提供有力理由。法尔肯海因延续毛奇（与施里芬）的法国优先策略，兴登堡则想走俄国优先路线，想利用沙俄帝国无可救药的无能来解决这心腹大患。但由于俄国已完成动员且康拉德败退而非进逼，兴登堡的华沙作战行动并非万无一失。没有奥军在南边配合夹攻，德军将得独力打破俄国已完整动员的军力。

德军东线指挥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执行自认为对的构想，展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作风（此后直至战争结束，他们一直维持这作风）。

法尔肯海因正准备在法兰德斯攻打英军，希望一举将其击倒；对于东线战事，他希望兴登堡只要将德军移往克拉科夫以增强康拉德战斗力，并采取守势稳住东部战线即可，但兴登堡选择进攻。他和鲁登道夫主张，攻势作战将威胁俄军侧翼和后方，比起在西里西亚或加利西亚四平八稳的部署，这样能为康拉德卸除更多的压力。


华沙之役与
罗兹之役，
1914年10~11月
里加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德文斯克
波罗的海
梅梅尔
科夫诺
威利亚
维尔纳
柯尼斯堡
但泽
东普鲁士
8
10
明斯克
维斯瓦河
尼门河
纳雷夫
巴拉诺维奇
托恩
1
德意志帝国
俄罗斯帝国
波森
布格河
2
华沙
平斯克
普里佩特河
瓦尔塔河
波兰
9
罗兹
奥德河
5
伊万哥罗德
布雷斯劳
西里西亚
卢布林
4
1
珊多米尔
4
9
普热梅希尔
克拉科夫
3
3
伦贝格
泰申
新桑德茨
加利西亚
塔尔诺波尔
萨诺克
2
布吕恩
8
喀尔巴阡山脉
11
奥匈帝国
德涅斯特河
维也纳
普雷斯堡
多瑙河
布达佩斯
蒂萨河
克劳森堡
特尔古-穆列什
阿拉德
罗马尼亚
普洛耶什蒂
9 德国第九集团军
1 奥匈第一集团军
5 俄国第五集团军
0 100 200 英里
0 250 公里

换句话说，在东边，兴登堡欲攻下华沙，就和法尔肯海因在西边欲攻下加莱一样坚决。华沙这个八十万人的城市，有兵营、医院、军火库、一字排开的数座现代堡垒，是俄国第三大城，波兰的铁路运输中枢，俄军司令部理所当然的设置地点。失去波兰将使俄国人不得不将其战线整个往后退，把总司令部迁到维尔纳（Vilna）或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之类的边陲地方。加莱会是征服英国的跳板，华沙则会是攻进俄国的跳板。[16]

康拉德被夹在维斯瓦河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把自己困在死角。他运气好，仓皇撤退时退得够远够快，超出俄军的补给范围，因而未遭俄军消灭。诚如丘吉尔后来所说的，“在西边，军队太大，超乎地方所能容纳；在东边，地方则太大，让军队疲于奔命”。[17] 有位俄国军官指出，奥军和俄军行军速度极快——奥军退，俄军在后面追——因而俄国的补给队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赶上；有几天，他所属的部队从破晓走到晚上十点，中间完全没东西吃。即使食物送达——一些军用面包、一头杀掉的牛——他也难以入口：“我已经吃素；他们杀了这些牛给我们吃；肠子、牛鞭、胃、眼珠子散落一地，几滩变黑的牛血，有时声嘶力竭大叫的牛会跑过你身旁，喉咙已被划开，然后倒在你旁边，血汩汩流出，四肢朝空中乱踢。”[18]

鲁登道夫的盘算是趁着俄军面临这些难题时抓住机会打败俄国。正忙于抽调德国第八集团军部分兵力以在布雷斯劳（Breslau，波兰语称弗罗茨瓦夫/Wroclaw）创建第九集团军的鲁登道夫，请康拉德拨出丹克尔的第一集团军投入这一重启的攻势。康拉德犹豫不决（把来自德国人的要求全视为对他个人之冒犯）时，兴登堡提醒他，只有进攻才能扭转每个战线日益不利的战局：他在九月二十二日开导康拉德，“要取得更大的战果，得通过包围”，而非通过被动防御。德国总司令部私底下鄙视奥地利的被动作风，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上校在日记里写

道："这里什么都好，就只有奥地利人例外。真希望这些畜生动起来！"[19]

这一次，这些畜生倒是愿意动起来。康拉德分析这是他将俄国人包围在波兰突出部的最后机会。有了德军助一臂之力，柏林和维也纳将在东边集结将近八十个师对付俄国的五十八个师。俄军苦于组织问题且需分兵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需分兵高加索打土耳其人，在一九一六年中期之前，在东部战线都无法取得兵力上的压倒性优势。施里芬计划的提倡者之所以认为此计划大有可为，就是因为俄国有这一反应迟缓的现象。俄国人在八、九月的战斗中也失去数千名中下级军官和士官；这时得找新血递补他们的空缺，而这些新血缺乏经验和训练。[20] 换句话说，奥匈帝国仍有机会打赢东线战争，如果它与德军协同作战，且行动快速果断的话。

康拉德匆匆凑集他仅存还完好无缺的战斗力（"最后的士兵、最后的火炮、最后的机枪"）。他很难得地不夸大其实；步枪一年产量只有十五万支，这个君主国就快无枪可用，而且许多士兵把枪拱手让给俄国人或塞尔维亚人。野战炮兵团发现兵比炮多，因为已有太多加农炮丢给了俄国人。[21]

康拉德自然而然认为东线德奥联军该由他，而非由兴登堡，总绾兵符。康拉德向博尔弗拉斯发火，"为什么德国第九集团军向其设于梅济耶尔（Mézières）的总部报告，而非向我报告？"曾赞成与德国人合作的康拉德，这时极为反感被拉到北边："为何要我们放弃桑河边的作战行动，去帮华沙的德国人？"但这时博尔弗拉斯非常乐于让康拉德听命于兴登堡，甚至乐于以全新的总司令部取代康拉德：或许以弗里德里希大公为总司令，以鲁登道夫为其大权独揽的参谋长。[22]

鲁登道夫，一如兴登堡，是个厉害角色。鲁登道夫把第八集团军的兵力缩减为只剩两个军，借此得以组建第九集团军，这个新集团军有四

个军、一个预备师、一个驻于西里西亚卡托维兹（Kattowitz，波兰语称卡托维采/Kattowice）周边的骑兵师。战前，鲁登道夫就以德军参谋总部内作风无情的部门主管形象为人所知，承接下毛奇许多工作，且对陆军部长法尔肯海因没怎么放在眼里。法尔肯海因与鲁登道夫为两个不同派系的代表，前者所代表的派系较后者温和、讲理。[23] 这时，鲁登道夫的行动目标，与德皇、法尔肯海因设于法国的陆军总司令部（Oberste Heeresleitung，简称OHL）背道而驰。陆军总司令部希望东线只要守住即可，西线则全力出击；法尔肯海因认为，过早将兵力抽调到东线，必会使他在西线吃败仗。为此，兴登堡不得不打电报给德皇，以辞职为要挟，借此索得较不受法尔肯海因节制的自主权（和更多兵力）。

兴登堡这时身为一级上将，地位形同陆军元帅，不可能任人指挥来指挥去。东部战线“神奇三角”（康拉德、鲁登道夫、法尔肯海因）所做的每个决定，都有政治角力牵扯其中，这令康拉德非常恼火。马克斯·霍夫曼上校指出这一紧张关系：“仔细审视大人物（他们彼此关系的恶劣、目标的矛盾）时，得时时记住，在另一边的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之间情况还更糟，否则很有可能惶惶不安。”[24]

在俄国这一边，情况的确更糟。以有所迟疑而缓慢的步伐拿下伦贝格后，鲁斯基已被赏以西北方面军司令官之职，原司令官日林斯基则因坦嫩贝格之役和马祖里湖区之役战败遭撤职。但鲁斯基未把矛头指向兴登堡，反倒指向他在西南方面军时的旧长官伊万诺夫。伊万诺夫想趁奥军崩解之机继续挺进克拉科夫和布达佩斯。鲁斯基猛踩刹车，坚持此时不该有任何进攻，坚持该纠集后备兵力，击败集结愈来愈多兵力、欲取道华沙攻入俄国内地的德军。评估过自身不良的通信后，鲁斯基甚至提议“战略性撤退”到涅曼河（Niemen River）。他还想过放弃华沙这个重要的公路中枢和战略要地，退回科夫诺（Kovno）。[25]

如果鲁斯基以安全堪虑撤退，伊万诺夫也要跟着后撤，甚至要让出

伦贝格以保护其侧翼。俄军总司令部的后备兵力都已被苏霍姆利诺夫分派出去，这时赫然发现自己几乎无法向下贯彻命令，甚至无法像个“总司令部”那样调动部队。东普鲁士牵制了俄国二十五个师，加利西亚牵制了三十个师，只剩下三十个师可供执行沙皇和西方盟邦要求的中间攻势。尼古拉大公“惊骇”于麾下诸将的悲观和爱发牢骚，但要调动他们的话，他手上没什么工具。每个战线的司令官都控制庞大的腹地和铁路、火车，而且他们已懂得用无法辩驳的后勤难题，回绝总司令部要其配合行动的要求。最后是靠德国人才让俄国人动起来。九月二十八日，德国奥古斯特·冯·马肯森（August von Mackensen）将军的第九集团军开始往维斯瓦河进发，行走的道路非常泥泞，兽拉车和士兵不得不走路两旁的耕地才得以慢慢前进。军官惊奇于波兰城镇“缺乏中产阶级文化”，建筑、陈列、街头活动破落寒碜，诚如某德国人所说的，“和美国西部一样吓人”。[26] 极力要求发动这一秋季攻势的鲁登道夫，没料到这么快情况就这么糟。他说波兰境内烂泥“及膝深”，即使在克拉科夫至华沙的大驿道上亦然。火炮和兽拉车下陷到车轴处，靠又湿又累的士兵拉才得以前进。军官忆起一个世纪前拿破仑走这条路时的感想：“除了水、空气、土、火，上帝还创造了第五元素：烂泥。”[27]

一如拿破仑，德国人有宏大的计划。在法国优先、俄国优先两策略达不成折中方案的情况下，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准备在“将法国从大国之列除名”（霍夫曼语）之后，立即与俄国人打一场猛烈的“第二次战争”。在这场战役中，兴登堡带了萨克森国王（德意志帝国的一名亲王）同行，以便在将俄国人赶出波兰后，立即在华沙册立他为“波兰国王”。[28] 德国第九集团军行军队伍里的哈里·凯斯勒（Harry Kessler）中尉，思索胜利的到来：俄国会落败，波兰会脱离俄国，“按照加拿大或澳洲的模式”，成为德国的自治领。[29]

有位与俄军一起出征的英国军官指出，他们吃的苦头更甚于迎面而来的德国人：“道路太烂”，他的部队九天才走了约一百九十公里。在卢

布林与俄国人共事的另一位外国武官，描述那里的道路“被重炮和架浮桥用的浮舟压烂，路面覆盖数寸厚的烂泥”[30]。苏霍姆利诺夫的陆军部为恶劣天气预做的准备，不如鲁登道夫或康拉德那么周全，因此这些俄国士兵穿着湿透的夏季军服发抖，赤脚或穿着湿重的麻鞋走过烂泥。十月五日，脚下鞋子只比俄军稍好一点的奥军第四、第三、第二集团军渡过维斯瓦河，第一集团军的十三个师（共十万人），在奥帕图夫（Opatów）与德国第九集团军合拢，左右相连。其中有个德国人对奥军印象不佳：“奥地利人给人愚蠢、乱无章法的印象。许多人不懂德语……整体来看，就连俄军战俘给人的军事印象，都比这些四处流浪、不管到哪里都姗姗来迟的奥地利军人来得好。”[31]

奥军于十月九日解了普热梅希尔城和要塞之围。一如人在菲律宾时的麦克阿瑟，康拉德誓言重返该地，而今他果然做到。博罗耶维奇部的某些士兵，清走要塞周边一万五千具俄军、奥军尸体，其他士兵则与第二集团军一起追击退往伦贝格的俄军。但追击脚步不久就变慢，然后完全停住。犹如九月战役但角色互换，俄军从一道沿河防线退往下一道沿河防线，开枪击退每一次追兵的逼近。与九月时的俄军不同的是，奥军兵力不足以绕过俄军包抄，因而都从正面攻击，然后落得一贯的下场。奥托·迈克斯纳（Otto Meixner）将军于十月十二日写道，“今日这场仗未能一举了结敌人；我的部队无一能完成任务。”十三日：“我们似乎不再是与敌人的后卫部队交手，而是与强大的敌军部队交手。”十七日：“今早我们依令开始进攻。来自侧翼的猛烈火力攻击，使攻势很快就瓦解。我们入睡的阵地，还是醒来的那个阵地。”

俄军已停止撤退，且已在奥军九月让出的格鲁代克阵地站稳脚跟。奥军被躲在阵地里的俄军开枪射中，而且俄军所据的阵地就是奥军不久前借以藏身、用来射击俄军的那个阵地，这想必令奥军大为泄气，而由于进攻时无炮兵支持，奥军又更为泄气。十月二十一日，迈克斯纳表达了他的惊愕：“科莱鲁斯将军下令，由于炮弹短缺，只有在无炮兵支持

下还据认有胜算的地方，才能进攻。”[32] 而在这段战线，没有这样的地方。

丹克尔的第一集团军沿着维斯瓦河往东北走，渡到河的左岸，到桑多米尔（Sandomir），心态同样是意兴阑珊。这支奥军一直走到遇见抵抗才停步。奥军虽已破解俄国密码，德军已在十月九日某军官尸体上发现俄军完整的战斗序列（order of battle），从中知悉作为俄军中军的三个集团军集中于维斯瓦河，但康拉德手上的兵力不足，虽有这情报，也只能大叹心有余而力不足。俄军则想方设法欲攻击德军并善用奥军斗志不坚这弱点。他们需要有所作为，以免更多波兰土地落入德国人手里，暴露加利西亚境内伊万诺夫西南方面军的侧翼、后方。如果真走到那地步，整个俄军都得撤退，从而使奥地利人得以收复伦贝格，使德国人得以在西线解决英法军时拿下华沙。

这时俄军总司令部的主要想法，乃是奥匈帝国力弱，靠小股兵力就可将其压制住，俄军主力则用于进攻德军。布鲁西洛夫受命统率那小股兵力，含第三、第八集团军和新组建的第十一集团军。伊万诺夫从鲁斯基的战线调走第二集团军，要它同第四、第九、第五集团军一起归他指挥。伊万诺夫渡过维斯瓦河回到对岸，然后往北走；十月中旬时，第一、第二、第五集团军已在华沙周边集结，第四集团军在伊万哥罗德（波兰语称登林尔）周边集结，第九集团军在桑多米尔周边集结。俄国六十个师面对德国十八个师。后来兴登堡将此举誉为尼古拉“大公最了不起的计划”：倚赖奥地利的被动，将德军诱向华沙，然后从两侧包抄马肯森躁进的第九集团军。[33]

尼古拉大公的计划拟得很漂亮，但现实上，俄国诸集团军全苦恼于严重的物资短缺。俄国濒临波罗的海、黑海的港口遭德国、土耳其封锁，不得不倚赖从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距前线三千公里，半年冰封期）、海参崴（距前线约一万三千公里）进口。俄国诸港一整年的

船舶入港数量（一千两百五十艘），只及英国港口四天处理的数量，沙俄补给难题由此可见一斑。尼古拉大公和伊万诺夫请求待炮弹存量补足之后再行作战，但沙皇和苏霍姆利诺夫受法国人催逼，要诸将前进，无计可施的俄国炮手于是用配给的罐头罐子、瓦斯管、废铁制作炮弹充数。[34]

十月十日，俄军开始渡过维斯瓦河进攻。德国第九集团军于华沙受到攻击时，奥军在桑河边和普热梅希尔南边受到俄国第三、第八集团军猛烈攻击。这场桑河战役在波兰、乌克兰边界地带激烈开打，从十月十三日打到十一月上旬。已取代奥芬贝格接掌第四集团军的约瑟夫·斐迪南大公，一下子拿借口推托（“我们迎击兵力大于我们一倍的俄军已三个多月”），一下子又发出激励（“找出能让我们与敌人站在平等立足点上厮杀的地方”）和空泛的胡言（“唯强者能浪费时间；弱者得节省时间”），[35] 结果完全不管用。奥军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三十万人再遭彻底击溃。博罗耶维奇动用机枪才挡住他第三集团军在桑河边的溃退；其辖下以匈牙利人为主体的第三十四团，因集体自杀而兵力大减——疲惫不堪的士兵宁可自杀也不愿再打。[36] 博罗耶维奇接掌第三集团军已两个月，仍在哀叹他于九月时就观察到的现象：“太多兵自行脱离战斗编队，没人阻止。”他的奥地利地方防卫军第四十四师撤退，留下堆放整齐的数百支宝贵步枪给追来的俄军。博罗耶维奇发火道：“那些步枪是按照规定从我们的伤兵那儿取得的，没人想过把它们运到安全之处？”[37]

德军误判俄军意图，不得不在十月十八日宣布从华沙撤退。康拉德先前同意出借丹克尔部以掩护马肯森部右翼，这时则不得不用丹克尔的第一集团军掩护撤退，命该集团军于俄国第四、第九集团军渡维斯瓦河时攻击其侧翼。十月最后一星期，奥匈帝国第一集团军在伊万哥罗德（华沙南边八十公里处有护城河环绕的大堡垒）对面遭击溃。补给短缺到极点，奥军已数日未见到他们的野战炊事车，骨瘦如柴的辕马在路上

倒下，奄奄一息。有位奥地利参谋如此报告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三十七师在这场仗期间的状况：“数天不眠不休的行军、作战，士兵累垮，军官得动粗才能逼他们前进；就连军官也撑不下去。”[38] 原是为掩护德军撤退而开打的一场仗，结果被兴登堡更改为带有机会主义心态的攻势作战，以诱使俄军尾随马肯森部，然后奥军得与德军主力渡过维斯瓦河，包抄俄军侧翼。但丹克尔自从垂头丧气撤离克拉希尼克之后一直想扳回颜面，于是敞开自己的防线，企图诱使俄军渡过维斯瓦河，再将其包围。他让俄军渡河，却未能围住他们，从而包围者反遭包围，鲁斯基部从北边，埃维特部从南边，往两侧翼逼来。兴登堡重启撤退，边退边咒骂奥地利人。他们似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丹克尔部遭俄军第四、第九集团军于后面追击，一路退回到克拉科夫，再退到尼达河（Nida River），在该河河湾处、兴登堡的右侧翼后面休息。丹克尔的第一集团军，一如约瑟夫·斐迪南的第四集团军，已经瓦解。有个德国军官走上前跟一批群龙无首的奥匈帝国士兵讲话，震惊于他们什么都不当回事的心态。“你们为何脱队？”他质问道，“脚痛，累垮了？”他们气鼓鼓地说不是，朝前线的方向瞥了一眼，然后说：“我们干吗傻傻地在那里被人射成马蜂窝？”[39] 记述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三十七师之败象的那位奥地利军官，描述了该师撤退期间的所作所为：“士气低落到极点，在奥帕图夫，我看到这支部队中喝醉酒的士兵摇摇晃晃走过街头；他们灌了朗姆酒；整个地方挤满撤退的四轮马拉货车；没有比眼前更令人泄气的景象了。”

邻近的奥匈帝国诸师彼此怀着浓浓的族群仇恨，使已然战斗力大失的哈布斯堡军队更加打不了仗。丹克尔部某军长于十一月十五日向丹克尔解释道：“相邻的第五师与第三十三师士兵彼此产生猜疑，肇因于第三十三师某团集体投降，未掩护友军从易遭攻击的阵地撤退，致使第五师某团蒙受极惨重的伤亡。”他话中真正的意思——在哈布斯堡军队里仍是忌谈的话题——乃是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之所以遭屠，全因为匈牙利

人为保命而投降，未挺身战斗以救友军脱困。这件事发生于十月二十六日。十二月十三日，个性太拘泥于琐碎小事的丹克尔仍纠缠于此事，尽管那是在这条战线的每个地方每天都在发生而寻常至极的那种争执，“我仍然搞不清楚是何种情况导致第二十六（匈牙利）团擅自撤退，”他发文给正为第九十三团的捷克人、德意志人说话的第五师师长，“你所附的文件未厘清此事。回去查清楚，完整写下来，我才能判定（第二十六团的）行动是否违反了当时‘不准撤退’的命令。”[40]

兴登堡也在埋怨，矛头指向康拉德的躁进；这时德奥两军的总司令部关系已非常恶劣，这位德国人提到这位奥地利人时，以“那个人”称之，例如：“那个人在俄军只部分渡过维斯瓦河，主力部队还未过河时，就攻打俄军，操之过急。”[41] 他们彼此厌恶对方说话的声音——康拉德如鸟鸣般的维也纳腔，与兴登堡的“柏林近卫军腔”大相径庭，后一腔调吐词快，发音清脆干净，带着自以为是又好为人师的口吻，使每个奥地利人，尤其是康拉德，觉得狗眼看人低。

这时奥军已弱到连挡住俄军部分兵力都办不到。康拉德求法尔肯海因增援更多德军。有一天，法尔肯海因把他的奥匈帝国军事联络官请到一旁，说：“康拉德将军写了封信给我，信中说东部战线需要增派三十个师……我觉得他说得没错，我也同意，但请告诉我去哪里找那些师？”[42] 但俄国本身的犹豫不决，再度让起了口角的奥地利人、德国人逃过一劫。华沙之役后，俄军总司令部拿捏不定该把重心放在南线、中线或北方前线，因而三线并重。伊万诺夫抱怨道：“坦白说，总司令部的指示里既不可能看到确切的任务，也不可能看到明确的目标。”[43]

在奥地利战线，俄军于十月十八日夜渡过桑河。这意味着十月九日才解普热梅希尔之围的奥军，将不得不放弃该要塞，不然就是让该要塞再度被围。康拉德已经名声扫地，不敢放弃该要塞，于是，长达一星期，每隔十四分钟就有火车驶进普热梅希尔，卸下挺住俄军六个月围攻

所需的军需品，运出已在该城攻防战中受伤的一万五千人。在普热梅希尔饱受战火摧残的周边，有位第一次打围城战的俄国人，惊骇于这场战役的残酷：“景象令人沮丧；左边、右边都有尸体，我们的和他们的尸体，有些刚死，有些已死了几天……最令人难忘的，乃是死者的颅骨、头发、指甲、手。到处都有脚从土里伸出，来自埋得不够深的尸体。我们火炮的重轮碾过那些脚，发出嘎吱嘎吱声。我们看到一个遭活埋的奥地利人；他醒来，挣脱，然后死去。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头、手在地面之上，其他部位在地下。我的天啊，这种事你能看多久仍不会发疯？”[44]

康拉德看不到这些骇人景象，但似乎还是方寸大乱。他的防御安排马虎得离谱。奥军就要整个垮掉，要守住普热梅希尔根本不可能，但它又是奥匈帝国抵抗俄国蒸汽压路军不可或缺的象征。如果要保住这个象征，康拉德得撤出三万平民，把守军减到守住该城和城外堡垒所需的最少兵力（约五万人），使俄军无法以断绝粮食逼守军投降。这些预防措施，他一样也没做。平民仍待在城里，加上十三万五千部队，徒劳留下一批人数过多、大体上派不上用场、争食粮食的居民，使俄军只要围住该城，让城里人饿到受不了，就能让敌人不攻自破。没人相信哈布斯堡援军会及时来援或真的来援。英国武官从华沙写道：“据说奥地利在那个战场留了十六个正规军和五个预备军，但它们是空壳子。俄国人已缴获一千门炮，掳获二十万人。奥地利人败了？”[45]

自夏末败于伦贝格、拉瓦鲁斯卡之后，康拉德的战争一直在桑河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盆地上缓慢打转。九月被逼退到桑河之后，康拉德把十月的大半时间（令德国惊愕地）花在试图回头渡过桑河以取得战果。但未能在康拉德退到安全的桑河之前将其包围的俄军，这时扭转情势，反过头来利用这道河障阻止奥军与在华沙周边作战的德军合作。在桑河边一连串令人泄气的小冲突里（桑河战役，Sankämpfe），奥军奋力欲攻回波兰，俄军则奋力不让他们如愿。[46]

在十一月上旬为期三天的奥帕图夫卡（Opatowka）河之役中，丹克尔的第一集团军又损失四万兵力，然后拉回到尼达河后头。康拉德随之把（短暂）夺回的土地又全部吐了回去。大部分奥军在下一道河障（克拉科夫诸堡垒正东边的杜纳耶茨河—尼达河阵地）后面重新整编时，康拉德的北方面军愈来愈像乌合之众。七月时为辖下第十九师的捷克人伤透脑筋的卡尔·卢卡斯（Karl Lukas）将军，十月时完全推不动自己的军队。他以好兵帅克似的讥讽口吻恳求道："同心协力！我们竭尽所能，一起为我们所挚爱的皇帝献出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和鲜血。"[47]

康拉德吃惊于他部队的伤亡之惨重和战争成本的急剧上升，指出只打了几个月，就耗掉帝国四十亿克朗，相当于战前七年的军事支出。但尽管花掉这么多钱，奥匈帝国的炮弹产量仍低得让人难堪，即使就一九一四年的标准来看亦然。这一君主国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只生产了十一万六千枚炮弹，但炮兵每周要打掉二十四万枚。靠着德国定期送来炮弹，才使奥军炮兵能发挥战斗力。[48] 康拉德指示其集团军司令官编纂可制成文宣、用于"激励我君主国渴求打仗之青年"的"战绩"，但根本没有战绩可言。应要求而编成的作战故事，只是打击奥地利青年的斗志。[49]

奥地利人从德军的撤退中得到有苦有乐的慰藉。奥地利驻柏林大使发牢骚道，尽管德军从华沙退回到德国境内，尽管德国的紧急应变计划打算若俄军穷追不舍，他们要炸掉西里西亚的煤矿，但兴登堡的"光荣花环"出奇地毫发无伤。[50] 俄军不会穷追不舍，德国人知道这一点。与奥地利人不同的是，德国人对自己的能耐和敌人的虚实有切实的了解。鲁登道夫分析，德军撤退一百二十或一百六十公里（沿途将俄国所有铁路、公路桥梁拆毁），就足以保住他的军队，挡住俄国追兵。而过了维斯瓦河后没有铁路，俄军的确只追了三天就停住，有位观察家指出："德国人撤退那么从容不迫，意味着他们的撤退完全称不上是溃退。"[51] 在日俄战争时实地观察过战况，且仍爱谈论萨姆索与伦南坎普夫两位将军在沈阳火车站月台上争吵、互殴那段趣事的霍夫曼，在日记

里就预言俄军会有类似的分裂失和："完全不必担心；我们如果得撤退，俄军只会追三天。"[52]



兴登堡、威廉二世皇帝、鲁登道夫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德皇威廉二世（中）任命兴登堡（左）、鲁登道夫（右）坐镇设于波森的新司令部，掌管东线所有德军部队。这两位将军与法尔肯海因争夺资源和影响力，想在东线，而非西线，决定这场大战的成败。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到了十一月一日，俄军已停止追击。德国人利用绵亘整条德、俄边界的军事铁路，能快速增援每个受威胁的地点。与奥地利人不同的是，德国人已将这种快速部署改良到尽善尽美。英国旅游作家亨利·诺曼（Henry Norman）在战前就注意到："接近边境的每个火车站，铁路线都扩展为十二条，每条铁路线旁都有月台，显然，火车可在每个月台迅速装卸，以将德国军力投送到北边。"将部队和炮弹运上那些火车以延长这场战争需要的资金，而资金从比利时之类的占领地输入德国。德国

在那些地方征收每月四千万马克的“战争捐款”，以支应每月高达十二亿五千万马克的战争开销。[53]

但谁都看得出，即使有德军投入更大兵力于东线，俄国人还是在华沙（“东边的加莱”）避开重击，挺过另一个回合的交手。同盟国发现他们退回到一个月前他们开始作战的地方。这时，德奥两国政府几乎不沟通，奥地利驻德勒斯登公使指出，德国军事当局什么都没告诉他，他落得只能“在火车站闲逛，观察从东往西驶过的运兵列车”，而从奥匈帝国的角度看，那完全是不该有的运兵方向。[54]

十一月一日，德皇正式任命兴登堡为东线德军司令官。鲁登道夫为这一设于波森（Posen，波兰语称波兹南/Poznan）的新东线德军司令部的参谋长，霍夫曼为作战长。“东部德军”由两个集团军组成：马肯森的第九集团军和巴伐利亚利奥波德亲王的第八集团军。两集团军卷入与法尔肯海因、德皇的战略辩论中，直到一九一六年八月法尔肯海因被革职，由兴登堡接替其位，争辩才结束。法尔肯海因无心于对俄战事，把心力全放在伊普尔（Ypres）之役上。打赢此役，德国将取得一重大的战略收获，即英吉利海峡沿岸诸港。德国人如果掌控这些港口，将能用潜艇和海面船只直接压迫英国，从而或许逼英国同意不再将资金、工业、海军投入这场战争，使德国得以有更多余裕打击法、俄。

法尔肯海因认为把重心放在俄国太冒险。靠俄国出名的酷寒的冬天之助，加上要部队后撤远离德军，沙皇才得以为另一场消耗战争取到时间，而英国则正忙着扩展其陆海军，意大利则一如所料投入协约国阵营。因此，法尔肯海因不肯派兵增援兴登堡，要兴登堡在他为打赢比利时战事而奋战时，守住东边的冬季战线。法尔肯海因甚至考虑要不要与俄国单独媾和，以便全力对付英法。[55]

就在法尔肯海因为他于十一月四日发动的伊普尔攻势投入更多心力时，鲁登道夫仍信誓旦旦表示他能打赢东线战事。[56] 兴登堡一直以为

会收到的六个军，最终给投入法尔肯海因“奔向大海”（race to the sea）的行动，使东线德军和奥军只有七十五个师对付俄国的一百三十五个师。鲁登道夫未因此丧气，还是在托恩（Thorn，波兰语称托伦/Torun）重新集结第九集团军。他和兴登堡给了法尔肯海因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国优先策略一个曲解性的新解读。他们（不情不愿地）同意，英法仍将是德军进攻的矛头，但补充说，英国远征军在受挫和夏季、秋季死伤大量兵员后，英国陆军总司令基钦纳（Kitchener）呼吁组建“新战斗力”一事，为德国提供了一个一旦错过即不再有的机会：一九一四年冬结束东线战争，然后趁着英国还未有新战斗力可用时，在一九一五年春将德国（和奥国）所有兵力移到西线。才几个星期，动用相对较少的兵力，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就挡住俄国蒸汽压路机。此刻他们打算将它解决掉。

---

[1] General Josef von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Leipzig：Paul List，1921），46，132.

[2] Octavian C.Taslauanu，*With the Austrian Army in Galicia*（London：Streffington，1919），75.

[3] Graydon Tunstall，*Blood on the Snow*：*The Carpathian Winter War of 1915*（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0），10.

[4] Kriegsarchiv，Vienna（KA），Gefechtsberichte（GB）1，“Die Kämpfe der Gruppe Hofmann in den Karpathen im Sept. und Okt.1914.”

[5] KA，Neue Feld Akten（NFA）910，Zakliczyn，Sept.28，1914，GM Krauss，“Widerrechtliche Benützung von Krankenzügen”；K.u.k. Kriegsministerium，Abt. 10，Vienna，Nov. 27，1914，GM Urban，“Transporte，deren Abgehen.”

[6] Rudolf Jerabek，“Die Brussilowoffensive 1916：Ein Wendepunkt der Koalitionskriegführung der Mittelmächte，” dissertation，Vienna，1982，12.

[7] Holger H.Herwig，*The First World War*：*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1914-1918*（London：Edw.Arnold，1997），96.

[8] Holger H.Herwig，*The First World War*：*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1914-1918（London：Edw.Arnold，1997），95-96.

[9] 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837，Munich，Nov.24 and Dec.8，1914，Oct.11，1915，Vélics to Berchtold.

[10] HHSA，PA I，837，Munich，Oct.22，1915，Vélics to Burián.

[11] HHSA，PA I，837，Munich，Nov.24，1915，Vélics to Burián.

[12] HHSA，PA I，842，Berlin，Oct.6 and Nov.8，1914，Hohenlohe to Berchtold.

[13] Norman Stone，*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London：Penguin，1998[1975]），96；Jerabek，“Brussilowoffensive，” 11.

[14] Ward Rutherford，*The Tsar’s Army 1914-1917*，2nd ed.（Cambridge：Ian Faulkner，1992），72，

[15] Stone，*Eastern Front*，96；Alfred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 1914-17*（London：Hutchinson，1921），1：139-140；Rutherford，*Tsar’s Army*，75-76.

[16] John Morse，*In the Russian Ranks*（New York：Grosset and Dunlap，1918），258；Winston S.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85.

[17] Winston S.Churchill，*The Unknown War*（New York：Scribner，1931），76.

[18] Fedor Stepun，*Wie war es möglich*：*Briefe eines russischen Offiziers*（Munich：Carl Hanser Verlag，1929），22，31.

[19] Hew 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vol.1，*To Arm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359；Gunther E.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81.

[20] Stone，*Eastern Front*，93；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xxix.

[21] Manfried Rauchensteiner，*Der Tod des Doppeladlers*：*Österreich-Ungarn und der Erste Weltkrieg*（Graz：Verlag Styria，1993），146-148；Herwig，*First World War*，107.

[22] Jerabek，“Brussilowoffensive，”13-15，18-22.

[23] Annika 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47-148.

[24] Capt.B.H.Liddell Hart，*The Real War* 1914-1918（Boston：Little，Brown，1963），125；Jerabek，“Brussilowoffensive，”24.

[25] Stone，*Eastern Front*，94-97.

[26] Harry Kessler，*Journey to the Abyss*：*The Diaries of Count Harry Kessler*，*1880-1918*，ed. and trans. Laird M.Easton（New York：Knopf，2011），655.

[27] C.R.M.F.Cruttwell，*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1914-1918*（Chicago：Academy，2007[1934]），80.

[28] Rutherford，*Tsar's Army*，78；Max Hoffmann，*The War of Lost Opportunities*（New York：International，1925），150.

[29] Kessler，*Journey to the Abyss*，657.

[30] Morse，*In the Russian Ranks*，118；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146.

[31] Kessler，*Journey to the Abyss*，653.

[32] KA，NFA 1795，7 KpsKdo，Dobromil，Oct. 31，1914，GdI Meixner，“Ge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Kämpfe bei Chyrow und Dobromil von 11 bis 24.Okt. 1914.”

[33] Rutherford，*Tsar's Army*，77.

[34]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ｘｘｘiii；Rutherford，*Tsar's Army*，74.

[35] KA，NFA 910，Krakau，Nov.14，1914，GdI Eh Joseph Ferdinand.

[36] Jerabek，“Brussilowoffensive，”1.

[37] KA，NFA 1367，3.Armeekdo，Oct.29，1914，GdI Boroevic to corps. Jerabek，“Brussilowoffensive，”1.

[38] KA，NFA 1794，5 Korpskdo，Wachok，Oct.28，1914，Maj. Aladar von Kovacs，“Bericht über Situation，Zustand etc. der Truppen des 37.LITD.”

[39] Kessler，*Journey to the Abyss*，654.

[40] KA，NFA 1794，1 Korpskdo，Chechlo，Nov.15，1914，GdK Kirchbach to GdK Dankl.

[41] HHSA，PA I，842，Dresden，Oct. 29，1914，Braun to Berchtold.

[42]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132-133.

[43] Stone，*Eastern Front*，101.

[44] Stepun，*Wie war es möglich*，22.

[45] Stanley Washburn，*On the Russian Front in World War I*：*Memoirs of an American War Correspondent*（New York：Robert Speller，1982），96-97；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167.

[46] KA，NFA 1868，Lt.Karl Popper，“Das Feldjägerbattalion Nr.6 im Weltkrieg 1914.”

[47] KA，NFA 1151，19.ITD Kdo，Jaroslau，Oct. 28，1914，Divisionskdobefehl Nr. 10，FML Lukas.

[48] Herwig，*First World War*，108；Stone，*Eastern Front*，123.

[49] KA，NFA 911，AOK，Nov.16，1914，“Schilderung der Meldentaten einzelner Truppenkörper und Personen für die Jugend.”

[50] HHSA，PA I，842，Berlin，Nov.12 and 17，1914，Hohenlohe to Berchtold.

[51] Cruttweli，*History of the Great War*，82；Morse，*In the Russian Ranks*，130，155.

[52] Liddell Hart，*The Real War*，109；Max Hoffmann，*War Diaries*（London：Secker，1929），1：46.

[53] Henry Norman，*All the Russias*（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02），3；HHSA，PA I，837，Munich Dec.29，1915，Vélics to Burián；PA I，842，Berlin，Aug. 11，1914，Szögeny to Berchtold.

[54] HHSA，PA I，842，Dresden，Oct.29，1914，Baron Karl Braun to Berchtold

[55] Jerabek，“Brussilowoffensive，” 34-35；Cruttwell，*History of the Great War*，84.

[56] Liddell Hart，*The Real War*，110.

第十二章 细长的灰线

鲁登道夫不想输。俄国第二、第五集团军重新踏上疲累的征途，往德国逼来，德军东线司令部打算重施故技，让俄军于坦嫩贝格再吃一次大败仗：迅速包抄俄国第二集团军（先前坦嫩贝格之役时鲁登道夫的手下败将）侧翼，再度将其击溃，然后要马肯森的第九集团军奔往东南边的罗兹城。在这个地区，除了罗兹有良好铁路、公路和住所外，其他地方全没有士兵住宿处和通信设施。它对双方来说都是战略要地，兴登堡打算用德奥四十二个师对付俄国四十九个师，夺取该城，然后用它作为发动新东线攻势的最后跳板。

鲁登道夫认为，在罗兹取胜，将一举打开通往华沙的大门。以罗兹为基地，德奥两军或许能解决俄军，然后如某奥地利外交官所说的，“重画东北欧的地图”。人人都很有信心能打败俄国，开始思量要怎么处置战败后的俄国。贝特曼谈到一个“获解放的乌克兰”——大概解放到该地能顺服于德国或奥地利为止。维也纳和柏林想拿下波兰，德国人认为他们还将得到俄国的波罗的海诸省和芬兰。波兰是最棘手的地方，德国人或奥地利人都不是真的很想要它，因为它境内有太多波兰人，若归入德国或奥国，他们的民族主义要求会削弱德国或奥国政府。但不能把波兰留给俄国人，因为得尽可能削弱俄国，把俄国推离德、奥国界愈远愈好；也不能让波兰独立，以免它本身成为大国或成为法国的附庸国。由于战局还混沌未明，这一“波兰问题”眼前还不需解决，但终究日益迫近。[1] 而德国人接下来要取道的波兰公路，十二月才会被雪封住，十一月中旬就会冰封，这有利于德军快速挺进且使俄军无法掘壕固守。如果德国人能迅速攻入波兰心脏地带，或许能在野外截住俄军，在这一

年结束前让俄军吃场大败仗。

马肯森用八百列火车将第九集团军北运到托恩，然后，十一月十一日奔往东南，以维斯瓦河作为屏障保护其左翼，攻向罗兹与华沙之间的俄军侧翼。仅仅五天，他就神不知鬼不觉调动二十五万兵力攻击俄军侧翼。如俄军方面的英国武官所说的，这是“组织调度上的一大杰作”，发动于德军从华沙撤退仅仅十五天后。[2] 在德勒斯登火车站，即奥地利公使先前抱怨德国从东往西运兵的那个车站，他证实“运兵车现在正由西往东行”。[3]

在这同时，德国往东运兵之事，正改变西战场的局势。未能抢先“奔向大海”以在法兰德斯包抄英军侧翼之后，法尔肯海因毅然决定在西线打消耗战。他为他在比利时、法国的壕沟线构筑防御工事，放出三个步兵军给兴登堡。俄军方面的某英国观察家认为，德国运兵之神速“令人惊叹——（俄国人）俘虏了其中一些人，得知他们整个军、整个师从比利时迅速调来，再调回去，派入奥地利，然后调回东普鲁士”[4] 。

这一在两战线之间的内部路线上灵活移动的能力，使德国人有机会执行兴登堡所偏爱的策略：西守东赢。为打出那制胜的一击，柏林大动作征集新人力（首度强征四十五至五十岁男子入伍）和新资金。德国国会于十一月投票通过发行第二波战争债券。由此吃下定心丸的兴登堡，将其东方面军打造为共有十二个军、七个骑兵师的大军。这时运气和地位都大不如前的康拉德，在一旁嫉妒地看着，只撂下一句话“等着瞧”。[5]

从西线过来的德军，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们的心态：他们比东线部队受过更多战火摧残，精神病症状更为鲜明。有位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德国军官指出，从法国拨入他部队的十人，有三人精神崩溃。其中一人会呆坐数小时，眼睛一直盯着地上，用希腊语念出《奥德赛》里数个长

长的段落。[6] 但这时还是战争初期，这些走不出战争创伤的士兵，仍只占东线兵力的一小部分。

地面因结霜而变硬，那些有着更健全心智的德国人快速挺进，四天走了八十公里，在维斯瓦河南岸击溃俄国第一集团军落单的一个军。然后德军插入第一、第二集团军间的缺口，十一月十八日把谢尔盖·沙伊德曼（Sergei Scheidemann）的第二集团军四个军，逼回到有五十万人口的城市罗兹。当俄国第一集团军踉踉跄跄退向华沙时，鲁登道夫聚集十三万六千战俘，准备包围第二集团军。他的分析家估算，自战争开打以来，德奥两军已杀死、打伤或俘虏一百二十五万俄国人，分析即使是俄罗斯蒸汽压路机也无法永远承受得了这样的损耗。

来自前线的证据似乎为德国人的乐观提供了有力理由。被俘的俄国人证实，他们弹尽粮绝；他们所接到的命令是在无武装下进攻，从死伤者身上捡拾步枪。受伤的俄国人受指示不仅要等待急救，还要四处寻找没武器的战友，把步枪递给他们。这一困境局部说明了德国人一九一四年为何想开战：俄国一九一三年的大陆军计划，拟于一九一八年才补足俄国陆军的步枪数量缺口，而这一缺口和其他不足之处在此计划的第一年显然连缩短都没办到。[7] 在这整场战争期间，一般的俄国步兵师，会有三成五的士兵根本无步枪可用；德国军官窃笑道，俄国人缺火炮缺到求日本人把他们在日俄战争时失去的火炮归还。俄国人也试图在日本购买步枪和子弹，表示凡是拿步枪（德制、奥制或俄制步枪）给俄国部队的农民，都赏以五卢布。[8]



俄罗斯战俘

德国人估算，到一九一四年，战争才打三个月，他们和奥地利人已杀死、打伤或俘虏俄国人一百二十五万。俄国战俘，如照片中这些战俘，什么都没有——没枪、没子弹、没食物，完全不清楚为何而战。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战争开打头一天，俄国火炮平均一天打掉四万五千枚炮弹，弹药短缺到俄国军官此刻被告知“把士兵推上前，把弹药往后拉”，而对士兵来说，这当然不是件好事。据估算，俄国的炮弹只有百万枚或更少，而且只有一座弹药厂（英国有一百五十座），又无法顺利输入新厂，因为法国、英国已订走美国所有出口品；即使把机器运送到距战场遥远的俄国港口，也无法将其安装在前线附近。[9] 在西线战局陷入僵持之后，德皇威廉二世嗅到胜利逼近的气味，大为欣喜，启程展开对俄战线的十天之

行。德国将领这时兴奋谈到胜利在望的“向东推进”行动。[10]



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

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打过普法战争，当过威廉二世的军事史私人教师。马肯森被誉为德国陆军里骑术最精湛者（因此着轻骑兵军装），一九〇六年时与小毛奇争夺参谋总长之位，一九一四年时是执掌东线德军第九集团军的不二人选。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西北方面军司令官鲁斯基，十一月十五日终于弄清楚情况。马肯森部的移动不是佯攻，而是主要作为，目标指向罗兹，即俄罗斯帝国纺织业的中心和通往华沙道路上重要的冬季士兵住宿地区之一。鲁斯基原只留下伦南坎普夫的第一集团军一个军守罗兹周边，要该集团军其余兵力挺进东普鲁士。这时他要伦南坎普夫率部返回，加入罗兹之役。鲁斯基命埃维特率第四集团军继续西进，以和迎面而来的奥军交手，使增援的德军转向，然后要辖下的第二、第五集团猛然调头向北。他大胆要其第一集团军迅速往南包围马肯森部。

俄国第五集团军司令官普列韦，先前在科马鲁夫从奥芬贝格的陷阱脱身，这时则奋力摆脱马肯森的陷阱。六十五岁（和马肯森同龄）的普列韦是天生的将才，有位在其司令部待过的人忆道："他掌握情况格外迅速，做决定快且明确。"[11] 普列韦的第五集团军，前军变后军调头行进，三天时间在冰封道路上走了一百一十公里路，把马肯森部打退到罗兹，然后攻击试图包围俄军的德军右翼。[12] 信心大增的伦南坎普夫第一集团军在洛维奇（Lowitsch，波兰语称罗兹/Lowicz）逼近德军左翼。马肯森部来到罗兹城外，发现该地已有俄国七个军。该部突然陷入被兵力大自己一倍的俄军包围的险境。尼古拉大公察觉到这是场决定战局成败的战役，把总司令部从巴拉诺维奇移到罗兹东边的斯凯尔涅维采（Skierniewice）村。

一如在华沙时，鲁登道夫放手一搏且输了。俄军计划凌乱无章，先是前进，然后后退，使他以为俄军最近一次退回罗兹的举动，预示其要仓皇撤退到维斯瓦河对岸，而非欲坚守阵地。一如马肯森，鲁登道夫上钩，一头冲进鲁斯基设下的陷阱。在罗兹以北、以西，战事最激烈，而在此二处，俄军人数多于德军；由于罗兹城的补给近在咫尺，总是大叹弹药不足的俄军，在此难得地有了充足的弹药，而德军处于长长补给线末端，就要弹尽粮绝。俄军伤兵的性命被看得比弹药还不值，任其死亡、腐烂。俄国议会议长米哈伊尔·罗赞科（Mikhail Rodzyanko）在前线附近下车，看到俄军伤兵一万七千人躺在冰冷的泥土上，其中大部分人已躺了五天，没人处理过他们化脓的伤口，更别提运到后方救治。[13]

德军与普列韦部激战时，也在窃听俄国的无线电，自坦嫩贝格之役起，德军就每天这么做。他们在地图上标出伦南坎普夫部往罗兹缓缓行进的路线，知道不管自己还有什么优势，那优势正快速流失。马肯森部赌他仍有时间派莱因哈德·冯·谢弗（Reinhard von Scheffer）的预备军（六个师五万五千德国兵力）到罗兹城东边，完成对该地俄国两个集团

军的包围。此一行动原应由奥军执行：康拉德命令已从杜纳耶茨河悄悄潜到维斯沃卡河边的第四集团军从该河后面出击，即从南边进攻，以“彻底消灭波兰境内的俄军”，但该部未做到。约瑟夫·斐迪南大公的第四集团军顶着敌人的猛烈攻击欲强行渡过维斯瓦河，却遭位于其右侧的俄国第三集团军和左侧的俄国第九集团军硬生生挡住（对斐迪南大公部来说，这已是其司空见惯的困境）。奥军士兵冲过浮桥，陷入俄军榴弹炮和机枪弹的火海，死伤特别惨重，致使第四集团军某些师不得不更名为旅。鼓手和乐师奉命放下乐器改拿枪。上级对此的解释是：“因为不再需要音乐。”[14]

有位名叫费多尔·斯特朋（Fedor Stepun）的俄军中尉，十一月二十日追击撤退的奥军，注意到奥军走后留下的脏乱和破灭的希望。斯特朋想起在博罗季诺（Borodino）与拿破仑打成平手，以“只要砍倒树，锯屑就会到处飞”一语说明战争中之劫掠和暴行的俄国元帅库图佐夫（Marshal Kutuzov）。而今，斯特朋周边就飞扬着战争的所有锯屑。“我们进到落败敌军刚刚离开的一个城镇。多可怜的景象……街道和火车站挤满想带着家产逃离却未能如愿的老百姓。五列火车困在火车站，私人家当成堆摆放在月台上，塞进每个火车车厢里——床、长沙发、床垫、玩具、画、相簿、女人衣物、帽子、犹太教祷告书、提灯、咖啡、一台绞肉机。”

骑马的哥萨克人（每个人后面另外拉着一两匹从当地人抢来的马），在一堆堆私人家当里翻找；有些哥萨克人下马，取下他们老旧的马鞍和毯子，换上软垫和桌巾。“军人与哥萨克人的差别就在这里，”这位俄国军官论道，“军人只拿自己需要的东西，还有良心；哥萨克人没良心，什么都拿，不管需不需要。”在街对面，罗马天主教教堂已遭洗劫：墙上有尿痕、呕吐物、粪便，拉丁文《圣经》躺在地板上，两具奥地利士兵尸体横陈在入口，一具年轻英俊，另一具老而丑。“他们的口袋，一如每具军人尸体的遭遇，已被人翻到外面；在这里，每个人都想

要黄金。”[15]

哈布斯堡君主国不识民间疾苦的领导阶层，几乎看不到这悲惨景象。在遥远的西边，在某个阴冷的十一月天，施蒂尔克将军正与蒂萨一同游览格拉沃洛特（Gravelotte）、圣普里瓦（St.Privat）的一八七〇年战场。他们在这两个法国小村四处走看，畅谈他们对普法战争的认识时，蒂萨说：“直到今日我仍不解到底是谁下令八月进攻塞尔维亚。与俄国开战一旦变得势不可免，进攻塞尔维亚的行动就该全部搁置。我还是不懂我们怎会继续干，怎么入侵塞尔维亚。我深信如果当初康拉德立刻把第二集团军派去东边，我们不会输掉伦贝格之役。”[16]



在营地里跳舞的哥萨克人

在营地里跳舞的哥萨克人。“军人与哥萨克人的差别就在这里，”有位俄国军官论道，“军人只拿自己需要的东西，还有良心；哥萨克人没良心，什么都拿，不管需不需要。”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对正踉踉跄跄退往克拉科夫的东线的奥匈帝国士兵来说，伦贝格当然已是陈年旧事。他们“往西退，再度走在我们已非常熟悉的道路上”，

有位奥地利皇家步兵团军官以嘲弄口吻说道。逃兵陡增，第四集团军下令调查十一月二十五日两个完整的团共八千人，连同上校团长和军官，被俄军俘虏之事。在克拉科夫城内，第四集团军士兵大肆偷抢，要塞司令不得不组织民间防卫队“保护私人财产”，以免遭奥地利自己的士兵“攻击、捣毁、盗窃”。在奥地利乡间，农民很快就开始害怕本国军队的到来。部队报告里充斥着抢劫、勒索、殴打之事。十二月一日，丹克尔将军誓言惩罚“我军士兵对本国人民日益增加的劫掠事件”，但在当时老吃败仗、老在撤退的气氛中，这个誓言并不易履行。[17]

奥地利八月的“北攻”，以九月大撤退收场，继之以十月的桑河战役，再到现在落入更为愁云惨雾的克拉科夫之役。俄国数个集团军团团围住康拉德已然兵力大减的奥匈帝国军队。康拉德的军队照理该勇敢往前冲，在罗兹与马肯森的第九集团军会合，却窝在其位于罗兹南边两百四十公里处的壕沟里。由于奥军怠惰，鲁斯基部慢慢移过来，德军有覆灭之虞。鲁登道夫曾夸口要在罗兹打出“第二次色当之役”，打算德奥军联手将俄国数个集团军包围在那里，但如今马肯森理解到他将得独立完成这壮举。长远来看，马肯森部的兵力居于劣势，但他仍然认为只要他能在伦南坎普夫部大举抵达之前击倒俄军，短期来看他仍能赢。

俄国第二集团军的确觉得大势已去。莱因哈德·冯·谢弗的军（五万五千兵力）进攻该集团军侧翼时，集团军新司令官打电报给鲁斯基，告以他被包围，正在研究地图的鲁斯基收到后神奇回道：“不，你已包围他们，现在该要他们投降。”事实确是如此。谢弗部困在洛维奇（罗兹与华沙的中途），发现与马肯森断了联系，开始拼命往后退。地面太硬无法挖掘壕沟，因此双方部队在开阔地厮杀，或滑下溪床，或把大树枝、沙包堆起来当屏障。但这些屏障挡不住炮火和机枪弹，很容易就被打掉。旧壕沟符合新战斗队形的要求时，即占领那些壕沟，但封冻的地面使液体无法被地面吸收掉，于是血、粪、尿积在从未结冻的烂泥里，使这场冬季战争比夏季、秋季战役更为污秽难受。[18] 有位观察家沿着

其中一条恶臭的壕沟边缘走，看到一骇人景象，停脚记下：“我撞见一只渡鸦停在已不成人形的某人脸上。它已啄走他的双眼，扯掉他的嘴唇和他脸上的部分肉。它拍拍翅膀慢慢飞走，留下一沉闷的嘎嘎声。”[19]

鲁登道夫痛骂康拉德按兵不动。鲁登道夫相信，奥匈帝国的北方面军如果在德军右侧强力挺进，那么同盟国将已包围俄军。结果如今反倒是俄军已准备好要包围德军。[20] 有位附属于法国境内德国某军的奥匈帝国军官报告道：“这里大家都在谈的是奥地利，谈兴登堡频频抱怨我们吃不了苦……他们说德军必要时能行军六十公里，我们的部队顶多只能走三十公里；他们说德军能不带辎重打仗，而我们的部队不行。”[21] 在德军总司令部，施蒂尔克苦思德国人、奥地利人的根本差异：“奥地利人始终把私事与本分混为一谈；德国人只着眼于本分，把私事摆在一旁。对奥地利人来说，指派任务的方式和作风比任务本身重要，而德国人只着眼于任务。在德国人眼中，奥地利人缺乏干劲，务虚不务实。”[22]

奥军毫无作为而德军处于大败边缘，鲁斯基却只能徒呼负负地看着德军逃脱。坦嫩贝格之役后即被蔑称为“没打就跑”的伦南坎普夫，这次再度跑掉。他从北边包围的速度太慢，使谢弗部得以全军（连同一万战俘和六十门火炮）从洛维奇口袋逃脱。有位俄国上尉为这一离谱的迟钝提出解释：他被从蒂尔西特（Tilsit）紧急叫去围困德军后，要他的部队三天强行一百零四公里到最近的火车站，结果车站没火车候着。士兵在月台上待了二十四小时，没吃没喝，没地方躲避寒风。陆军部终于发现他们人在米陶（Mittau，拉脱维亚语称叶尔加瓦/Jelgava），派了列火车过来，然后花了整整两天（士兵仍然没东西吃）才慢慢驶到华沙。在华沙他们再搭火车前往罗兹，仍然没东西吃，抵达罗兹外围时下火车，奉命进入壕沟，没睡觉，没吃东西。士兵饿得大骂，开枪时开到睡觉。军官跌跌撞撞上下壕沟，“精神不济像梦游者咕哝说着什么，用剑面打士兵”。[23]

谢弗也没睡。在十一月底开始率部大逃亡时，他已连续七十二小时没合眼。德军在大雪中撤退，而大雪使俄军的指挥调度更为紊乱。罗兹之役双方不分胜负，德军损失三万五千人，但俄军兵力与炮弹储量的耗尽，使俄军总司令部不敢指望再采取攻势。子弹也快用完，有些俄军步兵师才打三天仗就打掉两百万发子弹。[24]

因为战死、受伤、生病、被俘，俄军第一、第二集团军也损失高达七成的战斗力。伦南坎普夫于坦嫩贝格、马祖里湖区两役失利之后勉强保住司令官之职，而经过这场丢脸的失败，去职就成了定局。因为德裔身份而被许多人怀疑不忠的他，失去兵权，被赶出陆军。尼古拉大公为这次大败枪毙了十五名作战不利的俄国军官。在华沙巡视贪污出名的陆军补给部门时，这位大公向集合的军官只丢下四个字："你偷我绞（刑伺候）。"[25]

有位英国记者在经过罗兹附近的一处野战医院时，注意到数千伤兵被搁在雪地里，因为（一如以往）没有交通工具将他们运送到后方；"某帐篷外，有许多截掉的手、脚弃置在地上"。许多人被榴弹炮的弹丸打瞎一只眼或双眼，人数之多令他印象非常深刻。[26] 冬季这几场仗总共让俄军又损失五十万兵力，以及七成的前线军官。这时，俄国送到前线的强征入伍兵，全都没配步枪，这是德军为何损失较轻（十万人）的原因。[27] 东部战线辽阔的地域利于打运动战（在东部战线，德国一个半的师就占领最前线；若是在西部战线，要用五个德国师去占），但俄军缺乏机动力、靴子（鲁斯基谈到不足五十万双）、火炮，无法解决掉兵力稀疏的德军。事实上，此后直至战争结束俄军都不会再威胁德国领土。

奥匈帝国领土则不是如此。事实表明德军太难对付，于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有鲁斯基、尼古拉大公出席的作战会议上，伊万诺夫提议"通往柏林之路要取道奥匈帝国"。鲁斯基部有四分之三的兵力损耗于与德

军的交手，已几乎无战斗力可言。[28] 俄国人得从头再来，这一次得把矛头对准较弱的对手奥地利。尼古拉大公同意此论点，批准将重心从西北方面军转移到西南方面军。伊万诺夫将指挥此一行动，率部攻向克拉科夫，然后翻过喀尔巴阡山脉。

康拉德也需要重新开始。由于俄军回头推进到华沙正西边一线且有德国四个新的军从陷入僵持的西部战线调来增援东部战线的德军，他要打出一番成绩，以免沦为配角。他把挫败之后的怒气发泄在兴登堡身上，宣称那些记述德军英勇逃离罗兹的文字“天真”，还说兴登堡准备以增强后的九个军、三个骑兵师的兵力反攻是“幼稚”的。康拉德悄声说，切记，“这位‘人民英雄’已遭击败”，但这位奥地利将领的公信力已快荡然无存。[29] 十二月六日，兵力大增后的德军果然拿下罗兹，挺进到距华沙不到五十公里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同意让无能的康拉德，在新成立的奥德联合东线作战司令部里听命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似乎只是时间问题。这位皇帝问奥匈军总司令部：“我们的战绩如此糟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连尚可容忍的外交政策都难以施行，不是吗？”[30] 康拉德的答复，乃是他最近一再祭出的响应——以辞职作威胁。举棋不定的弗朗茨·约瑟夫再度退让。

罗兹之役大败后，康拉德急欲展现他的本事，于是命博罗耶维奇进攻波兰东南部的萨诺克（Sanok），要约瑟夫·斐迪南大公的第四集团军进攻正再度往上西里西亚移动的埃维特第四集团军。俄军炮弹、火炮、步枪、子弹、军服、靴子、粮食样样都缺，且无法集结大军包围康拉德，让奥地利方面生起希望。约瑟夫·斐迪南大公的第四集团军在克拉科夫附近与埃维特部相遇，博罗耶维奇的第三集团军则进攻俯临桑河且是铁路和公路运输中心之一的萨诺克。[31] 埃维特部与奥军厮杀，一时分不出胜负，直到俄国拉德科-季米特里耶夫（Radko-Dimitriev）的第三集团军前来支持才改观。第三集团军原被耽搁在普热梅希尔外围，直到十一月中旬俄国另一个集团军，谢利瓦诺夫（Selivanov）的第十一集团

军，前来普热梅希尔接防，第三集团军才得以前去支持埃维特部。

奥军于是再度被迫退向克拉科夫。数千名绝望的哈布斯堡王朝士兵假装得了霍乱以逃避作战。奥地利集团军司令部每天刊出告示抓逃兵：“帕尔提卡，一八八八年生于马塔维奇，黑发褐眼，说波兰语，高一米六二：如果发现，请逮捕送交第一军法庭。”[32] 弗里德里希大公刚从将军晋升为陆军元帅，但没什么值得庆祝；从位在遥远后方的舒服司令部，他和康拉德只能对前线的实际情况有一丁点了解，但光是这一丁点了解，就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军队根本不想打仗。十二月二日，康拉德指示诸集团军司令官，凡是敌前撤退的部队，一律枪毙十分之一的士兵。[33]

康拉德吹嘘赢了几场局部性的胜利，但那些胜利都如昙花一现。俄国第九集团军将约瑟夫·斐迪南大公的第四集团军逼退到克拉科夫南边。俄国第三、第八集团军击败博罗耶维奇的八个师，使其退离萨诺克，并在布科维纳重创卡尔·冯·弗朗泽-巴尔丁（Karl von Pflanzer-Baltin）将军的暂编兵团的七个师。奥匈帝国军队的壕沟上方，升起有着白色半月和星星图案的绿旗，以表明这是得到奥斯曼人支持的反沙皇圣战，以吓阻俄国穆斯林部队的进攻，但未收效。博罗耶维奇部和位于喀尔巴阡山脉山麓丘陵的第四集团军十一个师之间，敞开一个宽达一百一十公里的大缺口。俄军蓄势待发，要大举穿过这缺口，经由乌兹索克（Uzsok）、杜克拉（Dukla）、卢普科夫（Lupkov）、蒂利奇（Tylicz）诸山口，进入匈牙利和摩拉维亚（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心脏地带）。

在奥军右侧，博罗耶维奇部有气无力地对抗俄国第八、第十一集团军。由于俄国特务（一身农民装扮或奥匈帝国军服的士兵与军官）轻易就潜入、潜出奥军营地和壕沟刺探军情，向“斯拉夫裔士兵”发送只要投奔俄军，就能据以得到赏金和特别待遇的凭证，奥军更加守不住其阵

地。在东边五千公里处的土库曼斯坦，有位与其他奥匈帝国战俘一起修路的被俘奥地利军官，可证实俄国人此言不假。“俄国人按民族把我们分开，”他在一九一四年晚期说道，“斯拉夫人住到最好的营房，德意志人、匈牙利人、犹太人住的营房最差。我们的工作时数也比斯拉夫人长，所有脏工作都交给我们干。”他们领到的配给都少得可怜（甜菜汤和荞麦粥），因为俄国的营地指挥官克扣掉这些人每日粮食配给的一半，卫兵和伙夫又拿走剩下的大部分，但斯拉夫人始终被获准先吃，且被鼓励去嘲笑、脚踢排在他们后面的德意志人、匈牙利人。[34]

从俘来的奥地利军官那儿，俄军也得到许多关于奥地利实力和意图的情报。那些人被俘期间，用弗里德里希大公的话说，表现出“愚蠢和饶舌”。[35] 奥匈帝国农民也为俄军提供了大量情报，许多农民支持俄国人更甚于支持本国军队。约瑟夫·斐迪南大公，身为这一摇摇欲坠之奥地利皇族的子弟，下令其部队冷血对付协助俄国人的奥地利村落：“在这种事情上没必要征询地方行政官的意见；直接扣为人质并杀害，把村子烧个精光，凡是嫌疑分子都当场吊死。”[36] 而且这是在奥地利境内。这个君主国显然已是忍无可忍。多亏鲁登道夫出借几个德国预备师，加上俄军本身行动迟缓，奥军才得以挡住俄军的攻击。鲁斯基一如以往主张休息、重新补给，俄军炮弹存量降到每天每门炮只有约十枚炮弹可用。

奥军已处于绝境，敌人有可能冲过喀尔巴阡山脉进入匈牙利平原。这时奥军部署成一道细长的灰线，兵力虚弱的第二集团军位于左侧，沿着克拉科夫北边的德国国界部署，第一集团军位于该城西北边（其后方区域是名叫奥许维兹的地方），第四集团军位于克拉科夫城里，第三集团军在该城东南边铺展，从新桑德茨往南到切尔诺维茨。

克拉科夫是奥地利在喀尔巴阡山脉以东最后一个据点，为挽救此城，康拉德下令越过维斯瓦河进攻。十二月头两星期，奥地利第四集团

军和某德国师在克拉科夫附近的利马诺瓦（Limanowa）与俄国第三集团军打成相持不下的局面。在克拉科夫东南，俄军面向西边，使自己难以抵御来自约瑟夫·斐迪南大公的侧翼攻进。第四集团军利用克拉科夫周边的铁路和强行军，切入俄军侧翼。这两个湿漉漉、冷得发抖的集团军，像史前穴居人般狠狠厮杀，打了两个星期。奥地利骑兵，仍按照古传统配备有檐、平顶筒状的军帽和马刀，特别无抵御之力：有位奥军上校参谋气急败坏地记载：“我军骑兵在利马诺瓦打肉搏战，没用刺刀！我们发现许多骑兵丧命，头部被打瘪。我们为骑兵配备武器的方式，实在大大失策。”[37]

虽然攻击了俄军侧翼，但奥军在许多地方仍继续在没有充足炮火支持下正面强攻。炮兵因未能为进攻做好准备，未能帮助进攻部队攻破敌人防线，也未能掩护不可避免的撤退，招来弗里德里希大公的叱责（这时已是预料中躲不过的叱责）：“荣誉和奥地利炮兵的悠久传统，要你们不管死伤多惨重都不能离开你们的炮，要你们务必协助步兵有条不紊地撤退。”[38] 结果，奥地利火炮响应以炮轰自己人。[39]

俄军战斗力似乎也在衰退，奥地利第六皇家步兵营打了一天就俘虏了一千名俄国人，包括一名看来如释重负的将军。[40] 有个德国军官检视过两百名这些俄军战俘后，谈到他们的悲惨状况：“他们紧靠着牢笼，像饿坏的牲畜，只要有人从街上过来，递出一块面包，他们就争相爬到别人身上，爬上铁栏杆，睁着大眼睛，用贪婪嘶哑的嗓音尖叫，使劲伸长手，每个都想让人注意到他的饥饿。”这些俄国人让他想起一幅哥雅的画，骇人如《疯人院》或《吞掉亲生子的农神萨杜恩》。[41]

利马诺瓦之役将俄军击退五十公里，经过此役，康拉德吹嘘光靠他的军队就能挡住“半个亚洲”，打垮俄国的气势，“逼他们全线后退”。[42] 这大大背离事实。利马诺夫之役俘获两万三千名俄国人，拯救了克拉科夫，使俄军无法插入奥地利第三、第四集团军之间，打到喀尔巴阡山脉

另一头，但此役未能决定战局走向，因为俄国增援部队大批抵达，从新桑德茨过来，威胁第四集团军的一个侧翼和后方，迫使该集团军让出其刚以一万两千人死伤的代价辛苦拿下的地盘。[43] 俄军从容前进，重新占领杜纳耶茨河东岸他们放弃不久的壕沟，使利马诺瓦之役再怎么看都是奥地利又一个惨胜。

利马诺夫之役好似从未发生过一般。康拉德从柏林呈报博尔弗拉斯，坦承在利马诺夫或任何地方都未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俄军能以生力军打掉我们每次的攻击”。一如俄军先前用桑河将德军与奥军隔开，这时俄军用杜纳耶茨河发挥同样的作用。康拉德抱怨道：“他们被钉死在一岸，我们被钉死在另一岸。”[44] 但他辖下的师级部队，这时大部分只剩数千兵力或更少。第六皇家步兵营发现，七月起注入的一千九百名官兵新血，十二月时已死、伤、被俘共一千一百人。[45] 十二月十七日冒雨巡视战场时，某奥军参谋写下该地的破败荒凉：“壕沟往四面八方延伸，每道壕沟里都积满水。战场上散落各种东西：炮弹弹壳和子弹壳、故障的步枪、背包、刺刀、帽子、头盔、衬衫、马铃薯、拆下来当掩护物的木门、烧掉的房子、啜泣的农民、漂浮在壕沟里和整条马路上狼藉的尸体、插了木头十字架的墓、马尸、被数千双靴子踩过的田、倒地的电话线杆、被炮弹炸开而干草外露的谷仓——悲惨又混乱的景象。”[46]

到了年底，奥军仍被困在杜纳耶茨河（距克拉科夫仅五十六公里）往南到喀尔巴阡山脉一线。战事已停滞，参谋在每日战情报告里写上“一如昨日”。士兵也困在岗位上受冻，除了用来包冻伤之脚的纸（丹克尔在备忘录里细心记下，“能拿到的只有薄纸片”），没其他补给。[47] 第二集团军的第三十二师已经累垮，康拉德不得不放他们两个星期假，但该师师长回前线时却无感激之意。他指出：“我们休假全待在帐篷里，不是下雨就是下雪，还染上霍乱。休假根本是骗人的，没使我们变强，反倒变弱。”[48]

俄军无精打采盯着对面苦不堪言的敌人。有位俄国军官写道："灵魂像刺猬，在我们里面缩成球状；表面上看我们处变不惊，内心里我们却在冬眠。"[49] 奥地利最精锐的部队，例如维也纳的第四条顿骑士团首领步兵团，士气未失，甚至进攻，但都以惨败收场。第四条顿骑士团首领步兵团驻守沃多维采（Wodowice）的某营，强攻对面的俄军壕沟。士兵服从命令上刺刀冲锋，穿过约两百米纵深的敌军火力扫射场（营长难过报告，"阿尔特里希特中尉伤重不治，弗里德里希中尉胸口中枪"），闯进俄军壕沟，与壕沟里三百俄军短暂混战，然后理解到就在视力可及之处，在他们以如此惨重代价夺下的壕沟之后，有另一道俄军壕沟。他们的报告坦承："我们既无力进攻新壕沟，又不能留在旧壕沟里，所以撤退，我们深信已尽到职责，取得该日应有的战果。"[50]

但是，有什么战果？为什么辛苦打这场仗？大部分部队行事比这支部队理性。有位接掌奥匈帝国第十九师的将军，向麾下军官发布了一份严厉的师部命令（"一些观察心得"），文中描述了一支正分崩离析、军服肮脏、步枪生锈、不向长官敬礼、一有机会就装病逃避差事、军纪荡然、消极被动的军队。[51] 这个奥匈帝国师最后会拨给德国人，以充实德国的南集团军，即法尔肯海因所批准成立，以坚定失去斗志之奥军信心的一支新军队。一九一四年圣诞节，弗里德里希大公收到他的圣诞礼物，即又一次撤退。这次撤退使哈布斯堡王朝军队退到了喀尔巴阡山脉边。第一、第四集团军仍待在克拉科夫与新桑德茨前面的杜纳耶茨河—比亚拉河阵地，但其他奥军全退到喀尔巴阡山脉：第三集团军部署于杜克拉山口两侧，司令部设在卡绍（Kaschau，斯洛伐克语称科希策/Kosice），第二集团军部署于恩格瓦尔（Ungvár，乌克兰语称乌日霍罗德/Uzhhorod）周边，南集团军司令部设在穆卡奇（Munkacs，乌克兰语称穆卡切沃/Mukachevo），弗朗译-巴尔丁的暂编兵团位于马拉马罗斯-锡盖特（Maramaros-Sziget，罗马尼亚语称锡盖图-马尔马切伊/Sighetu Marmatiei）。

换句话说，哈布斯堡王朝军队正缓缓退入匈牙利，这与他们所应走的路——挺进俄罗斯——完全背道而驰。弗里茨尔和康拉德为一连串没完没了的败仗大为难堪，重施他们在伦贝格的故技，指责麾下部队“未能执行计划周详而本该会成功的作战行动”。康拉德甚至不愿听前线部队的一连串辩解：“总司令部无法理解，数日来我们的部队怎会让自己在大雾中遭俄军奇袭、打败，而非反过来利用大雾奇袭、打败敌人。”[52] 但部队清楚原因；他们撑不下去了。这时每个奥地利军人都受到怀疑，不管是被怀疑怕死、装病，还是替敌人刺探情报。来自奥匈军总司令部的定期公告，提醒所有官兵留意在奥军前线后方到处走动的俄国特务：“有些特务在左腋窝下面文了一条鱼，有些特务在脖子上印了一个俄国十字，还有些特务的军服上，有一只纽扣后面刻了‘Vasil Sergei’字样。”士兵获告知留意其实根本不存在的人物：“有位俄国上尉参谋名叫卢布诺夫，他开车四处跑，黑发，长得帅，体格健美，通常是平民打扮”，或“有个俄国人，讲得流利的波兰语，脸白，带聪明相，蓝眼，金发，戴围巾，穿黑外套；据信在我们第十一军周边活动。”[53]

弗里德里希大公责备麾下将领，在步兵于前线遭屠戮时，自己在后方毫无作为。他怒叱道，“师长必须亲临战场……不该待在遥远后方用电话与下属军官联系。”弗里茨尔以恳求口吻说，绝不可让奥匈帝国的士兵“觉得师长待在安全的后方……不管他们死活”。他要将领在前线领军，组织侧翼攻击，阻止自杀式的正面强攻。[54]

他的命令不管用：战争头五个月战死了三千两百名奥匈帝国军官，其中只有三十九人是上校或将军。[55] 奥匈帝国士兵受到遥远上级长官的漠视，却有时受到俄国人的搭救。有位挖壕沟时中了两枪的奥地利军人，忆述他获救的过程：“我受伤躺了两个小时，被一名俄国步兵发现。那人迅速包扎（我的伤口），把我扶离射击范围，让我躺在一旧壕沟里的马毯上。”[56] 其他俄国人就没这么好心。有个哥萨克人在喀尔巴阡山脉附近经过一名光着脚的俄国军人和一名犹太村民身旁时，要那村

民脱下他的“犹太靴”给那个军人。村民不肯，哥萨克人即要那个军人褪下长裤，然后回头向那村民说：“现在给我亲他的屁股，想想你自己命好，还能活到现在。”村民乖乖做。片刻之后，三人分道扬镳，哥萨克人大笑，俄国军人欣赏他那双上好的新靴子，犹太村民光着脚。有位目睹这段迫害犹太人之事的俄国军官写道：“集体迫害犹太人所留下的阴影，落在我们迫害过的每个地方”，“或许有人会说这些只是‘逸闻’，但它们远非逸闻，而是我们近代史上的重大史事。”[57]

极力躲避前线匮乏生活的康拉德，这时把他的总司令部从新桑德茨往更西边移，移到奥属西里西亚的泰申（Teschen），进驻弗里德里希大公位于该地的府邸和邻近的阿尔布雷希特高中。此后直到一九一七年三月他遭撤职，这个建筑群一直是他的豪华总司令部，有马厩、网球场、咖啡馆，还有丰盛餐食可享。康拉德以地理教室当他的办公室，在此研究地图，每天向弗里茨尔简报两次；除此之外，这位大公什么事都不必做。[58] 皇储卡尔大公更闲。前线军官指出总司令部大人物的生活作息基本上和老百姓没两样：“我们的司令官知道怎么管，但不知道怎么领导，”第四集团军某少校写道，“司令官应该要表现出意志和人品，以作为他参谋的表率。”在泰申，这两样都付诸阙如。[59]

在泰申，佳肴美酒不虞匮乏。那里的所有开销，包括康拉德使用他的府邸，弗里茨尔都向陆军部报账请款，爱国心荡然无存。但在弗里茨尔与康拉德所弃之不顾的土地上，粮食非常短缺，致使要到加利西亚、喀尔巴阡山脉的部队报到的奥匈帝国军官，自己带食物过去。康拉德在泰申创设了“战时新闻总部”，其职责是以吹捧性的文章，例如《我们的康拉德》（*Unser Conrad*）、《我们在战场上的王朝》（*Unsere Dynastie im Felde*），为他的名声增光。编制员工名单里放进摄影师、电影制片人、雕塑家、作家（包括里尔克与茨威格）的名字，以予人重振雄风的印象，且发布《俄罗斯猎杀》（*Russenjagd*）之类的画作或《从杜纳耶茨河到桑河》（*Vom Dunajec zum San*）之类乐观的宣传小

册。[60] 没人受骗。康拉德的德国联络官胡戈·冯·弗莱塔格-洛林霍芬（Hugo von Freytag-Loringhoven）将军向法尔肯海因报告，康拉德的军队是“一碰就破的工具”。奥地利的师级部队，兵员少到只有五千人或更少，连级部队少到只有五十人。有作战经验的奥地利军官大量战死，乃是一大“灾难”。俄国人吹嘘他们俘虏了数万奥匈帝国官兵（相对地只俘虏了两千德国官兵）。评估过这支破败的军队后，兴登堡向德皇抱怨，他不得不倚赖“一支优柔寡断、战斗力差的奥地利军队”[61]。



逃离战区的犹太人

一九一四年晚期，趁俄军还未到，逃离家园的加利西亚犹太人。

犹太人在俄罗斯帝国内受迫害且常受到俄国士兵虐待，得知俄军要来，即收拾能带走的家当逃难。有位俄国军官写道：“集体迫害犹太人所留下的阴影，落在我们迫害过的每个地方。”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在维也纳，博尔弗拉斯从康拉德处得知，东线战事已无指望。在附近的某个红十字会医院里，有个记者难过地看着一名刚从波兰回来的奥地利军人死亡。绿脓从大腿处的伤口流出，这个军人无助地躺着，让医生划开感染部位，排干恶脓："这个病人先是喘着气，然后呻吟，接着嘶哑地一声大叫，然后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可怕的尖声急叫，像狗一样。"[62] 精疲力竭的军医开始把士兵称作"脓槽"。而俄国人在人力这项必不可少的资源上拥有三比一的优势，一百二十个俄国师（每师十六营）对抗六十个奥匈帝国、德国师（每师只十二营）。



弗里德里希大公与康拉德在泰申

奥匈帝国士兵在前线受苦时，弗里德里希大公（左）与康拉德（右）却在弗里德里希位于泰申的西里西亚府邸里设立了豪华的总司

令部。哈布斯堡王朝军队于东边一百二十公里处垮掉时，据军官记载，这两位司令官仍维持老百姓般的生活作息（小睡、漫长的午餐、散步、读报数小时）。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康拉德窝在他位于泰申的别墅里，开始奇怪地执着于形式上的尊卑。凡是可能让人觉得他隶属于德国人的场合，他都拒绝出现。法尔肯海因邀他到柏林讨论战略事宜，他说在泰申有要事要办，婉言拒绝，然后派了一个少校代他出席。此举的羞辱意味鲜明，而德国人也这么认为。在梅济耶尔的德国总司令部，奥地利联络官施蒂尔克大为惊骇："在康拉德的这一举动里，我开始看到欲保住德国这个盟邦和我君主国的利益所不可或缺的良好关系是不保的。"施蒂尔克将此事呈报博尔弗拉斯，后者承诺着手损害防控。在德皇走访东部战线十天期间里，康拉德前去布雷斯劳会晤德皇，在那里他也不肯和法尔肯海因谈正事，还向一脸不敢置信的德国人解释道，他纯粹是以弗里德里希大公随员的身份，不是以奥匈帝国参谋总长的身份前来。[63]

此刻，康拉德本该与德国人从长计议确立大计，不该藏身在弗里茨尔的行馆里，但即使德奥两国的总司令部关系改善，恐怕也改善不了奥匈帝国军队的战斗力。贝希托尔德担心德、奥两国已没有共同的奋斗目标。维也纳打俄国人，柏林打英国人，对伊普尔突出部投入超乎比例的大量资源，甚至考虑从海空入侵英国。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时，德国人已杀死、杀伤或俘虏英国远征军三十万兵力的三分之一，推测伦敦不久后就会因撑不下去而垮掉。[64] 奥地利外交官则没这么笃定。他们谈到德国总司令部里非理性的仇英心态，谈到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Alfred Tirpitz）所组织的陆海战将把宝贵资源从东部战线移到西部战线。[65] 德奥七月时张开双臂欢迎的这场大战，此刻正渐渐失控，已几乎失和的德奥两国面临可能输掉战争的险峻情势。

---

[1] 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837，Munich，Nov. 24 and Dec.8 and 17，1914，Vélics to Berchtold.

[2] Alfred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 1914-1917*（London：Hutchinson，1921），1：214.

[3] HHSA，PA I，842，Berlin，Nov.4，1914，Braun to Berchtold.

[4] John Morse，*In the Russian Ranks*（New York：Grosset and Dunlap，1918），93.

[5] HHSA，PA I，837，Munich，Dec.1，4，8，1914，Vélics to Berchtold；PA I，842，Berlin，Nov.30，1914，Braun to Berchtold.

[6] Harry Kessler，*Journey to the Abyss*：*The Diaries of Count Harry Kessler*，ed. and trans. Laird M.Easton（New York：Knopf，2011），673.

[7] Österreichische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Heereswesen und vom Kriegsarchiv，*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Vienna：Verlag Militätwissenschaftlichen Mitteilungen，1931-1938），1：173-174.

[8] Timothy C.Dowling，*The Brusilov Offensiv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6-7；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196，217.

[9]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ｘｘｘiii，218.

[10] HHSA，PA I，837，Munich，Nov.24 and Dec. 1，8，17，20，1914，Vélics to Berchtold，“Mannschaften vorwärts，Munition zurückhalten.”

[11]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229.

[12] C.R，M.F.Cruttwell，*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1914-1918*（Chicago：Academy，2007[1934]），87.

[13] Ward Rutherford，*The Tsar’s Army 1914-1917*，2nd ed.（Cambridge：Ian Faulkner，1992），75.

[14] Kriegsarchiv，Vienna（KA），Neue Feld Akten（NFA）911，k.u.k. 4.Armeekommando，Nov.29，1914，GdI Eh Joseph Ferdinand.

[15] Fedor Stepun，*Wie war es möglich*：*Briefe eines russischen Offiziers*（Munich：Carl Hanser Verlag，1929），31-33.

[16] Josef von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 （Leipzig：Paul List，1921），100.

[17] KA，NFA 911，6 KK，“Abfertigung am 29/11”；K.u.k. Festungskommando in Krakau，Krakau，Nov. 27，1914，“bürgerliches Wohnungsschutzkomite”；“Ganz besonderes wird über die ungarische Honvéd geklagt”；1.Op.-Armeekdo，Dec.1，1914，“Requirierung-Plünderung und Standrecht”；KA，NFA 1868，Lt. Karl Popper，“Das Feldjägerbattalion Nr.6 im Weltkrieg 1914.”

[18] Morse，*In the Russian Ranks*，222.

[19] Morse，*In the Russian Ranks*，219.

[20] Rutherford，*Tsar’s Army*，87.

[21] HHSA，PA I，842，Berlin，Nov. 25，1914，Braun to Berchtold；Holger H.Herwig，*The First World War*：*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1914-1918* （London：Edw.Arnold，1997），111.

[22]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134.

[23] John Reed，*Eastern Europe at War* （London：Pluto，1994[1916]），98.

[24]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181，220.

[25] Kessler，*Journey to the Abyss*，666-667.

[26] Morse，*In the Russian Ranks*，223-224.

[27] Herwig，*First World War*，109-110；Cruttwell，*History of the Great War*，86.

[28] Rutherford，*Tsar’s Army*，88.

[29] HHSA，PA I，842，Berlin，Nov.30，1914，Braun to Berchtold.

[30] Herwig，*First World War*，108.

[31] Graydon Tunstall，*Blood on the Snow*：*The Carpathian Winter War of 1915*.（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0），7.

[32] KA，NFA 911，k.u.k. 1.Op.-Armeekdo，Nov.29，1914，“Strafsache Partyka und Pawlina.”

[33] KA，NFA 911，k.u.k. 1.Op.-Armeekdo，“Erinnerung an Standrechtskundmachung”；“Choleraverdächtige”；KA，Armeeoberkommando（AOK）1914/15，Evidenzbureau（EVB）3510，2 Armee-Kommando，k.Nr.311，Sanok，Nov.4，1914，Col.Bardolff；AOK EVB Nr.2674，Dec. 16，1914.

[34] Kasper Blond，*Ein Unbekannter Krieg*：*Erlebnisse eines Arztes während des Weltkrieges*（Leipzig：Anzengruber-Verlag，1931），22-24.

[35] KA，NFA 911，AOK，Dec.14，1914，FM Eh Friedrich，“Verhalten höherer Kommandanten und Kriegsgefangener”；“einer solchen Gesinnungslosigkeit oder...Geschwätzigkeit.”

[36] KA，NFA 911，k.u.k. 4，Armeekdo，Dec.11，1914，GM Mecenseffy；Dec.7，1914，GdI Eh Joseph Ferdinand.

[37] KA，B/1438：18-28（Paic），Col. Theodor von Zeynek，“Aus meinen Tagebuch Notizen 1914.”

[38] KA，NFA 911，AOK，Dec.9，1914，“Gefechtsleitung，Zusammenwirken von Infanterie und Artillerie im Gefecht.”

[39] KA，NFA 911，Dec.17，1914，“1.Meldung.”

[40] KA，NFA 1868，Lt.Karl Popper，“Das Feldjägerbattalion Nr.6 im Weltkrieg 1914.”

[41] Kessler，*Journey to the Abyss*，664.

[42] KA，NFA 170，k.u.k. 5 Armee-Kdo Nr.602，Dec. 19，1914，“Nachrichten”；Herwig，*First World War*，110.

[43] KA，B/1438：29-37（Paic），GM Paic，untitled，undated study of Erzherzog Joseph Ferdinand.

[44] KA，B/1450：124-125（Conrad），Col. Rudolf Kundmann，Tagebuch Nr.11，Berlin，Jan. 1，1915；letter，Conrad to Bolfras.

[45] KA，NFA 1868，Lt.Karl Popper，“Das Feldjaegerbattalion Nr.6 im Weltkrieg 1914.”

[46] KA，B/1438：18-28（Paic），Col.Theodor von Zeynek，“Aus meinen Tagebuch Notizen 1914.”

[47] KA，NFA 911，k.u.k. 1.Op-Armeekdo，Dec.1，1914，“Ausfassung von papierenen Fusslappen.”

[48] KA，NFA 1813，32 ITD，Feb.3，1915，Unewel，GM Goiginer，“G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Kämpfe bei Starasol von 10 Oct-6 Nov. 1914.”

[49] Stepun，*Wie war es möglich*，20.

[50] KA，NFA 1840，k.u.k. Inf Reg Nr，4，1 Feldbaon，Standort，Nov. 18，1914.

[51] KA，NFA 1151，19 ITDKdo，Zaborow，Dec. 27，1914，Divisionskdobefehl Nr. 13.

[52] KA，NFA 911，AOK，Dec. 26，1914，FM Eh. Friedrich，“Bemerkungen über Truppenführung.”

[53] KA，NFA 911，AOK，Dec. 15，1914，GM Krauss，“Russische Spionage.”

[54] KA，NFA 2116，AOK Nr. 5033，Dec.9，1914，GdI Eh. Friedrich，“Gefechtleitung，Zusammenwirken von Infanterie und Artillerie im Gefecht.”

[55] Dowling，*Brusilov Offensive*，24-25.

[56] Arthur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A Year of the War on Many Fronts—and Behind Them*（New York：Scribner’s，1916），250.

[57] Stepun，*Wie war es möglich*，116-117.

[58] Manfried Rauchensteiner，*Der Tod des Doppeladlers*：*Österreich-Ungarn und der Erste Weltkrieg*（Graz：Verlag Styria，1993），172-173.

[59] KA，B/1438：18-28（Paic），CoL Theodor von Zeynek，“Aus meinen Tagebuch Notizen 1914”；Lawrence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Architect of the Apocalypse*（Boston：Humanities Press，2000），162-166，180-182.

[60]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AAT，

EMA，7N 851，n.d.，“La Propagande en Autriche pendant la guerre mondiale.”

[61] Herwig，*First World War*，110.

[62]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259-260.

[63] Holger Afflerbach，*Falkenhayn*：*Politisches Denken und Handeln im Kaiser reich*（Munich：Oldenbourg，1994），249-254；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102-103.

[64] HHSA，PA I，837，Munich，Nov. 17，1914，Vélics to Berchtold；“*Westminster Gazette* has called for‘a curtailment of the war’”；B.H.Liddell Hart，*The Real War 1914-1918*（Boston：Little，Brown，1963），69.

[65] HHSA，PA I，837，Munich，Nov.10，1914，Vélics to Berchtold，“streng vertraulich”；PA I，842，Vienna，Dec.3，1914，Berchtold to Vélics；“Streng vertraulich：über die gefährliche Anglophobie der Stimmung in Deutschland.”

第十三章 以塞尔维亚为献礼

奥匈帝国连连败北的战略性冲击和政治上所受的羞辱，何者较严重，很难说得准。从战略上看，哈布斯堡君主国已是一团乱，凡是它与敌人交过手的地方，都被捅出大洞，汩汩流血。由于塞尔维亚军队一直未收手，奥匈帝国的东南边界仍然不得安宁，其与盟邦奥斯曼帝国的陆上联结，也在多瑙河对岸戛然而止。维也纳一再显露的软弱无能，使其更难以将中立国拉拢进德国阵营。如果塞尔维亚继续捣乱，意大利会生起开辟反奥第三战线的念头。立场偏向协约国阵营的罗马尼亚和希腊，会更进一步倒过去。如果大奥地利连小塞尔维亚都打败不了，那么因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被塞尔维亚夺走土地而理所当然与奥地利结盟的保加利亚，还会冒险加入同盟国阵营吗？[1]

波蒂奥雷克九月入侵塞尔维亚期间，奥军在塞姆林（塞尔维亚语称泽蒙）某废弃书店发现的一张地图，暗示了奥匈帝国如果没办法打倒俄国和塞尔维亚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这张地图名为《欧洲的新瓜分》，复制自俄国某报纸，在塞尔维亚广为销售；地图上，德国解体为北邦联和南邦联，奥匈帝国消失，其东部诸省给了俄国、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其南部诸省给了塞尔维亚人和意大利人，而塞尔维亚人拿到最大一块：从希腊边界往北到南匈牙利，往西到亚得里亚海，全归塞尔维亚。[2]

为免落得这一下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已批准第三次入侵塞尔维亚。十月中旬，奥地利在这时已很熟练地在萨瓦河、德里纳河的河湾处集结二十万大军，再度攻入塞尔维亚。波蒂奥雷克自信满满地宣

告：“第五、第六集团军的将士，此战的目标——彻底击败敌人——就快达成。”他避谈八月、九月两次失败的入侵，只谈这次更有可为的入侵，预言“三个月的战役就快结束；我们必须在冬季来临前击溃敌人的最后抵抗”[3]。

这是这些年来塞尔维亚人打的第三场战争，他们已终于耗尽库存的炮弹，且没什么希望从盟邦那里得到重新补给，因为盟邦很难将军火或其他任何物资运到四面不环海的塞尔维亚。光是出于这一点，这场入侵，对塞尔维亚来说，就情势险峻。塞尔维亚的诸战斗部队，经过不间断的作战，兵力已都少掉一半。十月二十七日，塞尔维亚第二集团军司令官无助地望着进逼的奥军，打电报给普特尼克：“我们还需要炮弹，敌人炮轰我们的壕沟，我们没东西可还击；我的兵在如此攻击下会性命不保，而我没有预备队来替补，没有炮弹来阻止伤亡上升；我觉得无能为力，束手无策，要求卸去此司令官之职。”普特尼克否决他的要求，要他的所有部队尽可能力撑再撤退，但此季节撤退，比夏季撤退难上许多，因为秋雨已使泥土路变得泥泞不堪，会使火炮和四轮马拉货车深陷其中动弹不得。[4]



在维也纳和萨拉热窝，奥匈帝国高官把得胜视为势所必然，开始规划战后的大变革。要占领贝尔格莱德，要把塞尔维亚当成劫来的宝物，用于扩大奥地利版图和收买巴尔干半岛的中立国。罗马尼亚人将会得到

此王国的东南角，奥地利人将并吞斯库塔里（阿尔巴尼亚语称斯库台）、都拉佐（阿尔巴尼亚语称都拉斯），以及摩拉瓦河以西的所有土地，并着手拆散“所有塞尔维亚成分的紧密的民众”。这些“紧密的民众”——塞尔维亚居民——将被移走或被奥地利的“殖民者”稀释，殖民者将“改变（此地区的）心态”，“使塞尔维亚（在观念上）更为哈布斯堡”，而较不塞尔维亚。财政部某部门主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际上的行政首长，路德维希·塔洛齐（Ludwig Thallóczy），十月下旬致函波蒂奥雷克，建议于战场上击败塞尔维亚王国后，立即“以强势手段将塞尔维亚人西欧化”。[5]

波蒂奥雷克为击败此王国所拟的作战计划，没有出奇之处：从北、西两边合攻，目标指向自七月起即是塞尔维亚首都又是军队重要运输中心的尼什。波蒂奥雷克的左军，第五集团军，将攻向瓦列沃和科卢巴拉河一线；其右军，第六集团军，将要再度挺进亚哥德纳高地，从南边包抄科卢巴拉线。尼什坐落于摩拉瓦河谷，是驶往君士坦丁堡之东方快车的大停靠站，南北移动之塞尔维亚部队的重要交会点。尼什也是附近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ac）兵工厂所生产之塞尔维亚军火的发配中心。若攻下尼什，奥地利将把此王国一分为二，使分散各地的塞尔维亚军队形同失去武装。奥地利将领克劳迪亚斯·齐布尔卡（Claudius Czibulka）于十一月九日告诉其麾下军官，“把此次战役的目标告知士兵，且是在上场与敌厮杀之前告知他们”。[6] 尽管屡战屡败且天气日益恶化，但奥地利人不想让士气低落。讯问过九月攻势时所俘虏的塞尔维亚人，奥地利人得知塞尔维亚士气也在下滑。塞尔维亚士兵抱怨没吃饱或薪饷太低，抱怨收税员“把他们家牛舍里的最后一头母牛带走”。他们嘲笑帕西茨把国家带进战争，谈到常遭他们的“残暴军官”虐待。[7] 这让波蒂奥雷克听了很开心，似乎证明他的乐观并非胡扯。

雨水使山谷里到处是水，十月上旬起高山上白雪皑皑。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亲王率预备队等在萨瓦河北岸，同情南岸士兵的处境。“至

少我们睡在屋檐下；塞尔维亚境内那些可怜的士兵露宿野外，寒冬中坐在烂泥里，一身湿，那肯定很苦。”[8] 最苦的可能是伤兵，他们无法在撤退后被送到烂泥公路边的医院，而是被丢在农舍里，躺在麦秆堆上，痛得扭动身体。数千伤兵遍布于塞尔维亚的乡间小路上，只要曾爆发战事的地方就有他们。伤寒透过奥匈帝国骑兵的粪便传入塞尔维亚，最终将夺走塞尔维亚三分之一人的性命。眼下，伤寒在军队里大肆蔓延，染上者也都被弃之不顾。即使四轮马拉货车上有空位，也不让伤寒患者上车，怕传给健康的人和污染补给品。[9]

由于兵员、火炮、弹药、粮食样样都快耗尽，普特尼克将军这时宣布："我们唯一的战略，就是用塞尔维亚的烂泥把敌人的战斗部队与其补给隔开。"[10] 奥军往泥淖高歌猛进，最初取得了八、九月时他们只能梦想而无缘实现的那种推进成果。攻陷萨巴茨，也攻陷列斯尼察和洛兹尼察。但这三地都取之不易，主要是因为奥地利统兵官奉命"炮弹尽可能省着点用，以便这一有用东西全运给北方面军用"[11] 。第二十九师靠着一路激战才打进萨巴茨，肃清该城敌军。他们上刺刀冲向卧倒在该城铁路路堤后面向他们开火的塞军，为此死伤了数百人。哈布斯堡步兵军官不得命令炮兵开火："炮弹短缺，只有炮兵军官有权决定要不要开炮。"[12] 但第五集团军至少渡过了萨瓦河和德里纳河，开始往南边、东边进攻。

霍夫堡宫大为高兴，博尔弗拉斯发文给波蒂奥雷克，说他认为塞尔维亚人一旦再与奥军"正面对决"就会垮掉。[13] 以克罗地亚人为主体的第十六步兵团，在十一月一日真的与塞尔维亚某部队正面对决时，该部队军官下令进攻，但塞尔维亚士兵却抗命。"你们自己怎么不进攻？"有人无意间听到抗命的塞尔维亚士兵向他们的军官如此喊道。[14] 奥匈帝国搜集到的情报充斥以下的好消息：塞尔维亚兵力只剩最后的二十万；塞尔维亚士兵已在尼什哗变；部队已由最后的预备队组成；军队已无步枪可用；已开始征召六十多岁的人入伍；较年轻的塞尔维亚人都已战死

或受伤。[15]

法兰克的第八军从萨瓦河与德里纳河的肘状弯处攻入塞尔维亚。他的第十三军在洛兹尼察渡过德里纳河，从塞尔维亚一后卫部队手里拿下采尔山和俯扼周遭地方的该山高原，第六集团军的第十五、十六军则在更南处渡过德里纳河，攻上亚哥德纳高地。在此，战斗一如九月时拼命、惨烈。塞军决意尽可能消耗敌军兵力，于是用火炮和机枪守卫状况好的壕沟，然后，十一月八日，即战事最激烈时，他们还从山上滚下原木和大石，丢掷石块和手榴弹，甚至举起信号枪朝奥地利人射击。[16]进攻的奥军士兵被岩石碎片砸伤之处，和被炮弹碎片打伤之处一样多。

先前让奥军付出惨重伤亡的克鲁帕尼、罗兹罕（Rozhan），在十一月第一个星期陷落。奥地利第七十八团于十一月六日拿下重兵防守的古切沃（Gucevo）高地。那是普特尼克部防线上最重要的一点，塞尔维亚人在那里抵御奥军已四十九天。由两百人组成的一支奥地利“冲锋连”，在拂晓前的黑夜中，利用战术奇袭渗入塞尔维亚人的壕沟，用手榴弹制服敌军，然后召唤线列步兵上前。线列步兵抢在塞尔维亚预备队前头抵达壕沟，然后将后者赶下高地，也难得地俘获大量敌军和武器：六名军官、六百名士兵、一门加农炮、三挺机枪。龙心大悦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欣慰于终于有值得庆祝的战果，授予该部队三百三十四面奖章表彰其英勇，赏给冲锋连每名幸存者五十克朗。[17]

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似乎终于转为奥地利占上风。与摄政亚历山大和总理帕西茨会晤时，普特尼克将军说塞尔维亚军队的情况很糟，甚至提到可能得与奥地利单独媾和。[18]塞尔维亚人于十一月十五日让出瓦列沃，西塞尔维亚主要的交通中枢。原打算在该地困住塞军并予以歼灭的波蒂奥雷克，虽然未能如愿，但还是在向全帝国广播的公报里得意表示：“经过九天行军，走过高山、湿地，冒着雨、雪和寒冷，同时经过九天激战，勇敢的第五、第六集团军士兵已拿下科卢巴拉河一线，使敌

人溃逃。”[19]

塞军退往克拉古耶瓦茨，波蒂奥雷克随之在瓦列沃跨过科卢巴拉河，把南方面军出人意料的战果归功于他本身“锲而不舍的追击”。他自认是穆拉德（译按：Murat，一三八九年在科索沃之役歼灭塞尔维亚军队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再世，把塞尔维亚人打倒在地，他的马刀刺进他们背里。这时波蒂奥雷克邀记者团入塞尔维亚，以“见证这决定性的一役”。原本他为怕打败仗难堪，要记者团只能待在奥地利境内。记者团穿过马奇瓦地区抵达瓦列沃和贝尔格莱德两地周边的前线，震惊于所见景象。纽约《晚间太阳报》（*Evening Sun*）的威廉·谢泼德（William Shepheard），报道了归冷酷无情的哈布斯堡军官监管的十八座焦黑、人去屋空的城镇：“他们不承认杀了妇女，但承认杀了数百个老百姓。有位匈牙利军官得意地把一根六英尺长的草耙拿给我看，说他就用它来处决人。”[20] 奥匈帝国军官对下属行径的批评，似乎正证实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为真：弗朗茨·丹尼尔（Franz Daniel）将军于十月下旬提醒他的士兵，“我们的目标是消灭敌人的武装部队，而不是消灭敌人的所有平民”。他要求不得再有奸淫、劫掠、污辱敌人尸体、虐待敌人伤兵的事情。[21]

在这同时，普特尼克正努力凑拢他最后的后备兵力，且仍在撤退，希望借由广大失土使奥军兵力捉襟见肘。奥军难得一见地聚拢数百敌人战俘，其中许多人一身平民衣着，诚如波蒂奥雷克在写给博尔弗拉斯的信中所嘲笑的，这样的打扮“较方便偷溜回家”。[22] 普特尼克指示塞尔维亚军官尽可能把他们的士兵留在壕沟里；否则一旦行动，他们会逃跑。[23] 接下来十几天，波蒂奥雷克把部队带过科卢巴拉河，在利格（Ljig）周边作战。

奥地利新炮弹派上用场却动辄不爆（有时多达一半不爆），但这个麻烦还应付得过去，因为这时塞尔维亚人可伤敌的火炮少之又少。[24]

波蒂奥雷克的浮桥还落在后面甚远，得靠人力拉过烂泥和雪泥才能抵达前线。塞尔维亚人趁着这空档撤向克拉古耶瓦茨和阿兰杰洛瓦茨，在科卢巴拉河谷、摩拉瓦河谷之间的丘陵挖掘了新的防御阵地。

把壕沟推进到更接近敌军处时，奥军察觉到塞尔维亚农民在奥军阵地上做记号，以为他们的炮兵标出炮击目标。塞尔维亚牧羊人则会把绵羊、山羊赶到奥军壕沟前的开阔地，以标示出奥军步兵所在；把牛赶进奥军炮兵所在，以标出炮兵位置。还有些塞尔维亚人会用旗子指出奥军兵力的强弱，向左右挥表示步兵（挥一次表示一个营），上下挥表示炮兵（挥一次表示一个炮兵连）。奥匈帝国士兵从壕沟里看到此事后，把子弹顶部挖空以制造出达姆弹。口头警告，若塞尔维亚农民不听，达姆弹造成的可怕伤口，或许就管用。[25]

哈布斯堡军队还在为平民问题伤脑筋。部队奉命“把所有塞尔维亚人赶到战线前面；前线之后不准有塞尔维亚人待着”。如有村子向塞军打信号以通知奥军逼近，奥军士兵奉命“烧掉全村”。看到塞尔维亚游击队员，当场击毙。但这时，几乎每个塞尔维亚正规军士兵都可能被当成游击队员，因为他们全没穿军服。有位刚从普热梅希尔来到奥地利占领之塞尔维亚地区的美国记者，描述了这场塞尔维亚战争的“兽行”。与俄罗斯战线上的暴行相比，这里的暴行到处可见，且也比他在比利时亲眼看到的德国人暴行远更恶劣。这位美国人把这归因于“奥地利人独有的仇恨塞尔维亚心态”。奥地利人对待塞尔维亚老百姓和战死敌军的作风，令他印象特别深刻：前者常遭骚扰、杀害，后者则被拖到敞露的壕沟里任其腐烂，不予埋葬或行葬礼。[26]

奥地利第四山地旅在右侧猛进，未遭抵抗就拿下乌日采，缴获三百箱步枪弹、数堆炮弹、数百支步枪。[27] 有位塞尔维亚传令兵大雾中误闯进奥军壕沟时，表示松了口气：“谢天谢地，反正我是迟了，他们会因为迟了把我们枪毙。”[28] 其他塞尔维亚战俘则对这王国的前途很悲

观：兵员、火炮、粮食都快耗尽。炮兵连惨到一门炮只有六枚炮弹可用。上级已命令塞尔维亚部队抢本国村子的粮食喂饱自己，勿把村子粮食留给即将到来的奥军。在那些村子里，每两户就有一户在服丧，三分之二的妇女穿着寡妇丧服。经过奥地利三次入侵，这个国家的人民犹如几乎整个被杀光。[29]

柏林的《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欢欣鼓舞地报道："奥匈帝国部队正施以重击；他们已把塞尔维亚人赶离德里纳河边，已深入该国内地。"《本地万象》（*Lokalanzeiger*）高呼，"我们的奥地利兄弟无役不胜"；"塞尔维亚军队已被消灭三分之一"。[30] 十一月下旬很少出现在该区上空的奥地利飞行员，大概见到一道带土色的蓝灰色长龙，从北边的奥布雷诺瓦茨一路往南绵延到乌日采，那是奥军挺进的身影。阿兰杰洛瓦茨是奥地利诸集团军的枢纽，同样也是塞尔维亚诸部队的枢纽：奥地利第五集团军和塞尔维亚第二集团军位于该城北边，奥地利第六集团军和塞尔维亚第三、第一集团军位于该城之南。俄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先前已把公使馆从贝尔格莱德迁到尼什，这时则完全撤出塞尔维亚，撤到索非亚。在那里，俄国外交官恳请保加利亚人站在反奥一方参战，保加利亚人漂亮回道："但我们于一九一二年为你们打土耳其人，结果我们所得到的，乃是看着马其顿地区送给塞尔维亚和希腊。"[31]

塞尔维亚遭完全孤立；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认为这场战役已大势底定，十一月二十四日任命斯特凡·萨尔科提克（Stefan Sarkotic）将军为塞尔维亚行政长官。[32] 这位将军曾任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军区司令，上任后可望以铁腕镇压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逮捕民族主义分子，禁用塞尔维亚国旗，废除东正教会的宗教自主地位，关闭修道院，要东正教学校的教育脱离宗教影响（但天主教学校当然不在此列）。[33] 贝希托尔德欢欣鼓舞，认为拿下瓦列沃代表"我们与塞尔维亚的战争已走到一重大转折点"。[34] 波蒂奥雷克得意于自己的成就，要求召开大型奥匈帝国

首脑会议，以决定如何将他所“征服的塞尔维亚”分而治之。[35] 不消说，这位南方面军司令官，在情势最不利的时刻，未留意于该正视的发展。他已打算将塞军围在科卢巴拉河边，却又愚蠢地要已过度伸展的第五集团军左翼大幅度迂回，以把塞尔维亚首都也拿下。波蒂奥雷克很想在十二月二日，老皇帝登基六十六周年纪念日那天，“把贝尔格莱德城和要塞献给陛下”。“我打算以第五集团军拿下贝尔格莱德，第六集团军则绑住敌人主力，”波蒂奥雷克于十一月十九日发文给麾下诸将。[36]

波蒂奥雷克该采信克劳塞维茨的原则，集中全力对付塞尔维亚“主力”，不要管贝尔格勒，但他没有。疾病和战斗已渐渐压垮他的部队，营部报告他们在山区挺进的情况时说道：“我们出击时有四百二十四人；三天后我们拿下这座山丘，但为此损失一半兵力。”[37] 但波蒂奥雷克始终是个敏感易怒、缺乏自信的人，这时渴望得到贝尔格莱德能给他的喝彩。波蒂奥雷克描述了塞尔维亚流亡政府里的“恐慌”和日益不服帕西茨与激进派的心态。道路上挤满难民、失去斗志的塞尔维亚士兵大量逃亡，波蒂奥雷克这么说。有位在尼什的奥地利特务报告，塞尔维亚士兵穿不暖，处境悲惨，唯一的冬季军服乃是俄国人“在东部战线捡来”，转交给塞尔维亚人的“血渍斑斑的德、奥破烂衣服”[38] 。

首支进入贝尔格莱德的奥地利部队，是由克罗地亚人组成的第六团，但遭到自家火炮轰击，因为奥地利炮兵没料到自家军队会这么快就到。第六团派一个班进入卡莱梅格丹（Kalemegdan）护城城堡摘下塞尔维亚国旗，结果手边没奥地利旗可用，于是竖起一面白旗。奥军就如此顺利攻下贝尔格莱德，第六团军官一脸狐疑地向长官表示：“街头到处响起‘弗朗茨·约瑟夫万岁！’的叫喊声。”[39] 为庆祝拿下贝尔格莱德，维也纳四处悬挂旗帜、灯饰，办音乐会，游行，在市中心张贴一面大海报，上面写着“敌人塞尔维亚的首都已落入我们手里！”

德国数个城市也庆祝此胜利，奥地利驻慕尼黑公使报告，哈布斯堡

公使馆前有欢欣鼓舞的民众，他的窗户底下出现数群巴伐利亚学童，可爱地唱着“哈布斯堡王朝的胜利旗帜，史上第四度飘扬在贝尔格莱德上空”。这位奥地利外交官高兴地说道：“这里的军界和报界认为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乃是此事的战略意义：贝尔格莱德是奥地利的安特卫普，既是防卫堡垒，也是整个军队日后作战的基地。”通向萨洛尼卡与君士坦丁堡的门户，原来因为塞尔维亚人的反抗而封住，如今终于打开。[40]事实上，维也纳想着战后永远控制贝尔格莱德：一个现代要塞，扼控多瑙河的要地，由奥地利经营通往中东的东方快车，一座重建的城市。“重建”至关紧要，因为贝尔格莱德已沦为废墟，其多瑙河河岸的码头已付之一炬，其主要建筑已被奥地利炮火轰成瓦砾堆。[41]

波蒂奥雷克大出风头，乐不可支。他吹嘘道已杀死至少三万塞尔维亚人，“顶多只剩八万人”。[42]他的部队不只杀军人，也屠杀非战斗人员。生于德国的塞尔维亚将领保罗·尤里西奇·斯图姆，记录了他在行经之地看到的奥匈军队暴行：男人、女人、小孩用绳子绑成一串，形体遭毁损，然后遭“可怕屠杀”；女人被活活剥皮或切下双乳。惊骇不已的尤里西奇-斯图姆呈报司令部，“农民说这种景象到处可见”。列斯尼察的塞尔维亚军官报告，小男孩遭吊死或射杀，女人遭强暴，沦为奴隶。[43]已在战前揭露马扎尔化恶行的塞顿-华森，这时开始在英国为塞尔维亚人募款，他的代理人在英国城镇街头和电车上四处走动，为塞尔维亚救难基金募捐。[44]

波蒂奥雷克大出风头的同时，康拉德失宠，而康拉德的失宠令这位巴尔干方面军司令官时时刻刻都喜不自胜。皇帝发了一封私人感谢函和一面奖章给波蒂奥雷克；萨拉热窝的元老以他的名字作为街道之名，甚至派系倾轧不断的布达佩斯议会封他为匈牙利的救星。博尔弗拉斯的副手斐迪南·马尔特勒（Ferdinand Marterer）将军，从霍夫堡宫被派去记下波蒂奥雷克的宏大计划。波蒂奥雷克向马尔特勒耳提面命：“此刻我们得决定当强制缔和时，我君主国要并吞塞尔维亚哪些地方。”波蒂奥雷

克想要“贝尔格莱德、萨巴茨、整个马奇瓦地区，以及德里纳河、萨瓦河下游、从贝尔格莱德到奥尔绍瓦（Orsova）这一段的多瑙河，塞尔维亚一侧河岸上的制高点”。马尔特勒记下波蒂奥雷克的想法，带回霍夫堡宫。[45]

但波蒂奥雷克不知道普特尼克在耍他。攻下贝尔格莱德后，波蒂奥雷克继续以已经捉襟见肘的兵力深入塞尔维亚。他的官兵穿着磨光露底的军服踉跄前进，穿过愈来愈浓的雾、雪和愈来愈深的烂泥。波蒂奥雷克“锲而不舍的追击”，意味着他的官兵没时间休息，没时间晾干他们的靴子，乃至没时间吃顿热食。[46] 第九师报告，“我们的病号愈来愈多”，“急需外套和Baschlik”，Baschlik指的是一百年前哥萨克人在俄罗斯雪地上追逐入侵的拿破仑军队时引进的毡制风帽。但不会有这种风帽，也不会有外套。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每样东西，包括纺织品，都快用光，只能提供部队纸衬衣和纸袜，“耐用两天至一星期”。奥地利军官还接到无君子风度的命令，要他们脱掉塞尔维亚战俘的外套，给冷得发抖的哈布斯堡士兵穿。军人获告知拿禾秆或粗麻布袜包鞋子御寒。许多奥地利部队抱怨赤脚行军（鞋子已碎裂），睡在高低不平的地方，连生火煮饭或取暖都没办法。[47]

第六十九团的匈牙利人，十一月二十四日从他们位于巴伊纳巴什塔（Bajina Basta）东边的壕沟报告：“情况没变”，“我们整夜开火，他们还击；雨下很大且没停，非常冷。”[48] 有些部队不得不走下山，进入山谷避寒。奥地利后卫部队穿着用禾秆包住的鞋子踉跄前进，发现前线士兵丢下机枪、炮弹、子弹，以免还得拖着它们穿过泥地、雪地。第八军某奥地利二等兵描述了官兵的绝望：“地形很恶劣，我们没有储备，军人有自杀念头。”[49] 山谷中的烂泥和高地上的雪，使重要补给无法送达。草秣吃光，马匹死去，从而更难运粮食、弹药、火炮到前线。一个又一个军官从他们荒凉的山顶哀叹道：“没有补给，没东西可买。”有位将领十一月二十五日写道，第九师的“情况糟糕”，“接连遇上让人很不

愉快的事：浑身是血的伤兵、发臭的尸骸、坏掉的四轮马拉货车、浑身是干硬泥块的士兵。这还要多久？”一半的奥匈帝国骑兵徒步打仗，因为坐骑已死。[50]

奥地利死伤清单上多了一个新分类：“无法行军的、不堪用的。”不久，这一类人开始多过丧命者、受伤者、失踪者。在尼什受某位美国外交官访谈的奥地利战俘透露，被俘前几天里，他们只吃了梨子，喝了水，没吃其他东西。有位奥地利军官写道，“军方领导阶层要我们送命”，“我们不断打仗已经打了一个月，赤脚，没面包吃，靠吃马肉活命”。[51] 四轮马拉货车和双轮弹药车都被困在烂泥里，士兵除了得背平素要背的东西，还得背炮弹和其他军需品。

波蒂奥雷克不为所动。他已进驻更接近前线之处，即洛兹尼察附近科维利亚察（Koviljaca）温泉疗养地的五星级饭店，且为最后阶段的作战取了振奋人心的代号“最大奥林匹斯”（Max-Olymp）。他无法忍受部队指挥官要求休息或索要毯子。他在他的舒服办公室里，温暖的火炉边，拟了结束战争的最后一击。他要派第十五、第十三军渡过利格河上游，夺取拉扎雷瓦茨（Lazarevac），将仅存的塞尔维亚军队困住。当克劳斯说他的官兵生病、累垮、挨饿，打不下去时，波蒂奥雷克冷冷回道：“他们不是一直如此？”[52]

“最大奥林匹斯”行动终于在十一月三十日让第六集团军休息四天，但那完全是因为他想暂停战事，以赶在皇帝登基六十六周年纪念日前完全占领贝尔格莱德。原以为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却变成长达两周累人且惨烈的战斗。贝希托尔德从维也纳祝贺波蒂奥雷克取得“杰出成就和亮眼成果”，但康拉德和弗里德里希大公从遥远的泰申批评波蒂奥雷克的作战速度：“较高阶指挥官未表现出足够的干劲与勇气，削弱我们的整体情势。”[53]

康拉德和波蒂奥雷克一样窝在温暖的冬季住所里，与这位南方面军

司令官一样昧于奥匈帝国军队的真实情况：奥匈军队在塞尔维亚所展现的“干劲”，就和在其最后一小块加利西亚土地上所展现的一样少。事实上，波蒂奥雷克的胜利就要化为泡影。第六集团军怀着感激的心情在科卢巴拉河边将枪支堆成三脚架，四处寻找食物、柴枝、弹药时，彼得·卡拉乔尔杰维奇国王登上鲁德尼克（Rudnik）高地激励士气，十二月二日普特尼克开始以二十万兵力大规模反攻。塞尔维亚第一集团军的三个师与第三集团军的三个师在瓦列沃会合，将奥地利的第六集团军和第五集团军第十三军打出罗扎纳（Rozana）和瓦列沃。塞尔维亚第二集团军的四个师从拉扎雷瓦茨和奥布雷诺瓦茨左右包围第五集团军的第十三军。普特尼克终于为部队重新补给上炮弹和子弹，且已把塞尔维亚王国剩下的所有后备兵力（警察、宪兵，原抽调到保加利亚、希腊边界处的部队）都调上来。从口风不紧的奥地利战俘那儿，他还了解奥地利苦撑、士气低落的程度。[54] 奥匈帝国战俘与塞尔维亚审问人员闲聊时，主动透露了有关波蒂奥雷克之作战序列的情报，且是远超乎必要的大量情报。他们描述了哈布斯堡军队几近垮掉的情况：奥地利连级部队只剩一半或更少的兵力，只剩寥寥可数的军官可带兵。他们描述了波蒂奥雷克的急躁，谈到他如何在不留预备队的情况下，把兵力分布在一宽阔的战线上，以扩大追击面，把贝尔格莱德加入战利品清单。简而言之，不管是何处的奥军，都难以挡住反击；如果塞尔维亚人在一处打溃奥军，或许就会使疲累、受冻的奥军全军溃败。[55]

在这同时，尽管经过漫长撤退，尽管有奥匈帝国参谋可怕的预言，塞尔维亚人的士气仍出奇高昂。他们刚得到俄国、法国弹药的重新补给（弹药越过希腊、黑山边界辛苦运来），且补给线比奥军短，因为接近他们的主要铁路和补给站。仇恨奥匈帝国的心态，像胶水一样把他们团结在一块。塞尔维亚婴儿出生时，母亲以“科索沃之败的小复仇者万岁”问候新生儿（科索沃之败发生于一三八九年，一九一二年才得到彻底报仇雪耻），当男婴长大逃学，则受到如此责骂：“你那样的行为解放不了马其顿！”[56] 长大成人后，他们延续这一爱国教育。奥地利参谋

仔细翻看十月下旬缴获的文件，发现一份塞尔维亚的《军人初级读本》。这本小册子无异于“一本仇奥匈心理问答集”，含有十二个训谕，包括：“对谁的仇恨都不该比对奥地利人的仇恨大”，“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受奴役，必须把他们从奥地利统治中解放出来”，“为让塞尔维亚国旗在萨拉热窝、莫斯塔尔升起而奉献你的一生”，“我们得像父亲恨土耳其人那样恨奥地利人”。[57]

在奥匈帝国医院接受治疗的塞尔维亚伤兵所表现出的坚忍，令每个人吃惊。“他们入院时浑身是土，用树枝固定骨折处，就和他们在战场上所受的包扎一样。有时髋部骨折会用树的大枝捆缚住，大枝从人的脚到腰。”[58] 在战场上，塞尔维亚人的冷血同样令人注目；他们在每个地方都挖掘漂亮的壕沟线，并构筑侧翼阵地，然后躺在里面一动不动，不发出声响、亮光，不移动身子，直到奥地利人直直走进来，被他们近距离撂倒为止。”[59]

波蒂奥雷克震惊于普特尼克的反攻，打算至少守住科卢巴拉河一线，就和康拉德的军队在东部守住杜纳耶茨河一样，但事实表明，即使压低了目标，仍是奢望。塞尔维亚的第一、第三集团军攻向瓦列沃，第二集团军攻向贝尔格莱德，两军合并的力量一举将奥地利诸阵地一起攻破。这一战会打上十天，但胜败其实在头一两天就已决定。“前进，英雄们！”塞尔维亚军官爬过顶部时大喊，“相信上帝！”三日早上七点，塞军对全线发动进攻，塞尔维亚人像鬼魅般从大雾中突然现身，先是把奥地利人吓呆，然后令他们恐慌。[60] 第一集团军出奇轻松地就将奥军赶出强固阵地，缴获四百一十个战俘、四门榴弹炮、一挺机枪、千枚炮弹。[61] 三日在将奥军打到利姆河对岸之后，塞军接到命令要其于四日将奥军赶到科卢巴拉河对岸，结果他们不负使命。

普特尼克的进攻部队在攻破奥地利前线时，他要塞尔维亚预备队和炮兵推进到更接近前线处。阿道夫·冯·雷门将军的第十三军惨到只剩一

万七千人，散布在阿兰杰洛瓦茨附近十六公里长的战线上，然后被两个塞尔维亚师歼灭。塞尔维亚靠另外两个师的兵力，也大败奥匈帝国第八军；这支奥地利部队遭遇猛攻，不久就耗尽弹药，呼救补上弹药，却发现他们的弹药车队只是个空壳。士兵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打开一个又一个双轮弹药车找炮弹和子弹，车里却空空如也。有人告诉他们弹药在瓦列沃，弹药已用火车送到那里，但未及时送到他们手上。[62]

波蒂奥雷克躲在科维利亚察温泉疗养地，噤声整整一星期。他怒骂天气作弄他，雨、雪、大雾、烂泥拖慢他的追击，然后却突然放晴。十二月四日太阳露脸，驱散大雾，使地面变干，有利于塞尔维亚人炮轰、进攻、追击。[63] 彼得国王跟着第二集团军翻越锡布尼察（Sibnica）、罗加察（Rogaca）的丘陵，督促士兵上前杀敌。波蒂奥雷克的记者团，千辛万苦穿越萨瓦河与科卢巴拉河之间的荒凉土地以见证“决定性一战”，却突然被没来由赶回奥地利境内，无缘目睹、报道最惨不忍睹的溃败。[64]

在瓦列沃周边丘陵，塞尔维亚人使出全力攻打奥军，插入疲惫的奥地利诸部队间的缺口，将他们打散或使他们自行溃散。塞尔维亚人进攻、夺地的速度非常快，快到他们没有够长的电话线连接往前疾驰的步兵和后面的炮兵。丘陵上的大雾使炮兵看不清前线状况，发出的炮常打中进攻的友军，而非撤退的奥军。[65] 每个塞尔维亚集团军每天都报告俘虏了数百名未受伤的奥军。第一集团军十二月五日报告，“我们缴获许多战利品和许多战俘；敌人惊慌失措”。[66] 吓坏的奥地利人跌跌撞撞躲入十、十一月战斗后废弃的壕沟，躺在那里，最后也遭制服、俘虏。[67] 瞠目结舌的波蒂奥雷克，从其温泉饭店下令要部队挺住。他命第十三军坚守拉扎雷瓦茨的阵地，两翼与第六、第五集团军接合，准备向阿兰杰洛瓦茨反攻。[68]



在塞尔维亚遭敌攻击的奥匈帝国步兵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塞尔维亚人的反攻，击溃波蒂奥雷克的南方面军。

照片中两名奥匈帝国军人受到塞尔维亚火力攻击，缩在壕沟里。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领兵作战从不在行的波蒂奥雷克，显然已掌握不住真实情况。科维利亚察的温泉以能打消悲观著称，或许受了这温泉的影响，他这时抱怨第六集团军“出乎意料的撤退”，使第五集团军的侧翼暴露，“就在第五集团军正准备给塞尔维亚人结束战争的最后一击时”。[69] 但到了这时候，出手攻击的只有塞尔维亚人。补给品和弹药都快耗尽的塞尔维亚前线部队，轻易就将奥地利人赶出已做好防备的阵地，把他们完全赶出塞尔维亚，奥军之不堪一击，由此可见一斑。

这场旋风般的战斗，后来据断定从十二月三日打到十三日，并被称

之为阿兰杰洛瓦茨之役（奥地利两个集团军在该镇会合）。塞尔维亚第一、第三集团军诸师，将波蒂奥雷克的第六集团军打出壕沟，从奥军手里拿下位于科卢巴拉河与西摩拉瓦河之间至关重要的高地。[70] 奥军营级部队的兵力，有许多已降到连级程度，自知挡不住敌军，所以还未与塞尔维亚人交手就逃走。有位军官率领其营退出塞尔维亚时写道："没有友军的迹象，没有接到命令，我的士兵溃散。"[71]

十二月九日，波蒂奥雷克终于向无法置信的霍夫堡宫透露"全完了"。他再度惨败。普特尼克宣布奥地利"左军和中军实质上遭歼灭"。他惊叹于被俘的奥匈帝国官兵之众和遭弃置于各地的火炮、机枪、步枪之多。奥地利伤兵也散落各地，被撤退的同袍丢下，自生自灭。在塞尔维亚每份谈奥军的报告中，都出现"恐慌"这字眼。[72]

然后，普特尼克的第二集团军攻打拉扎雷瓦茨附近科卢巴拉河边的雷门第十三军。这时拉扎雷瓦茨是联结奥匈帝国两个集团军的枢纽。这支部队接着往北呈扇形散开，以将有八万兵力的奥地利第五集团军余部赶出贝尔格莱德。第一集团军大举翻越俯临瓦列沃的山丘，俘虏奥军五千人，一个师攻进该城，截断第六集团军的主要补给线和撤退路线。

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四十二师的克罗地亚人，遭从格拉博维察（Grabovica）北边的高地击退。他们于十二月七日撤退，试图与其左边的第三十六师保住联系，于是开始透过单单一座桥渡过利格河，不料桥禁不住士兵、辎重车队、火炮重压而垮掉。塞尔维亚人出现，开始朝落水的奥军开火，引发从一个部队往另一部队蔓延的恐慌。在克罗地亚人后面排好队准备过河，由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组成的奥地利地方防卫军第三十师的士兵，朝四面八方溃逃，把火炮、机枪、辎重车队、弹药留给塞尔维亚人。[73]

没有一处奥军发动有效的反攻；他们的每日战情报告，意图将他们（蓝色）和敌军（红色）并置呈现以比较双方兵力的差异，报告中相当

清楚地计算出他们日渐萎缩的兵力，却只以红色问号呈现敌军兵力。他们已完全掌握不了局势。奥匈帝国第五十二团在拉扎雷瓦茨掘壕固守，称“受到猛烈且惊人精准的炮火攻击”。这支由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组成的部队彻底瓦解，慌乱逃向后方时，把其旅指挥部冲垮。遭乱军冲垮的指挥部无法阻止部队溃退，下令邻近的第七十八团前来填补缺口，但没人找得到这支部队。有位军官写道，“他们也已弃离阵地”。[74]

波蒂奥雷克的整个南方面军仓皇退往德里纳河、萨瓦河的渡河口，或退到位于贝尔格勒而仍在奥军手里的桥头堡。由克罗地亚人组成的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四十二师，在拉扎雷瓦茨附近渡过科卢巴拉河时，停下来欲与邻近的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四十师仓促组成后卫部队，但清一色匈牙利人的第四十师迅速通过未停下，他们的军官奇怪地坚称上级“严令撤退”，而非战斗。第四十二师跟着冒着寒雨走上通往贝尔格莱德的烂泥道路。他们的马太虚弱，拉不动火炮或辎重车，于是火炮和辎重就弃置给在此师下方渡过利格河、攻打他们侧翼和后方的塞军。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四团部署在附近，也遭溃败。他们看着塞尔维亚人把壕沟挖到他们前线，挖到围住他们两侧翼，同时看到位于左右两侧的捷克人、德意志人部队撤离，于是决定自己也撤退，丢下背包、毯子、弹药袋以加快逃跑脚步。抵达萨瓦河边时，此团只剩九百人。该团七成人被列为“失踪”。

萨巴茨塞满欲逃离塞尔维亚追兵的奥地利士兵。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六团（在匈牙利南部征集的塞尔维亚人），奉命掩护捷克人第一〇二团逃到萨瓦河对岸，小心翼翼走在被弃置的火炮、辎重车堵住的马路上。最初他们遇到一队塞尔维亚军官从漆黑夜色中现身，劝他们投降；有位奥地利军官忆道，“我们开枪打死其中两人”。然后他们继续上路，前去解救快垮掉的第一〇二团。第六团军官告诫他们手下的士兵，行军期间勿用塞尔维亚语交谈，但他们没听进去，使得一〇二团胆战心惊的捷克人听到他们接近，不停地开火。第六团不得不掘壕以免死于友军之

手。一〇二团的射击整夜没停。[75]

《晚间太阳报》的威廉·谢弗德急忙在贝尔格莱德渡河，报道“有众多伤者和惊慌失措者，一场彻底的溃败”。有名奥地利下级军官证实，哈布斯堡三个吓坏的军，在该地混成一团，造成“全面且无法形容的混乱：命令未传下去，后卫部队被弃之不顾，一如其他每样东西，火炮、弹药、四轮马拉货车、粮食、流动野战医院、伤兵，简而言之，所有东西，遭弃之不顾”[76]。降下的雪堵住道路，谢弗德目睹“许多军官简直发疯”。由于军事预算不足且平时维持的军力不多，奥匈帝国军队自一八八〇年代起一直倚赖“预备军官”——服役只一年的中产阶级学生或专业人士——而这些新手承受不了这场战役的压力而垮掉。谢弗德看到有个奥地利少校骑马经过一名摊开四肢躺在路边的受伤中尉身旁，中尉朝少校喊着什么，少校愤而拔出手枪，向中尉开了几枪（结果只打中中尉的脚）。[77]

塞尔维亚人从两侧翼收拢，把火力发挥得更好，缴获大量火炮、炮弹，也俘虏护送火炮的许多未受伤官兵。塞军简单把手往东或往南一指，要奥匈帝国战俘朝着那个方向走，告诉他们“顺着电话线走，直到拉扎雷瓦茨为止”；又湿又冷又饿的奥军战俘乖乖照办。奥匈帝国的战后报告，对于本国士兵投降得那么干脆感到惊讶。舍恩（Schön）将军在其位于匈牙利的办公室写道，“整个部队被敌人俘虏，没有一点反抗，怎会这样？”“塞尔维亚俘虏证实真有此事，证实我们的部队认为向敌人投降，乃是解决其困境显而易见、理所当然的办法。”无疑“没有比毫发无伤、没有战斗就被敌人俘虏更糟糕或可耻的事”。舍恩将军誓言战后调查所有返国的奥地利战俘，“以查明他们是如何乖乖被俘”。[78]但其中许多人无意战后返国。一万捷克人在塞尔维亚投降，且在不久后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兵团”，与协约国一同对抗同盟国。[79]

波蒂奥雷克原似乎胜券在握，没想到反而损失掉另一支大军的大半

兵力：两万八千人死，十二万两千人伤，四万人失踪。编制千人的奥地利营级部队，惨到只剩百人或百人不到。第三十六师损失一半军官和六成士兵。第一师辖下每个旅只剩几乎不到三百人。这场惨败的奥地利幸存者，全被判定得了战斗疲劳，已打不了仗。[80] 行军途中，许多奥地利士兵见到围墙、树干、小屋上，钉着以奥匈君主国的斯拉夫语草草写下的标语："已遭击败的奥匈君主国的军人！投降吧！不要再为你们的德意志人主子打你们自己的兄弟！"[81]

十二月九日，塞尔维亚人在群集于贝尔格莱德周边的第五集团军和正涌到德里纳河、萨瓦河渡口处的第六集团军之间，打开一个缺口。奥地利将领海因里希·庞格拉茨（Heinrich Pongracz）在思索此次挫败时推断，这一次挫败，一如其他所有挫败，源于奥匈帝国士兵仍把自己视为"团体的沉默一员，而非自认是负责任的个人"。他们不愿积极巡逻，轻易撤退，从未协调火炮和步兵团进攻，允许后方区域塞满逃避责任者、逃兵或小偷，例如中尉阿瑟·费舍尔（Arthur Fischer）因从绝望的农民那儿偷走数十只鹅和猪，以及强行闯入撤退沿线的教堂偷窃圣像、圣餐杯、烛架、家具，坐了五年牢。[82]

塞尔维亚部队紧追不舍，波蒂奥雷克终于同意部队司令官抛弃补给车队，只要撤出人员即可。波蒂奥雷克把这次溃退称作只是"向后机动"，把两个集团军拉回多瑙河、萨瓦河、德里纳河对岸，牺牲掉它们的大部分装备和数十门火炮。这类似敦刻尔克大撤退，只是心态上更绝望：士气涣散、钩心斗角的奥匈帝国人将费上一番工夫，才能从这次战败中复原。一如康拉德，波蒂奥雷克急忙替自己辩解（"我们已连续打了一个月的仗"）、卸责（"缺乏后备部队和弹药，使我们的战斗力大打折扣"）。[83]

十二月十四日，萨尔科提克将军的新军事政府在贝尔格莱德成立，隔天，塞尔维亚部队就夺回该城。此前，人仍在科维利亚察的波蒂奥雷

克，严令部队“守住贝尔格莱德，不然战死”，但士兵还是撤退。上面下令逮捕传送撤退命令的电报接线员，但仍然止不住溃逃。[84]（“有位军官嘲笑道，如果波蒂奥雷克出现在他自己的部队里，会被枪杀。”）[85]波蒂奥雷克奋力最后一搏，以拿破仑时代的古谚“战争中，左右大局的是统帅，而非士兵”提醒众人。波蒂奥雷克吼道，他的士兵已成为罪犯：“逃兵、懦夫、强暴犯、杀人犯、纵火犯、小偷、恶霸、打家劫舍者、骗子。”心情较平静时，他表示绝不可将贝尔格莱德的失去解读为“塞尔维亚的军事胜利，而应解读为只是奥地利疲乏的表征”。[86]

享受波蒂奥雷克所献上的将贝尔格莱德作为登基周年贺礼还不到两个星期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未领会这差异。博尔弗拉斯发文给波蒂奥雷克，“陛下不高兴”，而在霍夫堡宫讲究稳重得体的语言里，那其实意味着“陛下震怒”。[87]德国人也非常火大。奥地利驻德勒斯登公使呈文贝希托尔德，“这里的人在问，在所谓的征服贝尔格莱德之后，怎会这么快就出现所谓的向后机动撤出塞尔维亚之事？”德皇威廉二世走访东部战线期间得了感冒和支气管炎，整个人病恹恹，听到这消息，“既惊且恼”，下不了床。[88]这一次在塞尔维亚作战的损失非常大，致使第五、第六集团军这时只能缩并为只有九万五千支步枪的一个集团军。若非塞军本身遭重创（两万两千人死、九万一千人伤、一万九千人被俘或失踪），可能早已发兵追到河对岸，进入奥匈帝国境内。[89]

康拉德·冯·赫岑多夫这时认为，他的名字将不会如卡尔·克劳斯战前所戏谑道的，“与每个奥地利学童脑海中德里纳河边的著名战役连在一块”。[90]康拉德痛斥来自巴尔干半岛的这最近一个“晴天霹雳”，毁掉了哈布斯堡军队仅存的公信力。由于波蒂奥雷克——与前线保持至少一百一十公里距离的城堡将军——继续为自己的调度失当辩解，把那归咎于“我们斯拉夫族的逃兵”，这种借口更令人震惊。[91]波蒂奥雷克甚至于十二月十二日呈文博尔弗拉斯，恳请再给他一支军队，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深信我能扳回一切；只要给我人、步枪、弹药！”只要四个星

期，他就能做好再入侵的准备。届时塞尔维亚人将已“财力耗尽”，将撑不过第四次入侵。[92]

但博尔弗拉斯和皇帝早听过这种漂亮话，而康拉德终于有了把对手击毙所需的武器。康拉德装出宽容大气的口吻呈报博尔弗拉斯，“如今不是找出该地事态之肇因的时刻”。此刻“我们该处理现实状况——一场无法否认的挫败——和后果：从俄罗斯战场抽不出一个人”来增援巴尔干半岛。如果波蒂奥雷克无法重振他萎缩的兵力，那么奥地利人或许得一路退回到布达佩斯处的多瑙河边，把这中间的土地全割让给塞尔维亚人。[93] 康拉德说，波蒂奥雷克的领军作风“令人费解”。怎会这么快就损失这么多兵力？[94] 康拉德先前曾劝波蒂奥雷克“攻入敌人心脏地带”，但此刻他睁眼说瞎话，说没这回事。康拉德谎称：“眼下出人意料的情势转变，总司令部一头雾水。”[95] 在梅济耶尔的德军总司令部，法尔肯海因哀叹波蒂奥雷克之败对其他战线产生不可避免的冲击，冷冷问施蒂尔克：“这位将军是怎么在你们军中得到如此显赫的名声？”[96]

这一次就连霍夫堡宫都对波蒂奥雷克失去信心。他三次领兵入侵，三次搞砸，为此损失了三十万人。受最近奥地利这场挫败的鼓舞，意大利人更急欲参战反奥匈。他们基于政治、经济理由按兵不动——民意不大支持参战，意大利王国从钢、铁到弹药、化学品、木材、橡胶，什么都缺——但此刻支持参战的民意在上升，而这得部分归因于煽动家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鼓动。墨索里尼已在米兰组成“革命干涉主义法西斯”，在每个意大利城市鼓吹以示威表达参战立场。总理安东尼奥·萨兰德拉（Antonio Salandra）在国会发表演说，要求参战以削弱奥地利，“实现意大利的陆上、海上的雄心”。[97]

“我们付出如此多鲜血，从塞尔维亚人那儿辛苦挣得的所有优势，都已遭浪掷，”博尔弗拉斯如此叱责波蒂奥雷克，“你所犯下的所有过失，此刻民众看得一清二楚，而民众要最高领导阶层负起此责。”为让

皇帝不致再受难堪，波蒂奥雷克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连同法兰克将军一起被迫退休。波蒂奥雷克被召回维也纳与皇帝做离职面谈，结果皇帝的副官在车站月台迎接，要他继续搭车返回位于克拉根福特的老家。与皇帝的会晤“遭无限期延期”，事实上他就此未再见到皇上。波蒂奥雷克未能免于训斥，并以一八六六年丢脸下台的那位司令官自况。他写道，“一如贝内戴克，我得静静度过余生”。显然口气已不如以往那么自大。[98]

康拉德于圣诞节前夕与外长贝希托尔德会晤，以说明哈布斯堡军队的破败：最优秀的军士官兵，不是已战死，就是已因为受伤、生病或被俘而“退役”。原来的奥匈帝国军队，在各战场共损失九十五万七千人，已元气大伤：十八万九千人死，四十九万人伤，二十七万八千人被俘；剩下的，如阿道夫·冯·雷门将军所说的，“纪律糟得离谱”。军官直接呈文指挥官要求奖赏其英勇；士兵掠夺自己同胞，穿着破烂军服拖着脚四处晃荡，对自己的军官绷起脸露出威胁状。[99]

已有许多团级部队遭彻底歼灭，哈布斯堡军队愈来愈倚赖非常年轻和非常老的入伍兵。[100] 奥地利于一九一四年晚期征得八十万新兵，战前十年期间被判定不适宜服役的两百三十万男子被召回以再行审查。训练很马虎，只有射击、挖壕、进攻、如下之类的陈腐说教：“胜利的男人成为勇敢的男人；快乐的军人加倍可敬。”[101] 这时，只有残障人士、军工业工人、神职人员、公务员得以免服兵役。许多榴弹炮、野战炮、炮弹、步枪被弃置在加利西亚、塞尔维亚的战场上，因此造成的缺口几乎是奥地利的工业所无法填补的。但由于实际可作战的士兵，在东部战线只剩三十万三千人，在塞尔维亚周边只剩十万人，所以奥匈帝国的物质需求远比平常时更低上许多。有些奥地利骑兵团没有坐骑，改归类为“徒步骑兵”，直到此战争结束，因为一九一四年损失的十五万匹马弥补不回来。泰申的德国军官议论康拉德的多疑、“宿命论”心态、“失去自信”。这时康拉德正把一切过错都归在德国人头上，称他们是奥地利的“隐秘敌人”。[102]

波蒂奥雷克在巴尔干战线失利时，东部战线的情况只变得更糟。俄国兵力这时已壮大到令人咋舌的一百七十个师，分配在五十三个军、十六个集团军里，每个集团军有二十五万人。[103] 面对这东面大军，同盟国只有二十八个军六十个师。斯图加特的《新日报》（*Neue Tagblatt*）有气无力地声称，塞尔维亚战役的失败无碍于大局，因为哈布斯堡另一支军队的溃败，只意味着最终要把剩下的兵力用于对付俄国："塞尔维亚境内这个发展，符合最高的战略原则：集中所有兵力用于你想取得决定性战果的那个地方。"[104] 这场愚蠢战役的幸存者，会于不久后被送到东部战线，而他们何其不幸的是，康拉德为了东线决战所选定的"地方"，将比他们所要离开的地方更荒凉、更令人绝望。

---

[1] C.R.M.F.Cruttwell，*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1914-1918*（Chicago：Academy，2007[1934]），90.

[2] 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819，Tuzla，Oct. 25，1914，Masirevich to Berchtold.

[3] Kriegsarchiv，Vienna（KA），Neue Feld Akten（NFA）170，17 Brig.，k.u.k. Ober-kommando der Balkanstreitkräfte，Nov. 5，1914，FZM Potiorek.

[4]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 Serbiens zur Befreiung und Vereinigung der Serben*，*Kroaten und Slovenen*（Belgrade：Buchdruckerei des Ministeriums für Krieg und Marine，1924-1926），3：256，6：80.

[5] KA，B/1503：4，Sarajevo，Oct.19，1914，"Promemoria Sektionschef Theodor Zurunic，" with margin notes by Bosnian Sektionschef Ludwig Thallóczy；Vienna，Oct.22，1914，Thallóczy to FZM Potiorek；HHSA，PA I，819，Bern，Nov. 22，1915，Gagern to Burián.

[6] KA，NFA 2116，36 ITD，Op.Nr.134/24，Ljesnica，Nov. 9，1914，FML Czibulka.

[7] HHSA，PA I，819，Tuzla，Oct.23，1914，Masirevich to Berchtold.

[8] Felix Prinz zu Schwarzenberg，*Briefe aus dem Felde 1914-18*（Vienna：Schwarzenbergisches Administration，1953），24.

[9] Felix Prinz zu Schwarzenberg，*Briefe aus dem Felde 1914-18*（Vienna：Schwarzenbergisches Administration，1953），24-25；Joseph Schön，*Sabac*！（Reichenberg：Heimatsöhne，1928），83.

[10] R.G.D.Laffan，*The Serbs*（New York：Dorset Press，1989[1917]），199.

[11] KA，NFA 475，41 Sch.Br.，Jarak，Oct.24，1914，FML Krauss.

[12] KA，Gefechtsberichte（GB）21，29 ITD，Op.Nr.102/10 and 114/17，“Gefechtsbericht für den 31.Okt. und 1.Nov.1914” and “Gefechtsbericht für den 3.Nov.1914”；NFA 475，Op.199/127，Oct.1，1914，FML Krauss.

[13] KA，B/1503：7，Vienna，Oct. 8，1914，Bolfras to Potiorek.

[14] KA，NFA 2116，36 ID，Nov.1，1914，Trbusnica，IR 16 to 36 ITD.

[15] KA，Armeeoberkommando（AOK）1914，Evidenzbureau（EVB）3506，k.u.k. Evidenzbureau des Generalstabs，123/B，131/B，148/B，158/B，166/B，178/B，179/B，Oct.1，7，and 23 and Nov. 2，10，22，and 23，1914.

[16] KA，GB 42，4 GB，“Gefechtsbericht über den 6.bis 16.November 1914.”

[17] KA，NFA 1845/1，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71-79，“Die Erstürmung des Gucevo-Rückens durch das I.R.78.”

[18] Andre Mitrovic，*Serbia’s Great War 1914-1918*（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2007），70.

[19] KA，NFA 911，AOK，Nov.17，1914，Potiorek via GdI Eh Friedrich；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3：454.

[20] HHSA，PA I，819，2a，FPA 305，Feb. 12，1915，FML Krauss to k.u.k. Kriegsüberwachungsamt.

[21] KA，NFA 528，9 I.D.，Oct. 20，1914，GM Daniel.

[22] KA，B/1503：7，Tuzla，Nov.15 and 16，1914，FZM Potiorek to Bolfras；NFA 528，9 ID，Nov.10-13，1914，“Disposition.”

[23]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3：346.

[24] KA，NFA 2116，36 ITD，Moni Bogovagya，Nov. 18，1914，

Col.Müller.

[25] KA，NFA 2160，4 Geb.Brig.，Jagodna，Nov. 6，1914，“Abfertigung”；NFA 170，17.Brig.，k.u.k. 8 Korps-Kommando Res.Nr.936，Bogatic，Nov.4，1914.

[26] KA，NFA 2116，36 ID，Op，Nr，128/6，Koviljaca，Nov.3，1914，FML Czibulka；HHSA，PA I，819，2a，FPA 305，Feb.12，1915，FML Krauss to k.u.k. Kriegsüberwachungsamt.

[27] KA，NFA 2160，4 Gebirg，Brig.，Nov.29，1914，“Intendanz.”

[28] KA，NFA 1840，k.u.k. IR 6，Baon 1，n.d.，“Kämpfe um den Gradjenik com 23-25 Nov. 1914.”

[29] HHSA，PA I，819，Tuzla，Nov，12 and Koviljaca，Nov. 28，1914，Konstantin Masirevich to Berchtold；KA，B/1503：7，Tuzla，Nov.18-19，1914，Potiorek to Bolfras；PA I，819，Teschen，Nov. 25，1914，Friedrich Wiesner to Berchtold；Laffan，*The Serbs*，200.

[30] KA，NFA 2116，36 ID，“Zeitungsnachrichten vom 21.Nov.1914”；NFA 2161，Nov.10，1914，“Neuste Nachrichten.”

[31] HHSA，PA I，872，Sofia，Nov. 6，1914，Tarnowski to Berchtold.

[32] KA，B/1503：7，Vienna，Nov. 25，1914，Bolfras to Potiorek.

[33] KA，B/1503：4，Sarajevo，Nov. 20，1914，Ein hoher bosnischer Funktionär，“Promemoria über die actuelle Behandlung der serbischen Frage in Bosnien.”

[34] HHSA，PA I，819，Vienna，Nov. 17，1914，Berchtold to Potiorek.

[35] KA，B/1503：7，Tuzla，Nov. 29，1914，Potiorek to Kriegsminister.

[36] KA，B/1503：7，Tuzla，Nov. 19，1914，FZM Potiorek，Op. Nr. 2529/OK.

[37] KA，NFA 1840，k.u.k. IR 6，Baon 1，nd，“Kämpfe um den Gragjenik com 23-25 Nov. 1914.”

[38] KA，AOK（1914），EVB 3506，k.u.k. Evidenzbureau des Generalstabs，183/B，186/B，189/B，190/B，192/B，Nov. 27，30 and Dec. 3，

4，6，1914；HHSA，PA I，819，Vienna，Dec. 15，1914，Berchtold to Vladimir Giesl.

[39] KA，NFA 1840，k.u.k. IR 6，Baon 1，“Eiziehen der serb. Fahne am 2. Dez. 1914 am Kalimedgan.”

[40] HHSA，PA I，819，Munich，Dec，3，1914，Ludwig Vélics to Berchtold.

[41] HHSA，PA I，819，Teschen，Nov. 25，1914，Wiesner to Berchtold.

[42]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3：424-425.

[43] Mitrovic，*Serbia's Great War*，73-74.

[44] Mitrovic，*Serbia's Great War*，xv.

[45] KA，B/16，Beilage 2，“Aus den persönlichen Vormerkungen des Generals der Infanterie Oskar Potiorek vom 17. Nov. 1914.”

[46] Rudolf Jerabek，*Potiorek*（Graz：Verlag Styria，1991），168-170.

[47] KA，NFA 529，9 ID，Nov. 30，1914，“Abfertigung”；NFA 170，17 Brig.，5 Armee-Etappen Kommando，Nov. 24，1914，Col. Ottokar Landwehr，“Verlautbarungen”；Jan. 1915，“Merkblatt über Erfrierung und Kälteschutz”；KA，NFA 2116，36 ITD，Celije，Nov，21，1914，IR 16 to 36 ITD.

[48] KA，NFA 2160，4 Gebirg，Brig.，Nov. 24，1914，“III/69 meldet.”

[49] Holger H. Herwig，*The First World War*：*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1914-1918*（London：Edw. Arnold，1997），111；KA，NFA 170，17 Brig.，Bogatic，Nov. 4，1914.

[50] KA，NFA 2160，4 Gebirg，Brig.，Nov. 29，1914，“Intendanz”；NFA 2116，36 ITD，Op. Nr.173，Becinen，Dec. 18，1914，36 ITD to 13 Korps-Kdo；Jerabek，*Potiorek*，177.

[51] HHSA，PA I，819，Bucharest，Dec.31，1914，Szent-Ivany to Berchtold；KA，NFA 2160，4 Gebirg，Brig.，Nov. 25-28，1914，“Intendanz”；Jerabek，*Potiorek*，183.

[52] KA，NFA 2160，4 Gebirg，Brig.，Nov. 30，1914，“Deckadressen”；

Kurt Peball，“Der Feldzug gegen Serbien und Montenegro im Jahre 1914，” Österreichische Militärische Zeitschrift Sonderheft I（1965）：28；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5：2.

[53] KA，B/1503：7，Koviljaca，Nov，30，1914，FZM Potiorek，Op. Nr. 3068/OK；NFA 2116，36 ID，k.u.k. AOK Op. Nr. 5102 v. 1914 an das k.u.k. Oberkommando der Balkanstreitkräfte，“Verhalten höherer Kommandandten und Kriegsgefängener”；HHSA，PA I，819，Vienna，Dec. 2，1914，Berchtold to Potiorek.

[54]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6：2-3，80-83.

[55] KA，NFA 2116，36 ID，k.u.k. AOK Op. Nr. 5102 v. 1914 an das k.u.k. Oberkommando der Balkanstreitkräfte，“Verhalten höherer Kommandandten und Kriegsgefängener.”

[56] John Reed，*Eastern Europe at War*（London：Pluto，1994[1916]），22-23.

[57] HHSA，PA I，819，Tuzla，Oct. 25，1914，Masirevich to Berchtold.

[58] Arthur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A Year of the War on Many Fronts—and Behind Them*（New York：Scribner's，1916），251.

[59] KA，GB 86，GM Heinrich Pongracz，k.u.k. 53 ITD，Sept. 19，1915，Op. 244，“Erfahrungen in diesem Kriege.”

[60]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6：86-91.

[61]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6：103-104.

[62]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6：152-157.

[63]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6：157-158.

[64] HHSA，PA I，819，2a，FPA 305，Feb. 12，1915，FML Krauss to k.u.k. Kriegsüberwachungsamt.

[65]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6：316.

[66]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6：321.

[67] KA，NFA 1845/1，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71-79，GM Stracker，“Gefechts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den 5. Dez. 1914 südostl. Burovo.”

[68]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6：403-404.

[69]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7：108.

[70]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6：351.

[71] KA，NFA 1840，Inf Baon 1/1 to 1 Geb. Brig.，Nikinci，Dec. 8-12 and 15，1914.

[72]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Der Grosze Krieg*，6：351-352.

[73] KA，NFA 1866，42，k.u. Landwehr Inf Div，“Gefechtsbericht über den Kampf am 7. Dec. 1914.”

[74] KA，GB 29，k.u.k. 13 IB，Dobrinica，Dec. 28，1914，GM Karl Stracker，“Gefechtsbericht für den 5. Dezember.”

[75] KA，GB 74，Ruma，Jan. 2，1915，“Gefechtsbericht über den Kampf am 3. Dec. 1914”；GB 67，“Gefechtsbericht für die Zeit von 2. bis 14. Dez. 1.914，” k.u.I.R. 4 GB 67，Surcin，Dec. 18，1914，“G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Verwendung k.ung. LS I.R. 6 bei Sabac 8-9 Dez. 1914.”

[76]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AAT，EMA，7N 847，2ème Bureau，“Journal de Marche d’un officier autrichien depuis le debut de la guerre jusqu’au 19 Juillet 1915.”

[77] HHSA，PA I，819，2a，FPA 305，Feb. 12，1915，FML Krauss to k.u.k. Kriegsüberwachungsamt；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08.

[78] KA，NFA 170，9 ITD，Ó Futak，Jan. 1，1915，GM Schön；KA，GB 29，k.u.k. 13 IB，Dobrinica，Dec. 31，1914，GM Karl Stracker，“Gefechtsbericht für den 7 Dezember 1914”；KA，GB 29，k.u.k. 13 IB，Jan. 4，1915，GM Karl Stracker，“Gefechtsbericht für den 13. Dezember”；Laffan，*The Serbs*，202.

[79]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Washington，DC（NARA），M 695，roll 21，Chicago，June 14，1917，D. Fisher and J. Smetanka to Lansing.

[80] KA，NFA 2116，36 ITD，72 I.B.，Zeleznik，Dec. 13，1914，Col. Lexardo；KA，NFA 2116，36. ID，Op. Nr.184/4，Dec. 29，1914，“Standes-und-Verlust-Nachweisung”；KA，GB 10，1 ITD，Res. Nr. 349，n.d.；Jerabek，*Potiorek*，185.

[81] HHSA，PA I，819，Nov. 1914，FML Schleyer to Berchtold.

[82] KA，NFA 2162，4. Gebirgsbrigade，Vlasenica，Dec. 31，1914，“Frührapport”；NFA 191，18 IB，5. Armee Etap-Kdo，Res. Nr. 4987，Dec. 10，1914；KA，GB 86，GM Heinrich Pongracz，k.u.k. 53 ITD，Sept. 19，1915，Op. 244，“Erfahrungen in diesem Kriege.”

[83] KA，B/1503：7，Dec. 9，1914，FZM Potiorek to MKSM，AOK，KM，LVM；Jerabek，*Potiorek*，187.

[84] KA，NFA 2162，4. Gebirgsbrigade，Nr. 257/13，Vlasenica，Dec. 27，1914，GM Konopicky.

[85] HHSA，PA I，819，Teschen，Dec. 13，1914，Giesl to Berchtold；Jerabek，*Potiorek*，188，196.

[86] KA，NFA 170，17 Brig.，Dec.16，1914，FPA Nr. 305，FZM Potiorek.

[87] HHSA，PA I，819，Peterwardein，Dec. 18，1914，Kinsky to Berchtold；KA，B/1503：7，Vienna，Dec. 12，1914，Bolfras to Potiorek.

[88] HHSA，PA Ⅲ，171，Berlin，Dec. 12，1914，Hohenlohe to Berchtold.

[89] HHSA，PA Ⅰ，819，Dresden，Dec. 22，1914，Braun to Berchtold；Herwig，*First World War*，112.

[90] Karl Kraus，ed.，*Die Fackel*（Munich：Kösel-Verlag，1968-1976），5：12（Jan.4，1910）.

[91] KA，AOK（1914），EVB 3506，k.u.k. Evidenzbureau des Generalstabs，205/B，Dec. 19，1914.

[92] KA，B/16，Beilage 7，Brief Potiorek an Bolfras，Dec. 12，1914.

[93] KA，B/16，Teschen，Dec. 14，1914，Conrad to Bolfras.

[94] KA，B/1503：7，Dec. 14，1914，GdI Conrad，“Beurteilung der Lage.”

[95] 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ustro-Hungarian Campaign Against Serbia in 1914，”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April 1989，144.

[96] General Josef von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 （Leipzig：Paul List，1921），110.

[97] HHSA，PA I，845，Milan，Dec. 12，1914，Ladislaus Györgey to Berchtold；KA，GB 86，3 Korps Kommando，1917，“Die kriegswirtschaftliche Lage Italiens.”

[98] KA，B/1503：7，Vienna，Dec，20，1914，Bolfras to Potiorek；Jerabek，*Potiorek* ，40，201.

[99] KA，NFA 2116，36. ITD，Op. Nr，320/8，Dec. 20，1914，GdI Rhemen；NFA 170，8. Korps-Kdo，Res. Nr. 72，Jan. 11，1915，FML Scheuch.

[100] Herwig，*First World War* ，113.

[101] KA，NFA 2116，36 ID，Op. Nr. 184/9，Kraljevo，Dee. 29，1914，FML Czibulka，“Ausbildung.”

[102] Herwig，*First World War* ，129-130.

[103] Österreichische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Heereswesen und vom Kriegsarchiv，*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 （Vienna：Verlag Militätwissenschaftlichen Mitteilungen，1931-1938），1：762.

[104] HHSA，PA I，837，Munich，Nov. 11，1914，Vélics to Berchtold；819，Stuttgart，Dec. 19，1914，Koziebrodski to Berchtold.

第十四章 雪人

奥地利最近一次战败的丑事，余波荡漾，遍及全欧。塞尔维亚已击退奥匈帝国三次入侵。德国欲“借由塞纳-马恩省河边之胜赢得布格河边之胜”的计划已失败，同盟国的军队其实既未能打到塞纳-马恩省河边，也未能打到布格河边。哈布斯堡帝国因为连连战败，死伤失踪人数上百万，似已一蹶不振。奥地利在俄罗斯战线上兵力居于劣势，在塞尔维亚又遭击溃，显然已撑不下去。这个二元君主国如果垮掉，德国大概也会跟着垮。打到现在还未能在西线取胜，柏林怎有办法在没有奥匈帝国出兵的情况下两面作战？德国人将得独力保卫东、西边界，得打破英国日益紧密的海上封锁，得击退另一个大国的军队。这一个大国评估过奥地利连连战败后的形势，已准备投入战局。

这时意大利人开始积极准备参战，德国急派新任驻意大使，一九〇九年卸下德意志帝国总理之职的、六十五岁的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亲王赴罗马施压，以阻止意大利参战。在维也纳，贝希托尔德认为比洛定会试图以割让奥匈帝国领土给罗马，换取意大利继续保持中立。在泰申，康拉德说出明眼人都懂的道理：奥匈帝国禁不起在俄罗斯战线、塞尔维亚战线之外，再多应付一个意大利战线。那或许是他在这整场战争里唯一切合实际的言谈。

伊斯特万·布里昂伯爵前往梅济耶尔的德军总司令部，以消弭德皇和法尔肯海因要奥地利立即把的里雅斯特、南蒂罗尔或达尔马提亚割让给意大利，以阻止意大利参战的主张。外交情势危急，外长贝希托尔德愈来愈显得无力应付，为此，蒂萨已提议由布里昂伯爵接替其职。对一

个仍喜欢自封为东边“德意志人之墙”的君主国来说，这处境何其可悲。[1] 伦敦《泰晤士报》论道，“奥匈帝国常遭轻蔑，但从未像这次这么被轻蔑”，“兵败塞尔维亚，失去整个加利西亚，奥地利的政治、军事未来操在德国手中，奥地利的将领可能不久后就换成德国将领”。[2] 事实上，因为一九一四年的数场战败，一九一五年开始时奥匈帝国已沦为德国的附庸。一月，奥匈皇帝派卡尔大公赴法尔肯海因设于法国的总司令部，要德国人放心哈布斯堡军队不会瓦解。[3] 德国人不这么认为。德国外长发文给其驻奥地利大使，说“连差劲的塞尔维亚人都能给维也纳如此严重的打击，维也纳要何时才会看清它不可能这么一直傲慢和装模作样下去？”[4]

俄国人也从奥地利最近的战败中得到鼓舞。俄国人认为哈布斯堡军队已不足惧，于是打算在一九一五年进攻德国——入侵西里西亚，占领布雷斯劳，目标再度指向柏林，卸除西部战线盟国所受压力。为确保两侧翼安全以推进此次进攻，尼古拉大公命其右军进向东普鲁士，命其左军挺进喀尔巴阡山脉，奋力保住诸山口并将奥军逼往南边，使其进入匈牙利平原，到了该平原，奥军将无力阻挠俄军入侵德国。法尔肯海因原指望于一九一五年从东线调八至十个军到西线，以打破西线相持不下的局面，但此刻他理解到，由于奥匈帝国兵败塞尔维亚、加利西亚、波兰，那已是不可能的事。德国人被困在日益绝望的消耗战中。[5]

正在接收波蒂奥雷克南方面军破败之残部的康拉德，恳求拨予真正的（即德国的）援军，但遭峻拒。一九一五年元旦法尔肯海因在柏林与康拉德会晤，称拨不出别的兵力给东线，因为他“在西线的兵力只有敌人的一半”。这场在德国陆军部举行的会面，暴露了使两盟国无法同心协力的所有积怨。法尔肯海因说：“你的第三集团军，开战时打得很好，但现在一直在撤退，又退了五十公里。”法尔肯海因和其参谋要康拉德“守住既有阵地，面对东边”，不要再退。法尔肯海因还说，“你面对的俄国人不可能有那么多”，康拉德回以真有那么多。

康拉德还说，更惨的是，俄国人已填补死伤造成的兵力空缺，已用后备生力军恢复部队的完整战斗力。法尔肯海因说：“我们怎么做，你就该怎么做，该用病号和轻伤士兵使你的部队恢复完整战斗力。”康拉德反驳道：“我们也是这样做，但我们已打了五个月，伤亡甚大：重伤、死亡、重病的士兵人数之多，已使我们的军队破了大洞。”

法尔肯海因不表同情；他复述道，不能再撤退，康拉德带着怒气回道，“你的军队在西边开打时不也有大撤退，一路退到默兹河？”法尔肯海因反驳道，那是前任参谋总长犯下的错。康拉德嘲弄道，“但撤退就是撤退”，“你们如果真守得住，就不会撤退！”两人不欢而散。康拉德记载道：“这次会面毫无所获”，“我们两人都坚持自己原有的立场；我觉得他们已帮不上我们。他说他会找鲁登道夫谈谈，再做出最后决定。”[6]

同个下午，康拉德和法尔肯海因再度见面，谈了两个半小时。这一次鲁登道夫也在场。法尔肯海因重述，他没有多余的兵力可拨给奥地利人或其他人；他已派遣重要的补充兵力到东线，正用尽“各种方法，包括带刺铁丝网和其他使法国人无法近身的障碍物”，在西线挡住“兵力两倍于我”的敌军。德国头一批新训部队，四个军，二月时可派上用场。三位将领争辩新训部队该如何使用效果最好，鲁登道夫和法尔肯海因一致认为同盟国比海上协约国远更禁不起打长期消耗战。法尔肯海因主张，“由于诸中立国和英国国力强大，我们得突围，不能消极待在带刺铁丝网后面。我们得在某处发出一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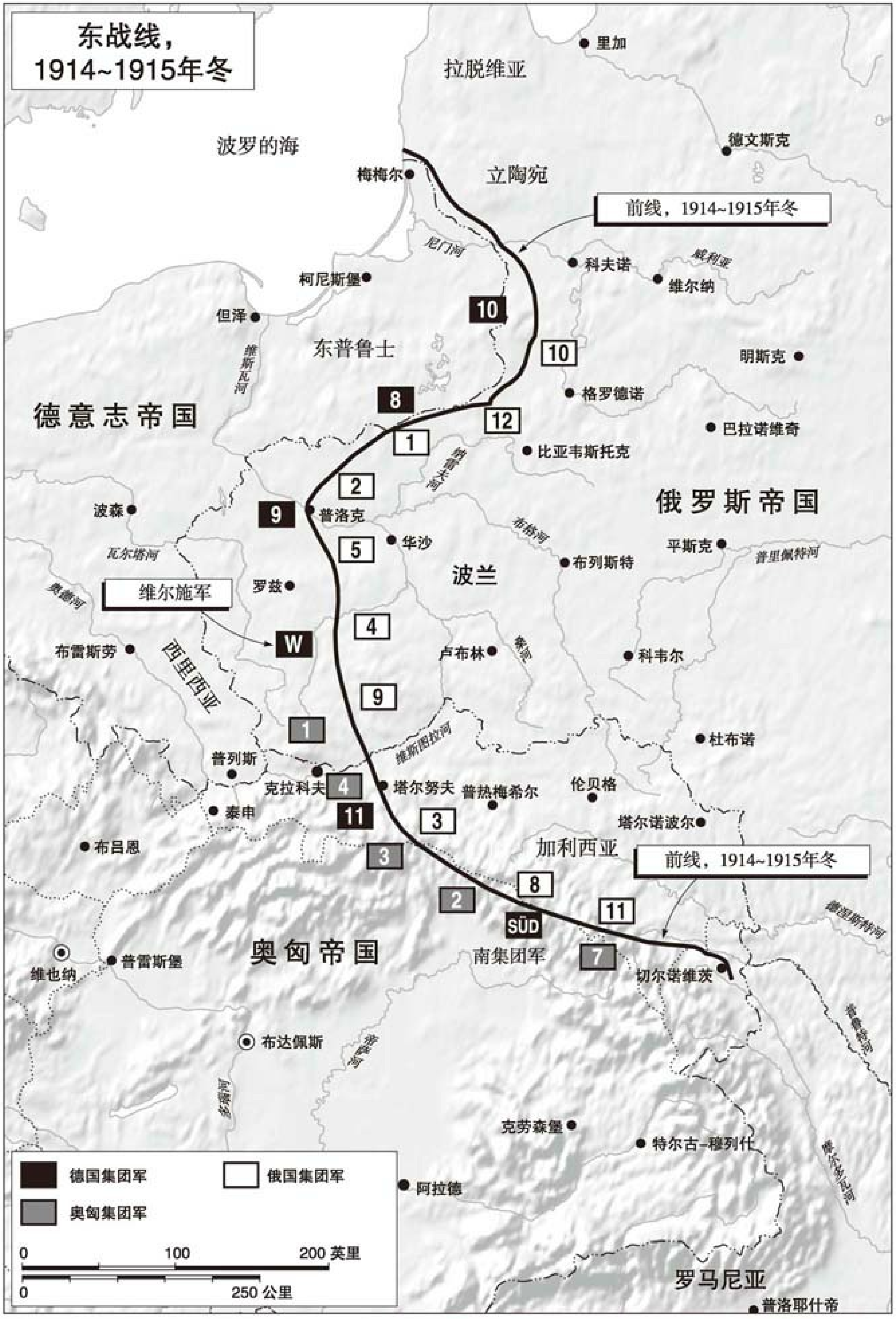
但康拉德、鲁登道夫、法尔肯海因，在该于何处发出这一击上，未能达成一致见解。在法国和法兰德斯出击，只是送死。东普鲁士离加利西亚战线太远。波兰缺乏公路和可稳当越过重兵防守之维斯瓦河的路径。喀尔巴阡山脉太陡、太冷、太多雪。鲁登道夫抱怨道，“我们已流出这么多德国人的血，仍无突破性进展”。康拉德怒火中烧；后来他埋

怨道，“我很想说我们的血和你们的血等值”。经过几番讨价还价，鲁登道夫表示愿拨三个师助康拉德。然后鲁登道夫利用对康拉德的这一小小让步，名正言顺地要求法尔肯海因接受对德国四个新的军的用途，提议在东线发动德奥联合攻势，以善用这股新兵力。法尔肯海因反驳道，在冬季下雪天气下，不可能获致重大战果；但由于未能打赢法国境内战事，他在德皇面前已愈来愈无影响力。于是，以康拉德在喀尔巴阡山脉最后一搏的反攻，以需要在北侧翼给予支持为理由（鉴于奥军战斗力奇差，这理由无可反驳），鲁登道夫的东部战线司令部从西战线抢到四个军。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誓言在春季融雪、天气解除白海封冻，使美国的补给品和弹药得以送到俄国之前，解决掉俄国人。由于波罗的海和黑海遭封锁，俄国只能倚赖通过阿尔汉格尔斯克港输入的少量物资，而这个港口的不冻期从未超过六个月。尼古拉·戈洛维纳（Nikolai Golovine）将军论道，“俄国成为如同门窗都被闩上的屋子，要进去只能透过烟囱”。[7] 样样东西都严重不足。英国武官于一九一五年从彼得格勒（Petrograd）报告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俄国整个陆军，部署在从爱沙尼亚到乌克兰的五百万人，只拥有六十五万支步枪。另有人估计俄国的步枪数只百余万支。不管究竟有多少步枪，有数百万俄国士兵几乎可以说打不了仗，只能呆呆站着，等同袍被打倒或病倒，才能把他们的枪据为己有。

俄国第九集团军的军需主任哥洛文忆道，步枪极为不足，致使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指示他以长柄斧头作为他步兵团的武器，称他们为“戟兵”。[8] 戟兵完全得不到炮兵掩护。喀尔巴阡山脉的某位俄国炮兵军官报告，师司令部对他的炮兵连下达了以下命令：“立刻报告几天前是谁下令打十二发榴霰弹。”[9] 俄国样样东西奇缺，乃是奥匈帝国能存活到一九一五年的最大因素。俄国若有充足的武装和补给，将轻易就把奥地利击垮，使其退出这场战争。但他们没有，而鲁登道夫，在俄国的虚弱

里，而非奥地利的强大里，瞥见一线希望。一如德国人发动战争以“拯救”奥匈帝国，此刻他们加剧战事以重振这一君主国。鲁登道夫于一九一五年一月提醒法尔肯海因，“奥地利的紧急状况乃是我们无法预料的大变量”，[10] 得将它搞定。



东战线，
1914~1915年冬
里加
拉脱维亚
波罗的海
德文斯克
梅梅尔
立陶宛
前线，1914~1915年冬
尼门河
科夫诺
威利亚
维尔纳
柯尼斯堡
10
但泽
10
东普鲁士
明斯克
维斯瓦河
8
格罗德诺
德意志帝国
12
巴拉诺维奇
1
比亚韦斯托克
纳雷夫河
2
9
普洛克
俄罗斯帝国
波森
布格河
5
华沙
平斯克
瓦尔塔河
布列斯特
普里佩特河
波兰
奥德河
罗兹
维尔施军
4
W
布雷斯劳
卢布林
科韦尔
西里西亚
9
1
杜布诺
维斯图拉河
普列斯
4
克拉科夫
塔尔努夫
普热梅希尔
伦贝格
11
秦申
3
塔尔诺波尔
布吕恩
3
加利西亚
前线，1914~1915年冬
8
2
11
德涅斯特河
SÜD
7
奥匈帝国
南集团军
维也纳
普雷斯堡
切尔诺维茨
布达佩斯
蒂萨河
多瑙河
克劳森堡
特尔古-穆列什
德国集团军
俄国集团军
阿拉德
奥匈集团军
0
100
200 英里
0
250 公里
罗马尼亚
普洛耶什帝

康拉德结合鲁登道夫所出借的诸德国师与同样数目的奥地利师，在喀尔巴阡山脉中段组成德意志南集团军。奥匈帝国的无能已表露无遗，因此南集团军由德国将领亚历山大·冯·林辛根（Alexander von Linsingen）统率。它有奥地利大集团军掩护其两侧翼，将冲出山区，解救普热梅希尔。鲁登道夫将交出奥托·冯·贝洛（Otto von Below）将军统辖的第八集团军和马肯森的第九集团军，以及从法国调来的几个新的军，即赫尔曼·冯·艾希霍恩（Hermann von Eichhorn）的第十集团军，让他们一起从东普鲁士出击，以支持上述行动。

俄国人在维斯瓦河边有十八个军，但他们一如以往未有一致的计划。伊万诺夫和阿列克谢夫仍然主张，通往柏林的最短快捷方式在西南战线，要踏过奥匈帝国的尸骸。普热梅希尔可拿下，诸中立国可拉拢加入协约国阵营，匈牙利可入侵，使其脱离奥地利，使奥地利得不到匈牙利的粮食补给，从侧翼瓦解同盟国阵营。鲁斯基的西北战线，得到俄军总司令部里达尼洛夫的支持，力排此议，主张真正的决定性战果，只能在东普鲁士的德国人身上取得。西北战线派断言，中部波兰被德国防御工事挡住，冬天的喀尔巴阡山脉是天然屏障。据英国武官所述，鲁斯基的新参谋长古列维奇（Gulevich）将军，在这场辩论上发言不多。他“是个肥胖之人，自战争开打以来体重增加不少，因为每天下午两点至五点躺在床上休息”。[11]

尼古拉大公再度让其臃肿的兵力被双头马车的指挥权浪费掉。伊万诺夫得到喀尔巴阡山脉的三十一个师和位于维斯瓦河沿线中部平原区的另外十八个师（第四、第九集团军）。鲁斯基得到位于东普鲁士的十五个半师，罗兹周边的二十三个半师（第一、第二、第五集团军）。[12]

这些集团军无一具有能将敌人一击毙命的人力物力。俄国士兵仍然吃不饱，装备低劣，弹药供应仍时时让人无法放心。陆军部炮兵局局长库兹明·卡拉瓦耶夫（Kuzmin Karavaev）将军，某次与苏霍姆利诺夫会

晤时情绪失控哭了起来，恳求这位具影响力的陆军部长“媾和，因为炮兵弹药不足”。名义上执掌兵权的尼古拉大公，对此一无所知；俄军复杂死板的规定，意味着索求装备、火炮等补给品之事，得由前线直接向人在彼得格勒的六十六岁苏霍姆利诺夫提出，而苏霍姆利诺夫完全未将收到的要求告知他人。他贪污出了名，当陆军部长期间个人财富增加了九倍，每笔陆军合同都拿回扣，或干脆扣住公家经费供日后挪用。军队苦于弹药不足时，苏霍姆利诺夫正坐拥原指定用于购买炮弹、子弹但未花掉的两亿金卢布上（除了他的随员，没人知道此事）。[13]

如果装备低劣的俄军能一路打过喀尔巴阡山脉，打进匈牙利平原，他们将在德国与奥匈帝国被协约国封锁而开始感受到粮食不足时，夺得同盟国的谷仓。但那终究是假设情况。由于抽调大批兵力到东普鲁士和中部波兰，俄国在喀尔巴阡山脉沿线只部署了四十五个师，对抗五十二个重新整编的奥、德师。[14]

俄军欲打通喀尔巴阡山脉，受阻于地形和天气而行进缓慢。有位俄国炮兵军官忆道，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某夜，他的炮兵连花了四小时才爬升四百米，而且是在十二匹马在前头拉一门炮，十二人在后面推的情况下完成这样的推进。由于奥军掘壕固守，俄军在喀尔巴阡山脉的进攻，就和先前奥军在加利西亚的进攻一样不明智。有位俄国炮兵军官对这样的一次进攻给予火力支持后，以不解的口吻记录下所见景象：“白发团长一手拿着电话坐在壕沟里的树桩上下达命令：一连‘正面’强攻。”他下达这命令时，心里非常清楚，不到二十五分钟，这连里每个人不是丧命，就会断手断脚；他要其他连上前预备，那只意味着他们会较晚丧命，而非立刻丧命。

这位俄国军官从其位于悬崖顶上的炮阵地看了此次进攻。第一连遭击毙，然后第二连也未幸免：“我看到五百人不到一小时丧命于褐绿色的山坡上。”到了十二月下旬，俄军已开始后撤，撤过他们不久前才拿

下的艰困地形。费多尔·斯特朋中尉忆道，“这场撤退吃尽苦头”，“四周都是奥军，还有两个可怕敌人：我们将军的彻底无能和天气——结冰道路和泥泞地把我们的马累垮；它们就在路上停住，不肯再走”。斯特朋的纵队在一山村暂时停脚时，遭奥军一个炮兵连精准炮击。他们往上看，看到一名奥地利军人和一个老百姓从教堂尖塔上指示炮击地点。那个老百姓被带离时，斯特朋打量了他一番：“他是个老犹太人，很老，知道自己就要死；他经过时，我瞄了他脸上一眼，不得不立刻转移视线。长这么大，我从未在人的眼睛里看到这样恐怖、绝望的神情。”斯特朋的炮兵连退出山区五天后来到桑河边，正走在浮桥上以退回东岸时，一座冰山击中浮桥，整个部队，人、马、炮、弹药车，全翻落到冰冷河水里。斯特朋论道，“似乎就连天气都和我们作对”。[15]



掘壕固守的奥地利步兵击毙来犯俄军

俄军在喀尔巴阡山脉的进攻，和先前奥军在加利西亚的进攻一样不智。照片中的场景是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掘壕固守的奥地利步兵击毙来犯俄军。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为把俄军赶出喀尔巴阡山脉，在加利西亚重建一稳固据点，一月二十三日康拉德反攻，命令三个集团军进攻。其中一集团军，博罗耶维奇的第三集团军，要拿下西喀尔巴阡山脉的诸山口；林辛根的南集团军要拿下中段诸山口，而更东边卡尔·冯·弗朗译-巴尔丁将军的暂编兵团，则要攻破布科维纳以攻打俄军侧翼（此暂编团将于不久后改名第七集团军）。一如法尔肯海因所预料，在这个冰封的荒野里，别想取得重大战果，就连一向爱替自己辩白的奥地利参谋，都判定这场指向普热梅希尔的反攻（由康拉德坐在其位于泰申的舒服司令部指挥的行动），乃是“残忍的愚行”。没有弗朗茨·斐迪南把他差来遣去，康拉德终于开始展现他华伦斯坦（译按：Wallenstein，三十年战争时神圣罗马帝国大权独揽的名将）的作风。一九一五年初期，博尔弗拉斯愤愤抱怨道，“我们正受总司令部摆布”。[16]

普热梅希尔离第二次被围已有一段时日，大概在三月中旬时城中补给品就会耗尽，博罗耶维奇于是猛攻俄军壕沟。博罗耶维奇已在元旦那天让俄军夺走乌兹索克山口和该处一千六百米长的铁路隧道，这时则在夺回该山口的战斗中损失一半兵力（一月二十三日夺回）。一月二十六日，南集团军进攻，但那天只前进了一个足球场的距离，接下来每天都如此。诚如某德国军官所说，“汉尼拔的确最终越过阿尔卑斯山，但那里没有罗马人等着。而我们不只得越过高山，还得同时赶走俄国人”。[17]

整个行动有其缺陷，德奥两国集结仅仅十七万五千人和一千门火炮，对掘壕固守的俄军阵地展开一连串自杀式强攻。[18] 奥匈帝国第十九师的军官想借由赋予士兵“保卫匈牙利”的重任来唤起士兵杀敌之心，但该师大部分士兵对匈牙利存亡的关心更低于对奥地利存亡的关心。他们往山上攻，在及膝深的积雪里跌跌撞撞前进，每日攻打位于厄科尔梅佐（Ökörmező）之高地上的俄国步兵、炮兵。他们接连夺下拥有上戈耳戈（Hohe Gorgon）、扎沃姆（Zalom）之类奇怪名字的战术要地，但

最终还是遭击退。他们于五天后重启攻势，进攻他们曾强攻过、拿下、上个星期得而复失，由俄军控制的那些九百米高的高地。几天前雪已及膝深，这时则及腰深。连级部队打到只剩几人。奥地利第六皇家步兵营，除夕时有一千零六十九人，到了一月底只剩百人。就连精锐的皇家步兵，都无法长久承受这杀戮、雪、冰、风、死亡的折磨。撑不住而垮掉的军官多得惊人，遣送回家时，遣送单位只给出如下解释："累垮。"[19]

由新兵与后备军人组成的行军连，前来为遭受重创的奥匈帝国军队补充新血，一脸惊骇地望着战场和他们仍在硬攻防守严密之山头的死板军官。经过二月中三天的恶战，南集团军拿下卡利诺夫采（Kalinowce），但第四天即遭俄军反攻夺回。想趁黑夜进攻，成效一样差；走过雪、冰、结冻的山中小湖时，部队发出太大声响。奥地利第五师某营报告，"往俄军铁丝网走去时，冰裂的声响暴露我们的行踪"，"我们走近时，敌人照亮我们，从三方攻击"，造成五十一人死伤，七十四人"失踪"。师部担心有损本部名声，向军部保证那些失踪者已光荣战死，但他们很可能只是又冷又累，于是躲在俄军的铁丝网后，枪炮声平息时即投降。[20] 有位俄国军官于一月二十一日写给母亲的家书中说，"这场战争最令人费解的地方，乃是我们渐渐不恨敌人……我想那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遭遇；我们都是被迫去做最违反人性的事：杀害同类"。[21]

约瑟夫·冯·施蒂尔克将军，奥地利派驻西部战线的军事联络官，二月来到泰申拜访奥匈军总司令部，震惊于他所受到的接待。康拉德以拉长的语调说："那么，我们的内敌，德国人，情况怎么样？那位喜剧演员，德皇，最近怎么想？"然后康拉德对施蒂尔克长篇大论，谈附属于奥匈军总司令部的德国军官的罪过：他们"四处查看"，干涉他的事，侦察他的动态，在报上谴责他，散播恶意的谣言，拿一张官僚大网套住他，使他做起事碍手碍脚。施蒂尔克告退时，怀疑康拉德精神是否出了

问题，写道："他仇视德国人，紧张，太激动，疑神疑鬼。"他也是个十足的伪君子，呈报博尔弗拉斯道，他搞不懂法尔肯海因与鲁登道夫为何斗得这么凶："我个人认为，在像现在这么严峻的时刻，所有个人野心都该摆到一旁。"[22]

康拉德的副官，鲁道夫·昆德曼少校，愈来愈像是在做保姆的工作。博尔弗拉斯发文康拉德，要求这位参谋总长报告其访问柏林之事时，康拉德置之不理。昆德曼告诉他该照办，毕竟那是皇帝所要求的，但康拉德仍然不肯。昆德曼在日记里写道："他总是先说不，然后才理解到别人说得没错。"康拉德的副官为部队在山区的困境感到极为愧疚。

"更冷，雨更多，我们却把部队一连十四天部署在这脏污的环境里，他们肯定抵抗不下去了。"康拉德也撑不下去了；他得了流感，向昆德曼说他已在"鬼门关门口"。昆德曼为这人的作为感到作呕："他总是夸大其词；这里其他人也得了流感；不是只有他得，但只要是让他受苦的事，就是紧急事件；其他事，他满不在乎。"他停了一下，然后用英语说："自私鬼。"[23]

博罗耶维奇在喀尔巴阡山脉受到猛攻，有远比流感还更该担心的事。他表达了对康拉德进攻之举考虑有欠周详的疑虑后，从前线部队抽出一半兵力，拨给爱德华·冯·伯姆-埃尔莫利。伯姆-埃尔莫利在塞尔维亚与加利西亚之间游走，错过这场战争的许多战事，可以指望会比受苦已久的博罗耶维奇更愿意接受此战线的真实情况。[24] 不久，真实迎面扑来。二月十七日，伯姆-埃尔莫利部与第二集团军重新推进，结果在冰与雪中毫无所获。奥地利炮弹落进软雪里，未能引爆。步兵未取得战果，反倒有一半兵力（四万人）折损于寒冷和受伤。有位记者写道："你得想象雪深及膝，高地上壕沟密布，冻脂般平静的天地被尖声呼啸的炮弹、榴霰弹和嗒嗒响的机枪划破。"[25]

将领醒来时会发现，已有数百官兵睡觉时冻死，还有数百人逃亡。德国驻泰申的代表忧心忡忡地指出，数千奥地利人“未发一弹被俄军俘虏”。最糟糕者是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有个两千人的捷克团，一个晚上就有一千八百五十个逃兵。罗马尼亚行军营向皇帝宣的誓，遭神职人员暗地废除。神职人员会力劝他们一有机会就投奔俄国人阵营。[26]



在冰天雪地的喀尔巴阡山脉里戒备的奥匈帝国士兵

“你得想象雪深及膝，高地上壕沟密布，冻脂般平静的天地被尖声呼啸的炮弹、榴霰弹和嗒嗒响的机枪声划破。”照片中，奥匈帝国士兵在冰天雪地的喀尔巴阡山脉里戒备，等待俄军进攻。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这场战役的目标——拿下喀尔巴阡山脉诸山口，解放普热梅希尔的要塞，阻止意大利、罗马尼亚参战——似乎是个残酷的笑话。每次作战前，武器都得解冻才能用。[27] 士兵简直停止了战斗。军官无法骑马去找他们，因为马在冰和积雪上走不了，而冷漠、受冻的士兵不肯行军或打仗。有位奉命被派到奥地利第十九师司令部索取奥军作战计划纲要的德国军官，觉得奥地利人实在不行："作战纲要让人觉得部队分散、七零八落……进攻力弱而小，不会有战果……整个师已瓦解为数股游击队。"[28]

哈布斯堡军官的报告，悲观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若不动粗硬逼，士兵一动也不动。士兵行经卡住的四轮马拉货车时，会不愿把它推出雪地；骑马信使向他们问路时，他们会呆呆望着，不发一语。奉命帮忙将受伤同袍搬上救护车时，他们会耸耸肩，继续往前走。奉命卸下补给车或弹药车的货时，他们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上面要他们清除路径沿线障碍时，他们会无精打采地走开。战死或病倒的军官、士官太多，士兵变得很难管。[29]

这场山区冬季战役似乎比以往更徒劳无功，因为他们一掘完壕沟，立即受到来自左右山头的侧翼攻击。有位德国联络官发现奥地利士兵"疲累、差劲"，斯拉夫人部队"不可靠"。[30] 有位奥地利将军哀叹"他的兵偷偷摸摸四处走动"，"不再敬礼，不再擦步枪，不再刮胡子或剪头发……他们穿着一身脏兮兮、破烂、不合身的军服"。他指示他的军官，"别费心教他们打仗，他们在战斗中自然会学到；该教他们服从"。[31]

凭着深厚的人力储备，俄军不断进攻，兵力日蹙的哈布斯堡军队则吃力防御。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四十二师，在一九一四年三次入侵塞尔维亚的战役中遭遇最惨，这时却跟着第十三军来到这个前线。约翰·沙利斯（Johann Salis）将军三月三日对该师的评价，意在降低外界对该师的期待："只有炮兵和骑兵堪称能打。步兵的功用已降到一无可取的程

度。”部队因士兵丧命而填补兵员已太多次；由新兵组成的行军连配置各地，毁了仅存的些许休戚与共精神。该师两个团，第二十七（德意志人）团和第二十八（捷克人）团，因为未经战斗即让出阵地，已被处死十分之一，而经过此事之后，他们的战斗力却和此事之前一样差。他们的师长指出：“真的是一伙士气涣散的兵。”[32] 一九一五年三、四月在科比拉（Kobila），奥地利第八十一团的捷克人描述了“呈密集队形、一路吼叫的俄国冲锋纵队”不间断地进攻。第八十一团忆道：他们在高地上掘壕固守，“没有哪个白天或夜晚，俄国人不想用他们的优势兵力包围我们。他们的人愈来愈多，每次进攻都比上次进攻更猛烈”。[33]

死伤人数上升，俄军战斗力不减。有份奥地利手册提醒士兵：“俄国军人愚蠢且软弱，使其成为上级军官手中极有用的材料。对那些军官来说，人命不值一顾。”[34] 有位俄国中尉在喀尔巴阡山脉停下来和其排里的士兵聊天，而令他印象深刻的不是他们的愚蠢，而是他们的复杂。他以俄国军官父亲般的口吻说：“孩子，你怎么不挖壕沟防范敌人来攻？”士兵回道：“长官，干嘛要挖？如果要壕沟，打败奥地利人，抢占他们的壕沟就行了，因为他们很善于挖壕沟。而且从深壕沟不易进攻；从我们的浅壕沟，容易得多。”这位俄国军官打量过他们半认真、半揶揄的口气后推断：“在此可清楚看到这些人如何把讽刺、懒惰、虔敬结合在一块。”[35] 这种豁达看待打仗的心态，肯定有助于抵消战争的可怕。三月三十一日，在遭遇俄国典型的攻击后，奥地利第八十一团军官清点他们壕沟前方的俄军尸体共有四百具。俄军在单单这段战场里，每天损失这么多人，却浑然不以为意。像这样的战场有数百段，俄军前仆后继，源源不绝。

奥军在喀尔巴阡山脉的悲惨遭遇，显然只有俄军的遭遇更有过之。俄军像牛一样被赶进奥军炮击范围里。布鲁西洛夫喜欢以缓慢且严肃的口吻说，“别担心侧翼和后方，只要担心前方，敌人只会出现在那里”，而俄国军官似乎真的贯彻这看法，奥地利某营长的作战记录就证实了此

点：“三月十八日：击退俄军两个连的正面强攻，胸墙上有五十具俄国人尸体；三月十九日：击退敌人正面强攻，胸墙上约两百具尸体。”[36]

地面开始解冻时，双方都往前挖掘壕沟；经过这番狂挖，在战线的某些段，两军前线相隔不到九米。冲突随之爆发：“我们隔着（四点五米）距离互相开火，互掷手榴弹，前后两个小时。”许多奥匈帝国士兵第一次丢手榴弹，不小心炸死自己，使奥地利不得不在三月时重新设计手榴弹。[37] 士兵逃避这一疯狂的杀戮；在以手榴弹为武器的这场小规模交手中，四百名未受伤俄军士兵和五名军官投降，奥军方面也有七十八人投降。[38]

偶尔俄军会突破防线，打散邻近的奥军部队，迫使他们离开壕沟，进入开阔地。四月二日就发生这样的事，奥军一个团被迫退到其后面某村，撤退时损失十四名军官、八百零二名士兵，相当于他们本已日渐萎缩之兵力的三分之一。[39] 在战线后方，俄军正搜刮其所占领的奥匈帝国领土的资源。有位俄国军官四月十五日写道：“最近我一直在征用物资，为此得用军票换取加利西亚人的母牛，其实就是抢。加利西亚妇人哭泣、尖叫、亲我的手，我的兵牵走她的母牛时，她咬他们的手。”[40]

在加利西亚的苦，康拉德似乎无动于衷。他在泰申的日程表，密密麻麻写着“参谋总长在咖啡馆”或“参谋总长早上在读报”之类的活动记录。[41] 他的情妇吉娜于一月时前来待了四天，招来维也纳和军方充满厌恶的强烈批评。奥地利媒体，在陆军设于维也纳恬静郊区的新闻总社指导下，也表现得好像一切顺利，没出任何差池似的。报纸自信满满地报道奥军、德军如何英勇，如何善于解决问题、化险为夷，穿插以俄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落魄倒霉的故事。有漫画描绘吓得要死的俄国军人包着尿布，想爬过咧嘴而笑的奥地利步兵身旁，图说写着“伪装大师”。有漫画描绘鱼跃离波兰、加利西亚的河湖，因为有太多逃跑的俄国人溺死在水里：有条开心的鱼落在干地上时对其同伴说：“我们要走

人，因为水污染太严重。”

漫画家轻描淡写前线的骇怖。“内敌，来自北战场的报道”以三张画呈现一可怜的奥地利军人在抓虱子，然后在第四张画里他脱到只剩短裤，丢掉军服：“我们的猛攻终于迫使守军让出阵地。”但实情是这些哈布斯堡士兵不只一身虱子，还惹人厌。奥地利新闻局以戏谑心态报道了以下故事：有支德奥巡逻队“在南波兰某处”找吃的。每个农民都以带着苦恼的同样说词把他们打发走：“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官。俄国人把什么东西都吃掉了。”南波兰的情况这么惨，就在这时，德国人突然染上痢疾，病得非常严重，这人向民家借用厕所。农民盯着他看，一脸不解神情，然后回道，“没有，长官！俄国人把那个也吃了！”简而言之，这些东部农民几乎和那些吃屎的俄国人一样蠢：笨、天真、不卫生，与他们周遭那些干净，有条不紊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大相径庭。[42]

俄国的宣传一样低劣。它敦促军民继续投入“为圣索菲亚而打的战争”。圣索菲亚是君士坦丁堡的清真寺，原是东正教大教堂，而在这些遭战火摧残之地的军民眼中，它想必和月亮一样遥远。一九一五年初期，有位俄国军官看过送到他位于加利西亚的战壕的俄国报纸后，对标题印象深刻：“这场战争已把俄罗斯人、波兰人、犹太人牢牢团结为一，并肩作战。”他躺在报纸旁，心里想着：“让我来告诉你真相；我们人在加利西亚，春天的第一天，天气很美，一辆破烂不堪的旧雪橇沉重地走在土路上；斜躺在雪橇上的是个年轻的哥萨克人，毛皮帽下露出他梳理整齐的马尾辫。拖着这辆雪橇走过土石地的是只母马，母马没东西吃，饿得皮包骨，肋骨根根突出，像床垫上坏掉的弹簧；。骑在母马身上者是个老‘犹太男孩’，因害怕而一脸吓呆的神情。哥萨克人偶尔懒懒地举起皮鞭抽犹太人的背，示意犹太人鞭马加快脚步。”[43]

奥地利于开打后头四个月在加利西亚、塞尔维亚损失了百万兵力，在喀尔巴阡山脉又损失八十万，其中四分之三死于若待在冬季住房就可

避免的疾病。维也纳与泰申以需要解普热梅希尔守军之围为理由打这场冬季战争，结果却失去六万守军。[44]

光是第二集团军，在三月头几天，就因冻伤损失四万人。事实上，根据每日死伤报告，冻伤所造成的兵力损失，远高于战场伤亡所造成的。[45] 南集团军已损失三分之二兵力。令第三集团军残破不堪、雪上加霜的是，这时意大利就快参战攻打奥匈帝国。[46] 俄军三、四月时派兵探查诸山口，遭激烈抵抗，迫使康拉德再度请求德国派兵增援。

康拉德的位置变得岌岌不保。施蒂尔克有次去了奥匈军总司令部，在观察康拉德后论道，“他清楚没有德国大力援助，治不好我们的弱点，而这一认知像虫一样啮咬他的心”，“他知道德国若提供这援助，会要求奥地利领导阶层以受其摆布作为回报，而此事令他斗志全消，使他成了冷漠无情的盟友。”他每天把心力花在维护其与总司令部里的德国人“平起平坐”上，冷落他们，退回他们例行的盟国文书作业要他们修改，坚持愈来愈虚妄的奥地利独立地位。[47] 鲁登道夫这时已打从心底瞧不起康拉德和奥地利人，但还是又出手相救，派贝斯基德军（Beskidenkorps，来自鲁登道夫之前线部队的士兵和来自南集团军的两个半师）前去遏阻俄军攻势。

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普热梅希尔又落入俄军之手，[48] 为愚蠢的喀尔巴阡山冬季战役画下句点。为拯救要塞里挨饿被围的十五万居民，这场战役牺牲了八十万人，结果最后竖起白旗，落入俄军之手。一名目睹奥地利守军投降的英国人写道，守军看来“快饿死……我没看到比这更绝望、更沮丧的一群人”。他们的军官显然未和入伍兵同甘共苦；他们“看来富足，吃得好，据居民所说，生活豪奢”。[49] 美籍记者史坦利·华许本从伦贝格横越一百四十多公里到达普热梅希尔，“道路上积着厚厚的烂泥，撤走的战俘堵住道路”，而他也对要塞里截然不同的情景大感惊讶。军官看来很健康，对战败浑然没放在心上。“看着他们

在街上开心地聊天……很难理解他们的马已被吃了或他们的骑兵已被俄国俘虏。”

那些骑兵饿到发昏。围城期间，奥匈帝国守军已吃光存粮，然后开始吃运输用的马，再吃骑兵的马，最后吃城里的猫狗。奥地利军官留下自己的马且继续喂食，直到投降前十小时才交出来，它们也全遭宰杀，但不是为了给挨饿的入伍兵填肚子，而是为了不让马落入俄国人之手。有位在普热梅希尔投降后最早进城的俄国军官，描述了“我在战争里所见过最骇人的景象……匈牙利军人饿到发狂，生吃血淋淋的肉块，用小刀和指甲从刚杀的马尸上挖肉，手、脸满是血”。[50]

更令人愤慨的丑事在维也纳上演。在布拉格地区征兵组建的第二十八团，哈布斯堡君主国最悠久的团之一，一九一五年四月在维也纳遭皇帝下令解散。这个捷克人居多的团，在喀尔巴阡山脉全团离开战斗岗位，向俄军投降，不料他们以为满是俄国人的那道壕沟里，竟全是德国步兵。五十名官兵遭以叛国罪被送上法庭；八名遭绞刑处死，其他人判服苦役。团中士兵先被枪毙掉十分之一，然后其余士兵被打散拨到其他部队。[51]

这就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危机所在。奥匈帝国军队已伤亡两百万人，却一无所获。哈布堡斯君主国运了四个集团军四十二个师进入喀尔巴阡山脉，然后被消灭，而消灭他们的最大敌人就是奥地利自己的无能。[52] 哈布斯堡君主国只剩二十五万毫发无损的兵力。俄国开战以来死伤一百九十万人，但仍有六百三十万兵力在战场上。正如俗话所说，“俄罗斯母亲的儿子够多”。沙皇的后备兵力似乎取之不竭，一九一五年三月俄军参谋总长的话正无情证实这一表象：“即使以目前的‘损耗’再打两年，仍不愁找不到壮丁。”

实际上还是有令俄国发愁之处。俄国开打头一年损耗极大（一个月三十万到四十万人），陆军其实已耗尽可合法征召入伍的壮丁。沙皇因

此开始非法召兵：还未达服役年龄的年轻人、警察、有缓役资格的男子、俄罗斯帝国内两千万非俄罗斯裔人民。这些非俄裔居民战前一直不用服兵役，此刻突然失去这权利。俄国国会或许原被认为会反对让人民送死，会阻止把人民送去当炮灰，结果反倒提供炮灰：凡是军方想要的人，不管有没有免役资格，全双手奉上。[53] 于是，借由光明正大和见不得人的办法，俄国有源源不绝的生力军投入战场，当奥地利火炮的炮灰。

一九一五年五月，施蒂尔克将军经过一列俄军战俘身旁时，惊讶于他们气色竟那么好；奥地利已在刮取最后的人力残渣，这些俄国人却看来“强壮、健康、吃得好、青春正盛、穿着很好的衣服鞋子。他们看来一点不像战败……根本开心于能离开壕沟”。[54]

正是俄国人本身无法完全发挥其潜力（名义上有一千七百万兵力的军队），未能善用他们的成就（诚如当时某人所说的，“他们未被有效击退，但也无法往前推进”），给了奥地利喘息空间。互斗的俄国将领（北边的鲁斯基与南边的伊万诺夫斗）无法在该偏重哪个战线上达成一致见解，鲁斯基最后根本无视尼古拉大公要其以南战线为重的命令。因此，伊万诺夫四月攻进喀尔巴阡山脉，拿下杜克拉山口时，俄国三分之二兵力仍待在普里佩特河以北。俄国的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仍严重不足，生产的炮弹太少，一九一五年入伍服役一百四十万新兵，只有七万支步枪可用。[55]

但不幸的奥地利人能如何利用这些优势？打过仗的哈布斯堡军队已被打掉，换上的是未经战火洗礼的民兵军队。就连老兵都不是特别能打。康拉德于一九一五年三月发了一份问卷给其部队指挥官，询问他们对开战以来的观感，而回复的意见，拿措辞最客气的来说，都令人气馁：部队士气涣散；厌恶军服（颜色太亮）和背包（太重且“塞满无用的东西”）。虽然士兵集体大批伤亡，但军官仍然偏爱“纵深队形和宽阔

的正面”，而此举把大批穿着亮蓝灰色军服的人集结成簇推进，招来敌人枪炮攻击。但那些以紧密队形组成的连纵队，似乎是驱使这些难驾驭的士兵上前，“保住对军队的控制力和机动性”（某军官语）的唯一办法。它们也是使士兵开枪的唯一办法，因为没有军官或士官在旁监视，士兵不会开枪。他们会只是把脸埋在土里，祈祷获救。有个皇家步兵营军官认为，“士兵爱用铲子的恶习得打破”，“士兵奉命进攻，往前走几步就立即开始挖壕，但离敌人还太远，开枪根本打不到对方。”他们的壕沟反映了这一（有其充分理由的）悲观。“士兵把时间全花在改善他们的壕沟、胸墙、防榴霰弹设施，未把时间花在想办法在壕沟外开火。”因此，看来坚不可破的奥匈帝国壕沟线，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只是个“看不见外面、得到掩护、把自己围起来的孤立群体”。

开小差已成为奥地利的通则，而非例外。就连历史悠久、清一色德意志人的团，都报告“开小差、纪律涣散的情形变多”。每个团里的士兵都想逃跑，被俘时，他们会说他们已在最近的战斗里被列为“失踪者”。进攻时若有人遭击中，他身边的人个个都停止进攻，替他包扎，把他抬到救护站。有人劝康拉德成立“骑马军事警察”，要他们在每个部署了奥匈帝国部队的地方不断巡逻，以遏止掉队、逃跑。

军官团有自己的士气问题。奥芬贝格打赢科马鲁夫之役后，因为批评彼得·斐迪南大公被撤职，一九一五年四月在维也纳自己家遭逮捕，关了三十六天，然后被以一九一二年迫使他离开陆军部的那件丑闻受审。当年皇帝似乎觉得无伤大雅的一件丑闻（奥芬贝格在宣布一笔火炮大宗购买案前夕拿Skoda公司股票进行内线交易），此刻似乎变得无比重要。奥芬贝格的名字遭从教科书介绍科马鲁夫之役的部分移除，他被指控把股票内线消息卖给外国投资人，进而危及国家安全。整件事（从未完全获证实的一件事）根本就是为了报复、拿小事大做文章。[56]

地位没奥芬贝格这么高的军官，分为水火不容的两派：一派只想着

升迁（擅于保命者），另一派是战争开打时征召入伍而官运没这么好的新干部。大部分一年期的志愿军官（为免被征去当大头兵而取得后备军官身份的学生、专业人士），这时置身前线。他们在维也纳没有人罩，没有机会取得所谓的“免挨子弹的差事”。最不用挨子弹者是匈牙利人，因为凡是与匈牙利议会有关系的军官，不管是议会里的议员、男侍从、助理或分析员，都能在开议期间请假。弗朗茨·约瑟夫向马扎尔人做出数个造成国内分裂的让步，这是最近一个让步，但这一让步发生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正值哈布斯堡军队人力需求正殷之时，在维也纳引发比以往更大的怨怼。[57]



被俘的奥地利军官和俘获他们的俄国人

一九一五年初期时，哈布斯堡军官团已分为水火不容的两派：一派是职业军官，往往有人脉来取得远离前线、“免挨子弹”的差事；另一派是仓促动员来，在壕沟里吃苦的志愿军官。照片中这群被俘的奥匈帝国军官，看来为不用再打仗松了口气。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新近抵达奥地利前线的士兵，发现他们（短暂）受训所要应付的情况是一回事，战地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本来火炮就不多的奥匈帝国炮兵，开打头六个月已损失千门加农炮，却只新造出两百七十八门来填补。炮弹产量一直停在每月需求的八分之一左右的程度。[58] 难怪士兵对自家炮兵完全没有信心。有位军官写道：“他们把我们的伤亡惨重归咎于缺乏炮兵准备和支持……缺乏重型火炮。”[59] 他们说得没错。康拉德的问卷里，有一道问题要师长说说他们对与重型炮兵部队合作的看法，结果大部分师长都答得很干脆，“本师从未用过重型火炮”。[60] 在老军队里，军官若发现自己部队有这短处，会试着用士兵的母语向他们说明，但老军队已葬身在塞尔维亚、加利西亚的泥地里和喀尔巴阡山脉的雪地里。开打头几个月，有太多奥地利校级军官丧命或残疾，因而不得不以德意志人或匈牙利人居多的后备军官紧急递补，而这些军官既无时间也无意愿学他们士兵的“团内用语”。

幸存者无缘得到任何语言的安慰。战前嘲笑弗洛伊德的奥地利军官，这时拟出一套精神病词汇，以描述他们士兵的遭遇。他们神经毁坏（nervenzerüttenden）或神经分裂（nervenzersetzenden），已失去自制力（Selbst-Kontrolle），得了感觉紊乱症（Sinnesverwirrung）、神经扰乱症（Nervenstörungen）或彻底神经崩溃（Nervenzusammenbrechen）。似乎每个人都患有某种程度的惊弹症。士兵被投以镇静剂溴化钠，但那从未驱散惊骇的主要根源：敌人炮火把许多同袍炸成血肉模糊一团的景象。有位战地记者看过某陆军医院里这些受惊吓的士兵后写道：“他们进来已约一星期，其中许多人茫然发呆。他们就躺在那里，几乎未从惊弹症中苏醒过来。”[61]

奥匈帝国的征兵制原以十九到四十二岁男子为征兵对象，后来遭悄悄修改，将征兵年龄扩大为十八至五十岁。原被归类为无用之人的吉普赛人，变成得服兵役，为哈布斯堡王朝历史上所首见。前几年被视为心智上或身体上“不适服役”而免服兵役的两百多万男子，这时当权者大笔

一挥，变成适于服役。[62] 意大利整军经武，据传要建立三十个军、一百三十万兵力，部署于特伦托（Trento）和伊松佐河（Isonzo River）沿线，奥匈帝国因此已在思考彻底承认失败之事。[63] 一九一五年三月，康拉德告诉博尔弗拉斯，成功已无望；哈布斯堡军队已垮掉，得再次胁迫德国人出手相救。他在议事录里阴险写道："我们可以一再威胁要和俄国单独媾和，作为反制的筹码。"四月，康拉德向法尔肯海因发出同样的威胁：奥匈帝国放弃加利西亚（给俄国），会比放弃的里雅斯特（给意大利）更早，所以你们自己看着办。

法尔肯海因深信奥地利已在垮掉边缘，于是派施蒂尔克先去泰申，再去维也纳，以说服康拉德和皇帝做出会让意大利放弃参战的那些让步。施蒂尔克在两处都无所获。康拉德与蒂萨刚如愿将贝希托尔德解职（一九一五年一月），理由是贝希托尔德竟提议以哈布斯堡王朝的特伦蒂诺和奥地利所占有的阿尔巴尼亚领土收买意大利，使其不与奥匈帝国为敌。他们让伊斯特万·布里昂伯爵当上外交部部长，指示他寸土不让。施蒂尔克来到泰申时，康拉德轻蔑说道："不知法尔肯海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他把这位将军送到维也纳，说外交政策他无权置喙。此前他一直有权置喙；只是此后不再是。

在维也纳，施蒂尔克最后一次看到老皇帝，皇帝昏昏欲睡地告诉他，"不会把领土让给"意大利人或其他人。为满足这老人的荣耀观、帝国观，还会有数十万人在意大利战线上死亡、受伤。与施蒂尔克会晤时，布里昂以明确口吻表示，如果他知道意大利人不是随便说说，他或许会力主让步："如果有人拿着未装子弹的手枪指着我，我不会交出我的钱包，除非我知道手枪有装子弹，那时我才会做决定。"但在抢匪扣扳机之前，受害者要如何知道手枪里有没有装子弹？而装子弹的过程会增添施暴的风险，一如一九一四年的动员所表明的。施蒂尔克黯然离开，觉得布里昂或维也纳官场里的其他人都是平庸之辈。他写道，德国人比更直接受到威胁的奥地利人，更敏锐察觉到意大利出兵干预的威

胁。比洛亲王转达了来自罗马的另一个非正式提议：把南蒂尔罗给意大利，意大利就会继续保持中立。这提议不算过分，在兵败塞尔维亚和喀尔巴阡山、普热梅希尔陷落、军队垮掉之后，为奥地利人所乐见，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再度立即拒绝。在两个战线都败下阵后，对于在第三个战线可能也战败，他似乎没放在心上。[64]

维也纳与这场可怕战争的现实面脱节，而且脱节现象就属此时最鲜明。有位名叫阿瑟·鲁尔（Arthur Ruhl）的战地记者，参观过布达佩斯的某家奥匈帝国医院（院里满是蒸汽、消毒水、腐烂伤口的气味），久久难忘于所见的真实情景。他写道："只有见识过现代火炮的威力者，才知道它们有多可怕。"这些伤残士兵与运兵火车之间的强烈反差，令他大不舒服。运兵火车覆盖祈求好运的绿枝和鲜花，隆隆驶过这医院的窗户下方——只是为东部战线运去更多炮灰。从病床上往下看的那些伤兵，没那么幸运，身上被炮弹和子弹打出窟窿。有个伤兵脖子上有道手掌宽的伤口，伤口深到让鲁尔能看到颈动脉在薄薄一层纤维底下搏动。他仔细观看了榴霰弹、子弹创伤的X光照片，看到"骨头被子弹打碎，喷出周边肌肉，好似被引爆过"。从喀尔巴阡山脉送回的截肢者，人数之多同样令他震撼：其中许多人"是作战时受的伤，但也有寒冬里被丢在外头二十四小时或更久而未获救的哨兵，脚冻坏，脚踝以下切除"。他走过一间间病房，估算有（且闻到）"数千个冻坏的手、脚"，其中大部分手脚"发黑，渐渐烂掉"。[65]

对奥匈帝国来说，这整场搞砸的战争已经开始烂掉。此后所要做的，乃是把奥地利的作战行动委托给德国操持，悲惨结束一场维也纳决策者原以为可中止奥匈帝国颓势、重振帝国构想的冲突。奥地利在加利西亚、塞尔维亚原有机会得胜，有超乎其预期的好机会。但即使有德国相助，哈布斯堡君主国也浪费了所有机会，最后它的军队残破不堪地摆在从波兰经喀尔巴阡山脉诸山头，一路往南到波斯尼亚的一条战线上。奥地利本身的存在意义也已残破不堪。经过无以计数的战败，这个二元

君主国从其子民和邻邦那儿赢得的尊敬已荡然无存，任何团结一致或主权的表象也荡然无存。它的来日已不多。

---

[1] Kriegsarchiv，Vienna（KA），Armeeoberkommando（AOK）1914-1915，Evidenzbureau（EVB）3510，Dec. 22，1914，“Italien：Auszüge aus Attache-und Kundschaftsberichten”；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Ⅲ，171，Berlin，Dec. 5，1914，Hohenlohe to Berchtold；Vienna，Dec. 7，1914，Hoyos to Hohenlohe.

[2] HHSA，PA Ⅰ，819，Sofia，Dec. 13，1914，Tarnowski to Berchtold；Pera，Dec. 15，1914，Pallavicini to Berchtold；*Times clipping in Copenhagen*，Dec. 17，1914，Szechenyi to Berchtold.

[3] General Josef von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Leipzig：Paul List，1921），112-113.

[4] Rudolf Jerabek，*Potiorek*（Graz：Verlag Styria，1991），193.

[5] HHSA，PA Ⅰ，837，Munich，Feb. 20，1915，Vélics to Burián.

[6] KA，B/1450：124-125（Conrad），Col. Rudolf Kundmann，Tagebuch Nr. 11，Berlin，Jan. 1，1915.

[7] Nikolai N. Golovine，*The Russian Army in the* World Wa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37.

[8] Nikolai N. Golovine，*The Russian Army in the* World Wa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127-128.

[9] HHSA，PA I，837，Munich，Jan. 25，1915，Vélics to Burián；Timothy C. Dowling，*The Brusilov Offensiv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6；Fedor Stepun，*Wie war es möglich*：*Briefe eines russischen Offiziers*（Munich：Carl Hanser Verlag，1929），83.

[10] HHSA，PA Ⅰ，837，Munich，Dec. 30，1914，Vélics to Berchtold；Norman Stone，*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London：Penguin，1998[1975]），122；B.H. Liddell Hart，*The Real War 1914-1918*（Boston：Little，Brown，1963），70.

[11] Alfred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 1914-17*（London：Hutchinson，

1921），1：235.

[12] Stone，*Eastern Front*，112.

[13] Ward Rutherford，*The Tsar’s Army* 1914-1917，2nd ed.（Cambridge：Ian Faulkner，1992），28；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219-220.

[14]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237.

[15] Stepun，*Wie war es möglich*，35-36，41-44，49.

[16] 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77；Stone，Eastern Front，42.

[17] Harry Kessler，*Journey to the Abyss*：*The Diaries of Count Harry Kessler*，*1880-1918*，ed. and trans. Laird M. Easton（New York：Knopf，2011），669.

[18] Graydon Tunstall，*Blood on the Snow*：*The Carpathian Winter War of 1915*（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0），11.

[19] KA，Neue Feld Akten（NFA）1868，Lt. Karl Popper，“Das Feldjaegerbattalion Nr. 6 im Weltkrieg 1914.”

[20] KA，NFA 1803，5，ITD Kdo，Góry，Jan. 15，1915，“Gefechtsbericht über die nächtliche Unternehmung gegen Zakrzów.”

[21] KA，B/1450：124-125（Conrad），Col. Rudolf Kundmann，Tagebuch Nr. 11，Berlin，Jan. 1，1915，letter，Conrad to Bolfras；Stepun，*Wie war es möglich*，43，65.

[22]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115-116.

[23] KA，B/1450：124-125（Conrad），Maj. Rudolf Kundmann，Tagebuch Nr. 11，Teschen，Feb. 3，1915.

[24] Stone，*Eastern Front*，114.

[25] Arthur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A Year of the War on Many Fronts—and Behind Them*（New York：Scribner’s，1916），267.

[26] Generalleutnant August von Cramon，*Unser Österreich-Ungarischer Bundesgenosse im Weltkriege*（Berlin：Mittler u. Sohn，1920），9.

[27] HHSA，PA I，837，Munich，Feb. 20，1915，Vélics to Burián；Dowling，*Brusilov Offensive*，22-24.

[28] Kessler，*Journey to the Abyss*，672.

[29] KA，NFA 2116，36 ID，AOK Nr. 2096，GM Höfer，Dec. 16，1914；NFA 170，17 Brig.，Etappen-Kdo，Dec. 31，1914，Ob. Ottokar Landwehr.

[30] Stone，*Eastern Front*，122.

[31] KA，NFA 170，k.u.k. 8 Korps-Kdo，Op. Nr. 617/28，Dec. 21，1914，FML Scheuchenstiel.

[32] KA，NFA 1866，13 Korps Kdo，March 3，1915，FML Salis，"einen Rudel demoralisierter Mannschaft."

[33] KA，NFA 1845/2，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 80-83，"Die 81er im Osterkampf um die Kobila."

[34] KA，NFA 1878，"Kriegserfahrungen，" 6 Auflage，"Taktik der Feinde：Russen."

[35] Stepun，*Wie war es möglich*，80-81.

[36] KA，NFA 1868，Maj. Lunzer，Amniowa，April 3，1915，k.u.k. FJ Baon Nr. 9，"Bericht über die Tätigkeit der Gruppe Maj.Von Lunzer vom 2/Ⅲ bis 29/Ⅲ"；NFA 1878，AOK，Oct. 15，1915，"Ursachen und Vermeidung grosser Verluste."

[37] KA，NFA 1878，k.u.k.1. Armeekdo，March 2，1915，"Verwendung von Handgranaten."

[38] KA，NFA 1868，Sattel 993，May 8，1915，Maj. Heinich von Lunzer，"Gefechtsbericht über den Angriff auf Jawornik 6./5.1915."

[39] NFA 1845/2，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80-83 "Die 81er im Osterkampf um die Kobila."

[40] Stepun，*Wie war es möglich*，113.

[41] KA，B/1450：124-125（Conrad），Col. Rudolf Kundmann，Tagebuch Nr. 11.

[42] Beiblatt der "*Muskete*，" Vienna，March 11，1915.

[43] Stepun，*Wie war es möglich*，115.

[44] Tunstall，*Blood on the Snow*，12.

[45] KA，NFA 1868，k.u.k. 1 Regt. Der Tiroler Kaiser Jäger，March 13，1915，Col. Mollinary，"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von Sekowa am 8. März."

[46] Stone，*Eastern Front*，314.

[47]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116-117.

[48] Rudolf Jerabek，"Die Brussilowoffensive 1916：Ein Wendepunkt der Koalitionskriegführung der Mittelmächte，" dissertation，Vienna，1982，1：6-8.

[49] Stone，*Eastern Front*，114.

[50] Stanley Washburn，*On the Russian Front in World War* Ⅰ：*Memoirs of an American War Correspondent*（New York：Robert Speller，1982），89.

[51] HHSA，PA I 842，Leipzig，Dec. 4，1915. Includes copy of "Die 28er—Armee-Befehl de dato 25 April 1915."

[52] Tunstall，*Blood on the Snow*，12，20-21.

[53] Golovine，*The Russian Army*，58.

[54]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140；Golovine，*The Russian Army*，48-54.

[55] John Morse，*In the Russian Ranks*（New York：Grosset and Dunlap，1918），252；Dowling，*Brusilov Offensive*，7，26. Of the 5 million Russians under arms in 1915，only 650，000 to 1.2 million（there were various estimates）actually had a rifle. See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267-270；Ruhl，*Antwerp to Gallipoli*，266.

[56] KA，B/677：23，Manfred Beer，March 1993，"General von Auffenberg-Komarów nach 70-jährigen Attacken posthum rehabilitiert"；Josef Ullreich，"Moritz von Auffenberg-Komarów：Leben und Wirken，" dissertation，Vienna，1961，148-150.

[57] KA，NFA 911，4 Armee Kdo，Cracow，Nov. 16，1914，"Beurlaubung

Mitglieder des ungarischen Reichstages.”

[58] 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84-185；Stone，*Eastern Front*，124.

[59] Replies to the *Frage-Bogen* and additional *Fragepunkte* here：KA，Gefechtsberichte（GB）86，Standort der Brigade，Mar. 17，1915，GM Balberitz；Standort，March 18，1915，Feld-Jäger Battalion Nr.17；Standort，Mar. 20，1915，50 Inf-Brig. Kommando.

[60] KA，NFA 1878，Allgemeine Erfahrungen，1914-1915. See reports throughout this *Karton*.

[61] KA，GB 86，93 ITD，July 1915，GM Adolf Boog，“Nervenstörungen”；Ruhl，*Antwerp to Gallipoli*，256.

[62] Dowling，*Brusilov Offensive*，24.

[63] HHSA，PA I，905，Copenhagen，Sept. 30，1914，Dionys Széchenyi to Berchtold.

[64]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118-120.

[65]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244，248，252-257.

结语

一九一五年三月，喀尔巴阡山上的雪变软时，康拉德命奥匈帝国诸将向士兵重新说明战争的目标。“对这场冲突的看法”，士兵似乎“分歧得离谱”，这一事态必须予以“厘清并统一”。康拉德的新说法如下：奥匈帝国与德国属于“平和的中欧”，但它们的敌人经过数年用心准备，“从最深沉的宁静中”猛扑向这些无助的受害者。巴黎、伦敦、彼得格勒诸“匪”发动了荼毒人民的“冒险战争”；法国人是为了找到新的投资处所；英国人是为了统治世界；俄国人则要以十足虚伪的泛斯拉夫主义为幌子，用“火、剑、西伯利亚”“奴役”更多人，摆出“俄国好似自由国度的样子”。

奥匈帝国军官必须告诉其士兵，他们在打一场新三十年战争，必须保卫中欧，使其不受协约国的蹂躏。不然，后果之可怕只会更甚于十七世纪。十七世纪时，叛变的捷克人受到肯定，结果“在那场冲突后，波希米亚人口只有四分之一存活”。总而言之，奥地利士兵获告知，他们打仗是因为英、法、俄三国阴谋使德国、奥匈帝国沦为“奴隶民族”。三国中逼人最甚者是俄国。俄国是个“丰饶、落后的地方，由军人和官僚统治，贪污横行，广大人民贫穷且无知”。



一名奥匈帝国军官和前来保护他的德国人

一九一五年，德国人已接管奥匈帝国的作战事务。照片中第七军军长约瑟夫大公与德国将领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以及两人的参谋，摄于喀尔巴阡山脉。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康拉德解释道，俄国人引发这场战争，以使他们的革命知识分子（列宁、托洛茨基之类的“危险分子”），把目光从俄国内部问题移开，让他们心中燃起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俄罗斯——“亚细亚、半亚细亚的野蛮民族，人数是我们的四倍之多”——觊觎君士坦丁堡，但也觊觎巴尔干半岛，想以之作为俄国产品的外销市场，并鼓动巴尔干诸国反奥匈帝国“这个爱好和平的多民族帝国”。该走的路显而易见：继续打下去，否则会落得“和巴尔干半岛一样的下场”，也就是遭击败、殖民、陷入“饥饿与不幸”。这份传阅的文件叮嘱奥地利士兵，这就是“你们疲惫不堪时该摆在心里思考的：胜利的必要。你们所有充满活力的青春梦想，肯定还没被这场战争的苦难扑灭”。[1]

但奥地利的帝国梦想已遭扑灭，彻底扑灭。没人相信这些谎言，尤其不信那些编造谎言者。为了解（火炮不足这原因之外）军队战绩这么差的原因，奥匈帝国陆军部一九一五年初期向诸指挥官发了另一份问卷，并将其标为最高机密文件。“民族沙文主义或其他有害的倾向，在我们的军官身上清楚可见？我们的军官讲起士兵的语言流利到足以领导、激励他们？我们得尽量让军官和其所统领的士兵属于同一民族？”至于士兵，“为何在各战线上出现那么多不够坚忍或彻底崩溃的例子？”奥匈帝国团级部队里“煽动族群或煽动反对军方”的因子，是战争开打前就存在于现役士兵中，还是动员时由招来的后备军人所引入？

诸民族齐心组成一快乐帝国的虚幻不稽的说法，在平时可支撑住军队，但在开战后，禁不住战争压力，已彻底瓦解。波蒂奥雷克于一九一二年就示警道，奥匈帝国三分之一的军人在大战时会不愿打仗，此刻的情势正证明他有先见之明。士兵虽然乖乖报到，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穿上军服后无心作战。[2] 军队逐渐解体，主要原因是不再有人相信多民族的“奥地利使命”。至少对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来说，“奥地利使命”只是把装备不良的奥匈帝国人民铲进德意志人的战争机器里。[3]

德国人迅速且鄙夷地接管奥地利的作战事务。驻西部战线的奥地利联络官于一九一五年中期指出，康拉德已被梅济耶尔、普列斯（Pless）的“德国参谋和司令部”贬为无足轻重的角色（梅济耶尔、普列斯分别是德军西线、东线两战场的总司令部所在地）。[4] 此后直至战争结束，每次奥地利人陷入险境，德国人就会前去搭救。他们干预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加利西亚的战事、一九一五年塞尔维亚的战事，一九一六年（重创奥匈军队的布鲁西洛夫攻势后）再度干预布科维纳、加利西亚战事，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克伦斯基攻势（Kerensky Offensive）之后再度干预加利西亚的战事。一九一七年，德奥联军在卡波雷托（Caporetto）拿下大捷，而诚如鲁登道夫所说，打这场仗（又称第十二次伊松佐河战役）既是为打倒意大利人，也为“防止奥匈帝国垮掉”，因为此前十一次

伊松佐河战役，已使奥匈帝国战斗力大减。[5]



一九一五年休息的德军

组织、武器、领军作战方面都优于奥军的德军，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势里再度大败俄军。照片中为一九一五年五月行军途中休息的德军。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德军这些救援行动，的确有几次令德奥燃起希望，但终究是转瞬即逝的希望。一九一五年五月的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势（Gorlice-Tarnow Offensive），德奥在一个星期里夺回俄军花了半年才夺下的城池。他们击毙、打伤俄军一百四十万，另俘虏了一百万。一支小小炮兵部队所能发挥的威力，令人震撼。德国第十一集团军部署了四百门火炮，其中将近半数是重型壕沟炮，备用炮弹三十万枚。[6] 俄军按照对付低战斗力的奥军时所惯有的轻松方式列队展开，赫然发现他们喀尔巴阡山阵地的侧翼出现德军。英国武官在俄军总司令部写道，这是场俄国的卡波雷托战

役（“这一严峻考验，大部分军队碰上都会败下阵来”），俄国未因此败亡，完全是因为德军受到其他威胁的大大牵制，因为奥军实在弱得无可救药。[7]

鉴于俄军的中央部位遭撕裂，军队被一拆为二（一在加利西亚，一在波兰），一九一五年春，俄军拔腿急退，有些部队一天后撤七十二公里。[8] 但“奥古斯特的火炮”所揭露的俄国种种难题仍在。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在著名的“突破战役”里，带领德军获胜。突破战役开打于俄国炮兵因该国的“炮弹危机”而几乎失去武装之际，因而德军占有天时之利。此役的关键条件，是未彻底改革工业、军事科技程度低的奥地利人怎样也无法拥有的。

尼古拉·哥洛文将军把德国人在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势里所用的方法，比喻为“某只巨兽”的打法。这只巨兽会要其步兵悄悄潜近俄军壕沟，接着“把它的尾巴——重型火炮，拉向壕沟”，但会保持在低劣的俄国火炮刚好打不到的地方。然后这只巨兽会用“鼓击般的炮火”（又密集又快速，听来像是击鼓不断的炮火），打垮俄国的壕沟。接着德国人（或他们的奥匈帝国援军）会向前急冲占领打得稀巴烂的俄国壕沟。如果俄国预备队反攻，德国炮兵会把他们也了结；幸存的俄军全会被躲在夺来的壕沟或炮弹坑里的德国步兵击毙。“然后这只巨兽会再拉起它的尾巴，其重炮会开始有条不紊地重击俄军下一道防线。”[9]

德国人以昂贵科技替其士兵护身，借此减轻战争的残酷；奥匈帝国人（战前和战时）紧缩开支，把他们的步兵像垃圾一样丢弃。一九一五年有位俄国将军坦承，“德国人不惜消耗金属，我们不惜消耗人命”，这句话用在奥地利人身上同样贴切。一九一五年六月随德国部队快速穿越波兰时，哈里·凯斯勒（Harry Kessler）中尉停下来检视奥匈帝国某次进攻后的残骸：“数百万只苍蝇和一股又浓又湿的气味……森林里布满横七竖八的尸体，全是奥地利人的尸体。脸已全黑，像黑人，已半腐烂，

表面覆盖污物和土。几乎每棵树旁都有一具尸体……那是这场战争最血腥的事件之一，而且毫无意义或成果。”[10] 诚如凯斯勒笔下逸事所间接表示的，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势，乃是德国人的突破性进展，而非奥地利人的突破性进展。这时俄国炮兵团全团一天只有十枚炮弹可用，但奥匈帝国的战斗报告显露的是更为徒劳、代价更大的进攻和有限的战果。[11]

一九一五年十月，终于打败塞尔维亚。马肯森打赢戈尔利采之役，即奉命接掌由马克斯·冯·加尔维茨（Max von Gallwitz）的德国第十一集团军和赫尔曼·冯·科费斯的奥地利第三集团军组成的暂编兵团。他们南攻，渡过多瑙河，两个保加利亚集团军则西攻，人力、弹药都已枯竭的塞尔维亚不支倒下。有位哈布斯堡外交官严正宣告，这场战役将“对东线战局有决定性影响”，将打开通往亚洲的补给线，使同盟国取得急需的石油、金属等物资。这位奥地利外交官十月下旬呈文外长布里昂，说“塞尔维亚这一障碍的垮掉，将使我们终于掌控这一至关紧要的战略路线和多瑙河通道”。[12] 保加利亚人十月八日拿下尼什，十一月二十四日拿下比托拉（希腊语称莫纳斯提尔）。加尔维茨部顺着摩拉瓦河往南猛进，一路只遇轻微抵抗，将塞尔维亚彻底一分为二。到了十二月中旬，加尔维茨部已一路挺进到马其顿的库马诺沃（Kumanova），距萨洛尼卡只有一百六十公里。埃伦塔尔和弗朗茨·斐迪南只能把拥有萨洛尼卡当作梦想；而今德国人就准备要实现这梦想。拿下萨洛尼卡是德国人更大策略的一部分。根据这策略，要先拿下有“英国的第二个直布罗陀”之称的此地，然后拿下“通往三个世界的门户”苏伊士。这一进攻将由马肯森领军。[13]



德国皇帝会晤新任奥地利皇帝

一九一七年三月的西克斯图斯事件，乃是奥地利躲掉战争的最后机会。德皇（左）风闻此事后，把奥地利新皇帝卡尔一世（右）叫到德军总司令部，逼他回头。卡尔自称“和新生儿一样无知”，温顺地接受德国所有要求。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但德国人只能延长这场战争，无法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在蒙斯（Mons）、伊普尔消灭英国远征军，赫然发现有二十五个军的基钦纳“新军队”形成于狼藉的尸体之后，五百艘英国皇家海军战舰扼住德意

志民族的咽喉。德国人一九一四年杀死、打伤或俘虏无数俄国人，却在来年面对兵力更大的一支俄军。从一九一六年至战争结束一直统筹德军作战行动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曾以一句话总结他的战略缺陷。他写道，“确立纯战略性的目标之前，得先思考战术，若不可能在战术上成功，追求战略目标只是徒劳”。此言甚是（协约国与同盟国的战略计划整体来讲失败，因为强攻壕沟的打法无法实现那些计划），但鲁登道夫太自负，相信借由改进其战术，他能克服此战争无法克服的战略难题：一亿两千万人的奥德同盟要如何打败有两亿六千万人口，拥有更多兵力、船舰，国民收入比同盟国高六成的协约国联盟？[14] 德国人战术很高明，战略却奇糟，未坦然评估自己、奥地利人与敌人的实力差距。一九一四年七月时若这么做，他们会务实寻求外交解决，而非开战。

奥匈帝国未与行事愈来愈不顾后果的德国保持距离，反倒局促不安地投入德国的怀中。这并非势不可免。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八十六岁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终于在申布伦宫去世，卡尔大公（这时已是卡尔一世皇帝）透过任职于比利时陆军的大舅子西克斯图斯亲王，询问与法国、俄国个别媾和的条件。随之展开的西克斯图斯事件（Sixtus Affair），一九一七年三月时达到决定性阶段，且是奥地利躲掉德国主导的战争，救亡图存的最后机会。透过西克斯图斯转达的协约国媾和条件——要求交出阿尔萨斯-洛林，恢复塞尔维亚、比利时的独立地位——奥地利“无兴趣看待”俄国声索君士坦丁堡之事。

鉴于奥匈帝国已遭遇如此多的惨败，这些条件并不苛刻，卡尔皇帝收到消息后既惊且喜，表示要大力促成。[15] 遗憾的是，他在书面上表示愿大力促成，实际行动却拖泥带水。一年后德国人风闻此事（此前克列蒙梭公布卡尔的信函以分化同盟国阵营），鲁登道夫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将卡尔叫到德军总司令部，逼他回头。卡尔皇帝先是说谎（那些信是“伪造”的），然后归咎于他的外长（外长扬言如果皇帝坚决不同意他会自杀），最后向德国人求饶，宣称他“像新生儿一样无知”。德国人向

这位回头浪子提出的条件很严苛：只要战争没停，军事和经济上都要唯柏林是从。

这时时局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概述的美国在欧目标——总结于美国参战十个月后的一九一八年一月他所提出的十四点原则里——只要求重组奥匈帝国，而未要求将其解体。英法仍极乐见出现改革后的奥匈帝国，作为战后防止德国或俄国扩张的屏障。如果卡尔皇帝要抽身，此刻就得抽身；俄国人已被打退出战场，意大利人在卡波雷托之役后也几乎如此。一九一八年开始时他所短暂享有的优势，此后将不再有。德国人正准备以从俄国调来的部队，在西部战线发动一大规模攻势。将军生涯步入尾声的康拉德，即将在愚蠢的皮亚韦战役（Battle of Piave）中再失去三十万官兵，从而（在一九一八年六月）把在卡波雷托战役中所赢得的，大部分吐了回去。只让境内百分之七公民享有选举权，不让其斯拉夫裔、罗马尼亚裔人民享有美式“自主发展”待遇的匈牙利，不是那种会在威尔逊重新审视大局后存活的伙伴。[16]

换句话说，机不可失，若背叛同盟国阵营，卡尔皇帝将获得厌战的协约国某种程度的支持，但卡尔未这么做，反倒软弱屈服于德国的压力，让德国接管奥匈帝国境内所有事物（部队、铁路、公路、军火、工厂），甚至誓言此后奥匈帝国将为保住斯特拉斯堡作战到底，一如为保住的里雅斯堡作战到底。[17] 威尔逊总统最初愿意与奥地利人合作，此刻则嫌恶转身，不再理会那个“德国政府的附庸”，并在一九一八年九月承认捷克、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从而为肢解奥匈帝国揭开序幕。[18]

这场战争始于倚赖德国武器的奥匈帝国，也结束于这样的奥匈帝国。德国人计划于一九一八年以从俄国抽调来的部队，在西部战线发动大规模春夏攻势。这场攻势失利，德意志、奥地利两帝国随之垮掉。卡尔皇帝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向其人民发表宣言，承诺变革和承诺成立一新的“民族部”，但为时已晚，这时这君主国的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

都已宣告独立，卡尔除了流亡国外，几乎无其他路可走。这个君主国登场时威风八面，好不神气（击败土耳其人、拯救基督教世界），下场时让人不胜唏嘘。

史学家常以哈布斯堡君主国直到一九一八年才灭亡一事，证明它的坚忍顽强或正当性，但这说法太牵强，不足采信。这个君主国是个残忍的碎骨机。它在一九一四年以最漫不经心的作风耗掉它征召的最精壮兵员，然后如弗里德里希大公一九一五年所忧心忡忡指出的一样，只能倚赖“营养不良的孩子和年老男子”打仗。[19] 法国人利用俄国人、意大利人、塞尔维亚人所提出的死伤记录，一九一六年估计，由于哈布斯堡军队一九一四年几乎遭全歼和此后每月平均损失十二万兵力，奥匈帝国已“耗掉”它所能取得的大部分男子。[20] 据估计还有六十五万奥地利男子未被耗掉，而这些人大概每日提心吊胆，不知在这支军队里还能活多久。“第三度修正男子”（即曾两度被评断为身体或心智上不适打仗而免服兵役的应征入伍男子）的加入，为六十五万奥匈军增添了兵力。但这是支什么样的军队？[21] 一九一六年寄到霍夫堡宫门的一封匿名信，真相贯穿在思乡之情中：“陛下，如果你想认识这场战争的真实面貌，不必派你的陆军部长千里迢迢到前线，只要派他到后备兵站看看即可。在那里，正有得了严重结核病的男人被强征入伍；在那里，正有得了心脏病的五十岁男子被令以整齐步伐集体走来走去，直到不支倒地为止；在那里，自称有病的男子遭下狱十四天。”[22] 像这样的男子，在战场上没有立足之地，将一批批成群死去。光是在东部战线，就有一百万奥地利人丧命，其中半数死于感染和疾病。在一九一四年秋，战争从机动战转为壕沟战时，哈布斯堡军队的情况未好转，只是较易维持军纪而已。但每当奥匈帝国士兵置身开阔地，奉命展开新攻击时，通常打得很糟或逃跑。奥匈军总司令部于是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发了一份令人难堪的极机密通条给诸军、师长，想知道俄军“虽然后备士兵和军官的素质劣于我方，但在弹药比我们少的情况下，为何打得比我们出色许多”；二十万奥匈帝国官兵在加利西亚作战期间怎么会“消失得如此快且彻底”；为

何“有那么多次进攻，甚至就连敌寡我众的进攻，都被打得七零八落”。

凡是在前线附近待过的人都知道答案：奥地利士兵不在乎胜败，已不愿承受行军、待壕沟的苦。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老百姓。奉命离开壕沟行军至别处时，大批士兵在路旁坐下，等着被俘。弗里德里希大公要求将士兵鉴别分类，“较佳者”送到前线，老弱送到后方部队。这正证明逃避责任的风气在哈布斯堡军队里有多盛行，最有战斗力的人利用关系把自己弄到后方安全的宿营地，这位大公不得不在提出此建议时放话稽查，“以确保此命令严格执行，提升我军战斗力”。[23]

一九一四年时，以团为傲的精神就已渐渐成为明日黄花。团向来是拥有自身历史、讲究仪式排场的部队，但随着团在战火中消融，谁都看得出当兵只是去当炮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布隆（捷克语称布尔诺）上演了一件让军方颜面无光的事。当时，第八团某连上火车，开赴前线。火车加速时，一名全身战斗装的步兵跳出货车厢，落在月台，拔腿逃命；结果被围困在火车站广场一隅，遭宪兵以棍棒打倒在地，三百名路人惊愕看着这一幕。[24] 哈布斯堡第三十团，一九一五年四月从格拉茨（Graz）得到补充兵员后，该团波兰人痛殴他们，叫他们“德意志猪”，扯破他们的背包，抢走他们的食物。[25] 格拉茨这些波兰恶霸，大概会集体自豪于他们属于一七二五年在伦贝格所创建之团一事，但不会有人自豪于他们的新际遇：编入独立营，独立营会被随机安插进暂编团。暂编团则是为了集拢各残破部队里可用的残兵，将他们送回前线而成立，而到了前线，他们也可能难逃一死。[26]

每个地方的壕沟战都非常残酷。有位战地记者报道了一九一五年在布达佩斯某医院所见到，来自喀尔巴阡山脉的冻伤病患和截肢者，“医生得意夸称他们很善于找到良好的健康纤维皮瓣和制作合用的假腿，他们的农民伤员则一下子咧嘴而笑，一下子绷起脸”。[27] 另一名记者惊骇地看着混在一块的奥地利人、俄国人尸体，像好多“块生铁”般被倒进敞

露的壕沟里。诚如他所说的，这不是“维也纳的女孩向这些青春正盛的健壮年轻男子喝彩时”心里所想的下场，甚至不是奥匈帝国陆军部所想的下场。陆军部原保证会“把官兵六人一个棺木，埋在从远处可容易见到的高地上，以表达祖国对这些英勇军人的虔敬和感激”，结果却是把这些不知姓名的官兵一股脑丢进万人坑里，撒上生石灰。[28]

一九一六年康拉德在其某份保守自大的公报里确立了最高指挥部轻慢的作风：向士兵保证，只要“往地下挖三米，就会安全无虞。这样的壕沟即使遭直接命中，士兵也几乎不会受伤害，只有些许震动和摇晃，但士兵会没事”。[29] 当他和弗里德里希大公得为自己寻找挡住一切攻击的安全处所，挽救他们破败的名声时，就一点也没这么自满。整个一九一六年，康拉德与弗里茨尔拼命欲打消深受霍夫堡宫宠信但黯然下台的布鲁德曼将军所提出的要求，即对他们两人在两次伦贝格战役中领导有否失当的调查。一九一六年七月康拉德紧张地抗议道：“总司令部无法响应已遭卸除兵权的将领提出的每个申诉、备忘录、作战报告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康拉德痛恶德国人，此时却坚持要布鲁德曼看看“德国陆军的指导原则：将领遭卸除兵权即永远不会再取得兵权，且永远不会对其遭卸除兵权之事提出抗议”。这一如黑手党成员被抓即封口，绝不泄露组织秘密的原则，肯定合康拉德的意，尽管他战后写了带有偏见的回忆录，整个战后生涯都在做替自己辩解的抗议。他一九一六年对布鲁德曼的背后中伤，将化为二十五页以不空行方式打成的文稿，而那就像是他回忆录的第一份草稿，把自己说成无辜受害者，受害于有勇无谋的下属。他写道：“为了维护纪律，我得促请陛下的军事文书署将这一调查连同布鲁德曼的平反要求一并驳回。”八月，经过一番思考后，博尔弗拉斯将军和皇帝再度退缩，拒绝调查、平反。[30]

康拉德所谓在壕沟里会平安没事的保证，从未平息士兵的疑虑。他

们并不安全，全军所有官兵被炮轰得胆战心惊，不想再这样下去。战争步入尾声时，哈布斯堡军队已分为两派：居少数的“冲锋集团”（年轻有冲劲者）和居多数的“防守集团”（军中大部分人）。冲锋集团是仿德国方式打造的冲锋队，吃得好，薪水高，装备好，执行所有进攻；防守集团则在整个战争期间扮演全然被动的角色，挖壕沟，修壕沟，守壕沟。[31]

一九一六年布鲁西洛夫攻势所引发的情景，即使是厌战的奥地利人都感到震惊，且说明了这个君主国的大部分官兵如何不愿打这场战争。卡尔·冯·弗朗泽-巴尔丁将军谈到他“破败的军队”，目击者惊讶地看着奥匈帝国一场大规模（且出乎预料）的反攻，竟演变为集体投降，数千名哈布斯堡士兵丢下步枪，举起双手跑向俄国防线。[32] 多达三十五万奥地利人以如此方式向俄国人投降，布鲁西洛夫收复一九一五年失去的所有土地，一路攻回到喀尔巴阡山脉诸山口。布鲁西洛夫攻势打掉了奥地利人仅存的些许进攻能力，迫使他们把军队交给德国人指挥，直至战争结束。[33]

一九一六年，康拉德的总司令部遇到一突如其来的报复性活动，因为每个奥地利军、师都奉命查明问题根源，予以解决。两年前兵败萨巴茨后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彻底失败的特尔斯蒂扬斯基将军，向他的集团军如此讲话：“第四集团军被战斗力并不具压倒性的敌人赶出强固的阵地，被逼退好远，损失众多士兵和物资，且辛苦建造的桥头堡和斯蒂尔河（Styr）阵地也未守住，你们得给我一个解释！”军官奉命调查其部队，查明是谁带头组织集体逃亡，谁同意放弃如此多加农炮和机枪，并奉命“无情”惩罚还留在部队里的所有坏蛋。[34]

但还有什么惩罚，比留在这个军队和这个走入歧途的战争里继续打仗，更为无情？到了一九一七年，哈布斯堡军队已几乎称不上是军队。丧命、受伤或被俘者（共三百五十万），和剩下的现役军人一样多。[35] 由于协约国军队不断增加其火炮、炮弹、机枪的数量，每个哈布斯

堡士兵都确信自己很快就会从第二类（活人）变为第一类（死人），于是许多人开始撤离。一九一七年开始时，被俄国人俘虏的奥匈帝国士兵高达一百七十万（相对地，被俘的德国人只有此数目的十分之一）。[36] 一九一七年六月俄军克伦斯基攻势，在奥匈帝国第三集团军的诸军之间，轻易就扯开一道五十公里宽的缺口，又俘虏数千人。若非俄军本身为失望情绪和布尔什维克宣传所腐化，奥匈帝国很可能已在那年画上句点。[37]

在意大利战线的苏加纳谷（Val Sugana）——阿尔卑斯山中史上有名的狭长谷地，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往来亚得里亚海的要道达数百年——某奥地利团的整个领导阶层（斯洛文尼亚裔上校、四名捷克裔军官、三名捷克裔士兵），在卡尔扎诺（Carzano）投奔意大利壕沟，然后带敌军回来，穿越奥军铁丝网，进入奥军壕沟，把此团整个俘虏。奥匈帝国当局宣称震惊，但这问题自一九一四年起一直未消失而且是日益恶化。[38] 集体逃亡变得司空见惯；一九一八年十月某日，匈牙利第六十五团一千四百五十一人逃亡。这时，哈布斯堡君主国已开始把有专门技能的军火工人、男孩、领养老金者送进其战争机器里。在索尔费里诺战役（Battle of Solferino，一八五九年）和柯尼希格雷茨之役（一八六六年）之间那几年出生的老人，一九一六年被征召入伍，一直服役到战争结束。[39]

对奥匈帝国来说，这场战争从头至尾都没有道理可言，而一九一七年俄国戏剧性的战败和解体，最为鲜明突显这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夺取政权后，突然退出战争，并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中，把波罗的海地区、白俄罗斯、波兰、乌克兰割让给德国。俄国的垮台照理应使同盟国阵营团结，结果反倒加深该阵营成员间的分歧。德国评论家觉得上了奥匈帝国的当。哈布斯堡王朝在战场上打得一塌糊涂，从头至尾倚赖德国支援，却在俄国垮掉时，试图在俄国割让的波兰、乌克兰大片土地

里分一杯羹。哈布斯堡王朝想得到波兰，然后派一大公治理该地，但此事若成真，哈布斯堡君主国里斯拉夫人与德意志人比例失衡的程度会加剧到危及其生存的程度。有位分析家于一九一七年晚期写道，“奥地利一千万德意志人会淹死在七千万或更多斯拉夫人的大海里”。吃下波兰这块肥肉，奥匈帝国版图会增加一倍，斯拉夫人和天主教徒会更能左右民意的走向，这几乎必然导致奥匈帝国日后与其盟邦德国决裂。这一预言绝非杞人忧天，一九一七年时德国人未把波兰视为该直接吞并的土地，而是视为该先清空其上的波兰居民、再安置以德意志人的一个空间。那一构想因俄国撤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有实现的可能，且将导致德国在下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展开有计划的族群清洗和种族灭绝。[40]

俄国的战败让奥匈帝国得以继续打这场艰苦的大战，但奥地利人从未解决俄国充沛人力所带来的难题，美国作者（暨俄国通）约翰·里德（John Reed），对此有言简而意赅的说明：“落败但变强之军队的吊诡，即撤退的一大群人，其撤离本身为征服者带来他们所非常不乐见的后果。”一九一五年在伦贝格看过看不到尽头的俄国步兵纵队走向野战餐车后，里德写道：“现在，唱着歌的军人如长河般涌进每个街道……这是俄国用之不竭的国力，她血管的有力血液，从她深不见底的人力喷泉随意洒出，浪费掉，毫无节制地用掉。”[41] 里德热爱他的俄国人，以浪漫手法描绘他们。事实上俄国人杀自己人，就和奥地利人杀他们一样麻木不仁，而俄国农民不是傻子，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不是毫无抵抗地向奥地利人投降，就是逃亡。他们于一九一四年响应动员，但一年后大批逃亡。

整个大战期间，俄国老百姓惊讶于“在城里、村子里、铁路边、俄国全境四处游荡”（沙皇的农业部长一九一五年语）的军人之多。其中只有少数人有假条（征召入伍兵鲜少有幸得到的特权）。载增援部队赴前线的俄国运兵车，有时抵达目的地时才发现，车上的军人已全部跳车逃走。俄国行军营的逃跑率平均达四分之一。[42] 一九一六年时，法国

人已把每月死伤率降到一九一四年水平的一半，俄国人的死伤率却未降低，甚至反倒升高。一九一四年时俄国人用光其第一级本土防卫预备队，一九一六年时则耗尽所有第二级预备队。一如奥地利人，他们开始把他们所能找到的男子都征召入伍，一九一六年俄国国会某委员会痛批军方“恣意挥霍”：没有足够的“铅、钢、爆裂物”，俄国将领觉得“用人血打开通往胜利之路”没什么好大惊小怪。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国人已在思考所有人力物力用尽的问题，二月革命突然爆发时，俄国人正努力欲解决该问题。临时政府决定继续打仗以取得“最后胜利”一事，使该政府失去了深信打这场战争徒劳无益只是送死的人民的支持。死伤惨重到了吃不消的程度：一百三十万人丧命，四百二十万人受伤，两百四十万人被俘，总数将近八百万。[43] 十一月时，布尔什维克人以非常宏观的政纲——列宁要结束战争——拉下临时政府。

但俄国熊的垮掉也救不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君主国已分裂为数个得到协约国帮助的“民族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受邀于巴黎和会上表达他们各自的民族独立主张。德国于《凡尔赛条约》中受到人尽皆知的惩罚，奥匈帝国则在《圣日耳曼条约》（the Treaty of St. Germain）、《特里亚农条约》（the Treaty of Trianon）两条约中寿终正寝。这两个条约于一九一九年正式裂解哈布斯堡帝国，创造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个新国家，强化既有国家（例如罗马尼亚）的版图。塞尔维亚吸并维也纳的原南斯拉夫土地，成为名叫南斯拉夫的新国。在其他所有民族都退出后，由哈布斯堡王朝仅存的小块土地，即维也纳至因斯布鲁克之间的德意志人地区，郁闷地组成奥地利共和国，且受条约所束，严禁与北边大上许多的德意志人国家合并。

奥匈帝国垮台的影响甚大。《凡尔赛条约》要德国割土、赔偿且严格限制德国海陆军力，但德国国力受削弱只是表象。事实上，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所创造的新秩序，使德国变强。苏俄已缩回去打内战，陷入孤立，而后来的发展表明，从中欧奥匈帝国割出的“继起诸国”，国力太

弱，挡不住德国（或苏俄）的侵犯。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它们与英法结盟。巴黎和伦敦把这些新国家视为制衡东山再起之德国或俄国的潜在力量。这些防御条约意在填补哈布斯堡王朝留下的权力真空，最终却在德国人于一九三八年吸并奥地利和窃取捷克斯洛伐克后，一九三九年尝试侵犯波兰时，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如一九一四年时，西方列强不情不愿地动员开战，以解决来自中东欧的纠纷。

这场人间浩劫的罪魁祸首在西方历史里的形象，从未受到大幅修正。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仍是那个留着络腮胡、居心良善的帝国老爹。这岂是事实？就最高指挥官的角色来说，他是个屠夫。就战略家的角色来说，他是个不自量力之人。就政治家的角色来说，他原本可以利用在位如此之久的契机修正或减轻令奥匈帝国衰弱的诸多难题，结果他毫无作为。传说收到意大利已于一九一五年向奥地利宣战的消息时，这位老皇帝深情微笑，低声道“终于和意大利打起来，这下我可以开心了”，如果此说不假，我们不得不推断此人老时已性情大变，变成凶残之人，与年轻时谦逊的他判若两人。[44]



民族自决：
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解体，
1918~1919年

总的说来，我们得重新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把奥地利人摆进新的历史位置。从根本上来说，奥匈帝国并不是一个正派的，而是带着光环的懒懒散散的强权，它稀里糊涂地闯入并打完了整个战争。它是个心态极其矛盾的强权，为了保住其自古即拥有对波希米亚、匈牙利之类土地——已不想再和哈布斯堡王朝有瓜葛，正努力脱离自立的土地——的所有权，不惜让整个欧洲陷入战火。奥地利的大战建立在不计后果的赌注上，即赌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内部问题可靠战争来解决。实则战争解决不了那些问题。[45] 这不是战后才为人所揭示的。一九一四年的重大事件发生之前许久，总理卡西米尔·巴德尼（Casimir Badeni）就指出，奥匈帝国境内失意的诸民族与该帝国的军事安全拥有明眼人都看得出的关联：“多民族国度发动战争，必会危及自身。”[46] 但奥匈帝国还是发动了战争。该帝国最后一位外长奥托卡·切宁（Ottokar Czernin）伯爵，以太不当一回事的口吻论道，“我们在劫难逃；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怎么死，而我们选了最可怕的死法”。[47] 前线士兵陷身于这场可怕战争

的最可怕的环境里，若听到切宁（胎死腹中的西克斯图斯事件的主导者）这番话，肯定会深表赞同，且遗憾于他无法阻止或结束这场战争。

一九一四年七月，老皇帝最后一次抽出他的剑，却惊骇地看着挥出的剑刃被挡开，反转，刺回他肚子里。哈布斯堡王朝没理由于一九一四年开战，却开了战，要自己人民在准备不周的攻势里送死，然后打起一场使已然衰弱的君主国必然垮掉的消耗战。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里，有太多错误和失算，而奥匈帝国一九一四年的决定堪称是其中最不明智且最应受斥责的。这场大战只是在我们的历史地图上赢得的一块黑色区域，而维也纳，和柏林一样，同是这块区域的核心。

---

[1] Kriegsarchiv，Vienna（KA），Neue Feld Akten（NFA）1878，Kriegsministerium，March 20，1915，“Ursachen und Ziele des Weltkrieges 1914/15.”

[2] KA，B/1503：5，Sarajevo，Dec. 21，1912，Potiorek to Conrad.

[3] KA，NFA 1878，“Fragen die dem Kpskmdo bis 31./1 1915 erschöpfend zu beantworten sind”；A.J.P，Taylor，*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London：Penguin，1948），254.

[4] General Josef von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Leipzig：Paul List，1921），148.

[5] B.H. Liddell Hart，*The Real War 1914-1918*（Boston：Little，Brown，1963），305.

[6] Richard DiNardo，*Breakthrough*：*The Gorlice-Tarnow Campaign* 1915（Santa Barbara：Praeger，2010），48-49.

[7] Alfred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 1914-17*（London：Hutchinson，1921），1：349-350.

[8] Fedor Stepun，*Wie war es möglich*：*Briefe eines russischen Offiziers*（Munich：Carl Hanser Verlag，1929），129；Harry Kessler，*Journey to the Abyss*：*The Diaries of Count Harry Kessler*，*1880-1918*，ed. and trans. Laird M. Easton（New York：Knopf，2011），685.

[9] Nikolai N. Golovine，*The Russian Army in the World War*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221.

[10] Kessler，*Journey to the Abyss* ，687.

[11] Golovine，*Russian Army* ，145.

[12] 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837，Munich，Oct. 22 and 28，1915，Vélics to Burián.

[13] HHSA，PA I，837，Munich，Nov. 30，Dec. 22，1915，Vélics to Burián.

[14] Liddell Hart，*Real War* ，368-369.

[15] William de Hevesy，“Postscript to the Sixtus Affair，” Foreign *Affairs* 21，no. 3（April 1943）.

[16] Taylor，*Habsburg Monarchy* ，254-255；Géza Andreas von Geyr，*Sándor Wekerle* （Munich：Oldenbourg，1993），353，378-379，396-397.

[17] David Stevenson，*Cataclysm* （New York：Basic Books，2004），304；Alan Sked，*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815-1918（London：Longman，1989），259；Holger H. Herwig，*The First World War*：*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1914-1918* （London：Edw. Arnold，1997），369-370.

[18] A.Scott Berg，*Wilson* （New York：Putnam，2013），538；Sked，*Decline and Fall* ，260；Taylor，*Habsburg Monarchy* ，268-271.

[19] KA，NFA 1878，AOK，Oct. 15，1915，“Ursachen und Vermeidung grosser Verluste.”“Jünglinen und alternden Männern.”

[20] Golovine，*Russian Army* ，48-49.

[21]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EMA 7N 846，Jan. 30，1916，“La Situation Militaire：L’état actuel de l’Autriche-Hongrie.” Mission Russe，Paris，March 24，1917，Col. Ignatieff.

[22] KA，B/75（Bolfras），Frühjahr 1916，Anon，letter to Kaiser Franz Joseph I.

[23] KA，NFA 1878，AOK，Oct. 15，1915，“Ursachen und Vermeidung grosser Verluste.”

[24] HHSA，Allgemeines Verwaltungsarchiv（AVA），MdI Präs.，Karton 1733，Prot. Nr. 1511，Jan. 20，1915，Kriegsüberwachungsamt to Interior Minister.

[25] HHSA，AVA，MdI Präs.，Karton 1733，Prot. Nr. 8797，Apr. 27，1915，Statthalter Graz to Interior Minister.

[26] KA，Gefechtsberichte（GB）86，March 17，1915，GM Balberitz.

[27] Arthur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A Year of the War on Many Fronts—and Behind Them*（New York：Scribner’s，1916），244.

[28] KA，GB 86，4 Armee Etappenkommando，“Allgemeine Direktiven für die Errichtung von Militärfriedhofen im Felde，Juni 1915”；Stanley Washburn，*On the Russian Front in World War* Ⅰ：*Memoirs of an American War Correspondent*（New York：Robert Speller，1982），59.

[29] KA，NFA 1877，AOK，Feb. 4，1916，GO Conrad.

[30] KA，B/96：3a，AOK to Militärkanzlei Seiner Majestät，July 26，1916；Bolfras to Brudermann，Aug. 21，1916.

[31] Geoffrey Wawro，“Morale in the Austro-Hungarian Army，”in *Facing Armageddon*，ed. Hugh Cecil and Peter Liddle（London：Leo Cooper，1996），399-410；SHAT，EM A 7N 845，Paris，Oct. 13，1917，“Renseignements sur les‘troupes d’assaut’de l’Armée Austro-Hongroise d’après enquête faite au camp de prisonniers de Bagnaria-Arsa.”

[32] Rudolf Jerabek，“Die Brussilowoffensive 1916：Ein Wendepunkt der Koalitionskriegführung der Mittelmächte，”dissertation，Vienna，1982，2：308-9.

[33] Timothy C. Dowling，*The Brusilov Offensiv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xv.

[34] KA，NFA 1795，4. Armeekdo，June 26，1916，GenObst Tersztyánszky to 10 KpsKdo.

[35] SHAT，AAT，EMA 7N 846，2ème Bureau，May 14，1917，“Armée Autrichienne.”

[36] Golovine，*Russian Army*，74.

[37] Dowling，*Brusilov Offensive*，xix-xx.

[38] KA，GB 1，k.u.k. 10 Armee Korps-Kdo，Oct. 8，1917，“Gefecht bei Carzano-Verrat am 18. Sept. 1917”；Liddell Hart，*Real War*，128.

[39] SHAT，AAT，EMA 7N 846，2ème Bureau，Oct. 13，1918，“Recrutement.”

[40] Dresden，Sächsiches Kriegsarchiv，Zeitgeschichtliche Sammlung 127，“Zwei politische Aufsätze，1917.”

[41] John Reed，*Eastern Europe at War*（London：Pluto，1994[1916]），92.

[42] Golovine，*Russian Army*，122.

[43] Golovine，*Russian Army*，67，77，93.

[44] I was told this anecdote by Prof. Lothar Höbelt of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45] Norman Stone，“Army and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1900-1914，” *Past and Present* 33，no. 1（1966）：111.

[46] 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28.

[47] Norman Stone，*World War One：A Short History*，（New York：Basic Books，2009），22.

参考文献

档案

AUSTRIA

Vienna

HHSA Haus-，Hof-und Staatsarchiv

AVA Allgemeines Verwaltungsarchiv

PA Politisches Archiv

KA Kriegsarchiv

AOK Armeeoberkommando

B Nachlässe

GB Gefechtsberichte

MKFF Militärkanzlei Franz Ferdinand

MKSM Militärkanzlei Seiner Majestät

NFA Neue Feld Akten

EVB Evidenzbureau

FRANCE

Vincennes

SHAT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

GERMANY

Dresden

Sächsiches Kriegsarchiv

UNITED KINGDOM

Kew

BNA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FO Foreign Office

WO War Offic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DC

NARA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出版物

Afflerbach，Holger. *Falkenhayn*：*Politisches Denken und Handeln im Kaiserreich* . Munich：Oldenbourg，1994.

Alten，Georg von. *Handbuch für Heer und Flotte* . 6 vols. Berlin：

Deutsches Verlagshaus，1909-1914.

Auffenberg-Komarów，Moritz Freiherr von. *Aus Österreichs Hö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 . 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

Bardolff，Carl Freiherr von. *Soldat im alten Österreich*：*Erinnerungen aus meinem Leben* . Jena：Eugen Diederichs，1938.

Bloch，I.S. *The Future of War* . Boston：Ginn，1897.

Blond，Kasper. *Ein Unbekannter Krieg*：*Erlebnisse eines Arztes während des Weltkrieges* . Leipzig：Anzengruber-Verlag，1931.

Brettner-Messler，Horst. “Die Balkanpolitik Conrad von Hötzendorfs von seiner Wiederernennung zum Chef des Generalstabes bis zum Oktober-Ultimatum 1913，” *Mitteilungen des österreichischen Staatsarchivs* 20（1967）.

Brosch-Aarenau，Alexander von. *Der militärische Ausgleich* . Vienna：k.u.k. Hofbuchdruckerei，1909.

Broussilov，A.A. *Mémoires du General Broussilov*：*Guerre 1914-18* . Paris：Hachette，1929.

Brusilov，A.A. *A Soldier’s Notebook* . London：Macmillan，1930.

Buchanan，Meriel. *The Dissolution of an Empire* . London：Murray，1932.

Burián，István. *Austria in Dissolution 1915-18* . New York：George Doran，1925.

Churchill，Winston S. *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 . London：Thornton Butter worth，1931.

———. *The Unknown War* . New York：Scribner，1931.

Clark，Christopher. *The Sleepwalkers* . New York：Harper，2013.

Cornwall，Mark，ed. *The Last Years of Austria-Hungary* . Exeter：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2002.

Cramon，August von. *Unser Österreich-Ungarischer Bundesgenosse im Weltkriege* . Berlin：Mittler u. Sohn，1920.

Cruttwell，C.R.M.F. *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1914-1918* . Chicago：Academy，2007［1934］.

Danilov，Yuri. *La Russie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 Paris：Payot，1917.

Deák，István. *Beyond Nationalism*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Dedijer，Vladimir. *The Road to Sarajevo* . London：MacGibbon and Kee，1967.

Der "Militarismus" in Österreich-Ungarn . Vienna：Seidel，1902.

DiNardo，Richard. *Breakthrough*：*The Gorlice-Tarnow Campaign 1915* . Santa Barbara：Praeger，2010.

Dowling，Timothy C. *The Brusilov Offensive* .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

Emmerson，Charles. *1913* . 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3.

Fischer，Fritz.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 New York：Norton，1968.

———. *War of Illusions* . 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75.

Fraccaroli，A. *La Serbia nella sua terza Guerra* . Milan，1915.

Fromkin，David. *Europe’s Last Summer* . New York：Vintage，2005.

Fuller，William C.，Jr. *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 1600-1914* . New York：Free Press，1992.

Golovine，Nikolai N. *The Russian Army in the World War* .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

Groszen Generalstab，Serbien. *Der Grosze Krieg Serbiens zur Befreiung und Vereinigung der Serben，Kroaten und Slovenen* . 7 vols. Belgrade：Buchdruckerei des Ministeriums für Krieg und Marine，1924-1926.

Gumz，Jonathan. *The Resurrection and Collapse of Empire in Habsburg Serbia 1914-1918*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Hagen，Mark von. *War in a European Borderland*：*Occupations and Occupation Plans in Galicia and Ukraine 1914-1918* .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7.

Hantsch，Hugo. *Leopold Graf Berchtold* . 2 vols.Graz：Verlag Styria，1963.

Hasek，Jaroslav. *The Good Soldier Svejk and His Fortunes in the World War* . Trans. Cecil Parrott. London：Penguin，1985［1923］.

Herrmann，David G. *The Arming of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Herwig，Holger H. *The First World War*：*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1914-1918* . London：Edw. Arnold，1997.

Hötzendorf，Franz Conrad von. *Aus Meiner Dienstzeit 1906-1918* . 4 vols. Vienna：Rikola，1921-1923.

———. *Infanteristische Fragen und die Erscheinungen des Boerenkrieges* . Vienna：Seidel，1903.

———. *Mein Anfang* . Berlin：Verlag für Kulturpolitik，1925.

Hoffmann，Max. *The War of Lost Opportunities* . New York：International，1925.

———. *War Diaries* . 2 vols. London：Seeker，1929.

Jelavich，Barbara. *History of the Balkans* . 2 vol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Jerabek，Rudolf. “Die Brussilowoffensive 1916：Ein Wendepunkt der Koalitionskriegführung der Mittelmächte，” 2 vols. Dissertation，Vienna，1982.

———. *Potiorek* . Graz：Verlag Styria，1991.

Kerensky，A.F. *The Catastrophe* . New York：Appleton，1927.

Kessler，Harry. *Journey to the Abyss*：*The Diaries of Count Harry Kessler*，*1880-1918* . Ed. and trans. Laird M. Easton. New York：Knopf，2011.

Knox，Alfred. *With the Russian Army 1914-17* .2 vols. London：Hutchinson，1921.

Kraus，Karl，ed. *Die Fackel* . 12 vols. Munich：Kösel-Verlag，1968-1976.

Krauss，Alfred. *Die Ursachen unserer Niederlage*：*Erinnerungen und Urteile aus den Weltkrieg* . 3rd ed. Munich 1923.

Lackey，Scott W. *The Rebirth of the Habsburg Army* . Westport：Greenwood，1995.

Laffan，R.G.D. *The Serbs* . New York：Dorset Press，1989［1917］.

Liddell Hart，B.H. *The Real War 1914-1918* . Boston：Little，Brown，1963.

Ludendorff，Erich. *My War Memoirs* . New York：Harper，1919.

Lyon，James M.B. "'A Peasant Mob'：The Serbian Army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War."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1（July 1997）：481-502.

Markus，Georg. *Der Fall Redl* . Vienna：Amalthea Verlag，1984.

McMeekin，Sean. *July 1914* . New York：Basic Books，2013.

———.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 Cambridge，MA：Belknap Press，2011.

Menning，Bruce W. *Bayonets Before Bullets*：*The Imperial Russian Army 1861-1914* .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

Mitrovic，Andre. *Serbia’s Great War 1914-1918* . 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2007.

Mombauer，Annika. *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Morse，John. *In the Russian Ranks* . New York：Grosset and Dunlap，1918.

Musil，Robert.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 2 vols. New York：Vintage，1996［1930-1933］.

Neue Ö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1815-1918* . 22 vols. Vienna：Amalthea，1923-1987.

Norman，Henry. *All the Russias* . 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02.

Österreichische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Heereswesen und vom Kriegsarchiv.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 .7 vols. Ed. Edmund Glaise-Horstenau，Rudolf Kiszling，et al. Vienna：Verlag der militärwissenschaftlichen Mitteilungen，1930-1938.

Paléologue，Maurice. *An Ambassador’s Memoirs* . London：Hutchinson，1933.

Peball，Kurt. “Der Feldzug gegen Serbien und Montenegro im Jahre 1914.” Österreichische Militärische Zeitschrift Sonderheft I（1965）.

Pfeffer，Rudolf. *Zum 10 . Jahrestage der Schlachten von Zlocsow und Przemyslany，26-30 August 1914* . Vienna：Selbstverlag，1924.

Pflanze，Otto. *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 . 2nd ed. 3 vol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Rauchensteiner，Manfried. *Der Tod des Doppeladlers*：*Österreich-Ungarn und der Erste Weltkrieg* . Graz：Verlag Styria，1993.

Redlich，Josef. *Schicksalsjahre Österreichs 1908-19*：*Das politische Tagebuch Josef Redlichs* . 2 vols. Graz：Verlag Böhlau，1953.

Reed. John. *Eastern Europe at War* . London：Pluto，1994［1916］.

Regele，Oskar. *Feldmarschall Conrad* . Vienna：Herold，1955.

Reiss，R. A. *Report on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Austro-Hungarian Forces* . London，1916.

Ritter，Gerhard. *The Schlieffen Plan* . 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79.

Rothenberg，Gunther E. *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 . 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

———.“The Austro-Hungarian Campaign Against Serbia in 1914.”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April 1989：127-146.

Ruhl，Arthur. *Antwerp to Gallipoli*：*A Year of the War on Many Fronts—and Behind Them* . New York：Scribner’s，1916.

Rutherford，Ward. *The Tsar’s Army 1914-1917* . 2nd ed. Cambridge：

Ian Faulkner，1992.

Schorske，Carl E. *Fin-de-Siècle Vienna*：*Politics and Culture* . New York：Vintage，1981.

Schwarzenberg，Felix Prinz zu. *Briefe aus dem Felde 1914-18* . Vienna：Schwarzenbergisches Administration，1953.

Shanafelt，Gary W. *The Secret Enemy*：*Austria-Hungary and the German Alliance 1914-18* . New York：East European Monographs，1985.

Schön，Joseph. *Sabac*！ Reichenberg：Heimatsöhne，1928.

Showalter，Dennis E. *Tannenberg*：*Clash of Empires* . North Haven：Archon，1991.

Silberstein，Gerard. *The Troubled Alliance*：*German and Austrian Relations*，*1914-17* .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0.

Sked，Ala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815-1918* . London：Longman，1989.

Sondhaus，Lawrence. *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Architect of the Apocalypse* . Boston：Humanities Press，2000.

Stepun，Fedor. *Wie war es möglich*：*Briefe eines russischen Offiziers* . Munich：Carl Hanser Verlag，1929.

Stevenson，David. *Armaments and the Coming of War*：*Europe 1904-14* .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

———. *Cataclysm* . New York：Basic Books，2004.

Stone，Norman. “Army and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1900-1914.” *Fast and Present* 33，no.1（1966）.

———. *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 . London：Penguin，1998［1975］.

———. “Hungary and the Crisis of July 1914.”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no.3（1966）.

———. “Die *Mobilmachung* der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n Armee 1914.”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 ，1974.

———. “Moltke-Conrad：Relations Between the 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General Staffs 1909-1914.” *Historical Journal* 9，no.2（1966）：201-28.

———. *World War One*：*A Short History* （New York：Basic Books，2009）.

Strachan，Hew. *The First World War* ，vol. 1，*To Arms*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Stürgkh，General Josef. von. *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 . Leipzig：Paul List，1921.

Taslauanu，Octavian C. *With the Austrian Army in Galicia* . London：Streffington，1919.

Taylor，A.J.P.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 . London：Penguin，1948.

Tunstall，Graydon. *Blood on the Snow*：*The Carpathian Winter War of*

1915 .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0.

———. “The Habsburg Command Conspiracy：The Austrian Falsification of Historiography on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 27 （1996）：181-198.

———. *Planning for War Against Russia and Serbia*：*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Military Strategies 1871-1914*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 *The Verdun of the East*：*Fortress Przemysl in World War I* .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1.

Ullrcich，Josef. “Moritz von Auffenberg-Komarów：Leben und Wirken.” Dissertation. Vienna，1961.

Washburn，Stanley. *Field Notes from the Russian Front* . London：Andrew Melrose，1915.

———. *On the Russian Front in World War I*：*Memoirs of an American War Correspondent* . New York：Robert Speller，1982.

Wawro，Geoffrey. *The Austro-Prussian War*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 *The Franco-Prussian War*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 *Warfare and Society in Europe 1792-1914* . London：Routledge，2000.

Wildman，Allan K. *The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 2 vol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Williamson，Samuel R.，Jr. *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 New York：St. Martin’s，1991.

索引

（以下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erenthal，Count Alois Lexa von，48，49，54-55，58-59，62-64，66-69，74，78，372

Aircraft，140，174-176

Albania，8，52，73-74，76，77，79，82，90，93，94，103，256，365

Albrecht，Archduke，89，137

Alekseev，General Mikhail，185，347

Alliance systems. *See* Triple Alliance and Triple Entente

Andrássy，Count Gyula，4，5

Apis，Colonel，67，99-100，108

Appel，General Michael，64，76，77，107，114，141

Armeeoberkommando （AOK）. *See* Conrad von Hötzendorf；General Franz；and Friedrich，Archduke

Arms race，xx，12，29，111，118-119

Artillery Austrian artillery，29，56-58，60，93，110，181，195，198，199，226，227，248，257，261，306，362-363

German artillery，370-371 Russian artillery，197，198，226

Assassination of Franz Ferdinand. *See* Sarajevo，assassination plot and Franz Ferdinand Atrocities，135，139，142，160，161，162-164，165（photo），167，170，231-232，233（photo），257-258，263-264，299，305，321，322，325

Auffenberg，General Moritz von，36-38，40，92-93，137，143

Auffenberg Affair，9，38，81，84，213，362

July Crisis，110，113，115，117

Komarów，131，135，178，180，181，190，200，202，203（map），204-217，226，234，247

Rawa-Ruska，232-236，234，236，238，239，240，245-247，248，250-251

War Minister，34，48，60，64，70，78，81，102

Ausgleich（1867），3-5，6，7，24-25，41-47，95

Austria-Hungary，4

Balkan Wars，73-77，90-91

bureaucracy，32-34，58，230

Dualism，xix，4，6，7-8，24-25，27，31-32

financial problems，6-7，29-30，64，80-81，94

Hungarian obstruction，3-8，12，24-25，32，41-43，47，54-55，91，123（*see also Hungary* ）

internal politics，26-29，32-34，41-43，47，96

“Magyarization，” 4-5，16-17，35，41-43，47

military weakness，xxiii，8-9，28-32，38-40，79，94-95（*see also* Austro-Hungarian military）

problem of nationalism，2-3，5，15，16（map），17-19，26-33，41-43，47，64，67-68，80，113，380-381，384（map）

rivalry with Serbia，xix，51-52，54-55，63，66-69，79，90-91，93，98，107

war aims，109-110

war plans. See War plans

Austro-Hungarian military，22-23，31-32，36-38，59-60

artillery. *See* Artillery

atrocities. *See* Atrocities

casualties. *See* Casualties

cliques，38-40

Common or joint *k.u.k* . Army，6-7，12，24，29-32，34-38，89

cooperation with the German army，65-66，122，126-129，169-170，171，178，247，249-250，269，270-272，276，277，283-284，287，291，300-301，313-314，336，339，341-345，351-352，358，369-373，380-381

corruption，9，38，40-41

general staff，38-40

Honvéd，3，6，29-30，123

Landwehr，6，123

language problems，22-23，31，34-37，159，163-164，190，261-262，363，368

low status，36-38，40-41

military weakness，xxiii，6-7，8，12，22—23，25，29，35-36，55-60，61-62，91，93，132-133，151

mobilization in 1914，xxiii，100-102，110，111-113，115-118，122-133，126-133

morale problems，227，248，251，256，257，262-263，282-283，299，303-305，307-309，318，333-335，353-354，361-364，368，376-378，379-380

prewar maneuvers，61-62，90，91-93，96，99，100，102

scandals，83-84，86-90 shell shortage，60，156，170-171，248，250，257，261，267-268，280，286，319，321，363

tactics. *See* Tactics

war plans. *See* War plans

Austro-Prussian War（1866），xix，xxii，1-3，4，7-8，11-12，17-21，23，38，58，61-62，156，177，193，215，243，338

Badeni，Count Casimir，27，28，33，383，385

Balkan League（1912-1913），73-74，90，255

Balkan policy of Austria，8，25-26，43-44，49，52-55，58-60，62-63，66-69，73-77，98，109，255，267，324-325，372

Balkan Wars（1912-1913），xxii，8，12-13，60，65，73-77，83，90-91，113，141，154

See also First Balkan War（1912）

See also Second Balkan War（1913）

Bardolff，Col.Karl，31-32，100

Beck，General Friedrich，17，23，38-40，84，88，91，92，139，141

Below，General Otto von，345

Berchtold，Count Leopold，48，76，79，255，271，313，323，327，336，338，341-342，364

Balkan Wars，77-79，94

July Crisis，106-109，113，116-119

Bethmann Hollweg，Theobald von，111，118-119，271

Beust，Count Friedrich von，3-4

Bilinksi，Ritter Leon von，113，153

Bismarck，Count Otto von，1，7，19-20，26，119，136

Black Hand，67，95，99-100，106

“Blank check，” 64，109-110，112，118

Böhm-Ermolli，General Eduard von，124，138，166，171，180，188，352

Lemberg battles，217，218，224，226，228

Rawa-Ruska，232，244

Boer War（1899-1902），65，121

Bolfras，General Arthur，39，79，120，139，140，167-168，209，251-255，257，266-267，307，313，321，336，337，350，352，364，378

Boroevic，General Svetozar，205，206，207-208，250（photo），252

Carpathian battles，349-350，352

Rawa-Ruska，232，237，238，239，242，244，246-247，248

San battles，282-283，303-304

Bosnia-Herzegovina，internal problems，67-68

occupation （1878） and annexation（1908），8，25-26，43-44，54-55，58-60，62-63，66-68，77，145

See also Balkan policy of Austria

Brest-Litovsk，Treaty of（1918），380-381

Brosch von Aarenau，Colonel Alexander，94，195，208-209，239-240

Franz Ferdinand’s influential aide，31，39-41，47，78，82

Brudermann，General Rudolf，92-93，131，223（photo）

Lemberg battles，180，204，208，211-213，217，221，224-229，378

Rawa-Ruska，232，236-237，242，246

Brusilov，General Aleksei，176，185，186，213，280，355

Lemberg battles，221，224，226，227-228

Rawa-Ruska，232，236，243，247-248，249

Brusilov Offensive（1916），369，379

Bülow，Prince Bernhard von，341，365

Bulgaria，44，52，63，69.73-74，83，90-91，95，134，150，255，267，315，316，323

Burián，Count István，113，116，166，342，365，372

Caporetto，Battle of（1917），369，370，374，375

Carpathians，Battle of（1914-1915），341-360，346（map），349（photo），353（photo）.

Casualties，xxi

Austrian，168，192（photo），200，205，219（photo），223，246，247，251，259，265-268，269-270，285，306，307，309，312，327，335-336，338-339，358，359-360，364，375-376

German，271，301，302

Russian，193，200，226，246，247，293，301，302，306，360，370，381-382

Serbian，168，268，319，325，336

Cavalry，174，176，177（photo）

Cer Mountains，Battle of（1914），149，151-155，164-165，166

Churchill，Winston，xxi，17，64，94，109，111，209，275

Ciganovic，Milan，108

Clemenceau，Georges，373

Colerus，General Emil，223，225，280

Congress of Berlin（1878），51-52，63

Congress of Vienna（1815），2

Conrad von Hötzendorf，General Franz，91，100，245（photo），311（photo），374-375

Carpathian battles，343-345，346（map），349-353，358-360

deployment in Galicia，169-170，171，172（map），173-174，178-179，180，181，185-186

July Crisis，110

Lemberg battles，189，204，207，211-213，217，221，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4，245（photo），378

Komarów，193-194，200，201-202，204，206-207，208-209，211-212，214，247

Krásnik，188-189，193-194，200，201-202

Lodz，299-301

mistress. *See* Reininghaus，Gina von

misunderstanding of modern war，102-103，176

mobilization errors，xxiv，96-97，102，110，111-113，115-118，122-135，169-171，178-179，228，299

pessimism，94，119，121，202，209，270-271，339，364

prewar reputation，xxiv，34，39，48，58，60-61，65，84，121-122

push for war，63-65，69-70，78，80-81，82，90，106-107，113

Rawa-Ruska，195，232-233，237-239，240，243-244，245（photo），247，249-250，378

Redl Affair，84，86-90

San battles，275-276，283-286，293，297，302-303，305-307，309

Serbian invasions，137-140，150，155，156，167，327-328，337-338（*see also* Potiorek，General Oskar）

wartime leadership，131-135，198，200，201-202，204，206-207，208-209，212，214，238，239，240，243-245，247，249-252，253-255，261，270-271，277，293，302-303，311-313，337-339，341-345，364-365，367-368，378，379

Conrad von Hötzendorf，Lieutenant Herbert，239

Conrad von Hötzendorf，Lieutenant Kurt，84，86. *See also* Jandric Affair

Crna Ruka，*See* Black Hand

Cult of the Offensive，61-62，65，102-103，196，209，217，254，268

Czech defeatism，163，242，285-286，353，359，367

Czech nationalism，19-21，27，31，33，35，80，96

Czernin，Count Ottokar，373，385

Czibulka，General Claudius，318

Danilov，General Yuri，183，185，197，347

Dankl，General Viktor，115，131，135，191（photo），209，210，240，275，280，282，283，285，299，307

Krásnik，180，188-191，194，198-204，213，226，236，238

Delegations，Austro-Hungarian，32，37，44，91，96

Dimitrijevic，Colonel Dragutin. *See* Apis，Colonel

Disraeli，Benjamin，20-21

Eichhorn，General Hermann von，345

Evert，General Aleksei，199，201，204，295，303

Falkenhayn，General Erich von，111，269-271，273，277，284，287-289，308，312，313，337，342-345，350，352，364，365

First Balkan War（1912），73-77，75（map），90，323

Fourteen Points（1918），373-374

France，63，71，97，271，367

French army，125（map），135-136，185，210

July Crisis，114，119

Franco-Prussian War（1870-1871），7，21，60，242，299

Frank，General Liborius，146，153，154，158-159，160，162，168，257-258，319，338

Franz Ferdinand，Archduke，xxiv，25，45，46（photo），69，90-93，104（photo），231，350

anti-Hungarian views，5，24-25，28-32，41-47，96

assassination of，xx，xxiii，99-100，103-107，117，121，128，137

proposed reforms，12，44-47

rivalry with Franz Joseph，39，40，45，48，78-79，88-89，95-96，100，105

strategic ideas，54-55，76-77，372

Trialism，54-55，96，103

Franz Joseph I，Emperor of Austria，xxiii，2，8，18（photo），33，46（photo），373

concessions to Hungarians，3-8，24-25，28-32，35，41-49，362

eclipsed by Franz Ferdinand，39-40，45，48，78-79，88-89，95-96，100

July Crisis，107，109，113

prewar leadership，39，48，58，64，69，76，96

vacillating policy，17，19-22

wartime leadership，127，128，133，137，143，151，171，200-201，215，253，255，257，261，266-267，303，316，323，365，378

Freytag-Loringhoven，General Hugo，178，31

Friedjung Trial（1909），66-67

Friedrich，Archduke，25，245（photo），311（photo），375

AOK commander，117-118，133，137-138，178，206，230，231，250-251，267，276，377，378

Carpathian battles，303，305，306，308，309，311-313

Lemberg battles，224，230，237，244，245（photo）

Galicia，xxii，174，175（photo），208-209，310（photo）

atrocities. *See* Atrocities

Gallwitz，General Max von，372

German army，55，56，371（photo）

casualties. *See* Casualties

cooperation with Austrian army，65-66，122，126-129，169-170，

171，178，247，249-250，269，270-272，273，276，277，283-284，287，291，300-301，313-314，336，339，341-345，351-352，358，369-373，380-381

operations on Western Front，135-136，266，273，287-289

war plans（*see also* Schlieffen Plan and War plans）

German nationalism in Austria，27，33

Germany，1-2，7，20-21

fears for Austria，12，63，79-80，94-95，118

push for war in 1914，xxi，12，80，94，108-110，115，118-119

support for dualism，7-8

See also German army

Giesl，General Arthur，83，84，147，149，150，256，260

Giesl，Wladimir，114-115

Golovine，General Nikolai，344，345，370

Gorlice-Tarnów Offensive（1915），370-372

Great Britain，1，59，94，118，119，271，288，313-314，367

BEF，125（map），289，313，372

Greece，44，52，63，73-74，134，267，315

Griessler，General Andreas，158，159

Grodek position，228，237，242，243-244，245（photo），280

Gumbinnen，Battle of（1914），180

“Halt in Belgrade，” 117，118，119

Haustein，General Heinrich，148

Hindenburg，General Paul von，200，230，250，288（photo），312，344

Warsaw battles，271，273，275-276，277，278，281-284，287-289，303

Hoffmann，Colonel Max，275，277，278，286-287

Hohenlohe，Prince Gottfried von，170，247，271-272

Holzhausen，Colonel Ludwig，187

Honvéd. *See* Austro-Hungarian military

Hoyos，Count Alexander，109

Hungary，3，34，375

rivalry with Austria，3-8，16-17，24-25，29-30，93，96，112

Huyn，General Karl，207，208，210，246

Italy

Libyan War（1911-1912），69

military weakness，xix

rivalry with Austria，11-12，30-31，49，68，69

threat of intervention，124，134，166，168，288，315，337-338，341-342，353，358，364-365

Ivanov，General Nikolai，182，185，190，199，210，212，213，226，238，277-278，280，284，302，347，360-361

Jagow，Gottlieb von，109

Jandric Affair，84，86

Jews of Austria，21，28，89，232，247，310（photo），311，349，357-358

Joseph，Archduke，157，158，160，166，369（photo）

Joseph Ferdinand，Archduke，193-194，251

Komarów，195，202-204，206-206，208，210

Rawa-Ruska，240，241，246

San battles，281，282，297，303-305

July Crisis（1914），xx，xxi，xxiii，106-116

Jurisic-Sturm，General Paul，147，325

Kageneck，Colonel Karl von，178

Karageorgevic，Crown Prince Alexander，103，143，320

Karageorgevic，King Peter of Serbia，51，59，103，256，328，330

Karl，Archduke. *See* Karl I，Emperor of Austria

Karl I，Emperor of Austria，137，178，244，251，312，342，373，374（photo），375

Kerensky Offensive（1917），369，380

Kolossváry，General Desiderius，221-222，225

Komarów，Battle of（1914），xxiii，172（map），190，196，202，203（map），204-217，226，233-234，247，251，362

Königgrätz，Battle of（1866），1，3，7，13，20-21，38，70，82，215

Kosovo，52，74，90，328

Kövess，General Hermann，171，176，188，218，224，372

Krásnik，battle of（1914），xxiii，172（map），187-194，198-204，213，217，226，236

Kraus，Karl，47，54，66-67，106，121-122，141-142，337

Krauss，General Alfred，156，225，256-257，262，263，267-268，327

Kritek，General Karl，210，241

Krobatin，General Alexander，79，107，110，113，212

Kuhn，General Franz，22

Kundmann，Major Rudolf，225，352

Lemberg，First Battle of（1914），172（map），186，188-189，199，201-202，206，207，211-213，217-229，235（map）

Lemberg，Second Battle of（1914）. *See* Rawa-Ruska，Battle of（1914）

Lenin，V.I.，380，382

Lichitski，General Platon，201，238，249

Limanowa，Battle of（1914），305-307

Linsingen，General Alexander，345，349

Lodz，Battle of（1914），274（map），291-302

Ludendorff，General Erich，250，273-277，278，287，288（photo），289，291，293，295，343-345，352，358，369，372-373

Lueger，Mayor Karl，27-28

Macedonia，8，52，59，73-74，75（map），76，82，83，90-91，103，256，323，329

Machine guns，57

Mackensen，General August von，278，282，291-292，295，296（photo），297，299-300，345，370，372

“Magyarization，”4-5，16-17，35，41-43，47，325，375

Marne，Battle of（1914），xxiii，158，185，210，230，266，269，270，271

Marterer，General Ferdinand，325-326

Masurian Lakes，Battle of（1914），277

Meixner，General Otto，279-280

Merizzi，Lieutenant-Colonel Erich von，105，141

Military changes 1866-1914，55-58，97，150，187

Misic，General Zivojin，144，145

Moltke，General Helmuth von “the Elder，” 1，38，150，177，215

Moltke，General Helmuth von “the Younger，” xxiii，64，83，96-97，230，270，273，296

July Crisis，108，111-112，118-119

mobilization，126-128

Montenegro，73

Moroccan Crises（1905 and 1911），xxi，12

Musil，Robert，33

Mussolini，Benito，338

Narodna Odbrana，66，108，114

Nationalism，problem of，2-3，16（map），18-19，22-23，26-28，32-35，47，93，96，113，384（map）

Naumann，Viktor，109

Nicholas Ⅱ，Tsar of Russia，51，95，111，182，183（photo），184，272，360

Nikolai，Grand Duke，136，182，183（photo），272，278，281，302，342，347，360

Nordstoss，188，189，195，202，204，212，217，299

Obrenovic dynasty，51，67

Offensive doctrine. *See* Cult of the Offensive

Opatowka，Battle of（1914），285

Ottoman Empire，8

Balkan Wars，73-74，77，81-82

First World War，315

partition of，26，44，51-52，81-82，94

weakness，xix，15，21，51-52

Young Turk revolution，59，70，73，82

Paic，General Josef，207，236，240，241-242

Paléologue，Maurice，272

Pan-Slavism，xvii，5，7，33，51，63，95，109，367，368

Pasic，Nikola，51，103，144-145，318，320，324

Peter Ferdinand，Archduke，207，211，213-215，242，362

Pfeffer，General Rudolf，225，226，229，246

Pflanzer-Baltin，General Karl von，304，308，349，379

Piave，Battle of（1918），375

“Pig War，” 68-69

Plan U（1905），5-6，30-31，47，49，78，81

Piehve，General Pavel，185，186

Komarów，195，199，200，201，202，204，205，206，207，208-211，213

Lodz，295，297

Rawa-Ruska，238，239，242，244

Poincaré，President Raymond，114

Poland，German-Austrian plans for，169，184，278-279，291-292，380-381

Potiorek，General Oskar，89，100，102，104（photo），142（photo）

assassination of Franz Ferdinand，103-106

August 1914 invasion of Serbia，102-103，108，130，132-134，137-142，146（map），146-152，153，155，160-163，166-170，178

Bosnian military governor，67-68，80，82，120

early career，39-40，84

October-December 1914 invasion of Serbia，268，316，317（map），318，320-321，323-327，329-332，335-338

September 1914 invasion of Serbia，253-255，254（map），257，262，266-268

Princip，Gavrilo，xx，99，106，107，121

Przemysl，fortress and sieges，171，249，252，279，284-285，345，350，358-359

Przyborski，General Arthur，154-155

Putnik，General Radomir，143，144，145，150-152，158，160，162，253，257，264，316，319，320-321，326，328-330，332

Railways，58，97，101-102，124，129-130

Rasputin，182，183

Ratzenhofer，Major Emil，129，130，132

Rawa-Ruska，Battle of （1914），172（map），186，199，223，232-246，235（map）

Redl Affair，9，83-90，93，100，131，149，212

Redlich，Joseph，133，202，238

Reed，John，381

Reininghaus，Gina von，100，110，115，121-122，133，177，179，202，238，356

Rennenkampf，General Pavel，184，286，295，297，300，301

Rhemen，General Adolf von，147，163，164，256，330，332，338

Rifles，56-57

Romania. *See* Rumania

Rudolf，Archduke，25，45

Rumania，44，52，73-74，90，91，95，112，134，166，267，315，316，353

Hungary’s Rumanians，17，112，113

Russia

pan-Slav policy of，xxi，51，95，367，368

rivalry with Austria-Hungary，xix，51，79

Serbian alliance，51-52，59，63，68，71，95，113，115

“steamroller，” xxii，66，96-97，113，122，124，131，170，171，181，186，191，202，269，289

See also Russian army

See also Russo-Japanese War

Russian army

artillery. *See* Artillery

casualties. *See* Casualties

deployment in 1914，182-187

manpower，xxii，56，66，97

mobilization，xxii，66，97，101-102，116-117，122，124，125（map），170，171

shell shortage，197，281，295，305，345，347-348，361，370

Stavka，136，182，183，184，185，210，278，284，301（*see also* Nikolai，Grand Duke）

supply problems，186，197，275，279，281，293-294，302，344-345，347-348，361

tactics. *See* Tactics

Russo-Japanese War（1904-1905），51，61，63，65，97，103，242

Ruzski，General Nikolai，185，186，199，302，347，360

Komarów，208，210，211

Lemberg，212，221，224，226

Lodz，295-296，299-301

Rawa-Ruska，232-233，238，239，241-242

Warsaw，277-278

Sabac，Battle of（1914），147，150，155，156-161

Salandra，Antonio，338

Salza，General Anton，185，186，189，190，193-194，199，200，204，210

Samsonov，General Alexander，184，286

Sarajevo，assassination plot，xxiii，13，99-100，103-107，108，114，121，153，155

Sarkotic，General Stefan，323，336

Scheffer，General Reinhard von，297，300-301

Scheidemann，General Sergei，293

Schemua，General Blasius，9，69-70，76，78，211，214，246

Schlieffen Plan（1905），xx，xxii，xxiii，65，96-97，100-101，113，122，124，125（map），126-128，270，273，276（*see also* War plans）

Schönaich，General Franz，39-40，78，155

Schönerer，Georg von，27

Schwarzenberg，Colonel Felix，156，258，262，318

Scutari Crisis（1913），8，74，77，82，93

Second Balkan War（1913），75（map），83，90-91

Seeckt，General Hans von，369（photo）Serbia，44，53（map）

atrocities. *See* Atrocities

August 1914 campaign，134-135，137-142，143-145，146（map），146-152，157-159

Balkan Wars，8-9，12，52，73-74，75（map），77，90-91

casualties. *See* Casualties

defeat in 1915，372

Field of the Blackbirds，52，77，90，103

military shortages，134-135，143-145，154，255-256，263，316，321，322

mobilization，102，116-117，125（map），134-135

October-December 1914 campaign，316，317（map），318-19，321-322，325-336

rivalry with Austria in Balkans，52，54-55，63，66-69，82，90-91，93，98，315-317，328-329

Russian alliance，51-52，59，63，68，95，113，115

September 1914 campaign，253，254（map），255-256，264（photo）

shell shortage，154，158，316

tactics. *See* Tactics

war plans. *See* War plans

Seton-Watson，R. W.，42，325

Sixtus Affair（1917），373-375

Stepanovic，General Stepan，152

Straub，Colonel Johann，110，127-129，130，132

Stürgkh，General Joseph von，230-231，298，300，313，351，

358，360，364-365

Stürgkh，Count Karl von，96

Sukhomlinov，General Vladimir，182，183（photo），184，197，272，278，279，281，347-348

Szögyeni，Count Ladislaus，109，111，112

Taaffe，Count Eduard，26，27

Tactics，Austrian tactics，23，61-62，65，151，155-156，162，167，187，190，191-192，195-197，201，205-206，210-211，220-221，222-224，227，239，242-243，249，256-258，260，265-266，305-306，361，371-372

Russian tactics，187，196，201，205-206，210-211，220-221，223-224，239，243，371

Serbian tactics，157，163，258，260，261，266

Tankosic，Major Vojin，108

Tannenberg，Battle of（1914），126，184，200，230，272，277，291，297

Tersztyánszky，General Karl，89，156，159-160，161，379

Thallóczy，Ludwig，317

The Good Soldier Svejk（Hasek），xxiii-xxiv，138

Tirpitz，Grand Admiral Alfred，314

Tisza，István，43，167，168，255，264，298-299，342，364

July Crisis，107-108，112-13，119

Treaty of Bucharest（1913），91

Treaty of London（1913），74，81-82

Trialism. *See* Franz Ferdinand

Triple Alliance，xx，7，49，70，112

Triple Entente，xx，12，55，69

Turkey. *See* Ottoman Empire

Ultimatum to Serbs. *See* July Crisis

Uxküll，General Alexander von，117，231

War plans，xx

Austro-Hungarian war plans，xxii，xxiii，49，65-66，77，85-86，87，94，96-97，100-101，112-113，115-118，122，124，125（map），126-127，131-132，138-142，167，324-325，372

German war plans，64-66，278-279，287-289，372-373. *See also* Schlieffen Plan

Russian war plans，101，113，183-186，272-273

Serbian war plans，101，145

Warsaw，Battle of（1914），273，274（map），275

Wilhelm Ⅱ，Kaiser of Germany，64，76，82，93，94，193，231，287，288（photo），295，312，313，336，351，374（photo）

July Crisis，108-111，118

wartime leadership，127，200-201，230，272，342

Wilson，President Woodrow，373-375

Wodniansky，General Friedrich，205，209

World War I casualties，xxi

origins，xix-xx

Woyrsch，General Remus von，271

Yanushkevich，General Nikolai，183，272

Ypres，Battle of（1914），xxiii，287-288，313，372

Zhilinsky，General Yakov，182，184，277

Zimmermann，Arthur，1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美）瓦夫罗（Wawro，G.）著；黄中宪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7

书名原文：A Mad Catastrophe：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Habsburg Empire

ISBN 978-7-5097-8883-7

Ⅰ.①哈… Ⅱ.①瓦… ②黄… Ⅲ.①奥匈帝国-历史 Ⅳ.①K52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1808号

哈布斯堡的灭亡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

著者/〔美〕杰弗里·瓦夫罗（Geoffrey Wawro）

译者/黄中宪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冯立君 李洋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5.25 字数：353千字

版次/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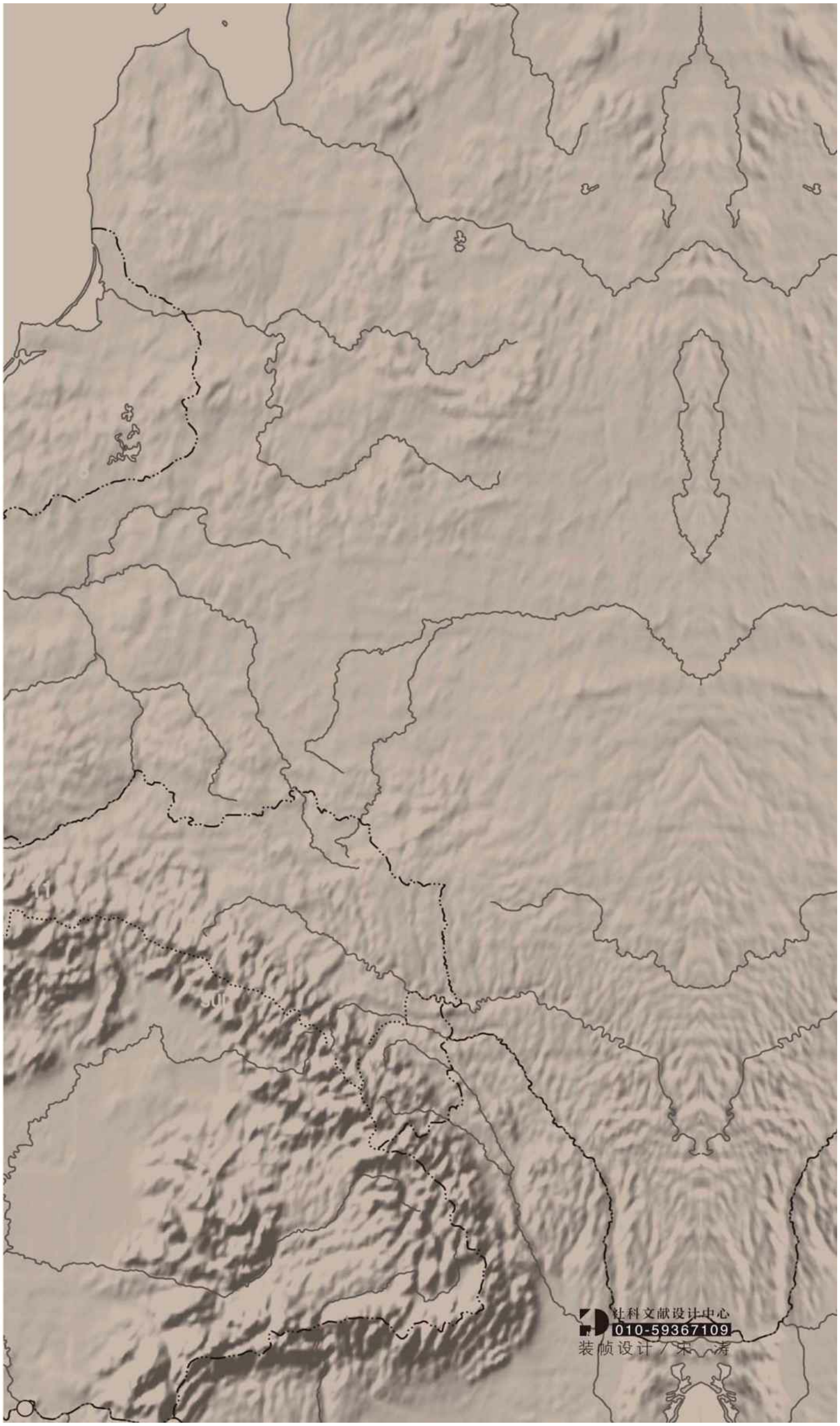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978-7-5097-8883-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5-2654号

定价/6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 / 宋 涛

《哈布斯堡的灭亡》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历史的相关著作，增添了一部特色独具且早该诞生的佳作。芭芭拉·塔奇曼《八月炮火》的书迷和伊斯特凡·萨博电影《雷德尔上校》的影迷，必会觉得这是部精彩、引人入胜、写作严谨的著作，为已然连篇累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故事给了必要的平衡。

——**彼得·茨瓦克（Peter Zwack），美国陆军准将**

杰弗里·瓦夫罗用精湛的文笔描述了哈布斯堡帝国如何在试图救亡图存时激起一场大战，然后如何在既无能又狂妄的作风下毁掉自己的军队。

——**诺曼·斯通（Norman Stone）**
《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World War One: A Short History*）作者

杰弗里·瓦夫罗引人入胜、备受肯定的著作，描述了奥匈帝国如何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头一年的杀戮战场里。哈布斯堡军队准备不周却自信满满，且因民族、宗教、利益的分殊而无法一致对外，遭到意料不到的痛击，从而使这个摇摇欲坠的君主国更早灭亡。这是旧中欧的墓志铭，对了解帝国的不自量力、政治人物的不负责任、可怕的人命牺牲，是一本很有益的入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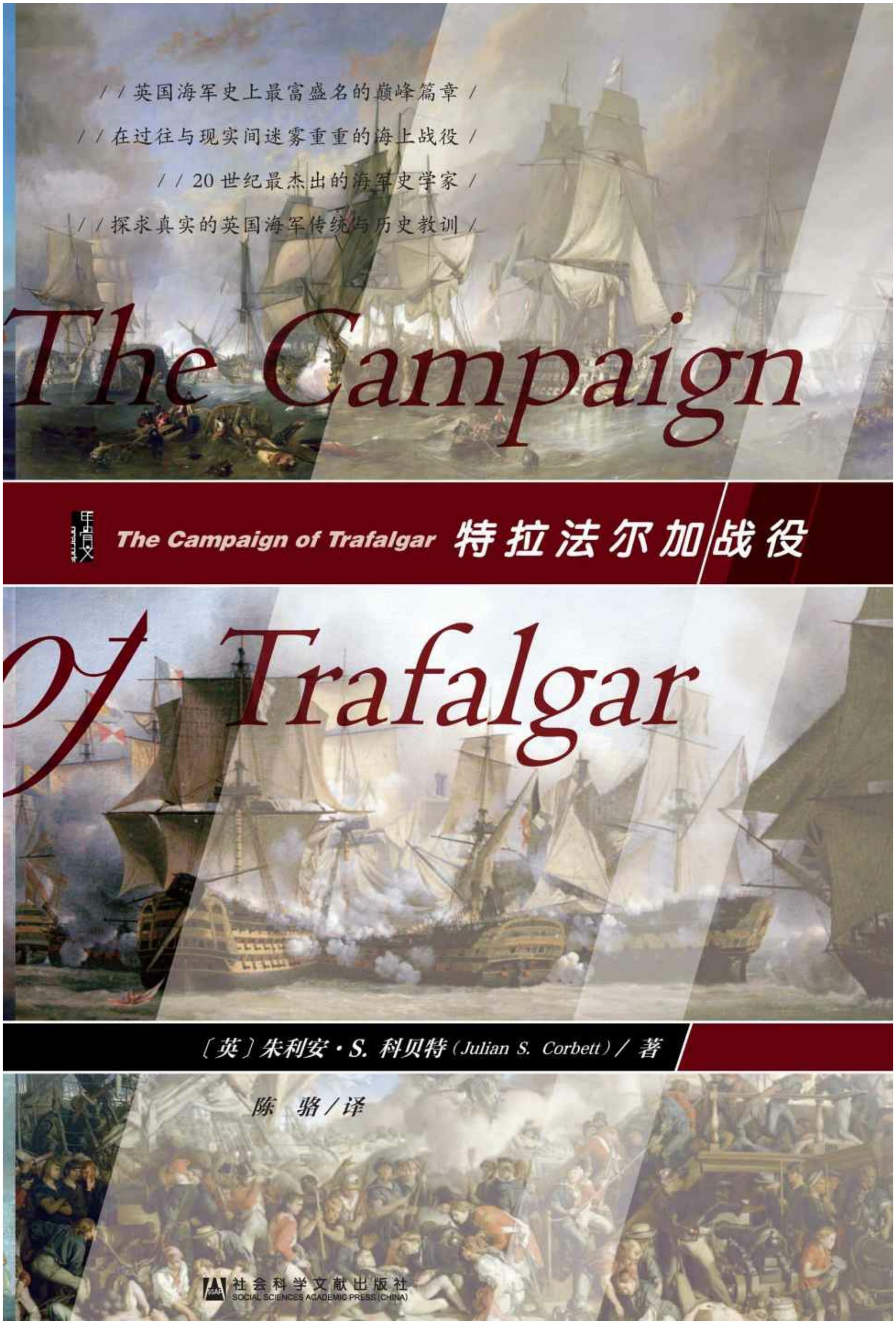
——**伊沃·巴纳克（Ivo Banac），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

甲骨文官方微信

ISBN 978-7-5097-8883-7

9 787509 788837 >

定价：69.00元


//英国海军史上最富盛名的巅峰篇章/
//在过往与现实间迷雾重重的海上战役/
//20世纪最杰出的海军史学家/
//探求真实的英国海军传统与历史教训/
The Campaign
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 特拉法尔加战役
of Trafalgar
〔英〕朱利安·S. 科贝特（Julian S. Corbett）/著
陈 骆/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朱利安 · S. 科贝特
（Sir Julian Stafford Corbett，1854 ~ 1922 年）

军事理论家，同时也是为广大历史学家所公认的英国最伟大的海洋战略家。其关于战争史和海军学术方面的著作主要集中于 16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风帆舰队的战斗活动，代表作有《德雷克的继承人》(1900 年)、《海军战略的若干原则》(1911 年)和《世界大战中的海军作战史》(1920 ~ 1922 年)等。本书《特拉法尔加战役》即是他于 1910 年出版的代表作之一。

陈骆，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对风帆时代的海军史有颇多了解。



本书根据Longmans，Green and Co. 1910年版本译出。根据后人对特拉法尔加战役的研究以及相关的解密档案，本书对原书进行了部分修订，并添加了注释，以便理解。书中航迹图以及有关插图已据原书内容进行了重绘。

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 特拉法尔加战役

〔英〕朱利安·S. 科贝特（Julian S. Corbett）/ 著

陈　骆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 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 / /（作者：**John Hoppn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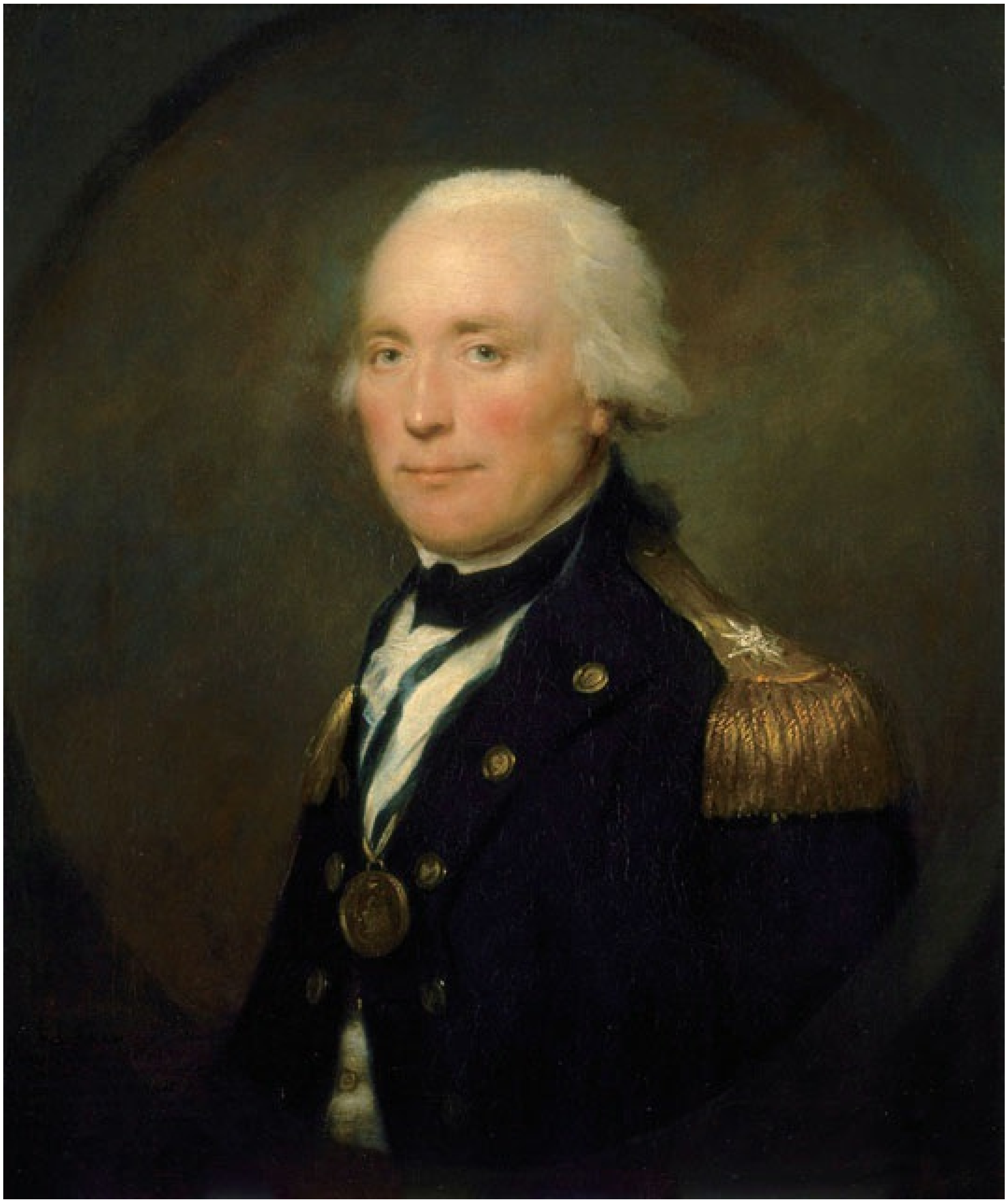
/ / 海军大臣查尔斯·米德尔顿，巴勒姆勋爵/ / /（作者：**Isaac Pocock**）



/ / 皇家海军将领艾伦·加德纳，加德纳男爵/ / / （作者：**William Beechey**）



/ / 皇家海军将领威廉·康沃利斯**/ / /** （作者：**John Eckstein**）



/ / 皇家海军将领罗伯特·考尔德/ / /（作者：**Lemuel Francis Abbott**）



/ / 皇家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 / /** （作者：**Lemuel Francis Abbott**）



/ / 皇家海军将领卡斯伯特·科林伍德/ / / （作者：**Henry How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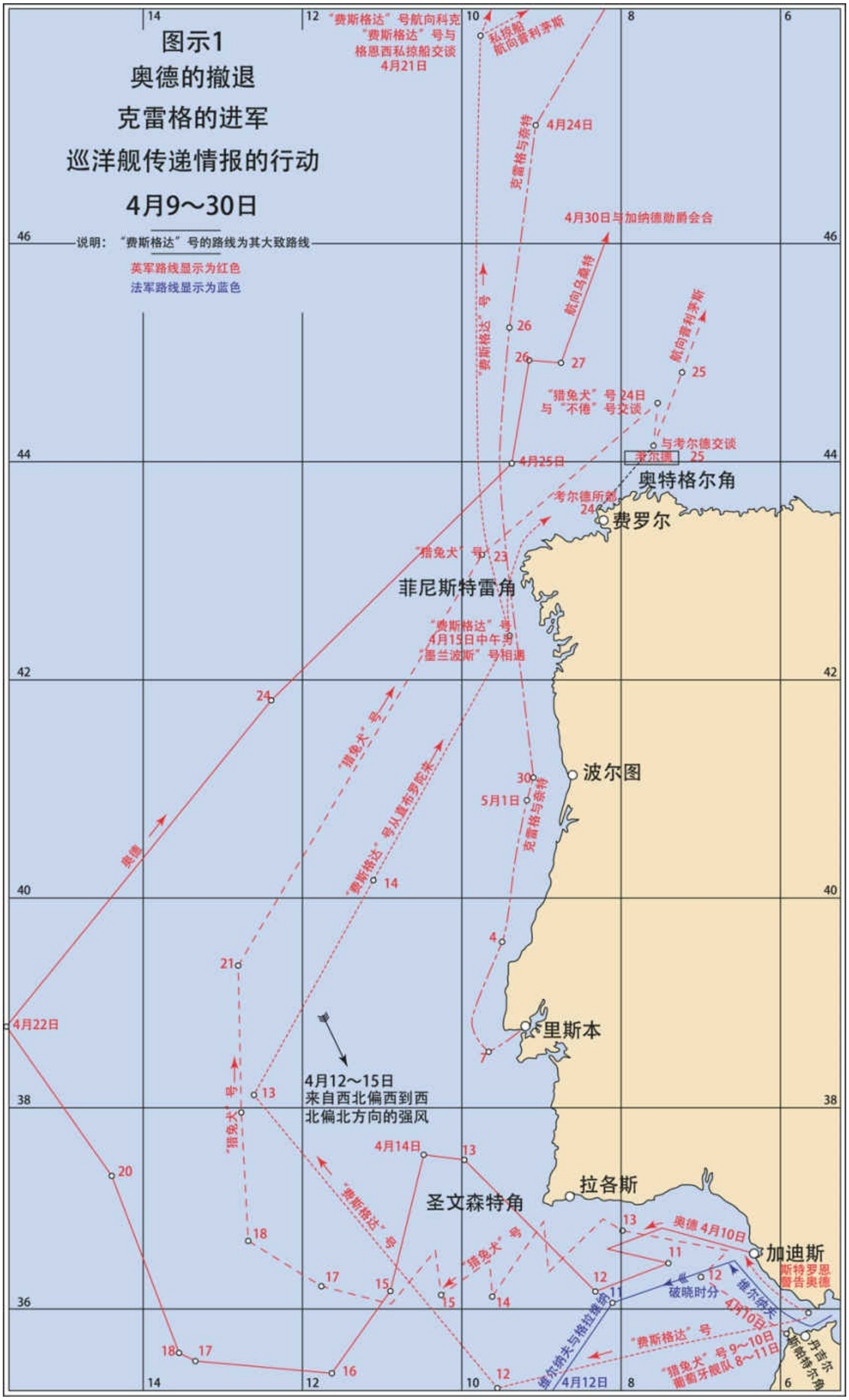
//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作者：**Andrea Appia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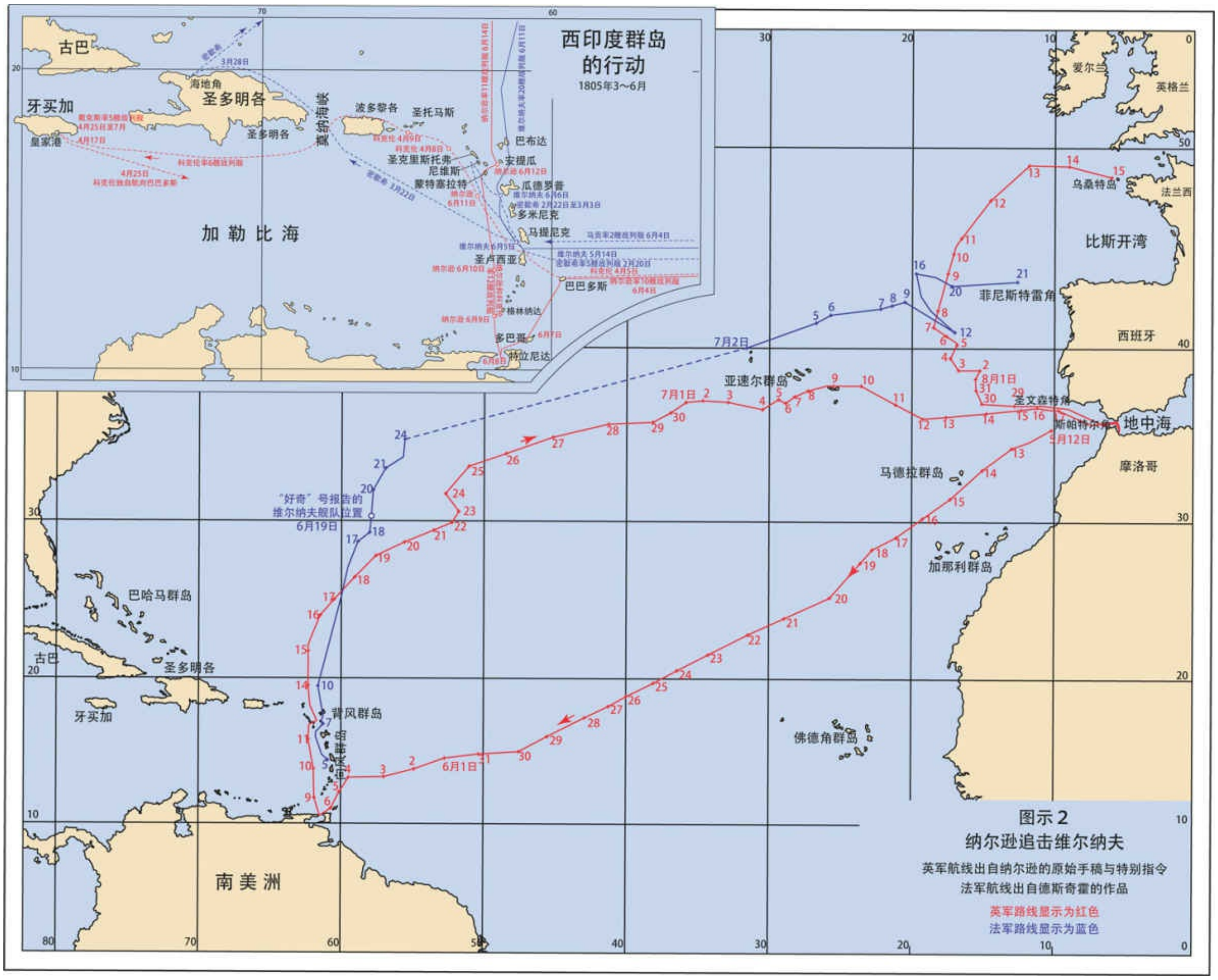
//法国海军将领皮埃尔-夏尔·维尔纳夫///（佚名，巴黎海军博物馆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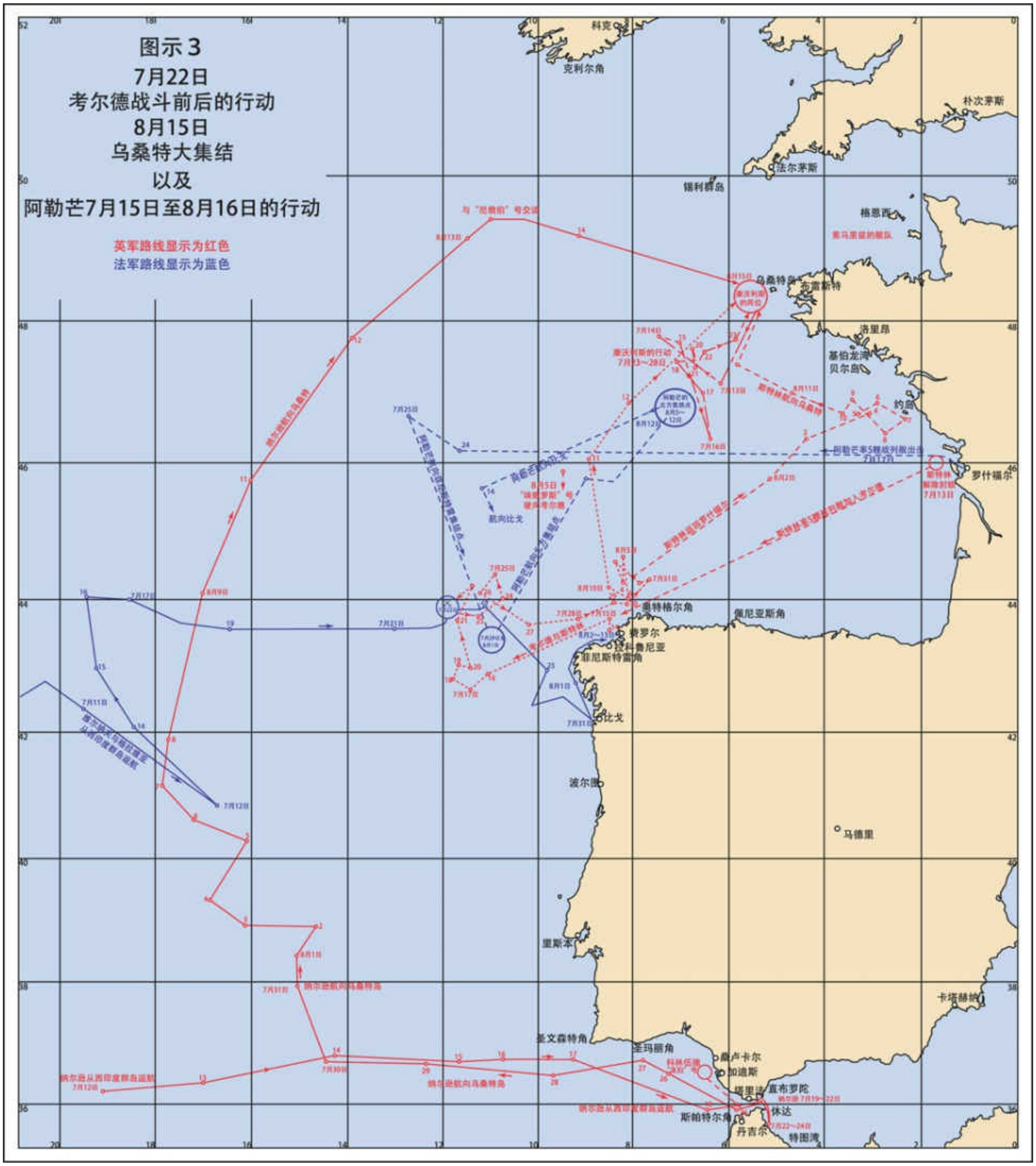
/ / 西班牙海军将领格拉维纳/ / / （佚名，马德里海军博物馆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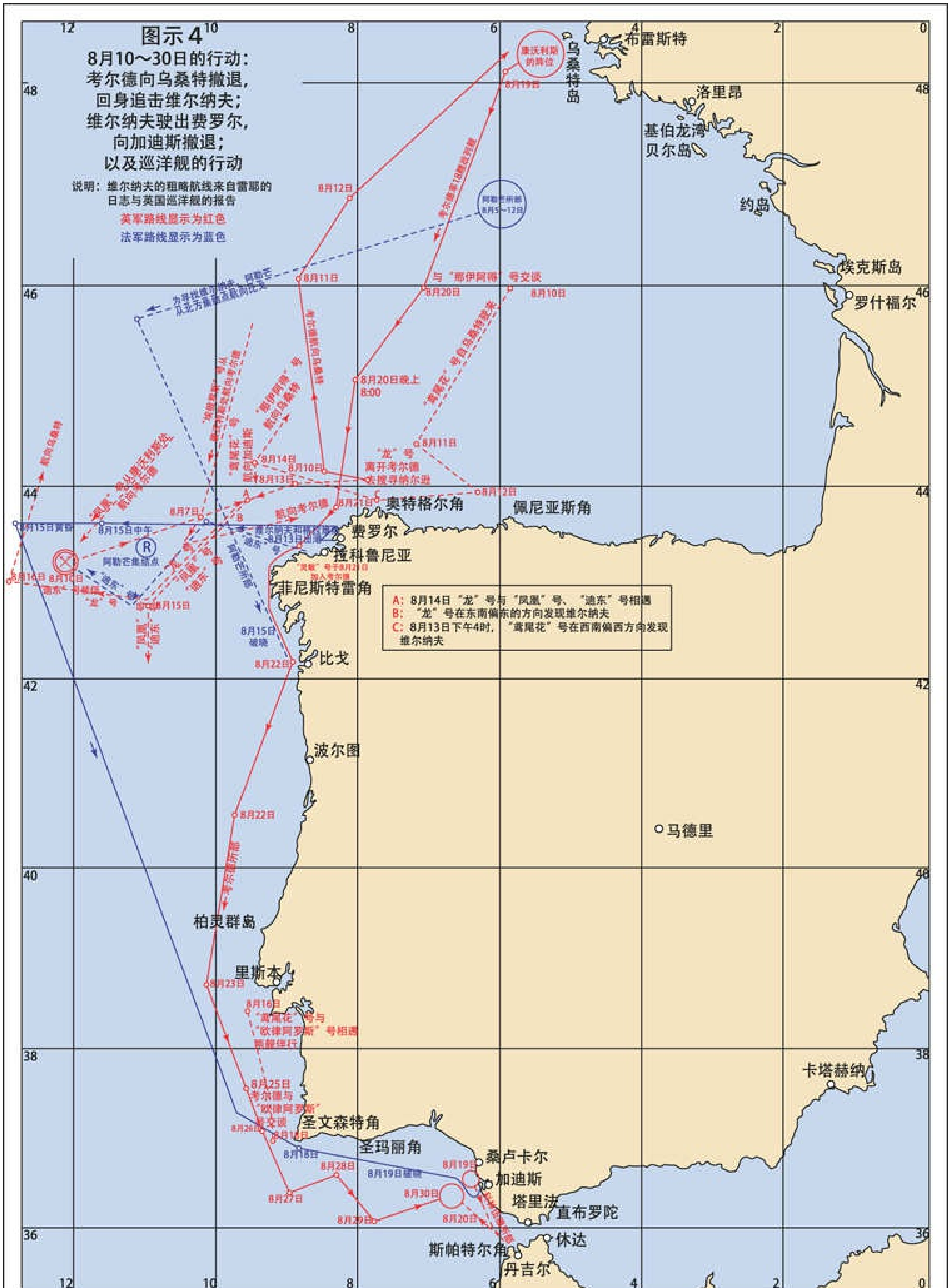
图示1
奥德的撤退
克雷格的进军
巡洋舰传递情报的行动
4月9～30日
说明："费斯格达"号的路线为其大致路线
英军路线显示为红色
法军路线显示为蓝色
"费斯格达"号航向科克
"费斯格达"号与格恩西私掠船交谈
4月21日
私掠船航向普利茅斯
4月24日
克雷格与奈特
4月30日与加纳德勋爵会合
航向乌桑特
"费斯格达"号
航向普利茅斯
"猎兔犬"号24日与"不倦"号交谈
与考尔德交谈
考尔德
奥特格尔角
考尔德所部
费罗尔
"猎兔犬"号
菲尼斯特雷角
"费斯格达"号4月15日中午与"墨兰波斯"号相遇
"猎兔犬"号
"费斯格达"号从直布罗陀来
波尔图
5月1日
克雷格与奈特
奥德
4月22日
里斯本
4月12～15日
来自西北偏西到西北偏北方向的强风
4月14日
拉各斯
圣文森特角
"费斯格达"号
"猎兔犬"号
奥德 4月10日
加迪斯
斯特罗恩警告奥德
破晓时分
维尔纳夫
4月10日
"费斯格达"号
"猎兔犬"号 9～10日
葡萄牙舰队 8～11日
维尔纳夫与格拉维纳
4月12日
丹吉尔
斯帕特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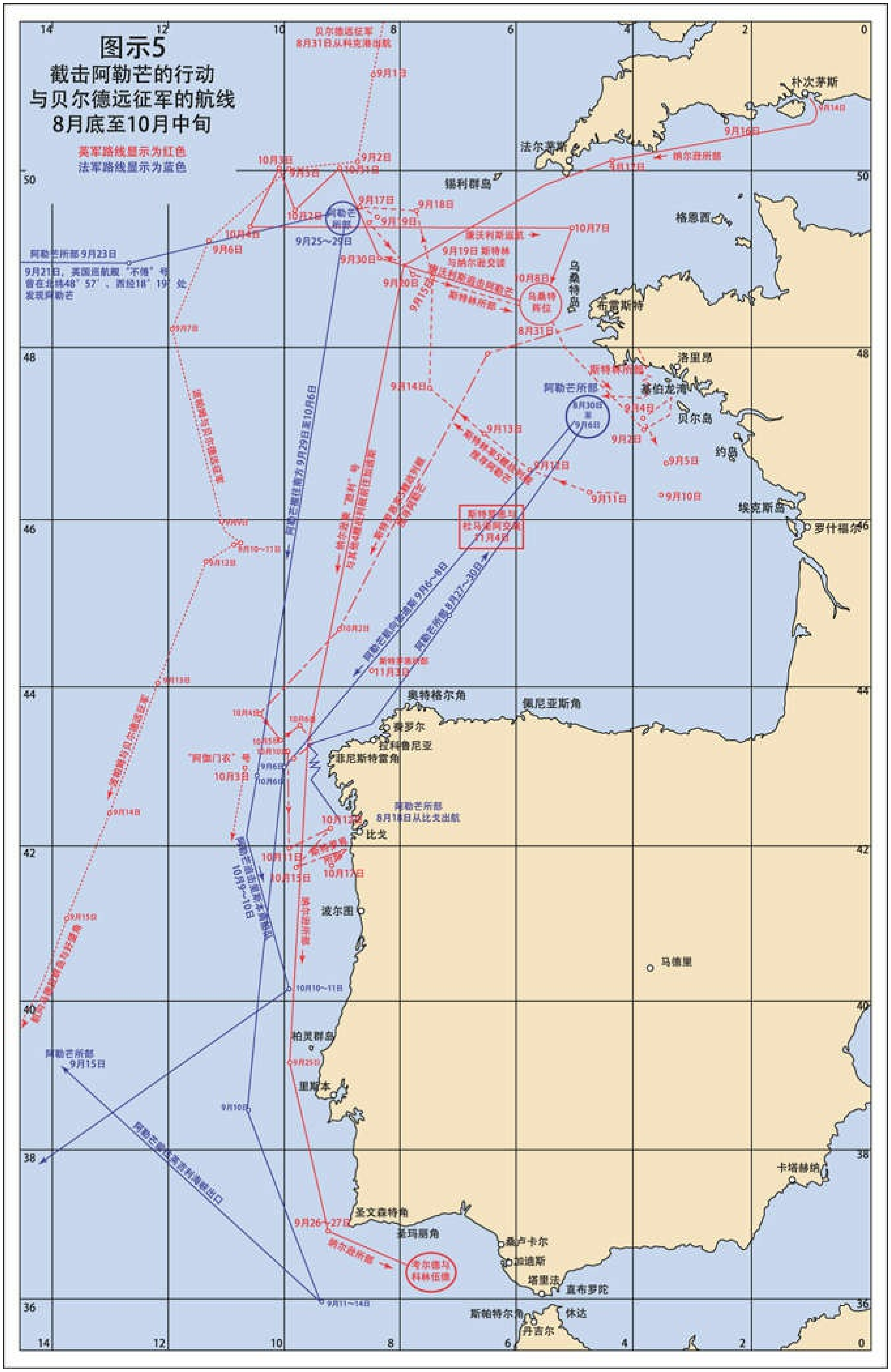
图示2
纳尔逊追击维尔纳夫
英军航线出自纳尔逊的原始手稿与特别指令
法军航线出自德斯奇霍的作品
英军路线显示为红色
法军路线显示为蓝色



图示3
7月22日
考尔德战斗前后的行动
8月15日
乌桑特大集结
以及
阿勒芒7月15日至8月16日的行动
英军路线显示为红色
法军路线显示为蓝色
科克
克利尔角
朴次茅斯
法尔茅斯
锡利群岛
格恩西
乌桑特岛
布雷斯特
洛里昂
基伯龙湾
贝尔岛
约岛
罗什福尔
奥特格尔角
佩尼亚斯角
费罗尔
拉科鲁尼亚
菲尼斯特雷角
比戈
波尔图
马德里
里斯本
圣文森特角
圣玛丽角
加迪斯
直布罗陀
休达
斯帕特尔角
丹吉尔
卡塔赫纳
航向比戈
纳尔逊航向乌桑特岛



图示4
8月10～30日的行动：
考尔德向乌桑特撤退，
回身追击维尔纳夫；
维尔纳夫驶出费罗尔，
向加迪斯撤退；
以及巡洋舰的行动
说明：维尔纳夫的粗略航线来自雷耶的日志与英国巡洋舰的报告
英军路线显示为红色
法军路线显示为蓝色
A：8月14日“龙”号与“凤凰”号、“迪东”号相遇
B：“龙”号在东南偏东的方向发现维尔纳夫
C：8月13日下午4时，“鸢尾花”号在西南偏西方向发现维尔纳夫
布雷斯特
乌桑特岛
洛里昂
基伯龙湾
贝尔岛
约岛
埃克斯岛
罗什福尔
奥特格尔角
佩尼亚斯角
费罗尔
拉科鲁尼亚
菲尼斯特雷角
比戈
波尔图
马德里
柏灵群岛
里斯本
圣文森特角
圣玛丽角
桑卢卡尔
加迪斯
塔里法
直布罗陀
休达
斯帕特尔角
丹吉尔
卡塔赫纳
与“那伊阿得”号交谈
8月20日晚上 8:00
“龙”号 离开考尔德 去搜寻纳尔逊
“鸢尾花”号与“欧律阿罗斯”号相遇 旅程伴行
8月25日 考尔德与“欧律阿罗斯”号交谈
8月19日破晓
阿勒芒集结点


图示5
截击阿勒芒的行动
与贝尔德远征军的航线
8月底至10月中旬
英军路线显示为红色
法军路线显示为蓝色
贝尔德远征军
8月31日从科克港出航
朴次茅斯
法尔茅斯
锡利群岛
格恩西
纳尔逊所部
阿勒芒所部 9月23日
9月25～29日
康沃利斯巡航
9月19日 斯特林
与纳尔逊交谈
乌桑特
布雷斯特
乌桑特阵位
洛里昂
基伯龙湾
贝尔岛
约岛
埃克斯岛
罗什福尔
阿勒芒所部
奥特格尔角
佩尼亚斯角
费罗尔
非尼斯特雷角
阿勒芒所部
8月16日从比戈出航
比戈
波尔图
马德里
柏灵群岛
里斯本
圣文森特角
圣玛丽角
桑卢卡尔
加迪斯
塔里法
直布罗陀
斯帕特尔角
休达
丹吉尔
卡塔赫纳
阿勒芒所部
9月15日
斯特罗恩与
杜马诺阿交战
11月4日
考尔德与
科林伍德
"阿伽门农"号
9月21日，英国巡航舰"不倦"号
曾在北纬48° 57′、西经18° 19′处
发现阿勒芒
14
12
10
8
6
4
2
0
50
48
46
44
42
40
38
36



/ / 1805年**6**月**2**日，法国舰队夺取钻石礁。**/ / /** （作者：**Auguste Etienne Francois Mayer**）



//横跨大西洋追击法军的**“**胜利**”**号。///（作者：**Geoff Hunt**）



//特拉法尔加海战。///（作者：**George Chambers**）



//特拉法尔加海战后在风暴中散落的战舰。///（作者：**Thomas Buttersworth**）



/ / 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法国战舰**“**敬畏**”**号。/ / / （作者：**Louis-Philippe Crépin**）



/ / 特拉法尔加之战。/ / / （作者：**John Christian Schetky**）



/ / 特拉法尔加海战。/ / / （作者：**Thomas Luny**，皇家海军国家博物馆藏品）



/ / 特拉法尔加之战。/ / / （作者：**William Clarkson Stanfie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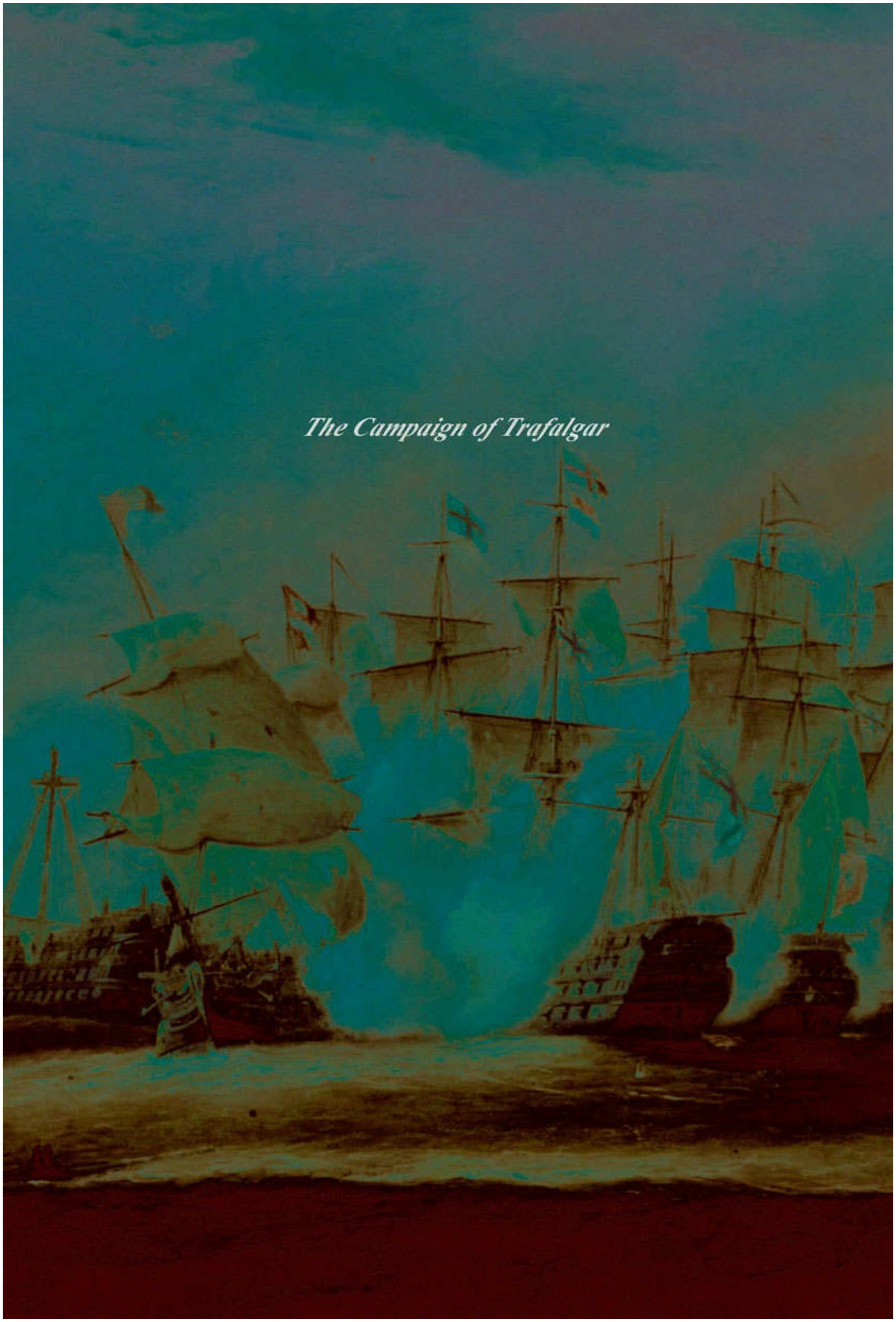
/ / 纳尔逊之死。/ / / （作者：**Daniel Maclise**）



/ / 从特拉法尔加角返航的英国战舰。/ / / （作者：**Thomas Buttersworth**）



/ / “胜利”号被拖回直布罗陀。/ / / （作者：**Clarkson Stanfield**）


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

目录

- 自序
- 第一章 小皮特的大战略
- 第二章 拿破仑首次受挫
- 第三章 战役开局
- 第四章 维尔纳夫出逃
- 第五章 巴勒姆勋爵登场
- 第六章 纳尔逊的困境
- 第七章 纳尔逊何以确信？
- 第八章 科林伍德的快速舰队
- 第九章 拿破仑改变计划
- 第十章 重掌费罗尔与直布罗陀海峡
- 第十一章 西印度群岛的行动
- 第十二章 巴勒姆直面危机
- 第十三章 康沃利斯敞开布雷斯特
- 第十四章 考尔德的战斗
- 第十五章 战后的行动
- 第十六章 危机全局
- 第十七章 高妙之举
- 第十八章 化解危机
- 第十九章 回归攻势
- 第二十章 保障交通线
- 第二十一章 加迪斯僵局
- 第二十二章 主力舰队相遇
- 第二十三章 纳尔逊的攻击计划
- 第二十四章 特拉法尔加海战
- 第二十五章 海上战役的落幕
- 第二十六章 结局
- 附录Ⅰ：纳尔逊勋爵的备忘录，1805年10月9日

- 附录 II：参加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英国军舰
- 附录III：特拉法尔加海战前的旗语信号

导言：朱利安·科贝特与特拉法尔加战役

The flag which braved the battle and the breeze，

No longer owns her .

朱利安·科贝特的海军史研究

1854年11月12日，朱利安·斯特福德·科贝特（Julian Stafford Corbett）出生于伦敦城肯宁顿街的沃尔科特宅邸。他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建筑商，在政治理念上奉行自由主义。科贝特自幼生活在富裕的上流社会中，深受家庭氛围的影响。他就读于剑桥大学的马尔伯罗学院与三一学院，于1875年取得法学一级荣誉学位，两年后取得律师执业资格。但是，他毕业后却从未从事法律工作，反而像小说中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花花公子，开始了漫长的浪荡生涯。他曾在斯莱德艺术学院学习绘画，1877年起便前往印度、北美、北非、意大利等地长期游历。在美国期间，科贝特与著名文学家马克·吐温结交，向他学习写作小说的技艺。回国之后，科贝特在家中致力于小说创作和传记写作，尽管入不敷出，却仍保持着花花公子的秉性。他时不时地放下手边的文稿，在垂钓季前往苏格兰或挪威度假，或是到英国南部的萨塞克斯打猎旅行。他还曾担任特约记者，前往非洲报道英军占领苏丹的消息。我们或许很难想象，这样一位游手好闲的贵公子竟会在中年之后一头扎进海军史的专门研究，成为英国最为杰出的海军史学者，甚至对一战前的英国海军战略产生巨大的影响。

1890年代中期，支持科贝特文学事业的母亲病逝，而他的创作仍未赢得预想的声誉。他已完成了两部与海洋有关的小说，并撰写了德雷克

与蒙克的传记，却被讥讽为写小人书的外行。受此刺激，科贝特毅然用数年时间对德雷克时期的英国海军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研究，却由此因缘发掘出自己最强大的潜力。1898年，他出版了《德雷克与都铎海军》一书，以翔实的文献运用、对国家政策与海军战略的精彩阐释而声名鹊起。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英国海军史权威约翰·劳顿（John Laughton）发现了他的天赋，邀请他加入新近组建的海军档案协会（Navy Records Society），对无敌舰队之役的相关史料进行整理。1899年，在新婚妻子的劝说下，45岁的科贝特终于决定割舍他热爱的文学，全心投入严肃的历史撰述中去。

尽管科贝特具备一流的思维与文学训练，并且通晓多国语言，但以现代人对历史研究的普遍认知，我们或许很难相信这样一位中年转行的花花公子能够在十年之间成为当世最卓越的海军史学者。但若放眼于19世纪以降“海军史”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我们或许便能理解他的经历。作为专门学科的海军史事实上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一可称之为“以海军为题材的历史”（history of navy），其二可称之为“服务于海军的历史”（history for navy）。19世纪前期的海军史以前者为主，处于广义的历史研究的边缘境地。在1840年代之前，各国海军仍以16世纪登场的风帆木制炮舰作为主要武器，其作战模式与17～18世纪并无本质区别。此时主掌海军的军官正是从拿破仑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对这套作战模式有着丰富的经验，并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益的需要和动力。英国律师威廉·詹姆斯撰写的《大不列颠海军史，1793～1827》（1822～1824年）与法国小说家欧仁·苏（Eugène Sue）撰写的《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海军史》（1835年）堪称彼时最优秀的著作，但两书的作者都不是专业历史学者；而从其立意与体例上看，这更多是由民族主义情绪推动的普通叙事史，且因缺乏对海军专门性的把握而存在不少问题。然而，19世纪中叶发生的蒸汽舰与铁甲舰革命改变了这一切。从1860年代起，海军军事技术的变革日新月异，基于风帆时代技术条件的经验知识已无法指导新时代的海军作战。与此同时，进入工业时代的各国对海洋的竞逐

也愈发激烈，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却使各主要强国毫无获取实战经验的时机。如此一来，时代的需求便为海军史研究赋予了新的使命。

1876年，英国海军教官约翰·劳顿与菲利普·H.科隆布将军（Admiral Philip H.Colomb）在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开设了一门海军史课程。尽管课程的内容仅限于通过对风帆时代的战术研究得出适用于蒸汽舰的教益，教学对象也仅仅是较低级的尉官学员，它却标志着现代的海军史学科伴随着现代海军的发展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立足现实的海军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展开，其研究范围也在西方海军历史的丰富积淀中极大拓展。历史叙事的非凡魅力更使海军史研究的作用范围远远超出了军界，广泛地影响着学界、政界与市民社会。1890年，劳顿的追随者之一、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T.马汉出版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这部名著将风帆时代海军史的研究对象拓展到了宏观的海军战略与国家盛衰，使海军史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迈向顶峰。海军史陡然成为军事学、国际政治学、社会学与国际法学等诸多研究领域中的热点。在“海权至上”信条的指引下，美国、德国、日本等新兴国家以愈发激进的姿态投入对世界海权的角逐，马汉也因此成为名留青史的显赫人物。

然而，在劳顿的主持之下，英国的海军史研究却呈现出与此不同的面貌。相较于用二手文献构建宏大理论的马汉，劳顿在一生中始终恪守实证主义的史学精神，多次批评马汉的疏阔史论。1893年，劳顿在花甲之年主持成立海军档案协会，统合海军内外的人才，专门负责整理出版新近开放的英国海军历史文献——在他看来，这才是科学的海军史研究与现代海军教育的必要起点。半路出家的科贝特虽然同样具有研究宏大主题的野心，但在劳顿的指导下，他先后在海军档案协会整理出版了《英西战争期间海军相关文件，1585～1587》（1898年）、《海军作战指令，1530～1816》（1905年）、《舰队信号与指令，1776～1794》（1908年）等大部头档案集。海军档案协会对科贝特的学术成长极有助

益。他不仅得到了扎实的文献训练，更在协会中接触到当时最杰出的海军史学者与当世一流的研究作品。他的知识背景、文献训练与学术环境使他找到了一种独创的研究模式：在《德雷克与都铎海军》一书中，他首次将扎实的历史考据与宏大主题相结合，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在具体、复杂的历史情境中探讨当代人关注的战术、战略与政策问题。用唐纳德·舒曼（Donald Schurman）的话说："他开创了一条前人未及的、用细致手法研究英国海洋战略的精巧路径。"[1] 科贝特的著述远不如马汉那般简单明了、具有煽动力，但他细致却又视野开阔的研究更加贴近在具体情境中展开的政治军事实践，这使他很快得到军界与政界的认可，并成为海军改革派领袖约翰·费舍尔将军（Admiral John Fisher）的重要伙伴。

在完成《德雷克的继承者》（1900年）一书后，科贝特于1902年成为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的讲师。在世纪更迭之际，海军学院的战史课程已在海军改革派的影响下成为颇具威望、以战略问题为重心的高级讲席；而在1905年费舍尔出任第一海务大臣后，海军学院迅速担负起按照改革派的主张培养新型军官与参谋人员的重要使命。同年，科贝特出任英国海军部首席非军职战略顾问。1906年，科贝特还加入了由丘吉尔担任主席的帝国国防委员会，该部门负责整合外交、军事等各方面人员，为战争与国防提出参谋建议。这是科贝特一生中最为繁忙的时期。他在学术研究之外承担了如此重要的工作，却同时编撰了两部风帆时代的海军战术档案，撰写了《英国在地中海》（1904年）、《七年战争中的英国》（1907年）与《特拉法尔加战役》（1910年）这三部杰出的历史专著，随后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著名的《海军战略的若干原则》（1911年）——这本纯粹的海军理论著作至今仍是英美海军军官的必读教义。当费舍尔于1910年去职之时，他曾对科贝特做出这样的评价："没有多少人能当得起'他开创了他的时代'这句话。你已经向人们展示他们要追求的方向和那样做的方法。战争的伟大技艺正在大步向前迈进，再也不会折返。"[2]

一战爆发后，科贝特深入参与了英国大舰队对德战略的制定，为大舰队司令杰里科将军贡献了重要的建议。而在科贝特的战略思想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影响之时，他仍在海军史研究的本职工作上努力耕耘。1913～1914年，他主编了18世纪末的海军大臣斯宾塞勋爵（Lord Spencer）的书信集，又于1914～1915年撰写了《日俄战争中的海上行动，1904～1905》。1915年，他被帝国国防委员会与海军部选定为英国海军一战官方战史的作者，这充分说明了他的研究在实践领域得到的认可。科贝特试图将巨量的档案文献组织撰写成一部能体现出海军战略理念的全景式作品，这个困难重重的庞大工程消耗了他此后的大部分精力。就在他撰写这部巨著第三卷的过程中，1922年9月21日，一次心脏病突发夺走了这位仍处学术盛年期的学者的生命。

科贝特的葬礼映衬着海军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凋零。一战后的厌战思潮使市民与政客对旧日的海上争霸失去了热情，而当现代海军军事学科与现代军官培养制度建成之后，立足于服务海军的海军史研究也完成了它的主要使命。随着航空时代与核子时代的相继到来，从高峰跌下的传统海军史日渐萎缩，仅仅在大学历史系与海军参谋学院占据狭窄一隅。1988年，格林尼治的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甚至取消了“1805年前的海军史”展馆。但几乎在同一时间，历史研究向海军相关主题的拓展开始为尘封的海军史赋予新的含义。与马汉和科贝特的时代相比，始自1980年代、以尼古拉斯·罗杰（Nicholas Rodger）、扬·格雷特（Jan Glete）、罗杰·奈特（Roger Knight）等学者为代表的“新海军史”不再以战术、战略与军事决策作为研究中心，他们更加侧重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视角，试图将17～19世纪的海军与海洋纳入全球化、现代国家构建、社会变迁等主题中去。而与此同时，C.S.弗雷斯特（C.S.Forester）与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an）等杰出的历史小说家也在现代社会中培养了为数众多的海军史爱好者，传统的海军史以这种方式间接地恢复了生机。

无须讳言的是，“新海军史”的研究成果已经修正了大量的传统认知，但同样值得说明的是，不同的学术思潮与研究视角只是基于不同问题、探求历史不同面相的不同工具。潮流的变换并不意味着知识价值的优劣高低，若非当日海军史对战术、战略的极端重视，或许没有人会用如此多的精力，调用如此多的文献，对一场风帆时代的复杂战役做出如此周密细致的解析。科贝特开创的时代早已远离我们而去，但他建立在翔实文献基础上的实证研究仍是我们从军事、政治层面了解旧日海战史实的重要指引。出版于1910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是科贝特最后一部以风帆时代海军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他的史笔与海军思想在撰写此书时已经成熟，他所描绘出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令人既熟悉又陌生，即便从今日看来仍极具颠覆性。在接受新近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个英国海军史上最负盛名的巅峰篇章领略科氏海军史研究的独特魅力。

通往特拉法尔加：**1793～1804**年的英法海上博弈

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海军史研究里，1793～1815年的英国海军史以其开创时代的历史意义与相对丰富的档案文献而成为一大中心。作为一部成书于20世纪初的海军史专著，《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受众对这一时期的史实大多有基本的了解。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本书的内容，我们有必要对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前史”加以简略说明。

自1689年大同盟战争始，英法两国围绕着世界霸权展开了被称为“第二次百年战争”的漫长角逐。英国在18世纪前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逐渐确立起海军优势，并在七年战争中沉重地打击了法国的海外领地，奠定了大英帝国的根基。不甘落败的法国联合西班牙整军备战，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还以颜色，但由于英国海军在战争后期恢复元气，法国并未从胜利中得到实质性的战利品。1783年《巴黎和约》签订后，法国耗费巨资为未来的角逐继续扩充舰队，并试

图在英吉利海峡南岸的瑟堡开辟海军基地。然而，战争债务与财政赤字最终压垮了法国的国家财政，法王路易十六被迫召开三级会议增收税款，由此点燃了席卷欧陆的法国大革命。

在1780年代，英国背负了远比法国更重的战争债务，但首相小皮特成功地用缩减公共开支、发行国债等方式度过了危机。英国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一直保持中立姿态，他们乐见于革命对其宿敌的削弱，英国社会也对革命者抱有同情。小皮特在1792年年初提出的财政预算中甚至打算降低税额、削减军费，期望保持长期的和平。然而在当年秋天，法国共和军在瓦尔密会战与热马普会战中击败普奥联军，随即占领奥属尼德兰，直抵荷兰边境。自16世纪以来，平坦而多良港的尼德兰海岸都被英国视为国土安全的禁区。12月31日，英国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向法国大使表示，英国绝不会坐视法国直接或间接地主宰尼德兰，但法国毫无退缩之意。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思想也开始在英国社会发酵，甚至在爱尔兰激起了反英叛乱，威胁到了英国的国体。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英国随即与法兰西共和国断绝外交关系。随后，法国宣布吞并奥属尼德兰，并向英国宣战。“第二次百年战争”由此迎来了长达二十二年的大决战。

对英国的战争必须用海军来进行，但让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未能料到的是，民族主义与革命狂热并不适用于专业性极强的海军。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法兰西王国海军的军官团全部由贵族组成，这种安排本是为了将封建贵族纳入君主专制之下，却让海军在大革命爆发后遭遇灭顶之灾。自1789年起，布雷斯特与土伦相继发生暴乱，反抗管理秩序的船坞工人与水兵很快就对海军军官造成了生命威胁。几位将军险遭刺杀，多位舰长不幸遇难，而革命政府却对这些暴行持放任态度，使旧军官的大规模逃亡在所难免。截至1791年5月，法国原有的42位海军将领仅剩5人在职，原有的170位舰长仅剩42人。而到路易十六被杀、恐怖统治降临之后，绝大部分高级军官都离开了海军。革命政府只得突击大量提拔低

级军官与商船船长——在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中指挥法国布雷斯特舰队的维拉莱-乔伊斯（Villaret-Joyeuse）仅用两年多时间就从一位普通尉官跃升为舰队司令。意识形态的破坏还不止如此。1792年6月，基于人人平等的革命观念，共和国发布法令，解散了享有特殊待遇的王家水手炮兵部队（Corps-royal de canonniers-matelots）。这支部队的成员本是专门操纵舰炮的精英，法军引以为豪的远程炮术于是再也未能恢复到革命之前的水平。更糟糕的是，革命后混乱的局势使得海军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有效管理。法国海军的主要基地恰好位于叛党盘踞的地区，布雷斯特与罗什福尔受到旺代叛乱和朱安党叛乱的直接波及，土伦甚至一度被保王党占领。信息传达与粮饷调运因此变得相当困难，进而严重削弱了舰队官兵的士气与活力。在拿破仑最终恢复法国的内部秩序之前，这始终是缠绕着法国海军的难题。

1793年2月，法国海军的纸面兵力共有72艘战列舰，其中有8艘即将被改造为巡航舰；由于财政困难和物资短缺，只有约40艘能投入作战。他们的敌人是久经战阵、装备精良并由强大国家机器所支持的英国皇家海军，后者拥有145艘战列舰与17艘50炮舰，而在当年年底已有88艘投入现役。更重要的是，英国的财政能力冠绝全欧，远非其他国家可及。然而，英国的战争决策者却犯下了轻视敌人、目标分散的大忌。英国一方面与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等国在奥属尼德兰组成反法联军，以求直捣巴黎，另一方面又向法国的西印度殖民地派出远征军。貌合神离的联军很快在革命军的顽强抵抗下止步不前；针对西印度群岛的远征虽取得了早期的成功，但随后便因法国援军的抵达及其发动黑奴的策略陷入胶着。当王党叛军邀请英国地中海舰队控制土伦港时，英国因陆军已尽数派出而无法提供增援兵力。

让英国聊以自慰的只有皇家海军取得的战果。在土伦陷落后，地中海舰队成功攻取科西嘉岛，海峡舰队（亦称西方舰队）则在名将理查德·豪的指挥下赢得了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以一场大捷首开胜绩。由此

开始，英法两国的海军战略开始逐步成型。英国海军的战略目标是防止法国舰队扰乱其海上贸易与其他地区，并护送陆军通过大海，向各战场投送兵力。此时的法国海军受困于物资匮乏，每次出击都必须兴师动众地筹集物资，英国的侦查舰与间谍往往能提前掌握其动向，并向本土复命。1793～1800年，先后出任海峡舰队司令的豪勋爵与亚历山大·胡德都选择了“远程封锁”（open blockade）策略，即让主力舰队在远方的安全锚地待命，接到敌军情报后再行出击。相形之下，法国海军的战略决策则是狂热的革命精神与急迫的内外交困的杂糅品。在1794年以及1795年的春季，法国布雷斯特舰队与土伦舰队两次同时出航，却相继被英军击败。为了避免与英军相遇，法军决定不顾舰队糟糕的航行能力，选择在气候恶劣的冬季冒险出击。这一策略的确能躲开在母港内避风的英军，但巨浪与礁石对他们来说同样致命。1794年年末的冬季大巡航与1796年年末的爱尔兰远征都以遭受灾难性的损失而收尾。

但是，在陆地战争的过程中，法国逐渐寻找到了另一种反制策略。1794年冬，法国共和军跨过结冰的河流攻入荷兰。荷兰随即爆发革命，新成立的巴达维亚共和国及原先的荷兰舰队成为法国的盟友。1795年，法国赢得了尼德兰战场的胜利，并在南线攻入西班牙本土。普鲁士与西班牙随后退出对法战争，西班牙甚至认为与法国结盟更为有利。1796年春，拿破仑率领法军在北意大利接连取胜，并迫使南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王国接受了法国的和平条件。英国在地中海内的盟国海港几乎丧失殆尽，而西班牙在当年10月向英国宣战，更使仅有不足20艘战列舰的英国地中海舰队要面对法西两国40余艘战列舰的强大兵力。英国舰队被迫撤离科西嘉，进而撤往直布罗陀，让拿破仑顺利地夺取了科西嘉、科孚等关键岛屿。与此同时，荷兰与西班牙为法军阵营带来了70余艘战列舰，三国联盟使得法方拥有了抗衡英军的纸面实力。

在此背景之下，英国在1797年迎来了海上局势最为险恶的时期。1796年年末试图远征爱尔兰的法国舰队并未遭到英军阻截，而在1797年

2月，一支伪装成英军的法军小部队甚至在威尔士成功登陆。更严重的是，4～6月，海峡舰队与北海舰队因水手待遇问题发生大规模哗变，使英国本土门户洞开。与此同时，让市场吸纳国债以化解赤字压力的政策也达到了其能力的极限，导致了一场全面的财政危机。所幸的是，约翰·杰维斯（John Jervis）率领地中海舰队在2月14日的圣文森特海战中击败西班牙主力舰队；法国布雷斯特舰队则因爱尔兰远征而元气大伤、无所作为；当年10月，亚当·邓肯（Adam Duncan）又率领刚刚平息哗变的北海舰队在坎伯当海战中大胜荷兰舰队。英军的辉煌胜利重振了皇家海军的赫赫声威，也充分暴露了法军盟友的种种问题：西班牙受制于财政困难，无法招募到足够的海员，战舰上充斥着不习海战的陆军士兵；荷兰海军尽管战技娴熟，但战舰的体型与火力远逊于英军。1797年的财政危机促使小皮特开始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财政改革，他大幅度增加直接税，使税收成为英国在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中的主要财源，确保了英国的最终胜利。

然而，法军却在1797年10月逼迫奥地利签署和约，宣告了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瓦解。英国成了法国及其盟友面前唯一的敌人，入侵英国的行动很快提上日程。拿破仑受命为侵英军团司令，但在考察了北方海岸之后，他认为这种行动无法在短时间内进行，转而提议入侵埃及。法国计划在布洛涅港建造渡海船队以营造侵英假象，同时让土伦舰队护送拿破仑的军团杀向埃及，随后攻向印度——法国眼中英国最富饶的殖民地。拿破仑天真地相信，英国会在布雷斯特港外集结60艘战舰，在布洛涅港外与荷兰沿海各集结12艘战舰，再在直布罗陀海峡外集结22～25艘战舰，从而使他可以自由地发动跨海攻击。但英国早已得知土伦港的异动，杰维斯已派纳尔逊分舰队进入地中海，本土也及时派出了增援兵力。1798年7月1日，法军护航船队抵达亚历山大港。他们的行动犹如天佑：纳尔逊缺乏侦察巡航舰的舰队恰好在一天前离开，否则一场灾难必将降临。然而，拿破仑的好运只救下了运输船上的陆军。一个月后，回过身来的纳尔逊在尼罗河口与法国舰队相遇，法国土伦舰队几乎被纳尔

逊尽数歼灭。

尼罗河口海战的惨败不仅让法国远征军陷入困境，其也是俄国、奥地利、土耳其与那不勒斯组建第二次反法同盟的一大动因。1799年夏，奥军与俄军在英俄海军的掩护下杀回意大利，英俄陆军则向巴达维亚发起海上入侵。在危急关头，拿破仑于当年10月潜回法国，通过“雾月政变”执掌军政大权。与此同时，法国海军则力图解救埃及、马耳他与科孚岛的被困陆军。1799年4月底，法国海军部长布吕克斯将军（Admiral Bruix）率领25艘战列舰从布雷斯特出航。英军事先接到了情报，亚历山大·胡德率领英国海峡舰队及时赶到港外，但因巡航舰布局的疏失与法军擦肩而过，随后其因怀疑法军要入侵爱尔兰而向北驶去。加迪斯港外的英国地中海舰队也未能截住法军，基斯勋爵（Lord Keith）的追击反而使被封锁的西班牙舰队获得自由。布吕克斯顺利地驶入土伦，但法军的糟糕状态使他无法完成任何战略任务。在短暂休整后，法军踏上归程，并在卡塔赫纳与18艘来自加迪斯的西班牙战舰相遇。他们在8月8日一齐驶回布雷斯特，使法军在此集结起43艘战列舰的庞大舰队。不过，紧追不舍的基斯勋爵也在第二周抵达港外，平衡了双方的实力对比。此次行动虽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战果，却让法军意识到大范围兵力调动的可能性——拿破仑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集结计划便是以此役作为原型。

反法同盟在欧陆战场的优势并未持续多久。入侵荷兰的英俄联军不久便战败撤退，俄国宣布退出战争，奥地利随后在马伦哥会战与霍恩林登会战中失败。1801年2月，法国与奥地利签署了《吕内维尔和约》，确认法国拥有莱茵河左岸，双方尊重北意大利诸邦与巴达维亚共和国的独立。英国再次失去了大陆盟友，但在海外仍掌握着主导权。1800年4月，因圣文森特海战而得到圣文森特勋爵封号的约翰·杰维斯出任海峡舰队司令，英国海军战略出现重大的转变。圣文森特勋爵延续了他之前对加迪斯采用的策略，即用主力舰队在敌军港外进行“近距离封锁”（close blockade），使法军无法在适航季节造成任何威胁。法军只

得在冬季冒险出击。1800年冬天，冈托姆少将率7艘战列舰驶向土伦，于次年策动了对埃及远征军的不成功的救援。这支舰队随后试图与西班牙联合作战，却一同被英军封锁在加迪斯。1801年年底，埃及法军在英国与土耳其的海陆夹攻下最终投降。两国就在这种情形下走向了短暂的和平。

1801年2月，小皮特因统合爱尔兰导致的宗教争端宣布辞职。继任首相亨利·阿丁顿随后开始与法国接触，并于1802年3月签署了《亚眠和约》。英国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地位与巴达维亚共和国的独立，承诺撤出马耳他，并归还从法国、巴达维亚与西班牙手中夺得的大部分殖民地；法国则承诺从那不勒斯与教皇国撤军。在短暂的和平时期，法国力图恢复其海外贸易，以求增强财政能力。拿破仑决定在西印度群岛重新恢复奴隶制种植园，并派舰队前去镇压黑奴起义。然而，英法间的脆弱和平却日渐动摇。在英国返还大部分领土后，拿破仑仍在欧陆的政治与经济事务上排斥英国，并拒绝按英国的要求从巴达维亚撤出法军。法国在欧洲与西印度群岛的行动更让英国怀疑拿破仑的和平信念，又使英国坚决拒绝撤出马耳他。双方的外交冲突迅速激化，最终让战争在1803年5月重启。

拿破仑清楚地知道战争无可避免，但英国的宣战时间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法国商船正在公海上航行，海军仓库并未储备足够的木料，被派往西印度群岛的舰队只得仓皇返航，被困在西班牙的港口里——而昔日的盟友西班牙则一意保持中立。拿破仑迅速重启了1797年被放弃的侵英计划，从洛里昂到荷兰的所有港湾都热火朝天地建造起平底运兵炮艇，他计划在法国北部与尼德兰海岸集结一支由15万人、1万匹战马与400门火炮组成的侵英大军。法国海军的战术素质尽管仍旧糟糕，但国内交通与财政基础的改善使之能随时保持待命状态，因而具备了更大的战略威胁性。1803年秋，拿破仑准备让布雷斯特与罗什福尔的主力舰队搭载数万名士兵，在冬季或来年春天与平底船队一齐发动侵英战役。

拿破仑曾放出豪言："只要我能主宰海峡六个小时，我就能主宰世界。"然而，英军的迅速动员与灵活反应很快打破了他的幻想。面对法军舰队的威胁，战略意识极为敏锐的海峡舰队司令威廉·康沃利斯对布雷斯特、罗什福尔与费罗尔展开了堪称完美的近距离封锁，甚至将封锁维持到危险的冬季；基斯勋爵则率北海舰队封锁了法国北部与荷兰的海岸，密切监视着布洛涅大营。拿破仑的第一个计划已经失败，他转而将希望寄托于地中海内的土伦舰队——土伦港外风向复杂，纳尔逊的地中海舰队不可能维持近距离封锁，使法军可以寻隙出击。他计划由布雷斯特舰队牵制康沃利斯的主力舰队，同时让能干的海军中将拉图什-特雷维尔（Latouche-Treville）在1804年夏秋时节率土伦舰队出航，在绕过纳尔逊所部与费罗尔之后和罗什福尔舰队会合，再绕过布雷斯特港外的康沃利斯，用16艘战列舰与11艘巡航舰掩护布洛涅大军渡海入侵。但拉图什-特雷维尔在此前的西印度群岛远征中身染热病，最终于1804年8月去世，这个计划又化为泡影。

1804年年末，拿破仑正全神贯注于登基称帝。侵英计划已被暂时搁置，他只想用海军发动一场对英国殖民地的袭击；但西班牙在1804年12月加入对英战争，这又让他看到了用联合舰队击败皇家海军的可能前景。而在海峡对面，重登相位的小皮特正在入侵威胁下酝酿着英国的进攻计划，他正试图向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宿敌发动反击。双方的努力最终造就了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

决战神话的破灭

自特拉法尔加海战的第一份消息抵达伦敦之时起，这场海战与这场战役的意义就双双坠入了历史评价的迷局。对这场海战与这场战役的历史形塑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基于种种目的的外部因素，它们在19世纪到20世纪曾成功地维系着一个与真实情况大相径庭的历史图景，同时也在军界、学界与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误解与争议。基于这种图景的结论至今

仍拥有相当广泛的受众，我们可以简要地用“决战神话”将其命名——这种观点认为，特拉法尔加海战是纳尔逊深思熟虑的战术全胜，同时也是打破拿破仑侵英计划、确定英国海权决定性优势的战略胜利。极力鼓吹海权优先与舰队决战的马汉学派正是这种观点的典型。马汉在《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年》（1892年）一书中引用查尔斯·艾伦·菲弗（Charles Alan Fyffe）在《欧洲近代史》（1880年）里面的评论，极力颂扬这场决战的历史意义：

> 特拉法尔加不仅是最伟大的海战胜利，它也是整场法国革命战争——包括海洋战场与陆地战场——中最伟大也是最重要的胜利。拿破仑的任何一场或任何一系列胜利都无法对欧洲造成与之相当的影响。……特拉法尔加结束了法国再次从海上对英国造成严重威胁的时代。自英国组建海军以来，法国一直抱有的击败英国海军的希望彻底破灭。此后，拿破仑只能将他的希望转移到用迫使所有欧陆国家排斥对英贸易的办法来耗尽英国的资源。特拉法尔加迫使他将枷锁强加给整个欧洲，迫使他放弃了征服大不列颠。……纳尔逊最后的捷报使得英国拥有了这样一种位置：除了那些终将导致欧陆解放的方法，没有什么还能给它造成伤害。[3]

基于对口耳相传的旧日辉煌的沉迷，基于对陈陈相因的教条化的“海军传统”的自豪，19世纪后期的英国海军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这种对舰队决战与海上目标优先的迷信。1902年，英国海军部在殖民地防卫会议上威严地宣称：

> 制海权取决于海上决战的结果，取决于诸如萨拉米斯、亚克兴、勒班陀、无敌舰队之役与17世纪英荷战争中的那些双方集中所有可用兵力以求决定性结果的海战。任何海上强国的目标都必须始终是摧毁敌舰队。尽管大海战在它发生的地方不会留下痕迹，但不论它发生在哪，它的影响都会遍及整个世界。……我们之前的话中始终没出现过“防御”这个字眼。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英国海军的首要目标并不是防御任何东西，而是攻击敌人的舰队，并通过击败它们来保护英国的领土、物资和贸易。[4]

然而，这种简单粗暴而又得意扬扬的想法恰恰是科贝特希望打破的幻觉。自《德雷克与都铎海军》开始，科贝特就力求去除传统海军史中

的浪漫色彩，希望用历史科学的精神探求真正的海军传统与历史教训。而在费舍尔的改革步入正轨后，他的主要职责正是向未来一代的军官传授现代的、科学的海军军事理念。基于坚实的文献基础，科贝特决定用冷静而理智的史学手法将在以往海军观念中如神圣图腾般存在的特拉法尔加拉下神坛，以此来清除那些附着在盲信、讹传与谎言上的错误观念。在《特拉法尔加战役》这部专著中，科贝特首次在英文世界内完整地构建了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历史图景，首次对流传甚广的“决战神话”提出了全面而有力的反驳。尽管他用意激进的著作最终也未能阻止“决战神话”的继续流传，但书中的主要观点却在后来的学术发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军实践中得到了应验。

科贝特首先认为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并不是单纯的海上战役，而是一场海陆联合战役。在1804～1805年的具体政治局势中，英国的战争决策者们绝不是在构思什么海权决战，小皮特试图在欧洲大陆组建的陆军同盟才是贯穿整场特拉法尔加战役的战略关键。1804年年末，英国开始与俄国展开同盟谈判，并在同盟缔结之前约定在南意大利组织一支陆上联军。由于英俄同盟是日后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必要前提，直接关乎英俄同盟缔结的这支小规模的远征军便由此成为反法同盟政策的基石，具备了特殊的政治含义。英国人对本土防御极为自信，他们在1805年的战略目标并不是打破拿破仑的侵英计划，而是在欧洲大陆上向拿破仑发起全面攻击。着眼于此，我们才能认识到特拉法尔加战役的真实目的。这场战役中的英国海军不仅是要保卫英伦本土的安全，不仅是要保卫庞大的大英帝国，更是要保卫英国向海外投送陆军和资源的交通线，这是组建欧陆同盟的必要前提。换言之，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海军与海权只是实现国家政策的手段，而非目的；而评价这场战役成败的标准只能是决策者们设定的政策目标，而不能是后来者基于后见之明而建立的简单抽象的因果联系。

在此基础上，科贝特做出了更为激进的推理。科贝特认为，英国海

军在这场战役中的战略使命在法西联合舰队被迫退回加迪斯之后就已完全实现：拿破仑的侵英计划已经破产；英国派往那不勒斯与好望角的两支重要远征军已经安全；欧洲大陆上的反法同盟也已成型。法国海军本来就并不具备挑战英国的实力，因此，随后发生的、被视作英国海权与舰队决战之顶峰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战略意义。科贝特还指出，让拿破仑逼迫维尔纳夫驶出加迪斯、继而导致这场海上决战的直接动因恰恰是英俄联军在南意大利的陆上威胁；这也就是说，这场最经典的舰队决战恰恰是基于陆军而非海权的逻辑。法西联合舰队的毁灭只是阻止了其对西西里的海上入侵，并使这些兵力无法在将来损害英国的贸易；但拿破仑赢得的乌尔姆战役与奥斯特利茨战役却决定性地挫败了第三次反法同盟，粉碎了小皮特的战略目标，使法兰西帝国对欧洲大陆的统治格局得以长期存续。换言之，英国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取得的成功远远无法抵消它在反法同盟上遭遇的战略性失败。海军行动只是这场战役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是首相小皮特、海军大臣巴勒姆、海峡舰队司令康沃利斯，然后才是我们的传奇英雄纳尔逊。

另外，科贝特对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采用的海军战术也得出了颇具颠覆性的结论。长期以来，纳尔逊都被视为一位鲁莽好战的战略家与天才般的战术家，但在科贝特的笔下，这一形象却遭到了逆转。科贝特认为，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几乎所有战略决策都秉持着谨慎而理智的理念，他绝不像时人所想象的那样鲁莽好战。相反，他却在此生最后也是最精彩的大海战中做出了严重误判，背离了战前设定的合理的作战计划，转而展开了一场并不必要的致命冒险。在科贝特之前，许多海军史研究者已意识到纳尔逊在战前制订的作战计划与他实际采用的战术大相径庭，他在海战中采用的纵队舰首对敌的阵型也完全与合理的海军战术背道而驰；可他们却被纳尔逊传奇的光芒与精心构造的掩饰所诱惑，反而试图弥合而非澄清这三者之间的差别。然而，基于对现代海军史学科与费舍尔改革的理解，科贝特却认为现代海军必须摒弃非理性的纳尔逊传奇，讴歌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战术错误无异于传播鲁莽不

智的作战观念。科贝特在书中坦诚地表示，纳尔逊未按照预先计划重整阵型就匆忙发起进攻，这使得他事先设计的精妙战术无法施展，进而以反面教材般的糟糕姿态投入了战斗，“他所承担的这种风险几乎超过了理智指挥的极限”。

然而，特拉法尔加海战并不仅仅是一段逝去的历史。长期以来，它已成为英国海军与海上霸权的象征，在社会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正因如此，向这些象征符号猛烈开火的《特拉法尔加战役》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位牛津大学的近代史教师在书评中认为，科贝特拔高了陆军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地位，贬低了海军粉碎侵英计划的意义；[5] 而更大的反对声浪则指向他对纳尔逊的战术的批评——他们担心这将会动摇海军信奉的“纳尔逊精神”，甚至有损公众的爱国热情。由于争议激烈、事关重大，议会指派海军部在1912年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用以全面核验和考察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所用战术的全部相关证据”。委员会用15个月的时间查验了英、法、西三方文献，随后向议会递交了报告。尽管没有明确承认，他们的报告却在事实上确证了科贝特的结论。但即便如此，特拉法尔加神话仍是英国不愿割舍的精神图腾，科贝特的神话解构仍然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冷处理。普通的公众读物仍然充斥着已被他驳倒的旧说，甚至一些学术性较强的著述也倾向于维系这种有利于海军形象的错误图景。在世界大战后的海军史低潮中，曾担任英国战列舰舰长的阿尔弗雷德·H.泰勒（Alfred H.Taylor）少将所撰写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因其翔实的文献基础与战场描述而成为20世纪后期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而这篇论文仍在小心地弥合作战计划、实际战术与合理战术原则之间的裂缝，使已经被推翻的神话得以延续。[6]

在随后的冷战期间，目睹苏联陆权威胁的英国历史学家逐步接受了科贝特提出的海权有限观念。G.S.格雷厄姆（G.S.Graham）的《海军霸权的政治：英国海上优势研究》（1965年）与保罗·肯尼迪（Paul M.Kennedy）《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1976年）都对特拉法尔加海

战的战略意义做出了极为保守的评价，他们认可海上优势的必要性，但在与陆权国家的战争中，海战胜利并不是赢得战争的充分条件。专注于海军战术史的布莱恩·滕斯托尔（Brian Tunstall）在其《风帆时代的海战：1650～1815年的战术演进》（1990年）中对科贝特的战术研究多有商榷，但他充分肯定了科贝特在书中对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分析，只是利用新出史料修订了一处细节。

1990年代以降，冷战的终结、英国海军的衰落与“新海军史”的兴起彻底改变了特拉法尔加海战的研究格局。在纯学术领域内对特拉法尔加的重新评价终于成为可能，于是，在20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两百周年前后，这个旧日海军史的巅峰篇章再次成为新一代海军史学者的关注热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的治学取径与科贝特时代大相径庭，但他们却在不同方向上追认了科贝特在近一个世纪前做出的史实判断，并在其基础之上继续向前推进。当代著名的英国海军史学家尼古拉斯·罗杰在2005年的《海事研究杂志》（*Journal for Maritime Research* ）发表了《海战胜利的本质》（The Nature of Victory at Sea）一文。他首先驳斥了认为特拉法尔加海战挫败了拿破仑侵英计划、确定了英国海上霸权的陈说，承认特拉法尔加并未在欧洲造成直接的战略影响。但他也认为科贝特、格雷厄姆与肯尼迪忽视了海战在经济、外交方面的独特性质，过度限缩了海军在最终胜利中的间接贡献。[7] 与此同时，埃克塞特大学海军史教授迈克尔·达菲（Michael Duffy）也在2005年的《水手之镜》（*The Mariner’s Mirror* ）中发表文章《“一切都已被掩盖”：被隐藏的特拉法尔加》（‘...All was Hushed Up’：The Hidden Trafalgar），这篇精彩的论文雄辩地揭示出英军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重大失误以及传统叙事的根源。达菲指出，由于纳尔逊鲁莽的接敌阵型与英舰的迟缓行动，仅有半数的英舰在战斗打响的一个小时内投入了战斗，本可以在半个小时内全部投入战斗的科林伍德分队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全部参战；而在整场战斗中，仅有13艘战舰执行了纳尔逊的近战命令。但为了保全老友纳尔逊的身后荣誉，为了防止这场大胜演变为军事法庭上的相互攻讦，继任

司令科林伍德与那些未尽职责的军官一起向政府和公众隐瞒了这一切。[8]

时至今日，对特拉法尔加海战的探讨仍远未终结。尽管作为海权象征与教义来源的特拉法尔加战役已经远逝，尽管曾笼罩这场旧日海战的神话已被打破，但历史本身的魅力并不会因后人赋予的意义而有所增减，为它着迷的人们仍会为这卷泛黄的宏伟史诗描摹出新的细节、新的图景、新的侧面。2010年11月，在当年第4期《水手之镜》中，本业为软件工程师的海军史研究者托尼·比尔斯（Tony Beales）通过对部分战舰的航迹整理，在《“远大前程”：英国战舰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接敌》（‘Great Expectations’：The Approach of British Ships at the Battle of Trafalgar）一文中对英军的失误提出了新解。比尔斯认为，纳尔逊在战斗前夜的机动导致英国舰队在战斗当日极为分散，当日的海风既微弱又多变，这迫使英国舰队要在结阵上花费超出预期的大量时间，部分航行条件和初始位置不佳的战舰因此无法及时驶入阵位。[9] 这无疑为纳尔逊的临阵决策补充了一个关键侧面，而从另一方面着眼，这也说明人们仍能用海军史的传统视角与传统的思辨能力在这场经典海战中寻得新的发现。对这段历史而言，科贝特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出色研究无疑为后人提供了相当高的起点。我们可以反对他那19世纪的“历史科学”观，可以拒斥那种服务现实的研究目的，可以不接受他的海军战略学说，却难以否定他对恢复具体历史情境的追求与摒弃浪漫传奇的冷静思辨。正是这两种简单而基本的思维素质使得《特拉法尔加战役》成为相关海军史研究中无法忽略的杰作。即便在今日，这种简单而基本的历史思维仍然不可或缺。

陈骆

2015年7月

致爱妻

在她的生日这天

1910年10月21日

---

[1] Donald M.Schurman，“Julian Corbett’s Influence on the Royal Navy’s Perception of Its Maritime Function，” *Mahan Is Not Enough*：*The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on the Works of Sir Julian Corbett and Admiral Sir Herbert Richmond*（Newport，RI：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93），p.52.

[2] Liam J.Cleaver，“The Pen behind the Fleet：The Influence of Sir Julian Stafford Corbett on British Naval Development，1898-1918，” *Comparative Strategy*，Vol.14，No.1，1995，p.52.

[3] 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1793-1812*，Vol.2（Little，Brown，and Company，1905），p.196.

[4] “Appendix IV：Memorandum on Sea-Power and the Principles Involved，” *The Collective Naval Defence of the Empire*，*1900-1940*，Vol.136（Navy Records Society，1997），p.7.

[5] C.T.Atkinson，“Reviewed Work：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 by Julian S.Corbett，” *The 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Vol.8，No.29，1910，pp.76-80.

[6] Alfred Hugh Taylor，“The Battle of Trafalgar，” *The Mariner’s Mirror*，Vol.36，Issue 4，1950，pp.281-321.

[7] N.A.M.Rodger，“The Nature of Victory at Sea，” *Journal for Maritime Research*，Vol.7，No.1，2005，pp.110-122.

[8] Michael Duffy，“‘...All was Hushed Up’：The Hidden Trafalgar，” *The Mariner’s Mirror*，Vol.91，Issue 2，2005，pp.216-240.

[9] Tony Beales，“‘Great Expectations’：The Approach of British Ships at the Battle of Trafalgar，” *The Mariner’s Mirror*，Vol.96，Issue 4，2010，pp.455-467.

自序

在奥曼教授（Professor Oman）最近为《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列出的滑铁卢战役研究文献中，完全致力于阐明史实的作品已有近二十种。但对于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我们英文世界却几乎一无所成。对那场战斗（battle）本身已经有了无数的研究，或严肃，或幻想，或热衷于趣闻轶事，但如下的事实仍然没有改变：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没有一位英文作者能够利用现存的大量史料，为这个海军史的巅峰篇章撰写一部类似于参谋报告的翔实作品。是的，我们已经欣喜地拥有了纽波特先生（Mr.Newbolt）的《特拉法尔加之年》（*The Year of Trafalgar* ）。然而，尽管其中已经包含了目前对这场战斗的最佳研究，它却完全没有涉及导致这场海战的政策与行动。事实上，近年来围绕这场海战的所有艰苦努力——包括约翰·K.劳顿爵士（Sir John K.Laughton）、利兰先生（Mr.Leyland）和其他人的作品——都遗漏了这个海军与公众都十分关切的环节，都存在着与我们大部分的海军史研究同样的盲点。只有纳尔逊参与的部分得到了充分合理的对待，也的确只有他的视角曾让我们接近这场战役。不过，他的分量直到战役临近末尾时都还相当有限。直到他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再次统领地中海战区之前，他麾下仅有12艘战列舰与20余艘各类巡洋舰[1]。而在那一年中，现役与后备役中的战列舰远远超过100艘，还有超过400艘的各型巡洋舰。

在此之外，远比海军方面遗漏得更加彻底的是这场战役的陆军方面。在那一年中，除去在东印度与西印度的部队，英国还有约5万名士兵在本土之外积极作战。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与纳尔逊有所关联，而他们

对他的决策造成的巨大影响几乎被完全忽略。事实上，可以毫不过分地说，1805年战役并非一场海军战役，而是一场海陆联合战役，并且我们从未赋予它与之相应的重要性。同时，仍然极少有人能认识到它并不仅仅是为了防御入侵，它还是一场进攻性的战役。对这些关键事实的误判让人们错误地理解了纳尔逊的行动，让他遭受那些并不应得到的批评，更不用说在其他的各个方面所造成的阴影了。

详尽的研究并不会有损纳尔逊的伟大。这种研究会提高他的同僚们的声誉，但纳尔逊仍是最伟大的海军将领之一。他炫目的个人魅力目前仍主导着相关判断，因此只有长期而严肃地与之保持距离，我们才可能看清事件的主次关联和真实含义。要想能够正确地吸取这些教训，我们不仅要将纳尔逊放到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从属位置，同时还要坚决放弃只顾海战前线的冲动，从而将自己置身于小皮特（Pitt）、梅尔维尔（Melville）、巴勒姆（Barham）与卡斯尔雷（Castlereagh）所在的密室里。在他们身边，我们才能看到他们用以指挥海上舰队的内在动力，并从间谍、巡洋舰与外交官们发来的源源不断的情报之间找出令他们行动起来或停歇下去的关键信息。

由于所需档案的大量公布，将这种业已广泛运用于陆军战役的细致研究推广到海军中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战役的外交影响方面，我们已经有了霍兰德·罗斯先生（Mr.Holland Rose）为皇家历史协会整理的《第三次反法同盟相关密件，1804～1805年》（*Select Despatches Relating to the Third Coalition Against France，1804-5*）。不幸的是，编者并未标上密件的收信时间，如果不核对原件，我们很难追索它们与海陆军具体指令之间的关联。除了这本必不可少的资料之外，还有著名的拿破仑与塔列朗（Talleyrand）之间的书信集，而P.库科尔先生（Mons.P.Coquelle）的《拿破仑与英格兰（1803～1813年）》［*Napoleon et Angleterre*（*1803-13*）］以及夏尔·奥瑞尔先生（Mons.Charles Auriol）的《法国、英国与那不勒斯（1803～1806

年）》［*La France，l'Angleterre et Naples*（*1803-6*）］也都是价值极高的作品。

在海军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利兰先生为海军档案协会整理的《封锁布雷斯特相关信件，1803～1805年》（*Despatches and Letters relating to the Blockade of Brest，1803-5*），以及最近由康沃利斯·维肯姆-马丁先生（Mr.Cornwallis Wykeham-Martin）的藏稿（*Various Collections*，vol.vi，1909）整理而来、由历史文献委员会（Historical MSS.Commission）出版的《康沃利斯文集》（*Cornwallis Papers*）。然而，最具价值的作品却是来自法国陆军部；如果不说是羞愧，我们也必须虚心地看到自己的问题。爱德华·德斯奇霍上校（Colonel Edouard Desbriére）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法国陆军总参谋部历史局（Section Historique de l'État-major de l'Armée）[2]的指导下出版，名为《入侵不列颠群岛的计划与尝试（1793～1805年）》（*Projets et tentatives de débarquement aux iles Britanniques，1793-1805*）与《特拉法尔加海上战役》（*La Campagne Maritime de Trafalgar*）。在书中，德斯奇霍首次尝试为这场战役构建起一种真正的参谋战史（Staff history）。尽管这些作品未能充分利用尚未出版的英方史料，但他们却首次将英国放到了合理的位置上，希望考察这场战役的真实情形。此外，德斯奇霍上校曾亲自为我解释因打字机出错而无法辨认的字句，这更加深了我对这些作品的愧疚之心。在西班牙方面，由加利亚诺将军（General Galiano）——一位特拉法尔加海战英雄的直系后裔——撰写的相关作品仍在《海军期刊》（*Revista de Marina*）杂志上连载。这可以用于佐证德斯奇霍上校的著作，尽管加利亚诺将军业已慷慨地为法国总参谋部提供了德斯奇霍所需的绝大部分重要的西班牙档案。

在最近才能使用的文献资源方面，我们还有保管在公共档案馆的《皮特文集》（*Pitt Papers*）与即将由海军档案协会出版的《巴勒姆文集》（*Barham Papers*）。我被允许使用后者中的资料，并在审阅它们

时得到了文集整理者约翰·劳顿爵士的宝贵帮助。

在大量的舰艇日记、航海日志、将领与舰长的书信以及其他海军部文档间爬梳，将之改写为叙述或评论型的文体，这自然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但是，人们给予我的现成帮助已经让这条艰苦的道路平整了许多。我要特别向皇家海军的赫德尔斯顿上校（Captain Hudleston）表示感谢，他将他关于本土海域海军防御体系的研究惠赐于我。我要感谢海军部图书馆员佩兰先生（Mr.Perrin），他为我提供了多方面协助，特别是在整理特拉法尔加海战信号时间表的工作上。我还要感谢皇家海军的齐特上尉（Lieutenant Keate），他曾在根据航海日志绘制航迹图的准备工作中提供帮助。

本书首次绘制并发表的这些航迹图是所有战略批评的必要基础，但必须声明的是，它们绝非精确无误。除非另有说明，所有航迹都是通过直接联结相邻两日中午时的位置而得出，又因为经度观测的不准确性，这些位置只能算是大致准确。在一些有小型巡洋舰参与的场合中，它们被忽视的航迹往往能决定性地匡正主力舰队的行动，如奥德（Orde）在加迪斯港外的撤退，或是纳尔逊去西印度群岛追击敌人的最终决定。然而，在费罗尔港外发现维尔纳夫（Villeneuve）最新行动的“鸢尾花”号（Iris）尽管身处如此重要的情境中，舰上却没有一个人曾测得当时的经度。它的航海日志只记着它从乌桑特岛（现称韦桑岛）南下后首先抵达了佩尼亚斯角（Cape Peñas），那里位于奥特格尔角（Cape Ortegal）以西100英里。

难度更大的工作则是绘制法军的精确航迹图。我们最初是基于德斯奇霍上校的绘图，不幸的是，这些绘图的质量实在无法与书中的其他部分相比，只能按照档案记录小心地加以修正。一些档案中还有些明显的错误，尤其是关于维尔纳夫在费罗尔和加迪斯港外撤退的部分。在这样的例子中，我们转而采用英军巡洋舰实际观察、报告的航迹。在这种最

难确证的情况下，只有两艘或以上的独自行动的巡洋舰给出了相互一致的观察，我们才认可它们报告的位置和航向。

我希望，这些巡洋舰的行动和指令——事实上是整个侦察和情报系统——能被视为这本书中最为有趣的章节。由于詹姆斯[3]创下的不幸先例，巡洋舰行动的记述常常与主要舰队行动相割裂。尽管前者本是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我们现在却很难了解巡航舰作战之外的其他情况。对于海军军官而言，事实上是对于所有严肃的海战研究者而言，这样写出的历史定会带有让人抵触的不真实色彩。他们需要的是每场行动中各种舰船的综合行动报告，需要清楚地了解行动展开时所依据的情报与指令。简言之，如果海军史的目的是将自身打造成实实在在的行动指导，那么研究者就必须能在这些战役报告中找到与现代行动报告的共通之处。

若从这一点着眼，即便从本书暂时采用的不完善的著述方式看来，所有人都会感到我们目前拥有的大部分海军史都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不夸张地说，所有内容都需要按照参谋报告的方式重写。除非在海军部成立一个历史研究机构，这样庞大而技术性的工作才可能圆满完成，而需要这样一个机构的呼声已经出现。我们的海军档案中埋藏着成熟的海军传统，埋藏着大量不为人知的学识，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但它却遭人遗忘，仍在休眠。这股无法估量的历史力量正在被白白浪费，它们本应该，也只能属于枪炮之后的我们。但是，要重新唤醒这一传统，要使它重新活过来，要让它如同对巴勒姆、康沃利斯与纳尔逊那样再次赋予我们勇气与主动性，再次向我们施展那些奇迹，这绝非个人的努力所能企及。它需要一间不亚于最为专门化的海军技术实体部门的实验室，以让海军内外的专家并肩协作，相互补足缺陷、完善观点。

有人曾建议道，大学中的海军史教席或许能满足这些需要。然而，

这些教席虽然可能在陆军史方面取得成功，或许也有助于塑造一种理智的全民观念，却注定无法满足海军的实际需求。旧日的海军传统诞生于咸涩的海水中，它也只能在咸涩的海水中得到滋养；有关海洋的知识必须呼吸大海的气息，否则就只能得出一些学院化的论断。如果将这种复兴任务与海军部相分离，就会使那些难以把握的精神、那些我们独有的财富同它的宝贵源泉相割裂。只有我们才能承担起运用这些知识的任务；最完美的组织，最学术化的研究，最复杂的科技，这一切都无法为它提供立足点。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海上战争的结晶，而我们才是几个世纪之后的继承者。它们诞生时的那种氛围才是问题的灵魂所在，而只有与舰队保持密切接触，它的智慧才能得到人们的信赖。

我希望，这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现实。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或许能再次拉开奥德修斯之弓[4]，再次认识到这股力量的价值所在。历史研究机构也将如同高能炸药实验室或测试水槽，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国家资产。

J.S.C

---

[1] 需要说明的是，科贝特在本书中广泛使用的“巡洋舰”（cruiser）一词是指所有可以在外海执行巡航、侦察、护航、破交、通信等任务的非主力舰。作为军舰类别的“巡洋舰”概念源自基于不同任务职能所做的舰种划分，但这种分类直至1870年代才成为海军语言的主流，而在此前的风帆时代，船型与载炮数量才是军舰归类的主要依据。若按照当时的舰种划分，科贝特的“巡洋舰”概念包含了巡航舰（frigate）、轻帆船（sloop）、纵帆船（schooner）、双桅船（brig）等多种军舰。——译者注

[2] 1890年代，新成立的法国总参谋部（General Staff）开始对拿破仑战争与普法战争展开全面研究，其总体目的并非对历史做出公正评判，而是希望从历史中得出对未来战争有益的指导意见。他们的研究因1914年大战爆发而终止。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是拿破仑战争研究中的关键环节。——译者注

[3] 威廉·詹姆斯（William M.James，1780～1827年），英国海军史早期研究者。他曾在拿破仑战争与第二次英美战争期间（1801～1813年）任职于牙买

加的海军中将官署，后投身于海军史撰述。其主要作品是六卷本《大不列颠海军史，1793～1827年》（*Nav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1793-1827* ）中的前五卷。此书广泛使用一手史料，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海军史作品。在该书中，詹姆斯将当时的海战分为主要舰队行动与小型战斗而分别加以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割裂了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译者注

[4] 奥德修斯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最具智谋的希腊英雄。他曾设下木马计，使希腊联军赢得特洛伊战争。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在凯旋途中历经险阻，迟滞了十年之久，家中的妻子佩涅洛佩因此遭到许多追求者的纠缠。迫于各种求婚和威胁，她最终将丈夫的弓挂在墙上，宣布谁能拉开此弓，她便以身相许。试者云集却无人能如愿，直至伪装成乞丐回到家中的奥德修斯一把拉开了自己的弓。——译者注

第一章 小皮特的大战略

1804年5月，小皮特怀揣着坚定的战争决心重掌大权。[1] 他已决定，要用他父亲的那种艰苦方法来进行一场同样大规模的漫长战争。在他写作于此时的文稿中，一段引人注目的雄辩式的设问正敦促着他重新回到那个曾被威廉三世（William the Third）、马尔波罗（Marlborough）和他的父亲所取得的关键位置[2]：他要成为全欧洲反抗其最为强大的压迫者的领袖，要挑动各大强权达成联合，同时，还要粉碎那种认为英国在伟大的老皮特时代之后就再没出现一位战争名臣的讪谤之语。

英国的国力已在战争中成长，觉察到这一点的人们正期望小皮特能够表现出这种昂扬的精神。他们期望皮特不仅教会他们如何避免一场入侵，更要教会他们如何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如何以之击败其头号劲敌——就像英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皮特驾驭着这种精神，手握缰绳，开始驱动他的庞大计划，为这场战争描画出一个全新的、更具意义的前景。

自从《亚眠和约》被打破以来，英国采取的政策一直是防御性的。拿破仑肆无忌惮地践踏着他订立的种种外交约定，毫不掩饰其用暴力威胁将英国孤立于欧陆之外的目的，最终驱使追求和平的阿丁顿[3] 政府于1803年5月18日对法国宣战。[4] 可宣战是一回事，进行战争则是另一回事。这被证明是超出了该届政府的能力所及。他们完全受制于法军的入侵威胁，让拿破仑夺取了主动权。由于陆军的弱小，英国在欧陆发动攻势的希望完全破灭，而自信的拿破仑则能够得意地向那些试图抵抗他的

国家发动攻击。

受制于当时的资源，英国所进行的攻势行动只能是纯粹的海上战争，其对象则是法国的海外贸易及其弱小的殖民地。战争爆发之时，即便不将上一次战争中被派往夺取法国岛屿而尚未返回的守备部队计算在内，英军在西印度群岛也还有相当可观的兵力。他们随即夺取了圣卢西亚（St.Lucia）——这个在过去的历史经验中被视为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关键海军据点的岛屿，它的归属问题甚至一度危及结束七年战争的和平协定。由于上一次战争的苦涩教训，英军在这次战争刚刚开始时就不顾约定夺取了多巴哥（Tobago），以及德梅拉拉（Demerara）、埃塞奎博（Essequibo）、伯比斯（Berbice）、苏里南（Surinam）这四处荷兰据点。这些据点都需要驻扎卫戍部队，其结果是占用了英国本不宽裕的陆军兵力的相当比例，进一步降低了其在本土周围展开积极行动的可能性。[5]

阿丁顿及其同僚因此遭到了无情的责难，但若能诚实理性地看待当时的政治局势，我们就不会接受这些仅仅基于一贯的反对立场而提出的批评。首先，英国并不具备独自用陆军在欧洲展开行动的任何可能性，但他们只能独自面对战争。其次，对荷兰殖民地的突袭事实上有着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目的。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正如现在双方都承认的那样，是由于拿破仑打破《吕内维尔和约》的无耻行径——在和约的墨迹尚未干透时，拿破仑就迫使荷兰与法国结盟。类似的行为还发生在北意大利与瑞士，他的背信弃义引起了愈发激烈的抗议。对荷兰的实质吞并不可避免地召唤着战争的重启，因为这一行径触碰到了英国传统政策的底线，英国从来不能忍受在本土海域（the Narrow Seas）周边遭遇威胁。作为回应，英国拒绝按照《亚眠和约》的约定从马耳他撤军，新的战争因此而起。在此背景下，对荷兰殖民地的突袭在逻辑上也就完全合理。这是一场立即就能发起的突袭，而且它能教会世人，如果法国不让英国在欧洲格局中占据一席，法兰西帝国也就别想在大海对岸享有任何

余地。

征服西印度诸岛并未收获任何有利的政治影响，但就战争实效而言，却也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英军夺取的岛屿是私掠船的聚集地，而私掠船则是对英国海外贸易的最大威胁。历史经验表明，解决私掠船问题不能仅仅依靠舰船的行动，因此，阿丁顿的策略不仅是对法国海外贸易与国家财政的打击，同时也是对英国最为有效的防御。请记住，是英国的财政能力最终让英国击败了拿破仑，财政能力是英国团结盟友的唯一能力，而在此时，英国唯一可能的攻势行动就是打击法国的海外贸易。这种攻击方式无疑让拿破仑倍感头疼，他在和平时期的首要任务正是重建国家财政与海军。因此，责备西印度行动违背了兵力集中原则、对战争无实质意义的判断与批评或许是太过狭隘了。一个海洋帝国必须对大陆国家战略家提出的那些简单公式保持谨慎。海上战争与陆地战争在其本质条件上存在着太多的差异，将其中一方的规则套用在另一方的复杂性之上远远不足以解决问题。而且，阿丁顿的批评者至少应该指出，把部队投入在其他哪个地方能够取得比巩固英国海军优势和减轻其负担更大的收益。[6]

很快，所有人都意识到，更加激烈的事态即将来临。皮特正是乘着这股要求立即改弦更张的激进浪潮重掌大权。英国本土兵力得到迅速强化。在战争开始时，英国本土的正规军仅略多于5万人，而在1804年夏天，这一数字增长到8.7万人，此外还有8万名民兵以及34.3万名志愿兵——总兵力已超过50万人。皮特的第一个措施是进一步增强正规军兵力，但即便如此，对抗像拿破仑这样的强权不可能仅着眼于单边行动。他开始考虑像他父亲那样联合起欧洲大陆上的陆军强国，通过一个联盟来聚集巨大的战争能量。

在试图组建联盟的谈判与初步行动中，我们得以发现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关键意义。若将这场战役视作那种旧式的、已经被皮特放弃的、仅

仅是为抵抗入侵的防御政策的结果，我们就无法理解其真实含义。这种错误认识已衍生出大量批评，而真正的教益却被掩埋在一大堆错误的战略推论里。如果我们想重现旧日海军经验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就必须将之从这些错误中挖掘出来。作为第一步，我们首先应当对皮特的反法同盟政策有所知悉。当拿破仑因英军拒绝撤离马耳他而千方百计地恫吓阿丁顿政府之时，他公开宣称要让英国从欧洲大陆孤立出去。英国在拿破仑眼中孤立无援；他那近乎疯狂的自负使他相信，他能阻止欧洲固有政治机制的生效，能够践踏赋予英国国际政治地位的基本法则，即便它们从未从欧洲格局的历史中隐去。然而，这些被他蔑视的法则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再次生效了，甚至在皮特重掌大权之前就已在俄国那里取得了进展。拿破仑在荷兰、意大利与瑞士的行为让俄国相信，他想建立欧洲帝国的野心一刻也不会停息，因此，俄国一心希望组建一个防御同盟来对抗他的大计。

危机已经到了最急迫之时，只有英国能够给予他们有效的帮助。据信，拿破仑正计划从阿尔巴尼亚与希腊两路攻略奥斯曼帝国，俄国因而必须在科孚岛（Corfu）与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保持一支小舰队与一支驻军。英国同样深切关注拿破仑的企图，土耳其是攻向印度的重要一步，因此，即便违反《亚眠和约》，英国也必须固守位于东西地中海交界之处的马耳他。当然，英俄两国还有其他共同利益。这一利益的交集，就是被拿破仑公开威胁、将成为其近东攻略之起点的南意大利。俄国已将那不勒斯王国纳入其特殊保护之下；而自克伦威尔时代以来，防止两西西里王国（包括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落入法国之手就是英国的传统政策——正如防止其他强权染指低地（the Low Countries）[7] 一样。

自然地，伦敦很快收到了俄国人的提议。沙皇的大使沃龙佐夫（Woronzow）[8] 告诉刚刚上任的英国首相皮特，俄国将从黑海调出一支大军，按照时局需要派往爱奥尼亚群岛或是意大利，而沙皇希望英王

陛下能在马耳他保有一支部队，准备届时与俄军联合作战。[9]

英俄两国的联合意图正是那条最终导致特拉法尔加海战的线索的起点。它是如此的隐微，但只有它能确切地引导我们走出这场战役的迷局。长期以来，那些或喜或悲的大事件让这条主线晦暗不明；但在今天，我们可以理智地断言，如果拿破仑不是被它困扰，这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海战就根本不会发生。正是试图挣脱它的努力让拿破仑赔上了他的舰队，而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将它控制于指掌之间，我们也会走上歧途，无法理解这一年中所有行动的真实含义。现在，让我们继续追踪这条曲折前行的线索，直至其坚固地构织起最终的事件。

沙皇脑海中的意图，是在英国的支持——尤其是财政支持——下，与奥地利、普鲁士和瑞典组建一个防御同盟。这些国家是否愿意加入尚不得而知，且组建起这种同盟也势必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在此期间，拿破仑很可能已极大地强化了他的阵势，但是英国与俄国至少能够共同阻止他在地中海继续向前。在《亚眠和约》中，拿破仑同意从那不勒斯的奥特朗托（Otranto）和塔兰托（Taranto）撤军，可现在又重新占领了这两处意大利南部的海港。从这里出发，拿破仑不仅威胁着亚得里亚海对面的陆地，而且还可以穿过卡拉布里亚，向西西里发起突袭。这是对当前局势最为致命的威胁，也是必须力图避免的威胁，因此，在地中海投入英军也就成了皮特战略的标志与考验。皮特向俄国施压道，同盟应该是进攻性的，且应立即展开行动，而沙皇随即要求英国加强在地中海的驻军，且要求组建一支在意大利作战的部队。皮特要求宽限两三个月，因为英国目前还没有足够兵力进行这样一场远征。英国驻俄大使约翰·B.沃伦将军[10] 马上补充道，英国可以在马耳他与直布罗陀的驻军中腾出一大部分来组建一支军队，剩余兵力则将在沙皇组建攻守同盟之后很快抵达。[11]

于是，双方接触还不到一个月，俄国就决定向拿破仑发出最后通

牒。俄国要求拿破仑撤出普利亚（Puglia），妥善处理意大利问题，对撒丁国王做出赔偿，并从北德意志撤军。如果法方在二十四小时内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俄国大使就将离开巴黎。[12] 在迈出这坚决的一步之后，皮特派格兰维尔·列文森-高尔勋爵[13] 取代沃伦担任驻俄大使，让他与俄国进行正式的联盟谈判。在他所携带的特别指令中，第一个任务是了解俄军在意大利的目的，扫除英国对俄方行动的误解。皮特希望俄军立即夺取从塔兰托进入卡拉布里亚的道路，而沙皇则认为其首要目的是独自将法军逐出那不勒斯王国。列文森-高尔指出，沙皇的目的在奥地利加入同盟之前不可能实现，但如果他选择前一行动，马耳他的2000名英国士兵就能马上提供支援。在此时，防止法国通过一场穿越卡拉布里亚的奇袭夺取西西里是英国最为紧急的目标。如果失去了作为补给基地的西西里，英国地中海舰队就很难继续保持在有效的阵位上。

这封特别指令中的其他语句也值得铭记。这是由皮特的外交大臣哈罗比勋爵[14] 写给列文森-高尔的，它在字里行间解释了如此重要的海军战略，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纳尔逊对于那不勒斯问题的意见的钥匙，从而与之后所涉及的复杂的海军问题相联系。在英俄谈判中，英国的实际资本在于地中海的制海权，而这又取决于纳尔逊对法国土伦舰队的控驭——他的办法不是那种不必要的近距离封锁，而是如他所说，“让它处于掌握之中”，直至他能够与之遭遇，将之歼灭。“如果西西里陷落，”哈罗比向列文森-高尔写道，“能否像现在这样保持对土伦的有效封锁就会成为问题。万一法国舰队从港口逃出，并向亚得里亚海派出任何足够强大的分舰队，俄国政府就会担心他们在这一海域中的舰队有暴露的风险，而法军也就有机会向阿尔巴尼亚或者希腊南部的摩里亚（Morea）发起成功的攻击。”

这也正是纳尔逊的看法。他并不是近距离封锁着土伦，而是在一定距离上积极地监守着土伦舰队。一旦它们向东方出击，危及他所特别保护的地区，他就会前去与之交战。直布罗陀与马耳他对这一目的作用甚

微，它们的位置并不适于作为纳尔逊的基地。法军有可能向西驶出直布罗陀海峡，也可能向东驶向那不勒斯或地中海东部，因此，英军最理想的海军基地应该能让纳尔逊保持在敌军这两种可能行动的共同内线位置上。这就是为什么纳尔逊一再强调，撒丁岛与西西里是英军战略位置的关键。

哈罗比继续向列文森-高尔写道：“你将会收到我给沃龙佐夫的保证，我方会尽力加强马耳他驻军。你可以向他们表示，5000～6000人的增援兵力将会在未来数月中抵达。这些部队将按时局需要而被用于守卫西西里、卡拉布里亚以及土耳其……但是目前看来，他们的关注重心应该已被特别吸引到防卫……西西里。”[15] 不过，一个新提议的出现结束了这一调兵计划。按照这一提议，俄国将立刻派出军队，与卡拉布里亚当地人一道防守通往西西里的道路，而英国则负责支援，并为他们提供补给以及武器。同时，从马耳他出击的英军则要占领墨西拿。

列文森-高尔还收到了另一份特别指令，要求他向俄方施压，让撒丁王国重新得到皮埃蒙特，以此作为法国重建意大利秩序的阻碍。加强萨伏依王室是为了保持地中海的均势，这是英国一贯的策略。撒丁王国陆军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但是在英国眼中，它作为海军基地的价值也毫不逊色。自纳尔逊统领地中海舰队以来，他一直向英国政府强调撒丁岛的战略意义。皮特上台不久就在给他的指令中表达了本届政府对这一观点的赞许。在写给列文森-高尔的这封指令落笔之时，纳尔逊已经获知，英国政府正特别关注着撒丁岛的局势。[16]

但是，英方多线行动的提议并未得到俄国政府的赞许。俄国人希望得到一支更大的军队，在意大利展开联合行动，由一位将军统一指挥。然而考虑到拿破仑在布洛涅的大军团对英国本土的威胁，列文森-高尔只能以英国目前无法再在地中海投入兵力作为回应。[17] 不过，伦敦的小皮特正尽一切努力加强英军的机动兵力，他不仅继续强化正规军，更

采取措施让地方武装承担起本土防御的任务。[18] 在数次讨价还价之后，俄国接受了英国在一到两个月内提供8000名士兵的承诺，并同意以科孚岛的20000名士兵与之联合。联军将由一位俄国将领作为总司令，英方则承担必要的运输任务。英国政府同意了这一计划，在1804年年底，埃塞克斯防区司令官詹姆斯·克雷格爵士[19] 接到准备向马耳他调兵的命令。

在英俄两国商议地中海行动军事安排的同时，组建一个稳固同盟的谈判也在重重困阻间继续。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奥地利的摇摆不定，以及随之在各国间引起的相互猜疑。俄国不甘于英国对保留马耳他的执着，英国又怀疑俄国的真实目的是攻略土耳其。较之从拿破仑的威胁下解放欧洲，奥地利更关心如何在北意大利恢复哈布斯堡王朝的旧日势力，普鲁士则只对篡取汉诺威有兴趣，而瑞典只准备通过有限的行动赚得英国提供的佣金，而这些行动与它们的实力和获得的报酬完全不成比例。

尽管这一情况让皮特恼怒至极，但在1804年冬季来临时，英国的处境已极大地好转，甚至能够解散部分守备军。英国本土的防御体系尽管陈旧，却仍然坚不可摧。对法军入侵的恐惧已经让位于一种强烈的复仇意愿，他们正渴望着向那个让英国陷入如此的恐慌、付出如此的代价的人发起反击。

英国的防御体系已在历史上多次展现其实力，任何花招和设计都难以突破它的阻击。由小炮艇和小军舰组成的英国舰群直接面对着从泰瑟尔岛到勒哈弗尔沿岸的法军阵营，它们使得拿破仑的运兵船队在取得战列舰队的支援之前无法渡海入侵。英军的轻型舰群得到了一支小型战列舰队的加强，这支舰队的实力足以对付泰瑟尔岛的荷兰战列舰队，以及任何从被封锁的大西洋港口逃逸的小股敌军。基思勋爵[20] 负责指挥这些部队，其指挥部设在唐斯锚地（the Downs），又在雅茅斯（Yarmouth）与诺尔沙洲（the Nore）设立了下属基地，用以监视泰瑟

尔与敦刻尔克的敌军动向。英方总体的防御计划是让轻型舰群与被称为“封锁舰”的岸防战舰布防于英国海岸，结成若干集结点。[21] 前出的轻型巡洋舰队负责监视法军的行动，如果法军运兵船试图驶出布洛涅、埃塔普勒（Étaples）、维姆勒（Wimereux）或昂布勒斯特（Ambleteuse）四处港口，它们就应抓住一切机会发起攻击。在海峡群岛还设有一支由索马里兹少将[22] 指挥的独立巡洋舰队，负责防止法军运输船通过周边海域，或是对海峡群岛发动攻击。但他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保持基思所部与西方舰队（Western Squadron）的联系——后者的职责是掩护整个战区。[23] 西方舰队是英国海军的核心主力，它由康沃利斯[24] 指挥，扼守着英吉利海峡的西部入口，并封锁着布雷斯特。此外，还有两支从西方舰队延伸出的分舰队在罗什福尔和费罗尔港外封锁着港内法军。[25]

通过这种久经考验的方式，英国舰队牢固而不可动摇地阻挡着意图入侵的敌人。拿破仑却仍如他的前辈那样天真地认为，他可以出其不意，靠用远方的战列舰队发起突然袭击的方式来突破这些防御。他认为法军能轻松地避开康沃利斯，因为后者会因封锁布雷斯特的任务而固守在港外；但这种看法却是对英国西方舰队之职能的误解，真实情况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被诺里斯（Norris）与安森（Anson）阐明。[26] 如同今天的很多人一样，拿破仑仅仅将西方舰队视为一支封锁布雷斯特的舰队，但事实上，这支把守海峡通道的舰队却承担着英国本土与贸易保护所需的综合任务。封锁布雷斯特，正如封锁罗什福尔与费罗尔，只是它的临时任务之一。在战争中的任何情况下，任何敌舰队在与西方舰队交战并将之击败前都绝不可能进入甚至接近英吉利海峡，甚至用兵力更强的舰队试图与英军交战的策略也一再遭到失败，这已得到了1779年与1782年战役的证明。[27] 法国海军与英国海军部对此都了然于胸。

我们可以借由梅尔维尔勋爵——皮特的海军大臣——在1804年8月致康沃利斯的一封指令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的英国政府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处境的。当年7月底，康沃利斯从西方舰队司令的职位上休假回国，从封锁敌军的紧张中放松自己，将指挥权移交给他的副司令官查尔斯·克顿爵士（Sir Charles Cotton）。仅仅两三周之后，法军即将发动入侵的危机出现。英国政府、海军部都对康沃利斯抱有高度的信心，但毕竟无法十分从容地对待他的缺席。[28] 在他休假期间，梅尔维尔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最后，康沃利斯结束休假，返回西方舰队的指挥位置，这就是8月24日的这封指令发出时的背景。

这封指令首先复述了一则情报，表明法国布雷斯特舰队即将有所行动。指令认为，法军有一到两个可能的目的地，而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出击的舰队是否搭载着陆军。如果没有搭载部队，这可能意味着其目的是掩护大军团入侵。“这看起来是一次绝望的尝试，”指令写道，“如果他们试图利用任何偶发情况逃脱你的监视而驶入海峡，那也很可能使他们的舰队招致毁灭。”由于历史上的类似尝试全都以灾难性的惨败而告终，因此海军部甚至不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再次出现。[29] “不过，”指令继续写道，“如果现在的法国政府决定冒上一切风险执行这个长期威胁我国的计划，我们也无法用理性思维来估算其可能性。我们必须警惕这种概率极小的事件，毕竟一时的激情放肆也可能使它发生。”因此，康沃利斯应该用尽可能近的距离封锁敌军，即便他们侥幸脱逃，他也能很快跟上敌舰并将之歼灭。指令进一步提醒道，如果敌军的真实目的是进入海峡掩护大军团渡海，他们便会用尽一切办法试图误导封锁舰队。我们在这里看到，英国政府早已洞悉了拿破仑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意图——骗开康沃利斯舰队正是拿破仑入侵计划的前提之一。

指令之后的部分为敌军各种可能的行动制定了不同的反制方案。若敌军舰队倾巢而出，康沃利斯又与它们脱离了接触，他就应该驶向利泽德半岛（Lizard）[30] 附近，在那儿肯定能得到法军是否进入海峡的消息。如果法军尚未进入，他就应在此固守，或者前往爱尔兰海岸他认为更加可取的其他要地。若只有部分敌舰搭载着陆军部队出航，它们的目

的便可能是爱尔兰，他应该派出一支实力相当的分舰队如前所述般进行截击。若部分敌舰向南方出航且未搭载陆军，其目的有可能是与地中海舰队会合。若敌舰不超过五六艘而又搭载着陆军，目的就可能是西印度群岛，他仍应如前所述，派出兵力相当的分舰队。

这封指令也设想了全部敌军或敌军主力出击可能是为罗什福尔与费罗尔解围的情形。其应对措施，是让那儿的两位舰队司令“在西班牙北部海岸或其他地方将两支舰队集结起来”，康沃利斯则应率西方舰队与之会合。他还应安排巡航舰为他随时提供预警信息，并以其主力舰队为巡航舰提供增援，使之具备持续跟踪敌舰队的实力。如果两者中的任何一支封锁舰队因强敌出现而被迫解除封锁，它就应立即加入另一支舰队，一同等待增援的到来。接下来的部分对如何封锁布雷斯特做出了若干指示。这些指示极其琐碎，但其中仍包含了一个保留条款，在保证战役计划照章进行的同时也赋予一线将领某些决策自主权。“我们意识到，这些指令在许多无法预见的具体情况中也许是难以执行的。在这些情况下，你必须用自己的酌定权与决断力来指导你的行为，及时通过我们的秘书向我们报告你的进展。”[31]

这些睿智而全面的指令自然不可能全部出自梅尔维尔勋爵一人的手笔。几乎可以确定，它们是在康沃利斯尚在休假时与之共同订立的，其中不仅包括康沃利斯的观点，也可能包括未来的巴勒姆勋爵查尔斯·米德尔顿[32]的意见，后者即将成为特拉法尔加战役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正担任海军大臣梅尔维尔的私人机要顾问。或许正因如此，这封指令能够成为这一继承自18世纪大海战时代、同时又保持着活力的海军战略传统的最精要的表述，值得我们致以最高的敬意。除却以上提及的战略性论述，我们还能通过这些指令看到一个典型情境，借之了解英国海军部一般是如何指挥本土海域内的舰队行动的。我们还能看到的是，他们眼中的入侵威胁显然并不危急。

拿破仑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意识到侵英计划的不可行，至今尚不清楚。有时候，他说自己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一企图；而在另一些场合下，他又说这一计划仅仅是因运气不佳以及海军将领的无能才招致失败。我们能够肯定的是，没有哪位高明的陆军大师曾如此致命地误判了发动入侵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也没有哪位能干的管理者曾在组织工作中失败得如此彻底。拿破仑对其大军团渡海侵英的安排正是这样的反面典型。计划中的任何部分，甚至是大军团本身，都不曾准备完毕。[33] 侵英计划已如此明显地破产，但为了维护尚未破损的拿破仑神话，其一塌糊涂的准备工作只能有一种合理解释：这位伟大的将领从未认真地将这一计划加以施行。

情况或许就是这样吧。1804年秋天来临之时，拿破仑已经意识到皮特与沙皇在他身边构织的阴谋，但他任其发展，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加冕称帝的工作中去。当年冬天，整个侵英计划已经被他放弃。大部分运兵船被拆除，港口得不到维护修理，花费数百万挖掘出的水道很快就被海沙填埋。拿破仑拥有法国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所有类似行动的经验，但在18个月的准备工作之后，他甚至没能解决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为了在失望的国民与士气低落的大军团面前挽救他的名誉，他开始把战争焦点转向奥地利。

在沙皇的压力下，奥地利对法国的态度日益变得强硬。它开始扩充军队，在亚得里亚海的末端与蒂罗尔（Tyrol）布设弹药补给站，准备直接对拿破仑夺取的北意大利发动攻击。英国与俄国间的联盟谈判似乎即将完成，奥地利看起来也已经打定主意要加入它们的阵营。在拿破仑看来，局势的危险程度已发展到难以被忽视。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一支由英国资助的大陆盟军。侵英行动对英国的威慑虽然一直有效，目前却难以继续下去；无论用什么手段，英国决不能在此时继续制造问题。正在他如此思考的时候，合适的机会也正好出现在他的手里。西班牙一直是法国实现其野心的工具。自从因受到恫吓而对法国舰船开放港

口以后，西班牙的中立早已形同虚设；只要拿破仑再对它施加一点压力，就足以让它丢弃仅仅存在于纸面上的中立，加入法国的阵营。拿破仑果然开始向西班牙施压。面对这一局势，皮特则祭出了那柄历史悠久，但他的父亲却不能使用的利器。不宣而战地向富饶的西班牙运宝船队发起突袭，自弗朗西斯·德雷克于1585年首次发起那次失败的攻击之后，这就是英国在类似情况下的惯常之举。英国一次次地展开此类行动，尽管很少能得手，却也乐此不疲。9月底，地中海的纳尔逊与费罗尔港外的亚历山大·科克伦（Alexander Cochrane）接到了这一命令，要求他们夺取自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归航的西班牙运宝舰队。此外，一支雄心勃勃的新舰队也被组建起来，负责封锁加迪斯与安达鲁西亚（Andalusian）海岸，由约翰·奥德爵士（Sir John Orde）所统领。当年11月，莫尔准将[34]麾下的特遣巡航舰队已经捕获了4艘西班牙运宝船。西班牙随即于12月12日向英国正式宣战，而拿破仑的新计划也开始成形。[35]

西班牙的参战意味着拿破仑在纸面上又得到了32艘战列舰。西班牙、荷兰与法国的联盟使他在纸面上拥有了略超出英国舰队的总实力。但皮特的先手行动让西班牙在尚未做好准备时加入了战争，拿破仑最多能指望它在1805年春提供大约25艘适于行动的战列舰；而在此之前，他只能单独行动。他希望展开某些行动，尽力将英国舰队的注意力引离他的海岸。他希望调动兵力进行一次殖民地攻击，进而在英国国内唤起一阵停战呼吁。此时的拿破仑还并不打算让舰队杀回海峡，他仅仅希望用一次殖民地袭击从英国内部颠覆皮特政府，让英国海军在他面对大陆同盟的威胁时从其背后撤离。这一设想就是著名的西印度行军的缘起。

在他刚刚放弃的前一个方案里，出击的土伦舰队要躲开纳尔逊，再用一个大范围机动绕开费罗尔港外的科克伦，之后为罗什福尔舰队解围，与之会合后再用一个大范围机动绕开布雷斯特港外的康沃利斯，最后驶入海峡。而在新的殖民地攻击计划里，土伦与罗什福尔舰队应搭载

着陆军部队分头出击，航向西印度群岛这一共同的目的地。他们应夺回被英军占领的荷兰岛屿，加强当地法军的防御，尽可能地攻取英国殖民地，随后在次年春季一道返航，击败科克伦，解救费罗尔舰队，然后共同进入某处法国港口。与此同时，布雷斯特的冈托姆[36]舰队则应搭载第三支陆军部队，抓住时机尽早出击，让陆军入侵爱尔兰，此后再驶向北方，最终到泰瑟尔岛掩护马尔蒙[37]的陆军部队渡海入侵。

需要指出的是，拿破仑提出这些计划的真实目的始终难以确定。他很清楚，自己的身边——甚至是在他的国务委员会里——布满了叛徒与奸细。因此，他常常编造一些从未认真考虑执行的计划来扰乱敌人的情报。可以确定的是，这个计划对冈托姆行动的描述主要是为了蒙骗英国间谍，其目的是让他们相信，令他们最为敏感的入侵威胁依然存在。对土伦的维尔纳夫[38]与罗什福尔的密歇希[39]的行动计划则的确属实，且得到了后来事态的证明。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理解拿破仑的想法。他对爱尔兰与苏格兰仅仅是试图保持威胁，遥远的西印度群岛才是其真正的攻击目标。他由此便能避开英国战略布局的重心。整个计划显然是为了取代未遂的入侵；在他努力将奥地利逐出尚未结成的反法同盟之时，他试图以这一计划让英国内阁难堪，确保他们不会在欧洲方向再投入舰队和陆军。

次年春天，拿破仑的三支舰队将会集结在一处不为我们所知的港口里，这就是这个计划的最终结局。或许这是因为他面前的局势尚不确定，但他知道，这一切必须取决于能否制服奥地利。他可能只是想将所有兵力攥在手中，静候变迁的时局。或许，他已开始意识到他的先辈们一再从痛苦经验中取得的那个教训：除了用海战夺取制海权，再也没有其他办法能击败英国。西班牙将在明年春天完成战备，它的海军至少还让拿破仑怀揣着一丝希望。

拿破仑的下一步动作证实了他对英国的恫吓意图。1804年年底，他

紧急命令维尔纳夫与密歇希迅速出海。而在不久前，他正向英王乔治三世发去一封和平提议，同时又向维也纳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函，要求他们对奥地利的军事行动做出解释。在等待回复之时，拿破仑向他的新一届国务委员会正式解释了他的总体构想。在全盘考虑各路情报之后，他在此刻相信，他已得体地脱离了执行侵英计划的两难困境。然而，没有哪个意欲统治法国的人会忘记罗马共和国的那句战吼：“迦太基必须毁灭！”（Delenda est Carthago！）[40] 看似即将要爆发的对奥战争给了他一个理想的理由，只需对准备入侵的巨额开支做出解释，他便能无损英明地从侵英计划中脱身。“两年来，”拿破仑说道，“法兰西已经为我们的需要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和奉献……但是，为了组建这样一支全副武装、拥有20000匹炮兵挽马的大军，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借口，让我们集结部队的行动不被其他大陆强国所警觉。这个借口就是入侵英国的计划……两年来，我一直没有将这些告诉你们，但这的确是我唯一的目的。你们现在已知道了，这就是那许许多多问题的解释。但我们现在还不能开始战争，我正在同英国国王开始一场谈判，试图缔结和平协定。”[41]

在拿破仑刚刚完成这次精彩演说之时，英方的回复抵达了。英方仍然不承认他的皇帝头衔，而这个称呼却凝聚着他全部的虚荣心。英方回信的开头是“致法国政府的首领”，其末尾落款人也不是英国国王，而是一位内阁大臣。在正文中，英方寥寥几句就拒绝了拿破仑提出的让英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俄国——停止接触的和平条件。这封回信激发了拿破仑性格中最激愤丑恶的一面，更为糟糕的是，奥地利皇帝不久后又送来了一份请求和平的手记，将他发动战争的借口逐一规避。拿破仑在盛怒中发现，自己已被重新掷回那个让他绝望的侵英计划里。他的舰队已被派出，分散在大西洋中；他的陆军无所事事，士气低沉；他的海峡港口里满是沙砾；而他的渡海船队甚至已经被解散。他的声威与名誉仍然被捆绑在侵英计划上，甚至比往日捆得更紧，且因他先前的行为而陷入更严重的矛盾和错乱。这就是他那自负的好斗心理为他赢得的一切。

现在，他只好假装本来就要继续这一计划，将这件已经耗资过半的荒废事业从头做起。

皮特因这封强横无礼的回信受到了英国各界的指责，但他的父亲当年正是如此回复舒瓦瑟尔[42]，而他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对付西班牙。在这里，精巧的诡计被近乎残酷的直率所击退。皮特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英国人很容易就会原谅他。他们从中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昂扬精神，看到了国力增长带来的自信，看到了唤醒欧洲的崇高使命，看到了那绝不动摇、斗争到底的坚定信念：如果拿破仑不被击败，欧洲大陆就无法恢复自由与和平。

此时，组建联盟的谈判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彻底划清界限的时机已经成熟，英国再也不用孤军奋战了。1804年11月6日，俄国与奥地利缔结了防御同盟，约定两国将在法国继续攻略德意志、意大利与东欧之时联合加以阻击。普鲁士仍坚决要求取得对汉诺威的保护权，以此作为参与欧洲事务的报偿；但瑞典已同意向英国提供吕根岛（Rügen）与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作为英国与俄国联合行动的海军基地。英俄两国间的谈判则取得了更多成果，皮特与沃龙佐夫已经在伦敦商定了联盟的主要条款。在严词拒绝拿破仑的和平提议后，圣彼得堡的列文森-高尔收到了伦敦发来的正式盟约。[43]

然而，谈判的进程不可能毫无波折。在俄国人眼里，克雷格的马耳他远征部队能否如约抵达仍然是对英国是否有意愿与能力达成盟约的考验。他们需要以此确定，英国人并不只是自私地从他们的国土正面引开拿破仑的关注重心。因此，英方所提出的让马耳他的英军夺取墨西拿，而俄军在南意大利展开行动的新提议随即遭到了俄方的怀疑。不过，英方对俄国将领在南意大利拥有最高指挥权的承诺很快又将这分怀疑消去。留到最后的问题是英国是否愿意从马耳他撤军，但不幸的是，英国绝不愿在这一点上让步——它甚至甘愿为此发动一场战争。远东地区在

它的帝国版图中越来越重要，而拿破仑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野心已不可忽视。马耳他因此成为英国此时的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正如直布罗陀之于威廉三世。

这个焦点问题几乎使所有的谈判成果化为乌有。英方起草的盟约里没有一个字提到马耳他，但在圣彼得堡的进一步谈判中，沙皇却坚持让列文森-高尔接受一条有关马耳他的独立条款，然后才会签署盟约。沙皇的目的是将整个同盟作为向拿破仑施压的筹码，以武装调解的方式逼迫拿破仑接受盟约所安排的欧洲秩序。很显然，如果英国一定要占领马耳他，调解就必然会失败。因此，沙皇要求英国，如果拿破仑接受和平条件而又坚持解决马耳他问题，英国就应当撤军。由于接到了国内对这一问题的严格指令，列文森-高尔坚决回绝了俄方的提议。沙皇不相信皮特也会像他的大使这样固执，于是，他让英方将盟约带回伦敦，还附上了自己的强硬声明：除非这一条款加入其中，否则俄国不会签署同盟协定。皮特大为惊骇，他已经准备好修改其他条款做出让步，但马耳他问题却无可商议。在他眼里，马耳他是整个计划的关键所在。英俄两国关系立即紧张起来，甚至濒临破裂。沃龙佐夫向皮特提出了种种恳求与抗议，皮特则回复道，法国一直是历史上最为强大的陆军强国之一，它的统治已从西班牙的加迪斯延伸至意大利的契维塔韦基亚（Civita Vecchia），它正用尽一切努力征服地中海。不仅如此，法国还意欲征服整个奥斯曼帝国，希望将英国逐出印度。地中海的自由、黎凡特与埃及的独立都需要英国占有马耳他。简而言之，南意大利、爱奥尼亚群岛以及奥斯曼帝国所有领土的安全都取决于英国能否坚实地掌控这个昔日的海上骑士团要塞。沃龙佐夫不为所动，他坚持道，英方的固执将会破坏刚刚约定的、为了拯救欧洲而成立的同盟。皮特打断了他的发言：“这不会拯救欧洲。一旦英国舰队不再拥有这处得到强大要塞保护的良港作为基地，地中海、黎凡特还有埃及都会瞬间落入法国的支配范围……因此，”他总结道，“如果其中包括了让我们放弃马耳他的条款，无论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痛苦，我们也只能放弃签署盟约的愿望。我们

将继续独自作战，仍旧在大海上作战。”[44]

在这里，我们得以从皮特的亲口阐释中了解到他对这场战役寄予的期望，以及他希望达成的最终目的。这场战争是为了地中海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而进行的，而且也不仅仅是一场海上战争，同样也要在陆地上展开。皮特坚决地向沃龙佐夫声明，马耳他是不列颠帝国的必需。而接替哈罗比担任外交大臣的马尔格雷夫勋爵（Lord Mulgrave）更争辩道，让英国保留马耳他符合整个欧洲的利益。沙皇无非要重建马耳他骑士团，但马尔格雷夫指出，查理五世（Charles the Fifth）之所以在这个小岛上建立骑士团，就是为了让他们保护基督教国家，对抗其共同的敌人。[45] 而现在，即便骑士团得以重建，他们也没有力量执行这一任务。只有大不列颠——这个在地中海沿岸没有领土野心的头号海军强国——才是骑士团的合法继承者；也只有作为英国的港口与军事基地，马耳他才能在对抗欧洲公敌的战争中发挥作用。马尔格雷夫总结道："国王陛下在保留马耳他的问题上已全面考量了整个欧洲与英国的利益，将保留该地作为陛下尽其全部巨大的努力能够做出的国家利益牺牲的唯一例外。"考虑到英国要在相当长时间内担负起对半个欧洲的巨额财政资助，它所要求的这个报偿很难说是过分的。

总而言之，这种紧张的情形就是拿破仑与皮特各自启动其战役计划时的外交处境。在英俄盟约终于签订的那一天，维尔纳夫正试图驶出地中海，克雷格与他的远征军也即将在一周之后起航。

然而，盟约并未立即生效，局势在此后的几个月内仍然晦暗难明。为了更好地研究这场战役，我们有必要探究推迟盟约生效的复杂原因。沙皇对英国提出的核心条件，其一是马耳他撤军问题，其二是改革英国的战时航海法典（Maritime War Code）[46]，两者都被他个人视作盟约生效的必要条件。皮特对保留马耳他的执着极大地加深了他对英国真实目的的怀疑。面对英国大使的恳切抗议，他指出克雷格的马耳他远征部

队未能及时出发。最后，克雷格部队如约出发的消息终于送达，同时送到的指令也让俄国人完全感到满意。尚未生效的联盟部分地组建了起来，但沙皇的心思却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他又提出要求，抵达意大利的克雷格在与那不勒斯最高司令官莱西将军（General Lacy）[47] 商议之前不得展开任何行动。英方也接受了这一提议。为了促使盟约全面生效，皮特甚至决定在马耳他的独立条款上做出一点微小让步。他打算，如果实现欧洲和平将取决于马耳他的归属问题，他便会在若干条件得到满足之时从马耳他撤军。条件之一是让西班牙将梅诺卡岛（Minorca）割让给英国——这块英国原先的领土刚刚在《亚眠和约》中被西班牙夺去。但是，这个让步只出现在拿破仑立刻接受和平条款的前提下。如果战争爆发，英国则会将马耳他继续占据下去。沙皇并未立即接受英方的提议，他仍然希望英国能修改航海法典。一直到1805年7月，沙皇才最终批准盟约生效，结束了他那极其令人不快的迟疑。[48]

因此，我们在研究这场战役时必须随时注意，在它开始之时，这场战争的核心要素尚未确定。皮特与海军部都无法肯定，这场战役到底是与其他陆军强国联合作战，还是由英国独立进行。因此，我们在评断将领与政治家的行动与布局时必须考虑到，他们是处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里。这本是联盟协定在一开头就要给出答案的问题，却直到很晚才得以确定。

盟约第一条规定，俄国有义务尽力组建一个大陆国家的联盟，并与它们协调一致，提供一支规模超过50万人的大军。第二条宣示了它们的目标：迫使法国从汉诺威与北德意志撤军；重新让荷兰和瑞士恢复独立；将皮埃蒙特还给撒丁王国；确保那不勒斯王国的主权完整；从包括厄尔巴岛（Elba）在内的整个意大利撤军。第三条规定了英国的义务，除提供海陆军之外，英国还应担负起盟军行动所需的运输工作，同时还要按照每10万投入战场的正规军每季度100万英镑的比率向盟国提供财政支援。

随着盟约的生效，自这场战役开始以来的战争政策因为一个伟大的新要素的登场而彻底改变。英国舰队不再仅仅被用于海上行动，它已将自己与一场规模庞大的陆地战争联系起来。如果只有奥地利加入同盟，英国舰队与陆军的主要活动地点就将是意大利海岸与东地中海，纳尔逊正期盼着在那儿展开行动。如果普鲁士也加入进来，英军就能以吕根岛和施特拉尔松德作为基地，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周边作战。

盟约给战争中的英国所带来的第二个新要素，即战略学者所说的“攻势回归”（an offensive return）。皮特从他父亲那儿继承的那股精神，以及迪穆里埃将军[49]提出的著名国防方案，其在皮特政府上台之初即呈给了英国，在那一刻终于变为现实。“现在，是时候让波拿巴高悬在英格兰头上的利剑落下来了，”迪穆里埃如此说道，“没有什么比一味固守更加危险，它为敌人提供着用各种手段展开攻击的广阔空间……我问你们，这种纯粹防御到哪里才是尽头？……如果我们仍旧在恐惧下继续忍受目前的形势，又如何能成为欧洲各大强权的新核心？……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从防御至上转变为进攻性策略。如果从今年开始进攻政策还不能取代固守政策，你们就将看到，波拿巴得手的机会将会迅速增加。”[50]

离开了这两个关键要素，我们就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对特拉法尔加战役产生误解。如若将之视为一场防御性战役，认为它纯粹是为了保护不列颠岛屿的安全，我们就会错误地评判那些战役设计者，而他们本来对此有着最为确切和洞达的理解。对于他们而言，这场战役的真正意图并不是如何避免失败，而是如何让敌人遭受失败。英国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传统。马尔波罗与老皮特的精神正在振奋起来，它正全力准备出击，一刻也不愿等待。这场战争是为了整个欧洲，而不仅仅是它自己。若认为它一心只顾自己的安危，我们就完全忽视了这个宏大的主题，将那些主动承担风险的水手的勇敢自信误解为鲁莽粗心。缺乏清晰把握与正确理解的后人往往将这些精巧的谋划视为无知的失误，现在，是时候将这些

错误清扫掉了。让我们纵览这场战役的全局，追踪他们行动间的微妙联系，虚心地坐在缔造这场战役的巨人们的脚边。我们或许能够了解到，这些被鲜活的海军传统所鼓舞、因丰富的战争经验而成熟起来的人，将如何正确地思考，如何无畏地承担风险，如何明智地遵从战争的中心意图，如何建立起他们的功勋。

---

[1] 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1759～1806年），英国政治家。著名政治家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年）之子，下文的皮特，如无特殊说明，皆指小皮特。他于1783～1801年、1804～1806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
1804年其第二届内阁名单如下：第一财政大臣（首相）兼财政大臣小威廉·皮特、大法官埃尔登勋爵（Lord Eldon）、枢密院议长波特兰公爵（Duke of Portland）、掌玺大臣威斯特摩兰伯爵（Earl of Westmorland）、外交大臣哈罗比勋爵（Lord Harrowby）、内政大臣霍克斯伯里勋爵（Lord Hawkesbury）、陆军与殖民地大臣卡姆登伯爵（Earl Camden）、海军大臣梅尔维尔子爵（Viscount Melville）、军械总局局长查塔姆伯爵（Earl of Chatham）、贸易委员会主席蒙特罗斯公爵（Duke of Montrose）、管理委员会主席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兰开斯特公爵领地总裁马尔格雷夫勋爵（Lord Mulgrave）。1805年1月，马尔格雷夫接替哈罗比出任外交大臣，白金汉郡伯爵（Earl of Buckinghamshire）接替马尔格雷夫出任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总裁，锡德茅斯勋爵，即前任首相亨利·阿丁顿，接替波特兰公爵出任枢密院议长。1805年4月，巴勒姆勋爵接替梅尔维尔出任海军大臣。1805年7月，哈罗比接替白金汉郡伯爵出任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总裁，卡姆登接替锡德茅斯出任枢密院议长，卡斯尔雷则兼任陆军与殖民地大臣和管理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2] 威廉三世（1650～1702年），奥兰治亲王。于1672年始出任尼德兰共和国元首。1688年“光荣革命”后成为英国国王，在大同盟时期（War of the Grand Alliance，1688～1697年）作为全欧洲对抗法国的战争的领袖。马尔波罗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1650～1722年），英国陆军将领，安妮女王时代的权臣。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1701～1714年）统领反法联军多次击败法军，被誉为英国最伟大的陆军统帅，亦是欧洲对抗法国的军事领袖。威廉·皮特，英国政治家，是七年战争时期的内阁实际领袖。——译者注

[3] 亨利·阿丁顿（Henry Addington，1757～1844年），英国政治家，1801～1804年担任英国首相，以在其任内签署《亚眠和约》而著名。1800年，小皮特为解决爱尔兰叛乱而提出爱尔兰合并法案与天主教解放法案，但英王乔治三世作为英国国教守护者强烈反对解放天主教。小皮特随后辞职，由阿丁顿接任

首相。阿丁顿随即对法媾和，但和约条款并不令人满意。他无法阻止战争再次爆发，在战争开始后又缺乏领袖才能，最终在政敌的攻讦中黯然下台。——译者注

[4] 近来法国对拿破仑战争责任的研究，参见P.Coquelle，*Napoleon and England*，translated by G.D.Knox，1904。

[5] Fortescue，*The county lieutenancies and the army*，p.10.

[6] 亨德森上校（Colonel Henderson）在执掌参谋学院时曾归纳出这样一条规律：“英国陆军的首要任务是支援海军夺取制海权。”在这个例子里，这种支援是实在而持久的。

[7] 即尼德兰地区，约为今比利时与荷兰所在地区。——译者注

[8] 谢苗·罗曼诺维奇·沃龙佐夫（Семён Романович Воронцоóв，1744～1832年），俄国外交官，1785年起任驻伦敦大使，属亲英派，1806年退休后在伦敦居住直至逝世。——译者注

[9] J.Holland Rose，*Select Despatches relating to the Third Coalition*（Royal Historical Society，1904），p.ix.

[10] 约翰·波拉斯·沃伦（John Borlase Warren，1753～1822年），英国海军将领、政治家与外交官，1802～1804年起出任驻俄大使，随后返回海军。——译者注

[11] Warren to Harrowby，July 24，1804：J.Holland Rose，*Select Despatches relating to the Third Coalition*（Royal Historical Society，3rd Series），vol.vii，p.25.

[12] Warren to Harrowby，July 24，1804：J.Holland Rose，*Select Despatches relating to the Third Coalition*（Royal Historical Society，3rd Series），vol.vii，p.32，August 14.

[13] 格兰维尔·列文森-高尔，格兰维尔伯爵（Granville Leveson-Gower，Earl Granville，1773～1846年），英国政治家、外交官。曾于1804～1805年、1806～1807年出任驻俄大使，1824～1828年、1830～1835年、1835～1841年出任驻法大使。——译者注

[14] 达德利·瑞德，哈罗比伯爵（Dudley Ryder，Earl of Harrowby，1762～1847年），英国政治家。1804年任外交大臣，次年1月改任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总裁，随后前往欧陆，担任联系俄国、奥地利、普鲁士三国的重要特使。——译

者注

[15] Harrowby to Gower，October 10：Rose，*Third Coalition*，p.45.

[16] Nelson to Marsden，October 10，1804：Nicolas，vi.227.另可见 Earl Camden to Nelson，August 29（Ibid.，p.228n），信中说，在冬天到来前向地中海地区发起一场远征就能避免法军侵英的威胁，同时他们已派出官员前往撒丁通报。

[17] Leveson-Gower to Harrowby，November 28：Rose，*Third Coalition*，p.72.

[18] 在受威胁地区的海滩上建造马特洛炮塔（Martello Towers）也是当时采取的办法之一。这并非仅为消极防御，还是为了有效地解放卫戍部队。此外还有海斯军事运河（Hythe Military Canal），这本是为了阻拦渡海登陆的敌人，但在当时遭到了人们的奚落和嘲笑。1805年9月，前任内政大臣查尔斯·约克（Charles Yorke）在写给爱尔兰总督的信中说："我们每天刨土挖掘的这条大沟叫作皇家军事运河，据说是为了拦住入侵内地的法国人……这样，他们就要多穿过一条更宽、更难走的沟渠。"Rt.Hon.Charles Yorke to Earl of Hardwicke：*Add.MSS.* 37506.从专业的军事角度看来，这些批评都过于肤浅。挖掘运河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迟滞登陆敌军的侵入，同时缩短运送防御兵力的时间，正如马特洛炮塔是为了迟滞敌军的登陆行动一样。

[19] 詹姆斯·克雷格爵士（Sir James Craig，1748～1812年），英国陆军将领。1804年年底出任那不勒斯远征军司令。1807起出任加拿大总督，直至逝世。——译者注

[20] 乔治·埃尔芬斯通，基思子爵（George Elphinstone，Viscount Keith，1746～1823年），英国海军将领。1803年战争爆发后，他出任英国北海舰队总司令直至1807年。随后又出任英国西方舰队总司令。——译者注

[21] 最初的兵力布置还包括：玛格丽特海道（Margate Roads）：1～2艘战列舰；王后海道（Queen’s Channel）：2艘；国王海道（King’s Channel）：2艘；格达摩尔海门（Goldamore gate）：1艘；泰晤士河口的粗滩浮标（Buoy of Rough）：1艘"通信用的巡航舰"（通过旗语信号的方式）；霍利斯湾（Hoseley Bay）：1艘"强大的战舰"。最终，这些布防被撤销，其水手被派往操作那些临时雇来的巡洋舰。*Admiralty Sec.In-letters*，p.537.

[22] 詹姆斯·索马里兹，索马里兹男爵（James Saumarez，Baron de Saumarez，1757～1836年），英国海军将领。在法国革命战争中经历诸多战事，并在1798年尼罗河口海战中担任纳尔逊的副官，1801年独立指挥阿尔赫西拉斯海战。1803年起指挥海峡群岛舰队。1808年起出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迫

使俄国与瑞典、英国保持贸易，这是拿破仑于1812年率军侵俄的重要原因。——译者注

[23] Barham to Cornwallis，August 15：*Cornwallis Papers*，*Hist.MSS.Com.*，*Various Collections*，vi.411.

[24] 威廉·康沃利斯（William Cornwallis，1744～1819年），英国海军将领。曾参与七年战争与美国独立战争。1794年任海军中将。在1795年的第一次格鲁瓦海战（Battle of Groix）中，他率5艘战列舰冲向12艘法舰，成功吓阻敌军的追击。1799年升任上将，出任西方舰队副司令，并多次在总司令圣文森特勋爵离职时暂代总司令。他在1803～1806年主掌西方舰队，以敏锐的战略意识完美地遏制着拿破仑的渡海威胁。虽无赫赫之功，却是保障英国本土安全的重要功臣。事迹详见Alan Schom，*Trafalgar*：*Countdown to Battle 1803-1805*（Atheneum，1990）。——译者注

[25] 皮特曾试图将这一指挥权交给圣文森特勋爵约翰·杰维斯，但杰维斯回复道："我蔑视他的任命，除非皮特先生没有在下议院说过那些攻击我的话。"*Cornwallis Papers*，ibid.，p.418.（1801～1804年，圣文森特曾在阿丁顿内阁出任海军大臣，因此在议会曾遭到当时在野的皮特的攻击。——译者注）

[26] 英国西方舰队即一般所称的英国海峡舰队（Channel Squadron）。它成立于1745年，最初目的只是为了在海峡西部保护贸易航线。1746年，安森将军出掌西方舰队，之后又出任海军大臣。他赋予西方舰队更强的实力与更重要的使命，而此后的一系列重大战事也证明了它的战略意义。在与法国和西班牙的长期战争中，西方舰队所处的关键位置使之成为英国海军的主力舰队，也是英国海上优势的基石所在。它长期巡航在英国西部的航道上，承担着最为重要的任务：阻止渡海入侵、保护贸易航线、拦截敌舰、监视甚至在必要时封锁敌港。其防区从爱尔兰西南部的法斯内特岩（Fastnet Rock）延伸至西班牙西北部的菲尼斯特雷角，涵盖150000平方英里的广阔洋面。——译者注

[27] 1779年夏，法国与西班牙组成了拥有66艘战列舰的强大舰队，试图驶入海峡掩护陆军入侵。兵力处于劣势的英国西方舰队只有38艘战列舰，它们选择了谨慎的避战策略，但同时始终保持着威胁，最终迫使敌人放弃侵英计划。1782年1月，时任西方舰队总司令的肯彭菲尔特将军在一份备忘录中详尽地阐释了西方舰队的防御策略。其核心是保持一支机动性较强的弱势舰队，通过机动避战和保持威慑来牵制敌人，迫使兵力较强的敌舰队无法执行任何侵袭计划，进而在其他战场投入更多的资源。之后，肯彭菲尔特意外身故，理查德·豪接任西方舰队司令。他继续执行这一策略。1782年6月初，一支法西联合舰队从加迪斯出海，并于7月初与法国布雷斯特舰队会合，意图以36艘战列舰封锁英吉利海峡入口，希望拦截英国商船队或迫使英国舰队与之交战。此前荷兰舰队的异动牵制了英军的部分兵力，豪只得率领25艘战列舰出击。他沿着海峡北岸向西航

行，前往爱尔兰海岸成功掩护了一支大规模西印度船队，并占据了敌舰队的上风位置，最终迫使联合舰队于8月初无功而返。参见John B.Hattendorf，*The Idea of a Fleet in Be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i，2014）。——译者注

[28] Melville to Cornwallis，July 29，1804：*Blockade of Brest*（Navy Record Soc.），ii.38.

[29] 此前的类似情况已由1588年的西班牙舰队与1744年试图从敦刻尔克入侵的法国舰队所证明——前者的遭遇广为人知，而后者也只是因偶然的海流庇护才勉强逃离被歼灭的命运。

[30] 利泽德半岛位于英国康沃尔郡西南部，即大不列颠岛西南端，也是英国的最南点。——译者注

[31] Draft，"Instructions to Admiral Cornwallis：Secret，Aug.24，1804，" signed by Melville，Gambier，and Colpoys. *Barham Papers.* 康沃利斯自己对这份长指令的摘要可参见*Blockade of Brest*，ii.48。

[32] 查尔斯·米德尔顿，巴勒姆男爵（Charles Middleton，Baron Barham，1726～1813年），英国政治家、海军将领。他是皮特第一届政府前期最亲密的海军顾问，力主海军改革，并以推动废奴运动而闻名。1805年出任海军大臣，是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实际指挥者。1806年年初随着皮特病逝、政府倒台而退休。——译者注

[33] 1804年8月，根据对海峡沿岸大军团及其运兵船队的最后回报，其准备状态如下：

港口	船队			完成准备的军队	
	船只数量	运载能力			
	艘	人	马	人	马
埃塔普勒	365	27000	1390	20000	1200
布洛涅	1153	73000	3380	45000	1500
维姆勒	237	16000	769	13000	—
昂布勒斯特	173	15000	673	15000	—
		131000	6212	93000	2700

引自Desbrière，*Projets et Tentatives de Debarquement Aux Iles Britanniques*，v.465。

[34] 格雷厄姆·莫尔（Graham Moore，1764～1843年），英国海军军官，英国陆军名将约翰·莫尔的兄弟。1803年战争开始后负责指挥4艘巡航舰组成的舰队（故得到准将的临时职衔），于1804年10月5日不宣而战地捕获了一支由4艘巡航舰组成的西班牙运宝舰队。随后加入考尔德将军的费罗尔封锁舰队。——译者注

[35] 西班牙加入战争的原因较科贝特所述更为复杂。西班牙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一度加入反法同盟，与英军一道入侵土伦，摧毁了法国地中海舰队。之后，西班牙遭法军入侵，被迫与法军媾和，于1796年8月与法国结为反英同盟，开始与英国作战。1803年10月19日，西班牙与法国再次订约：西班牙退出反英同盟，宣布中立，代价则是向法国船只开放港口，向法国提供15艘战列舰、6艘巡航舰与4艘轻巡航舰，再提供18000名步兵与6000名骑兵。然而，英国无法接受这样的“中立”。1803年12月，英国要求西班牙与法国划清界限。西班牙同意向英国开放港口，延缓海军武装进度，但这远不能满足英国的条件。1804年，英国海军与私掠船开始袭击西班牙船只，拿破仑也一直向西班牙施压。马德里继而宣布没收领土范围内的英国资产、在费罗尔修建海军基地，并下令攻击英国船只。1804年12月12日，西班牙正式对英国宣战，再次与法国结盟；英国也在次年1月11日向西班牙宣战。参见Jose Ignacio González-Aller Hierro，“Some Strategies and Tactics Regarding the Trafalgar Campaign，” *Journal for Maritime Research* ，Vol.7，Issue 1，2005。——译者注

[36] 奥诺雷·约瑟夫·安托万·冈托姆（Honoré Joseph Antoine Ganteaume，1755～1818年），法国海军将领。大革命后作为战列舰舰长参与了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与同年的冬季巡航。1798年作为舰队参谋长参与埃及远征，在尼罗河口海战中在“东方”号爆炸前夕惊险撤离。随后护送拿破仑返回法国。1801年率舰队试图解救埃及远征军，捕获了1艘英国战列舰与1艘巡航舰，但未完成战略使命。《亚眠和约》签订后参与了对西印度群岛的远征。1804年升任中将，受命指挥布雷斯特舰队，但始终未能成功出击。——译者注

[37] 奥古斯特·德·马尔蒙（Auguste de Marmont，1774～1852年），法国陆军将领，拿破仑的亲密伙伴。1803年，他负责在布洛涅准备侵英军团的炮兵，后于1804年3月转任荷兰军团司令。1805年一度登船预备侵英；侵英计划破产后随拿破仑入侵奥地利，在乌尔姆会战（Battle of Ulm）中表现出色。——译者注

[38] 皮埃尔-夏尔·维尔纳夫（Pierre-Charles Villeneuve，1763～1806年），法国海军将领。他在1798年尼罗河口海战中任后卫舰队司令，在战斗后期率2艘战列舰、2艘巡航舰成功撤退，使它们逃脱被全歼的命运，赢得了训练有素和幸运的声誉。1802年指挥舰队远征向风群岛。1804年，在杰出的拉图什-特雷维尔将军病逝后，维尔纳夫接任土伦舰队司令。在特拉法尔加海战的惨败后被英军俘获，1806年4月回到法国，在驿站中身中6刀离奇身死。维尔纳夫被普遍视为无能而软弱的指挥官，在接管土伦舰队后使法军士气迅速衰落。但英军对他评

价较高，认为他冷静清醒、不好浮夸。他的消极表现或许源于他清醒的认识：法国海军的糟糕状况根本无法与英军为敌。——译者注

[39] 爱德华·托马斯·布尔格斯·德·密歇希（Édouard Thomas Burgues de Missiessy，1756～1837年），法国海军将领。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继续留在海军服役。1792年任战列舰舰长，次年升任海军少将，但因贵族出身遭到监禁，后流亡意大利。1803年任布雷斯特海岸守备司令。1804年出任罗什福尔舰队司令，并于次年执行了对西印度群岛的远征，远征结束后病退。1809年再次出任位于荷兰的斯海尔德河口（Escaut）舰队司令。他组织的防线成功抵御了英军的渡海入侵，随后升任海军中将与北海海岸守备司令，并于1814年在安特卫普成功防御反法联军的攻击。——译者注

[40] 这里的寓意是，拿破仑意识到国务委员会中的野心家们一定会坚持继续战争的政策，自己只能用其他的战争借口来规避执行侵英计划。——译者注

[41] 对此的权威证据来自*Memoires de Miot de Melito*，ii.244，法国总参谋部的研究认为它可信。关于对此的讨论以及对当时情境值得敬佩的总结，参见Desbrière，*Projets et Tentatives de debarquement*，iv.336 et seq。

[42] 在七年战争期间，法国重臣舒瓦瑟尔公爵（duc de Choiseul）曾与英国首相老皮特在1761年通信议和。但老皮特坚定而激烈地拒绝了舒瓦瑟尔提出的条件，他的侵犯性言辞还使法方提出抗议。——译者注

[43] Rose，*Third Coalition*，p.90.

[44] De Martens，*Recueil des Traites*，Vol.ii，pp.110-111.对于整个谈判可参见ibid.，p.75 et seq。

[45] 16世纪初，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同时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西班牙国王，是欧洲权力最大的君主。1522年，驻守罗德岛的医院骑士团被奥斯曼帝国逐出罗德岛。查理五世决定将西班牙治下的马耳他永久租予医院骑士团，即后来的马耳他骑士团。——译者注

[46] 沙皇主要的诉求是让英国废除在战时检查公海上的中立国船只的政策。——译者注

[47] 他是一位爱尔兰出身的军官，据他自己的签名，他叫Lacy，但其他国家的人常将他拼成Lasci或Lascy，可参见 his letter of July 8th，enclosed in Elliot’s despatch of August 9th，*F.O.Sicily*，25。

[48] Rose，*Third Coalition*，pp.110，143，151.

[49] 夏尔·弗朗索瓦·迪穆里埃（Charles Francois Dumouriez，1739～1823年），法国陆军将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非常活跃，一度成为法国最具权势的军事领袖，后在雅各宾派与反法联军的夹攻下流亡国外。1804年移居英国，在英国陆军部担任对法战争的重要顾问。后随威灵顿参与半岛战争，最终在英国去世。20世纪初，他给英国本土国防提出的重要建议被研究者发现。——译者注

[50] Rose，*Dumouriez and the Defence of England* ，p.260.

第二章 拿破仑首次受挫

1805年年初，罗什福尔的密歇希为拿破仑的新计划迈出了第一步。就在向伦敦发去和平提议的同一天，拿破仑紧急命令密歇希率舰队出海。法国罗什福尔舰队在埃克斯岛（Isle of Aix）装载了3500人的部队，它们正驻泊于河口浅滩，早已做好出航准备。在英国海军部看来，安全地对大西洋港口实施冬季封锁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罗什福尔仍处在英国西方舰队的一支分队的监视之下。这支分舰队的指挥官是托马斯·格雷夫斯爵士（Sir Thomas Graves），他曾在哥本哈根海战中担任纳尔逊的副司令，有相当出色的表现。可是，他的任务还包括封锁波尔多（Bordeaux），防止运输船由此北上前往准备侵英的港口；其职责范围从约岛（Isle d’Yeu）一直延伸到吉伦特河口，跨度近100英里。比起封锁港口，要在冬季的外海上为舰队进行补给则是更不可能完成的挑战。正因如此，在密歇希受命出航之时，格雷夫斯正决定去基伯龙湾补充淡水——自从霍克将军（Admiral Hawke）在1759年取得那场伟大胜利之后[1]，基伯龙湾就一直是英国舰队的前线锚地。帕特里克·坎贝尔舰长（Captain Patrick Campbell）指挥的巡航舰“多丽丝”号（Doris）被留下来继续监视。1月8日，他进行了一次近距离侦察，发现密歇希正在忙碌地装载部队与物资。坎贝尔匆忙离去，途中遇到了刚从格雷夫斯处驶来的纵帆船“菲利克斯”号（Felix），从它那里得到了英国舰队的位置。于是，坎贝尔将“菲利克斯”号留在他先前所在之处，自己则驶向北方，将这个消息报告给格雷夫斯。

11日，埃克斯岛一切准备完毕。裹挟着雪片的暴烈海风从东方袭来，密歇希决定在午后起锚，于当日夜间突破英军的封锁。正确的决断

和好运气使他获得成功，他确信自己已在风雪中隐遁，只是没料到负责监视港口的“菲利克斯”号仍保持着高度警惕。第二天清晨，“菲利克斯”号发现了法国舰队，观察到1艘三甲板战列舰、4艘74炮战列舰以及5艘巡洋舰。它在这一天里远远地跟随着敌人，在夜色掩护下于约岛西南50英里处悄然脱离，乘着刮起的西南风前往基伯龙湾报信。当它脱离目标之时，法国舰队正在向北行进。

与此同时，“多丽丝”号在赶往大部队的途中也看到了法国舰队。它以不惜让帆具受损的高速抵达基伯龙湾，却发现格雷夫斯已经离去。格雷夫斯据说已前往贝尔岛（Belle Isle）西南方。“多丽丝”号再次试图强行军，却不慎撞上一块暗礁，花了一整夜时间才控制住进水。“菲利克斯”号也赶到了基伯龙湾，它向“多丽丝”号报告了敌舰队的方位，让坎贝尔陷入了绝望。一股海潮正从西南方涌来，坎贝尔知道格雷夫斯将按照常规做法驶入某处港湾以保护舰队，这将使他无法展开任何行动。因此，他必须在一切变得太晚之前阻止这场危机。然而，“多丽丝”号只能勉强漂浮，帆具也严重受损；他还要对抗正在涌起的海潮，这都超出了他的能力。最终，坎贝尔只得顺流下锚。“多丽丝”号在两天后沉入海底，但所有人都被“菲利克斯”号成功解救。16日，格雷夫斯终于露面。“菲利克斯”号向他打出敌舰队出航的信号，格雷夫斯立即转向上风，尽力往回航行。但格雷夫斯已驶离得太远，在激烈的海潮中无法回到贝尔岛的上风位置，也只能无奈地下锚停船。[2]

密歇希也在海湾外艰苦地努力。他同样在航行过程中遭到了种种磨难，但最终凭借坚定的决心而成功逃离。英国巡洋舰的侦察已经获知法军的一些灾难性遭遇，但英国舰队中却无人知晓该如何利用法军的不幸。他们普遍认为，恶劣的天气将迫使法军返回罗什福尔、洛里昂甚至布雷斯特。英军的确相信布雷斯特是密歇希的目的地，法国舰队向北的航向更强化了这一印象。康沃利斯的舰队并不在那里，他已被海潮赶回普利茅斯，直至月底才能返回。糟糕的天气使得英军在整整一周时间内

无法侦察这三处港口，因此无处得知密歇希的位置。没有人考虑过罗什福尔舰队前往西印度群岛的可能性。可谁又能猜到，拿破仑会忽然离开他下得正起劲的棋局，把他的舰队派到一场殖民地远征中去呢？除了深谙政治局势的人，没有人能够预知到事实真相。正是在统帅部——情报信息的中心——英方首次意识到这一可能性。

但即便在伦敦，对密歇希目的地的推测仍是存在争议的问题。情报得出的结论在西印度群岛与地中海这两个目标之间徘徊摇移。内阁认定后者是最为可能的目的地，而这也是他们最为担心的地区，因为与俄国在南意大利展开联合行动的谈判才初步成形。得知密歇希舰队失踪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如果有情报表明敌军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就应向纳尔逊的地中海舰队派出援军。这一措施以英军一贯的办法进行。2月14日，康沃利斯收到命令，派出他麾下排位第三的将军——罗伯特·考尔德爵士[3]——率领6艘战列舰离开布雷斯特封锁舰队，去接替费罗尔港外的科克伦，而科克伦所部——与密歇希兵力相当的6艘战列舰——则受命追击这支法军。科克伦首先应前往里斯本打探，如果没有消息，再去寻访圣文森特角附近的约翰·奥德——他的5艘战列舰在英国与西班牙决裂后一直负责监视加迪斯。如果密歇希前往地中海，他便应尾随其后并与纳尔逊会合；如果一直没有音讯，他就应前往马德拉群岛（Madeira）、佛得角群岛以及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继续探听，然后在背风群岛加入塞缪尔·胡德准将（Commodore Samuel Hood）的舰队。如果仍旧没有法军的消息，他应派出3艘战列舰支援牙买加的戴克斯（Dacres）所部；如果听说敌舰队去了他们北方的圣多明各，支援兵力就应提高到6艘战列舰。考尔德于1月底抵达费罗尔，接到命令的科克伦随即起航，但早在一周以前，密歇希就已抵达了马提尼克岛的法兰西堡。[4]

而在地中海，拿破仑战役目标的忽然转移给英法双方都造成了同样的困惑。维尔纳夫于1月2日接到了皇帝下达的加急命令，此时，纳尔逊

的舰队正在土伦港外梭巡。纳尔逊是在头年12月26日出现的，这次近距离侦察让他获悉维尔纳夫“正在装载部队，正在准备某种迫在眉睫的远征”。[5] 此时的纳尔逊正处在他那多变的性情中最为糟糕的一种状态里。战列舰“敏捷”号（Swiftsure）刚刚加入他的分舰队，带来了他工作中油水最足的部分已离他而去的坏消息。[6] 在皇家海军的传统布局中，地中海舰队的防区从地中海延伸到直布罗陀海峡之外，一直到伊比利亚半岛西南端的圣文森特角，覆盖了满载财宝的西班牙美洲船队的丰饶航线。然而，当皮特下定决心痛击西班牙时，他决定改变这一传统布局。地中海舰队远离英国本土的情报中心，其指挥官还要分出精力掌管地中海东部，这一传统的兵力布置无法灵活地回应新的局势。因此，皮特批准新成立一支直属海军部的“西班牙舰队”，其防区从直布罗陀海峡出口一直到西班牙西北端的菲尼斯特雷（Finisterre），在此接续延伸至费罗尔的西方舰队防区。海军部为这支油水丰厚的舰队选定的指挥官是约翰·奥德爵士——他正是纳尔逊的死敌。在纳尔逊看来，奥德在尼罗河口海战之后就再也不能容纳自己了。当时，奥德的官秩在纳尔逊之上，他希望杰维斯任命自己为特遣舰队的司令。但取得这一职位的却是纳尔逊，他随即赢得了尼罗河口海战的光荣胜利。[7] 奥德和他的属下在此时表现出的失望让纳尔逊相信，他们之间的怨念永远不会停息。无论奥德的感受到底如何，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由于纳尔逊非凡的胜利与荣耀，人们的确忽视了奥德受伤的自尊心。这或许正是梅尔维尔如此急促地任命他的原因，但更可能的解释是，这是由于本应被授予此职的纳尔逊此时恰好申请回家养病。

面对着法军即将出击的态势，纳尔逊仍旧沉浸在这一任命的怨恨里。他并不知道奥德的态度已经转变，如果他当时没有被新设指挥官导致的经济损失所干扰，他的人格一定会更加超群。他这一时期的信件里充斥着抗议，且令人生疑地不断强调这一切仅仅出于对任命本身的不满，而无关价值丰厚的战利品。即便这可能是真实的，但其他关键的事实同样清楚地表明，纳尔逊从始至终都对奥德——这一本应与之真诚合

作的重要同僚——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这种偏见甚至已经威胁到了国家利益。

纳尔逊强烈盼望一场战斗来平复他焦躁的神经。他在土伦港前一直待到1月10日，然后留下了2艘巡航舰继续监视，随即前往位于撒丁岛以北的拉马达莱娜（La Maddalena）的前进基地。而罗什福尔的密歇希此时已受命出击。“至于那支法国舰队，”纳尔逊向英国驻那不勒斯外交代表休·艾略特（Hugh Elliot）写道，“我期盼上帝让他们出海。”他的祈祷很快得到了回应。1月14日，维尔纳夫发现英军已经离去。在花了两天时间试图驱逐纳尔逊的巡航舰之后，维尔纳夫率领着11艘战列舰与9艘巡航舰于1月17日出海。与此同时，拿破仑正告知他的国务委员会，他从未打算对英格兰发动入侵。英国巡航舰成功地跟踪了法国舰队两天，然后在阿雅克肖（Ajaccio）附近双双脱离正向西南方前进的敌军，驶向拉马达莱娜以通知纳尔逊。按照通常情形，这2艘巡航舰是不该同时与敌军脱离接触的，其原因已无从探寻，但很有可能是被维尔纳夫阵中兵力更强的巡航舰部队所驱赶。不过，这对纳尔逊毫无意义，在他眼里，只有一种措置需要立即进行。他向来以无与伦比的敏锐把握着自己处境的核心意义，并能坚韧地固守他在战争全局中的关键位置，绝不允许任何可能影响其行动的分兵。他以这样的方式统治着地中海，而维系这一统治的关键则在于西西里岛的安全。我们可以设想，伦敦的内阁大臣眼中展开着一幅如此巨大的帝国版图，而他们却努力地将本土防御的宝贵资源投入在这里。英国积极地支援即将组成的同盟，这是皮特努力建构的战争机器，而地中海则是这架机器的轴心。纳尔逊同样认定这一点。着眼全欧，他认为拿破仑的首要目标是全面征服意大利。他并不认为康沃利斯或格雷夫斯之外的其他人能干扰到已经投入这场角逐的强大敌人，同时，他也绝不认为他对局势的理解与把握需要有任何游移。在他的舰队已成为拿破仑最有可能的针对重心之时，即便纳尔逊对时局的把握并不这么坚定，我们也很难期待他能做出比历史情形更为合理的反应。他对战斗的热情、对歼敌的狂信能让他扫平行军道路上的一切困

难，但他从未做出让托付于他的关键据点直面威胁的冒险决定。他从未因追求某个不确定的战斗机会而将必须保护的据点暴露给敌人。这一次，纳尔逊仍旧如此。

在夜深人静的西北海潮中，纳尔逊毫不犹豫地率军驶过危险的比什海道（Biche Passage），冲向撒丁岛东侧，在维尔纳夫驶向那不勒斯或西西里的航线上准备截击。他对他的密友、英国驻马耳他专员亚历山大·波尔爵士（Sir Alexander Ball）解释了如此行动的原因：在法军出航的两周前，土伦港外东风正盛，维尔纳夫却没有出击，可见他的目标并不在西边。尽管法军已驶向西南方，但这更像是为了躲避战斗。尽管他们攻击撒丁岛、那不勒斯或西西里的可能性看上去并不大，“但是，我不能冒险”。他首先要确保敌人的目标并非这三处战略要地。[8]

抵达撒丁岛南端以后，纳尔逊遭遇了一股自西方涌起的强大海潮，将他一直滞留到26日。他的巡洋舰纷纷前来传信，却没有任何关于维尔纳夫位置的消息。他们唯一知悉的是，一艘法舰已在恶劣天气中受损瘫痪。同罗什福尔港外的格雷夫斯一样，纳尔逊面前可供决策的信息也极度匮乏。他派出巡洋舰进行了如此广泛而全面的侦察，却仍然无法确定敌舰队的位置。这使他确信，他面前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其一，法军已返回土伦；其二，法军正前往攻击希腊或埃及。这两处地点是仅次于那不勒斯、撒丁岛与西西里之后的重要目标，其防御任务也同样被托付给了纳尔逊。他对这一推论深信不疑，随即驶向希腊南部的摩里亚，却发现那儿一切平静，除了听说法国大使刚被君士坦丁堡召去之外并没有法国舰队的消息。于是，埃及似乎已是维尔纳夫确凿无疑的目的地了，纳尔逊便争分夺秒向亚历山大港赶去。

实际上，出航后的维尔纳夫既没有密歇希的好运，也没有他的坚定决心。维尔纳夫发现，他的军官与水手无法在海流中操控那些满载着部队的战舰，一切都被潮水破坏，舰队很快失去了秩序。维尔纳夫还面对

着不知将从何方出现的强敌，他认为继续这场行动与发疯无异。他咨询了陆军部队司令官雅克·洛里斯东（Jacques Lauriston）——他是拿破仑高度信任的侍从官——然后共同做出了返航的决定。“我们观察到，我军在头一天夜里已被2艘英国巡航舰发现，”维尔纳夫在信中向拿破仑解释道，“他们会带来敌军的全部兵力，而我们用尽全力也无法让状况如此糟糕的战舰升起足够的帆，于是我们决定返航。”这一决定是在19日做出的，到21日时，他已安全抵达土伦，而纳尔逊此时正在撒丁岛南端等待着法军。显然，如果纳尔逊选择在获悉维尔纳夫出航的时刻直接冲向敌军，他很可能已经摧毁或俘获了所有敌舰。一位不那么优秀的指挥官很可能就已经这样行动了。但对于纳尔逊而言，这不是战争的正确方式。遭遇敌军的机会是如此的不确定，他绝不能以此来交换让关键据点失去保护的重大危险。[9]

对拿破仑而言，舰队集结行动的破产无疑是一次严重的挫败。但他仍希望将全部的海军投入对敌方殖民地的袭击之中，在1月16日——维尔纳夫出海的前一天——他还在忙于策划一场对印度的大规模攻击。这场行动将由冈托姆的布雷斯特舰队负责。他的21艘战列舰、9～10艘巡洋舰与6艘运输船将搭载着大约15000名士兵，在合适的时机突破封锁，前往洛里昂与一艘战列舰会合，然后到罗什福尔，让另一艘战列舰与2000人的部队加入他们。随后，他将前去为费罗尔舰队解除封锁，得到5艘以上的法国战列舰、8～9艘巡洋舰以及许多西班牙舰船。其中一半将是武装运输船，上面搭载着另外6000人的部队，其中法国人与西班牙人各半。这支大舰队随后将驶向毛里求斯，在那里再添上3000名士兵。这样，他就将集结起由23000名法国士兵与3000名西班牙士兵组成的大军。“毫无疑问，”拿破仑写道，“他们会给英国带来一场可怕的战争，让他们做出最后的决定。”计划中对英国舰队可能的行动一字不提，这一关键要素的缺席是如此引人注目，但这正是拿破仑海军战略的一贯特点。与其陆军战略构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几乎完全忽略了他的敌人，或是把他们设想得天真到难以置信。[10]

在维尔纳夫出航失败的消息送抵之时，拿破仑的海军大臣德尼·德克雷[11]正在为这幅非凡的战役图景努力工作着。几乎在同一时刻，拿破仑又因皮特充满蔑视的回复而勃然大怒。此时，奥地利的乞和回信尚未送抵。他已向维也纳发出战争威胁，却没能恫吓住皮特，似乎即将面临两面夹击。此时的处境如此晦暗难明，他的思路也因此而变得几乎无法把握，我们只能借由他那些考虑不周的命令来探索其中奥理。

密歇希的舰队已经无法召回，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提醒他，他的舰队无法得到除几艘巡洋舰之外的任何支援，与维尔纳夫会合的计划已经被取消。“皇帝陛下已经决定，”德克雷向密歇希写道，“将维尔纳夫将军的舰队派往另一处目的地……因此，你必须独立行动，接下来应该按照原来行动方案中若无法按计划会合的预定选项来执行。”这意味着，他要将舰队装载的支援部队与补给物资运至圣多明各，然后返回本土。他被告知，到那时，通往罗什福尔航线“可能”会是畅通的。

但是，拿破仑所说的维尔纳夫的新目的地又是哪儿呢？显然不会是入侵英格兰。此时，拿破仑尚未采取任何行动来重启已经破败的准备工作。即便没有奥地利与俄国在东部边境以及意大利的威胁，入侵英国也超出了他力所能及的范围，更何况奥地利的威胁看似迫在眉睫。维尔纳夫被命令重整受创的舰队，在舰队休整之时，洛里斯东也将部队从船上卸下来，将他的兵营重新补满，同时收集更多的运输船。“在月底，”拿破仑告诉他，“你将接到让部队重新登船前往别处的命令，而实现之前那个目标的时机已经逝去。”

在拿破仑写下这封故弄玄虚的信件的同一天，执行奥地利战役的命令被全部撤回。维也纳送来了一封盼望和平的回信，但即便如此，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拿破仑已经意识到他只能回过头去向英国发起直接攻击。法国总参谋部对当时局势的深入研究指出，拿破仑仍然醉心于他构想中的印度战役，维尔纳夫所部将被派去加入冈托姆的海陆大军。此

时的拿破仑一定已怀疑俄国与英国的联合是为了阻止他在东地中海的进取。那么，将计就计地瞒骗他们，绕过好望角发起一场攻击，这不是他最为典型的作风吗？当然，他必须假设的是，入侵印度要比入侵英国更容易。他或许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一再被军事史所证实的、看似矛盾的真理：跨过开放水域发起的攻击远比通过狭窄水域攻击来得容易。原因很简单，进攻方在开放水域中更容易突破敌人的布防，这已被奥什（Hoche）对爱尔兰的攻击以及拿破仑自己对埃及的远征所证明。

不过，这整个计划也有可能仅仅是为了干扰英国的间谍，或者，即便其最初意愿并非如此，但在计划被证明不具备可行性之后被改用于这一目的。我们知道，在此后的数月之中，拿破仑的确沉浸在将英国海军的注意力引向印度的幻想里。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印度远征计划是否被严肃地构想过，它在被构想出来的数周之后就被放弃了。在2月底，出于目前尚难以理解的原因，拿破仑已经重新拾起侵英大计，并开始为此筹划一场不比他的印度幻梦现实多少的海军集结行动。在2月29日[12]与3月4日之间，他发布了那些著名的、在西印度群岛集结舰队的命令。

为了尽可能理解此时的情况，我们需要回到他最初放弃的那个计划，看看拿破仑脑海中最为关注的问题，尽管此时的局势已较当日更为严峻。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将北意大利吸纳到法兰西帝国中去，而他施展的手段，是在从撒丁、奥地利与热那亚的旧势力废墟中诞生的诸多革命城邦之上建立起一个新的意大利王国。这一政策的最大阻碍在于，若拿破仑出手鲁莽，将可能导致奥地利参战，并刺激沙皇与皮特组成反法联盟。数周以来，他都在试图说服他的诸位兄弟接受新王国的王冠；而在遭到一致的拒绝后，拿破仑终于决定再次为自己加冕。于是，他就必将面对奥地利的震怒，面对为了阻止他在意大利进一步扩张而组建的英俄联军。他被迫让他的军队进入战备状态，并公开宣传入侵英国的威胁。这是防止英国在地中海投入兵力，继而与俄国组成不可阻挡的军势并鼓动奥地利加入战争的唯一办法。

拿破仑是否相信侵英行动的可能性，这一点不得而知。即便他相信，这也只能是出于他著名的赌徒性格，认为他所欲想的一切都有可能实现。天命曾使他移走阿尔卑斯的高山，也曾使他相信他能让埃及大漠流淌着奶与蜜。而现在，他或许相信自己能跨越大海。

除了这种解释，我们已无法理解他下一步行动的疯狂企图。首先，他开始集结陆军，认为投入行动的必要兵力应达到15万。英国陆军以及整个本土防卫部队正在兵力、士气、训练与组织方面得到极大加强。而在海峡对岸的天际线愈发阴云密布之时，拿破仑维持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部队却仅仅达到其预想兵力的一半。即便在六个月的准备工作之后，在那个关键时机即将到来、传奇行动将要展开的时刻，拿破仑仍旧受制于那些失职无能的海军指挥官。他麾下只有不到9万人能登上对应的渡海船舶，登船与运输工作的安排则更加混乱。多处港口被淤泥堵塞，船只即便在涨潮之时仍会搁浅；除了次要的维姆勒港，耗费数月的准备工作几乎没能取得任何进展。在布洛涅，六个月的努力仍旧无法让一半的部队在一次涨潮中驶出港口。运兵船队分散在毫无联系的陆军各部队之间，仍旧无法集结，毫无组织可言，且迫切需要整修。拿破仑能在两个小时中让15万大军登船的说法是关于他的种种传说中最大的神话。仅就可能性而言，在完美天气的配合下用十二到十八个小时装载9万人的军队就是他能够做到的极限。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仍是从未企及过的。[13]

毫无疑问的是，正是来自西班牙的一封封捷报使拿破仑能够蔑视这一切的困难。自英国不宣而战以来，西班牙人以超过预想的热情投入了战争。拿破仑对西班牙舰队的所有要求和期待几乎完全得到实现。如果说陆地上的准备工作使得行动前景愈发黯淡，而在大海上，他却看到了更大的希望。他将所有乐观精神投入行动的海军部分中去，而干脆忽视了他无心面对的其余问题。

在2月19日与西班牙政府的通信中，拿破仑首次提出了在西印度群

岛集结起全部海军兵力的观点。第一道正式命令在当月27日下达，在这一天，拿破仑向密歇希发去指示，取消令其返航的上一道指令，改令其原地待命至6月末，并立即准备与出现在马提尼克的友军会合。统领法国费罗尔舰队的古尔东将军（Admiral Gourdon）也接到命令，要求他准备与另一支即将出现在港外的法国舰队会合，与港内适于出海的西班牙战舰一道出击。三天后，拿破仑发出了行动的核心命令。布雷斯特的冈托姆被要求搭载3000余名士兵，与21艘战列舰、6艘巡航舰、2艘运输船择机尽早出击，去联合古尔东的舰队。他将前往费罗尔，努力歼灭考尔德的英军封锁舰队，而后打出信号让古尔东出港，一起航向马提尼克，在那儿与土伦舰队和罗什福尔舰队会合。在用1000名士兵加强当地守军后，他将即刻与余下的部队及其麾下的40余艘战列舰返回欧洲。在乌桑特岛周围，冈托姆要攻击他所发现的任何英军舰队，然后穿过海峡，在6月10日到7月10日间抵达布洛涅。这就是拿破仑希望达成的整个计划，但如果土伦舰队无法抵达，还有一套备用方案。若冈托姆拥有25艘以上的战列舰，而维尔纳夫在三十天内仍未出现，他就将继续行动，独自打开通往布洛涅的航路。如果他阵中的战列舰因种种原因低于25艘，那么他就应返回费罗尔，在那儿遇到集结于此的欧洲海域的所有法国与西班牙战舰。他们将在港外联合，然后按照原计划驶向布洛涅。

同一天，对应的命令也被授予土伦的维尔纳夫。在冈托姆为费罗尔舰队解围的同时，维尔纳夫则应解救加迪斯舰队，然后与之共同驶向马提尼克。在接下来的四十天中，他应时刻做好准备：如果布雷斯特舰队抵达马提尼克，冈托姆将不会下锚，而是打出信号让维尔纳夫与之会合。若冈托姆在四十天期限截止时仍未出现，维尔纳夫应该让舰队搭载的陆军士兵登上法国的岛屿，然后尽其所能打击英国殖民地，再前往加那利群岛（Canaries）攻击英国的东印度贸易航线。冈托姆也许会在那儿与之相遇，但若仍未能在二十天内出现，维尔纳夫就应返回加迪斯待命。在这些命令中，拿破仑并未对在费罗尔集结大舰队做出计划，尽管这是在冈托姆未能在马提尼克集结舰队且兵力不足时的备选方案。这可

能是因为拿破仑希望根据未来局势的发展而做出进一步安排。

这就是这位天才构想出的宏伟航程。拿破仑是如此看重这一蓝图，他认为——正如他对维尔纳夫所说——世界的命运将因此而改变。可是，他手下的海军将领对此又做何感想？这些想法没有被记录下来，但他们的后继者对此问题耐心而详尽的研究已经给出了能让我们满意的答案。德斯奇霍上校指出："两次从被优势兵力封锁的港口中突围；打破加迪斯与费罗尔两处封锁，然后在马提尼克——这个在密歇希突围后已经被英军推测到的地点——集结舰队。如果我们只看这些指令书信，这就是整个计划的行动流程，这无法得到历史学者的欣赏。如果我们不能在其中发现某些更深层的含义，这样的计划实在配不上拿破仑其人及其天才。"

那么，我们在其中还能发现些什么深层含义呢？这只能是拿破仑为了挽救自己脸面的一出诡计，让他从前途无望的侵英行动中威名无损地脱身而去。既然布洛涅的陆军必须等待舰队的到来，他们在下一步行动之前就至少要原地等待三个月。三个月的时间足够发生太多的事，他们所处的形势氛围必定会更新，而拿破仑的意图更可能随时转变。站在辩护立场上的德斯奇霍进一步指出，这整个计划都建立在完全忽视敌人的基础上，而拿破仑历来的行为和他的才华让我们无法相信他竟然没有考虑到英军的相应行动。他断言，拿破仑一定知道这里有多大的风险。"如果冈托姆成功"，在他加强殖民地防卫后"与48艘战舰在西印度群岛组成庞大的舰队，一场大规模海战就必然会到来。这可能发生在美洲或欧洲海域，但在英国这样的对手面前，这场海战肯定无法避免。拿破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一旦冈托姆战败……这将意味着侵英行动的结束，但惨败的责任不会被归结给拿破仑，而是由别人的脑袋来承担……另一方面，如果海军取得大胜，这就意味着英国的毁灭，甚至后续的登陆行动都无须展开……简而言之，3月2日的计划看起来像是那种被他的秘书称为双重目的（thèmes à deux fins）的类型。最糟糕的结

果无非法国的庸劣海军在远海战败，而这次失败很快就会被陆军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所掩盖。但这一计划无法实现拿破仑构想它的最初目的——‘在控制海洋之前让陆军渡海’。相反，这一目的随着局势变迁逐渐被弱化乃至被搁置，直至海战胜利取得制海权，陆军渡海的问题甚至都根本不可能出现”。[14]

这就是法国研究者对拿破仑实际意图的最为权威的观点。拿破仑真的意识到这场行动终将对阵英国舰队吗？他真的意识到这个宏伟计划与不掌握制海权而发动入侵的目的是矛盾的吗？他真的是如此自信地冒着险吗？从英国方面看来，这些解释就像拿破仑的计划一样不切实际。旧日的混乱思想在一封封命令间不断地摇摆。尽管教导海军的主流学说声称海战能够取得完整的制海权，但实际上，他们很难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完全确保某一临时、局部的控制权。因此，这些解释并未把握住问题的关键。一个判断力尚未被拿破仑的传奇色彩所干扰的英国人则会在这里看到，这只是一个自负的海军外行的谋划，表现出一个伟大的士兵对海陆军战略之本质区别的无知，表现出一个不愿接受挫败的恼怒独裁者的某种盲目自信。

但是，这个宏伟的计划仍然继续推进着。尽管半个世界已被卷入其中，英国方面却似乎毫无展开行动的迹象。纳尔逊赶忙从埃及回到他原本的位置上，而其他区域的舰队仍旧维持着缄默的警戒，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拿破仑规模惊人的舰队集结方案。皮特正在朴次茅斯准备着那场小规模的马耳他远征。事后看来，这正是一支刺向拿破仑的阴险毒针，让他的帝国感染、溃烂，让他招致最终的失败。

---

[1] 1759年11月，在七年战争中的基伯龙湾海战中，霍克将军率领24艘战列舰与驶出布雷斯特的21艘法国战列舰相遇。在恶劣的天气中，法军决定退入暗礁丛生的基伯龙湾。霍克勇敢地命令英军发起全面追击，在法军完全退入海湾前咬住其后卫舰队，歼灭7艘法国战列舰。——译者注

[2] *Blockade of Brest*（N.R.S.），ii.158-166.Desbrière’s *Projets et Tentatives*

，iv.306.For the Admiralty’s criticism，see *Barham Papers*，iii.251.

[3] 罗伯特·考尔德（Robert Calder，1745～1818年），英国海军将领。曾参与1797年的圣文森特海战。1805年任费罗尔封锁舰队司令，于7月22日在菲尼斯特雷与法西联合舰队进行了非决定性交战，但战斗结束后未能积极地再次求战。之后被康沃利斯派往加迪斯执行封锁任务，随后因菲尼斯特雷海战后的行动被解职，并被军事法庭判决有罪，从此再未率军出海。1810年被宣告无罪，晋升上将，任普利茅斯守备司令。——译者注

[4] *Admiralty Secretary*，*Out-Letters*（*Secret Orders*），1363.

[5] Nelson to Marsden，Dec.26，1804：Nicolas，*Nelson’s Letters and Despatches*，vol.vi.

[6] Nelson to Orde，Dec.29.

[7] 当时英国海军任用和升迁军官的主要依据是《海军军官表》（*Navy List* 或*Flag List*），这份表格主要按照海军军官的官阶、资历、奖惩进行排序，任用和升迁在理论上应参照表格排序的先后来进行，这是海军长期通行的制度。在1795年组织西印度群岛远征时，当时的海军大臣斯宾塞勋爵受主持陆军的重臣亨利·邓达斯影响，选择了一位排序靠后但善于组织运兵船队的将领担任舰队指挥官。此举直接导致海军部的重要成员查尔斯·米德尔顿——后来的巴勒姆勋爵——宣布辞职。而在1798年5月选派分舰队司令时，圣文森特也是在斯宾塞勋爵的支持下选择了排位靠后的纳尔逊。——译者注

[8] Nelson to Ball，Feb.11th，and see also same to Melville，Feb.14th.

[9] Villeneuve to Decres，Jan.21：Desbrière’s *Projets et Tentatives*，iv.299.一个忽视纳尔逊原则的例子是美西战争中桑普森将军（Admiral Sampson）对波多黎各的赛维拉将军（Admiral Cervera）几乎致命的截击。（在1898年的波多黎各战役中，桑普森为歼灭西班牙舰队而从哈瓦那贸然出击，结果却扑了个空，西班牙舰队则成功驶入古巴圣地亚哥湾，给美军造成巨大威胁。——译者注）正因这种永不更改的原则被“沉着冷静地遵守着”，一切试图将英国舰队从海峡入口那个久经考验的掩护位置引开的企图都徒劳无功。

[10] Napoleon to Decres：Desbrière，iv.325. *Correspondance de Napoleon*，x.117.

[11] 德尼·德克雷（Denis Decres，1761～1820年），法国海军将领，拿破仑的海军与殖民地大臣。出身于海军世家，法国革命初期在印度洋作战，1795年回国旋遭逮捕，后授予战列舰舰长之职，参与爱尔兰远征。1798年任海军少将，负责指挥埃及远征舰队中的轻型舰艇分队，在尼罗河口海战中随维尔纳夫

撤退。1800年3月，他指挥满载伤病员的“威廉·退尔”号（Guillaume Tell）战列舰试图从被英军围攻的马耳他突破，遭到了2艘战列舰与1艘巡航舰的截击，尽管最终被俘，但其英勇抵抗的行为仍赢得了双方的赞誉。1801年回国后出任洛里昂海事主管、罗什福尔舰队司令，自当年10月起出任海军与殖民地大臣，直至拿破仑退位。1804年5月晋升海军中将。德克雷有出色的行政管理才能，对海军的认识亦冷静客观。但拿破仑并不尊重他在战略与作战计划方面的专业意见，每每要求海军实现他异想天开的构思。——译者注

[12] 原文如此。——译者注

[13] Desbrière，*Projets*， vol.v， part iii， chap.4.

[14] Desbrière，*Projets*， v.371.

第三章 战役开局

截至此时，英国政府对拿破仑的谋划还毫无察觉。法军的所有举动似乎只是为了扰乱英军的本土防御、阻挠其向地中海派遣部队，因此，他们可能只是想在密歇希之后再发动一场殖民地袭击。为了应对他们所认定的这一事态，3月2日，海军部向康沃利斯发去一封指令，后者此时正在托尔贝（Torbay）组建着一支由5艘战列舰组成的快速舰队（flying squadron）[1]，为其筹备远航所需的物资补给。这支舰队由科林伍德[2]指挥，旗舰设于拥有三甲板的战列舰“无畏”号（Dreadnought）。但康沃利斯并未让其立即出击，仍将之收在自己麾下。3月7日，他与这些战舰一道返回西方舰队，使其战列舰数量达到21艘，其中至少8艘是三甲板战舰。如果科林伍德与之分兵，他的兵力便只余下7艘三甲板战舰与9艘其他战列舰，他要封锁的冈托姆舰队则拥有3艘大型三甲板战舰与18艘普通战列舰。换句话说，康沃利斯只能以16艘战列舰面对敌人的21艘战列舰。

在对特拉法尔加战役的现代批评中，康沃利斯因分兵所造成的兵力劣势总是人们乐于提起的一个话题。不过，英国海军部与法国冈托姆方面却并不如此认为。在那个时代，评估不同战斗单位的价值或许同今天一样困难。除非谁能提出某种评判兵力布置的标准，否则这种对彼时策略的批评就毫无意义。

但有一点是清楚无疑的。从各种表格、文书来看，我们能够确定地说，英方或法方海军参谋都绝非只考虑了兵力数量的问题。在下文的列举中，敌我兵力的衡量常常倚仗于比较战舰的类型。比起其他战舰，拥

有三层炮甲板的大型战舰显然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其理由在当时的海军语境中相当清楚有力。纳尔逊的随军牧师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后写道：“我们拥有7艘三甲板战舰，他们只有3艘；但他们的战舰普遍体积庞大，装有80门火炮。”在纳尔逊麾下参与西印度群岛追击的一位舰长说：“他知道法国舰队中没有三甲板战舰，他断定三层炮甲板在近距离交战中对双层炮甲板享有巨大的优势。”托马斯·哈迪[3]——纳尔逊旗舰“胜利”号的舰长——在日后担任第一海务大臣时也力主建造三甲板战列舰。与他熟识的托马斯·布里格斯（Thomas Briggs）告诉我们，“他特别推重三层甲板战舰与90炮战舰，就像伏尔泰推崇强大的军团”——拥有三层甲板战舰的一方总能得到上帝的眷顾。[4]

我们在法国方面也可以找到相同的表述。3月末，当冈托姆向拿破仑解释他从布雷斯特突围的尝试如何失败、如何惊险地从一次锚地袭击中逃脱时，他这样写道：“敌军比我方少3艘战列舰，但是他们有8艘是一级战列舰，而我方只有3艘。”[5]拿破仑的确接受了这种解释，事实上，对三甲板战舰的最高评价正出自他的笔下。8月9日，他在谈及考尔德的战斗时说：“3艘三甲板战列舰在对抗一支没有三甲板战舰的舰队之时，相当于8艘经验丰富、训练完美的普通战列舰。”[6]当然，这种极端的表述并不能只按字面理解，因为拿破仑的写作目的正是试图将这场行动描述为维尔纳夫一方的胜利。[7]但无论如何，英法双方对三甲板战舰价值的认可都确凿无疑。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两国的新式80炮双甲板战列舰的标准侧舷射击投射量已能匹敌于英国的98炮二级三甲板战列舰，较之一级战列舰也仅仅弱十七分之一。[8]然而，在弹药投射量之外，三层甲板战舰还具有其他战舰不可比拟的优点。法国海军战术家比戈·德·莫罗盖[9]指出：“在进行接舷战时，它们能宰制那些低级的战舰。大型战舰上的轻型枪炮能够压制小型战舰，所有的枪弹都可以越过舷墙，从上方射下。”当英国的三甲板战舰在艏楼与艉楼甲板上装备了68磅卡隆炮之后，这种“宰制”的优势便愈发明显。“其次，舰员从高处跳上一艘较小的战舰，比从低处爬上一艘较大的战舰更加容易。在底层火炮都无

法使用的高海况下，大型战舰能更容易地操作下层甲板的炮组，如果双方被迫近距离炮击，三层甲板战舰在火炮方面甚至优势更大，因为它们能以两层炮甲板对付敌人的一层，而不是普通情况下的三层对两层……大型战舰更加坚固，能更好地抵御攻击。”以上观点在当日的英国海军——至少在当时的海军课本中——极为流行。[10]

那么，当时的英国海军部是怎样衡量不同战舰的战斗力的呢？这是一个更难确定的问题。在特拉法尔加海战的一周之前，纳尔逊曾要求巴勒姆勋爵派出他先前承诺过的三甲板战舰，因为考尔德在返回本土时乘走了“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其他三艘的航行状况也颇为糟糕。他在信中写道：“我长期盼望能得到一艘较快的战舰，两艘靠在敌舰侧舷的双甲板战舰要胜过远距离开火的三甲板战舰。”这或许暗示着，在他看来，一艘航速足以确保其正确战斗位置的三甲板战舰要优于两艘74炮战舰。[11] 这一推测并非没有旁证。[12] 在对战役双方舰队的分析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如果将三甲板战舰换算成2个单位，而将74炮战列舰算成1个单位，双方在多个场合中的单位数量常常几乎相等。这种换算关系出现得极为频繁，而又颇为精确，英国海军部的确可能将之作为在某些关键位置上配置兵力的公式。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出，既然英国海军部用这种计算方法在多个场合下保持着与敌人相当的兵力，那么，他们必定相信英军具有更强的战斗力，并以此作为其实力优势的必要保证。类似的计算方法同样可见于法国方面。在战役危机到来时，拿破仑曾命令冈托姆率领21艘战列舰——其中3艘为三甲板战舰——冲入海峡。到那时，他可能会面对30艘英国战舰，其中12艘为三甲板战列舰。冈托姆就此抗辩道：“他们的兵力几乎是我军的两倍。”[13]

在试图对这场战役做出正确评判之前，我们还需要弄清另一个关于战斗力对比的问题。一些权威的现代批评者提出，尽管英军在三甲板战舰上占有优势，但这一优势却因法国战舰的优越性而打了折扣——在某一艘或某一级战舰的对比中，法国战舰往往在尺寸与火力投射量上优于

英国战舰。[14] 但是，这一结论是通过对比纸面登记的战舰火力而得出的，这些数据往往只计算了战舰分级所参照的长炮数量。如果考虑到大多数英国战舰已在其艉楼或艏楼上装备了卡隆炮（Carronade）[15] ，那么，这一结论显然就无法成立。像“玛尔斯”号（Mars）这种在上层炮甲板装备24磅炮的顶级74炮战舰，同时也装有12～14门32磅卡隆炮，这样便将其在战斗距离上的侧舷投射量提高到了1000磅以上。[16]

连炮兵大师拿破仑都肯定了这种火炮布置的战术价值与后勤优势。在海战危机临近时，他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敌人因卡隆炮而取得的优势。1805年3月，他忧心忡忡地向海军大臣德克雷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以统一口径、统一重炮的布置方式重新装备各型军舰，其中就有74炮战列舰。所有12磅以下的轻型火炮将被卸载，只有36磅加农炮与36磅卡隆炮保留下来。他写道：“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我的计划是用同样口径的火炮装备战列舰。我认为，卡隆炮具有比我们标准的18磅加农炮更大的威力……当战舰在600托阿斯（约1170米）的距离上射击时，二者都无法造成足够的破坏，但在300托阿斯的距离上，36磅炮弹足以击毁索具与桅杆。”德克雷按这种方式装配了一艘巡航舰与一艘74炮战列舰——它的下层炮甲板装备着36磅加农炮，上层炮甲板装备着36磅卡隆炮，艏楼与艉楼则装备着轻型卡隆炮。拿破仑在信中说：“英国人最先在战争中使用卡隆炮，每次都给我们造成巨大损害。我们必须迅速效仿他们的体系，在战争中，优势总是属于口径更大的一方。只要装弹没有困难，我们就该把舰炮口径提高到36磅上。我特别希望你不要忽视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相信，用这种方式装备起的74炮战列舰能够装载74或76门36磅炮，远远强于常规布置的战舰。”[17] 但拿破仑的难题是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卡隆炮，在这一年中，他一直催促着他的大臣为此努力。“就是因为有卡隆炮，英军才能将‘东方’号（Orient）打得着火（指尼罗河口海战），对我军占得巨大优势。”两周后，德克雷向他报告供应卡隆炮的困难，而他在回信中更急迫地写道：“我向管理部门提出的最低要求是，要让士兵有足够的武器投入战斗。这是作为一位大臣的首

要职责，没有什么可以作为逃避的托词。我们难道不是受够了因缺乏那些武备造成的劣势吗？你的那些‘如果’和‘但是’通通不能被当成借口。”一周之后，当危机临近，而冈托姆仍无法从布雷斯特出航时，拿破仑的措辞变得愈发激烈：“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运些卡隆炮来！只要有火炮，你就能武装那些战列舰，而他们除了那些大口径火炮之外什么也不缺。”他每周都要对此呵责催促一番。在布洛涅的大军预定登船出发的时刻，拿破仑仍在热那亚写信催促德克雷：“英国人不说一个字，就悄悄用上了这种方法。我们已经落后于他们的海军十年……但我发现，竟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然而，他自己最终也没能完成这番事业。[18]

尽管拿破仑在海军战术和战略方面并不入流，但他却是炮兵领域的一流权威。这个最为关心炮术问题并通过其优秀的海军情报部门完全理解此时事态的专家，已经对这个炮术与火力布置的问题做出了评判：他毫不怀疑英国海军的领先优势，而单舰火力投射的对比也不利于他的舰员。因此，英国海军在三甲板战舰方面占据的优势是无法被法国双甲板战舰在尺寸与表面武备上的优势所抵消的。

在缺乏强有力的反驳证据时，我们不妨有限度地接受这样一个观点。这个从英军实际兵力布置中归纳得出的，得到冈托姆与拿破仑确证的，且从英法双方都找不到理由否认的战斗力公式是：舰队中的1艘三甲板战舰至少相当于2艘双甲板战舰。即便是强大的法国80炮战舰也无法动摇这一普遍规律，这不仅仅是因为英军同样拥有这种战舰，还因为英方拥有制衡这种超重战舰的100炮三甲板一级战列舰——而载炮低于100门的三甲板二级战列舰则对应于普通的74炮战舰。

利用这一规律，我们得以用谨慎的态度来评估双方舰队的实力，粗略地接近这场战役的历史真相。在3月临近结束之时，真正意义上的特拉法尔加战役拉开了帷幕。在理解此刻的态势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它

之所以被视为战役的开局，并不仅仅是因为拿破仑开始了他的大规模攻势行动，同样也是由于英国与俄国的陆军开始在地中海协同作战。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英俄同盟已在3月中旬基本敲定，英方起草的盟约文本已经送抵圣彼得堡。条约签署尚未完成，克雷格的地中海远征军便已准备出发。这支远征军由300名轻龙骑兵与6个步兵营组成，其中2个营前往直布罗陀，剩下的则作为马耳他的驻军，这样一来，英国就能在地中海抽出8000人的季度性机动兵力。45艘运输船已做好了运兵的准备，护航兵力是2艘战列舰——三甲板战舰“王后”号（Queen）与74炮战舰“龙”号。奈特少将[19]是船队的护航指挥官，他还要派“龙”号去增援加迪斯港外的奥德舰队。

在3月28日签发的一封行动指令中，英国陆军与殖民地大臣卡姆登伯爵[20]要求远征军径直驶向马耳他，除非某些突发状况迫使其必须改变航程。这封指令显然有违老皮特时代指挥军事行动的传统方法，那时，行动决策者会列举出所有可能的目标，让将领们按照他们所处的不同环境自由地采取最有利的行动。但在此刻，他们面前的目标已然十分确定。“最为重要的是，”指令如此写道，“西西里不能落到法国人手里，保护这些岛屿应被视为这场远征的首要目的。”按照预定计划，克雷格应该听从英国派驻那不勒斯特使休·艾略特的指导，由他来考虑在那不勒斯国王同意或不同意合作的前提下展开行动的不同情形。如果国王同意合作，克雷格就应尽全力协助他防守西西里。但如果国王拒绝英军的帮助，又在法国教唆下禁止英国舰船驶入其港口，或者法军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那么，他就应该竭尽全力，与纳尔逊一起在未取得国王许可时守卫西西里。这封指令的内容仍旧如同之前的目标列举。但是，不管其统治者怎么看，这个地中海的重要枢纽决不能落入法国之手，这就是指令的实质含义。英国早已对此下定了决心，甚至在联盟谈判中失去俄国的支持也在所不惜。

不过，下一封“极密”指令则提供了与俄国合作的方案。其中仍旧有

两种情况需要考虑。“第一个是，若法国向那不勒斯发起攻击，艾略特先生或俄军指挥官将要协助防御那不勒斯领土。第二个是，若俄军要将法军驱逐出境，或者法军由于北意大利的反法军事行动而撤出那不勒斯。”在这两种情况下，克雷格被授权在艾略特、奥地利或俄国指挥官请求协助时，依照自己对行动效果的判断，决定是否在意大利投入其部队；而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有可能要接受俄军总司令莱西将军的指挥。但与此同时，他的身上还有其他一些使命，诸如保护亚历山大港和撒丁岛。这些任务可能也要动用这支军队，因此，他不能在大陆战役中卷得太深，以至于无法在必要之时抽身而去。[21]

远征行动的军需主官亨利·班伯里（Sir Henry Bunbury）对这些指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詹姆斯·克雷格先生的注意力被导向这些不同且不相干的目标上，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内阁对这场行动缺乏主次分明的明智规划。”但是，这些指令显然是基于不确定的外交处境及各种可能的发展状况，这已然足够明智了。这个行动计划与英俄联盟相关，而英国的底线是表达它的决心：无论是否有盟友相助，英国都要保卫那个被纳尔逊视作地中海制海权之关键的海军基地。事实上，在克雷格的命令被签发的前一天，一份命令的副本就已被抄送给纳尔逊。[22] 在了解这个事实之后，我们完全可以打消对内阁行动计划的任何怀疑。

在保护远征部队之外，奈特将军的舰队还承担着保护地中海、东印度与西印度贸易的使命。他给克雷格提供的护航到伊比利亚半岛东南部的圣文森特角就宣告结束。在护航中止之后，克雷格还要在未掌握制海权的海面上航行2500英里，面对5支未受到严密封锁、未曾与英军交战的敌方舰队。面对尚未被击败的法国舰队，这次远航绝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

英国海军在这种行动中分配兵力的原则可以被归为两条。首先，提供一支足够抵抗敌方小型巡洋舰队袭扰的护航舰队；其次，提供一些防

止敌方大型舰队发起袭击的掩护舰队。奈特的舰队承担前一种任务，而后一种情形中的掩护舰队则由英国在各处港口前的封锁舰队来扮演。接着，只需要让各处舰队结成彼此连续的保护区，它们就会构成一条环环相扣的防御锁链。这样的命令已经发布。康沃利斯确保布雷斯特港外的安全，而考尔德确保费罗尔外海的安全。驶过葡萄牙的安全海岸之后，加迪斯之外的奥德继续为船队提供掩护，其保护区穿过直布罗陀海峡，一直到西班牙东南部的卡塔赫纳。接着，纳尔逊将阻击任何从土伦出发的敌方舰队，并掩护克雷格驶向马耳他。[23] 这是一个大胆的行动，即便如此安排，他们仍须承担一定风险。我们即将看到，这些风险究竟有多么的大。

在最后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运载着地中海远征军的船队集结于斯皮特黑德（Spithead），而拿破仑的大规模舰队调遣的条件也已经成熟。确凿无疑的消息从每处被封锁的法国港口传来：在费罗尔港外，考尔德得到信息指出，法军准备在3月22日起锚出海。26日，布雷斯特的英军也观察到了冈托姆的行动，他已将舰队从布雷斯特港内挪到了港外的水道。此时，康沃利斯已经因病假离开了舰队，而继任的加德纳勋爵[24] 尚未到来，康沃利斯的副将查尔斯·克顿爵士成为临时司令官，统帅着17艘战列舰。与土伦不同，布雷斯特港外的英军一直是以尽可能近的距离封锁着法国舰队。[25] 克顿立即让舰队驶近港口，他更倾向于将法国舰队吓止在原先位置上，而非诱使其出海决战。他的举动让拿破仑恼怒万分，因为他的战役计划正是让冈托姆在避免战斗的前提下出海。3月24日，冈托姆致信拿破仑，称英国舰队正位于港外的伊洛瓦斯航道（the Iroise passage），法军不经战斗而出航的意图已不可能实现。冈托姆的侦察哨仅观察到了15艘敌方战列舰，他因此希望冒险一战：“我们无疑能取得成功，我正等候着陛下的旨意。”但拿破仑却回复道：“一场海战的胜利对目前的局势毫无意义。要始终关注那个唯一的目标——完成你的使命。出海，不要交战。”

在这个最后的命令之下，冈托姆于3月26日率领舰队驶出布雷斯特海峡（Goulet de Brest）[26]，进入港湾之外的贝尔托姆锚地（Bertheaume anchorage）——这里受到强大要塞的掩护，便于法军寻隙出击。现在，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浓雾天气。浓雾在第二天凌晨降临，他随即打出起锚的旗语；但在法国舰队努力升帆之时，雾气又忽然散去。在春日清晨的明亮阳光中，他的侦察部队很快传来了英国舰队正在逼近的消息。克顿和他的17艘战列舰屹立在轻柔的北风中，而阵型受到狭窄海域限制的冈托姆只能令全军原地下锚，此时，克顿距离他已不到5英里。冈托姆无法再忍耐下去。他害怕在下锚时遭到英军攻击，造成第二场尼罗河口海战的惨剧。此时的风向已不可能让他返回布雷斯特港湾，但他仍然下达了准备升帆的命令。事后，他对拿破仑报告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因所处的位置而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发现，我只能被迫违反您的命令，在事态尚未明朗时冒险与敌军交战。"当他观察到克顿舰队在一次转向后坚守待命时，冈托姆实际上已经打出信号，令舰队切断锚链，以各自便捷的方式组成战斗阵型。然而，正如克顿所说的，英国舰队并没有抓住作战的时机："黑夜来得很快。在派出托马斯·格雷夫斯少将的4艘战列舰与其他小型舰艇并确保它们对敌舰的监视之后，我与我的舰队继续在原地待命。"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至少能让法国布雷斯特舰队在一场战斗后退出战局的机会，就这样错失了。但克顿毕竟只是这支舰队的临时指挥官，我们很难责备他没有在这样危险的海域里让舰队冒险，或者采取某种更加疏阔的部署，实现他"如果他们进入大海，我定能将他们拦下痛击"的豪言。冈托姆没有继续尝试突围。在第三日早晨，海面刮起清新的西南风，他立即率军返回布雷斯特，保障了舰队的安全。[27]

当这些行动报告送抵英国海军部之时，他们正将关注重心放在费罗尔港。费罗尔看起来像是拿破仑正在进行的秘密计划的核心，于是，海军部向新任的西方舰队司令官加德纳发去紧急命令，要求他即刻前往舰队上任，然后尽全力为费罗尔港外的考尔德派出增援。其实，费罗尔并

非威胁所在。港内的法国舰队不会在冈托姆舰队抵达之前起锚，一切仍保持着往日的平静。只有在土伦港中，局势发生了些许改变。拿破仑在3月24日给冈托姆的命令中说："出海，不要交战。其他舰队与你会师的行动已经开始。"但这并不属实。维尔纳夫仍在土伦港内，而纳尔逊正盯守在港外。事实上，这只是拿破仑用乐观消息激励其手下的一贯手段。当纳尔逊航向东方，确认了摩里亚与埃及的安全之后，他又火速赶向撒丁岛南部的普拉水道（Pula Roads）与补给船会合。在3月的第一周里，他完全被糟糕的天气所阻碍，直至9日才到撒丁岛西南的帕尔马斯湾（Gulf of Palmas）完成了补给。第二天，维尔纳夫再次让陆军登船的消息传到了他的军中，他决定率领舰队直扑土伦。[28]

在危机来临之际，纳尔逊不得不完全靠自己的心智做出决断。此前，连续两艘来自本土的通信船都未能抵达他的舰队：一艘在加迪斯外海触礁，另一艘则撞上了维尔纳夫的舰队，被法军俘获。如此一来，自1804年11月之后，纳尔逊就再也没能收到任何来自本土的信件，而他的处境此时已变得相当困难。土伦港的一切迹象都表明维尔纳夫将要出海，但他却不知道法军的目的地在哪里。他已经从过往的经验中认识到，他对西西里和地中海东部的坚决保护迟早会让土伦舰队有机会逃出地中海。不过，他仍倾向于认为埃及是法军的目的地。同时，由于他之前的任务和个人判断，他仍以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作为首要的保护对象。除非在土伦港前面进行近距离监视，他无法同时兼顾由土伦向东或向西的两条航线；但这种监视不可能长期保持，在此过程中，他也无法迫使维尔纳夫出港交战，从而一举消除威胁。纳尔逊必须在两条航线中做出选择。他认为，法军驶向直布罗陀所能带来的威胁较小，而航向西西里岛与那不勒斯的危险最大，他必须优先确保它们的安全。如果他决定前往其中一处，反方向的另一条航道就会敞开。纳尔逊决定利用这一点设下伏击圈套，迫使法军与之交战，一劳永逸地打破这个战略困局。

3月11日，纳尔逊在一份"极密备忘录"里记下了他的方案。英国舰

队的集结位置要能同时掩护那不勒斯、撒丁岛与西西里岛，基于这一考量，他选定了撒丁岛西南的帕尔马斯。但在英军前往那里之前，纳尔逊首先要在巴塞罗那现身。这就是他的圈套所在：一方面，他的现身能够阻止维尔纳夫偷偷驶过西班牙东部的加泰罗尼亚海岸；另一方面，这又能诱使法军乘机出海，驶向东方——他始终相信那里是法军的真正目的地。为了诱使法军中计，他在土伦港外只留下两艘巡洋舰。

3月26日，维尔纳夫接到了最后的行动指令，让他在两天之内出发，驶向马提尼克。他刚刚收到纳尔逊于17日在巴塞罗那出现的消息，只得无奈地写道："如果他保持在那个位置上，我将很难前往直布罗陀海峡。"30日夜间，维尔纳夫乘着80炮战列舰"布森陶尔"号（Bucentaure），率领另外3艘80炮战列舰、7艘74炮战列舰、8艘巡洋舰与超过3000名士兵悄然起航。为了与巴塞罗那保持较远的安全距离，他决定取道更偏南方的航线，从巴利阿里群岛[29]外侧驶向西方。第二天，他发现自己已被纳尔逊留在土伦港外的2艘巡航舰发现，但在晚上，英军巡航舰便已离开。截至此时，一切仍如纳尔逊所希望的那样，维尔纳夫选择的航线仍使法军处在纳尔逊秘密集结点的打击范围之内。然而，在英军计谋得手前的最后时刻，在海上战争中常常出现的那种不可预见的因素改变了一切。第三天早晨，维尔纳夫幸运地遇到了一艘拉古萨[30]商船。在与中立国船长的交谈中，他获知纳尔逊的真正位置并不在西班牙沿岸，而是在撒丁岛西南端。维尔纳夫迅速改变航线，转而取道巴利阿里群岛内侧；而纳尔逊的圈套，由于这糟糕的运气，在距离成功仅有几个钟头之时不幸败露了。就严格的批评视角看来，纳尔逊本应考虑到，维尔纳夫能够在这片繁忙的海域里从中立方获得情报；而且，他也不应该让巴利阿里群岛内侧的航路如此敞开，至少要在离开时留下一艘巡洋舰——更何况卡塔赫纳港内此时还待着一支西班牙舰队。无论维尔纳夫向东还是向西行驶，这都是纳尔逊理应做到的。或许由于巡洋舰数量不足，纳尔逊没能实现这种完美的布置，而维尔纳夫因此得以在他的视野之外溜过西班牙海岸。[31]

于是，战役中的一个紧迫危机出现了。在维尔纳夫成功打通进军道路之时，克雷格的远征部队刚刚在朴次茅斯尽数登船，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奈特的护航舰队则在等待着一阵适于出航的海风，以及等待他所要护送的商船集结起来。一切迹象都表明，敌对双方的攻势行动很可能在大海上相遇，英国的地中海远征正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灾难性威胁。

---

[1] 其中包括98炮战列舰“无畏”号，80炮战列舰“雷鸣”号（Tonnant），74炮战列舰“玛尔斯”号（Mars）、“光辉”号（Illustrious）与“米诺陶”号（Minotaur）：*Blockade of Brest*，ii.203。

[2] 卡斯伯特·科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1748～1810年），英国海军将领。法国革命战争爆发后作为战列舰舰长参与了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与圣文森特海战，表现出色。1803年战争爆发后在西方舰队服役，应对拿破仑的侵英威胁。1804年晋升中将。法国土伦舰队出逃后受命指挥一支特遣舰队，随后负责封锁加迪斯，作为纳尔逊的副司令参与了特拉法尔加海战，并在纳尔逊战殁后接替指挥舰队。此后一直出任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后在病休回国的途中病逝。——译者注

[3] 托马斯·哈迪（Thomas Hardy，1769～1839年），英国海军军官。曾作为巡航舰舰长参与尼罗河口海战，并于1798年10月起担任纳尔逊的旗舰长。在哥本哈根海战中负责勘测港区水情，表现出色。1803年起担任纳尔逊旗舰“胜利”号的舰长，直至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战殁。——译者注

[4] 据说伏尔泰曾有过这句名言：天意总是站在军团更强大的一边。（Providence is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big battalions.）——译者注

[5] Desbrière，v.473.

[6] For Gravina’s opinion，see *Barham Papers*，iii.262：*Correspondance*，xi.72.

[7] 考尔德的战斗详见本书第十四章。在此战中，拥有4艘三甲板战舰与11艘双甲板战舰的英国舰队击败了拥有20艘双甲板战舰的法西联合舰队。如果按照拿破仑的说法，英国舰队的实力本就强于联合舰队，联军在劣势兵力下的较大损失就不能算是失败。——译者注

[8] 1805年，英军有两种98炮二级战列舰。较新的一种被称为“18磅式”，载重量超过2100吨，侧舷火力投射量约1050磅，但只有3艘入役：“无畏”号、“尼普顿”号、“勇莽”号（Téméraire），其中2艘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紧随在旗舰身

后。还有2艘更大的战舰将在年内完工，其载重量达2277吨。其他8艘在役的98炮战舰则是“12磅式”，这意味着它们在上甲板所装备的是30门12磅炮，而非新式战舰的18磅炮。它们的载重量在1870吨至2000吨之间。以上投射量数据不包括卡隆炮。

[9] 塞巴斯蒂安-弗朗索瓦·比戈·德·莫罗盖（Sébastien-François Bigot de Morogues，1706～1781年），法国海军将领、海军战术家。莫罗盖对海军的学术研究极有兴趣，曾任法国海军研究院（Academie Marine）的第一任主管，发表了诸多战术、造船、炮术、水兵健康等方面的论文。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出版于1763年的《海军战术：论机动与信号》（*Tactique navale ou Traité des évolutions et des signaux* ），该书对海军战术进行了详尽的理论阐释，对欧洲各国海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英国、荷兰等国先后出版了此书的译本。——译者注

[10] Bigot de Morogues，*Tactiqtie Navale* ，p.27.三甲板战舰的防御能力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胜利”号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在纳尔逊的私人牧师Rev.A.T.Scott一封未公开的、写于10月27日的信件中有这样的描述：“后甲板、艉楼与艏楼上是一片残酷的杀戮，其他甲板都无法与之相比。下甲板仅有2人受伤，而且奇怪的是，竟然是被火枪击中所致。”（但是，据与“胜利”号对敌的法舰“敬畏”号舰长吕卡自述，“敬畏”号的作战策略是放弃下层炮甲板的火炮对战，把水兵集中于上甲板进行轻武器战与接舷战。这才是“胜利”号下层炮甲板几乎无人员伤亡的真正原因。——译者注）

[11] *Barham Papers* ，iii.323；Cf.Mahan，*Life of Nelson* ，ii.333.Possibly，however，Nelson meant to write “two-deckers alongside，&c.”

[12] 最直接有力的证据来自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老将罗德尼。他在1782年圣徒岛海战后给海军大臣的信中写道：“我的大臣，三甲板战舰是保证我国海上统治权的必需，没有什么能与它们为敌……与其拥有18艘双甲板战舰，我更希望拥有10艘三甲板战舰，如果它们战败我就提头来见。”换而言之，1艘三甲板战舰胜过1.8艘双甲板战舰，约等于科贝特提出的战斗力公式。参见Brian 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1650-1815* （Naval Insitute Press，1991），p.160。——译者注

[13] Ganteaume to Napoleon，July 14th：Desbrière，iv.640.计算方法是：12艘三甲板战舰与18艘其他战列舰等于42个单位，冈托姆的3艘三甲板战舰与18艘其他战列舰等于24个单位。海军部最终为康沃利斯舰队规定的最低兵力是18艘战列舰，其中三甲板战舰的登记数量为5～8艘。若取平均数6艘，那么这支舰队也相当于24个单位，与冈托姆舰队相当。与之类似的是，在密歇希返回罗什福尔时，当时的西方舰队司令官加德纳派格雷夫斯前去封锁，自己则留下了8艘三甲板战舰与7艘其他战舰看守着规模如上所述的冈托姆舰队。加德纳舰队的兵力

相当于23个单位，但他的旗舰是最新完工的“海伯尼亚”号（Hibernia）110炮战列舰，也是英国海军最强大的战舰。而当斯特林（Stirling）与考尔德会合，前往截击从西印度返航的维尔纳夫与格拉维纳时，他们一共拥有15艘战列舰，其中4艘为三甲板战舰，相当于19个单位。巡洋舰的报告称联合舰队拥有17艘战列舰，但实际上是20艘，其中6艘为80炮战舰，无一是三甲板战舰。在5月底，布雷斯特港外的加德纳拥有10艘三甲板战舰与12艘其他战舰，相当于32个单位，其中包括了科林伍德舰队的2艘三甲板战舰与8艘其他战舰，计12个单位。他享有自由酌定权，最终分出了科林伍德舰队中的一半兵力，为自己留下26个单位来封锁冈托姆，但其中有3艘仅为64炮战舰。*Blockade of Brest*，ii.27.许多类似的例子还将在下文中提及。

[14] See particularly “Barfleur，” *Naval Policy*，p.212.

[15] 卡隆炮是苏格兰卡隆公司（Carron Company）制造的一种短管火炮。它身管短、初速低、射程近，但在中近距离上却具有不逊于重型加农炮的弹药投射能力，其低速重弹能造成大量破坏性的船壳破片，具有比加农炮更强的杀伤力，恰好契合英国海军的近战战术。同时，其重量远轻于加农炮，操作所需人手比轻型加农炮更少。它在1770年代作为商船自卫武器开始流行，此后逐渐被海军接受，成为一种装备广泛的武器。但直到纳尔逊时代，卡隆炮仍非英国海军的制式武器，不同战舰之间的装备情况存在极大差异。——译者注

[16] 许多较小的“18磅式”74炮战列舰也装备了12门32磅卡隆炮，如载重量1815吨的“龙”号（Dragon）装有28门32磅加农炮、34门18磅加农炮与12门32磅卡隆炮。

[17] Napoleon to Decrès，March 13，1805：*Correspondence*，x.221.

[18] Napoleon to Decrès，ibid.，June 2，13，22；July 6，19.

[19] 约翰·奈特（John Knight，1747～1831年），英国海军将领。幼年时随父亲参与七年战争，后参与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诸多战事。法国革命战争爆发后曾在西方舰队、地中海舰队与北海舰队服役，在1797年歼灭荷兰舰队的坎伯当海战中表现出色。1801年升任少将。1805年护送远征军前往马耳他，随后被任命为直布罗陀守备司令，直至战争结束。1805年11月升任中将。1813年升任上将。——译者注

[20] 约翰·普拉特，卡姆登伯爵（John Pratt，Earl Camden，1759～1840年），英国政治家。曾在皮特第一届首相任期内担任海军部委员、财政部委员、枢密院顾问、爱尔兰总督。1804～1805年出任陆军与殖民地大臣，1807～1812年任枢密院议长。——译者注

[21] Bunbury，*Passages in the Great War*，p.183. *W.O*.（6），56，March

28.

[22] *Admiralty Secretary*，*In-letters*（*Secret Orders*），vol.1363，March 27.

[23] *Admiralty Secretary*，*In-letters*（*Secret Orders*），vol.1363，April 6 and 15.

[24] 艾伦·加德纳，加德纳男爵（Alan Gardner，Baron Gardner，1742～1809年），英国海军将领。曾参与七年战争与美国独立战争。1793年升任少将，次年参与了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1799年升任上将。1800年起担任爱尔兰海岸舰队司令，基地设于爱尔兰南部的科克港。1805年3～6月短暂出任西方舰队总司令，随后返回科克。1807年担任西方舰队总司令，在任上去世。——译者注

[25] 克顿麾下有6艘三甲板战列舰、2艘80炮战列舰与9艘其他战列舰，对应冈托姆的3艘三甲板战列舰、2艘80炮战列舰与16艘74炮战列舰。之后，加德纳勋爵又驾乘120炮战列舰“海伯尼亚”号加入他们，使其兵力对比——按照前文介绍的规则——达到了25∶24。冈托姆对双方兵力的比较见前文脚注。

[26] 即连接布雷斯特海湾与大西洋的狭窄水道，长3000米，宽1500米。——译者注

[27] Ganteaume to the Emperor：*Desbrière*，v.473.Cotton to Admiralty：*Blockade of Brest*，ii.217.

[28] 从纳尔逊许多信件的引用中，我们可以知道帕尔马斯是98号集结点，土伦南部的位置是102号，加泰罗尼亚的帕拉莫斯（Palamos）以北的圣塞巴斯蒂安角（Cape St.Sebastian）是97号。此时的地中海全部集结点的编号列表尚待搜寻，而*Add MSS*. 34950，p.49保留了纳尔逊在1805年9月的集结点列表。这份官方列表一直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沿用，但其中的编号与早期有所不同。例如，土伦外海在新的表格中变成了93号。

[29] 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是西班牙东南外海中几处岛屿的合称，包括马略卡岛（Majorca）、梅诺卡岛、伊维萨岛（Ibiza）与福蒙泰拉岛（Formentera）。——译者注

[30] 拉古萨共和国（Republic of Ragusa）是一个存在于1358～1808年的海洋城邦，领土范围在今日克罗地亚沿海地区，以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为中心城市。1808年被拿破仑帝国所征服。——译者注

[31] 纳尔逊显然在97号集结点——西班牙东北部的圣塞巴斯蒂安角外海——留有一艘巡洋舰，他也许认为，这足以在维尔纳夫试图偷偷溜过西班牙海岸时发现他的踪影。但是，法国土伦舰队一开始是在南方的巴利阿里群岛外侧

行进，之后才转向内侧，这正好避开了97号集结点。

第四章 维尔纳夫出逃[1]

直至此时，维尔纳夫对自己正在参与的大集结还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的任务将全部围绕西印度群岛进行，诸如对抗英国据点或是增援当地法军。行动的其他内容仍被密封在拿破仑下发的密函里，只给他透露了一丁点信息——“这支舰队与我所信任的司令官将会执行一个远较我最初的计划更加重要的行动。”这就是拿破仑在3月22日急令维尔纳夫出海并与西班牙加迪斯舰队会合的命令中的词句。而当法国皇帝正在草拟这道命令时，纳尔逊与他的舰队正下锚于帕尔马斯湾的集结点，守候着他设下的圈套。

纳尔逊正等待着他的侦察巡洋舰前来报告敌情，他那易于冲动的性格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发紧张和焦急。他仍因自己错误地出击埃及而烦躁不已：在他离开之时，航向英国本土的黎凡特商船队遭到了从土伦出发的法国巡航舰队的攻击。两艘护航舰都被俘虏，但他们的坚决抵抗使大部分商船安全地逃入了直布罗陀。纳尔逊刚刚接到这一消息，他知道商船队又将暴露在阿尔赫西拉斯的炮艇的攻击之下，于是派出理查德·斯特罗恩爵士[2]指挥的74炮战舰“声望”号（Renown）前往护送，这艘战舰正好也要回国修整。[3]

不过，在纳尔逊脑海中的种种焦虑之间，黎凡特商船队的重要程度还仅仅是最低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土伦港仍未传来任何消息，他开始怀疑维尔纳夫根本不打算出击。“我还会在这儿待上几周，”他给他的朋友、马耳他的亚历山大·波尔爵士写道，“如果法国人还不出海，我认为他们在这个夏天很可能不会有行动，除非布雷斯特、费罗尔或加迪斯的

舰队要进入地中海。”他对艾略特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然而，来自那不勒斯的坏消息又迫使他面对着在此展开重大海军行动的可能性，将他之前投向埃及的关注全部引向这里。请记住，拿破仑开始战争的第一步棋就是命令圣西尔将军重新夺取在《亚眠和约》中放弃的那不勒斯南部海港，而普利亚地区随即被法军侦察部队所占领，他们与科孚岛的俄国人隔海相望，监视着那不勒斯宫廷。俄军稍一显露干涉迹象，拿破仑就加强了当地守军，而圣西尔更在俄军开始行动的同时接到了向那不勒斯进军的命令。[4] 关于克雷格远征的模糊谣言更恶化了当地形势，那不勒斯人将远征军的规模夸张到20000人，随时能与俄军联合行动。这是拿破仑无法容忍的，他立即命令圣西尔发起痛击，不仅要削弱敌军的调动能力，更要达到驱逐英国外交官艾略特的目的。更让纳尔逊感到痛苦的是，艾略特似乎要屈服了。他告诉这位疲倦的舰队司令官，他只想尽量拖延，“争取时间，等到承诺已久的俄国与英国援助部队的抵达”。如果那不勒斯国王要求他退休去西西里，他也许应该听从这一建议。到那时，他希望乘着“卓越”号（Excellent）离开——纳尔逊本计划让这艘战列舰永久待在那不勒斯，用于保卫王廷。[5] 艾略特的消极态度进一步加重了纳尔逊的悲观与沮丧，他在给卡姆登伯爵的信中写道：“法国很快就将夺取撒丁岛和西西里，如果我们不加阻止，埃及也会步其后尘。”不过，他很快又接到了维尔纳夫于3月21日让部队登船的消息，精神随即振奋起来。他立即起锚航向南方，但恶劣的天气迫使其转入普拉水道躲避大风。4月3日，他再次起锚，并于次日清晨与他的一艘侦察巡洋舰相遇，从那里得到了最新敌情。三天之前，3月31日早晨8时许，这艘巡洋舰在土伦西南方约60英里处脱离了维尔纳夫舰队，那儿距离纳尔逊当时所处的位置约为300英里。纳尔逊随即转舵向西行进，他说：“尽管我不相信法国人会取道特洛岛（Toro）……但我认为，如果他们没去特洛岛，就一定会去加里特（Galita）。”

特洛岛是位于撒丁岛西南末端的小岛，加里特岛则坐落于特洛岛以南100英里处的突尼斯海岸边。在纳尔逊看来，法军显然并不是从土伦

直接驶向西西里去发起登陆，而是试图贴着非洲海岸绕过英国舰队。他必须将敌人拦截下来。在纳尔逊做出下一步行动的重大决策之前，另一艘巡洋舰也抵达阵中。它在当天下午露面，但只带来了在31日夜间与维尔纳夫失去接触的消息。事实上，维尔纳夫在那天夜里已从拉古萨商船那里得知了纳尔逊的真正位置，于是甩掉了它。由于缺乏可靠的情报，纳尔逊被迫采取最为保险的措施。他立刻决定让战列舰队前往撒丁岛与加里特岛之间的正中位置，并将巡洋舰队的侦察范围延伸到从特洛岛到突尼斯海岸的整片水域，希望能阻止法军前往那不勒斯、西西里或埃及。

纳尔逊仍将精力集中于这几个特定的目的地，他的思考已经与他被赋予的首要使命牢固地捆绑在了一起。纳尔逊在4月5日给梅尔维尔勋爵的信中写道："如果这的确是他们的航线的话，那么，法军绝不可能在今日之前通过这里。我必须尽量缩小留给他们的机会，在让撒丁岛、西西里与那不勒斯冒险暴露之前，我必须确定他们是否要向东进军。即便在这个距离上，敌人也可能拖延前来的时间，他们希望我焦急地扑向埃及，然后让他们自由地对付撒丁岛、西西里与那不勒斯。"在这个清楚无误的果断判断中，纳尔逊对于战争全局关键要素的把握仍然没有任何游移，他仍然自信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丝毫不改变目的。他在自己选择的航道中心等待了四十八个小时，随后才终于可以确信，维尔纳夫并非如他怀疑那般想施展那个驶向东方的诡计。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敌军避开了英国舰队，从其他的航线将部队运往那不勒斯或墨西拿。维尔纳夫有可能已从英国巡洋舰确定其位置之处折返，再快速地驶向科西嘉岛与撒丁岛，从科西嘉以北或两岛间的博尼法乔海峡（Straits of Bonifaccio）前往其目的地。在这一可能性得到确认之前，他所能做的只有继续等待。4月6日，他在写给波尔的信中说："我真的只剩半条命了，可我必须查清他们的位置。但是我决不能急躁地离开撒丁岛、西西里或那不勒斯，将它们暴露给敌军。在没有得到更多敌情时，我决不能贸然向东方或西方出击。"当日夜里，为了确认这一新的可能性，纳

尔逊重新部署了巡洋舰，并率领他的战列舰队驶向新的阵位。他选定的阵位是乌斯蒂卡岛（Island of Ustica），位于巴勒莫以北50英里，而他的目的正如他所说，是“准备在敌军驶向那不勒斯时迅速施以救援，兼顾保卫西西里”。[6] 4月7日，他抵达了新的阵位，并决定在最终查明维尔纳夫没有攻向那不勒斯或西西里之前一直坚守在这里。他在给艾略特的信中急切地写道：“在下一步的行动中，我必须得到一些情报的指引。但在我获得确切的消息之前，我不会驶向西西里以东或撒丁岛以西。”

我们早已习惯于赞叹纳尔逊非凡的灵感与迅猛的攻击，但在这里，可以确定地说，他比任何一位杰出的指挥官都更加计较这些“确切的消息”，都更加小心地避免根据直觉行事。可以确定地说，他在这一刻所体现出的军事才华比其他任何时刻都更加耀眼。他坚定而专注地守望着自己的目标，让自己面对的种种可能性收束到他确定能展开行动的确切程度，无论是紧张疲惫的精神还是对战斗的渴望都无法诱使他逾越界限，做出超过其实力所及或会因小失大的错误决定。可以设想到，以纳尔逊向来冲动易怒的性格，他一定做出了极强的自我克制。在他所面对的所有可能性中，维尔纳夫退出地中海、放弃挑战英国制海权无疑是威胁最小的选项。他的职责就是确保英国的制海权，为此就必须在必要位置上集结一支力能胜任的舰队——他似乎已经预见到，地中海制海权就是皮特整个战争计划的关键。然而，通往直布罗陀海峡之外的航路也就因此而完全敞开了。

就在纳尔逊艰苦地守候着截击法军的机会时，维尔纳夫却毫无阻碍地在他的航路上行进——不过，未受阻碍并不意味着气定神闲。在他们身后，由“暴躁的提督”——这是法国人对纳尔逊的称呼——所率领的英国舰队仍是一个位置不明的威胁。4月7日，当纳尔逊抵达乌斯蒂卡时，维尔纳夫已悄然抵达卡塔赫纳港外。在这里，他看到了由萨尔塞多[7] 所率领的、已做好了出海准备的6艘西班牙战列舰，随即邀请它们加入法

国舰队。西班牙人完全愿意与他一道前往加迪斯，仅需法军稍候片刻，让他们再给战舰装载些火药并提交出港申请；但维尔纳夫却不敢冒这个险。当日夜间，海面吹起了轻柔的东风，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良机已经出现。于是，法军撇下卡塔赫纳舰队，独自驶出海峡。

在维尔纳夫抵达卡塔赫纳时，他已获知了加迪斯的最新情形。情况并没有改变，格拉维纳[8] 率领的15艘战列舰仍在港中，但只有7～8艘双层炮甲板战舰做好了出航的准备。看守这支舰队的奥德麾下只有1艘三甲板战列舰与4艘其他战列舰，其中3艘还是较弱的64炮战舰。对奥德而言，这的确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即将发生的事件将使他招致众人的鄙夷与大众的谴责，但是，以这种姿态来研究当日的情境却毫无意义。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我们究竟能从奥德所面对的困境、应对措施及其结果中得到什么教益。

奥德此时的恼怒毫不亚于听说西班牙舰队成立时的纳尔逊。纳尔逊向海军部抗议道，新成立的舰队将造成他的战利品收入损失；奥德恰好在同时询问，他的战舰已满载战利品，应当如何处理。海军部对奥德的唯一回复是让他将一定比例的战利品分给友军将领。加上其他种种摩擦，他已经无法再忍受这一切，于维尔纳夫出航的三天之前正式提出了辞职申请。[9]

在维尔纳夫离开卡塔赫纳之时，正好有几艘补给船来到奥德阵中。东风尚未刮来，海面一片平静，奥德决定抓住时机，将补给品全部搬上战舰。于是，每艘战列舰旁都靠上了一艘运输船，战舰甲板很快就被木桶和货箱堆满。然而，正在水兵们用晚餐时，一艘在微风中张着全帆的战列舰忽然闯入了他们的视野；它在桅顶挂着信号旗，意为发现敌舰队。这是理查德·斯特罗恩爵士所指挥的“声望”号。一天之前，他已完成了纳尔逊交付的任务，航向本土的商船队已经驶过直布罗陀海峡西南侧的斯帕特尔角（Cape Spartel），并未遭到阿尔赫西拉斯的炮艇与敌方

私掠船的袭击。接着，他返回直布罗陀进行了必要的修理。清晨破晓时，他正行至塔里法（Tarifa）附近，恰好看到维尔纳夫的舰队驶出海峡，于是立即与他的巡航舰一道折返，赶往奥德的锚地。[10] 奥德相信，要不是斯特罗恩的机敏警报，他很可能就会葬身敌手。

斯特罗恩所乘的微风尚未吹拂到奥德的锚地，但他仍打出了起锚、准备战斗的旗语，并让运输船退往拉各斯（Lagos）附近的中立水域，接着尽全力组建起战列线阵型。随着微风渐渐吹来，他轻扬风帆，以指向左舷的斜向线列（larboard line of bearing）驶向拉各斯方向——这是转入战列线阵型的最为快捷的方式，同时还可以掩护补给船队的转移。然而，维尔纳夫一心只想钻进加迪斯港湾的入口，对奥德的种种动作完全没有侵扰之意。

这算得上一次惊险的逃脱，但既不惊惶，也不匆忙，既没有砍断系锚绳，也没有随风漂移，而是一次操船技术十分娴熟的撤离。下一步要采取什么行动是奥德面对的新难题。他应该在原地等待纳尔逊，还是驶入海峡与之会合，或是向北航行驶向西方舰队？在拉各斯，他让斯特罗恩加入了舰队会议。斯特罗恩不久前才离开纳尔逊，他知道纳尔逊满脑子都想着埃及。他让奥德相信，维尔纳夫的出逃只能被解释为纳尔逊再次错误地向亚历山大港出击。接着，奥德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他毫不怀疑维尔纳夫的目的是带走格拉维纳的西班牙舰队，而他刚刚又听说了冈托姆驶入港外的贝尔托姆锚地的消息。他认为，这些情报直指向一次规模巨大的、危险的集结行动：拿破仑想要集结起他的全部舰队。基于这一推论，他只能采取唯一的应对措施。斯特罗恩的巡洋舰“索菲”号（Sophie）立刻被派往乌桑特岛，向西方舰队司令官报信，并通知对方，奥德所部将向他靠近。奥德在给海军部的信件中写道：“我将尽我所能与加德纳勋爵会合，在这个关键时刻，迅速地集结起部队也许会非常重要。”

这一决策使奥德遭到了包括纳尔逊在内的许多人的强烈攻击。在审视它时，值得强调的是，他并没有率领整支舰队北上，而仅仅是他的战列舰队。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将全部的巡洋舰都留了下来，并精心布置了监视维尔纳夫的阵型。两天之后——4月12日——敌人还没有任何动静，他对当前局势的认识得到了确认，将此尽快地通报给海军部也就成了当务之急。不利的风向使他无法赶往圣文森特角，“索菲”号也与大部队一道受困，于是，奥德又多写了一封信，更充分地叙述了他对局势的推测与下一步行动。他在这封写给海军部的信中说：“我确信，敌军将不会长久地待在加迪斯，我认为他们的目的地是西方某处，要在那儿突然地集结起数支舰队。波拿巴或许希望以此在英吉利海峡中占得一时的兵力优势，让他能够对他的敌人发起致命一击。”在这封信中，英国方面首次正确地推断出了当前的真实局势，而这竟出自一位广受鄙夷的将领之手。他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地中海的重要性，他只是认为，那里的危险已经不再是重中之重。“如果有证据让我相信，敌军是要向东方返回地中海，我将毫不犹豫地冒险穿过海峡，尽管我缺乏纳尔逊的位置与行动信息。”在这里，他面对着与纳尔逊几乎同样的抉择难题：敌人对何处的威胁最为严重？奥德认为，此时的答案是英吉利海峡的入口。“我将把我所指挥的大型战舰带回英格兰，让它们能接受海军部的重新分配；如果敌人真要对英格兰或爱尔兰发起袭击，这样做的风险最小，但收益最大。”

在接下来的两天中，奥德勉勉强强地绕过了圣文森特角，接着，他又因躲避糟糕的天气或是想侦察先前所在的海域而调舵向南。16日，他已行进到比直布罗陀海峡纬度更低的海域，一天后终于转向西方，按照常规方式开始了北上航行。其间，奥德仍旧没有发现维尔纳夫的踪影。无论他此番机动的意图为何，其结果都是让他对自己的推断愈加确信。[11] 于是，他又派出阵中速度最快的双甲板战列舰“波吕斐摩斯”号（Polyphemus）前往海军部报告他的最新消息。奥德在信中认为，维尔纳夫的消失更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推论。他向他们保证道，无论发生了什

么，敌军绝不可能先于他北上。当然，维尔纳夫没有出现在西部海域也可能意味着他要返回地中海，但奥德认为，在目前的战略局势中，这是可能性最小，也是威胁最小的一种情形。维尔纳夫不可能第二次从纳尔逊手中溜走，即便他与加迪斯的西班牙舰队一道返回，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击败纳尔逊。经历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们深知，指挥良好的弱势舰队足以组织起坚固的防御；而奥德对纳尔逊——他的军中宿敌——的战术能力更有着极高的肯定。“我敢相信，到那时，纳尔逊与他的12艘战列舰及其余巡航舰将做出毫无损失的成功防御，甚至能稳稳地咬住敌军舰队，使之无法执行任何实质性任务，尤其当他们舰上还有陆军之时。”在旧日战争最为黑暗的时刻，理查德·肯彭菲尔特[12]就是这样发挥着海军的防御力量，而纳尔逊以同样的方式拖延敌军行动的观念也已广为人知。

接着，奥德推理得出了最后的洞见。“我完全相信，法国人已经充分意识到他们将舰队调出地中海后可能对我军形成的优势。即便让他们返回地中海，他们也会尽量避免这样做。”他的结论完全正确，只是，他尚不能预见法军此次出击将会遭遇的种种苦难，其最终将迫使拿破仑无可避免地下达撤回地中海的命令。

基于这些完全正确的推论，我们可以认为，奥德向西方舰队靠拢的决策符合英军集中兵力的战略传统，而且是出于对拿破仑战争计划的敏锐洞悉。即便没有对维尔纳夫展开充分的侦察与警戒，他也绝不应受到严重的谴责；更何况，他在调动战列舰队前已全神贯注、竭尽所能地布置了留守的巡洋舰。他已经命令一艘商船去地中海寻找纳尔逊[13]；而在向北航行之前，他将一艘巡洋舰派往西印度群岛，又让一艘空载的运输船去马德拉群岛警告归航的东印度商船。纳尔逊的旧友、巡航舰“安菲翁”号（Amphion）的萨顿舰长[14]率领麾下的两艘轻帆船——“黄蜂”号（Wasp）与“猎兔犬”号（Beagle）——也已被他派去侦察维尔纳夫。萨顿应前往圣文森特角附近，“搜集一切关于敌军行动的情报，并

防止海角东面的船只落入敌手”。如果他确认维尔纳夫要向西航行，他就应带领沿途遇到的所有战列舰前往乌桑特；如果敌军向东航行，他们就应尽力与纳尔逊会合。“黄蜂”号的任务是监视加迪斯，“猎兔犬”号则在斯帕特尔角与特拉法尔加角之间巡航，萨顿希望它在这里警戒敌方私掠船，同时报告敌军舰队的消息。然而，它并没有长久地待在这个阵位上。奥德尚不知道的是，“猎兔犬”号已经发现了敌舰队的身影。它没能与上级取得联系，于是便径直向英国本土驶去。[15]

可以看到，奥德的决策有着理由充分的基础，他并未在此犯下什么错误。批评者认为，他更好的选择是与费罗尔港外的考尔德一道返航，而这也正是海军部在接到局势报告后对他下达的命令。但是，当时强劲的北风使他难以靠近费罗尔，而驶向乌桑特岛的航线则更靠西方，便于航行——纳尔逊在后来驶向康沃利斯的行动中也被迫选择了这一路线。事实上，尽管面对着重重困难，奥德的确曾试图接近考尔德，而两军会合的失败也并非他的原因。他在常规的西北航线上行进至4月22日，然后遇到了一阵足以支持他驶向东北方的海风。乘着这股风势，他在三天之后抵达了菲尼斯特雷集结点。这里一直是英国巡洋舰的侦察阵位，他本应在此与考尔德麾下的巡洋舰取得联系，但此时却空空如也。原来，本应在此守候的、由波因茨舰长（Captain Poyntz）指挥的“墨兰波斯”号（Melampus）巡航舰已在一周前离去。波因茨的行动其实也与当下时局相关：他得到了维尔纳夫驶出直布罗陀海峡的消息，于是便去给考尔德报信。奥德在他的接替者尚未出现时抵达了这里，事实上，他已位于费罗尔的西北方向，距离考尔德的锚地只有约50英里。但奥德对考尔德的踪迹一无所知，他认定考尔德一定也得知了维尔纳夫出击的消息并已经驶向乌桑特，正在像自己一样向北行进。[16]

上述一切就是这个有趣案例的真实情形。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他们的决策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纳尔逊被苛责为情报闭塞、轻率鲁莽，而实际上他们对当时的局势有着最为真切的判断。如果说奥德还有什么事

未能做好，那就是他因巡洋舰数量不足而没能对敌人展开足够的侦察。他在算计敌人、布置巡洋舰阵位时遗漏了十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位置不明的纳尔逊舰队对法国舰队及其指挥官士气的影响——维尔纳夫正因此而极度紧张。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他很难猜到，维尔纳夫既然已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与格拉维纳舰队会合，却竟然不敢等待足够长的时间让全部的西班牙战舰做好出海准备，以全部兵力与之联合。但是，真实情况就是如此。4月9日晚8时许，法国舰队在港湾之外下锚，接着向加迪斯港内打出信号，让格拉维纳的西班牙舰队与早先抵达此处的法国74炮战列舰“鹰”号（Aigle）出港会合。港内做好出海准备的几艘战列舰于10时开始动身，而维尔纳夫在次日凌晨1时就下达了起锚的命令。纳尔逊有可能正紧追在他身后，他急于利用一切机会藏匿自己的踪迹，连一个晚上也不愿放弃。在加迪斯港外等待了不到四个小时后，维尔纳夫就匆忙地逃入夜色之中，让西班牙舰队阵型散乱、勉勉强强地追随着他的航迹。如果奥德还在那里，他很有可能将之全部俘获。但我们又怎能将这一结果归咎于他呢？奥德毕竟从未料到敌军如此行动的可能性。只要他多等待一会儿，弄清真实的情况，只要他能像他期望纳尔逊做的那样，“稳稳地咬住敌军”一天时间，局势就很可能改变。然而，早在萨顿的侦察行动开始之前，事态的发展就完全超出了他的预计。奥德已失去了这个良机。维尔纳夫与格拉维纳率领着18艘战列舰出航了，从这一刻起，他们就已从英军的视野中成功逃离。[17]

---

[1] 本章可参见彩插中的图示1。

[2] 理查德·斯特罗恩（Richard Strachan，1760～1828年），英国海军军官。1805年11月率一支分舰队全歼了从特拉法尔加海战撤退的4艘敌舰，随即晋升少将。1809年负责指挥在尼德兰发起的瓦尔赫伦岛远征，但斯特罗恩缺乏类似行动的经验，并与陆军沟通不善，导致行动最终失败。此后他再未得到指挥职务。1810年凭资历晋升中将，1821年晋升上将。——译者注

[3] For Nelson’s “Order of Battle and Sailing” issued here，March 26th，see Hubback，*Jane Austen’s Sailor Brothers*，p.132.It is for twelve ships，including

the *Excellent*， in two divisions.

[4] Auriol，*La France*，*l'Angleterre*，*et Naples*， vol.ii，pp.33-6.

[5] Ibid.，chap.v and p.222（Alquier to Talleyrand，March 29th）； and Nicolas，vi.377.

[6] 新的巡洋舰布置如下：一艘在加里特岛，一艘在非洲沿岸，一艘在加里特与非洲海岸之间，同时担负着从突尼斯获取情报的任务。这三艘巡洋舰的目的是防止维尔纳夫沿着非洲海岸偷偷航向东方。还有两艘在纳尔逊与特洛岛之间，一艘负责弄清敌舰是否通过了博尼法乔海峡，另一艘在那不勒斯，随后又被召回，被派去打探法国舰队是否已返回土伦。Nelson to Ball：Nicolas，vi.399.

[7] 何塞·胡斯托·萨尔塞多·阿劳科（José Justo Salcedo y Arauco，1753～1825年），西班牙海军将领。长期在地中海服役，1805年出任卡塔赫纳舰队司令，但始终未能与法军或加迪斯舰队会和，同时幸免参加特拉法尔加海战。当年11月升任海军中将，负责保护航运。——译者注

[8] 唐·费德里克·卡洛斯·格拉维纳·拿坡利（Don Federico Carlos Gravina y Nápoli，1756～1806年），西班牙海军将领。1804年出任驻法国大使，参加了拿破仑称帝的加冕礼，与拿破仑和德克雷关系良好，因而在1805年2月被任命为西班牙海军总司令。之后随法军参与特拉法尔加战役，在菲尼斯特雷海战中表现出色，受到拿破仑的特别赞誉。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负伤，因伤口感染在数月后去世。人们对格拉维纳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表现存在一些争议。维护者认为他表现出了非凡的忠诚和勇敢，是联合舰队中最杰出的将领；反对者则认为他缺乏领导舰队的资历，并因家乡在那不勒斯王国而对入侵那不勒斯的法国同僚十分消极，从未推动维尔纳夫执行拿破仑的命令。——译者注

[9] March 27：Nicolas，vi.383 n.：*Barham Papers*， iii.303-4.

[10] Strachan to Nelson，April 30：*Nelson Papers*，*Add. MSS.* 34929.

[11] 这些有意思的机动可以在奥德的旗舰"光荣"号（Glory）的航海日志中读到，但奥德在发出的信件中对此只字不提。他只提到自己因背风而无法赶往圣文森特角。

[12] 理查德·肯彭菲尔特（Richard Kempenfel，1718 ～1782年），英国海军将领，以海军战术与策略的革新者闻名。1779年夏天，法国与西班牙组成了拥有66艘战列舰的强大舰队，试图驶入英吉利海峡掩护陆军入侵。此时，肯彭菲尔特正担任英国西方舰队参谋长，麾下仅有38艘战列舰。英军选择谨慎避战，同时又紧随敌人，保持着威慑。这使法西联合舰队无法保障陆军渡海的安全，最终放弃了侵英计划。之后，肯彭菲尔特接任西方舰队司令，在1781年年末以

劣势兵力成功地袭击了由优势敌军护航的运兵船队，并在1782年年初的一份备忘录中充分解释了他的防御观念。参见John B.Hattendorf，*The Idea of a Fleet in Being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i，2014）。——译者注

[13] Orde to Nelson，*Add.MSS.* 34929，April 11.

[14] 塞缪尔·萨顿（Samuel Sutton，1765～1832年），英国海军军官。1797年升任舰长，随纳尔逊参加了1801年的哥本哈根海战，曾担任纳尔逊的旗舰长，后随纳尔逊在地中海舰队服役。1804年随格雷厄姆·莫尔参与了袭击西班牙运宝舰队的行动，从中得到巨额赏金。1805年随纳尔逊参与了西印度大追击，返航后因病上岸，从此再也没有出海服役。——译者注

[15] 奥德的信件及其巡洋舰的命令，可参见 *Admiralty Secretary*，*In-letters*，410，March 19，April 10，11，12，15，17，19；而完全确证以上内容的其旗舰长的报告，可参见Ralfe，*Naval Biography*，ii.75；“猎兔犬”号的航行线路，可参见*post*，pp.122-3。

[16] Log of the *Glory*. For the *Melampus*， see her *Log*， and Gardner to Marsden，April 22：*Blockade of Brest*，ii.236，and *post*，p.81.

[17] 回国之后，奥德被解除了指挥官职务，此后再也没能恢复原职。但他与巴勒姆的往来信件表明，这与他在加迪斯港前的撤退并无关系。他在抗议解职命令时提醒巴勒姆，“在我荣幸地向海军部中的您表达个人敬意之时，你曾以那样的奉承姿态对我的行动表示完全赞许”。他的不幸完全是由于3月27日发出的那封轻率的信件。在那封信中，他对海军部要求他与纳尔逊分享战利品的命令感到怨恨。奥德认为这封信纯粹是私人性质的，但巴勒姆则认为一定要提交海军部会议讨论，最终结果是奥德被解职。巴勒姆曾劝他申请重返旧职，但他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Barham Papers*，iii.305-8.

第五章 巴勒姆勋爵登场

在英国本土这场战争的指挥部，一切都已陷入了混乱；更不凑巧的是，法国土伦舰队恰恰在此刻出击。在1804年年底，由圣文森特勋爵 [1] 在1802年成立的著名的海军质询委员会发布了其第十份报告，其中用确凿的证据揭露出海军为抹平账目而采用的多种违规手段，让公众大为吃惊。作为海军大臣，梅尔维尔勋爵必须担下责任。他是皮特的挚友，而这一身份更让反对党希望发起一场政坛风暴。就在维尔纳夫驶向直布罗陀海峡之时，英国下议院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弹劾。皮特用尽全力为他的挚友——同时也是能干的大臣——提出辩护。得益于他那慷慨激昂的精彩演说，皮特距离胜利只剩一步之遥。然而，议长的关键一票却让他在最后关头败北。在这一击之下，皮特崩溃了。当他起身离开时，党内的年轻人如贴身侍卫般在他周围组成一道环绕的人墙，以免政敌看见他的泪水。第二天，就在奥德对加迪斯的封锁被突破的同时，梅尔维尔辞去海军大臣之职，海军部失去了首脑。 [2]

幸运的是，这里还有一个人选能维持海军政策的连续性。年迈的水兵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仍然在世，尽管年近八十，他的头脑与身体仍然精力充沛。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担任海军审计长（Controller）——海军的首席会计师。在那个管理最为混乱的时期，他如支柱一般勉力维持着海军的运作，眼看着他的朋友——那些最为杰出的海军军官——在大海上陷入痛苦和绝望。在他任职期间，海军供应部门的效率最终得到改善，但他仍不满足，一直盼望着进一步的改革。但在得到上层支持之前，他无法取得实现这一愿望所需的权力。几年后，他所需要的权力似乎到来了。1788年，还在第一个首相任期内的皮特希望用一个文

官顶替豪勋爵（Lord Howe）出任海军大臣。候选者是他的长兄，能力平平且缺乏经验的查塔姆勋爵（Lord Chatham）。尽管皮特对协调内阁有着非凡的天分，但这样的提名无可避免地遭到了反对。格伦维尔[3]建议让米德尔顿出任。此时，尽管他还从未指挥过舰队，但米德尔顿已被视为仅次于豪勋爵的海军事务大师——正如格伦维尔所说："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的名望与品格足以掌握局势。"然而，我们却找不到米德尔顿对此的任何回应，他此时正因自己没能成为海军部的委员而深感失望。[4]更糟的是，即便作为海军审计长，他似乎也说不上话了。他的提议被屡屡否决，改革建议被搁置一边——查塔姆勋爵不准备做出任何改变。到1790年时，他已无法忍受下去，于当年2月向皮特提交了辞呈。他向皮特解释道，由于他先前给质询委员会提供了海军委员会（Navy Board）[5]中普遍恶习的证据，他已在部中大受猜忌。正因如此，他一定会让这些证据在报告中尽早披露出去。尽管皮特与他的兄长一再挽留，米德尔顿却不为所动。他在一周或两周之后写给皮特的信中说："我辞职并非仅仅出于个人原因，我确信，海军部门目前的状态无法让我发挥任何作用，我很高兴您和查塔姆勋爵能坦率地承认我辞职的正当性。"[6]到1794年，他在查塔姆的帮助下进入了海军部委员会，但他对社会性、政治性影响的看法仍旧没有改变，这份工作也没能维持多久。第二年，他拒绝签署查塔姆继任者的一封命令，认为那违背了海军部的优良传统，结果又被迫辞职。[7]

米德尔顿虽然没有正式的工作，却绝非无所事事。下一任海军大臣梅尔维尔勋爵是他的亲戚，于是任命他为自己的机要顾问。国会议员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曾与米德尔顿在废除奴隶贸易的议题上合作，米德尔顿是他最早的支持者，他告诉我们："梅尔维尔勋爵关于王国海军力量的计划实际上是出自查尔斯。"[8]此时，米德尔顿刚刚被任命为一个新部门的领导，这个部门的任务正是执行质询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9]因此，威尔伯福斯的说法足以采信。对于那些准确而适当的作战部署，对于英国战争策略所体现出的那些最为精妙的老练特性，这是唯

一可能的解释。

如果我们相信威尔伯福斯的说法，那么，皮特任命米德尔顿的深层原因正是梅尔维尔勋爵曾亲自认定他为最合适的继任者。但是，这一任命也经历了激烈的人事斗争。英王乔治三世希望查塔姆再次出任，或者是卡斯尔雷，或者是查尔斯·约克（Charles Yorke）——他曾在阿丁顿内阁中担任陆军大臣。已经无力改变战争方向的前任首相阿丁顿在年初时同意加入皮特的联合内阁，并得到了锡德茅斯勋爵（Lord Sidmouth）的封号，但他显然还在期待着更多东西。现在，锡德茅斯勋爵提出用他的人填补海军大臣之缺。然而，在战争的重压之下，皮特无法容忍这种脆弱支离的政府结构。如果没有一位得心应手的海军大臣，他一定会被繁重的工作压垮。沃龙佐夫曾向俄国政府报告道："一个人怎能承受如此繁重的工作与辛劳，怎能让他的头脑在如此纠结复杂的事态间保持清晰，并其惊人的洞察力与决断力加以把握和执行，这真是难以置信。"[10] 犹豫了两周之后，皮特告知锡德茅斯，任命已不能再拖延，他要把米德尔顿的名字提交给国王。锡德茅斯与他的亲密伙伴——也就是他的人选——白金汉郡伯爵（Earl of Buckinghamshire）立即请求辞职，一场内阁危机压到了皮特头顶，但皮特顶住了压力。在他做出米德尔顿的任期"不会太长"的承诺之后，两位反对者最终同意留任。

于是，这位老兵的名字作为新任海军大臣的提名被呈报了上去。由于从未在议会任职，他得到了巴勒姆勋爵的贵族封号，用以达成任命所需的条件。即便如此，乔治三世在批准他的任命时仍提出了一条特别规定："他仅限于参加议题与海军相关的内阁会议。"[11] 在这一刻，米德尔顿终于取得了他期待已久的那个能让他奉献余生以施展其抱负的职位。在国家最为危急的时刻，皮特的坚定与睿智终于确保了这个重要职位的人选，任命了一位在海军事务的广度与深度上都极具经验、在整个欧洲无可匹敌的海军大臣。甚至连因未能得到任命而失望不已的查尔斯·约克都大方地承认："今天，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成为新的海军大臣。

我不知道年迈的他是否具有这份工作所需的健康体能，但如果有的话，他无疑是当下最为合适的人选。他的能力一直被认为是卓越的，他的丰富经验无与伦比，他在海军实务策略方面也鲜有敌手。”[12] 4月30日，巴勒姆的任命得到了最终确证，人事危机随之结束。

在这场危机的顶峰时刻，4月19日，奈特已护送着克雷格的远征军从朴次茅斯出航。他们的出发正当其时：沙皇已对远征军的时间拖延提出抗议，而拿破仑正动身前往米兰去为自己戴上意大利国王的王冠。似乎这正是展开行动的绝佳时机。在两艘穿越比斯开湾的巡洋舰携带着土伦舰队驶出地中海的紧急消息火速回赶时，克雷格和他的部队已沿着预定航线驶入英吉利海峡。当英国政府接到告警时，一切都已太晚。维尔纳夫正在大海上，无人知晓其踪迹，而纳尔逊与奥德都尚未接到掩护克雷格的命令。远征军已经航向大海，奈特麾下仅有一艘98炮战舰与一艘74炮战舰作为护航兵力。

在克雷格出发的一周之后，英国本土才获知此时的真实情形，而这完全是依仗一位巡洋舰舰长的敏锐决断。当维尔纳夫驶过海峡时，由马克·克尔勋爵（Lord Mark Kerr）指挥的巡航舰“费斯格达”号（Fisgard）正在直布罗陀修理，它一半的帆索滑轮已被拆卸上岸。[13] 发现法军之后，克尔迅速雇用了一艘双桅快船，让自己的尉官乘着它去向纳尔逊报告。在维尔纳夫匆忙驶向加迪斯时，他正没日没夜地加紧修船，终于在4月10日提前出海，勉强用残缺的滑轮以最快的速度赶向爱尔兰与乌桑特岛报信。[14] 海峡之外没有敌军的踪影，他询问了附近巡航的英国私掠船，他们也语焉不详，只知道维尔纳夫已神秘消失。五天之后，顶着那股让奥德无法驶近圣文森特角的西北风，克尔抵达了菲尼斯特雷角集结点，并与考尔德布置于此的巡洋舰“墨兰波斯”号取得联系。[15] “墨兰波斯”号随即前去报告考尔德，而考尔德又派它去向加德纳报告，因此克尔得以直接前往爱尔兰告警。考尔德没有像奥德那样撤退，而是勇敢地坚守在自己的阵位上——当然，他的处境与奥德有很大差异。奥德的

封锁已经被打破，但考尔德的并没有，而他的任务显然是将封锁尽量久地保持下去。此外，他也并不像奥德那样处在加迪斯港外风势难测的海域里，也没有被困在港湾内的风险。从南方驶来的敌军无法迫使他交战，他可以自如地撤离。因此，考尔德唯一的应对措施是让加德纳的那艘巡洋舰去菲尼斯特雷接替“墨兰波斯”号，此后便自信地坚守在原地。

与此同时，克尔正匆忙地赶往爱尔兰。在穿越比斯开湾途中，他幸运地遇到了一艘来自格恩西岛（Guernsey，亦称根西岛）的私掠船。他命令它前去普利茅斯港向海军部报信，而自己则前往爱尔兰南部的科克港（Cork），如之前那样向加德纳的外围巡洋舰报告消息。[16] 他的表现堪称杰出，这场战争的某些方面是如此倚仗于巡洋舰资源，倚仗于舰长们传递情报的职责以及他们审时度势做出的决定。

就这样，4月25日，在克雷格与奈特的护航船队出发一周之后，加德纳与海军部第一次接到了来自克尔的告警。他们对此似乎早有准备，在当天就发布了一系列重大命令，这只可能是出自米德尔顿从英国战略传统中积累得来的丰富经验。此时，他一定知晓国王已批准了皮特的提名，并且也一定已经开始了工作。

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西印度群岛的安全。法军长期预谋在此发动袭击，在海军部眼中，这是维尔纳夫最为可能的目标。的确，皮特此前已从他的间谍处得到消息，法军正在谋划对牙买加的攻击，而密歇希之前的远征已使西印度群岛陷入危机。于是，他们给科克伦发去了一份行动命令，如果证实维尔纳夫的目的地是牙买加，他就应该率领所有的战列舰前去与牙买加皇家港（Port Royal）的戴克斯会合。这样，他们就能集结起11艘战列舰，其中1艘为三层炮甲板战舰，足以与维尔纳夫及其从加迪斯带出的西班牙战舰抗衡，并等待增援到来。

他们对最后提及的增援完全不担心，必要的增援将自行与之会合——他们的希望正是纳尔逊。要理解纳尔逊的大追击，我们就必须理解

这种古老而被遗忘的海军传统：在这种情形下，地中海舰队司令应该率领或派出相当比例的舰队进行支援，使得受威胁水域中的英国舰队在兵力上强过敌军。最初的时候，地中海舰队的行动指令确实就已包括了这一点。早在1704年，鲁克（Rooke）就曾接到命令，如果土伦舰队驶出海峡，他的首要职责就是追击敌军并与之交战。迟至1756年，宾将军的指令也包括了关于此点的多种情形。因此，我们无须感到惊奇，海军部正期望纳尔逊能够延续这一久经考验的传统，并很快给他下达了命令。

这封命令告诉纳尔逊，“如果你尚未分出与敌军相当的兵力”，奈特的两艘战列舰在圣文森特角完成护航任务后就应立即前往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Barbados）；而如果他已经这样做了，奈特就应加入奥德的舰队，奥德则继续掩护克雷格的远征船队。当然，如果维尔纳夫向西进军，地中海中就再没有敌人能威胁到远征船队——根据目前的报告，卡塔赫纳的西班牙舰队尚未做好出海准备。因此，纳尔逊的舰队就无须再如十天前的命令所说的，承担掩护的职责了。新的命令这样写道：“诸位先生相信，你已经得到了土伦舰队出航的情报，并派出了与敌人兵力相当的战舰进行追击。”他手下剩余的战舰应去加迪斯港外加入奥德所部，而纳尔逊本人则可以如他之前申请的那样回国养病。[17]

然而在两天后，出于对纳尔逊可能采取错误行动的担心，海军部又布置了额外的预防措施。海军部已经获悉，纳尔逊在维尔纳夫出港时正在撒丁岛的拉马达莱娜位置附近；既然如此，对他漏放维尔纳夫的最自然的解释就是他再次错误地杀向埃及。这种解释在英国本土造成了不小的恐慌，正如查尔斯·约克在写给哈德威克勋爵[18]的信中所说：“他仅剩的那只眼睛只顾盯着东方，让我们陷入了巨大的麻烦。”[19]海军部决定，如果纳尔逊真的误入歧途，他们就要从加德纳的舰队中抽调兵力以增援西印度群岛。这支现成的兵力就是之前成立的、由科林伍德指挥的快速舰队，它正是为了应对紧急事态而组建的。唯一的困难在于，加德纳舰队的成员尚未到齐，贸然分兵将严重削弱其兵力。海军部决心迎难

而上。在加德纳的常规预备兵力之外，还有一些仅需装配船员和索具便能出海的战舰。如果加紧工作，它们或许能及时填补因分兵造成的空缺。人们为此绷紧了每一根神经，付出了最大的努力。陆军部也提供了帮助，各港口司令获得授权，可动用周边的卫戍部队协助其工作。港口司令能向陆军指挥官申请所需人手，“尽其一切努力，在舰队分兵时让战舰做好出海准备”。巡洋舰队为目前最为重要的战列舰队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每个港口都接到命令，将手头所有的巡航舰水手转移到乘员未满的战列舰上。[20]

此时的快速舰队由10艘战列舰组成，这次行动则由其中5艘进行。加德纳派出了科林伍德的旗舰98炮的“无畏”号以及4艘双层甲板战舰，并将一则密封的命令交给科林伍德。依照这则命令，科林伍德将伴随着克雷格的远征船队前往马德拉群岛，不待下锚，就要去探寻法国舰队与经过此处的英国舰队的情报。如果他确切地听说7艘或更多的英国战舰正在追击敌军，他就应该返航；而如果情报并非如此，他就应前往巴巴多斯，加入科克伦的舰队，然后搜索敌军并与之交战。如果他发现法军已经离开背风群岛北上，科克伦就应将旗舰转设为巡航舰并原地布守，由科林伍德率领所有的战列舰驶向牙买加，协同戴克斯的舰队一道保护这个岛屿，继续索敌交战。最后，命令也包括了那则常见的条款：为了保卫英国领土不受袭击，他可以按照自己对最佳时机的判断采取自主行动。[21]

马德拉群岛是快速舰队的目的地，海军部已在此采取措施，加强对周边海域的监视。一个多月前，在为筹建中的快速舰队做着未雨绸缪的先期准备时，海军部便已采纳一个提议，要为它提供所有业已逃脱、亟待追击的敌舰队的情报。最终，他们从基思与索马里兹的海峡舰队中抽出了3艘巡航舰，让它们在距马德拉东南40里格（league）[22] 到西北100里格之间的海面上巡航。它们已在此守候了一个月，一旦其中一艘发现了敌舰队，它就会立即驶向本土告警，而其余两艘则将如影随形般盯住

敌军，直至其航行方向得到确定。[23]

在科林伍德接到命令之时，对应的命令也被发往纳尔逊。他被告知，如果他没有分兵，科林伍德就会与奈特的2艘战舰一起前往巴巴多斯。如果这样，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舰队兵力就会达到18艘战列舰，其中2～3艘为三层甲板战舰，无须纳尔逊再去增援。那么，在对地中海内的剩余敌军做好应对之后，他就应将舰队中的4艘战舰留给奥德，然后率领余下的战舰返航。与此同时，加德纳也被要求向奥德派出巡洋舰，在获得关于维尔纳夫的情报之后去马德拉群岛向科林伍德报告。[24]

截至此时，英国海军部对维尔纳夫的使命似乎尚未产生怀疑。基于他们先前掌握的情报，维尔纳夫似乎只是执行着拿破仑最初交给他的命令。指挥部尚未对他突然杀回英吉利海峡或是在大海上与克雷格船队相遇的可能性感到任何不安。土伦舰队的目标就是牙买加，这一印象已在指挥部之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开始觉得，纳尔逊对其首要目标的坚决守卫已迫使拿破仑落入了皮特的股掌之间。维尔纳夫放弃了在地中海展开行动的一切机会，被派去执行一场次要的殖民地袭击，让地中海完全向他们蓄谋已久的、协同俄国的行动敞开。然而，在围绕西印度群岛——这个他们认定的位置——发布的命令下达后不久，一切又都变得悲观下来。4月30日，加德纳发出了那封他从奥德那儿获得的信件。指挥部很快就认清了当前的情形。无人知晓纳尔逊的位置，最可信的观点来自斯特罗恩：他已经跟丢了敌军，几乎可以确定地说，正在赶往埃及。奥德仅仅知道维尔纳夫在加迪斯出现过，并放弃了自己的封锁阵位。因此，这两位受命掩护克雷格远征船队的将军，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竟然都不在自己的位置上。奥德并不知道维尔纳夫的目的地，他可能向北，也可能向南。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奥德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的猜想，法军应该是向西航行，折返杀回英吉利海峡可能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我们现在知道，这就是法军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的真实行动，而在当时却无人严肃地提出这种情形；但从奥德信件抵达的那一刻起，他们便再也没有遗漏过这一可能性。在英国方面看来，如果考虑到皮特的计划，维尔纳夫接到的任务很有可能是接近英吉利海峡，摧毁克雷格和奈特的远征船队。克雷格和奈特有50艘运输船，已经驶入了大海，显然面临着被歼灭的巨大威胁，而这样的打击将让反法同盟陷入令人绝望的崩解危机。关于远征的风言风语已经传出，英国政府无法用拿破仑并不知晓来自我慰藉，更何况大海上还有其他的运输船队。在爱尔兰的科克港，还有一支与克雷格所部性质相似的、由艾尔·库特爵士（Sir Eyre Coote）指挥的远征军，其目的是加强印度的卫戍部队。这两支远征船队都很难逃离法军的刻意袭击，事实上，尽管拿破仑尚不清楚克雷格的使命，但他已经对英军的动向产生了关注和怀疑。在塔列朗（Talleyrand）写给拿破仑的报告中，这两支远征船队被描述得无足轻重，只是皮特政府陷入绝望处境而不择手段的证明。但葡萄牙的法国外交官接到消息，一些情报向他们警告道，里斯本的特茹河口（Tagus）可能是远征军的目的地——这有些超出了塔列朗的预计。“这仍然算不上什么计划，”塔列朗写道，“考虑到英国的态势和内阁的尴尬处境，这些计划是不可能存在的，是荒谬的，我们可以安全地排除这一可能性。如果他们真要进行什么远征，他们的目标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而如果这一切仅仅是他们刻意的威慑性表演，他们要去葡萄牙、北方、黎凡特或者印度也都没有什么不同。”[25]

但是，拿破仑本人对此却要严肃得多。他已听到一个模糊的传言，称密歇希已经夺取了多米尼克与圣卢西亚，这让他与他的下属们相信，最初将罗什福尔舰队派往西印度群岛的错误决策竟是一招天赐的妙棋。他们已让英国战略陷入混乱，将其关注的重心引向远方的殖民地，为法国的侵英计划铺平了道路。英国派出的远征军似乎很好地印证了这种看法，但是，这真的就是拿破仑对敌军行动的真实看法吗？在阅读他的批复时，我们或许会对此产生怀疑。在接到塔列朗报告的三天之后，拿破

仑给帝国大法官（Arch-Chancellor of the Empire）康巴塞雷斯（Cambacérès）写去一则备忘录，后者被他留在巴黎辅佐其兄长约瑟夫（Joseph），以在他前往意大利时主持国家政事。拿破仑在信件下的注记里写道：“似乎有两支规模为5000～6000人的远征军已经或正准备开拔，一支前往印度，一支前往西印度群岛。他们并不是民兵或者志愿兵，而是英国最好的部队。”[26] 法军入侵的威胁没能将英国陆军的精锐束缚于国内，这让拿破仑感到出乎意料并且很恼火。他继续写道：“如果我们的船队接到行动命令，如果合适的海风、雾气或夜色能持续六个小时，英国人就会遭到奇袭，并发现他们最为精锐的部队不在身边。”

这显然不是他的真实想法。在拿破仑多变的计划里，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加确切：他此时已经完全放弃了由海峡船队独自发起突然侵袭的方案。他或许一度相信过如此行动的可能性，英国大众的看法也是如此，但现在，双方都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拿破仑业已采纳了海军的观点，因此，这些言语只能被视为一些情绪化的表达——他正因自己的威胁无法持续而恼怒不已。拿破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在这番恼怒过后，他转而以自欺欺人的态度对待着这一切。他说服自己，他已将英国的关注引向它在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而在他写下备忘录的同一天，他也将此告知了他在意大利王国的陆军大臣皮诺将军（General Pino）。皮诺显然对英国在地中海的行动感到焦虑，但拿破仑向他保证，英国除了金钱之外无法给奥地利提供任何支援。据他所说，他对印度的威胁已经迫使英国政府派出了由查尔斯·康沃利斯勋爵[27] 率领的数个军团，而为了保卫牙买加，他们还需派出8000～10000人的远征军。[28]

在拿破仑跨过阿尔卑斯山为自己戴上那顶新王冠之时，这就是他为自己绘制的那个玫瑰色的美好图景。我们已无从得知他在何种程度上相信着这一切，但可以相当确定地说，他已开始感受到皮特那令人痛苦的刺击。也许他仍然相信主动权在自己手中，尚未意识到一场以夺走它为

目的的行动早已开始。而在皮特方面，他却不敢相信自己已经骗过了那位欺诈战术的大师，在他眼里，维尔纳夫驶出海峡的行动一定是拿破仑在醒悟之后为了阻止远征军而做出的回应。如果不是如此，那也可能如奥德所说，他执意要实行入侵英国的计划，以此来掩饰一场大规模海军集结。

在这一刻，英国本土的整个氛围瞬间改变，变得极度紧张，悸动不安。通过阅读当日的文件，我们仍能感受到这场危机所造成的震颤。然而，主持这一切的皮特却无法专注于此。4月29日，当新的消息抵达下议院时，他在那儿花掉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质询委员会发布了他们的第十一份报告，其内容关乎海军的军事行动，在议会中引发了一场超乎寻常、令人精疲力竭的激烈争辩。在此过程当中，皮特宣布了新任海军大臣的任命，而反对党的福克斯[29]则提出控诉，称皮特曾试图避免让质询涉及自己的好友。一份对梅尔维尔进行犯罪调查的议案让事态达到了白热的顶点。绝大多数的反对党领袖都用投票支持的方式折磨着他们的首相，不顾国家所面临的危险。这是一场激烈的争斗，尽管他们恶言相向，皮特最终还是顶住了压力。拖着刚刚为好友辩护的疲惫身躯，他在次日的凌晨两点才返回家中，随即看到了奥德从西班牙海岸发来的信件。皮特安插在巴黎的间谍曾传来消息，土伦舰队即将起航，目的地暂时不明，不过普遍认为是爱尔兰，而据间谍推测可能是牙买加。但在所署日期为4月17日的第二份报告中，间谍让皮特确信，拿破仑目前的整个计划只是将英国的注意力从他真正的攻势上引开。[30]这一情报确证了奥德的观点，即一个突然在海峡集结兵力的计划正在进行。皮特无法安然入睡，两点半时，他又坐在了桌前，为新任的海军大臣写下一封警告信：

> 一从议会回来，我就看到了这些文件，它们是目前最为重要的。我好几个小时内都不会休息，已准备好尽早在你方便时会见你。为了筹集额外的人员、让所有的战舰做好出海准备，我想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目前的事态是如此的紧急，我想我们必须保证此时的人力供

给，必须采取那些在这种极端急迫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的措施。[31]

在上任的第一天，巴勒姆正为改组海军部做着繁重的准备工作。现在的海军大臣是一位年迈的水兵，而他还要负责指挥这场海上战争，海军部的工作架构因此需要改变。[32] 他或许也是彻夜未眠。第二天，4月30日，他向大海上的舰队指挥官们发出了一系列极其清晰的命令，这一切都是在极度紧张、缺乏休息的情况下做出的。其首要目标是拯救克雷格的远征军，其次是维持对费罗尔的封锁，最后，如果奥德的推测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还要按照传统方略，封锁英吉利海峡的入口。

巴勒姆向考尔德发去的命令是，如果他发现了已受到威胁的远征船队，他就应该截留住奈特和他的两艘战列舰，克雷格的运输船队则应在巡洋舰的护送下返回普利茅斯或科克港。而发给奈特的命令是，当下最为紧迫的需要是加强费罗尔港外的英国舰队，以防维尔纳夫试图打破封锁。如果他在护送运输船队驶过圣文森特角之前接到了这封命令，他就应该把船队带回费罗尔，再按照发给考尔德的命令行事；如果他已经驶过圣文森特角并确信维尔纳夫已经离开了加迪斯，他就应当把旗舰转设到一艘巡航舰上，将他的两艘战列舰如前文描述的那样派往考尔德或加德纳，然后与剩下的巡洋舰继续将运输船队护送到直布罗陀。

发给奥德的指示则是让他在加迪斯留下侦察所需的巡洋舰，然后立即率战列舰队去费罗尔与考尔德会合。考尔德将听从他的指挥，而他则听令于加德纳。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加迪斯的封锁，新成立的西班牙舰队已被并入西方舰队。这样做的目的，正如命令所说，是为了加强对费罗尔的封锁。如果封锁失败，则所有舰队都应集结于英吉利海峡的入口。因此，如果发现考尔德已经返航，奥德也应当驶向乌桑特。但如果他和考尔德能够在费罗尔会合并维持封锁，他就应该遵照这则命令。如果他们有理由认为法西联合舰队正在接近费罗尔，并处在“你们认为无法有利地与之交战”的情况下，他们也应一道返回乌桑特，与加

德纳会合。最后，海军部指示加德纳，如果情报表明联合舰队已经驶向北方，他就应该命令考尔德向自己靠拢。[33] 如果将这些命令与奥德的实际行动相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他实际上已经准确地把握了海军部的意图。他们都遵循着那个众所周知的传统措置，依靠这种方略，英军就能在任何对其战略布局的袭扰出现之时自发地在关键的时间与地点完成集结。英国舰队勇敢地分散在大海的各个角落，但这个传统方略却留存在舰队指挥官的心中，就如同他们的直觉。一旦有警报认为分散已不合时宜，他们就会如条件反射一般向战略中心收缩兵力。奥德的行动就是基于这种直觉，并得到了巴勒姆的认可。在急于指责纳尔逊之前，我们最好牢牢记住一点——纳尔逊对他已知的这些情况从不会说第二遍。

在向大海中的舰队发出命令的同时，海军部还在加倍努力地强化西方舰队的核心兵力。他们立即派出了三层炮甲板的“乔治亲王”号（Prince George）战列舰；罗利将军（Admiral Rowley）则被派往查塔姆船坞，督促2艘即将完成的74炮战舰加紧建造，还要去雇用6～8艘用来传递信件的轻帆船。[34]

以上这一系列命令的真实含义并不难理解。英国正试图让一支陆军部队穿过无法控制的大海，也就是说，英国在这片海域中并没有决定性的制海权。英国舰队的掩护锁链已经被突破，因此，远征军必须撤退，除非他们已经安全地驶离了危险。然而，如果敌军的行动并不是针对远征军，他们就必须假设敌人是针对着最为危险的目标，英军就必须守住英吉利海峡的入口——那个传统的战略关键点。

在英国海军看来，只要他们坚守着这个坚不可摧的传统布局，拿破仑的入侵计划就会像它的所有前辈那样，根本不可能成功。在谈及法国对海峡奇袭的盲目自信时，德斯奇霍上校曾这样写道：“不幸的是，英国早就听见了这种危险行动的风声，并在确证其严重性之后发布了集结命令。因此，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舰队必定会守御着海峡。在这种沉着应

战的传统布局面前，拿破仑的任何计划都会被撞个粉碎。”[35]

就这样，巴勒姆勋爵开始了他值得纪念的九个月任期。得益于长期工作的丰富经验，他还在紧张繁重的工作之余对海军部进行了改组，使这一战争机构能出色地处理好所有诉求，直至胜利日的到来。在开始下一章的叙述前，我们最好能对他创设的新制度有所了解。

他并未给自己安排特定职责。他在备忘录中写道：“海军大臣负责总体监督和全盘部署。”

“职务最高的第一位军职大臣”——此时由甘比尔将军（Admiral Gambier）担任——“会在海军大臣缺席时接替其工作。他的职责还包括处理每日的文书，但更侧重于港口和秘密工作方面。”这意味着他将主掌各处海军基地和情报部门。“他会将所有送到他部门且他认为有必要记录的命令与信件交给他的秘书，然后由秘书抄录下来。”

巴勒姆对其职责权限还做了进一步说明：“在海军大臣的许可下，他能调动本土与海外基地的所有舰船，有权向战舰上的将军、舰长或其他指挥官下达命令，有权调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他还要处理所有军舰的装配事宜。”实际上，他在物资供应方面的职责仅限于那些已经入役而尚未做好行动准备，因而被划入他部门管辖范围的军舰。他还要负责通过对比战舰的日志来确认海军部的命令是否得到执行，还要“考虑决定所有的军官升迁”——尽管是由海军大臣来签署晋升状。

主要的物资供给则由“第二位军职大臣”负责，“他将从秘书那儿得到所有审查过的，属于海军委员会、运输委员会、伤病委员会与格林尼治医院的书信与文件”。

第三位军职大臣则“在海军大臣的监督之下”主管所有现役军官与专职军官（warrant officers）的任命，并确保所有的军舰都配上了足够的

军官——但舰长与尉官（Lieutenants）的空缺则需“报告给海军大臣”。

“文职大臣的任务，”巴勒姆在备忘录的最后写道，“是让军职大臣们能不受干扰地完成他们所负责的多种重要工作，负责签署所有从部里发来的命令、授权、保护单等文件。他们还要向海军部提供咨询意见。”[36]

通过对海军部的改组，巴勒姆将他的同僚们变成了他的下属。第一海务大臣（First Sea Lord）——即巴勒姆所谓的第一位军职大臣——承担了类似于海军参谋长的职务，他指挥着战争的每一步行动，同时也要负责入役战舰的装备与人员配给。第二海务大臣掌管着物资供给，第三海务大臣掌管高级人事。而巴勒姆本人，正如海军部秘书巴罗（Barrow）所言，从未在海军部的办公室中工作过。他似乎只关心这场战役中的重大行动。巴罗告诉我们：“年迈的巴勒姆勋爵满足于各司其职的工作方式，他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偶尔提几个问题，将海军的日常事务交给部里的几位大臣去商量解决。事实上，他从未出席过海军部会议；但每当疑难问题出现时，一位大臣或秘书就会前往他的房间，请他定夺。”[37]

在巴罗的回忆中，巴勒姆似乎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但在他的房间中，他必定在思索着扭转这场战役的战略危机，推测着下一步的威胁所在，随时准备着向大海上的舰队发出必要的命令。这一切都在一系列的“秘密命令”中得到体现，这些密令全都指导着关乎战争全局的重大行动，而落款处都署着巴勒姆的签名。如同巴罗所说，他并不关心“海军的日常事务”，在更高的层级上指挥这场战争才是这位老人未曾止息、从未间断的工作。

他让自己完全专注于唯一的目标，甚至不惜因此而失礼。《巴勒姆文集》中有一篇长长的《致国王的信》，内容是关于1805年9月的海军形势。在信的开头，他就对自己没能前往王宫表示歉意；而他这样做则

是因为要同时监管海军部与海军委员会的工作，无法抽出时间等候国王接见。当年11月，他又让皮特代他向内阁递去一份申请，希望那条只让他参加与海军相关会议的禁令能继续下去。[38] 没有任何证据能对巴罗有关巴勒姆不在海军部办公的说法构成质疑，他的工作方式似乎是独自起草那些关乎战争方向的战略性命令，然后再将稿件交给海军部同僚以得到正式批准和署名。最为确切地说，巴勒姆就是这场海上战役的真正引导者；但在他眼里，这份工作还必然包括管理物资供给方面的重大问题。就在如此全神贯注的时刻，他仍旧坚持着英国的古老传统，时刻紧盯着后勤部门。也就是说，巴勒姆的职责如同皮特这位战时首相的海军参谋长；与此同时，他也将海军委员会掌控在手心。

---

[1] 约翰·杰维斯，圣文森特伯爵（John Jervis，Earl of St Vincent，1735～1823年），英国海军将领。1793年升任中将，在对法战争中出任西印度舰队司令。1795年晋升上将，出任地中海舰队司令，赢得了圣文森特角海战的胜利，因此得到伯爵封号。在此期间，他十分赏识舰队中的纳尔逊。1800～1801年他统领西方舰队时，开始对法国军港实行近距离封锁。这一政策直至1870年代都是英国海军的基本战略。1801～1804年在阿丁顿内阁出任海军大臣，展开了激进但并不成功的改革。1805年年末再次出任西方舰队司令，但因健康原因于1807年退休。1814年晋升为海军元帅。——译者注

[2] 海军质询委员会（Commission of Naval Enquiry）是时任海军大臣圣文森特勋爵为了查处海军部门的腐败案件而设立的兼具讯问、调查、审判的特别机构。现代研究者认为，当时的海军部门虽存在效率不良等问题，但实属英国政府的普遍情况。圣文森特勋爵的反腐运动主要是基于他根深蒂固的偏见，其手段蛮横粗暴，不仅没有解决制度性问题，反而对海军的后勤运作造成了巨大伤害。哗众取宠的海军质询委员会报告很快卷入党派斗争，甚至成了圣文森特勋爵打击私敌的工具。由于皮特在野时曾抨击过阿丁顿内阁中的圣文森特勋爵，委员会报告便多次针对皮特的伙伴。质询委员会在第十份报告中指控道，在梅尔维尔于1790年代担任海军财政主管时，他的直接下属——一位海军出纳员——将一笔公款存在一家银行的私人账户中，而不是海军部规定的、近在咫尺的另一家银行的官方账户里，这恰恰违反了梅尔维尔此前在议会提出的法案。梅尔维尔在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暴中辞职，再未重返政坛，但他最终被宣告无罪。参见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1649-1815*（Penguin UK，2006），pp.478-480；Roger Knight，*Britain Against Napoleon*：*The Organization of Victory*，*1793-1815*（Penguin UK，2013），pp.213-250。——译者注

[3] 威廉·温德汉姆·格伦维尔，格伦维尔男爵（William Wyndham Grenville，Baron Grenville，1759～1834年），英国政治家。曾在皮特第一届内阁中任内政大臣、外交大臣等职，对英国政策的制定与决策有很大的影响力。皮特病逝后曾短暂出任首相。——译者注

[4] Stanhope，*Life of Pitt*，i.377；*Barham Papers*，ii.323.

[5] 海军委员会（Navy Board）是海军部（Admirality）下属的行政管理组织，主管舰船的修造、维护，舰队的后勤保障。米德尔顿长期担任的海军审计长即是海军委员会的下属部门负责人。——译者注

[6] Middleton to Pitt，Feb.8 and March 15，1790：*Chatham Papers*，*Bundle III* .他还交给皮特一份大篇幅的细致备忘录，讨论海军委员会的重组问题。Ibid. and *Bundle* 245. And see *Barham Papers*，iii.337-50.

[7] Ibid.，418 et seq.

[8] Stanhope，*Life of Pitt*，iv.287，and Wilberforce's *Life*，iii.223.在《巴勒姆文集》（*Barham Paper*）中有一封"给詹姆斯先生的短信"（Note for Mr.James），其中提及，在皮特再次当选首相后，他与梅尔维尔决定，所有关于整顿海军的事都要咨询查尔斯·米德尔顿爵士。历史学家尚不能确定这个詹姆斯先生的身份。

[9] 这个机构的名称是"海军民事活动改进与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 for Revising and Digesting the Civil Affairs of the Navy），一般被称为改进委员会，成立于1804年12月。现代学者认为，设立该机构的目的部分是抵消质询委员会的破坏性，而主要目的则是真正地改革海军行政机构。参见N.A.M.Rodger，*The Command of the Ocean*：*A Naval History of Britain 1649-1815*（Penguin UK，2006），p.479。——译者注

[10] Woronzow to Czartoryski：De Martens，*Recueil de Traites*，xi.109.

[11] Stanhope，*Life of Pitt*，iv.Appendix，p.xxlii.

[12] To Lord Hardwicke，Viceroy of Ireland，April 26：*Hardwicke Papers*，*Add.MSS.* 35706.

[13] 它刚刚从护送纳尔逊的补给船前往第97号集结点的任务中返回。第97号集结点位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海岸的圣塞巴斯蒂安角外海。Nelson to Capel：Nicolas，vi.409.

[14] Lord Mark Kerr to Nelson，April 9：*Nelson Papers*，*Add.MSS.* 34929.

[15] 按照最早记录这一集结点的1808年版的《信号手册》（*Signal Book* ），这里是第52号，位于“菲尼斯特雷西北方6里格处”，但詹姆斯说当时的集结点是在38里格处（vol.iv，p.452）。两艘巡洋舰实际上是在菲尼斯特雷西南方5～6里格处相遇的。

[16] Kerr to Gardner，April 23：*Blockade of Brest* ，ii.237.

[17] *Out-letters*（*Secret Orders*），1363，April 25.

[18] 菲利普·约克，哈德威克伯爵（Philip Yorke，Earl of Hardwicke，1757～1834年），英国政治家。——译者注

[19] *Hardwicke Papers* ，April 30：*Add.MSS.* 35706.

[20] *Admiralty Minutes* ，152，April 27.

[21] *Admiralty Minutes* ，152，April 27.

[22] 里格为欧洲古代的长度单位，1里格在英语国家中通常被规定为3海里。——译者注

[23] *Secret Orders* ，1363，March 6.索马里兹在3月27日派出了“刻耳柏洛斯”号，基思则派出了“墨兰波斯”号与“不朽”号。

[24] *Secret Orders* ，1363，April 27.

[25] Bertrand，*Lettres de Talleyrand & Napoleon* ，1800-9，p.118：Lyons，April 10.

[26] To Cambacérès，Lyons，April 13th：*Correspondence*，*x.* 315.

[27] 查尔斯·康沃利斯，康沃利斯侯爵（Charles Cornwallis，Marquess Cornwallis，1738～1805年），英国陆军将领。他是海军上将威廉·康沃利斯的长兄。曾参与七年战争与美国独立战争，1777年晋升中将，次年起出任北美英军副司令，1781年在约克镇围城之战中投降。1786～1793年出任印度总督，任内取得第三次英迈战争的胜利（Third Anglo-Mysore War），晋升上将。1795年进入皮特内阁。1798年任爱尔兰总督。1802年代表英国签订《亚眠和约》。1805年再度出任印度总督，同年7月于加尔各答上任，但于10月5日病逝。——译者注

[28] Correspondence，p.317.

[29]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1749～1806年），英国辉

格党政治家，长期任下议院议员，是皮特担任首相期间的主要政敌。曾大力谴责策划派兵镇压美国革命的首相与英王乔治三世，对法国大革命予以肯定，极力反对英国对法国作战以及对国民实施的战时高压政策。1806年年初皮特去世后与格林维尔联合组阁，出任外交大臣，试图与法国媾和，但不久就因病去世。——译者注

[30] “Secret Intelligence from Paris，” March 29th，April 17th：*Admiralty In-letters*（*Secretary of State*），4198，April 30th.

[31] Sir John Barrow，*Autobiographical Memoirs*，p.264.

[32] *Admiralty Minutes*，256，April 25th.这封短信要求秘书马斯顿（Marsden）给他提供一份关于海军部人员架构与工作分配的详细备忘录。我们在后文还会介绍巴勒姆对海军部的重组。

[33] *Out-letters*（*Secret Orders*），1363，April 30th.

[34] *Admiralty Minutes*，153，May 1st.

[35] *Trafalgar*，p.3.

[36] *Admiralty Minutes*，p.256.巴勒姆亲手修订并签署了该备忘录，落款时间为“5月”。Printed in *Barham Papers*，iii.76.

[37] *Autobiographical Memoirs*，p.277.巴罗是海军部的成员，在1804年5月被梅尔维尔勋爵任命为第二秘书。他在海军部工作四十年之后才写下了这本回忆录，他在那时已成了一个老人，因而在回忆细节上时有出入，但除此之外看上去还是可信的。当时的第一海务大臣是海军上将甘比尔。第二海务大臣是海军中将菲利普·巴顿（Vice-Admiral Philip Patton），他对海军人事有特别的研究，并预见到了1797年的海军大哗变。第三海务大臣是加利斯舰长（Captain Lord Garlies）。在两位秘书之后，是三位文职大臣，包括两位拥有特别能力和经验的前任秘书。其中之一是老兵菲利普·斯蒂芬爵士（Sir Philip Stephens），他曾担任安森勋爵的秘书，又在1763～1795年一直担任海军部秘书；另一位是埃文·尼皮恩爵士（Sir Evan Nepean），一位海军书记官，之前在外交部与陆军部担任次等秘书，从1804年起接替斯蒂芬在海军部的秘书职位。Sir J.K.Laughton in *Dictionary of Nat.Biog*.

[38] See *Barham Papers*，iii.pp.98，108.在8月3日，他在写给皮特的一封关于舰队缺员的信中说：“我所肩负的职责是极重的，而且各方面的工作量已经大幅增长，非日前所能比拟。我在早上8点到下午6点之间忙得放不下笔，全是工作上的事，即便到此时还不能算完……这项工作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人理想的状态。”&c.Ibid.，p.95.

第六章 纳尔逊的困境

在英国本土焦急万分的时刻，纳尔逊却一直没有传来只言片语。在战争指挥部看来，他已经如同维尔纳夫那样神秘地消失，理查特·斯特罗恩爵士关于他再次去了埃及的推测似乎颇合情理。但实情并非如此。正如我们所知，纳尔逊在这种极不明确的局势中只做了一个决定：在获得任何确切的情报之前，他不会驶向西西里以东或撒丁岛以西。正因如此，他率领舰队前往巴勒莫附近的乌斯蒂卡岛，在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前先用两天时间等待消息。

4月10日，他已听到了英国远征军向地中海出发的传闻。他的焦虑事项中突然增加了这样一个重大而复杂的事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没有接到任何预警。在束手无策之时，纳尔逊决定向他的朋友波尔寻求脱困之法。纳尔逊向他写下了一封信："我很难想象，他们会在没有知会我的情况下向这一区域派出远征军，我的看法对这种行动显然非常重要。如果他们就这么出发，一定会被法军截获，法国人对英国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然而，我现在却什么也做不了。我对被蒙在鼓里的感觉厌烦至极。"写到这里，他的思绪被一位刚刚登上旗舰的舰长打断；当他再次坐在桌前继续书写时，他已经得到了那则爆炸性的消息。"哈洛韦尔[1]刚刚从巴勒莫过来，他带来的消息说，英国远征军已经出发，另外7艘俄国战列舰即将进入地中海。因此，我想法国舰队或许是要驶向西方。我必须全力以赴。愿上帝保佑你。我现在真是可悲至极。"

纳尔逊的处境的确好不到哪去。在数个月的疲惫坚守后，他盼望已久的远征行动终于开始，然而却进行得如此糟糕，似乎一场无可避免的

灾难即将降临。他毫不怀疑维尔纳夫的目标就是摧毁这支远征军。那么，为什么没人警告他呢？他并不知道，就在英国与俄国就联盟意向达成一致之时，海军部便已向他发出警报，只是他尚未收到这则消息。[2] 他只知道，他的整个行动计划已经被这个新要素打乱，他精心选择的阵位已然不合时宜。在他刚刚开始给波尔写信时，他正打算“转移到拉马达莱娜或是科西嘉角（Cape Corse）”，显然是希望在广泛分散的巡洋舰仍未发现敌军动向时确认维尔纳夫是否已经折返。但现在，直布罗陀海峡已取代地中海东部，成了当下最为重要且危险的海域。纳尔逊没有丝毫的迟疑，他立即下令，让舰队以最高的航速向西方驶去。

但他并不准备直接驶向直布罗陀，而是制定了一条“机密航线”。在这条航线上，第一个集结点位于撒丁岛南部（第71号），第二处则位于福蒙泰拉岛，它是巴利阿里群岛的最南端。[3] 在担心克雷格远征军的同时，纳尔逊仍然希望借由这条航线确认维尔纳夫没有杀回那不勒斯，这一点即将在他下一步的行动中得到证明。

然而，他所遭遇的困难还远没有结束。尽管他舰队中的水手拥有极其精湛的航海技艺，尽管他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他的舰队却根本无法向西航行。强劲的西风与西北风让他无法驶向撒丁岛，直到11日，他才刚刚航行到西西里西端的马雷蒂莫岛（Marettimo）。第二天，出于他那长久以来的怀疑，他派出两艘巡洋舰去土伦进行侦察，其中一艘在任务完成后前往撒丁的某处港口，而另一艘则前往撒丁岛西南端的特洛岛。4月15日，在四天的艰苦努力后，他仍旧被海风阻挡在撒丁岛南端。两艘来自那不勒斯的巡洋舰在这里加入了他的舰队。其中之一是被他派去搜索情报的“亚马孙”号（Amazon），另一艘则是从英国本土出发、经过十七天的航行才来到这里的“十年”号（Decade）。马尔格雷夫勋爵的私人秘书史密斯中校（Colonel Smith）搭乘这艘巡航舰，给那不勒斯的艾略特带去了远征军出航的消息以及下一步的行动指令。接到消息后，艾略特在第一时间就派“十年”号去通知纳尔逊，但纳尔逊在一周

之后才收到消息。[4] 艾略特在信中写道：“马尔格雷夫勋爵告诉我一个重大机密：数量可观的部队即将航向马耳他，想必你早已知道他们的目的地。史密斯中校——马尔格雷夫勋爵的私人秘书——给我带来了与之相关的秘密指令，他估计远征军将在‘十年’号被派向你处的几天之后出发。我认为让你知悉这一情况是极为重要的。如果法国人也知道了这一点，或许会影响到他们给土伦舰队设定的目的地。”[5]

我们不难想象纳尔逊阅读这封信时的感受。如果史密斯的推断没有错误，如果远征军已经在3月底出航，他所面对的局势便不异于恶化了十倍，而海军部之前的沉默也就愈发显得可恨。他在回信中愤怒地写道：“阁下关于地中海远征军的来信是我所接到的关于此事的第一份通知。我完全不敢相信，对于这么重要的事，海军部竟然没有通知我，让我提供保护！”如果纳尔逊了解梅尔维尔的倒台对海军部工作的影响，他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困难；但现在，没有什么能平息他的怒气。“阁下的意思是，您 或我 早就知道了这件事吗？如果说的是您 ，我想应该没错；但如果您是说我 早就知道了这些部队的秘密目的地，我就必须郑重声明，我对他们的目的地，哪怕是派兵到地中海这件事都一无所知！我很清楚他们想把这好几千人派到哪去，但正如之前所说，我完全不敢相信，有任何部队竟敢在我做出保证之前冒险驶入地中海。如果我预先知道的话，我就会在卡塔赫纳以西或土伦以西的某处海面等待他们。”

纳尔逊只知道远征部队早在两周前已经做好了出航准备，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他写下这封信的时候，远征军仍被逆风困在朴次茅斯港外的斯皮特黑德——与之类似的还有海军部向他发出的消息。在他结笔之前，当日夜间，他又收到了一则来自中立国的情报，称土伦舰队曾在九天之前出现在西班牙东南端的加塔角（Cape Gata），正乘着一阵东风向直布罗陀海峡驶去。纳尔逊绝望地写道：“如果这则消息属实，他们就打破了我们的层层设计。我真想让它杀死我自己。”[6]

突如其来的危机似乎让纳尔逊的心态失去了平衡。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着自己先前选择的策略。在他看来，只要没有完全确保身后地域的安全，即便面对着看似如此确定的威胁，他也不能贸然向西方出击。因此，他又派出一艘巡洋舰前往土伦侦察，约定与他在福蒙泰拉岛的集结点会合。它还要给之前被派去西班牙东北部圣塞巴斯蒂安角的巡洋舰带去一封信，让其结束任务。纳尔逊在信中写道："我正要去确认法国舰队是否回到了土伦港内，然后向西航行，这就是目前我能告诉你的一切。"[7]

纳尔逊的处境在两天之后终于明晰了起来。在他刚刚乘风离开特洛岛时，巡洋舰"亚马孙"号的威廉·帕克[8]舰长向他打出了旗语。他遇到了一艘拉古萨商船，它的船员曾在4月8日——十天之前——亲眼看到法国舰队驶过直布罗陀海峡；而更加糟糕的是，先前曾遭到法国巡航舰袭击，并让纳尔逊派出斯特罗恩前去保护的那支黎凡特商船队，仅仅在法军通过之前一天通过了海峡。[9]

纳尔逊被这个新的消息震惊了。他终于能确定自己已被法国舰队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他随即将下一处集结点直接改为直布罗陀的罗西亚湾（Rosia Bay），坐在桌前，重新安排他的整个计划。他给艾略特又写了一封信，其间的语气已完全不同于上一封的激切愤慨："我将跟着法国舰队驶出地中海"；"或许有人认为，我把撒丁岛、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保卫得太过分了，但我认为我做的并没有错，因此并不担心由于放跑法国舰队而即将降临到我身上的命运。"他虽然写下了这些字句，但心里却是既紧张又担心。接着，他就因他的失败而向海军部致歉。"法国舰队从地中海出逃让我感到极为痛苦，我希望各位长官不要将之归咎于我没能给予它足够的重视。相反，正是因为我的警惕心，使敌人认为他们无法在地中海沿岸展开任何远征。"这一直是他的首要职责，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可是，海军部与国家能理解他吗？

直至此时，他仍未确定舰队的最终目的地。他只告诉海军部，自己将航向西方，在抵达直布罗陀之后再听从新情报的指引。与此同时，他还采取了若干措施，确保英国在他离开地中海后仍能掌控意大利海域。

为达此目的，纳尔逊将麾下的多艘巡洋舰组成了一支舰队，交由托马斯·布莱登·卡佩尔舰长（Captain Hon.T. Bladen Capel）指挥，以他的36炮巡航舰“菲比”号（Phoebe）作为旗舰。他受命以特洛岛为阵位并在该岛与马雷蒂莫岛之间巡航，“阻止敌人向撒丁岛、西西里与埃及发起任何袭击”。纳尔逊在命令里接着写道：“我只说这些，如果敌人要从土伦发起远征，以上这些地区最有可能是他们的目的地。但在某些情境下，只有你能对那些信息做出最正确的判断，请你一定要自信地依照自己的判断来行动，以防敌军登陆到其他地区。”当这支舰队如预期般集结于特洛岛时，他们将拥有5艘巡航舰与1艘臼炮艇。加上那不勒斯海军与留在那里的战列舰“卓越”号，即便不算入即将抵达的俄国人，他们也已具备了足够的兵力。[10]

这是纳尔逊最后一次服从于他的基本战略原则。他的首要职责曾是保卫地中海的制海权，而对他来说，现在这一切已经走到终点。摧毁土伦舰队成了他新的目标。为了这个终点，他牺牲了麾下超过半数的巡洋舰，仅将3艘巡航舰与2艘轻帆船留在身边——他在此刻无比渴求与敌军舰队交锋，而巡洋舰几乎就是一切。但是，他必须为了更高的战略目的做出这种牺牲。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与敌军主力交锋的重要性，这是他为之魂牵梦萦的目标；但他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什么才是局势的关键，要在何时做出让步。

在这里，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纳尔逊作为战略家的品格，他的一生中从未有过比此时的考验更为可贵的表现。那场不朽的长途追击的动机已然成了一个传奇，它的动力似乎只是一时涌现的大胆灵感，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基于耐心的逐步推导而得出的冷静演

算，那些精彩的行动都有着坚实的根基。他以确保身后地域的安全作为行动前提，并以战争所允许的时间损失换来了当前局势的确定性。在我们的认知里，没有什么能与这些决策流程相提并论，没有什么能像这样全面地揭示出一位军事大师的思考过程。纳尔逊尽可能地让这些思考贯穿了他每时每刻的思绪。

在接到帕克报告的一天之后，纳尔逊仍在特洛岛以西10里格的海面上缓慢行进，但他的心情已经平复，下一步的目标已经确立。他再次给波尔写去了一封信："该死的混蛋，该死的混蛋……不过，即便在直布罗陀海峡也没有关于敌军目的地的明确消息，我也明白该要怎么做了……糟糕的运气快折磨死我了，但现在还有可以争取的机会，我决不能因自己的感受而沮丧下去。"他还给梅尔维尔勋爵写了一封信——他以为梅尔维尔勋爵此时还是他的上级："我不会绝望，一切都会按部就班地进行。我已经为自己制订了行动计划，我会好好地依此行事。"

人们通常认为，这个计划就是在直觉的指引下直扑向西印度群岛，但后来信中的内容显然并非如此。他跟丢了敌军，但此时已确定要离开地中海。如果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情报，他就将遵循那则历史悠久的传统措置，像奥德那样驶向北方，向英吉利海峡入口处的西方舰队靠近。一旦处在难以判断的处境里，当时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就会遵循这一黄金守则，那就像他们的第二天性。

就在这一天里，帕克舰长遇到了马克·克尔勋爵雇来报信的双桅快船，其为纳尔逊带来了重要的新消息。它不仅带来了克尔关于维尔纳夫在十天前驶过直布罗陀的消息，更带来了关于维尔纳夫抵达加迪斯然后又与数艘西班牙战舰一道离去的更新的信息。[11] 纳尔逊依此推断，维尔纳夫并不是要去西印度群岛。他坐了下来，将自己的推论写在这封寄给海军部的信里：

敌军舰队在很久之前就通过了海峡，并在加迪斯与一些西班牙战

> 舰会合。我已派“亚马孙”号去里斯本打探消息，而我则将尽快驶向圣文森特角。我希望“亚马孙”号能在那里与我会合，并带给我关于敌军目的地的确切信息。考虑到他们与西班牙战舰一道从加迪斯出海，我认为他们并不是要驶向西印度群岛，而是要与费罗尔的舰队汇合，再直接扑向爱尔兰或者布雷斯特——我相信法国战舰上搭载了陆军。因此，如果我没有得到足以改变目前推断的有效情报，我就将从圣文森特角出发，前往锡利群岛（Scilly）以西50里格处，慢慢地驶近群岛，以确保任何传令的船只都能找到我的舰队。之所以选择这个位置，是因为一旦有需要，从这里去布雷斯特或爱尔兰都同样便利。我相信这个计划能够得到各位先生的许可，我很乐于带回11艘优秀的战舰，在娴熟的指挥之下，它们的秩序与状态都像刚刚出海时那样完美……附记：我将把这封信的摘录同时发送给爱尔兰舰队与海峡舰队，让他们的司令官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

纳尔逊再一次冷静了下来，他将琐事从头脑中逐出，专注地思考着那些准确而必要的行动。他的精神状态也恢复过来，旧日的愉快音符再次在他写给加德纳勋爵的信里出现。他开始将维尔纳夫驶出海峡视为一个战略胜利——这确实已得到证明——且毫不畏惧法军在海峡之外的行动：“亲爱的爵爷，如果土伦舰队与加迪斯舰队去了您那里，我的战舰也一定会在您视野之内。如果您不需要我的帮助，就让我们返航吧。他们溜出地中海让我颇感烦恼，我原已将他们划入自己的责任范围。而现在，我期待着您，我亲爱的爵爷，来消灭他们。”更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再也没有为克雷格远征船队的安全担忧的进一步迹象了，维尔纳夫去加迪斯与西班牙舰队联合的消息也让他确信敌人有着某个其他更高的目标。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纳尔逊仍然与糟糕的西风做着斗争，但这已无法再改变他的想法。在这周末寄给直布罗陀专员的一封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坚定信念：法国与西班牙舰队的联合必然暗示着为费罗尔解围，而后再向英国本土——而非西印度群岛——展开袭击。[12] 在航向海峡的途中，他派出巡航舰“十年”号带着这封信去直布罗陀报告他的位置。在四天之后的5月1日，直布罗陀海峡东南端的休达（Ceuta）已经出现在海平线上，纳尔逊也收到了来自海军部的直达信。这封信不仅解释了

海军部在远征军问题上的离奇沉默，还让他对远征军的安全重新燃起希望。他立即写下了回信：“我刚刚收到您4月1日寄给我的信……说奈特少将与‘王后’号和‘龙’号将在一到两天内出航……运输船队搭载着5000名士兵。”这就是那则他期盼已久的、让他提供掩护的命令。它的意义极其重要，纳尔逊从中得知，远征军并没有如艾略特猜测的那么早出击。它给出了让人重燃希望的良好理由，正如纳尔逊所说，马克·克尔勋爵的“费斯格达”号仅仅在法国舰队离开加迪斯的两个小时后就驶向了英国，它应该能及时赶到，拦下远征军。[13]

5月4日，风向仍然对纳尔逊不利，他只好在海峡东南岸的特图湾（Tetuan Bay）下锚，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淡水、牛肉和燃料补给。正在此时，他收到了第一封描述出当下真实态势的情报。这是直布罗陀海军专员奥特维舰长（Captain Otway）寄给他的回信，他将联合舰队完全失踪的消息告诉了纳尔逊，并认为他们很可能已前往西印度群岛。新的消息显然动摇了他先前的判断，这给他造成了新的焦虑，但这还不足以让他改变目的。为了证实这一情报，他希望向奥德的巡洋舰确证联军并未驶过他们的防区；不管大洋西面的威胁有多大，他绝不能仅仅根据一则流言就展开行动。他向奥特维回复道：“即便牙买加有陷落之虞，我也不能仅仅依据一些猜测就驶向西印度群岛。”

他的首批传记作者在一个值得关注的段落中清楚地展示了纳尔逊是如何应对这一困境，其中一位是曾在他身边担任秘书的麦克阿瑟（McArthur）。在他们撰写传记时，关于西印度追击源于纳尔逊天赐灵感的传奇说法已经出现，但在他们看来，这种说法应该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他们如是写道：“在完全确认敌军不会驶向其他方向之前采取如此大胆的行动，与纳尔逊勋爵伟大的职业品格以及他对军事纪律的重视完全相悖……更为必要的是，我们不能让其他军官效仿这种激情散漫的冲动和鲁莽追击取得的成功，以免他们错误地沉湎于反面的观念，招致自己的毁灭。”[14]

纳尔逊的真实行为完全符合他的传记作者们所坚持的军事理念。西印度群岛只是一个可能的目的地，如果没有得到足以确证的消息，如果不能排除所有怀疑，他仍会保持着开放的头脑，向英国的战略中心乌桑特靠近。但与此同时，他也做好了应对不测的万全准备。5月5日，他正式命令舰队副司令官理查德·比克顿爵士[15]在他离开之后出任地中海地区英国舰队的总指挥官，继续执行海军部先前下达的命令，特别是“海军部关于保卫西西里岛以及撒丁王国领地，以及防止敌人向埃及发起远征的指令”。他的兵力将包括纳尔逊几乎全部的巡洋舰，以及可能来自本土的所有增援。听说有一分威胁，他就会做出四分的防备，纳尔逊正是如此小心地保卫着托付于他的地域。但他不可能给留守舰队分出多少重要兵力，比克顿的坐舰是宝贵的一级战列舰“皇家君权”（Royal Sovereign），但纳尔逊需要它，便让比克顿将旗舰转设为其他留守的军舰。

正在他准备着这些命令之时，合适的海风终于出现。他随即率军航向海峡，希望在海峡的那边遇到从里斯本驶来的“亚马孙”号，这是他驱散战争迷雾的唯一希望。里斯本是当时的情报中心，在纳尔逊乘着时有时无的东风驶向西方的同时，让我们在这里尝试着把握战争局势的情形。

---

[1] 本杰明·哈洛韦尔·卡鲁（Benjamin Hallowell Carew，1761～1834年），英国海军军官，纳尔逊的亲密伙伴之一。1793年升任舰长，参与了土伦战役与圣文森特海战。随纳尔逊参与了尼罗河口海战，此后长期在纳尔逊的地中海舰队服役，但错过了特拉法尔加海战。——译者注

[2] 克雷格的命令以及与之联合行动的指令都在一封信件中发给了纳尔逊，落款时间为3月27日（*Out-Letters*，*Secret Orders*，1363），但直至5月1日他才收到这封信（*post*，p.107）。类似的情况还有，纳尔逊直至4月15日才收到海军部于2月16日发出的邮包。Nicolas，vi.404.

[3] *Journal*，April 10 and 16.在一份当年9月的集结点列表中，第71号是塔里法（Tarifa），第80号是福蒙泰拉岛西端。

[4] Phillimore，*Life of Sir William Parker*， i.281.“十年”号在4月9日抵达那不勒斯，可见它是在3月22日或23日从英国出发的，也就是让纳尔逊与克雷格联合行动的命令被下达的3天或4天之前。See also Nicolas，vi.406 n.

[5] Nicolas，vi.406 n.这封信落款时间为4月9日，是“十年”号抵达那不勒斯的同一天。由此可见它又花了近六天的时间寻找纳尔逊。

[6] Nicolas，iv.406.

[7] Nelson to Thomas，H.M.Bomb *AEtna*， April 16th：Nicolas，vi.404；and *Nelson's Journal*， April 16th.

[8] 威廉·帕克（William Parker，1781～1866年），英国海军军官。曾参与法国革命战争。1801年晋升舰长，1802年起指挥“亚马孙”号，随纳尔逊参加了西印度大追击，但错过了特拉法尔加海战。曾两次担任第二海务大臣。1841年起接替伯麦（James Bremer）出任东印度与中国舰队总司令，指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诸多战事，当时被译作巴加。1851年晋升上将。——译者注

[9] Phillimore，*Life of Sir William Parker*， vol.i，p.284.Parker to Nelson，April 18th：*Nelson Papers*， *Add.MSS.* 34929，f.170.

[10] Nelson to Capel，April 18th；Nicolas，vi.408.

[11] Phillimore，*Sir William Parker*， i.284.

[12] Nelson to Otway，April 26th；Nicolas，vi.415.

[13] To Marsden，May 1st：Nicolas，vi.418.

[14] Clarke and McArthur，*Life of Nelson*， II.Part，iii.94.

[15] 理查德·比克顿（Richard Bickerton，1759～1832年），英国海军将领。长期在地中海舰队服役。1799年升任少将，1800年指挥封锁加迪斯，之后远征埃及。1803～1805年9月担任纳尔逊的副司令，后病退。——译者注

第七章 纳尔逊何以确信？

在特茹河畔的里斯本城中，皮特对抗拿破仑这出大戏里的一条支线正在上演。在英格兰与法兰西旷日持久的帝国竞逐中，里斯本——这个欧洲海上扩张的起点——早已被视为用任何代价都无法换取的必争之地。如同他的所有先驱者一样，拿破仑不仅要求葡萄牙不能成为英国的盟国，甚至不允许它保持中立。法国与西班牙已经像旧日的波旁王朝家族同盟那样约好，他们至少要强迫葡萄牙对英国船只实行港口禁入令。1805年2月底，拿破仑派他的副官与骠骑兵队长朱诺将军（General Junot）出任法国驻里斯本大使，督促约定的履行。朱诺在路上耽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首先去马德里与西班牙政府讨论了海军行动的事务，直至4月的第二周才抵达目的地。

这是一个极其凶险的时刻。英国驻里斯本大使罗伯特·菲茨杰拉德勋爵（Lord Robert FitzGerald）已于4月13日收到了奥德有关其已被维尔纳夫逐离加迪斯港外的消息，他已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外交争斗。朱诺随即于次日抵达，这让菲茨杰拉德深信土伦舰队将在一两天后出现在特茹河口，迫使葡萄牙加入拿破仑的大陆同盟，从而将他推入绝望的境地。他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法国与西班牙舰队在加迪斯的联合将让这里的两国大使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结果。”他的手中缺乏抵抗的实力。葡萄牙人的确想重振他们的海军，并得到了英国军官、海军少将唐纳德·坎贝尔（Rear-Admiral Donald Campbell）的协助。但坎贝尔现在已率领着包括1艘战列舰与3艘巡洋舰在内的葡萄牙舰队驶入了大海，据说是去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打击日渐棘手的阿尔及利亚海盗。[1]

朱诺与西班牙大使所希望的局势很快就初现端倪。萨顿舰长——奥德留下的巡洋舰队指挥官——在拉各斯湾补充食物时遭到了葡方的拒绝。菲茨杰拉德提出抗议，葡方却悄悄地告诉他，禁令并不会实际执行。可随后，葡萄牙又宣布了隔离英国船只的命令。萨顿随即发现，他已无法继续执行奥德的指示。“猎兔犬”号轻帆船已经下落不明，只有“黄蜂”号仍与他保持着联系，而他现在已很难雇到用来侦察加迪斯的葡萄牙小艇。然而，菲茨杰拉德仍然得到了一些来自加迪斯的情报。4月24日，他向英国政府报告了法西联军在10日驶向西方的消息。他立即让英国邮船发出了这封信，里斯本的压力似乎已经减轻。但在不久之后的5月2日，他又收到了萨顿的新情报，称“黄蜂”号的军官在4月27日乘葡萄牙小艇进行侦察时发现，整支法西联合舰队仍然待在加迪斯。如果这是真的，这便意味着维尔纳夫已经折返，他们面临着比之前更大的威胁。菲茨杰拉德无法相信这则消息，他之前已从一位中立国船长那儿得到了精确的细节，证实联合舰队已经驶向西方，而来自加迪斯的每一份报告都表示牙买加是他们的目的地。但是，他也无法取得更进一步的确切消息。在这一困境中，他最终遵循了一则值得记录的行动准则。现在，外交渠道的情报与海军渠道的情报出现了矛盾，但外交形势却要取决于海军形势，这首先是一个海军问题。因此，在咨询了渊博睿智的领事官甘比尔（Gambier）先生之后，他认定目前只能假设海军发来的情报为真。他们随即将这一情况向本土汇报，随后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展开了行动。[2]

此时此刻，立即采取行动的确极为必要。他们知道，奈特和克雷格距离这里已是相当之近。仅仅数日之前，在附近巡航的“俄耳甫斯”号（Orpheus）巡航舰已经携带着奥德离去的消息前去寻找并警告远征军。如果它没能找到他们，而萨顿的新情报又不幸属实，远征船队便无异于朝狮子的巨口驶去。无论如何，他们必须得到警告。另一艘英国邮船刚刚抵达，菲茨杰拉德的一位下属立即乘着它出海，也去搜寻远征军。不过，就在他出发的二十四小时后，远征船队便在特茹河口现身。

领事官甘比尔立即向他们传达了紧急消息，他发现他们在一天之前已经遇到了“俄耳甫斯”号，但并没有与那艘邮船相遇。

那么，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里斯本目前的事态极为微妙，但甘比尔力劝奈特与克雷格不要犹豫。“俄耳甫斯”号已被派往南方去搜集关于加迪斯港内状况的可靠情报，而领事官则向葡萄牙政府转呈了一封由两位英军指挥官连署的、措辞强硬的信。信中说，他们希望在特茹河口寻求庇护，而任何尝试阻止他们进入河口的行为都会被视作敌对行径。葡萄牙人态度和缓地下达了相关要求，这封信成功达成了他们希望的目的。第二天，远征船队没有遭到任何阻挠便悄悄地下锚在受到防御工事保护的港口里。

外交气氛立即紧张到了极点。朱诺和西班牙大使都知道维尔纳夫已经前往大西洋彼岸，在他们看来，英军的行动只可能有一个目的。他们显然是要先下手为强，就如同1762年那场成功的阻击。[3] 他们对克雷格远征目标的猜测已在心中徘徊了相当长的时间，并向塔列朗警告了这种威胁[4]，而现在，这种担心似乎已变为现实。朱诺和西班牙人向葡萄牙发出恫吓，他们抗议道，这是皮特与葡萄牙人事先设计的圈套，用英国部队来驻守葡萄牙的要塞。他们要求葡方要么做出详尽而令人满意的解释，要么就驱逐英军。

正如我们所知，皮特所能掌握的陆军兵力远不足以支持他执行这样的战争计划，但两位大使的疑心却让他们相信，只要法国舰队有进入特茹河口的迹象，克雷格就会立即安排夺取海岸要塞，这就是他的真正使命。因此，一位好奇的英军军官在记录这件意外事件时如是写道：“事态将会变得十分有趣。”

葡萄牙大臣阿劳约（Aranjo）对此束手无策。如果他不能安抚朱诺和他的同僚，就会招致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入侵。而如果得罪了英国人，他们的反击或许会来得更快——纳尔逊的舰队随时都可能出现。任

何一方他都得罪不起。他只能转而求助于菲茨杰拉德，希望克雷格不要待得太久，而菲茨杰拉德只能向他保证，一旦“俄耳甫斯”号带来了关于敌军行动的进一步情报，远征军就会离去。[5]

于是，这种情形只能持续下去。法国与西班牙大使依旧发出恫吓，却也无可奈何；驱逐英军的极端要求也没有得到回应。正在迟疑之间，紧张的局势得到了缓解。第三天的时候，“俄耳甫斯”号回到了里斯本。它确证了菲茨杰拉德的推测：维尔纳夫并未折返。更让他欣喜的是，他期盼已久的纳尔逊已经驶出了直布罗陀海峡。奈特随即打出信号让船队起锚，准备出海与纳尔逊相遇。[6]

此前，前往加迪斯打探消息的“俄耳甫斯”号在圣文森特角以北约50英里处遇到了帕克所指挥的“亚马孙”号——巧合的是，纳尔逊正等着它从特茹河口带来足以做出最终决断的关键信息。它们一同行驶至圣文森特角，即纳尔逊指定的集结地。随后，帕克将他的信件与消息交给了“俄耳甫斯”号，让它带往里斯本，而他则怀揣着从“俄耳甫斯”号得来的消息，在此等待纳尔逊。这样一来，他们可能就节省了一两天时间。而这也正是纳尔逊本人的行事风格。当合适的海风出现时，尽管纳尔逊在特图湾内尚未完成补给，但他仍下达了起锚的命令。靠近直布罗陀时，风势又消歇下去，他再次下锚，继续搬运补给。五个小时后，海风又一次出现，他终于能乘着它前往圣文森特角，在那儿根据新的情报做出最后的决定。

正如纳尔逊自己所说的，他仍旧被包围在一面黑暗幕布里。但在离开特图湾时，他已面对着与之前不同的可能性。他在写给海军部的信中不再提“没有消息就向海峡靠拢”，而是说可能前往西印度群岛。这一转变的原因已毋庸置疑。在直布罗陀，他与坎贝尔少将的葡萄牙舰队取得了联系，而“贝尔岛”号（Belleisle）战列舰的哈古德舰长（Captain Hargood）告诉我们，纳尔逊从坎贝尔那儿得到了“关于法国舰队目的地

的重要信息”。纳尔逊的信件中并未提到这一情节，这也是自然之举：唐纳德·坎贝尔正在为中立国服务，如果别人知道了这件事，他就将陷入棘手的困境——这是我们完全可以推想到的实情。朱诺和他的同僚的确已经盯上了坎贝尔。在坎贝尔回到里斯本后，他们强烈要求葡方将之解聘，迫使他返回英国，在穷困中去世。[7]

不过，并不是坎贝尔的信息让纳尔逊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在迈出这关键一步之前，他一定要得到更加确切的情报，也就是在圣文森特角从“亚马孙”号或奥德留下的巡洋舰那里得到的消息。在5月6日——他遇到坎贝尔的那一天——的夜间，纳尔逊离开了直布罗陀。乘着轻微的海风，他要到9日清晨才会抵达圣文森特。在此期间，他的目标仍然不确定，他也尚不具备足以穿越大西洋的补给。“胜利”号舰长托马斯·哈迪在圣文森特角出现于其视野内时写道：“除了他们在4月10日离开了加迪斯，我们还没听到关于法国舰队的任何消息。因此，纳尔逊勋爵强烈相信他们去了西印度群岛，如果我们在里斯本也打探不到任何关于其目的地的消息，我们就应该追踪而去。我们派出的‘亚马孙’号应该在明天就能与我们再次相遇。”直至此时，这个开放性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但纳尔逊已经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他们耽误的时间，用以追求行动的确定性。奥德派往拉各斯湾的补给船仍在原地，纳尔逊决定利用这个明显的机会，去那里装载补给。第二天，纳尔逊在拉各斯湾向坎贝尔写道：“亲爱的坎贝尔，我们在这里搬空了约翰·奥德爵士的运输船……我们现在能在大海上坚持五个月的时间，明天就向西印度群岛进发……奈特将军与他的运兵船队已在里斯本出现。我希望他能到这里来，但他被一则称联合舰队仍在加迪斯的假消息骗住了——我倒真希望他们在那里。”[8] 当天夜里，他驶回圣文森特角。夜晚10时，哈迪在他的信中添上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我们正在圣文森特角外海，爵爷已经下定决心，于明天向西印度群岛进发。”[9] 因此，我们可以精确地推断出纳尔逊是在哪几个小时中做出了这个重大的决定，而他依靠的又是哪些信息。

第一份为他描述出真实局势的情报来自他的老友、巡航舰“安菲翁”号的舰长萨顿，他一直待在奥德为他指定的位置上。尽管纳尔逊在日志中并未承认这一点，但其却毋庸置疑。纳尔逊的日志写道，9日晚7时30分，“安菲翁”号加入了舰队，“我命令萨顿舰长接受我的指挥，而他告诉我，他自敌军离开加迪斯后就再没得到任何关于他们的消息。”但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相。萨顿仍能为他提供一个消极证据，证明敌军并未留在欧洲水域。两天前，他遇到了巡航舰“活力”号（Lively），后者刚刚在约一周前从英吉利海峡驶来。它在4月27日从斯皮特黑德出发，七天之后，它的舰长登上了加德纳勋爵的旗舰，在那里听说奥德正在返回乌桑特岛途中，而维尔纳夫并未露面。第二天，它快速向南行进，目睹了奥德与加德纳的会合，之后又目送一支并未受阻的商船队向北驶去。纳尔逊由此可以确定，在联合舰队离开加迪斯的三周之后，北方的海域中完全没有他们的音讯。

按照“亚马孙”号舰长帕克的说法，这则消息的作用至少与他带来的情报相当，帮助纳尔逊做出了决断。他在向父亲解释为什么舰队要前往西印度群岛时这样写道：“纳尔逊勋爵对最近从里斯本获得的情报十分满意。同样的还有由‘活力’号用七天时间从英国本土带来的消息，它证明敌军并未驶向北方。他随即做出了前往西印度群岛的决定。”[10] 帕克接着认为，正是这则反面情报最为有力地打消了纳尔逊的迟疑——他由此确信，目前的局势已不再要求他前往乌桑特海域。

在“安菲翁”号抵达一小时后，“亚马孙”号也携带着来自里斯本的情报回到了舰队。在“俄耳甫斯”号交给帕克舰长的这些文件中，有一份是它从一位美国船长那里得到的目击证据。那位船长刚刚于5月2日离开加迪斯，他能够准确地报告出联合舰队的序列、步兵数量以及将领姓名，他说：“关于他们目的地的报告五花八门。一些人认为他们要去爱尔兰，另一些则认为很可能是去西印度群岛，特别是牙买加。”于是，从坎贝尔、本土海域与里斯本得到的这三份坚实的情报最终消除了纳尔逊

脑海中最后的怀疑。他坐在桌前，向海军部写下了他接下来要去往哪里。[11]

他面前唯一的困难是敌军已领先他们整整一个月时间。但是，他并不因为无法及时援救牙买加或其他岛屿而感到沮丧。他对英国舰队的航海能力极为自信，他确信，在好运气和正确决断的合力之下，他完全能在追击途中扳回这些时间损失。现在的每个钟头都很宝贵，然而，纳尔逊仍未下达出航的命令。他知道克雷格的远征军已经由于错误的情报驶入了里斯本，而他从本土接到的最后命令则是让他确保远征军的安全前行。从那位美国船长的情报中，他得知加迪斯此时有好几艘战列舰在热火朝天地做着出海准备。尽管他急切地希望前往自己的目的地，但他必须等待远征军抵达，再护送他们通过直布罗陀海峡。

第二天早晨，他的焦虑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奈特率领护航船队在圣文森特角与他相遇，同时还带来了海军部关于此次远征的相关指令。纳尔逊将海军部指令转发给比克顿，让他与克雷格继续展开必要的合作，而自己则在这里排兵布阵，力图用最短的时间确保船队安全通过海峡。他指示奈特让船队绕过加迪斯与塔里法，沿着北非海岸直接驶过直布罗陀海峡。[12] 而在此之后，他们还须当心西班牙的卡塔赫纳舰队。无论付出任何代价，远征军绝不能受到它的威胁。尽管纳尔逊的兵力已经落后于法西联合舰队，但在短暂商讨之后，他还是决定向奈特移交“皇家君权”号战列舰。

在纳尔逊的一生中，没有什么能比这个决定更能展现他对海上战争之目标与意义的坚实理解。他正要追击一支兵力数量占据优势的敌军，并试图与之交战；正如帕克舰长所言，他所倚仗的成功前提之一正是维尔纳夫麾下缺乏英军拥有的三甲板战舰，“他认为三甲板战舰在近距离交战中极大地优于双甲板战舰”。[13] 然而，他是如此坚定地把握着战争的全局蓝图与自己在其中的位置，甚至在最后时刻放弃了一艘珍贵的

100炮战舰，用它来保护整场战役最为重要的目标的安全。在海上战争中，最艰难的事就是在首要目标与次要目标之间做出准确的取舍，在直接确保战略目标与间接但猛烈打击敌舰队之间做出正确的权衡。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能力处于巅峰状态的纳尔逊对此做出的决断，它的价值再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这个决断在英国本土也得到了普遍认可。哈德威克勋爵在打开纳尔逊发往爱尔兰的信件时如是写道：“正如他对待国事的一贯态度，他似乎已经做出了最为慷慨的行为。为了保卫‘王后’号与‘龙’号护航的运输船队，他不惜削弱了自己的兵力。”[14]

这天夜里，两支舰队在圣文森特角以南约20英里处分手告别。奈特护送着他的运输船队驶入直布罗陀海峡，而纳尔逊即将开始他那漫长的跨洋追击。他的麾下还剩下10艘战列舰与3艘巡航舰——分别是“十年”号、“安菲翁”号与“亚马孙”号。海军部从他这里接到的最后一份报告是他在5月14日写下的信，那时的他正要前往马德拉群岛，他让海军部确信即使维尔纳夫并没有驶向西印度群岛，这也并不会对他的追击造成多大损害。他说：“如果他们不在那里，我的舰队就会在敌军获知我的真实位置之前于6月底返航。”在审视他的决断时，我们不要忘了那个极具分量的因素，即一支方位不明的舰队所能造成的对敌方士气的打击。纳尔逊的精密推算让拿破仑无法厘清思绪，他不知道纳尔逊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会出现在哪里。而维尔纳夫的意志更因这一不确定的要素而陷入了瘫痪的境地。

---

[1] FitzGerald to Mulgrave，April 13th and 14th：*State Papers*，*Foreign*（*Portugal*），vol.47.

[2] FitzGerald to Mulgrave，May 3rd：Ibid.，cf. *Barham Papers*，iii.103.

[3] 在七年战争中，国王同属波旁王朝的西班牙与法国曾试图迫使葡萄牙加入它们的同盟，而葡萄牙拒绝遵从。1762年春天，西班牙陆军入侵葡萄牙。英

国随即派出远征军协助葡萄牙作战，成功阻击了西军，后将之逐出边境。——译者注

[4] See ante，p.87.

[5] FitzGerald to Mulgrave，May 5th：*S . P.Foreign*（*Portugal*），47.Log of the *Orpheus*；*Captains' Logs*，P.R.O.

[6] Fitzgerald to Mulgrave，May 8th.

[7] Allen，*Life of Captain Sir William Hargood*，p.110.Clarke and McArthur，iii.489，and see *post*，p.122.

[8] To Rear-Admiral George Campbell，May 10th：Nicolas，vi.431.纳尔逊在这封信中似乎搞混了唐纳德·坎贝尔少将与他麾下“卡诺普”号的舰长乔治·坎贝尔。

[9] Hardy to Mansfield，May 10th：*Nelson's Hardy*，p.127.

[10] Phillimore，*Sir William Parker*，p.292.

[11] Nicolas，vi.430，and *note* .

[12] Nelson to Earl Camden，May 14th：Nicolas，yi.438.他对奈特的指示可参见 ibid.，p.433。

[13] Phillimore，*Life of Sir William Parker*，p.289.

[14] Hardwicke to Charles Yorke，June 1st：*Hardwickt Papers*，*Add.MSS.* 857*0* 6.纳尔逊放弃“皇家君权”号的部分原因是这艘战列舰迫切需要入坞修整，因而速度缓慢。但战列舰“华丽”号（Superb）也处在类似状态下，纳尔逊仍将它带在身边。他告知海军部的理由是，这能让卡塔赫纳舰队即便全体出动也无法威胁到奈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纳尔逊特别看重三层炮甲板战舰的进一步证据。卡塔赫纳舰队由6艘双层甲板战舰组成，而纳尔逊认为奈特用2艘三层甲板战舰与1艘74炮战舰就足以应对。

第八章 科林伍德的快速舰队

在战争的技艺中，最为宝贵的部分即是对情报的解析。在英法之间漫长的海上战争接近尾声时，英国的情报解析机构已在海军方面达至其能力的顶点。他们的战场是这样的宽广，信息传达是这样的缓慢，而每一条有限的消息又是这样的珍贵。这迫使他们发展出一种职业敏感，时常能做出极具先见之明的判断。一种敏锐的通感弥漫在整个系统周围。参谋部与各条战线能够相互理解，外海上的舰队司令常能窥知海军部的意图，而海军部亦可以放心地让指挥官们各行其是。这就是拿破仑失算的——甚至无法想象的——那个重要环节。过分的自信让他拒绝相信，英国海军竟能拥有与他的陆军同样出色的战略决策机构。事实上，英国海军的这一机构甚至要比他的更加强大、更加可畏。拿破仑只是依靠他一个人的卓越头脑，而英国海军所依靠的则是涌动在每个战略枢要处的、被训导出的直觉。在这场战役的每一个转折点，这种直觉都能被迅速调动起来，尤以海军部的反应最为强烈。他们得出了与纳尔逊同样的结论，随即依此展开行动。

我们在第五章已经介绍过，在最初收到马克·克尔勋爵关于维尔纳夫通过海峡的情报之时，海军部认为牙买加是其最为可能的目标，并派出科林伍德与其快速舰队的一部分兵力前往马德拉群岛。他接到指示，一旦确认敌军目的地属实，而纳尔逊又没有参与追击，他就应该去增援西印度群岛。随后，海军部又接到了奥德发来的消息，称纳尔逊可能再次去了埃及，而维尔纳夫似乎要袭击克雷格的远征船队，之后再在西方某处集结起舰队，夺取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接着，我们就看到他们为了拯救克雷格船队而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并在乌桑特岛的加德纳所部周

围集结起了相应的兵力。

然而，就在那些必要的命令刚刚下达之际，最新的、更为清晰的情报抵达了普利茅斯。这同样是来自奥德的一艘巡洋舰，而它也正能解释为什么当日海军部对奥德措置的看法与今日的批评者是如此的不同。奥德返回英国之后受到的完全是正常的待遇。他之前已申请辞职，因此在命令舰队进入普利茅斯港修整之后便降下了自己的旗帜。但是，他之前的行为全都得到了海军部的认可。

前来传信的巡洋舰是“失踪已久”的“猎兔犬”号，它是奥德留给萨顿监视直布罗陀海峡的轻帆船，却从它的阵位上凭空消失。现在，这个谜团可以解开了。4月9日，“猎兔犬”号与坎贝尔的葡萄牙舰队一道在海峡西南侧的斯帕特尔角躲避东风，发现有几艘奇怪的舰船跟在驶向英国的商船队之后驶出了海峡。在与葡萄牙巡航舰交流之后，疑虑重重的布恩舰长（Captain Burn）决定去丹吉尔（Tangier）搜集进一步情报。第二天，他从丹吉尔领事官那儿得知，他一天前所看到的是包括13艘战列舰与5艘巡航舰的法国土伦舰队，奥德所部与英国商船队都因此陷入了巨大的危险。他立即出航，去寻找加迪斯港外的舰队司令。次日清晨，他再次在海峡外侧看到了向西行进的奇怪舰船，而葡萄牙舰队仍待在斯帕特尔角。他们一定也看到了敌人的行动，这就是坎贝尔提供给纳尔逊的信息之由来。回到加迪斯集结点后，布恩发现奥德已经离开，土伦舰队也不在港内。但是在港外的海面上，他看到4艘落在后面的西班牙战舰正在费劲地向西行驶。它们显然刚刚离开加迪斯，“猎兔犬”号随即跟踪着它们，直至4月12日夜晚。在确定了它们的航向之后，布恩迅速赶往圣文森特角，希望在那里找到他的指挥官。途中，他遇到了一艘驶往土伦的美国商船，其称看到了一支由5艘战列舰组成的舰队向西驶去。布恩因此认为英国舰队已经去了那个方向，转而向西北方航行；但正如我们所知，奥德却在向南方行进。直至4月18日，尽管之间的距离一度只有30英里，但“猎兔犬”号始终未能发现奥德舰队。布恩决定，一旦合适

的西风出现，他就将朝费罗尔驶去。[1]

在这里，布恩舰长表现出了值得敬佩的判断力。奥德之后也转向西方，采取了与他相同的航线。然而，“猎兔犬”号所乘的海风比奥德的那阵更为强劲，他领先奥德一天时间，在伊比利亚半岛最北端的奥特格尔角（Cape Ortegal）找到了一艘考尔德所部的巡洋舰。这是由那位西班牙运宝船猎杀者——格雷厄姆·莫尔舰长——所指挥的“不倦”号（Indefatigable）。他领着“猎兔犬”号找到了考尔德，后者正因躲避西风而待在费罗尔西北方的普莱尔角（Cape Prior）。此时，奥德正在他们西面约100英里处向北行进，但他们却完全没有关于奥德的任何消息。在报告完所有见闻后，“猎兔犬”号直接航向本土，这或许是听从考尔德的命令。它携带的情报显然极其重要，而且比纳尔逊后来决定追击时所依靠的所有情报都更加确切和清晰。它在4月30日抵达了普利茅斯。

5月2日，巴勒姆得到了这份极其重要的情报，但这并没有让他完全满意。尽管布恩舰长的言外之意是维尔纳夫舰队不在加迪斯，但他并未带来关于他们的准确信息。同时，布恩也没有亲眼看到那4艘西班牙战舰从加迪斯港内驶出，尽管他完全确定可以做出这种推理。更不幸的是，他在报告中遗漏了一些对于其可信性不可或缺的关键信息。在那个时代，训练军官以科学的方法汇报情报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布恩舰长在其报告中遗漏了他与敌舰队分离时的风向，这使得海军部在完全弄清情况前无法判断他所描述的航线的正误。[2] 因此，在取得“猎兔犬”号的航海日志之前，巴勒姆并未做出任何重要的决定。尽管如此，巴勒姆仍采取了一些措施。牙买加所受到的威胁已越发明朗，于是，他向西印度群岛以及大海上的舰队指挥官发去了警报。他授权迈尔斯将军（General Myers）——背风群岛的英军总司令——在必要时向牙买加调去2000～3000人的部队，而科克伦则应该用麾下舰队竭尽所能地协助他们运兵。[3]

两天之后，巴勒姆勋爵已经理清了思绪。他掌握了行动所需的确定

性，随即决定展开行动——而拿破仑至少要到五天之后才能接到相关消息。西印度群岛就是维尔纳夫的目的地。巴勒姆的第一步行动是通知加德纳派出科林伍德与他的5艘战列舰。科林伍德的使命仍旧是去马德拉群岛确定维尔纳夫或纳尔逊是否已经驶过，然后按照命令见机行事，并将他的行动选择告知当地领事官，再由后者发回加迪斯和直布罗陀。如果他找不到确切的情报，就应直接前往巴巴多斯，与迈尔斯将军一道保卫牙买加。[4] 然而，由于整体形势尚未完全确定，巴勒姆仍授权加德纳勋爵，如果收到了什么最新情报，他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截下将要派出的战舰。授予科林伍德的行动命令被装在一个密封的口袋中，他在率军出航时才能拿到它，且在驶出英吉利海峡之后才能开启。

在这些命令发出之前，巴勒姆接到了奥德正要向加德纳靠拢的消息。[5] 这样一来，之前向奈特发出的命令就必须作废。那则命令要求奈特与奥德一道去增援费罗尔港外的考尔德，而巴勒姆发出的最新命令是，如果纳尔逊没有去西印度群岛，奈特的2艘战列舰就应该作为科林伍德的增援部队前往那里。[6]

在所有的这些兵力调遣中，巴勒姆从未放松过对其战略中心的牢牢把握。他坚定地处理着各处遥远的呼救，让拿破仑将英国舰队引离本土的乐观企图化作泡影。在收到奥德关于敌舰队可能在西方海域集结的推测后，他严格要求加德纳，任何诸如科林伍德舰队这样的分兵行为都必须以他自己保有18艘战列舰为前提。在这个底线之上，如果可能的话，加德纳还应将考尔德麾下的战列舰数量维持在8艘以上。[7] 与此同时，巴勒姆还向纳尔逊发去命令，如果他没有跟踪维尔纳夫，那么，在留下足以看守土伦与卡塔赫纳舰队的军舰之后，他麾下的其他战舰就应该来填补因科林伍德离去而造成的兵力空缺。他应该在加迪斯留下5艘巡洋舰，用于给考尔德及英国本土传递情报，然后便与加德纳汇合。如果他本人仍想留在地中海，也可以让比克顿爵士率领多余的战舰返回本土。[8]

5月9日，加德纳收到了巴勒姆关于派出科林伍德的命令。他立即让相关船只开始装载补给，并且正如决意前往西印度群岛时的纳尔逊，他给海军部发去回复，称如果没有收到进一步的情报，他就准备立即派出科林伍德舰队。第二天，强烈的西风与大浪让出征舰只的补给装载工作被迫中断。加德纳随即驶向英格兰西南顶端的利泽德半岛寻找平静的海面，在这里，他又收到了给科林伍德所部增加2～3艘战列舰的命令。恶劣的天气仍在持续，于是，加德纳将那则密封的命令交给科林伍德，让他率领8艘战列舰去普利茅斯港外的卡桑德湾（Causand Bay）继续装载补给，自己则率军返回乌桑特岛附近的原定阵位。[9]

直至此时，巴勒姆手中仍保留着这支用以把握局势的重要预备队。但在这个关键的节点，陆军部却半道杀出。由于西印度群岛已面临着巨大的威胁，陆军部准备将艾尔·库特爵士所统帅的、原定派往印度的远征军转调至西印度群岛。库特将被任命为牙买加总督以及陆军总司令，尽早从爱尔兰的科克港出航。这一决策是在4月初做出的，显然是基于阿瑟·韦尔斯利爵士（Sir Arthur Wellesley）——后来的威灵顿公爵——平定印度的消息，以及英国间谍探得的拿破仑的真实目的。他们已经向背风群岛的胡德准将发去命令，要求他派出巡洋舰来迎接远征军，但他们还需要一支兵力来掩护船队通过危险海域。[10] 在陆军部看来，维尔纳夫的出逃是巴勒姆未能尽责的表现。他们因此要求将科林伍德的兵力提高到12艘战列舰，作为保护远征军的特遣舰队。巴勒姆自然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认为，这种在制海权受到严峻威胁之时向海外派遣陆军的行为违背了海军战略的首要原则。这种观念上的冲突也正是他在1795年与当时的内阁爆发激烈争执、最终被迫辞职的原因。这一次，他的反对更加强烈。陆军部的要求意味着将西方舰队的兵力削弱至底线之下，并使增援考尔德——他正扼守着目前最为关键的位置——变得不再可能。这所有的牺牲都只是为了掩护一个次要的陆军行动。但是，皮特却坚持要这样做。他们的争执并没有文献记录，我们所能知道的是，英王乔治三世给巴勒姆发去了一则明确的指示，让他向普利茅斯下达行动所需的命

令。按照这则指示，科林伍德应在出航之际再得到3艘来自加德纳或考尔德的战列舰，在前往马德拉群岛之前应先去护送远征船队，若发现纳尔逊已经参与了追击，他就应该返回普利茅斯。[11]

然而，在这些命令还在传递途中时，外交部又收到了菲茨杰拉德从里斯本发来的报告，其中包括了维尔纳夫折返加迪斯的错误情报，以及克雷格远征军正在特茹河口寻求庇护的消息。库特的行动命令立即被撤销，海军部立即向乌桑特岛和普利茅斯发出通知，中止科林伍德的此次出击。第二天，由于担心他已经出击，海军部急令一艘巡航舰立即去加迪斯弄清真相，然后到菲尼斯特雷集结点等候科林伍德并向他报告，再将他最终的决定及说明传回海军部。[12]

尽早弄清这些情况显然至关重要，因为海军部必须为科林伍德制定新的行动命令。目前的局势已变得极其棘手。维尔纳夫折返的消息并不可靠，但他们必须面对这种可能性。如果它属实，便意味着维尔纳夫最初向西航行是为了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牙买加去，而皮特刚刚得到他最为能干的海外间谍的密报，拿破仑想要虚晃一枪来掩盖他的真实行动。返回加迪斯，意味着他的真实目的地要么是地中海，要么是奥德强烈坚持的英吉利海峡——由于拿破仑本人正在意大利，后者的可能性并不大。此时的政治形势已经让地中海的安全变得愈发敏感。与俄国的联盟谈判正处在拉锯战当中，5月9日——最新命令被发往加德纳的同一天——外交部收到了列文森-高尔的来信，称那条关于放弃马耳他的附加条款阻碍了盟约的订立。在海军陷入危机的同时，沃龙佐夫与皮特进行了一次火星四溅的会谈，他告诉这位倔强的首相，英方完全无条件地认可马耳他条款是沙皇批准盟约生效的必要条件。[13] 沃龙佐夫告诉我们，听到这则消息的皮特就如同听到晴天霹雳一般。皮特还听说，沙皇再次激烈地抱怨英国对其承诺的地中海陆军行动的拖延，这让他的处境愈发困难——克雷格则正受困于里斯本，无法继续向前。[14]

对皮特而言，沙皇所坚持的这个条件是无法接受的。在从列文森-高尔那里听说俄方提出的新条件之后，皮特的阁臣马尔格雷夫立即向沃龙佐夫提交了一份强烈的抗议。他写道，在法国正谋划着埃及与印度之时，拥有“一处不会在战争开始时被一场突袭所夺走的地中海安全海港”对英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英王陛下知道，放弃马耳他可以换来一场局部和平，可以保证他自己权位的绝对安全，但是他更想要保持欧洲各大强国的永久独立。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宣称英国是耶路撒冷圣约翰海上骑士团的合法继承者。查理五世让骑士团驻扎于马耳他，正是要让他们作为保护基督国家、抵抗当面之敌的卫士。而现在，这个古老的要塞只有成为英国海军的港口才能发挥其往日的职能。[15]

皮特在答复沃龙佐夫时强硬地指出，沙皇的要求意味着同盟的破裂。这是他与英王都不愿看到的，但任何放弃马耳他的政府都将因群情激奋而倒台。沃龙佐夫私下理解皮特的看法，但他必须忠实地强调俄方的意见。皮特被迫打断俄国大使的发言，提出他的最后条件。他的话值得我们复述一遍：“如果其中包括了让我们放弃马耳他的条款，无论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痛苦，我们也只能放弃签署盟约的愿望。我们将继续独自作战，仍旧在大海上作战。”[16]

在这个不幸的时刻，来自里斯本的错误情报将整个局势的焦点转向地中海。他们要牢牢把握地中海的制海权，将集结起的敌人困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入口，使之无法自由行动。那才是科林伍德要去的地方。他必须拥有足够的兵力，一支劣势的舰队只会酿成灾难。按照斯特罗恩的报告，纳尔逊已经去了埃及，可能无法与他联手。科林伍德很可能要孤军奋战，而此时的政治局势更需要他取得一场真正的胜利。瑞典和普鲁士已经退缩了，而拿破仑加冕为意大利国王的消息也未能使奥地利下定决心。只有一场决定性的、不容争议的胜利才能帮助皮特继续他的大计，而任何稍逊的结局都显然会让组建反法同盟的微弱希望走向破灭。

但是，在派给科林伍德足够兵力的同时，乌桑特岛的西方舰队可能因此而陷入危险——他们的兵力已经极其紧张。如果派给科林伍德足够多的兵力，加德纳的战列舰数量就会严重低于巴勒姆规定的底线。这是一个需要极大勇气和决心来面对的困境，是一个需要极强的风险控驭能力来解决的困境。比起纳尔逊的那个决断，处理这一困境更需要对战略价值做出睿智权衡，而皮特和巴勒姆都像纳尔逊一样坚韧不屈。他俩在两天之内下定了决心，即便冒着风险也要重夺地中海的制海权。5月17日，他们向科林伍德发去了最后的命令。科林伍德麾下已有11艘战列舰，但仍然不够，因此他再次找到加德纳，从后者那里调来1位将官、1艘三层甲板战舰以及2艘74炮战舰。会合后科林伍德接着要前往里斯本，让奈特及其2艘战舰加入，这样一来，他们就将拥有3艘三甲板战列舰与13艘其他各型战列舰。这支强大的舰队将前往加迪斯外海，理清当前的局势。如果联合舰队仍在那里，科林伍德就要将之封锁在港中。如果他发现敌人已经前往西印度群岛，纳尔逊又紧随其后，他就应该参照敌军规模为纳尔逊派出增援，然后让剩余战舰返回普利茅斯。如果纳尔逊没有进行追击，科林伍德就应该率领12艘战列舰前往西印度群岛，将当地的战列舰数量提高到18艘；如果他确信敌军规模比这更大，他也可以按照需求调动足够多的兵力。而另一方面，如果他发现敌军进入了地中海，他就应该跟随其后，找到纳尔逊并向他传达新的指令，然后依计行事。

发给纳尔逊的这则命令是基于维尔纳夫返回加迪斯的情报为真的假设之上。如果的确如此，在他与科林伍德会面后，纳尔逊就应率20艘战列舰封锁住联合舰队，同时分出他认为必要的兵力看守卡塔赫纳和土伦。

新的兵力分配将使加德纳只能以15艘战列舰对抗布雷斯特港内冈托姆舰队的21艘战列舰。尽管如此，他的风险并不如数字对比所显示的这么大，也并未逾越坚固防御所需的基本前提。在他的15艘战列舰中，有

3艘是当时只能勉强算入战列舰的64炮战舰；但是，其中不少于9艘都是拥有三层炮甲板的大型战舰。[17] 在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还有奥德带回的舰队和其他一些后备战舰。它们正在加紧修整，其中大部分都能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好出海准备。此外，巴勒姆还想出一条妙计，能保证他们拥有至少一周的缓冲时间。这一招极其简单：他指示加德纳，一旦科林伍德到来，他就应率领全军靠近布雷斯特进行侦察，然后再让他们分兵前往加迪斯。这样的兵力展示足以让冈托姆在弄清英军确切实力之前不敢轻举妄动，而到了那时，他们肯定已准备好了后续增援。

这就是皮特和巴勒姆应对这个突然出现的战略困境的解决方案。令人唏嘘的是，它却由于是针对着一个永远不会发生的情形而被人遗忘了。如此多的用惨痛代价换来的旧日战略智慧，曾经如此有效地发挥过它们的功用，却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被我们遗忘。只有耐心的考证发掘才能将之恢复出来，而只有通过恢复这些从未执行过的预案，我们才能避免用较少的现存案例做出粗泛推断的危险。

在最后关头出现的两个事件让这一切归于沉寂，并因此被人们遗忘。在科林伍德从普利茅斯出航驶向加德纳时，加德纳收到了纳尔逊从特洛岛发来的消息，称他如果在里斯本打探不到联合舰队的消息，就打算朝锡利群岛驶来。[18] 加德纳立即向锡利群岛集结点派出了一艘巡洋舰，并将纳尔逊的信件上呈海军部，请示他们的指令。然而，海军部却决定，在收到纳尔逊下一封消息前不会做出任何指示。

紧随其后的另一则消息则需要他们立刻采取行动。5月22日，加德纳与科林伍德正在布雷斯特港前进行着巴勒姆导演的兵力展示。正在此时，考尔德向他们传来急报：十天之前，他麾下的一艘巡洋舰——由梅特兰（Maitland）指挥的“卢瓦尔”号（Loire）——在费罗尔以西500英里的海面上发现了一支敌方舰队。它跟踪敌军直至夜幕降临，之后又从一艘美国商船处得到了敌军的细节，确认其就是由密歇希率领的法国罗什

福尔舰队，正在向奥特格尔角行进。[19] 它马上去向考尔德报告这一消息，并于5月14日在普莱尔角的常规位置找到了它的司令官。考尔德立即推断，密歇希可能意图在奥特格尔让陆军登岸，然后返回罗什福尔。他于次日破晓时赶到了奥特格尔，但敌军并未如预期般出现。他认为自己或许应该更靠近北方，于是转而驶往北偏东的方向——如果敌军从南方驶向罗什福尔，这样正可以截击他们的航线。强劲的西南风使得费罗尔港内的敌舰队无法出航，这使他可以大胆地执行这些行动，无须顾虑被他封锁的敌港。不幸的是，西南风在当日夜间转为北风，并极有可能继续变换风向；如果东风出现，费罗尔舰队就可以乘风出航。考尔德不敢冒险，只得被迫中止行动。他派出“卢瓦尔”号向加德纳通报消息，然后率军折返费罗尔港外。[20]

在加德纳与科林伍德即将按照最新命令展开行动时，这则重要的消息扭转了整个局势。首先，在维尔纳夫返回加迪斯的情报尚未被证伪之时，密歇希又莫名其妙地重新出现了，这一消息动摇了他们所笃信的巴勒姆对局势的推断。如果密歇希出现在西印度群岛是为了制造法军要在那里展开战役或集结兵力的假象，那么，他的忽然返回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要在维尔纳夫出击之时返航？维尔纳夫是否有可能根本不打算出击呢？其次，这意味着英军当面之敌的兵力得到了明显的增强。加德纳与科林伍德都对此极为关切，他们在商议后得出结论，梅特兰看到的1艘三甲板战舰与其他4艘战列舰无疑会安全地回到罗什福尔或是洛里昂。如果加德纳按预定计划派出科林伍德舰队，乌桑特岛的西方舰队就会因兵力不足而陷入危险。作为前提条件的“最新情报”已经出现，加德纳决定执行海军部在指令中赋予他的自主酌定权：他决定扣下快速舰队最后增加的那一部分，即包括5艘战列舰在内的格雷夫斯分队。科林伍德将率领剩下的9艘战列舰踏上征程。

加德纳在发给海军部的报告中如此陈述了他的理由：“在中将先生（科林伍德）正要向西印度群岛派去相当数量的战舰时，5艘敌舰已经

从那里返回……他用14艘战舰就足以对付那里的敌军。”至于封锁加迪斯，他认为那不能以牺牲他目前的任务作为前提。“我希望我所采取的措施能得到各位先生的批准，一旦土伦舰队返回加迪斯的消息得到确认，我就会迅速派出我扣留的5艘战列舰去增援中将先生，紧随其后抵达他目前预计前往的位置。”[21] 海军部认可了他的措置，但在等待指示之时，他并未想到用他扣留的战舰去封锁罗什福尔，或是去加强亟待增援的考尔德。5月23日，加德纳派出了由科林伍德率领的9艘战列舰，之后便静候着海军部下一步的命令。这就是他所做的一切。

---

[1] 关于“猎兔犬”号的行踪可参见布恩的报告*Captains' Letters*，1535，*April 12 and 25*；and *Captains' Logs*，1530；and Chart，*ante*，p.63。

[2] *Admiralty Minutes*，153，May 2nd.

[3] *Out-letters*（*Secret Orders*），1363，May 2nd.

[4] To Gardner and Collingwood：Ibid.，May 4th.这是巴勒姆最早签署的命令。发给加德纳的命令可参见 *Barham Papers*，iii.244。

[5] Admiralty to Collingwood，Postscript：*Out-Letters*（*Secret Orders*），1363，May 4th.

[6] Admiralty to Collingwood，Postscript：*Out-Letters*（*Secret Orders*），1363，May 4th.

[7] To Gardner：*Out-Letters*（*Secret Orders*），1363，May 9th.

[8] To Gardner：*Out-Letters*（*Secret Orders*），1363，May 9th.

[9] Gardner to Marsden，May 9th，11th，and 15th：*Blockade of Brest*，ii.255，258，260-1.

[10] *Secret Orders*，1363.To Hood，April 5th.To Captain Woodruff of the *Calcutta*，April 29th.To Collingwood and to Nelson，May 17th.

[11] *Secret Orders*，1363，May 14th：Camden to Admiralty，May 10th：*In-letters*（*Secretary of State*），4199：same to Barham，*Barham Papers*，iii.309.

[12] *Secret Orders*，1363，May 15th and 16th.

[13] Mulgrave to Gower，June 7th：Holland Rose，*Third Coalition*，p.165. *F.O.Russia*，58.

[14] De Martens，*Recueil de Traites*，xi.109，and *ante*，p.24.

[15] Mulgrave to Woronzow，May 7th：Rose，*Third Coalition*，p.145.

[16] De Martens，op.cit.，xi.Ill，and cf.ante，p.24.

[17] Gardner to Marsden，May 7th；*Blockade of Brest*，ii.278.

[18] Gardner to Marsden，May 19th，with enclosures；*Blockade of Brest*，ii.266.

[19] See Gardner to Marsden，May 22nd：*Blockade of Brest*，ii.275；and Maitland’s report；*In-letters*，p.128.梅特兰在5月11日看到它们在“北纬43°4′，西经20°8′（航海记时仪测算为20°6′）”的位置上。它们乘着西风，向E.by S.1/2S.转舵——这显然是指南针表盘的标示法，大概是东西轴线偏南22.5度的方向。它们沿着这个方向将驶向费罗尔以南的菲尼斯特雷，但这对密歇希而言是不可能的。从西印度群岛返回比斯开湾的法国舰队似乎是在奥特格尔角以西500英里处沿着它的纬线行进，然后冲向目标发起登陆。这种航行方法被考尔德在那里的另一艘巡洋舰记录了下来。梅特兰还精确地记录了密歇希所打出的旗语信号的颜色。

[20] Gardner to Marsden，May 22nd，enclosing Calder to Gardner，May 15th；*Blockade of Brest*，ii.275-7.

[21] Gardner to Marsden，May 22nd：Ibid.，p.275.他扣下的战舰包括格雷夫斯的旗舰、80炮战舰“闪电”号（Foudroyant），98炮战舰“温莎堡”号（Windsor Castle），74炮战舰“勇士”号（Warrior），64炮战舰“却敌”号（Repulse）与“理智”号（Raisonnable）。5月25日发给加德纳的命令已推测到他目前的兵力已经被削减至弱于法国布雷斯特舰队。命令特别提醒他，击败优势舰队的唯一希望在于“更强的技巧与行动”，这些优势只能通过持续的战术训练来取得。参见*Barham Papers*，iii.246。

第九章 拿破仑改变计划

加德纳的行动很好地契合着局势的进展。5月20日，拿破仑意识到他在西印度群岛集结舰队的计划已经破产。此前，他曾多次催促冈托姆用各种手段不经交战直接出海。他最后告诉冈托姆，如果未能在20日午夜之前出航，他就应该原地待命，等着执行另一个不同的集结方案。20日已经到来，而密歇希也正在此时返回了罗什福尔。他的舰队满载病员、士气低落，已完全无法继续作战。

密歇希在这场战役中的任务已经失败。当他在新年伊始出航之时，拿破仑暂时放弃了侵英计划，只想让他进行一次殖民地攻击。密歇希的特殊任务包括向法属岛屿提供物资，与当地守备军合作夺取多米尼克、圣卢西亚，以及袭击并劫掠较小的英国岛屿。遵照这些指示，他在2月20日抵达马提尼克。在与当地官员商讨之后，他在第二天就向多米尼克首府罗索（Roseau）发起了奇袭。

这场奇袭完全出乎英方的意料。当法国舰队来到在这个英国城市时，他们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当地总督普雷沃斯特将军（General Prevost）甚至派出他的一位幕僚前去欢迎，他登上了密歇希的旗舰，却未能发觉法军的阴谋。法国陆军指挥官拉格朗日将军（General Lagrange）毫无阻碍地让士兵登上了海岸，随即夺取了控制罗索城的关键据点。罗索城已经守不住了，普雷沃斯特只好命令当地守备队停止抵抗；但是在拉格朗日觉察之前，他已让全部的正规驻防军撤向岛屿顶端的卡布里尔要塞（Fort Cabril）。拉格朗日发现了英军危险的行动，他恳请密歇希派出一部分战舰去阻截英军的撤退。然而，此时海面无风，

密歇希无法动用任何一艘船。拉格朗日又提出，可以让水手乘着舰载划艇阻截英军，但密歇希仍然拒绝。让他的舰员陷在一场陆地行动中将可能影响舰队的行动力，他不愿冒此风险。于是，普雷沃斯特成功地逆转了局势，情形开始对法方不利起来。岛屿失陷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回欧洲，但要想夺取卡布里尔要塞，他们只能进行一场事先毫无预备的围城战。密歇希无法在此久留，只得被迫撤退。在离开之前，他勒索到了价值10万法郎的赎金，又夺取了锚地旁的几艘小船。

他们并没有攻击圣卢西亚，而是向北方展开了几场风险较小的袭击。密歇希让陆军部队在瓜德罗普登陆，加强了当地驻军，接着便扑向其后的一系列英占小岛。他们在尼维斯（Nevis）、圣克里斯托弗（St.Christopher）和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各自勒索了一笔赎金，然后就终止了行动。在他看来，他此时应返回马提尼克，按照命令与维尔纳夫会合，之后再展开一场更大规模的攻击。他的行动的确对英方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害：被勒索的赎金与33艘被俘的英国船只总价值约为4万英镑。但比起法军行动的花销，这次远征仍是入不敷出，而英国在背风群岛占据的阵位依旧不可动摇。

对当地的法国官员而言，最让他们恼怒的据点就是位于马提尼克岛西南1英里处的钻石礁（Diamond Rock）。这是一座荒芜崎岖的柱状礁岛，但这块小小的礁石却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法兰西堡与圣皮埃尔是这片殖民地的政治与贸易中心，而钻石礁正耸立在它们与欧洲之间的必经航道上，同时又截断了这两座海港和富饶的南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的海岸航线。1803年，塞缪尔·胡德准将乘着“半人马”号（Centaur）战列舰前来封锁马提尼克。他发现，近海船只经常偷偷地从礁石旁溜走，让他的巡洋舰无可奈何。钻石礁成了封锁任务的严重阻碍。在法国人看来，这座耸立在风浪中的陡峭崖石是不可企及的，但胡德并不这么看。他决心夺取此地，让它成为一艘永不沉没的“封锁舰”，并作为近岸划艇的行动基地。“半人马”号尝试着展开行动，凭借着奇迹般的技巧，他们

在几小时内取得了成功。一位目击者在行动后这样写道："水手们用绳索滑轮吊起了一门24磅炮，他们就像是老鼠拖着一根香肠，这是多么危险，甚至可说是陡峻的行动，你一定会想看到这个场面！……相信我，我不会对任何人脱帽致敬，除了这些英国水手。"他们在礁石的高处建起一处难以接近的据点，又在下方靠近登陆场的海滩上建造了一处小炮台。"半人马"号的莫里斯尉官（Lieutenant Maurice）被任命为这里的指挥官，而钻石礁则被海军正式登记为"英王陛下的轻帆船钻石礁号"。两年来，这里一直驻扎着一支百人左右的守备队，如同《鲁滨孙漂流记》那样在岩洞中艰苦地生活着。尽管不断遭遇袭击，补给常被切断，但他们仍在马提尼克岛的一侧维持着这个让敌人痛苦不安的据点。[1]

钻石礁让法国总督如鲠在喉，他准备在密歇希与维尔纳夫于法兰西堡会合之后夺取此地。然而，在密歇希从北部地区的侵袭中返回时，他接到了维尔纳夫首次出航失败的消息。会师计划已被取消，罗什福尔舰队应该折回法国。在密歇希看来，这就是让他立即返航的命令。当地总督徒劳地恳请他在离开之前夺取钻石礁，但遭到了拒绝。密歇希再次出航，按计划将最后的部队和补给运送至圣多明各，随后便踏上了返回法国的航程。

然而，密歇希并不知道，他过早的返航让拿破仑的海军集结计划遭受了第一次重大挫败。从一开始，拿破仑就对某种可能要发生的状况有所不安。当他接到奥地利的和平请求后，他发现自己只能重启侵英计划，随即传令撤销之前让密歇希返航的命令。维尔纳夫再次试图出航，而密歇希则应该在西印度群岛等待他的到来。但撤销令并未及时地送到密歇希手上，并没能阻止他返航。事实上，拿破仑早在接到维尔纳夫从土伦出航的消息之时就已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于是便对他的计划开始了无穷无尽的修改。他的海军将领完全无法领会他的意图，由此陷入无助的困惑中；他自己的头脑也被这些方案搅得一片混乱，分不清哪个是他实际下达的命令，哪个又是前线实际接到的命令。

4月11日——维尔纳夫与西班牙舰队在加迪斯成功会合的一天之后——拿破仑提出了新的计划草案。对于维尔纳夫，拿破仑只知道其离开了土伦，但他已了解到冈托姆出航失败，而密歇希可能正在返航途中。因此，拿破仑已意识到第一个集结计划有可能失败。他转而回到让维尔纳夫独自向英吉利海峡发起突袭的不足信的设想之上，开始描绘另一幅玫瑰色的美好图景。他假设格拉维纳会率领8艘战列舰在加迪斯加入维尔纳夫，而罗什福尔的马贡将军[2]还有2艘做好了出海准备的战舰。如果冈托姆在5月10日之前仍无法出航，他就将马贡派往马提尼克。维尔纳夫舰队因此将拥有22艘战列舰，足以让他绕行苏格兰以北进入北海，去泰瑟尔岛解放那里的荷兰舰队与马尔蒙将军的军团，然后从海峡东面驶向布洛涅。

拿破仑认为这个计划可行的理由，正是他无法理解英国战略细节与实力的显例。他让自己相信，维尔纳夫不会遇到足以与之匹敌的截击舰队，因为冈托姆一定能将20艘战列舰牵制于布雷斯特港外，返航的密歇希也会吸引其他封锁兵力。[3]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英国政府并不会如他所想的那样在布雷斯特保持那样多的兵力，而我们将会看到，罗什福尔的任何舰队都不会让巴勒姆过度削弱其战略要点。

这个乐观的计划只在他脑海里保留了两天，它还不足以体现出拿破仑对其对手能力的极端轻蔑。4月13日，他又构想出了一个全新的计划。他听到流言，说多米尼克与圣卢西亚已经被法军夺取，让他变得更加乐观。他又接到情报，英国各处港口正在加紧工作，两支远征军即将出发，科林伍德的快速舰队已经组建。这让他相信，他的布局已经打乱了敌人的阵脚，对方的参谋们已经陷入困惑，惊愕而焦虑地将他们的强大舰队和精锐部队分散到遥远的天涯海角。[4]

在构思新计划的同时，他正享受着更大的愉悦。拿破仑正在前往意大利的途中，但他对法国各行省对其称帝加冕的态度尚无把握。他来到

里昂，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受到了市民们的热烈欢迎。崇拜的欢呼声在他耳畔回响，让他觉得整个世界就像一只包含珍珠的牡蛎，等着他用舰队将之撬开。通过一次突然的集结、用优势兵力夺取英吉利海峡制海权的想法再次浮现。他撤销了之前的计划，不待5月10日的期限，就让马贡将军携带着发给维尔纳夫的命令立即出航。如果维尔纳夫在接到命令的35天内仍未见到冈托姆出现，他就应假设冈托姆无法突围，就应率领20艘战列舰——拿破仑认为他应能掌握的兵力底线——返回费罗尔。他们将在那里打破英军封锁，让古尔东与格兰达加纳[5]的15艘战列舰出击，然后去布雷斯特港外与冈托姆会合。他们将拥有56艘战列舰——占据兵力上的绝对优势——然后扫清英吉利海峡，前往布洛涅。皇帝本人将在那里下达最终的命令，“在他们成功抵达之时，扼住整个世界的命运”。[6]

当然，如果冈托姆在马提尼克出现，新的安排便不会执行。维尔纳夫仍被命令等候一段时间，但绝非原地待命。如果圣卢西亚尚未陷落，那么这正是夺取它的好时机；如果机会允许，其他英占岛屿也将是他的目的地。

以拿破仑的非凡能力，制定出这样的行动命令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已经迷醉在他所取得的统治功业里。在向意大利胜利进军的路途上，他发现整个法国已匍匐在他脚下，远远超出意大利王冠的光芒所及。奥地利和普鲁士公然违背了它们的联盟约定，始终保持静默；而他唯一的当面之敌——英国——看上去正束手无策。这个计划的唯一优点是他似乎第一次面对了真实的难题，开始考虑用一场海战来赢得英吉利海峡的通航权。但他并未意识到其中最为致命的弱点：布雷斯特外海的战斗只能由维尔纳夫舰队独自进行，而免遭战败的唯一机会又在于压倒性的兵力优势。尽管冈托姆与德克雷都曾表达过各自的反对意见，但拿破仑仍旧相信，冈托姆能够出港与维尔纳夫联合，就像陆地上两个移动自如的兵团。另外，尽管这一任务将遇到极大的困难，尽管努力集结舰

队极其必要，但他仍让维尔纳夫将其兵力过早地投入一场殖民地袭击。而为了实现这个不合理的计划，他更假定他的敌人们都会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愚蠢地行动。很显然，没有什么能比这个计划更加背离那些被称为“拿破仑式”的军事原则了。[7]

尤其要注意的是，拿破仑在发布这些野心勃勃的命令时还并不知道维尔纳夫在驶出土伦港后的经历，更不知道纳尔逊的行动。这些命令于4月17日从巴黎发往罗什福尔，直至20日，刚刚抵达意大利的拿破仑才从热那亚听说，纳尔逊直至4月10日仍待在撒丁岛南部，并未投入追击。[8] 两天后，新的消息从西班牙传来，维尔纳夫已于4月10日与格拉维纳安全会合于加迪斯，并再次出海。令他失望的是，其中只有5艘——而非他预想的8艘——西班牙战舰；但他立即决定将剩余的西班牙战舰派上新用场。他仍将美好的愿望建立在敌人犯傻的基础上，他确信，既然纳尔逊没有追击维尔纳夫，那他一定再次去了埃及。对于这个新计划的前景，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充满希望；他决心要保住这点优势，将纳尔逊困在地中海里。为了这一目的，他将组建起一支新的土伦舰队。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先前对密歇希舰队的安排，如果后者没能接到最后的命令而返航，就应待在罗什福尔港内，吸引、牵制一支英国封锁舰队。现在，他想将密歇希调到土伦来，并让西班牙的卡塔赫纳舰队在此与之会合。因与法国媾和而得到“和平亲王”（Prince of the Peace）头衔的曼努埃尔·戈多伊（Manuel Godoy）正在马德里大权独揽，塔列朗受命与之商议新的联合舰队议案。拿破仑在给塔列朗的命令中写道：“我的目的并不是让舰队驶出地中海，而是让它作为一种威慑，同时我将在这里（土伦）驻扎下四五千人的兵营，应该能让英国人极度不安。如果和平亲王不同意这个方案，我想卡塔赫纳舰队应该前往加迪斯。”[9] 拿破仑的目的是将英国的注意力吸引在地中海或者是加迪斯港内的舰队。加迪斯舰队控制着直布罗陀海峡的出口，几乎具有与新的土伦舰队同样高的牵制价值。为了帮助实现他的希望，他在等待谈判消息的同时利用了欧洲大陆上星星散散的报商，传播着维尔纳夫逃过英军监

视、让1万人在埃及登陆的假消息。

拿破仑想用这些把戏骗住纳尔逊，将维尔纳夫和格拉维纳从中解放。由此，他指示海军大臣德克雷为他们下达更充实、明确的命令，让他们征服英属背风群岛。他们不仅要将英军逐出多米尼克和圣卢西亚，还要攻取圣文森特、安提瓜（Antigua）、巴巴多斯，甚至还要重新夺取多巴哥（Tobago）和特立尼达（Trinidad）。[10] 即便在老皮特时代最为乐观的时刻，英国也从未制订过这样不合时宜、不合兵力的计划。

在拿破仑看来，他的元帅们最为严重的缺点就是总觉得形势对敌方有利。然而，在他自己的海军谋划中，他却总以为形势对己方有利。他心满意足地看到，英国已被印度的事态震悚，科克伦正在赶往那里；纳尔逊正紧盯塔兰托的法军，全神贯注地防御着埃及。只要英国无法从本土舰队中抽调出比维尔纳夫更强的分舰队，西印度群岛就必定无法守御。可这幅图景中的每条支线都出了差错，拿破仑却看不出这些问题。5月1日，马贡将军携带着他早前的命令驶出了罗什福尔；紧跟其后的巡航舰“迪东”号（Didon）又带去了更新的命令。对维尔纳夫和格拉维纳而言，将英国势力逐出西印度群岛只相当于一道开胃菜，而之后在英吉利海峡展开的行动才是正式的大餐。

作为实现这个虚妄图景的第一步，拿破仑在接下来的一周中为维尔纳夫驶向英国的行动制订了同样乐观的计划。他的计划包括了每一处细节，但每一处细节都是同样的过分乐观。他并不知道马贡已经出航，而那顶自授的铁王冠[11] 已经让他的整个头脑情迷意乱。时间和空间似乎不复存在，广阔的大洋仿佛是一个棋盘，可以让他自如地移动舰队，让愚蠢疲乏的敌人陷入混乱。

对于最后的行动方案，通过突袭而暂时取得海峡制海权的念头仍在其中有一席之地。维尔纳夫在返航本土、打破费罗尔封锁、与古尔东和格兰达加纳会师之后，将会按照自己的判断选择最佳的行动方式。拿破

仑仍旧认为，自己所需要的只是在布洛涅之前取得三到四天的制海权。维尔纳夫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种是与冈托姆会合，另一种是让冈托姆在布雷斯特牵制英国主力舰队，他则绕道苏格兰北部航线，进入与敌军方向相反的北海。这并非没有可能：英国海军部会将首要的关注重心放在防止布雷斯特舰队与土伦舰队会合之上，他们会在这里仔细地准备对付维尔纳夫。为了截击土伦舰队，他们可能会让康沃利斯与布雷斯特保持一段距离。这将只会有利于法军的袭击。他不应接近布雷斯特，而要绕过康沃利斯，前往利泽德角，从那里冲入海峡；如果风向不利，那就从苏格兰以北驶向泰瑟尔岛。而如果他决意与冈托姆会合并与英军交战，他也可以带上罗什福尔舰队，或者让他们在港口里牵制英国的封锁兵力。在与冈托姆会合之前，他应尽可能地避免战斗，但如果前期战斗不可避免，他应在尽量靠近布雷斯特的地方与敌人交战，以期冈托姆可以与他联合行动。最后，如果以上计划都因某些事件无法继续，他还可以带着罗什福尔舰队航向加迪斯，在那儿与卡塔赫纳舰队汇合，等待着下一步命令。[12]

这是一个突破英国西方舰队内线位置的巧妙计谋，但也是一个典型的、遵循着陆上战争法则与陆军运动方式的陆军式作战方案。其致命弱点，正如海军大臣德克雷所言，在于忽视了海风和潮汐对舰队运动的特殊局限。简而言之，维尔纳夫联合冈托姆的行动计划只是对陆军解救被围友军之行动的错误翻版。如果陆军在围攻一处要塞，要塞内部的驻军和外部的救援兵力的确可以在某些程度上联合作战；但在风帆时代的历史中，并没有被封锁者与港外援军一道对抗封锁舰队的记载。[13] 其困难之处首先在于风向：能让解围舰队驶向港口的风向，往往同时让航向相反的港内舰队难以出海。其次，港内舰队很难随时掌握封锁者的动向，即便封锁舰队前去迎击解围舰队、将航道敞开在港内之敌面前，港内舰队在确切地听到港外战斗的消息之前也不敢冒险出海。总之，拿破仑在他的算计中忽视了海上战争的两条首要规则：其一，海军运动依靠风势和潮水，与陆军极为不同；其二，谁也不能在一两天内确知敌舰队

的封锁是否已经放开。

就这样，5月20日的午夜，在西印度群岛集结舰队的计划被正式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本土水域的集结方案。这天也是拿破仑为冈托姆独自突围指定的最后期限，之后，他就只能等待维尔纳夫为他打开大门。布雷斯特舰队暂时被闲置了，但罗什福尔舰队则完全不同。在西班牙拒绝了组建新土伦舰队的设想后，拿破仑那永不止息的头脑开始设想利用这支部队的新方案。他已听说，西班牙政府坚持将卡塔赫纳舰队派往加迪斯。他们的理由十分古怪。英国政府没能把握到密歇希不期而返的真实含义，而西班牙人对此更是纠结不安。但对他们而言，最为重要的是纳尔逊的踪迹。他曾在克雷格抵达里斯本之时出现在直布罗陀海峡，而现在，当克雷格出现在直布罗陀时，他又没了踪影。他正在图谋什么呢？正如西班牙首相戈多伊对法国大使所说的，这个问题对法皇无关紧要，但对西班牙却是关键问题。纳尔逊最后一次露面是在圣文森特角，他已经落后于维尔纳夫一个月，进行追击很难再有任何收获；那么，他就可能会对西班牙在加迪斯湾沿岸的军工厂发起袭击。萨尔塞多率领的卡塔赫纳舰队必须来这里提供防卫，由此也能尽早地得知纳尔逊驶出海峡后的去向。[14]

拿破仑对克雷格远征军同样困惑不解，但并未如此不安。同往常一样，他还是选择相信与他的计划最为合拍的答案。他在写给德克雷的信中说："著名的秘密远征军在5月7日进入了里斯本，在10日再度出航。船队包括2艘战列舰、1艘轻巡航舰、50艘运输船，搭载着5000～6000名士兵。他们看上去是因为害怕维尔纳夫而在里斯本寻求庇护。问题在于，他们要去哪？我的看法是，他们没有理由不去夺取开普敦，或者去增援牙买加或向风群岛（Windward Islands）。[15] 如果他们要去马耳他，那就更好了。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能说明英国内阁对欧陆行动的极度无能。这些几千人的欧陆行动简直是侏儒的计划。如果你之后听说远征军去了马耳他，那就尽管高兴吧，他们就再也用不上这6000人和这些军

舰了。我从英国接到的报告都说他们正在向海外的各个地区派遣部队。”[16]

对皮特战略的批评已被认为是拿破仑的真实看法，而他所批评的这种两栖作战形式也已被视作英国战略的特点。但是，这种理解并不确切。熟悉拿破仑书信的人会注意到他的某些习惯：越是他看重的行动，他就越是不加废话；越是他担心的行动，他就越是言语轻蔑。他的成功和自信为他带来了这样一种心态，他从不相信自己的推断会错漏任何合理的可能性，而如果他无法推测到敌方指挥官的行动方式，他唯一的解释就是那个人是个迟钝的笨蛋。这种思维只是他刚愎的自欺欺人的一个方面，这或许是他作为指挥官的最大缺点，而在这场战役中，他的这一缺点表现得异常明显。在之前的一两个月中，他曾以严肃警告的语调谈起这支英国远征军。而在那些信件之外，在他于这几天写下的其他信件中，他对英军行动的真正感觉远非这样的轻蔑。

他们在米兰的加冕礼前忙碌了两天，皮特联盟的巨大阴影在筹备典礼的盛况中也赫然可见。拿破仑开始怀疑，这场战役的目标是否就是他自己。在将意大利并入帝国的前夕，这一切给他带来了太多的顾虑。他一封又一封地发出信函，里面满是他新的担心。他让贝尔蒂埃元帅（Marshal Berthier）——他的首席参谋长——去巩固以及再次武装科西嘉和意大利的主要港口。他让康巴塞雷斯——他在巴黎的代理人——“响亮地驳斥目前已散布开来的英俄联盟的消息，间接地传播‘俄国拒绝听从任何敌对建议’的反面信息”。他让掌握新闻部门的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发布消息，称法国人在圣彼得堡正越来越受欢迎，而英国人则不受喜欢，联盟的计划已经落空，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参与，而且这样遥远的协定也不可能直接有效地实现其利益。他让巴贝-马布瓦（Barbé-Marbois）“小心地阅读英国报纸，尽快及时地获得它们。别心疼那一千路易，将我可能感兴趣的消息——所有船只的运动、所有公布的远征军准备情况——及早地送到我手里”。他在写给若阿尚·

缪拉（Joachim Murat）的书信中暴躁地说：“你写给我的关于英国与俄国达成联盟协定的结论完全是废话，全都错了。这些消息是英国在自己一塌糊涂的时刻故意传播的，都是捏造的。”在庆典的那天夜里，在焰火与灯光都熄灭之后，他甚至开始思考他的敌人再次支持法国国内暴动的可能性。他再一次写给富歇：“在这样混乱和丢人的状态下，英国可能会重新在法国内部挑起麻烦。但我不觉得他们会做得太多，它只会如它的无数先例般招致失败。”

皇帝那任性的弟弟热罗姆·波拿巴（Jerome Bonaparte）自美洲归来后一直谋求着舰队指挥官的职位，拿破仑便准备让他率领一支巡航舰队出海巡航。因此，他的第一条命令——加强意大利的主要港口——或许是希望为他提供一些安全的庇护点。但剩下的那些书信则与克雷格远征军和纳尔逊密切相关，并严肃地指向英俄联盟的传言。拿破仑被迫开始怀疑，他的侵英威胁能否如他预期的那样有效地瘫痪英国的行动力。

第二天，他仍然继续关注着直布罗陀的克雷格远征军以及英国与俄国在地中海联合行动的可能性。他致信富歇称：“如果英军没有在那里留下更强的舰队，那么把卡塔赫纳舰队调去加迪斯然后封锁直布罗陀就是目前最为迫切的事。”他接着又写道：“我已经告诉过你，英俄盟约就是个假消息。这是英国内阁的把戏，他们的阴谋完全破产了。即便你看到英国人把它印在公报上，看到皮特在议会里大声宣扬，你都可以相信那并非实情。”同一天中，拿破仑还听说布雷斯特港外的英国舰队进行了一轮射击，这更加剧了他的紧张与焦虑。他担心马贡舰队遇到了什么糟糕的意外，便与德克雷讨论了这一事件。最后，他向海军大臣保证道：“英国已经完全被大陆国家孤立，处在有史以来最为糟糕的处境里。”[17]

让拿破仑焦虑的还有毫无音讯的密歇希。他尚未接到罗什福尔舰队返航的消息。西班牙对克雷格远征军的恐惧打破了成立新土伦舰队的所

有希望，拿破仑决定还是让他回到维尔纳夫那里。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拿破仑越来越担心他的行动太迟，或者是被封锁舰队阻截。于是，他又与德克雷商量着用其他方式利用这支部队。尽管英国处在“这样混乱和丢人的状态下”，英国舰队仍然分布在各处海域。他是要用密歇希牵制、诱离一支兵力相当的英国舰队，还是将其掌握在手中，以投入决定性的行动中去呢？5月29日，拿破仑在写过德克雷的信中说：“如果我让密歇希去加迪斯或土伦，而英军若撤出地中海，那么在乌桑特岛外海交战的那一天，他们就会比我们多6艘战舰，我应该让密歇希避免这一点。”他们显然还可以派他前往加迪斯，与卡塔赫纳舰队和加迪斯舰队会合，再前往费罗尔。但这样的航程面对着两大阻碍。拿破仑相信，费罗尔港前的考尔德拥有10艘战列舰，而与西班牙舰队成功会合后的密歇希将有15艘。“但是，用5艘法国战舰与10艘西班牙战舰去攻击10艘英国战舰是足够谨慎的吗？”另外，在费罗尔集结舰队，正如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所进行的所有集结一样，很可能弊大于利。这样至少会引来20艘敌舰，如果不经一场战斗，维尔纳夫将很难前往那里。布雷斯特的困境再次重现。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不能让密歇希去布雷斯特。即便他成功地溜了进去，也会导致拿破仑力图避免的英国在海峡入口集结兵力的结局。由于没有其他办法，拿破仑最终决定，密歇希应当作为独立的舰队。如果他被封锁在罗什福尔，至少也能牵制6艘敌舰，并确知他们的动向。如果维尔纳夫驶近，封锁解除，他就必须出航，在爱尔兰海岸进行一场巡航表演。“这一行动将加剧伦敦的紧张神经，迫使他们派出6艘战列舰。”与此同时，密歇希则将驶入大洋之中，回到费罗尔港外与维尔纳夫会合。

不久后，英国海军部在维尔纳夫出逃后迅速下达一系列命令的消息传到了米兰，拿破仑为自己描画的图景愈发显得乐观，他对德克雷写道：“英国人已陷入极端的混乱。”但与自欺欺人的拿破仑不同，德克雷仍保持着对真实局势的关切。6月1日，他向乐观的皇帝提醒道，皇帝陛下正在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用颇为嘲讽的语调写道：“我们可以确

定的是，即便英国政府还没猜到陛下您的想法，但伦敦的记者们肯定也洞悉了它们。”[18] 他认为科克伦显然要去西印度群岛，而不是印度；他警告拿破仑，如果纳尔逊也去了那里，英军就会集结起18艘战列舰，“其中数艘为三层甲板战舰”，法国舰队极有可能在那里提前遭遇战斗。“维尔纳夫将军麾下的一些战舰速度很慢，他们避免交战的希望十分渺茫。如果这个假设不幸是真的，战争之神在半个月内就会做出他的评断。”即便科克伦并未前往西印度群岛，维尔纳夫或许能避免战斗，但局势甚至会变得更糟。纳尔逊将迅速跟踪维尔纳夫返航，“如果他无法及时赶往费罗尔，他就会往那里派去一艘快速巡航舰，然后率军前往布雷斯特。这将让敌人在这个要点上集结起一支极为强大的舰队”。

为了平衡英法海军战斗力的差距，拿破仑必须在他预想的“乌桑特岛海战”之前让维尔纳夫与冈托姆会师，但德克雷对此的态度却十分微妙。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说服固执的皇帝，于是这样说道：“我不是说两支陆军部队间最微小的意外往往能打乱最精密的集结计划，我并不是将此与那种情况相比。……能使维尔纳夫将军接近加迪斯的风向也正好是不利于冈托姆出航的风向。要让他们成功会合，维尔纳夫将军必须在能让舰队出港时待在布雷斯特港外。”即便如此，维尔纳夫不可避免地要独自在敌方的全部兵力前暴露一段时间。“如果维尔纳夫将军的兵力不足以迫使敌军避战，那么在与布雷斯特舰队会合的至少十个小时之前，他只能独自经受考验。这样的战斗将让胜利者相当比例的战舰无法继续行动，使之不能具备发起第二次攻击的足够兵力。”换句话说，即便一切都按最好的情况发展，他们也无法取得那种决定性的胜利，使之能够确定地掌握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

德克雷进一步指出了行动不可能这样理想的技术原因。由于缺乏情报支持，维尔纳夫将很难在风向和潮水便于冈托姆出港时恰好抵达。因此，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布雷斯特舰队在维尔纳夫出现的一天之内也不可能出港提供支援。另外，维尔纳夫还可能在那里发现一支比拿破仑

的预想要强大得多的敌舰队。在常规的封锁兵力之外，他们很可能还包括所有的后备兵力，包括费罗尔舰队甚至是纳尔逊的舰队。他提醒他的长官，集结计划赖以成功的要素是训练精良的舰队，但联军中的19艘西班牙战舰才刚刚被征召出海，它们不仅武器落后，指挥官也缺乏经验。最后，他恳求拿破仑向维尔纳夫下令，让他在确认己方战舰至少多于敌方6艘之前避免冒险交战。[19]

这个明智的推演首次预测到了实际发生的情况，但德克雷是否真的提出了它，倒是值得怀疑的。其中还有一个有趣之处：德克雷显然并不怎么相信引开纳尔逊的计划，但他又不敢明说纳尔逊并不像拿破仑认为的那么愚蠢。他只想暗示纳尔逊可能会采取正确的行动，于是选用了一种巧妙的办法旁敲侧击。德克雷如是说道："他的夸耀只能说明他的无能，但他有一个特点，除了勇气和运气，他对他的舰长们并不浮夸。因此他可以在困难处境中听从他们的建议，尽管他是名义上的统帅，却让其他人实际指挥舰队。"[20]

不管德克雷是否曾冒险提出这些重要的批评意见，但显而易见的是，拿破仑的固执没有丝毫好转。一周后，他责备他的大臣缺乏"足以进行伟大战役的头脑"。绝望中的德克雷恳求他返回法国，而拿破仑却答复道："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劝我回到巴黎。我的行程正是掩饰我们计划、欺骗敌人的最佳妙计。"他仍在做着敌人蠢笨无能的大梦！他不服气地继续阐述他的计划，尽管证明其错漏百出的消息正接踵而至。

萨尔塞多曾试图前往加迪斯，准备去攻击直布罗陀的克雷格船队。但糟糕的天气迫使他返回卡塔赫纳，随后便被"奥德与纳尔逊正在附近"的流言困在了港里。拿破仑没能看出这则传言的舛误，他又将之纳入了自己的行动图景。对他而言，这意味着在乌桑特位置上削弱敌军的又一个机会已经出现。密歇希现在可以去北海与泰瑟尔岛外进行武装游行，马尔蒙也要在陆地上做出积极行动的样子，以吸引英国政府的注意

力。但这一切纯粹是基于他的幻觉。由于英军在加迪斯与卡塔赫纳之间的内线位置，分处于两侧的这两支舰队既不能会合，也无法牵制住比它们更强的英军。一周后，萨尔塞多再次试图前往加迪斯，在接到警报后又惊惶地钻回了母港：科林伍德已经抵达，英军重夺海峡出口处的制海权。[21]

但拿破仑的乐观情绪仍然没有衰减，他仍旧认为自己已让敌人完全陷入了混乱，打散了他们的兵力集结。他已听说由12艘战列舰组成的快速舰队已从乌桑特舰队中分出，尽管英方公报已宣称其目的是封锁加迪斯，但他仍旧相信其真实目的地远在印度。他对纳尔逊也是同样的乐观，尽管不知道其确切位置，却完全相信后者就在英国本土海域或者地中海，而密歇希的行动一定能打乱敌人的阵脚，从而让他得偿所愿。他重复道："从任何方面看来，伦敦海军部都已陷入了犹疑和混乱。相悖的命令，优柔寡断，这就是他们的实际状态。"[22]

然后，这些让他暗自欣喜的"相悖的命令"却并不混乱。英国海军正在重建因维尔纳夫舰队的出逃而改组的漫长封锁线。他们精密地调整了环环相扣的各个环节，如此稳健地把握着平衡，以简练的手法应对每一种可能性，而每一招反制都巧妙地抵达了他们预计的位置。从泰瑟尔岛到卡塔赫纳，他们的链条开始缩紧了。脱身乏力的各处舰队再也无法突破封锁——而拿破仑正要用它们组建起他的大舰队。

---

[1] *Naval Chronicle*，xii.205，and ix.201，里面有钻石礁的草图。

[2] 查尔斯·勒内·马贡·德·梅迪纳（Charles René Magon de Médine，1763～1805年），法国海军将领。贵族出身，法国革命爆发后长期在印度洋作战。1798年返回法国，1801年年末参与了重夺叛乱殖民地的圣多明各远征，因表现出色晋升少将。1803年时负责指挥布洛涅的运兵船队的一部，曾在演习中损失数十艘船只，但也击退了英军的数次袭击。1805年3月改任罗什福尔舰队司令，率战列舰"阿尔赫西拉斯"号（Algeçiras）与"阿基里斯"号（Achille）前往西印度群岛与维尔纳夫会合，参与了随后的所有行动。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因身中三弹而战殁。——译者注

[3] Desbrière，iv.607.

[4] Napoleon to Decrès，April 12th，and to Lauriston，Cambacérès，Talleyrand，Murat，Pino，and Decrès，April 13th：*Corrctpondanct*，x.312-320.

[5] 多明戈·佩雷斯·德·格兰达加纳·塞拉（Domingo Pérez de Grandallana y Sierra，1753～1807年），西班牙海军将领。早年曾长期与北非海盗作战，因表现出色而成为西班牙海军入役年限最短的舰长。曾参与圣文森特海战等一系列战斗。自1802年起被时任海军大臣的重臣曼努埃尔·戈多伊推举为战争委员会顾问。1804年对英宣战后重返海军，任西班牙费罗尔舰队司令，并被戈多伊视为出任西班牙舰队总司令的合适人选。但拿破仑在1805年6月的信中要求由法国的古尔东少将作为费罗尔港内舰队的总司令，并希望由曾担任驻法大使的格拉维纳担任西班牙舰队总司令。当年8月联合舰队驶入费罗尔后，格兰达加纳与格拉维纳产生争执，在舰队出航前被解职上岸。后在马德里担任国务委员，直至去世。——译者注

[6] Napoleon to Lauriston，April 13th，and to Villeneuve and Decrès，April 14th：Ibid.，pp.314，321.

[7] Decrès to Villeneuve，April 17th：Desbrière，vol.iv，p.513.

[8] Desbrière，iv.518.

[9] Napoleon to Talleyrand，and same to Decrès，April 23rd：*Correspondance*，x.338-9.Same to same，May 4th：Ibid.，p.375.

[10] Napoleon to Decrès，April 23rd：*Correspondance*，x.339-341，and Desbrière，iv.522.

[11] 即象征意大利王权的伦巴第铁王冠，据说内含耶稣受难时所用十字架的铁钉，是重要的基督教圣物，也是欧洲最古老的王室象征物。——译者注

[12] For all the above orders，see Desbrière，iv.iii.，chapters 7 and 9.

[13] 典型的例子是1653年英国与荷兰海军间进行的莱戈恩海战（Battle of Leghorn），参见*England in the Mediterranean*，i.265 et seq。

[14] Beurnonville（French ambassador at Madrid）to Talleyrand，May 14th and 16th：Desbrière，iv.578-81.

[15] 即小安的列斯群岛，英国官方文件中称之为“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See *England in the Seven Years’ War*，i.352.

[16] Napoleon to Decrès，May 25th and June 8th.

[17] 关于上面提及的5月25～28日的信件可参见 *Correspondanece de Napoléon* ，x.441-454。英国舰队的射击可能是由于收到了普雷沃斯特在多米尼克击退敌军攻击的消息。

[18] Desbrière，iv.596.德克雷特别指出了5月9日的《记事晨报》（*Morning Chronicle*）、16日的《太阳报》（*Sun*）。5月至6月刊号的《海军记事》（*Naval Chronicle*，vol.xiii.p.484）也写道，拿破仑意图用60艘战列舰“清扫海峡”（balayer la Manche）并与英军作战，同时用巡洋舰队掩护陆军渡海。

[19] Desbrière，iv.596.这份文件是一份未完成的手稿。

[20] Desbrière，iv.599.德斯奇霍上校注意到了这份不同寻常的文件：“尽管它对纳尔逊性格的推测是完全错误的，但这封信仍值得我们致以最高的敬意，它的预测几乎完全准确地成了现实。”德斯奇霍似乎把德克雷对纳尔逊的评价当真了，但这看起来是没有根据的。很难相信这样一个能够高明地指出拿破仑的战略失误、精确洞悉英方企图的人，会这样糟糕地误判敌方重要人物的性格。考虑到拿破仑身边的军官们对他的敬畏，德克雷不会去直接反驳皇帝对纳尔逊的肤浅看法，而会选择另一种更安全的、能够取得预想结果的方式。

[21] Beurnonville to Talleyrand，June 13th and 17th：Ibid.，p.622.

[22] To Decrès，Jane 14th：Desbrière，iv.612.

第十章 重掌费罗尔与直布罗陀海峡

在拿破仑依靠狂热的幻想做出回应的同时，巴勒姆勋爵冷静推演出的命令与英军指挥官自信的机动则让这场战役中的英方展现出极其老练的一面。

英国海军部起初并未意识到密歇希的返航是敌人的失误，他们最初时认为，法军并没有在西印度群岛发起重大攻势或集结舰队的意图。他们甚至设想维尔纳夫可能根本不打算去那里，于是立即向科林伍德发出命令，让他在得到新的命令前不要驶过马德拉群岛。出于同样的原因，皮特决定不再将艾尔·库特的部队派往西印度群岛。他担心远征军已经出发，便匆忙致信接替加德纳掌管爱尔兰舰队的德鲁里（Drury），让他制止或召回远征船队。[1] 维尔纳夫前往印度的可能性也如同拿破仑所希望的那样浮现在英方的脑海中，但在得到最为可靠的证据之前，英国政府绝不会在那样遥远的海域虚掷兵力。他们只是向东印度舰队司令爱德华·佩留爵士（Sir Edward Pellew）发去了警告。[2]

海军部正式追认了加德纳用自由酌定权扣下格雷夫斯分舰队的行动，并让他将这支部队用于封锁罗什福尔。一旦法国舰队再次出海，格雷夫斯就应当截击或者追踪敌人，无论他们驶向何处。加德纳在6月5日接到了这则命令，此时距离科林伍德出发已有两周时间。而法国海军大臣德克雷到这时才获悉英国乌桑特舰队兵力削弱的消息，他认为这是让冈托姆打破封锁的良机，于是恳求拿破仑下达行动所需的命令。但是，拿破仑并不准备放弃这个目前看来运作良好的新计划。在他清楚明白地看到最终结局之前，他绝不会放弃通过一场奇袭来摧垮敌人的信念。他

向德克雷回复道：“一场战斗能带来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只要简单地将‘英军向罗什福尔港外派出了8艘战列舰，因此严重削弱了他们对布雷斯特的封锁’的消息刊发出去……那么，敌人就会对法军为什么没有利用这一局势而感到不可思议。第二天，另一份报刊里再宣称记者们能被允许发布这些消息真是不同寻常。这样一来，在争论他们的将军是否采取了正确行动之前，他们将会发现，皇帝还掌握着某些尚未交给记者发布的英军指令，这会让他们基于其上的所有讨论都失去意义。”[3]

英军对罗什福尔的迅速行动使拿破仑无法再动用这支舰队，它唯一的用处就是牵制英军的封锁兵力——事实上，这支舰队从各方面看都无法在数周内再次出航，它们物资完全告罄，舰船亟待修理。在密歇希驶入港口的两周之后，格雷夫斯出现在罗什福尔港外。他坐镇于一艘80炮战舰，麾下还有2艘三甲板战列舰以及3艘其他战列舰，拥有比港内敌人强大得多的兵力。当拿破仑接到密歇希返航的消息时，英军已经完成了封锁。但格雷夫斯刚一抵达就看出法国舰队完全不适于出击，他随即请示加德纳，看是否有必要撤回他的舰队，仅在港外留下1艘巡航舰。加德纳的回复表现出当日的海军将领与上级作战指令之间的有趣关系。他并不认为他已得到了能够召回这支舰队或其中任何部分的授权，除非海军部下达特别的命令。最终，他从海军部接到的命令是撤出2艘战列舰，将之用于加强费罗尔港外的考尔德或是他自己的舰队。

费罗尔的情况已经让加德纳颇为担忧。考尔德不断地抱怨道，他手中的兵力不足以看守港内的敌军。除却他的旗舰、三甲板的“威尔士亲王”号，他只拥有1艘80炮战舰、4艘74炮战舰以及1艘不能算成战列舰的44炮舰；而港内的古尔东与格兰达加纳则拥有11艘已做好了出海准备的战列舰，还有3艘战舰的准备工作也接近完成。更糟糕的是，考尔德的1艘战列舰帆索严重受损，另外4艘也亟待修整。加德纳对他的处境极为担心，他曾打算将整支格雷夫斯分舰队派往费罗尔。这样一来，扣除需要返航修理的战舰，考尔德在他的80炮旗舰之外就将拥有10艘战列舰，

其中3艘为三层甲板战舰。通过前文曾述及的战斗力换算方法，这支兵力将强于港内的联合舰队。然而，海军部让格雷夫斯加入科林伍德舰队、之后又将其派往罗什福尔的命令阻止了这一调动。除非让他自己的战列舰低于18艘的底线，加德纳无法再给考尔德派出任何增援。

然而，他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巴勒姆敏锐地注视着局势，已经为此派出了援军。这些命令的性质以及海军将领理解它们的方法都极具参考价值。他们提供了一些典型的案例，揭示出处在关键位置上的英军将领将如何凭借丰富的战争经验在阅读命令时领会其间的自由酌定权，坚决而无畏地在自己的头脑与书面指示之间做出决断。

我们曾在第八章介绍过，巴勒姆在听说维尔纳夫出逃之后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若纳尔逊没有投入追击，奈特的2艘战列舰——为克雷格远征军提供护航的“龙”号与“王后”号——就应与科林伍德的快速舰队一道追击法军；如果纳尔逊已经加入追击，奈特就应将这2艘战舰派往奥德所部——当时他仍以为奥德还待在原来的位置上。这是4月27日的情形。三天之后，他收到了奥德的信件，其显示奥德正在驶回乌桑特岛，信中还包括他对局势的预测，指出敌军的各支舰队有可能在西方某处海域里集结起来。费罗尔港内正待着一支时刻准备出海的大型舰队，加强费罗尔封锁舰队的兵力、给考尔德提供增援因此变得极为迫切。于是，正如前文所述，奈特接到指令，如果他尚未与运兵船队驶过圣文森特角，他就应该返回费罗尔；而如果他已经驶过，就应在直布罗陀将旗舰转设为一艘巡航舰，然后将他的战列舰派给考尔德。若考尔德已经撤除封锁，他们就应加入加德纳所部。

奈特在抵达直布罗陀港时才收到了第一封命令。在那时，纳尔逊已决定留下“皇家君权”号，理查德·比克顿爵士继续以之作为旗舰，而官阶较低的奈特则须听从他的调遣。按照纳尔逊的指令，比克顿将用这支舰队掩护克雷格远征军前往马耳他，再找到黎凡特商船队，任务便就此

完结。依照纳尔逊的指示，比克顿决定待纳尔逊投入追击之后，就将奈特的战列舰留在地中海舰队中。他告诉海军部，他之所以违抗将战舰派给奥德的命令而将之留在自己手下，是本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考虑：海军部在下达这些命令时并不知道西班牙的卡塔赫纳舰队已经完成了准备工作，甚至一度驶出港外。他对这些命令的理解是，如果海军部知道这一情况，便一定会让克雷格的护航兵力留守下来。然而，就在他如此行动之前，他接到了第二封要求增援考尔德的命令。比克顿转而认为，他在此刻已不再享有根据当地情况来自主行动的自由酌定权。他向海军部回复道："我必须放弃之前的目标，服从命令，即便这将把远征船队与贸易航线暴露给阿尔赫西拉斯炮艇与卡塔赫纳舰队。我目前的兵力显然不足以击败这支舰队，他们以拥有5艘战列舰的加迪斯舰队作为后援。……由于我无法通过一场战斗将卡塔赫纳舰队留在地中海内，或是制止其主力与加迪斯舰队会合，所以我觉得我不能不顾各位先生的命令。我认为，他们会将下一步的兵力调配建立在我部战列舰已加入罗伯特·考尔德或加德纳勋爵所部的充足信念之上。"他的行动原则在此得到了清楚展现：在面对明白确切的命令时，处在关键位置上的海军军官并不能行使有可能扰乱战争全局的自由酌定权，除非他看到了统帅部尚未知晓的当地情况，同时有把握对敌方海军发起决定性的打击，或是瘫痪比自身规模更大的敌军部队。[4]

这是一个需要最高尚的统帅品格才能做出的艰难决定。比克顿很清楚当地的处境，他将让一支重要的陆军部队暴露于被歼灭的风险中——加迪斯、卡塔赫纳与阿尔赫西拉斯的敌人很可能联手发起袭击，但他必须服从命令。幸运的是，与他共事的陆军将领也拥有同样高尚卓著的军事品格。比克顿在接到命令后立即通知了克雷格，后者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但仍与比克顿就其眼下唯一能做的事达成了一致。为了清楚阐明情况，他向本土的陆军部寄出信件，保证比克顿的所有决策都曾以"最为亲密和诚恳"的方式与他商议过。克雷格没有一个字眼抱怨过护航舰队的离去，他说："他的行动得到了我完全的认可。"尽管他知道海

军部在下达命令时并不了解敌军舰队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规模与活跃程度，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应该迫使比克顿违反命令。他从奈特与比克顿展示给他的命令中看到，海军部的指示有一个明确的核心要旨，用他的话说，就是“在西部海域集结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兵力在当下的局势中极其重要，为此甚至可以牺牲任何次要的目标”。

没有什么能比这些言辞更能显示出当日海军与陆军中最为优秀的将领是如何相互理解、亲密合作，并完满地把握着海陆联合作战的诸条准则的。大海上的克雷格即将失去护航兵力，敌人正蜂拥而至，他几乎无力抵抗。但他并没有忘记，对英国来说，有一种情形可以牺牲掉其他所有的一切。他从海军部的命令中觉察到，一场极其宏伟的、在关键的战略要点进行的大型舰队行动正在展开。如果是这样，那么，此刻的一切——包括他的远征军在内——都必须为之冒险。他没有退缩，甚至没有吐出一个可能让他的海军同僚偏离其首要责任的字眼。[5] 第二天，5月17日，比克顿与3艘战列舰转舵驶向费罗尔，而奈特则留在直布罗陀港内。他只能用几艘巡洋舰和炮艇竭尽所能地监视着卡塔赫纳，保卫着远征船队的安全。

十天之后，比克顿已接近了菲尼斯特雷，他在那里遇到了科林伍德的9艘战列舰与1艘巡航舰，随即告知后者目前的真实局势。正如我们所知，科林伍德对运用他的舰队享有较大的自由酌定权。两位将军进行了漫长的商讨，讨论科林伍德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依照当地情况变更上级命令。科林伍德从比克顿处得知，纳尔逊仅用10艘战列舰去追击拥有18艘战列舰的维尔纳夫。他还了解到，加迪斯与卡塔赫纳港内都存在着活动中的敌舰队。考虑到纳尔逊与维尔纳夫的兵力差距，再考虑到西印度群岛的科克伦最多仅有6艘战列舰，他应该按照命令在纳尔逊之后再派出2艘战列舰，使英军在背风群岛也拥有18艘战列舰。但在他接到命令后，密歇希已经返航，西印度群岛的敌军已失去了5艘战列舰。他由此决定在接到下一步命令之前暂不分兵。比克顿的紧急报告使他确信，目前的

局势要求他率领全部兵力前往直布罗陀海峡，保障当地的制海权。科林伍德在给海军部的报告中写道：“考虑到卡塔赫纳和加迪斯港内的积极准备以及预计从马耳他驶来的商船队，我应该率领整支舰队前往加迪斯港外待命。”由于海军部在发布命令时尚不知悉卡塔赫纳舰队的情况，科林伍德希望他的上级能认可他对命令的擅自改变。他总结道：“我认为，命令的核心要旨是不让这样重要的一支兵力游离于敌军的行动计划之外。”在这里，我们又能看到一个海军将领如何变更其明确命令的典型案例——授予他的这些命令绝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指令。科林伍德的报告随后得到了海军部的认可：“批准你参照当地情形。”[6]

由于科林伍德同意前往直布罗陀海峡，比克顿派出了他唯一的巡洋舰去向海军部报信。两位将军的信件在6月8日抵达，海军部立即根据他们目前的情况下达了新的命令。前往费罗尔的比克顿将在那里把“皇家君权”号与“龙”号交给考尔德，自己则乘着“王后”号返回直布罗陀海峡，并听从科林伍德的指挥。

此时，英国西班牙舰队由于奥德的撤退已被重新并入西方舰队。科林伍德已成为英国地中海舰队的总司令，他因此而主掌着从圣文森特角到黎凡特的地中海广阔海域，麾下拥有10艘战列舰，再加上保卫那不勒斯的“卓越”号与把守直布罗陀海峡的巡洋舰队。他受命封锁加迪斯与毗邻塞维利亚（Seville）的圣卢卡斯（St.Lucas）。截至此时，顾虑到中立国——特别是美国——的态度，对此的贸易封锁尚未强制执行。但由于附近的军官传来了西班牙船坞正在加紧工作、调动大批物资的紧急报告，现在他必须严格地执行封锁令。

当科林伍德重掌加迪斯外海阵位之时，比克顿——按照纳尔逊的安排——应当负责海峡内侧的区域。他同时要经常向科林伍德汇报，并服从后者的调遣。他的首要任务是护送克雷格远征军，因此，科林伍德准备将他们的兵力平分，拨给他4艘战列舰。[7]

但这一安排并未实现。6月8日，在海军部为他们下达新命令的那一天，科林伍德已经与比克顿分别抵达了加迪斯港外。此时，他又重新考虑起先前推迟增援纳尔逊的决定。他想到，科克伦也可能像纳尔逊那样追踪密歇希回到了欧洲海域。科克伦的离去将严重削弱英军在西印度群岛的兵力，而为了应对这一可能，科林伍德决定向巴巴多斯派出2艘航速最快的74炮战舰。于是，在6月22日比克顿从费罗尔驶来再次与他相遇时，他手中的战列舰已由之前的9艘下降到7艘。加迪斯港内有2艘一级战列舰与2艘双层甲板战舰，他的封锁兵力因此需要4艘战列舰。于是，他将3艘战列舰交给了比克顿，加上“王后”号，比克顿便也拥有了4艘战舰。科林伍德向海军部解释道，这支兵力虽然比卡塔赫纳舰队要弱，但他确信，这足以让萨尔塞多在那不勒斯的“卓越”号加入比克顿之前不敢出击。比克顿率领这支舰队又一次与科林伍德分离，于两天之后再度出现在直布罗陀港外。[8]

比克顿的出现正当其时。自他离去后，奈特与克雷格无时无刻不感到焦虑万分。正如我们所知，科林伍德的及时到来拯救了远征军，使之免受萨尔塞多的侵袭。但这并不意味着麻烦的终结：在直布罗陀港湾的另一端，阿尔赫西拉斯炮艇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奈特竭尽所能地利用着他的小型舰艇，他让远征船队以密集阵型下锚，亲自指挥1艘巡航舰与业已返回原位的“猎兔犬”号轻帆船进行掩护。他还让1～2艘武装双桅船与炮艇在周围巡逻，并设置了夜间警戒哨。指挥葡萄牙舰队的坎贝尔也在直布罗陀港湾内下锚，西班牙人就此控诉他有意掩护运兵船队，而他显然也为奈特提供了他力所能及的所有消息。截至此时，这支秘密远征军已经暴露在敌方视域之下长达一个月之久，日趋恶化的局势似乎已不可能再有转机。直布罗陀总督福克斯将军（General Fox）接到情报，称敌军在数日之内就将发起攻击，而阿尔赫西拉斯炮艇的数量已达到40艘，还有许多待在卡塔赫纳。福克斯、克雷格与奈特就此进行了一次联合会议。奈特建议从陆军部队中拨出一些兵员补充给他的巡洋舰，并武装几艘运输船，然后让整支运兵船队出海，由他乘着1艘巡航舰进行指

挥。两位陆军将领也赞成他的提议，于是，远征船队就这样利用一个“良好的天气”驶向海峡东面。[9]

奈特的策略完全奏效。运兵船队并未遭到阿尔赫西拉斯炮艇的袭击，而科林伍德出现在加迪斯外海的消息也成功慑止了卡塔赫纳舰队。其实，萨尔塞多毫无出海进攻的打算，反而是忙碌地组织着港口防御——福克斯听说的那些炮艇正是为了保护港口而装配的。事实上，自克雷格远征军从里斯本起航以来，整个安达卢西亚（Andalusian）[10]地区都在全神贯注地准备抵抗英国的入侵——他们认为克雷格似乎准备对西班牙南部某处发起突袭。[11]

在这种情况下，比克顿率领战列舰队回到了远征船队的身边。6月25日，他不待下锚，就率领远征船队乘风驶出了直布罗陀海峡。他驶近非洲海岸，在此派出“猎兔犬”号去侦察萨尔塞多的动向。“猎兔犬”号在卡塔赫纳以东的提奈斯角（Cape Tenes）[12]重新归队，报告萨尔塞多所部仍在港内下锚。于是，奈特决定用3艘巡航舰继续护送克雷格，而他自己则离开运兵船队，与比克顿一道在卡塔赫纳港外组建掩护舰队。[13]

在拿破仑那些活跃而未被击败的舰队面前，英军最终保障了远征航线的安全，皮特已经为欧洲大陆上的联合围剿迈出了第一步。而在克雷特船队安静地行进的同时，拿破仑也在西方的大海上全力组织着反击。侵英舰队的大集结开始了。

---

[1] *Out-Letters*（*Secret Orders*），1363，May 30th.

[2] *Out-Letters*（*Secret Orders*），1363，June 4th.他被告知，海军部得到情报，土伦舰队已在4月10日离开加迪斯，“尽管概率极低，但它们要前往东印度或者开普敦的可能性目前已有所提高”。海军部此前也曾向他发送过类似的警告。

[3] To Decrès，June 16th.

[4] *In-Letters* ， 410，Bickerton to the Admiralty，May 14th and 16th.Knight to same，May 15th.比克顿的上一封信已被记录在案：“准许他按照他所处的局势行事。”

[5] Craig to Lord Camden，May 16th：*W.0.*（*1*），*In-Letters* ，280.All Craig’s despatches go to confirm the judgment of his enthusiastic young admirer，Ensign Charles Boothby.“The name of my new chief I had long known；for his fine person and dark flashing eye had been pointed out to me when a boy as belonging to the finest officer in the service.” *Under England’s Flag* ，p.3.

[6] Bickerton to Admiralty and Collingwood to same，May 27th，off Finisterre：*In-letters* ，410.

[7] *Secret Orders* ，1363，June 8th.

[8] Collingwood to the Admiralty and Bickerton to same，June 24th：*In-letters* ，441.比克顿麾下的战舰包括98炮战舰“王后”号、80炮战舰“雷鸣”号、74炮战舰“柏勒洛丰”号（Bellerophon）与74炮战舰“米诺陶”号。卡塔赫纳舰队据称拥有2艘一级舰、3艘74炮舰与1艘64炮舰。另外，比克顿从未将“卓越”号收入麾下。他在7月30日致纳尔逊的信中说：“我尚未从那不勒斯调走‘卓越’号，此外，我也不确定要让它在哪里与我会合。我不愿破坏您的部署。”参见*Nelson Papers* ，*Add.MSS.* 34930。自1805年1月17日至1806年2月11日，除了偶尔出海操练或进行炮术训练，“卓越”号都一直待在它原先的锚地。*Log of the Excellent.*

[9] Knight to the Admiralty，June 17th，enclosing Fox and Craig to Knight，June 13th，Fox’s information，and Craig to Knight，June 15th：*In-letters* ，441.Craig to Lord Camden，June 17th：*W.O.* （1），*In-letters* ，x280.Boothby，*Under England’s Flag* ，p.20.Bunbury，*The Great War* ，p.189.Knight to Nelson（enclosing his journal），July 16th：*Nelson Papers*，*Add.MSS.* 34930.

[10] 即西班牙最南部的沿海地区。——译者注

[11] Beurnonville to Talleyrand，Madrid，June 18th：Desbrière，iv.625.

[12] 今阿尔及利亚北部港口。——译者注

[13] Bickerton to Admiralty，July 28th：*In-letters* ，411.

第十一章 西印度群岛的行动[1]

纳尔逊最后为英国本土所知的消息是他与克雷格分别三天之后寄出的信。那时他正要驶向马德拉群岛，他向海军部简短地保证道，即便联合舰队并未前往西印度群岛，他也能在6月底——在敌军获知其真实动向之前——返回加迪斯。接着，他会留下足以完成任务的战舰，随后返回英国。[2] 他对于这一行动的自信、对于一支方位不明的舰队的威慑力的判断完全得到了事实的证明。我们可以看到，拿破仑始终认为他没有离开欧洲水域，而在法军指挥部确证他的离去并展开行动之前，他已在直布罗陀再次出现。

英国陆军大臣卡姆登勋爵曾让纳尔逊与克雷格合作，并让他向克雷格提出建议。因此，纳尔逊也一道给卡姆登写下一封长信，解释了目前政治局势的困难所在。出于在上一次战争中的实践经验，纳尔逊认为，让克雷格一次性地将部队卸载于西西里将会酿成大错。这样的行动只会给法军提供攻向那不勒斯的信号，那不勒斯国王显然不会同意。但如果是法军首先行动，国王就会欢迎英军的到来。纳尔逊在这则建议中的看法与英国政府高度一致，而他唯一多说的只是督促英国政府保卫撒丁岛的安全。[3]

纳尔逊向英国本土传达的最后信息是为了保护他所离开的那片地区。为此，他已经竭尽所能，做到了当日局势所要求的一切。说他轻率地放弃了地中海，实在是误解了他的谨慎用心。从战略层面上着眼，他的使命在此时已然十分明了：从今往后，他可以全神贯注于西面大洋上发生的一切。

纳尔逊已经着手了。在之前的几天中，考虑到可能与维尔纳夫的强大舰队相遇，他起草了一份战术备忘录，让“亚马孙”号的帕克舰长在5月15日将之分发给整支舰队。[4] 这则备忘录的内容现在已无从稽考。纳尔逊的首批传记作者克拉克与麦克阿瑟认为，这则备忘录就是他们在圣文森特勋爵文集中找到的一封文件，哈里斯·尼古拉斯爵士（Sir Harris Nicolas）在收集纳尔逊的书信时也沿袭了这一看法。但是，这封文件并未署上时间，很难说就是当日的产物。就其内容证据而言，纳尔逊起草的这份文件是为了用一支兵力相当的舰队对抗11～12艘敌舰，而在当日情境之下，他面临的挑战则是用一支劣势舰队对抗兵力强大得多的敌军。他在几天之前给阿克顿[5] 的信中写道：“西印度群岛的敌军拥有24艘战列舰，而我部兵力处于极大的劣势。我只能率领10艘战列舰，并且只能期待还有6艘战舰能加入我们。”[6] 此处所指自然是科克伦的舰队，当时的普遍看法都认为他的6艘战舰在纳尔逊抵达西印度群岛后就将加入其队伍。5月15日战术备忘录的遗失的确是十分可惜的，它记载着纳尔逊在此时对付一支优势敌军的想法。在海军史上，鲜有什么文件能比它更具价值。

为了确保与科克伦舰队的联合，他在圣文森特角派出了1艘巡航舰；而这一次，西印度群岛的复杂局势却要让他失望了。[7] 从费罗尔出发、追击密歇希舰队的科克伦于4月5日抵达巴巴多斯，比纳尔逊从直布罗陀海峡出发早了一个多月。在这里，他听说敌舰队正在邻近的圣多明各；出于对当时情境、命令要旨与个人倾向的综合判断，科克伦决定继续追击敌军，以确保牙买加的安全。他没有花费时间——甚至都没有下锚——从胡德准将那里接掌背风群岛地区的正式指挥权。他仍旧让胡德担任当地司令官，只是将战列舰“斯巴达人”号（Spartiate）划拨给他，为他的巡洋舰队提供支援，帮助他坚守岗位。他随即率领剩下的6艘战舰投入火热的追击中，企盼着与敌舰队相遇。[8]

4月9日，科克伦抵达了维尔京群岛的圣托马斯，并在那里确信密歇

希已到圣多明各卸载了战舰搭载的部队。他还听说法军正等待着第二支远征军，由法西联合舰队对牙买加发起攻击。这则消息是科克伦无法忽视的。科克伦做梦也想不到密歇希已经返航罗什福尔，而是相信他肯定已在返回马提尼克的途中，并在等待着与从法国开来的援军会合，以投身到那场大规模袭击中去。如果能在半路上截击密歇希，他就能将法军的集结扼杀于萌芽之时。于是，科克伦选择原路折返，驶过波多黎各岛以南，进入莫纳海峡（Mona passage），守候在波多黎各与圣多明各之间。他在这里时刻等着敌人跌进他设下的圈套。然而，密歇希并未出现，而科克伦得到的所有情报都指出，牙买加正处在愈发急迫的危险里。于是，他认为现在只有按照海军部的指令行事。海军部指示道，如果在他抵达之时听说罗什福尔舰队已经去了圣多明各，就应该用6艘战列舰增援牙买加，科克伦由此决定率全部战舰前往那里。[9] 由于他自己并不准备待在牙买加，这个决定意味着他要将麾下的所有战舰移交给当地指挥官，将旗舰转移到一艘巡航舰上，这需要他表现出极强的忠诚，做出极大的牺牲。他在背风群岛等候了几天，将6艘战舰中的5艘移交给戴克斯将军。不过，他与戴克斯都没有巡航舰可供转乘之用，于是，在4月25日时，科克伦只能乘着80炮的旗舰“诺森伯兰”号（Northumberland）费劲地返回巴巴多斯。

在5月14日法西联合舰队抵达马提尼克之时，这就是西印度群岛的兵力态势。当地的法国陆军立即要求维尔纳夫对英国岛屿发起攻击，但维尔纳夫却面临着许多困难。首先，他在出航时携带的命令严格要求他去皇家堡（Fort Royal）[10] 等待着与随时可能出现的冈托姆会合。他怎能在此时投入两栖作战？其次，他还面对着位置不明的敌舰队的威胁。他接到报告，一支强大的舰队正在圣多明各与波多黎各附近。这当然就是科克伦的舰队，但位于马提尼克的法军对其阵营、位置和兵力都一无所知。这是不是英国认定他的目标是牙买加并随即派出的追击舰队呢？这是维尔纳夫最初的直觉，而他也不可能得到确切的答案。除此之外，现在还有什么目标可供他安全地发起袭击？他只能企及多米尼克与圣卢

西亚，但两者都驻扎着守军，而密歇希在多米尼克的新近战例也说明，他们无法通过奇袭将之攻取。维尔纳夫实在找不到什么机会来打发长达四十天的等待时间，只决定派出3艘巡航舰出海梭巡以打击英国贸易，并努力搜寻关于当地船只与欧洲派遣舰队的情报。

接着，维尔纳夫将注意力转移到了钻石礁上。“舰长”莫里斯与他的“船员”仍在这艘所谓的“轻帆船”上积极地对抗着敌军。他们升起法国国旗，引得1艘落后于维尔纳夫的西班牙战舰靠近礁石，随即用24磅炮一阵痛击。这次成功的欺骗战术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攻击，这已超出了法西联军的忍耐极限。在3艘巡航舰出发的一天之后，维尔纳夫派出了一支分舰队，其中包括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与12艘搭载着陆军部队的炮艇，由74炮战舰“普鲁托”号（Pluton）的舰长科斯莫[11]担任指挥官。5月31日，他们终于抵达了登陆位置。面对着拥有压倒性兵力优势的敌军，莫里斯放弃了海滩上的炮台，将他的全部“船员”撤离到崖石峭壁之上。法军立即展开登陆，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已陷入窘境。他们没有云梯，完全无法企及莫里斯所处的位置；他们的登陆部队已经晕船了两天，正处在饥饿中；而防御者的石块与枪子儿又如雨下，使登陆部队无法从舰队那里取得食物和饮水。即便是海滩上守卫炮艇的士兵也无法坚守阵位，许多人或死或伤，只能逃到崖石下的洞穴中暂且安身。这些围攻者转眼竟成了被围攻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炮艇随波逐流，最终撞碎在礁石上。海上的战舰日复一日地轰击着守军，但在云梯抵达之前，他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25名士兵尝试着用绳索登上峭壁，最后却都成了英军的俘虏。

莫里斯的抵抗绝不是毫无价值的。就在法军开始攻击钻石礁的那天，法国巡航舰“迪东”号抵达了马提尼克。正如前文所述，它是在马贡将军于5月1日驶出罗什福尔的两天之后出海的，它携带着马贡所领命令的副本和拿破仑在4月29日制定的新命令。它带来的消息是，尽管冈托姆时刻盼望着出航，但他仍然待在布雷斯特；而纳尔逊则去了埃及，维

尔纳夫的行动将不会受到他的干扰。维尔纳夫还听说，马贡已经率领2艘战列舰与800多名士兵从罗什福尔驶来，将要与他会合，使他“能继续攻击英国殖民地”。这则命令告知他要如何使用马贡到达之后的三十五天时间，而如果时限已至但冈托姆仍未出现，他就应返回费罗尔，而不是之前命令所要求的加那利群岛。拿破仑认为，算上当地的部队，这样的布置将使得西印度群岛聚集起20艘战列舰与12000人的兵力，具备了将英国势力从整个背风群岛甚至特立尼达驱逐出去的可能性。然而，这则命令的结尾却是一则限制性条款：这些行动必须“服从于皇帝陛下重要战争行动的伟大目标”。

维尔纳夫被拿破仑的新命令惊呆了：新的命令竟假设他在领命之时已经开始攻击英国岛屿。显然，拿破仑忘记了在2月22日下达给他的最初命令。维尔纳夫到此时才被告知要袭击英国殖民地，而之前的命令则严格要求他只能时刻等待着冈托姆，与之会合后再展开袭击。他在回信中写道，如果他之前得到了通知，肯定已采取了行动，但现在为时已晚。英国人已从奥德派出的巡洋舰那里得到了他们出击的预警，各地都已做好了防御。他试图夺取一块小小的礁石，已经花掉三天时间；原始计划的四十天时间中，十五天已经逝去。而利用马贡到达后的三十五天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物资储备将消耗殆尽。他向他那位令人恼火的上级写道：“我似乎看到您在谴责我之前的无所作为，但唯一束缚我的东西就是发给我的那些命令……我只能说，这不是我承担得起的。虽然如此，一旦我们拿下了钻石礁，就会向安提瓜或巴布达发起攻击。”[12]

与此同时，围攻钻石礁的行动仍在继续。直至6月3日，法军才终于取得进展。在那一天，法军终于取得了必要的攀缘工具，成功地从背面爬上了那块崖石。面对法军的突击，莫里斯已经弹尽粮绝。继续抵抗已经没有意义了，他打出休战旗，让他的士兵怀揣着作战的荣誉走出据点。在法国方面的记录中，他的有效兵力是107人，损失为2死1伤。法军登陆部队为260人，但莫里斯认为，从围攻开始到结束，累计有1500

名法军登上海岸，其中30死40伤，而按照法方说法，至少有50人或死或伤。毫无意外，这是一场勇敢而有效的防御战。当莫里斯因最终放弃“英王陛下的轻帆船钻石礁号”而走上军事法庭时，他被光荣地宣布无罪，并得到了审判者的最高敬意。[13]

法国分舰队在钻石礁陷落的一天之后重新与维尔纳夫会合，而马贡所率领的2艘战列舰也在此时出现。维尔纳夫不想再浪费时间，立即准备向北方的安提瓜或巴布达发起攻击。然而，就在他如此行动之时，甚至就在马贡刚刚加入他的舰队之时，英属巴巴多斯的海岸炮台却传来了礼炮的轰鸣：纳尔逊所率领的英国地中海舰队已经到来了。

纳尔逊的跨洋航行将他与法西联军之间的时间差缩小了10天，他自己甚至还认为缩得更短。巴巴多斯的鸣炮是为了礼送他再次出击。他在那里并没有找到预想中的6艘战列舰，只遇到了科克伦和他的“诺森伯兰”号。“诺森伯兰”号是在两天前才从牙买加驶来的，当天夜里，战列舰“斯巴达人”号也来到这里。它接到了海军部所转发的奥德的预警以及新命令，要求它掩护艾尔·库特爵士的西印度远征军——但这次远征已在5月30日被取消了。于是，它在附近的上风位置梭巡，寻找着从本土驶来的运输船队。纳尔逊让这2艘战舰加入了他的队伍，他的麾下便拥有了12艘战列舰，而根据当地情报，敌军的战列舰数量据信为18艘。这则消息无疑是令人失望的，纳尔逊的兵力比他的敌人弱了三分之一，但这并未阻挠他的求战热情，他唯一想知道的就是在哪里可以找到敌军。

巧合的是，一天之前，圣卢西亚的英军指挥官布里尔顿将军（General Brereton）送来了一则情报。据其下属称，他们曾在5月28日的夜间发现敌军舰队驶过了圣卢西亚西北部的格罗斯岛湾（Gros Islet bay），布里尔顿认为，这意味着敌人将对巴巴多斯或特立尼达发起袭击。对于这则错误的消息，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格罗斯岛湾的英军观察哨在夜间错将法军先期派出的3艘巡航舰认作了维尔纳夫的主力舰队。当

地的指挥官迈尔斯将军（General Myers）对此并无怀疑，立即让他的军事秘书将之转发给纳尔逊。既然敌人并未出现在巴巴多斯，那么，他们就很可能去了特立尼达，截至此时，他们很可能已经让部队登岸了。迈尔斯因此建议，让纳尔逊带上他所能动用的2000名士兵。这将使他的出发推迟一天，而纳尔逊并未拒绝。“我无法拒绝这样慷慨的提议，”纳尔逊写道，“因为，在上帝的护佑下，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来怀疑。敌人的舰队和陆军都将遭到歼灭。”

他原本希望去北方搜寻敌军，但这则情报看上去十分准确，让他无法置之不理。[14] 他在早年的地中海战事时就已结识了布里尔顿。后者曾是一位积极能干的参谋军官，参加过科西嘉的相关行动，让纳尔逊觉得值得信赖。第二天，在迈尔斯与他的部队匆匆登船之后，纳尔逊率军航向特立尼达，对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斗寄予厚望。

在等待的间隙中，纳尔逊制定出一个极为有趣的战斗阵型，其中也包括科克伦的2艘战列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特拉法尔加海战所采用的那种战阵的原型，二者之间至少有两处关键的相同点。首先，类似于特拉法尔加海战前著名的战术备忘录，这是一个将舰队分为两支分队的“航行与战斗阵型”，是从当年3月他在帕尔马斯湾所制定的阵型修改而来。其次，他的重型战舰并未如通常情形一样分散在舰队的各个位置，而是集中于他自己所在的那支分队的前端。这种新式的布阵思想源于法国海军战术家比戈·德·莫罗盖，由罗德尼首次引入他的信号手册，继而被纳尔逊首先投入使用。就目前所知，这一阵型命令并没有附随什么战术备忘录，也没有任何明确的暗示表明他准备以两条独立的纵队投入战斗。但这种阵型的确与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那种情况颇为相似，也的确会造成与之相似的交战形式。[15]

6月6日，英国舰队以这种新阵型驶向多巴哥，其正位于从巴巴多斯前往特立尼达的航线上。贝特沃斯舰长（Captain Bettesworth）的双桅快

船“好奇”号（Curieux）被派往前方搜集情报。次日，他在多巴哥外海遇到了纳尔逊，为他带来了重要的消息。一天前，一艘美国船告知多巴哥的官员，他曾在圣文森特角遭到法国舰队中的一艘战舰的登船检查，对方随后驶向了南方。这则情报显然是错误的，有可能是想故意误导英军。但不幸的是，英国舰队随即又看到另一艘民用纵帆船向他们打出信号，意为敌舰队正在特立尼达。纳尔逊的运气在此刻坏到了极点。事实上，那并不是打给他们的信号，而是一位多巴哥商人的自编旗语。这位商人急于知道海军舰队在何方，并派出自己的下属前去探看。其旗语意为发现英国舰队，其形式却正好与科克伦所拟定的、意为敌舰队在特立尼达的海军信号相同。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向我们揭示出私人旗语在战争中可能造成的危险。这一事件打消了纳尔逊的疑虑，他打出准备战斗的信号，立即加速向前。当特立尼达进入他的视野时，他又错误地将海滩上的英军哨所认成了敌军哨所，按照常理，英军会撤退到主要阵地，从他们后方的碉堡开火射击。昏暗清晨中的火光填补了推理的最后一环，纳尔逊完全确信敌军已经在此登陆。他穿过龙口海峡（Dragon’s Mouth），驶进帕里亚湾（Gulf of Paria），准备在面前的这处西班牙海港里迎接第二场尼罗河口海战。

然而，当他们驶入港口后，却发现这里连敌舰的影子也没有。那些情报看上去是那样确切，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纳尔逊一个字也没有多说。他的自控力是令人钦佩的，他性格中最好的一面在此时显露了出来。他将先前的所有情报弃之不顾，立即转向，决心完全依照自己的判断来作战。

6月8日清晨，在再次穿越龙口海峡时，纳尔逊接到了莫里斯“舰长”写来的信。莫里斯在信中说，钻石礁即将陷落，而联合舰队尚未离开马提尼克。他们还有希望。此外，莫里斯还告诉纳尔逊，自己抓的那些俘虏向他保证，法国费罗尔舰队最近已与维尔纳夫舰队会合。纳尔逊知道这有可能是假消息，但写信给他的莫里斯肯定是第一手的见证人。

他在写给巴巴多斯总督的信中说："我对费罗尔舰队到达的消息抱有怀疑态度……但是即便如此，像他们这样强大的一支兵力绝不可能不受挂碍地展开任何大规模攻击。我军紧凑灵活，而他们则十分笨拙。我绝不相信维尔纳夫或格拉维纳有能力演奏这把极其精妙的小提琴。"[16]

纳尔逊对一支活动中的存在舰队（fleet-in-being）的威慑能力有着最为深刻的理解。他率军北上，试图为他的理论做出证明。第二天，他接近了格林纳达，莫里斯关于敌军尚未行动的消息似乎得到了证实。但没过多久，他又遭遇了一艘来自多米尼克的巡洋舰。这艘巡洋舰带来了新的消息：在三天前的6月6日夜间，有人看到整支联合舰队在瓜德罗普的最南端转舵向北航行。纳尔逊下令升起满帆，用最快的速度赶往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与安提瓜之间的海域。他在寄回海军部的信中写道："无论他们的目标是安提瓜、圣基茨（St.Kitts）或是回欧洲去，到时自见分晓。"

这一次的情报总算没出差错。6月5日清晨，正当纳尔逊转向南方、航向特立尼达时，维尔纳夫已开始向北行进，其意图正如他在官方报告中所述："我准备对巴布达岛发起攻击。"[17] 联合舰队从多米尼克背风的一侧驶过，在那里遇到了一支英国商船队。它与它的护航舰处在锚地炮台的掩护之下，而法军并未发起攻击。维尔纳夫执意要去瓜德罗普再搭载一个营的兵力，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后才朝着他的目标进发。6月6日夜间，当纳尔逊正在多巴哥附近时，维尔纳夫已穿过了蒙特塞拉特与安提瓜之间的水道。他在官方报告里接着写道："上午10时，在抵达安提瓜之后，我们听说在北偏西的方向有一支由14艘船只组成的商船队，仅由1艘纵帆船提供护航。我下令进行全面追击，到夜幕降临时，我们已俘获了除那艘护航舰之外的所有船只。"[18]

除钻石礁之外，这支被俘获的商船队就是被拿破仑寄予厚望的西印度行动的唯一战果。这是一支要驶向英国本土的船队，它以常规方式集

结于圣约翰水道（St.John’s Road）与安提瓜，等待着正规护航兵力与船队的另一部分从南方驶来。法国罗什福尔舰队已经与维尔纳夫会合，联合舰队与10000名士兵正要攻击这处岛屿。商船主们一听说这则消息，便立即陷入了不幸的慌乱。他们恳请当地总督从当地的舰队中抽调护航舰，并立即让船队出航。在总督的要求之下，圣约翰水道军阶最高的诺斯舰长（Captain Nourse）决定派出由尉官船长威廉·卡尔（Lieutenant-Commander William Carr）指挥的“奈特雷”号（Netley）纵帆船，由他护送船队返回英国。[19] 然而，惊惶出海的他们却一头撞上了维尔纳夫的枪口。卡尔自然无能为力。面对着进逼的敌方巡航舰，他只能打出信号，让商船分头逃窜。“奈特雷”号继续监视着敌军，直至遭到敌军炮击，被迫逃开。2艘巡航舰在他身后紧追不舍，而在逃跑途中，他眼睁睁地看着英国商船被法军逐一夺取。太阳落山时，他终于甩掉了追击者，但整支商船队已难逃覆灭的命运。

作为一位年轻的军官，卡尔面前的处境对他来说极为艰难。虽然他已不再需要护送船队，但他手里还有一封他的上级诺斯舰长寄给海军部的信。另外，他已弄清了敌舰队的位置及其大致兵力。他应该把那封信带回英国，还是把他偶然得到的这个重要消息带给纳尔逊呢？在这个困境中，他决定采取非常措施，私自拆开了诺斯的信。他发现，信中只是诺斯对派出“奈特雷”号返回本土的解释。他打消了所有疑虑，明确了其职责所在，立即决定调头去寻找纳尔逊。[20]

几乎在同一时间，维尔纳夫也得到了一则同等重要的消息。他从英国俘虏口中得知，英国地中海舰队已经抵达巴巴多斯，并拥有12～14艘战列舰。维尔纳夫长期以来最为担心之事竟然成为现实，他的战意因这一打击而完全熄灭。他在报告中如此写道：“这支舰队再加上科克伦将军的兵力，即便不比我们的联合舰队更强，也与我军相当。他们的单舰实力更强，其中有好几艘是三层炮甲板的战舰。”在他看来，他们已无法再对英国领土展开任何攻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返回马提尼克，花

时间休整舰队——“令人痛苦的无所作为已经给船员们的健康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随后返回欧洲。然而，即便是用十天时间进行休整，他们仍有可能被英军发现，被迫与之交战。在战斗之后，他们又将无处修整；因此，即便在海战中取胜，他们也将无法返回欧洲。维尔纳夫发现，拿破仑这个思虑欠周的计划的一处致命缺陷已经无可避免地出现在他面前。忧心忡忡的他只好找格拉维纳共同商量，而西班牙水手的健康状况让他们只能做出一个选择：无论冈托姆是否会出现，他们都应该尽快地驶回欧洲，不能再浪费任何时间。他们将夺取的战利品匆忙搬到1艘巡航舰上，又让舰队中的陆军部队挤上另外4艘巡洋舰，将他们运回原先的驻地。6月10日，法西联合舰队再次起锚，全速开往亚述尔群岛（Azores）。

在这个案例里，处于惊恐之中的指挥官的虚弱意志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而一支位置不明且积极活动的舰队的威慑能力也得到了最为清楚的彰显。维尔纳夫身边的一位军官如是写道：“我们控制了这片海面长达三周时间，并拥有7000～8000人的登陆兵力，却没能攻击哪怕是一处岛屿。”[21] 而此时的拿破仑或许仍在幻想着，只要能控制海峡几个小时，他就能够征服世界。

事实上，两位将军对拿破仑糟糕计划的应变绝不是神经过敏。6月10日，正在他们转运部队之时，纳尔逊已向蒙特塞拉特打出信号，告知自己的到来。第二天，他派人去那里搜集情报，并从一位美国船长那里得到了一则重要消息：联合舰队已经离开瓜德罗普，意欲对安提瓜发起攻击。纳尔逊随即赶往安提瓜，但那里同样没有敌人的踪影。现在，他必须要做出决定，做出与一个月前在圣文森特角时同等重要但更为艰难的决定。在6月12日的清晨，在焦急等待着巡洋舰从岸上带来的情报时，纳尔逊再一次遇到了曾在直布罗陀海峡苦苦折磨他的那种不确定性。他向海军部写道：“如果在安提瓜打听不到敌人的消息，我就将守候在鲁伯特亲王湾（Prince Rupert’s Bay）（那意味着返回多米尼克）再

想好对策。但我觉得，既然他们已经保卫了他们的殖民地与200艘以上的运糖船，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已在我军之前改变了航向，驶回欧洲。”在这里，纳尔逊与维尔纳夫几乎同样地猜到了对方的意图，而又被同样的限制束缚了手脚。这封信的墨迹尚未干透，纳尔逊所等候的消息便已到来。据称，从瓜德罗普被带走的法国部队又被运了回来，并已经登上了海岸——这实际上已经证实了他的判断。于是他接着写道：“我将去圣约翰锚地（安提瓜）卸载陆军部队，希望能在早晨出航，跟随敌人驶向直布罗陀海峡的出口。”

在卡尔的情报送达之前，纳尔逊已经做出了决断。他派出贝特沃斯的“好奇”号去向海军部报信，告诉他们维尔纳夫已经返航，而自己将紧随其后。当日夜里，他驻泊于圣约翰锚地，继续卸载部队。次日清晨，部队全部登岸，舰队立即开始准备出海。卡尔的“奈特雷”号就在此时抵达了。他的经历扫除了纳尔逊所有的疑虑，而且卡尔还报告了一个新的信息：敌军兵力远较纳尔逊所设想的更为强大，他在黄昏中数出了不少于32艘船舰。[22] 但纳尔逊不为所动，反而因此增添了信心。现在，他与维尔纳夫之间的航程差距已从三十天缩短到了四五天，从任何角度来看，他们都极有可能相遇。事实上，他不仅认为西班牙舰队将被独自派往哈瓦那，还相信维尔纳夫的剩余兵力即便与他相遇，也不会阻挠他的追击。他甚至没有留下科克伦的“诺森伯兰”号，而是让他留守在原地。“斯巴达人”号则被保留在他的舰队中，这样纳尔逊就拥有了11艘战列舰的兵力。

纳尔逊正准备用这样一支弱势的兵力投入战斗，但这种战斗必须满足某些明确的前提。一个月前，他曾相信他的战略使命就是将维尔纳夫赶出地中海，这一目的已然实现。而现在，他又要将维尔纳夫逐离西印度群岛，并为此更加冷静地承担着风险。据说，他曾在军事会议上向他的舰长们说：“别把我想象成那种头脑发热、会在极端不利且缺乏明确目标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家伙。我的目的已部分实现。如果我们与他们

相遇，而他们拥有不少于18艘——甚至我认为是20艘——战列舰，你们不用惊奇，我将不会立即发起攻击。但我也不会在交火之前放走敌人。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干扰他们的航行，他们应该也会很乐于放过我们。这种状态将保持到我们抵达欧洲海岸之时，除非他们给我提供了太过诱人的进攻时机。”[23]

怀揣着这些想法，纳尔逊再一次消失在了宽广的大西洋里，却给科克伦留下一个难题。法军对牙买加的攻击计划有可能极为狡猾，这使他无法认可纳尔逊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所有行动进行期间，科克伦向牙买加派去的增援舰队始终按兵不动。他们时刻准备参与皇家港防御战，准备尽其所能抗击预想中的来袭之敌。或许有人会说，他们是被敌人诱骗了。但事实上，他们并未从这场博弈中离去。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因为他们存在于西印度群岛海域，维尔纳夫才觉得自己无可作为。但对于科克伦而言，法西联军的威胁仍旧存在。在纳尔逊离去的十天之后，他回到巴巴多斯，焦急地向海军部写去一封信，声称他确信牙买加就是敌人的目标所在。令人好奇的是，他并不知道纳尔逊去了哪里。而根据先前的谈话，纳尔逊似乎认为维尔纳夫要返回地中海。[24]科克伦对此极为恐慌，他的焦虑也不难理解。胡德准将的舰队已经伴着一支商船队返回本土，现在，他成了背风群岛海域中唯一的英国舰队指挥官。直到三周之后，科林伍德派来增援纳尔逊的“拉米利斯”号（Ramilies）与“光辉”号（Illustrious）抵达安提瓜岛，他的焦虑才终于得到缓解。就在两艘战列舰抵达之时，他又接到一则报告，称联合舰队已在大海上转向，意欲与布雷斯特和费罗尔舰队联合。如果纳尔逊如他猜想的那样去了直布罗陀海峡，那么，一场危机就迫在眉睫。在这一刻，科克伦把所有对自身安危的忧虑都抛到了一边。基于对海军部决策思维的通常了解，他决定派这两艘战舰立即随两支即将出发的商船队返回英国。科克伦在发给海军部的信中写道：“你们或许想把所有空闲的战列舰都调往英吉利海峡。”而就在他写下这句话时，大洋对岸的英国海军部也几乎同时起草出了同样的命令。[25]

昔日的西班牙人曾经相信，德雷克拥有一面魔镜，能用它看到敌人的所有动作，看清敌人的所有兵力。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的确是真的，而且，他还将之一代代传递了下去。这面魔镜就是他所奠定的海军传统，它被他的继承者们用丰富的战争经验打磨得愈发光亮，直至成为一种海上战争的鲜活直觉，为所有人提供着指引。科克伦也是德雷克的继承者之一，他清楚地看到了本土水域所面临的紧张压力，并预见了即将到来的战役危机。事实正是如此。

---

[1] 本章可参见彩插中的图示2。

[2] To Marsden，April 14th：Nicolas，vi.437.

[3] To Marsden，April 14th：Nicolas，vi.439.

[4] Phillimore，*Life of Sir William Parker*，ii.289.

[5] 约翰·弗朗西斯·爱德华·阿克顿（John Francis Edward Acton，1736～1811年），那不勒斯王国首相，英国男爵。他是那不勒斯王国的首席亲英大臣，曾与纳尔逊密切合作。——译者注

[6] Clarke and McArthur，ii.427（4th edition）.将这则备忘录系于1803年的理由，参见Laughton，*Nelson's Letters and Despatches* and *Fighting Instructions*（*Navy Records Society*），pp.280-1。事实上，我们完全能推测，这封文件是在圣文森特勋爵仍然担任海军大臣时写下的，那是在1804年的5月之前。而到1805年，下野后的圣文森特正忙着对抗他的政敌，纳尔逊并不会就此与他联系。

[7] Allen，*Memoirs of Sir William Hargood*，p.111.

[8] 科贝特在这里介绍的事实并不正确。事实上，科克伦舰队中的6艘战列舰只有5艘抵达了巴巴多斯；“斯巴达人”号在之前的航行途中搁浅，被留在佛得角群岛的普拉亚（Praia）先行修理。为了对抗密歇希舰队，科克伦不仅没有为胡德提供增援，反而扣下了胡德的“半人马”号战列舰，使其总兵力仍保持6艘战列舰。“斯巴达人”号在修理完成后继续前往巴巴多斯，并在那里与纳尔逊相遇。参见Clarke，James Stanier，and John McArthur，eds.，*The Naval Chronicle*：*Volume 30*，*July-December 1813*：*Containing a General and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Royal Navy of the United Kingdom with a Variety of Original Papers on Nautical Subjec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p.375。——译者注

[9] Cochrane to the Admiralty：*In-letters*，326.April 5，8，9，14，17.

[10] 即今法属马提尼克首府法兰西堡（Fort de France）。——译者注

[11] 朱利安·玛丽·科斯莫-克朱里安（Julien Marie Cosmäo-Kerjulien，1761～1825年），法国海军将领。1793年任战列舰舰长，多次与英国海军交战。在《亚眠和约》存续期间参与了西印度远征。随后率“普鲁托”号参与了整个特拉法尔加战役，并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表现出色。成功撤退至加迪斯后又整队出航，夺取了2艘被俘的友舰，但最终又损失了3艘战列舰。——译者注

[12] Desbrière，iv.539-5.维尔纳夫在这里写下的地名是“Barbade” 而非“Barboude”，因此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困难，好像他要去攻击相反方向上的巴巴多斯。我们可以在他后来的信件中清楚地看到，他所说的“Barbade”就是靠近安提瓜的那个岛屿。由于之前攻打钻石礁的经历，他不可能再想去攻击巴巴多斯，因为那至少要花上一个月，他的物资储备无法支持。纳尔逊后来写道：“如果巴巴多斯是他们的目标……一支舰队从马提尼克去那里平均要四到五天，他们何必用十五到十六天再驶向北方呢。”Nicolas，vi.458.考尔德在后来战斗中俘获的西班牙人承认他们当时的目标是安提瓜。*Blockade of Brest*，ii.323.

[13] 这一情节参见*Life of Sir William Parker*，i.294，其中声称莫里斯用90人的兵力造成了法军800人的损失。Desbrière，iv.541给出了维尔纳夫的统计数据。The *Naval Chronicle*，xv.123给出了莫里斯给纳尔逊与科克伦的报告以及法军指挥官给马提尼克军事长官维拉莱·乔伊斯（Villaret-Joyeuse，他正是1794年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中的法军指挥官）的报告，以及其他的当地文件。莫里斯发给纳尔逊的报告原文见*Admiralty In-letters*，411，June 6th。

[14] 布里尔顿将军在圣卢西亚得到的情报被迈尔斯抄送给纳尔逊，其下方有这样一条注记：“由威廉·迈尔斯阁下的秘书梅杰·迈尔斯（Major Myers）从将军的信中抄录。梅杰·迈尔斯对这则情报的可靠性没有疑义。（签名）” Nelson and Bronte，June 4th：*Adm.Sec.In-letters*，411，and Nicolas，vi.446.

[15] 这个战斗阵型可见于哈布柏克（Hubback）所著*Jane Austen's Sailor Brothers*，p.138，那是来自路易斯将军（Admiral Louis）的转抄本，但有几处明显错误。下表则是“华丽”号舰长济慈（Keats）的抄本，可参见英国海军档案局所编*Greenwich Hospital Miscellanea*（Various），No.141。这显然是按照拥有30艘战舰的舰队的官方格式起草而来：

航行与战斗阵型

<table>
<tr><td rowspan="10">前卫舰队</td><td>1</td><td>“卡诺普号”（Canopus），80 炮，路易斯</td><td rowspan="14">右侧分队</td></tr>
<tr><td>2</td><td>—</td></tr>
<tr><td>3</td><td>—</td></tr>
<tr><td>4</td><td>“华丽”号（Superb），74 炮</td></tr>
<tr><td>5</td><td>—</td></tr>
<tr><td>6</td><td>“胜利”号（Victory），100 炮，纳尔逊</td></tr>
<tr><td>7</td><td>“多尼戈尔”号（Donegal），74 炮</td></tr>
<tr><td>8</td><td>—</td></tr>
<tr><td>9</td><td>“斯宾塞”号（Spencer），74 炮</td></tr>
<tr><td>10</td><td>—</td></tr>
<tr><td rowspan="10">中卫舰队</td><td>1</td><td>—</td></tr>
<tr><td>2</td><td>—</td></tr>
<tr><td>3</td><td>“虎”号（Tigre），74 炮</td></tr>
<tr><td>4</td><td>—</td></tr>
<tr><td>5</td><td>“诺森伯兰”号，80 炮，科克伦</td><td rowspan="6">左侧分队</td></tr>
<tr><td>6</td><td>—</td></tr>
<tr><td>7</td><td>“利维坦”号（Leviathan），74 炮</td></tr>
<tr><td>8</td><td>—</td></tr>
<tr><td>9</td><td>—</td></tr>
<tr><td>10</td><td>—</td></tr>
<tr><td rowspan="10">后卫舰队</td><td>1</td><td>—</td><td rowspan="10">左侧分队</td></tr>
<tr><td>2</td><td>—</td></tr>
<tr><td>3</td><td>—</td></tr>
<tr><td>4</td><td>—</td></tr>
<tr><td>5</td><td>—</td></tr>
<tr><td>6</td><td>“贝尔岛”号（Belle-isle），74 炮</td></tr>
<tr><td>7</td><td>“征服者”号（Conqueror），74 炮</td></tr>
<tr><td>8</td><td>“敏捷”号（Swiftsure），74 炮</td></tr>
<tr><td>9</td><td>“斯巴达人”号，74 炮</td></tr>
<tr><td>10</td><td>—</td></tr>
</table>

“华丽”号是极为强大的新型74炮舰，仿造自土伦战役中俘获的法国战列舰“庞培”号（Pompee）。算上卡隆炮，它的单舷投射量可达1000磅。“卡诺普”号原本是在1798年尼罗河口海战中被俘获的法国战舰，其单舷投射量为1092磅，比最初未加装卡隆炮时的“胜利”号的投射量（1068磅）还略重一点。“多尼戈尔”号

也是1798年在爱尔兰俘获的法舰，它比“华丽”号还要大，装配卡隆炮之后有时也被算成80炮战舰。纳尔逊分队末尾的“虎”号也是一艘1798年俘获的大型法舰，与“华丽”号实力相当，而“贝尔岛”号与“斯巴达人”号也是如此。余下的战舰都是小型的74炮舰。这种不均等的布局显然不同于以往的舰队组织。在实际航行中，纳尔逊并没有待在自己的位置上，而是在最前方引领着右侧分队。他在6月5日的日记里写道：“我让‘卡诺普’号跟在‘胜利’号的后面，让‘诺森伯兰’号引领着下风的舰列，大家一致同意了这种航行与战斗阵型。”如果我们把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实际情形考虑进来，纳尔逊恐怕不会在接敌之时回到他原本的位置上去。

[16] To Lord Seaforth，June 8th.

[17] Desbrière，iv.679.

[18] Desbrière，iv.680.

[19] Captain Nourse of the *Barbadoes* to the Admiralty（*In-Letters*，2231），enclosing the merchants’ memorial and the governor’s request.

[20] Carr to Nelson，June 13th，enclosed in Nelson to Marsden，Jane 14th：*In-letters*，411.See below p.169 n.James gives the name of the *Netley*，commander as Richard Harward and says Nourse was with him.There seems no authority for either statement.Vol.iv，p.351.For Carr’s previous exploits see Ibid.，pp.248-9.He was still in command of the *Netley* in 1807 when she was captured by a French frigate and brig.Ibid.，v.466.

[21] *Journal de Reille*： Desbrière，iv.681.

[22] Letter from an officer on board one of Lord Nelson’s ships：*Add.MSS.* 3430，June 19th；Nelson to Marsden，June 14th：*In-letters*，411.Nicolas missed this letter and it seems never to have been printed.It runs：“*Victory* at sea，June 14th.The *Netley* schooner joined me yesterday morning about an hour after the fleet got under weigh（*sic*）from St.John’s Road，Antigua，when Lieutenant Carr came on board and showed me the accompanying despatches from Captain Nourse of the *Barbadoes*，addressed to you（which in his hurry to return to the *Netley* he omitted to take with him）.I therefore judge it proper to forward them to you in the state they were left，and also beg leave to transmit you for their Lordships’ information a letter from Lieutenant Carr giving his reasons for having opened the said despatches.” The letter was not holograph，but signed by Nelson.

[23] 这句话的可靠性无法确定。克拉克与麦克阿瑟以这一事例来说明其要旨，他们称这一事件发生在追击期间，他将所有舰长召集到“胜利”号开会之

时，但他们并没有给出信息出处。这里还有另一则从未公布过的昔日传闻，它与后来成为圣赫勒拿总督的艾略特和后来成为海军上将的安东尼·霍斯金斯（Anthony Hoskins）尉官相关。霍斯金斯曾将此复述给他的旗舰尉官，即文中曾经提到的马克·克尔舰长（Captain Mark Kerr）；而克尔又将此记录了下来，因而能为我们所知："在从西印度群岛返航的途中，纳尔逊曾多次走上艉楼甲板，与负责瞭望的军官交谈。那位军官说：'我希望我们能遇到维尔纳夫，长官。'纳尔逊答道：'是的，如果能知道他在哪里就太好了。'那位军官又说：'我们将迎来一场极其光荣的战斗，长官！'纳尔逊答道：'我不认为我要与他交战。'军官说：'不交战？那我们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找到他呢？'纳尔逊说：'若是往外逃，他就会越来越强，而我军就会越来越弱。若往本土航行，我军就会越来越强，而他们就会越来越弱。如果我们现在遭遇敌人，我毫不怀疑我们能够打败敌人，并由此而赢得非凡的个人荣耀，但这对我们的国家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知道，我们在一周之内就能得到增援，而他什么也没有。到那时，我一定会歼灭敌人。'"这个故事的主旨是十分清楚的，不过有几处细节难以理解。向外海航行将使维尔纳夫更强，这或许是指英军的船只状况将越发糟糕。但纳尔逊越来越弱又是因为什么呢？英军在西印度群岛还有一支舰队，而法西联军没有。

[24] *In-letters* ，326，June 25th.

[25] *In-letters* ，326，July 13th and 17th；*Admiralty Minutes* ，154.海军部让科克伦派回2艘闲置战舰的命令落款于7月11日，而在那一周里，科克伦也自行做出了派回战舰的决定。

第十二章 巴勒姆直面危机

5月底，病休离职的康沃利斯向海军部提出了恢复工作的申请。但由于维尔纳夫出逃与密歇希返航所造成的混乱，海军部决定推迟他的上任，暂不改变主力舰队的将领。一个月后，局势再度稳定了下来。康沃利斯随即接到了接替加德纳勋爵的命令，而加德纳则返回他之前的职位，去科克港统领爱尔兰水域的巡洋舰队。[1]

作为乱源的法西联合舰队已经驶向西方，没有人知道它们正在返航途中，英国本土仍是一片平静。在那个长期精心准备的重要时刻临近之时，拿破仑愈发想让他的敌人自以为处在安全之中，至少要将其注意力引离他真正的行动重心。这是他停留在意大利的最后几天，他在这里重整着这个新王国的海陆军资源，特别要在热那亚——那个古典时代的要地——建立起船坞和兵工厂。拿破仑相信，他在布洛涅的长期缺席将会加强他所希望营造的印象。出于同一理由，他多次拒绝冈托姆试图出击的请求，因为那只会让敌人警觉起来。他甚至认为，布雷斯特舰队不应该全部驻泊于港外的贝尔托姆锚地，而应让几艘战舰驶回港口。他向德克雷写道："我想用一种自然的表现让英国人对布雷斯特舰队尽可能地放心，从而将他们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泰瑟尔去。把这个意思告诉马尔蒙……我将在前往乌德勒支（Utrecht）的道路上设置保卫哨岗，我一抵达巴黎就会宣布前去那里的消息。这会让英国人担心维尔纳夫也将驶向那里，并诱使他们削弱布雷斯特港外的关键兵力。"他向德克雷保证这个手法将会奏效。"英国政府是最为短视的，他们被政党政治所吸引，在喧闹争吵上浪费着注意力。"[2]

这种错误认识并非拿破仑或拿破仑时代所独有。这种错误的观点认为，英国政客在议会争斗中投入的精力将导致在进行战争与治理国家方面的无能，至少在处理其庞大帝国的诸多事务时难免疏失和无知。我们仍然很难相信，像拿破仑这样从未低估过敌人的伟大军人竟然真的想用这种小把戏糊弄住他老谋深算的对手。但是，他给马尔蒙下达的详细命令却的确如此。“英国人在雅茅斯的64炮以上的战舰不超过3艘。在未来的行动中，我希望在那里吸引住更多的敌舰。”马尔蒙首先要与泰瑟尔保持距离，而在7月的第二周，他应该让一个师的部队登船，并将舰队移动到处于安全范围之内的航道的最远端，摆出一副要开始远征的架势。接着，他要在7月20日突然调动他的军团，使之在一周之内尽数登船。随后，他本人也要与熟悉爱尔兰北部水域的引航员一道登上战舰。拿破仑继续写道：“这会让你看起来仅仅在等待一阵潮水，只要英国封锁舰队被它赶走，你就会驶入大海。英军将被迫在这里维持至少10艘战列舰，这将让他们极为不安。”这就是此种行动的真实含义，但马尔蒙不应将之告知给荷兰海军将领和他的军官。最后，考虑到运用罗什福尔舰队的诸多可能性，拿破仑也警告马尔蒙不要认为这次登船仅仅是一场表演。它的确有可能演变成一场真正的入侵。[3]

一支装载在运输船上、受到护航舰保护的陆军部队的扰乱威慑力常常遭到人们的怀疑。而在这里，我们至少有证据表明拿破仑的确相信这一点。他在那不勒斯港口中的部队曾对纳尔逊的决断造成了巨大的干扰，而我们在这里也将看到，这种策略将会再一次发生效力。

尽管拿破仑的确想过让罗什福尔舰队与马尔蒙军团会合，但他从未将此纳入他的严肃思考。他的真正意图是用这支孤立的舰队袭击波罗的海的入口，那将威胁到英国人的贸易，并让他们担心在爱尔兰遭到入侵。他面前的难题是为这种大胆而冒险的行动找到一位合适的指挥官。拿破仑对密歇希已愈发反感，他觉得其在西印度群岛的表现缺乏主动性和进取心。他向德克雷写道，“当我读到他没有夺取钻石礁时，我几乎

是强忍着愤怒”，“钻石礁将成为这次远征的耻辱柱”。在密歇希返航之后，他曾推算这支舰队在一周内就能再次出击；但他并未等来这则消息，反而收到了这位垂老将领絮絮叨叨的唉声叹气。他病了，他怀疑自己已不再适合出海，他想回巴黎见他的妻子。拿破仑想不到任何能够取代他的人选，只得好声劝诱，试图重新唤起他的雄心。德克雷告诉密歇希，他现在正关系到这场大集结的成败关键，因而不能前往巴黎。“不过，”德克雷向拿破仑写道，“我觉得密歇希夫人是个通情达理、没有野心的妇人。可以让她来罗什福尔。这是密歇希将军见他妻子的唯一方式。要让他明白，他必须完成这场战役。”[4] 然而，一切努力都化作了泡影。由于糟糕的健康状况，密歇希最终还是放弃了他的指挥权。

拿破仑最初想让罗西利将军（Admiral Rosily）——他曾于美国独立战争时在叙弗伦（Suffren）麾下担任巡洋舰长，距现在已有二十多年——接替密歇希。但拿破仑已厌倦了年老的将领，他决心开始一场人事上的改变。在密歇希最终辞职之前，他已经告诉德克雷：“事实上，这里并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必须从那群32岁的年轻军官中选拔我的海军将领。我有数量足够的有着十年服役经历的巡洋舰长，从中可以选拔出6位我能信赖的指挥官……同时，先让密歇希或其他什么人率领罗什福尔舰队出击。”[5]

德克雷选中的继任者是密歇希麾下的战列舰“高尚”号（Magnanime）的舰长阿勒芒[6]。根据报告，他在之前的远征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意志和才能，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确是最佳人选。他的上任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格雷夫斯曾对这处颓废的军港做出颇为乐观的报告，并让海军部从封锁舰队中调走了2艘战列舰。而到了这个月底，出海准备工作已在这里热火朝天地展开，格雷夫斯只能为之前的乐观而懊悔不已。由于这一事态，罗什福尔的封锁兵力又被提高到5艘战列舰，格雷夫斯的指挥职务随后被查尔斯·斯特林将军[7]所接替——他的旗舰是98炮战列舰“光荣”号（Glory）。斯特林是一位勇敢无畏的军

官，曾在牙买加担任海军专员。他刚刚返回本土就接到了这一任命，这也是他首次出任舰队司令官。

在费罗尔，危机迫近的迹象同样难以掩盖。考尔德拥有一套极为出色的情报系统，一位战前曾在英美两国担任领事的英国人至今仍是美国驻西班牙的领事官，他为考尔德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正规情报。拿破仑刚刚给古尔东将军与他的西班牙同僚格兰达加纳将军下达命令，让他们率领完成出航准备的13艘战列舰前往附近的拉科鲁尼亚（La Coruña）。一旦维尔纳夫与格拉维纳出现，他们就要与之会合，驶出大海。接到这则命令的古尔东随即指出，拉科鲁尼亚缺乏足够的锚地，因而命令不可能执行；但早在他接到命令之前，它就已经被送到了考尔德的手里。这则情报是在7月3日被送出的。在那时，考尔德刚刚得到2艘来自罗什福尔的74炮舰的增援，但他最大的三层甲板战列舰"皇家君权"号却必须返回本土修理。他麾下只剩9艘战列舰，其中只有2艘是三层甲板战舰。他并不认为这样一支兵力足以担当封锁任务，但他仍向他的上级保证道："如果各位先生认为这支兵力足以完成目前的关键任务，这支舰队就将为国王陛下竭尽全力。"[8]

在更靠南方的海面上，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科林伍德也接到了警报。他用3艘战列舰近距离封锁着加迪斯，1艘战列舰则位于海峡西南侧的斯帕特尔角，在直布罗陀还驻扎着1艘巡航舰。在地中海中，比克顿将他的战列舰队布置于卡塔赫纳港外，掩护着克雷格的远征军。他的巡洋舰则为船队提供护航，以免遭到从土伦出发的法国巡航舰的袭击。纳尔逊留下的由卡佩尔舰长指挥的巡洋舰队则看守着位于热那亚的法国巡航舰，并将其中1艘封锁在尼斯（Nice）的一处港口里。他的部署主要是为了防止敌军向撒丁岛发起任何跨海攻击。"卓越"号仍然待在那不勒斯，它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保证，代表着艾略特背后的强权。意识到这一政治重要性的比克顿因此并未让它返回舰队。在马耳他，亚历山大·波尔则用1艘50炮战舰与4～5艘巡洋舰保护着黎凡特贸易线。1艘巡航舰在

君士坦丁堡护送一位英国大臣，的里雅斯特（Trieste）还有1艘保护贸易的轻帆船。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军事据点则由科孚岛的俄国舰队护卫，到7月末时，这支舰队的兵力已达到4艘战列舰与10艘巡洋舰。[9]

这就是6月底时英国海军的真实态势，而通过拿破仑写给德克雷的详细备忘录，我们可以了解到拿破仑对此的推想。他看到在布雷斯特港外有18艘战列舰，罗什福尔港外有6艘战列舰，费罗尔港外有8艘战列舰，地中海内则有不超过4艘战列舰。他对纳尔逊和科林伍德一无所知，只有一则错误的情报称他们于5月15日在圣文森特角相遇，随后双双失踪。他们也许是一起去了西印度群岛，但拿破仑并不这样认为。他确信，纳尔逊将独自去西印度群岛与科克伦会合，而科林伍德则被派往印度。如果是这样，纳尔逊就会在巴巴多斯用几天时间完成集结并装载补给，同一片海域中的维尔纳夫在接到警报后就会有足够的逃脱时间。唯一的后果是，纳尔逊的追击将让维尔纳夫等不到预定集结时限期满，发动入侵的危机窗口将比预计情况更早到来。为了应对新的局势，他只能提前赶往布洛涅。“我要加紧脚步，把原定前往那里的日程提前几天，因为我觉得纳尔逊抵达美洲会迫使维尔纳夫驶向费罗尔。”

然而，拿破仑也无法排除维尔纳夫被封锁于法兰西堡的可能性，在内心深处，他甚至怀疑那场大集结能否成功进行。他的备忘录里还包括另一处改变，即将行动的最终保障托付给了布雷斯特舰队。他接受了德克雷的观点，决定做好两手准备。如果冈托姆抓住了出击的时机，他应该让自己的航线看起来像是要攻击爱尔兰；而事实上，他要突入海峡，将他的舰队独自带往布洛涅。或者，他也可以与费罗尔舰队会合，再率领33艘战列舰驶入海峡。“这无疑是一个备用方案，但如果维尔纳夫遭到封锁，我们就必须要做些什么……把这个大致的主意告诉冈托姆，听听他的意见。”[10] 而冈托姆在回信中有力地指出，这些计划完全缺乏对英国防御体系的基本考虑。

在拿破仑写下这些推断的两天之后，英国海军部最终接到了确切的情报，确认维尔纳夫已经前往西印度群岛。据说，他率领16艘战列舰在5月13日抵达了马提尼克。这则消息是由一艘“疾驶而来的商船”带到利物浦的，这些投机商人很乐于见到因贸易线受到威胁而导致的市场饥饿。利物浦市市长很快将此消息发给皮特，并在7月1日送到了他的手上。皮特马上将之转发给海军部，并示意他决定再次将艾尔·库特爵士派往西印度群岛。库特的远征军一直在科克港候命，他接到命令让部队立即登船，海军委员也被要求为他组织护航船队。[11]

但是，内阁的决定并不意味着拿破仑已成功将巴勒姆的注意力引向西印度群岛。就在他们接到这则消息的同一天，海军部已向科林伍德与考尔德发去警报，让他们留神维尔纳夫的突然返航。[12] 这是他唯一警惕的事态。得益于丰富的海军经验，巴勒姆比拿破仑更加确定地推测到了纳尔逊驶入加勒比海的后果。事实上，欧洲水域内的所有英军指挥官都已预料到维尔纳夫将会再度露面。科林伍德在这个非常时期写道：“我认为，这些家伙在飓风季节之前从西印度群岛驶回并不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直接驶向爱尔兰，我一直觉得那里是他们计划中的一环。波拿巴就像猴子一样诡计多端。我相信，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征服，而是将我们的兵力从本土水域引开。从罗什福尔舰队来看，这是唯一的可能。”[13] 这就是拿破仑自以为骗过的那些人的洞见。

他们唯一难以确定的是维尔纳夫具体要驶向哪处港口。他有可能前往加迪斯或驶入地中海，这将为英军带来相当大的麻烦。直到7月7日，巴勒姆才了解到直布罗陀海峡周围的兵力短缺。科林伍德的信在那一天寄到了海军部。他在信中说，他将按照命令给纳尔逊派去2艘战列舰，还说会将他的舰队平分给比克顿。[14] 巴勒姆由此正确地推算出，他的麾下将只剩4艘战列舰。年迈的海军大臣再次独坐在他的房间，着手重掌当前的局势。最终，他留下了一则价值难以估量的战略手记，旧日英

国海军几乎被遗忘的智慧正徜徉其间。[15]

手记的开头描述了当前可动用兵力的分布情况。“布雷斯特港外，22艘；罗什福尔港外，5艘；费罗尔港外，包括来自罗什福尔的2艘，共12艘。”此外，还有2艘战舰立即可用，另有5艘战舰是用于顶替从前线撤回维修之友舰的后备军。如他所说，这意味着有38～40艘“在役或准备”中的战列舰可用于布雷斯特、罗什福尔和费罗尔，即所谓的“西方舰队”。他打算从布雷斯特港外的康沃利斯舰队中抽出10艘，立即为加迪斯港外的科林伍德提供增援。他解释道：“我推算出那里只留下了4艘战舰。敌人很可能会去那里，我们有必要在这个关键点集结起一支强大的舰队。”在这一点上，拿破仑的确成功地误导了他们的视线。与纳尔逊一样，巴勒姆也认为直布罗陀海峡周围是维尔纳夫最有可能的目的地。但巴勒姆从未忽视过联合舰队前往比斯开湾沿岸的可能，并在手记中制定了对策。他准备在维尔纳夫驶近布雷斯特、罗什福尔或费罗尔之前，或在维尔纳夫与其中任何一支舰队取得联系之前，对联合舰队首先发起攻击。显然，这一计划要求用一支以上的封锁舰队作为反击兵力，因此，其困难就在于如何在距离港口足够远的距离上实施打击，而又不放跑任何被封锁的敌舰。他想出的解决办法堪称精妙。他将用费罗尔舰队与布雷斯特舰队分别作为两支独立的攻击部队，并用一种巧妙的方式维持对各自港口的封锁。“给费罗尔舰队派去3艘额外的巡航舰，再让它们向北偏西的方向展开。让巡航舰时不时地在费罗尔露面，敌人在这段不确定的时间里就无法弄清它们的真正目标。”罗什福尔则需要维持严格的封锁。他接着写道：“布雷斯特舰队的兵力将在此时被削弱到12艘，但在得到‘防御’号（Defence）、‘歌利亚’号（Goliath）与‘热情’号（Zealous）的增援后，他们会拥有15艘战列舰。他们应当在南偏西的方向上展开，形成一条指向菲尼斯特雷角的直线。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用巡航舰与费罗尔舰队取得联系。”

这个计划——尤其是其中对布雷斯特舰队的安排——的确十分大

胆。乍看上去，它似乎严重动摇了这次战役的防御基石。这一布置不仅将意味着英吉利海峡有可能将对敌人敞开，而且从费罗尔逃出的敌军也可能突破对罗什福尔的封锁，接出港内的敌舰。巴勒姆并没有忽视计划的这些方面，但根据他的推算——后来也得到了事实的证明——这些风险其实并不存在。“在敌人构想出这些计划之前，引起他们如此行动的动因将已被我军消灭。这个动因就是返回欧洲的联合舰队，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它最后的目的地。”经过多方面的权衡，巴勒姆最终认为，一场胜利所带来的士气影响将是如此的巨大，足以为之担上任何风险。“我所知道的意义最为重大的行动目标就是在其返回欧洲的途中截击这支制造麻烦的舰队。（敌人）未来的所有远征都会因此化作泡影，它还将告诉欧洲，我们可能为了某个明确的目的而偶尔放松我们的封锁体系，将兵力集结在手中以把握方便的时机。”换句话说，一场胜利对士气造成的影响与极其紧张的实兵封锁具有同等效力，而今后任何敌人在遇到英军放松封锁时都会疑心那是故意设下的陷阱。

这就是巴勒姆用于应对这一不确定的艰难时局的精妙方案。他为此花了四十八个小时来进行稳健的推演。在他的敌人意识到英军新阵势的意义之前，巴勒姆已经推算到迷雾散去的时刻，并希望这是迷雾的最后一次降临。然而，就在他将这一方案改写成命令形式时，一束穿透迷雾的亮光出现了。7月8日晚11时，双桅快船“好奇”号的舰长贝特沃斯叩响了海军部的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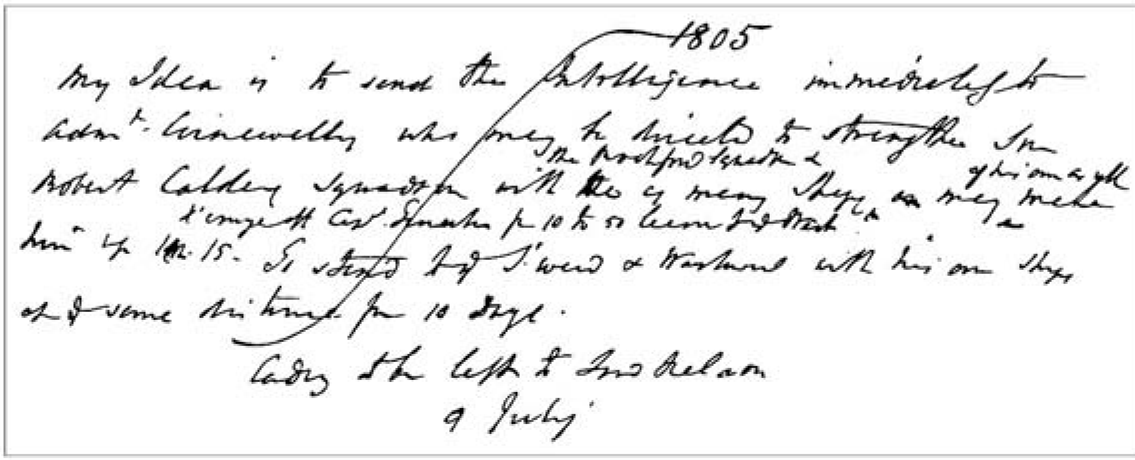
6月12日时，贝特沃斯在安提瓜接到了纳尔逊让他返回本土报信的命令。二十四天后的7月7日，他的“好奇”号已在普利茅斯下锚，此时的巴勒姆正在构思着他的反击方案。贝特沃斯火速赶往伦敦，但当他在次日夜间抵达时，却发现巴勒姆已经入睡，而他的属下都不敢贸然把他叫醒。老人在第二天的清晨早早地醒来，但看到一直在等待着他的消息之时，他不禁勃然大怒。贝特沃斯不仅带来了纳尔逊的信，还带来了一则极其重要的信息。纳尔逊将驶向直布罗陀海峡，而驶向英国的“好奇”号

则选择了一条比他更靠北方的航线。贝特沃斯因此发现了维尔纳夫的踪迹，并确定了他们的航向。6月19日，在北纬33°12′、西经58°，距离安提瓜北偏东900英里的海面上，他发现了法西联合舰队，并发现他们仍在向北方行进。贝特沃斯无疑跟踪了一段时间，随后便带着这一关键信息全速返航。维尔纳夫如此靠近北方的航线只能说明他要前往比斯开湾，而非巴勒姆与纳尔逊所认定的直布罗陀海峡。面对新的情形，巴勒姆在一个半小时内再次做出了决定。

历史学者詹姆斯或许是从海军大臣的秘书那里偶然地听到了一些信息。他告诉我们，巴勒姆低吼着抱怨失去的七八个小时，不待穿戴整齐就写下并发出了那些极为必要的命令。这则轶事的真实性或许存疑，但它的确具有某些事实基础。在他的档案中，有一则为了应对此时局势而匆忙写下的手记，那是用极快的笔速、极大的行距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的，与他之前长长的备忘录风格迥异。现在，加迪斯不再是让他紧张的中心，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立即用六行字改变了他之前的设计。考尔德显然处在最为急迫的威胁之下，却也同时处在攻击维尔纳夫的最佳位置之上。但是，用康沃利斯的兵力对他进行加强并非毫无风险。康沃利斯同样有可能首先与敌舰队相遇，如果他的兵力因增援费罗尔而被削弱，是否还有足以补上缺口的备用战舰就成了新的问题。

巴勒姆处在一个颇为棘手的矛盾状况里。他在最初起草的手记里这样写道："我的看法是，立即把这一情报转发给康沃利斯，或许还要指示他为罗伯特·考尔德提供增援，使其兵力达到15艘战列舰。"与之前的备忘录一样，他打算"让罗什福尔维持严格的封锁"。但他随即想到，对乌桑特位置的削弱似乎冒着过于巨大的风险，这迫使他开始寻求动用备用兵力之外的解决方案。唯一合理的办法是将所有的兵力集中于这两个关键点。因此，必须牺牲对罗什福尔的封锁，并且命令斯特林加入考尔德的舰队。于是，他修改了这则手记，加黑的部分就是他此次插入的字句："我的看法是，立即把这一情报转发给康沃利斯，或许还要指示他

用罗什福尔舰队与他的一些战舰 为罗伯特·考尔德提供增援，使其兵力达到15艘战列舰，去菲尼斯特雷角以西**10**～**50**里格的海域上巡航。 他的舰队也要在布雷斯特西南方同样的距离上守候十天。加迪斯则留给纳尔逊勋爵。7月9日。”[16]



巴勒姆在**7**月**9**日起草的手记

在这则手记中，著名的7月9日命令已经成型。我们现在知道，巴勒姆曾犹豫地将它提交讨论，看谁能想出更好的方案，但没有什么战略决策能得到比它更为一致的肯定。然而，一旦状况出现，他先前的布局或许能更全面地掌控局面。对罗什福尔的严格封锁可以避免许多麻烦，这些麻烦的影响甚至较联合舰队本身还要恶劣。在特拉法尔加海战的一周之前，它曾严重危及纳尔逊的交通线；它不仅对英国贸易线构成威胁，还差点让英国对好望角的远征遭到挫败。不过，他们肯定已对这些后见之明有了充分的预见。请记得，让英国分出舰队封锁罗什福尔正是拿破仑的计略。这是他最为盼望和期待之事，而巴勒姆则力图避免对乌桑特阵位的控制有任何松懈。没有人能说他做得不对。“若存疑义，则确保海峡入口的安全”，这已经成了一条一再得到事实验证、无人能质疑其正确性的箴言。

巴勒姆来不及走正规程序就匆匆发布了这些命令，而他的同僚们则

一致做出了追认。他甚至等不及正式命令的下达，就通过私人渠道向康沃利斯传达了消息。他以极快的笔速匆匆写道：“亲爱的阁下，如果我们没有太迟的话，我认为这里有一个截击法国土伦舰队的良机。纳尔逊已经跟它去了加迪斯，如果你能立即联合费罗尔与罗什福尔舰队，并命令他们在西方30～40里格的海面上巡航，如果你能将你的舰队也如此展开，如此巡航六到八天，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我认为我们就可能得到截击它的机会。官方命令会尽快传达下来。您的，巴勒姆。时间就是一切。”

最终草成的官方命令是这样写的：“康沃利斯将军：国王陛下的双桅快船‘好奇’号得到的情报表明，在上月8日驶离安提瓜的法西联合舰队曾在北纬33°12′、西经58°的位置上被发现。他们首先驶向东北方，随后又转向北偏西，基于这一点，他们应该要驶向法国或西班牙的某处港口。因此，我们需要并命令你用位于罗什福尔港外的斯特林少将的舰队加强费罗尔港外的罗伯特·考尔德中将的舰队，并指示中将立即前往菲尼斯特雷角，在西方30～40里格的海域里巡航索敌，持续六到八天。此外，我们还需要并命令你立即率领你的舰队去西南方同样的距离上用同样的时间进行同样的行动。到时限期满，这些舰队都应回到各自的原位上去。——（署名）巴勒姆，J.甘比尔，加利斯（Garlies）。”[17]

这一切都是在三小时之内完成的。上午9时，海军部的信使已经出发。正在他向朴次茅斯一路疾驰之时，拿破仑也已从都灵启程。他要前往布洛涅，去那里“改变世界的命运”。

---

[1] 加德纳的任务并不比执掌西方舰队更轻松。当年9月，巴勒姆向乔治三世报告道，加德纳掌控着一张从爱尔兰南部延伸至菲尼斯特雷角的巡航舰幕，这对情报工作和护航任务都至关重要。参见I.Lloyd Phillips，“Lord Barham at the Admiralty，1805-6，” *The Mariner’s Mirror*，Vol.64，Issue 3，1978，pp.217-233。——译者注

[2] From Bologna，June 22nd：*Correspondance*，x.556.

[3] To Marmont and to Decrès，Parma，June 27th：*Correspondance*，x.566-8.

[4] To Decrès，Milan，June 6th：*Correspondance*，x.482.

[5] June 14th：Ibid.，p.563.Lacour-Gayet，*Louis XVI*，p.661.

[6] 扎卡里·雅克·西奥多·阿勒芒（Zacharie Jacques Théodore Allemand，1762～1826年），法国海军将领。1793年战争爆发后升任巡航舰舰长，夺取了英国巡航舰“泰晤士”号（Thames），这是英国在战争中被俘的第一艘军舰。随后升任战列舰舰长，多次进行交通线袭击战，夺取大批商船。1800～1802年离开作战一线，1805年参与密歇希的西印度远征，随后被任命为罗什福尔舰队指挥官，再次出海巡航。他是特拉法尔加战役中表现最为优秀的联军指挥官。——译者注

[7] 查尔斯·斯特林（Charles Stirling，1760～1833年），英国海军将领。海军世家出身。法国革命战争爆发后曾参与光荣的六月一日海战与阿尔赫西拉斯海战，1802年出任牙买加船坞专员。1804年年末返回英国，升任少将，负责封锁罗什福尔。随后参与了菲尼斯特雷海战。——译者注

[8] Gourdon to Beurnonville，July 7th：Desbrière，iv.627.Calder to Gardner，July 5th，and Gardner to Marsden，July 6th：*Blockade of Brest*，ii.298-9.

[9] Knight to Nelson，July 16th，and same to Collingwood，August 5th：*Nelson Papers*，*Add.MSS.* 3430.Napoleon to Decrès，June 22，25，27：*Correspondance*，x.555，564，568.

[10] To Decrès，June 28th：*Correspandance*，x.573.

[11] *Admiralty In-letters*（*Sec.of State*），4199，July 1st.

[12] *Admiralty Minutes*，153，July 1st.

[13] To Dr.Carlyle，July 2nd：*Blockade of Brest*，ii.296.

[14] *In-letters*，410，June 8th，endorsed “Approved，July 7th.”

[15] *Barham Payers*，iii.355.这份文件所署时间为“7月”，但其中特别提到了科林伍德向纳尔逊派出2艘战列舰的信息，因此其肯定完成于7日到8日这两天之间。到了9日，正如我们会看到的，他的计划又因新的情报而改变。我们看到的计划主线在巴勒姆的头脑中酝酿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6] Facsimile in *Barham Papers*，iii.257.最后一段插入的字句显然是在手记

写完之前加上的，倒数第二段也是如此。因此，关于罗什福尔舰队的重要改变肯定也是在手记完成之前由他独立做出的。

[17] Draft in *Barham Papers* ，iii.259 and *note.* 其中只有巴勒姆的签名是亲笔书写。这显然是仓促之下的不正规做法，这则命令也并未收入档案局编订的机密命令集中。这只能被视为巴勒姆不愿浪费任何时间再给秘书进行誊写。这则命令的简短形式也说明它并没有经过秘书之手。

第十三章 康沃利斯敞开布雷斯特 [1]

7月7日，在“好奇”号抵达普利茅斯的同一天，康沃利斯在布雷斯特港外登上了110炮的“巴黎城”号（Ville de Paris）战列舰 [2] ，重掌西方舰队指挥权。他直接掌控的兵力是加德纳留下的19艘战列舰。7月9日，从费罗尔返回本土修理的74炮战列舰“可怖”号（Terrible）给他带来了考尔德从美国领事官那里得到的情报：费罗尔港内的舰队已接到了去拉科鲁尼亚等待维尔纳夫的命令。他从中读出，一场战斗已迫在眉睫。普利茅斯港口司令也紧随其后地发来了贝特沃斯带来的情报，称维尔纳夫正在朝比斯开湾驶来。康沃利斯立即将之转发给斯特林与考尔德，让他们当心遭到奇袭。在同一天，理查德·斯特罗恩爵士指挥的80炮战舰“恺撒”号（Caesar）加入了他的舰队。康沃利斯原准备让他指挥由5艘战列舰组成的近海舰队，但巴勒姆的私人信札随即抵达，打乱了他早前的安排。7月11日中午，康沃利斯已经为考尔德和斯特林发出了必要的指令。他并未等候正式命令的传达，就在布雷斯特港前留下了6艘巡洋舰，随即率领战列舰队驶向西南。 [3]

这支强大的舰队拥有20艘战列舰，其中至少7艘是三层甲板战舰，3艘是80炮战舰，远较维尔纳夫和格拉维纳的舰队强大。他接到的正式命令是在西南方30～40里格的海域巡航十天，在他看来，海军部显然已经赋予他一定的自主权。首先，他将舰队朝南偏西的方向展开，如同巴勒姆最初的计划那样，“形成一条指向菲尼斯特雷角的直线”。他在这条航线上行进了100英里，随后转向西北，穿过驶向布雷斯特的主要航线，最终抵达乌桑特岛西南方70～80英里处的集结点。他在这里一直待到7月15日夜间，直至此时，敌人的踪影仍未被发现。康沃利斯似乎很有把

握地相信，敌军根本不打算驶向布雷斯特。我们无法从现存的信件中探寻他当时的想法，唯一能知道的是，他在集结点上留下了1艘巡洋舰，随后率军南下，来到与罗什福尔相同纬度的海面。

这堪称是整场战役中最为大胆的行动。按照巴勒姆的命令，他本应守候在乌桑特岛西南方30～40里格处，但康沃利斯显然对在哪保卫他的首要目标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定的最佳阵位就是连接乌桑特和费罗尔的直线与穿过罗什福尔的纬线的交点。这个位置监视着维尔纳夫三条可能航线中的两条：无论他们是先去费罗尔再去布雷斯特，还是沿着纬线直接驶向罗什福尔，英军都能从此发起攻击，所以这是最有可能截击到敌人的地点。然而，直接通往布雷斯特的航线却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危险地敞开了。维尔纳夫不大可能长驱直入，他仍旧会为了避战而选择更曲折的航线，何况港外还有康沃利斯的巡洋舰；可布雷斯特港内的冈托姆却可以不受阻碍地自由出航并驶入海峡，他才是英军的最大威胁。正如我们所知，拿破仑发给他的上一封信正是如此建议，这更极大地加深了事态的严峻程度。我们可以想象到，康沃利斯撤离布雷斯特和斯特林撤离罗什福尔的消息将在巴黎引起一阵接一阵的振奋和喜悦。

7月10日，在康沃利斯接到命令重新部署舰队的紧要关头，拿破仑回到了枫丹白露。他从都灵赶回来只用了三天半时间，但他还嫌不够快，不断斥责着道路状况，并抱怨皇后总想停下来用餐。他再次投入了工作，一个个计划愈发热烈地在他的脑海里涌现。他首先筹划着从荷兰发起的佯攻，马尔蒙应在荷兰西南部的海勒福特斯勒斯（Helvoetsluys）准备他的远征船队。[4] 接下来，他制定了一长串准备在费罗尔港外授予维尔纳夫的指令。维尔纳夫再次被要求取得多佛尔海峡的制海权，哪怕只有四五天的时间。拿破仑给了他相当大的选择自由，他可以依照自己的情况与布雷斯特和罗什福尔的两支舰队会合，或者只是二者之一；而如果他选择了后者，他就应该绕道苏格兰北部，与泰瑟尔的荷兰舰队会合。如果他最终难免与敌军交战，而理想的目标又

超出了他的实力所及，他就应该为费罗尔舰队解围，并将之带往加迪斯——而绝不应让他的舰队驶入费罗尔。显然，拿破仑已经考虑到了失败的情形，如果行动失败，维尔纳夫就应回到地中海继续作战。德克雷为他起草的命令更凸显出拿破仑的不安：“陛下希望你指挥的舰队能够执行他以天才筹划已久的侵英计划，但由于距离你最初接到命令已经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那样多的变数都可能出现，皇帝陛下睿智地认为不应授予你强制性的命令，而应信赖你的理智与勇敢，尽管陛下希望坚持进行这一大业。”[5]

新任罗什福尔舰队司令阿勒芒的任务最终也被完全改变。考虑到维尔纳夫很可能出现在西班牙海岸并使英军放弃对罗什福尔的封锁，他不应再如先前的指令那样去爱尔兰海岸和北海转移敌人的注意力，而应等候古尔东将军的消息，直接驶向费罗尔。但是，新的命令来得太迟了。就在命令落笔的那一天，斯特林的舰队已经撤离，发现港外安全的阿勒芒随即遵照旧的指令于次日出海。他跟在英军之后直接向西航行，驶向康沃利斯业已占据的那片海面。

与此同时，拿破仑正遭到了另一个打击，或许正是这个打击让他在上述指令中口吻犹疑。他曾向冈托姆问道，如果布雷斯特舰队出海，它应直接冲入海峡还是先去解救费罗尔的友军，随后他便收到了冈托姆的回信。冈托姆的专业知识让他自己得出了十分确定的答案，而他鲜明直露的个性则让他学不会隐瞒和委婉。冈托姆写道：“如果驶出布雷斯特的舰队能幸运地躲过封锁舰队的警惕心，它毫无疑问应该先去费罗尔，接着是罗什福尔……如果按照您问题中第一部分所说，以不超过22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冒险驶入海峡，我们很快就将被英军发现、与敌舰相遇。他们一定会在这里集结起英国海岸与港口间的一切兵力，在我看来，这可能对我军相当不利。英吉利海峡太过狭窄，我们既不可能躲过敌人的侦察，也难以用机动来应付敌人的优势兵力。”据他计算，康沃利斯拥有21艘战列舰，其中12艘是三层甲板战舰；此外还有5艘战舰部署于爱

尔兰海岸，15艘在本土作为预备队。[6] 他接着写道："要在英吉利海峡这种风高浪大的海域里发起如布洛涅那样的重要航渡，那些征用来的划艇难保不出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将大军渡海的时间估计为至少两周。在此期间，我们的21艘战舰将始终处在30艘敌舰突然出现的恐惧里——他们的兵力几乎是我军的两倍。"[7] 在这里，冈托姆的自述足以告诉我们，敞开布雷斯特的行动并没有多大风险。难道巴勒姆在发布命令时就洞悉了冈托姆的头脑吗？难道康沃利斯在接到命令时就弄清了敌人的想法吗？这并非不可能。他们都知道，自1744年以来，哪怕再强大的敌人也不敢在背后的英国舰队未被击败时让陆军渡海。1744年从敦刻尔克起航的法国入侵舰队是历史上最后的例外，偶然的恶劣天气如同1588年无敌舰队之役那样使法军免遭全歼，但两者都同样演变为灾难性的溃败。这就是英国传统防御战略的核心，它的坚实基础就是英国西方舰队的存在。没有哪支舰队能期待着不经战斗就抵达多佛尔，而在此之后，英国本土舰队将占据更大的优势，使入侵舰队招致更彻底的惨败。

拿破仑向来毫不顾忌这些考虑，冈托姆的回复自然招致了他的愤恨不满。7月18日，他向德克雷写道："我完全不能理解冈托姆的无动于衷。他是我所有计划的组成部分，怎么能在敌人消失之时毫无作为？我在指令中已经预料到敌人将从布雷斯特撤离，而现在，他们已经失踪了四天。再加上罗什福尔港外的舰队也已消失，维尔纳夫的到来几乎已是可以确定的了。"他相信危机时刻比他的预想提早了几天，因而陷入了缺乏耐心的焦躁情绪。于是，德克雷向冈托姆下达了一道强制性命令，让他出港驱逐英国巡洋舰，看看它们身后还有什么兵力。如果他发现英国战列舰队已驶向远海去迎击维尔纳夫，他就应该直接驶向布洛涅。[8]

两天之后，皇帝从他的间谍那里得知了"好奇"号以及它所携带的消息，这使他愈发确信维尔纳夫已经近在咫尺。他相信，肯定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让英国改变了舰队部署，因为英国海军部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做出决策，如此及时地颁布指令。一定是英国本土的巡洋舰发现了维尔纳

夫，基于这一推想，拿破仑下达了立即行动的命令。他命令贝尔蒂埃让大军团立即登船，“要让四位元帅都知道，每分每秒都很紧急，一刻钟都不能浪费”。发给冈托姆的命令重复了之前的大意，更加强调了其中的重心。拿破仑甚至为此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冈托姆应该驶出布雷斯特，如果他发现港外的敌军兵力低于16艘战列舰，他就应该与之交战。如果敌舰队已经前往费罗尔或驶向外海迎击维尔纳夫，他就应该直接驶向布洛涅。他不顾冈托姆的顾虑，用乐观的笔调向他写道：“在那里，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在那里，只要控制海面三天，你就能让我们了结英国的命运……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本人将会前往布洛涅的海滩，登船出航就是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

没有哪位伟大的指挥官曾说过这样疯狂的话语。他难道真的是神志不清，或者只是一场故意的表演？他所描绘的图景与实际的局势完全不相符。渡海船队在7月22日与8月3日的报告表明，附近的登船港口塞进了超过2000艘各式各样的船只，准备用于搭载约15万名士兵与近万匹军马。[9] 这一大堆船严重阻塞了港口，而更多的船只仍在按照命令从弗莱芒的船厂源源不断地驶来。精密的组织方案仅仅存在于纸面上，看似漂亮的计划一个接着一个，却根本没有反映现实中的真实状态。做好了登船准备的士兵只有9万人——而非计划中的15万；做好了登船准备的战马只有3000匹——而非计划中的1万匹。布洛涅港已被可搭载7.3万人的船队堵得严严实实，只有4.5万人能登上港口里的船。更糟糕的是，没有人知道运兵船队出海会花费多长的时间。他们从未让船队作为整体一起行动，甚至连相关的行动计划都没有制订过——或许，这已超出了人类脑力的极限。[10]

人们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在这种对达成这一功业极为必要的组织工作中，秩序与登船速度是首要的因素。然而，他的智慧却止步于这样简单而虚幻的构想之前，完全没有考虑到部队的实际状况和港内登船部队的集结方法。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他到底是不是真想发动这场跨海

突袭？”[11]

那么，拿破仑到底在打着什么主意？尽管已向冈托姆做出了保证，他却并不准备离开巴黎，同时又并未撤回行动命令。不过，这已是无关紧要的了。在布雷斯特舰队能够执行命令之前，康沃利斯持续八天的巡航已经结束，他回到了布雷斯特港外。

在7月16日抵达与罗什福尔同一纬度的海面之后，康沃利斯并未在此停留，而是立即转向东北方，用战斗阵型操演着海战战术。18日，他回到了乌桑特岛西南30～40里格的预定位置，在那里按照海军部的命令巡航索敌。到了20日，由于之前派出的侦察舰仍旧一无所获，他决定派出巡航舰去罗什福尔与洛里昂打探，而他则待在原位继续巡航了两天。随后，由于时限临近终点，他开始驶向乌桑特岛附近的原位，并在24日早晨再次出现在布雷斯特观察哨的视野之内。[12]

最终，巴勒姆的谋划得到了事实的证明。他确信封锁舰队的秘密行动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冈托姆在英军完成计划之前无法及时做出反应。如果冈托姆真的出击，如果他真的按照拿破仑的命令偷偷驶入海峡，那只会招致毁灭——冈托姆自己对此也了然于胸。康沃利斯的巡航舰将迅速发出警报，老练而熟悉水文的英国海员足以追上法国舰队，并利用兵力和训练上的优势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即便冈托姆未经交战就抵达了布洛涅，即便他能够与渡海船队会合，那又能怎样？运兵船队将要在尚未完成组织工作、尚未制定出渡海方案时受命出击，加上基思勋爵位于唐斯锚地的战列舰队，这一定会酿就战争史上举世无双的惨剧。没有迹象表明巴勒姆是故意设下这些陷阱的，但陷阱的确就在那里。直至此时，盲目性愈发膨胀的拿破仑尚未跌落进去，而他面前唯一的阻碍就是这些狡诈多智并被他如此轻视的法国海军将领。

---

[1] 本章可参见彩插中的图示3。

[2] 这并非罗德尼在1782年圣徒岛海战中俘获的同名的法军旗舰，而是于1795年在查塔姆船厂新建的一级战列舰。在装备卡隆炮之前，它的侧舷投射量为1236磅；装备了68磅卡隆炮之后，其投射量已超过1500磅。

[3] *Barham Papers*，iii.393.

[4] July 13th：Desbrière，iv.639.

[5] July 16th：Desbrière，iv.642.

[6] Desbrière，iv.640，July 14th.冈托姆的估算是基于一份表格，日后发表于*Naval Chronicle*，vol.xiv。其标题为“英国海军实际兵力概要”（Abstract of the British Efficient Naval Force），声称其有效期直至7月20日，但其实并不准确。其中“英吉利与爱尔兰海峡”一栏（包括康沃利斯所部、斯特林所部与爱尔兰舰队）写着30艘战列舰，其中11艘为三层甲板战舰。在“港口内与修理中”一栏（即所谓预备队）写着9艘战列舰，包括三层甲板的“皇家君权”号，另外还有6艘“海防舰”（guard-ships）。法国情报部门可能是从某些英国报刊上得到了这个表格，实际上爱尔兰舰队已不再独立存在，被并入了西方舰队。

[7] 这里显然是把三层炮甲板战舰计算为2个单位。因此英军包括12艘三甲板战舰在内的30艘战列舰就等同于42个单位。冈托姆所部拥有22艘战列舰，仅有1艘是三甲板战舰，等同于23个作战单位，但其中只有21艘战舰做好了出海准备。

[8] Saint-Cloud，July 18th：*Correspondence*，xi.22.

[9] Desbrière，iv.465-6.

[10] *Appareillage général de la flottille impériale.* August 3rd（Desbrière，iv.398）.编者对此写道：“这样的报告实在让人无法评论。矛盾之处和资料错误实在是太多、太明显。”据基思勋爵的估计，布洛涅的船队要乘着6次潮水才能全部出港。*Barham Papers*，iii.141，181.

[11] *Appareillage général de la flottille impériale.* August 3rd（Desbrière，iv.398），p.466.

[12] Cornwallis’s *Journal* and *Log of the Ville de Paris.*

第十四章 考尔德的战斗

在冈托姆于布雷斯特按兵不动的同时，拿破仑还必须在维尔纳夫与费罗尔舰队的集结行动上集中注意力。但在那里，巴勒姆的计划同样取得了成功。7月22日，当康沃利斯正要重新恢复他之前的近距离封锁时，一场决定战役成败——至少关乎拿破仑侵英行动成败——的战斗已经来临。

考尔德在菲尼斯特雷外海的战斗是一场被低估的行动。我们只能在特拉法尔加海战这尊辉煌巨像的阴影之下，在一场对其战术重要性毫无检视的军事审判之间看到它的模糊身影。然而，哪怕仅仅是为了考尔德所属的战术流派，它在海军战术史上的地位也值得肯定。风帆时代战术演进的最后阶段由罗德尼、豪与杰维斯的三个流派所构成。在长期竞逐之后，罗德尼的主张已被豪取代。才华卓越的肯彭菲尔特完善了豪的流派，并赋予其无与伦比的精确性，使之直至此时仍在英国海军中占据统治地位。纳尔逊也是这一派的支持者，但他不拘一格的头脑可以说并不属于任何流派。他显然也受到了特别强调个体主动性的杰维斯的重要影响，而考尔德也正是接受了这一派的训练。[1] 因此，我们无须对以下断言感到惊讶：这场被忽视的海战的作战经验，正是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前留在那则备忘录中的伟大思想的前提。它对纳尔逊采用的战术具有重大影响，这足以使我们对这场海战的每一处细节倍加留心。

7月12日夜间，斯特林接到了康沃利斯用巡洋舰给他下达的命令：撤除对罗什福尔的封锁，加入考尔德的舰队。[2] 他在当天夜里就起锚出航，并于7月15日——康沃利斯大胆地向南方行进的同时——完成了巴

勒姆的第二处布局。考尔德为夜幕的降临而等待了一两个小时——他希望以此隐匿自己的行踪——随后便从封锁阵位上悄然离去，朝着西方驶向巴勒姆指定的截击位置。他只在费罗尔港外留下了1艘双桅快船，以此近距离监视着港内敌军。

考尔德现在的兵力包括4艘巡洋舰和15艘战列舰。战列舰中4艘为三层炮甲板的98炮战舰，还有1艘“马耳他”号（Malta）是载重量比三甲板战舰还大的重型80炮战舰；[3] 剩下的10艘，除却“龙”号是重型74炮战舰之外，其他都是小型或旧式的双层甲板战舰，甚至有2艘是弱小的60炮舰。他得到的消息称，他将要面对的联合舰队只有16艘战舰，其中没有一艘有三层炮甲板。航途中的考尔德因而对维尔纳夫舰队并不怎么担心。

但是，被他留在身后的两处港口就有所不同了。他从斯特林那里得知，罗什福尔港内有9艘战列舰与数艘巡航舰做好了出海准备，现在已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与费罗尔舰队会合了。他还知道，西班牙人在费罗尔以西的加利西亚（Galician）海岸设置了一系列信号站，这是为了通报维尔纳夫接近的消息，一旦他露面，古尔东将军就能出港与之会合。考尔德成功的唯一机会就是在维尔纳夫靠近海岸或费罗尔之前攻击并歼灭他的舰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巴勒姆要求他前往菲尼斯特雷角外海，在其西方30～40里格的海面上巡航六到八天。[4]

7月19日，考尔德已经位于菲尼斯特雷西北方的数百英里处。在这里，他得到了纳尔逊在一个月前发出的最新消息。6月17日，在安提瓜以北600英里处追击着维尔纳夫的纳尔逊遇到了一艘美国小船，它的船长在三天之前曾看到正向欧洲驶去的联合舰队。敌军的目的地是他面前剩下的最后一个疑问，但他完全确信自己距维尔纳夫只有一步之遥，一定能在他驶入港口前追上敌军。6月19日，他满怀着希望派出轻帆船“马丁”号（Martin）向直布罗陀与地中海报信，又将巡航舰“十年”号派往里

斯本，再由当地人员将它携带的消息发往费罗尔和乌桑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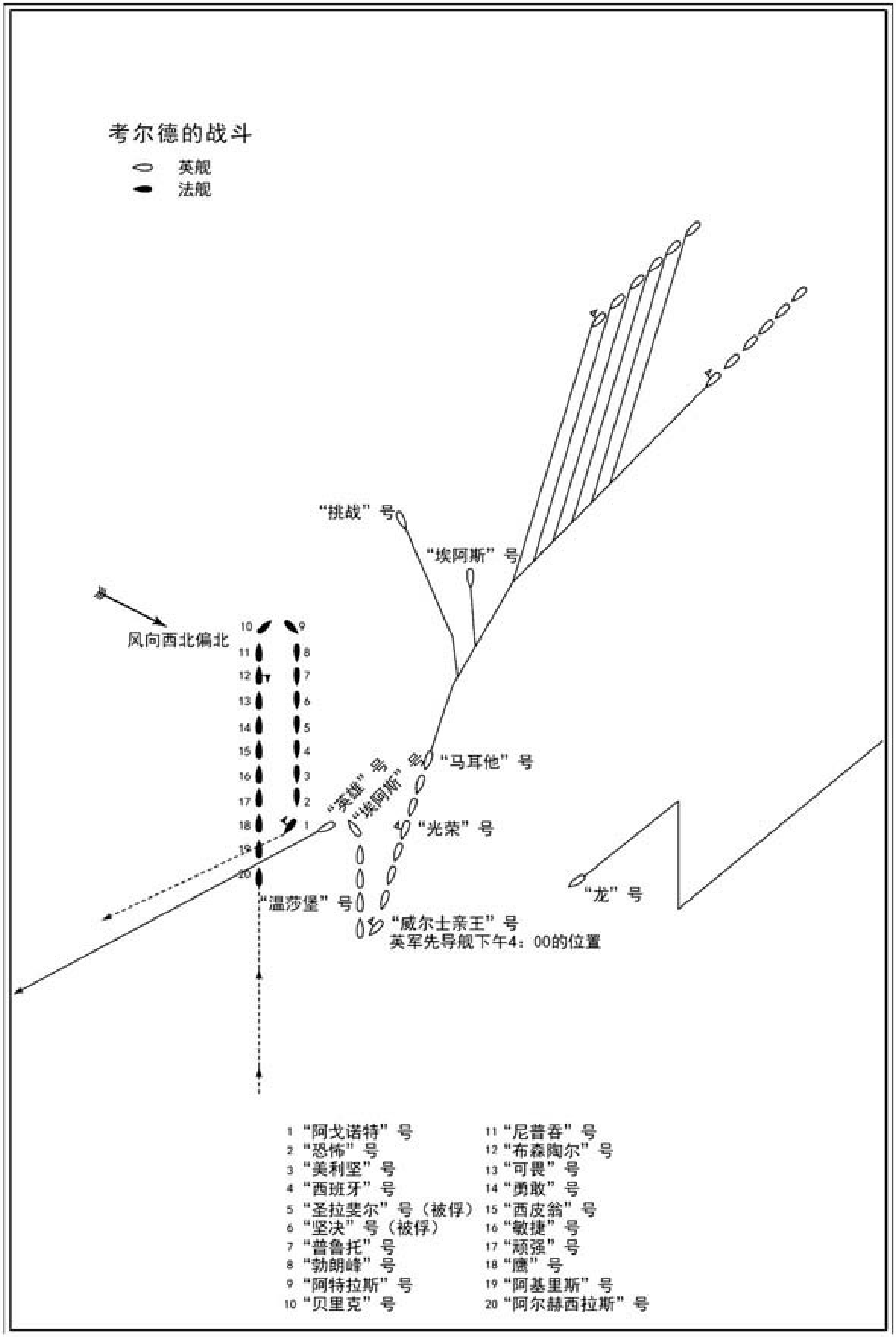
考尔德收到的正是从里斯本发来的信件。但他并没有做出如纳尔逊那样的误判，而是继续驶向西北方，穿过维尔纳夫可能行经的航线。他相信，维尔纳夫已经抵近到了咫尺之前。事实上，就在7月12日——斯特林从罗什福尔撤离的那一天——维尔纳夫已经驶入了波尔图以西300英里之内。然而，强烈的北风却迫使维尔纳夫调转航向，让他用四天时间向西航行，尝试以曲折的方法来接近目标所在的纬度。[5]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7月17日，在这一天，风向终于允许他再次转舵，驶向费罗尔所在的东面。

7月22日早晨，考尔德正位于费罗尔西北方300英里处。他已抵达预定巡航位置的远端，占据着西偏南方向的上风阵位，随时准备向舰队发出准备战斗或紧凑列阵的信号。[6] “挑战”号（Defiance）与“埃阿斯”号（Ajax）是其舰队中最靠前的战舰，此外还有2艘巡航舰按照常规布置分散在前方6～7英里处，而“龙”号——那艘最强大的74炮战舰——正在下风约6英里处追击着一艘可疑的帆船。轻风拂过海面，浓雾却久久未被吹散，舰队周围的能见度因而变得极其有限。然而午后不久，“挑战”号就打出了发现可疑舰队的信号：24艘——之后又修正为27艘——不明船只在南偏西的方向上出现。考尔德立即迎着它们，向西南方驶去。他组成了队形紧密的两路纵队，以便于转换为战斗阵型。[7]

中午时分，双方指挥官都已觉察到对方舰队的踪影。他们相距约16英里，但海面上的雾气是如此浓厚，这使他们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中无法施展任何动作。维尔纳夫让联合舰队组成了三路纵队，西班牙舰队位于右舷下风处，由2艘战列舰与2艘巡航舰组成的轻型舰队则被布置在最前。[8] 维尔纳夫本来是朝着东方的费罗尔驶去，但在前卫舰发现可疑舰队之后，他也像考尔德那样转舵相迎，希望弄清对方的底细。下午1时，前方的轻型舰队向他发来报告，一支由21艘船只组成的英国舰队正

在迫近。他立即命令法国战舰与西班牙舰队组成顶风航行、驶向上风位的战列线，以便投入战斗。而在英军一方，“挑战”号与“埃阿斯”号也辨识出敌方的战列舰队，局势由此明朗起来。考尔德打出信号，让舰队保持航向，同时将战舰间距缩短半链（half a cable）[9]。他并不准备与敌军争抢上风，而希望在下风位置与敌交战，让他的舰队横亘在维尔纳夫与费罗尔之间。

截至此时，双方尚未认清各自对手的确切实力。浓雾再一次聚拢，两支舰队只能透过雾气模糊地看到敌军的身影。迎风组成战列线的联合舰队以格拉维纳的旗舰作为先导。海风从西偏北的方向吹来，他们的航向自然是指向北面。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双方舰队在浓雾中继续接近。下午2时过后，雾气有所消散。考尔德布置在前方的巡航舰终于看清了联军的战列，于是用信号发回了他们的准确兵力。由于维尔纳夫已让他的轻型舰队加入战列线的后卫，英军又未能分辨出战列线上的巡航舰，因此，他们认为敌军拥有20～22艘战列舰。[10]


考尔德的战斗
英舰
法舰
“挑战”号
“埃阿斯”号
风向西北偏北
“马耳他”号
“英雄”号
“埃阿斯”号
“光荣”号
“龙”号
“温莎堡”号
“威尔士亲王”号
英军先导舰下午4：00的位置
1 “阿戈诺特”号
2 “恐怖”号
3 “美利坚”号
4 “西班牙”号
5 “圣拉斐尔”号（被俘）
6 “坚决”号（被俘）
7 “普鲁托”号
8 “勃朗峰”号
9 “阿特拉斯”号
10 “贝里克”号
11 “尼普吞”号
12 “布森陶尔”号
13 “可畏”号
14 “勇敢”号
15 “西皮翁”号
16 “敏捷”号
17 “顽强”号
18 “鹰”号
19 “阿基里斯”号
20 “阿尔赫西拉斯”号

菲尼斯特雷海战，**1805**年**7**月**22**日

敌军这样强大的兵力必定让考尔德错愕万分。由于他的名望已因之后的战斗一落千丈，我们有必要在这里特别关注他应对意外时的精神状态。他发现，一支兵力占优的敌舰队已经在上风位置组成了迎风的战列线，而交战也已迫在眉睫。豪勋爵与肯彭菲尔特曾对这种情况做出指导：留下中军不管，攻击敌军前卫与后卫，以防在两端遭到迂回夹击；如果舰队由三支分队组成，中卫舰队则应攻击并牵制尽可能多的敌军中部战舰。[11] 换言之，他们的办法就是托林顿勋爵（Lord Torrington）在1690年比奇角海战中使用的著名方略。[12] 但考尔德并不是豪与肯彭菲尔特的信徒。他的海战经验源于1797年圣文森特海战，他曾担任杰维斯的舰队参谋长（first captain）[13]，因此也继承了杰维斯极不信任形式化战术的观念。[14] 面对兵力占优的敌人，他执意要发起攻击，但并未选择豪与肯彭菲尔特的战法，而是选择了与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同样的攻击策略。他准备集中攻击敌方的后卫与中军，这意味着他要暂且放过由西班牙人组成的前卫，攻击敌军战列线尚未组建好的后一部分。我们并不知道这种想法在他脑海中酝酿了多长时间，但我们至少可以相信，他最初的确做出过一个相当勇敢的决定。

菲尼斯特雷海战战列线

英国舰队			
“英雄”号	Hero	74	
“埃阿斯”号	Ajax	74	
“凯旋”号	Triumph	74	
“巴夫勒尔”号	Barfleur	98	
“阿伽门农”号	Agamemnon	64	
“温莎堡”号	Windsor Castle	98	

续表

英国舰队			
“挑战”号	Defiance	74	
“威尔士亲王”号	**Prince of Wales**	**98**	考尔德
“却敌”号	Repluse	74	
“理智”号	Raisonnable	64	
“龙”号	Dragon	74	
“光荣”号	**Glory**	**98**	斯特林
“勇士”号	Warrior	74	
“雷神”号	Thunderer	74	
“马耳他”号	Malta	80	

法国－西班牙舰队				
“阿戈诺特”号	**Argonaute**	**80**	格拉维纳	原右舷分舰队
“恐怖”号	Terrible	70		
“美利坚”号	America	61		
“西班牙”号	España	64		
“圣拉斐尔”号	Saint Raphael	80		
“坚决”号	Firme	71		
“普鲁托”号	Pluton	74		原中央舰队
“勃朗峰”号	Mont Blanc	74		
“阿特拉斯”号	Atlas	74		
“贝里克”号	Berwick	74		
“尼普吞”号	Neptune	80		
“布森陶尔”号	**Bucentaure**	**80**	维尔纳夫	
“可畏”号	**Formidable**	**80**	杜马诺阿	原下风舰队
“勇敢”号	Intrépide	74		
“西皮翁”号	Scipion	74		
“敏捷”号	Swiftsure	74		
“顽强”号	Indomptable	80		原前卫舰队
“鹰”号	Aigle	74		
“阿基里斯”号	Achille	74		
“阿尔赫西拉斯”号	**Algeçiras**	**74**	马贡	

说明：加黑者为将领座舰。

下午3时30分，两支舰队间的距离已经拉近到8英里，两军仍旧分别朝着东北和西南方向稳步向前。考尔德仍旧没有争抢上风的想法，他召回了前出的战舰，随即打出准备交战的命令，组成了指向南偏西方向的战列线——这只能驶向下风方向。[15] 几分钟后，他又打出信号要求转向右舷，浓雾随后再次降临，让两军脱离了对方的视线。一刻钟后，雾气又一次消散，两军忽然发觉，他们已经形成了航向相反的两条平行线列，相互间的距离也仅仅比火炮射程多出一点。

对于维尔纳夫而言，考尔德选择这种阵位只能有一种含义。法国海军此时的观念——如同在其他地方也随处可见的类似倾向——受到了上一次重大海战的深刻影响。维尔纳夫就此认为，考尔德准备重演纳尔逊在尼罗河口海战中使用的战术，准备双面夹击其后卫舰队。[16] 基于这一设想，他向战列前方的格拉维纳打出信号：如果听到后卫传来炮声，他就应该让舰队依次顺风调头。出乎维尔纳夫意料的是，格拉维纳刚刚从雾气间看到法国巡航舰转发的信号，就立即开始执行调头的命令——不过他却将幸运地因此得益。[17] 与此同时，英军先导舰——由艾伦·加德纳舰长指挥的老旧而弱小的74炮舰“英雄”号（Hero）——已经靠近了敌军中部。考尔德认为进攻时机已经来临，随即打出信号，令全军依次迎风掉转航向。他打算让英国舰队紧靠在敌军中后卫的下风处，在与敌军相同的航向上展开战斗。在前一信号降下之后，他接着打出“攻击敌军中卫”，一刻钟后又打出“组成紧密阵型”。[18]

他直至最后一刻才让舰长们了解到他的攻击计划，但舰队前方的战舰却并未遵照他“攻击敌军中卫”的关键命令。考尔德的命令并未在加德纳舰长的日志上出现，而他身后的“埃阿斯”号也只是简单地写着“与敌军交战”。事实上，在这则信号尚未传递到身处战列线前端的加德纳时，他已被迫开始自主行动。他在掉转航向后同维尔纳夫一样朝着北方航行，却忽然发现一支西班牙大舰队正以相反航向迎面驶来。格拉维纳

的旗舰一马当先，前来救援后卫的法国舰队。考尔德预想的攻击就这样被完全格挡了，浓密的大雾又让他看不清舰队前端的最新情形。加德纳舰长也看不到考尔德的旗舰，战斗决策的责任落到了他自己的肩上。如果他继续航行，两支舰队就会再次相向驶过，但这是长期以来都被视作无法取得决定性战果的战斗形式。于是，他决定担当起责任，引导舰队再一次转舵，并与敌军保持相同的航向。在他转舵之前，格拉维纳已经杀到他的身边。西班牙旗舰射出了一轮舷炮，但其船身由于糟糕的压舱物而有些倾斜，因此无法准确地造成严重破坏。加德纳得以继续他的机动。这场海战就以这样的方式在下午5时打响，完全脱离了考尔德预想的作战方案。

开火之后，格拉维纳随即发现自己已抵达法军殿后舰的位置。由于维尔纳夫曾在他驶过法军旗舰时向他下达掩护后卫的命令，他决定穿过法国舰队的尾迹，顶风转向至右舷迎风的西偏南。在英军方面，“英雄”号之后的“埃阿斯”号遭到了2艘西班牙战舰的攻击，它被迫驶往下风、退出战列。考尔德的旗舰在这个时候刚刚抵达加德纳转向的位置，退出战列的“埃阿斯”号决定驶向旗舰，向他报信。[19] 于是，直到战斗开始的三刻钟后，考尔德才弄清了战场的真实情形。6艘战列舰已跟随加德纳进行了第二次转向，考尔德的旗舰是第7艘。他随即打出“全军听令”信号，指示所有战舰到他附近的位置上转舵，追认了加德纳的自发之举。

一场构思良好的攻击就这样毁于格拉维纳的提前调头以及他自己无法掌控的战场环境。考尔德现在只能集中攻击敌军的前卫与中军，而这种糟糕的作战方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敌军在己方后卫舰队上集中兵力——他们的后卫舰队完全可以赶上前去。此外，只有12艘英舰正在与敌军作战。在考尔德转向之前，“英雄”号与“埃阿斯”号已经被逐出战列；在他转向时，格拉维纳已在同英国舰队中的第四艘战舰——98炮的“巴夫勒尔”号——交战。不仅两艘弱小的先导舰退出了战斗，强大

的“龙”号也一直被逆风困在下风方向，从始至终都没能加入战斗。

英军战列最后方的“马耳他”号正在与法西联军的第12艘战舰交火。那也是一艘80炮战舰，是由法军少将杜马诺阿[20]坐镇的联军后卫的首舰。不过，绝大多数后卫法舰都没有加入战斗，考尔德得以势均力敌地应付面前的这部分敌舰。之后发生的事就没人能说得清楚了：大雾再一次降临，两支舰队在西偏南的航向上继续近距离交战。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向谁开火，只是朝着对面炮口的闪光不断射击。维尔纳夫在跟着西班牙舰队转向时甚至都分不清敌军是在左舷还是右舷。而友军的误击也在所难免：“马耳他”号在转向之后就曾朝一艘英国巡航舰开火。这种混乱而盲目的战斗一直到夜里9时才完全停息。

当战斗结束时，英军已夺取了2艘位于前卫最后方的西班牙战舰，它们在英勇抵抗之后因重伤瘫痪而不幸地漂到了下风的英国舰队中。98炮战舰“温莎堡”号（Windsor Castle）对此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但受损也最为严重：它的前顶桅（foretopmast）被打断，舰员死伤45人。一位在场的军官曾称赞它“表现精彩”；而从伤亡情况看来，是它与考尔德的旗舰、同样拥有三层炮甲板的“威尔士亲王”号给敌军造成了最大的破坏。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英军后卫的两艘战舰：战列末端的“马耳他”号与它前方的“雷神”号（Thunderer）遭受了敌军的集火攻击，却也给当面之敌造成了更大的伤害。两艘战舰都遭受了严重的人员损失，“马耳他”号的死伤情况与“温莎堡”号相当。[21]

双方战斗伤亡人数统计

英国舰队				法国－西班牙舰队			
船名	炮数	死	伤		炮数	死	伤
“英雄”号	74	1	4	“阿戈诺特”号	80	6	5
“埃阿斯”号	74	2	16	“恐怖”号	70	1	7
“凯旋”号	74	5	6	“美利坚”号	61	5	13
“巴夫勒尔”号	98	3	7	“西班牙”号	64	5	10
“阿伽门农”号	64	0	3	“圣拉斐尔”号(俘)	80	53	114
“温莎堡”号	98	10	35	“坚决”号(俘)	71	41	97
“挑战”号	74	1	7	“普鲁托”号	74	8	22
“威尔士亲王”号	98	3	20	“勃朗峰”号	74	6	11
“却敌”号	74	0	4	“阿特拉斯”号	74	10	32
“理智”号	64	1	1	“贝里克”号	80	2	8
“光荣”号	98	1	1	“尼普吞”号	80	1	7
“勇士”号	74	0	0	“布森陶尔”号	80	3	3
“天狼星号”	36	2	3	“可畏”号	74	4	6
“雷神”号	74	7	11	“勇敢”号	74	5	5
“马耳他”号	80	5	40	“西皮翁”号	74	0	0

续表

英国舰队				法国－西班牙舰队			
“天狼星”号	36	2 41	3 158	“敏捷”号	80	1	0
				“顽强”号	74	4	1
				“鹰”号	74	0	0
				“阿基里斯”号	74	0	0
“龙”号	74	未参战，4 人意外受伤		“阿尔赫西拉斯”号	74	0	0
						155	341

共计	死	伤	
英国	41	158	
西班牙	111	246	155 死，341 伤
法国	44	95	

说明：“可畏”号和“阿特拉斯”号的舰长在战斗中阵亡。

考尔德在次日早晨的信中写道：“这是一场很有决定性的战斗，一直持续了四个小时，直到我认为有必要让舰队去掩护被俘的敌舰。”维尔纳夫的说辞则与之相反：“敌人匆匆逃离，他有好几艘战舰已被打残，我军仍保有战场。胜利的欢呼响彻我们的战舰。”[22]

双方的夸耀都无法令人满意。不过，考尔德的说法至少在战略层面上还算事实，而维尔纳夫对保有战场的吹嘘则完全没有道理。这次战斗的真实结果是，考尔德守住了他的位置，他击退了维尔纳夫接近费罗尔或加利西亚信号站的企图。他从优势敌军手中夺取了2艘战列舰，给敌人造成比己方伤亡大三倍的损失。截至此时，考尔德显然赢得了胜利，他在海战中的行动也得到了海军部的表彰，这一点从未遭到质疑。他当然也觉得自己干得不错，并在凌晨时分传出话来，准备在次日一早再次与敌军交战。

然而当太阳升起时，他忽然发现自己的舰队正散落于广阔的洋面上。舰队前卫远离敌军所在的上风位置，巡航舰、战利舰与“温莎堡”号

和“雷神”号则在下风某处的视距之外。更让他为之焦虑的是，它们发来的损伤报告表明其索具严重受损，无法顶风航行。最终，他决定召回前卫舰队，然后转向下风，去与受损战舰会合。

同1756年梅诺卡岛海战中的约翰·宾将军[23]一样，考尔德重新交战的雄心业已被激情消退后的重重顾虑所瓦解。他在发给康沃利斯的一封短信中解释了他此时想法的转变：“敌人正处在视距内的上风位置，我在保护好战利舰并整理好舰队之后就会尽可能地抓住机会，或许会给你送去关于联合舰队的进一步的消息。与此同时，我必须防范费罗尔的那支舰队，我相信他们昨晚已将一到两艘受创的战舰派往那个港口。因此，如果必要的话，我可能要率领整支舰队与你在乌桑特附近立即会合。另外，我必须把‘温莎堡’号派往你处，它已在战斗中严重受损。”[24]

次日，他所暗示的那种机会并没有发生。事实上，维尔纳夫的确曾显示出继续交战的意图，但他声称考尔德每次都拒绝让他靠近。而考尔德则声称，是占据上风位置的维尔纳夫一直保持着距离。7月24日，风向转为对考尔德有利，但他仍旧没有尝试发动攻击。敌人完全处在视距之内，考尔德却认为强行交战将冒着要让战利舰与受创舰遭受损失或让维尔纳夫接近海岸信号站的风险，这超出了他的实力所及。他认为，只要尽量长时间地坚守在这个无须作战就能阻止维尔纳夫接近其目标的阵位上，他就能够确保自己的胜利果实。他总是辩称自己追随着豪勋爵和杰维斯的先例：他们在六月一日海战与圣文森特海战之后的作为与自己并无不同，何况他们身后并不存在兵力相当且未被击败的第二支敌军舰队。他说：“就我所处的局势而言，即便我只注意当面之敌，强行与这样一支占据优势的敌舰队交战看来也不切实际。更何况还有16艘战舰正在费罗尔，他们可能出海来支援友军……或者驶向英国，发起他们日思夜想的渡海入侵。我认为再次交战太过冒险，会将我的舰队置于过分危险的境地。因此，我觉得最好还是将舰队集结在手里，不要强行与敌人

再度交战，除非出现了更有利的时机。同时，我认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与费罗尔舰队会合，我一定会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25日早晨，双方舰队脱离了视线接触，海面风浪也变得汹涌起来。维尔纳夫担心舰队会因此散开，于是决定放弃前往费罗尔的计划，调头驶向加迪斯。即便如此，天气情况仍在迅速地恶化，不久就变得极为危险。格拉维纳提议去西班牙港口比戈（Vigo）暂避风浪，最终得到了军官会议的认可。

考尔德对这些变化一无所知。他的两艘巡航舰正在专心保护受创的战舰，无暇顾及敌军，他只知道联合舰队已在南方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将之理解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通过一场成功的战斗，他守住了菲尼斯特雷的战略要地，成功阻止了敌军在费罗尔集结。因此，他终于可以自由地行动了。他首先关注的是“温莎堡”号与两艘战利舰，它们正位于北方的远处，在驶向本土，他必须保护它们免遭费罗尔和罗什福尔舰队的袭击。在此之后，他驶向了康沃利斯交代给他的集结点，希望能遇到业已返航、随时可能露面的纳尔逊。如果纳尔逊并未出现，他就将重返费罗尔港外。

在这些行动决策之间，考尔德面对的或许是历史上最为难解的疑题：他必须在歼灭敌舰队的首要目标与防止英国遭到入侵的终极目标之间做出决断。现代批评者指责他不可救药地缺乏勇气，他的错误纯粹出于胆怯。然而，他那些用了三天时间听取相关证据、触及那个关键时刻的敏感要害的同僚却并不能这样肯定。他们花了六个小时举行机密会议，在最后的判决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终才做出了对他加以惩戒的决定。他们的判决理由是“他未能尽力地重启他所承诺的战斗，夺取或摧毁所有敌舰”。他因此遭到指控，并被定罪。但在考尔德看来，这一指控完全回避了问题实质。在他看来，当时自己的职责并不是重启战斗，也不是摧毁所有敌舰，而是保有一支“存在舰队”（fleet in being），

以阻止敌人驶向费罗尔。不过，即便用上现代军事概念，今日的海军特别法庭仍会对他做出有罪判决。指出考尔德的错误并做出判决是一回事，但指责他是胆怯的懦夫又是另一回事。

考尔德相信，自己和当年的宾将军一样，只是公共舆论的受害者。这个国家每天都在热切期待着捷报，得到的却是英军撤退的消息，而海军部在公开他的信件时又删去了暗示着不会再次交战的最后一节。他认为，是公众因失望而产生的反感毁掉了他的前程；但事实上，海军部和英国政府的看法与普罗大众并没有区别。如此判决的原因与巴勒姆作战计划的内核密切相关。巴勒姆决定用巨大的风险交换一场极其重大的士气打击。他的目的是让敌人知道，任何溜出港口的敌舰队都将有去无回，从而在他们心中造成一种持久不散的恐怖阴影。他令人钦佩地做出了牺牲，以此为代价，将考尔德置于实现这一目的的关键位置上，但考尔德却没能将之贯彻到底。他的失败是由于他的心理状态，由于他迷茫而焦虑地担心着身后与他无关的问题——巴勒姆对此早有充分的准备。考尔德对战斗精神的背弃不可能得到原谅，这使他无可避免地走上了军事法庭。

事实上，从未有人为考尔德提出过真正有效的辩护。在当日情境之下，没有人给他解释过巴勒姆命令的内在意图。他无须在乎自己舰队的结局，唯一的职责就是竭尽全力地紧紧咬住维尔纳夫舰队——但他对此却并不知情。

用战斗打破迷局，这一原则业已成为现代海军思想中不言自明的公理，但在考尔德的时代尚不为人所知。这个案例最为棘手的部分在于，他是在一套标准下投入战斗的，又是在另一套标准下受到审判的。[25]在考尔德的战斗与军事审判之间，纳尔逊赢得了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胜利。这场胜利提供了一种信心充沛、热切求战的理想典型，但在考尔德投入战斗时，这仅仅存在于纳尔逊与他的“兄弟帮”之间。对考尔德抱有

深切同情的纳尔逊曾经明确地指出他的问题。纳尔逊在寄给第二海务大臣的信中写道："比起眼前的舰队，他似乎更关心费罗尔港内的敌军……他过分紧张地忧虑着作战之外的其他问题，因此没有去做那些他本可以做到的事。我冒昧地建议让考尔德保留原职，这样就能挽回他的名誉。" [26] 在纳尔逊那里，"无法做到"才是没能集中精力于当面之敌的唯一正当理由，他与旧时代的蒙克（Monck）都一定会再度展开攻击。然而，我们却无法保证同样情境中的其他人不会犯下与考尔德类似的错误。更好的办法不是执着于那些浅薄的指责，而是应该谦卑地认识到"过分紧张地忧虑着作战之外的其他问题"所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只有这样，人们在类似的情况下才能避开误入歧途的风险。

---

[1] 罗德尼是统帅作风较为传统的老一辈将领，他习惯于在海军部颁发的《永久航行与作战指令》（*The Permanent Sailing & Fighting Instructions* ）的信号框架下组织战术，其指挥风格保守而独断。他强调进攻，强调舰长应迅速地服从命令，但不愿为执行复杂战术而制定自己的信号，也不愿给他的下属赋予相应的自主权。豪则是一位创新的战术家，他乐于制定自己的信号系统和额外的战斗指令，继而用自己发明的数字信号系统组织某些复杂的战术行动，突破传统战术的藩篱。他的信号系统与战斗指令得到了另一位战术革新者肯彭菲尔特的进一步完善，在他们构建的海军战术体系中，指挥官可以用旗语信号对应海军作战所需的各种行动。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尽管豪的流派更为先进，使用它的指挥官却无法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甚至在切萨皮克海战的关键时刻战败。而罗德尼则赢得了圣徒岛海战的决定性胜利，这场胜利延续了旧式战术的生命，将豪在战术领域的全面胜利推迟了十年。继之而起的杰维斯则侧重于对个体舰长的培养，试图用训练精良、积极自主的舰长来实现更为复杂精巧的战术构想。纳尔逊曾在杰维斯麾下服役，而他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打出的"近距离交战"等信号则是来自豪与肯彭菲尔特编制的信号体系。不过，他们都十分强调指挥官在战场决策时的核心地位，而纳尔逊却并不重视这一点。考尔德曾长期担任杰维斯的舰队参谋长，并曾协助杰维斯准备其战术训令，因此被科贝特认为属于杰维斯的流派。但布莱恩·滕斯托尔认为，考尔德的行动是由战场的实际情况所决定，而未应用战术学派来分析。参见Brian 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1650-1815* （Naval Insitute Press，1991）pp.135-258。——译者注

[2] *Log of the Glory* . Letters of First Lieutenant of *Egyptienne*：*Blockade of Brest* ，ii.313.在军事法庭上，斯特林说他记不清具体日期，但同意是12日的说法。

[3] “马耳他”号即法国80炮战列舰“威廉·退尔”号，它是尼罗河口海战最后的幸存者，于1800年被英国战列舰“闪电”号俘获。按照英国计算标准，它的载重量达2255吨，而98炮战舰的平均载重是2000吨，尽管后者的排水量要更大。加装卡隆炮之后，“马耳他”号的侧舷投射量达1200磅，比98炮战舰还多200磅。

[4] Court-martial，Calder’s defence；*Naval Chronicle*，xv.164.Lords of the Admiralty to Cornwallis，July 9th：*Barham Papers*（*ante*，p.200）.

[5] See the chart in Desbrière，*Trafalgar*，p.50.

[6] 信号52：“保持紧密阵型，朝先导舰或旗舰靠拢。”当时的舰队处于巡航队形中，并非正式的航行阵型。在巡航队形中，各分队跟随其旗舰行动，不设固定阵位。

[7] 据1799年的《信号指令簿》（*Signal Book Instructions*），xix.p.121，密集阵型下的战舰间距为1.5～2链（1链为1/10海里。——译者注），即300～400码。据Art.ii.，p.127，这一距离是2链，平行纵队的横向间距是1.5英里，但Plate I所标示的、与考尔德舰队兵力相当的15艘战舰的纵队横间距又只有1英里，故其实际距离可能因舰队规模而有所变化。参见*A System of Naval Tactics*，1797，p.170。战列舰的长度平均为60码，如果一支纵队由8艘战舰与7个2链的间隔距离组成，其长度就是3280码，约为1.64英里，那么处于这种阵型下的考尔德舰队足以覆盖1.5平方英里。松散阵型的间距为3～4链，8艘战舰组成的纵队长度将会超过3英里。

[8] Galiano，*Revista General de Marina*，1908，p.477 *note.*

[9] 信号52：“保持紧密阵型。”据Instruction xix.，p.121，每次打出这一信号，战舰队形间距都应缩短半链。

[10] 双方战列线如正文表格所示。

[11] Signal and Instructions（Navy Records Society），pp.77，108，120，134，173，319，328-9.

[12] 1690年夏，英国海军将领托林顿勋爵率领英国-荷兰联合舰队在比奇角海域与法国舰队交战。由于兵力处于明显劣势，托林顿让中军远离敌军炮火，而让前卫和后卫尽量与敌军阵列平齐，与敌交战。但联军前卫未能与法军平齐，中军又远离战火，未能提供有效支援，导致前卫舰队遭到法军围攻而战败。——译者注

[13] 在当时的英国海军中，“first captain”一词代指“captain of the fleet”，是指在大型舰队的旗舰上协助总司令的舰队参谋长。而“second captain”则相当

于“flag captain”，指旗舰舰长。——译者注

[14] 布莱恩·滕斯托尔在《风帆时代的海战：1650～1815年的战术演进》一书中认为这是科贝特的过度推理。圣文森特尽管认为形式战术并非必须，却也是海军战术的组成部分。——译者注

[15] 威廉·詹姆斯认为，他在3：22打出了全体转向的命令，这表明他想抢得上风。实际上那只是预备转向的命令，而且在3：30撤销。3：33时，他向右舷纵队打出了93号信号——“在不破坏阵型的前提下升起尽可能多的帆”——同时还打出代表西偏南的航向命令。这是让上风纵队驶向下风舰队前方、由此组成战列线的常规机动。到3：43，他打出了“组成松散的战列线”的信号。

[16] Duro，*Armada Española*， viii.291.

[17] 这要归功于格拉维纳的参谋长艾斯卡尼奥舰长的先见之明。参见*Elogio de Don Antonio Escaño*， quoted by General Galiano。

[18] 其含义是，参照风浪情况，将原本一链的距离缩短到半链，即将间距减半。

[19] 詹姆斯所著海军史（vol.iii.360）认为“埃阿斯”号在5：45转向，没去支援加德纳，而立即驶向了旗舰，他因此而谴责其舰长布朗（Brown）的行为。但布朗的日志表明，“埃阿斯”号在5：35投入战斗，在5：50转向。他与身边的另一艘英舰组成了航向相反的平行横队，此时仍在“与驶出雾气的敌舰交战”。他的人员损失显然比同尺寸的任何战舰都要大。

[20] 皮埃尔·杜马诺阿·勒·佩雷（Pierre Dumanoir le Pelley，1770～1829年），法国海军将领。1805年随维尔纳夫参与了特拉法尔加战役，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指挥前卫舰队未能及时回援参战，随后率4艘战舰撤离战场，几天后在奥特格尔角被斯特罗恩将军率领的英国分舰队全歼。遣返后遭到法国官兵的强烈谴责，直至1810年才被宣告无罪。——译者注

[21] 从正文表格的伤亡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哪里是战斗的焦点。

[22] 目前对这场海战最好的叙述来自詹姆斯所著海军史，iii.p.360 et seq。而埃金斯将军（Admiral Ekins）的作品（*Naval Battles*， p.662）则十分荒诞。他说除了他们一致同意这是一场糟糕的战斗之外，他无法从参战舰长那儿找到任何足够清楚的描述。德斯奇霍上校也和埃金斯一样，认为格拉维纳是迎风转向而不是顺风转向，他的态势图因此也是误导性的。加利亚诺将军（General Galiano）在其*El Combate de Trafalgar* 的态势图中修正了这一错误。他与德斯奇霍都注意到了艾斯卡尼奥舰长——格拉维纳的参谋长——的宝贵报告，它是使对这场海战的可信叙述成为可能的最为重要的材料（*Trafalgar*， *Appendix of*

Documents， p.3）。维尔纳夫及其他人的叙述可参见其*Projets et Tentatives*， iv.chapter xiv。格拉维纳的说法、波帕姆尉官（Lieut.Popham）的证词与考尔德写给巴勒姆的私人信件则可参见*Barham Papers*， iii.259 et seq.。利兰先生（Mr.Leyland）在其*Blockade of Brest*， vol.ii中收录了考尔德的证词，以及两份由通信巡洋舰军官所抄录的更全面的报告。考尔德的个人日记已经遗失，但参战舰艇的日志都保存在档案局。加利亚诺将军曾发表过由被俘的西班牙战舰——“圣拉斐尔”号（San Raphael）与“坚决”号（Firme）——的舰长所撰写的两篇报告。

[23] 约翰·宾（John Byng，1704～1757年），英国海军将领。在七年战争初期率领状态不良的英国舰队支援被法军围攻的梅诺卡岛，在一场非决定性的战斗后认定他的兵力不足以再度进攻及援救要塞，因此回师直布罗陀，使梅诺卡岛陷落。这一消息在英国引起舆论公愤，他随即被军事法庭判处有罪，遭到枪决。——译者注

[24] *Blockade of Brest*， ii.312.他的私人信件可参见 *Barham Papers*， iii.259。

[25] 对考尔德的军事审判在1805年12月23日举行。——译者注

[26] Nelson to Gambier，Oct.2，in Chatterton’s *Memorials of Gambier*， ii.4.

第十五章 战后的行动

无论我们是否为之辩护，考尔德对其行动要求的误解业已让巴勒姆大胆的反击构想功败垂成。截至此时，拿破仑的计划从各方面看来仍然进展顺利，而英军则已被迫退回到防御姿态。这场战役中最为有趣的环节也开始出现：为了应对敌军集结的威胁，广泛分散的英国舰队开始自发地驶回战略中心。

纳尔逊是最早开始行动的。他与巴勒姆最初都认为维尔纳夫的目的地是加迪斯，便决定从安提瓜直接驶向圣文森特角，这是赶在敌人近岸之前追上他们的最佳方式。6月21日，战列舰“利维坦”号的贝恩顿舰长（Captain Bayntun）在从一位美国船长处获知维尔纳夫的消息之后向纳尔逊写道：“前方的敌人离我们不会很远。如果我们选择尽量偏向东方的航线（而他又绕了远路的话），我们就能先于他抵达圣文森特。这是先生您每晚做梦都会想到的吧。”[1] 纳尔逊在7月17日抵达了圣文森特角，并与先前被派往里斯本的巡航舰“十年”号在此会合，但他唯一得到的只有密歇希在两个月前返航的消息。他没有收到关于维尔纳夫的任何消息，于是，在向科林伍德派去通信船之后，他便驶向直布罗陀去装载补给物资。7月20日，纳尔逊踏上了陆地——这是自他登上“胜利”号两年以来的第一次登陆。他的心中仍旧留存着先发制人的希望，即能在维尔纳夫接近直布罗陀海峡时与之交战。然而，科林伍德却在发来的欢迎函中写下了与他的预想完全不同的推断。

在之前的战争岁月中，科林伍德一直在英吉利海峡服役，他的看法无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个位置的影响。有关位置的偏见在战争中随处可

见，这是一种必须被纳入考量的人性要素。每位指挥官都更偏向于看到敌人在自己行动舞台上的目标，正如纳尔逊执着于地中海，科林伍德则特别关注英吉利海峡。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他在这里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就认为他的战略眼光比纳尔逊更强。科林伍德向他的上级提出，维尔纳夫的目标是带出费罗尔与罗什福尔舰队，在乌桑特岛外海汇集34艘战列舰，然后在那里与布雷斯特的20多艘战列舰会合。即便集结起西方舰队的三支分属舰队，康沃利斯的兵力也不会高于30艘。“这似乎是一个可能的计划。这支大舰队与大军团可能要执行某种重要任务——某些渡海征服的突袭——否则，这只会让他们面临遭受损失的风险。我不认为那个科西嘉人会这样做，除非他想得到的某种奖励值得他如此冒险。”[2]

但纳尔逊仍未放弃那个愈发暗淡的希望。正如他向海军部报告的那样，他只是想先去特图湾取得新鲜的饮水与给养，同时向科林伍德与比克顿索取海军部于他不在时发来的所有命令。如果他发现其中并无违碍之处，他就将安排好对卡塔赫纳的封锁，然后在地中海之外等待进一步的指令。然而，如果他听说维尔纳夫已经驶向比斯开湾，如形势有需要，他就会立即加入费罗尔或乌桑特外海的舰队。[3]

在这段等候的时间里，纳尔逊重新规划了地中海的舰队布局。科林伍德的舰队现在分散在海峡两侧的加迪斯与卡塔赫纳，在直布罗陀控制海峡的奈特却没有一艘战列舰，这样的军力布置让他实在无法理解。不过，他最为关心的还是马耳他的克雷格远征军。他找到了一则从马耳他召回轻帆船的命令，这则命令准备让它们与科林伍德会合。然而，敌军的私掠船正在肆虐，马耳他岛又无法自给自足，必须依靠临近的淡水水源，这则命令意味着马耳他驻军可能要陷入补给被切断的危险。他刚刚听说巴勒姆被任命为新的海军大臣，在写给其的第一封信中，纳尔逊就对这一布置提出了抗议。他自作主张地撤销了这则命令，让轻帆船返回原位。不仅如此，他还将地中海的整个指挥权划分为三部分，并向本土

申请各个部分所需的兵力增援。科林伍德的防区从直布罗陀海峡西北方的圣文森特角延伸至西南方的斯帕特尔角，封锁着海峡外侧的加迪斯与塞维利亚。奈特与他的巡洋舰队负责海峡与直布罗陀的部分，其防区从斯帕特尔延伸至海峡东北部的马拉加（Málaga）。而比克顿则要在详细的指导之下用剩余的兵力封锁卡塔赫纳，保卫撒丁岛、西西里、那不勒斯与马耳他，以及保护黎凡特贸易线。这些布置在7月22日得以完成，纳尔逊随后驶出了特图湾。此时的他还并不知道，另一个人正在菲尼斯特雷以北的海面上享用着他为自己而辛苦筹备的海战盛宴。

直至7月24日，纳尔逊仍在焦急地盼望着新的消息。他仍未收到任何重要情报，便起锚驶向斯帕特尔角，那里是他预定的与巡洋舰会面的集结点。25日凌晨3时30分，在他刚刚驶出海峡、尚未驶过塔里法之时，一艘最近从英国本土驶来的轻帆船“泼妇”号（Termagant）加入了他的舰队。它在远航途中曾驶入里斯本的特茹河口，并从那里带来了“好奇”号抵达普利茅斯并在途中发现联合舰队的消息。纳尔逊在此刻终于理清了思绪。维尔纳夫显然已驶向比斯开湾，因此他也必须立即前往那里。强烈的东风忽然袭来，使他难以与老友科林伍德取得联系。尽管与科林伍德会面十分重要，但他也不愿意浪费任何风向合适的时机。他给巡洋舰留下话，让它们到圣文森特角与之会合，如果不在那里，就是在费罗尔——除非有理由认为他采取了其他的航线。万一是那样，它们就会在乌桑特或爱尔兰海域找到他，或者是在英吉利海峡内的斯皮特黑德休整地。于是，在考尔德驶向菲尼斯特雷远端、希望遇见纳尔逊之时，纳尔逊也正以最快的速度全力朝他赶去。[4] 第二天，纳尔逊抵达了圣文森特角，但海面上却刮起了强劲的北风。如果要继续前往费罗尔，他势必要在此耽搁不知道多长时间，同时让乌桑特舰队处于孤立无援的危急境地。依照科林伍德的兵力计算，恢复双方兵力平衡的唯一可能性就在于他的舰队。他只能尽量向西方航行，并向康沃利斯发去消息：他将按照相应情报驶向乌桑特或爱尔兰。

这是一个不幸的决定，但我们无法责怪任何人。如果考尔德在战斗结束后立即向南方发出消息，这一状况或许就能避免，但他手头却没有空闲的巡洋舰——也许只有凿沉那两艘不值钱的旧战利舰才能让他的巡洋舰腾出手来。由于信息的匮乏，纳尔逊只得假设敌军已经驶向北方，这迫使他只能赶往那个危险性最大的地点。假如他能与考尔德会合，这样急迫紧张的情况就将不复存在，一场伟大的胜利就将横躺在他的进军途中，特拉法尔加海战就根本不会发生，巴勒姆的伟大设想就能完全实现。

如果纳尔逊继续北进，他所拥有的巨大优势足以扫清前方的战略乱局。考尔德从菲尼斯特雷集结点派出了未披战伤的“龙”号去侦察费罗尔港，但出乎意料的是，港内的情况与其撤离封锁时毫无不同。古尔东和格兰达加纳仍然待在他们的锚地上，维尔纳夫与罗什福尔舰队也并未出现。考尔德只能认为维尔纳夫驶向了加迪斯，那必定会落入纳尔逊和科林伍德之手，他由此决定去恢复之前的封锁。他原本打算将“龙”号留在身后，接应可能北进的纳尔逊，但这种可能性现在已非常有限。于是，他带着“龙”号一起返航，这处集结点只余下空荡荡的海面。7月29日，他率领14艘战列舰恢复了对费罗尔的封锁，两天后，他又派80炮战舰“马耳他”号返回本土去修整它之前的损伤。

与此同时，在比戈躲避风浪的维尔纳夫正处在被他称为“最为悲惨的处境”里。他既没有接到新命令，也没有得到新情报。这处港口既缺乏防卫设施，也没有可供修理船只的设备。坏血病与痢疾正在船员之间肆虐，而除却2艘被俘的战舰，还有3艘战舰在战斗中受创，不适于继续作战。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中，他曾召唤古尔东前来与他会合；但古尔东的唯一答复却是这不可能——他甚至还没能按照拿破仑的指示驶向附近的拉科鲁尼亚。维尔纳夫只能冒着再次交战的风险主动与他会合，他自己说：“希望下一次的运气比第一次好一些。”他半偷半骗地收集到了可供15艘战舰使用一个月的补给与饮水。7月31日，他将伤病员留在3艘受

创的战舰上，率领剩余的15艘战舰再次出海，希望不经战斗前往费罗尔。[5] 第二天，即8月1日，他幸运地遇上了一阵强有力的西南风，于是便以最高航速沿着海岸偷偷向北方驶去。

那么，率领法国罗什福尔舰队的阿勒芒现在又在何方呢？他为什么没有在费罗尔出现？在斯特林从港外消失的三天之后，阿勒芒乘着120炮战列舰“雄壮”号（Majestueux）驶入了大海。他的舰队还包括4艘双甲板战列舰与5艘巡洋舰——对于他的任务而言，这是一支相当理想的兵力。我们必须再重复一遍，他所接到的最后一则命令是让他去爱尔兰西海岸进行一场巡航表演，之后要及时地回到费罗尔以西40里格的位置上，等着加入从西印度群岛返航的联合舰队。事实上，拿破仑为他设定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他期待已久的与维尔纳夫的会合，而这种莫名其妙的行动则是拿破仑将敌军引离其阵位的典型计略。他所指定的集结点正处在考尔德舰队的掩护范围之内[6]，其西北方40英里处就是7月22日考尔德与联合舰队交战的地点——我们将会看到，天真的法皇将因此而大为吃惊。两军会合的时间被定于当月月底，从7月29日到8月3日，他都应待在指定位置。但是，这里还存在着另一处误判：这一命令基于维尔纳夫会在马贡抵达马提尼克的三十五天之后返航的必要前提，而他们忽视了纳尔逊可能对此造成的影响。现在，纳尔逊的火热追击已迫使维尔纳夫提前返航，他不仅过早地错过了阿勒芒，甚至因过早返航而根本未能获知与罗什福尔舰队会合的新安排。

让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斯特林的封锁已经严重拖延了阿勒芒预定的出海时间。当他驶入大海、打开密令时，阿勒芒发现前往爱尔兰进行巡航掩饰的时限已经结束。这正是拿破仑下令制止他的原因——但为时已晚。旧命令指示他先往西航行400里格，以避开英国在乌桑特与费罗尔外的舰队，然后在7月4～9日出现在爱尔兰西部外海。他要在那里巡航一周时间，接着去菲尼斯特雷集结点与维尔纳夫相遇。如果他要严格遵守命令，他就应该在驶出罗什福尔的那一天径直驶向集结点。但阿勒芒

是一个斗志昂扬的人，他并未执着于命令中的具体字句，而是尽力实现其内在意图。他决定暂不放弃去爱尔兰吸引敌军注意力的行动。他在致德克雷的信中写道：“尽管时限已经结束，但我认为，尊敬的阁下，我仍能在不错过费罗尔40里格外的首要集结点的前提下，利用有利的风向与截短的航程出现在爱尔兰海岸。”[7]

他在这一想法的指引下直接驶向西方，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不仅无法避开英国乌桑特舰队，反而一头撞进了英军为维尔纳夫设下的陷阱——他正朝着康沃利斯巡航路线的最南端驶去。但就在他起锚之际，康沃利斯如同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选择了返航。于是，当阿勒芒在7月19日抵达这个关键要点时，他在那里只遇到了被康沃利斯留下来从中立国商船处打探联合舰队消息的“漫游者”号（Ranger）轻帆船。它立即被俘获凿沉，而它的使命也因法方对英国军官的搜查而暴露了出来。阿勒芒立即变得十分警觉。第二天，他发布了一则冷酷的命令：当舰队在真实航线上行进时，任何出现在视域内的中立国船只都应被俘获并击沉。[8]

7月21日，阿勒芒已位于罗什福尔以西约150里格处。风向转为西偏北使他难以继续西行，而他尚未航行到指令所要求航行距离的一半。但是，这对驶向爱尔兰却较为有利。冒着与康沃利斯相遇的风险，他可以在此截短航程，以此来弥补被封锁在罗什福尔所造成的时间损失。这正是他的打算，于是便迎风转向北方。然而，这个打算却也仅止于此。在他转向之后，风向逐渐偏向北方，他在随后三天的奋力进军中只取得了一丁点儿进展。通过俘获一艘来自格恩西岛的船只，他得到了一幅大比例的爱尔兰海岸地图，但在7月23日，他终于放弃了试图前往爱尔兰的行动。他距离目标还有超过300英里，一场从北方吹来的暴风迫使他收帆停航、随风飘荡，驶向爱尔兰的时机因此不复存在。第二天，他再次转向，驶往预定的菲尼斯特雷集结点。[9]

在我们所知的海上传奇中，或许没有任何一场冒险能有阿勒芒这般

难以形容的好运气。拿破仑偏执而盲目的计划让他穿过了巴勒姆最终布局中的每一处要地，而他却一次又一次地逃过了毁灭危机。他游走在那些精心布置的、渴望将他歼灭的舰队之间，却每每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逃离。他的出现和消失如同幽灵一般，每次都领先一步，总是受到某些神秘的运气转折或随机应变的保佑。如果我们再想到，这一切都是源于巴勒姆在最后关头往手记的行间插入了一些字句，就此让斯特林撤除了对罗什福尔的封锁，那么它的神秘色彩也就愈发扑朔迷离。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决定在此提醒这位年迈的海军大臣：在战争时运的面前，他的技巧是多么无力。

阿勒芒从始至终保持着他的好运。在巡航的开头，他朝着康沃利斯笔直冲去，与危险擦肩而过。而现在，他又一无所知地冲向考尔德的怀抱。但他的幸运星依然闪亮，当他在7月28日抵达那片危险区域时，前去封锁费罗尔的考尔德正巧在一天前离开，只留下空荡荡的海面。

阿勒芒依旧没有严格遵照指令所规定的时间，为了寻找维尔纳夫，他在此派出了麾下的巡洋舰。其中之一在8月3日返回阵中，它并未发现维尔纳夫的踪迹，却于一艘从波尔多驶出的美国商船处得知费罗尔已在7月底被再次封锁，封锁舰队拥有14艘战列舰。于是，阿勒芒遵照指令驶往第二处指定的集结点，那里位于乌桑特岛西南160英里处，正好处在乌桑特岛与菲尼斯特雷角之连线的外侧，处在康沃利斯的巡洋舰活动范围的边缘。[10] 就在他开始动身时，法军已经被英国巡航舰“埃俄罗斯”号（Aeolus）发现。阿勒芒随即将航向转为错误的东偏南，直至看到“埃俄罗斯”号在费罗尔的方向上消失，他才转往北方。[11] 他在8月6日抵达了第二处集结点，而另一艘返回的巡洋舰向他报告道，根据一艘瑞典商船提供的消息，它确定有11艘战列舰——其中3艘为三甲板战舰——正巡航在奥特格尔角以北60英里处的海面。我们将在下文中得知，这同样也是考尔德的舰队，但阿勒芒并不知晓这一切。他只能认为这是另一支搜寻他的敌舰队，他们肯定已在某天夜里擦肩而过，这自然使他

变得焦虑起来。指令要求他在这里停留一周时间，这显然是假设维尔纳夫在为费罗尔舰队解围之后将驶向北方的乌桑特，他将在此途中加入他们的阵列。然而，过度执迷于此的拿破仑却没有考虑到，这里同样也是他的敌人最为关切的海域。阿勒芒立即发觉，一小群巡洋舰已经盯上了自己，它们在天际线处小心窥探，随即将情报传给友军和国内。阿勒芒对此无可奈何，他徒劳地试着捕获它们，敌舰却灵巧地滑过他的指间。[12] 他所俘获的仅有一两艘商船与一艘从英国出发的私掠快船。这艘私掠船刚刚从普利茅斯出航，曾在那里的浅滩上看到两艘被俘的西班牙战舰。这更加深了阿勒芒的困惑。一场战斗显然已经发生，与英军交战的是维尔纳夫，还是费罗尔舰队呢？两天后，他从一艘葡萄牙战利舰船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消息。它曾在几天前遭到英国战列舰“龙”号的登船检查，它的船长由此听到了战斗的消息。与联军交战的是考尔德所部，葡萄牙舰船的船长并不知道考尔德的敌人是谁，但确定奥特格尔角以北的11艘战列舰就是考尔德舰队。那么，封锁费罗尔的又是谁？让局势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葡萄牙船长还说他曾遭到英国巡航舰“凤凰”号（Phoenix）的登船检查，它似乎正在搜寻考尔德，要去向他报告“好奇”号发现维尔纳夫且纳尔逊紧随其后的消息。[13]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惊惶的准将所能忍受的极限。按照指令的规定，阿勒芒应该在北部的集结点上再待三十个小时，但他却认为在这里坚持到底是一种疯狂之举。他在报告中写道：“先生，我在比斯开湾中的位置已经不再安全。封锁布雷斯特的舰队肯定已从逃离‘阿米德’号（Armide）追捕的那艘巡航舰［即‘那伊何得’（Naiad）号］处得知了我们的地点，封锁费罗尔的舰队与那支在北纬45度、西经11度（即奥特格尔角以北）巡航的舰队肯定也从监视我们的巡航舰那里得知了我们的踪迹。我的阵位因此已经完全曝光了，出于谨慎，我不能继续待到13日。维尔纳夫舰队与我会合已几乎是不可能，在海湾中各处巡游的大批敌舰将俘获我方的所有舰只。”他决定行使指令所允许的自由酌定权，先驶向安全的比戈港，在抵达那里之后再向西远航，以打开安全的航线。

真实的情况与他的设想并无多大差别，只有一处例外。8月1日，在考尔德恢复封锁费罗尔的一天之后，维尔纳夫从比戈出航，再次向费罗尔驶去。强劲的西南风吹得联合舰队顺利地驶向他们的终点，同时迫使英国舰队撤往费罗尔港的下风方向。维尔纳夫面前已毫无阻碍，不发一炮驶入拉科鲁尼亚的目的即将实现。被强风驱赶的考尔德却对此一无所知。按照巴勒姆的指令，所有舰队都应当在行动时间截止后回到原先的位置。因此，考尔德于次日让斯特林所部返回罗什福尔——如果发现港内舰队已经出逃，他就应当加入康沃利斯舰队。考尔德自己则率领剩下的9艘战列舰在费罗尔以北40～60英里处巡航，这就是阿勒芒从瑞典商船那里听说的那支神秘舰队。可是，这并不是正常的行动方式。在这种天气下，考尔德本应去奥特格尔角后方躲避风浪，但他却在强劲的西南风中坚持了好几天。[14] 他从未解释过如此行动的原因，但我们完全可以猜到，他就是在搜寻阿勒芒的踪迹。尽管他尚未得到任何确切的信息，发现罗什福尔舰队的“埃俄罗斯”号也尚未与他取得联系，但从他战后表现出的焦虑看来，考尔德显然认为阿勒芒舰队想要前往费罗尔。于是，他守候在从罗什福尔前往费罗尔的必经航道上，试图在距港口较远的海面上截击敌人——这种明智的处置手法可以让他在港内舰队出海支援之前从容对付外海之敌。

这一判断的精准程度好似他身在拿破仑跟前。如果斯特林撤除封锁，罗什福尔舰队就应直接前往费罗尔，这正是拿破仑未能送到阿勒芒手中的新命令。但是，考尔德注定要失望了。正如我们所知，他的行动已经传到了阿勒芒的耳朵里，后者因此退出了比斯开湾。在徒劳地巡航了一周之后，考尔德在8月9日向费罗尔派出了“龙”号战列舰，他想知道罗什福尔舰队是否已经偷偷地溜了进去。“龙”号与“埃俄罗斯”号在当夜一齐返航，为他带来了爆炸性消息。罗什福尔舰队已经出海西行，并未驶入费罗尔；但更糟糕的是，维尔纳夫的一整支联合舰队却已出现在那里。考尔德面对着30艘显然会再度出击的敌舰，此外，还有阿勒芒的5艘战舰完全动向不明。在考尔德看来，自己薄弱的兵力实在是无济于

事；同早些时候的奥德一样，他认为自己此时的职责就是将舰队带回乌桑特。8月10日，他将“龙”号留在身后监视港口，并让它去菲尼斯特雷集结点接应纳尔逊，随后便向北方驶去。由于谨慎地在指定期限结束前撤离了那处集结点，阿勒芒第三次惊险逃离了英军。按照指令，他应该在这里待到8月13日，而向北进军的考尔德恰恰在那一天驶过这片海域。阿勒芒仅仅在一天之前撤离，使他免遭覆灭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明智地选择了抗命。

截至此时，罗什福尔舰队在拿破仑战役计划中扮演的角色仍然悬而未定。除此之外，在让其他舰队集结于拉科鲁尼亚方面，这一计划似乎仍在顺利进行。可是，身处第一线的将领却明白这只是表面上的假象。8月2日，在联合舰队驶入拉科鲁尼亚之时，拿破仑终于从巴黎动身前往布洛涅。8月3日，他在大军团驻地发布了最新命令，与此同时，格拉维纳与维尔纳夫却在写给德克雷的信中诚恳而严肃地提出警告，指出皇帝计划的不切实际。格拉维纳写道：“我想对阁下说，我们的行动计划曾经被隐藏得相当好，简直可称神佑……但在今天，在我们离开马提尼克的六十天之后，英国人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向欧洲告警，加强他们在费罗尔港外的舰队……在我看来，这一切已经严重打乱了这个优秀且执行良好的计划。敌人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兵力……他们在我军动身离开时自然不会急于交战，而会派侦察艇通知他们在布雷斯特港外的舰队，然后跟随我军，在我军靠近布雷斯特之前、在时机对他们有利之时进行第二场战斗。他们可以用这种办法来挫败我们的战役计划——尽管它极为优秀，我们对它也极有兴趣。”法国人从始至终都真诚地认可格拉维纳的忠诚和勇气，因此，出自他笔下的这一批评尽管笔调极为客气，其程度却最为严厉。[15]

身罹病痛、情绪沮丧的维尔纳夫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在赞同格拉维纳的战略判断的同时，他还向德克雷坦诚地预测未来所谓的“胜利”——事实上，他对这一计划与他的舰队的所有信心已经完全崩溃。他

说："敌人已经接到警报，他们已经得到增援，他们不会急于以弱势兵力与我军交战……在雾气中，我们的舰长既缺乏实战经验又不懂如何执行舰队战术，只知道跟着前方的友舰，我们在这里已经成了全欧洲的笑柄。"[16] 更让他绝望的是，在驶入海湾时，刚刚送到他手中的信封里出现了拿破仑毫无耐心地禁止他驶入费罗尔港的命令。他只能在拉科鲁尼亚下锚，等待古尔东与格兰达加纳前来会合。这一变数导致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舰队最前方的格拉维纳已经深入海湾，他无法在狭窄的水道中遵从总旗舰打出的信号，只好继续向前进入费罗尔。维尔纳夫只能匆忙下锚于拉科鲁尼亚，半数战舰在狭窄的锚地上撞在了一起。拉科鲁尼亚缺乏仓储和水源，这一切都在8英里之外港湾深处的费罗尔。更麻烦的是，联合舰队总司令古尔东已卧病在床、奄奄一息，格兰达加纳则在阴谋篡取格拉维纳的指挥权。舰队已分散在两处港口，他们无法作为一个整体再次出海；而根据一天前的情报，考尔德统帅的英国舰队就在他们身边。维尔纳夫声称他准备在舰队完成补给之后出海，但他既无法避免战斗，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他写道："8艘战列舰在距海岸8里格的距离上保持着监视，他们会吸取奥德将军的教训，一直跟踪我们。我无法靠近他们，而他们则会在布雷斯特或加迪斯港外加入当地的封锁舰队——这取决于我要驶向哪里。"

罗什福尔舰队业已出航并受命与之会合的消息并未缓解维尔纳夫所谓的"灵魂痛苦"。现在，他知晓了阿勒芒的两处集结点，但所有水兵都明白，要在这两者间做出选择极为困难，他对找到阿勒芒根本不抱希望。德克雷已经被拿破仑的混乱命令搞得晕头转向，结果，他也忘了传达阿勒芒的撤退地点是比戈这个关键的消息。阿勒芒守候在菲尼斯特雷集结点的时限已经结束，与他取得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前往北方，溜过康沃利斯巡航阵位的边缘。于是，维尔纳夫决定用一艘巡航舰来承担整场行动的风险。8月6日，在阿勒芒抵达北部集结点的同时，维尔纳夫派出了由米利厄斯舰长（Captain Milius）指挥的、拥有40门舰炮的"迪东"号巡航舰。它携带着发给阿勒芒的命令，让他来费罗尔与联军会合

——如果他发现维尔纳夫已经离开，他则应执行留在那里的进一步指令。[17]

一场极为有趣的巡洋舰行动就此拉开序幕。7月20日，为了回应考尔德对巡洋舰的紧急需求，也为了满足巴勒姆指令中的保持通信的要求，康沃利斯派出了38炮巡航舰“尼俄伯”号（Niobe）。29日，在接到考尔德的战斗报告之后，他派出了由威廉·菲茨罗伊勋爵（Captain Lord William Fitzroy）担任舰长的32炮巡航舰“埃俄罗斯”号，接着又派出了36炮巡航舰“凤凰”号，它们应前往菲尼斯特雷集结点寻找考尔德。康沃利斯预见到考尔德可能不久后就要北上与他会合，便让“埃俄罗斯”号向他捎去一封信件，里面记录着他的集结点。菲茨罗伊的使命还包括在穿越比斯开湾时搜索敌舰。如果他发现了一支敌舰队的位置，他就应抢先一步，将之报告给敌军附近的指挥官。[18] 在8月4日发现阿勒芒的那艘巡航舰正是“埃俄罗斯”号，当它在第二天观察到敌军东偏南的航向（这实际上是阿勒芒故意摆出的错误航向）之后，它便结束跟踪，前去向考尔德报告。在驶向菲尼斯特雷的途中，菲茨罗伊与阿勒芒一样，也从一艘美国商船处得到了考尔德恢复封锁费罗尔的消息。他随即转向费罗尔。8月7日下午，在菲尼斯特雷西北方约60英里处，进军途中的“埃俄罗斯”号发现了“迪东”号。在确认对方并非阿勒芒的巡洋舰之后，“迪东”号迅速转向西南，逃离英舰。菲茨罗伊一直追击到黑夜降临，在发现无法迅速地赶上敌人之后，他认为传达情报的任务更为重要。于是他再次转向，继续去给考尔德报信。[19]

与此同时，朝西南方躲闪了好一段时间的“迪东”号在发现敌舰离去之后也决定继续北进。它转向西北方，舰首直指阿勒芒的集结点。8月10日，它在远方又发现了一艘可疑的巡洋舰；可这一次，它却主动展开了追击。在此之前，米利厄斯舰长同其他人一样，也已对那艘来自波尔多的美国商船进行了登船检查。这位美国船长戏耍了法军，他告诉米利厄斯，那艘可疑的巡洋舰就是英军的“凤凰”号，他在一天前曾因接受检

查而登上那艘军舰。据他所说，“凤凰”号只有20门舰炮，而它的舰长与军官却信心高涨地热切求战。美国人对法军撒了谎，“凤凰”号其实是一艘36炮巡航舰。这是英军的欺敌之计，他却没有戳破这一点。他的确曾登上“凤凰”号，但在受邀参观时，他发现托马斯·贝克舰长[20]正试图将它伪装成一艘轻帆船。贝克自己掏钱从他手里买了几箱葡萄酒，风趣而客气地接待了他，又将他礼送回船。这位美国人由此决定帮英军完成他们的欺骗。

贝克由此得到了他最为理想的结果。“迪东”号距离阿勒芒的集结点只剩下三天的航程，而米利厄斯则相信挡在他航道上的只有一艘弱小的敌舰，他决定通过战斗打开通路。这个决定应当得到人们的称许，它当然正确，也符合水兵的天职。米利厄斯的情况与“埃俄罗斯”号完全不同，尽管他也要将一则明确的情报带往明确的地点，但如果不驱逐这艘弱小的敌舰，他就无法及时抵达指定位置。如果再次逃离，任务就会因超出时限而失败，而选择交战至少能使任务的成功仍具可能性。一场著名的巡航舰决斗就这样开始了。

两位舰长在各自海军中都属于最具智勇的军官。“迪东”号在尺寸、火力、人数与速度上都具有决定性的优势。[21]然而，贝克舰长却自信地在交战之前抢占了下风位置，决心不让法舰从自己手中逃走。在之后的交战过程中，“迪东”号的操舰极为出色，尽管遭到了数轮纵射，但米利厄斯的战斗意志仍坚定无比。“迪东”号的帆索严重受损，已经难以继续机动，于是便不顾一切地冲向敌人，让两艘战舰投入了船舷对船舷的缠斗。卡隆炮、葡萄弹、滑膛枪——所有一切都在敌人那里找到了最佳归宿。“迪东”号试图进行一轮纵射，贝克巧妙地闪躲，结果让两艘巡航舰贴近到桁杆相抵的距离，“迪东”号的舰首与“凤凰”号的右舷几乎撞到了一起。所有人都试图登上对面的敌舰，但法军的人数优势迫使贝克只顾得上防御己方的甲板。长矛和火枪的激战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直至贝克操纵一门火炮从他住舱的窗口往外射击，造成了可怕的结果。枪对

枪、炮对炮的暴烈战斗一直打到双方都无法继续操纵战舰，他们只得相互脱离，利用喘息之机修补损伤。

在激战过后的平静海面上，双方的战意却愈发膨胀，他们都想抢在敌人完成休整前率先开战。此时的局面已经转为对“凤凰”号有利：尽管它的帆索受到重创，桅杆与桁杆却基本完好。“迪东”号的主桅已被打断，前桅也严重受损——还没来得及抢修，它就栽倒在甲板上，接着滚下了海。当海风再次吹来，“凤凰”号所有重要的绳结与修补都已完毕。几分钟后，它朝着“迪东”号再次扬起破烂的风帆，继续之前的作战。“迪东”号已死伤七十余人，完全失去了取胜的希望。最终，米利厄斯降下舰旗，这场勇敢而精彩的战斗到此结束。[22]

贝克赢得了胜利，但他的处境并未因此而稍显乐观。舰上几乎所有的军官都身被战伤，他必须用不足200人去接管250名未受伤的俘虏以及一艘被打断桅杆、比他的座舰重上200多吨的巡航舰，还要将它带往安全的海域。“凤凰”号拖着战利品继续驶向费罗尔，在途中却遇到了正在驶向菲尼斯特雷、正想去与纳尔逊取得联系的“龙”号战列舰。贝克由此获得了考尔德已解除封锁、阿勒芒舰队也已驶入大海的消息。继续向北寻找考尔德已经不再现实，他决定在“龙”号的护送之下驶回菲尼斯特雷，再从那里绕过危险的比斯开湾。

战役中最为重要的时刻已经到来，所有舰队都朝着最终的决战而展开了各自的行动。贝克的杰出战斗化解了这场战役的危机。尽管拿破仑做出了精密详尽的行动计划，罗什福尔舰队却一直无法摆脱最初的茫然状态。他们要扮演的角色仍旧悬而未决，他们仍旧无法与任何人取得联系，因此也根本无法影响到整个战局。

---

[1] *Nelson Papers*： *Add* . *MSS* . 34930.

[2] Collingwood to Nelson，off Cadiz，Jane 18th：*Nelson Papers*，*Add* . *MSS*

34930.Printed in Nicolas，vi.472.

[3] To Marsden，Gibraltar，July 20th：Nicolas，vi.473.

[4] 这并非通常位于菲尼斯特雷西北6里格处的52号集结点，而很可能是詹姆斯所提到的西北38里格处，这一位置大概与奥特格尔角位于同一纬度，在费罗尔以西100英里。

[5] 被留在比戈的3艘战舰是法国74炮战舰“阿特拉斯”号、西班牙61炮战列舰“美利坚”号与西班牙64炮战列舰“西班牙”号。——译者注

[6] 法军的这一集结点位于英军集结点西南方30英里处，即位于菲尼斯特雷角的西北方38里格处。

[7] August 14th：Desbrière，iv.759.

[8] Rapport du capitaine Allemand，July 20th：Desbrière，iv.759.从这天起一直到8月16日驶入比戈，他发现了91艘船只，其中有3艘英国船只与至少22艘中立国船只被击沉。Ibid.，p.785.

[9] Rapport d’Allemand：Desbrière，iv.759.

[10] Instructions pour le commandant de l’escadre de Rochefort，June 9th：Desbrière，iv.606.第二处集结点的位置是北纬46°5′、西经7°8′；and see Ibid，p.765，and chart，ante，p.184.

[11] Rapport de la *Gloire* and Rapport d’Allemand：Desbrière iv.763-5.

[12] 关于英国巡洋舰“那伊阿得”号的惊险脱逃，可参见Captain Dundas to Cornwallis：*Blockade of Brest*，ii.332；以及 Rapport du Capitaine de *l’Armide*：Desbrière，iv.766。“那伊阿得”号是康沃利斯在8月6日派出的，其任务是去南方和西方搜集联合舰队的信息：*Blockade of Brest*，ii.331。

[13] Ibid.，p.766.康沃利斯在回到布雷斯特港外不久就派出了“凤凰”号，这是为了按照巴勒姆的指令与在费罗尔的考尔德保持联系。

[14] See his *General Instructions*：*Blockade of Brest*，ii.197.

[15] Desbrière，iv.775，August 8th.

[16] Desbrière，iv.776，August 6th.

[17] Desbrière，iv.729，note 1.

[18] Cornwallis to Marsden，July 29th：*Blockade of Brest*，ii.328，and *Log of the Phoenix*. Fitzroy's orders are printed by James，vol.iv，p.451-2，Appendices 1 and 2.

[19] 米利厄斯舰长的报告称这一意外事件发生于8月8日。詹姆斯则根据“埃俄罗斯”号的航海日志，将之记于8月7日，并称其地点在北纬43°1′、西经10°1′处。这个位置比德斯奇霍上校的示意图更靠南方（*Projets et Tentatives*，v.731）。菲茨罗伊的行为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论。对战略问题毫无兴趣的詹姆斯在他的海军史第一版中指责菲茨罗伊的胆怯。布兰顿（Brenton）的《海军史》（*Naval History*）则支持了菲茨罗伊，随后詹姆斯在其海军史第二版中用更大篇幅论述了他的指控，批评更为严厉。菲茨罗伊是一个专断而不受欢迎的军官，但在这个案例中，他的上级似乎并未提出任何责难。由于两者都承担着传递关键情报的任务，现代海军思想或许会完全认可菲茨罗伊与米利厄斯在此的避战行为。相反，詹姆斯却表彰了“尼俄伯”号，后者在并未得到特别情报就对一艘可疑船只追击了三天三夜，结果没能与考尔德取得任何联系。可是，他后来又批评米利厄斯不该与“凤凰”号交战。整个争论可参见James（ed.1902），iv。

[20] 托马斯·贝克（Thomas Baker，1771～1845年），英国海军军官，曾参与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以指挥巡航舰在哥本哈根海战与特拉法尔加战役中表现卓越而闻名。战后出任南美舰队司令，曾协助查尔斯·达尔文乘“猎兔犬”号的自然考察。官至海军中将。——译者注

[21] 詹姆斯在其海军史中给出了此次战斗的简要统计（iv.p.70），其中有以下比较：

	单舷火力	船员	吨位（载重）
“凤凰”号	21门炮，444磅	245人	844
“迪东”号	23门炮，563磅	330人	1091

36炮舰与40炮舰的说法来自官方书面登记的数据，这一数据只将长炮计算在内，而“凤凰”号恰恰是卡隆炮武备优越性的典型。在重新武装后，“凤凰”号拥有26门短管18磅加农炮、4门9磅加农炮与12门32磅卡隆炮，使其侧舷投射量几乎翻倍——它最初的侧舷投射量仅有265磅而已。

[22] For further details see James，iv.65 et seq.，and Captain Baker to Cornwallis：*Blockade of Brest*，ii.338.

第十六章 危机全局

战役的转折点已经迫在眉睫，然而，这一时刻的意义却远较战役危机更为重大。一百年来对海洋统治权的争夺已经临近顶点，它的两位主角——就如同那述说命运的古老戏剧——正在宏伟的舞台上遥相对峙。在布洛涅的峭壁之上，漫长角逐所塑造出的最伟大的战争统帅正处在权势的巅峰，他正因大军团的声誉和荣耀可能面临的惨败而分外警觉。在他的对面，一位默默无闻、年近八十的老水兵独自坐在位于白厅的安静房间中。他躲开了众人的目光，正将从一次次战争中总结出的海军传统的线索汇聚在指掌之间；他娴熟地驾驭着它们，处置着远方的舰队传来的敏锐反应。速战速决的雄伟气势和无与伦比的战争天赋正对抗着来之不易的经验和从中孕育出的直觉，但这一切只会是枉费时间。

自打拿破仑不情愿地意识到他不可能让大军偷偷渡过海峡之后，他已在策略上竭尽了创意，只求争取暂时的制海权。他尝试了他的前辈用过的所有方法，但是，没有什么被遗漏的花招或计谋能够驱散阻挡在他进军途中的兵力，能将固守的卫士诱离其坚不可摧的阵地，或者出人意料地让一支占压倒性优势的舰队猛扑上前。在忙碌的七个月时间中，他几乎控制着整个欧洲大陆的海岸线，并用最为杰出的才能努力地谋划；然而，当那个时刻临近之时，他的舰队仍然无能为力地散落在大海各处，他的努力远未能扫清舰队集结的道路，只是让他的敌人在其传统战略中心上集结起了所有可用兵力。

对于巴勒姆和康沃利斯而言，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极为焦虑的时刻。为了让英国放松对海峡的控制，拿破仑曾让马尔蒙在泰瑟尔进行一场牵

制性的表演，这一计策取得了成效。自7月的第二周以来，荷兰的情报人员不断发来有关登海尔德（Den Helder）港正准备展开行动的报告。所有运输船都驶出了泰瑟尔航道，3艘预计从弗利辛恩（Flushing）[1] 驶来的战列舰已被催促加快行程，7艘战列舰与4艘巡航舰已做好了出海准备，弹药物资正沿着道路从阿姆斯特丹源源而来。所有人都相信这意味着一场大规模行动，但英国间谍并未上当受骗。他在信中写道：“我可以告诉你真相。这个在我们（指荷兰）海岸公开进行着的、看起来是要袭击爱尔兰的行动计划，唯一目标就是误导他的敌人。”然而几天之后，英国政府接到了有关马尔蒙行动的更为有力的情报，他们感到不能再让事态这样继续下去。[2] 和往常一样，他们无法忽视敌人的陆军与海军联合行动的威胁。拿破仑有可能让其舰队从爱尔兰以北驶向泰瑟尔，而根据海军大臣的推算，乌桑特岛的英国舰队拥有25艘战列舰。他们因此决定要增援位于唐斯的基思勋爵，让康沃利斯为之派去3艘74炮战舰。[3] 基思本人对此深表怀疑，但他回复政府，如果他们认为这些消息分外重要，他就会建议他麾下从雅茅斯监视荷兰海岸的拉塞尔将军（Admiral Russell）始终保持对泰瑟尔的监视。他将会尽快为拉塞尔提供增援，并随时保有一艘巡航舰——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他自己就能执掌指挥权。同时，他还下令给驻扎于利斯（Leith）[4] 、负责北部防区的瓦雄将军（Admiral Vashon），让他布置在挪威海岸的巡洋舰提高警惕。[5]

英国政府的焦虑仍在升级。四天之后，英国驻里斯本代理公使斯特兰福德勋爵（Lord Strangford）传来消息，他确定维尔纳夫的使命就是从北线返航，去泰瑟尔解放马尔蒙的大军。[6] 正如我们所知，这则消息并非毫无根据，这的确是拿破仑构想的行动选项之一。斯特兰福德直接从巴黎得到了这一情报，而双桅快船“好奇”号关于维尔纳夫航线的报告似乎也与之相符，这愈发加重了这种威胁。在这个非常时刻，海军部向康沃利斯发出命令，让他一定要向基思再派出至少3艘战列舰“以及所有可能的支援兵力”。同时，海军部还指示掌管爱尔兰水域的德鲁里少将

要保持对“敌舰队的任何一部分”的监视警惕。如果任何敌人出现，他就应该派出快速帆船，向乌桑特舰队、海军部以及拉各斯的纳尔逊告警。[7]

不过，基思勋爵对此仍旧保有怀疑。在接到斯特兰福德的消息后，他回复道，他对此并不怎么相信。但出于对政府观点的尊重，他向瓦雄将军再次重复了先前的命令，并指示拉塞尔将军在需要时返回唐斯锚地。[8]

此间发生的一个有趣插曲很好地展现了巴勒姆对于法国运兵船队的看法，并清楚地标示出他对战役计划中的攻击和防守所划分的界限。一些姗姗来迟的法国运兵船仍在向集结港口驶去，而英军前哨巡洋舰的年轻舰长们则抓住一切机会向它们发起攻击，甚至不放过布洛涅船队的出港演习。当凡·许埃尔将军（Admiral Ver Huell）在7月17～18日率领一支较大的船队从敦刻尔克驶向布洛涅时，比平日更为严重的类似事件发生了。英军大胆而强力的袭击给凡·许埃尔的船只造成了相当可观的损伤，但袭击并未及时停止，英国巡洋舰最终与岸炮交上了火，遭到较为严重的伤害。基思上报了这一事件，并褒扬了表现出色的相关军官，但这完全违背了巴勒姆的意见。在充分理解这些行动的勇敢和牺牲精神的基础上，他告诉基思，这种行动有违明智的策略。他明确表示这类行动不能再有第二次，巡洋舰决不能在岸炮的火力下攻击运输船队，因为“这或许意味着将无法在更需要它们的重要时刻动用它们”。换句话说，在英国战略计划的防守区域内，部队不应主动发起攻击，而应始终保持防守态势，除非明显有利的反击时机自己出现。[9]

康沃利斯的主要任务是掩护基思勋爵的防御阵位，防止敌方的战列舰队打乱他的部署。只要不被来自大洋的敌舰队扰乱，基思的阵势就稳如泰山，因此，康沃利斯才是这一局势的真正关键。出于这一原因，他已被告知，任何分兵命令的前提都是使他保有18艘战列舰。在此前提下，海军部让他再向基思派出3艘战列舰的第二道命令就使他陷入了两

难。他在8月4日接到了这一命令，他刚刚从考尔德那里得知，维尔纳夫已在战斗后失踪，考尔德恢复了对费罗尔的封锁，斯特林也驶回了罗什福尔。一切仍然在顺利进行，但他的麾下已只剩下18艘战列舰，执行第二道分兵命令将使其兵力低于事先规定的下限。康沃利斯最终仍遵照命令派出了3艘最为弱小却也是最适于在荷兰海岸服役的战列舰[10]，而核心阵位上因兵力削弱造成的危险也很快得到了关注。7月30日，海军部接到了考尔德的战斗报告。考尔德在报告中认为，维尔纳夫可能已经驶入了费罗尔，他自己则会向康沃利斯靠拢。先前分出的3艘74炮战舰立即被命令重返康沃利斯麾下。[11]巴勒姆清楚地意识到，对于目前的动荡局势，简单且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迅速在乌桑特岛集结起所有可用的战舰。西方舰队的集结已经在进行当中，海军部又在8月3日向纳尔逊发出命令，让他留下必要数量的战舰使科林伍德足以维持对加迪斯的封锁，然后也前来加入这场集结。[12]

这些部署体现着明确的战略原则，而巴勒姆在此时向康沃利斯发去的一份备忘录则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西方舰队在战争计划中所承担功能的基本观点。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康沃利斯的职责远远超出了单纯的防御。为了完成最为迫切的本土海域防卫任务，他的舰队应当成为一个行动中心，依照时机或需求发起小规模的反击。备忘录这样写道：

> 我之前已经为你草拟了一则个人指令，一旦我们听说罗什福尔舰队驶入大海，就将派出4艘战列舰去截击他们。但来自东方的警报迫使我们将这些战舰派给基思勋爵，否则它们就会被派到你这里来……
>
> 在这种机会出现时没能把握住它真是让人痛心，我将努力让你拥有尽可能多的兵力，让你在每次听到附近敌军的动向时都能派出舰队袭扰他们，无须等待本土的命令。
>
> 由于西方舰队是一切必要的攻势行动的原动力，我会注意尽可能地维持其强大实力和有效状态。
>
> 东面的敌人看起来正在积极行动，但由于让这样一支部队驶入大海必然会有许多连锁效应，他们不可能在不被察觉的状态下向我们发起攻击。

> 我希望你有机会经常与约翰·索马里兹爵士[13]沟通，这样你就可以尽早接到东面遭到攻击的消息，那时你的支援将必不可少。[14]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巴勒姆勋爵一面坚守着主要的防御阵地，一面则准备在任何需要的时刻向任何方向发起攻击。皮特也同他一样，并未因本土防御的需求就对其战争政策的攻势目标有任何犹豫。如果我们要对最终化解危机的高招做出正确的评断，这一点就极为关键。不管拿破仑怎么想，他都没能从皮特手中夺取主动权。尽管反法同盟的盟约尚未得到沙皇的批准，但在7月的最后一周，英国政府已从圣彼得堡接到了新的消息：所有争端都会很快迎来最终的解决。还请记得，沙皇的意图是利用同盟进行一场武装调解，迫使拿破仑放弃令人难以忍受的扩张政策，迫使他接受一个英国和其他大国都同意的欧洲秩序。我们已经看到沙皇如何拒不同意英国在地中海保持其地位的要求，而英国政府在7月3日收到的驻俄大使列文森-高尔的信件声称奥地利也同样不能接受这一点——尽管奥地利已经开始动员军队，但它并不值得信赖。然而，俄国很可能会独自开始行动，大使已经获知它正将科孚岛的驻军加强到25000人。莱西将军已经抵达了那不勒斯，似乎已经准备好在南意大利与克雷格联合作战。此外，尽管沙皇还不打算批准盟约，他却已按照盟约展开了行动。他已与皮特商定，负责调解的俄国特使将同时代表英国与俄国。被选中的特使是沙皇最为信任的近侍之一，尼古拉·诺沃西利采夫（Nikolay Novosiltsev）。他已动身前往巴黎。途中，他将在柏林停留，努力推动迟疑中的普鲁士政府加入他们的阵营。[15]根据此时传来的最新消息，沙皇的耐心已经被拿破仑吞并北意大利的挑衅行为消耗殆尽。列文森-高尔写道：“在俄国的全权特使正要在法国负责解决已经公开宣布的欧洲总体秩序问题时，这样的行为显然严重侮辱了特使所公开代表的两位君主，这使得沙皇陛下认为他无法……让诺沃西利采夫先生继续其使命。”俄国政府随即发出了召回他的命令。

尽管一切的发展都还算顺利，但列文森-高尔必须指出，他认为沙

皇对皮特坚决占据马耳他和拒绝修改航海法典的行为几乎是同等的恼怒。在高尔做出解释与辩护之后，俄方责难道，伦敦在沙皇提出扩充行动计划的主张后仍然没有做出回应，也没有因俄国兵力的增加而提高相应的补贴。幸运的是，一封来自伦敦的信件正在此时寄到了高尔手里，其坦然接受了俄国的提案，阴云就此开始散去。高尔说，尽管他实际上无法保证盟约得到批准，但他毫不怀疑自己能在下一封信中宣告这一事件。[16]

与此同时，俄国驻伦敦大使沃龙佐夫也收到了柏林的诺沃西利采夫传来的消息，称奥地利正在觉醒过来。它终于意识到，武力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尽管它默许了拿破仑加冕为意大利国王，但这只是在等待着公开加入同盟的合适时机。普鲁士也正在改变它对法国俯首帖耳的姿态。俄国特使在抵达柏林后这样写道："他们看得更清楚了，波拿巴不再是守护天使，而是不折不扣的恶魔。他们还相信，如果他们继续让德意志孤立无援，继续无所作为，这个恶魔就会将他们吞噬殆尽。"[17]

并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这则情报影响了皮特的思考，但他采取的行动似乎表明，在这个其他大国都开始行动的时刻，对局势洞若观火的他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尽管英国仍旧处在对谋划已久的入侵行动的防御危机中，但他毫不犹豫地表现出了新的攻击姿态。无论冒着多大风险，无论拿破仑如何努力束缚住它的手脚，英国都一定要在这个时刻展现出它的进攻实力与进攻意愿。毫不夸张地说，在来自泰瑟尔的消息造成极大扰乱之时，在海军因此而陷入紧张之时，皮特却在它身上增加了新的负担。俄国人的要求必须得到正面回应，在7月27日，他决定让地中海的海军最高指挥官与克雷格合作，在意大利按照俄国扩充后的计划展开联合作战。这意味着他们将为来自马耳他的6000名英军士兵与来自黑海的25000名俄军士兵提供护航舰和运输船。[18]

但新的情况还不止如此。在列文森-高尔的另一封信件中，一个新

的危机——一个不论其他强国是否参与，英国都必须准备独自应对的危机——已经出现。高尔写道："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局势目前十分危急。"俄国驻土耳其大使已向俄国政府发回报告：儒贝尔（Joubert）已经来到这里，他带着拿破仑写给苏丹的私人信件，还有用以笼络法国利益支持者的一大笔钱。最近上台的宰相是一个亲法分子；一位轻率的俄国总督又不合时宜地侵犯了土耳其的边界；英国大使目前尚未露面，而正在进行的俄土两国联盟的谈判已经中断。[19] 纳尔逊曾在尼罗河口海战中消灭的威胁再一次浮现，但全神贯注于欧洲的皮特并不会对此置之不理。艾尔·库特的远征军仍在科克港蓄势待发。当听说维尔纳夫驶向西印度群岛时，这支部队被要求在此待命。随后，库特被任命为牙买加总督，大卫·贝尔德将军（General David Baird）成了继任的总司令。这支部队目前仍可动用，巴勒姆得知，英国政府希望用它来进行一场旨在夺取开普敦的秘密远征。远征部队将包括六七千人，海军部则需要为负责护航的霍姆·波帕姆爵士[20] 提供一支战列舰队及相应的巡洋舰。[21]

在土耳其的严峻局势面前，这个计划似乎暴露出了明显的缺陷。如果皮特真的将在意大利展开的联合攻击作为其战役计划的中心，那么，在这里投入全部的可用兵力才符合其基本战略。但我们必须指出，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基本战略的问题。当前的局势仍因各国对于尚未完成的同盟的相互怀疑而混乱不堪。尽管前景已经明确会好转，但英国大臣仍无法立即打消他们对相关大陆国家的顾虑。它们有可能只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展开行动，有可能在任何时刻与拿破仑媾和，让英国陷入困境；如果是这样，皮特通过迫使拿破仑在地中海放弃攻势来掩护印度的宏大计划就会彻底失败。在如此不安全、不稳定的外交处境中，英国是否应当为了保护东方的领土和贸易而做好第二手准备？除了军事学的初学者，没有人能自信地给出答案。这个答案似乎取决于土耳其局势的现实危险性，取决于反法同盟能够预期的确切可信赖程度。对此，显然没有人能比皮特做出更好的评断。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将这个计划矮化为一场偏离中心的、零散的袭击，决不能忽视它与核心问题的有机联系。事实

上，这是整个帝国防御计划的必要一环。

在发给印度总督康沃利斯勋爵的指令中，皮特清楚地指出了远征计划的高层战略目标。这些内容被总括在卡斯尔雷发出的急件中，他告诉康沃利斯，尽管英国本土可能无法及时为印度派出所需增援，但政府已授权他在必要时动用贝尔德将军的部队，并让波帕姆提供掩护，以防遭到法军从毛里求斯发起的侵袭。但是，这仅限于印度面临紧急危险之时。卡斯尔雷解释道：“整个指令基于这样一个原则，我们认为，无论在任何时候，作为保卫我国印度领土的前哨就是开普敦对于大不列颠的真正意义。如果我们拥有它，它就能服务于我们在不同领土间的交通，负担起相当可观的住宿和基础设施。更为重要的是，夺取它就是从敌人手中夺取欧洲和印度之间的最佳要冲，敌人将难以从欧洲向东印度派遣军队。”同时，也将难以骚扰或保护周边的贸易。因此，在召唤贝尔德远征军之前，康沃利斯勋爵必须对夺取开普敦或增援印度的得失优劣加以全面考虑。[22]

制订这一计划的原因显而易见。在前一年的冬天，当拿破仑开始意识到侵英计划不可行之时，他转而制定了一个如卡斯尔雷信中暗示的那种印度远征方案。考虑到英国政府对本土防御极为自信，拿破仑的确有可能被逼回殖民地袭击，转而以此牵制英国的兵力。印度可能就是他选中的地区，而儒贝尔将军在君士坦丁堡的露面更加重了对此的怀疑。不管英国在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阵势多么强大，拿破仑仍然可以绕道好望角发起这样的攻击。如果是这样，地中海的任何胜利都将无法阻止他发起这种远征，尤其当他还与土耳其保持着合作关系时。开普敦正掌握在他的荷兰附庸国手中，这仍然构成现实的威胁，使他拥有一条同埃及和红海或土耳其和波斯湾同样有力的进军路线。对英国而言，将所有兵力投入在一条战线上就将使另一条路线向敌人敞开；它绵延在开阔的大海上，无法像本土的狭窄海域那样单独靠海军进行防御。因此，简单粗略地用兵力集中的观念来批评开普敦远征并不全面。将全部努力集中在同

一个目标之上当然是有效的，但从地缘紧迫性与现实政治局势着眼，如果只是将相关兵力全部集中到同一条战线上，这种行动的有效性就相当值得商榷。这个事例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警示我们，海外帝国复杂而开放的国防难题并不能用大陆国家在相对简单而有限的环境中得出的格言来轻而易举地解决。

在皮特和巴勒姆应对本土海域周围的危机时，对这些问题的相关思考贯穿了他们的重要决策。这些考量初看来并不起眼，但事实上，它们对于我们现在关注的重要行动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除非我们将之铭记在心，否则就不可能对此做出正确的评断。

---

[1] 今荷兰语作Vlissingen。——译者注

[2] Intelligence from Holland，July 10th，13th，and 18th：*Admiralty In-Letters*（*Secretary of State*），4199.

[3] Minutes of July 22nd：*Barham Papers.* 命令中具体的战舰是“防御”号（Defence）、“歌利亚”号（Goliath）与“热情”号（Zealous），这则消息是通过“好奇”号发往康沃利斯的。*Cf.* p.199.

[4] 位于爱丁堡以北，苏格兰东海岸福斯湾（Firth of Forth）南岸。——译者注

[5] Keith to the Admiralty，July 22nd：*In-Letters*，551.此时基思勋爵的旗舰设在拉姆斯盖特（Ramsgate）沿岸的“圣奥尔本斯”号（St.Albans）封锁舰——它原本是一艘建造于四十年前的64炮战列舰。

[6] *Admiralty In Letters*（*Secretary of State*），4199.Received July 26th.

[7] Marsden to Cornwallis（two despatches），July 26th：*Barham Papers* .与此同时，内政大臣霍克斯伯里正力图让海军部派尉官接管在爱尔兰海岸建造的一系列信号站，但海军部很难满足这一要求。这些信号站从爱尔兰东海岸一路修筑到西南端，再沿着西海岸修到最北端，共计72处。参见*Admiralty In-Letters*（*Secretary of State*），4200，August 5th。

[8] Keith to the Admiralty，July 28th：*In-Letters*，551.此时基思麾下共有六位将军：驻扎在利斯的瓦雄；乘着50炮战舰“豹”号（Leopard）监视布洛涅的绰

号叫“比利”的道格拉斯（“Billy” Douglas）；率领雅茅斯-泰瑟尔分舰队的拉塞尔；弗利辛恩沿岸的西德尼·史密斯爵士（Sir Sidney Smith）；驻扎在唐斯，负责加莱到奥斯滕德（Ostend）沿岸的霍洛威（Holloway）；以及驻扎在诺尔（the Nore），负责泰晤士河口的罗利（Rowley）。不过，海军部对这些战舰的分布与这一区域的总体战略一直都保持着很直接的控制。基思也习惯于将他发布给下属将领的指令提交给海军部，如果得到批准，他有时似乎还要求海军部直接向相应的将领发布命令。参见*In-Letters*，551-2，July 22nd；August 15th，et passim。

[9] Secret Orders：Out-letters，July 21st.相关行动可参见James，iii.318-323；Desbrière，iv.418-425；Keith to the Admiralty，July 18th-23rd；*In-Letters*，551。

[10] 它们分别是：74炮战列舰“奥兰治公主”号（Princess of Orange）——其前身是被俘的荷兰战列舰“华盛顿”号（Washington）；64炮战列舰“红宝石号”（Ruby）；64炮战列舰“波吕斐摩斯”号（Polyphemus）。参见Cornwallis to Marsden，August 4th：*Blockade of Brest*，ii.330。

[11] Minute of July 30th：*Barham Papers*：*Admiralty Minutes* 153，July 31st.

[12] *Admiralty Secretary*（*Secret Orders*），1363.此后不久，康沃利斯还向斯特林与考尔德发去了密令，但其主旨已无从得知，因为它们并没有被送到其对象的手里。在基思得到的增援兵力方面，还有一些信息需要厘清。“歌利亚”号与“防御”号在7月30日抵达了唐斯，巴勒姆当天便让它们返回。第二批的3艘战列舰则在8月6日抵达，基思重申了让它们返航的命令。但这一命令在第二天被撤销，这些战舰被派往泰瑟尔沿岸的拉塞尔所部，最后留在了那里。参见*In-Letters*，551，July 23rd，30th.Ibid.，552，August 6th，7th，8th。

[13] 即在海峡群岛指挥巡洋舰队，负责保障基思与西方舰队之间通信联系的索马里兹少将。——译者注

[14] Barham to Cornwallis，Aug.15th：*Hist.MSS.Com.*，*Various Collections*，vi.411.

[15] Gower to Mulgrave，June 10th：*Foreign Office*，*Russia*，58.Endorsed，“Received July 3rd.” Printed in Holland Rose：*Third Coalition*，p.174.

[16] Gower to Mulgrave，June 29th.Endorsed，“Received July 29th.” *Foreign Office*，*Russia*，68.Printed in Holland Rose：*Third Coalition*，p.183.

[17] Novosilzow to Worontzow，Berlin，July 18th：Holland Rose：*Third*

Coalition ，pp.182 and 186-7.

[18] Hawkesbury to the Admiralty，July 27th：*Admiralty In-Letter* （*Secretary of State* ），4199.

[19] Gower to Mulgrave，June 29th：Rose：*Third Coalition* ，p.185.

[20] 霍姆·波帕姆（Home Popham，1762～1820年），英国海军军官。曾参与美国独立战争。1795年升任舰长，1798年突袭了奥斯滕德的侵英运兵船，1801年前往红海支援英国埃及远征军。1805年，他护送贝尔德远征军远征好望角，随后远征西属南美。此人以新型海军信号系统的发明者而闻名。——译者注

[21] *In-Letter* （*Secretary of State* ），4200，July 25th.

[22] Castlereagh to Cornwallis，September 10th.（Copy communicated to the Admiralty.）*Admiralty In-Letters*（*Secretary of State*），4200.

第十七章 高妙之举

8月10日，维尔纳夫准备从拉科鲁尼亚开始他的最后航程。他在这一天向德克雷写道："我正准备出海，准备看情况驶向布雷斯特或加迪斯。敌人在这里紧紧监视着我们，使我们毫无掩藏行踪的可能。"[1]

海面上刮着轻柔的西风，联合舰队的一部分又深入费罗尔峡湾，这使得他直到13日才让全部战舰驶出大海。考尔德给原先那支联合舰队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损害，即便得到古尔东和格兰达加纳的增援，这支舰队也仅有29艘战列舰，其中14艘在费罗尔刚刚加入队伍，毫无出海或舰队演练的经验。全军仅有1艘战舰——120门炮的"阿斯图里亚亲王"号（Principe de Asturias）——是三甲板战舰，此外还有6艘80炮战舰，其余都是74炮战列舰。巡洋舰队则包括6艘巡航舰与4艘轻巡航舰。但他们还怀揣虚妄的希望，希望"迪东"号能够与阿勒芒取得联系，让两支舰队能够会合，使联合舰队的战列舰数量达到34艘，同时还能增加1艘三甲板战舰。

几乎就在同时，英国舰队正在乌桑特外海进行着针锋相对的集结。发现罗什福尔舰队出逃的斯特林于8月13日抵达乌桑特，这正是维尔纳夫努力让他的舰队全部驶出拉科鲁尼亚的同一时间。当天夜里，康沃利斯的巡洋舰打出了考尔德舰队追近的信号。次日早晨，考尔德赶在维尔纳夫开始行动前加入了西方舰队。而在一天之后的15日，纳尔逊也出现了。

在8月9日因躲避北风而驶向西方之后，纳尔逊重新制定了航线，直接驶向位于锡利群岛以西50里格处的原定集结点。到13日的中午，他距

离目标已不到150英里，并在当日下午遇到了康沃利斯在三天前派出的“尼俄伯”号巡航舰。“尼俄伯”号在出发之时并未听说任何有关联合舰队驶入比斯开湾的消息，但它此前曾遇到一位葡萄牙船长，船长称曾短暂地看到了联合舰队，随即自己就驾船转向了北方。纳尔逊由此确信爱尔兰的处境并不危险，于是便立即转舵向东，用信号打出乌桑特集结点。8月15日晚6时，纳尔逊已抵达康沃利斯阵中，并向他的旗舰行礼致意。[2]

康沃利斯甚至没有让纳尔逊向他当面报告，便遵照巴勒姆的指示，命令他与“胜利”号返回本土进行早已应得的休整。斯特林搭乘的“光荣”号与其他几艘需要修理的战舰也先后返航。位于南方的“歌利亚”号和“龙”号仍在搜寻考尔德和纳尔逊，除此之外，最终被留在康沃利斯麾下或正在驶向他的战列舰还剩下36艘。考虑到三甲板战舰的数量和质量优势，这支舰队足以掌控局势。如果联合舰队驶向北方，即便他们能与阿勒芒会合，他们也一定会在冈托姆能够出港支援之前被早早地击败。[3]

这就是目前的实际局势。那么，拿破仑对此又有多少了解呢？他是否从一开始——甚至在舰队集结之前——就已经怀疑到，侵英计划的一切希望都将终结于此呢？

正如我们所知，他在8月3日抵达了布洛涅，并对夺取海峡制海权一事表现出令人鼓舞的自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为这番冒险的功业扫清了道路。在他的身后，反法同盟的异动已经难以忽略。奥地利正在威尼斯和蒂罗尔集结部队，那不勒斯、科孚岛与马耳他之间的通信络绎不绝，圣西尔还向他报告道，那不勒斯正在秘密地进行全面动员。在离开巴黎之前，拿破仑曾指示塔列朗为奥地利与那不勒斯的宫廷起草一份最后通牒，他一个字都没透露就起身去了布洛涅。他在抵达海岸的第二天批准了有关奥地利的部分内容，并进一步指示道，如果那不勒斯全面动员的报告被证明为真，就应该向他们展示随时发动入侵的威胁。正

如他事后承认的那样，他毫不怀疑这些威胁手段的有效性，这将使他能腾出手来执行侵英大业。

这就是拿破仑在此时的精神状态。然而，在他上一封命令的墨迹尚未干透时，塔列朗给他发来了一封西班牙急件。西班牙人在信中称，纳尔逊已经几乎确定地在直布罗陀露面，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加令人不安，而他们相信他将驶入地中海。

塔列朗并未隐瞒这则消息的含义。没人知道维尔纳夫现在位于何处，但任何深谋远虑的大臣都能看到，如果他错误地认为英军已被打散而靠近海峡，他就必定会迎来毁灭——因为这个位置已经得到了最充分的预警。拿破仑毫无预兆的突然离去让塔列朗恐慌至极，他唯恐主上的赌徒精神占得上风，在被他长期隐瞒的糟糕局势中孤注一掷。他向拿破仑写道："这个出乎意料的消息让我产生了一种难以平息的印象，只有获得您支持的仆人才能忍受这种刺激。"他径直告诉他的主上，他已经失败了。塔列朗确信纳尔逊将驶向北方，根据计算，那将使英军拥有一支由54艘战舰组成的战列线。他力劝道："这个未能料到的集结无疑使侵英计划此时已无法进行，但这个无法执行的计划却由于陛下在布洛涅的现身而得到了最强的证明，这可能让英军决定将舰队聚集在海峡之内，从而使联合舰队拥有驶入某处西班牙港口的时机。"[4]

拿破仑并未屈尊去反驳他的大臣，但这纯粹只是由于他拒绝承认事实。他向德克雷写道："所有关于纳尔逊的消息看起来都很可疑。他接下来想在地中海里做什么坏事？他们想在那里集结20艘战列舰吗？"需要注意的是，此时他还尚未接到克雷格抵达马耳他的消息，也没有任何关于维尔纳夫的音讯，他对维尔纳夫的返航与战斗都一无所知。他仍旧认为他的威胁已经让敌人转入了可悲的防御姿态，而英国人对于自己的大业仍旧毫无怀疑。他接着写道："他们无法理解挂在他们耳边的消息。这里的一切仍进展顺利，如果我们能控制航道十二个小时，英国的

命运就将终结。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还没有从费罗尔得到新消息。我不相信马贡没有与他（指维尔纳夫）相遇。我正要发信号告诉冈托姆，让他待在港外的贝尔托姆水道。”[5]

新的消息在三天之后传来，但其主角并非维尔纳夫，而又是纳尔逊。在直布罗陀与特图湾补充了淡水与食物之后，纳尔逊再次驶出直布罗陀海峡，加迪斯信号站在7月25日发现他正往圣文森特角驶去。[6] 就在同一天——我们无法弄清这是在接到有关纳尔逊的消息之后还是之前——拿破仑告诉塔列朗，不要在他再次审核之前向维也纳发去最后通牒，并指示他的近卫军从巴黎开往布洛涅。维尔纳夫的消息终于在翌日送达，他在信中报告了他与考尔德的非决定性交战，之后又如何进入比戈休整舰队。但维尔纳夫仍旧表示出继续任务的意愿，他将按照计划与费罗尔舰队会合，再驶向布雷斯特。在这里，拿破仑选择性地——或者至少是假意地——看到了他希望的实现。他立即宣布自己已取得成功，宣称维尔纳夫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但与此同时，他又命令近卫军在巴黎待命。[7]

此时的拿破仑显然一筹莫展。在警觉的金融家们看来，他似乎是要孤注一掷，这使他的借贷信用下降到非常危险的地步。他只好极力将维尔纳夫的战斗描述成一场胜利，以此恢复他们的信任。对于意志消沉的维尔纳夫，拿破仑还在信中对其给予鼓励：英军的这场胜利其实无关紧要，仍希望他能将任务继续下去。根据来自英国的谍报，拿破仑相信英国海军部已将联合舰队的目的地认定为泰瑟尔或加迪斯，他因此再次敦促马尔蒙“去做那不会成真的事”，在他的方向上吸引英军兵力。他必须牵制住12艘战列舰，但这的确“不会成真”。在距离最后时限只剩十天时，马尔蒙只看到预计数量一半的战舰在封锁他的航道，而被派往这里的最大兵力只是8艘几乎不适于执行其他任何任务的弱小战舰。正如我们所知，这场佯攻唯一重要的影响只是阻挠了巴勒姆对康沃利斯的增援，使他无法分出兵力对阿勒芒进行回击。[8]

通过顽固地无视纳尔逊的动向，通过将英国海军部认定为幼稚愚蠢，拿破仑——如果有过的话——似乎在这一刻真的相信那个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在这三天里，他表现出的全都是鼓舞与和悦。但一切都在8月13日改变。维尔纳夫在这一天传来了消息，他没能在费罗尔港外完成集结并立即北进，而是在得知皇帝的禁令前就驶入了港口。拿破仑气疯了。大军团物资总监达吕（Daru）所说的那个著名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天。皇帝召他觐见，他却发现拿破仑在房间里忽高忽低地说着胡话，粗俗地詈骂着那位可怜的舰队司令。他忽然停了下来，大喊道："坐在这写！"他一气呵成地口述出一整套命令，而这些命令的内容就是他那不朽的奥斯特利茨战役。[9]

无论这则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其并不意味着拿破仑已完全抛弃了入侵的念头，这也许仅仅是为了强化他对维也纳的威胁。同一天，他命令塔列朗会见奥地利大使，用最强硬的条件要求他们立即解散军队。塔列朗告诉这位大使："他（拿破仑）已经停止执行他的战争计划，他意识到，他不能在率领15万大军杀入英格兰的同时在南方边境受到威胁。"[10]

不管拿破仑到底是什么用意，他的言辞中并没有迹象表明他已承认自己的失败。同样在这躁动的一天，他的情绪愈发高涨，写给德克雷的信和发给维尔纳夫的训示从他笔下一封接一封地喷涌而出。他必须让那个绝望的舰队司令再次出击，不管用什么办法——激励、劝诱还是威胁。如果这些不寻常的文件背后没有什么深层目的，如果拿破仑真的对他写下的东西抱有期望，这只能说明他对局势已完全失去了把握。在名副其实的狂怒中，拿破仑想象英国舰队已经中了他幻想的诱敌之计，它们已分散在广阔的大海上——爱尔兰海岸、北海、地中海，总之是在它们本应在的位置之外，正要向那个关键位置进行集结。他一次又一次地计算着英军的兵力和位置，将它们统统发给德克雷和维尔纳夫，但这些计算却一个比一个离谱，一个比一个乐观，全都充斥着明显的矛盾和错

误。他的工作注定毫无用处。此时，维尔纳夫已从拉科鲁尼亚出航，他前方的航道已被英军阻绝。不用多久，他就将得到任务成败的最终答案。

竞逐已经开始，而拿破仑已经落后。他的狂怒使他拒绝承认塔列朗所说的事实，但现在，他终于要准备面对这一切。在8月13～14日这两个关键的日子里，他指示塔列朗向奥地利发出经过修订的最后通牒。他在信中写道："他们的答复很容易猜测，其中会有拒绝、抗议，总之是些拖沓的字眼。我可不会这样。我心意已决。我将攻击奥地利，在11月之前进入维也纳，然后再对付俄国人——如果他们也在战场上出现。"[11] 也许，他已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8月15日，维尔纳夫出航的消息尚未送达，绝望中的拿破仑再次为他那看起来蠢笨得无可救药的将军发去了信件。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那些混乱命令的后果，终于发现它们无法为他带来应有的回报。他完全没能掌握这场角逐的基本要点，但每一位英国海军将领都将之铭记于心。对于这位如此伟大的战争天才，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这封不同寻常的信中，他幼稚的表现只能被称为天真单纯，而这也正是他那不切实际的侵英计划的特点。他说："最出乎我意料的是，阿勒芒集结点的位置……恰好是那场战斗发生的地点。"当然，最起码的海军常识都能教会他，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极端的自负使他拒绝承认，他正在和一群专家展开角逐，而他是其中唯一的外行。对他的敌人而言，他那精明狡诈的战略灵感只不过是稀松平常的计略。当他因迷惘无助和信心受挫而把情况弄得愈发混乱之时，那些遵循着旧日传统的人正以远比他高明的老练手法应对着一切。

正在此时，他们使出了那高妙之举。这个瞬间所体现的战争意志比整场战役中的任何部分——甚至是纳尔逊的大追击——都更纯粹且深刻，但它所承受的指责也最为严厉。现在，让我们看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8月中旬，拿破仑筹备已久的入侵危机终于降临。他本人正在布洛涅，准备随时下达行动命令；大军团与运输船已经整装待发——至少

是接近拿破仑能够利用的状态。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英国战列舰队在海峡入口完成了大集结，这使拿破仑的大军已无法继续行动。只要舰队保持集结，英格兰的防御便坚不可摧，即便面对有史以来最为可畏的入侵威胁也不例外。另外，位于费罗尔的敌方主力舰队尽管能自由地驶向北方，但同时也可能自由地驶向南方，前往加迪斯或驶入地中海。巴勒姆和康沃利斯认为，这才是拿破仑正在玩弄的诡计——而塔列朗的确也曾这样进谏。在英国海军将领眼中，入侵行动的成功概率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他们无法相信它的真实性。经验丰富而极具洞察力的他们从中看到了一出诡计：它要迫使英军在布雷斯特港外保持集结，使维尔纳夫自由地向南方进军。在英国的战争计划中，阻止联合舰队南下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待其北上而将之歼灭。那么，康沃利斯又该怎样行动呢？他应该在这里继续盘踞于入侵计划的行动舞台，还是攻出去掌控整场战役？他应该满足于坚不可摧的防守，还是要冒险去剥夺敌军的所有主动权？巴勒姆曾向他做出指示，“西方舰队是一切必要的攻势行动的原动力”，但这封信尚未交到他的手里。[12] 康沃利斯不能浪费任何一天时间，维尔纳夫随时可能出航，如果他继续等待海军部的指令，便很可能错过行动时机。等待命令就等于放弃。外海上的舰队指挥官从未承担过这样重要的责任，但这位魁梧的老将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犹豫。海军部房间里的巴勒姆曾让他见机行事，“无须等待本土的命令”。康沃利斯的确没有等待本土的命令——他甚至没有等到准许他如此行动的授权令。

英国舰队的大集结仅仅持续了二十四个小时。8月16日，在纳尔逊加入舰队的第二天，康沃利斯向考尔德签发命令，让他率领18艘战列舰——再加上已在南部海域的“龙”号和“歌利亚”号——前往费罗尔港外，尽全力阻止敌舰队再次出航，或在它们试图出海时加以截击。这支舰队拥有5艘三甲板战舰，以及7艘来自纳尔逊舰队的战舰，其中包括纳尔逊的副司令、坐镇于80炮战舰“卡诺珀斯”号的托马斯·路易斯少将[13] 。考虑到维尔纳夫的舰队士气低沉、成分混杂、满是病员，而这支舰队的状态却相当良好，两者的实力可以说恰好相当。至少维尔纳夫本人就是这

样认为的。[14]

根据考尔德的报告，阿勒芒很有可能已经与维尔纳夫会合，这将使敌舰队拥有超过30艘战列舰。康沃利斯对此并不怀疑。此时的他已无法动用更多的战舰，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做出局势所需的勇敢之举。[15] 事实上，他已将舰队一分为二，自己仅保留着最低要求的18艘战列舰，其中大约10艘是三甲板战舰。[16]

在接到英军分兵的相关报告后，拿破仑将这一行动形容为“非凡的愚行”（insigne bêtise）。他在给德克雷的信中写道：“维尔纳夫错过了多么好的机会啊！只要从开阔的海面上驶向布雷斯特，他就可以同考尔德舰队玩一出‘劫狱游戏’（prisoner’s base）[17]，然后向康沃利斯发起攻击。或者，他也可以用30艘战列舰击败那20艘英舰，进而取得决定性的优势。”[18] 如此之多的现代批评者都沿袭了这一观点，但是，他们却不记得这声低吼是出自何等的愤恨和痛苦，反倒认真地附和起这句气头上的批评之言。他们说，这个伟大的行动“违背了最简单也是最为普遍认可的战争原则”，是一个“战略失误”，是“一个足以致命的错误”，此外还有种种类似的观点。[19]

这是一个关乎海军战略之根基的重要问题。只有通过对这一案例进行小心而细致的研究，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数百年来的战争经验达到巅峰的时刻，这些老兵会毫不犹豫地一致做出与现代批评意见截然相反的决定。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英国将领是怎样看待其中的风险的。很显然，维尔纳夫与考尔德之间的作战并不会得出拿破仑所希望的结果，在整场战争中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法皇的乐观推断。所有的证据都指出，二者交战的唯一结果就是让他们同时退出战场，这也正是纳尔逊的看法。当几位大臣在听到舰队解散的消息后焦虑地向他咨询意见时，纳尔逊这样写道：“我丝毫不担心这里的风险。如果考尔德能与27或28艘敌舰展开

近距离交战，即便他们能完全战胜我军，他们在这一年中也无法再造成任何危害。”[20]

而布雷斯特港外的康沃利斯也同样无惧拿破仑所谓的“劫狱游戏”。除“龙”号与“歌利亚”号之外，他还有3艘巡洋舰正监视着费罗尔，附近海域还有额外的2～3艘巡洋舰。[21] 在报告考尔德的分兵行动时，他这样写道：“各位先生应该很乐于将战舰派往其他易于收获成效的方向。”显然，他认为海军部赋予他的战略职责一直没有改变。在他看来，他们所关注的仍旧是命令中的内在精神，并以这种方式支持着远方的舰队指挥官。他总结道：“我认为我现在采取的措施能够得到各位先生的认可。它的用意在于遏制敌舰队的行动，即便罗什福尔舰队已经驶入大海。”[22]

现代批评者常常忽视了海军部的长官们对这一行动的认可，但他们当然会这样做：当他们听说纳尔逊返航时，他们向康沃利斯发出的命令几乎完全等同于康沃利斯自己做出的决断。巴勒姆独自做出了与康沃利斯几乎相同的决定，这足以使所有批评者哑口无言。这一命令签署于8月19日，他命令康沃利斯在乌桑特留下18艘战列舰，然后派他的副司令查尔斯·克顿爵士及其麾下的两位将军前往费罗尔港外。康沃利斯应当交出20艘战舰，还有他能处置的所有其他兵力，以尽量使克顿拥有32艘战列舰。[23] 两者之间只有一处细微的差别：海军部对考尔德的战后表现很不满意，想要解除他的指挥权。

英国本土绝不是没有意识到当前局势的危险性。就在十天之前，他们已向康沃利斯发去了正式警告，“敌人正准备从荷兰和布洛涅的港口立即发动入侵”。涨潮期已经到来，荷兰舰队随时可能驶入大海，巴勒姆在写给康沃利斯的私人信件中让他特别留意这一威胁：“我只多说一句，内阁认为法军很快就要发动入侵，他们已向所有陆军部队下达了指令，我也向每处港口的海军指挥官发去了个人指示。我希望你能在涨潮

时占据一个较近的位置，以便在必要时为东面的舰队派出增援。”[24] 他们就是这样面对着迫在眉睫的威胁，但无论是巴勒姆还是皮特，他们都决心绝不退回防御姿态。除了那些被认为足以应对入侵威胁的部队，他们不会再为此投入更多的兵力，他们绝不会因这种威胁而放弃整场战役的攻势部署。让舰队继续集结就等同于将主动权拱手让与拿破仑，然后老老实实地进行防御。有趣的是，那些对分兵行动攻讦得最激烈的人，恰恰又是最为热切的攻击倡导者。

其中最具分量的一位批评者这样写道：“将舰队一分为二的行为违背了最简单也是最为普遍认可的战争原则，它将中央位置与优势兵力的一切有利条件都交给了维尔纳夫，并被拿破仑视为一个明显的失策……这个指责恰如其分。”[25] 可是，分兵行动要如何才能将中央位置交给维尔纳夫呢？如果他敢于面对他已预料到的英军大集结，朝着北方驶去；如果他奇迹般地避开了康沃利斯的巡洋舰侦察幕，并行驶到其与考尔德之间，他的确能在某种程度上占据英军防御地带的中央位置。但着眼于战役全局，位于费罗尔的联合舰队已经插在英国主力舰队与科林伍德的地中海舰队之间，如此看来，维尔纳夫早已占据了这场战役的中央位置。取得这一位置的拿破仑可以在攻向英吉利海峡或驶入直布罗陀海峡之间做出选择；而政治局势在过去几周内的重要变化已使得剥夺这种选择权变得极为关键。皮特为反击而耐心播下的种子已经成熟。正如康沃利斯所说，敌舰队的行动必须“被遏制”，地中海的制海权对于英国和盟国的联合行动至关重要。如果他们没有执行分兵，爱德华·柯德林顿[26] 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前夜对维尔纳夫舰队的描述就很可能实现：“这支强大的兵力此时可能已待在土伦港，准备配合法国陆军在意大利作战。”[27] 事实上，从费罗尔到布雷斯特的宽阔洋面才是整场战役的中央位置，这正是巴勒姆与康沃利斯决心立即重新夺回的关键地带。

在战役全局的层面上，这一行动显然与那些通行的战略原则完全相符。但比这更加重要的是，这一行动所体现的海上战争的特殊要求必须

得到阐明。将陆上战争的基本准则用在评价海军战略之上往往会造成诸多谬误，这恰好又是一个典型案例。海军行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问题，它还必须兼顾保护贸易的使命。此时正是大型商船队驶回英国的时节，集结在费罗尔的敌舰队已对它们造成了直接威胁，它们的安全返航因此在巴勒姆的头脑中占据了首要地位。他向康沃利斯写道："东印度和西印度船队也许会在两周之内抵达，在此之前，费罗尔都是重要的（防备）对象。你应当派出尽可能多的重型巡航舰——这是它们最能派上用场的时候——让它们与船队一起驶向爱尔兰海岸。"换而言之，他按照英国海军例行的护航方法派出了一支针对敌军战列舰队的掩护舰队，同时在商船队驶入危险海域时增强了它们的护航兵力。巴勒姆接着还添上一句："我们在此时接到了你的报告，你完全洞悉到了我的想法。"[28]

在大陆军事学派培养出的正统主义者眼里，这些对基本原则的调整完全是异端之见。但事实上，每个行为的决策都要在收益和风险间达成平衡，海上强权正是以这种方式统治着海洋，追求着它的种种目的。我们在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保护商船队的巨大意义足以使任何与之相当的风险变得合理。继续保持集结将使敌人能不受阻碍地向商船队发起攻击，也就是承认己方舰队对此无能为力，这在当时的局势中找不到任何可供辩护的依据。

那么，真的存在着实质性的威胁吗？对此时背景的细致考察足以公正地揭示出分兵行为所承担的战略风险。从考尔德所抓的俘虏口中，英军已经清楚地了解到联合舰队的状态。他们还清楚地知道，资源有限的费罗尔无法在海峡战役所要求的时限内为维尔纳夫的大舰队完成补给。面对纳尔逊位置不明的舰队，维尔纳夫的惶恐姿态早已尽显无余，这使经验丰富的巴勒姆与康沃利斯相信，他自己绝不敢冒险向北方出击。当然，拿破仑也可能强制他执行这种毫无希望的行动，但巴勒姆与康沃利斯都知道，这在实际执行中一定会失败。他们知道，联合舰队已经物资

用罄，费罗尔又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提供补给，那么，这就一定会导致以下二中选一的结果。要么，维尔纳夫会在港内花足够长的时间来筹集物资，这将使考尔德拥有充足的时间来完成封锁；要么，维尔纳夫将在补给未完成的状态下仓促出击，这将使他无法在出海后维持足够长的时间，继而无法执行拿破仑的战役命令。因此，如果维尔纳夫在考尔德抵达之前出航，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的目的不是前往加迪斯，就是对商船队展开袭击。

如果这些推理都不正确，如果维尔纳夫孤注一掷地与考尔德玩起“劫狱游戏”，然后向落单的康沃利斯发起迅猛的攻击，结果又将怎样呢？一般认为，维尔纳夫拥有比康沃利斯更强的兵力。但必须记住的是，康沃利斯拥有10艘三层炮甲板战舰，其余也都是经验丰富的80炮战舰与74炮战舰，而维尔纳夫麾下的29艘战舰则是由两国舰船混杂而成，其中至少有10艘——包括唯一一艘三甲板战舰——是满载旱鸭子的浮动兵营。[29] 执掌这支兵力的康沃利斯将面对两种可能性：如果他被迫应战或主动出击，维尔纳夫舰队就必将无力参与后续行动；如果他采取豪与肯彭菲尔特的旧日策略，驶向海峡以西等待考尔德前来会合，按照过往的经验，维尔纳夫与冈托姆在同他交战之前也绝不敢驶入海峡。[30]

事实上，英军已经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来应对这一局面。各处港口的海军指挥官已经接到了最紧迫的命令，令他们将一切可以浮起的舰船投入大海。按照巴勒姆的计算，已经或接近完成准备工作、可以在海峡中应急参战的兵力包括15艘三甲板战列舰、4艘80炮战列舰和35艘其他双甲板战列舰，全部隶属于西方舰队。除此之外，还有基思勋爵麾下的9艘双甲板战列舰与泰晤士河口中正在装备的至少5艘战列舰。[31] 一旦巴勒姆主动承担的战略风险中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一旦维尔纳夫真的执行了被所有法国海军将领视为疯狂的举动，他就必将在陌生的狭窄海域中迎来与英军的决战。这将成为所有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梦魇，将成为比1588年无敌舰队更为恐怖的灾难，甚至成为比特拉法尔加海战更具决

定意义的惨败。

---

[1] Desbrière，iv.778.

[2] Nelson’s *Journal*， and *Log of the Victory* （Hardy）.

[3] 我们很难弄清康沃利斯此时拥有的三甲板战舰的准确数量。除却“胜利”号与“光荣”号，我们可以确定他拥有9或10艘。根据《巴勒姆文集》中一篇签署时间为8月20日的回信，本土舰队当时有10艘三甲板战舰正在外海服役，还有5艘正在修理。

[4] P.Bertrand，*Lettres inédites de Talleyrand à Napoléon*， 120.法国外交部此时成立了一个处理海军情报的专门部门，根据其签署时间为7月20日的最新报告，他们认为英军在西班牙和法国海岸拥有44艘战列舰。塔列朗当晚就向皇帝送去了英军当时的兵力分布状况（Ibid.，第122页）。两周后，拿破仑在写给他的信中说道：“外交部关于敌军舰船活动的工作非常有用，但还需要更加完善。” *Correspondance*， xi.146， August 27th.

[5] August 4th；*Correspondance*， xi.69.

[6] Desbrière，iv.736.

[7] Desbrière，p.739，note.

[8] See Desbrière，iv.749 and *ante*， p.256.

[9] 关于这个故事与其真实性的争议，参见Auriol，v，p.452 脚注与p.493 脚注。他引用*Mémoires de Ségur*， p.158，认为此事件发生在8月13日。梯也尔（Thiers）在《执政府与帝国的历史》（*Consultat et Empire*， v.464）中将这一事件写在8月23日之后，但并未给出任何依据。

[10] August 13th；*Correspemdance*， xi.81.

[11] August 13th；*Correspondance*， xi.80.

[12] Barham to Cornwallis，August 15th，*ante*， p.257.

[13] 托马斯·路易斯（Thomas Louis，1758～1807年），英国海军将领。1796年加入地中海舰队，在纳尔逊的指挥下参与了尼罗河口海战，表现出色。随后参与了意大利沿海的一系列战事与埃及远征。1805年随纳尔逊参与特拉法尔加战役，但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前夕被派出护送商船，错过海战。次年追击法

国舰队前往西印度群岛，取得圣多明各海战（Battle of San Domingo）的胜利，随后重返地中海。但后因在西印度群岛染上的瘟疫去世。——译者注

[14] *Blockade of Brest* ，ii.344，347.

[15] 参见 Captain Hallowell （*Tigre* ）to Nelson，August 17th：*Add.MSS.* 34930.据他所说，考尔德的报告认为阿勒芒已经在费罗尔与维尔纳夫会合，康沃利斯据此认为联合舰队拥有25艘法国战舰与13或14艘西班牙战舰。康沃利斯的旗舰长也曾对纳尔逊表示：“在我看来，您在那里与我们会合是再及时不过的了，这使得将军能够派出那支大型分舰队。这对目前的敌舰队态势非常必要——如果罗什福尔舰队驶入了费罗尔，敌军在那里就会拥有30艘战列舰。”（Captain John Whitby to Nelson，August 19th：Ibid.）巴勒姆也认为“罗什福尔舰队无疑正待在费罗尔”。参见Barham to Cornwallis，*Hist.MSS.Com.*，*Various Coll.* ，vi.410；same to Pitt，*Barham Paper* ，iii.97。

[16] Ganteaume to Decrès，August 23rd：Desbrière，iv.806.

[17] “劫狱游戏”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多人游戏，其起源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游戏的形式多样，其共同特点是将参与者分为两队，让双方相互追逐，防止被对方抓为“囚犯”，同时努力去对方基地解救己方“囚犯”。拿破仑在此的寓意是让维尔纳夫躲开考尔德，然后去布雷斯特解救冈托姆舰队。——译者注

[18] To Decrès，August 29th：*Correspondance* ，xi.160.

[19] 《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Influence of Sea Power on the Revolution and Empire* ），ii.176；《剑桥近代史》，ix.226；《封锁布雷斯特相关信件》，ii；Introduction，p.xxxix；莱尔德·克劳斯（Laird Clowes）的《皇家海军史》（*The Royal Navy* ），v.119。我相信，除了马汉上校之外，目前还没有海军军官采纳过这一观点。科洛姆将军（Admiral Colomb）、于连·德·拉格拉维埃（Jurien de la Gravière）与德斯奇霍都没有采用这种说法，约翰·K.劳顿爵士（Sir John K.Laughton）更是明确否定了这一点。

[20] To Captain Keats，August 24th：Nicolas，vii.16.

[21] 在考尔德加入舰队前后，康沃利斯已专门为他派出了“那伊阿得”号（Naiad）、“灵敏”号（Nimble）与“鸢尾花”号（Iris）。而“冒险”号（Hazard）、“革命者”号（Révolutionnaire）与“墨兰波斯”号（Melampus）也随后被派往南方。*Blockade of Brest* ，ii.337，345.

[22] Ibid.，ii.343，August 16th.

[23] *In-Letters*（*Secret Orders*） 1363.Signed “Barham，Gambier，Garlies.”

[24] Barham to Pitt，August 9th，*Barham ’ Papers* ，iii.97；and same to Cornwallis，August 10th，*Hist.MSS.Cam.*，*Various Collections* ，vi.410.

[25] Mahan，*Sea Power*（*French Revolution*），ii.576.对于这位博学而刻苦的作者（A.T.马汉），我们必须要指出，他在写下这一观点时还没有任何的战争指挥经验。当他有过相关的经验之后（马汉在美西战争中担任美国海军战略委员会委员。——译者注），他对“集中”做出了一个似乎与先前对康沃利斯的批评相反的定义：“就像开开合合的风扇，如此有组织地联结在一起的舰船构成了一股影响范围巨大的力量，这使得它们能越过广阔的洋面而发挥作用，能在同一时间相互支持，因为它们从属于一个共同的中心，并被这个中心所控制。这就是对‘集中’的合理阐释——并不是像一群绵羊一样挤成一团，而是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分布于各处，并被统一的意志有效地联结在一起。”马汉：《海权的影响及其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and Its Relations to the War of 1812* ），第316页。

[26] 爱德华·柯德林顿（Edward Codrington，1770～1851年），英国海军军官。1805年指挥战列舰“俄里翁”号加入加迪斯港外的纳尔逊舰队，参与了特拉法尔加海战，在战斗中让三艘敌舰降旗投降。——译者注

[27] Bourchier，*Memoirs of Codrington* ，i.66，October 16，1805.

[28] *Hist.MSS.Coll.* ，Far. *Coll.* ，vi.410.

[29] 参考1艘三甲板战舰顶得上2艘双甲板战舰的公式，康沃利斯舰队的战斗力系数为（10×2）+8=28，而维尔纳夫舰队则是（1×2）+28=30。

[30] 一位最为平和、审慎的批评者在康沃利斯独自遭遇维尔纳夫的问题上采用了一种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康沃利斯似乎只有逃跑这一种选择，50艘战列舰在海峡之内的大集结就很可能实现。” *Blockade of Brest* ，ii.xxxix。但是，康沃利斯毫无疑问将会选择那个由德雷克首次应用，并由豪和肯彭菲尔特最近使用过的传统阵位，如果敌军试图进入海峡，他就会在上风位置跟随敌人。他很可能在时机不利时拒绝交战，但逃跑违背了所有的传统和实践方式。

[31] *Barham Papers* ，August 20th.

第十八章 化解危机 [1]

我们在上一章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在担当责任者看来，分兵得到的决定性优势足以使他们冒上相应的风险。他们准确地估算了英军位置的士气威慑力，同时也对联军向南进攻的可能性做了最为细致的防备。英军对费罗尔的监视一天也不曾中断，相反，康沃利斯为此采取了一套详尽的监控措施。在维尔纳夫开始出港的8月9日，考尔德派出了“龙”号去侦察港湾。10日凌晨，它与发现阿勒芒踪迹的“埃俄罗斯”号一齐返航，给考尔德带来了敌舰队已进抵拉科鲁尼亚、只有8艘战舰因逆风仍在费罗尔港内的消息。基于这份报告，考尔德决定驶向北方，而他紧接着又遇到了康沃利斯派来联系考尔德与斯特林的“灵敏”号（Nimble）轻帆船。它曾被维尔纳夫的巡航舰发现，并遭驱逐，但在此之前，它也同样发现了拉科鲁尼亚的联合舰队。5艘战舰正在行驶中，好像它们刚刚加入这支舰队——这一观察似乎印证了考尔德对阿勒芒已经与维尔纳夫会合的推断。“灵敏”号迅速驶回乌桑特报信，于14日清晨抵达；考尔德随后也抵达乌桑特，向康沃利斯报告了目前的态势。康沃利斯随即做出了分兵决定，“灵敏”号与其他巡洋舰被派回费罗尔，在考尔德抵达之前保持监视态势。[2]

维尔纳夫真正的行动意图向来存有争议。他是否曾真的打算与冈托姆会合？他在通过“迪东”号发给阿勒芒的信中表示，如果他在前往布雷斯特时遇到了任何阻碍，加迪斯就将是他最终的目的地。[3] 他在8月10日写给德克雷的信中也说：“我正准备出海，准备看情况驶向布雷斯特或加迪斯。敌人在这里紧紧监视着我们，使我们毫无掩藏行踪的可能。”[4] 他并不清楚考尔德是否还在港外，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

纳尔逊的紧追不舍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士气，每个人都深信纳尔逊正在海平线下的某处，与考尔德一起，一旦他们驶离港口便会发动突袭。关于纳尔逊的最新消息是其正在从直布罗陀海峡赶往圣文森特角。在得知维尔纳夫出航之前，法国驻马德里大使伯农维尔将军（General Beurnonville）在写给塔列朗的信中记录了法方对此的推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英国舰队尚未集结，因此我建议让我们的舰队指挥官集结于费罗尔。纳尔逊与考尔德拥有不少于27艘战列舰，其中好几艘是三甲板战舰。”[5] 联合舰队中的陆军统帅洛里斯东将军认为，英军这种可能的集结完全打乱了维尔纳夫的心绪。他在后来写给拿破仑的信中说：“陛下，对纳尔逊的恐惧在维尔纳夫那里的确占据了上风。”但洛里斯东本人也无法免于这种精神压力，他在同一封信中又写道：“在此之前，纳尔逊会追上我们。我们已经知道，他发誓要用那11艘战舰追踪我们，即便跨越半个地球也在所不惜。”[6]

西风将费罗尔港内的战舰迟滞了三天之久，推迟了联合舰队的出海时间。在这段无可作为的时间里，纳尔逊与考尔德会合的可能性每时每刻都在提高，法西联军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精神压力。8月13日，维尔纳夫终于与剩余战舰会合，但他的战意却已丧失殆尽。洛里斯东认为，在舰队即将出发、最后的报告已发往巴黎时，维尔纳夫已完全放弃了与冈托姆会合的意愿。据传维尔纳夫曾告诉他说：“我已经通知了海军大臣，我们确定要前往加迪斯。”[7]

维尔纳夫发给德克雷的最后报告其实是这样写的：“我正要出航，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做。在距离海岸8里格的位置上，有8艘战列舰始终在视域之内。他们将跟踪我们，我无法迫使其交战，他们则会在布雷斯特或加迪斯港外加入各自的封锁舰队——这取决于我们要去哪里。我不怕直接告诉您，我恐怕无法击败20艘敌舰。我们的海军战术是过时的。我们只知道组成战列线，这正中敌人的下怀。”[8]

这封信或许可以反驳洛里斯东的说法，他似乎有意地歪曲了事实。他明显敌视着维尔纳夫，而他在写给皇帝的那封报告中也公开承认，他的目的就是让拿破仑撤换这位失去了勇气、丧失了信心、不再适合指挥舰队的舰队司令。然而，另一个最为谨慎也是最为公正的权威声音却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洛里斯东的说法。格拉维纳的参谋长艾斯卡尼奥舰长（Captain Escaño）在8月13日的日志中简要地写道："我们向加迪斯出航。"看起来，这在那一刻已经成了普遍的信念。[9]

不管维尔纳夫内心深处的意图到底如何，他已清楚地认识到，他受命要执行的行动不可能成功，甚至很难避免一场灾难性的惨败。他后来解释道："我对我军战舰的状态、对他们的航行能力、对他们一齐执行机动的能力都毫无信心。考虑到这一点，考虑到敌军的兵力集结，再考虑到他们清楚地掌握着我军抵达西班牙海岸后的一举一动，我对完成这支舰队的伟大使命完全不抱希望。"[10]

每个钟头的煎熬都使维尔纳夫更加沮丧。在他正准备朝西北方行进之前，一艘陌生帆船出现在他们的东北方。联合舰队立即打出了准备战斗的信号，转向驶往东北方的普莱尔角，并将港口保持在他们的下风方向。康沃利斯的警戒措施开始生效了——这艘陌生帆船正是他派来联系考尔德的32炮巡航舰"鸢尾花"号。刚驶离康沃利斯不久，它就遇到了从阿勒芒所部巡洋舰的追击中逃脱的"那伊阿得"号。在交换情报之后，"鸢尾花"号决定去费罗尔向考尔德报告。它并不知道考尔德已经解除了封锁，起初将出港的联合舰队误认为英国舰队。但它很快就看出了真相，在敌方巡洋舰的追击下逃往北方。它从敌舰队的混乱状态中看出，他们一定是刚刚出港，正准备起航。于是，它在第二天早晨再次回到港外。维尔纳夫在前一天夜晚决定出航。或许他希望掩藏行踪，于是在黑夜的掩护下改变了航向，却不料"鸢尾花"号仍旧紧跟在旁。联军的整支巡洋舰队再次将它驱逐，但在此之前，它已经摸清了联合舰队的准确兵力。下午2时左右，"鸢尾花"号脱离了联合舰队，朝西偏北的方向

驶去。[11]

就在此时，邓达斯舰长（Captain Dundas）统领的“那伊阿得”号再次出现在它的东南方。“那伊阿得”号是康沃利斯在决定分兵时派来监视维尔纳夫的另一艘巡洋舰，已在上午观察到了部分联军的动向。两位舰长都同意加迪斯将是联合舰队的目标，他们因此决定让“那伊阿得”号向康沃利斯复命，而“鸢尾花”号则去向科林伍德发警报。[12]

邓达斯在19日早间抵达乌桑特。闻讯后，康沃利斯立即让他与另一艘巡洋舰“冒险”号（Hazard）向考尔德送去最新的命令与其对此时态势的明确评析：“敌人最有可能驶向加迪斯或进入地中海，我并不认为他们的补给物资足以支持他们去更远的地方。首要的目标是在敌人进入港口前追上他们。敌舰不太可能搭载陆军部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前往爱尔兰的可能性非常小。我也不认为他们敢花时间在海上巡航，以图截击驶向英国的商船队。”因此，考尔德的任务被更改为“不要再去费罗尔港外，而应该追击敌军”。[13]

康沃利斯刚刚发出命令，海军部发来的、关于一支商船队正在驶近的机密情报就送到了他的手中。这是由雷尼尔将军（Admiral Rainier）护送的东印度船队。康沃利斯得到了他的机密航线，如果敌舰队的行动是以它为目标，他就应采取措施保障其安全。[14] 但是，康沃利斯并未因此改变计划。他已经为遏制风险采取了行动，只有在十分必要或具有更高的战略价值之时，他才会采取专门的措施。而在此时，他的面前还有另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8月21日早晨，他的前出巡洋舰打出信号，称法国布雷斯特舰队[15]正在出港。两天之前，沉浸在最后的乐观中的拿破仑用最强硬的口吻向冈托姆下达了一则命令，让他驶出港口、进入贝尔托姆锚地，随时准备接应维尔纳夫舰队。[16] 冈托姆只得执行命令，康沃利斯则毫不犹豫地率领整支舰队做出回应。他发现法军正乱糟糟地驶出布雷斯特海峡，于

是便勇敢地在正对海峡的黑礁（Les Pierres Noires）附近下锚过夜，准备次日一早顶着岸炮发起攻击。具有这种决心的人，即便面对两倍兵力之敌也不可能退缩。次日破晓，两支舰队起锚并组成了战斗阵型。他们彼此对峙，冈托姆似乎准备迎战英军，但就在双方即将进入射程时，冈托姆转舵向港内退去。康沃利斯冒险地驶近法军，试图切断其后端战舰的退路，但猛烈的岸炮最终迫使他撤离。在这场由他一己发起的攻击中，康沃利斯被一块弹片击伤，可这位坚韧的老将却认为这根本不值得在报告中提起。这场行动的士气打击完全遏制了冈托姆动用其舰队的任何企图，并使他与维尔纳夫会合的行动前景更加绝望。比起这些成果，那点损失当然不值一提。

与此同时，如“鸢尾花”号所报，维尔纳夫正朝着西偏北的方向驶去。[17] 当他驶出费罗尔时，一切迹象似乎都印证着他的信念——似乎有一支敌舰队在监视着自己。正在驶向菲尼斯特雷的英国战列舰“龙”号被近来的西风拖慢了行程，它与几艘英国巡洋舰位于联合舰队以北30英里。维尔纳夫的侦察舰将之误认为2艘战列舰与2艘巡航舰，并推测它们一定是隶属于封锁舰队的近海舰队。让这一推断更显得可信的是，另一则消息声称东北方有14艘帆船——显然这是错误的消息。[18] 此外，他们还发现西北方向有8艘帆船，但查验后发现，那都是中立国的船只。[19] 最后，维尔纳夫终于乘着一股逐渐变强的东北风开始向西方进军。他将费罗尔保持在自己的下风方向，但仍旧无法摆脱萦绕在心头的恐惧。

我们曾在第十五章中提到，8月13日，“龙”号遇到了拖着“迪东”号驶向费罗尔的“凤凰”号，并让它与自己一同驶向菲尼斯特雷集结点。第二天下午2时左右，“龙”号对一艘驶向汉堡的丹麦商船进行了登船检查。或许是为了掩护“凤凰”号和它的战利品，“龙”号的格里菲斯舰长（Captain Griffith）告诉那位丹麦船主，他们隶属于一支由25艘战列舰组成的舰队。为了强化这一假象，他在放走丹麦船时还表演了另一出老

把戏，向远方并不存在的司令官打出了一串信号旗。他刚刚完成表演，便发现一支陌生舰队在东偏南的方向上出现。他观察了对方一个多小时，对方的巡洋舰也前来探查他的身份。下午6时左右，他极为得意地看到敌人登上了那艘他故意播下假消息的丹麦商船，然后又匆匆返回舰队之中。太阳正要落山，在天色完全暗下之前，格里菲斯数出了26艘敌舰，它们似乎正朝西北方驶去。[20] 为了避开威胁，“龙”号与它的伙伴全速驶向南方。第二天早晨，敌舰队已经脱离了它们的视野。它们在此分别，“凤凰”号拖着它的战利品驶向直布罗陀，而“龙”号则顶风转舵，似乎想追踪它之前看到的那支舰队。[21]

15日上午，维尔纳夫已经接到了那艘发现英舰并登上丹麦商船的巡洋舰发来的报告，但他在信中对那则假消息只字不提。我们只知道，尽管法军已经认出“凤凰”号的战利品就是“迪东”号，但维尔纳夫并未试图去解救本方舰船。他只是继续向前航行，驶向阿勒芒的第一处集结点，认为其很有可能已回到了那里。他在中午时分靠近了那片海域，但全然不见阿勒芒的踪影。[22] 事实上，他们已经错过了相遇的时机。当日破晓时，驶向比戈的阿勒芒已位于比戈与菲尼斯特雷之间。[23] 这意味着他一定是在夜间近距离地穿过了维尔纳夫的航线。或许由于夜幕的掩盖，两支舰队都没有发现对方。此时的阿勒芒从中立国船只处得知维尔纳夫也曾驶向比戈。他反而决定加速向前，希望得到确切的消息。

向西行进的维尔纳夫越来越远离他想要会合的友军。不管他在驶出费罗尔时最初是怎么打算的，他在此时的想法已确定无疑。他所遇到的中立国船只印证了他最深的恐惧。洛里斯东说：“自离开拉科鲁尼亚后，我们从各种船只处得到的回报全都显示，纳尔逊已经得知我们曾驶入比戈，他已经驶向北方并且一定已与考尔德会合。”[24] 分散英国舰队是战役成功的基本前提，但在乐观的法皇为此采取了如此多的措施之后，维尔纳夫却发现英国舰队集结得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密，而他自己的集结行动却已经失败。依据目前的所有情报，他几乎不可能与阿勒芒取

得联系。如果要按照拿破仑的计划驶向北方，他只能动用手头的兵力。可这仅仅是一支徒具名号的舰队：驶出费罗尔港的行动表明，这支胡乱拼凑成的部队完全缺乏一支舰队应有的作战能力。继续行动只能是疯狂之举，整个战役计划显然已经破产。目前，他所执行的是德克雷于7月16日向他发出、他在费罗尔港外接到的那道命令，其中有这样一条保留规定："皇帝陛下已考虑到，某些不测可能使舰队陷入难以预料的处境，使你无法继续执行这个对世界的命运有着巨大影响的计划。唯有在这种情况下，皇帝陛下希望在加迪斯集结起强大的舰队。"[25] 维尔纳夫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他为自己的行动辩护道，敌人显然已经洞悉了皇帝的计划，计划已经失败。他说："他们目前的兵力集结比之前的所有阵势都要危险，他们的兵力比布雷斯特和费罗尔舰队之和还要强大。"除此之外，一股强劲的东北风已经持续了两天，它似乎还将继续下去，维尔纳夫也不敢让他那状态糟糕的舰队顶风航行。夜幕降临后，他再次在黑暗的掩护中调转航向，朝着加迪斯驶去。

我们无从得知格拉维纳对此的看法。他的参谋长艾斯卡尼奥忠诚地保持着沉默，完全不予置评。在这一天以及此后的三天中，他在日志里只留下了这几句话："这几天里，只有捕获一艘商船的事值得一提，它被烧毁了。我们追击进入视野的所有船只，沿着航线驶过加利西亚海岸和葡萄牙。"[26] "只有捕获一艘商船的事值得一提"，这就是西班牙人在这则记录中表现出的可悲的忠心。所有人都知道，过去几天中发生的事无异于将全部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敌人，但所有人都对此无能为力。洛里斯东向拿破仑写道："舰长们没有心思好好工作。他们不再专心看信号，信号旗往往要在桅杆上飘两三个钟头。军纪已经荡然无存。"[27]

维尔纳夫转向南方的行动并未被任何英国巡洋舰发现，但是，正要向科林伍德告警的"鸢尾花"号却已赶在他们前方，一路上广泛地传播着敌人南下的消息。15日上午，就在它抵达菲尼斯特雷之前，它遇到了威廉·帕克爵士统领的"亚马孙"号。在驶向乌桑特之前，纳尔逊曾派"亚马

孙”号去费罗尔港外打探消息。帕克接到的命令是，如果他判断纳尔逊没有前往费罗尔，他就应前往乌桑特或爱尔兰。帕克从“鸢尾花”号得知了敌军南下的情报，并得知“那伊阿得”号已带着这则情报驶向乌桑特，他就此决定直接去科克港报信。他在8月24日抵达，及时地让德鲁里制止了即将出海的东印度船队和贝尔德将军的开普敦远征军。[28]

与此同时，赶往科林伍德处的“鸢尾花”号在16日遇到了著名的巡航舰“欧律阿罗斯”号（Euryalus）——它的舰长亨利·布莱克伍德[29]是英国最为杰出的巡洋舰指挥官。他能出现在这恰好也是某种运气的体现。“欧律阿罗斯”号本来隶属于爱尔兰巡洋舰队。7月底，当海军部的注意力被引向泰瑟尔和维尔纳夫将驶入北海的可能性时，它被派给科克港的德鲁里，使之能够监视爱尔兰北部海岸。然而，从斯皮特黑德出航之后，它在途中接到了考尔德的战斗消息，以及一份称已迫使联合舰队向南驶往加迪斯的报告。它在8月2日抵达科克港，将此报告给德鲁里。德鲁里刚好在一天前接到命令，如果他的任何舰只确定了维尔纳夫的方位，他就应当立即去拉各斯给纳尔逊报信。他认为继续监视北方海岸已没有意义，便将布莱克伍德调出爱尔兰舰队，让他直接去找纳尔逊。[30]这当然是太迟了。当“欧律阿罗斯”号抵达特茹河口时，英国驻里斯本代理公使斯特兰福德勋爵告诉它，纳尔逊已经离开了拉各斯，有人在8月5日看到他正在里斯本以西的100里格处朝北方驶去。[31]斯特兰福德已经得到了有关维尔纳夫行动意图的消息。他在西班牙大使家中安插了一位间谍，这位间谍看到了格拉维纳在战斗刚刚结束时写来的信。据其所说，格拉维纳对他的法国同僚大加嘲讽——那些人想去加迪斯补给舰队，然后趁英军追上他们之前驶入地中海。[32]

我们并不知道布莱克伍德是否也得到了这则消息，但他立即回航，希望在菲尼斯特雷找到纳尔逊。于是，他便在此遇到了“鸢尾花”号，并从它那里得知维尔纳夫从费罗尔驶向西方的消息。这则消息当然转变了他对整个局势的判断，历来善于把握局势、不惧承担责任的布莱克伍德

立即将之牢记在心。他后来向海军部解释道，基于“鸢尾花”号的情报，他认为维尔纳夫驶出费罗尔后的目的地一定是南方，便决定去南方寻找敌军。任何单独的军舰都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两艘巡洋舰必须相互合作，于是他便将“鸢尾花”号留在了身边。它们将一起巡航，去确定联合舰队的方位；如果它们发现了目标，较快的一艘就应跟踪敌人，而较慢的一艘则应向主力舰队报信。他还认为，他不应继续受制于寻找纳尔逊的命令。“鸢尾花”号已经把他所知的所有消息告诉了“亚马孙”号，它与“那伊阿得”号已经覆盖了纳尔逊可能前往的所有海域。他由此决定，先去里斯本通报最新消息，随后与“鸢尾花”号一起到圣文森特角——那是唯一可以确定地遇到敌人的地点——等候四十八小时。8月18日，布莱克伍德抵达了圣文森特角。一艘丹麦船只告诉他，西方正有一支大舰队朝他驶来。这只能是联合舰队，他的下一步行动立即明了无疑。他立即决定留下来跟踪维尔纳夫，让“鸢尾花”号带着消息朝爱尔兰驶去，如果可能，也应给康沃利斯报信。[33]

他们在19日分手告别，而在三天之前，考尔德已接到了康沃利斯的命令，率领着18艘战列舰开始向南方进军。在前两天中，相反的风向将他阻却在乌桑特岛附近，而现在，他决定乘着那股东北风横跨比斯开湾，直扑费罗尔港外。他相信阿勒芒已经与维尔纳夫会合，使得敌军的兵力接近己方的两倍。然而，尽管最近的战事使他遭到了诸多责难，他却丝毫没有表示要退缩的迹象，反而热切地赶往费罗尔。20日清晨，考尔德在比斯开湾正中遇到了从康沃利斯那里追赶而来的“那伊阿得”号。他由此得知了维尔纳夫已经出港，这使他面对的局势更加困难。他打出信号，召集舰队中的所有将领；经过短暂的商讨，他决定升起满帆，加速航行。他先将航线转往更偏西方的方向，如果敌军北上，他就能横截敌军的航线。但由于仍不确定维尔纳夫是否已真的出海，不久后他又恢复了直接驶向费罗尔的航线，并派出“攻击”号（Attack）炮舰去侦察港内的状况。21日中午，考尔德已抵达了他所熟悉的奥特格尔角西北方。[34] 他在这里打消了第一处疑虑。一艘用于交换俘虏的英国船只在一天

前刚刚离开费罗尔，他告诉考尔德，维尔纳夫据说已率领着26艘战列舰在一周之前出航。由此看来，阿勒芒并未与他会合。尚待解决第二处疑虑是维尔纳夫要驶向何方。[35] 一小时后，从南方驶来的双桅纵帆船“皮克尔”号（Pickle）前来报告，称阿勒芒曾经驶入比戈。根据最为浅显的推测，维尔纳夫肯定是去那里与阿勒芒会合。考尔德毫不犹豫地转舵向西，朝着菲尼斯特雷全速驶去。

阿勒芒再次面临灭顶之灾，事实上，他此时正在向考尔德迎面驶来。8月16日，他在比戈港外得到了维尔纳夫留下的命令。维尔纳夫让阿勒芒去费罗尔与自己会合，如果到时发现自己已出航，他就应当去布列塔尼半岛南方的庞马尔克（Penmarcks）。阿勒芒在第二天匆忙起航，他顶着东风与东北风，竭力驶往菲尼斯特雷，而考尔德却正好要从那里驶来。

在菲尼斯特雷角的另一边，被康沃利斯派来传达最新指令的巡航舰“灵敏”号也在21日加入了考尔德的舰队。它在一天前抵达费罗尔，从考尔德的侦察舰“攻击”号那里得知了他的方位。它扬着全帆赶上了考尔德，为他带来了康沃利斯的命令与另一则至关重要的情报。一位葡萄牙船长曾告诉它，维尔纳夫在一周前率领29艘战列舰与10艘巡洋舰向西出航，可能前往加迪斯或圣多明各。[36] 考尔德首次得知联合舰队的准确兵力，他立即下令保持向西航行，但同时仍想弄清比戈港内的情形。次日上午9时，他已经抵达菲尼斯特雷角，便派出数艘巡洋舰前去比戈打探消息。截至此时，他并未发现阿勒芒的踪影，这不得不说是又一个奇迹。在起航的四天后，阿勒芒的幽灵舰队已经抵达了拉科鲁尼亚以北的锡萨加斯群岛（Sisargas Islands），他一定曾在此前的某个时刻与考尔德擦肩而过。第二天，发现维尔纳夫已经离开了费罗尔，阿勒芒便转向北方，希望在庞马尔克与之会合。

当日夜里，考尔德接到巡洋舰回报，称罗什福尔舰队已在四天前离

开比戈，向北驶去。与此同时，他还遇到了另一艘巡洋舰“少女”号（Poulette），它被派往加迪斯寻找纳尔逊，又被科林伍德在两周之前遣回。在此期间，它并未发现维尔纳夫。但他们也有可能在夜间相向驶过，如果是这样，维尔纳夫仍可能位于南方。毫不夸张地说，考尔德在此面对着一个比康沃利斯先前的决定更加令人焦虑的难题。维尔纳夫到底是去了南方还是北方？他所拥有的唯一确切的信息——阿勒芒的航向——显然更支持北方，但英军并未发现他的踪影。考尔德或许听从了自己的直觉，他勇敢地决定向南方进军。由于缺乏敌人的准确消息，他决定沿着海岸驶向圣文森特和加迪斯。他对康沃利斯解释道，如果敌人没有南下，他就能在此找到科林伍德；如果敌军确已南下，而科林伍德已被逐退，他也能在某个集结点上与之相遇。“如果他们没有南下，我确信科林伍德将军[37]会准许我去乌桑特与您会合。”

考尔德在第二天继续向南进军，并派出一艘巡洋舰去里斯本打探消息。24日早晨，他的焦虑终于得到了缓解。英国领事甘比尔派来的一艘小艇为他带来了一则消息，证实联合舰队此时就在加迪斯。考尔德再次召集了将官会议，他们决定加速向前，去锁住敌军的大门。[38]

黄昏时分，考尔德在距圣文森特角不到20里格之处遇到了“欧律阿罗斯”号，考尔德由此得知了敌人的整个行踪。正如布莱克伍德所料，他在“鸢尾花”号离开后不久就发现了联合舰队。敌舰的凶狠追击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决心，但在摆脱追击之后，他却发现自己无法去通知科林伍德，因为那样必须要穿过敌人的舰群。他只得先通知了“凤凰”号——它正拖着战利品前往直布罗陀，闻讯后只好转向北方，朝英国本土驶去。

因此，加迪斯港外的科林伍德近乎在锚地上遭到奇袭。他在当月21日向妻子写道：“我必须告诉你，我们昨天经历了多么紧张的事。我们正在港外巡航，拥有36艘战列舰的联合舰队忽然驶来。我们只有3艘可怜的战列舰，还有1艘巡航舰和1艘臼炮船，只得向海峡方向撤退。”[39]

两天前，他得到了或许是来自甘比尔的警告，对将要发生的事已有所预料。他仍在思念着家人和家园——“橡树、森林、嫩绿的草甸”——但在此时，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他打算保持直布罗陀海峡敞开，让卡塔赫纳港外的比克顿所部与他位于丹吉尔的第四艘战舰前来会合，如遭追击则退往海峡的另一边。

事实上，科林伍德的处境并不危险。敌军意志已是如此消沉，位置不明的纳尔逊舰队仍旧是纠缠着维尔纳夫的梦魇。他的巡洋舰常常打出错误信号，不停发来在周围海域发现舰队的混乱报告。最新的一则消息是，一艘瑞典商船在海峡内看到了8艘军舰，还有12艘在直布罗陀，3艘在加迪斯港外。维尔纳夫悲叹道：“这就是纳尔逊，他在这里统帅着23艘战列舰。”由于担心笨拙的舰队遭到突袭，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快驶入安全的港口。格拉维纳曾试图追击科林伍德，但维尔纳夫很快就将他召回。8月20日，整支联合舰队灰溜溜地回到了加迪斯港内。

让联军舰长们更加气恼的是，科林伍德在第二天就悄然恢复了封锁，现身于港外。这个与奥德截然相反的决定的确需要极大的决心，但是，我们并不能将这两个案例等量齐观。奥德所面对的是一支刚刚开始其宏伟冒险的崭新舰队，而科林伍德面前则是一支物资枯竭、任务失败、正在败退的疲敝之师。北方某处一定有一支友军追赶在他们身后，那支舰队不用多久就能为他提供支援。我们不应贬低奥德，但仍应高度赞扬科林伍德的表现。此时此刻，他无从得知敌人的士气状态，只能预计他们马上会重新出海。他在20日给甘比尔的信中写道：“他们驶入加迪斯是为了装载物资，我估计他们很快就会再次出航，并得到港内8艘战舰的增援。”第二天，他又向妻子写道：“我们正监视着加迪斯，里面的敌舰就如同森林一般。我希望有人能尽快前来支援，同时，我一定会尽力照顾好自己。”他并未等待多长时间。正在岸上养病的比克顿已听说了海峡以西的事态，他立即撤销了对卡塔赫纳的监视，派出麾下战舰前去增援他的长官。8月28日，两支舰队在加迪斯港外会合，两天之

后，考尔德也在此出现。

这就是那“非凡的愚行”的结果。凭借着果敢的胆识和睿智的洞见，巴勒姆和他的同僚们同时保卫了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他们并未在防御位置上消极等待。只要舰队能把握局势，他们就绝不会跟从于拿破仑的调动，反而能将他的把戏掌控在自己手中。现在，拿破仑只剩下陆军可以动用了，除了阿勒芒那支行踪难测的小舰队，他的整支海军都已身陷囹圄。战役的大危机结束了。

---

[1] 本章可参见彩插中的图示4。

[2] Lieutenant Delafons to Cornwallis，August 15th：*Blockade of Brest*，ii.334，and *Log of the Nimble*，*P.R.O.*

[3] Desbrière，iv.730.

[4] Desbrière，iv.778.

[5] Desbrière，*Trafalgar*，*App.*，p.38，and see Thiers，*Consulat et Empire*，v.439.

[6] Desbrière，*Trafalgar*，*App.*，pp.106，108.这封信的写作时间不早于8月21日，那时他们已回到加迪斯。但这封信很好地展示了舰队中的普遍看法。纳尔逊在5月7日写给海军部的信中曾提到过利用这种印象的问题。Nicolas，vi.428.

[7] Desbrière，*Trafalgar*，*App.*，p.105.

[8] Thiers，*Consulat et Empire*，v.442.这是我们唯一所知的关于这一时刻（8月13日）的信件。梯也尔从杜伊勒里宫取得了他所需的材料，但德克雷的回信在后来毁于巴黎公社的杜伊勒里宫大火。（1871年5月23日，法国政府军攻入巴黎，公社当局下令焚毁巴黎的各主要建筑，包括卢浮宫、卢森堡宫、巴黎歌剧院、巴黎市政厅、内政部、司法部、王宫。杜伊勒里宫遭到焚毁。——译者注）不过，还有一封信件能让我们看到其中的蛛丝马迹。拿破仑在9月8日向德克雷写道：“在接到维尔纳夫的信之后，你就再别假设他会去布雷斯特了。他已经告诉我‘我要前往加迪斯’。”之后，他还提到了洛里斯东的信。*Correspondance*，xi.183.但德克雷在9月1日认为，维尔纳夫的信件表示其目的地尚未确定。Desbrière，iv.822.

[9] Desbrière，*Trafalgar*，*App*.，p.7，and Report of the *Nimble*.试图为老友辩护的德克雷也是同样的观点。他在写给拿破仑的报告中说："舰队在8月10日起锚，几艘船发生了碰撞，造成了损坏。许多侦察舰正在全神贯注于敌军的行动。维尔纳夫将军得知考尔德与纳尔逊已经会合，这加剧了他的焦虑。他的补给品只够用40天。他最终在13日驶出港湾，驶向西北偏西，并在15日决定驶向加迪斯。从维尔纳夫的信件来看，他或许早在11日就下定了决心。"Desbrière，*Projett*，iv.726 n.

[10] Desbrière，*Projets*，iv.786.

[11] "鸢尾花"号爱德华·布雷斯舰长（Captain Edward Brace）的报告与布莱克伍德舰长8月16日的急报都刊载于*Captains' letters*，1534。他给出的维尔纳夫的航向是西略偏北（W.by N.1/2N.，约为正西方偏北5度——译者注），位置是北纬44°17′，西经9°26′。

[12] *Captains' letters*，1534 and *Phillimore's Life* of Sir W.Parker，i.303.

[13] Cornwallis to Calder，August 19th：*In-Letters*，129."那伊阿得"号带着原件，而"冒险"号则带着副本。另可参见 Marsden，August 19th：*Blockade of Brest*，ii.346.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将分离舰队的行为通知海军部，而巴勒姆此时正在做出同样的决定。

[14] Cornwallis to Marsden：*In-letters*，129，August 20th.

[15] 法军兵力为21艘战列舰、5艘巡航舰、1艘轻巡航舰，其中有3艘大型三甲板战舰。英军兵力为17艘战列舰、1艘巡航舰、2艘单桅快艇与1艘武装快帆船。参见William James，*The Nav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1811-1827*（Stackpole Books，1837），Vol.3，pp.302-305。——译者注

[16] To Decrès and to Ganteaume（by telegraph），August 21st：*Correspondance*，xi.105-6.

[17] 它报告的这一航向仍然存疑。它以及其他权威人士，包括艾斯卡尼奥，都说联合舰队在东北风下驶向西北偏西；但雷耶（Honoré Reille，法国将领，联合舰队中洛里斯东的陆军部队指挥官——译者注）却说，他们在8月15日中午时位于菲尼斯特雷角西北偏西的40里格处，也就是费罗尔正西方的55里格处。一种调和二者矛盾的办法是，我们可以假设位置信息没有错，而航向信息则受到了地磁变化的影响。1805年，菲尼斯特雷附近的地磁偏角是偏西22.5度（即罗经显示的正北方向比真实的正北方向往西偏了22.5度——译者注），那么，将西北偏西的罗经航向折算之后，得出的真实航向正好是正西。由此可以进一步佐证，他的航线正是朝阿勒芒的第一处集结点驶去。不过，维尔纳夫给出的当天夜里的位置是菲尼斯特雷西北偏西的80里格，但他显然不可能在这么

短的时间内驶过这么远的距离。另一种解释是，尽管他的确转向到西北偏西，但比斯开湾中南偏东方向的海流与偏航的综合作用使其实际航向变成了正西。不管怎么样，他都不可能像法国参谋地图（Desbrière，iv.782）所示的那样航行到那么北的地方，因为他在转向南方之后只用了八十个小时就抵达了加迪斯港外。如果他从费罗尔以西60里格处向南航行，前往加迪斯的距离就是550英里，他的行进速度就是每小时7节。由于他还必须等待落后的舰船，这已是他的舰队所能达到的最大航速。

[18] 在那些后来驶向他东北方的英国巡洋舰的报告中并没有这些船只的踪影。

[19] 德斯奇霍上校认为，这8艘船“肯定是阿勒芒”。但根据雷耶的记述，这些船经过查验都是中立国的船只。8月14日凌晨2时，维尔纳夫在普莱尔角附近转向，而在凌晨4时，阿勒芒在东北方看到了3艘可疑船只。德斯奇霍上校认为它们肯定是维尔纳夫的巡洋舰，但据阿勒芒所说，他的位置在北纬45°39′、西经13°31′——格林尼治经度的西经11°1′（当时的法国以穿过巴黎天文台的经线为0度经线——译者注），也就是说，他位于普莱尔角西北方150英里。*Projets*，iv.783；*Trafalgar*，100.

[20] 格里菲斯舰长很可能是数错了。天色已渐渐昏暗，他很可能没有看清整支联合舰队。

[21] *Log of the Dragon*（Griffith’s）.James，iii.374；Lauriston to the Emperor，August 21st：Desbrière，*Trafalgar*，*App.*，p.107.

[22] 《雷耶日志》（*Journal de Reille*）记载：“中午时……位于菲尼斯特雷角西北偏西的40里格。”Desbrière，*Projets*，iv.785.这一位置也可以将维尔纳夫从费罗尔起航后的航向修正为正西。

[23] Allemand’s Journal：Ibid.，784.

[24] Desbrière，*Trafalgar*，*App.*，p.108，August 21st.

[25] Desbrière，iv.646.

[26] Desbrière，*Trafalgar*，*App.*，p.7.

[27] Desbrière，p.108.维尔纳夫在报告中说，他是在菲尼斯特雷西北偏西的80里格处转向。但这显然不可能，这里距离他中午的位置约120英里，他不可能在七八个小时内驶过这么远的距离。

[28] *Lift of Parker*，p.303.不待下锚，帕克转而驶向乌桑特。他“携带着一份

副本，以防‘那伊阿得’号因任何难测的意外而没能通知到康沃利斯将军”。Ibid.，p.304.

[29] 亨利·布莱克伍德（Henry Blackwood，1770～1832年），英国海军军官。1795年晋升舰长，此后在一系列巡航舰作战中取得辉煌战绩。1800年曾利用巡航舰的机动优势成功使法国80炮战列舰“威廉·退尔”号瘫痪，并被友军俘获。1805年参与特拉法尔加战役，并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后作为舰队总司令科林伍德的旗舰长，随后运载被俘的维尔纳夫返回英国。——译者注

[30] 德鲁里的这一行为后来遭到了海军部的批评，海军部还告诫他，在未来派巡洋舰执行通信任务时要更加小心。*In-Letters*，620，August 2nd，11th，14th，16th.

[31] 这则消息大致准确，但斯特兰福德的消息来源却不得而知。

[32] *S.P.Foreign*，*Portugal*，vol.47：Strangford to Mulgrave，August 7th.马尔格雷夫在9月9日收到了这封信，随即将此转发给海军部，并批示道：“给纳尔逊勋爵发一份副本。” *In-Letters*，*Secretary of State*，1200.

[33] Blackwood to the Admiralty，August 16th and 18th：*Captain’s Letters*，1534.Logs of the *Iris* and *Euryalus.*

[34] *Masters’ Logs*，3673 （*Prince of Wales*）.我们找不到相关信息来说明他在何时再次转变航向。但在21日中午11时，他遇到了一支并未遭到袭击的运输船队，或许他由此推测维尔纳夫已经返航。他也可能是想占据更偏上风的方向，以便在必要时折返以与康沃利斯会合。

[35] 这是俘虏交换船“特里默”号（Trimmer）。详情可见朴次茅斯运输官巴顿舰长（Captain Patton）的信。*War Office*，i.712，Aug.31st，以及Log of the *Defence*，Aug.21st。

[36] Log of the *Nimble*，Calder to Cornwallis，August 22nd：*In-Letters*，129.圣多明各正遭到黑奴起义军围困，拿破仑当时正试图组织一支救援圣多明各的远征军。Napoleon to Decrès，August 5th：*Correspondwnce*，xi.63.

[37] 科林伍德的军阶比考尔德高。——译者注

[38] Calder to Cornwallis，Aug.24th：*In-Letters*，129，and Log of the *Prince of Wales*.

[39] *Blockade of Brest*，ii.356 n.；*Life of Collingwood*，95.

第十九章 回归攻势 [1]

战役的形势发生了转变。在英国与法国的角斗中，英国再次掌握了主动权。用军事术语来说，“攻势回归”已经出现。现在轮到英国来发起攻击，法国则被迫退回防御。这是皮特自其上任之始就悄然谋划的态势，拿破仑却从未料到这种情况。正如我们所知，他最终选择用一场堪称其军事生涯之巅峰的辉煌战役来应对这种局面，但在一开始，他却顽固而迟缓地拒绝承认这一点。他的自尊和威望受到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他用浮夸的想法来维系的心理平衡也被打乱。天命的眷顾似乎背他而去，但出于逆反心理，他拒绝承认皮特已经将他挫败。他竭力抵制着不光彩的真相，这样的狂热足足持续了三周——也正是纳尔逊上岸休假的同一时间。最终，他还得要面对这一切。他发现欧洲就像一个在他脚下蠢蠢欲动的弹药库，皮特并未如他料想那般退缩，反而偷偷伸出了一根试图将其引爆的火绳杆。随后，拿破仑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姿态。为了尽全力掐灭那阴险的导火索，他只得牺牲了舰队。这就是对我们将要追索的戏剧性结论的简要概括。

迟至8月22日，拿破仑才得知联合舰队已驶出拉科鲁尼亚，他也由此得知，自己对维尔纳夫无理拖延的激烈谴责并无依据。他再一次乐观了起来——或者说，是准备孤注一掷。他固执地相信维尔纳夫仍有可能前往布雷斯特，便向冈托姆打出信号，令他禁止维尔纳夫驶入港口装载物资。冈托姆则应在维尔纳夫打出信号后立即出海，整支联合舰队应在他的指挥之下立即驶向英吉利海峡。与此同时，拿破仑还让德克雷通知维尔纳夫，如果他真的去了加迪斯，他就应当立即装上可供使用两个月的给养物资尽早驶向北方，不许有一刻的延迟。

这些对策当然毫无成功的希望，但在此时，拿破仑已发觉了皮特伸出的火绳杆。此前，他毫不怀疑他那气势汹汹的威胁足以震慑俄国和奥地利；但在此刻，他得到的消息却称克雷格与6000名士兵已经抵达马耳他，并与那不勒斯和科孚岛的两位俄国将领保持着密切联系。尽管这支兵力微不足道，但它对拿破仑的重要性却不能用人数来衡量。这使得他开始意识到奥地利此次动员的严重性——他本来期望这次也能如年初一样，在他提出要求后就立即停止。很显然，他必须采取其他措施来加强他的威胁。对于俄国向普鲁士的施压，他已决定以汉诺威为代价换取普鲁士的支持。由于维尔纳夫的来信使得整个局势如此难以预料，他决定让普鲁士立刻做出答复。[2] 就在维尔纳夫信件抵达的同一天，拿破仑向他的外交官发出了一则强横的指令，让普鲁士国王马上做出抉择。他让驻普鲁士大使告诉国王，如果其接受了他提出的条件，这就能吓阻俄国和奥地利，使他能腾出手来继续执行海上战争，而这就是他满意的结果。但留给国王应允的时间只有14天。一旦他解散了海滨大营，一切就再难回头：虽然他的海上战争计划将会失败，但普鲁士也会失去这份报酬。[3]

不管英国的陆军行动与这个冷酷的外交举动有多大关联，这显然令拿破仑感到了某些不安。腓特烈大王和老皮特曾经深知，一支远征军往往能拥有远远超出其自身兵力的扰乱能力。现在，这条旧日的法则开始生效了。克雷格的远征军足以在拿破仑最薄弱之处夺下一处立足点，而在这支小小的前卫背后还有什么计划却没人能说得清。贝尔德远征军正在此时起航向南驶去，拿破仑并不知道他的目的地。不仅如此，在7月底，皮特已经按照他父亲的计划，开始筹建一支兵力强大得多的预备军，“既可作为威慑，也可以攻击敌人或者他们的海外领地”。卡斯尔雷认为，这支军队可能由3.5万名步兵和1万名骑兵组成。与此同时，在保障本土防卫的前提下，全副武装的1万名士兵将会集结在朴次茅斯或科克港附近，充分保证其装备与补给，以准备随时登船出击。[4]

这个把戏并不新鲜。拿破仑自己也曾用马尔蒙的军团与荷兰运输船在泰瑟尔施展这种诡计，他非常清楚这种难以忽视的扰乱能力。在向柏林发出那则强横指令的第二天，他向塔列朗写道："塔列朗先生，在考虑欧洲局势时，我越发感到我们迫切需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其实，我已经丝毫不指望奥地利的解释了。它只会用好听的说辞争取时间，阻止我在这个冬天采取行动……到4月，我将在波兰面对俄国的10万大军，他们将由英国提供装备、战马和火炮；在马耳他，有1.5万～2万人的英军，在科孚岛还有1.5万人的俄军。到那时，我将陷入艰难的处境。现在，我已经做出了决定。"[5]

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着——或者说，假装坚持着——维尔纳夫将于最后关头出现在布雷斯特的希望。拿破仑在这封信中继续写道："如果他要执行他的指令与布雷斯特舰队会合，然后驶入海峡，他仍有时间；那么，我就将成为英格兰的主人。相反，如果我的海军将领犹豫不前……我就只能等到冬天让船队直接渡海。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处境将最为紧迫。我将让第三营接替野战营进驻营地，使我在布洛涅仍能保持一支足够可畏的大军。"[6] 最后，他让塔列朗起草一份向奥地利宣战的檄文，但暂时不要发出。拿破仑想把它藏到最后一刻，以此获得领先敌人的两周时间。

事实上，这是由于他收到了来自德克雷的强烈抗议，后者认为联合舰队不可能出现在布雷斯特。憔悴的海军大臣毫不怀疑维尔纳夫将前往加迪斯，同时，他完全不能接受拿破仑让它们与加迪斯和卡塔赫纳的西班牙舰队会合然后折返北方的命令。他被主上的轻率所激怒，甚至就自己那凄惨职责的意义提出抗议：

> 陛下，我恳求您不要让西班牙战舰再编入您的舰队……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境遇能比我更加痛苦。我恳请陛下考虑到，我并没有私人动机，全都是为了您的旗帜和荣誉。如果您的舰队去了加迪斯，我恳求您将之视为命运的裁决，让您能够用它执行其他的行动。我恳求您不要让它从加迪斯驶回英吉利海峡……最重要的是，我恳求您不要命令

> 它仅仅装上两个月的给养物资就试图出航。我记得，德埃斯坦先生（Monsieur d’Estaing）从加迪斯驶向布雷斯特花了七八十天，也许更长时间。[7] 更重要的是，为了陛下您的海军，我或许要阻止发布这些致命的命令；然而，我的职责又应当强烈支持这一命令。如果将要这样，我会比之前更加成功！然而，拥有航海知识对我来说真是一种不幸，我无法用它对陛下您的计划造成影响，它则让我对此毫无信心。是的，陛下，我的职位实在太令人痛苦了。我责备自己无法说服您，但似乎任何人都无法说服您。我恳求您为海军行动成立一个讨论会，成立一个海军参谋部，那或许更适合于您。一位在海军的各个方面都对您言听计从的海军大臣势必无法正常地履职，即使不变得有害，也无法对您军队的荣誉做出任何贡献。

这是一封如此忠诚、如此明智而又如此令人心碎的信，即便是拿破仑也无法置之不理。或许就是这封信最终扭转了拿破仑重大的战略布局。第二天，他向贝尔蒂埃元帅发去了攻向维也纳的进军路线；8月25日，拿破仑告诉塔列朗，关于侵英计划的一切都已终结。截至此时，他并未将失败归咎于维尔纳夫，而是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在军事和政治局势方面的误判：“我从未料到奥地利人竟是如此顽固，不过，我在一生中常常犯下错误，我并不会因此而感到羞愧。”[8]

尽管拿破仑的兵锋已转向东方，但他本人仍旧固守在布洛涅。他必须隐藏这些行动，必须在奥地利起疑之前赢得领先敌人的两周时间，也需要保障后方的安全。最后，他还必须面对英国不再处于防守姿态的事实。它的军队已经能自由地发起攻击；为了改变进军方向，他必须严肃地重视这一点。

贝尔蒂埃在8月26日收到了进军的命令。次日，拿破仑让塔列朗将英国陆军的情况划入其海军情报部门的职能范围。该部门的长官应当“随时保有一个情报箱，里面分门别类地记录着英国陆军的所有行动，包括炮兵，还有将领和参谋人员的驻地”。一旦准备妥当，其就应该发来一套副本供他自己使用。[9]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拿破仑对英军的动向相当关切。他在布洛涅部署了防御部队，以防英军为了摧毁运兵船

队而登陆发动突袭。他还命令马尔蒙在率军东进之前必须向荷兰人确保，一旦他们在法军离开后遭到来自海上的攻击，他的军队会迅速折返以提供防御。拿破仑还告诉刚刚被派去柏林、强迫普鲁士国王做出决定的特使杜洛克（Durco），他其实并不在乎是否让出汉诺威。如果普鲁士拒绝了提议，他就将在哈默尔恩（Hameln）部署3000人的卫戍部队，希望用它来牵制前来围攻的3万～4万名的英军士兵——他意味深长地说："腓特烈从布拉格打到罗斯巴赫（Rosbach）并没花多长时间。[10]"[11]他估计英国能动用的兵力是4万人，刚好和卡斯尔雷提出的数字相一致。[12]他显然认为英军的战斗力相对低下，因此只在布洛涅留下了2.5万人的防御兵力，再加上将运兵船队的水手编成军团所需的军官。他告诉贝尔蒂埃："如果英军兵力低于4万人，他们就无法取得任何战果。"[13]

就在拿破仑全神贯注准备出击时，他从伦敦的间谍处首次听说了康沃利斯分散舰队的消息，随即开始大发雷霆。在他不希望英国舰队集结时，他没能将它们分散；而在他最不希望英国舰队分散时，他又没能迫使英军保持集结。他发现，他被自己所鄙视的水兵耍得团团转，而他唯一的排遣方法就是称他们为奇蠢的笨蛋，并自欺欺人地把所有错误归咎于维尔纳夫错过了这个大好时机。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如果维尔纳夫在抵达费罗尔后如拿破仑希望的那样立即北上，他就会一头撞上集结起来的英国舰队；如果他在英国舰队分兵之后北上，成功地躲过英军驶入海峡，他就会发现大军已经离开了布洛涅大营。事实上，在拿破仑得知维尔纳夫驶入加迪斯的两天之前，他就已经遣散了运兵船队；而早在一周之前，他就已经决定在奥地利完成战备前发动攻击。维尔纳夫能否出现在布雷斯特，与这一切已毫无关系。

直到9月1日，拿破仑才接到了维尔纳夫驶入加迪斯的消息。[14]在同一天夜里，"欧律阿罗斯"号正在怀特岛以西的针礁（Needles）附近全速航行。布莱克伍德携带着他的情报，花了十天便从圣文森特角赶到这

里。为了不浪费任何时间，他在索伦特海峡外侧跳下了巡航舰，随后在利明顿（Lymington）登岸，坐上一架四轮马车彻夜疾驰。第二天清晨，他顺道在默顿（Merton）叫醒了在此休假的纳尔逊，将令人激动的消息告知他，随后继续向海军部狂飙而去。[15]

对英国政府而言，布莱克伍德带来的情报无疑终结了此前的紧张焦虑。他们不仅得知维尔纳夫正在加迪斯，还得到了拿破仑尚不知晓的、考尔德已经完成封锁的消息。值得再次说明的是，让英国政府焦虑的并不是法军的入侵计划，而是驶向本土的商船队和即将出发的远征军遭到袭击。集结于费罗尔的敌舰队使他们面临着急迫的威胁，而维尔纳夫在完成补给前从拉科鲁尼亚仓促出航更极大地加深了他们的担心。向西驶去的联合舰队直接威胁着一支东印度商船队，即便躲过此劫，它也可能成为阿勒芒舰队的目标。这支船队在本土引起了超乎寻常的焦虑。这不仅是由于它运输着价值极高的货品，更是因为提供护航的64炮战列舰“三叉戟”号（Trident）上搭乘着两位不容损失的重要人物。其中一位是东印度舰队的前任司令官雷尼尔将军，爱德华·佩留爵士刚刚接替了他的指挥权；另一位更重要的乘客则是阿瑟·韦尔斯利爵士，他在起程前已结束了辉煌的马拉塔（Mahrattas）战役，消除了法国扰乱印度的所有威胁。这支船队已经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St.Helena）收到了秘密航线，但威胁并未因此而消解。[16]

如果法军夺取了这支无价的商船队，英国不仅将失去一位杰出的陆军将领，国家财政也会遭到灾难性的打击。商业利益与国民士气都一致要求，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它的安全。8月27日，在尚无证据表明拿破仑已放弃其侵英计划时，焦虑万分的海军部向康沃利斯发出了指令：如果他的兵力足够强大，他就应派出一支由4～5艘战列舰组成的分舰队到锡利群岛西南偏西约100里格处接应被威胁的船队。考尔德此前已经接到指示，如果他发现维尔纳夫和阿勒芒要以商船队为目标，他就应当担负起掩护职责。发给康沃利斯的新指令则要求道，如果这支分舰队发现

考尔德在附近执行掩护任务，它就应当考虑与之会合。[17]

目前亟待解决的疑问就是联合舰队的真正目标和它的下落。当纳尔逊抵达伦敦时，这就是大臣们急切地前来咨询的问题。8月19日夜间，纳尔逊踏上了英国的土地。此时的他正在担心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在他看来，自己没能完成任务，中了敌人的诡计。但他很快就安下了心。他的英勇冲刺拯救了西印度群岛，并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尼罗河口与哥本哈根的那位英雄的所有热情。他在朴次茅斯受到了热烈欢迎，而当他抵达伦敦时，更受到了无边无际的崇拜与美誉。过分的谀美使得一些清醒的人士感到有必要提出抗议。《海军记事》（*Naval Chronicle* ）的编辑这样写道："如果疯狂的入侵行动真的发生，而尼罗河口之战的英雄就在我国海岸，公众将会因此而感到更加安全。但让我们十分痛惜的是，错误的认识与过高的公共声望正要把纳尔逊勋爵塑造成另一尊'半人半神'，这将损害其他所有海军军官，其中不少人与这位高尚的将军有着同样的功劳、同样的才干与同样的勇敢。"[18]

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那股潮流。群众、城市和大臣们全都被卷入其中，纳尔逊也不无反感地发现，自己被当成了一位魔法师——尽管他的确拥有德雷克传说中的那面魔镜，能用它看到"敌舰曾做出的所有动作，清点他们的兵员"。8月23日，他在抵达伦敦的第一天就见到了卡斯尔雷和皮特，他发现他们"满脑子都是敌舰队"，正指望他说出敌人的下落。第二天，他向他最为亲信的幕僚、与他一同上岸休整的"华丽"号舰长济慈写道："我现在被当成了一个巫师，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发觉我根本就不是。他们向我提出一些我不愿回答的问题，如果我猜错了一点，我的魔法就会全部消失。"

巴勒姆独自远离着喧嚣。两位伟大的水兵几乎互不相识，但在海军大臣那冷静坚毅的头脑中，肯定有什么东西抵触着纳尔逊那浓墨重彩的天才。或许，巴勒姆也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把纳尔逊看成了一个装腔作

势的家伙。他的大部分成就似乎都源于虚荣心作祟，而从表面看来，他那冲动的性格更让人无法在危急关头加以信赖。毫无疑问，此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应当让谁出任地中海舰队的指挥官，此时的地中海已然成为海军利益的核心所在。经验丰富的纳尔逊是自然的人选，但巴勒姆——同纳尔逊本人一样——仍怀疑他近来的表现是否思虑周全。在这位民族英雄刚刚踏上陆地时，巴勒姆就向他提出了上交日志的冷酷要求。纳尔逊申辩道，他从不知道一位舰队总司令还要上交这种东西。好在他随身保留着一份日志，其中有大追击过程中两段时间的记录。他将此提交了上去，很快就收到了回复。一个最为权威的声音告诉我们："巴勒姆勋爵一收到……纳尔逊勋爵的日志，就仔细地阅读了所有行文，这使海军大臣对这位将军的品格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事后，巴勒姆勋爵大方地承认，他从未如此彻底地赞赏过这种非凡的才能。针对纳尔逊将军近来行动的评论立即被发往内阁，巴勒姆勋爵在其中担保道，纳尔逊应当得到完全的信任，他能力出众，并完全理解其中的政治关系，比任何人都更加适合承担这一职责。"[19]

从这一刻起，英国政府开始坦诚地将纳尔逊视为一个对战争至关重要的人物；在皮特的战争计划中，在地中海展开一场大胆反击的时机也已经成熟。巴勒姆就海军装备问题广泛地征求纳尔逊的建议，这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我们也将看到它在未来装备发展方面的丰硕成果。对于其他内阁大臣而言，纳尔逊的政治智慧也同样可贵。英国与大陆国家的关系仍在不确定中，在纳尔逊登陆的一周前，一位国王的信使从圣彼得堡回到了英国。在上一封信中，列文森-高尔让皮特等待着俄国人批准盟约的好消息，但现在，他只能告诉首相，沙皇仍然犹豫不定。圣彼得堡在马耳他和航海法典问题上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但高尔坚决回绝，甚至不容商议。一位俄国大臣向他暗示道，沙皇有可能重启武装调解；但高尔毫不动摇，他向政府保证道，不含调解条款的盟约在数日内就可能通过。对于奥地利，他的看法甚至更加乐观。奥地利已经向沙皇做出了保证，它决定与俄国同时展开行动，不给拿破仑留下各个击破的时

间。也就是说，奥地利已经制定好了与俄国联合作战的战役方案。他们向高尔传达了这一部署：5.5万名俄国士兵将在8月中旬进入加利西亚（Galicia），然后在两个月里与奥军会师于巴伐利亚（Bavaria）边境。根据计算——事后证明，这是最为可悲的计算——他们将领先拿破仑二十天时间。卡尔大公（Archduke Charles）将出任联军总司令，不受维也纳的妨碍。[20]

这一切都很顺利，但皮特尚未得到能让他继续行动的可靠前提。然而，在纳尔逊抵达伦敦之时，局势终于稳定了下来。高尔如他预料的那样宣布了盟约生效的消息，联合作战已经开始进行。俄军在8月20日开始穿过奥地利，而另一支前往施特拉尔松德的1.6万人的军队也已整装待发。他们请求让位于英国的汉诺威军队也加入行动，并让英国政府尽快与瑞典达成关于补贴金额的协定。[21]

显然，在法国的另一侧展开猛烈攻势的时机已经来临。不幸的是，意大利南部局势仍然很不稳定，但纳尔逊对此的深入了解却堪称英方的天赐福音。目前的困难在于，英国本土还并不知晓艾略特与俄国将领商定的联合方案，甚至不知道克雷格是否抵达了马耳他。[22] 艾略特发来的最后消息是，巴黎派来了一位残暴无情的特使，试图威逼那不勒斯王室承认拿破仑的新头衔。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退缩，而莱西——那位俄国将军——希望立即将他的部队转移到科孚岛去。他已经向克雷格急迫地提出了联合作战的要求，但尚未得到任何回应。[23]

拿破仑的暴力威胁很可能让那不勒斯放弃那微弱的抵抗。如果克雷格如期抵达，他很可能要被迫从那不勒斯手中夺取墨西拿，从而保住对英国至关重要的西西里。纳尔逊曾长期呼吁派部队来应对不测的局面，现在的他焦急地想知道克雷格将如何行动，但卡斯尔雷却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纳尔逊向亚历山大·波尔写道："他就像一个念叨着要做好事的布道牧师，所以大臣们都说我们的部队会为国家利益做贡献。"在如此

模糊不清的局势中，纳尔逊仍坚持着他一贯的看法，认为保卫撒丁岛是破解难题的关键。只要他拥有撒丁岛作为基地，他就能保证西西里的安全。[24]

他的意见得到了尊重，事实上，英国政府已经拨出了4万英镑用于在必要时组织撒丁军队。但核心问题很快又转到了另一方面。9月1日，列文森-高尔发来了另一份报告，称奥地利已经派出一位全权代表来签署同盟条约，却在细节问题上屡屡发难。由于对北意大利的胃口没能得到满足，奥地利决定在最终的欧洲秩序方案中加入恢复撒丁王国的特别条款。它仍试图在开战之前进行一次和平斡旋，尽管俄国最近的调解尝试已经失败，同时它还希望皮特能立即开始支付陆军补贴。高尔自然拒绝了这些提议，他向马尔格雷夫警告道，奥地利宫廷是如此软弱和优柔寡断，即便它在某些积极的时刻被迫做出保证，它也仍然不值得信赖。奥地利提出的作战方案同样无法让人满意。它希望将主力部队用于北意大利，并要求克雷格与莱西的部队也加入其中。对英国来说，这是一个不容商量的问题。这一方案将剥夺克雷格发起两栖作战的能力，而其恰恰是这支远征军最具价值的能力；此外，它还会危及西西里的安全。于是，高尔再次回绝了提议。[25]

在同一个邮包里，高尔还发来了俄国胁迫普鲁士参战的行动细节和俄方在北欧地区提出的新要求。高尔写道："他们试图用这种行动的好处来说服我。如果我们在英国海岸做出展开行动的姿态，在唐斯集结运输船，再把部队调动到海边，这就会极大地加剧波拿巴的不安。"他们希望英国军队能在战役开始后在易北河口（Elbe）登陆。[26]

这些方案对皮特毫无吸引力。它们的时机尚未成熟，他不希望在局势仍十分危险时被卷入这些超出其兵力所及的冒险。事实上，这些计划在总体作战方案中也并未得到认真的对待。这项工作由奥地利的马克将军[27]组建的联合军事委员会来负责。马克在军事管理方面有着良好声

誉，但他并不是一个能加强互信的角色，结果，委员会提出的部署建议全都带有强烈的有利于己方的色彩。因此，皮特毫不犹豫地支持了高尔的反对态度。马尔格雷夫在回信中写道："这些提议和行动计划将对我们在战役开始时的进攻造成诸多困难，使我们无法有条理地展开主动而积极的行动。"对于俄国提出的特殊要求，他答复道，英国已准备好为每一名士兵提供补贴，但在主要行动充分开展之前，派兵到易北河和威悉河口（Weser）与瑞典和俄国联合作战对战争并无帮助。这当然是严格遵照着那条原则：只有纯粹的跨海远征才能对大陆战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28]

我们并不知道纳尔逊在反法同盟的总体格局上贡献了多少意见。但有一项贡献特别值得一提。在1798年，他曾与被派来指挥那不勒斯军队的马克将军相识，并深信由其负责的行动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尽管政府并未就此征求他的意见，他还是尽力通过老友克拉伦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威廉·亨利[29]提出了毫不客气的警告。根据记载，他说："如果公爵殿下与政府有任何联系，请别让马克将军得到那份工作，据我所知，他是个流氓、骗子、懦夫。"[30]出于对国外政治的特别兴趣，他可能还提出了其他的建议。他那位诚实的神父曾告诉我们："没有一位大臣能听懂他养成的口音。"的确，他自己也承认他只有极少的时间待在英国，伦敦更是只去过四次，而且绝大部分发言都围绕着海军事务。[31]但与他同时代的传记作者曾指出，"他拜访了许多部门，向大臣们介绍了主要在地中海暴露出的威胁。错误的政策被坚持了如此长的时间，鉴于目前的政治局势，欧洲很可能会发生一些大事和一些改变"。[32]威灵顿公爵有关两人在卡斯尔雷会客厅里那次交谈的著名记述也能证实这一点。在安全回国的"印度将军"（Sepoy General）前来报到时，纳尔逊也在此等着与卡斯尔雷告辞。起初，威灵顿也像巴勒姆那样对纳尔逊自负的言辞产生了反感："如此虚荣，如此可笑，这让我感到惊讶，甚至感到厌恶。"然而，当纳尔逊弄清楚他的身份之后，威灵顿的看法也随之改变，他说："接着，他谈到了我国的现状和欧陆事务的形势与未

来。他有着高明的见识，对国内外各方面都有了解，这让我同样感到惊讶……事实上，他就像一位官员，一位政治家。”[33]

我们很想知道，纳尔逊到底表露了什么想法，能给这位伟大的将军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没准，他们谈到的就是皮特正在酝酿并将由威灵顿收获其最终成果的那个战略。从大海上向拿破仑的薄弱处发起攻击，这是纳尔逊早已熟知，也是他最为喜爱的观念。好几年前，他曾就此与一位著名的法国革命军将领展开讨论。流亡的迪穆里埃将军后来在英国政府中出任本土防御顾问，同时仍在寻找机会，恢复自己被毁的生涯。正是他献出了这些赢得衷心赞叹的计策，而当他看到纳尔逊即将要执行自己的计策、执行皮特的地中海反击计划时，这位已被遗忘的将军重新燃起了与自己的最新继承者一决高下的希望。迪穆里埃向纳尔逊写道：“我一直都想和你在意大利合作。在欧陆战争的这个时刻，我唯一希望的就是请您建议您的大臣，让我指挥一支意大利人或奥地利人的外国军队，穿过意大利中部，向那个科西嘉暴发户发起攻击。”为此，他已经向维也纳提交了一份作战方案。“如果我能指挥一个师，我们就将共同实现我们首次在汉堡会面时制订的计划，共同对抗那个我们深恶痛绝的野蛮篡位者。”[34]

在纳尔逊前往默顿享受假期时，他的头脑却无法忘怀这一切。自他第一次见到皮特起，他已经意识到，皮特可能随时会将他召回岗位。[35] 但在维尔纳夫舰队的位置尚未确定、局势尚不明朗之时，他只能随时等待传唤。他和他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胡德勋爵（Lord Hood）在8月26日对他说，他认为维尔纳夫肯定是去了地中海或加迪斯，因此他一定会再次出海。[36] 在8月的最后一周，海军的形势同政治局势一样高度紧张。但纳尔逊始终对大规模召集令保持着警觉，他的注意力从未被次要因素吸引开。8月29日，他在回绝一次召集令时说道：“他们命令所有战舰——甚至是‘胜利’号——都驶入大海，这都是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费罗尔舰队到底去了北方还是去了地中海，或者是在

大海上搜寻我们宝贵的商船队。”在同一天中另一个场合，他再次表达了相同的疑虑：“我的时机和行动都必须取决于波拿巴。我们目前尚不知道他的真正意愿。”[37]

四天之后，布莱克伍德为他带来了廓清迷雾的重要消息。纳尔逊立即动身，紧随其后前往伦敦，发现所有人都因压力减轻而兴奋不已。老水兵拉德斯托克勋爵（Lord Radstock）向他写道：“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千千万万次！这些鬼火终于回老家了，再也不能做可怕的恶作剧了。报纸告诉我们，你将很快展开追击。”[38]

这个时刻终于到来，这正是他等待已久的召唤。在布莱克伍德的马车抵达白厅后，海军部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截下“胜利”号——这也许是纳尔逊提出的第一个要求。[39] 第二道命令是发给康沃利斯的，它要求撤销之前那道让克顿接替考尔德的指令。在接下来的一天中，海军部发出了一系列关键的命令，我们只需看其中一道就能明白当时的紧张局面：用于增援纳尔逊的战舰人手不足，海军部向所有港口的指挥官发出指示，要从回国的商船队里强行征募海员。第二天，一切似乎沉静了下来。或许，这是由于在布莱克伍德带来那则关键消息的同时，海军部也收到了一批最新报告，称布洛涅大营已开始解散。战役的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一个崭新的阶段已经开始。巴勒姆用整整一天时间起草着一系列非凡的指令，用于应对这个新局面。这些命令在次日全部完成。[40] 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探讨它们的要旨，而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指出，当纳尔逊接到他的命令时，他发现其中的内容完全印证了我们曾介绍过的巴勒姆的态度转变。地中海舰队防区的西端再次恢复到了传统的圣文森特角，而“基于对他的能力和热情的信赖”，巴勒姆为他赋予了依照意愿来部署舰队的充分自主权。事实上，纳尔逊只受到两项条款的约束：他应当防止敌舰队驶入大海，同时还要保护地中海的商船队。[41]

在陆军方面，尽管目前的行动计划仍然无法确定，但前景已逐渐明

朗了起来。在布莱克伍德抵达的第二天，海军部接到了来自比克顿的报告，称他曾看到克雷格的远征军安全地驶过博纳角（Cape Bona）[42]。9月5日，英国政府接到了驻维也纳大使亚瑟·佩吉特爵士（Sir Arthur Paget）发来的两封急件。佩吉特在第一封信中满是绝望，因为奥地利坚持在开战前进行调解。但他又在第二封信中宣布，奥地利外交大臣科本茨尔（Cobenzl）刚刚告诉自己，他向拿破仑提出要求时采用的措辞将让战争无可避免。[43]正在此时，他们又收到艾略特从那不勒斯发来的信。他说，傲慢的法国特使已经递交了拿破仑的苛刻通牒，那不勒斯王后对此已无能为力。形势看起来即将发生变化，而急于开战的俄国人对于克雷格的毫无音讯愈发不满。不过，希望仍然存在。奥地利态度的变化使圣西尔无法得到任何增援，艾略特则让俄国人与“卓越”号的索泽伦舰长（Captain Sotheron）保持联系，以此竭力缓解他们的烦躁不安。[44]

危机显然已刻不容缓，他们立即展开行动。克雷格无疑已抵达马耳他，到此时他肯定也已与莱西将军取得了联系。第二天，海军部命令直布罗陀的所有运输船向马耳他驶去。[45]

在同一天，他们还收到了关于法军放弃入侵的最为确切的证据。武装快艇“信使”号（Courier）截住了法国纵帆船“特雷波尔”号（Tréport），后者在9月2日刚刚驶出布洛涅。法国船长承认，运兵船队正在解散，陆军部队在六天之前就“因为与俄国的新战争”而开往内陆。据他说，拿破仑在他出港时仍然待在布洛涅，但应该会在一两天之内动身离开。“特雷波尔”号所属的运兵船分队也已开始将船上的补给与弹药搬回岸上。[46]

从此时开始，英国的战争前线和行动重心已转移到了地中海地区，而纳尔逊则成了其中的关键。这一职责使他得到了诸多奉承，但他本人对此却并不乐观。9月6日，他向好友戴维森（Davidson）写道：“我希望我能尽早出现在敌人阵前，希望能尽早用一支足以圆满完成任务的舰

队与敌人相遇，一场残缺的胜利并不会让我感到满意。但我并不认为海军部将要派给我的兵力足以歼灭15～16艘敌方战列舰……但我会尽我所能，希望上帝与我同在。我可以牺牲的很多，可以得到的却很少。但这是我应当要做的；我会竭诚为国效力。”在长期的身心劳损后，他只享受了略超过一周时间的短暂休息，面前的局势又是如此严峻。他清楚地知道，如何击败敌军并不成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诱使或迫使敌军投入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如果他不能做到，他就只能率领封锁舰队在港外度过又一个漫长的冬季。

这个问题是纳尔逊要面对的当务之急。在他与卡斯尔雷的最后一次会面中——也就是与威灵顿那次谈话之后——他们讨论了用陆军部队迫使维尔纳夫出动的可行性。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建议到底是来自纳尔逊、卡斯尔雷还是韦尔斯利。卡斯尔雷在一封信中暗示纳尔逊认可这个策略，他明确指出，纳尔逊没有要求陆军支援的唯一原因是他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太迟，难以在年内采取行动。[47]

如果想用海军的单方面努力让敌人投入战斗，唯一有把握的办法就是在某一段时间内保持兵力劣势。但是，劣势兵力很难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这无法解决进行决定性战斗的首要难题。对于这个替代方案，纳尔逊只得做出妥协。他得准备尽可能地隐藏他的兵力规模，诱使维尔纳夫主动出击。9月11日，他花了一整天时间在海军部制定作为地中海舰队总司令所需的命令。12日，他告辞了皮特和卡斯尔雷，之后在默顿待了最后一天，于当夜启程前往斯皮特黑德。次日一早，他在朴次茅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部分缓解了压在他心头的焦虑。清晨时分，他登上“胜利”号，再次升起他的将旗。两位海军部大臣——坎宁（Canning）和罗斯（Rose）——前来为他送行。[48] 他们在旗舰上举行了饯行宴会，之后，纳尔逊打出了起锚的命令。他对面前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丝毫不抱幻想。但与此同时，拿破仑却如有默契一般，起草了一道正中纳尔逊下怀的命令。这道命令将替他解决这个难题，把维尔

纳夫送到他的手里。

事实就是如此，命运似乎有意让它推动的灾难发生，让这场战役具有如此之强的戏剧性。8月30日，在滨海大营的一片废墟中，法国皇帝签署了解散运兵船队的法令。第二天，留意着英国陆军的他忙碌地部署着部队，以防英军从海上发起突袭。在这时，他肯定已经接到了维尔纳夫从加迪斯发来的信。9月1日，遵照拿破仑的指示，德克雷向维尔纳夫发出了应对战役新局势的新命令。他在命令中写道："陛下希望让他的舰队和盟友在安达卢西亚海岸与直布罗陀海峡周边的舰队集结起来，以得到36艘战列舰；他认为，这将使敌人不可能用相等的兵力与你对抗。据说英国此时正在筹备一支商船队和几支远征军，据推测，他们可能要前往地中海。陛下希望你采取一切适当的预防措施，在远征军接近的时候提前得到预警，然后将之歼灭。"[49]

由此看来，拿破仑一定听说了关于科克港的贝尔德远征军的消息。这加剧了他的不安，但截至此时，他还并不想为此展开任何大规模的舰队行动或海上战役。在德克雷向维尔纳夫起草新命令的同时，拿破仑正在构思一个运用其海军部队的新方案：他打算将海军重组为数支游猎舰队，并去摧毁敌人的海上贸易。除了三支巡洋舰队，他还准备将战列舰部队一分为七——布雷斯特舰队划分为三支舰队，加迪斯舰队划分为四支舰队——这总共要动用30艘战列舰与11艘巡航舰。[50]

怀揣着这个并不理想的计划，拿破仑于次日启程前往巴黎。他苦闷地思考着入侵失败对他的声望造成的打击，盘算着如何用一场大规模战役来恢复他的名誉。与此同时，他对维尔纳夫的愤怒也愈发炽烈。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最终让自己相信，这场惨败全都是因为维尔纳夫，全都是维尔纳夫一个人的问题。9月13日，当纳尔逊在默顿享受着最后的安宁时，拿破仑着手编造他关于侵英行动的著名神话——这一神话至今仍未失去多少生命力。

他是这样写的："我本想让土伦、加迪斯、费罗尔和布雷斯特的舰队前往马提尼克的一处港口，集结起40～50艘战列舰（事实上他从未准备让费罗尔舰队前往那里），再让他们突然返回布洛涅，使我在两周时间内拥有制海权（这个时间之前多次变化，从几个小时到四天不等）；我在这片海滩驻扎了15万名士兵和1万匹战马（其实际兵力从未超过此数的三分之二），当我的舰队出现时，他们就能立即登陆英格兰，夺取伦敦和泰晤士河。但这个计划失败了。如果维尔纳夫将军没有进入费罗尔（他的确没有），而是让西班牙舰队出港会合（港内也是法西联合舰队，而且风向也使它们难以很快出港），再去布雷斯特让冈托姆将军加入他们的队伍，我的陆军肯定已登陆并征服了英国。"其实他早已清楚地知道，如果维尔纳夫的给养足以使其执行这种行动，法军就会在布雷斯特港外一头撞上集结完毕、严阵以待的英军。接着，他又试图去解释自己当初认为用武装运兵船队可以独自渡海的错误。据他说，尽管武装运兵船完全没有用，但如果大量征用无武装的普通运输船，英国人就会立即看穿他让战列舰队驶入海峡的计略。组建并武装船队的高昂代价仅仅是为了骗过敌人，使他们忽视真正的危险来源，这一计策取得了成功。拿破仑恬不知耻地说："敌人被欺骗了，他们以为我准备用全部由陆军组成的运兵船队作为渡海的主力部队，其实我从未打算这样做。"这种对真实情况的无耻歪曲简直令人咋舌，但对于想象力极丰富的拿破仑，写出这些文字并不比他真的如此认为更值得惊诧。很明显，这只能反映出他对自己威望受损的焦虑。这只是他为了维护脸面而采用的政治宣传，通过把他的所有行动描述为天才之举来糊弄那些易于轻信的人。[51]

这个弥天大谎所掩盖的焦虑在下一封文件里得到了清楚展现。他似乎刚刚从意大利接到有关其大规模行动的右翼受到威胁的消息，这更加剧了他面前的难题。拿破仑很快就放弃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击英国贸易的战役计划，他决定交给联合舰队一个紧迫的新任务，并在第二天向维尔纳夫发出了新的命令。立即发起一次勇敢而迅疾的行动，为此，拿破

仑甚至不允许德克雷把他自己对其的真实看法透露给这位可怜的将军。他再次试图激励起维尔纳夫的斗志与勇气。他要求维尔纳夫无须按照上一则命令配齐六个月所需物资，而应在装载两个月所需的给养之后立即出海，去挽救当前的危局。他仍然拒绝承认自己已退回防守姿态：

> 我已决定做出一个重大决策，准备让我国集结于加迪斯港的海军部队与西班牙国王的海军部队一齐驶入地中海。我们要向你传达的意图是，一旦你接到这则命令，你就要抓住最早的有利时机让联合舰队出航，然后驶入地中海。……你应首先驶向卡塔赫纳，让港内的西班牙舰队加入你们；然后驶向那不勒斯，将舰队搭乘的陆军部队卸载于某处海岸，让他们加入圣西尔将军指挥的军队。如果你在那不勒斯发现有任何英国或俄国的军舰，你就应捕获它们。舰队待在那不勒斯海岸的时间应由你自己判断，总之要对敌人造成最大的损害。你还应截击敌人准备从马耳他派出的远征军。我们希望，不管你在哪里遇到敌人，只要他们处于兵力劣势，你就应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力求决定性的胜利。只要你及时出航，它们就不会离你而去；这些行动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你能否及时驶出加迪斯。[52]

在拿破仑对圣西尔将军与马耳他远征军的忧虑中，我们得以看到这场战役剩余部分的关键所在。在这些忧虑中，我们可以看到，皮特是如何用一支弱小的远征军迫使拿破仑向纳尔逊献出他自己的舰队。法皇在第二天再次致信德克雷，他不加掩饰地写道，新命令的首要目标就是应对克雷格的远征军，并要防止在地中海再出现其他类似的情况。这场行动在他眼里是如此重要，经过一天的反复盘算，他确信绝不能冒险让胆怯的维尔纳夫执行这次任务，他必须换上一位更有斗志的军官。被他选中的是罗西利将军——其最初是接替密歇希的人选。拿破仑让德克雷命令他启程前往加迪斯，如果舰队没有出航，他就应当接掌指挥权。[53]

就这样，皮特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传统计略再次发生了奇迹。这个计略完全依仗着战略法则的力量，其意图也从未得到阐明。虽然纳尔逊并未暗示可能用它解决难题，但在德克雷为罗西利起草命令的时刻，它的确发生了效力。此时，纳尔逊正同布莱克伍德与两艘从普利茅斯加入他们的战列舰一道驶出英吉利海峡。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死敌已

向他奉上了此生中最为荣耀的桂冠。

---

[1] 本章可参见彩插中的图示5。

[2] 这两个事件间的联系只是一种推测，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拿破仑得知克雷格抵达马耳他的准确时间。克雷格抵达于7月19日，那不勒斯的艾略特得知这一消息是在8月1日（Auriol，i.387）。8月8日，法国驻柏林大使提出了出让汉诺威的议题。圣西尔在8月15日提到了这一事件，但他肯定在更早的时间接到了消息（Ibid.，318）。拿破仑首次提到这件事是在8月19日命令增援圣西尔之时。

[3] To Talleyrand，Aug.22nd：*Corresponiance*，xi.107.

[4] *Correspondence of Castlereagh.* To the Duke of York，July 26th，vol.ii，p.6.

[5] *Correspondance*，xi.117，Aug.23rd.

[6] 在1805年，大多数法国陆军军团（regiment）由三个营组成，前两个营为野战营，第三营则在后方作为补充和整训营。在这里，拿破仑计划将在布洛涅驻扎的各军团野战营投入对俄奥的作战，同时让各个军团的第三营作为预备队进驻大军团营地。参见Frederick C.Schneid，*Napoleon’s Conquest of Europe*：*The War of the Third Coalition*（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2005），p.116。——译者注

[7] August 22nd，Desbrière，iv.814.这里提到的是1780年秋法国与西班牙舰队大规模但并不成功地集结于加迪斯港的情况。德埃斯坦在11月6日出航，到1781年1月3日才下锚于布雷斯特。他在圣文森特角花了一段时间进行巡航，实际用在驶向布雷斯特的时间是58天。参见Lacour-Gayet，*Marine tout Louis XVI.*，p.322。

[8] *Correspondance*，xi.134.

[9] *Correspondance*，146，Aug.27.

[10] 七年战争时，普鲁士统帅腓特烈二世先在1757年5月6日的布拉格战役中击败从东进逼的奥地利军，后于11月5日的罗斯巴赫战役击败从西进逼的法军。拿破仑暗示道，只要卫戍部队能拖住英军一段时间，法军主力就能在击败俄军、奥军之后回身迎战英军，达成各个击破的目的。——译者注

[11] *Correspondance*，xi.157，Aug.28.

[12] *Castlereagh Correspondence*，ii.6.还有一份与此类似的未署时间的《可用兵力备忘录》（*Memorandum for Moving the Disposable Force*），可参见*Pitt Papers*，Bundle 243。其中显示有4.5万名步兵、6700名炮兵与1.2万名骑兵，按照每人1.5吨位的运输需要，共需要载重量为30.8万吨的运输船。当俄国提出与西班牙和谈时，皮特正在考虑将这支军队用于伊比利亚。

[13] *Correspondance*，xi.169，Aug.29.

[14] To Duroc（Postscript），*Correspondance*，xi.15.

[15] Blackwood to the Admiralty：*Captains' Letters*，1534.这次行动的交通费用，据他的日记记载，是15镑19先令。这是由于远程信号站在夜间和浓雾天气时无法使用。

[16] 4月10日，雷尼尔和韦尔斯利从马德拉斯（Madras）启程，并于6月21日抵达南方大型船队的集结点圣赫勒拿。几艘从中国驶来的商船和捕鲸船在此加入了他们，使其护航队拥有29艘船，价值1500万英镑。根据海军部指令赋予他的自由酌定权，他于7月12日再次出航；在出航前，他强迫所有中立国船只锚定于要塞炮口之下，以防他们发现并泄露其秘密航线。Rainier to Marsden，“Off the Start，Sept.8”：*In-Letters*，176；and *Log of the Trident.*

[17] *Secret Order*； August 27th：*Barham Papers*，iii.279，Aug.28th.

[18] Vol.xiv.157.

[19] Clarke and McArthur，ii.116.档案局收藏了这份日志的副本，其封面附有纳尔逊写给海军部首席秘书威廉·麦斯登（William Marsden）的一封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信：“默顿，1805年8月（原文如此）。你在19日发来了海军部长官所提的要求，作为答复，我会向你提交一份他们需要的日志。我恳求你允许我申辩，此前从来没有要求（或者习惯）让一位舰队总司令向长官们提交行程日志。我并没有为此专门保留的日志，只有一些我率领舰队追击敌人时在不同时段留下的记录，一份从1805年1月19日到3月12日，另一份从4月4日到20日。我将它们附随此信一起交给海军部长官。”

[20] Gower to Mulgrave，July 21st and 22nd，received Aug.12th：*F.O.Russia*，58.Printed by Holland Rose，*Third Coalition*，pp.188-93.

[21] Gower to Mulgrave，July 31st（two despatches），received August 23rd：Ibid.

[22] 直至9月3日，海军部才向内阁通报了比克顿曾看到远征军驶过博纳角（Cape Bona）的消息。*War Office*，i.712.早在8月1日，艾略特已经写下了一份

关于克雷格抵达并与俄军联合行动的报告，并向罗马发出。通过陆路邮递，这封信直到“9月17日夜间”才抵达英国。*Foreign Office*，*Sicily*，25.

[23] Elliot to Mulgrave July 9th and 16th received August 14th and 22nd. *Foreign Office*，*Sicily*，25.

[24] Nelson to Pitt，6 a.m.，Aug.29th，and same to Lord Minto，Aug.31st：Nicolas，vii.20，25.Castlereagh to Nelson，Sept.—：*Castlereagh's Letters and Despatches*，2nd series，i.88.Nelson to Ball，Sept.30th：Nicolas，vii.55.

[25] Gower to Mulgrave，Aug.14th，receired Sept.1st：*F.O.Foreign*，68.Holland Rose，*Third Coalition*，p.197.

[26] Same to same，August 14th：*F.O.Russia*，58.Received September 1st.

[27] 卡尔·马克·冯·莱贝里希（Karl Mack von Leiberich，1752～1828年），奥地利陆军将领。骑兵出身，曾是奥皇约瑟夫二世亲信随从官。1798年起指挥那不勒斯军队，在此与纳尔逊结识。随后因作战失利、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投奔法军避难，两年后以战俘身份遣返。1804年被起用为陆军军需主官，竭力推动陆军改革。1805年成为德意志军团的军需主官，并担任事实上的司令官。10月15日随奥军主力在乌尔姆向法军投降，被释放后参加12月2日的奥斯特利茨会战，再遭惨败。——译者注

[28] Mulgrave to Gower，September 3rd：*F.O.Foreign*，58.

[29] 威廉·亨利（William Henry，1765～1837年），英国王室成员。13岁加入皇家海军，曾参与美国独立战争。1782年与纳尔逊相识，此后两人长期在美洲服役，成为密友。1789年起得到克拉伦斯与圣安德鲁公爵（Duke of Clarence and St Andrews）的封号，1830年登基为英王威廉四世。——译者注

[30] Clarke and McArthur，ii.117.纳尔逊的看法当然也不能太当真。马克是一个从普通士兵中成长起来的将军，至于是由于他的能力还是由于罗利（Ralegh）所说的“大胆的花言巧语”，则有许多看法。英国陆军部倾向于信任他，拿破仑则认为他是个假内行。

[31] To Sir A.Ball，Sept.30th.Nicolas，vii.55.

[32] Clarke and McArthur，ii.117.

[33] Croker，*Diary*，ii.233.

[34] Rose and Broadley：*Dumouriez and the Defence of England*，p.453，Sept.11th，citing *Add.MSS.* 34931，f.100；该书第207页记载了迪穆里埃在1801年

4月20日写给纳尔逊的信："如果你能执掌地中海，我们就能一起将民主暴行逐出意大利和法兰西。"第208～210页还有其他两封信。他在得知维尔纳夫正在拉科鲁尼亚，并误以为考尔德将把他封锁于此之后写下的评估见该书第八章。

[35] 纳尔逊在8月24日写给济慈的信末附言道："你看我的印戳就知道，我还没被任命为舰队总司令。"Nicolas，vii.16.

[36] *Add.MSS.* 34930.

[37] 在8月29日的一份会议纪要里，海军部命令"胜利"号一旦完成出海准备就应加入康沃利斯所部，并通知纳尔逊，"胜利"号不再受他指挥。*Admiralty Minutes*，p.154.

[38] Admiral Lord Radstock to Nelson，September 3rd：*Add.MSS.* 34931.

[39] Admiralty Minutes，154，Sept.2nd.

[40] 9月4日肯定是海军部历史上工作最繁重的时刻之一。当天只有7位"高级书记员"与17位"初级书记员"负责处理所有在役战舰的航线，他们在四天前刚刚提出加薪意愿（*Minutes*，154，Aug.29th）。在7月时，巴勒姆曾试图用印刷的回信格式纸来减轻他们的纸头工作量，其中包括回复命令的信纸与回复书信的信纸，后者包括三个部分：日期、信的主题和结果，例如行动已经结束，或即将采取措施。范例可见*In-Letters*，552，August 2nd and 4th。

[41] *Out-Letters*，1363，Sept.4th.海军部秘书马斯顿在9月6日告诉他，商船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并要求他前去迎接。*Add.MSS.* 34931.

[42] 位于今阿尔及利亚东北海岸，安纳巴（Annaba）城北端。——译者注

[43] Paget to Mulgrave，August 10 and 17，received Sept.5th（at night）：*F.O.Austria*，74.

[44] Elliot to Mulgrave，July 23rd，received Sept.5th（at night）：*F.0.Sicily.* Printed in Auriol，ii.368.

[45] Admiralty *In-Letters*（Secretary of State），4199，Sept.6th.

[46] *Admiralty In-Letters*，552，Sept.5th.这则消息在第二天便转发给了陆军部。*W.O.*（i.），712.顺便一提，这段时间内每一份海军情报都会被尽快转发给陆军部。

[47] Castlereagh to Nelson：*Letters and Despatches*，2nd series，vol.i，p.124.这封信是在纳尔逊战殁的消息传到伦敦之前写下的。

[48] 乔治·坎宁是当时的海军财政主管，罗斯则是海军军需部长兼贸易委员会副主席。

[49] Desbrière，iv.823.

[50] Napoleon to Decrès，Sept.1st：*Correspondence*， xi.170.

[51] 对于此种传说的生命力，可参见Gabriel Darrieu上校的《海上战争》（*La Guerre sur Mer*），1907年出版，第63页。该书写作时，法国方面的参谋战史已在7年前出版，但这位战略学教授仍然引用了拿破仑的这篇文献，还写道：“这是一个伟大战略的范例，其中的原理无可挑剔，这样规模宏伟的计划可以也应当被继承下去。”他全盘接受了拿破仑颠倒的事实和拿破仑对其敌人的忽视，并将巴勒姆的布局视为全凭运气。之后，他更好的判断力和他的专业知识似乎恢复了过来，他随即指出整个计划建立在拿破仑对其敌人的严重忽视之上，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52] Napoleon to Villeneuve，St.Cloud，Sept.11th：*Correspondamx*， xi.196.

[53] To Decrès，Sept.15th，and Rosily’s Instructions，Sept.17th：*Correspondance*， xi.204，217.

第二十章 保障交通线

一切都得到了合理的解决。但是，位置未能确定时的维尔纳夫给英国海军部造成的高度紧张着实是值得吸取的教训。很显然，现有的巡洋舰机制远不够周密、科学，无法满足皮特对欧洲海域实行有效监控的行动需要。在这场战役余下的阶段里，巴勒姆决心与纳尔逊协作，将他的巡洋舰组织成数道警戒线。目前，对于英国海军的情报搜集和贸易保护最为重要的部队是以科克港为基地的巡洋舰队，它的指挥官是德鲁里将军，但他的战略眼光却相当有限，以至于让海军部不断指出他的错误。巡洋舰的舰长们也是如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独自出海执行任务就是享受“一次巡游”，还有机会赢得战功和赏金。这种自由散漫已然让人难以忍受，整个巡洋舰机制正迫切需要高强度的约束和重组。[1]

目前的局势对优化巡洋舰机制颇为有利。法军放弃入侵带来的压力缓解使得基思舰队中大量巡洋舰得以自由调动，同时更为便利的通信手段也开始大规模应用。而纳尔逊无疑与后者颇有关联。海军部秘书巴罗提到，在纳尔逊待在伦敦的最后一天，他正在海军部热切询问着新近改进的信号码（code of signals）的情况。巴罗写道：“我向他保证，尽管它们现在还没准备好，但他绝不会失望，我保证它们会在第二天早上出现在朴次茅斯。”即便如此，纳尔逊也没有放松。他再次检视了所有编码和词条，这是他在离开伦敦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为了送别纳尔逊，巴罗一直在海军部待到很晚。“我发誓，不等到邮差将信号送出，我就不离开办公室，邮包一定能在次日早晨送抵朴次茅斯。听了这话，他便来与我握手……他离开时显然比平时更为愉快。”

让纳尔逊如此焦急的东西正是霍姆·波帕姆爵士的最新发明。这是一本名为《远程视觉信号与航海词汇》（*Telegraphic Signals or Marine Vocabulary*）的信号语言系统簿，它将因为纳尔逊而名垂千古。此时的英国海军尚未全面接受这一发明，但在1803年战争爆发时，它已得到认可，被发放给一些战列舰使用。[2] 很显然，基思的巡洋舰队也得到了这种信号簿，并由其发明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波帕姆的指挥下，这套信号显示出了极大的便利性，即便在无法派小艇传信的恶劣天气中依然可以使用，其价值无疑已得到证明。因此，在纳尔逊接受巴勒姆咨询时，他们决定立即给每艘军舰发放一份信号簿的复本。而这一决定似乎又与新的巡洋舰机制密切相关。

新的机制是基于巡洋舰链（cruiser lines）的现代概念，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是由爱尔兰舰队在爱尔兰西南方的克利尔角（Cape Clear）到伊比利亚半岛东北方的菲尼斯特雷角之间部署的巡洋舰警戒线。这一命令是在布莱克伍德抵达伦敦的第二天下达的。此时，加德纳勋爵的病休已经结束，他正要去科克港接替德鲁里的指挥权。海军部让他派出巡航舰在克利尔角到菲尼斯特雷之间的连线上巡游，尽可能地与其他英国舰队保持直接联系，同时制止敌人的骚扰、保护己方贸易航线。如果他们与任何敌舰队相遇，他们就应当跟随敌人，直至确定其航向与目标，然后才能脱离敌人，并用最快的速度通知他认为最能使这则情报发挥效用的舰队指挥官。[3]

此时，立即可供派遣的只有3艘巡航舰，但海军部已经让康沃利斯在菲尼斯特雷的警戒线终点始终保有1艘巡洋舰，而另外10艘位于西部海域的巡洋舰也全都能在必要时提供增援。尽管如此，这些军舰的数量仍远远不足以组成现代意义上的巡洋舰链。[4] 这最多只能算是一道巡逻线，通过对巡洋舰的合理部署来尽量有效地覆盖某处海面。

在菲尼斯特雷之后，警戒线还要一直延伸至圣文森特角，这也正是

康沃利斯和纳尔逊的防区交接点。这一延展无疑是出自纳尔逊本人的建议。他在抵达伦敦不久后就得到巴勒姆召见，下面这封信简略地记录了他的观点：

> 阿尔比马尔（Albemarle），1805年8月29日：
>
> 尊敬的大臣——出于极高的敬重，我冒昧地遵照您的意愿来陈述我的观点。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接连不断地部署一系列快速轻帆船与巡航舰，从而保护我方贸易，摧毁敌人在葡萄牙海岸——从奥特格尔角到圣奥比斯（St.Ubes）[5]——活动的大量私掠船。它们大多是藏身于巴约讷群岛（Bayonne Islands）和柏灵群岛（Burlings）[6]的小船。我方的这些舰艇不仅能防止私掠船的侵袭，还能用这种方式监视任何穿过其航线的敌舰队。一艘隶属于地中海舰队的巡航舰会始终待在圣文森特角附近，这样一来，情报就能迅速传达，我认为敌人将无法再次逃离我们的视野。我很愉快地从汤普森先生（Mr.Thompson）那里听说，大人您正在考虑将巡航舰尽可能地从菲尼斯特雷延伸至爱尔兰。这将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贸易，并从各个方向极大地扰乱敌军。——尊敬的大臣，我永远是您最忠实的仆从。
>
> 纳尔逊&布龙泰（Bronté）[7]

纳尔逊的观点得到了采纳，海军部为此专门派出4艘巡洋舰。它们的指挥官是洛布舰长（Captain Lobb），他是波帕姆在布洛涅港外的得力助手——而波帕姆本人此时正高挂着宽三角旗，统领着贝尔德的护航船队。[8]洛布所部是英国最先派出的舰队。9月3日，海军部下令让洛布接收足够数量的新式信号簿，并在次日签发了行动指令。洛布应当在圣文森特角与菲尼斯特雷之间保持持续通信，使敌舰队的相关情报能够迅速送达乌桑特、费罗尔与加迪斯的舰队指挥官，“或者你所熟悉的任何其他巡洋舰警戒线”。如果他无法与其他警戒线取得联系，得到情报的舰只就应尽可能地直接驶向其中一位舰队指挥官，而洛布则应小心地与里斯本保持持续通信。[9]

与这封命令一道送来的还有波帕姆信号簿的复本，其封皮上还有另一封信，内容是解释海军部长官为何认为新信号有利于海上通信。洛布

留下了其中一份，将其他复本分发给下属舰长。9月9日，海军部下令将50份复本发往“胜利”号，还有一封发给纳尔逊的类似的信。同一天，科克港的德鲁里也收到了25份复本；两天之后，又有50份复本被发往康沃利斯舰队。[10]

新近成立的巡洋舰警戒线同时也开始使用新式信号码，这使英国海军具备了更加科学的情报与贸易保护机制，无疑具有显著的进步性。考虑到阿勒芒舰队仍在逃窜当中，这更是时势所需。那支大胆的舰队正活动于大型船队航线的终点地区，那同时也正是与地中海舰队保持联系的关键海域，英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在英军能够确定他的位置并采取应对措施之前，整个局势的持续紧张必定无法得到缓解。因此，为了全面了解这场战役，我们有必要去追踪这些扰乱要素的变动以及英军为此做出的努力。

正如我们所知，令人棘手的阿勒芒舰队由120炮战列舰“雄壮”号、4艘74炮双甲板战列舰、3艘巡航舰与2艘轻帆船组成。他们在费罗尔一无所获，随后便按照维尔纳夫在比戈留下的消息驶向布列塔尼南方的庞马尔克集结点。他在8月30日破晓时分抵达了那里。康沃利斯也正在监视着这片重要的海域，他麾下的“墨兰波斯”号巡航舰与2艘轻帆船正在这里巡航。阿勒芒追击了他们整整一天未获成功，“墨兰波斯”号逃往康沃利斯处报信，2艘轻帆船则继续监视敌军。第二天，阿勒芒继续展开追击，2艘轻帆船通过丢弃火炮和物资才勉强逃离。次日，康沃利斯从“墨兰波斯”号得到了消息。他采取的行动与西方舰队传统职责的内在精神完全一致。正如我们所知，这个职责就是为了种种使命而保障英吉利海峡入口的安全，封锁布雷斯特也只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部分手段。在本土舰队的通常部署中，一支小型战列舰队往往会待在爱尔兰南部海岸，隶属于科克港的爱尔兰舰队或作为西方舰队的分遣舰队。但由于法国、西班牙与荷兰结盟导致的英国海军资源紧缺，这支舰队业已被吸纳入西方舰队，转而被康沃利斯派去封锁比斯开湾。到目前为止，英军的布阵足

以防止敌方战列舰队侵扰由巡洋舰实际控制的海峡入口，但阿勒芒的出现却在这个关键时刻极大地威胁到英军的制海权。

波帕姆所护送的贝尔德远征船队恰在此时从科克港起航，与他们一道出海的还有大量驶向东印度或西印度的商船。波帕姆的兵力仅有2艘64炮战列舰、1艘50炮战舰和几艘巡洋舰，如果他们与阿勒芒舰队相遇，一场惨重的灾难恐怕难以避免。[11] 没有直接证据能说明康沃利斯是否了解此时事态的急迫性，但他显然已从其他方面得到了预警。仅仅一周之前，他所收到的海军部机密快件就已经提到雷尼尔的宝贵船队即将抵达，如果有任何迹象表明敌舰队似乎以它为目标，他就应采取措施特别保障其安全。[12] 不仅如此，从背风群岛驶来的第一支商船队也即将抵达。由于密歇希与维尔纳夫之前对西印度群岛常规航线的扰乱，这支船队的规模非同寻常的巨大，至少包括200艘航船。我们在第十一章末尾曾介绍，科克伦与海军部在7月中旬同时做出了向本土派回战列舰的决定。为了保护这支船队中的巨大财富，他亲自坐镇于“光辉”号指挥护航——它是科林伍德派给纳尔逊、又被科克伦派回本土的2艘快速74炮战列舰之一。[13] 最后，从英国驶向里斯本和波尔图的商船队也正准备起航。

这一局势使得巴勒姆再次陷入严重焦虑。他原本认为，敌人的下一步行动将是解散其主力舰队，然后“让分舰队杀入大海”，猎杀商船——正如我们所知，拿破仑在得知克雷格远征军的消息之前的确曾这样打算。[14] 因此，巴勒姆通知加德纳，让他在手中保有一支尽可能强大的重型巡洋舰队。这不仅是为了反制敌方巡洋舰，同时也是为了保护驶向本土的商船队，并在必要时保护英国的西部沿海。基于保护贸易线末端的传统信条，他继续写道：“通过这种方式，商船队就能够在最需要的时刻得到强有力的增援。”[15]

但如果敌人有可能派出重型舰队，这些措施就有所不足了。在缺乏

战列舰支援时，巡航舰也难以发挥其作用。只要本土舰队的主力战舰一直待在布雷斯特港外，它们就无法为控制海峡北侧的巡洋舰提供支援。在这种情况下，英军只能以某种形式按传统部署重组爱尔兰舰队，或者让西方舰队吸纳的那支舰队恢复原状。因此，即便要冒着种种风险，英军也必须分兵。早在8月27日，巴勒姆就已经指示康沃利斯，只要他得到了足以使他继续保有18艘战列舰的增援兵力，他就应当派出4～5艘战列舰去锡利群岛西偏南100里格处接应商船队。[16] 但后续的增援兵力迟迟无法派出，原因在于船员人手的极度紧缺——这个问题直到商船队归航才有所缓解。然而，当康沃利斯从“墨兰波斯”号得知阿勒芒出现的消息之时，他却没有丝毫的犹豫。基于对其舰队职能的认识，他认为贸易线所受到的威胁应优先于巴勒姆命令中的具体字眼。正如巴勒姆最近告诉他的那样，他的舰队是一切必要的攻势行动的原动力；基于一精神，他决定立即派出分遣舰队，尽管这将使英军控御布雷斯特舰队的兵力在增援到来之前低于18艘战列舰的底线。

仍在康沃利斯麾下的斯特林将军被选中担任这支分舰队的指挥官，交给他的兵力仅仅等同于阿勒芒——这是基于另一条海军法则：在与敌方同等兵力对峙时，一支舰队往往无法对贸易线造成严重破坏。[17] 然而，授予他的行动指令尽管在当时情境中十分正确，结果却很不走运。阿勒芒在庞马尔克的露面让康沃利斯决定不将分舰队直接派往巴勒姆指定的位置，因为那个位置所应对的是与目前的直接袭击有所不同的局面。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事实上是错误的消息导致阿勒芒在那里出现。此时的拿破仑几乎已毫不遏制自己对维尔纳夫失误的暴怒：“维尔纳夫将军在最后一刻搞砸了一切，当他驶出比戈时，他给阿勒芒舰长留下的命令是前往布雷斯特，但他告诉你的意图却是前往加迪斯。这完全就是叛国。这使阿勒芒的舰队陷入了极大的危险，他一定会在大海上再巡游好几个月……维尔纳夫是一个我们必须加以惩治的混蛋。”[18] 但

是，康沃利斯并不知道这些错综复杂的缘由，他只能将阿勒芒那莫名其妙的位置理解为他要去洛里昂或罗什福尔装载补给，因此决定立即将分舰队派往那里。授予斯特林的指令要求其首先去侦察这两处港口，如果敌军在港内便加以封锁。如果确定敌人并未驶入，斯特林就应“立即前往北方保护驶向本土的商船队，护送其进入海峡”。[19]

斯特林在8月31日离开了主力舰队，他沿着布列塔尼海岸一路航行，并在9月1日侦察了洛里昂港。他并未试图展开舰队，但这或许不是他的过错，因为没人能想象到阿勒芒距离康沃利斯会是如此之近。由于从未料到敌人会如此接近，斯特林从贴近海岸的一侧与阿勒芒擦肩而过。他在洛里昂一无所获，接着又顶着不利的微风驶过贝尔岛和莫尔比昂（Morbihan）海岸，希望去罗什福尔寻找敌军。然而，涌起的海潮和微弱的风势严重地阻挠着他的行动。他在距离阿勒芒不到50英里的海滩外徘徊了长达一周时间，但敌对的双方却都没有得到对方的音信。[20]

在这段时间里，勇敢的法军准将一直在距离庞马尔克15里格处巡航，试图寻找维尔纳夫的消息。9月5日，一位葡萄牙船长告诉阿勒芒，他最近看到联合舰队朝着费罗尔西北方航行，并在菲尼斯特雷附近海域看到了考尔德的舰队。很显然，维尔纳夫已经发现自己无法北上，被迫退回加迪斯。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待在这处集结点不仅无济于事，甚至还会陷入更大的危险。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他发现一艘曾被逐退的英军轻帆船再一次跟上了法军，阿勒芒就此决定立即向南方撤退。他的撤退正当其时。两天后，斯特林从中立国船只处确认敌舰队并不在罗什福尔，他立即升起全帆，赶往锡利群岛之外的巡航位置，而他途经之处恰恰是阿勒芒刚刚撤离的阵位。[21]

阿勒芒又一次惊险地逃过一劫。全速航行的斯特林离他的猎物越来越远，一周后，他终于抵达英吉利海峡入口处，在那里发现了帕克舰长的巡航舰“亚马孙”号。在康沃利斯得知阿勒芒消息的一天之前，它被派

来在海峡以西巡航。[22] 帕克已在此待了两个星期，竭尽所能地保护着牙买加商船队中那些刚刚驶入海峡的落后成员。在遇到斯特林的两天之前，他刚刚从一位有名的法国船长手中俘获了一艘崭新的24炮私掠船“拉巴斯亲王”号（Principe de la Paz），但他并未发现阿勒芒的踪迹。[23] 尽管如此，斯特林仍选择继续坚守这一阵位。他已获悉牙买加船队的安全抵达，但并未听到雷尼尔的东印度船队的任何消息，尽管其在斯特林离开法国海岸时已安全抵达了唐斯锚地。就在他驻守期间，9月19日，斯特林惊喜地发现了一支陌生的舰队。这似乎正是他苦苦寻找的对手，于是下令准备战斗并开始追击。但他最终发现，这支陌生舰队其实是纳尔逊与他的4艘僚舰，他们正顶着西南风努力朝加迪斯驶去。纳尔逊告诉斯特林，海峡方向并没有阿勒芒的音信，但雷尼尔已经安全归航。就在两支舰队尚未分离时，巡航舰“十年”号从南方驶来，带来了比克顿将军因病离舰的消息，但它同样也没有听到阿勒芒的音信。纳尔逊因此决定继续他的航程，斯特林则决定不再坚守，转而与康沃利斯重新会合。[24]

没有哪个决定会比这一个更不走运，但事实已经发生。就在这一天，大胆的阿勒芒正在他们以西不足45里格处巡弋。我们并不是要将这个不幸的行动归咎于决策错误，但面对这所有的事实，我们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在康沃利斯可敬地统领着他的舰队期间，这支法军对他来说的确是触手可及。在商船队尚未全部归航、阿勒芒位置仍旧不明的情况下，他或许应当在斯特林归队时再次令其返航。但必须记住的是，当时的形势委实不容易。冈托姆突围而出去加迪斯与维尔纳夫会合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任何对布雷斯特封锁兵力的削弱都应尽量避免——除非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在海军部看来，阿勒芒肯定已经回到了港口里。在尚未得知雷尼尔安全抵达时，他们就已经通知了康沃利斯，让他自行决定是否有必要执行之前让他派出分舰队的那道命令。[25] 基于修改后的指令，康沃利斯决定维持现状。

那么，阿勒芒又是如何行驶到他现在的位置上的呢？他的行程的确具有某种魔力。正如前文所说，在庞马尔克奇迹般地逃离斯特林之后，他便朝着加迪斯——也就是考尔德舰队——的方向驶去。直至此时，他似乎还不准备归航，但一件幸运的意外却让他逃离了危险。这一次，阿勒芒既勇敢又谨慎的性格为他自己赢得了奖励。当他行驶到葡萄牙海岸时，他确切地得知，维尔纳夫就在加迪斯。他扬起了能够升起的每一张帆，但并未直接驶向那处港口。9月11日，当他驶过圣文森特角时，他选择继续向南行驶，抵达与直布罗陀海峡相同的纬度。在这里，他肯定能从其他船只处打探到加迪斯周边的局势。就在这一天，一艘英国双桅帆船错把阿勒芒当成了日夜期盼的纳尔逊，向法国舰队热情地迎了上来。[26] 它自然成了法军的战利品，阿勒芒则从俘虏口中得知，加迪斯正遭到26艘战列舰封锁，卡塔赫纳港外还有5艘战列舰。他的处境由此变得极端困难，想要强行突破封锁显然已不可能。一阵有利的天气或许能让他逃走，但如果撤退失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就很可能会被沿着海岸赶往这里的纳尔逊切断退路。他由此意识到，自己与维尔纳夫会合的大胆尝试已经失败。他决定逃向大西洋，重新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阿勒芒的最终决定的确符合他的品格，堪称法国海军传统的最佳范例。他让所有舰长前来参加会议，并为他们朗读了作战指令中应对目前这种情况的段落。“你应当把舰上的补给用在巡航过程中，巡航在你认为能对敌人造成最大破坏的地方，在出海后的六个月内不要返航。”他能造成最大破坏的地方正是英吉利海峡的入口处，但他毫不掩饰地承认，不仅即将抵达的西印度群岛与美洲商船队拥有强大的护航兵力，一支针对他的战列舰队也很可能已经出航——就在此时，斯特林正如阿勒芒担心的那样全速赶往海峡入口处的阵位。他接着读道：“你的指令将明确告知你这次任务的精神和目的……竭尽全力对敌人造成破坏——这就是皇帝命令的精髓。”这位无畏的准将就此做出结论：“接着，我不会再犹豫，将航线设置为驶向利泽德半岛以西的海域。”[27]

这个勇敢的决定即将为他带来巨大的成功。在北方的海面上，波帕姆护送的商船队与贝尔德的远征军正在向南航行，而自西方迂回的阿勒芒则将自西向东横穿他的航迹。如果事态继续这样下去，他们将不可避免地相遇。波帕姆在9月9日中午时位于菲尼斯特雷西北偏北方约200英里，而在11日，阿勒芒开始从直布罗陀海峡外侧朝着西北方进军。波帕姆对此一无所知，但幸运的是，不利的风向使他在三天内只行驶了不到30英里，从而使得阿勒芒在他们之前三天——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差以内——穿过了他的航线。[28] 近来的不少作者都谈到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派出远征军是多么的容易，但这一事例却说明，这种自负完全没有根据。克雷格和贝尔德的远征军都背负着被歼灭的巨大风险。在克雷格的案例中，风险是由于海军部的正确决策所产生的，而他们已经采取了最为科学的部署来掩护他的进军。但贝尔德的出航却纯粹是基于一种缺乏直接证据的臆断，即认为阿勒芒已经回到了港口里。即便从最有利的观点来看，这种行为也绝不会被视为合理的战争风险。使他得救的唯一凭借仅仅是运气。

然而，拯救了贝尔德的好运在此时开始也对阿勒芒展露微笑。在近距离错过了一场光荣胜利之后，他相当准确地来到了巴勒姆让康沃利斯派舰队留守之处——锡利群岛西偏南100里格。但斯特林并未在这里守候，他选择的位置还要往东约150英里。就在他与纳尔逊相遇时，阿勒芒来到了这个降位。我们并不知道巴勒姆是出于何种原因或直觉指定了这个位置，也并不知道斯特林为什么没有执行巴勒姆的指令。当然，有可能是康沃利斯在增援兵力尚未到来时做出了妥协，让斯特林所部离他更近。我们只能说，如果巴勒姆的战略得到了完整实现，阿勒芒舰队必将无法继续巡弋。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斯特林与康沃利斯再度会合时，阿勒芒正不受干扰地盘踞在富饶的贸易航线当中，冷静地修整着他受损的战舰。他将巡洋舰和快速的74炮战舰伸展开来，在这里待了四天时间。9月24日，他发现周围有十来艘正驶向海峡的帆船。他随即开始追击，但在第二天，他的先导舰回报称发现了一支由8艘战列舰组成的舰

队。直至次日早晨，他才发现了这场追击的真正目标。

事实上，这是一支从圣赫勒拿岛驶来的小型商船队，其中包括1艘东印度商船、3艘南大洋捕鲸船、2艘其他商船与1艘西印度船队中因受损而落后的商船。唯一的护航舰是由沃道夫舰长（Captain Woodriff）指挥的“加尔各答”号（Calcutta）——一艘老旧的但改装上54门舰炮的东印度武装商船。在发现追击者迫近后，沃道夫命令船队散开，向北方和东方驶去，自己则转身迎战法军的先导巡航舰。他尽力驶向南方，希望将敌人引离他的船队。这一计策取得了成功。法军巡航舰希望让后面的74炮战舰赶上来，因此一直与他保持着距离，但被此情形激怒的阿勒芒率领整支舰队开始了追击。到日落时分，一艘74炮战列舰已经开始与沃道夫交战。尽管沃道夫十分勇敢，但集中射击其帆桅的法舰很快就使英舰瘫痪。夜里10时，“加尔各答”号只得向阿勒芒舰队降旗投降。[29]

通过这场出色的作战，沃道夫成功地将他的追击者引到了斯特林刚刚离开的海域。他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如果斯特林再留守一会儿，阿勒芒的巡航就一定会中断。事实上，沃道夫不仅拯救了自己护送的所有商船，还挽救了“光辉”号护航的西印度船队。一天前，阿勒芒的巡洋舰已经遇到了好几艘西印度船队的落后船只，并在这次作战的上午俘获了4艘满载昂贵货物的商船。但急于俘获“加尔各答”号的阿勒芒已经追出了太远，远离了船队的中心航线。在接下来的三天中，阿勒芒又俘获了4艘落后的商船；但得益于沃道夫的狡黠，船队的大部分船只已安全地回到了本土。阿勒芒最重要的战利品仍是“加尔各答”号，他将其编入了自己的舰队。沃道夫因为座舰的损失而走上了军事法庭，但这仅仅是为了让他和他的伙伴们名正言顺地赢得胜利。

此时的阿勒芒还并不知道，他的行踪已经被英军发现。康沃利斯派往西部水域的巡洋舰“蚊子”号（Moucheron）听到了交战的炮声。海面平静无风，但“蚊子”号仍努力向炮声传来的方向搜寻。它在当天夜里靠

近了法国舰队，并于次日清晨在阿勒芒忙于修理“加尔各答”号的同时，悄悄地清点了他们的兵力。在此过程中，“蚊子”号一直悬挂着美国国旗，这使得阿勒芒并未对其加以留意。在侦察完成之后，“蚊子”号便以全速朝康沃利斯驶去。[30]

所发生的还不止如此。在沃道夫护送的船队逃离法军之后，其中一艘捕鲸船遇到了一支由33艘帆船组成、刚从英国驶出的葡萄牙商船队，巡洋舰“和蔼”号（Aimable）的霍斯船长（Commander Hawes）正在为他们提供护航。闻讯后，霍斯立即改变了原先的航线，远离敌人而向康沃利斯靠近。康沃利斯必须得到警告，但霍斯能够派出的只有“勤奋”（Diligent）号——这是一艘十分重要的、为直布罗陀卫戍部队运送物资的补给船。霍斯决定担起责任，派它去给康沃利斯报信。[31]

就在这艘捕鲸船遇到霍斯的同时，康沃利斯发现布雷斯特港内正一片平静，几艘战舰正在修整，于是他准备率领舰队前往法尔茅斯（Falmouth）装载物资。他已经组织了一支由理查德·斯特罗恩爵士负责指挥的近海舰队，其中包括4艘战列舰，以在他离开之时留守港外。[32]同巴勒姆一样，他仍然认为阿勒芒肯定已驶入了某处港口去补充给养。如此一来，一旦其位置确定，他就有充分的时间将之封锁在港内。除了西方海面上的舰船，他还为此向罗什福尔、洛里昂和费罗尔派出了额外的侦察巡航舰，似乎已经采取了足够充分的措施。

9月29日一早，“勤奋”号抵达了目的地。这是康沃利斯手中关于此时事态的第一份通知。他立即让它驶向斯特罗恩，命他去南方海域搜寻敌军，并护送这艘补给船穿过比斯开湾。不久之后，“蚊子”号也前来报告：它已经确定敌军位置，并确定那就是阿勒芒。在它离开之时，敌人正安静地停在海面上修理索具，于是它便扬起全帆赶来报信。

在舰队防区的核心海域遭到如此肆无忌惮的藐视，超出了这位老将所能容忍的极限。不管是冈托姆还是阿勒芒，海峡入口的控制权必须得

到保障；他的首要职能如此强烈地召唤着他，这使他勇敢地决定再次敞开布雷斯特，亲自去完成那支分舰队没能完成的使命。斯特罗恩的命令依旧有效，他应当驶向菲尼斯特雷；与此同时，康沃利斯只留下了一艘巡航舰来看守冈托姆，随后便率领全部兵力杀向那支“幽灵舰队”。他直接冲向“蚊子”号向他报告的地点，在那片海域仔细搜寻，却没能找到阿勒芒的任何踪迹。在寻找了三天之后，康沃利斯相信那位谨慎的法军准将肯定已得到了风声，于是便在第四天与一支驶向本土的葡萄牙商船队会合，决定护送它们驶离这片危险地带。10月8日，他再次回到了乌桑特阵位，并在一天之后得到了全部的增援兵力。[33]

事实上，就在“蚊子”号抵达乌桑特之时，阿勒芒已经意识到他很难再在这片海面上藏匿行踪。自沃道夫船队逃走已经过去了四天。根据他的计算，英国本土只需两天就会得到消息，再有两天，他们派出的舰队就能杀到他的面前。他不敢再多逗留哪怕一个钟头。就在康沃利斯开始冲向他的那一天，他再次转向南方，朝着比戈驶去。他再一次避过了英军的猛攻，并且还掠夺了9艘战利品。[34]

值得注意的是，这整个事件充分地反映出一支破坏贸易的袭击舰队所能造成的最大影响。这种行动只有在有限的几处舞台上才能对战争的方向造成真正的震撼，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本土航线末端，其次是海外航线末端和海外联络点。阿勒芒勇敢地来到了本土航线末端，这里的英军巡洋舰队无法与之对抗，形势对他十分有利。英国的巡洋舰机制还远远称不上完善，他们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才确定其位置，并为此调动了整支本土战列舰队。他们的出现使得阿勒芒无法在这个关键位置上待上足够长的时间，从而无法造成致命的破坏。英国的海上贸易保护建立在一种永恒不变的原则之上，它生发自英国的地理位置，因此也必须克服这个位置与生俱来的一切弱点。这一点关乎英国整个海上防御系统的根基，任何陆上防御力量都无法改变。即便本土海域不需要战列舰队来防御外国军队入侵，他们仍然需要把守本土贸易航线的末端。在当时，这是英

国唯一的贸易保护机制，海上巡逻根本无法替代它的地位。大海是如此广阔，贸易航路是如此繁多，除了航线末端的合流之处，敌人在外海的其他区域都无法指望能遇到足够多的商船。因此，只需用战列舰队保证航线合流处的安全，敌人就不能指望将摧毁贸易作为自身战列舰队的合适的作战目标。

阿勒芒的无畏和睿智并未给他带来他自己所希望的结果，从战略行动的层面着眼，他的巡航已经彻底失败。设计这一行动的拿破仑信心十足地想用它来打乱英军的部署，想迫使英军无法保持集结；但巴勒姆及其将军们却如此坚决地掌控着局势，一刻也不曾松懈。直到主要阵位的安全已经得到保障、时机已经允许他们展开行动，这支袭击舰队才进入他们的视野。整个事件清楚地告诉我们，只要英国海军仍然保持着睿智的战略传统，任何将其舰队诱离的企图都终将破灭。

让我们跟随着勇敢而机智的阿勒芒走得更远一些，看看他那非凡的运气还将有怎样的表现。现在，他正要前往比戈装载淡水、处置战利品；而与此同时，斯特罗恩正快速穿过比斯开湾，去菲尼斯特雷截断他的航线。斯特罗恩取得领先。10月4日，他抵达菲尼斯特雷角西北方60英里处，开始在靠近陆地的海面上来回搜寻。这是康沃利斯为截击那支“幽灵舰队”而选择的最为科学的策略，但阿勒芒再一次从中逃脱。我们并不清楚这次逃脱的细节，但可以猜到的是，阿勒芒似乎是从靠海的一侧溜过了英国舰队。无论如何，到10月9日清晨，阿勒芒发现了64炮战列舰“阿伽门农”号（Agamemnon）。它跟在纳尔逊之后穿过了比斯开湾，随后行经菲尼斯特雷正西方约60英里处，这时的斯特罗恩正在菲尼斯特雷北偏西25英里处的海上游弋。[35] 阿勒芒立即展开追击，他的旗舰紧追在“阿伽门农”号身后，后者通过倾倒淡水才勉强逃开。阿勒芒的拼命追击甚至使他自己闯入了比戈港的下风区，但他的步伐仍然没有停止。[36] 刚刚放跑了“阿伽门农”号，他又在南方的海面上发现了“和蔼”号与那支在海峡入口处逃走的葡萄牙船队。他不顾此时的处境，再

次向比戈港的下风方向展开追击。“和谒”号陷入了被俘的危险，它也被迫倾倒淡水、抛弃船上的小艇，还丢弃了大量炮弹。它在每一处横杆末端都挂上了风帆，最终脱离险境。葡萄牙船队的大部也成功逃离，阿勒芒最终只俘获了3艘落后的商船和1艘小型私掠艇。[37]

就在法国罗什福尔舰队勇敢地向纳尔逊的交通线发起袭击时，斯特罗恩还并不知道自己的猎物已经溜走，他仍在菲尼斯特雷外海徘徊索敌。事实上，阿勒芒正在他南方约200英里处，他正试图召集他那分散的舰队，想出下一个行动目的。坏血病已在船员中蔓延，他迫切需要尽快得到救援，而逆风返回比戈至少要花十天时间。此外，他得到了一份有关斯特罗恩的夸张报告，称这支舰队拥有10艘战列舰，正在费罗尔港外迎接他的到来。阿勒芒再次显露出一贯的精明。他据此怀疑，逃走的“阿伽门农”号已经逃向了那支舰队，他们很可能前来封堵他返回比戈的航线。事实上，尽管没有遇到“阿伽门农”号，但斯特罗恩的确得到了关于他的消息。斯特罗恩在10月10日驶向比戈，自信能在阿勒芒返航时向其发起攻击。然而，阿勒芒并不会轻易就范。他的面前还有另一个机会，那就是逃往加那利群岛。第二天，当斯特罗恩仍耐心地守候在通往比戈的航线上时，阿勒芒却加速向南，朝加那利群岛驶去。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咫尺之前就是波帕姆和贝尔德远征军。

---

[1] “刻耳柏洛斯”号（Cerberus）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密歇希从罗什福尔出逃后，索马里兹在3月27日从他的舰队中派出这艘巡航舰，让它去马德拉群岛巡航一个月，然后立即返回。但它一直拖到7月15日才迟迟归队。索马里兹径直谴责它的舰长“对海军部极不服从”。*In-Letters*，223；Secret *Orders*，1363.

[2] 纳尔逊显然早已采用了这种方法与他的战列舰长进行沟通（see *e.g.* his letter to Hargood，Aug.5th：Nicolas，vii.3）。巴罗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这种信号刚刚得到了改良和增订，这种描述是误导性的。根据其导言和各版序言，第一版信号簿是私人印制，出版于1800年，随即被波帕姆用于波罗的海，主要是用于他在哥本哈根港外的座舰——50炮战舰“罗姆尼”号（Romney）——与位于埃尔西诺（Elsinore）的迪克森将军（Admiral Dickson）之间的交流。此后，他又将之沿用到了红海。由于后来的海军大臣斯宾塞勋爵的鼓励，他在返回本土

时编订了新版信号簿，增加了两个新章节。信号簿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最初的版本，包括约1000个单词；第二部分又新添了1000多个；第三部分则增加了一些句子和短语。这个版本为四开大小，发布于1803年。此后直到1809年，它被多次重印为较便宜的八开本，但内容并无改变。

[3] Gardner to Admiralty，Sept.9th：*In-Letters* ，620.他称命令发布于9月6日；而在*Barham Papers* ，iii.210，其只是一份未标日期的草稿。

[4] 例如，康沃利斯就没有从这种部署中看出任何特别的新意，甚至对他的常用方式表示了些微不满。在收到发给爱尔兰舰队的命令副本与波帕姆的信号簿时，他这样回复道："命令中的指示与之前给过我的一般指示几乎完全相同。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把这则命令的副本发给我。"To the Admiralty，Sept.28th：*In-Letters* ，129.

[5] 即今葡萄牙西部海港塞图巴尔（Setúbal）。——译者注

[6] 即今葡萄牙西部沿海的贝伦加群岛（Berlengas）。——译者注

[7] 这封重要的信仍未公开发表。来自肯特郡比尔斯特德（Bearsted）的斯卡思女士（Mrs.Scarth）曾在1907年的特拉法尔加纪念日将之展出于达特茅斯的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汤普森先生是海军大臣的私人秘书。至于让洛布舰队将葡萄牙港口作为行动基地的外交困难，可参见Barham to Mulgrave，*Barham Papers* ，iii.310，Aug.15.［署名中的"布龙泰"指1799年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国王费尔迪南三世为纳尔逊授予的"布龙泰公爵"（Duca di Bronté）之封号，用以表彰他在当年的那不勒斯革命中为保护王室做出的贡献。——译者注］

[8] 波帕姆当时仍为"舰长"（Captain）军衔，若要统领大型舰队，就只能加上临时性的"准将"（Commodore）职衔。"准将"职衔对应的旗帜就是宽三角旗。——译者注

[9] *Out-Letters*（*Secret Orders*） ，1184.For his working of the line see Captain' Letters，2075.

[10] Drury to Admiralty：*In-Letters* ，640，Sept.9th. *Admiralty Minutes* 154，Sept.3rd，9th，11th.10月5日的一份会议纪要显示他们还向西印度群岛和北美送出了信号簿，还给纳尔逊再送去了20份。

[11] *Log of the Diadem* （Sir Home Popham），*Captains' Logs* ，1743.他在8月28日起锚，但直至31号才驶出科克港外。

[12] Cornwallis to Marsden，Aug.20th：*In-Letters* ，129.雷尼尔的航线是先驶向亚速尔群岛（Azores）以西200英里，再驶向利泽德半岛。

[13] Cochrane to the Admiralty，July 17th：*In-Letters*，326.7月11日的海军部会议纪要要求他将“光辉”号与“拉米利斯”号派回本土。科克伦则安排“拉米利斯”号随着第二支商船队返航。

[14] See *ante*，p.325.

[15] Barham to Gardner：*Barham Papers*，这封信写于8月17日到23日之间。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已在一个多月前的7月11日命令牙买加的戴克斯将军派回他麾下最重型的4艘巡航舰。*Secret Orders*，1363.

[16] Secret Orders，1363.

[17] 斯特林的旗舰是98炮战列舰“光荣”号，此外还有74炮战列舰“却敌”号、74炮战列舰“凯旋”号、74炮战列舰“龙”号、74炮战列舰“勇士”号以及30炮巡航舰“新月”号（Crescent）。此外，“墨兰波斯”号与其他巡洋舰已被派出搜索敌军。

[18] To Decrès，Sept.4th：*Correspondance*，xi.176.

[19] Cornwallis to Marsden，Sept.2nd：*Blockade of Brest*，ii.352.康沃利斯直接发给斯特林的命令如今已不存在，因此，我们并不能确定他是否让斯特林前往巴勒姆指定的位置——锡利群岛西偏南100里格处的海域。

[20] 英军索敌失败部分是由于巡洋舰的糟糕表现。9月6日，“墨兰波斯”号前来报告，称它一天前在勒桑（Le Saint）外海的雾气中遭到4艘战列舰的追击。但最后查明，这些船只是康沃利斯下属的2艘巡航舰与2艘轻帆船。*Blockade of Brest*，ii.358-361.

[21] Stirling to Cornwallis，Sept.16th.“Scilly bearing N.E.by E.26 leagues，” enclosed in Cornwallis to Marsden，Sept.27. *In-Letters*，129.

[22] 8月30日，帕克向他的母亲写道：“在上述行动后，我加入了康沃利斯将军的舰队，他拥有最好的意愿和最出色的处置方法。他派我去西面巡航三周时间，以保护驶向本土的商船。”Phillimore，*Life of Sir W.Parker*，i.305.

[23] Parker to Cornwallis：*Blockade of Brest*，ii.359.“拉巴斯亲王”号是一艘西班牙私掠船，但其指挥官是法国人弗朗索瓦·贝克（François Beck）。他已经劫取了里斯本派往英国的邮船与一艘英国私掠船，后者的船员和数量可观的香料都被他弄上了自己的座舰。

[24] *Log of the Glory*（Stirling’s flag），*Captain’s Log*；1644.Cornwallis to Admiralty with Stirling’s Report，Sept.22-27.See also “Proceedings of the Fleet.”

Nelson Papers，*Add.MSS.* 34973，and Nicolas，vii.p.46.Stirling rejoined on Sept.22nd.

[25] Admiralty Minutes，154，Sept.3rd.

[26] 阿勒芒说这是从直布罗陀驶向格林纳达的“腓比斯”号（Phœbus），而英国海军的任何舰船表中都没有这个名字，可见它必然只是一艘商船。

[27] Allemand’s *Journal*： Desbrière，iv.794.

[28] 参见彩插图示5的航迹图。这些事实可以从波帕姆舰队中“王冠”号（Diadem）的日志（*Captains’ Logs*，1743）与阿勒芒的航海日志（Desbrière，v.793.）得到佐证。当阿勒芒俘获那艘双桅帆船时，他的位置是北纬35°0′，西经11°8′（格林尼治经度西经9°8′），这是在9月11日下午6时。接着，他“驶向西北方，再往东方折返”。如果他沿着这一航线继续向前，他很可能是直接穿过北纬39°2′，西经14°2′，也就是波帕姆17日中午时所在的位置。如果采用中等航速，他不可能早于13日太长时间穿过英军的航线，也有可能晚于13日，然而，他的日志对这几天的记载却残缺不全。此时，波帕姆手中的兵力只有64炮战列舰“王冠”号、64炮战列舰“好战”号（Belliqueux）、50炮战舰“迪奥梅德”号（Diomede）、32炮巡航舰“那喀索斯”号（Narcissus）与36炮巡洋舰“勒达”号（Leda）。随后，“勒达”号在9月15日被派往马德拉群岛。

[29] James，iv.47.Allemand’s *Journal*： Desbrière，iv.795.

[30] *Moucheron’s* Report，enclosed in Cornwallis to the Admiralty：*In-Letters*，129.

[31] Hawes’s Report，ibid.作为告警，他向康沃利斯捎去了那艘捕鲸船的日志的抄写稿。

[32] 这支舰队包括80炮战列舰“恺撒”号、74炮战列舰“英雄”号、74炮战列舰“那慕尔”号（Namur）、74炮战列舰“勇气”号（Courageux），以及2艘巡航舰。

[33] Cornwallis to Marsden，October 5th，8th，and 9th：*In-Letters*，129.

[34] Allemand’s *Journal*： Desbrière，iv.795

[35] 此时的局势并不十分明晰。据“阿伽门农”号舰长爱德华·贝里爵士（Sir Edward Berry）说，在凌晨3时30分，他位于菲尼斯特雷的南偏西70度，这个数字显然受到了地磁偏角的影响（依照前文，1805年菲尼斯特雷附近的地磁偏角是偏西22.5度——译者注）。阿勒芒说，他在凌晨4时发现英舰“在很近的正前

方”，但他同时声称自己在10月7日距离比戈仅有12里格，这将使他当时的位置太靠近菲尼斯特雷的正南方。这里的“12”肯定是一处打字错误。如果他在10月8日距离比戈这么近，他就不可能在第二天发现“阿伽门农”号，而且肯定会在一天直穿过斯特罗恩舰队的航线。

[36] For Captain Sir E.Berry’s despatch see Newbolt，*Year of Trafalgar*，p.40，and Nicolas，vii.117 *note.* 阿勒芒将“阿伽门农”号错认作“龙”号，认为那是“英国最快的战舰”。

[37] 一份由一位新晋海军见习生写下的关于“和蔼”号逃脱的有趣报告，可参见Newbolt，*Year of Trafalgar*，p.40。

第二十一章 加迪斯僵局

9月28日夜，纳尔逊抵达了加迪斯港外的舰队，并在次日——正好是他的生日那天——接掌了指挥权。当他行经葡萄牙海岸时，他已与洛布的巡洋舰链取得了联系，而当他来到里斯本港外时，他又发布指示，要求对他的到来加以保密。如同往常一样，他希望能在自己身后保持良好的稳定态势，以防出逃的布雷斯特舰队截断其交通线。在春分或秋分时节出逃早已是法国海军的故技，考虑到海军部承诺给他的增援兵力将分批到来，纳尔逊无法忽视他们的航线所受到的威胁。在圣文森特附近，他截住了一艘带着科林伍德的信件驶向本土的巡洋舰，按照新的机制，他令其在此连接洛布的巡洋舰链。纳尔逊指示它在此接应后续增援，指引他们前往他选定的"圣玛丽角（Cape St.Mary）与加迪斯之间"的集结点；如果他因追击敌人而离开了那里，他们就应去斯帕特尔角接收命令。纳尔逊在指令末尾写道："如果从布雷斯特驶来的敌舰队在此出现，我希望你能用最快速度为我们带来敌军的报告。"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那种束缚康沃利斯行动自由的严重焦虑——它曾将他束缚于乌桑特，从而为阿勒芒创造了行动时机。

基于这一原因，纳尔逊派布莱克伍德发出了另一道命令，要求在他抵达之时不要鸣炮敬礼，或者弄出其他动静。他面临的主要难题仍旧是迫使维尔纳夫交战，而他采取的第一道措施就是尽可能地隐瞒自己的到来。他甚至恳求直布罗陀的福克斯将军禁止当地报纸刊载那些消息。他写道："我十分担心，如果敌人得知我们增强后的兵力，我们就将再也看不到他们出现在加迪斯港外了。"当他看到联合舰队并非停泊在海湾内，而是拥挤在港口之中时，他忽然想到，如果其他手段行不通，康格

里夫上校（Colonel Congreve）和他的火箭或许能够派上用场。[1] 他向卡斯尔雷写道：“即便不能烧毁任何战舰，这也能让加迪斯变得极其难以容身，使他们宁愿冒着交战的风险也不愿待在港内。”

不过，纳尔逊认为最合适的施压手法仍是制造物资短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就必须严格封锁所有安达卢西亚海岸的港口，尤其是要禁止那些前来倾卸法国货物的丹麦商船。但基于政治上的考量，此时的英国政府很不愿意将封锁贯彻到底。这种封锁总是会激起中立国的不满——基思勋爵曾对一些向马尔蒙的军队和荷兰舰队提供物资的北海港口展开严格封锁，但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就招致了极强的反对。[2] 然而，科林伍德却勇敢地担当起责任，对整个安达卢西亚海岸实行了严格的封锁。纳尔逊决定将之延续下去，他请求卡斯尔雷给予支持，因为仅有海军的参与还不足以贯彻他的命令。他暗示道，只要本土的高官不再向英国船只滥发进入被封锁港口的许可证，中立国的抗议也就不会那么激烈。

先制造物资短缺，再隐藏自己的兵力，纳尔逊正是希望用这种办法让维尔纳夫出海决战。他完全不指望克雷格远征军对敌人造成的压力，甚至直至此时还不知道他们的行动目的。当他从英国出航时，那不勒斯的局势仍然晦暗不明，大臣们还无法给出确切的消息；但是，他很快就能明白这场远征的意义。9月17日深夜，就在纳尔逊驶出英吉利海峡时，一位信使来到了外交部，送来了最终驱散迷雾的消息。邮包中有一份艾略特从那不勒斯发来的急件，他在信中宣布，克雷格已经安全抵达马耳他，他与俄国人合作的商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克雷格发来的信件也随附其中，他表示已有6000人做好了作战准备，不需再挪用马耳他的守军。还有一封是英国驻维也纳大使发来的信，他在信中说，拿破仑正如科本茨尔料想的那样拒绝了和解条件，而其提出的对应要求也被奥方坚定回绝。所有的奥地利军队都在开赴战场，卡尔大公随时都可能在意大利发动突袭。此时的奥地利人仍然相信自己把握着主动权，并将其

主攻方向设定为拿破仑的新王国——北意大利。[3]

对皮特而言，没有什么能比这些消息更合时宜了。在最近的议会活动中，福克斯的反对党与他的朋友们敌对到了极致，这让皮特筋疲力尽。他感到无法再在同样的议程上面对议会，也无法再处理战争问题。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与福克斯形成一个联盟，正如他的父亲在七年战争的危急关头与纽卡斯尔（Newcastle）所成功做到的那样。[4] 党派之争必须让步，一个真正的国家政府必须取而代之。在做好打算之后，他来到韦茅斯（Weymouth），向正在这里享受滨海空气的国王提出建议。但是，倔强的老国王仍旧顽固如昔。纳尔逊的朋友罗斯（Rose）也前来相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告诉国王陛下，考虑到我们在下议院的形势，我深刻地意识到，如果皮特先生再被痛风或者别的什么病痛折腾两三周，我们就都会完蛋。"但这并未奏效。一想到福克斯要加入内阁，国王就极度懊恼，以至于有再次突发精神错乱的危险。他们只好放弃这个念头，让皮特继续面对下一场会期。到那时，他只能用整个白天对付福克斯，再用整个夜晚与拿破仑为敌。

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消息点燃了在下一次会期到来前发动一场辉煌进攻的希望。此时此刻，这无异于最高等级的激励。他们在十天内就敲定了必要的行动方案。9月21日，卡斯尔雷通知海军部，在欧陆业已明朗的战事中，克雷格的兵力将被用于意大利海岸。他希望海军部提请纳尔逊留意相关消息，指示他"在有效地封锁了加迪斯之后，就应随时留意掩护詹姆斯·克雷格爵士这样的行动，使之免遭敌舰在地中海内发起的侵袭"，还要与克雷格保持持续的联系。[5] 因此，海军部在同日向纳尔逊发出了一份秘密指示，其中还附随了克雷格的行动命令。[6]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英国政府的想法和纳尔逊的并不完全一致。在皮特看来，如果维尔纳夫舰队被成功封锁，他们就无法再扰乱他在意大利发起的侧翼联合攻击，舰队的职责就已经履行完毕。这就是发给纳

尔逊的命令的潜在含义。一方面，他们的确赋予纳尔逊极大的自主权，可这种自主权必须服从于两条明确的条款，其中之一就是封锁加迪斯，防止联合舰队再次出击。另一方面，纳尔逊却也清楚地知道在天气无常的安达卢西亚海岸执行漫长的冬季封锁是多么不可靠，迫使敌军出港然后加以歼灭才是他的当务之急。

巴勒姆的看法显然与纳尔逊相同。早在拿破仑放弃入侵计划的消息传来之时，英国政府就一心想要摧毁已经解散的渡海船队，想对布洛涅发起一场水陆两栖突袭。如果成功，这种行动的士气影响将无可估量：它不仅能确保政府的稳固地位，还能让全国在向欧陆派遣军队发动攻势的问题上搁置争议。正因如此，不管它在纯粹的策略层面有多少缺陷，大臣们都认为有必要加以强力推行。然而，这种行动的缺陷早已让海军部望而却步：早在1801年，纳尔逊就曾指挥过一场对布洛涅的失败的攻击。但卡斯尔雷认为，康格里夫上校的发明或许能带来不同的结果。一贯自信的西德尼·史密斯爵士（Sir Sidney Smith）相信它一定会奏效，海军部便让他负责发动袭击。但在进一步的观察中，他接受了海军部的看法，认为陆军的支持不可或缺。于是，皮特命令杰出的陆军将领约翰·莫尔爵士（Sir John Moore）对此展开必要的调查，并明智地决定在莫尔提交报告后再考虑是否批准的问题。巴勒姆对行动计划大泼冷水，他既不相信火箭也不相信西德尼·史密斯。如果可以动用陆军部队，他认为还有一个好得多的袭击对象，那就是维尔纳夫的联合舰队。他由此提出，如果部队一定要出发，他们也应该去加迪斯。然而，莫尔私下向皮特表示布洛涅计划并不可行，于是这场突袭便在此戛然而止。[7]

与此同时，正如我们所知，拿破仑自己已经替巴勒姆和纳尔逊解决了那个令他们殚精竭虑的、向维尔纳夫发动攻击的难题。就在纳尔逊出现在圣文森特角时，拿破仑让联合舰队驶向那不勒斯的命令抵达了加迪斯。一听到消息，格拉维纳立即登上维尔纳夫的旗舰“布森陶尔”号，宣布他的14艘战舰已准备随时起程。遵照维尔纳夫的要求，他已指示西班

牙船厂向法军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为其装满物资补给；同时，维尔纳夫则下达了令人激动的行动命令。到下一个星期一，补充船员的必要部队就能尽数登船，他准备在那一天出航，“去推翻英国对大海的独裁统治”。然而在当天晚上，信号站却发来了1艘三甲板战舰与2艘74炮战舰从西方加入科林伍德舰队的消息。

维尔纳夫用低沉的口吻写道：“这使我们所知的港外兵力增加到了31艘战列舰。”此时他还并不知道纳尔逊已经驾临，部队的登船仍在继续。10月2日，部队登船完毕，但在当天夜里，格拉维纳收到了两份从里斯本发来的快件，其中的消息严重地动摇了他们的自信：纳尔逊据说已经“带着4艘战列舰和攻击、炮轰并烧毁联合舰队的宏伟计划”来到了港外。这则情报造成了令人震悚的影响。联合舰队立即停止了出海准备，他们急急忙忙地组建了一支轻型防御船队，成员包括炮艇、臼炮船以及任何能在恶劣天气下操控的船只，并从舰队中调配军官和船员。[8]此外，舰队也不再按照预案开出港外，对纳尔逊的恐惧使他们相信，更好的选择或许是远离危险的航道继续拥挤在港口里。但维尔纳夫仍然宣称，他准备在适宜的微风出现时率舰队出海。

在秋季的良好天气中，加迪斯在夜间往往盛行从东方吹来的陆风，便于船只驶出港外，到上午则转为从西方吹来的微风，便于船只驶入地中海。10月7日夜间，从东方吹来的微风已经出现，维尔纳夫打出了准备起锚的信号；但这则信号几乎立即被撤销，因为风势迅速加强，变成了一股真正的东风，“显然与我们将要采取的航向相反”。这个故事就是维尔纳夫所汇报的官方版本。[9]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更像是纳尔逊的抵达再次主宰了这位法国将军和他的同僚们的心神。自纳尔逊加入之后，西班牙的陆地信号站就再也看不到英国主力舰队。他们能看到的只有英军在港外留下的5艘巡洋舰，偶尔还能看到与之传递消息的战列舰。纳尔逊肯定就在港外，但谁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谁也不知道他的真正兵力。维尔纳夫在向德克雷报告其出航延迟时写道：“我不能对那些观察

统统不闻不问，从各方面发给我的报告都认为我军相较敌人处于劣势。他们的兵力，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是31～33艘战列舰，其中8艘是三甲板战舰，还有大量巡航舰。在这种情况下出港只会被认为是超出两国实力所及的癫狂之举。”他因此决定召开作战会议。然而，格拉维纳的参谋长艾斯卡尼奥却给出了召开会议的另一种更加真实的说法。据他所说，维尔纳夫在一天之前要求格拉维纳让舰队做好准备，他说他必须遵照上级命令，在补给装载完毕后立即起锚出海。艾斯卡尼奥说：“西班牙将军只得答复道，他认为有必要在起锚前召开会议，听取两国所有参谋官的意见。但在进一步讨论之前，他下令解散轻型船队，让军官们先返回自己的军舰。”

作战会议于次日上午在“布森陶尔”号上举行。维尔纳夫首先传达了法国皇帝的密令：“你要抓住最早的有利时机让联合舰队出航……不管你在哪里遇到敌人，只要他们处于兵力劣势，你就应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力求决定性的胜利。”据艾斯卡尼奥说，维尔纳夫基于这则命令向与会人员提出问题：他们应当出海，还是留在锚地上等待敌人发起攻击？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或许能摧毁敌人，从而打开出海的安全航路。西班牙军官们谨慎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一致支持格拉维纳的看法：由于英国舰队占据优势，拿破仑的命令并不要求他们在这个时候寻求这样的战斗，他们可以接受在锚地上迎击敌军。但法国人并不认可他们的顾虑，结果导致了一场极为激烈的争论。一些法国军官愤怒地坚持道，他们无疑应当出港，并立即与敌人交战。然而，维尔纳夫的参谋长普利尼舰长（Captain Prigny）指出，即便港外之敌仅有25艘战列舰，联合舰队也并无优势：“他们自1793年以来就一直不间断地待在海上，而我们的大部分战舰在过去八年中很少出海。”他因此提出，一支组织良好的轻型防御船队更可能取得成功，并极力主张上级的命令并不要求他们进行这种不可能取胜的战斗。马贡将军立即起身驳斥参谋长和西班牙军官的看法，他的态度和言辞极为激进粗暴，场面由此逐渐失控。西班牙陆军旅长加利亚诺将军起身抗议，据艾斯卡尼奥说，法国人的行为已

经超出了他（指加利亚诺）卓越高尚的荣誉感所能容忍的限度，他要求法方让马贡收回冒犯性言辞。会议立即陷入了硝烟弥漫的混乱状态。双方的争吵愈发激烈，直到格拉维纳突然宣布无须继续讨论，双方才安静了下来。格拉维纳总结道："联合舰队是否应当出海，取决于其兵力优势是否足以抵消其内在劣势。"他们随即进行了投票，而投票结果是继续留在港内。他们还同意重新从舰队中抽调人员组建轻型防御船队，直至便于出海的有利时机自行出现。[10]

这些海军将领就是这样来努力挽救拿破仑让舰队扑向克雷格和俄国人的鲁莽决定的。就在他们做出这个消极的决策时，纳尔逊接到了从本土发来的消息，首次得知了马耳他远征军的行动目的。这则消息最终让他厘清了思路，一幅明确的战役蓝图开始在他脑中成形。很显然，在接到消息时，他已经改变了诱使敌军出港交战的想法，随后制定了一个再也不曾改动的行动方案。我们有必要先弄清他手中的情报与当前的舰队部署，然后再来讨论这一点。

根据舰队已收到的9月20日的报纸，欧洲大陆的战事已经确定。而根据当地流言，拿破仑已经命令加迪斯舰队出海，但他们在作战会议上决定抗命，据说维尔纳夫已因此被德克雷免职。[11] 尽管这些消息强化了英军对联合舰队将在不久后出港的预期，但并未指明其目的地。他们有可能直接驶入地中海，但也很可能向北方或西方分头出击。英国战列舰集中于加迪斯，实际控制洋面的其实是轻便的巡洋舰，因此，纳尔逊对巡洋舰布局加倍留心。他刚刚向本土发出一封备忘录，其内容是他整个防区所需的最低巡洋舰兵力。[12] 就在这封备忘录的写作期间，他接到了有关克雷格的新指令。他由此对当前的舰队部署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改变。

在接掌指挥权之后，纳尔逊的第一个举措是让布莱克伍德召回加迪斯港外的路易斯将军。科林伍德此前曾派他去指挥一支近海舰队，其兵

力包括98炮战舰“王后”号、80炮战舰“卡诺珀斯”号以及3艘74炮战舰。这是一种十分正常的封锁布局，但除了特别情况之外，纳尔逊并不赞成采用这种方式——尤其是在加迪斯港外，从西方突然刮起的劲风很可能对近海舰队造成威胁。封锁实施者具有向敌人隐藏其兵力、位置与行动的主动权，这正是其内在优势，而纳尔逊决心最充分地利用这一点。他决定让整支战列舰队脱离敌人的视野，仅仅用布莱克伍德指挥的一支巡洋舰队监视港湾。这个新布局十分关键，它集中体现出纳尔逊对与敌舰队决战的高度期望：只要他们留出一个明显的逃跑机会，当前的紧迫局势就会迫使联合舰队起锚出海。近岸的布莱克伍德已经传来消息，称港内之敌正在装载部队，这使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敌人随时可能出击。与此同时，纳尔逊也在为消耗性的长期监视做着准备。他要处理的主要是补给问题，虽然在天气良好时，一些工作可以在原地由运输船完成，但为了使给养与淡水尽如人意，可靠的办法只有分批将战舰派往直布罗陀和特图湾。然而，这个令人为难的需要显然受到了其他任务的限制。目前，卡塔赫纳港内还有一支活动的敌舰队，他必须派兵对其加以监视。他必须防止这支舰队扰乱地中海或驶向直布罗陀海峡的贸易航线，更不用说必须阻止它溜进英军并未近距离封锁的加迪斯了。因此，10月2日，路易斯将军不情愿地接到了纳尔逊的命令。他的舰队要前往直布罗陀海峡，顺便护送一支开往马耳他的小型商船队。

纳尔逊为英国主力舰队选定的位置位于加迪斯以西16～18里格处。为了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他派“玛尔斯”号的达夫舰长（Captain Duff）指挥一支由4艘战舰组成的前锋舰队，在西班牙信号站的视距之外与布莱克伍德的巡洋舰队保持信号通信。他向布莱克伍德写道：“一旦海上刮起从东方吹来的微风，我就将驶向加迪斯，绝不会驶到它的北方。如果听说他们出港，我就将升起满帆，驶向南方的斯帕特尔角和阿拉切（Arrache）。”[13]

他预料敌军将乘着最早吹来的东风出航，在接到克雷格的消息之

前，这就是纳尔逊的真实想法。东风在10月5日出现。由于分出了路易斯的舰队，纳尔逊开始对海军部承诺给他而尚未到来的增援兵力感到十分担心。他在写给巴勒姆的信中解释了自己采取的措施，随后提出，他不能仅仅“破坏他们的远航”，更重要的是将之歼灭。一天之后，他在写给罗斯的信中更是加重了语气：“我对它们的到来，对未来几天内可能发生的事感到非常、非常、非常担心……皮特知道，国家特别希望赢得一场歼灭战……只有足够的数量才能歼灭敌军。因此，我希望海军部能尽可能早地派给我那支早已说好的兵力。”[14]

布莱克伍德关于敌军部队登船的报告让纳尔逊的焦虑达至顶峰，他将此转发给科林伍德，同时附上了自己对敌军用意何在的疑虑。根据自己的最新经验，科林伍德抓住机会向他的长官暗示其推测并不正确，其焦急也有欠考虑。科林伍德的回信表现出他对维尔纳夫头脑的惊人洞见：“尊敬的阁下，我将向您阐述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果他们乘着东风出航，他们又没有驶入地中海，您可以确信这是想让卡塔赫纳舰队加入他们。如果他们成功——在强烈的东风下的确可能——他们就会率领40艘战列舰来到我们面前。如果任何的好运使得路易斯与卡塔赫纳舰队相遇，我保证他能占据敌人的上风位置……一面法国舰旗或许能把他们引到我军阵前。不管卡塔赫纳的家伙在什么时候到来，他们都会点着舰尾的大灯。布莱克伍德舰长应当将此视为敌人到来的信号。”[15]

就在此后的第二天，纳尔逊接到了称克雷格准备在意大利展开行动的信件。传信者是10月8日加入舰队的“皇家君权”号，它此前已经完成了全面整修，被派来担任科林伍德的旗舰。尽管东风仍继续袭来，但纳尔逊的紧迫焦虑已随风而散。克雷格的行动指令使他最终确信，维尔纳夫的目的地就是地中海；而科林伍德的推测则使他相信，敌人将不会乘着东风出航。一旦他接纳了这种看法，他就立即坚定而专注地采取了行动。布莱克伍德发来敌军部队登船、准备乘着最新的东风出海的消息是在路易斯与舰队分离的第二天。在风向转为东风时，路易斯决定让舰队

中的2艘战舰继续护送商船队，而让剩余兵力重新加入纳尔逊。“但是，”詹姆斯在他的著作中告诉我们，“纳尔逊勋爵认为这是敌人为了弄清他的兵力而诱使他靠近加迪斯的诡计，于是命令少将继续执行他的命令。”[16]

因此，路易斯和他的舰长们再次极不情愿地离开了舰队。而布莱克伍德也接到了按照纳尔逊对局势的最新判断而制定的新指令，他还得到了增援部队，使其舰队实力达到了5艘巡航舰与2艘轻帆船。纳尔逊向他写道：“据那些比你我更了解加迪斯情况的人说，刮东风的好天气还会持续几天，之后，白天就会从西方吹来轻柔的海风，夜间则刮起陆风。如果敌人要驶入地中海，他们就会在夜间出港……驶向南方，在海峡入口搭乘海风，在我们得不到什么风声的时候通过海峡。”因此，纳尔逊采取了若干措施确保对这种行动的监视，并安排了特殊的远程夜间信号来提供告警。

眼下，纳尔逊对战列舰队的职责也有了十分明确的见解。他向科林伍德写道：“目前，我确定敌人的目的地就是地中海……如果敌军有所动作的话。如果他们可能出港，我就将打出信号，驶向海峡的入口。”[17] 此时，针对预想战斗的所有部署已经完成。他在此时发布了他的战斗阵型与著名的攻击计划[18]，也就是他自己所称的“纳尔逊式接敌”（Nelson touch）——此前，他只在接掌指挥权后的欢迎会上向他的舰长们口头解释过这个方案。[19]

在此后的一周中，除了阿勒芒制造的骚扰与遣送考尔德返回本土接受审判的痛苦任务，一切仍保持着平静。10月13日，爱德华·贝里爵士率领“阿伽门农”号加入了纳尔逊的舰队，他带来了刚刚从法军手中惊险逃脱的消息。这使他们相信阿勒芒仍在北方的比戈附近，而考尔德刚刚在前一天夜里驾乘“威尔士亲王”号离开舰队，纳尔逊十分担心他会落到法军手里。这支横亘在他与本土之间的交通线上的敌舰队自然使他十分

焦虑。他从一位在格恩西私掠船上俘获的法国军官口中得知了阿勒芒此前的航线及其具体兵力。更多的情报则来自“勤奋”号，也就是那艘将阿勒芒正在英吉利海峡入口处的消息通知给康沃利斯的补给船。斯特罗恩护送着它驶往南方，把它安全地交到了洛布的手里，随后便在比戈港外悄悄展开巡航——他认为将会驶入港口的阿勒芒正在附近。[20] 纳尔逊对斯特罗恩也极为担心，14日时他向布莱克伍德写道：“我希望他有更强的兵力，但我确信他能结束敌人的巡航。”17日，他又向科林伍德写道：“我希望他的舰队里有一艘强大的三甲板战舰。”[21]

剩下的时间，他则忙于部署如何控制意大利海域——即便不考虑敌人对通信线路的扰乱，这本身也是极大的难题。克雷格的远征在他的头脑中占据了相当重的分量，于是，他派“阿伽门农”号去执行与克雷格合作的指令。此前他已告知海军部，他在先前的请求外还需要3艘巡洋舰用于与远征军保持联系。现在，他十分焦急地想派10艘战列舰前往他最初的阵位——撒丁岛和西西里，但这在解决维尔纳夫的威胁之前并不可行。他唯一能期望的只是派出由“华丽”号舰长济慈指挥的强大的巡洋舰队，但这在短期内同样无法实现。然而，他对于支援克雷格的任务看得如此之重，以至于不惜采取极端手段，向路易斯下达了一则命令：他应当护送马耳他商船队驶过卡塔赫纳，然后再返回主力舰队。[22] 此时，他似乎已不再对敌军会很快出港抱有什么期待。他正在筹集臼炮艇、纵火船、康格里夫火箭和弗朗西斯先生的“鱼雷”，准备用它们来强行结果敌军。[23] 但是，他仍将决战的主要希望寄托于物资封锁的缓慢压迫和英俄联军在南意大利的刺激。纳尔逊的信件并未提到这点，但他一定曾与科林伍德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至少知道，科林伍德对维尔纳夫的无所作为感到莫名其妙。他在18日向纳尔逊写道：“加迪斯港内的家伙毫无动作，这真是太奇怪了。如果他们纵容意大利的战事发生，他们今后就再也不可能完成所需的支援任务了，而他们本可以在第一时间提供支援。”[24]

科林伍德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洞见，他对加迪斯港内正在激化的事态的推想完全正确。就在他写下这些字句时，那个关键的时刻已经到来。

联军作战会议的初步决定正在拿破仑的预料范围之内。他已经为此采取了防备措施，但这些措施的结果却比他的计划来得更快。10月12日，在作战会议的四天之后，前去接替维尔纳夫的罗西利将军抵达了马德里。此时，科尔多瓦（Cordova）以下的道路已被大批土匪盘踞，西班牙的驿站网络已经瘫痪。法国大使向他提出警告，让他在旅途安全得到保障之前不要继续前行。距离加迪斯只剩十天的路程，但在时间过半时，维尔纳夫就接到了罗西利抵达西班牙首都的消息。他立即猜到了这则消息的含义，但没有对任何人吐露半点风声，在10月18日——科林伍德写下前述信件的同一天——突然向马贡将军下达了一则命令。他要求马贡让7艘战列舰与1艘巡航舰在夜间出海，尽力俘获布莱克伍德的舰队，探明其后方的英军兵力。然而，就在马贡准备执行命令之前，陆地信号站传来了路易斯的分舰队在直布罗陀的消息。该消息称，之前在那里等待护航的商船队已在4艘战列舰的保卫下驶向东方，还有2艘战列舰留在港口里。[25] 维尔纳夫据此推断，纳尔逊所部一定缺少了6艘战列舰，现在就是自己的行动时机。虽然没有任何消息或现象能证实他的推断，但维尔纳夫已决定孤注一掷。他没有咨询任何人，便升起了全军准备起锚的信号旗。[26]

---

[1] 康格里夫火箭的灵感源自印度土邦的火箭部队。1804～1805年，炮兵上校威廉·康格里夫制成了改进版的火箭，弹头重32磅，射程可达1800米。后经不断改进，射程可达4000米。最初用尾焰燃烧杀伤，后来又配备了爆炸弹头，是袭击木质舰船的利器。火箭最初装备给海军，供海军炮兵和陆战队从军舰或专用的火箭艇上发射。1806年被投入了对布洛涅船队的袭击，取得良好成效，随后开始大规模使用。——译者注

[2] Keith to Admiralty，July 12th：*In-Letters*，557.巴勒姆在收录信件时认为基斯建议进行的封锁是外交部的一个问题，于是将纪要发给了外交部，对方不予同意。

[3] *Foreign Office*（*Sicily*），25.Elliot to Mulgrave，August 1st （*via* Rome），endorsed，“Received Sept.17th at night.” Paget to same，August 29th and 30th，“most secret，” received the same day：*Foreign Office*（*Austria*），74.Craig’s despatches are in *War Office* （1）250，July 20-1.

[4] 老皮特与纽卡斯尔公爵曾是1750年代针锋相对的政敌。1754～1756年七年战争初期，纽卡斯尔出任首相，后因梅诺卡岛陷落而辞职。1757年，老皮特试图上台，但因无法得到议会多数而被迫与纽卡斯尔联合组阁，纽卡斯尔出任名义上的首相，以此应对危机。——译者注

[5] Castlereagh to the Admiralty，September 21st：*In-Letters*（*Sec.of State*），4200.

[6] *Secret Orders*，1363，September 21st.

[7] Maurice，*Diary of Sir John Moore*，ii.109.Castlereagh to Moore，September 23rd.Barham to Castlereagh，September 25th.Pitt to same，October 6th. *Castlereagh Correspondence*，*2nd Series*，i.86-117；and Stanhope，*Life of Pitt*，iv.337：“沃尔默堡（Walmer Castle），1805年10月6日——亲爱的卡斯尔雷——你将从莫尔将军那里得知我们交流的内容，这使我确信任何附带的登陆企图都太过冒险。我仍在积极考虑采取什么有效措施的可能性，同时，我相信你不会再因为基斯勋爵与海军部对此的反对而感到为难。你在回复巴勒姆勋爵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非常正确……除此之外，欧洲大陆还没传来任何的新消息，这让我十分失望。——您真诚的，W.皮特” See also *Barham Papers*，iii.155 et seq.

[8] Escaño（Gravina’s Chief of the Staff）to Don Enrique MacDonnell，Captain of the *Rayo*： Desbrière，*Trafalgar*，*App.*，p.98.

[9] Villeneuve to Decrès，Oct.8th：Ibid.，p.96.

[10] “Procès-verbal du Conseil du guerre，&c，” and Escaño’s letter to Captain MacDonnell：Ibid.，pp.97-9.

[11] Bourchier，*Life of Codrington*，i.53.Codrington wrote Duplex instead of Decrès.

[12] Nicolas，vii.85-6，107.在他的申请中，8艘巡航舰和2艘轻帆船用于辅助战列舰队，2艘巡航舰和4艘轻帆船用于保持直布罗陀和里斯本之间的交通线。对于侦察和贸易封锁任务，他申请用3艘巡航舰分别布置在斯帕特尔角、圣玛丽角和马德拉群岛，再用2艘轻帆船布置在圣文森特角，1艘巡航舰与1艘轻帆船布置在卡塔赫纳港外。此外，直布罗陀港区司令还要求用2艘巡航舰和3艘轻帆船保卫海峡，地中海内的其他区域还要求3艘巡航舰和6艘轻帆船，克雷格的

远征船队也申请3艘巡航舰作为护航兵力。

[13] 依照森豪斯尉官（Lieutenant Senhouse，Humphrey Fleming Senhouse）——后来的汉弗莱爵士（Sir Humphrey）——的看法，纳尔逊的位置选择是基于以下几个目的："首先，要给敌人留出逃跑的机会；其次，要防止我军舰队被冬季从西方涌来的潮水冲入直布罗陀海峡……最后，还要能在布雷斯特舰队前来与加迪斯舰队会合，而加迪斯舰队尚未出港支援之时截击布雷斯特舰队。" *Macmillan's Magazine* ，vol.81，p.415.

[14] To the Right.Hon.Sir George Rose，Oct.6.这封信常被视作纳尔逊偏好用许多战舰对抗单个目标的证据，但应当注意的是，他要求罗斯派来的是"那支早已说好的兵力"。除了他们已经派出的"胜利"号、"皇家君权"号与另外2艘74炮战舰，他所期待的预定兵力还包括"伦敦"号与"巴夫勒尔"号这2艘98炮战舰、"阿伽门农"号64炮战舰与"贝尔岛"号74炮战舰。这8艘战舰中有一半是三甲板战舰。（To Blackwood，Oct.8 and 9，Nicolas vii.88 and 90.）在他发给巴勒姆的正式信件中，他从未谈及"数量"，只提到"从英国派来的战舰"。（Oct.5，Ibid.，p.75.）在这封发给罗斯的信中的表述也是如此。

[15] Nicolas，vii.81 note.

[16] Hubback，*Jane Austen's Sailor Brothers* ，p.149；James，*Naval History* ，iv.380；Log of the *Canopus.* 布莱克伍德的消息来自一艘瑞典船。

[17] Nicolas，vii.110，October 10th.

[18] 即附录Ⅰ中起草于10月9日的备忘录。——译者注

[19]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维尔纳夫按纳尔逊最早预计的时刻出海，那时的纳尔逊还没有准备好他的战术备忘录。

[20] Log of the *Cœsar* .

[21] Nicolas，vii.121 and 126-7-9.在18日，我们还能找到另一则证据表明纳尔逊对三甲板战舰的态度。科林伍德在谈到让战舰从淡水运输船处搬运淡水时说："我想，您会想要装满三甲板战舰。"Ibid.，note.在他看来，战舰质量似乎比数量更加重要。

[22] Hubback，*Jane Austen's Sailor Brothers* ，p.152.在10月17日，位于特图湾的路易斯从一艘巡航舰那里接到了命令。他在此时派74炮战舰"多尼戈尔"号（Donegal）驶入直布罗陀港，补充舱底的补给品。

[23] 弗朗西斯就是著名的美国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的化

名。他发明了多种水下爆炸装置，将之命名为“鱼雷”（Torpedo）。其中一种设计是用一根较长的系带连接着两个雷头，可以顺着潮水放出，让系带缠在下锚战舰的锚链上，待雷头被潮水推到战舰下方，定时装置就会引爆炸药。1804年10月，这一设计已在实验中取得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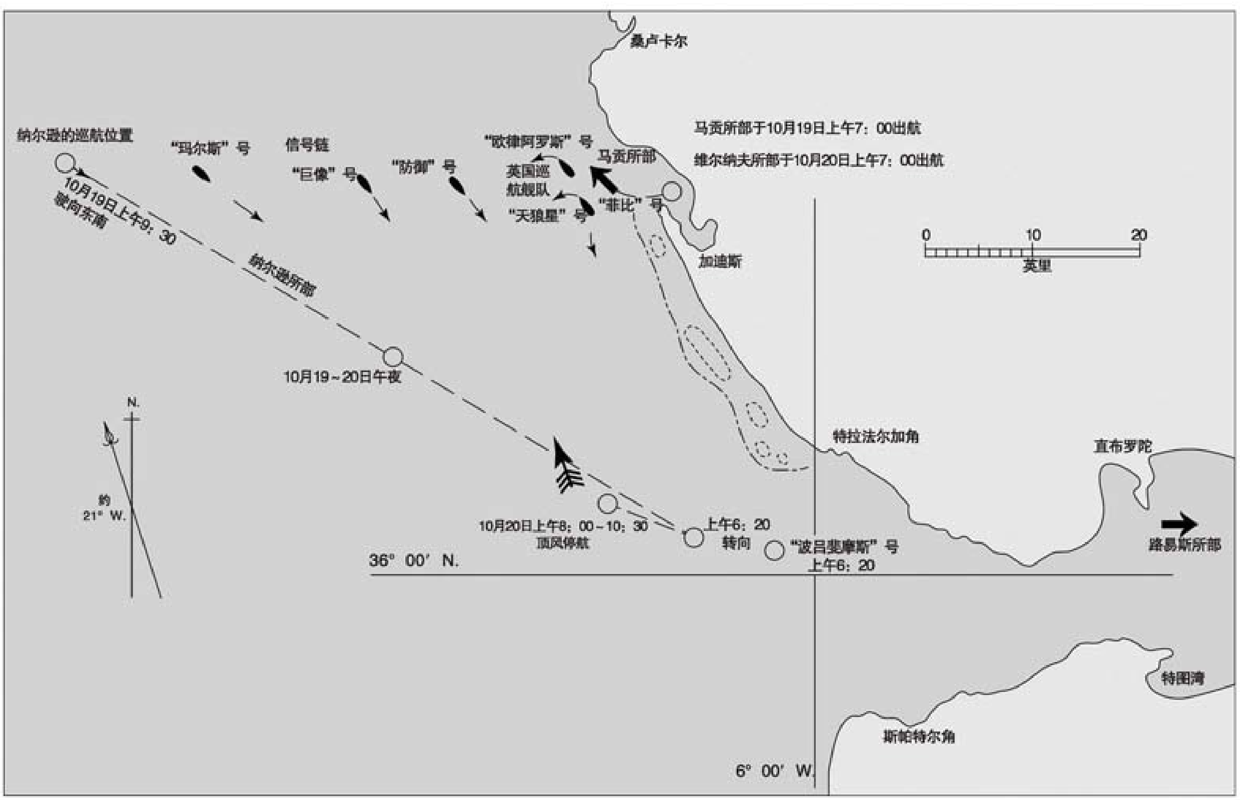
[24] Nelson Papers，*Add.MSS.* 34968.

[25] 其中之一是纳尔逊刚刚派来的74炮战舰“多尼戈尔”号，它“被迫进入港口两天时间”。Nelson to Collingwood，Oct.19th：Nicolas，vii.127.另一艘可能是74炮战舰“热情”号，与它一起的还有40炮巡航舰“恩底弥翁”号（Endymion），它们都是路易斯最初派去护送马耳他商船队的舰只，但“都成了受损难行的船”。

[26] Villeneuve to Decrès，Oct.18th（two letters）：Desbrière，*Trafalgar*，*App.*，pp.101-2.

第二十二章 主力舰队相遇

10月19日早晨6时，最靠近海岸的英国巡航舰“天狼星”号（Sirius）打出信号：“敌舰升起了上桅帆。”7时，它打出了英军期盼已久的第370号信号：“敌舰正在出港或开始航行。”十分钟后，布莱克伍德将这则消息转发到了位于其西方的“菲比”号巡航舰。随着天色渐明，这则消息又被传给了达夫分舰队中最靠东方的“玛尔斯”号战列舰，随后在9时30分抵达了纳尔逊的旗舰。他正位于加迪斯以西约50英里处。纳尔逊毫不迟疑，不待组成航行阵型便打出了“全面追击，东南方”的信号，紧接着打出准备战斗的信号。[1]



1805年10月19～20日 马贡出港，纳尔逊向东南方追击

资料来源：Alfred Hugh Taylor，“The Battle of Trafalgar，” The Mariner’s Mirror，Vol.36，Issue 4，1950，pp.281-321。

与此同时，布莱克伍德则继续监视正乘着微弱的陆风努力出港的敌军，他将麾下的两艘轻帆船中的一艘派去警告路易斯，另一艘则派往纳尔逊处。下午3时，他转发了友舰的信号，称敌舰队已驶入大海——尽管这时只有马贡的分舰队成功驶出港外。纳尔逊则继续驶向东南方。自他从英国政府处得知克雷格行动重要性的那一刻起，他已决心要阻止维尔纳夫进入直布罗陀海峡，而在此时此刻，他还有另一个自己的目的。在发给路易斯的指令中，纳尔逊曾让他“不要错过任何从东面吹来的风”，即使这将让商船队必须等待下一支舰队的护航。最新刮来的东风使他燃起了希望，他希望能遇到驶出海峡的路易斯，使他在决战中能动用舰队的全部兵力。[2] 为了尽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在夜幕降临时，纳尔逊决定按照在地中海的实践经验以及他提出的战术备忘录组建一支前锋舰队（Advance Squadron）。这支分舰队拥有9艘双甲板战列舰，由达夫舰长驾乘着“玛尔斯”号进行指挥，其中5艘在舰队前方侦察，其余4艘负责用信号联系布莱克伍德的巡洋舰队。[3] 由于在夜间实施机动时很可能无法使用信号旗，主力舰队的其他战舰则遵循惯例，在夜间密切观察总旗舰的动向。与此同时，他用组成航行阵型的命令取代了之前的“全面追击”，但在最近的航行中，“不列颠尼亚”号（Britannia）、“亲王”号（Prince）与“无畏”号这3艘三甲板战列舰的航行状况非常糟糕，他只好让它们自行选择便利的阵位。[4] 这个小小的变数值得我们特别加以留意：纳尔逊事先编定的“战斗阵型”和“攻击计划”由此开始崩塌，而他灵活的头脑也开始意识到实际状况中的战术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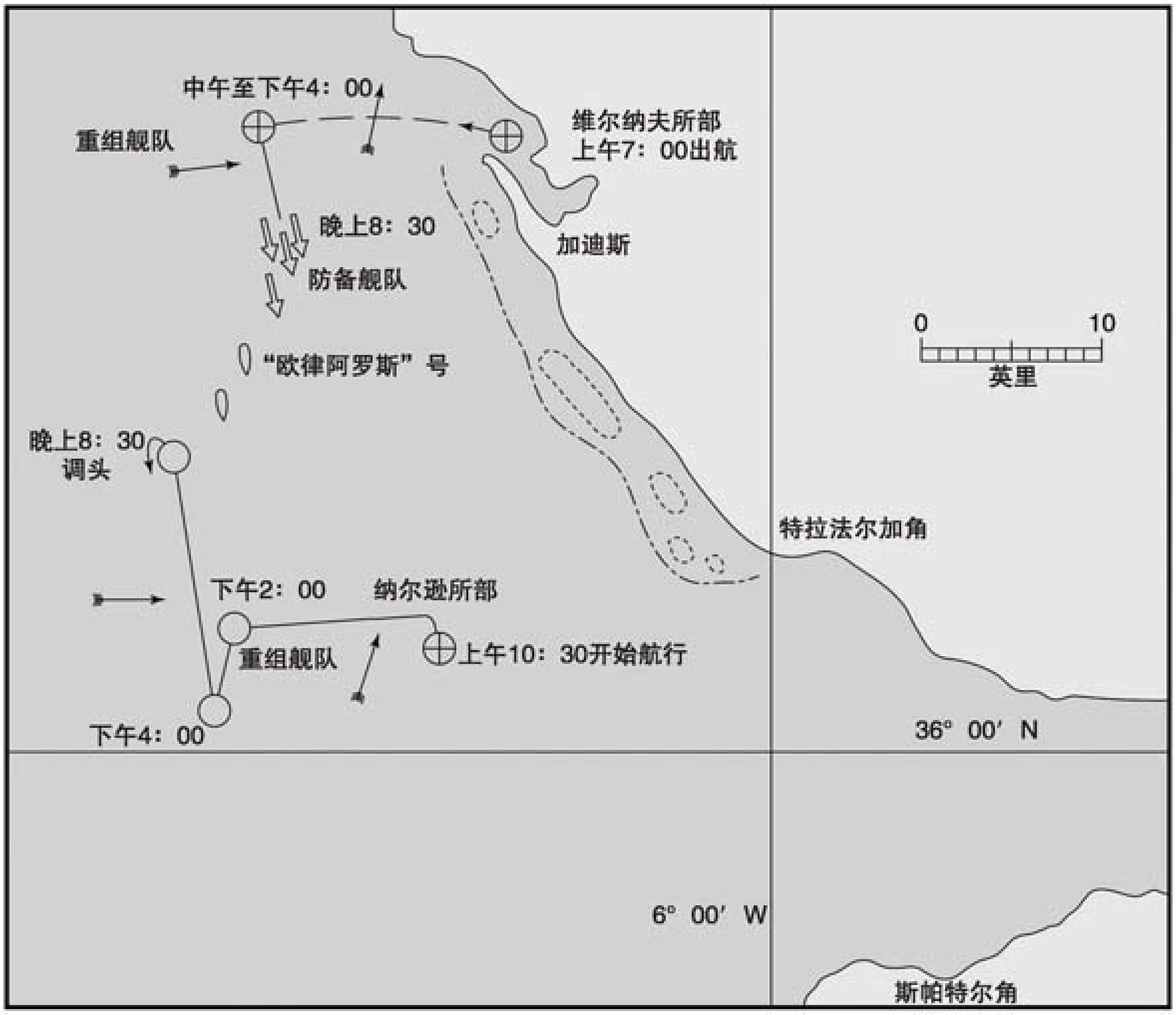
20日凌晨1时，纳尔逊抵达了预想位置，于是转为顶风缓行（hove-to）。破晓时分，他发现自己位于特拉法尔加角和斯帕特尔角之间，直布罗陀已位于其舰队视距之内。在逐渐明亮的海面上，每个人都焦急地

搜寻着路易斯舰队的身影，但他们却一无所获。事实上，在路易斯首次折返纳尔逊驻地并被纳尔逊再次派往直布罗陀后，盛行的东风迫使他在向东的航程上花费了五天时间。直到15日，他才在特图湾补充好了给养和淡水。随后，他启程重返纳尔逊麾下，但一阵西风又将他赶回特图湾。在17日再次起航前，他接到了纳尔逊发来的让他护送马耳他商船队继续前进的命令，随即遵照命令改变了行动。结果，他错过了布莱克伍德派出的轻帆船，而当纳尔逊在斯帕特尔角和特拉法尔加角之间搜寻他的时候，他正位于200英里之外，且仍在向东航行。直到21日——决战爆发的那一天——路易斯才在提奈斯角（Cape Tenez）离开了商船队，随后按照惯常的方式返回卡塔赫那港外，为船队继续提供掩护。[5]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卡塔赫纳港内的舰队实际上一事无成，尽管他们没有完成拿破仑为之设计的任何行动，但他们却在决战时刻阻挠了英国舰队的关键集结。如果想要理解海上形势的准确预测要比陆地上的情况困难多少，这是一个最佳案例。海军战略和陆军战略之间存在着根本而深刻的差别，这主要就是由于贸易保护任务的急迫性。

无迹可寻的路易斯舰队让纳尔逊的官兵们深感失望，而另一个更糟糕的麻烦也在这时缠上了他们。他们信心高涨地准备在破晓时分投入战斗，但维尔纳夫却并未出现；随着太阳升起，暴风雨也一道袭来。良好的天气已经结束，雾气和雨水笼罩着海面，使能见度变得非常有限。在极度的紧张焦虑中，英军开始在雾中搜寻敌人，但没能发现任何踪影。联军到底去了哪里？柯德林顿在当天上午向他的妻子写道：“我们所有的良好期待都落了空，我们本希望在良好的天气下、在轻柔的微风中与敌军交战，但现在却在非常暴烈的强风和大雨中紧收着帆，并发现卑劣的法国人返回了加迪斯。”这个看法显然仅仅是在没有发现敌人时所做的推断。他又加上一句：“如果他们还在海上，我们就一定会从直布罗陀海峡发起一次果断的冲锋，然后追上他们。”[6] 如果联合舰队不在加迪斯，他们还能在哪？能够确定的至少有一点：在这样糟糕的天气中，他们不可能保持他们原本的位置上。纳尔逊向巴勒姆写道：“我必须避

免在加迪斯附近遇上一阵西风，这支舰队有这么多三甲板战舰，必定会被吹进海峡。”[7] 因此，在足够明确的敌军情报到来之前，他决定利用一阵西南偏南的强风驶回他先前的驻地。

就在他刚刚做出这个决定时，布莱克伍德的一艘巡航舰升起了他们期待已久的信号：敌人正在朝他们的北方航行。纳尔逊立即下令组成航行阵型，并在一小时后让“胜利”号顶风停航，召唤科林伍德上舰商议。据说，科林伍德希望立即发起攻击，但纳尔逊却并不同意。我们只能猜测他的反对理由。或许，他认为科林伍德的提议将导致战斗发生得太晚，战场太靠近加迪斯，难以实现战斗的决定性，此外，目前的风向也无法使他们迅速投入攻击。他所做的只是重新组成航行阵型，随后扬着满帆驶向西北方，仿佛在诱使维尔纳夫从近岸一侧悄悄溜过去。[8]



10月**19**～**20**日 维尔纳夫出港，纳尔逊开始与敌军接触

资料来源：Alfred Hugh Taylor，“The Battle of Trafalgar，” *The Mariner’s Mirror*，Vol.36，Issue 4，1950，pp.281-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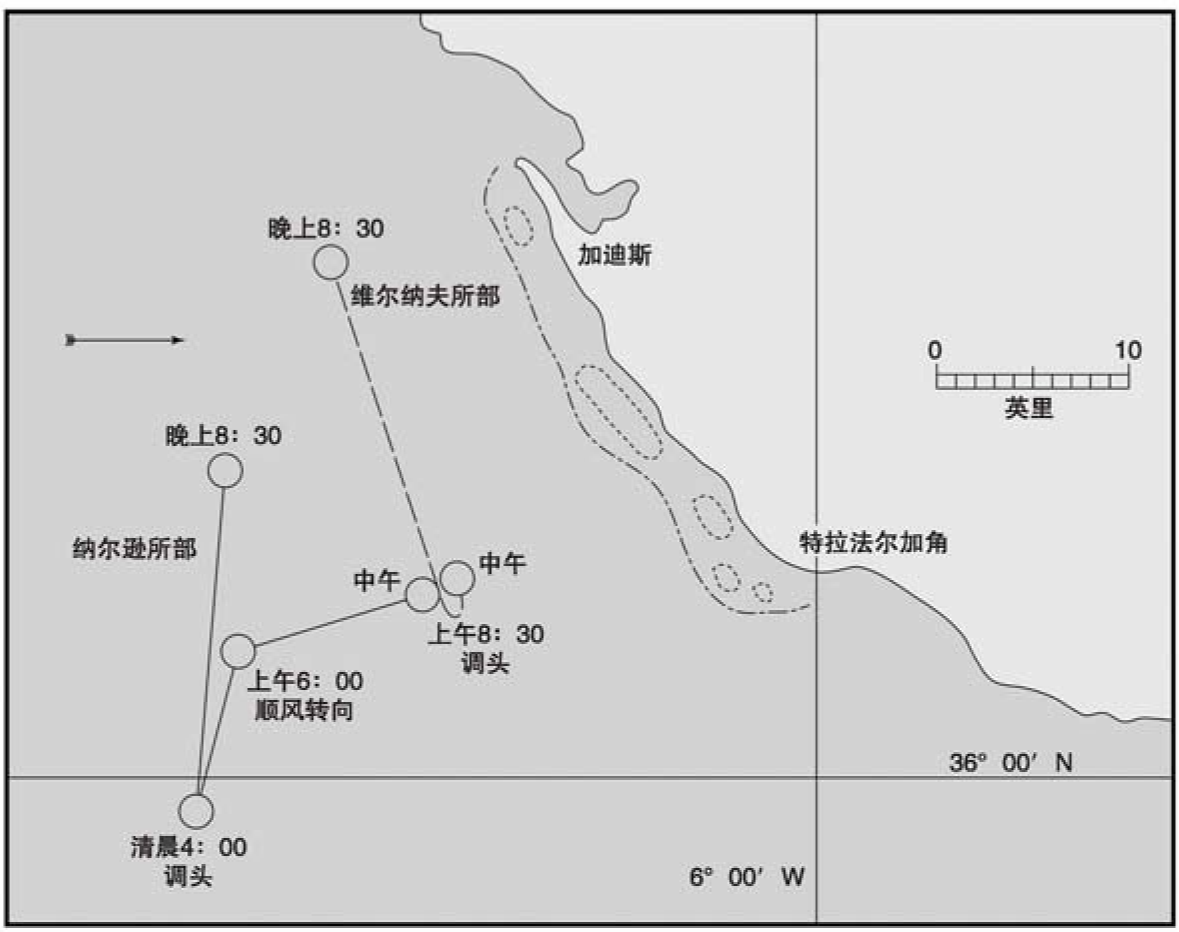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纳尔逊还传唤了达夫和他麾下的两名舰长，指示他们要与布莱克伍德和当面的敌人保持接触。然后，他并未召回前锋舰队中的其他战舰，继续朝着他选定的方向航行，这或许是为了避免过早与敌接触，或过早暴露己方的兵力。到中午时，他已经位于加迪斯西南方约20英里。布莱克伍德派出的轻帆船在此与他取得了联系，向他报告了发现40艘敌舰在前日夜里驶出港外的消息，但敌人出港后的行动仍是一个谜。然而到下午时，布莱克伍德又用信号旗发来了一则足以厘清局势的

消息，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敌人没有在海峡入口处遭遇英军。这则消息的内容是，敌人看来已决定向西航行。纳尔逊在日记中写道：“纳尔逊会去阻止他们，在他的掌控下，他们不会得逞。”不管有意或无意，他此前选择的航向正好符合此时的需要；他于是继续前行，直至舰队航向在下午2时被忽然变化的风向偏转到西北偏西。航行阵型因此陷入了混乱，这使他在恢复阵型之前无法展开任何行动。

其实，他们对维尔纳夫的真实意图感到费解丝毫不足为奇，因为联军没能在海峡入口处现身其实是由于他无法控制的航海环境。布莱克伍德在19日晚间报告了联合舰队驶入大海的消息，但实际上，在微风中完成这一任务超出了他们的航海能力。直至20日接近中午时，整支联合舰队才在港外开始航行。纳尔逊的推断并没有错，维尔纳夫的意图的确是直接驶入地中海；但在舰队出港后，海面上的南风转变成了西南风。纳尔逊正是乘着这股风势扬着满帆从海峡折返，而维尔纳夫——正如布莱克伍德报告的那样——则被迫转向西方。在这个航向上，他开始艰难地组建航行阵型。

联合舰队的组织遵循着“同等战列”的旧式战术观念，并用多余兵力组织了一支预备队（corps de reserve）。维尔纳夫相信，路易斯的离去将使纳尔逊仅仅拥有20艘战列舰，他便为“战斗舰队”（corps de bataille）安排了同等兵力。战斗舰队被分为三支分舰队，由他本人直接指挥。剩余的12艘战舰则被组建为“防备舰队”（escadre d’observation），下辖两支分舰队，如同纳尔逊的前锋舰队一样作为预备队。这支舰队由格拉维纳指挥，他的行动指令是基于一种历史悠久的战术安排：他应将防备舰队保持在战斗舰队的上风靠前处，如果敌人在任何部分集中兵力，他就可以前去提供支援。可以看到，维尔纳夫已确信纳尔逊会运用集中兵力的原则，他构想出的舰队组织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这也是唯一一种能适应其战术执行能力的作战计划。然而，在改变了方向的强风中，联合舰队缺乏凝聚力、航海能力低下的缺陷却表

现得愈发明显。他们的机动极为不便，在三个小时的艰苦努力后，笨拙的舰队仍然没能组成阵列。下午4时左右，西南风转为西风。尽管联军远未组成航行阵型，维尔纳夫却认为他必须抓住机会驶向南方，于是打出信号，令全军向下风方向转舵。这一命令使得联军的混乱程度几乎无法挽救，使得组成航行阵型需要付出远比之前更为艰苦的努力。他们只能紧挨着最靠下风处的战舰开始列队。维尔纳夫试图保持右舷迎风（close-hauled on the starboard）的航向，似乎想要占据纳尔逊的上风位置，或者抓住合适的机会驶入海峡。然而，组建阵型的巨大困难迫使他只能驶向南方。傍晚时分，英国巡航舰报告了他的这一动向。



战斗前夜

资料来源：Alfred Hugh Taylor，“The Battle of Trafalgar，” *The Mariner’s Mirror*，Vol.36，Issue 4，1950，pp.281-321。

维尔纳夫舰队遇到的困难不足为奇。在风向变化之后，纳尔逊也花了两个钟头来重组航行阵型。[9] 他因此让舰队右舷迎风，使其舰首指向西南方。但到下午4时，也就是维尔纳夫让舰队转向下风时，纳尔逊决定让左舷迎风转向。此前，他并不知悉敌军的航迹，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他曾得到有关敌人行动的任何消息。但是，布莱克伍德的“欧律阿罗斯”号急速赶到战列舰队中，直接向“胜利”号打出了旗语。他带来的消息并不是发现敌军，而是敌人的先导舰正在他的北方航行。[10] 于是，英国舰队转而采取北略偏西的航向；到这时，纳尔逊一定已知道他正在直接冲向敌军。雾气已被西风吹散，海面上的天气再次变得明朗起来；在太阳落山之前，从逼近加迪斯的英舰桅顶已能看到好几艘敌舰。[11]

那么，纳尔逊是否考虑过夜间交战呢？这或许并不可能。一位在场的军官告诉我们，当时英国舰队中的通行看法是认为敌人并不想返回加迪斯，但他们在恶劣天气下仍然待在海上，这表示他们很可能试图冒着交战的风险要逃离这里。就在此时，纳尔逊最终决定集结舰队。在日落时分，除了两三艘用于通信的战舰，整支前锋舰队都被重新纳入主力舰队的航行阵列。[12] 与此同时，他已占据了他曾在早先的备忘录中描述的最佳进攻位置——正如我们所知，他偏好用纵队两端直接接敌，如此一来，敌人就不知道他要从上风方向还是下风方向展开攻击。[13] 如果他打算在此时进攻，这一定会导致一场维尔纳夫已预料到的夜战。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这种意愿。当前锋舰队并入主力舰队后，他只是用信号通知布莱克伍德，让他的巡洋舰队在夜间与敌人保持接触。20日晚8时，担心随时可能遭到攻击的维尔纳夫首先打出信号，命令各舰以最便捷的方法组成战列线。与此同时，纳尔逊则再次转往外海的方向，使英军的阵列指向西南。[14] 联军因此而大受鼓舞，他们相信英军要如他们预料的那般逃窜。然而，英国舰队却紧随在联合舰队的上风处，确保敌人无法成功逃脱。

这个机动在整支英国舰队中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只有一艘战舰例外，结果对即将来临的海战造成了微妙的积极影响。64炮战列舰“阿非利加”号（Africa）显然没有接到信号，它继续驶向北方，最后与主力舰队失去了联系。[15] 纳尔逊扬着满帆一直行驶了8个小时，布莱克伍德每个小时都通过军舰信号链为他发来敌军位置的消息。清晨4时，风向转为西北偏西，他再次下达了“驶向东北方”的命令，但“胜利”号的日志却记录了更为精确的“北偏东”，而他们在此前的一整夜里都在朝这个方向航行。

然而，这些机动的结果却是使英军的航行阵型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我们应当注意到，在那个时代，舰队遵照固定阵型进行巡航并非惯例，航行阵型很少保留到夜间，特别在这个案例中，他们还要在黑夜里执行机动。因此，到破晓时分，英军的队列已算不上任何像样的阵型。科林伍德显然位于其分舰队的前端，但纳尔逊却落在大多数战舰的后面。当光线足够明亮时，法军所看到的英国舰队只是“不成形”的乱糟糟的一大堆船，两艘彼此靠近的旗舰位于中央，散乱的战舰则从东南方延伸至西北方。[16]

于是，两支相距8～9英里的舰队开始沿着东北与西南的航向相互接近。早晨6时许，海面上的亮度已足以使两军遥遥相望。纳尔逊发现，联合舰队正以一种难以辨别的阵型驶向直布罗陀海峡。他的生命与这场战役的关键时刻已经来临。他应该怎样行动？他应当随机应变，还是按照预定计划展开攻击？在警报响起的第一刻，他最为关切的又是什么问题？死神从我们面前夺走了答案。我们只能收集起散落在这片神圣海域的零散碎片，恳请它们为我们揭示其间的无价之秘。

---

[1] 对于纳尔逊此时的具体位置还存有一些争议。他在日记中写道：“南风，加迪斯位于我方罗经东北偏东的16里格。”这里需要考虑地磁变化，根据西班牙战舰“蒙塔涅斯”号（Montañés）的日志，附近的地磁偏角是偏西20度（Desbrière，*Trafalgar*，*App.*，p.374），因此，东北偏东实际上就是东北方。

然而，在南风迎面吹来时，他不可能朝正东南方行进（风帆战舰无法驶入与风向夹角小于6个罗经点即67.5度的范围，而东南方与南方间的夹角是45度——译者注），这个位置与这个航向也不可能让他驶向海峡。纳尔逊打出的信号是升起单旗，鸣炮两响，再升起东南罗经旗，其含义是“全舰队向东南面（south-east quarter）展开追击”。我们可以将他的航向理解为东略偏南，这个方向仍可算在罗经的东南半弧（quarter）里。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是纳尔逊记载的位置有误。当天中午，“胜利”号的航海日志显示其位置是北纬36°6′、西经7°30′，加迪斯位于其东方19里格。这正是他的常规驻地，若从此出发，驶向东南方的确可以前往海峡。没有任何资料说明纳尔逊曾转移舰队驻地，因此，日记中的“东北偏东”可能是“东南偏东”的笔误。按照“勇莽”号的航海日志，英军的航向在风向为南偏东时是东偏南；当风向变为西南偏西时，英军航向才转向东南。

[2] Nelson to Collingwood，October 18th and 19th：Nicolas，vii.127，129.纳尔逊发布给路易斯的指令已经佚失，但据纳尔逊说，他让其“不要错过任何从东面吹来的风”，即使让商船队必须等待下一支护航舰队。

[3] 早在1790年，地中海舰队便曾组建过前锋舰队，这并非纳尔逊的独创，很可能是从法军那里借鉴而来。参见*Signals and Instructions*（*Navy Record Society*） p.72。此时的这支前锋舰队的兵力部署并不明确。柯德林顿在给妻子的信（*Life* ，i.57）中写道：“以上4艘［‘阿伽门农’号、‘防御’号、‘巨像’号（Colossus）、‘玛尔斯’号］和其他更多的战舰现在组成了一支前锋舰队，我相信我们明早就能（与路易斯）会合并发现敌人。”他还说，他的座舰“俄里翁”号与另一艘战舰“贝尔岛”号也在其中，并被派往舰队前方。“防御”号和“阿伽门农”号是最靠近加迪斯港的战舰，而“玛尔斯”号与“巨像”号则作为通信舰。“勇莽”号记载了一则发往“贝尔岛”号、“俄里翁”号、“利维坦”号、“波吕斐摩斯”号与“柏勒洛丰”号的第155号信号：“在便于使用夜间信号进行交流的距离上，点亮舰尾的灯笼，在夜里保持对前方的小心监视。”参见*Masters' Logs* ，3706。而曾经在“贝尔岛”号指挥陆战队的欧文上校（Colonel Owen）也说，有5艘战舰被派往前方。参见Allen，*Memoirs of Sir W.Hargood* ，p.137。因此，前锋舰队必定拥有9艘战列舰，这也意味着它占据了纳尔逊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这是非同寻常的极大比例。

[4] *Private Diary* ，Nicolas，vii.133，and *Téméraire's* Signal Log，*Masters' Logs* ，3706.这则命令造成了一种有趣的后果，它使法军相信，这三艘战列舰被组成了一支见机行事的分舰队。

[5] Log of the *Queen* . Hubback，*Jane Austen's Sailor Brothers* ，p.152.

[6] Bourchier，*Life of Codrington* ，i.58.

[7] Nicolas，vii.76.

[8] 贝蒂医生（Dr.Beatty）写道：“8时，‘胜利’号顶风停航，科林伍德将军……来到舰上接受指令。”柯德林顿则这样写道：“周日早晨，为表示对科林伍德的尊重，纳尔逊勋爵打出了向他咨询的信号，召唤他登上旗舰。纳尔逊向哈迪开玩笑说，他不会听从科林伍德的观点，除非他自己也同意。在征询意见时，科林伍德的看法倾向于立即发起攻击。但纳尔逊勋爵决定暂不执行攻击计划，直到联合舰队行驶得更远，直到他们看起来不会再改变想法返回加迪斯，而是坚持其原先目的。”这是柯德林顿在多年之后口述给女儿鲍彻女士（Lady Bourchier）的若干片段之一。参见*Life of Codrington*，i.59。

[9] Hardy’s Journal：*Captain’s Logs*，414.

[10] Log of *Euryalus*：Great Sea Fights，ii.167.“在4时10分，向‘胜利’号打出第413号信号，北方，鸣炮两响。”这一信号位于信号簿的附录章节，根据霍普舰长（Captain Hope）的信号簿复印件，其含义是“敌舰队先导舰航行在随后展示的罗经方位”。“欧律阿罗斯”号的记录时间比“胜利”号早了三刻钟，“胜利”号记录的信号时间是在3时30分左右，“勇莽”号则说是“那伊阿得”号在3时34分打出了信号。

[11] Lieutenant Senhouse to his mother：*Macmillan’s Magazine*，vol.81，p.416.

[12] See Colonel Owen’s letters.Allen：*Memoirs of Hargood*，p.138

[13] 其早年的战术备忘录可参见*Fighting Instructions*，p.315。“另一种方法是在可以操控的满帆下直接驶向对方最前端的战舰，这样可以使敌人无法得知我要驶向他的上风还是下风方向。”

[14] 此时已经入夜，他打出的是夜间信号的第31号，随后焚起蓝光以标示自己的位置：*Téméraire’s Signal Log.*

[15] 森豪斯尉官向他母亲写道：“‘阿非利加’号在夜间离开了舰队。”参见*Macmillan’s Magazine*，1900。它并非如某些人说的那样是被派往前方侦察。

[16] 此问题可参见德斯奇霍在其著作中引用的大批指挥官报告，特别是法国舰队参谋长普利尼绘制的示意图。另外，从不同英舰的日志对敌军方位的不同记述中也可以看出彼时英国舰队的混乱。“胜利”号记载敌军位于东方到东南偏东。“皇家君权”号的记载是东南偏东到东偏北，它肯定是位于“胜利”号以南。“不列颠尼亚”号的记载是东南偏东，它位于“胜利”号前方。“勇莽”号记载为东南方，更加靠前。“尼普顿”号的记载是东偏南，接近“胜利”号。科林伍德纵队的“无畏”号看到敌人在东北偏东，它因此位于“胜利”号的西南方，处于上风位置。纳尔逊纵队的“斯巴达人”号则认为是北偏东，“征服者”号记载为东北方，这两艘战舰显然都在纳尔逊身后，但“米诺陶”号、“阿伽门农”号、“埃阿

斯”号与“阿非利加”号则位于前方。

第二十三章 纳尔逊的攻击计划[1]

从特拉法尔加海战的第二天开始，纳尔逊的攻击是否遵照了他的备忘录就成了一个长期饱受争议的问题。一些完全有能力做出正确判断的军官对此表示肯定，但另一些具备同样判断力的人却给出了无可置疑的否定答案。

科林伍德小心翼翼地带过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做出直接回应。他在官方报告中只是这样写道："攻击方式已在早先确定，并已告知给副将和舰长，这只需要很少的信号"——但事实上，他们显然打出了不少信号。两个月后，他在写给托马斯·帕斯利爵士（Sir Thomas Pasley）的私人信件中说，纳尔逊决定采用的计划得到了良好的展开与极好的执行。在更早的信中，他对这里所指的"计划"做出过解释："纳尔逊勋爵决定用一场迅猛的两路攻击代替准确排列的战阵。他指挥上风舰列，而将下风舰列交由我来全权指挥。他还指定了攻击的对象。"然而，这显然并不是对备忘录中攻击计划的完整概括，这些描述与一场分头发起的"全面追击"式的攻击并没有多少差别。两者的区别仅仅得到了些许暗示，纳尔逊打算实现其意图的精妙细节则被完全忽略。因此，科林伍德最多只说到两路分头进攻的意图得到了执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清楚纳尔逊备忘录的要点。他那仗义忠诚的品格绝不允许他说得更多。在他关于那场海战的所有文字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已高尚地决定要回避一切可能贬损其亡友荣誉或使这场胜利不再全然属于纳尔逊的细节问题。

在海战中，哈维舰长（Captain Harvey）指挥的"勇莽"号

（Téméraire）紧随在纳尔逊的旗舰之后。“勇莽”号的日志显示，他是对这场海战最为细致、最有条理的观察者，而他的说法也与科林伍德相同。他写道：“战斗在午后开始，是按照纳尔逊勋爵发给我们的指令来进行的。”这里的“指令”到底是指行诸文字的“攻击计划”，还是指接敌过程中口头传达的指示，人人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但我们显然无法排除“攻击计划”的可能性。另外两位持肯定态度的见证者同样是含糊其辞。在海战的三十年后，当年指挥“俄里翁”号的柯德林顿回忆道，他曾让他的第一尉官注意纳尔逊投入战斗时的出色行动：“将军多么漂亮地执行了他的计划”；但在战斗的一周后，他却向一位海军部官员写道：“我们全都以最快的动作乱糟糟地投入战斗。”[2] 最后，这里还有一段由“防御”号的霍普舰长（Captain Hope）记在他的备忘录副本上的文字：“我们同意这些就是纳尔逊勋爵攻击法西联合舰队的指令。”以上这些就是目前所知的所有肯定性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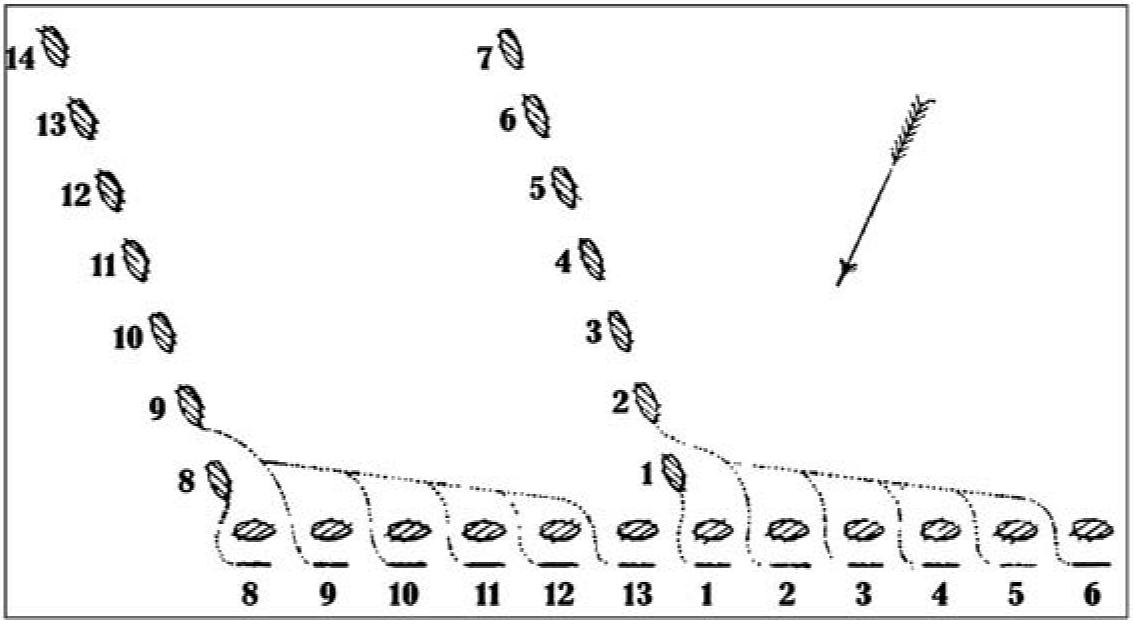
较之这些证据，否定性结论的证言则更为丰富，其表达也更为明确。科林伍德分队中的“复仇”号的舰长莫尔森（Captain Moorsom）表示：“纳尔逊勋爵在战斗之前制订了一个正式计划，但并未执行”；“科林伍德将军直冲了下去，他得到了能够跟上的战舰的支援，直接穿过了他们的战列。纳尔逊勋爵也同样如此，其余战舰也尽快照做”。在他看来，两支舰队投入战斗的方式并无区别，两者都发动了近乎垂直的攻击，因为两条舰列都“直冲了下去”，而非驶向平行于敌军战列的指定位置，再组成顶风战列。[3] 他的儿子，在战术研究领域享有崇高声誉的康斯坦丁·莫尔森将军（Admiral Constantine Moorsom）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他在《海军战术原则》（*Principles of Naval Tactics*）——目前唯一有关旧日海战的原创性专著——中写道：“战术机动与科学原则此时都已被完全改变。”[4]

唯一一份由在场军官撰写的详细批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份材料写于1820年，其作者是汉弗莱·森豪斯爵士（Sir Humphrey

Senhouse），他曾在伊斯雷尔·佩留（Israel Pellew）指挥的“征服者”号上担任尉官，并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脱颖而出，指挥海峡舰队与地中海舰队的旗舰。[5] 他的批评针对着那个一直不存在争议的事实，即英国舰队是以两列纵队依次向前进攻。他认为，“如果坚持之前制订的计划”，攻击效果会更好。他说：“这位几乎永无过失的将军所发动的攻击与他之前在指令中规定的行动有所不同，他的分队队形由横队（a line-abreast）变成了纵队（a line-ahead）。”他认为，这一变化既丧失了同步冲击力，也丧失了集中进攻兵力的优势。他声称两路纵队前端接敌的攻击形式在参战者当中毫无争议，事实也的确如此。“勇莽”号的哈维舰长写道：“你要知道，我们是以两路纵队（columns）驶向敌人。”所有谈到这一点的人都是同样的说法。

完全能了解事实过程的查尔斯·伊金斯爵士（Sir Charles Ekins）对此同样坚信不疑：“舰队中所有舰长都知道，从上风发起的攻击与事先的安排有所不同，其性质更加令人惊叹。”[6] 我们的确可以认为，当时在场或直接相关的军官们在详细谈到这一问题时都曾表示，实际发起的攻击与备忘录中的计划在关键细节上存在着巨大差别——这个结论已将那些粗略的概括、推论和附言排除在外。

对于那些惯于掂量证据分量的人而言，这里还有一份最无可怀疑的证据，那就是由当时的海军参谋所做的判断。没有任何推论可以撼动这则证据：在这场海战后刊发的新版信号簿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攻击信号，其“释义”（Signification）表明，它来源于特拉法尔加海战的经验与纳尔逊备忘录的要领。这则信号就是“以两列纵队的航行阵型切割敌军战列”，它的配图是两支纵队几乎以垂直姿态向前发起攻击。长长的指令解释了依次投入战斗的方法及其战术优点，认为这比同步冲击更为有利。[7]



1816年版信号簿中的**“**特拉法尔加信号**”**插图

来自外国的最精详的批评也与此高度一致。格拉维纳的参谋长艾斯卡尼奥在战斗的六周之后向西班牙政府递交的评估报告中总结道：“最具水兵作风也是最优秀的战术，莫过于让一支舰队占据另一支舰队的上风，然后以两支独立的舰列向它冲去，在敌舰的开火距离上展开成战列线。但纳尔逊将军并没有在我军开火距离上展开他的舰列，而是一直冲到手枪射程（pistol-shot）内，突破了我军战列。我不认为会有许多人效仿他的这种方式。”[8]

那么，在面对这些坚实而权威的陈述时，我们如何才能解释目前通行的、认为纳尔逊遵照了他的备忘录展开战斗的观点？答案或许就在备忘录的文本当中。

就如其他同类文件一样，在分析这个著名的文本时，我们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两类构想：第一类是主要战术，第二类是实施细节。第一类构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纳尔逊与他最为亲信的幕僚——济慈舰长——的谈话，当时，纳尔逊正在默顿等候召唤。据说，纳尔逊向济慈表示：“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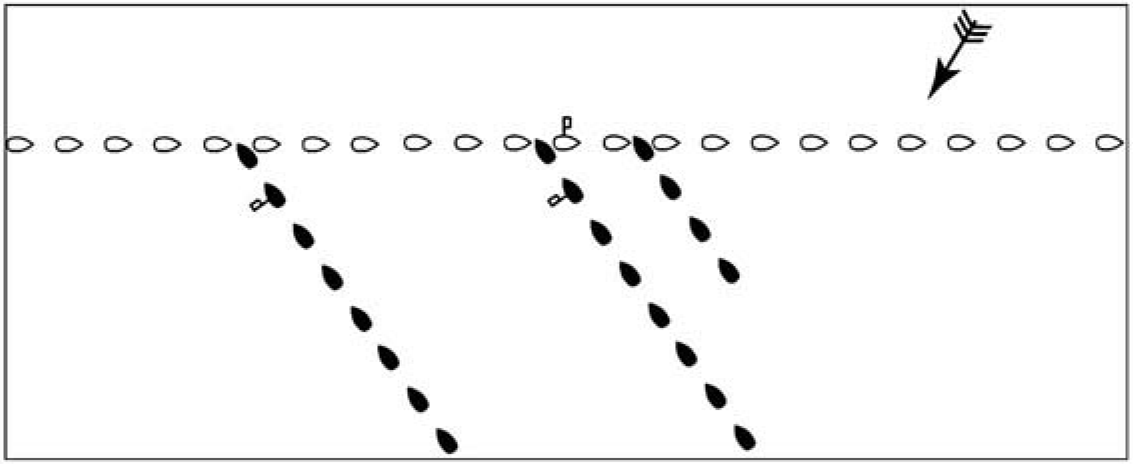
照旧体系，一个白天的时间不足让以两支舰队列队并打出一场决定性的战斗……我将把舰队分成三支分队，形成三支纵队。一支分队将由12～14艘最快的双甲板战舰组成，我会将之保持在上风处或有利的位置上……我想它应始终服从我的指挥，我会把它投入我所选定的任何局部战斗中去……舰队的剩余部分组成两支纵队，我会尽量让它们一起行驶到敌人战列上距离前端三分之一长度的位置……我认为这会让敌人感到惊讶和困惑，让他们不明白我用意何在。然后，它会被卷入一场我所希望的混战。”让我们先把第三支分队留待之后讨论。除了这一点之外，这个方案似乎比纳尔逊的备忘录更符合实际发生的战斗。当然，“让它们一起驶向敌人”和“混战”的说法似乎表明，济慈的记忆可能经历了一种我们所熟知的心理加工，被后来实际发生的那场战斗染上了某些色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在这里看到纳尔逊的三个主要构想：其一，以多支分队而非一支纵队发起攻击；其二，集中攻击敌军后卫；其三，将攻击方式与攻击点隐藏到最后一刻——这已是他所有构想的四分之三。不过，他的备忘录较此更为精妙，其中还包括完全由纳尔逊独创的第四点构想。在7月22日的菲尼斯特雷海战中，考尔德的主要构思同样是集中攻击敌军后卫，他同样直到非常靠近时才组建战斗阵型并展开攻击。但是，考尔德的进攻却被敌军前卫调头支援后卫的机动挡了下来。正是在这里，纳尔逊的备忘录针对这种行动提出了最为精彩也最具原创性的重要见解。其他观念都不是他的独创：两路进攻来自邓肯的坎伯当海战（Battle of Camperdown）[9]；他构想的接战方法脱胎于埃尔丁的约翰·克拉克提出的梯阵接敌法[10]，而考尔德的战斗则为他警示了敌军可能会采取的行动。

纳尔逊在备忘录一开篇就提出，交战时间的延迟与让大型舰队从航行阵型改组成战列线密不可分。他因此决定将舰队组织成一种航行阵型等同于战斗阵型的方式，只是有一条保留条款：“总司令和副司令的旗舰例外。”这一条非常重要，它意味着在航行阵型中两位司令官通常引领着各自的分队，但在战斗阵型中则会指定其他位置。假设他有一支拥

有40艘战舰的舰队，它将由两支各有16艘战舰的分队与一支拥有8艘（占总兵力五分之一）最快的双甲板战舰的前锋舰队组成——后者最终并未出现，我们暂时先不讨论这一点。

接下来则是一个全新的构想：在了解总司令的意图之后，副司令将全权指挥他自己的舰列。备忘录中的语句并未明确表示副司令将从什么时候起接掌独立指挥权。不过，根据之后段落的说明，纳尔逊所谓的“在了解我的意图之后”，至少在从上风发起进攻的情形中，是指攻击实际发起的时间。根据其说明，纳尔逊本人将指挥舰队“行驶至接近敌军中军的火炮射程之处”，随后他会向科林伍德打出很可能事先已经约定的、他准备以何种方式展开攻击的信号，并告诉其在敌人发起反击时他可能希望的行动方式。之后，纳尔逊重申道，“在总司令表达了其意图之后”，下风舰队的全部指挥权就将交给副司令。这只能意味着，独立指挥权是在纳尔逊向同僚打出进攻信号时直接开始生效。换句话说，他这个清晰的原创构想就是由自己指挥接近敌人，然后向他的同僚赋予自主行动权，让其完成特定部分的任务。[11]

在阐述主要战术之时，其间他还谈到了一些实施细节，对应于敌人位于上风处或下风处的两种情况。当敌人位于上风、英军从下风处进攻时，他会以三支舰列展开攻击（见下页示意图）。科林伍德将率领舰队尽其所能地穿过从后端数第12艘战舰，集中攻击兵力仅有其四分之三的敌人。纳尔逊的舰列将穿过敌军中军；前锋舰队则在距此数艘战舰处穿越，“以保证攻击到他们的总司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将他俘获”。围攻敌军主帅的构想恢复了中世纪战术的核心观念。的确，在这份不朽的备忘录中，对各种有效战术原则的融会与协调无疑是其最为出色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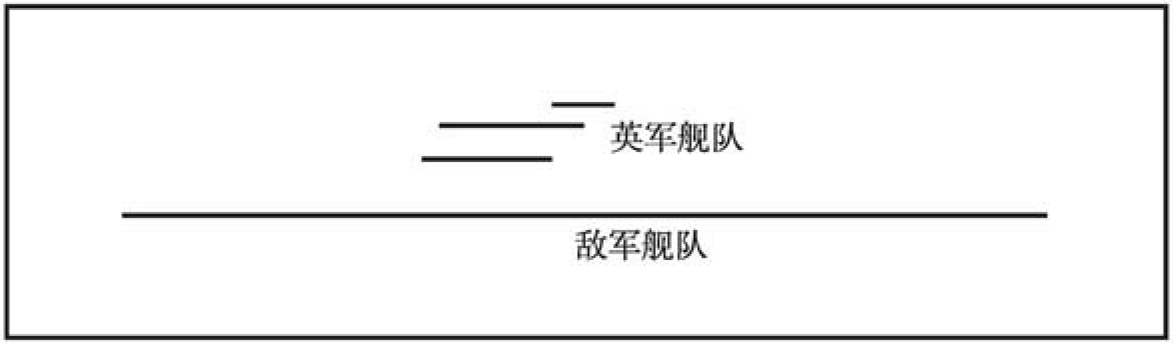


纳尔逊从下风处发动进攻的作战计划

资料来源：译者据10月9日战术备忘录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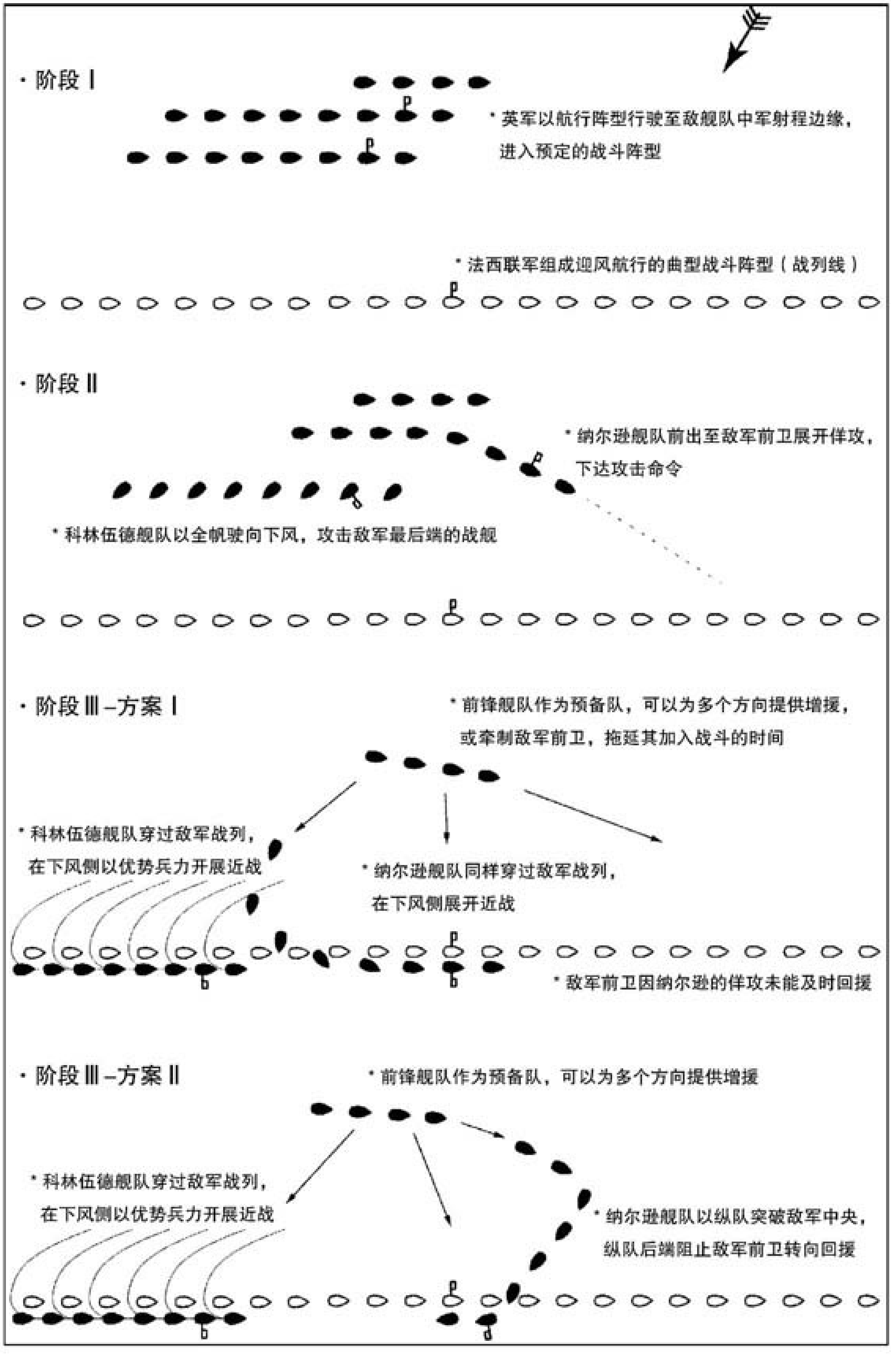
随后，他又继续阐述其主要战术。英军的作战原则是用整支舰队集中攻击敌人从舰队末端到主帅之前的战舰。这将使20艘左右的敌舰不会遭到攻击，它们可能像7月22日战斗时的格拉维纳那样行动，但纳尔逊认为自己的攻击方式足以应付任何折回支援的完好敌舰。他说："他们在执行机动、驶近攻击英国舰队的任何部分或支援友舰之前一定会耗费一些时间，而且他们定会卷入交战的战舰。"他清楚地表明，如果最糟糕的情况发生，那么就会发生一场混战（mêlée），这必然会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他接着说："我有信心在敌军前卫能够支援后卫之前赢得胜利，然后，大多数英国战舰就能准备好迎击他们的20艘战舰。"对这一段的总结又回到了战术细节，他细致地阐述了敌军前卫折返之后需要采取的行动；但如果并非从下风处发起进攻，英军或许也不会实施这些细节。接下来的部分则与从上风处发起攻击有关——这是他希望达成并选择的攻击方式。这部分的开头是"从上风发起预想的攻击。敌人已组成战列线，准备迎接进攻"。在这种情况下，"英军分队将首先行驶至接近敌军中军的火炮射程之处"，他还在此给出了一张示意图（见下页示意图），用以表明理想的位置。之后最可能打出的信号是让下风舰列一齐驶向下风，攻向敌军最后方的12艘敌舰——同之前一样，敌军兵力应为

己方的四分之三。[12]



在纳尔逊指定的位置上，副司令将可以发起豪勋爵那样的攻击，从敌军战列的各处间隔进行穿越；他们可以如约翰·宾将军在梅诺卡岛海战中尝试的那样，扬起所有风帆，以横阵攻向敌人。纳尔逊写道：“一些战舰可能无法在他们的准确地点穿越，但他们总是能支援友军，只要任何战舰在敌军后卫周围，他们都能有效地完成歼灭12艘敌舰的任务。”

这种从上风处发起的攻击将会面对两种广为人知的反制措施，纳尔逊必须对此提出应对策略（见下页示意图）。敌军很可能一齐倒转航向，使其后卫变为前卫；或者执行旧日的法国战术教科书中的那种机动，集体转向驶向下风，使试图穿越的攻击者遭到两面夹击，同时避免遭到纵射。无论如何，科林伍德都应坚决攻击指定给他的那12艘战舰，并力求贯彻，“除非总司令另有指示，但这几乎不用指望”。敌舰队的剩余部分将留给纳尔逊来对付，但除了“他会努力尽量不干扰副司令的行动”外，他并未阐明他的意图。简而言之，他的主要职责是牵制敌军前卫，再依照实际情况展开一些次要的战术。



· 阶段 I
* 英军以航行阵型行驶至敌舰队中军射程边缘，
进入预定的战斗阵型
* 法西联军组成迎风航行的曲型战斗阵型（战列线）
· 阶段 II
* 纳尔逊舰队前出至敌军前卫展开佯攻，
下达攻击命令
* 科林伍德舰队以全帆驶向下风，攻击敌军最后端的战舰
· 阶段 III–方案 I
* 前锋舰队作为预备队，可以为多个方向提供增援，
或牵制敌军前卫，拖延其加入战斗的时间
* 科林伍德舰队穿过敌军战列，
在下风侧以优势兵力开展近战
* 纳尔逊舰队同样穿过敌军战列，
在下风侧展开近战
* 敌军前卫因纳尔逊的佯攻未能及时回援
· 阶段 III–方案 II
* 前锋舰队作为预备队，可以为多个方向提供增援
* 科林伍德舰队穿过敌军战列，
在下风侧以优势兵力开展近战
* 纳尔逊舰队以纵队突破敌军中央，
纵队后端阻止敌军前卫转向回援

纳尔逊从上风处发动进攻的作战计划

资料来源：译者据10月9日战术备忘录与纳尔逊的信号指令绘制。

在驶近敌人之后，他可能像科林伍德那样多点突破，也可能以纵队阵型在一点上突破敌军战列；同时，他并未指定前锋舰队在上风攻击中的特定职责，这支部队可能会一直作为预备队，在局势需要时为两位将军提供支援。相较于多点突破，他显然更倾向于风险更大的单点突破。然而，这种战术在英荷战争之后就已不再使用，因为使用者必须面对巨大的危险：首先，领头的战舰可能在接敌过程中被敌人的集火射击打败；其次，跟随穿越敌阵的战舰也有可能被敌人分割包围。常有人说，纳尔逊从未权衡过其中的风险，但这种愚行绝不符合他的性格。在这里，他用他那无可比拟的战术直觉权衡了风险，并提出一个没有先例的反制意见。这个高度原创的科学构想是将较快的速度与集中在攻击点的强大炮火结合起来。有史以来，这是首次提出攻击应在全帆状态下——而非通常的“战斗帆”状态下——展开。这样一来，他就能得到最高的航速，从而最大限度地强化其冲击力，最大限度地缩短其危险时间。

下一个应对之策更加非同一般。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纳尔逊将大部分三甲板战舰布置在舰列前端。这种集中兵力的方法源于法国战术家比戈·德·莫罗盖在1763年写成的《海军战术》中提出的意见。罗德尼曾为这种布局拟定一则信号，但它是被纳尔逊首次实践，用以克服他自己的战术方案中最大、最明显的缺陷。以旧方法组成的纵队从未成功突破过组织良好的战列线，但纳尔逊认为，他已在法国战术理论中看到了前人不敢尝试的解决方案。为了那致命的一击，他用任何人都无法抵抗的强大火力武装了他的纵队前端，这使他能用投射量和冲击力打败久经考验的防御阵列。他的前卫舰群是如此强大，即便敌人将之分割包围，它也能独自应对任何围攻的威胁。在风帆海战的巅峰时刻，理论家与实践者的身份已在此合二为一。将炮火集中在尽量少的单位，集中于尽量短的战线，这就是纳尔逊在面对棘手危机时向伟大的法国战术家所寻求的

理论支援。

莫罗盖集中兵力的办法已在纳尔逊的脑海里酝酿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将重型战舰集中于前卫的部署方法已经在追击维尔纳夫期间发布的两份战斗阵型中出现。[13] 当然，这两种部署或许是出于其他的考虑，甚至是出于偶然。但即便如此，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的英军阵型必定是来自莫罗盖的观点。奇怪的是，在海战中实际采用的战斗阵型没有任何材料流传下来。最有可能的解释是，纳尔逊在路易斯分舰队加入之前并不打算展开攻击，因此从未给这支被迫投入战斗的缺编舰队制定阵型。10月10日，纳尔逊将他制定的最后一份战斗阵型与他的备忘录一道公布，这也是我们唯一所知的阵列。联合军种研究会（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的博物馆收藏了一份原始的阵型抄件，这份抄件有签名和落款时间，发布于“加迪斯港外，1805年10月10日”。正如下表所示，这个阵型是按照海军部向他承诺的40艘战舰的兵力规模设计而来。考尔德此时仍在舰队中，因此，这个阵型包括了他的座舰和路易斯的分舰队，留为空白处的则是一些随时可能抵达的增援。最终未能参战的战舰被标示为斜体，并在括号里注明了缺席原因。

航行阵型

前卫\右舷分队,攻击敌军中卫				后卫\左舷分队,攻击敌军前卫			
第一分队	1. “勇莽”号	Téméraire	98 炮	第一分队	1. “亲王”号	Prince	98 炮
	2. “华丽”号(未抵达)	*Superb*	*74 炮*		2. “玛尔斯”号	Mars	74 炮
	3. “胜利”号	**Victory**	**100 炮**		**3. “皇家君权”号**	**Royal Sovereign**	**100 炮**
	4. “尼普顿”号	Neptune	98 炮		4. “雷鸣”号	Tonnant	80 炮
	5. —				5. —		
	6. “虎”号(路易斯分队)	*Tigre*	*74 炮*		6. “柏勒洛丰”号	Bellerophon	74 炮
	7. “卡诺珀斯”号(路易斯分队)	*Canopus*	*80 炮*		7. “巨像”号	Colossus	74 炮
	8. “征服者”号	Conqueror	74 炮		8. “阿基里斯”号	Achille	74 炮
	9. “阿伽门农”号	Agamemnon	64 炮		9. “波吕斐摩斯”号	Polyphemus	64 炮
	10. “利维坦”号	Leviathan	74 炮		10. “复仇”号	Revenge	74 炮
第二分队	***11. “威尔士亲王”号(随考尔德返航)***	**Prince of Wales**	**98 炮**	第二分队	**11. “不列颠尼亚”号**	**Britannia**	**100 炮**
	12. “埃阿斯”号	*Ajax*	74 炮		12. “敏捷”号	Swiftsure	74 炮
	13. “俄里翁”号	*Orion*	74 炮		13. “防御”号	Defence	74 炮
	14. “米诺陶”号	*Minotaur*	74 炮		14. —		
	15. —				*15. “肯特”号(未抵达)*	*Kent*	*74 炮*
	16. “王后”号(路易斯分队)	Queen	*98 炮*		*16. “热情”号(路易斯分队)*	*Zealous*	*74 炮*
	17. “多尼戈尔”号(在直布罗陀)	Donegal	*74 炮*		17. —		
	18. “斯宾塞”号(路易斯分队)	Spencer	*74 炮*		18. “雷神”号	Thunderer	74 炮
	19. —				19. “挑战”号	Defiance	74 炮
	20. “斯巴达人”号	*Spartiate*	74 炮		20. “无畏”号	Dreadnought	98 炮

说明：加黑者为将领座舰。

除了在舰列前方集中重型战舰之外，这份文件中还有一个特点值得注意。可以看到，这支舰队被分为两支分舰队（squadrons），其下又划分为四支分队（divisions），每支分队拥有各自的将官。自豪和肯彭菲尔特的改革以来，一支舰队通常被划分为三部分，即拥有三支分舰队，而在这种规模的舰队中，一支分舰队通常被分为两支分队。另一种常见的组织方法是将中卫舰队的两支分队分别划入前卫和后卫，从而形成由两支“大分队”（Grand Divisions）组成的双列舰队。由此可见，两支分舰队、四支分队的舰队结构无疑是一个创新，但我们并不能确定它是否出自纳尔逊。另外，这份阵型抄件中并未提到备忘录所设计的前锋舰队。[14]

如果纳尔逊在此之后还发布了其他战斗阵型，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它没有任何副本流传至今。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相信，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使用的阵型就是随着备忘录一同公布的阵型，只是根据实际的紧急情况做了些许修改。根据现存的有关战舰如何投入战斗的多种材料，我们只需简单地弥合未出场战舰在表格中造成的空档就能得出实际的战斗阵

型，但是其中有一处重要的例外。在实际战斗中，“不列颠尼亚”号显然隶属于纳尔逊的分舰队，根据它自己和其他两艘战舰的说法，它是战列上第6艘战舰。我们可以很自然地猜想，由于考尔德返回本土，海军少将诺塞斯克勋爵（Lord Northesk）便接替了他的位置，而他的旗舰“不列颠尼亚”号也就成为纳尔逊第二支分队的领舰。诺塞斯克原先的位置自然由路易斯接替，后者此时已成为纳尔逊麾下的排位第四的将军。但由于路易斯已离开，科林伍德第二支分舰队的领舰只能暂时由“无畏”号担任——它是科林伍德在“皇家君权”号到来之前搭乘的旗舰。[15]

基于以上推论，我们便得出了如下表所示的在战斗中实际使用的缩编阵型。

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可能阵型

前卫\上风舰队				后卫\下风舰队			
第一分队	1.“勇莽”号	Téméraire	98 炮	第一分队	1.“亲王”号	Prince	98 炮
	2.“胜利”号	**Victory**	**100 炮**		2.“玛尔斯”号	Mars	74 炮
	3.“尼普顿”号	Neptune	98 炮		**3.“皇家君权”号**	**Royal Sovereign**	**100 炮**
	4.“征服者”号	Conqueror	74 炮		4.“雷鸣”号	Tonnant	80 炮
	5.“利维坦”号	Leviathan	74 炮		5.“贝尔岛”号	Belleisle	74 炮
	6.“阿非利加”号(?)	Africa	64 炮		6.“柏勒洛丰”号	Bellerophon	74 炮
					7.“巨像”号	Colossus	74 炮
					8.“阿喀琉斯”号	Achille	74 炮
第二分队	**7.“不列颠尼亚”号**	**Britannia**	**100 炮**	第二分队	9.“无畏”号	Dreadnought	98 炮
	8.“埃阿斯”号	Ajax	74 炮		10.“波吕斐摩斯”号	Polyphemus	64 炮
	9.“俄里翁”号	Orion	74 炮		11.“复仇”号	Revenge	74 炮
	10.“阿伽门农”号	Agamemnon	64 炮		12.“敏捷”号	Swiftsure	74 炮
	11.“米诺陶”号	Minotaur	74 炮		13.“防御”号	Defence	74 炮
	12.“斯巴达人”号	Spartiate	74 炮		14.“雷神”号	Thunderer	74 炮
					15.“挑战”号	Defiance	74 炮

说明：此表按照实际登场的战舰对 10 月 10 日发布的阵型修改而来。加黑者为将领座舰。

事实上，这个阵型与现存的有关战舰如何投入战斗的所有材料都不完全相符。但是，这些材料中也并没有任何两份能完全相符，并没有任何一份有排斥其他材料的明确权威，它们在细节上全都存在着这样或那

样的缺陷。因此，10月10日的正式阵型仍为我们提供了纳尔逊构想的舰队组织的最佳推论。我们可以在这个阵型中看到，纳尔逊在上风舰队的前卫集中了3艘三甲板战舰，但其中又插入了1艘74炮战舰——这是由他特别亲密的济慈舰长所指挥的强大的“华丽”号，他已向济慈承诺，如果能及时到来就让其待在自己身边。[16] 由于期盼着本土的增援兵力，他或许还准备安排第4艘三甲板战舰，于是将第5艘战舰留为空白。科林伍德的舰列同样是如此，在最前方的4艘战舰中，2艘是三甲板战舰，1艘是80炮战舰，另1艘是较强的74炮战舰，第5艘战舰同样留为空白。随后抵达的“贝尔岛”号占据了这个位置，它也是一艘特别强大的74炮战舰。[17]

在两支分舰队的前卫部署中，一个更为重要的特点是，纳尔逊和科林伍德的座舰都并未在战斗阵型中担任先导舰，它们只有在普通的航行阵型中才作为各自舰列的领舰。纳尔逊在备忘录中的说法是“我的舰列会穿过”（My line would lead through），而非“我会带头穿过”（I should lead through）；“勇莽”号的哈维舰长也说，他是根据纳尔逊在最后一刻打出的信号，才在“胜利”号之后而非之前投入了战斗。由于“华丽”号的缺席，这暗示着纳尔逊旗舰应该位于战斗阵型中的第二位。至于科林伍德，哈维和森豪斯的证言都明确指出，他在战斗阵型中的位置应当是下风舰列的第三位，与10月10日的正式阵型一致。[18]

必须指出的是，在实际阵型与前述的计划阵型之间，还有另一处甚至与备忘录的要求相悖的重大差别。现存的各种材料都认可的是，在实际的战斗中，两支分舰队的兵力并不相等：纳尔逊所部只有12艘战舰，而科林伍德则有15艘战舰。纳尔逊纵队的兵力劣势无疑部分是由于路易斯舰队的缺席，在前述的计划阵型中，整支路易斯舰队除了一艘之外全部都属于纳尔逊的上风舰队。不过，如果考虑到1艘三甲板战舰等于2艘双甲板战舰队的公式，纳尔逊与科林伍德的兵力对比就是16∶18，他们的实力差别并未如表面那般明显。纳尔逊舰队的任务是用纵队突破战列

线来阻滞敌军，他的兵力劣势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与此同时，科林伍德则要负责攻击12艘敌舰，他的舰队必须尽量占据四分之一的对敌兵力优势。

要达成这种兵力部署，纳尔逊只能将前锋舰队重新吸纳进两支主力舰队，使舰队构成由之前的三支分舰队变为两支分舰队。这一重大的改变从未得到清楚的阐释，值得我们在此加以思考。在地中海舰队近来的行动中，前锋舰队一直只是一支侦察舰队，但纳尔逊显然准备更进一步，为其赋予某种实质性的战术功能。在他的备忘录中，前锋舰队并不仅仅是一支侦察舰队，还是一支预备队。基于他的舰队拥有40艘战列舰的假设，他在备忘录中写道，他将组成各有16艘战舰的两支大型分队和一支拥有8艘最快的双甲板战舰的前锋舰队，而后者的任务是“按照总司令的指挥，随时使一支舰列拥有24艘战舰”。可以看到，这里的前锋舰队占据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而非在他在战斗前夜组建的那支前锋舰队所占据的三分之一。就我们目前所知，这种组织并未在实际战斗中出现，但由于我们缺乏10月10日之后的舰队编制，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最初，这支舰队只是一支侦察舰队。在纳尔逊接掌指挥权之时、发布备忘录之前，他按照最初的航行阵型，在每支分舰队中拨出了2艘战舰，让达夫舰长统领“玛尔斯”号、“巨像”号、“防御”号和“埃阿斯”号4艘战列舰。在备忘录发布之后，“贝尔岛”号与“阿伽门农”号抵达阵中。它们也分属于两支分舰队，随后被派去增援通信线。这些兵力就是纳尔逊所说的前锋舰队。在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十天之前，他向亚历山大·波尔写道：“我在我的舰队和巡航舰之间部署了一支由快速战舰组成的前锋舰队。”[19] 如果柯德林顿说得没错，前锋舰队此时已得到了它的全部兵力。据他自己说，在备忘录发布之后，前锋舰队已有8艘战舰，其中就包括了他的“俄里翁”号。但是，柯德林顿对纳尔逊交给他们的任务显然并不十分清楚。他大致知道，他们将以两支舰列攻击敌军后卫，科林伍

德担任主攻，纳尔逊则负责防止敌军前卫阻挠英军进攻。为此，纳尔逊将从联军总司令后方突破其战列，而英军前锋舰队则将从总司令的前方突破，从而孤立并包围敌军的总旗舰和僚舰。不过柯德林顿似乎完全不明白，备忘录中的这种攻击方式只适用于从下风发起攻击的情况。在有关从上风发起攻击的段落中，前锋舰队并未被要求展开独立的进攻，尽管它在示意图上仍旧存在。我们只能猜想，它在这种情况下将执行一般性的保留条款，为任何一支主力分队提供必要的增援。

尽管备忘录中的战术构思是如此卓越，但我们必须承认，它的行文的确非常晦涩难解。它是纳尔逊匆忙起草的产物，在那时，他正担心风向的变化随时可能让维尔纳夫在数小时内驶出港湾。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的段落安排毫无逻辑，不成体系；内容多有重复之处；许多地方有语法问题，而其中介绍的战斗阵型又与实际发布的阵型截然不同。如果未经仔细的诠释研究，它的含义远远谈不上清楚明白，而战斗前夜的实际状况更是加深了舰长们的困惑。

依据当时的状况，他们显然是要从上风发起攻击。备忘录中的示意图清楚地标示了前锋舰队在发起攻击时的位置，然而，它已在前一天夜里被并入主力舰队。备忘录所规定的舰队组织已然残缺不全，但直至最后一刻，纳尔逊都没有告诉他的舰长们，他已决定对自己在备忘录中设计的舰队组织加以改变。在现存的大量证据中，没有任何线索表明他曾对舰长们解释过这个战术变化。如果他还发布了任何新的指示，柯德林顿显然不会将之略过不谈，或者忘记执行某种战术的前提条件。在战斗的多年之后，他脑海里留下的唯一印象只有那个从未被撤销的安排：纳尔逊曾说，如果敌军前卫威胁着要去支援其后卫，就应让8艘战舰离开战列。但是，这种行动并无可能。正如我们所知，战前组建的那支前锋舰队的确包括5艘位于舰队前方的战舰与4艘负责和巡洋舰保持联系的战舰。然而，它们之中不少于6艘战舰隶属于科林伍德舰队，如果它们要离开战列，这就必然使英军的主要进攻陷入瘫痪。

于是，我们必然能得出以下两个结论。其一，当纳尔逊仍希望与路易斯舰队会合时，前锋舰队的构想仍保留在他的脑海里；但当希望破灭后，他也将三支分舰队的组织模式一并放弃。其二，在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他并未给出任何新的战术指令。

这就是我们能尽量确定的关乎纳尔逊真实意图的全部事实。凭借着它们的指引，我们便得以探求他改变行动的意义。它们是我们揭示纳尔逊思考的唯一帮手，只有在它们的协助之下，我们才能对他实际采用的战术做出正确推理。

---

[1] 本章内容可参考书后附录Ⅰ中纳尔逊勋爵的备忘录。

[2] To Lord Garlies，Oct.28th：Bourchier，*Life of Codrington*，i.60 and 77.

[3] Captain Moorsom to his father，November 1st，1805：*Great Sea Fights*，ii.242.

[4] The *Principles of Naval Tactics*，exemplified with Tables for facilitating the several evolutions.By Captain C.R.Moorsom，R.N.London，1843.

[5] 1900年，将军的女儿森豪斯小姐将这篇出色的文章交给了《麦克米兰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森豪斯小姐认为它写成于1827～1830年，但查尔斯·埃金斯爵士也曾得到这篇文章，并在1824年刊发了其中的一部分（参见*Naval Battles*，p.271）。由此可见，它最初的创作时间还要更早，或许是应埃金斯邀请所作。不过，森豪斯小姐的这份手稿是一份增订稿，其中更小心地回避了可能贬低纳尔逊的说法，因此可能是较晚的作品，有可能写作于他担任地中海舰队旗舰舰长期间。在特拉法尔加海战时，他仅是一位在职三年的尉官，并不知道纳尔逊的攻击计划或意图（参见他在1805年10月27日的信：Ibid.，p.415）。他说攻击计划得到了很好的安排，唯一需要的临场信号就是改变航向，但他之后又认为科林伍德的任务是突破敌军战列或在任何便利之处穿过敌舰的首尾，纳尔逊则从上风一侧夹击那些与科林伍德交战的敌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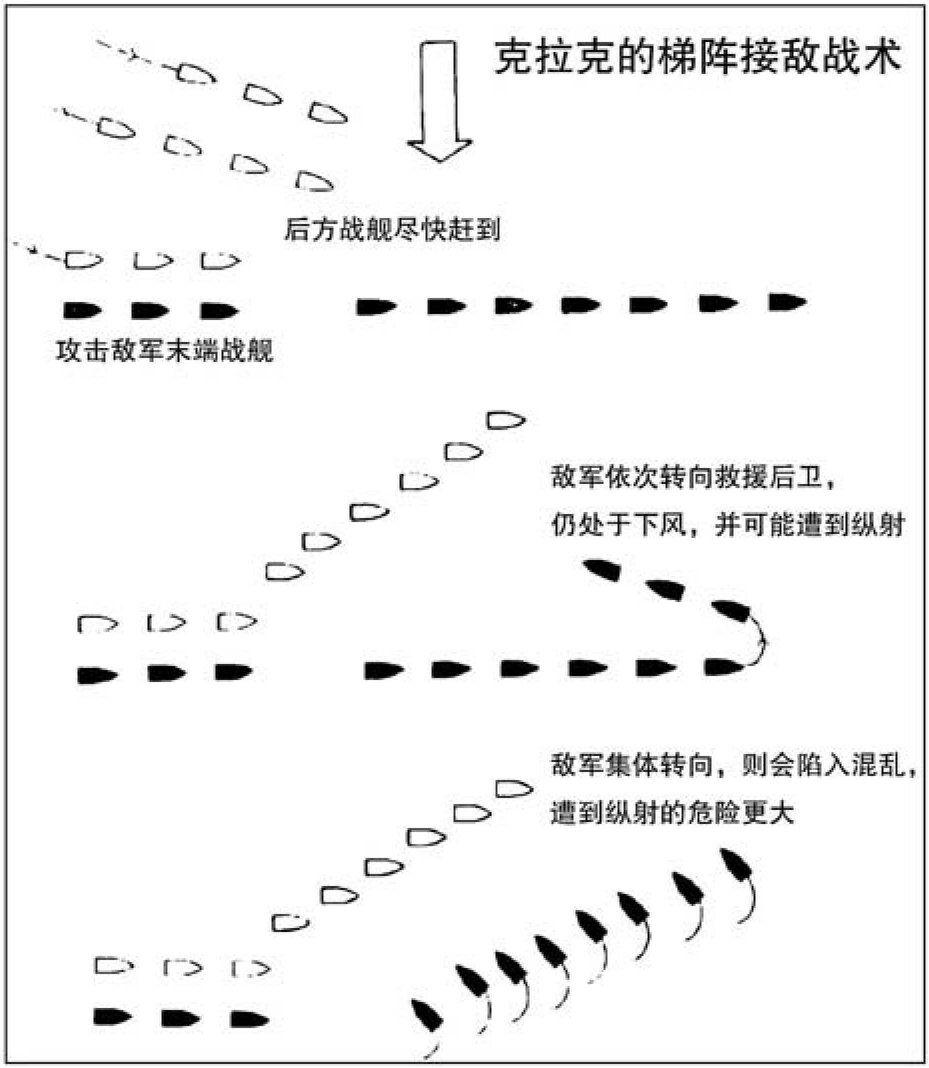
[6] *Naval Battle*，p.268.埃金斯写于1821年。

[7] *Signals and Instructions for the use of H.M.Fleet*，1816.Signal I.7，p.28.

[8] Fernandez Duro：*Armada Española*，viii.353.

[9] 1797年10月11日，由亚当·邓肯将军（Admiral Adam Duncan）率领的英国北海舰队在荷兰的坎伯当海岸遭遇了返航途中的荷兰舰队。吃水较浅的荷兰战舰组成战列线向近海浅滩撤退，邓肯下令顺风全帆追击，致使航速不一的英舰在航行过程中逐渐分为两队。驶近敌军后，邓肯等不及重组阵型，下令直接发起攻击，在近距离混战中成功歼灭荷兰舰队主力。——译者注

[10] 埃尔丁的约翰·克拉克（John Clerk of Eldin，1728～1812年），苏格兰商人、海军研究者。1779年写成《论海军战术》（*Essay on Naval Tactics* ）的第一部分，1782年出版，其余章节在1797年出版。他在书中提出不少新的战术理念，对英国海军战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前的命令多次引用书中的句子。克拉克认为，传统的让全军从上风进攻敌人全体的方式存在诸多弊端；他提出用多支分舰队组成梯阵，首先用最前线的战舰集中歼灭敌军后卫的少数战舰，再用梯阵后方的战舰来对付前方的敌军。这一策略与纳尔逊战术备忘录中所采用的三支平行于敌军的分舰队部署十分相似。参见下页示意图［引自Brian 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1650-1815* （Naval Insitute Press，1991），p.190］。——译者注



[11] 1816年信号簿的作者显然采纳了这种看法。那则“特拉法尔加信号”的指示写道，在没有打出特殊信号时，“下风分队在突破战列线之后，可以考虑交给它的司令官来指挥”。

[12] 在这里打出的信号是正式信号簿并未作出规定的“一面旗”。他选中的是第17页的第8面旗，即黄底蓝边旗。这面旗从未被用作战术信号，纳尔逊却为之赋予了含义：“截断敌军战列，在他们的另一侧近距离作战。注意——所有战舰都要重复打出这一信号。”这些词句见于“胜利”号舰长哈迪的信号簿印刷本，现由皇家海军少校马尔科姆·麦格雷戈爵士（Sir Malcolm Macgregor）收藏。

[13] 参见本书第十一章。

[14] *Signals and Instructions*（*N.R.S.*），p.73.尼古拉斯在纳尔逊书信集（vii.94）刊印了另一份与前述表格类似但有所不同的“航行与战斗阵型”，虽然没有签名也没有写明时间，但被系于10月9日，其可能是一个被放弃的早期草

稿。其中只划分了前卫和后卫，并没有分队组织形式；每支分舰队的第5个位置都有战舰占据，而不像诺塞斯克勋爵的版本那样被空出来。那个表格也并未提及“肯特”号，它的位置被柯德林顿的“俄里翁”号占据，而“俄里翁”号最终的位置是跟在纳尔逊分舰队的“埃阿斯”号之后。

[15] 哈里斯·尼古拉斯爵士在纳尔逊书信集（vol.vii.301）中的一幅示意图上就把“无畏”号放在了这个位置上。它显然不可能继续作为殿后舰，因为它是纳尔逊授权其自行选择便利阵位的三艘三甲板战舰之一。

[16] Nelson to Ball，Oct.15th：Nicolas，vii.123.

[17] “贝尔岛”号本是一艘法国战列舰，于1795年被俘，最初在英国海军舰船表上被登记为80炮战舰。它拥有30门32磅炮、30门24磅炮、18门9磅炮、14门32磅卡隆炮与4门24磅卡隆炮。其舰员编制为700人，仅比98炮二级战列舰少50人。

[18] Harvey to his Wife：*Great Sea Fights*，ii.225，and Senhouse to his Mother：*Macmillan’s Magazine*，vol.lxxxi.117.

[19] Nicolas，vii.III，October 11th.

第二十四章 特拉法尔加海战

1805年10月21日清晨，海面略有微风，一片宁静。纳尔逊发现他的舰队已陷入混乱，一部分舰只甚至已不见踪影。兵力占优的敌军位于他们的下风位置，但他们并未如备忘录描述的那样“已组成战列线，准备迎接进攻”，而是仍处在一种不规则的阵型里。据“胜利”号的日志估测，联合舰队主力散布于其旗舰东偏南方约9海里内；格拉维纳舰队则位于其前卫舰队上风处，从东北偏北向西南偏南延伸。它们的舰首指向南方，似乎要向直布罗陀海峡驶去。

联合舰队阵型不整主要是由于维尔纳夫的变阵——他试图将夜幕降临时让各舰以最便捷方式匆忙组成的临时性战列线改变为事先规定的阵型（l’ordre naturel）。他发现英国舰队的实际兵力比他料想的要多出5艘，这更进一步打乱了他的舰队部署。英国舰队与他计算的“战斗舰队”的兵力并不相当，而是较之更强，他的整个战术构想因而在最后一刻完全破灭。为了应对当前形势，联军只能增强“战斗舰队”；他只好牺牲他自己精心设计的双舰队组织模式，让格拉维纳不再统帅一支独立的“防备舰队”，转而命令他占据“战斗舰队”的前方。因此，在种种审慎的事先谋划后，维尔纳夫还是被迫组建了一支笨拙的单纵队。他清楚地知道，这在英军的战术面前是最不顶用的阵型。

在临战之际被迫放弃唯一能阻挡敌人攻击的阵型已足够糟糕，但麻烦还远未结束。强风已在夜间消歇，继之而来的是从西北角吹来的不断偏转方向的微风。英军最初得到的是足够强的西北风，但联合舰队得到的风势较小，其风向还在西南偏西和西北偏西之间不断变化。与此同

时，一股强大的海潮从西方涌来，这使得舰队机动变得更加困难。于是，在联合舰队开始重组阵型时，他们的秩序愈发混乱，已完全看不出任何阵型的外观。[1]

有人认为，纳尔逊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首先组成预定的航行阵型，再令全军一齐驶向下风；或者至少组成侧舷迎风的斜向阵列（line of bearing），从而使舰队进入备忘录所描述的位置。[2]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这些方法都有悖于现有的实践方式。当日的舰队若以横队或斜向阵列行驶较远距离，不同战舰的不同航行性能就会使舰队的秩序与凝聚力迅速消散；在豪与肯彭菲尔特的改革中，最具实用性的一点就是废弃这种笨拙难用的旧式航行阵型。他们改良过的阵法源于法国海军，处于航行阵型中的舰队要始终以双纵队或多路纵队行进；这一创新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战术机动性，受到了官兵们的欢迎。[3] 没有任何一位将军会在这个关头重新启用那种不可信赖的阵型，尤其是纳尔逊。他的计划需要他将舰队牢牢控制在手中，具备高度的凝聚力和灵活性，直至在必要时刻令其攻向敌军。

纳尔逊首先打出了组建航行阵型的信号，几分钟后——有可能就是在前一则信号得到回复时——又打出了“大张风帆，驶向下风”（to bear-up and sail large），附随的罗经信号是东北偏东。这个信号并不准备让舰队预先组成航行阵型或战斗阵型，而是想让尚未组织好的战舰一艘接一艘地驶向下风，就像实际发生的那样，在各自的旗舰身后遵照各自的预定位置依次朝东北偏东方向开始航行。[4] 一份直白的证据来自“尼普顿”号的航海长在信号簿下所做的注记，他说英军接连着朝下风驶去。[5] 此外，我们还能在纳尔逊自己的手笔中看到他的准确意图。他在最后一篇私人日记里写道：“破晓时分，发现敌人的联合舰队位于东方到东南偏东；驶向下风；打出信号组建航行阵型。”我们可以清楚无疑地看到，他认为“驶向下风”是组成航行阵型的前提，他希望让舰队在自己的旗舰驶向东北偏东后以自己为端点进入阵型。[6]

法西联军也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英国舰队在远处驶向下风，这给联军造成的第一印象是他们要组建横队、斜向阵列或是横向舰群。[7] 随着英军机动的继续展开，他们发现英军逐渐形成了两支舰群（pelotons）——这是许多舰只从各个方向驶入旗舰身后的自然结果。两个小时之后，舰群最终明显形成了两支分别由重型战舰所引领的纵队。[8]

维尔纳夫最初认为，纳尔逊要用大批舰群攻向他的后卫，从而达成集中优势兵力和截断其返回加迪斯退路的双重目的。[9] 法军信号簿中为应对这种攻击规定了一则特别的信号，它是这样规定的："当共和国的舰队组成战斗阵型或其他队形并处于下风，而敌军组成舰群阵型（en peloton）或其他队形或数支分队，企图与我军后卫交战时——命令所有战舰同时顺风转向。"[10] 维尔纳夫的舰队正在执行上一则组建正式阵型的命令，舰队多处极为混乱，与其说是舰列还不如说是舰群，其状态并不足以完成这一机动。然而，他已决意下达这一命令，于是他不顾一切地再次打出信号，让尚未成形的舰队180度掉转航向。

在纳尔逊对维尔纳夫的后卫做出不加掩饰的威胁时，他是否料到了敌人的这一举动？据此时被召上"胜利"号的布莱克伍德说，"他对此表现得非常后悔"。[11] 他的备忘录的确预计到了这种行动，纳尔逊曾在其中写道，如果敌军集体转向，原先的后卫仍应是科林伍德的"攻击目标"。不过，他料想的调头是在攻击已经完全展开之后，他显然没有料到敌人的机动会这么早进行。即便如此，维尔纳夫的过早调头似乎并不足以给他造成困扰。如果维尔纳夫没有调头而继续向南航行，那么，在不让英军两支舰队互换位置的前提下，他要向敌军后卫发起预想攻击的唯一方式就只能是先驶向敌军前卫，再依次顶风转为与敌军相反的航向，这样才能让舰队抵达与敌军中军并列的位置。这种机动极为不便，且在微风中必将花费太长时间。但如果维尔纳夫将他的舰队阵列反转，英军的攻击位置就会有利得多。只要纳尔逊在合适的时机让舰队以其左

舷为端点组成斜向阵列，他就能直接占据备忘录所描述的攻击位置。那么，纳尔逊又为什么会感到后悔呢？探明他此时的想法似乎远较他的处境更加困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他在此时并未意识到维尔纳夫已经组成了战斗阵型。在他看来，远方的联合舰队似乎仍处在巡航阵型——法军所谓的“散阵”（route libre）——里。他在私人日记中这样写道：“7时，敌军依次倒转航向。愿我所尊崇的伟大上帝为了欧洲的总体利益，能赐予我国一场伟大而光荣的胜利。”就像克伦威尔（Cromwell）一样，他期待着上帝直接将敌人送进他的手里。但我们已经知道，敌人是集体调头，而非他所记的依次转向。如果纳尔逊意识到他们已组成了战斗阵型，他就不可能犯下这种错误。他似乎将之误认为是自己刚刚执行的那种机动，认为敌人并不是在反转他们的战列线，而是让一支不成形的舰队一艘接一艘地“依次倒转航向”。[12] 这只能意味着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遇到了他，为了逃离一场全面追击，便以“散阵”匆忙地朝加迪斯撤去。[13]

的确，此时的英国舰队像是要展开一场旧式的猛攻，就好像霍克和博斯科恩（Boscawen）那样以“全军追击”的信号发起进攻，让先导舰在追击过程中组成战列阵型。[14] 一些英国舰长认为，这正是纳尔逊的真正目的。“皇家君权”号的一名尉官在他的日志中写道：“这则信号想要进行追击。”而“征服者”号的航海长则写道：“转向下风，全帆追击。”[15] 从各方面看来，纳尔逊最初的想法的确有可能是尽早让舰队杀向队形不整的敌人，就像科林伍德对帕斯利爵士所说的，发起“一场迅猛的两路攻击”。[16]

不管这是不是他最初的冲动，显然其并未持续多长时间。不管敌人战阵的反转给他造成了多大困扰，他很快就重新回到了攻击计划的基本预案。当意识到敌人驶向北方的意图后，他随即再次打出了驶向下风的信号，而这次附随的则是指向东方的罗经旗。尽管他并没有转舵，但舰队前端战舰的日志显示，他的航向是正东偏北半点到1点[17]，直指敌舰

队的中军。这正是备忘录所规定的位置，这将让他朝着敌人反转阵型的新后卫发起整个攻势。[18]

在继续描述战斗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厘清所谓“中军”和“后卫”的概念，许多错误认识都源于它们的歧义。由于联合舰队阵型的改变，双方的报告对其不同部分的辨别与称呼都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当维尔纳夫决定反转战列时，他同时命令格拉维纳让“防备舰队”接续于“战斗舰队”的后方。在之前的部署中，“战斗舰队”就是法西联合舰队的主舰队，它由维尔纳夫直接指挥，被划分为前卫、中军、后卫三支分舰队。然而，新的部署打乱了之前的那种舰队划分。一些军官在其报告中仍旧沿用了之前的称呼，用“后卫”指称战斗舰队的后卫，而另一些军官则用“后卫”指称整支舰队的真正后卫，即格拉维纳的防备舰队。“中军”一词也是如此。在一些报告中，它被用来指称战斗舰队的中军，而另一些报告则用之称呼整支舰队的中军，包括了战斗舰队的部分中军及其后卫——战斗舰队中军的另一部分则被归入整支舰队的前卫。这种歧义导致某些报告称纳尔逊和科林伍德都向敌人的中军发起攻击，而另一些报告则说纳尔逊攻向敌军前卫，科林伍德则攻向敌军后卫。为了厘清这些混乱，法国参谋部为拿破仑编写了下面这个清晰的表格，非常好地把握住了此时的阵型。

战列线 ·按照10月6日向所有战列舰发布的阵型反转得来 ·加黑者为将领座舰				战列线 ·根据普利尼先生的报告与舰船日志得来 ·名前加横线者为位于战列下风处的战舰	
第三分舰队	〔西〕“涅杜诺”号	Neptuno	80	一时未能投入战斗的9艘战舰	〔西〕“涅杜诺”号
	〔法〕“西皮翁”号	Scipion	74		〔法〕“西皮翁”号
	〔西〕“雷电”号	Rayo	100		〔法〕“勇敢”号
	〔法〕“可畏”号	**Formidable**	**80**		〔西〕“雷电”号
	〔法〕“迪盖-特鲁安”号	Duguay-Trouin	74		〔法〕“可畏”号
	〔西〕“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号	San Francisco de Asis	74		——〔法〕“迪盖-特鲁安”号
	〔法〕“勃朗峰”号	Mont Blanc	74		〔法〕“勃朗峰”号
第一分舰队	〔西〕“圣奥古斯丁”号	San Agustín	74		——〔西〕“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号
	〔法〕“群雄”号	Héros	74		——〔西〕“圣奥古斯丁”号
	〔西〕“至圣三一”号	**Santísima Trinidad**	**130**	遭第一纵队袭击的8艘战舰	〔法〕“群雄”号
	〔法〕“布森陶尔”号	**Bucentaure**	**80**		〔西〕“至圣三一”号
	〔法〕“尼普吞”号	Neptune	80		〔法〕“布森陶尔”号
	〔西〕“圣利安卓”号	San Leandro	64		——〔法〕“尼普吞”号
	〔法〕“敬畏”号	Redoutable	74		〔法〕“敬畏”号
第二分舰队	〔法〕“勇敢”号	Intrépide	74		——〔西〕“圣利安卓”号
	〔西〕“圣胡斯托”号	San Justo	74		——〔西〕“圣胡斯托”号
	〔法〕“顽强”号	Indomptable	80		——〔法〕“顽强”号

续表

战列线 ·按照10月6日向所有战列舰发布的阵型反转得来 ·加黑者为将领座舰				战列线 ·根据普利尼先生的报告与舰船日志得来 ·名前加横线者为位于战列下风处的战舰	
第二分舰队	**〔西〕“圣安娜”号**	**Santa Anna**	**112**	遭第二纵队袭击的16艘战舰	〔西〕“圣安娜”号
	〔法〕“激情”号	Fougueux	74		〔法〕“激情”号
	〔西〕“蒙纳卡号”	Monarca	74		〔西〕“蒙纳卡号”
	〔法〕“普鲁托”号	Pluton	74		〔法〕“普鲁托”号
防备舰队 第二分舰队	〔西〕“巴哈马”号	Bahama	74		〔法〕“阿尔赫西拉斯”号
	〔法〕“鹰”号	Aigle	74		〔西〕“巴哈马”号
	〔西〕“蒙塔涅斯”号	Montañés	74		〔法〕“鹰”号
	〔法〕“阿尔赫西拉斯”号	**Algeçiras**	**74**		〔法〕“敏捷”号
	〔西〕“阿罗戈诺达”号	Argonauta	80		〔法〕“阿戈诺特”号
	〔法〕“敏捷”号	Swiftsure	74		——〔西〕“蒙塔涅斯”号
防备舰队 第一分舰队	〔法〕“阿戈诺特”号	Argonaute	74		——〔西〕“阿罗戈诺达”号
	〔西〕“圣伊德方索”号	San Ildefonso	74		〔法〕“贝里克”号
	〔法〕“阿基里斯”号	Achille	74		〔西〕“枭玻穆的圣若望”号
	〔西〕“阿斯图里亚亲王”号	**Principe de Asturias**	**112**		——〔法〕“阿基里斯”号
	〔法〕“贝里克”号	**Berwick**	**74**		〔西〕“圣伊德方索”号
	〔西〕“枭玻穆的圣若望”号	San Juan Nepomuceno	74		〔西〕“阿斯图里亚亲王”号

说明：表中防备舰队各舰的具体位置尚不能确定。

表中战舰的国家归属为译者所加。需说明的是，西班牙战舰“涅杜诺”号（Neptuno）、法国战舰“尼普吞”号（Neptune）与英军战舰“尼普顿”号（Neptune）的舰名都源于罗马神话中的海神尼普顿（Neptunus），为了避免混淆，故以三国语言的不同发音作为译名。同理，“阿罗戈诺达”号（Argonauta）与法国战舰“阿戈诺特”号（Argonaute）的舰名都源于希腊神话中的阿尔戈英雄（Argonautai），英国战舰“阿喀琉斯”号（Achille）与法国战舰“阿基里斯”号（Achille）都源于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喀琉斯。此外，原表中西班牙战舰的数据存在不少错误，还有不少数据混淆了短炮与长炮的计算标准。译者据 Alfred Hugh Taylor 的“The Battle of Trafalgar”进行了修改。——译者注

资料来源：Desbrière，*Trafalgar*，*App.*，p. 124。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出于某些战术考量，两支英国纵队在维尔纳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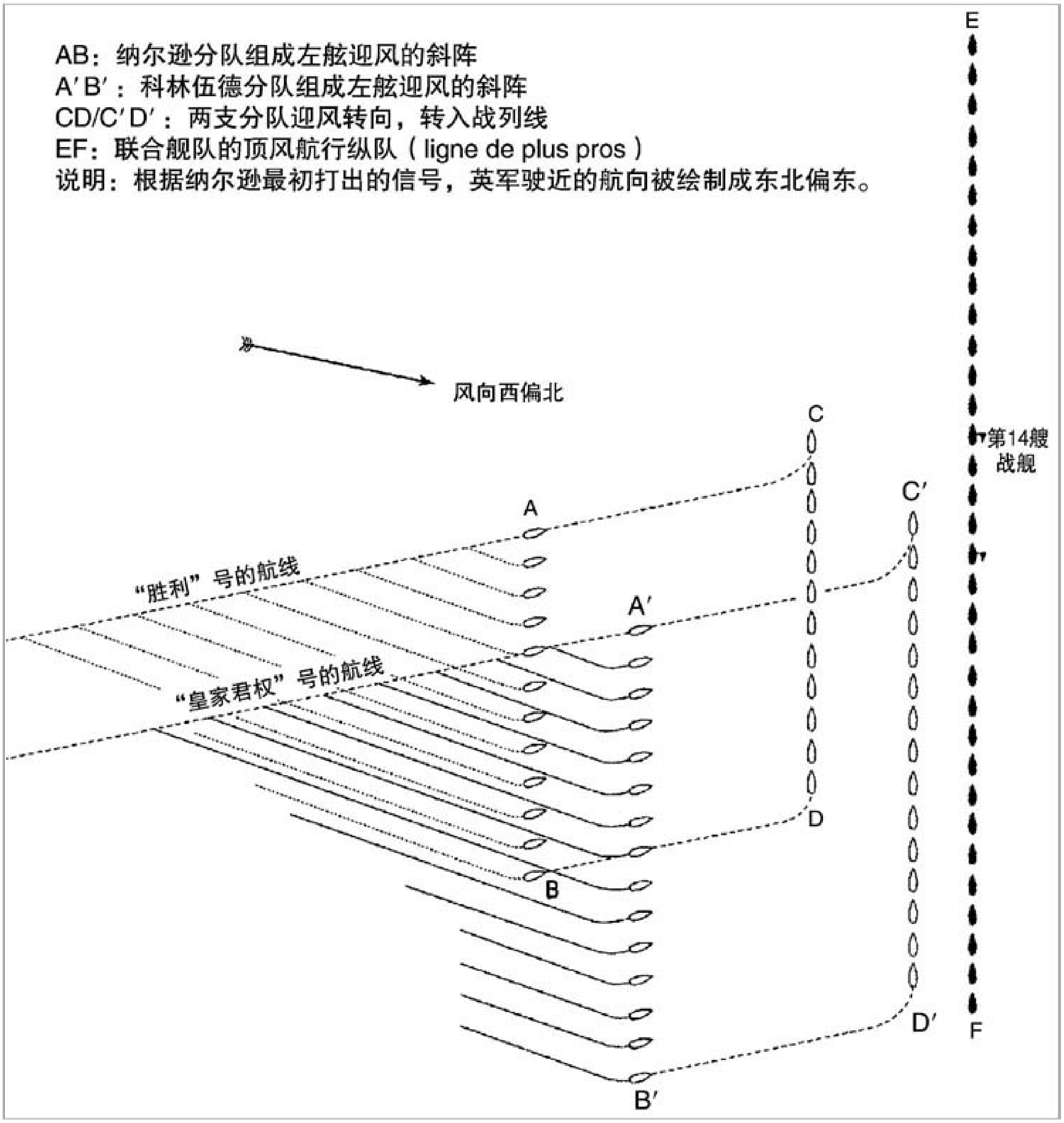
反转阵型后都杀向了敌舰队的中军。而如果我们将联合舰队视为两支大型分队，事实也正是如此，那么，纳尔逊就是驶向其前卫的后队，而科林伍德则是驶向其后卫的前队。

在纳尔逊前述信号的指挥下，英国舰队以两路纵队迎头驶向敌军整支舰队的真正中军，但这一态势很快就被科林伍德引人注意的独自行动所改变。按照备忘录的规定，舰队副司令应当“在总司令表达了他的意图之后”接掌其分队的指挥全权，但这种意图表示要到纳尔逊率领两支分队“行驶至接近敌军中军的火炮射程之处”后才会出现。他们距离那个位置还相当遥远，阅读过备忘录的科林伍德也绝不会认为纳尔逊已承诺在此时进行指挥权交接。但在维尔纳夫下令反转战列线不到半个小时后，科林伍德向下风分队打出了新的信号：“组成左舷迎风的斜向阵列”（to form the larboard line of bearing）。这实际上是否定了纳尔逊上一则组建航行阵型的命令。[19]

这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显然逃离了人们的关注视野，因此人们总是认为科林伍德是到最后一刻才打出了这个信号。人们进而认为，这只是一个航向问题。这是由于联合舰队的战列形成了一个凹面，从而使格拉维纳的分舰队几乎与科林伍德的接敌路线平行。但如果是这样，他反而不需要再组成左舷迎风的斜阵。真实的答案是，这与联军阵列的凹面完全无关。科林伍德下达这一命令是在维尔纳夫打出那则造成阵型凹陷的信号的两个小时之前。

那么，科林伍德为什么要打出这则信号呢？信号簿对这则信号的战术目标的说明足以扫清我们的疑虑。其释义的一条注记模糊地解释道，这则信号意味着战舰要“按照它们未来航向的罗经点相互展开，如果向左舷转向形成一支纵队，要与风相差1个罗经点”。（To bear from each other on the point of the compass on which they would sail，keeping a point from the wind，if formed in a line-ahead on the larboard tack.）除非我们能

弄清“与风相差一个罗经点”的含义，豪勋爵留存下的这段模糊字迹几乎无法理解。事实上，这句话是指其航向应与顶风航行的极限航向保持1个罗经点，即与来风方向保持7个罗经点之差，而非真正的顶风航行纵队——即法军所谓ligne de plus pros——所采取的6个罗经点。因此，这只是表现出英军在迎风航行时保留1个罗经点以应对不时之需的常规做法。[20] 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将这则指令翻译成以下形式：“组建起来的斜向阵列应满足下列条件：当全体战舰顶风转向组成战列线时，其战列航向与风向保持7个罗经点之差，亦即与真正的顶风航行的战列线航向相差1个罗经点。”简而言之，这就是一种特定的机动方法，能使一支纵队由前端接敌的姿态转入与法军所采用的迎风阵列航向大致相同的平行战列。[21] 科林伍德的行为是由于他认为这正是纳尔逊期待他采取的行动，从而使舰队进入备忘录示意图所描述的位置，尽量提前发起攻击的时间。他相信纳尔逊会跟随其后展开同样的机动。这种机动显然能让两支分舰队准确地形成备忘录所描述的、在上风发起攻击时组成的平行于敌人中军的梯形阵型。



科林伍德打出“组成左舷迎风斜阵”信号的意图

然而，纳尔逊对此的看法颇为微妙，他并未做出对应的机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并不认为科林伍德已接掌了下风分队的指挥权，但他显然也并不认为副司令的行动有什么过错。他没有提出任何反对，而是允许这一机动以最佳方式继续展开。但必须注意到的是，他目前的姿态

实际上也不可能完成这种动作。纳尔逊并未减速，已经着手展开攻击的科林伍德也仍旧保持着全帆，但当一支舰队以纵队队形高速前进时，除非领头的战舰减速降帆，它显然无法组成左舷迎风的斜向阵列。不过，即便他不能组成那种左舷迎风的斜向阵列，他多少还是能组成某种斜阵。科林伍德的分队没有时间在其身后组成纵队，其分队后方的大部分战舰位于“皇家君权”号右舷侧后，已然部分地组成了一道次舰舰首与前舰舰尾相错的斜阵（bow-and-quarter line）。一个半小时后，科林伍德似乎意识到了这一情形。或许是由于纳尔逊仍旧以全帆前进且没有显露出要展开舰队或降帆减速的任何迹象，或许是因为他发现平行于敌阵的斜向阵列已不可能组成，科林伍德最终放弃了这个他曾希望完成的战术动作。

此时，原定紧跟“皇家君权”号的“雷鸣”号已经掉队，科林伍德遂命令“贝尔岛”号占据他身后的位置。于是，他向“贝尔岛”号打出信号，令其保持在他的西南方，这意味着他希望用一道向西南方展开的斜阵取代之前左舷迎风的斜向阵列。五分钟后，他又向其舰队中部航速最快的“复仇”号打出信号，令它与“皇家君权”号组成斜阵。信号中并未提及斜阵的方向，但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仍然是西南。一段时间后，科林伍德再次向“贝尔岛”号与位于“贝尔岛”号与“复仇”号之间的“阿喀琉斯”号打出信号，这则信号是让它们同时向右舷转舵1个罗经点。参照信号簿，它的含义是“一齐向右舷或给出的罗经方位信号转向1个罗经点，战舰应保持原有的相对方位”。附随的指令还写道：“当已组成斜阵时，不管战舰在何时接到一齐转向的命令，它们都应保持相互间的相对方位。”[22] 现在，科林伍德并未给出罗经方位信号，而它们也不可能在上一则信号打出后的七分钟内就组成标准的斜向阵列。因此，根据信号簿的解释，我们唯一的结论是，科林伍德已经意识到在不降帆减速的前提下即便是向西南方展开的斜阵也无法实现，他只能被迫组成仅与纵队展开方向相差1个罗经点的斜向阵列。

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并不仅是科林伍德所发布的组建斜向阵列的诸多信号。他自己在官方通信与写给帕斯利爵士的战术解析中承认，他是以纵队发起攻击的。他在这些文件里完全没有提及斜向阵列，这是因为，一道组织不良的、仅仅与纵队展开方向相差1个罗经点的斜阵在战术效果上与纵队并无多大区别。出于同样的原因，哈维和森豪斯都表示舰队是以两路纵队发起攻击，甚至连“复仇”号舰长莫尔森都采取了同样的说法。这也是所有目击者和提到这个问题的所有同时代作者的共同观点。

当然，通过从保管不善的日志和日记中拣选零碎语句，通过在各舰宣称的各不相同的交战时间上进行计算推演，我们的确有可能推断出科林伍德组成了一条真正的侧舷迎风的斜向阵列。但在直接而确切的证据面前，历史科学的严谨性绝不允许用这种脆弱的罗织来掩盖相反的结论。我们不仅拥有最明确和最权威的积极证据——科林伍德的信号，同时还拥有最无可辩驳的消极证据——同时代的大量描述完全没有提及下风舰队的这种阵型。在历史学者看来，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这种沉默本身就足以得出结论，何况还有其他旁证。这些证据的分量已经使这一结论不容怀疑。尽管焦虑的科林伍德或许曾试图组建斜阵，他最终却与按兵不动的纳尔逊一样意识到，这种机动与自己的其他意愿相违背，在当前状态下显然也不可能实现。

我们很难弄清楚纳尔逊对这整个问题的想法，他在此时的运思十分令人费解。他仍然大张风帆驶向敌方中军略靠前处，让他的分队竭力在其身后组成阵列，好像仍要发起一场旨在防止敌军逃跑的霍克式追击。[23] 莫尔森写道：“他似乎非常担心落到敌舰队的下风处，这将让他们在我军靠近之前就逃回加迪斯。”但在纳尔逊向前挺进之时，维尔纳夫并不打算临阵脱逃。出乎他意料的是，联合舰队在倒转航向后勇敢地顶风减速、组建战列线，准备迎接他的进攻。[24] 在这种情况下，霍克的攻击方法已变得极其不合时宜，除非其能在敌人的战斗阵型组建完成前与

之交战。敌人的勇敢姿态显然打乱了纳尔逊的盘算。据布莱克伍德舰长说："10时左右，纳尔逊勋爵对与敌人交战的忧虑变得十分明显。"他一定是陷入了高度的精神紧张，不断地向布莱克伍德念叨着，敌人摆出了一个良好的正面，但他每次都很快就补充道："我会把他们前所未有地好好打扮一番。"他仍然没有表现出依照科林伍德的机动展开舰队的任何迹象，反倒开始干预科林伍德的舰列，仿佛他并不认为副司令已接掌了指挥全权。两位老友间的这种交流颇有几分幽默色彩。

此时，他们两人都并未遵守事先规定的战斗阵型，他们仍旧引领着各自的分队，似乎完全不准备回到各自的指定位置。纳尔逊麾下的军官对此感到十分忧虑，他们极为担心总司令的生命安全。被召上"胜利"号的布莱克伍德此时仍在他身边，他徒劳劝说纳尔逊到他的"欧律阿罗斯"号巡航舰上指挥战斗，之后又恳请他将紧随其后的"勇莽"号、"尼普顿"号与"利维坦"号部署到"胜利"号之前。布莱克伍德好不容易才得到了向"勇莽"号传达命令的许可，以让它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驶过"胜利"号，而"胜利"号也已打出了执行这一机动的必要信号。[25] 然而，如果要让纳尔逊同意进入原定阵位，他的老友"科尔"（Coll）[26] 也必须这样做。此时，本应位于下风舰队最前方的"亲王"号已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它根本不可能进入原定位置；科林伍德孤傲地在整支分队的右前方远远地领航，似乎完全不在乎友军的支援。纳尔逊出手纠正的冲动让他无法忍受这种局面，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用他的较高职权直接发布命令。他就像一个顽皮的中学生，试图用某种花招将科林伍德从战列前端骗开。科林伍德刚刚让"贝尔岛"号顶替"雷鸣"号的位置，但纳尔逊无视其命令，径直向从后方迅速赶来的"玛尔斯"号打出信号，让它占据"皇家君权"号身后的位置。纳尔逊的意图很快就显露了出来，但科林伍德并没有遵照其意愿，相反，他在此时打出了最后的信号，要求集体向右舷转向1个罗经点。纳尔逊让科林伍德后退的明显顾虑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放弃了向西南方展开斜阵的前一个意图。如果不减慢航速，这一阵型就无法实现，而除非纳尔逊为他做出表率或下达直接命令，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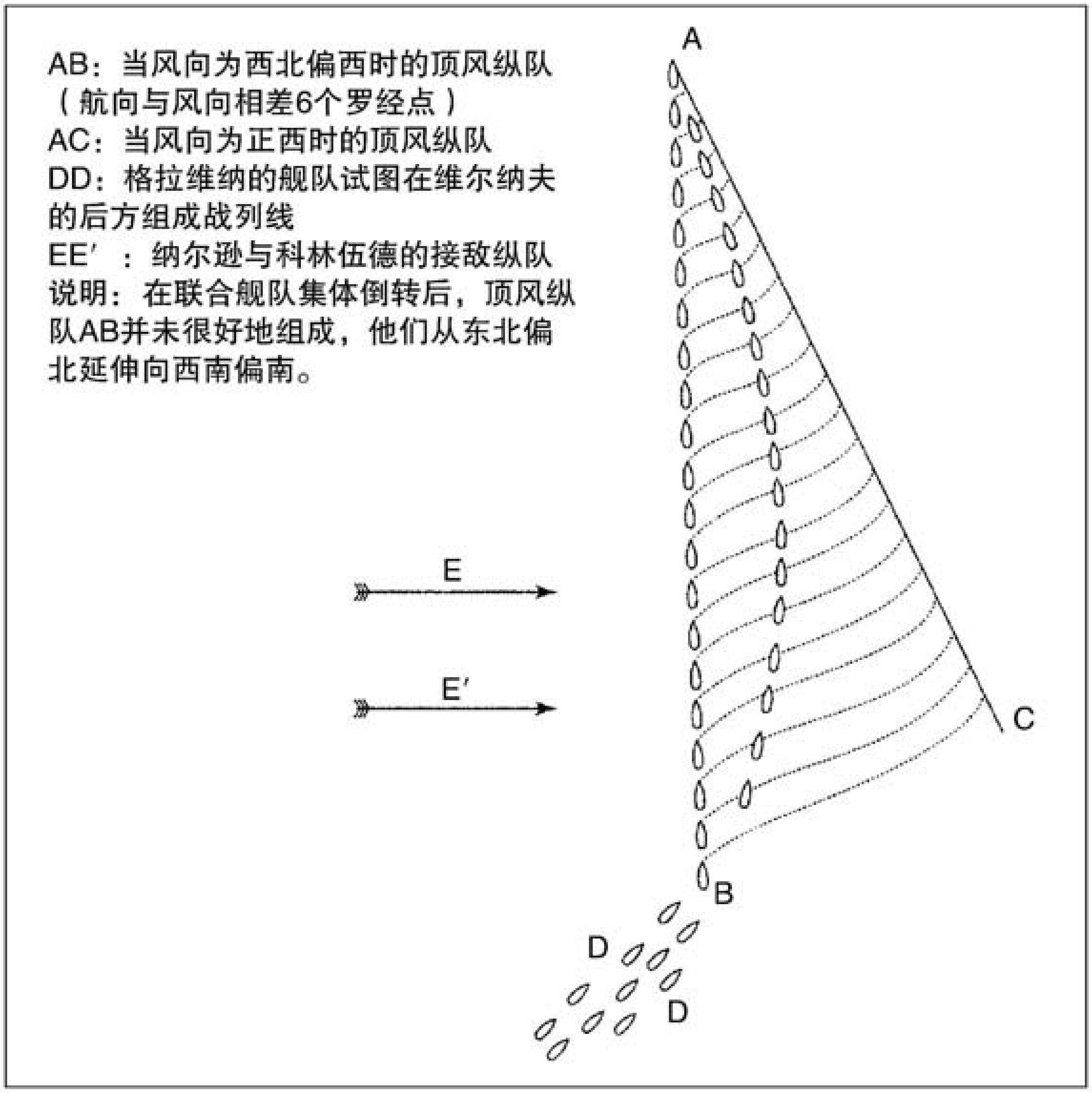
林伍德绝不会收紧风帆。纳尔逊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在一刻钟之后再次打出信号，这一次他更进一步，直接命令“玛尔斯”号引领下风分队。在“亲王”号脱离原位时，那本是“玛尔斯”号在战斗阵型中的预定位置，这则命令很显然是在暗示科林伍德退到它的后面。但是，纳尔逊的意图最后也没能实现。在得到直接命令之前，科林伍德显然并不准备退后，他必然了解他的老友绝不想打出那样的命令。他至少有一条正当理由：除了他的旗舰之外，他麾下再也没有能引领舰队的三甲板战舰。于是，他大胆地升起了所有的翼帆，以此作为对纳尔逊的回答。[27] 纳尔逊随即放弃了他的意图，正因如此，本该前往“胜利”号前方的“勇莽”号最终也没能进入它的预定阵位。

有一则轶事写道，就在这时，纳尔逊发现某艘战舰升起了一对翼帆，他认为这是不服从自己命令的举动，让他陷入了似乎超乎寻常的压力。科林伍德此时正在下风方向的远处，新包过铜底的“皇家君权”号正在全帆航行，使得它与后方战舰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而下风分队已在它的右舷后方组成了不规则的小角度斜阵。因此，我们会毫不奇怪地看到，当布莱克伍德回到“胜利”号时，纳尔逊正急躁地竭力提高航速，以防“勇莽”号成功执行那则他被迫下达的、使他感到苦恼的命令。但对于同僚的抗命，他表现出的只有钦佩之情。半个小时后，他感叹道：“看啊，看我们高尚的伙伴科林伍德是怎样将他的战舰投入战斗！”

与此同时，战场的态势已经清晰起来。现在，敌人显然并不想逃跑，而是大胆地准备迎击。维尔纳夫的这种姿态颇有缺陷，对英军相当有利。一方面，他认为，只要将特拉法尔加的浅滩保持在下风方向，英军就很难贯彻其攻击，他们就可以朝加迪斯撤离。另一方面，这也更加便于纳尔逊执行他原本设想的攻击计划。在此时的局势中，纳尔逊显然并不需要如他自己以为的那样匆忙，他完全可以在此时展开舰队，驶入备忘录示意图所描述的阵位。不过，他还必须面对一个在科林伍德那里并不存在的难题。纳尔逊分队中的大部分战舰都在他的左舷后方组成了

纵队[28]，这对改组成类似科林伍德试图组建的那种向右舷延展的斜阵相当不利，他势必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而更重要的是，纳尔逊已经构思出了一种更加狡猾、更加有效的方法，同样能实现他在备忘录中为自己的分队所赋予的功能。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他的职责是牵制敌军前卫；而他向来精准的战术眼光使他看到，通过保持纵队向前的姿态，他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向敌军隐藏意图，使他们陷入不确定性之中。这正是他最终的决定。于是，维尔纳夫在此时开始看到，英军的两支舰群开始形成两支纵队，其中一支指向他的旗舰，另一支则指向他所部的后卫分队。由于格拉维纳的防备舰队此时已组建为联军真正的后卫，维尔纳夫所部的后卫分队事实上就是整支舰队的中军。[29]

由此开始，两军的阵型和相对方位一直保持到了他们交手的那一刻。由于各自不同的结阵方法，两支英国舰列几乎共同指向敌人的中军，都朝着东方航行。联合舰队的前后两端分别位于北偏东和西偏南，舰队中部则逐渐朝下风方向凹陷。微风从西面吹来，时而转向偏北，时而转向偏南。[30]当前方的战舰试图保持贴近风向而向上风处转舵时，其跟随者也随之依次转向，使联军战列的前半部分大致形成了一条由北向南的直线。而根据法军方面的所有官方示意图，前卫的最前端甚至已在某种程度上指向西北方。舰队其余的部分在中军位置逐渐弯曲，使其后卫末端指向西南。因此，当英军舰列朝着正东方逐渐接近联军时，不管战术意图为何，其大致航向都是朝着他们所瞄准的敌人中军垂直开进。



联合舰队在结阵时如何因风向变化导致阵形凹陷

敌军战列的意外变形对纳尔逊非常有利，前卫和后卫的偏斜已经替他解决了实现预定攻击基本设想的最大难题，但这完全是由于风向的偶然变化，而非他的有意设计。而且，这一偶然事态在他驶向敌人的头一个小时中并未出现，他的战场决策与此完全没有关系。维尔纳夫在上午10时才打出了导致这一变形的信号，当他的队形产生变化时，距离遥远的纳尔逊并没能立即意识到它的后果。一直到11时，在联军组成战列线的行动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之后，其队形的扭曲才清晰地显露出来，此

时的纳尔逊距离联合舰队中军的距离已不超过3英里。[31] 因此，他不可能在比11时早太多的时候觉察到联军的“新月阵型”（the crescent formation）。那么，联军阵型的变化究竟对英军的进攻造成了什么影响呢？由于他们并没有打出新的信号或转往新的航向，这个问题似乎不可能得到厘清。纳尔逊和科林伍德都在原先的航线上扬着全帆，以他们所能企及的2～3节的极限航速向前挺进。[32]

科林伍德的分队仍在努力地按照他最后的信号组成队形，但很显然没有严格遵照准确的阵位。事实上，至少在尚未成形的后卫分队，他的舰长们已经从这一连串的信号中洞悉了他的意图，那种独特的自由风格显然暗示着，他希望他们能尽早且尽量同时投入战斗。在之后的表现中，他们的确表现出了这种精神，就如柯德林顿曾坦然承认的那样，“我们全都以最快的动作乱糟糟地投入战斗”。[33] 纳尔逊的分队仍旧跟在他身后，蜂拥着努力组成战列，而他的冲锋则一刻都没有停顿。[34] 当接近敌军火力范围时，最大冲击力在此变得至关重要，他们再次提高了航速。科林伍德打出信号，要求升起更多风帆，而纳尔逊立即用更加激进的方式与之呼应：“只要安全，尽可能在桅杆上升起所有的帆。”落后的英舰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两位老友开始了一场激动人心的竞赛，似乎仅仅是看谁能最先跳入那个正等候着他们的炼狱。

此时的纳尔逊显然还并没有想好下一步的行动。他有可能如备忘录暗示的那样，准备到最后一刻才按照局势所需做出决定。他仍在稳步接近敌人的中军，舰首直指联军最大的战列舰“至圣三一”号之前的位置。[35] 还请记得，他为自己规定的职责不仅是牵制敌军前卫，还要包围他们的总司令。但截至此时，英军尚未寻获他的踪影。维尔纳夫并没有挂出自己的将旗，确定他的位置因此成了纳尔逊此时最主要的焦虑。詹姆斯写道：“尽管‘胜利’号上每一只望远镜都在搜寻法军总司令，纳尔逊的不断发问却全都以失望结尾。”[36] 詹姆斯一定是从某位目击者那里得到了这个细节，而这也正是对纳尔逊为何驶向“至圣三一”号的最为简明的

解释。纳尔逊转而相信，法国海军大臣德克雷已前来接掌了联军的最高指挥权，他自然会搭乘那艘最新出现的最大战舰。[37]

然而，另一种不同的解释则与他牵制敌军前卫的职责相关。这种说法出现于海战的许多年后，给我们对纳尔逊战术的推理造成了混乱。由于纳尔逊此时的航向距离他实际发起攻击的位置有1个罗经点之差，有人认为他试图向敌军前卫发起佯攻，从而使之无法及时投入战斗。唯一一份支持这种说法的当日证据出自柯德林顿的“俄里翁”号，它的航海日志写道：“在向前卫发起一场佯攻后，‘胜利’号向右舷转舵，杀到了敌人的中军。”事实上，这份材料中并没有字句表明纳尔逊在向右舷转舵之前曾向左舷转向。但当年迈的柯德林顿被尼古拉斯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却说：“我记得纳尔逊曾明确指示我，他自己（而不是用备忘录所规定的前锋舰队）可能会向前卫发起佯攻。”他接着表示：“我能确定，‘胜利’号向左舷行驶了一小段距离。”他还说他记得自己曾在这时提请首席尉官注意，因此才在日志里留下了这一笔。他详细地描述了纳尔逊升起的翼帆，然后接着说，转向左舷的行动让“胜利”号遭到了敌方中军数艘战舰的纵射，使它严重受损。随后，他又说到自己转舵向前，向那些纵射纳尔逊的敌舰发起了攻击，这些叙述足以证明他此时的记忆力已经衰退。[38] 事实上，纳尔逊一方的任何人都不曾知晓向左转向的机动。除了他自己的参谋人员，当时还有三位巡航舰舰长待在“胜利”号的艉楼甲板，他们对类似的行动一个字也没提。这在敌方的报告中同样也无迹可寻。正如“俄里翁”号日志的原始记载，他们只是记录了“胜利”号转向右舷，而并没有所谓的转向左舷。因此，我们目前不能采信这种说法。在更好的证据到来之前，这只能被视作柯德林顿对其长官的热切崇拜的副产品。[39]

这个结论并不只有消极证据。我们拥有布莱克伍德的直接证言，它足以说明纳尔逊此时酝酿的是一场真正的攻击而非对前卫的佯攻，即便有预备转向动作，那也是向右舷而非左舷发起。事实上，早在柯德林顿

认为纳尔逊想要发动佯攻的时间点之前，纳尔逊就已经想好了未来的行动；最令人好奇的是，在这个被不断传唱的故事中，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个非凡的决定，但它的存在确凿无疑。根据“欧律阿罗斯”号的日志，它在11时40分转发了一道由纳尔逊发出的消息：“我准备袭击或穿过敌军战列的末端，防止他们逃回加迪斯。”[40] 这显然不是逐字记下的原文。同样知道这则消息的詹姆斯认为这则信号是发给科林伍德的，他记录的语句是：“我准备穿过敌军战列的前卫，防止他们逃入加迪斯。”[41] 这则信号显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所有其他的战舰都没有记录它，但它存在于巡航舰转发长官命令的日志里，这由不得我们不相信。不管其真正的字句到底如何，它只能被解释为纳尔逊放弃了豪与肯彭菲尔特所提倡的用优势兵力攻击敌军后半部分的作战计划，转而试图与占据数量优势的整支敌军交战。[42] 或许，这是由于维尔纳夫刚刚向其前卫下达的升帆命令再次在纳尔逊的头脑中唤回了之前的判断，让他认为敌人准备溜回加迪斯，而非投入决定性的会战。为了阻止这种行动，他将要攻击敌军前卫而让科林伍德攻击其后卫，如同托林顿在1690年的作战方案那样不管敌军的中军。

尽管备忘录已预示了这种行动的可能性，尽管这的确与纳尔逊非凡的天才性格相匹配，如此突然地对他自己的作战方案做出彻底改变还是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新的攻击方法完全放弃了包围敌军总司令的意图，这是原计划中的另一个关键。但“欧律阿罗斯”号记录的信号完全可以厘清这里的疑虑。在这个时候，纳尔逊完全有理由认为他可以不去俘获敌军总司令，因为科林伍德刚刚向他发来信号，“敌人的统帅似乎在一艘巡航舰上坐镇指挥”。[43] 如果维尔纳夫并不在敌人的中军，攻击那里就无法取得决定性战果，那还不如去攻击敌军前卫。因此，科林伍德自然会将纳尔逊攻击前卫的信号视为对自己的回应。在纳尔逊对攻击计划的新构思中，最大的改变还是在于他放弃了自己的牵制功能，这本是科林伍德的攻击赖以成功的保证。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一职责。如果按照新的攻击计划，未遭到攻击的敌方中军自然会立即去救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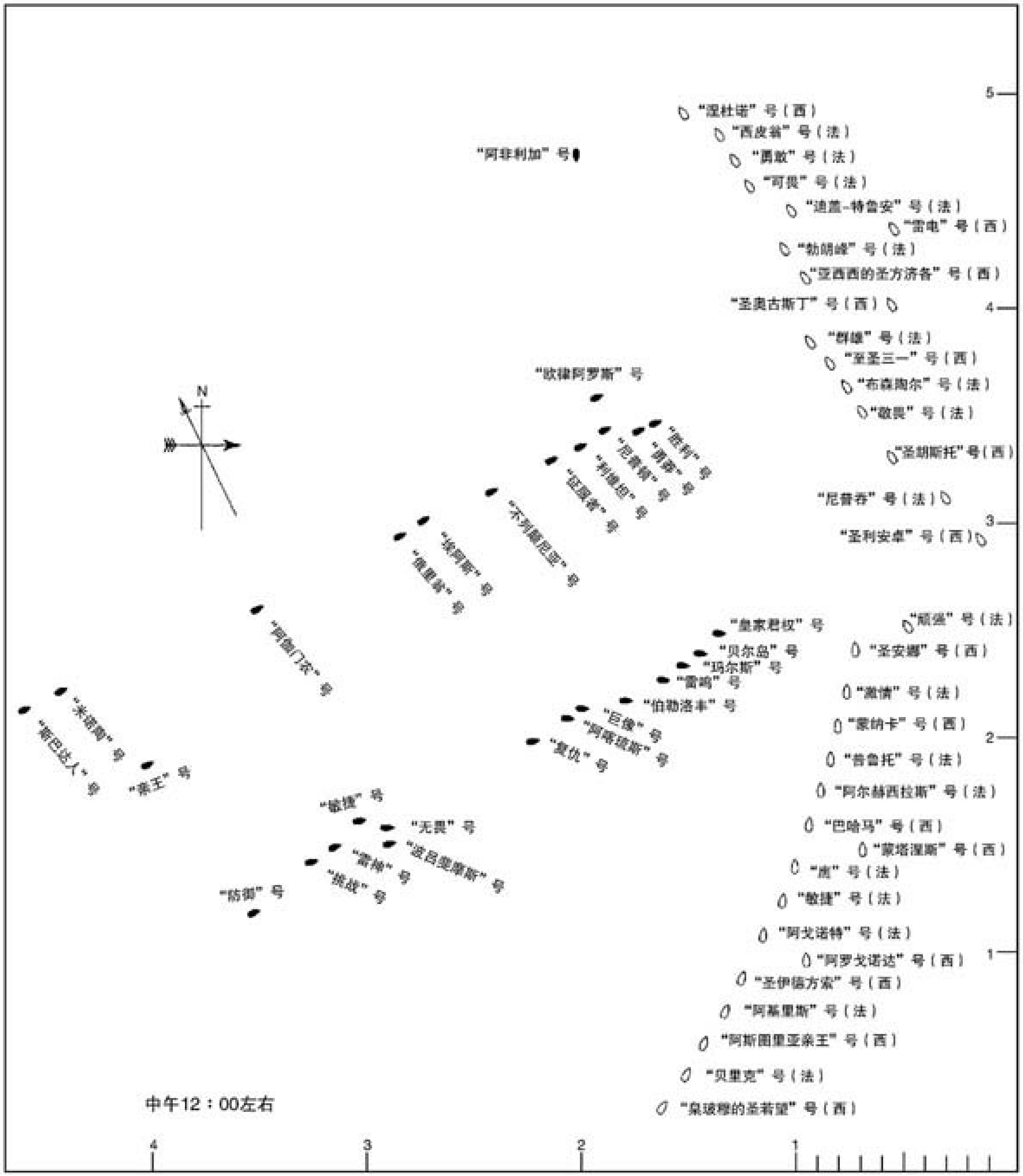
前卫，而这正是集中攻击前卫舰队的弊端。纳尔逊或许会遭到两面夹击，但这只会造成一场混战，从而使科林伍德能从容地解决掉敌军后卫。

这样看来，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理由拒绝相信“欧律阿罗斯”号的明确记录。就在此时，纳尔逊撤销了让“勇莽”号驶往他前方的许可，命令它待在“胜利”号身后。[44] 换而言之，他在最后一刻重要地改组了他的纵队，就好像他准备用纵队一端突破敌军一样。从一份无可争议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知道这正是纳尔逊的想法。在敌军前卫开始从远距离向他开火之时，他解散了仍在身边的三位巡航舰舰长，让他们把他的想法准确传达给后方的战舰。布莱克伍德驾乘的小艇直接划向“尼普顿”号身边，他告诉它的舰长弗里曼特尔（Captain Fremantle），纳尔逊想要“在第13或第14艘战舰处切断敌军战列，然后扬帆朝左舷方向转舵，杀向他们的前卫”。[45] 此时，由于联合舰队中部分位于下风的战舰未能进入其指定位置，他们的战列线在第13艘战舰处出现了一个宽阔的缺口。[46] 纳尔逊显然准备抓住这个机会，从这里突破他们的战列，然后迅速驶向敌军前卫，从下风一侧与之交战。在此过程中，他准备用纵队前端大批的三甲板战舰打瘫沿途的敌人，然后把他们留给后续较弱的友舰来解决。

这个构想完全配得上他的天才，而且完全符合其最初计划的基本原理。这很好地回答了他为何没有横向展开舰队，他对纵队接敌的执着也得到了清楚阐释。这个构想令人钦佩地实现了牵制前卫的目的——直到攻击发起的最后一刻，敌人都不可能知道前卫到底是不是他的攻击对象。敌人的前卫和中军都同样处于威胁之下，因此，他根本不需要通常意义上的佯攻，事实上他也的确没有发起。如果他像几位目击者明确记录的那样驶向了“至圣三一”号，那么，在他穿过敌阵、朝左舷迎风转向之前，他想在“至圣三一”号后方一两艘战舰处的缺口穿越的意图就会让他朝右舷微微转舵。因此，与其说佯攻前卫，倒不如说是佯攻中军。但

整个构想的决定性意义更在于他无与伦比的战术眼光在最后一刻捕捉到了敌人阵型上的一个弱点，于是决定以完美的技巧在此发起攻击。这显然不再需要其他理由，只有保持纵队前进的姿态，他才可能发起这种突然袭击。他在这里最大限度地强化了他身先士卒的示范性。

在战斗开始之前，这就是纳尔逊向他的舰队发布的最后一道命令。然而，就在巡航舰舰长刚刚离开时，他又得到了足以令他改变决定的理由。维尔纳夫在两军逐渐靠近时打出了信号，命令联军一待敌舰进入有效射程就与之交战。当后卫开始朝科林伍德开火时，他与联军的所有将领都亮出了各自的将旗。敌军的总司令已经现身，他只能是纳尔逊的俘虏，而不能属于其他人。维尔纳夫的旗舰“布森陶尔”号位于联军实际战列的第10位，纳尔逊立即决定不再驶向它后方的缺口，转而在它与“至圣三一”号之间进行穿越。



特拉法尔加海战舰船位置示意

资料来源：据迈克尔·达菲教授论文《“一切都已被掩盖”：被隐藏的特拉法尔加》绘制的接敌态势图。

在最后一刻，纳尔逊似乎放弃了攻击前卫的计划，又回到了备忘录

中的原初方案。弱小的“阿非利加”号正从北方赶来，纳尔逊向它打出信号，让它与敌军前卫的领航舰交战。他似乎认为必须牺牲“阿非利加”号来使敌军前卫在他解决掉两艘旗舰前保持克制。然而这绝非易事。他刚刚拾起的包围敌军总司令的意图几乎立即就被敌人挫败。维尔纳夫看穿了他的想法，他立即让“布森陶尔”号转向上风，与“至圣三一”号组成一道斜阵，成功缩紧了纳尔逊所选择的间隔。纳尔逊只得顶着法军旗舰周围舰群的密集火力驶向“布森陶尔”号身后的下一个空隙，诚如他自己所说，这在猛烈炮火中无法支持太长时间。敌人每分每秒都在期待他和科林伍德被强大的火力压垮，而海上的风势几乎已完全衰竭。“布森陶尔”号身后的空当正是他最初为攻击前卫而选择的突破点，但在此时，那里已不再是一处易于通过的普通间隙了。为了应对旗舰所受到的威胁，法国战列舰“敬畏”号忠实地加速前进，它已靠近了“布森陶尔”号的船尾。任何人都不可能干净利落地穿过这两艘战舰，但如果纳尔逊要俘获敌军总司令，他就只能在这里突进。无奈之下，他只得转动船舵，冲向了“布森陶尔”号的舰尾。

纳尔逊的战术已经在此结束。如果他仍然希望从下风处与联军前卫交战，“敬畏”号的大胆行动已经完全挫败了他的意图。虽然身后的“勇莽”号为他提供了巨大的支援——它几乎挨到了“胜利”号的舰尾——但他突破战列的行动至少在战术层面已经失败了。由于“敬畏”号的及时阻拦，他只是简单地停在了敌军的阵型之内，已无力引领他所意欲的行动，也无法引领英军展开下一步的机动。“勇莽”号之后的“尼普顿”号在“布森陶尔”号身后完成了穿越，它对法军旗舰进行了纵射，随后便按照纳尔逊最后下达的指示迎风转舵，杀向了位于北方的“至圣三一”号战列舰，但这种行动并未持续多久。由于上风纵队是逐一冲向敌人的密集阵型，他们的冲击力已经自行瓦解。

这就是那场史无前例的、以垂直纵队向紧密甚至是重叠组成的战列线故意发起的大胆攻击的最终结果。就其实施细节而言，其垂直进攻的

特征是在最后一刻才被修改而出现的。“勇莽”号和“尼普顿”号距离它们的长官是如此之近，纳尔逊的突然行动迫使它们迅速转往左舷和右舷，以免撞上旗舰。[47] 舰队后方的那些战舰则从未组建成准确的阵型，舰长们匆忙地跟在纳尔逊的左舷或右舷之后，让它们看起来更像一群狼而非一支结阵的舰列。就战术原理而言，从来不曾有过如此孱弱的进攻，也从来不曾有过如此违背同步冲击原则的进攻。两支纵队都以霍克将军追杀逃亡之敌的方式投入了战斗，所有的战术构想在进攻开始时便已终结。

纳尔逊似乎是在赌博甚至绝望的心态下使用了这一战术，但事实上，这的确出于他英雄式的决断和直觉。这一行动准确地权衡了优势和风险。英军纵队前端的强大火力压倒了敌人的集火射击，并在联军总旗舰周围展开了纳尔逊所希望的混战；而从战场绵延而出的英军后卫则阻挡着杜马诺阿指挥的联军前卫，如果他直接折返援救，他就势必会处在不利的T字竖位，遭到英军的集火射击。

而在科林伍德方面，他发起进攻的冒险和大胆程度更甚于纳尔逊。他的分队前端并没有大量三甲板战舰，再加上“皇家君权”号的较高航速和他组成的小角度斜阵，他在遭受第一轮攻击时只能得到比纳尔逊还少的支援。不仅如此，他的攻击对象并不是纳尔逊为其指定的那12艘战列舰，而是原本后卫的后半部分再加上格拉维纳的一整支防备舰队——共计16艘战舰。其中3艘在下风侧脱离了战列，剩下的战舰则挤在一团，这使他难以辨别出第12艘战舰。一艘扬着中将将旗的西班牙三甲板战舰正好位于那个位置旁边，我们不能指望像科林伍德这样斗志昂扬的人在面对这种诱惑时还会追求那种严谨的精确。结果，他的攻击位置太过靠近中军，敌军阵型在那里与他的航线构成直角，而非如后方那样偏斜。科林伍德说：“在中午时分，‘皇家君权’号开始朝着从敌军后方数的第12、第13、第14、第15艘战舰开火射击，保持全帆去突破敌军战列。12时15分，转向左舷。”也就是说，他在最后一刻让他的航向更靠近战列

前方，在西班牙副司令的旗舰“圣安娜”号身后完成了穿越。[48]

尽管曾如此努力地展开舰队，科林伍德在一刻钟之内却没能得到任何支援。在将进攻兵力集中于敌军后卫之前，他自己却暴露在4艘强大敌舰的集中火力之下。然而，他却成功抢在长官之前率先投入了战斗，他高兴地向他的旗舰长喊道：“这会让纳尔逊说些什么！”在他率先开始战斗后，他的后续战舰并未紧随他跟进。最靠近他的“贝尔岛”号和“玛尔斯”号首先赶来为他提供救援。随后，“皇家君权”号独自留在这里与“圣安娜”号展开了决斗，而他的伙伴则被敌军的集中火力打断了桅杆、撕成了碎片。

除了科林伍德拒绝推迟进攻，另一个问题是他的舰队前端与敌舰队太过垂直，从而无法让他身后的斜向阵列作为整体展开冲击。这使舰队前方的半数战舰几乎全都遇到了同样的险境。森豪斯尉官搭乘的“征服者”号位于纳尔逊纵队第4或第5位，他说：“英军在那一天不仅没能两面夹击敌军，反而遭到敌人的两面、三面包围，他们似乎完全丧失了同时投入压倒性兵力的优势。‘胜利’号、‘勇莽’号、‘皇家君权’号、‘贝尔岛’号、‘玛尔斯’号、‘巨像’号和‘柏勒洛丰’号都在进攻时陷入了这种困境，只有最大无畏的勇气与最娴熟的炮术才能让他们脱身。……联合舰队一度占据了英军最希望取得的形势，那就是两面夹击敌军之一部，并使之与舰队主体分离。”[49]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巨像”号之后的其他战舰上，如“复仇”号。柯德林顿位于纳尔逊的纵队中，他说自己的位置拥有很清晰的视野，而他看到的是，下风分队的战舰一艘接一艘地驶向前方，依次向敌军后卫的剩余战舰发起攻击。[50] 事实上，由于各舰航速不同，也由于他的分队在三令五申后仍然未能组成阵型，这些战舰不仅是一艘接一艘地投入战斗，而且间隔还极不规则，以至于敌人甚至认为他们显然是以小组（groups）为单位发起袭击。第一个舰群即科林伍德和前端战舰，第二个舰群似乎跟在“复仇”号之后，第三个舰群则由“无畏”号与“波吕斐摩斯”号引领。由于格拉维纳奋力向前试图支援中军，

联合舰队的阵型组建得十分紧密。即便战列被英军多处突破，它仍然保持了阵势，直到后卫末端遭到另一支舰群的夹击。

战斗在接近一个小时后才大规模展开，战况由此好转，变得更加势均力敌。大约22艘英国战舰此时肯定已投入了战斗，他们的对手是22艘已被截断的法国与西班牙战舰。[51] 他们在联军战列两侧的手枪射程（pistol-shot）内开始了一场混战，舰长们只能用卓越的奉献精神与高超的机动技巧相互支持、相互救援，这就是他们在这个烟雾笼罩、几乎令人窒息的午后所能做到的一切。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战斗，双方也都是值得一战的强敌，他们都从对手那里赢得了不少敬意。任何一方都没有优势，唯一的例外是英军的炮术和航海技艺。凭借着艰苦奋战，纳尔逊与科林伍德麾下的官兵们逐渐扭转了鲁莽的进攻所造成的不利局面。他们在一个小时后开始收获果实，在逐一开始喷射的猛烈炮火上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优势。

在此期间，联军前卫并未采取行动试图投入作战。除了从北方驶向其阵位的弱小的“阿非利加”号，10～11艘战舰实际上并未遭到英军的攻击。但前卫舰队司令、法军少将杜马诺阿按兵不动，尽管所有人都认为他有责任去支援友军。军事法庭的无罪开释或许能终结对他的指责，但我们所关心的只是他的实际作为，尤其要用他的行为来评判纳尔逊攻击计划中“牵制”功能的有效性。

直到战斗开始的两个小时后，或者说直到战斗全面展开的一个小时后，杜马诺阿才因维尔纳夫反复打出的信号开始调转航向。此前，纳尔逊出乎意料的攻击方式一直使他深感困惑，他并不知道英军上风舰队的行动目的。但在此时，杜马诺阿已经看出了这种古怪战术的用意，它是想用纵队攻击联军的中军。他因此表示，这种纵队攻击有一个危险的缺陷，他们可以去截断纳尔逊后方的兵力。这是纳尔逊早已料到并了然于胸的风险。他曾在备忘录中写道：“他们在执行机动、驶近攻击英国舰

队的任何部分或支援友舰之前一定会耗费一些时间。”这一预想成功实现了。

海面上风力极弱，杜马诺阿只有用小艇拖曳才能让战舰转向。他们在接近下午3时才开始进发，但在此时，联军主力在大规模抵抗之后已经精疲力竭。遭到纳尔逊和科林伍德攻击的联军旗舰都已不剩一根桅杆，所有3艘都已降旗投降。不过，杜马诺阿还有机会：率先投入激战的英国战舰大部分都成了桅杆折断的船壳，而纳尔逊本人已在战斗中受了致命伤。如果不直接杀向中军，法军前卫完全可以在后卫末端提供有效支援。那里的战斗仍在继续，格拉维纳正在绝望地抵抗英军逐渐增强的兵力集中。他像纳尔逊一样躺在甲板下方，已经受到了最终不可救治的战伤；但他的舰队参谋长仍以顽强的勇气坚持战斗，杜马诺阿的兵力似乎仍能够挽救战局。救援后卫的希望是如此之大，而那位可敬的西班牙将军的处境又是那么危险，于是，当杜马诺阿带头向上风处驶去时，只有4艘战舰——包括3艘法舰和战列最前方的西班牙战舰“涅杜诺”号（Neptuno）——跟随着他的旗舰，其余的战舰则朝着下风处的格拉维纳驶去，其中的“勇敢”号（Intrépide）径直投入了“布森陶尔”号周围的混战。在维尔纳夫的参谋官看来，所有战舰都应采取“勇敢”号的航线。[52] 这是最直接、最稳妥的重启近战的方法，也唯有如此，联军才有一丝成功的希望。然而，弱小的“阿非利加”号——此前，它成功地驶过了危险的敌军前卫，来到了战场中央——拦住了大胆的“勇敢”号。这艘孤立无援的英勇法舰很快就被新赶到战场的英舰俘虏——与之交战的至少包括由诺塞斯克勋爵的“不列颠尼亚”号引领的“埃阿斯”号和“俄里翁”号。[53]

与此同时，杜马诺阿正朝着纳尔逊纵队中最后两艘没有投入战斗的战舰——“斯巴达人”号和“米诺陶”号——驶去，法军少将想要截断它们的阵线。由于组成纵队的要求被保留到了最后，曼斯菲尔德舰长（Captain Mansfield）此时驾乘较慢的“米诺陶”号位于前方，“斯巴达

人”号则作为殿后舰。他们已经看到了危险，但并不是他们自己面临的危险。两艘英军旗舰与“勇莽”号几乎成了不能自理的船骸，正被各自俘虏的敌舰所拖累。“斯巴达人”号的舰长弗朗西斯·拉弗雷爵士（Sir Francis Laforey）认为机不可失，请求让后舰取代前舰。于是，两位忠诚的伙伴便直接越过杜马诺阿旗舰的舰首，在手枪射程上对其展开纵射，随后在下风处顶风停航，阻挡在他与英军旗舰之间。他们坚守着这个阵位，与随后行经的4艘法舰交火，并迫使它们待在上风位置。他们的表现相当出色：出于他们的主动性与备忘录的实质精神，这2艘74炮战舰阻挡住了3艘74炮战舰和2艘80炮战舰。

除了战斗的开局，没有哪个时刻比此时更加危急。“胜利”号和“皇家君权”号都只剩下一根桅杆，两者都已无法操控；“勇莽”号则已经成为废船壳，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不列颠尼亚”号已穿过战列去攻击下风处的敌舰，它无法及时折返，只有“尼普顿”号和2艘受创的双甲板战舰仍能抵抗杜马诺阿的攻击。但更糟糕的是，科林伍德已经得知纳尔逊身受重伤，他因眼前的危机陷入了深深的焦虑，没有人知道这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布莱克伍德登上了“皇家君权”号，他用纳尔逊去世的可怕消息打破了沉寂。这场战斗的灵魂已经远逝，科林伍德受到了强烈的震悚，但即便如此，他一刻也没有丧失理性。现在，他接掌了指挥权。他有责任从危险中保全这场属于他朋友的胜利。

“雷神”号是科林伍德分队中最后方的几艘战舰之一，它扬着全帆，突然闯出硝烟。它在战斗中的角色可以很好地展示出逐一进攻导致的兵力集中态势。1时15分，它在舰队末端开始用右舷炮射击，并在2时左右靠上了一艘已与它展开炮战的双甲板战舰。一刻钟后，它打断了对手的所有桅杆，迫使其降旗投降；又一刻钟后，它用同样的方法俘虏了另一艘被打残的双甲板战舰。接着，它杀向了格拉维纳受创严重的旗舰“阿斯图里亚亲王”号，后者刚摆脱了“无畏”号，正在朝“复仇”号猛烈还击。“雷神”号转向下风，在“阿斯图里亚亲王”号舰尾进行猛烈纵射，迫

使其最终逃往下风，退出了战斗。随后，它看到敌军前卫袭来，便转向上风，再次穿越敌军。[54] 与此同时，“米诺陶”号与“斯巴达人”号正试图投入战斗。科林伍德作为总司令的第一则信号在此时打出，他命令这3艘战舰前去迎击正从上风方向四分之三英里外驶向中军的杜马诺阿的5艘敌舰。“雷神”号在日志中写道：“我们扬起了所有还能使用的帆，欢呼着驶过了‘胜利’号。”而“米诺陶”号与“斯巴达人”号也服从了命令，正如我们所知，它们已经开始与西班牙准将巴尔德斯（Commodore Valdez）的座舰“涅杜诺”号交战。[55] 经过艰苦的努力，“胜利”号、“皇家君权”号与一些双甲板战舰恢复了部分火炮的射击，“尼普顿”号也再次做好了战斗准备。杜马诺阿发现中军局势已经无可挽救，“布森陶尔”号已经投降，他便将“涅杜诺”号抛弃给了“米诺陶”号与“斯巴达人”号，自己率领剩余兵力继续去后卫寻找战机。

但是，科林伍德已在后卫准备好迎击，他的战斗意志仍如往常那样坚定。看到杜马诺阿的威胁后，他打出了全军依次转向左舷、驶向上风的命令。[56] 结果，当杜马诺阿抵达向后卫发起攻击的位置时，他看到6艘战舰正在迎风组建一条新的战列线。更让他斗志消沉的是，他看到格拉维纳的旗舰显然已逃离了战斗，桅杆上飘扬着在它周围集合的信号旗。此时，杜马诺阿至少还有理由从英军后卫旁驶向下风以与格拉维纳会合，但科林伍德的信号似乎对这种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格拉维纳与他身边的战舰很快就驶向了加迪斯，看来不会再展开攻击，这使他再次失去了战意。杜马诺阿决定接受战败的事实，朝着南方的直布罗陀海峡驶去。他分队中剩余的战舰也试图逃向下风，但很快就被追击敌军驶向加迪斯的“不列颠尼亚”号及其伙伴阻拦，1艘被俘，其余则被重创。就在此时，这群英舰接到了科林伍德打出的驶向上风的信号，把它当成了召集舰队的命令。[57]

它们在这里无疑还能取得更多的战果。格拉维纳的旗舰已无法操纵，它正由友军拖曳前行，显然很可能被英军俘获。但是，海潮涌起的

预兆已经出现，这使位于下风浅滩边的伤残英舰岌岌可危，更不用说那大批被俘的战利舰了。尽管纳尔逊在战斗前已经准备了下锚的信号并在临终时希望执行，但科林伍德认为在此下锚完全不可行。每一艘能够转向、能够升帆的舰船都需要去协助友军，在他看来，局势的风险已经到了最大极限。此时，除了仍在做着最后抵抗的西班牙战舰“涅杜诺”号，整个战场上的炮火已经消歇。它在下午4时刚过时降旗投降，这场英国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海战就此落下帷幕。

敌军的总司令与两位将军成了英军的俘虏。在一天前离开加迪斯的33艘战列舰中，只有9艘战舰在夜间安全返航，4艘战舰正逃往直布罗陀海峡，至少有20艘仍然留在战场上。其中，17艘已完全被毁，13艘已经被战胜者实际接管，1艘爆炸沉没。与之相对的是，英军舰艇无一损失。

因此，无论纳尔逊是否执行了他的攻击计划，其战术的合理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他对这种战术的牵制能力的预判完全正确：联军前卫无法及时回援，待到他们回过身来，备忘录所说的那种“驶近攻击英国舰队的任何部分”的行动也最终失败。至于其他方面，西班牙海军参谋官已经基于当时所知的所有情况，在容纳了所有细节误差之后，做出了最慎重的总结。他们写道：“英军集中兵力攻击我方战列的中军和后卫，让后卫卷入了常规的战列对战列的作战，并两面夹击我方后卫末端，同时让前卫远离战斗。”[58] 这句话对实际发生的战斗做出了准确的评估，并正确地总结了纳尔逊备忘录的主要构想。在西班牙海军参谋官看来，这一构想得到了圆满实现。而在另一方面，与法方一样，他们的报告中也满是困惑和惊讶：这样一种极其鲁莽、完全无视现有规则、以纵队发起并缺乏任何常规调度的攻击，竟然没在刚刚展开时就被粉碎。任何推论都无法回应这一批评。在战术效果上，他在最后一刻的接敌方式的确是用纵队的一端向前进攻。纳尔逊分队的不规则队形和舰队正面在最后一刻意外变宽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正如不能用科林伍德出于良好意愿但

并未落实的组建左舷迎风斜阵的信号来否认他的纵队阵型一样。在先导舰投入战斗之前，英军的两支分队既没有完成任何调度部署，也没能让整支舰队形成整体，进而发挥出纳尔逊在备忘录示意图中所设计的整体冲击力。

如果这些当时的证据所认可的结论都是事实，那么，对“这场战斗是否遵从了纳尔逊的攻击计划”的回答就简单明了，不容置疑。我们可以认为，它的主要战术的确遵从了预案，其实施细节却没有。正如西班牙海军参谋官所言，其主要战术构想已经完全胜利地实现，但实现它们的实际方法并未遵照纳尔逊的设想。或许他曾口头讨论过他将采用的方法，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他在一生中最为关键的巅峰时刻放弃了科学部署的保障，以较高航速冲向了一支似乎没有结阵、正试图逃跑的敌人，把所有赌注都压在了英军的士气与战斗力优势以及他对敌人的假设之上。两支纵队的前端毫无遮蔽地暴露在敌军阵前，他们可能因风力减弱而被孤立，可能被敌军的集火射击早早击毁，他所承担的这种风险几乎超过了理智指挥的极限。他的胜利和敌军广为人知的缺陷使之取得了成功，但我们或许可以怀疑，如果他意识到敌人的作战意志远较他预想要高，他是否还会如此冒险。布莱克伍德让我们看到了他在发现敌军摆出良好的迎击姿态时的高度紧张，但为时已晚，他无法再做改变。为了降低风险而在最后时刻中止一场鲁莽的攻击将会酿就最为严重的错误。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纳尔逊是正确的。敌人缺乏训练和缺乏航海经验的缺陷拯救了他，并为他的大胆冒险提供了正当理由。一些能干的军官在事后对战术进行冷静评估时认为，他实际上并不必须如此冒险，如果把进攻推迟一个小时左右，让舰队先进入他所设计的阵位，他仍有足够的时间来消灭敌人，甚至能取得更具决定性的战果。现在已没人能对这一说法做出评判，这似乎全然取决于一种旧日的风帆时代海军战术的实施细节。我们只能说，他所冒的风险极其巨大，这是他在制订计划时并

不准备承担的风险，也是他的舰长们从未料到的风险。然而，即便如此，他最终的决定仍然超凡绝伦，这是由于他的领袖精神与冥冥天意。天才的光芒不会屈服于理智的批评，他们超出法则和原理之上，所有用科学标准来衡量他们的努力都只能迷失在这句最后的评论里："这是一场光荣的胜利。"

---

[1] 风向的不断变化非常重要，尤其是最近有人试图用风向来精巧地论证纳尔逊并非垂直发起攻击（Thursfield，*Nelson and Other Naval Studies*）。这种说法假定风向一直如"胜利"号航海日志在中午记载的那样是西北方，但科林伍德的说法就与此相反，他说风来自西方附近。英军与法军的报告也一致印证了这一点。"亲王"号的航海长日志说风向是西方到西南方；"尼普顿"号的舰长日志则分别记录为北偏西5～8 个罗经点、北偏西8～12个罗经点（即西偏南）以及北偏西12～6个罗经点；"雷神"号在中午时记录的风向是西南偏南。总体而言，这些证据的说法是风向从西偏北转为西方，时而转为西偏南。"柏勒洛丰"号依次记下了"西偏北""东北偏北""西北偏北""西"。"无畏"号的记录是"由西北到西"，"复仇"号的记录是"变化，静止，变化"。

[2] "侧舷迎风的斜向阵列"可以用高度技术化的语言描述为航向与风向相差7个罗经点、所有战舰航向相同但首尾相错的直线阵型，如果全体逆风转向，就可以组成左舷或右舷顶风航行的战列线。因此，"侧舷迎风的斜向阵列"的航向已经被规定为确定的罗经点。

[3] See "Instructions respecting the Order of Sailing"：*Signal Book*，1799，article ii，p.127."纵队应相互平行，每艘战舰都应跟随其纵队先导舰转向。" Cf. *Signals and Instructions*（*Navy Records Society*），pp.75-77.

[4] 纳尔逊首先打出的是72号信号："组成两路纵队的航行阵型。"对应的指令可见于*Signal Book*，No.4，p.101，内容是"当组成任何舰列或航行阵型信号的打出"并附有罗经信号时，信号的意思是"按照指定方向组成阵型"。如果罗经信号是在主信号得到回复之后才挂出，"这表示舰队将要转舵的方向"。而在这里，纳尔逊并未在打出组成航行阵型信号的同时挂出罗经信号，而是随后将之与另一个信号一齐打出。76号信号的意思是"迎风停船，遵照旗舰的动作或信号指示的方向转舵，然后大张风帆，驶向下风"。在这里，东北偏东就是"信号指示的方向"。这有时会被理解为"同时转向下风"，但对应指令（No.14，p.132）的开头是"当舰队逐次大张风帆，驶向下风"，随后又说明每艘战舰的行动应如何注意它之前与之后的战舰。这是纳尔逊在舰队尚未结阵时惯于使用的信号，例如，他在《9月30日的舰队行动》（*Add.MSS.* 34973）中写道："1时，顶风缓行；6时，打出全体信号，让停航船只开始航行（76号）；6时35分，依次转

向；6时35分，大张风帆，驶向下风（再次打出76号）；6时42分，全体组建航行阵型。”让舰队组建“战列线或航行阵型”的信号是79号到82号。79号和80号是让战舰逐次向左舷或右舷转向一个罗经点，或者转往罗经信号明确标示的航向。81号和82号则是一同转向。这里没有信号能让未结阵的舰队一同驶向下风。如果没有组成起战列线或航行阵型，这个信号就不可能打出，因为这将使整支舰队失去便于快速结阵的宽松的巡航阵型（cruising order）。

[5] *Masters' Logs*，P.R.O.不幸的是，尼古拉斯的纳尔逊书信集和《大海战日志汇编》（*Logs of Great Sea Fights*）都没有收录这份日志，否则，十分谨慎的历史学家科隆布将军（Admiral Colomb）就绝不会冒险推测舰队是同时驶向下风（*The Battle of Trafalgar*，1905，reprinted from the *United Service Magazine*）。森豪斯对此的说法也很清楚："英国舰队依次驶向下风……随之组成了两路纵队的航行阵型，直至发起攻击。"（*Macmillan's Magazine*，vol.lxxxi.422.）"依次"这一概念不仅能用于纵队，同样也能用于松散的巡航阵型，意即每艘战舰在前方战舰行动之后才能转往新的航向，这是为了防止混乱和意外的发生。

[6] Nicolas，vii.137.科林伍德在他的日记里清楚地记录了此时发生的情况："6时30分，组建两路纵队的航行阵型……驶向下风。英国舰队以两路纵队驶向他们。"（*Great Sea Fights*，ii.201.）他最初的航向是南偏东80度，可能是为了与"胜利"号拉开一个合理的距离（*Royal Sovereign*，Captain's Log）。另可参见莫尔森舰长和哈维舰长的叙述以及纽波特先生的《特拉法尔加之年》。（*Year of Trafalgar*，pp.83-4.）英军信号簿中的"纵队"（Column）是来自法语的术语，这个词在所有关于组成航行阵型的信号中都没有出现。

[7] 一些战舰似乎预测到了纳尔逊的信号，如往常那样事先驶近了它们的位置。See Logs of *Conqueror* and *Ajax*：*Great Sea Fights*，ii.257 and 285.

[8] See Desbrière，*Trafalgar*，pp.184-6 and in his *Appendix*，Report of Villeneuve，p.129；Dumanoir，p.150；Magendie，p.178；Lucas（*Redoutable*），p.197；Philibert（Magon's chief-of-staff），p.233；Epron（*Argonaute*），p.249；L'Achille，p.263.Two French vessels，*Neptune*（p.192）and *Fougueux*（p.214）report the enemy forming *en échequier*（*i.e.* line of bearing）and then in column.

[9] Desbrière，*Trafalgar*，p.129.

[10] Ibid.，p.192，*Neptune's* report.See also p.166，Report of the *Héros*，其写道"敌人形成舰群"。

[11] Clarke and McArthur，ii.146，and Nicolas，vii.138.

[12] 格拉维纳的参谋报告记载得非常明白："8时，打出同时调头的命令。为了朝着左舷船舷后侧组成战列，各舰依次向下风转去。"

[13] 当舰队依次调头时，两艘战舰间的距离必然会因为二者的相对运动而扩大，进而使战列线不再紧密，不利于集中火力与敌交战。但这种机动相对易于执行，适用于较为松散的航行阵型。而处在战斗阵型之中的舰队则往往采用一齐机动的方式，从而保证阵型的紧密。由于联合舰队集体调头的信号未能得到良好的执行，使纳尔逊误以为他们在执行依次转向的命令，而执行这种命令的阵型自然只能是航行阵型。由此，纳尔逊错误地得出了联军一心要逃回加迪斯的结论。——译者注

[14] 在七年战争中的1759年，法国试图集结土伦舰队与布雷斯特舰队，掩护陆军侵英。1759年8月，法国土伦舰队在直布罗陀海峡被博斯科恩将军率领的英国舰队发现。两军在拉各斯相遇。法军转身逃跑，英军立即展开追击，在接敌过程中逐渐组成战斗阵型，随后追上法军，摧毁和捕获了5艘战列舰。同年11月，布雷斯特的21艘法国战列舰出海与运输船会合，遭遇霍克将军率领的拥有24艘战列舰的英国舰队，前者随后决定退入暗礁丛生的基伯龙湾。在恶劣天气中，霍克勇敢地命令英军发起全面追击，并让靠近敌人的前卫舰队在满帆状态下组建战列线。通过这种方式，英军在法军完全退入海湾前咬住了其后卫舰队，再次取得大胜，歼灭了7艘法国战列舰。——译者注

[15] 有趣的是，在17艘记录了之前准备信号的战舰中，只有7艘提到了组建航行阵型的命令。

[16] To Pasley，December 16th：Nicolas，vii.241.

[17] 每个罗经点与相邻罗经点之间的夹角是11度15分。——译者注

[18] "胜利"号的日志这样记录了航向的改变："7时，航向是东北偏东。8时（一直到中午），是东偏北。""尼普顿"号的记录是："7时，东北偏东。8时（一直到中午），东偏北半点。"科林伍德的日志记录了一则信号："7时40分，驶向东方。""皇家君权"号给出的航向大概是"南偏东80度"，它身后的"雷鸣"号则是"东偏南"。"尼普顿"号之后的"征服者"号记录的是"东偏南半点"。接敌过程中的实际航向十分令人困惑，这是由于一些战舰只记录了最初的一则罗经信号，另一些战舰只记录了两则；而且，只有"埃阿斯"号是唯一正确记录了两则信号的战舰。

[19] 由于"皇家君权"号日志未得到妥善保管，这则战斗中最为重要的战术命令一直被系于11时左右。"雷神"号同样也记录了这一信号，它将之记在下午。然而，"勇莽"号和"防御"号的两份信号日志足以准确说明其时间，令人惊奇的是，许多以这场海战为题的作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些材料。"勇莽"号的航海长日志写道："8时47分，'皇家君权'号向左舷分队打出42号和88号信号。""防

御”号的舰长日志和航海长日志都写道：“8时45分，‘皇家君权’号发来50号信号；8时46分，又打出42号和88号信号。”50号信号的意思是“向右舷转向，但应维持左舷迎风的斜向阵列”。纳尔逊分队中的“阿伽门农”号以为这是发给全军的信号，便做出了回应。但这或许是信号官的失误，随后打出的42号立即撤销了之前的信号，它的意思是“组成左舷迎风的斜向阵列，转向标示的方向”。而88号的意思是“升起更多的帆，如果在战列线或航行阵型中，则由领航舰开始”。

[20] See *Signals and Instructions*（*Navy Records Society*），p.77，and *Signal Book*，1799，Instruction xv.120.

[21] 这则信号所附的指令（*Signal Book*，1799，p.149，Instruction vii.）是：“战舰应当让自己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如果它们在业已组建的斜向阵列中一齐向上风转向，它们能立即组成一道航向与斜向阵列展开方向相一致的战列。为此，每艘战舰必须驶向若组成战列线则将位于它之前的那艘战舰，然后靠近舰队将要采取的航向，也就是与来风方向相差7个罗经点的方向。如果信号要求‘紧靠’风向，则是相差6个罗经点。”

[22] Signal 81，and Instruction viii.150.

[23] “胜利”号的日志写道：“仍然驶向敌军前卫（van）。”但按照其记录，这是驶向第14艘战舰，而且它从未再改变其东偏北的航向。因此，这应当是指“前半支舰队”（the van half of the fleet）。

[24] 由于有人试图用联军正在向北航行来论证纳尔逊并非以垂直姿态接敌，联军的静止姿态就十分关键。对阵双方都能给出有力的证据。在《大海战日志汇编》（*Logs of Great Sea Fights*）中，我们可以看到：“白天，敌人正在组建战列线迎接我们的攻击。”（Britannia，p.211.）“白天，敌人顶风停航，组建战列。”（Spartiate，p.262.）“12时10分，敌舰队组成纵队，顶风停航。”（Colossus，p.265.）“中午时……联合舰队顶风停航。”（Entreprenant，p.320.）“柏勒洛丰”号上的见习生沃克尔（Walker）写道：“当我们乘风驶向他们时，他们组成了战列，以极大的勇气等待着我们。”（Ibid.，p.323.）森豪斯说，敌人“在顶风停航时还挂着主桅的上帆，结果无法保持准确的位置”。（*Macmillan's Magazine*，vol.lxxxi，p.421.）在法军记载方面，很明显，他们唯一的动作就是组成战列所必需的动作。“前卫的战舰被迫停留了很长时间。”（Prigny's *Abstract*，Desbrière，p.285.）“战斗舰队”也是一样，“其他战舰在战斗开始时都没有动”。（Ibid.，p.186，另可参见他引用的报告。）“布森陶尔”号也顶风慢行（Ibid.，p.187）。我们还可以从“胜利”号的转向情况中得知这一事实，尽管它在整个接敌过程中都是驶向联军前方第14艘战舰，但直到最后一刻之前，它都没有任何转向的记录。由于其他战舰每个小时都会记录其航向变化，我们可以认为“胜利”号从未转向。

[25] Clarke and McArthur，ii.ch.xii.p.148.贝蒂医生说“胜利”号向“勇莽”号

和“利维坦”号打出信号，让它们驶向它的前方。Nicolas，vii.146.“勇莽”号的航海长日志记录了9时36分发给“利维坦”号的269号信号，让它待在“勇莽”号身后。本应在此的“尼普顿”号此时显然是落在了后面。

[26] 科林伍德的昵称。——译者注

[27] “皇家君权”号的日志：“11时，升起翼帆。”（翼帆指在桅杆纵轴中央的横帆两侧附加的帆，主要用于在微风天气下增大帆面，提供更多动力。——译者注）

[28] 所有法方的态势图都显示了这一点，纳尔逊舰队中部分战舰所记录的航向也与此相符。

[29] 维尔纳夫自称在9时看到了这一情况，而官方简报则将之推迟到11时。

[30] “尼普顿”号给出的风向是西偏南，“雷神”号在12时15分的记录是西南偏南。

[31] “胜利”号的G.L.布朗尼尉官（Lieutenant G.L.Browne）写道：“11时，我们距离敌人约3英里。” *Great Sea Fights* ，ii.197.

[32] 此时最快的战舰航速也很难高过3节，较慢的战舰航速则为2节。非常缓慢的“亲王”号记录的航速为2节，在9时到10时之间仅有1节。“尼普顿”号最初超过3节，在9时之后就减到了1.4节，之后也一直如此。“米诺陶”号最初也是1.4节，到9时提高到了2节。其后的“斯巴达人”号始终都是2节。另一艘低速三甲板战舰“无畏”号在10时之前航速仅有1节，到中午时增加到了2节。“雷鸣”号的航速为2节，随后略有提高，在投入战斗时到了2.4节。快速的“复仇”号航速则从最初的1.5节提高到2.4节，并在投入战斗时提高到3.4节。之前被用作信号通讯舰的“防御”号必须从北方驶来，航速仅有1节。“征服者”号航速始终保持了2节。“敏捷”号的航速在11时由2节提高到3节。“胜利”号和“皇家君权”号最终阶段的航速都显然是3节。

[33] *Life of Codrington* ，ii.60.与之类似的是“挑战”号的日志，简单地记着“驶向敌舰队”，而没有通常对航向的说明。

[34] 一些战舰记录了它们的具体航向。在下风舰队，“雷鸣”号的航向一直是东偏南。“复仇”号在接到科林伍德的信号后从东偏北转向正东，之后再无改变。“敏捷”号在7时的航向是东北，在8时是东北略偏东，在10时是东北偏东，到11时接到科林伍德最后的信号指挥转为东南偏东。“防御”号从北方驶来，其航向是西南偏南、南偏西，到10时转为东南偏南。“亲王”号的航向依次是正东、东偏北、东北偏东，到10时又转向正东。“无畏”号在7时为东北偏东，8时为东偏北，10时转为东偏南1.5个罗经点，一直保持到投入战斗。保管不善

的“皇家君权”号的日志给出的航向一直是南偏东80度。而在纳尔逊分队，“勇莽”号只记录了北偏东34度。“尼普顿”号在7时是东北偏东，8时之后改为东偏北半个罗经点。“征服者”号也一直是东偏北半个罗经点，一直到中午。“俄里翁”号在7时是东偏北，在8时是正东，9时是东偏南，之后的两个小时又是东偏南1.5个罗经点，到中午时是东南偏东。“斯巴达人”号保持东北略偏东一直到中午，“米诺陶”号肯定与它相同。“不列颠尼亚”号驶向正东，一直到中午再转向东南偏东。

[35] 所有联合舰队中军的报告，包括法国官方的简报，都认同这一观点。但德斯奇霍上校认为（*Trafalgar*，p.208），就总体证据而言，纳尔逊的分队是驶向联军战列的最前端，再在联军舰炮射程的中央、顶着前卫的炮火以相反的航向驶向后方，直至其在“布森陶尔”号之后的位置转向。但他仅仅引述了“勇敢”号和“西皮翁”号的报告，而事实上，如果看过普利尼对舰队划分的提示，他就会发现这两者并不支持这一结论。“西皮翁”号说，纳尔逊的纵队“驶向前卫的中央”，这显然是指前半支舰队的中央，也就是“至圣三一”号的前方。“勇敢”号的说法只是纳尔逊“用机动切断了‘布森陶尔’号”。杜马诺阿所说同“西皮翁”号一样，纳尔逊“驶向我军前卫的中央”，意指“胜利”号计划在“至圣三一”号之前转向突破。而除了柯德林顿的说法之外，我们无法为纳尔逊意欲发动佯攻找到任何证据。

[36] Vol.iii.397.

[37] 参见布莱克伍德致他妻子的信（Nicolas，vii.226）：“如果上帝能让他活着看到他的战利品和他俘虏的将军——总共有三位——其中就有法军总司令，但我只能抱歉地说，那是维尔纳夫而非德克雷。”纳尔逊的私人牧师斯科特的一封尚未刊印的信件也能佐证纳尔逊当时主要想俘虏敌人的总司令。他写道：“这是他主要的目标，然而，那个法国人却从未升起他的将旗。（当纳尔逊死去时）他并不知道他已经俘虏了那位将军。”在这里，斯科特所述显然不对。他说：“我从未去过中甲板以上的地区……我在医生下面的房间里。”他肯定是在维尔纳夫升起将旗之前就去了那里。参照法方和西方的报告，联军显然打出了将旗。纳尔逊麾下的战舰也能应证这一点，他纵队中位于末尾的“斯巴达人”号记录道：“12时59分，‘胜利’号驶向一艘西班牙四甲板战舰和法国双甲板战舰之间，法国战舰的主桅上挂着将旗。”（*Captains Logs*，*P.RO.*）它的航海长日志记录道：“按照钟表记录的开战时间似乎快了34分钟。”事实上，它的计时比“胜利”号还要快半个小时，这12时59分相当于“胜利”号的11时55分。

[38] See Nicolas，vii.154，note.对纳尔逊转向的唯一描述是他转向了右舷，参见“雷神”号的日志：“观察到‘胜利’号转向领航……朝着敌人的中军。”Ibid.，202，note.

[39] 然而，在布莱恩·滕斯托尔1990年首次刊发的纳尔逊进攻指令中却清楚

地写道："在打出这个信号之前，将军可能会让他的舰队向前行驶到敌军前卫的位置，以此来欺骗敌人，使他们认为他想对他们的前卫发动攻击。"因此，科贝特虽然可以否认纳尔逊曾向左舷转向，可以论证纳尔逊曾想向前卫发动真正的进攻，却无法否认他的确曾计划向联军前卫进行佯攻。参见本书附录Ⅰ后的译者说明。——译者注

[40] 这里的时间似乎与"胜利"号的计时相一致，但"欧律阿罗斯"号记载转发"英格兰希望所有人履行职责"的信号是在11时56分，而"胜利"号信号官帕斯科（Pascoe）则说是在11时45分。

[41] Vol.iii.392.

[42] 当时最好的法国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旧日战争的老兵）在对这场海战进行了谨慎而睿智的研究后认为，这就是纳尔逊的意图，尽管他自然会将之视作一种佯攻。"纳尔逊首先向联合舰队的前卫和后卫发起佯攻，之后重新将其兵力集中于中军，将战斗的成败交到了他那些机智的舰长们的手里。"Mathieu Dumas，*Précis des Evénéments Militaires*， xiv.408.

[43] Lieutenant G.L.Browne of the *Victory*：*Great Sea Fights*， ii.196.布朗尼尉官的记录称它是在10时40分打出，而詹姆斯在其海军史中则称是"在战斗开始的几分钟前"。但布朗尼说得十分明白，而且他还是旗舰上的辅助旗语官。

[44] "尼普顿"号的航海长日志记录道："11时50分，'勇莽'号占据了'胜利'号后方的位置，下一艘就是'尼普顿'号。"而"勇莽"号的舰长日志写道："中午时，'胜利'号向'勇莽'号打出了269号信号并挂起了三角旗。""勇莽"号的计时比"胜利"号快了20分钟，哈维舰长说他在"胜利"号开火前15分钟接到了信号，因此这应当是11时45分左右。

[45] "尼普顿"号的日志将之记载为11时50分（Nicolas，vii.186）。这是在"皇家君权"号开火的7分钟前，而根据"胜利"号的时间记载，"皇家君权"号在11时40分开火。

[46] Rapport du Capitaine de vaisseau Lucas （*Redoubtable* ）： Desbrière，*Trafalgar*，*App.* ， p.196.

[47] "至圣三一"号的报告（Desbrière，*Trafalgar*，*App.* ， p.365）对此时局势做出了描述："胜利"号转向联合舰队的中军，"与'勇莽'号和'尼普顿'号一同组成了一道大致平行于'群雄'号、'至圣三一'号与'布森陶尔'号的舰列"。这似乎意味着纳尔逊与他的两艘僚舰也组成了大致平行于"至圣三一"号及其两艘后续舰的斜向阵列或者不规则横队。柯德林顿表示："我们的舰列彼此压得太近，以至于只能组成舰首与舰尾想错开的斜阵而非纵队。" *Life* ， i.64.

[48] 它是一艘112炮的一级战列舰，桅顶飘扬着西班牙海军中将德·阿拉瓦（Vice-Admiral de Alava）的将旗。按照德斯奇霍上校所言，它在实际战列中位于从后数的第13位（*Trafalgar*，p.207）。

[49] *Macmillan's Magazine*，vol.lxxxi.424.

[50] *Orions' Journal*：Nicolas，vii.192，note.柯德林顿此时写下的文字当然是很好的证据，与他晚年的回忆形成了鲜明对比。

[51] 埃克塞特大学历史系教授迈克尔·达菲曾对英军各舰投入战斗的时间加以考证研究。科林伍德的“皇家君权”号在12时左右开始对“圣安娜”号开火回击，他身后的前7艘战舰在随后的20分钟内全部投入战斗。但从“波吕斐摩斯”号到“挑战”号的这5艘战舰却是在他开战的60～75分钟后才开始射击，而最后方的“防御”号与“亲王”号甚至在2～3个小时后才开始战斗。纳尔逊分队的情况也与此相似。旗舰“胜利”号在12时20分开火，随后的5艘战舰在10～15分钟内就开始战斗，但其余战舰则是在“胜利”号开火的50分钟后开始交战，纵队最末的“米诺陶”号与“斯巴达人”号则要到2个多小时后才开始向折返的联军前卫射击，而落单的“阿非利加”号倒是很早就开始与法军前卫交战。综上所述，自12时英军作战开始的头一个小时中，只有15艘英国战列舰投入了与强大敌人的战斗，其中只有13艘战舰及时地突入敌阵，与敌人展开了近战。它们承担了英国舰队中绝大部分的伤亡，完成了战斗最为关键的阶段。达菲认为，英国的胜利主要就来自这半支舰队的奋战。直到战斗开始的一个半小时后，科贝特所说的22艘战舰才全部投入战斗；除了最早投入作战的半支舰队，其他大部分战舰始终未按照纳尔逊的指示与敌舰展开近战。参见Michael Duffy，“'...All was Hushed Up'：The Hidden Trafalgar，” *The Mariner's Mirror*，Vol.92，Issue 2，2005，pp.216-240。——译者注

[52] See the plan attached to Prigny's report，No.i，Desbrière，*Trafalgar*，*App*，p.142.

[53] *Life of Codrington*，i.61.诺塞斯克勋爵在海战中的角色非常模糊不清。他自称在纳尔逊10分钟后投入战斗，“当我们进攻时遭到了3艘敌舰的射击”。“不列颠尼亚”号的日志写道：“3时，穿过战列。”这意味着他在两个小时中都在相当远的距离上射击。科林伍德在他的官方表格中将之排在最后，但“斯巴达人”号与“米诺陶”号显然还在他之后。“布森陶尔”号的舰长马戎第（Magendie）在他的战斗形势图中将“不列颠尼亚”号放在第4位，或许这是它在战斗阵型中的真正位置。但最权威的列表则将之放在第6位，位于“埃阿斯”号与“俄里翁”号之前。

[54] *Thunderer*，Captain's Log，P.R.O.

[55] 科林伍德的日志，*Great Sea Fights*，ii.203。他说他在3时30分之后打

出了信号。另可参见“米诺陶”号与“斯巴达人”号的日志，Ibid.，pp.250，270.“雷神”号表示，它在3时30分之后接到了口头命令（Nicolas，vii.202）。对于杜马诺阿的报告，参见Desbrière：*Trafalgar*，*App.*，p.152。不幸的是，“欧律阿罗斯”号没有记录这些信号的时间，而“勇莽”号在12时30分之后已没有任何记录。

[56] “无畏”号的日志称：“在4时5分，向全军转发101号信号。”（由于各舰计时存在极大差别，此处时间约等于“胜利”号计时的3时35分。）巡航舰“菲比”号（Phoebe）说，它在3时20分从“胜利”号那里转发了这则信号（约等于“胜利”号计时的3时40分。）“胜利”号的后桅此时并未倒下，因此可能也转发了这则信号。信号的意思是：“在先导舰之后，逐一向左舷转向驶向上风，抵达其后方。”与相应指令对读，便可以知道这是一则让每支分队按照局势所需进行转向来重组战列线的命令。

[57] “不列颠尼亚”号称它在4时30分遵守了这一命令（相当于“胜利”号计时的3时40分）。

[58] *Diario del navío Príncipe de Asturias*（Gravina’s flagship）：Desbrière，*Trafalgar*，*App.*，p.387.The passage is a note added subsequently.

第二十五章 海上战役的落幕

皮特的政策所需要的决定性战斗已经实现。拿破仑在地中海沿岸动用舰队的企图已被粉碎，但英军同样也付出了代价。尽管这在他们的战果面前不值一提，但也足以让科林伍德无法立即执行从纳尔逊那里继承而来的在意大利支援盟军行动的那则指令。

凶险的强风在战斗后的那天夜里席卷而来，并在接下来的两天中变得愈发暴烈。如果它没有稍稍向南方偏转，恐怕所有失去桅杆的英舰与战利舰都会遭到灭顶之灾。3艘曾与纳尔逊和“勇莽”号战斗得最为激烈的战舰——“敬畏”号、“激情”号与“布森陶尔”号——在风暴中沉入大海。英军释放了俘虏，敌我双方决定携起手来，只有这样孤注一掷的努力，其他的许多战舰才能远离礁石、保持漂浮状态。更糟糕的是，为了解救漂到加迪斯海湾的被俘友舰，法军中最优秀的舰长之一、加迪斯港内职级最高且未被战伤的科斯莫（Cosmäo）勇敢地率领归航的5艘战列舰与7艘巡航舰在第二天再度出击。科林伍德将之误认为杜马诺阿和格拉维纳率领的10艘战列舰，便命令同等数量的英舰解开拖带战利舰的缆绳，组成战列线迎击敌军。[1] 法军巡航舰因此得以解救了“圣安娜”号和“涅杜诺”号。它们的状态只比废船壳好上那么一点，但联军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使纳尔逊的胜利更加彻底。在返回港口的途中，科斯莫舰队中的三甲板战舰“雷电”号与1艘80炮战舰和1艘74炮战舰被冲上了海滩。次日，在战斗的前一天被纳尔逊派往直布罗陀的“多尼戈尔”号返回英军阵中，它与科林伍德麾下一些损伤最轻的友舰被迫开始大批处置那些难以控制的战利品。数艘搁浅的战舰被烧毁，即便是壮观的“至圣三一”号也只得牺牲。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俘获的19艘敌舰中，4艘被敌军

重新捕获，11艘沉没或被毁，最终只有4艘被英军带回直布罗陀。[2]

强风终于在24日消歇，科林伍德得以恢复对加迪斯港的封锁。但是，这主要是出于士气影响的考虑：他知道杜马诺阿并不在港内，也知道被封锁的港口里已几乎没有适于出海的敌舰。在掌握局势之后，他最先关照的一件事就是向那不勒斯派出一艘轻帆船，向艾略特送去消息。他的信令人钦佩地展示了当时的局势与他的想法。他写道：

> 由于它对意大利与全欧事务的巨大重要性，刚刚发生在这片海岸的事件应当尽快被传达给您所在的宫廷，因此我将这一消息立即通知给先生您。联合舰队在本月19日驶出加迪斯，他们的目的地显然是意大利。21日……海战在中午时开始。在三个小时的最为激烈的决斗之后，敌军战败，格拉维纳将军与他的9艘战舰逃向加迪斯；另外4艘（法国战舰）在杜马诺阿少将的指挥下逃往南方，可能已进入地中海；他们给国王陛下的舰队留下了20艘被俘的战列舰……这是对一支强大敌军所赢得的最具决定性也是最为彻底的胜利。18艘被留下的敌舰已经不剩一根桅杆，我敢说，如果战斗在远离陆地的大海里进行，并且没有受到特拉法尔加的礁石和浅滩的妨碍，敌人的战舰可能一艘都不会逃走。一阵强风在22日袭来，并持续了三天时间，一度刮得极为猛烈。它把舰队吹散到各个方向，把大部分被俘的船壳刮上了岸，还有2～3艘被吹进了加迪斯港。余下的被俘战舰已经彻底瘫痪，使我必须将之烧毁或凿沉……联合舰队已被歼灭。我认为加迪斯港内只有不超过四五艘战舰具备出海的条件，而且我知道港内既没有桅杆、帆布，也没有用于维修的绳缆，只有一支弹药枯竭的残缺舰队。但是，最能让他们又敬又惧的却是在如此激烈的战斗后仍然坚守阵位的英军旗帜，我这样做是让他们确信，他们尽最大努力也无法让我军从坚守的阵地上移动半步。在做好必要的安排之后，我会尽快进入地中海。如果卡塔赫纳的西班牙舰队出海有所动向，我也会竭尽全力地摧毁他们，然后把我的部队带到意大利海岸，阻止敌人准备在那里发起的任何行动。[3]

有人认为，科林伍德更应该立即前往那不勒斯，而不该在加迪斯港外耗费数日时间。但在为期一周的令人精疲力竭的高度紧张之后，他或许已经做到了人力可及的极限。他在写给康沃利斯的信中说：“简而言之，我的力量已经耗尽。”[4] 路易斯的分舰队仍在直布罗陀海峡的某处，因此，不管卡特赫纳舰队与杜马诺阿去了哪里，他们都并不让人担

心。即便杜马诺阿闪过路易斯而进入了地中海，在前往那不勒斯之前，他显然会先去土伦进行修整。

事实上，杜马诺阿并未驶入直布罗陀。10月22日，从南方吹来的强风袭击了他受创的舰队，使他无法继续驶向海峡。当天夜里，他又在海峡入口处看到了几艘帆船，他认为那是路易斯的舰队，于是决定转向西方，试图与阿勒芒会合。他在西方搜寻了两天时间，同时竭尽所能填补裂缝、修整战舰，25日时，他决定向北方驶去。29日，在路易斯驶出直布罗陀海峡去加入科林伍德的同时，他正高速驶过圣文森特角。他盘查了中立国船只，但完全没得到阿勒芒的音讯，于是只好朝罗什福尔驶去。杜马诺阿并不知道的是，斯特罗恩仍在热切地盼望着截击那支他想寻找的舰队，其正耐心地守候在他航线的前方。

一直到海战爆发的那一天，斯特罗恩仍然待在比戈附近的位置上，一直与洛布的巡洋舰链保持着联系。他听说维尔纳夫留在比戈港内的战舰准备出港，于是便欲擒故纵地撤向海外。他在24日转移至菲尼斯特雷沿岸的阵位，他相信，既然南方有加迪斯港外的纳尔逊把守，敌舰就一定会试图向北航行。[5] 他选择的位置十分得当。杜马诺阿的旗舰与其他一些战舰严重进水，这迫使他只能贴近海岸航行。11月2日清晨，他驶过了菲尼斯特雷的纬线，维拉诺角（Cape Villano）随后进入他的视野。尽管他已在近岸一侧偷偷地溜过了斯特罗恩而未被发现，但他所处的位置却是英军两道巡洋舰链的接合点，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已处在英军的监视之下。

此时，大致隶属于乌桑特-菲尼斯特雷巡洋舰链的38炮巡航舰“博阿迪西亚”号（Boadicea）与36炮巡航舰“德律阿得斯”号（Dryad）肯定位于菲尼斯特雷集结点的西部海面。第三艘巡航舰则略靠南方，位于杜马诺阿舰队的近岸一侧。这正是由贝克舰长所指挥的“凤凰”号巡洋舰，他的天才再次让他来到了这个正确的位置上，为我们展现出巡洋舰活动十

分有趣的另一个方面。他与他的战利品“迪东”号十分惊险地逃过了阿勒芒，随后在驶向直布罗陀的过程中又差点被维尔纳夫的联合舰队捕获。最终，他再次转向北方，安全地返回了本土。海军部奖励了他的战功，随后再一次派他出海巡航。10月29日，“凤凰”号驶出法尔茅斯（Falmouth），前往锡利群岛西方的阵位，他应当在那里打开一个藏命令的信封。但在第二天，他遇到了一艘丹麦船只，自称曾在13～15日被阿勒芒扣留。他在北纬37°51′、西经14°3′处被释放，那里正是圣文森特角西北偏西的250英里处，捕获他的舰队随后向西北方驶去。[6] 正如我们在第二十章的末尾介绍的，阿勒芒其实是驶向了加那利群岛，因此这显然是一个故意释放的错误航向，是为了掩盖他的真实航迹。但贝克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些，在他看来，这正是返回法国大西洋沿岸港口的惯常航线，他推测阿勒芒已经进入了比斯开湾，正在朝罗什福尔驶去。他十分急切地想让斯特罗恩得到这则消息，于是决定在抵达预定位置之前拆开命令。他发现，这则命令只是为他慷慨地提供了一个十分富饶的巡航范围，于是他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可能得到的战利赏金，去费罗尔寻找斯特罗恩。他在费罗尔并未发现斯特罗恩的身影，于是便转往菲尼斯特雷集结点。最终，在11月2日的破晓时分，他发现自己的座舰已在近岸一侧驶过了据信为阿勒芒所部的敌舰队。

杜马诺阿随后转向东北偏东，他立即派出“迪盖-特鲁安”号前去追击。但贝克并不准备逃离，他坚持驶向西南方的常规集结点，相信能在那里与斯特罗恩取得联系。下午5时许，贝克已占据了法舰前方的上风位置，法军的拦截企图已经失败，杜马诺阿只得打出了召回命令。在这场追击的最后两个小时中，“凤凰”号数次鸣炮示警，让杜马诺阿以为这是在给其他两艘巡航舰发信号。事实上，贝克并没有看到它们的踪影，他所看到的其实是位于南方的斯特罗恩分舰队的一部。杜马诺阿有着与阿勒芒同样的好运气，由于斯特罗恩的舰队阵型已大为分散，他一定是在前一天夜里与英军擦肩而过。然而，贝克的行动使他无法再次成功逃离。另外两艘英军巡航舰在此期间一直奇怪地毫无作为，它们直到天色

暗下的晚间9时左右才认出了“凤凰”号。它们位于杜马诺阿舰队与“凤凰”号之间，结果使贝克将它们的确认信号误认为是杜马诺阿舰队打出的信号。不久后，这两艘巡航舰又发现了“凤凰”号前方的那支舰队，但它们打出的信号再次被友军误解，结果使其确信自己已陷入阿勒芒舰队的两支分队之间。它们于是决定逃走，再也没有在此露面。[7]

在弄清形势之前，斯特罗恩曾一度朝“凤凰”号开火射击。所幸的是，他的旗舰、80炮战舰“恺撒”号把其他战舰远远甩在了后面，使他自己与“凤凰”号离得最近。误会解除之后，贝克向他报告了遭到阿勒芒舰队追击、敌舰队就在下风处不远的消息。斯特罗恩写道：“我感到十分高兴，便让他去通知后方的舰长，我希望立即与敌人交战。”于是，“凤凰”号离开“恺撒”号去召集舰队，与此同时，斯特罗恩则立即展开了追击。在月光之下，他看到了敌军组成的横队，但在月亮降下之后，他又失去了他们的踪影。事实上，想要甩掉他的杜马诺阿已在黑夜降下之时就立即转向了东南方，但斯特罗恩并未上当。他转而收帆缓行，让麾下的两艘74炮战舰——“英雄”号与“勇气”号（Courageux）——以及仍旧由威廉·菲茨罗伊勋爵指挥的32炮巡航舰“埃俄罗斯”号前来会合。剩下的74炮战舰“那慕尔”号（Namur）与36炮巡航舰“圣玛格丽塔”号（Santa Margarita）仍在后方，而他的第5艘战列舰，即74炮战舰“贝罗纳”号（Bellona），以及巡航舰“不倦”号则不幸掉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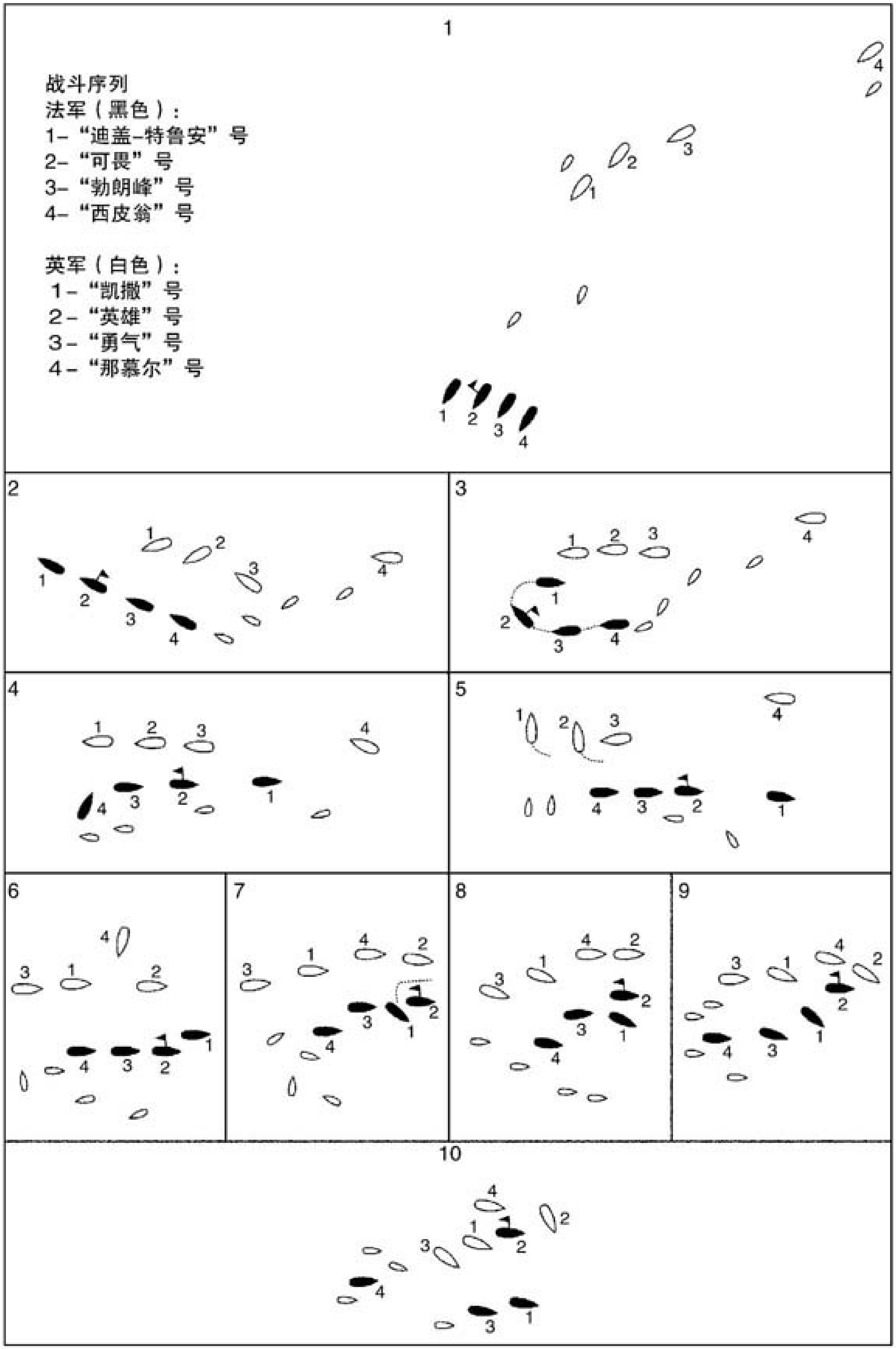
尽管兵力已被削弱，尽管跟丢了追击的对象，但斯特罗恩对自己要做的事坚定不移。他似乎洞悉了杜马诺阿的想法，直接朝东北偏东的奥特格尔角驶去。这里正是杜马诺阿将要经行之地，他或许希望从这里溜进费罗尔，但斯特罗恩机智地截断了他的去路。11月3日破晓时分，巡航舰“圣玛格丽塔”号加入了他身边的舰群，奥特格尔角也已进入他的视野。上午9时，他的猎物再次在东北方出现。两小时后，“凤凰”号与“那慕尔”号也跟上了队伍，它们身后还有一艘临时加入的迷途的巡航舰。这是38炮的重武装巡航舰“革命者”号（Révolutionnaire）[8]，它的到来

多少弥补了“贝罗纳”号造成的空缺。因此，斯特罗恩手中的总兵力包括了4艘战列舰与4艘今日所谓的一等巡洋舰（first-class cruisers）。他的接战过程则更为精彩。在舰队决战的历史上，这是巡洋舰作为战斗部队首次被直接投入战斗。这并不是以与战列舰组成同一纵队的原始方法，而是让巡洋舰队承担着独立职责分头作战，类似于当代新近才产生的观念。

在11月3日的一整天中，英军朝罗什福尔疲乏地追击着法军，逐渐向猎物靠近；但到夜幕降临时，他们之间仍然留有很宽的距离。不过，绝佳的夜色使英军能轻松地盯住猎物，他们组成了一道斜阵继续追击，到次日破晓时，英军旗舰“恺撒”号距离杜马诺阿的殿后舰“西皮翁”号仅剩6英里。英军巡航舰在战列舰队前方领航，他们已经进入敌人的尾炮射程，并在6时之前赶上了法军的后卫。在这里，重型巡洋舰阻滞逃跑的战列舰队的能力得到了最佳展现。在一两个小时中，驶近“西皮翁”号的“圣玛格丽塔”号与“凤凰”号不断地用偏航-摆正的办法向法舰倾泻侧舷火力。杜马诺阿仍希望避免交战，他的旗舰“可畏”号被迫抛弃了80门舰炮中的20门以保障船只浮力，这样糟糕的状态甚至无法迎战一支劣势兵力。但在11时，他意识到用舰尾的有限火力已无法摆脱英国巡航舰，他只得顶风组建战列线，一场战斗终于无可避免。

斯特罗恩身边仍然只有3艘战列舰，他的行动与后来广为接受的那张示意图一样，向舰长们打出了意欲攻击敌军后卫的信号。他本人坐镇于旗舰“恺撒”号引领这场进攻，它是舰队中最为强大的战舰。在这种情况下，最佳的作战方法是让舰队以战列线队形从敌军后方的上风方向杀来，然后反转舰队序列，让先导舰攻击敌军的殿后舰，让第2艘战舰在先导舰的掩护下向前攻击敌军倒数第2艘战舰，如此逐一在友舰掩护下攻击前方的敌舰。但斯特罗恩并没有选择这种战术，这或许是由于杜马诺阿的旗舰是法军战列线中的第2艘，他希望用旗舰迎战旗舰。因此，他决定像纳尔逊那样引领英军战列，首先在航行过程中与行经的法军最

后两艘战舰交战，然后在法军旗舰旁顶风减速，取得与之平行的阵位。他并不准备像纳尔逊在1803年战术备忘录中提出的那样突破战列线或从下风处与敌军交战，这或许能够从精彩的巡洋舰作战中得到解释。两艘巡洋舰并未处在英军上风方向远离敌军的常规阵位，而是在敌军殿后舰的下风一侧与之持续交战。


战斗序列
法军（黑色）：
1-“迪盖-特鲁安”号
2-“可畏”号
3-“勃朗峰”号
4-“西皮翁”号
英军（白色）：
1-“凯撒”号
2-“英雄”号
3-“勇气”号
4-“那慕尔”号

理查德·斯特罗恩爵士的战斗

资料来源：本图出自德斯奇霍《特拉法尔加海上战役》中杜马诺阿少将的报告的附图。

斯特罗恩用这种方法在敌军后卫处实现了兵力集中，同时让最前方的“迪盖-特鲁安”号脱离了战斗。杜马诺阿则敏锐地打出了全军依次调头的信号，希望以此来掩护后卫的2艘友舰，同时想将正在赶来的“那慕尔”号分割在战场一侧。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举动，法军必须在“恺撒”号与其后方的“英雄”号的毁灭性火力下完成转向，并使得两军战列间的距离缩小到手枪射程之内。不仅如此，另外两艘重型巡航舰此时也赶了上来，这4艘巡航舰在法军的下风处组成了战列线。杜马诺阿由此陷入了两面夹击，他已不可能驶向下风撤离战斗。因此，斯特罗恩并不需要用突破战列线的冒险机动来确保一场决定性的战斗，杜马诺阿的行动也的确表示出他并不想逃离。

法军的机动使得两支战列以反航向相对驶过。接着，杜马诺阿并未再次转向，而是径直驶向落单的“那慕尔”号，后者正试图占据他们的上风阵位。结果，两军间的战斗停歇了半个多小时。斯特罗恩试图尽快重启战斗，他显然也要执行顶风调头，但他的帆索已经严重受损，只得被迫顺风转向。在此过程中，局势变得混乱起来。斯特罗恩发现法军正在驶远，而且还有占据英军上风位置的威胁，于是便向“那慕尔”号打出信号，就如纳尔逊让“阿非利加”号做的那样，让它牵制住敌人的前卫。“英雄”号率先完成了调头转向，为了节约时间，斯特罗恩下令以它作为先导舰，让其他战舰在它身后组成一道新的战列线。英军以这种阵型重启战斗，再次向法军的后卫发起了新一轮攻击。此时的巡航舰队仍保持着原先的位置，位于敌军侧后的下风一侧；“那慕尔”号则在“英雄”号身后加入了战列线。“迪盖-特鲁安”号再次置身事外，斯特罗恩得以以4艘战列舰集中攻击杜马诺阿的后3艘战舰。他在信中写道：“法国舰队是令人钦佩的，他们直到战舰无法操纵才降旗投降。”但到下午4时

左右，战斗便已完全结束，所有法舰都成了英军的战利品。

直到法军将领登上他的旗舰，斯特罗恩才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写道："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夺取的4艘战舰并不属于罗什福尔舰队，而是来自加迪斯。"与他作战的根本不是阿勒芒，而是被纳尔逊击败后的残存者。此时，行踪飘忽的阿勒芒早已驶远，他最终得以保全自己的荣誉。在特拉法尔加海战的第二天，阿勒芒发现没有任何一处欧陆港口向他敞开，于是决定前往加那利群岛。两周之后，他靠近了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Teneriffe），并在那里遇到了一艘从马德拉群岛驶来的葡萄牙双桅纵帆船。根据它提供的消息，一支包括8艘战列舰、8艘巡航舰与130艘运输船的英国远征船队最近曾要求在马德拉岛避难，但遭到了拒绝。这正是波帕姆提供护航的贝尔德远征军，他们在几周前就曾惊险地逃过了阿勒芒的威胁。他们据说要进行一场遥远的远征，途中也要夺取加那利群岛。如果消息属实，阿勒芒就陷入了可怕的困境，但他认为英国舰队可能已经离开，使他有可能从敌人的守备队手中重新夺取这些岛屿。于是，他决定继续前进。第二天，也就是斯特罗恩与杜马诺阿相遇的这天，他抵达了特内里费岛，并做好了战斗准备。但是，葡萄牙人告诉他的却是一则错误的消息。贝尔德与波帕姆直接驶向了开普敦，加那利群岛并非他们的目标，因此，迎接阿勒芒的并不是敌人，而是西班牙总督的热情拥抱。他在这里停留了两周，用于卸载病员、装载补给，以及出售战利品。这些战利品换来了不低于2万英镑的巨款，除此之外，他还凿沉了一些价值较低的被俘船。然而，如往常一样，他对英国贸易造成的损失尚不足以弥补他这次出海的花费。

直至此时，这位不知疲倦的将军仍不打算结束他的行动。联合舰队没有任何消息传到他的手里，他因此认为他们仍被封锁在加迪斯，并基于这一假设制定了后续的行动方案。他补充了船员，装载了可以供三个月航行之用的补给；他决定先去马德拉群岛附近巡航一阵，打击英国的殖民地贸易与零散部队，然后再去葡萄牙沿岸扰乱那支封锁维尔纳夫的

英国舰队的后方交通线。基于这些目的，阿勒芒在11月19日再次出海。但是，他在次日就发现了7艘陌生帆船，认为那是搜寻他的数支英国舰队之一。根据报告，敌人兵力处于劣势，他便组成了战斗队形展开追击，但那些陌生船只在夜间成功逃离。事实上，他周围并没有英国舰队，这些船只很可能只是一支惊险逃脱的商船队。三天之后，他在马德拉群岛附近捕获了一艘从英国西海岸驶出的商船。它的船长告诉法军，他在离开朴次茅斯时听说刚刚发生了一场大海战，纳尔逊在战斗中丧生，但他并不清楚其细节。阿勒芒没有再捕获船只，他随后就从马德拉群岛的巡航位置动身，但到12月中旬才抵达葡萄牙海岸。在18～19日，他捕获并凿沉了3艘英国船只。他从它们那里得知，附近有一支英国舰队正在搜寻他，而联合舰队业已被纳尔逊和斯特罗恩歼灭。阿勒芒说："传信者不慎重的言行在舰上造成了一片恐慌，使人们焦急地盼望返回港口。"这则消息最终将他与他麾下舰队的斗志完全浇灭，他由此决定返回罗什福尔寻求庇护。在这场冒险的末尾，他依然得到了好运气。从西方刮来的强风令他能以10节的高速北进，而糟糕的天气则提供了良好的掩护，使他一路未被英军觉察。他在平安夜安全地回到了母港，这场非凡的长途远征到此结束。阿勒芒在他的报告中做了这样的总结："（雪月）3日[9]，在驶出港口的161天——其中有148天在海上航行——之后，我在埃克斯岛旁的航道中下锚，带回了陛下托付于我的舰队和敌人的'加尔各答'号战列舰。阁下，如果皇帝陛下和阁下您能屈尊批准我对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不利局面所做的处置，我就会感到我所历经的艰苦已经得到了极好的酬谢。"[10]

是的，这就是这场海上战役的一切。倘若克雷格的远征军没有逼迫拿破仑动用舰队，倘若拿破仑坚持了最初的想法，他就会将他的舰队拆分为若干支游猎舰队，由阿勒芒这种年轻军官指挥，在冬季封锁松懈时溜入大海，对英国的殖民地与贸易利益造成无穷无尽的麻烦。然而，纳尔逊的决定性胜利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皮特的攻势战略在无意中迫使拿破仑牺牲了自己的舰队，他在海上展开有效作战的所有希望也因此

完全破灭。[11]

---

[1] Collingwood to Cornwallis，Oct.26th：*Hist.MSS.Com.*，*Various Collections*，vi.412.

[2] 或许由于当时材料的限制，或许由于关注重心并不在此，科贝特对被俘战舰命运的描述存在不少错误。在10月21日向英军投降的联军战舰共计18艘，它们分别是："涅杜诺"号、"圣奥古斯丁"号、"至圣三一"号、"布森陶尔"号、"敬畏"号、"圣安娜"号、"激情"号、"勇敢"号、"蒙纳卡"号、"巴哈马"号、"鹰"号、"阿尔赫西拉斯"号、"阿罗戈诺达"号、"敏捷"号、"圣伊德方索"号、"阿基里斯"号、"贝里克"号和"枭玻穆的圣若望"号。"阿基里斯"号在海战结束时爆炸沉没，因此，英军在风暴来临时共掌握着17艘战利舰。
22日早晨，"激情"号最先触礁，"敬畏"号在下午因进水过多沉没。当天夜里，"阿尔赫西拉斯"号俘虏暴动，重夺战舰并成功返回加迪斯。23日中午，出港反击的科斯莫舰队与被风暴刮散的英军一部相遇，英军被迫放弃了拖带的"布森陶尔"号、"圣安娜"号和"涅杜诺"号，组建战列线迎击敌军。"圣安娜"号和"涅杜诺"号因此被法国巡航舰重新夺取，随后被拖往加迪斯；无法操纵的"布森陶尔"号则触礁沉没，科斯莫舰队中试图援救它的"顽强"号也不幸地步其后尘。而在驶入加迪斯之前，科斯莫麾下的"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号、"雷电"号和刚刚夺得的"涅杜诺"号都在港外搁浅或触礁，随后被风浪摧毁。24日上午，科林伍德开始处置战利舰，"至圣三一"号与"勇敢"号被英军自行摧毁。25日，"鹰"号俘虏暴动，重夺战舰，但同样在加迪斯港外触礁。"蒙纳卡"号则在风浪中撞上了浅滩。26日，"雷电"号亦撞上浅滩，"贝里克"号也遭到如此厄运。"圣奥古斯丁"号被英军烧毁，"阿罗戈诺达"号也被凿沉。
综上所述，在10月21～26日，英军手中原有的17艘战利舰中有2艘（"阿尔赫西拉斯"号、"圣安娜"号）被联军成功地重新夺取，有11艘沉没或触礁，只有4艘（"敏捷"号、"巴哈马"号、"圣伊德方索"号、"枭玻穆的圣若望"号）被英军安全带回了直布罗陀。此外，科斯莫舰队又有额外的3艘战舰（"顽强"号、"雷电"号、"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号）被摧毁。截至10月26日，共有19艘敌军战列舰被英军歼灭。
参见Roy Adkins，*Trafalgar*：*The Biography of a Battle*（Hachette UK，2011）。——译者注

[3] Nicolas，vii.231：*Euryalus* off Cadiz，Oct.24th.

[4] *Hist.MSS.Com.*，*Various Collections*，vi.412，Oct.26th.

[5] Cornwallis to Marsden，October 29th：*In-Letters*，129.这封信中附上了一份由巡航舰"不倦"号的舰长发来的报告。"不倦"号是一艘由64炮战舰改造而成的44炮巡航舰，此前，它曾被派到英吉利海峡以西掩护归航的商船队。9月20

日，它在北纬48°57′、西经18°19′的位置上发现了阿勒芒的舰队。在与敌军失去接触之后，它赶回通知了康沃利斯，并在斯特罗恩刚刚开始搜寻阿勒芒时与之相遇。斯特罗恩将它留在自己手中，并将其带到了比戈。

[6] Captain Baker’s Journal enclosed in Strachan’s despatch：Ibid.，Nov.5th.

[7] 斯特罗恩把他们当成了敌舰队中的2艘军舰。他在写给康沃利斯的信中说："我们曾看到6艘船，没法弄清其他2艘去了哪儿。" *Hist.MSS.Com.*，*Var.Coll.*，vi.413.

[8] "革命者"号本是一艘法国塞纳河级（Seine class）40炮巡航舰。1794年10月，建成不到半年的"革命者"号被英军俘获。在1805年时，"革命者"号装有36门32磅卡隆炮与10门9磅长炮，其近距离投射量远高于一般的巡航舰。参见Rif Winfield，*British Warships in the Age of Sail 1714-1792*：*Design*，*Construction*，*Careers and Fates*（Seaforth Publishing，2007）。——译者注

[9] 按照法国共和历与公历的换算，共和十四年雪月三日即1805年12月25日。——译者注

[10] Desbrière，*Projets et Tentatives*，iv.798-800.

[11] 阿勒芒继续在海上扰乱英军战略。海军部特别担心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受损的"胜利"号和其他舰船会在返回本土的途中遭遇阿勒芒的截击。*Barham Paper*，iii.289-291.

第二十六章 结局

特拉法尔加海战普遍被视作世界范围内最具决定性的会战之一，但是，没有任何一场伟大胜利的直接成果比它更加贫瘠。这场史上最为精巧复杂的海上战役已取得了一个胜利的结果，但作为一场海陆联合战役的组成部分，它的影响却几乎被人忘记。它让英国最终统治了海洋，却让拿破仑主宰了陆地。由于其战果的匮乏是如此令人费解，为填补空缺，便出现了它使英国免遭入侵的传奇。直到最近，这仍是通行的说法，但这只是对事件时序的简单排列，并无任何依据。在现代历史学方法的严密审视下，这种神话已经破灭。继之而起的问题是，为什么纳尔逊的最后胜利远未实现他自信地期望的结果？为什么皮特会将失败归于自己？

很显然，这并不是皮特的过错。他在随后的进攻中并未浪费任何时间。早在拿破仑改变进军方向的消息传来之时，陆军部就已开始准备将机动兵力立即投入作战。在10月的第一周，卡斯尔雷为英国的欧陆战役迈开了第一步。为了配合拿破仑的大规模行动，为了加入侵奥大军，贝纳多特（Bernadotte）将他的部队撤出了汉诺威。他只在哈默尔恩留下了一小支卫戍部队，守卫着跨过威悉河通往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桥头堡。如此一来，趁拿破仑不在时将法军逐出北欧的诱人机会就出现在盟军面前。一支俄国军队正在开往瑞典的施特拉尔松德，皮特决定不待所有机动部队准备完毕，就立即派出英王德意志军团（the king’s German legion）参与联合作战。[1] 冬季的临近与北欧海域的封冻使渡海行动冒着极大的风险，但皮特已决意承担。为了降低风险，他们决定将部队运到易北河口而非波罗的海；从库克斯港（Cuxhaven）和施塔德

（Stade）出发的英军很快就能在威悉河畔的劳恩堡（Lauenberg）与从施特拉尔松德开来的瑞典及俄国部队会师。于是，他们让基思勋爵与陆军部保持着直接联系，命令他护送部队尽快渡海，康沃利斯则负责在布雷斯特港外提供掩护。

英王德意志军团再加上作为前卫部队的两个旅共计约1.1万人，由乔治·唐将军（General George Don）指挥。后续部队也会在他们之后尽快渡海，卡斯尔雷期望最终的总兵力能达到6万～7万。当然，皮特的胜利绝不仅仅倚仗于这一支部队。英国远征军只是在拿破仑左翼展开的大规模联合行动的一部分，这场联合作战的主力只能是普鲁士陆军。

此时，普鲁士对于反法同盟的态度尚未明朗。柏林的主战与主和两派仍处在胶着状态，皮特正加快派出第一批远征军，希望能鼓舞它的斗志，促使它变得强硬。如果普鲁士能振奋起来加入盟军，那么，到1806年春，算上从施特拉尔松德开来的瑞军、俄军以及若干德意志城邦部队，这支联军的总兵力就能达到10万。这样一支军队能对荷兰和法国北部边境造成相当可观的威胁，它势必会有力地牵制法军，掩护普鲁士主力部队的前进——他们应该能迅速穿过摩拉维亚（Moravia），向拿破仑的左翼发起攻击。这正是皮特希望施展的行动，他的父亲在七年战争中就曾以这种方法成功地援救了腓特烈大王，他正希望用同样的方式来利用英国的制海权。然而，这最终仅仅成了奥斯特利茨战役中一条早已被人遗忘的荒芜小径。拿破仑以令人难料的迅疾手法英勇地调转了阵线，使这一切变为泡影。

只有指挥陆军的惊人才华与陆军具备的确定性才能抵消这位伟大统帅在指挥海上战役时的无能和无知，拿破仑正是凭借它们侥幸地躲过了皮特的陷阱。就在特拉法尔加海战的那一天，就在纳尔逊与科林伍德在海面上如蜗牛般比拼着谁能率先投入战斗之时，驻扎在巴伐利亚（Bavaria）埃尔欣根（Elchingen）的拿破仑在大军团营地中发布了他著

名的“第九号公报”。公报的内容一如纳尔逊的预言：两天之前，马克将军率3万名士兵在乌尔姆（Ulm）向法军投降。这个噩耗与先前的一系列战斗使得奥地利的本土军团几乎不复存在；而讽刺的是，它正巧发生在维尔纳夫被拿破仑的冷酷命令逼出加迪斯的同一天——从此之后，舰队就再也不需要冒死出击，再也不需要承担着被歼灭的风险了。

尽管这场猛攻令人震惊，但反法同盟并未因此瓦解。在乌尔姆战役期间，拿破仑明显违背了“军事行动应避免产生新敌人”的重要战略准则，正是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使同盟得以存续。为了尽快截击马克将军，拿破仑不惜侵犯了普鲁士的疆界，这使柏林的主战派在犹豫不决的国王面前占得上风。其他交战国也加快了步伐，拿破仑左翼的朦胧威胁很快就开始成形。11月3日，正当斯特罗恩火热地追击着杜马诺阿之时，普鲁士与俄国签订了《波茨坦条约》。按照条款，普鲁士接受了英国的提议，并同意如果拿破仑不在四周之内接受它的调解，它就将以18万兵力加入反法盟军。

最终，皮特的伟大构想似乎即将实现。内阁成员哈罗比勋爵承担着推动普鲁士尽快参战的秘密使命被立即派往柏林。他在11月中旬抵达，此时，特拉法尔加海战的消息已经震彻全欧，唐将军的远征军也已在威悉河口登陆。[2] 为了缔结全面同盟，哈罗比被授予了确定共同目标、协调战役计划的全权。他的主要目标是确保普鲁士立即参战，但普鲁士如之前的奥地利一样，仍胆怯地在武装调解上浪费时间。哈罗比甚至有权提出超出英国目前承诺的新条件。他向普鲁士许诺为其所有部队支付一大笔津贴，而且如果它能立即在摩拉维亚展开行动，英国还将提供威悉河周边的英军辅助部队的指挥权。他还被授权与瑞典、丹麦及威斯特伐利亚诸邦谈判，向它们承诺英国会在来年春天提供7万名士兵，用于大陆战事或盟友希望的海上远征。为了体现英国超然无私的形象，哈罗比还表示，如果反法同盟能迫使拿破仑实现全面和平，英国也愿意无条件地放弃已经夺取的、除马耳他与开普敦之外的所有战利品。谈判期间，

在远征军中指挥一个旅的阿瑟·韦尔斯利爵士也曾作为军事专家提出意见。他给整个计划大泼冷水，不过这并非针对着任何战略层面的内在缺陷，而是出于如纳尔逊鄙视马克的那种军事直觉：他确信普鲁士军队无法及时完成动员，因而也就无法完成这一切。

目前的局势发展确实已使人们很难抱有许多期望。如果说拿破仑的第一场攻势在他的左翼捅破了马蜂窝，那么，右翼的成果则完全实现了他的意愿。考虑到在意大利受到的多面威胁，他被迫让圣西尔将军撤出南方，用他的部队为阿迪杰（Adige）的马塞纳（Masséna）所部提供增援。马塞纳的目标是阻滞由卡尔大公统帅的兵力更强的奥地利大军，而卡尔大公则要终结拿破仑的新王国，将法国人逐出意大利。马塞纳的任务事实上是防御性的，但在得知乌尔姆会战的消息后，他直扑向前，向奥军的大营发起猛烈的攻击。卡尔大公有力地将他击退，但考虑到奥地利本土的糟糕局势，他已不可能让成功继续下去。只有安全撤退才能保全他的大军，于是他迅速地退出了意大利，试图去挽救奥地利本土的危局。

卡尔大公的撤退使得克雷格与俄国人联合作战的希望完全破灭。10月30日，就在马塞纳向奥军营地发起不成功的攻击的同一天，克雷格接到了与俄国远征军会师的召集令。两军计划在锡拉库扎（Syracuse）会合，但糟糕的天气使英军出征的行动推迟了十天，不愿等待的俄军率先进发，两支远征军最终在帕萨罗角（Cape Passaro）相遇——近一个世纪前，乔治·宾将军（George Byng）就是在这里击败了西班牙舰队，那同样也是英国为了防止西西里落入其他一等海军强国之手而发动的众多战事之一。[3]

克雷格的兵力已经提高到了8000人，但俄国人承诺的从黑海派出的增援部队并未抵达，这使得英俄联军实际上只有不超过2万人。那不勒斯国王刚刚在拿破仑的压力下屈服，他在绝望中签署了中立协定，这给

联军的下一步行动增添了几片疑云。不过，俄国外交官很快就说服了意志坚定的那不勒斯王后，用保卫那不勒斯王国的承诺使她同意废除中立协定，并加入反法盟军。英方外交官艾略特一再表示，他反对这样明目张胆的违约，他担心这将导致某些不好的结果。他显然并未参与谈判，但俄英两国部队仍按照谈判结果接受了登陆邀请。11月20日，装载远征军的运输船队在那不勒斯湾下锚，但他们在此接到的却是马克投降与卡尔大公撤退的惊人消息。[4]

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在克雷格看来，法军随时可能转头入侵那不勒斯领土，当地部队与他们的盟友都无法抵挡敌军的强大兵力。艾略特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认为任何保卫那不勒斯的尝试都将以灾难收尾。他知道他的外交手腕远不如俄国人，但他相信英军将领对俄国的莱西将军拥有更强的影响力，英方的观点将能占得上风。[5] 但是，这还远远无法解决他们面前的窘境。如果仅仅只是让部队重新登船，这就意味着让不幸的那不勒斯王后独自面对拿破仑极强的报复心。不过，重新登船的确有正当且紧急的理由。卡尔大公发来的一则消息请求远征军前往威尼斯，去马塞纳的后方制止他的追击。但这显然是不值得讨论的问题。英俄联军的兵力并不足以执行这种行动，而且时间也太晚，同时还超出了克雷格所接受的指令。因此，英俄两军将领决定扎营观望，为其骑兵与炮兵收集载具与马匹，等待着进一步的命令。

他们并不用等待多久。局势的发展异常迅速，在11月3日，也就是普鲁士签署《波茨坦条约》加入反法同盟的同一天，卡斯尔雷向英国的全部机动部队下达了准备出国参战的最后命令。一切都能在普鲁士所坚持的为期四周的调停期限结束时准备停当，不过，事态的发展也并非如此平稳顺遂。普鲁士表示它难以接受最后达成的协议，它仍垂涎于汉诺威，希望英国同意用它来交换弗里斯兰（Frisia）与威斯特伐利亚之一部，但英国内阁甚至拒绝向英王提出这个提议。至于武装调解，那本就无关紧要；现在这完全被视作争取动员时间的诡计。在11月底之前，皮

特已经得到了普鲁士盟约的全部条款，哈罗比也得到了普军参谋部制订的详细战役计划，它满足了英方的所有要求，完全符合英国内阁的构想。除负责英军部队以外，英国还要负责守卫作为北欧联军的补给线的易北河、威悉河与埃姆斯河（Ems）的出海口，以及俄国向普鲁士输送弹药物资的路线。由于拿破仑的舰队已被歼灭，这些任务并不困难。至于陆上行动，战役计划完全延续了老皮特时代的传统，只要求在埃姆斯河和威悉河进行防御性作战。它们可以掩护内陆的主要战事，直至局势的发展需要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

除了瑞典，一切都进展顺利——它拒绝在普鲁士做出参战保证前让军队前进。联合行动由各方协商展开，协调者主要包括联军总司令不伦瑞克公爵（Duke of Brunswick）、俄军司令官托尔斯泰（Tolstoi）以及普军参谋长布吕歇尔（Blücher）——黑森选侯威廉一世（Wilhelm I，Elector of Hesse）则是普军司令。乔治·唐指挥的英军前锋已经与托尔斯泰包围了哈默尔恩，由卡斯卡特勋爵（Lord Cathcart）指挥的英国远征军主力则仍在雅茅斯等待出航的风讯。[6]

很显然，拿破仑目前的阵线并不会维持太久，他显然也无法将之保留过冬。马克将军所率奥军的一些残部已成功地与普军会合，另一些则从阿尔卑斯山脉方向的蒂罗尔逃到了马塞纳的背后。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拿破仑都必须要发动另一场攻击；他决定无视左翼后方正在酝酿的威胁，孤注一掷地迅速向前推进，杀向距离法军营地尚远的俄军前锋。他的迅疾与勇敢收获了一场辉煌胜利。12月2日，他在奥斯特利茨发起了致命的攻势，将皮特的宏大布局变成一片废墟。第三次反法同盟的确已就此瓦解，尽管人们没能立即意识到它的真实含义。

普鲁士坚持的调解时限刚刚结束，但它立即就软化了下来，并未信守承诺且抓住拿破仑因发动进攻而阵线不整的危险时机。哈罗比担心最糟糕的情况可能出现，他警告乔治·唐不要深入内陆太远。此时，唐的

部队已开到了威悉河畔的费尔登（Verden），他在评估局势之后已经让空载的运输船返航执行其他任务。现在，他必须召回运输船准备撤退，他的部队也必须尽快转移。当卡斯卡特勋爵于12月15日抵达库克斯港时，这就是他所面对的形势。在那不勒斯焦急等待消息的联军将领也因此而大感震惊。

艾略特陷入了绝望。在奥斯特利茨会战的消息送达那不勒斯王宫的第二天，他向本土寄出了一封信，绝望地评估了当前的局势。他认为，奥军将领的不幸和疏失已经造成了超出所有推演的致命后果。在两军从科孚岛和马耳他抵达那不勒斯之前，奥地利皇室的强大力量已经不复存在。“我忍不住引用莎士比亚的话：‘它已像一场虚无缥缈的幻梦那样消失无影。’维也纳、蒂罗尔与威尼托（Venetia）都已陷入敌手，据说卡尔大公率领着目前仅存的奥地利军队正在向匈牙利撤退。甚至有传闻说，法军已开始朝那不勒斯开进。”[7]

这则传闻并不完全准确，但也并非虚言。就在艾略特写下这封信的前一天，拿破仑告诉愈发焦虑的意大利督抚官欧仁亲王（Prince Eugene），他正打算派回圣西尔将军与5000名士兵。不过，抽出这支部队也并非易事。法奥两国已签署了停战协议，正在进行和平谈判，但维也纳的态度出乎意料地强硬。塔列朗严格要求将那不勒斯摒除在和约之外，但拿破仑对能否坚持吞并这块土地仍感怀疑。卡尔大公正从匈牙利向维也纳靠近，这使得马塞纳所部有必要加入拿破仑的大军。很显然，如果胆怯的普鲁士不被恐吓退出，奥斯特利茨会战就无法实现法国所需的和平。为了这一目标，拿破仑竭尽了他个人的全力，终于在该月中旬取得进展。12月15日，普鲁士外交代表豪格维茨（Haugwitz）终于不堪重压，签署了卑劣的背盟协议。不过，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普鲁士国王拒绝批准豪格维茨的协议，奥地利的和平条款仍然悬而未决。

与此同时，英军仍在源源不断地渡过北海。若将英王德意志军团征

募的新兵包括在内，卡斯卡特麾下已有约2.5万名士兵。他们正朝埃姆斯河进发，试图夺取仍被法军敞开在他们面前的荷兰（Holland）。[8]然而，哈罗比勋爵却发来了奥地利签署停战协议的消息，这使所有行动都被迫停止。虽然俄军并未参与停战，但在奥斯特利茨战败的沙皇已在返回圣彼得堡的途中，而普鲁士则请求不要再发起任何攻击。按照此前英方与普方的协商，卡斯卡特可以在需要时经由普鲁士领土撤退。但普方仍未做出承诺，它显然已不再可信。于是，卡斯卡特将部队留在原地，自己则立刻沿威悉河赶往宁布尔格（Nienberg），去与托尔斯泰进行商议。

俄国将领已经接到了旨意，他的主上仍希望在来年春天与普鲁士联合作战，但依照目前的形势，他们都同意只能全面退回防御姿态。对哈默尔恩的包围只得解除，卡斯卡特扣下了所有最近抵达的运输船；他从埃姆斯河召回了前哨，并开始在威悉河下游的不来梅（Bremen）附近集结部队。不过，他并不准备在本土发来明确命令之前抛弃忠诚的盟友。为了完成防御任务，他打算攻占不来梅。夺取这座城池是保障撤退的最佳方法，而即便浮冰将他困在陆上，他也能拥有最有利的防御阵地。[9]老实说，成功的希望似乎并不大。因此，他警告英国政府不要再派出远征军的第三批部队——他们曾在首次出航后被强风赶回，还造成了一些损失。在他看来，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在德意志北部投入兵力实属不智。然而，运输船已经再次驶入大海，欧陆的局势也急转直下。第三批英军在12月22日再次出航，但在一天之后，一切便都已结束。普鲁士选择了退缩，奥地利接受了和平条件，俄军主力只得悻悻地撤退。

那不勒斯最先感到了这一剧变。就在和平协议达成的次日，圣西尔接到了进军的命令。12月25日，法国与奥地利签署了《普莱斯堡和约》（Peace of Presburg）；拿破仑等不到第二天就向他的大军发布了一份公告，声称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统治已经由于它的罪行和背叛而终结。12月底，法皇的兄长约瑟夫接到了去那不勒斯继承君权的命令，马塞纳

则被派去指挥一支军队，辅佐约瑟夫登上王位。

那不勒斯王后注定难逃一劫，面对她的急切恳求，莱西将军和他的参谋决定先对那不勒斯王国的边境及其防御可能性进行侦察，然后再考虑克雷格的观点。他在来年1月3日返回军营，随即召集所有高级军官举行作战会议，做出最后的决定。莱西身边有三位参谋官，克雷格身边则有英军副司令斯图亚特（Stuart）与排位第二的旅长坎贝尔（Campbell）。俄国海军准将格雷格（Greig）与“卓越”号的索泽伦舰长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一致同意目前的可用兵力无法守卫边境，但在替代行动方面，双方则出现了分歧。分歧主要在于是否能守住那不勒斯王国的任何一部分领土，以及联军是否应登船离去。俄方明确提出应当放弃首都那不勒斯城，将所有部队——俄军、英军与那不勒斯军——撤入卡拉布里亚（Calabria），他们相信可以守住这片地区。他们得到了斯图亚特与英军军需主官亨利·班伯里的支持，但英军总司令持有不同的观点。按照克雷格接到的指令，不管他能否展开行动，他都必须保住西西里。在目前的危险局势中，他希望在国王的允许下占据西西里岛上的墨西拿，即便国王不同意也在所不惜。他与艾略特此前都没有参加俄国为保卫那不勒斯而举行的会议，他们不愿像俄国人那样轻易以英国的名誉做出保证。不过，就像卡斯卡特对托尔斯泰那样，作为军人的克雷格也不愿抛弃莱西将军。这使他的处境变得十分困难。他坚持认为现在必须按照他的指令去保卫西西里，他应当立即向拿破仑无法企及的墨西拿转移；但与此同时，他又不能一意孤行，不顾多数人的决定。因此，他以书面形式提交了个人的独立见解，声明他强烈反对守卫卡拉布里亚，认为这无益于那不勒斯与同盟军。即便如此，他基于个人荣誉的考虑也不会抛弃俄国盟友，他将与盟友共同承担英方所承诺的行动风险与危机。[10]

会议的决定立即被发往那不勒斯宫廷。君臣们已经陷入了绝望，但更糟的消息即将到来。就在纷乱的争吵声中，沙皇的一位副官从奥斯特

利茨赶来，给莱西带来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命令：沙皇要求从意大利撤军。[11] 除了规模有所差别，这实在无异于普鲁士可耻的背叛罪行；而且，这种行动并没有什么必要性。在一片混乱中，克雷格的头脑仍然保持着清醒，他知道英军的行动已经自由，便毫不迟疑地开始执行他的指令。他的部队再次开往他们的登陆点卡斯泰拉马莱（Castellamare）[12]，俄军则开往巴亚（Baia）。那不勒斯的君臣们徒劳地恳求他们再等一会，他们正试图通过教皇避免拿破仑的报复，但这完全是没有希望的花招。祈求拿破仑的慈悲比他们进行抵抗更无胜算。俄军在几天的迟疑后返回了科孚岛，克雷格也在1月20日让远征部队下锚于墨西拿港外。

同样的悲惨状况也已在北海方向出现。就在克雷格向卡斯泰拉马莱进发之时，伦敦接到了普鲁士即将背弃同盟、为自己争取最有利条款的确切消息。更加糟糕的是，皮特已被奥斯特利茨会战的噩耗击倒，他的生命所剩无多。他刚刚从温泉疗养地巴斯（Bath）返回，但病情反而较之前更加恶化，无力处理任何工作。但是，目前的形势十分危急。第一批派出的部队主要是为强化普鲁士对拿破仑的强硬姿态，可它目前显然已对法国千依百顺。在英国的大臣们看来，普鲁士随时都可能被拿破仑用汉诺威收买，转而与英国为敌。如此一来，约占英国机动部队总兵力一半的卡斯卡特所部就将深陷险境。1月3日，卡斯卡特占领了不来梅，并在周边地区集结起了所有的兵力。但是，如果普鲁士转为敌对姿态，即便威悉河口保持畅通，他也很难长期保有这片阵地。很显然，能拯救卡斯卡特的只有两种方法：要么派出援军，要么在冬季浮冰将他封锁之前立即撤离。

即便皮特已绝望地倒下，英国的大臣们仍不敢在未得到他的许可之前擅自改变他的政策。于是，陆军大臣卡斯尔雷与内政大臣霍克斯伯里决定承担起去床边请示的职责，而这次交谈也是皮特所经受的最后一场打击。直至此时，他还是很有康复的希望，但到了第二天，他显然已失去了生机。他在最后一刻努力地收拾着他那英勇战略的残局，这是他为

国家所尽的最后一份力。发给卡斯卡特将军的命令并不是让他马上撤退，而是在原地做好让所有部队登船的准备工作，等他得到柏林的消息后再采取行动。皮特必须抓住最后一丝希望，但卡斯卡特并未等待多久，哈罗比勋爵的发来的信件几乎立即浇灭了最后的几点火星。就在克雷格在墨西拿下锚之时，英国向卡斯卡特发出了明确的紧急命令，让部队立即登船出发，在基思的掩护下撤离。

就这样，这位濒死的大臣在他的大同盟上寄托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现在，英国只能通过单边行动来保护自己。睿智的皮特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他为此派出了克雷格与贝尔德的两支小规模远征军。他们在这场战役结束时仍安然无恙，在欧陆的阴云间为英国保留下几缕让人略感欣慰的胜利的光明。

在墨西拿港外下锚的远征军已经保住了西西里。克雷格随时都能保卫被托付给他的要地，因此并不急于登陆，而是静候那不勒斯王室的许可或其他迫使他必须登陆的情形。这种状态并未持续多久。在他抵达三天之后，皮特逝世的消息打破了伦敦城的平静；与此同时，圣西尔的进军已迫使那不勒斯国王登上了“卓越”号，这艘战列舰随即起锚，纳尔逊在一年多之前嘱咐它的时刻已经来临。国王被转移到了巴勒莫，阿克顿正等候在那里，他身边的老幕僚都清楚地知道克雷格下一步的行动。“卓越”号返航去搭载王后，她同样也接受了纳尔逊的庇护。一两天后，她便与国王再次会合，一切都尘埃落定。他们立刻向克雷格发出了登陆邀请，英军随即在2月16日占领了墨西拿。

这就是特拉法尔加战役的最后一击，而且恰好发生在整场战役所围绕的中心地域。这座城市似乎在欧陆的大规模战事中不值一提，然而，它已足够重要，就连拿破仑也明白并很快承认了它的重要性——尽管他此前一度认为，只要皮特不再掌舵，他就能对英国为所欲为。

战时领袖的悲剧性死亡迫使乔治三世改换政府。由于反法同盟的崩

溃，他只能让反对派主导组阁，巴勒姆与打造这场战役的其余旧臣只得退出。自乔治·安森时代以来，无人能在控御舰队的高明技巧上与巴勒姆相比；但他并未得到表彰与认可，便从皮特的紧急召唤中悄然隐去。我们找不到任何一句话可以显示国家对他的完美工作的最起码的肯定。他严苛地拒绝让任何积弊拖累皮特托付他的战争机器，他对裙带关系冷酷无情，对普通任务的嘉奖颇为保守，这都让那些试图在社会与海军中博取名声的利己主义者与他为敌。康沃利斯的舰队参谋长的妻子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听说现在的海军部正在做离职前的安排……我绝不相信他们留得下来，整个海军都向他们报以暴怒的叫喊。他们对待贝克、理查德·斯特罗恩爵士以及其他人就像对待罪犯。我听说巴勒姆勋爵曾放出这句话，'他的职责就是让其他人尽责，因为那是他们的职责'。这听起来真是好极了，高尚极了，但对我们来说纯粹是无意义的荒唐话……乔治·汤森勋爵[13]曾写信给巴勒姆勋爵，要求给他的小儿子詹姆斯·汤森勋爵（Lord James Townshend）一个尉官。如果我告诉你他竟然被拒绝了，你会说些什么？想想汤森勋爵的资历，他的名望，这是不是令人难以置信？汤森夫人气极了，这简直是要了她的命！"[14]这封信是如此琐碎，但它足以解释巴勒姆作为英国最伟大的战略家与管理者之一的名望何以遭到了如此全面的掩盖。在那个时代，这种态度即便出于高尚的动机，即便出于时势的需求，也不可能得到人们的谅解。他在社交与政治领域的刚直不阿、他思想观念中的激进色彩和他不屈不挠的个性都与他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他没有多少朋友，身边只能是孤独和寂寞。除了皮特和海军将领们，很少有人真的明白他曾做出过多么伟大的工作。[15]

外交部也发生了与海军部同样彻底的改变，拿破仑的机会正在这里出现。在极为糟糕的形势中，乔治三世最终同意福克斯加入内阁。福克斯选中的职务是外交大臣，正如人们的预料，他在坐稳位置之后很快就开始争取和平。拿破仑同样乐见于此，在皮特去世两周后，福克斯就与塔列朗建立了直接联系。1806年5月，双方已在占领地保有原则（uti

possidetis）的基础上缔结了正式协议，但最终使他们分道扬镳的阻碍正是西西里。事实上，为和平而狂热的福克斯已竭力消除它的影响；拿破仑完全有机会将它列入有利的条款，却因对胜利的执迷而错过了时机。[16] 这完全是刚愎自用的疯狂之举，然而，对于正处在权势巅峰的拿破仑来说，他的自尊心无法忍受在大海上颜面扫地的同时还在欧洲给英国留下任何一丁点胜利。在约瑟夫登基之后，拿破仑发去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攻占西西里。他无视当地的混乱情况就轻率地派出部队，显然没有从之前的失败中吸取什么教训。事实上，约瑟夫还远远不能执行他弟弟的命令，他甚至无法向卡拉布里亚进军。在西德尼·史密斯爵士所率英国舰队的支援下，那不勒斯西北部沿海的加埃塔（Gaeta）仍然飘扬着波旁王室的旗帜，所谓的“暴徒”仍占据着城外的山地。拿破仑一直在催促他们采取更有力的措施，雷尼埃将军（General Reynier）已经派出7000名士兵上山作战，但他们仍未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

考虑到与福克斯的秘密谈判，战场上的拖延使拿破仑异常恼怒，他给软弱的约瑟夫施加着越来越强大的压力。6月中旬，法皇在信中写道：“英国人很愿意承认你为那不勒斯国王，但如果拿不下西西里，他们就不会承认你。如果你能征服西西里，就可以实现和平。”然而，约瑟夫的回答显然窘迫之极。此时，克雷格已经因病回国；接掌指挥权的副司令斯图亚特忽然率5000名士兵渡过墨西拿海峡，在马伊达（Maida）大败雷尼埃率领的法军。拿破仑的部队首次与英国陆军进行了刺刀战，并在弱势的敌人面前败北。更加烦恼且丢人的是，整个卡拉布里亚似乎立即被这场战斗点燃。约瑟夫面对着一场针对自己的强大反击，他不仅远未能夺取西西里，甚至一度可能像他迅速登基那样迅速地被赶下台去。

从这一天起直到1814年战争的终结，拿破仑攻占这个地中海心脏的所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它在最后一刻仍掌握在英国手里，这个事实足以显示皮特的伟大战役构想的正确性。他没能拯救欧洲，但保卫了英国

的海外领地。除了西西里这个关键前哨，他还在遥远的南方赢得了另一个同等重要的据点。1806年1月中旬，贝尔德的部队完全占领了开普敦。这两处阵位正是英国海军将领用无与伦比的海上工作换得的丰厚回报，两者结合在一起，使得大英帝国坚不可摧。

这就是特拉法尔加战役所取得的功业。它不仅使不列颠群岛免遭入侵，而且建立了一道延伸到世界两端的防线；它不仅摧毁了法国的海军力量，而且通过确保地中海与通往东方的基地，使得拿破仑海军的任何复苏都无法再对英国的海外领地造成严重威胁。如果英国对抗的是拿破仑之外的任何人，如果英国的盟友是普鲁士之外的任何国家，它都会赢得比这多得多的成就。海洋已经提供了海洋所能提供的一切，但对于欧洲来说，这场战役却是以失败完结。

---

[1] 在拿破仑战争中，这支英国部队在欧洲各处建立了赫赫功勋。它主要由原先的汉诺威部队构成，他们不承认1803年6月3日的《索林根条约》（Convention of Suhlingen）并逃到了英国，随后就留在英王麾下作战。参见Beamish，*History of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

[2] 哈罗比从柏林发出的第一封信与唐将军从库克斯港发出的第一封信都落款于11月17日，参见Rose，*Third Coalition* ，p.222，and *War Office* （1）*In-Letters* ，186。

[3] 1718年7月，西班牙入侵奥地利治下的西西里。8月11日，西班牙舰队在帕萨罗角与乔治·宾指挥的英国舰队相遇。由于英国已与奥地利等国签署盟约，便对西班牙舰队发起突袭，几乎将之全歼。——译者注

[4] Craig to Castlereagh，November 2nd and December 9th：*War Office* （1），280.

[5] Elliot to Mulgrave，Dec.10th：Auriol，ii.693.Napoleon to Prince Eugène，and Berthier to St.Cyr：Ibid.，pp.704-6.

[6] 整个出击计划的细节可见于despatches of Don，of Brigadier Decken（chief intelligence officer with Don），and of Lord Cathcart，the British Commander-in-chief，all in *War Office* （1）*In-Letters* ，186.Castlereagh’s are in Ibid.（6），*Out-Letters*（*Secretary of State*） ，13，and in his *Correspondence*，

Second Series， vol.ii.Harrowby’s are in Rose，*Third Coalition.*

[7] Elliot to Mulgrave，December 10th：Printed by Auriol，ii.693.

[8] 一封落款于1806年1月的回信给出的总兵力是27000人，其中英王德意志军团为11000人。五个旅的指挥官分别是邓达斯（Dundas）、弗雷泽（Fraser）、韦尔斯利、舍布鲁克（Sherbrook）与希尔（Hill）。*W.O.*（1），186，January 2nd and 14th.

[9] Cathcart to Castlereagh，December 25th（enclosing Harrowby to Cathcart，December 20th），and Cathcart to Castlereagh，January 1st：*W.O.*（1），176.

[10] Auriol，ii.745：Protocol of the Council of War.

[11] Elliot to Mulgrave，January 13th（Auriol，ii.778）.这一命令的原因似乎不得而知，但或许和法国与奥地利的停战协议相关，残余俄军也的确被允许不受骚扰地撤退。按照托尔斯泰对卡斯卡特的说法，召回莱西或许是由于俄国想在波兰集结兵力，准备来年再与普鲁士联合作战。Cathcart to Castlereagh，December 25th：*W.O.*（1），186.

[12] 今意大利斯塔比亚海堡（Castellammare di Stabia），坐落于那不勒斯湾岸，距那不勒斯约20公里远。——译者注

[13] 乔治·汤森，汤森侯爵（George Townshend，Marquess Townshend，1724～1807年），英国陆军将领。曾参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1767年起任爱尔兰总督，1772年任军械总局局长，1782年晋升上将，1784年退休，1796年晋升陆军元帅。——译者注

[14] Mrs.Nugent to Cornwallis，Jan.23，1806：*Hist.MSS.Com.*，*Various Collections*，vi.417.

[15] 退休后的巴勒姆一直活到胜利前夜，在1813年6月7日去世，享年87岁。一种传言认为，他的继任者是圣文森特勋爵，他还同时兼任着“统摄从菲尼斯特雷角到苏格兰极北端海面的海军统帅阁下”。但这显然不合乎英国的传统。巴勒姆的继任者是文官出身的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也就是在1830年代出任首相、以改革政府而闻名的格雷伯爵（Earl Grey）。

[16] 他们的谈判可参见Coquelle 的*Napoleon et Angleterre*， part ii，Translation by G.D.Knox。

附录Ⅰ：纳尔逊勋爵的备忘录，1805年10月9日

本文转录自纳尔逊的手稿，未签署姓名。原件上有他的私人牧师斯科特博士（Dr.Scott）订正的痕迹，斯科特加入的字词标示为斜体。[1] 文章分段与原始文本相同。篇幅为2张大纸，或者8页四开纸。原件现藏于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

备忘录

“胜利”号，加迪斯港外，1805年10月9日

考虑到在多变的风向、有雾的天气或其他可能的情况下，让一支拥有40艘战列舰的舰队组成战列线几乎必然会损失时间，这种方式有可能错失让敌人投入战斗并取得决定性战果的时机——

因此，我想把航行阵型当作战斗阵型，让舰队维持其原本的航行位置（除了总司令和副司令的旗舰）。舰队会被分成两支各有16艘战舰的舰列，还有一支拥有8艘最快的双甲板战舰的前锋舰队。后者可以按照总司令的指挥，随时使一支舰列拥有24艘战舰。

在了解我的意图之后，副司令将全权指挥他的舰列向敌人发起攻击，继续战斗直至他们投降或毁灭。

如果发现敌舰队在上风处组成战列线，而两支舰列和前锋舰队仍能与之交战；敌阵可能会延展过度，使其前卫无法支援后卫。

那么，我会向副司令打出信号，让他穿过从舰队后端数第12艘战舰（或者与敌舰交战的任何位置，如果他无法那样靠前的话）。我的舰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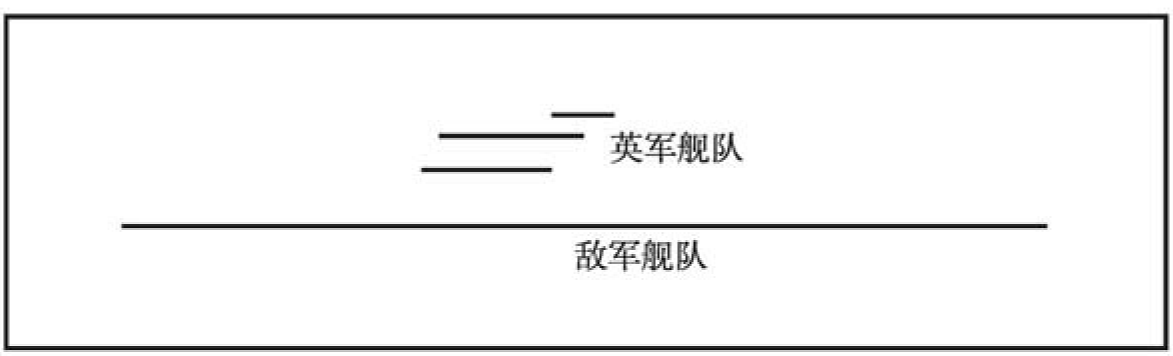
会穿过他们的中军，前锋舰队则会在其中央之前的三四艘战舰处突破，以保证攻击到他们的总司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将他俘获。

英国舰队的总体目标，是制服从敌方总司令（假设位于中军）之前第二或第三艘战舰到舰队末端之间的敌舰。我假设敌军战列上还有20艘战舰未遭攻击，他们在执行机动、驶近攻击英国舰队的任何部分或支援友舰之前一定会耗费一些时间，因为他们定会被卷入交战中的战舰之间。[2] 有些东西必须留给运气来决定，没有什么能比海战的情况更不确切。炮弹将会打坏友舰或敌舰的桅杆和横杆，但是我有信心在敌军前卫能支援后卫之前赢得胜利，然后，大多数英国战舰就能准备好迎击他们的20艘战舰。如果他们试图逃跑，英军就会进行追击。

如果敌军前卫朝上风转向，已俘获的敌舰就应逃到英国舰队的下风处。如果敌军朝下风转向，英军必须挡在敌舰与俘虏舰和受损舰之间。如果敌军驶近，我毫不担心最终的结果。

副司令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指挥其舰列紧贴敌人。舰长们应当将指定的敌军战列视为他们的集中点。但在无法看到信号或无法正确理解信号的情况下，如果将他自己的战舰靠在一艘敌舰旁边，舰长就绝不会犯下大错。

[3] 从上风发起预想的攻击。敌人已组成战列线，准备迎接进攻。



英军分队将首先行驶至接近敌军中军的火炮射程之处。之后最可能

打出的信号是让下风舰列升起包括转向帆（steering-sails）在内的所有风帆，一齐驶向下风，从而尽快抵达敌军战列，从后方第12艘敌舰开始穿越。[4] 一些战舰可能无法在他们的准确地点穿越，但他们总是能支援友军，只要任何战舰在敌军后卫周围，他们都能有效地完成歼灭12艘敌舰的任务。

如果敌舰一齐倒转航向或大张风帆驶向下风，最初位于敌军后卫末端的12艘战舰仍然是下风纵队的攻击目标，除非总司令另有指示，但这几乎不用指望。因为在总司令表达了他的意图之后，他就准备让这支舰队的指挥官全权负责相关决策。

敌舰队中剩下的34艘战舰则留给总司令来对付，他会努力尽量不干扰副司令的行动。

译者说明：

在科贝特撰写此书时，他并未看到纳尔逊为执行上述攻击而特别制定的信号指令，他推测这是纳尔逊自己增添到附录中的信号。1990年，英国海军战术史的权威研究者布莱恩·滕斯托尔在其《风帆时代的海战：1650～1815年的战术演进》一书中首次刊布了这则指令，它的存在印证了科贝特的推测，但也对其后续论证造成了小幅度的冲击。现抄录如下：

> 纳尔逊勋爵向低级军官发布的信号。
>
> 黄底蓝边信号旗。突破敌军战列并在另一侧与其交战。
>
> 提示：所有舰只都应重复这一信号。信号会标出从敌舰队末端往前数的序号，从而为先导舰指定它将要从其舰尾突破并与之交战的那艘敌舰。准备进攻的战舰应当尽可能升起所有风帆（同时尽可能保持其相对方位与密集阵型），从而使整支舰队能尽快地同时穿过敌军。如果升起了翼帆（studding sails），建议在突破后将它们降下，以免起火或造成混乱。如果形势许可，每艘战舰当然应该在自己将要对战的那艘敌舰的舰尾后进行穿越，否则就参照《指令》第160页第31条（即

普通的突破战列线指令——译者注）。在打出这个信号之前，将军可能会让他的舰队向前行驶到敌军前卫的位置，以此来欺骗敌人，使他们认为他想对他们的前卫发动攻击。[5]

---

[1] 斯科特的订正主要在语法方面，绝大部分难以用中文标示。——译者注

[2] 斯科特在这里插入了一个星号，用来引述纳尔逊写在背面上缘的一条注记："假设敌军拥有46艘战列舰，英军拥有40艘。不管实际兵力多少，被分割的敌舰数量都要遵循这个比例。发起攻击的英军舰队要比被分割的敌军舰队强四分之一。"

[3] 原稿在此分行，并在文字前有一空格。"从上风发起的预想攻击"独占一行，因此这半句话前很可能还有其他内容。下方的示意图原本画得非常粗略，线条并非如此图这般笔直，也不完全平行。但此图完全保留了原图的相关比例和距离。

[4] 抄件上缘的注记这样写道："参见黄底蓝边旗的信号旗指令。第17页，第18面旗，参照附录。"所谓"附录"是海军部在1804年刊发的额外信号手册，但其中并没有这则信号。因此，这应该是纳尔逊自己增添到附录中的信号。（科贝特的推测已得到了新文献的证明，详见本节末译者说明。）

[5] Brian Tunstall，*Naval Warfare in the Age of Sail*：*The Evolution of Fighting Tactics*，*1650-1815* （Naval Insitute Press，1991），p.251.

附录II：参加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英国军舰

舰名	原文名	标准炮数	说明
战列舰：			
“勇莽”号	Téméraire	98	
“胜利”号	Victory	100	纳尔逊的旗舰
“尼普顿”号	Neptune	98	
“征服者”号	Conqueror	74	
“利维坦”号	Leviathan	74	
“阿非利加”号	Africa	64	
“不列颠尼亚”号	Britannia	100	
“埃阿斯”号	Ajax	74	
“俄里翁”号	Orion	74	
“阿伽门农”号	Agamemnon	64	
“米诺陶”号	Minotaur	74	
“斯巴达人”号	Spartiate	74	
“亲王”号	Prince	98	
“玛尔斯”号	Mars	74	
“皇家君权”号	Royal Sovereign	100	科林伍德的旗舰
“雷鸣”号	Tonnant	80	
“贝尔岛”号	Belleisle	74	
“柏勒洛丰”号	Bellerophon	74	
“巨像”号	Colossus	74	
“阿喀琉斯”号	Achille	74	
“无畏”号	Dreadnought	98	
“波吕斐摩斯”号	Polyphemus	64	
“复仇”号	Revenge	74	
“敏捷”号	Swiftsure	74	
“防御”号	Defence	74	

续表

舰名	原文名	标准炮数	说明
“雷神”号	Thunderer	74	
“挑战”号	Defiance	74	
巡洋舰：			
“欧律阿罗斯”号	Euryalus	36	巡航舰
“那伊阿得”号	Naiad	38	巡航舰
“菲比”号	Phoebe	36	巡航舰
“天狼星”号	Sirius	36	巡航舰
“皮克尔”号	Pickle	8	双桅纵帆船
“大胆”号	Entreprenante	10	单桅纵帆船

附录III：特拉法尔加海战前的旗语信号

信号		发出者	针对者	资料来源		说明
信号簿中的指令	旗语编号			日志	时间	
组成两路纵队的航行阵型。	72	“胜利”号	全军	“贝尔岛”号 M & C “柏勒洛丰”号 C “埃阿斯”号 M “俄里翁”号 C “挑战”号 “玛尔斯”号 M & C	5:40 ? 6:00 6:00 6:00 6:09	
迎风停船，遵照旗舰的动作或信号指示的方向转舵，大张风帆，驶向下风。	76 东北偏东 罗经旗	“胜利”号	全军	“贝尔岛”号 M & C “柏勒洛丰”号 C “埃阿斯”号 M & C “玛尔斯”号 M & C “俄里翁”号 M & C “挑战”号 M	6:00 ? 6:10 6:14 6:15 6:15	

续表

信号		发出者	针对者	资料来源		说明
信号簿中的指令	旗语编号			日志	时间	
准备战斗。	13	“胜利”号	全军	“贝尔岛”号 C “柏勒洛丰”号 C “埃阿斯”号 C “挑战”号 M & C “征服者”号 M “那伊阿得”号 M “尼普顿”号 M “欧律阿罗斯”号 M	6:00 6:20 6:20 6:30 6:35 6:40 7:00 7:00	
迎风停船，遵照……信号指示的方向转舵，大张风帆，驶向下风。	76 正东罗经旗	“胜利”号	全军	“柏勒洛丰”号 C “埃阿斯”号 C “阿喀琉斯”号 M “那伊阿得”号 M “挑战”号 M & C “欧律阿罗斯”号 M	6:42 6:45 6:50 6:50 7:00 7:00	“阿喀琉斯”号、“那伊阿得”号、“挑战”号的记录没有提到罗经信号。
战舰可以采取最便利的位置，无须遵照指定的航行阵型。	265	“胜利”号	“亲王”号 “无畏”号	}“勇莽”号	7:23 7:25	

续表

信号		发出者	针对者	资料来源		说明
信号簿中的指令	旗语编号			日志	时间	
召唤舰长登上旗舰。	—	“胜利”号	“欧律阿罗斯”号 “天狼星”号 “天狼星”号 “菲比”号 “那伊阿得”号 “那伊阿得”号	“勇莽”号 M “欧律阿罗斯”号 “天狼星”号 N }“勇莽”号 M “那伊阿得”号 M	7:40 8:00 7:45 7:46 7:50	
战舰可以采取最便利的位置，无须遵照指定的航行阵型。	265	“胜利”号	“不列颠尼亚”号 “亲王”号 “无畏”号	}“贝尔岛”号 M	8:00	
迎风停船，遵照旗舰的动作……转舵，大张风帆，驶向下风。	76	“胜利”号	“亲王”号	“勇莽”号 M “那伊阿得”号 M	8:33 8:40	“亲王”号航海长日志：“转向左舷，为舰队结阵腾出空间。回复信号后驶向下风。”
舰队中的战舰相互间保持左舷迎风的斜阵，尽管驶向右舷。	50	“皇家君权”号	左舷分队	“防御”号 M & C “阿伽门农”号 M	8:45 ?	“阿伽门农”号将之记录为发往全军。

续表

信号		发出者	针对者	资料来源		说明
信号簿中的指令	旗语编号			日志	时间	
组成左舷迎风的斜向阵列，转往指定航向。 说明："战舰应按照它们未来航向的罗经点相互展开，如果向左舷转向形成一支纵队，要与风相差一个罗经点。"	42	"皇家君权"号	左舷分队	"防御"号 M & C "勇莽"号 M	8:46 8:47	这则信号很快就取代了前一则信号，因此前一则有可能是打错了。
升起更多的帆，如果在战列线或航行阵型中，则由领航舰开始。	88	"皇家君权"号	左舷分队	"贝尔岛"号 M & C "防御"号 M & C "勇莽"号 M "复仇"号 M	8:45 8:46 8:47 9:00	
一齐朝左舷转向1个罗经点。	82(?)	旗舰	全军	"贝尔岛"号 M & C	9:00	这似乎是误记，其他战舰都没有提到这则信号与类似的转向。
交换在战列或航行阵型中的位置。 说明："打出信号的同时会指示出要改变位置的战舰。"	46 "贝尔岛"号与"雷鸣"号的舰旗	"皇家君权"号	"贝尔岛"号 "雷鸣"号	"贝尔岛"号 M & C "勇莽"号 M	9:20 9:23	

续表

信号		发出者	针对者	资料来源		说明
信号簿中的指令	旗语编号			日志	时间	
升起更多的帆。	88	"皇家君权"号	"贝尔岛"号	"贝尔岛"号 M & C "勇莽号" M	9:20 9:35	
指定的战舰、分队或分舰队按照给出的罗经信号与旗舰保持方位。	267 西南罗经旗	"皇家君权"号	"贝尔岛"号	"贝尔岛"号 M & C "勇莽"号 M	9:30 9:35	
进入指定战舰身后的位置，该信号得到回复后将会给出指定战舰的信号旗。	269 "勇莽"号的舰旗	"胜利"号	"利维坦"号	"勇莽"号 M	9:36	
指定的战舰……按照给出的罗经信号与旗舰保持方位。	267	"皇家君权"号	"复仇"号	"勇莽"号 M	9:40	"复仇"号的舰长也记录了这则信号，但两者都没有提到罗经旗。
升起更多的帆。	88	"皇家君权"号	"复仇"号	"勇莽"号 M "复仇"号 C	9:40 ?	
进入指定战舰身后的位置……	269 "皇家君权"号的舰旗	"胜利"号	"玛尔斯"号	"勇莽"号 M "玛尔斯"号 M "征服者"号	9:58 10:05 10:10	该信号并未得到回复。

续表

信号		发出者	针对者	资料来源		说明
信号簿中的指令	旗语编号			日志	时间	
准备战斗。	13	“胜利”号	全军	“米诺陶”号 M “皮克尔”号 M	10:00	
一齐向左舷转向，驶向上风。	102	“防御”号	“菲比”号	“防御”号 M & C	10:40	可能是混淆了107、108、109号要求“靠近”的信号。
升起更多的帆。	88	“防御”号	“俄里翁”号	“防御”号 M & C	10:41	
为舰队或指定的纵队领航……	97	“胜利”号	“玛尔斯”号	“玛尔斯”号 M	10:45	“玛尔斯”号回复了信号并升起了翼帆。“俄里翁”号记录道，“玛尔斯”号与“利维坦”号分别在12:15接到信号。但此时纵队前端已开始交战，这个时间并不可能。
只要安全，尽可能在桅杆上升起所有的帆。(纳尔逊的附加信号)	307	“胜利”号	“防御”号 “阿非利加”号	“勇莽”号 M “阿非利加”号 M “那伊阿得”号 M “俄里翁”号 M “俄里翁”号 C “勇莽”号 M	11:02 10:53 11:05 11:15 11:25 11:55	

续表

信号		发出者	针对者	资料来源		说明
信号簿中的指令	旗语编号			日志	时间	
一齐朝左舷转向1个罗经点。	82	“防御”号	“俄里翁”号	“俄里翁”号 M & C	11:32	
升起更多的帆。	88	“皇家君权”号	全军	“玛尔斯”号 M “柏勒洛丰”号	11:40 ?	“柏勒洛丰”号将之记在63号“准备下锚”之后，且错写成了80号
“我准备袭击或穿过敌军战列的末端，防止他们逃回加迪斯。”	拼词旗语	“胜利”号	“皇家君权”号	“欧律阿罗斯”号 M	11:40	
保持紧密阵型。	56	“皇家君权”号	“贝尔岛”号	“贝尔岛”号 M & C	11:50	
只要安全，尽可能在桅杆上升起所有的帆。	307	“胜利”号	全军	“勇莽”号 M	11:55	
“英格兰希望所有人都将尽到他的职责。”	拼词旗语	“胜利”号	全军	“俄里翁”号 C “那伊阿得”号 M “尼普顿”号 M “防御”号 M & C “欧律阿罗斯”号 M “挑战”号 M & C “复仇”号 M	11:25 11:35 11:40 11:48 11:56 12:00 12:10	

续表

信号		发出者	针对者	资料来源		说明
信号簿中的指令	旗语编号			日志	时间	
准备在白昼结束后下锚。	准备信号8 执行信号63	“胜利”号	全军	“阿非利加”号 C “尼普顿”号 M “柏勒洛丰”号 M “那伊阿得”号 M “俄里翁”号 M & C “欧律阿罗斯”号 M “无畏”号 M “埃阿斯”号 M & C “防御”号 M “勇莽”号 M “征服者”号 M “挑战”号 M	11:32 11:46 12:00 12:00 12:00 12:00 12:00 12:05 12:05 12:10 12:10 12:15	“征服者”号的日志把信号编号错写成了62。
进入指定战舰身后的位置……	269 “胜利”号的舰旗	“胜利”号	“勇莽号”	“尼普顿”号 “勇莽”号 M& L “征服者”号 M	11:50 12:00 12:25	
在更近的距离上与敌军交战。	16	“胜利”号	“阿非利加”号	“阿非利加”号 M “征服者”号 M	12:00 12:25	

续表

信号		发出者	针对者	资料来源		说明
信号簿中的指令	旗语编号			日志	时间	
在更近的距离上与敌军交战。	16	“胜利”号	全军	“贝尔岛”号 C “尼普顿”号 N “勇莽”号 M “埃阿斯”号 C “柏勒洛丰”号 C “俄里翁”号 M & C “阿喀琉斯”号 M “阿非利加”号 M “埃阿斯”号 M “那伊阿得”号 M “欧律阿罗斯”号 M “征服者”号 M	11:55 11:56 12:10 12:10 12:13 12:15 12:15 12:15 12:18 12:20 12:20 12:30	
只要安全,尽可能在桅杆上升起所有的帆。	307	“胜利”号	“阿非利加”号	“征服者”号 M “勇莽”号 M& L “阿喀琉斯”号 M “那伊阿得”号 M	12:25 12:26 12:30 12:30	

说明：表中的“M”意为航海长日志（Master's Log），“C”意为舰长日志（Captains' Journal），“L”意为尉官日志（Lieutenants' Journal），“N”意为在《纳尔逊书信集》中引用但未找到原件的文件。信号的时间仅排列到中午全面交战展开之前。

（在纳尔逊时代，海军舰船上的计时方法较为原始，各舰之间的计时存在较大的误差。而这一误差又被信号传达过程的时间和记录者的笔误所放大。因此，表中的时间仅能被视作大致时间。——译者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拉法尔加战役/（英）科贝特（Corbett，J.S.）著；陈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097-7997-2

Ⅰ.①特… Ⅱ.①科… ②陈… Ⅲ.①海战-战争史-史料-英国-1805 Ⅳ.①E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3005号

特拉法尔加战役

著者/〔英〕朱利安·S.科贝特

译者/陈骆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李洋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8 插页：1 字数：406千字

版次/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997-2

定价/7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宋　涛



图示制作／顾伟欣

//《特拉法尔加战役》是一部关于 1805 年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全景战史。该书首次出版于 1910 年，后多次再版，至今仍被公认为对这场海战最为精良的研究作品之一。科贝特兼具海军历史学家与海军战略学家的双重身份，他的著作将细节的把握与精密的思考相联系，通过对这场著名海上战役的通贯叙述呈现出拿破仑战争时代庞大纷繁的政治军事史图景，在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关于海军战略原则的种种思绪。///



The Campaign of Trafalgar



ISBN 978-7-5097-7997-2

定价：79.00元



甲骨文官方微信

THE HISTORIES OR 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的崛起

翁嘉声 译



Polybius

波里比阿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波里比阿 著



罗马帝国的崛起

THE HISTORIES OR 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录

- 中文版译者导读
  - 波里比阿历史的“考古”
  - 一 斯巴达及雅典：刺猬与狐狸
  - 二 斯巴达政体
  - 三 斯巴达的没落及底比斯的霸权
  - 四 佣兵问题
  - 贰 古典时期之马其顿王国
  - 一 菲利普二世
  - 二 亚历山大大帝
  - 参 “继承者的时代”：希腊化三大王国的建立
  - 一 埃及王国
  - 二 叙利亚王国
  - 三 马其顿王国
  - 四 联邦：城邦的出路
  - 五 斯巴达革命
  - 六 罗德岛与帕加马王国
  - 七 尊荣、合法性及“希腊性”
  - 肆 古代西西里的历史
  - 罗马共和简介
  - 壹 罗马阶层斗争与内部政治整合
  - 贰 意大利联盟的建立与对外扩张
  - 叁 中期罗马共和的“帝国主义”
  - 肆 中期罗马共和的重要人物
  - 一 雷古鲁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三○七至约二五四年）
  - 二 汉尼拔（Hannibal Barca）（约二四六至一八三年）
  - 三 弗拉米宁（Gaius Flaminius）（殁于二一七年）
  - 四 “延迟者”费边（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

Cunctator）（约二八○至二○三年）
- 五 马谢勒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二七一至二○八年）
- 六 “非洲征服者”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二三六至一八三年）
- 七 福拉明尼纳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约二二八至一七四年）
- 八 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二三四至一四八年）
- 九 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二二八至一六○年）
- 十 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约一八五至一二九年）

- 英文版导读
  - 1.背景
  - 2.波里比阿的生平
  - 3.历史的写作
  - 4.作品的性质
  - 5.史学家的技巧
  - 6.命运的问题
  - 7.罗马宪政
  - 8.波里比阿的史料来源
  - 9.波里比阿的流传
  - 10.近来有关波里比阿的作品
  - 11.目前之选文
- 第一书
  - 导论
  - 第一次布匿战争
- 第二书
  - 在西班牙之事务
  - 罗马人在伊利里亚
  - 在西班牙的事务
  - 罗马与高卢人
  - 在西班牙的事务
  - 在希腊的事件：亚该亚联邦
- 第三书
  - 导论
  - 第二次布匿战争

    - 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
    - 第二次布匿战争
    - 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
    - 第二次布匿战争
- 第四书
    - 在希腊之事务：谷奈塔（Cynaetha）的内战
    - 拜占庭与黑海
- 第五书
    - 在埃及之事务：克里奥米尼斯之死
    - 在希腊之事务：菲利普及希腊人
- 第六书
    - 来自序文
    - 论国家之形态
    - 论成熟的罗马宪政
    - 罗马的军事系统
    - 罗马共和与其他共和的比较
    - 结论
- 第七书
    - 在西西里之事务
    - 在希腊之事务：汉尼拔与马其顿菲利普之间的条约
    - 菲利普的个性
- 第八书
    - 在西西里之事务：围攻叙拉古
    - 在希腊之事务：马其顿之菲利普
    - 在意大利之事务：围攻他林敦
- 第九书
    - 导论
    - 在意大利之事务：围攻卡普亚
    - 论将军之领导统御
    - 汉尼拔的人格特质
- 第十书
    - 西庇阿的人格
    - 在西班牙之事务：攻占新迦太基
    - 西庇阿及西班牙人
- 第十一书
    - 在意大利之事务：迈托如斯河之役

  - 汉尼拔的人格
- 第十二书
  - 对泰密乌斯及其历史方法的批评：非洲及科西嘉动物志的错误
  - 有关西西里的错误
  - 蓄意及非蓄意的错误
  - 泰密乌斯论凯利斯尼兹、雅典之德谟卡瑞斯、西西里之阿加索克利斯
  - 泰密乌斯对其他作家的批评
  - 泰密乌斯论法拉吕斯之铜牛
  - 泰密乌斯编写演说词的方法
  - 历史与医学的比较
  - 泰密乌斯欠缺政治及军事经验以及不愿旅行
  - 泰密乌斯作品缺失的原因以及优秀史家的特质
- 第十四书
  - 在非洲之事务：西庇阿的征战
- 第十五书
  - 在非洲之事务：最后决战
  -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结束
  - 在马其顿、叙利亚及埃及之事务
  - 在埃及之事务：一场宫廷革命
- 第十八书
  - 在希腊之事务：弗拉米宁与菲利普
  - 论背叛
  - 论方阵兵团
  - 在希腊之事务：弗拉米宁以及和平协议
- 第二十四书
  - 在希腊之事务：菲洛波义曼及阿里斯泰纳斯
- 第三十一书
  - 在罗马及叙利亚的事务：德米特里的逃走
  - 在意大利之事务：宝路斯、西庇阿以及波里比阿
- 第三十六书
  - 在罗马及迦太基之事务：第三次布匿战争
  - 论命运及机遇
- 第三十九书
  - 取自结语
- 地图清单

- 编年纪事简表
- 名词对照
  - 二划
  - 三划
  - 四划
  - 五划
  - 六划
  - 七划
  - 八划
  - 九划
  - 十划
  - 十一划
  - 十二划
  - 十三划
  - 十四划
  - 十五划
  - 十六划
  - 十七划

中文版译者导读

翁嘉声

波里比阿历史的“考古”

波里比阿的历史有两个面向：它是普世史[1]；它是实用史（pragmatike historia）。关于实用的面向，史家已经多所着墨；至于普世史则是关于罗马所雄霸之西地中海与马其顿人及希腊人所控制之希腊化世界，在公元前三世纪末时的交会以及混融，以及之后罗马发展为全地中海唯一的主宰国家。因为这两个文明构成波里比阿所知之全世界的主要部分，所以他认为他所写的是已知世界的历史，亦即世界史。波里比阿因为顾虑到他潜在的希腊读者不熟悉中期罗马共和的历史，所以将其史书的第一及第二书用来阐述二六四至二二○年（本书以下年代皆为公元前，除非另有标示）之间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二六四至二四一年）击败迦太基，进而崛起、征服意大利波河平原高卢人，以及同时期东方希腊化世界所历经的变动，作为读者所需的背景知识，以协助他们了解他整个巨著的主旨：何以罗马能在二二○至一六七年的五十三年间统一当时所知的世界。这种用心非常类似修昔底德在他的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章之中讨论波斯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四七九至四三一年），这约略五十年间[2]他称之为“考古”（archaeology）的历史，来为四三一年爆发的战争预作历史背景的陈述。但对现代读者而言，波里比阿历史所预设的更广泛古典及希腊化世界历史以及早期和中期罗马共和历史，都非现代人熟悉的领域，所以本导读将会对波里比阿的历史提供另外一个“考古”，对其所提及之事尽量述及，给予适当的历史框架，俾供读者理解史家波里比阿所提到之人事物，也尽量避免重复沃尔班克的导论中已经提及的事项。

希腊人与罗马人早在八世纪末便已发生接触。当时整个地中海世界出现广泛殖民活动：希腊人在意大利最先于坎帕尼亚（Campania）地区殖民，影响到伊达拉里亚人（Etruscan）文化的发展，使希腊文化间接

传递给罗马人；七世纪希腊人在后来被称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的南意大利及西西里岛殖民，建立城邦，这又构成另一个影响的来源。罗马人有关自己祖先是特洛伊落难王子埃涅阿斯（Aeneas）的故事，便可能是在四世纪时从南意大利传来。当罗马人在四世纪末及三世纪初逐渐统一意大利半岛时，南方希腊城邦他林敦（Tarentum）倍感威胁，于是从希腊化世界邀请一位亚历山大大帝的亲戚，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Pyrrhus of Epirus），前来助阵（二八○至二七五年）。他是当时希腊人认为最有才气的将军，总共和罗马进行了三场战役，最后以没有明确结果的惨胜（Pyrrhic Victory）及战和告终，而南意大利的希腊城邦也随即落入罗马势力范围。当时这种希腊及罗马激烈的接触在希腊化东方引起一些涟漪：埃及的托勒密二世在听闻罗马与皮洛士[3]战争的结果时，大为惊讶，在二七三年以自居希腊化世界的领导身份遣使致意。但随后希腊化世界又恢复到苏格拉底所形容的希腊人的状况：环绕在爱琴海盆地的池塘旁，一群彼此争论的井底之蛙，对罗马统一意大利以及第一次布匿战争并无多大的兴趣。这解释了何以波里比阿认为他需要他自己版本的“考古”，来替他的历史主题先做铺陈。但是波里比阿所描写的罗马在二六四年之前的发展究竟为何，以及当时希腊化世界如何产生以及发展，并没有系统性的交代，但他在历史著作中却又常指涉到一些影响三世纪希腊化及罗马世界形成的事件。所以以下的叙述将分别对希腊化世界如何形成及发展的大致过程，以及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前的政治演化以及在意大利的扩张进行说明。希望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图像来协助了解波里比阿的历史，作为波里比阿整部历史整体的另一个“考古”。

在希腊化世界部分因为希腊政治形态高度多样化，而且各自独立，彼此又密切互动，再加上复杂的古典传统，不似意大利本身是由罗马来主导发展，而西地中海是由罗马及北非迦太基之间的关系来架构，[4]所以在希腊化历史部分会有较长及较复杂的叙述以及细节，而且相同事件常会涉及不只一个国家，常可以从不同观点来了解，故部分不免有重复叙述的情形。另外，因为波里比阿作品的对象主要是希腊人，所以对希

腊部分常略而不论，但对罗马则较详细叙述，这些因素造成以下之“考古”有篇幅及密度的差异。这种情形反映在在以下的章节的布置。相对地，在罗马部分则以数个重点主题为主，特别是罗马政治演化、“意大利联盟”的建立以及中期罗马共和扩张是否为帝国主义的行为；在最后的部分则是对波里比阿历史所涵盖时代的几个重要罗马人物，交代简短的传记，协助读者在阅读时，对相关人物能在心中先有个大致的概念，因为这时代充满了这类型的传奇性人物。

希腊化世界简介

壹 古典希腊城邦世界

一 斯巴达及雅典：刺猬与狐狸

二 斯巴达政体

三 斯巴达的没落及底比斯的霸权

四 佣兵问题

贰 古典时期之马其顿王国

一 菲利普二世

二 亚历山大大帝

参 “继承者的时代”：希腊化三大王国的建立

一 埃及王国

二 叙利亚王国

三 马其顿王国

四 联邦：城邦的出路

五 斯巴达革命

六 罗德岛与帕加马王国

七 尊荣、合法性及“希腊性”

肆 古代西西里的历史

罗马共和简介

壹 罗马阶层斗争与内部政治整合

贰 意大利联盟的建立与对外扩张

参 中期罗马共和的“帝国主义”

肆 中期罗马共和的重要人物

一 雷古鲁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

二 汉尼拔（Hannibal Barca）

三 弗拉米宁（Gaius Flaminius）

四 “延迟者”费边（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 Cunctator）

五 马谢勒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

六 “非洲征服者”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

七 福拉明尼纳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

八 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

九 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

十 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希腊化世界简介

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qe）始于亚历山大大帝（三五六至三二三）过世那年，至于何时结束，莫衷一是：或是一四六年（迦太基、科林斯被罗马摧毁），或是一三三年［罗马人民继承阿塔罗斯三世（Attalus III）的帕加马王国］，或是三十一年［埃及最后一任君王克丽欧佩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被罗马执政官屋大维（Octavian）打败后自杀］。根据传统的编年，这希腊化时代是继希腊前古典（Archaic Age，七七六至四七九年）以及古典时代（Classical Age，四七九至三二三年）之后。这整段希腊史经常被看做像是登山、攻顶以及下山的过程。希腊化时代于是被看待为一个下山或“堕落”的时代，背离古典时期的典范，因为希腊化时代的人不再说典雅的雅典（Attican）希腊文，而是简化的普通希腊文（Koine）；希腊人不再生活于自由自主的城邦之中，而是受独裁君王的宰制。希腊人在如此的状况下不再能够写出第一流的文学以及成就如波斯战争时成就的事功。这是发明“希腊化”这名词的十九世纪德国学者的观点：所谓“希腊化”者其实并非真正“希腊”。这种贬抑希腊化时代的成就或许与当时学者所处的德国民族建国热潮有关，认为政治自由是优秀文化不可或缺的前提，而既然希腊人在希腊化时代失去他们在古典时期所曾享有的政治自由，所以不再能够创造出如古典时期的杰出作品。这当然是偏见，而且断非实情，因为希腊化时代一样具有创意，一样能够产生一流的作品。在过去五十年，对希腊化时代的研究兴趣也重新被点燃，并且以稳定的步伐成长进步。

壹 古典希腊城邦世界

前古典时期始于以尊崇宙斯神之奥林匹亚运动竞赛，这一竞赛每隔四年[5]举行一次，所以“奥林匹亚年”（Olympiad）成为希腊人最主要的纪年根据之一。前古典时期是个充满创意的时代，但对希腊文明整体来说，没有一项会比“城邦”[6]体制的出现更具意义。城邦体制并不独属希腊人，因为在八世纪时，整个地中海盆地星罗棋布着由希腊人、迦太基人、伊达拉里亚人及意大利民族（包括罗马人）所建立的类似社区。据估计就希腊人所散居的希腊、爱琴海及黑海沿岸、利比亚、南意大利、西西里以及远及法国南部的马赛有超过一千个希腊城邦。城邦是由一群平等公民所组成的小型社区，它有两大诉求：对外自由以及对内平等；所有的政治及经济资源由所有公民分享，政府治理是由公民轮流担任职务来执行，所以城邦在这意义上来说基本上是以“民主政治”[7]的方式来运作，而所谓的“寡头政治”[8]其实只是对参与政治之公民身份做出更严格的限制。但是城邦经常因为种种困难陷入纷争，进而爆发内战（stasis），一旦无法再由这种以取得集体公民共识的政治形态来解决时，常会促成有野心的个人以非法方式独自揽权，进行激进的政治社会改革，来解决问题，这便会出现所谓“僭主”（tyrant）的人物；他独揽权力，违背城邦为平等公民社区的理念，实行所谓的“僭主政治”（tyranny）。这里的僭主或tyrant并不一定会指涉到“暴君”的意涵，而是专门针对希腊城邦体制而言的一种违宪政体，其所执行的功能常像是革命者或是激进的改革者之所为。这种僭主的现象在希腊化时代变得相当常见，在屡受迦太基人威胁的西西里城邦特别容易发生。

城邦不仅是一个强调公民自由及平等的政治社区。它也提供一种希腊人理解这世界的方式：城邦是文明的空间，而且只有过城邦生活的希腊人才是文明人。在城邦之外的是野性自然，充满非理性的危险，居住着人类之下的野兽以及人类之上的神明，所以希腊人以狩猎及祭祀行为来与之区隔。城邦是文明的空间，也是希腊文明最杰出的贡献，如文学或艺术，所必须预设的创造脉络。因为，例如说，戏剧便是由城邦赞助，在公民之前演出以及在剧中以神话故事作为媒介来讨论公民所关切

之议题（例如妇女、战争、政治等）。因此希腊剧场常被称为“第二市民广场”（second agora）。城邦更提供希腊人自我认同的方式。除了面对“野蛮人”时，希腊人（Hellenes）的集体认同才会被强调外，在希腊人之中，一个人所属的城邦是他自我认同最重要的根据。所以亚里士多德（三八四至三二二）曾经提过，一个没居住在城邦的人，就像一个落单的棋子；他若不是野兽，便是神明。[9] 城邦因此也是一套希腊人理解周遭世界的知识论根据，它清楚简易，使得希腊的文化创造具有清晰表达、明确逻辑以及完整结构的特色。

一 斯巴达及雅典：刺猬与狐狸

第二次波斯战争之后的古典世界由两大强权主宰：斯巴达与雅典。斯巴达自前古典时期以来，一直都是领导希腊的陆权国家，而雅典则是在特密斯托克里斯（Themistocles）[10]（约五二九至四五九年）领导下，在第二次波斯战争中领导海军击败波斯，崛起为最强的海权国家。这造成古典时期以希腊大陆及爱琴海盆地为地缘政治主轴、分率伯罗奔尼撒联盟及提洛联盟的两个集团，分庭抗礼。斯巴达与雅典这两个国家不仅是政治军事强权，它们也同时具现两种希腊城邦社区的愿景——“优良秩序”[11]以及“相同法律权力”，[12]或是强调稳定社会结构以及强调个人权利和发挥。前古典时期的诗人阿奇罗赫斯（Archilochus of Thasos，约七世纪上半叶）曾经说过一句谚语“狐狸知道许多，而刺猬只知道一件”，似乎可用来形容雅典及斯巴达社会的不同性质以及所各具有的意识形态魅力，因为斯巴达社会似乎是为了完美社会的单一愿景而设计，将所有精力投注其中，因此所有斯巴达公民被训练、调教以及要求朝向共同目标前进，有如刺猬在与狐狸冲突时，所有的方法只是蜷住身体，将尖刺往外张开；雅典则是如狐狸般地多才多艺，可以想出许多方法来对付刺猬，能够提供一个自由的论述空间，鼓励公民种种创造行为，结果成就希腊文明的许多成就。至于在古希腊这场刺猬和狐狸的冲突是谁获胜？刺猬。

因为雅典在波斯战后急速地扩张，引起斯巴达盟邦的恐惧，最后爆发了希腊人的“内战”，亦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四三一至四○四年）。雅典在进行战争时，因为制定一连串错误的决策，以及斯巴达得到波斯军援，最后落败。雅典所留下的海上“帝国”却让斯巴达陷入进退维谷的情状。因为在四七九年波斯战争结束时，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曾经要求斯巴达出面领导他们对抗波斯，来保全自由，但被婉拒。雅典自告奋勇，

最后成就霸业。所以这次斯巴达决定要接受领导全希腊人的角色，但最后它不仅无能胜任，甚至落入衰败的田地。何以如此？波里比阿在提及罗马成功的崛起时，于第六书将其归功于特殊的混合政体，也在同处经常提及类似的斯巴达莱克格斯（Lycurgus）系统。相同的理由或许也可以用来解释斯巴达帝国的崛起及衰败。

二 斯巴达政体

斯巴达在八世纪末及七世纪上半叶曾经对邻国美塞尼亚（Messenia）发动过两次战争，占领大片土地，降服大量人员，一跃而为希腊世界最大最强的国家，但在政治上却陷入空前的混乱及失序，所以所谓的“莱克格斯改革”应该发生在七世纪下半叶。莱克格斯改革的内容出现在一件叫“宣言”（Rhetra）的文件中，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人数相对极少的斯巴达人能控制广大领土及人民。这改革将所有人分为斯巴达公民（Spartiates）、边居民（Perioikoi，没有参政权的二等公民）以及农奴（helots），并将征服的土地分割为均等的份量，[13] 分配给斯巴达公民，并由依附在土地上的农奴来耕种，免除公民在经济上的负担，可以全心从事公民职责：政治及军事。所有公民从小便都需经过agoge的教育系统，强调体力训练以及服从命令，以备成为希腊世界最早的全职军人；成年后他们过着集体的军营生活，强调同侪竞争。[14] 整个系统的目的是要保证斯巴达持续拥有所征服的土地及人员。所有斯巴达公民由两位分属不同王朝的国王（basileus）率领，并由包括国王在内的元老院（gerousia）提供建议咨询。这便是莱克格斯系统所强调的士兵人民、贵族元老以及国王彼此之间的制衡以及因之所形成的“混和政体”，[15] 这一点波里比阿着墨甚多。正如罗马的政体一样，元老机构其实扮演最关键的角色。这三种成分被认为彼此制衡，促成斯巴达高度稳定及保守的政治局势，成就所谓的“优良秩序”。后来虽然出现五名权势极大的监政官（ephors），[16] 但被认为并非莱克格斯原先“宣言”的一部分，也是三世纪克里奥米尼斯三世认为要恢复莱克格斯系统时，亟欲除去的对象。

斯巴达为了保有“优良秩序”，因此固定驱逐外国访客，以免外来思想的污染；它甚至禁止钱币的使用，以免造成经济上的过度变化，使财

富不均，而造成公民之间有不平等的现象出现。[17] 对莱克格斯而言，不平等是所有邪恶的来源，所以这整个系统规定所有斯巴达公民要过相同的生活，执行相同的志业；这系统强调集体性以及稳定性，所以古代政治评论家赞美莱克格斯系统为斯巴达带来了“优良秩序”。

所以美塞尼亚的土地及人民为斯巴达公民进行其独特生活方式提供经济基础，而这种由莱克格斯系统所创造出的独特生活方式及所造就出来的无敌军队，却是用来保有美塞尼亚。这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也意味着无敌的斯巴达军队是用来对内镇压的警察部队，而非用来对外扩张；即使它所领导的联盟也非其扩张之臂膀，而是另一环的保障，所以斯巴达最重要的盟邦——科林斯——时常批评斯巴达缺乏主动以及怯战。[18] 另外，这由莱克格斯为斯巴达所设立的系统所创造出的是一种极为静态的政治秩序，无法在面对世变时进行自我调整，特别是在公民人数变少（oliganthropia）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因为斯巴达没有体制来面对战胜以及出国领导希腊城邦后，财富流入以及分配不均的问题，造成公民因为经济资格不符，无法维持其独特生活，而丧失公民权的窘境。所以当斯巴达正规军队在三七一年于留克特拉（Leuctra）被底比斯以“神圣兵团”（Hieroi lochoi，“Sacred Band”）带头的军队打败时，才发现全国具有公民资格的人仅余七百人。亚里士多德在评论斯巴达的衰落时，便提及全国有五分之二的土地是掌握在女人手中。[19] 即使斯巴达人理解问题所在，却也因为保守个性，未曾设法解决，直到二四○年代时才有艾吉士四世（Agis IV，二四五至二四一年在位）以及更重要的克里奥米尼斯三世（二三五至二二二年在位）着手解决。但即便如此克里奥米尼斯三世还是以恢复莱克格斯系统为名，进行改革，而其目的是为了要恢复斯巴达的军力。

三 斯巴达的没落及底比斯的霸权

所以当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击败雅典，接受领导希腊人的责任时，斯巴达在政治传统上是无法胜任的。它只能诉诸安插驻军，扶植傀儡政权，进行高压统治。这造成怨声四起，愤恨难平。最恶名昭彰的是雅典的“三十僭主”（Thirty Tyrants）政权。斯巴达的官员在海外以蛮横及贪污著称，而这些战胜之后所流入国内的巨大财富，更使莱克格斯系统所预设的平等的经济基础、教育训练及军事生涯，都倍受挑战。所以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四○○至三六○年在位）二世的妹妹菊妮丝卡（Cynisca）花费巨资，在奥林匹亚四马马车竞赛中两次夺冠，这以前常是希腊僭主才会有的殊荣；但相反地，因贫富不均所造成的叛变，如基拿东（Kinadon）阴谋，最后是靠斯巴达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才镇压住。

“优良秩序”的斯巴达已经变成一个政治压力锅，逐渐沸腾。在国际上，斯巴达的高压政策迫使雅典、科林斯、阿哥斯以及底比斯联手发动“科林斯战争”（三九五至三八七年）。斯巴达勉强战胜。之后斯巴达决定以牺牲小亚细亚希腊人的自由为代价，援引波斯作为保证人，在三八六年强加在希腊世界身上“共同和平”[20] 条约，来维持斯巴达霸权的地位。但阿格西劳斯所领导的斯巴达甚至无法遵守自己所立下的规定：他在三八二年以诈术占领底比斯，引起希腊公愤，所以雅典立即宣布恢复第二雅典海军联盟（Second Athenian League），与其他城邦积极协助底比斯人复国，最后在三七八年成功。

从这时刻起，底比斯在战略大师艾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以及创造同性恋“神圣兵团”的沛洛皮达斯（Pelopidas）领导下，进行全面改革，一举在三七一年于留克特拉击败斯巴达，粉碎斯巴达不败的神

话，进而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解放美塞尼亚，结束长达三世纪之久的奴隶状态，并且在政治上整合斯巴达北方的阿卡狄亚（Arcadia）人，建立迈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21] 将斯巴达困在半岛南端，而伯罗奔尼撒联盟也随之瓦解，斯巴达遂沦为希腊的二流国家。战败的斯巴达充满愤怒怨怼，无心忏悔，但也无计可施，被边缘化，逐渐成为主要佣兵输出国，而其南端台那伦（Taenarum）海岬成为最著名的佣兵招募中心。打败入侵迦太基雷古鲁斯（Regulus）的佣兵队长赞提帕斯（Xanthippus）便是斯巴达人；[22] 当克里奥米尼斯三世流亡埃及时，对埃及雇用的佣兵极具影响力，但反而也引起其埃及主人极大的戒心。[23]

恢复海军联盟的雅典已经无复五世纪黄金时期的实力，而将重点集中在保护来自黑海谷物供应的航线以及在色雷斯海岸的利益上。对其北邻底比斯的迅速崛起，雅典大为不安，这迫使它与斯巴达重新建立关系。而在艾帕米农达斯主政下的底比斯雄心万丈，将势力延伸至伯罗奔尼撒外，更往北到色萨利（Thessaly）平原，甚至往马其顿延伸；菲利普二世可能因此一度在底比斯担任人质。但是底比斯的成就几乎是艾帕米农达斯一人之功，而且纯粹建立在军事武力的强大上，毫无斯巴达或雅典所具有的意识形态魅力。所以当三六二年艾帕米农达斯战殁于曼提尼亚（Mantinea）时，底比斯顿失方向感，甚至因为要控制附近的弗西斯（Phocis）人，而卷入护卫阿波罗特尔斐神殿的“神圣战争”（Sacred War）之中。弗西斯人因为被指控邪恶，蒙受严厉处罚，所以干脆借用特尔斐神殿数百年来累积的财富，雇用一支完全由佣兵组成的军队，击败底比斯；这是佣兵在希腊世界第一次的大规模使用，在希腊化时代则更屡见不鲜。整个希腊陷入束手无策的状况，转而求助一个到目前为止相当边缘的国家：菲利普二世所领导的马其顿王国。

四 佣兵问题

在进入马其顿王国之前，略对佣兵先做些极为简单的观察，因为这是罗马的对手最常使用的武力。希腊城邦是个民兵制（militia）的国家，公民不仅是国家的主人，也是执干戈护卫家园的执行者；斯巴达亦然，只不过特殊的莱克格斯系统使其公民可以全心投入军事训练。希腊是个资源不丰的国家，自古以来男人常以佣兵为业，在海外服役。早在七世纪时，埃及便有希腊佣兵的身影。六世纪希腊僭主经常雇用佣兵作为贴身侍卫以及镇压部队。在四八○年时，阿卡狄亚是佣兵最重要的来源之一，甚至有些人为第二次波斯战争入侵的波斯大王效命；五世纪末，则转而效劳小亚细亚的波斯总督。希腊佣兵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他们所构成的重装方阵兵团（hoplite phalanx）是当时最精锐、几乎无法抵挡的部队，能对战局扭转乾坤，特别是在没有使用类似战术的地区。后来五世纪末，色雷斯佣兵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四三一至四○四）中也开始崛起，但是以轻装及机动为主，称为peltasts。最知名佣兵事件是波斯王子小居流士（Cyrus the Younger）在四○一年为争夺波斯王位，透过斯巴达招募万名佣兵（Ten Thousand），前去巴比伦争夺王位。在小居流士被杀后，这一万名佣兵自行组织，在波斯流窜，如入无人之境，直到黑海南岸后逐渐解散。这一万名佣兵的领导人色诺芬多年后将整件事纪录在他的《长征记》（Anabasis）。之后这些佣兵并未完全解甲归田，有很大比例继续从事这行业，例如色诺芬本人甚至在科林斯战争中为斯巴达效劳，与自己祖国作战，并因此而遭受流放。

在四世纪希腊佣兵似乎充斥在地中海各处，所以出现一些知名的佣兵队长，如雅典的伊费克拉底司（Iphicrates）、凯瑞司（Chares）或凯瑞德谟斯（Charidemus）。但是佣兵的涌现，也时常意味着古典城邦民兵制以及城邦体制的衰落，而这正是四世纪时的普遍现象。佣兵从此逐

渐成为战场上常见的成分：波斯在四世纪用他们来取镇压埃及的叛变；中希腊的弗西斯人擅用特尔斐神殿的财富，雇用数量极大的佣兵，击败四世纪中最强的希腊国家底比斯，迫使希腊人要求马其顿南下，发动护卫阿波罗神殿的“神圣战争”，让菲利普二世名正言顺地扩张势力。但菲利普自己刚即位，重整马其顿武力前，亦是利用佣兵，也曾被弗西斯人的佣兵击败。亚历山大东征时，所面临最难以对付的波斯军队亦是由希腊佣兵组成，所以这些人一旦落败，常遭受最严厉的处分。希腊化时代，佣兵无役不与。

迦太基传统皆以佣兵为武力，但由国内传统武将家族来统领（如汉尼拔所属的巴卡家族，Barcids），是当时地中海世界最重要的雇用者。但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因为迦太基无法履行原先承诺的奖赏，佣兵发动叛乱（二四一至二三七），对迦太基造成极大伤害。斯巴达国王在被围堵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方时，常常以国王为首，带领国民以佣兵为业，在海外服务。如之前所提，斯巴达南端的台那伦海岬即是佣兵雇用及交易的据点，所以波里比阿提及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三世流亡在埃及时，因其身份，可以轻易在埃及镇压当地的佣兵兵变，但反而引起埃及当权者的警惕。[24] 佣兵最恶名昭彰的不外是所谓的坎帕尼亚“战神之子”（Mamaertines），因为他们的问题造成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爆发。所以佣兵固然方便，但经济代价极大，政治代价更难以预估。相形之下，罗马军团一向依赖自己以及意大利盟邦和外国友好部队的协助，较不需担心这些风险。

贰 古典时期之马其顿王国

马其顿王国位居希腊大陆北端，与希腊的历史关系有些复杂。希腊城邦是小规模的自主社区，但马其顿王国却是由数个以地方诸侯为首之地区（cantons）构成。以阿克希亚斯河（Axius）所灌溉、特迈克（Thermaic）海湾周围平原为根据地的马其顿国王在这些诸侯中是“同侪中的第一人”（primus inter pares），必须要以军事武力及威望来建立自己的地位，所以传统的马其顿国王通常都会领军亲赴战场。古代的马其顿历史是一段领土扩张的历史，不只要面对来自西、北、东三方蛮族的入侵，还要镇压桀骜不驯的豪强贵族；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马其顿从前古典时期起，在地理及政治上都处于边缘的地带。但是它的存在却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确保更南方的希腊城邦不受蛮族侵扰，可以安全发展，创造了所谓的“希腊奇迹”。但希腊人不一定是很知道感恩的民族，他们始终视马其顿人为半野蛮人。

依据希罗多德对希腊人所做之定义的判准，马其顿人应该算是希腊人：根据碑铭以及马其顿人的命名，古代的马其顿语确实是希腊语的西北系方言；在神话上，马其顿人崇拜宙斯及阿耳忒弥斯（Artemis）等典型的希腊神明，但他们也崇拜如班迪斯（Bendis）或恩诺狄亚（Enodia）等当地及色雷斯信仰的神明，而这些后来也被一般希腊人所接受；[25] 更重要的是马其顿人认为自己祖先系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名城阿哥斯，透过这层关系，马其顿很早就受邀参加泛希腊的庆典竞赛，如奥林匹亚的宙斯神祭典，而成为希腊文明社会的成员；他们也征询泛希腊神殿特尔斐的神谕。但像雅典人这种视马其顿人为半野蛮人的意见，在四世纪更因为马其顿王国崛起所带来的政治冲突，而更形恶化。

一 菲利普二世

马其顿在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三八二至三三六年，三五九至三三六年在位）主政之下脱胎换骨。菲利普在年少时曾经到底比斯当人质，目睹艾帕米农达斯领导下的底比斯的全盛时期，特别是军事改革。后来其国王兄长过世，菲利普担任其幼子摄政，进而取代之。他首先着手军事改革，建立一支新的马其顿重装武兵，使用双手握持的加长型长矛（叫sarissa）及较轻便的小型圆盾，成为后来马其顿重装方阵兵团（hoplite phalanx）的标准配备；他强化骑兵武力，成为重要打击部队，后来在亚历山大的部队中成为最有效的打击武器；另外还有轻装部队或特殊功能的作战部队，让战斗团具有整合性及弹性，能应付不同的战局。其基本战术是铁钟及铁砧：以重装兵团为铁砧，来牵制敌军，而骑兵为铁钟，以高度机动性的移位，由左右或后侧来进行打击。这种战术构想不像有如一块铁板、相当缺乏弹性以及只与敌人进行正面推挤的传统希腊重装方阵兵团战术。

但是菲利普更是战略专家，他结合武力及外交，[26] 往北、西与东扩张，特别是东边的色雷斯及其关键城市安菲波里斯（Amphipolis）。这引起雅典不满，因为雅典一直认为安菲波里斯及周围地带为其势力范围以及利益所在。三五二年时，他获邀协助特尔斐神殿，发动“神圣战争”，并得到色萨利（Thessaly）人支持，成为他们的领导，[27] 一起对付邪恶神殿、滥用宝藏、雇用佣兵的弗西斯人，并打败他们（三五二年），于是拥有往希腊南方扩张的窗口。

但是他仍致力于巩固马其顿，所以在三四八年并吞马其顿旁边最强的奥林特斯（Olynthus）城邦及整个卡尔希迪司（Chalcidice）半岛，这又再度引起雅典的不满。但是当时雅典国内分裂为鹰派及鸽派，彼此拉

锯，应对危机进退失据。鹰派代表人物是雅典最伟大的演说家德谟斯特尼斯（Demosthenes）；他仍然怀抱四世纪雅典仍是希腊世界超级强权的幻想，无视马其顿崛起的事实；鸽派则是攸布勒斯（Eubulus）及埃斯基涅斯（Aeschines），认为雅典不可回避马其顿的崛起，必须与其协商出共同利益。菲利普在三四六年完成“神圣战争”的使命，成为神明之拯救者及最能影响特尔斐神殿的人物，逐渐改变希腊人对马其顿的看法，所以雅典鸽派成功地与马其顿签订和约。[28]

但马其顿控制“温泉关”（Thermopylae），可随时出入中希腊，让底比斯及雅典倍感威胁，最后反马其顿的鹰派德谟斯特尼斯胜出，并与底比斯联手力阻菲利普扩张，并导致三三八年菲利普南下与雅典及底比斯联军在凯洛尼亚（Chaeronea）的决战，结果马其顿大胜。这场战争的失败常被认为是决定希腊城邦从此丧失自由自主的主因。菲利普严惩底比斯，但宽容对待雅典；他建立科林斯联盟，成为联盟的将军；他以报复在第二次波斯战争中，波斯亵渎希腊神明为名，准备进攻波斯。三三六年，他指派前锋一万人在达达尼尔海峡待命，但在庆祝典礼时被人暗杀。他后来埋葬之处——古都佩拉（Pella，今日Verginia）陵墓——的发现，是公元二十世纪考古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马其顿王位顺利由其十八岁的儿子亚历山大接任，继续完成其东征波斯的遗志。菲利普是位极有政治智慧聪明及在战场上勇敢的君王，能屈能伸，通权达变。若非菲利普二世励精图治，转化马其顿为强大富有的国家，而且能以希腊作为后盾，亚历山大东征或是无法如愿，或至少是会被严重耽搁，甚至无法有相同的成就。

二 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 The Great，三五六至三二三年，三三六至三二三年在位）身为王位继承人，很早就率领菲利普军队中最精英的骑兵部队。他在三三八年的凯洛尼亚战役中，扮演攻击角色，初试啼声，并且受命送回雅典战士的骨骸。后来他与菲利普争执，与一些朋友被放逐（三三七年）。菲利普遭暗杀时，他回来继承王位；他是否涉及暗杀不得而知，但即位后开始整肃可能的竞争者，迅速镇压底比斯的叛变，摧毁全城，贩卖人民为奴，杀鸡儆猴。他巩固希腊之后，继承父亲遗志，开始入侵波斯帝国。在三年内他连续在三场主要战役［三三四年的小亚细亚格蓝尼克斯（Granicus）河战役、三三三年的叙利亚伊色斯（Issus）战役以及三三一年美索布达米亚高嘎袂拉（Gaugamela）战役］打败波斯帝国末代大王大流士（Darius）三世，成为波斯帝国的新主人。

在完成伊色斯战役后，亚历山大前往埃及，建立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造访西洼（Siwa）绿洲的宙斯·阿蒙（Zeus Ammon）神殿，被以神之子之名欢迎。虽然在打败大流士后，他已经是波斯帝国实际的统治者，但是他仍然持续远征。他模仿荷马史诗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29]，在作战时永远身先士卒，而史学传统也常将他描述为荷马史诗中的单打独斗的英雄。希腊化时代历史作家，还认为他有股称做pothos（aspiration，“企望”）的冲动，想去探索不可知的世界；史学传统时常提及他要超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Heracles）以及酒神锹俄尼索斯（Dionysus），到达比他们所到过更远的地方，特别是印度。有关亚历山大的雕像或钱币常将他这种追求超越的pothos呈现为稍微抬头朝上看，眺望远处，双唇稍微张开的图像。但这种pothos的冲动，也常被认为是种自大狂的表现。

亚历山大远征到印度时（三二七年），他的军队兵变，拒绝继续往前到遥远的恒河流域。亚历山大因此决定海陆并进回到巴比伦。普鲁塔克及一些传统认为这次故意绕行远路班师回朝是场大灾难，损失惨重，是他自大狂的结果。这可能是误解。回到巴比伦，他开始以波斯帝国的典章制度来统治这多元民族文化的庞大领域，并推动一些波斯的朝廷礼仪，如朝觐时的跪拜礼（proskynesis）和下令马其顿人与波斯妇女集体结婚，甚至训练波斯子弟使用马其顿装配以及战术，同时遣散马其顿老兵。这些引起马其顿人的不安及不满，因为马其顿传统认为国王不过是贵族"同侪中的第一人"，而非高高在上的波斯大王；这再加上之前的摩擦或甚至阴谋，使得一些人因此丧命。这使学者巴迪恩（E.Badian）认为亚历山大的统治类似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但这太言过其实。另外，亚历山大常被认为是文明的推动者，将古典希腊文明散播在广大的东方，使这些地方"希腊化"，特别是以他建立许多命名为亚历山大的城市为代表。所以唐恩（W.W.Tarn）认为他不仅将文明带到这些野蛮地方，还强调四海一家、人类皆兄弟的世界理想。这同样也是太过理想化，不符史实，例如这些称做亚历山大的城市当初多是以边防要塞或是战略据点而建立的，而非希腊文化前哨站，而且被迫移居该地的希腊人，在亚历山大过世后，不惜叛变，亟欲返回希腊世界。如果有任何"希腊化"，那或许更应该归诸叙利亚塞琉西王朝以及埃及托勒密王朝历代君王的努力。

亚历山大生前有多次婚姻，特别重要的是他与一位中亚公主罗克珊（Roxane）的婚姻。他生前强迫马其顿将领婚娶波斯贵族仕女为妻，但除少数之外，[30] 其他在亚历山大过世后，立即被遣走。他在三二三年六月十日死于不明的热病，只留下一位遗腹子亚历山大四世，他获得骑兵的支持；但步兵另推一位菲利普二世的失能儿子菲利普三世[31] 来作为共同的名义统治者，但实权由摄政来操纵。接下来的历史变成保存帝国完整的统一论者（unitarans）和坚持分裂的分离主义者（separatists）之间的斗争，称为"继承者的时代"。[32] 要历经几乎半世纪才逐渐稳

定，形成以三大王国为首的希腊化时代。

参 “继承者的时代”：希腊化三大王国的建立

“继承者的时代”（三二三至二七二年）十分混乱，充满戏剧性发展及比真实人生还要夸大的人事物。亚历山大在三二三年过世后，首先由统一论者采取主动。波帝卡斯（Peridccas）担任类似宰相的角色，[33]声称握有亚历山大的印鉴，并控制两位名义上的继承人，自封摄政。他的副手卡迪亚之欧迈尼斯（Eumenes of Cardia）于小亚细亚内陆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取得胜利后，波帝卡斯出兵埃及，但发生兵变，被托勒密一世（三○五至二八三年在位）杀死；之前，送回马其顿安葬的亚历山大遗骸也被托勒密劫持到埃及亚历山大安葬。波帝卡斯之死促成亚历山大将领于三二一年在北叙利亚举行会议，决定由欧洲将军安提帕特（Antipater）将婴儿及失能人这两位名义元首带回马其顿，成为新的摄政，而安提帕特也利用他多位女儿及孙女来与最重要的“继承者”结亲，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的统一者。[34]

但安提帕特在三一九年过世，亚洲将军“独眼”安提柯一世（Antigonus I Monophthalmus，三○六至三○一在位）与儿子“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 I Poliorcetes）（三○六至二八三年在位）成为统一论的代表人物。他们历经一些激战之后，成为小亚细亚到伊朗这广阔土地的主人，并将未来叙利亚王国的建立者塞琉西一世（Seleucus I，三○五至二八一年）驱逐到埃及。安提柯父子在三○六年于塞浦路斯（Cyprus）击败托勒密，在“继承者”之中首先称王，将势力延伸到爱琴海盆地，怂恿希腊人反对马其顿，追求自由。他利用地缘政治的中心优势以及对庞大人力物力资源的掌控，显示大一统的野心。这种态势强迫其他“继承者”合作：马其顿的卡山德（Cassander，安提帕特之子）、色雷斯的莱西马克斯（Lysimachus，三○六至二八一年在位）、埃及托勒密一世以及从东方印度带回五百头战象的塞琉西一起联手，在三○一年

于小亚细亚伊普色斯（Ipsus）击败安提柯父子。安提柯本人阵亡，德米特里逃到他的舰队，在二九七年卡山德过世后，入主马其顿。战后参加者分配战利品，大部分小亚细亚归莱西马克斯，而塞琉西分到叙利亚、美索布达米亚以及伊朗，但是没依约参战的托勒密却在战争期间偷偷占据“空叙利亚”（Coele Syria）（即巴勒斯坦及腓尼基）。当时塞琉西感念当时托勒密收留之恩，所以暂时不予计较，但这地方却成为希腊化时代埃及及叙利亚两王国发生六次叙利亚战争（Syrian Wars）的主因，徒劳无功地耗费双方的人力物力资源。

所以在三○一年时，希腊化世界共有马其顿、色雷斯、叙利亚及埃及四个王国存在。但后来入主马其顿的“攻城者”德米特里是个想模仿亚历山大却不及其才气十一的人，想统一帝国，结果一出兵，立即遭遇其他继承者的杯葛：莱西马克斯及皮洛士立即瓜分马其顿，“攻城者”自己的部众逐渐散去，最后在小亚细亚被塞琉西所擒。[35] 他留下一位有耐心且能干的儿子安提柯二世（Antigonus II），为他留守希腊仅余的几个据点，但经过十年的惨淡经营后，终于反败为胜，掌控马其顿。这稍后会交代。

莱西马克斯在占领马其顿后，立即成为舞台上的大人物，因为他逐走皮洛士，控制马其顿，加上色雷斯及小亚细亚，势力极为庞大。但他一直被认为与托勒密一样，仅有偏安的想法；但无论他是否有统一的野心，他自己的家庭悲剧却先发生。在四强并立时，埃及惮于塞琉西对其不利，所以与莱西马克斯结盟，并将两次婚姻的两个女儿婚嫁给国王及王储；莱珊德拉（Lyssandra）嫁给王储，而阿尔西诺伊（Arsinoe）二世则嫁给国王莱西马克斯；之前莱西马克斯自己的女儿阿尔西诺伊一世已经婚嫁给埃及王储托勒密二世。托勒密二世的同父异母兄长“雷霆”托勒密（Ptolemy Keraunos）因为被剥夺继承埃及王位的机会，所以也与莱珊德拉一起前往色雷斯发展。但是阿尔西诺伊二世为莱西马克斯生下儿子，设计使莱西马克斯杀死自己的王储，而这迫使莱珊德拉及“雷

霆”逃往塞琉西，寻求庇护。莱西马克斯杀死王储一事，在国内引起极大不满，而“雷霆”又积极鼓吹塞琉西兴兵征讨。结果双方在二八一年于柯罗派迪温（Corupedium）发生大战，莱西马克斯战死。塞琉西现在控制除了埃及之外的亚历山大帝国。实现统一的梦想从未如此可能。

当塞琉西前往色雷斯王都莱西马奇亚（Lysimacheia）时，“雷霆”托勒密出城欢迎，但在致意时，突然刺死塞琉西，逃向莱西马奇亚，声称他已经为他们原来死去的国王复仇。之后继续急驰马其顿，成为新的国王。莱西马克斯的遗孀阿尔西诺伊二世，顿失依靠，据说投奔到自己的同父异母兄“雷霆”那里，并与之结婚。但是“雷霆”身为马其顿国王，有戍守边界、阻挡蛮族的责任。二七九年高卢人入侵，“雷霆”轻忽应战，一战败死，高卢人长驱直入，直到特尔斐神殿附近才被伊托利亚联邦（Aetolian League）与其他希腊人联手打败。阿尔西诺伊二世旋即回到埃及，与当时已经即位、自己的亲生兄长托勒密二世结婚。至于被暗杀的塞琉西一世的儿子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I）从东方赶来，终其余生来收拾那一刺之后所留下的残局。塞琉西的尸首则由当时看守帕加马的一位阉人费乐泰勒斯（Philetairus）重金赎回，予以安葬。安条克一世感激他。这城市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帕加马王国（Kingdom of Pergamum）。

陷入空前混乱的马其顿终于给耐心等待的安提柯二世一个入主的机会。他在二七七年于莱西马奇亚击败入侵的高卢人，名声大振，所以入主马其顿时，十分顺利。虽然二七五年从意大利冒险回国的皮洛士，立即将安提柯二世逐离马其顿，但皮洛士是另一位“攻城者”，不安一室，旋即到伯罗奔尼撒半岛进行战争，而安提柯尾随在后。在二七二年时，皮洛士在阿哥斯巷战时，被一位老妇从屋顶投下一块屋瓦击昏，旋即被安提柯的人马割下头颅。安提柯因为声称击败了这位当代最杰出的希腊将领，更添增威望，更没人敢挑战他对马其顿王位的主张。马其顿人民在经过亚历山大东征起所造成的人口流失以及贫穷战乱的浩劫后，终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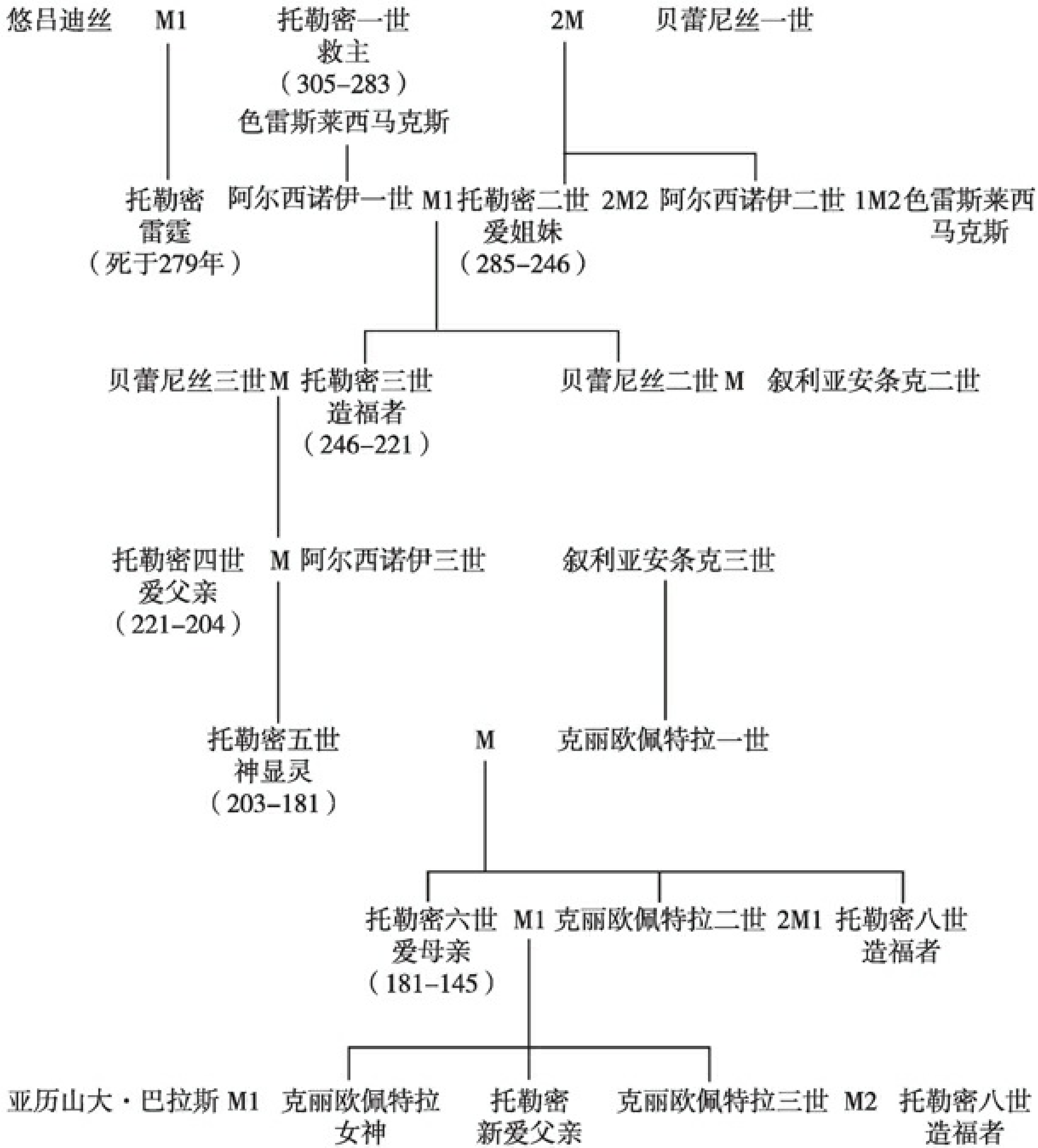
有幸地找到一位稳重用心的君王，愿意让人民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希腊化世界的托勒密王朝的埃及王国（Ptolemaic Egypt）、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王国（Seleucid Syria）以及安提柯王朝的马其顿王国（Antigonid Macedon），三国鼎立局面终于确定。

一 埃及王国

托勒密埃及是最早稳定下来的王国，资源十分丰富，而托勒密王朝前三位君王都相当干练，所以在希腊化时代前一百年（三二三至二二一年）左右整个东地中海的发展。托勒密王朝这种分离主义的决心显现在他们的国防投资上。“空叙利亚”控制西亚进入埃及的管道，一旦突破，埃及除了尼罗河及沙漠外，便无险可守，所以自埃及新王国时期（New Kingdom，约一五五○至约一五○九年），法老王一直将防线推进到腓尼基北方，所以托勒密王朝在此是依循古埃及的传统。但这种将防线推到叙利亚王国的核心——“四都城”（Tetrapolis）[36]——当然让叙利亚王国难以忍受。另一方面，在西侧则是昔兰尼（Cyrene，今日利比亚），一直是埃及属地，由王室人员掌管，虽与迦太基势力范围接壤，但迦太基的利益是在北方以及西方，双方大致相安无事。至于大海则为托勒密埃及提供更大的保护，并由其强大舰队来保证。最初的三位托勒密君王将防线推进到塞浦路斯、小亚细亚西岸及南岸、克里特岛以及爱琴海列岛。这些前哨站都设有驻军，不仅提供防卫，更是他们探知希腊其他两个王国的政治触须，提供早期警报及政治风向，以及采取主动攻势的管道。所以透过资金协助、政治支持（如鼓吹希腊城邦的“自由”），甚至直接武装干预，他们促成克里孟尼迪斯战争（Chremonidean War，二六七至二六二年）以及克里奥米尼斯战争（Cleomenean War，二二九至二二二年）的发生，对马其顿造成极大的困扰。但这种投入并非要取得实质占领，而是要削弱对方，以强化自保，所以当雅典及斯巴达露出败相，托勒密的支持立即撤出。

所以虽然托勒密王朝在一些威望性质的计划（如图书馆、博物馆、盛大游行及豪华宫廷生活）上耗费甚多，但在维持驻军及舰队，支助叛乱以及发动战争方面，更是所费不赀，甚至在托勒密三世的末年让极为

富庶的埃及几乎破产。当波里比阿批评托勒密四世懒散愚蠢，纵欲享乐，无心国事，放弃其先祖所设计的层层防护网时，[37] 可能并不了解如此的军事投入已经超过埃及财政所能负担者。所以安条克三世在二一九至二一七年发动第四次叙利亚战争时，托勒密王朝必须求助于埃及土著，甘冒极大政治风险武装训练他们。果然埃及在这一战争中胜出后，本土的叛乱变得十分频繁。第一次便是在二○七年发生之上埃及分裂退出埃及王国；类似情形屡次出现。所谓的罗塞塔石碑（一九六年）便是记录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感谢孟斐斯（Memphis）埃及祭司协助平乱的。但二世纪起的托勒密王朝一向都是幼主即位，受到权臣操弄，甚至发生托勒密六世与托勒密八世兄弟阋墙，而被叙利亚王国入侵或是遭受罗马元老利用及勒索。[38]



悠吕迪丝 M1 托勒密一世
救主
（305–283）
色雷斯莱西马克斯
2M 贝蕾尼丝一世
托勒密
雷霆
（死于279年）
阿尔西诺伊一世 M1托勒密二世
爱姐妹
（285–246）
2M2 阿尔西诺伊二世 1M2色雷斯莱西马克斯
贝蕾尼丝三世M 托勒密三世
造福者
（246–221）
贝蕾尼丝二世M 叙利亚安条克二世
托勒密四世
爱父亲
（221–204）
M 阿尔西诺伊三世
叙利亚安条克三世
托勒密五世
神显灵
（203–181）
M 克丽欧佩特拉一世
托勒密六世
爱母亲
（181–145）
M1 克丽欧佩特拉二世 2M1 托勒密八世
造福者
亚历山大・巴拉斯 M1 克丽欧佩特拉
女神
托勒密
新爱父亲
克丽欧佩特拉三世 M2 托勒密八世
造福者

埃及托勒密王朝[39]

二 叙利亚王国

当二七二年三大王国确立之后，叙利亚的安条克一世仍然还在收拾塞琉西一世在二八一年遭到“雷霆”托勒密刺杀之后所留下的残局。安条克首先要面对核心地带叙利亚的叛变，而托勒密二世（二八五至二四六年在位）趁机发动第一次叙利亚战争（二七四至二七一年），迫使当时在小亚细亚的安条克必须迅速横越分隔小亚细亚与叙利亚的陶鲁斯（Taurus）山脉，镇压叛变，打败埃及，然后立即又回到小亚细亚对付四处施虐的加拉太人（Galatians）[40] 并在一场名之为“大象之战”的战役将其击败，赢得“救主”（Soter）名号。但是托勒密二世随即扶植其妻子阿尔西诺伊二世与色雷斯莱西马克斯所生之子，在小亚细亚兴风作乱。安条克除了疲于奔命外，也使出类似计谋，鼓动托勒密二世之弟马斯（Magas）在埃及属地昔兰尼宣布独立。所有这些除徒增对方困扰之外，浪费资源，并无其他正面结果。

在安条克二世（二六一至二四六年在位）时期，叙利亚与马其顿联手开始反击，发动战场不在叙利亚的第二次叙利亚战争（二六○至二五三年）。托勒密埃及海军失利，丧失小亚细亚一些领土，但在希腊则成功颠覆马其顿的控制；后来埃及与叙利亚谈和，安条克二世罢黜皇后雷奥迪凯（Laodice），与托勒密二世女儿贝蕾妮丝二世“叙拉”（Berenice II Syra）结婚；当“叙拉”怀孕生子后，安条克二世与托勒密二世已陆续过世，塞琉西二世虽然已经可以接位，但却必须与“叙拉”所生之子争夺名分。此时托勒密三世（二四六至二二一年在位）出兵征讨叙利亚王国，保护其妹的权益。这便是第三次叙利亚战争（二四六至二四一年）。[41] 虽然“叙拉”及幼子旋即被暗杀，但托勒密三世隐藏消息，仍以王位继承人保护者自居，长驱直入叙利亚及美索布达米亚，望风披靡，叙利亚王国的存亡似乎在风雨飘渺之间。但后来母子已死消息走

漏，塞琉西二世也从小亚细亚回到叙利亚，获得民众支持，所以托勒密三世匆匆撤军，只占领王都安提阿的外港，其余回复到战前状况。

这其中的故事细节甚为复杂，而且经常不易厘清，但应该让人可以感觉到希腊化王国之间的冲突常毫无意义，只是彼此互耗对方，来提升君王自己空洞的尊荣。这种悬而未决的结果究竟是能力不足还是意志不坚，甚难回答，因为这其中端赖所涉及之君王的能力及意志，还有国家所能动员的人力及资源。但这却给我们一个重要的观察：所谓希腊化三大王国的均势或制衡，似乎是没有一方足够强大到并吞另一方，或是能够独力打败其他两个国家，所以这种均势其实是一种力有未逮的“弱势均势”（balance of weakness），但却又常为了君王的荣耀，徒然发动战争，结果民穷财尽。至少就埃及而言，似乎发动这些叙利亚战争以及其他阵线的外交及军事投资后，在托勒密三世后，国力已经耗竭，所以之后的第四到第六次的叙利亚战争，皆由叙利亚王国启动。因为波里比阿的历史会触及这三场由叙利亚发动的战争，所以在以下仅大致带过。

另一个观察是叙利亚王国的巅峰似乎在建国者塞琉西一世即已达到。在生前他已经放弃印度的领土，来换取五百头战象。而自从他在二八一年被刺杀后，叙利亚王国的历史是一波波由埃及或其他人——如中亚的希腊王国、帕提亚（Parthia）王国以及后来的罗马人——制造危机，而叙利亚王国只能处于被动回应的态势。而治理这如此庞大的王国原本便是极耗资源的事业，所以遭逢每次危机时，塞琉西王朝的君王便被迫放弃次要的领域，来保全较为核心的地带；如此不断重复的结果，便是见到叙利亚王国不断地缩小，最后仅余叙利亚一地。号称中兴的安条克三世之所以被称为“大帝”，是因为其“东征”复兴，但是这作为只是暂时停止这整个“危机出现—放弃次要地带—凝聚资源回应—克服危机”过程的重演。但当罗马在二世纪初出现在希腊东方，没有任何一位叙利亚君王可以阻挡这样的结构再度发生，即使中兴之主安条克三世亦无由为之。

安条克三世（二二三至一八七年在位）在二二三年十八岁登基其实是临危受命。他的兄长塞琉西三世（二二六至二二三年在位）在率军前往小亚细亚时，兵变被杀。幸亏其亲戚阿凯乌斯（Achaeus）平定叛变，在小亚细亚收复失土。安条克在叙利亚面临美索布达米亚及波斯行省的叛变，结果因听信佞臣，出师不利。最后亲征才平定叛变。他在任内发动第四次叙利亚战争（二一九年）入侵埃及，但被托勒密四世在拉非亚（Raphia）一地击败（二一七年）。之后叙利亚王国发生内战，原因是阿凯乌斯盘据小亚细亚为王；安条克在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一世（Attalus I）协助下捻平叛乱。随后他进行“东征”（Anabasis，二一二至二○六年），重新取回亚美尼亚（Armenia）以及帕提亚（Parthia）；但久攻巴克垂亚（Bactria）[42] 不下，承认其独立。这件事开启了希腊人在中亚及今日阿富汗及巴基斯坦一带建立一个希腊—巴克垂亚王国（Greco-Bactrian Kingdom）及稍后一群较小规模的印度—希腊王国（Indo-Greek Kingdoms）的传奇历史。安条克三世远达印度，回程时途经阿拉伯。他的东征成果常被夸大，但是却大大提升了叙利亚王国的地位，也为他赢得“大帝”的别号。

他最先引起罗马人的注意，可能源自他与菲利普五世在托勒密五世（二○四至一八○年在位）幼年即位时，有所谓瓜分埃及领土的密约。果不其然，他在二○二至一九五年发动第五次叙利亚战争，在帕尼翁打败埃及，夺回“空叙利亚”。随后他开始往小亚细亚及色雷斯进军，借口是这些远及马其顿的领土都是建国始祖塞琉西一世于二八一年打败莱西马克斯而据有的，所以这次进军不过是恢复其原本主权。当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于一九七年结束，罗马人已经将注意力转向这来自东方的威胁，所以决定以较宽容的方式对待战败的马其顿，并从希腊撤军，来拉拢希腊人，并以解放希腊城邦为借口，挑战安条克，要求他退出欧洲，允许亚洲的希腊城邦自由自主。

在希腊本土一直对罗马不满的伊托里亚联邦决定将安条克三世的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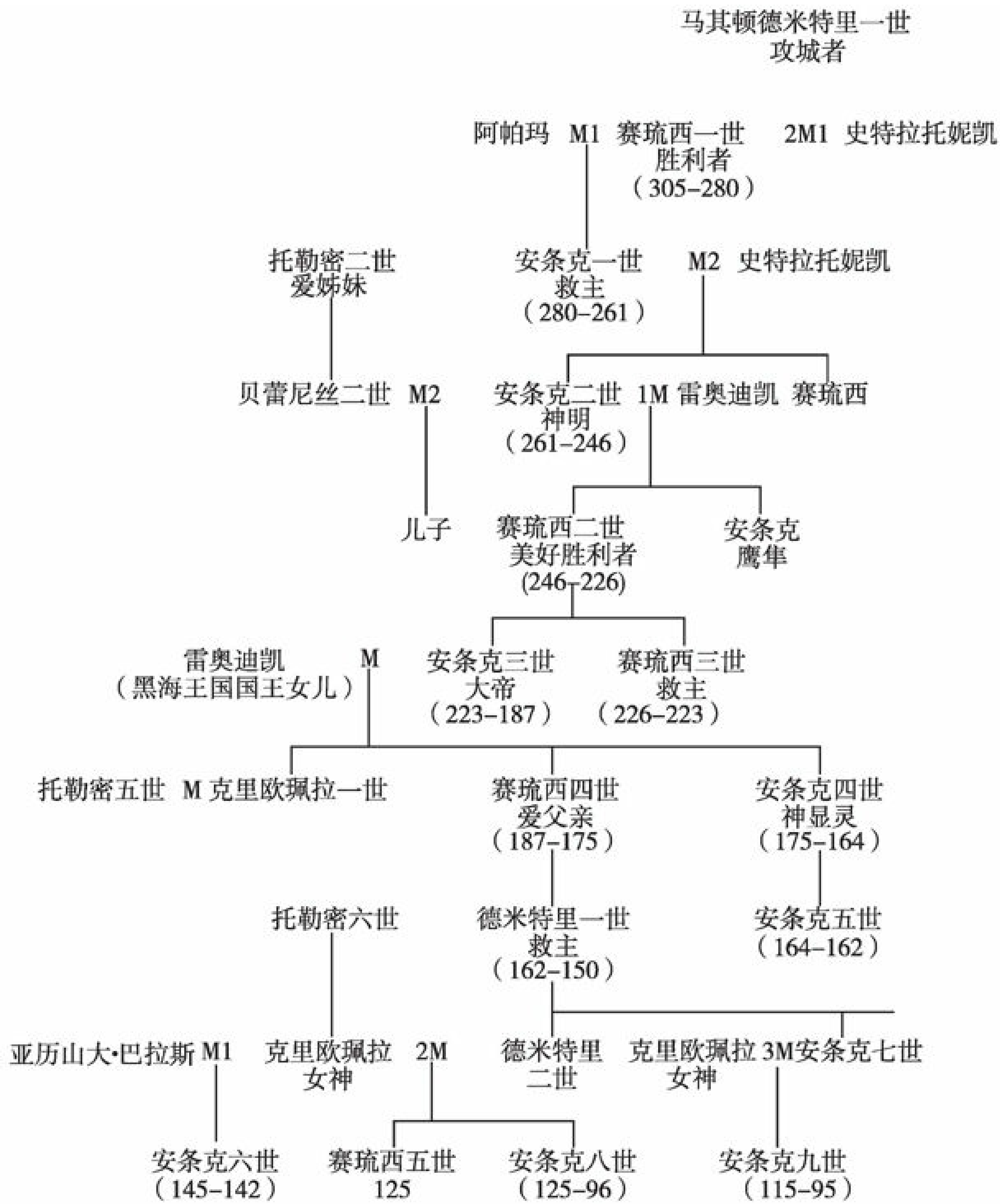
力引入希腊世界，但并没有太多希腊人响应，最后安条克于一九一年在温泉关被罗马人击败。罗马人决定要除去这希腊化世界仅存的威胁，所以在一九○年由“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兄弟领军，联合帕加马王国及罗德岛等盟邦，在小亚细亚麦格尼西亚（Magnesia ad Sipylum）一地击败安条克；在一八八年双方签订阿帕米亚[43]和约，将叙利亚王国的势力全面逐离陶鲁斯山脉以北的小亚细亚，由帕加马王国及罗德岛瓜分。[44]安条克为应付庞大的赔款，常以掠夺神庙经年累聚的财富为手段，最后在一八七年掠夺波斯一座神庙时被杀死。

安条克三世过世后，由其子塞琉西四世（一八七至一七五年在位）继位，其任内或是无所建树，或是资料过少，无由得知。他死后由在一九○年麦格尼西亚战败后，被送往罗马当人质，并于一七五年返国的弟弟安条克四世（一七五至一六四年在位）继位。这显然受到罗马的首肯，因为塞琉西四世有一子德米特里（一世）继续羁留在罗马，而这位德米特里正是波里比阿详细叙述在安条克五世（一六四至一六二年在位）幼年即位，政权不稳时，如何潜逃回叙利亚，谋取王位的人。[45]塞琉西四世及安条克四世两脉的后代，彼此争夺叙利亚王位，使得叙利亚王国更陷分裂。

安条克四世表面对罗马恭顺，但私底下重整武装，巩固联盟。在第六次叙利亚战争（一七○至一六八年）中，他入侵埃及三次，利用罗马忙于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一七一至一六八年）的机会，兼并埃及。合并起来的新王国，在资源上相当可观，而安条克的野心将对罗马带来极大的威胁。但就在兼并前，却传来马其顿已经在皮得纳（Pydna）战役中被击败，而罗马特使也适时抵达埃及边防重地培留希温（Peleusium）。罗马特使在国王周围以权杖画出圆圈，坚持他在没回答是否撤军前不得踏出；安条克慑于罗马势力，羞辱地撤军。这事件将在之后讨论中期罗马共和的帝国主义时，引用及论及。

但是他在历史上更重要的留名原因是他所谓的宗教政策：据说他想在国内施行“希腊化”的措施，禁止犹太人执行传统宗教礼仪，遭到保守犹太人的激烈反对，结果酿成叛变，甚至导致犹太人独立建国。犹太人开始与罗马人接触，寻求协助，而罗马人对任何可以削弱希腊化王国的事，皆乐观其成。这个由“执槌者”犹大·玛加伯（Judas Maccabaeus，the Hammer）在一六七年主导的叛变以及部分犹太人对“希腊化”的普遍敌意，在希伯来圣经相关诸书中有详细记载，也解释了安条克四世后来名声不佳的原因。

在他死后两年，波里比阿所描写的德米特里一世成功争得王位。德米特里支持一位僭夺者来推翻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国王，因为他拒绝与他结成姻亲。这件事显示出叙利亚王国已经沦为与其他二流国家相同的地位。卡帕多西亚国王于是与盟友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二世一起去支持叫亚历山大·巴拉斯（Alexander Balas）的僭夺者来争夺叙利亚王位。结果德米特里在一五○年战争中失利被杀，这使得叙利亚王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混乱之中。接下来的故事极为混乱。“危机出现—放弃次要地带—凝聚资源回应—克服危机”的形态不断重演外，之前所提之两支王系开始斗争，最后甚至沦为街头巷战、帮派群斗。经过一连串“无限切割”后，叙利亚王国消失在六○年代罗马将军庞培整顿东方、设省治理中，在历史上无声无息地消失。


马其顿德米特里一世
攻城者
阿帕玛
M1
赛琉西一世
胜利者
（305–280）
2M1
史特拉托妮凯
托勒密二世
爱姊妹
安条克一世
救主
（280–261）
M2
史特拉托妮凯
贝蕾尼丝二世
M2
安条克二世
神明
（261–246）
1M
雷奥迪凯
赛琉西
儿子
赛琉西二世
美好胜利者
(246–226)
安条克
鹰隼
雷奥迪凯
（黑海王国国王女儿）
M
安条克三世
大帝
（223–187）
赛琉西三世
救主
（226–223）
托勒密五世
M
克里欧珮拉一世
赛琉西四世
爱父亲
（187–175）
安条克四世
神显灵
（175–164）
托勒密六世
德米特里一世
救主
（162–150）
安条克五世
（164–162）
亚历山大•巴拉斯
M1
克里欧珮拉
女神
2M
德米特里
二世
克里欧珮拉
女神
3M
安条克七世
安条克六世
（145–142）
赛琉西五世
125
安条克八世
（125–96）
安条克九世
（115–95）

叙利亚塞琉西王朝

三 马其顿王国

安提柯二世（约三二○至二三九年，二七七至二三九年在位）何以有“勾那塔斯”（Gonatas，“膝盖颤抖”，“knee-trembling”）的别号并不清楚。他是“独眼”安提柯一世之孙，“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之子；菲利普五世即为其孙。这位豪情壮志的大开大阖人物，恰好与谨慎自持、稳扎稳打的安提柯二世相反。在德米特里入主马其顿后，他负责掌管希腊一些据点。在他父亲败死后，他陆续与莱西马克斯、皮洛士及“雷霆”托勒密争夺马其顿王位，但都屈居下风。他在二七七年时于色雷斯王都莱西马奇亚拦截击败高卢人，声望大为提升。在二七二年，他幸运杀死皮洛士，成为唯一掌控马其顿的人。他在王国草创初期，必须应付托勒密唆使希腊人起义的“克里孟尼迪斯战争”，十分忙碌。但是他沉着稳重的个性以及深谋远虑的规划，让马其顿休养生息，恢复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所带走的极大数量人口，甚至在托勒密二世最鼎盛时期，协助叙利亚王国打败埃及，让自己称雄爱琴海。但是他最重要的战略目标还是希腊本土，而其主要对手为希腊的亚该亚联邦及伊托里亚联邦。安提柯二世的做法是控制所谓“希腊枷锁”的三处战略要地——迪米特利亚斯（Demetrias），卡其斯（Chalcis）以及科林斯——来箝制希腊。这些地方方便他控制北希腊的色萨利、中希腊彼奥提亚平原以及南部伯罗奔尼撒的出入；他也在在位期间控制雅典外港派瑞亚斯。

德米特里二世（二三九至二二九年在位）是安提柯二世之子，菲利普五世之父。他在二三九年继位，婚娶皮洛士孙女，将马其顿与伊庇鲁斯结合成一王国，但他在希腊西边的扩张，引起亚该亚联邦及伊托里亚联邦的干预，而发生所谓的“德米特里之战”。他虽然略有进展，但后来因为马其顿边疆遭受蛮族入侵，而必须抽身，结果“希腊枷锁”因为丧失科林斯，不复以前的强势。他在二二九年过世，留下稚龄的菲利普五

世，所以马其顿大臣及将军决定推举已故国王的堂弟“多森”（Doson）安提柯三世（Antigonus Ⅲ Doson，二二九至二二一年在位）为摄政，然后再成为国王，以挽救陷入重重危机的王国。他之所以有Doson[46]这别名，可能是因为其兄长德米特里二世过世后，应由其子菲利普继任，但因他年幼，所以由安提柯三世担任摄政，并婚娶其母，但未曾将王位如安条克四世一样只留给自己后代而引发王朝的分裂，而是很有智慧地还给原来继承人菲利普，故有此名。

“多森”掌权后，首先恢复德米特里二世任内所失去的势力范围，他在二二八年打败伊托里亚人及色萨利人，再度将马其顿势力往北、中希腊延伸。他并且往小亚细亚西南的卡里亚（Caria）地区远征，延续安提柯二世在海上击败托勒密二世后，在小亚细亚发展的扩张政策。在二二五年时，亚该亚联邦迫于斯巴达压力，以交还马其顿科林斯为代价，主动邀请“多森”南下援助。二二四年“多森”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重新建立四世纪底比斯在半岛所建立的联盟，将斯巴达围困在半岛南部；二二二年马其顿重装武兵在塞拉西亚（Sellasia）一地击败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三世，迫使其流亡埃及。但在胜利后不久，马其顿遭受伊利里亚（Illyria）人入侵，“多森”必须立即北返，但在指挥作战时，用力过猛，血管破裂，死于二二一年。“多森”与其伯父安提柯二世一样，是个稳健果决的人，他恢复马其顿在希腊世界的影响力，也使得十七岁的菲利普五世得以顺利即位，而且有好的开始。

菲利普五世（二二一至一七九年在位）大概是波里比阿作品中，希腊世界里最主要的角色，而他如何回应罗马的崛起以及罗马往东的扩张，决定了后来罗马与希腊的关系。“多森”在位时积极培养菲利普，派他去认识亚该亚联邦的领导人阿拉特斯（Aratus），并促成马其顿与亚该亚联邦更密切的合作，在希腊化的“同盟战争”（Social War，二二○至二一七年）中共同对抗伊托里亚联邦。菲利普在即位初期，相当在意希腊人对他的风评，也重视阿拉特斯的意见，但是根据波里比阿的说法，

他在法洛斯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ros）影响下，开始改变施政风格，对希腊城邦采取较高压及投机的手段，并且往亚得里亚海方向扩张，干预罗马在伊利里亚沿岸的盟友。菲利普后来更与在意大利连战皆捷的汉尼拔签订密约，引起罗马人的恐慌，因此发动第一次马其顿战争（二一五至二○五年），将菲利普牵制在希腊，而战争的执行由马其顿世仇伊托里亚联邦代劳，罗马则提供海军协助。在二○五年的腓尼企和约（Peace of Phoenice）中，马其顿大致维持在伊利里亚的可见度。

之后他转而与叙利亚王国的安条克三世合作，瓜分埃及幼年即位的托勒密五世在爱琴海及小亚细亚的领土。此事引起波里比阿极大的愤慨，因为如果检视一下希腊化王国的系谱，不难察觉三大王国间常有联姻现象，即使双方长久以来一直处于敌对状态。所以三大王国，甚至包括那些如卡帕多西亚、比提尼亚以及本都等二级的王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生命共同体”，维持着稳定的国际秩序，所以这种利用埃及幼主即位，其他两国趁机瓜分，大概被波里比阿认为已经超过可以接受的程度。当然这种现象更无助于抵挡罗马的进犯，也给罗马干预提供了借口。

果不其然，菲利普这次投机行为即使收获有限，但仍激起帕加马王国及罗德岛的恐慌，联手求助罗马干预。罗马在结束第二次布匿战争后，也想报复菲利普与汉尼拔的密约，所以尽管人民极为疲惫，还是发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二○○至一九七年）。结果菲利普在色萨利“狗头山”（Cynoscephalae）战败，认输求和，保持实力，全心重新建设马其顿，而罗马人也担心被逼急的马其顿会和叙利亚王国合作，所以在一九六年双方签订条件相当宽松的和约。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后，菲利普虽然在许多方面愿意配合罗马，但他积极重建的企图常被罗马人以最负面的观点来看待。所以菲利普在色雷斯的发展虽不在条约限制内，却屡屡遭受帕加马投诉，未曾得到有利的判决。他在罗马做人质的二子德米特里，依恃罗马支持而有意与王储佩尔修斯争位，被他以叛逆罪在一八○

年处决，更加深罗马对他的猜忌。他在次年病故。他生前是位精力充沛的国王，在前任国王所遗留下来大臣的辅助下，谨慎节制，深获希腊人肯定，一度被认为是“希腊人宠儿”。但是他后来自己主政，越来越具侵略性，越来越像“攻城者”的祖先，而且政策时常具有投机性，而引起不必要的罗马干预。

马其顿最后一任国王佩尔修斯（Perseus，一七九至一六八年在位）在一七九年继承菲利普五世，与罗马人续签和约，虽然罗马一直希望曾为罗马人质的弟弟接任，但显然没有为难他。他继续菲利普巩固、稳定扩张的政策。他与叙利亚王国公主结婚，由罗德岛派送巨舰护航；他也将自己妹妹嫁给小亚细亚西北的比提尼亚（Bithynia）国王，在希腊世界广结善缘，赢得许多支持，特别是他被认为倾向于类似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三世的政策，动摇罗马人以及罗马代理人帕加马国王在希腊支持温和寡头的希腊城邦政权。欧迈尼斯二世向罗马抱怨佩尔修斯不断增强的势力，配合其他人编造出佩尔修斯主使谋杀他以及意图毒杀罗马元老院等谣言，促成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一七一至一六八年）爆发。罗马战事并不顺利，后来选出当代最杰出将军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领军，一六八年在皮得纳击败佩尔修斯。佩尔修斯逃亡至色雷斯海外的萨莫色雷斯岛，但被俘，与家人在次年的胜利大游行中亮相游街示众。他不久之后死于狱中，而马其顿王国也一起同时被罗马解散而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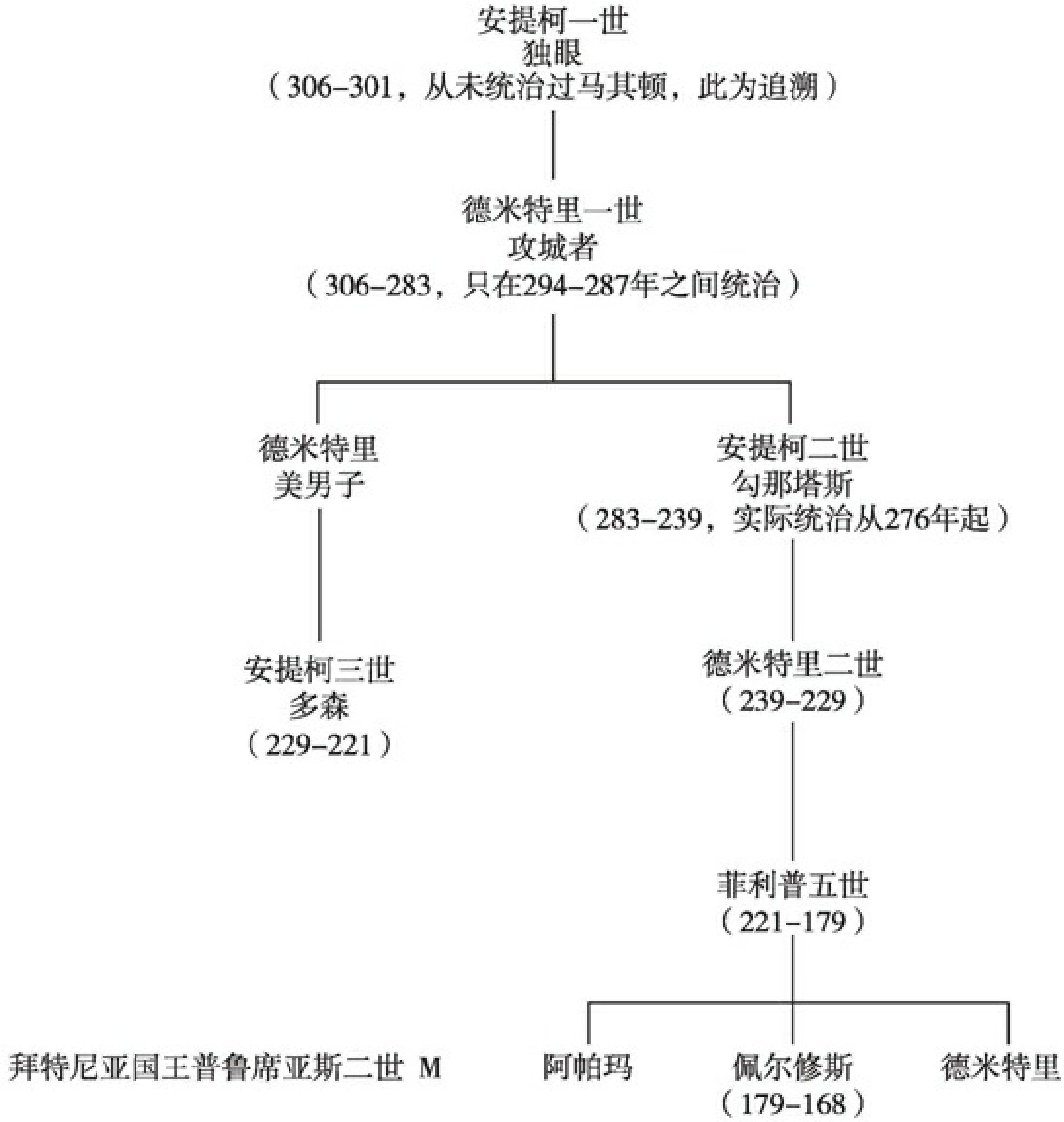
但是一位叫安得列司克斯（Andriscus，活跃于一五三至一四八年）或“假菲利普”的僭夺者，在色雷斯人协助下，于一四九年反攻马其顿。罗马征战不顺，惊觉事情危险，最后派出“马其顿征服者”迈帖勒斯（Metellus Macedonicus），并获得帕加马王国海军协助，才打败、处决他。波里比阿在著作中，对安得列司克斯叛变能成功到如是的程度大惑不解，只能认为当时的马其顿人不知感恩，被鬼神蛊惑，自取其祸。波里比阿对希腊民心思变及对罗马不满的可能性，好像觉得不可思议，所

以只能归诸神鬼蛊惑。[47]

虽然亚历山大东征成为历史传奇，但马其顿从他离境的那一刻，以及接下来的六十几年时间（三三四至二七二年），其实一直处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状态。这一直要等到安提柯二世在二七二年完全掌控之后，才有机会休养生息，而他稳扎稳打的政策，正是马其顿所需要的。但在罗马往东方希腊化世界发展时，马其顿首当其冲，结果经过三次马其顿战争后，被罗马击败、解散，划分为四个薄弱、不能往来的共和国，完全无法抵挡来自北方蛮族的攻击，也无法抑制僭夺者安得列司克斯的叛变（一四九至一四六年），最后在一四六年被设为罗马行省。



马其顿王国


安提柯一世
独眼
（306–301，从未统治过马其顿，此为追溯）
德米特里一世
攻城者
（306–283，只在294–287年之间统治）
德米特里
美男子
安提柯二世
勾那塔斯
（283–239，实际统治从276年起）
安提柯三世
多森
（229–221）
德米特里二世
（239–229）
菲利普五世
（221–179）
拜特尼亚国王普鲁席亚斯二世 M
阿帕玛
佩尔修斯
（179–168）
德米特里

安提柯王朝

四 联邦：城邦的出路

希腊化世界的三大王国局势，在二七二年终于稳定下来。在这种格局下，除非如海军强国的罗德岛，没有城邦可以在人力及物质资源上，能和王国匹敌。以雅典为例。在希腊化时代初期，马其顿卡山德任命一位亚里士多德学派学者法勒隆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来治理雅典。若在古代世界有所谓柏拉图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那大概是他。德米特里以财产资格来限定公民权，[48] 而这正是马其顿王朝所偏好的政体；[49] 他让人民富足，生活无忧，但也降低人民政治上的参与，引起如鹰派及狭隘民族主义者德谟斯特尼斯外甥德谟卡瑞斯（Demochares，约三六○至二七五年）的不满，而这成为其他有意于马其顿王位或是欲制造麻烦的其他君王可以切入之点。在三○七年“攻城者”德米特里入侵雅典后，法勒隆的德米特里被迫流亡埃及，在亚历山大协助成立图书馆及博物馆，勤力著述。

“攻城者”德米特里失败后，托勒密王朝的势力介入希腊，模仿波斯战争，鼓吹一场由雅典及斯巴达联手反抗马其顿“新野蛮人”的“克里孟尼迪斯战争”，[50] 但在逐渐失利后，立即抽腿，让雅典再度沦陷。斯巴达的“克里奥米尼斯战争”亦是如此；城邦在此不过是三大王国可以牺牲掉的筹码。从马其顿角度来看，直接介入城邦事务，徒增困扰，所以安提柯王朝以控制“希腊枷锁”来控制希腊。至于雅典，在“克里孟尼迪斯战争”之后逐渐成为大学城，而且因为过去的荣耀及学术成就，备受国王及权贵的偏好及礼遇，留下不少当时捐献的建筑物。但史家波里比阿对雅典无意加入亚该亚联邦一事，始终不能谅解，所以似乎刻意藐视雅典过去的成就及运作相当成功的政体，认为雅典不过是一群极会阿谀奉承，自以为是的人聚集之处，充满民主政治的种种缺点。[51]

若个别城邦无法在希腊化世界的政治舞台扮演突出的角色，那么将多个城邦重组为一联邦，则是新选项。一方面它可以聚集多个城邦的人力及物力资源，方便在一个王国并立的时代竞争，但另一方面会员城邦却仍享有高度的自主自治。所以联邦组织似乎是城邦体制的出路。联邦其实在希腊世界其来有自，多是基于地域、族群（ethnos）或是宗教的理由而存在。这希腊化时代最重要的两个联邦分别是位居科林斯湾北岸及南岸的伊托利亚联邦（Aetolian League）及亚该亚联邦（Achaean League）。希腊化时代的联邦不同于古典时期著名的“霸权式”（hegemonic）联盟，如由雅典主宰的提洛联盟以及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联盟，而是更为平等、更重视个别加入城邦之自主性的组织。另外，希腊化时代这两个最成功的联邦都发生在古典时期城邦体制较不成熟、文化较落后的地带，所以当地的社区似乎比较没有传统包袱，较能自行调整来面对新局。

伊托里亚联邦位居科林斯湾北岸，在四世纪时已经组成联邦国家，取代之前伊托里亚人较原始的部落组织。它在组织上有全体男性公民所组成之大会、代表议会、常设议会及年度选出的联邦将军。特蒙（Thermon）是伊托里亚人古老的宗教祭祀中心，也成为联邦行政中心及聚会地点。在二七九年伊托里亚联邦与其他希腊人联手击败入侵到特尔斐神殿附近的高卢人，成为这希腊祭祀中心的拯救者，名声大为提高，也使伊托里亚人进而控制管理特尔斐神殿的安费克提安尼联盟（Amphictyony），[52] 进而开始往中希腊扩张，甚至控制温泉关这南北陆路交通要塞。但尽管是神殿之拯救者，伊托里亚联邦却允许其国人进行类似强盗或海盗的行为（称为syla，“掠夺”），迫使受害国家为求保全，而与伊托里亚联邦签订有关asylia [53] 的条约，承认联邦，行径如同古代世界的流氓国家。

因为地缘政治之故，伊托里亚联邦始终与马其顿王国为敌，彼此竞争控制色萨利一地。所以当马其顿投机地与汉尼拔合作时，伊托利亚立

即成为罗马最先拉拢的对象，在第一次（二一五至二○五年）及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二○○至一九七年）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伊托里亚联邦始终不满与罗马合作收获有限，所以在一九二年邀请叙利亚王国安条克三世来“解放希腊”，但在失败后遭受罗马严厉的惩罚，成为臣属盟邦，在希腊政治的重要性逐渐消失。因为伊托里亚联邦和亚该亚联邦的竞争关系，所以身为亚该亚联邦国民的波里比阿特别不喜欢伊托利亚人，在作品中常有诋毁之词。

亚该亚联邦则原来是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北边、科林斯湾南岸的亚该亚族群城邦国家所组成，在五世纪曾活跃于半岛，但旋即没落，直到二八○年再度重组，后来甚至包括非亚该亚族群的国家，如西息温（Sicyon）、科林斯及阿哥斯等多利安（Dorian）族群的城邦，使原来是地区及族群性的组织，一跃为半岛里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它与科林斯湾北岸的伊托里亚联邦齐名，但立场时常相左。联邦事务由每年选出两位将军来主持（但二五五年后只有一位），另设有联邦官员、议会以及全员大会。联邦有固定或特别召开之会议，作出重大决议。将军不得年年连任。阿拉特斯（二七一至二一三年）首先在二五一年引进自己的城邦西息温进入联邦，并在三世纪中领导联邦，在希腊政治扮演一席之地；他在二四三年突袭攻占科林斯后，公开反对马其顿王国干预南部希腊。反马其顿是亚该亚联邦的主要政策，所以在此时与伊托里亚联邦常有合作的关系。

但在莱狄亚迪斯（Lydiades）自愿放弃僭主位置，带领迈加洛波利斯加入联邦后，联邦政策面临变化；这是因为迈加洛波利斯在四世纪之所以建立，是为了围堵斯巴达，而为达此目的，常依赖半岛外势力（如最初的底比斯及后来的马其顿）协助。所以迈加洛波利斯加入联邦让亚该亚联邦的政策开始发生分裂。当斯巴达于二二○年代在克里奥米尼斯三世领导下，经历革命，再度崛起为强权，让亚该亚联邦倍感压力。阿拉托斯决定改弦易辙，以交出科林斯为代价，与马其顿联手，主动邀请

马其顿势力深入希腊南部，一起对付斯巴达；马其顿及其盟友在二二二年于塞拉西亚将之击溃。这让马其顿势力再度深入希腊，完全违背联邦的初衷。在希腊的“同盟战争”（Social War，二二○至二一七年）之中，阿拉托斯率领联邦加入马其顿，对付伊托里亚联邦，但是还是没办法阻挡年轻的菲利普五世直接染指伯罗奔尼撒，摧毁迈瑟纳（Messene）城。在二○○年后罗马人决定直接干预希腊事务，与马其顿为敌，亚该亚再度改变政策，背弃马其顿，转为与罗马合作。

阿拉托斯过世后，菲洛波义曼（Philopoemen of Megalopolis，约二五三至一八二年）成为联邦最重要的领导人。他与罗马人联手击败斯巴达国王的纳比斯（Nabis），并将斯巴达及迈瑟纳（Messene）并入亚该亚联邦之中，进入联邦最兴盛的时期；这些成就却几乎全拜罗马所赐。这期间亚该亚联盟已经感受到罗马是新的且如排山倒海的威胁，再也不得不正视这问题。他见到罗马人在面对希腊时，那越来越明显的高压政策，试图据理力争，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同时代之人亚历士泰纳斯（Aristaenus）则认为去忤逆罗马意图，绝非明智之举，甚至有时必须主动曲意迎合，以求自利自保，而这确实是罗马乐见的。这种辩论想必在当时许多希腊国家发生，但是任何希望维持独立的意图，越来越像是幻想。

马其顿王国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一七一至一六八年）后被解体，亚该亚联邦在战争期间对罗马有所保留的支持，被元老院质疑为不忠，因此有一千个亚该亚人在一六七年被送到罗马审判，开始漫长的羁留生涯；其中包括史学家波里比阿。马其顿被消灭后，亚该亚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消失，加上联邦一向寡头温和、亲罗马的政治结构，因为社经失序，被激进民主政治及反罗马分子取代，后来在一四九至一四六年因为史料没提及的原因，而与罗马发生冲突，结果科林斯被夷为平地，联邦解散。波里比阿所能做的似乎只是善后工作，让罗马的直接统治比较令人可以忍受。

亚该亚联邦或伊托利亚联邦在分量上都不及三大王国，但凭着微妙均势以及罗马势力的东渐，随时见风转舵。例如，伊托利亚联邦借罗马之力来对付菲利普五世的马其顿王国，借安条克三世的叙利亚王国来对付罗马，但最后国破人亡；亚该亚联邦则是借托勒密王朝以及罗马之力来对抗马其顿，借马其顿来对付克里奥米尼斯三世的斯巴达，但是当罗马认为联邦的利用价值不复存在，便狡兔死、走狗烹；在得到一些短期性利益后，最后还是免不了出卖自己的灵魂。但他们真的有其他选项吗？另外两个类似处境的国家分别是罗德岛（Rhodes）及帕加马王国，它们更擅长利用三大王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引入崛起的罗马势力来从中取利，但最后还是面临类似的命运。

五 斯巴达革命

如何对付马其顿是上述这两个联邦最大的议题，但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亚该亚联邦却还需面对从二四○年代末起斯巴达企图进行改革，恢复过去光荣的挑战。斯巴达是个骄傲、不服输的国家，在三七一年留克特拉战败后，始终给人愤怒、不忏悔但却又极度疲惫的感觉。“人口稀少”的问题始终困扰它，但解决却需要进行激进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改革，而这是保守的斯巴达人难以接受的。艾吉士四世在二四四至二四一年曾企图进行，但仅完成“取消债务”，便受到监政官的掣肘，以失败被处决告终。

这改革或革命的主动权落在另一王朝的国王克里奥米尼斯三世手中。其父曾被艾吉士四世以改革之名罢黜，但在自己即位后，婚娶艾吉士四世富有且美丽的遗孀，受到她的影响，继续进行未完成的改革。克里奥米尼斯是位能力极强，具有领袖魅力的国王。他发动政变，废除他认为并非莱克格斯宪政的监政官制度（ephorate），并以说服或强迫方式让大家捐出财产土地充公，重新分配，解放农奴，且将分割后的田地分配给边居民、佣兵，甚至是解放后的农奴，[54] 彻底改变斯巴达自三七一年在留克特拉战役被底比斯打败后，所暴露出的公民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他同时也恢复斯巴达独特的agoge教育训练以及种种莱克格斯系统所要求的项目，结果这种社经革命立即将原来积弱的斯巴达一变为强大的国家，并在伯罗奔尼撒吹起一股革命风潮，蔓延各地。这对在意识形态上偏好富人及寡头政权的亚该亚联邦造成威胁。他因为这种激进的改革，被不满他的人士冠上“僭主”的称号。

在军事上克里奥米尼斯开始入侵北邻阿卡狄亚，占领迈加洛波利斯，造成亚该亚联邦几乎解体。阿拉特斯于是被迫在政策上转弯，重新

接受马其顿势力进入伯罗奔尼撒。“多森”安提柯三世于是带兵南下，最后在二二二年时于塞拉西亚击败斯巴达。克里奥米尼斯逃亡至到之前一直支持他的埃及。但是埃及新王托勒密四世不愿继续原来的政策，也不愿放克里奥米尼斯离境。克里奥米尼斯最后在设法逃离时被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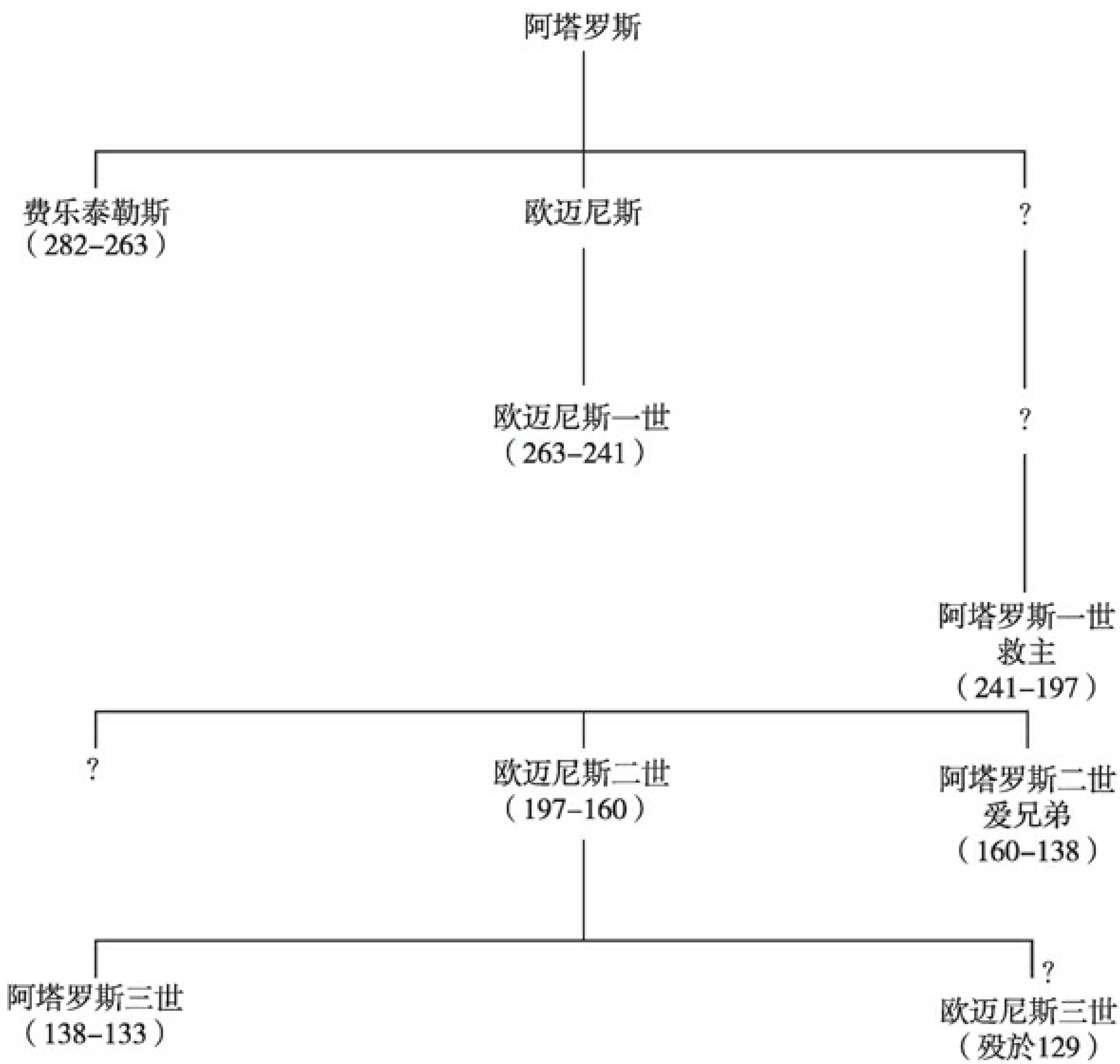
之后斯巴达陷入一段混乱、记载不全的时代。斯巴达纳比斯（二○七至一九二年在位）在二○七年谋杀幼王配罗普斯（Pelops），自己掌权，重新引进克里奥米尼斯三世的改革，但更为激进，因为原来的改革较像是将时钟往回拨，恢复之前的制度，但纳比斯则是创造全新的斯巴达。他改革后再度启动斯巴达对外扩张的政策，而且蓄意“输出革命”，撼动亚该亚联邦，但是在二○○年时被亚该亚的菲洛波义曼击败。纳比斯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时，暗助菲利普五世，交换取得阿哥斯，但是在战后被罗马将领福拉明尼纳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以及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一世击败，被迫放弃阿哥斯以及斯巴达的海港。在伊托里亚联邦协助下，他恢复失地，但又再度被福拉明尼纳斯及菲洛波义曼击败。最后他引狼入室，被进驻的伊托里亚人在一九二年杀死。之后的斯巴达被纳入亚该亚联邦之中，但是这只会引起联邦更多的问题，时常引来罗马元老院的干预。

六 罗德岛与帕加马王国

罗德岛是位于小亚细亚西南的岛屿。[55] 亚历山大曾经在此驻军（三三二年）。他过世后，因为它有强大的海军，罗德岛开始扮演重要角色。罗德岛在外交上一向广结善缘，与海军强大以及贸易兴隆的托勒密埃及关系尤其密切。当三○六年，“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与托勒密一世于塞浦路斯岛外海作战时，罗德岛婉拒德米特里的协助要求，所以三○五年遭受德米特里围攻，但反抗成功，并且利用“攻城者”所留下的巨量器械及材料，兴筑一座横跨罗德岛港湾出口的太阳神（Helios）巨型塑像，与亚历山大的法洛斯（Pharos）灯塔，并列为古代七大奇观之一。罗德岛从二五○年代托勒密王朝逐渐淡出海洋后，主动巡逻东地中海，消灭海盗，保障航行安全，成为东地中海的海上警察。它的商业贸易兴隆，民主政治成熟，是当时的模范国家。希腊城邦在希腊化时代不像之前的古典城邦，彼此间动辄兵戎相见，而是常诉诸国际仲裁，因为罗德岛人民以公道正义闻名。而罗德岛的公民常被邀请到其他城邦担任鲁仲连，化解纠纷，所以当罗德岛在二二七年遭遇地震的摧残时，希腊化世界王国及各地踊跃捐输，援助重建。

它后来与帕加马王国一起对抗菲利普五世在三世纪、二世纪之交于爱琴海及小亚细亚的扩张，并且一起加入罗马所发动的第二次马其顿战争。这两个国家亦不满叙利亚王国在小亚细亚的扩张，所以又如法炮制，在一九○年一起与罗马击败安条克三世。罗德岛在和约中分配到对岸大陆的土地，变得更为繁荣。但在一六八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罗德岛在战争悬而未决之际，主动出面仲裁；罗德岛特使在会见元老，想提出仲裁建议时，传来罗马击败马其顿的消息，他们尴尬万分，只得立即改口祝贺，但还是遭受罗马人惩罚，幸亏得到老加图（Cato the Elder）的支持，才未灭国。罗德岛从此上诉罗马，请求仲裁，屡屡不

利，最后被完全剥夺所有岛外的土地；罗马人更宣布提洛岛（Delos）成为免税的自由港，立即使罗德岛的商业贸易一落千丈，[56] 之后再也无法维持舰队的巡逻，海盗因此再度猖獗。罗马在此时可以仅凭一道命令，便严重惩罚一个主要海军国家，改变它的命运。



帕加马阿塔罗斯王朝

帕加马在小亚细亚西北的麦希亚（Mysia）地区，位居凯克斯（Caicus）河畔的城市。帕加马成为阿塔罗斯（Attalid）王朝在三世纪上半叶所建立王国的首都。这个城市在希腊古典时期并不重要，神话中

仅有不很知名的特列福司（Telephus）这位英雄。帕加马王国王朝始于费尔泰勒斯（Philetairus），一位曾为“独眼”安提柯一世及色雷斯国王莱西马克斯看管这地方财库的阉人；他之后转而效忠叙利亚王国塞琉西一世，并在他被“雷霆”托勒密杀死后，为其收尸安葬。他过世后由姪子欧迈尼斯一世（二六三至二四一年主政）[57] 继任，以这笔财富及凯克斯河谷丰富的农业生产，开始对外扩张以及建筑计划。这些都继续由其继任者进行。整座城市以其高耸的卫城为中心，以梯田方式往山坡下延伸，是希腊化时代城市规划的典范。卫城包括宫殿及防御工事、神殿、剧场以及堪与亚历山大城匹敌的图书馆，外加在后来阿塔罗斯一世战胜加拉太人的纪念建筑（包括宙斯大祭坛及雅典娜神殿）。卫城以下的梯田式城镇则有市民广场、其他神殿以及希腊世界最大的体育场（gymnasium），附近也有以梦疗知名的医神（Asclepius）神庙。[58] 罗马公元二世纪名医盖伦（Galen）即出身此城。帕加马王国历任君王皆以在小亚细亚建立一个新雅典为目标，赞助文化及宗教活动，造就出一个美丽、精致、富裕以及文化气息浓厚的希腊化城市。今日在雅典卫城旁的欧迈尼斯回廊以及市民广场旁修复完成的二层楼阿塔罗斯回廊，即是著名例证。

阿塔罗斯一世（二四一至一九七年在位）继承养父欧迈尼斯一世，是这王朝中第一位采用国王头衔的统治者，别号“救主”，因为他在二三○年代时打败四处流窜、打家劫舍的加拉太人。他在二二八年打败叙利亚王国王弟、在小亚细亚发动叛乱的“鹰隼”安条克，赢得许多土地。当马其顿菲利普五世开始在爱琴海大肆扩张，入侵小亚细亚，这让阿塔罗斯十分警惕，加上他怀疑叙利亚与马其顿签有密约瓜分埃及，所以阿塔罗斯决定积极引进罗马势力到希腊世界，同时也对抗菲利普盟友比提尼亚国王普鲁席亚斯一世（Prusias I of Bithynia，二二八至一八五年在位）。他与罗德岛联手将马其顿势力逐出爱琴海后，也加入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但在胜利不久后，旋即因病过世。

欧迈尼斯二世（一九七至一五八年在位）继续其亲罗马的政策。他在一九五年时协助福拉明尼纳斯攻打斯巴达的纳比斯；一九二至一九一年协助抵抗安条克三世入侵希腊。他积极参加一九○年罗马对安条克三世在麦格尼西亚（Magnesia ad Sipylum）的战役，表现最为优异，所以罗马给予他大部分安条克三世所割让之小亚细亚领土，使帕加马成为希腊化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与其他王国分庭抗礼，但这也引起比提尼亚及本都（Pontus）两邻国的嫉妒及怨恨，而导致一连串冲突。他也积极对付内陆的加拉太人。之后欧迈尼斯二世首先警告罗马有关马其顿在国王佩尔修斯（Perseus，一七九至一六八年在位）领导下，已经迅速恢复，逐渐在希腊世界成为新领袖，威胁罗马地位，所以积极促成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但是因为他与罗德岛在战争悬而不决之际，企图说项，引起罗马不悦，对其忠诚开始怀疑，使得罗马宣布不欢迎任何希腊化世界的国王，在没有邀请下，不得踏入意大利。加上能够威胁罗马的希腊化王国皆已一一消失，使得罗马不再认为帕加马以及罗德岛等的协助是那么必要。所以在一六七年，罗马一度有意以其弟阿塔罗斯二世（一五八至一三八年在位）取而代之，但阿塔罗斯并不愿意。

帕加马王室是典型的布尔乔亚。皇后阿波罗妮司（Apollonis）谨慎持家，乐善好施，深得民众尊敬，[59] 而欧迈尼斯二世及阿塔罗斯二世等兄弟，敬爱父母，兄友弟恭，分工合作治国。当阿塔罗斯二世即位时，他婚娶其兄的遗孀史特拉托妮凯，保护其兄之子的继承权，非常像“多森”安提柯三世；想必其中理由与他相同。当时叙利亚王国已经分裂为两系，造成极大动乱，而托勒密六世及八世兄弟阋墙还在进行中，殷鉴不远。在外交上他谨守罗马至上的原则。他过世后，帕加马由阿塔罗斯三世（一三八至一三三年在位）继位；他虽然是位杰出的植物学及药物学专家，但被认为与之前的帕加马君王大不相同，个性残酷，不喜国政。当时他似乎模仿埃及托勒密八世的遗嘱，[60] 以罗马人民为王国继承者。他如此做可能是要防止其他人篡位，消弥因为继承可能引起的政治动乱。但当他在一三三年过世时，遗嘱生效，帕加马王国于是不再

存在。一三三年时常也被认定是希腊化时代结束的时间之一。

七 尊荣、合法性及“希腊性”

希腊化时代的君王会尽其所能地展现及提升自己的尊荣。托勒密王朝的频繁军事活动主要为的是要彰显王威国势，但这并非唯一的方式。其他如建设希腊化第一大城亚历山大（包括最高的法洛斯灯塔）、修筑唯一亚历山大陵墓（Sema）以及成立最大的博物馆及图书馆等文化投资，加上无与伦比的定期壮观精彩游行[61]以及宗教庆典，亦是如此。这么做也要在这原本不属于希腊人的世界里，凸显他们的“希腊性”（Greekness）。这种彰显荣耀亦可延伸至对特定地方的捐输或免税，或如在二二七年罗德岛地震灾难时提供协助。这些行为统称为“施恩行为”（euergetism）。埃及托勒密王朝是这个中高手，但其他王国，特别是帕加马王国，亦不遑多让；事实上，帕加马王国更需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因为其建立国家的人物不像其他王国曾是亚历山大麾下的元帅，而是一位阉人，所以合法性明显不足；阿塔罗斯一世必须在打败四处施虐的加拉太人才能称王，得到“救主”（Soter）的称呼，然后历代君王必须以种种丰功伟业或“施恩行为”来证明自己值得为王。之前提及在雅典捐献回廊即为一例，但是在各地所留下的碑铭，特别是在泛希腊的宗教祭祀中心，如特尔斐神殿，都见证到帕加马王室的慷慨大方。在罗德岛地震时，帕加马的援助自然不落人后，甚至互相竞争；希腊时常发生的饥荒，亦会见到帕加马谷物运输舰适时来到；帕加马国王建立图书馆时，也是要和托勒密王朝一较长短；到如是程度，所以托勒密王朝干脆禁止埃及草纸输出，因此帕加马人被迫改以小羊皮书写。帕加马国王在宫廷里赞助、豢养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及艺术家等，努力将自己原来蛮荒偏远的小亚细亚西北角小城，转化为“新雅典”；而艺术家则以歌功颂德，荣耀君王的作品来加以回报。

阿塔罗斯一世在击败加拉太人后，赞助“垂死的高卢人”塑像；欧迈

尼斯二世再度击败加拉太人时，更花费巨资来完成具有纪念及标志性的帕加马宙斯大祭坛（现存于柏林帕加马博物馆）。在上面的浮雕复制雅典帕德农神殿的主题：将帕加马击败野蛮的加拉太人，呈现为与雅典击败波斯和奥林匹亚诸神击败泰坦族并列，象征文明战胜野蛮，刻画帕加马在小亚细亚这地方是希腊文明的守护者。另外祭坛后方则是将默默无闻的帕加马英雄特列福司，强调他是赫拉克勒斯与伯罗奔尼撒半岛提基亚（Tegea）城的公主所生，再加上其种种事功，让特列福司进入希腊神话的主流之中，而帕加马也不再是希腊文化的边陲地带。帕加马就这点而言十分成功，因为它在罗马帝国继续是重要的学术研究及宗教祭祀中心。

在这些显示君王尊荣的行为中，最常见的方式之一是对君王（无论生前或死后）所进行的祭祀（cult of ruler）。亚历山大生前曾经发令要希腊城邦对他死去好友以“英雄”祭祀，对自己则是以“神明”敬拜。雅典的德谟斯特尼斯回应说，要拜什么，随意他，因为这并非希腊传统，所以没必要严肃看待。但在希腊化时代则不然，特别是在受到来自东方传统的影响之后。以前学术界对君王祭祀所具有的认知是将这种敬拜视为统治者的政治工具，君王借此来提升尊荣、威望及合法性。但我们应该理解的是：这种对君王的祭祀让君王权力“具体化”，以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感知到，而非抽象虚拟、不可捉摸。许多希腊化时代君王的子民会毫不迟疑地向能控制他们生活的权贵之人，进行如向神明一样的祭祀。这其实是一种在受统治者及统治者之间协商出一种沟通方式。所以当“攻城者”德米特里在二九一年航行驶入雅典时，雅典人民齐声以歌曲及舞蹈来欢迎他：

> ……最强大海神及爱神之子，向您致敬欢迎！因为其他神明或远在天边，或装聋作哑，或是不存在，或是忽略我们。但是您我们可以看见。您不是用石头或木材做成。您是真的。所以我们向您祈祷：首先，带给我们和平，我们最亲切的，因为您有力量！……[62]

这样的回应其实并没有与德谟斯特尼斯在回应亚历山大命令所说出的话有所矛盾。当时骄傲的德谟斯特尼斯并不接受亚历山大宰制雅典这看法，但二九○年代的雅典人则了解“攻城者”就是他们的宰制者。这歌颂其实透露出双重意识：他们知道“攻城者”不是真的神，但他们愿意将他视为如此，因为他所拥有的权势以及亲临雅典，比神明还真；另外，雅典人借此与统治者建立关系。所以对君王的祭祀不能用单纯的宗教信仰来看待；对君王的祭祀是让希腊人能够以双边互惠的方式来形塑希腊化时代君王的权力：荣耀归于君王，但恩惠或是宽容归于敬拜的社区或个人；反过来说，当君王施恩时，为何人们还要吝啬回应呢？这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协商出彼此双方接受的关系。所以以雅典为例，每当雅典接受埃及或帕加马的恩惠，便会以类似新创宗教祭祀，或以国王名号创造新部落，以提升君王的荣耀；相反地，若是双方关系恶化，相反的行为（如取消祭祀、将部落改名或每道命令法律必须附上诅咒之言）便会发生，而这种事便发生在后来不受雅典人欢迎的安提柯二世时。难怪波里比阿嘲讽这些是三世纪雅典唯一能使用而且运用最好的武器。

但反过来说，希腊化的君王其实相当在意这些公共意见，而这也稍稍钝化连年不停的竞争，甚至如战争的暴力程度。所以尽管希腊化三大王国宰制了大部分包括希腊传统城邦的生活，但是国王也会在意子民的公共意见，并以“施恩行为”来笼络子民对他的支持及拥护。这也呈现在他们在回应其国土里或外之城邦所做的要求或陈情，因为他们会以尊重城邦自主的语言来回应，仿佛是两个独立政权在来往。所以尽管希腊城邦在希腊化时代已经不像在古典时期一样地可以自行进行外交、宣战及媾和，但却仍然可以维持原来一些自主自由的表象尊严。

肆 古代西西里的历史

因为波里比阿的《历史》中有论及西西里之处，所以在此亦对这区域做简单的介绍，俾能够协助理解他的陈述。西西里是希腊前古典时期在西地中海殖民的重镇。希腊人盘踞东半部的地方，西半部则多属迦太基势力范围，在双方之间则夹着一些西西里的原住民。叙拉古（Syracuse）是古代西西里最大的城邦，是科林斯人所建立的殖民地（约七三三年）。叙拉古在兄弟档盖洛（Gelo，四八五至四七八年以僭主身份在位）以及希洛一世（Hiero I，四七八至四六七年以僭主身份在位）统治下，以武力征服及强制人口迁徙的方式，成为西西里主要的军事强权，接连在希美拉（Himera）河打败迦太基，在意大利的库迈（Cumae）打败伊达拉里亚人（四七四年）。在希洛一世后，僭主政治被民主政治取代。民主的叙拉古打败当时兴起的西西里本土民族主义运动，并在四二七至四二四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阻挡雅典干预西西里，进而在四一五至四一三年打败雅典的大规模入侵，使雅典元气大伤，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落败的主因之一。

但是叙拉古在胜利后，立即遭遇迦太基的攻击以及内部政治动乱；民主政权无能为力，导致戴奥尼素一世（Dionysius I）的崛起，进而成为僭主（四○五至三六七年在位）。戴奥尼素一世打败迦太基，将叙拉古的势力以及繁荣带到难得一见的程度；但之后其不甚成材的继承人戴奥尼素二世与亲戚的争执，削弱了叙拉古，连带整个原来的西西里和平跟着崩溃。[63] 叙拉古人民要求母城科林斯协助，结果提莫立昂（Timoleon，活跃于约三六五至三三四年）前来平乱，建立一个温和的寡头政权，也恢复了叙拉古在西西里的势力。他是位坚决反对僭主的人，积极改革，也驱逐走其他西西里城邦的僭主。最后在三三九年击败迦太基。他解决僭主统治以及迦太基侵略之后，鼓励希腊人移民到西西

里，解决此地人口锐减的问题，为西西里带来短暂和平以及繁荣。他在面对所有这些问题时，都是利用独裁者的权力来完成。他功成身退后，荣耀加身，回到科林斯退休。史家泰密乌斯对提莫立昂极为推崇，除了因为他确实解救了当时急迫的局势，还因为自己的家族也可能因他而受益。波里比阿则对泰密乌斯推崇提莫立昂多所批评。这除了基于同行相忌外，还基于西西里是小地方，无法与自己所描写的巨大主题相比，所以不能苟同他对提莫立昂的溢美之词。

提莫立昂的安排在他返回科林斯后开始崩解，旋即被阿加索克利斯（Agathocles）的民粹主义及僭主政治所推翻。阿加索克利斯[64]是位出身低微但具雄才大略的人物；他得到中下阶级人民之助，推翻提莫立昂协助建立的无能寡头政权。他设法将势力扩张到西西里西半部时，被迦太基所阻，最后决定直接带兵攻打非洲，并得到来自北非昔兰尼的军事协助，给迦太基造成极大的威胁。在经过一番波折后，他放弃军队，逃回叙拉古。在三○四年时，他仿效希腊化世界的“继承者”称王。希腊史学家泰密乌斯的家庭，是他在叙拉古当政所造成之动乱的受害者，最后被迫流亡雅典，因此泰密乌斯十分厌恶阿加索克利斯，在作品中大肆诋毁他。但是他入侵非洲及威胁迦太基，却得到一些罗马将军的欣赏及效法。只是他的死亡又是叙拉古及西西里动荡不安的开始。

这情形一直要等到希洛二世成为叙拉古国王（二七○至二一五年在位），才告一段落。他与“战神之子”的冲突，让罗马人介入西西里，进而引爆第一次布匿战争。但他立即与罗马结盟，保障叙拉古接下来将近五十年的和平繁荣。可是在他过世以及儿子短暂的统治后，他的孙子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继位，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改变政策，与迦太基结盟，结果引来罗马人的攻击，最后叙拉古在二一二年沦陷，并遭到大规模的劫掠。叙拉古后来成为罗马西西里行省的首府。

罗马共和简介

罗马建国是在七五三年，是当时城邦体制在整个地中海四处发展的一个例子。罗慕路斯（Romulus）在杀死自己亲弟之后建立罗马城。当时罗马是一群以打家劫舍为生的“罗汉脚”，没有女人想与之为伍，所以他们设计去抢夺、强暴附近撒宾族的妇女。在五○九年开始的共和则是肇始于罗马贵族仕女禄克里席雅（Lucretia）被最后一任伊达拉里亚国王的儿子强暴而引发，结束“王政时期”（七五三至五○九年）。有这样弒弟、强暴“起源”的国家的确令人好奇。另外，开创罗马帝国的人是奥古斯都（Augustus），而在公元四七六年罗马最后一任皇帝叫罗慕路斯·小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结束罗马悠久历史的人，恰好结合了两位最重要的罗马历史开创人物之名。这不知是否巧合。

波里比阿的历史就罗马部分而言，所涵盖的时代是二六四至一四六年，常被编年归为中期罗马共和（二六四至一三三年）。之前是早期共和（五○九至二六四年），而之后是晚期共和（一三三至一二七年）。当波里比阿开始他第一书的故事时（二六四年），罗马已经完成两项发展，使他能自信满满地跨出意大利，面对世界。这两件发展是透过所谓的阶层斗争（struggle of orders）所完成的内部政治整合，以及在对外扩张时，建立意大利联盟（confederacy of Italy）的外部整合。前者让罗马能产生高度的政治共识，有强大的政治领导，而这是波里比阿在第六书何以会探讨罗马宪政之故；后者则是使得罗马及罗马盟友携手进行一场对彼此有利及成功的扩张冒险。罗马在中期共和之前的这些成功，完全是政治智慧累积的结果。波里比阿的《历史》时常影射这些罗马人的成就，但并没有系统性的陈述。以下将先就此两点做些补充。

壹 罗马阶层斗争与内部政治整合

有关罗马共和早期的政治史集中在所谓的阶层（ordo，复数ordines）斗争上。当罗马共和肇始之初，公民分为称为patrician的世家贵族以及plebeian的一般平民两个阶层。patrician的世家贵族代表一个因出身而有权力去进行占卜吉凶、确知神意的宗教行为（这称为taking auspices），而因为他们有权进行占卜吉凶，这让他们能够占有“统帅权”（imperium）的职位。而这有“统帅权”之执政官（consuls），其权力由在执政官前导、拿“法西斯”[65]的仪杖队（lictors）来象征其权力。这是一种社会及法律的身份，而非经济阶级。执政官是世家贵族的囊中之物，平民阶层则被排除在外。但在最初时，世家贵族似乎容许少数平民家族加入，这可由罗马人树立在卫城神庙之前，所编辑历年来执政官名字的“榜单”（fasti）得知，但不久之后则封闭这一渠道。

在四九四年，平民阶层的人要求进行社会及经济改革，包括取消债务及因债务所造成的奴役，还有法律上的不公行为，但这些要求没有得到回应，于是集体退出罗马到附近的甲奴库伦（Janiculum）山丘，形成自己的“平民会议”，（concilium plebis）[66]选举保障自己权益的护民官（tribunes plebis）。[67]平民会议可以通过“决议”，[68]但只对平民出身的公民有约束力，因为它不是法律（lex）。因为当时流行在地中海世界的以民兵为主的步兵也已经在罗马发展一段时间，所以平民阶层的人力对当时刚成形的罗马共和极为重要，因此世家贵族被迫让步。让步内容我们并不清楚，但平民所形成的会议及选出的护民官被承认，虽然他们的功能仅局限在平民阶层而已。护民官有所谓的“护民官权力”（tribunicia potestas），可以干预纷争（intercessio），保护平民免于世家贵族的欺凌；平民也宣誓维护护民官的人身神圣（sanctitas）不被侵犯。在国家政务上，护民官有否决权，但这经常运用在否决军事动

员，迫使世家贵族的阶层让步上。

类似的危机又发生在四五一至四四九年，主题则是法律及其明文化（codification）。当时罗马遣使到希腊考察法律的发展，在回国后克雷苏斯（Appius Claudius Crassus）领导一个十人小组（Decemviri），暂停正常体制，对法律进行编修，后来发表“十二木表法”（Twelve Tables）。类似立法行为在希腊则是所谓“立法者”（nomothetes）的责任，往往发生是在国家出现危机时，“立法者”被授权进行广泛、深刻的改革；立法行为本身则是掌控这项资源的贵族对平民的让步。但在罗马，这十人小组中的部分成员趁机揽权，不愿退让，最后被推翻。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陆续发生创造可由平民阶层参与的官职，如市政官（aediles），出现取消债务以及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世家贵族阶层愿意部分退让，平民阶层也愿意接受妥协。

另一个重要的阶段是三六七年。[69] 因为阶层斗争所关系的是权力，而官职，特别是执政官一职，是权力的具体化。在这一点上，平民阶层获得让步：两位执政官至少必须有一位平民出身。但是世家贵族阶层则另外创造出一个专司法律事务的官员职位叫“副执政”（praetor，亦享有“统帅权”），同时开放给两个阶层，来弥补他们所丧失的权力，因为贵族在竞争官职上仍然占有优势。这种双方妥协让步、求取两边都能接受的中间点，是到当时为止改革的特色。在三○○年罗马通过“欧居尔尼亚斯法”（Ogulnian Law），将世家贵族阶层所垄断的占卜吉凶、探询神意的特权完全废除，宗教团体的位置也完全开放给平民。[70] 在二八七年时，罗马又再度发生平民集体离开罗马的情形，最后由独裁官侯田希亚斯（Hortensius）通过称为侯田希亚斯法（Lex Hortensia）的法律，规定由平民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对“所有”罗马公民皆具约束力；[71] 另外平民对任何判决都有上诉平民会议的权力，以防官员滥权。这一法律的出现时常被认为象征阶层斗争的结束。

被波里比阿指责为群众煽动家、在特雷西米尼（Trasimene）湖败给汉尼拔的执政官弗拉米宁（Gaius Flaminius），便曾在二三○年代以护民官身份主持平民会议，通过法律，将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Cisapline Gaul）的一些公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公民；在二世纪所谓的格拉古兄弟（Gracchi）改革，所利用的宪政武器便是护民官召开平民会议，通过对所有罗马人都具约束力的法案，来对抗以元老院主导的政治集团，最后逐渐衍生出所谓的“群众派”（Populares）及“贵族派”（Optimates，“最好的人”）。这些是未来的发展，在通过侯田希亚斯法时，这未来的发展是否在侯田希亚斯的心中，自然不得而知。

所以阶层斗争主要环绕在对官职及其所代表之权力的争取，特别是具有“统帅权”的职务，因为担任这职务会让持有者成为贵族，甚至致富，名留“榜单”，名垂千古。而整个家族最先得到这官职的人会成为政治上的“新人”（novus homo），使整个家族名列贵族之中。随着扩张的区域越来越大，一些官职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执政官在共和时期始终保持两位。有些时候，卸任官员会被元老院要求继续为国效力，而将其原来的“统帅权”继续延长，这称为prorogatio。在波里比阿《历史》里时常会出现如pro-consul或pro-praetor的官衔，其意为“行执政官”或“行副执政”之统帅权的延任官员。

回顾整个罗马早期共和最重要力量的阶层斗争演化，其过程大致平和，没有内战或流血，这让身陷晚期共和惊涛骇浪政争的西塞罗（Cicero）十分羡慕，因为晚期共和便是以格拉古兄弟的流血丧命开始。但是更重要的是双方高度的妥协性格，愿意求取双方都能接受的变化，力求社会共识，平民阶层的人虽然因此有机会分享权力，但世家贵族的阶层在这些让步过程中，也吸收平民阶层中最具才干的人员进入，最后在三世纪初逐渐浮现出“新贵族”（nobiles）。所以在侯田希亚斯法通过时，新的精英阶层也恰好形成。这些新旧贵族往往会建立联姻或收养的社会关系，因此元老院是个“寡头”且相对封闭的机构。但正是这新

的领导阶层领导二六四年之后中期共和的海外扩张。

这种寡头的情形可以由数字来证明。在三六七年到四六年之间罗马有六百四十多位执政官，其中只有二十一次是由十一位“新人”所担任。何以如此？或许与罗马的社会结构有关，因为罗马上层与下层之间常以一种“保护主—随从”（patron-client）的社会关系所架构，而这关系定义上下彼此的权利义务，例如在选举中随从要为其保护主出钱出力，在保护主婚嫁中，贡献一部分嫁妆；保护主则必须照顾随从的利益，在困难时提供协助。波里比阿与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即是这样的关系，虽然波里比阿是外国人。但是史家也提到其同时代之罗马年轻人会争相向豪强贵族致意（salutatio），即是这种关系的表达方式之一。[72] 而这种关系可以继承，会被所谓的mos maiorum [73] 所强化，其深度可以由所留下的碑铭来证明。这种关系后来甚至延伸至海外，所以那些到罗马元老院求情的人（经常是之前被其征服的），时常会先去拜会他们的保护主，争取他的支持及保护。这种“保护主—随从”之间的社会关系时常使外人不容易打进贵族圈之中。

但正因为罗马实际统治的权力集中在这些数量极为有限的贵族保护主手中，所以一般公民权虽然包括参政权，但其真正效果其实有限，因此罗马人较愿施舍公民权给外人，因为公民权的行使并不会那么直接影响政治权力分配。这与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公民权可以进行决策，分享城邦里的所有资源相当不同，所以希腊人十分吝于将自己的公民权扩大来与其他人分享。对公民权的不同看法以及实际运作，部分解释了希腊城邦何以一直维持小规模的社区形式，而罗马虽最初为一城邦，但却发展成近乎百万人的城市，并控制相当大的帝国。另外，罗马正是凭借这样性质的公民权，得以建立以下要提的意大利联盟的体制。

贰 意大利联盟的建立与对外扩张

与罗马内部政治演化同时进行的是对意大利的扩张及巩固，这是因为扩张需要以平民阶层为主之重装步兵的协助，而这为平民阶层提供了向世家贵族阶层要求权力下放的机会。而在这一阶层斗争过程中，双方愿意彼此协商出两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所以平民的权力逐渐扩大，终于有侯田希亚斯法的通过，使平民的决议可以等同法律，对所有罗马公民皆具约束力，但世家贵族却也同时吸纳最杰出的平民到他们之中，形成所谓的新贵族，领导罗马对外扩张。以下的扩张过程，其实一直与国内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

罗马位居拉丁姆（Latium）平原一隅，与其他拉丁社区因为同时受到北方艾逵（Aequi）人及南方福斯基（Volsci）人入侵所迫（约五○○至四四○年），所以双方缔盟抗敌。之后罗马率领拉丁联盟往北方伊达拉里亚人的地区扩张时，与台伯河以北的费伊（Veii）人进行一连串的战役，最后在三九六年攻占费伊城，瓦解伊达拉里亚人的势力。但战后战利品分配不均引起双方冲突，造成罗马与拉丁盟邦之间的不和；而就在三九○年，高卢部落入侵，打败罗马人，占领除了卫城的整个罗马。高卢人之所以突然入侵，让罗马及其盟友措手不及，是因为伊达拉里亚人除了殖民罗马北方的伊特拉里亚（Etruria）地区，也在波河平原殖民。伊达拉里亚人势力瓦解，意味着罗马北方出现政治真空，所以高卢人长驱直入。最后罗马以付出赎金方式送走高卢人。这次占领罗马对罗马人是一次极大的心理打击，因为在公元四一○年哥特人入侵时，这件事仍然被很逼真地回想到。但这次入侵可能迫使罗马在军事上作了重大的变革，决定将目前为止以类似希腊重装方阵兵团的作战方式，转变为如波里比阿在第六书所提及之较具弹性的编组以及近身交战的战术；另外，与盟邦因为在对费伊胜利后，分配战利品所发生的冲突也得到重

视，所以后来“意大利联盟”的建立便特别着眼于合作及分享。最后，罗马也第一次慎重地修筑“瑟比亚斯墙”（Servian Wall）来防卫罗马。每当高卢人进犯时，罗马便进入“动乱”（tulmultum）的紧急状态，全员备战；波里比阿的历史作品中对高卢人着墨甚多，正是因为高卢人所带来的恐惧是很真实的，而且是如此逼近罗马及意大利半岛。

罗马持续与不愿顺服之拉丁人及伊达拉里亚人作战，直到三三八年将其联军打败，并重新改变与他们的关系：罗马现在与被其击败之城邦签订个别条约，规定双方权利义务。随后罗马跨过亚平宁山脉，与强悍的萨莫奈（Saminite）人进行三次战役。这是罗马统一意大利过程中最艰巨的战役。萨莫奈人是说奥斯肯（Oscan）语的意大利部落联盟，居住于亚平宁山中南部，主要以放牧为生，只有少数的城镇。但萨莫奈地区（Samnium）人口相当稠密。他们山中设有许多山头据点，见证他们也常从事掠夺以及战争。罗马人与萨莫奈人进行过三次“萨莫奈战争”。第一次（三四三至三四一年）是为争夺坎帕尼亚平原的控制权，因为当时这地区的第一大城卡普亚（Capua）无法抵抗，向罗马求援。在经过几次胜利后，罗马控制了坎帕尼亚地区。第二次战争（三二六至三○四年）则是罗马征服整个意大利最关键性的一战：罗马在三二一年在一个叫考丁叉路（Caudine Forks）的山间窄道里，被萨莫奈人团团围困，罗马人弃械投降，从敌人以枪矛架起的“牛轭”下低头走过，以示屈服。但罗马人之后持续采取攻势，不断地消耗萨莫奈人的战力，迫使他们屈服。第三次（二九八至二九○年）则是萨莫奈人联合伊达拉里亚人、高卢人、翁布里亚（Umbria）人等联合与罗马作战。但罗马在二九五年山提农（Sentinum）以及二九三年在阿揆隆尼亚（Aquilonia）的胜利，终于让萨莫奈人及其他意大利民族俯首称臣。尽管如此，萨莫奈人仍是不屈不挠，在九一至八八年的意大利“同盟战争”（Social War）中，扮演主导角色，仍是一样强悍，也是罗马独裁官苏拉（Sulla）秋后算帐的最主要对象。

击败萨莫奈人后，罗马人的势力进入意大利南方，与当地居领导地位的希腊城邦他林敦（Tarentum）发生冲突。他林敦在二八一年要求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援助；接下来两年皮洛士率领一支两万五千名以马其顿装配及战术训练的重装方阵兵团士兵以及二十头战象，与罗马人交战两次，皆得胜利，但自己也损失惨重，后来这惨胜被称为“皮洛士式的胜利”（Pyrrhic Victory）。所有这些胜利对皮洛士而言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所率领的军队无法面对源源不绝的罗马军团，而他的个性就像“攻城者”德米特里一样，需要不断地冒险。所以当意大利战事没有进展时，罗马不愿谈判，恰巧西西里邀请他去对抗迦太基，他欣然接受，但除了自封为西西里王之外，亦徒劳无功。所以再返回意大利与罗马人交战；在贝尼温敦（Beneventum）打平后（二七五年），回到希腊继续冒险，直到他闹剧般地在阿哥斯结束生命（二七二年）。罗马人与皮洛士的交战，是罗马军团以波里比阿所描绘的战术编组及装配和当时希腊化世界最杰出将军所率领的马其顿重装方阵兵团，直接对阵。虽然罗马并未战胜，但这可能是因为罗马完全依照最有利于希腊方阵兵团的方式来应战。

元老院在这一连串的扩张中扮演领导的角色，所以它的威望大为提升，逐渐由原来的咨议机构转变为最具主导性的政治体制。因为罗马经常发生的战争使得国家必须特别器重有经验的将领，而这只有在元老院方能觅得，而若有院外人士表现杰出，亦会被提拔进入院内。当皮洛士派遣特使到罗马谈判议和，特使的印象是元老院成员优秀杰出，每位都堪为国王。另外，这群元老贵族必须以战争来争取荣誉，所以会积极寻求战争的机会，而这些战争也是“新贵族”崛起的背景之一。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见到这样的事实：罗马内部政治整合的成功与对外扩张的顺利，似乎携手并进，相互加强；内部共识的建立是扩张的基础，而扩张成功促使新共识必须建立；处于领导地位的贵族及提供作战兵力的平民之间的沟通及谈判具有耐心及愿意妥协，之后产生的新共识又成为新扩张的基础。

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整合不仅发生在罗马城邦内，也发生在罗马及盟邦之间。这便是所谓的“意大利联盟”的形成。当时罗马人并未使用“意大利联盟”来指称某种制度；这名词是方便用来论述罗马人如何组织他们的盟友成为一个相当合理及具有实用功能的系统，让他们与罗马合作，进行扩张，而且可以动员前所未见的人力及物力资源；而且罗马与盟友在扩张中经历共同的历史经验，将意大利各民族融合凝聚在一起。

首先，罗马定义公民权为一束政治及法律的权力，所以拥有公民权并非由于出身血统（如希腊大部分城邦），也非文化因素而来。罗马人所关注的是将人类历史上最宝贵的资源——人，引进到罗马政体之内，因为他们需要军事武力来扩张。这与希腊对公民权相当限缩、不愿与他人分享的观念十分不同，这使得希腊城邦永远都是小型社区，而且往往越来越小。[74]

在二六四年时，罗马大约控制意大利半岛百分之六十五的土地。所有这些与罗马结盟或因战败而臣服于罗马的人民，会因为历史因素而分为四个类别。

（1）没有参政权的公民（civitas sine suffragio）。这是“潜在”公民权。这些人通常被并入罗马政体中，享有罗马法律的保护，但因为居住在偏远之处（如坎帕尼亚），无法实践他们的参政权。

（2）拉丁权（ius Latini）人民。这是拉丁人社区以及拉丁人所形成殖民地的居民；他们享有部分公民的地位，但只要他们满足条约所规定的军事义务，可以在移居罗马时，享受完整的公民权。这些社区或殖民地都必须与罗马各自签约，但它们之间则不可以。

（3）罗马人为在拉丁殖民地之下设置一个叫“城镇”（minucipium）的等级，其权利义务不甚清楚，但其社区之领导人物常被赐予罗马公民权，方便罗马吸纳这些地方精英。

（4）条约同盟（socii），包括意大利及希腊民族的不同社区、部落或城邦。他们依据与罗马签订的个别条约来规定权利及义务，特别是对罗马提供军事服务，但仍可保有自己的法律及体制。

这些等级的人民都有提供罗马军事服役的义务。罗马将这些缔盟及臣属的人民归类分等，让罗马可以分而治之。与罗马关系越密切的，享有越多的权力，反之则不然。在这样的架构下，罗马人可以依据表现来升降他们的地位，重新定义他们与罗马的关系以及权利义务内容。这使得所有意大利人民都仰望罗马，追求他们自己的福祉，而这进一步使得罗马对外扩张的事业成为意大利联盟的共同事业，因为罗马成功扩张所获得的利益将由罗马及盟邦所共享。这些盟邦为罗马提供至少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战力，所以能够承受汉尼拔战争所带来的毁灭及耗损。二一八至二一六年的特雷比亚（Trebbia）、特雷西米尼湖（Trasimene）以及坎奈（Cannae）三场战役，任何一场战役的损失都足让希腊化王国立即停止运作，元气大伤，但罗马却越挫越勇，兵源也仍源源不绝。所以意大利联盟是罗马与其盟友之间通过一种臣服—联盟—参与的过程，之后一起携手进行权益及风险分担的战争冒险创业行为，这个联盟以共同利益将罗马及其曾击败的盟友结合一起。另外，这些加入意大利联盟的城邦或社区，在政治上往往会像罗马由元老院来领导一样，是由当地少数精英阶级来领导，甚至复制罗马的政治结构；它们认同罗马，而罗马保障它们的利益，这点也使罗马与盟邦更休戚与共。

罗马这种将其臣服社区列入伙伴关系，与希腊世界一旦战胜，常将战败国男人全部处死，小孩妇女贩卖为奴，大不相同。罗马固然是意大利联盟扩张时最大的获益者，而盟邦以其贡献兵力而成为“小股东”，分享较小的利润。但罗马更多的成功，意味着有更多盟邦的加入，这就像滚雪球一样，动能越来越大，甚至发展到意大利之外，仍然继续运作。之前所提及之帕加马王国及罗德岛分割战败之叙利亚王国的小亚细亚领土，即为一例。[75] 这种以罗马为首的意大利联盟与现在现代上市公司

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是专门从事政治军事征服，以获取利润的事业。而这样共同奋斗的历史经验，更将罗马与盟邦更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即使罗马在二一八至二一六年连续战败，盟友大多仍然忠诚，不被汉尼拔离间；但刚征服的高卢部落及南部希腊人，则尚未被整合成功，所以容易脱离，屡屡叛变。罗马政治的成功固然使它获得军事的成功，但在进行这些活动时的共同经验，也在塑造新的罗马历史。

所以这一系统提供给罗马足够的人力及物力资源去进行海外征服，而且经常不只开启一个战线，并且可以连年征战，例如第二次布匿战争（二一八至二○二年）与第一次马其顿战争（二一五至二○五年）同时发生，然后接着又发生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二○○至一九七年）。罗马盟邦也将罗马的战争视为自己的战争。而这种关系只有在罗马要求盟邦贡献越来越多，但罗马却越来越垄断所有的利益时，才逐渐崩溃。发生在九○年前后的意大利“同盟战争”即是这样的结果。另外，迦太基能够与罗马进行三次大战，前两次都为期甚久，或许证明迦太基的海上帝国所能创造的财富以及政治统治也名不虚传。相反地，马其顿王国与叙利亚王国，一战即败，投降议和，也显示出其政治整合及组织动员能力的不足。

叁 中期罗马共和的“帝国主义”

罗马虽然是个善于政治组织以及讨伐征战的民族，但并不是很会反省自己对别人做了何事以及别人如何感受。这一连串的征战以及胜利对他们而言，仿佛是自然界的秩序：神明的力量以及他们的虔诚（pietas）保证他们的成功，而成功又证明眷顾罗马的神意。在这时期虽然他们扩张征服的对象包括高卢人，但其他的常都是在文明上更为先进的民族，所以类似公元十九世纪“白种人负担”的“使命感”，大概还不存在。但对罗马人而言，征服高卢人仍是为自保、掠夺以及致富，因为高卢人近在咫尺。但整体而言，我们可以问一下：波里比阿所描绘之中期罗马共和的扩张（特别是针对希腊化世界）是否为帝国主义的行为?

公元十九世纪德国罗马史学家蒙森（Theodore Mommsen）提出“防御性之帝国主义”（defensive imperialism），认为罗马的扩张行为其实是一连串的预先防范的自保行为，而这是源自于三八六年高卢占领罗马以及后来汉尼拔蹂躏意大利。这听起来像是在为某些行为找借口辩护，就像他为当代殖民主义者所做的说辞之一。至于罗马人会派遣叫fetiales（单数fetial）的祭司到边界去，以规定格式宣告罗马的冤屈及补偿，然后在未得到适当回应时，会将一支矛丢掷到敌人疆域，请神明见证的仪式，为自己的战争行为争取神意的许可。[76] 这绝不能解释说罗马的行径不是帝国主义般的；反而是将神明找来背书。

格吕恩（Erich S.Gruen）从法理及军事占领来讨论“帝国主义”。他认为即使在二世纪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罗马也都还称不上“帝国主义”，而后来马其顿设省，是不得不为。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哈吕斯（W.V.Harris）：他基本上是根据古典史家，如修昔底德，认为如雅典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永远不满意现状，总要求更多的现象，在希腊文

叫pleonaxia。罗马就他而言，其扩张就是pleonaxia使然，而这是因为罗马社会原本就是极为好战，精英阶级之中的激烈竞争是以战功来衡量成就。奥古斯都在他的《神圣奥古斯都的丰功伟绩》（Res Gestae Divi Augusti）提及罗马两面之神耶奴斯（Janus）神庙在罗马战争期间会打开庙门，关门则代表罗马世界普世太平，而耶奴斯神庙在罗马历史中第二次关门是在他任内。换言之，罗马的整个历史终究是不断地战争；和平反而是异常。另外，之前已经提及之“意大利联盟”本质上就是以战争来获利的军事动员机制，而罗马为“超级大股东”所形成的“企业”，必须以战争及胜利来证明自己的领导地位。很多人甚至怀疑：罗马的扩张行为在古代世界恐怕不是单独现象或是异数；其不同之处或许在它是如此迅速、如此有效、如此大规模以及如此成功。

但讨论这样的问题有其盲点：执行帝国主义行为的人不太常承认自己如此，而这又常涉及如何定义“帝国主义”这名词。格吕恩及哈吕斯的不同见解，部分正是根源于此。但就那些非罗马的国家，无论是曾经被其击败者（叙利亚王国）或是其盟邦（帕加马王国），或是没有太直接关系者（如比提尼亚王国），它们又如何看待罗马？因为没有“受害者”，又何来“帝国主义”？他们的资料都是集中在一六○及一五○年代，所以态势应该相对明显。罗马即使在那时候实质占有的地方仍多局限在意大利波河平原、西西里及撒丁，所以军事占领不一定是罗马成为“帝国主义”的要件。这些资料有两则是出自波里比阿，[77] 但不在译文之中，另一则是碑铭。[78]

如果我们有更多更早的资料，或许对所谓罗马“帝国主义”发展的过程便会理解更多。但我们其实已经可以从罗马如何仲裁亚该亚联邦与并入联邦后之斯巴达的冲突，还有菲利普五世在色雷斯扩充时，[79] 屡屡遭受投诉，屡屡仲裁失利中，感受希腊人（无论是盟友或战败者）对罗马的行为敢怒不敢言。但以下三份年代稍晚的资料应该更清楚地透露出希腊人对罗马帝国主义的看法，特别是这三份资料都在波里比阿第三书

四章中被提及，他想把原来《历史》从二二○到一六七年的范围延伸到一四六年，而一六七至一四六年对波里比阿而言的意义是："因此本书之最后成就将会是去确认每个民族在被征服，进入罗马统治之下，直到之后所发生之普遍动乱及剧变那段时间，他们的处境究竟如何。"波里比阿所谓的统治在法理上并未发生，因为这些国家仍有自己的君王及军队，但这三份资料所透露出的处境，则似乎有雷同之处。以下讨论顺序是依这三份资料的年代先后。

安条克四世发动第六次叙利亚战争（一七○至一六八年）已经在之前论及。这战争的发生时间恰好与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一七一至一六八年）部分重叠，而罗马在一六八年由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二二八至一六○年）接任统帅前，战事十分不顺，所以当安条克四世攻到埃及边防要地培留西温（Peleusium），即将以托勒密六世（一八一至一四五年在位）之舅的身份接管埃及时，恰好传来马其顿战败，罗马特使莱纳斯（Gaius Popilius Laenas）等人已到达培留西温的消息。安条克四世年轻时曾经在罗马当人质，与莱纳斯是旧识，在见到时趋前致意，但莱纳斯没有回应，只交给他一份元老院命令的蜡版，要他先读完再说。国王读完，回答说他必须询问他的国政顾问有关这些新的发展。莱纳斯并没说话，而是以一根葡萄藤蔓的枝干在国王周围画一个圈子。接着波里比阿又说：

> （莱纳斯）告诉他在踏出这圈子之前要先回应这个信息。国王对这样的傲慢深感震惊，但在迟疑些许时间后，说他愿意做任何元老院要求他做的。在那时候莱纳斯及其同事才和他握手，并且有礼地欢迎他。元老院命令他立即结束与托勒密的战争。所以在指定的数日之内，安条克将军队撤回叙利亚，对所发生之事大为沮丧，但却必须向现况低头。莱纳斯及其同僚在亚历山大进行调解，敦促国王们要保持和谐。指托勒密六世及托勒密八世之间的冲突。以这种方式罗马人在埃及濒临毁灭之际，拯救了托勒密王国。

接下来波里比阿引进命运女神来说这时间的巧合，因为这是史家常提及的议题，所以在此顺便引用：

> 命运如此安排有关佩尔修斯及马其顿人的事情，所以在亚历山大及整个埃及被逼迫到绝境时，因为佩尔修斯的命运先被决定这事实而得到解救。假如这没发生或是尚未确定，我不相信安条克必然会遵守这样的禁令。

这些文字十分出名，他显示出罗马仅凭三位特使，便可以外交方式来执行元老院的意志，不费一兵一卒，不仅逼迫叙利亚国王撤军，而且也可以调解托勒密兄弟的争执。虽然史家也怀疑若非时间巧合，安条克恐怕不会撤军，但这不是很有说服力的假设。之后安条克四世或许为了在国人或邻国面前扳回一城，恢复颜面，所以在一六六年于首都安提阿近郊达福奈（Daphne）举行盛大阅兵游行，展示国力，[80]但立即引来罗马元老院派委员会的调查，最后虽然无事，但罗马在犹太人叛变时却给予外交上的支持，刻意削弱叙利亚王国。之后德米特里欲返回叙利亚接任王位，元老院不愿让成年、充满活力的德米特里回国，宁可见到叙利亚由幼主当政，让国务陷入混乱，最后德米特里只好被迫逃离罗马返国。

第二份资料则是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一年。小亚细亚西北的比提尼亚国王普鲁席亚斯二世（Prusias II），虽然是佩尔修斯的妹婿，但在战争期间骑墙等待战事结果。但是从罗德岛被如何对待的经验，可显示出罗马已经将任何不积极表态以及全力贡献的国家视为不忠及敌对，所以普鲁席亚斯不得不亲自前往元老院致意。波里比阿如此形容他在罗马的行为：

> 大约在相同的时间，国王普鲁席亚斯到达罗马向元老院及将军们恭贺他们的胜利。他的行为完全不配他国王的身份地位，如我们可从以下之事来判断。首先当罗马使者来访，他将自己剃头来迎接他们，戴上白色瓜皮帽，穿上罗马公民服（toga）以及鞋子，简言之，就是将自己装扮成最近刚获公民权的解放奴隶（罗马的词语叫liberti）。在欢迎使者时，他高声宣布说："我是你们的解放奴隶，我要做任何事来讨好你们，要模仿你们的习俗。"实在难以找到比这更没尊严的说话方式。[81]当在进入拜见元老院的场合时，他停在面向会场的门槛，垂下双手，对地板及就坐的元老致敬，说出："万岁！我的救主神明！"几

乎无法能够有更没志气以及更像女人的薄弱以及卑屈。他在会见时与元老所说的话在语调上也相似，所以转述甚是不妥当。在以一种完全令人鄙视的方式行为后，他正因为那种理由而得到同情的回复。

这是一个极为夸张的例子，或许跟当事人的人格特质有关，但是那种恐惧，以及不惜卑躬屈膝，以求保全一切，令人印象深刻。

对极为讲求体面，而且也曾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出兵协助的帕加马王国，些许的独立政策，即使是有限的规模以及在自己后院发生，都还必须考量到罗马的因素。接下来这资料是封私人书信，内容显然不宜公开，不像其他还是会预设公共观众的希腊化时代的一般私人书信。它大约订年在一五六年，亦即阿塔罗斯二世在位初年。这是帕加马国王与佩西奴斯（Pessinus）[82]“神殿国”（temple state）祭司阿提斯（Attis）的来往书信，讨论要如何一起遏止经过百年还在肆虐、几乎是所有人公敌的加拉太人。帕加马国王首先向阿提斯致意，并且说明他之前与大臣在另外一地所得到的结论。回国后他再将此事交付议论，结果大臣及顾问皆同意之前的决议，唯有一个叫克罗鲁斯（Chlorus）的人独排众议，坚持要先征询罗马人。当时没有什么人附议，但是当一再琢磨时，他们越来越觉得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国王的逻辑是：

假如成功，结果必然是嫉妒、不悦及怀有敌意的怀疑，正如他们（指罗马人）之前对我兄长所表现的。

这里所提及的是因为欧迈尼斯二世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没有表现出彻底的积极，所以当加拉太人在一六八年对帕加马王国发动攻击后，罗马在次年开始间接鼓励加拉太人继续作乱；即使欧迈尼斯打败他们，罗马人还是在一六六年给予这群行径如盗匪或恐怖分子的人自主的地位。阿塔罗斯继续说：

但假如我们失败，那注定毁灭。因为他们必然不会动一根指头协助，而是满意地旁观，因为我们进行如此大的计划时，却没征询过他们。但假如我们遭逢任何挫折（但愿老天不让它发生），我们会因为得到他们的应允之后才行动，而得到协助，而且也可以在神明善意的

> 庇佑下，进行反击。我因此决定要在每个场合都派遣特使持续地去报告不确定的案子，而我们自己要做谨慎的准备，以备需要之时，能够自保。

从一九六年福拉明尼纳斯在科林斯地峡运动会宣布希腊自由解放，以及在一九四年他在与希腊人讨论从希腊枷锁撤军时，罗马驻军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科林斯卫城，行军返回意大利，那是段希腊人及罗马人的“蜜月期”。但三四十年后，则令人觉得沧海桑田。在上述这些地方都没有罗马驻军，但现在罗马仅凭特使或命令或只是当事人臆测罗马可能会如何反应，罗马意志便被遵守；另一方面，罗马人甚至会做出一些对当地人不利的决定，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威权，所以当罗马宣布提洛岛为自由港，罗德岛贸易立即一落千丈，无法再维持海军。所以要评论中期罗马共和的扩张是否为帝国主义，或许从这些接收端来看，可能比较具体，因为帝国主义加害者总必须要有受害人！

肆 中期罗马共和的重要人物

研究罗马史有许多方法，其中之一是阅读相关人物的传记，以他们的生平及事功为根据来了解相关的时代。波里比阿的历史也充满传奇性的人物，也对其中一些人物有所着墨，但都只是与其历史叙述相关时的事迹及作为，而无法窥得全貌，甚至有些时候会流于碎裂。以下仅以数位在中期罗马共和中最杰出、最值得一提的人物，给予简略的传记，使读者在进入波里比阿《历史》时，有个方便的引导，可以将波里比阿所提到的部分给予适当定位。以下人物，系依据时间发展的顺序来讨论。

一 雷古鲁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三○七至约二五四年）

他在二六七年第一次担任执政官时，攻占意大利前往希腊最重要港口布伦迪希温（Brundisium）。在第二次担任时，他领军进攻迦太基。他首先在西西里南岸埃克诺穆斯（Ecnomus）海岬赢得海战，然后登陆非洲，占领突尼斯（Tunis）。当时迦太基愿意求和，但是雷古鲁斯的条件严苛，无异于要迦太基无条件向罗马投降，所以被拒。但是次年自己反被打败并被俘虏。迦太基人释放他回罗马协商，但他在元老院之前坚决反对和谈，自愿回到迦太基，之后受酷刑而死。

二 汉尼拔（**Hannibal Barca**）（约二四六至一八三年）

汉尼拔·巴卡出身于迦太基武将世家，并在九岁时与其父哈密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这位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英雄，一起前往西班牙征战。在二二二年时，姊夫哈斯德鲁巴过世，他在迦太基得到西班牙军队的拥戴，接任统帅一权，时年二十五。他继续讨伐西班牙部落，但也透过外交（如婚娶西班牙女子为妻）来巩固对西班牙的控制。他在二一九年时围攻罗马盟邦萨贡托（Saguntum），八个月之后攻下；这是促成第二次布匿战争（或称“汉尼拔战争”）爆发的近因。罗马人原先决定要决战境外，所以指派二一八年的两位执政官分别前往西西里（然后再前进非洲）及西班牙，但汉尼拔亦采取相同战略，但行动更迅速，让罗马人措手不及。他在冬天横越阿尔卑斯山，到达北意大利。他的战略或许是希望离间罗马盟友，在战场上打败罗马，强迫求和，谈判条件；实质占领或许未曾在他的计划之内。

但在二一八至二一六年的提契诺河（Ticinus）、特雷比亚（Trebbia）、特雷西米尼湖（Trasimene）以及坎奈（Cannae）四场战役的胜利，都还是无法逼迫罗马人坐上谈判桌。这其实重复了当初皮洛士在意大利两次击败罗马之后，要求谈判的行为，但遭罗马拒绝，因为罗马人不会和敌人在意大利境内议和。汉尼拔虽然成功离间许多高卢人和南部希腊城邦（如他林敦）及坎帕尼亚平原的一些城邦（如卡普亚），但也造成额外负担，必须分派原来有限的兵力去协助驻军，但更重要的是罗马的意大利联盟十分牢固。因为第一次布匿战争后，迦太基不敢再挑战罗马海军，所以汉尼拔只能利用自己以及在意大利所争取来的有限人力及物力资源，继续奋斗。他在战略上，力求决战，却遇见“延迟者”费边以坚壁清野的焦土（scorched earth）政策来回应，以罗马源源不绝的兵力及物力来耗损汉尼拔有限的战力；费边认为除非有绝

对把握，否则不大规模交战，并以小规模接战来训练士兵。经过十余年，汉尼拔逐渐被圈围在南意大利布鲁提恩（Bruttium）地区一角，难有作为。但是他以领袖魅力、战略智慧以及身先士卒，将一支来自多种民族的佣兵给结合起来，未曾遭逢兵变，难能可贵。

他在二○三年因为国内危机，被迫返国，面对战术上与他一样优秀的“非洲征服者”西庇阿，结果因为自己一向最倚赖的努米底亚（Numidia）骑兵被削弱——大部分在马西尼沙（Masinissa）的带领下，转投罗马——最后汉尼拔在查马（Zama）战役失败；西庇阿提出极为宽容的条件，所以他极力推荐迦太基元老院接受。之后他致力于改革政府，在一九六年虽然被选为迦太基的执政官（suffete），但巴卡武将家族出身的汉尼拔始终与传统迦太基贵族不和，最后被迫流亡到叙利亚王国，成为安条克三世的座上宾；他的出现引起罗马人的紧张。一九○年叙利亚王国在麦格尼西亚战败后，他又被迫流亡，结果逃到比提尼亚王国，但无法逃避罗马人所派出之专员福拉明尼纳斯的追缉，最后在一八三年服毒自杀。

三 弗拉米宁（**Gaius Flaminius**）（殁于二一七年）

他是位罗马政治上的“新人”，是他家族第一位担任有“统帅权”官职的人。他在担任护民官时，是位知名的改革者，算是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前驱：在二三二年时，他以护民官在平民会议中通过立法，将国家“公地”（ager publicus）[83] 分给穷人。在二二三年，他违反元老院指示，向英苏布里（Insubres）人作战胜利，并赢得胜利大游行（triumph）。在二二○年他以监察官身份，修筑道路（Via Flaminia）以及罗马城内的赛马场（Circus Flaminius）。他被波里比阿形容成一位好大喜功的群众煽动家（demagogue），“让人民开始堕落”，并且因此导致二一七年特雷西米尼湖战役的失败，他死于该战役中。这反映出的是波里比阿在意识形态上的偏好，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所提及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

四 **“**延迟者**”**费边（**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rucosus**，**Cunctator**）（约二八○至二○三年）

他在二三三年第一次担任执政官，战胜利古里亚人（Ligurians），后来陆续在二二八年、二一五年、二一四年以及二○九年担任执政官，并且是二二一年及二一七年的独裁官。他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最主要的战略家。在二一七年罗马败于特雷西米尼湖后，他第二次担任独裁官，出面克服危机，决定不与汉尼拔正面交锋，改采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以罗马庞大人力及物力资源来耗损汉尼拔在意大利有限的部队。但因为这意味着任由汉尼拔蹂躏罗马及盟邦领土，所以极不受欢迎，所以人民为他取了“延迟者”（“Cunctator”，“Delayer”）的负面别号，原来因脸上有疣他已得到别号Verrucosus。在他卸任独裁官后，二一六年的罗马元老院改变策略，以加倍军力的八个军团及相同数量盟军在坎奈与汉尼拔决战，结果又是大败。这是罗马将近一千多年历史中最严重的战败。所以费边的消耗战略又再度被罗马采用十余年。但是当“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在西班牙击败迦太基，二○五年决定进攻非洲时，费边极力反对，但是不果；他逐渐因为“非洲征服者”西庇阿的胜利而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他的姓氏“费边”（Fabius），被用于英国的“费边学社”（Fabian Society），意为社会改革必须“谨慎、渐进”。

五 马谢勒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二七一至二○八年）

他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主要的罗马将领之一。在参加第一次布匿战争后，他于二二二年担任执政官，打败英苏布里人，赢得单打独斗，杀死敌军指挥官的最高荣誉（spolia opima）以及胜利大游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他最先在意大利服役（二一六至二一四），后来转进到西西里（二一四至二一一），攻占阿基米得（Archimedes）协助防御的叙拉古，运回许多艺术品作为战利品，开始罗马人掠夺文物的传统。然后他又回到意大利（二一○至二○八年）服役。他与“延迟者”费边齐名，被称为“罗马之刀”，另一则为“罗马之盾”。但二○八年在维努西亚（Venusia）附近被袭丧命，成为波里比阿认为将军有更大职责，不应随意浪费性命的反面教材。

六 “非洲征服者”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二三六至一八三年）

他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那年（二一八年）同名执政官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的儿子。他是罗马最杰出的将军，堪与亚历山大相比。他在提契诺河战役（二一八年）中解救自己的父亲，也在坎奈战役（二一六年）中，重组败逃的罗马士兵。在二一一年他在西班牙远征的父亲及伯父，被汉尼拔之弟哈斯德鲁巴各个击破，双双阵亡，所以他在二一○年时，虽然资历不足，年纪甚轻（二十五岁），但却因为自愿远征以及其父、伯在西班牙的经营，被元老院赋予“行执政官之统帅权”（pronconsular imperium），史无前例。他前往西班牙继续其父亲的任务；首先他在西班牙攻占新迦太基城（New Carthage，二○九）；接着他在倍库拉（Baecula）打败哈斯德鲁巴（二○八年），但却使他流窜到高卢，去招募士兵，前往意大利，增援汉尼拔。他在二○六年以外交及武力平定西班牙，结束那边的战事。

在二○五年他又破格获选为执政官，计划攻打迦太基，尽管汉尼拔仍然在意大利流窜，而罗马主导战略的“延迟者”费边也极力反对。但西庇阿赢得辩论，在西西里训练军队，在二○四年横渡非洲。他在非洲的成功，迫使迦太基在二○三年召回汉尼拔。在二○二年他在查马打败汉尼拔，结束第二次布匿战争。他因为战功，所以有“非洲征服者”的别号。西庇阿在一九九年担任监察官，在一九四年再度担任执政官，反对福拉明尼纳斯从希腊撤军。在一九○年，他陪同其弟前往亚洲，攻打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三世，但因为生病，没有亲自在麦格尼西亚领军指挥。

他是位才气洋溢的人物，在许多事情皆有规范及前例的罗马政体中，常有“破格”情形发生，引起传统心态较强烈之罗马人的疑心，所以老加图（Cato the Elder）便曾以帐目不清质疑他弟弟。他挺身辩护，当

场撕毁帐簿，认为一位替国家击败安条克三世这极大威胁、为国家带回无比财富的人（阿帕米亚条约的赔款是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的十五倍，共计一万五千泰伦的银钱），无需拘泥小节，无需对这些指控做出回应，然后立即离开去进行祭祀，很多人也跟着离开，结果起诉不了了之。他虽然反对从希腊撤军，但在文化上是著名的亲希腊者；他的女儿考奈莉雅（Cornelia）便主持一个欢迎希腊文化的沙龙。晚年逐渐淡出政治，退休到罗马外，于一八三年过世。

七 福拉明尼纳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约二二八至一七四年）

他是罗马征服希腊东方的开创人物。他在一九八年破格获选执政官，年仅三十，受命到希腊进行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在一九七年于“狗头山”（Cynoscephalae）击败菲利普五世，并庆祝胜利大游行。在胜利后，他主导接下来的议和，并在一九六年于科林斯地峡运动会（Isthmian Games）时，宣布希腊自由独立，也说服罗马元老院从“希腊的枷锁”撤军，赢得希腊人热烈的正面回应。罗马之所以给予菲利普相对宽容的和约，并讨好希腊人，除了福拉明尼纳斯本身一向对希腊较为亲善，更因为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三世已经将势力延伸到小亚细亚，甚至跨海到欧洲，因此罗马必须争取希腊人及马其顿人的支持，以备即将发生的冲突。一九四年他正式从“希腊的枷锁”撤军，反驳伊托里亚联邦认为罗马之干预希腊，不过是让希腊从马其顿的主人换成罗马的主人，虽然这在后来确是实情，但当时的氛围是相当肯定罗马的作为。在一九五至一九二年他强迫斯巴达的纳比斯放弃阿哥斯，同时强化亚该亚联邦。当安条克三世接受伊托里亚联邦之邀入侵希腊，罗马元老院派他去巩固希腊人对罗马的支持。

他在一八九年担任监察官后，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在一八四年，老加图担任监察官，重拟元老院名单时，以德行不佳解除其弟的元老资格，更是对他的重大打击。在一八三年他受命到东方，要比提尼亚国王交出从叙利亚流亡到该国的汉尼拔，最后迫使汉尼拔自杀。他本身是罗马人中欣赏希腊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这不该与他身为罗马政治家的基本立场相混淆。对这些亲希腊的罗马政治家来说，名义上独立的希腊城邦都还是罗马的臣属，在政治上必须听从罗马指挥。

八 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二三四至一四八年）

常被称为“监察官加图”（Cato the Censor）或“老加图”（Cato the Elder），有别于在凯撒与庞培内战时，在非洲乌提卡（Utica）自杀的死硬派共和分子的同名后代（称为“乌提卡的加图”，Cato Uticensis）。老加图生于罗马附近塔斯卡伦（Tusculum）富裕家庭，是其家族第一位担任有统帅权官职的政治“新人”。他之迅速崛起，除了个人能力杰出外，也受到某位邻近贵族的提携。他曾经担任过“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在非洲征战时的财务官（quaestor），但因为对帐目斤斤计较，引起其不满，不过表现仍十分出色；之前他参加于二○七年在梅陶罗河（Metaurus），截击汉尼拔之弟哈斯德鲁巴（Hasdrubal）的战役。加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依循“荣誉进阶”（cursus honorum），依序担任市政官（一九九年）以及副执政（一九八年），最后在一九五年时担任执政官，并于一八四年被选为专事人口财产普查、发包公共工程以及以“道德查核”来重拟元老院名单的监察官（censor），这是一个极具威望的职务。对一位“新人”来说，能在一代之内完成所有这些荣耀，着实不易，因为罗马元老院一向轻蔑这些“新人”，视之为政治暴发户。

在其政治生涯中，加图一向采取保守立场，不喜欢那些以超人才气而且年纪轻轻便取得功勋的“破格者”，如打败汉尼拔的“非洲征服者”西庇阿或打败马其顿菲利普五世的福拉明尼纳斯。他也不赞成他们对希腊文化的支持。他致力于揭发政治丑闻及弊端，起诉任何在道德行为上他认为不如他的人。所以他起诉“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刻意阻碍他在政治上的发展，最后使他抑郁而终；他推动反奢侈法，来压抑因为大量财富流入后所引起的奢华行为。这些努力使他被选为一八四年的监察官。

在二世纪，因为与希腊世界的接触，希腊文化所向披靡，而加图似

乎成为拒绝这潮流的代表性人物。其实加图熟悉希腊文化，他所反对的是那毫无选择、盲目的崇拜，并视之为当日罗马道德沦丧的征象。他自己是位十分出色的文人，是拉丁散文之父，甚至是以拉丁文写作罗马史学的第一人（写给自己幼儿的大字版罗马简史）。他所留下的演说词，透露出他对希腊修辞学以及雅典演说家的熟悉。他亦著有医学、农业经营以及战争等的论文。他晚年曾经出使迦太基，调查迦太基与马西尼沙之间的冲突，但却十分惊讶迦太基的复原状况，认为罗马必须提早动手。当他回罗马到元老院报告时，他刻意让一些很大的新鲜无花果从衣袍落下，然后捡起来说这些是来自迦太基，而且只有三天旅行之遥。从此，他每次在元老院演讲，无论主题为何，总是以“迦太基必须被灭亡”（Delenda est Carthago）结束。有人认为第三次布匿战争爆发与他的坚持有关。无论正确与否，他并没见到迦太基最后被灭亡。

九 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二二八至一六○年）

宝路斯是一位成功的罗马将领，是二一六年坎奈战役身亡之同名罗马执政官的儿子。人格正直廉洁，喜爱希腊文化。他在一九一年担任副执政，服役于西班牙，在一八九年击败卢西塔尼亚（Lusitania）人。他被元老院派往小亚细亚担任专门委员，反对当时名义上攻打加拉太人，但四处搜刮的福尔索（Gnaeus Manlius Vulso）。在一八二年他担任执政官，一八一年庆祝击败利古里亚人的胜利大游行。但是他政治生涯的高潮是一六八年担任执政官，在皮得纳（Pydna）打败马其顿国王佩尔修斯，结束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据说他受命要严厉处分希腊，并全面搜刮掠夺唯一公开支持马其顿的伊庇鲁斯。他所带回来的财富如此之多，所以从那年起罗马公民不再缴税，但是宝路斯对此一介不取，唯一例外是佩尔修斯的图书馆。在罗马元老之中，他算相对贫穷，所以在死后必须归还妻子嫁妆时，并无足够现款支付，必须变卖其他家产。

他生前有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产有二子，分别过继给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最重要两位人物的家族——“延迟者”费边与“非洲征服者”西庇阿，他们是史学家波里比阿在罗马的保护人；第二段婚姻则又有二子，但是在他庆祝一六七年胜利大游行前后数日内相继身故。

十 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约一八五至一二九年）

他是一六八年第三次马其顿战役英雄宝路斯之子，过继给“非洲征服者”西庇阿的儿子，延续西庇阿家族香火。他在一五一年自愿在西班牙服役，并在一四九年以军团营长（tribunus militum）身份表现突出。虽然他不及龄，资历也不够，但仍在一四七年被选为执政官，并受命结束第三次布匿战争（一四九至一四六年），摧毁迦太基城。这也为他赢得与其养祖父相同的别号：“非洲征服者”（Africanus）。他在一四二年担任监察官，想以较高道德标准来履行职责，但受同事所阻。他在一三四年再度担任执政官，受命到让许多罗马将领及军队遭到歼灭及羞辱的西班牙，进行战争。他仍以如在迦太基所采取的步步为营的系统性围攻，在一三三年强迫努曼西亚（Numantia）的西班牙人投降，结束罗马中期共和最不光彩的一页。在回到罗马后，他反对大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一三三年的土地改革，使他失去许多人心。他之后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过世，被认为是遭到谋杀，甚至有人怀疑凶手便是他的妻子，而她正是格拉古的姊妹。

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是史学家波里比阿的密友，是他在罗马当人质时的主要保护主，同时也为他提供许多机会去进行历史及地理的探索。他熟悉希腊文化，是文艺的赞助人，所以他常出现在西塞罗许多对话录中。但另一方面他在人格及个性上却也非常罗马及传统，这使他成为这时候能够优游于这两个传统的罗马人。

---

[1] 例如，波里比阿一书6章：“命运女神将世界里几乎所有的事物（hapanta ta tes oikoumenes pragmata）都引导到相同方向”。

[2] 这段约五十年时间的历史称为Pentaconteia。

[3] 皮洛士曾在托勒密埃及做过人质。

[4] 或许再加上以赛拉纠斯为主的西西里岛。

[5] 但根据希腊人算法会将头尾那两年皆纳入计算，故是五年。

[6] Polis，复数poleis。

[7] Democratia=demos+cratia=people in control.

[8] Oligarchia=oligoi+archia=（a）few people in power.

[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Ⅰ，1252a24-1253a7是论述城邦起源非常重要的一段文字。他认为唯有希腊人具有理性（logos），而具有理性的人才会居住在城邦之中，所以从这里可以推论城邦可以抽象地形容为一个“理性论述空间”，是一个有理性之希腊人进行议论决策，谋求共同福祉的社区。城邦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于是不仅止于自保，而是追求美好的生活。而相反地那些无法居住在城邦的人是没有理性的野蛮人，所以亚里士多德引用一位叫赫希尔德（Hesiod）的诗人说：“希腊人理当统治野蛮人。”亚里士多德又说：“所以从所有这些，很明显地市民城邦是因自然之过程而存在，以及一个人很自然地存活在城邦之中。任何人若非偶然之故，而是由于其本性使然，以致不属于城邦，必然是次人类或者是超人类。他正如荷马所责骂之人是位‘没有亲属、法律或灶火’之人。任何如此之人必然是好战者；他正像在一盘棋戏中孤立的棋子。”

[10] 何以波里比阿对雅典政治家中，对特密斯托克里斯情有独钟，并未详细说明，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最像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而这正是史家心中最理想的政治家（九书16章）。另外，正如所引用“狐狸”与“刺猬”的比喻，特密斯托克里斯正是典型的“狐狸”型的人物。

[11] Eunomia，good law and order.

[12] Isonomia，equality in law.

[13] 普鲁塔克《莱克格斯传》8—9。

[14] 有关agoge原意为“引导”，类似雅典的paideia“教育”，都是为那些未来公民进行教育训练以及“社会化”的措施，作为公民养成的预备。在成为公民后，仍然会有类似措施（如斯巴达公民轮流做东聚餐，称为syssitia）来继续强化公民团体的认同。请参考色诺芬《斯巴达宪政》（Lacedaimonian Constitution）v.2-5。

[15] 这种力求所有公民皆有相同经济基础、教育训练、社会化过程以及从事相同的政治及军事志业，使得斯巴达公民有另一个称呼，homoioi，“相同之

人”。

[16] 普鲁塔克《莱克格斯传》7.1—2；参考色诺芬《斯巴达宪政》v.2-6。监政官有些像罗马的护民官，代表人民的利益，但在斯巴达却也是负有极大实权的行政官员。

[17] 斯巴达这种恐惧外人、排斥外人（xenophobia），请见普鲁塔克《莱克格斯传》27.3-4。

[18] 科林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分析了斯巴达那种希腊文称之为apragmosune（“不进取”或“不好事”）的特性（修昔底德Ⅰ.69.4-5），与雅典的polypragmosune（“积极进取”或“多管闲事”）形成对比（修昔底德Ⅱ.68.5-8；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20-21）。

[1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Ⅱ，1270a15-1270b6。

[20] Koine Eirene，Common Peace，或以斯巴达特使为名的安塔西达斯（Antalcidas）和平条约。

[21] 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希腊描述》Ⅷ.27.2；Todd no.132。这总共将四十余个村庄合并而成，规模相当大，所以称为“大城”（Megalopolis=Megalo+polis，great city），这是史家波里比阿的家乡。

[22] 波里比阿一书31-39章。

[23] 波里比阿五书36章。

[24] 波里比阿五书36章。

[25] 例如《理想国》第一书开始时，即是苏格拉底刚参加完在雅典外港派瑞亚斯举行的班迪斯庆典，回到雅典城。

[26] 包括至少七次的联姻，包括伊庇鲁斯的公主、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皮雅丝（Olympias）。

[27] 叫“塔格斯”（Tagos）。

[28] 根据雅典的主要协商人之名而称为“费洛克拉底斯和平条约”（Peace of Philocrates）。

[29] 亚历山大认为这是他祖先。

[30] 特别是叙利亚王国建国始祖塞琉西一世与阿帕玛的结合，他的儿子安

条克一世（Antiochus Ⅰ）是混血儿，而这种身份相当适合他来统治地域广阔以及民族多元的塞琉西王国。

[31] 原来叫阿瑞代尔斯（Arrhidaeus），改名为菲利普三世。

[32] Age of the Diadochi（=Successors）。有些学者会将diadochi一词仅局限在与亚历山大同时代的人，而另外称他们的后代（如安提柯二世或安条克一世）为epigoni，亦为“后代”之意。

[33] 原头衔是chiliarch（leader of a thousand），在体制上像是宰相的位置。

[34] 他大概有十三位子女，其中女儿（及孙女）所婚嫁的“继承者”包括了托勒密一世（一女一孙）、最资深及最有希望（但被欧迈尼斯杀死）的“继承者”克拉图勒斯（Craterus）、德米特里一世、波帝卡斯、莱西马克斯等。

[35] 因为德米特里将女儿史特拉托妮凯（Stratonice）许配给年纪足为其祖父的塞琉西作为妻子，所以德米特里受到礼遇，但每天饮酒浇愁，在二八三年喝死自己。因为塞琉西之子爱上继母史特拉托妮凯，后来父亲让出，让他们结合。这种“继承者”之间联姻的情形十分明显。

[36] 这四都城由首都安提阿、其港口赛流基亚（Seleucia），军事大本营阿帕米亚（Apamea）以及其港口雷奥迪凯亚（Laodicea）组成。

[37] 波里比阿五书34章。

[38] 提供船只协助德米特里返回叙利亚的曼尼拉斯，即是代表六世到罗马反驳托勒密八世的指控，详情请见波里比阿三十一书12章。

[39] 系谱里的时间皆为在位时间。其中M代表结婚，而其旁之数字代表与其邻近之人第几次结婚。此体例在以下系谱中皆同。

[40] 即二七○年代流窜到小亚细亚内陆的高卢人，在希腊文称为“加拉太人”，其在小亚细亚内陆所定居之处，位于今日安卡拉附近，称为加拉太（Galatia）。

[41] 因为攸关原来皇后名分，所以亦称为“雷奥迪凯战争”（Laodicean War）。雷奥迪凯后来因为支持另一位儿子“鹰隼”安条克（Antiochus Hierax），与塞琉西二世争位，造成小亚细亚一度独立于叙利亚王国之外，后来才逐渐被收服。

[42] 帕提亚及巴克垂亚，可能分别是是古代的“安息”及“大夏”。

[43] 这在小亚细亚，而非四都城之一。

[44] 但不再坚持希腊城邦需要自由自主，所以这些理想显然是政治宣传。

[45] 波里比阿三十一书11—15章。

[46] “那给予的人”，“he who gives”。

[47] 波里比阿三十六书17章。

[48] Athenaeus Deipnosophistae VI.272c=FGrH 245 F1.

[49] 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最偏好的政体，但亚里士多德仅称之为“政体”（politeia）。

[50] 此战争（二六七至二六二年）是依据当时在雅典提案向马其顿宣战之人而命名。相关决议碑铭，见M.Austin no.61及Burstein 56。

[51] 波里比阿六书44章。

[52] 原意为“邻居之联盟”。

[53] Asylia，“免于syla”，今日“asylum”“避难所”一词的由来。

[54] 克里奥米尼斯将公民权的限制大为松绑，所以增加许多兵源，但这种实际的做法在希腊世界实属少见。相反地，这种作法反而与罗马的较为相似。请见罗马部分之相关讨论。

[55] 岛上有三个城邦，分别为林德斯（Lindus）、伊亚来色斯（Ialysus）和卡密勒斯（Camirus），在四○八年或四○七年联合形成一个国家，首都称为罗德（Rhodes，“玫瑰”之意）。

[56] 波里比阿三十书31章。

[57] 因为尚未称王。

[58] 在罗马帝国时代尤其重要，可参考公元二世纪的亚历士泰迪斯（Aelius Aristides）的《神圣论述》（*Hieroi Logoi* ）六篇。

[59] 波里比阿二十二书20章。

[60] Michel Austin nos.248-251关于阿塔罗斯三世；no.289关于托勒密八世。

[61] Athenaeus Deipnosophistae V.201b-f，203f-203e（= Michel Austin no.258），系关于二七九/八年之游行。

[62] 背景及酒神阳具颂（ithyphallic hymn）全文，请见Athenaeus Deipnosophistae VI.253b-f；Burstein 7；M.Austin no.43。引文中的“海神”或许指其在三○六年于塞浦路斯击败托勒密，而爱神则影射德米特里的许多风流韵事。

[63] 这位戴奥尼素二世正是柏拉图三度前往西西里，希望调教为“哲学家国王”的人；但哲学家显然识人不明，结果自己被软禁。柏拉图在他人协助下，仓皇逃回雅典，回去主持他的学院。

[64] 他在三一四至三○四年以僭主身份在位，在三○四至二八九年则以国王身份在位。

[65] 这fasces是由棒棍及斧钺捆绑一起而成，象征执政官具有惩罚及处决之大权。

[66] 这仅由平民组成，所以不同于由全体公民所组成之各种“公民会议”（comitia）。“公民会议”可以根据军事负担、部落或居住区域来组成，各有其权限。

[67] 这常与军团里的tribunis militum（可译为“营长”）相混。

[68] Plebiscitum，复数plebiscita，这单词充分反映出是plebeian阶层所通过的决议。

[69] 这是Licino-sextian law，见李维《罗马史》六书35章，以及波里比阿六书38-42章。

[70] 李维《罗马史》十书6及9章。

[71] N.Lewis & M.Rheinhold Vol.1 no.42.

[72] 波里比阿三十一书29章。

[73] “大多数人的作法”或“祖宗成法”。

[74] 马其顿菲利普五世了解这种观点，所以在他二一七及二一五年写信给色萨利的官员时提及罗马人在这点的开放所能带来的好处。参考M.Austin no.75。

[75] 但反例则是伊托利亚联盟，它参加第一和第二次马其顿战争，自认贡献甚多，却没分配到所要的战利品，愤愤不平，所以引进安条克三世进入希腊，转而对付罗马。

[76] 哈利卡纳苏斯的戴奥尼素（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罗马古文

物》二书72章；李维《罗马史》一书32章。

[77] 有关叙利亚王国为二十九书27章；有关比提尼亚王国为三十书18章。

[78] OGIS 315 VI（= M.Austin no.244）.

[79] 一九六年和约并未禁止。

[80] 波里比阿三十书25章。

[81] 这里波里比阿的原文有缺漏。

[82] 此处是小亚细亚最重要的大地之母居比力（Cybele）祭祀地。

[83] 在此是指“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的公地（Ager Gallicus）。

英文版导读[1]

沃尔班克（F.W.Walbank）

1.背景

征服多数为希腊人之东地中海地区，是罗马人崛起为世界强权的主要一步。二○○到一六七年是决定性的年代，而我们对这些年的知识要归诸希腊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他的一生与这时代的一部分相重叠，而且时运让他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罗马人。对当代希腊人来说，罗马所带来的冲击是个既惊心动魄，但也沮丧心寒的经验，充满许多问题。即使在罗马主宰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之后，也并非每个人都能了解这新关系的严峻现实。为了向自己国人同胞阐释那种将人力资源、军事技能及强大战力和在逆境中反而令人倍感威胁的坚毅不挠，以及道德上的谨慎自持（有时候这和自欺混在一起），加总起来的无比结合，形成罗马统治世界的基础，所以波里比阿才写作他的《历史》。如今在一个他们必须学习与罗马主人共同生存的世界里，他希望如此的知识能够协助希腊人去面对会发生的政治问题。

本书最终的篇幅涵盖了二六四到一四六年。在这段时代刚开始时，希腊化主权国家的系统仍然稳固，而这大致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从希腊到印度的东方，然后在三二三年过世引发的争夺下，所逐渐浮现出的形态。在马其顿、叙利亚及埃及总共有三个主要王国出现。马其顿是由本土的安提柯（Antigonid）王朝所统治。与其他地方相比，马其顿王权比较不那么专制独裁，而且还保留一些原始的特征。马其顿贵族对于自己能够坦率地和他们国王对话及做事的传统相当自豪。但在其他地方，马其顿出身的国王则统治着被征服的不同族群。在埃及，亚历山大的将军托勒密（Ptolemy），占据法老的领土及王位。他的后代借着希腊及马其顿统治阶级及高度发展官僚制度的协助，榨取并利用埃及财富。叙利亚则是由亚历山大另一位将军塞琉西（Seleucus）的后代统治。这是一个绵延辽阔，但组成松散的城邦、小国、世袭藩属、神殿邦

国等的混合体，许多不同民族的人居住其间。最初塞琉西（Seleucid）王国由小亚细亚延伸到印度；但在公元二六四年时，许多的东方行省已经分裂离去。同样在西方，小亚细亚中有几个独立的王国，如比提尼亚（Bithynia）、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以及帕加马（Pergamum）。帕加马在三世纪期间崛起成为一个主要强权。它的统治者阿塔罗斯（Attalid）王朝，随着他们战胜四处掠夺以及恐吓安那多利亚希腊城邦的加拉太（Galatia）部落，因而获得财富、领土及威望。后来他们以罗马忠诚合作者之姿出现在波里比阿的史书中。他们的首都帕加马城以及托勒密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成为希腊化时代世界的两大文化中心，在赞助艺术、文学、科学和学术研究上，先后与雅典一较长短，进而超越。

希腊本土仍然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城邦国家，但一直生活在马其顿王国主宰的威胁，甚至有时候是实质的支配下。雅典、底比斯以及斯巴达这些在稍早世纪知名的城邦国家，仍然设法追求独立的政策（虽然底比斯已经衰败，而雅典在三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受到马其顿驻军的占领）。跨过爱琴海，罗德岛（Rhodes）这个海洋共和国，则相当安稳地在岛屿上继续生存，与诸位国王维持友谊关系，并凭借商业贸易以及国王恩惠而致富。然而在政治上，现在最重要的希腊国家组织是同盟。在希腊西北部落后的伊托利亚（Aetolia）民族，在三世纪期间扩张，控制特尔斐神殿及其著名神谕和节庆所具有的威望，往东兼并远达温泉关（Thermopylae）的领土。自从二七九年以来，伊托利亚人，这些（Thucydides）在五世纪时几乎不被修昔底德视为希腊人的人，却因为击败凯尔特（Celt）盗匪的入侵，保存特尔斐神殿，享有极大以及被四处宣传的盛名；这些盗匪与那些被帕加马阿塔罗斯王朝在小亚细亚击败的蛮族，两者有亲属关系。

伊托利亚联邦在希腊南方有亚该亚（Achaea）联邦与之分庭抗礼。沿着科林斯湾南岸原有个古老但名存实亡的亚该亚地区城邦同盟，从三世纪上半叶开始复苏。在二五一年阿拉托斯（Aratus）将他自己多利安

族裔的城邦西息温（Sicyon）并入亚该亚联邦里，之后开始主导联邦的扩张，直到它涵盖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us）许多地方。

这简单的轮廓便是希腊化时代世界的形态，而其瓦解正是波里比阿的主题。但是开始他史书的导论性前两书，所描写的事件却是发生在远离希腊之处。在二六四年，罗马及迦太基之间为了西西里海峡旁的迈萨拿（Messana）城发生战争。强大的商业城市迦太基位居北非海岸，靠近突尼斯，在这时候控制一个组织松散的帝国，涵盖的黎波里（Tripolis）、努米底亚（Numidia）及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的海岸，远达西班牙，还有西西里许多地方。就罗马人而言，他们最近刚征服整个意大利半岛，包括南方希腊城邦，现在借着联结良好的殖民地及盟邦网络之助，控制住意大利。两大势力范围间只有一片狭窄的海道分隔，因此只需迈萨拿的一场冲突，加上其中敌对双方分别求助罗马及迦太基政府，便点燃了第一次布匿战争（二六四至二四一年）。

波里比阿认为布匿战争是罗马踏上征服世界之途的主要一步。二六四到二四一年的战争只是序曲，因为这仅局限在西方。但随着汉尼拔战争（二一八至二○二年），意大利东方的希腊亦一起卷入。汉尼拔和马其顿菲利普五世的结盟（二一五年），很快便被罗马与伊托利亚联邦联手反制。从那时开始，一连串因果相循的事件引导罗马人向前迈进，去主宰几乎整个希腊化世界。因此二二○至二一六年，或依希腊人算法的第一四○个奥林匹亚年（Olympiad），见到罗马与汉尼拔战争的开始，所以波里比阿选择这时候作为《历史》主体的开始。它的主体叙述始于第三书。在之前两书里，他简短叙述第一次布匿战争，迦太基与叛变佣兵接着发生的战争，在西班牙建立迦太基帝国等事件，然后再转回到希腊本身，论及亚该亚的崛起和亚该亚同盟及斯巴达克里奥米尼斯（Cleomenes）之间的战争，而这导致马其顿又再度于希腊南方取得一席之地。这导论的意图是要为读者提供必要的资讯，协助他们进入第三书的主体叙述里。

波里比阿是以希腊人身份来写，主要（虽非全然）是为了希腊人而写。作为战败国家的一员，他分析在霸权所加诸的限制下，希腊政治家所会面临的问题。除此之外，他在生涯中经历一段长达十六年（一六七至一五○年）的关键时期，主要是羁留在罗马城中，这羁留的经验中有其利及其不利之处，但正因为此事，他得以与不同的罗马领袖政治家有密切交往——特别是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Scipio Aemilianus）。他因此处于非常好的位置来写作一部当代史。

2.波里比阿的生平

波里比阿出生于三世纪要结束之际，确切日期不明。他的出生地是迈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坐落在阿卡狄亚（Arcadia）荒山之中，该城在当时是亚该亚同盟的一部分。他的父亲莱可塔斯（Lycortas）活跃于亚该亚联邦政治圈，波里比阿从年轻时就希望能够出人头地，参与政治事务。关于迈加洛波利斯有一些古老的特色，包含强调音乐教育的重要，这被认为是针对相对严厉山区气候的文明教化处方，这城市对四世纪间一些重大事件有鲜明的历史记忆，并对马其顿王室有些微感情的依附。波里比阿自己所受到的训练是实用性，而非学院派的。身为富有地主之子，波里比阿很自然地会骑马及狩猎，这些是他后来推荐给他罗马贵族朋友的休闲活动，甚至直到临终前，他始终都还是喜爱这样的活动。有关他所学习的其他面向，有些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推断出。他设法以批判性眼光来研读他自己所处时代及早些世代的历史学家作品。他对经典的文学及哲学作家也有一些认知，但这些仅是肤浅的粗略阅读，甚至有些可能只是二手而已。他对政治理论特别有兴趣，而无论是在他年少或是后来，对当时一些流行的争执议题，如赤道地区是否适合人居，或荷马对奥德赛旅行的陈述能否被调整成与地理事实相符，他都积极地注意着。

一八二年，在他仍是位年轻人时，被赋予一项殊荣。他被挑选出来恭捧那时代最杰出的亚该亚人物——菲洛波义曼（Philopoemen）的骨灰坛。后来波里比阿以三书的篇幅写下一本关于他的《菲洛波义曼生平》（十书二十一章六节）。此作品现已佚失，但或许曾被普鲁塔克（Plutarch）作为他自己《菲洛波义曼传》（Life of Philopoemen）的史料来源之一。波里比阿在一八一年入选为赴埃及的使节团，但因为埃及国王突然驾崩，因此取消行程。在接下来的十年，我们对其所作所为几

乎一无所知；但在一七○/一六九年，他已经足够重要到被选为亚该亚联邦的骑兵司令（hipparch），这位置通常是为了竞选一年一任的统帅（strategia）或将军职务铺路，而将军一职是联邦的最高职务。这时候对所有希腊国家来说都是关键时刻。因为从一七二年开始，罗马人已经和菲利普之子及继承人佩尔修斯（Perseus）作战，但战事一直拖延，悬而未决，令各方情绪紧绷。罗马人已经对希腊人的行为变得十分敏感。现在只有对罗马做出完全的认同奉献，才会被认可接受，然而在这方面亚该亚同盟及一些其他国家似乎被认定有所不足。在一六八年时，佩尔修斯在皮得纳（Pydna）战败，接着被废。罗马人现在觉得可以放手行动，所以立即在所有希腊城邦中进行政治整肃。波里比阿名列亲罗马政客卡利克拉提斯（Callicrates）所指控的一千名亚该亚人士之一，被传唤到罗马接受调查，到那边却被羁留十六年，既没起诉，也没审判。

这些人质大多数被安置在伊特拉里亚（Etruria）南部，但是波里比阿比较幸运。或许因为他在希腊已经开始被人熟知，加上——如他自己所记录（页528）——在他到达罗马后，他十分幸运地与在皮得纳统帅罗马大军的宝路斯（Aemilius Paullus）年轻儿子西庇阿（Publius Scipio）在一次有关于书的谈话后，便建立起十分密切的友谊。透过这位与当时两大领导家族（Aemilii Paulli和收养他的Cornelii Scipiones）皆有关系之年轻贵族的影响力，波里比阿不同于其他的羁留者，他被允许留在罗马。在那里他成为西庇阿的导师及密友，甚至我们确实可以说，是西庇阿的政治经理人。他透过西庇阿能接触罗马领导家族的成员；但他也遇见许多希腊同胞，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或是居住在罗马，或是恰好造访罗马。除此之外，他或许也与其他羁留者保持联系，因为他似乎没有被严格限制行动。我们听闻他到拉丁姆（Latium）南部的狩猎之旅，而且或许是发生在羁留岁月的最后几年，他造访意大利南部的罗克里城（Locri），并且还进行他提及的许多旅行，“穿越非洲、西班牙以及高卢，还有在连接这三个地区之大海上，贴近它们西侧海岸航行”（页231）。当一五一年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志愿在西班牙服役，波里比阿

随行。必然是在那时候他陪同西庇阿进入非洲，在那里和年迈的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沙（Masinissa）相见，谈论有关汉尼拔及其他事情（页402）。在他回程到意大利时，他绕路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取得关于将近七十年前汉尼拔那著名横越山脉的“第一手资讯及证据”（页222）。

在一五○年，被羁留的亚该亚人获释回家。在原先的千人中，只剩三百人还健在；其中包括波里比阿。但在他回家不久后，他立即收到朋友召唤前去当时正被围攻的迦太基与西庇阿会合。罗马人现在正陷入与他们宿敌的第三次及最后一次战争中。波里比阿以其好友及军事专家的身份而受到器重。究竟他当时是否已经出版现已佚失的论文《论战术》（*Tactics*），不得而知；但是普鲁塔克提及在最后攻城时，他给予西庇阿军事建议。他留下来见证迦太基被占领与焚毁；不久之后，他开始探索之旅，横渡直布罗陀海峡，深入非洲海岸，后人虽然设法去重建这次旅行的细节以及规模，大致而言都没成功。为了这次远征，他用西庇阿让他使用的船只航行着。

与此同时，罗马及亚该亚联邦突然在希腊爆发战争。事件在那里快速进行，当波里比阿回家时，一切都已经结束。亚该亚联邦已经一败涂地，罗马元老院刻意下令摧毁科林斯。波里比阿与那些将亚该亚引入这场灾难的激进领导分子之间，并无共通之处；他确实以最严厉的方式来攻诘他们。接下来两年（一四六至一四四年）他担任罗马人与亚该亚人的中间人。联邦被解散，但是当罗马人撤出军队时，他们留给波里比阿一项任务，去规范城邦之间的关系以及解决新宪法地位所衍生的诸多问题。他对亚该亚的贡献被广泛认可及赞许。在迈加洛波利斯、提基亚（Tegea）、帕拉蒂尼山（Pallantium）、莱可苏拉（Lycosura）、克莱托（Cleitor）以及曼堤尼亚（Mantinea）等许多城市都有竖立他的塑像，表示敬意。地理志专家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希腊描述》（*Description of Greece*）VIII.三七.二］引用在莱可苏拉的碑文声明，“希腊若在所有之事都听从他，必然不会遭逢灾难，而在蒙难后，

只能透过他来得到拯救”。在迈加洛波利斯的碑铭则记录道，“他云游大地沧海，是罗马人之友，浇熄他们对希腊的怒火”。

关于波里比阿后来的生涯，记载甚少。他拜访亚历山大城（假如这没在更早时发生），和他的罗马朋友仍然保持联络。西塞罗［Cicero，《论国家》（*De Republica* ）Ⅰ.三四］形容西庇阿、波里比阿及斯多葛哲学家罗德岛之潘乃提亚斯（Panaetius of Rhodes），经常进行有关罗马宪政的讨论；这必然是在一四六年之后。在一三三年时，当西庇阿受命为讨伐西班牙努曼西亚（Numantia）的统帅时，召唤他许多朋友协助，而波里比阿可能名列其中。他后来写作一篇有关战争的论文［西塞罗，《致朋友书信》（*Ad Familiares* ）V.一二.二］。他何时过世并没有确切的日期。他书中提及在南部高卢丈量多米提亚大道（Via Domitia）（页212），这必然晚于一一八年，虽然这有篡改添补之嫌，但或许是由波里比阿死后的编者从手稿取出的资料。根据一本讨论长寿之人作品的佚名作者［伪卢西安（Ps.—Lucian）《长寿之人》（*Macrobioi* ）二三］，波里比阿是在八十二岁时，从马上摔下而死。

3.历史的写作

当波里比阿在一六七年到达罗马时，他很可能已经不只写过一本书。《菲洛波义曼生平》或许在早年时写作；《论战略》同样或许已经完成，但也可能属于羁留在罗马的时期。同样也有理由认为波里比阿已经写作或是准备写作亚该亚联邦崛起的历史，这部分他未曾发表过，但是其中有部分在预备以及修订《历史》时，被并入到导论性质的第二书之中，构成现在有关亚该亚的章节。但是很清楚地，刺激他要去写作这一巨著（magnum opus）是在罗马发生的，当时他与西庇阿的友谊开启了他对统治权力的新视野。

这巨作的主要议题是简单的，并且不断被重复陈述，“诚然没有人在其性情上会如此狭隘或漠然，所以会没有任何心思想去发觉究竟罗马人是利用何种方法以及在何种政府体制之下，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将几乎整个人类所居的地方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这是人类历史无与伦比的成就”（页1至2）。这五十三年期间涵盖从二二○年——汉尼拔战争开始的那一个奥林匹亚年——到皮得纳战役余波荡漾的一六七年。但是隐藏在波里比阿心灵背后的是：马其顿人从默默无名，最后变成波斯帝国的征服者；这一事件启发哲学家兼政治家法勒隆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作出预言：总有一天会轮到马其顿遭受类似波斯的命运。波里比阿相信（而且在二十九书二十一章告诉我们），在自己有生之年，他已经见证到罗马人实现那预言。

原先《历史》是要解释罗马成就的理由，并且被规划要占去三十书的篇幅。后来波里比阿决定要另外增加十书，所以将故事延伸到一四五年。在第三书他对何以必须如此做出解释。他说以实际上的奋斗为根据来对国家以及个人进行论断，是不恰当的。一个人必须能够看到他们对

之后的成功或灾难究竟如何进退应对；因此只有在考虑罗马如何行使其霸权时，我们才能决定究竟它是否值得赞美或谴责。然而选定一四六/一四五年[2]为新的结束年份时，这些并非波里比阿心中仅有的考量。紧邻那年之前的时期似乎充满极大的混乱，而他若仍急于将有关这段时间的叙述加入他的《历史》之中，那是因为他自己在那些年里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他是见证人，是位积极的参与者，或在某些个案中，是事件主导人。他告诉我们说，这部分几乎无异于一部新的作品（页18至182）。

波里比阿对何以要用这种方式来延伸原来计划所提出的解释，不尽令人满意。他声称所关切的是要去论断罗马帝国主义的实际作为；但是他自己对罗马的态度却模棱两可。在他处理他被迫羁留罗马的事件时，他通常对罗马元老院的动机相当具有批判性。他的言论经常反映出亚该亚流亡之人所具有的尖酸锐利及犬儒心理。但是当他触及对迦太基、马其顿和亚该亚的战争，以及他自己在里边所扮演重要角色的事件时，他的同情心却很自然地落在罗马那方。这后面几书的细节及重点显示出，他将计划延伸的一个重要理由（这很可能是在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死于一二九年之后才计划及完成的）是：要传诸后世一个有关自己个人成就的陈述，并赞美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他这位朋友及庇护人的丰功伟绩。他从一六八年到一五二年所搜集的资料提供一个方便的桥梁过渡到一五一至一四六年的战争，并且让他对罗马统治霸权加以论断时，有某种可行性。但是这样的声明却相对地不具重要性。这一点或许可以从他的全部作品结语之处见到（页540至541），波里比阿在完结他整部《历史》的结语时，干脆再次重申他原来的规划：要解释罗马如何在几乎只有五十三年的时间中，崛起为世界强权。

最后以四十书结束的版本（第四十书是目录，现已佚失），在他过世后才出版。其中有两书，至少就其最后的形态而言，是附加在原来的计划上的。第十二书其实是一长篇的离题叙述（digression），专门针对

波里比阿三世纪的前辈、来自西西里陶诺曼尼温的泰密乌斯（Timaeus of Tauromenium）进行全面性的批评。这是有份量的论战作品，但并非波里比阿最擅长做的事；这部分地显示出他在指责泰密乌斯时，流于挑三拣四及吹毛求疵的毛病。他许多的不满无疑是有道理：泰密乌斯当然喜欢挑剔毛病及找人麻烦，而他的一些故事也似乎显示出其幼稚可笑以及轻信受骗，尽管我们在评估这些事时，有点受限于这位批评泰密乌斯的人。或许这两人之间在气质上以及方法上有根本的对立，其中之一是典型的摇椅史家，在雅典图书馆研究五十年，另一位则是活跃的政治家、将军以及探险家。但此外，波里比阿怨恨泰密乌斯身为西地中海史学家，甚至是第一位写作罗马的名声；而泰密乌斯在他自己的《历史》中对西西里所赋予的重要性，对这位亚该亚作家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泰密乌斯对波里比阿所写时代没有任何着墨；的确凭着波里比阿的第一书是始于二六四年时，他已经宣告自己是泰密乌斯的延续者。因此第十二书虽然阻断了全部历史的叙述，然而它却对希腊史学家之间的争议，也同样对波里比阿的人格，给了我们宝贵的理解。

另一个打断历史叙述的是第三十四书，它完全投入到有关地理的事务。它是在后来作家，例如斯特拉博（Strabo）和老普林尼（Pliny），讨论波里比阿观点的方式下存留，而它的一般结构必须从他们所说的话来加以重建。它或许包括了波里比阿对自己所知世界的一般物理性描写，对欧洲距离以及面积的详细陈述，和对陆地的形容，而最后则是对非洲的概述，这必然包括波里比阿在一四六年沿海岸航行的结果。这种地理的补充说明不仅显示出波里比阿在航行后，对地理的兴趣逐渐增加，而且它也提供一种分界线，分隔开第三十到第三十三书（波里比阿在这些书叙述一六八到一五二年间的事件）以及第三十五到第三十九书（这就其尚完整部分来说，包含一五一年到一四六年战争的叙述，以及波里比阿自己涉入其中的事件）。第三十四书恰当地出现在这点，它使用了波里比阿自己的发现，并批评早期地理学家，如马赛的派提亚斯（Pytheas of Marseilles）和伟大的亚历山大城学者埃拉托斯特尼

（Eratosthenes of Alexandria）。即使就它目前的形态，三十四书告诉我们许多希腊化时代的地理知识以及臆测。它也触及许多让亚历山大城批评家费尽心思的主题，例如荷马对奥德修斯流浪所做之描述的可信性，或是狄凯尔卡斯（Dicaearchus）及埃拉托斯特尼所建构之世界地图的一致性及可靠性。这部分作品原文的佚失是一大损失，而这必须归诸在波里比阿作品被节录的时代，对这类事务是如此地兴趣缺缺。

4.作品的性质

波里比阿或许因为对德米特里“预言”的实现感到诧异，而受启发写作他的《历史》。但是他写作历史的目的却更实际。波里比阿最早的英译者华生（Christopher Watson，一五六八）形容他的作品是“包含有益的建议和极佳的技巧，来应付变化多端命运所带来的不确定”。这相当适当地反映出其目的。因为除了提供活跃政客实用以及感同身受的经验外（政治并没有因为罗马霸权的建立而从希腊消失），它也力图教导读者要如何承受命运的浮沉。这教训是借由描绘落在别人身上的灾难来进行传授（页41）。因此对高卢人入侵意大利的详细陈述，展现给希腊政治家要去如何面对如此的军事入侵（页146至147）；在更个人的层次上，雷古鲁斯（Regulus）在非洲罪有应得的灾祸，以及他的对手佣兵队长赞提帕斯（Xanthippus）的胜利，则是说明那无法预期的成分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单纯的决心有些时候会带来成功的结果。这些事件之所以被描述是“希望这《历史》的读者或许能从中获益”（页80）。

谁是这些读者呢？他们主要是希腊人，但罗马人亦被预期到，因为在二世纪中叶时罗马上层社会大致上已经使用双语，最早的罗马史学家还选择以希腊文写下他们自己的历史。除了那点，波里比阿还希望去满足怀有不同期望的读者，因为并非每个人都只是想学习研究而已。四世纪史学家埃福罗斯（Ephorus）坚持过，史家的首要职责是要提供有用的行为榜样，但其他人则认为历史是种娱乐，在这过程中读者的兴趣会因为其所描写可悲以及精彩的事件而被挑动，情绪受到影响。波里比阿承认这两种观点皆具效力，但很明显这天平是明确地落在“实用”这边，而非“娱乐”（比较页45、357、387、493、534），而且他甚少错失任何机会将可以汲取到的经验，努力灌输到读者身上。在这处是地理，另一

处则是理解事情因果的重要性，或是在伟人生平中所隐含的道德教训；他对平凡的问题也不回避，例如在战争期间如何以烟火作为信号（波里比阿自己改良一种新技术），或是在对城镇进行突袭时，所携带的攀墙云梯不可太短。

在实用以及娱乐这两种普遍性的目的之外，尚有许多不同方法来写作历史，以满足不同的品味（页386）。休闲阅读的读者喜欢家系年谱；那些爱好古文物之人则喜欢阅读殖民故事及城邦建立。但是学习政治的学生（这显然是波里比阿所偏好的读者）将会想知道关于民族、城邦以及统治者的事情，所以从这里他可以学到最多。波里比阿称呼这种历史为“实用史”（pragmatike historia），这是一个经常被误解的词语。它的意思是“政治及军事史”，而在实际上即为当代史（虽然这意义并没隐含在这词语中）；最后，至少在波里比阿的手中，它似乎带有某种教化的目的。所以“实用史”（pragmatic history）在这意义上是严谨的以及事实性的。虽然它可以包括提及当代文艺以及科学发展，还有如哲学家所形容的政体转变循环的议题，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战争及政治，而这是为了要直接回应在希腊化时代广泛流行的充满耸动及情绪的历史。

在波里比阿的看法里，将历史写成那样子其实是将历史与悲剧混为一谈。许多所谓的历史家都犯了这个错误，包括那些对汉尼拔横越阿尔卑斯山所说的怪异故事（页221），或是陈述太阳神之子费顿（Phaethon）战车的神话故事，及他的姊妹变形为伦巴底地区（Lombard）的白杨树（页127）。在这些作家中，波里比阿最讨厌的人物是费拉克司（Phylarchus）；波里比阿不喜欢他，无疑是因为他支持亚该亚联邦的劲敌及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所坚持的目的，但是波里比阿以论战的热情来攻诘他，则是因为他对曼堤尼亚城叛离亚该亚联邦，被再度征服，并严加惩罚后，对其人民受苦受难所做的充满华丽辞藻、情绪的陈述。“他透过故事急于想激起他读者的悲悯，并引起他们的同情时”，波里比阿写道（页168），“他逼真如画的景象描绘女性彼

此紧抱一起、撕扯头发、袒胸露乳，以及男男女女与相伴随行之稚龄幼童和年迈双亲，被强行俘虏的泪水悲鸣”。这类写作的极大缺失是它像悲剧一样，设法借着刺激观众，来制造立即的效果。但是历史真正的工作是要借着陈述真正发生之事，以及记录实际所发表的演说，设法为学习政治的严肃学生带来永久的福祉（页168）。

波里比阿相信将历史戏剧化，尤其是历史专题论文（monograph）作家特别会犯的错误。这是因为在有限的题材下，他们被迫要以修辞夸张的方式，来补足材料不足及其受限的性质。他们因此会包括极其详细的地形描绘，将围攻加以铺张陈述（这常是让写作栩栩如生的好题材，正如陆战及海战一般：十四书12章四节）。所以这其中错误至少部分是在于他们的主题。但是波里比阿本人则是在写作一部不同的历史：极大篇幅的历史，涵盖当时整个人类居住世界的历史。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在这意义上是新颖的，或几乎是新颖的。除了埃福罗斯外，没有人尝试过。然而在波里比阿的眼中，只有透过对普世史、世界史的了解，一个人才能对原因及后果有适当的理解与欣赏，也才能了解命运女神在人间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假如他想从历史中学得教训，这是根本的。

波里比阿认为普世史在本质上优于个别的专题论文。但他对普世史还有更高的要求。因为他所关切之时代，亦即罗马崛起为世界强权的时代，普世史是唯一可行的历史，因为没有其他种类的历史能够适当地形容所有已知世界不同的部分，正逐渐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早先的时候，有关世界的历史可以说是由一连串不相干的事件组合而成，其发生的缘由以及结果之不相关联，有如它们散落四处之地点的相隔。但是从这时开始，历史变成有机的整体。在意大利及非洲的事情与在亚洲及希腊所发生者相系，其中所有事件发生关联，并导致单一之结果。”（页43）一件艺术或文学作品构成一个整体的概念，是在柏拉图学派中所形成，在亚里士多德的学派里更有详细发展，而这成为希腊化

时代文学批评的共通概念，现在也被使用在历史作品上。基本上这概念原来所隐含的是一部有限定范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历史专题论文。因此吾人不得不佩服波里比阿大胆地将这概念转移到他的普世史和他成就此事的方法上，并捉住有机体这原来属于书写历史的概念，将之加诸在所形容的实际事件上。在完成此事后，他不仅辩护验明所使用的办法，也对历史学家传统上常自夸自己的主题，在本质上都比任何前辈都还更伟大及更重要性，提出了一个相当复杂与成熟的说法。

5.史学家的技巧

波里比阿在古代史家中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对自己行业里所使用的技巧较乐于进行讨论。整体而言，他对一个人能够开始写作“实用史”之前必须要做什么准备，给了读者一个非常完整的陈述。好的史学家必须研读及比较回忆录及其他作品；他也必须普遍地熟悉城市、地区、河流、港口以及地理特征，尤其是必须对政治生活有亲身经验（页442至443）。正是对最后这两项，亦即知道国家以及从事政治（这在古代包括战争），波里比阿评为最高。真正的历史是无法在图书馆里适当地写出的。历史学家必须四处巡走；他必须造访事发之处，在战争现场测试不同的说法，并反复诘问那些曾参与其中的人。波里比阿说这是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作为史学技巧，如此对见证人进行反复诘问当然只能施用于那些仍然在世者记忆所及的时代内；对一世纪以前的事件，则没什么用处。但波里比阿《历史》的主要部分（除掉导论的前两书）是落在他自己或是在自己之前那世代的记忆之中，所以像之前的修昔底德、色诺芬以及迪奥庞普斯（Theopompus）一样，波里比阿选择要写当代以及近来的历史。

个人的经验，个人的探索，构成了史学家工作的根本基础。波里比阿将柏拉图有关理想国里国王成为哲学家或是哲学家成为国王的著名说法，加以调整以为己用：波里比阿（页448至449）写道，历史“这工作应是由行动派之人来进行……或者是那些有志写作历史之人必须了解到，对他们来说，对事务的亲身经验是根本的资格”。很明显地波里比阿认为自己符合这两种条件，因为他就是由行动派转变成史学家，而身为史学家，他不遗余力地进行发现之旅以及质问可以找到的见证人。

这个充满活力计划的目的相当简单以及直接：那就是为了要发现究

竟发生何事的真相。因为唯有借由真相，历史才能满足波里比阿所赋予它的那雄心壮志的实际目的及道德目标。真相是全然重要的。他坚持说："作为生命体，一旦被剥夺视觉，就会变得完全无助，所以假如历史被剥夺真相，我们所剩无他，只有空洞及无益的故事而已。"（页55、432）真相当然可以以种种方式来加以曲解。但因为历史是要提供道德教训，更重要的是，必须正确地将赞美和责备施加在它们应得之处。赞颂词那种美化的色调则相当不适合历史。在一处可被允许的，在另一处则可能完全不适当，即使是当相同之人来写作这两样，正如波里比阿在自己对菲洛波义曼的两次陈述中所言：他在《历史》里会对他客观描述，但在已经佚失的传记中，他则会"多少有些夸张"。

波里比阿不喜欢费拉克斯的一个理由是，他那种以耸动方式写作的冲动，与诚实写作是不相容的（页168）。同样地，专题论文的作家在一个小题目上写作时，会脱离适当角度。他们对所处理之事件无法采取较宽广的视野，所以即使是他们没有刻意去渲染自己所选主题的重要性时，他们还是会模糊一件事与另一件之间的因果关系（页208、257）。的确，普世史的史学家必须涵盖如此庞大的领域，所以偶尔会对事实多少有些疏略或做出错误声明；但假如如此，他的错误应该被宽宏大量地对待。波里比阿如是说。

不幸的是波里比阿是一个随时会要求别人对他宽宏大量，却比较不愿对其他人也如此的人。他指控泰密乌斯会对自己前辈做出吹毛求疵以及不公道的批评（十二书四章a、七章六节、八章一节、十一章四节，页432），这些经常是——尽管并非全然——有根据的。但泰密乌斯的恶意，却常与波里比阿自己偶然间所表现出的恶意，几乎不相上下。例如他批评泰密乌斯是位摇椅史学家，但同时也是碑铭研究的前驱（十二书十一.二），这让他陷入某种程度的前后不一。泰密乌斯在攻击埃福罗斯、迪奥庞普斯以及亚里士多德时，当然是严厉及恶毒的；但当波里比阿写信给他同时代的罗德岛史学家赞诺（Zeno），指出他一些比较粗

疏的错误时，我们或许有理由怀疑，究竟他唯一的目的是否只是单纯对真理的追寻。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就大体而言，波里比阿符合诚实以及坦白的严格标准。他只有在两个状况中会稍稍偏离那标准。第一个是关系到宗教。波里比阿对宗教的态度不容易去定义。他被认为不敬神；虽然他对神明的态度是前后不一以及内容无法协调，但许多其他史家亦然，例如说，希罗多德。当然，波里比阿对那较粗糙的迷信方式会采取一种批判，甚至近乎理性的态度。有些史学家说过霜雪或雨水未曾降临在巴吉利亚（Bargylia）一地的阿耳忒弥斯·辛迪亚斯（Artemis Cindyas）神像上，而四世纪史学家迪奥庞普斯曾说过，任何人进入阿卡狄亚地区莱凯温（Lycaeum）山的宙斯神庙里，会失去自己的影子。波里比阿对此评论为，“会去相信那超过可能性之极限的事情，透露出其如孩童般的幼稚单纯，或者是智力有限的征象”。

然而，就诸如类似的故事要是来维持一般人对神明虔诚的状况下，我们应该原谅那些提供这类故事的人，只要他们不要过火，并知道该在何处画下底线（十六书十二章三至十一节）。其中最困难的当然是知道该在哪里画线。事实上，波里比阿赞成罗马使用宗教场面来震慑人民，并且形容迷信（deisidaimonia）正是使罗马国家结合起来的强大力量（页349）。这种赞成宗教是种有效的政治工具，无论真实与否，在希腊由来已久。其中一位主要的阐扬者是，雅典三十僭主寡头政治派系的领导人——克利替阿斯（Critias）；他在五世纪末坚持宗教是种刻意为之的诈术，被一些聪明人设计来达成政治目的。实际上，这种承认宗教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对身为史学家的波里比阿影响甚小，或许除了他对“非洲征服者”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的陈述，此事波里比阿曲解为是在很犬儒地操弄他部队轻信宗教的弱点，以巩固他们的忠诚，并鼓励他们有信心去攻击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大本营新迦太基（页406—415）。

波里比阿会对爱国主义的要求做出让步，这对他身为一位说真话作家的地位影响更大。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有适当的保留。他写道，“我愿意承认作家会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有所偏好，但是他们不该对它做出错误的陈述”（十六书十四章六节）。诚然，爱国心似乎扭曲了他在某些状况下的判断。他当然对亚该亚联邦十分宽容，虽然并非毫无批判，但对亚该亚联邦的永恒敌人——伊托利亚联邦，就没那么厚道。他对于斯巴达革命领导者克里奥米尼斯三世的陈述，主要是依据对斯巴达怀有敌意的史料。他对当代彼奥提亚（Boeotia）社会状况的批评（二十书五章七节），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被源自亚该亚联邦所怀之敌视扭曲。同样地，他在其他地方对局势的评估或是对个人的论断，似乎都受到相关对象对亚该亚联邦的态度，或者（在他后面几书中）对罗马的态度影响。但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刻意不诚实，因此大致来说，他的历史可以很公平地得到读者的信赖。

波里比阿在一个领域中的公正性及诚实经常被攻击，这便是他的演说词。在希腊史学家之中，将演说包含在历史中是其来有自的传统［这一直到史学家克拉伦登侯爵（Clarendon）[3] 的时代都还被其后继所遵循］，所以波里比阿在整部作品之中每隔一些时候便会插入此种演说。修昔底德使用这种设计，是为了对某局势做出历史性的评论，而他的“演说词”在何种程度上真正呼应到发表演说之人的用词及感情，仍是有争议的话题。他希腊化时代的后继者呈现出较少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同意如泰密乌斯等作家，并会利用这样的传统成规来书写纯粹修辞性的作品（见页440）。波里比阿对那类的书写深为鄙视。他责备他两位前辈，凯瑞亚斯（Chaereas）及索赛勒斯（Sosylus），因为他们记录所谓罗马元老院在汉尼拔战争前夕所发表的演说，“被定调在美容院里八卦的层次上”（页197）。他确认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忠实纪录下实际所发生以及所说之事，无论这有多陈腔滥调”；在其他地方他又说，“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要去对读者炫耀他的能力，而应是投注全部精力去发现并记录什么是真正发生过，以及真实地被说过的事

情，而且这是这份工作之中，最重要以及最有效的事”（三十六书一章六至七节）。在他的《历史》中有三十七篇演说词存留，我们还可以从李维（Titus Livius，五十九至公元十七年，是古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的章节中，推论出还有其他文章的存在，这些地方都是李维追随波里比阿之处，包括李维的演说词，都能够明显地看出其与原文在相对应之处，所应出现的演说。并非所有波里比阿的演说词，都能达成他所预期的历史真实性那种标准。例如，有些是双方将军在开战前个别发表的演说词。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史家在此是即兴创作。相反地，若它们存在的话，他会费尽心思去取得真正的版本。其中最出名的例证是他对一九八年在希腊洛克里斯（Locris）一地，雷拉明尼纳斯（Flamininus）与马其顿菲利普五世之间在会议上的陈述，对此他显然可以取得逐字稿（页493至503），或是伊托利亚联邦将军阿格拉俄斯（Agelaus）在公元前二一七年诺帕克都（Naupactus）会议中所发表的演说（页299至300）。但是在他缺乏此类资讯时，他偶尔会退回到文字史料，这包括修辞性的作品，他就会视状况加以接受。大体来说，特别是在希腊所发表的演说版本，他会让他的读者能听到希腊政治家相互争执时真正的声音，和读者分享他们进退维谷的窘境，还有他们在政策冲突时的激烈辩论。他以这种方式将历史的一个传统成分加以调整，用以强化自己作品作为政治以及道德教育手册的目的。

6.命运的问题

波里比阿如何处理命运女神（Fortune，Tyche），则是另一个议题。那是在人类事务上无法预见或是无法估算的成分，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喜欢将其拟人化为女神。波里比阿的主题是：已知世界统一在罗马的领导及控制之下，几乎无法避免要去面对命运女神的问题。要处理那问题，只有一种历史是适合的——普世史，因为只有在普世史中，史学家所采取的全面观点才符合历史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有机性质。波里比阿写道，“我的历史作品所具有的特质与我们所生活时代的特殊精神相关，而正是这点：正如命运女神将世界里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引导至相同方向，强迫它们汇聚至相同一致的目标，所以史学家的任务是将女神在完成这整体规划所历经的过程，置于一综合的观点之下，呈现给他的读者。而尤其是这现象最先吸引我的注意，鼓舞我进行我的工作”（页44）。

这一段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分配给命运女神的角色，以及因为波里比阿在里头强调是因为透过思索命运女神在罗马崛起里所扮演的角色，他才被引领去从事他《历史》的写作。如我们已经见到（页19），以华生的话来说，这些话是意图保护读者来面对“无常命运女神所带来的不确定”。但是否就是这相同的“无常命运女神”设计了罗马的崛起？或是命运对史学家所指不只一意？这问题很重要，因为因果之正常运作其实是被一个无法测知及反复无常的力量支配，历史作为范例的仓库及实用教训来源的价值便会缩减。然而生活在希腊化时代的多数人眼中，这些便是以命运女神（Tyche）之名而被人崇拜的神圣力量。

到底波里比阿会在何种程度上分享这流行的信仰，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很清楚地，他在使用Tyche“命运”这个字时，并不常

是同一个意思。一个词句如“命运使其发生”，经常是不很严谨地说某事“恰巧发生”。但在其他段落里，Tyche似乎是种积极的力量，或是对历史过程能施展某种客观影响的力量。波里比阿就其个人气质来说是位理性主义者（见以上页xvii—xviii），了解这个中的危险，并在稍后一书中（页537至539）他详细讨论在人类事务上能够适当归诸Tyche以及命运的部分。他的结论是，例如因洪水、干旱或是霜害的情形，而导致的饥荒以及瘟疫，一个人或许会很自然地认为是命运女神的安排，相当像我们在形容某些事件为“上帝所为”一样，但这其实是没有原因可被察觉到的。除此之外，当人们出现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行为时，例如当马其顿人被一位以“假菲利普”（Pseudo—Philip）为名的僭位者蛊惑时，因为无法以理性方式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或许可归诸Tyche。但当我们在处理有可被认定出原因的事件时，如“非洲征服者”西庇阿的成就（十书五章八节）、亚该亚联邦的崛起（页149至150）以及罗马人在战场上的胜利（页508至509），这时呼唤出Tyche作为解释，则是低劣及毫无价值的做法。

然而波里比阿在实践上并没经常遵守这样的区分。Tyche在他的篇章中时常出现，而且并不常是在所有解释努力都被穷尽之后才出现。特别是他在遇有两系列事情同时发展时——其中每一系列都可以理性方式来解释，但交织之后会产生新的、相当无法预料到的状况——他便会在这些状况中召唤Tyche的协助。一个例证发生在叙述西庇阿早期在西班牙的生涯：当时一位西班牙的领袖阿比莱克斯（Abilyx）说服迦太基人波司塔（Bostar）释放一些西班牙的人质，然后立即将他们交给西庇阿（三书九十七章五节至九十九章九节）。阿比莱克斯是根据利己的计算来理性行事。但在西庇阿的计划中完全没预料到这突然而来的利益，所以从西庇阿的观点来看，这是命运女神的干预。Tyche也经常被呼唤出来作为那些反复无常或耸人听闻事件的原因，或是事情结果是由极小差距来决定；例如克里奥米尼斯被击败：他若是再多等几天，必然会因为伊利里亚（Illyria）人入侵马其顿而得到拯救（页175至176）。另外，

有些是不可预期且经常是反讽性的角色反转，如发生在正在攻击梅迪昂（Medion）的伊托利亚人身上的：他们辩论着究竟是继任还是卸任的将军名字要刻写在将会赢得的战利品上，但是Tyche介入，导致他们失败，反而是胜利的梅迪昂人献祭了战利品，他们记载着这是赢自这“两位”将军（页114）！命运女神反复无常，让人无法一直顺遂下去，所以波里比阿特别谆谆教诲，在繁荣顺利时要多所节制的道理，因为无法预知那后面即将要到临的状况。节制无法避免吾人遭受命运打击；但比较适合人类，或许有天被回想起来，会对其有利。

Tyche并非经常反复无常。偶尔它会干预，惩罚为非作歹（页482至483），而在如此例证中，它似乎带有某种人格，与现代对命运（Fate）或天意（Providence）的看法相距不远。让罗马在不到五十三年崛起为世界强权以及在《历史》里占有一个核心地位的Tyche，似乎是落在这样的定义下。这却带来了解释上的困难，因为《历史》这部作品是基于波里比阿的假设，即认为罗马的成功可以用理性的方式来加以解释。他说，“罗马人的霸权并非如某些希腊作家所以为的是出于偶然，或是胜利者不知自己的所作所为。相反地，因为罗马人刻意地在如此伟大的事业中锻练自己，所以很自然地，他们不仅应该大胆地踏上追求世界主宰之途，而且他们应该达成他们的目的”（页109）。这里确实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却不能如一些学者所辩称，可以假设这是在波里比阿的哲学信仰过程中发生变化以及发展来加以解决。这个中事实更应在于波里比阿作品核心中的矛盾，这矛盾并未在他自己的思想中获得解决。这是由于他并未将Tyche所涵盖之不同层次的意义加以分辨清楚，这个字词由于它的历史以及日常使用，已经无法传递准确的意义。面临罗马那种无与伦比地崛起为世界主宰，波里比阿似乎已经模糊何事发生以及何事“应该”发生，模糊Tyche究竟偶发或者Tyche是命运。所以罗马的成功是因为Tyche安排的表达，然而同时也是罗马人自己冲劲与纪律特质使然的结果。事实上这中间的矛盾并未像乍看之下来的如此根本。神明相助以及实践品德会有回报这两种的概念，并不必然会是相互矛盾

或有我无他。俗话所说的“自助者天助”正为波里比阿的两难提出解释。罗马的成功是罗马优秀之处的适当奖励以及结果。

7.罗马宪政

罗马的优点，部分在于高尚的原则，部分在于组织优越及纪律精良的军队，但在波里比阿眼中，尤其更在于平衡稳定的政体。第六书中特别强调罗马这三个优点的面向，形成一个长篇的离题叙述，安排在《历史》中罗马在对抗汉尼拔的战争里，正历经命运的最低潮，因为它接连输掉特雷比亚（Trebbia）、特雷西米尼湖（Trasimene）以及坎尼（Cannae）三场战役。第六书对于波里比阿的核心主题是根本的，因为如我们已见（页viii-ix）这主题是要形容“是以何种方式以及何种政府系统”让罗马人取得到他们在整个文明世界的至高地位。第六书最后是以取自第二次布匿战争坎尼战役后，在那时传闻的故事作为结束，用来阐明罗马政府的诚实正直以及高昂士气（页351至352）。此外，本书的核心部分（页318至338）投注在对罗马军队、动员方式、构成单位、武器装备、制服、扎营方法以及纪律系统的详细描述。但是本书最令人惊讶之特色是对罗马混和政体的叙述。

希腊人普遍相信政体形态对任何国家的成功或失败是全然重要的。波里比阿是以希腊混和政体的理论来分析罗马宪政：这是一个王权政治（kingship）、贵族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混合，这自从五世纪以来即被认为是所有政体形态中最佳以及最稳定的，而且以斯巴达的莱克格斯（Lycurgus）政体作为典范。在他第六书中，波里比阿所做的不只是定义罗马在汉尼拔战争时所存在的政体。他也阐释一种政治循环，在这循环中三种简单的宪政形态——王权政治、贵族政治以及民主政治，以及与它们相对应的堕落形态：僭主政治、寡头政治以及群众政治（ocholcracy）（或暴民政治），以一种循环的顺序相随而来，他称这样的状况为“循环”（anacyclosis）。在波里比阿认为是政治发展自然形态的政治循环中，强人政权（monarchy）是在原始社会中首先出现的形

态，并发展成国王政治，当时国王以其力量来支撑道德理想以及正义。但随着时间流逝，国王政治会恶化而沦落为僭主政治，结果最好之人将僭主驱逐，并建立起贵族政治，但这又很快腐化，成为寡头政治。当这发生时，人民将寡头分子驱逐，建立民主政治，然而这又依序沦为暴民政治，最后陷入完全混乱之中。这时要解救局面，只能以一位新强人的形态来出现。整个过程又再度开始。

在第六书中一个佚失的部分，波里比阿形容罗马人如何因为一连串幸运的选择，成功地避免寡头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如“循环”所要求的），而是成为混和政体；他认为这种从循环摆脱出来的时机，是在四五○/四九年“十人执政团”（Decemvirate）被推翻之后。他接着又指出在国家里的三个构成部分中，执政官或是国王的成分、代表贵族政治的元老院，以及人民或者是民主的成分，会是如何的稳定平衡，所以对局外之人而言很难定义这种政体为何。第六书也包括一个将罗马“混和政体”与雅典、底比斯、克里特、斯巴达以及最后，迦太基等政体互相比较，并解释何以它优于其他所有的政体。但因为所有事物依其本性都会腐化，所以相同情形有朝一日也将发生在罗马的混和政体上

作为对公元三世纪及公元二世纪罗马的分析，波里比阿的理论就会显得太形式化，太抽象。而鉴于波里比阿在罗马的个人经验，他的分析无助于理解那巩固罗马名门贵族垄断之复杂政治生态的性质，反而代之以这精心发展以及理论化的模式，着实令人惊讶。但这模式强调罗马有能力去成长及创新，并且在逆境下从经验中学习，并配合局势变化进行调整。此一敏锐的分析相当贴近罗马成功的核心，并为波里比阿自认是希腊世界里的罗马诠释者，提供了一些证明。

8.波里比阿的史料来源

我们已经解释过波里比阿认为个人亲自探索，是史学家工作最重要的一部分（页xv），而他选择二二○年来作为他主要历史的开始日期是因为："我应该能以自己是某些事件的见证人和根据对其他事件所做之见证的资讯，来进行发言。"（四书二章二节）明显影射涵盖二六四至二二○年的导论性二书（一书及二书）里的资讯来源是无法亲自取得的；事实上他为《历史》的主体部分，谨慎及适当地使用了书写的史料。就导论性质的两书，他提及四位三世纪的作家，这些他当然都有所使用：希腊事件而言，有亚该亚阿拉托斯的《回忆录》（*Memoirs* ）以及费拉克司的《历史》，这是从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的观点来写作。还有费边·匹克拖（Fabius Pictor）以及亲迦太基、来自阿格里根特的菲利纳斯（Philinus of Agrigentum），波里比阿用这两位的作品作为他写作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参考资料。他对这些作家所进行的批判性讨论（页54至56、167、203至204），作为他在面对前辈时维持的那种独立及批判态度的证据，是相当有趣的，即使是当他使用到它们；同时也提出警告，警告我们在面对明显利用这些史料所完成的详尽叙述中，对是否能够指认出背后史料，切不可过分乐观。希腊史学家除偶尔之外，并没有习惯去将他们的史料来源指名道姓，而即使点名出来，在那时候也是为了要表达异议。因此有可能即使在一书及二书中，甚至在主体部分更是如此，波里比阿使用了他没有明言的史料，而且这些已经无法被指认出来。例如，他在陈述导致第一次布匿战争的事件时或许使用了泰密乌斯——他在第十二书时加以攻击的西西里史学家——的有关记载；有些他对早期事件的离题叙述，则可能是依据四世纪史学家埃福罗斯及凯利斯尼兹（Callisthenes）。

汉尼拔战争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希腊或罗马都有

许多作者写作它。除了费边·匹克拖外，波里比阿只提及凯瑞亚斯及索赛勒斯，但那时他是以最轻蔑的方式提及（见页26）。有关希腊东方之事务，他明显是使用书写史料，但这些已经无法指认。赞诺及安替斯提尼（Antisthenes of Rhodes）是波里比阿同时代之人，而赞诺或许适用于除了罗德岛之外的其他国家历史；但大体来说，我们还是只能臆测，而仅在极少数地方我们可能有些信心去分析波里比阿所依据的史料，例如有关对克里奥米尼斯之死的陈述（页292至297），因为对此普鲁塔克的《克里奥米尼斯传》（*Life of Cleomenes*，33章及以下）有另一种说法；还有在一些地方，原典史料似乎是出自费拉克司及迈加洛波利斯的托勒密（Ptolemy of Megalopolis），后者写了一部充满丑闻的托勒密四世的历史；从这些当中浮现出的复杂图像，阻碍任何试图指出波里比阿《历史》更大部分中，他所使用之史料来源的作者名字的努力。然而，已出版作品并非唯一可得的史料。尚有其他资料，如西庇阿写给马其顿菲利普五世的书信，信中描述他在新迦太基的战役（页409）；这些书信具有该文类的典型特征：名义上写给国王，但意图或许是用来广泛流通。波里比阿也有可能使用公开的演说词以及官方档案，例如亚该亚人在埃基提翁（Aegium）的档案，波里比阿当然可以接触到这些；他或许也可以参考在罗马的文件资料，如元老院对菲利普议和的决议文（页513至514）。他或许也能在“市政官的国库”（treasury of Aediles）参考与迦太基签订的条约（页203）。但大体而言，他更可能可以接触到在私人之间流传的说法。就像大多数的古代史家一样，波里比阿没有系统性地使用碑铭；唯一的例外是汉尼拔竖立在拉齐尼亚（Lacinia）海岬赫拉神庙的铜碑，波里比阿在那里发现（页210、228至229），上面记载了汉尼拔部队的数量以及部署情形。

事实上波里比阿相信历史研究真正的工作在于对见证人进行质问。有一个或两个名字留存下来：赖里亚司（C.Laelius）提及他的旧友“非洲征服者”西庇阿（页405至406），而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沙在年事已高时回忆汉尼拔的特征以及他的贪婪（页402）。波里比阿被羁留十六

年之久的罗马，那时已经成为所谓的文明世界之都，迟早会有有分量的人物去造访。在那里或是附近，他不仅可以遇见希腊其他被羁留的人，这些人多数在他们自己国家是重要人物，另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川流不息的使节。我们可以很持平地假设，在尽可能多的这些人之中，他们会被积极询问到与波里比阿作品有关系的事情，以及波里比阿最后发展出很技巧性的方法，来引导出资讯来。提供资讯之人的名字大部分只能猜测，但波里比阿叙述的主题以及其叙述是如此广泛和可靠，主要还是归诸这些人。

9.波里比阿的流传

波里比阿的长篇《历史》多达四十书，只有部分流传下来：第一书到第五书是完整的，第六书的许多篇幅，以及其余三十四书的断简残篇（十七书、十九书以及三十七书几乎完全不存，这些早在公元九世纪就已完全佚失，我们也完全没有第四十书，那是全书索引）。之所以如此，有几个理由。就那些对优美的雅典（Attic）文体比对整本书的内容更感到兴趣的人来说，《历史》只有极小的吸引力。的确哈利卡纳苏斯的戴奥尼素（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将它列在没有人会想读完的作品之一。同样地，这主题也随着罗马地位渐形巩固，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狄奥多罗斯（Diodorus）及李维两人都广泛地追随波里比阿，但他们以不同视角来看待罗马。在公元二世纪时普鲁塔克数篇的传记从波里比阿中取材，但将之调整来符合他传记的目的。西塞罗对第六书的政治讨论多感兴趣，并在他自己的《论国家》（*De Republica* ）第二书中，相当程度地依循波里比阿，但是帝国的建立使得波里比阿的政治理论变得过时。塔西佗（Tacitus）嘲笑混和政体是件说比做容易的事情［《年纪》（*Annals* ）四.三三］；晚期帝国的作家除了佐西默斯（Zosimus）外，几乎对波里比阿毫无兴趣；佐西默斯在公元五世纪写作时，先将罗马之衰亡编年纪事，所以很自然会有兴趣回顾那书写罗马之崛起的史学家。

波里比阿在拜占庭持续流传，他的《历史》在当时被节录，而这并不利于整部作品本身。在公元十世纪时皇帝“生于紫房”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 Porphyrogenitus）根据许多希腊史学家的著作做出一本节录的合辑，包括波里比阿，将其节录安排在如此项目之下：《论使节》、《论格言》、《论品德与罪恶》、《论阴谋》、《论战略》。大约同一时间，另外一本波里比阿的节录合辑也从第一书到十六书以及第

十八书中节录文章，而现在这个版本是以《古代节录本》（Excerpta antiqua）之标题流传到我们手上。

一直要等到公元十五世纪初时，波里比阿的文本才在西方出现，首先是在佛罗伦斯：布鲁尼（Leonardo Bruni Arentino）在约公元一四一八至一四一九年时使用波里比阿，作为他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及一些稍后事件叙述的根据。在公元一四五○年时，在教宗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的敦促下，裴洛提（Niccolo Perotti）将第一书到第五书（相当不适当地）翻译成拉丁文。假如我们不考虑第六书的军事部分，那除了由拉斯卡瑞司（Janus Lascaris）在公元一五二九年以拉丁文编辑，附带希腊文“以资比较”，其实一直都没有希腊文的版本出现。一直等到公元一五三○年时才由欧布索佩斯（V.Opsopaeus）在哈根瑙（Haguenau）完成第一书到第五书的版本。不久之后，荷发吉尔斯（Hervagius）在公元一五四九年于巴赛尔（Basel）出版《古代节录本》。这些晚近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在之前不知有希腊文的版本。在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于公元一五一七年开始写他的《君主论》（*Discorsi*）之前（这本书透露了波里比阿的影响），很清楚地已经有人在佛罗伦斯讨论第六书一段时间，而且最近有人指出鲁切莱（Bernardo Rucellai）大约在公元一五○五年之前写作的小册子《论罗马城》（*De Urbe Roma*）说明，他是熟悉第六书的。尚有证据显示《古代节录本》从公元一四八二年起，已经在乌尔比诺（Urbino）为人所知。

公元十六世纪见证了波里比阿研究的百花齐放，被翻译为法文、意大利文、英文以及德文。我已经（页xii）提及最早的英文翻译是由华生在公元一五六八年完成。在靠近该世纪末，乌尔西诺斯（Flavius Ursinus）于公元一五八二年出版君士坦丁七世的节录本《论使节》，扩大了我们所知之波里比阿的分量，这新增加的材料被归并到卡稍邦（Casaubon）于公元一六○九年的版本之中。

波里比阿此时不仅因为其历史叙述，也因为其政治智慧以及身为战争理论家及实践者而被研读。在许多受到他第六书罗马军队之叙述所启发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利普席亚斯（Justus Lipsius）于公元一五九四年出版的《罗马军事系统五书》（*De militia Romana libri quinque* ）。利普席亚斯被形容为“奥伦治之摩利斯（Maurice of Orange）军事改革背后的精神及技术导师”，而摩利斯是利普席亚斯在莱登（Leiden）的学生。尽管枪炮火药的使用给战争带来新视野，但波里比阿仍然以能够协助组织军队的作家地位，而被阅读、被珍惜，并护卫基督教世界来对抗土耳其人。除此之外，在公元十七世纪时，他作为政治上的老师，持续吸引更多人的注意，特别是在英格兰，在那里他影响了伊莉莎白一世的史家坎顿（William Camden）（公元一六一五）。混和政体已经出现在马基雅维利同时代之人谷贾迪尼（Guicciardini）以及约翰·喀尔文的宪政理论中。但是它对布莱斯（Bryce）称之为公元十八世纪政治哲学的圣经——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Esprit des lois）（公元一七五○），尤其具有最大的冲击。波里比阿透过孟德斯鸠，在那股创造出公元一七八七年美国宪法，及大约同时的几个美洲国家宪法的政治思潮爆发中，间接扮演某种角色，或至少协助提供需要的背景。

从那时起波里比阿一直有人阅读，但比较常被那些有兴趣于希腊化时代以及罗马崛起为世界帝国历史的人，而不再是作为政治改革或是军事胜利的引导。有关他后来命运的较近一章，则有关对希腊文本的广泛研究工作以及，更近日的，对他的历史方法及写作技巧进行详细探索。

10.近来有关波里比阿的作品

这部分必须始于公元十八世纪末，当时史威格豪瑟（Johannes Schweighaeuser of Statrasbourg）出版他那具纪念性的波里比阿版本（公元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五），其中有文本、注解以及字典。我们今日所使用之文本中有一些部分当时尚未出版：《论格言》节录（Mai，1827）、《论叛逆》节录（Mueller，1848）、《论战略》节录（Wescher，1867）。除此外，史威格豪瑟的版本几乎已经包括所有现在被我们所知的波里比阿文本，他还从这些残篇节录之中重新发现原来的架构；他并加入许多从后来作家、字典编撰者、文法学家以及相类似作品中可以相当合理地指认出波里比阿的残篇。从那时之后，有几个重要的版本出现：Bekker（公元一八四四）、Dindorf（公元一八六六至一八八）、Hultsch（公元一八六七至一八九二）以及Bttner-Wobst（公元一八八二至一九○五）。W.R.Paton的Loeb的版本在公元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年出现，以及P.Pdech，J.de Foucault，R.Weil，C.Nicolet的Bud版本，外加法文翻译，仍然在出版过程中（公元一九六一至今）。J.de Foucault也出版了一本对波里比阿之文体及语言有用的研究，《有关波里比阿语言及文体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a langue et le style de Polybe*，Paris，1972）。在手稿的传统上，现在有J.M.Moore《波里比阿手稿传统的研究》（*The Manuscript Tradition of Polybius*，Cambridge，1965）的充分研究；一套新的《波里比阿字典》（*Polybios—Lexicon*），由A.Mauersberger编辑（Berlin，1956-），现在已经到达字母O。[4]

近年来针对波里比阿作品之不同面向的专门研究，出现了大量作品，虽然对英语的读者而言——很不幸的是——大多数作品仍以其他欧洲语言书写。对史学家最方便的介绍（当然除了阅读波里比阿作品外）

是F.W.Walbank的Polybius（Berkeley and London 1972）；这是在加州大学所发表之沙瑟（Sather）系列演讲的文稿，包括对最近主要研究的充分书目。在这书目中，对能够阅读法文或德文的读者或许特别能参考P.Pdech的《波里比阿的史学方法》（*La Mthode historique de Polybe*，Paris，1964）及G.A.Lehmann的《波里比阿历史可信度的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historischen Glaubwdigkeit des Polybios*，Munster，1967）；在这些外，加上K.Meister的《波里比阿的历史批评》（*Historische Kritik bei Polybios*， Wiesbaden，1975）。K.Ziegler对波里比阿有份杰出的研究（德文）发表在Pauly-Wissowa的《古代研究百科全书》（*Real—Encyclopdie der classics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vol.XXI.2，1953），cols.1440-578；这作品亦包括到公元一九五○年为止非常丰富的书目。自公元一九五○年以来书写的作品，有份持平的批判性介绍（意大利文）：《过去二十年的波里比阿研究》［“Polibio negli studi dell’ ultimo ventennio（1950—1970）”］，作者为D.Musti，出版于《罗马世界的崛起及衰落》（*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mischen Welt*， ed.Temporini（Berlin—New York），II.i（1972）），1114ff.。最后，就详细研究，请见F.W.Walbank的《波里比阿的历史注释》（*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 ）三册（Oxford 1957，1967，1979）。

公元一九七三年在日内瓦附近的旺德夫莱（Vandoeuvre）的哈德特基金会（Fondation Hardt）举行了一场关于波里比阿的会议。议程及文稿出版为《古典古代世界会谈第二十卷：波里比阿》［vol.XX of the *Entretiens sur l’antiquit classique*：*Polybe* （ed.E.Gabba：Vandoeuvres—Geneva，1974）］，包括十位波里比阿专家所做的演讲。这之中最后一位摩明格利亚诺（A.Momingliano）的文章名为《波里比阿于西欧之再现》（“Polybius’ Reappearance in Western Europe”），而这篇以及摩明格利亚诺的J.L.Myers纪念演讲《英国与土耳其人之间的波里比阿》（“Polybius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the Turks，”Oxford，1974），构成

了对这位史学家在后来际遇的最佳介绍。

11.目前之选文

已经有一些波里比阿的英文翻译，包括华生·徐尔斯爵士的（Sir H.Shears）翻译及德莱登（Mr.Dryden）的介绍（一六九三），最近则有舒克博（E.Shuckburgh，1889）及巴通（W.R.Paton，1922—1927）。但是语言流行的风潮即使在半个世纪内亦是变化甚巨，本册系司高特·基尔福特（Ian Scott-Kilvert）的新译，以当代英文之节奏及词汇来呈现波里比阿。使用的文本版本是Bttner-Wobst的。所选择的章节涵盖：整个从第一书取来的第一次布匿战争；第二书全部，叙述高卢人入侵意大利，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直到与斯巴达克里奥米尼斯作战的亚该亚联邦历史，克里奥米尼斯在塞拉希亚（Sellasia）战败，以及马其顿势力在科林斯重建势力为止；几乎所有的第三书，陈述汉尼拔战争中的事件，直到罗马在坎尼的灾难；几乎所有的第六书，形容罗马军队以及军营，还有波里比阿对罗马政体的讨论。从后来诸书之中，有围攻叙拉古（Syracuse）以及阿基米德的反制措施，汉尼拔著名但功亏一篑的进军罗马，年轻的“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占领新迦太基；从第十二书对泰密乌斯之批评的选文，随着幼王托勒密五世即位后，在亚历山大城发生的暴力事件，罗马军团与马其顿方阵兵团的比较，罗马在一九六年宣布希腊自由，叙利亚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Syria）如何（得到波里比阿之助）逃离罗马，回去争取塞琉西（Seleucid）王朝王位的奇怪故事，希腊人对迦太基在一四六年毁灭的辩论，以及最后，波里比阿对全书的结语。

为了让选文保持在一册的篇幅内，有些段落不免被排除；但还是尽可能完整收录了所流传下来的原本《历史》里所有最有趣以及最经典的部分。

沃尔班克（F.W.Walbank）

---

[1] 在准备本书翻译时，我深深获益于沃尔班克教授对《历史》的评论以及他个人的协助，对文本及注释提供了许多有用以及建设性的批评及建议。——英译者注 英文版导读文中出现的章节与页码，是一九七九年PENGUIN出版社《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le》的版本。——编者注

[2] 希腊人一年的开始与现在不同，除了使用阴历外，根据不同历法，会落在不同月份，所以事件发生时间的月份若不能确定，在以公元纪年时，常会有不知落于相连的哪一年，故常以“某年/次年”的方式呈现，如此处。因此波里比阿的历史常被认为延伸至一四六年，但导读作者在上面却提到一四五年，但作者并未说明何以如此。——译者注

[3] 海德（Edward Hyde，1st Earl of Clarendon，1609—1674 CE），英国史学家，玛丽二世及安女王的外祖父。——译者注

[4] 根据导读作者在他的Polybius，Rome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Essays and Reflections（Cambridge，2002）里第二页所提，字典已经编辑到poieo。——译者注

第一书

导论

1.假如纪录较早时代人类事迹的人未曾赞颂过历史，那或许我有必要敦促读者去找出并去关注这类的作品，因为就行为来说，人类当然无法找到比对过去之知识更好的引导。而且我们可以这么说，实际上所有史学家都毫无例外地声称这样的主张正是他们作品所有而且仅有的目的，亦即，研读历史既是最真正意义的教育和从政生涯的训练，而且也是教导人们在遭遇灾难时，要能有尊严地承担命运所带来之浮沉，其最可靠以及唯一的方法是被提醒到其他人所曾蒙受过的灾难。所以我们可以同意，没有人在这时候有必要去重复其他作家经常提到且已适当论及之事。尤其就我的情形更是如此，因为正是我选择陈述之事情中所具有的不可预期成分，[1] 使所有的读者，无论老少，在研读我系统性的历史时，都将会受到挑战与刺激。诚然没有人会在见识上如此偏狭或漠然以至于会不想去思考并发觉究竟罗马人是利用何种方法和何种政府体制，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2] 将几乎全世界所有人居住的地方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这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成就，但却被忽略。或是从相反的角度来看，难道会有人全然沉溺于其他思辩或研究议题，所以他会发现其他的任务会比获得这知识来得更重要？

2.假如我们思考其他史家以过去知名帝国为主要议题的记录，并将之与罗马统治并置观察，那么我所研究主题的吸引力以及所呈现之宏伟景象，便可以得到最佳的阐明。那些堪称与此一较高低者，如下。波斯人曾有段时间称雄庞大疆土，但是每次冒险跨越出亚洲的界线时，[3] 他

们不仅危及帝国安全，甚至祸延自己的存亡。斯巴达人在历经多年争取希腊霸权后，终于如愿，但却仅仅维持十二年未遭受挑战。[4] 马其顿人在欧洲的统治仅及于亚得里亚海沿岸到多瑙河，这似乎仅是欧陆的片段；稍后他们推翻波斯帝国而成为亚洲主宰。[5] 虽然当时他们被认为较之前的任何民族，掌控了更多数量的国家以及疆域，但他们还是让更多人居世界的部分落在他人手中。他们甚至未曾去企图争夺西西里、撒丁或是非洲 [6] 的所有权，而且说实在话，他们也未曾见识过西欧最骁勇善战的部落。但另一方面，罗马人不仅将部分世界，甚至可以说是几乎将全世界都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而且远远超越任何现今存在，或（可能）是继承前人所留下的帝国。在我的作品陈述之中，我将会更清楚地解释它如何取得霸业，而且那些好学之人也将可以从研究严肃历史中，得到莫大的益处。

3.我的《历史》始于第一百四十个奥林匹亚年。[7] 这奥林匹亚年开始即发生了一些事件。在希腊有所谓的同盟战争（Social War），最先由马其顿菲利普五世，德米特里二世之子及佩尔修斯之父，联合亚该亚人对抗伊托利亚人；在亚洲则是为争夺空叙利亚所发动的战争，[8] 发生在安条克（Antiochus）三世以及“爱父亲”托勒密四世（Ptolemy Philopator）之间；而在意大利、非洲以及邻近国家则有罗马和迦太基的战事，大多数史家称之为汉尼拔战争（Hannibalic War）。[9] 这些事件是紧随西息温之阿拉托斯（Aratus of Sicyon）[10] 的历史所记录事件之后发生的。在早先的时候，有关世界的历史可以说是由一连串不相干的事件组合而成，其发生的缘由以及结果之不相关联，有如它们散落四处之地点的相隔。但是从这时开始，历史变成有机的整体。在意大利及非洲的事情与在亚洲及希腊所发生者相系，其中所有事件发生关联，并导致单一结果。这便是我何以选定这个特定时间作为我作品的起点，因为那正是罗马人在汉尼拔战争击败迦太基人之后，开始相信在他们取得世界主宰地位过程中，踏出最关键及最重要的一步，并且因此受到鼓舞，首度将双手伸出去掌握其余的部分，跨海挥军希腊以及亚洲大陆。

假如我们希腊人熟悉这两个争夺世界霸权的国家，那或许我便没必要交代他们之前的历史，或是解释何种目的促使他们或是他们依赖何种资源去进行如此巨大的事业。但实情是我们希腊人对无论是罗马或是迦太基之前的国力或历史知之甚少，所以我相信有必要以此书以及接下来一书作为我整部作品的前导。我殷切希望没有人在开始投入到叙述本身之后，便陷入困顿，不知罗马人在冒险进行那最后让他们成为我们这世界主宰的伟业时，心中是如何思考以及他们究竟掌握哪些武力。但另一方面，我意图以这两书及其中所含的导论，来让我的读者明确了解，罗马人从开始便有足够的理由去怀抱创造世界帝国的意图，而且有足够的资源去实现他们的目标。

4.我历史作品所具有的特质与我们所生活时代的特殊精神相关。正如命运女神将世界里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引导到相同方向，强迫它们汇聚至相同的目标，所以史学家的任务是将女神在完成这整体规划所历经的过程，置于一综合的观点之下，呈现给他的读者。而尤其正是这现象原先吸引我的注意，鼓舞我进行工作。第二个理由是，在我同时代之人中没有人着手去书写普世史；诚然，假如他们已经着手进行，那对我来说必然会比较没有诱因去尝试此事。但如我所观察到的，虽然有些不同的史学家去处理个别孤立的战争以及相关议题，但就我所知晓者，尚未有人曾经尝试去检讨所有这些事件的整体及普遍架构：何时发生、从何发生以及何以导致最终结果。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不去忽视这种现象，或让它隐而不彰，因为这种命运所造就的一切，正是最精彩，以及最值得去多加思考的。虽然命运不断创造出新的事情，并且不停地在人生之中进行新的剧目，但它从未在单一例证之中造就出如此的布局，[11] 或曾经展现过我们在自己时代里所见证到的奇观。

我们无法在那些只记录个别孤立事件的历史作品中，得到如此全面性的观点。正如一个人连续去亲访每座最著名的城邦，或去检视个别的城市蓝图，就能对整个世界的形状、布置以及秩序有所印象，因为这样

的方法不太可能带来正确的结果。我一直认为那些相信可以借由研读个别及专门的事件报告，而能对历史整体取得公正以及适当见解的人，其行为就像一个人在检视曾经活过的俊美身体在解剖之后的不同部位，却幻想他已经目睹这生物在生前所拥有的优雅举措以及行动。但我们若能在彼时彼地去重建整个生命体，恢复其在拥有生命时所具有的形体以及优雅俊美，并展现给那些人，我相信他们必然会立即承认自己之前的想法远离真实，像在梦中所见。这其中的真相是，我们从一部分事实所能得到的不过是对整体的大致印象，而这绝非透彻的知识或是准确的理解。所以我们必须对此下一结论：单一事件的专门研究对整体知识的掌握以及理解，贡献甚少。相反的，唯有结合整体的不同部分，彼此相互比较，注意相似及相异之处，我们方能获得全貌的观点，因此能获得研读历史所能带来的实际利益以及喜悦。

5.在本书中我将以罗马人第一次跨海离开意大利作为我的起点。这事件发生在泰密乌斯历史作品结束之时，亦即第一百二十九个奥林匹亚年。[12] 因此我的任务首先是要描述罗马人如何及何时立足意大利，以及是何种考量迫使他们跨海到西西里——他们首次在意大利海外登陆之地。他们何以跨海的真正理由，我必须述而不论，因为若我去追究其中缘由，我必将无法建立我《历史》的起点或基本原则。所以真正的起点确定在一个众所公认、可经由事件来清楚确定的时刻，即使这么做会需要我回溯一小段时间，并且概括介绍其间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假如历史之起点所赖以为据的事件不为人所知或是受人质疑，那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将会无法得到首肯或信赖。这一点如能得到读者的同意，那叙述的其余部分则将会容易被接受。

6.我选定标记罗马在意大利建立势力的时刻是落在阿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河口的海战后第十九年，[13] 留克特拉（Leuctra）战役前第十六年。[14] 该年斯巴达人与波斯大王批准所谓的安塔西达斯（Antalcidas）和约；[15] 叙拉古僭主老戴奥尼素（Dionysius the Elder）

在伊雷波路斯（Elleporus）河畔击败意大利来的希腊人，之后围攻利吉姆（Rhegium）；高卢人突袭占据罗马，占领除了卫城（Capitol）外的城市其他区域。然而，罗马人协商出一个高卢人愿意接受的和约。然后罗马在众人意料之外，再度掌握自己的祖国，并从那一刻起开始扩张领土，并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与邻国进行一连串的战争。他们因为在战场上的勇武善战以及连战皆捷，因此让所有的拉丁部落俯首称臣。从此之后，他们攻击伊达拉里亚人（Etruscans），接着是凯尔特人，然后则是与拉丁人领土东方及北方接壤的萨莫奈人（Samnites）。数年后，他林敦（Tarentum）人污辱罗马使节，接着他们因为害怕这种行为的后果，便向伊庇鲁斯（Epirus）国王皮洛士（Pyrrhus）求援。这件事发生在高卢人入侵希腊那年之前；这些入侵希腊的高卢人有些在特尔斐（Delphi）被歼灭，但其他则跨海转进到小亚细亚。如我所述，罗马人已经降伏伊达拉里亚人以及萨莫奈人，并在许多战役中击败在意大利的凯尔特人。他们现在首度对意大利其余的民族宣战，并非因为这些人是外国人，而是因为意大利这国家宛如已经完全属于罗马人的。他们和萨莫奈人以及凯尔特人已经历经武力的较劲，结果罗马人胜出，并成为战争技艺中真正的优胜者；他们在抵挡皮洛士入侵时展现出极大勇气，最后将他及他的军队驱逐离境，但罗马人为了降伏那些站在皮洛士那方的人，仍继续战斗。他们出人意料地成功克服所有劲敌，当他们最后征服除了凯尔特人外的其他意大利民族后，他们开始围攻瑞吉温，而这城邦当时是掌握在一些罗马公民的手中。

7.我必须解释何以横过西西里海峡、彼此对望的两个城邦——迈萨拿以及瑞吉温，会遭受到怪异但却相似的命运。一群受雇于阿加索克利斯（Agathocles）[16] 的坎帕尼亚（Campania）佣兵，对迈萨拿城的富庶及优美垂涎已久，而就在我所描述之事不久之前，他们捉住机会，以诈术占领该地。他们以友谊之名潜入城邦，然后立即占为己有。在这之后，他们驱逐一些公民，并屠杀了部分公民，并将这些被抄家受害者的妻子及家庭据为己有，这些人在当时保有犯下这些恶行时所占有的一

切。最后他们瓜分了所有土地以及所剩的财富。一旦他们如此迅速及轻易地占据如此美好的城邦以及邻近领土后，其他人立即起而效尤。当国王皮洛士随后立即从意大利跨海进入西西里岛，瑞吉温人民认为自己受到双重的威胁。他们不仅害怕皮洛士的攻击，也畏惧控制大海之迦太基人的入侵，因此他们请求罗马支援，派遣一支驻军协助。罗马所派遣人员为数四千，由一位坎帕尼亚出身之德西乌斯（Decius）率领，有一段时间由他的军队执行保卫该城的任务。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无法抵挡诱惑，最后终于效法战神之子（Mamertines）。[17] 他们艳羡瑞吉温地理之美以及居民的繁荣富有，便勾结佣兵成为共犯，他们违背对瑞吉温人民的誓言，开始驱逐或屠杀公民，占据该地，正如战神之子在迈萨拿之所作所为。人民在罗马对自己同胞的行为大感愤怒时，但却无能去加以禁止，因为他们深陷我所提及之战争中。一旦他们得以自由行动，他们便包围该城，进行攻击，如我之前所述。在瑞吉温被攻陷时，[18] 大多数驻军在攻击行动中尽力一搏之后丧命，因为他们了解等待他们的命运为何；最后仍有超过三百人被俘。这些俘虏被送往罗马，执政官命令他们前进广场；根据罗马人习俗，他们在那里先被鞭笞，然后斩首。执行这种惩罚的目的，是要尽其可能地恢复罗马人在盟友中美好的名声。罗马立即归还瑞吉温的城邦及领土给当地居民。

8.同时，战神之子只要能依靠罗马人和与占领瑞吉温之坎帕尼亚人的联盟，不仅可以安稳占有迈萨拿城邦及领土，而且也能骚扰邻近区域的迦太基人以及叙拉古人，[19] 并且从西西里的许多地方征收贡赋。但是当在瑞吉温为非作歹的罗马驻军被自己罗马同胞紧紧围攻后，战神之子顿失这方面的支持，很快轮到他们被迫躲入自己城市中避难，逃离叙拉古人。事情发生经过如下。当时不久前，叙拉古的军队与国内当局发生冲突，当时军队驻扎在莫干（Mergane）附近，并从军队中自行选出两位司令：其中之一为阿蒂米德鲁斯（Artemidorus），另一则为希洛（Hiero）——此人后来成为叙拉古的统治者。[20] 那时希洛仍然年轻，但天生的领导性格让他显得极适合承担那种崇高地位及政治权威。在接

管军队的指挥权后，他利用家族人脉，进入城邦。一旦入主城邦，他在面对敌人时，尽管占有上风，但却仍慷慨宽容地治理政事，因此所有叙拉古人一致拥戴他为将军，尽管他们对军队所选举出来之领导人物一点都不怀善意。然而从他最初施政起，所有有智之士立即察觉到他的野心将不只是将军的职位。

9.希洛已经观察到派遣叙拉古军队出国，在最高官员指挥下进行战争，将无可避免地会导致领导阶层内的争执，并爆发某种形态的革命活动。他也了解到在所有的叙拉古公民中，有位叫莱普廷斯（Leptines）的人深孚众望，得到最多支持，特别在平民阶层中受到欢迎。他因此婚娶莱普廷斯的女儿来缔结家族联盟，所以每次他必须离国征战时，他便可以倚赖莱普廷斯留在国内，看守他的利益。同时他也得到结论，认为经验老到的佣兵是军队里不可靠以及潜在作乱的分子。因此希洛率领他们去对付迈萨拿城，佯装对付盘据该地的坎帕尼亚人。他靠近鲜吐律帕（Centuripa）一地，面对敌人扎营，并在靠近赛尔摩苏鲁斯（Cyamosorus）河附近部署军队。他如此布置战局，而由他个人统帅的叙拉古公民所组成之步兵及骑兵，作为预备部队，仿佛他打算从另一个方向来进行攻击。另一方面，佣兵则接受命令前进攻击，被坎帕尼亚人杀得片甲不留。当他们溃散时，希洛立即撤军，与叙拉古人安全地撤退到叙拉古城中。[21] 那时他很有效率地达成目的，将军队中这些难以驾驭的叛乱分子给清除掉后，他开始亲自挑选征募相当数量的佣兵，从此之后安稳地掌握全局。不久后，他注意到战神之子因为此次的成功，行径变得肆无忌惮、倨傲不恭。于是他开始武装他的公民军队，在迈莱（Mylae）[22] 平原的隆卡奴斯（Longanus）河旁与敌人交战，并将他们彻底击败，俘虏他们的领袖。这行动终止了战神之子的侵略行为，所以当希洛回到叙拉古时，所有盟友便拥戴礼敬他为国王。

10.所以如上所述，战神之子失去来自瑞吉温的支持，接着又因为我刚提及的：在自己领土里遭受到压倒性的挫败。这时候，他们其中有

些人便转而求助迦太基人，将自己的安危及卫城交到他们手中，但另外一派人马则遣使到罗马，以坎帕尼亚人与罗马人有同族关系的身份，请求援助，同样也提议交出城邦。罗马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决定，因为若给予要求的援助，很显然会前后不一致。因为不久之前罗马人才因为自己同胞违背与瑞吉温该有的诚信，而处死一些人。若要现在去协助犯下相同恶行的战神之子，那必将是一件难以辩解的不公不义行为。罗马人在这一点上看得很清楚，但他们也同样看到迦太基人不仅将非洲，而且将很大部分的西班牙纳入统治，并且他们是撒丁海以及提蓝尼亚（Tyrrhenian）海所有岛屿的主人。假若迦太基人进而掌控西西里岛，必将成为最麻烦以及最危险的邻居，因为他们将会从每个方向来包围意大利，威胁这国家的每个地区，而这正是罗马人所畏惧的发展。很显然这将会是西西里的命运，除非他们对战神之子伸出援手：因为迦太基已经征服这岛的大部分区域，而一旦迈萨拿落入他们手中，叙拉古成为禁脔指日可待。罗马人预见所有这些可能性，于是认为绝对不能放弃迈萨拿，以免允许迦太基取得桥头堡，入侵意大利，所以他们进行彻底的辩论。[23]

第一次布匿战争

11.即使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元老院仍无法同意增援迈萨拿；他们的观点是任何能从解围这地方所得到的利益，必将会被如此前后不一的行为所抵消。但另一方面，深受战争之害的人民虽然才因为刚结束一连串战事，急需种种复原，但反而倾向听从执政官的建议。官员除了强调那些罗马若进行干预，可取得的国家利益之外，也强调每位公民必将从战利品中得到极大利益，所以人民通过援助的决议。当决议通过时，执政官之一阿匹乌斯·克劳迪乌斯（Appius Claudius）被任命为远征军统帅，并获授权跨海到迈萨拿。在这之后，战神之子半透过威胁，半透过假消息，设法说服已经驻防卫城的迦太基指挥官移出；[24] 然后准备邀请阿匹乌斯进驻，将城市移交给他。迦太基以指挥官擅离卫城时，表现怯懦以及缺乏判断为由，用十字绞刑将他处死。迦太基人接着将舰队停泊在佩洛里亚司海岬（Cape Pelorias）附近，[25] 利用他们的陆战部队从苏尼斯（Suneis）方向积极围攻。希洛认为这时候是一口气将占领迈萨拿之野蛮人逐出西西里岛的好时机，于是和迦太基人缔盟，从叙拉古出兵，进军迈萨拿。他在迦太基军队防线的对面，靠近卡基迪克斯（Chalcidicus）山附近扎营，因此也切断从迈萨拿脱逃的路线。与此同时，罗马执政官阿匹乌斯开始进行在黑夜渡海的危险行动，前往迈萨拿。他发现敌军从各个角度积极围攻，认为若在敌人同时控制海陆时，会让自己身陷围困之势，不仅危险，而且羞辱，所以他设法和叙拉古及迦太基人达成协议，希望将战神之子带离战局。然而两方对于阿匹乌斯的提议同时不予理会，所以单纯迫于情势，他必须冒险一战，首先攻击叙拉古人。他率领部队，摆开交战阵势；那时希洛积极应战，两军交锋。双方交战甚久，至为激烈，但阿匹乌斯最后胜出，将敌军逐回到他们的阵地，之后开始掠夺敌军死者遗物，然后回到迈萨拿。对希洛而言，这次军事行动让他预感到这整个战局将会如何落幕，所以他借黑夜

掩护，抽离军队，全速撤退到叙拉古。

12.第二天阿匹乌斯得知战事结果后，信心大增，不再耽误，直接攻打迦太基人。他下令部队要在很早时候就已预备待命，然后在破晓时刻立即出击。他与敌人交战，杀敌许多，强迫敌军在混乱中撤回到附近的城镇。这些成功足以解围迈萨拿，进而反攻，摧毁叙拉古人及其盟友的领土，控制乡间，没有任何抵抗。最后他扭转局势，反而在叙拉古之前布军，开始围攻。

这是罗马人第一次领军跨海，而且是因为这些理由及在如此脉络之中，他们有如此作为。我认为这是整个叙述最适合的起点，因此我的主题便以这些事件为根据，而我在综合事件过程时，也会回溯到更过去，这样在阐述事情发生原因时，才不会有所缺漏。对那些有心想理解罗马现今独霸的发展有详尽及全面陈述的人来说，我认为追溯罗马这段早期历史，至为重要。换言之，他们必须熟悉这段罗马人在自己国土遭受挫败后，[26] 渐入佳境的时期及过程，以及熟悉他们在成为意大利主宰后，如何和又在何时致力于去征服更遥远土地的诸多细节。假如我在这作品的叙述中，有时会离题去解释一些最知名国家的早期历史，读者不应该感到惊讶。我做这事是为了给读者一个起点，让他们能够了解这每个国家到达现今状况的缘起以及背景。换句话说，我将会用我已经为罗马人所采取的相同方法来说明。

13.在做完这些解释之后，现在该是呈现我主题的时候了。但我首先要对在这导论性质的前两书中，所处理的事件做一个简洁的整体说明。在依序论及这些事时，首先要提的是为争夺西西里而发生在罗马及迦太基之间的战争事件。接着是在非洲发生的战争，其后则是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成就，最先由哈密尔卡（Hamilcar），然后由哈斯德鲁巴（Hasdrubal）主导；哈斯德鲁巴在西班牙的征讨，与罗马人首次入侵伊利里亚及那部分欧洲，这两件事件同时发生，然后不久之后便是罗马人

在意大利对抗凯尔特人。在此同时，以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命名的战争在希腊爆发。至此我将结束我这部历史的导论以及第二书。

我无须巨细靡遗地陈述所有这些发展，这对读者想必亦无多用处；我的计划并不需要将这些完整照录，而仅是引领进入构成全书主题事件的导论，在经过时提及。因此我所做的不过是依序简洁地重述这些事件，来让我导论一书的结尾，使其密合到我的历史作品本体的起源。依照这种方法，我的叙述将依循一个没有间断的顺序，而读者也将会见到我有很好的理由去触及其中一些事件，即使这些已经被其他人记录过；同时，对学生而言，这样的安排会让处理后来之事变得可以被理解，容易跟进。然后我会设法对这场为了争夺西西里岛，而在罗马及迦太基间爆发的第一次战争，做较为详尽的陈述。这是因为甚难找到有任何其他战争，比它爆发的时间经过更久，交战双方准备更为积极，或一旦开打，更奋战不懈，或是找到有其他战争会涉及更多战役或更是多决定性的命运转折。在那时这两个国家在习俗以及体制方面仍保持原貌，两边从命运女神那里都只得到适度的协助，而且在国力上旗鼓相当。于是我们可以借着比较他们在这次而非之后的战争表现，对双方的民族特质以及国力资源，形成一个较为准确的图像。

14.尚有一个在影响力上不亚于上述原因的理由，说服我要对这场战争多所着墨的事实：费利纳斯及费边[27]这些号称对此事最为专精的权威史家，在我的评价中却认为他们没有尽责地去报道事实。假如我以这些人的生平及原则来作为判准，我不认为他们是刻意误导读者。但另一方面，就我看来，这两人的行为却像一般人陷入情网时一样。因为由于党派之私以及全心支持一方，所以费利纳斯坚持迦太基人在每个场合中都是以智慧、品德及勇敢行事，而罗马人皆反其道而行。而费边则给我们截然相反的版本。或许我们在人生其他领域之中，无法排除如是的偏颇，一位好人应该爱他的朋友、他的国家，也应该分享他们的仇恨及忠诚。但一个人一旦扮演史学家的角色时，他就必须扬弃所有这样的考

虑。他将会经常说他敌人的好话，若他们的行为有任何值得称许之处时，甚至愿意给予他们最高的赞誉；但另一方面在自己朋友行为上出现错误时，无论他们是如何亲近，也必须要能够批评斥责，这是他的职责。正如一个生命体若是被剥夺视力，就会陷于完全无助，若是史学被剥夺真相，所剩者不过是无聊无用的故事。所以我们不该怯于去指责我们的朋友或是赞美我们的敌人，我们也没必要畏惧在不同时机去赞美或指责相同之人，因为从事公共事务之人不可能永远正确，也不可能一直做错。为了提出他们行为所值得的陈述以及论断，我们因此必须要与故事中的角色保持距离。[28]

15.我刚才所说之事的真实性，可由这些历史作品所取出的一例来验证。费利纳斯在他的第二书开始之处告诉我们，迦太基人和叙拉古人一起对迈萨拿作战，围攻该城；然后罗马人渡海而来，进入城市，立即突围攻击叙拉古人，但是在遭受重大伤亡之后，退回迈萨拿。接着他们出城攻击迦太基人，但是不仅被击退，而且许多士兵被俘，损失惨重。这便是费利纳斯的陈述。但是他又说，在战后，叙拉古的统治者希洛完全丧失理智，不仅焚毁自己的营区及帐篷，当夜匆忙赶回叙拉古，同时放弃所有用来威胁迈萨拿领土的碉堡工事。同样地，他报道说迦太基人在战后，立即撤出自己阵地，四散到邻近个别城镇之中，不再企图去争取城外开阔的乡间地带。他又告诉我们，迦太基指挥官认知到自己部队士气已经瓦解，决定不让他们接受战争的考验；他还说罗马人紧追在后，侵犯迦太基人及叙拉古人的领土，进而围攻叙拉古。在我看来，这样的陈述是一团矛盾，无须仔细进行检验。对这相同的军队，费利纳斯在开头说正在围攻迈萨拿，而且连战皆捷，却在稍后仓皇败逃，放弃开阔乡间，最后士气衰竭，反遭围困。另一方面，那些他形容为挫败受困之人却突然被说成已经突围，追杀敌人，控制乡间，最后围攻叙拉古。这两种说法无法自圆其说，所以他之前或是之后的军事行动，其一必然有误。前者的说法不正确。真相是叙拉古人与迦太基人放弃乡间地带，而罗马人立即针对叙拉古进行攻击，也正如他说，同时对依克特拉

（Echetla）作战，这是介乎叙拉古及迦太基领土之间的城镇。我们因此必须认知费利纳斯报道的第一部分是错误的，而且这位史学家叙述罗马人在迈萨拿城前战败，但其实他们是胜利的。我们会发现这样的错误在费利纳斯的叙述中不断重复。类似的情形亦发生在费边的作品中；当时机出现时，我会加以指出。无论如何，就这次的离题叙述而言，我已经说出我的要点，现在将再回到原先进行的事情，尽我可能地呈现出这战争的真实图像，截弯取直，将我的叙述严格地限制在事件发生的顺序。

16.当阿匹乌斯及军团胜利的消息传回罗马，人民推选欧塔西里亚斯（Manius Otacilius）及瓦勒里乌斯（Manius Valerius）为新任执政官，派遣这两位将军以及所有武力[29]到西西里。罗马的四个军团皆是由公民所组成的，而这与盟邦军队的组成有所不同。每个军团皆是每年进行征召，由四千位步兵以及三百位骑兵组成。当这些军队到达西西里时，大多数的城邦皆已起义反抗迦太基人及叙拉古人，并投靠到罗马人那边。希洛注意到，慌张及恐惧的气息已经笼罩在西西里岛人身上，在罗马军队数量及强大战力与眼前的恐慌相对照之下，他的结论是罗马人的前景比迦太基人更为明亮。他的理性敦促他站在罗马人那边，所以他传送消息给执政官，希望缔结和平和建立友谊。罗马人欣然回应他的提议，特别是他们正在考虑要如何补给的问题。因为迦太基人控制海洋，他们担心基本物资的供应，不管从各方向运送，都会被切断。他们记取之前跨海到西西里的罗马部队，就曾因为这样的短缺，受害甚巨的教训，并判断希洛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很好的协助，所以他们欢迎这友好的提议。

于是他们草拟条约，其中的条件是国王同意交还战俘给罗马人，不要求赎金；此外，支付给罗马人一百泰伦[30]的银钱。罗马人民同意这样的条件，从此看待叙拉古人为朋友及盟邦。就希洛而言，一旦将自己置于罗马人的保护之下，持续为他们提供基本补给，终其余生，他就能够安稳地统治着叙拉古人，并以如此体恤的方式来对待其他希腊人，而

从他们那里赢得冠冕以及其他荣耀。平心而论，他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一位最杰出的统治者，就他长期从政所练就的智慧及其结果来看，不仅就个别事情，一般政策也是如此。

17.协议条款交付到罗马，经过人民批准、确认与希洛的条约，罗马人决定不在西西里岛上维持全部的军队，而是留下两个军团。他们估算，有国王站在他们这边，他们投入的规模就可以降低，军队也会得到比以前更好的补给。另外，当迦太基人了解希洛已经变成敌人，而且罗马人越来越涉入西西里岛，他们的结论是：假如要强大到足以与敌人抗衡，持续控制西西里事务，那他们的军队数量一定要补强。于是他们跨海招募佣兵，其中许多是利古里亚人（Ligurians）及凯尔特人，甚至还有更多是西班牙人，这些都被派遣到西西里。他们注意到，就他们目前的准备来说，阿格里根特拥有最好的自然优势，而且这也是他们行省里最重要的城市，所以在那里集中所有的军队及补给品，决定作为战争基地。

在罗马方面，原先与希洛协商条约的执政官已经离开，而继任的官员波士丢米亚斯（Lucius Postumius）及马米里亚斯（Quintus Mamilius）则率领军团抵达西西里。[31] 当他们得悉迦太基计划以及在阿格里根特所做的准备，他们决定先发制人，大胆一击。他们停止所有军事行动，集中全力攻击阿格里根特，并在离城约一里的距离驻扎，将迦太基人困在城里。当时正是收获季节，而这次围城预料将会更为冗长，罗马士兵于是开始收割粮草，表现比平常更为鲁莽不智。迦太基人发现敌人分散乡间地带，因此突围而出，攻击这些正在聚集粮草的人。迦太基人轻易地驱散他们，其中一些人进逼并掠夺罗马筑有防御工事的营区，另一些人则攻击卫哨。但就像过去经常发生的状况一样，正是罗马人优良的体制拯救了他们。根据他们的规定，一个人以任何方式擅离职守，或值勤时撤退，皆是极大罪行。所以这次，正如其他许多次一样，他们英勇地坚守岗位，对付数量上远超过他们的敌人；虽然他们失

去许多战友，但杀死更多的敌人。最后栅栏正被拆除时，他们成功地围住迦太基人。他们当场杀死许多敌人，并将其他人以边追边将其砍倒的方式，将他们追赶回城市。

18.在这次行动之后，迦太基人比较不愿贸然突击，而罗马人搜集粮秣也比较严格谨慎。当罗马将军发现迦太基人不再愿意做出超过小型攻击规模的战事，便将军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留在原地，靠近城外的医神（Asclepius）庙旁，另一部分则扎营在面对赫拉克里亚（Heracleia）方向的城外。罗马人加强分居城市两侧营区间的阵地防御：他们在靠城那边挖了一条内壕沟，以防城内军队进行突围，外壕沟则是排除任何来自外方的攻击，也避免人员或物资渗透进入到城内；在围攻时，常会有人尝试这么做。连接两营区的内外壕沟之间的空地则有卫哨巡逻，这些卫哨彼此间又相隔一段距离并在适当地点设立强化工事来给予保护。食物供给以及备用物资则由罗马的西西里盟邦提供，集中在赫别色斯（Herbesus）。因为这城镇邻近方便，他们可以经常往来，运送牲畜及其他补给到营区，因此物资充足。接着，双方陷入长达五个月的僵局，没有一方占有明显优势；除了小规模攻击所导致的成功外，几乎毫无进展。在这时候，迦太基人开始遭逢到因为饥饿所带来的困境，当时至少有五万人被围困在城内。受命统率这些受困军队的汉尼拔，[32]对这种处境感到忧心，因此送出一个又一个特使到迦太基去，解释他的困境，恳求增援。迦太基政府当时命令他们新募集到的军队以及战象登船，航向西西里，与岛上另一位将军汉诺（Hanno）[33]会合。汉诺将人员及物资集中在赫拉克里亚，[34]而他第一个行动则是对赫别色斯进行突袭；这次行动成功地攻下这座城，切断罗马人的基本物资供应。罗马人因此发现自己既是包围者也是被围者，受迫到如此严重短缺贫乏，他们不只一次考虑是否要停止围攻。事实上，若不是希洛利用种种可能的资源，想出种种计谋，成功提供足够分量的基本补给品，罗马人最后必然会选择停止围城。

19.这时候汉诺又再度采取主动。他知道罗马军中发生疫情，罗马人因为饥饿及疾病而由强转弱。他自信自己的部队强大到足以一战，于是他动员所有的军力，包括为数五十头左右的战象，迅速从赫拉克里亚出发。他派出他的努米底亚骑兵作为先锋，下令在靠近罗马人强化防御工事的营区时，将罗马骑兵引出交战；一旦成功做到这一点，他们立即撤回到主力军队中。努米底亚人执行这项命令，骑到其中一个营区，那时罗马骑兵立即出击，勇敢交战。这些努米底亚人根据计划撤退，直到汉诺的部队；那时他们回转过来，包围敌军，向他们冲刺，杀死许多人，将其余逐回营区。在这行动之后，汉诺占领叫托鲁斯（Torus）的山丘，在该处扎营，该处距离罗马敌人约十个弗隆（furlong）[35] 的距离。双方有两个月时间处于相同态势，每天都不愿尝试任何超过小规模行动层级的更具决定性的攻势。但在这期间，汉尼拔以烽火为信，提醒他的同事，城内人民再也无法忍受饥荒，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缺粮已经逃向敌军。最后迦太基指挥官决定冒险一战，而罗马人——因为我已提及之理由——也一样积极备战，所以两军前进到营区之间的空地，开始交锋。战斗僵持不下，但最后罗马人逐退迦太基前线的佣兵，当他们撤退到部署在他们后方的战象及其他单位时，整个军队陷入混乱。全面溃败开始发生，大部分迦太基军队在战场上被杀死，虽然有些人逃到赫拉克里亚。罗马人则掳获了大多数的战象以及随军行李。但在天黑后，罗马人既高兴又疲累，没有像平常一样谨慎。那时汉尼拔一直对自身处境感到绝望，突然看到挽回局势的契机，所以与佣兵在夜半时分一起突围离城。他用紧紧装满麦杆的笼子填满壕沟，设法让部队在不被查觉下安全离去。当白天来临时，罗马人发现发生之事；罗马人与汉尼拔的殿后部队进行短暂零星交战后，全军前进到城门。那里没有人抵抗他们，所以他们冲入城内，开始烧杀掳掠，奴役大量居民，[36] 并且掳获大量形形色色的战利品。

20.当阿格里根特事件的消息传到罗马，元老院喜不自胜。在这种兴高采烈的情绪下，他们的期望远超过预先的计划，不再只满足于解救

战神之子，也不满足于战争所获得的利益。他们现在怀抱希望，要将迦太基人完全逐出西西里，而一旦达成这目标，他们的势力将大为增加。于是他们将这设定为首要目标，全力计划，付诸实现。

就陆战而言，他们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取得所有可能的战果，因为在围攻阿格里根特之后选出的执政官，弗拉库斯（Lucius Valerius Flaccus）以及克雷苏斯（Titus Otacilius Crassus），很干练地处理西西里的军事行动。但只要迦太基人持续控制海洋，为所欲为，战争结局就仍属未定之天。在接下来的数月中，[37] 因为罗马既然已经占有阿格里根特，许多内陆的城邦害怕他们的军队，换边投靠，但同时也有很多沿海城邦因为畏惧迦太基舰队，而背弃罗马。所以当罗马人见到优势的天平，因为这理由在双方之间摇摆不定，以及意大利海岸屡次遭袭破坏，非洲则安然无恙，他们心中极想往海上发展，与迦太基人在那领域一决雌雄。[38] 因为这个以及其他许多因素促使我对这场战争做出比原先更多篇幅的叙述。我心中盼望我的读者不该对这类重要的创新举动有所不知：也就是罗马人如何、何时以及为何首度往海上冒险。

因为他们看到战争不断拖延，于是便开始致力建造船只：一百艘五层舰[39] 与二十艘三层舰。他们的造船师傅完全没有制作五层舰的经验，加上这些船只未曾在意大利被使用过，所以他们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正是这样的事实最能彰显罗马人在决策上的坚持精神以及冒险奋进。欠缺进行这种冒险事业所需资源对他们来说并不成问题，因为在这方面他们确实一无所有，而且在之前也未曾想过有关海洋之事。但一旦他们有这构想，他们就会大胆奋进地进行，所以不待在海战中学得任何经验，他们就立即与迦太基人交战，而这些迦太基人世世代代都一直在大海上称雄。他们这种特别的勇敢奋进，以及足以证明我所言不虚的例证是：当他们首次冒险运输军队到迈萨拿，他们没有任何装设甲板的船只，不仅没有长型战舰，甚至也没有轻型战舰。他们只不过向他林敦、洛克里以及厄勒亚（Elea）和尼亚坡里（Neapolis）人借用五十桨船以

及三层舰，冒险运送军队渡海。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迦太基人出海攻击正在渡海的罗马人，但一艘有甲板的迦太基船舰操之过急，为了赶上这些运兵船，冒险靠近海岸，结果搁浅，落入罗马人手中。罗马人就是用这艘船作为原型样本，并根据其中的规格制造出整只舰队。从这里可知，若非这个意外，他们或许就会因为纯粹欠缺必需的知识，而无法执行计划。

21.那些被指派造船工作的人，全心进行造舰工程，而其他人则招募水手集训，教导他们在岸边划船。方法如下。[40] 他们将人员安排在陆地上的划桨板凳上，依序坐定，正如在实际的船舰上，然后将下令划桨节拍的水手长（keleustes）[41] 安排在中间，训练水手将身体一致往后移动时，将双手移近身体，而在身体一致前倾时，双手推到身前，在下节拍者的命令下开始、结束这些动作。当水手学会这些动作，在船舰建造完成后，立即下海。[42] 之后他们其实在海上只有短暂练习，就在执政官命令下开始在意大利海岸巡弋。执政官西庇阿（Gnaeus Cornelius Scipio）受命统领舰队，在几天前已经下令船长，在船只装配完毕后，立即航向迈萨拿海峡。同时，他亲率十七艘船舰提前航向迈萨拿，因为他亟须取得舰队所需要的物资及备料。当他抵达时，便听说了利帕拉（Lipara）[43] 因为被出卖，有被攻占的机会而可能叛变的消息。西庇阿在过度仓促、不够谨慎的状况下，趁着这机会，率领我已提及的舰队出海，在城外下锚。这行动消息传到驻扎在帕诺穆斯（Panormus）的迦太基将领汉尼拔处，他于是派遣一位迦太基元老布得斯（Boodes）率领二十艘船舰前往。布得斯夜航到利帕拉，将西庇阿困在港中。当白天来临，罗马水手弃船逃到岸上，而西庇阿因为事态发展如此，陷入恐慌，而且无论如何都无法行动，因此向敌人投降。这些迦太基人立即航向汉尼拔，带走掳获的船只以及执政官。但是仅仅几天之后，即使西庇阿的重大失误殷鉴不远，汉尼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犯下与西庇阿几乎相同的错误。他听到罗马舰队沿着意大利海岸往前逼近，心中极想知道敌军数量及部署，于是带领五十艘船顺着他们前进的方向航行。当他在绕过意

大利海角（Cape of Italy）[44] 时，突然遇见井然有序、部署完成的敌军。交战后，他失去大多数船只，仅能以残余的船只脱身逃命。这结果完全超出他原先所预期的。

22.很快地，在罗马人靠近西西里海岸时，他们得知发生在西庇阿身上的灾难。他们立即传话给驻西西里的罗马陆军指挥官杜以里亚斯（Gaius Duilius），并等待他来临。他们也得知敌人舰队就在附近，于是开始备战。因为他们的舰队装配不良，难以活动，于是有人建议他们可以使用后来被称为“乌鸦”（raven）的装置在海上作战，以取得上风。其构造如下。一根长约二十四尺、直径十寸的圆木竖立在船首。圆柱顶端有滑轮装置，底部则是由木板交错钉牢所组成的四尺宽、三十六尺长的舷梯。舷梯被安装在船尾底处一个宽十二尺的长方型沟槽，圆柱的底端可以在这边卡住，通道的两侧长边有高及膝盖的护栏。在舷梯远端一侧，固定一个形状如杵的长铁锥，形状尖锐，看起来像是用来捣谷的器具，另一侧则有扣环可以让绳子穿过。绳子穿过铁环扣，然后再通过圆柱顶上的滑轮操控舷梯。当船只往敌人冲刺过去时，“乌鸦”会借着滑轮而升高，然后下降到敌舰甲板上；当两船相撞时，就可借由拖拉滑轮将舷梯转向放下。一旦“乌鸦”插入甲板，便可将两船抓牢固定，士兵就可以经此跳入敌船。假如两船平行时，他们甚至可以跳下自己舰队的船体直接登上对方的船只；但假如是船的首尾冲撞，人们则两两并行借着通道穿过。前锋的两人手持盾牌在前方保护，后边跟随的队伍则靠在栏杆边缘用盾牌保护侧边。在采用这样的装置后，他们等待机会在海上交战。

23.在听到西庇阿所遭遇的灾难时，杜以里亚斯将西西里罗马军团交给军团的营长指挥，自己加入舰队。他接获情报敌人正掠夺迈莱地区，[45] 所以他率领全军航向前去。迦太基人在目击之后，立即积极下海，全军共一百三十艘船舰。罗马人缺乏经验，迦太基人因此士气高昂，他们心中充满轻蔑之心。他们直接航行，正面切入敌军，认为自己

无需保持队形，便可冒险攻击，仿佛认为罗马舰队不过是瓮中之鳖。他们此次同样是由汉尼拔率领：他之前便是借着夜幕掩饰将军队撤离阿格里根特的将军，而现在他的旗舰是七人一排划一巨桨的船舰，这船舰曾经属于国王皮洛士所有。当迦太基人靠近敌人，看到在几艘船上船首举高的“乌鸦”时，迦太基人刚开始时并不清楚这装置有何用途，因为他们对于这个装置完全陌生。然而他们还是鄙视敌人，并且毫不迟疑立即展开攻击。当双方船只开始冲撞，迦太基人发现他们的船只全都被“乌鸦”固定住，罗马人则经由舷梯蜂拥而上，将他们团团围住，并开始在甲板上近身交战。整个海上作战似乎已经转变为陆上战斗，有些迦太基人被砍倒，其他人则对这样的战术不知所措，因此弃械投降。结果是迦太基人最先参与交战的那三十艘船全军覆没，并损失了水手和其他所有东西，其中包括旗舰。汉尼拔本人则以其果敢的行动加上过人的好运，设法利用舰上小艇逃离。迦太基其他船舰靠上前来，好准备攻击，但当他们靠近，发现了前导船只所遭受的事，立即转向航离，以避免碰到“乌鸦”。取而代之的是利用自己的速度，环行敌军，伺机安全地从船侧或是舰尾撞击。但是罗马人随时将舷梯转向，用以应付来自任何方向的攻击，并伺机放下“乌鸦”，任何靠近的船只都会被钉住，发现自己无处可逃。最后迦太基人掉头逃离，因为他们完全被这新的战术弄得信心大失。迦太基人最后总共损失五十艘船舰。

24.罗马人竟然用这种方法达成他们控制海洋的心愿，让众人大为意外，他们要继续奋战的决心也因此更加坚定。他们再次登陆西西里海岸，缓解赛格斯塔（Segesta）的围城之急，当地居民当时几乎已经可以说是奄奄一息。罗马人在回程时一鼓作气急攻，拿下马切拉（Macella）。

在海战后，驻扎在帕诺穆斯指挥的迦太基陆军将军哈密尔卡接到报告：罗马人及其战友因为分配战利品以及颁授功勋之事而开始内讧，以及那些罗马盟友远离罗马人扎营，驻扎在帕洛普斯（Paropus）城和希

美拉伊·特迈（Himerae Thermae）[46] 两地之间。他趁他们仍在扎营之际，以全军发动突袭，约杀敌四千。在这行动之后，汉尼拔带领那些逃离迈莱的军舰航回迦太基，之后很快带领一只得到充实的舰队航向撒丁，其中包括了迦太基最好的海军军官。但却在没多久后，被罗马人围堵在岛上的一个港口里，并且失去许多船只，他更被存活下来的迦太基人当场逮捕之后，加以绞刑处决。我应该要在这边解释：罗马人在对海洋发生兴趣后，便设法去掌控撒丁。

次年，[47] 罗马军队在西西里无重大进展，但在年末时，下一年接任执政官的阿提里亚斯（Aulus Atilius）以及苏尔皮吉斯（Gaius Sulpicius）抵达后，开始进攻帕诺穆斯——这是迦太基人过冬之处。执政官在城市附近布阵，率领全军叫战，但因为敌人没有应战，他们便行军离去，改为进攻希帕纳（Hippana），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此处。他们也占领地形险恶、久攻不下的米提斯特拉图姆（Myttistratum）以及最近背弃罗马的加马里纳（Camarina）；他们在加马里纳前布置攻城机，打破城墙。他们接着占领恩纳（Enna）以及一些迦太基的要塞。在完成这些军事行动之后，他们包围利帕拉。

25.接下来一年，执政官雷古鲁斯（Gaius Atilius Regulus）统帅舰队，在丁达里斯（Tyndaris）[48] 下锚，当时他见到迦太基舰队航行经过，没有保持队形。他下令主力部队跟随领先的船只，并且身先士卒，亲自领航可以以同速前行的十艘船作为前锋。迦太基人见到有些敌人还在登船，其他船只虽已航行，但先锋船只却远远超前，于是立即转向，与他们交战。他们将罗马人包围，击沉其中九艘，几乎就要逮捕执政官跟他的水手。但这艘船不仅快速且装配精良，最后逃离险境，迦太基人无法如愿以偿。在此之际，罗马其他舰队也已抵达，并立即采取密集队形。当舰队列阵完成，向敌军发动攻击，击沉八艘，并掳获十艘及水手。迦太基其他舰队撤退到利帕拉岛。

这场海战的结果是，双方现在认为彼此实力旗鼓相当，于是双方加倍努力建造舰队，来争夺制海权。与此同时，陆军没有重大进展，而是将时间花在偶然出现的次要或零星战役。于是乎，如我已提，一旦罗马人在次年度夏季完成海军备战，罗马人发动三百三十艘[49]设有甲板的船舰，停泊迈萨拿。从那里他们继续航程，保持西西里在他们右侧，绕过帕奇纳斯（Pachynus）海岬，航向埃克诺穆斯（Ecnomus），[50]因为他们的陆军当时驻扎该地。迦太基人派出三百五十艘设有甲板的船舰在利利贝乌姆（Lilybaeum）停泊，从那里往东南方航行，在赫拉克里亚·米诺亚（Heracleia Minoa）下锚。[51]

26.罗马此时的作战计划是航向非洲，将整个军事行动场景转移到迦太基去；他们希望让迦太基人感觉到战争不再只是威胁西西里，而是他们自己的领土。迦太基人则力求此事不要发生。他们了解非洲极易遭受攻击，人民对成功登岸的敌人势必难以反抗。他们不能容许这局势发生，所以积极在海上冒险一战。既然一方决心强迫登陆，另一方力求阻止，那么双方在目的上势不可免地发生冲突，产生如下的对抗。

罗马为两种结果都预做准备，亦即，在大海交战和登陆入侵敌国。为了第二项目的，他们精选陆战人员，并将入侵部队编组为四个单位。每个单位都有替代性番号，如第一单位又被称为第一军团或第一纵队，其余如是；但第四单位多了第三个名称——后线部队（triarii），这是原来军团部分部队的名称。[52]船舰运送的所有作战人员多达十四万，每艘运载三百名水手以及一百二十名陆战队。另外，迦太基几乎将所有准备投入到海上决战这种企图；从船只数量估算，他们的人力必然超过十五万人。[53]若从人员及船只数量来估算，这些数字想必会让当场见证之人震惊，甚至是读者都会对这次决战的巨大规模以及敌对双方的开销及资源感到惊讶。但现场亲眼见证两军队战的人，必然会更加震慑。

罗马人必须考量两种困难：首先，他们的航道横跨开阔的大海；第

二，敌人船速较快。他们因此苦心积虑地设计出一种队形，既可让舰队不致凌乱断裂，又难以受到攻击。两艘由执政官雷古鲁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及曼里亚斯（Lucius Manlius）指挥的旗舰，是每支桨需要六人划动的大船，在护航舰队的前方领航，彼此并排。在每艘船之后则是一列的船舰，以梯形编队展开，所以每接下来的船舰会逐渐地与其相应的另一侧船舰越来越远，但船首指向大海。其舰后的第一纵队及第二纵队依序成为楔形的两侧，第三纵队的两侧与前面两群舰队形成的两侧对齐，其余船只与之对齐，并排一列。全部舰队看起来像是以三角形形式布阵。在三角形底边之后则是载有马匹的运输舰，每艘以两条绳索与之前第三纵队的船只固定。最后在这些船后方则是第四纵队——后线部队。这些船只以直线排列，并往两侧延伸到甚至超过之前船队的行列。当每艘船以我所描述的方式布置妥当，整个战斗队形看起来宛如一个楔子：前端开放，后方则相当紧密扎实；整个队形有效率，容易维持，难以突破。

27.约莫同一时间，迦太基指挥官对他们的人员发表了简短的演讲。他向他们解释，假如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胜利，他们之后将会为控制西西里而奋斗，但假如他们被打败，他们将被迫为自己家乡以及自己的财产而战。说完这些，他下令登船。将军的话让他们清楚了解到他们面临的状况，所有水手立即听令，利落上船，士气高昂地出海，充满战斗意志。指挥官一看到敌军的战斗队形时，立即进行调整应付。四分之三的船只以一直线摆开；所有船只皆面对罗马人，但右翼则延伸到大海，越过敌军侧边来进行包围。其余舰队则是排列在左侧，指向岸边，与主力部队形成一个角度，并延伸超过。迦太基的右翼是由汉诺率领，这位将军曾在阿格里根特外的战争受挫。[54] 他的战斗群包括有特殊船首设计的军舰，可以用来撞击敌军，而且最快速的五层舰，拥有攻击船只腹侧所需的速度。统领左翼的军官是在丁达里斯海战中统帅迦太基舰队的哈密尔卡，[55] 他同时也占有中间位置；我稍后将会描述他在这场战役中使用的一种战术。当罗马人见到迦太基的阵线因为战线过长，相当单

薄地维持队形，于是针对中间发动攻势，战争于是开始。[56] 在这部分的迦太基船舰所接受到的命令，是遇敌时要让敌人通过，希望借此打散罗马的编队，所以他们以轻快的速度撤退，让罗马人在后面紧追。结果是第一纵队及第二纵队的罗马船舰追击撤退的敌军，第三纵队及第四纵队的船队则与他们分离：第三纵队缓慢是因为它们必须拖曳马匹运输舰，而后线部队必须与它们留在一起，作为预备。当迦太基人判断他们已经将第一及第二纵队与其他罗马船舰引得够远，哈密尔卡的旗舰立即升起旗号，所有迦太基船舰立即回转，与追击它们的敌船交战。接下来的战斗十分激烈。迦太基人优越的速度使得他们可以绕到敌人的腹侧，也可以轻易地接战或迅速脱离。但罗马舰队本身，充满着必胜的自信；只要敌舰一靠近，战斗便成为纯然的力气之争，因为他们的“乌鸦”会在敌舰进入固定范围内时，将其紧紧扣住。除此之外，他们是在亲自参与战斗的执政官监视下进行激战。至少这是在战线中心的状态。[57]

28.在此同时，在罗马最初攻击阵线中心时，率领右翼的汉诺先是保持距离，往大海航行，现在则开始攻击后线部队的船队，造成罗马人极大的困难及焦虑。在另一方，迦太基的左翼离开之前在岸边附近停泊的地点，改变原来队形，部署成直线队形，船首面对罗马人，攻击拖曳马匹运输舰的船只；在那当刻，罗马人丢弃缆绳，与敌人交战。战争现在变成在三个地方分别进行，每一处战斗都与其他两处分离甚远。因为双方舰队在开始时布署如此，所以每处的军力旗鼓相当，战斗皆势均力敌。这些交战的结果也大致可以预期，既然彼此对峙的舰队在战力上相当。那最先交战的也是最先分开，因为哈密尔卡的战斗群终于被逐退，开始逃离。曼里亚斯于是开始准备拖走他的战利品，但雷古鲁斯见到后线部队以及马匹运输舰正陷入挣扎，便匆忙带着第二纵队中仍堪战斗的船舰前往救援。一旦他到达汉诺的船舰时，便立即交战，后线部队虽然当时已经受创甚深，却因此大受鼓舞，重新鼓起精神，投入战斗。这次换成迦太基人发现自己受到压迫。他们受到前后包夹，并惊讶地发现自己正被敌方援军包围住，于是最后撤退，航向大海。同时间，曼里亚斯

重新返回战场，见到第三纵队被迦太基人进逼困在靠近海岸之处。[58]他和已经让后线部队及马匹运输舰安全脱困的雷古鲁斯，一起全速前往解救深陷险境的战友。这些战友被迦太基人团团包围住，宛如陷入围城，且将在不久之后即将被歼灭，若非迦太基人畏惧“乌鸦”，所以只能将它们圈围在靠近陆地的区域。因为担心会被“乌鸦”勾住，所以他们没尝试撞击。所以当这两位执政官全速前来，反而包围了迦太基人，并成功掳获五十艘军舰和水手。只有少数成功逃离，而且是以紧贴陆地航行逃离。这是各处战斗如何结束的情形。整体战斗的结果对罗马人有利。他们有二十四艘船舰被击沉，但迦太基舰队方面则超过三十艘。没有任何罗马船舰与水手被掳获，但迦太基却有六十四艘遭受如此的命运。

29.战后，罗马人重新补给舰队，修复掳获的敌舰，并细心去照顾在战场上为罗马建功的自家船员。然后再度上船，继续航向非洲。一支比主力部队先行的先遣舰队在称为荷密翁（Hermaeum）的海岬下方登陆，这海岬构成迦太基湾的东端，往大海突出，遥指西西里。[59]他们在那里等待其他舰队来到；当舰队加入，他们沿着海岸一起航行到阿斯匹斯（Aspis），在此登陆上岸，将船只拖上沙滩，挖壕沟及筑栅栏来保护它们。城里的驻军拒绝投降，罗马人开始围攻。在这时候，逃离战场的剩余迦太基舰队返回迦太基。他们确信敌人因为最近的胜利，必然充满信心，将会立即从海上攻击迦太基，所以他们聚集海军以及陆军人员，组织前进的防御系统，护卫通往首都的不同通路。可是当罗马人已经安全登陆，并且正在围攻阿斯匹斯的消息传来，他们便放弃原先以为从舰队攻击首都那方向的戒备。取而代之的是将所有武力集中投入到首都及周围陆路方面的防卫。

在这时候，罗马人已经攻下阿斯匹斯，并安排驻军占领该城以及邻近地带。之后他们送出使节回国报告战役进展，并寻求要如何进行后续行动以及处理迦太基事务的指示。接着他们全军迅速进击，掠夺乡间地带。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们摧毁一些装饰豪华的屋舍，掳获许多牲

畜。他们也带回船上约二万名的奴隶。在这时，罗马来使指示一位执政官留下，率领足够强大的军队，而另一位则率舰返国。结果雷古鲁斯留下带兵，掌控四十艘军舰以及一万五千名步兵和五百名骑兵。曼里亚斯带领所有水手及俘虏登船，平安地沿着西西里海岸，顺利返回罗马。

30.迦太基人此时发现罗马人正准备长期占领他们的国家，因此从公民中选出两位将军，汉诺之子哈斯德鲁巴以及波斯塔，并且派信到在西西里赫拉克里亚的哈密尔卡，训令他立即返国。他被任命为第三名将军，并率领五千名步兵以及五百名骑兵返回迦太基。他和哈斯德鲁巴开会讨论要如何应付目前的危机，决议要去帮助那些在乡间的人，不任凭他们遭受任意掠夺而丝毫无招架之力。几天之后，雷古鲁斯出兵进行掠夺的军事行动，他们对那些有防御工事的地点展开围攻，并在攻下没有城墙保护的城镇后进行洗劫。当他到达阿迪斯（Adys）这个略具规模的城镇，他在附近扎营，并积极以攻城机包围它。迦太基人出动军队努力援救，他们决定要挑战罗马人争夺乡间的控制权。他们占领某处高地，该处具有居高临下、观察敌人的优势，但并不适合自己的部队。他们主要的优势在于骑兵以及战象，一旦放弃平坦乡间，将自己局促在多石以及无法接近的地面，他们就等于是暴露出弱点，让敌人知道要如何最有效地攻击他们，而结果也正是如此。罗马指挥官的作战经验让他知道，敌军因为地形选择错误，其最有效率以及最可怕的武力已经变得无效。所以他们不待迦太基人下山，在平原交战，就先发制人，在刚破晓时，从两侧登上山丘。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战象及骑兵皆无法发挥任何作用，但是他们的佣兵却英勇积极地冲锋陷阵，迫使第一军团败退。但那时佣兵太过前进，反而被从另一侧仰攻的军团包围击溃，于是整个迦太基军队很快就被赶离营区。骑兵及战象则全身而退，抵达平原。罗马人在追赶步兵一段距离后停止行动，返回摧毁迦太基军营。这场战役后，罗马人恣意攻击乡间，毫无顾忌地掠夺城镇，其中，他们占领了叫突尼斯（Tunis）的城镇。此地地理位置极为优越，极适宜作为远征或是突击的根据地，作为对付首都迦太基及邻近地带的根据地也极其合适，所

以罗马人在此处设立司令部。

31.迦太基人发现自己正面临存亡之秋。他们已历经两次重大挫败，一次在海洋，另一次在陆地，而挫败之所以发生并非其作战人员欠缺勇气，而是因为统帅无能。除了我已经描述的灾难外，迦太基人也必须对抗努米底亚人的入侵。这族群与罗马人同时攻击他们，对迦太基乡间地区带来极大的损害。居民在恐慌中逃到首都，但在那里他们却只发现饥饿与绝望，饥饿导因于过度拥挤，绝望则是因可能被围攻的前景。但另一方面，雷古鲁斯却有另一隐忧。他知道迦太基在海上及陆路都已经蒙受压倒性的挫败，而且他自忖在短时间内便能攻占迦太基城；但是他也担心继任的执政官或许会在城市沦陷前，便已从罗马来到，并剥夺他攻占迦太基的荣耀，所以他邀请敌人开启协商。迦太基人极愿随时聆听提议，并派遣他们最杰出公民的代表团与他会面。然而进入协商之后，代表团非常不愿去接受雷古鲁斯所提的条件；这些条件实在太过严苛，他们根本无法听下去。[60] 雷古鲁斯的态度俨然已经是迦太基城的主人，因此他的任何让步，都被他自视为对迦太基人施恩及慈悲的行为。迦太基人的结论是，即使他们成为罗马人的臣属，也不会比接受雷古鲁斯所提出的要求来得更差，所以他们回去时，不仅不满所提出来的条件，也对他那无可妥协的姿态深感愤怒。所以虽然迦太基元老院几乎已经放弃任何拯救的希望，但当他们听到罗马指挥官所开出的条件时，他们以英勇的尊严采取行动，决定宁可承受任何极端状况，尝试各种方法，也不愿屈就如此卑微、不配他们过去成就的协议。

32.约在这时，他们之前派遣到希腊招募佣兵的军官回到迦太基。随行带回一大群士兵，其中一位是斯巴达的赞提帕斯。这个人历经斯巴达系统的训练调教，拥有广泛作战经验。当他得知迦太基最近遭受的挫败以及发生的状况，便针对全国剩余的资源以及他们在骑兵及战象方面的优势战力进行检讨。他很快得到结论，并私底下告诉朋友，认为这些挫败不必归诸罗马人的优秀，而是迦太基人的将领缺乏经验。因为当时

逐渐蔓延的危机局势，赞提帕斯言论的要旨很快就在人民中散播开来，亦为将军得知。那时政府决定召他前来进行质问。他在他们面前出席，报告他对局势的见解，解释他们现在何以遭遇如此多挫折。他接着辩论说，假如他们愿意信赖他的建议，利用平坦地形行军、扎营与敌人交战，他们必将发现不仅可以确保己身安全，亦可以击败罗马人。将军接受他的批评，决定遵循他的建议，并立刻移交军队给他指挥。

即使当赞提帕斯对这议题的言论只是刚刚传播出去，其充满希望的言论就已经引起骚动，也激发了人民的信心，而这些印象就在他开始指挥军队时，立即得到印证。他果决地率领军队，在城市前以正规方式布阵，进行不同单位演习，并以准确的军事术语下达命令，和他前任指挥官笨拙的表现，有天壤之别。士兵用雄壮的欢呼表达他们的感受，并且迫不急待想与敌人交锋，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赞提帕斯领军，他们就不会受到伤害。将军注意到这种令人意外的高昂士气，立即捉住时机向他们说出适合该场合的话。几天后，他们向战场前进。军队由一万二千名步兵、四千名骑兵以及将近一百头战象组成。

33.当罗马人注意到迦太基军队现在经常在平原行军，平地扎营，对此他们深感诧异，并对这种策略上的改变有点警惕，但他们的心愿仍是与敌人交战。所以当两支军队接触时，罗马人在离敌人超过一里之外的地方扎营。第二天，迦太基领导人举行军事会议，决定目前局势该有何作为。在这时候，积极地想冒险一战的士兵，集合成群，开始高喊赞提帕斯之名，毫不迟疑地表明希望他立即率领攻打罗马人。当将军们了解军队士气高昂，充满斗志，而同时赞提帕斯敦促他们切不可让机会流失，将军下令备战，移交权力给赞提帕斯，以他认为最妥当的方式指挥作战。赞提帕斯立即发号施令。他下令战象往前移动到全军之前，形成一列，随后是迦太基公民[61]组成的重装方阵兵团，保持适当距离。他将一些佣兵布置在右翼，而那些他认为最机动的人则与骑兵组合，在两翼之前前进。罗马人见到敌人已经布阵求战，并积极往前移动交锋。他

们对战象的冲刺有所警惕，所以他们将前战部队（velites）[62] 摆在前线，之后则是布置军团，有几个连队（maniple）[63] 的纵深，而骑兵则分居两翼。这些布局意味着罗马的阵线较短，但较深。这种阵势是设计来抵挡战象，但是却没充分考量到迦太基的骑兵在数量上远超过罗马人。最后两边的布局皆已完成：包括双方的全面性部署以及针对特别作战计划的战术组合，而他们也同时等待有利时机来进行攻击。

34.赞提帕斯下令控制战象的人员前进，突破敌人阵线，也下令两翼的骑兵进行包抄的动作，开始冲刺，罗马军队亦同时前进，并依照习惯，盾牌与标枪互击，发出战吼。罗马骑兵数量过少，很快就被从两翼包夹的敌军击溃。至于步兵，在左侧的部队部分为了避开战象，部分则是因为鄙视面对他们的佣兵，所以向迦太基右侧冲刺，将其逐离战场，追杀到敌人军营。面对战象部队的其余罗马阵线中，前面的连队在战象冲刺压力下退却，在战象脚下惨死，在战斗中成群死亡，可是军团的主体因为纵深，所以得以挡住一时，保持队形不破。但是最后，后方的连队在各方都被敌方骑兵包围，被迫转向来面对交战。但另一方面那些企图穿越战象往前冲出，并且在战象之后重组的人，却要面对迦太基的重装方阵兵团，而这些新敌人却是体力完全充沛，队形完整，因此他们被杀得七零八落。从这个时候起，罗马人从各方受到极大的压力。多数人是被战象极大的重量踩死，其余则是在行列之中，被迦太基占有绝对优势数量的骑兵射死。只有小群人设法逃跑，自力救济，而这些人唯一撤退的路线是经过平坦地面。其中一些人被战象及骑兵解决，雷古鲁斯一行五百人进行撤退时，很快被迦太基军队逮捕。

迦太基人在这场战事中约损失八百名佣兵，清一色是迎击罗马左翼部队的人，而另一方面，罗马的两千名生还者则都是左翼部队中的人。如我前述，他们将佣兵一路追杀到营区去，因此离开主要战事范围。其他人，除了雷古鲁斯及与他一起逃跑的人外，其余皆阵亡；而幸存的连队相当幸运地逃到阿司皮斯。迦太基人剥除死者身上的装配，行军返回

首都，对他们命运的转折大为兴奋，并随军带回雷古鲁斯和其余的战俘。

35.这些事对那些可以正确解读，并希望在为人处事上得到引导的人来说，是极为宝贵的一课。[64] 雷古鲁斯所遭逢的灾难，清楚地为我们说明了这个原则：我们切不可依赖命运的恩宠，特别是当我们站在成功的高峰期时。在此我们看见这个在不久之前拒绝给被征服者任何怜悯或慈悲的人，最后却让自己成为阶下之囚，在不久前还是他的受害人面前求情饶命。长久以来被认为公道的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名言：

> 一个拥有智慧的头脑可以胜过数十支手臂。

在这个例证中再度确认此一事实。一个能人以其智慧征服了之前看似无敌、无所不能的军队，挽救一个几乎已经落入万劫不复的国家，使之回归正轨，并提振起已经坠入绝望深渊的军队士气。我之所以记录这些事情，是希望阅读这本《历史》的读者能从中获益，因为有两种方法能让所有人借之来改善自己：其一是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另一是从他人曾犯下的错误中学习；前者会做出比较醒目的证明，后者则是则是较不痛苦的证明。因此，若我们可以避免的话，我们绝不要选择前项，因为它会涉及很大的危险和痛苦，而是要经常选择后者，因为它经常会为我们指出最佳的途径，但却不会带来伤害。我在此下一结论：真实人生中的最佳教育，是经由阅读严肃历史所得到的经验。因为唯有历史会在不给我们造成伤害的情况下，让我们有能力在任何状况或处境里，去判断出最佳的途径。这部分在此告一段落。

36.重振迦太基的希望达成，让迦太基人欣喜若狂，不仅对神明祭献感恩，也为自己庆祝胜利，尽情享乐。这当然归功于赞提帕斯对迦太基命运所带来意想不到的扭转以及复原；在战争之后，他立即返国，因此证明他是智慧卓绝以及深明道理的人物。这个中的道理是：最杰出及最不寻常的事功，往往会引起最强烈的妒忌以及最恶毒的毁谤。一个本

士公民若能享有亲友的支持，拥有许多朋友，或许能抗拒这些恶果一段时间，但是一个外国人很快就会屈服在这些恶意之下，立即发现自己地位不保。然而赞提帕斯之所以离去，有时候尚有其他说法，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我历史作品中较适当之处设法解释。

当这个预料之外的大灾难传回罗马人耳中，他们立即装配一支舰队去援救他们在非洲的残余部队。迦太基人在成功后，扎营阿司皮斯外，因为他们极想逮捕战争的幸存者，但是幸存的罗马人以十足的勇气防卫城市，所以迦太基人无法攻下，最后放弃围攻。那时他们听到罗马人正准备舰队，再度航向非洲，迦太基人开始修复他们还拥有的船舰，并且制造新舰，不久后便装配出一支规模达两百艘船的舰队。他们运用这些船舰巡逻海岸，以防敌人来袭。

在夏天来临之际，罗马人出动三百五十艘船舰，[65] 由埃米利马斯（Marcus Aemilius）以及弗尔维阿斯（Servius Fulvius）率领，沿西西里海岸航行，前进非洲。他们在荷密翁附近遭遇迦太基舰队，发动攻击，并轻易击溃他们；掳获一百一十四艘船舰以及水手。他们接着从阿斯匹斯接走所有仍滞留在非洲的罗马部队，再航回西西里。

37.他们平安横渡海峡，但却在加马里纳外的西西里海岸，进入暴风圈，遭受几乎无法用任何字眼形容的大灾难。在三百六十四艘船只中，只有八十艘幸存，其余或是进水沉没，或是被大浪抛掷，撞击上大石以及海岬，船身解体，在岸上留下了成堆尸首以及船只残骸。在所有历史中，没有任何记录记载过海上有发生过任何比这更惨的海难。关于这一点与其要责怪命运，倒不如责怪指挥官本身。他们的舵手一再地告诫他们不要沿西西里南岸，面对利比亚海的方向航行，[66] 因为这是布满岩石的海岸，只有极少处可以安全停锚。他们也同时警告，这趟航行是在猎户座及天狼星座升起之间发生的，但那两个预测恶劣天气的星宿，其中之一尚未过去，另一则即将到来。[67] 尽管如此，指挥官完全

忽略他们的建议：他们选择了一条会受到大海威力威胁的航道，因为他们希望借着他们所赢得的可观胜利，沿途威吓一些城邦，让他们归顺。无论如何，这些指挥官只因为如此微不足道的利益，让他们自己承受如此铺天盖地的大灾难，最后被迫承认他们行动的愚蠢。

大体而言，罗马人依赖他们的武力去执行所有任务，认为一旦为自己设定一件任务，他们便一定要全力完成；而且同样地，一旦他们决定尝试，便没有不可能之事。这种精神会感召他们成功，而确实也经常发生，但有时候则会让他们完全陷入灾难之中，尤其是在海上。其中理由是：在陆上他们是和其他人以及人类努力的成果相对抗，因此他们经常成功，因为他们是使用力量来对抗在基本上相同性质的力量；即使如此，他们的努力也还是会在少数状态下失灵。但是当他们与大海及天气对抗，设法以武力来征服它们，他们便要遭遇压倒性的挫败。这就是这次事件的结果，而这种过程也将会继续发生，除非他们能够改变他们对于胆识及气力的成见，因为正是这些让他们相信他们无论年内的任一个季节，都可以航海旅行。

38.当迦太基人得知罗马舰队的毁灭，他们认为根据最近的成功，现在可以在陆路以及——因为这场灾难——在海上与罗马分庭抗礼。于是在深受鼓舞下，迦太基人开始进行更具野心的军事以及海事预备活动。他们立即训令哈斯德鲁巴前往西西里，命令他指挥不仅之前已经经动员的部队，以及从赫拉克里亚前来加入他们的部队之外，另外再加上一百四十头战象。在派遣他出去后，他们开始装配二百艘船舰，为海军远征进行准备。哈斯德鲁巴安全渡海到利利贝乌姆后，立即训练战象以及其他部队，明白表示他打算和罗马人争夺广阔乡间地带的控制权。

当罗马人从幸存者处得知灾难的全部程度，他们将这消息牢记心中，但他们决心无论在任何状况下，绝不言降，并决议再造另外两百二十艘船。这工作在三个月内完成，这几乎可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成就；

新执政官阿提里亚斯（Aulus Atilius）和福内里亚斯（Gnaeus Vornelius）在完成船只装配后便再度出海。[68] 当他们通过海峡时，逃过海难的舰队船只在迈萨拿加入。然后以总共三百艘的舰队，抵达迦太基西西里省最强大的城市帕诺穆斯，开始进攻。他们在两个不同地点架设攻城机，并在做完必要准备后，推出破城大槌。竖立在海岸旁的高塔被轻易摧毁，然后士兵利用突破缺口，强行进入，因此现在称做“新城”的区域被急攻取下。很快地，因为罗马人这场胜利威胁到所谓的旧城，居民迅速投降。执政官占领整座城市，在布署驻军后，航回罗马。

39.次年[69] 初夏，新任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Gnaeus Servilius）及森普罗尼（Gaius Sempronius）再度率领全部舰队出海，并在停泊西西里后，跨海到非洲。他们沿着海岸航行，在许多地点登陆，并无斩获，然后抵达传说中的“吃忘忧果之人”（Lotus-Eater）的岛屿，其名为曼宁克斯（Meninx），与小赛尔提斯（Lesser Syrtes）相距不远。在此因为对当地岸边水文知识不足，结果撞上暗礁；海水退潮后，船只搁浅，整支舰队陷于极大危险中。然而不久之后，潮水突然流回，在将船上所有重物丢弃后，他们好不容易在减轻船重后脱险。幸运地解决了这场危机之后，他们的回航比较像是从灾区逃回。他们到达西西里，在绕过利利贝乌姆海岬后，在帕诺穆斯下锚。但在那时，当他们已经将航向定为罗马时，却又鲁莽地冒险横渡大海，再度遇见大风暴，损失一百五十艘船。

在这个时候，罗马政府尽管一向有为了达成完成所有任务百折不挠的决心，却也因为他们历经巨大规模以及极高频率的灾难，被迫放弃重建另一支舰队。他们决定完全依赖他们的陆军。他们派遣出一支由执政官凯启里亚斯（Lucius Caecilius）和弗里乌斯（Gaius Furius）率领的陆军，装配不超过六十艘的船只，来作为补给军团的运输舰。这些罗马人所遭遇到的挫败，大大改善了迦太基人的前景。因为罗马人几乎已从海洋完全撤离，他们现在对海洋的控制无人可以挑战，对自己的陆军也满

怀信心。这些期望并非毫无根据，因为赞提帕斯在非洲的胜利适时传到罗马，那时他们也知道是战象突破他们的战线，并杀死大部分的士兵。这消息引起罗马人对这动物极大的恐惧，接下来两年，罗马人虽然在利利贝乌姆或栖来那斯（Selinus）附近，离敌人不到五或六弗隆[70]距离远的地方布阵，却从来都不敢发动攻击。事实上，他们甚至不敢到平地来面对敌人的步兵。他们如此畏惧战象的冲锋攻击。这段期间，他们唯一成功的军事行动是以围攻降伏特马（Therma）和利帕拉，而在这些行动中，他们紧靠着多山的乡间地带以及难以横越的地形行动。但罗马并不是没注意到弥漫在军中的怯战以及低迷士气，所以最后他们改变心意，决心再度重回海上试试运气。于是在阿提里亚斯（Gaius Atilius）及曼里亚斯（Lucius Manlius）担任执政官的时期，他们建造五十艘船，全力招募水手，组成舰队。

40.迦太基总指挥官哈斯德鲁巴这时候也注意到，罗马人在和敌人遭遇时缺乏斗志。他发现两位执政官之一在回到罗马时，带走西西里一半的罗马驻军，而由凯启里亚斯留在帕诺穆斯，并与其他部队去保护盟邦收割谷物，因为现在正是收获的旺季。[71]哈斯德鲁巴于是从利利贝乌姆出兵，在帕诺穆斯领土的边界驻扎。凯启里亚斯发现哈斯德鲁巴自信满满，于是让自己部队留在城内，希望借此引诱他发动攻击。哈斯德鲁巴见此，大受鼓舞，他的结论是凯启里亚斯因为害怕，所以不出来。于是他大胆全军压境，从隘口进入帕诺穆斯的领土。凯启里亚斯继续坚持自己的计划，允许哈斯德鲁巴大肆破坏收成，近逼城墙，直到他诱敌深入，越过流经城市的河流。一旦迦太基人让战象及其他部队过河后，凯启里亚斯便开始利用轻装武兵去骚扰他们，直到他强迫他们将所有的部队部署出来。当他见到自己的策略奏效，便安排一些轻装武兵在城墙以及城外壕沟之前。命令他们将标枪瞄向进入投射距离的战象；接着在它们被驱散后，跳入壕沟避难，之后当战象冲向他们时，再迅速跳出，射击它们。他也安排那些依赖军营为生的市民从市场将可以投射的任何东西聚集起来，堆在城墙墙角下。同时，他亲自率领编队的罗马士兵，

在面对敌人左翼的城门就位，并经常派出支援人手，协助那些突袭的人。

当迦太基人和轻装武兵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扩散，战象的驾驭者极为冲动地想向哈斯德鲁巴炫耀自己的勇武。他们急于在胜利中扮演主导角色，所以在冲向轻装武兵的前列时，轻易地将其驱离击退，追击到壕沟去。但当战象攻击这些障碍时，它们立即被弓箭手的利箭所伤，同时在壕沟前新加入的部队也集中火力，向它们投射标枪。这些动物身上被标枪插满，遍体麟伤，不久之后便开始失控乱跑。它们转向自己的部队，践踏蹂躏，打乱队形，让全军陷入完全混乱之中。当凯启里亚斯见到这状况，立即率领军队积极从侧面攻击敌人。他的部队精神百倍，纪律精良，但迦太基人在此时却已完全失控。结果他击溃对手，杀敌甚多，并逼迫其他人匆忙逃难。他掳获十头战象以及它们印度裔的驾驭者，并在战后顺利围住其他没有驾驭者的战象，加以掳获。在取得这样的胜利后，众人认为正是他恢复了罗马人战斗的意志，并且重新掌控开阔的乡间地带。

41.当胜利消息传到罗马，人民喜出望外；并非因为敌人损失战象所受到的挫折，而是他们自己的部队在征服它们后，重新恢复信心。罗马人因此再次受到鼓舞，依照原定计划派遣执政官率领舰队及海军兵力前往远征，因为他们急于利用倾全力的方式来结束战争。当所有必须的预备都完成后，执政官带领两百艘船[72]的舰队前往西西里。那年是战争发生的第十四年。[73]他们在利利贝乌姆下锚，与前去围攻的陆军会合，因为他们认为若将此港口拿下，将战争带到非洲将是弹指之间的事。迦太基与罗马领导人对利利贝乌姆的重要性，倒是英雄所见略同。迦太基人因此放弃所有其他军事活动，将所有努力集中在解围，为了达成目的，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任何风险或牺牲；他们知道它若沦陷，他们在西西里将没有任何军事基地，因为全岛除了得雷帕纳（Drepana）外，其他已经完全落入罗马人手中。

我对这战役所将做的陈述需要读者对该岛地形有些知识，所以我现在将对地理位置以及我们所关切之地的特别优点，做简短的解释。

42.西西里对意大利及其最南端之处的关系，类似伯罗奔尼撒与希腊其他地方的关系。其差别是前者为岛屿，后者为半岛，所以与前者的交通是经过海路，后者则是陆路。西西里形状为三角形，三个角的每一点皆为海岬。向南望去，突出到西西里海的海岬，称为帕奇纳斯。北边的海岬形成迈萨拿海峡的西侧界限；它与意大利海岸的距离为一里半，称为佩洛里亚司。第三个海岬面向非洲本身，地理位置适于作为攻击那些保护迦太基之海岬的基地，其间宽度为一百一十五里。这海岬面向西南，将利比亚海与撒丁海分隔，称做利利贝乌姆；在这海岬上建有同名的城市。罗马此时正围攻此城。利利贝乌姆不仅有环城的高耸城墙以及护城河保护，[74] 而且在朝向大海方向有潟湖；要找到适当航道穿过潟湖，进入港口，需要极大技巧以及经常练习。

罗马人建立两个营区，各在城之两侧，然后以壕沟、栅栏以及高墙来加强防卫两营之间的地带。他们接着将攻城机移向在利比亚海方向最靠近大海的一座塔楼。他们每前进一些，就会在结构上增强一些，用这方式设法将攻城机往前及往侧边扩大，直到他们摧毁连接海边塔楼的其他六个塔。同时，他们立即以撞墙大槌来攻击其他塔楼。围攻此时正积极地以惊人的速度进行。每天都可以见到一些塔楼受到撼动，或是化为乱石，而罗马攻城机仍一再地往城中心移动。结果是尽管在城里有约一万名的佣兵，[75] 慌乱恐惧的情绪却笼罩着受困的居民。他们的将军希米尔科（Himilco）尽其所能，以各种方式来抵抗罗马人，并在被摧毁的塔楼之后，再盖一座新的城墙，并且针对造成他们如此大麻烦的攻城机，挖松其下方的地基。他每天必然会发动突袭，攻击攻城机，设法放火烧毁。这些反制措施日夜进行，激烈战斗，有时候这些损伤会比在一般的激战中所遭受到的还更为惨烈。

43.大约此时，佣兵里的一些资深军官彼此议论，计划要将城市移交给罗马人。他们相信他们的麾下必然会服从命令，所以在晚上偷偷出城，到达罗马营区，向执政官提出投降的提议。在早先，叙拉古的佣兵曾经预谋背叛阿格里根特的居民，但是一位叫阿列克松（Alexon）的亚该亚人解救了他们。现在这位亚该亚人又再度最先发现这项阴谋，他于是向迦太基将领通报。当希米尔科知道此事，他立即召集其他军官，尽其所能地恳求他们；假如他们能够坚守原来与他的约定，不倒向那些已经离城的人，他承诺丰厚的奖赏及恩惠。军官们热烈响应。那时他下令他们立即回到自己的部队。与这些人谈判的同时，他也派遣汉尼拔去加入凯尔特人的分队；此汉尼拔是在撒丁被处决之汉尼拔的儿子；之所以选择这军官，是因为凯尔特人在他底下服务过，甚为熟悉此人。阿列克松则被派遣到其他的佣兵处，因为他们喜欢他、信赖他。军官们于是召集所有佣兵，向他们呼吁。他们承诺每个人将会得到迦太基指挥官所承诺过的奖赏；最后他们轻易地说服部队保持忠诚。结果那些倒向敌人的军官在公开接近城墙，设法和城内的人们说明他们对罗马人所提供之承诺时，不仅没有效果，城内人们不仅不想听他们说话，甚至还从城墙用连发的石头及其他投掷物来驱离他们。因为这样，原本迦太基人差点因为他们佣兵的叛逆，而失去在利利贝乌姆所有的东西，正是这同一位的阿列克松——之前他的忠诚不仅拯救了阿格里根特人的领土及城市，还有他们的政体及自由——挽救迦太基人免于彻底的灾难。

44.迦太基政府当时对这些事件纯然不知。但他们还是思考一座受困之城的需求，所以他们装配五十艘船，装满部队，在交待配合该军事行动的指示之后，立即在哈密尔卡之子汉尼拔的率领下出航，此人同时是三层舰船长以及阿德巴尔（Adherbal）[76] 信赖的同事。汉尼拔收到的命令是不可耽误，要捉住第一时机，勇敢出击，解救受困之城。于是他率领一万士兵出海，在利利贝乌姆及迦太基之间的艾基尔特斯（Aegeates）群岛下锚；他在当地等待有利天气。一旦从船后吹来顺风时，他便扬起所有风帆，乘风御浪，直接前往港湾入口，而军队在甲板

上全副武装，准备行动。罗马人对他舰队的突然出现大感惊讶，而且也害怕被风的力量扫进敌人港口，深陷敌阵之中，所以没有设法阻挡这支驰援舰队的进入。相反的，罗马人停泊外海，仍对迦太基人的大胆行径感到惊讶。

这时候利利贝乌姆所有人都挤在城墙。他们深陷不知结果将会如何的焦虑之中，对同时出现的毫无预期的救援，感到喜出望外。当舰队驶入港口时，他们高声欢呼、双手鼓掌，表示欢迎。汉尼拔在完成这大胆以及危险进港的奇技之后，放下船锚，部队安全登陆。对市民而言，他们所欢欣的不仅是援助到来，大大提升他们的希望以及战力，更是因为罗马人不敢阻挡迦太基人航行入港。

45.驻军司令希米尔科看见他所有的部队充满信心，积极求战；对原先驻军这是因为援军来到，而对新到的军队则是因为他们仍然不知正在威胁他们的危险。他急于利用这两股部队来鼓动气势，再度尝试去烧毁敌军的攻城机器。于是他检阅全军，用符合当时气氛的演说向他们呼吁；他对那些表现出英勇行为的个别士兵，承诺丰厚的奖赏，向他们保证迦太基政府将会优待全军，给予慷慨奖励，士气因此被激发到最高点。部队给他一致的掌声，有人甚至高声呐喊他不该再耽误，而是立即带领他们直接作战。希米尔科对这样的回应，深感满意，赞美他们的精神，然后解散军队，命令提早休息，等待他们军官的指示。稍后他召集各队司令，分配给每人在攻击中的任务，并交代暗语以及详细攻击时刻。他命令所有军官要他们的单位以全部战力预备，并在明天点名时处于战斗位置。

他的命令被准确执行。在天亮时，他率领部队，同时从几个地点攻击攻城机。罗马人预期到他的意图，所以并非没有预备，毫不迟疑地进行回应。他们立即跑去防卫遭受攻击的各点，进行强力抵挡。战斗一发不可收拾，殊死战斗沿着整道城墙发展，因为虽然受困一方投入两万人

[77] 进行攻击，但罗马人数量更多。双方以非正规的方式交战，没有采用严格编队，而是每个人依据自己判断来使用武器。这使得战斗更加激烈，其中的理由是：即使有如此数量的人交战，但是战斗还是在一对一、单位对单位地展开，就像是某种个人战斗的精神充斥在整个战场。特别在攻城机附近，战斗的噪音特别响亮，行动最为激烈。这是战争的核心，因为攻击者首要的任务正是去将敌人逐离这些攻城的机具，而防御者则力求死守；两边都是以最激烈的情绪及决心来对抗，前者是用上所有利器将敌人赶走，而后者则是不屈不挠地坚守岗位。最后双方陷入僵局，众多人马死在他们最先站立的位置。与此同时，其他战斗人员加入战局，带来火把、火种及拖拉工具，而这些协助的人从各方攻击攻城机，大胆投掷燃烧物，罗马人无法抵挡这种攻击，陷入极危险的处境中。但在这时候，迦太基统帅知道自己这边正蒙受惨重损失，但却还没得到以急攻来摧毁攻城机的目标，所以下令鸣号撤军。罗马人差点完全失去他们全部的攻城机，但最后他们还是守住阵地，掌握他们的机具。

46.至于汉尼拔，他在战后带着舰队航离，当时仍是黑夜，因此没被敌人观察到；他航向得雷帕纳，与海军指挥官阿德巴尔会合。得雷帕纳离利利贝乌姆约十五里，而且因为它方便的位置以及港口的优越，迦太基人对它的防卫常多所注意。

迦太基政府急于知道在利利贝乌姆状况究竟如何，但因为他们自己的部队被围困在城里，而罗马人又执行严格的围堵，无法得知消息。一位具有领袖地位的公民——某位叫汉尼拔，别名“罗德岛人”——此时自愿航行进入利利贝乌姆，提出第一手的报告。当局非常愿意聆听他的计划，但怀疑他究竟能否成功，因为罗马人的船只停泊在港湾入口处。可是汉尼拔还是去装配自己的船只，航行到利利贝乌姆外海的一个岛屿。第二天他发现风向正确，约早上十点钟时，他在敌人众目睽睽下直接航行入港，令人对他的胆识惊讶到无以复加。次日，汉尼拔不浪费时间，预备返航。但罗马将领在此同时，决心要更加严格地看守港湾入口，他

在夜间装配十艘最快速的船舰来巡逻，而本人则从全军列队的陆上观察，进行戒备。十艘船舰排成一列，尽可能地靠近浅水之处，必要时可以从两侧登船。它们在那里浮动，船桨伸开如翼，准备打水，随时要冲出去逮捕即将航出的船只。“罗德岛人”在敌人环伺下，准备船只，在速度以及大胆灵活的操作上更是技压罗马人，他不仅全身而退，带走自己的船及水手，让敌人呆若木鸡，甚至在航行超前一些距离后，拉起风帆等待，完全不操作船桨，好似在挑衅罗马人。因为他划桨的速度，没有人敢冒险前行去攻击他，所以他在成功地以一条船挑衅所有罗马人之后离去。之后，他又重复几次相同行为，成功地对政府以及受困城市作出很有用的贡献。他让迦太基政府持续知晓最紧急的消息，提高防卫者的士气，而他的勇敢也让罗马人感到气馁。

47.让汉尼拔有信心尝试的最大因素，是他从经验中知道如何准确规划在浅滩行经的路线，并且为航线找好地标。在他横跨大海见到港口时，他会驾驶得就好像是从意大利那边来的一样，让他的船首对准海边的塔楼，所以可以在往非洲方向上，以直线横越城市的所有塔楼。唯有行驶这条路线，以尾风航行的船只才可以抵达港湾出口。“罗德岛人”的胆识，鼓舞许多对当地海岸水文熟悉的人以他为榜样进行模仿。这些行为对罗马人格外刺痛，他们设法用填满港湾出口进行反制。但这方面的努力全都徒劳无功：海洋在此处的深度实在太深，他们所投下的物体不是无法固定，就是无法聚集成堆。他们倾倒碎石，在还没到海底时就会被海浪以及海流冲走打散。然而在他们经过极大努力之后，在一个海床较浅处，他们终于堆积出小丘，有一艘五层舰在夜晚离去此处时搁浅，落入罗马人手中。这船只建造地格外精良，罗马人在拥有它之后，即命令精英水手登船操作，特别注意突围的逃跑者，尤其是“罗德岛人”。他恰好在那晚进入港湾，并依照他惯有的刻意公开方式离去。那时他发现那艘五层舰与他同时行动，开始感到害怕。开始时他立即冲刺，努力拉开距离，但当他发现他正在被动力较大的船尾随，最后他被迫转向，开始交战。当对方开始登船时，他的水手根本不是对方陆战队的对手，罗

马这一方不仅数量上有优势，而且都是精英，于是他被俘虏。罗马人在掳获他的船只时，发现它的制作也十分精良。他们将它装配好，来进行特殊任务，因此也结束那些胆敢设法突破所有封锁利利贝乌姆的行动。

48.在这时候，受困的驻军仍然努力建造反制的防御工事，虽然那时他们已经放弃去破坏或摧毁敌人攻城机的希望。当这些努力仍然还在进行时，一阵飓风刮起，激烈强大地扑向那些推动攻城机的装置上，它将防护屋[78]从基础吹离，将竖立起来遮蔽它的木塔给扫走。当飓风继续吹袭，一些希腊佣兵突然灵机一动，认为这是摧毁攻城机的绝佳时机，并将计划告诉驻军指挥官。迦太基人接受这想法，顷刻之间完成所有必要准备。驻军里较年轻的士兵集合在三个不同地点，然后将点燃的火把丢向攻城机。这些机具如此老旧，极易点燃，而且随着风势将大火直接吹向高塔及攻城机，火势迅速蔓延，效果立现，而罗马人控制火势及拯救机具的努力就显得相对困难，或者说对此几乎无能为力。突然出现的火灾铺天盖地侵袭那些想来救援的人，他们既无法掌握，也无法知道究竟发生何事。他们必须面对火焰、火星以及浓烟，直接吹向他们的脸，让他们目盲；许多人被烟雾呛倒，窒息而死，也无法靠近灭火。所有不利于罗马人控制火场的因素，都结合起来助长火势。所有能够模糊罗马人视线或伤害罗马人的东西都吹向或是丢到他们面前；但是防守者却有很清楚的视线，充分掌握眼前的空间，并准确丢掷武器，瞄准那些跑来援助的人，或投掷火把去摧毁机具，无论他们瞄准的目标是什么，都因为后面风势助长而更具破坏力。最后，这些破坏如此彻底，所有木塔的基础以及撞城大槌的木柱都因为大火，而不堪使用。历经这样的灾难后，罗马人放弃用攻城机去攻打城市的策略，取而代之的是用挖壕沟及筑栅栏的方式来围城。同时他们也用环绕军营的高墙来加强营区的防卫，至于进一步的发展，则留待时间决定。在迦太基这方面，利利贝乌姆的驻军则重建已经被摧毁的城墙，心情轻松地安顿下来，等待围攻的进一步发展。

49.这个消息及时传到罗马，然后又从其他方面得到确认，许多舰队水手因为大火或在围攻的军事活动中丧命。政府赶忙再招募更多水手，招募到约一万名时，便派送他们到西西里。这些人以船运送过迈萨拿海峡，然后从那里行军到营区。在他们到来后，执政官普尔凯尔（Publius Claudius Pulcher）召开军团营长的军事会议，告诉部属说，以全部舰队来攻击迦太基人在得雷帕纳军事基地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解释说那边的统帅阿德巴尔完全不知新近抵达的水手，而且以为罗马舰队因为围攻利利贝乌姆时的人员损失，无法出海。营长们热烈支持这项计划，他下令已在舰队服役的人与新进水手一起登船。陆战队则从军队里挑选出最佳人员，他们随时都准备好志愿参加征战，尤其因为这航程较短，而且战争结束后有极佳的机会去抢夺战利品。

在完成这些准备后，他在夜半敌人不注意时出海，并在航程的第一阶段时，以密集队形前进，西西里在船队的右侧。在破晓时，罗马舰队的领航船只已经被发现正朝得雷帕纳前进。最初阿德巴尔极为忧虑不安，因为他们的出现完全出乎意料。但是他很快恢复镇静，掌握敌人策略的意义，立即决定将尽其所能，甘冒各种风险，不让自己的部队受到包围受困的威胁。他立即在海滩聚集水手，派人宣布要从城里召集佣兵部队。当他的武力齐聚时，他向他们演说，努力利用一些话语来影响他们，说若是他们现在冒险一战，会有良机得到胜利，但若畏怯避战，让自己受困包围，结果将会何其艰辛。他的人马立即清楚表明，他们有雄心壮志要在海上一搏，并以呐喊表示赞成，敦促他不要耽误，立即领军作战。阿德巴尔感谢他们的回应，赞美他们的勇气，然后命令立即登船，注意跟紧他的船只，尾随在后。他清楚下完指令后，便全速进行，领导舰队出海，航行紧靠港湾对向的礁石，因为罗马人正往港口的方向前进。

50.罗马统帅普尔凯尔假设敌人会因为他的出现而灰心丧气，因此会避免任何行动。但当他看到迦太基人反其道而行，决心应战，而那时

他的一些船舰已经航入港湾，其他的仍在入口处，并有其他船舰正准备进入，他下令全军掉头，航向大海。但是因为突然转向，整个运作造成在港内某些船舰和那些正在进入的船只相挤碰撞，这命令在水手间造成很大的混乱，有些船只的船桨和其他船碰撞时折断。当船只全部脱离港湾，船长总算能够将船只重新编队，靠近岸边，船首面向敌人。普尔凯尔本人原先航行在舰队之后，但当军舰仍在移动时，他驶向大海，占据最左侧的位置。但同时阿德巴尔已经有五艘船成功地绕过罗马人左侧，这些都装配撞船的设施，并移动自己的船舰去面对敌人，朝向岸边。当其他四艘的每一艘都加入他时，他透过自己助手下令他们要在其船侧，直到五船成行，同时面对敌人。当他们阵线一致时，他发出预先约定的信号前进，一起撞向罗马船只，而这些罗马船只仍然相当靠近岸边，等待他们的同志从港弯折回。他们靠近岸边的位置，在接下来的军事行动中有很大的不利结果。

51.当两边舰队越来越靠近时，两边海军将领的旗舰上升起战斗信号，于是船只交战。起先战事不分轩轾，因为两边皆有精选的陆军来担任水兵。但是逐渐地，迦太基人在开始行动时所累积的许多优势渐渐对他们有利。他们制造精良的船身以及训练有素的划桨手，使他们比罗马人快速灵活，而且因为他们是在大海中摆开阵线，所选择的位置也相对有利。这意味着要是他们的任何船只受敌人压迫时，他们可以用较快的速度安全撤离到开阔的水域。在那里他们可以前去攻击追击他们的领头者，无论是从船尾绕过，或是往船侧攻击。但罗马人则被迫必须转向，但立即会出现困难，因为他们船身吃水较深，加上划桨手的经验不足，而迦太基人在那时通常都就会进行冲刺撞击，并予以撞沉。假如有任何迦太基船只处于危险，他们可以没有风险地彼此驰援，因为他们可以在自己阵线后面的开阔海域航行，不受干扰。但是就罗马人来说，局势恰好相反。太靠近陆地让他们陷入困境，也没有余地撤退，假如他们的船只被敌人从前面压迫，或是往前撞入浅滩，或是航向岸边，结果导致搁浅。在海战中最有效的移动方式是从敌人阵线中间穿过，然后在交战之

敌船后方出现，但对罗马人而言，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他们的船身较重以及水手训练也较差。不像迦太基人，他们无法航行绕过自己阵线的后方来协助自己的同志；他们被挤到过于靠近岸边，没有留下任何空间可以作为支援其他船只的航道。罗马舰队发觉自己在这次战争所陷入的困境，有些船在浅滩搁浅，牢牢卡住，其他则撞上陆地。当罗马执政官看见这个状况，便带着最靠近他的三十艘船舰紧贴海岸线开始逃跑。舰队其余的船只共计九十三艘，都连同水手被迦太基人掳获，但这不包括那些将船只往岸上撞去，设法逃跑的人。

52.因为这次军事行动的关系，阿德巴尔为自己在迦太基赢得极高的名声，因为此战成功归功于他的先见之明以及过人胆识。相形之下，普尔凯尔使罗马蒙羞；他因为主导战争的行为，而遭受各方指责。众人认为他在行动时，没有审慎思考与判断，反而就其一人能力所及之处，为罗马带来极大的灾难。他因此被审判，被严厉地罚款，甚至差点被处死刑。

尽管遭遇这样的灾难性转折，罗马人赢得战争的决心仍旧坚决，他们丝毫没有松懈，反而着手所有必要的措施，继续作战。此时适逢选举时期，当新任执政官被任命时，他们立即派遣普鲁斯（Lucius Junius Pullus）[79] 负责运送谷物给利利贝乌姆的包围者，补给组织军队所需之物资，并装配六十艘船舰去护送这运输船队。在抵达迈萨拿时，他又在舰队里加入一些来自利利贝乌姆以及西西里其他地方的船舰，并从那里沿岸全速航行到叙拉古。他现在拥有一百二十艘军舰，护卫八百艘运送补给品的运输船。在那里他移交给他的财务官（quaestor）一半的运输船以及一部分的军舰，然后先送他们出航，因为他极希望补给品可以毫无延迟地交给驻军。他自己则留在叙拉古，等待从迈萨拿来的船只，并从罗马在内陆的盟友那里获得更多的补给品。

53.阿德巴尔在这时候已经将海战中的战俘及掳获船只送到迦太

基。他接着任命他的同僚加泰罗（Carthalo）率领一支三十艘船的舰队，以及他带到得雷帕纳的七十艘船舰的舰队，下令突袭停泊在利利贝乌姆外海的罗马舰队，尽可能地拖走所有船只，否则放火烧掉。加泰罗遵循命令，在清晨时执行任务；他放火烧一些船，并开始拖曳其他船只，但在那时他的行为已经在罗马军营造成极大的骚动。当罗马士兵冲出去营救船舰时，希米尔科正在利利贝乌姆里值更戒备，并被噪音吸引。随着天色逐渐转亮，他看见正发生之事，于是派遣佣兵，从陆路方向攻击罗马人。罗马人此时四面楚歌，发现自己陷入不小的麻烦。可是海军将领加泰罗在拖走及破坏一些船之后，很快便航离利利贝乌姆；他往赫拉克里亚方向沿岸航行一段距离，然后停驻下来警戒，他真正的意图是要拦截那些正在途中要去补给军队的运输船。他的侦察人员回报说，有一大群形形色色的船只组成的运输船队正在接近，而且距离已经相当靠近；他立即出海，前往交战，他刚得到的胜利使他骄傲，瞧不起罗马人，他现在很想积极攻击。同样地，迦太基舰队接近的信息也被报告给罗马的财务官，他先行乘坐轻型的巡逻舰，出航离开叙拉古，它们通常都是在舰队之前巡弋。他们认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在海上冒险一搏，所以他们在附近一个归顺罗马并设有防御工事的小城镇附近下锚；这地方没有适宜的港口，但是有突出陆地所环抱的海外停泊处，可以提供一些保护。他们在这里下船，从碉堡中取得几个投掷器及巨弩，竖立起来应战，等待敌人靠近。当迦太基人靠近这城镇，最先计划围困敌人，因为他们假设罗马人会惊吓到撤退到防御工事之后，届时他们便可以在没有反抗情形下，掳获并拖走船只。然而他们大失所望，因为罗马人积极抵抗，加上该地方的形势为他们带来一些问题，所以迦太基人只拖走一些满载物资的船只，航行到附近河流，在那里下锚，等待敌人重新启航。

54.留在叙拉古的执政官普鲁斯完成他的任务后，航行出海，绕过帕奇纳斯海岬，航向利利贝乌姆。在这段期间，他完全不知他的先遣船队发生何事。迦太基的侦察部队又再度回报敌人进入视线范围之内。在

这个时候，迦太基海军将领加泰罗决定出海，全速航向敌人主力，因为他急于在罗马人离自己同志尽可能远的地方，与他们交战。在此同时，普鲁斯已经从相当远的距离看到迦太基舰队，并注意到它的实力；他不敢迎战，但那时双方已经太靠近，无法逃避。他因此改变航向，航向一个布满暗礁、极为危险的海岸，停泊在那里，因为他甘冒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也不愿他全部的武力以及船只落入敌人手中。迦太基将领见到他所做的事，决定不要冒险靠近如此危险的岸边。相反地，他找到附近一个可以遮蔽风雨的海岬下锚，在两支罗马舰队之间保持警戒，同时监督两边。天气突然变坏，一阵飓风很明显地从大海吹来；在这时候，迦太基的舵手因为熟悉当地的状态以及天气的征象，并预测可能发生之状况，建议加泰罗绕过帕奇纳斯海岬来避开狂风。他很有智慧地听从他们，费尽力气，千辛万苦绕过海岬，终于能够安然下锚。然而，这两只罗马舰队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在一段没有任何可安全避风的海岸，被狂风袭击，遭受摧毁。舰队彻底遭到摧毁，连船只残骸都无法搜救。在这种完全无法预期的状况下，罗马两支舰队完全失去功能。

55.罗马舰队的毁灭让迦太基人重获信心，再度点燃希望。另外，罗马人虽然之前遇见过不同局部性的灾难，但却未曾遭受过如此全面性的灾难。结果是他们放弃任何海上军事行动的努力，将自己局限在控制岸上的据点，而迦太基人不仅享有完全的制海权，[80] 也未放弃赢回在陆地上的据点。尽管在利利贝乌姆的罗马人民与军队对这些挫折深深感到沮丧，但他们坚决要持续包围；政府毫不迟疑地持续由陆路送来补给，部队也尽其所能进行紧密围堵。在舰队遭受船难后，执政官普鲁斯回到军队；他虽然深受这场灾难折磨，但立即着手规划新的并且有效的冒险计划，尽可能赢回失掉的优势。他捉住眼前的契机，去突袭并占据艾瑞克斯（Eryx），同时占有城镇本身以及维纳斯神庙。

艾瑞克斯是一座西西里面向意大利海岸的山；[81] 它介乎帕诺穆斯和得雷帕纳之间，但比较靠近后者；事实上，它邻接该城的边界，是仅

次于伊塔纳（埃特纳）山之外的西西里第二大山。在它平坦的顶端矗立着维纳斯·艾瑞克斯（Venus Erycina）神庙，[82] 这无疑是西西里所有神庙中最富裕也最为金碧辉煌的。城镇依循顶峰之下的斜坡展开，而从各方向通往这城镇的路既长且陡。普鲁斯在顶端以及往得雷帕纳方向下山之路的山脚，安排驻军。他在这两个据点同时设下严密的防护，特别是在后者，因为他相信借此可以同时控制艾瑞克斯城和艾瑞克斯山。

56.在这之后，迦太基人任命哈密尔卡·巴卡（Hamilcar Barca）为指挥官，安排他负责海军行动。他在战争之第十八年开始侵犯意大利海岸。在侵犯意大利南部的洛克里人 [83] 以及布鲁提恩（Brutti）人的领土之后，他渡海到西西里，率领全部舰队压境帕诺穆斯的领土。在此他占据靠近赫克特（Hercte）[84] 的要塞：山丘以及要塞皆是同名。它坐落在帕诺穆斯及艾瑞克斯的海岸之间，被认为是在这整个地区中，可以作为建立保护周全以及永久性军营的最佳地点。此处有一个从周围平原中隆起甚高的山丘，各边皆有陡峭斜坡。山丘顶端周围超过十二里；高耸平台的土壤提供良好的放牧地，也适合农业；它与凄厉的海风隔绝，而且免于危险动物的侵扰。面向海洋及内陆两侧的山坡都极为险峻，无法轻易接近；高原其他方面则仅需稍做防御工事来进行防护；在高原中间还有鼓起的圆丘，可作为卫城以及观测站，提供对邻近地区极佳的视野。赫克特亦控制一个港口，位置良好，可以接纳从得雷帕纳或利利贝乌姆航向意大利的船只，而且有充分水源。到达山丘仅有三条路，两条从陆路方向，一条从海路，但皆难行。所以哈密尔卡在此建立基地。但是选择此地，却需冒一个极大的风险：[85] 这附近没有一个可以依赖为友的城邦，亦无从他处获得奥援的机会，而是独自立足在敌阵之中。另一方面，他的出现对罗马人构成严重威胁，最后将把他们卷入一连串的困难以及武力较劲。不久之后，他与他的舰队出航侵略远及库迈（Cumae）的意大利海岸。罗马人在离他阵地约超过一里半处前方的帕诺穆斯，建立一个对付他的营区后，哈密尔卡则持续以不同的攻击以及侵略性的巡逻来骚扰他们，为期几近三年之久。然而我无法在此详细描述这些军事

行动。

57.哈密尔卡在西西里针对罗马人的战争，或许可以比喻成拳击比赛：在比赛中两位拳手都有完美训练，都以勇敢著称，彼此交手争夺奖品。当竞赛开始，两方铁拳互击，毫无休止，战斗双方或是观众都无法预期或计算每次攻击；但是从两位的行动以及他们所展示的决心，我们可以对他们的技术、力气以及勇气得到足够清楚的印象。所以对这两位指挥官亦然。促使他们进行日常军事行动的不同原因，以及这些行动的战略细节，多至超过任何作者能力去加以描绘，而且将会在阅读时令人觉得无聊以及无益，因为每天一边都会对另一边进行埋伏、突袭以及反击。但是对这两位指挥官的领导统御以及他们敌对行为的结果做一般性的综合，或许能够针对事实提供一个较清楚的图像。他们当然没遗漏掉、没不去尝试任何可能的策略，无论是正规的战术，是因地方或环境所迫而引起的临机应变，还是因为大无畏的主动冒险精神所启发的军事行动类型等。但是有几项原因解释战争何以无法有决定性之结果。

首先，双方武力彼此均等；其次，他们各自的防御固若金汤，近乎牢不可破；最后，这两个军营彼此只相隔一小段的距离。这就是何以这两支军队虽然在某些地方经常发生冲突，但未曾发生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在这些军事行动中的损失仅局限在那些面对面冲突交战的人员。那些被迫退让的部队则习惯借着退避到防线之后来摆脱麻烦，并在稍后再度冲出，恢复攻击。

58.但是命运女神就像比赛里一位好的裁判，[86] 突然会在竞赛中带来不可预期的变化：军事行动的场所，从我刚才形容的地点移开，而局限在一个更为狭窄的地带，使得征战更为激烈。如我已提，罗马人占据艾瑞克斯山，并在高处以及山脚安置驻军，但哈密尔卡设法占领在这两边阵地之间的城镇。占领顶端之罗马人发现自己被围住，却仍以极大的勇气忍受围攻所带来的痛苦以及危险。同时，迦太基人发现自己也是夹

在两支罗马军队之间，亦以几乎难以置信的决心坚持住；他们的补给是在极大困难中取得的，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出海口以及一条连接出海口和他们阵地的路。双方再度施展所有能耐、策略以及围攻所需的努力，忍受种种痛苦，并且诉诸激战以及其他每种战斗方式。最后这竞争结果是和局。然而这并非如费边·匹克拖所呈现的双方已经筋疲力竭或士气尽失，而应该是他们在离开竞赛场时，就像两个没有被击败打倒过的胜利者一般。真正发生的是在这其中一方征服另一方之前（而这战场上所进行的竞争延续两年之久），整个战事结果是以其他方式以及在其他地点决定的。

就陆军而言，这是在艾瑞克斯的状态。但大体而言，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斗争或许可以比喻为两只斗鸡，战斗至死方休。当两只斗鸡虽然因为单纯的疲惫而无法摆动它们的翅膀，但它们的勇气在死前始终高昂，所以仍是不断相互啄击，直到因为没有外来干预，它们陷入致命的格斗中，一旦进入此种情境，双方必将持续缠斗至死方休，最后其中之一将会当场毙命。[87]

如此便是罗马人与迦太基人的处境。他们被未曾间断过的辛苦激战所带来的压力，弄得疲乏不堪，逼到绝望。他们的力气开始消失，他们的资源因为年复一年的征税以及军事开销而日渐枯竭。

59.所以就像战胜的斗鸡一样，罗马人用尽全力，准备进行非生即死的最后一搏。因为过去五年他们已经完全远离海军活动，部分是因为他们所遭受到的天然灾难，部分是因为他们坚信可以只借由军团来赢得战争。但他们现在能认知到，主要是因为哈密尔卡具有胆识的领导，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完全依赖陆路来得到应得的战果，他们决定第三次将自己的命运押注在大海。他们相信，假如他们能够对敌人做出致命一击，这个策略会提供唯一成功结束战争的机会。事实上，他们最后做到了。在第一次尝试时，他们单纯因为恶运而被迫放弃海洋。第二次，他

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得雷帕纳战役的挫败。现在他们第三次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

在艾基尔特斯（Aegeates）群岛的埃古萨（Aegusa）海战中取得胜利，使他们可以切断对艾瑞克斯迦太基军队的补给供应，最后结束战争。然而这结果是出自罗马人纯粹的决心，而非物质资源。罗马国库里已经没有任何资金来支付战事支出，但尽管如此，由于一些位居领导地位公民的爱国心及慷慨捐输，财源终于有着落。他们根据财富多寡，由个人或者是两三人一组，去承担建造装配一艘五层舰；假如征战顺利的话，国家将会支付他们建造这些船舰的开支。用这种方法，一支依照从“罗德岛人”汉尼拔掳获来的船舰作为原型所打造出的规模达两百艘的舰队很快就准备好。罗马人接着任命卢塔提亚斯（Gaius Lutatius）为将领，命令他在夏天开始时出海。[88] 他在西西里海岸外突然出现，令敌人完全措手不及。所有迦太基舰队已经航回祖国，因此他立即占领得雷帕纳的港口以及靠近利利贝乌姆外海的停泊处。他竖立起攻城机具，围绕得雷帕纳，并做其他准备进行围攻。当他尽其所能以各式方法进行军事行动时，他预见迦太基舰队必然会返回，而且他并没有忘记他远征的首要目标：唯有海上胜利才能决定整个战争。他不允许时间白白浪费，或是他的人马无所事事。他要所有人员每天演练战争中所需要的技能。他特别注意水手的训练及纪律，借此在很短时间内将他们提升到有如训练有素的选手，要参加即将来临的竞赛。

60.罗马人派遣舰队，准备再度一争海上霸权，大大震惊了迦太基人，他们立即装配自己的船舰，装载谷物及其他补给品，派遣到西西里，因为他们十分关切在艾瑞克斯的部队应该有充分的物资供应。舰队由汉诺率领。他立即从迦太基起航，到达所谓的赫利岛（Holy Isle）。他的计划是要在罗马人不知情的状况下，尽快航行到艾瑞克斯；在那里卸下物资，减轻船体重量，装载那些最适合海上陆战的佣兵，以及哈密尔卡·巴卡本人，然后再与敌人交战。可是卢塔提亚斯已经接获汉诺前

来的情报，并预料到他的意图。他同时下令罗马军队里最好的士兵登船，作为陆战部队，并且航行到利利贝乌姆外海的埃古萨岛。在那里他向部队做适合该场合的演讲，并警告船长说战争可能在第二天发生。次日破晓时，海相已经转为恶劣凶猛，他见到正吹起的强风有利于敌军，而他的军舰则将难以逆风而行。最初他无法决定在这状况下，什么会是最好的途径。但之后他反省，若他在这暴风雨天气中，立刻冒险一战，那么他至少能在对方支援来到前，只要和汉诺及其水手交战就好。但是他若等待天气平静下来，让迦太基人横渡到艾瑞克斯，与当地陆上军队会合，他就必将要对付船身减轻、行动更自如，载有迦太基精锐部队，特别是那最可怕的哈密尔卡（罗马人对他比对其他人更加畏惧）在场的舰船。因为这些理由，他决定不能失去现在的机会。当他看到敌人船舰满帆前来，他立即出海。由于他们的状况极佳，他的人员轻易掌控波涛汹涌的大海，在很短时间内就将舰队移动成为一直线，船首向着敌人。

61.当迦太基人见到罗马人意图阻止他们航行，他们降下桅杆，每一条船彼此间互相打气，与敌人接近。这一次，两边的预备情形恰好与之前的得雷帕纳战役相反，因为条件相反，所以战争结果也相反。罗马人已经改良了他们的造舰方式，也将所有重装备从他们的船只移走，只留下战斗所需要的装备。他们的划桨手动作整齐划一，表现极佳，而他们的陆战人员更是由他们从军团中拣选出来拥有无比斗志以及身经百战的精英。但就迦太基来说，恰好相反。他们的船舰负载沉重，在行进中难以驾驭，他们的人员是在紧急状况下招募的，因此相当生涩，而他们的海军陆战人员更是刚征召来的生手，这是他们第一次经历艰苦以及危险的任务。迦太基人以为罗马人必将不会再挑战他们的海军优势，所以轻视敌人，忽略自己的海军。结果一旦双方交战，他们立即一点又一点地溃败，很快就被驱离逃跑：有五十艘船被直接击沉，七十艘船及水手被俘。其余则升起桅杆，顺风航离：很幸运地，风在关键时刻转向，协助他们逃走回赫利岛。罗马执政官航向利利贝乌姆，和当地的部队会师，努力处理已经掳获的船只及人员。这是很大的成就，因为罗马人在

战争中掳获将近一万人。

62.迦太基人得知这出乎意料的挫败，但就他们征服的决心及意志而言，他们仍然要准备作战，然而当他们估算自己的资源时，却发现已经陷入僵局。首先，敌人已经控制海洋，这使得他们无法供应他们在西西里的军队；第二，假如他们要放弃或是背叛这些军队，他们必将没法留下任何人或是任何领导者来继续战争。于是他们立即送信息给哈密尔卡·巴卡，授予他全权处理当地状况，而哈密尔卡则坚持他身为一位优秀及谨慎的将领的一贯行动。只要有任何合理的成功机会，他会尝试任何一种策略，无论这看起来是如何大胆或危险；假如曾有任何将军会彻底尝试任何可能胜利的机会，那便会是他。但是当命运女神与他作对，不给他任何可能的机会去拯救他领导下的部队时，他便展现出智慧以及现实感，屈服于那无法避免的结果，送出特使求和。因为知道何时已经败下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知道何时已经胜出，这是一位指挥官的职责。就卢塔提亚斯而言，当然乐于同意协商，因为他知道罗马这时已经因为战争而筋疲力竭，耗尽资财，所以他很成功地以协约来结束彼此的敌意。协约其中一部分条款如下：

> 依据以下条件，如能获得罗马人民批准，迦太基人与罗马人将会建立起友谊。迦太基人将撤离整个西西里；不得对希洛作战，不得对叙拉古及其盟友作战。迦太基人必须交还给罗马人所有战俘，不得要求赎金。迦太基人必须支付给罗马人两千两百优卑亚单位（Euboea）泰伦[89]的银钱，为期共二十年。

63.然而，当这些条件送抵罗马时，罗马人民不愿接受，而是派遣十人委员会去调查整个问题。在抵达后，他们对条款没有做出任何重要变动，但加入一些小变更，对于迦太基人来说则是更严厉的条件。例如，他们缩短支付赔偿的年限为十年，总数则再加一千泰伦，[90]并另外要求迦太基人必须从西西里及意大利之间的岛屿撤离。

如此结束了罗马人及迦太基人之间的战争，而这些便是获得和平的

条件。战争不间断地延续二十四年之久，这是我们所知最长久、最连续以及最大规模的战争。除了在我历史作品之前章节已提及的所有其他战争以及备战外，在两次海战中，其中一方有超过五百艘船舰参与，另一方则几近七百。[91] 假如我们把这过程中因船难而摧毁的那些船只也给算进来，罗马人损失约七百艘，迦太基人则是五百。对如“独眼”安提柯一世、“救主”托勒密一世或“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92] 之属的海战感到印象深刻的人来说，假如他们阅读这战争的叙述，无疑地会诧异于其中所涉及的巨大军事规模。再者，假如我们考虑这些五层舰的大小，和波斯人对付希腊人，以及雅典人对付斯巴达人，所使用过的三层舰相比，我们将会发现在世界史中未曾有如此强大的武力在海上对峙过。这些事实肯定了我在本《历史》之初所提的主题，亦即罗马人的霸权并非如某些希腊作家所以为的是出于偶然，或是胜利者不知自己的所作所为。相反地，因为罗马人刻意地在如此伟大的事业中锻炼自己，所以他们不仅自然地大胆踏上追求世界主宰之途，而且他们在实际上也应该达成他们的目的。

64.一些读者或许会怀疑：既然罗马人现在是世界主宰，比过去掌握更多的权力，何以他们在我们的时代不再能够装配如此多的船舰或是派遣如此大的舰队出海？那些被这种表面矛盾所困惑的人，在我们形容罗马政治体制时，将能清楚了解个中理由。这主题构成我作品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不仅不能被作者轻描淡写地处理，而且需要读者全神贯注。它提供了一个高贵的图像，但直到今天却仍然不为人熟悉。这是因为过去尝试这主题作家的无能，其中有些是因为缺乏知识，其他则做出含糊以及相当无用的陈述。至于我们正在陈述的战争，我相信人们将会发觉，就其行动的规模及广度，在追求实现时的崇高精神以及特别是在他们想胜过对方的野心上，这两个国家几乎平分秋色。在个人勇气上，罗马人的确较为优秀，但双方公认在胆识以及天分上最伟大的将军则是哈密尔卡，姓氏为巴卡。也就是那后来对罗马人作战之汉尼拔的父亲。

[1] 这不可预期成分在波里比阿处理历史的方法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概念源自希腊化时代的史学家，而他们又是从希腊悲剧里借用出来；亚里士多德定义它的功能是要引起恐惧及怜悯。在罗马帝国崛起这样的脉络中，这是指那无法预见以及非理性的成分，是由偏爱罗马的命运女神Tyche所掌控。

[2] 从二二○年（汉尼拔战争开始）到一六七年。

[3]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以及希罗多德同时将这种逾越界线的行为，视为hubris（凡人的僭越傲慢），这会带来nemesis（报复）。这里所涉及之事是大流士（Darius）远征西徐亚（Scythia），以及薛息斯（Xerxes）入侵希腊。

[4] 波里比阿对雅典并不友善，所以没提及雅典在五世纪时的称霸。斯巴达的霸业从四○五年算起［赖山德（Lysander）在阿哥斯波塔米（Aegospotami，原意为"羊河"）击败雅典］，到三九四年［雅典人柯农（Conon）得波斯舰队之助，在克尼多斯（Cnidos）击败斯巴达］。

[5] 在大流士三世死于三三○年后，亚历山大成为大王（Great King），并统治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及波斯帝国的东部行省。

[6] 波里比阿就像古代其他的史家一样，在使用到Africa这个字时，其实是有些弹性，端赖语境来决定。若是提及世界由欧、亚、非三洲，那这里的Africa所指的便是非洲大陆。但也有不少的时候，Africa一词所指的是迦太基最直接统治的本部，包括今日的大部分突尼西亚以及一部分利比亚（古代也叫"昔兰尼亚卡"，Cyrenaica）和小部分阿尔及利亚（古代叫"努米底亚"），这便是罗马的非洲行省范围。当然波里比阿所提的非洲地区尚有埃及、毛里塔尼亚两区，还有他后来航行探险的大西洋非洲海岸。但埃及是埃及，古代史料似乎甚少以非洲来指称埃及。另外，波里比阿有时候会用Africa来泛指迦太基在北非的势力范围，那就稍微模糊一些；所以利比亚人及努米底亚人的军队，会称为迦太基的非洲军队，相对于西班牙军队或凯尔特军队。虽然称呼迦太基在今天非洲的势力范围为"非洲"，容易有以偏概全的印象，但希望此处的提醒，能让读者从语境来决定这词（本书皆译为"非洲"）的范围。——译者注

[7] 二二○至二一七年。

[8] 第四次叙利亚战争，二一九至二一七年。

[9] 亦即大多数的希腊史学家；他们从亲迦太基的观点写作，将他们的叙述聚焦在汉尼拔这人物上。罗马人提及这冲突时，称之为第二次布匿战争（Second Punic War）。

[10] 这位希腊政治家写作一系列的回忆录，篇幅超过三十册。

[11] 波里比阿在此对命运（Fortune）概念是认为它是一种在宇宙间的力量，乐于见到变化只因为它是变化，但同时也是以戏剧创造者来行为，从人类命运之中创造出某种规划。

[12] 二六四至二六一年（原为二六四至二六○——译者注）。有关塔罗明尼昂的泰密乌斯（约三五○至约二五五年），见导论页9-11、16、19、25。

[13] 在这场战事中，斯巴达人突袭并且完全歼灭雅典舰队，并一口气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四○五年）。波里比阿所选择的那年是三八七/三八六年。

[14] 这是斯巴达军队被艾帕米农达斯所率领的底比斯人（Thebans）所击溃，而希腊霸权从那刻起转移到底比斯（三七一年）手上。

[15] 这项安排结束了斯巴达一边，以及由雅典、底比斯、阿哥斯及科林斯组成的四国联盟，并获得波斯军援的另一边，所发生的战争。这和约也恢复了波斯大王对小亚细亚的统治（三八七/三八六年）。

[16] 阿加索克利斯从三一七至二八九年期间，以叙拉古僭主（tyrant）的身份进行统治，并在三一五年时占领迈萨拿。他之前将佣兵安顿在叙拉古，他们同意在他过世后离开西西里。但在二八八及二八三年期间，他们占领迈萨拿。

[17] 这是坎帕尼亚佣兵在占领迈萨拿之后，所使用的称号。这源自于Mamers，这是奥斯肯语（Oscan）中的战神（Mars）。

[18] 在二七○年。

[19] 在二七○年时，迦太基人拥有西西里西部及中部，战神之子盘踞东北角，而叙拉古则是从塔罗明尼昂（Tauromenium）到帕奇纳斯（Pachynus）海岬的东部海岸，以及到达阿吉里安（Agyrium）的内地。战神之子比较常与叙拉古人而非迦太基人，发生冲突。

[20] 有关希洛掌权日期的证据彼此冲突：选项是大约二七五/二七四年或二七○/二六九年。早一点的日期比较可能。

[21] 这战事或许发生在二七四年。

[22] 在西西里北岸，迈萨拿以西数里之外。

[23] 究竟迦太基的势力在这时是否会对罗马造成严重的威胁，很可疑。比较可能的是与皮洛士的交战，让罗马人警觉到外敌干预南意大利的危险，而战神之子刻意挑起这些恐惧，正如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马希利亚（Massilia）人之所为。

[24] 其名为汉诺（Hanno）。

[25] 该城以北数里处。

[26] 四世纪初高卢人之入侵。

[27] 费边·匹克拖（Quintus Fabius Pictor）这位最古老的罗马史学家，生平经历过汉尼拔战争。他的历史将罗马的故事溯及至城邦建立之初，直到他当代；这是以希腊文书写，目的是为了向希腊人辩解罗马的政策。阿格里根特的费利纳斯（Philinus of Agrigentum）则是历经第一次布匿战争，从一个亲迦太基的观点来书写他的历史。一般人皆认为费边及费利纳斯是波里比阿第一次布匿战争所参照的仅有的史料来源。

[28] 亦即事实的陈述以及在有关意见上的论断。

[29] 这是二六三/二六二年。将两位执政官率领之军力同时派出，显示出局势严重：总计来说，约有四万人被派出。

[30] 二五八六千克。

[31] 在二六二年。

[32] 这位将军接受战神之子的提议，安排军队驻扎迈萨拿，并派遣之后被十字绞刑的汉诺去统帅（见页140）。

[33] 他曾与希洛结盟。

[34] 这港口位居阿格里根特西北约二十里之处。

[35] 约稍超过两公里。

[36]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估计数量为二万五千人。

[37] 二六一年。

[38] 其他证据显示出，虽然罗马人的动机无疑相当复杂，但防卫意大利海岸的需求是最优先的考量。

[39] 这里quinquereme翻译为“五层舰”，值得商榷。一般认为双层舰（bireme）或三层舰（trireme）的船舰桨位，从上到下共有三层以及两层，每人一桨；其作战方式常是以迅速的运动、转向及冲刺，来针对敌人船身最脆弱的腰侧撞击，以取得战果。迦太基基本上延续这种海战的战术，因为这种战术需要深厚的海军传统以及长时间的练习。但希腊化时代，开始有将船面作为作战

平台的趋势，所以需要更宽阔的船身以及更大的动力，所以超过三层以上船舰，变得越来越平常。所以“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以海军攻打罗德岛的城池，便常动用这类船舰；罗马在海战中使用“乌鸦”，也需要作战平台，所以一般而言船身会较大，所以常用超过三层舰以上的船舰设计；在八书中马谢勒斯甚至将两艘船合并起来，形成更大的平台，装载攻城用的“散布卡”，来攻击叙拉古。当然这样的船只也能运载较多的海军陆战人员。相形之下，迦太基则仍较多地使用三层舰设计。但五层舰是否“五层”，虽然不能排除，但现在更流行的看法是这些超过三层以上的多层舰，常是从三层舰以及双层舰变化而来，所以可能桨位的层次没有增加或没大幅增加，甚至只剩一层（如以下原著注释所认为的）。每一支船桨常不再只是由一人来划动，所以所谓的五层舰可能还是三层或其他层数而已，但是因为每支桨可能已经有超过一个人来划动，这一垂直单位的船桨共有“五”人而非三人来划桨，所以动力更大，速度更快，船身也能加大一些。这种说法也可运用在“更多层”的船舰设计中。因此quinquereme的“五”所指的是划桨手人数的动力大小，非关桨位的层次，但因为尚未为quinqureme寻得妥善翻译，故暂以“五层舰”代之。——译者注

[40] 这练习是有必要的，因为划动五层舰（五人一桨）的方法与三层舰不同；后者是罗马人到那时为止所曾经经验过的最大型船舰。

[41] Keleustes负责打拍子，所以可以控制划利帕拉船的速度及节奏。

[42] 根据存在老普林尼的传统，这些在六十天内完成。

[43] 位落在同名之岛屿上，该岛为伊奥里安群岛（Aeolian group）中最大者，当时是在迦太基人手中。

[44] 或许是现在的梵蒂冈海岬（Capo Vaticano），靠近意大利半岛的“脚拇趾”。

[45] 迈莱（Mylae），现今之米拉左（Milazzo），位落在西西里东北角约二十五里处的海岬；海战发生在二六○年夏天。

[46] 在西西里北岸，帕诺穆斯以东约三十里之处。

[47] 二五九年。

[48] 在迈莱以西十五里之处；日期是二五七年。

[49] 现代的估计是罗马的战力为二百三十艘，迦太基为两百艘。

[50] 在西西里岛南岸中间，约阿格里根特以东二十里。

[51] 阿格里根特以西约二十五里之处。

[52] 罗马军队传统上集合成四个等级的单位：前战部队为进行前哨战的部队，前线部队为青年精英部队，中线部队为壮年部队，而后线部队则是经验丰富的老兵部队。在此后线部队或许是对那些没经历过两栖作战部队的别号，换言之是所谓的“老鸟”。

[53] 波里比阿的估算是根据所出现的船只数量。这将会得出将近十万名划桨手及四万名陆战队。但是因为在西西里只有四个军团，所以其中的精兵数量必然更少，据现在估计约一万八千名。

[54] 见页149。

[55] 见页157。

[56] 埃克诺穆斯的海战被形容是“结果相反的坎尼战役”。在这情况中，迦太基的中间太过脆弱，无法抵挡罗马的冲击。

[57] 这战斗变成是设计来撞击的船舰与登船的船舰之间的竞赛。

[58] 因为在习惯上若是可能的话，尽量往岸边压迫，所以决定性的胜利意味着将敌人逼上岸边。执政官舰队的到临扭转整个迦太基人的局势，所以在掳获的六十四艘船只中，有五十艘是来自这无法逃向大海的迦太基左翼。

[59] 现代的波恩（Bon）海岬。

[60] 根据戴奥（Dio，Frag.43.22-3）的记述，罗马人要求支付赔偿，交还罗马战俘，赎回迦太基战俘，撤出西西里及撒丁，交出所有海军，除了一艘船之外，并承诺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要提供五十艘船舰给罗马。

[61] 只有当迦太基领土被入侵时，迦太基公民是才会被动员征召。

[62] 轻装部队，他们的武器是投掷标枪。

[63] 原先manipulus这个词是指“一把”；然后在早期时是指一根杆子，上有一把麦杆缠绕其上，而成为一支旗帜，所以manipulus开始指这样物件，成为属于同一面旗帜底下的一连部队。

[64] 这是波里比阿在页129所提及之道德教训的主要例证。

[65] 这总数与波里比阿在页158所给之数字相符，这是来自他有关埃克诺穆斯战役的资料，但现代的估算将其降至两百艘。因此若允许有约一百艘的高估，加上留在阿斯匹斯的四十艘，这援救的舰队必然为数在二百五十艘左右。

[66] 波里比阿这么说的意思是逆时钟方向航行，所以要绕过位居西西里东

南端的帕奇纳斯海岬。事实上，西西里岛西部的港口都在迦太基人手里，罗马司令官因为古代贴岸航行的做法，所以别无选择。

[67] “升起”是指星宿在东方海平线上可以看见之时，之后升起的太阳会使其消失不见。猎户座（Orion）升起的时间据估计是在七月四日，而天狼星座（Sirius）是在七月二十八日。

[68] 在二五四年夏天。

[69] 二五三年。

[70] 约一公里或一千二百公尺。

[71] 接下来发生战争的时间是二五○年六月。

[72] 现在的估计是一百二十艘。

[73] 二五○年。

[74] 根据狄奥多罗斯（Diodorus）《历史》二十四书1.2章，这有九十尺宽及六十尺深。

[75] 佣兵由凯尔特人及希腊人所组成。

[76] 似乎有可能这位Adherbal是远征军的统帅，而他自己前往得雷帕纳，留下汉尼拔在艾基尔特斯群岛，来解围利利贝乌姆。

[77] 这数字显示迦太基全军出动，亦即原先的一万驻军（见页176），加上汉尼拔带来相同数量的军队。

[78] 这些是具有斜屋顶的屋棚，保护围攻者免于由上往下投出的投掷武器。

[79] 波里比阿的订年不正确。普鲁斯是普尔凯尔在二四九年的同僚，而非其二四八年的接任者。

[80] 然而迦太基人没有利用这样的优势，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资源由于在非洲的内战而削弱。

[81] 现今的艾力切（Erice），靠近特拉帕尼（Trapani）。它约有二二五○尺高，但在西西里除伊塔纳（埃特纳）山外，它仍既非最高也非最大的山。

[82] 这神殿非常古老，而且维持在神殿卖淫的传统，这显示其来自东方的

起源。腓尼基人将其与阿斯塔帖（Astarte）相认同；罗马人则将维纳斯神殿的建立归诸埃涅阿斯（Aeneas）。

[83] 在布鲁提温（Bruttium），现今卡拉布里亚（Calabria）的东南沿岸。

[84] 波里比阿将赫克特形容为位居帕诺穆斯及艾瑞克斯之间是不准确的；现代学者指认这山丘是Monte Castlelaccio，约帕诺穆斯西北方七里处。

[85] 哈密尔卡之抵达标志着战争一个新的及较积极的阶段；他占领赫克特是回应罗马人占领艾瑞克斯的对策。

[86] 亦即要在两位旗鼓相当的对手中做出决定。

[87] 这比喻准确地写出，斗鸡之双翅失去使用功能，所指的是在陆路上的五年决战，而最后一击是罗马人在战略上的改变，这是以艾基尔特斯群岛海军战役为最高潮。

[88] 二四二年。

[89] 约五六八九二千克。

[90] 约二五八六○千克。——译者注

[91] 分别是在荷密翁海岬及埃克诺穆斯海岬的战役。

[92] 这些是继承亚历山大帝国之中最杰出的将领，并且进行战争来为自己分割出王国。

第二书

在西班牙之事务

1.在前书中我已经解释过罗马人征服意大利后，从那一刻起便开始干预意大利外其他国家的事务，然后我形容他们如何跨海进入西西里，以及以何种理由向迦太基宣战，以便占有那岛屿。接着，我陈述了他们如何以及何时最先建立海军；我报道双方从开战到停战间的主要事件；何时迦太基完全撤离西西里，由罗马人接管除由希洛统治区域外的所有地区。在这之后，我叙述迦太基佣兵的兵变，点燃所谓的利比亚战争（Libyan War），在那场战争中所犯下恐怖的残忍行为，以及过程中所发生种种没预料到的事件及命运的转折，直到迦太基最后胜出占得优势，打败佣兵。根据我原来的计划，[1] 我现在将要简洁概述这冲突之后所接续发生的事件。

在迦太基人再度控制非洲的局势后，他们立即聚集一支足够强大的远征军，派遣到西班牙，任命哈密尔卡·巴卡去统帅它。[2] 当哈密尔卡就任这军队的指挥官时，他当时只有九岁大的儿子汉尼拔陪同前往。哈密尔卡立即在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旁渡过海峡，建立迦太基的势力，主宰伊比利亚上的各民族。他在那国家几乎待了九年，[3] 在那期间降伏许多部落，令其归顺迦太基，有些是使用武力，有些则是透过外交。他生涯的结束方式符合他过去一生的成就，以名符其实的高潮作终。当时他在一场对付最强大、最好战部落的战斗中英勇应敌，完全不顾个人安危，结束生命。迦太基人任命他女婿哈斯德鲁巴继任，其人之前已经统领过哈密尔卡的舰队。

罗马人在伊利里亚

2.大约在此同时，[4] 罗马人首次入侵伊利里亚（Illyria）以及那部分的欧洲。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值得那些希望掌握我所写《历史》之目的，以及理解罗马帝国形成及成长的人进行详细研究。它的国王阿格隆（Agron）——普列福拉图斯（Plevratos）之子——拥有较之前所有伊利里亚国王更为强大的陆军及海军。[5] 马其顿菲利普五世之父，德米特里二世，曾经雇用过阿格隆去协助梅迪昂（Medion）：[6] 梅迪昂是当时正被伊托利亚人围攻的城镇，因为伊托利亚人无法说服梅迪昂人加入联邦，所以决心强迫他们加入。伊托利亚人于是动员所有军队，环绕该城扎营，并立即发动攻击，同时也带来攻城机加入行动，并用尽一切手段使其就范。这些军事行动恰好与年度选举同时，伊托利亚人必须在那时为下一年选出另一位将军。[7] 因为这受困城市处于极端危急状况下，沦陷指日可待，所以负责围攻军队的将军向伊托利亚人求情，辩称说他在任期时历经所有围攻时的危险艰辛，因此当这地方被攻打下来的时候，他应该享有特权来负责分配战利品，并将自己名字刻写在祭献神明、纪念胜利的盾牌上，这才算公平。有人反对他的主张，特别是那些以候选身份竞选的人。这些人敦促人民不要预先论断这事件，而是将它交给命运女神来决定究竟神明要给谁荣耀。在那时候伊托利亚人通过决议，决定在城市沦陷时，无论谁是将军，将必须与之前这职务的担任者一起分享战利品分配，以及将名字刻写在盾牌上的荣耀。

3.这项决议是在选举那天通过，而伊托利亚人的习惯是新任将军必须立即执行指挥权。但就在那晚，一百艘载着五千名伊利里亚人的船只抵达离梅迪昂最近的岸边。他们在那里下锚，趁没人注意到的时候，天一亮立即将人卸下。这些人以他们国家所习惯的方式组队，[8] 以小组人马方式潜入伊托利亚人营区。当伊托利亚人知道敌人出现时，首先对这

突如其来的登陆以及他们的大胆感到诧异，因为多年来他们对自己的军事素质相当重视，并且对现有的武力深具信心，因此当时感到相当受挫。他们把骑兵及重装武兵的主体在营区之前的平地排列成阵；接下来他们迅速占领位居更前方之处、容易防守的一些小丘，然后将自己部分的轻装武兵及骑兵安排在该处待命。伊利里亚人向这些武装简陋的步兵冲刺过去，并以其人数优势以及队形所形成的冲击力，成功地将他们从小丘赶走，并强迫骑兵退居到重装武兵之处。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用较高的地点来发动第二波的冲刺，对付在平原展开阵势的伊托利亚人主力部队。伊利里亚人很快地便将敌人驱散赶走。而在这次攻击中他们有梅迪昂人的支持，因为梅迪昂人同时从城内往外突击。他们杀死许多伊托利亚人，掳获更多的战俘，抢夺他们所有的武器及行李车队。伊利里亚人在完成国王命令后，将行李以及其他战利品带回船上，立即返航。

4.在这个意料之外的救援行动后，梅迪昂人举行公民大会，除了要讨论许多事之外，还辩论要在盾牌上如何刻写适当字句的问题。他们通过决议，决定戏谑伊托利亚人，将铭文表达成：这盾牌是“从”而非“被”伊托利亚统帅与接任下年将军的候选人所夺。当然降临在梅迪昂人身上之事情转折，或许正是由命运女神设计，向吾等凡人证明她的神力；[9] 因为在隔夜之间，她使梅迪昂人加诸伊托利亚人身上，那些梅迪昂人相信敌人即将加诸他们身上的命运。至于对伊托利亚人而言，他们遭受到那些预料之外的灾难后，应该可引以为戒，切不可在对未来做出规划时，好像它已经是既成事实，而且切不可对那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结果之事，自信满满。我们不过是会死的凡人，因此我们应该随时对不可预期之事多留余地，特别是在发生战争的时候。

国王阿格隆在船只回国及听完军官简报后，对能打败伊托利亚人感到喜出望外，因为这一群人一向自视超高，目中无人。于是国王立即沉溺在酒宴以及其他快乐的庆祝中，结果感染肋膜炎几天后死去。[10] 由寡妇提幽塔（Teuta）继位，她则将政事细节交给由亲信朋友组成的国

政顾问团。[11] 她受制于女人典型的弱点，对所有事情都采取短线看法，无法看见比她人民最近所得之胜利更加长远的事，对其他领域的事务都没有见解。首先，她允许在伊利里亚海岸横行的海盗去掠夺任何他们遇见的船只；接下来，她聚集一支舰队以及如之前远征相同规模的军队给派送出去，下令指挥官要视所有国家如同仇敌。

5.远征军于是出航，选择伊利斯（Elis）和美塞尼亚（Messenia）为最先目标；从不知多久以前开始，伊利里亚人就已经习惯来这些地方掠夺。这是因为两个地方都有很长的海岸线，它们的主要城市却都深居内陆，任何派去保护沿海地区的武力都必须旅行一段距离，所以总是姗姗来迟；因此伊利里亚人经常都可以在这些地区四处流窜，恣意抢劫，无所忌惮。然而这一次，当伊利里亚的船队到达伊庇鲁斯的腓尼企（Phoenice）[12] 入港进行补给时，他们在那里发现一群数量约八百的高卢人，受雇于伊庇鲁斯人；他们接触这些人，建议他们应该背叛这城市。高卢人同意这个阴谋。那时伊利里亚人登陆，攻击城市，高卢人从城内接应，协助占领城市，掳获居民。当消息传到伊庇鲁斯人那里去时，他们很快地聚集所有军队，前往救援。当他们靠近时，他们在河旁扎营；这条河流经腓尼企，分隔他们及敌人，而且为了保护他们的前方，所以伊庇鲁斯人拆毁横跨河流的桥梁。那时他们接获报告，史可第来达斯（Scerdilaidas）[13] 已经率领五千名伊利里亚人，通过安蒂冈尼亚（Antigoneia）[14] 附近的关口，循着陆路靠近他们，于是伊庇鲁斯人分派一部分军队来保护城市。他们轻松前进，尽情地享受乡间的资源，并疏于去布置卫兵以及安排夜哨。伊利里亚人发现他们的敌人已经将军力分散，且戒备十分松懈，于是在入夜后，借黑暗的遮蔽来发动突袭。他们修复桥面的木板，让人员安全过河，占据有利地点，在剩余的夜晚时间中适当休息。破晓时，两军在城镇前摆开阵势，进行交锋。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伊庇鲁斯人落败，许多人被杀死，更多人被俘。其余的人则向阿丁坦尼人（Atintanes）的乡间逃去。

6.因为这些不幸，伊庇鲁斯人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于是派遣代表到伊托利亚联邦以及亚该亚联邦要求协助。这些国家同情他们的遭遇，回应他们的诉求，并派遣部队救援，稍后便抵达贺利克拉农（Helicranum）。在这段时间中，伊利里亚人已经占领腓尼企，首先和史可第来达斯的部队会合，然后前进贺利克拉农。他们在那里扎营，面对驰援的军队，他们很想交战。然而却发现地形对他们非常不利，就在那时皇后提幽塔的一位特使抵达，传令他们尽可能快速返国，因为有些伊利里亚人已经分裂，加入到达达尼亚（Dardarnia）人那边。[15] 他们因此侵犯接壤的伊庇鲁斯领土，之后和伊庇鲁斯人签订停战协定。依据协定，他们要归还腓尼企以及释放自由的市民以换取赎金，但是他们已经先以船载走奴隶及其他动产。所以在原先那批伊利里亚人航离回国后，史可第来达斯及他的部队也经由陆路，借道安蒂冈尼亚返国。这次伊利里亚人的远征，让居住亚得里亚海沿海的希腊人深感沮丧及恐惧。他们见到在伊庇鲁斯中最强大以及最受自然天险保护的城市，却令人意想不到地被劫掠，他们开始感到焦虑，但已经不像过去是为作物担心，而是为了自己城镇以及身家性命的安全而焦虑。

当伊庇鲁斯人在没有料想到的状况中得到解救后，他们非但没有企图对侵略者进行报复以及对拯救者表示感恩，他们接下来的动作竟是派遣代表到皇后提幽塔那里，与伊利里亚人及阿卡那尼亚（Acarnania）人签订共同协议。根据这协议，他们将在未来与伊利里亚人结盟，反对亚该亚及伊托利亚联邦。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不仅表现得对施恩者极度缺乏判断力，[16] 而且从一开始就对自身利益表现出明显愚蠢的忽略。

7.人性经常会犯错，但若遭受不可预料的灾祸，就不能真算是受害者的过错，而是噩运，或是那些将灾祸加诸其身之人的过错。但是当我们纯粹因为缺乏判断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因为自己所犯下的错而卷入到灾祸中，这时每个人都会同意除了自己外，没人该受责难。因此假如有人失败是出自于噩运，他们会被同情、宽恕以及协助；但假如是由于

自己的愚蠢，那么所有有识之士都该指责怪罪犯错的人。当然在这例子中，希腊人有各种理由去批评伊庇鲁斯人。首先，任何知道高卢人风评的人，必然都会相当迟疑是否要将繁荣城镇的安危托付给他们，因为只要有机会又有诱因时，高卢人极有可能会选择背叛。其次，任何人都应该对这群人的名声及行为多加戒备：他们原先是因为背叛自己朋友及亲人，被部分同胞在盛怒之下逐离自己的祖国；后来当迦太基人因为战事急迫，需要并接纳他们，并让其驻扎防守阿格里根特；他们在那里的人数多达三千人。他们利用将军和士兵间的薪资争议作为借口，并且开始掠夺。之后，迦太基人再度于艾瑞克斯雇用他们担任驻军任务；这地方当时正被罗马人围困，他们企图出卖该地以及和他们一起受困的人。当这阴谋失败后，他们集体投靠敌人。罗马人接着雇用他们去看守维纳斯·艾瑞克斯神庙时，他们又再度抢劫。因为他们邪恶的证据如此昭然若揭，所以罗马人在与迦太基的战争结束之后，首要的关切便是将其解除武装；然后让高卢人登船离去，禁止他们再度踏上意大利任何土地。可是伊庇鲁斯人竟让这些人成为他们共和国[17]的护卫者以及他们法律的保障者，并将繁荣城镇托付给他们来守护。所以他们几乎无法避免被指责是自己惹祸上身。我认为有必要详细地处理这一议题，不仅是要证明伊庇鲁斯人的愚蠢，更是要指出：真的聪明的话，是不会有人允许一支比自己武力更强的驻军进驻，尤其是当这支军队是由野蛮人组成的时候。

8.现在再回到伊利里亚人。这民族之前有段时间习惯去掠夺从意大利航行来的船只；当他们占据腓尼企时，一些脱离伊利里亚舰队自行独立运作的人，跑去攻击意大利的商人；或抢劫，或加以谋杀，还有许多人沦为阶下囚。在过去，罗马政府通常会忽略这些对伊利里亚人的抱怨。但越来越多人开始联络元老院，申诉有关的议题，于是元老院任命两位专员盖亚斯·科伦康尼亚斯及路希亚斯·科伦康尼亚斯（Gaius and Lucius Coruncanius），前去伊利里亚调查究竟发生何事。

在这时候，皇后提幽塔对她的舰队从伊庇鲁斯带回来战利品的数量以及精美程度（因为腓尼企在那时候是该地最繁荣的城镇）感到满意，所以她决心加码，掠夺希腊人。但当时她必须停止类似的冒险活动，因为国内发生了动乱。她很迅速地镇压下伊利里亚人的反叛，但在围攻唯一还在抗拒的城镇伊萨（Issa）时，[18] 罗马专员由海路抵达。他们得到晋见允许，随即抱怨罗马人民所受到的侵犯。提幽塔以傲慢及蔑视的态度来聆听整个访谈。当他们说完，她说她会注意罗马人不会受到伊利里亚人“官方上”的伤害，但就私人恩怨而言，去阻止她子民在海上进行掠夺，则非伊利里亚国王的习惯。罗马使节中较年轻的一位对如是回答感到愤怒，所以直言不讳，虽然其言词有充分证据支持，但仍是不合时宜。他说：“提幽塔皇后，罗马人一直有项优良传统，亦即国家应该关切去惩罚那些犯下属于私人之罪行者，并且协助那些受害的人。借神明之助，我们将会尽己之能，迅速地让您改革伊利里亚国王对待子民的方式。”在如此直言不讳之后，皇后陷入一阵暴怒，对使者言论的愤怒，让她抛弃对待使节的文明规范，在使节正在登船离开时，她派出杀手暗杀那在言语上冒犯她的人。当消息传到罗马，皇后的罪行引起激烈的公愤，所以权威当局立即征召军团，聚集舰队，准备远征。

9.当征战季节来临时，提幽塔皇后装配一支比去年更庞大的舰队，派遣它到希腊海岸；[19] 部分船只直接跨海航行到科西拉岛（Corcyra），其他则在耶皮潭纳斯（Epidamnus）登岸。表面上，他们在耶皮潭纳斯停泊的理由是要取水，但其实是要偷袭并占领该城。耶皮潭纳斯人在没有戒心下接待他们，没有事先防范。伊利里亚人登陆之后，穿上短上衣，没有武装，仿佛只是要去取水，但其实是他们将刀剑放在取水瓶之内；然后他们突然砍倒城门守卫，占据城门塔楼。更多的人在安排好的计划下，迅速下船；以这些增援的人手，他们轻易地占领大部分的城墙。耶皮潭纳斯人措手不及，尽管完全没有准备，但是他们却快速聚集，勇敢应战，结果是伊利里亚人在坚持一段时间后，最后被逐出城外。耶皮潭纳斯人因为这疏忽，差点失去自己的城市；但因为勇

气，所以最后安然无恙，也被上了有用的一课，以备未来。在这之后，伊利里亚将领匆忙出海，再度和之前已经早先他们出航的其他舰队会合，然后航向科西拉岛。他们登陆后，在居民大为惊慌的状况下，开始围攻该城。这让科赛拉人陷入绝望深渊，他们和阿波罗尼亚（Apollonia）人及耶皮潭纳斯人一起派特使到亚该亚人及伊托利亚人那里。他们恳求这些国家迅速救援，不要袖手旁观，让他们被伊利里亚人逐出家园。这两个联邦接见特使，决定回应他们的诉求，两边同时联手装配十艘属于亚该亚人的甲板船舰。这支舰队在数日内装配完毕，然后航向科西拉岛，希望能解围城之急。

10.这时候伊利里亚人也得到阿卡那尼亚人依据协约所派遣出的七艘有甲板船舰的支援。他们以这些船舰出海，在帕克希（Paxi）岛[20]外海和亚该亚舰队相遇。阿卡那尼亚人在那里和被派来去对付他们的亚该亚舰队进行一场不具决定性的战争，阿卡那尼亚人除了几位水手受伤之外，没有任何损害。然而伊利里亚人将他们的轻型船只四艘一组固定在一起，并以这种编组队形和敌人交战。但他们忽略了船只会遭到损害的风险，而将他们的侧面对向敌人，提供给敌人清楚目标去加以撞击。一旦撞击发生，船首便会纠缠在一起，让他们立刻陷入险境，因为撞击部位深深卡入，固定在一起的四艘轻艇则会被船首举起。那时伊利里亚的水兵会立即跳上敌人船舰，以人数优势打败船上水手。他们用这种方式掳获了四艘四层舰，并赤手空拳弄沉一艘五层舰，这艘船载有卡瑞尼亚城的马古斯（Margus of Caryneia），一位终其一生以完全的忠诚来服务亚该亚同盟的人。当与阿卡那尼亚人交战的亚该亚舰队船只见到伊利里亚人胜利，他们决定依靠自己的速度，利用顺风升起风帆，平安返国。在这之后，伊利里亚人欢庆他们的胜利，他们可以不受干扰，以更大的信心继续围攻科西拉岛。但另一方面，科赛拉人在盟友被击败后完全陷入绝望；在坚持一段时间后，他们决定和伊利里亚人和谈，允许法洛斯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ros）驻军城镇之中。在做完这些安排后，伊利里亚的海军统帅航行离去，在耶皮潭纳斯外下锚，准备再度

包围这城市。

11.大约同时，[21] 执政官弗尔维阿斯（Gnaeus Fulvius）带领两百艘船从罗马航行而来；而另一位波士丢米亚斯（Aulus Postumius）[22] 则带领陆军出发。弗尔维阿斯原来的计划是要航向科西拉岛，因为他预期那里的围攻会持续进行。然而在他得知一切已经太迟时，他还是决定要航行该地。首先，他要确切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何事；以及，其次，要查核德米特里送给他的信息究竟是否正确。伊利里亚人其实已经怀疑德米特里这位军官，而他因为害怕提幽塔皇后可能对他不利，所以开始和罗马人接触，提议将他所控制的城市及其他地方交给他们。科赛拉人民对罗马人的到来感到很高兴，立即依据德米特里的协议，将伊利里亚的驻军交出。他们也一致通过接受罗马人保护，因为他们确信这是面对伊利里亚人那无法无天的劫掠时，唯一可以确保未来安全的方法。罗马人在接纳科赛拉为友好城邦后，航行前往阿波罗尼亚，而德米特里则充当他们接下来征战的向导。同一时间，另一位执政官波士丢米亚斯则从布伦迪希温（Brundisium）运送陆军；人数大约有两万名步兵及两千名骑兵。两支军队在阿波罗尼亚会师，那里的人民同意接受罗马人的保护，但就在这时候，耶皮潭纳斯受围的消息传到，陆军于是立即前往。伊利里亚人一听到罗马人靠近时，立即混乱地放弃围攻，然后撤退。罗马人亦将耶皮潭纳斯置于他们的保护下。他们从那里挥军伊利里亚内陆，在途中臣服阿尔迪安（Ardiaea）部落。

许多代表现在来和罗马人接洽，包括来自帕提尼（Parthini）部落的无条件投降。这部落被纳入罗马人的友邦；同样地还有阿丁坦尼部落。然后军队前往伊萨岛，伊利里亚人从稍早之前一直围攻它。罗马人强迫敌人停止包围；并将伊萨人纳入保护。舰队在巡行伊利里亚沿岸时，罗马人急攻强取一些城镇，但是在努翠亚（Nutria）时，他们遇到挫折，不仅损失许多士兵，还包括几位军团营长和财物官。但他们同时也掳获装载着伊利里亚从乡间地区抢来的战利品的二十艘船舰。在过去曾围攻

伊萨的伊利里亚人中，那些现在属于法洛岛的人被允许留下，不受伤害，作为对德米特里的示惠；[23] 没被逮捕的其他人则落荒而逃，避居在阿波（Arbo）。提幽塔皇后仅由几名侍从陪同，逃到离海有些距离的小城镇——瑞衷（Rhizon），它坐落在同名的河流之上，防御坚强。执政官在完成这些种种不同任务，并将大部分伊利里亚纳进德米特里管辖权威下，让他成为一大片领土的主宰之后，便率领海军及陆军返回耶皮潭纳斯。

12.弗尔维阿斯接着带领大部分的海陆军返回罗马，[24] 而波士丢米亚斯则带领四十艘船的舰队留下。他从邻近地区城市招募一支军队，在耶皮潭纳斯过冬，护卫着那些将自己托付给罗马人来保护的阿尔迪安及其他部落。然后在早春时，提幽塔派遣使节给罗马人，缔结和约。根据条款，她同意支付罗马人所规定数额的贡赋，[25] 放弃除了少数地方外的整个伊利里亚，以及（这条件对希腊人最为重要）她承诺不会拥有超过两艘船舰，不会航行越过利苏斯（Lissus），而且不会有武装。当签订和约时，波士丢米亚斯派遣使节到伊托利亚联邦及亚该亚联邦去。官员抵达时解释何以导致战争，以及何以罗马要跨越亚得里亚海参战，接着报告在征战中所获得的战果，最后则是宣读他们和伊利里亚人签订的条约。两个联邦亲切有礼地接待使节，之后使者经由海路回到科西拉岛。此条约解除了希腊人的心腹大患，因为伊利里亚人不仅是这一民族或那一民族的敌人，而且是所有人的共同敌人。这便是罗马人第一次武装干预伊利里亚以及那部分的欧洲，也是第一次为了干预希腊之后如何发展所进行的外交任务。在走出第一步后，他们稍后立即派出其他的使节到雅典及科林斯；科林斯人也是在这场合中，第一次邀请罗马人参加地峡（Isthmia）运动竞赛。

在西班牙的事务

13.在上述这段期间，我们暂时离开西班牙的事务，现在回归正题。经过这些年，哈斯德鲁巴以他的智慧以及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这行省，表现杰出。他在提倡迦太基整体利益方面，贡献极大，特别是借由建立所谓的迦太基城——或被其他人称之为“新城”（New Town）——巩固了迦太基的利益。因为这城的地点相当适合作为非洲或是伊比利亚的运作基地，我将会在更适合的场合来描绘它的地理状态，并解释它能够对这两个国家提供何种利益。但罗马人突然发现，哈斯德鲁巴已经建立一个远比迦太基所曾拥有的更庞大及更令人畏惧的帝国，所以他们决心插手西班牙事务。他们现在了解到，自己在这几年当中都在熟睡，竟允许迦太基建立并装配一支更强大的军队，所以他们要弥补失去的势力。他们不敢冒险直接对迦太基提出要求或是宣战，因为在这时候罗马人正值凯尔特人入侵的威胁，几乎每天都必须防范攻击。因此他们首先要设法缓和并安抚哈斯德鲁巴，并去攻打凯尔特人，以战争将事情解决，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有像是凯尔特人这样的人在威胁边界，他们不仅无法控制意大利事务，甚至也无法在罗马安身立命。所以他们先派遣使者到哈斯德鲁巴那里签订条约。根据条款，迦太基人承诺不在武装状况下越过埃布罗（Ebro）河，但并未述及西班牙其他地区。那时之后，罗马人便立即全心投入去对抗意大利的凯尔特人。

罗马与高卢人

14.假如我依照在序文中所解释的这作品的原先计划，对这些不同民族做一些陈述，但不超过简洁的综合，我想对读者来说是有帮助的。要描述他们的状况，必须回到他们最先占领这些地区的时代。为了让我们了解人的天性以及后来汉尼拔依赖那些地区来摧毁罗马帝国，我想这故事不只值得一说，也值得记住，不仅是因为故事本身有趣，更因为它对我更大的计划也是必要的。首先，我必须处理凯尔特人所居住国家的性质，以及它与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关系，若我们对它不同的部分以及整个地区有清楚的图像，我们将更能掌握战争中的主要事件。

整体来看，意大利状若三角形，东侧首先以爱奥尼亚海峡（Ionian Straits）为界，然后是亚得里亚海，而南侧及西侧则分别是西西里海以及提蓝尼亚海。这三侧汇聚在最南端顶点的意大利海岬，[26] 叫科欣特司（Cocynthus），将爱奥尼亚海与西西里海分开。其余的一侧则由阿尔卑斯山脉构成意大利本身与北方的界线，它连续横过整个国家；这山脉始于马赛[27] 以及撒丁海北岸，不间断地延续到亚得里亚海湾湾头不远之处。这山脉的山脚我们可将其视为三角形的底部，在山脉南方则是意大利半岛北方最肥沃的平原。这便是我们要处理的地区。这个平原就面积及肥沃程度而言，超过我所熟悉欧洲的其他任何地区。就这区域而言，平原周边的界线形状大致是三角形。构成三角形顶端的是阿尔卑斯山脉与亚平宁山脉在马赛上方交会之处，离撒丁海北方不远。平原北边，如我已提及，则是由阿尔卑斯山脉本身构成，在长度上绵延二百五十里；南侧则是以亚平宁山脉为界，约四百里；而其三角形底部则是亚得里亚海岸，其长度从先纳（Sena）城到海湾头超过二百八十里。平原三边加起来的总和将近九百二十五里。

15.这区域的肥沃甚难以笔墨形容。它生产极为丰盛的谷物，所以在我成长的时代，一西西里迈迪温诺斯[28]单位的小麦，价值四欧宝，[29]相同分量之大麦则是两欧宝，而一迈垂特斯[30]单位的葡萄酒，价钱与一迈迪温诺斯的大麦相同。粟[31]及蘼[32]亦有丰富的产量，整个区域橡树森林的橡果数量，可以由这个事实来评估：意大利每年屠宰非常大量的猪，作为家庭食用或军队消耗，有很大比例是在这平原养的。所有种类食物如何物美价廉，或许可以从这事来加以说明：在这区域的旅行者在停驻旅店时，不会去计较每项食物的价钱，而只会问住宿每个人需要多少钱。旅店主人，一般而言，都会以一天半个阿斯（as）为总价，包吃包住；换言之，亦即一个欧宝的四分之一，而且甚少会超过。至于本地居民数量、身高以及姣好面容，和他们战斗时的勇敢，在历史中都有证据足资证明。

部分阿尔卑斯山地区没有太多岩石，而是拥有肥沃的土壤，山的两侧都有人居住：在北侧，山脉斜坡眺望隆河（the Rhne），在南侧则是我已经形容的意大利平原。前者区域系由“阿尔卑斯山脉那边的高卢人”（Transalpine Gauls）居住，而后者则有塔乌里斯契（Taurisci）、阿格尼斯（Agones）及其他野蛮部落定居。但是“阿尔卑斯山脉那边的高卢人”当然不是指称单一族群，而是源自于拉丁文的介系词trans，意谓“越过”，施用在居于阿尔卑斯山脉那边的族群。阿尔卑斯山的顶峰因为它们崎岖嶙峋的性质，以及终年覆盖的深厚冰雪，完全没人居住。

16.亚平宁山脉从马赛上方和阿尔卑斯山脉交会的斜坡，宜于人居，从亚平宁山脉的两侧斜坡可以分别眺望提蓝尼亚海以及内陆平原。第一个区域是利古里亚人（Ligures）的家乡，他们的领土在靠海那边延伸远达匹赛（Pisae），是西伊特拉里亚（Etruria）的第一个城镇，[33]在内陆那侧则远至阿雷提乌姆（Arretium）。在他们旁边的是伊达拉里亚人；伊达拉里亚人南边的两侧山坡都居住着翁布里亚（Umbria）人。大部分的亚平宁山脉离亚得里亚海岸约六十里，但在翁布里亚人所居之

南，则是突然转向右边，然后穿过意大利中部，远及西西里海。三角形其他较低洼之处，继续面向亚得里亚海海岸的平原，延伸远至先纳·盖利卡（Sena Gallica）。[34] 波河（The Poe），[35] 这条被诗人赞誉为伊庇丹努（Eridanus）者，源起于阿尔卑斯山，靠近三角形顶点之处，在开始时往南流到平原。然后它在这里一转，往东奔流，穿过平原，将河水经由两个河道分别注入亚得里亚海。因此将平原分割为两个部分，其中较大者介于河流及阿尔卑斯山脉间，延伸至亚得里亚海海湾。波河的水量超过意大利其他河流，因为它是由阿尔卑斯山脉及亚平宁山脉许多山间河流汇聚而成，顺流而下到平原地区，又有河流从两侧灌注流入。波河在天狼星升起时 [36] 水位最高，看起来最美，因为那时它被两道山脉的溶雪灌注而成，波涛汹涌。它从称为欧拉纳（Olana）[37] 的河口，可溯流而上约达二百五十里，并且可以行船，而原来单一河道的河流在称为崔加波里（Trigaboli）[38] 之处分隔为两个水道；其中一个出口叫帕多瓦（Padua），另一个则是欧拉纳，后者则提供一个与亚得里亚海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安全的港口。这条河的当地名称是波登克斯（Bodencus）。希腊人记录了许多关于波河的不同神话，我现在所想到的是那些涉及费顿（Phaeton）[39] 和他从天空摔下的故事，以及据说当地居民直到今天仍穿黑衣，以示对费顿的悼念。所有具有悲剧性格及类似这样的传奇故事，我暂且略而不谈，因为我导论的性质不适合对所谓的“悲剧史学家”进行详细的批判。但我会在更合适的脉络回到这议题，尤其是泰密乌斯 [40] 对这些区域显示出的无知。

17.在古代这北方平原先由伊达拉里亚人定居，进驻时间同于他们占有在卡普亚（Capua）及诺拉（Nola）附近的费雷格里恩（Phlegrean）平原。后者平原区域自古拥有肥沃美名，其位居许多民族的通道，也为众人皆知。但是那些有志于理解伊达拉里亚享有霸权那段时间一些东西的人，不应该去研究他们现在定居之处，而应该将注意力放置在北方平原以及他们从中取得的资源。凯尔特人因为是伊达拉里亚人的邻居，与他们多所关联，逐渐将他们嫉妒的眼睛投注在他们的乡村

之美，于是突然间以细枝末节的借口，发动大军攻击，将他们从波河河谷赶走，占据这个区域。那些最先定居在靠近波河源头的人是莱费人（Laevi）及列别企人（Lebecii）；在他们之后则来了英苏布里人（Insubres），其中最大部落塞诺马尼人（Cenomani）沿河岸定居。邻近亚得里亚海那部分的平原一直都属于一个非常古老的部落，威尼提人（Veneti）；在习俗及衣着上，他们几乎与凯尔特人甚少有异，但是他们却是操持另一种语言，而悲剧诗人有很多关于他们的精彩故事可说。在波河南岸，较靠近亚平宁山脉的一边，最先的定居者来自西方，他们是阿那瑞斯人（Anares），后来是波伊人（Boii）。在他们往东边方向，朝向亚得里亚海居住着林贡斯人（Lingones），再过去更靠海的是塞农人（Senones）。

这些是占有这区域的主要部落的名称。他们居住在没城墙的村落中，不知任何精致文明。他们睡在稻草、树叶上并且食肉，除了战争与农业外，不知其他事业，他们的生活非常俭朴，不识任何文艺或科学。他们的财产是由牲畜和黄金构成，因为无论处境为何，只有这些物件是他们可以轻易随身携带，并运送到任何他们所想去的地方。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是拥有随扈，一个人若被认为在周围有最大数量的依附者以及追随者，他便是部落里最受人敬畏以及最强大的一员。

18.凯尔特人最初抵达意大利时，他们不仅占领北方区域，而且以其胆大妄为或威吓的手段来降服许多邻近民族。他们不久后在一场激战中击败罗马人和他们的盟友，追杀溃逃的敌人，并曾有三天占领除了卫城之外的整个罗马城。[41] 但在那时候，威尼提人入侵他们的领土，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于是他们和罗马签订和约，归还罗马城后回国。后来他们卷入自己境内的战争，因为一些邻近阿尔卑斯山的部落看到他们和自己的处境相比，在波河的凯尔特人显得繁荣，于是经常团结起来以武力对付他们，掠夺他们的领土。在这期间，罗马人得以恢复自己的实力，重新建立他们在拉丁姆区域的权威。在凯尔特人占据罗马三十年

后，他们又再度以大军压境，远达阿尔巴（Alba）。[42] 罗马人在这时仍不敢在战场上与他们对战，而且这次入侵又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没有时间去聚集盟友的武力，组织与其对抗的力量。然而十二年后，当凯尔特人再度全力入侵，[43] 这次罗马人事先获得他们发动攻击的情报，因此他们聚集盟友，充满信心地应战，因为他们急于进行决定性的一役。高卢人对敌人的进攻感到惊恐，与此同时在他们自己的行伍之间发生了内讧；最后当夜幕低垂那刻，他们撤军回国，行迳与溃败几乎无异。在经过这种惊吓之后，他们有十三年按兵不动，而当他们见到罗马势力迅速增强，他们与罗马签订正式条约，并且有三十年忠实地遵守其中的条款。

19.在那段时期结束之后，阿尔卑斯山脉那边的高卢人之中出现了新的人口移动，[44] 因此凯尔特人担心一场危险的战争正在威胁他们。于是他们借着贿赂以及他们与高卢人是亲属关系，将入侵的部落从他们的领土导离，并怂恿这些同民族之人去攻击罗马人，甚至自己也参加这些征战。当他们行军穿过伊特拉里亚，伊达拉里亚人跟着加入，并在掠夺大量的战利品后，安全撤离罗马人的领土。但是一旦回到家，他们便因为谁该分得较多的战利品而陷入争执，结果反而摧毁了他们大部分的军队，甚至是摧毁掠夺来的战利品。这是高卢人在侵占邻居财产时，常会发生的现象，而这通常源自于他们无节制的酗酒以及暴食的习惯。

四年之后，[45] 高卢人与萨莫奈人结盟，在卡美里诺（Camerinum）与罗马激战，大败罗马，[46] 造成极大损失。罗马人毫无所惧，在面临挫折时，反而展现出胜利的精神；几天之后，他们全军出动，[47] 在山提农（Sentinum）附近攻击高卢人及萨莫奈人。他们歼灭大部分的敌人，逼迫其余落荒而逃，于是这两族群的部队避居回到自己的领土。十年后，高卢人再度尝试入侵，并包围阿雷提乌姆。[48] 罗马人前去协助解围，并在城前攻击敌人，但被击败。在这战争中，他们的副执政凯启里亚斯（Lucius Caecilius）被杀，所以他们任命库吕亚斯

（Manius Curius）代替。但是当库吕亚斯派遣使节去协商遣返战俘时，高卢人狡诈地破坏停战协定，屠杀使节，罗马人被此行为激怒，所以他们立即采取攻势，入侵敌人领土，在那里他们面对叫塞农人的高卢部落。[49] 罗马人在激战中大败敌军，大多数的高卢人被杀，其余则被驱离他们的家乡，所有土地由罗马人占领。这是他们在高卢第一个设立的殖民地，依据之前居住此处之高卢部落，名之为先纳。这是我以上所提之城镇，靠近亚得里亚海，北部平原的东南角。[50]

20.当以波伊之名为人所知的部落，见到塞农人被从自己的家园逐走，他们担心自己也会面临相同的命运，所以动员所有作战人员，要求伊达拉里亚人协助，然后出兵作战。[51] 这支联合部队在靠近瓦迪蒙（Vadimon）湖[52] 附近与罗马人交战，结果大部分的伊达拉里亚人被消灭殆尽，只有少数的波伊人逃掉。尽管遇到这样的灾难，这两个民族却又于次年再度合作；他们甚至武装一些未成年的人，然后再次于激战中挑战罗马人。他们遭受全面挫败，直到在他们的精神经过彻底洗练而改变后，才促使他们送出特使到罗马求和，订立条约。这些事件发生在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跨海进入意大利三年之前，以及高卢人在特尔斐被歼灭五年之前，而这次几乎看起来命运女神以一种像是侵略性的瘟疫，来折磨整个高卢的族群。[53] 但无论为何，罗马人从这些争斗之中学得两大优势。首先，一旦他们在高卢人手中逐渐习惯蒙受严重损失，从此他们再也不必预期去经验或畏惧任何比这更恐怖的经验。其次，在他们遇见皮洛士之前，他们在这些战斗中已经被训练成身经百战、训练有素的竞赛选手。他们在时间仍有余裕之时，先学会去压制高卢人挑衅的精神；[54] 然后在解决那危机之后，他们能将完全专注的心思首先投注在与皮洛士争夺意大利的霸权，后来是与迦太基作战争夺对西西里的控制。

21.在遭受这些挫败后，高卢人保持沉寂，与罗马维持四十五年的和平。但随时间推移，那些见证过可怕战争的高卢人逐渐凋零，由年轻

一辈取而代之，他们充满着无可救药的好战欲望，完全没有历经民族苦难，更没有在风雨飘摇存亡之间的经验，他们的冲动无疑会摧毁条约所带来的稳定平衡。高卢人视罗马最微细的动作为挑衅，他们也邀请阿尔卑斯山的高卢人加入联盟。最先这些接触是由部落领袖秘密进行，完全不让部落人民知晓；因此当一支阿尔卑斯山那边的高卢人抵达阿里米努姆（Ariminum）时，[55] 波伊人对他们起疑，并与他们领导者及这些陌生人争吵，杀死他们的国王阿提斯（Atis）及卡拉土斯（Galatus），并且与在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同胞在激战中彼此相残，结果双方蒙受惨重伤亡。罗马人已经对高卢人的进展感到紧张困扰，所以派遣一个军团到北方，但是当他们听到他们自相残杀，他们于是返国。在这种紧张状况后五年，[56] 罗马人在雷比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的执政官任期，将以皮切诺（Picenum）为名的高卢领土分配给他们自己的公民；皮切诺是他们在征服塞农人后，将他们逐离的地方。[57]

这个殖民政策是弗拉米宁（Gaius Flaminius）提议立法，用来讨好、煽动群众的手段，这或许可以说是罗马人民道德败坏的第一步，[58] 并促成后来与高卢人的战争一触即发。个中真相是许多高卢人（特别是波伊人）的领土与罗马接壤；他们之所以参加战争，是因为深信罗马人不再只是因为要建立对高卢人的主宰权而进行战斗，而是要将他们驱逐，最后要将他们完全灭绝。

22.因此波伊人及英苏布里人这两个最大的部落立即团结起来，派遣特使到住在阿尔卑斯山和靠近隆河的高卢部落。这些民族因为担任佣兵，所以通常被称为盖沙泰（Gaesatae）。[59] 这些特使敦促盖沙泰的领袖——康可利塔纳斯（Concolitanus）和阿内罗斯特斯（Aneroestes）——一起加入攻击罗马人的队伍。特使立即支付他们大量黄金，他们强调罗马人现在所享有的蓬勃繁荣以及假如他们未来取得胜利的话，将会落入他们手中的财富。他们无须费太多心思便赢得这些国王加入，而且除了这些诱因之外，特使们也承诺自己将会是忠诚的盟友，并提醒听众

他们祖先过去的丰功伟业。这些英雄不仅在战场上打败罗马人，并且成功攻下罗马城，掳获城中所有财富；并因此曾经担任该城七个月的主人，若非他们自愿放弃，作为恩典赏赐，他们最后满载战利品回家，保持不败，安然而退。这些辩论引起国王们极为热烈的反应，他们派遣出该地区史无前例的大批人马，其中包括了较以往更多的领导人物以及知名战士。

此时罗马人已经风闻这些备战的消息，并且臆测可能将会发生何事，因此处于持续警戒以及悬疑状态。有时我们发现他们正在招募军团，囤积粮食以及其他物资，在其他时刻则是移动部队到边疆，宛如敌人已经进入他们的领土，但事实上凯尔特人尚未踏出他们自己的疆域。大体上也是因为这些高卢人所造成的骚动，所以迦太基人才得以在不受干扰状况下，在西班牙建立自己的势力。如上所述，罗马人认为来自北方边境的威胁是所有问题中最迫切的，因为它将威胁自己的腹侧，于是被迫忽略西班牙正在发展的局势，转而全力对付凯尔特人。他们因此借由与哈斯德鲁巴订立条约的方式，与迦太基建立关系——其条款我已经交代[60]——然后集中所有资源准备对付在意大利的敌人，因为他们认为对此事做出一个决定性的结果是攸关生死之事。

23.盖沙泰人在动员强大、装配完备的军队后，跨过阿尔卑斯山，并在皮切诺土地分配后的第八年，[61]降临波河河谷。英苏布里人及波伊人始终坚持他们原来给盟友的承诺，但是罗马特使却成功地说服威尼提人以及切诺曼尼人站在罗马那边。所以凯尔特的领袖必须派遣部分军队来防卫自己的领土，以防这些部落的攻击。他们之后拔营，带领由约五万名步兵、两万名骑兵及战车所构成的主力部队，士气高昂地前进伊特拉里亚。罗马人一旦得知高卢人已经跨越阿尔卑斯山，立即派遣一位执政官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到阿里米努姆，阻挡敌人的路线，另一位副执政则是到伊特拉里亚。另一位执政官阿提里亚斯（Gaius Atilius）[62]已经率领他的军团前往撒丁。此时罗马城内人心惶

惶；他们相信威胁他们的危险既巨大且逼近，会有这些感受十分自然，因为高卢人所激起的长期恐惧，[63]未曾完全驱散。他们的想法经常会绕回到这种可能性，政府当局则是持续忙于招募军团和征召必须服役的盟友来随时应战。所有被罗马臣服的地区通常都要提供服役年龄男子的名册，因为政府当局必须知道他们可用之兵的全部战力，同时进行谷物粮食的收集囤积，矛枪投掷武器和其他作战物资的库存，比记忆所及之任何类似准备，在规模上都更胜以往。意大利其他居民也一样恐惧高卢人的进攻，所有盟邦随时提供协助，他们不再将自己看成是罗马盟邦而已，也不会将这次战争认为只是为了支持罗马霸业而战。相反地，所有人都认为这危险是对他们自己人身、城市及领土的共同威胁。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他们在回应罗马人的命令时，没有迟疑过任何一刻。

24.在此我应该从这局势的实际状况，来证明汉尼拔后来冒险进攻的这个强权究竟是如何庞大，以及当他差点成功达成目的时，对罗马所施加的极大灾难，他所胆敢面对的帝国是何其强盛。为了让我的重点更加明确，我必须解释罗马的资源，以及在这时候他所能支配的战力究竟有哪些。罗马的每位执政官各会带领两个公民组成的军团，每个军团系由五千两百名步兵以及三百名骑兵构成。除此之外，这两位执政官军团的盟友共计三万名步兵和两千名骑兵。立即靠拢来支持罗马的撒宾（Sabine）人和伊达拉里亚人骑兵共计四千名，步兵五万名。罗马人将这些征召的兵力组成一支军队，并在一位副执政率领下，部署在伊特拉里亚边界。住在亚平宁山区的部落，翁布里亚人和沙欣纳提（Sarsinati）人，募集一支约两万人的军队，而威尼提人和切诺曼尼人另外提供两万人。这些部队部署在高卢人领土的边界，借着入侵波伊人的领土，分散敌军注意力。这些是防卫罗马领土疆界的军力。

罗马城本身则驻扎一支预备部队，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任何紧急状态，数量是两万名步兵及一千五百名骑兵，都从罗马公民团体征召，外加盟邦所提供之三万名步兵和两千名骑兵。盟友提供给权威当局之足以

担当军事任务的男子名单，其内容如下。拉丁人，八万步兵及五千骑兵；萨莫奈人，七万步兵及七千骑兵；雅庇吉亚（Iapygia）人和美沙皮亚（Messapia）人，五万步兵及一万六千骑兵；卢坎尼亚（Lucania）人，三万步兵及三千骑兵；马西人（Marsi）、马禄奇尼人（Marrucini）、福连塔那人（Frentani）和威士提尼（Vestini）人，二万步兵及四千骑兵；在西西里及他林敦，有两个预备军团，每个军团各有约四千两百名步兵及两百名骑兵。罗马人及坎帕尼亚人中，所有出现在登陆名册的共有二十五万名步兵及两万三千名骑兵。所以罗马人及其盟友中可以服役的人，共计超过七十万名步兵和七万名骑兵，然而汉尼拔在侵略意大利时，所带领的军队不足两万人。我将会在稍后之处，更详尽地处理这个议题。

25.那时凯尔特人兵临伊特拉里亚，蹂躏整个区域，随心所欲地烧杀掳掠，然后在没人抵抗下，进军罗马城本身。当他们到达离罗马三天路程的克鲁修姆（Clusium）城时，他们接到消息，罗马驻扎在伊特拉里亚的军队已经从后追赶上来，并逐渐逼近，那时凯尔特人将部队掉头迎战，士气高昂地与敌人交锋。日落时，两军几乎已经相接，他们营区之间仅隔一小段距离。天黑时，凯尔特人点燃营火。他们将骑兵留在该处，命令他们等到日出之时，在可以看见敌人时，他们再循着步兵已经行进的路线移动。在这期间，凯尔特人将他们的主力部队在黑夜中撤离到一个叫费苏莱（Faesulae）的城镇去，[64] 在那里布置阵地。他们的计划是在那里等待骑兵，并同时用出奇不意的方式来扰乱并攻击敌人。罗马人在日出之时见到骑兵，并发现他们没人支援，他们下结论认为凯尔特人已经逃走，于是依照敌人被认为逃走的路线来追杀骑兵。当他们在接近时，凯尔特的主力部队突然从阵地跳出，向他们冲锋。一场激烈的战斗于是爆发，双方顽强战斗，但是最后凯尔特人因为勇敢及占据优势的人数，占有上风。罗马人损失六千人，其余逃跑，其中大多数都撤退到一个有自然天险可以保护的山丘。凯尔特人最初想进攻取下山丘，但是他们因为昨夜的行军而筋疲力竭，加之因为战斗所承受到的辛劳痛

苦，所以他们立即撤退，休养生息。但他们留下一队骑兵来防守山丘，决定假如他们没有投降，便要攻击任何逃跑的人。

26.在这时候，另一位执政官宝路斯率领靠近亚得里亚海附近的军团，得知凯尔特人已经入侵伊特拉里亚，并且逼近罗马。他匆忙南行驰援，并且很幸运地在关键时刻抵达战场。他在敌人附近驻扎；在山丘上的罗马人看到他的营火时，了解所发生之事，大受鼓舞，于是在黑夜掩饰下，送出没有武装的使者找路穿过森林，向执政官报告。宝路斯在接到消息时，决定除了一战，别无他法，便下令军团营长在破晓时，率领步兵出击，他自己则带骑兵前进到战友正在避难的山丘。高卢指挥官也看到营火，推论敌人已经来到，所以召开军事会议。在这时候国王阿内罗斯特斯辩论说，既然他们已经掠夺到如此大量的战利品（因为战俘及牲畜的数目，以及掠夺品的数量真的极大），他们不应该再继续交战，将所有获得到的物质置于险境，现在就应该以安全地回家为要。在处理完所有掠夺物，摆脱这些阻碍行动的东西后，他们应该行军返回，在未来发展看好的状况下，再与罗马人一决雌雄。军事会议决定，在目前状况下依照阿内罗斯特斯的建议行事。他们在夜间同意此事，所以在天亮前便已拔营，沿着海岸，穿过伊特拉里亚行军离去。宝路斯那时从山丘援救出剩余的罗马士兵，并与自己部队结合。他决定此时并非激战的时刻，而是要尾随敌人后面，注意任何有利地点或时机来骚扰他们，或是取回一些战利品。

27.同时，另一位执政官阿提里亚斯已经率领他的军团从撒丁渡海回国，在前往罗马途中抵达匹赛，从相反方向与敌人面对面而来。当凯尔特人在伊特拉里亚的特拉蒙（Telamon）附近时，他们收集粮草的部队遇见阿提里亚斯的前锋，因而被俘。执政官质问他们后，得知在战争中发生何事；他们也透露两支敌对军队的出现，解释说高卢人正在附近，但宝路斯尾随而来。这消息让阿提里亚斯大惊，但也给他很大希望，因为他相信已经让高卢人落入两支军队前后夹击的陷阱中。他下令

军团营长准备行动，并在地形允许下，列队以行军速度前进。在幸运的机缘下，他注意到有某个高地可以控制高卢人必经的路线，所以带领骑兵奔驰前去，因为他极希望在高卢人上来前，先占领山丘顶。这样的举动将能使他发动战争，而以这方式他可确定会在战争结果中有比较大的功劳。

凯尔特人最初并不知道阿提里亚斯的到来，并以为宝路斯的骑兵必然会在夜间包抄过来，在他们行军路线之前占领阵地。他们因此立即送出一些骑兵以及轻装部队，去阻挡任何占领山丘的动作。但是他们很快便从一位战俘的口中知道阿提里亚斯已经来到。在这时候他们匆忙部署步兵，所以军队同时朝前及朝后两个方向，因为根据已经收到的两边的情报，以及他们亲眼见到的军事行动，很清楚地显示一支军队已经在后，而且他们将必然会在前方面临另一支军队。

28.这时候宝路斯已经收到消息，阿提里亚斯的军队已经登陆匹赛，但他未曾想过会与他如此接近。然而当他见到战争已经在山丘进行时，这很清楚地指出另一支罗马军队就在附近。他立即派出骑兵去协助阿提里亚斯夺得高地；然后将步兵以常用的阵势部署，对付挡住他去路的敌人。凯尔特人用阿尔卑斯山的盖沙泰部落来对付后方，这是他们预期宝路斯将攻打来的方向，而盖沙泰之后的是英苏布里人。他们在前方部署来自波河北岸的塔乌里斯契人及波伊人，面对阿提里亚斯军团展开攻击。他们在两翼的末端部署马车与战车，而掠夺来的战利品则是被聚集看守在一个邻近的山丘上。这种同时面对两方所摆下的阵势，不仅看起来令人畏惧，也同时适合当时局势的需求。

英苏布里人及波伊人穿着长裤[65]以及轻披风，但是站在整个军队最前位置的盖沙泰人则因为渴求荣耀及无畏的精神，完全脱掉这些衣物，赤身裸体，身上除了武器，别无他物。他们相信在这状况下他们的装配比较恰当，因为这地形在有些地方生长有刺的灌木，这或许会钩住

他们的衣服，阻碍他们使用武器。最先冲突局限在山丘周围地带，而因为大量骑兵纠缠在战斗中，所以三支军队只得旁观。在这次遭遇中，执政官阿提里亚斯殉职，在最激烈的战斗中豁出全力，他的人头被带到凯尔特国王面前。但是罗马骑兵顽强奋战，最后克服他们的敌人，占领高地。在这时候，步兵几乎已经接战，而整个战场显示出一个怪异、惊奇的景象——不仅对在现场的人，也对那些之后根据报道，在自己想像中画出图像的人。

29.首先，因为这战争是在三支军队之中进行，所以彼此对峙军队的外观以及行动必然极端奇怪及异常。其次，一位观看者必然会问——正如我们在今天也会，究竟凯尔特人是处于比较危险的状况——因为敌人正从两侧向他们攻击，还是处于比较有利的处境——因为他们同时面对两支军队作战，所以他们的后边可以同时受到保护，尤其是当他们被打败时，他们已经没有撤退或逃避的可能；因为这正是在同时面临两面作战时所要采取阵式的怪异之处。

就罗马人而言，他们因设计让敌人困入两军之间的局面，感到鼓舞，但是对凯尔特军队的精彩布阵以及制造出来的刺耳噪音，觉得沮丧气馁。在凯尔特的行伍之间有无数的号角和喇叭同时吹出，而且当全军发出战吼，从中响起混杂的音响，听起来不像是来自号角和士兵，而是同时发自周围的乡间地带。除此之外，在阵前裸体战士的样子及动作形成令人害怕的景象。他们都体格极佳，处于英年之时，而那些在引导队伍中的人也大肆地以黄金项链和黄金手镯装饰。光这些人的景象都已足够在罗马人之中引起恐惧，但光想到掠夺这么多战利品的可能性，也让他们加倍好战。

30.但是当罗马标枪手依据罗马人在战事中的正规战术，[66] 站在军团之前开始密集投掷他们的武器，在后排凯尔特人的披风及长裤给他们一些保护，但是对在前方的裸体战士来说，这情形却非常不同。他们没

有预料到这种战术，发觉自己陷于困难且无助的状态。高卢人所使用的盾牌并未遮蔽全身，所以这些裸体军队中较高的人便容易成为这些标枪的目标。在一阵子之后，当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驱散这些不在他们攻击距离内，但却持续发射武器的投掷手，他们的士气在无可忍受的煎熬下终于崩溃。有些人在愤怒下盲目地往前冲，在和敌人接战前，已经将自己性命丢掉，而其他人则撤退，一步步地退回到他们战友那边，但因为他们是从敌人那边退回来的反而给自己的军队制造了混乱。因为这情形，所以盖沙泰在军事上的勇武，就被投掷手的攻击给击溃。然而当投掷手退到步兵的行列间，而罗马整军向敌人前进时，英苏布里人、波伊人以及塔乌里斯契人直接面对他们的冲锋，在激烈的个人对个人的战斗中守住阵地。虽然这些部落的人被杀的七零八落，然而始终坚守岗位，证明他们就勇气而言，是与敌人不相上下，只在武器装配上屈居下风，但罗马人在这点上拥有的优势，不仅是个人，也在整体上。我应该解释，罗马盾牌对防卫而言，设计的远为周全，同样他们用来攻击用的刀剑亦是如此，因为高卢刀只能用来劈砍，而非击刺。最后的结果是罗马骑兵从高处往敌人腹侧激烈冲刺，攻击凯尔特人；凯尔特骑兵转向逃跑，步兵在他们所站的地方被砍倒阵亡。

31.约有四万名凯尔特人被杀；至少一万人被俘，其中包括他们的国王康可利塔纳斯。另一位国王阿内罗斯特斯与一些随扈从战场上逃走，后来发现他和所有随扈在避难所集体自杀。生还的执政官宝路斯收集凯尔特人的战利品及掠夺物，送到罗马；同时归还给当地居民那些高卢人从他们那边掠夺来的东西。之后他率领所有军团，沿着利古里亚（Liguria）边界前进，入侵波伊人的领土。在那里他允许士兵大肆掠夺，在几天后带领他们回罗马。[67] 他用高卢人的军旗以及配戴的金项链来装饰卫城；[68] 其余的战利品及战俘则保留下来，用来为他进入罗马之后的胜利大游行，添加光辉。

这是最可怕的凯尔特人入侵，并使得所有意大利人，特别是罗马

人，陷于生死攸关的危险，所幸危机在最后被消灭掉。这胜利鼓励罗马人希望见到凯尔特人从整个波河河谷中被驱走，所以在次年[69]他们同时派遣执政官弗尔维阿斯（Quintus Fulvius）以及曼里亚斯（Titus Manlius）率领一支强大、装配良好的军队。他们的攻击让波伊人措手不及，使他们惊吓到臣服于罗马之下。这战争其余的部分则没带来实际的结果；部分是因为豪雨的侵袭，部分是因为军队里爆发了疫情。

32.次年[70]执政官弗里乌斯（Publius Furius）和弗拉米宁（Gaius Flaminius）入侵凯尔特领土，这次进军通过了阿那瑞斯人的国家，这些人住在离马希利亚不远之处。[71]罗马人在同意这部落与罗马建立友好关系后，从靠近波河与阿达（Adda）河汇流之处，进入到英苏布里人的领土。罗马人在越过疆界以及扎营时都受到一些损失。他们占据这地方一段时间，但后来订定和约；根据条款他们必须离开英苏布里人的领土。从那里他们往东北方迂回前进几天，渡过克鲁希亚斯（Clusius）河，进入到切诺曼尼人的领土。这民族是罗马人的盟友，所以联手入侵英苏布里人的领土，但这次是从阿尔卑斯山山脚进入。他们从那里降临平原，开始破坏乡间，掠夺一些英苏布里人的聚落。部落的领袖们见到罗马人决心攻击他们，决定将所有东西都押注下去，与敌人进行决战。他们聚集所有兵力，将那被称为“不可动摇者”的数面黄金军旗，从密纳瓦（Minerva）[72]的神庙中取下，并且进行所有必须的备战，然后五万人在士气高昂中出发，面对敌人，扎营在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地点。罗马人见到自己在人数上大大不如敌人，很紧急地向他们的凯尔特盟邦求助。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记得高卢人惯常有的背叛行为以及这项事实：他们的盟友与他们的敌人是属于同民族之人，所以他们迟疑是否要诉请忠诚上如此不可捉摸的人来与他们并肩作战，但这战争又如此关键。最后他们还是克服疑虑。他们自己留在河流右侧，派遣其凯尔特盟友到河的另一边，并且摧毁桥梁。他们这么做部分是要提防自己盟友，部分是要破釜沉舟，除非胜利，否则没有安全的机会，因为现在无法横渡位于他们后方的河流。他们在完成这些部署后，待命行动。

33.罗马人被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展现了极大的技巧——不仅在个人对个人的战斗，还有整体的战术上，这是因为军团营长给士兵所下达的指示。他们已经从之前的战斗中得知，高卢人最危险的是他们第一次的攻击：当时他们的激情正是高昂，而且如已提及，他们刀剑铸造的方式是只有第一劈才会产生效果。[73] 在这之后，刀锋立即变钝，而刀身在直向及横向都变弯，所以这些人除非有时间以脚对着地，将其弄直，否则第二劈实际上没有效果。于是军团营长发放给在前列的士兵通常由殿后之后线部队所持的刺击长枪，[74] 并命令他们不可使用他们自己的刀剑，除非这些长枪已经做了该做的事。一旦敌人做出第一道对刺击长枪枪身的劈击，使他们的武器无法使用，那时罗马人便近身攻击，让他们没有空间举起双臂来全刀劈击，[75] 这会使得他们陷入无助；这是高卢人独树一帜的劈击，而且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一击，因为他们的刀没有刀尖。另一方面，罗马人并不进行劈击，而只使用刺击，让他们的刀身保持笔直，依赖锐利的刀尖造成伤害，这非常有效果。他们在敌人的胸膛或脸部留下一道又一道的伤痕，因此使用这方法杀死更多的敌人。这种成功必须完全归功于军团营长的远见，因为执政官弗拉米宁被认为在作战部署时犯下严重的错误。将军队部署在河边时，他无法进行特别属于罗马人战术的移动方式，亦即他无法留下空间让连队能在一定范围内撤退。假如他的部队在战斗过程中被迫退让，即使这退让是在最小的程度上，他们必将因为他们的指挥官缺乏远见，而被迫退到河流那边去。但如事情发展的结果，他们由于自身勇敢赢得精彩的胜利，并在回罗马时，满载大量掠夺物以及战利品。

34.次年，凯尔特人派遣代表团求和，他们愿意在任何条件下接受和平，但新任执政官马谢勒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以及科尔内利马斯（Gnaeus Cornelius）毫不妥协，坚持不给予和平。在努力失败后，他们决定孤注一掷：他们再度接触住在隆河的高卢部落盖沙泰，向他们雇用约三万人的部队；然后在雇用后，使其处于待命状况，等待罗马人攻击。当征战季节来到，执政官率领部队，进军英苏布里人的领

土。他们在一个叫阿克莱（Acerrae）的城镇附近扎营，此地介于波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开始围攻。因为罗马人已经预先占领周围所有居高临下的地点，所以英苏布里人无法协助自己的同胞；但是因为他们决心要让敌人停止围攻，所以他们分派部分军队，横越波河。他们从那里进入阿那瑞斯人的领土，包围一个叫克拉司提迪姆（Clastidium）的城镇。当罗马将军得知此一行动，马谢勒斯与骑兵及小群的步兵一起出发，急行军去拯救被围攻的城镇。当凯尔特人被警告他已经前来，他们停止围攻，将军队排成战斗队形，准备交战。罗马人开始只以骑兵进行积极的冲锋来开启战局：凯尔特人稳守阵地，但不久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侧翼以及后方都受包围，最后他们被打退，在整个战事中，步兵没有参与。许多凯尔特人投入河中，被水流卷走，但大多数人站在原地，力战而死。罗马人接着占领阿克莱，这地方储存大量的谷物粮食；另一方面高卢人则撤退到米迪奥拉努姆（Mediolanum），这是英苏布里人领土中最重要的聚落。科尔内利马斯紧追不舍，突然出现在米迪奥拉努姆之前。最先高卢人停在他们的阵地，但当执政官开始行军到阿克莱时，他们发动突袭，大胆攻击他的后卫部队；行动中，他们杀死他的许多人马，甚至击溃部分部队，直到科尔内利马斯将前锋部队调回，号召军队坚守阵地，与敌人交战。罗马人回应他的命令，重新整顿，激烈反击敌人，在那时凯尔特人虽然为短暂的顺利而雀跃，一时间士气饱满地坚守阵地，但很快便被驱离，四散在山中。科尔内利马斯干扰他们的撤退，一边前进，一边破坏乡间，接着便在急攻之下，占领米迪奥拉努姆。在这之后，英苏布里人的领袖们放弃所有透过自身努力来赢得平安的希望，对罗马完全归顺。

35.与凯尔特人之间的战争终于结束。假如我们以那些参与者所展现的大胆无畏和必死决心，以及参与战争及死者的人数来考量，这冲突在历史上无出其右；但是从种种攻击行动的规划以及执行时所显示出的判断看，将军领导能力的水准则令人不齿。因为不仅在大多数的行动中，甚至是在个别的例子里，高卢人都是受冲动情绪而非计划思考所左

右。不久之后，除了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些地区，这些部落将被完全从波河河谷驱离，所以我认为对他们原来的入侵、之后的行为或是最后被完全驱离，若略而不提，必将是错误的。[76] 因为我相信历史的真正功能是传递给后代那些命运女神戏剧中安排的插曲段落，所以我们的后代不应该因为单纯对事实无知，而被这些野蛮人突然及不可预期入侵所带来的恐怖而慑服，而是应该了解如此的行动是何其短暂以及容易消灭。假如有这样知识的加持，他们在面对入侵者时，才能在做出即使是一丝丝重要利益的退让之前，还能尽其所能地去努力获得任何安全的机会。

我的确认为那些记录并传递波斯人入侵希腊以及高卢人攻击特尔斐的作家，对希腊民族奋战，保存自己的共同自由，贡献良多。只要他能坚定地怀有如此知识：不可预期在这些征战之中经常扮演何其重要角色；并且记得：无论如何有不可胜数的部队，如何庞大的武器装配和不可一世的睥睨自信，经常会被以智慧面对及冷静算计去对付危险的人类决心及能力所击溃。那便没有理由因为敌人在数量、武器、补给上的优势，将一个人惊吓到放弃他最终的希望，放弃为自己的祖国奋战到最后一刻。而这不仅在那遥远过去的时日，甚至在我一生中有超过一次以上，希腊人曾因为高卢人入侵而惊恐。特别是因为这理由，所以我叙述高卢人的事迹，虽然不过是简洁的综合，但却将其历史追溯到开始之初。

在西班牙的事务

36.在探讨高卢人这主题时，我已经偏离了西班牙事务。在那里迦太基统帅哈斯德鲁巴已经统治该省八年，但却于某晚在自己住处，被某位凯尔特人因为私人恩怨暗杀。他对强化迦太基在这地区的势力，贡献良多；多半不是借由军事征服，而是透过他与地方领袖所建立的友谊关系。迦太基人任命汉尼拔继任为西班牙最高统帅；尽管年轻，[77] 选择汉尼拔是因为他已经显露出他有勇有谋的大将之风。一旦接任统帅，从他所要执行的措施可以很清楚看到，[78] 他的目的是要对罗马宣战，而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一点都不迟疑。从就任开始，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摩擦与猜疑无间断地相随而来。迦太基人不停地设计对付罗马，因为他们期望能为西西里的挫败复仇，而罗马人在发现到这些计划时，越来越不信任他们。对所有长眼睛的人来看，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为期不远。

在希腊的事件：亚该亚联邦

37.大约同时，亚该亚人和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加上他们的盟友，开始对伊托利亚人作战，这被称为“同盟战争”（Social War）。[79] 我们已经追查了在西西里及非洲事务的轮廓以及之后的发展；于是根据我在导论里所描绘之事件顺序，接下来便是“同盟战争”的开始以及罗马人与迦太基人的第二次战争，这后者通常被称为汉尼拔战争。如我在之前开头的章节里所云，[80] 正是在这一点，我计划要开始我的普世史的叙述。我因此暂时离开罗马及迦太基事务，回到希腊世界里的事件，所以才能够把我导论中所有的段落都带到同一个时间点，从那之后开启我详细的历史。[81] 我不会像之前的史学家一样，只将自己局限在单一国家的历史上，例如希腊或波斯，而是让自己努力同时去形容发生在所有已知世界的事情。在我们时代的性质中，确实有某种东西对我目前的目的特别有利，[82] 而我将会在我历史作品的其他地方更加明白地发展开来。所以着眼于我所审视之广度，我应该在进入主题之前，去处理一下这世界里最重要及最知名的民族和国家。至于就亚洲及埃及而言，我没有必要回溯到超过我史书起点之外的事件。已经有许多作家对他们较早期的事件做过描述，并为众人知晓，但是在我们的时代里，命运女神并未给他们的处境带来任何戏剧性的变化，使得我们必须要去回顾他们的过去。

但是就亚该亚民族以及马其顿王室而言，[83] 对他们的事件进行简单的重点叙述却相当符合我的计划，因为在我们的时日里，马其顿王朝已经灭绝，而亚该亚人，如我以上所述，势力多所增长，而且内部政治和谐，两者皆是可观。在过去曾有许多人尝试去说服伯罗奔尼撒人为共同利益来采取相同的政策，但没有一次成功，其理由是每个这种联合的提倡者，所努力奋斗的通常不是共同的自由，而是自己的霸业。然而在

我们今日，这些理想已经大有进展，完成到如此的程度，所以不仅亚该亚人创造出一个联邦以及友善的共同社区，他们也分享相同的法律、度量衡以及货币，除此之外，还有相同的官员、议会以及法庭。几乎涵盖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联邦，与单一城邦国家处境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其居民并非由单独一道的城墙围绕着；但在其他方面，无论是以这区域为一个整体来看，或是就单一个别城邦来考量，其体制几乎完全相同。

38.首先，“亚该亚人”这名称最先如何使用在伯罗奔尼撒人，并且后来被所有人采用，值得调查。最先拥有这古老名称的族群在所有人之中，并不以其土地广袤、城邦数量众多、财富雄厚或战场英勇，而显得特别突出。阿卡狄亚人及拉空尼亚（Laconia）人的民族在土地面积及人口数量上远超过他们，而且他们当然无法同意有任何其他希腊民族在战场上的英勇会在他们之上。那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两个族群[84]以及其他伯罗奔尼撒人，不仅愿意把他们的政治体制，甚至是他们的名称交换为亚该亚人的呢？很明显地，我们不该说这纯粹是偶然的结果，因为那必将是极不恰当的解释。我们更应该去寻找出一个原因，因为没有一连串的事件[85]——无论是可预期与否——会发展到如此结果，不可能没有原因。而这原因在我意见中大概如此：要在任何其他地方发现一个比亚该亚联邦政治体制或指导方针更能够允许有更多平等以及言论自由，或是更能真实地代表真正民主政治，那必定是不可能的。

一些伯罗奔尼撒人根据自由意志准备选择这样的政体；许多其他人是经过说服及辩论而被引导去接受；那些当时机来临，经由武力而被迫接受者，很快便能欣赏其益处。因为这社区并没有为最先的成员保留特殊权益，而是所有国家在加入后，都被赋予相同的权力；而且因为这方式，它很快便取得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因为它有两个最强大盟友的支持：人性以及平等。我们必须认为，正是这个系统形成现在伯罗奔尼撒普遍和谐和繁荣的基础及主因。

这些原则及这个政体，从早期便已经以其独特的地方形态存在于亚该亚一地。这点有许多证据，但为了目前的目的，引用一两个例证就已足够。

39.当属于毕达哥拉斯派系的集会结社被消灭焚毁的时候，接着又发生普遍革命带来的动荡。因为每个市民城邦里最杰出的成员在没预期下被屠杀殆尽，所以这种动乱现象是很自然的。当时南意大利地区[86]的希腊社区充满谋杀、革命战争和种种内乱的情景。希腊许多地区派遣出代表，纷纷提供仲裁调解的服务，但这些国家还是最信赖亚该亚人，因此也将解决纷乱之道的任务托付给他们。他们在这时候不仅对亚该亚政治体制有所偏好，在几年之后，他们也决定采用亚该亚的宪法，作为他们自己宪法的模范。[87] 最先主动采用的是克罗敦（Croton）、赛巴利斯（Sybaris）以及高隆尼亚（Caulonia）。他们召集会议，形成联邦，开始建立供奉“团结者”宙斯（Zeus Homarios）[88] 宙斯神的别号意为“那联合起来的”。的共同神庙及祭祀中心，他们在此处举行会议，进行辩论；之后他们采行亚该亚人的法律，决议要根据这些原则来经营政府。这情形一直要等到他们落入叙拉古僭主戴奥尼素（Dionysius）一世的主宰之下，[89] 并受迫于邻近野蛮人的攻击时，他们的目的才遭受挫折，被迫放弃这种体制，但那时他们也是在违反自己意志之下才如此做。后来当斯巴达在众人意料之外，受挫于留克特拉，[90] 而底比斯人，同样也在预期外，声称握有希腊霸权，所有其他国家都陷入不确定的状态中，特别是直接涉入这争霸的两个族群，因为斯巴达人拒绝承认他们已经输掉，而底比斯人仍未完全确信他们已经胜出。亚该亚人再度成为希腊世界中唯一的这两方希望邀请出面仲裁争议的国家。这不可能是因为亚该亚人的强大——因为当时他们在希腊是最弱小的国家——而是基于普遍认可他们是值得信赖以及坚持崇高原则，而这种对亚该亚人的看法，无疑地被普遍接受。

然而直到那时，这些政治原则充其量只不过存在于亚该亚人之中而

已，尚未能实际运用这些原则，亦无明显的企图想去增加国家的实力，这是因为亚该亚迄今都尚未出现过值得与这系统相配的政治家；无论何时有任何人显示出迹象能够担任这角色时，他或是被斯巴达政府，或更有效率地，被马其顿政府推到幕后，加以阻挠。

40.但在适当时候，这国家的确出现具有足够分量的领导者，这些政治原则所能带来的潜力，立即由那最光荣的目标，亦即伯罗奔尼撒之联合，来加以彰显。这计划的原创者及创造者是西息温的阿拉托斯（Aratus of Sicyon）。[91] 迈加洛波利斯的菲洛波义曼（Philopoemen）支持它，最后完成它；而莱可塔斯及其派系之人维持它很长一段时间。我将会设法形容每位政治家如何以及何时对这结果作出贡献，偶尔会以如此方式引介他们，所以不会和这作品的架构相互冲突。至于阿拉托斯所执行的措施，我将只会在此以及之后略微触及，因为他自己有发表一本诚恳清晰的回忆录；但我将会以比较多的篇幅和更详尽的细节来处理另外两位政治家的成就。我认为对我而言最易采用以及读者最易了解的方法，是从亚该亚联邦被马其顿国王强迫解散后，联邦中的各个城邦为了恢复它，开始彼此接触。从那刻之后，联邦持续成长，一直到我所生活的时代，它已经到达我刚刚才形容的完美状态。

41.第一步是由帕特莱（Patrae）及戴亩（Dyme）两个城邦踏出，它们在第一百二十四个奥林匹亚年形成联邦；[92] 期间见证了拉哥斯（Largus）之子托勒密一世、[93] 莱西马克斯（Lysimachus）、塞琉西一世以及“雷霆”托勒密（Ptolemy Ceraunus）等人之死。亚该亚民族在此之前的状态，可以简述如下。他们第一位国王是奥瑞斯提斯（Orestes）之子提沙迈纳斯（Tisamenus），他在赫拉克勒斯子孙（Heraclidae）回归时，被逐出斯巴达，后来占据亚该亚。亚该亚人持续由他的子孙统治，直到欧居格司（Ogygus）的时代，他的儿子们因为以僭越以及违宪的方式统治，在人民中引起敌意，所以革命爆发，建立民主政治。[94] 在这之后，直到马其顿菲利普二世及亚历山大三世建立他们的霸业，亚

该亚的命运根据局势不断变化，但他们经常在联邦中努力维持民主政治。[95]

他们的联邦由十二个城邦组成，除了欧勒奴斯（Olenus）和海利切（Helice）在留克特拉战役不久前被大海吞食，其他城邦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这些城邦其名为：帕特莱、戴亩、法瑞（Pharae）、粹泰亚（Tritaea）、莱昂提乌姆（Leontium）、埃基提翁、埃基拉（Aegira）、培林尼（Pellene）、布拉（Bura）以及卡瑞尼亚（Caryneia）。在亚历山大三世结束统治以及第一百二十四个的奥林匹亚年间，主要因为马其顿国王的作梗，彼此互不相容，甚至敌视，所以他们脱离联邦，彼此开始公开作对。结果是有些城邦先被“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96]和卡山德（Cassander），后来被“勾那塔斯”安提柯二世（Antigonus Gonatas）派设驻军，而其他甚至接受他扶植的僭主，因为没有人比安提柯二世在希腊培植了更多的极权统治者。然而如我之前所提，在约第一百二十四个奥林匹亚年时，城邦回心转意，自己又开始重组联邦。这发生在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入侵意大利之时。[97]首先行动的城邦是戴亩、帕特莱、粹泰亚以及法瑞，而且因为它们并非由外面加入联邦，而是最先组成联邦的国家，所以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碑铭记录有个联邦已经形成。约五年之后，埃基提翁人民驱走马其顿驻军，加入联邦，而布拉人民在杀死其僭主后，亦追随邻居的榜样；下一个几乎同时加入联邦的是卡瑞尼亚。它的僭主伊希亚斯（Iseas）见到埃基提翁驱逐驻军，以及布拉的僭主被马古斯和亚该亚人所杀，而且认知到所有邻近的城邦即将对他宣战，所以他放弃权位。他从亚该亚人那里得到他人身安全的保证，所以正式同意卡瑞尼亚加入联邦。

42.现在读者或许会问，我何以要重述这段历史？第一，我的目的是要解释是哪些亚该亚城邦主动来重新建立联邦，以及是在何时；第二，是为显示出我对于联邦政治原则所做的主张，是可由事实来加以验证。其中的关键点是亚该亚人经常遵守一致的原则：邀请其他城邦来分

享他们的平等以及言论自由，并且对抗且战胜所有那些——或是以自己之力，或是借国王协助[98]——去奴役任何它们邻国的人。接着，他们用这种方式，追求这样的理想，最后达成目的，部分是因为自身的努力，部分是盟邦的协助，但是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还是要将所有的成果归诸这亚该亚人决意采行的政治原则，后来他们的盟友对这些成果继续有所贡献。虽然亚该亚人在其他人的事业中扮演突出的角色，特别是那些许多由罗马人所进行而特别成功者，然而他们却未曾有任何欲望要去利用任何这些成功来为任何单一国家谋利；他们在给予盟邦所有热情的支持后，所要求回报者，不过是所有国家都能自由，以及伯罗奔尼撒人能团结一致。当我们检视联邦在行动时的努力，所有这些将会被更清楚了解。

43.我所提及之城邦再度组成联邦后的二十五年，[99]每个城邦依序选出一位秘书长及两位将军。但之后，他们决定只选出一位将军，[100]并把经营所有联邦业务的大权托付给他。[101]第一位接受到这样荣誉的人是卡瑞尼亚城的马古斯。然后在马古斯将军任期后的第四年，当时年仅二十的西息温阿拉托斯，透过他过人的勇敢以及胆识，将他的城邦从僭主手中解放出来。他一直热情崇拜亚该亚政治系统，现在则引进自己的城邦加入，成为联邦成员。八年后，在他第二次担任联邦将军时，阿拉托斯成功规划了一次军事行动，占领科林斯卫城阿克罗科林斯（Acrocorinth）——当时是由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二世派人镇守。借此大功，阿拉托斯不仅让所有伯罗奔尼撒的居民免于极大的恐惧，而且也说服刚刚被解放的科林斯加入联邦。接着在同一任期内，他设法以相似的方法将麦加拉（Megara）引进联邦。这些事情发生在迦太基人在艾基尔特斯群岛附近遭受挫败之前；迦太基人因为该战役而撤出西西里，并且首度向罗马人称臣缴交贡赋。[102]

阿拉托斯在短期内即在目标上取得极为可观的进展；之后他继续领导联邦事务。他的蓝图与计划都是关切同一个目的：将马其顿人逐出伯

罗奔尼撒，扫除僭主政治，重建联邦自由，这是每个城邦成员之社区集体的权利，以及祖先所传下的权利。[103] 只要“勾那塔斯”安提柯二世在世，阿拉托斯便反对马其顿对希腊事务的干预，并且强力抗拒伊托利亚人那永不休止的掠夺欲望；他坚定地坚持这两项政策，尽管这两个强权肆无忌惮，且又挑衅好战，他们彼此甚至达成协议，公然要瓦解亚该亚联邦。[104]

44.然而安提柯二世过世时，亚该亚人已经和伊托利亚人缔结联盟，毫无保留地对抗马其顿国王德米特里二世。[105] 所以一时之间，他们彼此的疏远及敌意暂时缓解，因此在这两个族群之间产生一种多少较有来往及较为亲善的感情。德米特里二世仅统治十年。他过世时是罗马人首度远征伊利里亚。[106] 在这之后，发展态势似乎有一阵子是倾向于亚该亚人一直所致力的政策。伯罗奔尼撒各地僭主对一直扮演他们保护主及金主的德米特里二世之死，普遍感到绝望，也对阿拉托斯现在加诸他们身上的压力感觉沉重。阿拉托斯要求僭主们必须放弃他们的权势，但提供给那些同意放弃僭主位置的人丰厚的奖励及荣耀，而对那些仍然拒绝的，他则施以其必将遭受亚该亚人伤害的恐惧。所以他们之中普遍有同意阿拉托斯要求的趋势，放弃自己的权位，因此解放了不同城市，并加入联邦。德米特里二世在世时，迈加洛波利斯的僭主莱狄亚迪斯（Lydiades）展现难得的远见及现实感，预期到何事将会发生，因此自愿放下权势，向联邦输诚。后来阿哥斯（Argos）僭主阿里斯托马科斯（Aristomachus）、赫迈俄尼（Hermione）僭主谢浓（Xenon）和夫利阿斯（Phlius）僭主克里奥尼马斯（Cleonymus）都同样放下权力，加入联邦。

45.这些发展大大地增加了联邦的规模及实力，但也引起伊托利亚人的怨恨。这个民族天生工于算计，对占有他人财物有不知节制的欲望，或许是出自对邻居的嫉妒，但是更可能的是想去分化联邦里的城邦，[107] 因为他们曾经和亚历山大[108] 瓜分阿卡那尼亚的城邦，而且当

时正计划要和“勾那塔斯”安提柯二世针对亚该亚进行相同的事。他们厚颜地同时与马其顿摄政兼幼王菲利普监护人，“多森”安提柯三世（Antigonus Doson），以及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109]协商联手。伊托利亚人见到安提柯三世已经在马其顿建立稳定的政权，而且也是亚该亚人公开及宣誓的敌人，因为后者曾经突击占领科林斯卫城阿克罗科林斯。伊托利亚人计算：假如他们可以先诱使斯巴达人对亚该亚同盟采取敌意行动，取得他们对伊托利亚人计划的支持，他们可以借着选定一个有利时机并从各方向同时发动攻击，就可以轻易征服亚该亚人。他们其实非常有可能成功地完成计划，若不是一个他们没列入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他们没有计算到他们的对手将是阿拉托斯，而且他们将会发现此人能够掌握任何局势状况。所以尽管他们精心策划的计谋，以及不择手段的侵略，最终结果是他们不仅无法取得任何一个目标，反而在实际上增强了联邦的实力以及阿拉托斯的权威；当时阿拉托斯是联邦的将军，巧妙地躲开并阻挠他们所有的企图。以下的陈述将会显示出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46.阿拉托斯已经注意到伊托利亚人愧于公开宣战，因为亚该亚人直到最近还曾支持他们进行对德米特里二世的战争。但阿拉托斯也注意到伊托利亚人和斯巴达人勾结如此之深，对亚该亚人嫉妒如此恶毒，所以当克里奥米尼斯对提基亚、曼提尼亚及欧可曼奴斯（Orchomenus）进行突击时，他们没表现出任何愤慨，甚至承认他占领这些地方，而这些地方不仅是伊托利亚人的盟友，甚至是他们自己联邦的成员。在过去，因为他们对掠夺的欲望，伊托利亚人认为任何借口都是好借口，用来辩护他们攻击那些没有触犯他们的国家。但现在他们甚至允许条约被破坏，自身受到攻击，他们联邦中一些最强大的城邦从他们手中被夺走，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因为要见到克里奥米尼斯变成亚该亚人危险的对手。阿拉托斯和联邦官员观察所有发展，决定不要跟任何强权主动发生冲突，而是要保卫自己，以防斯巴达人的攻击。至少那是他们最初的决定，但是之后很快克里奥米尼斯便做出更挑衅的动作，在迈加洛波利斯

领土内的雅典娜（Athenaeum）加强要塞，专门对付亚该亚人，开始对他们表现出尖锐、毫不掩饰的敌意。在那时阿拉托斯与同僚召集亚该亚人的特别大会，通过决议公开对斯巴达宣战。这便是所谓“克里奥米尼斯战争”（Cleomenean War）的缘起，而这天便是战争开始的日期。[110]

47.最初亚该亚人决心要完全由自己来面对斯巴达人。首先，他们认为不去求助他人来关心己身安全，较为荣耀；他们应该用自己的双手来保卫城邦及领土；其次，他们急于维持和埃及国王托勒密三世的友谊；他们已经在之前得到某些协助，而有所亏欠，所以他们不希望制造出他们现在求助他人的印象。

当斯巴达国王突然对自己国家政治体制进行革命，将立宪王政转变为僭主政治时，这两国已经处于战争状况一段时间。进行革命的同时，克里奥米尼斯显示自己在战场上也是位大胆积极的统帅。此时阿拉托斯预见何事可能发生，因为畏惧伊托利亚人不择手段的胆大妄为，于是决心要先发制人，阻挠其计划。他个人肯定马其顿摄政安提柯三世是位有活力及有智慧的人，而且看起来也是位信守承诺、有荣誉感的人。但他也深深知晓国王不会因其个人因素，而看待任何人为盟友或是敌人。于是他决定要和安提柯三世进行对话，与他建立信赖的关系，并且用这种方法向他解释目前事态的进程，所可能带来的结果。但是因为种种不同理由，他认为若公开进行此事，属不智之举。第一，他必将引起克里奥米尼斯和伊托利亚人对其所要从事之事的不满；第二，假如他给别人的印象是他现在要转向要求敌人协助，必将动摇亚该亚绝大多数人的勇气，从而完全放弃他对亚该亚人所加诸的希望，这是他所最不想要他们浮现的想法。于是他在构想整个计划后，他决定要秘密协商。他于是经常被迫在公开情形下说出及做出不符合他真正意图的话或事；换言之，他只能借由造成相反的印象来维持他的秘密计划。因为这理由，他并没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这时期的一些细节。

48.阿拉托斯知道迈加洛波利斯的人民受害于战争甚多。他们国家邻近斯巴达的事实，使他们比其他国家更易暴露在攻击之下，而亚该亚人则是受迫于自己要面对的困难以及危险，所以无法提供给盟友所有应该的协助。他也理解迈加洛波利斯人自从从亚历山大父亲菲利普二世那里得到益处之后，[111] 一直对马其顿王室怀有好感，所以他的结论是：他们必将随时求助于安提柯三世，把保全自己的希望交到马其顿人手中。所以他开始接触迈加洛波利斯的尼可法奈司（Nicophanes）和科吉达斯（Cercidas）。他要他们发誓保守秘密后，向他们透露计划。这些人是自己家族的友人，有资格去进行如此任务，并且在他们协助之下，他将会没有困难地去说服迈加洛波利斯人民送出代表团到联邦来，目标是要邀请安提柯三世前来协助。迈加洛波利斯人选择尼可法奈司和他的同事，立即去晋见马其顿国王。对有关迈加洛波利斯的问题，他们不过加以略述，但是对希腊的一般局势，却是长篇大论，而他们这正是根据阿拉托斯的指示来进行。

49.这些长篇大论是要强调伊托利亚人和克里奥米尼斯共同行动的范围和重要性，并且强调亚该亚人，特别是安提柯三世，必须警觉提防。所有人应该都很清楚：亚该亚人无法同时抵抗来自两方的攻击。但对任何有识之人而言应该更清楚的是：假如伊托利亚人和克里奥米尼斯胜利的话，他们将不会仅局限于这次的收获。伊托利亚人的贪婪并不受限于伯罗奔尼撒的界线，或甚至是希腊的界线；至于克里奥米尼斯的个人野心，他目前所有的努力都是集中在使自自己成为伯罗奔尼撒的霸主，但一旦他达到目标，他下一个目标便是希腊本身的霸业，但若他没有首先摧毁马其顿的优势，他无法取得这奖品。[112] 所以特使们敦促国王要看向未来，考虑最有利的途径：和亚该亚人及彼奥提亚人在伯罗奔尼撒联手，反对克里奥米尼斯，角逐希腊世界的主宰地位，或是放弃希腊最伟大的国家，[113] 来让命运摆布，然后在色萨利（Thessaly）的战斗中，同时面对斯巴达人、伊托利亚人、彼奥提亚人和亚该亚人，因而撼摇马其顿的主宰。假如伊托利亚人做出维持和平的假象，正如他们因

为亚该亚人在他们与德米特里二世作战时曾表达过的善意，所以现在也正对其表达出善意，[114] 那么亚该亚人必然可以独自去与克里奥米尼斯战斗，而且假如命运女神在他们那方，他们将不需进一步的援助。但假如运气对他们不利，而且假如他们受到伊托利亚人的攻击，那他们恳求国王要谨慎关注事件的发展，不要让事态过度恶化，而是在伯罗奔尼撒仍可拯救之际，加以援助。至于亚该亚人值得信赖以及他们对他所提供之协助的回报，他可以多加放心；一旦亚该亚人的需求得到满足，他们承诺阿拉托斯将保证会令双方满意，而且他也将清楚表示何时有协助之必要。

50.在聆听这些辩论后，安提柯三世的结论是阿拉托斯已经对局势提供准确以及现实的观点。他仔细考虑该采取何种行动。他的第一个动作便是修书一封给迈加洛波利斯的人民；信中承诺他将会协助他们，假如这也是亚该亚人所希望的。[115] 当尼可法奈司和科吉达斯回国后，将国王书信交出，同时报告他的善意及乐于协助，人民大受鼓舞；他们宣布要接洽亚该亚人的大会，要求安提柯三世前来协助，并且将战争的指挥权托付给他，不要延误。与此同时，阿拉托斯已经私下被尼可法奈司告知，国王对联邦及他本人都有善意；他自己则大为放松，见到自己的计划被正面看待，而且国王对他没有敌意，因为伊托利亚人原本希望安提柯三世必然会继续怀有敌意。阿拉托斯认为迈加洛波利斯人准备透过亚该亚人来和安提柯三世打交道，正是有利于他计划的重点。如我所说，他认为最好是不要去要求任何协助，但若出于单纯的必要而使他必须做出诉求的话，他急切希望这种呼吁是来自整个联邦，而非他本人。他担心假如安提柯三世真的来到伯罗奔尼撒，然后在战场上打败克里奥米尼斯及斯巴达人后，若采取任何违背联邦意愿的措施，那时他自己将会因为这结果而成为众矢之的；那时必有人辩称说，国王这边有理，错在阿拉托斯，因为当他占领科林斯卫城时，他已经冒犯了马其顿王室。

来自迈加洛波利斯的特使适时地在联邦议会厅现身，呈递国王书

信，确定他的善意，接着诉请亚该亚人邀请国王立即干预。当阿拉托斯见到议会的气氛有利于这路线，他起立发言，首先表达他对国王愿意协助感到高兴，以及他同意议会里合作的氛围。接着他进行长篇大论，敦促亚该亚人若可能的话，要以一己之力，使用种种方式来解救城邦以及自己的领土，因为这是最有荣誉以及最实际的方法。但是假如命运女神对他们不利的话，那只有在竭尽己力及所有可能之后，他们才能诉诸朋友的协助。

51.人们对他的发言鼓掌，通过决议，他们应该坚持目前的任务，继续在没有援助下进行战争。但之后他们遭受一连串不幸。首先国王托勒密三世放弃联邦，反而开始提供克里奥米尼斯财政协助，目标是鼓励他攻击安提柯三世。托勒密三世估计，斯巴达人较之亚该亚人更能约束马其顿国王的野心，所以会是更有效率的盟友。接下来亚该亚人在克里奥米尼斯手中连吃三次败仗：第一次是他们在莱凯温山附近前进时；第二次是在一个叫拉多凯亚（Ladocea）的地方[116]附近的激战，而最后一次则是在戴亩境内的赫卡通迈温（Hecatomaeum），[117]整个亚该亚的军队蒙受决定性的挫败。这局面让亚该亚人无法有喘息的机会，所以他们被迫同声一致向安提柯三世求援。阿拉托斯在危机之中，派遣自己儿子作为特使去晋见国王，确认援助的详细内容。然而有个特别棘手的问题造成他们很大的困难，也带来不确定。一般相信安提柯三世不会出兵协助，除非有这样的条件：阿克罗科林斯必须归还给他，而这将使他可以利用科林斯城作为战争的基地。但另一方面，亚该亚人却无法同意在违反科林斯人意志下，将其交给马其顿。亚该亚人最先因为这理由被迫延迟讨论，所以他们可以先讨论他们究竟可以提供给国王哪些保证。

52.我所形容克里奥米尼斯在战事的成功，已经让整个伯罗奔尼撒充满沮丧气馁，因此国王持续在城邦间如入无人之境地前进，有些以说服赢得，其他则以胁迫。他以这些方式占领了卡费耶（Caphyae）、培林尼、福尼亚斯（Pheneus）、阿哥斯、夫利阿斯、克列欧奈

（Cleonae）、艾匹达罗斯（Epidaurus）、赫迈俄尼、特罗曾（Troezen）以及最后的科林斯。[118] 接下来他又包围西息温，[119] 亲自指挥军事活动，但是在这征战中，他却也为亚该亚人解决了他们最大的问题。科林斯人命令亚该亚驻军及其指挥官阿拉托斯[120] 离开城邦，然后送信给克里奥米尼斯，邀请他前来；这反而给阿拉托斯提供了一个机会去交出阿克罗科林斯给安提柯，以及一个充分的理由去如此做。阿拉托斯把握良机，他以这方法不仅弥补之前对马其顿王室的冒犯行为，也为他们未来的合作提出一个足够的担保，并给安提柯三世提供了对斯巴达人作战的根据地。

当克里奥米尼斯发现安提柯三世与亚该亚人之间已经达成协议，他离开西息温，在科林斯地峡附近扎营。他挖壕沟、筑栅栏，将阿克罗科林斯与一个称做驴背（Ass’s Back）的防御工事连接起来，充满自信地认为从这时开始，整个伯罗奔尼撒已经臣服在他的统治下。对安提柯三世而言，他已经如阿拉托斯所建议，一直准备等待适当时机出击。他从事件的进展做出结论：克里奥米尼斯正准备进入色萨利；安提柯三世因此派遣特使到阿拉托斯及亚该亚人处，提出联手的条件。接着他带领部队经由优卑亚（Euboea）岛[121] 到达地峡。他之所以依循此路，是因为伊托利亚人除了企图阻挡他协助亚该亚人，禁止他率军越过温泉关，而且还威胁说，假如他前进，他们必将阻挡。于是安提柯三世和克里奥米尼斯的军队现在是面对面，其中之一决心要进入伯罗奔尼撒，另一则极力阻挡。

53.在这期间，亚该亚人尽管已经承受严重的挫败，却不放弃他们的目的，也没有背离他们自助人助的原则。所以当阿哥斯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反叛，对抗克里奥米尼斯的支持者，亚该亚人还是送出一支由将军提摩赞诺斯（Timoxenus）[122] 所率领的联邦军队去协助，而这些部队进行突袭，成功占领城市。这项成功的努力应该被视为亚该亚接下来运气由坏转好的主要原因，因为后来的事件明确显示：正是在

阿哥斯的失败，顿挫了克里奥米尼斯的锐气，震撼了他部队的士气。虽然他较之安提柯三世有更强势的地理位置，及更优良的补给供应，而且就个性而言，有更强烈勇气及野心的驱使，然而就在阿哥斯已经被亚该亚人攻下的消息传来时，他立即停止与敌人接战，放弃原有的优势，仓皇从地峡撤出，担心被敌人从各方向包围。他攻击阿哥斯，占据部分城市，但是亚该亚人激烈反抗，并得到阿哥斯人坚定的协助；阿哥斯人尽管换边，却仍以相同的勇气作战。所以当克里奥米尼斯夺回阿哥斯的企图也失败时，他们借道曼提尼亚，行军返回斯巴达。

54.这时，安提柯三世无人阻挡地进入伯罗奔尼撒，占领阿克罗科林斯，没有耽误地推进到阿哥斯。在那里他赞美阿哥斯人所给予的协助，然后在安排好城市的安全之后，立即出发到阿卡狄亚。他驱离一些防御据点上的斯巴达驻军，这些据点是克里奥米尼斯在埃吉斯（Aegys）及倍尔比那（Belbina）两地所设立的，[123] 并将这些据点交还迈加洛波利斯人，然后回到埃基提翁，亚该亚人在此召开大会。安提柯三世向议会报告他所进行的军事活动，并且与他们协商，安排战争行动。议会任命他为所有盟军的总指挥官，然后他前进到西息温及科林斯附近的营区过冬。

次年早春，[124] 安提柯率军南移，三天抵达提基亚；在那里他与亚该亚人会师、扎营，并且开始围攻该城。马其顿人积极进行围城，特别是挖地道，因此提基亚人很快对继续死守感到绝望，决定投降。在做完城市必要的安全安排后，安提柯继续前进到他作战计划的下一个目标，全速前往拉空尼亚。安提柯发现克里奥米尼斯的军队在边界展开布局，防御领土；他利用一些小型攻击战术来测试克里奥米尼斯的兵力。但当他的侦察人员报告说，欧可曼奴斯的驻军已经前去加入克里奥米尼斯；他立即拔营，急行军前往该城。他的行动让该城措手不及。他以强攻将之占领。在那之后，他包围并攻击曼提尼亚。这城市同样因惊恐而迅速屈服。那时他又再度拔营，前进赫里亚（Heraea）和泰尔富沙

（Telphusa），当地居民自愿投降。这时，冬天迫近，安提柯行进到埃基提翁，参加亚该亚联邦全员大会。他解散马其顿部队，允许他们回家过冬，但自己留在伯罗奔尼撒，与亚该亚人讨论目前局势，并且为未来协调计划。

55.这时克里奥米尼斯注意到安提柯已经解散他的马其顿军队；安提柯停留在埃基提翁时，只保留佣兵武装备战，这地方离迈加洛波利斯有三天的路程。他知道因为迈加洛波利斯的规模以及它的市民散居在很大的空间，所以该城难以防守，而且因为安提柯三世出现在伯罗奔尼撒，所以当时防守也非常松懈，而且更特别的是，他大多数的役龄公民都已经在莱凯温及拉多凯亚战役中丧生。克里奥米尼斯与一些当时恰好住在迈加洛波利斯的美塞尼亚流亡者接触，希望凭借他们的协助，他可以在夜间入城，不被发现。然而，当破晓天明时，迈加洛波利斯人勇敢回击，克里奥米尼斯不仅身陷被逐出城的危险，甚至他所有部队几乎被全部歼灭。事实上三个月前，城市里的人在他强行进入一个叫科来温（Colaeum）的区域时，他们将他击败，并驱走他。但在目前状况下，他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以及事先占领居高临下的位置，所以他的计划成功，最后赶走迈加洛波利斯人，占领城市。一旦这城落入他手中，他以野蛮以及报复的方式将其摧毁，不想留下它未来再度被定居的可能性。我相信他这么做是因为迈加洛波利斯和史汀发莱亚（Stymphalaia）在它们所经历的命运浮沉中，克里奥米尼斯从未成功地收买过其中任何一位公民，或是找到支持者或伙伴来参与他的阴谋。在克来拖人民的例子中，他们追求自由的热情只被一个人污染过——狄尔色斯（Thearces）——而如可预期的一样，克来拖人拒绝承认他是城邦里的成员，坚持他是偷抱来的，是一位当时在欧可曼奴斯外国驻军的儿子。

56.有一位生活在阿拉托斯时代叫费拉克司（Phylarchus）的作家。他对事件的陈述经常自相矛盾，他的意见也与那些亚该亚的政治家不同，但是他仍被一些读者认为是可靠的见证。于是乎，既然我已经选择

依据阿拉托斯的叙述作为根据，来陈述克里奥米尼斯战争的历史，所以我想将这两位作家相对的可信度作一检讨，将会有用，而且确实是必须的；我们用这种方法将可确保在他们的个别作品中，错误不至于和真相拥有相同的权威。普遍而言，散落在费拉克司作品中的许多言论未经慎思明辨，是恣意妄为。在目前状况下，我无需批评他在作品其他部分所发生的错误，或是仔细追究，但有必要去详细检验那些与我现在正在形容的时代，亦即克里奥米尼斯战争相关的部分。事实上，如此之检验将相当足以让我们去论断他作品的一般目的和性质。

例如，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强调安提柯三世与马其顿人，以及阿拉托斯与亚该亚人的残酷，他告诉我们说，曼提尼亚人在落入敌人之手时，蒙受恐怖的苦难，以及降临在阿卡狄亚最古老及人口最多城市的灾难是如此地骇人，以致惊吓了所有希腊人，使他们痛哭流涕。他透过故事急于想激起读者的悲悯之心并引起他们同情时，他用逼真如画的手法描绘女性彼此紧抱一起、撕扯头发、袒胸露乳，以及男男女女与相伴随行之稚龄幼童和年迈双亲，被强行俘虏的泪水悲鸣，在每个场合中，设法在我们眼前重现这些恐怖情景。让我们姑且暂时忽略他处理这主题的卑劣和怯懦的方式，而来考虑一下历史本身的性质及用途。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要用耸人听闻的描绘来惊吓读者，也不该如悲剧诗人一样，去呈现那些或许曾经被说过的演讲，或是一一罗列正在考量之事件的所有可能结果。他首先及最重要的任务是去忠实地记录实际上所发生过的以及被说出来的，无论那些是如何的平常。悲剧与历史的目的绝不相同，恰好相反。悲剧诗人透过他的角色将最可能说得通的话语说出，借此来惊悚或是迷惑他的读者，但是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借由他所呈现之话语及行动的真实性，来教化和说服严肃的学生，但这效果并非短暂即兴，而是永恒。因此在悲剧这第一种情形下，最高目标是“可能性”（probability）；即使所说的并非真实，其目的是要欺骗观众；但在第二种情形——历史——下则是真相，其目的是要有利于读者。除了这些考量之外，费拉克司只不过是叙述他历史里出现的大多数的灾难，却

没说出事情何以被做或是因何而做，所以在没见到如是之分析下，不可能感受到符合实际状况的悲悯或是愤怒。例如，每个人都认为自由之人受到殴打令人气愤，但假如有人是因为他先诉诸暴力，因而引起行动，那他被认为是受到正确的处罚。再者，假如处罚之实施是为了矫正或纪律的目的，那些殴打所谓自由之人的人，则被认为是值得赞美以及感激。又或，杀死一位公民被认为是恶中之恶，因此是种会带来最高惩罚的罪行，但是这也是众人所知：一位杀死窃贼或是通奸者的人，是不用去处罚他，而且杀死叛徒或僭主之人，在每个国家都会以各种赏赐及殊荣来奖励。所以我们对于正确或错误的论断，在每种情形中并非在于行动本身而已，而是由那些执行之人的不同动机及目的来决定。

64.在克里奥米尼斯占领迈加洛波利斯之后的早春时，[125] 他开始聚集部队，但安提柯仍在阿哥斯的冬营过冬。克里奥米尼斯对部队发表适合当时场合的演讲，然后率领人马入侵阿哥斯人的领土。许多人认为这是没必要的冒险，甚至是愚蠢冲动的一步，因为进入阿哥斯的通道都被坚强地防守着；但对有资格的观察者而言，这是既安全又明智的举动。克里奥米尼斯发现对手已将部队送回国，[126] 所以对他而言，很明显将不会有反击的危险，而且假如他把乡村摧残到靠近城墙时，阿哥斯人必然对这种景象感到愤怒，怪罪安提柯。假如马其顿国王无法忍受平民责怪，然后轻易出击，与克里奥米尼斯所率领的部队冒险一战，当然克里奥米尼斯比较会轻易得胜。另一方面，假如安提柯持续执行他的计划，按兵不动，那克里奥米尼斯不仅将成功地恫吓敌人，也鼓舞他自己的部队，在那之后，他如是估算，他仍可以安全撤退到拉空尼亚。结果这正是所发生之事。当阿哥斯的乡间地区被破坏摧毁，难民涌入城内，辱骂安提柯。但是安提柯同时扮演将军以及国王的角色，所以不让任何考量干扰他，偏离进行战争的理性途径，于是继续采取守势。克里奥米尼斯则执行破坏乡村的计划，让敌人心生恐惧，提高自己军队士气，以备即将来临的战斗。最后，他在不受骚扰下回国。

65.早夏之时，回家过冬的马其顿人及亚该亚人再度回到岗位，强化安提柯的军队。他率领他们以及盟友前进拉空尼亚。他的马其顿军队由一万名用于方阵战术的步兵、三千名轻装部队（peltasts）[127] 以及三百名的骑兵组成。除此之外，他尚有一千名的阿吉里亚尼亚（Agriania）人、[128] 一千名高卢人，[129] 人数共计三千名步兵和三百名骑兵的佣兵分遣队，一支有三千名精选步兵及三百名骑兵的亚该亚分遣队，以及来自迈加洛波利斯的一千名马其顿装配的步兵，[130] 由科吉达斯率领。盟友的部队包括彼奥提亚二千名步兵和二百名骑兵、一千名伊庇鲁斯步兵及五十名骑兵，相同数量的阿卡那尼亚人和由法洛斯的德米特里所率领的一千六百名的伊利里亚人。安提柯的部队加起来共计二万八千名步兵以及一千两百名骑兵。

克里奥米尼斯预料到了这次入侵，所以以安排驻军、挖壕沟以及修筑树木做成的栅栏，来堵住通往拉空尼亚的其他通道。他自己率领由两万人组成的部队，在一个叫塞拉希亚（Sellasia）的地点布起阵势，因为他估算这是入侵者最可能选择的路径，而这正是发生的结果。有两个山丘眺望这条通道，一名为伊发斯（Evas）山丘，另一为奥林匹斯（Olympus）山丘，而在它们之间是前往斯巴达之路，沿着欧易诺斯（Oenous）河而行。克里奥米尼斯同时以壕沟及栅栏加强这两个山丘的防御。在伊发斯山丘他布置“边居民”（Perioeci）[131] 以及联军，由他的弟弟攸克雷达斯（Eucleidas）来率领，[132] 而他亲自率领斯巴达人以及佣兵来控制奥林匹斯山丘。[133] 在河岸平坦处、道路两侧，他部署骑兵及部分佣兵。当安提柯到达时，他立即了解阵地的强大以及克里奥米尼斯将不同部队单位安置在地形上最有利的位置，所以整个布局的外观看起来像是一位训练有素之战士随时应战之姿。无论就进攻或防守，在准备上皆已不遗余力，所以斯巴达的布局在同一时间既是准备行动之战线，也是难以接近之强化营区。

66.安提柯因此反对仓促与敌人交战，强攻阵地。取而代之的是，

他自己在离敌人一小段距离处扎营，前方有苟垓勒斯（Gorgylus）河保护。他在那里等待数日，利用时间来勘查乡间地区的特征，以及与自己对峙之敌军部队的性质，他也进行几次佯攻，来引诱敌人露出底细。但是他未曾发现有弱点或是没防守之处，因为每一次克里奥米尼斯总是以反击来阻挡他的突击。所以安提柯放弃这些战术。最后这两位国王同意事情的结局将以战争来决定。[134] 命运女神捉对厮杀的这两名军事统帅，确实都极具天赋，并且旗鼓相当。面对部署在伊发斯山丘的敌人左侧，安提柯安排装配铜盾的马其顿步兵和伊利里亚人，这两个军队里的单位交互排列，[135] 这一翼是由阿克迈吐斯（Acmetus）之子亚历山大以及法洛斯之德米特里领军。在这些人之后是阿卡那尼亚人和伊庇鲁斯人，以及两千名亚该亚人作为殿后的预备部队。[136] 他的骑兵则面对敌人，由亚历山大率领，由一千名亚该亚人以及相同数量之迈加洛波利斯人支援。安提柯决定自己亲率佣兵以及其他马其顿军队，来对付克里奥米尼斯在奥林匹斯山丘的阵地。佣兵部署在前，之后则是排成两倍厚度方阵的马其顿步兵，两个单位之间没有间隙；[137] 他被迫采取这种布局，是因为他前方通道狭窄。大家约定好，伊利里亚人一旦看到从奥林匹斯山丘方向有亚麻布旗挥动时，立即仰攻伊发斯山丘，开启战事。他们已经在前夜晚于苟垓勒斯河的伊发斯山坡脚下，攻下一席之地。[138] 迈加洛波利斯人以及骑兵的开战信号是红旗，将由国王高举。

67.当攻击时刻来临，伊利里亚人接到信号，军官将话传下，交代各尽其职，那时所有的伊利里亚人立即在敌人眼前出现，在山丘发动攻击。在这时候，部署在山谷里支持斯巴达骑兵的轻装佣兵，注意到亚该亚人的后面没有任何其他部队掩护，于是他们立即从后方进行冲锋。行动威胁整个安提柯的右翼，这一翼的人马正面对上方的攸克雷达斯部队，准备仰攻伊发斯山丘，但是却有佣兵从他们后方和下方攻击。就在这紧急时刻，迈加洛波利斯的菲洛波义曼看清正发生何事以及将可能发生之事。刚开始时，他设法向资深军官指出危险，但因为当时他仍相当年轻，[139] 未曾有指挥的经验，所以没人理会他。最后他号召同胞聚集

身边，勇敢向斯巴达骑兵冲刺。他的行动立即转移了注意力。原来在攻击向伊发斯山丘仰攻的部队的后方佣兵，在听到混乱的声音时，见到他们的骑兵已经交战，所以立即中断原来的行动，跑回原先的位置去支援骑兵。在同一时间伊利里亚人、马其顿人以及其他的攻击部队，发现已经摆脱来自后方的攻击，无后顾之忧，所以重新鼓起勇气，再度冲向敌人。之后我们很清楚看出，正是菲洛波义曼的行动成为成功攻下攸克雷达斯阵地的主因。

68.故事这么说：在战争后，一向喜欢开骑兵指挥官亚历山大玩笑的安提柯问他说：何以他在信号发出前，下令攻击。亚历山大否认这指控，回说这攻击是由一位来自迈加洛波利斯的男孩下达的，这违反他的命令。国王的回应是这男孩掌握局势，行动像个优秀的将军；反倒是亚历山大所谓的将军，却是行动如男孩。

无论如何，攸克雷达斯的部队在看到敌人向他们逼进时，放弃他们强大阵地的优点。他们所该做的是，在敌人仍在山坡下方时，立即发动冲刺。用这方式必然可以打破他们的队形，让他们陷入混乱，在那时之后他们可以再逐步缓慢撤退，安全地重回到较高处的阵地。假如他们从一开始便先声夺人，从敌人处夺走伊利里亚人因为武装及密集队形所拥有的优势，他们必然可以因为在山丘所占有的优势地形，轻易驱走他们。然而，实际上是他们的行为就像是已经胜券在握，所以做出恰恰相反之事，亦即，攸克雷达斯的部队停留在原先丘顶的阵地，目标变成敌人在山丘尽可能高的地方时，才和敌人交战，当敌人被击退时，敌人要逃跑的路途必将更长，必会经过陡峭及险峻的地形。但如可能被预料到的：相反的情形恰好发生。斯巴达人没留给自己后退的空间，而在他们面临精神相对饱满以及秩序良好的马其顿人冲刺时，他们发现自己落入不利状况中，但必须局限在沿着山脊而战。从此时开始，斯巴达人每次都由于敌军武装以及紧密队形所具有的冲力，而被迫退让，伊利里亚人则立即占领他们之前曾据有的地方。攸克雷达斯的人马每退一步，他们

就会往更低的地方挤去，因为他们没有预留可供撤退的空间，重组队型。结局并没有耽搁许久，他们便被迫转向，开始撤军。因为撤退距离相当长，而且要经过困难以及崎岖的地形，导致灾难式的结局。[140]

69.同时，骑兵的军事行动也刚好有了结局；在此菲洛波义曼以及亚该亚的骑兵贡献杰出。菲洛波义曼的马匹在他骑乘时被杀，那时他继续徒步战斗，并被锐利地一刺，两腿同时贯穿，伤势严重。同时，两位国王的军队在奥林匹斯山丘附近交战，而这里的战争是以他们的轻装步兵与佣兵的冲突开始，双方各有五千人。有些战斗发生在单位与单位之间，其他则是沿着战线发展，双方都英勇奋战，而且因为战斗发生在两位国王以及对战的军队眼前，因此单位及个别敌对者相互竞赛来表现勇气，战斗益加激烈。最后克里奥米尼斯看见他兄弟的部队溃败，而且他在低地的骑兵也即将后退。他担心自己会同时遭受多方攻击，所以被迫取下部分保护栅栏，率领自己的全部军队在他防御工事的一侧排成一列。在这时，两军统帅命令吹起号角，下令轻装部队撤离两军之间，那时重装方阵兵团叫起战吼，将长矛往前对齐平举，正面对撞。激烈一战接踵而来。在某点马其顿方阵被迫让步，在斯巴达人坚决的攻击之下后退相当的距离，但在另一点马其顿方阵的极大冲力强迫他们的敌手后退。最后安提柯命令长枪手以密集队形聚集，利用加倍厚度的特殊阵式所具有的优点，进行冲刺，最后将斯巴达人从他们的阵地驱离。整个斯巴达的军队溃败，部队在逃跑时被砍倒，克里奥米尼斯则在一小队骑兵周围保护之下，安全抵达斯巴达。[141] 后来在夜晚来临时，他南下盖提姆（Gythium），之前在那里已准备多时，假如有必要时，让他借海路逃离，与他的朋友一起航向亚历山大。

70.安提柯三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为斯巴达的主人后，即以慷慨及人性的方式对待斯巴达人。他恢复传统政体，[142] 几天之后率军离去，因为他接到消息，伊利里亚人已经入侵马其顿，正在蹂躏国家。命运女神经常以一种武断的方式来决定人间最大的事件。在这例子中，假

如克里奥米尼斯将战争拖延几天，或甚至在回到斯巴达时，再等待几天，利用局势变化，他必然可以挽回他的王位。

但事实是安提柯三世前进到提基亚时，他同样在那里恢复传统的政体；两天之后，他抵达阿哥斯，当时正值庆祝尼米亚（Nemea）庆典竞赛。在那里他获得亚该亚联邦以及个别国家各式各样的荣耀以及勋功，让他名声永垂不朽。之后他匆忙回到马其顿，在那里发现伊利里亚人入侵。他强迫双方进行激战，并且得到胜利，但当他在鼓励战争中的部队时，用力过度，口吐鲜血，陷入垂死致命的昏迷之中，而吐血正是其征兆之一。之后很快死去。他为所有希腊人激发希望，不仅因为他在战场上为他们所作的贡献，更是因为他崇高的原则以及行事的标准。他在马其顿王位的继任者是菲利普五世，德米特里二世之子。[143]

71.何以我会如此详尽地书写克里奥米尼斯战争，我欠读者一个解释。这段历史时期是紧邻我主要历史主题之前，我因此认为对马其顿人及希腊人那时候的关系进行描述，将会是有用的，而的确我作品的原先计划也需要我如此去做。我现在所正提及之时代的同时，亦见证“造福者”托勒密三世（Ptolemy Euergetes）生病过世，由绰号“爱父亲”（Philopator）的托勒密四世继任。[144] 绰号“美好胜利者”（Callinicus）或“蓄胡”（Pogon）的塞琉西二世之子，塞琉西三世，亦在此时过世，[145] 由他的弟弟安条克三世[146] 继任叙利亚王位。相同情形发生在安提柯三世、托勒密三世以及塞琉西三世身上。正如三位亚历山大大帝的最初继任者，亦即他们的过世都落在同一个奥林匹亚年之中，在前者是第一百二十四，后者则为第一百三十九。

我已经完成我历史作品的介绍或引论。在其中我首先显示罗马人在何时、如何以及为何首度涉足国外事务，挑战迦太基对海洋的控制。其次，我已经描绘希腊、马其顿以及迦太基在那时的状况。我已经根据我的目的抵达那一点：希腊人在“同盟战争”，罗马人在汉尼拔战争，以及

亚洲国王在争夺空叙利亚（Coele Syria）的战争的前夕。我以上所描写事件的结束，正是紧邻这些战争的开始，所以直到此时，主导事件的三位国王陆续死亡，可以算是本书适当的终点。

---

[1] 如在页133所陈述。

[2] 在本书中波里比阿以三章触及西班牙里迦太基帝国的重建：1.为哈密尔卡；13.为哈斯德鲁巴；36.为汉尼拔，这提供了一个编年的架构。

[3] 二三八至二二九年。

[4] 罗马干预伊利里亚发生在二二九年春天。哈密尔卡是在二二九/二二八年的冬天被杀。

[5] 他统治一群在斯寇得拉（Scodra）及瑞衷（Rhizon）湾（今日之寇塔，Kotor）附近的部落，他们以轻艇进行海盗行为谋生。

[6] 一个在中阿卡那尼亚边界的城镇。

[7] 可能是在二三一年的秋天。

[8] 这些或许是以亲属关系为根据的组合，这样的情形在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或更晚近地在阿尔巴尼亚人之中，亦可见到。

[9] 这里的譬喻用语持续波里比阿在页133所用的比喻，认为命运女神是在创造剧情。

[10] 在二三一年秋天。

[11] 提幽塔透过亲信朋友所组成之议会来运作，是依循希腊化时代王国中很常采用的方式。

[12] 在凯奥尼亚（Chaonia）的城镇，靠近今日之莎兰达（Saranda）。

[13] 或许是国王阿格隆之兄弟。

[14] 离现在阿尔巴尼亚之特普列尼（Tepleni）南方约二十里处。

[15] 邻近的部落，其领土在阿克希亚斯（Axios）河（即今日之Vardar河）上游。

[16] 波里比阿对这种行为特别地义愤填膺，因为他是亚该亚人。

[17] 这是指伊庇鲁斯的民主联邦，类似亚该亚及伊托利亚的联邦。

[18] 今日之维斯（Vis），在南达尔马提亚（Dalmatia）海岸外的一座岛屿。

[19] 在二二九年春天。

[20] 在科西拉岛东南方数里外。

[21] 二二九年春天。

[22] 这是Lucius Postumius之误。

[23] 这是德米特里的家乡。

[24] 他在二二八年在罗马庆祝海军的胜利大游行。

[25] 这可能是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的赔偿金。

[26] 这是一个牵强、不自然的描述。三十四书显示出波里比阿对这半岛的真正形状其实知道更多。

[27] 波里比阿显然认为波河平原延伸至马赛上方那地方。

[28] 一迈迪温诺斯（medimnos）约一点五浦式尔或五一点五公升。

[29] 欧宝（obol）为希腊钱币及重量单位；钱币系以银币为主，其不同单位之间的关系为：一泰伦（talent）（二五.八六千克）＝六○米纳（mina）＝六千德拉克马（drachma）＝三万六千欧宝。在希腊古典时期，一位工匠一日所得约一德拉克马，即六欧宝，可养活一家四口。

[30] 一迈垂特斯（metretes）约八.五加仑或三十八公升。

[31] 所使用之希腊文为elymos，这是指意大利小米。

[32] 所使用之希腊文为kenchros，这是指一般小米。

[33] 是指第一个到达、而非首要的城镇。

[34] 今日之Sinigaglia，安科纳（Ancona）以北数里。

[35] 接下来之描述是最早对波河的准确描述。伊庇丹努之名最先在希罗多

德《历史》III.115发觉，在那里这是指北欧地区出产琥珀的神奇河流。实际上，这平原里的几条河流各有个别的出口，但是波里比阿是要给对此地区相当不熟悉的希腊人呈现一幅简化的图像。

[36] 在七月末。

[37] 北河口。

[38] 直到约公元一一五○年，波河经由两个水道流入亚得里亚海，河流是在费拉拉（Ferrara）附近分流。

[39] 太阳神黑利欧斯（Helios）之子，因无法驾驭其父的太阳马车，几乎要摧毁地球，所以被宙斯神以雷电击毙，以避免危机。

[40] 塔罗明尼昂的泰密乌斯曾写作一部西方希腊人、罗马及迦太基的历史；虽然算是一位谨慎的史学家，但他显得过于轻信以及迷信。

[41] 在三八六年。

[42] 在三五六年。

[43] 在三四四年。

[44] 在二九九年。

[45] 在二九五年。

[46] 罗马人分割自己的武力，而正是前锋部队被击败。

[47] 这意味着两支执政官军队，为数超过三万人。

[48] 在二八四年。

[49] 正是这部落围攻阿雷提乌姆。

[50] 今日之Sinigaglia，安科纳（Ancona）以北数里。

[51] 在二八三年。

[52] 罗马北方约四十二里处，今日之Lago di Bassano。

[53] 波里比阿经常提出如此的同时性来支持其所得的广泛结论。皮洛士在二八○年五月跨海到意大利；在特尔斐的挫败发生在二七九年。

[54] 这里提及压制高卢人的说法，呼应并反转波里比阿在页218时，用来描绘早期高卢人入侵时的字眼。

[55] 今日的吕米尼（Rimini）。

[56] 在二三七年。

[57] 见页220。

[58] 弗拉米宁是平民（plebian）出身以及政治上的“新人”（novus homo）。他的规划设计是要提供罗马无产阶级的人民去分享土地，元老院对此极力反对，因为其成员从占有征服夺来的土地中获利许多，所以弗拉米宁最后是以护民官的身份，在平民会议通过这项措施。波里比阿对道德败坏这种一竿子打倒一船人的说法，所指的是在这特定阶段的民主坚持，与弗拉米宁的政治生涯恰好同时。在波里比阿的元老朋友眼中，国内的民主改革与这些群众煽动家的候选人，如弗拉米宁和米努基乌斯（Minucius），被选出担任军事指挥要职无法切割，而这最后导致特雷西米尼湖及坎尼的灾难。

[59] 错误的陈述；这名字源自于gaesum，投掷用的标枪。

[60] 见页212。

[61] 在二二五年。

[62] 他便是第一次布匿战争知名的雷古鲁斯之子（见页163至169）。这防卫撒丁的举动有可能是为了阻挡可能的迦太基攻击。

[63] 即在三八七年的入侵。

[64] 费苏莱（Faesulae，今日之Fiesoli）离克鲁修姆（Clusium，今日之Chiusi）约八十里：显然高卢人并没在夜间行进到该地，而只是往那方向而已。

[65] 图拉真（Trajan）在罗马的胜利圆柱上的浮雕，野蛮人的服饰。裤子是宽松的，但在脚踝处束紧。

[66] 罗马军团包括三千名重装步兵，以三种主要等级的行列应战：在前方的是前线部队（一千两百人），接下来是中线部队（一千两百人）以及最后的后线部队（六百人），作为预备部队。这些不同等级的是以十个相隔开的单位（称为连队，maniple），一个连队一百二十人（但后线部队则为六十人），每个连队中间的空地，由后方的连队来占有掩护。前战部队的标枪手（velites）经常前进到重装步兵之前，投射出他们的武器来开启战争，投掷完后，撤退到各级连队间的空地。

[67] 埃米利马斯·宝路斯的征战费时较这所言更久：他直到二二五年秋天才回罗马。

[68] 根据戴奥，frag.50-4，高卢人发誓直到他们攻占卫城之前（他们在三八七年并未完成），绝不取下他们身上的配刀带或是胸甲。但这誓言却由于那些出现在埃米利马斯胜利大游行之中的高卢战俘（因为游行到卫城——译者注），反而以戏剧性反讽的方式实践诺言。

[69] 二二四年。

[70] 二二三年。

[71] 这地理上的错误可以由波里比阿相信阿尔卑斯山是在马赛稍稍北方之处开始；因此他才将阿那瑞斯人的领土认定在那城市附近。其实它是在靠近普拉仙提亚（Placentia），今日之皮亚仙查（Piacenza）。

[72] 凯尔特人崇拜一位战争及胜利的女神，相当于罗马人的密纳瓦（Minerva）；这座神殿或许在英苏布里人的首府米迪奥拉努姆（Mediolanum，今日之米兰）。英苏布里人拿下军旗，以作为神明庇佑的来源。

[73] 相同关于高卢刀刀锋质软的细节也见诸普鲁塔克有关卡密勒斯（Camillus）在三七七年战胜高卢的陈述中；或许这已经是传统的故事。

[74] 见230注，有关罗马军团之战争人员部署。前线部队及中线部队通常配备pilum，一种短的标枪，以及一把刀；后线部队则是配备hasta，一种较长刺击用的枪。

[75] 罗马人如此贴近，所以敌人没有空间来挥动他们的刀具。

[76] 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Cisapline Gaul）是在二○○至一八○年被平定的。

[77] 他当时二十五岁（二二一年）。

[78] 这种主张并没有被汉尼拔接下来直接采取的行动所证实，但是在分析战争的因果时，波里比阿强调汉尼拔所属之巴卡家族的愤怒，以及他们决心要洗刷第一次布匿战争后之结果的羞辱。

[79] 在二二○年春末。

[80] 于页132。

[81] 亦即包括证据及论证的历史，不同于只是事件单纯的主张或综合，如

在他导论两书之中所包含的。

[82] 见页133—134，在那里波里比阿辩论要以综观来论历史，以及真相存在于对事件之全面性而非局部性，这些观点的重要性；换言之，“只要将其关联起来！”

[83] 波里比阿正在将叙利亚及埃及统治王朝的幸存与马其顿安提柯王朝的消失做比较。

[84] 阿卡狄亚人在二三五年加入亚该亚联邦。斯巴达人在一九二年被菲洛波义曼强迫加入，之后退出，在一八二至一八一年又再度加入。

[85] 波里比阿对亚该亚同盟那种充满爱国心的自负，在此被证明超过了他对历史哲学所要求的一致性。在《历史》一书中有许多段落，在那里偶然或是机运的效力被认可，如以上之页236，在那里他详细论述运气在打败野蛮人入侵中所扮演的角色。

[86] 毕达哥拉斯在南意大利地区的影响力始于哲学家在约五三○年从萨摩斯（Samos）岛移居到克罗敦时；他的门生逐渐在许多城邦取得具有影响力的地位。有关他们政治影响力的性质，其实甚少任何积极的证据，但是在波里比阿所提及之暴动起义之时，这大约在五世纪中叶发生，这些人已被认为是反动势力。

[87] 戴奥尼素一世入侵意大利，在伊雷波路斯河的胜利（三八九年）结束了克罗敦的影响力以及以亚该亚为模范所组成的联邦。

[88] 在三七一年。

[89] 三八九年。

[90] 三七一年。

[91] 西息温的阿拉托斯（二七一至二一三年）建立了亚该亚联邦在三世纪及二世纪扮演重要角色的联邦形态。菲洛波义曼（二五二至一八二）改革亚该亚的军队，在二○六年打败斯巴达，成为二世纪最知名的亚该亚政治家。迈加洛波利斯的莱可塔斯（Lycortas of Megalopolis）是波里比阿的父亲，支持对罗马保持中立以及与埃及托勒密王朝和帕加马之阿塔罗斯王朝结盟的政策。

[92] 二八四至二八一年。

[93] 托勒密一世（他成为埃及国王）、塞琉西一世以及莱西马克斯都是马其顿王国的将领，在亚历山大麾下服务，并成为他帝国直接的继承人。塞琉西一世在二八一年击败并杀死莱西马克斯，但自己也在同年被“雷霆”托勒密暗

杀。“雷霆”托勒密死亡之年并不确定。如此将事情同时化（synchronism），经常出现在希腊化时代的史学家中，用来阐明命运女神的运作。

[94] 在希腊始终甚少有民主政治会不经过贵族统治，直接接续王权政治而来。欧居格司的年代不详。

[95] 在五世纪时亚该亚的城邦是实行民主政治，但是证据显示在四世纪期间，它们的政治体制是由斯巴达或底比斯政府所控制。

[96] “攻城者”迪垂亚斯一世在四世纪末时断断续续入主希腊及马其顿，并且从二九四至二八七年统治马其顿。卡山德是亚历山大首相安提帕特（Antipater）之子，从三一七年起统治马其顿，直到死于二九七年。“勾那塔斯”安提柯二世（Antigonus Gonatas），德米特里一世之子，二八三至二四○为马其顿国王。

[97] 二八○年。

[98] 从四世纪中开始，希腊以民主政治统治的国家经常会受到威胁，最先是来自马其顿王国，后来则或是来自地方性的僭主，或是“国王”（亦即如埃及托勒密王朝，或其他亚历山大帝国之继承者）所任命的人。

[99] 从二八○到二五五年。

[100] 每年轮流选出，或许每一位从一个城邦选出。

[101] 这变化意味着秘书长重要性的降低。

[102] 二四二年。

[103] 这些代表阿拉托斯在“同盟战争”发生之前的政策目标。在那之后他被迫改弦易辙，而当因为受克里奥米尼斯之迫而必须一战时，他开始重新将马其顿人找回伯罗奔尼撒，并交出阿克罗科林斯以为条件。

[104] 在二四五年，安提柯二世重新占领科林斯，而伊托利亚人入侵伯罗奔尼撒。

[105] 德米特里二世是安提柯二世的儿子及继承人。伊托利亚人正设法兼并属于伊庇鲁斯人的那部分阿卡那尼亚，在那时德米特里兵援他的岳母伊庇鲁斯皇后奥林皮雅丝（Olympias）。

[106] 二二九年。

[107] 这些主张并没事实来证明：波里比阿所给的是阿拉托斯对战争起源的

说法。

[108] 这所提之人是指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二世，他在二八二年继承伊庇鲁斯为国王，并非指亚历山大大帝。

[109] 他在二三五年继承其父列奥尼达二世（Leonidas）。

[110] 在二二七年，克里奥米尼斯完成其前任艾吉士四世（Agis IV）没有成功启动的反贵族革命；艾吉士四世在二四一年被处死。在他所发动的政变中，克里奥米尼斯立即处死四位监政官（ephors），取消监政官制度，并流放八十位他主要的政敌。一次“莱克格斯式”（Lycurgan）的社会改革计划被通过执行，这包括取消债务，将私人资产移转到共同国库，恢复传统严格的青年教育方式，以及重新组织公民团体为许多的“聚餐团体”。“僭主政治”（tyranny）公平来说，只能施用在废除双王制以及使用暴力进行改革这些事；大体而言，克里奥米尼斯的改革计划一点都不像僭主所为。普鲁塔克在他的《克里奥米尼斯传》中对改革显示出比波里比阿更多的热情。

[111] 这是在凯洛尼亚战役（Chaeroneia）（三三八年）以及之后马其顿人入侵伯罗奔尼撒扩大他们的领土。

[112] 似乎这种说法是对这次谈话事后（ex post facto）的说法。在实际上，斯巴达主宰伯罗奔尼撒的可能性不应该会对马其顿造成任何严重的威胁。

[113] 所提的自然是亚该亚联邦。

[114] 在此波里比阿透露出实际状况，亦即伊托利亚人在此时仍然维持中立。

[115] 很重要的是这邀请必须出自整个联邦，而非仅来自于迈加洛波利斯。

[116] 皆于二二七年。

[117] 于二二六年。

[118] 在二二五年的夏天。

[119] 或许在二二四年一月。

[120] 这显然是阿拉托斯的特别任命。联邦正式的将军是提摩赞诺斯（见P255页下注2）。

[121] 这路径避开了色萨利，这时在伊托利亚人的控制中。

[122] 提摩赞诺斯是二二五/二二四年或是二二四/二二三年的将军。阿拉托斯仍然是最高指挥官，但或许所关注的是战略而非战术的指挥。

[123] 在迈加洛波利斯以南靠近拉空尼亚及美塞尼亚的边界之处，在这些据点中有雅典娜要塞。

[124] 二二三年。

[125] 二二二年。迈加洛波利斯在前一年的秋天时沦陷。

[126] 马其顿的部队在冬天时要回国去耕作田地，这是希腊军事生活的正常特征，特别是在马其顿。

[127] 马其顿机动步兵的精锐部队，装配较小型的盾牌，但仍有足够的重型装配来和方阵兵团协同作战。

[128] 这部落居住在罗多培（Rhodope）山及史垂蒙（Strymon）河源头附近。他们的武器是标枪、投石器以及弓箭，所以他们是支多种能力的部队，经常用于特殊作战任务。

[129] 或许是来自欧洲的高卢步兵，而非小亚细亚的加拉太（Galatia）地区。

[130] 安提柯三世装备了迈加洛波利斯人，因为他们失去了所有资产。他们的武器必然会包括sarissa，二十一尺长的步兵长矛。

[131] Perioeci（“边居民”）原先是拉空尼亚山丘及海岸地带的斯巴达殖民者，拥有自由身份，并形成斯巴达阶层中第二级市民，在斯巴达公民（Spartiates）之下。在斯巴达国内只有后者才享有公民权，但是在对外关系上，边居民亦被视为斯巴达人，也负有持武器捍卫国家的责任。在他二二七年的政变后，克里奥米尼斯创造出一支四千名边居民组成的特别部队，并以马其顿配备来加以武装。

[132] 克里奥米尼斯政变的另一项特色是他任命自己兄弟为共同统治的国王。到目前为止，未曾有两位斯巴达国王是出自同一王室。

[133] 这些斯巴达人构成六千人的方阵兵团；佣兵队伍或许人数约五千名。

[134] 比较页266。克里奥米尼斯决定一战无疑地是受到消息影响：十天前他得知埃及的军援已经停止。

[135] 这比方阵兵团是更具弹性的组合，可以与罗马的连队（maniple）相比。

[136] 亚该亚人在阿卡那尼亚人之后形成第二条战线，显然是用来在左翼仰攻山丘时，填补右翼及中间部队间的空隙。

[137] 这为数一万人的方阵兵团通常厚度是十六排深；在此方阵兵团的宽度减半，而厚度加厚到三十二排。

[138] 波里比阿很一致地忽略阿卡那尼亚人在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根据普鲁塔克的陈述，他们必然会和伊利里亚人一起组合，参与仰攻山丘的行动。这些部队躲藏在河床，而且数量足够到从侧边包操斯巴达的左翼。

[139] 菲洛波义曼将成为亚该亚同盟中最为杰出的将领之一。在这时候他年三十一，在亚历山大麾下的亚该亚骑兵服役。

[140] 如经常所见，波里比阿在此引进一个戏剧性反讽的注脚：这是当初攸克雷达斯为敌人所设计的命运。

[141] 当最后突破到来时，呈现一边倒的现象，因为安提柯三世的重装武兵密集到相当不寻常的程度。双重方阵（double phalanx）将一万人集中在只有三百码的正面。根据普鲁塔克的陈述，除了两百人之外，组成方阵的所有斯巴达公民，皆战殁沙场。这种斯巴达部队遭受屠杀与国王逃离战场的反差对比，与斯巴达传统如此格格不入，这是波里比阿故意为之的。

[142] 安提柯三世恢复监政官及废除克里奥米尼斯的“莱克格斯式”改革计划。就这意义而言，他是将时钟往后拨回到贵族政治，而非鼓励民主政权。

[143] 菲利普五世，德米特里二世之子，出生于二三八年，十七岁时即位。

[144] 托勒密三世，以“造福者一世”（Euergetes I）为人所知，在二四六至二二一年时统治；“爱父亲”托勒密四世，从二二一到二○四年在位。

[145] 塞琉西三世，“拯救者”（Soter），在二二七至二二三年统治；他在军营里被暗杀身亡。

[146] 安条克三世，以“大帝”之名为人所知，在二二三至一八七年统治，后来在这部《历史》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第三书

导论

1.我在第一书中解释，将以在希腊发生的同盟战争、汉尼拔战争以及为争夺空叙利亚的战争，作为起点。[1] 在同书中我也陈述理由，解释我何以会将前二书用来审视这些事件之前的时代。现在我要对这些战争、它们的缘由以及何以会以如此宏大规模来进行的理由，做出完整的陈述，但是首先对于整部作品，我必须说一些话。

我现在所处理的题目，亦即所有已知世界的各部分如何、何时以及何以会落入罗马的主宰之下，应该被视为有单一行动和单一场景，有可被指认出之起点、可确定之过程以及公认之终点。[2] 我提议在此对这过程做个序言，简短地审视其中自始至终的主要阶段，因为我相信用此方式最能传达给历史研究者我对计划的明确概念。对整体有初步掌握会对我们了解细节大有助益，而同时，对于细节有预先的认识，能协助我们去了解整体。基于如此信念——将这两种取向相结合的初步审视是最佳预备——所以我将以这原则来安排本作品的简洁导论。我已经解释了主题的大致范围以及限制。至于其中所涉的个别事件，将以上述之战争开始，以马其顿王国被消灭为止。我所选定之时代自始至终，共计五十三年之久，这比过去历史中大致相同长度的年代里，包括了更多数量的战争。在叙述这些时，我将始于第一百四十个奥林匹亚年，并以如下顺序来安排我的叙述。

2.首先，我将指出上面所提，罗马与迦太基之间战争的源由，也就

是众人皆知的汉尼拔战争，并叙述迦太基人如何进攻意大利，打破罗马对整个国家的主宰，导致罗马为图自己的存亡安危，以及保有祖国领土，而陷落到极大恐慌之中，及汉尼拔出人意表地胸怀攻占罗马的雄心壮志。

接下来我要设法解释，在同时期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在结束与伊托利亚人的战争，安顿希腊事务之后，何以会构想出与迦太基结盟的计划。[3] 然后我会描绘安条克三世和“爱父亲”托勒密四世如何发生争执，最后诉诸战争来争夺空叙利亚，还有罗德岛人民与比提尼亚统治者普鲁席亚斯一世（Prusias）联手向拜占庭人宣战，强迫他们停止对航行前往黑海之船只征收通行费。

在此处，我将会中断叙述，来介绍罗马政体。然后延续这研究，我会叙述此一宪政的特殊性质不仅使罗马恢复统治意大利及西西里，也对占领西班牙、光复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最后成功结束与迦太基人的战争，和达成称霸全世界，皆贡献极大。

再接下来，我将再引进一个离题的叙述，叙述叙拉古之希洛二世权力的瓦解，从这里我将会过渡到发生于埃及的动乱。此处我会报道在托勒密三世过世后，安条克与马其顿的菲利普决定瓜分托勒密幼龄继任者领土的协议，而且我将会叙述在这过程中菲利普着手兼并埃及、萨摩斯及卡里亚（Caria）地区，而安条克要占领空叙利亚及腓尼基，这些不公不义的行为。

3.我计划的下个阶段将完整交代罗马人与迦太基人在西班牙、非洲以及西西里的交战，然后依据那时候事情发生的形态，转移我叙述的场景，全心集中到希腊及邻近地区。在那里我会报道帕加马阿塔罗斯王朝和罗德岛人对马其顿菲利普发动的海战，然后处理菲利普与罗马人的战争，[4] 叙述这何以发生以及结果为何。从这点我将转到伊托利亚人所怀之怨恨冤屈，以及因这缘故他们从亚洲召唤安条克的协助，因此点燃亚

洲与亚该亚人及罗马人的战争。然后在解释这战争的原因以及安条克如何渡海进入欧洲后的发展时，我首先会叙述他如何被驱离希腊，接着是他在战争中失败后，被迫放弃整个陶鲁斯（Taurus）山脉以外的所有亚洲领土，然后是，罗马人在压制加拉太（Galatia）高卢部落的侵略后，罗马人如何在亚洲建立无人质疑的统治，以及让所有在陶鲁斯山以西的居民免于野蛮人略侵的恐惧，压制高卢人无法无天的行为。

在这之后，我将引领读者去注意伊托利亚和克法利尼亚（Cephalennia）人所遭遇之不幸，并触及欧迈尼斯（Eumenes）二世针对普鲁席亚斯一世和高卢人，以及阿里亚拉提斯四世（Ariarathes）和帕尔那凯斯一世（Pharnaces）彼此间所发动的战争，我也要描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统一以及安定，叙述罗德岛这岛国的成长。最后我将会以“神显灵”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Epiphanes）出兵埃及，罗马人和佩尔修斯之间的战争，以及马其顿之灭亡，作为我整个叙事的结论。所有这些事件是要用来说明，罗马人在危机出现时如何处理，因此建立他们对全世界的统治。

4.如果只以成败为依据，来适当判断究竟哪些国家及个人值得赞美或责难，我应该就此打住，对我的叙述以及所有的历史研究，以对这些刚提及之事件做一陈述，下定结论，而这其实正是我原先的意图。这五十三年的时段是以此告终，而罗马势力的成长及崛起在那时已经完成。[5] 在那时已经众所公认，整个世界必须接受罗马的权威，服从它的命令。但是若只根据战争结果来对胜利者及失败者所下论断，可能不会是最后的论断；因为看起来像是最惊人的胜利，假如没有适当使用的话，铺天盖地的灾难也会接踵而来；但反过来说，假如能勇敢地承受最可怕的灾祸，实际上会转而有利于那原先受害的人。我因此深感有必要在我刚提及的陈述之外，再加上征服者在胜利后所进行的政策，他们如何执行世界霸权，以及其他人对他们的主宰者有何观感和评断。除此之外，我也必须形容相关之不同民族里，于公于私，所具有的驱动力量以及最

主要关切之事。以这种方式我们同时代之人可以看清：罗马的统治究竟是否受欢迎，抑或要不计代价来加以避免，以及未来世代会如何判断，究竟是要赞美崇拜它或是定罪谴责它。我的作品特别是在这方面，对现在以及对未来皆会被认为是有用的书。因为无论是统治者，或是论断他们的史学家，皆不可视征服行为本身，或使他人屈服于自己权威下，是政策的唯一目的；正如有识之人不会只为了要打倒他的对手而进行战争，抑或不会只为了跨海而行，因此飘洋过海。事实上，不会有人致力于工匠技艺只不过为了学习，而是每个人进行这些活动时，是为了从中获得愉悦、荣耀或是利益。

因此本书最后的成就将会是去确认每个民族在被征服，进入罗马统治之下，直到之后所发生之普遍动乱及剧变那段时间，他们的处境究竟如何。因为这些后来事件的重要性以及不可预测的性质，以及特别是因为我不仅亲身见证大多数这些事件，并且参与其中一些，甚至还主导另一些其他事件，我因此说服自己将它们写下，让这些陈述成为几乎是另一部新历史作品的起点。[6]

5.这时期的动乱包括了罗马人对凯尔特-伊比利亚人（Celtiberians）人以及瓦凯伊（Vaccaei）人的战争，[7] 迦太基人对利比亚国王马西尼沙的战争，以及帕加马阿塔罗斯（Attalus）二世对比提尼亚之普鲁席亚斯一世在亚洲的战争。与此同时，欧洛福尼斯（Orophernes）借由叙利亚国王德米特里一世之助，将卡帕多西亚国王阿里亚拉提斯四世（Ariarathes）逐离国家，但后者因阿塔罗斯王朝协助而复国，取回王位；之后塞琉西四世之子德米特里一世，在叙利亚掌权十二年，当时其他国王联手对付他，他不仅因此失去王位，也失去性命。[8] 在这最后一件事不久前，罗马人澄清那些在对佩尔修斯战争中，被指控涉及阴谋而蒙受毁谤之人，允许这些流亡者返回家乡。[9]

在不久之后，[10] 罗马人将武力指向迦太基。原先他们的意图是要

将这城市移往他处，但后来决心要将其彻底摧毁。我会在适当时候交代个中缘由。与此同时，马其顿人放弃他们与罗马人的友好协定，斯巴达人则退出亚该亚同盟，而这些事件导致那最后笼罩全希腊之灾难的开始与结束。

这便是我作品的大致计划。它的完成必须依赖究竟命运女神能否恩赐我足够的寿命。但是即使共同于人类的命运降临我身，我相信我的主题不会因为缺乏有能力延续的人而凋零萎缩；将会有许多人承诺来延续这个工作，完成预定的结论。

所以我既然已经对最重要之事件提供摘要，给予读者对整个作品的印象以及内容细节，现在该是我重新恢复原先计划，并回到作品要开始的那个时候。

第二次布匿战争

6.一些记录汉尼拔及他时代的历史，以及设法指认出罗马与布匿战争发生原因的史学家，提及其发生的第一原因，是因为迦太基人包围萨贡托（Saguntum）的行为，第二则是他们跨过埃布罗河，违反他们与罗马人的条约。我可以认可这些事件或许可以被形容为战争之“起始”，但是决无法同意这些事件构成其“原因”。若依据相同类比，我们会有理由说亚历山大大帝渡海进入亚洲是他对波斯作战的原因，以及“大帝”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the Great）在迪米特利亚斯（Demetrias）港一地登陆是他对罗马作战的原因，但这两个说法不正确，甚至不合道理。何以有人会认为这些行动是相关战争之原因？因为就远征波斯的战争而言，有许多计划以及准备都是由亚历山大进行，甚至有一些是在他父亲菲利普二世生前时就已进行；而且对罗马人来说，战争在安条克三世来临之前，伊托利亚人已经进行。如此理论是由那些无法掌握“起始”“原因”以及“借口”之间区隔（遑论其重要性）的人所提出，因此忽略这事实：原因是在一连串事件中最为优先的，而起始则是最后的。我将会使用“起始”这个词来指涉最先将已经决定之计划付诸实现的动作；而“原因”是指涉那些事先影响我们目的及决定的事件，亦即我们对事情的概念、我们的心态、我们对它们的评估，以及整个我们赖以做出决定和承诺的整个思虑推理过程。

这些因素的性质可以由上面所引用的例证清楚地看出。任何人对波斯战争的真正原因以及起源都可以轻易辨识。这些原因中最先发生的是希腊人佣兵在色诺芬（Xenophon）领导下[11] 安全撤离波斯帝国亚洲内陆的行省（Upper Satrapies），在这支军队行进中，他们横越整个亚洲，经常穿过敌人领土，但没有野蛮人敢去挡下他们的路线。其次，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入侵亚洲；他在整个过程的任何战役

中，都没遇到值得一提的反对力量，而只因为希腊本土发生困难，他才被迫返国，因此没有达成他原来的目的。[12] 这些事件使菲利普二世相信，波斯人在与他自己及马其顿军队的军事效率相较，是懦弱以及懒散的；这些事件也打开了他的眼界，看到从战争中所能够获得奖赏的规模如此精彩。于是在他得到希腊人对他远征计划的公开支持后，他立即找了一个适当的借口：他迫切希望报复波斯人曾经加诸希腊的伤害行径，之后他随即决定发动战争，并为这目的进行所有需要的准备。我们因此必须认为第一组的因素为对波斯战争的“原因”，第二组为“借口”，而亚历山大之渡海进入亚洲为“起始”。

7.依相同之法，很明显地，安条克三世与罗马人之间的战争是因为伊托利亚人感受到的愤怒：他们认为在对付菲利普五世的战争中，在许多方面被罗马人轻视。所以他们不仅邀请安条克前来希腊，而且因为当时这事件在心中所引起的愤恨，随时愿意做出并忍受任何事情。而战争的借口是所谓的解放希腊，这是伊托利亚人在与安条克逐一造访各城邦时，所声明的主张，但其实这完全违背理性与真相。最后，战争的起始则是安条克登陆迪米特利亚斯。

我对这议题多所着墨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批评之前的作家，而更是为了让有志历史的学生走上正途。医生若不知道身体某些状况的原因，便无法协助病患，政客若无法掌握每件事是如何、何以和依据何种过程发展，便无法协助其公民同胞。前者几乎不可能为身体设想出适当的治疗，而后者则无法应付突发的状况，除非他拥有如我对每件发生之事所描述的知识。因此没有其他事情更需要我们关注或更需要小心去搜寻出每件事情的原因，因为最重大的结果经常源自细微之处，而正是这最初之念头和决定最容易去进行修正。

8.罗马史学家费边·匹克拖认为，除了加诸萨贡托人的伤害外，战争的原因之一是哈斯德鲁巴野心勃勃以及爱好权力。他陈述说，哈斯德鲁

巴在西班牙取得重要的统帅权后，返抵非洲，设法解散迦太基政体，将政府改为王政。然而其他政治领袖预料到他的计划，团结起来反对他，哈斯德鲁巴那时怀疑他们的意图，所以离开非洲。从那时起，他便依一己之意来统领西班牙，不理会迦太基的元老院。汉尼拔从小时候，就接受并且崇拜哈斯德鲁巴的原则及政策，所以在他继任哈斯德鲁巴的西班牙统帅权时，他也以相同方式来处理事务。于是根据费边的说法，汉尼拔是自己违背迦太基的意见，主动向罗马发动战争；迦太基领导阶层中无人支持他对萨贡托的行动。费边又接着说，在城市沦陷之后，罗马提出要求，迦太基人或者交出汉尼拔，或者接受战争。现在假设这位作家被问到如下的问题：迦太基人能否有更好的机会去得到他们所想要的？或是，除了答应罗马人要求外，他们如何能做出既符合正义，且同时又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根据费边自己的证据，他们从一开始便不认同汉尼拔的行为。迦太基人只要交出犯下这行为的人，不仅是以合理的借口除掉国家共同的敌人，而且无需背负亲自动手的恶名，还能够确保他们领土的安全，停止即将发生的战争，并让罗马人满意：所有这些都可以仅凭通过一个决议就可达成。如是的问题当然是无法回答的。因为迦太基人非但没有做这任何其中一件，他们还根据汉尼拔的政策，持续进行战争达十七年，而且他们从没有放弃这次的斗争，直到最后在可能成功的希望都试过，但都失败后，使他们自己的城邦以及人员陷入立即毁灭的危险之中。

9.或许有人会问，我何以提及费边以及他的理论？这当然并非出于担心有读者或许会认为这理论说得过去，所以接受：这理论内在的不可能性，对任何研究它的人都昭然若揭，无须由我来评论。我真正的关切是要提醒那些或许去阅读该书的人，不可被作者姓名所具有的权威性所误导，而是要去关注事实。因为有些人老是停留在作者人格上打转，而非其所写作品。他们会顾及费边乃汉尼拔同时代之人，且为元老院一员这事实，于是立即相信他所写每件事是必然可信。我个人的意见是我们固然不可对其权威等闲视之，但同样地也不可视为定论，以及在大多数

的情形下，读者应该以参照事实，来测试他的主张是否正确。

但我必须回到罗马及迦太基之间的战争，这次的离题叙述已经将我远远带离。战争的第一个原因，我们必须认知到，是汉尼拔父亲哈密尔卡（姓氏巴卡）的愤怒。[13] 他的气概未曾被西西里战事的结局所打倒：他似乎一直维持在他驻扎于艾瑞克斯的部队时，洋溢在全身的那股勇武气概；在迦太基舰队于艾基尔特斯群岛被歼灭后，[14] 他迫于局势才同意和平，所以未曾在决心上有任何削弱，反而随时等待时机反击。若非战后的佣兵叛乱，他就其能力之所及，必然会很快地去寻找其他场合，创造资源，重启战争。但如事件后来发展，他完全忙碌于镇压那时的佣兵动乱，必须将全力投注在那些事情上。

10.迦太基人镇压住叛乱后，罗马人宣布要对他们宣战的意图。刚开始迦太基愿意在所有点上协商，相信道理是在他们那边，他们国家的利益仅凭目的的正当性，便会胜出。这题目已经在本作品稍早的书中提及，读者必须加以参考来了解我现在所说，以及接下来要发生之事。[15]

然而因为罗马人拒绝讨论，所以迦太基人别无选择，只能屈于情势；他们对这种不公不义深恶痛绝，却又无能为力，所以他们撤离撒丁，并且同意在原来要求赔偿的金额外，再另外支付一千两百泰伦，[16] 以免当时就要面临战争。我们在此得到了这次战争第二个及最重要的原因。对哈密尔卡而言，最近这次不公不义所激起的愤怒，让所有国人亦同感愤慨，再加上原来的积怨。所以就在他镇压佣兵之乱，确保国家安全后，他立即将所有的精力投注到征服西班牙，目的是要利用这些新的资源，来准备对罗马的战争。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开发成功，必须被认为是第三个原因，因为正是他们在实力上增长所带来的保证，促使他们有信心进行新的战争。

要提出哈密尔卡在导致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相关证

据，相当容易，尽管他在战事爆发前十年已经过世，但是以下故事将足以来确定这些辩论。[17]

11.汉尼拔最后败于罗马人之手后，离开祖国，停留在国王安条克三世的宫廷里。在那时候，罗马人已经知晓伊托利亚人的计划，派遣使节到安条克那里，要弄清楚国王可能采取的政策。罗马人见到国王礼遇伊托利亚人，似乎倾向于和罗马人作战，于是他们刻意表现出对汉尼拔的友好及关照，希望借此在国王心中留下对他的疑心，而这其实正是他们所得到的结果。时间越久，国王益发不信赖汉尼拔，然后两人相见，坦白讨论彼此间越来越不信任的时刻来临。在对话中，汉尼拔彻底地为自己辩护，然后当最后再也无法再提出更多辩论时，他说了如下的故事。

当他父亲准备率领军队远征西班牙时，汉尼拔约九岁，站在他父亲准备向宙斯神献祭的祭坛旁。占卜的征兆呈现吉祥，哈密尔卡倾倒祭酒献神，执行一贯的礼仪，之后他下令所有出现在祭祀场合的人，往后退离祭坛。他叫汉尼拔靠近，很亲切地问他是否希望随军远征。汉尼拔喜出望外，然后像个小孩子一样，恳求前去。他父亲握着他的手，引领他到祭坛，命令他将手放在牲品上，发誓他绝不会成为罗马人的朋友。

他那时让安条克印象十分深刻，而既然国王知道这些事实，所以只要国王的政策是要与罗马人为敌时，便可以毫无疑问地信赖汉尼拔，认定他是最全心全意的支持者。但假如国王和罗马人妥协或订立和约的话，那国王不需等待风闻任何对这迦太基人的诋毁，而应该立即不要再信赖他，反而要提防他，因为汉尼拔会倾其所有来伤害罗马人。

12.当安条克听了这故事，他相信汉尼拔是真诚地在表达真正感受，所以完全搁置之前的怀疑。就我们而言，我们应该认为这是哈密尔卡对罗马向来所具有的敌意以及态度，而这一点确实也被这些事实所肯定：他成功地给自己女婿哈斯德鲁巴以及儿子汉尼拔灌输了对罗马那种

无人可比的仇恨。哈斯德鲁巴这些意图在可以得到明证之前，便已去世，但事件的发展给汉尼拔机会去清楚地证明这种他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仇恨。因为这缘故，政治家要确认他们了解何以宿敌会和解，或新友谊会形成的真正理由，至为重要。他们必须观察当人们愿意妥协和解释是因为迫于情势，还是因为士气土崩瓦解之故。就前者的例子而言，他们必须思考，如此之人不过是在等待有利时机，于是要对他们多加警戒；然而对于后者的情形，他们必须视其为真正的朋友以及臣服之子民，在情势有需要时，无须迟疑地去要求他们提供服务。所以我们现在或许可以宣布汉尼拔战争发生的“原因”是那些我已经陈述的。至于其“起始”则如下。

13.如我所述，迦太基人对在争夺西西里所遭受到的挫败感到深恶痛绝，更进一步被撒丁事件，以及最后被迫要支付增额的赔偿所激怒。于是在他们征服大部分的西班牙后，他们急于抓住出现在眼前的机会，来对罗马进行报复。哈斯德鲁巴，这位继承哈密尔卡、被全军托付西班牙最高统帅权的人过世后，最初迦太基本土在等待在西班牙的军队会如何回应。稍后当军队同心拥戴汉尼拔为统帅的消息传来，他们便匆忙召开人民大会，一致同意军队的决定。汉尼拔在接收统帅权后，立即出发征服被称为欧凯兹（Olcades）的部落。[18] 他抵达这部落最重要的城镇阿帖以亚（Althaea），就地扎营，并且在一连串让敌人深为惊吓的积极攻击下，迅速占领该地，结果部落其他人都饱受威胁，所以向迦太基人臣服。汉尼拔对各城镇征收贡赋，取得一大笔钱后，他撤退到新迦太基（New Carthage）过冬。他很慷慨地对待他的部队，立即给予丰厚的犒赏，并承诺之后会有更多的奖励；用这方法他建立大家对他极大的善意，也鼓舞他们对未来有很高的期望。

14.在接下来的夏天，[19] 他再度出发，对瓦凯伊部落[20] 进行攻击，在第一次行动中占领荷曼迪卡（Hermandica）。然而阿伯卡拉（Arbocala）是座大城，且因为规模以及人民的勇敢，他被迫采取围

攻。在经过许多困难之后，他才得以急攻取下。后来在返程中，他突然身陷很大的危机。卡佩塔尼人（Carpetani）[21] 是邻近地区最强大的部落，他们团结起来攻击他，并有邻近其他部落加入。这是在欧凯兹之流亡者煽动，加上逃离荷曼迪卡之人推波助澜下促成。[22] 假如迦太基人被迫要面对这些联合的军队，在战场上一决雌雄，那他们必定失败。但事实是汉尼拔结合技巧与谨慎，调头撤军，直到他使自己与敌人沿着塔古斯（Tagus）河，隔河对峙。在那里他停下来阻止敌人渡河，同时利用河川障碍以及为数约四十头的战象部队优势，进行布阵，结果整个军事行动如他所算计地发展。当野蛮人设法在不同点强渡河川，大多数离开河流的挣扎登岸者，立即被沿着河岸攻击的战象所歼灭。许多人也在河流中被骑兵队砍倒，因为马匹在水流中比较能保持立足点的平衡，而且骑兵对他们所攻击之步兵有高度上的优势。最后汉尼拔转守为攻，渡过河流，攻击野蛮人，驱离一支约十万人的大军。在这次挫败后，在埃布罗河以南的其他部落，除了萨贡托人外，不再敢贸然挑战迦太基。就他自己而言，汉尼拔尽其可能地不去染指这城市。他谨慎行事，不给罗马人任何明显借口来进行战争，除非等到他已经确切控制这国家的其他地区。在这一点上他是依循父亲哈密尔卡的告诫及建议来行事的。

15.在这期间萨贡托派出一个又一个使节团到罗马，部分是因为他们预见将发生之事，部分是因为他们很希望告知罗马人，迦太基人在西班牙逐渐发展出的势力。罗马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忽视他们的诉求，但这次他们派遣一些专员来调查萨贡托人的报告。在同一时间，当汉尼拔已经完成当季应该完成的征战，率领部队回到新迦太基过冬，[23] 这座城市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帝国中，最光彩的城市以及政治中枢。他在那里发现来自罗马的代表团，接见并聆听他们要传达的信息。罗马人要求汉尼拔不要插手萨贡托，他们主张这是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并且根据与哈斯德鲁巴所订立协议中的承诺，不可渡过埃布罗河。[24] 对此汉尼拔回应的方式正如一位年轻有为、[25] 充满勇武精神、对事业深具信心，并长久以来受到仇恨罗马刺激的人。在回应代表团

时，他声称是在保护萨贡托人的利益。不久之前萨贡托城发生党派之争，罗马人被召唤来仲裁，但汉尼拔现在指控他们不公平地处死一些领导公民。他警告他们，迦太基人绝不会漠视这种任意滥杀滥捕的叛逆行为，因为迦太基人自古以来的传统是要支持因不公不义而受害者的立场。与此同时，他也遣人回迦太基去征询要如何行动的指示，其理由是因为萨贡托人依赖与罗马人的结盟，要伤害那些臣服于迦太基的人。

在与罗马人打交道时，他处于不理性以及激烈愤怒情绪中，所以并没有说出所发生之事的真正理由，而是诉诸一些没根据的借口，而这经常发生在一些因受激情迷惑，忽略正常行事方式的人身上。假如他要求罗马人应该归还撒丁，同时取消罗马人趁着迦太基落入不幸内战之际，被强迫接受最后通牒，否则以战争胁迫，因而勒索来的赔偿金，就会显得合理。但事实是他没说任何这些自己国家含冤的理由，反而捏造一个关于萨贡托的假理由，给人印象是他违背理性，甚至在违背正义下进行战争。罗马代表团做出结论，认为战争显然势不可免，所以航向迦太基，向该地权威当局传达相同的抗议。他们假设必然会在西班牙作战，并以萨贡托为军事根据地，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战争竟然发生在意大利。

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

16.罗马元老院根据如此的假设来拟定计划，决定他们首先必须巩固他们在伊利里亚的地位，因为他们认为与迦太基的战争将是一场艰困的持久战。碰巧在这时候，[26] 法洛斯的德米特里正在掠夺及摧毁伊利里亚地区臣服于罗马的城镇，并且有五十艘船航行越过利苏斯以南，劫掠在爱琴海赛克拉迪斯群岛（Cyclades）中的许多岛屿，明显违反与罗马共和国的条约。他已经将罗马人曾经为他所做过的种种事，忘得一干二净，甚至在见到罗马最先受高卢，然后受迦太基威胁后，开始轻视它的实力。他将所有的希望放在马其顿王朝，因为他在对克里奥米尼斯的战役中，携手并肩站在安提柯三世那边。因为这些事以及马其顿王国国势蒸蒸日上，罗马人急于巩固意大利以东的地位。他们深具信心会有时间来遏止伊利里亚人那种冲动的愚蠢，并且惩罚德米特里的胆大妄为以及忘恩负义。然而在这些算计中，他们被蒙骗，因为汉尼拔攻占萨贡托的速度快过他们的计划，结果是战争不在西班牙打，而是在罗马门前以及整个意大利开打。但正是因为有这些考量在心中，所以罗马人就在第一百四十个奥林匹亚年的第一年夏天前，[27] 派出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28] 领军，攻打伊利里亚。

第二次布匿战争

17.在同一时间汉尼拔已经与军队从新迦太基出发，行军前往萨贡托。这城市坐落在连接伊比利亚及凯尔特-伊比利亚山脉向海的一侧，[29] 离海约不到一里处。居民所垦殖的土地，生产各式各样的作物，是整个西班牙最肥沃的地方。汉尼拔在城市之前扎营，积极地进行围攻，因为他预见到在攻占该城后所能获得的许多利益。第一，他相信用这方式他将剥夺罗马人任何在西班牙作战的机会；第二，以此军事行动他必将在伊比利亚整个地区引起恐惧，所以已经臣服者，将会更加顺服，其他仍然独立者，势必更加谨慎；但最为重要的是，他将能够安全地进军意大利，无后顾之忧。除这些利益外，他认为攻占这城市会对即将预定之远征，提供充足的资金以及物资补给，以分配到军队中的奖赏，来提升军队的士气，并且以运送战利品回国，博得迦太基人的善意。[30] 在这些考虑下，他倾全力围攻。有时候他会亲自冒险加入操作攻城机，为下属立下榜样，其他时候则是为自己的人马加油打气，毫无顾忌地将自己暴露在战争的危险中。最后在忍受过种种的艰辛及焦虑后，在围攻的第八个月，他成功占领该处。钱币、奴隶及财富等不同形式的大量战利品落入他手中。他将钱财留置用于远征，如之前已经决定的，奴隶则根据战功分配到他的部队，其他种种财富则立即完全运送回迦太基。这次军事行动一点都没出乎他的期望；相反地，原先计划已经充分达成。他已经顺利地使他的人马对未来的行动更加热忱，迦太基人也更愿意答应他的请求，而他现在自己掌握如此丰富的资源，所以他能够采取许多步骤，来促成他的远征。

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

18.当这些事件依序发生时，法洛斯的德米特里已经得知罗马人出兵计划的情报，他立即派遣一支强大的驻军到迪马莱（Dimale）城，[31] 并准备必需的军需品来维持这样的军队。在其他伊利里亚的城镇中，他处死那些反对他政策的人，并且安排支持者当权。与此同时，他亲自精选最勇敢的六千名士兵，驻扎在法洛斯岛（Pharos）。[32] 当罗马执政官率军到达伊利里亚时，发现敌军士气高昂，对迪马莱的自然天险以及为防御所做的安排自信满满。他所得到的印象是此地一向被认为牢不可破，于是决定排除其他事情，优先攻击此地，借此让敌人心生恐惧。接着他对军官下达必要指示，将攻城机竖立在不同地点，包围城镇。七天之后，他强攻取下该城，仅凭一击便彻底瓦解所有敌人的士气，结果是使者从所有邻近城镇前来，愿意无条件地将自己交给罗马人保护。执政官在接受他们的投降，加诸适合个别状况的条件后，航行去攻击德米特里本人。在那里他得知法洛斯岛首都的防御坚强，有一支庞大的精选部队聚集其中，而且军需武器弹药充足。所以当他开始担心这次围攻将会冗长以及困难时，他构想出如下策略。他在晚上率全军航向该岛，并在一处茂密森林卸下大部分部队，然后在日出时，以为数二十艘的舰队公开航向最靠近城镇的港口。当德米特里看见海军部队时，轻视他们明显薄弱的武力，所以从城中往港口率军突袭，避免敌人登陆。

19.两军开始交战便陷入激战，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军队从城中抽调出来，直到所有的驻军都倾巢而出，参加战斗。那时在晚上登陆的罗马军队，已经沿着一条有遮掩的路径，在关键时刻参加战斗，他们占据城镇与港口间的一道斜坡，砍倒冲出的部队。当德米特里发现这件事，他立即停止攻击正在登陆的部队；然后聚集人马，向他们说话，领导向前，并与已经占领斜坡的敌军进行激战。罗马人看到伊利里亚人坚定、

秩序井然地向他们前进，攻击他们的队形，但在同一时间，他们刚下船登陆的同志，看到战事的发展，立即从敌人后方向前冲刺。伊利里亚人于是各方受敌，完全陷入失控及混乱中。最后当德米特里的部队发现自己前后同时受到压力，他们转身逃走，其中有些人逃回城镇，但大多数人则散落在岛屿的乡间地带。德米特里本人已经在海岸一个偏僻地点准备一些船只，作为紧急应变之用，所以前往该处登船，在黑夜掩护下航行，不其然地出现在马其顿国王菲利普的宫廷中，并在那儿度过余生。他是位有大胆冒险精神的人，但完全缺乏理性思索以及判断能力，而这些弱点所带给他的结果，完全符合其余剩的生涯。他在菲利普的首肯下，进行一个构想不周、大胆冒进的计划，要去攻占麦瑟纳（Messene），结果在战争中被杀死。当我们到达这时期时，将会详细叙述。罗马执政官宝路斯紧接他的胜利后，以强攻取下法洛斯城，将其夷为平地。他继续征服伊利里亚其他地区，而且在以他认为最佳的方式妥善安顿这一行省的事务，在夏天结束时返回罗马。他在众人欢呼下庆祝胜利大游行，因为他被认为极有技巧甚至是更有勇气地处理这次战争。

第二次布匿战争

20.当萨贡托沦陷的消息传到罗马，对是否宣布战争，并无辩论。有些史学家主张辩论的确发生过，甚至大费周章地将两方可能表达的演说给写下来。罗马人已经在一年前给过警告，假如迦太基人进入到萨贡托领土，将被视为战争行为。现在城市已经被攻占，他们怎有可能聚会辩论，究竟是否要宣布战争？但何以这些作家会对元老院那低抑的气氛描绘出如此戏剧化的图像，而同时也以同样的口吻告诉我们，这些元老将他们十二岁以上的儿子带到元老院会议厅去，以及这些孩童参加辩论，但却没透露任何支言片语给最亲近的亲属？这些是不可能的，正如其不会是真的，除非我们要去相信命运女神在她所颁赐的福祉之外，还恩赐给罗马人自摇篮起便有智慧的大礼。我无须再花费任何口舌，在如凯瑞亚斯（Chaereas）或索赛勒斯（Sosylus of Lacedaemon）等那些人的作品上：[33] 他们毫不具有历史所应有的规矩或权威成分，而是将自己定调在美容院里闲言闲语的八卦层次上。

在听闻降临萨贡托的灾难时，罗马人所做的是任命使节，火速派遣到迦太基。[34] 他们受到指示要给迦太基人两个选项，其中之一是，假如接受的话，会羞辱以及伤害迦太基这国家，而另一个则是会成为一次大规模对抗以及极大危险的开端。简言之，他们必须交出汉尼拔及其顾问，或者宣布战争。当罗马使节到达，现身元老院之前，传达他们的信息，迦太基人在愤慨中聆听这两种选项，要从中择一，但是他们还是选出他们能力最强的演说家来发言反驳，以如下方式来护卫他们的行为。

21.他们拒绝讨论哈斯德鲁巴及罗马人之间的协议，理由是这未曾被签订，或即或如此，这协议对他们没有约束力，因为这是在没有得到他们允许之下签订的。他们声称此点是依循罗马人自己所立下的前例，

因为在卢塔提亚斯领军时，在争夺西西里战争期间所签订下的条约，已经为卢塔提亚斯所接受，后来却被罗马人所否认，理由是条约是在没得到他们同意下签订的。迦太基人在陈述他们的立场时，自头至尾都将他们的辩论立基于，甚至坚持在西西里战争结束后所签订的最后条约。他们指出条约中没有任何条款与西班牙相关，但却有一条明白指出每个交战强权的盟友，都必须免于另一方的攻击。他们辩称在条约完成时，萨贡托人并非罗马盟友，而且为了证明他们的重点，他们有几次高声朗诵出条约内的条款。

罗马人这边断然拒绝讨论迦太基人对在萨贡托行为的辩护。他们辩称，只要萨贡托人没有受到伤害，整个局势仍然允许进行辩解，并可经由讨论来摆平争执，但现在条约已经因为攻占这城市而被破坏无遗，迦太基人或是交出罪人，这么做会让所有人了解迦太基人并没参与这次犯罪，以及这犯罪并没有得到他们的首肯；或者是，假如他们拒绝如此做，便是承认他们自己涉及阴谋，那他们必须接受战争。

在辩论中，罗马与迦太基之间条约的问题，多少仅以一般性的方式处理，但是对我而言，却有必要以深入细节的方式来研究。对实际参政的政治家，其责任及利益是要对这些事情拥有准确的信息，可以在关键性的辩论中避免错误，[35] 而对研究历史的学生，则可避免被历史学家的无知或偏见所误导，所以这样深入的研究都是有用的，因此要对罗马及迦太基之间，从最早到今天，[36] 所缔结的各个条约进行一般认为是正确的审视。

22.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一个条约是在布鲁图斯[37]（Lucius Junius Brutus）与豪拉提乌斯（Marcus Horatius）担任执政官之时签订。他们是在伊达拉里亚国王被驱离后，所选出的第一任执政官，并且奉献了朱庇特·卫城（Jupiter Capitolinus）的神殿，而这些事情发生在波斯大王薛息斯（Xerxes）入侵希腊之前二十八年。我在以下会尽我所能准确地翻

译这条约，但现代语言已经和古代语言之间发展出如此多的差异，所以罗马最杰出的学者在诠释某些点上，即使经过许多研究，仍感到极大的困难。这条约其文句大致如下：

> 罗马人和其盟友以及迦太基人和其盟友，将根据这些条件而建立友谊：
>
> 罗马人及其盟友不得超越波恩海岬（Fair Promontory）[38] 航行，除非他们受制于暴风雨或敌对行为，而被迫如此。假如他们其中任何人因为受制于外力，而超过该线，他不可买下或带走任何超过需要用来修船或祭祀的东西，而且必须在五日内离境。[39]
>
> 那些前来进行贸易的人，除非在传令官或城镇公务人员前，否则不得进行交易。假如交易发生在非洲或撒丁，在这些官员前所贩卖之价钱，必须由政府保证支付给贩卖人。[40]
>
> 假如有任何罗马人到西西里岛的迦太基行省，他将与其他人一样享有平等权利。迦太基人不得伤害在阿狄亚（Ardea）、昂提马姆（Antium）、劳伦特斯（Laurentes）之人以及舌切易（Circeii）和特腊契纳（Tarracina）民族，或是那些臣服于罗马之任何其他拉丁人城市。
>
> 关于那些并未臣服于罗马人之拉丁民族，迦太基人不得干预任何这些城邦，而假如他们攻占任何之一，他们必须无损害地交出。他们不得在拉丁人领土，建立防御工事。假如他们携带武器进入该地区，他们不得在那里过夜。”

23.条约中所提及之波恩海岬是迦太基面海正北方最靠近的海岬。迦太基人禁止罗马人的战舰南行越过此线，[41] 对我来说其理由是他们不希望罗马人熟悉拜占庭（Byzancium）或小赛尔提斯（Lesser Syrtes）附近的海湾，这地区迦太基人称为恩波利亚（Emporia，“货栈”），因为该地区相当富庶。[42] 假如有任何人被飓风，或因为敌对行为而带至此处，或是因为必须祭神或修船而需要任何东西，他可以取得所需物质，但不得更多，而那些到达此地者，必须在五日内离境。罗马人被允许因贸易目的而来到迦太基本身、波恩海岬这侧之非洲所有地区、[43] 撒丁以及西西里岛里迦太基行省的所有地方，而迦太基政府将会担保支

付他们的合法债务。

这条约的措辞显示出迦太基人认为撒丁及非洲完全属于他们；就西西里而言，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来定义他们的利益，并在条约中仅提及那些在他们统治下的部分。以相同方法，罗马人做出关于拉丁姆的规范，而不提及意大利其他地方，因为它们并非在其权威之下。

24.后来双方又签订第二个条约，迦太基人在其中包括了泰尔（Tyre）及乌提卡（Utica），而且除了波恩海岬外，还提及马斯提亚（Mastia）和塔西恩（Tarsium）的地点，罗马人不得越界去进行掠夺的征战或建立城市。这条约其文大致如下：

> 罗马人与其个别盟友，以及迦太基人、泰尔人、乌提卡人民及其个别盟友之间，根据以下之条件，将会友好相处。罗马人不得在波恩海岬、马斯提亚和塔西恩 [44] 那侧进行掠夺或贸易或建立城市。
>
> 假如迦太基人掳获拉丁姆上任何不臣服于罗马的城市，它们将可保留财务及人员，但要交出城市。
>
> 假如有任何迦太基人掳获任何与罗马有签订和约，但并非臣服于罗马之民族的人， [45] 它们不得将其带至罗马的港口，但假如有人被带进，而有罗马人主张拥有此人，则他将被释放自由。 [46] 罗马人同样不可如此做。
>
> 假如罗马人从迦太基人所统治之任何地方，取得水和物资，他将不可用这些补给来伤害任何与迦太基人享有和平及友谊的人民。同样迦太基人亦不可如此做。假如任何一方如此做，受害一方不得采取私人报复，而假如他如此做，他的错误将成为公共罪行。
>
> 罗马人不得在撒丁或非洲建立城市，或是停留在撒丁或非洲超过他必须取得补给或修船的时间。假如他被飓风吹来，他必须在五天内离境。
>
> 在西西里的迦太基行省以及在迦太基城，他可以进行交易，贩卖任何允许公民贩卖之物。迦太基人在罗马亦是如此。

在条约中迦太基人再度强调拥有非洲以及撒丁；他们严肃地坚持这

主张，禁止任何罗马人接近。然而他们以不同词语来提及西西里，仅提及臣服于他们的部分。罗马人在提及拉丁姆时，亦以相同方式禁止迦太基人侵犯阿狄亚、舌切易以及特腊契纳人民。这些是拉丁人领土中濒临海岸的城邦，这些是条约所涉及者。

25.罗马人与迦太基所签订的第三个以及最后一个条约，是在皮洛士入侵意大利时，迦太基发动战争占有西西里之前。[47] 这条约保留之前所有的协定，但加上下列条款：

> 假如罗马人与迦太基人签订一个写下的联盟协约，来对付皮洛士，他们必须以如是方式签订，所以他们能在他当时进行战争所在之领土那方，给予彼此协助。
>
> 无论何方需要协助，迦太基人必须提供船只来进行运输及军事行动，但各方必需支付己方之人。
>
> 迦太基人在有必要时，必须协助罗马人，但没人可以强迫水手下船，违反其意志。

在这些不同条约中所宣誓之誓言如下。在第一个条约中，迦太基人以其先祖之神明起誓，而罗马人根据古老习俗，以朱庇特·圣石（Jupiter Lapis）起誓，而在第二个条约则以战神（Mars）和逵律纳斯神（Qurinus）起誓。以朱庇特·圣石起誓之誓词如下。对条约进行宣誓之人在手中拿一块石头，然后以他自己国家之名发誓。他说：

> 假如我遵守誓言，愿所有美好之事皆为我有：但假如我在思想或行动上并非如此时，且让所有其他人在他们土地上安居乐业，受自己法律管理，拥有自己的资产财富、神殿庙宇以及祖宗坟茔，但唯独我有如此石，被抛弃不顾。

说完这些话，他从手中将石头丢弃。

26.因为如此条约确实存在，直到今日保存于铜碑之上，典藏于朱庇特·卫城神庙旁市政官的国库里，所以我们在阅读史学家费利纳斯关

于这议题的作品时，心中只有惊讶。并非其无知令人惊讶，因为即使在今日，那些在年龄上与有关时代最为接近之罗马人和迦太基人，且对公共事务最为娴熟，也不知晓这些记录。令人惊讶的是，他如何以及根据何种权威来坚持相反之事，亦即，罗马和迦太基有条约，根据条约罗马人必须避开整个西西里，而迦太基人则远离整个意大利，接着罗马在他们首次渡海到西西里时，破坏条约及誓言，但其实在当时或在之后，并没有如是文件存在过。但是费利纳斯在他的第二书之中花费篇幅谈论。我在本书导论处曾提及这议题，但是保留较详细的讨论到这地方；[48] 我的理由是因为许多读者依赖费利纳斯对此议题的处理，因此恐被误导。至于罗马人渡海进入西西里一事，假如有人打算因为他们结交、之后协助那些奸诈地占有迈萨拿及瑞吉温的战神之子，而去责备他们，那他的确有道理去谴责罗马人的行为；但假如他认为他们在前往该处时，就已经违背誓言或协定，那显然他不清楚其中的真相。

27.在争夺西西里的战争结束后，又签订一条约，其条款如下：

> 迦太基人必须撤离西西里以及意大利与西西里之间所有的岛屿。[49]
>
> 双方盟友都必须免于另一方的攻击。
>
> 任何一方皆不可在另一方之领域内强加贡赋，或建立公共建物，或是招募士兵，亦不得和另一方的盟友结盟。
>
> 迦太基人必须在十年之内支付两千二百泰伦 [50] 银钱给罗马人，其中一千泰伦须立即支付。[51]
>
> 迦太基人必须交还给罗马人所有的战俘，不得要求赎金。

后来非洲内战结束，罗马人大张旗鼓通过决议，对迦太基宣战后，以下条款又加入已经提及的条约中：“迦太基人必须撤离撒丁，并缴纳另一笔一千两百泰伦 [52] 的数额。”

在上述所有条约后的最后一次协议，是由西班牙的哈斯德鲁巴所订，其规定如下："迦太基人不得武装跨越埃布罗河。"这些是从最早到汉尼拔时代为止，罗马人与迦太基人之间曾存在的双边责任条约。

28.根据以上资料，虽然我们或许可以说罗马人跨海进入西西里，没有违反任何条约，但关于后来强加撒丁条款，最后导致第二次战争，则无法为罗马的行为找到任何合理的根据或借口。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事件上，在违反所有正义下，迦太基人迫于自己处境的必要性，因此撤离撒丁，如我已说，并支付增额的赔偿金。

罗马人为了辩护他们自己的要求，声称说在非洲的内战过程中，迦太基人伤害来自罗马船只的船员，但是他们在接回所有被带到迦太基的罗马船员时，其实已经开脱对迦太基人这样的指控，而且他们也以不要求赎金，释放所有迦太基的战俘，作为表示恩惠的回报。在之前的一书中我已经叙述过这些事。

在确认这些事实后，我们仍须彻底调查，究竟这两个国家的哪一个要被视为汉尼拔战争的始作俑者。

29.我已经记录下迦太基人在辩护时应该要说的话，现在则要陈述罗马人的答复。当时萨贡托的沦陷激起普遍愤慨，而他们确实在当时并未使用这些辩论，但是这些辩论后来在罗马的许多场合中，被许多不同的人提出，作为诉求。首先，迦太基人胆敢提出其中没有包括如当时卢塔提亚斯所提出条约里的"本条约若被罗马人民所接受，将会生效"的但书，但罗马人仍坚持与哈斯德鲁巴的协议不能被视为不存在。相反地，哈斯德鲁巴已经断然无条件地承诺："迦太基人不得武装越过埃布罗河"。再者，有关西西里的条约包括这条款——如迦太基人自己承认的——"每方的盟邦免于另一方的攻击"，而这不仅只适用于——如迦太基人所诠释——那些在当时为盟邦者。假如这是实情，那进一步的条款应该再加入，或是排除双方与当时既存之盟友外的其他结盟，或是规定那

些之后被接纳为盟邦者，不该享有该条约之益处。然而，既然没有加上这样的条款，很明显地每方皆保证另一方所有的盟友，无论是当时已存在的，以及之后被接纳的，都应该免于受到攻击。这听起来十分合理，因为双方当机会发生时，当然不会签订条约来限制他们去接纳任何似乎对其有利的盟邦；同样地，假如他们已经接纳任何民族在他们的保护之下，也当然不会去忽视任何其他国家对盟邦造成的伤害。相反地，当双方在订定条约时，心中的要点是去避免攻击另一方既有的盟友，以及绝不接纳其为盟友。至于后来的结盟，对此这条款特别适合，他们承诺不会在彼此的行省，或是与其结盟的领土内，招募士兵或征收贡赋，以及双方所有盟友都必须免于受到另一方的攻击。

30.既然事实如此，萨贡托人在汉尼拔之前许多年，已经将自己置于罗马人的保护之下，则是不容争议的事实。[53] 这点最重要的证明，而且也被迦太基人接受，是当萨贡托发生政治动乱时，人民并非求助迦太基人来出面仲裁，即使他们近在咫尺，也在西班牙扮演积极角色，反而是转往求助罗马人，并在他们协助下，恢复政治局势的秩序。于是乎，若我们认为萨贡托的毁灭是汉尼拔战争发生的原因，那迦太基人应该被论断在发动这冲突时，是错误的一方，这不仅是卢塔提亚斯条约的观点：规定每一强权的的盟友都免于另一方的攻击；也是哈斯德鲁巴协议的观点：迦太基人承诺不会武装渡过埃布罗河。但另一方面，假如我们认定战争原因是罗马人兼并撒丁以及向迦太基人勒索增额的赔偿，那我们必须同意后者有好的理由来进行战争。正如之前他们受制于环境，所以他们现在善用局势，来反击报复那些曾经伤害他们的人。

31.有些缺乏批判能力之人或许会认为我无须以如此细节来考量这些。我的答复是：如果有任何人自认如此自给自足，足以应付任何事件，那我必须接受有关过去的知识虽然美好，但对他并非必要。但假如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人在进行私事或公事时，可以自认能如此全知全能（因为没有有识之士，即使现在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可以完全确定未来

之事），我仍将坚持对过去事件的知识，如我现在所描述者，不仅只是美好之事，而是绝对根本必要的。

且让我们思考三种想必经常发生的状况。让我们想像一位政治家，因为个人处境或是因为国家蒙受不公不义而被伤害；或是一位急于去获得某些财产，或是等待敌人攻击；或是最后一位，对现状满足之人。在这每一种情形中，都可从过去的历史收到指示：在第一个状况下，要如何寻找支持者及盟友；在第二个则是要如何激发他希望合作之人采取行动；而最后一项则是给予其他人适当的刺激，来确保自己原则的成功，以维持现状。因为所有人都倾向于将自己调整来适合眼前的状况，并且采用当时环境所必须之任何特性，所以甚难辨识出每个人真正的原则为何，因此真相经常就被模糊。但是人类过去的行为，可以被实际发生的事实加以测试，透露出他们政策及意图的真正性质，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从何处去寻求感激、友善以及希望，但在什么地方却只有相反的东西。依这方法我们会有很多机会学习到谁可能在我们沮丧时来安慰我们，与我们同仇敌慨，与我们并肩作战对付敌人。在我们一生中，所有这些都是大有助益，无论于公或于私皆然。因此可从这里引伸得知，历史的作者或读者皆不该将注意力只集中在事件的叙述上，而是必须思虑之前、现在以及之后的事件。因为假如我们从历史中移除掉何以、如何以及为何每件事会被进行，以及这结果是否我们可以合理期待，那我们所剩下的不过是描写技巧的单纯展现，而非道德教训；这些技巧虽然可以暂时讨好读者，但对未来却没有永恒的价值。

32.因为这理由我希望去更正那些因为本书所包括之书数，认为我的作品难以取得，以及难以阅读的误解。去阅读四十册，册册相连贯，宛如在一块完整的布匹中，针针线线紧密缝织一起，借由从斯巴达克里奥米尼斯流亡埃及，到罗马人和亚该亚人在科林斯地峡发生战争的连续性陈述，呈现出一幅清晰图像，清楚描绘发生在意大利、西西里、非洲等地，从皮洛士到迦太基沦陷，以及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件，这比

起去阅读或收购那些处理个别事件之作品，是件远远更为简单之事。除了将它们加起来，会是我作品的许多倍外，读者也无法从那些作品中确知任何事实。这其中的理由是：第一，因为它们大多数都对相同之事，提供不同的叙述；第二，它们省略了那些“同时发生”的事件。因为我们可以借由比较，来评估这些事件，这比将每件事孤立看待，更能得到一个远远更为可靠的普遍图像；以及最后，因为许多最重要的因素明显地超出它们所能掌握的。这是我的论点：历史作品最重要之处在于考量事件之结果，伴随它们的环境以及特别是它们所有原因。于是我认为罗马与安条克三世的战争源自罗马与菲利普五世的战争，而与菲利普的战争，源自汉尼拔的战争，而汉尼拔的战争源自为争夺西西里的战争，而其他之间的事，无论其如何繁多与不同，皆可回溯汇聚到相同的基础上。[54] 所有这些倾向皆可以从全面的历史来加以辨识与理解，但对处理个别战争的历史，如只针对佩尔修斯或菲利普的战争，则无法如此，除非有人认为仅需阅读包含在那些书中的战事报告，便可以清楚了解整个战争之规划以及执行。但这绝非如此；我认为我的作品远远优于这些个别事件的历史，正如学问之优于纯然的道听途说。

33.我是在罗马特使在迦太基被接待这一点，从原来的叙述开始离题。当他们听完迦太基人对自己立场的陈述后，特使回应时不发一语，但代表团中的资深成员指向他身为罗马公民所穿长袍（toga）的怀中，向元老院宣布说：在他的怀里，他同时带来了和平与战争，而他们究竟要他留下哪项，他便会让那项落下。迦太基执政官（Suffete）回应说，他应该拿出来任何他认为最好的，而当特使回答说这将是战争时，许多迦太基元老立即喊出“我们接受它！”在这样的言词交锋下，迦太基元老院和罗马特使分道扬镳。

这时，汉尼拔正在新迦太基过冬。他首先解散西班牙部队，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城镇，希望借此让他们随时准备以及乐意接受下一次的征战。他接着指示他的弟弟哈斯德鲁巴，万一他恰巧不在国内时，要如何

治理西班牙以及需做何准备来对付罗马人，防卫行省。除此之外，他也为非洲安全预作安排。在这点上他采取有效且具有远见的措施：他将西班牙军队驻扎在非洲，也以非洲军队驻扎在西班牙，以这种方式来巩固两边对彼此的信赖及忠诚。前往非洲之军队系来自特西台人（Thersitae）、[55] 马斯提亚尼人（Mastiani）、[56] 伊比利亚种的奥瑞特斯人（Oretes）[57] 和欧凯兹人，[58] 人数共计一千两百名骑兵以及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名步兵。除了这些外，尚有八百名巴利阿里（Baleria）人。他们以意味"投掷手"（slingers）的字眼来称呼他们，而根据他们的这种技巧，他们也用来称呼这民族以及他们世居的岛屿。大多数这些部队被安排驻扎在北非海岸迈塔冈尼亚（Metagonium）地区，一些则是在迦太基城。

四千名步兵从迈塔冈尼亚被派送到迦太基，加强首都防御，同时作为人质。在海军部队，他留给他的弟弟哈斯德鲁巴五十艘五层舰、两艘四层舰及五艘三层舰，其中三十二艘五层舰及所有的三层舰皆有足编的人员配置。他也提供给他一支骑兵队，系由四百五十名利比亚以及利比亚-腓尼基人、三百名伊勒盖特斯（Ilergetes）人和一千八百名努米底亚人组成，后者是由居住非洲沿海地区之马赛利人（Massyli）、马色赛利人（Masaesyli）、马凯伊人（Maccaei）以及摩如希人（Maurusii）所构成。哈斯德鲁巴的步兵武力由一万一千八百五十名利比亚人、三百名利古里亚人和五百名巴利阿里人所构成，外加二十一头战象。

关于汉尼拔有关战争布局之细节的准确性，读者不应诧异，虽然任何实际负责动员部队之人必然也会觉得难以提出准确数字。但同时，若我看起来好像在模仿那些设法让他们欠缺准确的数字看起来可信的史学家，我也不应该被责怪。这个中事实是，我自己在拉辛尼安（Cape Lacinium）[59] 发现一个铜碑，这是汉尼拔在意大利时，自己将这些细节刻写下来，而因为我认为这是件绝对可信之证据，我因此毫不迟疑地采用它。

34.在汉尼拔准备好所有确保非洲及西班牙安全的必要措施后，他仍然焦虑地等待从凯尔特民族回来的使者。他充分理解在阿尔卑斯山脚下以及靠近波河等地区的物产富饶、人口稠密、人民作战时的勇武，以及特别是他们对罗马的仇恨，这仇恨自从稍早的战争后一直持续下来，而我在上一书中已经形容过这些战争，以便让我的读者可以掌握我现在即将要叙述的。因此汉尼拔对这些部落怀抱极大希望，费尽心思，派遣特使，给凯尔特部落领导人慷慨的承诺，不仅是对那些居住在阿尔卑斯山以南之地，也包括那些住在山中的。他相信假如在克服长征路途的艰辛后，他能抵达凯尔特人的领土，与他们成为征战的盟友及伙伴，他才能够将与罗马人的战争带进意大利。

最后他的使者回报：凯尔特人愿意合作，并热切等待他的到来；他们也报告说阿尔卑斯山的路途极为辛苦艰难，但并非无法通过。于是在春天来临时，他从各地过冬地区号召部队。同时，他也听闻罗马使节在迦太基之事，这结果提振了他的士气，并且相信他已经得到国内群众热情的支持后，他公开呼吁人们要加入对罗马的战争。[60] 他提醒他们罗马人是如何要求迦太基将他及所有军队里的资深军官都交给罗马，但同时他也告诉他们，他们即将要入侵之国的富有繁荣，以及高卢人的善意和积极支持。当他见到士兵如他一样急于出动，他赞美他们的精神，命令他们准备在指定之日出发，然后说完后解散集会。

35.他已经在冬天完成我形容的准备工作，也安排好非洲及西班牙的安全，他在指定之日，开始率领约九万步兵及一万两千骑兵的军队出发。在横渡埃布罗河后，他开始降服远至比利牛斯（Pyrenees）的伊勒盖特斯、巴股希（Bargusii）、艾瑞诺希（Aerenosii）和安多西尼（Andosini）部落。他成为所有这些领土的主人，以强攻取下数城，并以极惊人的速度完成征战；但他也涉入几场激烈战斗，蒙受一些严重损失。他留下汉诺来统领埃布罗河以北的领土，并将巴股希人置于他弟弟全面的统治之下；因为他们对罗马人友善的态度，是汉尼拔最不能信赖

的部落。他从自己的部队中，分出一万名步兵及一千名骑兵交由汉诺统领，并托付他远征军所有的重型辎重补给。这么做他有两个目的：首先是留在后方一些对他怀有善意的人以及，其次，向其他西班牙人显示他们有很好的机会回家，不仅是那些与他一起服役的人，还有那些留守后方的人，所以假如他需要增援，他们所有人必将热烈响应。他率领已经摆脱重型装配的其他部队，人数约五万步兵及九千骑兵，强行通过比利牛斯山，前往横渡隆河。他所率领的部队令人敬畏，并非其数量上之强大，而是其高度的效率，因为这军队在西班牙部落的连续战役中，已经获得相当多的训练及锻炼。

39.在我们现在所提及的时代，迦太基人所统治的非洲系从大赛尔提斯（Greater Syrtes）的费莱纳斯（Altar of Philaenus）祭坛[61]起，到达赫拉克勒斯之柱。这海岸线的长度超过一万六千史台德（stade，约等于三○七二公里）长。他们也跨过赫拉克勒斯之柱旁的海峡，成为远及地中海海岸线中被称为恩波利亚（Emporiae）那地区海岬的西班牙主宰者；分隔凯尔特人与西班牙人的比利牛斯山在那地方与地中海相遇。这地点与地中海出口的赫拉克勒斯之柱距离约八千史台德（约一五三六公里）。构成这海岸线的各段距离分别为：从赫拉克勒斯之柱到汉尼拔出发远征意大利的新迦太基有三千史台德（五七六公里）；从那里到埃布罗河，二千六百史台德（一○八九公里）；从埃布罗河到恩波利亚约一千六百史台德（三○七公里），以及从恩波利亚到隆河渡口，约一千六百史台德（三○七公里）。这整条路的最后一段现在已经由罗马人详细测量过，每隔八个史台德（一点五二三六公里）即有里程碑作为标记。从隆河渡口，假如我们沿河溯流而上，远达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之通道关口的山脚下，距离是一千四百史台德（二六九公里）。汉尼拔即将穿越之通道会带到波河平原，全长约一千二百史台德（二三○公里）。因此从新迦太基出发，他总计必须行军约九千史台德（一七二八公里）的距离。[62]当他到达比利牛斯山时，就里程数来说，他已将近完成一半的行程，但是就困难度而言，他任务的更大一部分，仍然横阻在面

前。

40.汉尼拔设法越过比利牛斯山，凯尔特人因为在那里占据通道的自然天险，让他十分担忧。与此同时，罗马人从他们派遣到迦太基的特使口中，得知双方在那里表达的言论以及做出的决定。而汉尼拔及他的军队已经横渡埃布罗河的消息，[63] 比他们预想的来得更快；那时他们决定要派出执政官及军团到战场上，决定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到西班牙，而隆古斯（Tiberius Sempronius Longus）则到非洲。[64]

当他们正招募军团以及进行其他准备时，他们也计划在公民大会提案通过要在阿尔卑斯山这侧的高卢建立两个殖民地。他们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强化城镇的防御，命令殖民者要在三十天内报到；每个殖民城市各分派六千人入驻。其中之一建立在波河以南，名为普拉仙提亚（Placentia）；另一则在河的北侧，叫克里孟纳（Cremona）。这两个殖民地在高卢波伊部落反叛时，几乎尚未成立。波伊人一直在等待机会来摆脱对罗马的效忠，但都未发现有适当的时机。现在受到他们所接到的信息的鼓励，因为这等于告诉他们迦太基人已经近在眼前，所以他们可以脱离罗马，决定要放弃他们在战争结束时（这我在上书已经描述）所交出的人质。他们向英苏布里部落呼吁；后者对罗马人的怨恨亦是其来有自，所以欣然答应；然后这两个部落入侵划分给这两个殖民城市的土地，而当殖民者落荒而逃，他们追杀他们到另一个罗马殖民城市穆提纳（Mutina），并且围攻它。

在那些被包围之人中，有三位高阶官员，他们以专员身份被派遣来监督土地分配：前任执政官卢塔提亚斯（Gaius Lutatius）以及两位前任副执政。这三人要求和谈，波伊人答应；但当这三位官员离开城镇前来谈判，部落的人却奸诈地逮捕他们，希望利用他们来换回自己的人质。副执政曼里亚斯（Lucius Manlius）率领一队人马，占有防卫这地区的前进基地，在听到所发生之事时，前来救援。然而波伊人已经风闻他的

接近，便在他行军路线会经过的森林安排埋伏；在他一进入树林时，立即从各方起而攻之，杀死许多罗马人。幸存者最先是逃亡，但当他们抵达较高地形时，他们重组队伍，足够到使他们可以有秩序地进行撤退。但波伊人紧随而来，也在一个叫塔尼司（Tannes）的村落，将这支军队困住。当消息抵达罗马，第四军团已经被波伊人紧紧包围攻击，人民立即通过派出已经分配给西庇阿的军团，前往解围，由一位副执政负责统领，并命令执政官从盟友中再招募另一个军团。

41.我已经在第二及第三书，从最早时候到汉尼拔来临之间的事务以及结果审视过凯尔特人。

罗马执政官在这时候已经完成他们个别任务的必要准备工作，在夏天时[65] 启航，执行已经规划好的军事行动。西庇阿率领六十艘船前往西班牙，而隆古斯则率一百六十艘五层舰前往非洲。后者看起来似乎准备一支规模宏伟的大舰队：他从各处聚集兵力，在利利贝乌姆进行如此有野心的准备工作，所以给人印象是他将航向迦太基，立即展开围攻。在同一时间，西庇阿则在五天内，沿着海岸航行到利古里亚，从匹赛（Pisae）横渡到马希利亚（Massilia）附近地带，在隆河第一个出海口处下锚，这被称为马希利亚河口，然后卸下部队。他得知汉尼拔正在通过比利牛斯山，但因为路途所经国家的地形困难和之间凯尔特部落的数量，所以他确定迦太基人仍然有许多里路要走。

可是汉尼拔已经贿赂一些凯尔特人让他通过，并以武力强行通过其他人的领土。然后他持续行军，保持撒丁海在其右侧，突然他与他的军队出现在隆河的渡口，远远在任何人可以预期到的时间之前。当他抵达的消息通报给西庇阿，这位将军几乎无法置信敌人前进的速度竟然如此快，但他急于发现真相。他因此派出由最勇敢之三百名骑兵组成的侦察队，与一些凯尔特人同行；这些凯尔特人曾以佣兵身份和与罗马友好的马赛人并肩作战，现在则作为向导以及辅助部队。他自己留在后方，让

他的部队在旅途困顿后，得以喘息，并和军团营长商议最佳地形来与敌人交战。

42.与此同时汉尼拔已经抵达隆河附近，他立即设法在隆河仍是单流、距离大海有四天行军路程的地点渡河。他使用各种资源来和当地居住于河边的居民结交友好，并且买下他们所有的独木舟及木筏，数量极多，因为隆河河谷许多居民从事海上交易。他也从他们那里取得许多圆木，适合制作独木舟，所以在两天之内他已经聚集了数不胜数的小型渡船，因为在这种状况下，每个士兵都急于不去拖累旁边的人，以一己之力来寻求横渡的机会。但同时也有一大群野蛮人聚集在河对岸，阻止迦太基人渡河。汉尼拔注意到这一点，认为他无法在如此庞大数量的敌人之前强行渡河，但也不能停留原处，因为担心各面受敌。于是在第三夜，他分派出部分军队，给他们当地向导，由迦太基执政官波密卡（Bomilcar）之子汉诺率领出发。

这支分遣部队沿着河岸溯流上行约两百史台德（约三点八四公里），在那里隆河分流，形成小岛。他们在那里停留。他们发现四处有许多木材可用，于是将这些木头捆绑或是钉在一起，很快就制造出许多木筏，这些对现在的目的而言算是足够坚固；他们借着这些木筏安然渡河，没有阻碍。他们占据一处地形险要的阵地，休息一天，部分是在消耗如此多体力后，需要恢复气力，但部分是要准备他们受命要执行的任务。汉尼拔在同一时间也全心为主力军队投入类似准备；如何让三十七头战象可以过河，是他最大的问题。

43.在第五夜，[66] 汉诺的部队在日出稍早前已先行出发，在河的另一岸顺着河流流向，往野蛮人的军队方向前进。这时候汉尼拔已经准备好部队，等待渡河的时机。他的船只装满轻骑兵，独木舟则是载着他最轻装的步兵。大型船只被安置在比较上游的地方，直接面对水流，较轻型的则在其下游的地方，这些较重的船只可以减缓水流的力量，而使得

独木舟在横渡时比较不容易暴露于危险中。关于马匹的计划则是它们应该在船后方游泳，在船后两侧各有一人，每人握住韁绳，引导三或四匹马前进；以此方法，有许多动物与第一波部队被带过河。当野蛮人看到敌人正企图要做的事，倾巢而出，散乱无章，因为他们确信可以轻易地阻止迦太基人登陆。

当汉尼拔看见预先安排的一缕缕烟雾信号，这代表汉诺的部队就在附近，他命令所有控制渡船的人登船，面对水流推进。这立即完成，结果一个非常戏剧以及惊悚的场面接着发生。在船上的人彼此打气吆喝，设法胜过彼此，全力对抗水流的力量。在这时候，两军在岸边对峙：迦太基人随着船只的进展，大声呐喊，同样陷入他们同伴那种与水流对抗、悬疑不决的痛苦，而野蛮人则发出战吼，挑战敌人一决雌雄。在这时候野蛮人已经完全离开他们的营区，汉诺在对岸的部队突然发动攻击。有些人放火烧营，主力部队则攻击那些阻碍渡河的人。野蛮人完全措手不及；有些人冲回营区去抢救他们的帐篷，其他人则抵抗来自后方的攻击。汉尼拔见到战争完全依照他的意图进行，立即在部队登陆后，组成第一部分，向他们说几句话，然后立刻与野蛮人交战。凯尔特人没有时间去整顿队伍，再度被这阵式弄得不知所措，于是开始转头逃命。

44.迦太基统帅因此控制桥头堡，击败敌人，并立即着手将还留在对岸的人马运送过来。在很短时间内，他运送全军过河，当晚在河边扎营。次日早晨他得知罗马舰队在隆河口外停泊。那时他挑选五百名努米底亚的骑兵，命令他们侦察地形以及敌军数量，并观察他们的活动。他同时下令那些负责要将战象渡河的人开始工作。接着，他检阅士兵，将从波河平原来访的马吉勒斯（Magilus）及其他凯尔特部落的人介绍给军队；他们依据他们领导人所说，借着翻译向迦太基部队解释凯尔特部落的决定为何。对汉尼拔人马鼓励最大的是，第一，特使真正地现身，邀请他们前往，并承诺他们会并肩作战来对付罗马人；第二，迦太基人对高卢人承诺要引导他们行走一条路径，不仅有丰富补给品，而且会迅

速及安全地到达意大利。此外，高卢特使对他们即将前去之国家的规模及财富，以及并肩作战对抗罗马人的积极精神，着墨甚多。

在他们向军队说出像是这样的话之后，凯尔特人退出，汉尼拔向前对他的人马说话。他以回忆他们过去的成就开始，提醒他们说，虽然他们已经参加过许多危险军事行动，参加过许多战争，当他们依照他的计划以及建议时，他们从未输过。接着他敦促他们要充满士气，因为他们已经强渡大河，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中最困难的部分，并且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盟军的善意及随时的协助。他呼吁他们要有信心，将细节留给他，因为这是他的职责，并且要服从命令，表现出自己是有勇气的人，配得上他们过去的纪录。军队以高度热情及热烈掌声来接受他的演说。那时汉尼拔称赞他的人马，为所有人向神明祷告，然后解散。他下令他们要充分休息，以全速做好准备，因为次日便要行军出发。

45.在散会后，前往侦察的努米底亚骑兵回到营区；大多数人已经被杀，其他则仓皇逃回。在相当靠近罗马营区时，他们遇见西庇阿所派遣出来进行相同任务的罗马骑兵。他们以如此勇气以及愤怒交战，所以罗马人及凯尔特人约损失一百四十名，但努米底亚人则超过两百名。在这行动后，罗马人骑马紧追，直到迦太基营区；他们做番观察后，扬长而去，警告他们的将军，敌人已经到达。他们平安抵达罗马营区，进行报告，在那时西庇阿立即将军队的辎重全数上船，然后率领全军沿河而上，希望遇见迦太基人。

在举行集会之次日凌晨，汉尼拔派出他所有的骑兵往大海方向前进，作为掩护部队，并且命令步兵离营，开始行军，但是他自己则等待战象以及看守它们的人过河。战象被运送过河的方式如下。

46.他们制作一些坚固的木筏，然后将其中两个捆绑在一起，牢固地固定在木筏下水之处，[67] 这两个木筏加起来的宽度约为五十尺。其他木筏则在河面上固定，所以形成一座突向河心的浮桥。浮桥面向河流

上游的那端固定在岸边的树木上，所以整个结构在定位上应该牢靠，不会因水流而移位。当整座浮桥延伸至约二百尺的长度时，他们以两座构造坚固的木筏来联接浮桥远端；它们之间牢固地捆绑在一起，但却以如此方式联接，所以绳索固定之处可轻易砍断。它们以数条缆绳将中间的木筏固定；这些缆绳是由拖动木筏的拖船所牵动，避免它们被带往下游，所以要面对水流将它们固定，然后将在上面的战象运送过河。接着他们在串连在一起的木筏所形成的堤道上堆积许多土，直到表面与河岸等高，让它看起来像是道路，可用来过河。战象习惯听从印度驯象师，但是在它们到达岸边则绝不肯冒险下水。这次他们引导战象走上这覆土堤道，前有两头母象引路，其他则服从地随后。在它们站在最后的几个木筏时，固定它们的绳索突然被砍断，船只立即接受拖曳缆绳的拉力，立即从堤道拉离战象所占的木筏。在这时，这些动物变得惊恐，最先是转身，开始往各方向移动，但是在那时它们已经在各方向被水包围，恐惧最后强迫它们保持安静。用这方式以及不断地在浮桥末端加上新的木筏，他们设法让大多数的动物走过这些木筏，但一些动物是如此害怕，所以在过河到一半时，跳入河流。这些动物的驯兽师都淹死，但是战象却得救，这是因为透过象鼻的力量及长度，它们可以使象鼻保持在水面上，透过它呼吸，并且将由口进入的水给吐出来。因为这方式，所以它们大多数都存活下来，以步行渡河。

47.在战象被以如是的方法运送过河后，汉尼拔将战象与骑兵组成押阵的部队，沿着河流往上移动，往东离开海岸而行，宛如他在向欧洲中心内陆前进。隆河源头是在越过亚得里亚海湾，[68] 在阿尔卑斯山北坡向西之处，然后往西南流，注入撒丁海。在它的流经过程中，它穿过一座深谷，在其北侧住有阿戴耶斯（Ardyes）的凯尔特部落，而其南侧完全被阿尔卑斯山北坡围住。我在之前段落中详细描绘的波河平原，被一系列始于马赛、延伸至亚得里亚海这山脉的高峰所阻绝，而与隆河河谷隔离。汉尼拔现在要经由隆河河谷，横越这山脉，进入意大利。

有些作家在报道这次攀越阿尔卑斯山时，因为希望要以对这些高山奇景的描述取胜，来让读者印象深刻，于是落入两种最违反历史精神的罪恶；我的意思是这些是扭曲事实以及自我矛盾的陈述。例如，他们呈现汉尼拔为一位有无比勇气及远见的统帅，但同时又显示他完全欠缺判断力。然后在其他地方，他们发现自己无法由他们所陷入错误迷宫之中脱身，他们于是引进神明以及神明儿子进入到那被认为属于事实的历史。他们向我们显示阿尔卑斯山是如何地崎岖难行以及无法接近，所以最灵活的步兵亦难以通过；与此同时，他们又将这国家呈现地如此荒凉，所以若没有某神明或英雄遇见汉尼拔，向他指路，全军必然覆灭，没人幸存。这类的报道是我所提及两项罪恶中的典型：它们是既错误又自我矛盾。

48.首先，有任何人可以想像出比汉尼拔更欠缺先见之明或更笨拙的将军？发现自己统领一支庞大军队，并将所有远征成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此，但却如这些作家所认为的，完全不熟悉这国家的道路及形貌，丝毫不知他现在行军何处或对付何敌，或甚至是究竟整个远征究竟是否可行？换言之，这些作家所认为的是：汉尼拔因为未曾经历过败战，来顿挫他追求胜利的高远希望，必然会投入到一位曾经遭受全面挫败、无计可施的将军绝对不会采取的计划，亦即将军队带到完全陌生的国度去。以相同的方法，他们描述这国家的荒凉萧条以及路途的陡峭和无法出入，但这些都是明显地不正确。他们没有说明住在隆河的凯尔特人在汉尼拔到达之前，不止一次或两次，而是在许多次的情形下，而且不是在遥远的过去，而是相当近来之事，出动大军，横越阿尔卑斯山，与波河的凯尔特人并肩作战，对抗罗马人，这些我在之前一书已有提及。这些作家甚至没发觉到，其实有相当多人居住在阿尔卑斯山，但因为昧于所有这些事实，所以他们报道说有某位英雄显灵现身，向汉尼拔指点迷津。这种说法的自然结果是他们陷入与悲剧作家相同的困境，他们所有人都要用“从剧场道具出现的神明”（deus ex machina）来化解因为他们是基于错误或不可能的假设，而造成的故事情节。同样地，这些史学家

必须诉诸神明或英雄显灵，因为他们叙述的基础是不正确或没说服力的。因为要将理性的结尾建立在非理性的开始，那如何可能呢？

当然，汉尼拔并不是以这些作家所影射的方式来行动，而是以健全的常识来进行计划。他费尽心力了解他所计划要进入地区的天然财富，以及当地人民对罗马人所怀的仇恨；而且为了克服路途困难，他雇用即将加入他欲讨伐国家的凯尔特人，作为他的向导以及斥候。我有信心地说出这些事，是因为我曾质问过实际现身在这些场合的人，有关环境的问题；而且为了取得一手资讯及证据，我也曾亲身探索这国度，横越阿尔卑斯山。

49.汉尼拔渡河后，再度行军前进三天之后，执政官西庇阿抵达迦太基人横渡隆河之处。他对于敌人已经往前推进深感惊讶，因为他过去相当确定他们永远不会经由这条路冒险进入意大利；部分是因为他们的人数，部分是因为居住这地区的野蛮人反复无常的天性。然而当他得知，他们已经甘冒这个风险，于是他匆忙折回到他的船舰，立即登上他的部队。接着派遣他的兄长到西班牙继续进行战争，自己折返航回意大利。他的计划是以全速通过伊特拉里亚，首先抵达迦太基人从阿尔卑斯山下来时所经过通道的山脚，来阻止敌人。

在这时候，汉尼拔在渡过隆河后前进的第四天，到达一个叫“岛屿”（The Island）的地方。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盛产谷物，以其自然孤立而得其名的地区。它形状呈三角：隆河及以色蕊（Isre）河形成这形状的两边，汇聚在其顶点。这三角形地带的面积与形状，与尼罗河三角洲类似，除了后者的底部是由大海形成，而尼罗河支流灌注其中；然而在此底部是由一系列难以到达或穿过（甚至，或许可说，确实无法接近）之高山群所组成。当汉尼拔到达时，他发现有两位兄弟争执王位，双方军队待命对峙。两位中之较长者接触汉尼拔，恳求他协助取得王位，汉尼拔答应请求，因为在目前的局势中，他很清楚如此行动会对自

己有利。的确在与这位王子联手，驱走他的敌手后，汉尼拔从胜利者那里得到一些宝贵的协助。新统治者不仅提供军队、大量谷物及其他补给，而且也以新的来替换老旧及磨损的武器，因此就在正确的时机，全部军队重新武装。他也为汉尼拔大多数的军队提供新衣及新鞋，这对他们横越阿尔卑斯山，带来极大助益。但他更提供一项比这更重要的协助：因为迦太基人对通过阿洛布罗克斯（Allobroges）人的领土充满顾虑，国王利用他的部队来守护他们的后方，因此以这方式使他们得以安全地抵达通道的山脚。

50.沿着河流[69]行军十天，这段路程大约一百里，汉尼拔开始登上阿尔卑斯山，而且很快地发现自己四周充满危机。只要迦太基人在平原时，阿洛布罗克斯不同的领导人让他们自行其是，因为他们畏惧迦太基的骑兵以及陪同他们的野蛮人。但就在后者返家离去，而汉尼拔的部队开始进入崎岖难行的地形，阿洛布罗克斯的领导人便聚集一支大军，沿着迦太基人必须攀行的路径，占领居高临下的地点。[70]假如他们对计划保密，必会完全消灭迦太基的军队，但结果他们的计划被知道；虽然他们对汉尼拔的军队造成严重伤害，但是他们自己一样伤亡惨重。汉尼拔得到情报，野蛮人已经占领那些有利地点，于是他在通道的山脚扎营。在那边停留时，他派遣一些高卢的向导去侦察地形，并且报告敌人布置以及一般状况。他们执行命令，发现敌人习惯日间在阵地值勤时武装待命，小心看守，但在夜间则撤退到附近城镇。所以汉尼拔根据这样的报告，修改计划，规划出如下的策略。他相当公开地与全军前进，并且当靠近那再往前一步，便会受到威胁的道路时，他就在仅离敌人一小段距离扎营。当夜晚来到，他立即下令点燃营火，并让大部分的部队留在营区。接着率领精选的轻装部队，通过隘口，根据敌人撤回到城镇时的习惯，去占领他们弃守的阵地。

51.在破晓时，野蛮人发现已经发生的事，最初并没做任何行动来进逼攻击。但后来他们看到长串的负重驮兽及马匹队伍，缓慢且困难地

沿着羊肠小径往上行走，他们被这样的机会诱惑，于是决定要去骚扰他们的前进。凯尔特人开始行动，从不同点立即进行攻击；迦太基人蒙受惨重损失，特别是马匹与背负行李的骡子，而这并非出自敌人之手，而是地形所致。前往山间通道的路径不仅狭窄崎岖，而且两侧有断崖绝壁，所以行进中最小的动作或失序，便会造成许多驮兽被迫与它们身上的负重一起掉落山谷。主要是马匹，因为当它们受伤时，便会带来这样的混乱：其中一些因为疼痛发狂，便会打转，与背负行李的骡子相撞，而其他则往前冲刺，将所有挡在窄路上的任何东西扫到旁边，让整队陷入混乱。当汉尼拔见到这状况，他了解即使那些可以从埋伏中幸存下来的人，假如在行李补给被摧毁殆尽后，也必将没有安全的机会，所以他率领一队前夜已经占据敌人阵地的人马，匆忙去拯救在队伍前头的那些人。他杀死许多阿洛布罗克斯人，因为他占有从较高地势攻击的优势，但是他自己部队的损失，仍是一样惨重，因为他主力部队的混乱失序已大大增加，而现在这些是同时来自于敌我两边人马，因为那些在较高斜坡上战斗的人制造出呐喊以及挣扎。唯独在他杀死大部分的阿洛布罗克斯人，并将其击溃，仓皇逃离回到自己领土后，残存的马匹及骡子队伍才得以在这段危险路途上，继续缓慢以及相当困难地前进。在这军事行动后，汉尼拔尽可能地聚集许多部队，去攻打进行突袭的敌人城镇。他发觉这城镇几乎空无一人，因为所有居民都被可以轻松掠夺的机会吸引，倾巢而出，于是他立即占据城镇。占领这地方带给他一些立即以及未来的好处：他找回一些背负行李的骡子及马匹，而且还有一起与驮兽被逮捕的许多人；他也发现可让他们食用两或三天的谷物以及牲畜。但一个更重要的收获是，这个胜利在附近部落中引起极大恐惧，所以那些住在靠近上坡路段的人，不敢再攻击他们。

52.他在当地扎营，休息一天，然后继续行程。接下来三天，他平安地率领军队继续下一阶段的路程；但在第四天，他又再度发现身陷险境。住在通路旁的部落联起手来，针对他设计出狡诈的阴谋。他们携带树枝、花圈来迎接他，这些是在所有野蛮民族中，被认为友谊的象征，

正如希腊人是用使者的权杖。然而汉尼拔一向怀疑这些人的信用，特别花费心思去发现他们的意图，以及这次接触的意义究竟为何。高卢人告诉他，他们都知道城镇被攻占，以及那些设法攻击他的人被歼灭之事。他们解释这正是何以他们前来会见他，因为他们不希望伤害他，也不想自己受到任何伤害，而且承诺从自己的族群中交出人质。汉尼拔不愿相信这些人的保证，迟疑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他决定，假如他接受交涉，那或许可以让他们和平一些，比较不会攻击他；但假如他拒绝，必将只会刺激他们公开为敌。那时野蛮人交出人质，提供给他大量牲畜，而且甚至毫无保留地任由他来处置，在那时汉尼拔相信他们，雇用他们为向导，来进行下一阶段困难的旅程。他们带路两天，但那时同一个部落已经聚集他们的武力，从迦太基人背后尾随而来，在他们通过一个险峻陡峭的隘口时，开始攻击他们。

53.若非他的顾虑未曾平息过，而且对可能发生之事有所预感，这次汉尼拔的军队必然会被全部消灭；他已经先将他的骡子以及骑兵安置在队伍前头，而重装武兵则在后押阵。押后的步兵掩护他的主力部队，并能压制野蛮人的攻击，所以损失没有比可能发生的还严重。但即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员、驮兽及马匹在攻击中死亡。敌人占领较高地形，可以沿斜坡移动，而有些人从那里推滚巨石，而其他人则近距离地以石块击倒他们的敌人。迦太基人陷入混乱，被这些战术弄得倍感威胁，所以汉尼拔与他一半的军队被迫在一块裸露的巨岩旁过夜，这提供了些许的保护。他在这里与自己的骑兵及骡队分开，等待去掩护他们前进的时机；在经过整夜的挣扎后，他们在极大困难下缓慢地脱离隘口。次日早晨，敌人已经消失，没有接触，所以汉尼拔得以再加入骑兵以及负重的驮兽队伍，前往通道的顶端。他不再受任何野蛮人集中的威胁，但在路途中的一些点，他还是受到零散团体的骚扰，他们利用地形来对他的前方以及后方发动攻击，并且抢走一些驮兽。他在这状况中，最好用的资源是战象，因为敌人被它们怪异的样子弄得十分惊恐，从未敢接近它们所在的那部分队伍。在行军第九天，汉尼拔到达通道顶端，在那里扎

营，停留两天来让他存活下来的部队休养生息，并等待落后脱队的人。当他在那里时，许多惊吓逃走的马匹以及甩下负重的骡子，意外地再加入队伍；它们跟着行军队伍的痕迹，在四处游荡后，回到营区。

54.这时是靠近昴宿星团（Pleiades）落下的时候，[71] 而且冰雪已经开始在山峰凝聚。汉尼拔见到他的人马因为经历过的苦难及相信横阻在未来的艰辛，士气委靡不振。他召集部队，设法提振他们的精神，而为了这目的，他特别依赖实际上就在他们眼前展开的意大利；因为这国家在这些山脉下是如此靠近，所以当同时对这山脉两侧以全景观看时，阿尔卑斯山似乎在其他地表景观中，突然高耸崛起，就像座城墙环绕的堡垒，在城市中突出一般。汉尼拔因此将他人马的视线转向波河平原，提醒他们将会有居住在那里的高卢人欢迎他们。同时，他也指向罗马城本身，以这方法用心去恢复他们的士气。次日他开始拔营下山。在这部分的行军中，除了一些伺机而动的强盗外，他没遇见敌人，但因为冰雪以及路径的危险，他丧失了几乎与上山时一样多的人马。往山下的路径既窄且陡，而人员及动物都因为冰雪，无法确定是否踏稳脚步，任何人只要偏离路径，或是失去平衡跌倒，便会从绝壁悬崖滚落下去。他们可以忍受这些危险，因为到这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了如此的不幸，但是最后他们抵达一个地方，那里的路径对战象，甚至对驮兽都实在太窄，无法过去。之前的山崩又已经流失约三百码的坡面，而最近的一次山崩，则让状况更糟。士兵在这时候又再度灰心丧志，变得近乎绝望。汉尼拔第一个想法是做出一条绕过的便道，避开断路，但一场新雪让任何进展都不可行，他被迫放弃这想法。

55.这些状况如此不寻常，几近怪异。新雪覆盖在原先就已积存的旧雪之上，所以极易地松垮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它刚降下，所以松软，也因为它仍不够深，所以当人及驼兽踩过去时，穿透到底下冰冻的雪时，他们不再陷下去，但却发现双腿在泥雪上滑动，就像人走在覆盖一层泥浆的平地。接下来的事让情况更加危殆。就人而言，他们发觉无法

在较下层的冻雪上，找到稳定的立足点，他们于是滑倒，而在他们用手及膝挣扎站起时，无论他们在沿途捉住什么，因为斜坡的角度是如此地陡峭，他们甚至更快滑倒。

至于动物，当它们跌下并设法站起来时，它们会打破下层的冰雪，然后它们和负重便会卡住，黏在地上，好像结冻，这是因为它们的重量以及旧雪的凝结状态。汉尼拔被迫放弃另辟绕行便道的想法，而是从山脊清除冰雪后，在那里扎营。接着他下令部队开始进行沿着峭壁开辟路径的繁重工作。然而在一天内，他已经开辟出宽度足以让骡队及马匹可以通行的道路；他立即将这些带过，在雪线之下扎营，并让动物觅食。接着他带领努米底亚人开始轮流修筑路径的工作。经过三天令人疲惫不堪的努力后，他成功让战象通过，但这些动物因为饥饿，所以状况相当可怜。阿尔卑斯山脉的山顶，以及靠近通道顶端的区域，完全没有树木，也没有植栽，这是因为从冬天到夏天终年不溶的冰雪；但是面向意大利的斜坡半途中，则是花草茂盛，密林覆盖，普遍相当适合人居。

56.在重新聚集所有军队后，汉尼拔再度下山，在离开我已经形容过的峭壁三天后，到达平原。他已经在敌人手中、在横渡不同河流以及行军过程中，损失许多人员，然而阿尔卑斯山的悬崖绝壁，以及难以通行的通道，不仅让部队损失许多人命，甚至更多的马匹以及骡子。从新迦太基出发的行军已经耗时五个月，而实际跨越阿尔卑斯山则是十五天，现在他则大胆地降临在波河河谷的平原，以及英苏布里部落的领土上。他所剩余的军队有一万两千名非洲步兵及八千名西班牙步兵，总共不超过六千名的骑兵；他自己在拉辛尼安记录他兵力的碑铭上，提及这些数字。

如我已提，大约同时，执政官西庇阿已经将大部分的部队交由其兄长葛耐尔斯（Gnaeus）·西庇阿，前去进行西班牙的征战，攻击哈斯德鲁巴，而他自己则带一小群人返航回匹赛。他接着通过伊特拉里亚，从

副执政手中接收驻扎边界、正与波伊人作战的军团。从那里他前进波河平原，扎营，等待敌军，迫不及待地希望进行一战。

57.既然我已经将我的叙述、两方将军以及战争本身带到意大利，我希望在开始形容军事行动之前，说一些我相信适合我所写之历史的原始史料。

有些读者或许会问，既然我所叙述之事多关于非洲及西班牙，何以我没多说一些在赫拉克勒斯之柱附近的地中海出口，或关于外海（Outer Sea）及其特色，或关于不列颠诸岛以及那里采锡的过程，或是有关西班牙本身的金矿及银矿，因为其他作家都对所有这些议题提供了长篇但彼此抵触的报道。我略过这些议题，并非我认为它们在我的历史中毫无一席之地，而是首先因为我希望避免经常打断我的叙述，将我的读者岔离全书的主题；其次，是因为我决定不要以任意的方式来提及它们，或仅是顺便一提，而是在我的规划中分配给它们适当的位置，因此提供我能力之内尽可能为真的形容。于是假如当我在我历史中到达如此位置时，我因为已经给的理由，却不去形容它们，那需要惊讶。但那些坚持要在每一点都要有有关地形的离题叙述，是无法了解他们其实像在晚宴中出席的美食家，浅尝桌面上的每样菜色，所以既没在品尝的时刻，享受到任何一道菜，也没有完全消化，从中得到任何好处。那些以如此方式来对待他们的历史研究的人，也不会在阅读时感受到真正的喜悦，或有关未来的道德教训。

58.历史写作中没有一个领域会比这一点更需要研究或修正。[72] 有许多证据支持这样的结论，但我或许特别能引用如下证据。几乎每位作家，或至少绝大多数的，会设法去形容位于已知世界里最极端的国家，它们的状况以及特征，但大多数都在许多地方犯下明显的错误。我们当然不可忽略他们的错误，而且我们要以适当的系统及方法来进行评论，而非任意为之或轻易带过；同时我们不该吹毛求疵，或是责怪他们，而

是去认知他们的成就，但同时修正其不完美之处；我们要经常牢记在心，假如他们活在我们的时代，他们也必然会修正及调整许多他们自己的陈述及声明。的确，在遥远的过去，甚难发现希腊人会去调查这些偏远的地区；这是因为在实际上无法做到。海洋具有如此多难以预测的危险，而陆路上则就更多。即或有人因为规划详细或是因为环境力量，而到达世界最遥远的界限，并不必然意味着他将能够达成其目的。这些区域中有些是如此野蛮，其他则如此荒凉，因此经常难以直接去观察现象，甚至因为语言差异，更难以取得实际上所观察到现象的资讯。再者，即或一个人能亲自目睹，做出见证，但他也难以做出节制有度的陈述，更难轻视旅行者所喜欢的奇人奇事，也更难因真相之故而选择真相，以及告诉我们不超过真相的东西。

59.在古代，这些问题让人不仅难以，甚至不可能对我提及之区域做出可靠的描述，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有所缺漏以及不准确，而疵议这些作家，及虑及他们写作的时代，而要因为关于这些议题，他们至少发现某样东西，对人类知识有所增长，来赞美敬佩他们。但在我们的时代，部分是因为亚历山大在亚洲，以及罗马人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帝国，几乎所有区域都已经可由海洋或陆路到达。与此同时，在希腊富于行动能力的人，在摆脱政治及军事野心的压力后有许多机会去进行探索或研究；从这里得知，我们应该能够获取关于之前不为人所知地区，一个更为真实及准确的图像。当在我作品中适当之处，引进议题时，这至少是我将会为读者建立，而对那些对如此之属感到好奇的人，详细地给予教诲，亦将是我的目标。事实上，正是怀着这明确的目的，我历经千辛万苦，穿越非洲、西班牙以及高卢，并在连接这三个地区之大海上，贴近它们西侧海岸航行；换言之，这是为了要修正之前作家不完整的知识，并使得这些地区亦为希腊人所知。[73]

在做完这离题叙述之后，我将返回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即将在意大利进行的激烈战斗。

60.关于汉尼拔在进入意大利后的兵力规模我已描述。在抵达后，他立即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扎营，[74] 因为他的首要关切是让部队休养生息。全军不仅从攀爬、下山以及行走山区崎岖路径的疲累中，受苦甚多，也因为缺乏物质供应及最基本的身体需求，而历经极大的困难，在持续的肉体负荷及欠缺食物的压力下，许多士兵已经陷入完全的绝望。因为要携带数以千计士兵足够食用的粮秣，是不可能的，而当失去驮兽时，大部分的补给也随之失去。结果是汉尼拔以三万八千名步兵及超过八千名骑兵渡过隆河后，他在通过山顶通道时，失去近半的兵力，如我所描述，而幸存者因为承受无止境的匮乏，最后从他们的外表以及一般状况来看，比较像是野兽而非人类。

汉尼拔于是把所有注意力投注在照料士兵以及他们的马匹上，直到他们在肉体及精神上都彻底恢复。稍后当他的军队已经复原，他得知居住阿尔卑斯山脚的陶律尼（Taurini）部落和英苏布里部落有争执，所以倾向于怀疑迦太基人。汉尼拔首先去接触他们，争取他们的友谊及联盟，但当他们拒绝交涉，他便在他们主要城镇之前扎营，并在三天内攻占它。他接着将所有抵抗的人全部杀死，而这动作在邻近部落引起极大恐惧，于是他们立即蜂拥向他输诚。其他住在这些平原的凯尔特部落已经从一开始时，便积极加入迦太基人，但是罗马军团已经前进越过他们大多数人的领土，现在处在他们以及自称为罗马盟友的人之间；他们因此保持沉默，而有些人甚至必须与罗马人一起服役。这因素说服汉尼拔不可再耽误，而是往前进军，采取行动来鼓励那些愿意与他冒险的人。

61.当他得知西庇阿已经与他的军队渡过波河，而且近在咫尺，这是汉尼拔心中所想到的计谋。首先他不愿相信这报告，因为他记得他在隆河渡河处才离开罗马统帅几天，但从马希利亚到伊特拉里亚的航程既难且长；此外，他也被告知意大利内从提蓝尼亚海到阿尔卑斯山的陆路同样相当长，需要辛苦的行军。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信差到来，都越来越详细地确认这项情报，他因此对西庇阿进兵的计划以及执行的方式，既

惊恐又折服。西庇阿的感觉也非常类似，[75] 因为他最初未曾预料到汉尼拔竟然会率领一支外国军队横越阿尔卑斯山，而且还假设汉尼拔若冒险进行的话，这远征注定失败。但在做完这些假设后，他发现汉尼拔平安，并且已经在围攻意大利的城镇。他对敌人的胆识及勇气至为震惊折服。

这些消息在罗马也造成相同的效果。他们最后知道迦太基人的消息是他们在攻占萨贡托，而这事件所引起的震撼才刚刚淡化。那时对付这局势所采取的步骤是派遣一位执政官到非洲，围攻迦太基城本身，并派遣另一位到西班牙，在那里对付汉尼拔。现在传来的消息却是汉尼拔和他的军队已经就在附近，而且实际上已经在包围意大利的城镇。事情的转变完全让权威当局不知所措，而在警觉之下，他们立即训令给利利贝乌姆的隆古斯，告知敌人已经抵达意大利，立即终止正进行的军事行动，全速返回，参加保护国家的防卫工作。隆古斯立即召集他舰队的所有船员，下令返航意大利。至于陆军，军团营长被训令要士兵进行宣示，规定他们要在某约定之日入眠前，[76] 亲自到阿里米努姆报到。这是在亚得里亚海岸旁，波河平原南边的城镇。因此大家在各方面都相当紧张，充满骚动，因为这状况是罗马人及迦太基人都没预料到的，使得双方对未来都感到极大焦虑。

【西庇阿在横渡波河后，决定要前进越过提契诺河（Ticinus），而双方军队在河的北侧彼此靠近。】

65.次日，双方统帅都沿着最靠近阿尔卑斯山的那段波河，将他们的军队往前推进；河流在罗马人左侧，迦太基人右侧。又次日，他们从收集粮草的人那里得知两军几乎已经接触；在那时双方开始扎营，停留在阵地中。在接下来的一天，两位将军率领出所有骑兵，然而西庇阿也另外带领标枪手，然后双方迅速横越平原前进，观察对方军力。每次一方前进，看到另一方因为移动所激起的烟尘，便立即形成作战队形。西庇阿将他的标枪手及辅助的高卢骑兵安置在前锋，并将其余部队列成阵

式，以缓慢步伐向前移动。汉尼拔将有上韁的骑兵以及所有重装骑兵单位布置在前方，直接率领他们往前到敌人处，在他两侧安排努米底亚骑兵，随时要做从侧边包夹的动作。

两位将军及两边骑兵因为如此急于交战，所以当双方阵线交锋时，标枪手竟然完全没时间投射出第一击。他们立即转头并从人缝中撤退到骑兵后的位置，害怕被往他们这边冲刺的骑兵践踏在铁蹄之下。骑兵队伍直接碰撞，有一阵子两边势均力敌；因为在战斗过程中，下马的人数甚多，所以变成骑兵与步兵的混合作战。但最后努米底亚骑兵成功从侧边包抄罗马人，并从后方攻击他们；而步行的标枪手，虽然最初逃离骑兵的冲刺，现在却被努米底亚人的数量优势，以及激烈进攻压制践踏。在这时候，从一开始就和迦太基中央交战的罗马骑兵，损失许多人，但却也能对敌方造成更大的伤害，不过现在却发现被努米底亚人从后方攻击。在这时候他们的队形瓦解四散，许多人往不同方向离去；只有一些人重新组队，留在他们执政官身旁。

66.在这行动之后，西庇阿撤军拔营，行军越过平原，到达一座横跨波河的桥梁，尽可能快速移动，好让他的军团在迦太基人到达前，先行过河。他观察到整个乡间地势平坦，而因为敌人在骑兵上占有优势，自己本人又受伤严重，他决定要将部队撤退到一个安全之所。就汉尼拔而言，他最先预计罗马人会以步兵来冒险一战，但当他看见他们已经放弃营区，便尾随在后，直到在提契诺河上的桥梁。他发现桥梁上的木板多已被拆除，但那些被留下来防守的人仍在他河流这侧的岗位上。他逮捕这支分队，约有六百人强。当他得知罗马的主力部队在那时已经远远在前，他立即掉头，以相反方向前进到波河，寻找出一个最容易在河上搭桥之处。在行军两天之后，他停下来，建造一条由船只组成的浮桥。他命令哈斯德鲁巴监督部队过河，但他自己立即先行过河，前去会见从附近地区前来的使者。在赢得骑兵的交战后，所有附近的凯尔特部落风闻结果，如汉尼拔从一开始便希望的，急忙宣布他们支持迦太基人，提

供补给，并送出部队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汉尼拔热情地接受所有这些依附的人，而在他的部队从河另一边过来与他会合后，他率领人马，沿着波河，但以与之前相反方向的路线前进；这次是顺流而下，刻意要找出敌人。

在这期间，西庇阿已经渡过波河，扎营在罗马殖民地普拉仙提亚；在此他努力照顾受伤的士兵，并调养自己的伤势。因为他相信已经将军队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不做任何移动。但在西庇阿过河两天后，汉尼拔在近处出现，次日则在罗马人清楚视线下摆出作战队形。那时没人出来攻击他，所以汉尼拔就在距离约六里处扎营。

67.在这时候，在罗马军队中服役的凯尔特部队，认为迦太基人的前景的确比较看好，于是在他们自己之中协调出一个计谋，但暂时在他们在营区内保持沉默，等待时机攻击罗马人。在这设有防御工事营区之内的所有阶层都用完晚餐后，他们退出休息。在夜晚大部分时间里凯尔特人等待着，但约在清晨哨兵值勤时，拿起武器攻击驻守在附近的罗马人。他们直接杀掉许多人，也伤害不少人，然后再砍掉他们杀死之人的头颅，投靠迦太基人。汉尼拔热情地欢迎他们：他向他们说了鼓励的话，然后在承诺他们适当的奖赏后，他派遣他们回到自己的城镇去，告诉同胞他们做了何事，敦促其他人加入，因为在这时候，他觉得一旦其他高卢人若得知他们自己国人对罗马人所犯下的叛逆行为，他们必然都会站在他们那边。与此同时，有个波伊人的代表团来拜访他，交出三位被派遣来分割他们土地的罗马专员，而如前所述，这些人是他们以诈术捉来的。汉尼拔感激他们的善意，对这些特使正式承诺他的友谊以及联盟。然而他则交还给他们这三位罗马人，建议他们小心看守，与罗马协商，换回自己的人质，正如他们原来的意图。

西庇阿深深关切这次叛逆性的攻击。他看得出其中危险，因为凯尔特人已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很不满，这新的举动或许会影响这邻近

地带所有高卢部落去投靠迦太基人，所以他决定要防范于未然。接下来的夜晚，他在清晨值更前拔营，行军前往特雷比亚河以及附近的高地，在那里他觉得可以依赖地形的天险以及邻近盟友的忠诚。

68.就在汉尼拔发现西庇阿已经离开，他先派遣努米底亚骑兵前去追杀，然后很快地也派出其他的骑兵，而他自己及其他主力部队，紧随在后。努米底亚人发现罗马军营空无一物，停下来将之焚毁，但这次耽误却对罗马人大有益处，因为假如努米底亚人立即跟上，并追上行李队伍，许多随行之人必定会被杀害，因为他们所行经之地形十分平坦。但事实是，虽然较多人成功地横渡特雷比亚河，但那些被安排在队伍后端的人，不是被迦太基人砍倒，就是被逮捕。

西庇阿带领他的人马渡过特雷比亚河后，扎营在第一个发现的山丘，用壕沟以及栅栏来强化阵地，在那里等待隆古斯和他的军队；同时，他特别注意自己伤口的治疗，因为他急于参加即将发生的战争。汉尼拔这一方在距离四、五里之处扎营；同时，附近的凯尔特人认为迦太基人的未来看好，提供给他们丰富的补给，并且随时准备在任何汉尼拔的军事行动或战役中，扮演他们的角色。

当骑兵军事行动的消息传到罗马，人民得知事情发展不如他们预期时，变得惊慌失措，但是不乏借口来说服自己这并非真正挫败。有些人责怪执政官操之过急，但其他人怪罪凯尔特人的恶意，这可由他们之后的弃逃证明。但一般而言，只要他们的步兵仍然完整无缺，人民对罗马军队最后胜利的信心，丝毫不会动摇。因此当隆古斯及其军团到达罗马，并行军穿过城市时，人民仍然相信只要这些部队在战场上现身，便可决定战事的成功。

隆古斯的人马完成他们的誓言，依约集合在阿里米努姆，而将军率领他们全速前去与西庇阿会师。这两支军队适时接触；隆古斯在西庇阿附近扎营，但在这之后，他必须让部队休息，因为他们已经从利利贝乌

姆到阿里米努姆连续行军四十天。在同一时间，他准备部队应战，与西庇阿举行多次军事会议，在那期间也让自己熟悉近来的事件，并与同事讨论在目前局势下应该采取的措施。

69.大约在这时候，汉尼拔占领克拉司提迪姆，同时掳获驻军以及储存的谷物，因为罗马把此城的防卫交给了一位原籍为布伦迪希温的人负责，但他却选择背叛，将城交给汉尼拔。汉尼拔为眼前的目的，立即使用这些谷物，但却大费周章地不去伤害战俘，而是无论到达何处，都展示这个行为。他的目的是要提供他的政策范例，让那些自认是因为战争所迫的人，不要惊慌或放弃希望，因为汉尼拔会宽恕他们。他重重地奖赏那背叛罗马，将城交出的人，因为他希望去吸引那些位居高位的人到迦太基这边。

但是，他发现有些居住在特雷比亚河和与波河河谷之间的凯尔特部落，虽已经和他签订和约，却同时与罗马打交道，因为他们相信这样一来，他们必将同时从罗马人及迦太基人那里得到安全。所以他派遣一支两千名步兵及一千名凯尔特和努米底亚骑兵组成的部队，去掠夺这地区。他们执行命令，搜刮大量战利品，那时凯尔特人立即出现在罗马人营区，要求协助。隆古斯长久以来一直想找机会来采取攻势，所以他立即捉住这机会，派出一支包括他的大部分骑兵以及一千名步行的标枪手在内的部队。他们迅速行军，为的是要在特雷比亚河那端赶上这些掠夺者；他在那里与敌人交手，争夺战利品，并强迫凯尔特及努米底亚人退到他们加强防御的营区。那些正在迦太基营区之前占据前面位置的人，理解何事发生，便召唤预备部队来支援他们受到压迫的同志，那时罗马人接着就被击溃，撤退到他们自己的营区。当隆古斯见此，便聚集所有剩下的骑兵以及标枪手，以这些部队增援，这次轮到凯尔特人被击败，并退回到安全的地带。迦太基统帅不打算进行全面的战争，而且立下一个原则：除非是经过刻意的选择，绝不被卷入到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当然也不可以出于冲动而任意发动。在这场合，汉尼拔的行动犹如一位优

秀将军所该为的：他制止撤退的部队，强迫他们停下，在靠近营区时转身稳住，然后才逐步撤退。他不允许他们追逐敌人以及交战，而是派遣军官以及号手去召回他们。罗马人暂时停留，然后撤军；他们损失一些人马，但对迦太基人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70.隆古斯在这次成功的喜悦中，被一股要尽快强迫敌人决战的野心所淹没。因为西庇阿受伤，所以他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处理局势，但由于他希望知道同事的意见，所以就这议题向他征询。然而西庇阿却对局势采取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相信军团将会从冬训中获益许多，而且凯尔特人反复无常、叛逆成性，只要迦太基人一旦不再赢得战争，被迫按兵不动，就不会继续保持忠诚，而是再次与他们最近的盟友决裂。他也希望在伤势治愈后，可以与同事携手，真正效劳。因为这些理由，他因此敦促隆古斯让局势保持原样。隆古斯深知这些辩论的每一项都是真实的，且无可避免。但却又立即被自己的野心，以及对好运有盲目的信心所驱使，盼望自己在战事中施予敌人致命一击。他急切希望战争可以在西庇阿能够现身战场之前，或是在新任执政官接任指挥权之前，便能发生，而这时机几乎已经来到。既然他所选择的交战时间不是由局势之事实来指定，而是出自个人动机，所以他的判断必然会出现问题。

汉尼拔对事态的看法非常类似于西庇阿，但却基于完全相反的理由：他急于引诱敌人进入战场，首先是为了利用凯尔特人的好战精神仍然旺盛；其次，则是要在罗马军团仍是生涩新兵，没有作战经验时，来和军团交战；再次，是要在西庇阿康复前，便已经解决这问题。然而最急迫之考量是他希望维持主动，不要让时间消逝，却没得到成功，因为当一位将军领军进入陌生国度，进行一场充满危险的战争时，他唯一安全的机会在于借着持续进行一连串新的攻击，来保持盟友的希望。这是汉尼拔的目的，而他会有这样的目的是因为他知道隆古斯性情冲动，即将要采取攻势。

71.汉尼拔在之前一段时间便已知道两边军营间有块平地，虽然平坦无树，却相当适合埋伏；此处被一条水道划过，高悬的两侧岸边，绵密地长满荆棘与刺藤，而在此处他要为敌人设下陷阱。他有很好的机会出其不意，让罗马人不知所措；罗马人会怀疑有树林的地点，因为凯尔特人惯于选择如此地形来进行突袭，但对无树的空间则无所畏惧。但他们忽略了以下事实：后者或许能较之森林更能有效地提供隐蔽及安全，来进行突袭，因为隐藏等待的人能有良好的远距离视线，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形下能有足够的掩护。一条有高悬岸边的水道，中间长有一定数量的芒草、蕨类，或某种荆棘植物，不仅能够遮掩步兵，假如能够有简单的谨慎安排，让有队徽的盾牌平放地上，并将头盔隐藏其下，甚至骑兵亦可得到遮掩。

汉尼拔将他对即将发生战争的计划，透露给他的弟弟马哥（Mago）以及幕僚中的其他军官。他们都同意这计划。所以汉尼拔在部队用完晚餐后，召来马哥；其人相当年轻，充满勇武好战精神，而且从孩童时期便开始锻炼士兵的战技；汉尼拔命令这年轻人率领一百名步兵及一百名骑兵的分队。在稍早之时，他自己已经亲自从军队中挑出这些最勇敢的士兵，并告诉他们在晚餐后到他帐篷报到。在那里他向他们说话，激发他们这场合所需的精神，并命令每个人再从他们的连队中挑选出十个最勇敢的人，并到营区一个他们知道的特定地点报到集合。他们执行他的命令；汉尼拔在夜里派出整支队伍，人数达一千名骑兵以及相同数量的步兵，在选定的地点埋伏。他提供这支分遣队向导，并指示他弟弟攻击的时机。在破晓时，汉尼拔亲自检阅努米底亚骑兵，队中所有的人都具有非比寻常的忍耐力；他向他们说话，承诺奖赏那些表现突出的人，然后命令他们前进到敌人的壕沟附近。他们要奔驰越过河道，设法丢掷枪矛引出罗马人，目的是要在罗马人吃早餐或任何战斗准备之前，即已经受到引诱而开始行动。他那时召集其他军官，激发他们的精神来迎接即将来临的冲突，并且下令全军吃早餐，并为军事行动准备好武器以及马匹。

72.当隆古斯见到努米底亚骑兵接近，他首先派出他自己的骑兵回应，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下令要与敌人接战。接着他派出一队约六千名的标枪手，然后继续从营区出动全军。他在数量上的优势，以及前天在骑兵行动中的成功，让他充满信心，他想像只要他的军队一出现，便能决定战局。但是时序已经进入十二月，气候变得酷冷，偶尔会有风雪，而且几乎所有人马在离营时都没吃早餐。最先他们有天生的高昂士气以及作战勇气来支撑，但他们必须渡过特雷比亚河，而这条河才因为昨夜在营区上方高地所下的雨，成为洪流，因为水深及胸，步兵难以横渡。结果是当这天持续下去时，整支军队就因为寒冷以及缺乏食物而开始深受其害。相形之下，迦太基人在帐篷里吃喝，为马匹梳毛整理，并围绕着营火，并为武器进行涂油以及武装。汉尼拔已经在注意他的机会，所以当他看到罗马人在横渡特雷比亚河时，他将长枪部队以及投掷部队，人数约八千，往前移动作为掩护，然后带出自己的军队。他前进约一里，然后将步兵以一列散开，有两万人强，由西班牙人、凯尔特人及非洲人所组成；至于骑兵，再加上凯尔特盟友所提供的，共超过一万人，分为两翼。他也将战象的武力分组，将它们安置在步兵方阵之两侧前，所以他的侧翼可以有双层的保护。在这时候隆古斯见到他们无法有效对付敌人时，召回他的骑兵，因为努米底亚骑兵以四散及撤退的方式轻易地避开他们的攻击，但之后他们又突然立即转身，以极大冲力来冲刺，这是他们特别擅长的独特战术。隆古斯的步兵是以正规的罗马阵势来布阵，[77] 数量约为一万六千名罗马人及两万盟军，这是只有在重要战役时，当状况需要两位执政官同时将部队结合在一起动员，所组成的一支完整罗马军队的军力。他接着将总数四千名的骑兵安排在两翼，以节制有度的决心，缓步、有秩序地前进。

73.当这两军到达交战距离之内，行动由前方位置的轻装部队开始。[78] 在此阶段，罗马人已受制于许多不利之处，迦太基人则证明他们是更有效率的部队：罗马标枪手从日出之时，已经和不利的环境斗争，在对付努米底亚的突袭中，几乎用尽大多数的标枪，而其余的则已

因暴露在湿气及水中太久，变得无效。骑兵及其他步兵也同样处于不利状态，但迦太基人的状况恰恰相反。他们在行伍之间等待，精神饱满、蓄势待发，在需要时随时都可去援助。所以当进行小规模战斗的人从队伍间空隙退回时，换成重装步兵上场，迦太基的骑兵立即攻击敌人两侧；他们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加上人员及马匹完全清新饱满——如我已经解释。罗马骑兵在迦太基人的冲击下后退，让步兵的侧边完全暴露出来。在那时迦太基的长枪手以及努米底亚的主力部队跑过他们之前的部队，从罗马人两侧攻击，造成严重损失，并且暂时阻止他们与前方部队交战。之后构成两军的前锋及中锋的重装步兵进行激烈的战斗。双方有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显示出任何明显优势。

74.在这时候，马哥所率领的努米底亚步兵和骑兵从躲藏之处冒出，突然从后方攻击敌人中心，这举动让所有罗马人陷入混乱失序中。最后隆古斯步兵的两侧在遭受到来自前方战象以及来自侧边轻装部队的攻击后，便开始退让，被攻击者挤回到在他们身后的河边。在这之后，虽然罗马中心的后方被埋伏的努米底亚人所攻击，而承受极大损伤，那些在前方的重装部队仍继续往前推进，克服凯尔特人以及一队的非洲人，杀死许多人，并突破迦太基阵线。但当他们见到他们的两翼同时都已经被驱离战场，他们放弃恢复局面或是回到营区的想法；他们被迫禁止如此行动，部分是因为他们惧怕敌人的骑兵，部分是因为暴雨继续狂泻，增加了重渡特雷比亚河的困难。这支军队，人数不少于一万人，因此重组队型，安全退到普拉仙提亚。其余大多数罗马军队不是被战象踩死，就是被骑兵杀死；步兵中的残存者以及大多数骑兵，设法加入我所提及之重组部队，与他们一起到达普拉仙提亚。迦太基人追杀他们到特雷比亚河，但受制于风雨，无法再前进，随后返营。他们对战争结果欢欣鼓舞，认为这是决定性的胜利；西班牙及非洲部队的损伤极轻，大多数的伤亡多落在凯尔特人身上。然而全军被倾泻而下的暴雨以及随之而来的降雪所影响，结果是除了一头战象外，其余皆死去，也有大量人员及马匹因受冻而死。

75.隆古斯对真正发生何事，非常清楚，但急于尽可能地不让罗马权威当局知道其中细节，因此他派遣使者报告，说战事爆发，但风雨夺去军队的胜利。罗马人最先接受这种说法，但之后很快地便知道迦太基人仍然占据自己的营区，以及所有凯尔特人都加入那边，但他们自己的部队却放弃营区，从战场撤离，现在在邻近城镇避难，并且从海上及波河取得补给。这些事实为人知晓后，他们心知肚明战争的结果。这消息让他们大吃一惊，迫使他们着手更多战争的准备，特别是去保护敌人前进路线会经过的据点。他们派遣军团到撒丁及西西里，驻军他林敦以及其他重要战略要地，而且除了这些措施外，他们装配了一支六十艘五层舰的舰队。执政官当选人塞尔维利乌斯（Gnaeus Servilius）和弗拉米宁（Gaius Flaminius）开始动员盟军，从罗马公民中征召军团，并在阿里米努姆及伊特拉里亚内建立仓储据点。他们亦向西西里统治者希洛二世请求协助；希洛送去五百名克里特岛人及一千名轻装步兵。简言之，他们在各方面都进行准备。正是当罗马人陷于危险之秋时，最令敌人恐惧，而这原则同时适用于他们的公共事务以及私人生活。

77.在接下来的初春，[79] 弗拉米宁行军进入伊特拉里亚，在阿雷提乌姆（Arretium）之前扎营，而塞尔维利乌斯在东海岸，沿海岸北行，直到阿里米努姆，以阻挡敌人从那方向前进。这时，汉尼拔在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过冬，将在战争中所掳获的罗马人加以看管监禁，只给他们足够维生的口粮；但从罗马盟友逮捕来的俘虏，他则相当亲切地对待，并召集他们说话，指出他并非来与他们作战，而是为了他们才与罗马人为敌；假如他们知道自己利益所在，他们必然会回应他所提出的友谊，因为他特别是要交还给意大利人自由，来协助他们收复罗马人从他们手中抢走的城镇及领土。说完这些话，他送他们所有人回家，不要求任何赎金；其目的是要赢得意大利居民到他的旗帜之下，让他们从对罗马的依附中脱离出来，并让那些相信他们港口或城镇是因为罗马统治而败落的人，引发叛乱。

78.在这年冬天，汉尼拔也尝试一个典型的腓尼基骗局。他深知凯尔特人的反复无常，而且因为只在最近的时候才和他们建立友好的关系，所以他要提防任何谋取他性命的企图。他因此订做许多假发，每一顶都会产生不同年龄的印象，而他经常进行更换，同时配合假发有不同的穿着形态。以这方法他让别人难以认出他，不仅是那些不过只有惊鸿一瞥的人，甚至对他熟识的人，亦是如此。

在这时候他注意到凯尔特人对战争仍然发生在他们的疆界之内，变得有些焦躁，迫不急待地想入侵敌人领土。他们声称这是因为对罗马人的仇恨使然，但是真正的理由是他们对战利品的贪婪。无论如何，汉尼拔决定要尽快重新继续前进，来满足他部队的期望。于是在天气变得较暖和时，他开始质问那些最了解这国家的人，发现其他入侵罗马领土的道路不仅漫长，而且敌人彻底熟悉，然而通过沼泽到伊特拉里亚的道路不仅短，而且可让弗拉米宁出其不意。汉尼拔在个性上一向偏好出其不意的解决方式，于是他便选择这个行军路线。但是当消息在部队中流传，说他们的将军将要率领他们通过沼泽地带时，刚开始时大家兴趣寥寥，因为每个人都想像到即将要穿过深深的沼泽及泥坑。

79.然而汉尼拔花费心血去探索地形特色，确定他们要通过的地面积水是浅的，地是坚实的。当他拔营，开始行军时，他安排非洲人、西班牙人以及所有最好的部队在队伍前方位置，之中穿插行李辎重队伍，借此确定保有所有军队短期内的未来所需。他更往未来看，他决定不再维持驮兽，因为他估算，一旦在敌人疆域内，他若被击败，它们对他没有用处，但假如他控制开放的乡间，那他将没有补给的问题。凯尔特人被安排在我所提及之队伍的后方，而骑兵则负责殿后押阵，后卫的指挥则交给他的弟弟马哥。他做这些布置有一些道理，但主要是凯尔特人欠缺忍耐力，以及不喜欢辛苦的体力操劳。他的想法是，因为行军辛苦，所以假如凯尔特人要掉头回去，马哥可以用骑兵拦截，禁止任何此种企图发生。西班牙人及非洲人在土地仍是坚实时，通过沼泽，因为他们已

经习于如此操劳的磨练，他们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任何伤害。另一方面，凯尔特人只能在费尽全力之后通过，因为不仅沼泽土地已经被之前行走过的人踏松，而且走路之人自己也发现这整个行军的努力实在令人疲惫及折磨士气，他们并不习惯如此艰苦。但他们被后方的骑兵防止掉头离去。整支军队尤其受到缺乏睡眠的影响，因为他们必须连续行军四天三夜，在那段时间他们不断涉水而行。但是凯尔特人比其他人受到的伤害更大，损失更多人。大多数的驮兽都已经倒下，在泥巴中死去，而它们在死后所能提供的唯一的服务是倒下之后，人们将行李堆到它们的尸体上，用这方法可以暂时离开水面，在夜间捉住片刻休息。同样因为在泥中的长途跋涉，许多马匹也瘸脚。汉尼拔自己坐在唯一幸存的战象上，相当难行：他因为眼疾的侵袭而感到强烈痛苦，但情势无法使他停下接受治疗。

80.在完全出人意料之外地完成横越沼泽后，汉尼拔发现弗拉米宁在伊特拉里亚的阿雷提乌姆之前驻扎。汉尼拔第一个动作是在沼泽旁扎营，目的是先让部队休息，也重新侦察在他之前的这整个区域，并且搜集有关敌人情报。首先，他知道周围乡间地带提供了获取大量战利品的机会，而其次，弗拉米宁拥有煽动群众之演说技术以及讨好观众的特有才艺，对实际如何进行战争则知之甚少，但对自己的才能智慧又有荒谬的自信心。汉尼拔估算，若他行军越过敌人军队，进入到敌人前方地区，弗拉米宁必然会对行伍士兵的嘲笑极为敏感，绝不袖手旁观，让乡间地带任人摧残；同时，他必然会被这景象刺激，所以会跟随到任何他被引领的地方去，也会被自己独力赢得战争的机会所诱惑，而不等待同事来到。所有这些因素导致汉尼拔得到这结论：弗拉米宁必然会给迦太基人许多攻击的机会。

81.汉尼拔这些推理既有远见，而且策略正确。对一位将军来说，没有一项资产比了解敌手之指导方针及人格特质更加宝贵；任何不以为然的人，都是既盲且蠢。当个人或行列士兵彼此对峙时，希望征服之人

必须不计代价地寻找出如何达成目标，特别是他的敌人最为脆弱或最没保护之处。依相同之理，指挥官必须训练自己的眼睛去看到他敌人防卫的弱点，不仅只是身体，也包括心灵。有许多人因为自己懒散以及缺乏精力，不仅让自己国家的福祉，甚至个人的财富，皆毁于一旦。有些人如此沉溺于酒，除非将自己弄得酩酊大醉，否则无法入睡，而其他人则耽溺于性爱，因此削弱他们的判断力，不仅摧毁他们的国家以及个人生涯，还让自己的一生以耻辱结束。当一个人显示自己是个懦夫或是蠢人，这羞辱至少只是个人或私人，但是当一个将军显示出这样的特质时，其影响却是普遍的，并且产生最严重的公共结果，因为不仅他让那些在其手下的人变得无能，而且经常将那些信赖他的人，也卷入最大的危险之中。

另一方面，轻率躁进、过度鲁莽、盲目冲动、自矜自夸或是无知的野心，都容易被敌人利用，对任何盟友皆最是危险；一位有这些人格特质弱点的人，自然会成为所有类型谋略、埋伏以及诡计的受害人。最能够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领导人，是那些能够辨识出敌人错误，并且准确选择，充分利用敌对统帅的弱点，来攻击那致命之点的人。正如一艘船，一旦被剥夺其掌舵者，将会与全船水手落入敌人手中，所以将军能够以智慧胜过或谋略赢过他的对手，便容易掳获对手全部的军队。在这次场合，因为汉尼拔已经正确地理解并预测了弗拉米宁的行动，他的计划于是乎取得他想要的结果。

82.汉尼拔几乎还没离开费苏莱地区，只越过罗马营区一小段距离，并且对邻近区域只做一次掠夺，弗拉米宁立即暴跳如雷，开始想像敌人已经在蔑视践踏他。又稍后，当迦太基人开始掠夺乡村，四处缕缕升起的火烟成了这些破坏的证据，执政官因此变得更加愤慨，认为这是无法再加以容忍的羞辱。有些军官劝告他不要冒险，冲动追逐他的敌人，企图上战场一决雌雄，认为他应该采取守势，并注意敌人在骑兵上的优势；尤其是，他们敦促他要等待他同事的到来，不要交战，直到两

军结合起来后，他们才能开战。但弗拉米宁不仅忽视这规劝，甚至无法忍受提出如此辩论的军官；他问他们在罗马的人们会如何说？假如军队在敌人后方，却留在军营内，然而整个意大利的乡间地带却被蹂躏到几乎抵达首都的城墙。这是当他拔营，开始移动军队时，所持有的观点。他并没注意行军的方向以及时机，只是盲目往前推进，唯独想要要遇见敌军，好像胜利毫无疑问地已经属于他。的确，他甚至在人民之中创造出如此的自信心，所以士兵甚至那些数量远远多过战士的随营非战斗人员，随身手持铁链、镣铐以及其他道具，希望找到掠夺的战利品。

与此同时，汉尼拔持续进军罗马，穿过伊特拉里亚，保持科托纳（Cortona）及山丘在其左侧，特雷西米尼湖在右侧。他一边前进，一边放火，破坏乡间，心中经常想到要引诱敌人采取行动。当他见到弗拉米宁几乎要与他接触，这迦太基人已经选好最适合他目的的地形，布好阵势，准备作战。

83.道路在此处通过一个既平且窄的山谷，两侧有绵延不断的高丘环顾。隘口的东端一个陡峭高耸地形崛起，其坡地几近垂直，难以攀爬；在西侧则是湖泊，在那里唯一可以进入山谷的是一条沿着山丘脚下的小径。汉尼拔率领部队经过湖泊边缘，然后穿过山谷。他自己以非洲及西班牙军队占据东端的山丘。投掷手及长枪队则被命令要绕路，从隘口前面绕过，以山丘作为掩护，然后以延伸的阵势布置在山谷右侧。[80] 凯尔特人及骑兵移动绕过到左侧，同样地也在山丘之下以延伸的阵势待命，其余的人被安排在山丘及湖泊之间，进入隘道的开口处。

所有这些布置都是在夜间完成，他的部队环绕整个山谷，待命偷袭，汉尼拔不再做进一步的行动。在这同时弗拉米宁紧追在后，迫不及待要赶上敌人。他在极晚的时候，在靠近湖泊的前方扎营；在第二天，他因为急于交战，于是天一亮，便带领他的前锋部队，沿着湖泊进入隘道的入口处。这我已经描述过。

84.那早晨湖边浓雾笼罩。然后在罗马大部分军队已经进入隘口，并开始接触迦太基人后，汉尼拔发出信号开战，告知埋伏的人，立即从各方向攻击罗马人。敌人突然出现，完全让弗拉米宁措手不及。雾气遮蔽所有的能见度，攻击同时从高处与四面八方多点出现，百夫长及营长不仅无法发出必要的命令，甚至也无法掌握发生何事。他们发现自己同时被从前方、侧边以及后方攻击。结果是他们虽然还保持行进队形，但大多数的部队已经被砍死，毫无机会防卫自己，可以说是在他们统帅缺乏判断力下，送出去就死；简言之，在他们仍怀疑究竟要如何做时，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取走生命。弗拉米宁本人对所发生之事，感到士气崩溃，陷入彻底绝望，被一群凯尔特人攻击杀死。约有一万五千名罗马人命丧山谷之中。在这局面下，他们无法做任何事来协助自己，然而也不愿向环境投降；他们认为至高无上的职责，如他们在所有训练所教导的，是绝不逃走或离开岗位。至于那些在后方，受困于山丘及湖泊者，他们遭受甚至更羞辱或更可悲的命运。他们发现自己被赶入湖泊，而在那里一些人丧命，一些设法身着装备游泳，却溺水毙命，而其他人则涉水，尽可能地走远；他们站在那里，只有头部冒出水面。

那时骑兵骑马追赶而来，死亡瞪着他们的脸，他们举起双手，口念最可怜的求情，恳求慈悲，饶恕一命。结果不是被骑兵杀死，便是自己勇敢面对毁灭。在山谷中有六千人成功击败直接面对的敌人，但虽然他们或许会提供很大的协助，但却无法前去解救他们的同志，或是绕到敌人后方，因为他们完全无法看到所发生之事。他们持续往前推进，相信他们迟早会遇见敌人，直到他们发现，但却没注意到，他们其实已经突破到较高的地形。当他们到达山脊时，雾气消散，并且可以看清完整的灾难程度，但那时去提供任何协助已经太迟，因为敌人已经在所有方向得到胜利，完全掌握战场。他们因此重组队伍，撤退到某个伊达拉里亚村落去。在战争后，汉尼拔派遣马哈巴（Maharbal）带领西班牙人和长枪队去包围。在那时罗马人见到在每边都有威胁，放下武器投降，条件是他们的性命能被饶恕。

如此便是在罗马人与迦太基人在伊特拉里亚进行战斗的最后结果。

85.当投降的士兵被带到汉尼拔及其他人面前时，他命令所有犯人被集合起来，总数超过一万五千人。他开始时告诉他们，说马哈巴并没征询他授权去饶恕他们的性命，然后他接着攻诘罗马人。最后，他将罗马人分布在他的军队中来加以看守，但释放罗马盟邦的俘虏，送所有人返家，如在之前场合一样，提醒他们：他来此不是要和意大利人作战，而是为了意大利人而和罗马人作战。然后他让自己的部队休息，埋葬那些最高阶的战死者，共计三十人，而他整体的损失为一千五百人，多数是凯尔特人。在这之后，他和自己的弟弟及朋友开始讨论在何处以及如何进行下一场攻击，因为在这时候，他对自己最后将会成功，深具信心。

当战败消息抵达罗马，单单灾难的规模就已经无法让国家领导人去掩盖或淡化事实，他们必须召开人民大会，加以公布。所以当副执政从市民广场的发言台（Rostra）宣布“我们在一场大战中战败”，这几个字让他的听众如此震惊，所以对那些在这之前两次战败场合出现的人来说，这次灾难在那时比在战斗的时候似乎还要更严重，但这不令人惊讶。因为许多年来，人民一直没有经历过任何公开承认战败的报道或事实，所以他们现在无法以平常心，或有尊严地去接受如此的失败。然而对元老院，情形则不然，它持续做出适当的判断，为未来设想，思考所有阶层的人该做什么，以及要如何去进行此事。

86.在战争进行时，另位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在阿里米努姆地区的岗位上，此地位于亚得里亚海海岸，阿尔卑斯山这边高卢的平原与意大利其他部分在此地相会，靠近波河河口。当他知道汉尼拔已经入侵伊特拉里亚，在弗拉米宁附近扎营，他的意图是要和他的同事会师，将两军结合。但因为他军队的规模使他无法办到，所以他立即派出山塔尼乌斯（Gaius Centenius）率领四千名骑兵，这些部队在主力部队之前先行，

并在局势危急时支援弗拉米宁。但在战争结束后，汉尼拔接到报告说这援军正在接近，他派遣马哈巴率领长枪队和一队骑兵去迎战。马哈巴发现山塔尼乌斯，在第一波攻击时，消灭他一半的武力；然后追杀其他人到附近一个山丘；第二天他成功地逮捕所有人。

特雷西米尼湖之战的噩耗不过三天，所以在整个罗马城所造成的动荡情绪尚在高点，但新的灾难消息又接着传来；这次不仅人民，甚至元老院，都相当沮丧失志。决议于是通过，要搁置透过年度选出官员的正常政府程序，同时采取较激进的措施来应付危机；当时一般人的感觉是，罗马现在的局势以及正威胁人民的处境是需要任命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统帅。

在与此同时，汉尼拔这时对成功有充分自信，决定暂时不进军罗马，而开始边走边摧毁乡间地带。他通过翁布里亚及皮切诺，在行军第十天到达亚得里亚海海岸。[81] 在他前进过程中，他搜集如此多的战利品，结果他的部队既推不动，也带不走，而且他也在沿途中杀死一些居民。他已经下令，而且这成为惯例，当急攻取下城镇时，部队发现到的所有成年男子都必须被杀，而他如何做这事，是因为他与生俱来对罗马人根深蒂固的仇恨。

87.他于是在靠近亚得里亚海一个地区扎营，该地物产极为丰富，种类繁多，而他的第一要务是让部队休息，加上恢复人员及马匹的健康。因为在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历经过冬时所暴露的风寒，缺乏他们习惯的涂油按摩，以及之后通过沼泽行军的艰辛，所有人员以及马匹都苦于坏血病以及其后遗症。所以现在他既然拥有一片丰腴乡间，他逐渐让马匹回到良好的状况，让他的人员在肉体及心灵上都恢复健康。他以罗马的装配来重新武装他的非洲部队，为了这目的他挑选最好的武器，因为他现在拥有大量掳获的军械。同时他也送出使者，航海送信给国内迦太基人，详细报告发生之事，因为自从入侵意大利后，这是他第一次

到达海洋。迦太基听闻这消息，举国欢腾，而政府当局不浪费任何时间，立即采取步骤，提供每种可能的支持，来协助意大利及西班牙战争的进行。

罗马人民任命费边（Quintus Fabius）为他们的独裁官（dictator），此人天赋极高，以极判断稳健著称，即使在我所生的时代，这家族后代成员因为他的功积成就，而仍以“最伟大”（Maximi）为人所知。一位独裁官与两位执政官的差别如下：亦即，每位执政官有十二位仪仗队（lictors）伴随，但独裁官有二十四位；执政官在许多场合必须征询元老院来执行他们的计划，但独裁官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将军。因此当他被任命时，罗马其他官员停止执行权力，唯一除外的是人民的护民官。[82] 我将会在稍后的一书，更详细地回到这主题。[83] 在同时间，人民任命米努启亚斯（Marcus Minucius）为骑兵长（master of the horse）。骑兵长是独裁官的下属；若独裁官忙于其他事务时，他便成为其权威的继承人。

88.现在汉尼拔经常移动营区，但始终靠近亚得里亚海。在这段期间他借着他可以大量取得的老酒来浸洗他的马匹，成功地让它们的皮肤恢复到良好的状况。同时他也确定要让伤者得到治疗，部队其他人恢复健康及精神，以应付未来的任务。他行军经过普来吐提亚（Praetuttia）、哈德里安纳（Hadriana）、马鲁启纳（Marrucina）及扶列他纳（Fretana），并且摧毁这些地区，然后前进到雅庇吉亚。这个行省有三支民族居住，分别给予其区域名字，亦即道尼亚人（Daunii）、皮攸切替人（Peucetii）以及美沙皮亚人（Messapii），而汉尼拔所最先入侵的是道尼人[84] 的区域。他首要目标是罗马殖民地卢切利亚（Luceria），他在那里摧毁周围区域，接着在菲比农（Vibinum）附近扎营，侵略阿匹人（Arpi）的区域，然后掠夺道尼亚（Daunia）全区，没遭遇任何抵抗。

在此同时，费边被任命，向神明进行献祭，也率领他的副手以及四个军团，领军上战场，这些士兵都是在紧急状态下招募。他在靠近纳尼亚（Narnia）的地方，与原来从阿里米努姆前去支援弗拉米宁的军队会师，在那里他解除现任将军塞尔维利乌斯在陆上的兵权，然后派人陪同他到罗马，命令假如迦太基人企图想从海上进行军事活动时，他必要时要随时提供支援来对付。他与骑兵长接管全军统帅权，在离面对迦太基人约六里处扎营。这地方称为阿耶凯（Aecae）。

89.当汉尼拔听闻费边来临时，他决定立即采取攻击，来顿挫敌人锐气，他立刻领军接近罗马营区，将人马以作战阵势摆开。他在那里等待一些时候，但没人回应，他最后又退回自己营区。就费边而言，他决定不冒任何风险，更不愿涉险激战，一决雌雄，而是以人员安全为他第一及首要原则，而既然选定这策略，他坚决地遵守它。最初他因此而被鄙视，而他的行动让人民有借口说这完全出自于懦弱胆小，以及他害怕进行交战。但当时间继续往前推移时，他迫使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没有人可以在目前既有的状况中行动地更为谨慎。不久之后，事件发展见证他所采取政策的智慧，而这是很自然的。

这个中的事实是，敌人武力已经在战争中持续磨炼，而这磨炼其实是从他们最早的青年时期即已开始；他们有位一起与他们接受养成教育的将军，而且从孩提时期便已经习惯在战场上的活动；他们已经在西班牙赢得许多战争，而且连续两次击溃罗马人与他们的盟友；特别是他们已经放弃其他军事选项的活动，所以他们唯一存活的希望就是胜利。在罗马这方，情形恰好相反：他的军队普遍欠缺经验。这使费边无法在激战中面对敌人，所以在考量后，他决定退而求其次，诉诸罗马人占优势的地方：他们拥有无法耗竭的补给及人员，而他则紧紧抓牢这些优势，并且据之来设计他的策略。

90.在接下来的数月，他持续与敌人保持平行线来进行移动，但他

会根据他对乡区的经验，事先去占领最有利的地点。因为他可以依靠后方丰富的补给，所以他未曾在任何借口下，允许他的士兵离开营区去收集粮秣。相反的，他的军力始终集中一起，然而会仔细注意任何时间或地点可能提供的时机。他用这些方法设法去杀死或俘虏任何脱离营区，去进行收集粮秣的许多敌人团体。在依循这种战略时，他有两个目的：第一，要持续降低敌人有限的人力资源；第二，借着这些次要的胜利，来重建他自己部队的士气，因为他们的信心已经被之前的连番挫败严重撼动。至于他敌人所想要的激战，绝对没有任何事情会诱惑他去接受如此挑战。但是他的政策一点都不能让他的副手命米努启亚斯满意，而后者的看法却是众人的意见。命米努启亚斯经常数落费边主导战争时的示弱，以及他拖延的行为，这与他自己积极勇于采取攻势以及甘冒一战，形成对比。

在迦太基人蹂躏我已提及之地区后，他们横跨亚平宁山，下降到萨莫奈人的领土。这些土地十分肥沃，而且在过去多年没有战事波及，他们在此处发现可以坐拥用之不尽的补给，也就不去摧毁它。他们也侵略罗马殖民地贝尼温敦（Beneventum），并占领极为富裕的威奴希亚（Venusia）。罗马人在这所有时候，都尾随迦太基人的后卫，保持一或两天的行军距离，但从来都不愿更靠近些，来与敌人交战。汉尼拔从这些军事活动，了解到费边虽然有明显的决心避战，但却一点都不打算放弃开阔的乡间，他大胆地前进到卡普亚平原一个叫法乐农（Falernum）的地方。他相信这举动会带来两个结果：或者强迫敌人应战，或是他将证明自己是乡间的主宰，而罗马人选择放弃该地。他希望这样的证明会在罗马盟友间带来警惕，说服他们摆脱对罗马的忠诚。因为直到那时刻，即使罗马已经在两次战役中大败，但没有一个意大利城邦投靠到迦太基人这边；它们都维持与罗马的信诺，虽然它们其中有一些已经严重受害。盟邦是以如此敬畏与尊重来看待罗马这国家。

91.尽管如此，汉尼拔有很好的理由进行算计。环绕卡普亚的平

原，在整个意大利是以其肥沃、美丽、近海、有许多港口提供交通，并且是来自世界各地之游客造访意大利时的出入处，而广为人知。这区域亦包括意大利内最美好及最出名的城市。在沿海有锡纽萨（Sinuessa）、库迈及迪凯阿启亚（Dicaearchia），[85] 在往南有尼尔波利斯最后则有努切里亚（Nuceria）。在内陆以及其北有卡雷（Cales）和提亚农（Teanum），在东方及南方是道尼亚及诺拉的领土。在平原中心有卡普亚，这曾是这区域最为富庶的城市。在所有神话中没有比关于这地方的神话来得更有可信度，而这地方就像其他因美丽而著称的其他平原一样，都称为费雷格里恩平原，而在所有这些之中，这里是最有道理被如此称呼的，因为她以其美丽及肥沃，而成为众神争夺的特别例子。这看起来似乎是完全自然。

除了这些优点外，这平原也受自然保护，难以接近。一侧为大海，其余则被高耸且绵延不断之山峦所阻绝，那里只有三条路可以出入，所有通路皆既窄又难行：其中之一是由萨莫奈人地区（Samnium），第二是从拉丁姆，第三则是从赫彼奈（Hirpini）人的乡间。所以迦太基人将营区建立在这平原上，将其转化为战争的舞台：他们因没被预料的出现在那里，而让所有居民惊吓，但也让罗马这敌人的怯懦变成大家都看到的景象，证明了迦太基人不容置疑是乡间的主宰。

92.汉尼拔心中正是以这些作为考量，离开萨莫奈人地区，越过靠近叫艾瑞毕安努斯（Eribianus）山丘附近的通道，然后在福吞纳斯（Volturnus）河旁扎营，这条河将坎帕尼亚平原正好一切为二。他的营区在较靠近罗马的一方，但他却能够以收集粮秣的队伍来侵略整个平原，没遇见任何阻挡。虽然费边极为惊讶这种大胆的举动，他却更加严格地遵守已经选定的作战计划。可是他的同僚命米努启亚斯以及所有军队里的百夫长和营长都坚信敌人已经真正地、完全地被困住，敦促他尽快到达平原，不要让国家里最精华的部分被摧残。费边的确倾其全力赶到那里，假装与那些比较挑衅及冒险精神的人一样积极。但当他靠近法

乐农时，他却将军事行动局限于现身山丘，保持与敌人平行移动。他的用意，是为了避免给意大利盟友他已经放弃开阔乡间的印象，但是他并没有将军队带下山丘，而是继续避免公开交战，其理由如我已经提及的；另外，还因为迦太基人在骑兵上具有优势。

汉尼拔极为用力，蹂躏整个平原来引诱罗马人采取行动，但他也已经聚集极大数量的战利品。他因此决定撤退，因为他不愿意浪费战利品，而是将其储存在一个地方，方便他设立冬营时使用，他的军队不仅现在过得好，而且可以确保在整个冬天都不虞匮乏。费边猜测他的对手打算依照他进入平原时的路线折回。他知道通道狭窄，这一出口提供了一个埋伏攻击的绝佳机会，因此他在通道布置四千人，交代他们要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在适当时机来临时，积极地加以攻击。他自己与主力部队扎营在一个山丘上，面对通道，可以居高临下。

93.当迦太基人抵达，并在这些高处之下的平地扎营，费边希望他至少可以不费力气地将战利品带回；他甚至能够利用他现在所占有的居高临下的位置，来结束整个战争。结果他把全部的心思集中去思索要在何处、如何善用地貌轮廓，以及利用何种部队来攻击敌人。当罗马人致力于这些准备，汉尼拔之前或许已经预料到他们可能如何行动，所以决定不给他们时间和喘息的机会来让他们协调计划。他请负责军队前锋的哈斯德鲁巴过来，命令他尽可能收集尽可能多的干柴，并从掠夺来的牲畜中，选出约两千头最强壮的耕牛，将它们聚集在营区之前。当准备完成，汉尼拔聚集前锋部队，向他们指向一座位于军营后方的山丘的丘脊，然后再指向他意图经过的通道。当他们接到命令时，他们要尽量快速及用力地将牛赶往高处，直到丘顶。接着他下令全军食用晚餐，及早休息。在夜里第三更时，他率领前锋离营，命令他们将干柴绑在牛角上。因为人手充足，所以任务迅速完成；之后他下令点燃所有干柴，将牛赶往山脊。紧接着他在后方部署轻装的长枪队，命令他们要协助驱牛者走一段上坡路。一旦动物开始移动时，士兵必须在后陪跑，让它们在

往较高处去时，仍然聚集一起。那时他们要占据山脊，所以假如罗马人要前进到山脊任何一部分，他们要接战，并且攻击。与此同时，汉尼拔自己与他的主力部队往通道的狭隘处前进；他的行进队伍是重装步兵在前，接着是骑兵，最后是西班牙人及凯尔特人。

94.防守隘口的罗马人看到燃烧火炬往高处移动时，结论是汉尼拔正在快速往那个方向前进，所以他们放弃通道口，行军到山丘去攻击敌人。但当他们靠近牛群时，他们完全被移动的火光所困惑，想象他们即将要面对某种比真实情形更可怕的东西。当长枪队抵达现场时，两军交锋一小段时间，而当牛群在他们之中冲过，他们停止交战，停留在高地，等待日出。费边本人因为也对局势感到困惑，而且，依据荷马诗句，"怀疑有某种更高深的计谋"，[86] 加之他坚决依照普遍拒绝交战的原订计划，所以留在营中，没有任何举动，同样也在等待日出。在这时候，汉尼拔的计划已经在每个细节都执行成功，将他的军队以及战利品安全带过隘口，因为原来驻扎留守该处的罗马武力已经离开岗位。当白天来临时，汉尼拔看见罗马人已经摆开阵势，与他的轻装长枪队对峙，所以派出一队西班牙人去增援。这些部队攻击罗马人，杀死约一千人，轻易地将自己的轻装部队救出，与主力部队会合。

在成功完成从法乐农撤出后，汉尼拔安全地扎营，开始思考在何处以及如何建立冬营，[87] 因为他在这时候已经在意大利所有城市及民族激起极大的恐惧以及不确定性。费边在此期间被群众责怪软弱，允许敌人从一个显然无解的受困状态中逃走，但费边仍然拒绝在任何方面背离他原先的政策。然而几天之后，他必须前往罗马去执行某些祭祀，而将指挥权交给他的骑兵长。当他道别时，他严格指示米努启亚斯不要想去伤害敌人，而是要自己避免灾祸。然而米努启亚斯没在意这些警告，即使当费边在耳提面命时，他心中已经完全投入到要进行一场决定性战争的计划。

100.这是在西班牙的状态。在意大利，我们留下汉尼拔从法乐农平原撤出，要寻找冬营过冬。他这时候已经从侦察人员那里得知，卢切利亚以及杰如尼温（Gerunium）附近地区拥有丰富作物，而且杰如尼温是收集及储存的最好地方。他决定用它来作为冬营，于是向该地区前进，经由里本奴斯（Liburnus）山行进。当他抵达杰如尼温——此地与卢切利亚约有二十四里远——时，他首先向居民呼吁与他结盟，并对他能够给的利益提出保证；当他们拒绝交涉，他围攻该城并很快攻占它，接着将全城居民杀死，但小心不去破坏城墙或绝大多数房舍，因为他打算使用它们来做冬天时的谷仓。他接着将军队安排在城前扎营，以壕沟及栅栏来防卫这一地点。当工作完成时，他派遣两部分的军队去取回谷物；每一部分要遵守负责补给的官员所指定每日所需带回的数量。其余的第三部分军队则受令防卫营区，掩护收集粮秣人员所进行的区域性征战。因为大部分周围乡村平坦以及容易到达，而收集粮秣人员不可胜数，气候又适合收获谷物。结果是每天都收集到极大的数量。

101.当米努启亚斯从费边手中接管过指挥权，他最先沿着山丘形成的路线来尾随迦太基人，因为他相信在他们企图横跨时，他们必定会相遇。但当他得知汉尼拔已经占领杰如尼温，正在该地收集粮秣，并且已经在城市之前驻扎在一个加强防御工事的营区时，他于是改变行进路线，经由一个斜向杰如尼温的山脊，从山丘上下来。他下定决心，无论任何条件下，都要和敌人交战，而当他到达一座在拉瑞农（Larinum）地区的卡林（Calene）山时，他在那里扎营。汉尼拔现在注意到了敌人的接近。他留下三分之一的部队去收集粮秣，带领其他两部分军队在高地扎营；他的目的是同时要保护收集粮草的人和威吓罗马人。在这两方军队中间有一座山丘；汉尼拔观察到这山丘不仅较靠近罗马营区，而且居高临下，所以在天黑后，他派遣两千人的长枪队去占领。当天亮时，米努启亚斯见到敌军这支武装后，带出自己的轻装部队，攻击这阵地。他们有短暂的冲突，罗马人得胜，所以后来他们将整个营区迁到这个山丘。有一段时间汉尼拔将大部分的部队维持在他们原来的界限内，因为

敌人如此靠近；但在几天后，他被迫送出一些人，去给掳获来的牲畜寻找放牧的地方，而其他人则带回粮秣。根据他原先的计划，他急于让他掳获的牛群存活下来，去收获尽可能多的谷物，用以确保有足够补给来支持整个冬天；这不仅要喂食他的人员，还有他的马匹及驮兽，因为骑兵是他最依赖的武装。

102.米努启亚斯注意到有许多迦太基人四散在乡间各地，执行这些任务，所以他选择太阳在头顶的时候出动军队。当他靠近敌人营区时，他将重装步兵排成战斗队形，将骑兵及轻装步兵分为数队，派遣他们去攻击收集粮秣的人，并下令不留活口。这个举动让汉尼拔陷入困境，因为他部署在营区外的主力部队并不足够强大到去接受挑战，但他也不能出发去拯救散落在乡间的人。罗马送出去猎杀收集粮秣的人，成功杀死许多敌人，因此在汉尼拔防御工事之前布阵的罗马部队，开始变得轻敌，他们甚至开始拆下栅栏，几乎冲向汉尼拔的营区。这是汉尼拔危急的时刻，但尽管这重重麻烦降临在他身上，他还是设法击退攻击者，并且经过很大努力稳住营区。最后因为哈斯德鲁巴所带来的约四千人，他的局面才解围：这四千人是从收集粮草之乡间地带逃回的人，并在杰如尼温附近防线避难。这一增援恢复了汉尼拔一些信心，于是汉尼拔突围，将部队带离营区，往前一段距离来重组，并发动攻击；在历经困难的战斗后，终于缓解了防线的压力。米努启亚斯攻击城前营区，但更是要攻击收集粮草的人，这对迦太基人造成了严重的损伤，所以米努启亚斯在离开战场时，对未来怀着极大希望。次日，迦太基人撤出杰如尼温周围的防线，而米努启亚斯则立即占领。这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汉尼拔警觉到罗马人或许会利用夜晚来接近在杰如尼温的营区，发现它没人防守，而掳获行李以及储藏品，所以他决定撤退回来，重新建立。在这之后，迦太基人显得更远为小心，对收集粮草的征战采取更严格的防备，然而罗马人却越来越有信心，并敢冒更大的风险。

103.米努启亚斯的成功被传回罗马，所用的语言远远超过实际事

实，所以让人民雀跃不已；他们的信心回升，首先是因为终于有转机，可以纾解他们之前对战争的悲观；其次则是他们现在可以相信，之前在军中盛行的缺乏行动及士气低迷，其实并非出自士兵在勇气上有任何不足，而是他们统帅的过度谨慎。于是乎每个人都联合起来责怪费边，指责他怠惰地让敌人溜走。另一方面，米努启亚斯的名气因为这次成就变得如此之高，以至于人民作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他们同时将绝对权力颁赠给骑兵长以及独裁官，相信前者必然可以快速结束战争。于是实际上有两位独裁官被任命去进行相同的战争，这在罗马史里前所未见。当米努启亚斯被告知他在人民中如何受欢迎，以及因为这命令所颁赠给他的权威，他于是想对敌人进行冒险行动，大胆先发制人的欲望更是加倍。

另一方面，费边回到军中，一点都不因近来状况而有丝毫改变，反而更加相信他原先判断的正确性。然而这一点也没逃过他的眼睛：米努启亚斯现在充满傲气，嫉妒地处处反对他，全心全意只想冒险一战。费边因此提供他的同事两种选项：或是隔日指挥全军，或是一分为二，并且以认为最好的方式来使用军团。米努启亚斯乐于答应将军队分割为二；这样的安排立即执行，所以军队的两半，在相距约一里半之处分开扎营。

104.在这期间汉尼拔已经取得这两位将军彼此不和，以及米努启亚斯野心勃勃和冲动行事的情报，这部分是透过战俘所提供的资讯，部分则是透过自己观察正在发生之事。他的结论是这些因素会有利于他，他因此将注意力转移到米努启亚斯，因为他急于去压制后者挑衅的倾向，预期他的攻击。在他的营区与米努启亚斯之间有座小丘，可被用来对付对方，于是他决定占领这优势之点。他充分了解，米努启亚斯因为之前的成功，将立即冲出来反制这一行动，所以他设计了以下策略。环绕山丘的乡间地带空无一树，但有许多碎裂地形以及各种凹洞。他因此在天黑之后，送出一支五百人的骑兵以及约五千人的轻装和其他种类的步

兵。部队分为每组两百人或三百人，命令他们占据最有利于埋伏突袭的地点；然后为了确保这些部队在早晨不会被罗马人收集粮秣的部队所见，汉尼拔在破晓时亲自派出轻装部队占领山丘。一旦米努启亚斯见到这一举动，必定会认为这是进行反攻的绝佳机会，所以立即送出他的轻装步兵，下令要与敌人交战，力图占领山丘。在这之后，他又派出骑兵，后面接着是军团，这由他亲自率领，以密集队形前进，意图重复之前相同的策略。

105.日刚破晓，罗马人的眼睛及注意力集中在山丘上的战斗，毫不怀疑那里已经有埋伏等待的迦太基部队。汉尼拔不断增援山丘上的人马，很快他与骑兵出现，之后随着其余军队，两方的骑兵随即进入行动。这一冲突的结果是罗马轻装部队因为迦太基骑兵的人数优势而撤退，退回到军团，造成他们队形陷入混乱。同时汉尼拔也发出信号给埋伏的待命部队；他们立即从各方向一起出现，进行攻击，结果是不仅轻装部队，甚至整个米努启亚斯的部队都发现自己陷入危急状态。就在此时，一直观察战事进展的费边，严重担忧罗马人或许会遭受全面战败，便匆忙将他的部队前移，来拯救他的同事。罗马人在他靠近时，重拾信心，虽然整个战斗的布阵已经被打乱，但他们聚集在军旗周围，并在费边的掩护下撤退，成功抵达到安全地带。然而在此期间，许多轻装部队人员已经被杀，而军团损失甚至更重，包括许多他们最勇敢的部队。

援救部队的精神焕发以及完美纪律，使得汉尼拔心生警惕。他立即放弃追杀，结束战斗。对那些从事于军事行动的人而言，毫无疑问，米努启亚斯的冲动几乎导致全面性的战败；而且正如之前，整个局面只有在费边的现身后才得以挽回。另一方面，这给了那些在罗马的人一个清楚的证明：一位将军所具有的前瞻之见、逻辑思考及冷静计算，与一位单纯士兵的冲动鲁莽及虚张声势，两者是何其不同。无论如何，罗马士兵习得了一次实用的教训，于是他们现在开始去强化单一的军营，将军力在里面团结起来。从此他们对费边马首是瞻。迦太基人则修筑栅栏环

绕山丘，此处现在已经在他们手上，并且在山丘及自己的军营间挖了一道壕沟。他们驻扎山丘，然后在不受侵扰之下准备过冬。

106.执政官选举的季节逼近。罗马人选择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及瓦罗（Gaius Terentius Varro）为执政官。当他们就任时，独裁官放下权力，而之前的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Gnaeus Servilius）及雷古鲁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被宝路斯授予行执政官（proconsular）之权的权威。这些官员在战场上依据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来指挥军队的行动。在征询元老院之后，宝路斯立即开始征召士兵；这些人是要让军团回到足额编制及所必须具有的战斗水准，然后才再将他们送往战场。他严格命令塞尔维利乌斯，绝不可被吸引去参加大规模激战，而必须去寻找经常发生以及有战斗机会的小型军事活动，借以训练新兵，增强他们参加主要战役的信心，因为元老院相信他们最近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使用新征召没经过训练的士兵。执政官亦将一支军队置于副执政波士丢米亚斯（Lucius Postumius）的统领之下，并派遣他到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去转移注意力。

同时，他们召回正在利利贝乌姆过冬的舰队，并且运送必要物资到西班牙将军那里，以供应那个战区的征战。这些以及其他备战的工作是执政官全心投入的职责，而塞尔维利乌斯在接到命令后，开始执行他们所要求的小规模军事活动。因为没有决定性或值得一提的结果发生，就不再赘述了，部分是因为当时的状况，部分是因为这些命令的性质。其间所发生的是数量很多的小规模接战或冲突。罗马指挥官在这方面表现优异，常常被认为是以有勇气及有见识的方式来进行战争。

107.经过整个冬天以及春天，两军仍然彼此对望地扎营，而只有在季节已经进展到允许将去年作物收割，来收集补给品，[88] 汉尼拔才开始移动，离开在杰如尼温的营区。在那时候，他认为要倾所有之力来强迫敌人作战，才会对他有利，所以他占领坎尼的卫城，当时罗马人已经

在那儿堆积从卡奴西（Canusium）地区周围所收集到的谷物及其他补给。这个城镇虽然之前已经化为废墟，但是其卫城以及仓储被占领，仍造成罗马军队的恐慌。它的沦陷是个打击，不仅只是丧失仓储，而且因其位置掌控周围地区。将军因此不断送信息回到罗马要求指示，指出假如他们靠近敌人，那将无法避免激战，因为这乡间地区已经被掠夺过，而盟军的态度已经开始动摇。

元老院决定军队应该一战，但他们下令塞尔维利乌斯等待，并同时派遣执政官到前线。所有人都仰望宝路斯：所有最具信心的希望都奠基在他的能力及经验之上，因为他在早期生涯中所获得的崇高名声，以及在几年之前他在伊利里亚战役中展现的勇气，对国家贡献良多。[89] 现在元老院决定派出八个军团到战场上，这是罗马人未曾采取的步骤，每个军团人数五千，不计盟友。如我之前所解释，[90] 罗马人通常使用四个军团，每个军团约四千名步兵及两百名骑兵，但在例外需求下，他们会将每个军团战力提升到五千名步兵及三百名骑兵。他们会让盟军步兵数量等于在军团里的罗马公民步兵，但骑兵在惯例上则是罗马人的三倍之多。当他们将军队派到战场时，他们分配每位执政官两个军团以及盟军总数的一半。他们大多数的战争是由一位执政官来指挥一支两个军团及一般配额的盟军，只有在极少的场合他们才会使用所有的兵力。但这次他们如此担心警惕，所以他们决定不仅要派四个，而且要派八个军团来行动。

110.次日，执政官拔营，率领部队前往他们听闻敌人已经建立的地点。在第二天，他们到达迦太基人视线范围内，在约五里处扎营。宝路斯注意到周围乡间地形平坦无树，他的观点是因为迦太基人在骑兵上的优势，不宜在此处攻击敌人，而是要引诱他们到一个战争结果可由步兵来决定的地形去。瓦罗却因为囿于有限的军事经验，不以为然，结果是两位统帅的争执及不同观点公开化，这是可能发生的最危险状况。当有两位执政官在场时，惯例是每位执政官轮流统兵，而因为瓦罗恰好是第

二天要统领，所以他拔营，命令前进，目的是要去接近敌人；尽管宝路斯激烈抗议、积极反对，瓦罗执意要做。汉尼拔出动他的轻装部队以及骑兵来对付他，在他行军时出其不意地突袭，让罗马队形陷入混乱。然而他们成功地挡住迦太基人的第一波冲击。稍后，当瓦罗出动标枪手以及骑兵时，他们在战斗上开始占有上风。这是因为迦太基人没有充足的后备部队，而在罗马人这边，有些轻装部队得到来自军团单位的补强，与他们一起参加战斗。

黑夜来临强迫他们停止战斗，迦太基人在这次冲突中没有如原先希望的成功。第二天，宝路斯仍然不认为局势有利于战斗，但却不能安全撤出他的军队，所以与他三分之二的部队扎营在奥菲狄亚斯（Aufidius）河边。这是唯一穿过亚平宁山的河流，这座绵延不绝的山脉形成所有意大利河流的分水岭，那些在西侧的河流流进提蓝尼亚海，在东侧则注入亚得里亚海。但是奥菲狄亚斯河其源头来自提蓝尼亚海那边，却穿过山脉，流入亚得里亚海。宝路斯以其余三分之一部队来防御津渡以东、[91] 河流远侧的一个阵地。离其主要营区几乎一又四分之一里远，但又更远离敌人的营区；他的目的是要保护来自河流以西，主要营区所派出之收集粮秣的部队，同时也可以骚扰迦太基人。

112.次日，汉尼拔命令所有部队装配准备妥当，以利行动；又次日，他将军队沿河摆开阵势，清楚表明要立即作战。然而，宝路斯仍然不满他所在的地形；他见到迦太基人必将移动军营，来取得补给，所以除了以增加守卫来强化军营外，没有任何动静。汉尼拔等待一些时间，发现罗马方面没有回应，他带部队回到原来防御的地方，但他送出他努米底亚的骑兵去攻击敌人的取水队，禁止他们取水。这动作对瓦罗来说不仅是一项侮辱，而且士兵也积极想战，对任何耽误变得越来越没耐心。一般而言，没有事会比不断延宕的悬疑更难以忍受，但一旦下达决定，人们就会想办法去忍受即使是所能发生者中最糟的事。

当消息传到罗马，说两军扎营相望及前哨冲突日日发生，整城的情绪变得极度激动及恐惧。大多数人害怕结果，因为他们已经不止一次遭受挫败，他们在自己心中，开始绘出完全战败的结果。所有曾经向他们发布过的神谕，都挂在人们嘴上，每间庙宇及每间家舍都被征兆及异象所包围；城市出现祈愿游行以及祷告的盛大场景。罗马人在危险时刻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安抚神明以及人类，这类的典礼没有一项他们会认为不恰当或是配不上他们的尊贵。

113.次日，瓦罗接管指挥权，在日出后立即同时从两个营区出动他的军队。他带领从主军营出发的军队跨河，[92] 立即摆出作战队形，另一个营区的部队则随之而来，布置在旁边，形成一线，全军朝南。罗马骑兵位居右翼，在河流旁，接过来维持同一阵线的则是步兵。在此军团连队以较平常更为密集的队形编组，每连队单位的深度为其宽度的几倍长。[93] 盟军的骑兵则置于左侧，而轻装部队则是在全军稍前之处。罗马军队的全部战斗力量，包括盟军，多达八万名步兵以及超过六千名骑兵。与此同时，汉尼拔将标枪手以及长枪队带过河来，将他们安置在前进位置。然后他将全军由营区带出，在两个地点过河，直接面对敌人。在左侧靠河之处，他安排西班牙及凯尔特骑兵来对付罗马骑兵。较靠近中央则布置一半非洲重装步兵，然后是西班牙以及凯尔特的步兵，在他们右边则是另一半非洲重装步兵，最右侧是他的努米底亚骑兵。在这一阶段他的全军是以一直线排开，但他接着将中间的西班牙籍凯尔特人往前移动，但让他们与两翼维持联系，以符合他的计划；这一队形产生突出的弯月，随着它往两侧延伸的队伍则逐渐单薄。这一安排的目的是要以西班牙及凯尔特部队开始接战。利用非洲部队作为预备部队来支持他们。

114.非洲部队配有罗马武装以及武器，因为汉尼拔用之前掳获装备中最佳者来装配他们。西班牙人及凯尔特人所使用的盾牌十分相似，但刀剑则相当不同。西班牙刀的刀尖与刀锋在杀伤威力上不相上下，然而

高卢刀却只有用来劈扫时才有用，而且需要大动作的劈扫才能达到目的。部队是以交替队形方式安排，所以凯尔特人的赤身裸体加上西班牙人的亚麻短衣（配紫色边，他们的传统服饰）呈现一个怪异骇人的景象。

迦太基的骑兵约一万人强，而他们的步兵，包括凯尔特人，刚刚超过四万人。罗马右翼由宝路斯统帅，左翼则是瓦罗，而中间则由以前的执政官指挥，亦即雷古鲁斯（Marcus Atilius Regulus）和塞尔维利乌斯（Gnaeus Servilius）。哈斯德鲁巴统领迦太基左翼，汉诺右翼，而汉尼拔及其弟马哥则在中间。罗马人，如我已述，朝南。迦太基人朝北，所以没有一方会因为升起太阳的逆光而处于劣势。

115.战斗始于双方前锋的冲突。最先只有轻装步兵涉入，战斗平分秋色。但一旦左翼的西班牙及凯尔特骑兵与罗马骑兵接触，行动就变得如火如荼，战斗变得野蛮。关于这次遭遇没有通常见到的正式前进或后退：一旦两军相遇，他们立即下马，人对人步行战斗。在此迦太基人最后得胜，虽然罗马人以豁出去的勇气抗拒，但他们多数人还是在对战中死去。罗马的敌人毫不留情地沿着河岸推去，罗马人边退、迦太基人边杀，而就在这时重装步兵取代轻装步兵的位置，开始近身接战。有一阵子西班牙人及凯尔特人稳住队形，极为勇敢地战斗，但接着他们落败，被军团单纯的重大推力往后推去，所以迦太基战线弯月的中心开始凹陷。罗马军团的连队胜利地往前推进，轻易地穿过敌人前线，因为凯尔特人是以厚度有限的阵线展开，而罗马人是由两翼向中央挤去，而那里是作战最激烈之处。迦太基部队中央与两翼并没同时行动，而是中间部分先行接战，因为凯尔特人是以往外凸出的弯月形状队形布阵，所以突出于两翼之前，因此弯月突出的弧线最靠近敌人。然而因为罗马人追杀凯尔特人，针对敌军前锋已经退让的部分往前推进，穿透敌人阵线如此之深，所以那时他们腹侧同时面临非洲重装步兵的威胁。在这时候，右翼的非洲重装步兵向内转身，所以现在面左，然后从右翼冲刺敌人的腹

侧，而在左翼的，亦同样往内，以相同方式攻击；每个情形的行动都符合当时的需求。但这结果正是汉尼拔所计划的：罗马人因为追逐凯尔特人推进过前，所以陷入两边的非洲人之间。他们再也无法维持连队队形，而被迫单独或一行列一行列地转身来防卫自己，对付正攻击他们腹侧的敌人。

116.这时候的宝路斯虽然自战争开始就已经在右翼，而且参加骑兵军事行动，但仍然平安无伤。但他希望能将他在战前对士兵所说的话，转化为行动，所以参与战斗。他见到战斗结果可能由军团来决定，所以他骑行到阵线中央，将自己投身到最激烈的地方，和敌人对打，并给自己的人马鼓舞打气。汉尼拔自从战斗开始一直在战场的这个位置，在这时候也做相同之事。

当这些都在进行时，在迦太基右翼的努米底亚人攻击罗马左翼骑兵部队；然而他们并未给敌人造成许多伤亡，自己也没受到严重损失，这是因为他们所采取的独特作战方式。但是他们借着将罗马骑兵吸引走，先从一个方向攻击他们，接着又从另一个方向攻击，实际上让罗马骑兵完全脱离战局。在这时候哈斯德鲁巴已经几乎在河旁消灭所有敌军的骑兵，于是回过来协助努米底亚人。意大利盟邦的骑兵见到他即将向他们冲刺，溃散逃走。在这一点上，哈斯德鲁巴似乎以少见的技巧及判断力来运用他的武力。他知道努米底亚人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知道他们最有效率的时候是当他们追击敌人时。他因此留给他们去对付撤退的罗马人，而自己率领部队前去步兵正在酣战的地方，奔驰去支援迦太基人。他从后方攻击罗马人，借着从许多方向反复冲刺，他立即为非洲人添增了士气，也对罗马人消沉的士气做出另一次重击。在此宝路斯于激战中承受了几个致命的伤害后阵亡。这个人终其一生，为他的国家尽忠尽职，在其人生终点更是如此。

只要罗马人能够维持没有崩溃的前线，并且转身对付一波波来自环

绕四方之敌人的攻击，他们便能够坚持下去。但随着他们外围的士兵被一一砍倒，而幸存者被迫后退，挤在一起，他们最后在所站立的地方一起战死。在他们之中有雷古鲁斯和塞尔维利乌斯，前任的执政官；两人在战争中行为勇敢，无愧于罗马公民的身份。

当这种人和人近身接战及杀戮仍在进行时，努米底亚人追杀逃跑的罗马骑兵，杀死许多人，并将他们从马上扯下。一小群人逃到威奴希亚，其中包括执政官瓦罗，他因此用一样令人不耻的逃亡，来搭配他在任时为国家所制造的灾难。

117.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在坎尼的战争结束了。在这场斗争中胜利者与被征服者皆以不屈不挠、绝不认输的勇气战斗。这一情形的证明，是在罗马一方六千名的骑兵中，只有七十名与瓦罗逃到威奴希亚，而有三百名盟邦骑兵四散地避难于不同城镇。在步兵中，约有一万人被俘，虽然这些人并不是在真正的战斗里被俘，而只有三千名逃到邻近的城镇去。其他人，多达约七万名，则是英勇战死。在坎尼，如同之前的遭遇，正是优势的迦太基骑兵对胜利贡献最多，而这场战争为后代证明一事：宁可只有对手一半的步兵，但在骑兵上要有压倒性的优势，也比与对手在各方面皆为相同数量，来彼此较劲，更为有效。汉尼拔那方约有四千凯尔特人与一千五百名西班牙人和非洲人被杀，另外还有约两百名骑兵丧生。

这一万名罗马战俘没有参加战争，其理由如下。宝路斯留下一万名预备部队在营区，意图是假如汉尼拔忘了保护自己的营区，而将所有部队投入战场，这些人或许可以在战争期间强行进入，掳获敌军行李。另一方面，假如汉尼拔已经预见这危险，留下足够的部队防守，那时他的战斗力便会相形减弱。这些罗马人是在以下状况中被俘。汉尼拔留下一支足够强大的分队来防守营区，而且在主要战斗发生时，这些罗马人也执行他们的命令，并攻击这支迦太基留守的武力。最初防守者挡住，但

当他们开始感受到压力，汉尼拔却在此时在战场上各处都占上风，前来支援，将罗马人打跑，把他们关在自己营区。他杀死约两千人，俘虏其余人。努米底亚人同样地猛攻这一地区里庇护逃跑敌人的不同据点，围捕逃跑者，共计掳获两千名骑兵。

118.在战争如我所述地被决定后，双方预期的结果很快便发生。迦太基人因为他们的胜利，几乎成为海岸其余部分的主宰。他林敦人立即向他们投降，阿匹人（Arpi）以及一些坎帕尼亚的城镇，邀请汉尼拔到他们那里，所以现在所有目光都在迦太基人身上。他们自己也怀抱极大希望：他们终将攻占罗马。至于罗马人，在这次战败后，放弃所有维持他们对意大利人霸权的希望，开始为自己祖国担心，甚至为自己的生存害怕，因为他们预期汉尼拔随时会出现。事实上，因为接下来发生之事，使得命运女神在他们的挣扎中，好像已经选边来对付他们，灌注他们的复仇之杯，满溢而流。就在几天之后，当罗马城仍对坎尼的消息诧异不止，他们派往阿尔卑斯山这边高卢的将军波士丢米亚斯（Lucius Postumius），中了凯尔特人的埋伏，全军被一扫而空。尽管有这些打击，元老院还是尽其所能去做其能力所及之事。它鼓励人民士气，强化城市防御，以勇敢负责的精神及男性气慨，来考虑局势的各种事实；接着而来的事件见证它的坚定沉稳。虽然毫无疑问地，罗马人最后是在战场上被击败，军事上的声望完全幻灭，然而因为他们宪法的独特优点以及他们能够继续抬起头来，不仅为他们赢回他们在意大利的霸权，后来也打败迦太基，甚至在几年内使自己成为已知世界的主宰。

因为我已经描述了在第一百四十个奥林匹亚年发生在意大利及西班牙的事务，我现在要将此书做一结束。然后在我陈述同一奥林匹亚年相同时间里希腊的事务后，我会对罗马宪法做一番个别的介绍，之后才会继续进行我其余的故事。我相信对这一议题的描述，不仅对我作品整个规划有重要的关系，也将对学习历史的学生，以及对进行改革或草拟其他宪法之实际参政政治家，都会带来极大的助益。

[1] “空叙利亚”这名词所指的是起于黎巴嫩及相对的东黎巴嫩（Anti-Lebanon）两道山脉间，经由利塔尼（Litani）山谷、约旦、死海，直到今日的阿克巴（Aqaba）及红海的狭长凹陷之地；这后来与腓尼基的土地相关联，所以包括了介乎西里西亚（Cilicia）与埃及之间的整个区域。

[2] 《历史》在此使用亚里士多德对一部“戏剧”作品所需具有之完整性的学说中曾使用过的关键术语。

[3] 见页389至390。

[4]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二○○至一九七年。

[5] 这其实一点都非实情，但是波里比阿完全接受罗马势力在一六七年后已经完全停止扩张这样的理论。

[6] 波里比阿原先计划他的历史会涵盖五十三年（二二○至一六七年），但他在之前的章节中辩论说，对征服者以及被征服者要做出适当的论断，只有在对他们之后的关系及行为加以研究才能做成。因此他决定将他的历史延伸到至少一四六年。这引起一些问题：关于波里比阿何时做出这一决定，他修改后计划的范围为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这会涉及对之前完成之诸书的修改。我们所拥有的证据显示出，波里比阿是在一四六年之后才构想出他的新计划，而这部分是由于他希望记录下来他自己在其中曾扮演过相当分量角色的事件。这些包括，例如，他在第三次布匿战争出现在迦太基城（三十一及三十六两书），还有他参与亚该亚事件发生后的安排。

[7] 这些战争并没有如波里比阿所提及之顺序发生。凯尔特-伊比利亚战争是一五三至一五一年；第三次布匿战争始于一五一年；阿里亚拉提斯五世（Ariarathes）在一五八年被驱离，在一五六年复位；阿塔罗斯和普鲁席亚斯的战争从一五六年延续到一五四年；德米特里从一六二年到一五○年统治叙利亚；希腊流放者回归祖国是在一五一年发生。

[8] 他与一位由阿塔罗斯及托勒密所支持之僭位者亚历山大·巴拉斯（Alexander Balas）交战后阵亡。

[9] 这些是一千名自从皮得纳（Pydna）战役（一六八年）后，被拘留在意大利，没有受到任何审判的亚该亚幸存者。

[10] 第三次布匿战争是从一四九年延续到一四六年。

[11] 这是著名的从波斯撤退的“万名战士”（Ten Thousand），在色诺芬的《长征记》（Anabasis）中有所描述。这件事发生在四○一至四○○年。

[12] 在三九六年，阿格西劳斯入侵小亚细亚，在长达两年时间中与波斯帝国西部行省的总督交战。他在一个由底比斯、雅典、科林斯及阿哥斯所组成的联盟向斯巴达宣战时，被征召返国应战。

[13] 这理论变成被接受为罗马的传统说法，但是并不能解释哈密尔卡在这相关一段期间，并没有任何对罗马敌意行为的记录，也没有他允许迦太基舰队在这两次战争中退化到危险的状态。

[14] 见页195。

[15] 实际上只有在页296时有简短触及。

[16] 约三一○三二千克。——译者注

[17] 这故事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哈密尔卡的作战计划，而只不过是汉尼拔对罗马人仇恨的这一事实而已。

[18] 这是居住在现在称为拉·曼查（La Mancha）地区的部落。

[19] 二二○年。

[20] 居住在杜罗（Douro）河中游，里翁（Leon）及旧卡司提尔（Castile）王国间边界的部落。

[21] 他们居住在塔古斯河以北山区之中，现今的西耶拉·迪·杜达拉玛（Sierra di Duardarrama）。

[22] 现今之撒拉曼加（Salamanca）。

[23] 在二二○年至二一九年冬天。

[24] 汉尼拔仍远远地在埃布罗河以南；波里比阿在此或许是在此引用罗马人的警告，而非抗议。

[25] 他现在年二十七。

[26] 这部分的编年有些不确定之处。因为使节从迦太基回来所促成之元老院决议不会在二二○年至二一九年冬天之前完成。法洛斯的德米特里在二二○年夏天驶入爱琴海赛克拉迪斯群岛。

[27] 二一九年夏天。

[28] 原为Lucius Aemilius。——译者注

[29] 连接新卡斯提尔（New Castile）及阿拉贡（Aragon）的山脉。

[30] 这些战利品由各种物资构成；给军队的奖赏系来自贩卖奴隶所得。

[31] 这座城现在已经被指认是克罗提纳（Krotina），在贝拉特（Berat）西北的山丘。

[32] 现今的史达瑞格拉得（Starigrad）城镇，在赫发（Hvar）岛上。

[33] 对这位凯瑞亚斯，我们一无所知。斯巴达的索赛勒斯陪同汉尼拔远征，并教他希腊文。

[34] 在得知汉尼拔已经渡过埃布罗河时，这一代表团在二一八年三月之前可能无法离开罗马，而且有可能要一直等到六月时。

[35] 这里提及的“关键性的辩论”或许是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之前几年，在元老院里所进行的辩论。

[36] 事实上是直到二一八年。

[37] 这是共和国的第一年，五○九年至五○八年。波里比阿记录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的三个条约。第二个条约（页293）并无日期；第三个则是与皮洛士入侵意大利时同时（公元前二八○年）（原为二一八年——译者注）。

[38] 波里比阿认为这是现今的波恩海岬（C.Bon），或许正确；但也可能是法玲纳海岬（C.Farina），在那情形下，罗马人被排除的区域必然是在那海岬之西，而非如波里比阿所相信之赛尔提斯（Syrtes）。

[39] 约在同时的埃及瑙克拉提司（Naucratis），亦有类似限制。一般来说，迦太基在这时候所关切的是他们商业上的利益以及规范贸易行为，罗马人则是欲建立他人对其控制拉丁姆平原的认可。

[40] 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会担下债务，而只是它会强迫没付款之人去支付，假如它有能力如此做的话。

[41] 波里比阿将这限制在战舰似乎是错误的。

[42] 迦太基以南约两百里的海岸线，包括了今日的Gulf of Hammamet以及Gulf of Gabes（小赛尔提斯）。

[43] 这是模糊的词语。假如波里比阿“美好海岬”（Fair Promontory）是波恩海岬（C.Bon）的话，那必然是意味着以西的地方，但若是法玲纳海岬（C.Farina），则是意味着“以东”。波里比阿认为是前者。

[44] 这些地点不详。虽然波里比阿似乎认为它们是靠近波恩海岬，它们或许在西班牙。

[45] 特别是提布尔（Tibur）及普莱涅斯特（Praeneste）的城镇，罗马与这些城镇有个别的条约。

[46] 这一条款显示出类似于罗马解放奴隶的仪式，在仪式中奴隶被主人碰触，然后得到解放。

[47] 这一条约的历史脉络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迦太基人担心这样的可能性：罗马人在二八○年于阿斯库伦（Asculum）击败皮洛士后，会签订合约；而迦太基人宁可战争继续在意大利进行。皮洛士据闻怀有入侵非洲的野心。

[48] 罗马人到达迈萨拿在页141之处提及，而费利纳斯之不可靠在页143—144提及，但并没有提及任何这所谓的条约。

[49] 亦即艾基尔特斯及利帕拉岛。

[50] 约五六八九二千克。——译者注

[51] 约二五八六○千克。——译者注

[52] 约三一○三二千克。——译者注

[53] 这日期不确定，但或许是在《埃布罗条约》之前（二二五年）：或许是在二三○年至二二八年之间。然而萨贡托是在埃布罗河以南，因此其与罗马结盟（假如这结盟意味着在最后会提供武力协助），便与《埃布罗条约》互相矛盾。

[54] 波里比阿认为针对菲利普五世与安条克三世所发动的战争，是罗马在汉尼拔战争之后的扩张。而汉尼拔战争有些时候被视为是罗马进行主宰世界计划的第一步（页132），有些时候则被认为是让罗马人开始有如此构想的事件（页133）。

[55] 这个民族的来历并不清楚。

[56] 一个来自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部落。

[57] 他们的领土在瓜达尔基维尔（Guadalquivir）河旁，靠近卡司吐罗（Castulo）。

[58] 见页282。

[59] 在意大利最东南之海岬，靠近克罗敦，现今之克罗纳海岬（Cape Colonna）。

[60] 罗马的最后通牒一直要等到最早二一八年三月才会递交到迦太基，但或许迟至六月，所以这个演说或许是想像的。

[61] 这原先标记迦太基及昔兰尼（Cyrene）的疆界；它们靠近今日之艾尔·阿吉拉（El Agheila），班加西（Benghazi）之西南。

[62] 这是一个整数的总数：实际所提及之距离加起来是八千四百史台德，大约达一千罗马里。

[63] 不甚确定这消息是在特使返回罗马前就已经先到罗马；甚至这消息还早于他们出使迦太基。

[64] 西庇阿率领一支八千名军团士兵，一万四千名盟军步兵，六百名罗马骑兵及一千六百名盟军骑兵，前往马希利亚（Massilia，今日马赛），从那里入侵西班牙。隆古斯则率领另一支八千六百名军团士兵，一万六千名盟军步兵以及一千八百名骑兵，在西西里建立根据地，准备最终入侵非洲。

[65] 实际上是在二一八年秋天。

[66] 亦即在军队最初抵达隆河后。

[67] 亦即最先的两个木筏完全靠在岸上。

[68] 这是波里比阿最惊人的地理错误之一。因为他相信阿尔卑斯山山脉横亘东西，而隆河源起于其北侧，所以河流必然被认为会是往西的方向流动。

[69] 文本仅提及河流，但是行进路线强烈显示是以色蕊（Isere）河。

[70] 波里比阿对横越阿尔卑斯山的陈述在许多重要细节上与李维的不同，因为这两位作家使用不同的史料。李维的描述最能合理地诠释为是军队经由较南的路径，通过Mont Genevre的通道越过山脉，而波里比阿则是较北，经过Mont Cenis。

[71] 如按照表面意思，这必然意味着十一月初，但汉尼拔在这通道上有可能是在九月第三周，所以星宿的这个阶段一般使用的意义是指天候不良季节的开始。

[72] 亦即地理资讯及其在历史写作的位置。

[73] 这一段落很显然是在波里比阿旅行过高卢、西班牙及非洲后所写的，

其时大约在一五一年到一四六年间。

[74] 或许是现今之都灵（Turin）。

[75] 这些论断是彻底的臆测。西庇阿或许对汉尼拔到来的速度感到诧异，但若汉尼拔在敌人北方疆界之处“尚未”遇见敌军，那必然更是惊人。

[76] 在四十天之后（见页330）。

[77] 亦即以三列的前线部队、中线部队以及后线部队来布局。见页412至页413。

[78] 这是罗马的标枪手，他们面对汉尼拔的长枪手以及投掷部队。

[79] 二一七年。

[80] 这里的右侧及左侧是以汉尼拔行进时的观点来看。因此投掷手及长枪队被布置在罗马纵队的南方及西南方，凯尔特人及骑兵则在北方，除了罗马没进入的最后部队。弗拉米宁的处境在越深入山湖之间的隘道时，越显得困难。他的军队以纵队前进，绵延六、七里之长，很容易在攻击时被切成数段，而他的人马与湖泊间的狭隘地形提供甚小空间来进行撤退或重组部队，而突起的地形阻碍往北突破的机会。这场战役提供历史里少见的例证：一位将军以一整支庞大的军队来进行埋伏，同时面对几乎敌对的全军。

[81] 特雷西米尼湖之战发生在六月二十一日；汉尼拔在大约两周之后抵达海岸边。

[82] 这一陈述是错误的，就任的官员，包括执政官，是在独裁官的命令下行事。

[83] 这些并没留存下来。

[84] 道尼亚是从加尔干诺山（Mount Garganus）往南延伸的地区。皮攸切替人居住在巴律（Bari）往内陆延伸的地区，美沙皮亚人则是居住在布伦迪希温及他林敦后方的内地。

[85] 亦以普提欧里（Puteoli）为人所知，现今之普左里（Puzzuoli）。

[86] 《奥德赛》十书二三二行。

[87] 这日期可能是九月初。

[88] 日期是六月初。

[89] 见页285、287至288。

[90] 见页145。

[91] 亦即在奥菲狄亚斯河的右岸。

[92] 瓦罗横渡到右岸，在坎尼之下，而是在那里战争爆发，罗马人是背海应战。

[93] 这种组队的目的是要突破敌人中央，并在迦太基骑兵可以决定战局之前，便先赢得战争。

第四书

在希腊之事务：谷奈塔（**Cynaetha**）的内战

【这段落所描述之事件发生在第一百四十个奥林匹亚年（二二○年至二一六年）。谷奈塔是阿卡狄亚地区的一个城市，在今日卡拉福列塔（Kalavryta）之地点。在约二四○年，这城市被当时阿拉托斯担任将军的亚该亚人占领，之后由一亲亚该亚派系的人主政。后来那里爆发的阶级冲突，与克里奥米尼斯三世在二二七年斯巴达夺权，引发的社会改革有关；事实上，在斯巴达所实施的土地充公、重新分配，对整个伯罗奔尼撒的群众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伊托利亚人当时正与亚该亚人作战，他们捉住机会，鼓励亚该亚联邦中这些爆发的革命情绪。】

17.谷奈塔的人民是阿卡狄亚人，多年来他们的城市被未曾停歇、毫不妥协的政治派系斗争所撕裂。这两个派系一再以屠杀、放逐、没收充公财产及重新分配土地来彼此报复；而在我现在写作这部分所提的时期中，一个亲亚该亚的派系占有上风，占据城市，而亚该亚人派出军事总督以及驻军，来防守城池。这是当时的状态。但就在伊托利亚人入侵不久前，被放逐的派系诉诸国人，要求应该有普遍和解，所以他们应该被允许回家。当权的派系答应如此要求，派出代表去亚该亚联邦，因为他们希望联邦同意他们达成的任何协议。亚该亚人乐于接受这一提议，相信双方必然会以善意看待他们，因为当时那些当权者将所有希望寄托在亚该亚人，而那些即将回国的人，则会将他们得以平安回国，归诸联邦的同意。谷奈塔人于是解散亚该亚总督及驻军，人数共计约三百；这是当权者首先得到对方做出通常所有人绝不可反悔的承诺之后才解散的。回归之流放人士在被允许返国后，应该没有理由或借口让他们认为会有进一步的斗争要发生；但就他们而言，从他们回归的那一刻起，他

们便开始阴谋对付城邦以及他们的造福者。我认为甚至有可能，当他们在祭祀中彼此交换誓言以及承诺时，他们的思想已经集中在那邪恶神明的阴谋，去破坏对神的信赖以及那些相信他们的人。因为一旦他们与政府重新建立关系后，他们便开始秘密接触伊托利亚人，便提议将城市出卖给他们，并迫不及待地去摧毁那些曾经拯救他们的人，或曾经养育他们的城邦。

18.他们计划去进行的大胆一击是这样的。一些流放之人被任命去担任“普列马”（polemarch）的职务。这些官员的职责是关闭城门，在城门仍是关闭时，看守钥匙，以及白天时则在城门守卫室警戒。伊托利亚人已经为自己准备攀爬的长梯，隐身起来，等待预定时刻发动攻击。属于流放之人那派系的“普列马”在城门守卫室中杀死同事，然后开启城门，一些伊托利亚人在那时经由入口冲进来，其他人则将长梯靠放城墙，攻占防御工事。全城的人对事情的变化深感恐慌以及混乱，不知所措。他们无法完全将注意力放在从城门蜂拥而入的攻击者上，因为攻击行动同时也发生在城墙上，但因为那些从城门强行进入的人，他们也无法有效对付在城墙上的攻击。在这状况下，伊托利亚人迅速占领城市，然后在犯下其他犯罪行为后，开始进行即审即判，旋即处决。他们首先杀死那些让他们进城之人，掠夺他们的财产，然后以相同方式屠杀其他所有公民。最后他们占据、入住受害人家室，系统性地掠夺所有财富，酷刑虐待许多他们怀疑有隐藏金钱、贵重器皿或其他珍宝的谷奈塔人。

在对谷奈塔人犯下这些罪行后，伊托利亚人移出他们的部队，留下驻军看守城墙，然后前往卢西（Lusi）城。当他们抵达位居克来拖及谷奈塔之间、希腊人视为神圣的狩猎女神阿蒂米斯神庙时，他们威胁要驱走在神庙范围内蓄养的圣兽以及掠夺庙产。但是卢西人民以极具见识的方式行动。他们给予伊托利亚人一些神庙的家具，说服他们亵渎神明的行为，避免任何犯罪。伊托利亚人接受这些礼物后，立即离开，并在克来拖前扎营。

19.在这时候亚该亚联邦将军阿拉托斯送信给马其顿菲利普，要求协助。他也采取措施来动员那些服役的亚该亚人，要求与亚该亚订有协议的美塞尼亚及斯巴达这两个国家派出军队。

伊托利亚人最先敦促克来拖人民放弃他们与亚该亚人的联盟，转而与他们缔盟。当克来拖人断然拒绝这提议时，他们开始攻击城市，设法以攻击城墙来直接占领。然而居民勇敢以及激烈地抗拒，伊托利亚人迫于局势压力，拔营离开，再度前往谷奈塔。在途中他们掠夺并且带走在卢西的圣兽，尽管他们之前承诺要尊重它们。最初他们提议要将谷奈塔交给伊利斯人，但当伊利斯人民拒绝接受时，伊托利亚人决定要自己占有，并任命欧里庇得斯（Euripidas）为军事总督。后来他们惊恐地得知情报，一支马其顿的援军正在途中，所以他们将城焚毁后放弃。他们接着前往位居科林斯湾的港口流温（Rhium），意图从那里航行到对岸大陆去。

20.谷奈塔人民在伊托利亚人手中历经这些残酷的灾难后，却仍然被认为罪有应得。然而这也是事实：阿卡狄亚民族整体而言，在希腊人之中享有美好品德的名声，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民族在个性及习俗上，展现出好客及人性，而且特别是他们对神明的虔诚。因此这里似乎值得暂时先离题一下，来探讨谷奈塔人野蛮的个性，并问我们自己：虽然他们无疑的是属于阿卡狄亚人，何以他们却在残酷以及无法无天的行为上，远超过那个时代所有的希腊人。

我个人的意见是，谷奈塔人是在所有阿卡狄亚人之中最先，甚至是唯一放弃他们先祖高贵构想出——而且就阿卡狄亚居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来说，都会加以深究——的一种体制。我所指的是对一般音乐教育的特别重视，而且我这里所要指出的是真正的音乐。[1] 音乐对其他所有人是种祝福，但对阿卡狄亚人来说却是必要的。我们切不可以接受埃福罗斯[2] 的建议：他在他历史的序言中，说出一句颇不得宜的话，亦即音乐

被介绍到人类之中，其目的是为了彼此欺瞒诈骗。我们也不可误认，以为克里特人及斯巴达人没有理由用笛子以及韵律性的运动，来取代在军事行动中的号角。[3] 依据相同道理，早期阿卡狄亚人当他们给予音乐在公共生活中如此重要地位时，是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的。所以不仅男孩，而且直到三十岁的年轻男性，都必须经常练习，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都是在最节衣缩食的状态下生活。这是一个许多人都可以作证以及众所周知的事实：阿卡狄亚人几乎是唯一会要求小孩从最稚龄时候起，便开始以富于节奏的方式来咏唱纪念（根据他们的传统）特定地点神明和英雄的赞美诗歌的民族。后来他们学习菲罗玄（Philoxenus）[4] 以及提摩泰乌斯（Timotheus）[5] 的旋律，而每年在剧场都有配合专业笛手伴奏的合唱激烈竞赛，男孩参加适合他们年纪的赛事，而男人则在所谓的男人庆典中参加。除了这些场合外，他们终其一生的习惯是在宴会中自娱娱人：他们不会去聆听雇用来的歌手，而是创造出自己的音乐，每个人都会被要求轮流唱一首歌。他们一点都不会羞于承认，他们对其他学问完全无知，但是在歌唱方面，没有人可以声称没被教过，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学习；也没人可以说知道如何唱歌，但却婉拒表演，因为这在他们之中会被认为是耻辱。除此之外，年轻人在游行时，会以笛子演奏进行曲，会让自己精于舞蹈，会在剧场中进行年度表演。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国家赞助以及在公家支付下进行。

21.在引进这些作为时，我不相信阿卡狄亚人的祖先会认为它们是奢侈或多余的。相反的，他们了解身体操劳是普遍命运；人类生命生而辛勤艰苦，以及因为这地区寒冷阴沉的天气，以至于居民个性普遍相对粗鲁不文。这个中事实是我们身为凡人，纯粹出于自然需要，必须自我调适来配合天气影响，而只因为这理由而非其他，造成彼此相隔遥远之个别国家及民族在他们的环境、体态和外观以及大多数习惯上，有如此明显不同。所以为了缓和及调节自然所导致的顽固粗鲁，最早的阿卡狄亚人引进我已经描述的行为。除此之外，他们也同样灌输男性以及女性要经常举行社交聚会、祭祀牺牲以及由少男少女所表演的舞蹈，还有以

各种方式透过如此体制所带来的缓和及文明教化，来努力让民族个性中的粗鲁不文变得人性化。

但另一方面，谷奈塔人却完全忽略这些努力，虽然他们比其同民族之人更需要这些，因为他们的国土较之阿卡狄亚其他部分更加崎岖不平，气候更加严峻。所以他们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内部问题及政治斗争，最后变成如此野蛮，在希腊没有一个城邦会常犯下如此残酷或是如此频繁的罪行。我提以下之事件来说明谷奈塔人在这方面已经沉沦的深度，以及其他阿卡狄亚人对他们行为的深恶痛绝。在他们人民遭受大屠杀之后，谷奈塔人送出代表团到斯巴达，但在前往途中，凡特使所经过之阿卡狄亚城市，都立即公开下令他们离境，而曼提尼亚人在访客离开后，还进行正式仪式、献祭牲品，以及高抬祭品游行城市和国内诸多祭坛，来净化这次他们带来的污染。

拜占庭与黑海

38.海洋对于拜占庭而言，为它的安全及繁荣提供比我们这部分世界所有其他城市，都还要更多的优势，但是就陆路而言，局面恰恰相反。在向海一方，他如此彻底地控制黑海出入，所以没人可以在没得到拜占庭同意下，自由航入航出。结果是他们对世界其他地区日常所需，但黑海特别盛产的物品，施展绝对的控制权。有关生活所需，没有人会去争议环绕黑海周围的土地提供最大数量以及最高品质的牲畜及奴隶；至于奢侈品，这相同的区域不仅提供我们很大数量的蜜糖、蜜蜡、腌鱼，这地区的人也吸收我们国家所生产的多余物质，亦即橄榄油及各种类的酒品。就谷物来说，这是双向交易，因此当我们需要时，他们提供，但有时从我们这里进口。假如拜占庭人对希腊人采取刻意敌对的态度，或假如他们在过去与高卢人结盟，或特别是现在，和色雷斯人结盟，或干脆放弃与希腊城市的合作，希腊人必然会完全无法进行贸易，或是贸易变得十分没利润。这其中理由是因为海峡航道狭窄，以及沿着海岸居住的野蛮人数量特别多，希腊船只将必然无法航入黑海。无疑地，拜占庭人本身从他们城市的位置而获利最多，因为他们可以轻易以有利于自己的利润，输出所有多余物品以及进口任何他们所需的，而且如我所说，对其他人做出许多的服务。所以，既然他们是整个希腊的共同造福者，他们不仅应该得到感恩，也在无论何时受野蛮人威胁时，应该得到希腊人民普遍的支持。但绝大多数的希腊人并不十分了解拜占庭位置独特的自然优势，因为它远离那些人们最常造访的那部分世界。但是我们却又都对类似事情亟欲知晓，并且亟欲亲访特殊或非寻常可见的有趣之地，或是假如它们并非在我们能力可及之处，就尽我们可能地去对它们有准确的印象或想法。既然如此，我应该在此记录这案例的事实，解释究竟什么使这城市如此非凡地繁荣。

39.我们所知之黑海（Pontus）其周围约超过两千五百里，而且有两个开口，彼此遥相对立。其中之一是开向前普罗滂提斯海峡（Propontis），另一则是向迈奥提克湖（Maeotic Lake），[6] 此湖周围约九百三十里。从亚洲方面许多大河灌注其中这两个盆地，但那些在欧洲方面则是更大的河流；因此，当河流注满迈奥提克湖，则溢流到黑海，而由黑海又注入前黑海。迈奥提克湖的开口称为希摩利亚的博斯普鲁斯（Cimmerian Bosporus），约有三里半宽，七里长，而这片水面从头到尾都是浅的。黑海的开口称为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Thracian Bosporus），约有十五里长，但是其宽度则不一致。在其末端导入前黑海，亦即所谓南端，是拜占庭与卡希洞（Chalcedon）之间的海峡，约一又四分之三里宽。黑海之口是始于所谓的“神圣之地”（Holy Place）；[7] 根据传奇故事，杰孙（Jason）在从考曲斯（Colchis）回航时，[8] 最先在那里向奥林匹亚十二神献祭。这“神圣之地”位居亚洲那侧，与对岸色雷斯的相对点有约一里半的距离，对岸那点以撒拉匹斯（Sarapis）神庙为人所知。

造成迈奥提克湖及黑海之间经常的水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对众人来说，较为明显的是有许多河流都将水灌注到这有限的范围内，水量持续增加，而假如没有出口，那必将不断升高，在盆地中填满一个较大的区域。而出口确实存在，多余的水便会流出，并且经常是由那些接受这些水的水道承接流走。第二个原因是，在大雨之后，河流冲刷到这些盆地里各种类的大量冲积物；海中的水因此被沉积物所造成的堤岸所取代，因此水位被迫更为升高，最后以相同方法透过既存之出口流出。正如从河流流出之水会挟带冲积物是个持续的过程，所以透过出口进行外流，也必然会持续进行。

因此这是何以水流会流经黑海的两个理由，而它们的可信度并非奠基在旅行者的故事，而是自然科学的原则；不容易发现会有比这更正确的方法。

40.然而，既然我已经将这议题进行到如此的程度，我不可以如许多作家的习惯，留下任何一点没被加以解释，或只是做单纯的声明而已；而是要去呈现一个可以适当提出有凭有据的描述，所以不会让读者心中留下疑问。这是我们现在世界的特殊之处，因为旅行者已经可以去造访每个海洋及每处陆地，所以我们不再能够待我们不知的议题时，还是只提出诗人或神话编撰者的证词而已，如我们前辈对大多数的议题所曾做过的一样，或像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如是说，“对争执的事实做出不值得信赖的证词”。相反的，我必须尽我所能，摊开在读者之前，一个仅凭其优点便能够取信于读者的陈述。

我的论点是黑海的淤塞从远古以来便一直进行着，至今仍在进行，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假设地方因素维持不变，而产生冲积物的因素持续运作，黑海以及迈奥提克湖将会完全填满。[9] 因为时间是无限的，而这些盆地的容积无疑是有限的，所以即使流入的数量是相当微不足道，这两个海迟早还是会填满的。根据自然法则，假如有限的量在无限的时间中不断增加或减少，那即使增加或减少是极小（因为这是我现在所预设的），那这假设必然需要这过程最终会完成。但是如目前情形，这流入量绝非极小，而是有大量的泥沙被冲积下来，很明显地，我所预测的转变不会是在遥远的时日发生，而是在不久的将来。事实上，这现在已经可见到其正在发生中。迈奥提克湖已经是如此的淤塞，所以其大多数的部分都没超过五噚或七噚（fathom，约九点六公尺或十三点四四公尺）深，所以较大船只若无引水人引航，不再能够航入。且如古代权威人士都同意的，这曾经一度是延续到黑海的海洋，但现在则成为淡水湖。[10] 原因是咸水已经被底部的淤积所挤走，而从河流流入的水取代它的位置。相同之事亦发生在黑海，这转变确实已经发生。因为这个盆地的规模虽然对大多数观察者而言并不明显，但对那些比较小心求证的人，很明显这已经正在发生中。

41.例如，在多瑙河流离欧洲，经由多处河口流入黑海之处，已经

有一个由多个河流释放之冲积物所堆积的堤岸，已经在面对河流之处形成；这有将近一百二十里之长，而距离需约航行一日，所以远离海岸而在黑海航行的船只，航行稍有不慎，很容易在这浅水处搁浅，这些地方水手称之为“胸部”（the Breasts）。这些冲积物并非在靠近岸边处形成，而是被推向远离陆路之处的事实，必须以如下方式解释：河流的水流较海洋水流更为强劲，并且从中推出一条路，将河流所冲下之泥土及其他物质持续往前推，而且不允许停下或沉淀。但是当水流的冲力已经在海水逐渐加深以及海水量增中耗尽，泥土会因其自然重量而下沉集结。这是何以在流量大以及流速急的河流，而且附近海域深，沉积物会在一段距离的地方累积，但对流量小且流速慢的河流，沙岸则是在河口处形成。这事实容易证明：每当豪雨发生，因为在这时候即使是相当小的河流，在克服河口的波浪后，根据当时它们流量的强度，会强将泥土往海推去一段距离。我们不该不相信由多瑙河所形成的沙岸的范围，或从其他河流所冲刷下来的石头、树木及泥土的庞大数量；的确，拒绝相信是必然的愚蠢，因为我们经常亲眼看到某些不起眼的冬天洪流，强行经过高地，夹杂各类木头、泥土和石头冲刷而下，并形成具有规模的冲积物，在短时间内会如此改变地形外观，以至于无法辨识出原来的地貌。

42.所以我们不该惊讶，假如如此庞大之河流的持续流动会产生我所形容的效果，最后终于将黑海填满；事实上，逻辑似乎也会使这一过程不仅只是可能，而且是必然。以下是这可能发生之一个征兆。迈奥提克湖之水现在较之黑海更为甜美，而黑海又比地中海明显甜美。从这里很清楚得知，用来填满迈奥提克湖所需的时间，将会随着黑海盆地规模之超过迈奥提克湖的比例而延长，以来填满黑海，届时黑海同样地会变成浅水的淡水湖。[11] 事实上，我们或许有理由去期待这一过程将会发生的更快一些，因为注入黑海的河流，既更大也更多。

我以上所说的是针对那些倾向于不信黑海正在淤积，而且会持续淤

积，或者如此广大之海将会变成湖泊或沼泽的人士。除此之外，我心中还想到一些回来的商人向我传述的异象以及谣言。我的目的是，我们不应该只因为受限于单纯无知，而被迫以小孩易信之心去聆听我们所被告知之任何事，但是在拥有几分真相后，我们或许可以用它们来测试凡是所有告诉我们的东西是否可信或相反。

43.我现在回去形容拜占庭处境的特殊过人之处。如我已述，连接黑海及前黑海之通道共计约十五里长。所谓的“神圣之地”标记着北端，而拜占庭海峡则是南端，在这两点之中，欧洲那边是荷密翁（Hermaeum）：[12] 它坐落在一个突出到海峡中的海岬上，标记出其最狭窄之点，离亚洲几乎不到半里。大流士（Darius）当初要过海攻击西徐亚（Scythia）人时，便是在此处下令建造他的船桥。在此处，来自黑海的水流强度一致，因为海峡两侧岸边状况差异不大。但当它到达欧洲那侧的荷密翁时，即我所说最窄之处，水量因此受到局限，强力地往海岬冲刷，宛如在一击之后回弹，将自己往对面亚洲岸边撞去。在那里它又回弹，击中欧洲海岸的海岬，这里以是“炉灶”（the Hearths）为人所知，而从这里它的力量又被引导到亚洲那边称为“母牛”（the Cow）之处，因为根据传说伊欧（Io）在游泳过海峡之后，最先脚踏于此。最后，水流迅速从“母牛”流到拜占庭本身；在城市之前，它分为两股水流，较小的进入称为“号角”（the Horn）的海湾入口，[13] 而后者又再度被转向。到这时候它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到达对岸，那里便是卡希洞。水流现在已经多次跨越及折返海峡，而在此处海峡明显较宽，所以水流变缓，不再以锐利角度从一岸弹回另一岸，而是以钝的角度回弹，没击中卡希洞，而从海峡中间流走。

44.正是这个事实，使拜占庭有如此有利的状况，而卡希洞恰好相反。初看之下，我们或许会认为两边都有一样方便的位置，但事实上，假如您想要的话，航行到卡希洞不容易；水流会将您带到拜占庭，无论您要或不要，如我已经解释。这件事之证明是要从卡希洞航向拜占庭，

是无法以直线航道航行，因为水流将这两地隔开。相反的，他们得要斜角地航向亚洲那侧“母牛”以及称做克利索波利斯（Chrysopolis）的地方。[14] 雅典人当他们企图要向航入黑海的船只征收关税，在亚西比得（Alcibiades）建议下所占领的正是这个城镇。从这地方乘客将自己随波逐流，无论是要或不要，水流都会将他们带往拜占庭。从海峡另一端前进到拜占庭，从两方都一样便利。无论一艘船来自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借南风而北行，或借北风（Etesian wind）从黑海到赫勒斯滂海峡，从拜占庭沿着欧洲海岸到黑海峡窄开始之处，赛斯拖斯（Sestos）及阿比多斯（Abydos），是条直接以及容易之通道，同样回程到拜占庭，亦复如此。但从卡希洞沿着亚洲海岸的路线却恰好相反，因为海岸线被几个深邃的港湾所打断，而赛济克斯（Cyzicus）领土所形成的海岬又深入海洋。再者，一艘从赫勒斯滂海峡前往卡希洞的船只，会沿着欧洲海岸先到拜占庭附近，然后再利用风向来航向卡希洞，因为水流以及其他因素，使离开卡希洞直接航行到色雷斯是不可能之事，因为不仅其中干扰的水流，而且北风及南风都会阻碍这种往返的努力：南风会将船带往黑海，北风则是带离，而这些风是在行离卡希洞前往赫勒斯滂海峡以及折返时，皆必须利用的。这些是拜占庭有关大海所享有的优势：我现在将描绘它在陆路的不利之处。

45.这些不利之点源自陆路方面，拜占庭被色雷斯领土从海到海围住，以及拜占庭一直以来和色雷斯人进行永久而且无法解决的战争。因为色雷斯的部落领导人以及其随从人数众多，所以拜占庭无法做任何周全准备的攻击，来赢得决定性的胜利，终结战斗。假如拜占庭人征服一位领导人，会有另外三个更可怕的（领导人）入侵它的领土。而假如他们让步，同意谈和及缴交贡赋，对事情亦毫无改善，因为如果他们向一位部落领导人让步，这会带来五倍的敌人来攻击他们。结果，如我所解释的，他们发现自己卷入一场格外困难以及无限延长的战争，因为有什么会比与居住在你边界的野蛮人作战，是更危险及更令人惊恐之事？

广泛来说，这些是拜占庭人必须在陆路去对抗的考验以及承受的风险，但除了与战争相随的其他恶事之外，他们注定要承受类似如荷马史诗所形容折磨坦塔罗斯（Tantalus）的命运。[15] 他们发现自己是一块最富庶沃土的主人，投注劳力在他们的土地上，也有极优厚丰收的奖赏，但野蛮人在收获时却扑扫过来，将一些谷物焚毁，带走其他，所以除了白费的操劳和开销外，他们在见到这些在他们眼前被毫无异议地摧毁时，收获时的美好却反而加强了他们感受到的辛酸悲哀。

---

[1] 这包括配乐演唱的诗歌，但不是指柏拉图所谓那种更广泛的教育脉络的音乐。

[2] 在伊奥利斯（Aeolis）地区库默（Cyme）城邦出身的埃福罗斯（Ephorus）是四世纪有领导地位的史学家。他内含三十书的历史结束于三六五年。在所提及的引句中，埃福罗斯或许是在将音乐与历史做对比，声称其中之一是提供刺激，另一则是要提供教导。

[3] 号角主要是要用来传递信息，所以不适用于在行进中调整步伐。

[4] 基西拉的菲罗玄（Philoxenus of Cythera，四三五年至三八○年），是酒神颂诗歌（dithyramb）的作家，居住在戴奥尼素一世（原为Dionysius the younger——译者注）统治下的叙拉古。

[5] 米利都的提摩泰乌斯（Timotheus of Miletus，四五○年至三六○年）以在原来的七弦琴之上，再加上新的四弦而著称。

[6] 现在在地理上等于黑海（Pontus）、马尔马拉海或前黑海（Sea of Marmara，Propontis）以及亚速海或迈奥提克湖（Azov Sea，Maeotic Lake）。

[7] 一座奉献给宙斯神的庙宇。

[8] 这是指杰孙王子到黑海东岸取金羊毛回色萨利的故事，所谓的“阿戈号航海记”（Argonautica）。——译者注

[9] 这个预言并没实现的实情，无疑是因为波里比阿低估水流经常性地从黑海迅速流出的速度，因为这强大到足以将冲刷下来的淤积给带走。

[10] 这说法是不正确的。

[11] 这可用来阐明波里比阿复杂的论点：假如黑海盆地是迈奥提克湖的三倍大，而填满后者需要一千年时间，那经过三千年时间，黑海亦必然成为淡水湖。

[12] 现在是由穆罕默德二世（Mohammed II）所建之奥斯曼土耳其Roumeli Hisar城堡的地点。

[13] 这是所谓的“黄金角”（Golden Horn），这长条的河道在今天分隔了伊斯坦布尔以及甲拉塔（Galata）区。

[14] 现今之斯库塔里（Scutari）。

[15] 坦塔罗斯被惩罚要永远站在水中，口渴却不能喝它，以及在其头顶处，生出无法触及的果树。

第五书

在埃及之事务：克里奥米尼斯之死

【年轻的“爱父亲”托勒密四世在二二一年掌控埃及王位。叙利亚国王塞琉西三世在二二三年过世，而安提柯三世在二二一年夏天亦身故；他们的继任者安条克三世及菲利普五世分别为十九岁及十七岁。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三世被马其顿人于二二二年夏季，在塞拉希亚战役中击败（见页170至175）。】

34.在他父亲“造福者”托勒密三世过世后，托勒密四世——别号“爱父亲”——将他的王弟马斯（Magas）及支持他的人给处决，亲自掌控埃及王位。他认为借着这方法将其对手除去，他因此已经除掉国内的危险，而且命运之神也解除了他国外的危机，因为这时安提柯三世及塞琉西三世也都恰好过世，而他们的继任者菲利普五世及安条克三世都相当年轻，甚至还只是男孩。无论如何，这些考量让他对局势感到安心，而他也刚开始进行自己的统治，但这统治好像这是一场永不止息的庆典。他忽略国家大事，并拉高自己的姿态，几乎不愿纡尊屈就来接见宫廷大臣或负责国内事务的官员，并且以轻蔑、漠不关心的态度看待那些在海外处理国家利益的人员，但其他前任国王对这些都会给予甚至比治理埃及本土更多的关切。因为他们控制了空叙利亚（Coele Syria）[1] 以及塞浦路斯，前任诸位托勒密国王经常能够在大海及陆路对叙利亚国王施加压力。他们控制的范围包括所有沿东地中海海岸，从潘费里亚（Pamphylia）到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和莱西马奇亚（Lysimacheia）周围附近的主要城市、要塞以及港口，这给托勒密王朝对小亚细亚岛屿及较小王国一种主宰性的影响力；他们占据伊纳斯

（Aenus）、马洛尼亚（Maroneia）以及其他更深入色雷斯的城镇，使他们可以对色雷斯及马其顿事务进行有效的注意。因为他们已经将势力延伸到如此遥远的区域，并在很早之前就已建立广泛的藩国系统来保护自己，加上埃及国王又未曾担忧过国内的统治，反而很自然地会对处理国外事务极为看重。然而“爱父亲”忽略他王权所辖的所有领域，反而全心全意进行令人鄙视的爱情追求，耗费在无谓浪费以及终年不断的宴饮上。所以不出所料，不久后便逐渐发生针对国王性命及王位的阴谋。第一桩是来自克里奥米尼斯三世，流亡该地的斯巴达国王。

35.“造福者”托勒密三世在世时，克里奥米尼斯保持沉默；他已经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国王，对埃及国王宣示效忠，而且始终活在这想法中：他终将被给予必要的协助，去收复斯巴达祖国。但在“造福者”过世后，[2] 随着时间流逝，希腊的局势似乎在呼唤着克里奥米尼斯回国。安提柯三世已死，亚该亚联邦陷入战争，而斯巴达人在这时候——如克里奥米尼斯从一开始所规划以及所图——与伊托利亚人一样，抱持着对亚该亚和马其顿人的仇视。因为这些理由，克里奥米尼斯觉得时机到了，需要立即行动，于是尽其所能来离开亚历山大。他首先晋见国王，在不止一次场合中要求提供给他足够的部队以及补给，去征战斯巴达。但因为托勒密四世不想听到这些，他于是做出殷切的恳求，希望能够被允许与他自己的家属离开埃及，因为局势提供了够良好的前景，让他恢复祖先的王位。但托勒密因为我上述的理由，显示出他完全无心于此，对未来也未曾思索，而且持续以出人意料的无知及愚蠢，对克里奥米尼斯充耳不闻。

这时，当时对国事握有主要影响力的索西比乌斯（Sosibius）及朋友一起商议，针对克里奥米尼斯得到如下的结论。他们的决定是反对派他率领舰队及补给出去，这是因为在“多森”安提柯三世过世后，外交事务对埃及不再重要，进行如此冒险的开销，无疑是浪费钱财。此外，既然安提柯已经不在，他们认为现存的国外君王没有一位是克里奥米尼斯

的对手，他们因此担心他必将不需费太多力气，便使自己成为希腊主宰，反而成为一个极为可怕的对手。这看起来似乎更为可能，因为克里奥米尼斯现正处于可以仔细观察埃及事务的位置，已经开始轻视国王，而且发现这王国内有许多地方控制松散，远离政府核心的区域因此可以提供许多进行革命阴谋的空间。例如，有许多军舰以萨摩斯为基地，以及有相当数量军队驻扎在以弗所（Ephesus）。这些理由使托勒密的顾问拒绝给克里奥米尼斯远征军及补给品。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羞辱如此杰出之人，然后让他离去，绝非他们的利益所在：如此做法确定会使他为敌。另一选项则是违反克里奥米尼斯的意志，强行将他留在埃及，但是他们没经讨论，立即排除这一点，其原则是将狮子与绵羊关在相同牢笼里，绝不安全。正是索西比乌斯本人特别反对这样的可能性。其理由如下。

36.当权臣索西比乌斯及其支持者正计划要谋杀马佳斯（Magas）和贝蕾妮丝（Berenice）时，[3] 他们对计划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心生恐惧，倍感煎熬，主要理由是贝蕾妮丝有过人的勇气。在这局势下，他们必须要讨好所有的廷臣，假如阴谋成功，那大家将都会有好处的前景，便会引诱他们。就在那时，索西比乌斯因为知道克里奥米尼斯需要国王的协助，加上他是位有判断力的人，对局势能有真正掌握，于是将整个阴谋向这个斯巴达人吐露，并提出克里奥米尼斯或许能从中获益的极大希望。克里奥米尼斯见到索西比乌斯陷于极大焦虑，而且特别担心外籍佣兵的态度，所以他敦促索西比乌斯鼓起勇气，承诺说他们不仅不会伤害他，甚至将会支持他。当索西比乌斯对这些保证倍感惊讶时，克里奥米尼斯回应说：“难道您没见到这些人之中，有三千名是来自伯罗奔尼撒，[4] 以及一千名来自克里特岛？我只需向他们点头示意，他们便会一起向您靠拢。有这些部队团结一致，您何需恐惧？不太可能会是那些叙利亚人或卡里亚人让您担心吧。”在那时候索西比乌斯听到这些话大喜过望，信心加倍地回来重新进行对贝蕾妮丝的阴谋。但后来，当索西比乌斯观察到国王所展现出来的彻底被动及堕落，克里奥米尼斯的话反而

在他心中回响着，而且回忆到这位斯巴达人的勇气及在佣兵中受到的欢迎，都一再地折磨他。所以这次他带头敦促国王及其朋友要囚禁克里奥米尼斯，以免太迟。那时为了让他的建议看起来更为紧急，他利用了以下的情势。

37.在美塞尼亚有位公民叫尼卡哥拉斯（Nicagoras），他是斯巴达国王阿启达马斯（Archidamas）的世交。在阿启达马斯生前稍早之时，他们甚少相遇，但是当国王因为害怕克里奥米尼斯，被迫逃离斯巴达，来到美塞尼亚时，尼卡哥拉斯不仅立即接受他到家里，提供所有需求，而且在他们后来的密切往来中，他们之间发生了温暖的感情以及善意。所以当克里奥米尼斯在后来对阿启达马斯提出他可以回国，以及两人之间的歧见可以化解时，尼卡哥拉斯在两人之间奔波，进行协商及达成协议。当事情确定后，相信透过尼卡哥拉斯协调出的条件，阿启达马斯于是前往斯巴达；但克里奥米尼斯出来见他们时，却将阿启达马斯处死，[5] 虽然他饶恕尼卡哥拉斯及其他的伙伴。尼卡哥拉斯对外面的世界假装他感恩性命被饶恕，但在心中却由于所发生之事，对克里奥米尼斯怀着很尖锐的恨意，因为所有的迹象都显示是克里奥米尼斯要为国王之死负责。

在我所形容之事件不久前，这位尼卡哥拉斯带着一船的马匹抵达亚历山大；当他下船时，他遇见克里奥米尼斯以及他的朋友潘提亚斯（Panteus）和希皮塔斯（Hipptas），他们正在码头散步。当克里奥米尼斯看见尼卡哥拉斯时，他上前亲切致意，询问他为何事前来。当尼卡哥拉斯回答说他带来一船的马匹要卖，克里奥米尼斯说：“您如果带来妓男和妓女，那就更好，因为这才是讨好国王的货品！”那时尼卡哥拉斯微笑，不发一语。几天之后，当他因为马匹生意，而和索西比乌斯见了几次面，他引用克里奥米尼斯所说的话，希望对克里奥米尼斯造成不利。他发现索西比乌斯很满意地听他正在说的，所以在那时候，他告知怨恨克里奥米尼斯的所有故事。

38.当索西比乌斯了解到这个人对克里奥米尼斯心怀恨意，他当场贿赂并承诺未来给他一笔钱，说服他写信指控克里奥米尼斯，并将其缄封；几天之后尼卡哥拉斯离开，他的仆人带给索西比乌斯这封信，好像是由他主人亲自送达的。尼卡哥拉斯在这计划中扮演他该扮的角色，所以当他离去，这封信如期送到，索西比乌斯立即将信及仆人带到国王那里。仆人说尼卡哥拉斯留下这封信，指示他要交给索西比乌斯，而写信的人在信中坚称说，假如克里奥米尼斯没被提供一支装配完整的远征军，他意图叛变国王。索西比乌斯立即利用这机会，敦促国王及他的朋友，切不可再耽误，而是采取将克里奥米尼斯软禁的预防措施。这措施于是被执行。于是克里奥米尼斯被发配到一间很大的房子，在受监视中度过时间；他的情势与其他犯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比较大的监牢居住。这种情况下，他除了对未来的前景感到黯淡，别无其他，所以克里奥米尼斯决心孤注一掷，争取自由；他并非真正相信他能够重新获得自由，因为他手上完全没有成功的机会去进行如此企图，但他决心要死得有尊严，不屈服于任何不值得他过去表现出的男性勇敢气概。或许那些赫克妥（Hector）在跟阿喀琉斯（Achilles）最后决战之前所说的，而那些有大无畏精神的人时常会想到的这些话，在此时进入他心中，协助鼓励他：

且让我至少是珍贵地牺牲生命，而非卑屈地毁灭；

在勇敢的奋斗中死去，所以未生之人将会传颂纪念。[6]

39.克里奥米尼斯因此等待托勒密四世前往卡诺普司（Canopus）那天。那时他在看管他的守卫中散布谣言，说国王即将要释放他，并利用这为借口来宴请自己的随从，并赠送肉、酒以及花圈给他的守卫。士兵没有怀疑，慷慨地享用他的招待，然后不久后醉酒。克里奥米尼斯那时聚集自己的朋友及仆人，在大约日中时分，在守卫没注意下，身上佩带匕首，溜出房子。前进到街上时，他们遇见总督托勒密，他是国王指定来管理整个亚历山大城的人；他们开始攻击时，那纯然的勇气如此震慑

总督的奴仆，所以他们轻易把他从马车上拖下来，将其囚禁。那时他们外出，开始鼓动人们起义，要掌握自己的自由。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全城没人响应他们的呼吁，或显示出要加入叛变的迹象。那时他们转身，往卫城冲去，希望突破城门，说服囚犯加入他们。但这次的企图又失败，因为监狱里的狱卒已经被警告他们的意图，所以将门锁住。最后这些人将武器指向自己，就像有勇气之人以及像斯巴达人一样地死去。这是克里奥米尼斯生命的结束，一位在进行社会改革以及成就大事上有杰出天赋之人；换言之，一位天生具有领导统治能力之人。

在希腊之事务：菲利普及希腊人

【这一段落描述二一七年夏天在希腊之事件。波里比阿强调罗马人在当年六月于特雷西米尼湖遭受压倒性挫败的消息传开后，所产生的影响。】

101.在菲利普五世围攻底比斯时，[7] 罗马人被汉尼拔在特雷西米尼湖打败，但这战争的消息尚未传来希腊。菲利普抵达太晚，来不及攻击在马里亚（Malea）海岬[8] 的伊利里亚船只，所以他在坎克里埃（Cenchreae）港口[9] 下锚，派出他有甲板的船只，命令它们航行绕过伯罗奔尼撒，前往埃基提翁和帕特莱。同时，他下令将其他船只拖过科林斯地峡，命令船只停泊在科林斯湾的勒卡埃乌姆（Lechaeum）港口，而他自己则与朋友匆促前往阿哥斯，去参加尼米亚（Nemea）庆典竞赛的开幕。就在他坐下来观赏典礼时，一位使者从马其顿带来消息，说罗马人在一场大战中大败，而汉尼拔已经控制了广阔的乡间。唯一让他告知这一信息的人是法洛斯的德米特里，并命令他不可外传。德米特里捉住这机会，敦促菲利普要尽快摆脱伊托利亚战争：首先，全力集中征服伊利里亚，然后入侵意大利。他告诉菲利普，“整个希腊现在正等待您的吩咐，它将在未来服从您。亚该亚人无论如何都已经倾向去支持马其顿，而伊托利亚人因为最近战争失利，已经灰心丧志。但超越希腊以及入侵罗马，是朝向征服全世界的第一步，而没有人比您更有资格去进行。当罗马人遭受到灾难性的挫败时，这正是出马一击的时刻”。

102.德米特里以诸如此类的辩论，很容易就激起菲利普的野心，而这在一位如此年轻的国王是相当自然之事，因为到目前为止他的事业都是一帆风顺，已经享有大胆进取的名气，而且除这些品德之外，还声称是出自一个比其他都更容易有拥抱统治世界之雄心壮志的家族。

首先，如我所说，菲利普除了德米特里外，没将信息内容告诉他

人，而接下来他召开由他朋友所组成的国政顾问咨议会，来讨论与伊托利亚人和平的问题。阿拉托斯倾向支持开启协商的想法：他认为这是讨论协定的良机，因为马其顿已经在战争中占有上风。菲利普因此等不及去接待已经在讨论和平协议的联合代表团，立即派遣诺帕克都的克里欧尼可斯（Cleonicus of Naupactus）到伊托利亚去；但菲利普发现这位政治家在被亚该亚海军将领逮捕后，还在等待亚该亚联邦大会的决定。于是菲利普从科林斯率领船舰及陆军出发，远至埃基提翁。从那里他往北行军到拉西翁（Lasion），攻占佩律皮亚（Perippia）要塞，而且为了要让自己不被发现太想要结束战争，所以他放出风声，计划要入侵伊利斯。在那个时候克里欧尼可斯已经造访伊托利亚两三次，而伊托利亚人也恳求国王亲自在会议中接见他们。菲利普同意此事，然后下令停止所有敌意行为，并派遣廷臣到所有联邦的国家去，邀请他们送出代表参与协商。他本人则率军前往，在位居伯罗奔尼撒北岸的港口帕诺穆斯（Panormus）扎营，与诺帕克都（Naupactus）正好遥遥相望，在那里他等待伊托利亚联邦代表到来。当他们正在聚集时，他航行到札欣特斯（Zacynthus），主动安顿该岛事务，然后再回到帕诺穆斯。

103.当代表团完全聚集时，菲利普派出阿拉托斯、陶律翁（Taurion）以及一些人陪伴去造访伊托利亚人。他们发现后者正在诺帕克都召开联邦大会，在进行一次简短的讨论后，他们不怀疑伊托利亚人是希望和平，于是他们回航报告菲利普。就伊托利亚人自己而言，非常急于结束战争，送出特使到菲利普，敦促他航行横越科林斯湾，率领军队与他们会面；他们可以安排私人会议，使争执之点得到满意的解决。国王同意所请，率军渡湾，在所谓的“诺帕克都凹地”（Hollows of Naupactus）之处——这是在城镇以西约两里半之处登陆。他在那里扎营，以栅栏环绕船舰和军队，等待会议开始。伊托利亚人全军到达，但没有武装，在离菲利普营区约四分之一里处停止，然后送出消息，开启讨论。国王第一个动作是将所有联邦的代表送出，他指示这些人向伊托利亚人提出和平，条件是双方保有他们在那时所占有的。伊托利亚人乐

于接受这些条件。之后双方对于种种事务细节持续讨论。我将会略过大部分这些事，但我打算报道阿格拉俄斯（Agelaus of Naupactus）在第一次会议时，对国王及盟军之前所做的演说。他所说如下。

104.“假如希腊人从未彼此开战，假如他们认为神明最大之恩赐是所有人以同一信念，能够像人过河时手牵手一样，这将是最好的。用这方法他们能够团结起来，去抵抗野蛮人入侵，保全自己人身以及城邦。但假如我们没有希望在整个国家有如此程度的团结，那我必须让你们了解，我们至少要能够彼此协商，维持警戒，这在现今会是如何地重要，因为西方动员了庞大的军队，正进行着浩大的战争。对即使那些对现在事态最不关注的人，这都已经很明显：无论迦太基人击败罗马人，或罗马人击败迦太基人，胜利者绝不会只满足于意大利及西西里的霸权而已，而是将会波及这里，会越过公理正义的疆界，把武力及野心都推到这里。我因此恳求你们所有人都要提高警觉来应付这危险。但我要特别呼吁国王菲利普，因为对您而言，最安全之政策并非让希腊人疲累困顿，成为入侵者的轻松猎物，而是要照顾他们，正如您照顾自己的身体一样，来保护希腊每一个地区，宛如他是您自己领域的一部分。如果您依循这样的政策，在有人攻击时，希腊人将会是您的朋友及盟军，外国人将比较不会去觊觎谋夺您的王位，因为他们会被希腊人对您的效忠所阻挠。但假如您期盼一个让您行动的空间，那请将您的注意力转向西方，锁住在意大利的战争，并等待时机，所以当时刻来临时，您能够进入竞赛，争夺世界霸权。现今时刻绝非不利于如此之希望。但我请求您，请务必搁置您和希腊人的歧见以及您对他们的战争，直到世局变得更为稳定；所以，最优先的是您要关切我刚才所提及世局的那个面向，保持实力，根据您认为最好的情形来宣战或媾和。因为假如您一直等到现在已经聚集在西方的乌云飘到希腊时，我非常担心这些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休战、开战以及这样的游戏，将会从我们手中应声完全被夺走；所以我们必须向神明祷告，仍然赐予我们力量，随我们所喜来彼此战斗以及缔和，换言之，留给我们摆平自己纷争的能力。”

105.阿格拉俄斯这场演说强烈地撼动所有联盟去赞成和平，而菲利普更是如此，因为演讲者的辩论强化了他之前因为德米特里建议，已经成形的倾向。于是双方在所有细节都达成及批准协议后，解散会议。每位代表带回家的是和平，而非战争。

所有这些是发生在第一百四十个奥林匹亚年的第三年，亦即是在伊达拉里亚的特雷西米尼湖战役，以及安条克三世在空叙利亚的战役，以及菲利普和伊托利亚人以及亚该亚人签订条约的那一年。

就是在这个会议的同时，[10] 希腊、意大利及非洲的事务第一次彼此纠结在一起。从此刻起，菲利普和希腊主要的政治家，单就希腊事务，彼此停止交战、签订休战协定和条约，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意大利正在发生的事件上。但很快之后，相同的过程亦在爱琴海岛民及小亚细亚的居民中发生影响。那些不满菲利普以及其他对帕加马阿塔罗斯国王不满的对手，不再往南或向东，亦即向托勒密或安条克求助，而是向西求助；其中有些派出外交人员到迦太基，另一些则到罗马。罗马人如法炮制，派遣使节到希腊，因为他们对菲利普大胆冒进的性格，感到困扰，而现在既然自己身陷麻烦，所以希望采取预防措施，来应付他的攻击。

如我所承诺，我相信我已经做出清晰的叙述，说明希腊事务如何、何时及为何会和意大利与非洲事务彼此纠结在一起。我将继续我的希腊历史，直到罗马人在坎尼战役被迦太基人击败之日为止。这场灾难标记着我对意大利战争叙述所达之处，而我将在此处结束本书。

---

[1] “空叙利亚”这名词所指的是起于黎巴嫩及相对的东黎巴嫩（Anti-Lebanon）两道山脉间，经由利塔尼（Litani）山谷、约旦、死海，直到今日的阿克巴（Aqaba）及红海的狭长凹陷之地；这后来与腓尼基的土地相关联，所以包括了介乎西里西亚（Cilicia）与埃及之间的整个区域。

[2] 新王在二二一年即位。

[3] 贝蕾妮丝是“造福者”托勒密三世的遗孀，以及马佳斯及“爱父亲”的母亲。

[4] 这个词句“来自伯罗奔尼撒”，或许是指在半岛极南端台那伦（Taenarum）的佣兵招募中心，而斯巴达无疑控制着这一地点。

[5] 普鲁塔克在他的《艾吉士和克里奥米尼斯传》（*Life of Agis and Cleomenes* ）将克里奥米尼斯呈现为对阿启达马斯的谋杀知情，但不需为此负责。

[6] 《伊里亚特》二十二书三○四至三○五行。

[7] 这是指在色萨利的否提尔提斯·底比斯（Phthiotic Thebes），并非指在彼奥提亚（Boeotia）平原的底比斯城。

[8] 这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端的海岬。

[9] 科林斯在萨罗尼加湾（Saronic Gulf）的港口。

[10] 特雷西米尼湖战役以及空叙利亚的拉非亚（Raphia）战役发生在二一七年六月，而诺帕克都会议是在八月。然而在将这些事件同时发生来诠释为地中海历史的转捩点，波里比阿是在强行扭曲证据。爱琴海岛屿居民或是小亚细亚希腊人尚待许多年才会有向罗马请求的记录，没有任何阿塔罗斯的敌人被报道曾向迦太基进行接触，也没有罗马特使团曾在二○○年横跨爱琴海。

第六书

来自序文

2.我知道有些读者会怀疑，何以我拖延到这时才谈对罗马宪政的研究，因此打断原来叙述的流畅性。然而我已经在许多地方清楚表达，我始终认为这宪政分析是整个规划中的一个根本部分。我在开头以及本书初步导论中特别触及这点。我在那里说，历史最好及最有用的目标是能够向我的读者解释：究竟是以何种方法和凭借何种政体，让几乎整个世界都落入一个强权，亦即罗马的统治之下，这绝对史无前例。以这作为目的后，我无法找到比现在这时候更适合的场合，来将注意力引导到我即将要说的，并且测试其真实性。在私生活里，假如您想对好人或坏人的人格做出论断，而且假设您的意见会被真正检验，您不会只在无风无雨的宁静时期去检查他们的言行，而是在大起大落的时候。一个人真正品德的考验，在于他可以以勇气及尊严的方式去承受最彻底的命运转折。因此依照相同原则，这亦适用于我们对国家的论断。所以既然在我们的时代里，我无法发现比降临在罗马人身上规模更宏大或状况更惨烈的命运转折，那么在本书中，我就保留这地方来研究他们的宪政。

历史中对原因的追查，以及因之而来在每种情形下做出最好政策的能力，是同时能够吸引及有利于读者的特别面向，这是这种研究所带来的奖赏。我们必须理解，对于所有政治局势，造成成功或失败的主要因素是这个国家宪政的形式。正是来自这一源头，就如水来自水源一样，所有行动的设计及计划不仅由之而起，也在其中完成。

论国家之形态

3.在那些能够再度崛起，变得伟大，然后历经命运完全转折的希腊国家中，将它们的过去写出编年记录，并且对其未来做出论断，是件相当简单之事。要报道已知事实并无困难，而且从之前发生何事的知识来推测未来将会如何，亦非难事。然而就罗马人之情形，因为他们政体的复杂性质，要解释现在状况，则绝不容易，而因为我们对其在过去之私人以及公共生活典型特色相当无知，所以要去预测未来，更非易事。假如我们要对他们的政体有清楚掌握，这议题需要非比寻常的谨慎以及研究探索。

大多数那些设法对政治体制做出权威性描述的作家，[1] 会分辨出他们分别称之为“国王政治”（kingship）、“贵族政治”以及“民主政治”这三种类型。我想我们有权去质问他们，究竟他们所呈现给我们的这三种是唯有，还是最好的三种政体类型，因为无论哪种，我相信他们都是错的。很明显的，我们要认为“最好”的政体是包括所有这三种类型中的成分；这不仅在理论上，甚至在实践上都已经由莱克格斯（Lycurgus）加以证明，因为他是第一位以这种原则来建立政体——斯巴达政体——的人。但是我们也不能承认这是独有的三种政体类型，因为我们已经见过强人（monarchical）政府及僭主（tyrannical）政府的例证，仍与国王政治大有不同，[2] 即使它们与它有相似之点，所以这是何以一人独强的统治，就其能力所及，会僭越使用“国王”头衔。有一些寡头政体和贵族政治具有表面上类同之点，虽然再次地，此间的差异是可能的大；相同之概括说法亦适用于民主政治。

4.我刚才所说之事的真实性，或许可由如下辩论来说明。我们不能说每个一人统治的例证都必然是王政，而是只有那些子民自愿接受他来

统治他们，而这自愿是诉诸理性而非恐惧或暴力。同样我们也不能说每个寡头统治都是贵族政治，而是只有那些权力由最正直及最有智慧的人来施行的，而这些人是依照其优点而被选出。依相同道理，在一个国家内公民团体可以自由去做其所喜或是所想之事，但这并非一定是民主政治。但凡是其传统及习惯是去崇拜神明、照料双亲、尊敬长者、遵守法律以及在如此之社区中确保大多数人的意志能被普遍接受时，形容这种情形为民主政治，则是恰当的。

我们于是可以列出六种政体：三种是我们已经提及，以及那些与它们有某些共通之处的政体，而我在这里所说的是指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以及暴民统治。这些里面最先存在的是一人统治：这是无需外力，而是在自然中自己发生的。在一人统治后，由之发展而出，并且得到技艺协助以及修正缺失后，出现了国王政治。后者会恶化成其堕落但仍有关的形态，也就是我所谓的僭主政治，在废除这两者之后，产生了贵族政治。贵族政治因其性质而堕落为寡头政治，而当群众在愤怒中崛起，为了要报复其统治者所犯下的不公不义行为后，民主政治于焉发生；在适当之时，由于这类政权会滋生出的放纵以及为非作歹，暴民统治于是开始出现，因此完成整个循环。任何对这每种政府形态所应有之开始、起源以及变化做过研究的人，将会十分明了我方才说话的真实性。因为唯独透过观察这每种政体如何出现，我们才可以知道这些政体会在何时、如何及往何处来成长、完美、变化和结束。我相信罗马政体较之于其他政体更适合这种分析方法，因为其起源及成长从一开始时，便是依照自然的原因而来。

5.不同政体形态如何在彼此之间自然演化为另一种政体的过程，已经有柏拉图及其他哲学家详细讨论过。但是因为这些复杂的分析以及论证的精细，超过一般人的理解——除了一些人外。我因此会就我认为可以施用在严肃的历史研究以及可诉诸人类共同智慧之处，来对理论作一简洁的综合。因为我是以概论方式来讨论，所以假如在阐释中有遗漏某

些因素，接着下来的详细讨论，应该足够弥补读者那些我留下来没解决的难题。

所以，什么是政治社会的起源以及它最先如何出现呢？有些时候，因为洪水、瘟疫、农作物歉收以及其他缘故，灾难性的毁灭会降临人类，所有有关技艺及社会体制的知识都会丧失。传统告诉我们，如此灾难经常发生在人类中，因此必须合理预期这还会再发生。然后在一段时间后，人类由浩劫后幸存下来之人，再度重新繁殖，有如植物种子，人类在数量上再度增加，而且如兽群一样，开始形成团体。因为人类先天上的脆弱，所以可以想见他们会与同类相聚成群，而在这种状况下，免不了那在身体气力以及勇气见识上高人一等的，会出来领导及统治其他人。这种现象可以在那些没有理性的动物上见到运作，如牛群、猪群、鸡群以及其他类似者，其中最强大者无可争议地便成为其领袖。我们必须认为这是在最真正之意义上，自然所给予我们的教诲。人类在原先之时可能以这种方式生存，如野兽群聚，追随其最强壮及最勇敢者为其领袖；在这种状况下，领导者之统治是由其气力来加以定义，而我们应该施用于这种系统的名称便是强人政权（monarchy）。但是随时间流逝，家庭及社会关系开始在这社区里发展，亲属关系的概念于是出现，然后人类首度会去构思美善、正义以及其他与之相反的概念。

6.这些概念之起源及演化的方式如下。两性之交合是自然界普遍的本能，生育孩子为其结果。假如其中之一被养育成人，可是非但没有对那抚养他为成人者表达感恩或加以协助，反而刻意用言语或行动去伤害他们，他必会让所有那些与其双亲交往、见证养育时耗尽心力去照料及喂食孩子的人，对这个人心生不满，感到冒犯。人与其他野兽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唯一具有理性能力的动物，所以这种行为上的差异，当然不会像其他动物，会不受众人的注意；他们会记下做了什么，并对此感到不悦，因为我们会看向未来，反思他们自己有朝一日或许会得到相同的待遇。再者，一个人若受人帮忙，或因受助而从困难中脱身，没有对其

施恩之人表达感激，反而竟然去伤害他，那些听闻此事之人自然会对这种行为感到不喜以及愤怒，会和邻居同仇敌忾，并且会设身处地去想。以这种方式每个人会开始形成有关责任的理论和意义，这是正义的开始以及目的。

相同道理，当一个人在所有同伴中，会挺身而出，去保护他们免于危险，以及有勇气去面对最强大野兽的攻击，很自然他理当从人民那里得到敬爱，并视其为人中之杰，而一个人若是做出相反之事，将会遭遇非议及蔑视。在此，可以很合理地去假设，在人群之中会对有关何者高贵和何者鄙贱，以及什么构成它们之间的差异，发展出一些理论，结果是有些类型的行为会因为其有利之处而被赞美效法，但另一种则会被避免。所以当人民中最杰出及最强大之人，在我上述提及之事上，经常会使用他权威的力量去支持大多数人的观点，并且依据他子民的意见以及根据行为优劣，去奖赏或惩罚每个人，那他们会因为支持他而遵照他的命令，而非因为对暴力的恐惧。无论他有多老，他们将会加入来支持他的统治，并且会团结一致拥戴他，抗拒所有对他的统治进行阴谋篡夺的人。在理性比暴力或残酷更为强大时，这强人（monarch）会以这种方式，几乎不着痕迹地发展为国王（king）。

7.于是最初的美善和正义概念以及相反的概念，就以这样的方式就在人们之中自然形成，这便是真正国王政治的起源及诞生。人民确保至高无上的权力会留在不仅是最初的领导者手中，而且在其后代手中，因为人们相信那些出自他们、由他们所教育抚养的人，将会珍惜与他们类似的原则。但假如人们不满这些后代，人们便不再因为他们身强体壮来选择他们的国王及统治者，而是根据他们判断力的优点及他们理性的能力，因为他们已经从实际经验了解到这一套特征与另一套有何不同。

在古代，那些因为国王般的权威而被拣选出来的人，会持续执行他们的功能，直到老迈为止；他们建造壮观的要塞，并以高墙强化；并且

取得领土来提供给他们的子民安居乐业，让生活供应无缺。当他们在追求这些目标时，他们未曾是嫉妒或是被指控滥权的对象，因为他们并不牺牲他人，来使自己沉溺于异于他人的衣着、食物或宴饮，而是和其他子民以相同方式过生活，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与人民密切接触。但当统治者因为继承而取得权力，发现他们的安全无虞，而食物超出一般所需，他们的余裕会诱惑他们去沉溺于一己私欲。他们以为统治者要以特殊服饰与子民区隔，他们必须享受食物烹调及进餐时，那额外的奢侈与多样，以及他们不该被否认任何在爱情上的追求，无论那些追求是否非法。这些罪恶首先会引起嫉妒及愤慨，接着是怒气及恨意的爆发，结果是国王政治变成僭主政治。因为这样，开始了瓦解的第一步。于是阴谋颠覆开始成形。这些并非始于国家里最邪恶之人，反而来自最高贵、心志高尚以及最勇敢之人，因为如此之人发觉自己最难以忍受他们统治者的傲慢。

8.一旦人民发现新的领导者后，人民会支持他们，来对付原来的主宰者，其理由如我已述。结果是强人政权及国王政治皆被扫除，取而代之的是贵族政治体制的出现及发展。人民仿佛对那些推翻王政之人有所亏欠，所以为了表达感激，经常接受那些有功之人占有权威的位置，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们。最初贵族乐意接受这种托付，视服务大众利益为他们最高的关怀，并以最谨慎及最贴心的态度来同时处理人民的私人事务及公共事务。但当下一代继承他们父亲的权位，他们没经历过不幸的遭遇和市民平等及言论自由的传统，因为从襁褓起，他们已经沉浸在权威及特权的氛围中，所以他们放弃崇高的责任，有些人偏向贪婪、肆无忌惮地捞钱，其他则沉浸于饮酒以及相关的纵欲行为，而其他人则专门侵犯女人及强暴男孩。他们以这种方式将贵族政治转变为寡头政治，所以很快人民怨恨沸腾，达到高点——类似于我已经形容过的——结果是他们的政权同样遭受到降临在僭主身上的灾难，一切又再度重演。

9.这其中的真相是：无论何时，任何人观察到公民对僭主产生恨意

及嫉妒，能够鼓起勇气针对权威当局以言语或行动反对，他会发现所有人民随时会支持他。但在他们杀死或是罢黜寡头政治人物后，人民不再冒险设立一位国王，因为他们对之前国王所施行的不公不义，仍然心有畏惧，他们也不会将政府托付给有限范围的阶级，因为他们最近的错误仍然历历在目。在这一点上仍然未受污染的唯一希望是他们自己，于是他们就转往这方向：将国家转变为民主政治，而非寡头政治，由他们自己来掌握对事务的监督及管理。只要那些从寡头邪恶统治下存活的人还在世，他们会认为他们现在的政府形式是种祝福，并且珍惜平等及言论自由的特权。但一旦新世代继承以及民主政治落入其建立者的子孙辈时，他们此时已如此习惯于平等以及言论自由，所以不再珍惜，开始设法将自己抬举超过公民同侪之上，而且很明显的是，其中的富人最容易受到这种诱惑。所以当他们开始追求官职，发现他们透过自己的努力或依据自己的优点无法取得时，他们开始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利诱并腐化人民，弄得自己倾家荡产。整个结果是由于他们非理性的追求高人一等，刺激、增大群众去索求、收受贿赂的胃口，民主政治的统治便转变为由暴力及强制统治的政府。在这时候，人民已经习惯慷他人之慨，他谋求生计的方法是去觊觎邻居的财富：一旦他们发现一位领导者有足够的野心以及胆识，但却因为贫穷而被排除在权位之外，他们将会引进一个以暴力为基础的政权。在这之后他们会凝聚武装力量，对他们的敌人进行屠杀、放逐以及掠夺，最后沦落到野兽般的状况。[3] 之后他们会重新再度找到一位主宰及主人。

如此便是政治革命的循环，如此便是政体演变、转化以及最后回归到原先形态的自然法则。任何对这一过程有清晰掌握的人，在提及国家未来时，他在预测需要多少时间来让变化过程发生，或许会出些差错，但只要他的判断没有被敌意或是嫉妒所扭曲，对于一个社区已经到达之成长或衰落阶段，或是它将会演变成何种形态，他甚少会发生错误。尤其是在罗马国家这个例子上，这种检视的方法将会给我们最清楚的洞见，去洞察它赖以形成、成长、到达最高成就之点，以及继之而来由盛

转衰的过程。因为这个国家（假如还有任何其他国家也曾如此的话，如我已经指出）是因为自然因素而起源及成长，而且将会透过自然演化而步入衰退。无论如何，读者将最能从以下的叙述中，去判断这句声明的真实性。

10.在这一点上我打算对莱克格斯的立法做一番简单的陈述，因为它与我目前的议题有重要关联。莱克格斯充分了解我所形容的变化是根据不可动摇的自然法则来发展的，而且他接受这种观点，即认为任何一种政体，只要是单纯且只奠基在一个原则上，会是不稳定的，因为它会迅速恶化到独特于它，而且内在于它的腐化形式。正如铁锈会腐蚀铁，蛀虫或凿船虫会吃掉木头，而这些材质即使逃掉外来的伤害，也会被在其内部所产生的过程摧毁，每种政体具有自己内在、不可分离的缺失。在国王政治上，其内在缺失便是独裁，在贵族政治是寡头，而在民主政治则为暴力的残酷统治，而且如我已经说过，这每一种政体都无法不堕入其本身会堕落的形态。莱克格斯预见到这一点，于是没有将他的政体设计为单纯或单一，而是结合所有最好政府形态中的优点以及特征，所以没有一种原则会独占，并转变成它相关的缺失；反而是它们之中的每一成分都会被其他的成分来相互平衡，所以它们之中没有一项政体的形态会不恰当地倾向或沦落到与其对应的另一方。换言之，政体由于互惠或制衡原则，在长期来说应该处于平衡的状态。所以国王政治要因为畏惧在政府运作时有一席重要之地的人民，以免沦为傲慢，而人民依次又因为他们对元老院的敬畏，所以也能克制自己，不去蔑视国王。元老院这一团体的成员，则因为其优点而被选任，而且可以在所有时候皆可被信赖能一致站在正义那一方。因为这方法，所以国家中的一部分人会因为对传统习惯之尊重，而处于不利之地位，但却经由元老院之支持及影响，终于能够取得权力以及分量。因为那样的理由，所以根据这些原则所草拟之宪政的实施结果，便是斯巴达人比其他我们有记录记载之其他人，保有更为长期的自由。

莱克格斯凭借他理性的能力，可以预见事件自然发展的方向以及使它们何以如此的因素，于是得以建构他的宪法，而无需去学习不幸遭遇所带来的教训。另一方面，罗马人虽然就其政府形态也得到相同的结果，但并非以抽象理性而得到结果，反而是从许多斗争以及困难中所习得之经验及教训而来。最后，借助从灾祸中所学习到的经验，他们经常选择较好的路径，他们与莱克格斯一样到达相同之终点，亦即所有现存之政体中最优良的。

论成熟的罗马宪政

11.从薛息斯跨海到希腊，特别是那件事之后的三十二年，罗马政治系统历经越来越令人满意的修正，并且在汉尼拔战争时，到达其最优良及最完美的状态。

我有理由相信，对那些生活在罗马共和下的人，我的陈述或许因为省略了细节，看起来多少会不完整。……

主导罗马宪政的成分有三，这些我在之前都已提过；而在执行上面如果分开来看，是极为公平以及恰当地透过这三个成分的运作而分配及规范，以至于对罗马人来说，要他们清楚宣布整个系统究竟是贵族政治，或是民主政治，或是王权政治，甚至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假如只将注意力放在执政官的权力上，这政体或许给人一种完全是国王政治及王权的印象；又假如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元老院，这似乎看起来是贵族政治；但假如我们集中在人民的权利，这似乎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明显范例。对于国家所拥有不同权力，这三个成分过去是——而且在经过一些调整后——现在仍然是如下所述。

12.执政官，除非他们必须率领军团出征，[4] 否则会留在罗马，对所有公共事务拥有最高权威。所有官员，除了护民官外，[5] 都是他们的下属，必须服从他们，而且是由他们引进外国使节，介绍给元老院。[6] 除了这些职责外，他们会将紧急事件提交元老院进行讨论，而且必须完全负责执行它的决定。监督所有由人民所执行之国家事务，亦是他们的职责；在如此情况下，他们会召开公民大会，提出议案，执行人民议决。在有关战争准备以及战场上军事活动的一般执行上，他们的权力近乎绝对性。他们有权对盟友提出任何合理的要求，[7] 任命军团里的营长，[8] 征召士兵以及选任那些适合服役之人。他们在执行勤务时，可以

对任何在他们统领之下的人进行惩罚，并且有权从公库动用任何他们认为适合的金额；在财政事务上，他们有位财务官（quaestor）作为助手，完全配合执政官的指示行事。所以假如有任何人只思考宪政里的这个成分，他可以合理地说这是一个国王政治或王权的纯粹范例。在此我或许可以附加一点：在我所描述或即将描述的功能中，在现在或未来若有任何变化，并不会变更我所做之分析的真实性。

13.现在且让我们思考元老院。这一机构控制国家财政，规范所有收支出入；财务官需要得到元老院命令的授权，来进行任何计划的开销，唯一例外是已经拨给执政官的款项。元老院亦控制所有开销中最巨额及最重要的项目，亦即监察官（censors）每五年对公共建筑物所提供之维修及新建计划，但这是由元老院拨款来完成的。同样的，任何在意大利所犯下罪刑，需要公开调查者，如叛国、阴谋、下毒及暗杀，亦落入元老院之司法审判权限内。[9] 再者，如果意大利内有任何私人或社区需要仲裁纠纷，或是需要加以正式谴责，或是寻求协助或保护，正是元老院处理所有此类案件。它亦负责派遣使节团或委员会到意大利以外的国家，或是去弭平纷争、提供建议、提出要求、接受投降，或是宣布战争；依相同之理，无论何时有外国使节到达罗马，它决定他们要被如何接待，以及要回复他们什么答案。所有这些事务都在元老院手中，而人民无法与闻其事。

因此对任何恰巧居住在罗马的人士，当执政官离城时，罗马宪政或许有道理被认为是完全的贵族政治；而在许多希腊城邦以及其他国家的国王那里，正是这种印象流行着，因为元老院几乎处理所有与罗马人相关的国家大事。

14.所以当我们考量元老院执行我形容之所有详细功能的权威，而且最重要的，对开销以及收支有完全的掌控，并且也考量过执政官在有关军事准备以及战场上的绝对行动权力，我们很自然会想去问：在宪法

中还有什么空间留给人民？毫无疑问，答案是：仍然有角色让人民扮演，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唯有人民才有权利奖赏以及惩罚，[10] 而这些是唯一可以凝聚王国、国家以及一般人类社会的力量。个中事实是：在赏罚不明，或只在理论上如此，但在实际上却执行失误的国家中，没有任何事务可以被恰当执行，因为假如优秀者和邪恶者都被相同看待，那这该如何进行呢？所以人民被授权去审判那些可以罚刑的案件，对犯行者施加严厉的惩罚，特别是被指控之人若享有国家最崇高职位时；他们亦是唯一有权审判生死重罪的法庭。关于后一项，他们有一个特别值得赞美、值得一提的习俗。只要宣布判决结果的部落中，尚有任何一个仍未投票，这习俗允许那些性命正在受审之人，在审判定罪过程中可以公开离国，因此加诸己身自愿流放之刑。如此流放之人可以在尼尔波利斯、普莱涅斯特、提布尔以及其他有条约协定之城镇的领土避难。

依据相同原则，正是人民授予官职给那些值得之人，而这是国家对品德所能提供的最高奖赏。此外，人民亦有权通过或拒绝法律，而且最重要的，他们考虑及决定有关宣战及媾和之事。更进一步，在结束敌对状态以及订定条约上，人民有权批准或拒绝。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合理地做结论，人民在政府里拥有最大的一份权力，所以这种政体是民主政治。

15.我已经叙述了在国家之中，政治权力要如何分割为三个成分，而我现在将要解释它们三个其中之一——假如要的话——将会如何与另外一个合作或牵制。当执政官与军队出国时，他被赋予如我所描述的权力，似乎为了执行他的目的，而拥有绝对之权，但在实际上他需要人民与元老院的支持，而且没有他们，执政官便无法让军事活动有完美的结果。例如，很清楚地，军团需要经常性的补给供应，但若无元老院同意，则没有食物、衣服或是薪资的提供，所以若是与元老院格格不入或元老院刻意阻挠，那统帅的计划便会遭遇完全的挫折。而且元老院亦有

权利决定究竟一位将军能否完全执行他的设计及规划，因为它有权在执政官任职期满后，派遣另一位将军取代他，或是继续留任他。再者，元老院有权决定是否让一位将军以盛大排场来庆祝胜利或大胜利，借此抬举他，或是藐视他。他们称之为胜利大游行者，是将他们在战场上所成就的场景，搬到公民同侪之前，而除非元老院同意提拨必要的经费，否则并无法适当地呈现，甚至在一些情形下无法进行。至于人民，执政官无论离开国家有多远，要考虑到人民的利益始终是首要之事，因为如我以上解释，正是这最高主权所在之人民批准或拒绝停止敌意行为以及订定条约。但最重要的是，当执政官卸任时，他们必须向人民报告任内作为；所以忽略运作元老院及人民的善意，在任何状况下对执政官都是不安全的。

16.接着，元老院虽然拥有如此庞大权力，但首先必须在公共事务上注意到人民的观点以及尊重他们的心愿。除这之外，它无法调查危害国家最严重及最广泛的罪行，如那些涉及死罪者，并采取步骤来加以控制，除非它的命令被人民所确认。对那些直接关切到元老院本身之事务，亦如此。假如有任何人提案，目的是要剥夺元老院一些传统性的权威或是要取消元老的一些特权或其他的尊严，或甚至减少他们一些财产，[11] 所有这些情形中，唯独人民才有权去通过或是拒绝提案。这亦是事实：假如有一位护民官介入，加以否决，元老院不仅无法对任何议题达成最后决定，甚至无法聚会及开会。护民官经常必须执行人民的议决，尤其是要注意他们的心愿。因为这些理由，元老院敬畏人民，而且重视人民的意志。

17.然而依相同的道理，人民对元老院亦有义务，必须将其意愿列入考虑，无论这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在整个意大利，有相当庞大数量的契约，多到不可胜数，是由监察官发包出去，以进行公共建筑之修建及维护，除此之外，尚有河流通航、港口、花园、矿区、土地之收入的征收，换言之，每一项在罗马政府控制下之交易，都发包给承包商承

揽。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由人民执行，而我们或许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从这些契约以及利润中获得一些利益。一些人事实上向监察官买下契约，另一些人则成为他们的投资伙伴，又有其他人则为承揽契约的人提供担保，或是有人为契约而将他们的财产抵押给国库。所有这些交易都列入元老院的权力之下。它有权在一些无可预见的意外下，允许将契约时间延长，减少承包商损失，或是在无法履行契约时，让其完全解套，安然脱身。因为在实际上，元老院有许多方法来对那些承揽经营公共建设之人，或是施加极大困难，或是减轻负担，因为所有案件都需上诉元老院。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多数的民事审判中，凡是其中涉及庞大利益者，承审法官是从元老院选出。[12] 结果是所有公民，因为可以得到保护而与元老关系密切，以及因为不确定以及担心他们是否需要它的协助，所以在阻挠或抗拒元老院的意志时，都非常谨慎。依相同道理，人民在反对执政官的计划时，都会一再三思，因为他们就个人以及就整体而言，都会在征战时落在他们的权威之下。

18.这些是系统里三个成分中每一项所享有的权利，能够彼此协助或互相伤害；其结果是联手时，其强大足以抵挡所有的紧急状况，所以不可能发现比这一系统更佳的宪政体制。因为无论何时有共同外敌威胁时，都会强迫这三者团结起来，同心合作，那时国家所发展出的力量变得格外强大。没有任何要求会被忽略掉，因为所有各派系的人都争相去发现符合当时需求的方式，而且每个决定一旦被采用，会立即实施，因为所有的人于公于私都会互相合作，来完成手上的任务。

其结果是这独特的宪政体制具有无可抗拒的力量，来完成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当人们从外来威胁中得到解脱后，开始收获胜利为他们所赢得的好运及繁荣，但在他们享受这种富足时，他们会被阿谀奉承及懒散怠惰所腐化，变得倨傲无理，目中无人。这经常发生，但尤其是在这时刻，宪政会展现能力，修正如此的滥权。无论何时这三种成分中任何之一，膨胀自己的重要性，变成野心过度，容易侵犯其他；因为上述理

由，这情形将会变得很明显：没有成分能完全独立，而是任何一个的计划都有可能会被其他的妨碍或阻止，结果是没人可以主宰或以轻蔑态度来对待其他。于是整个局势又恢复并维持平衡，因为侵略挑衅的冲动被克制约束，每个成分会因为其他两个成分开始谴责时，便会深自警惕。

罗马的军事系统

19.在他们选出执政官后，人民继续任命军团营长；十四位是从那些已经服役五年之人中选出，而十位是从那些服役十年之人中选出。至于其他人，骑兵被要求服役十年，步兵在四十六岁之前要服役十六年；但这些是排除那些财产价值被估算少于四百德拉克马（drachma）的人，而这些人会被分配到海军服役。在国家紧急状况期间，步兵会被要求服役二十年。除非他已经完成十年的役期，否则没有人会被允许去担任任何政治职务。[13]

当执政官准备要征召士兵时，他们会在公民大会中宣布何时所有役龄的罗马公民必须报到服役，而这每年都做。在指定之日，那些有兵役责任的人抵达罗马，聚集在卫城山丘（Capitoline Hill）上，十四位资浅的军团营长会将自己分为四群，所根据之顺序是依照人民拣选或执政官任命他们时的顺序；这是罗马兵力最主要、也是最初的分法。最先四位被任命的营长被分派到第一个军团，接下来三个到第二，接下来四个到第三，以及最后三个到第四。十位资深营长中，前两位被分配到第一个军团，接下来三位到第二，在接下来两位到第三，以及最后三位到第四。

20.营长被以如此方式分派后，每个军团会拥有相同数量的军官，每一军团的军官则各据一个位置，彼此分开，一一抽签挑选部落，依照抽签结果呼叫出每一部落之名。从这部落他们首先挑选出四名青年，在年龄及体格上尽量相似。当这四位被带向前，第一个军团的军官优先挑选，第二军团第二顺位，第三则次之，第四则殿后。当下一群四位青年被带向前，第二军团的军官有权优先挑选，第一军团则殿后。再下来四人，则是第三军团之军官优先挑选，第二军团则殿后，以及如此等等。

用这方法每个军团依序都有优先顺位挑选，所以所有军团接收大约相同水准的人。在他们选择所需要的数量，亦即当每个军团的战斗力到达四千两百人，或在特别危急的时刻，达到五千人时，在以前的习惯是开始选择骑兵，但在我们的时代，骑兵会先被征召。监察官根据财产的基础来选择骑兵，每一军团分配三百名。

21.当以这种方式进行征召工作时，被分配到这一职责的营长于是检阅这些征召的士兵，而每位营长都会从所有人之中挑出他们认为最适合之人；这些人被命令要宣誓服从长官，并尽其所能来执行命令。然后其他征召的士兵一起向前，每个人宣誓他会如那第一人所宣誓的去做。

与此同时，执政官会发布命令给意大利盟邦城市的官员，希望从那些地方征召部队；他们会表示所需的部队数量，以及这些被选来服役的人必须在何时及何地出现报到。相关之权威当局会以类似程序来选择人员，执行宣誓，任命一位指挥官及财务人员，并将部队送到罗马。

在征召的士兵宣誓后，在罗马的营长会向各个军团宣布在哪一天以及哪一地点他们不需携带武装报到，然后解散他们。当他们在指定之日报到时，最年轻及在财产等级上最低者，被分派到前战部队（velites），第二群为前线部队（hastati），那些在壮年的则是到中线部队（principes），最年长则是到后线部队（triarii）。这些是罗马人给他们军团中四个战术群的名称，他们彼此以年纪及装配来加以区隔。他们如此划分，所以资深的后线部队有六百人，中线部队有一千两百人，前线部队有一千两百人，其余则构成前战部队。假如军团的战斗力量超过四千人，这每一群人的数量依比例增加，但后线部队除外，它的战力仍维持在六百人。

22.最年轻的前战部队士兵被命令要佩戴刀剑、标枪以及小盾牌。最后一项是圆形，直径三尺，制作坚固，大到足以保护人身。他们戴上一般的头盔，[14] 有时上面披有一片狼皮或类似之物，用来保护以及辨

识该名士兵；这使得军官可以认出这个人，并观察他在面对危险时是否勇敢。他们所携带的标枪木柄身长三尺，直径一指宽。其头部约一指幅之长，[15] 被敲薄，而且如此锐利，所以在经过第一击之后，必定弯曲，使敌人无法回掷；否则这武器对双方都会有用。

23.下一个以前线部队为人所知的年龄群，则受令要全副武装。罗马全副武装之组成，首先是一面长盾（scutum）。其外表为凸面状；它宽度为二尺半，长度四尺，其厚度在边缘处为一手掌厚。它有两层木板，由牛皮胶黏住固定：其外层首先由布包覆，然后是小牛皮。上缘及下缘又有铁加以包覆，来保护盾牌免于刀具劈击所带来的破坏，当靠在地面时，可免于磨损，在中间则是铁制的突出物，可以转移石头、长枪以及一般大重量投掷物所带来的重大冲击。除了盾牌外，他们亦携带一把长刀，置于右侧，被称为西班牙刀。[16] 这刀有锐利的刀尖，而且刀刃两边都可以带来有效的打击，因为每边刀锋都很坚固，不会弯曲。

除此之外，前线部队携带两支投掷用的标枪（pila），一顶铜盔以及护胫。标枪有两种，较细及较粗。其中较粗的一种，有些是圆的，在直径上有手掌宽，其他则是方的。[17] 他们所携带之较细及较粗的标枪都像是中型大小的狩猎用标枪，木制柄身长约四尺半。其铁制头部有弯勾，与枪身长度一样。他们借着将铁制头部牢牢附在柄身上，尽心尽力去确保武器的用处。铁制头部插入柄身固定，深达柄身一半的长度，并以一连串环扣来加以固定，所以在战斗时，它击中目标时，会裂开而非仅松掉；铁制头部插入木柄身时，其厚度只有一只半手指的宽度。[18] 最后，前线部队佩戴以三根紫色或黑色羽毛作为头饰，直立约有一尺半的高度。这些被插在头盔上，其一般效果，加上其他武装，是要使人看起来像是实际高度的两倍，让他有个可让敌人心生恐惧的外表。除了这些装配外，士兵还会挂一块胸牌，约手掌张开的幅宽，放在心脏部位，称做护心片（pectorale）。这些项目构成他们全副的武装，但那些财产被估算有一万德拉克马的人，则是穿锁子甲的外套（lorica）。中线部

队与后线部队有相同武器配备，除了投掷用的标枪外，后线部队是携带长型的刺枪（hastae）。

24.每种前线部队、中线部队以及后线部队战术群，根据个人优点各选出十位百夫长（centurion），然后又再选出十位。[19] 所有这些人都有百夫长的官衔，而且第一位被选出的亦是军事会议的成员。这些百夫长又依序任命相同数量的低阶补给官（optiones）。[20] 除了前战部队外，这些百夫长将与另外三种战术群的人，各分为十个连队（maniples），每个连队分配到两个百夫长及两位补给官。前战部队亦分为相同数量之连队，每连队一百二十人。所有这些连队可称为“团队”（orders，ordines）、“连队”（maniples，manipuli）[21] 或是“旗帜”（standards，signa），而他们里边的军官则是百夫长（ordinum ductores）。这些军官又从行伍之间选出两位最勇敢及最具男性气概的人，成为每一个连队的掌旗人（signiferi）。每一个连队任命两位百夫长并无不合理之处，因为无法确定这个连队的指挥官会被要求做什么，或什么事会发生在他身上。因为战争的紧急状况并不允许任何借口，所以他们极不希望连队没有领导人及指挥官。当两位百夫长都在时，资深的率领连队的右半部，资浅的为左半部；否则由在场的那一人来指挥全部。在选择他们的百夫长时，罗马人看中的不是冲锋陷阵或是火爆霹雳那样类型的人，而是那些天生的领导者，具有稳定沉着的个性，非只会开启战端、发动攻击，而是那些即使陷入颓势或受压迫时，仍然能够稳住阵脚以及能死守岗位的人。

25.他们以相同原则将骑兵分为十骑队（turmae），他们从这每一队选出三位骑兵官（decuriones），又依序任命三位补给官。第一位被选上者，率领这一骑兵队，其他两名则带有骑兵官的官衔，事实上这三位都有相同的官衔。假如第一位不在职，第二位接任骑兵队指挥权。骑兵之武装非常类似现在希腊所使用的。在早期他们没有胸甲，而是身着短衣作战，这在上下马时，极为容易及灵活，但在近身交战时却暴露在极

大危险中，因为身体几乎没有保护。除此之外，他们的长枪亦在两处不合使用：第一，他们将武器制作的如此细长柔软，所以无法做出稳定的瞄准，而且马匹运动时所带来武器的震动，造成许多武器在铁端固定住任何东西前，便已经断裂。第二，尾端并未附上尖刺，所以只能以尖端做出第一击，而假如武器断裂，长枪则变得无用。骑兵盾牌是由牛皮制成，在形状上有些类似用于祭祀之圆形糕饼，中间有突出物，这些盾牌在作战时实无甚用处，因为它们不够坚实，而且暴露雨中时，牛皮外层会脱落以及腐蚀，它们不仅看起来怪异，如同之前一样，而且现在则已完全不用。既然这装配证明在使用上如此不理想，罗马人立即变更去使用希腊人用的类型。希腊类型的优点是：在长枪上，骑兵可以稳定以及准确地做出第一击，因为这武器在设计上力求稳定，不在手中震动，而且也可以将其转向，以尖锐尾端做出用力的一击。希腊盾牌情形亦同，因为它们是坚固扎实地制作，在做投掷进攻[22] 及冲锋陷阵时都能提供良好的保护。当罗马人发现这些优点，立即模仿希腊武器，而这正是他们的强项之一：没有民族比他们更愿意去采用新的习惯，以及效法别人做更好的东西。

26.军团营长将征召的士兵组成这些单位，命令他们以这种方式武装，然后将他们解散回家。当他们宣誓过要在执政官所宣布之地点以及报到的日期到来时，所有那些登录在册的人都无一失误地报到，因为除了恶兆或是某种意外使得报到完全不可能外，没有任何其他理由可被接受。在这些场合，执政官们通常会指定不同地点让他所指挥之部队报到，因为每位执政官都将分配到两个罗马军团以及他应有之数量的盟军。

在同一时间，盟友亦与罗马公民一起集合，他们单位的组织及统帅都由执政官所指定之军官来监督；这些军官共计十二位，称为盟军长官（prefects）。这些人为执政官所动员的盟军中，挑选出那些最适合服役的步兵及骑兵，而这些人以“特选”（extraordinarii）为人所知，亦即精

选之部队。盟军步兵之数量通常等于罗马人的步兵，但骑兵则多达三倍。从这些人之中，他们大约拣选出三分之一的骑兵及五分之一的步兵来担任“特选”。其他的他们则分为两团，其中之一为右翼，另一则为左翼。

在做完这些安排之后，军团营长会带领罗马人及盟军前去扎营。无论是在何地进行扎营，他们都使用有关军营的一个简单公式，而这适用于所有时间及地点。我认为这正是恰当的时机来让我来向读者解释——至少就文字上可以做到的——罗马人在行军、扎营以及行动时，是如何地部署他们的部队。当然不会有人会对这些能完美执行，漠不关心，因此拒绝忍受一些额外的麻烦来了解这类的事情；一旦他读过这些技术性的介绍，他将会对一个当然值得他注意的题目有许多知识。

27.罗马人布置军营的方法如下。一旦选定基地后，能够对整个地区提供最佳视野，而且最方便发号施令的位置，保留给将军的公署（praetorium）。他们在打算竖起帐篷之处，插下军旗，以这点为中心量出一块正方形的土地，这方形每边离军旗一百尺远，所以整个区域有四个普列特拉大。[23] 沿着这方形的一侧——而那是能提供最佳取水及收集粮秣设施的一侧——罗马军团会以如下方式来被安顿。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在每个军团中有六位营长，而因为每位执政官通常率领两个军团，所以在一支执政官的军队中会有十二位营长。他们将这些军官的帐篷沿着直线搭建起来，与方形地区所选定之一侧相互平行，相距五十尺，所以预留空间给营长的马匹、骡子以及行李。这些帐篷在搭建时是背对执政官公署所在之区域，所以面对营区外面，这个面对的方向我自此将以前方提及之。营长之帐篷以彼此等距安置，所以他们沿着军团所占有之空间的全部宽度，一字排列开。

28.他们接着又在这些帐篷前方丈量出一百尺的距离。在那样的距离，他们又画出一条与帐篷平行的线，而在此处他们开始标记出军团的

不同区域，这些安排如下。他们将最后提及之线对分，从那点又拉出与之垂直的线。沿着这条线，在其两侧，并且彼此相对望，他们驻扎每个军团的骑兵。在两侧之中有五十尺的空间，恰好被最后提及之线对分。驻扎步兵的方式类似于用于骑兵的。分配的空间形成一个完整的方形，对连队或骑兵队皆然。这个方形面对主要道路（viae）中的一条，它穿过营区；面对路的那一方是固定的一百尺长度，而且他们通常会设法让宽度也一样，但盟军不同的状况除外。当他们必须容纳兵力较强之军团，他们依比例增加方形的长度及宽度。

29.骑兵营区布置则是好像占据始自营长帐篷中间一条道路的两侧，并与之成直角，而且沿着道路搭建起这些帐篷，而且也跟他们之前的通道成直角。这些道路及通道的整个设计，事实上类似一个十字路的系统，道路在帐篷所形成的区域的两侧通过，骑兵营区的是一侧，步兵的则是另一侧。每一军团中分配给骑兵以及后线部队的空间是背对背：部队相连，但却面朝相反方向，而且中间没有空间。给予每一连队后线部队之深度为其正面的一半，因为就一般而言，一后线部队连队的兵力是其他群体的一半。可是，连队或许会有不同的兵力，但是分配给他们的正面长度都是一样，这是因为他们的营区会有缩减的深度。接着而来，并和分配给后线部队空间相平行的是中线部队，与他们相对望，中间有五十尺的距离。因为这两个群体皆面对中间的空间，所以有两条道路与一百尺宽之通道成为直角，通道是从营长帐篷前通过，两条道路都道向与营长营区相反方向的军营另一方，而这我们之前同意称为前方。在中线部队之后——与之背对背，中间没有空间——他们驻扎前线部队。根据军队原先的建制，每一种战术群都是由十个连队所构成，道路在长度上皆相等，而且都在军营之前方以直线结束，所以线上的最后一个连队，便是直接面对军营前方。

30.在前线部队之外，且又再度被五十尺距离所隔，他们驻扎盟邦的骑兵，而这始于相同之线，亦即经过营长帐篷之前的通道，结束于相

同之线，但在军营的前方。如我以上所述，盟邦步兵单位的兵力与罗马人的相同，但盟邦骑兵单位的兵力，在减去送到“特选”的骑兵后，是罗马骑兵的两倍。因此在规划营区时，他们也依比例增加分配给盟邦骑兵空间的深度，所以让他们每个人占有与罗马军团相等的空间。在这时，已经有五条道路完成，所以接着它们安置盟军的步兵，依据他们较大的数量来增加他们位置的深度。[24] 他们与骑兵背对背，中间没有多余空间，所以步兵会面对环绕军营外部的栅栏。在每个连队里，每一列两端的第一个帐篷是由百夫长居住。在以这方式布置军营时，他们通常在第五及第六单位间会留下五十尺的空间，因此这形成贯穿整个营区的另一通道。这通道和营长的营区互相平行，并与其他道路形成直角，这称为“第五道路”（via Quintana），因为他紧邻第五骑兵队和第五连队。

31.在营长营区之后的空间使用方法如下。在执政官公署（praetorium）之右侧是广场，左侧则是财务官之办公室以及其所负责之补给品。在营长营区之最两侧，而且或多或少与其成为直角的是特选的骑兵以及那些因为与执政官之情谊而参军的自愿军，[25] 这些人的扎营之处与环绕整个营区的栅栏相平行，其中一个营区面对财务官之营区，而另一个则面对广场。在大多数时候，这些部队不仅在扎营时靠近执政官，而且在行军及其他场合，他们都与执政官及财务官常相左右。与他们背对背，往外朝向栅栏驻扎着特选的步兵，他们执行与我刚形容之特选骑兵相同的任务。在这些区域之外，尚留有另一空间，有一百尺宽，与营长之帐篷相平行，越过执政官公署、广场以及财物官办公室，从一侧栅栏延伸到另一侧栅栏。在这通道之远方，安置其他特选骑兵，所以会面对执政官公署、广场以及财物官办公室（quaestorium）。在这些骑兵营区之间，而且恰好面对执政官办公室的是一条约五十尺的通道，通到营区后面的栅栏，并与执政官办公室之后一百尺宽的通道形成直角。与这些骑兵营区背对背，并且面向栅栏，以及处于营区之后端的是其他特选之步兵。最后这些营区之左或之右的空间，紧邻营区之栅栏，则是分配给外国部队以及任何被允许进入营区之联盟部队。

这些布置的结果是整个营区以一个方形展开，而街道及营区蓝图给军营一种城镇的样貌。四周之栅栏是在离营区两百尺的距离挖掘固定，而这空无一物的空间有一些重要用途。首先，它提供适当以及必须的设施来领军出营或入营；它确保所有人都可以经由通过他们营区之路进入这空间，因此不会一堆人挤进同一条道路，彼此催促推挤。还有，所有带进营区之牲畜以及从敌人掠夺来之战利品都收集在这区域，在夜间被安全地看守着。但这空间最重要的用途是，假如营区在夜间遭受攻击，他可以避免营区被纵火，而且可以使士兵在敌人投掷武器的距离外，或是假如其中一些确实飞得够远，但因为帐篷之前所留下的距离以及空地，它们几乎已经变得无害。

32.既然已知骑兵及步兵的数量，而且假设每个军团的兵力为四千或五千人，而且同样已知的是连队及骑兵队的深度、长度及数量，此外还有道路及通道和其他细节，所以任何想要去计算的人，都可以估算出营区的面积及周长。假如有不太常见的大数量盟军，这或是那些依照原来之兵力部署，或是因为特别场合而依附之部队。对于后者可以借由将执政官公署两侧的广场和财务官之仓储面积降到最小，仍然可以应付紧急需求；而对前者，假如超过正常数量太多，他们在罗马军团区域之两侧加上两条道路，面对营区栅栏。

偶尔当两位执政官以及他们四个军团联合驻扎在一个营区之内，我们必只要去想象这两个营区会类似我方才所描述的，但是背对背，两营区交接之处是在特选部队步兵驻扎的地区，这些部队我们形容过是面对整个营区后方之栅栏。在这情形下，营区的形状会成为长方形，它的面积加倍，整个新营区的周长再增加半倍。任何两位执政官恰好一起联合扎营时，这是他们所采取的形态；当他们分开扎营时，唯一的差别是广场、财务官区域以及执政官办公室会安置在这两个军团中间之处。

33.在营区被布置好后，军团营长会检阅所有在场者，要求个人，

无论是自由或奴隶，要执行宣誓。每个人都要发誓他将不会在营区偷窃，假如他发现任何东西，他都会带给营长。接下来他们发布命令给每个军团的前线部队以及中线部队的各个连队，交代这些连队要负责营长帐篷前的空地。这些营区在日间是许多事务进行的地方，所以要确定这地方经常用心打扫洒水。其他十八个连队，每三个抽签分配给每位营长，而每军团有六位，而这三个连队每个依序轮流待命，服务营长。以下是他们提供的一些服务。当军队扎营时，他们为他搭建帐篷，将周围地面铲平，而且假如有必要采取特别预防措施来隔离他的行李时，他们会照办。他们也提供两班的卫哨，每哨四人，一人在他的帐篷前，另一在后，马匹之旁。每位营长分配到三个连队，而每个连队超过一百人，这不包括后线部队及前战部队，这些人没有这种勤务负担；这些勤务是轻松的，因为每个连队三天才轮一次。这些安排为营长提供必要的福利，而且维护他职务上的严正及尊贵。后线部队的连队可以免除对营长的这种个人服务，但每个连队每天都要提供一位卫兵给与其营区相连的骑兵队。这卫兵除了维持一般警戒外，特别注意马匹，以免它们因为纠缠的韁绳，伤害自己或是变成失能，或是松脱走散，在营区里和其他马匹横冲直撞，造成混乱骚动。最后，每个连队要依序在执政官帐篷之前每日站卫兵，要保护他免于阴谋伤害以及提升他职务上的严正及尊贵。

34.关于环绕营区之壕沟及栅栏的建造，[26] 这工作是由盟邦来建造他们两翼所驻扎之两侧的全部长度；其他两端则交由罗马人，一个军团一侧。营区每侧依据连队的数量来分割为段落，而百夫长在旁监督每个连队的工作；同时有两位营长监督整侧的全部工程，确保工作实在，而且也是这些军官要监督与营区有关之所有其他工程。他们两人一组，每组轮流值勤六个月中的两个月。他们以抽签决定顺序，中签那组要负责监督所有战场军事活动。盟军的长官以相同系统来划分职责。每天在破晓时，罗马骑兵要在营长营区前阅兵，然后由营长向执政官报告。他会对营长下达必要命令，而他们又对骑兵官以及百夫长下达，而这些人在适当时机又将命令传达给行伍的士兵。

确保在夜间可以安全地交代暗号的程序如下。从每一战术群步兵及骑兵的第十连队中选出一位，这个连队位居帐篷间的道路末端，最靠近营区前端。这个士兵可以免除卫哨之责，但必须每天在日落之时，到值勤的营长帐篷报到；在那里他会被给予暗号，亦即一块木板上面刻有写字板，然后离开。在回到他的营区后，他在证人面前将暗号及写字板交给下一个连队的指挥官，他又依序交给下一个连队等。所有连队都重复这程序，直到这写字板到达靠近营长的帐篷的第一个连队，这些人必须将写字板在黑夜来临前交还给营长。假如所有发出之写字板都交回，值勤的营长知道暗号已经在写字板交回过程中，交代给所有的连队。假如有任何写字板遗失，他立即调查此事，因为从写字板上的标记，他可以得知是在哪一部分的营区，遗失的写字板没交回，以及谁要为这遗失负责任，并因为遗失会被适当地惩罚。

35.夜间卫哨安排如下。执政官帐篷是由值勤之连队负责看守，那些营长及骑兵队的帐篷，则由我已经形容过的系统所轮流连队的指定士兵来守卫。每个单位，无论是连队或骑兵队，亦会从自己人之中安排守卫，保障自身安全。其他卫哨则由执政官来指派。一般而言，财物官公署有三个卫哨，每位军团司令（legate）以及军事会议成员的帐篷则各有两个。营区外围地带是由前战部队防守，他们在沿着栅栏的地方每日驻守。这是他们特别的职责，而且他们也看守营区出入，每处十人。那些要值勤卫哨的人之中，每个连队的第一班会在夜间时，由补给官从单位带到营长那里。营长会交代一个书写板给每个人，一个人一处哨站；这板子甚小，上面书写符号，在接收到这板子后，每个人回到指派给他的哨站。

巡逻的责任则交付给骑兵。每军团第一骑兵队的第一位骑兵官必须在早上发布命令给他的补给官，在早餐之前通知骑兵队里四位年轻人，他们已经被选派去巡逻。相同之人亦必须在夜晚时通知下一队之骑兵官，要在接下来一天安排巡逻的职责。在接到这种指示时，骑兵官必须

在次日执行相同的程序。在所有骑兵中，依此类推。第一骑兵队中由补给官所选出的四个人，抽签选择他们要进行的夜间巡逻。那时他们向营长报告，从他那里接受到书面命令，规定哪些哨站他们要去查访以及在何时。接下来，所有四个人必须进驻夜间值勤的位置，这在后线部队第一个连队旁边，因为这个连队百夫长的职责是要在每一夜哨开始时，吹响号角。

36.当指定时间到时，抽签到第一夜哨的人要开始巡逻，并带一些同伴同行，作为见证。他会去查访他命令中所指定的哨站，不仅有沿着栅栏以及出入门禁的哨站，而且包括所有步兵连队以及骑兵队的哨站。假如他发现第一哨班的卫兵是清醒的，他拿走他的小书写板，但假如他发现有任何一位睡着或是擅离卫哨，他会叫那些同行之人做见证，然后持续巡逻。那些在不同哨班时段进行巡逻的人要重复相同的程序。在每班夜哨之前吹响号角，那些要去巡逻的人则会在正确时间去查访不同哨站，这职责，如我已提，是属于每军团第一个后线部队的连队百夫长的职责，每个人轮值一天负责。

每个巡逻的人会在日出之时，将小书写板交还给营长。假如所有都交还，则全部都解散，没有问题。但假如其中之一交还比他所查访之哨站数量少的小书写板，书写板的符号会被查对，并查出这板子是属于哪个哨站。当这被确定之后，营长会请来连队的百夫长；他会带来那些值勤的人，而他们与巡逻的人对质。假如错误是在哨站，巡逻者可以请来陪伴的证人作证，澄清事件，其实他必须如此做。但是假如没有这样的事发生，那罪责则落在巡逻的人身上。

37.由营长组成的军事法庭立即成立来进行审判；假如发现有罪，他会被以杖刑（fustuarium）处罚。其执行如下。营长会拿出一根棒棍，以它轻触被定罪之人，那时所有士兵开始以棒棍及石头攻击他，通常会在营区之内杀死他。但那些设法逃避的，也没有更好的下场。因为

他们又能如何？他们不被允许回到家中，没有家人敢接纳如此之人回家。那些人一旦落入如此这种不幸，会注定毁灭。如果补给官及骑兵官没有在适当时候传递适当命令给下一个骑兵队巡逻的人以及其骑兵官，他们亦会遭受相同处罚。这种极端严厉以及绝无法逃避的惩罚，所带来的结果是罗马军队的夜哨完美无缺地被执行。

普通士兵要向营长负责，百夫长向执政官负责。营长以及在盟军中的长官，有权施加刑罚、扣押物品以及下令鞭打。鞭打致死的惩罚亦加诸那些在营区偷窃、作伪证、已成年时却犯下同性恋罪行，以及那些已经因为相同罪行被处罚三次者。以下行为被认为在士兵中是缺乏男性气概以及不荣誉的：为赢得奖励，出人头地，对营长做出在战场上英勇的假报告；被命令到进行掩护的部队中，因为害怕而擅离被指派的位置；以及相类似的，因为害怕而将武器丢弃在战场。由于这理由，那被指派到掩护部队的人经常都会注定等死。这是因为虽然有排山倒海般数量上的悬殊，但因为害怕等待他们的死刑惩罚，所以他们将会留在岗位，坚持到底。再者，那些在战场上遗失盾牌或刀剑或任何武器的人，经常会奋不顾身冲向敌人，希望或是因此取回他们失去的武器，或是以死亡来逃避他们在国内无可避免的羞耻及屈辱。

38.假如曾经发生大量人员以这种方式弃职逃跑，以及整个连队在极大压力下离开岗位，军官会拒绝将所有罪人全数打死或处决，但是他们所采取的解决方法之有效，正如其之可怕。营长会检阅军团，将那些擅离职守犯罪的人叫到前面。他严厉责备他们，最后以抽签方式选择五位、八位或二十位的犯错之人，这数字是经过计算，所以它代表的是所有那些证明自己胆小怯懦之人数量的十分之一左右。那些抽到的，便会被以我已经描述过之方式来加以毒打致死。其余之人则关禁闭，只能食用大麦而非小麦的配给，并被命令要驻扎在营区外没有防御的地方。抽到这致命之签的危险及恐惧同样威胁每个人，因为没有办法确定会落到谁身上，而关禁闭，被配给大麦的公共羞辱，同样都是大家会面对的，

所以罗马人采用了最好的可能方式来激起恐惧，并且修复任何骁勇善战精神遭到削弱后所带来的伤害。

39.罗马人亦拥有极佳办法来鼓励年轻士兵面对危险。无论何时有任何人在战场上特别出色，将军会召集所有部队，叫那些他认为非常勇敢之人出列。他赞美他们在行动中的英勇，以及表现中任何特别值得一提之事，然后颁发如下的奖赏：杀伤一位敌人士兵，一支枪矛；杀死并掠夺一位敌人，假如他是步兵，一个杯子，或如果是骑兵，则是马匹装饰（原先的奖品是一支刺击的长枪）。这些颁奖并非颁给那些在激战或是攻下城池之中杀伤或掠夺敌人的士兵，而是给那些在小型遭遇战或类似情形下，在那时并无与敌人进行近身交战之必要，而是自愿以及刻意地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的士兵。

在攻占城池时，第一位登上城墙的人会被奖赏一顶金冠。依相同之理，那些护卫以及拯救一位公民同胞或是盟友的人，会得到执政官颁奖赏识，而那些其性命因他们而获救的人，会自愿呈献给他们金冠；如果没有，他们会被对此事进行论断的营长强迫去做。此外，一位因这方式而获救之人，终其余生会尊敬其拯救者有如自己父亲，视他如再造父母。借由如此鼓励的诱因，甚至那些停留家中的人，也会有冲动在战场上模仿如此成就，就如那些在场亲眼目睹发生之事的人一样。那些接受奖励的人，不仅在军队中享有极大声望，而且很快地在家乡亦然：当他们回家时，他们会被推举出来带头领导宗教游行。除了那些因为勇敢被执政官奖励之人外，在这些场合没有人可以佩戴奖章；而且他们习惯于将赢得的奖赏安置在家中最显眼之处，视它们为勇敢的证明及象征。所以当我们思考这民族几乎着迷般地关切军事奖励和惩罚，以及他们赋予它们极大的重要性时，他们会在每一场进行的战争中都光辉得胜，也就不足为奇。

步兵每天有两个欧宝的薪资，百夫长两倍于此，而骑兵则是一个德

拉克马。步兵每个月接受到小麦配给，约等于一个雅典迈迪温诺斯的三分之二，骑兵则是七个迈迪温诺斯的大麦及两个迈迪温诺斯的小麦。[27] 在盟军中，步兵接受相同的配给，骑兵则是一又三分之一迈迪温诺斯的小麦以及五个迈迪温诺斯的大麦。这些配给免费提供给盟军，但在罗马部队中，财务官会从他们的薪资中扣掉小麦、衣服以及任何他们所需要之额外武器的价钱。

40.罗马人无论何时拔营，其所采取程序如下。一旦信号发出后，人们开始收下帐篷以及打包背包，但是没有士兵可以先行取下或搭建帐篷，除非已经先为营长及执政官做完。在第二道信号时，他们将背包放在驮兽上，而第三个信号发出时，带队的连队必须出发，让整个营区开始移动。一般而言，特选部队会排在队伍前面；在他们之后则是盟邦的右翼，之后是他们的驮兽。接下来的顺序是罗马的第一个军团，其随行行李在后，再接着是第二个军团，后面跟着驮兽以及盟邦的行李车队，这是在队伍后段，盟军左翼则为后卫，提供保护。骑兵有时候会在他们所属个别单位的后面，有时与驮兽共行，将它们聚集一起，保护它们。当攻击被认为会从后方来时，会维持相同的大致部署，但是盟军的特选部队会后退，形成后卫，而非前锋。这两个军团及盟军两翼，每部分在不同天会依序占领前方或后方的位置；变化队形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士兵都有相同机会去发现干净的水源以及新的收集粮秣地区。

假如有不寻常的危险局势威胁时，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行军秩序，但前提是有足够开放的地形来进行。在这情形下，军队是以三种战术群纵队平行前进，由前线部队、中线部队以及后线部队组成。带队之连队的行李车队被安置在前面，第二的紧接其后以及诸如此类，行李车队被安插在战斗队伍之间。以这种队形，假如有一列受到威胁，军队会面向右边或左边，端赖攻击所来自的方向，所以那时可以很快地摆脱行李，面对敌人。因此步兵可以很快地及以一次动作采取这种战斗队形，除了它或许需要将前线部队回转穿过其他战术群，[28] 而驮兽及其驾驭人在战

斗中会在适当位置，由一排部队来加以掩护。

41.当军队行军到靠近扎营地点时，一位营长以及被依序选定担任这职责的数位百夫长，会先行前往勘查要安置营区的地形。他们以决定执政官公署帐篷需要在何处搭建来开始（所根据的考量我已经在上面提及），以及以此为据要往哪个方向来布置军团营区。在决定这一点后，他们首先丈量出执政官公署的区域，接下来他们拉出一条直线，沿着它搭建营长的帐篷，然后再拉出与此线平行的一条线，这标记军队主要营区的开始。依照相同方式，他们在执政官办公室另一侧拉出其他的线，这是根据如我已经详细描述的蓝图进行。所有这些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而做标线是件容易的差事，因为所有的距离都有规定，并且熟悉。他们接着去插旗：首先是在执政官公署所立之点，第二是在那已经选定为营区之处，第三是在营长帐篷所在之线的中心点，而第四则是在军团扎营所沿着的平行线。这后者的旗帜是红色，但执政官是白色。在执政官办公室另一侧的线，有些时候是以其他颜色旗帜来标记，有些则是单纯以标枪来标记。在这之后，他们会去将不同区域之间的道路及通道规划出，并用标枪来标记出每一条路。结果是在军团行军到足够靠近时，可以对基地有清楚视野时，每个人都已经对整个规划了然于心，因为他们可以从执政官旗帜的位置来计算，从那里得到方位的概念。每个人都准确地知道他的帐篷在哪一条街道以及街道哪一块，因为每位士兵都一成不变地占有军营中的相同位置，所以搭建帐篷的过程相当类似士兵回到自己的城镇。当那发生时，士兵在城门口离开他们的队伍，每个人从那里径自回家，毫无困难地抵达，因为他知道他的家所在的区域及确切地点。所以相同之事亦发生在罗马军营中。

42.因为罗马人在规划营区时，特别重视行动方便，所以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在我来看恰好与希腊人相反。后者在选择营区时，特别会考虑到借着利用自然地形之优势，以求安全。首先，这是因为他们懒于劳动去挖掘壕沟；其次，因为他们认为人为的防御工事劣于地形

自然特征所能提供的。所以整体而言，他们在军营规划上会被迫去采用所有形状，为的是要迁就地貌，于是会把军队的不同部分移到不适当的地点去，结果是每个人都不太确定军营的细节以及他在之中的位置。但罗马人宁可历经挖掘以及准备其他防御工事的操劳，为的是要有一个一致及统一，而且每个人都熟悉的军营规划。这些是关于罗马军事理论最重要的事实，特别是关于他们如何驻军扎营的方法。

罗马共和与其他共和的比较

43.几乎所有史学家都向我们推荐斯巴达、克里特、曼提尼亚以及迦太基政体的优秀，而有些人则提及雅典和底比斯。我可以同意对前一类的赞美，但我想对于雅典及底比斯的系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这两个国家的崛起都是异常的；两者在权力极盛时期，都没维持长久，而它们所经历的衰落却非同小可。它们是借由命运之突然转折而取得壮观之极盛，但接着在它们显然仍在蓬勃发展，而且可能维持下去时，却又遭受到命运完全的逆转。当他们在攻击斯巴达人时，底比斯人利用的是对手犯下毫无道理的错误，以及斯巴达在自己盟友中所引起的仇恨意识；除此之外，底比斯人在希腊人之中所得到的优越名声，是基于一人或最多两人的胆识，而他们已经观察到敌人这些弱点。命运女神的确很快证明底比斯人在当时所得到的成功，是基于它的领导人所具有之英雄气概，而非由于宪政形态。众所皆知，底比斯在政治上之领导的起源、极盛以及终止，皆与沛洛皮达斯（Pelopidas）和艾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之生命同期，所以我们必须下结论说，它在那时所享有之霸权是其公民的成果，而非其政府系统的成就。

44.极为相同之判决亦适用于雅典的宪政上。雅典人享有较多的成功，这确为实情，但所有之中最光荣者，则是与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令人激赏的领导力有关。[29] 在那之后，经历了彻底的命运转折，这归之于其不稳定的民族个性，因为雅典人民经常或多或少像是搭乘一艘大船，却没有船长。当对海洋的状态或是暴风雨的出现感到恐惧时，水手行为合理，遵守船长命令，完美地执行他们的职责；但不久之后，他们变得过度自信，开始以鄙视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长官，并且彼此闹开。有些人急于继续航行，其他人则催促船长将船只下锚停泊，有些人张开船帆，其他人则阻止他们，并命令要将船帆收起；他们

分裂、争吵的整个景象不仅令旁观者感到羞耻，而且对所有参与相同航行的人，是件绝对危险之事。常发生之结果是，在逃离最凶恶大海及最猛烈暴风的危险后，他们在船舰入港以及在海岸可及之处，却成功地将船给搁浅触礁，给破坏掉。

这正是不止一次降临在雅典政府系统的命运。因为人民及其领导人的英勇行为，抵挡住最浩大及最恐怖的危险后，国家进入无风无浪的宁静时代，然后却相当无端无故以及毫无理性地经历全面崩溃。因为这理由，我没必要再对这政体[30]或是底比斯的政体多做发言，因为这两个国家是由群众根据他们随意而来的冲动做出所有决定。在雅典的情形是人民莽撞冲动以及心怀怨恨，而在底比斯的情形，则是人民被训练以暴力及残酷的习惯来成长。

45.当我们讨论克里特的宪政时，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何以之前时代作家中最博学者，亦即埃福罗斯、色诺芬、凯利斯尼兹及柏拉图等，首先会声称它与斯巴达的政体类似？以及，第二，它真的值得尊崇赞许？我并不认为这两个声明有任何一个是对的，而我的意见是基于以下之事实。且让我以它与斯巴达政体不同之处来作为开始。我们或许可以说出后者的三个明显特征。首先，它有相关土地的法律：据此法律，没有公民可以拥有较之其他公民更多的土地，而是所有人都对公地拥有均等的持份。其次则是关于金钱之取得：因为钱币在斯巴达人之中是相当不受信赖之通货，结果是任何可能因为拥有较多或较少金钱所导致的纠纷，都完全从宪法中移除。再次是：整个行政工作必须赖以执行或是需要其合作的官员中，国王一职是永久性的职务，而元老院成员则在任命后，成为终身职务。

46.但这些事情的实践在克里特人中恰好相反。他们的法律允许公民可以无限制地取得土地——如俗语所说：天空是唯一界限——而且金钱在他们之中被如此高尚看待，所以拥有它不仅只是必要而已，而几乎

也是件最荣誉的事。的确，贪婪及欲念在克里特人性格上如此根深蒂固，所以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会认为没有任何形态的利润是值得羞耻之事的民族。再者，他们的公共职务是年度性的，而且透过民主选举产生。着眼所有这些，我常百思不得其解，何以上述作家会声称这两个呈现出如此截然对立属性的政体，却会拥有共同的外观，彼此关系密切。除了忽略如此的差异外，这些作家还另外对莱克格斯的作品做出冗长的评论，声称他是唯一的立法者，掌握到问题的根本。

现在，每个国家在自我保存上会依赖两项根本的特质：在面对敌人时的勇敢，以及公民之间的和谐。莱克格斯在除去对财富的欲望时，也同时除去城邦的不和及斗争。所以斯巴达人在从这些邪恶中得到解放后，在国内事务的作为以及团结精神上，都胜过所有其他希腊人。在做出这样声明后，这些作家同时也观察到克里特人因为个性上对财富的追求，所以无论公开及私下，都涉及频繁的叛逆、谋杀、屠杀以及内战；然而他们对这些事实却视若无睹，仍还胆敢辩称说这两个政治系统有许多共通之处。的确，除了两者名称不同之外，埃福罗斯是使用相同的词语来解释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面貌，所以假如一个人没有注意到这两个国家专有的称呼，必然没办法知道他究竟在形容哪一个。

以上是我认为这两个政治系统不同之点，我现在将解释何以我认为克里特的宪政并不值得赞美或模仿。

47.我个人认为，在每个政治系统中有两个基本成分，而根据它们，政治系统的真正形态及品质因此才会是值得欲求，或是恰好相反。我意思所指的是习俗及法律。值得欲求的是那些让人民的私生活有品德及有纪律，而国家之公共性质是文明的以及正义的；不可欲的是那些具有相反之影响者。所以当我们见到任何民族之习俗及法律时，我们可以有信心地下结论说，这些公民及他们的政体是同样优秀的；依据相同原则，当我们见到一个社区，其中私人生活充满贪婪及欲念，公共行为便

会是不公不义，那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宣布他们的法律、独特的习俗以及一般政体是不良的。所以除了一些少数例外，几乎不可能会有比克里特岛中盛行的私人行为更加虚伪，公共政策更不正义的了。于是乎，既然我无法认为克里特的宪法或是与斯巴达的相似，或是本身有值得任何赞美或模仿，所以我将它从我所提议要进行的比较中移除。

至于柏拉图著名的共和国，有一些哲学家相当赞赏，但我不认为应该将它带进有关宪政的讨论之中。因为正如我们不允许没有适当注册[31]的艺术家或运动选手参加庆典或竞赛，所以我们不该允许柏拉图的政体进入这竞赛之中，来竞争奖品，除非有例证可以证明它在实际上运行过。但无论如何，直到现在，将它与斯巴达、罗马及迦太基宪政相比，就像拿出某件雕像来和活生生的真人相比。因为即使雕像的雕工再完美，但是这没有生命的物件和有生命的人相比，必然会让旁观者感觉相当不恰当以及不协调。

48.我因此将省略这一类政体，并且继续我对斯巴达政体的陈述。对我而言，若从确保公民间的和谐、保存斯巴达领土完整和国家自由这些观点来看，莱克格斯的立法以及其中所展现出的远见，是如此令人敬佩，我们可以认为他的智慧有如神明，非凡人能有。他所设置的土地财产平均分配、简单饮食以及团体聚餐，规划如此之好，所以创造出一个节制及有纪律的私人生活，并且保护整个社区免于纷争及内战，正如其训练人民忍受艰辛及危险，来产生高贵及勇敢的人民。当勇敢及自律这两种品德结合在一个灵魂或国家之中，邪恶将不容易在如此土地中滋生，同样，如此之人亦不容易被邻居征服。以这种精神以及从这些成分来建构他的政体，莱克格斯确保斯巴达整个领土的安全，留给斯巴达人他们的自由，作为永恒的财产。至于兼并邻国领土，或是坚持在希腊拥有霸权，或是追求更广泛的扩张政策，莱克格斯无论是就个别的法律或是国家的整体宪法，似乎没有做出任何规定。他仍然需要做的是加诸国人某种必要的或是既定的原则，据此他使他们在私生活上俭朴以及满

足，城邦精神能够在公共政策上同样地变成节制以及满足。但如其所然的是，他在使斯巴达人在个人活动及国内体制上，变得不自私自利和明辨事理时，却也使斯巴达人在对其他希腊人的态度上，变得最富有野心、积极争权以及侵略占有。

49.例如，斯巴达人是希腊人中最早觊觎邻国领土，并且是因为贪婪而向美塞尼亚人宣战，目的是要奴役他们，这是恶名昭彰的事实。除此之外，所有史学家都一致记录到他们纯粹由于顽固，让自己受到自己誓言的束缚，绝不停止围攻麦瑟纳，直到他们占领该地。[32] 最后这成为人尽皆知的事实：斯巴达人因为渴求霸权，所以被迫从他们在战争中所征服之人那里接受命令。当波斯人入侵希腊，斯巴达人以希腊自由的领导者征服他们，然而在入侵者撤退逃跑之后，斯巴达人由于安塔西达斯和平条约之故，背弃小亚细亚希腊城邦，以换取金钱，使他们可以建立起对其他希腊人的霸权。[33] 在那时，他们的宪法显露出一个重要的缺失。

只要他们的野心只扩及统治邻国以及伯罗奔尼撒的居民，他们发现自己国家所提供的补给及资源是足够的，因为所有他们征战所需之供应都在手边，所以他们可以很快回家，再度补给或是送出补给给出征的军队。

但一旦他们开始跨海远征，或是在伯罗奔尼撒之外进行征战，很显然，只要他们还是受制于莱克格斯的经济立法，以他们的铁币或以农作物来交换缺乏的商品时，都还是无法提供他们所需，因为这些活动需要普遍流通的通货，以及来自国外的物品供应。结果是斯巴达人被迫向波斯人求情，向希腊岛屿居民征收贡赋，并且向其他希腊人勒索捐献。他们被迫承认，假如他们仍保留莱克格斯的系统，他们无法对局势施加任何影响，更遑论取得希腊霸权。

50.那么我们这离题叙述的目的为何？我希望在历史事实的观照

下，去显示出就稳固护卫国家领土，并维持自由而言，莱克格斯的宪法对这样的任务是充分足够的。因此从那些认为这便是宪法最终目的的观点来看，我们必须承认没有，也未曾有更值得选择的政体或政治系统。假如一位政治家有超越这些成就的更大野心，以及追求更崇高的威望及名声，想将自己置于众人之首，成为浩瀚地区与众多人口的领袖，成为全世界众所注目的焦点，那我们必须承认斯巴达的政体确实有所不足；罗马的政体则是更加优越、设计更适合用来获取权力。这点的证明是当斯巴达人企图在希腊赢得霸权时，不久自己便落入失去自由的危险中，然而罗马人他们首先仅以在意大利建立霸权为目标，但在极短时间内将整个世界纳入他们的统治下，在这成就中，他们所能掌控的丰富资源扮演了不小的角色。

51.迦太基的宪法对我而言，在最重要的特征上刚开始时，设计良好。迦太基人有国王，元老所组成之会议有贵族的权力，而人民在那些适合他们的事情上，则是至高无上，所以整个国家一般架构与罗马及斯巴达相似。但在汉尼拔战争开始时，迦太基的政治状况陷入衰退，罗马则日渐增强。每个有机体、每个国家以及每种活动，都会经历自然的循环：首先是成长，然后是成熟，最后则是衰落，因为当它到达顶峰时，每个组成成分是在最强的时候，正因为这个理由，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别在这时显示出来。迦太基的势力及繁荣，比罗马发展的远远为早，至少就其政府系统而言，因此与这一点相称的便是在它国势已经衰颓时，罗马正处于其高点。于是在迦太基，人民的影响力已经可以主导国事会议，而在罗马元老院则仍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这意味着在其中之一，国家大事之思虑议决是由群众来进行，而在另一则是由最杰出之人来定夺，结果是罗马人对公共政策的决定显得较为优秀。换言之，虽然他们在战场上遭受几场一面倒的灾难性挫败，他们决策的智慧最后使他们能在战争中胜出，征服迦太基人。

52.且让我们现在思考其中细节上的差异。例如，首先在战争的进

行。在此我们发现就海上军事活动而言，正如可以预期的，迦太基人是有比较好的训练和装配，因为航海技术长久以来就是他们国家的专长，而且他们较之于其他人都更专注海洋发展；但在军事征战上，罗马人则是把自己训练到更高的水准。事实上，他们将所有精力都投注在战争这方面，而迦太基大体而言，则忽略了他们的步兵，虽然他们对骑兵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兴趣。这其中的理由是他们雇用外国军队及雇佣军，然而罗马则是使用他们自己的市民及本国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同样必须判断说：罗马的政治系统较迦太基人更为优越。迦太基人在所有时候都是依赖佣兵的勇敢来护卫他们自由的机会，但是罗马人则是仰仗自己市民以及盟邦的协助。结果是假如罗马人在开始时恰好被打败，他们仍然可以运用所有的资源来继续战争，但这对迦太基人则不可能。就罗马人来说，知道自己是为自己国家以及子孙来奋战时，在激烈的战斗中是不会松懈，反而全心全意坚持奋战，直到敌人被征服为止。结果是如我已经提及，虽然罗马人不善于使用他们的海军力量，他们却在最后取得成功，这是因为他们人员的英勇；因为虽然航海的技术在海军作战中极为重要，但水兵们的勇气却是最后赢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一般而言，意大利人在身体力气以及个人勇敢方面先天地优于腓尼基人及非洲人，这诚为事实，但同时罗马人的体制在培养年轻人勇武的精神方面，也作出很大的贡献。我仅需引用一例来说明罗马国家如何花费心思及气力，来培育能够忍受任何考验的国民，为的是让自己在国内赢得勇武的美名。

53.无论何时他们有知名人士过世，在丧礼游行过程中，他的尸体会被以各种尊荣的方式抬进市民广场（Forum），到所谓发言台的地方，有时候是以直立的方式呈现，所以可以变得显著，或是比较少见地以平躺的方式呈现给大家。所有民众会围绕观礼；而他若有留下成年儿子可以在场出席，那便是他的儿子，如果没有，则是某位亲戚，会登台进行演说，细述死者生前成就的品德及事功。以这些方法，所有群众——不仅是那些在这些丰功伟绩中扮演某些角色的人，还有那些没参与其中的人——都参加这典礼，当死者生平事迹在他们心中重新被追忆思

念，再度呈现眼前，他们的同情心是如此深刻地投入，所以损失不只局限在悲伤之人，而是成为公共的损失，影响所有的人。然后在埋葬尸体以及执行习俗的礼仪之后，他们将死者的遗容放在家中最显著之处，安放在木制的小神龛内。这遗容是一副面具，在脸形及五官上皆以分外忠实逼真的程度来制作，以呈献死者的生前特征。偶尔在进行公共祭祀后，这些面具会被以极为谨慎的方式来装饰及展示。当任何家族里之显赫成员过世时，这些面具会被带到丧礼场合，由那些被认为与原来本人最相似（身高以及一般外表及姿态）的人佩戴。[34] 这些替代之人根据死者之阶级来穿着：绣有紫色宽边的公民长袍，代表执政官或副执政，完全紫色之公民长袍代表监察官，镶有金边则代表曾庆祝过胜利大游行，或是执行过类似丰功伟绩的人。

他们所有人皆乘坐马车，在他们之前有手执法西斯（fasces）、斧鏚 以及其他配章印绶的仪仗队先行，这是依据死者生前所享有的国家职务尊荣，而且当他们抵达发言台时，他们所有人皆端坐在一排象牙坐椅上。甚难想象对一位盼望赢得名声以及力行品德的年轻人，会有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有谁在目睹所有这些在生前享有功名，现在死后齐聚一堂，仿佛再度复活、重新拥有气息的面具时，竟然会无动于衷？有什么景象会比这更为荣耀？

54.除此之外，在针对即将下葬之人发表演说的讲者，会继续陈述面具所代表之人，他们生前所有的丰功伟业。借由经常重复这些勇敢人物的美好传闻，那些已经成就高贵行为之人的名气，因此永垂不朽，那些曾尽心尽力服侍国家之人的声望，众所皆知，成为后人永远的遗绪。但是典礼的最重要的效果是，它会鼓舞年轻人为了国家共同利益，去忍受极端的艰苦，希望能够赢取那伴随勇者而来的荣耀。而我方才所说的都被事实验证。许多罗马人自愿从事单打独斗，借此决定一场战事，而且不少人选择必然的死亡，有些人在战争中，为了去拯救他们同胞的性命而牺牲，其他则在承平时代要确保共和国的安全。除此之外，有些例

子则是在位之人，愿意将自己儿子处死，因为他们违反法律及习俗；[35] 因为他们认为国家的利益比血肉之亲的关系还要珍贵。罗马历史中有许多人有许多这类的故事可说，尤其有一个可作为我所提之议论的范例及明证。

55.这故事是如此。当豪拉提乌斯·寇可勒斯（Horatius Cocles）[36] 在台伯河桥的远端与两位敌人交战，这桥可以从西方进城，他那时见到一群敌军增援部队前来。他担心他们会强行过桥，进入城市，于是转身，向后面的人呐喊立即撤退，迅速将桥拆毁。他的同志遵命，而在他们拆桥的过程中，豪拉提乌斯·寇可勒斯坚守岗位。他身受许多创伤，但挡住敌人的攻击，让他们深感惊讶，这并非由于他的体力，而是他的勇气及坚忍。一旦桥被砍断，敌人的前进也被阻挡，在那时候豪拉提乌斯·寇可勒斯跳进河中，身上仍然武装、手持武器。他刻意牺牲自己，因为他认为国家安全，以及之后将会依附在他姓名的荣耀，比他目前的存在以及仍然留给他的人生岁月，还要来得更加珍贵。对我而言，这是要效法及有野心执行英勇行为之精神的典型范例，这正是罗马人灌输到他们年轻人心中的东西。

56.再者，罗马有关金钱交易的法律及习俗优于迦太基。在后者之中，没有任何导致利润的行为会被视为是值得谴责的原因，但对罗马人而言，没有事情会比以不正当手法去接受贿赂或追求利益，来得更加可耻。正如他们会全心赞成取得金钱，若方法是光明磊落；所以若其来源是要被禁止的，他们也会断然谴责。这样的事实可以说明：在迦太基人中，官职候选人是可以公然贿赂的，但在罗马这是重罪。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对优良表现给予的奖赏是恰好相反，很自然地去取得奖赏的方法，也就应该一样地不同。

但是罗马共和国在一个领域里彻底地展现出其优越：宗教信仰。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种现象：在其他民族 [37] 会被视为值得谴责的对象

——迷信——其实是将罗马国家团结在一起的要素。这些事件被如此严肃地对待，并且如此频繁地引进到公共及私人生活中，所以没有事情会比它们来得更为重要。许多人或许会觉得这着实令人惊讶，但我的观点是罗马人采取这些作为，是为了普通的民众。假如有去建立一个国家完全由有智慧之人所组成的，这种处理方法或许没有必要，但因为群众随时反复无常、充满不法的欲望、不讲理的愤怒以及猛烈的激情，所以他们只能借由神秘力量的恐怖，或将这主题做出其他戏剧性的表现，来加以约束。因为这个理由，所以我相信古人绝非愚蠢行事或恣意妄为，引进到人民之中种种关于神明的概念以及对地狱（Hades）惩罚的信仰；反而是现代人愚蠢，甘冒极大风险来拒绝这些。无论如何，其结果是在希腊人之中，在其他事之外，担任官职的人无法被信赖去保管甚至仅仅只是一泰伦的银钱，即或他们有十位审核会计、同样数量的核章以及二十位见证人；然而在罗马人之中，他们的官员经手大量钱财，谨慎执行公务，因为他们已经发誓，做出承诺。在其他国家中，甚少发现有人能不擅动公款，而且在这方面的记录是清白无瑕的；然而在罗马人之中，发现一个人犯下如此行为，那是相当例外。

结论

57.所有既存的东西都会历经衰落，这是个几乎无须证明的命题，因为自然界无法违逆的过程，便足以让我们接受这原则。我们或许可以说，每类国家会从两个来源而面临衰落，其一是外来的，另一则是国家内部演化。对于第一项我们不能列出任何固定的原则，但是第二项，则是会依循规则的顺序。我已经指出哪一种国家政体是最先演化出，何者会继之而来，以及每一种会如何转化到下一个，所以那些可以将我论证开头及结论联结在一起的人，便能够对于未来做出他们自己的预测。在我看来这是很清楚的。当一个国家在抵挡如此多的大灾难，获得绝对优势，以及无可争议的宰制，很明显地在长久以来的繁荣影响下，生活将变得越来越奢侈，而公民对官职的竞逐以及其他领域的活动，会比应有的情形还要越来越激烈。当这些征象变得益加明显时，对官职的欲求争取，以及因为默默无名所带来的羞辱，加上炫耀及铺张的流行，将会导致普遍衰落时期的来临。这变化主要的始作俑者将会是群众，他们有些时候会认为，因为社会其他成员的贪婪，使他们感到委屈，但在其他时候却被那些期盼官职的人阿谀奉承，而感到自负。在这阶段时，他们会被刺激而愤怒，他们的思虑会经常受到激情的左右，所以他们将不会同意去服从他们的领导人，甚至拒绝与他们平起平坐，而是会去要求所有事情，或是将最大的一份留给他们自己。当这发生时，这宪体已经改变其名称，而成为那听起来最壮观的——自由与民主，但其性质却是所有政体之中最恶劣者，亦即暴民统治。

我既然已经形容过罗马国家的形成、崛起、巅峰以及目前的处境，而且我也同样描述它和其他政体之间的差异，无论是较好或较坏，我现在要将这研究做一结束。

58.我要回归到我开始这离题叙述的日期之后，立即接下来的时代，但首先我要提议挑出一个事件来稍做陈述。我做此事的原因，是要给一个不是理论上而是实践上的说明，说明罗马政体如其所真正存在的完美及长处，仿佛我正在展示的作品是件范本，会透露出来一位工艺优良匠师的精致技术。

汉尼拔在坎尼胜利后，掳获八千名罗马士兵，这些都是当初被罗马执政官留下来守卫营区的人，但汉尼拔允许他们派出代表到罗马，去商讨赎身及释放事宜。部队选出十位领导人，这些人在汉尼拔要求他们宣誓一定会再回来后，被送到罗马。这其中一人在刚离开军营的栅栏时，说他忘记某物，所以在拿到他留在后面的东西后，再度出发，心想既然他已经回到营区，所以他已经信守承诺，从誓言的束缚中解除。当他们到达罗马时，代表团恳求拜托元老院不要吝于给这些战俘释放的机会，而是允许每人缴纳三个米纳（minae）[38]后，再回到自己的人民当中，因为他们说汉尼拔已经给予这种让步。他们进一步求情，说他们这些人值得释放，因为他们并未在战斗中犯下怯懦的行为，也没做出任何不配罗马的事情。他们被留下来看守营区，而在所有其他军队都已经牺牲后，他们受迫于环境，才向敌人投降。虽然罗马人在战争中遭遇到一面倒的挫败，几乎丧失所有的盟军，而且每日担心他们城市本身将受威胁，但他们在灾难的压力下，仍然没有忘记自尊，也不允许自己忽视什么是该做的事。他们认识到汉尼拔的目标是要掌握一些钱财，同时也要削弱凡是与他为敌之军队的作战精神，要告诉他们即使在被打败之后，他们仍然有平安获救的机会。因此元老院非但没有准许这要求，更拒绝因为对同胞的怜悯，或是考量这些人在未来或许会作出贡献，来说服自己。所以他们拒绝赎回战俘，阻挠汉尼拔的算计，以及他建立在这些算计之上的所有希望。同时，他们为自己人民建立规范：他们或是征服，或是死在战场；因为假如他们被打败，他们便没留有任何安全的希望。在他们通过决议后，他们将九位代表解散；他们因为受誓言束缚，自愿回到汉尼拔那里去。至于那位设法以欺骗来给自己自由的人，他们则另

外加上锁链送回给敌人。当汉尼拔见到罗马人在决议中展现出不可动摇的决心和崇高的精神时，他大为惊讶；因为这样子，他在胜利中经验到的喜悦，反而不如他感受到的失望。

---

[1] 波里比阿在此所指这主题的古典作家，并不必然是如希罗多德、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之属，而更可能是比较靠近波里比阿时代进行写作的二流作家。

[2] 例如波里比阿提及斯巴达的克里奥米尼斯时，指称他为僭主以及独裁者。

[3] 这过程由谷奈塔的例子得到明证（见页368至370）。

[4] 在波里比阿所写的时代，执政官就任他们一年一任的职务时，通常不久便会离开罗马，执行军事任务。

[5] 护民官之制度是特别设计来限制执政官的权力，所以由护民官在元老院里提出的动议，执政官不得否决。护民官的权力逐渐扩大到可以在司法上控制所有官员，所以他们成为国家追究行政机关的刑事责任时所拥有的主要工具。换言之，护民官可以起诉犯错之官员。

[6] 他们是在执政官任期初，在执政官前往他们被指派之行省前，被接见的。

[7] 每个盟友的责任义务是在它们个别的联盟条约中规定下来，每个盟邦都被要求记录它有效的兵力。在紧急状况下，特别的要求或许会被提出。

[8] 每年所征召的前四个军团的营长（tribunes）是由部落会议（tribal assembly）选出，共计二十四名。其他军团的营长则是由执政官任命。

[9] 意大利盟邦在名义上以及原先都是独立的国家，而元老院之所以有权干预，是出自它在外交事务上的角色，特别是巩固联盟的责任。许多叛逆及阴谋的案件发生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因为汉尼拔鼓励罗马盟邦退出或是反叛：例如，在坎帕尼亚地区以及他林敦和布鲁提恩等。

[10] 换言之，人民控制法庭以及公职人员的选举。

[11] 这或许是指涉由弗拉米宁（Gaius Flaminius）动议，有关在高卢之公地的问题（见页221）。

[12] 比较小型的诉讼案件，或许经由双方协议，省去寻求元老院加入裁判。

[13] 年轻贵族通常会服役的军种是骑兵；这意味着无人可以竞选任何政治职务，直到他过完二十七岁。

[14] 亦即没有头盔上的装饰。

[15] 约九寸。

[16] 波里比阿提及它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被使用，但有可能是在第一次战争中，从为迦太基人作战之西班牙战士那里引进采用的。

[17] 亦即有些是圆形的、有些是方形的切面。

[18] 木柄的宽度约三寸，而插入木柄的铁制头部宽度则约一寸。

[19] 先选出的十位军官称做“前百夫长”（centuriones priores），第二次选出的则是“后百夫长”（posteriores）。

[20] Optio（单数，复数为Optiones）可以分担百夫长种种行政上的职责，或许可以被形容为某种补给官或军需官（quartermaster）。

[21] 所以每个营队（cohort，corhors，复数cohortes）（原为maniple，连队——译者注）平均由四百二十人所构成，军团的十分之一。

[22] “进攻”或许是指从远距离投掷出标枪。

[23] 一个普列特拉（plethra）是一万平方尺。

[24] 这是因为扣掉占有五分之一步兵的精选部队后，盟军有两千四百人要挤进去十个单位的空间，而不是罗马军团三十个单位的空间。

[25] 这些是老兵，他们以特别条件重新接受征召，形成执政官的贴身卫队。

[26] 在罗马的军事术语中，agger是指栅栏，而vallum则为栅栏上的护栏。波里比阿经常使用的字眼是charax及charakoma来代表整个结构。

[27] 步兵每月领到约半个蒲式耳（一个蒲式耳约三十六多公升——译者注）的小麦，罗马骑兵则是一又二分之一的蒲式耳小麦及六个蒲式耳大麦，而盟军骑兵则是四个蒲式耳的大麦及一个蒲式耳的小麦。

[28] 假如前线是在右边纵队前进，但攻击是来自右边，那作战部队会转向左边，形成三列；那时前线将会是在后列，所以必然需要绕过其他部队，来占有前方的位置。

[29] 特密斯托克里斯的领导期是从四八九年到四八○年，而以在撒拉米斯（Salamis）岛附近战胜波斯舰队为最高潮。

[30] 在与罗马政体相比之下，波里比阿谴责雅典政体的两个理由是：首先，它并非“混合”政体，所以没包括适当的约束及平衡；其次，它没有成功地维持帝国。但是由特密斯托克里斯所立下基础的雅典势力，无论如何在现代人眼中，是由伯里克利（Pericles）继续巩固。因此波里比阿似乎对现代读者会认为是黄金时代的那段时间，反而认为雅典衰落，亦即，在第二次波斯战争及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的那段时间（四八○年至四三一年）（原为四八○年至四三四——译者注）。他对民主政治的批评所指的主要是五世纪末及四世纪。

[31] 这里所指的是参加如节庆场合的表演者行会或基尔特（guild），特别是演员以及歌手。

[32] 或许是在靠近八世纪末的时候。

[33] 由于斯巴达海军将领赖山德与波斯王子小居流士（Cyrus）在四○七年的协议，波斯提供金钱给斯巴达，协助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来对付雅典。安塔西达斯和平条约是在三八七年协商，而原来由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在入侵波斯领土时，所解放的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再次回归到波斯的统治之下。

[34] 被选定之人通常是家庭成员，但是有些例子则是死者由演员来代替。

[35] 例如布鲁图斯（Junius Julius Brutus）因为阴谋（李维《罗马早期历史》二书5章）以及托夸特斯（Titus Manlius Torquatus）因为不守纪律（李维《罗马早期历史》八书7章）。

[36] 波里比阿将这出名的传奇故事视为历史事件，并且可能将其定位在与拉斯·波赛纳（Lars Porsenna）以及塔克文家族（the Tarquins）的脉络之中。根据李维的说法（《罗马早期历史》二书10章）——而这是英国史家麦考莱（Macaulay）诗歌的来源——豪拉提乌斯后来游泳安然登岸。

[37] 特别是在希腊人之中。

[38] 约一点二九公斤的银钱。——译者注

第七书

在西西里之事务

2.在针对叙拉古国王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1] 所进行的阴谋，以及在特拉索（Thraso）离开后，年轻国王的叔舅左伊帕斯（Zoippus）及阿德拉诺多路斯（Adranodorus）说服国王立即派特使到汉尼拔那里。他于是选择昔兰尼的波利克里托斯（Polycleitus of Cyrene）和阿哥斯的菲洛德谟（Philodemus of Argos），派送他们到意大利，带着训令和迦太基人商讨联合行动计划。与此同时，他派遣他的弟弟到亚历山大。汉尼拔热情地接待波利克里托斯和菲洛德谟，向年轻国王提出令人鼓舞的前景，并且立即由同名的汉尼拔——在意大利的迦太基三层舰舰队的指挥官——陪同特使回去；陪同之人尚有叙拉古人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及其兄弟埃皮库代斯（Epicydes）。这两个人恰好都在汉尼拔麾下服务过一段时间；自从其祖父被认为暗杀阿加索克利斯的一位儿子阿加塔库斯（Agatharchus），被判放逐海外后，他们已经接受迦太基为自己的祖国。这些特使如期返回叙拉古；波利克里托斯提出报告，而迦太基代表则传达汉尼拔托付他的信息，国王在那时候立即表达他有意和迦太基人订立协议。他敦促这位叫汉尼拔的特使应该立即前往迦太基，并承诺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去和迦太基人协商。

3.同时，驻扎在利利贝乌姆的罗马副执政已经收到这一事件的进展报告，并且派遣特使到希罗尼穆斯，希望重新恢复曾和国王祖先所订立过的条约。在迦太基代表之前，希罗尼穆斯宣布说，他为罗马人在意大利战争中，惨败在迦太基人手上之事，感到惋惜。罗马特使对他如此不

识大体，震惊地无言以对，但仍然去询问他的资讯从何而来；国王那时指向在场的迦太基人，并邀请罗马人去反驳这报道，假如它不是真的话。罗马人反唇回应说，他们没习惯去接受敌人的说辞，并且劝告他不要做出任何违反目前协议之事；如此的政策不仅本身正确，而且最有利于他。希罗尼穆斯回应说，他会考虑此事，并通知代表团；但他也询问：何以在他祖父过世之前，有一支五十艘的罗马船队航行远至帕奇纳斯海岬，然后又再度回去。当时的状况是：在不久之前，罗马人接到报告说希洛已经过世。他们担心有些人在叙拉古会利用他继任者的年幼无知，来推翻政府，所以下令这次巡航，但当他们听到希洛仍然活着，舰队便回航到利利贝乌姆。罗马人承认的确有船舰出航，他们的目的是因为国王的年轻，所以要保护他，协助他保住权势，但在收到他的祖父仍然健在的消息时，立即返航。在讲到这点时，这年轻人喊出说："那么也允许我，我的罗马朋友们，用'返航'来维持我的权威，看我可以从迦太基得到什么！"罗马人清楚看出他的立场是偏向何方，所以没有再延长讨论；他们回到利利贝乌姆，在那里向派遣他们出使的副执政报告会谈结果。从那时开始，罗马便盯着国王，视他为敌人。

4.希罗尼穆斯接着挑选阿加塔库斯、欧内希坚尼斯（Onesigenes）以及希波斯特涅斯（Hipposthenes）为特使，一起与汉尼拔到迦太基，训令他们要以如下条件为基础，订立条约：迦太基人将以海军及陆军，协助他将罗马人逐出西西里，之后他们将瓜分这岛，他们各自领域的疆界是在希美拉（Himera）河，恰好将这岛对分。在抵达迦太基后，代表团开始协商，进行讨论，在会中他们发现迦太基人愿意在每一点上对他们让步。但同时希波克拉底及其兄弟也让希罗尼穆斯落入他们的影响之下。他们开始使用汉尼拔在意大利的行军、战略以及激战，来激发他的想象力，然后持续告诉他说，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力去统治整个西西里。首先，他是国王皮洛士之女奈瑞丝（Nereis）的儿子，这皮洛士是所有西西里人出自于自由选择以及因为对他的敬爱，唯一愿意接受为领袖及国王的人；其次，他是其祖父希洛所握有之主权的继承人。结果这两位

借着言词，迅速说服这年轻人，所以他不再去注意其他人的意见；这部分是出自于他天生不稳定的性格，但更因为他们已经将他的野心抬高到令人晕头的高度。所以当阿加塔库斯及其同事仍然还在迦太基依据原来训令进行协商时，希罗尼穆斯已经又派送出另一个代表团，声称在权力上，整个西西里的主权是属于他的，要求迦太基人应该协助他收复整个岛屿，但承诺会在迦太基人的意大利征战中协助他们。迦太基人现在了解到这年轻人欠缺持重稳定，以及反复无常的彻底程度，但他们仍然认为放弃西西里事务，将在许多方面会对他们有所不利。因此他们还是同意希罗尼穆斯的所有要求，而且在之前已经准备了一些船只和部队，着手安排运送他们的军队到西西里。

5.当罗马人得知此点，他们派遣特使到希罗尼穆斯，去抗议他违反他祖先所订定的条约。国王于是召开国政顾问会议，询问他们的意见，究竟应该采取何种行动。西西里人的成员保持缄默，因为他们担心统治者欠缺判断力，但是阿里斯托马科斯（Aristomachus of Corinth）、达米帕斯（Damippus of Lacedaemon）以及奥图诺斯（Autonous of Thessaly）都建议他要遵守与罗马人的条约。唯有阿德拉诺多路斯独排众议，敦促他不可让机会流失，理由是这是他建立西西里全岛主权的唯一机会。在他说完后，国王询问希波克拉底以及其兄弟的意见，当他们回答说与阿德拉诺多路斯意见一致，顾问会议于是结束。

这是叙拉古如何决定对罗马宣战的经过。希罗尼穆斯急于留给人他很有技巧地对付罗马特使的印象，但结果是他处理这次会面如此拙劣，他不仅没有安抚，反而大大地触怒了他们。他宣布说，他将会遵守条约，但有一些条件：首先，罗马人归还所有从他祖父希洛所收取到的黄金；其次，他们归还希洛统治期间内，所收到的谷物及其他物品；再次，他们承认所有在希美拉河以东的城镇及乡村都属于叙拉古。正是在提出这些条件后，罗马特使与叙拉古的国政顾问会议分道扬镳，而且从那时刻开始，希罗尼穆斯开始积极备战，动员以及武装部队，准备其他

的补给物资。

7.一些史学家在叙述希罗尼穆斯如何垮台时，写得长篇累牍，并且引进超自然的成分到故事之中，报道在他就任之前的种种异象，以及降临在叙拉古人身上的厄运。他们以戏剧性的色彩来描绘他个性上的残酷以及他行为冲动的特质，最后则是伴随他死亡时的怪异及恐怖情状，从他们的叙述来判断，法拉吕斯（Phalaris）[2] 或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3] 或是其他僭主看起来都没有他来得更加残暴。然而实情是，他上台掌权时，仍然只是男孩，而他继位后活着的时间也没超过十三个月。在这样的时间范围内，可能会有一两位会遭受酷刑，以及一些他的朋友或是其他叙拉古人被处决，但是他的统治几乎不可能会如此夸张的邪恶或是他的邪恶会触怒众生。我们必须承认他的人格十分古怪不定、充满暴戾，但还是无法与我已经提到的其他僭主相提并论。这事情的真相，对我而言，是那些专门写作特定事件历史的人，无论何时，他们需要去处理一个在意趣上相当有限的主题时，因为纯粹地欠缺主题素材，被迫去夸张微不足道事件的重要性，对那些几乎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反而写得十分冗长。也有一些其他人因为纯粹是欠缺判断力，而犯下相同的错误。假如将那些由如是作家浪费在这些主题的空间——这些只是用来充填以及拉长故事而已——转而投入到他祖父希洛二世以及父亲盖洛（Gelo）的统治期内，甚至根本无需提及希罗尼穆斯，那更将中肯及得体！这同时会对好奇的读者来说变得更有趣，对研究历史的人会更有用。

8.首先，希洛二世是更有趣的主题，因为他自立为叙拉古及其盟友的统治者，完全是透过一己能力做到的，并未亏欠命运女神财富、名声或是任何东西。最可观者是，他完全凭借自己奋斗来取得他的地位，却没有杀戮、放逐或伤害任何一位市民，而且不仅取得，甚至还以相同方式维持他的权力。在五十四年统治期间，他保持国家和平，自己的权威未曾受阴谋动摇，甚至成功地没引起他人嫉妒，而这一点经常属于那些

有高超能力之人；的确，他在不止一个场合中，想放下自己的权力，但却被市民联合起来的行动阻止。他不仅恩赐极大的福祉给希腊人，而且全力地去赢得他们的好评，这在最后为他留下一个极美好的名声，以及大家普遍对叙拉古人怀有善意的遗绪。虽然在整个统治期间内，他在富裕、豪奢以及铺张浪费中生活，然而他却活到超过九十岁，仍是耳聪目明，机能健全，身体无恙，对我而言这是他一生均衡及节制生活的最佳见证。

他的儿子盖洛活到超过五十岁，他人生最高的目标是要服从父亲，不认为财富或是王权或任何其他东西，会比对他自己双亲的感情与忠诚来得重要。

在希腊之事务：汉尼拔与马其顿菲利普之间的条约

9.一方是将军汉尼拔、马哥、迈尔干（Myrcan）、巴莫卡（Barmocar）与其在场之迦太基元老院其他成员，以及所有他麾下的迦太基人，另一方是马其顿国王德米特里二世之子菲利普五世的代表，雅典人色诺芬尼斯，克里欧马克斯之子（Xenophanes，son of Cleomachus），被派到我们这里来代表他、所有马其顿人以及他们的盟友，彼此之间宣誓的条约。

这誓言是在宙斯、赫拉以及阿波罗之前；在迦太基神明、赫拉克勒斯以及伊奥雷乌斯（Iolaus）之前；在战神（Ares）、特莱顿（Triton）以及海神（Poseidon）之前；在那些站在我方这边作战之众神以及太阳、月亮以及大地之前；在河流、港湾以及水域之前；在所有统治迦太基众神之前；在所有统治马其顿以及其他希腊众神之前；在管辖这誓言的所有战争之神之前宣誓。

将军汉尼拔，那些与他一起之人，与他一起之所有迦太基元老院元老，以及所有在他军中服役之迦太基人提议：就那对你们及我们看起来是好的事，我们应该缔结这宣誓的友好及善意条约，根据以下之条件成为朋友、亲属以及弟兄。

第一，国王菲利普、马其顿人以及其他希腊盟友，应该保护迦太基人这有主权的人民、他们将军汉尼拔以及生活在迦太基统治下和遵守相同法律的所有民族；同样的，所有乌提卡及所有臣服于迦太基之所有城邦及部落，还有我们的士兵及盟友；以及所有在意大利及阿尔卑斯山这侧的高卢和利古里亚地区，与我们有联盟的所有城邦及部落，以及与任何在这国家之内，稍后我们会将之列入联盟关系者。

第二，国王菲利普、马其顿人以及其他希腊的盟友，必须被下列这些人保护：为我们服役的迦太基人；乌提卡人民以及所有臣服于迦太基之城邦及部落；在意大利及阿尔卑斯山这侧的高卢和利古里亚地区，与我们有联盟的所有城邦及部落；以及被任何在意大利及邻近地区内，稍后我们将会列入联盟关系者。

第三，我们绝不设下阴谋，也不安排埋伏来对付彼此，而是以所有诚心及善意，也没有遁词或秘密计划，我们必将是那些与迦太基人作战者的敌人，但通常会排除那些我们有已经共同宣誓过之条约及友好关系的国王、城邦以及国家。

第四，我们必将是那些与国王菲利普作战者的敌人，但通常会排除那些我们已经共同宣誓过之条约及友好关系的国王、城邦以及国家。

第五，你们将是我们现在针对罗马人所进行之战争的盟友，直到神明恩赐给我们及你们胜利为止，而你们将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协助，或如我们双方所预定的。

第六，当神明恩赐给我们对罗马及其盟友战争胜利之时，假如罗马人要求迦太基人谈和，我们必将做出包括你们的协议，而且根据以下之条件：

罗马人将不被允许对你们作战；

罗马人将不得统治科赛拉、阿波罗尼亚、耶皮潭纳斯、法洛斯、迪马莱、帕提尼人或阿丁坦尼人，[4] 而且他们必须归还给法洛斯的德米特里那些在罗马统治领域里他朋友的领土。

第七，假如罗马人竟会对你们或我们作战，我们将在这冲突中，如每一方所需要，给予彼此协助。

第八，假如有任何其他国家对你们或我们作战，也同样给予彼此协助但排除那些我们已经有宣誓过条约的国王、城邦或民族。

第九，假如我们决定要对这誓约做任何移除或是添加，我们必将只会移除或添加我们彼此决定要移除或添加的条款。

菲利普的个性

11.我打算在此中断我的叙述，说几句有关菲利普五世的事，因为这时正是在他生涯中，出现个性上的变化以及堕落的开始。这对我而言似乎是最令人惊讶的例证，值得任何希望从研读历史中获益的实际政治家所注意，无论获益多么的小。他地位崇高及才华洋溢，促使这位国王的良善及邪恶的冲动都同样显著，而且在希腊广为人知；同样的，当这些冲动在互相对照下，它们所带来的现实结果亦是人尽皆知。在他继任王位时，色萨利和马其顿行省，以及他王国所有其他部分，的确对他都比对任何前任国王还要来得更为忠诚以及更具善意，即使他是在如此年轻时继承王位。而这事实可以轻易由以下证据来证明。虽然他经常因为斯巴达人及伊托利亚人之间的战争，而必须到其他地方，但不仅这些民族没有人叛变，甚至居住在边疆地区的野蛮部落，也没有人胆敢冒险进犯马其顿。

再者，甚难恰当地去说明亚历山大、克吕梭勾纳斯（Chrysogonus）以及其他的朋友是如何地对他表示喜爱以及忠诚奉献，而且毫无疑问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伯罗奔尼撒人、彼奥提亚人、伊庇鲁斯人以及阿卡纳尼亚人，都从他的行动中获益良多。的确，用一个多少有些夸张的词语来说，我们提到菲利普时，可以很恰当地说他那些有益众生的宽大为怀政策，使他成为希腊的宠儿。例如，在这事实中有一个非常显著及惊人的明证，证明其崇高原则及良好信用的价值：克里特岛人在彼此之间达成理解，并且形成广泛联盟后，接着决定选择菲利普作为全岛的保护人，而这样的安排并没有诉诸战争或暴力便已达成，这在整个希腊史中，甚难找到前例。然而，在他攻击美塞尼亚人后，所有这些良善的倾向却遭到完全的逆转，而这转变其实是相当合乎逻辑的：因为当他彻底改变自己的原则时，免不了他也应该会改变人们对他

的意见，所以他会在种种不同的行动中，遇见截然不同的结果。无论如何，这些是发生的事，而我即将陈述的事件会让那些谨慎跟着我叙述的人，相当清楚这样的转变。

12.当菲利普打算占领麦瑟纳的卫城时，他告诉该城的官员说，他希望拜访该地，向宙斯神进行献祭。他与随从登上卫城，如往昔一样，当他被提供宰杀后牲品的内脏时，他将内脏接过来，站在一旁展示给阿拉托斯以及那些与他一起的人，然后问："这祭祀意谓为何？我应该从卫城撤出，或是留下占有它？"法洛斯的德米特里在当时立即回应："从解读征兆的观点，这信息是要立即撤出；从一位实际统治者的观点，是要占有它，所以您不要让这机会流失，之后却徒劳无功地去寻找更好的机会。记得，唯有将公牛的两只犄角捉住，您才能制服它。"所谓的犄角是指在美塞尼亚的伊托美（Ithome）山和科林斯卫城阿克罗科林斯，而公牛是指伯罗奔尼撒。菲利普接着转向阿拉托斯，问他："您的建议是否相同？"当时阿拉托斯没有回答，菲利普问他真正在想什么；这人迟疑一下，然后回答："假如您在不破坏对美塞尼亚人的承诺下，而占领此地，那我建议您去占有它。但是假如因为攻占及驻扎它，您将使自己丧失您从安提柯三世手中继承您的王国时，所有随之继承而来的其他卫城以及驻扎卫城的驻军——阿拉托斯的意思是希腊人对马其顿国王信用的信心——那请好好想一下，究竟此时将您的部队送走是否较好，并留给人民对您的信心，来为您守护美塞尼亚人以及其他人。"但此时菲利普个人的倾向是想违背诺言，如他之后的行为所清楚显示者；但在不久之前，他才被小阿拉托斯严厉责怪无端造成如此多性命的损失，所以现在当老阿拉托斯坦白且权威性地说出，敦促国王不要忽略他的意见时，国王深觉羞愧，握住他的手，说："且让我们从我们所来之路走回去。"

13.当阿拉托斯见到菲利普现在刻意与罗马人进行战争，而且完全改变他对盟友的政策，他甚难说服国王不如此做，而只能让国王知道他

将要面对重重的困难，另外做出一些恳求。

在这里我希望提醒读者一个我在第五书时所做的声明，这在那时无甚根据，但现在则被事实所确定；我这样做是为了不让我任何的提议没被证明或是被别人质疑。在我陈述伊托利亚战争时，我说菲利普在摧毁特蒙（Thermum）的柱廊，以及其他圣物时，行为过度野蛮，但我同时说着眼于当时国王在那时的年轻，我们不应过度苛求国王，而是要指责那些他当时所交往的朋友。[5] 我又接着说，若是就阿拉托斯终其一生的行为，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他会做出如菲利普这样的建议，所以这种建议比较属于法洛斯之德米特里那类型。我当时承诺将在后续补足这样的声明，所以我在叙述中将这证明保留到现在的时刻。如我在形容菲利普如何对待美塞尼亚人时所做的解释。国王正是在美塞尼亚这一点，第一次犯下他严重的罪行；而所有这些都是发生在某日当天德米特里恰巧在场，但阿拉托斯却迟来的偶发事件中。从那时刻起，菲利普仿佛首度尝到人血，以及经验过屠杀和背叛盟友；他并没如柏拉图所引用之阿卡狄亚故事所言，[6] 从人变成狼，而是从一位国王变成残酷的僭主。德米特里及阿拉托斯彼此相对立态度的另一个更惊人证明，是由他们每人对麦瑟纳卫城所提出的建议，这我已经刚引用过：所以对有关他在伊托利亚所做之犯行，亦即摧毁特蒙，德米特里应负责一事，这并没留下任何质疑的空间。

14.一旦承认这一点，我们便很容易去判断他们在原则上的差异是到如何的程度。正如菲利普在之前有关卫城命运的场合，会采取阿拉托斯的建议，遵守他自己对美塞尼亚人的承诺，因此如谚语所说，为可怕的伤口带来一些香膏，但这伤口是他原先的屠杀所造成；所以在伊托利亚时，他接受德米特里的建议，他不仅因为破坏奉献给神的物品，而邪恶神明，并且也因为显示出对所有反对他的人来说，他是位暴烈且无法安抚的敌人。相同情形亦可用来说明他在克里特之行为：他在那里只要是使用阿拉托斯为他主要顾问，他不仅公平对待所有克里特人，而且不

曾对任何一人做出不义之事；他以这种方式让所有克里特人皆接受其领导，并因为他统治正直，所以赢得所有希腊人的善意。但相反的，在他接受德米特里给他的引导时，加诸美塞尼亚人我以上所形容的痛苦，他同时失去盟友的善意以及其他希腊人对他的信赖。年轻统治者必须善选环绕他四周的朋友，有如此大的重要性，因为这或许会导致灾难，或是导致他稳固的统治，然而这却是一件大多数人都没有加以注意的事，反而以不可思议的漠然来看待之。

---

[1] 希罗尼穆斯在二六一年继承其祖父希洛二世，此人与罗马订有结盟的条约。

[2] 法拉吕斯是阿格里根特五七一年至五五五年的僭主，以其残酷而恶名昭彰，据说将其敌人关在铜制牛里头，活活烤死。

[3] 阿波罗多洛斯是希腊北方卡尔希迪司半岛（Chalcidice）上卡山德里亚（Cassandreia）城市（在修昔底德时代这地方名为波提达以亚，Potidaea）的民主派系领导人。他借由高卢佣兵之助控制政权，约在二七九年至二七六年进行统治。

[4] 所有这些在亚得里亚海岸旁的城镇及岛屿，在法洛斯之德米特里被罗马人逐出前，曾是由他来统治。见页287。

[5] 这所提之处是第五书五章九节之处，并没包括在本节录之中。这事件发生在二一八年，当时马其顿人摧毁伊托利亚特蒙一地的廊柱、雕像以及奉献神明的祭品，这是为了报复伊托利亚人邪恶摧毁迪温（Dium）及多多那（Dodona）的行为。

[6] 《理想国》第八书565d。

第八书

在西西里之事务：围攻叙拉古

【在二一四年夏天，希罗尼穆斯在列安提尼（Leontini）中伏被暗杀。杀死国王的人是亲罗马的派系，他们也同时杀死希罗尼穆斯之叔舅阿德拉诺多路斯，但在接下来的选举中，亲迦太基的领导者埃皮库代斯和希波克拉底被选为将军。之后罗马人占领并掠夺邻近城市列安提尼，这使得埃皮库代斯及希波克拉底可以凝聚群众力量来支持迦太基的目的。】

3.埃皮库代斯及希波克拉底在叙拉古掌权后，他们设法将之前国人对罗马人保有的友谊及忠诚，转移到迦太基这边。与此同时，罗马人已经得知叙拉古僭主希罗尼穆斯所遭遇到的命运，所以任命普尔凯尔（Appius Claudius Pulcher）行副执政（propraetor）之职，率领陆军，而马谢勒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则负责舰队。这些官员在离城不远之处占领阵地，决定以陆军攻击名为“六门”（Hexapyli）的区域；[1] 舰队则攻击在阿克拉丁那（Achradina）地区所谓的史凯提斯门（Portico of Scytice），在那里城墙延伸至堤岸处。罗马人都已事先备妥以柳条编织的遮蔽、投掷武器以及其他攻城机具，而且他们有信心能以他们掌握的人数，在五天之内将攻城计划准备到他们在面对敌军时，可以占有优势。但此处他们没有算进阿基米德（Archimedes）的天才，或是预见到在某些情形中，一个人的天分，会比数量上的优势更远为有效。他们现在将从经验中学到这教训。

叙拉古防御强处在于这个事实：城墙沿着高地建筑，围成一圈，具有悬空断崖，除了在某些特定点外，是难以攀爬的峭壁，即使没有人干

涉其出入。于是阿基米德以如是之方法来设计城市的防御：不仅在陆路方面，而且也同时抵抗来自海上的攻击，所以防守者没必要去忙于临时应变；相反的，他们必然万事俱备，可以反击，来回应敌人的任何攻势。而在普尔凯尔那边，他配备了高耸塔楼及登墙云梯，运作这些来攻击联结“六门”城门之东的那部分城墙。

4.与此同时马谢勒斯正以六十艘五层舰从海上攻击阿克拉丁那，每艘船配有弓箭手、武器投掷手及标枪手，他们的任务是要将防守者从城垛赶走。除此之外，他让八艘船两两结合成对。每对移除一半的船桨，一艘是右舷，另一艘为左舷，而两艘船在这两侧则捆扎固定在一起。它们现在则由在外侧的划桨手来划动，并将称为“散布卡”（sambuca）[2]的攻城机移到城墙来。这些攻城机制作如下。云梯宽四尺，高度从其立足之处足以抵达城墙上端。每侧以有高度的保护性胸墙围起，而且这器具在上方还有柳条编织之头部防护。它被平放在船只结合起来处的两侧，其一端突出船首相当的距离。在船舰上桅杆的顶部固定有滑轮以及绳索，当准备使用“散布卡”时，绳索会捆绑在云梯一端，人们则在船之尾端一起以滑轮将这攻城机拉起，而其他人则是站在船首以长杆支撑，确保它会被安全竖立起来。在这之后，两侧之划桨手会将船划近靠岸，那时水手会设法将“散布卡”靠在城墙上。在云梯顶端有一个木制的平台，三侧具有柳条编织的防护；四个人会被安置此处来对付城墙防卫者，而防守者反而在同一时间要努力避免“散布卡”卡向城垛。一旦攻击者让它就位之后，因此站在比城墙更高的地方，它们会取下两侧柳条编织的防护，冲向城垛或是塔楼。他们的同志会随后登上“散布卡”，而云梯则以固定在两侧船上的绳索紧紧捉住。这设计命名适当，因为在它被高举时，船只与云梯之结合看起来相当像所提及名为“散布卡”的乐器。

5.这是罗马人计划用来攻击城墙塔楼的攻城机具。但阿基米德已经设计好大炮，可以涵盖所有不同距离，所以当攻击的船舰仍然在一段距离时，他以投射器以及投石机打到敌方多次，足够造成它们极大的损

害，干扰它们前进。然后在距离变短时，这些武器的投射开始越过敌人头部，他于是诉诸越来越小的武器，让罗马人士气大挫，于是他们停止攻击前进。最后马谢勒斯陷入绝望，于是在夜晚的遮蔽下偷偷将船驶近。当他们几乎要到达岸边时，因为太近，所以不再会被投掷器击中，阿基米德于是设计另一种武器来打退这些从甲板作战的水兵。他在城墙上穿过许多长洞，在外墙上有一人高，一掌幅宽，在每个洞之后，以及城墙内侧，站着弓箭手，配备一排排所谓的“毒蝎”，一种小型的投掷器，可以发射飞镖，经过这些射击孔，他们让许多水兵无法行动。因为这些战略，他不仅避开所有敌人的攻击，包括那些长距离以及近身交战，而且也造成他们许多损失。

无论何时敌人设法运作他们的“散布卡”时，他立即会有其他机具沿着城墙随时备用。在正常的时候，这些会移开视线之外，但一旦要被使用时，它们会立即升高到城墙之上，横杆伸出城垛之外许多，有一些会装载石块，重量多达十泰伦，[3] 其他则是大型的铅块。一旦“散布卡”靠近时，这些横杆会以一个共用的支点回转，然后借由一个发射机具或是扳机，将重物砸到“散布卡”上；这不仅砸碎登墙的云梯，而且会危及船只及水手的安危。

6.其他由阿基米德所发明的机具，则是针对攻击部队。当他们在防护遮蔽下，免于从城缝所射飞镖的攻击，可以安然前进。针对这些攻击者，他设计的机具可以释放石头，重量重到足以将水手从船首赶走；同时，一支挂在铁链上，可以抓住东西的铁爪，会从城墙垂放下来，控制横杆的人可以用它抓紧船只。一旦船首被牢牢固定，城墙内机具的横杆会被下压。当操作者将船首以这种方式举高，让它以船尾站立，他将机具的底部固定，所以船只不会移动，最后以绳索及滑轮，立即将铁制抓手以及铁链松开。结果是一些船只倾斜，以侧边落水，其他则翻覆；然而绝大部分是当船首被从高处放开时，会插入水中，进水沉没，然后陷入混乱。马谢勒斯的军事行动因此完全被阿基米德的发明阻挠。而当他

见到守军不仅打退他的攻击，造成严重损失，而且还嘲笑他的努力，他对这些失败深深在意。同时他也没办法不对自己开玩笑：“阿基米德使用我的船只来舀取海水，灌入我的酒杯，但我的‘散布卡’乐队却被鞭打赶走，像是不请自来、参加宴会的人！”所以就这样结束了企图从海上占领叙拉古的尝试。

7.在同一时间，普尔凯尔发现自己在从陆路攻击时，也陷入相同的困难，最后也放弃尝试。当他的部队离城墙一段距离的时候，他们已经从敌军投石器及投掷机的攻击中，遭受许多伤亡。这炮火在火力上的数量上及强度上，都特别有效，这是希洛慷慨提供资金，而阿基米德精心设计种种机具时，就已经可以预料到的。那时即使在士兵都已经靠近城墙时，它们仍是受到由城墙缝隙中倾泻而出的袭击，如上所述，所以他们的前进也很有效地被阻止。另一种方式是，假如他们在移动塔楼的掩护下进行攻击，他们会被掉落在头顶上的石头及横木压到。防守者会以起重机垂下的铁制抓钩杀死许多人，这我在之前已述：这些被用来将人、武器以及其他器具举起，然后再丢下它们。最后普尔凯尔退回营区，召集营长，召开军事会议，在那里大家一致决定，无论使用任何其他方法，也不要再坚持以急攻方式，来取下叙拉古。而这决议未曾被改变过，因为在接下来围城的八个月中，虽然他们没有放弃去尝试任何一样策略或是大胆的实验冒险，但他们再也没有进行全面性的攻击。所以这是非常真实：假如被适当地运用在某些问题上，一个人的天才会成为一项极大，甚至是奇迹般的资产。无论如何，在这例子上，罗马人带来如此多的军力，包括陆军及海军，原来希望会立即占领这城市，只要可以除掉叙拉古的这位老人就好；可是只要他仍然在场，他们甚至不敢用任何阿基米德可能反制的方法去进行攻击。相反的，他们的结论是，着眼于这城市庞大的人口，最好降服它的方式是利用饥荒。他们于是以舰队切断来自海上的补给，并以陆军切断陆路的供应，而且将希望放在这样的解决方式上。但因为他们急于在外边取得某些有效的成果，而不是把所有的时间浪费在围困叙拉古上，这两位统帅于是分散他们的军力。

普尔凯尔率领三分之二，继续围困城市，而马谢勒斯则以其余三分之一，去攻略那些西西里内支持迦太基的区域。

在希腊之事务：马其顿之菲利普

8.当他抵达麦瑟纳城时，菲利普开始恶意蹂躏这个地方，这显示他是在发泄愤怒，而非理性行事，因为他似乎已经期待，无论他造成多少伤害，他的受害者必然不会对他感到怨恨或仇视。现在，我除了之前所提及理由，亦即，我前辈在处理这议题的不恰当外，我还因为另一个理由，而被迫在此书及之前的书中，对这些事件给予更加详尽的叙述。我们史学家中，有一些完全没提及这时候在美塞尼亚的事件；其他人，或许受到他们对这国王较好的评价，或是出于对他的恐惧，辩称说：菲利普在违反神圣及人类的法律下，对美塞尼亚人犯下的恶行，非仅没有被视为是错误的，而且相反竟然被赞美及辩护为配得上他的行为。的确，菲利普的编年史家不仅只就美塞尼亚人以这种方式书写，他们在其他的例子上也做相同之事，结果是他们的作品与历史甚少有相像之处，反而更像是赞颂辞。我个人的意见是：在没有对真相有适当的重视之前——这常发生——我们不该赞美或是责怪国王，而是应该根据我们之前的声明以及根据他们的行为及政策，前后一致地来书写他们。或许有人会辩称说，这谈起来容易，却是极难实践，因为人生的处境及状况是如此多样及多变，人们有些时候必须对这些让步，因此被迫无法诉说出或书写出他们所真正相信的。在考量所有这些后，我们或许可以在一些情形下谅解某些作者，但这谅解并不及所有其他人。

9.在这方面，我认为最应该被责怪的人是迪奥庞普斯。[4] 在他有关阿明塔斯（Amyntas）之子菲利普二世[5] 的历史中，他说会促使他去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考量是以下事实：欧洲从来没有出现过如这菲利普二世一般的人物。然而，在此之后的序言以及整本书中，他首先描写菲利普与女人的关系是如此混乱，他因为在这方面冲动及夸张的欲求，所以尽其所能地毁灭自己的家室；其次，他描写菲利普以最不正义及最毫无

顾忌的行为，来建立友谊以及联盟；再次，他以欺骗以及暴力的方式，叛逆地占有并奴役许多城邦；最后，他沉溺于烈酒，常被朋友见到即使在白天时，也公开宴饮酗酒。任何决定去读他的第四十九书开始的人，将会惊讶这作家的夸大其词。他除了其他声明外，也大胆地以如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我引用他自己写下的相关章节：

> 任何人在希腊或在野蛮人中，其人格若是彻底淫乱或恬不知耻，都会被吸引到菲利普在马其顿的宫殿去，在那里他会赢得“国王朋友”的头衔。菲利普习惯将有美好名声、善加管理家产的人给踢走，反而去荣耀、提拔那些挥霍无度，将人生浪费在宴饮豪赌中的人，结果是他不仅使他们在弱点上更为冥顽不灵，甚至使他们成为每一种邪恶及罪过的个中高手。的确，他们会欠缺任何羞愧或不名誉的特色，或者他们会拥有任何美好或诚实的品行吗？他们虽然是男人，但有些人却在身体上剃毛除毛，而其他人则是向其伴侣求爱，虽然他们都是长胡须的。他们习惯随身带着满足性欲的两三位喽啰，而且自己也会为别人提供相同的服务，所以称呼他们为艺妓而非廷臣，或称为男性娼妓而不是配刀配剑的男人，应该相当公允；所以以这种方式，本性嗜血的男人，现在则因习惯，而成为淫荡的男性。

迪奥庞普斯继续写道：“换言之——而且我不想将这话题拖出来说，特别是因为我有一大堆其他题目要处理——我认为那些自诩为菲利普朋友及伴侣的人，就其本性以及人格，比居住在珀隆（Pelion）山的人头马（Centaurs）或是比居住在列安提尼平原的雷斯特利哥尼斯食人兽（Laestrygones），或是其他任何怪物，都还要野蛮、更像野兽。”

10.每个人当然都会加入去谴责这位作家，竟以如此尖锐刻薄的感情以及毫无节制的语言书写。他之所以值得谴责，不仅是因为他完全抵触他史书所明言的目的，也因为错误地指控国王及其朋友，特别是以如此粗俗及厌恶的语言来陈述他的指控。即使他是在写撒达那帕鲁斯（Sardanapalus）[6] 或是他的廷臣，他必然也不敢写下如此淫秽不堪的东西。但我们仍然保有刻写在他坟墓上的碑铭，来证验那位统治者好色的个性以及荒诞的生活。其内容如下：

> 所有我餐桌的快乐，床笫的喜悦

我仍然享受……

但当我们谈到菲利普及其朋友时，这问题不仅是在我们指控他们懦弱、阴柔以及无耻之不道德时，理应迟疑，而更应是，我们要给予自己任务去荣耀他们的成就；我们或许会无法找到适当字眼来形容他们的勇敢、坚毅，以及简言之，他们人格中男性化的英勇品德。因为毫无疑问地，正是凭借他们不屈不挠的活力以及勇武，他们将马其顿从蕞尔小国的地位，高举到世界上最伟大及最荣耀的王国。而且除了菲利普生前所成就的之外，亚历山大在他父亲逝世后所得到的成功，也为他们赢取勇敢的美名，这已经被后世普遍认可。尽管亚历山大极为年轻，我们应该给予身为远征统帅的他大部分的功绩，但我们也应该给予他的朋友及同志一样多的认可，这些人在许多战役中出人意表地征服敌人，并且忍受许多辛苦、危险及艰难。后来，即使他们拥有庞大财富，并享有无止尽的机会来满足每种欲望，却没有一个人因为上述那些理由，而经历体能上的衰退，也没有人做出任何不公不义或是好色淫荡的行为，来满足激情的需求。相反的，所有那些与菲利普，以及稍后与亚历山大交往的人，都以他们的宽宏大度、他们的勇敢以及他们的自我纪律，来显示自己是真正的国王。我们无需以点名方式来提及这些人。但是在亚历山大过世后，当他们为了拥有涵盖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帝国，因此成为对手，但他们成就的光荣如此之高，在一部接一部的编年史中，充满了他们的成就。

在此作一总结。我们或许可以允许史学家泰密乌斯对西西里僭主阿加索克利斯提出尖锐的攻击，无论这看起来是如何过度，但却拥有某种根据，因为这些是针对一位他个人的敌人、一位恶人以及一位僭主，但迪奥庞普斯的攻击却不值得任何严肃的考虑。

11.后者在开始时宣布说意图去写作一位最具天赋，拥有各种能成为美德之特质的国王后，却进而指控他犯下每件令人羞耻以及鄙视之事。结果是作者以开头所说的话，来证明自己其实是位说谎及阿谀奉承

的人，或是在整个作品中所做声明，证明自己是位愚蠢以及头脑简单之人。若是他想象他可以借着沉浸在那些毫无道理以及夸张不实的滥骂，以提升自己的声望，但同时信守他对菲利普热情、积极的评价，我们又能如何去猜想？再者，我们甚难对迪奥庞普斯所采取的全面架构表示苟同。因为在写作一部从修昔底德所停笔之处开始的希腊史后，但就在靠近留克特拉战役日期以及希腊史最精彩的一段时期时，他却突然在作品之中放弃希腊以及它种种不同的大业，径自改变主题，而决定要写一部菲利普的历史。显然将菲利普的成就包括在一部希腊通史之内，会比将希腊史置于菲利普历史之内，来得更有尊严及更为中肯。对一位完全将自己投入到王朝历史之中的人，假如他有能力及被给予机会的话，似乎完全难以想象他会有任何迟疑去将作品中主要角色及头衔转移到希腊；或是任何有理性之人，已经在写作希腊史，并有所进展时，竟会将这换成充满炫耀排场的国王传记。是什么能诱使迪奥庞普斯去忽略如此刺目的前后矛盾？其中的解释显然是在写作第一部分的历史时，他的动机是纯粹追求理想，但在第二部分则是追求利益。假如有人质疑他关于更动历史架构一事，他有可能会提出某种辩护，但是关于他对国王朋友所使用的那些令人羞愧的语言，我不认为他可以为自己找到借口开脱，而是必须承认他自己已经严重地违反适度节制的原则。

12.虽然菲利普五世现在公开视美塞尼亚人为敌人，[7] 而且尽管他企图去抢夺他们的土地，他并未成功地对他们造成任何严重伤害，但是他却反而以最令人憎恨的残酷，来对待一些曾经是他最亲近的朋友。例如，当西息温的阿拉托斯对菲利普如何对待美塞尼亚人一事，表达无法赞成时，国王在不久之后设法透过他在伯罗奔尼撒的代表陶律翁来毒杀他。这件事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因为所施用之药物并非那种会立即杀死受害者，而是一种慢性毒药，让身体产生一种生病的状态。但是阿拉托斯本人知晓国王的罪责，如以下状况所显示。虽然他会掩饰他的情形，不让外界知道，但是他无法不透露给他一位仆人克法龙（Cephalon）知道，因为此人甚了解他。这个人在阿拉托斯生病时，十

分照顾他，而在一个场合中向他主人指出留在墙上一些染有血迹的痰液。在这时候阿拉托斯告诉他：“克法龙，那是我从与菲利普友谊所得到的奖赏。”这种自我节制是如此伟大高贵的特质，这罪行的受害者实际上却比施害者更觉得羞愧，在参与如此多对菲利普有利的伟业后，他竟然会从对他的忠诚得到如此邪恶的回报。

在过世后，阿拉托斯因为如此频繁地担任总指挥官一职，[8] 以及因为他为民族成就了如此伟大功业，所以他从自己的祖国以及亚该亚联邦整体得到他应得的荣耀。他们投票给他那些对英雄才会给的祭祀及荣耀，简言之，任何可以让其名声永垂不朽者。假如死者可以体会到任何感受，那我们有道理相信阿拉托斯一定会深深满意亚该亚人的感激，以及满意地回想起他一生所承受过的危险及艰苦。

在意大利之事务：围攻他林敦

【这章开头的段落是对政治所做的一般反省，而在这段落以及接下来的叙述之间有个缺口。皮洛士原先是由当时（二八一年）在他林敦城邦主政的民主政权召唤前来。但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的局势则相当不同。罗马人已经从他林敦带走一些人质，但他们在二一二年设法逃离罗马；这些人被逮捕，立即处决。这个行为刺激他们国内的一些朋友及亲属，共计十三位高贵出身的年轻人，决定进行以下章节所形容的阴谋。】

24.正是因为繁荣所带来的傲慢，说服他林敦人召唤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前来协助。因为每个民主政权在享受权利一段时间之后，首先会因为其性质会发展出对既存秩序不满的态度，然后四处观望，寻找一位主人。当它发现时，很快就会厌恶他，所以再度很清楚地显示这系统是往越来越差的方向变化。这正是他林敦人在这场合中所经历的……

决定要去接触汉尼拔的他林敦人离开城市，仿佛他们要去进行一场收集粮秣的征战，并在黑夜掩护下到达汉尼拔营区附近。这群人大部分都躲在路旁的树林中，但费勒迈纳斯（Philemenus）及尼孔（Nicon）前去营区。他们在那里被守卫捉住，带到汉尼拔面前，因为他们没有说自己是谁或从何而来，而只是很单纯地宣布希望见到将军。他们很快就被带到汉尼拔面前，在那时表达希望和他私下会谈。汉尼拔立即给他们机会，而这两人解释他们是谁以及他林敦的局势如何；同时，他们也倾泻出一连串对罗马的指控，因为他们不希望给人在没有好理由之下来执行任务的印象。汉尼拔感谢他们，有礼地聆听提议，然后解散他们，并同时安排要在不久的未来，再度造访他。就目前而言，他告诉他们，一旦他们离开营区一段距离，他们最先会看到放牧的牛群，然后加以圈围带走，也将牧者一起带离。他们那时无需感到恐惧，可径自回家，因为他会确保他们的安全。汉尼拔这样做，首先是为了争取时间，可以测试这些年轻人所说之事是否可靠；其次，他要在这些他林敦人中营造信心，

让这些阴谋者看起来确实是离城去进行集粮的征战。尼孔及其同伴准确依照指示去执行他们收受到的命令。紧随而来的结果是汉尼拔非常高兴地想到方法，要去执行占领城市的计划；另外，费勒迈纳斯及其他人就他们那方来说，当他们反省第一次的会面已经圆满完成，见到汉尼拔从善如流，以及带回去掠夺牲畜的数量，变得益发积极去进行他们的企图，确实地建立他们在他林敦市民中的信用。他们贩售一些掳获的牲畜，有些则自行宰杀，用来邀宴，所以以这方式他们不仅赢得他林敦人的信赖，也鼓励更多人来追随他们的榜样……

25.在这之后，他们又进行第二次出征，到达汉尼拔的地盘，这也以相同的方式安排。这次他们向他宣誓，也得到汉尼拔承诺：迦太基人既不会向他们索求任何贡赋，也不会强加任何负担；迦太基人则被允许在攻占城市后，去掠夺罗马人的房舍及住处作为回报。他们也安排好暗号，让迦太基的卫哨在他们到达时，不必耽误地进入营区。他们以这种方法得以和汉尼拔有更多次的会面。有些时候他们是假装要去收集粮秣，有时候则是进行狩猎的活动。

一旦他们开始为未来安排这些计划，绝大多数的阴谋者都愿意静待时机，直到行动时刻到来，让费勒迈纳斯继续扮演猎人的角色。这运动是他最主要的嗜好，而且他也以认为狩猎是人生里最重要活动而变为全城所知。于是他被告知要利用他所猎杀到的猎物来广结善缘，首先是城市里的军事指挥官李维（Gaius Livius），还有塔楼的守卫，这些塔楼被称为泰曼诺斯城门。[9] 费勒迈纳斯进行这样任务时，设法以固定的周期带进猎物，这些或是他亲自猎杀，或是从汉尼拔之处取来。这些有的他呈上给李维，有的则送给塔楼的卫兵，让他们习惯在任何时段随时为他开门。他习惯在夜晚后进行狩猎活动以及返回；这被认为是因为害怕敌人，但实际上是要为他所准备的企图铺路。他以这种方式逐渐形成一种安排的方式；根据这安排，城门上的卫兵，无论何时在他靠近城墙吹出口哨时，会在夜晚时分立即为他打开侧门，不去质问他。最后，阴谋者

得知罗马指挥官在某天会在一场大型的欢宴中出席，这是在一座靠近市民广场叫演艺厅（Museum）的建筑中，在白天早些时候举行；他们和汉尼拔达成协议，阴谋将在那天进行。

26.汉尼拔在这段时间放出风声说他生病，所以当他们得知他在相同地方耽误如此之久，罗马人的好奇心才不会被激起，而现在他假装病况变得更加严重。他的营区离他林敦有三天行军距离，而在预定之日靠近时，他准备好一支精选士兵的军队，约一万人。这些人是从他的步兵及骑兵中，以其奋战精神而挑选出，而且也因为他们能够快速行军。他们被命令要携带四天军粮，在凌晨出发，以最快速度前进。一群约八十名的努米底亚骑兵在四里之前领先前行，而且沿着道路两旁散开。这行动的目的是要避免敌人瞧见主力军队。汉尼拔估算任何他们遇见之人，或是会被逮捕为俘虏，或是假如逃走，将会向城市回报说，有群努米底亚人正在掠夺这一地区。当努米底亚人约离他林敦十五里，汉尼拔停止部队前进，在河旁食用晚餐，这条河流过山谷，在这地点提供极佳的掩护，所以在那里他召开军官军事会议。他并没向他们解释他计划的细节，而只是强调三点。首先，他呼吁他们要英勇作战，因为成功的奖励未曾比这次来得更大；其次，他们每个人要保持其所率领之人，是以密集队形前进，并且严厉惩罚无论以何借口，任何离开河岸之人；最后，他们必须彻底执行命令，绝不可依个人主动，来尝试任何其他事。在说完这些话后，他解散军官，在天黑后恢复行军，他的目标是要在半夜时分到达城墙。他有费勒迈纳斯带路，而且也为他取得一只野猪来让他继续扮演猎人的角色。

27.这些年轻的阴谋者消息灵通：李维从早晨就与他的朋友在一起公开庆祝。约太阳下山时，宴会正酒酣耳热，有人报告说努米底亚的骑兵正在附近搜索。李维采取行动去应付这次入侵，但除此外，不及其他。他召集一些军官，命令他们率领一半的骑兵，出城去防止敌军掠夺乡间；在做完这决定后，他对任何其他更严重之事，更放下戒心。在此

期间尼孔、特拉吉斯克斯（Tragiscus）和其他盟友，在夜晚时聚集于城内，躲避起来，等待回家的李维。参加酒宴的人在夜晚稍早时已离开会场，因为宴饮是从下午就开始。大多数阴谋者都撤退到一个选定的地点等候，但有些年轻人则外出去找李维及他的朋友，而且以喧闹的行进和彼此间高声的玩笑，给人印象他们也正从酒宴回来。当李维及其朋友因继续饮酒而更加酩酊大醉时，他们两边很快就打成一片，大声分享笑闹以及恶作剧。最后他们转身回家，陪同李维入屋，他在那里躺下休息，完全不省人事，这对如此之早就开始的酒宴，是可预料之事。他不知道任何不寻常或令人担心之事正在靠近，反而完全放松躺下歇息，满心惬意。

在这时候，当尼孔及特拉吉斯克斯再度和朋友会合，他们分为三组，在街道上占据让他们最容易接近市民广场的位置。他们在那里保持警戒，可以最先知道任何来自城外发生的消息或是城内任何的动静。有人停驻在李维家附近，因为他们知道要是有任何人怀疑有事发生，他必将是第一个收到消息的人，而且无论有任何措施要进行的话，必然由他下令。最后，这些返家客人所制造的喧嚣逐渐散去，所有其他类似的噪音也消失无踪，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已回家就寝。与此同时，夜晚逐渐深沉，所以没有任何发生的事会去摧毁阴谋者成功的希望。所以年轻人再度聚集，开始执行他们那部分的计划。

28.他林敦年轻人和汉尼拔的安排如下。汉尼拔将从东边的方向接近城市，亦即抵达面向内陆的区域。他将前进到泰曼诺斯门，在一些人称为海尔金特斯（Hyacinthus）墓地，而其他人称为阿波罗墓地的地方，点燃火焰。特拉吉斯克斯一旦看到这信号，会从城墙内点火回应。在交换信息后，汉尼拔会扑灭火焰，缓慢接近城门。执行这计划后，年轻人会越过城内人居之处，到达墓地。我应该在此解释整个他林敦东部地区其实满布坟墓，因为直到今天居民还是将死者葬在城内，遵守一则古代神谕所下的命令。这传奇如是说。神明给他林敦人这样的回复：假

如他们将居住地与大多数人分享，他们将更为发达繁荣。他们诠释这神谕的意思是假如他们同时让已逝之人和自己同时居住城墙之内。他们将会过得更好，所以他林敦人直到今天还是在城门内埋葬他们的死者。

年轻人抵达排提翁尼可斯（Pythionicus）的墓地，在那里他们等待，静观其变。汉尼拔军队立即接近，发出期待的信号。在他们看见火焰的那刻，尼孔、特拉吉斯克斯以及他们的伙伴都感觉到勇气涌上，所以他们也点火回应。一旦汉尼拔的信号扑灭后，他们全速跑到城门的塔楼；他们必须及时到达那里，突袭并杀害守卫，因为之前已经达成协议要迦太基人缓慢前进。所有一切皆依计划行事。守卫完全出乎意料：有些阴谋者将他们砍死，另一些则以弩箭击杀。城门迅速打开，而汉尼拔军队在约定时候到达；他以极为准确的速度前进，没有在前往城市的路上有任何耽误。

29.汉尼拔根据预先安排的计划将军队送进城里，不仅无需冒险，连一点声音也都没发出；他觉得已经完成他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充满信心地沿着街道往市民广场前去，这条街道从那时起被称之为“巴帖亚”（Batheia）街或是“深街”（Deep Street）。他在城外留下为数两千的骑兵部队，作为预备，来保护他免于敌人从城外发动的攻击，并且预防任何未曾预见的突发事件，诸如那些在这类军事行动中经常发生的。当靠近市民广场时，他让部队以行军队形停下，等待费勒迈纳斯出现，因为他也极想知道他那部分计划是否成功。当他最先点燃火炬信号，并即将前往泰曼诺斯门时，他已经先行派遣费勒迈纳斯，挑起担架上的野猪，后随一千名非洲人到下一个城门，因为他急切希望，根据他原先计划，他军事行动的成功不仅依赖一个，而是数个机会。

费勒迈纳斯走到城墙，以习惯方式吹口哨，那时守卫立即出现，走到侧门。费勒迈纳斯从外边向他呼叫赶快开门，因为他们正抬着野猪，相当疲倦。守卫听到后很高兴，立即开门，希望费勒迈纳斯的袋子中会

有东西给他，因为他常会得到一份任何带进来的猎物。费勒迈纳斯于是首先进入，抬着担架的前方；与他一起的是位衣着像是来自乡间的牧者，之后又有两位在后面带着死去猎物的人。当这四个人都通过侧门时，他们首先杀死没有戒心、正检查野猪的守卫，然后很安静、不疾不徐地让下一批的三十位非洲人进入，这些人是随着那四人之后，但在其他部队之前。接着，他们破坏门闩，其他人则是去杀死其他守卫，还有人则是发出预先安排的信号，召唤其他等在城墙外的非洲人。当这些人通过城门时，全部的军队依序进入市民广场。他们与汉尼拔在此会师；他高兴整个行动完全依照他所预期的来进行，所以继续下一阶段。

30.他派遣一支两千名凯尔特人的部队，将他们分做三群，并各指派两名加入阴谋的他林敦人，去指挥每一群。他自己也送出一些军官与这些部队随行，并下令他们占据最能通往市民广场的所有街道。当这事完成时，他告诉年轻的他林敦人去找出，并拯救任何他们或许会遇到的公民同胞，并从远处呐喊他林敦的公民应该留在原处，因为他们不会有危险。同时，迦太基及凯尔特的军官收到命令，去杀死所有他们遇见的罗马人。这三群士兵于是散开去执行这些任务。

一旦他林敦人知道敌军已经在城内，各式不同的叫声爆发出来，到处充满混乱。至于李维当他知道迦太基人已经突破入内时，他理解到在目前酣醉的状况下，他无法处理这种局势，所以从家中冲出，与随从一起前往港口的城门。守卫在那里替他们开了侧门，逃过危险，他与仆人立即登上下锚该处的一艘船，沿着岸边，到达卫城。与此同时，费勒迈纳斯以及他的伙伴找来一些罗马号角以及一些知道如何吹响的人，站在剧场中，吹响号角要大家武装。罗马人听到召唤，携带武器集合，而且根据以往习惯跑向卫城，而这正是迦太基人意图要他们做的。他们一组组地到达街道，零零散散，人数过少，无法组成战线。他们在那里遇见迦太基人及凯尔特人，结果有很多人遇害。

当天空开始破晓时，他林敦人安静停留在家，因为他们对究竟正发生何事没有明确的资讯。因为号角的声音以及在城内并没抢夺或暴力行为发生，他们想象这些骚动是由罗马人自己造成的。但当他们见到许多罗马人死在街道上，以及高卢人正在掠夺他们的尸身，他们开始怀疑迦太基人已经进城了。

31.汉尼拔此时已经将军队驻扎在市民广场，而罗马人则撤退到卫城去，他们在那里一直维持着驻军。因为当时已经天亮，他于是借由司仪将所有他林敦人在没有武装下，聚集在市民广场。这些阴谋者也四处巡回城内，要求人民呼应并支持自由的目的，并且要有信心，因为正是为了他们，迦太基人才前来此地。支持罗马人的他林敦人在知道何事发生时，立即撤退到卫城，但是其他人则遵从这样的召唤，在没有武装下抵达市民广场，在那里汉尼拔善意地向他们说话。他林敦人对每句话都大大鼓掌，因为他们很高兴这未预料到的转折，在那之后汉尼拔解散大家，命令每个人迅速回家，并在门口上写着“这是他林敦人的家”。然而他警告，任何人将这些字写在罗马人的家门时，会被处死。他接着挑选出最适合的军官，下令他们去掳掠那些属于罗马人的房子。所有没书写这些字的房子都将被视为敌人财产。而在同一时间，他将其他人马作为预备部队，在必要时来支持这些掠夺者。

32.他们以这种方式搜刮种类繁多、数量极大的财产，而这些掠夺品不少于迦太基人原先所预期的。他们当晚武装过夜，汉尼拔在次日召开公民大会，参加的人包括所有的他林敦人。在这场合他决定要建筑一道城墙，把卫城与城市其他部分给隔离开来，所以他林敦人无需再害怕占据卫城的罗马驻军。他第一个措施是建筑一道栅栏，与卫城的城墙及之前的壕沟相互平行。他当然清楚敌人不会被动地静观这些活动，必然会做出某种抗拒。所以为了对抗这情形，他安排一些最好的部队随时待命，因为他认为激起罗马人的恐惧以及他林敦人的信心，对未来是最为重要的。

而的确，一旦建筑栅栏的工程一开始，罗马人立即对它发动大胆、激烈的攻击。在抵抗一段时间之后，汉尼拔下令自己的人马撤退，以引诱敌军前进，然后在他们越过壕沟时，下令调动预备部队反攻，全面反击敌人。一场搏命之战接着发生，因为战斗发生在两座城墙间有限的空间里，但最后罗马人被击退溃散。许多人在战斗处阵亡，但也有很大数量的人在被击退时，被迫坠入壕沟时身亡。

33.在他们安全完成栅栏后，汉尼拔有段时间按兵不动，因为他的计划已经达到预期效果。他已经将敌人关闭起来，限制他们留在城墙内，让他们担心性命以及卫城的安全；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使市民如此自信，所以他们现在认为即使没有迦太基人的协助，自己也是罗马人的对手。他接下来的计划是要修筑一条与栅栏以及卫城城墙平行的壕沟，但这壕沟挖得有些远离栅栏之后，而比较靠近城市。在这状况下，所有从壕沟挖出来的土方，被堆积在靠近城市这边，然后在上面又竖立第二道栅栏，因此创造出一个和城墙一样有效的防御工事。在这之后他开始修建一座城墙，与第二道栅栏有适当距离，但是仍比较靠近城市，从名为“拯救者”的街道延伸到“深街”，这些防御工事因为足够强大，所以即使没有人去防卫它们，也足以适当地保护他林敦人。他那时留下一支驻军，足够用来防御城市及城墙，并且还有一队骑兵支援他们。他自己在他林敦城外约五里处，在一条有人称为莱色斯（Galaesus），但更被普遍称为欧罗塔斯（Eurotas）的河流旁扎营，这名字取自于流经斯巴达的河流。他林敦人有许多源自于斯巴达的名字，包括城内以及邻近周围乡间，因为他们自认是由斯巴达人所建立的殖民地，与他们有血缘关系。因为他林敦人的活力及热心，加上迦太基人所给予的协助，这城墙很快就完工，而汉尼拔接下来则将心思转到如何攻占卫城的问题上。

34.在这些工程的准备完成之后，罗马人经由海路，从麦达蓬坦（Metapontum）得到一些援助。这缓解的措施的确对恢复士气有所贡献；他们对围城的工程做了夜间突击，成功地摧毁所有汉尼拔的机具及

装置。在这挫败后，汉尼拔放弃以急攻方式攻占卫城，但在新城墙结束时，他召开所有他林敦人的会议，指出目前状况下，最重要的措施是控制海洋。如我已经提及，卫城控制出入海港，而这意味着他林敦人无法再航入港内或驶出港外，然而罗马人却可以安全地从海上接受到他们所需的供应；因此只要这情形维持如此，这城市无法让新近取得的自由能够稳固安定。

汉尼拔很清楚这一点，并向他林敦人解释说，假如罗马驻军被剥夺海上运补的便利，他们必然很快就会自动妥协，放弃防卫，交出卫城。他林敦人聆听并见到他辩论的力道，但无法想到将其付诸实现的方法，除非从迦太基来支舰队，但这在那时是不可能的。他们因此回答说，他们不了解汉尼拔在提出这问题时，究竟是要说什么。当他继续说，很明显地他们即使在没有迦太基人协助时，那时都几乎掌握海洋；这使他们更加诧异，相当不解他的意思。但汉尼拔已经注意到一条恰好与阻隔之城墙相平行的街道，从港湾延伸到外海；他了解这条通道可以轻易地来达成他的目的，这便是将船只沿着这条街道，从港湾拖行到城市的南端。一旦他将这计划透露给他林敦人，他们不仅完全同意他所说的，而且立即对汉尼拔这个人感到一种无限的敬意，因为他们相信他的勇气及智慧已经超过每一道的神谕。他们于是很快地建造有轮的拖车，所以整个行动在提出来时，立即付诸实现，因为这里有无限的劳力以及热忱来进行这项工作。一旦他们将船只运送到大海，他林敦人便力足以在没危险下围堵罗马人，并切断他们来自外界的补给。汉尼拔那时撤出他的军队，在城里留下驻军，在三天后回到旧的营区，在那里他停留了整个冬天。……

---

[1] 艾皮波来（Epibolae）台地北侧上所修筑之城墙的一座城门。

[2] “散布卡”，sambucae（单数sambuca）是种乐器名称，一种多弦及三角形状的竖琴。

[3] 约二百五十八点六千克。——译者注

[4] 希俄斯岛的迪奥庞普斯（Theopompus of Chios）出生于三七八年。他是斯巴达的仰慕者，并且书写了一部以斯巴达霸权时代为中心的希腊史。这历史承接修昔底德所记录的事件，持续到三九四年。

[5] 这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

[6] 被认为是亚述帝国最后一位君王，以荒诞淫乱著称。——译者注

[7] 二一三年。

[8] 这是亚该亚联邦的首席官员。

[9] 费勒迈纳斯所使用的城门在泰曼诺斯（Temenid）门稍南的地方；但汉尼拔是经由泰曼诺斯门而进入城市。

第九书

导论

1.在撰写本书时，我刻意遵守前后一致的计划，而这点我知道会给整个作品某种严正性，但结果却是只会有一种类型的读者会给予好评，并发现这正适合他的品位。大多数其他的作家——虽非每一位——会在他们作品中包括所有不同形态的历史写作，以诉求一个宽广以及多样的公众。因此那些喜欢狭义历史的人会被以系谱方式来处理历史所吸引；好奇及好古者则钟情于殖民地建立、城邦奠基以及之间亲属关系的陈述；政治家则对国家、城邦及统治者的行动感兴趣。我现在因为集中在最后一类别，使其成为我整部历史编写的独一无二目标，所以如我所解释，这作品之形态是为了诉诸某一类的读者，因此对绝大多数的读者将不会是具有吸引力的阅读。我在其他地方已经陈列出促使我排除其他类型的历史论述，以及将自己限制在将行动完整记录的各项因素，但是没有理由我不该在此再略述一次，所以将这其中的原则印烙在我读者的心目中。

2.系谱及神话、殖民地建立、城邦奠基和城邦之间的亲属关系，这些类型的主题已经有许多作家以许多不同的形态处理过。所以如果一位作家在今日要写作这样题材，必然会犯下冒称别人作品为自己作品那种不名誉的行为，否则便是在白白浪费自己力气，因为我们不能否认他所研究写作的素材，已经被前人适当地记录，并传递下来。因为这些及其他理由，我决定要对如此主题略而不论；而要去写作一部实际发生的历史。我之所以如此做，首先是因为经常发生新的事情，需要新的处理方

法，因为古人很显然无法描述在自己时间之后的事件；其次，因为如此的历史最具实用价值。这在过去一直如此，而当今日文艺及科学进展如此迅速，所以研究历史之人已经配备着——我们或许可以说——科学方式，来处理任何可能出现的偶发事件时，那在今天则更是明显如此。因此我的目的不是要给我的读者愉悦，而是要对那些将注意力投注在历史的人带来利益，因此我略过其他议题，而被引导去编写这种类型的历史。我的读者在阅读时全心全意地投入，将能提供我所言为真的最佳证明。

在意大利之事务：围攻卡普亚

【其年为二一一。他林敦已经在二一三年及二一二年之交的冬天，沦陷在迦太基人之手，并且随着图里伊（Thurii）、麦达蓬坦以及赫拉克里亚的占领，汉尼拔已经控制除了利吉姆外，所有南部的希腊城市。在二一二年，普尔凯尔（Appius Claudius Pulcher）和弗拉科斯（Quintus Fulvius Flaccus）计划围攻卡普亚，而在那年夏天汉诺在企图解卡普亚之围时，被弗拉科斯重重地击败。】

3.汉尼拔现在包围普尔凯尔修筑在卡普亚外围的栅栏，开始进行一系列骚扰性的小规模攻击，希望借此刺激他的对手出来进行战斗。当罗马人没有回应这些动作时，汉尼拔的攻击逐渐加强，像是要攻占整个据点。骑兵以分队出击，在大声呐喊中将标枪投到罗马的防御工事中去，步兵则是以正规队形，设法拆卸栅栏。但即使以这些方法，他还是无法让罗马人改变战略。他们利用轻装部队来击退迦太基人对栅栏的攻击，将重装步兵聚集在他们的军旗附近，在那里他们以盾牌来保护自己，抵挡多如雪花的标枪。

汉尼拔的努力因此受挫，因为他既无法突破进入卡普亚，也无法引诱罗马人出营一战，所以他开始想，在这状况下什么是最好的行动方式。而的确，就我个人看法而言，那时的局势发展如此，所以不仅让迦太基陷入困惑中，也让其他听闻此事的人不得其解。这看起来几乎有些不可思议：罗马人在之前如此多的激战中被迦太基人打败，而且即使现在也不敢贸然在战场上与他们交手；但同时，罗马人却也拒绝撤军或放弃对开放的乡间地区的控制权。在此之前，罗马人所做的不过是沿着山丘，尾随敌人行动，但现在却在意大利最富庶地区的平原有立足之地，而且还正在围攻其中最强大的城市；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却也被他们连想都不敢去面对的敌人所包围攻击；但另一方面，迦太基人尽管已经赢得未曾中断的胜利，有时候却发现自己处于比他们所击败之部队更为艰

难的境地。对我而言，双方现在都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各方都了解汉尼拔的骑兵是迦太基胜利以及罗马败仗的原因。因此早期罗马军队在遭遇连续挫败后，所采用与敌人平行前进的策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那时当他们在乡间前进时，敌人毫无机会去伤害他们，因此现在同样的，双方在卡普亚城之前的行动，正是可以预料到的。

4.所以这状况是：罗马军队不敢离开营区，进行交战，因为他们畏惧敌人的骑兵，但是他们若留在防御工事之后，则保有信心，觉得安稳，知道这些之前击败他们的骑兵无法在那里碰触到他们。另外，迦太基人无法在那种状况下与他们的骑兵停驻扎营，因为周围乡间地带的所有粮草，都已经被罗马人因为同样目的而系统地摧毁，而且要行军如此遥远距离，运送足够的粮草、大麦来喂食如此多的马匹及骡子，是做不到的事。迦太基因为相同理由，若没有骑兵协助，也不敢去攻击一个受到壕沟及栅栏保护的敌人，因为如果他们缺乏这支决定性的武装力量，而以相同条件来与罗马人交战，结果势必难以预料，而且是危险的冒险举动。此外，他们也同样担心新任执政官[1]或许会突然到达，在他们后方建立基地，切断补给线，这会带来极大的麻烦。因为这些理由，汉尼拔的结论是无法发动直接进攻来解围城之急，因此他改变计划。他突然想到，假如他可以秘密行军，突然出现在罗马之前，他或许能够因为突袭以及引起的恐慌，而得到某些有价值的利益；即使达不到这个目的，他至少可以对普尔凯尔施压，强迫他放弃卡普亚，匆忙前来解救自己祖国的首都，或是分割出部分的兵力。在这种形势下，分派去解围罗马的军队以及所留下的兵力，对他而言都比较容易击败。

5.他怀着这样的目的，派人带信到卡普亚。他说服自己军中的一位利比亚人，让他假装成逃兵，逃到罗马阵营，而从那里再继续潜逃进入城内，来安排此事。他特别费心来确保书信的安全，因为他十分担心卡普亚人在见到汉尼拔离开时，或许会以为他正放弃他们，所以绝望之余，或许会向罗马人投降。他因此写信解释他拔营的真正目的，并且送

出这位利比亚人告知他们，所以他们在得知他离去时，应该如往常般地坚决，忍受围攻。

当罗马城得知汉尼拔已经沿着罗马人包围卡普亚的防线扎营，反过来包围攻击罗马人，市民心中充满惊奇以及警惕，因为他们意识到这即将来临的决定，对整个战局将是个关键。于是乎人民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备战以及将资源运送到那地区。至于卡普亚人，一旦他们收到由利比亚人所带来的书信，理解迦太基人的计划，他们持续抗拒罗马人的包围，决心将得救的希望付之一试。所以汉尼拔在他抵达卡普亚城外的第五天，安排他的人马进用晚餐，让营火继续燃烧，设法在敌人毫不知情下将军队撤离。他做了一连串的急行军，穿过萨莫奈人的领土，每日派遣先锋先行，进行侦察，占领路旁的阵地；他让罗马人脑中还是只有发生在卡普亚的事件，所以利用这些方法，在没被察觉到的情形下横渡阿尼奥（Anio）河，最后到达距离罗马城墙不到五里的地点。在那里他建立自己的营区。

6.当汉尼拔军队抵达罗马的消息传开，一股恐惧及惊慌的浪潮袭遍整个城市：这发展何其突然以及意外，因为汉尼拔之前未曾如此靠近过首都。除此之外，罗马人心中亦开始怀疑，敌人到目前无法如此接近，也未曾展示过如此胆识，除非在卡普亚的军队已经被歼灭掉。人们于是立即登城守卫，占据城外居高临下的阵地，而女人则巡回各个庙宇，祈求神明保佑，用她们的长发来清扫神殿路面，这是当极端危险威胁她们国家时，她们所采用的习俗。但就在汉尼拔已经扎营，正准备在次日攻城时，好运干预，解救了罗马。

执政官森图马鲁斯（Gnaeus Fulvius Centumalus）以及尔巴（Publius Sulpicius Galba）已经完成征召一个军团，并且以誓言来约束他们要携带武器，在汉尼拔决定攻城之日到罗马报到；此外，他们也正挑选及招募第二个军团的士兵。结果是有一大群人恰巧在那他们被需要

的时刻聚集在一起。[2] 执政官于是大胆地率领这些部队，以战斗队形在城前部署，因此制止了汉尼拔原来进行攻击的意图。迦太基人原先积极向前进攻，怀着诱人的希望：他们或许会攻打下罗马。但当他们见到敌人已经以战斗队形摆好阵势，而且很快从一位俘虏那里得知发生何事，他们于是放弃要进行直接攻击的计划，转而去掠夺周围乡村，放火烧房。在这些最初的掠夺中，他们围起并带回营区极大数量的牲畜，因为他们现在在一个没人预料过敌人会入侵的地区。但后来当执政官冒险在离开他不到一里半的地方扎营后，汉尼拔决定撤军。

7.他这么做有三个理由。首先，他现在已经聚集极大数量的战利品；其次，他已经完全放弃攻占罗马的希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根据原先的计划，估算在这时候普尔凯尔必然已经风闻他对罗马的威胁，所以那时便会放弃围攻卡普亚，或是留下一部分部队，而自己率领主力部队赶来救援。无论哪一种发展，他认为他都已经达到他的目的，所以他立即拔营，在天亮前离去。

在这期间尔巴已经摧毁阿尼奥河的桥梁，迫使汉尼拔利用津渡将部队运送过河；他于是在迦太基人企图过河时来攻击他们，造成他们极大的麻烦。他这攻击无法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敌军有庞大数量的骑兵，而努米底亚人能轻而易举地驰骋在战地的每个地方。但他成功地从敌军那里抢回很大比例的战利品，然后在杀死约三百人后，撤回军营。后来他开始有这种想法：认为迦太基人是因为恐惧而匆忙撤离，所以他尾随在后，沿着山丘路线而行。汉尼拔刚开始时以极快速度行军，因为他急于抵达他的目的地。[3] 但在第五天结束时，他收到情报说普尔凯尔仍然在进行围攻卡普亚。在这时他停止下来，等待尾随的敌军赶上；然后他对罗马人发动一场夜袭，杀死许多人，并将其他人逐离营区。然而当天亮后，他见到罗马人撤退，并在一座陡峭的山丘占据强大的阵地，他决定不再继续进行攻击。取而代之的是他行军转向，穿过道尼亚以及布鲁提恩（Bruttium），然后出其不意地降临利吉姆，几乎攻占该城。结果

是他拦截了所有那些要离开城市、前往乡间避难的居民，虏获大量的人。

8.我想应该在这场合指出罗马人及迦太基人在这场战役中所表现出的勇敢及果决，并且加以称赞。在这里有件类似底比斯之艾帕米农达斯因之而赢得普世赞美的事情。

当艾帕米农达斯与盟军到提基亚时，[4] 他发现斯巴达人已经全军抵达曼提尼亚，并已经聚集他们所有的联军，准备和底比斯人一战。他那时命令军队提早进用晚餐，然后在天黑不久后，率军出营，借口是他急于在战争即将来临之前，占领一些有利的据点。他让军队的士兵行伍中有这样的印象，但是接着却继续前进，直接前往斯巴达，约在第二天白天的第三时到达。[5] 他做到完全的奇袭，发觉没人守城，直接强行进入市民广场，占领所有面向河流的区域。但在此处他就没那么幸运。有名逃兵在夜里逃向曼提尼亚，告知国王阿格西劳斯发生何事，所以一支斯巴达的援军恰好在斯巴达即将全被占领之际到达，阻挠艾帕米农达斯的希望。然而艾帕米农达斯在让他的人马于欧罗塔斯河畔吃早餐，并允许其在历经强行军后，做些休息后，他立即循原路回去，因为他估算既然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匆匆前来救援斯巴达，曼提尼亚必然是无人防守，而这证明确为实情。所以他要求底比斯人再度努力，以彻夜强行军方式前进，在日中时抵达曼提尼亚，发现它几乎无人防守。但是就在那时，当时正积极支持斯巴达人对抗底比斯人的雅典军队，根据条约里的协议，抵达来协助前者。所以就在底比斯军队的前锋到达海神庙时——这离城市不到一里处——事情发生了：雅典军队好像在刻意安排下，突然出现在俯瞰曼提尼亚的山丘上。当他们见到这些部队，那极少数被留下来的曼提尼亚人，鼓起足够的勇气，登墙防卫，逐走底比斯人的攻击。

所以在论断这些军事活动失败的责任时，那些史学家是对的，他们认为统帅已经做到一位好将军所应该做的，以及艾帕米农达斯战胜他的

对手，但自己却被命运女神所击败，这是正确的分析。

9.在这情形下来论断汉尼拔，或许也可以做出相当一样的判决，因为我们几乎无法对一位做到所有他所能做到的将军，不去加以赞美或是尊崇。他以对敌人采取攻击开始，设法以一连串骚扰性的攻击，来缓解卡普亚围城之危。当他的企图失败后，他直接前往罗马本身；当他攻占城市的计划被人类计算之外的转折所阻挠，终告失败后，他转向并吸引追击的敌军，但也同时保持警戒，所以在围攻卡普亚的罗马军队采取行动的可能下，他能够趁机取利。最后，在仍然还在进行他原先的计划时，他仍致力于摧毁敌人，而且几乎让利吉姆人口牺牲殆尽。[6]

至于罗马人，我们必须下结论说他们比斯巴达人在面临危机时，处理得更好。后者在风闻消息后，立即蜂拥去拯救自己的城市，但就他们所能做到的，却是将曼提尼亚弃之不顾。另外，罗马人不仅拯救他们自己的城市，而且非但没有放松对卡普亚人施压，他们仍始终坚定不移地坚守自己的目的，并且在之后以比之前更大的决心来进行围城。

我的这些言论，并非要对罗马人或迦太基人歌功颂德；我已经在许多其他场合中赞誉过他们的素质。这么做是为了这些民族的领导者，以及为了所有那些未来的工作是要指导国事发展的人，[7] 所以当他们为自己回想起或勾画出这些事件时，他们或许能够得到启发，加以效法。我希望他们以这种方式将能够拥有勇气去进行那些或许看起来充满危机及风险的计划，而那些计划虽是十分大胆，但却不冲动躁进，在构想上令人钦佩，并且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将值得保存在人类的记忆中。但这根本的条件还是：无论所从事为何，都应该以健全的理性为基础。

论将军之领导统御

【这讨论所出现之脉络并不清楚，但通常被认为是波里比阿已佚失之书《论战术》（*On Tactics* ）的补充。】

12.对那些与军事行动无法分割的风险，我们需要极大的警觉，但在这样任何一个状况中，假如执行既定计划时，所采取的措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仍然可以获得成功。从之前战争的历史中很容易推论出，在进行军事活动时，公开运用和直接使用武力，其实是远远少于利用策略以及善用时机。另外，经验也显示出那些需要依赖选择正确时机的行动中，失败会较成功更为频繁。但毫无疑问，这些失败中的绝大多数是因为统帅所犯的错误或是疏失。我们或许可以考虑一下我在上面所提及之能力要如何取得。

首先，我相信所有那些发生在战争中，但落在人类计算范围之外的所有事件，不应该被形容为“行动”，而应该是“意外”或“巧合”。于是乎，既然它们没有固定法则，也没形成系统，我建议将它们搁置一旁。我的主题是根据既定计划来执行一场战役，下面我将开始描绘。

每场战役需要固定时间来开始，以及一段时间和一个地点来执行。它也需要秘密性、事先预定的信号和是由谁负责及透过谁来加以执行，以及一个详细的计划。很清楚地，一位正确提供所有这些因素的人，最后不会失败；但另一方面，忽略任何其中一项，可能会毁坏整个计划。自然会让单一微不足道的失误毁坏了整个规划大局，这诚然为真，但即使在每项细节上绝对准确，亦几乎不能够保证一定成功。

13.这也就是说在任何类似的努力中，统帅不能忽略任何项目。最优先以及最根本的要求是守口如瓶。一个人绝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透露他的计划给任何不相干的人，也不能在有未曾预期的希望，竟然获得实

现，而得意忘形，透露机密；亦不可由于恐惧，或与某人关系熟稔，或对某人亲爱而透露出；他必须只能将相关知识透露给那些若没有他们协助，则无法进行计划的人，而且即使如此，也不能比必要的时刻更早，而是只有在需要其中之人的贡献时，才能如此。此外，我们有必要记得，不仅要能约束我们的口舌，甚至更重要的是约束我们的心思，因为许多人没有打开他们的嘴，却因为其脸部表情或是因为其行径，仍然还是透露出他们的心思。

第二个必需之要求是对日夜行动之可能性的广泛经验。换言之，行军或旅行要花多少时间，包括陆路及海上，皆需有准确知识。第三以及最重要的是，能够从仰观天时星辰而知道时间，并为了自己的计划来善加使用。

再者，为行动选择地形是件极为紧要之事，因为这经常使得那显然不可能之事变为可能，或是相反情形。最后，我们亦必须留意有关预先已经同意的信号以及回应的信号，并且慎择人选，因为要靠他们或是在其陪同下来执行计划。

在这些基本项目中，有些是因为重复练习，有些则是借由探索，又有些是以科学方法所获得的经验而得知。理想上，统帅应该对他即将行进路线、前往地点、地形特色以及他打算借之来执行并合作之民族，都能有第一手的知识。当无法如此时，次佳的方法是他应该做仔细调查，而非依赖随机提供资讯的人；同样根本的是向导所提供的诚信担保，必须一直掌握在那些他所引导的人手中。

14.军队统帅在之前担任士兵的一般经验过程中，或许就能得到这些或是类似事务的必要知识，部分是借由练习，部分是进行探索。但是涉及科学原则问题的种种类型，则需要科学的教育，特别是在天文学及几何学方面，而虽然涉及的作品难称广泛，但至少就军事目的而言，这些研究是重要的，而且对我们正讨论的军事活动，有潜在的用途。从我

们的观点来看，天文学最重要的面向是有关规范日夜长短的原则。明显地，若日夜都一直一样长，就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麻烦，所涉及之知识亦将为大家所共有。但是日夜彼此不仅长短不一，而且就个别日夜而言，也是长短不一，所以很清楚地我们必须要让自己熟悉日夜如何增减；因为若不知道日与夜的不同长短，则不可能准确估算每日之行军距离。事实上，若无此知识，亦不可能在时间上准确安排军事行动：它将无可避免地发生过早或过晚。而在此且让我加上：唯独在战争性质的事情上，过早比过晚是更大的错误。因为一名统帅抵达地比预定时间晚，只不过错失机会，因为在他抵达前，他已经知晓这事实，可以安全脱身；但是过早来到，接近敌人，被发现踪迹，不仅在行动上失败，而且冒着被完全歼灭的风险。

15.正确时机的选择控制所有人类活动，尤其是所有战争的运作。这意味着一名将军必须要有对夏至、冬至以及春分、秋分之日期，以及之间日夜如何消长的准确知识，因为唯有这种方法，他才能够依照比例来估算他能够在海上或陆路前进的距离。他亦必须熟悉白天与夜晚下的细分，所以能够知道何时要叫醒集合军队或何时行军前进，因为除非一个人知道如何正确地开始战役，才能够将军事活动成功地结束。白天时间可借由对物件阴影、太阳行进或在空中位置的观察而得知。然而在夜间则甚难确定时间，除非熟悉黄道带的十二个星座，以及它们在可见天空中的系统以及秩序；这知识可借由研究星宿而轻易学到。夜间自然长短不一，但每次黑夜过程中，无论是长是短，黄道带十二个星座中，有六个都必须升到水平面上：结果是每个夜晚的时辰，会相应于十二星座中的相同比例出现的星座。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太阳在每日于黄道带所占据的位置，所以很清楚地在日落西山后，与之对立的那部分黄道带必然在东方地平线升起。于是乎将夜间所做之细分，会跟随与太阳相反之星宿的升起，呼应不同星座依序之升起以及横越天空。[8] 然而在多云的夜晚，我们必须依赖对月亮的观察，因为一般而言，因为月亮的大面积，所以无论它在天空哪一部分，都是经常可见的。所以假如我们有足够知

识去了解它的起落，每天所历经的变化，我们借由记录它升起或落下的时间，可以猜测时辰。在这情形下，观察的方法还是同样地简单，因为月亮周期的范围是一个月，而所有月份在观察上都是一样的。

16.我们因此可以赞美荷马所做的判断，因为他呈现奥德修斯（Odysseus）这位超越群伦、最适合担任领导的人，在仰观星座，不仅用来引导大海的航行，而且也引导陆路的冒险。这里的事实是：那些在预期之外发生、而且无法准确预测的意外，例如突然降雨及洪水、异常寒霜及降雪、多雾或阴霾天气，以及诸如此类等等，都足以为我们带来极大及常见的困难。但是我们假如略而不谈那些可以被预见到的，那我们注定会在绝大多数的事业中失败，而且只能责怪自己。所以假如我们要避免许多其他将军被认为曾犯下的错误，并且避免我即将引述的几个个别范例，那这些因素中没有一项能够被忽略。[9]

汉尼拔的人格特质

22.所有降临在罗马及迦太基这两个民族的大事，都源自同一个有效的原因：一个人及一颗心。我所指的是汉尼拔。毫无疑问地，正是他在主导意大利的战争，也在西班牙主导，最先是透过他年纪较长的弟弟哈斯德鲁巴，后来是透过马哥；这些人在那国家杀死两位罗马将军普布里亚斯·西庇阿及格尼亚斯·西庇阿。除此之外，他亦掌控西西里事务，最先是透过希波克拉底，[10] 后来则是非洲人迈拖尼斯。[11] 他同时也活跃于希腊及伊利里亚，透过与马其顿菲利普签订的协约，他成功地在那里掀起骚动，造成罗马人紧张，制造出具有威胁性的注意力转移。这个人是如此伟大及超凡的自然产物，拥有一颗在天生的构成上，便足以执行任何人类能力所及之计划的心灵。[12]

然而因为事件的过程会引导我们去思考汉尼拔的人格，所以我想应该表达一下有关那些引起如此争议之特质的看法。在此，我特别想提的是针对他过度残酷及极端贪婪的指控。然而要陈述有关汉尼拔这个人或一般参与公共事务之人的真相，并非简单之事。有些人认为环境的力量会测试人的天性，因此有些人在当他们拥有权力时——即使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设法加以隐藏——或是当他们遭受不幸时，他们才透露出真正的人格。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样的论断有合理根据，对我来说，人们常发现自己被迫在所说所做上，抵触自己真正的原则，而这或许是因为局势复杂或朋友建议而加诸其身，但这些其实并非例外，而是常态。

23.过去的历史提供了我现在所说之事许多的例证。首先考虑西西里之阿加索克利斯的例子。所有史学家都同意他以极残酷的手段来执行他早期事业，因而建立权力，但是后来就在他认为他对西西里人的权威已经稳固后，他被认为是所有人之中最温和及最具人性者。难道斯巴达

之克里奥米尼斯不同时是一位最杰出国王、最严厉的僭主，以及——在私人交往中——最体贴有礼的人？然而认为如此完全互相抵触之气质，可以在相同天性中同时并存，并非合理之事。这应该是有些统治者有必要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合环境的需求，并对他人展现出一种与他们自己天性相反的倾向，所以非但人们的人格特质会在如此处境中透露出，它们反而更常因此而被掩饰。相同印象也经常出于朋友所做建议而产生，而这不仅适用于将军、统治者和国王，也适用于国家。所以，例如说，我们发现亚里斯泰德及伯里克利在雅典掌权时，国家甚少涉及残酷的行为，然而当克里昂和查瑞斯握有影响力时，局面恰好相反。[13] 再者，当斯巴达成为希腊最强大的国家时，国王克莱奥姆波洛图斯 [14] 始终以友好结盟政策的精神来行动，但他同期的国王阿格西劳斯，行为恰好相反。从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国家本身的性质容易与其统治者的人格特质一起变化。所以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 [15] 亦然，他在陶律翁及德米特里为其执行者时，行为最为乖张及邪恶，但是在与阿拉托斯和克吕梭勾纳斯交往时，则是以远较为人性的方式来进行。

24.对我而言，汉尼拔面临极为类似的处境。他所要处理的环境既非比寻常，又瞬息万变；此外，他最亲近的朋友在个性上又如此殊异，以他在意大利所执行之行动作为证据，极难用来判断他真正的人格。至于他在环境压力下的作为，从我已经写作的以及即将继续写作的，则是甚易进行追踪，但是我们绝不可忽略他朋友的影响，特别是我们有一道资料可以给我们在这方面足够的证据。当汉尼拔正在思考从西班牙挥军入侵意大利时，人们预料到他必将在军队粮秣的固定补给上，面临特别的困难。事实上，因为行军距离以及两国之间野蛮民族的数量及凶残天性，行军的困难看起来几乎无法克服。这些问题似乎在汉尼拔战争会议的多次场合中被讨论过。而他一位叫汉尼拔的朋友，绰号“竞技斗士”（Monomarchus）——提到说，就他个人所能见到的，他们只有一条通往意大利的路。当汉尼拔请他解释他所指为何时，“竞技斗士”回答说：他们必须训练军队去吃人肉，并且习惯此事。汉尼拔无法反驳这种

大胆以及怪异的想法，但是他也无法说服自己或他的朋友去接受它。据说在这些归诸汉尼拔在意大利所犯下的残酷行为，其实是此人之作为，但当时环境的压力当然扮演相同重要的角色。[16]

25.但汉尼拔确实似乎特别喜爱金钱，正如他在布鲁提恩担任指挥官的朋友马哥。我首先是从迦太基人自己那边取得这样的说法，因为当地居民不仅最清楚风往哪边吹，如俗语所言，也知道自己国人同胞的性质。我亦从马西尼沙[17]处听到更详细的故事：他长篇大论地谈爱好金钱，认为这是迦太基人的通性，但在汉尼拔及其朋友马哥（亦以“萨莫奈人”为人所知）的情形上，则是特别显著。其他事情之外，他向我透露这两个人从他们最年轻时，彼此便从所有的军事活动中慷慨分享。他们每个人都攻占过在西班牙及意大利的许多城镇，有些是以武力攻取，有些则是以诈术获得，但他们实际上未曾参加过相同的活动。的确，他们花费更多的心血要胜过对方，而非胜过敌人。这使得在一个人攻占城镇时，另一个人不该在场，避免掉在如此场合中——他们彼此间的任何利益冲突，或是分享战利品所引起的问题——因为他们是属于相同等级的。

26.然而不仅仅只是朋友的建议改变并且破坏汉尼拔天生的个性。环境的压力扮演一个甚至更重要的角色，如我的叙述将清楚显示者——不仅在之前的章节，也包括之后的。当卡普亚城落入罗马人手中，不令人意外地，所有其他城市对迦太基的忠诚也开始发生动摇，所以开始四处寻找机会以及借口，来回归到对罗马的效忠。在这危机中，汉尼拔很显然地落入最进退维谷的困难中。假如他自己集中全力，立足一个地点，他或许会被想拦截他行动的数支敌军一起威胁，而且他势将无法照顾到所有这些彼此相距遥远的城市；另一方面，他也无法分割他的军队，因为在那种状况下，他必将成为敌人的囊中物，因为他无法同时在许多地方亲自指挥，而他每一支分遣部队在人数上都必定被敌军超过。他因此被迫相当公开地放弃一些城市，并将驻军撤离其他地方，担心假

如这些城市转而反对他，他亦必将失去这些军队。在一些情形下，他自己破坏了缔结的条约，将居民迁移到其他城镇，没收他们的财产，加以掠夺，而因为这点他引起极大的气愤，所以一些人指责他邪恶，另一些则控诉他残酷。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都会伴随着窃取钱财、谋杀以及借口使用暴力，这是离开以及进驻的部队都会犯下的事，因为每个人都是依据留下的居民将会投靠敌军这种假设来行动。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特别难以对汉尼拔的真正性格做出论断，因为我们必须允许他朋友的影响力以及环境的力量。无论如何，对他所流行的印象是：对迦太基人来说，他以喜好金钱而恶名昭彰，对罗马人则是因为他残酷的行为。

---

[1] 二一一年的执政官是森图马鲁斯（Gnaius Fulvius Centumalus）以及尔巴（Publius Sulpicius Galba）。

[2] 根据李维《汉尼拔之战》二十六书，汉尼拔接近的消息已经传到罗马。费边（Fabius Maximus）认为在罗马的军力以足敷城市防御使用，而从卡普亚召回部分的军队，必将落入汉尼拔的圈套中。根据李维的说法，元老院将决定留给在卡普亚的将领裁夺，而在那状况下，千图马鲁斯率领一万五千名步兵及一万名骑兵回到罗马。

[3] 亦即抵达卡普亚，他希望大多数的罗马军队已经从这里撤走。

[4] 在三六二年。

[5] 这其中距离约三十八里。据估计艾帕米农达斯在靠近下午七点时离开，而在第二天上午八到九点之间到达斯巴达。

[6] 波里比阿关于卡普亚沦陷的陈述，并没留存下来。故事的结局记录在李维《汉尼拔之战》二十六书十二至十六章之中。同年（二一一）卡普亚沦陷，汉尼拔失去迦太基在当地的驻军以及领军的汉诺及波士塔。支持卡普亚脱离罗马的卡普亚元老中，有二十七位自杀，约七十位被罗马人处决。

[7] 这句子的措辞显示出，这书是在迦太基于一四六年最终被灭之前写成的。

[8] 这公式的重要之点是不同黄道面的星座会以不同速度升起，因此在夏季短的夜晚，会很迅速的升起，而在冬季长的夜晚，可见到六个较缓上升的星座。

[9] 接下来是由阿拉托斯、克里奥米尼斯、尼西亚斯（Nicias）及其他人所犯下这类错误的例证。这些已经从这本选文中省略。

[10] 见页445至447。

[11] 迈拖尼斯（Myttones）是汉尼拔在叙拉古沦陷后派到西西里去的。以骑兵统帅在早期获得一些胜利后，他和罗马人最后达成协议。

[12] 与使用在阿基米德之词语相比较，页461。

[13] 亚里斯泰德（Aristides）影响的时代是四九○年至四七九年之间，虽然他在四八三/四八二年至四八○年遭到放逐。伯里克利（Pericles）从四七一年至四二九年在职。他的敌人克里昂（Cleon）于四二九年至四二二年权力到达高点。查瑞斯（Chares）的政治生涯始于三六六年，长达三十年，当时他积极反对马其顿的势力。

[14] 在这期间斯巴达的两位国王，克莱奥姆波洛图斯（Cleombrotus）代表阿基尔得（Agiad）王朝，从三八○年开始统治，直到他战殁于三七一年的留克特拉战役。另一王朝的国王阿格西劳斯则在三九九年至三六○年统治。

[15] 见页454（阿拉托斯）及页467（陶律翁）。

[16] 波里比阿将在意大利所犯下的残酷行为归诸“竞技斗士”汉尼拔的行径——难道汉尼拔没授权他们？——或是归诸环境的力量，而对这点汉尼拔认可默许。波里比阿并未讨论这些行为会否是宣传上所虚构的。

[17] 在波里比阿时代努米底亚的统治者。他属于努米底亚的马赛利（Massyli）部落，在二一二年至二○六年在西班牙指挥努米底亚的骑兵队。后来他加入西庇阿，与他在非洲并肩作战。罗马人承认他是位国王，并以牺牲迦太基来扩大他的领土。

第十书

西庇阿的人格

2.既然我即将要描述“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在西班牙的成就，以及甚至是他整个生涯作为的完整记录，我想我首先必须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的人格及特质上。他赢得的名声超过几乎所有前人，这样的事实让全世界都很好奇，想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的自然天赋以及后天调教为何，使他能够在如此多的伟业中，功成圆满。然而大部分人几乎无法避免被误导，去对这些事情形成错误的意见，因为那些写他的人所提供的描述是如此偏离事实。对所有能够透过我的叙述去欣赏他最灿烂及最冒险事功的人，我所做主张的正确性，将会最为清晰明确。现在所有其他作家都将他呈现为是位受命运女神恩宠眷爱的人，经常在面对所有不利状况下，却因为纯然机遇的协助，终于成就正在着手的事业，他们显然认为比那些经常依据理性计算来行动的人，如此之人更像神明，更值得我们的崇拜。他们似乎没有认知到这其实是两种相当不同的成就类型，其中之一只不过令人羡慕嫉妒，而另一则是值得最高程度的赞美。前者通常在普通之人中即可遇到，而后者却只能由那些有正确判断力及心智才能的人，方可完成，而正是这些我们应该认为更具神性，所以更受神明所钟爱。

我个人认为西庇阿的人格及原则，与斯巴达立法者莱克格斯相当类似。在这样的类比上，我并没假设莱克格斯不当地受到迷信影响，同样也不假设他在草拟斯巴达的宪法时，[1] 是不断受到特尔斐神殿女祭司催促而去做的。在西庇阿的例子上，他并非遵循梦境以及征兆的引导，而

为他的国家赢得如此庞大的帝国。两个人无疑都清楚看到，绝大多数的人类不会被任何他们觉得奇怪的东西所说服，也不会在没有某种神明协助的希望之下，去承受大规模的风险。因此莱克格斯其实是为了他自己的理念，经常祭起特尔斐神谕的协助，使他的计划让整个社会看起来比较可信以及能够接受，而西庇阿同样也灌输他们这样的信仰，说他的计划是受到神明启示，来增强他所统帅之人的信心，以及愿意随时去面对危险行动的准备。然而个中事实还是他的行动一直是由评估计算及先知远见来主导，而这从我即将要说的话中，便可见分晓。

3.众所承认，西庇阿具有高尚以及慷慨的性格，但有关他的精明、谨慎以及拥有一颗能专注在眼前目标的心灵，这些证据却只能来自那些与他亲密交往的人，对他们来说，他的人格宛如朗朗白天，昭然若揭。这些朋友之一是莱伊利乌斯（Gaius Laelius），[2] 他几乎是西庇阿从孩提以来，直到生命终点时，所有言行的见证人，而他以证据说服我他所说之事的真实性，因为他所说的不仅本身可能，而且符合西庇阿成就的记录。他告诉我说，西庇阿在战场上的第一件功绩，是在他父亲的骑兵与汉尼拔的骑兵在波河附近交锋时发生的。[3] 他那时只有十七岁，[4] 而且是他第一次参加征战。执政官西庇阿命令他儿子指挥一支精选的骑兵，确保孩子的安全，但是当后者见到他父亲在酣战中被敌军包围，危险负伤，只有两三名骑兵在旁，他最先敦促他其他部队驰往救援。那时他见到他们怯战不前，因为在他们周围有压倒性的敌军人数，据说他自己毫无畏惧地往包围的骑兵冲去。在这之后，他的同志觉得必须去协助攻击，所以在那时敌军陷入混乱，队形破碎；将军发现自己意外获救，首先向他的儿子致意，在全军之前向他的拯救者敬礼。这件功绩为他赢得勇敢的名声后，这所有人都必须承认；但后来当国家的全部希望都维系在他的安全时，他会小心避免让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如此的行径不是一位凭借运气，而是富于智慧之将军的特色。

在西班牙之事务：攻占新迦太基

【这些事件发生在二○九年春天。西庇阿的父亲普布里亚斯·西庇阿及伯父格尼亚斯·西庇阿在二一二年皆战败身亡。在接下来一年，西庇阿虽然只有二十四岁，但在罗马自愿到西班牙参军，并且立即被任命为指挥官。】

6.我在此恢复原来的叙述。在我现在即将描述的场合中，“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在横渡埃布罗河前，召集他的人马，向他们演说。他敦促他们切不可因为近来的挫败而灰心丧志。他告诉他们：“罗马人未曾在以勇敢较劲的战争中被迦太基人击败过。我们这最近一次的失败是因为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背叛以及我们将军的冲动行事，因为他们过度信赖与这些部落之人的联盟，让自己的军队彼此分散。[5] 但现在我们的敌人正陷于这相同的不利之处：他们军队的营区彼此远离，而且因为他们对待盟友的倨傲态度，所以已经彼此疏离，即将变成敌人。结果是，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和我们协商，而其他的只要鼓起勇气，并且见到我们已经渡河，将乐于站在我们这边，而这些并非出自于对我们的喜好，而是因为他们长久以来想对所受到的欺凌侮辱，来报复迦太基人。但最重要的是敌人的指挥官们自己彼此争吵，不愿团结成一支军队来作战，而假如他们个别来攻击我们，我们将更轻易地将其打败。”

他要求他的士兵要记住所有这些事实，然后充满自信渡河。在那之后，决定下一步为何便是他以及其他指挥官的任务。当他结束演说后，他留下同僚希拉奴斯（Marcus Silanus）率领三千步兵及五百骑兵防守津渡，保护在河流北方的盟友，而他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过河。与此同时，他并未将计划透露给任何人；这其中真相是他决定不做任何他在公开场合所说出的事，而是要突然去围攻敌人名之为“新迦太基”的城市。

我想这次的行动是我稍早所表达之意见最早以及最强的证据。西庇

阿在那时年仅二十七，然而他不只先去掌握住因为最近大规模的挫败，所以已经被认为无望的局势，而且是既然已经为自己设定这任务，他拒绝那些简单及——对众人而言——明显的解决方式，反而去设计出一个让他的朋友及敌人都同样诧异的计划。没有任何完成之事不是经过最深思熟虑的计算。

7.这事实是西庇阿在最初以及还在罗马时，其实已经详细探索有关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叛逆行为，以及有关两支罗马军队的异地分离；他得到结论，认为这些正是他父亲败战的原因。结果是他并没有像其他同胞那样因对迦太基人的恐惧或是被普遍的沮丧感所重压而感觉沉重。所以当他得知罗马在埃布罗河以北的联盟仍然忠诚，而迦太基的将领彼此争执，以压榨的方式对待西班牙人，他于是对他远征的前景逐渐有信心，这并非因为他信赖命运女神，而是出自于精心计算。无论如何，在他抵达西班牙时，他开始询问每个人，探索所有资讯的来源，所以他得知敌军分为三群。他听闻马哥正占领赫拉克勒斯之柱以东的地带，在被那称为康尼（Conii）部落的国家；[6] 基斯哥之子哈斯德鲁巴（Hasdrubal son of Gisco）在卢西塔尼亚（Lusitania），靠近塔古斯（Targus）河口之处；[7] 另一位哈斯德鲁巴[8] 正在卡佩塔尼的领土围攻城市；最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都离新迦太基十天行军路程之外。于是西庇阿的理解是：假如他决定与敌人交战，若与三者同时进行一场战争，必将极度危险，因为他心中想到他们已经击败过他的前任，而且在总人数上大大超过他自己的军队。另一方面，假如他以强行军方式前去攻击三者之一，而敌人拒战，或假如其他军队前来帮忙，他或许会发现自己反被包围，在那情形下，他也担心降临在他父亲及伯父身上的灾难，将再度重演。

8.他因此排除这些选项。当他接到情报说，新迦太基是敌军补给最重要的基地，以及在目前战争中构成对他最大危险的来源，他于是在冬天时，向最熟悉该城之人搜集情报。他首先发现，它几乎是所有西班牙

城市中唯一拥有港口，可容纳舰队及海军武装力量，且又位置方便，让迦太基人可以直接渡海到非洲。他还得知迦太基人保存在该地大部分的钱财，军队及佣兵的所有行李和辎重补给，以及他们从整个西班牙所得到的人质。还有最为关键的：驻守卫城的战斗部队仅有一千人强。这其中理由是因为只要迦太基人几乎控制整个西班牙，那任何人会想围攻该城的可能性便不会在意料之中。新迦太基的其余人口虽然数量庞大，但多由工匠、商人以及水手组成，他们没有任何作战经验。西庇阿考虑假如他突然出现在该城之前，所有这些因素必然会不利于这城市的安全。除此之外，他已经熟悉新迦太基的地形环境、城市整体规划以及环城潟湖的水文资料。特别是他从一些在当地交易的渔夫处得知，整个潟湖水浅，可以在许多地点渡过，而且覆盖的海潮在每晚会退得够远，这使横渡成为可能。在衡量所有这些因素后，他得到的结论是：假如他可以完成计划，那他会给敌人带来相当大的打击，为罗马夺得决定性的优势。除此之外，即使他的计划失败，一旦他巩固营区，他仍然可以确保他人员的安全，因为他掌控了海洋；这计划本身不会构成问题，因为所有敌人的军力都仍在遥远之处。因此西庇阿搁置所有其他计划，在冬营休息期间，将所有时间投入去准备这军事行动。

9.虽然他已经构想出如此有野心的计划，而且如我已提，当时他只有二十八岁；但除了莱伊利乌斯外，他隐瞒所有计划细节，直到他认为适合将其计划公开的时刻来临。虽然其他作家都同意西庇阿确实做了这些算计，但当他们在描述整个计划如何执行时，他们却没将其中功绩归诸这个人以及他的远见，反而是归诸神明以及命运女神。尽管所有的可能性，尽管所有那些与西庇阿生活在一起的人所做的见证，以及尽管他曾写信给马其顿国王菲利普解释说，只有在经过我所提及之计算后，他才开始一般性的西班牙征战，特别是这次新迦太基的军事行动，这些作家仍始终坚持如此。

无论如何，他接着发布秘密命令给统帅海军的莱伊利乌斯——我已

经解释是唯一知道计划细节的人——要他航向新迦太基，而西庇阿本人自己则带着二万五千名步兵以及两千五百名骑兵强行军前进。他在行军第七天抵达新迦太基，[9] 并在城市北方扎营；这城市由从海洋延伸到潟湖的一条壕沟，以及双层栅栏保护着。西庇阿自己并没在面对城市的方向修筑任何防御工事，因为他的地点受到地形轮廓的充分保护。但既然我即将要形容围攻及占领这城市，所以我必须先给我的读者有关此城地理及周遭环境的概要介绍。

10.新迦太基在西班牙东海岸大约中间之处，位居面向西南，约长二里半、宽一里的海湾。这海湾因为如下理由可以作为港口。在它出口处有个岛屿，在两边都只有狭窄的通道，这有防波的效果，所以整个港湾内十分平静，除了西南风有时会吹过通道，激起波浪，这也是唯一会骚动海面的海风，因为从其他方向，这海湾完全被陆地封锁。在它最内部的角落有一半岛突出，一座山丘覆盖其上，城市屹立在山丘顶端。城市在东侧及南侧被海洋所包围，在西侧则是潟湖。后者延伸如此之远，直到北侧，所以半岛的其余部分除了被海洋环绕外，与大陆相连部分的宽度只有四分之一里。这城市本身在中央有一凹陷，在南端前往海洋的陆地与海平面同高。另外一侧则是山丘环绕，其中有两座高耸并崎岖，其他三座虽然较低，却是嶙峋多石，难以攀爬。这两座中最高大的往城东耸起，突入海洋，上面建有医神庙。另一座山丘则在西侧占据相呼应的位置，在上面有座豪华宫殿，这据说是哈斯德鲁巴意图建立其国王般威权时所起造的。

其他三座较小的山丘则位居城市北方，其中最东的称为火神（Vulcan）之丘，过来的是阿列帖斯（Aletes，根据传说，他因为发现银矿，所以被给予神圣的荣耀）之丘，而第三座则称做农神（Saturn）之丘。潟湖与周围海洋之间有一条运河，方便船运，在运河上建有一桥，所以驮兽及货车可以从乡间运来补给。

11.这是城市及其周围环境的概况。罗马营区在其内侧受到潟湖以及海洋的保护，所以在这一点无需建筑防御工事。连接城市及大陆的半岛这中间的段落亦没有防护，即使这部分突入到营区中央。他如此做或许是为了要威胁敌人，或是调整整个营区的规划，来适合他自己的目的，例如说，在军队通行时没有障碍，无论是要出击或是撤退入营。新迦太基城周围全长在那时候不到二里半。我知道有些权威人士形容它为五里左右，但这并不正确，因为这是就我个人亲自观察而知的，非仅道听途说而已，而且现在它又进一步地缩小。

当舰队在约定之日到达位置，西庇阿决定要聚集陆军，向他们说话；他意图以那些他说服自己的相同辩论——我这已经描述——来鼓励他们。他开始先证明这军事行动是完全有道理的。简洁综合说：它若成功，会带给敌人何种伤害，以及罗马人将会获得何种利益。接着又承诺会颁赠金冠给最先登城的人，还有一般奖品给那些表现出特殊勇敢的人。最后他告诉他们，是海神最先向他建议这样的计划：他在梦中对他显灵，承诺要在行动时机来临时，给罗马人如此壮观的协助，所以他的协助会毫无疑问地让全军见到。他这种精明地结合准确计算、承诺金冠和上天保证协助，在年轻士兵中激发出极大的热忱，提高了他们的士气。

次日，莱伊利乌斯的船舰装配许多不同种类的投掷武器，从面海的方向包围城市；西庇阿在陆路方面派出他最强的两千名人员与携带攀城云梯的队伍。迦太基指挥官马哥将一千名驻军分为两群，一群驻守卫城，另一群则在东丘。至于其他的居民，他以城里能找到的武器武装两千名最身强体健的人，将他们驻扎在靠近面对地峡以及敌军军营的城门；他下令其他人要尽其全力，防守城墙。一旦西庇阿军队的号角发出攻击的信号，马哥打开城门，以武装民兵进行冲锋；他相信以这种方式，他可以在敌人中制造慌乱，扰乱他们的攻击计划。这些市民充满斗志地攻击布置在地峡营区外的罗马军队，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发

展，在城里其他人和军营的人一起呐喊打气，鼓励他们的同志；但是两边的战力一点都不平衡：迦太基人从单一城门出现，必须要涵盖将近四分之一里的宽度，而罗马人有预备部队随时待命，能够从不同角度加入战局，所以这差距对罗马人是大为有利。

就西庇阿而言，他刻意在靠近营区处部署人马，为的是要尽量吸引敌人出来，因为他很了解，假如他摧毁这些代表市民人口中的精锐分子，必然会打击其他人的士气，所以没有人会有勇气冒险跨出城门。然而在目前，这战斗仍然顽强地进行着，因为双方都挑选出精锐之士加入战局。但最后因为罗马增援部队持续从营区源源而来，迦太基被单纯的人数压力逼迫后退，最后瓦解逃逸。他们有许多人在战斗以及溃逃中被杀，但更多的人是被挤回城门，在慌乱中彼此践踏而死。在这时候，城中居民陷入如此沮丧，所以即使城墙守卫也弃职潜逃。罗马人几乎与逃难者一起强行挤入城门，但同时，他们也已经将攀城的云梯固定就位，没有遇见任何阻碍。

13.在这时候，西庇阿本身绝没远离战局，但也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来保护己身的安全。他有三位手持大盾的人随侍在侧，他们在面向城墙那边举起这些盾牌，保护西庇阿免于投掷武器的攻击。他以这种方式得以在阵线中来回穿梭，或是从较高处观察战斗，所以对时时刻刻所需要的措施，都能作出极大贡献，因为他不仅能看到战争如何发展，而且他完全在他人马的视线之内，而这鼓舞他们以加倍的精神战斗。结果是任何能为罗马军力带来成功的事，没有不去做的，而且一旦局势显示出必须有某种新的措施，这样的需求会立即有效达成。

当罗马前锋队伍大胆往前登上云梯，他们发现行动的危险并非来自于守卫的数量，而是城墙的高度。那时防守者开始鼓起勇气，因为他们见到威胁敌人的困难为何。有些云梯因为城墙高度，在如此多人同时攀爬的重量下折断，而其他则是因为领导攻击的人感到晕眩，而且已经攀

爬如此之高，所以受包围的守卫只需极小力气，就将他们推下云梯。再者，无论何时守卫从城垛丢掷木柱或其他投掷物来进行反击，所有攀附在云梯的人都必然会被扫下，坠落地面。尽管有这些挫败，没有东西可以制止罗马人攻击的热忱，而且领导的攻击者无论何时倒下，他们的位置会立即由后面的人补上。但在这时候，白天已经经过许久，士兵过度疲劳，所以西庇阿下令召回攻击部队。

14.驻军认为自己已经打退攻击，所以士气高扬。另一方面西庇阿现在则等待海潮退去。他已经聚集五百名携带云梯的人在潟湖岸边，同时又再度带来新的预备军到地峡东门之前。在向军队发展演说后，他发给他们比以前更多的云梯，城墙全段会覆盖着攀墙的人。当攻击信号再度响起，攻击者竖立云梯靠在城墙，以无畏的勇气蜂拥登墙，城墙守卫心中有股沮丧的感觉，士气下沉。他们原来想象自己已经从严峻考验中获得解脱，但现在却正又遭遇新一波攻击。除此外，他们手边开始没有投掷武器，而且因为自己已经损失的人手，弄得灰心丧志。虽然他们竭尽所能，鼓起勇气，坚持到底，但他们是在极大困难下面对攻击。

正当沿着城墙上的争斗进入最白热的状况，海水开始退潮。海水开始离开潟湖的边缘，外流的海水通过水道，迅速流向附近大海；对那些不熟悉这景象的人，这看起来不可思议。在这同时，西庇阿准备好向导，命令所有他为这行动而挑选的人，不要畏惧踏入水中，而无论何时他需要他们的时候，他的确拥有特殊天赋来灌输信心、传送热忱到他的手下。在这时刻，他们遵守命令，跑过浅水滩，全军心中充满着这行动必然是某位神明所造成的想法。他们记得西庇阿有关海神的话，以及他在演说时所做的承诺，他们热情加倍。他们将盾牌连扣起来，举在头上，强行前进城门，设法以战斧及手斧砍出一条通路来。

在这期间，横跨潟湖的军队已经到达城墙。他们发现城墙已经弃守，所以他们竖立云梯，不费吹灰之力攻占城墙，因为守卫已经被召唤

到其他地方，特别是到地峡及东门。没人想到有敌人可能从潟湖那侧到达城墙，但最令人觉得混乱的还是到处嘈杂各种语言叫声及如此混乱场景，所以新迦太基里的人无法真正听到或看到什么。

15.一旦他们占据城墙，罗马人开始沿着顶端缓慢前进，将所有途中遇见的敌人抛下，他们的武器特别适合在这类战斗中使用。当他们到达城门，有些人爬下来，将门闩破坏，那时他们外面的同志开始强行进入。同时，那些在地峡攻击城墙的人已经克服守卫，在城垛占有一席之地。最后当他们以这种方式占据城墙后，部队向城门方向打过去，将东丘防守者驱离，并且攻占它。

西庇阿判断进入城内的部队已经够多，便根据罗马传统，放纵他们绝大多数人去对付居民；他们的命令是要消灭他们所遇见的每一种形态的生命，毫不留情，但是不可开始掠夺，除非下令如此做。这做法是用来激起战败者的恐惧，所以当城市被罗马人攻占的时候，您或许不仅会见到人类尸首而已，还有狗被砍成两段，以及其他动物被肢解的肢体，但在这场合的屠杀特别惊悚，因为这里原来有众多的人口。

西庇阿自己带领一千人压迫到卫城。马哥在此最初有些抵抗，但一旦得知城市已经沦陷，他送出信息为自己的安全求情，并交出卫城。在这发生时，信号立即发出，杀戮停止，军队开始掠夺。当黑夜降临时，那些被指示去守卫营区的人留在原处，而西庇阿以他的一千人扎营卫城。他那时也将他其余部队从城市里的民房召回，命令他们经由营长指示，将所有的战利品聚集在市民广场，每个连队都带进来属于它的那一份，然后安排卫哨看守它，并在旁边休息睡觉。他也从营区召唤前战部队，部署他们去防守东丘。

16.这是罗马人占领西班牙的新迦太基城的经过。次日，那些与迦太基人一起服役军队所拥有的行李，以及城镇居民及工匠所拥有的家产，都被集中在市民广场，在那里军团营长根据罗马习惯，将其分配给

他们个别的军团。在一个城镇被攻占后，罗马人对战利品采取如下的处理程序。有些时候每个连队中一定比例的士兵或甚至整个连队（正确人数端赖城市大小来决定），会被下令去收集战利品。他们从未用超过一半以上的兵力去进行此事；而其他人则留在队伍中，这些人或在城内或在城外搜刮，如状况所需。军队通常会被分为两个罗马公民的军团及两个盟军的军团，而只有在极少状况下，会有四个军团被聚集在一起。所有那些被下令去搜集的人会带回战利品，每个人再回到自己所属的军团，在这些战利品被贩卖后，营长将所得平均分配给所有人，不仅是那些被留下来保护的部队，也有那些守卫帐篷或照料伤病的人，或是因为任何特殊任务而不在场的人。

西庇阿及西班牙人

【现在是二一○年冬，是西庇阿攻占新迦太基的那年。他已经因为慷慨地对待他发现在该地的人质，而让西班牙人印象深刻，而他现在将以这些为基础，继续发展。】

在西班牙，罗马统帅西庇阿在塔拉寇（Tarraco）过冬，他在那里的第一个成就是归还人质给他们不同的家庭，借此赢得西班牙人的信赖及友谊。在从事这项工作时，他因为机缘而得到埃德塔尼（Edetani）部落领导人艾得科（Edeco）的协助。这位君王在得知新迦太基已经被攻占，他妻子儿女落在西庇阿手中，他立即预见西班牙人即将换边，所以急于在任何类似行动之中捷足先登。他相信如此行事不仅会有最好的机会取回妻子儿女，而他也必然看起来是自己主动，而非迫于情势来投靠罗马人。所以就在军队被解散回冬营休息时，他与亲戚朋友出现在塔拉寇。他在那里得到与西庇阿会面的机会。他说他虔诚地感谢神明，因为他是去拜见罗马统帅的第一位西班牙部落领导人。他解释说，其他人仍然派遣特使去迦太基求取援助，即使他们也同时向罗马人伸出触角，但他来此不仅要将自己，也将朋友亲戚托付给罗马人。假如他被视为一位朋友及盟友，他必能为罗马人——在现在及未来——提供最大的服务。但一旦西班牙人看见他已经被接纳到罗马将军的友谊之中，而且他的请求被允许，他们必将心怀相同目标，齐聚到西庇阿处：让他们的亲戚归还给他们，并与罗马人联盟。假如他们能有如此光荣及体贴的对待，他们的忠诚必然会更加巩固，他们会在整个军事行动中，给予西庇阿完全的支持。他要求妻子儿女归还给他，以及在回到自己国度之前，他被宣布为罗马盟友。他要求这两项让步来给他机会，所以他将以其所能来表现出他及朋友们对罗马人所争取之目标的诚意。

35.这些是艾得科要求的重点。当他结束谈话后，西庇阿一直沿着

类似路线思考，倾向于应允他的请求，决定归还艾得科的妻子儿女，并宣布他为朋友。的确，他做得比这些还多，所以在谈话过程中，他以许多方式让这西班牙人深为着迷：他让所有那些与艾得科交好之人，对未来所能享有的利益，有很高的希望；西庇阿最后送他们回家。这会晤的结果很快传得既远且广，而所有在埃布罗河以北的西班牙部落，在此之前未曾与罗马人处于友好关系，现在好像同心一志，完全投靠过来这边。

西庇阿的事务现在发展的如他所能希望地一样好，在西班牙使节回去后，他解散海军，因为现在没有任何人能挑战他对海洋的控制。他挑选出水手中最精锐的，将他们分配到连队中，以这方式他加强他陆军的战力。在这时，两位西班牙最强大的部落领导人安多贝勒斯（Andobales）及曼多尼亚斯（Mandonius），一向被认为是迦太基人最忠诚的支持者。但实情是他们有很长时间一直处于不满，只是在等待适当时机反叛。如我以上章节所述，之所以如此，是自从哈斯德鲁巴要求他们必须支付一大笔金额，交出妻子女儿为人质，而所有这些做法的借口是因为他不能信赖他们。他们觉得现在正是良机，所以聚集所有部队，在夜里离开迦太基营区，撤退到某处高地，这里有坚强的地形来保护他们的安全。其他大部分西班牙人在那时候也抛弃哈斯德鲁巴。他们长久以来就怨恨迦太基人的傲慢行为，所以他们捉住第一次出现的机会，来表达他们的感受。

36.相同的事情过去也发生在许多其他人民身上。如我之前已有机会谈及，主导一项政策让它成功或是在战役中征服敌人，都是伟大的功绩，但是要如何善用却需要更多技巧以及谨慎。因此我们发现那些赢得成功的人，远比那些善用他们的人来得更多，而这正是那时发生在迦太基人身上的情况。他们打败罗马军队，并杀死两位统帅普布里亚斯·西庇阿及格尼亚斯·西庇阿后，想象他们在西班牙的地位已经毫无疑问地巩固。他们接着以傲慢的态度来对待当地原住民，结果他们的臣服者，

非但不是他们的盟友及朋友，反而成为他们的敌人。这过程非常自然，因为迦太基人认为以权力取得，与维持所取得的方式，是相当不同；还有他们没有认识到那些保存霸权最佳的人，正是那些坚持原先赢得霸权之原则的人。然而这点非常清楚，而且一再地被观察到：人们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对待邻居，去提出未来会有更佳生活之希望的人，会赢得权力。但假如在他们已经取得所要的霸权之后，却接着虐待臣服的子民，以暴政统治他们，很自然当统治者的政策改变之后，他们子民的态度也随之改变。这正是现在发生在迦太基人身上的情况。

37.在这状况下，哈斯德鲁巴面对威胁他的危险，陷入重重焦虑。他首先很震惊、很苦恼安多贝勒斯的叛变，其次则是其他将领的反对及敌意，而再次则是西庇阿正在附近，因为他预计这罗马人与其军队会迅速来到。所以当他发现自己被西班牙人抛弃，并有志一同投靠到罗马，他决定了如下的计划。他将准备齐全，然后与敌人进行一战。假如命运女神愿给他胜利，他才能够去思考下一步为何，但假如被打败，他将与残部撤退进入高卢；在那里他将征召尽可能多的当地原住民，然后再进军意大利，与他的兄长汉尼拔同舟共济。

在决定这行动方式后，哈斯德鲁巴继续准备。与此同时，西庇阿与莱伊利乌斯会合；[10] 莱伊利乌斯向他报告元老院的指示。西庇阿聚集他的部队，从冬营出发；沿途西班牙人热烈欢迎他，并且在两军会面时加入他。安多贝勒斯已经和西庇阿保持联系一段时间，所以当后者接近他正在扎营的地区时，他聚集朋友，前去拜访罗马统帅。当两人相见，安多贝勒斯解释他何以一度与迦太基人交好，并且针对他为迦太基人所作的贡献以及他对于迦太基人所追求的目标的忠诚，多所着墨；然后继续形容在他们手中所遭受到的诸种不正义对待。他因此向西庇阿诉求，由西庇阿自己来判断所说的话是否属实。若他不公平地指控迦太基人，那西庇阿很清楚，他便不会对罗马信守约定。但假如所有他经历过的冤屈，证明他别无选择，除了放弃与迦太基人的友谊，那西庇阿可以放

心，一旦他选择站在罗马人这边，他必定会对他们贯彻始终。

38.安多贝勒斯对这议题还有更多要说的事。当他结束时，西庇阿回答说，他完全接受所有这西班牙人告诉他的。他本人对迦太基行为的傲慢有非常清楚的证据，特别是他们非礼、淫乱地对待部落领导人的妻子与女儿和他们的朋友；他发现这些人比较像是俘虏和奴隶，而非人质。他又说，他谨慎遵守对待他们的责任，其严格连他们自己的父亲都几乎无法相比。安多贝勒斯及朋友承认他们知道此事，所以所有人向西庇阿表达敬意，并如国王一般看待他，对他顶礼膜拜。在场之人都对他们所说的话鼓掌；此时西庇阿受到感动，告诉他们要有信心，因为他们在罗马人手中只会遇到和善的对待。西庇阿那时立即归还西班牙人的女儿，次日与他们缔结条约；协议的主要条件是他们必须追随罗马指挥官，服从他们的命令。在这些安排结束后，西班牙人回到自己营区，聚集部队，再回到西庇阿处。在那里他们被安置在罗马营区中，[11] 加入对付哈斯德鲁巴的进攻行动。

迦太基指挥官那时驻扎在卡斯塔隆（Castalon）的地区，靠近倍库拉（Baecula）的城镇，离银矿不远。当他得知罗马人来到，他将营区移到新地点，在那里背后有条河流保护，前面则是一片平坦地形；这片地大到足够让他部署部队，但是周边却仍有足够陡峭的山脊，可做有效防卫。他在此停驻，将掩护部队安排在山脊，在主力部队之前。当西庇阿上来时，原先急于一战，但看到敌人所选择地形的强大及优势时，对要如何进行，感到不甚确定。在等待两天之后，他对马哥以及基斯哥之子哈斯德鲁巴或许会前来的可能性，心生警惕，在那时他会发现自己被敌人从所有方向包围，因此他还是决心先冒险一战，测试敌人的实力。

39.在准备好军队作战后，他将主力部队留在营区，派遣出前战部队以及特选盟军的一支步兵，下令他们爬上山脊，攻击敌人的掩护部队。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去执行命令，而最初迦太基指挥官并无动静，只

是等待行动的结果；然而当哈斯德鲁巴见到自己的人马备受压迫，在罗马人猛攻下，损失惨重，所以他领出军队，沿着山脊的边缘部署，仰赖地形的自然优势。西庇阿则派遣轻装部队作为回应，命令他们增援已经开始战斗的前战部队：[12] 那时西庇阿已经准备好其他部队进行攻击；他带领一半的主力部队，逐步前进到山脊，从左侧攻击迦太基人。另外一半由莱伊利乌斯率领，则被命令以相同方式前进，从右侧攻击。当行动仍然进行时，哈斯德鲁巴仍然还在率领军队出营。他在那里等待这个时刻，信赖地形的自然优势，有信心敌人不会来攻击他，所以这最后的攻击反而让他措手不及，来不及去部署部队迎战。罗马人现在正在攻击迦太基阵地的两侧，而他们的敌人尚未站稳队形，占据阵地。罗马人不仅没有人员伤亡，成功攀登山脊，反而在敌人逐渐就位过程中，开始冲锋，攻击暴露出来的翼侧，杀死一些人，强迫其他人转向逃跑，而那时敌人还正在设法形成战线。

当哈斯德鲁巴见到自己部队溃逃，陷入混乱，他回归原来的计划，决定不要战斗到死。取而代之的计划是聚集战象及作战基金，网罗尽可能多的逃亡之人，沿着塔谷斯（Tagus）河谷撤退，转进到那越过比利牛斯山的通道，前往居住该处的高卢部落。西庇阿认为尾随哈斯德鲁巴并非良策，因为担心被迦太基其他将领攻击；所以他让士兵去掠夺敌人军营。

40.次日他聚集战俘——这些战俘包括一万步兵及超过两千骑兵—— [13] 他忙于对他们做必要的安排。所有居住在我已形容之区域的西班牙人，[14] 之前是迦太基盟友者，但现在向罗马人称臣；当他们遇见西庇阿，他们以国王之礼向他礼敬。艾得科是第一位向他行礼服从的，后来安多贝勒斯亦如法炮制。在过去场合中西庇阿忽略这些礼敬，没特别注意，但在这次战争之后，所有部落都拥戴他为王，他开始对此事关切。他因此召集西班牙人聚会，告诉他们他愿意被他们以“如国王般”来提及，而且他的确也如国王般地行事，但他不希望是位“国王”，或是从

任何人手中接受这样的头衔。[15] 在他解释这点之后，他告诉他们称呼他为“胜利大将军”（imperator）。

换言之，即使在他生涯的早期阶段，我们应该去注意西庇阿高尚的伟大心灵（megalopsychia）。关于这一点的证据是，虽然他当时还相当年轻，而且明显地受命运女神祝福，所有那些在他权威之下的人，都是自动自发向他致意，称他为王，但他却仍然保持自制，节制这种群众的冲动，以及相随而展现出的尊贵。这种心灵之超凡伟大，在他人生结尾的场景中更是令人钦佩，当时他除了西班牙的功绩外，他还击败迦太基人，为罗马绥靖从赫拉克勒斯之柱到费莱纳斯祭坛这非洲区域中最广大富庶的地区，征服亚洲，并推翻叙利亚国王，将已知世界最广大及最丰饶的区域带入罗马统治之下，并且在任何地方，只要他伸手去要的话，便享有执行国王权威的机会。如此成就确实不仅会诱惑世俗凡人，甚至——假如如此表达被允许的话——诱惑神明去睥睨世人；然而西庇阿在慷慨大方上超越所有其他人，所以虽然王权这奖品，这凡人胆敢向神明祈求的最大祝福，经常被命运女神置于他掌握之中，但他拒绝它；他珍惜他的国家，并对它奉献效忠，认为这比普世所尊崇及嫉妒的王权，有更崇高的价值。

西庇阿接着从他的战俘中挑出所有西班牙人，释放他们回到家乡，无需赎金。他亦下令安多贝勒斯可以为自己挑选三百匹掳获的马匹；其他的他则分送给那些没马的人。在这之后，他将军队迁移到迦太基营区，因其状况甚佳。他自己停留在该处，静待观察其他迦太基将领将如何动作，但他也派遣一些人去那前往越过比利牛斯山的通道，所以可以监督哈斯德鲁巴的行动。最后，因为季节已晚，他与军队撤到塔拉寇，在那地区过冬。

---

[1] 对莱克格斯所设立的体制源自特尔斐神殿，或至少得到神殿之允准这样的说法，色诺芬及柏拉图皆贡献良多。波里比阿赞美莱克格斯有洞见认知出“政

治循环”，并设计出他的混合政体来阻止它的发生（见页395）。

[2] 他是一九○年的执政官，而且必然还比西庇阿多活约二十年，所以能提供资讯给波里比阿。

[3] 这是提契诺河战役，在第三书64章形容。

[4] 李维说十八岁，而他可能是正确的。

[5] 迦太基人贿赂担任罗马辅助部队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逃离战场。

[6] 在葡萄牙南部。

[7] 亦即在葡萄牙的大西洋沿岸。

[8] 汉尼拔的弟弟。

[9] 因为从埃布罗河到新迦太基的距离几乎有五百里之遥，所以这对他行进速度的估计几乎是不可能的。

[10] 在二○八年三月。莱伊利乌斯刚从罗马回来。

[11] 盟邦通常不会驻扎在罗马营区。但着眼于之前西庇阿父亲被西班牙部落击败，这或许代表一种特别具有信心的姿态。

[12] 这些战术的显著特色是由轻装部队在中央来牵制敌人的攻击，而利用重装部队来攻击敌人的侧翼。

[13] 这些数字似乎夸大，因为哈斯德鲁巴的军队总数约二万五千人左右。

[14] 亦即靠近卡斯吐罗（Castulo），在现在利那雷斯（Linares）城镇周围附近。

[15] 西庇阿当然不会忘记“国王”一词在罗马是以如何的恨意来被提及。波里比阿显然是以希腊化时代的意义来使用这头衔，这是指一个人具有如国王般的品德，以及拥有军事、道德及知识的特质。这里同时也许是将军被其部队以imperator来欢呼的最早记录下来的例子。

第十一书

在意大利之事务：迈托如斯河之役

【哈斯德鲁巴于二○八年至二○七年在高卢过冬，在二○七年春横跨阿尔卑斯山，或许在五月时抵达波河河谷。罗马为防止他的军队与汉尼拔的会师，一位执政官尼禄（Gaius Claudius Nero）被派遣去南方监视后者，另一位塞林纳托尔（Marcus Livius Salinator）在北方对付哈斯德鲁巴。哈斯德鲁巴给他兄长的信息被拦截，并透露出两支军队预计在翁布里亚（Umbria）会师。塞林纳托尔已经靠近哈斯德鲁巴的扎营地点，而尼禄留下一支掩护部队，继续监视汉尼拔后，派出六千名步兵及一千名骑兵的分遣队，成功地和塞林纳托尔会师。当哈斯德鲁巴得知与他对峙的执政官军队得到增援，他设法往北撤退，但是错过道路，被罗马人在迈托如斯（Metaurus）河赶上。】

1.哈斯德鲁巴抵达意大利比预期来得简单许多，而且更为快速。

在人民正等待着战争的结果期间，罗马未曾如此充满紧张、激动以及恐惧。……

这些因素没有一项让哈斯德鲁巴满意，但局势已经无法让他继续耽误，因为他可以看到罗马人已经组成战斗队形，正往他这里前进；他因此被迫开始部署一起服役的西班牙人及高卢人。他接着将十头战象安排在他阵线前方，并且增加队伍的厚度，整支军队只涵盖一个狭窄的正面。然后他自己坐镇在战象后的中央位置，攻击敌人左翼；他已经决定在这场战役中，不是征服就是阵亡。与此同时，塞林纳托尔及部队以自信、有节奏的步伐往敌人方向前进，而当两军交锋，他的部队十分勇敢地战斗。另一位执政官尼禄位居右翼，因为前面地形困难，无法前进包抄敌军，所以哈斯德鲁巴会攻击罗马左翼。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最开始

执政官因为动弹不得，大为困扰，但突然之间，状况向他透露了什么是必须做的事。他重组自己人马，将一些人从右翼后侧调出，越过罗马战线到达左翼，在迦太基人右侧进行攻击，在那里迦太基人部署了战象。直到那时，双方战况势均力敌，两边士兵都搏命战斗，因为罗马人要是败战，便要少了安全的希望，这对西班牙人及高卢人亦然。战象同样证明对任何一方都无甚助益，因为它们夹在两支军队之中，暴露在如白雪纷飞的标枪下，它们同时让罗马人及西班牙人的队伍陷入混乱。但一旦尼禄的部队绕过来，从敌人后方冲锋，整个平衡发生变化，因为西班牙人现在发现自己被前后夹攻，而它们大多数都在战场上被砍杀死亡。有六头战象与驯象师一起被杀，四头强行突出战线，后来被单独捕捉，因为它们的驾驭者放弃了它们。

2.哈斯德鲁巴终其整个人生，都显示出自己是位勇敢的人；在人生最后一刻，他是死于酣战之中，而我在还没对他表达他应得的敬意前，我不应该离开他。我已经提及他是汉尼拔的弟弟，在他离开西班牙时，被安排统领该省。我已经形容过在他与罗马人的许多战争，以及因为由迦太基派来与他一起统治的将军，彼此个性不合，所以他必须面对种种困难，他以配得上作为伟大巴卡之子的坚强及高贵心灵，忍受所有这些挫折以及命运的变化。我现在将解释在他最后一役中，他如何树立榜样，这在我个人意见中，同时值得关注以及效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将军及国王在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时，在所有时间都在心中怀着假如他们成功，他们会赢得的光荣及利益。他们所有注意力会集中在假如每件事都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展，他们将如何处理，但是从没预料到失败的可能性，或在结果是失败时，他们并没计划该做什么或如何做。事实是，第一个途径甚少问题，而第二个途径则需要极大远见。结果是他们多数人，因为在如此结果下，欠缺勇气或资源，使得他们的挫败变成确切的羞辱。如此的指挥官，虽然他们的人马为他们英勇奋战，却玷污了他们之前功绩的纪录，使他们在余生成为责难的对象。因为历史提供给我们许多这类事实的例证，所以很容易看出有许多指挥官都落

入这种错误，在这里便是一名指挥官与另一名在素质上最重大的差异。相形之下，哈斯德鲁巴只要在仍有合理希望，仍可以完成某些值得他过去成就的事情，会在战场上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但当命运女神剥夺他所有对未来的希望，将他推到最后边缘时，那时虽然他会在准备战争及在战场上如何利用种种资源来取得胜利，他也一样思考若在完全失败下，他该如何面对那最终结果，他绝计不愿遭受任何配不上他过去生涯之事。

这些话语或许可作为警告给那些主导公共事务之人，既不可肆无忌惮地将自己暴露于险地，背叛那些信赖他们之人的希望，也不可当责任向他们指出另一条路时，还留恋生命，为已经降临在他们身上的灾难，再添加羞耻及侮辱。

3.罗马人在赢得战争后，继续掠夺敌人营区。他们发现许多凯尔特人酩酊大醉，睡在他们茅草堆出的床上，于是像对待许多祭祀用的牲品一样，将他们屠杀。他们接着圈围其他的战俘，而这部分的战利品为他们赚到超过三百泰伦[1]的钱给国库。有不止一万名的迦太基人及高卢人在战场上被杀；[2]罗马人损失达两千。有些高阶的迦太基人被逮捕，其他则被杀死。当胜利的消息传回罗马，人们最初不敢相信，其中理由是因为他们一直如此急于希望它这样发生。但当越来越多使者到达，不仅宣布这事实，而且还在细节上加油添醋，那时整个城市陷入热烈的狂欢。每个神龛都被装饰，每座寺庙都盛载着祭祀供品或牲畜。罗马人怀有如此充满希望及信心的情绪，就好像汉尼拔——这位他们直到现在如此惧怕之人——已经完全不在意大利了。

汉尼拔的人格

19.当我们考虑对汉尼拔作战时间的长度，包含关注大大小小不同战役、围攻城市、从一方变节投靠一方、在不同时间所遇到的困难，以及简而言之，他计划及执行的规模，对他的领导，对他在战场上的勇敢及能力，实在难以不表示钦佩。他对罗马人在意大利作战长达十六年，在那整段时间，他从未让他的部队在战场上除役，像是位优秀的舵手，让那在他领导下的庞大数量人物，对他自己或其他人没有任何不满。尽管他所使用的部队不仅来自不同国家，甚至是不同民族，但他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他随行有非洲人、西班牙人、利古里亚人、凯尔特人、腓尼基人、意大利人以及希腊人，这些人在天生上没有共同之处，不管在法律、习俗语言或是在任何其他方面都没有。然而他们统帅的技巧是如此高超，所以他能以一己声音及一己意志的权威，加诸如此不同起源之人。所有这些他都在无法始终如一，反而是瞬息万变，有时命运之风对他有力地吹拂，但另一些时候他却在逆风而行的状况下达成。因此这些都是极佳的理由，让我们钦佩汉尼拔在这些方面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只要假如他先征服世界的其他部分后，然后接着再来与罗马一较长短，他的计划没有一项会落空。但事实是，因为他将注意力最先转向他应该最后处理的，所以他的生涯始于罗马人，但也终于罗马人。

---

[1] 约七七五八千克。——译者注

[2] 波里比阿的数字比李维的更为可靠；李维给的数字是迦太基死亡五万六千人，罗马八千人。现代学者估计哈斯德鲁巴的战力约为三万至三万五千，约与塞林纳托尔的部队相当。这些人之中有些逃兵，或从未上战场；战俘估计约一万人。李维在《汉尼拔之战》二十七书51章结束之处说这故事：汉尼拔最先知道这灾难的消息是他弟弟的头颅被丢在他卫哨前方的空地上。

第十二书

对泰密乌斯及其历史方法的批评：非洲及科西嘉动物志的错误

3.没有人会对非洲土壤之肥沃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我们想批评泰密乌斯所做的陈述是：他既不熟悉非洲，而且极为幼稚，判断力不足，拘泥于古代传统。传统认为整个非洲都是沙地、干燥和贫瘠。对其中的动物，情形亦同，因为居住该地之马匹牛只、羊群以及山羊是如此众多，所以我怀疑究竟相同的数量，是否能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这其中的理由是非洲部落不食用谷物，而是生活在牛群羊群之中，并食用它们的肉。再者，有谁没读过非洲庞大数量的大象、狮子以及野豹，还有它们的威力，或是羚羊的美丽或是鸵鸟的身形？这些动物在欧洲完全不存，然而非洲却充满它们。泰密乌斯没有探究这事实，反而像是刻意去记录与真实状况相反的事。

就科西嘉的情形，他给我们与对非洲一样不负责任的陈述。在他包括在第二书的形容中，他说这岛屿包含许多野生山羊、羊群以及牛群，还有野鹿、野兔、野狼及一些其他动物，以及居民花费时间在捕猎这些动物，而且这是他们唯一的行业。但事实是，非但岛上没有一只野山羊或是野牛，而且也没野兔、野狼、野鹿和野羊。这里的挖洞兔子若从一段距离来看，像是一只小野兔，但当您捕捉到它，却跟野兔大不相同，不仅在外观，还有在味道上，它们大部分生活在地底下。

4.所有岛上的动物都是野生的这种印象，源自于以下的原因。这岛

屿森林茂密，乡间十分崎岖及险峻；在让他们的牲畜及牧群吃草觅食时，牧人无法四处追寻。所以无论何时他们希望去召回牧群时，他们会在显著突出的地形上，占好位置；在那地方他们以号角来呼唤召集它们，而所有动物都会无误地回应这它们所熟悉的乐声。现在假如有旅行者登陆该岛，看见山羊和牛群吃草，却没人照料看管，而去设法捕捉它们，动物不会靠近他们，因为它们不习惯这些人，所以会奔逃。因为这理由，所以动物给人像是野生的样子，但泰密乌斯在做完一些不严谨以及草率随意的调查后，恣意妄为写下这些说法。

动物会辨识、听从号角的声音，并没令人惊讶之处，因为在意大利那些在从事牧猪的人，正是运用相同的方法。牧猪人并未如在希腊般地跟着动物走，而是在之前引导，隔段时间发出声音，动物持续在后，回应这声音。的确，猪如此习惯于回应属于它牧群的特定乐器，所以那些首次见证这种做法的人，都大感惊讶，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猪群众多以及食物丰盛，所以在意大利的猪群都是非常庞大，特别是在塔斯坎尼（Tuscany）的居民及在高卢人之中，因为一只母猪可以生产多达千只或更多的小猪。农夫因此将它们从晚上睡觉的猪舍赶出，依照年纪及猪舍来喂养它们。假如有许多群被带往相同之地，他们会无法让这些不同群分开，在外出时、喂食时候或是回家时候，会混淆一起。所以牧猪人发明号角的声音作为最简单的工具，在不同猪舍的猪混在一起时，不费力气和麻烦地将它们分开。实际上，每当一位牧猪人吹响号角，往一个方向引导，另一位则往另一方向，动物会自动分开，急切地追随个别号角的声音，这它们都知道，所以那时会无法制止它们离开或让它们转向。

另外，在希腊，假如不同牧者的不同牧群于橡树林相遇，寻找橡子食用，无论哪位牧者带有最多助手随行，以及有最好的机会，容易将自己的牧群带离时，也会将他邻居的猪带走。另外，小偷会躲藏等待机会，在牧猪人不知情下，将一些动物偷走；这是因为猪在橡子开始掉落

时，急于寻找橡子，很容易四处长途游荡，远离主人。

有关西西里的错误

4c.从我引用的这些证据来看，很清楚地，泰密乌斯对非洲、撒丁，以及特别是，意大利做了许多不可信的描述，而且就一般而言，相当忽略去做第一手的调查，但这正是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既然有许多事同时发生在不同地方，同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在许多不同地点出现，同样他不可能去以自己眼睛去看到世界上所有不同地方以及观察它们不同的特色，那史学家唯一剩余的途径便是要去询问尽可能多的人，去相信那些可信的见证，并且证明自己对那些他手中的报告有优秀判断的判断力。

4d.虽然泰密乌斯花上许多口舌来强调准确的必要性，但对我而言，他似乎离真相有段非常远的距离。他非但没有询问他人，来对事实彻底调查，他甚至对亲眼所见之事物，或是亲自造访之地，也无法给我们可靠的资讯。假如我们能够证明在他有关西西里所做的声明中，他对一些事实无知的错误，便足以清楚证明这点。假如我们发现在即使是他所诞生及成长的国家中，有关最知名之地，他甚至无知或资讯错误，那当然无需更多有关他作品不正确的证据。他告诉我们说，叙拉古的阿瑞突莎（Arethusa）泉水，其源头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尔菲奥斯（Alpheus）河水，这流经阿卡狄亚和流过奥林匹亚，然后他说这条河流潜入地下，在西西里海下流动将近五百里[1]，然后在叙拉古再度浮现。他坚持说这可由如下事实证明：在奥林匹亚庆典中，曾经有次下过豪雨，河流淹没当地神庙，后来阿瑞突莎的泉水抛出许多在节庆中被祭祀牺牲之牲品的排泄物，甚至有金碗，而叙拉古人辨认出是在奥林匹亚所使用的器皿之一，因此为自己留下，善加保存。

蓄意及非蓄意的错误

11a.泰密乌斯说历史写作中最大的罪行是曲解造假；他因此认为他所指控的那些人做出错误陈述，要为他们的书另取一些其他名字，可以称呼它们为任何东西，就是不要称为历史。

12.他以木匠之量尺的例子来作为类比，辩称说就一个人的目的，这支尺或许过短或过窄，但是只要它保有尺的基本属性，亦即笔直，它仍然可以称做尺。另一方面，假如他不够笔直，或是一点都无法符合那性质，它就不能是被称为尺的东西。相同原则亦适用于历史作品：那些在文体上，或在处理上，或在其他个别之处有缺失，但是仍然设法捕捉住真相的，有资格被称为历史，但是那些不及真相者，则不可再以该名来称呼之。我必须同意他，真相在这类作品中扮演主宰性的角色，我在这作品中也做过类似的声明，[2] 其大旨是生命体一旦被剥夺视觉，就会变得完全无助，所以假如历史被剥夺真相，我们所剩无他，只有空洞及无益的故事而已。

然而我亦提及有两类错误，其中之一是无知而为，另一则是蓄意为之，以及我们应该宽恕那因为无知而远离真相的人，但毫无保留地谴责那些刻意说谎者。我们双方所同意就如此之多，但是我认为那源自无知的错误类型，以及那源自蓄意的，是有很大差异。其中之一可以原谅，值得加以善意改正，其他则值得断然的谴责，而我们将见到泰密乌斯本身是属于后者的主要犯行者，我将会证明此点。

泰密乌斯论凯利斯尼兹、雅典之德谟卡瑞斯、西西里之阿加索克利斯

12b.我们当然有权去批评及嘲笑那些做梦、写的像是神鬼附体的作家。但那些自己出产如此多胡说八道的人，不仅不该攻击他人，而且如果能躲开责备，就应该认为自己很幸运。这确实是泰密乌斯自己的立场。他谴责凯利斯尼兹写作的风格，因为他是位阿谀奉承之人，并且辩论说他一点都不像哲学家，因为他如此注意乌鸦[3]以及口吐呓语的女人，所以泰密乌斯的结论是亚历山大有充分的道理去惩罚他，因为他尽己所能去腐化这年轻国王的心灵。他赞美德摩斯梯尼斯（Demosthenes）以及当时活跃的其他政论演说家，并说他们是配得上希腊的人，因为他们发言反对颁发神圣荣誉给亚历山大；另一方面，他辩称凯利斯尼兹这哲学家值得降临到他身上的命运，因为他赋予一介凡人宙斯神的神盾及雷电，所以很应该地受到天谴。

13.泰密乌斯在其他地方声称德谟卡瑞斯（Demochares）[4]犯下不自然性欲之罪，他因此不配去吹熄圣火，以及就性爱行为而言，德谟卡瑞斯远超过玻吹斯（Botrys）、费来尼斯（Philaenis）及其他情色春宫作家的作品。的确泰密乌斯曾经口吐粗鄙下流的指责及谩骂，一些人们甚至很少从常出入妓院的人口中听闻到，更不用说是有文化教养之人。而泰密乌斯为了让自己所提出的恶劣指控以及完全缺乏格调的习惯更有可信度，他进一步毁谤德谟卡瑞斯，扯进来一位默默无名喜剧作家的证据。你们将会问，我是以何为根据，来下结论说这指控是错的？首先是因为德谟卡瑞斯是一个出身良好及教养优秀的人，因为他是德摩斯梯尼斯的外甥；其次，因为雅典人认为他不仅值得被选为将军，[5]而且还担任其他官职；若是他要面对如此羞耻的行为的话，那他不会拥有其中任何一项。所以泰密乌斯对我来说，所指控的不是德谟卡瑞斯这个人，而

是雅典人民，因为他们晋用如此之人，将自己生命及国家托付给他。所以这其中没有一项为真。假如是，那不仅是喜剧诗人阿盖迪可斯（Archedicus）必然在提及德谟卡瑞斯时会说到此事，如泰密乌斯自己所声称；他也必然会被安提帕特的许多朋友所重复，因为德谟卡瑞斯甘冒直言不讳，肆无忌惮地反对他，说了许多话，不仅惹恼马其顿将军，[6] 而且还有他的继承人及朋友，其中之一是法勒隆的德米特里。[7] 相同的指控亦必定会被德谟卡瑞斯的政敌所利用，这又再度包括法勒隆的德米特里。在他的历史里，德谟卡瑞斯对德米特里做了一些有分量的指控，辩称说德米特里作为国家领导人以及其所引以为豪的成就，不过是一名小小税吏或许该自夸的；根据德谟卡瑞斯，他的自矜自是充其量不过就是这事实：城市有很丰盛供应，生活花费很低，以及每个人都可低价取得民生必需品。他亦在回忆德米特里时，提及一只机器蜗牛，在游行队伍之前爬行时，同时会释放出黏液，随后有一长列的驴子会随行到剧场。[8] 这些仿佛是要显示出雅典已经将那希腊所有的荣耀退让给其他国家，而只知服从卡山德的命令。但是根据德谟卡瑞斯，德米特里无须为此感到羞愧。尽管如此的挑衅，德米特里或是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提出像是泰密乌斯的指控，来对付德谟卡瑞斯。

14.于是乎，因为我认为德谟卡瑞斯自己国家所提供的证据，会比泰密乌斯的恶毒更值得信赖，所以我宣布德谟卡瑞斯的人生从这些泰密乌斯的指控中无罪开释。但即使假设他犯下任何如此的羞耻行为，那到底是哪种场合或是什么事件迫使泰密乌斯在其历史里将其记录起来？有识之人在决定反击他们的对手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另一方值得受到什么，而是他们自己要如何做，才算是行事得宜。依相同之法，当我们使用责难的语言时，最先的考虑应该不是我们的敌人是否值得被如此称呼，而是我们说什么才适合。假如作家根据他们自己的愤怒和嫉妒来形成他们所有的判断，我们不免会怀疑他们的陈述，所以我们要提防、对抗他们的夸大其词。在目前的例子里，我可以声称说，我有很好的理由去拒绝泰密乌斯对德谟卡瑞斯的毁谤；另一方面泰密乌斯不能从任何人

那里要求原谅或要求赞誉，因为在他充分发挥自己天生的恶毒，谩骂他的目标时，他已经让自己越过了体面的尺度。

15.他对西西里之阿加索克利斯的诋毁，我也一样不能苟同，[9]即使我承认这统治者是人类中最邪恶的。我在此所提的是指泰密乌斯在历史结尾之处的章节。在那里他声称阿加索克利斯年轻时是位一般的男妓，愿意与最淫乱人物交往，是位小偷、贪婪卑鄙的小人，随时见风转舵。除此之外，泰密乌斯说当阿加索克利斯死去时，他的妻子为他悲悼哭喊出："啊！有什么我没为您做的！有什么您没对我做过的！"在这例子中，我们或许可以重复在德谟卡瑞斯例子中已经说过的，但是仍然一样惊讶地发现泰密乌斯会以如此异常的愤恨说出。然而泰密乌斯对阿加索克利斯的描述很清楚显示出，这个人必然具有某些相当可观的自然天赋。且思考一下此人的生涯：他如何在十八岁时逃离陶匠的辘轳、烧窑以及黏土，自行前往叙拉古，如何在短暂时间内从卑微的开始，使自己成为西西里的主宰，成为迦太基人的恐惧，最后在王位上终老，以国王头衔过世。所有这些事实都确实证明此人身上有伟大及惊人的特质，以及他对公共事务的天赋异禀，才气过人。着眼于所有这些，史学家的职责是不仅要为后代记录那些往往用来去确认毁谤的细节，还有所有那些协助阿加索克利斯获得荣誉之事，因为那才是历史的功能。既然泰密乌斯被自己的恶意所蒙蔽，他给我们一个针对所有阿加索克利斯缺失的充满敌意及夸张的报道，但却没有提及任何优点。他显然在历史写作上没了解到这一点：一位作者在掩饰实际上所发生的，正如去报道那些没发生的事，都是一样的误导。我个人已经设法避免那些会让泰密乌斯为人厌恶的过度批评，但没有省略掉任何与我目的有关的任何东西。

泰密乌斯对其他作家的批评

23.泰密乌斯猛烈批评埃福罗斯，但自己却犯下两个严重的错误：首先，他尖锐地批评他人那些他自己也犯下的相同错误，其次，他在作品中发表这些指控以及设法将这些想法深植在他读者心中，显示出他完全缺乏道德意识。因为假如我们承认凯利斯尼兹该死，正如他实际是受酷刑而死，那泰密乌斯该受什么惩罚，因为神明愤怒降临在他身上，远比降在凯利斯尼兹上更来得符合正义？后者希望让亚历山大为神，但泰密乌斯推崇提莫立昂（Timoleon）到超过最显赫的神明之上。凯利斯尼兹赞美一个人，而根据共识，此人的精神具有某种超凡性质。相形之下，泰密乌斯尊崇提莫立昂，但此人似乎不仅没有完成过任何伟大的事业，而且也未曾尝试过。在他整个生涯中，他仅完成一个举动，[10] 而且在考量过那世界的大小，亦即从科林斯到叙拉古的航程，[11] 那也并非极为重要的。就我个人意见，这真相是泰密乌斯所相信的：假如提莫立昂在一个如西西里的浅碟（a mere saucer）地方，求取名声，证明可与世界英雄史上最知名英雄相提并论，那他自己虽然只写作意大利及西西里事务，便可以和那些处理世界级事件及世界史的作家，平起平坐。这些说法应足以来护卫亚里士多德、提奥弗拉斯托（Theophrastus）、凯利斯尼兹、埃福罗斯以及德谟卡瑞斯等人，来对抗泰密乌斯的攻击。这些说法也是要针对那些相信泰密乌斯是忠于历史事实、没有偏见的人。

24.且让我们根据泰密乌斯自己的原则，来思索一下他的人格。他告诉我们说诗人及散文作家借着不断地重复某些主题，在他们的作品中透露出他们真正的性质。例如，他说荷马一直经常在形容宴会的场景，这显示诗人是位老饕。相同之理，亚里士多德因为时常形容丰富的食物，必然也是位美食家，热爱佳肴。依照相同类比，他认为僭主戴奥尼

素爱好奢侈，因为他有兴趣去装饰他进餐用的卧床，并且经常注意到不同布料的种类及特殊性质。因此我们免不了要在泰密乌斯身上使用相同的原则，并对他的人格做出不利的判决。因为在他显示出极大的机巧以及胆识来攻击他人时，他自己的陈述却一直使用梦境、异象及不可能的故事；简言之，他容易掉入低俗迷信及老太婆的故事中。无论如何，根据我刚刚所说的，现在可以很明显地浮现出：有许多人虽然自己会出现在某件事情中，但也一样可能等于不在现场，而且也可能会是见证者，但却视若无睹。这种事实是来自他们的无知以及有缺陷的判断，而泰密乌斯正是如此一例。

泰密乌斯论法拉吕斯之铜牛

25.且让我述说出名的铜牛故事，其内容如下。这铜牛是由法拉吕斯在阿格里根特所做，他是该地之僭主；他的习惯是将人关在里面，并在下面点火，来惩罚他的子民。当铜变成红热时，在里面的人被烫伤、烤熟，因为这器具的结构如此，所以哀嚎的声音传到那些在场者的耳朵时，像是吼叫的牛。在迦太基征服阿格里根特时，[12] 这铜牛被带到迦太基。活动门是在肩胛骨的关节处，受害者从这地方被放入到铜牛中，这活动门仍然留着；何以如此之牛竟会在迦太基被制造出，不可能会有任何其他理由去解释。然而泰密乌斯着手去摧毁大家所熟悉的故事，反驳诗人及史学家所做的陈述。他坚持说这只在迦太基的铜牛并非来自阿格里根特，而且没有任何如此装置曾经存在于该地，而且他在这议题上已经投入冗长时间去探索。[13]

在我们提及泰密乌斯时，要使用哪种语言？我们该用什么名字来说他呢？我个人的意见是，他为自己博得那些他用在别人身上的严厉批评。根据我已经说的话，已经很清楚地证明他是位爱争执、误导以及不负责的作家，而且从我即将要再加上的，也很清楚地证明他缺乏哲学的知识，而且，说得直截了当些，他相当没学养。例如在第二十一书靠近结束的地方时，他让提莫立昂在对部队演讲的过程说："在天空以下的大地分为三部分，称为亚洲、非洲及欧洲……"。[14] 即使是由出名的马垓提斯（Margites）说出，[15] 更遑论提莫立昂，如此词语在这类场合中说出会是可信的吗？

泰密乌斯编写演说词的方法

25a.有道谚语告诉我们说，单单一滴液体，即使是从最大的容器中取来，都足够透露给我们整个内容的性质；这相同的原则或许可以施用在我们现在正要讨论的议题。于是当我们在一本书中发现一句或两句错误的陈述，而他们被证明是刻意为之时，我们再也不能看待如此作家所说的任何事是可靠或值得信赖。然而假如我要说服那些一向比较挑剔的人，我则必须要说一些泰密乌斯运用在编写政客演说、将军演讲以及使节陈述所会用到的原则，简言之，即那些所有类似的公共论述。这些综合事件，将整部历史胶合起来。有任何泰密乌斯的读者会没观察到，他在做这些声明时会忽略实情，而且这是刻意为之的？这其中真相是，他既没将所真正说过的内容，也没将真正的意思[16]给记录下来。相反的，在他心中做出应该要说什么的最初决定之后，他将所有这些想象中的演说以及伴随而来的细节给分门别类，好像他是在学校里针对特定一套议题在做练习；换言之，他设法展示他的修辞功力，但却没提供实际上所说的内容。

25b.历史的特别功能，尤其是有关演说时，首先是要去发现实际所说的话语，无论这些为何；然后接下来是要建立何以特定行动或辩论会失败或成功的理由。单纯将一件事实做出陈述，虽然可能引起兴趣，但对我们并无助益，但是当有关原因的知识再加上去时，历史研究便会丰富。因为正是在对过去及我们现在相似的状况，进行类比，使得我们可以预言即将发生之事：于是在某些情形下，一旦某项既定的行动已经失败，我们被迫要谨慎预防，以免重蹈覆辙；在其他状况下，我们则可再次使用之前成功的解决方式，比较有信心地处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一位作家若略而不谈实际发生之事，以及实际发生之事的因果，反而引进虚构的修辞演练和演说论述来取代，那会摧毁历史的独特

优点。这方面泰密乌斯是位累犯，而我们都知道他的书籍中充满这类的错误。

25c.我或许现在会被问到说，假如他是我现在所证明的那种作家，那他为何已经被一些读者如此乐意接受以及信赖。这个中理由是他的作品充满如此多对他的竞争者的批评以及谩骂，所以读者并非以泰密乌斯自己所处理的历史，或是以他自己所做的陈述来论断他，而是以他攻击别人的能耐；就这点而言，我觉得他似乎显示出一种非凡的勤快以及特殊的天分。的确，在这一方面，他非常像一位叫蓝帕斯克斯的斯特拉波（Strabo of Lampsacus）的自然科学作家。他同样在进行阐释以及批驳他人理论时，最是光彩四射，但当自己提出任何原创的提议，或解释自己的想法时，在研究科学之人看起来，远比他们所预期的还要愚蠢以及鲁钝。就我个人，我认为相同原则适用于文学及一般人类生活，因为去挑剔别人都是一样容易，但自己却难以毫无瑕疵。当然，我们经常见识到那些最想随时挑出别人错误的人，正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最该被责难之人。

历史与医学的比较

25d.除了以上我所处理的问题外，关于泰密乌斯尚有一点要提。因为他在雅典居住将近五十年之久，[17] 在那里他可以去参考之前的作家，所以可以假设他已经掌握历史写作的最重要资源。但就我的意见而言，他在此处亦是大错特错。历史与医疗科学在这方面相似，亦即每一项广泛来说，或许可以被再分为三个部门，这呼应那些从事这项行业之人所具有的不同倾向。首先是医学的三个部门：其一是关乎疾病的理论，其二为摄食养生，而其三则是手术及药学。研究疾病理论起源于亚历山大之希洛费勒斯（Herophilus）[18] 及卡利马克斯（Callimachus）所成立的学派，这当然是医药科学里应该有的部门，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某种卖弄炫耀的习气；其操作者常装腔作势，给自己如此优越感的气势，以至于认为没有其他人可以成为这学科的大师。但是当您带位病人去见他们，来测试实际状况，您将发现他们没有能力处理这状况的需求，其表现得完全如那些未曾读过任何医学论文的人。的确，有一些病人本身并没有严重疾病，但却因为单单只是他们的夸饰语言，而印象深刻，受到影响，之后反而在将自己交付给如此的医生的照顾时，危及性命，因为这些人就像依赖书本来导航的舵手一样。可是他们却拥有高知名度，从一城旅行到另一城，而当他们吸引一群观众聚集时，他们常将当地医生弄得混淆，让观众嘲笑鄙视他们，虽然当地医生在实际行医时，已经证明过他们的医术。但尽管如此，这些人口若悬河的说服力量还是胜过了实际经验所能做出的见证。

医学的第三部门所关切的是要在对不同病例进行专业治疗时，产生真正的能力，这不仅本身稀有，而且经常因为一般大众欠缺判断力，而在单纯口舌以及厚颜无耻相比之下，黯然失色，落居下风。

泰密乌斯欠缺政治及军事经验以及不愿旅行

25e.政治史亦以相同方式，由三个部分所组成。其一是由辛勤研究以及文献搜集所构成；其二是地形上的，包括对城市、地点、河流、港湾，以及一般而言，陆海特征等的审视，还有任何两地的距离；其三则是关乎政治活动。正如医学的情形一样，许多人期盼去写作历史，因为政治史被赋予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大多数进行这任务时，除了不负责任、肆无忌惮以及作恶欺骗外，却没有东西来证验他们可以写作历史的主张。他们像卖药郎中，设法讨人欢心，经常会说出场面所需要的话，为的是以这方式来求得糊口。对这样的作者我无需再说更多。

然而有另一类的作者，他们看起来似乎有道理去进行历史写作，但其实他们正像专讲理论的医生。他们徘徊于图书馆，彻底专精回忆录及各种记录，然后说服自己已经配备妥当来从事这项任务；[19] 虽然对外人而言，他们似乎已经备妥所有政治史写作所需要的东西，然而在我个人意见中，这些准备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当然，研读过去的回忆录，对发现古人所信为何，人们面对状况、地方、民族、国家及事件所具有的想法，以及了解每个民族在早期必须面对的处境和可能发生之事，都有所价值。而且假如作家在每个案子中，对实际所发生的事实进行探索，那过去事件当然能使我们去注意未来，这亦有所关联。但要如泰密乌斯一样去说服人说，单独文件史料资源便足够让人准备去适当地书写最近事件的历史，那就无可言喻地幼稚。这宛如一个人去想象自己仅凭看过过去的作品，便是位足以胜利的画家，或甚至是位艺术大师。[20]

25f.透过我提议要讨论的篇章，特别是那些取自埃福罗斯历史中的某些部分，我能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当这位史学家写作有关战争之事时，对我而言他似乎了解一些海军行动，但是对陆路战争则纯然无知。

因此假如我们细细地阅读他对塞浦路斯以及克尼多斯（Cnidos）岛附近海战的描述，波斯大王的统帅在战争中先针对伊伐哥拉斯（Evagoras of Salamis），然后再针对斯巴达人作战，[21] 我们必须要佩服这位作家的描绘能力以及他对战略的知识，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些战争中得到许多类似状况的有用资讯。但当他报道底比斯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的留克特拉战役，或是相同对手对峙的曼提尼亚战役（艾帕米农达斯在这战役中阵亡），[22] 显然不是如此。假如我们检查这些交战细节，作战队形以及实际战争中的变化，埃福罗斯只不过会激起吾人的嘲笑，因为他给人的印象是对这些事物完全没有经验，没有观看过一场战争。诚然，留克特拉战役是个简单的军事行动，而且只有双方敌对力量中的一部分交锋，所以作者的无知没有昭然若揭地被完全暴露出来。但是另一方面，他对曼提尼亚作战的说法给人一种幻觉，这战争是场全由丰富的精湛战术技能所组成，但是这形容其实是相当想象性的，而且作者完全没了解到战场所发生之事。假如我们能对地形建立一个精确的图像，然后对比他对战场地表上所进行之军事行动的形容，这将变得十分清楚。相同的批评亦适用于迪奥庞普斯以及——特别是——泰密乌斯，此人正是现在辩论的议题。当这些作家对如此事件，仅提供结论性的说法，他们的错误避开了注意，但无论何时他们提供详尽以及细节性的形容，则暴露出他们与埃福罗斯是同属一个等级。

25g.一个没有战场行动经验的人要将战争行动写好，一样是不可能的，正如一位未曾经验或从事政治事务以及伴随而来的状况的人，不可能写好这些议题。因为单纯书虫的作品缺乏第一手经验和任何逼真的呈现，他们的作品对读者完全没有价值。假如您将实际教诲的成分从历史中移除，所剩余者对读者是没有意义及帮助的。再者，作者若设法提供城市及地点的细节，但却缺乏这类的一手经验，其结果注定会非常类似，因为他们会遗漏许多该被提及之事，而且会过度冗长地处理不值得费心的细节。泰密乌斯经常落入这样的错误中，因为他并没有依靠他自己眼睛所观察到的证据。

25h.泰密乌斯在第三十四书里说到，他五十年来一直以外国侨民的身份定居雅典，自承没有作战经验，也没有造访他地，更没做第一手观察。于是当他必须在历史里处理如此事情时，他犯下许多错误及不实陈述，而且假如他曾接近事实，他比较像是那些根据填充动物来写生，画出轮廓的动物画家。在这情形中，画家有时会捕捉到正确轮廓，但还是没有任何真正活生动物所具有的逼真及动感，而这正是绘画要捕捉到的特殊功能。这就是泰密乌斯的状况，而且一般而言，也就是那些以这种学究方法为出发点之所有人的处境。这里所缺乏的是对真实对象的逼真显现，因为这成分只能从作家之亲身经验中才能创造出来，于是那些未曾亲自参与公共生活的人，无法引起读者的兴趣。

因为这理由，过去作家相信历史回忆录应该保有如此的逼真，所以无论何时这些叙述在处理政治事件时，它们能够让读者呐喊出：这作者必然参与过政治，有公共事务的经验；而当处理战争时，作者已经历经积极参与服役，出生入死；或当他回到居家事务，他与妻子一起生活，抚养孩子；相同情形也发生在生活其他不同的面向。现在，这样的特质只能存在于那些亲自参与事件并让历史的这一面向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的人身上。当然，要亲自投入，并且在每种事件中都扮演积极角色，实属不易，但是当然有必要对最重要及最常发生之事有所经验。

25i.荷马提供我所说之事并非不可能达成的证明，因为我们在他的史诗中发现许多这类逼真的描述。无论如何，我认为根据之前的辩论我们可以同意：研究文献只是对历史有所贡献之三个成分之一，而且在重要性上只位居第三。这命题的真实性可以从泰密乌斯所介绍之不同种类的公共论述来看：亦即，政客的辩论演说、统帅的鼓舞军心的演说和使节所做的陈述。在历史中甚少出现让每种可能辩论都充分发挥的场合，而大多数都只留有空间给那些极少自然出现的简短声明。但即使在这些之中，也只有一些是适合现在，而其他适合过去；一些适合伊托利亚人，一些适合伯罗奔尼撒人，另一些则适合雅典人。但除了充满矫揉造

作以及炫耀博学外，对事实都相当不忠实，并且没重点或没缘由地将演说辞拉长，强将每种可能的辩论都包括进去，这些正是泰密乌斯以他发明辩论的机巧，会针对每个议题都去做的。这种作为的确曾让许多政客身败名裂，受人轻视，然而相反的，这其中根本的原则是要选出那些攸关宏旨以及适合场合的辩论。但因为针对某一特定状况下，必须使用哪几种或是多少样的可能辩论，从未有固定的规则去规范，所以假如史学家的意图是要造福而非误导读者，那就必须需要相当高程度的专注力以及清晰的原则；要准确规定出何种场合需要什么，这从未是容易之事，但并非不可能透过个人经验及实践所得到的信条来作为引导。[23] 就目前而言，以下是传达我所言为何的最好方法。假如史学家最先清楚地描述那些正进行讨论之人的状况、目标以及环境，然后报道实际所说的，接着最后解释何以演说人会成功或失败的理由，我们将可以对所发生的事有真正的图像。我们也将借着分辨出成功及与其相反者，从中找出可资类比的，所以我们以后在处理任何或许会面对到的处境时，会有成功的希望。然而在我的看法中，要追踪出真正因果是困难之事，但是要将词句串联起来则非常简单。依相同之法，只需给书中一些人简短演说，符合要旨，且发现出规范这技巧的规则即可；相反的，毫无重点及目的，拉杂冗长地写作，的确是常见的成果。

泰密乌斯作品缺失的原因以及优秀史家的特质

27a.泰密乌斯历史作品中政治的部分结合了他写作的所有缺点。我现在来解释他缺失的主要原因，这很多人会发现应该不可能出现，然而它将最能真正解释我们针对他所提出的指责。对我而言，他似乎发展出详细研究的才能，加上以探讨资料为根据的能力；简而言之，他以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去从事历史写作，然而在某些方面我却没办法想到有任何史学家会更没经验，或是更不愿面对麻烦。以下考量会解释我所说的要点。自然提供给我们所谓的两项工具，依据它们的协助我们可以进行探索，取得我们所要的资讯。我所指的是听的能力以及看的能力；而在这两项之中，根据赫拉克利特，视觉能力更远为可靠。他告诉我们说“眼睛较耳朵是更准确的见证”。现在泰密乌斯进行他的探索是透过那完全较为宜人但却较低劣的媒介，也就是他完全避免去使用他的眼睛，而是偏好使用他的耳朵。[24] 除此之外，耳朵或许会以两种方式来接收它的资讯，或是借由阅读，或是检验证词，而对这里的第二项，如我以上所指出的，泰密乌斯甚少花费力气。

他偏好的理由很容易理解。您可以在书堆中忙碌，完全没有风险或辛苦；只要您花些心血去接近一个资料记录充足的城市，[25] 或是附近有座图书馆。在那之后，您只要斜躺在卧榻上进行研究，而且您可以比较之前史学家的错误，无需历经任何辛苦。另一方面，个人进行调查需要较多的努力及花费，但这却有最大的重要性，对所有历史研究能作出最大贡献。这一点可以从史学家自己所使用的表达中，清楚见到。例如，埃福罗斯宣布说，假如作家本人可以出现在所有事件发生的时候，这必然会是各种经验中最佳的。迪奥庞普斯说最好的军事史家是在最多数战场上出现过，而最好的演说词作家是曾经参与过最多辩论的人，因此相同原则亦适用于医疗及航海的学问。而荷马较之其他人更是强调这

样的主题。当他希望呈现在我们面前那行动之人该拥有的特质时，他以这些文字来呈现奥德修斯的形象：

缪思神，且让我吟唱足智多谋之人，远及各地海陆的流浪者……

以及在稍后一些：

他观察过许多人的城市，他注意风俗民情，

他在漂泊浪迹大海，历经千辛万苦。[26]

再者，

一位历经战场及风暴冲击的人。[27]

28.在我来看，那属于历史科学所享有的尊荣正是需要这类型之人。柏拉图辩称说，若哲学家能成为国王或国王成为哲学家，人类事务将会一帆风顺；但对我而言，我们应该说：假如这两条件中任何一项能达成的话，对历史会是好的，那这工作应该是由行动派的人来进行。在那种情形下，他们断不可以以现在这时代的方式来处理历史，因为现在仍然视历史为次要的东西；反而是必须怀着信念，认为这是他们最必要及最荣耀的志业，终其一生专心一致地投入其中。或者那些要有志写作历史的人必须了解到，对他们来说，对事务的亲身经验是根本的资格。除非那天来到，否则历史学家所犯下的错误不会歇止。

泰密乌斯从未思索任何这些考量。他终其一生耗在同一个地方，他甚至不是该地的公民，而且几乎刻意将自己隔绝于任何积极的战争或政治参与，或是从旅游或观察得到的个人经验；然而因为某些不知的原因，他却得到杰出史家的名声。这样说泰密乌斯是给他做了公平的描述，而所需的证据可以从他自己所说的话中找到，因为他在其第六书的序言中说，有些人认为要写作修辞性的演说会比写作历史更需天分、勤劳以及训练。他指出埃福罗斯在他自己的时代曾对这观点无法苟同，但

因为他无法对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做出适当回应，所以泰密乌斯自己对历史与修辞作品进行比较。但这其实是相当不恰当，因为首先他对埃福罗斯的说法便不正确。埃福罗斯从头到尾在他的作品中，就辩论的言语修辞、处理及发展，值得赞美钦佩；他在离题进行穿插叙述以及表达个人反省沉思，简而言之，无论何时他想要扩大任何议题时，他最是流畅；除此之外，他对史学家以及演说词作家之间的差异，所做的评论，特别具有说服力以及可信度。然而泰密乌斯急于去避免给人以他自己其实正是呼应埃福罗斯的印象，所以除了对他做出不正确的陈述外，他还谴责所有其他史学家。所以当他在以长篇巨牍以及混乱方式讨论其他人处理相当正确的议题时，他想象没有任何在世的人会去注意他所做的事。

28a.他在这段落的目的是要去荣耀历史，所以他说历史与演讲式作品之间的差异，大的如真正建筑物与家具，如实际地表景观，与我们所绘之风景画构图之间的差异。

第二，他说，写作历史时所需要的资料搜集，较之演讲术整个学问而言是更辛苦的工作。他说，他本人从泰尔搜集资料[28] 以及对凯尔特人、利古里亚人和伊比利亚人的习俗进行研究，所经历的辛苦和所花费的开销如此巨大，所以他几乎无法期望他或其他人所做的见证会被人相信。我们很想问这位作家，究竟哪种研究计划他认为比较辛苦：安静呆坐在城市之中，搜集笔记以及询问利古里亚人和凯尔特人之风尚习俗，或是去大多数地方及人民中取得亲身田野经验，并且做出第一手见证？或再者，哪一项需要更多努力：去质问那些在不同战役出现之人有关战争布局、海战和围攻的形态，或是出现在实际现场，历经真正发生危险和命运转折的军事行动？我个人的观点是，真正建筑物和那些舞台布景上所绘画的，或是编写历史和编写演说词，在所有历史作品中的差异，都没有比根据亲自参与或第一手经验为基础的叙述，以及源自道听途说及他人故事所完成的叙述，彼此之间的差异来得更大。

然而泰密乌斯因为没有前一类写作的经验，自然会以为这工作是真正不重要以及最容易进行，亦即，搜集记录及质问那些对不同事件有知识之人乃是最重要及最困难的事。但即使在这领域里，没有第一手经验之人还是注定会犯下严重错误，因为若一个人没有对这议题有清楚的概念，要如何对战争、围攻或海军行动，或是有效掌握见证者叙述的细节来进行检验？这其中事实是诘问者对叙述之贡献，正如资讯提供者一样的重要，因为对有关细节的回忆会将叙述者从一点带到另一点。另一方面，一位缺乏行动经验之人，没有资格去质问那些参与其中之人，或即使他自己亲自在现场出现，也无法了解正在发生何事：因此即使他在现场，他或许就正如不在场一样。

---

[1] 事实上约三三○里。

[2] 见页144。

[3] 三三一年凯利斯尼兹陪同亚历山大横越利比亚沙漠去造访在西洼（Siwa）绿洲的宙斯·阿蒙（Zeus Ammon）神庙。因此此处提及乌鸦：这些鸟据说在横越沙漠的路线完全被风沙覆盖之后，出现来引导整个行进。根据凯利斯尼兹，“所有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假如这队伍之中有任何人在夜里走偏走丢，这些鸟会在他们上方呱呱地叫，直到他们发现回到行进的路线”。泰密乌斯声称，凯利斯尼兹在亚历山大造访神谕之后，将他呈现为神之子，来奉承讨好他。见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Life of Alexander* ），27。后来凯利斯尼兹失宠，因为他批评亚历山大采取一些波斯的习俗，特别是要求马其顿人行跪拜之礼的做法。他因为是希洛雷乌斯（Herolaus）的教师，所以牵涉皇家侍从的阴谋，而且据说是在三二七年被处决或是死于狱中。见《亚历山大传》，55。

[4] 德谟卡瑞斯（Demochares of Leuconoe，约三五○年至二七五年），德摩斯梯尼斯之妹的儿子，是雅典的民主政治家，以他直言敢言性质的演说词而知名。卡山德所扶植的法勒隆之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亲马其顿政权于三○七年垮台后，他变得活跃。雅典从马其顿的占领者手中获得解放是因为“独眼”安提柯一世的儿子“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突然入侵所致。

[5] 或许是在三○六年期间及之后，当他在雅典对抗马其顿国王卡山德扮演积极角色时。

[6] 安提帕特殁于三一九年。当亚历山大前往波斯，他留下安提帕特来管理

马其顿及希腊。

[7] 这位哲学家由卡山德指定为雅典的总督。他从三一七年到三○七年担任此职务，后来因为“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的入侵而被推翻。

[8] 这经济情势及游行庆典被拿出来象征德米特里的行政：一个面包及马戏的政权。这游行是在公元前三○九/八年酒神祭（Dionysia）的戏剧庆典中举行。但德谟卡瑞斯将驴子以及其他细节诠释为代表雅典的堕落；它们只不过是这些表演的部分，就本身来说没有特别的重要性。

[9] 阿加索克利斯是泰密乌斯特别厌恶的对象。

[10] 直译为“一条线”，这意象所指的是叫“五条线”的游戏，在古代希腊是在一个台面上进行的游戏，以骰子及筹码进行，有点像双陆的游戏（backgammon）。

[11] 提莫立昂在三四四年时从科林斯航行到西西里，时年六十七；他将叙拉古从戴奥尼素二世的僭主统治之下解放。在三四一年，他决定性地击败迦太基，并且解放一大部分的西西里。见普鲁塔克的《提莫立昂传》（*Life of Timoleon* ）。

[12] 迦太基将领希米尔科（Himilco）在四○六/四○五年攻占阿格里根特。

[13] 根据品达（Pindar）之《派提安颂第一篇》（*Pythian Ode I* ）的一个注释，泰密乌斯说阿格里根特人在法拉吕斯过世后，将铜牛投入大海，而城邦在他时代所展示的牛，所代表的是盖拉（Gela）河。西西里之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的《历史》十三书九十章四节报道说，在四○六年这城市沦陷时，有只铜牛被运送到迦太基去。在一四六年迦太基沦陷时，有只铜牛被发现，小西庇阿将他送回阿格里根特。这想必是波里比阿自己在迦太基亲自见证，看到有活动门的铜牛。就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知识，泰密乌斯或波里比阿都无法被证明是错误的。

[14] 这是相当熟悉的地理学陈述。波里比阿批评的重点是，在一场战前的演说中，提及如此炫学的说法，是完全不合时宜的。

[15] 俗谚中傻瓜的名字，同时也是同名之喜剧性史诗的英雄，这史诗传统上归诸荷马。

[16] 亦即既非逐字记录，亦非摘要。

[17] 泰密乌斯在雅典停留的期间不甚确定，或是约三三九年至二八九年或是三一五年至二六五年。

[18] 原来自卡希洞之希洛费勒斯（Herophilus of Chalcedon，活跃于三世纪初）发现脉搏的节奏，并特别对疾病发生原因有兴趣；他及之后的追随者后来被认为比较关心疾病的发生学，而非疾病的治疗。他们倾向于与斯多葛哲学联手。但另一方面医学里的“经验学派”（empiricists）则更关切疾病之治愈，往往倾向于怀疑主义的哲学。波里比阿相信我们就治愈疾病所必须的程度，一定要研究疾病的原因，但并非只是为了要展现炫耀自己的理论知识。

[19] 波里比阿正是将泰密乌斯归于此类，与江湖郎中术士不同。

[20] 波里比阿的重点是关于最近发生之历史，特别需要某种对公共事务的经验。

[21] 波斯人于三八一年在息提昂姆（Citium）外海打败塞浦路斯国王伊伐哥拉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击败雅典所建立的海上霸权，在三九四年的克尼多斯战役中被终结掉：在那战役中斯巴达人被雅典人柯农所率领波斯拥有但由希腊人操作的舰队击溃。

[22] 留克特拉战役发生在三七一年七月，结束斯巴达在希腊大陆的霸权。曼提尼亚战役是在三六二年早夏时爆发。

[23] 亦即史学家提供给那些阅读其作品之政治家的信条；这些信条是基于史学家之个人经验以及实践而来的。

[24] 亦即借着阅读，在此阅读是种耳朵的功能，而非眼睛。

[25] 泰密乌斯研究的地点，雅典，对有关西地中海国家所能够提供的资料甚是稀少。

[26] 《奥德赛》一书一至三行。

[27] 《奥德赛》八书一八三行。

[28] 用于他对迦太基之写作。

第十四书

在非洲之事务：西庇阿的征战

【本章开始的日期为二○四年至二○三年冬。西庇阿在二○六年从西班牙返回罗马，二○五年被选为执政官，二○四年以行执政官（proconsul）之职，横渡到非洲。在二○三年开始时，他的统帅权被延长，直到他结束整个战争。在意大利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凯皮欧（Gnaeus Servilius Caepio）和塞尔维利乌斯·基米努斯（Gaius Servilius Geminus），分别在伊达拉里亚以及布鲁提恩的战区。】

1.当两位执政官在意大利从事军事活动时，当时在非洲冬营中过冬的西庇阿[1]得到情报说，迦太基人正在装配一支舰队。他也因此着手准备自己的海军，但与此同时围攻乌提卡。他仍然怀抱说服西法克斯（Syphax）来投靠的些许希望，[2]所以捎给他一连串的信息，因为这两支军队相隔不远，而且西庇阿相信他可以离间这位君王，放弃与迦太基的联盟。他怀疑西法克斯是否已经厌倦他当初之所以选择站在迦太基这边的那位女人，他与迦太基人热络的友谊是否已经逐渐失温，因为西庇阿深切理解努米底亚人天性上容易满足任何取悦他们的东西，而因为这理由，对神明及对人类都一样反复无常。在这一时刻，西庇阿的因为对未来有许多焦虑而心烦意乱。由于敌人在数量上的优势，他担心在开阔的战场冒险一战，所以他立即捉住以下恰好出现在眼前的机会。有一些他送到西法克斯的使者回报说，迦太基人已经在他们的冬营里建造由不同种类木头及枝干，但没有使用泥土的小屋；在努米底亚人的情形则是，最初到达的部队是用茅草建屋，但从各城镇后续不断来增援的部队，在目前则只是用树干搭建。后者有些是在壕沟及栅栏内扎营，但大多数是在营外。西庇阿因此得出结论：最能让敌人彻底措手不及的攻击

营区方式将是纵火烧营，所以他开始实施这样的计划。现在西法克斯在和西庇阿进行沟通时，不断高谈阔论迦太基人应该撤离意大利，罗马人则相应离开非洲，以及每方持续占有两地之间原来所占有的领土。西庇阿到目前为止一直断然拒绝聆听这种建议，但他现在开始丢给这位努米底亚君王一些暗示，认为他所希望见到采用的方式并非完全不可能。西法克斯的心情大为喜悦，结果是他与西庇阿的交通来往比之前都更为大胆。这意味着双方来往的使者越来越多，造访越来越频繁，所以在一些场合，每方都会在他们对手的营区中待上数日，对使者的行动没有预先提防。为了这些使命，西庇阿派出到对方营区的人中包括一些见过场面的历练之人，另一些则是有军事能力之人；他们必然衣着卑微简陋，事实上是以奴隶装扮来伪装，但他们的任务是在不受干扰下，调查摸索出入敌人营区的方式。这里有两个军营，其中之一是由哈斯德鲁巴占据，包括三万名步兵及三千名骑兵，另一个营区则在一里半之遥，属于努米底亚人，容纳五万步兵及一万名骑兵。[3] 后者较易接近，而且它的营舍也特别易燃，因为努米底亚人——如我所述——不是用木头或泥土为建材，而是只用茅草及草席。

2.在春天开始时，西庇阿已经进行所有需要的侦察工作，来实施对付敌人的计划。他也出动船只，建造在船上使用的攻城机，好像他即将从海上围攻乌提卡。他再度以步兵占领乌提卡城之上的一处高地，人数约两千，不遗余力去加强防御这阵地，并在周围挖出一条护城河。他希望给敌人印象，所有这些准备是为了围城，但其实他真正的意图是要在他实施火攻的行动时，可以保护自己，以应付当时突然冒出的风险。他担心一旦军团离开营区，在乌提卡的驻军或许会鼓起勇气来进行突围，攻击靠近城镇的栅栏，并包围他留下来防卫营区的部队。

当他正做这些准备时，他也送一道信息给西法克斯，问他说假设西庇阿同意君王的提议，那迦太基人究竟会否接受人们，而不只是重复说他们必须要有时间去思考这些条件。他也训令使节：除非他们在这点上

得到答复，否则不可回来。当代表到达时，西法克斯聆听他们的信息，他确信西庇阿已经准备要签订条约，部分是因为罗马使节已经说过他们若没有取得答案，不会离开，而部分是因为他们想要得到迦太基人同意的明显焦虑。他立即送话给哈斯德鲁巴，解释发生何事，并敦促他接受和平提议。同时，他让时间溜过，没制定进一步的防卫措施，允许不断加入他的努米底亚人在阵线之外驻扎。西庇阿就所有外表上来看，都一切如常，但在实际上却是进行各种准备来发动攻击。一旦西法克斯从迦太基人那里收到确认，他应该缔结和平条约，那时他至为欢喜，将消息传给罗马使节代表，他们则立即回去自己营区，告知西庇阿西法克斯的行动。在这时候罗马统帅立即再派出一团人马，向西法克斯解释说，西庇阿十分满意，会尽其所能来取得和平，但是他军事会议里有些人有不同观点，辩称说事情应该保持原状。特使适时到达，向西法克斯传达这一信息。西庇阿之所以派遣他们是为了假如他采取任何作战行为，但和平的协商却仍然进行时，他看起来不会像是在破坏停战协议。他考虑到一旦他做出这样声明后，他可以如他所选择地自由行动，不让自己遭到责难。

3.西法克斯在听到这消息时，大失所望，因为他之前已经相信和平已经确定，但他仍和哈斯德鲁巴安排一场会议，在里边告诉他来自罗马人的消息。他们充分讨论，辩论如何面对局势，但在他们所有思考以及从中所生出的计划里，他们都未曾怀疑到即将要发生的事。他们对任何关系他们安全，或是预感有任何灾难也许会威胁他们的可能性，都没先见之明；另一方面，他们都急于采取攻击行动，要在平坦的战场上挑战敌人，一决生死。在这整段时间中，西庇阿持续准备以及发布命令，给自己部队他即将要攻占乌提卡的印象。然后突然间他在中午的军事会议中，召见所有军团里最能干及最可靠的营长。在会议里他透露计划，命令他们提早进用晚餐，然后在每天固定时间号角手吹出撤退的信号后，带领军团离开营区；在消夜时间，号角手习惯在将军帐篷外发出信号，让大家知道夜间卫哨要开始就位。接下来他召唤不同时间派到敌人阵营

的间谍，质问他们，并将有关方向和出入的细节相互比较。他又召见马西尼沙（Masinissa）来评估他们的报告，并依照他的建议，因为他对当地具有亲身经验的知识。

4.当所有战争准备都已经完成，西庇阿留下足够强大的军队看守营区，然后在夜晚第一更结束时，引领部队出营；敌人在约七里之远的地方。他在靠近第三更结束前到达敌人附近，然后开始分派部队，将一半的军团及所有努米底亚的部队交由莱伊利乌斯以及马西尼沙来统领。他们的命令是要攻击西法克斯的营区，而西庇阿则向自己所率领的部队呼吁，要表现勇敢，但不可冲动行事；他们非常清楚，因为夜袭会让士兵无法使用正常的视觉，所以需要结合胆识及冷静头脑来取代视力。西庇阿所率领的其余部队是针对哈斯德鲁巴的营区。他已经决定在莱伊利乌斯对另一个营区纵火前，不发动攻击；心中怀着这样的计划，他缓慢前进。

莱伊利乌斯及马西尼沙在这期间已经将他们的部队再分为两群，但都是同时攻击西法克斯营区。敌人的茅屋，如我已经提及，好像是特别为了纵火而建的。所以一旦罗马前排军队开始纵火后，火焰立即沿着第一列扩散；因为茅屋彼此紧密排列，又包括极多易燃材料，所以火势很快就完全失控。莱伊利乌斯留在后方掩护整个行动，而马西尼沙则明确知道人们在设法逃难时，会在哪些点离开军营，于是派驻军队看守那些出口。没有一位努米底亚人——甚至是西法克斯——对究竟真正发生何事有任何概念。相反的，每个人都假设营区是因为意外着火，所以在没有怀疑下，有些人从睡梦中惊醒，其他人则仍在饮酒作乐时，措手不及，手持酒杯，冲出帐篷。许多人被同志在营区出口处踩死，又有许多人被火焰围困，焚烧致死，而所有那些成功逃离火窟者，直接落入敌人手中，在还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或是什么命运落在他们身上前，便已被屠杀。

5.当所有这些正在发生时，迦太基人观看这火灾的程度以及冲上天空的火焰，认为努米底亚营区是意外着火。他们有些人匆忙赶去协助，而其他人则在没武装下冲出营区，站在营区前恐惧地观看这奇观。那时西庇阿发现整个行动已经准确地依计划进行，所以开始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他杀死一些，追杀其他，然后放火去烧他们的木屋，因为我已经在努米底亚营区所描述的大火，现在则是在迦太基营区里发生。哈斯德鲁巴立即放弃灭火，因为他从刚发生的事，知道降临在努米底亚的灾难不是偶然，而是敌人的行动及胆量。他现在除了救自己的命外，不及其他，而的确即使要做到此事，也希望甚小，因为火焰散播迅速，很快就吞没营区。贯穿营区的通道挤满马匹、驴子以及人员，有些已经半死，被火焰吞没，其他人则陷入疯狂般的慌张及恐惧中。即使那些决心去重组队伍来保护自己的人，都被这些障碍阻挠，而在四处弥漫的喧闹及混乱中，所有安全的希望消失无踪。

西法克斯及其他指挥官的情形非常类似。这两位将军设法与一小群骑兵逃走；但其他所有人，数以千计又数以千计的人员、马匹以及驴子都在火焰之中悲惨可怜地毁灭。其他同志则在努力逃出大火愤怒之余，卑微且毫无尊严地死于敌人之手，因为他们不仅没有武器，甚至没有衣服遮蔽、赤身裸体，毫无防卫地被砍倒。整个地区充满绝望的哀嚎、混乱的呐喊以及恐惧的哭声，这些混合起来成为一种无可名状的噪音，但尤其是愤怒火焰及火花所发出的吼叫，压过一切的抗拒。正是这些成分的不可预期以及结合，使它们如此恐怖，因为它们单单任何一项就已足够令人心惊胆战。的确，任何活着的人都不可能对这可怕的景象做出真实的描绘，无论他如何夸张，因为它在恐怖的程度上远远超过任何至今被记载下来之事。由于这理由，所以在所有西庇阿所执行许多精彩的军事行动中，这个对我而言似乎是最壮观以及最大胆的。

6.当天空破晓之时，西庇阿发现敌人不是被杀，便是四处流窜逃亡，但他仍然命令营长立即追杀。刚开始时，哈斯德鲁巴停留在他避难

的城镇中，因为尽管已经收到西庇阿已经靠近的警告，他仍然对这地点的强大感到自信。但后来当他发现当地居民民心思变，他放弃抵抗西庇阿的希望，所以与幸存者继续撤退，而这些人加起来有超过五百名骑兵及约两千名步兵。在这之后，城镇的居民向罗马人无条件投降。西庇阿饶恕他们，但他允许士兵掠夺两个邻近的城镇，然后再回到他出发的营区。

既然迦太基人原先所倚赖的战争的希望及计划都已经彻底破灭受挫，他们深感沮丧。他们原先仰仗的是将罗马人围困在靠近乌提卡的海岬——罗马人选择为冬营之地——而且已经做了所有准备，要以陆路方面的军队以及海上的舰队将他们团团堵住。但现在他们发现因为一个突然、没预见的灾难，他们被迫将整个开放乡间的控制权退让给敌人。更糟的是，他们觉得自己以及首都现在或是在任何时刻都会被攻击，所以他们的情绪濒临绝望的恐慌。然而局势让他们觉得有必要去思考未来，决定要采取何种措施。可是当元老院聚会时，却充满困惑，所以最令人惊奇以及最混淆的建议都被提出。有些元老敦促他们应该传话给汉尼拔，将他从意大利召回，因为他们相信迦太基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那位将军及其率领的军队。其他人则赞成派遣特使团去见西庇阿，要求停战，开始与他协商议和。还有其他人则辩称说他们必须鼓起勇气，与已经撤退到阿巴（Abba）城镇附近的西法克斯取得联系，聚集他逃离灾难的残存军队——事实上这是最后得胜的意见。于是迦太基政府开始重新聚集部队。他们指定哈斯德鲁巴监督这项任务，而且也传话给西法克斯，呼吁他来协助迦太基人，履行他原先的承诺，并向他保证，哈斯德鲁巴必将带领军队与他的军队立即会合。

7.在这期间西庇阿先忙于围攻乌提卡的准备。然后当他听到西法克斯仍然忠诚于迦太基，而迦太基人又再度出动一支部队，他于是率领自己的军队，在乌提卡前驻扎。同时，他将最近战役中所收集到的战利品分发给士兵，然后在商人手上赚了一笔之后，送商人离开。[4] 西庇阿的

胜利激起士兵对战役其他部分极大的希望，于是他们对现在所具有的战利品不甚珍惜，所以愿意以极低价钱交给那些商人来处理掉。

西法克斯及他的朋友原来计划要继续撤退，然后返家，但恰巧在阿巴城镇附近遇见一群超过四千名由迦太基人雇用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见到这群增援部队来到，激起他们的士气，足以说服他们停止撤退。与此同时，年轻少女娑凤尼斯芭（Sophonisba），这位之前我提及之哈斯德鲁巴的女儿，已嫁给西法克斯，恳求她的丈夫留下，不要在事件进入如此关键时刻时，遗弃他们。结果这位努米底亚君王被说服，应允她的请求。这群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来到，也让迦太基人增添了士气。他们的人数在首都被报道为一万人，而非四千人，而且传说他们的勇敢及武器的精良，让他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以这些谣言和在群众间流传的琐事，迦太基人的战斗精神突然升高，他们能够再度勇赴战场、对抗敌人的信心倍增。最后在三十天里，迦太基部队和努米底亚人及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在一个叫“大平原”（Great Plains）的地方一起扎营以及强化阵地；他们结合起来的战斗力量不少于三万人。

8.当这些事件的消息传到罗马军营时，西庇阿立即决定要以行动来对付敌军，并且下令正以海路围攻乌提卡的军队要如何进行后，他开始征战。他下令全军要以携带最少行李的轻装行军。在第五天时，他到达大平原，而一旦他到达敌人附近时，他第一天扎营在约四里外的山丘上。次日，他往下移动，将军队布置在离敌人不到一里之处，他的骑兵在前保护步兵。在接下来的两天，双方军队停留在原地，以一些小规模的遭遇战行动，测试彼此的战斗力量。然后在第四天，双方将军率领军队，布置成作战队形。西庇阿采用正规的罗马队形，将前线部队的连队布置在前列，在他们之后是中线部队，最后是后线部队。就他的骑兵而言，他将意大利人安排在右，马西尼沙率领的努米底亚人在左。在另外一方，西法克斯及哈斯德鲁巴将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布置在中间，面对罗马的连队，其余努米底亚人在左，迦太基人在右。

在第一次冲锋时，西法克斯的努米底亚人被意大利骑兵击退，而迦太基人被马西尼沙打败，因为他们的作战精神已经因为之前的挫败而动摇。但是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精彩奋战，对付罗马中央，坚守阵地；他们对这国家欠缺了解，所以排除任何逃跑活命的希望，而假如他们成为战俘的话，他们对西庇阿的背叛，也排除了他们被宽恕的机会。西庇阿在他西班牙远征的任何一役中，未曾对他们做出敌意的行为，所以他们在加入迦太基这边战斗时，被认为已经破坏了与他的诚信。无论如何，当两翼溃败后，整支军队立即被中线部队及后线部队包围，并且在他们所站立之处被砍倒，除了一些幸存者外。于是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就这样被毁灭，但他们仍然对迦太基人在战斗中以及溃逃中提供极大的协助，因为假如罗马人没有遇到他们的顽抗，而是立即追杀，甚少敌人可以苟活。但正如所发生的，由于他们坚持到底，西法克斯平安完成撤退到自己的领域去，而哈斯德鲁巴亦能够与他残余的部队回到达迦太基。

9.西庇阿在对战利品及战俘做出必要的安排后，召集军事会议，思考下一步行动应该为何。会议决定他应该与一部分军队留在大平原区域，寻访这区域的不同聚落；同时，莱伊利乌斯和马西尼沙应该率领努米底亚人及部分的罗马步兵去追击西法克斯，不给他时间停下来去组织反抗势力。在做好这些安排后，这两支军队分别开来，莱伊利乌斯及马西尼沙追击西法克斯，而西庇阿则巡回附近城镇。有些城镇被吓得向罗马献降，其他则被围攻占领。整个非洲国家已经时机成熟到要经历政权的转变，因为人民由于西班牙拖延多年的战事，已经蒙受连续一段艰苦及苛捐杂税的时期。

在迦太基本身，普遍不安的情绪在之前已经很严重，但现在在市民中动荡的状况更令人担忧，在经过第二次如此压倒性的战败之后，所流行的印象是迦太基人已经对自己完全丧失信心，对自己的目的完全绝望。尽管如此，那些在元老院里被认为最有勇气的人，仍敦促迦太基人应该立即出动舰队，对付在乌提卡的围攻者，设法解围城之危，与对这

次攻击没做准备的敌人船舰交战。他们也要求召回汉尼拔，而且要立即实施这救亡图存的唯一希望，不得耽误。就可以估量的程度上，他们对这些行动能拯救国家仍抱有极大的希望。然而其他人辩称说，如此权宜做法的时机已过，他们现在必须做的是强化城市防御，准备对付围攻。假如他们愿意同心一志，命运仍然提供许多机会，来对敌人做致命一击。提出相同意见的人也建议他们应该考虑求和的可能性，并且心里要有定数，究竟在何种条件下及以何种方法，可以从现在的苦难中求得逃脱之路。在做完一些演说后，他们一起采取所有这些提议。[5]

10.一旦决定所有这些事情之后，那些即将航向意大利的元老，立即离开议会厅前往港口，而海军统帅立即登船。其余人则忙于巩固城市的防卫，并且经常聚会讨论细节。

西庇阿的营区现在满溢着掠夺来的战利品，因为他没有遇见反抗，每个人都对他的入侵称臣投降。他因此决定要将大部分战利品移转到原来的营区，然后摆脱这些负担后，计划带军去占据在突尼斯前的壕沟阵地，所以能够在可以将迦太基尽收眼底的地方扎营。他认为如此举动将会胜过任何方式，令迦太基军心恐慌，沮丧绝望。与此同时，敌人在几天内已经配置人员以及装配船舰，即将出海执行他们的计划；但在那时候西庇阿抵达突尼斯，驻守的军队闻风而逃，所以他立即占据该地。突尼斯距离迦太基只有十五里之远，从首都几乎每一点都能见到。如我之前已述，这是一个自然地形极为坚固的城市，更因人工防御而进一步加强。

11.这时罗马人已经在那里扎营，而迦太基舰队也已经在前往乌提卡途中。当西庇阿看见敌人舰队接近时，他对自己船舰的危险感到紧张，因为在船上没有人预料到会受攻击，所以对这样的发展相当缺乏准备。他因此立即拔营，匆忙赶去保护他的海军力量。在那里他发现他设有甲板的船只配备精良，携带攻城机，而且已经移向城墙，随时支援攻

城行动，这完全不是要进行海战的准备状况，但是迦太基舰队已经在整个冬天为这目的进行预备。于是他放弃任何出海和敌人交战的想法。相反，他下令所有战斗船舰下锚，排成一列，将运输舰停泊成一个圆圈，有三艘或四艘船厚。他下令将船桅及帆桁取下，而运输舰牢固地固定在一起，在船和船之间只留小空间让轻型船只可以通过出入。[6]

---

[1] 他在乌提卡（Utica）外驻扎，大约迦太基城西北二十五里处。

[2] 哈斯德鲁巴之女娑凤尼斯芭（Sophonisba）已经由其父亲婚配给西法克斯（Syphax），来赢得他支持迦太基（见李维《汉尼拔之战》二十九书23章）。

[3] 这些数字看起来不可能地大。一个较可能的估计是部队加起来总数多达三万步兵及五千骑兵。

[4] 在一个城镇被掠夺，战利品在士兵中分配后，士兵会将他们交由随军前行的交易商处理。

[5] 即如何对抗的提议，而非投降。

[6] 李维《汉尼拔之战》三十书10章形容迦太基攻击这支舰队，在攻击结束后，有将近六十艘船被拖往迦太基去。

第十五书

在非洲之事务：最后决战

【在二○三年科塔（Cirta）之役以及西法克斯被逮捕后，迦太基请求谈和。西庇阿获得授权提出条件，迦太基人接受这些，并派特使到罗马去。接着在二○二年初，一队罗马运输舰被大风吹到进入迦太基湾出口的阿基姆鲁斯岛（Aegimurus）海岸去。在罗马的协商完成前，这队运输舰遇到船难，遭受攻击，然后被掳获。】

1.因为在非洲海岸外的一场飓风，迦太基人掳获一队罗马运输舰以及随舰的庞大物资。西庇阿对事情会如此转折深感困扰，因为他不仅丧失他自己军队的补给，反而敌人现在获得大量的必需品供应；然而更激怒他的是，迦太基人违背最近才宣誓的停战协定，因此出现另一个重起战端的理由。他因此立即挑选舌基亚斯（Lucius Sergius）、拜比亚斯（Lucius Baebius）以及费边（Lucius Fabius）去向迦太基人抗议所发生之事，同时知会他们——因为一道来自罗马的通知，告知罗马人已经批准所提出的和平协议。在他们抵达迦太基后，特使最先在迦太基元老院被接待聆听，后来介绍给公民大会。罗马特使对公民大会就目前局势坦白、自由地发表演说。罗马人开始时先提醒听众，当迦太基代表到达突尼斯，受到西庇阿顾问会议接待时，他们不仅对神明表达虔诚，对大地进行礼敬，而且他们以俯卧地上，表示卑屈，并亲吻与会官员的脚；在起身时，他们指责自己破坏罗马人及迦太基人之间原先的条约。因为这理由——他们如是说——所以罗马人有好理由加诸任何选择的惩罚，但他们恳求罗马人要记得人类命运之起起伏伏，不可走上极端；以这种方式，迦太基人的愚蠢可以见证他们敌人的慷慨。罗马特使继续说，当西

庇阿与在场同事回想起那场景，他们只能惊讶地问自己：何以迦太基人现在竟然可以忽略他们曾经所说过的话，冒险破坏已经宣誓过的协议条款。这毫无疑问地清楚：他们胆敢如此行为，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将信心放在汉尼拔及他的武力上。但假如是如此，那他们的行动真是彻底地轻率；因为众所皆知，汉尼拔及其最精锐的部队在过去两年，被逐出意大利其他地方后，已经撤退到拉奇尼亚海岬。他们在那里被严密限制，不，更应算是被紧紧包围，而只有在历经千辛万难后，才设法脱身逃命回到非洲。罗马人又继续说："然而，即使他们胜利地离开意大利，企图与我们的军队交锋，而这支军队刚刚在两场接连而来的战役中击败你们，你们对未来的希望充其量不过是打平，但你们应该严肃考量到再遭遇另一场败战是何场景，就像你们考量胜战一样。假如那事发生，有哪些神明你们可以召唤来协助？有什么辩论你们可以用来向胜利者求情，怜悯你们的不幸？因为你们自己的背信及愚蠢，你们当然已经自绝于任何神明或是人类的慈悲之外。"

2.在发表完演说后，罗马使节离开。至于迦太基人，其中只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必须受到条约约束。但是大多数的政客及元老院成员都被条约所加诸的条件所激怒，并且难以忍受使节的出言不逊。除此之外，他们也不愿意将他们所捕获的罗马船舰及补给交出。尤其是他们相信以汉尼拔军力的协助，他们可以征服敌人，这不仅只是渺茫的机会，而且是具有很大的可能性。于是公民大会议决将罗马使节遣返，没给他们答案，而那些决心使用任何方法来引起战争的政客，又再度举行聚会，设计出如下的策略。他们宣布要采取每种预防的措施，来确保罗马使节安全回营，并立即下令两艘三层舰待命护航。他们也送出信息给海军将领哈斯德鲁巴，要求他在离罗马营区不远之处，准备好一些船舰；一旦随行船舰与罗马人分手，其他船舰立即压迫下来，击沉他们，因为迦太基的舰队在这时候停泊于乌提卡。在与哈斯德鲁巴做完这些安排后，他们送走罗马人。

在这期间，他们已经下令三层舰的船长在他们经过马卡（Macar）河口后，将使节留在海峡中间，然后航行离开，因为在这一点罗马营区已经在视线范围内。随行船舰遵照这些指示，而就在通过河口后，迦太基护航舰立即转向返航。拜比亚斯以及他的同事多少感到被冒犯，因为他们认为随行之人竟然如此快地停止陪伴，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但并没有怀疑任何危险。然后当他们单独航行时，三艘迦太基的三层舰突然从隐藏的地方出现，往他们的方向压迫。当它们靠近罗马的五层舰时，它们无法撞击它，因为它闪躲过它们所有的企图，它们也无法登船，因为船上陆战人员奋力一搏，多加抗拒。相反，它们随着移动，持续在周围绕行，向水手射击，杀死许多人。最后罗马人见到士兵从自己营区奔向海滩来协助他们，所以设法将船往海滩行驶。大多数的陆战人员都被杀死，但是使节们令人惊讶地安全下船。

3.这行动的结果是重新启动战事。但这次重启的理由更加严重，双方争执比以往更为激烈。罗马人认为他们受到狡诈的攻击，所以决心要征服迦太基人，而后者非常清楚他们所做之事，准备付出任何代价，也不要落入敌人手中。因为双方的情绪如此高涨，所以很明显的，事情结果必须以战争来决定，因此不仅所有意大利及非洲的民众，还有西班牙、西西里以及撒丁的所有民族，都陷入悬宕及痛苦的紧张中，等待最后结果。

汉尼拔的武力这时候在骑兵方面已经变弱，所以他派人到西法克斯的亲戚，一名叫泰启亚斯（Tychaeus）的努米底亚人那里，他享有掌握了非洲最佳骑兵的盛名。汉尼拔呼吁此人给予协助，拯救迦太基；汉尼拔相信泰吉亚斯必然知道，假如迦太基人得胜，他必将能维持自己的统治，但若罗马人得胜，那他的性命以及财产将因为马西尼沙对权力的欲求，而落入危险中。泰吉亚斯被这样的呼吁说服，以两千名骑兵加入汉尼拔。

4.在这期间，西庇阿安排好他舰队的安全，将指挥权指派给拜比亚斯后，出发去对迦太基的城镇进行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他因为迦太基人狡诈叛逆的行为，不再接受那些献降之人的臣服，而是攻下每个地方，将居民贩卖为奴，显示出他对敌人的愤怒。他也一个信息接着一个信息地通知马西尼沙，解释迦太基人是如何破坏协议，所以敦促他动员一支越强越好的部队，尽快与他会师。马西尼沙，如我以上所解释，[1] 率领他自己的部队出发，得到十营（cohort）罗马步兵及骑兵，外加西庇阿所提供之军官的增援。[2] 他的目的不仅是要恢复他自己祖先的国家，而且要借着罗马人协助去兼并西法克斯，而在这样的目标上，他最后终于成功。

恰好大约就在这时候，来自罗马的使节要到迦太基完成和平协商，抵达罗马营区。拜比亚斯立即将这些罗马官员送到西庇阿那里去，但拘留迦太基代表。后者在得知迦太基人对罗马使者所做的不敬对待后，情绪相当沮丧，认为他们的生命陷于极大危险，罗马人当然会因为如此犯行来报复他们。但是当西庇阿从罗马专员那里得知，元老院及人民已经接受他与迦太基人所达成的协定，而且愿意答应所有他的要求，他对这消息感到高兴，训令拜比亚斯要以各种礼节来善待迦太基代表，并送他们回去。在我来看，他在这件事上的行为既慷慨又明智。他知道国人对使节守信的行为相当看重，所以在决定自己行动时，他首先考量的是罗马人的义务，而非迦太基人之优劣功过。所以他强调要克制自己对近来事件所感受到的愤怒，坚持“我们祖先高贵的传统”——如谚语所说。结果是他以自己的慷慨赢过他们的卑鄙，在面对整个迦太基民族以及汉尼拔时，占有道德上的优势。

5.当迦太基人见到他们各地城镇被攻占掠夺，送话给汉尼拔，要求他不要耽误来与敌人一搏，以战争试出个结局。他聆听使者，然后回答说，他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上，而对一决雌雄一事，暂且放心，因为他会选择适当时机来战斗。几天之后，他将营区移离哈德鲁曼

敦（Hadrumentum）附近，[3] 出发前进，然后在查马（Zama）附近驻扎，这是位于迦太基西行五日的地方。

汉尼拔从那里派出三个间谍去调查罗马人下落，以及他们军营的性质及部署情形。当这些人被逮捕，带到西庇阿面前，他非但没有依照一贯的处罚处理，反而指派一位营长陪伴他们，向他们展示营区如何布置。当这事结束后，他问他们，究竟这位军官有否向他们解释清楚。当他们确认他已经做到，他提供他们补给以及伴随人员，告诉他们要向汉尼拔仔细报告他们所见的每件事。在他们回去后，汉尼拔对西庇阿所表现出的勇气及崇高精神，印象极为深刻，以至于他开始构想一个惊人的想法：他们应该见面晤谈。在做出这样的决定后，他送出使者去宣布，他希望和西庇阿讨论全盘局势，而在收到这消息后，罗马统帅回应说，他会传话给汉尼拔约定时间及地点来会谈。次日，马西尼沙的部队抵达，有六千名步兵及四千名骑兵。西庇阿亲切接待他，恭喜他已经将所有西法克斯之前的子民纳入他的统治之下。西庇阿那时立即拔营，到达一个叫纳拉加拉（Naragara）的城镇后，在该地扎营；他选择一个在其他方面都适合的地点，可以在一只标枪投射到的距离内取得饮水。

6.从那里西庇阿送话给迦太基的统帅，说他已经准备好和他见面，商讨事情。在听到这点时，汉尼拔立即拔营，前进到离罗马人不到四里之处。在那里他扎营在一座山丘上，这山丘似乎在大部分方面都适合他目前的意图，但是离水源有些太远，所以他的人马因为这不利之处，受害甚多。次日，两位将军骑马离开各自营区，仅由一些骑兵陪同，然后也将这些人留在后面。他们自己在中间的地方相见，每人各有一位翻译人员陪同。汉尼拔首先向西庇阿致意，然后开始说话。如下。[4]

他告诉西庇阿，他只希望罗马人不去觊觎在意大利之外的领土财富，同样迦太基人也不要贪图非洲之外的。两个民族都建立雄伟的帝国，而或许可以简单言之，大自然已经标记出它们各自的界线。他继续

说道："但首先，我们为了拥有西西里，之后为了西班牙，而进行战争，而且我们两边都忽略命运女神给我们的教训。最后我们到达那在过去是我们其中一方遭遇到的，而现在则是另一方遇到的一个关键时刻，即祖国领土处于危险之中。除了去考量我们究竟用哪种方法可以避免神明愤怒，让我们现在争执得到和解，我们所余为何？我本人随时愿意做如此尝试，因为我已经从实际经验中得知，命运是如何地变幻无常，如何在命运天平上做个小偏移，便能对任一方带来最重大的变化，以及它如何玩弄人类，好像它的受害者不过是小孩子。"

7."但我担心，您西庇阿，部分是因为您非常年轻，部分是因为整个在西班牙及非洲的发展有利于您的计划，所以您尚未尝试过运势上的衰弱，不会被任何我的话语影响，无论我之所言含有多少真理。但是，且以一个例证的观照来考虑事实，这例证并非取自过往，而是从我们的时代。我便是那汉尼拔，在坎尼战役之后成为几乎整个意大利的主宰，后来进军罗马城，在城外五里扎营，在那里思考我该如何处理你们及您的国家。今日我在此地非洲，正与您这位罗马人进行协商，讨论我的国家及我自己能否存在。请记得这命运的转折，我恳求您，切不可过度骄傲，而是在这时刻，以人类规模的角度来将思绪集中在事情上；换言之，追求那将能够产生最多美善结果及最少邪恶的途径。因为有哪些有识之士会选择冲向那您正面临的危险之中？假如您胜利，对您已有的声望以及您国家的荣耀增添甚少，但假如您被击败，您将因为您的举动而抹除您所有已经得到的名誉及荣耀的记忆。我告诉您这些事，我的目的为何？我提议我们过去所有争执的领土，亦即西西里、撒丁以及西班牙都将属于罗马，而迦太基将不会因为它们的缘故而与罗马作战。所有在意大利及非洲间的其他岛屿，必须同样属于罗马。我确信，如此的和平条约在未来对迦太基人是最安全的，对您及所有罗马人是最荣耀的。"[5]

8.在汉尼拔说完之后，西庇阿回答如下。他指出在争夺西西里及西

班牙的战争中，罗马人没有在任何一场战争曾是挑衅者：迦太基人毫无争议地都是开启战端的人，没有人比汉尼拔知道得更清楚。神明已经不把胜利给予那些做出不正义之第一击的人，而是给予那些拿起武器自卫的人，来为这事做出见证。他本人也时常将命运女神的反复无常置之眼前，所以其能力范围之内，他也将人类事务之不确定性列入考虑。

“但关于那些您所提及之条件，”他接着又说，“假如您自己撤离意大利，然后在罗马人跨海到非洲前，提出如此建议，我不认为您的希望会破灭。[6] 但既然您是因为环境所迫而离开意大利，而我们在这期间已经渡海到非洲，掌握开阔的乡间，局势现在已经很清楚地是在一个很不一样的基础上。事实上这是一个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何处？在您的国人被打败后求和，我们写下一个条约，上面除了你们的提议外，还规定迦太基人应该归还战俘，不得要求赎金，应该交出战舰，赔偿我们一千五百泰伦，[7] 最后要提供人质来担保这些条件的履行。这些是他们和我彼此同意的条件。我们双方派遣特使到罗马去，将这些提议提交元老院及人民审议，我们罗马人确认这些条件，而你们迦太基人恳求它们被通过。元老院同意，而人民也批准条约。但一旦迦太基人取得他们所要求的之后，他们却背信地违反条约。有什么途径还可让我采用？将您自己置于我的立场，请告诉我？要我们现在将条约中最严厉的条款给废除？在那状况下，我们将会因你们国人的不法行为而奖励他们，教他们在另一个场合要背叛他们的施恩者。或我们应该应允他们现在的请求，寄望于未来他们的感激？记住，他们才刚刚首先取得以求情者身份恳求来的，然后在您回国时，带给他们些微的成功希望，他们立即以敌人来对待我们。着眼于这一点，假如我们要再加上一些更为严厉的条款，那还有理由将条约再度提交给公民大会；但假如我们撤销任何条件，然后将我们的讨论提交到那里，则根本没用。那我们的会面还有进一步的目的吗？这事实是：您必须将您自己及您的国家无条件交到我们手中，或是以战斗来征服我们。”

9.在交换这些意见，没有提供妥协的希望后，汉尼拔及西庇阿分手。次日早晨，双方将军率领他们的军队，进行交战。迦太基人为自己的生存及拥有非洲而战，罗马人则是为了帝国及主宰世界而战。[8] 难道会有任何人在掌握这局势后，在读这场战争的故事时，仍然会无动于衷？不可能会再发现更骁勇善战的士兵，或是更加成功或更娴熟兵法的将军，命运女神也未曾提供给对峙两军一个比现在更大的奖品，因为胜者注定会成为不仅是非洲及欧洲的主宰，而且是历史所知之所有地方的主宰。而这的确证明正是最后结果。

西庇阿以如下方式来部署军队。在前排阵线他在连队之间以固定间隔安排前线部队，他们之后则是中线部队。然而中线部队并非以常见的罗马方式来部署，亦即掩护前线连队之间的缝隙，而是位居连队本身“正后方”一些距离；他采取这对形式是因为敌军为数颇众的战象。[9] 最后后线部队则在后方阵线部署。在他左侧他安排莱伊利乌斯及意大利骑兵，在右侧则是马西尼沙和他所有的努米底亚部队。前排连队之间的间隔布满了前战部队。这些部队被下令要发动攻势，而假如他们被战象的冲刺进逼而被迫撤退，那些人可以足够迅速地在队形中所留下的直线通道来逃避，而那些被追赶上的，则可往左右侧的队伍缝隙中移动。

10.在做完这些部署后，西庇阿骑马在行伍间移动，向部队发表演说，这虽然简短，但十分契合当时状况。“记得你们在过去打过的战争，”他告诉他们，“让自己表现得就像个英勇的士兵，值得你们的名声以及你们的国家。将这事实摆在你们的眼前：假如你们克服敌人，你们不仅将成为非洲完全的主人，你们也会将为自己及为罗马赢得无可挑战的领导地位以及其余世界的主宰权。但假如战争结果不然，那些殉难的人，会因为你们为国家所做的牺牲，而接受一个更加光荣的死亡，那些以逃跑来苟活的，将会留下一个除了痛苦及羞辱外，别无其他的人生。在非洲没有一个地方会给您安全，而假如您落入迦太基人手中，没有人会肯面对那种现实，没人怀疑会有何种对待正等着你们。我祈求你们没

有人会活着去面对那种命运。现在命运女神已经给我们根据战争来决定的结果，给我们选择最荣耀的奖品，假如我们拒绝了那最光辉灿烂的奖品，我们必将会是最为懦弱胆怯，或换言之，所有人类中最不智的人，只因为要苟活，而去选择命运中最恶劣者。所以当你们面对敌人时，将两个目标保持在你们面前，去征服或去战死。当人们受到那精神所鼓舞，他们通常将会胜过他们的敌人，因为在他们进入战场时，他们已经决定要选择牺牲生命。”

11.这是西庇阿如何呼吁他的人马。在这期间汉尼拔也已经部署好他的军队。在全军之前，他安置战象，他所拥有的数量超过八十头，之后则是佣兵，[10] 其战斗力量约为一万两千名，由利古里亚、凯尔特、巴利阿里及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人组成。在他们之后则安排本土的利比亚人和迦太基人，而在他的最后一线，约在其余部队后两百码之处，是随他从意大利回来的军队。他的两翼由骑兵保护，在左侧为努米底亚的盟友，在右侧则是迦太基骑兵。他下令每一团队的指挥官要向他们自己人演说打气，告诉他们在他及他从意大利带回部队的参战下，他们拥有胜利的坚定基础。至于迦太基人，他要求军官向他们的军队描述战败的后果将会如何，让他们对自己的妻儿子女会有何命运毫无疑问。指挥官们执行汉尼拔的命令，然后他在自己部队的行伍中移动。他向他们说了一段时间的话，要求他们记得这十七年期间，他们是战斗的同志，以及他们与罗马人打过多少战役。他告诉他们说，“在所有这些行动中，你们证明自己所向无敌，从没给罗马人任何可以打败你们的最小机会。且让我们忘记那些小型战争；我要求你们特别要记得特雷比亚河战役，这是你们对付的这位现今罗马人统帅西庇阿的父亲，记得特雷西米尼湖战役，当时你们的敌人是弗拉米宁，还有坎尼战役，当时我们打败宝路斯。今天等待我们的战斗无法与那些战争相提并论，无论你们所考虑的是我们敌军的数量，或是他们的勇气。”在说完这些后，他告诉他们仔细打量，注意对付他们的敌人的部署行列。这不仅是一支较小的军队，而且甚至不到之前与他们作战之军队的一部分；至于勇气，罗马

人不再像他们之前一样。因为在较早的战斗中，罗马人的战斗力量未曾被击溃，而且也不知道战败为何，而今日罗马士兵在某些情形下是那些军团的孩子，另一些则是军团的残余，这些军团他们都一再在意大利予以击败，让他们溃逃。所以他现在要求他们不可让之前成就的光荣及名声溜走，而是要勇敢奋战，坚持他们骄傲的名声，这是他们作为一支未曾败过之军队所赢来的。

12.这是两位统帅所做的演说。在两边部署完成时，两支对峙的努米底亚骑兵已经初步交战一些时候，而在那时候汉尼拔命令他战象部队的驾驭者向敌人冲刺。但当号角与喇叭的声音刺破它们周围的空气时，一些动物开始慌张，掉头就跑，开始往后践踏，与前来支援迦太基人的努米底亚的骑兵队相撞，而那时马西尼沙正同时攻击，所以迦太基的左翼立即暴露出来。其他战象往两军之间地带的罗马前战部队冲去，杀死许多人，但自身亦损失惨重。最后所有这些猛兽都受到惊吓：有些从连队之间的空隙逃去，而罗马人愿意让它们通行过去，其他则逃向右翼，在那里它们遇见来自骑兵一批又一批投掷过来的标枪，最后仓皇逃离战场。就在这一时刻，莱伊利乌斯利用战象所制造出来的混乱，向迦太基骑兵进行冲锋攻击，将他们击溃，逐离战场，然后进行追杀，正如马西尼沙在右翼一样。与此同时，除了汉尼拔从意大利带回的士兵仍留在原处外，对峙的重装步兵仍以缓慢但坚决的步伐互相攻往对方。当这两边到达打击的距离时，罗马部队发出战吼，习惯地以刀剑敲击盾牌，冲向敌人，而来自迦太基一方的佣兵则升起一股各式叫呐呼喊的声音。因为他们并非都以相同的语言说话，如荷马在谈及特洛伊军队时所言：[11]

此处没有共通的语言；

这支军队的语言有许多及怪异

他们来自的家乡既多又远。

正如同汉尼拔军队的组成一样。这我已经刚刚描述。

13.整个战争变成人对人之间的搏斗。[12] 在这场战斗中，佣兵的勇气及技巧给他们最初的优势，成功地伤害了许多罗马人。但即使如此，罗马人行伍的坚定以及武器的优越，使西庇阿的人马强迫敌人让步。这时候，罗马人后排部队紧贴在他们前面的同志，鼓励他们向前，相反，迦太基人却是懦弱地退却，没有支持他们的佣兵。结果是最后这些野蛮人自己退下来；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被自己的一方所放弃，所以当他们后退时，他们开始攻击后方的士兵，将他们击倒。这行动强迫迦太基人勇敢死去，尽管自己如何不愿，因为当他们发现自己被佣兵屠杀时，他们被迫违反自己的意志来同时攻击罗马人及野蛮人：当他们被逼到墙角时，他们以搏命的勇气来保卫自己，杀死许多敌人及佣兵。迦太基人的反攻甚至让一些前线部队的连队陷入混乱，但一旦中线部队的军官看见所发生之事，他们稳住自己队伍的阵脚，所以大多数的佣兵及迦太基人都在他们所站立之处被砍倒，无论是被自己一方或是被前线部队。汉尼拔那时禁止逃跑的幸存者逃入到他自己老兵的行列中；他命令他后排的行列将标枪瞄准，在他们靠近过来时，将他们吓阻，所以他们被迫往两翼或是往开放乡间逃命。

14.这两边剩余军队的中间地带现在布满了血腥、尸体以及伤患，而敌人溃败之后所形成的实体障碍，造成罗马将军的问题。每件事结合起来都让他无法在前进时仍保持队形：地表上因血迹而湿滑，尸体躺在血液浸透的尸堆里，之间的地带则满布随意丢弃的断肢。然而西庇阿首先安排他自己的伤患被运送到后方，接着以号角召回那些追杀敌人的前线部队。然后他在之前战斗已经发生之地的前面，面对敌人中央，重组前线部队，命令中线部队和后线部队部署完成，经过尸首，以密集队形在两翼站好位置，与前线部队对齐。[13] 当他们越过这些障碍，将战线部署整齐，两军皆以最大的奋战精神及愤怒冲向对方。因为他们不仅在人数，而且在勇气、战斗精神以及武器上都势均力敌，战争结果在很久一段时间内一直悬疑不定。双方在他们所站立之处以最大决心应战，都有许多人战死倒下，但最后马西尼沙以及莱伊利乌斯的骑兵队，在追击

迦太基骑兵之后回来，并且因为运气之故，恰好于关键时刻抵达。当他们从后面冲向汉尼拔的部队，有更多人在行伍间被砍倒，而那些逃走之人只有一些成功逃命，因为骑兵紧追在后，而地形十分平坦。罗马人损失超过一千五百人，但在迦太基一方则超过两万人被杀死。几乎有一样多的人被俘虏。

15.这是两位统帅最后战役的结果。这场战役决定了整个战争。当战斗结束，西庇阿往前移动追逐敌人，掠夺迦太基营区，然后回到自己营区。汉尼拔在一些骑兵陪同下，不停奔驰，直到他安全抵达哈德鲁曼敦。在这战役中他运用一位经验丰富之优秀将军所会运用的方法。首先，在他与西庇阿会面时，他尽其所能地凭借一己之力，在战前取得解决方案；以这方法他显示出，即使他作为一位期望得到胜利之人，但却仍然不能信赖命运女神，十分清楚不可预期的成分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然后一旦他投入战争之中，他以如此方法去处理军事行动，所以不可能有任何统帅在具有如汉尼拔军队之装备的情况下，可以做出更佳的部署来对付罗马人。罗马军队所采用的部署十分难以突破，因为它允许每个人以单兵或是集体合作来作战；其效果是要提供一种队形，能够在任何一个方向呈现出一个阵线，因为最靠近危险威胁之处的连队，可以回转过来以面对危险。他们所持的武器既能提供保护，也灌输给他们极大的信心，因为盾牌的面积以及刀剑的强度都可承受屡次的劈击。所有这些因素都让罗马人在战斗中成为可怕的对手，非常难以克服。

16.在应付罗马方面的每一个优势，以及在关键时刻使用每种可以合理被期待会成功的资源上，汉尼拔展现出一种几乎难以超越的技能。他聚集大量的象群，将它们安排在军队之前，其明显的目的是要令敌人陷入混乱之中，打乱他们的队形。他亦部署佣兵在前，迦太基人在后，希望敌人在最后决战之前会因为单纯的大量杀戮，而在肉体上感到疲乏，刀剑失去锋芒。除此之外，借着将迦太基人从两边围住，他强迫他们坚定站稳，并且奋战，所以用荷马的话说：[14]“即使那些厌恶战斗的

人，也将被迫参与战争。”

同时，他将作战部队中最骁勇善战及最坚定不移的人安排在后方一些距离外。他的意图是他们应该在一段距离外观察战斗，让他们的力气以及精神保持完整，直到他可以在关键时刻使用到他们善战的素质。在采取他能力所及之每种措施来取得胜利后，假如这位统帅在此之前未曾尝过败仗，但在最后却失败了，我们必须原谅他。有些时候命运女神会阻碍勇者的计划，而其他时候，如谚语所言，“一位勇敢之人遇到比他更强的人”。正是在这场合中，我们或许可说是发生在汉尼拔身上。

17.有些时候人们会以一种超出他们民族平常习惯的方式来发泄他们的感受，而假如这情绪的表达看起来是真诚的，那是源自他们所蒙受到之不幸的巨大规模，激起那些看到或听到者的怜悯。另一方面，当如此表现只是一种演戏及惺惺作态而已时，它不会引起怜悯，反而是愤怒及敌意。这正是迦太基代表在这场合所发生之事。

西庇阿对迦太基代表团先做一个初步的简短声明。[15] 他说罗马人没有义务为了他们的缘故去善意对待他们，因为他们自己承认违反条约，占领萨贡托，奴役其人民，开启对罗马人的战争；而比较近来的是，他们违反他们已经签署，并且宣誓要遵守的停战协议，犯下背信之罪。[16] “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他继续说，“以及考量到命运之浮沉不定，还有对人性的要求，我们决定要展现宽恕，要慷慨对待你们，而假如你们认识到真正事实为何，这对你们将会十分清楚。当然假如我们强迫你们去遭受一些惩罚，或是遵照某种形式方法，或是要放弃这个或那个财富，你们应该不会觉得奇怪；而恰恰相反的是，假如我们给予你们任何恩惠的话，你们应该认为这是未预料到的让步，因为正是因为你们所犯下的过错，所以命运女神才剥夺你们有任何权力去要求怜悯或宽恕，使你们受制于敌人所有的摆布之下。”在说完这前言之后，他解释将要对他们所做的让步，以及他们要接受的惩罚。

18.以下是罗马人所提出条款的内容。迦太基将保留它最近对罗马开战前所拥有的非洲城市，所有之前的领土以及牛群、羊群、奴隶以及其他财产。迦太基人从那天开始不再遭受进一步的伤害，[17] 他们应该以自己的法律及习俗来统治，而且不会有罗马驻军进驻其间。这些是罗马所做的让步。相反性质的条款则如下。

迦太基人将因为在停战期间所做的所有不义行为，赔偿罗马人；在任何时候落入他们手中的战俘及逃兵必须要遣返；除了十艘三层舰外，所有战象[18] 以及战舰都必须交出；他们不得对任何非洲之外的民族作战，而且除非得到罗马同意，亦不得对非洲内的民族作战；[19] 他们要归还马西尼沙后来被分配到之疆土内，所有属于他或他先祖的屋舍、领土、城镇以及任何其他财产；他们要提供给罗马人足够三个月的谷物以及薪资，直到他们从罗马收到关于条约的回应；他们必须在五十年期间支付一万泰伦[20] 的银钱，以优卑亚制为单位，每个月五十泰伦[21] 的分期付款；[22] 他们要交出一百名人质作为诚信的保证。这些人将由罗马指挥官从这国家里十四岁到三十岁之间的年轻人中选出。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结束

19.这些是西庇阿对迦太基特使所宣布的条件，他们在接受通知后，立即回去向他们在迦太基的国人解释。在这场合中，据说一位元老决定要发言反对接受这些条约，而事实上他也已经实际开始如此做时，汉尼拔走向前，用力地从讲台上拉他下来。当其他成员对这种破坏元老院传统感到愤怒时，汉尼拔起身，坦承他犯错：假如他的行为违反他们的习惯，他们必须原谅他，因为他们知道他在九岁时离开，而只有在他现在四十五岁时才返回迦太基。他因此向他们呼吁不要将注意力局限在他是否违反院规这问题上；他们反而应该去思考：他究竟是否真正关切他的国家，因为正是因为这理由他才犯下这不良的行为。他告诉他们说，“我很惊讶，而且确实超过我的理解之外，任何人若是迦太基公民，并且充分了解我们在对付罗马时所采取的个别及集体政策，竟然有人不知感谢他现在的运气，因为当我们在他们的摆布之下，我们竟然能得到如此宽容的条件。假如你们在几天前被问到，”他继续说道，“假如结果是罗马胜利，你们期待你们的国家会遭受什么。这威胁我们的灾难那时是显得如此排山倒海，所以您甚至无法表达出你们的恐惧。所以我现在恳求你们甚至不要辩论这问题，而是直接宣布你们无异议接受这些提议，向神明进行献祭，并以一致的声音祈祷罗马人民会批准条约。”

所有元老认为这建议构思良好，因为极为适时，所以他们决议要以上面所列之条件来订定和约。迦太基元老院接着立即派出使节，训令他们接受条件。[23]

在马其顿、叙利亚及埃及之事务

20.难道这不令人惊奇吗？当“爱父亲”托勒密四世还在世，无需来自马其顿及叙利亚国王的协助时，他们非常乐意提供；但一旦他过世，只留下一个小孩作为继承人，他们原来的天生职责是要协助保存他领土的完整，他们却反而立即冲去分割他的王国，彼此怂恿对方去毁灭这无助的孤儿。他们甚至不像在僭主中所常见的，会去为自己捏造出任何琐碎的借口，而像是立刻以一种如此野蛮猎食的方式去进行，所以我们只能将他们的行为比喻成像鱼群一样。因为据说在鱼群中，尽管它们属于同类，但大鱼却是以吃小鱼为生。这两位国王彼此签订的协约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对神明邪恶以及对他人残酷的真实形象，遑论这两人毫无止境的贪婪。虽然人们或许会认为在这例子上，他们有道理去责怪命运女神如此处理人间事务，但应该也可以原谅女神，当他们知道女神在之后如何使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公平的代价，以及女神如何以这些国王为镜鉴，为后代竖立起一个无法忘记的教训。因为就在他们正在彼此背信，瓜分这小孩的国家时，女神将罗马人带来，以符合正义以及适当方式，以他们想恶毒地加诸在对方身上的侮辱，反而加诸在他们两者身上。因为两位国王很快就在战争中被征服，所以不仅被禁止去贪图他人财产，甚至被迫要去缴交贡赋，臣服于罗马的命令之下。最后，在短时间之内，命运女神又再度抬举托勒密的王国，而对其敌对的王国，女神则在其中一例中，施加完全的毁灭，另一例则是带来一连串的不幸，所以几乎导致相同的毁灭。

在埃及之事务：一场宫廷革命

【“爱父亲”托勒密四世是位软弱的统治者，生活形态懒散放荡，把从二二○年到二○四年的统治，当作“宛如一场永远的庆典”（页291）。这国家由他机巧、不择手段的国政顾问索西比乌斯来管理，他却仍然无法阻止这王国在国外及国内严重的衰退。托勒密在二一○年获得一子，立即被宣布为共同的统治者。大约在二○七年，“爱父亲”与他能干贤惠的皇后阿尔西诺伊（Arsinoe）仳离，落入国王新宠的情妇阿加托克勒亚（Agathocleia，阿加索克利斯之妹）以及欧南特（Oenanthe）（他们两人的母亲）的影响。与此同时三角洲以及上埃及发生叛变和分裂运动，严重动摇国家安全。在二○四年“爱父亲”过世，在那时候索西比乌斯及阿加索克利斯掌握权力，谋杀阿尔西诺伊，假造遗嘱，任命他们为这七岁继承者“神显灵”托勒密五世的监护人。根据波里比阿的记载，索西比乌斯在世时，曾经主谋，导致莱西马克斯（“爱父亲”之长子）、马佳斯（“爱父亲”之弟）、贝蕾妮丝（“爱父亲”之母）、斯巴达的克里奥米尼斯以及阿尔西诺伊（“爱父亲”之妻）的死亡。他自己在二○三年过世，将摄政大权留给意志薄弱的阿加索克利斯。针对后者而发的群众暴动在二○二年爆发。培琉喜阿姆（Pelusium）地区的军事统帅特勒波勒摩斯（Tlepolemus）接替阿加索克利斯为摄政，掌权到一九六年。在这期间，马其顿之菲利普以及叙利亚之“大帝”安条克三世，协商出无所顾忌的条约，决定瓜分托勒密一些埃及的海外领土。菲利普在二○一年占据萨摩斯，而安条克则在二○一年入侵空叙利亚，深入到西奈（Sinai）沙漠。】

26.阿加索克利斯第一个行动便是召开马其顿卫队[24]的会议，并且在阿加索克利斯及男孩国王“神显灵”托勒密五世陪同下，在他们之前出现。最初他假装泪水让他呛到，所以无法言语，然后装模作样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将男孩国王在手上举起，高呼：“接受这男孩，他的父亲‘爱父亲’在临终时委托到这女人手中，”讲到这里他指向他的妹妹阿加索克利斯，“并且信赖你们的忠诚，马其顿的士兵们。可惜，她的爱心无法成为命令，来确保这男孩的安全，所以他的命运只有依赖你们及你们的力量。对你们所有有眼睛的人，这一直都十分清楚，特勒波勒摩斯[25]一直阴谋计划，要夺取远高于他的权位，现在他甚至指出在哪日哪

时，意图登上王座。你们无须只依赖我所说的话来判断这事的真实性；你们可以询问那些知道事实，而且刚从这些事件之地点回来的人。”当他在说此事时，他将克里图劳斯（Critolaus）带向前去，证实说自己亲眼见到祭坛已经摆出，祭祀牲品在人们面前准备，准备进行加冕典礼。

当马其顿卫队听闻此事，非但没有被阿加索克利斯所说的话而感动怜悯，反而置之不理，以嘘声及窃窃私语来显示对他的鄙视，所以他几乎不知道自己要如何逃离聚会。非常类似的场景发生在其他军队单位的集会中。在此期间，一些人陆续从上埃及的驻军地点搭船过来，而所有人都向他们的朋友及亲戚呼吁，要在目前状况中出来协助，不要袖手旁观，让他们落入如此毫无价值之人手中，忍受野蛮的暴政。但是最刺激士兵去对政府进行报复的因素是，因为特勒波勒摩斯已经控制所有进口补给品到亚历山大的渠道，所以潜在的任何耽误对他们都是危险的。

27.此外，阿加索克利斯及支持者有项动作特别激怒群众以及特勒波勒摩斯。特勒波勒摩斯的岳母达那厄（Danae）被从谷神迪米特（Demeter）的神庙带出来，在没戴面罩的状况下，被拖行通过市中心，然后投入监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阿加索克利斯要清楚表达对这位将军的敌意。这种冒犯行为如此激怒群众，所以他们不只在私底下或秘密中来谈它；有些人在夜晚时，在所有城墙上涂鸦，表达对当权者的厌恶，其他人则甚至因为相同的目的，相当公开地聚会。

当他看见这些逐渐升高的敌意，阿加索克利斯开始为自己的安全担心，曾有一时考虑逃离国家，但因为他甚至在准备逃亡时，都缺乏先见之明，于是很快就放弃了这想法。他接下来的一步是列出一张加入阴谋的人名清单，将立即处决他的一些敌人，逮捕其他人，并且为自己夺得绝对的权力。当他仍忙于这项阴谋时，国王的一位私人幕僚莫拉坚尼斯（Moeragenes），被指控将所有宫廷里进行的事，通风报信给特勒波勒摩斯，并为他工作；据说他之所以为他工作，是因为他与邻近布巴士提

斯（Bubastis）行省总督阿迪右斯（Adaeus）的友谊。阿加索克利斯于是立即命令他的国务秘书尼可斯特拉托斯（Nicostratus）逮捕莫拉坚尼斯，以各种酷刑来威胁，进行彻底的质问。莫拉坚尼斯立即就逮，被带到宫廷的一个偏远地方；他最初被直接以一般方法来针对相关指控讯问；当他拒绝承认任何一项，于是被脱光衣服。一些逮捕他的人开始准备刑具，其他人则鞭子在手，自己脱下衣服。但在那一刻，一位奴隶跑向尼可斯特拉托斯，向他耳语，立即又跑出去。尼可斯特拉托斯立即跟随他，没发一语，只是重复地以手拍打大腿。

28.莫拉坚尼斯现在发现自己的处境是如此异常，几乎无法形容。有些逮捕者紧站旁边，正将鞭子举起准备要打下去，其他人则在他眼前准备刑具。当尼可斯特拉托斯匆忙冲出时，所有人都彼此相望，呆若木鸡，停止动作，期盼他随时返回。接着时间一拖，他们一个接一个溜走，只剩莫拉坚尼斯独自留下。在这之后，他自己都非常惊讶，竟然可以自行穿过宫廷，直到他半裸地撞进附近一个由马其顿卫队占用的帐篷。当他遇见他们，他们恰好都正坐在一起食用早餐，所以他告诉他们他的故事，以及他逃跑的怪异方式。有些人一开始根本不相信他的故事，但当他们见到他没穿衣服，又不得不相信。莫拉坚尼斯趁机利用这情势的完全转变，眼中带泪地向马其顿人提出诉求，不仅要协助救他，也要考虑国王安危，但特别是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他让他们深自认为，他们若没有捉住现在正当民怨正沸，每个人都想惩罚阿加索克利斯的机会，他们自己会面临必定的毁灭。他提醒他们，人民的情绪正在沸腾，所以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刻，而这只需要有人首先发难。

29.这些话最后终于激起马其顿人采取行动，他们同意莫拉坚尼斯的建议，开始行动。他们立即从巡回马其顿卫队的帐篷开始，之后去探访其他部队，这些彼此接近，都在面向城市里相同的区域。人民长久以来一直处于即将叛变的情绪中，而这只需一人有勇气登高一呼；接着，一旦这企图开始，叛变便像野火燎原般地扩散。在仅仅四小时内，城市

内所有民族的人民、市民及士兵，都同意发动叛乱，反对政府。

在这一时刻，连机运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来协助他们达到目的。有一封信恰好落入阿加索克利斯的手中，而一些间谍被带到他面前。这封信是特勒波勒摩斯向军队宣告，他立即会在亚历山大现身，而间谍报告说其实他已经现身。这让阿加索克利斯陷入如此恐慌之中，变得无法采取任何行动，甚至无法去思索环绕他身边的危险。所以他反而像平常一样，在固定时间去喝酒，以在宴席间习惯的方式恣意放纵。他的母亲欧南特也陷入沮丧，前往两位女神的神庙（Thesmophorium），[26] 因为年度祭祀之故，所以神庙是开放的。在那里她双膝落地，以表情丰富的姿势祈求女神协助，然后自己坐在祭坛附近，沉默不语。大多数出现的女人都乐于见到她如此颓丧消沉；她们也不发一语，但是波吕克拉特斯（Polycrates）的一些亲戚及一些贵族仕女尚不知即将来临的危险，前去安慰她。但欧南特对她们尖叫："不要靠近我，你们这些怪物！我太清楚你们的心思，想如何对我不利，我清楚你们如何向神明祈祷，希望最坏的事会降临我们。但尽管如此，假如这是天意，我相信你们有一天会吃下自己孩子的骨及肉。"说完这些话，她要求随从将女人驱走，而假如她们拒绝离去，便以木棍赶她们。但就她们来说，她们趁机利用这机会，集体离开神庙；她们也同时向神明举手祈祷，祈求欧南特自己会遭受她威胁别人的命运。

30.城市的男性居民已经决定要起而反叛，现在女性的愤怒又在每个家庭里火上加油，所以群众针对阿加索克利斯的怒火加倍猛烈燃烧。在夜晚降临时，整个城市充斥着喧闹的声音、火炬的火光以及急行的脚步声。有些人聚集在竞赛场里呐喊，有些人彼此打气，还有一些人四处奔跑，设法将自己躲藏在不太会被怀疑的地方。竞赛场、环绕宫殿的宽敞大道、城市主要街道以及酒神剧场之前的区域，都挤满了所有国籍的群众。在这时候，阿加索克利斯风闻正在发生之事，从酒醉昏睡中挣扎起身，因为他才刚刚解散酒宴，并且带着除了费罗（Philo）外的全家人

去晋见国王。他向男孩国王说一些话，在话中他悲悼自己的不幸，然后握着他的手，走向以米安德（Maeander）为名的亲水花园和摔跤场之间的遮覆长廊，这会导向剧场的出入处。在那里他锁住前两道门，并且只与一些卫士、国王及他自己家庭的成员，通过第三道门。每道门都有两道横栓，但门却都是格子细工的构造，所以可以看穿它们。

在这时候，暴民已经从城市各处群集，不仅开阔的空间，甚至屋顶及阶梯都站满人，而从那里发出一道持续但混乱的喧闹及叫喊，正如我们从妇女及小孩也混杂在男性群众中所能期待的；因为在迦太基，以及同样的，在亚历山大，孩童在这些骚动中，扮演和成人一样显著的角色。

31.当天破晓时，在这种普遍混乱里难以分辨出个别的叫声，但一个词句在其中却特别显著："带出国王！"马其顿卫队最先采取积极行动，前进占据宫廷谒见大门。很快，一旦他们发现国王在何处，他们绕过去，将长廊的第一道门从门枢移去，接近第二道门，然后大声叫喊，要求见到国王。阿加索克利斯现在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要求卫士为他带信给马其顿卫队，告诉他们他现在要辞掉摄政以及种种权力和头衔，还有他所有的俸禄，只要求保有性命及足够的维生水平，别无其他：所有他欲求的是退回到他原先在生活里的位置，而在那位置即使他愿意，也无法去伤害任何人。所有卫士都拒绝，但是阿里斯托米尼兹（Aristomenes）这位后来成为首席大臣的人，同意携带这信息。此人出身为阿卡纳尼亚人，而虽然他是在上了年纪后才取得国家的主要权位，但他能证明自己是位最值得尊敬、最谨慎看守国王以及埃及王国利益的人。当阿加索克利斯正位极人臣之时，他同样也是以奉承阿加索克利斯而著称，因此他后来在那职务上杰出的表现，显得更加可观。他是第一位邀请阿加索克利斯到宴会时，将他从所有客人中挑出，献给他一顶金冠的人，这是一项专属国王的荣耀。他同样也是第一位胆敢佩戴刻有阿加索克利斯肖像在戒指上的人，而当自己有位女儿初生时，他命名她为

阿加托马勒亚。

对此人之个性我已经说的够多，且回到我的故事。在答应为阿加索克利斯递话后，他从边门去见马其顿卫队。他还没说几个字来解释阿加索克利斯的提议时，马其顿卫队便想将他杀死。但一些士兵插手，向其他人请求饶恕他。阿里斯托米尼兹于是又返回宫廷，告知他必须带着国王一起出来，否则就不要再出来。在让他带回信息时，马其顿卫队已经到第二道门，将它打破。阿加索克利斯和那些与他一起的人从马其顿卫队的行为以及他们的语调中，知道他们现在的心情是会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因此向士兵恳求慈悲，说出所有能够激起他们怜悯的话，至少到饶恕他们生命的程度；阿加索克利斯甚至做到将手伸过格子窗，而阿加托马勒亚则是挺出她的胸部，说她用它们哺乳了国王。

32.但最后，他们发现对他们命运做再多的悲悼都无济于事，他们于是将年轻国王及保镖一起送出。马其顿卫队将男孩接到他们那里，直接将他安放在马匹上，陪同他到竞赛场。他出现在那里，受到高声欢呼以及鼓掌欢迎，在那时他们停下马匹，将男孩抬下，引他向前，让他端坐王位。至于群众，他们的感觉现在是在欢欣及愤怒之间分裂：他们欢欣，因为国王已经被带到他们面前；但是愤怒，因为犯罪之人尚未就逮，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他们持续喧嚣，要求那些让人民蒙受邪恶的负责人被带出来，要杀鸡儆猴。在这时候，白天已经过了许久，但是人民还是没发现任何人可以作为发泄怒气的代罪羔羊。在这时候索西比乌斯——他是同名政客的儿子——身为保镖中的一员，特别关切国王及国家安全，他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其他希望可以安抚暴民的愤怒。他也见到年轻国王沮丧，部分是因为那些围绕在他四周的不熟悉面孔，部分是因为群众骚动，所以他询问国王是否同意交给人民那些曾以任何方式伤害他或他母亲的人。男孩点头，在那时索西比乌斯告诉保镖去宣布国王的决定；接着他将国王从王座举起，将他带离，在附近自己家里照顾他。当国王的意旨公开后，极大欢呼的吼声以及鼓掌在整个竞赛场中爆

发出来。在这期间阿加索克利斯及阿加托马勒亚已经分手，回到各自家中。一群士兵——有些是自愿的，而其他士兵则是在群众敦促下——立即出发去寻找他们。

33.接着所发生的谋杀及流血则导因于一件意外事件。一位阿加索克利斯的随从以及奉承者叫费罗，离开宫殿，并在酒醉状况下走入竞赛场；当他观察到士兵骚动的情绪时，他向站在旁边的人说，假如阿加索克利斯出来的话，他们就会有理由忏悔他们现在的行为，正如在之前曾发生过的。当旁观的人听到这些话，有些人开始责骂他，其他人则将他推来推去。当他设法自卫时，有些人立即将他的外衣给撕开，而其他人则以枪矛对准刺向他。他很狼狈地被拖入竞赛场正中央，仍然还有气息，而人民一旦尝过鲜血，变得开始热切等待更多其他牺牲者的到来。不久之后阿加索克利斯便在手镣脚铐加身之下被引领进来；一旦他出现，群众奔跑过来，立即刺杀他。这在实际上是种同情而非敌意的行为，因为其结果是使他免于遭受他所值得的恐怖来受死。接下来尼孔被带进，然后是阿加托马勒亚；她以及两位姊妹被脱光衣服；她们之后则是所有其他的亲戚。最后一位是欧南特，他们将其从两位女神的节庆（Thesmophorium）中拖出来，放在马匹上，让她裸体骑马进入竞赛场。那时他们所有人都被交给愤怒的群众：他们有人用牙齿撕裂他们，有人用锐器刺击，其他人则挖出他们的眼睛。一旦有人倒下，他立即会被扯裂成身首异处、肢体四散，直到被完全肢解为止，因为一旦他们的激情被惹起的时候，埃及人的野蛮天性确实惊人。与此同时，有群少女曾是皇后阿尔西诺伊的随从，得知费拉蒙（Philammon）是造成她被谋杀的元凶，在三天前从昔兰尼抵达。她们那时冲到他家，破门而入，以棒棍石头杀死费拉蒙，将他不过是小孩的儿子绞死，然后她们报复的最高潮是将费拉蒙的妻子裸体拖到街上，当场杀死她。如此便是阿加索克利斯、阿加托马勒亚以及他们家族的结束。

34.我十分清楚有些作者在编年记录这些事件时，会求助曲折以及

耸动的描绘，只不过是为了让读者有强烈印象，所以往往超过适当地叙述实际发生之事的必要程度，擅自加油添醋。有些人将整个事件过程归诸命运女神，强调她反复无常的性质，以及人类无能去对抗她所带来的起伏变化，而其他人则致力于对不可预期之事给予理性的陈述，设法让每件事都有道理或可能原因。然而以那样的方式处理议题，从来都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理由是阿加索克利斯身为军人，无论就其能力或勇气，毫无可观之处；作为政客，他没受命运女神青睐，而且在处理事情的方法上，绝非可做模范；身为廷臣，他既不精明老练，也没有阴谋算计的功夫。但这些能力却使得索西比乌斯及其他许多人，在处理一位国王接着一位国王的事务时，能始终如此成功。事实上，在这角色上，阿加索克利斯恰好与我刚提及之人相反，但因为“爱父亲”托勒密四世是位软弱的统治者，所以他才能在没人预料之下，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在到达那位置后，虽然历经国王之死，他因为位居有利位置，得以维持权势，但却因为自己的胆怯及怠惰，同时丧失地位及性命，并且在很短时间内被众人唾弃。

35.如我已经解释，对于如是议题，以妄加评论及分析来扩大叙述，并无益于目的。但就西西里人阿加索克利斯、戴奥尼素一世和一些其他杰出统治者而言，则是另一种故事。在这两个人之中，第二位始于微寒卑贱的地位，而阿加索克利斯——如泰密乌斯以贬抑的影射所告诉我们的——原先是位陶匠，离开他的制陶辘轳、陶土以及乌烟瘴气，在年轻时来到叙拉古。首先，他们都在自己的时代最后成为叙拉古僭主，这城市在当代就其尊贵及繁荣，都是首屈一指，后来他们都被认可为整个西西里之王，[27] 甚至统治意大利的一部分。除此之外，阿加索克利斯不仅企图征服非洲，而且在他过世时，仍然握有他之前所拥有的领土。因为这个理由，所以当西庇阿这个最先击败迦太基的人，一度被问到他认为哪一位是最成功的政治家，一位同时结合勇气及智慧之品德的人时，他回答说“西西里人阿加索克利斯及戴奥尼素”。[28] 挑选出如此之人的生涯来引起读者注意，提及一些命运女神之无常以及人类事务之

不确定，还有指出其中历史教训，这是正确的，但是就埃及阿加索克利斯的情形，所有这些必然是不适当的。

36.因为这理由，我拒绝扩大发挥埃及阿加索克利斯的故事。不如此做的一个理由是这一事实：所有命运女神如此惊人的转折，只会在第一次被呈现给我们的时候，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之后不仅在读到它们或是在心中记得它们，都会变得无益，而且事实上，对如此事件做出逼真的描绘，甚至会产生某种反感。

对那些想利用他们的眼睛及耳朵来研究任何议题的人，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亦即他们自身的改善以及他们获得的愉悦，这些都应该在他们心思中占有优先的位置；这原则特别适用于历史研究，在那里假如耸人听闻的事件被不成比例地强调，那这两个目标将不会达成。首先，命运的异常转折不会让读者激起想模仿它们的欲望；其次，没有人会从见证或阅读那些与自然及常人经验相违背的事件中，得到任何持久的愉悦。诚然，我们的确会有兴趣见到或听到仅发生一次及第一次发生的事，但只不过是为了发现那显然不可能之事却实际上发生；但在那点好奇心得到满足后，没人会对不断沉溺于不自然之事感到喜悦，甚至的确除了不得不外，宁可不要遇到这类事。于是我们所被告知之事，或许能给我们愉悦，或许能引起我们模仿的欲望，所以对那无法产生这些效果的事件去做复杂扩大的处理，比较适合悲剧的艺术，而非历史。

但或许我们应该原谅那些对依循世界自然法则或一般经验过程的议题，不去加以发挥的作家。因为他们习惯认为过去历史中最重要及最可观的事，是那些他们恰好在自己经验中遇见的，或是他们从他人之处听闻并留下特别印象的故事。结果是他们投入比应该有的更多篇幅在那些既非原创——因为其他人已经陈述过——也无法给人教诲或愉悦的事情上。我对这主题已经说得够多。

[1] 这提及那已经佚失的部分历史。马西尼沙在页558所提及之休战协议时，便立即行动，以从西法克斯手上赢回他的王国。

[2] 亦即马西尼沙的征战获得罗马人的充分支持。

[3] 现在以苏斯（Sousse）为人所知，大约在突尼斯南方七十五里。

[4] 这次会面在李维的《汉尼拔之战》三十书30至31章中有报道，而且在本质上并非不可能。汉尼拔或许希望避免战争，或是寻求机会来会见，或评估他的对手。

[5] 这里所提出的条件比在迦太基破坏停战协议之前的还要少很多，所以西庇阿几乎无法期望有任何机会去说服公民大会去接受它们。

[6] 甚难理解何以迦太基政府在所有那几年中，未曾提出要撤出意大利，那时候如此提议可能可以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

[7] 约三八七九○千克。——译者注

[8] 见特别是页132以及页391至392有关波里比阿对查马战役如何塑造世界史进程，所具有之重要性的看法。

[9] 亦即让战象没有障碍地通过队伍。通常这间隔等于连队本身的宽度，所以传统的布阵看起来会像是西洋棋的棋盘。

[10] 有可能所有这些佣兵都是最近才招募的。不太能确定巴利阿里人及毛里塔尼亚人是投掷手以及轻骑兵，或是匆促地被训练为步兵，如在页570对战斗之描述所影射。汉尼拔的战术显示出他认为前线部队是可以牺牲的，希望在迦太基老兵上阵之前，借此来消耗磨损罗马人，将他们的武器弄钝（见页571）。

[11] 《伊里亚特》四书四三七行。

[12] 亦即现在战斗是以罗马人的方式进行，有别于希腊重装方阵兵团的集体冲击。

[13] 这并非以减少个别士兵之间的距离来达成，而是将连队与连队之间的间隔填满。

[14] 《伊里亚特》四书三○○行。

[15] 李维《汉尼拔之战》三十六书10至11章说，尽管在罗马人之中有普遍的愤怒以及希望摧毁迦太基的冲动，但西庇阿决定在这时候提出和平条件。他所提出的理由是在围攻迦太基时，可能必须做出极大的牺牲，还有他担心他的

继任者或许会揽走功劳。

[16] 亦即因为攻击罗马人特使（见页560至561）。

[17] 亦即对他们领土的侵犯。生效日期或许是西庇阿将这些条件提交给迦太基特使的那天。

[18] 李维报道说他们被禁止去训练任何战象。

[19] 这一条款特别是针对在迦太基领域之外所进行的攻击性战争：亦即，这假设迦太基如果在非洲之外作战，它必然是挑衅者。李维的陈述则禁止在非洲境内针对罗马的盟友作战。这一条款，例如说，便会涵盖迦太基对马西尼沙所采取的行动，而这反而导致马西尼沙对迦太基屡次的侵略，这最后导致第三次布匿战争的发生。

[20] 约二五八六○○千克。——译者注

[21] 约一二九三千克。——译者注

[22] 这五十年的还款期限是意图来延长臣服的时间，并避免提前缴清赔偿金。

[23] 特使首先回到西庇阿，然后迦太基人被给予三个月的停战协定，而在这期间他们要派遣特使到罗马。在罗马对特使团进行听证，以及决定以西庇阿所推荐之条件来订定和平条约，在李维《汉尼拔之战》三十书四二至四三章有所形容。

[24] 马其顿后裔拥有囤垦地，构成埃及军队里最重要的部分。

[25] 一位能干的军人，出身于一个移民到埃及的显赫波斯家族。

[26] 这神庙坐落于城外东边一小段距离之处。两位女神祭典（Thesmophoria）系有关丰饶，为尊崇谷神迪米特以及其女儿波赛凤妮（Persephone）而举行，时间通常是在十月、十一月播种时。

[27] 这严格来说并不正确。戴奥尼素未曾使用国王的头衔，也没以自己的形象来铸造钱币。

[28] 波里比阿在此并不一致。没有理由认为西庇阿会十分欣赏如此独裁统治者的类型；他更可能认为这些人是迦太基人成功的对手。

第十八书

在希腊之事务：弗拉米宁与菲利普

【菲利普五世在二○○年到一九八年对罗马人进行战争，但遭遇诸多不顺，要求会面进行协商。弗拉米宁自己未来任命的问题，仍然在元老院中讨论，也发现这是一个争取时间的有效办法。这会议于一九八年十一月举行。】

1.在为这会议所预定的时间到来时，菲利普从马利亚（Malia）湾的迪米特利亚斯港出发。他搭乘舰首突出的旗船与五艘设有甲板的船舰一起航行，由他的马其顿秘书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和德摩斯梯尼斯，还有来自彼奥提亚的布拉纠利斯（Brachylles）[1] 以及亚该亚人塞克利亚达斯（Cycliadas）[2] （此人因为我已经提及的理由而被驱离伯罗奔尼撒）陪同。与弗拉米宁 [3] 一起的有阿塔曼尼亚（Athamania）的国王阿密南德（Amynander）[4] 和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Attalus）一世的代表戴奥尼索多禄斯（Dionysodorus），而其他不同希腊民族及城邦则由亚该亚之阿里斯泰纳斯（Aristaenus）和色诺芬，罗德岛海军将领阿克欣布鲁图斯（Acesimbrotus），以及伊托利亚将军费尼亚司（Phaeneas），还有其他数位来自伊托利亚的政客。弗拉米宁与陪同他的人抵达尼西亚（Nicaea）的海岸，[5] 聚集在沙滩上，站着等待。然而菲利普在将船只靠近陆地时，却仍留在船上；当弗拉米宁要他上岸时，他从船上位置起身，拒绝下船。弗拉米宁再度跟他说话，但这次是问他担心什么，对此菲利普回应，他除了神明外，什么都不害怕，但他不信赖那些在场的大多数人，特别是伊托利亚人。当罗马将军显示出惊讶，说相同的危险都会发生在在场所有人，所以几率是一样的，菲利普回答

说他错了，因为假如有任何事发生在费尼亚司身上，有相当多人可以领导伊托利亚人，但假如菲利普失掉性命，目前没有人可以继承马其顿的王位。

所有在场的人认为，国王以这种方式开始会议，明显欠缺灵活手腕，有失大体，但弗拉米宁敦促他应该对任何说服他们来此会面的议题发表看法。菲利普说他不应该是第一位说话的人，而是应该由弗拉米宁先说，然后继续请他解释菲利普本人要做什么，才能得到和平。罗马将军回答说，他的职责指出了一个既简单又清楚的答案：菲利普必须撤离整个希腊，归还每个国家他现在掌握的战俘和逃兵，交还罗马在伊庇鲁斯签订条约后，他在伊利里亚里所掠夺来的区域，[6] 而且根据相同原则，也要归还在“爱父亲”托勒密四世死后，他从托勒密王国抢来的所有城镇。[7]

2.在说完这话后，弗拉米宁不再做更多评论，而是转向其他代表，要求他们根据那些派遣他们前来会议的训令，进行发言。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的代表戴奥尼索多禄斯首先起身发言。他宣布菲利普必须交还他在希俄斯岛（Chios）战役中，所掳获的船只以及一起被俘虏的水手，而且必须将靠近帕加马附近两个他摧毁的爱神庙以及“带来胜利者”雅典娜（Athena Nicephorus）神庙，恢复原状。之后是罗德岛海军将领阿克欣布鲁图斯要求菲利普撤离他从罗德岛人抢来的培拉以亚（Peraea），将驻军从伊阿索斯（Iasus）、巴吉利亚（Bargylia）及攸若摩斯（Euromus）撤走，[8] 允许培林特斯（Perinthus）人恢复他们与拜占庭人的政治结盟，撤出赛斯拖斯、阿比多斯和所有小亚细亚的海港及港湾。当罗德岛的代表结束时，亚该亚联邦要求科林斯及阿哥斯应该完整地归还他们。在他们之后，伊托利亚人开始时如罗马人一样坚持，菲利普必须撤离整个希腊，然后继续要求他必须没有损坏地归还他们那些之前属于伊托利亚联邦的城市。

3.在伊托利亚人费尼亚司提出这些要求后，一位同时兼具丰富政治家经验及能干演说家名声、来自伊索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Isus）[9] 起身发言。他攻击菲利普，理由是他在目前这时刻提出和平协议既不诚恳，而且在有必要进行战争时，他的方式也不勇敢。当他参加集会及会议时，经常在设计陷阱，注意机会，而且经常行动得像是在进行战争；但在战争时，他却又追求一个既不正义也不光明磊落的政策：他不会与敌人面对面作战，他的行为是在他们之前撤退，但边走边对城镇烧杀掳掠，而借着这方法，虽然自己被打败，但却也破坏了敌人胜利的奖品。早期马其顿国王却是以相反的方式行事，因为他们经常在开阔战场上彼此战斗，但甚少会去夷平或是蹂躏城镇。亚历山大在小亚细亚与大流士大王对战的战争中，他的行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坦坦荡荡，而且在亚历山大继承者长期的争斗中亦然：在这些战争中，所有人都是在战场上对抗安提柯一世，以争取亚洲霸权。而这些统治者的后人，直到皮洛士的时代，都遵守相同原则；他们经常乐于在公开战场上作战，并在能力所及范围内以武力征服对方，但他们放过城镇，所以无论任何人成为胜利者，必将能够统治它们，受其子民爱戴尊敬。但一个人放弃战争，却又同时摧毁战争之所以进行的目标，就不仅是疯狂，而是疯狂到极点，但这正是菲利普所做之事。因为当他从伊庇鲁斯的隘口[10] 强行军返回时，却比任何实际上对色萨利作战的人，还摧毁更多的城镇，尽管他是那国家的朋友及盟友。然后他以更多的例证来铺陈他的立场，最后亚历山大使用了这个论证。他问菲利普："为什么当莱西马奇亚城是伊托利亚联邦成员，并受伊托利亚人指派之军事总督统治时，他却将这军官驱逐，安插自己的驻军？他为何要将赛厄斯（Cius）人民贩卖为奴，这亦是伊托利亚联邦一员，但当时他自己本人却与伊托利亚人处于友谊状况中？最后，他现在有何借口去占据艾奇奴斯（Echinus）、否提尔提斯·底比斯（Phthiotic Thebes）、法萨卢（Pharsalus）以及拉瑞萨（Larsissa）？"[11]

4.当亚历山大说出这几点后，他结束激昂的演说，那时候菲利普将

他的船舰更靠近岸边，在甲板上起身回应。他告诉观众说，亚历山大发表了一篇典型的戏剧性、具有伊托利亚风格的演说。“我们都知道，”他说，“没有人愿意去摧毁自己的联邦，但是因为环境变化，统帅经常被迫要做许多违背他们决定要做的事。”当国王仍在演说，视力欠佳的费尼亚司打断他，说他胡说八道：“这其中真相是您必须或先是战斗，然后征服，或者是服从那些比您强大的人。”在说到这一点时，菲利普虽然处于弱势，但却无法避免他性喜挖苦别人的格调，所以他转向费尼亚司说，“是的，即使一个盲人都可以见到这一点，”因为菲利普对这种回话相当擅长，特别善于视敌人则渺之。他接着又向亚历山大说：“您问我何以要兼并莱西马奇亚。理由是要避免它因为你们的疏忽，被色雷斯人攻击，因而人口减少，而这确实是已发生之事，因为根据您的说法，现在进行的战争是要强迫我撤离驻军士兵，但事实上他们在那边正是要保护这地方。至于赛厄斯的人民，并非是我对他们宣战，而是当普鲁席亚斯一世如此做时，我协助他攻占这城市，而这也是你们的过错。我及其他希腊国家一再派遣特使，要求你们将那允许你们‘掠夺回那掠夺的战利品’的法条从法律中移除，你们却老是回答说，宁可将伊托利亚从伊托利亚移除，也不愿废除这法条。”[12]

5.弗拉米宁说他不晓得国王所指为何。菲利普设法向他解释说，伊托利亚人的习惯是不仅掠夺那些与他们正在交战国家的人员及领土，而且假如有任何其他民族彼此交战，并且双方都是他们的朋友及联邦，伊托利亚人是被允许给双方协助，所以同样地可以去掠夺两边的领土，而无需任何公共的议决来决定此事。换言之，在伊托利亚人眼中，对友好或敌意并没有适当定义的界限，而是他们随时可视任何陷于争议的国家为敌国，并对其进行战争。

菲利普继续说，“所以他们现在有何权力来谴责我，假如当我和伊托利亚人处于友好状况，并且和普鲁席亚斯一世结盟时，我去对付赛厄斯的人民，为的是要帮助我自己的盟友？但在所有之中，最令人气绝的

是，他们竟然胆敢将自己放在与罗马人一样的地位，要求马其顿人从整个希腊撤军。首先，使用如此语言已经是够傲慢；我们或许可以容忍罗马人如此做，但要是来自伊托利亚人，则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继续说，“无论如何，你们要求我应该撤出的是什么希腊，你们如何去定义它？当然，大多数的伊托利亚人本身就不是希腊人！阿格拉艾（Agraae）人、阿波多泰（Apodotae）人以及安菲洛奇亚（Amphilochia）人的国家不能被视为希腊人。[13] 所以你们允许我留在那些领域吗？”

6.听到这点，弗拉米宁无法遮掩他的微笑，在那时菲利普又说道，“这些是我所有能对伊托利亚人说的话。就罗德岛人及国王阿塔罗斯来说，我相信一位心态公正的仲裁者，会认为他们放弃那些船舰及其水手，会比将他们归还来得公平。并非我先对阿塔罗斯及罗德岛人进行战争，而是如众人所承认，是他们先对马其顿人开战。然而既然您要求这点，弗拉米宁，我同意将培拉以亚归还给罗德岛人，并将船只及仍然尚存的船员交还给阿塔罗斯。至于对‘带来胜利者’雅典娜庙以及爱神庙所造成的破坏，要去复原它们并非我能力所及，但我将送去植物以及一些园丁去照顾这地方，注意那些被砍断树木的生长。”弗拉米宁又再度对国王话语中的反讽发出微笑，然后菲利普又再度转向亚该亚人。他开始时，先细数所有他们从“多森”安提柯三世及之后从他本人那里获得的恩惠；他接着引用亚该亚人颁赠给马其顿统治者的特殊荣耀，最后他读出一道决议案，根据案文他们放弃了他菲利普，转而投靠罗马，然后他利用这场合来铺陈亚该亚人一般表现出来的反复无常及忘恩负义。但尽管他们有这样的行动，他答应将阿哥斯归还他们，但是关于科林斯，他说他要征询弗拉米宁。

7.当他结束对其他使节的演说时，菲利普转向弗拉米宁说，现在要讨论的是端赖于他自己与罗马人之间的事，并问罗马将军的心愿究竟是他应该退出那些他自己过去在希腊征服的城镇及地方，或是这撤退也要

包括那些他从先祖们继承来的土地。弗拉米宁此时保持沉默，但是阿里斯泰纳斯准备好要为亚该亚人发言，而费尼亚司为伊托利亚人发言，但时刻已晚，天色渐暗，所以无法进行。那时菲利普要求他们应该给他书面声明，写出他们和平协议的条件；他指出他只有一个人，没有顾问可以征询，所以希望能有时间思考他们不同的要求。弗拉米宁对菲利普语调中明显的嘲讽并没感到不悦，但他不希望其他人看到这一点，所以轮到他来开菲利普的玩笑，说："当然这次您是独自一人，菲利普；您已经杀掉所有能给您最好建议的朋友。"对这一点马其顿国王冷冷微笑，不发一语。那时所有使节都将他们的要求以书面交给菲利普，其中的条款都与我刚才形容的一致，并安排好次日在尼西亚恢复会谈后，他们分手离去。第二天早晨，弗拉米宁以及所有其他人在约定时间准时出席，但菲利普并未现身。

8.白天将尽之时，弗拉米宁那时几乎已经完全放弃希望，但菲利普在靠近落日之刻抵达，如昨日由相同随从相伴。他解释他花费时间细读使者们的要求，但陷于极大的困惑，以及不确定要如何去满足他们。然而其他代表都相信，他的目的是要借着压缩可进行讨论的时间，来避免亚该亚及伊托利亚人发言指控；因为在前一日，当他要离去时，他注意到这两位代表正箭在弦上，要攻击他，申述他们的冤屈。所以这次他来到这会面地点，要求罗马将军应该在私底下与他讨论局势。这会面的目的是他们双方应该停止只是言词上的攻防战，而是对争议事项达成确定的解决方案。

当他重复数次这样要求，极力推动这想法，弗拉米宁询问在场其他代表他该如何做。他们敦促他去与菲利普见面，聆听他要说什么。那时弗拉米宁召唤当时的军团营长阿匹乌斯（Appius Claudius）加入他；然后他告诉会议其他成员离开海岸一些距离，然后留在原地，而由他邀请菲利普上岸。国王那时下船，由阿波罗多洛斯和德摩斯梯尼斯陪同会见弗拉米宁，并与他举行一段时间的私人会谈。甚难说两人在这场合交换

什么意见，但他们分手后，弗拉米宁向其他代表解释国王的提议。他告诉他们说菲利普打算归还给伊托利亚人法萨卢以及拉瑞萨，但不包括否提尔提斯·底比斯；他将归还科林斯及阿哥斯给亚该亚人，以及培拉以亚给罗德岛人，但是不会从卡里亚地区的城镇伊阿索斯和巴吉利亚撤军。对罗马人他交出所有他在伊利里亚的财富以及所有战俘，而对阿塔罗斯他将交还船只以及所有在海战被俘虏而尚存活下来的船员。

9.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宣布他们不满所提出的和平条件，菲利普必须答应他们共同的要求，亦即从整个希腊撤出；没有这行动，所有其他让步既无价值，也无意义。在这期间，菲利普可以见到一场激烈的讨论正进行着，而因为他担心针对他所做的指控，所以他询问弗拉米宁是否将会议再延期到次日，因为天色已晚；他说他在下次会面或是说服其他人接受他的观点，或者是接受他们正义的要求。弗拉米宁同意这项要求，在安排特洛尼昂（Thronium）的海滩会面后分手。

次日，整个会议在指定地点准时开始。这次菲利普做简短演讲，呼吁所有使节代表，特别是弗拉米宁，既然大家都处于和解的气氛中，不要中断和平协商，而假如可能的话，他们彼此之间要对仍受争议之点达成协议。假如这不可能，他会派遣使节团到元老院，或是说服那团体接受种种不同的争议事项，或是执行它的议决。[14] 所有希腊代表的回应是，他们应该继续作战，不管菲利普的提议。然而罗马将军的观点是：虽然他很了解菲利普不可能同意他们任一项要求，可是因为菲利普的要求绝不会干预到他们采取行动的自由，所以他们应该答应这一点。其实没有一项提议可以在没提交给元老院的情况下，在会议中得到批准，所以除了要确定元老院的意见外，此刻在许多方面也正是时候。冬天使得军队无法上战场，所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征询元老院，不会有任何时间的损失，而且如此做法对所有相关各方都是有利的。

10.当希腊人注意到弗拉米宁无意反对将事件提交元老院时，他们

很快同意他的计划。决议结果是允许菲利普派遣特使到罗马，而其他国家也同样要派遣使节在元老院前说明，提出对他不利的说法。

这会议于是产生一个弗拉米宁可以接受的结果，而这相当符合他原先的预测，[15] 所以他立即将他计划的架构给组织起来，小心稳定自己的立场，不允许菲利普有不当的利益。因为虽然他给两个月的停战协定，他坚持马其顿国王必须在那段期间完成他派人到元老院的任务，而且必须立即从服吉斯（Phocis）及洛克里斯（Locris）撤军。他为盟邦积极行事，要让菲利普清楚：马其顿人在这段期间不得对他们进行任何敌意的行动。他将这些要求付诸文字，然后根据自己的权威来执行政策。首先，他派遣阿密南德到罗马去；他之所以选他，部分是因为他是位随和的人，可以轻易被弗拉米宁的朋友说服去遵照任何他们可能提出的方法；[16] 其次，他国王的头衔会让场合增添光彩，激起人们与他会见的兴趣。[17] 接下来，他派遣他妻子之甥侄费边（Quintus Fabius）和服拉费亚斯（Quintus Flavius）以及尼禄（Appius Claudius Nero）作为他个人的代表。来自伊托利亚的代表为伊索斯的亚历山大、德谟克利特（Damocritus of Calydon）、迪凯尔卡斯（Dicaearchus of Trichonium）、玻勒马霍斯（Polemarchus of Arsinoe）、拉米乌斯（Lamius of Ambracia）尼可马克斯（Nicomachus）——他之前被从泰瑞温（Thyrrheum）放逐，现定居在安布腊基亚（Ambracia）——以及一位从色萨利流亡、居住于史特拉托（Strato）的迪奥多突斯（Theodotus of Pherae）。亚该亚人代表是埃基提翁之色诺芬（Xenophon of Aegium），而阿塔罗斯送出亚历山大，雅典人选择凯菲索多禄斯（Cephisodorus）[18] 作为他们个别的代表。

11.当这些使节抵达罗马时，元老院尚未决定是否必须指派当年两位执政官都到高卢，还是其中之一去对付菲利普。然而当弗拉米宁的朋友确定因为来自凯尔特人攻击的威胁，两位执政官于是都将留在意大利时，所有希腊的使节都出现在元老院之前，以直言不讳的方式陈述不利

于菲利普的冤屈。大体而言，他们所做的指控与之前会面对国王所提出的雷同，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为了元老院的利益而特别强调：只要卡其斯（Chalcis）、科林斯以及迪米特利亚斯仍然在马其顿人手里，希腊人便不可能享有任何自由。当菲利普自己形容这些地方为“希腊的枷锁”（Fetters of Greece）时，希腊人声称他的用词实在太真确了。当国王的驻军驻扎在科林斯，伯罗奔尼撒人无法自由呼吸；当菲利普控制卡其斯以及优卑亚岛其他部分，洛克里斯人、彼奥提亚人以及服吉斯人无法有任何信心；同样，只要马其顿人还掌控迪米特利亚斯，那色萨利人或是迈格尼希亚（Magnesia）人不会享有任何自由。菲利普提议从其他地方撤离，不过是让步的姿态，来让自己从当时的危险中脱困，但只要他仍然掌握这些战略要地，他可以轻易地在任何他指定的那天，将希腊人降为臣属之民。特使因此敦促元老院，或是去强迫菲利普从这些城市撤离，或是坚守他们属于共同一方的协定，全力继续对他作战。事实上，整个斗争最艰苦的部分已经过去，因为马其顿人已被击败两次，已经耗费掉他们绝大部分的陆上资源。

他们以呼吁元老院站在他们的立场做一结尾，呼吁他们不要让希腊人被欺骗掉他们自由的希望，不要剥夺罗马人自己所应拥有的最高名声。[19] 这些或是一些与此类似的话是希腊特使演说的大要。菲利普的代表已经准备冗长的演说作为回应，但在开始之时，他们被禁止去发表它；因为当元老院对他们提问，究竟是否要从科林斯、卡其斯以及迪米特利亚斯撤离时，他们回答说他们对此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训令。

12.当菲利普的代表被以这种方式打断，他们没做进一步陈述。那时元老院，如我以上所提，继续派遣两位执政官到高卢，并投票继续对菲利普作战。同时他们亦安排弗拉米宁掌管希腊事务。这些决定很迅速地被传到那里，所以整个事件发展地非常像是弗拉米宁所想要的；运气在这样的结果中只扮演非常小的角色：这种结果大多是归诸他自己在处理这问题时的技巧以及远见。假如有任何罗马人曾经证明过自己是充分

地机灵敏锐，那便是他弗拉米宁，因为在经营公共事务以及他个人关切之事上，[20] 他都展现某种程度的判断力及执行力，这些都无法被超越，而所有这些都还是在他还是位年轻人时所做到的，因为他仍然不到三十岁。他是第一位指挥军队跨海到希腊的罗马人。

论背叛

【对这离题叙述在波里比阿全书整体叙述中的脉络，因为在任何残篇中都没有很清楚的标示，有许多讨论。最有可能的理论是他提及阿哥斯领导者的行为，这些人在一九八年时从亚该亚同盟撤出，允许马其顿军队进驻阿哥斯。当菲利普将他们交给斯巴达的僭主纳比斯（Nabis）时，他们遭受到立即的报复。】

13.我经常发现自己会对人们在人生中所犯下的许多错误，感到十分惊奇，特别是在叛徒的例子上。因此就与我所讨论之时代相关者，我希望对这议题说一些话。然而我非常清楚仅仅去调查或是甚至只是去定义，都非简单之事，因为要认为哪种人可以恰当地被认定为叛徒，断非易事。例如，我们不能认为那些出于自由意志，而与某些国王和君主从事联合活动的人是叛徒；[21] 也不能认为那些在危急时候，促成他们国家改变既有的来往对象，转向其他友好国家或联邦的人是叛徒。一点都不。因为在实际上如此之人经常成为他们国家杰出的造福者。我无需回溯到遥远的过去来找寻明证，因为我所能说的可以在我正写作的时间里轻易寻得。因此，例如说，阿里斯泰纳斯若没有及时说服亚该亚人放弃与菲利普的结盟，并代之以与罗马人友好，很明显地整个国家必然已经被彻底摧毁。如其所然，他这行为不仅在眼前的危机中确保了联邦每个国家的安全，而且很快就被认知到，阿里斯泰纳斯和他的政策无疑为联邦在后来势力上的增长，贡献良多。结果是他不仅没被视为叛徒，而且普遍被尊敬为自己国家的造福者及拯救者。相同的原则亦适用于以相类似方式来执行政策，并且根据时局形势来塑造政策的其他人。

14.从这观点来看，虽然雅典政治家德摩斯梯尼斯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赞美，但我们必须在一个方面来指责他：我在此要说的是当阿卡狄亚加入菲利普二世，他激烈攻击希腊世界最杰出之人科吉达斯（Cercidas）、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以及攸康皮达斯

（Eucampidas）背叛了希腊人的目的时，他那时的行动其实是冲动鲁莽及欠缺思虑；他也批评麦瑟纳城的费利亚达斯（Philiadas）的两位儿子尼翁（Neon）及特拉修洛赫斯（Thrasylochus），在色萨利的道可斯（Daochus）及奇涅阿司（Cineas），在彼奥提亚的帖奥盖顿（Theogeiton）及提摩列乌斯（Timolaus），他还一个接一个城市指名道姓，批评不同的公共人物。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有很好及明显的理由要以这种方式去坚持自己国家的利益，特别是阿卡狄亚以及麦瑟纳的居民。正是这些人凭借自己的行动，鼓励菲利普二世入侵伯罗奔尼撒，打破斯巴达人的权势，才使得所有居民再度呼吸自由的空气以及怀抱自由的理想；他们无疑赢回了斯巴达人在他们强盛繁荣时期从美塞尼亚人、迈加洛波利斯人、提基亚人及阿哥斯人所兼并的领土及城镇，所以重新增加自己国家的势力。

为了回报这一点，如果向菲利普二世及马其顿人宣战便非其该做之事，反而要在其能力之内，尽力提升他的荣耀及威望。假如在采取如此途径时，他们同意菲利普进驻他们的城镇，或者是为了私人利益而废除宪法，或剥夺公民同胞行动或言论自由，只是为了一己之私，以赢得权力，那他们的确值得被烙印为叛徒。但如果他们持续坚信自己城邦的利益，而认为雅典利益并不符合自己国家利益，因此对局势判断有不同见解，那就我个人来看，德摩斯梯尼斯便没有权力去称呼他们为叛徒。因此就他所有考量来看，德摩斯梯尼斯其实只顾虑到自己国家利益，却也同时假设整个希腊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雅典，并将那些不如此做的人烙印为叛徒，这对我而言，德摩斯梯尼斯似乎是错得相当离谱，而且远离真相。实际上在希腊所发生的事，证明不是德摩斯梯尼斯展现出真正的远见，而是攸康皮达斯、希罗尼穆斯、科吉达斯以及费利亚达斯的儿子们。的确，所有雅典反对菲利普的结果，带来的只是在凯洛尼亚（Chaeronea）战役中最终的失败。而若非菲利普的慷慨大度以及关切自己名声，雅典人必然会遭受更严重的灾难；所有这些都是德摩斯梯尼斯所带来的后果。相形之下，阿卡狄亚及麦瑟纳的国家却立即让自己安

全巩固，免除来自斯巴达人的攻击，更不用提对他们自己公民所带来的福祉利益，而这些优点都是那些名字我已提及之人的成就。

15.因此对那些能够适当贴上叛徒标签的人来进行定义，甚是困难。或许与此事最相像的状况是当人们处于公共危险之中，或者为了个人安全或利益，或者因为与反对者之间的歧见，而将整个城邦交到敌人手上，或者接受外来驻军或是召唤外来协助，来促成他们个人的目标及政策，将国家置于外来势力的主宰下。所有那些做出这类行为的人，或许可以公平地被认定是叛徒。然而如每个人所同意的，由如此之人所进行的叛逆行为，并没为他们带来任何真正的利益或好处——事实上，恰恰相反——以至于我们会惊讶地问自己：他们最初的动机为何，或是何种计算促成他们冲往如此的致命处境。因为从来没有人背叛城邦或军队或要塞，却不被发觉出来：假如这在行动的时刻没有发生，但在一段时间中，整个事情还是会曝光。这些人一旦被发现，没有一位会在之后过好日子，反而在大多数情形下，他们会从那些他们如此努力去赢取恩惠的人手中，遭遇到适当惩罚。因为将军和统治者经常会利用叛徒来促成他们的利益，一旦他们不再有用，便会如德摩斯梯尼斯所言，将他们视为叛徒。他们自然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一位背叛自己国家和之前朋友的人，无法证明会对他们保持忠诚或信守承诺。而即使这些人没有在他们新主人手中遭到惩罚，他们仍难躲过那些受他们背叛之人的报复。或假如他们曾设法逃过两方的捕捉，他们的恶名在其他人之中仍然会终其余生，追杀他们。这会对他们带来许多真实的或是想象的恐怖，继以日夜，它会助长及鼓励那些想对他们设局的人，让他们即使在睡觉时，都无法忘记他们自己的罪恶，[22] 而使他们梦到种种阴谋诡计以及灾难不幸，因为他们经常会被提醒到他们与其他人类的疏离，以及思想到他们所引起的普遍怨恨。然而尽管这些事实难以否认，但是除了极稀罕的例外，在需要叛徒时，还没证明过无法找到人去当叛徒。所有这些或许会导致我们得出结论：人类被认为是最机巧的动物，或许也有理由被认为是最愚蠢的动物。因为其他动物是它们生理需求的奴隶，只会因为这些

方面的误导而招致灾难不幸，但人类虽然有理性来引导他，却会因为缺乏思考以及因为生理上的欲望而误入歧途。对这议题我所言已经足够。

论方阵兵团

28.在我第六书之处，我曾提及在适当机会，我会尝试对罗马及马其顿之军事装备以及战术队形做一比较，显示无论是好或坏，它们究竟如何相异。现在我们已经见过这两个系统在战场上彼此对峙过，所以我将履行我的承诺。在过去，马其顿的队形在运作经验的方面证明，比其他在亚洲及希腊所使用的队形都还优越，而罗马的系统则征服了那些运用在非洲以及在西欧所有民族的系统。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见过这两种队形以及这两个国家的士兵在多次场合中不止一次的对抗。这应该是有用及值得花费心血的演练，来发掘何以罗马人在战场上经常得胜，带走奖品。假如我们以这种方法调查此事，我们将不会像人类中无知的多数一样，只以运气来说明，并在恭喜胜利者之余，却不愿给个道理，但我们将会给他们应得的赞美及钦佩，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他们成功的原因。

我无需在此铺陈那些罗马人与汉尼拔战斗所输掉的战役，因为他们所遭受到的挫败与武器或队形无关，而是汉尼拔的巧妙及军事天才所导致。我已经在对相关战役描述时，说得够清楚，而且还有两件证据支持我的结论。第一是战役结束的方式：因为一旦一位才能足堪与汉尼拔相比的将军出现在罗马一方，胜利在不久之后便会属于罗马人；第二，是由汉尼拔本人所提供的：他在赢得第一场战役后，立即抛弃掉原先出发时的装配，而以罗马武器来武装他的部队，持续使用这些，直到战争结束为止。至于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则不仅使用意大利武器，还有意大利部队，而且在对付罗马人时，交替使用连队以及方阵军团里的单位，来布置战斗队形，但即使有这些方法协助，他并没赢得胜利，而且所有他所进行的战役都是多少没决定性的。[23]

在开始比较前，我有必要先处理这几点，所以没有任何可能会抵触我说法的东西会被遗漏。我现在将继续比较。

29.有许多因素让人容易了解到，只要方阵兵团维持它的特色队形以及强度，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挡它的冲刺或是面对面来对抗它。当方阵兵团密集起来，进行活动，每个人及他的武器会占据三尺的空间。[24]他所持的长枪在早期被设计为二十四尺长，但现在用法则已调整缩短为二十一尺，从这里我们要扣掉持枪之人的手部及长枪后方用来平衡及夹住枪身以进行攻击的部分。这整个长达六尺，根据这些很清楚地长枪会在每位重装武兵之前伸出十五尺，当他向敌人前进时，他以双手紧握长枪。这意味着：虽然第二、第三、第四列人的长枪自然会较第五列的更为伸出，即使后者仍然在第一列之人前面伸出三尺。我现在当然假设方阵兵团维持它典型的秩序，而且从后方及两侧紧紧靠拢，如荷马在这些诗句里所说：[25]

> 盾牌紧扣着盾牌，每个人的肩膀紧靠着肩膀；
>
> 在他们闪亮的头盔上，马背的鬃毛在他们点头时会触及，
>
> 行伍队形是如此紧凑……

无论如何，假如我的描述是真实及准确的话，那在头排的每个人将会有五支长枪的尖端在他之前伸出，每一尖端都是那之后的三尺前。

30.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轻易地去描绘整个方阵兵团，当它以十六列的厚度，向前伸出水平的长枪，往前冲锋时的性质及强大威力。在那十六列里，那些位置在第五列之后的人，无法使用长枪在战场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他们因此没有将长枪放平来针对敌人，而是将枪头往上指天，将枪身架在前面之人的肩上。以这方式他们从上方来保护整个方阵军团，因为这些长枪如此密集，所以他们可以挡下任何会掉在前排士兵头上的投掷武器，而击在那些紧接在他们之后的人。一旦冲刺开始发

动，后排的人仅凭着身体的重量来强大地增加动能，使得前列的士兵无法回头。

我已经以大致方式描写这两种系统，并以细节来形容方阵兵团的构成。我现在为了要进行比较的目的，要解释罗马装备以及战略队形的特征，以及区分这两个系统的差异。当罗马士兵完全武装时，亦占有三尺宽的空间。然而，根据罗马人战斗的方式，每个人都可以个别地进行移动：他不仅用长盾牌来护卫自己的身体，并经常通过移动来对付打击的威胁，他也用刀剑来同时进行劈砍以及刺击。显然，这样的战略必须有比较开放的队形秩序以及人与人的间隔，而在实际上，每位士兵需要与同列左右士兵以及与同行前后士兵，至少相隔三尺，假如他要有效地执行他的功能。这些布置的结果是：每个士兵必须要面对方阵兵团前列的两个人，所以必须要遭遇以及攻击十个枪头。一旦双方开始交战，一个人无法自己冲过超越所有人，也无法将这些枪头挡回；除此之外，在罗马的队形中，后方并不支援前方，无论是将枪头档掉，或是使用他们的刀剑。所以如我在开始时所言，很容易去了解到，只要方阵兵团维持特有的队形以及冲力，何以会没有东西可以抵挡住它的正面攻击。

31.那究竟是何种因素使得罗马人赢得战争，造成使用方阵兵团的人落败？这答案存在在战争之中，行动的时间及地点的选择是无止境的，然而方阵兵团却只能用于一次时间以及一种地形，来产生其独特的效果。无论何时有重要战争逼近，假如敌人被迫要根据方阵兵团所要求之时间及地点来站好位置，那无疑使用方阵兵团的人必定会因为我已给的理由而取得战果。但假如要躲避其无可抵挡的冲刺是可能甚至容易的话，那方阵兵团何以能够再被认为是可怕的呢？再者，通常我们都承认，它必须在平坦无碍的地面使用，没有任何障碍，如壕沟、冲沟、凹地、山脊以及水道所打断，所有这些都足够去妨碍以及打乱如此的队形。一般的看法是：几乎没办法或至少难得去发现一片乡间，例如，有两三里之长，上面没有任何这类的障碍物。即使假设可以找到如此的战

场，但也得假设敌人拒绝应战，而宁可横越乡间，掠夺城镇，蹂躏对手盟军的领土，那方阵兵团有何用途？假如它留在最适合它的地形，不仅他无法去协助其盟军，而且也无法确保其安全，因为当敌人毫无疑问地掌握开阔的乡间地带，它的补给运输会被敌人轻易拦截。另一方面，若方阵兵团离开有利于它的地形，尝试在其他地方活动，它将轻易地被击败。再者，假如敌军真的决定要走下到平原，在那里作战，但当方阵兵团仅有一次机会冲刺，在主要行动发生后，敌军却没有将其所有兵力投入战局，甚至只保持一小部分的军力作为后备，从罗马人现在正实施的战略，很容易预测什么事会发生。

32.这结果的确不需要辩论来加以证明：我们只需提及已经发生的事实。罗马人并不打算他们的阵线在数字上要和敌人一样多，他们也不会将军团的全部战斗力量暴露在方阵兵团的正面攻击上。相反的，他们将部分的武力作为预备，而由其他的部队来和敌军交锋。稍后在战争中，无论冲刺的方阵兵团将面对它的敌人部队击退或是自己被人击退，他都会失去原来的队形。因为追击撤退的敌人，或是在攻击过来的敌人之前撤退，方阵兵团都会留在后面它自己部队的其他单位；在这时候，敌人的预备部队会占据方阵军团所空下来的地方，而没必要再从正面来攻击，而是从侧面及后方来进攻。当拒绝给方阵兵团它所需的机会，降低它享有的优势，是如此容易，而且它无法避免敌人来攻击它，难道从这里不会见到这两系统之间的差异是何其大吗？

除这一点之外，那些依赖方阵兵团的人必须要行经、扎营于各式的地形；他们必须预先占据有利的地点，围攻他人和自己被人围攻，并面对敌人出其不意的出现。所有这些都是战争的一部分，对最后胜利或许会有重大或是决定性的影响。在所有这些状况中，马其顿的队形有些时候甚少有用，有些时候是完全无用，因为方阵军团无法以较小单位或是个别单独来运作，但是罗马队形却极具弹性。每位罗马士兵一旦武装并开始行动后，能够自行调整到任何地点或时间，并面对任何方向来应付

攻击。无论是要与主力部队一起或是与分遣队一起，在连队里或是单兵作战，他同样都有一样好的准备，无需任何变更。于是乎，因为在有效使用部分罗马军队是如此具有优势，所以他们的计划比其他人的更可能取得成果。我觉得有必要以相当篇幅来处理这议题，因为仍有如此多的希腊人在马其顿遭受挫败时，认为如此事件几乎不可置信，而且仍有许多人难以理解在武裝他们的士兵上，方阵兵团相较于罗马军团为何和如何会处于劣势。

在希腊之事务：弗拉米宁以及和平协议

【这段落形容在一九七年罗马对菲利普赢得决定性胜利后，所草拟之和平协议。】

44.在这时候，罗马所指定的十位希腊事务的专员已经抵达，他们带来元老院有关与菲利普之和平协议的议决。主要特色如下。在亚洲及欧洲的所有其他希腊人都是自由人，享受自己的法律。菲利普要在地峡运动会（Isthmian Games）[26]开始前，要交给罗马人那些臣服于他的希腊人以及驻军占领的城镇。他要从攸若摩斯、佩达撒（Pedasa）、巴吉利亚以及伊阿索斯，还有阿比多斯、塔索斯（Thasos）、穆利纳（Myrina）和培林特斯等城镇撤出驻军，让居民自由。弗拉米宁要根据元老院有关赛厄斯城镇之解放的议决，写信给比提尼亚的普鲁席亚斯一世。菲利普要在相同期限内归还给罗马人所有战俘及逃兵，并将他所有战舰交出，除了五艘轻艇以及八名水手划一只桨的巨型旗舰一艘。他要支付一千泰伦[27]的赔偿，一半立即交出，其他分期付款，为期十年。

45.当这决议的内容在希腊广为周知时，唯一例外的是，所有城邦及民族都深受鼓舞，极度喜悦。伊托利亚人对这决议并不符合他们的期望感到失望，并且激烈地抱怨说这决议不过是言词游戏，忽略实际问题。他们从这决议的实际条文演绎出可能的诠释，但这些是刻意用来混淆那些愿意聆听他们这种预言之人的心思。伊托利亚人声称决议中有关菲利普所驻军的城市，其实里边有两种不同的声明：其一是命令他将驻军撤回，将城镇移交罗马人，另一是要撤离驻军，并让城镇自由。这明确指出被解放的城镇都是位居亚洲；因此很明显地，那些要被移交给罗马人的都是位居欧洲，亦即欧瑞温（Oreum）、伊瑞垂亚（Eretria）、卡其斯、迪米特利亚斯以及科林斯。[28]这当然是很清楚的指示：罗马人要从菲利普之处接收所谓的“希腊的枷锁”，所以希腊人并非被给予自

由，而只是换个主人而已。

这些伊托利亚人的辩论令人厌烦地不断重复。但弗拉米宁在这期间已经与十位专员离开在服吉斯的伊拉帖亚（Elateia），往南旅行到安提居拉（Anticyra），立即横渡海湾到科林斯。在那里他继续与专员讨论及考虑整体希腊的安排。在这整个时候伊托利亚人那种中伤毁谤的评论逐渐散出，开始变得有人相信，所以弗拉米宁觉得有必要向他的同事陈述，详细讨论安排的条件。他辩论的要点是，假如他们要在希腊人之中有完整的名声，说服整个希腊国家说罗马人最初跨过亚得里亚海时，并非为了提倡自己利益，而是要争取希腊人的自由，他们必须撤离每个地方，解放所有现在由菲利普驻扎的城镇。而如其所真正发生的，这点正是在专员之中仍悬而未决的议题。罗马关于其他事项都已经有所决定，而专员也从元老院得到关于这些事项的训令，但是因为对安条克三世的意图仍有所疑虑，所以有关卡其斯、科林斯及迪米特利亚斯地位的问题，元老院则交由他们斟酌，端赖现场局势决定；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知道安条克三世正密切观察及等待干预希腊事务的机会。尽管如此，弗拉米宁成功地说服他的同事，立即解放科林斯，将它交给亚该亚人，但他继续占领阿克罗科林斯以及卡其斯和迪米特利亚斯。

46.在这些决定达成时，庆祝地峡运动会的时机也来临。对那场合会发生何事的预期，吸引来自文明世界各角落的最上层人士，而关于结果的所有种类报道及臆测，也在整个庆典礼中流传着。有些人辩称罗马人不可能从某些地方及城市撤离，其他人则认为他们会放弃被那些被认为出名的地点，但会保留那些一样有用但恰巧没有相同光彩的地方。的确，这些人甚至凭空杜撰出那些相关的地名，并且彼此竞争猜测的机灵。在这种不确定的氛围中，而且群众正集合在竞赛场，要观赏比赛的时刻时，有位号角手要求大家保持肃静。司仪走向前，做出如下的宣布：

罗马元老院及行执政官之职，弗拉米宁，在战场上击败国王菲利

> 普及马其顿人，让以下国家及城市自由，没有驻军，不缴贡赋，充分享受他们祖先的法律：科林斯、服吉斯、洛克里斯、优卑亚、否提尔提斯·亚该亚、迈格尼希亚、色萨利以及柏希比亚（Perrhaebia）等人民。

在这宣布开始之初时，有道震耳欲聋的吼声响起，所以有些人完全没听到宣言，而其他人则是急于再听一次。绝大多数的群众无法相信他们的耳朵，因为所发生的结果是如此不可预期，所以他们仿佛是在梦境中听到这些话语。每个人或许都因为不同冲动而受感动，他们喧嚣地呐喊要司仪及号手向前靠近到竞赛场中央，重新宣告；他们无疑希望不仅听到说话的人，也要看到他，因为他们似乎如此难以相信他所正在说的。但当司仪走到竞赛场中央时，再度借号角之助来平息喧闹，再度读出完全相同的文字后，有极度欢呼的爆发，甚难让那些今天只能以书面阅读这事件的人去想象声响是如何发出。当最后这叫喊声逐渐消退后，没有人对体育竞赛有任何注意；群众的欢呼现在被喋喋不休的吵闹声所取代，人们与旁边的人讨论消息，或是喃喃自语，所有人都像发狂似的在说话。的确，在竞赛结束时，他们以毫无节制的激情兴奋和感激，几乎杀死了弗拉米宁：有些人盼望看到他的脸，欢呼他为救主，其他人则往前推挤要去触摸他的手，而绝大多数人则将花冠及发带投向他，在他们之中，弗拉米宁几乎被撕成碎片。但他们的感激无论看起来是如何过度，我们还是可以有信心地说，这些仍然远不及此事本身的重要性。这是件完全值得钦佩的行动，首先，因为罗马人民及其将军竟然会做出选择，甘冒无限的风险以及花费来确保希腊人的自由。但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会投注足够的武力，来实现这理想，但所有之中最可观者还是没有任何厄运来横阻，让他们的意图遭受挫折。相反的，当仅凭一次声明，所有居住在亚洲及欧洲的希腊人都变成自由人，没有驻军，也没有贡赋的负担，而是享受他们自己的法律时，每个因素都结合起来造就这最高潮的时刻。

---

[1] 这位是率领加入马其顿军队之彼奥提亚人的统帅。

[2] 他在亚该亚领导亲马其顿的派系，在二○○年被选为联邦的将军，但是一直抗拒菲利普企图将亚该亚卷入对罗马的战争之中。在亚该亚人离开马其顿，转而向罗马效忠时，他被放逐。

[3] 福拉明尼纳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是一九八年的执政官。

[4] 在希腊西北，介乎阿拉克索斯（Arachthos）河以及品都斯（Pindus）山脉西坡之间的区域。

[5] 在马利亚湾（Malian Gulf）岸边的一个港口，靠近温泉关（Thermopylae）。

[6] 这是指在二○五年签订的《腓尼企和约》（Peace of Phoenice），这结束了第一次马其顿战争。

[7] 这是菲利普在二○○年时所攻占的色雷斯城镇。

[8] 这些是小亚细亚大陆卡里亚省的城镇，在罗德岛之北。

[9] 这城镇在伊托利亚南部，诺帕克都城之东北方。

[10] 这是菲利普被弗拉米宁驱逐走时，所经过的通道。

[11] 这四个城镇之前属于伊托利亚人，但被马其顿人攻下。

[12] 正如十八世纪时不同欧洲国家允许海盗横行，伊托利亚人允许他们的市民针对那些在官方上并未敌对的国家，进行独立的敌意行为。

[13] 姑且允许某种程度的马其顿修辞，但修昔底德确实认为居住在安布腊基亚（Ambracia）湾东端的安菲洛奇亚人是野蛮人。

[14] 这是没有前例可循的提议，因为到目前为止，征询元老院是接着与现场之罗马将军已经达成初步协议而来。弗拉米宁希望在希腊的统帅权能够延长，无法做到那点，则被托付签订和约的任务。

[15] 这显示出派遣特使的提议可能是弗拉米宁自己设计出的。

[16] 亦即或是推动一个协议或是持续战争。

[17] 他是第一位去造访罗马的国王。

[18] 这是那时候领导雅典的政治家。

[19] 亦即为希腊之解放者。

[20] 亦即这派遣使者到罗马背后的计划。

[21] 这所指是伯罗奔尼撒人与菲利普二世合作，而他们被德摩斯梯尼斯指责为叛徒。

[22] 比较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一幕第四景——克雷伦斯（Clarence）的梦境。

[23] 这样的论断对皮洛士不甚公平，他在赫拉克里亚（Heracleia）（二八○年）以及阿斯库伦（Asculum）（二七九年）打败罗马人，虽然他自己当然也蒙受惨重的损失。

[24] 这种队形不仅假设横向，即从右肩到右肩，而且直向从前到后，即从胸到胸，都有三尺的空间。

[25] 《伊里亚特》十三书一三一至一三三行。荷马当然不知有方阵兵团，所以这几行并不是指它。

[26] 地峡运动会在泛希腊的大型运动会中，位居第三［在奥林匹亚以及特尔斐（Pythian）之后］，在每隔一年的六、七月时举行，在目前的情形是一九六年的六月。

[27] 约二五八六○千克。——译者注

[28] 有关这最后三者的重要性，请参见页599。

第二十四书

在希腊之事务：菲洛波义曼及阿里斯泰纳斯

11.无论是在人格上或是在政治性格上，菲洛波义曼与阿里斯泰纳斯之间甚少有共通之处。天生在心理上及身体上，菲洛波义曼都被赋予行动以及战争的生活，但阿里斯泰纳斯则是政治与辩论的生活。在政策选择上，两人之间的差别或许可综合如下。在罗马与菲利普以及与安条克发生战争的期间，罗马霸权已经成为与希腊事务无法切割的因素。于是阿里斯泰纳斯在政治活动中，随时愿意去做罗马人所要求的任何事情，有些时候甚至到事先预料到他们要求的地步，但同时，他也费尽心力去保持遵守法律的表象，甚至大肆张扬地如此做；然而无论何时，任何希腊法令若明显与罗马之指示有所冲突之处，他会以牺牲法律来做出让步。另一方面，菲洛波义曼随时接受、毫不迟疑地达成与国家法律以及联盟条约相和谐的所有要求；然而，若是有罗马的要求超过这些界限，他无法自愿地去配合它。他说他们首先应该计较合法性，而在那之后，才继续将罗马人的意见视为请求。最后，假如这处理方式无法说服罗马人，他们应该在抗议下让步，而只有在那时才执行命令。

12.阿里斯泰纳斯习惯以一些如下的辩论，来向亚该亚人辩护他的政策。他说："我们无法同时一面握剑，一面拿出橄榄枝[1]来维持与罗马人的友谊。"假如我们决心要面对罗马人，而且强大到足够去如此做，那非常好。但即使假如菲洛波义曼都不愿冒险去坚持这一点，我们为何要牺牲那可能的，而去争取不可能的呢？每道政策都包括两个目标：荣誉以及利益。在荣誉可以取得的状况下，那正确的政策是要针对

这个；然而那些没具备足够力量的，必须避难于他们的利益之中。若在这两项目标都失败，则是处理不当的最明显证明；这是由那些没有清楚表明反对别人对他们的要求，反而心不甘情不愿地附和的人导致的结果。结果是我们必须显示出我们够强大去拒绝，或是——假如没人敢这样说——我们必须愿意去做我们被告知去做的事。

13.菲洛波义曼的回答是：人们不该认为他如此不懂事理，所以无法了解罗马及亚该亚国家之间的差异，或是罗马武力的优越性。他说："那些占上风的人，很自然会对较弱势的人进行更大的压迫；然而事情即使如此，难道在每一点上附和我们主宰者的突发奇想，真的符合我们的利益吗？假如我们现在对他们的行事不提出任何阻碍，难道我们就不会在最可能短的时间内，发现有最严厉的命令加诸我们身上吗？尽我们能力之极限与他们一搏，挡住压力，直到我们精疲力竭，难道这不是较好一些吗？接着，假如他们发布不合法的命令，我们提醒他们这一点，并且做些事去制止他们独裁的行为，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将会软化他们严厉的统治，特别是如您阿里斯泰纳斯自己也承认，罗马人相当看重誓言、条约以及对盟友的承诺。但假如我们自己忽略我们的权利，立即毫无疑问地屈服于任何给我们的命令，就像战俘一样，那亚该亚联邦和西西里岛及卡普亚的人民有何差别？如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多年来已经形同罗马人的奴隶。所以或是让我们承认事情的正义性对罗马人不算一回事，或是假如我们不走到如此之远，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权利，不放弃我们的立场，特别是因为在罗马人眼中，我们能对他们做出很强大及有荣誉的要求。"他又说："我非常了解希腊人必须完全服从罗马人的时候将会来临。但难道我们希望这尽快发生吗？当然是越晚越好。所以在这意义上，我的政策与阿里斯泰纳斯的相异。他急于见到那不可避免的结局尽快早到，然而我却竭尽所能，努力去避免它。"

我认为，从这些演说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虽然菲洛波义曼的政策是荣耀的，但阿里斯泰纳斯的则具有说服力，但两者都基于安全考量。

结果是虽然在对抗菲利普及安条克的战争中，曾有极大的危险威胁罗马人及希腊人，但这两个人都在面对罗马人时，力保亚该亚人的权利，维持其完整性。但阿里斯泰纳斯比菲洛波义曼对罗马较为亲善的印象，仍然还是普遍流传。

---

[1] 直译为“枪矛与使者的权杖”。

第三十一书

在罗马及叙利亚的事务：德米特里的逃走

【当叙利亚的统治者“神显灵”（Antiochus Epipahnes）安条克四世在一六四年过世，他留下一个年轻的儿子及女儿。这位儿子以“好父亲”（Antiochus Eupator）安条克五世为人所知，并在莱席亚斯（Lysias）的监护之下，继承王位。他的堂兄德米特里一世，安条克大帝的孙子，被他的父亲塞琉西四世，安条克三世的继任者，在一七五年交给罗马人作为人质，作为诚信的保证，当时德米特里只有十岁。十三年之后，这年轻人看不出有任何好理由，何以要继续被当作人质羁留，来保证安条克四世之继任者的良好行为，所以设法说服元老院让他成为叙利亚的国王，而不是让那位男孩担任国王。然而元老院偏好去支持一个傀儡，而非一位积极的统治者，并且派出一个由屋大维（Gnaeus Octavius）率领的委员会，下令去削弱叙利亚的军力。这些措施激起强烈的怨恨，导致屋大维的谋杀。】

11.在这时候，[1] 对屋大维犯下的罪行，以及他如何被暗杀的报道传到罗马，同时由摄政莱席亚斯为安条克五世所派遣的代表亦抵达罗马，做出最严正的保证，保证这年轻国王的朋友绝没有牵涉其中。然而元老院对特使不甚在意，也不希望对这些事件宣布任何决定，或甚至公开表达它的意见。

另一方面德米特里一世却对这消息大感兴奋，立即邀请波里比阿，并向他吐露他的疑虑，究竟他是否该再度向元老院提出有关他羁留的问题。波里比阿建议他说“不要在相同的石头上跌跤两次”，而是依赖自己的努力，将他的运气赌注在某件大胆行动中，这或许会为他赢得王冠；他暗示说，就目前态势，有许多机会去行动。德米特里掌握这些话的要旨，在那时候没再多说；不久之后，他征询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阿波罗

多洛斯有关相同的议题。这个人不仅年纪轻，而且本质纯良，建议德米特里再度向元老院求情；他有信心，认为既然他已经被不公不义地剥夺他的王国，元老们至少可以解除他目前的羁留，因为一旦年轻的安条克五世继承叙利亚的王位，但德米特里却仍为他做人质，继续羁留，是很荒谬的。德米特里对这些辩论印象深刻，所以他再度现身元老院之前，向他们求情，至少从现在起能解除人质的义务，因为他们已经决定要将王位保证给年轻的安条克五世。虽然他详细陈情，但元老院决定继续坚持原来的判决。而的确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因为在前次场合中，他们决定要让年轻国王继续留任，并非德米特里没有提出好的理由，而只不过如此做符合他们的利益。原先影响他们决定的环境仍然存在，元老院的决定是可以预期的，仍会依据相同的政策。

12.因此德米特里已经徒劳无功地唱完他的天鹅挽歌（换言之，已经对元老院做过最后的求情）；他认识到波里比阿警告过他，不要在相同石头上摔跤两次的好建议。因为德米特里后悔他之前先行之事，但他性情奋发有为，而既然他拥有天生的勇气将计划付诸实现，所以邀请一位最近从叙利亚来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并视他为密友。狄奥多罗斯过去曾是德米特里的养父，是位聪明人，花费许多心血去了解叙利亚政局的发展。他向德米特里指出，随着屋大维被谋杀所造成的动乱，摄政莱席亚斯与人民两边彼此不信任的情形逐渐蔓延开来，而且元老院坚信国王的顾问朋友必须对罗马使者所遭受的负责。这诸多事情同时发生，假如德米特里现在能在现场现身，必然对他最为有利。这里的机会是即使他在到达时，只有一位奴隶陪伴，叙利亚人民必然会立即将王位转赠给他，而因为莱席亚斯最近的行为，元老院必将不愿冒险给予任何进一步的协助或支持。剩下的问题是如何秘密逃离罗马，所以没人会发现他的意图为何。当他做出这样结论时，德米特里邀请波里比阿，向他透露计划，要求协助他来计划最好的逃脱方式。

在那时候有位叫曼尼拉斯（Menyllus of Alabanda）的人在罗马；他

受大托勒密六世之命出差，来和小托勒密八世对抗，并在元老院之前回应后者的指控。波里比阿已经和曼尼拉斯交好一段时间，对他甚有信心。他认为他正是适当的人选来从事目前之事，所以将他引介给德米特里，对他深表敬意，极力推荐。曼尼拉斯同意加入这计划，承诺会备妥一艘船，提供航行一切所需。他那时在台伯河口发现一艘迦太基船停泊，这船是被用来运载神圣祭品，于是将它预订下来。这些船都是在迦太基特别精选的，来运送传统初果祭品到他们位于腓尼基泰尔（Tyre）的祖先神明处。曼尼拉斯相当公开地包船下来，供自己回程使用；他以这种方式得以将一个月的补给先送上船去，而不引起任何怀疑，自己也可以相当自在地和水手聊天，与他们一起安排事情。

13.当船长备妥所有之事，只剩下德米特里来完成自己那部分的准备；他首先送他的养父狄奥多罗斯回到叙利亚观察局势，打听人民正在说什么，借此衡量民情。他自己的义兄阿波罗多洛斯从一开始就是参与这计划的伙伴，所以他也接受阿波罗多洛斯另外两位兄弟墨勒阿格尔（Meleager）及迈尼斯丢士（Menestheus）进入这关系中，但他并没有让他自己的随从成员加入，虽然他们人数众多。这三位兄弟是在塞琉西四世宫廷据有高位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之子，但是当“神显灵”安条克四世继承王位时，[2] 移居到米利都城（Miletus）。

与水手预定之日已近，所以必须有一名德米特里的朋友出面安排酒宴，作为他自己要远行的借口。他无法在家宴饮，因为他一直谨慎且准时地保持与他随从成员一起进餐的习惯。于是所有那些加入这阴谋的人，先在家进餐，然后再外出。每个人只能有一位奴隶陪同；其他则被送到阿那格尼亚（Anagneia）去，被告知他们的主人将在第二天与他们在该地会合。波里比阿恰好那时卧病在床，但因为曼尼拉斯固定与他保持联络，他知道在进行中的每件事。波里比阿担心假如酒宴持续过久，德米特里或许会喝得过多，难以脱身，因为他不仅年轻，而且贪杯。波里比阿因此写下简笺，加以弥封，而且因天色已暗，所以由一位仆人送

去。这个人被告知要将德米特里的执杯人叫出，将简笺交给他；他不可说自己是谁，也不可说简笺来自何处，但必须告诉他要立即交给德米特里。这很快完成，德米特里收到简笺，拆开阅读。它包含了以下的警句格言：

早鸟捉到虫 [3]

夜晚对谁都一视同仁，但最喜勇者 [4]

要勇敢，面对危险，现在行动：输或赢；

做任何事，也不要将自己交出。 [5]

保持冷静，有智慧去怀疑；

这些是心灵的筋肉……

14.当德米特里读过简笺，立即知道这些引句所言为何以及是谁捎信；他接着表示感到不适，立即由朋友陪同告别。他回到住所，安排送到阿那格尼亚所有他不希望随行的奴隶。他命令他们拿着捕兽网、带着猎犬，与他在舌切易会面，他习惯在那里狩猎野猪；而的确也是因为这方式，他才和波里比阿开始建立友谊。那时他将计划细节透露给尼卡诺（Nicanor）以及其他朋友，向他们求情，共享他的命运。他们所有人都热情地答应，在那时候他要求他们立即返家，告诉他们的奴隶在第二天早晨到阿那格尼亚去，然后在舌切易加入狩猎者及团体里的其他人。他们自己穿上旅行的衣着，然后回来找他；在这期间他们要放出风声给他们的奴隶，说他们要去找德米特里，在第二天和他们在舌切易会合。

所有这些安排都适时执行，在那之后他们在夜晚走下到台伯河口的港口奥斯提亚（Ostia）。曼尼拉斯已经在那里和水手说话。他告诉他们他收到国王托勒密的信息；这包括指示他要暂时留在罗马，但派遣给国王一些他年轻士兵中最值得信赖的人，他们会向他报告所有有关他弟弟的消息。曼尼拉斯已经告诉他们说他自己不会登船，但要航行的年轻人

大约在半夜抵达。船员的管理人员对此没找他们麻烦，因为包船的钱已付清，而且他们也在德米特里及其人马在第三更结束前抵达时，已经完成出航的所有准备。他们除了五位成年奴隶及三位少年奴隶外，共计八位。曼尼拉斯向他们致意，向他们展示为航行所准备的补给，并热情地向船长及船员们推荐他们。在这之后，他们登船，船长起锚，在破晓时，正式起航。船长不知乘客真正身份为何，但想象他不过是从曼尼拉斯那里载送一些士兵给国王托勒密。

15.在此期间，在罗马不可能有任何人会在第二天去寻找德米特里或是他旅行的伙伴。他家庭里那些被留下的人认为他前往舌切易。而那些在阿那格尼亚的人，准备与他会面，想象他们会在那里见到他。结果是完全没人注意到他的逃脱，直到有位奴隶恰好在阿那格尼亚被殴打，跑到舌切易去。他也认为会在那里找到德米特里，而当他不在时，他跑向罗马，预料会在路上遇见他。那时因为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的踪跡，所以告知德米特里在罗马的朋友以及他家庭里那些留下的成员。在他离开四天之后，人们开始寻找德米特里，而直到那时候，他们才开始起了疑心。最后在第五天，那时他已经航行经过迈萨拿海峡，元老院匆促召开会议来考虑此事。首先他们假设德米特里已经早就在航程中，因为风向有利。其次，他们认知到即使他们想做，也无法去阻止他。几天后，他们任命三位专门委员，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连图勒斯（Lucius Lentulus）以及格劳启亚（Servilius Glaucia）去调查希腊的状况，然后再到亚洲，观察德米特里企图的结果。他们也要调查其他国王的态度，以及在这些统治者与加拉太人之间的争执中，扮演仲裁者的角色。格拉古被任命是因为他对这些问题有特殊的知识。如此便是在意大利所发生之事的状态。[6]

在意大利之事务：宝路斯、西庇阿以及波里比阿

22.对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之正直廉洁最具说服力以及最令人敬重的见证，是在他过世之后才被透露出来的。他终其一生享有相同崇高的声誉，而在他与世长辞之后，仍始终维持不坠，而这当然是所有能够被发现的最强明证。宝路斯从西班牙带回罗马的黄金比当代的任何人都还多，整个马其顿庞大的财富也落入他手中，他对如何使用这些钱有完全的控制权。但尽管如此，他死去时如此贫困，以至于他的儿子无法从动产中付给他的守寡母亲所应分配到的财产，而必须去贩卖部分的不动产来筹钱。这事情的细节我将会在他处处理。[7] 但此处我们必须承认，在有关正直廉洁上，宝路斯的范例超越即使是希腊人之中因为这品德而最被推崇的人。拒绝贿赂者为自身利益而给的钱，固然值得赞美，如雅典之亚里斯泰德（Aristides）和底比斯之艾帕米农达斯便据说曾如此做，但这更值得赞美：当一个人已经成为整个王国的主宰，拥有如他所喜去使用的权威，但却仍然一介不取。

假如此事对任何读者似乎不可思议，且让他记得现在本书作者心中特别在意这一事实：特别是那些可能会阅读此书的罗马人，因为此书所描绘的所有成就中，绝大多数以及最为光辉灿烂的，都是属于他们，所以他们不可能会对这些事实无知，或去宽恕任何做出不实陈述的作者。所以很清楚地，没有人愿意让自己不被相信或甚至遭受轻蔑。无论何时我若或许看起来像是对罗马人做出惊人的陈述时，在我整个故事中，这事实必须始终被牢记在心。

23.现在既然我叙述的进度以及我正提及的时代，已经将埃米利乌斯家族（Aemilii）带进到我们眼界中，为了研究历史的人们，我打算去实现一个在前书之中所做的承诺。我那时说，我必将述说西庇阿·埃米

里亚纳斯何以能在十分年轻时，便取得如此光辉灿烂的名声，他何以和本书作者熟识及友谊是如此亲密，所以这两人关系的传闻不仅限于意大利及希腊，他们彼此尊重和友朋关系甚至在之外的国度也为人所知。我已经提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始于借阅一些书籍以及因之而来的谈话。但随着他们彼此认识益发密切，而被召唤到意大利的亚该亚人陆续被送往不同偏远城镇去，那时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8] 的儿子费边与西庇阿，向副执政求情，同意波里比阿留在罗马。有一天三人从费边的房子出来，费边恰好往广场的方向离去，而波里比阿则与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往另一方向同行。当他们在散步闲逛时，西庇阿低声温和以及些微脸红地询问波里比阿："波里比阿，虽然我的兄长和我一起同桌共餐，何以您经常与他说话，面向那方陈述您所有的问题以及表达您的意见，却将我从中遗忘？看起来您对我的意见，与我所知城市中其他人对我的意见一样。每个人都认为我是个文静以及相当懒散的人，以及我没有任何典型罗马人去行动的冲劲，因为我没选择在法庭里发言。而且他们说，我所属于的家庭无需有我这样的代表，而是需要恰恰相反的，而这正是让我最困扰之事。"

24.波里比阿对这年轻人开始对话的方式有些讶异，因为他只有十八岁而已。"以上天之名，西庇阿，"他回答说，"您切不可如此说，或是有任何如此的念头进入脑中。我没有以这种方式与您说话不是因为我对您评价不佳或是要忽略您；一点都不。这只不过是您的兄长比您年纪大，所以我以他来开始和结束谈话，而假如我将我的话语和意见向他陈述，那是因为我想象您必然与他分享相同的意见。但我很高兴听到您对被众人认为您的个性比您家族成员所应有的还更温和或柔软这点感到困扰，因为这当然证明您拥有高贵的精神。我必将十分乐意将自己奉献给您，来协助您以值得您祖先的方式来言谈、行动。对我而言，那些已经开始在您的兄长及您心中激起野心及热情的学问中，您将会发现有许多人会协助你们兄弟，因为我可以看到一群博学之士在这时候正蜂拥进入意大利。但是有关您刚说让您如此困扰之事，我不认为您可以发现有比

我更适合之人来协助您，来鼓励您的努力。”

即使在波里比阿结束发言之前，西庇阿已经捉住他的右手，放在他双手中，亲切地握紧说：“我只希望我能见到那天，当您将会给我第一次的机会，得到您的关注，将您的生命加入我的生命之中，如此一来我将会立即感觉我是对得起我的家族以及我的先祖。”当波里比阿记起西庇阿家族的崇高地位以及其成员的财富，他对这年轻人感情的表达既感到喜出望外，但也感到尴尬。无论如何，从谈话的那时刻起，这年轻人与波里比阿便形影不离，喜欢他的陪伴胜过其他人。

25.从那时候开始，他们经常给予对方他们彼此契合的实际证明，并且开始感觉到有种只能被比喻为父子关系或是相同血缘之亲人的那种相互感情。

西庇阿要过高贵生活的心愿，最先表现在他赢得自律自制的美名，而他在这方面超过当代之人所恪遵的标准。这是一个高尚但通常困难的愿望，但在那时候却是相当容易，因为绝大多数人在道德上堕落。有些年轻人将他们的经历，虚掷在追求男孩的爱情，其他人则消磨在艺妓身上，又有其他人则是在靡靡之音及欢宴上度过，还有随之而来的大肆挥霍，因为在对付佩尔修斯及马其顿人的战争过程中，他们很快学习到希腊人在这方向的淫奢习惯。挥霍及放纵的嗜好在年轻男性中散布如此之广，所以他们有很多人随时愿意为一名男妓付出一泰伦[9]银钱，为一罐黑海的腌鱼付出三百德拉克马[10]银钱的代价。正是在如是的脉络中，老加图（Cato）有次公开演讲宣布说，当一位美男子比一块良田、一罐腌鱼比种田人，都还更昂贵时，任何人都能看到共和国正在走下坡路。这种奢侈铺张在我所描绘的这段期间里，已经变成无耻的炫耀；其中理由首先是在摧毁马其顿王国后，罗马普世霸权已经毫无争议地建立起来；其次，马其顿财富被运送到罗马，紧随在后的是在公开及私人场合中大肆炫富以及排场。

相形之下，西庇阿决定让自己走相反的路径。他节制所有欲望胃口，并且借着为自己规定稳定一致以及不偏不倚的行为方式，他五年内在众人眼中已经建立了自制自律的名声。

他接下来所关切的是要为自己设计一套原则以及诚实规范，来处理有关财物事务，这些又再次远超过当时的一般标准。在这领域中，他与生父一起生活过的那部分人生，为他打下一个极佳的基础，他天生的倾向也被引导到正确的方向，而除此之外，机运也协助他成就这特殊的理想。

26.他在这方面的第一个机会始于其养父的母亲埃米里雅（Aemilia）之死。[11] 她是其生父的姊妹，以及其养祖父“非洲征服者”西庇阿、查马之战胜利者的妻子。她留给其外甥一笔庞大财富，而他处理这份遗产的方式，首度证明他高尚的原则。埃米里雅无论何时离家去参加妇女游行，她总习惯以极大排场现身，适合一位分享正处于成功人生巅峰之伟大“非洲征服者”生活的人。除了个人衣着及车乘富丽堂皇外，所有篮子、祭杯以及祭祀器皿道具都由金银打造，并且在如此仪式场合中，随队伍里抬出，而伴随她的侍女及男仆队伍行列，亦是依比例地庞大。

在埃米里雅的丧礼后，西庇阿将她所有富丽堂皇的衣着交给他亲生母亲。她已经与其丈夫仳离多年，而她现有的资产远不足以维持适合她阶级的场面。前几年她在类似仪式场合，停留在家，没有参与。但现在有个庄严的祭典必须举行，她以那以前属于埃米里雅的排场以及光辉，驱车出门。所有见证到这场景的妇女都被感动，深深崇拜西庇阿的良善及慷慨，并且举手望天，祈祷神明赐福给他。如此行径在任何地方都会被视为荣耀，但在罗马则是奇迹，因为在那里要是可以的话，绝对没有人会将任何私人财富馈赠他人。这是西庇阿高贵人格名声的开始，而且很快就众所皆知，因为女性喜欢道听途说，而一旦她们开始启动一个话

题，她们就不会嫌话太多。

27.在这之后出现了西庇阿对伟大“非洲征服者”女儿们的责任问题，这些是西庇阿养父的姊妹。当西庇阿继承财产时，他的职责是要负担每位女儿她们该有嫁妆的一半。她们的父亲曾经安排要为她们每人支付五十泰伦银钱。其中一半数量已经由她们母亲在婚礼时支付给每个人的丈夫，但当埃米里雅过世时，尚有一半还没支付，所以便由西庇阿来承担这债务。罗马法律规定她们的嫁妆中仍未支付的这一部分，通常应该在三年期间支付完成，第一次支付系由个人财产所构成，根据一般习俗要在十个月内支付。[12] 然而西庇阿指示他理财的人，要在十个月内支付给每位女儿二十五泰伦。在十个月过去之后，这些仕女个别的丈夫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13] 以及纳西卡（Scipio Nasica）询问理财的人，究竟他是否已经从西庇阿处收到任何关于钱财的指示。在这时候，理财之人要求他们立即一次接受，并且完成转移给每人二十五泰伦的手续。然而这些丈夫告诉他说，他必然弄错，因为根据法律，他们没有资格收到总数，而是其中的三分之一。当他向他们保证这些正是西庇阿的指示，他们仍然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所以接着去拜会这年轻人，想象他是否弄错。而确实这是很自然的假设，因为在罗马非但没人会在三年内预先缴出五十泰伦银钱，甚至没有人会在比预定之日的早一天缴出一泰伦的钱，因为每个人对金钱的数额是如此严格地准确，而且因为急于获利，所以对时间相当有意识。无论如何，在他们拜访西庇阿以及询问他给理财之人何种命令时，他回答说“支付给两位姊妹属于她们的全部金额”，他们告诉他说他犯了错，同时也坚持他们是考量到他的利益，因为根据法律，他仍有权力使用这笔钱相当长一段时间。西庇阿告诉他们说，他相当了解这一点，但在陌生人的情形下，他会遵守法律条文，但就其能力之内，他会以非正式及宽松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亲戚朋友，所以他要求他们从理财之人那里收下整笔金额。当格拉古及纳西卡听到后，他们惊讶无言地离去，对西庇阿的慷慨感到震惊，正如对自己的吝啬感到尴尬，虽然他们和罗马里的任何人一样都拥有崇高的人

格。

28.两年之后当他的生父宝路斯过世，由他及其兄长费边联合继承遗产，西庇阿又再度以值得被称道的原则信念来行事。宝路斯在法律上来说已经没有子嗣：他之前让他两个儿子被过继到其他家庭去，而其他两位被抚养来继承他的人也都过世，[14] 因此他将财产赠送给西庇阿及费边。西庇阿知道他的兄长状况不如他，所以放弃他所继承到的那一份，虽然这被估计有超过六十泰伦之多，所以费边的财产可以与他一样多。这成为众所皆知之事，而他之后又立即做出一个他慷慨大方的另一次更出色证明。在他父亲的丧礼中，费边希望安排一个竞技斗士的表演，但是因为这样的娱乐开销庞大，他无法负担其中费用，而在那时西庇阿从自己的财产中提供一半的金额。如此表演的全部开销，假如是在如此铺张的程度上演出，不会少于三十泰伦。

当这行为仍然被人讨论的时候，西庇阿的生母葩琵丽雅（Papiria）过世，他非但没有取回任何他送给她的礼物，反而还将所有礼物以及他母亲的财产转移给他的两位姊妹，即使她们在法律上无权要求。以这种方式，他的姊妹又依序拥有那原来属于埃米里雅的典礼配饰以及随从，而西庇阿的慷慨大度以及对家庭的奉献，再度被展现出来。

因此西庇阿在早年为他所选定之理想打下基础，在他前往自制自律以及高贵人格的道路中，不再往回看。他慷慨的名声是以他花费六十泰伦的开销建立起来的，因为这是他从他自己的资产中拿出的。但这些并非他所贡献金额的大小，而是礼物的适时以及他馈赠时的乐意，那才重要。至于他自制自律的名声，没花费他任何金钱，而是借着避免其他许多样的娱乐开销，他获得终其一生所能拥有的健康身体以及幸福。也为他带来另一种满足，以及因为他牺牲眼前快乐，而大大得到补偿的奖赏。

29.他仍待去取得勇敢的名声。这在任何国家或许都可被说是最重

要的品德，但没有哪个国家比罗马更为看重，而他为此必须经历特别辛苦的训练。但幸运女神在此亦是站在他这边。马其顿王室成员一向特别热衷于狩猎，所以马其顿人将国内最适合的部分给圈围起来，用于培育兽群。在对抗罗马的战争中，这些区域跟以往一样被小心维护，但因为一连串的国家危机，它们未曾被猎杀，结果是每一种类的大型动物都数量众多。当战争胜利，宝路斯相信狩猎能提供给年轻人最佳的训练以及休闲，于是将王室的猎人安排在西庇阿的指挥下，并授权他完全控制与狩猎相关的事务。

西庇阿接受了这任务，因为他实际上可以视自己处于一个国王的位置上，所以只要军队在皮得纳战役后，仍然停留在马其顿期间时，他都将所有时间投注在这项活动上。在那时候他恰好处于最适当的年纪，在体能上处于最成熟的状态，而因为他就像一只成长良好的猎犬一样，在天生性格上适合此事，他对这项运动发展出很大的热情，这种嗜好终其一生始终存在。所以当他回到罗马，发现波里比阿拥有与他相合的追逐狩猎乐趣，所以不像大多数其他年轻人将时间耗费在法庭或是正式拜访，[15] 在广场徘徊，讨好群众，西庇阿将时间花费在狩猎上。他在战场上成就许多精彩的事功，而且在那里他赢得比同时代之人更高的声望。那些投身于法庭之人，只能以伤害自己公民同侪的这人或那人来赢得赞美，因为这通常是法庭程序的结果，然而西庇阿没有伤害任何一人，却赢得勇敢的普世之名，以行动来对抗口才。结果是在很短时间之内他已经超越同时代群伦，其杰出在罗马记录中，无人能比，即使他追寻名声的路径与其他依据罗马传统及习俗而做选择的人，也相当不同。

30.我已经花费相当篇幅在西庇阿的原则以及人格上，始于他最年轻之时。部分是因为我认为这故事对我较老及较少的读者比较有趣，但尤其是因为我将会在后书之中提及他而将此写下，这看起来会较令人信服。我急切希望我的读者没有人会觉得难以接受西庇阿晚年生活中，任何那些听起来非比寻常的事情，而且也没有人能因为对某些事件的真正

缘由无所知晓，认为这些该归诸运气，而让西庇阿被剥夺他成就中所应有的功劳。除了几个场合外，没有太多我们可以该归诸好的机遇或是运势。

---

[1] 在一六二年。

[2] 一七五年。

[3] 直译是："他那做事的人会拿走属于那只有意图去做的人"。这是不知来源的谚语。

[4] 欧里庇得斯《腓尼基女人》行七二六。

[5] 这是不知来源的谚语。

[6] 德米特里一世的赌注成功。他在叙利亚被热情地接受，掌握权力，将年轻的安条克五世及摄政莱席亚斯处死，并从一六二年统治到一五○年。但他接着又被一位僭夺者亚历山大·巴拉斯（Alexander Balas）击败并杀死。

[7] 在十八书35章。

[8] 宝路斯的这两位儿子中，年长的被过继给费边·马克希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而年幼的过继给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查马战役胜利者的儿子。

[9] 约二五点八六千克。——译者注

[10] 约一二九三千克。——译者注

[11] 她死于一六二年。

[12] 这是由衣服、珠宝、奴隶以及其他个人财产组成。

[13] 这两位女儿中较年轻的，成为台伯里亚斯（Tiberius）及盖亚斯（Gaius），格拉古兄弟（Gracchi brothers）的母亲；他们是民主领袖，在接下来那世代的政治动乱中丧命。

[14] 这两位较年轻的儿子，其中一位在宝路斯于一六七年的马其顿胜利游行的前五天过世，而另一子则在三天之后过世。

[15] 在早上先去贵族家庭拜访及致意，稍后则是从事法庭事务。

第三十六书

在罗马及迦太基之事务：第三次布匿战争

9.在希腊世界流传许多有关迦太基人最终被罗马人击败的报道，[1]而这些彼此对立的说法反映出很大的歧见。有些人赞美罗马人采取有智慧及政治家的政策，来护卫他们的帝国，将经常悬挂在他们头顶上的恐惧给摘除掉，摧毁屡次与他们争夺世界统治权的城邦，一旦机会出现，它又可能再度如此竞争，因此为了确保他们自己国家的主宰权，有人认为这些是有智慧及有远见之人所采取的行动。

但其他人则有相反的看法，辩称说罗马人非但没有坚持他们赖以获得主宰权的原则，反而逐渐放弃这些，转向那曾伤害雅典人及斯巴达人的权力欲求；虽然他们比这两个国家起步较晚，所有征象显示他们必将抵达相同目的地。在过去，罗马人对所有的民族进行作战，但是只作战到他们敌人被击败，然后敌人承认将服从罗马人，执行他们的命令为止。但现在他们在对待佩尔修斯的态度上，预告他们未来的意图，这将涉及对马其顿进行从根拔起的毁灭，而新政策在有关迦太基的决定上到达最高点。迦太基人对他们的敌人并没犯下任何无可挽回的罪行，然而尽管敌人已经同意他们的所有条件，并且愿意遵守他们的命令，罗马人却加诸惩罚，这惩罚不仅严厉，而且是最极端的。

然而其他人主张，一般而言罗马人是有文明的民族，他们引以为傲的民族独特性是他们以直接以及英勇的方式来进行他们的战争：他们不诉诸夜间突击或是埋伏偷袭，他们厌恶借由欺瞒或诈骗而可能取得的优

势，所以他们认为公开及面对面的战争是唯一配得上他们特色的战斗形式。[2] 但后来在整个他们与迦太基人交手的过程中，他们进行欺瞒或是诈骗，在一个时刻提出一套提议，但在下一刻却隐瞒它们，直到它们剥夺这城邦所有能从其盟友处取得协助的希望。有人认为，这些方法比较像是独裁者才会进行的阴谋诡计，而不是一个立宪国家如罗马所应执行的政策，而从任何诚实的观点来看，只能被形容为与邪恶或背叛几乎难以区分。

再者，尚有他人以不同方式诠释这些动作。他们主张假如罗马在迦太基人提出投降之前，以这种方式行事：在一个时刻提供某些让步，然后逐渐在其他方面露出底牌；那么罗马人必然看起来已经犯下他们被指控的欺诈罪。但假如迦太基自己先交出自己，令敌人宰割，罗马人则可以以任何他们认为最佳的方式来行动；而罗马人之后下令，强加在迦太基人身上已经决定的条件，那么其所作所为不像是邪恶的行为，而且也甚少与背叛行为有所相似。因为每件罪行据其本质必须落入三种类型之一，而罗马人之所作所为不属于其中任何一项。邪恶行为是冒犯神明，或是父母长上，或是已逝之人；背叛行为则是由对宣誓或写定之誓词加以违背而构成；不正义之行为，则是对法律及习俗所做之犯行。然而罗马人在任何一项上都没犯错。他们既没冒犯神明、父母长上或是死者，他们也没破坏任何宣誓过之誓言或条约；相反的，他们指控迦太基人是犯错的一方。再者，他们也没有破坏法律或习俗或他们自己的诚信。他们是从一个交出权力，任由他们宰割的民族那里，接受他们自愿的投降，而当这民族的人民拒绝服从他们的命令时，他们才对其施加武力。

论命运及机遇

17.既然我批评那些作家将公共事件以及私人生活中所遇见之灾难归诸命运及机遇的运作，我就一个严格的历史作品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希望对此议题陈述我的观点。有关那些凡人无法或难以理解的现象，将它们归诸神明或机遇之运作，来逃避这种进退维谷的困难，是相当合理的。明显的例证是例外的极大或连续降雨及降雪，或是相反，干旱或霜害造成植物枯萎死去，或是持续爆发的瘟疫，或是其他这类事件，这些都难以发现其发生原因。在如此情形下，因为欠缺更好的解释，我们很自然地去跟随公共意见，企图以祈祷和祭祀来平息神明的威力；然后我们派人去询问神明，我们应该说什么以及做什么来产生更好的转变，从现在压迫我们的邪恶中得到喘息的机会。但关于那些其缘由我们可以发现的事件，并解释它们何以会发生，在我看来，我们则不应该认为它们是神明的作为。且让我提出一例，来说明我所指为何。在我们的时代，整个希腊为缺乏孩子的现象所苦，因此有普遍人口减少的趋势，于是有些城镇开始被放弃而荒废，而且农业生产减少，虽然并没有持续发生的战事或传染病发生。现在假如有人提出说，我们应该征询神明去发现出我们该说或该做什么，来增加我们人口数量，重新补足城镇人口，他的建议必然会被认为徒劳无益，因为这情况的原因是相当自明，而其解决方案操之在我。这邪恶在我们有意识之前，迅速发生在我们身上，追上我们，这其中简单的道理是人们堕落到浮夸野心、爱好钱财以及好逸恶劳里，结果是我们不愿结婚，或是假如结婚，不愿养育生下的孩子；或是他们只愿从一大群之中抚养一位或两位，所以让他们能够过舒适的日子，然后得以继续挥霍遗产。因为在那只有一位或两位孩子的情形中，其中一位在战争中被杀，而另一位则因疾病身故，很明显家庭便会无人居住，最后整个城镇，正如发生在蜂群中的现象，逐渐地失去其资源，不再繁荣。

在这些状况下，去向神明拜求是完全无用的，因为任何普通人必将告诉您，其中解药是在人们自己的意志力，而这是改变他们野心目标，或是通过法律来确保他们所生的孩子必须要被抚养。在此处预言家或是超自然能力都无法提供解决方案，而相同的原则亦适用于类似的问题。但在那些仍无法或难以确定原因者，那答案仍会有疑问：近来马其顿的历史即是有关之一例。

马其顿人从罗马人那里接受到相当多的福利。这整个国家已经从专制统治者独断的索求以及征税中得到豁免，而且如普遍所承认，享受到自由，而非压迫，而其他不同城镇也因罗马人，而摆脱内战流血以及内部派系斗争。然而在几年时间之内，马其顿人见到自己国人在僭位者菲利普的手中，遭受到放逐、酷刑及谋杀，人数超过之前合法的统治者之所为。另外，当他们在合法统治者如菲利普五世及佩尔修斯[3]领导下，他们被罗马人击败，然而现在当他们正为一个令人厌恶之人作战，他们却展现出最高的勇气来护卫他的王位，而且实际上还打败一支罗马军队。如此的结果只会让我们的智慧深感困惑，因为甚难发现此事有任何理性的原因。所以在尝试解释如此的发展时，我们倾向于称它为从上天降下来的蛊惑，以及神明的愤怒降临在马其顿人身上。

---

[1] 这所指的是第三次及最后一次布匿战争。

[2] 西庇阿纵火攻击西法克斯（页550）一点都不符合这样的传统。

[3] 佩尔修斯在一六八年于皮得纳战役中被罗马人彻底打败。僭位者菲利普打败由副执政祖文特斯（Juventus）所率领的一个罗马军团，但他自己后来在一四八年被打败，并且被俘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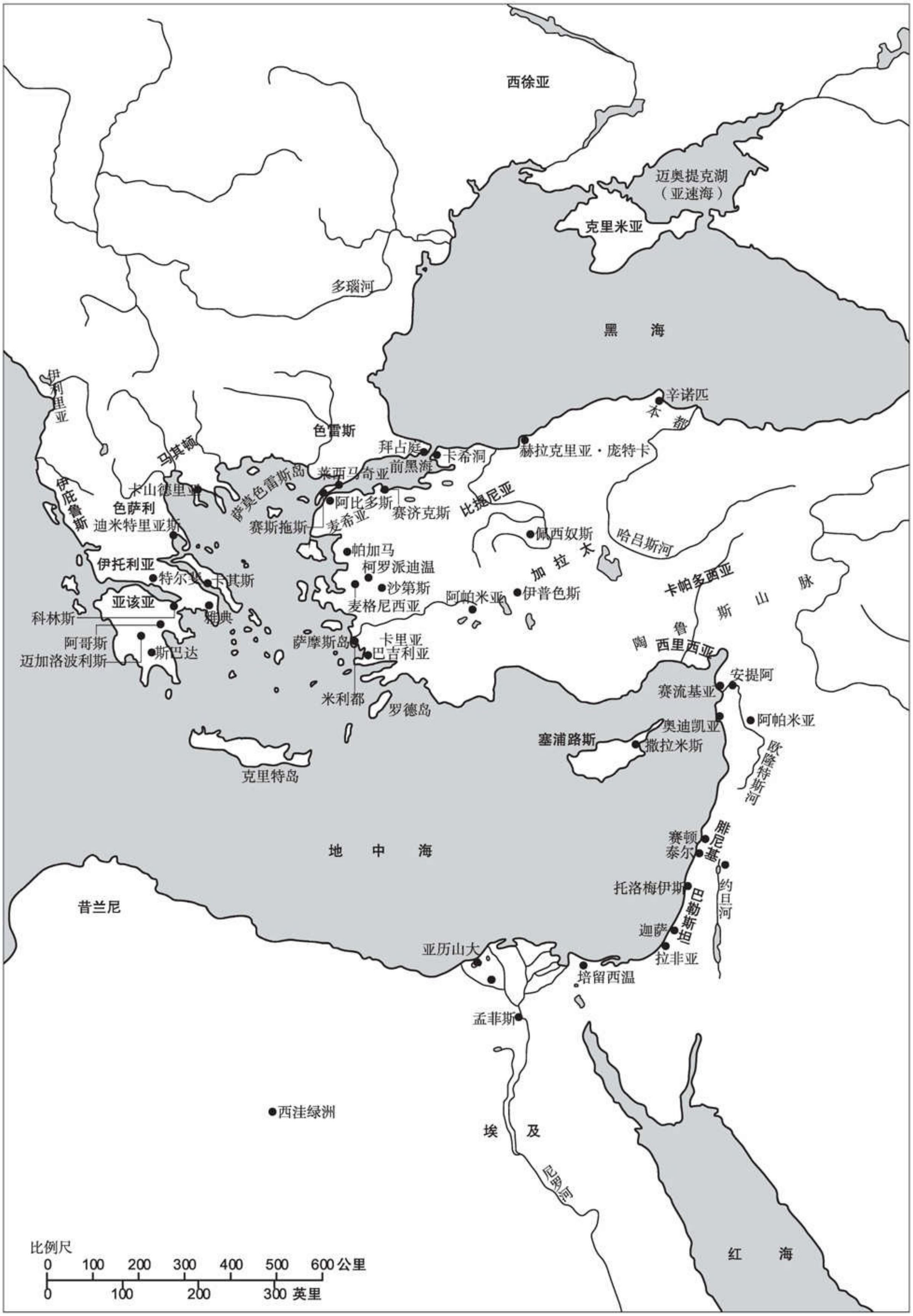
第三十九书

取自结语

最后，在完成我的任务之后，我从罗马返家。或许可以说，我被赋予机会去从我过去的政治活动中进行收获，这是我凭借对罗马的忠诚所赢来的恩典。所以我向诸位神明献上我的祈祷，愿我能在余生中以相同条件继续行走相同的路，牢记——如我现在——命运女神是嫉妒凡人的，而且最会在凡人认为他在人生最受祝福以及最成功的那一刻，展示出她的神力。

这结果确是如此。但既然我已经到达我工作的终点，我希望提醒我的读者我的起始点以及我初步的规划，这我列在读者之前作为我整个历史的基础蓝图，并同时将我的主题加以综合简述，而且以一般观念及以细节深入起始与结束之间的关联。我在开始之初即已解释，我将从泰密乌斯所留下之处开始我导论性的章节，然后对在意大利、西西里以及非洲之事务进行简洁的回顾，因为泰密乌斯在他的历史中，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国家。我接着到达汉尼拔统帅迦太基军队、德米特里二世之子菲利普五世成为马其顿国王、斯巴达之克里奥米尼斯被逐出希腊、安条克三世继任叙利亚王位以及“爱父亲”托勒密四世继任埃及王位。在那里我开始一个新的起点，亦即第一三九个奥林匹亚年，并从那点来叙述整个世界的普世历史，以奥林匹亚年标记时间，再细分为年，然后借着对这每个国家进行同时的论述，直到迦太基被攻占、亚该亚人与罗马人在科林斯地峡交战和因为那事件所导致对希腊政治事务之安排为止。

正是透过这样的方法，如我在开始时所说，历史的学生将会从他们的研读中得到最佳以及最有利的结果：亦即，去发现究竟是何种过程以及在何种政治制度之下，整个世界臣服于罗马的统治之下，一件在过去完全没有前例的事件。现在我既然已经完成我全部的目的，我所剩下的工作是将那些包含在我历史之中的时代加以详细说明，并且细数罗列整个作品的内容以及区分。



西徐亚
迈奥提克湖
（亚速海）
克里米亚
多瑙河
黑 海
辛诺匹
本 都
伊利里亚
色雷斯
拜占庭
卡希洞
赫拉克里亚·庞特卡
马其顿
前黑海
莱西马奇亚
萨莫色雷斯岛
卡山德里亚
色萨利
伊庇鲁斯
阿比多斯
赛济克斯
比提尼亚
迪米特里亚斯
赛斯拖斯
麦希亚
佩西奴斯
哈吕斯河
帕加马
柯罗派迪温
加 拉 太
伊托利亚
特尔斐
卡其斯
沙第斯
卡帕多西亚
亚该亚
雅典
阿帕米亚
伊普色斯
麦格尼西亚
科林斯
阿哥斯
斯巴达
迈加洛波利斯
萨摩斯岛
卡里亚
巴吉利亚
陶 鲁 斯 山 脉
西里西亚
米利都
罗德岛
安提阿
赛流基亚
阿帕米亚
奥迪凯亚
塞浦路斯
撒拉米斯
欧隆特斯河
克里特岛
地 中 海
赛顿
泰尔
腓尼基
约旦河
托洛梅伊斯
巴勒斯坦
昔兰尼
迦萨
拉非亚
亚历山大
培留西温
孟菲斯
西洼绿洲
埃 及
尼罗河
红 海
比例尺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公里
0 100 200 300 英里

希腊化世界

地图清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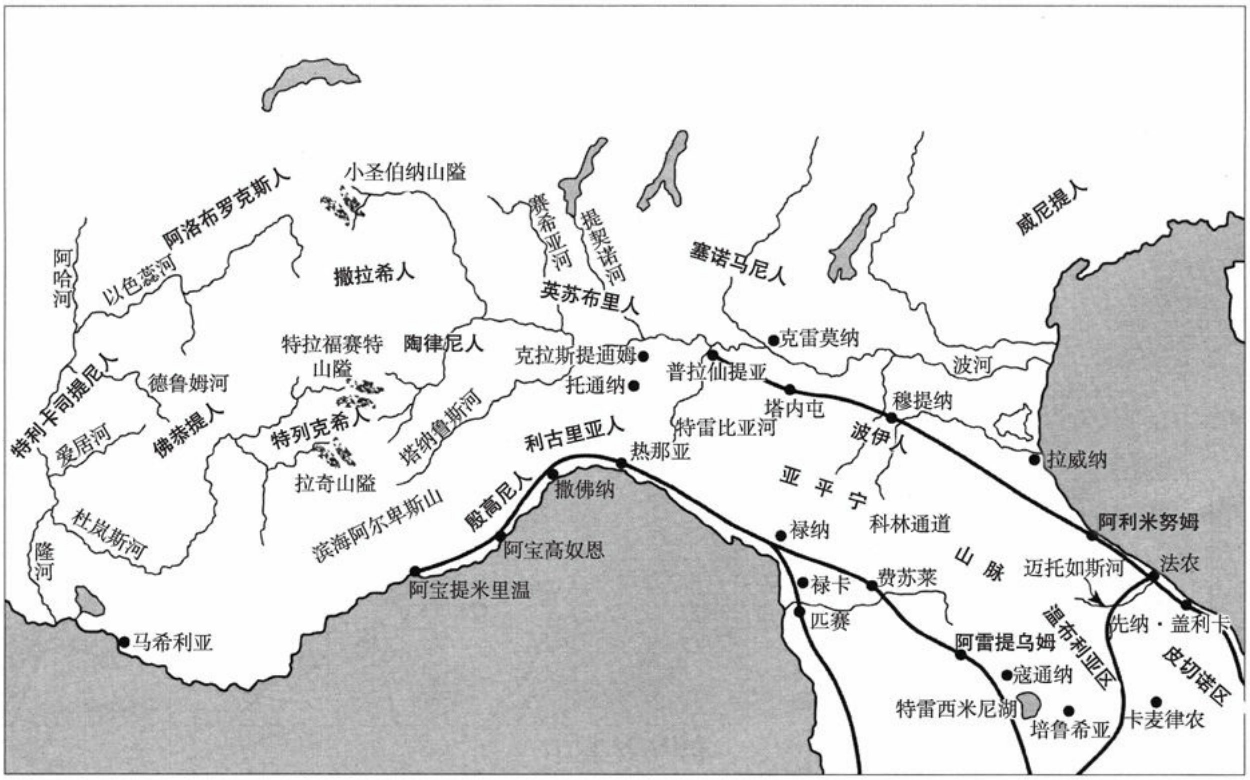


与汉尼拔作战时的西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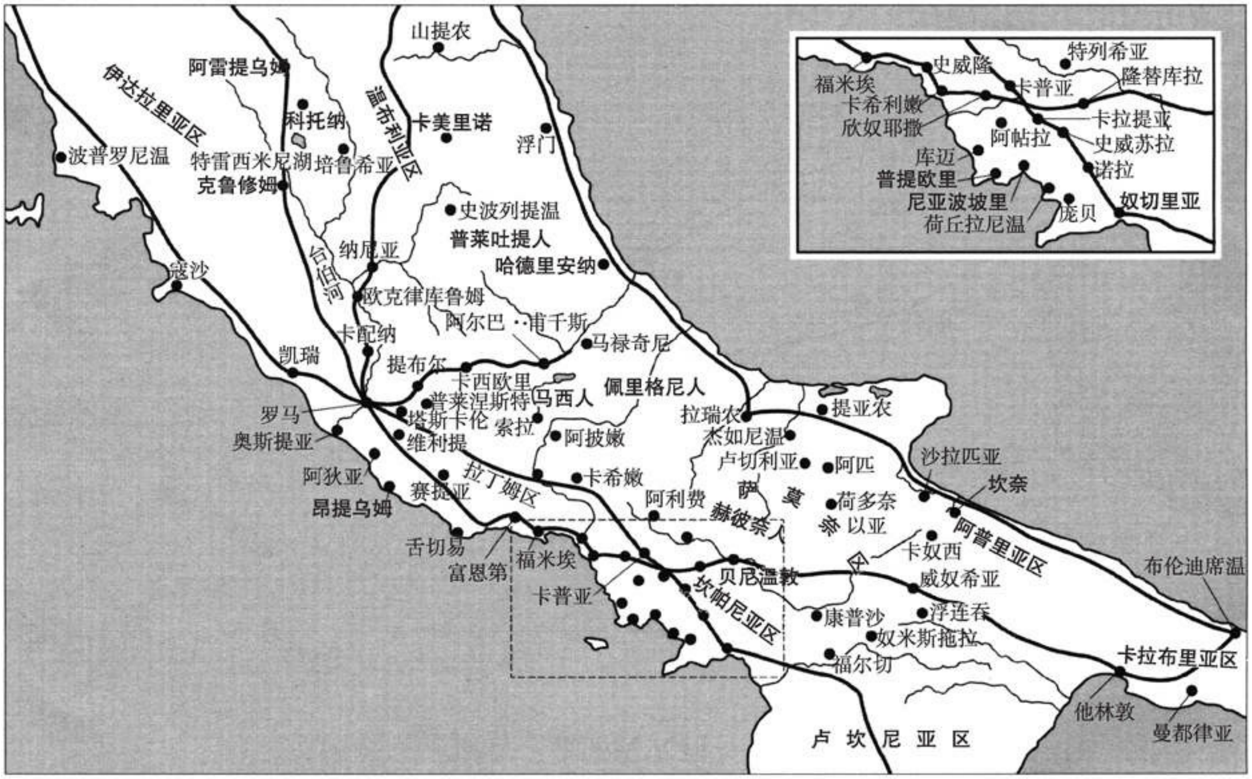


汉尼拔行行军路线
得比尔（Gavin de Beer）之“阿尔卑斯山及大象”（汉尼拔路线）所建议
里昂
小圣伯纳山隘
阿洛布罗克斯人
隆河
以色惹河
塞尼山
卡拉皮尔山隘
都灵
克耳福列山
特拉福赛特
山隘
夏都达拉
格里蒙山隘
德鲁姆河
特列克希人
佛恭提人
戛普
特利卡司提尼人
斯杜拉河
拉奇山隘
爱居河
“岛屿”
卡发利人
亚威依
隆河
杜岚斯河
孔尼奇通道
阿珥
地中海

汉尼拔横越阿尔比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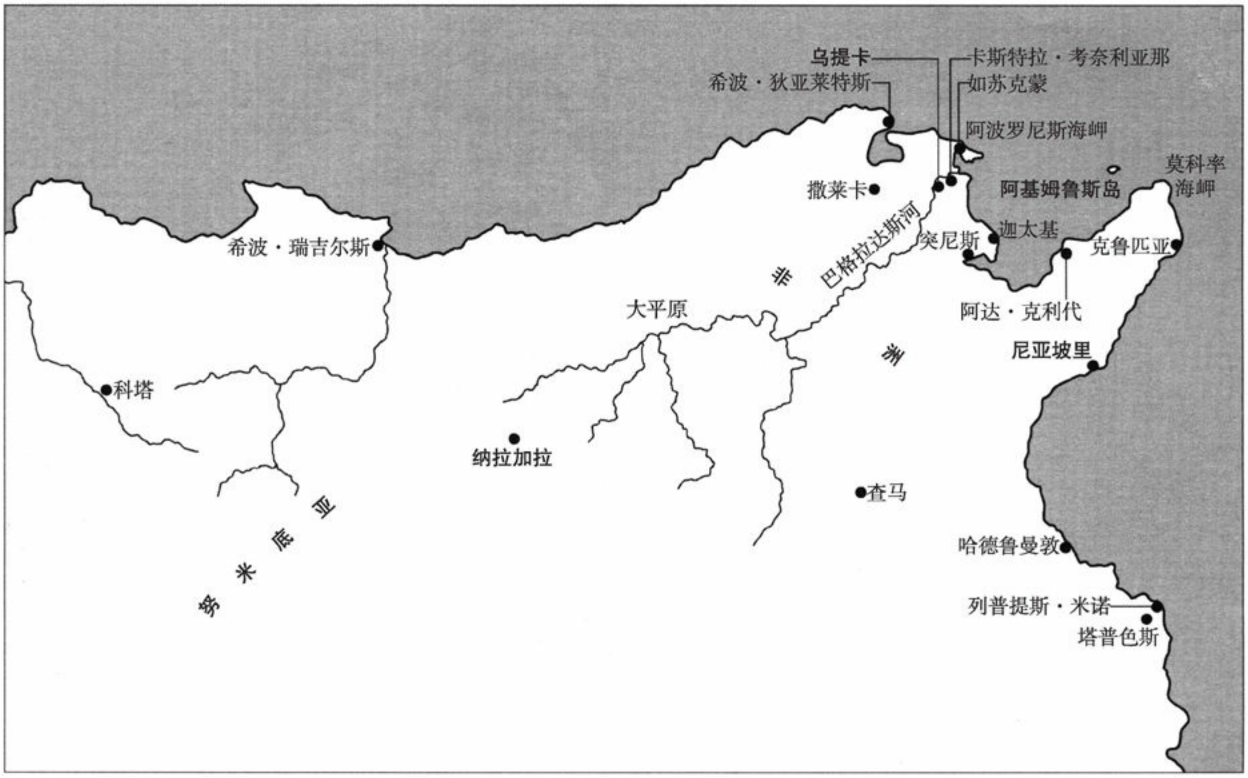
北部意大利


山提农
阿雷提乌姆
伊达拉里亚区
温布利亚区
科托纳
卡美里诺
浮门
波普罗尼温
特雷西米尼湖
培鲁希亚
克鲁修姆
史波列提温
普莱吐提人
哈德里安纳
纳尼亚
台伯河
欧克律库鲁姆
阿尔巴··甫千斯
寇沙
卡配纳
马禄奇尼
凯瑞
提布尔
卡西欧里
普莱涅斯特
马西人
佩里格尼人
罗马
塔斯卡伦
提亚农
拉瑞农
奥斯提亚
维利提
索拉
阿拔嫩
杰如尼温
卢切利亚
阿匹
沙拉匹亚
坎奈
阿狄亚
卡希嫩
萨莫奈区
荷多奈以亚
昂提乌姆
赛提亚
拉丁姆区
阿利费
赫彼奈人
阿普里亚区
舌切易
卡奴西
布伦迪席温
福米埃
富恩第
贝尼温敦
威奴希亚
卡普亚
坎帕尼亚区
康普沙
浮连吞
奴米斯拖拉
福尔切
卡拉布里亚区
他林敦
曼都律亚
卢坎尼亚区
特列希亚
史威隆
福米埃
卡普亚
隆替库拉
卡希利嫩
欣奴耶撒
卡拉提亚
阿帖拉
史威苏拉
库迈
诺拉
普提欧里
尼亚波坡里
奴切里亚
荷丘拉尼温
庞贝

中部意大利


福尔切
阿普里亚区
他林敦
卡拉布里亚区
布伦迪席温
麦达蓬坦
格鲁曼吞
卢坎尼亚区
希拉克利亚
曼都律亚
帕利奴和司海岬
图里伊
培帖利亚
康仙提亚
克罗敦
维伯·华伦提亚
里帕拉
佩洛里亚司海岬
布鲁提恩区
迈萨拿
丁达里斯
得雷帕纳
帕诺穆斯
特迈·希美拉伊亚
高隆尼亚
罗克里
艾基尔特斯群岛
艾瑞克斯山
利利贝乌姆
赛格斯塔
凯法洛迪温
利吉姆
塔罗明尼昂
西西里
汉纳
希美拉河
卡塔纳
栖来那斯
赫别色斯
姆尔根提亚
叙拉古
赫拉克里亚·米诺亚
列安提尼
迈格拉·海布拉伊亚
阿格里根特
塔普色斯
阿克拉埃
埃克诺穆斯
赫洛如斯
加马里纳
帕奇纳斯海岬

南部意大利及西西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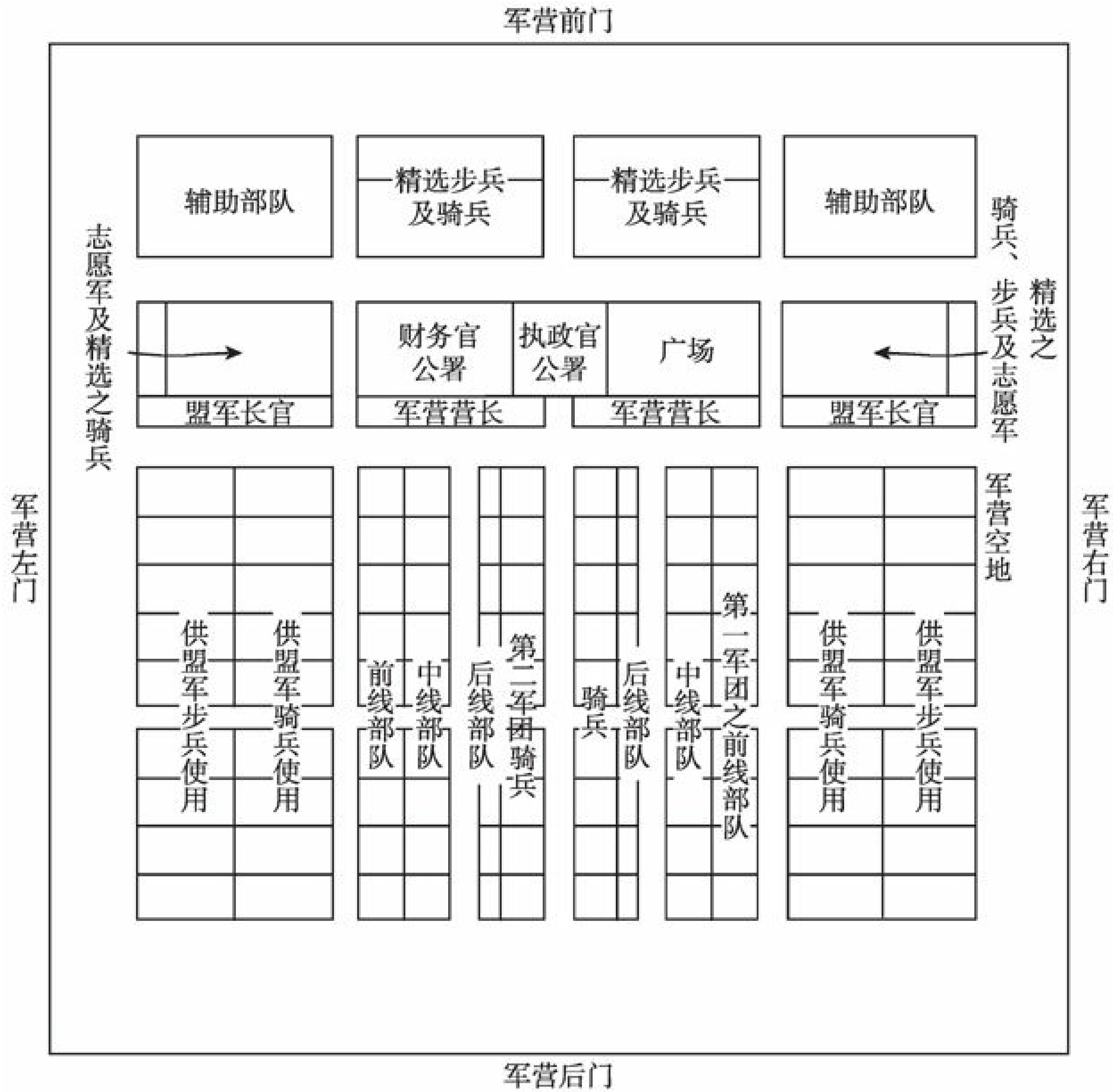


非洲与奴米底亚


斯寇得拉
利苏斯
帕提尼人
德瑞罗河
乌斯坎纳
达
达
尼
亚
培奥尼亚区
斯托比
艾瑞冈河
林色司提斯区
培拉冈尼亚区
里赫尼得斯
奥图洛布斯
波拉山
班尼岔隘口
耶德撒
培拉
阿克希亚斯河
比萨提卡区
希拉克利亚·辛提卡
安菲波里斯
奈斯特斯河
麦迪
色雷斯
撒别伊
阿博得拉
马洛尼亚
塔索斯
阿波罗尼亚
耶皮潭纳斯
阿普索斯河
歇列特鲁温
奥瑞斯提斯区
耶欧代以亚区
别洛伊亚
帖萨隆尼卡
卡尔希迪司半岛
阿坎特斯
安第冈尼亚
奥瑞克斯
艾沃伊河
阿丁坦尼区
艾丽米尔提斯区
皮得纳
皮艾律亚区
迪温
佩特拉
希拉克利温
卡山德里亚
连诺斯岛
德瑞乌斯河
柴勾斯隘口
柏希比亚区
费拉
天培关
克雷提埃
法洛律亚
科赛拉岛
多东纳
阿塔曼尼亚区
拉律撒
特瑞卡
阿特拉克斯
潘涅乌斯河
色萨利区
费莱
迪米特利亚斯
法萨卢
陶马希
克修尼埃
安布拉基亚
多洛皮亚区
叶赫纳斯
拉米亚
培帕瑞特斯岛
欧瑞温
斯柏凯乌斯河

北部希腊


伊庇鲁斯区
色萨利区
费莱
迪米特利亚斯
阿塔曼尼亚
法萨勒斯
陶马希
亚该亚·扶提欧提斯
安布拉基亚
多洛皮亚区
克修尼埃
培帕瑞特斯岛
叶赫纳斯
拉米亚
斯柏凯乌斯河
欧瑞温
梅迪翁
温泉关
琉卡斯岛
伊托利亚区
洛克里斯区
阿卡那尼亚区
特蒙
安菲撒
耶拉提亚
卡其斯
伊瑞垂亚
瑙帕克特斯
凯洛尼亚
欧若帕斯
克罗纳
别奥提亚区
欧尼亚代
特尔斐
底比斯
凯法连尼亚岛
散姆
埃基温
安提居拉
提斯比
迈夏拉
谷奈塔
西琼
留克特拉
艾提卡区
卡瑞司特斯
安德洛斯岛
亚该亚区
科林斯
雅典
伊利斯
阿卡底亚区
札欣特斯岛
伊吉纳
切乌斯岛
欧寇曼纳斯
阿哥司
迈加洛波利斯
特立菲利亚区
曼提尼亚
均特斯岛
提洛岛
提斯亚
贝比纳
塞拉希亚
迈瑟纳
斯巴达
拉空尼亚区
盖提温
拉斯
马里亚海峡
台那伦海峡



根据波里比阿四军团之半的军营蓝图

编年纪事简表

以下年表列出本波里比阿《历史》选文中所形容或提及之事件。

西方		东方	
		776	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509	废除王政，建立共和		
494	平民与贵族之争。设护民官、形成“平民会议”		
		480－479	第一次希波战争
		469－399	苏格拉底
449	发布“十二木表法”		
		427－347	柏拉图
390	高卢人占领罗马		
		385	柏拉图创学院
		384－322	亚里士多德
367	李锡尼法－执政官至少要有一位出身平民		
343－341	第一次萨莫奈战争	336	亚历山大即位
		335	亚里士多德创立书院
326－304	第二次萨莫奈战争		
		323	亚历山大去世
298－290	第三次萨莫奈战争		
287	侯田希亚斯法－平民会议通过的决议对所有罗马公民皆有约束力		

续表**1**

西方		东方	
280	皮洛士跨海道意大利	280	亚该亚联邦重新组构
		272	继承者时代结束，三大王国格局确立——马其顿、塞琉西叙利亚、托勒密埃及
264	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		
262	迈莱海战		
257	汀达绿斯海战		
256	埃克诺穆斯海战		
		251/250	阿拉托斯解放西息温
247	哈密尔卡·巴卡在西西里		
		243/242	阿拉托斯攻占科林斯
241	艾基尔特斯群岛海战：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		
240 – 237	迦太基佣兵之战		
238	罗马占领撒丁		
237 – 230	哈密尔卡在西班牙	235	克里奥米尼斯三世在斯巴达即位
230 – 221	哈斯德鲁巴在西班牙	229	“多森”安提柯三世在马其顿继承德米特里二世。帕克索斯岛（Paxos）海战
		229 – 228	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
		227	克里奥米尼斯发动政变。
226	罗马与哈斯德鲁巴签订埃布罗河条约		罗德岛地震
225	高卢人在特拉蒙被打败	225	塞琉西三世继承塞琉西二世
		224	安提柯三世在希腊；建立希腊联盟
		223	曼提尼亚被夷为平地；克里奥米尼斯占领迈加洛波利斯。
			安条克三世继承塞琉西三世

续表**2**

西方		东方	
222	克拉司提迪姆之战	222	塞拉希亚战役
221	汉尼拔继承哈斯德鲁巴在西班牙地位	221	“多森”安提柯三世过世；菲利普五世在马其顿继位。
		221	拖洛梅四世在埃及继位
		220	希腊爆发同盟之战
			波里比阿《历史》主要部分开始
219	围攻并占领萨贡托	219	克里奥米尼斯死于埃及
			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
			法罗斯之德米特里投靠菲利普五世
		219－217	第四次叙利亚战争
218	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	218	菲利普胜利。特蒙被攻占掠夺
	汉尼拔离开西班牙，横跨阿尔卑斯山，抵达意大利。特雷比亚河之战		
217	特雷西米尼湖之战	217	诺帕克都会议；同盟战争结束
	罗马在埃布罗河的海军胜利		拉非亚战役。埃及和叙利亚签订和平协议
216	坎奈战役	216	菲利普在伊利里亚。
215	叙拉古加入迦太基	215	菲利普与汉尼拔结盟。第一次马其顿战争开始
		215 或 214	菲利普干预美塞尼亚
214－212	罗马围攻叙拉古		
213/212	汉尼拔攻占他林敦		
212	叙拉古沦陷		
211	汉尼拔进军罗马	211	罗马与伊托利亚结盟
	卡普亚沦陷		
	普布里亚斯·西庇阿及格尼亚斯·西庇阿战殁于西班牙		

续表**3**

西方		东方	
210	“非洲征服者”普布里亚斯·西庇阿登陆西班牙		
209	西庇阿攻占新迦太基		
209－206	西庇阿征服西班牙		
		206	伊托利亚人独自与菲利普签订和约
		205	腓尼企和约。第一次马其顿战争结束
204－202	西庇阿在非洲	204	拖洛梅四世过世，拖洛梅五世继位
		203	阿加索克利斯在亚历山大垮台
		203/202	菲利普五世与安条克三世订定密约来对付埃及
202	査马战役		
201	和平协定结束第二次布匿战争	201	菲利普五世活跃于爱琴海；与阿塔罗斯一世及罗德岛作战
		200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爆发
		199	伊托利亚人加入罗马
		198	亚该亚人加入罗马
			洛克里斯会议
		197	狗头山（Cynoscephalae）战役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结束
		196	弗拉米宁宣布希腊自由
		196－193	安条克三世前进小亚细亚及色雷斯
		192－189	罗马及安条克三世发生叙利亚之战
		189	福尔索（Gnaeus Manlius Vulso）攻击小亚细亚的加拉太人

续表**4**

西方		东方	
		188	阿帕米亚条约。亚洲之安排
		186－183	普鲁席亚斯一世与欧迈尼斯二世发生战争
		183－179	帕尔那凯斯一世与欧迈尼斯二世（和阿里亚拉提斯四世联手）发生战争
		179	佩尔修斯在马其顿继承非利普五世
		171－168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
		169	安条克四世入侵埃及以及撤军
		168	皮得那战役。马其顿被分割为四个共和国
			安条克再度入侵埃及，接到罗马要撤军的最后通牒
			根据原先计划波里比阿《历史》结束之处
		167	波里比阿以人质身份到罗马
		162	波里比阿协助德米特里一世逃离罗马，回到叙利亚
		158	阿里亚拉提斯五世被逐离卡帕多西亚
		157	阿里亚拉提斯五世得阿塔罗斯二世之助进行复位
		156－154	阿塔罗斯二世与普鲁席亚斯二世发生战争
153－151	西班牙的凯尔特·伊比利亚战争		
151	波里比阿随同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到西班牙及非洲		

续表5

西方		东方	
	迦太基向马西尼沙宣战		
150	罗马决定向迦太基宣战	150	波里比阿及其他人质回到希腊
149	罗马人入侵非洲	149	安得列司克斯在马其顿起义
		149/148	斯巴达退出亚该亚联邦
		148	安得列司克斯战败
		147	罗马特使批准数个城邦退出亚该亚联邦
146	西庇阿攻占并摧毁迦太基	146	亚该亚战争
	波里比阿在大西洋航行		科林斯被占领洗劫
			波里比阿在希腊
145	波里比阿造访罗马		

名词对照

二划

丁达里斯Tyndaris

三划

三层舰trireme

大平原之役Great Plains，battle of the

大流士一世，波斯国王Darius I，King of Persia

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

山塔尼乌斯Centenius，G.

山提农Sentinum

意大利，意大利人Italy，Italians

小亚细亚Asia Minor

小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the younger

小莱伊利乌斯Laelius，G. the younger

四划

马切拉Macella

马卡河Macar，river

马尔马拉海，见前黑海Marmara Sea

马吉勒斯Magilus

马西人Marsi

马西尼沙，努米底亚国王Masinissa，King of Numidia

马色赛利人Masaesyli

马克西穆斯·菲路寇苏斯·费边（二三三年任执政官），坎奈战役后担任独裁官Fabius，Q. Maximus Verrucosus

马克斯·希拉奴斯Silanus，Marcus

马里亚海岬Malea，Cape

马利亚湾Malian Gulf

马希利亚（今马赛），马希利亚人Massilia，Massiliots

马其顿，马其顿人Macedonia，Macedonians

“马其顿征服者”埃米利乌斯·宝路斯（一六八年任执政官）Aemilius，L. Paullus ‘Macedonicus’

马凯伊人Maccaei

马垓提斯Margites

马哈巴Maharbal

马洛尼亚Maroneia

马哥，汉尼拔之友Mago，friend of Hannibal

马哥，汉尼拔之弟Mago，brother of Hannibal

马哥，新迦太基指挥官Mago，commander at New Carthage

马斯，托勒密四世之兄弟Magas，brother of Ptolemy IV

马斯提亚Mastia

马斯提亚尼人Mastiani

马鲁启纳Marrucina

马禄奇尼人Marrucini

马赛利人Massyli

马赛的彼提亚斯Pytheas of Marseilles

王权政治kingship

夫利阿斯Phlius

夫利阿斯的克里奥尼马斯Cleonymus of Phlius

天狼星座之升起Sirius，rising of

五层舰Quinquremes

历史与悲剧相比History，compared with tragedy

历史的真实Truth in history

尤尼乌斯·布鲁图斯Junius，L. Brutus

尤尼乌斯·普鲁斯Junius，L. Pullus

匹赛Pisae

比利牛斯山Pyrenees

比提尼亚Bithynia

瓦尔达尔河Vardar，river

瓦迪蒙Vadimon

瓦凯伊Vaccaei

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梅萨拉Valerius，M. Maximus Messalla

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Valerius，L. Flaccus

贝尼温敦Beneventum

贝蕾妮丝，托勒密三世的皇后Berenice，Queen of Ptolemy III

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

乌鸦“raven”，the

乌提卡Utica

“勾那塔斯”安提柯二世Antigonus II

六门Hexapyli

巴吉利亚Bargylia

巴利阿里群岛，巴利阿里岛民Baleria Islands，islanders

巴帖亚Batheia

巴股希Bargusii

巴莫卡Barmocar

以弗所Ephesus

以色蕊河Isre，river

双重方阵double phalanx

五划

艾基尔特斯群岛战役Aegeates Islands，battle of

艾得科Edeco

艾瑞毕安努斯Eribianus

艾瑞克斯山，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征战Eryx，Mount

艾瑞诺希Aerenosii

本都（黑海）Pontus

札欣特斯Zacynthus

左伊帕斯Zoippus

布伦迪希温Brundisium

布拉Bura

布拉纠利斯Brachylles

布得斯Bodes

布鲁提恩，布鲁提恩人Bruttium，Bruttians

平民plebian

卡山德，马其顿国王Cassander，King of Macedon

卡山德里亚的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 of Cassandreia

卡占东的德谟克利特Damocritus of Calydon

卡奴西Canusium

卡里亚，卡里亚人Caria，Carians

卡林Calene

卡奇洞Calchedon

卡拉土斯，波伊人国王Galatus，King of the Boii

卡迪亚的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 of Cardia

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

卡佩塔尼人Carpetani

卡美里诺Camerinum

卡基迪克斯山Chalcidicus，Mount

卡斯吐罗Castulo

卡斯塔隆Castalon

卡普亚Capua 围攻

卡瑞尼亚Caryneia

卡瑞尼亚之马古斯Margus of Caryneia

卡雷Cales

北风Etesian winds

卢切利亚Luceria

卢西Lusi

卢西安Lucian

卢西塔尼亚Lusitania

卢坎尼亚，卢坎尼亚人Lucania，Lucanians

卢塔提亚斯·克吐勒斯（二二○年任执政官）Lutatius，G. Catulus

卢塔提亚斯·克吐勒斯（二四二年任执政官）Lutatius，G. Catulus

史可第来达斯Scerdilaidas

史汀发莱亚Stymphalaia

他林敦，他林敦人Tarentum，Tarentines

他林敦的尼孔Nicon of Tarentum

瓜达尔基维尔Guadalquivir，river

印度，印度人India，Indians

外海Outer Sea，the

市民广场的发言台Rostra，The

市政官的国库Aediles，treasury of

汉尼拔Hannibal

汉尼拔，在利利贝乌姆之海军指挥官Hannibal，naval commander at Lilybaeum

汉尼拔，在利利贝乌姆指挥凯尔特人的军官Hannibal，commander of Celts at Lilybaeum

汉尼拔，“罗德岛人”Hannibal，The Rhodian

汉尼拔战争，见第二次布匿战争Hannibalic War

汉尼拔，基斯哥之子，阿格里根特的指挥官Hannibal，son of Gisco，commander at Agrigentum

哈密尔卡·巴卡，汉尼拔父亲Hamilcar Barca

汉诺，汉尼拔的军官Hanno，officer of Hannibal

汉诺，汉尼拔的将军Hanno，general of Hannibal

汉诺，迦太基在迈萨拿的指挥官Hanno，Carthaginian commander at Messana

汉诺，基斯哥之孙Hanno，grandson of Gisco

尼可马克斯Nichomachus

尼可法奈司Nicophanes

尼可斯特拉托斯，阿加索克利斯的国务秘书Nicostratus，secretary

of state to Agathocles

尼卡哥拉斯Nicagoras

尼卡诺Nicanor

尼亚坡里Neapolis

尼西亚Nicaea

尼西亚斯Nicias

尼米亚竞赛Nemean Games

尼罗河Nile，river

尼翁Neon

尼勒亚Elea

尼禄·克劳迪乌斯（二○七年任执政官）Claudius G. Nero

民主政治Democracy

弗尔维阿斯Fulvius，Q.

弗尔维阿斯·弗拉科斯（二二四年任执政官）Fulvius，Q. Flaccus

弗尔维阿斯·森图马鲁斯（二二九及二一一年任执政官）Fulvius，G. Centumalus

弗西斯，弗西斯人Phocis，Phocians

弗里乌斯·卡米鲁斯（三九○年任独裁官）Furius，M Camillus.

弗里乌斯·帕西鲁斯（二五一年任执政官）Furius，G. Pacilius

出自赫拉克利特的引句Heraclitus，quotation from

加马里纳Camarina

加贝斯湾Gabes，Gulf of

加尔干诺山Garganus，Mount

加拉太人Galatians

加泰罗Carthalo

皮切诺Picenum

皮攸切替人Peucetii

皮洛士，伊庇鲁斯国王Pyrrhus，King of Epirus

皮得纳Pydna

边居民Perioeci

台那伦Taenarum

台伯河Tiber，river

弗里乌斯·菲鲁斯（二二三年任执政官）Furius，P. Phlius

六划

老赖里亚司Laelius，G. the elder

老索西比乌斯Sosibius，the elder

地峡运动会Isthmian Games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之阿加索克利斯Agathocles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巴拉斯Alexander Balas

亚历山大，阿塔罗斯一世的代表Alexander，delegate of Attalus I

亚历山大的尼孔Nicon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的托勒密Ptolemy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的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亚历山大，塞拉西亚之战的骑兵指挥官Alexander，cavalry commander at Sellasia

亚平宁山Apennine Mountains

亚西比得Alcibiades

亚该亚Achaea

亚该亚之色诺芬Xenophon of Achaea

亚该亚联邦Achaean League

亚洲Asia

亚速海，见Maeotic Lake

迈奥提克湖Azov，Sea of

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

西庇阿，见科尔内利乌斯Scipio

西西里之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

西西里，西西里人Sicily，Sicilians

西西里塔罗明尼昂的泰密乌斯Timaeus of Tauromenium

西里西亚，西里西亚人Cilicia Cilicians

西法克斯Syphax

西班牙，西班牙人Spain，Spaniards

西班牙的摩洛哥Morocco，Spanish

西息温Sicyon

西息温的阿拉托斯Aratus of Sicyon

西徐亚，西徐亚人Scythia，Scythians

西塞罗Cicero

在Metaurus梅陶罗河之役

百夫长centurion

达达尼亚人Dardarnians

达米帕斯Damippus of Lacedaemon

达那厄Danae

列别企人Lebecii

列奥尼达二世，斯巴达国王Leonidas II，King of Sparta

迈尔干Myrcan

迈尼斯丢士Menestheus

迈托如斯河Metaurus，river

迈拖尼斯Myttones

迈莱之役Mylae，battle of

迈格尼希亚Magnesia

迈萨拿Messana

迈塔冈尼亚Metagonium

迈奥提克湖Maeotic Lake

托勒密，迈加洛波利斯的总督Ptolemy，governor of Megalopolis

托鲁斯Torus

毕达哥拉斯在南意大利的影响Pythagoras，influence in southern Italy

同盟战争Social War

朱庇特·圣石Jupiter Lapis

先纳·盖利卡Sena Gallica

舌切易Cerceii

优卑亚Euboea

伊比利亚，伊比利亚人Iberia，Iberians

伊发斯山丘Evas，Hill of

伊达拉里亚，伊达拉里亚人Etruria，Etruscans

伊托利亚人，伊托利亚联邦Aetolians，Aetloian League

伊托美山Ithome，Mount

伊利里亚，伊利里亚人Illyria，Illrians

伊利斯，伊利斯人Elis，Eleans

伊庇丹努Eridanus

伊阿索斯Iasus

伊纳斯Aenus

伊欧Io

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伊索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Isus

伊勒盖特斯Ilergetes

伊萨，伊萨人Issa，Issaeans

伊塔纳山Mount

伊奥利亚群岛Aeolian group

伊奥利斯Aeolis

伊奥雷乌斯Iolaus

伊雷波路斯河Elleporus，river

多多那Dodona

多利安Dorian

多瑙河Danube，river

色萨利，色萨利人Thessaly，Thessalians

色雷斯，色雷斯人Thrace，Thracians

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Bosporus，Thracian

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Thracian Bosporus

色诺芬尼斯Xenophanes

米利都Miletus

米利都的提摩泰乌斯Timotheus of Miletus

米努基乌斯·鲁夫斯Minucius，M. Rufus

米提斯特拉图姆Myttistratum

安布腊基亚的拉米乌斯Lamius of Ambracia

安达卢西亚Andalusia

安多西尼Andosini

安多贝勒斯，西班牙部落领导人Andobales

安条克三世，叙利亚国王Antiochus III the Great

安科纳Ancona

安菲洛奇亚人Amphilochians

安塔西达斯和平条约Antalcidas，peace of

安提帕特，马其顿首相Antipater

安提柯一世，马其顿国王Antigonus I

“好父亲”安条克五世Antiochus V Eupator

安条克三世，叙利亚国王 Antiochus III the Great

“多森”安提柯三世 Antigonus III Doson

米迪奥拉努姆Mediolanum

七划

麦加拉Megara

迈加洛波利斯，迈加洛波利斯人Megalopolis，Megalopolitans

迈加洛波利斯的科吉达斯Cercidas，of Mealopolis

迈加洛波利斯的莱狄亚迪斯Lydiades of Megalopolis

迈加洛波利斯的菲洛波义曼Philopoemen of Megalopolis

麦达蓬坦Metapontum

“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 I Poliorcetes

坎克里埃Cenchreae

坎奈之战Cannae，battle of

坎帕尼亚，坎帕尼亚人Campania，Campanians

坎帕尼亚的德西乌斯Decius，of Campania

劳伦特斯Laurentes

克尼多斯之役Cnidos，battle of

克列欧奈Cleonae

克劳迪乌斯·马尔塞鲁斯（二二二年任执政官）Claudius G.

Marcellus 围攻叙拉古

克劳迪乌斯·普尔凯尔（二四九年任执政官）Claudius，P. Pulcher

克来拖Cleitor

克里欧尼可斯Cleonicus

克里昂Cleon

克里图劳斯Critolaus

克里索古努斯Chrysogonus

克里特岛，克里特人Crete，Cretans

克里奥米尼斯，斯巴达国王Cleomenes III，King of Sparta

克利索波利斯Chrysopolis

克利替阿斯Critias

克拉司提迪姆Clastidium

克罗纳海岬Colonna，Cape

克罗敦Croton

克法龙Cephalon

克法利尼亚，克法利尼亚人Cephalennia，Cephalennians

克莱奥姆波洛图斯，斯巴达国王Cleombrotus，King of Sparta

克鲁希亚斯河Clusius，river

克鲁修姆Clusium

克雷莫纳Cremona

苏尔皮吉斯·尔巴Sulpicius，P. Galba

苏尔皮吉斯·帕特库鲁斯Sulpicius，G. Paterculus

杜罗河Douro，river

李维Livius，Titus

李维·塞林纳托尔（公元前二一九、二○七年任执政官），在梅陶罗河击败哈斯德鲁巴 Livius，M. Salinator

列安提尼Leontini

否提尔提斯·底比斯Phthiotic Thebes

利比亚，利比亚人Libya，Libyans

利比亚海Libyan Sea

利比亚·腓尼基人Libyo-Phoenicians

利古里亚，利古里亚人Liguria，Ligurians

利吉姆Rhegium

利那雷斯Linares

利苏斯，伊利里亚Lissus，Illyria

利利贝乌姆Lilybaeum 围攻

利帕拉Lipara

利帕拉群岛Liparean Islands

佐西默斯Zosimus

攸克雷达斯，斯巴达国王Eucleidas，King of Sparta

攸若摩斯Euromus

攸康皮达斯Eucampidas

伯罗奔尼撒半岛，伯罗奔尼撒人Peloponneses，Peloponnesians

伯罗奔尼撒的僭主政治Tyrannies of the Peloponnese

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

佛罗伦斯Florence

希皮塔斯Hipptas

希米尔科，迦太基在利利贝乌姆的指挥官Himilco，Carthaginian commander at Lilybaeum

希罗多德Herodotus

希帕纳Hippana

希波斯特涅斯Hipposthenes

希俄斯岛之役Chios，battle of

希美拉河Himera，river

希洛雷乌斯Herolaus

希腊，希腊人Greece，Greeks

谷奈塔Cynaetha

条约，罗马与迦太基之间Treaties，Rome and Carthage

岛屿“Island”，The

库迈Cumae

库吕亚斯·登塔图斯Curius，M. Dentatus

库默Cyme

沙欣纳提Sarsinati

阿丁坦尼，阿丁坦尼人Atintania，Atintanes

阿匹人Arpi

阿匹乌斯·考得克斯·克劳迪乌斯（二六四年任执政官）Claudius，Appius Caudex

阿匹乌斯·克劳迪乌斯，在希腊任军团营长Claudius C. Appius

阿匹乌斯·普尔凯尔·克劳迪乌斯（行副执政官）Claudius，Appius Pulcher 围攻叙拉古 在卡普亚

阿比多斯Abydos

阿比莱克斯Abilyx

阿内罗斯特斯，盖沙泰国王Aneroestes

阿巴Abba

阿卡纳尼亚Acarnania

阿卡狄亚Arcadia

阿尔巴Alba

阿尔巴尼亚人Albanians

阿尔西诺伊，托勒密四世之皇后Arsinoe，Queen of Ptolemy IV

阿尔西诺伊的玻勒马霍斯Polemarchus of Arsinoe

阿尔迪安人Ardiaeans

阿尔卑斯山Alps 汉尼拔横越阿尔卑斯山

阿尔菲奥斯河Alpheus，river

阿尼奥河Anio，river

阿加托克勒亚Agathoclea

阿加塔库斯Agatharchus

阿吉里亚尼亚人Agrianians

阿吉里安Agyrium

阿耳忒弥斯·辛迪亚斯的塑像Artemis Cindyas，statue of

阿耳忒弥斯的神庙Artemis，temple of

阿达河Adda，river

阿列克松Alexon

阿那格尼亚Anagneia

阿那瑞斯人Anares

阿克拉丁那（在叙拉古）Achradina

阿克罗科林斯，科林斯卫城，见科林斯（Corinth）Acrocorinth

阿克欣布鲁图斯Acesimbrotus

阿克莱Acerrae

阿里亚拉提斯四世，卡帕多西亚国王Ariarathes IV

阿里米努姆Ariminum

阿里斯托米尼兹Aristomenes

阿里斯泰纳斯Aristaenus

阿狄亚Ardea

阿启达马斯五世，斯巴达国王Archidamas V

阿耶凯Aecae

阿拉贡Aragon

阿拉克索斯河Arachthos，river

阿拉班达的曼尼拉斯Menyllus of Alabanda

阿明塔斯Amyntas

阿迪右斯，布巴士提斯总督Adaeus

阿迪斯Adys

阿帖米亚Althaea

阿波Arbo

阿波多泰Apodotae

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the elder

阿波罗尼亚Apollonia

阿波罗；在他林敦的坟墓Apollo

阿波罗多洛斯，菲利普五世之秘书Apollodorus，secretary to PhilipV

阿洛布罗克斯人Allobroges

阿格尼斯Agones

阿格西劳斯，斯巴达国王Agesilaus，King of Sparta

阿格里根特之法拉吕斯Phalaris of Agrigentum

阿格里根特，阿格里根特人Agrigentum，Agrigentines

阿格里根特的费利纳斯Philinus of Agrigentum

阿格拉艾Agraae

阿格拉俄斯Agelaus

阿格隆，伊利里亚国王Agron

阿哥斯，阿哥斯人，阿哥斯地区Argos，Argives，Argolid

阿哥斯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of Argos

阿哥斯的阿里斯托马科斯Aristomachus of Argos

阿哥斯的菲洛德谟Philodemus of Argos

阿哥斯波塔米战役Aegospotamic，battle of

阿基米德Archimedes 叙拉古被围攻

阿基姆鲁斯岛Aegimurus，Island of

阿盖迪可斯Archedicus

阿密南德，阿塔曼尼亚国王Amynander，king of Athamania

阿塔罗斯一世，帕加马国王Attalus I，King of Pergamum

阿塔罗斯二世，帕加马国王Attalus II，King of Pergamum

阿塔罗斯王朝Attalids

阿塔曼尼亚Athamania

阿斯匹斯Aspis

阿蒂米德鲁斯Artemidorus

阿提里亚斯Aulus Atilius

阿提略·凯亚提努斯（二六○、二五八及二五四年任执政官）Atilius A. Caiatinus

阿提略·雷古鲁斯（二二七年任执政官）Atilius，M. Regulus

阿提略·雷古鲁斯（二五六年任执政官）Atilius，M. Regulus

阿提略·雷古鲁斯（二五七及二五○年任执政官）Atilius，G. Regulus

阿提斯，波伊人之国王Atis，king of the Boii

阿喀琉斯 Achilles

阿雷提乌姆Arretium

阿德巴尔，迦太基海军将领Adherbal

阿德拉诺多路斯Adranodorus

阿戴耶斯Ardyes

努切里亚Nuceria

努米底亚，努米底亚人Numidia，Numidians

努曼西亚Numantia

纳比斯Nabis

纳尼亚Narnia

纳拉加拉Naragara

八划

坦塔罗斯的折磨Tantalus，the torment of

耶皮潭纳斯Epidamnus

昔兰尼Cyrene

昔兰尼的波利克里托斯Polycleitus of Cyrene

英苏布里人Insubres

苟垓勒斯河Gorgylus，river

直布罗陀海峡Gibraltar

林贡斯人Lingones

杰如尼温Gerunium

杰孙，阿戈号航海者Jason，Argonaut

奈瑞丝，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的女儿Nereis

奇涅阿司Cineas

欧内希坚尼斯Onesigenes

欧可曼奴斯Orchomenus

欧布索佩斯Opsopaeus，V.

欧迈尼斯二世Eumenes II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欧里庇得斯Euripidas

欧拉纳Olana

欧易诺斯河Oenous，river

欧罗塔斯河（在斯巴达）Eurotas，river（Sparta）

欧凯兹Olcades

欧洛福尼斯Orophernes

欧洲Europe

欧勒奴斯Olenus

欧塔希里亚斯·克雷苏斯（二六一年任执政官）Otacilius，T. Crassus

欧塔希里亚斯·克雷苏斯（二六三年任执政官）Otacilius，M. Crassus

欧瑞温Oreum

拉丁姆平原，拉丁人Latium，Latins

拉西翁Lasion

拉多凯亚Ladocea

拉辛尼安海岬，赫拉神殿Lacinium，Promotory，Temple of Hera

拉非亚之战Raphia，battle of

拉瑞农Larinum

拉瑞萨Larsissa

非洲，非洲人Africa，Africans

“非洲征服者”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Cornelius，P. Scipio Africanus

昂提乌姆Antium

迪马莱Dimale

迪米特利亚斯Demetrias

迪凯阿启亚Dicaearchia

迪奥庞普斯Theopompus

迪温Dium

帖奥盖顿Theogeiton

罗马卫城Capitol，Roman

罗马元老院Senate，Roman

罗马，罗马人，崛起为世界强权Rome，Romans

罗克里Locri Epizephyrian

罗德岛之安替斯提尼Antisthenes of Rhodes

罗德岛之潘乃提亚斯Panaetius of Rhodes

罗德岛，罗德岛人Rhodes，Rhodians

帕尔那凯斯Pharnaces

帕多瓦Padua

帕克希群岛Paxi Islands

帕奇纳斯海岬Pachynus，Cape

帕拉蒂尼山Pallantium

帕洛普斯Paropus

帕特莱Patrae

帕诺穆斯（伯罗奔尼撒）Panormus

帕提尼Parthini

凯尔特人，见Gauls高卢人 Celts

凯尔特·伊比利亚，凯尔特·伊比利亚人Celtiberia，Celtiberians

凯利斯尼兹Callisthenes

凯启里亚斯·迈帖勒斯（二五一年任执政官）Caecilius，L. Metellus

凯启里亚斯·迈帖勒斯·登特（二八四年任执政官）Caecilius，L. Metellus Denter

凯洛尼亚之役Chaeronea，battle of

凯菲索多禄斯Cephisodorus

凯奥尼亚Chaonia

凯瑞亚斯Chaereas

图里伊Thurii

佩尔修斯，马其顿国王Perseus，

佩达撒Pedasa

佩律皮亚Perippia

佩洛里亚司海岬Pelorias，Cape

依克特拉Echetla

的黎波里Tripolis

彼奥提亚，彼奥提亚人，见Thebes底比斯 Boeotia，Boeotians

命运Fortune（Tyche）

狗头山（辛诺塞法利山）Cynoscephalae

底比斯（在色萨利）Thebes（Thessaly）

底比斯的艾帕米农达斯Epaminondas of Thebes

底比斯的沛洛皮达斯Pelopidas of Thebes

底比斯，底比斯人Thebes，Thebans

法乐农Falernum

法玲纳海岬Farina，Cape

法洛斯Pharos

法洛斯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ros

法勒隆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

法萨卢Pharsalus

法瑞Pharae

波尔齐乌斯·加图Porcius，M. Cato

波吕克拉特斯的亲戚Polycrates，relatives of

波伊人Boii

波里比阿Polybius

波河Po，river

波恩海岬Bon，Cape

波桑尼阿斯Pausanias

波密卡，迦太基执政官Bomilcar the Suffete

波士丢米亚斯·比奴斯（二二九年任执政官）Postumius，L. Albinus

波士丢米亚斯·梅格鲁斯（二六二年任执政官）Postumius，L. Megillus

波斯，波斯人Persia，Persians

波斯塔，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迦太基将领Bostar

波登克斯河Bodencus，river

宙斯·团结者Zeus Homarios

宙斯·阿蒙神殿Zeus Ammon

宙斯神Zeus

库默的埃福罗斯Ephorus of Cyme

迦太基元老院Senate，Carthaginian

迦太基，迦太基人Carthage，Carthaginians

经验学派empiricists

九划

珀隆山Pelion，Mount

玻吹斯Botrys

毒蝎Scorpion

“带来胜利者”雅典娜在帕加马的神庙Athena Nicephorus，sanctuary at Pergamum

柯农Conon

查马Zama

查瑞斯Chares

柏希比亚Perrhaebia

柏拉图Plato

栅栏Agger

威士提尼Vestini

威尼提人Veneti

威奴希亚（在阿普里亚）Venusia（Apulia）

轻装部队peltasts

战神Mars

战神Ares

战神之子Mamertines

战象Elephants

昴宿星团 的下沉Pleiades，setting of

贵族政治Aristocracy

品达Pindar

哈利卡纳苏斯的戴奥尼素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哈斯德鲁巴，汉尼拔之弟Hasdrubal，brother of Hannibal

哈斯德鲁巴，汉诺之子Hasdrubal son of Hanno

哈斯德鲁巴，哈密尔卡之女婿Hasdrubal，son-in-law of Hamilcar

哈斯德鲁巴，基斯哥之子Hasdrubal son of Gisco

哈德里安纳Hadriana

哈德鲁曼敦Hadrumentum

拜占庭Byzancium

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二一八年任执政官）Cornelius，P. Scipio

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艾辛纳（二六○、二五八、二五四年任执政官）Cornelius，G. Scipio Asina

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卡尔乌斯（二二二年任执政官）Cornelius，G. Scipio Calvus

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纳西卡Cornelius，P. Scipio Nasica

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Cornelius，P. Scipio Aemilianus

科西拉岛Corcyra

科西嘉Corsica

科托纳Cortona

空叙利亚Coele-Syria

科来温（在迈加洛波利斯）Colaeum（Megalopolis）

科林斯的阿里斯托马科斯Aristomachus of Corinth

科林斯，科林斯人，阿克罗科林斯Corinth，Corinthians，Acrocorinth

修昔底德Thucydides

叙利亚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of Syria

叙利亚，叙利亚人Syria，Syrians

叙拉古之阿加索克利斯Agathocles of Syracuse

叙拉古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Syracuse

叙拉古的希洛二世Hiero II of Syracuse

叙拉古的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 of Syracuse

叙拉古的戴奥尼泰一世Dionysius，of Syracuse I

叙拉古的戴奥尼泰二世Dionysius，of Syracuse II

叙拉古，叙拉古人Syracuse，Syracusans

独裁官的定义Dictator，definition of

美好海岬Fair Promontory

美沙皮亚人Messapians

美塞尼亚，美塞尼亚人Messenia，Messenians

将军领导术Generalship

洛克里斯，洛克里斯人Locris，Locrians

宣言Rhetra

突尼斯Tunis

神圣之地Holy Place

“神显灵”托勒密五世Ptolemy V，Epiphanes

“神显灵”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IV Epipahnes

屋大维Octavius，G.

费边Fabius，Q

费尼亚司Phaeneas

费边·匹克拖，史学家Fabius，Q.Pictor

费苏莱Faesulae

费来尼斯Philaenis

费利亚达斯Philiadas

费拉克司Phylarchus

费拉拉Ferrara

费拉蒙Philammon

费罗Philo

费莱的迪奥多突斯Theodotus of Pherae

费顿Phaeton

费勒迈纳斯Philemenus

费雷格里恩平原Phlegrean plains

贺利克拉农Helicranum

十划

泰尔富沙Telphusa

泰吉亚斯Tychaeus

泰伦提乌斯·瓦罗Terentius，G. Varro 在坎奈战败

泰瑞温Thyrrheum

班加西Benghazi

都灵Turin

埃及的瑙克拉提司Naucratis of Egypt

埃及，埃及人Egypt，Egyptians

埃古萨Aegusa

埃布罗河Ebro，river

埃皮库代斯Epicydes

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of Epirus

伊庇鲁斯，伊庇鲁斯人Epirus，Epirotes

埃皮道鲁斯Epidaurus

埃吉斯Aegys

埃米里雅，“非洲征服者”西庇阿之妻Aemilia

埃米利乌斯·宝路斯（二二五、二一九年任执政官）Aemilius，L. Paullus

埃米利乌斯·宝路斯（二五五年任执政官）Aemilius M. Paulus

埃米利乌斯·雷比达（二三二年任执政官）Aemilius M. Lepidus

埃克诺穆斯之役Ecnomus，battle of

埃涅阿斯Aeneas

埃基拉Aegira

埃基提翁Aegium

埃基提翁之色诺芬Xenophon of Aegium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

埃斯基涅斯Aeschines

埃德塔尼Edetani

莱可苏拉Lycosura

莱可塔斯，波里比阿之父Lycortas，father of Polybius

莱西马克斯，马其顿将军Lysimachus，Macedonian general

莱西马克斯，托勒密四世之子Lysimachus，son of Ptolemy IV

莱西马奇亚Lysimachia

莱克格斯Lycurgus

莱昂提乌姆Leontium

莱凯温山Lycaeum，Mount

莱费人Laevi

莱席亚斯，叙利亚王国摄政Lysias，regent of Syria

莱普廷斯Leptines

莫干Mergane

莫拉坚尼斯Moeragenes

莫诺马克斯Monomarchus

莫提斯Myrtis

荷马Homer

荷曼迪卡Hermandica

荷密翁（在迦太基）Hermaeum（Carthage）

荷密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Hermaeum（Bosporus）

莎兰达Saranda

栖来那斯Selinus

恩纳Enna

特马Therma

特尔斐Delphi

特尔斐的彼提亚，女祭司Pythia of Delphi

特西台人Thersitae

特拉吉斯克斯Tragiscus

特拉帕尼Trapani

特拉修洛赫斯Thrasylochus

特拉索Thraso

特拉蒙Telamon

特罗曾Troezen

特洛尼昂Thronium

特莱顿Triton

特勒波勒摩斯，亚历山大摄政Tlepolemus

特腊契纳Tarracina

特蒙Thermon

特雷比亚河之役Trebbia river，battle of

特雷西米尼湖之役Trasimene Lake，battle of

“造福者”托勒密三世Ptolemy III，Euergetes

倍尔比那Belbina

倍库拉Baecula

息提昂姆Citium

爱父亲Philopator

“爱父亲”托勒密四世Ptolemy IV，Philopator

“爱母亲”托勒密六世Ptolemy VI，Philometor

爱琴海岛民 Aegean Islanders

爱奥尼亚海Ionian Sea

爱奥尼亚海峡Ionian Straits

翁布里亚Umbria

留克特拉战役Leuctra，battle of

留寇诺的德谟卡瑞斯Demochares of Leuconoe

高卢刀Swords，Gallic

高卢，高卢人Gaul，Gauls

高隆尼亚Caulonia

娑凤尼斯芭，基斯哥之子汉尼拔的女儿Sophonisba

海尔金特斯之坟墓Hyacinthus，tomb of

海神Poseidon

诺拉Nola

诺帕克都Naupactus

陶律尼Taurini

陶律翁，菲利普五世的特派专员Taurion

陶鲁斯山Taurus Mountains

十一划

逵律纳斯神Qurinus

培林尼Pellene

培林特斯，培林特斯人Perinthus，Perinthians

培拉以亚（罗德岛）Peraea（Rhodes）

培琉喜阿姆Pelusium

基西拉的菲罗玄Philoxenus of Cythera

黄金角Golden Horn

勒卡埃乌姆Lechaeum

菲比农Vibinum

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

菲利普五世Philip V of Macedon

菲利普僭位者Philip the Pretender

菊妮丝卡Cynisca

萨贡托，萨贡托人Saguntum，Sagutines

萨莫奈地区，萨莫奈人Samnium，Samnites

萨摩斯Samos

梵蒂冈海岬Vaticano，Cape

梅迪昂，梅迪昂人Medion，Medionans

排提翁尼可斯之坟墓Pythionicus，tomb of

推翻十人政团Decemvirate，overthrow of

“救主”托勒密一世Ptolemy I，Soter

“救主”塞琉西三世Seleucus III，Soter

“救主”德米特里一世，叙利亚国王Demetrius I，Soter

曼宁克斯Meninx

曼多尼亚斯，西班牙部落领导人Mandonius，Spanish chieftain

曼里亚斯·托夸特斯（二二四年任执政官）Manlius，T. Torguatus

曼里亚斯·福尔索·隆古斯（二五六年任执政官），在埃克诺穆斯Manlius，L. Vulso Longus 重建舰队

曼提尼亚，曼提尼亚人Mantinea，Mantineans 曼提尼亚之战

崔寇尼亚温的迪凯尔卡斯Dicaearchus of Trichonium

第一次布匿战争Punic War，First

第二次布匿战争Punic War，Second

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Illyrian Wars，Second

第三次布匿战争Punic War，Third

得雷帕纳之役Drepana，battle of

猎户座升起Orion，rising of

康可利塔纳斯，盖沙泰人国王Concolitanus，King of the Gaesatae

康尼Conii

盖亚斯及路希亚斯·科伦康尼亚斯兄弟Coruncanii，G. and L.

盖沙泰Gaesatae

盖洛Gelo

盖聂福列山通道Mont Genvre Pass

盖提姆Gythium

密纳瓦神庙Minerva，temple of

隆卡奴斯Longanus

骑兵官decuriones

维努西亚（在萨莫奈地区）Venusia（Samnium）

维纳斯·艾瑞克斯神庙Venus Erycina，shrine of

十二划

塔乌里斯契Taurisci

塔古斯河Tagus，river

塔西佗Tacitus

塔拉寇Tarraco

塔罗明尼昂Tauromenium

塔索斯Thasos

博那多·鲁切莱Rucellai，Bernardo

斯巴达之索赛勒斯Sosylus of Lacedaemon

斯巴达，斯巴达人Sparta，Spartans

斯库塔里Scutari

斯特拉波Strabo

斯寇得拉Scodra

斯塔基拉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 of Stagira

散布卡sambuca

葩琵丽雅，L. 埃米利乌斯·雷必达 Papiria，wife of Lucius Aemilius

Paullus

森普罗尼·布列苏斯（二五三年任执政官）Sempronius，G. Blaesus

森普罗尼·隆古斯（二一八年任执政官）Sempronius，T. Longus

提布尔Tibur

提亚农Teanum

提沙迈纳斯，亚该亚国王Tisamenus，King of Achaea

提图斯·昆克西阿·福拉明尼纳斯（一九八年任执政官）Quinctius，Titus Flaminінus

提契诺河Ticinus，river

提幽塔，伊利里亚皇后Teuta，Queen of Illyria

提莫立昂Timoleon

提基亚，提基亚人Tegea，Tegeans

提奥弗拉斯托Theophrastus

提摩列乌斯Timolaus

提摩赞诺斯Timoxenus

雅庇吉亚Iapygia

雅典Athens

雅典之色诺芬Xenophon of Athens

雅典之伯里克利Pericles of Athens

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 of Athens

雅典的亚里斯泰德Aristides of Athens

雅典的德摩斯梯尼斯Demosthenes of Athens 菲利普五世之秘书

雅典娜，在倍尔比那的堡垒Athenaeum（Belbina）

奥林匹亚Olympia

奥林匹亚年Olympiads

奥林匹亚竞赛Olympian Games

奥林匹斯山丘Olympus，hills of

奥林匹雅丝，伊庇鲁斯皇后Olympias

奥菲狄亚斯河Aufidius，river

奥斯提亚Ostia

奥瑞特斯人Oretes

奥瑞斯提斯Orestes

奥德修斯Odysseus

循环anacyclosis

腓尼企Phoenice

腓尼基Phoencia

普列福拉图斯Plevratus

普来吐提亚Praetuttia

普林尼 Pliny

普拉仙提亚Placentia

普罗滂提斯海峡Propontis

普莱涅斯特Praeneste

普提欧里Puteoli

普鲁席亚斯，比提尼亚国王Prusias，king of Bithynia

普鲁塔克Plutarch

道可斯Daochus

道尼亚，道尼亚人Daunia，Daunii

强人政权，见王权政治一款monarchy

十三划

瑞衷Rhizon

雷斯特利哥尼斯食人兽Laestrygones

“雷霆”托勒密Ptolemy Ceraunus

路西亚斯·拜比亚斯Baebius，Lucius

路西亚斯·费边Fabius，Lucius

路希亚斯·舌基亚斯Sergius，Lucius

锡纽萨Sinuessa

新卡斯提尔New Castile

新迦太基New Carthage 攻占新迦太基

塞尔维利乌斯·凯皮欧（二○四年任执政官）Servilius，G. Caepio

塞尔维利乌斯·凯皮欧（二五三年任执政官）Servilius，G. Caepio

塞尔维利乌斯·基米努斯（二○四年任执政官）Servilius，G. Geminus

塞尔维利乌斯·基米努斯（二一七年任执政官）Servilius，G. Geminus

塞尼山通道Mont Cenis Pass

塞尼加利亚Sinigaglia

塞农人Senones

塞克利亚达斯Cycliadas

塞拉西亚之战Sellasia，battle of

塞诺马尼人Cenomani

塞琉西一世，叙利亚国王Seleucus I，King of Syria

塞琉西四世Seleucus IV

塞浦路斯Cyprus

弗尔维阿斯·派提那斯·诺毕里尔（二二五年任执政官）Fulvius，S. Paetinus Nobilior

福尼亚斯Pheneus

福吞纳斯Volturnus

福连塔那，福连塔那人Frentana，Frentani

弗拉米宁（二二三年任执政官）Flaminius，G.

群众政治ochlocracy

十四划

赫卡通迈温Hecatomaeum

赫迈俄尼Hermione

赫迈俄尼之谢浓Xenon of Hermione

赫克妥在《伊里亚特》所说的话Hector，words of in Iliad

赫克特Hercte

赫里亚Heraea

赫别色斯Herbesus

赫利岛Holy Isle

赫拉女神Hera

赫拉克里亚Heracleia

赫拉克里亚·米诺亚Heracleia Minoa

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

赫拉克勒斯子孙，斯巴达国王Heraclidae，Spartan Kings

赫拉克勒斯，在其之前所发的誓言Hercules，oath in presence of

赫彼奈Hirpini

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

赫摩雷乌斯Hemrolaus

僭主政治Tyranny

鲜图里伊帕Centuripa

豪拉提乌斯·巴博特斯Horatius，M. Barbatus

豪拉提乌斯·寇可勒斯Horatius，Cocles

粹泰亚Tritaea

赛厄斯Cius

赛巴利斯Sybaris

赛尔提斯Syrtes

赛尔摩苏鲁斯河Cyamosorus，river

赛格斯塔Segesta

赛斯拖斯Sestos

十五划

寡头政权Oligarchy

撒丁Sardinia

撒丁海Sardinian Sea

撒达那帕鲁斯Sardanapalus

撒拉匹斯神庙Sarapis，temple of

撒拉米斯Salamis

撒拉米斯的伊伐哥拉斯Evagoras of Salamis

撒宾人Sabines

墨勒阿格尔Meleager

黎巴嫩Lebanon

德米特里二世Demetrius II

摩如希人Maurusii

潘费里亚Pamphylia

潘提亚斯Panteus

十六划

薛息斯Xerxes

赞诺Zeno

赞提帕斯Volturnus

穆利纳Myrina

穆提纳Mutina

十七划

戴奥尼索多禄斯Dionysodoru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帝国的崛起/（古希腊）波里比阿著；翁嘉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097-4142-9

Ⅰ.①罗… Ⅱ.①波… ②翁… Ⅲ.①罗马帝国-历史 Ⅳ.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4550号

罗马帝国的崛起

著者/波里比阿

译者/翁嘉声

出版人/谢寿光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010）59367004 责任编辑/段其刚 冯立君

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白秀君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印制/岳阳

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22.125

版次/2013年1月第1版 字数/512千字

印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2-7272号

书号/ISBN 978-7-5097-4142-9

定价/7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罗马帝国的崛起

THE HISTORIES OR 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

上架建议：历 史

ISBN 978-7-5097-4142-9

9 787509 741429 >

ISBN 978-7-5097-414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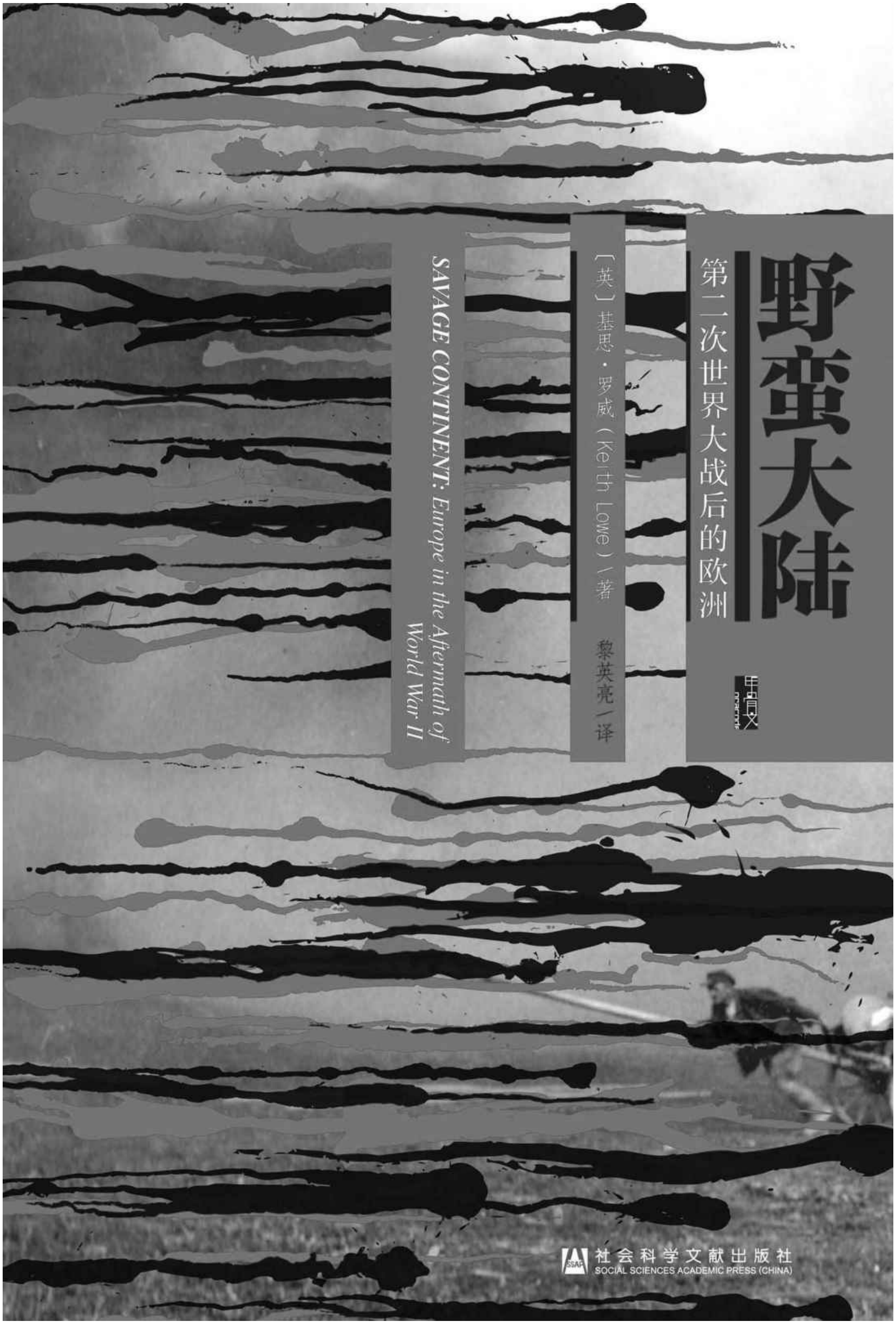
定价：78.00元


野蛮大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
〔英〕基思·罗威（Keith Lowe）/著
黎英亮/译
SAVAGE CONTINENT: Europe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甲骨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基思·罗威（**Keith Lowe**），全职作家和历史学家，曾做过十余年的历史类图书出版商。他被公认为二战史权威，经常在英国和美国的电视广播上发表意见。饱受赞誉的历史著作《火焰地狱：1943年汉堡灭顶之灾》（*Inferno: The Devastation of Hamburg, 1943*）即出自他之手。

黎英亮，历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讲师，著有《现代国际生活的规则：国际法的诞生》《何谓民族？：普法战争与厄内斯特·勒南的民族主义思想》，译有《浩劫之地》（即将出版）。


野蛮大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
〔英〕基思·罗威（Keith Lowe）／著
黎英亮／译
SAVAGE CONTINENT: Europe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书获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见证了欧洲各地暴力行为的恐怖爆发。囚犯杀死狱卒。士兵虐待平民。抵抗战士杀死和侮辱通敌卖国者。战争行动结束后，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种族清洗、内战、强奸、谋杀持续上演。探寻那个在彼此复仇中筋疲力尽的欧洲，《野蛮大陆》是一幅令人震惊的图画，刻画了一个迄今未被承认的、无序而恐怖的年代。

“刻骨痛心。动人心弦、落笔审慎、荡气回肠。一幅引人注目的图画，描绘了一片在物质上、道德上因为残忍屠戮而变得残酷无情的欧洲大陆。”

——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Dominic Sandbrook），《星期日泰晤士报》

“形象生动而笔调冷峻。这部杰出著作，为这片陷入无序和混乱的大陆，描绘了一幅鲜为人知、令人胆寒的画面。”

——伊恩·克肖（Ian Kershaw）

“不可或缺的作品。以严肃的笔调，叙述我们从未知晓、父辈宁愿忘记的事实。罗威极具穿透力的句子，让我们难以对种种苦难视而不见……看后难以入睡。如此优秀的历史著作，让所有问题萦绕于心。”

——《苏格兰人》

“令人震惊，令人感动，非常好的作品。”

——《新政治家》

“杰出非凡，过目难忘，饱含张力。”

——《每日邮报》

“精彩绝伦。才华横溢的构思，一丝不苟的研究……呈现出天才般

的历史叙事。”

——BBC历史频道

目录

- 序言
- 地名说明
- 中文版序言
- 第一部 战争遗产
  - 第一章 破败
  - 第二章 离丧
  - 第三章 流徙
  - 第四章 饥荒
  - 第五章 堕落
  - 第六章 希望
  - 第七章 乱象
- 第二部 复仇
  - 第八章 嗜血
  - 第九章 解放营地
  - 第十章 有限复仇：奴工
  - 第十一章 德国战俘
  - 第十二章 无限复仇：东欧
  - 第十三章 内部敌人
  - 第十四章 报复妇孺
  - 第十五章 复仇动机
- 第三部 种族清洗
  - 第十六章 战时选择
  - 第十七章 犹太难民
  - 第十八章 乌克兰与波兰之种族清洗
  - 第十九章 驱逐德裔
  - 第二十章 欧洲缩影：南斯拉夫
  - 第二十一章 西欧宽容，东欧不宽容
- 第四部 内战

- 第二十二章 混战
- 第二十三章 法国与意大利之政治暴力
- 第二十四章 希腊内战
- 第二十五章 反客为主：罗马尼亚
- 第二十六章 驯服东欧
- 第二十七章 “丛林兄弟”之反抗
- 第二十八章 冷战镜像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索引


1.1945~1947年欧洲各国领土变更
苏联获得
波兰从德国获得
其他变化
北
北海
贝柴摩
（佩琴加）
摩尔曼斯克
卡累利阿
波的尼亚湾
芬兰
瑞典
拉多加湖
挪威
赫尔辛基
列宁格勒
奥斯陆
斯德哥尔摩
塔林
爱沙尼亚
波罗的海
里加
拉脱维亚
苏　联
立陶宛
麦麦尔
丹麦
哥本哈根
考纳斯
加里宁格勒
维尔纽斯
明斯克
格但斯克
东普鲁士
波美拉尼亚
沃利尼亚
白俄罗斯
阿姆斯特丹
什切青
波　兰
荷兰
柏林
华沙
西里西亚
基辅
布鲁塞尔
波恩
比利时
东德
弗罗茨瓦夫
加里西亚
卢森堡
克拉科夫
利沃夫
北布科维纳
乌克兰
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
西德
比萨拉比亚
敖德萨
维也纳
布拉迪斯拉发
法国
布达佩斯
外喀尔巴
阡卢西尼亚
伯尔尼
奥地利
瑞士
匈牙利
罗马尼亚
黑海
的里雅斯特
威尼斯-朱利亚
（归南）
布加勒斯特
南多布罗加
（归保）
贝尔格莱德
扎拉
（归南）
亚得里亚海
南斯拉夫
保加利亚
意大利
索非亚


0
200英里
0
200千米
罗马
阿尔巴尼亚
地拉那
土耳其

序言

尝试想象一个没有组织、没有机构的世界。那是一个国家边界已然消失的世界，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广袤土地，在那土地上，人们到处流浪，寻找早已不复存在的社区共同体。那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政府，无论是民族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那里没有学校或者大学，没有图书馆或者档案馆，没有任何获取信息的手段。那里没有影院或者戏院，当然也没有电视节目。收音机偶尔会有点用处，但信号总是很模糊，而且几乎总是说外语。人们也已经很久没有看过报纸了。那里没有铁路或者公路，没有电话或者电报，没有邮政局，没有通信手段，只有口耳相传。

那里没有银行，但这也无妨，因为金钱再无用处。那里没有商店，因为没有东西可供出售。那里没有生产活动：曾经存在的工厂和企业已经全部被摧毁和拆卸，其他绝大多数建筑物也大致如此。那里没有工具，更不要说从断壁残垣里挖掘东西了。那里也没有食物。

法律和秩序几乎荡然无存，因为那里没有警察、没有法官。在某些地方，是非对错似乎再无意义。人们自谋生路，无视所有权，实际上，就连所有权本身也大致消失了。财产只属于那些足够强大的人，以及那些为了保住财产不惜豁出性命的人。男人手持武器，在大街上游荡，肆意抢夺他们想要的东西，肆意恐吓那些栽到他们手上的倒霉蛋。女人不论阶层、不论年纪，为求食物、为求庇护，不惜出卖肉体。那里没有礼义廉耻，那里没有伦理道德，只有生存高于一切。

对于现代人来说，除了在好莱坞的电影剧本中，实在难以想象还会有这样的世界。然而，时至今日，还有数十万名幸存者经历过这种惨

况，他们不是生活在地球某个远在天边的角落，而是生活在数十年来最为稳定、最为发达的中心地带。1944～1945年，在长达好几个月的时间里，相当部分的欧洲人就生活在这种混乱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它不仅摧毁了基础设施，而且摧毁了国家赖以结合的组织机构。政治架构威信扫地，以至于美国观察员警告说，欧洲各国可能会爆发全面内战。[1] 社区共同体的人为割裂，在邻里之间埋下互不信任的种子；而普遍存在的饥荒现象，也让个人道德变得无关紧要。1945年3月，《纽约时报》评论道：“欧洲，已经陷入美国人无法理解的极端状况。”欧洲已经沦为“黑暗新大陆”。[2]

此后欧洲设法脱离困境，奇迹般地成为繁荣、宽容的大陆。回顾欧洲重建的丰功伟业，包括公路的重建、铁路的重建、工厂的重建，甚至众多城市的重建，举目所见皆是欣欣向荣的景象。西欧的政治重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德国的复兴更是如此，短短数年间，德国就从被人唾弃的民族，变成欧洲大家庭里负责任的成员。战争结束还催生了国际合作的意愿，不仅带来了繁荣，而且造就了和平。1945年以来的数十年间，欧洲各国忽然迎来了最为长久的和平时期，而这种阔别已久的长久和平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

难怪那些刻画战后时期的人们，包括历史学家、政治家以及经济学家，经常把战后欧洲的崛起描述为凤凰在瓦砾灰烬中浴火重生。按照这种观点，战争结束不仅标志着镇压和暴力的结束，而且标志着整个欧洲大陆在精神上、道德上、经济上的重生。德国人把战后几个月称为“时钟归零”（德文Stunde Null，英文Zero Hour），这意味着当历史的伤痕被涂抹完毕，历史又再次起步前行。

但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对战后历史的看法未免过于浪漫。首先，希特勒的失败并不等于战争马上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大规模冲突，存在许多个环环相扣的小规模战场，战事需要经年累月才能平息，在欧

洲的不同地点，停战的时间也各不相同。例如，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战争几乎在1943年秋季就已结束。在法国，对于绝大多数法国人来说，战争又拖延了一年，但在1944年秋季亦告结束。与此相反，在东欧某些地区，暴力持续到欧战胜利日（1945年5月8日）之后很久。在南斯拉夫，铁托（Tito）的部队直至1945年5月15日还在与德国军队作战。在欧洲的大战结束后，最早由纳粹点燃的内战火焰，还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熊熊燃烧了好几年；在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民族主义游击队继续对抗苏联军队，战斗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

有些波兰人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近些年才真正结束：由于战争正式开始于纳粹与苏联同时入侵他们的国家，因此直至1989年最后一辆苏联坦克撤离波兰，战争才算结束。许多波罗的海国家的居民也有同感：2005年，爱沙尼亚与立陶宛两国总统拒绝前往莫斯科庆祝欧战胜利日60周年，其理由是，至少对于他们的国家来说，迟至20世纪90年代初才算解放。还要考虑到的事实是冷战，冷战实际上是东欧与西欧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以及若干次反抗苏联统治的民族起义。就此而言，断言战后存在牢不可破的和平，仿佛是无可救药的痴人说梦。

同样颇成疑问的是所谓“时钟归零”的观念。历史的伤痕当然不可能被抹去，德国政治家的坚忍努力终究无济于事。作为战争的余波，复仇和惩罚的浪潮席卷了欧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民族被剥夺了领土和财产，政府机关和社会机构受到清洗，各个社区共同体因为在战争期间的表现而惶惶不可终日。某些最为恶劣的报复行为直接针对个人。欧洲各国的德裔居民都受到殴打和逮捕，或者被充作奴工，甚至被杀害。曾经与纳粹合作的士兵和警察遭到逮捕和折磨。曾经与德军士兵姘居的妇女被脱光衣服、剃光头发、淋满沥青、游街示众。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妇女、匈牙利妇女和奥地利妇女被强奸。历史的伤痕未被抹去，战争的余波却放大了社区之间、民族之间的怨恨情绪，许多亲身经历者至今尚在人世。

战争结束也不意味着欧洲种族和谐新时代的诞生。实际上，在欧洲某些地区，种族矛盾甚至变得更为严重。犹太人继续受到迫害，一如在战争期间。欧洲各国的少数民族再度成为政治斗争的标靶，在某些地区，由此引发的暴行简直与纳粹曾经犯下的暴行无异。战争的余波同样见诸纳粹种族分类和种族隔离的逻辑结果。1945～1947年，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几次大规模种族清洗行动中，数以千万计的男人、女人以及儿童被赶出故国。这是“欧洲奇迹”的仰慕者们很少讨论的，更是他们难以理解的：即使人们了解驱逐德裔的行动，人们也不太了解东欧各地驱逐少数民族的类似行动。在战争之前，甚至战争期间，文化多样性曾经是欧洲固有的风景，但在战争结束后，文化多样性却受到致命的打击。

正因为欧洲是在种种困难中重新崛起，欧洲复兴才更加显得光彩夺目。但也正因为这种种困难，战争耗费了更长时间才结束，而重建也耗费了更长时间才启动。那些生活在欧洲破败城市中的人们，更加关心糊口果腹的日常小事，不太关心重建社会的宏图大计。他们饥肠辘辘，承受着痛失亲人的悲哀，承受着漫漫无尽的痛苦，在他们被动员起来开始重建工作之前，他们需要时间发泄愤怒、反省历史、哀悼亲人。

在欧洲各国，重新建立的行政当局也需要时间来树立权威。他们的当务之急并不是清理碎石瓦砾，也不是修复铁路干线，更不是重开工厂，而是在全国各地任命官员、指派行政机构。这些地方行政机构必须赢得民众的信任，毕竟在经历长达六年的有组织暴力之后，绝大多数民众对任何行政机构都极为抵触。在这种环境下，不要说大兴土木，就连重建法律和秩序，都如同白日做梦。只有外来的力量，如盟军、联合国、红十字会才拥有足够的权威，或者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完成重建的伟业。然而，在这种外部力量未能触及的地方，混乱压倒一切。

*

如上所述，战后初期的欧洲历史，并非一部以重建和复兴为主题的历史，而是一部以混乱和无序为主题的历史。这是一部从未被人认真记录过的历史。有许多优秀作品描述过个别国家的情况，尤其是德国的情况，但这些作品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同样的场景在欧洲大陆反复上演。还有一两部历史作品，如托尼·朱特（Tony Judt）的《战后》（*Postwar* ），以较为广阔的视角观察整个欧洲大陆，然而，这些作品时间跨度太大，对战后初期重大事件的描述被压缩到少数几个章节之中。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以任何语言写成的作品，描述过整个欧洲大陆——无分东欧西欧——在这一关键时刻、混乱时期的详细情况。

本书试图纠正这种研究状况。本书不会重复许多作品已经走过的老路，不会着力于解释欧洲大陆如何从碎石瓦砾中重建物质、重建经济、重建道德。本书不会着眼于纽伦堡审判、马歇尔计划或者其他治疗战争创伤的尝试。正好相反，本书关注那个重建和复兴尚未可能的时期，关注那个欧洲依然极端动荡的时期，关注那个零星挑衅就能引发暴力浪潮的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描述混乱时期的尝试不可能成功。但是，本书还是会从这团乱麻中理出头绪，并且尝试厘清种种乱象的来龙去脉。

首先，我会清楚展示战争创伤，无论是物质创伤还是精神创伤。只有充分了解人们在战争中失去了什么，我们才能理解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第二部分，我会刻画席卷欧洲大陆的复仇浪潮，并且分析如何利用复仇现象来谋取政治利益。探讨复仇现象是本书贯穿始终的主题，也是理解本书逻辑的主线，更是我写作本书的缘由，它是理解战后欧洲气氛的关键要素。在第三、第四部分，我会展示复仇行动和其他暴力所带来的后果。种族清洗、政治暴力、国内战争，构成了欧洲历史上某些最具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我个人认为，实际上，上述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余波，部分事件甚至与冷战爆发密切相关。总体而言，本书将会覆盖1944～1949年的历史事件。

我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打破狭隘的西方视角，这种视角长期以来充斥着相关作品。数十年来，但凡关于战后时期的作品都只着眼于西方，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人们无法获取来自东方的信息，即使在东欧范围内也是如此。自从苏联解体以来，苏联卫星国的信息渐趋透明，但依然模糊不清，主要信息只披露于学术专著和学术刊物，而且以所在国语言刊载。因此，尽管波兰、捷克、匈牙利的作者撰写了许多开创先河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只能以波兰语、捷克语、匈牙利语来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学界中人才能接触到这些作品。由此引出我写作此书的另一个目的：将战后时期的历史生动地呈现给普罗大众。

我写作此书的最终目的，也许是最为重要的目的，是为走出战后神话的复杂迷宫扫清道路。经过我的严格考证，许多关于“大屠杀”的真相远远没有传说中那么具有戏剧性。与此同时，某些相当令人震惊的暴行，要么被刻意掩盖，要么在历史洪流中湮没无闻。尽管我们不可能发掘某些事件背后的确切真相，至少我们还能澄清某些谬误。

尤其让我感到困扰的是大量模糊不清、未经证实的统计数字，这些统计数字在关于战后时期的学术讨论中到处流传。统计数字的确至关重要，因为它们经常被用于政治目的。某些民族习惯于夸大比邻民族的罪行，以此转移别人对本民族罪行的关注，以此推进本民族的事业。政党无分旗帜颜色，都习惯于夸大敌对政党的罪过，同时掩饰本党盟友的罪过。历史学家有时也会夸大其词，或者在几个统计数字当中选取最为耸人听闻的数字，以此让他们的历史作品更具有戏剧效果。但战后时期的历史本身已经足够耸人听闻，根本不需要再夸大其词。正因如此，当我使用统计数字时，我会尽可能使用官方文献记录，而当官方文献记录散佚或者存疑时，我才会使用严谨学术著作的统计数字。当统计数字存在争议时，我会在正文中采用我认为最可靠的数字，同时把存在差异的数字在注释中列明。

也就是说，不必指望我在追求准确性方面会有太大进展，那未免期望过高。本书也并未试图成为关于战后初年欧洲的“一锤定音”和“包罗万象”的历史著作：那未免不着边际。正好相反，本书试图向那些令人震惊甚至令人恐惧的事件投射一束光芒，让那些从未发现事实的人们得以窥见真相。

我希望此书能够引发争论，关于这些事件在欧洲大陆痛苦重生时产生了何种影响的争论，由于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或许还能激励其他人从事更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如果说过往历史如同陌生异域，那么这个时期的欧洲史仍有大片未知领域，其在历史寻宝图上只能如此标示——“恶龙之巢穴”。

---

[1] Dean Acheson memorandum to Harry Hopkins，26 December 194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5，vol.II，pp.1059-61.Pope Pius XII’s address to the Sacred College of Cardinals，*New York Times*，3 June 1945，p.22.

[2] “Europe：The New Dark Continent”，*New York Times* magazine，18 March 1945，p.5.

地名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版图发生了显著变更，乡镇和城市的名称也随之改变。例如，德国城市斯德丁（Stettin）变成了波兰城市什切青（Szczecin），波兰城市维尔诺（Wilno）变成了立陶宛城市维尔纽斯（Vilnius），意大利城市阜姆（Fiume）变成了南斯拉夫城市里耶卡（Rijeka）。

除了那些已有约定俗成英文名称的城市之外，我总是力求使用在当时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地名。因此，我在叙述战时事件时使用斯德丁，但在描述战后事件时使用什切青。同理，我使用俄文名称来标示乌克兰城市，如哈尔科夫（Kharkov）或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因为作为苏联领土，上述地名就是这些城市在当代史档案中的名称。

在地名背后，总是潜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性，尤其在边境地区更为敏感，过去如此，现在亦然。我要向读者重申，我无意于触动读者的情绪。

中文版序言

本书着眼于欧洲，但书中许多议题同样适用于亚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欧大陆两端同样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暴力肆虐，同样经受了暴力摧残。在亚欧大陆两端，伤害都是多层次的：不仅许多城市被彻底夷为平地，数千万人惨遭杀害，而且还有更多不易察觉的伤害——秩序荡然、道德败坏、心灵创伤。与欧洲类似，亚洲也因战争而陷入混乱，直至多年以后才建立起新的常态。

欧洲与中国的相似之处尤为引人注目。在战争期间，中国不仅承受了比任何亚洲国家都更为严重的战火破坏，而且承受了最为残酷的战争后果。与欧洲许多地方类似，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荡然无存，不仅缺乏可靠的政府，而且缺乏法律和秩序。及至1945年，由于粮食分配体系已被彻底破坏，数百万人在饥饿中等待死亡。举目可见人们对复仇的渴望、对正义的等待、对某种法律和秩序的期盼。更不幸的是，中国许多地方还要再忍受四年战争的煎熬——这次是内战——奉行不同政治信念的人群，为赢得这个国家的主导权而战。

如今的人们，很难想象他们的祖父母被迫经历的艰难困苦。与欧洲类似，如今的中国是一片和平宁静、欣欣向荣的土地。但关于战争的记忆随时会浮出水面，中国人对日本的怨恨仍然萦绕不去，一如欧洲人对待德国那样。这种恨意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无可避免的。但这种怨恨并非总是有所裨益，而且经常会妨碍各国外交官为解决当今现实问题所付出的卓越努力，而这些问题与我们共同的战争记忆也许无甚关联。

当然，我不想对1945～1949年的欧洲与中国做太多的横向比较，两

者确实有许多不同。但我希望中国读者留意到，我在本书中所写的许多议题，其实具有普遍意义。

如果真有什么普遍真理的话，我想那就是：战争从未能轻易结束。战争造成的破坏越大，走出战争就越是艰难。考虑到1945年以后亚欧大陆那大规模的混乱状况，我有时认为，如今的亚欧大陆大体能保持和平宁静，简直是人间奇迹。我希望以下的章节，能够为所有读者提供一点启示，那就是永远不要轻率地支持战争。

基思·罗威

于伦敦

2015年5月

第一部 战争遗产

我曾经以为你会在那里等着我……但我回到家乡，只闻到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只看到满目疮痍的破败家园。

——塞缪尔·普特曼返回华沙时所写，1945年 [1]

我们只见到物质损失，但对经济凋敝以及政治解体、社会解体、心理解体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却视而不见。

——迪恩·艾奇逊，美国副国务卿，1947年 [2]

---

[1] Samuel Puterman，引自Michał Grynberg（ed.），*Words to Outlive Us*：*Eyewitness Accounts from the Warsaw Ghetto*（London：Granta，2003），p.440。

[2] Acheson，Dea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Norton，1969），p.231.

第一章 破败

1943年，旅游图书出版商卡尔旅游指南（Karl Baedeker）发行了一本关于波兰总督区（Generalgouvernement）的旅行手册。波兰总督区是指波兰中部和南部地区，名义上仍未纳入第三帝国。与当时其他德国出版物一样，这本旅行手册既着眼于提供信息，又着眼于舆论宣传。以华沙一节为例，此书极力渲染华沙的日耳曼起源、日耳曼特色，以及在“日耳曼人的卓越努力下”，如何让华沙跻身于世界最伟大的都城之列。此书力主游客参观中世纪的皇家城堡、十四世纪的天主教堂以及文艺复兴晚期漂亮的耶稣会教堂，这些景点都是日耳曼文化影响的例证。尤为有趣的是对巴洛克晚期毕苏茨基广场（Piłsudski Square）建筑群的记载，“这是华沙最美丽的广场”，此时更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广场。广场正中是“萨克森”宫殿，这当然是德国人的杰作，宫殿旁边是漂亮的萨克森花园，同样是德国建筑师的手笔。此书承认，在1939年的华沙战役中，有一两处建筑物不幸受损，但同时强调，从那时起，华沙“已在德国人的领导下再次重建”。[1]

这本旅行手册绝口不提的华沙西郊，当时已成为犹太隔离区。或许这样还好，就在此书印行之时，此地爆发了起义，党卫队元首旅（SS-Brigadeführer）的于尔根·斯特鲁普（Jürgen Stroop）将军下令焚烧此地的每一处建筑物。[2] 将近四平方公里的城区就此被焚毁。

此后一年，华沙残余城区再次爆发起义。这次起义由波兰本土军（Polish Home Army）发动，参与者更为广泛。1944年8月，许多波兰男子、女子和青少年开始偷袭德军士兵，抢夺其武器弹药。此后两个月，起义者在华沙旧城内外筑起街垒，抵挡住有1.7万名德军士兵的镇压部队的进攻。[3] 直至1944年10月，经历过战争期间最为惨烈的战斗

后，起义终告结束。经此一役，希特勒不再指望驯服波兰人，再加上俄国人迟早会进入华沙，希特勒遂下令将华沙彻底夷为平地。[4]

遵照希特勒的命令，德国军队炸毁了那座在旅行手册里留下深刻印记的中世纪的皇家城堡。他们还炸毁了十四世纪的天主教堂。然后，他们又摧毁了耶稣会教堂。1944年圣诞节过后的三天内，他们又按部就班地摧毁了萨克森宫殿，以及整个巴洛克风格与洛可可风格的宫殿建筑群。旅行手册曾经极力推荐的欧罗巴旅馆，虽于1944年10月已被焚毁，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又于1945年1月再度被爆破。德国军队逐间房屋、逐个街区，有条不紊地摧毁整座城市：93%的华沙住宅已经无法修复。为了圆满完成破坏任务，他们焚毁了国家档案馆、古籍档案馆、财政档案馆、市政档案馆、时文档案馆以及公共图书馆。[5]

战争结束后，波兰人想要重建首都时，国家博物馆举行展览，展出德国占领期间被损坏和摧毁的建筑物碎片和艺术品残片。他们同样编订了旅行手册，与卡尔旅游指南出版的旅行手册不同，波兰人的旅行手册完全以过去时态写成。此举在于提醒华沙市民以及世界各国民众，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无论是旅行手册，还是展览本身，都带有深刻寓意，那些在华沙末日中幸存的人们，再也无法欣赏到这座城市的昔日美景。对于华沙市民来说，首先是1939年的轰炸，然后是德国占领期间的掠夺，然后是1943年犹太隔离区的毁灭，最后是1944年年底整座城市的毁灭。此时，就在华沙解放几个月后，华沙市民已经习惯于栖身在破屋陋巷之中，习惯于栖身在断壁残垣之间。[6]

某种程度上，只有华沙末日的凭吊者，而非华沙末日的亲历者，才能看见这次破坏的真正规模。约翰·瓦尚（John Vachon）当时还是年轻的摄影师，作为联合国战后救济人员来到华沙。1946年1月，约翰在致妻子彭妮的信中描述了他面对华沙废墟时的惊愕反应。

> 这确实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大城市，我想要描述给你听，但又不知

从何说起。这么说吧，这是一座大城市。战前有超过100万人口。大小跟底特律差不多。现在，这里有90%的街区被彻彻底底地摧毁了……无论我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大片没有屋顶或者没有墙壁的未倒塌房屋，人们就蜷缩在里面。犹太隔离区是个例外，那里就是一块遍布碎砖的大平原，到处散布着歪歪扭扭的床板、浴缸、沙发、相框、树干，数以百万计的杂物散落在砖块之间。我无法想象，怎样才能造成如此破坏……这种景象如此骇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7]

仅仅时隔两年，卡尔旅游指南描述的那座美丽的巴洛克城市就已经彻底消失。

很难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毁灭。华沙只不过是被毁城市的个别例子，仅仅在波兰境内，同样的例子就有数十处之多。在欧洲范围内，全部被毁或者部分被毁的城市更是数以百计。战后拍摄的照片也许有助于人们理解个别城市的破坏程度，但要人们想象整个欧洲大陆的破坏程度，那确实考验人们的理解能力。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德国、波兰、南斯拉夫以及乌克兰，上千年积淀的文化与建筑精华，仅仅数年之间，就被毁灭殆尽。曾经有不止一位历史学家，将造成这种全面破坏的惊人暴力，比拟为《圣经》记载的末日之战。[8]

那些亲眼见证欧洲城市毁灭的人们，只能尝试接受家园被毁的现实，但即使亲身经历他们的痛苦，也不足以描述这种破坏的严重程度。然而，在我们对这种残破景象表达怜悯之前，有必要记住几个统计数字，因为无论统计数字多么枯燥无味，也依然不可或缺。

作为战争期间绝无仅有的、成功独力抗击希特勒进攻的国家，英国承受了巨大损失。在闪电战期间，德国空军在英国上空投下了将近5万吨炸弹，摧毁了20.2万所房屋，损坏了超过450万所房屋。[9] 英国大城市受到的打击可谓人尽皆知，但对某些小城镇的打击更能说明轰炸的真正范围。对考文垂的残忍轰炸，甚至催生出一个德语新词“coventrieren”（英文Coventrate），意思是像考文垂那样被炸了个底朝天。克莱德班克是格拉斯哥外围的工业小城镇，在1.2万户民宅里

面，只有8户民宅未遭到轰炸。[10]

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战争的破坏没有如此普遍，但更加集中。例如，在1944年盟军登陆诺曼底期间，卡昂几乎从地图上被抹去：75%的城区毁于盟军的轰炸。[11] 圣洛和勒阿弗尔受损更甚，分别有77%和82%的建筑物被炸毁。[12] 当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时，马赛有超过1.4万栋建筑物被部分炸毁或者全部炸毁。[13] 根据战损索偿和战损贷款的政府记录，战争期间的法国，有46万栋建筑物被炸毁，有超过190万栋建筑物被损坏。[14]

战争过后，越往东去，破坏越重。在布达佩斯，84%的建筑物被损坏，30%的受损建筑物无法居住。[15] 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大约80%的城区被炸毁：市内332间大型工厂中只有19间得以幸存，这仅仅是因为德国军队败退前放置在这19间工厂的炸弹被苏联红军工兵及时拆除。[16] 在基辅，绝大多数公共建筑物在1941年苏联军队败退时被炸毁，余下的公共建筑物则在1944年苏联军队反攻时被炸毁。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在战斗中反复易手，以至于最后都没剩下什么可以争夺的了。根据英国记者报道，在罗斯托夫和沃罗涅日，“破坏程度近乎100%”。[17] 这份列表还可以一直列举下去。在苏联，大约有1700座城镇和城市被毁灭；仅仅在乌克兰，就有714座城镇和城市被毁灭。[18]

那些在战后穿越废墟地带的人们，将会看见一座又一座被毁灭的城市。很少有人尝试描述其总体印象，正好相反，当他们路过每座城市时，他们都致力于描绘当地承受的创伤。例如，斯大林格勒只剩下“断壁残垣、颓垣败瓦、砾石堆积、烟囱伫立”。[19] 塞瓦斯托波尔“让人哑口无言”，“即使在郊区……也几乎找不到未塌的房屋”。[20] 1945年9月，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来到原属芬兰、后属苏联的城市维堡，他写道：“清晨的阳光……洒在毁坏的公寓楼外墙上，瞬间映照出寒冷、苍白的微光。”除了在斑驳的楼道里碰见一头受惊的

山羊，凯南似乎已是整座城市里唯一的生灵了。[21]

在连片废墟中，位于中心地带的正是德国，毫无疑问，德国城市受到炮火硝烟的多番洗礼。大约有360万所德国公寓被英美空军炸毁，大约占德国民宅总数的1/5。[22] 就绝对数字而言，德国民宅受损数量是英国民宅受损数量的18倍。[23] 个别城市的受损程度更为严重。根据帝国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柏林住宅损失比例为50%，汉诺威为51.6%，汉堡为53.3%，杜伊斯堡为64%，多特蒙德为66%，科隆为70%。[24]

当盟国观察员于战后来到德国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预期德国的受破坏程度，如同他们在闪电战期间目睹的英国的受破坏程度。尽管英美报刊已经开始刊发相关照片和报道，但当人们亲临其境时仍然会大吃一惊。例如，战后初期代表英国制造业部门派驻德国西部的奥斯丁·罗宾逊（Austin Robinson）在抵达美因茨的时候一度大为震惊：

> 那片废墟涵盖所有街区，大片地区只剩下断壁残垣，工厂几乎被夷为平地，这幅图景让我永生难忘。那些仅仅听说过此地的人，是不可能感受到那种感情或人性的强烈冲击的。[25]

战争结束时，英军中尉菲利普·达克（Philip Dark）同样被汉堡的惨象吓倒：

> 我们向市中心行进，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破败得令人难以想象的城市。我们真的被吓倒了。举目所及，几平方英里内，都是建筑物的空壳，扭曲的横梁直指天际，在一堵尚未倒塌的墙壁上，裸露的钢筋四处伸展，如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翼龙残骸。在墙壁的轮廓中，隐约可见烟囱的丑陋形状。到处弥漫着死寂的气氛……除非亲眼所见，否则难以想象。[26]

1945年，在对德国城市的诸多描述中，大都充斥着伤心绝望的感觉。例如，德累斯顿不再被比喻为“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而是被比喻为“月球表面”，规划官员认为要“至少耗费70年”才能重建完毕。[27] 慕尼黑如此破败，以至于“人们真的相信末日审判不日将至”。[28] 柏林“支

离破碎，只剩下瓦砾堆堆、破屋处处”。[29] 科隆“东倒西歪，花容失色，消失于瓦砾堆里，孤立在废墟丛中”。[30]

大约有1800万～2000万名德国人因为城市被毁而无家可归，这相当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战前总人口。[31] 还有1000万名乌克兰人同样无家可归，这一数字超过匈牙利的战前总人口。[32] 这些人蜗居于地窖、废墟、洞穴之中，只要有个栖身之所就行了。他们完全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比如饮用水、煤气、电力，全欧洲有数百万这样的苦命人。例如，华沙全城只剩下两盏路灯。[33] 在敖德萨，只有在自流井里才能打到饮用水，即使是到访此地的达官贵人，每天也只有一瓶水用于洗漱。[34] 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公用事业，欧洲城市居民仅仅是勉强维生，一位美国专栏记者写道：“在20世纪的破烂机器中间，人们过着中世纪的生活。”[35]

当人们纷纷关注欧洲城市的破败状况时，农村社区的日子其实同样不好过。由于战争的缘故，欧洲大陆的耕地要么开垦过度，要么兵焚火烧，要么洪水泛滥，要么丢弃荒废。墨索里尼曾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排干了意大利南部的沼泽，但败退的德国军队又故意放水淹没这一地区，由此引发严重的疟疾疫情。[36] 德国军队还故意打开荷兰的拦海大坝，导致超过50万英亩（21.9万公顷）的土地被海水淹没。[37] 尽管偏远地区远离主战场，但它们也未能在这种败退行动中幸免于难。败退的德国军队还毁掉了拉普兰地区超过1/3的定居点。[38] 此举目的在于，让倒戈相向的芬兰军队在冬季无处藏身，但此举也制造了超过8万名难民。在挪威北部和芬兰地区，道路布满地雷，电话线路被切断，大小桥梁被炸毁，由此产生的问题将在战后遗祸多年。

越往东去，破坏越重，概莫能外。在德国占领期间，希腊损失了1/3的森林，超过1000个村庄被焚毁和荒废。[39] 在南斯拉夫，根据赔偿委员会的战后统计，有24%的果园和38%的葡萄园被毁，还有大约60%

的家畜被屠宰。数百万吨谷物、牛奶、羊毛被掠夺，彻底摧毁了南斯拉夫的农村经济。[40] 在苏联，情况更加糟糕：多达7万个村庄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这些农村社区和所有基础设施。[41] 如此严重的破坏，绝非仅是反复战斗和临时掠夺的结果，实际上是系统地、故意地破坏土地和财产的结果。仅仅因为零星抵抗的迹象，大片的农场和村庄就被焚毁。仅仅为了降低受到伏击的风险，道路两旁的大片森林就被砍光。

许多作者提到过德国与苏联在交战时如何残酷无情，但其实德国与苏联在自我防卫时也同样残酷无情。1941年夏天，当德国军队像潮水般涌入苏联国土时，斯大林发表电台讲话，命令人们在逃亡之前，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东西："一切有价值的财产，包括有色金属、粮食和油料等无法撤离物品，务必予以销毁。在被敌人占领的地区，游击部队……务必焚毁森林、商店和交通工具。"[42]

当攻守形势逆转，就轮到希特勒下令实行焦土政策，不给反攻的苏联军队留下任何东西。1941年12月，希特勒命令德军驻乌克兰部队的指挥官："无须理会居民，所有房屋务必焚毁，不给敌人留下栖身之所"，"那些仍然完好无损的房屋，稍后由空军摧毁"。[43] 后来，当形势变得更为绝望时，希姆莱命令党卫队指挥官摧毁一切："在我们走后，不留俘虏，不留家畜，不留粮食，不留铁轨……敌人会发现一个彻底被焚烧和毁灭的国家。"[44]

由于有这样的命令，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大片耕地被纵火焚烧了不止一次，而是两次，一同被焚毁的还有无数可能被对手利用的村庄和农舍。当然，工矿企业是首先被摧毁的目标。例如，在匈牙利，500间大型工厂被拆卸运往德国，余下的工厂超过90%被故意焚毁，几乎所有煤矿都被淹没或者炸塌。[45] 在苏联，大约有3.2万间工厂被摧毁。[46] 在南斯拉夫，赔偿委员会估计该国损失了价值超过91.4亿美元的工矿企业，占该国工业总产值的1/3。[47]

或许，受损最为严重的是欧洲大陆的交通设施。例如，荷兰损失了60%的公路、铁路、水路。在意大利，多达1/3的国家公路网不堪使用，1.3万座桥梁被损毁。法国和南斯拉夫都损失了77%的铁路机车和相当比例的铁路车厢。波兰损失了1/5的公路、1/3的铁路（波兰铁路总里程约为1万英里）、85%的铁路车厢、100%的民用飞机。挪威损失了战前船舶吨位的一半，希腊损失了2/3至3/4的船舶。当战争结束时，普遍有效的唯一交通方式就是步行。[48]

欧洲所受的破坏，远远不止是普通房屋和基建设施的损失，甚至还不只是数百年来文化积淀和建筑艺术的损失。实际上，真正的破坏在于其象征层面。一位英国军官说道：堆积如山的碎石瓦砾，“是记载人类自我毁灭能力的纪念碑”。[49] 对于千万欧洲人来说，这些瓦砾堆每天都在提醒他们欧洲大陆经历过怎样的灭顶之灾，这种痛苦梦魇在其余生都挥之不去。

普里莫·利维（Primo Levi）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认为，德国人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几乎毁掉整个欧洲，简直称得上是超自然现象。对他来说，明斯克附近斯卢茨克一处军事基地的遗址，说明了“破坏的天分，毁灭的本能，与奥斯威辛如出一辙；那里曾经是施行绝育手术的秘密场所，绝非出于战争需要，亦非出于掠夺冲动”。[50] 盟军造成的破坏几乎同样糟糕：当利维看见维也纳的废墟时，他深感震撼，“一种沉重的、压抑的强烈罪恶感压倒了我，这种罪恶感无处不在，深藏在欧洲乃至世界的肌体中，为今后的灾难埋下了罪恶的种子”。[51]

正是这种“毁灭”和“罪恶”的潜流，让人们在面对欧洲城镇的废墟时百感交集。在时人留下的种种描述中，虽然未见直白的语句，但都能读出如下含义：物质破坏背后，更为惨重的是精神创伤。华沙废墟中孤零零地伫立的房屋“骨架”和相框，极具象征意义：埋藏在废墟下面的，既有字面含义的创伤，又有隐喻含义的创伤；既是人道意义的灾难，又是

道德意义的灾难。

---

[1] Baedeker，Karl，*Das Generalgouvernement*：*Reisehandbuch von Karl Baedeker* （Leipzig：Karl Baedeker，1943），pp.85-94.

[2] Davies，Norman，*Rising ’44*：*The Battle for Warsaw* （London：Pan，2004），p.556.

[3] Davies，Norman，*Rising ’44*：*The Battle for Warsaw* （London：Pan，2004），pp.666-7.

[4] Davies，Norman，*Rising ’44*：*The Battle for Warsaw* （London：Pan，2004），p.439.

[5] Ministry of Culture & Art and Ministry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Warsaw Accuses*：*Guide-book to the exhibition arranged by the Office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Capital together with the National Museum in Warsaw* （Warsaw：Muzeum Narodowe，1945），pp.19-24；and Davies，Norman，*God’s Playground*：*A History of Po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355.

[6] Ministry of Culture & Art and Ministry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Warsaw Accuses*：*Guide-book to the exhibition arranged by the Office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Capital together with the National Museum in Warsaw* （Warsaw：Muzeum Narodowe，1945），pp.19-24.

[7] Vachon，John，*Poland 1946*：*The Photographs and Letters of John Vachon* ，ed. Ann Vachon（Washington，DC，and London：Smithsonian Institute Press，1995），p.5，letter of 10 January 1946.

[8] Hastings，Max，*Armageddon* （London：Macmillan，2004）.

[9] HM Government，*Statistics Relating to the War Effo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London：HMSO，1944），p.9；另可参阅The National Archives（TNA）：Public Record Office（PRO）CAB 21/2110 and *Daily Express* ，29 November 1944。

[10] Ray，John，*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Cassell，1999），pp.95-6.

[11] 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44.

[12] Florentin，Eddy，*Quand les Alliés bombardaient la France 1940-1945*（Paris：Perrin，1997），p.430.

[13] Gaillard，Lucien，*Marseilles sous l'Occupation*（Rennes：Ouest-France，1982），p.113.

[14] 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471.

[15] According to Nagy，Ferenc，*The Struggle behind the Iron Curtain*，trans. Stephen K. Swift（New York：Macmillan，1948），p.129.

[16] 参阅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16；以及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864。

[17]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709.

[18] 参阅Kondufor，Yuri（ed.），*A Short History of the Ukraine*（Kiev：Naukova Dumka，1986），p.239；以及Krawchenko，Bohdan，'Soviet Ukraine under Nazi Occupation，1941-4'，in Yury Boshyk（ed.），*Ukraine during World War* Ⅱ（Edmonton：University of Alberta，1986），p.15。

[19] Valentin Berezhkov，引自Beevor，Antony，*Stalingrad*（London：Viking，1998），p.418。

[20]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837.

[21] Kennan，George F.，*Memoirs 1925-1950*（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1967），pp.280-82.

[22]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USSBS），*Over-all Report*（*European War*），1945，p.72.Tooze提供的数字为380万人，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672；位于威尔斯巴登的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统计数字为337万人，参阅Hastings，Max，*Bomber Command*（London：Pan，1999），p.352。

[23] 20.2万间严重损毁、不可修复的英国房屋，仅占总数的1.5%：HM Government，*Statistics Relating to the War Effo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London：HMSO，1944），pp.31-2；另可参阅TNA：PRO CAB 21/2110。

[24] 参阅Rumpf，Hans，*The Bombing of Germany*，trans. Edward Fitzgerald（London：White Lion，1975），pp.128-9.英军轰炸观测部队提供的数字是，柏林33%、汉诺威60%、汉堡75%、杜伊斯堡48%、多特蒙德54%、科隆61%；参阅Webster and Webster，Sir Charles and Noble Frankland，*The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 1939-1945*（London：HMSO，1961），vol.IV，pp.484-6.美国战略轰炸观测部队提供了另一组数字：例如，汉堡61%，参阅Lowe，Keith，*Inferno*（London：Viking，2007），p.318。

[25] Robinson，diary entry for Monday，28 May 1945.

[26] Philip J.C.Dark，IWM Docs 94/7/1，typescript account，“Look Back This Once：Prisoner of War in Germany in WWII”.

[27] Herbert Conert，引自Taylor，Frederick，*Dresden*（New York：HarperCollins，2004），p.396.德累斯顿大轰炸后如同月球表面的惨状，参阅Kurt Vonnegut，*Slaughterhouse 5*（London：Vintage，1991），pp.130-31。

[28] Klemperer，Victor，*To the Bitter End*：*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 1942-45*，trans. Martin Chalmers（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9），p.596，diary entry for 22 May 1945.

[29] Colonel R.G.Turner，IWM Docs，05/22/1，letter to his mother，11 July 1945.

[30] Janet Flaner，引自Sebald，W.G.，*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struction*（London，2004），p.31。

[31]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Over-all Report*（*European War*）（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5），p.95.关于战后人口，参阅Maddison，Angus，*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2003），pp.38-9。

[32] Taras Hunczak，“Ukrainian-Jew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Soviet and Nazi Occupations”，in Boshyk，Yury（ed.），*Ukraine during World War* Ⅱ：*History and its Aftermath*（Edmonton：University of Alberta，1986），p.47；and Kondufor，Yuri（ed.），*A Short History of the Ukraine*（Kiev：Naukova Dumka，1986），p.239.认为战前匈牙利人口为922.7万的说法可参阅Maddison，Angus，*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2003），p.96。

[33] Lane，Arthur Bliss，*I Saw Poland Betrayed*：*An American Ambassador Repor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and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48），p.26.

[34]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 （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815.

[35] Anne O’Hare McCormick，“Europe’s Five Black Years”，*New York Times Magazine*，3 September 1944，p.42.

[36] Anne O’Hare McCormick，“Europe’s Five Black Years”，*New York Times Magazine*，3 September 1944，pp.42-3.

[37]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Pimlico，2007），p.17.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初步估计（1944年12月15日）略低，为50万英亩（20.2万公顷）；参阅Coles，Harry L. and Albert K. Weinberg（eds.），*Civil Affairs*：*Soldiers Become Governors* （Washington，DC：US Govt Printing Office，1964），p.826。

[38] Nøkelby，Berit，‘Adjusting to Allied Victory’，in Henrik S. Nissen（ed.），*Scandinav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trans. Thomas Munch-Peterse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315.

[39]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155；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Pimlico，2007），p.17；以及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 （London：Faber & Faber，2009），p.228，它的估计更高，为1700个村庄.

[40] 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15.

[41]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Pimlico，2007），p.17.仅在乌克兰就有2.8万个村庄被摧毁，可参阅Krawchenko，Bohdan，‘Soviet Ukraine under Nazi Occupation，1941-4’，in Yury Boshyk（ed.），*Ukraine during World War* Ⅱ （Edmonton：University of Alberta，1986），p.15。

[42] Stalin，Generalissimo Josef，*War Speeches*，*Orders of the Day and Answers to Foreign Press Correspondents dur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July 3rd*，*1941-June 22nd*，*1945* （London：Hutchinson，1946），p.7.

[43] 引自Andrew Gregorovich，“World War II in Ukraine”，*Forum*：*A Ukrainian Review*，no.92（Spring 1997），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infoukes.com/history/ww2/page-26.html。

[44] Order to SS-Obergruppenführer Prützmann on 3 September 1943，引自Dallin，Alexander，*German Rule in Russia 1941-1945*：*A Study of Occupation Policies*（London and Basingstoke：Macmillan，1981），p.364。

[45] 参阅Glanz，Susan，‘Economic Platforms of the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Elections of 1945’，in Nándor Dreisziger（ed.），*Hungary in the Age of Total War*（*1938-1948*）（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p.170 and 186。

[46]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17.

[47] 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15.

[48] 芬兰和挪威参阅Nøkelby，Berit，‘Adjusting to Allied Victory’，in Henrik S. Nissen（ed.），*Scandinav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trans. Thomas Munch-Peterse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315；波兰参阅Jan Szafrański，“Poland’s Losses in World War II”，in Nurowski，Roman（ed.），*1939-1945 War Losses in Poland*（Poznań and Warsaw：Wydawnictwo Zachodnie，1960），pp.68-9；荷兰、法国和苏联参阅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17；希腊参阅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17 和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28；意大利参阅UNRRA statistics，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34，以及Vera Zamagni，“Italy：How to Lose the War and Win the Peace”，in Harrison，Mark（ed.），*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Tw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212；南斯拉夫参阅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15；乌克兰参阅Kondufor，Yuri（ed.），*A Short History of the Ukraine*（Kiev：Naukova Dumka，1986），p.239。

[49] Philip J.C.Dark，IWM Docs 94/7/1，typescript account，“Look Back This Once：Prisoner of War in Germany in WWII”，entry for 19 April 1945.

[50] Levi，Primo，*Survival in Auschwitz and The Reawakening*：*Two Memoirs*

，trans. Stuart Woolf（New York：Summit Books，1986），pp.288-9.

[51] Levi，Primo，*Survival in Auschwitz and The Reawakening*：*Two Memoirs*，trans. Stuart Woolf（New York：Summit Books，1986），p.367.

第二章 离丧

死亡人数

如果说欧洲的物质创伤让人难以置信，那么，战争的人命损失就更是骇人听闻。对此，任何描写都不足以涵盖其全貌。我还记得，作家汉斯·埃里希·诺萨克（Hans Erich Nossack）曾试图描述1943年汉堡大火的后遗症："哎，每当我回想起汉堡，我就踌躇不前。为什么还要记起呢？为什么还要记载呢？全部忘掉不是更好吗？"[1] 尽管如此，诺萨克本人也承认，虽然未能为这些历史事件赋予任何意义，但目击证人和历史学家有责任记录这些历史事件。

每当落笔描写如此大规模的灾难时，历史学家总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历史学家大可以呈现原始统计数字，留待读者自行想象这些数字的含义。战争结束后，各国政府和援助机构曾经计算冲突各方的相关数字，涉及士兵阵亡人数、平民伤亡人数、轰炸工矿企业造成的经济后果等方方面面。欧洲各国政府都致力于测算、估算、计算，也许正如诺萨克所说的，"试图通过数字手段来制止死亡"。[2]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也可能完全忽略统计数字，只是记录上述事件的普通目击者的亲身经历。例如，在汉堡大火后，让德国民众感到痛彻心扉的不是4万人死亡这个抽象数字，而是这些人惨遭横死的痛苦过程。关于火海炼狱的传说，关于火场飓风的传说，以及关于漫天星火点燃人们头发和衣物的恐怖传说，正是这些形象描述而不是原始数字，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无论如何，当时人们的直觉告诉我们，统计数字是靠不住的。在一座城市里，当无数尸体被掩埋在堆积如山的瓦砾之下，当无数尸体由于高温焚烧而融为尸块甚至化为灰烬时，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准确的死亡数字。无论人们使用什么方法，最多只可能窥见这场灾难

的细枝末节。正如诺萨克所说，所谓信史，其实与“离题万丈……光怪陆离……无从稽考”的道听途说相差无几。[3]

在某种程度上，汉堡大火可被视为战时欧洲的缩影。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轰炸让城市成为一片废墟，但总有某些地方风平浪静地、如同奇迹地未受波及。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一样，为了逃避战火，郊区人口被彻底疏散，此后数年一直荒废。与其他地区一样，受害者来自许多国家，他们只能艰难度日。

然而，这座城市的命运，与这片大陆的命运，还是截然不同的。尽管汉堡大轰炸如此恐怖，但这座城市的居民死亡人数还不到3%，而欧洲大陆的死亡率比之还要高出两倍。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确令人难以置信：3500万～4000万人。[4] 这几乎相当于某些国家的战前人口，比如波兰（战前3500万人）和法国（战前4200万人）。[5] 又或者，换言之，这个死亡人数，相当于每天晚上发生一次汉堡大火，持续整整1000个晚上。

这些总体数字，有时掩盖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例如，英国的损失尽管相当惨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对轻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30万名英国人被杀害，大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人数的1/3。[6] 与之类似，超过50万名法国人被杀害，此外还有大约21万名荷兰人、8.6万名比利时人、将近31万名意大利人死于非命。[7] 与之对照，德国有将近450万名士兵和150万名平民丧生。战争期间，仅仅是死于盟军轰炸的德国人数量，就与死于各种原因的英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总数大致相当。[8]

越往东去，死人越多，概莫能外。希腊在战争中死亡41万人，与上述国家相比，希腊的死亡人数似乎不算显眼，但请不要忘记，希腊战前人口只有700万，战争杀害了大约6%的希腊人。[9] 与之类似，匈牙利在战争中死亡45万人，几乎占匈牙利总人口的5%。[10] 在南斯拉夫，超过

100万人被杀害，占南斯拉夫总人口的6.3%。[11] 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死亡人数大约占波罗的海国家战前总人口的8%～9%。[12]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波兰的死亡比例最为惨重：每6名波兰人中，就有1人以上被杀害，总共有超过600万人被杀害。[13]

战争期间的绝对最高死亡人数出现在苏联：大约2700万人死亡。[14] 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数字同样掩盖了巨大的地区差异。例如，关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并没有可靠的地区统计数字，因为当时国际社会并不把这两个地区视为独立国家，但绝大多数估计都认为，乌克兰的战争死亡人数为700万～800万。如果这个数字是准确的，那么每5名乌克兰人中，就有1人在战争期间被杀害。[15] 白俄罗斯的死亡比例据说是全欧洲最高的，有1/4的人口被杀害。[16]

今天，正如在1945年一样，几乎不可能把握这些统计数字的实际意义，而把这些统计数字形象化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死亡总人数，意味着在长达六年时间里，平均每五秒钟就有一个人被杀害，但这种类比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即使是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那些目睹过屠杀的人、那些看见过尸山血海尸横遍野的人，也都无法理解战争期间遍及欧洲的屠杀事件的真正规模。

或许，接近真相的仅有路径是不再把欧洲想象成尸体堆积的地方，而是把欧洲想象成痛苦沦丧的地方。当战争结束时，几乎所有欧洲人都失去了朋友或亲人。整个村庄、整个城镇甚至整个城市都被彻底抹去，生活在那里的居民也都不知所踪。欧洲有大片地区，曾经人烟稠密、社区兴旺，此时近乎人去楼空。战后欧洲的气氛，并非表现为死亡，而是表现为离丧，那些曾经生活在欧洲的房屋、商店、街道、市场里的人们，早已离开人世。

从21世纪遥望过去，我们总会把战争结束视为欢天喜地的时刻。我

们曾经看见，在纽约时代广场，水兵为女孩送上热吻；我们曾经看见，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各国士兵手挽手高声欢笑。然而，尽管在战争结束时普天同庆，但此时的欧洲其实哀鸿遍野。这种痛失亲人的感觉，既是个人的，也是共同的。当欧洲大陆的城镇和城市沦为废墟时，无数家庭和社区也都已经家破人亡。

消失的犹太人

某些人群承受的离丧之苦肯定超过其他人群，尤其是在东欧，受害最深的无疑是犹太人。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口述史访谈中，来自捷克斯洛伐克[17]的犹太幸存者伊迪丝·巴尼特（Edith Baneth）从个人角度讲述了这种至今挥之不去的丧亲之痛。

> 每当想起我们失去的家人，我们的心情就永远不可能平复。家人是无可取代的，即使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这种失落感依然存在。当年我们举行成人礼和婚礼的时候，两家来做客的亲友可能多达五六十人。但当我的儿子举行成人礼和婚礼的时候，已经没有亲友来做客了，这就是第二代、第三代感知大屠杀的方式，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我的儿子从来没有经历过家族生活，本来他有叔叔、姑姑、爷爷、奶奶，但现在家里却无比空洞。[18]

1945年，当绝大多数人都在计算战争期间失去多少亲友时，犹太幸存者却在计算还剩下多少亲友，而答案经常是一个不剩。在柏林犹太人的纪念册中，全家殉难的例子比比皆是，从幼小孩童到曾祖父母无一幸免。在纪念册里，名叫阿伯拉罕的殉难者有6页，名叫希尔什的有11页，名叫里维斯的有12页，名叫沃尔夫的有13页。[19]完全可以为任何犹太社区制作类似的纪念册，这样的犹太社区曾经遍布全欧洲。例如，1944年，维克托·布雷特贝格（Victor Breitburg）在波兰失去了所有亲人。“在54名家族成员中，我是唯一的幸存者。我曾经回到罗兹，看看能否找到我的亲人，但我一无所获。”[20]

当所有失去的亲人被叠加到一起，伊迪丝·巴尼特所说的“空洞”就

不仅可以吞没整个家庭，而且可以吞没整个社区。战前的波兰和乌克兰，在数十个大城市里，犹太人都占据了相当可观的人口比例。例如，战前的维尔诺，即今天的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就曾经是6万～7万名犹太人的家园。及至1945年年中，也许只有10%的犹太人得以幸存。[21]犹太人还构成了华沙人口的1/3，即总共大约393950人。及至1945年1月，当苏联红军最终渡过维斯瓦河进抵华沙时，他们在华沙市内只发现200名犹太幸存者。即使到1945年年底，当少数幸存者回到华沙时，华沙市内的犹太人也从未超过5000人。[22]

农村地区的犹太社区境况同样糟糕。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周边的大片农村地区，犹太人口比例从13%下降到只剩0.6%。[23] 在波兰战前最封闭的农村地区沃利尼亚，当地有98.5%的犹太社区居民被德国人及其扶植的地方武装杀害。[24] 总体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少有575万犹太人被杀害，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恶劣、最有系统的种族灭绝行动。[25]

这些统计数字同样是令人难以理解的，除非人们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去想象。艾丽西娅·亚当斯（Alicia Adams）是波兰德罗霍贝奇（Drohobycz）的幸存者，她以毫不掩饰的言辞描述了她的所见所闻：

> 不仅我的父母、我的叔叔、我的姑姑、我的兄弟，就连我所有的儿时玩伴、我所有的左邻右里，生活在德罗霍贝奇的全体居民都被杀害了，大约3万人，全部被枪决。我不仅看着我最亲密的家人被杀害，而且看着所有人被杀害。我每天都看见有人被杀，这构成了我童年记忆的组成部分。[26]

对于犹太逃亡者和犹太幸存者来说，回到丢荒废弃的东欧地区，简直是无比绝望的体验。著名的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在乌克兰长大，但在德国入侵期间生活在莫斯科。1943年年底，当他作为战地记者重返乌克兰时，他发现自己所有的亲友都已被杀害。他可能是最早理解大屠杀的作家之一：

> 乌克兰再也没有犹太人。波尔塔瓦、哈尔科夫、克列缅丘格、鲍里斯波尔、亚戈京，哪里都没有犹太人，在这数十座城市、数百处城镇、数千个村庄，你看不到又黑又瘦的小女孩眼泪涟涟，你听不到老妇人痛苦呻吟，你看不到饥饿的婴儿面如菜色。只有一片死寂，只有一片肃杀。整个民族都被残忍地谋杀了。[27]

随着整个种族的消失，欧洲大陆数百年来最为独特的文化也一并消失了。

> 这是对伟大的、古老的精妙文化的谋杀，这种文化在数以千计的能工巧匠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中世代相传。这是对祖辈传承的日常传统的谋杀，这是对记忆的谋杀，这是对哀怨歌曲和民间诗篇的谋杀，这是对充满喜怒哀乐的生活的谋杀，这是对家园和墓地的破坏，这是一个与乌克兰人共同生活了数百年的民族的消亡……[28]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欧洲的滔天罪恶，犹太人是少数几个亲身了解个中真相的族群之一。犹太人能够分析和综合所有事实，从而为他们提供了独特视角：犹太人能够看到，集体屠杀不仅仅是地方个案，而且是发生在整个欧洲大陆的普遍现象。即使是犹太孩子也对此心知肚明。例如，时年11岁的塞丽娜·利伯曼（Celina Lieberman）于1942年被乌克兰一对信仰基督教的夫妇暂时收养，但她极力尝试保持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每天晚上，她都会为跟随养父母去基督教教堂而向犹太教上帝致歉，因为她真诚地相信自己已经是最后一个活着的犹太人了。[29]

然而，即使是在如此绝望的境况中，也还是有少数几颗希望的种子。塞丽娜·利伯曼不是最后一个活着的犹太人。战争过后，犹太人开始走出藏身之所，有些地方简直让人难以想象。数以千计的人在立陶宛、波兰、白俄罗斯的森林和沼泽中幸存。还有数以千计的人躲藏在好心人家的地窖和阁楼中熬过战争。即使是在被毁灭的华沙，还是有少数犹太人从废墟中走出，如同圣经中的诺亚，重新踏足历经变乱的世界。他们躲藏在阴沟、隧道以及专门搭建的地洞中，从而安然度过大屠杀的浪潮，这些地方就是他们的私人方舟。或许最大的奇迹是欧洲各处集中

营里的犹太幸存者，尽管人们对这个奇迹往往浑然不觉。虽然纳粹机关算尽，要用饥饿和劳累杀死犹太人，但当1945年盟军解放集中营时，还是有大约30万名犹太人得以生还。总体而言，大约有160万名欧洲犹太人设法摆脱了死亡。[30]

战争同样造就了某些绝无仅有而且难能可贵的国家行为，尽管面对着纳粹的巨大压力，但某些国家坚持救助犹太人。例如，丹麦从未通过反犹法案，从未剥夺犹太人的财产，从未开除犹太公职人员。当丹麦民众发现党卫队打算围捕丹麦国内的7200名犹太人时，人们齐心协力把几乎整个犹太社区秘密疏散到瑞典。[31] 意大利民众同样抵制了任何驱逐犹太人的企图，不仅在意大利本土如此，而且在意大利征服的地区也同样如此。[32] 当党卫队要求保加利亚驱逐其国内的4.9万名犹太人时，国王、议会、教会、学者、农民都坚决反对党卫队的措施。实际上，保加利亚农民准备卧轨，以阻止犹太人被转送出境。正因如此，战争期间，保加利亚是仅有的犹太人口有所增加的欧洲国家。[33]

最后，还有某些个人，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拯救犹太人。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比如德国工业家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早已天下闻名；但从1953年起，还有超过21700人被以色列政府确认为救人者。[34] 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尽管对犹太人不乏偏见，但还是为犹太人提供庇护。例如，有一位荷兰教士，坦率承认自己非常讨厌犹太人，他认为“犹太人让我受不了……跟我们非常不同，他们是另一个物种，或者说另一个种族”。但他还是因为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迫害而被逮捕，进而被关进集中营，他对此无怨无悔。战时和战后，希望的种子绝处逢生，不仅为犹太人，而且为全体欧洲人带来了希望。[35]

其他屠杀事件

尽管灭绝犹太人是最为引人注目、遍及欧洲大陆的种族灭绝行动，但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地方性的屠杀措施。在克罗地亚，乌斯塔莎政权

试图在全国各地实行种族清洗，为此杀害了59.2万名塞尔维亚人、穆斯林和犹太人。[36] 在沃利尼亚，在灭绝犹太人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又杀害了数万名波兰人。在爱琴海北岸，保加利亚军队铁蹄所及之处，保加利亚人大肆屠杀希腊社区居民。在南斯拉夫的伏伊伏丁那地区，匈牙利人同样对塞尔维亚人大开杀戒。

在欧洲许多地区，那些不受欢迎的族群直接被赶出他们所在的市镇和乡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这种情况在中欧和东欧比比皆是，皆因古老的帝国要求索回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丢失的领土。但最具戏剧性的族群放逐行动发生在1945年，在苏联红军的步步进逼下，数百万名德国人被赶出东普鲁士、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在他们身后留下一座座空空荡荡的鬼城。当德国东部这些地区被作为战利品移交给波兰时，来到此地的波兰人形容此地了无生气，尽管当地的街道原本相当整洁。在某些房屋里，餐桌上还摆放着食物，仿佛房屋的主人匆匆离去。1945年春天，兹比格涅夫·奥格罗辛斯基（Zbigniew Ogrodzinski）被任命为接管德国城市斯德丁的首批波兰官员。他回忆道："到处空无一人，当你走进那些房屋，一切摆放如故，书架上还放着书，家居杂物井井有条，就是没有德国人。"[37]

在德国东部的某些农村地区，似乎已经十室九空。1945年夏天，一位英军少将要与苏联方面谈判物资交换事宜，他描述了途经德国省份梅伦堡时的所见所闻。

> 行程初段是穿越拉宾斯坦菲尔德森林，然后穿越大片农田，之后才到达克里维茨。我从未经历过如此怪异的旅程。我唯一见到的人是老气横秋的苏联红军的士兵和哨兵。田园已经荒芜，粮仓已经掏空，原野上没有牛马，也没有家禽，一片死气沉沉。在前往克里维茨的18公里旅程中，我不记得自己还见过什么活物（除了几个苏联士兵）。我没有听到鸟叫，也没有看到任何野生动物。[38]

短短六年间，欧洲的人口分布特征经历了无可挽回的剧变。波兰人

口密度下降了27%，而波兰东部某些地区甚至变成了无人区。[39] 那些历经族群融合的国家，此时经历广泛的种族清洗后，基本上只剩下单一族群。[40] 与人口的缺失同时出现的，是社区的缺失以及多元文化的缺失：欧洲大片地区成为单一族群地区。这一进程在战争结束后头几个月大大加快了。

如果说对整个社区的全面屠杀让外来者感到惊奇怪异，那么，那些生活在此地的生还者就更不知所措了。例如，法国利穆赞地区的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Oradour-sur-Glane），始终未能从噩梦中完全恢复过来。1944年夏天，为了报复当地抵抗组织，镇上所有男人都被围捕和枪决，妇女和孩子则被赶进教堂，然后教堂被付之一炬。战争结束后，当局决定不再重建此地，而是在附近另建新市镇，奥拉杜尔被保留下来，一如大屠杀当天的原貌。此地如今仍然是一座死城。[41]

同样残忍的屠杀事件也发生在欧洲各地无数的地方社区。或许最寂寂无闻的屠杀事件，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策（Lidice），为报复第三帝国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总督赖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遇刺，当地所有男人都被枪决。村庄里的孩子被送往海乌姆诺集中营，然后在那里被毒死；妇女则被囚禁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充当奴工。村庄被焚烧，被铲平，瓦砾也被清空，好让野草长满曾经建有房屋的废墟。这次屠杀的目的，不仅在于惩戒这个敢于反抗占领的地方社区，也是要彻底铲除这个社区，仿佛这个社区从未存在过。纳粹有计划地破坏这个村庄，以此作为范例，警告其他可能卷入抵抗运动的村庄。[42]

这种彻底抹去整个社区的做法，其心理冲击绝对不可低估。1945年，在集中营被解放后，幸存的利迪策妇女返回到她们的村庄。她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村庄结局如何，直至遇到村庄周围的捷克士兵。其中一位妇女，米洛斯拉娃·卡利博娃（Miloslava Kalibová），后来说起自己

当时的反应：

> 士兵们低下头，许多人眼泛泪光。我们说："噢不！不要告诉我们更坏的消息……"一名士兵还是告诉了我，我这才知道，三年前所有男人都被枪杀了……就连小男孩都不放过，所有男人都被杀死了……更糟糕的是，孩子们都被毒死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打击。[43]

当她走进村庄，她发现那里"只剩下荒地"。原来的村庄荡然无存，只有在她以及幸存姐妹的脑海中，还留着丝丝痕迹。[44]

这种地方层面的恐怖经历，与大屠杀本身同样具有毁灭性。对市镇和乡村的破坏，不仅是当地幸存居民的损失，而且是整个周边地区的损失，更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损失。借用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45] 的话来说，这剥夺了"一连串记忆……一连串传统"。[46] 利迪策，与数以千计的其他村庄一样，如同稍纵即逝的微光，湮没在黑暗之中。

孤儿寡妇

如果说屠杀行为在欧洲社会的编织物上刺出某些"空洞"，那么，另外一种更为隐性的人口缺失，就如同在挂毯上抽走一根丝线。最为显著也最为人所共知的人口缺失，则是男人的缺席。欧战胜利日当天，从英国各省份拍回的照片中，只见妇女和孩子在街道上庆祝战争结束，除了老人以及偶尔轮休的士兵，照片上几乎见不到男人。这些照片上的人们充满欢声笑语，因为她们知道男人离开家园只是暂时的。但在欧洲其他地方，人们就不敢如此确定了。绝大多数德军士兵以及来自其他轴心国的士兵，战争结束时都成了俘虏，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多年以后才能回家。当然，还有数百万名来自欧洲各国的男人再也未能回家。一位英军少将在战后写道："我们在德国走过数千英里，最为突出的事实是，几乎不见17～40岁的男人。这是一片属于妇女、孩子、老人的土地。"[47]

在欧洲许多地方，好几代年轻女子注定孤独终老，因为当地绝大多

数年轻男子已经死亡。例如，在苏联，当战争结束时，女人比男人多出1300万人。男人的缺失在农村地区最为明显，80%的集体农庄的劳动力是妇女。根据1959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在1929～1938年年满20岁的苏联妇女中，还有1/3尚未婚嫁。[48]

如果说欧洲变成了妇女的大陆，那么它也是孩子的大陆。战争结束后的混乱时期，许多与家人失散的孩子结成帮派以求自保。及至1946年，还有18万名流浪儿童生活在罗马、那不勒斯、米兰：他们被迫睡在走廊过道上，要靠盗窃、乞讨、卖淫来维持生计。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教皇本人向全世界呼吁，救救意大利的孩子，“他们在市镇和乡村里漫无目的地游离浪荡，被抛弃和暴露在种种危险之中”。[49] 在法国，农民经常发现有孩子睡在干草堆里。在南斯拉夫和斯洛伐克东部，游击队员在丛林、洞穴、废墟中发现许多几乎饿死的孩子。1945年夏天，仅在柏林就有5.3万名无家可归的孩子。[50]

英军中校威廉·拜福德-琼斯（William Byford-Jones）在柏林威廉皇帝纪念碑的裂缝里发现了一名女孩。中校问女孩在那里干什么，女孩说这是她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入睡之处：“没有人能够找到我。这里足够温暖，而且没有人能够爬上来。”德国社会福利署的工作人员来接女孩，但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她劝出来。[51]

这些故事点出了欧洲这块编织物上的另一处缺口，父母缺席。这个问题在受战争破坏最为惨烈的某些欧洲地区尤为严重。例如，在波兰，有超过100万名“战争孤儿”，这个英美官方术语是指那些至少失去父亲或者母亲的孩子。[52] 在德国，战争孤儿也可能超过100万名：1947年，仅仅是在英军占领区，登记在册的战争孤儿就多达322053人。[53] 缺少父爱，或者说缺少任何男性模范，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在孩子眼中也是正常现象。安杰伊（Andrzej C.）是一位来自华沙的波兰人，他在战争结束之初住过好几处难民营，他说道：“我还记得，我只见过一

名有父亲的男孩，男人是稀有动物，因为那里几乎没有男人。”[54]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3的德国孩子失去了父亲。[55]

失去父母以及失去父母监督，有时却会意想不到地让人振作起来。例如，安杰伊承认自己的童年确实艰难，但他还是饶有兴味地回想起，他和其他男孩子在德国南部的难民营玩过的游戏。安杰伊有机会去玩一些今天绝大多数孩子梦寐以求的玩具。

> 我们这些孩子就像野狗一样。当时的生活非常有趣！恐惧全无，阳光普照，乐趣无穷……有一次，我们找到一枚未引爆的炮弹。我们知道这很危险，我们把炮弹放进小溪里冷却一会儿，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最后我们把炮弹扔进火堆，跑到河谷对面，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发生了巨大的爆炸。我们从未想过，如果有人碰巧走近火堆会怎么样，我们完全不假思索。又有一次，我们发现一些德军机枪子弹，数量很多。我们把子弹放进别人弃置在森林的铁炉子里，塞进柴火，点燃炉子。结果非常好玩！炉子开始穿孔，直到被打成筛子！

还有好几次，安杰伊和朋友们用装满汽油的油罐搭起篝火，因为用无烟火药生火而烧掉了眉毛，他们互相投掷迫击炮弹，甚至找到并点燃了一枚反坦克火箭弹：“这也很好玩！”他最害怕的不是可能受到严重伤害，反而是母亲可能会发现他如此能耐。

有一次，他甚至走过地雷阵，为的是在德国军队废弃的地堡旁边捡拾野生的覆盆子果实。他解释道：“战争过去好几年了，地雷也能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认定我们能够走过去，毕竟，我们能够看见，所以我们是安全的……我们是愚蠢的，也是幸运的。如果你没脑子，你就会有运气。那些覆盆子真是美味……”[56]

安杰伊在许多方面都很幸运。他不仅避免了严重伤害，而且他还有母亲在身边。战争结束后不久，他的父亲从波兰第二军团退役，也从意大利战场回来了。对于1300万名欧洲孩子来说，这种幸运简直是种奢侈。[57] 有相当多的孩子父母双亡，及至1948年9月，还有大约2万名孤

儿在等待，看看是否还有任何亲戚可以联系得上。[58]

关于孤儿的心理学研究表明，这些孤儿通常比其他孩子更加容易感到焦虑和沮丧，这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更容易出现古怪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更容易自杀，更容易酗酒和滥用药物，他们更不自信，健康状况也更差。[59] 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父母代表着世界的稳定性，代表着世界的运作方式：一旦父母突然离去，他们就会失去理解世界的根基。除了经历父母离世，这些孩子还要面对这个世界，在他们眼中，这个世界变成了漂泊不定的地方。

战争期间，整个欧洲都在经历同样的过程，可谓影响深远。这种痛失亲人的忧郁气氛，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心理特质。不仅数千万人经历过失去朋友、亲人、爱人的创痛，而且许多地区被迫面对整个社区的灭绝，而且所有民族都失去了相当部分的人口。任何稳定感都不复存在了，个人如此，社会亦如此。

如果痛失亲人的个人容易出现古怪行为，那么，整个社区乃至整个民族也将如此。在接下来的章节里，如果读者对我如此连篇累牍地描述战争期间的创伤感到讶异，那么，你们只要记住我这句断语就够了。欧洲也曾经历过许多剧变，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几个世纪以来经历的剧变都显得微不足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让欧洲受伤，而且让欧洲迷失方向。

---

[1] Nossack，Hans Erich，*Der Untergang*（Hamburg：Ernst Kabel Verlag，1981），p.67.

[2] Nossack，Hans Erich，*Der Untergang*（Hamburg：Ernst Kabel Verlag，1981），p.98.

[3] Nossack，Hans Erich，*Der Untergang*（Hamburg：Ernst Kabel Verlag，1981），p.68.Lowe，Keith，*Inferno*（London：Viking，2007），*passim* .

[4] 统计战争死亡人数是极为困难的任务，其复杂性在于缺乏准确数据、领土变更、何谓“战争死亡”、大量人口迁移等。关于各国的复杂情况，参阅Frumkin，*passim* 。

[5] 基于战前波兰领土，参阅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 （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pp.60 and 117.对照参阅Maddison，Angus，*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OECD，2003），pp.38 and 96。

[6] 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 （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p.168）and Dupuy and Dupuy（p.1309）给出非常不同的数字；但英国中央统计局（pp.13，37 and 40）提供的数字是63635名平民死于战争，234475名军人死于战争，我认为这些数字是最为可靠的。Milward提供的数字包括英联邦有611596人死于战争，参阅他的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11。

[7] 法国：Frumkin提供的数字是60万，与Rioux相同，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 ，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8；但Milward提供的死亡数字是49.7万，参阅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11，以及Rioux也提到可能还有30万战争间接死难者（死于营养不良等原因）。荷兰：Frumkin提供的数字是21万，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 （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p.168，与荷兰中央统计局相同，p.749，可能有7万战争间接死难者。比利时：Frumkin提供的数字是8.8万，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 （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p.168，估计其中有2.7万名犹太人；Martin Gilbert提供的数字是24387名比利时犹太人，参阅*Atlas of the Holocaust* ，p.231。意大利：Frumkin提供的数字是41万，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 （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p.103；但意大利政府提供的官方统计数字是159957名军人阵亡和149496名平民死难，总数为309453，参阅Istituto Centrale di Statistica，*Morti e Dispersi per Cause Belliche Negli Anni 1940-45* （Rome：Istituto Centrale di Statistica，1957），pp.3-11。

[8] 统计数字出入极大，取决于对德国边界、德国国籍、统计截止日期、苏联集中营死亡人数的界定等。Frumkin估计有420万德国人死亡（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 （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p.83）；Overmans认为有超过600万人死亡，其中445.6万名军人阵亡，参阅Overmans，Rüdiger，*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Oldenbourg：Wissenschaftsverlag，2000），pp.333-6。Milward同样认为有600万人死亡，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11。按照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Over-all Report*（*European War*）（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5），p.95，有30.5万德国平民死于盟军轰炸；但德国联邦统计局于1962年提供的更为广泛的数字为57万人，参阅*Wirtschaft und Statistik*，1962，p.139。

[9] Frumkin认为有16万人死亡，其中超过14万名妇女，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pp.89-91。然而，实际上妇女死亡人数还要更高：一份红十字会报告认为高达25万人；参阅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41。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妇女死亡人数为35万，参阅Hionidou，Violetta，*Famine and Death in Occupied Greece*，*1941-194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2，158。Maddison，Angus，*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2003），p.44，认为战前希腊人口为715.6万。

[10] Frumkin认为有43万人死于战争（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p.94）；Glanz估计为42万至45万人，Glanz，Susan，'Economic Platforms of the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Elections of 1945'，in Nándor Dreisziger（ed.），*Hungary in the Age of Total War*（*1938-1948*）（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169；Maddison认为战前匈牙利人口为922.7万（p.96）。

[11] 最为可靠的数字为102.7万人：参阅Tomasevich的讨论，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718-50，and Croatian State Commission for Establishing Crimes of Occupying Forces and their Assistants，*Crimes in the Jasenovac Camp*（Banja Luka：Becjead，2000），pp.19-26。Maddison，Angus，*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2003），p.96，认为战前南斯拉夫人口为1630.5万.

[12] 受教育人数估计百分比来自Misiunas，Romuald and Rein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London：Hurst & Co.，1993），p.356。

[13] Frumkin认为波兰死亡人数为58万，其中包括320万犹太人（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p.122），但1947年的波兰官方统计数字为602.8万人（其中，非官方的，包括290万名犹太人），参阅Biuro Odszkodowańjennych przy

Prezydium Rady Ministrów。另可参阅Davies，Norman，*God’s Playground*：*A History of Po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344 and Jan Szafrański，“Poland’s Losses in World War II”，in Nurowski，Roman（ed.），*1939-1945 War Losses in Poland* （Poznań and Warsaw：Wydawnictwo Zachodnie，1960），p.44。战前波兰人口为3480万，参阅注释5。

[14] 统计数字出入很大：参阅Krivosheev，G. F.（ed.），*Soviet Casualties and Combat Los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Greenhill，1997），p.83；以及Barber，John and Mark Harrison，*The Soviet Home Front*，*1941-1945*：*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in World War* Ⅱ （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1），p.206。Milward认为只有1700万人，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11。Overy，Richard，*Russia’s War* （London：Allen Lane，1997），p.288，认为有2500万人，并且注明赫鲁晓夫于1956年发布的数字是2000万人，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发布的数字是2500万人。

[15] Yekelchyk，Serhy，*Ukraine*：*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51.另可参阅Krawchenko，Bohdan，‘Soviet Ukraine under Nazi Occupation，1941-4’，in Yury Boshyk（ed.），*Ukraine during World War* Ⅱ （Edmonton：University of Alberta，1986），p.15，其认为有680万人。Kondufor认为有500万人，Kondufor，Yuri（ed.），*A Short History of the Ukraine* （Kiev：Naukova Dumka，1986），p.222。

[16]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64.

[17] 1938年9月，在英法德意四国签署《慕尼黑协定》后，捷克斯洛伐克被纳粹德国逐步肢解和吞并。1938年10月，纳粹德国占领苏台德区，斯洛伐克建立“自治政府”；1939年3月，斯洛伐克发表“独立宣言”，请求德国“保护”，纳粹德国随即占领斯洛伐克；与此同时，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成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1945年5月，苏联红军解放捷克与斯洛伐克全境，两地重新合并为捷克斯洛伐克；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重新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由于捷克与斯洛伐克曾经几度分合，而西方学者有时亦会以捷克指代捷克斯洛伐克。为忠实于原著，译者在处理涉及捷克与斯洛伐克的专有名词时，一律按照英语原文直译，请读者予以辨别。——译者注

[18] Edith Baneth，引自Smith，Lyn，*Forgotten Voices of the Holocaust* （London：Ebury Press，2005），p.318。

[19] Moorhouse，Roger，*Berlin at War*：*Life and Death in Hitler’s Capital 1939-45* （London：Bodley Head，2010），p.183.

[20] Victor Breitburg，引自Anon.，*The Day War Ended*：*Voices and Memories from 1945*（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5），p.200。

[21] 参阅Friedländer，Saul，*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939-1945*（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7），p.219，更低的战前人数；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p.74 and 86，更高的战前人数，更高的战后比例。另可参阅Skolnik，Fred and Michael Berenbaum（eds.），*Encyclopaedia Judaica*，22 vols.（Farmington Hills，MI：Thomson Gale，2007），vol.XX，p.531。

[22] Skolnik，Fred and Michael Berenbaum（eds.），*Encyclopaedia Judaica*，22 vols.（Farmington Hills，MI：Thomson Gale，2007），vol.XX，pp.670，674.

[23] Skolnik，Fred and Michael Berenbaum（eds.），*Encyclopaedia Judaica*，22 vols.（Farmington Hills，MI：Thomson Gale，2007），vol.XIV，p.294.

[24] Spector，Shmuel，*Holocaust of Volhynian Jews*，trans. Jerzy Michalowicz（Jerusalem：Yad Vashem，1990），pp.357-8.

[25] Gilbert，Martin，*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Holocaust*，4th ed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232.按照纽伦堡审判出示的证据为570万人，但后来的估计为593.39万人，参阅Dawidowicz，Lucy S.，*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1939-1945*（Harmondsworth：Pelican，1979），pp.479-80。

[26] Alicia Adams，引自Smith，Lyn，*Forgotten Voices of the Holocaust*（London：Ebury Press，2005），p.317。她提供的数字极为夸张：在战争爆发时1.7万名犹太人中，只有400名犹太人在苏联解放此地时仍然幸存。参阅Skolnik，Fred and Michael Berenbaum（eds.），*Encyclopaedia Judaica*，22 vols.（Farmington Hills，MI：Thomson Gale，2007），vol.VI，p.24。

[27] 引自Beevor，Antony and Luba Vinogradova，*A Writer at War*：*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1945*（London：Pimlico，2006），p.251。

[28] 引自Beevor，Antony and Luba Vinogradova，*A Writer at War*：*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1945*（London：Pimlico，2006），p.253。

[29] Celina Liberman testimony in Anon.，*The Day War Ended*：*Voices and Memories from 1945*（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5），p.184.

[30] Gilbert，Martin，*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Holocaust*，4th ed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229.Dawidowicz认为有300万幸存者，但包括86.8万名俄罗斯犹太幸存者，可参阅Dawidowicz，Lucy S.，*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1939-1945*（Harmondsworth：Pelican，1979），p.480。

[31] Gilbert，Martin，*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Holocaust*，4th ed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154；Dawidowicz，Lucy S.，*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1939-1945*（Harmondsworth：Pelican，1979），p.446.

[32] Steinberg，Jonathan，*All or Nothing*：*The Axis and the Holocaust*，1941-1943（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passim*.

[33] Gilbert，Martin，*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Holocaust*，4th ed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140；Dawidowicz，Lucy S.，*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1939-1945*（Harmondsworth：Pelican，1979），pp.464-5.

[34] Gilbert，Martin，*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Holocaust*，4th ed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230.

[35] Hondius，Dienke，*Return*：*Holocaust Survivors and Dutch Anti-Semitism*，trans. David Colmer（Westport，CT：Praeger，2003），p.97.

[36] 战争期间被杀害的塞尔维亚人数曾被严重夸大。这个可能是最为精确的数字；参阅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727-8。

[37] Zbigniew Ogrodzinski，personal interview，30 October 2007.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参阅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p.814-15。

[38] Major A.G.Moon，IWM Docs 06/126/1，typescript memoir，p.50.

[39] 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15.

[40] 据1945年12月的统计，只有10%的东欧人口属于少数民族：参阅Pearson，Raymond，*National Minorities in Eastern Europe 1848-945*（London：Macmillan，1983），p.229。

[41] Farmer，Sarah，*Martyred Village* （London and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assim* .

[42] 关于利迪策的统计，参阅Anon.，*Komu sluší omluva*：*Češi a sudetští němci*（*Dokumenti*，*fakta*，*svědectví*），p.70；以及Sayer，Derek，*The Coasts of Bohemia*：*A Czech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p.231 and 369，fn.45。

[43] Miloslava Kalibová interview in Charles Wheeler’s BBC documentary *A Shadow Over Europe*，2002.

[44] Miloslava Kalibová interview with Carmen T.Illichmann，“Lidice：Remembering the Women and Children”，*UW-L Journal of Undergraduate Research*，8（2005）.

[45] 法国作家，《小王子》作者。——译者注

[46] Saint-Exupéry，Antoine de，*Flight to Arras*，trans. Lewis Galantière（Harmondsworth：Penguin，1961），p.63.

[47] Major A.G.Moon，IWM Docs 06/126/1，typescript memoir.柏林的男女比例几乎是1比2：参阅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27。

[48] 参阅Barber，John and Mark Harrison，*The Soviet Home Front*，*1941-1945*：*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in World War* Ⅱ （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1），p.207；also Mark Harrison’s essay “The Soviet Union：The Defeated Victor”，in Harrison，Mark（ed.），*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Tw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286；and 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12。

[49] 参阅Macardle，Dorothy，*Children of Europe*：*A Study of the Children of Liberated Countries*，*their War-time Experiences*，*their Reactions*，*and their Needs*，*with a Note on Germany* （London：Victor Gollancz，1949），pp.107，202，231.另可参阅Brosse，Thérèse，*War-Handicapped Children* （Paris：UNESCO，1950），p.29。

[50] Byford-Jones，W.，*Berlin Twilight* （London：Hutchinson，1947），p.52.

[51] Byford-Jones，W.，*Berlin Twilight* （London：Hutchinson，1947），

p.55.

[52] Macardle，Dorothy，*Children of Europe*：*A Study of the Children of Liberated Countries*，*their War-time Experiences*，*their Reactions*，*and their Needs*，*with a Note on Germany*（London：Victor Gollancz，1949），p.80.这是一个保守的数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46年估计的数字为170万人。参阅Brosse，Thérèse，*War-Handicapped Children*（Paris：UNESCO，1950），p.30。

[53] TNA：PRO FO 938/310.

[54] Andrzej C.，personal interview，3 March 2008.

[55] Brosse，Thérèse，*War-Handicapped Children*（Paris：UNESCO，1950），p.29.

[56] Andrzej C.，personal interview，3 March 2008.

[57] 按照国际红十字会于1948年的估计，Brosse，Thérèse，*War-Handicapped Children*（Paris：UNESCO，1950），p.28。

[58] 关于各国的官方数字，参阅Macardle，Dorothy，*Children of Europe*：*A Study of the Children of Liberated Countries*，*their War-time Experiences*，*their Reactions*，*and their Needs*，*with a Note on Germany*（London：Victor Gollancz，1949），pp.58，80，107，156，200，206 and 287。

[59] 参阅，如Lucie Cluver and Frances Gardner，“The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Orphaned by Aids：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nd Southern African Research”，*Journal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19（1）（2007），pp.1-17。把艾滋病孤儿与其他原因（包括战争）导致的孤儿以及非孤儿作对照。

第三章 流徙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杀死最多欧洲人的战争，那么，它同样是造成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原因。1945年春天，德国境内有大批外籍劳工。战争结束时，德国还控制着将近800万名强迫劳工，他们来自欧洲各地，被掳掠到德国的农场和工厂里工作。仅仅在德国西部，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就照料和遣返了超过650万名难民。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苏联、波兰、法国，此外还有许多人来自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南斯拉夫、捷克。相当比例的难民是妇女和孩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其他战争有许多不同点，其中包括在传统的军事俘虏行动中俘获大量平民。妇女和孩子，与男人一样，被视为战利品。她们都被贬为奴隶，而从罗马帝国以来，蓄奴现象在欧洲已经绝迹多年。[1]

德国境内的数百万名德裔难民，让德国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据估计，及至1945年年初，德国境内大约有480万名国内难民，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德国南部和东部，他们都是为了躲避轰炸而逃出城市的；此外还有400万名德裔难民，他们来自第三帝国的东部征服地区，因为惧怕苏联红军追击而逃回国内。[2] 再加上将近27.5万名英美战俘，德国境内至少就有高达1700万名难民。[3] 这还是相当保守的估计数字，其他历史学家给出的估计数字还要高得多。[4] 有研究表明，战争期间的欧洲大陆，总共有超过4000万人被强迫迁徙。[5]

随着敌对状态结束，许多人开始踏上回家的漫漫旅途。1945年4月中旬，英国皇家工兵团的德里克·亨利（Derek Henry）在明登附近开始遇见这样的返乡队伍。

> 我们曾被告知，留意那些德军散兵的口袋，他们随时可能袭击我们，但幸运的是，在我们眼前走过了数千名德军散兵，以及各国难民，都只是径直向西面走去：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

希腊人、南斯拉夫人、波兰人，不管怎样，他们就在那儿。有些人三三两两，带着可怜兮兮的家当，东西都垒在脚踏车或者手推车上。有些人聚集成群，挤满客车或者货车。人流远远地看不到尽头。每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来纠缠我们，希望能搞点吃的。[6]

后来，美国情报军官索尔·帕多弗（Saul Padover）说道："数以千计，数以万计，最后数以百万计的被释放奴隶，走出农场、工厂、矿井，涌上高速公路。"[7] 面对这庞大的难民队伍，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这取决于见证者的观点和立场。对于与德国人接触不多的帕多弗来说，这也许是"历史上最悲惨的人类迁徙"，而且更加证明了德国人的罪恶。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出于可想而知的原因，肯定会为如此众多心怀不满的外国人来到此地而感到不安，这些外国人构成了威胁。一位德国妇女在战后写道："他们看上去就像野兽，人们会害怕他们。"[8] 对于那些应接不暇的军政府军官来说，其职责是确保他们受到控制，他们仅仅是"乌合之众"。[9] 他们塞满道路，但道路毁坏严重，根本无法容纳他们，为了不致饿死，他们只能沿路抢劫商店和农舍。在这个国家，行政系统已然崩溃，地方警察或死或囚，藏身之所无从寻觅，食物供应不再充足，他们成为当地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同时成为法治秩序的严重威胁。

但这只是旁观者对他们的观感。对于难民来说，自己只是尽力寻找安全感的普通人而已。那些幸运的人，会被英美法三国的士兵集中到一起，转送到西部的迁徙中心。但在多数情况下，盟军并没有足够的人手去照料他们，数十万人实际上只能自生自灭。安杰伊在战争结束时还是个9岁大的孩子，他回忆道："周围空无一人。"他和母亲以及妹妹曾经在波希米亚的农场里做强迫劳工。战争最后几周，他们被集中运送到苏台德区的城镇卡尔斯巴德（Carlsbad，今捷克共和国的卡罗维发利），驻守此地的德国守卫最终丢下他们逃之夭夭。"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真空地带。那里没有俄国人，没有美国人，没有英国人。那里绝对是真空地带。"[10] 母亲决定向西进发，进入美军占领区的地界，因为她认为这

总比落入苏联军队之手更为安全。他们在德国的土地上走了几个星期，由于美军逐步退回自己的法定占领区，他们竟然几次穿越美军占领区的边界。安杰伊还记得，这是忧心忡忡的日子，甚至比被德国人囚禁的日子更为压抑。

> 那段日子真的很饿，因为周围空无一物。我们乞讨，我们偷窃，我们无所不为。我们从土里挖土豆……我经常梦见食物。土豆泥搭配着香熏肉，那是美味中的美味。我想不出有什么比那更美妙的了。一大盘金光闪闪、热气腾腾的土豆泥啊！

安杰伊走在难民的洪流中，这道洪流由许多似乎互不相关的独立群体组成。他所属的群体大约有20人，绝大多数是波兰人。他们在路上遇见的当地人，似乎对他们的困境漠不关心。群体里一个男人为安杰伊找到一份牧马人的工作，但一个德国农民咆哮着让他“滚一边去！”还有好几次，他们想讨水喝，但处处碰壁，甚至被当地人放狗驱逐。当地人认为是波兰人发动了战争，造成了德国的种种不幸。考虑到难民遭遇的真正不幸，当地人的无端指责真是让人倍感讽刺。

在为了寻找安全地带而长途跋涉的这个月，安杰伊的所见所闻已经深入脑海。他还记得，当他路过森林中的一处德军野战医院时，看见许多被困此地的缺胳膊少腿的男人，有些人从头到脚都包着绷带，还有些人“浑身恶臭，活活腐烂”。没有人来照顾这些男人，因为所有医护人员都逃命去了。他还记得，当他到达一处波兰战俘营时，尽管营门大开，但营地里的犯人拒绝走出营地，因为他们没有接到离开营地的命令。“他们都是士兵，他们认为总会有人命令他们向何处进发。至于谁下令，至于去哪儿，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彻底没了主见。”他看见成群结队穿着睡衣的犯人，在德国平民的看管下在地里劳作。再后来，他走进一处山谷，看见数千名德军士兵围着篝火，安分守己地席地而坐，只有几个美军宪兵在看管他们。

当安杰伊一行最终通过巴伐利亚霍夫的美军检查站时，他们被带到

一栋飘着红旗的建筑物前面。他们一阵恐慌，因为母亲以为自己被送到了苏联营地，直到母亲认出那是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红底白字旗时，大家才惊魂甫定。他们终于到达安全地带了。

像安杰伊这样的难民，他们所要克服的危险和困难，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尽管在不满9岁的孩子看来，危险和困难都是懵懵懂懂的，但对于长辈来说，危险和困难却是显而易见的。德鲁姆（Druhm）夫妇都是柏林人，战争结束时，他们已经60多岁了。经历过苏联红军占领期间的混乱局面，他们决定冒险前往易北河对岸女儿的家中，这段路程有90英里。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他们的旅程一开始就遇上各种问题，到达柏林郊区后更是麻烦不断。

> 那里还有小规模战斗。我们还听到枪声，经常被迫停下脚步，直到枪声远去为止。在这种偏远地区，士兵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桥梁经常被毁，道路损毁严重，我们被迫走回头路，寻找其他可能的路径……我们遇到许多让人灰心丧气的意外状况，比如走了好几里路，发现此路不通，然后被迫折返。有一次，我们沿着一条废弃的主要公路向前走着。我们看见一块俄文书写的大告示板，我们继续向前走，但心里有点不踏实。突然，有人朝着我们大喊大叫。我们看不到任何人，枪声随即响起，子弹在我耳边呼啸而过，甚至擦破了我的衣领。我们意识到自己误入禁地，只好往回走，绕了好几里路，才到达我们要去的地方。

他们沿路所见的破败景象，依稀可见暴力的痕迹，既有战火的摧残，也有苏军的蹂躏。

> 在树林里，到处散落着沙发、软床、床垫、枕头，这些家具通常开膛破肚、羽毛遍地，甚至连树上都有。树林里还有婴儿车、蜜饯罐，甚至是摩托车、打字机、汽车、马车、肥皂盒，还有从商店里抢来的许多折叠刀和新鞋子……我们还看见死去的马匹，景象恶心、气味难闻……

最后，路上还有其他难民，对于这对年老的德国夫妇来说，这些难民跟苏军士兵一样是个威胁。

> 路上有许多不同国籍的人，与这对德国夫妇朝着相反的方向行进，绝大多数是正在回家的强迫劳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拖儿带女，他们只能偷取任何他们需要的东西，比如从当地农民那里偷来的马匹和马车，有时候马车后面还牵着奶牛，以及锅碗瓢盆。他们看上去就像野兽……[11]

至少，德鲁姆夫妇还能够敲开当地农民的家门，从同胞那儿请求帮助。这些所谓的“野兽”却无可选择，只能从当地居民那里偷东西。他们不受当地居民欢迎，而且无论如何，在被德军守卫残忍虐待多年以后，他们对德国人已经毫无信任可言。

22岁的波兰女孩玛丽尔卡·奥索夫斯卡（Marilka Ossowska）就是生动的例子。及至1945年4月，她先后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关押了两年之久，最终在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的死亡行军途中逃脱。在见识到苏联解放者的残酷无情后，她和其他狱友认为，向美军占领区前进会更为安全。她同样被路上人满为患的景象所震惊。

> 1945年的德国如同巨大的蚁穴。人人都在迁移。这正是德国东部的景象。那里有逃避俄国人追击的德国人。那里有战俘。那里还有我们，尽管我们人数不多……真的让人难以置信，无数人都在迁移。[12]

玛丽尔卡和两位波兰朋友跟三位法国劳工、两位英国战俘以及一位美国黑人士兵结伴而行。他们一起向穆尔德河进发，这条河流当时是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的防区边界。在路上，他们向德国农民乞讨，有时会恫吓这些德国农民，好让他们交出某些食物。说到吓人，那位黑人士兵大有用场：玛丽尔卡总是让他最后出场，美国黑人正好刺激德国人的种族偏见，他故意把自己脱个精光，把小刀叼在嘴里，跳着原始人的舞蹈。见到此种情形，那些家庭主妇无不吓得大惊失色，手忙脚乱地递上食物篮子，只想把他打发出去。然后，那位黑人士兵就会把衣服穿好，继续赶路。

走到萨克森城镇里萨，大约是从德累斯顿到莱比锡的半路上，玛丽尔卡和两位朋友捉弄了两个苏联士兵，从士兵手上搞来了代步工具。玛丽尔卡和朋友碰到两个呆头呆脑的士兵，正在看守从商店里缴获的数百辆自行车，士兵们很快就被女孩们吸引住了。女孩们说：“噢，你们肯定很寂寞吧！我们能来陪。而且，我们知道哪里能找到杜松子酒！”大喜过望的士兵们给了她们三辆自行车，好让她们去拿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杜松子酒，她们当然也就一去不返了。

经过六天骑行，大家终于到达美军占领下的莱比锡。在莱比锡，妇女们坐上卡车，前往汉诺威附近的诺德海姆营地。从诺德海姆出发，玛丽尔卡搭便车前往意大利，最终辗转到达英国，那时已是1946年年底了。此后15年，她再也没有回过波兰。

在1945年春天，上述几个小故事其实可以重复数十万次，这几个小故事只是欧洲大小道路上混乱景象的速写而已。蜂拥而来的难民，说着二十几种不同的语言，被迫适应这个在长达六年的战争期间历经轰炸、爆破、荒废的交通网络。他们聚集在城市里，但城市已被盟军的空袭彻底摧毁，容纳当地居民尚且不足，遑论收留汹涌而来的难民了。此后六个月里，各行其是的军政府和救济机构，竟然能够把大多数难民集中起来，使他们可得温饱、不致冻馁，帮他们打听离散亲人的下落，然后将他们遣送回国，简直是人间奇迹。

然而，遣返回国的迅速行动并不能抹去业已造成的伤害。战争造成的人口流徙，深深地影响了欧洲的社会心理。就个人层面而言，人口流徙不仅对于流徙者来说是悲剧，对于留守者同样是悲剧，那些留守在家乡的人，通常经年累月地探问，心爱之人在异国他乡有何遭遇。就群体层面而言，人口流徙同样是场灾难：强征青壮年劳动力，让社区失去了养家糊口的顶梁柱，让社区在饥荒来临时不堪一击。但越是战争时期，人口流徙对于社区的影响就越是显著。这种有条不紊地根除居民中部分

人口的做法，为战后更为广泛的人口流徙提供了示范。战争结束后，全欧洲范围内的族群驱逐行动之所以能够付诸实行，正是因为稳定社群世代定居的观念已经被永远摧毁了。欧洲居民不再安土重迁。欧洲人口此时不再稳定，而是富于流动性，如同候鸟迁徙。

---

[1] 按照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517，及至1944年年底，德国境内的外国劳工高达790.7万人。另可参阅IWM Docs 84/47/1，statistical tables kept by Miss B.F.N.Lewis；Spoerer，Mark，*Zwangsarbeit unter dem Hakenkreuz*（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2001），p.222；Proudfoot，Malcolm J.，*European Refugees 1939-52*（London：Faber & Faber，1957），p.159。

[2] 关于轰炸疏散人数，参阅TNA：PRO WO 219/3549。关于躲避苏联红军的德国难民人数，参阅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672。另可参阅Beevor，Antony，*Berlin*：*The Downfall 1945*（London：Penguin，2003），p.48。

[3] 关于各种相互矛盾的英美战俘人数，参阅Nichol，John and Tony Rennell，*The Last Escape*：*The Untold Story of Allied Prisoners of War in Germany 1944-45*（London：Viking，2002），pp.416-20。

[4] 关于德国境内所有难民总数，Tooze认为有2000万人，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672。关于总数中各个群体的数量，参阅Spoerer，Mark，*Zwangsarbeit unter dem Hakenkreuz*（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2001），p.212；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50；Proudfoot，Malcolm J.，*European Refugees 1939-52*（London：Faber & Faber，1957），pp.158-9；Marrus，Michael R.，*The Unwanted*：*European Refuge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299，326。

[5] Proudfoot，Malcolm J.，*European Refugees 1939-52*（London：Faber & Faber，1957），p.34.

[6] Derek L.Henry，IWM Docs 06/126/1，typescript memoir，p.93.

[7] Padover，Saul，*Psychologist in Germany*：*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Intelligence Officer*（London：Phoenix House，1946），p.273.

[8] Mrs E.Druhm，IWM Docs 02/28/1，manuscript memoir.

[9] Major A.G.Moon，IWM Docs 06/126/1，typescript memoir，p.58.

[10] Andrzej C.，personal interview，11 February 2008.

[11] Mrs E.Druhm，IWM Docs 02/28/1，manuscript memoir.

[12] Marilka Ossowska，personal interview，17 November 2007.

第四章 饥荒

战争期间，少数能让欧洲显得协调一致的现象，就包括在欧洲随处可见的饥荒。几乎在战争爆发之初，国际粮食贸易就受到冲击，随着欧洲大陆到处出现军事封锁，国际粮食贸易完全停顿。首先消失的食物是进口水果。在英国，普罗大众尝试以幽默化解困境。水果店橱窗开始出现告示栏，广而告之：“是的，本店没有香蕉。”1943年，电影《众生如我》（*Millions Like Us* ）在片头一幕略带讽刺地介绍橙子的定义，好让那些不记得橙子长什么样的人温故知新。在欧洲大陆，最能让人感觉到物资匮乏的无疑是咖啡的短缺，人们只能饮用咖啡的替代品，包括菊苣、橡果以及蒲公英球茎。

然后，更为严重的短缺迅速袭来。食糖首先出现短缺，时鲜食品如牛奶、奶油、鸡蛋、鲜肉也陆续出现短缺。英国首先实行定量配给，然后是欧洲大陆多数地区，最后连美国也要实行定量配给。中立国也未能幸免。例如，在西班牙，即使是基本食品，如土豆和橄榄油，也要严格实行配给；而进口食品的大幅减少，也让1944年的瑞士人均营养摄入量比战前下降了28%。[1] 此后五年，鸡蛋几乎都要做成蛋白粉，以利于保存，天然黄油被人造黄油取代，牛奶只能留给小孩子饮用，传统肉类如羊肉、猪肉、牛肉如此鲜见，以至于人们开始在后花园里饲养兔子，以兔肉作为替代品。对抗饥饿的斗争，确实与军事斗争同等重要，人们同样感觉如临大敌。

首先掉落饥饿悬崖的国家是希腊。1941年年末1942年年初的冬季，在轴心国入侵希腊六个月之后，就有超过10万名希腊人活活饿死。战争降临让这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再加上侵略者限制民众迁徙，最终导致食品分配系统崩溃。农民开始囤积食物，通货膨胀完全失控，失业人

口剧烈增长。法律和秩序近乎完全瓦解。许多历史学家指责德国占领军从食品商店征集食物，从而引发了饥荒，实际上这些食品商店经常遭到当地居民、游击队员、散兵游勇的洗劫。[2]

且不论饥荒的起因是什么，饥荒的结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在雅典和塞萨洛尼基，死亡率上升了3倍。在某些群岛，如米科诺斯群岛，死亡率更是上升了9倍。[3] 战争期间，希腊有41万人死亡，其中25万人很可能死于饥饿及其并发症。[4] 情况如此危急，以至于1942年秋天，英国史无前例地同意解除海上封锁，允许船只运送粮食前往希腊。英德两国达成协议，在战争余下岁月里，救济粮食可以流入希腊，即使在1944年年底，希腊解放后的混乱时期，救济行动也仍在继续。

如果说战争对希腊食物分配造成的冲击相当迅猛，那么在西欧，食物短缺造成的影响要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例如，在荷兰，直至1944年年末1945年年初的冬季，人们才感觉到最为严重的饥荒。与希腊不同，荷兰的“饥饿冬季”不是由政局混乱所致，而是由纳粹剥夺某些国家生存权的长远政策所造成的。几乎从1940年5月德国军队进驻时起，他们就开始征集各种物资：金属、衣物、织物、食物、牲畜以及自行车。许多工厂都被整体拆卸运往德国。一直以来，荷兰都靠进口粮食和饲养牲畜来维持生计，但从1940年起，粮食进口停止了，荷兰人只能靠德国人征集物资后剩余的少量粮食来维持生活。战争期间，土豆和面包严格定量配给，人们只能靠甜菜根茎甚至郁金香球茎来填饱肚子。[5]

及至1944年5月，情况已近乎绝望。发自荷兰国内的报告表明，除非荷兰迅速解放，否则灾难无可避免。再一次，英国解除了海上封锁，允许救济粮通过，但解除封锁的范围非常有限。丘吉尔担心正规渠道的食物援助可能只会落入德国人之手，英军总参谋部则担心德国海军会利用援助船只为指引，通过密布水雷的荷兰海岸。因此，荷兰民众只能等待解放，并且继续挨饿。[6]

及至1945年5月，当盟军进驻荷兰西部时，已有大约10万～15万名荷兰人因为饥饿而患上水肿病。[7] 荷兰之所以免于承受希腊那种程度的饥荒，仅仅是因为战争结束之后大量救济粮终于得以运进荷兰。但对数千人来说，救济粮已经来得太迟。进入阿姆斯特丹的记者们形容这座城市如同“巨大的集中营”，“其恐怖景象可比贝尔森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8] 仅仅在阿姆斯特丹，就有超过5000人死于饥饿及其并发症。整个国家的死亡人数为1.6万～2万人。[9]

纳粹并非蓄意饿死荷兰人。与对待其他民族的态度相比，纳粹其实对荷兰人颇有好感，荷兰人被视为“日耳曼”民族，必须引领他们“回归日耳曼大家庭”。[10] 问题是德国的粮食供应也是自身难保。甚至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德国领导层就已经相信国内粮食生产面临危机。[11] 及至1942年年初，粮食储备已告枯竭，因为缺乏饲料，国内生猪存栏量下降了25%，面包和肉类的配给定量也被削减。[12] 尽管1943年德国迎来丰收，但危机并未远去，配给定量短暂上升，随即再次下降。

要了解德国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德国人口的营养需求。成年人要维持身体健康，每天需要摄入的热量为大约2500卡，如果从事重体力劳动，摄入的热量还要更多。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要避免水肿病等营养不良疾病，上述摄入量还不能只靠进食碳水化合物来获得，必须同时进食新鲜蔬菜以获得维生素，此外还需要进食蛋白质和脂肪。战争爆发初期，德国平民每天平均摄入的热量为2570卡，这个摄入量还算健康。但在此后一年，这个指标下降到2445卡，1943年下降到2078卡，在战争结束时下降到1412卡。[13] 1945年2月，一位德国家庭主妇写道：“饥饿敲打着家家户户的大门，新配给卡从每隔四周发放变成每隔五周发放，人们甚至不知道是否还会发放。我们每天都在数土豆，每人还有五个小土豆，面包变得更为稀缺。我们越来越瘦、越来越冷、越来越饿。”[14]

为了让本国民众免于挨饿，纳粹大肆搜刮占领区。早在1941年，纳

粹就把挪威和捷克斯洛伐克“普通消费者”的正式配给量减少到每天1600卡的热量，而比利时和法国更是只有每天1300卡的热量。[15] 在上述国家，当地居民如果不想慢慢饿死，就只能在黑市里想办法。本质上，荷兰的处境与比利时和法国没有太大差异：主要差异在于荷兰的解放日期晚了整整九个月。饥荒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就连黑市都已经枯竭，而德国国防军的焦土政策更是让这个国家超过20%的耕地淹没在海水之下。及至战争结束，在被占领的荷兰，正式日常食物配给量已经下降到只有400卡的热量，这个配给量竟然只是贝尔森集中营犯人食物配给量的一半。在鹿特丹，食物已经完全耗尽。[16]

总体而言，战争期间，第三帝国对待东部占领区的态度，比对待西部占领区的态度要残酷得多。当一位生活在雅典的年轻美国人质问德军士兵希腊的粮食供应为何如此糟糕时，对方回答道：“噢，难道你不知道吗，在波兰，每天有600人饿死呢。”[17] 如果说在荷兰和希腊食物短缺仅仅是战争后遗症，那么在东欧，食物短缺就是德国的主要武器。纳粹并不打算养活欧洲的斯拉夫人。几乎从一开始，纳粹就打算故意饿死斯拉夫人。

入侵波兰和苏联的所有目的，就在于为德国殖民者让出生存空间，为供养第三帝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为供养德国，提供耕地和粮食。按照第三帝国为东部领土制订的原始计划，东方总计划（Generalplan Ost），超过80%的波兰人将被逐出家园，乌克兰人的驱逐比例是64%，白俄罗斯人的驱逐比例是75%。但及至1942年年底，纳粹统治集团某些成员迫切要求“从肉体上灭绝”所有当地人口，不仅针对犹太人，而且针对波兰人和乌克兰人。[18] 这次种族灭绝的规模让大屠杀也相形见绌，而其主要武器就是饥饿。

东欧的饥荒从波兰开始。早在1940年，波兰主要城市的食物配给量就被确定为600卡的热量，战争期间这个配给量有所提高，但仅仅是因

为纳粹需要波兰人充当劳工。[19] 随着战火向东蔓延，针对平民的饥荒更为严重。入侵苏联后，纳粹计划部门坚持军队必须征集当地所有粮食，以维持军队给养，由此彻底断绝对乌克兰城市的粮食供应。通过这种方式征集上来的多余粮食被全部运往德国本土，与此同时，应该任由基辅、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陷入饥荒。按照这项计划的构想，军事官员开始公开谈论如何通过饥荒饿死2000万～3000万人。[20] 当地居民别无选择，只能到黑市里寻找食物，有时要长途跋涉数百英里。[21] 总体而言，农村居民的处境比城镇居民要好些。例如，仅仅在哈尔科夫，就有大约7万～8万人被活活饿死。[22]

最后，纳粹饿死东部领土人口的计划停顿下来，最起码是缓慢下来，因为饿死如此众多年富力强的劳工在经济上毫无意义，何况第三帝国严重缺乏劳动力。而且无论如何，这个计划根本不可能实施下去。对乌克兰城市的粮食供应不应被简单切断，因为警察根本无法阻止城市居民逃往农村，而且警察也根本无法取缔黑市。在全欧洲范围内，黑市养活了数千万人口。然而，对于那些无法外出觅食的人来说，等待饿死就是无可避免的悲惨宿命。1941年冬天，德国军队成功饿死了130万～165万名苏联战俘。[23] 在犹太隔离区，甚至早在大规模杀戮开始之前，就有数万名犹太人被饿死。在列宁格勒900日围城期间，大约有64.1万名市民死于饥饿及其并发症。仅仅在列宁格勒这座城市，饿死的人数就几乎相当于希腊全国性饥荒期间饿死人数的2倍。[24]

人们可能会以为，一旦战争结束，欧洲粮食供应的困境就会有所缓解，但在许多地方，情况却变得更糟糕。在宣布停战后的几个月间，盟军只能绝望地、气馁地供养数百万欧洲饥饿人口。我曾经提及，战争结束时，德国的标准日常配给量只有1400卡以上，但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及至1945年9月，配给量下降到1224卡，及至1946年3月，配给量下降到1014卡。在德国的法军占领区，及至1945年年底，正式配给量下降到1000卡以下，这种状况持续了六个月之久。[25]

在欧洲其他地区，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有时甚至更糟糕。意大利南部解放一年后，尽管其已经收到1亿美元财政援助，但罗马家庭主妇还是会因为食品价格高昂而爆发骚乱，1944年12月甚至爆发了“饥饿行军”，以抗议食品短缺。[26] 战争结束后，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报告，因为食品短缺而引发的骚动还是遍及全国。[27] 在1945年大部分时间里，维也纳的正式配给量大约是800卡。在布达佩斯，1945年12月的配给量下降到每天556卡。[28] 在以前的东普鲁士，人们甚至要吞食倒在路边的死狗。[29] 在柏林，有人看见孩子们把公园里的青草挖来吃；在那不勒斯，水族馆里所有的热带鱼都被人偷走吃掉。[30] 由于普遍营养不良，欧洲大陆到处爆发相关疾病。欧洲南部陆续出现疟疾，而肺结核更是到处蔓延。在罗马尼亚，另一种与饥饿有关的疾病，糙皮病，发病率升高了250%。[31]

问题不仅仅在于普遍的食品短缺，也在于食品无法正常分配。长达六年的战争，让欧洲的交通设施破坏殆尽。在把粮食运往欧洲各大城市之前，必须首先重建铁路网络、修复大小道路、修补商用船舶。同样关键的是，必须恢复法律和秩序。在欧洲某些地区，救济粮刚刚运到就被抢掠一空，就连救援机构也无法将生死攸关的粮食运到最急需的地方。

欧洲解放后，许多英美部队来欧洲换防，他们都被眼前的情景吓得目瞪口呆。他们本来已经做好准备，肯定会见到满目疮痍的破败场景，也许还会见到某种程度的战后混乱，但他们都没想到物资匮乏到如此程度。

雷伊·亨廷（Ray Hunting）当时是英国陆军的通信军官，他于1944年秋抵达解放后的意大利。他在中东已经见惯了乞丐，但他从未见过这么多人聚集在他乘坐的列车周围。在一处公路铁路交会点，他再也受不了人们的哀号之声，他翻遍自己的口袋，将自己剩余的存粮向人群抛去。接下来出现的情景彻底将他吓倒。

> 不加选择地向饥饿的人群抛掷食物，这根本就是个错误。他们马上为列车上抛下来的东西扭打成一团。男人最为粗暴，他们彼此拳打脚踢，就是为了抢到罐头食品；妇女彼此抢夺食物，塞到孩子手中，而孩子们随时都会被粗暴的人们踩在脚下。

列车离开交会点时，人们仍然在为少数残羹冷炙扭打。亨廷从打开的车窗继续朝他们张望，直到旁边包厢的军官探出头来挡住他的视线。那名军官说道：“真是浪费，都给了这些蛆虫。难道你不知道，仅凭一两个罐头，你就能得到她们当中最漂亮的姑娘吗？”[32]

战后初期的欧洲，饥荒是最为棘手、最为急迫的问题之一。早在1943年，盟国政府就已心中有数，并且把食物分配作为第一要务。但即使是最有先见之明的政治家和管理者，都认为食物只不过是纯粹的物质需求。只有那些亲临前线的人，那些直接接触饥民的人，才会意识到，食物同样是精神需求。

凯瑟琳·休姆（Kathryn Hulme）是巴伐利亚其中一处难民营的代理主任，她对此深有体会。1945年年底，她非常悲哀地写下人们在维尔德夫莱肯争抢红十字会包裹的情景。

> 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些装着肉酱和沙丁鱼的闪亮罐头，几乎在营地里引起骚动。立顿茶包、瓦灵顿屋咖啡罐、维生素巧克力条，引起人们近乎疯狂的追逐。但事实就是如此。这是欧洲历经破坏的例证，一如法兰克福那荒凉的废墟。这是人心的废墟。目睹此情此景，更让我痛苦万分。[33]

下一个章节，就让我们来探寻这人心的废墟。

---

[1] 关于西班牙可参阅*New York Times* magazine，18 March 1945，p.51；关于瑞士可参阅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55。

[2] 参阅Hionidou，Violetta，*Famine and Death in Occupied Greece*，*1941-194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esp.ch.4。

[3] Hionidou，Violetta，*Famine and Death in Occupied Greece*，*1941-194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62.

[4] 按照国际红十字会数字，可参阅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41。数字范围介乎于10万与45万之间，参阅Hionidou，Violetta，*Famine and Death in Occupied Greece*，*1941-194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2，158。

[5] 关于德国的征收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荷兰经济困难，参阅van der Zee，Henri，*The Hunger Winter*：*Occupied Holland 1944-5*（London：Jill Norman and Hobhouse，1982），*passim*，以及Fuykschot，Cornelia，*Hunger in Holland*：*Life during the Nazi Occupation*（New York：Prometheus，1995），pp.124-50。

[6] 关于荷兰的报告，参阅TNA：PRO FO 371/39329，20 May 1944；以及AIR 8/823，"Interview between the Prime Minister and Dr Gerbrandy，Prime Minister of the Netherlands"，5 October 1944。关于开往荷兰的紧急补给船，以及开往比利时的补给船的对比，参阅WO 106/4419，and FO 371/49032。另可参阅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p.98-122。

[7] NARA RG 331 SHAEF G-5，entry 47，box 27，Military Government Branch，Main HQ，First Canadian Army，Weekly Report no.27，period 13-19 May 1945.

[8] *The Times*，7 May 1945.

[9] 更低的数字，参阅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122；更高的数字，参阅Hirschfeld，Gerhard，*Nazi Rule and Dutch Collaboration*：*The Netherlands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trans. Louise Willmot（Oxford，New York and Hamburg：Berg，1988），p.53。

[10] Himmler to Seyss-Inquart，7 January 1941，引自Hirschfeld，Gerhard，*Nazi Rule and Dutch Collaboration*：*The Netherlands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trans. Louise Willmot（Oxford，New York and Hamburg：Berg，1988），p.46。

[11] 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264.

[12] 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539.

[13] 关于营养摄取量，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21；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361。

[14] Letter of 4 February 1945，in Wolff-Mönckeberg，Mathilde，*On the Other Side*：*To My Children from Germany 1940-1945*（London：Peter Owen，1979），p.107.

[15] 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419.

[16] 关于荷兰解放后的配给标准，参阅TNA：PRO WO 32/16168，Montgomery message to Eisenhower。关于德国占领荷兰期间的配给标准，参阅Burger，G. C. E.，J. C. Drummond and H. R. Stanstead（eds.），*Malnutrition and Starvation in Western Netherlands September 1944-July 1945*（The Hague：General State Printing Office，1948），pp.20-24。关于鹿特丹，参阅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114。

[17] 引自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33.

[18] 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467.

[19] 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366.

[20] 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p.479-80.在入侵俄国之前的一次周末宴会中，希姆莱告诉同僚，"入侵俄国的目的在于杀掉3000万的斯拉夫人"；参阅Rees，Laurence，*Auschwitz*（London：BBC Books，2005），pp.53-4。

[21] 可参阅如the many stories in Geddes，Giorgio，*Nichivo*（London：Cassell，2001），*passim* .

[22] Krawchenko，Bohdan，'Soviet Ukraine under Nazi Occupation，1941-4'，in Yury Boshyk（ed.），*Ukraine during World War* Ⅱ（Edmonton：University of Alberta，1986），p.27.

[23] 更低的数字，参阅Spoerer，Mark，*Zwangsarbeit unter dem Hakenkreuz*（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2001），p.72；更高的数字，参阅

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482，他认为还有60万人被处决。另可参阅Herbert，Ulrich，*Hitler's Foreign Workers*：*Enforced Foreign Labor in Germany under the Third Reich*，trans. William Templ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141。

[24] Glantz，David，*Leningrad*：*City under Siege 1941-1944*（Rochester：Grange Books，2005），p.220.

[25] TNA，FO 1005/1631，Reports on conditions in Germany，1945-1946.

[26] *New York Times*，9 September 1944："MYM100，000，000 in Aid Sent to Italians"；*Daily Express*，6 September 1944："Finished with War，Rome Cries for Bread"；*New York Times*，8 December 1944："Housewives Riot on Prices in Rome".

[27] 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34.

[28] 参阅Macardle，Dorothy，*Children of Europe*：*A Study of the Children of Liberated Countries*，*their War-time Experiences*，*their Reactions*，*and their Needs*，*with a Note on Germany*（London：Victor Gollancz，1949），p.206。

[29] Ruth Irmgard testimony in Jacobs，Ingeborg，*Freiwild*：*Das Schicksal deutscher Frauen 1945*（Berlin：Propyläen，2008），p.72.

[30] Botting，Douglas，*In the Ruins of the Reich*（London：Methuen，2005），p.168；Lewis，Norman，*Naples '44*（London：Collins，1978），p.61.

[31] Macardle，Dorothy，*Children of Europe*：*A Study of the Children of Liberated Countries*，*their War-time Experiences*，*their Reactions*，*and their Needs*，*with a Note on Germany*（London：Victor Gollancz，1949），p.201.

[32] R.J.Hunting，IWM Docs 10519 P339，typescript memoir，pp.272-4.

[33] 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77。

第五章 堕落

1943年10月初，就在那不勒斯解放后不久，英军第91战地保障部队的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开车进入城市外围的一处广场。映入眼帘的是一栋高大雄伟但损毁严重的公共建筑，门前停靠着几辆军用卡车。其中一辆卡车似乎装满了美军补给品，盟军士兵簇拥着领取定量罐头。然后，这些士兵鱼贯涌入市政大楼，手里都拿着罐头。

刘易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和下属跟着士兵们进去，并且挤到人群的前排。他在日记里记下了所见所闻：

> 那里站着一排女子，每隔一码站一个人，背靠墙壁站着。这些女子衣着得体，从面容来看，都是些喜爱逛街购物和闲言碎语的工薪阶层妇女。每位女子身旁，都叠放着一小堆罐头，显而易见的是，只要再放上一个罐头，士兵就可以选定任何一位女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行苟且之事。那些女子一动不动、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如同蜡像。她们仿佛在卖鱼，只是这里没有鱼市场的喧嚣吵闹。无须拉客、无须暗示、无须挑逗，甚至无须有意无意地裸露肉体。最冲动的几名士兵已经跃跃欲试，手里攥着罐头，拼命挤到前面，但面对面地看着这些因为家里粒米不剩而到这里来的家庭妇女，看着她们那面不改色的麻木表情，士兵们似乎退缩了。再一次，现实击碎了梦想，气氛变得极为尴尬。有人在偷偷发笑，笑声渐渐平息，看得出有人想偷偷溜走。一名酒醉微醺的士兵，在同伴的反复怂恿下，终于在一位女子身旁放下罐头，士兵脱了衣服，压在女子身上，动了几下就草草收场。转眼间，士兵站了起来，穿好衣服。看得出来，他也想尽快了结此事。他也许觉得自己像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而不是享受男欢女爱。

毫无疑问，刘易斯觉得此情此景味同嚼蜡，五分钟后，他已经踏上归途。“我的同伴们把罐头扔给路上的行人，人们在我们身后激烈地争抢。在我的卡车上，没有一名士兵想到大楼里找乐子。”[1]

让这个故事显得耐人寻味的，不是意大利家庭主妇的绝望困境，而是刘易斯笔下那些士兵的反应。一方面，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

气：他们可以对这些妇女为所欲为，而门外就停着一辆装满补给品的卡车，这使得他们面对这些妇女时似乎拥有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这种现实处境又让他们绝大多数人感到良心不安。他们意识到，这种交易不仅侮辱了那些妇女的人格，而且侮辱了自己的人格，甚至辱没了正常的男欢女爱。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家庭主妇会对士兵的羞耻之心产生共鸣。她们已经沦为玩具，了无生气，如同“蜡像”一般。

按照诺曼·刘易斯的说法，在解放后的意大利南部，类似行为日趋普遍。他还记得，一位意大利贵族来拜访过他，询问能否允许自己的姐妹到军队妓院工作。刘易斯解释道，英国陆军不设立任何随军妓院，贵族及其姐妹只好悻悻而去。还有一次，刘易斯调查一桩严重的妨害风化案，该案涉及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女孩，女孩的父亲极力向刘易斯求情，因为女孩的父亲希望起码能让女儿有顿饱饭吃。[2]

这种绝望的情形，绝不局限于那不勒斯，甚至绝不局限于意大利。整整一代德国年轻妇女都学会了坦然接受与盟军士兵同床共枕，而代价仅仅是一根巧克力棒。在荷兰城镇海尔伦，美国步兵罗斯科·布伦特（Roscoe Blunt）遇到一位主动接近他的年轻女孩，她“开门见山地问我，想不想‘ficken’（fuck），或者想不想‘kuszen’（kiss）。我脑子一片空白，好一会儿才明白她问什么”。布伦特问女孩多大了，女孩说自己12岁。[3] 在匈牙利，有年仅13岁的女孩向医院承认自己得了性病。在希腊，性病记录显示，最年轻的患病女孩才10岁。[4]

这种道德堕落的状况深深触动了《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 ）的战地记者艾伦·穆尔黑德（Alan Moorehead），在他看来，这远比他目睹的物质破坏触目惊心得多。当他在那不勒斯刚刚解放时抵达此地，他绝望地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他看见男人、女人、孩子为了争抢士兵抛下的食糖而彼此殴打，他看见黑市商人贩卖假酒，他看见皮条客在兜售

年仅10岁的雏妓，他看见6岁的男孩兜售色情明信片，明信片上是姐妹们的裸体，甚至是他们自己的裸体。

> 在我看来，人类种种肮脏污秽的行为，都比不上我在那不勒斯头几个月里看到的一切。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是人类道德的彻底崩溃。人们不再有自尊或者尊严。动物的生存法则压倒一切。食物，就是唯一的追求。给孩子的食物，给自己的食物，不惜以卑躬屈膝、腐化堕落为代价换取的食物。除了食物之外，但求不冻馁，但求不露宿。[5]

穆尔黑德认为，食物不再仅仅是物质问题，而且是道德问题。在全欧洲，有数百万饥民随时准备为下一顿饭牺牲一切道德价值。在英国习以为常的事情，在欧洲其他地方就变成权力的体现，因此，一名英国士兵能够让一位德国妇女与其共寝、代其购物、为其缝衣，他说道："她就像我的奴隶。"[6]

当你读过上述故事，有两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欧洲的道德图景，与欧洲的物质图景一样，早已面目全非。那些习惯生活在废墟中的人们，不再觉得周围堆积如山的断壁残垣有何碍眼。同样，许多生活在战后欧洲的妇女，也不再觉得为了换取食物而出卖身体有何羞耻。只有那些来自欧洲大陆以外的人，才会对他们目睹的堕落景象感到惊讶。

其次，至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与生存权相比，性道德只能退居次席。即使是对生存权的潜在威胁，似乎也足以让人心安理得地抛弃美德，但在生存威胁历历在目、步步进逼的气氛中，所谓的美德似乎也无关紧要了。

抢掠与盗窃

不顾一切地搜寻食物，同样是战时和战后的常见现象，由此掀起了盗窃与抢掠的浪潮。1941年，许多希腊人抢掠当地商店，因为他们饥肠辘辘，因为他们预计即使他们自己不去盗取食物，这些粮食也会被占领军征用。[7] 在白俄罗斯，游击队员也向当地农民征收粮食以充军粮，而

那些不愿意交出粮食的农民则会遭到抢劫。[8] 战争结束前夕，尽管到处可见抢掠将判死刑的告示，但柏林的家庭主妇还是把商店搜掠一空。[9] 毕竟她们随时可能饿死，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

然而，战时和战后，盗窃和抢掠如此频发，不仅仅是由生存压力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战争提供了盗窃的机会，加大了盗窃的诱惑。进入一处被炸弹气浪冲开门窗的房产，当然比自己动手打破门窗容易得多。在交战地区，当房产主人离家远去时，人们就更容易说服自己，房产主人将永不复返。早在战争造成物资短缺前，这些空置房产就遭到抢掠。在华沙周边的农村，几乎从战争爆发之初，人们就在搜掠邻居的房子。例如，1939年9月，安杰伊举家逃难，当他们数周后返家时，却发现几乎连房子都被人拆卸完毕了，他的父母只好逐家逐户拜访邻居，讨回他们家的梁子、柱子以及各种家当。[10]

随着战火燃遍欧洲大陆，盗窃和抢掠也随之蔓延，甚至牵连到未被战火波及的国家。例如，在中立国瑞典，1939年突然出现犯罪浪潮，而且持续到战争结束为止。1939～1945年，在斯德哥尔摩，盗窃案几乎翻了4倍。[11] 这简直比法国还糟糕，毕竟战争期间法国的盗窃案才翻了3倍。[12] 与之类似，在瑞士某些地区，例如巴塞尔州，少年犯罪率同样倍增。[13] 为何战争期间中立国犯罪率也会上升，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社会学家。唯一令人信服的解释似乎是，遍及欧洲的战火引起人们严重的焦虑感：社会动荡如同传染病一般，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

在被占领的欧洲国家，盗窃如此普遍，以至于不再被视为犯罪。实际上，由于当地的宪兵、警察、民政当局都被通敌者接管，盗窃以及其他犯罪经常被称颂为抵抗行为。游击队员从农民家中盗窃财物，是为了替这些农民继续战斗。农民在黑市上出售粮食，是为了让粮食不落到占领者手中。当地商店受到抢掠，是为了防止德军士兵先下手为强。人们可以找到各种理由，为盗窃以及种种不法行为辩护，尤其是为过去的行

为开脱，因为这些理由似乎都站得住脚。实际上，人们的道德观念已经完全颠倒：过去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现在被称颂为道义责任。

随着节节胜利的盟军开始解放欧洲，盗窃和抢掠的机会随之增多。地方上许多宪兵和官员都已逃之夭夭。那些留守的宪兵和官员，几乎从盟军进驻之日起就被撤换，取而代之的是既缺乏经验又不了解当地情况的军政官员。结果到处一片混乱，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犯罪浪潮横扫欧洲，让战争期间的犯罪行为相形见绌，这种混乱简直是前所未有。过去的德国行省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如此无法无天，以至于进驻此地的波兰行政当局称其为"狂野西部"。兹比格涅夫·奥格罗辛斯基是首批前往斯德丁（后来的什切青）任职的波兰官员，他总是随身携带手枪，以防强盗拦路抢劫，而他也经常不得不拔枪应对。当地一位英国医务军官也说道："谋杀、强奸、抢劫，暴力事件如此常见，人们都习以为常了。"[14]

那不勒斯解放后，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补给港口，但也成为世界闻名的有组织盗窃中心。1945年，艾伦·穆尔黑德写道："军队供应的香烟和巧克力被成批偷走，并且以惊人的价格转手出售。一天晚上就有六七十辆军用车辆被偷走（不总是意大利人干的）。偷窃转售轮胎这样的贵重零件已经形成产业链了。"[15] 遍布那不勒斯的临时摊贩，公然出售腐败官员贪没的军用物资，黑手党、土匪强盗、散兵游勇，各路人马相互配合，共同对盟军的补给列车下手。[16] 儿童帮派会跳到军用卡车的货斗上，拿走一切他们能够拿走的东西，盟军士兵只能用刺刀划过他们的手，以此威慑他们，结果大批孩子因为手指受伤而请求医治。[17]

按照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战后柏林成了"世界犯罪之都"。战争结束后，柏林市内平均每个月都有2000人被逮捕，这个数字比战前增长了800%。及至1946年年初，柏林市内平均每天发生240起抢劫案，数十个有组织犯罪团伙日夜威胁着这座城市的社会治安。[18] 一位柏林妇女在

日记中写道："一切所有权观念都已不复存在。每个人都盗窃，每个人都被盗。"[19] 露丝·安德里亚斯-弗里德里希（Ruth Andreas-Friedrich）是另一位柏林妇女，她把柏林的生活称为"交换游戏"，人人都在交换物品，但人人都不知道物品原主是谁。[20] 类似感觉在欧洲无处不在，一位匈牙利妇女说道："有时候俄国人偷我们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只不过是因果循环……"[21] 私有财产观念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在这波犯罪浪潮中，生存压力无疑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其他事实同样不可忽视。首先，一旦盗窃禁忌被打破，再次盗窃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对于某些人来说，经过长达六年的战争，盗窃行为已经变成谋生手段：那些曾经依靠偷鸡摸狗或者投机倒把求得生存的人们，不会因为战争结束就金盆洗手，何况艰难时世还在不断恶化。

然而，更加让人深思的是，战后普遍存在的盗窃现象，其实满足了许多盗窃者的深层次需要。许多人偷盗成性，甚至会去偷窃那些毫无用处的东西。许多经历过难民生涯的人都提到，他们会去偷餐厅的桌布，或者"某些绝对笨拙的目标，例如大花瓶"。[22] 玛丽亚·别利茨卡（Maria Bielicka）是一位在监狱和劳动营里熬过四年的波兰妇女，她说她几乎是出于本能去偷东西。战争结束后，美国人在一处德国别墅里暂时收留她们两姐妹，此处离她们原来从事强迫劳动的瓷器工厂不远。

> 我当时就坐在妹妹身边，万达（Wanda）说道："你知道吗，我喜欢墙上那幅画。我想我会拿走它的。我受过那么多苦，我觉得拿一幅画不算什么。"我说道："那里还有些瓷器。我非常喜欢。我们在那间工厂当了那么多年制造瓷器的奴隶。我会拿些瓷器的。"[23]

翌日早晨，也许是出于羞愧，两姐妹都归还了她们拿走的东西。

黑市

战后最为常见的不法行为，莫过于在黑市上买卖货物。同样，在战

争期间，非法交易被人们视为抵抗行为：任何货物，尤其是食物，只要放到黑市上出售，就等于避免落入德国占领者手中。例如，在法国，每年有35万头牲畜未经官方登记而私下屠宰：这些私宰肉都流向法国民众的餐桌，而非落入占领者的肚肠。[24] 奶农也经常被迫到黑市谋生：在交通系统严重毁坏的欧洲大陆，根本就不能指望采购商每天上门收购牛奶，所以奶农只好通过非官方的本地网络，确保他们的产品卖得出去。在西欧各地，非官方网络几乎与官方市场同样发达。在东欧，纳粹敲骨吸髓地征集粮食，东欧黑市当然就与西欧黑市同样发达。在东欧，黑市更是生存所必需，甚至成为农民和商人的道义责任：如果没有黑市，还会有数十万波兰人、乌克兰人、波罗的海人活活饿死。

非法交易的问题在于其固有的不公平。定量配给为所有人提供标准食物配额，为重体力劳动者提供额外食品配额，但黑市只为买得起的人服务。法国解放前夕，黄油的黑市价是官价的5.5倍，鸡蛋的黑市价是官价的4倍。[25] 正因如此，鸡蛋和黄油很难在官方市场上买到，只有富裕阶层才买得起鸡蛋和黄油。某些农民和商人利用市场差价一夜暴富，而这种行为却被同胞所唾弃。在希腊，当局面好转粮食价格可能下降时，粮食商人却利用粮食价格上涨的谣言，囤积居奇，限量发售。一位外国评论员激愤地写道："当全世界都为希腊民众的命运感到揪心时，某些希腊人却靠吸吮同胞的血液来发财致富。"[26] 在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因为在战争期间损公肥私而丑闻缠身，某些政府官员因此被判处5～10年监禁。[27]

非法交易也许是无可避免的，在战时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但当敌对状态结束，非法交易却成为难以取缔的恶习。实际上，由于行政管理和交通系统的崩溃，以及法律和秩序的崩溃，非法交易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及至1946年秋，黑市交易如此普遍，以至于绝大多数民众并未将其视为犯罪。联合国善后救济署驻德国西部主管在致函英国外交部时写道："几乎毫不夸张地说，在西欧，所有男人、女人、小孩，都或多或

少地参与了这样或那样的非法交易。实际上，在欧洲的大片地区，若非借助黑市，许多人的生活几乎过不下去。”[28]

当所有人每天都在嘲笑法律时，根本就不可能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无疑会造成道德上的严重后果。即使在英国，人们也能察觉到，道德水平因为诸如此类的行为而有所下降。1945年在空中运输辅助部队服役的玛格丽特·戈尔（Margaret Gore）说道：“在英国，黑市损害了人们的诚信，而且我认为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越来越不讲究诚信了……这还仅仅是个开始而已。”[29]

暴力

如果说遍及欧洲的盗窃和黑市是个难题，那么，无所不在的暴力威胁就是个危机。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对于许多人来说，极端暴力事件已是家常便饭。战争结束时，德国民众已经对夜以继日的轰炸习以为常：在瓦砾堆里见到死尸也是见惯不怪。程度稍轻、景象相同的，还有英国、法国北部、荷兰、比利时、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奥地利、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再往东去，居民会看到自己的城市被大炮粉碎，就连人类也一同粉身碎骨。对于数百万士兵来说，这同样是家常便饭。

即使在交战地区之外，暴力也同样残酷，而且同样无休无止，尽管这种暴力主要是个人层面的暴力。在全欧洲数千个强迫劳动营和集中营中，犯人每天都会遭到野蛮殴打。在东欧各地，犹太人受到追捕和杀害。在意大利北部，枪毙通敌者往往会引发无休止的报复与再报复，有时这种报复浪潮会演变成家族仇杀。[30] 在第三帝国境内，散播谣言者将被逮捕和殴打，临阵脱逃者将被绞死，政见不合者与种族不纯者将被殴打、囚禁甚至杀害。战争结束时，上述暴行都只是例行公事。结果，在欧洲大陆，极端暴力行为不仅未能令人震惊，反而令人麻木。

不难想象，那些曾经遭受暴力对待的人，会更加倾向于实施暴力行为，对此无数心理学研究早已有所证明。1946年，曾任德国西部联合国善后救济署负责人的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Frederick Morgan）爵士说过，他很害怕直视那些从集中营释放出来的犹太领袖："这些犹太领袖都是些铤而走险、无所忌惮的人。实际上，所有可能发生在生还者身上的事情，他们都已经领教过了，所以他们根本不把人命当回事。"[31]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德国境内的奴工。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对难民进行的心理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难民通常表现出"无法无天的攻击性"，此外还有其他心理问题，包括"无用感……痛苦和敏感"。许多难民表现出极端愤世嫉俗的倾向："即使是热心人提供的帮助，也被他们视为别有用心、动机不纯。"[32]

如果受害者无处不在，那么，这也意味着施害者无处不在。战争结束时，在对德战争中日趋活跃的游击队，已经控制了希腊多数地区、南斯拉夫和斯洛伐克全境、意大利北部多数地区、波罗的海国家主要地区、波兰和乌克兰大片地区。在法国，抵抗组织独力解放了至少15个省份，甚至在盟军抵达巴黎之前，抵抗组织就已控制了法国西部和南部多数地区。[33] 在上述许多地区，尤其是在南斯拉夫、意大利、希腊，战争暴力并非针对德国人，而是针对本国的法西斯分子和通敌卖国者。那些实施战争暴力的人，此时已成为当权者。

至于那些代表纳粹及其盟友实施暴行的人，许多已沦为阶下囚，但也有许多混迹于难民之中，或者复归平民生活。这些人同样是成千上万，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与其受害者同样承受着心理创伤。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犯下暴行的士兵并非心理变态，他们只是作为普通社会成员开启战端。针对个人的心理学研究表明，战争爆发时，绝大多数士兵都经历过对被迫执行任务的强烈反感，而且许多士兵发现自己已无力继续履行职责。然而，随着执行任务的经历日渐丰富，这种强烈反感也会日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堕落的畅快感，甚至幸福感，他们的道德底

线由此被突破了。[34]

对于某些人来说，杀戮已成嗜好，他们实施暴行时也更加堕落。在克罗地亚，乌斯塔莎成员不仅杀害塞尔维亚人，而且还花费大量时间割掉女人的乳房和男人的睾丸。[35] 在希腊东北部的兹拉马，保加利亚士兵用希腊受害者的头颅来踢足球。[36] 在海乌姆诺集中营，德军守卫会杀害那些从毒气车里幸存下来的婴儿，在大树上撞破婴儿的头颅。[37] 在柯尼斯堡，苏联士兵把德国妇女的脚绑在两辆卡车上，然后卡车朝相反方向行驶，就这样把这些妇女撕成两半。[38] 乌克兰游击队只是使用农具，就能把沃利尼亚的波兰人折磨致死。[39] 波兰游击队同样反过来折磨乌克兰人。一名乌克兰游击队员说："我从未看过这样的情景，我的一名战友用刺刀挑起一个婴儿或者小孩，然后扔进火堆，我还看到许多波兰婴儿的烧焦的尸体。但即使我们不这样干，我们之前的所作所为都已是罪孽深重了。"[40] 这些人如今也是欧洲大家庭的一分子。

作为注脚，值得提及的是，希姆莱本人其实早已认识到，实施暴行将对其下属造成心理冲击。因此，希姆莱向党卫队各级指挥官发出指示，确保持续杀戮的心理压力不会让党卫队下属变得更加"残忍"。[41] 这道指示的道德观念完全是颠倒是非，希姆莱竟然把党卫队下属视为他们一手制造的暴行的"受害者"，希姆莱根本就不在乎那些被他们杀害的民众。

强奸

有一个议题与我们讨论过的许多议题密切相关，并且有助于揭示我们将要探讨的议题。战争期间的强奸现象，集中体现为对无力自卫的平民百姓滥用军事权力和暴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现象更是空前普遍：在这场战争中，尤其是战争最后阶段，强奸现象比历史上的任何战争都要频繁得多。尤其是在每次战斗结束时，强奸的首要动机在于报复，这种行为通常都能逃脱追究，因为交战各国军队对此习以为常。强

奸对人们身心健康的伤害可谓恐怖，在中欧和东欧，由于强奸最为普遍，伤害也最为严重。

强奸总是与战争形影不离：通常，战争越残酷，参战者就越可能强奸敌国妇女。[42]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最为严重的强奸案例，肯定发生在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而且有奇怪的证据表明，妇女也察觉到，激烈战斗过后，她们的处境更加危险。[43] 有些亲历者甚至认为，考虑到士兵们置身于残酷的战斗环境，强奸现象是在所难免的。一名俄国军官说："你还能怎样？这就是战争，人人都会变得残忍粗暴。"[44]

最为严重的强奸案例发生在东欧，发生在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那里是苏联士兵最早踏足的德国土地。但随着战火蔓延，强奸的范围并未局限在上述地区。实际上，战争期间，强奸现象到处激增，甚至在战火尚未波及的地方也是如此。例如，从1939年到1945年，在英国和北爱尔兰，包括强奸在内的性犯罪几乎增长了50%，引起当时世人的极大关注。[45]

人们很难解释，战争最后阶段及战后，发生在欧洲的强奸现象为何大幅增长，但在欧洲大陆，确实存在某些普遍趋势。比如，同样的问题，在东线远比在西线严重得多。即使平民男子偶尔从事性犯罪，但说到底这还是个军事问题：随着盟军从四面八方涌入德国，性暴力的浪潮以及其他犯罪的浪潮也席卷而来。当地局势越是混乱，强奸现象就越是严重，例如激战过后的地区，或者驻扎部队纪律败坏的地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被征服国家比被解放国家的强奸现象又要严重得多。这表明，在1945年发生的集体强奸背后，报复心与支配欲都是其重要动机，甚至很可能是主要动机。

有研究表明，在占领部队与当地居民存在巨大文化差异的地区，战时强奸现象会特别残忍、特别普遍，这一理论早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系列事件所证明。[46] 驻扎在巴伐利亚的法国殖民部队尤其臭名

昭著。克丽斯特贝尔·比伦贝格（Christabel Bielenberg）是住在黑森林附近一处村庄的英国妇女，她记载道：摩洛哥部队刚刚驻扎下来，就开始“到我们的村庄里到处找人强奸”。后来摩洛哥部队换防，来了撒哈拉部队，他们“于夜间抵达，包围了村庄里的每一栋房屋，强奸了所有12岁至80岁的女性”。[47] 在图宾根，下至12岁的女孩，上至70岁的老妪，都惨遭摩洛哥部队强奸。[48] 这些男人的外国面孔更让妇女感到恐慌，何况这还是在纳粹长年从事种族宣传的德国境内。[49]

文化差异在东线同样存在。许多德军士兵都歧视东方的“劣等种族”（Untermenschen），德军入侵苏联时，这种歧视肯定会令他们以邪恶手法对待落入他们手中的乌克兰妇女和俄罗斯妇女。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曾经采访过一位被德国军官强奸的女教师。女教师回忆道，如果当时她不肯就范，那名德国军官就要枪杀她六个月大的婴儿。[50] 另一位俄罗斯女教师名叫吉尼亚·德米阿诺娃（Genia Demianova），她曾经被十几名德军士兵轮奸，其中一名士兵还用马鞭抽打她，她写道：“他们已经把我撕成碎片，我只不过是一具尸体而已。”[51]

但当形势逆转，苏联红军向中欧和东南欧挺进时，红军官兵同样受到种族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影响。例如，与其他邻国相比，保加利亚妇女几乎没有受到强奸威胁，这部分是由于进驻保加利亚的部队比其他部队要纪律严明得多，但同样也是由于保加利亚与俄罗斯文化相似、语言相通，而且这两个国家上百年来始终保持着友好关系。[52] 当苏联红军抵达保加利亚时，他们受到大多数保加利亚人的衷心欢迎。与此相反，罗马尼亚与苏联语言不通、文化迥异，而且直至1944年，罗马尼亚还对苏联进行着非常野蛮的战争。正因如此，罗马尼亚妇女比保加利亚妇女承受了更多痛苦。

在匈牙利和奥地利，妇女的处境还要悲惨得多，在某些地区简直可

以说是恐怖。在这里，双方的文化差异同样不可忽视，但与罗马尼亚不同，苏联对匈牙利和奥地利的敌意，是由于当苏联红军抵达时这两个国家还在对苏联作战。在布达佩斯西面的恰克堡，许多妇女遭到了极为严重的暴力强奸，以至于她们在男人的暴力对待之下脊椎骨折。波尔茨·阿莱娜（Alaine Polcz）那年刚好20岁，是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她也承受过这种痛苦的损伤，幸好她后来痊愈了。好几个星期里，她反复遭到强奸，有好几次，甚至连一个晚上有多少男人糟蹋过她，她都数不清楚了。她后来写道："这与亲热或性爱无关。这与任何事物无关。我现在才意识到，这只能用一个字眼来形容：侵犯。这就是侵犯。这种事情当时正在全国各地发生。"这让她备受折磨。[53]

但在德国，强奸案例最为普遍。在东普鲁士、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数万名妇女被以中世纪的暴力方式先奸后杀。玛丽·瑙曼（Marie Naumann）是来自波美拉尼亚比尔瓦尔德的年轻母亲，她被强奸后，兵痞们把她与丈夫一起吊在干草仓里，而她的孩子就被绞死在她脚下。她被几名波兰平民救下来时还没咽气，波兰人问她这是谁干的，她说是俄国人干的，波兰人却说她撒谎，而且还殴打她。她无法承受这一切，想要自沉在附近的溪流里，但未能死去。她浑身湿透，向邻居的寓所走去，结果碰见另一名俄国军官，于是再次遭到强奸。军官刚扔下她，又冒出了四名苏联士兵并"用变态的方法"强奸了她。完事之后，他们把她踢晕。她醒过来时，又有两名士兵闯进房间，"但他们把我扔下了，因为我看上去活像一具死尸"。[54]

数以千计的类似案例，收录于德国口述史计划、教会档案以及德国政府文献。苏联文献也印证了上述说法。俄国军官列夫·科佩列夫（Lev Kopelev）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回忆录都描述了普遍出现的强奸景象，此外还有几份来自苏联的报告，这些报告于1945年由苏联秘密警察机关即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交。[55]

随着苏联红军穿越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向柏林进发，强奸现象继续蔓延。在无数案例中，妇女惨遭轮奸，经常是连续好多个晚上被反复轮奸。瓦西里·格罗斯曼曾经采访过一位什未林妇女，她告诉格罗斯曼“今天已经被10个男人强奸过了”。[56] 在柏林，汉内洛蕾·蒂勒（Hannelore Thiele）被“7个野兽般的男人列队”强奸。[57] 另一位柏林妇女被人从地下室的煤堆后面拽出来，她后来说道：“23名士兵一个接着一个，我只能去医院缝合伤口。我再也不想跟任何男人发生任何关系了。”[58] 卡尔·奥古斯特·克诺尔（Karl August Knorr）是驻扎在东普鲁士的德国军官，他从一栋别墅里拯救出数十名妇女，“每人每天平均要被强奸60到70次”。[59] 类似事件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

1945年的强奸统计数字确实令人震惊，与战争期间的其他暴力事件相似，强奸案例多得惊人。收藏在科布伦茨的东欧档案收录了许多案例，其单调乏味的程度一如纽伦堡审判期间对犹太大屠杀的描述，连篇累牍地重复对恐怖事件的描述，让人不忍卒读。在中欧某些地区，强奸不仅仅是个别事件的集合，而且是全体女性居民的集体经历。在维也纳，诊所和医院报告的被强奸妇女多达8.7万人。[60] 在柏林，情况还要糟糕，据信约有11万名妇女成为受害者。[61] 在德国东部，尤其是在靠近苏联兵营的地区，这种时刻存在的威胁持续到1948年年底。[62] 在整个德国，据信将近200万名德国妇女在战后被强奸。[63]

匈牙利的统计数字更难收集。战争结束后，德国和奥地利异常细致地统计了被强奸妇女的人数，但在匈牙利，强奸现象始终不被战后建立的共产党当局所承认。直至1989年，常规研究才得以开展，而那时许多信息都已湮没无闻。根据医院记录所做的粗略统计，大约有5万～20万名匈牙利妇女被苏联士兵强奸。[64] 西欧的统计数字尽管低得多，但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例如，1942～1945年，美国军队被指控在北非和西欧强奸了1.7万名平民妇女。[65]

战争结束后，性暴力和性奴役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德国，尽管每年都有200万宗非法堕胎个案，但德国妇女还是生下了15万～20万名“外国婴儿”，部分是强奸的结果。在这些孩子当中，许多人都在怨恨母亲的痛苦情绪中度过余生。[66] 许多妇女被感染性病，某些地区染病的妇女多达60%。这些疾病通常是无法治愈的，因为在1945年8月的德国，注射一次抗生素的价钱可以买两磅货真价实的咖啡。[67] 伴随生理问题而来的是情感问题和心理问题，不仅那些受到直接伤害的妇女，就连其他的妇女也会受到影响。当众多妇女沦为铁蹄下的玩物时，所有妇女都不会安全，这个男权支配的世界只是把妇女当成物品而已。在欧洲大片地区，妇女被迫长期生活在焦虑状态中。[68]

我们切不可忘记，男性同样受到这种普遍现象的影响。许多男人被迫目睹他们的妻子、母亲、姐妹、女儿被强奸。那些试图阻止的男人经常会被枪杀，但通常德国男人只是呆坐一旁，自此之后终身阳痿。因此，尤其是在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集体强奸不仅使妇女备受虐待和侮辱，而且这也如同对男人进行集体阉割。即使是那些在解放时离开家园的男人，回家之后也会发现他们的妻子和爱人因历经变故而判若两人。许多无法承受这种变故的男人离弃妻子，由此更加深了妇女承受的痛苦。由于害怕丈夫的反应，许多妇女对自己的经历守口如瓶，许多妇女不敢说自己感染过性病、拿掉过胎儿，或者生下过“俄罗斯婴儿”。[69] 由于婚姻关系备受压力，战后德国的离婚率比战前翻了一番。其实，整个欧洲都是如此。[70]

最后，我们必须记得，强奸和奴役妇女的士兵其实是受到纵容的，尤其是大多数士兵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结果战后几年强奸事件频频发生，这也驳斥了许多人声称强奸动机仅仅在于报复的说法。实际上，我们面对的事实要严峻得多，许多士兵强奸妇女仅仅是因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71]

士兵们当时的言论暴露出他们的想法，即他们有权享受性爱，而且必要时不惜动粗：“我们解放了你们，而你们竟然拒绝我们的小小要求？”“我需要一个女人！我都快爆血管了！”“美国兵和英国兵有香烟和糖果去吸引姑娘，所以他们不需要强奸。俄国兵就没办法了。”[72] 在士兵对妇女拥有无限权力的环境中，在几乎不会受到惩罚的环境中，在所有同僚都沉溺于性暴力的环境中，强奸简直是家常便饭。例如，瓦西里·格罗斯曼有一名战地记者同事，强奸了一位因为躲避外面的醉酒士兵而躲进其房间的俄罗斯女孩，这不是因为他生性邪恶，而是因为他无法“抵挡诱惑”。[73]

今天被美国人称为“伟大世代”的那一代人，并非个个都是人们描述的无私英雄：他们当中也有小偷、强盗甚至恶贯满盈的家伙。数十万盟军士兵，尤其是苏联红军的士兵，同时也是强奸犯。正如列夫·科佩列夫当时所说的：

> 不必为此感到羞愧，那些士兵排队在德国妇女身上找点乐子又怎样？他们强奸小女孩又怎样？他们杀死老妇人又怎样？若非如此，他们终究会祸害我们自己的城市，祸害我们自己的妇女和女孩。那将是数百万名潜在的罪犯，那将会倍加危险，因为他们是带着英雄的荣誉回到家乡的。[74]

从军队退役后，这些男人有些会融入欧洲社会，有些会回到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如果有人想研究这些男人回国之后对待妇女的态度及其影响，这必将是一个有趣的课题。

道德与儿童

考虑到战后欧洲的气氛，也就难怪人们广泛关注当时欧洲孩子的成长环境了。我们都听说过孩子跳过炮弹坑、穿越地雷阵去采摘野果的故事，甚至听说过他们把路边捡来的铁拳火箭弹放在火上烤的故事，他们的人身安全持续受到威胁，但其实他们的道德观念也同样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在游戏中承受的心理伤害同样显而易见。当母亲看见孩子

玩“空袭”游戏或者“女人来”（Frau komm，俄国士兵强奸德国女人时使用的字句）游戏时，母亲肯定无比失望。[75] 在柏林，威廉·拜福德-琼斯中校震惊地看到，在一栋建筑物的三面墙壁上，挂了同一个男人的十五幅画像。根据一位救世军（Salvation Army）孤儿院社工的回忆，他所照顾的德国孩子总是给玩具人偶套上制服，而绝大多数其他孤儿，只要见到穿制服的男人走近，就会惊声尖叫。[76]

我曾经提到，孩子很少看见不穿制服的男人，实际上，在欧洲大陆某些地区甚至连男人都很少见。男性模范的缺失以及成人权威的减少，对孩子的行为造成了显著影响。在英国，战争期间的少年犯罪率急升将近40%，尤其是破门入室、恶意破坏以及小偷小摸（盗窃犯罪增长超过一倍）。[77] 在德国，情况也类似，根据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统计的数据，1937～1942年，少年犯罪率增长超过一倍，而1943年的犯罪率还在上升。在某些城市，如汉堡，战争期间的少年犯罪率增长了三倍。[78] 及至1945年年中，在苏联占领区，许多“少年帮派”四处抢掠，有时为了食物和金钱不惜谋财害命：孩子缺乏父母管教，有些孩子甚至没有父母，让他们变成“小野蛮人”。[79]

德国孩子受到最多的关注。有人认为，由于这些孩子的德国血统，德国孩子肯定最受威胁。在挪威，人们要求把所有父亲是德军士兵的孩子驱逐出境，因为他们将来可能成为纳粹的第五纵队。纳粹的优生学原则，曾经让纳粹自命为高等种族，现在则被用来识别德国孩子，他们被认为迟早是个祸害。[80]

在德国境内，盟军更担心的是十来岁的年轻人，而不是小孩子。1945年的德国年轻人是在纳粹意识形态下成长起来的，无论是12年的学校教育，还是强制加入的纳粹青年团体，如德国少女同盟和希特勒青年团，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反映。许多人担心这一代孩子已经无可挽救。1944～1945年参战的英国士兵，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德国人越是年

轻，就越是骄傲自大、‘目空一切’。”克里斯普（Crisp）少将曾经在《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上发表过一篇观点奇特的文章，指出之前他遇到的普通德军士兵，已经被十五六岁的狂热军队所取代，他们能力有限但残忍野蛮。

> 在他们身上，你看不到正派、温和、谦逊，却只看到兽性、贪婪、残忍。这一代人被刻意培养成残酷无情的男子汉，以执行一名疯子下达的可怕命令。没有什么正派思想能够触动他们。1920年以来出生的每一名德国人，都受到这种罪恶的诅咒。他们越是年轻，就越会受到这种邪恶流毒的深度沾染。每个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出生的孩子都是迷途的孩子。这是迷途的一代。

这篇报刊文章继续说道，这些孩子死于战火实乃幸事，为了全世界的福祉，剩下的孩子最好也能战死沙场。“但无论你把他们消灭，还是把他们绝育，除非最后一个纳粹分子死掉，否则根本不可能从地球上彻底消灭恐怖的纳粹主义。”[81]

纳粹统治的恐怖阴影，最终在盟军的思想和著作中得到反映。在这家英国主流报纸上，登载的这份被视为道德（moral）解决方案的灭绝计划，跟希特勒在欧洲大陆推行的灭绝计划如出一辙。这种灭绝计划，与戈培尔在《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上发表的最为丧心病狂的德语文章毫无二致。其中的差别，而且是巨大的差别，在于存有这种思想观念的人不可能在英国掌握政权，因此，这种计划也永远不可能被付诸实行。但这种思想能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国家媒体上，说明即使是战争期间未被占领的国家，也出现了道德败坏的迹象。

---

[1] Lewis，Norman，*Naples '44*（London：Collins，1978），pp.25-6.

[2] Lewis，Norman，*Naples '44*（London：Collins，1978），pp.42-3，56-7.

[3] Blunt，Roscoe C.，*Foot Soldier*：*A Combat Infantryman's War in Europe*（Cambridge，MA：Da Capo Press，2002），p.56.

[4] Macardle，Dorothy，*Children of Europe*：*A Study of the Children of Liberated Countries*，*their War-time Experiences*，*their Reactions*，*and their Needs*，*with a Note on Germany*（London：Victor Gollancz，1949），pp.94，206.

[5] Moorehead，Alan，*Eclipse*（London：Granta，2000），p.66.

[6] 引自Byford-Jones，W.，*Berlin Twilight*（London：Hutchinson，1947），p.38。

[7] Hionidou，Violetta，*Famine and Death in Occupied Greece*，*1941-194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ch.4.

[8] 如可参阅Tec，Nechama，*Defiance*：*The True Story of the Bielski Partisa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91。

[9] Anon.，*A Woman in Berlin*（London：Virago，2006），pp.57-60.

[10] Andrzej C.，personal interview，11 February 2008.

[11] Risto Jaakkola and Henrik Tham，“Traditional Crime in Scandinav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in Takala，Hannu and Henrik Tham，*Crime and Control in Scandinav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Oslo：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1989），pp.38-51.

[12] Fishman，Sarah，*The Battle for Children*：*World War* Ⅱ，*Youth Crime*，*and Juvenile Justice in Twentieth Century Fran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85.

[13] Brosse，Thérèse，*War-Handicapped Children*（Paris：UNESCO，1950），p.80.

[14] Zbigniew Ogrodzinski，personal interview，30 October 2007；Captain I.B.Mackay，IWM Docs 94/8/1，typescript memoir，p.130.

[15] Moorehead，Alan，*Eclipse*（London：Granta，2000），p.66.

[16] Porch，Douglas，*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4），p.518.

[17] Lewis，Norman，*Naples ’44*（London：Collins，1978），p.100.

[18] Botting，Douglas，*In the Ruins of the Reich*（London：Methuen，

2005），p.183.另可参阅TNA：PRO FO 1050/292，letter from anti-Fascist parties of Germany on increase in brigandage，31 January 1946；and FO 1050/323 for Berlin statistics in 1945。

[19] Anon.，*A Woman in Berlin*（London：Virago，2006），p.209.

[20] Andreas-Friedrich，Ruth，*Battleground Berlin*：*Diaries 1945-1948*，trans. Anna Boerresen（New York：Paragon House，1990），p.20，entry for 9 May 1945.

[21] Polcz，Alaine，*One Woman in the War*（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2），p.92.

[22] Alik Ossowski，personal interview，17 November 2007；Maria Bielicka，personal interview，28 January 2008.

[23] Maria Bielicka，personal interview，28 January 2008.

[24] 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82.

[25] 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83.

[26] 引自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60-61。

[27] The Great Decree，no.16/1945，para.10：参阅Frommer，Benjamin，*National Cleansing*：*Retribution against Nazi Collaborators in Postwar Czechoslovak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353。

[28] Lt Gen.Sir Frederick Morgan to the Foreign Office's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14 September 1946，IWM Docs 02/49/1.

[29] Margaret Gore interview，IWM Sound，9285，reel 4.

[30] Pavone，Claudio，*Una guerra civile*：*Saggio storico sulla moralità nella Resistenza*（Turin：Universali Bollati Boringhieri，2006），pp.475-91.

[31] Lt Gen.Sir Frederick Morgan to the Foreign Office's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14 September 1946，IWM Docs 02/49/1.

[32] 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

Europe 1944-1945 （London：Faber & Faber，2009），p.252。

[33] 根据the *New York Times*， 23 August 1944.

[34] Dutton，Donald G.，*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Massacres*，*and Extreme Violence*：*Why 'Normal' People Come to Commit Atrocities* （London and Westport，CT：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2007），pp.114-22.

[35] 损毁状况的照片证据存在于Italian Foreign Ministry Archive，Archivo Storico Diplomatico Jugoslavia（Croazia）AAPP B.138（1943），参阅Steinberg，Jonathan，*All or Nothing*：*The Axis and the Holocaust*， 1941-1943（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pp.30，271。

[36] 参阅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 （London：Faber & Faber，2009），p.229。

[37] According to the Jewish eyewitness Yakov Groyanowski，引自Friedländer，Saul，*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939-1945*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7），p.318。

[38] De Zayas，Alfred，*Nemesis at Potsdam*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7），*Terrible Revenge*， p.45.

[39] 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72.

[40] Lotnik，Waldemar，*Nine Lives* （London：Serif，1999），p.59.

[41] 参阅Konrad Kwiet，"Erziehung zum Mord：Zwei Beispiele zur Kontinuität der deutschen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in Grüttner，Michael，Rüdiger Hachtmann and Heinz-Gerhard Haupt（eds.），*Geschichte und Emanzipation* （Frankfurt：Campus Fachbuch，1999），p.449。

[42] Bourke，Joanna，*Rape*：*A History from 1860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Virago，2007），p.359.

[43] Polcz，Alaine，*One Woman in the War* （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2），p.104.

[44] Kopelev，Lev，*No Jail for Thought*， trans. and ed. Anthony Austin（London：Secker & Warburg，1977），p.57.

[45]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Statistical Digest of the War* （London：HMSO，1951），pp.48-50.另可参阅“Combating Crime”，*The Times*，23 July 1946，p.5；以及“A Problem Picture”，*The Times*，3 June 1948，p.5。

[46] Bourke，Joanna，*Rape*：*A History from 1860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Virago，2007），p.378.

[47] 引自Botting，Douglas，*In the Ruins of the Reich* （London：Methuen，2005），pp.35-6。

[48] Werner，Hermann，*Tübingen 1945* （Stuttgart：Konrad Theiss Verlag，1986），p.88.

[49] 参阅Bosch，Manfred，*Der Neubeginn*：*Aus deutscher Nachkriegszeit Südbaden 1945-1950* （Konstanz：Südkurier，1988），pp.34，52；以及Willis，F. Roy，*The French in Germany 1945-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69-70：法国殖民部队的强奸行径被人们夸大了。

[50] Beevor，Antony and Luba Vinogradova，*A Writer at War*：*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1945* （London：Pimlico，2006），p.209.

[51] Genia Demianova，引自Owen，James and Guy Walters（eds.），*The Voice of War* （London：Viking，2004），p.134。

[52] 参阅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70。

[53] Polcz，Alaine，*One Woman in the War* （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2），pp.89，90，105.

[54] 引自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p.54-65。

[55] 参阅Alexander Solzhenitsyn，*Prussian Nights*：*A Narrative Poem*，trans.Robert Conquest（London：Fontana，1978），pp.41，51-3，93-103；以及Kopelev，Lev，*No Jail for Thought*，trans. and ed. Anthony Austin（London：Secker & Warburg，1977），pp.50-56。另可参阅Beevor，Antony，*Berlin*：*The Downfall 1945* （London：Penguin，2003），p.29。

[56] Beevor，Antony and Luba Vinogradova，*A Writer at War*：*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1945* （London：Pimlico，2006），p.327.

[57] 引自Andreas-Friedrich，Ruth，*Battleground Berlin*：*Diaries 1945-1948*，trans. Anna Boerresen（New York：Paragon House，1990），p.16，entry for 6 May 1945。

[58] Kardorff，Ursula von，*Diary of a Nightmare*：*Berlin 1942-1945*，trans. Ewan Butler（London：Rupert Hart-Davis，1965），p.217.

[59] Ost-Dok 2/14，p.106，引自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45。

[60]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20.

[61] Johr，Barbara，'Die Ereignisse in Zahlen'，in Helke Sander and Barbara Johr（eds.），*Befreier und Befreite*：*Krieg*，*Vergewaltigung*，*Kinder*（Frankfurt-am-Main：Fischer Taschenbuch，2006），p.54.根据Botting，Douglas，*In the Ruins of the Reich*（London：Methuen，2005），p.92，在柏林，有9万名妇女在遭到强奸后求诊。另可参阅Laurel Cohen-Pfister，"Rape，War and Outrage：Changing Perceptions on German Victimhood in the Period of Post-unification"，in Cohen-Pfister，Laurel and Dagmar Wienroeder-Skinner（eds.），*Victims and Perpetrators*：（*Re*）*Presenting the Past in Post-Unification Culture*（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6），p.316。

[62] 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79，94-5.

[63] Johr，Barbara，'Die Ereignisse in Zahlen'，in Helke Sander and Barbara Johr（eds.），*Befreier und Befreite*：*Krieg*，*Vergewaltigung*，*Kinder*（Frankfurt-am-Main：Fischer Taschenbuch，2006），p.59.

[64] Kenez，Peters，*Hungary from the Nazis to the Soviet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Hungary*，*1944-194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44.

[65] Lilley，J. Robert，*Taken by Force*：*Rape and American GIs during World War Two*（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pp.11-12.

[66] Ruhl，Klaus-Jörg（ed.），*Unsere verlorenen Jahre*：*Frauenalltag in Kriegs-und Nachkriegszeit 1939-1949*，*in Berichten*，*Dokumenten und Bilden*（Darmstadt：Luchterhand，1985），p.155.按照西德的统计数据，在6.8万名"占领区儿童"中，有3194人是强奸犯的孩子；参阅德国联邦统计局数字，引自Ebba

D.Drolshagen，“Germany’s War Children”，in Ericsson，Kjersti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232。根据*Die Welt*，17 August 1948，战后德国每年有200万例堕胎手术；参阅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23。

[67] 关于欧洲性病大爆发的统计数字，参阅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98；War Office，*Statistical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the Army*，*1943-1945*（London：HMSO，1948），p.264；United States Army，Office of the Surgeon General，vol.V，p.257；以及Andreas-Friedrich，Ruth，*Battleground Berlin*：*Diaries 1945-1948*，trans. Anna Boerresen（New York：Paragon House，1990），p.84，entry for 18 August 1945。

[68] 关于未被强奸的妇女所受战后气氛的影响，参阅Lena Berg，引自Donat，Alexander，*The Holocaust Kingdom*：*A Memoir*（London：Secker & Warburg，1965），p.317；Yvette Levy，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307；Muriel Heath，IWM Docs 98/25/1，manuscript booklet。

[69] See，for example，the testimony of Ruth Irmgard in Jacobs，Ingeborg，*Freiwild*：*Das Schicksal deutscher Frauen 1945*（Berlin：Propyläen，2008），p.77.

[70] 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25.1939～194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离婚率上升了3倍，参阅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Statistical Digest of the War*（London：HMSO，1951），p.54。

[71] Kopelev，Lev，*No Jail for Thought*，trans. and ed. Anthony Austin（London：Secker & Warburg，1977），pp.51，55.另可参阅Anon.，*A Woman in Berlin*（London：Virago，2006），p.158；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09。

[72] 苏军士兵的话参阅Lena Berg，引自Donat，Alexander，*The Holocaust Kingdom*：*A Memoir*（London：Secker & Warburg，1965），p.317；苏军坦克兵的话参阅Kopelev，Lev，*No Jail for Thought*，trans. and ed. Anthony Austin（London：Secker & Warburg，1977），p.51，苏军翻译在什未林对英国军政府所说的话参阅Major A.G.Moon，IWM Docs，06/126/1，typescript memoir，p.56。

[73] Beevor，Antony and Luba Vinogradova，*A Writer at War*：*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1945*（London：Pimlico，2006），p.327.

[74] Kopelev，Lev，*No Jail for Thought*，trans. and ed. Anthony Austin（London：Secker & Warburg，1977），pp.56-7.

[75] Grassmann，Ilse，*Ausgebombt*：*Ein Hausfrauen-Kriegstagebuch*（Hamburg：Haymarket Media，2003），p.28；MacDonogh，Giles，*After the Reich*（London：John Murray，2007），p.100.

[76] Byford-Jones，W.，*Berlin Twilight*（London：Hutchinson，1947），p.53.

[77]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Statistical Digest of the War*（London：HMSO，1951），p.51.

[78]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Over-all Report*（*European War*）（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5），vol.I，pp.89-90.另可参阅Beck，Earl R.，*Under the Bombs*（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6），p.220，note 111。

[79] *Newsweek* report from Stockholm correspondent，11 June 1945，p.56.

[80] Borgersrud，Lars，‘Meant to be Deported’，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75.

[81] “I have looked into the souls of these Nazi boys-they are black”，*Daily Express*，26 October 1944.

第六章 希望

尽管生命财产的损失极为惨重，但战争结束还是带来了乐观情绪。1945年5月，当欧洲人环视四周，的确没剩下什么足以自豪的资本了。但是，众多变故也并非全然消极。起码独裁统治的消失让欧洲大陆比战前更自由、更安全、更平等，而民主政府也得以建立，即使在东欧，也存在过民主政府。人们普遍感觉到，无论将来如何，起码会比他们刚刚经历过的时代更为光明。

战后几年，人们见证了社会各层面观念与实践的大爆发。艺术、音乐、文学再度繁荣，欧洲大陆创办了数百份报纸杂志。新哲学思想也得以诞生，这种新哲学正在设想乐观的、活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能够实现“彻底的坚定与彻底的自由”。[1] 十几个崭露头角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派别得以成立，其中某些运动和派别将会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支配人们头脑中的政治理念。[2]

如果欧洲民众完全意志消沉、精疲力竭、腐化堕落，上述变化根本不可能实现。在战后的黑暗气氛中，希望起码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正是希望让欧洲大陆恢复元气，并且让欧洲大陆走出泥潭。也正是希望缓解了人们对新政府和新制度的冷嘲热讽，这些新政府和新制度正在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很大程度上，在希特勒垮台后，希望是对权利和自由得以恢复的自然反应。但在某种程度上，希望也深深植根于欧洲社会的需要、渴望甚至偏见。

英雄崇拜

战争结束后，欧洲似乎对于冲突期间的种种故事极为热衷。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人需要为自己刚刚经历过的岁月寻找意义，但随即涌现的

故事类型表明，欧洲人需要的绝非仅此而已。最为脍炙人口的故事都以极端英雄主义为主题，这类故事在欧洲大陆可谓俯拾即是。在几乎所有的故事中，英雄都是当地男女，起码在大众看来，其英勇事迹或牺牲事迹代表着本民族的真正精神。与此同时，战争的罪恶被投射到反面角色当中，反面角色几乎总是外国人，通常是德国人。外国人的邪恶与本国人的高贵，这种强烈反差对于战后重建民族认同极为重要，这也是备受打击的欧洲民族自我疗伤的主要方式。

这种情况以英国最为明显，战后英国尤其需要积极的消遣。1945年的英国是个自顾不暇的国家。它不仅要自我修复破败的设施和破产的经济，还要为欧洲其他地区承担警察职能，还要在非洲和远东为正在崩溃的大英帝国维持秩序。面对长期的艰难时世和节衣缩食，让英国人略感告慰的仅仅是，他们在战争面前未被击倒，他们在邪恶面前不失高贵，简而言之，英国人是英雄辈出的民族。

作为对海外恐怖经历以及国内悲惨境遇的解药，英国人转而炮制出大量的英雄传说。40年代末50年代初，英国涌现了大量战争故事，比如《胜利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 ）、《残酷之海》（*The Cruel Sea* ）、《敌后大爆破》（*The Dam Buster* ）、《月光下再见》（*Ill Met by Moonlight* ）、《科尔迪兹要塞》（*The Colditz Story* ）、《翱翔蓝天》（*Reach for the Sky* ），这里列举的只不过是最著名的几部而已。这些故事的主角，都对正义事业、自身能力、胜利前景深信不疑，尽管他们似乎都要面对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不仅仅是战时宣传的再次登场，这其实正是战后英国人看待自己时需要的形象。英国人从不绝望、从不动摇、从不抱怨的神话，时至今日仍然令人宽慰，但这种神话经不起战时任何“民意测验”记录的考验。

在战后欧洲，这种讲述本民族积极故事的需要可谓普遍。对于那些曾经被纳粹占领的国家来说，这种故事尤为重要：这些故事不仅能够让

人在战争过后的艰难生活中感到宽慰，而且能够让人从对德合作的暗淡记忆中摆脱出来。

例如，在挪威，针对卖国叛徒的清洗行动，与纪念民族英雄的庆祝活动几乎同时进行，而且后者的声势甚至盖过前者。十几场公开演说先后举行，以赞扬抵抗运动的勇敢精神，颁奖仪式也先后举行，以表彰事迹最为鼓舞人心的故事主角。4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战争回忆录被出版，详细记录了挪威士兵、特工以及破袭者的丰功伟绩。延斯·缪勒（Jens Müller）的《三个生还者》（*Tre kom tilbake* ），讲述了从空军三号战俘营“伟大逃亡”的故事：缪勒本人是仅有的三名走完全程回到家中的幸存者之一。奥卢夫·奥尔森（Oluf Olsen）的回忆录讲述了纳粹入侵后，自己如何炸毁里萨克大桥，之后如何逃亡到英国，之后如何作为英国特别行动组的特工于1943年跳伞返回挪威。克努特·豪克里德（Knut Haukelid）描述了自己以及其他特工如何摧毁纳粹建在尤坎的重水工厂，这次行动后来被拍成英国电影《雪地英雄》（*The Heroes of Telemark* ），并由此名垂千古。马克斯·马努斯（Max Manus）的传奇经历包含了一系列的逃脱、密谋、破坏行动。1946年，马努斯的回忆录在挪威出版，但他的故事迟至2008年才被拍成传记片。当时，此片是挪威有史以来投资预算最大的电影。这也证明了国家战争英雄的故事具有持久的号召力。[3]

当这种重复灌输足够频繁，我们就很容易想象，战时抵抗运动足以成为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日常记忆。英雄故事还有其他积极效果：通过反复提及抵抗运动与英国的战时联系，人们就会确信，挪威不仅积极解放自己，而且还积极解放整个欧洲。

正因如此，在所有曾经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抵抗故事成为战时经历的主要叙事。荷兰纪念布拉姆·范·德·斯托克（Bram van der Stok）等人的勇敢事迹，他是“伟大逃亡者”之一，并且还是荷兰功勋最为卓著

的军人之一。丹麦有莫恩斯·福（Mogens Fog）这样的人物，他是抵抗运动报纸《自由丹麦》（*Frit Danmark* ）的创办人，他后来侥幸逃脱盖世太保的追捕，因为正好碰上英国皇家空军轰炸盖世太保在哥本哈根的地区总部。捷克共产主义者有玛丽·库德利科娃（Marie Kudeříková）这样的英雄，一位因为抗议纳粹统治而被处决的学生；与此同时，捷克保守主义者有约瑟夫·马欣（Josef Mašin）这样的著名间谍和破袭者，他的儿子们将会步父亲的后尘，只不过这次他们是与共产党政权对抗。

在每个积极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里，这些英雄故事没有数千也有数百。某些故事有所夸大，某些故事有所美化，但在这些平凡人物战胜非凡逆境的直白描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欧洲的广泛斗争。这些故事不仅鼓舞了整整一代人，尽管这一代人并非人人都能为崇高理想而献身，而且这些故事还提醒人们，无论战后欧洲的生活多么艰难，比起生活在他们曾经推翻的暴君统治下，已经好太多了。

兄弟情谊

英雄主义并不是在战后受到普遍称颂的唯一事物。1945年5月9日，南斯拉夫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元帅发表了胜利演说，他在演说中赞扬了他在战争期间领导的游击队员的“英雄主义”，他们的“丰功伟绩”将会“激励后人，并且教导后人如何热爱自己的祖国”。然而，铁托演说强调的并非英雄主义，而是国家统一：

> 南斯拉夫人民！
>
>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门的内哥罗人、穆斯林！
>
> 你们翘首以盼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企图奴役你们的邪恶力量已被击败。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让你们彼此对立，让你们在自相残杀的斗争中自我毁灭。但你们最优秀的儿女，出于对祖国及其各民族的热爱，挫败了敌人残忍的计划。相互仇视、彼此敌对已成过去，今天你们已团结成崭新的、快乐的南斯拉夫……

在随后的演说中，铁托呼吁国人，不仅国内各民族要“亲如兄弟”，而且巴尔干半岛各国、盟国以及盟军，还有联合国各成员国，都要“亲如兄弟”。铁托说道，欧战胜利日是所有人的“共同胜利日”，而且他希望，“在战场上取得伟大胜利后，即使战争已然过去，和平已然到来，联合国各成员国都应该保持和谐与谅解”。[4]

这次演说传递的感情，其实在历经战争的欧洲各国领导人心中都颇有同感。例如，丘吉尔不仅承诺“英联邦和英帝国要更加团结……比其漫长传奇历史的任何时期更加团结”，而且再三强调同盟各国之间的“团结一致、同伴友谊、兄弟情谊”。丘吉尔说道，战争已经胜利，因为“几乎全世界都齐心协力对抗邪恶力量”。[5] 罗马尼亚解放后的首任领导人，康斯坦丁·瑟讷泰斯库（Constantin Sănătescu）提到“全国”的“完美团结精神”。[6] 即便是斯大林，也提到如何“让各民族的友谊观念彻底战胜希特勒的种族仇恨观念”。[7]

“团结”是这一时期的口号之一，以至于夏尔·戴高乐将其作为战争回忆录最重要一卷的标题。团结是万众追求的理想，也是战争造就了团结。在西欧，拥有不同政治信仰的游击队放下分歧，组成了“民族抵抗委员会”。及至1945年，几乎欧洲所有民族都组成了“民族团结政府”，所有政党通力合作。战争结束时，在盟国之间团结精神的激励下，50个国家共聚一堂，为一个崭新的国际机构起草宪章，这个国际机构就是联合国。

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不同民族之间的合作，以及同一民族内部不同阶级、不同政治信仰之间的合作，是战争带来的最鼓舞人心的事物。西奥多拉·菲茨吉本（Theodora FitzGibbon）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经历种种恐怖”，但战争“并非一无是处，战争明显改变了英国人对待彼此的态度。共度时艰的经历造就了友谊，甚至造就了爱，所有陌生人之间的爱”，这种爱无视传统的阶级藩篱和性别藩篱。[8]

理查德·梅恩（Richard Mayne）是一名英国士兵，他曾经与比利时人、挪威人一起服役，曾经与法国人、俄国人、波兰人一起住在战地医院，对他来说，战争成为“一堂欧洲课程”。后来他成为一位欧洲政治家，成为让·莫内（Jean Monnet）和沃尔特·哈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的同事，成为最为热心的欧洲联盟捍卫者。他后来回忆道：

> 并非所有对欧洲的“伟大预期”都得以实现。但有一条是最为根本的：一种团结意识，一种在战争期间隐约闪现的团结意识。无论你承认与否，这种团结意识让人们竭尽全力去建设更美好的世界、更美好的欧洲、更美好的社会，更多公平、更少成见、更少等级，并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破的人为障碍中解脱出来。[9]

不幸的是，历史已经证明，普遍团结的期望稍纵即逝。冷战将会在东欧与西欧之间制造鸿沟，两者之间不相往来超过40年。在南斯拉夫以及欧洲其他地方，“兄弟情谊”只是虚有其表，彼此竞争的各族群之间，和平经常是由强迫所造就，而非自愿的结果。“陌生人之间的友谊”将会和人与人之间的敌意或复仇同生共存。

尽管如此，即使是在战后最为昏暗的岁月里，战时形成的理想始终没有破灭。以这些理想信念为根基，欧洲各民族之间的合作关系终于得以延续至今。[10]

勇敢新世界

我们必须记得，战争年代的艰难与破坏，对人们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有些人在战后的生活甚至比他们所能想象的更好。在许多地区，战争彻底改变了社会结构，让新的等级制度、新的权力中心得以形成。

战后自由的最大赢家无疑是欧洲各国的共产党，欧洲大陆的共产党员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正因如此，尽管战争造成了巨大破坏，但许多左派人士都把战争视为天赐良机。斯拉芬卡·德拉库利奇（Slavenka

Drakulić）是来自萨格勒布的新闻记者，她写道："即使对于战后出生的南斯拉夫人来说，战争也不是无谓的流血，正好相反，战争是一段英雄史诗的、意义深远的经历，其价值远比100万受害者重要得多。"[11]

战争造成的革命后果，不仅在共产党最终建立政权的国家可以感受得到，甚至在西方都可以感受得到。其中一个国家正是英国，早在战争初始阶段，就能感受到巨大变化。从战争爆发开始，英国就实行配给制度，这正是共产党人梦寐以求的革命措施。几乎所有的基本食品都实行配给，其他必需品如布料和日用品也都实行配给。即使某人比邻居更富有、更尊贵，他也不可能分配到更多的食物，能够得到更多配给定额的是武装部队人员，以及在强体力劳动岗位上工作的人。换言之，食物是按需分配，而非按社会特权或经济特权分配。结果在战争期间，居民健康状况竟然普遍提高：及至40年代末，英国的婴儿死亡率稳步下降，由于各种疾病而导致的死亡率也比战前大幅下降。站在公共卫生的立场上，正是战争让英国成为更加公平的社会。[12]

战争期间的英国，还有其他变革产生类似效果，比如针对所有阶层、所有性别的征兵制度。西奥多拉·菲茨吉本写道："社会差异和性别差异被抹去，这一戏剧性改变发生后，再也不可能退回到过去了。"[13]美国战地记者爱德华·莫罗（Edward R.Murrow）同样见证了英国发生的社会变动，他以更加强有力的语调写道："这次战争与上次战争全然不同，战争的象征意义、平民的关注角度，都有所不同。你必须明白，旧世界正在死亡，旧价值、旧观念、旧的权力基础和特权基础，都已一去不返。"[14]

战争期间，类似变化在欧洲大陆也有发生，但方式有所不同。在欧洲大陆，因为更加严重的物资短缺，也因为纳粹及其盟友对欧洲更为严重的压榨，配给制度未能奏效。人们更加依赖黑市，这意味着城市居民经常要到乡间，用仅有的财物交换食物。战争年代，人们见证了财富流

出城市、流入乡村的重新分配过程，这扭转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普遍趋势。例如，在意大利，城市中产阶级的佣人大多离职，他们宁愿回到农村，起码农村地区的食物供应更为充足。一位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家庭主妇抱怨道，农民和店员“现在成了富人”。[15] 在捷克斯洛伐克，某些农村社区的变化尤为显著。海达·科瓦利（Heda Kovaly）是战后回国的政治犯，她写道：“农舍的规模比战前大了一倍，厨房里有冰箱，厅堂里有洗衣机。地板上铺着东方地毯，墙壁上挂着原创画作。”甚至捷克农民也愉快地承认这种变化：“无可否认，战争期间我们过得很好。”[16]

对于那些没有能力从战争造成的社会变动中捞取好处的人来说，解放提供了另一次机会。在匈牙利，40%的农民没有土地或者缺少土地，苏联红军的到来启动了某些迫在眉睫的土地改革。按照匈牙利政治理论家比博·伊什特万（István Bibo）的说法，1945年确实称得上解放，尽管也发生了暴力事件和不愉快事件，但也为早已过时的封建制度敲响了丧钟：“起源于1514年的这个僵化的社会制度，终于开始动摇，向更大的自由迈进。”[17] 同样，解放也为欧洲工业地区的工人提供了机会，比如在法国和意大利北部。由于所有主要的工矿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首脑都在战时与傀儡政权合作，因此工人有充分理由接管车间，而这在战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有时候，社会变动是由战争及其反面后果所导致的。尤其是在东欧，战前的精英阶层，首先被纳粹故意绞杀，然后被苏联故意绞杀。消灭犹太人，同样为其他族群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在1944年的匈牙利，人们瓜分了犹太人被驱逐后留下的财产，许多农民第一次穿上了体面的衣服和鞋子。[18] 在波兰，犹太人本来构成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后来新的波兰中产阶级崛起并取代了犹太人的地位。[19]

无论这些改变如何发生，总有许多人认为改变姗姗来迟。无论你是英国的自由改革家、法国的产业工人还是匈牙利的农民，你都会很容易

得出结论，战争及其后果具有某些非常积极的意义。或许并非人人同意，但总有部分人会同意。

战后时期，在社会各层面都出现了政治活动和政治理想的爆发。许多希望和理念是稍纵即逝的，尤其是在那些将要重新建立独裁统治的欧洲地区更是如此。更多希望和理念则受困于政治争论、经济困难、官僚主义。但在经历过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后，希望和理念的喷发并非毫无意义。欧洲已经开始迈向经济复兴和精神复兴，接下来的几代人将会见证“奇迹”。

即使当时的人们未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亲身见证“奇迹”的到来，他们起码也普遍感到宽慰；他们起码知道，在欧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地区，人压迫人的独裁统治已不复存在；他们起码知道，炸弹也将不再倾泻而下；他们起码知道，战争终于结束了。

---

[1] Motto of Jean-Paul Sartre’s *Les Temps modernes*，可参阅Watson，Peter，*A Terrible Beauty*（London：Phoenix，2001），p.410。

[2] Mayne，Richard，*Postwar*：*The Dawn of Today’s Europe*（London：Thames & Hudson，1983），pp.12-32.

[3] Jens Müller，*Tre kom tilbake*（Oslo：Gyldendal，1946）；Oluf Olsen，*Contact*（Oslo：Erik Qvist，1946）and *Vi kommer igjen*（Oslo：Erik Qvist，1945）；Knut Haukelid，*Det demrer en dag*（Oslo：Nasjonalforlaget，1947）；Max Manus，*Det blir alvor*（Oslo：Steensballes Boghandels，1946）.

[4] Speech by Josip Broz Tito，9 May 1945，reproduced as doc.239 in Trgo，Lt Gen. Fabijan（ed.），*The National Liberation 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Selected Documents*，trans. Anđelija Vujović，Karin Radovanović and Madge Tomašević（Belgrade：Military History Institute of the Yugoslav People’s Army，1982），pp.718-21.

[5] Churchill speech，13 May 1945，引自Cannadine，David（ed.），*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Winston Churchill’s Famous Speeches*（London：Cassell，1989），p.258；VE Day speech，8 May 1945，quoted on www.winston-churchill-

leadership.com/speech-victory.html-accessed 23 September 2011。

[6] Declaration of the new Romanian government，as broadcast on Radio Romania，23 August 1944，可参阅*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4，vol.IV，p.191。

[7] Speech to meeting of Moscow Communist Party representatives，6 November 1944，引自Stalin，Generalissimo Josef，*War Speeches*，*Orders of the Day and Answers to Foreign Press Correspondents dur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July 3rd*，*1941-June 22nd*，*1945*（London：Hutchinson，1946），p.110.

[8] FitzGibbon，Theodora，*With Love*（London：Century，1982），p.63.FitzGibbon，菲茨吉本是一位爱尔兰美食评论家，纳粹德国轰炸伦敦时他生活在那。

[9] Mayne，Richard，*Postwar*：*The Dawn of Today's Europe*（London：Thames & Hudson，1983），p.12.

[10] 我写作此书时，克罗地亚刚刚被欧盟接纳，塞尔维亚也将在数月后步其后尘。

[11] Drakulić，Slavenka，*Balkan-Express*：*Chroniques de la Yougoslavie en Guerre*（Paris：Éditions Mentha，1992），p.35.关于更加广泛的讨论，以及波兰人对于德拉库利奇经历的认可，参阅Jan Gross，"War as Revolution"，in Naimark，Norman and Leonid Gibianskii（ed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1944-1949（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7），pp.17-40。

[12] Milward，Alan S.，*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p.284-6.

[13] FitzGibbon，Theodora，*With Love*（London：Century，1982），p.63.

[14] 引自Owen，James and Guy Walters（eds.），*The Voice of War*（London：Viking，2004），p.80。

[15] 引自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64。

[16] Kovaly，Heda Margolis，*Prague Farewell*，trans. Franci Epstein and Helen Epstein（London：Gollancz，1988），p.57.

[17] 引自Kenez，Peters，*Hungary from the Nazis to the Soviet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Hungary*，*1944-1945*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07。

[18] Pelle，János，*Az utoisó vérvádak* （Budapest：Pelikán，1995），p.151.

[19] 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 （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40.

第七章 乱象

近年来，某些西方史学家和政治家倾向于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尤其是21世纪初，由于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其战后重建与恢复秩序的进程屡屡受挫，人们就会指出40年代在欧洲的类似计划是如何之成功。尤其是马歇尔计划，更被视为战后经济重建的样板工程。

这些政治家应该记得，欧洲重建进程并非战后立即开始的，马歇尔计划迟至1947年才启动，而且及至40年代末，欧洲大陆在经济上、政治上、道德上仍然处于动荡之中。正如最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联合国认识到当地领导人必须发挥领导作用。但是，产生当地领导人尚需时日。战后初期，唯一具有道德权威的人，是那些能够证明自己的抵抗功绩的人。但是，这些人只擅长游击、破袭、暴力，他们已经习惯于以严格保密的方式行事，他们不一定适应民主政府的日常运作。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有能力控制大局的权威就是盟国本身。人们普遍承认，只有盟国官员与纳粹毫无瓜葛，只有盟国军队有能力、有威望去维持某种法律和秩序，也只有盟国牵头，才能维持政局稳定，而政局稳定是回归民主的前提条件。尽管盟国很快就由于逗留太久而不受欢迎，但在当时的欧洲大陆，除了盟国牵头维持局面，的确是别无选择。

不幸的是，面对战后初期复杂而广泛的挑战，盟国毫无准备。难民多达数百万，这些人需要食物、衣物、住所，有些人甚至需要遣返，盟军士兵和盟国官员根本应接不暇。盟国分发的食物和药物是为数百万当地居民准备的，但由于战争，许多难民无家可归、忍饥挨饿、身心受创。盟国只好重新建立和改进民政机关，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从头做起，

他们要考虑当地居民的感受，但这些居民的语言和习惯却是绝大多数盟军士兵无法理解的。在陷入混乱、无法无天、武器唾手可得的欧洲大陆，盟军士兵被迫承担警察的职能。无论如何，他们都要为意志消沉的民众振作精神，帮助他们清除碎石瓦砾，帮助他们重建早已支离破碎的生活。

所有重建工作还被迫在愤恨和敌对的气氛中进行。德国人最不受待见，因为他们首先发动战争，因为纳粹发动战争的残酷方式。其他民族之间的仇恨也被点燃，有些民族仇恨就是由这六年的战争重新挑起的：希腊人反对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反对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反对匈牙利马扎尔人，波兰人反对乌克兰人。甚至同一民族内部也出现了兄弟相残，起因仅仅是因为人们对战后新社会抱有不同的社会观念和政治观念。这只会加剧邻里之间早已存在的冲突，早在战争期间，人们就以怀疑的目光看待别人的举动。在欧洲大陆，通敌者与抵抗者仍然比邻而居。暴行实施者混迹于居民当中，甚至混迹于从集中营返乡的希特勒的受害者当中。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形影不离，混杂在政治观念温和得多的居民当中，甚至混杂在政治信念荡然无存的居民当中。在无数城市和乡村，施害者与受害者再为邻里。

盟军的出现经常引起当地人的反感，许多人对于军事占领者的观感大有分歧。战争过后，盟军逐渐明白，自己正坐在定时炸弹上。1945年，在盟军的报告和备忘录中，反复出现如下句子：赢得战争，输掉和平。

1944年12月，在访问希腊期间，美国助理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致函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公函中提到，如果未能迅速实现复兴，欧洲随时都有爆发屠杀的潜在危险。艾奇逊写道，那些被解放的民族，“正成为世界上最为易燃的材料。他们好勇斗狠、暴力成性、焦躁不安，他们早已忍无可

忍”。如果盟国未能尽力养活他们、安抚他们，未能积极帮助他们恢复其祖国的社会架构和道德架构，那么，旦夕而至的将会是“挫折、煽动、骚乱”，最终“颠覆政府”。这种景象已经出现在南斯拉夫和希腊。艾奇逊担心，这种景象将会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引发欧洲范围的全面内战。[1]

就在盟国胜利后数周，教皇庇护十二世（Pius Ⅻ）曾发出警告，欧洲重新建立的和平脆弱无比。在对罗马教廷枢机主教团的演讲中，教皇指出，战争造成“大批无依无靠、不抱幻想、失意沮丧、不抱希望的人们”，他们愿意“投身革命与动荡，即使迎来暴君统治也在所不惜，即使这些暴君比人们刚刚推翻的独裁者还要独裁专制”。尽管教皇并未点名，但众人皆知，教皇言语所指正是斯大林的苏联政权，苏联正在动员共产党员接管若干个中东欧国家。教皇支持这些小国的右派势力，以抗拒苏联在这些国家建立政治和文化新体制，但他也认识到，在各民族之间与各民族内部实现真正持久和平的进程，将会耗费很长时间，“对于翘首盼待秩序和安定的人们来说，这个进程太漫长了”。[2]

不幸的是，西方盟国同样缺少时间。面对如此繁重的任务，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迅速解决战后问题以避免继续流血。西方盟国应对战争破坏的措施严重不足，考虑到欧洲大陆的破坏程度，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他们最多只能清理道路、恢复交通，以便把重建物资运遍欧洲大陆。西方盟国应对人道危机的措施同样短缺：此后数年间，欧洲大陆仍然严重地缺衣少食、缺医少药，而难民尤其是“无国籍”的犹太人和波兰人，直至50年代还潦倒地生活在尼森营地的棚屋里。西方盟国面对道德危机的应对措施更加糟糕。在1944～1945年的严峻局面中，西方盟国未能确认所有战争罪行，未能撤换和拘捕所有战时通敌官员，未能搜集罪证进而毫不迟疑地起诉这些官员。

在战争末期到处蔓延的暴力和混乱气氛中，人们难以避免自定法

律、自行其是。他们无法修复战争破坏，同样无法修复人性创伤，但他们相信，起码可以纠正某种道德失衡。正如我在本书下一部分将提到的，这种信念只不过是幻想：这种信念要靠寻找替罪羊来支撑，并且把整个族群当成少数罪犯的同谋者。正是如此，在战争造成的道德损害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新的罪行：复仇。

---

[1] Dean Acheson memorandum to Harry Hopkins，26 December 194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5，vol.II，pp.1059-61.

[2] *New York Times*，3 June 1945，p.22.另可参阅*Newsweek*，11 June 1945，p.60。

第二部 复仇

我们只剩下两个神圣的字眼。

一个是“爱”；另一个是“复仇”。

——瓦西里·格罗斯曼，1943年10月15日 [1]

---

[1] Beevor，Antony and Luba Vinogradova，*A Writer at War*：*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1945*（London：Pimlico，2006），p.248.

第八章 嗜血

1944年10月，苏德两国经过两年多的血腥厮杀后，苏联红军终于穿越战线，踏足德国土地。小村庄涅梅尔斯多夫（Nemmersdorf）不幸成为苏军途经的第一处居民点，而村庄的名字很快就成为暴行的代名词。在狂暴的气氛中，苏军士兵杀死了此地所有居民，男人、女人、孩子一概未能幸免，在部队开拔之前，受害者甚至被肢解。瑞士《邮报》（*Le Courrier* ）的一位记者声称，在苏军被暂时击退后，他曾经来到这座村庄，他简直无法形容眼前所见的情景。他写道："我还是不要描述田地里尸体被肢解的恐怖情形了，那个场景早已超出人们最为野蛮的想象。"[1]

随着苏军继续前进，类似场景也反复在德国东部省份上演。例如，在柯尼斯堡附近的波瓦延（Powayen），遇害妇女的尸体散落各处：她们都被强奸，然后被残忍地以刺刀或枪托击打头部而死。在大海德克鲁格（Gross Heydekrug），一位妇女被钉死在当地教堂的祭坛十字架上，两边还钉着两名德军士兵的尸体。[2] 在其他村庄，还发生了更多钉十字架事件，妇女们先被强奸，然后被钉死在谷仓门口。[3] 在梅格登（Metgethen），妇女和孩子都被杀死和碎尸。根据负责查验尸体的德军上校的陈述，"绝大多数孩子都是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但"个别孩子幼小的身体上有好几处刺刀造成的伤害"。[4]

屠杀妇孺并无军事意义，反而成为苏联军队的宣传灾难，只能激起德国人的殊死反抗。肆意破坏德国的城市和乡村，同样招致反效果。列夫·科佩列夫是目睹焚烧德国村庄的苏军士兵，他指出：焚烧村庄似乎是快意恩仇，"但快意过后，我们去哪儿过夜，我们去哪儿疗伤？"[5] 纯粹以实用主义角度看待这些事件，显然是不着边际。复仇的渴望也许根

本就无可避免，这只不过是对过去所受严重伤害的报复而已。实施这些暴行的士兵，本身可能经历过家破人亡的痛苦。1944年，一位名叫戈夫曼（Gofman）的苏军士兵说："我已经复仇，还会继续复仇。"戈夫曼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白俄罗斯城镇克拉斯诺波耶（Krasnopol'ye，即原属波兰的克拉斯诺波尔）被纳粹杀害。戈夫曼继续说道："我曾经见过那些埋着德国人尸体的田野，但这远远不够。到底要死多少德国人才能为他们杀害的孩子讨回公道呢？无论我在森林里还是在地堡里，克拉斯诺波耶惨案的情景时刻浮现在我眼前……我发誓，只要我的双手还能拿起武器，我就会复仇到底。"[6]

其他士兵同样有着痛苦的往事，因此也同样嗜血。萨勒曼·基谢廖夫（Salman Kiselev）在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死后写道："我的人生已经完全扭曲。"[7] 苏军少尉、苏联英雄克拉托索夫（Kratsov）的妻子和女儿都在乌克兰惨死于德国党卫队特别行动队之手，他说道："他们杀害了我的小柳琴卡，我的人生只剩下一样东西：复仇。"[8]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实施复仇的威胁或承诺无处不在。这实际上构成一条线索，贯穿起战后许多事件，从逮捕纳粹战犯及其合作者，到草拟决定欧洲数十年命运的战后条约。从罗斯福到铁托等盟国领导人，都乐于满足其部下的复仇幻想，进而寻求利用民众的复仇渴望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所有盟军指挥官对于部下的过火行为也是视而不见，而在混乱中捞取好处的平民，也把混乱视为受害者获取补偿的机会，毕竟他们曾经忍受过独裁者和暴君的长期统治。

在战后初期的所有研究课题中，复仇也许是最为普遍的。但这个课题很少得到深入分析。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着眼于与复仇相关的惩罚问题——也就是合乎法律、被认为是无私地伸张正义的行为——但关于复仇在战后承担的角色，却缺乏整体研究。即使提及复仇，通常也是泛泛而论、就事论事。在某些个案中，复仇现象被历史学家刻意淡化，甚

至被断然否认；在其他个案中，复仇现象又被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两种立场，都有其政治原因和情感原因，我们必须考虑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立场偏颇，那么真相难觅。

许多历史学家也以表面价值来看待当时的复仇故事，而不深究事件背后潜藏的动机。涅梅尔斯多夫事件就是典型例子。在长达50年的冷战时期，西方历史学家全盘接受纳粹宣传对涅梅尔斯多夫事件的陈述版本。这是由于纳粹宣传符合他们的需要，他们要把俄国人形容为欧洲妖怪，这同样是由于他们无法接触到苏联档案对此事的不同陈述。最近有研究表明，纳粹篡改了涅梅尔斯多夫的照片，夸大了屠杀的时间跨度和死亡人数。战争结束后，歪曲真相简直是家常便饭，对立双方的暴行都被认为具有宣传价值而被大肆渲染。涅梅尔斯多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与传统观点相去不远，但真相已经被掩埋在层垒交叠的陈述当中，我们今天称之为“编织”。[9]

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会描述某些最为常见的战后复仇形式，其中既有个人层面的复仇，也有集体层面的复仇。我会说明，复仇观念的来龙去脉，它与复仇本身同样重要。我会证明，渴望复仇的居民如何被那些老谋深算的、企图加强自身地位的人物所操纵。我还会说明，为何欧洲各新政权只有借助可控的复仇力量，才有可能树立权威。

复仇是战后欧洲重建的重要基础。战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以及本书描述的其他事情，都会打上复仇的印记：直至今天，个人、社区甚至整个民族，仍然生活在由复仇造成的痛苦当中。

---

[1] *Le Courrier de Genève* ，7 November 1944.Fisch，Bernhard，*Nemmersdorf*，*Oktober 1944*：*Was in Ostpreußen tatsächlich geschah* （Berlin：Edition Ost，1997），pp.151-3，这份报告的准确性存在争议，作者声称亲眼看到的情形同样存在争议。

[2] Hermann Sommer，引自Spieler，Silke（ed.），*Vertreibung und*

Vertreibungsverbrechen 1945-1948：*Bericht des Bundesarchivs vom 28 Mai 1974*，*Archivalien und ausgewählte Erlebnisberichte* （Bonn：Bundesarchiv Koblenz & Kulturstiftung der Deutschen Vertriebenen，1989），p.148。

[3] 参阅Fisch，Bernhard，*Nemmersdorf*，*Oktober 1944*：*Was in Ostpreußen tatsächlich geschah* （Berlin：Edition Ost，1997），pp.165-7，他不认为这件事情发生在涅梅尔斯多夫，但认为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东普鲁士其他地区。

[4] Hermann Sommer，引自Spieler，Silke（ed.），*Vertreibung und Vertreibungsverbrechen 1945-1948*：*Bericht des Bundesarchivs vom 28 Mai 1974*，*Archivalien und ausgewählte Erlebnisberichte* （Bonn：Bundesarchiv Koblenz & Kulturstiftung der Deutschen Vertriebenen，1989），p.147。

[5] Kopelev，Lev，*No Jail for Thought*， trans. and ed. Anthony Austin（London：Secker & Warburg，1977），p.37.

[6] 引自Ehrenburg，Ilya and Vasily Grossman（eds.），*The Black Book*，trans. John Glad and James S. Levine（New York：Holocaust Library，1981），p.236。

[7] 引自Ehrenburg，Ilya and Vasily Grossman（eds.），*The Black Book*，trans. John Glad and James S. Levine（New York：Holocaust Library，1981），p.234。

[8] 引自Ehrenburg，Ilya and Vasily Grossman（eds.），*The Black Book*，trans. John Glad and James S. Levine（New York：Holocaust Library，1981），p.38。

[9] Fisch，Bernhard，*Nemmersdorf*，*Oktober 1944*：*Was in Ostpreußen tatsächlich geschah* （Berlin：Edition Ost，1997），pp.141-53：例如，村庄里可能有26人被杀，但被夸大为超过60人被杀。

第九章 解放营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垃圾堆中，在暴力和恶行的所有象征中，也许最具强烈震撼力的就是集中营了。集中营及其代表的一切，成为战后报复行为的辩护理由，因此，我们必须了解集中营在当时造成的震撼与冲击。集中营分很多种，但最为人知晓的是“死亡营”。在这种营地里，犯人要么被饿死，要么被处心积虑地送进毒气室毒死，要么被行刑队枪决。

发现

第一个被发现的纳粹死亡营是马伊达内克（Majdanek），邻近波兰城市卢布林，当地于1944年7月底被苏联红军攻占。及至此时，德国人的战争暴行早已为俄国人所熟知。俄国人早就听说过巴比谷（Babi Yar），以及遍及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的无数屠杀地点，但正如当时一名新闻记者所说的：“所有这些屠杀地点遍布各地，尽管这些屠杀地点的死亡人数加起来远远超过马伊达内克，但这些屠杀地点的纪念意义，及其难以置信的‘工业化’程度，都无法跟卢布林郊外两英里的死亡工厂相提并论。”[1]

在苏联红军抵达之前，德国人拼命撤离马伊达内克，但他们走得太匆忙，以至于来不及毁灭罪证。当苏联军队开入院墙后，他们发现一系列毒气室以及六个巨大的焚尸炉，还有烧焦的人体残骸散落在周围，附近还有几个巨大的焚尸堆，上面堆满白色的灰烬和人骨。焚尸堆旁边就是大片菜地，苏联方面很容易得出结论：马伊达内克的组织者把人体残骸当成肥料。当时一名苏联记者写道：“这就是德国人生产食物的方式，杀死人类，滋养甘蓝。”[2]

马伊达内克以及附近营地的屠杀规模，只有在苏军士兵打开毒气室与火葬场之间某几栋建筑物时，才得以大白于天下。在一栋类似谷仓的巨大的建筑物内，他们发现了数十万双鞋子和靴子。另一栋巨大的建筑物“就像五层楼的大百货公司”：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堆满无数个货架的修面刷子、折叠小刀、玩具熊、七巧板以及挂满许多条长走廊的大衣和女装。[3] 建筑物的底层是登记室，逃离此地的纳粹党徒没来得及毁掉这些账目。在这里，苏联官员发现某些最为邪恶的文件，上面记录着后来被称为“大屠杀”（Holocaust）的事件。马伊达内克曾经作为整个灭绝营系统的中央存储仓库：在索比堡（Sobibor）、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和贝乌热茨（Belzec）被杀害的犹太人，其金银细软将被送到马伊达内克，然后运回纳粹德国，这些财产将被分配给因为疏散和轰炸而无家可归的德国家庭。仅仅在1944年头几个月，就有18节火车皮从这个仓库发回德国。[4] 后来，根据从马伊达内克幸存的苏联战俘的口述，调查人员才得知，1943年11月这里曾经发生过令人毛骨悚然的“收获节”大屠杀。幸存者带领调查员发现了埋葬着1.8万名犹太罹难者的许多个万人坑。[5]

这些发现马上就产生了效果。苏联宣传人员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曾被派往马伊达内克，就这座集中营撰写报告文学，并从8月起刊登于《真理报》（*Pravda* ）和《红星报》（*Krasnaya Zvezda* ）。[6] 外国记者也被邀请到这座集中营，许多俄国士兵和波兰士兵都被安排到这里参观，好让他们将所见所闻传遍苏联红军的所有部队。[7] 据说，在得知马伊达内克被完整占领后，希特勒大为震怒。希姆莱曾经竭尽全力拆毁和夷平主要屠杀中心，以此掩盖大屠杀的痕迹，但马伊达内克的发现成为第一份确凿证据，足以证明来自波兰的屠杀报告句句属实。[8]

此后数月间，在此前由纳粹控制的领土上，陆续发现由无处不在的奴工营、战俘营、灭绝营组成的庞大网络。发现马伊达内克之后不久，人们又发现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逃亡者与被逮捕的守卫都描述过这座人

间“地狱”。在这里，有90万名犹太人被杀害，他们的尸体被推入焚尸炉，而焚尸炉“就像许多座巨大的火山”。[9] 六个月后，苏联红军抵达奥斯威辛（Auschwitz），在这里，有将近100万名犹太人，还有超过10万名波兰人、吉卜赛人、苏联战俘，被毒死、射杀或者劳累至死。[10] 尽管苏联早已建立起自己的劳动营系统，即古拉格，但他们还是为如此高速、高效、复杂的杀人机器感到震惊。[11]

值得补充说明的是，人们过去经常说苏联从不提及这些死亡营的绝大多数受害者是犹太人。[12] 这种说法并不确切。1944年12月，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

> 如果问一名被俘的德国人，为何他的同胞要杀害600万无辜者，他会回答：“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黑头发或者红头发的。他们血统不同。”……这一切都起源于愚蠢的玩笑、顽童的吵闹、路牌的标示，结果却是马伊达内克、巴比谷、特雷布林卡，是填满沟渠的孩童尸体。[13]

《真理报》上另一篇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文章，同样特别提到这里的犹太受害者。[14] 然而，绝大多数俄文报刊、演讲以及后来的回忆录，都指希特勒的受害者仅仅是“苏联公民”。即使在死亡营被世人发现后，克里姆林宫还是决定，不把纳粹的种族灭绝描述为针对犹太种族的罪恶，而是描述为针对苏联国家的罪恶。

当这些事件迅速占据苏联各大媒体的版面时，英美方面的反应却要沉寂得多。早在1942年12月，英国人就知道，数十万名犹太人“在劳动营里慢慢劳累至死”，甚至被“故意集体杀害”。但是，英国政府不愿意大范围公布真相，以免公众要求政府有所作为。[15] 英国情报部门仍然根据之前发布的指令行事，在战争时期，“对于这些恐怖事件……必须谨慎对待，确保这些事件只与毫无争议的无辜者有关，不能与暴虐的敌对阵营有关，不能与犹太人有关”。[16] 因此，英国民众对德国暴行的了解，远远不如同时期的苏联民众。

美国政府似乎也不愿意承认犹太人比其他受迫害群体更为悲惨。尽管早在1940年就有定期报告指出欧洲犹太人所受的威胁，尽管在1944年3月罗斯福就已毫不含糊地宣告“大规模地、有系统地谋杀欧洲犹太人……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罪行之一”，但美国人似乎还是不愿意相信大屠杀真的发生过。[17] 即使是在罗斯福政府内部，人们也对大屠杀持怀疑态度，资历深厚的国防部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及其助理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认为这是犹太人的“诡辩”。这种态度倒不一定与反犹主义有关。我们不要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有许多暴行传说最后被证明子虚乌有，如人们“发现”的用人体脂肪制作肥皂的工厂，他们也不确定，关于死亡营的信息，有哪些足以采信。[18]

某些媒体也对死亡营有着类似的怀疑。《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 ）的记者亚历山大·维尔斯（Alexander Werth）曾经在马伊达内克解放后不久到过此地，亲眼看过毒气室、万人坑、焚尸堆。但当他把这条新闻提交给英国广播公司（BBC）时，对方却拒绝播发，因为“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俄国人的宣传伎俩”。[19] 《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 ）同样对这条新闻有所保留，对方声称：“即使我们认为纳粹残酷至极，这件事情听上去也太不可思议了。”[20]

只有当西方盟国开始发现类似的集中营时，人们的态度才有所转变。在西欧发现的第一座集中营是阿尔萨斯的纳茨韦勒-斯特鲁霍夫（Natzweiler-Struthof）集中营，1944年11月23日，法国军队进入此地。纳茨韦勒-斯特鲁霍夫是其中一座主要的夜雾（Nacht und Nebel）集中营，这种机构设立的目的，是让被怀疑为抵抗运动战士的人消失在“夜雾之中”。在这里，法国人发现一座小型毒气室，犯人的手腕被挂在铁钩上，然后剧毒的齐克隆-B（Zyklon-B）被泵进毒气室。许多受害者死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解剖台上，奥古斯特·希尔特（August Hirt）博士在此收集犹太人骨架，企图通过解剖学研究证明犹太人比较低劣。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吉卜赛人还从奥斯威辛被送到此地，在集中营里被用于医

学实验。[21]

1944年12月初，《纽约时报》记者米尔顿·布拉克（Milton Bracker）来到这座集中营。布拉克留意到，尽管许多美国军官已经参观过这座集中营，但他们仍然无法接受恐怖的规模和细节。许多军官似乎怀疑自己亲眼看到的证据，布拉克称之为“双重视觉”，即他们看到此情此景，却看不到德国人犯下的暴行的结果。按照当时的其他记录，美军士兵这种拒绝相信的态度，让当地居民感到愤怒，因为当居民们描述德国人的罪行时，换来的却是美军士兵的怀疑甚至嘲笑。[22]

及至4月，这种“双重视觉”终于走向终结，当时美军解放了奥尔德鲁夫（Ohrdruf），这是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的附属集中营。奥尔德鲁夫的地位尤为重要，因为欧洲盟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于4月12日到访此地，就在这座集中营被发现一周之后。陪同艾森豪威尔到访的还有奥马·布雷德利（Omar Bradley）和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两位将军，艾森豪威尔坚持看完这座集中营的“每个角落”，“因为从那时起，我感觉到，我的职责是亲自验证此事真伪，以免在国内有人认为或者以为纳粹暴行仅仅是宣传而已”。[23] 在这里，他们观看了几种刑具，看到一种用于从死人嘴里敲打金牙的屠宰工具，看到一间堆满尸体的房间，还看到一个大坑里被焚烧过的数百具尸体，他们仿佛看见了“食人族巨人的烧烤炉”。[24] 巴顿在战场上见过许多恐怖场面，但当他看见尸坑，“绿色脏水里散落着断臂、残肢、尸块”，他也忍不住躲到土坡后面呕吐。[25]

在发现奥尔德鲁夫之后不久，美军又发现了诺德豪森（Nordhausen）。在那里，美军发现3000名奴工的尸体被随意堆放，这些奴工曾经在生产V1火箭和V2火箭的地下工厂里劳动。同一天，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发现2.1万名奄奄一息的犯人，此地就在魏玛以北数英里处。许多男人、女人、孩子曾经被迫从东部营地走到此处，他们到达

时已经精疲力竭、孱弱不堪、疾病缠身，后世称这次迁移为“死亡行军”。美军心理战部门估计，战争期间，大约有5.5万名男人、女人、孩子死于这座奴工营。[26]

随着这些发现广为人知，美国军队对德国人愈发反感。佛瑞德·博姆（Fred Bohm）是一名在奥地利出生的美军士兵，他曾经参与解放诺德豪森，绝大多数与他同行的美国大兵“曾经对跟德国人交战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他们曾经相信，自己听说过的许多故事“要么并不真实，要么有所夸大”。只有在他们抵达诺德豪森后，纳粹暴行的真相才终于“尘埃落定”。[27] 也正是从那时起，艾森豪威尔下令，附近所有未承担战斗值班任务的部队，都要来参观奥尔德鲁夫和诺德豪森。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即使是从来不知“为何而战”的普通士兵，现在起码也知道自己“对谁作战”了。[28] 艾森豪威尔还邀请英美两国政府官员来参观这些新近解放的集中营，同时受到邀请的还有世界各地的媒体。这些参观者带出的新闻拷贝，最终于5月1日在美国的电影院放映，深深震撼了整个美国。[29]

由美国军队的发现引发的怒潮，于4月29日达到顶峰，此时离欧洲战事结束仅仅剩下9天，当天45师攻入达豪（Dachau）。在这里，他们发现了最为恐怖的场景，包括“像成捆木材”那样堆积如山的赤裸尸体。[30] 在铁路支线上，他们发现一列装载东部犯人的疏散列车。当他们打开那39个货运车厢时，他们发现2000名犯人已经全部丧生。[31]

与其他集中营不同，达豪集中营是由正在参加主要战斗的部队解放的。某些美军士兵，尽管早已准备浴血沙场，但也无法平静地接受在这里目睹的暴行，他们决定亲手为受害者讨回公道。157团一位连长，威廉·沃尔什（William P.Walsh）中尉，把4名向他投降的党卫队员带到一节铁路车厢里，然后亲手向他们射击。沃尔什的一名部下、列兵艾伯特·普鲁伊特（Albert C.Pruitt）爬上车厢顶部，用步枪将这4名党卫队员全部了结。沃尔什与另一位军官杰克·布希赫德（Jack Bushyhead），后来

下令把隶属国防军与隶属党卫队的德国战俘甄别开来。党卫队士兵在附近的煤场里一字排开，一个机枪队向他们开火，至少打死了12人。后来在就此事提交质询的正式报告中，沃尔什、布希赫德、普鲁伊特以及营长费利克斯·斯帕克斯（Felix L.Sparks）中校，都被点名指控。亲临现场的医官霍华德·比克纳（Howard E.Buechner）中尉，同样因为未对德军士兵提供任何救助而受到批评，某些当事人至今仍然健在。[32]

在营区边界的一座瞭望塔里，17名党卫队员在试图投降时同样被射杀。在营区的其他地方，还有25～50名党卫队员被愤怒的犯人杀死，犯人通常得到美军士兵的帮助。其中一名美国大兵杰克·哈莱特（Jack Hallett）目睹过这些杀戮，他后来回忆起这些可怕的仇杀是如何发生的：

> 我们看到集中营的情景后，一切就失控了，士兵故意打伤集中营守卫，然后将守卫交给犯人处置，让犯人可以任意复仇。实际上，你也看过照片的，一名士兵把自己的刺刀给了一名犯人，然后看着犯人把守卫的头颅割下来。场面相当血腥。许多守卫被士兵开枪打伤腿部，然后动弹不得，然后……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了……[33]

尽管关于这些事件形成了一份报告，但没有一名美军士兵因为违反《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中的战俘权利条款而受到审判。英军也开始发现希特勒集中营系统的意义。4月15日，当英军抵达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时，完全被那里的景象、故事、挑战所惊呆。在比较文明地接受集中营指挥官约瑟夫·克莱默（Josef Kramer）的投降后，英国军官在集中营指挥官的亲自指引下巡视这座集中营。然而，英国军官在集中营的所见所闻却远远称不上文明：牢头跳到犯人身上，踩踏毒打犯人，犯人“骨瘦如柴、面如土色、满身溃烂”，人们就在空地上甚至牢房里便溺。[34] 再一次，最令人不安的是堆积如山的尸体，有些尸体散落各处，有些尸体堆积在房间里，有些尸体堆积在空地上。德里克·辛格顿（Derrick Sington）是第一批进入集中营的军官之一，他说道，我们似乎看见“一间库存过多的肉店”，“在人类的面孔上

可以看到僵尸的表情，在人类的骨架上可以看到畸形的姿势，尸骨散落遍地，你可以设想，当你走在那片光线迷离的桦树林里，那种感觉是多么难以形容”。[35]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最让英军感到震惊的是，绝大多数幸存犯人麻木不仁地生活在尸骨堆里，似乎这种景象已经见惯不惊。一名被吓倒的医官描述了几个场景：

> 一位妇女太过虚弱，以至于无力从尸体堆旁边站起来，我们给她一些食物，她就在那里露天煮食；男人也好，女人也罢，就在露天的地方拉肚子，他们正饱受痢疾折磨；一位妇女赤身裸体地用肥皂擦洗身体，她洗澡的水来自贮水池，里面还漂浮着一具孩童的尸体。[36]

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根本数不胜数。威廉·埃梅里希（Wilhelm Emmerich）是负责清点犯人数目的党卫队军官，按照他的说法，在英军抵达之前，两个月里就有1.6万人丧生，但其他人估计，仅仅在3月，就有1.8万人丧生。[37] 贝尔森的小型火葬场根本无法处理这么多尸体，由于燃料缺乏，也不可能在露天坑道里燃烧这么多尸体。

当英军询问这里的犯人时，他们才揭示这里发生过的恐怖情形。斑疹伤寒和痢疾在营地里到处肆虐。犯人的食物只有清汤寡水的甘蓝汤，犯人都饿到骨瘦如柴。饥饿如此严重，以至于许多犯人试图靠吃人肉来保存性命。一位名叫扬·贝卢涅克（Jan Belunek）的捷克犯人告诉英国军官，他曾经看见许多尸体的心脏被挖出来，他曾经看见另一名犯人“蹲在一具尸体旁边，嘴里正吃着肉，我毫不怀疑这是人肉”。这件事情得到另外两名在医务室工作的犯人的证实，他们分别是来自德累斯顿的医生弗里茨·里奥（Fritz Leo）以及捷克医生兹德涅克·维斯纳（Zdeněk Wiesner）。他们都提到尸体的肝脏经常被偷走，维斯纳（Wiesner）医生甚至见过有人吃尸体的肝脏。里奥医生提到集中营里的300宗吃人个案，他经常看见有人吃人肉，甚至“烹煮性器官”。[38]

犯人同样提到无数暴行、谋杀、医学实验、集体处决，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帝国境内的其他集中营，这些情况比比皆是。1945年4月27日，一份关于贝尔森集中营的初步报告断定，“设立集中营的目的就在于毁灭部分人口”，报告还反复提到，“设立集中营的目的不仅仅是关禁闭，而是或迟或早的人口毁灭”。至于贝尔森集中营，尽管是按照“疾病营”（Krankenlager）来设计的，“但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疗营，因为犯人在这里根本就没有康复的可能”。[39]

英军士兵并没有像解放达豪的美军那样，对德军守卫采取狂暴的报复行动，但两者的环境相去甚远。与达豪不同，英军进入贝尔森时并未预计会发生战斗，他们只是来看看是否需要承担医疗、管理、守护方面的责任。与达豪不同，这里的德军并没有抵抗迹象，实际上，他们欢迎英军进驻，双方的第一次接触相当诚恳。但随着集中营的恐怖真相被揭露，英军士兵与集中营守卫之间的关系也迅速恶化。英军让党卫队员埋葬死者，强迫他们在烈日之下穿上全套制服从事体力劳动。党卫队员被迫徒手搬运腐烂的尸体：那些想用破布条保护双手的人，马上会遭到枪托击打。许多集中营犯人也来看党卫队员干活，还会围在万人坑周围，辱骂那些曾经的施害者。4月22日，一名英军医官写道：“其中一件让我感到快乐的事情，就是看着党卫队员被迫干活。”

> 他们收拾尸体和被感染的衣物，用手推车把这些东西集中到万人坑（每个坑埋了5000人）。我们全副武装的士兵每时每刻都在辱骂他们、踢打他们、威胁他们，让他们片刻不能停歇。考虑到他们犯下的惊人罪行，他们曾经是多么令人恐惧啊，这些党卫队员！他们没有宿舍，他们知道，干完活只能老老实实到仓库里待着。[40]

另一位士兵是369炮兵团的桑德森（Sanderson），他提到英军的报复行为偶尔也会更加极端。

> 我们只给党卫队员提供食不果腹的给养，让他们连续不断地干脏活累活。我们毫无顾忌，用枪托击打他们，用刺刀猛刺他们，迫使他们干双倍的活。有一次，一名奄奄一息的党卫队员被扔进万人坑，尸

体的臭味几乎让他窒息而死。他尽力想爬出来，却被子弹打伤。后来，人们把他扔回埋尸坑里，就像他当年对待犯人那样对待他。[41]

在几乎70年后，我们很难弄清楚，到底这些事情是确实发生过，还是其只是英军士兵的主观愿望。我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一名党卫队员在贝尔森被活埋，但这些故事到处流传并非毫无意义。这些故事会产生重要的心理效应：英军士兵需要感觉到，某些罪大恶极的党卫队暴徒，已经因其罪行而得到了报应。

在贝尔森，不仅集中营守卫受到严厉对待，就连所有在集中营里供职的人，包括技术人员和神职人员，都跟被俘虏的党卫队员一样受到严厉对待。来自策勒（Celle）以及邻近市镇的德国平民也被迫到贝尔森来，让他们亲眼看看以德国的名义犯下的罪行。一名英国工兵奉命传召当地的市镇官员，工兵及其战友不必进入营地，以免感染斑疹伤寒，但被他们传召来的德国人就没有这份幸运了。当那些德国人回去时，英军士兵要让德国人见识“我们的愤怒”，英军士兵故意把枪托撞在地上，试图砸伤那些德国人的脚趾头。许多平民似乎对他们目睹的一切感到相当震惊。“有些人恶心呕吐，有些人假装哭泣，有些人目瞪口呆，表示难以置信。”[42]

正如俄国人在马伊达内克所做的，英国人也认识到贝尔森是宣传素材。随军摄影师马上被派到此地，新闻记者和摄影行家也应邀来到此地。但最具影响力的是4月23日播出的英国有声电影新闻，此时距离发现这座集中营仅仅过去8天。很快，万人坑和尸体堆的影像就出现在英国的电影屏幕上，后来又传播到其他国家。

在这些令人难以释怀的影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孩子在尸体堆上玩耍，骨瘦如柴的行尸走肉无法站立，推土机把数百具尸体推进万人坑，由此永远形成了世人对纳粹德国的印象。这些历历在目的证据，让人们无法再用所谓的敌国宣传来为德国的暴行辩解。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影

片表明，整个德意志民族都难脱干系。斯波蒂斯伍德（Spottiswoode）上校是军政府指挥官，他曾经向参观贝尔森的德国平民发表电视讲话，借用他的话来说，这种集中营的存在，“是德意志民族的耻辱，这个民族的名字，必须从文明国家的名单上划去”。不仅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应该受到惩罚，整个国家都应该受到惩罚：“你们必须以劳作和汗水补偿这一切，补偿你们的孩子犯下的罪行，补偿你们未能阻止的罪行。”[43]

集中营的发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道德情境。似乎在战争期间，盟国做什么都是正义的了：轰炸德国城市，坚持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及让欧洲众多地区陷入饥荒的经济封锁。这也为盟国之后几个月所做的一切提供了理由。从此以后，无论承受多少痛苦，德国人都无法为自己博取同情：针对德军士兵和德国平民的不公待遇将被无视，比如达豪事件，比如苏联军队在德国东部的强奸行为。正如我们看到的，有时候，盲目的复仇会受到权威的鼓励。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发生在马伊达内克、达豪、贝尔森的暴力行为和堕落行为，“可以牵涉到任何人，甚至牵涉到解放者本身”。[44]

犹太犯人之复仇

如果说解放集中营的士兵想要对纳粹复仇，那么，被士兵解救的犯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以色列·古特曼（Israel Gutman）曾经在马伊达内克、奥斯威辛、贡斯基兴（Gunskirchen）待过，但最终得以幸存，他写道，“在集中营生活的最后最艰难的阶段”，“复仇渴望”是让集中营犯人活下去的“希望”。[45]

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宁愿对集中营幸存者的报复行为绝口不提，同样，当时的盟军士兵也宁愿对报复行为视而不见：比起犯人经历的苦难，这些报复行为简直微不足道。他们正确地指出，比起某些民族主义者挑起的劫难，犹太人的报复行为可以忽略不计。1947年，美国军政府首长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亲口承认：“尽管对德国人有着天然仇

恨，但（犹太难民）还是很好地克制了自己，避免与德国居民发生严重事件……在我心目中，他们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表现，堪称我在德国两年多以来见证过的显著成就。”[46]

然而，尽管只有极少数犹太人沉溺于报复行为，但报复行为也许比人们通常认定的范围要广泛得多。绝大多数集中营幸存者似乎都目睹过某种形式的报复行为，尽管他们自己并未参与其中。首先的报复目标是集中营守卫，由于绝大多数守卫在盟军士兵抵达前就已逃之夭夭，因此，在找不到集中营守卫时，犯人就会将矛头指向那些为纳粹充当帮凶的人，即牢头。如果无法向造成自身痛苦的直接责任人复仇，犯人就会把愤怒的情绪转向其他德国人，尤其是党卫队员、德军士兵、纳粹官员，如果找不到这些人，那么找到任何德国人都行。

男人、女人甚至孩子，都可以从事报复行为。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被解放后，本·赫尔夫戈特（Ben Helfgott）看见两名前往莱布尼茨的犹太女孩正在用手推车袭击一名德国妇女。他劝女孩们停手，但被女孩们拒绝，直至他亲自介入。后来在营地里，他看见一群人将一名党卫队员殴打至死。数十年后，他说道：“我目睹这一切，我感到一阵恶心。我并不愤世嫉俗，但我痛恨暴民。当人们成为暴民时，他们就不再是人类。”[47]

恰斯基尔·罗森布卢姆（Chaskiel Rosenblum）同样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解救，他没有杀死任何德国人，但这并不是在道德上有所顾忌，仅仅是因为他无能为力。然而，他知道，有一名10岁的男孩曾经目睹双亲被杀害，“于是他杀死一个又一个纳粹分子”。[48] 平库斯·库尔涅茨（Pinkus Kurnedz）看见一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当过牢头的男人被暴民杀死，暴民当中包括目击者的朋友，他们发现这个男人藏匿在附近的村庄里。“他躲在一间谷仓里，我们把他拖了出来。小广场里有两辆俄国坦克。俄国人也来帮忙。我们确实把他活活打死了。”[49]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很难找到那些亲口承认报复行为的犹太人，但也有少数勇敢者公开谈论自己从事的报复行为，这或者由于他们想确保历史记录尽量真实，或者由于他们仍然对报复行为无愧于心，并且相信这是正当行为。例如，1988年，一位名叫斯穆列克·贡塔兹（Szmulek Gontarz）的波兰犹太人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录制访问片段时，承认自己和朋友曾经在解放期间报复德国人，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如此。

> 我们都有参与。这是快乐的经历。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未能做得更多。例如，把他们扔出火车。无论在哪里可以殴打德国人，我们都会去。在奥地利，有一次特殊经历。我们待在马厩里，那里还藏着一名德国军官。我们把他揪出来，以其道治其身：我们把他绑在树上，然后对他射击。如果你现在让我这么干，那当然不行，但在当时，这很快乐。我很喜欢。在当时，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心满意足了。现在我还会对你说：我很怀疑，任何人处于类似境况中，还会拒绝快意恩仇……也许只有这件事情，值得我们熬过战争，能让我们熬过战争。那种满足感真是太巨大了。[50]

阿尔佛雷德·克内勒（Alfred Knoller）是一位在贝尔森被解救的奥地利犹太人，他还记得，在英军士兵的明确批准之下，他们袭击当地农场以获得食物。有一次，在谷仓旁边的院子里的几个麻袋后面，他和朋友发现了一幅希特勒画像。在谷仓里面，他们还找到一些枪支。出于愤怒，他们捣烂了那幅希特勒画像，然后，尽管农夫及其妻子声称自己反对纳粹，他们还是射杀了那对夫妇。

> 我知道，我们做的某些事情很不人道，但恐怕这就是我潜意识里一直想做的事情。我们想要与德国人战斗。我们并未与他们战斗，但我们还能退而求其次……我们想要复仇。一直都想复仇。这绝对是报复行为。这必然会发生。

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毫不内疚，似乎还找到了急需的情感宣泄。“我们对此毫不隐瞒。我们还告诉所有人。当我们返回营地时，我们感到欢欣鼓舞。”[51]

最初，许多袭击事件被忽视甚至得到盟军士兵的鼓励。集中营的幸存者普遍感觉到，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他们得到自行其是的全权委托，但由于法律和秩序的存在，袭击德国人终将被禁止。例如，阿雷克·赫什（Arek Hersh）提到，“俄国人给了我们24小时，允许我们对德国人为所欲为”。[52] 哈里·施皮罗（Harry Spiro）是另一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解救的幸存者，他也记得，俄国人告诉他们，他们有24小时“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杀死德国人”。[53] 马克斯·德绍（Max Dessau）是一位在贝尔森被解救的波兰犹太人，他提到，英国人也会“给你一段时间，让你随意复仇”，但“当他们说够了，复仇就得停止”。[54] 美国人同样乐意让犯人自行其是。库尔特·克拉普霍尔茨（Kurt Klappholz）是一位在强迫行军期间被解救的波兰犹太人，他被一名美军中尉带到一名党卫队士兵面前，那名党卫队士兵已经被美军中尉打得鼻青脸肿，“美国人含糊地告诉我，‘这就是有份折磨你的人，你可以自己讨回公道’”。[55] 这些人都没有利用别人给予的机会，但很明显，还是有许多人愿意利用这些机会。

自然而然，随着时间流逝，绝大多数被释放犯人的情绪开始软化。当他们看见那些自封的所谓“优等民族”可怜兮兮的样子时，他们的复仇渴望也就消解了。例如，彼得·弗兰克（Peter Frank）曾经在诺德豪森被解救，战争结束时体重只剩下4英石 [56] 。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消灭整个德意志民族，这样就可以避免再发生同样的惨剧”。但当别人看见他身体过于虚弱、无力独自行走而把一名德国战俘分配给他作为“坐骑”时，他的怒火似乎变成不屑，最终变成怜悯。“可以说，他被分配给我，他是我的财产。他曾经向我抱怨，战争给他带来多少不幸，但他很快就学聪明了。我想说，他是个可怜的家伙，没理由向他报复……一旦你开始面对个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跟你一样是受害者，你就释然了。”[57] 阿尔佛雷德·胡伯曼（Alfred Huberman）是布痕瓦尔德和雷姆斯多夫的幸存者，他也同意弗兰克的看法。“当我刚刚被解救时，我认为德国应该从地图上被完全抹去。随着时间流逝，如果我遇到一个德国人，我会跟

他说什么呢？我不会说同情他，我会说请你凭良心做人。”[58]

然而，也有人的怒火无法迅速平息。他们认为，如果不对德意志民族采取认真的复仇，犹太人将永远不得安宁。有一个团体被称为“复仇者”，由前犹太游击队员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创立。这个团体暗杀了超过100名战争嫌疑犯，也曾经在一个关押党卫队员的监狱放置炸弹，炸死80名犯人。他们的行动哲学包括有意识地、无差别地袭击大量德国人，他们的复仇具有非人道性质，就是为了反衬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他们的口号是“一命抵一命”，按照团体成员加比克·塞德利斯（Gabik Sedlis）的说法，这句口号要表达的含义是“杀死600万德国人”。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策划了一次密谋，在五座德国城市的供水管道里投毒，但科夫纳本人因为试图把毒药从巴勒斯坦带回欧洲而被逮捕，这次密谋最终受挫。[59] 纽伦堡附近的俘虏收容所关押着1.5万名党卫队员，另一个后备计划就是在这1.5万人食用的面包里下毒，这个计划更加成功。至少有2000名德国犯人砷中毒，尽管我们不清楚最终死了多少人，甚至不知道有没有人因此而丧命。[60]

这些计划依赖于战后初期的混乱局面。大批难民的集体涌入，为这些复仇者提供了极好的掩护（正如难民潮为逃脱的战犯提供掩护一样），法律和秩序的严重缺失，意味着谋杀者不会被告发、不会被调查，甚至经常不会被注意到。然而，情况终究会改变，即使是“复仇者”也放弃了他们的复仇之梦，转而为将来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独立国家而斗争。[61]

或许，这能在某些方面解释为何犹太人的报复行动未能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起来。在大屠杀结束之初，绝大多数幸存犹太人病弱不堪，根本无法考虑任何积极的报复行动，活下来本身就已经算是反抗行动了。更重要的是，报复行动是由那些想要恢复某种道德平衡的人来从事的。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也许对于多数犹太人来说，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

他们决定彻底告别欧洲，逃往其他道德平衡更有保障的地区：美国、英国，最重要的是巴勒斯坦。因此，他们的报复心象征性地表现为集体离开欧洲，1945年年底，一位犹太作家解释道：

> 我们通过轻蔑、摒弃、谴责、疏远来报复我们的敌人……只有彻底远离这些谋杀者……我们才能在本质上满足我们的复仇渴望：结束我们在欧洲的放逐之旅，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建立我们的家园。[62]

巴勒斯坦给了犹太人希望，他们希望在那里建立犹太国家，从此不受迫害，因为他们能够做自己的主人。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逃出欧洲大陆，加入到犹太兄弟的队伍中，试图在以色列建立新家园。长远来说，犹太人已经对报复德国意兴阑珊，也对麻烦盟国心怀愧疚，毕竟盟国曾经让他们免于灭顶之灾。因此，复仇大任只能留给其他被纳粹迫害过的族群来完成。当然，欧洲并不缺少这种待机而动的族群。

---

[1]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p.889-90.

[2] 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88。另可参阅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p.892-3：维尔斯于1944年到访马伊达内克，见证人的骨灰被用作肥料.

[3]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896.

[4]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897.

[5] 参阅Arad，Yitzhak，*Belzec*，*Sobibor*，*Treblinka*：*The Operation Reinhard Deathcamp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p.368；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p.890-99。

[6] *Pravda*，11 and 12 August 1944，16 September 1944.另可参阅Rubenstein，Joshua，*Tangled Loyalties*：*The Life and Times of Ilya Ehrenburg*（London and New York：I.B. Tauris，1996），p.426 fn.82；Beevor，Antony

and Luba Vinogradova，*A Writer at War*：*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1945*（London：Pimlico，2006），p.281。

[7]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895；Rubenstein，Joshua，*Tangled Loyalties*：*The Life and Times of Ilya Ehrenburg*（London and New York：I.B. Tauris，1996），p.426 fn.82.

[8] Gilbert，Martin，*The Holocaust*：*The Fate of European Jewry 1932-1945*（New York：Henry Holt，1985），p.711.

[9] Vasily Grossman，"The Hell Called Treblinka"，in Ehrenburg，Ilya and Vasily Grossman（eds.），*The Black Book*，trans. John Glad and James S. Levine（New York：Holocaust Library，1981），pp.399-429.另可参阅Beevor，Antony and Luba Vinogradova，*A Writer at War*：*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1945*（London：Pimlico，2006），pp.280-306。关于数字，参阅Burleigh，Michael，*The Third Reich*：*A New History*（London：Pan，2001），p.650。美国大屠杀纪念馆认为数字介乎于87万至92.5万之间，可参阅their Holocaust Encyclopedia page for Treblinka at www.ushmm.org/wlc/article.php？lang=en&ModuleId=10005193，accessed 27 September 2011。

[10]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Holocaust Encyclopedia page on Auschwitz，www.ushmm.org/wlc/article.php？lang=en&ModuleId=10005189，accessed 27 September 2011.

[11] 关于纳粹大屠杀与苏联古拉格的详细对比，参阅Dallas，Gregor，*Poisoned Peace*：*1945-The War that Never Ended*（London：John Murray，2006），pp.456-68。

[12] 如可参阅Burleigh，Michael，*The Third Reich*：*A New History*（London：Pan，2001），p.752。

[13] *Pravda*，17 December 1944，引自Rubenstein，Joshua，*Tangled Loyalties*：*The Life and Times of Ilya Ehrenburg*（London and New York：I.B. Tauris，1996），p.220。

[14] *Pravda*，27 October 1944，引自Rubenstein，Joshua，*Tangled Loyalties*：*The Life and Times of Ilya Ehrenburg*（London and New York：I.B. Tauris，1996），p.426 fn.82。

[15] Anthony Eden speech to Parliament，17 December 1942，Hansard，series 5，vol.385，col.2083.

[16] TNA：PRO INF 1/251 Part 4："Plan to combat the apathetic attitude of 'What have I got to lose even if Germany wins？'"，25 July 1941.

[17] Roosevelt statement to reporters，24 March 1944，引自Beschloss，Michael，*The Conquerors*：*Roosevelt*，*Tr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1-1945*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2），p.59。关于美国人不愿意相信大规模灭绝，参阅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5-19；以及Marcuse，Harold，*Legacies of Dacha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53-4。

[18] Beschloss，Michael，*The Conquerors*：*Roosevelt*，*Tr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1-1945*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2），p.61.

[19]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 （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890.

[20]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 （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898.

[21] 参阅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3-4；testimony of Dr Fritz Leo，TNA：PRO WO 309/1696。

[22] 参阅*New York Times* ，5 December 1944；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5-10。

[23] Eisenhower，Dwight D.，*Crusade in Europe* （London：Heinemann，1948），p.446.

[24] Patton，George S.，*War as I Knew It*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47），pp.293-4.

[25] Patton，George S.，*War as I Knew It*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47），pp.293-4；另可参阅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7。

[26] Hackett，David A.（ed.），*The Buchenwald Report* （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5），pp.103，112-15.

[27] 引自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33。

[28] 引自Marcuse，Harold，*Legacies of Dacha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54。

[29] Marcuse，Harold，*Legacies of Dacha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54-5.

[30] 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92.另可参阅Percy Knauth’s description of Buchenwald in *Time*， 30 April 1945。

[31] Marcuse，Harold，*Legacies of Dacha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51，54.

[32] Buechner后来就此事件写成著作*The Hour of the Avenger* （Metairie，LA：Thunderbird Press，1986），此书因为歪曲事实和夸大德军屠杀人数而备受批评。参阅Jürgen Zarusky，“Die Erschießungen gefangener SS-Leute bei der Befreiung des KZ Dachau”，in Benz，Wolfang and Angelika Königseder（eds.），*Das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Berlin：Metropol，2008），pp.113-16，and Israel，David L.，*The Day the Thunderbird Cried* （Medford，OR：Emek Press，2005），pp.175-8.另可参阅www.scrapbookpages.com/dachauscrapbook/dachauliberation/BuechnerAccount.html，accessed 13 September 2011.

[33] 引自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94。

[34] Sington，Derrick，*Belsen Uncovered* （London：Duckworth，1946），pp.20-25，37；以及Lt Col.R.I.G.Taylor，引自Shephard，Ben，*After Daybreak* （London：Pimlico，2005），p.37。

[35] Sington，Derrick，*Belsen Uncovered* （London：Duckworth，1946），pp.49-50.

[36] Lt Col.M.V.Gonin，IWM Docs 85/38/1，typescript account，“The RAMC at Belsen Concentration Camp”（no date，c.1946），p.5.

[37] Testimony of Wilhelm Emmerich，“Interim Report on the Collection of Evidence at Belsen-Bergen Camp”，TNA：PRO WO 309/1696；figure of 18，000 given by Shephard，Ben，*After Daybreak* （London：Pimlico，2005），p.37.

[38] Testimonies in “Interim Report on the Collection of Evidence at Belsen-Bergen Camp”，TNA：PRO WO 309/1696.

[39] Testimonies in “Interim Report on the Collection of Evidence at Belsen-Bergen Camp”，TNA：PRO WO 309/1696，p.1.

[40] 引自Shephard，Ben，*After Daybreak*（London：Pimlico，2005），p.55。

[41] BSM Sanderson，援引自Major A.J.Forrest，IWM Docs 91/13/1，typescript memoir，ch.17，pp.5-6。

[42] Derek L.Henry，IWM Docs，06/126/1，typescript memoir，p.95.

[43] Spottiswoode speech from Movietone film，引自Shephard，Ben，*After Daybreak*（London：Pimlico，2005），pp.76-7。

[44] 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93.

[45] Israel Gutman，引自Gilbert，Martin，*The Day the War Ended*（London：HarperCollins，1995），p.391。

[46] Clay，引自Gringauz，Samuel，‘Our New German Policy and the DP’s：Why Immediate Resettlement is Imperative’，*Commentary*，vol. 5，no. 3（June 1948），p.510。

[47] Ben Helfgott，personal interview，19 May 2008.

[48] 引自Gilbert，Martin，*The Boys*（London：Phoenix，1997），p.252。

[49] Pinkus Kurnedz interview，IWM Sound，9737，reel 3.

[50] Szmulek Gontarz interview，IWM Sound，10348，reel 4.

[51] Alfred ‘Freddy’ Knoller interview，IWM Sound，9092，reel 12.

[52] 引自Gilbert，Martin，*The Boys*（London：Phoenix，1997），p.251。

[53] 引自Gilbert，Martin，*The Boys*（London：Phoenix，1997），p.256。

[54] Max Dessau interview，IWM Sound，9236，reel 4.

[55] Kurt Klappholz interview，IWM Sound，9425，reel 23.

[56] 约为25公斤。——译者注

[57] Peter Leo Frank interview，IWM Sound，16690，reel 4.

[58] Alfred Huberman interview，IWM Sound，18050，reel 6.

[59] Cohen，Rich，*The Avengers*（London：Jonathan Cape，2000），pp.191-217；塞德利斯的说法引自p.191；四号引自p.224.另可参阅Mankowitz，Zeev W.，*Life between Memory and Hope*：*The Survivors of the Holocaust in Occupied Germa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236-8；更为详尽的纪录参阅Elkins，Michael，*Forged in Fury*（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71），pp.193-249，他隐去了他访谈对象的名字.

[60] 按照《纽约时报》，24 April 1946，有2238名犯人患病，但无人死亡。其他作者声称这是美国官方杜撰的情节，希望以此掩盖自身的安保责任。参阅Cohen，Rich，*The Avengers*（London：Jonathan Cape，2000），p.212。

[61] Cohen，Rich，*The Avengers*（London：Jonathan Cape，2000），pp.221-38.

[62] Shlomo Frenkel，引自Mankowitz，Zeev W.，*Life between Memory and Hope*：*The Survivors of the Holocaust in Occupied Germa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39。

第十章 有限复仇：奴工

不难理解，考虑到犹太人经历过特别毛骨悚然的历史，集中营解放之后，犹太人肯定会置身于这出历史悲剧的舞台中央。但是，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大屠杀”（Holocaust）在很大程度上是追溯性的建构物。[1] 在当时，起码在盟国之间，对种族群体的区分并不严格，实际上，盟国经常故意混淆各族群，宁愿以其国籍来区分希特勒的受害者群体。面对这种普世劫难，像联合国善后救济署这样的救济机构，最初并未把犹太人视为特殊类别，而是把波兰犹太人与其他波兰人归为一类，把匈牙利犹太人与其他匈牙利人归为一类，以此类推。直至1945年9月，犹太人才赢得聚族而居的权利，并且由专门的犹太救济机构予以照顾。[2]

对于当时的许多盟军士兵和救济人员来说，他们开始时并未觉得犹太人比其他许多族群更加痛苦。毕竟，苦难无处不在。在遍布第三帝国的庞大的剥削和灭绝网络中，集中营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类型。战俘营星罗棋布地分布于东欧，在那里，数百万名苏联战俘只能被活活饿死。奴工营附属于所有主要的工厂、矿山、农场、工地。（例如，达豪集中营经常登上英法美三国报纸的头版头条，但达豪集中营只不过是一个系统中心，这个系统为巴伐利亚南部240个附属营地提供各国犯人。）此外，还有许多中转营地，据说只有在把犯人从一处移往另一处时才会被投入使用，但在战争末期，这些中转营地变成堆积被拘留者的场地。实际上，这些被拘留者被遗弃在带刺的铁丝网后面，缺少食物，缺乏照顾。还有关押孤儿和少年犯的特别营地，关押刑事犯和政治犯的惩罚营地。把这数千个由带刺的铁丝网包围的营地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恐怖图景”。[3]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在这些营地的待遇可谓千差万别。英美战俘经常收到红十字会寄来的包裹，能够得到合理的伙食，允许从事文化活动，意大利和苏联战俘则经常遭受毒打、过度劳累、饥饿至死。与之类似，法国劳工在“义务劳动服务”中偶尔会有报酬，通常伙食充足，波兰的“东方民工”（Ostarbeiters）则经常劳累至死，只留下累累白骨。即使在集中营内部，苦难也是分等级的，雅利安犯人承受的虐待，通常远远少于所谓的“劣等种族”，如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承受的虐待。

有人说，德国民众并未意识到这些外国人的存在，或者并未意识到这些外国人承受的困境，尽管许多德国人在战争结束初期还在狡辩，但这纯粹是胡扯。在高峰期，外国劳工构成德国20%的劳动力，在某些工矿企业，如兵工厂和飞机制造厂，这个比例经常达到40%，甚至更多。[4] 德国人跟这些外国人一起劳动，目睹这些外国人的待遇，实际上有许多德国人向这些外国人偷运食物，有些是出于好心帮助，有些则是为了顺手发财。

及至战争末期，绝大多数德国人对此心知肚明，而且他们害怕，一旦这数百万外国人被解放，就会找德国人算账。1944年年底，汉堡成立了一支特别紧急护卫队，以防范外国工人起义。在奥格斯堡，有传言说，新来的工人私藏武器。[5] 在柏林，有谣言说，外国人正在向敌人传递消息，将会成为德国境内的“特洛伊木马”。[6] 许多外国工人故意鼓动这种恐慌：法国战俘自嘲为进攻部队的“先遣伞兵”，波兰工人嘲笑德国人，胜利之后将会列出杀死哪些德国人的“名单”。[7] 考虑到存在于德国人与外国工人之间的害怕与怨恨的气氛，双方出现严重对抗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3.星罗棋布的德国集中营

奴工之复仇

几乎从盟军进入德国时起，反击就开始了。最初几天，进驻德国的英军、法军、美军都在报告中提到，被解放的外国人从事抢劫和骚乱等行为，但驻地部队无力制止。1945年4月初，英军民政事务委员会官员渡过莱茵河，其中鲁宾·塞登（Reuben Seddon）上尉说道："当地抢劫甚为猖獗。俄国人、波兰人、法国人以及当地平民都有生存权，抢劫活动必须停止，越早越好。"[8] 越往东去，情况越糟。派驻梅伦堡什未林镇的新任军政府首长说道："难民数千人成群结队，谋杀、强奸、抢劫，一句话，离开主要街道，法律荡然无存。"[9] 5月，在柏林，一个由上百名难民组成的帮会甚至在安哈尔特火车站抢劫了一列似乎从西边开来的火车。[10]

许多人将类似行为归于诸种因素，心情亢奋、发泄忧郁、痛恨纳粹

等。[11] 但被解放劳工的野蛮狂欢，让德国居民和盟国都感到害怕。多年以来，这些劳工备受虐待、脱离异性、食不果腹、滴酒未沾：许多人现在正好通过暴饮暴食、追求性爱来弥补逝去的时光，而不问代价为何。多年以来，劳动营都是男女分居，但很快就变成“大染缸”，人们“到处便溺”，开始公开“在营房里通奸”。[12] 4月11日，一位名叫德里克·亨利（Derek Henry）的工兵被调往明登郊外邻近诺德海默恩（Nordhemmern）的一处废弃劳动营，以维持法律和秩序，他描述了目睹的场景：

> 那里有男犯人和女犯人，当我们进入营房，他们围住我们。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在喝自制伏特加，个个都醉醺醺，他们还想灌我们喝，有些人正在通铺上公开做爱，有些人则是又唱又跳。他们极力想让我们加入，幸运的是我们手里还有步枪……这些难民住在肮脏污秽的环境中，他们的营房臭气熏天，但我们还不得不品尝他们的自制伏特加，他们把酒倒在桌上，然后点火燃烧，证明这些酒有多烈。

按照亨利的说法，后来，一位波兰犯人“把他的女伴让给我过夜，我婉言谢绝了这番好意”。[13]

在解放后出现的混乱中，酒精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在哈瑙，数百名俄国人喝了工业酒精，结果至少20人中毒身亡，超过200人半身瘫痪。[14] 在沃尔夫斯堡，数百名曾经在该市大众汽车工厂工作的劳工，先后闯入城市兵工厂和当地的苦艾酒厂。一名美军连长奉命来到此地，协助解除暴民武装，他回忆道：“某些人酩酊大醉，站在堤坝上或者屋顶上开枪，然后倒地不起。”[15] 当记者艾伦·穆尔黑德（Alan Moorehead）开车进入威悉河谷斯特耶贝格村时，他碰见村民和难民正在抢劫一处酒窖，里面放着“我见过的最好的葡萄酒”。那些人绝大多数喝到“疯疯癫癫”，他们打烂酒瓶，直至酒窖里遍地碎玻璃，流淌在地板上的1891年拉菲城堡红酒“淹到脚脖子”。[16]

某些最为野蛮的场景发生在汉诺威。在解放造成混乱的时候，数万

名曾是强迫劳工的暴民洗劫城市、抢劫酒店、焚烧房屋。当残余的德国警察试图干预时，警察被暴民淹没、殴打，最终被吊死在城中的路灯柱上。[17] 某些曾是强迫劳工的暴民包围德国平民，迫使德国人去做前几个星期他们被迫去做的事情，如掩埋被党卫队枪决的200名俄国军官，当德国人干活时，他们“就用棍子和枪托敲打德国人”。[18] 其他暴民则在城市里到处寻找妇女，在这些妇女的家里甚至街上强奸她们。一名驻扎此地的英国炮兵军官提到，一队喝醉的俄国人“找到一门被丢弃的88毫米炮，他们把炮拖出来，为了取乐，任意射击他们感兴趣的目标，比如高大的建筑，比如阻挡他们去路的房屋”。[19]

1945年6月，在盟军控制汉诺威10周后，英国战地记者伦纳德·莫斯利（Leonard Mosley）来到此地，发觉汉诺威仍然处于半混乱状态。新组建的军政府致力于恢复供电、供气、供水，从瓦砾堆中清理道路，招募一名德国市长，组建一支临时警察部队，但还是无法恢复任何法律和秩序。“问题太大了。面对超过10万名多年以来第一次尝到自由滋味的外国奴隶，没有任何临时拼凑的警察部队能够维持秩序。”[20]

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当军政府首长开车把莫斯利从市政厅送到数英里外的住所时，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在路上，车子被充斥街道的暴动者截停五次，即使是军政府首长兰姆（GvH.Lamb）少将也只能靠反复向天鸣枪来脱身。他反复告诉莫斯利：“这就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抢劫、斗殴、强奸、谋杀，真是个鬼地方！”[21]

在汉诺威，许多抢劫和暴力事件的发生，简直可以说是为暴力而暴力。在其创作的一篇最有现场感的对战后混乱的报道中，莫斯利描述了发生在城市外围一处仓库的一次疯狂抢劫：

> 曾经有人告诉我，当一个男人因为打家劫舍而脑子发热时，他会为了抢到东西而不惜杀人伤人，即使那件“东西”根本不值钱，在汉诺威，我终于证实了这种看法。我们看见一群人闯进仓库；这群大喊大叫的乌合之众，既有德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打破门窗闯进去，当

> 他们出来时，手上竟然捧着很多门把手！这是一家卖门把手的商店，在这座半数门板不复存在的城市里，这些人抢来的东西真是让我无言以对；然而，他们不仅抢这些门把手，而且还为这些门把手大打出手。他们又踢又抓，还用铁棍敲打那些拿着更多门把手的人。我看见一名外国工人绊倒一名女孩，从她手上抢过门把手，然后反复踢打她的面部和身体，直到女孩倒在血泊之中。然后，他冲到了大街上。走到半路，他似乎意识到什么；他低头看着自己抢来的东西，然后做出一个弃之如敝屣的动作，把那些东西全部扔掉。[22]

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天，这种景象简直是家常便饭。由于绝大多数德国警察要么已逃亡，要么被罢免，当地居民别无选择，只能向盟军士兵寻求帮助，但只是巡逻根本没用。在汉诺威，军政府让盟军战俘临时充当警察部队，但这些人对于警务工作毫无经验，而且他们本身也对当地的德国人充满敌意。[23] 所有的德国大城市都在招募德国警察，但招来的新人同样毫无经验。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盟军不允许德国警察携带武器，结果，与发起暴动的难民相比，与日益壮大的外国武装帮派相比，德国警察根本没有还手之力。[24]

一名英军中尉告诉我们的故事，足以说明，盟军士兵在面对当时高度紧张的局势时是何等软弱无力；足以说明，在曾经被纳粹侵犯的人与从未被纳粹侵犯的人之间，存在多么巨大的道德鸿沟。1945年5月，雷伊·亨廷（Ray Hunting）在韦瑟尔（Wesel）市附近一条宁静的乡间小路上行进，他目睹的一件事情，让他终生难忘。

> 我看见前面有两个人：一个正在前往韦瑟尔的俄国人，一个年老的拄着拐杖的德国人，老人正在缓缓向车站走去。当我们走近时，这两个人都停了下来，那个俄国人似乎在打听时间，因为老人正在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怀表。那个俄国人动作连贯地夺过怀表，把一柄长刀捅进德国老人的胸口。老人踉踉跄跄地跌入沟渠。当我们停下时，老人已经两脚朝天，裤管卷起，露出瘦弱惨白的小腿。
>
> 当我用左轮手枪顶住俄国人的肋骨时，他已经把刀抽出来，若无其事地用老人的大衣擦干刀上的血。当俄国人举高双手站在马路上时，我把手枪递给帕特里克，然后我跳进沟渠去帮助受害者。老人已经死了。那个俄国人，那只笨口拙舌的野兽，看着我跪了下来，但他

面无表情，亦无悔意。

我拿着刀和怀表，把他塞进货车后车厢，我坐在他对面，拿左轮手枪指着他。我们前往军政府办公室，想把他交给格鲁布上尉，但上尉出去了。我们把犯人带到兵营，让他接受苏联法律的裁决。

我揪住犯人的衣领，将其扔进领导办公室，提出谋杀指控，同时出示刀和怀表。其中一位自称行政长官（这个词的俄文意思与英文完全对应）的领导走上前来。

他笑着问我："你说这个男人杀了一个德国人？"我向他出示凶器。他走向一名同僚，从同僚的帽子上摘下红星帽徽，然后把帽徽别在谋杀者胸前，还亲吻了谋杀者的脸颊！这个杀害老人的杀人犯，戴着装饰品溜出房间，消失在数百座营房中。我再也没见过这个人。[25]

针对难民的军事管制

为了终止这种无政府状态，盟国军政府被迫在各自的占领区内推行激进措施。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把尽可能多的新近释放的囚犯和劳工集中起来，并且在严加看管的前提下将其遣返回国，此举一出，马上导致那些本来只想回国的人们的愤怒和恐慌。严格的宵禁开始实行，在某些区域开始时间甚至早至傍晚六点，任何夜间离开营地的人都将被逮捕甚至枪决。武力威慑经常是恢复秩序的唯一手段。例如，穆恩（A.G.Moon）少将在接管布克斯泰胡德军政府时，他马上通知当地难民中心的居民，任何人因为抢劫被逮捕，都会被枪决。结果，这个地区很少麻烦。[26] 后来，在8月，派驻德国西北部的英国军政府将枪决抢劫者定为官方政策。[27] 派驻黑森的美国军政府同样发出警告，任何因为食品短缺而发动暴乱者，都会被判处死刑。[28] 这些公告与纳粹当年发布的公告相差无几，实际上，就连确保公告得以实施的控制手段都似乎是一脉相承的。[29]

由于仍然滞留在德国的外国难民对法律和秩序构成明显威胁，盟国开始尽快遣返这些难民。关于优先遣返程序，当时引发了许多争议。英美战俘以及抵抗组织成员有权要求特别待遇。同时还要考虑苏联当局遣

返苏联公民的迫切要求，毕竟还有数千名被解放的盟军战俘被捏在苏联手中。还有人说，那些最不守规矩的难民应该首先被送回家，以重建法律和秩序。在已被摧毁殆尽的欧洲铁路系统上运送这些人，后勤保障就足以让人头痛，何况还有许多难民根本就不想回国。许多犹太人、波兰人、波罗的海人把自己视为无国籍人士，因此无家可归。其他族群，特别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南斯拉夫人，也不想被遣返，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一旦回家就会受到惩罚。许多人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但前路茫茫。

在等待遣返时，难民会被转送到大型留置中心，像过漏斗一样根据不同民族属性分配到遍布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难民营。这些营地要么曾经是军营，要么是城镇的某个隔离区。某些营地专门为收容难民而建造，但其他营地就是以前的劳动营甚至集中营。在房屋奇缺的欧洲大陆，盟军只能把所有能够找到的建筑物都派上用场。对于许多曾经当过囚犯的人来说，当他们被赶去驱除虱子、剃光毛发，当他们被送回他们最近刚刚逃出的集中营，他们自然会有些焦虑。[30]

无论是在当时的官方报告，还是在普通士兵写下的许多回忆录和日记中，我们都可以清楚见到，盟国当局对待难民比对待德国人更为警惕。在之后几个月里，他们开始担忧难民的怨恨和绝望情绪，毕竟这些难民还未被真正解放，他们继续生活在流放中，被严加看管，被军人统治。8月，英国开始在波兰难民中招募警察，以确保波兰难民遵守秩序，因为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盟军士兵去控制难民，而且德国警察又不被尊重。[31] 及至11月，英美两国都考虑要在“难民活动构成威胁”的地区重新武装德国警察。[32] 一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报告提到了在即将到来的冬季盟国面临的威胁，报告以平实的字句阐明盟国的担忧：“如果严寒的冬季影响难民的生存状况，难民很可能会比德国人制造更多的麻烦，与德国人不同，难民聚集在营地里，甚至拥有相当数量的武器。”[33]


4.德国、奥地利以及意大利北部的流民营地
北
北 海
波罗的海
英国占领区
荷 兰
苏联占领区
波兰
德
国
卢森堡
法国占领区
捷克斯洛伐克
美国占领区
法国
法国占领区
奥地利
匈牙利
瑞士
意大利
南斯拉夫
利古里亚海
亚得里亚海
0
100英里
0
100千米

这种报告也许有点危言耸听。联合国善后救济署派驻德国西部的负责人确实认为："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管辖下的难民（并不）比其他平民更具有暴乱迹象。"[34] 许多关于难民抢劫的所谓证据，事实上是德国人杜撰的。[35] 实际上，官方报告显示，即使在大批难民被遣返后，当地的犯罪率仍然长期高企。[36] 借用一名军政府军官的说法："难民是无家可归者，所有麻烦都被栽到难民头上。"[37] 此时战争已然结束，难民很可能被视为新的敌人。

"解放综合征"

考虑到难民解放后的处境，难怪他们最初的幸福感会迅速让位于幻灭感。玛尔塔·科尔文（Marta Korwin）是最早关注德国境内的大批难民的观察者之一，她是一位波兰社工，于1945年4月跟随英国军政府工作组进入博霍尔特（Bocholt）。根据她当时的对话和评估，许多人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幸存，是因为：

> 要抵消这种极端艰难甚至卑鄙可怕的时世，只能靠回忆过去的美好幻想，直到他们确信，等到被解放后，他们将会寻回战前那个幸福美丽的世界。他们过去所有的苦难都会被忘记，自由将会使他们重回那个毫无错误的世界……那是一个人人为善的天堂……到处都是美丽的家园。

但他们未能返回"天堂"，他们"被领进营地，在许多个案中，他们的境况甚至还不如解放之前"。更糟糕的是，长期关押让他们有机会反思，他们曾经梦想的天堂是否已不复存在：在废墟环绕中，他们只看到"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已经毁灭"。[38]

玛尔塔的观察结果被国际机构更大范围的研究结果所证实。1945年6月，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监督下的国际-盟国心理研讨会提交了一份难民心理状况报告。报告提到，许多难民在被解救时远远说不上高兴，而是气愤难平、敏感易怒。许多盟军士兵以为这些难民会心怀感激，但这种

期待同样落空：正好相反，难民“坐立不安”“无动于衷”“麻木不仁”，而且“对任何权威……心存疑虑”。实际上，许多难民变得如此愤世嫉俗，以至于“任何人的热心帮助都备受怀疑”。这种态度被某些盟国军官称为“解放综合征”。[39]

对于这种综合征的产生，盟国军队亦非无可指责。尽管在此前两年英美军队已经大力投入救济工作，但绝大多数军官还是把难民问题视为技术问题而非人道问题。他们把大批民众视为需要被管理、除虱、穿衣、喂养的对象，只要把这些民众按照国籍分类、分配有用工作、最终遣返回国，就算完成任务。及至1945年，所有盟国军队在处理这类工作时可谓得心应手。然而，他们并不擅长处理“人情世故”。当他们按照流程处理难民时，他们经常忘记自己面对的是深受精神创伤的人类。

人道工作者经常对军人处理难民问题时的愚蠢做法感到错愕。有一次，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一名英国雇员看见一名美军中尉在未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命令大批妇孺移动位置，她当场被激怒。她喝止那名中尉，她说道：“我讨厌军队。为什么你不去打仗？为什么你对着平民百姓呼呼喝喝？他们跟你不同，你以为你能够命令母亲、婴儿、病人移动位置，就像你在战时调动几个连或者几个排那样吗？为什么你就不能只插手你真正懂得的东西呢？”[40]

当难民人困马乏、无动于衷时，军队总是依靠强硬铁腕的武断手法让他们听命。例如，面对兰斯贝格犹太难民营的肮脏状况，一名美国军官建议“以强制训练手段”推行卫生规章制度。[41] 这些军官似乎无法理解，军事纪律可以把征召而来的士兵塑造成军人，却无助于使大屠杀幸存者从长期的被侮辱和虐待中恢复身心。

与之类似，1945年9月，在对维尔德弗莱肯的波兰难民营进行过几次突击检查后，美国将军下令在营地执行军事纪律。从此以后，任何在大街上扔垃圾、在大树上晾衣服、在房子里收垃圾的难民，都会马上被

关禁闭。任何拒绝工作的波兰人都会被逮捕，营地里所有妇女都要马上接受性病检查。民主选举的波兰营地委员会应被解散，每两星期遣返1500名波兰人，必要时可动用武力，遣返程序应马上启动。[42]

不用说，这种法令肯定会引起强烈反感：多年以来，纳粹就是这样对待这些难民的，他们最不愿意得到的就是这种待遇。维尔德弗莱肯一名营地负责人嘲讽道："军队从事救济工作的能力，很难说得上是一流啊。"[43]

善后与救济

盟国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军事组织并非从事这类工作的合适主体。正因如此，对难民进行日常照顾的责任从军队手中移交到战时成立的国际人道机构手中，这个机构就是联合国善后救济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UNRRA）。这个机构成立于1943年，负责在欧洲绝大多数解放地区协调和分配食品及药品援助。最初，其援助范围仅限于巴尔干半岛居民，及至1945年春天，其援助范围扩大到欧洲其他地区，特别是东欧地区。其中一项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为遍及欧洲大陆的难民协调福利。

1945～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署侧重于照顾数百万难民的需要，他们暂住在遍布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难民营中。难民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社会需要、情感需要。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核心观点是，难民不仅需要食物、住所、药物，还需要咨询、教育、娱乐，甚至需要政治生活。这不仅是为了将难民的精力引向正途，而且希望通过这些行动，重塑他们的人格，重拾他们的尊严。

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职员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个"自助助人"计划。[44
首要任务就是在绝大多数难民营中建立学校。这不仅是为孩子提供他们曾被剥夺的教育，而且是为他们提供一种建设性的、常态化的感觉，有

些大孩子甚至还是第一次上学。根据一份美军的报告，1946年4月，难民学校的出勤率甚至高达90%。童子军组织和青少年俱乐部同样大为普及，因为这些组织能够让孩子远离遍及某些营地的不健康的、侵略性的、不道德的氛围。[45]

职员们还鼓励难民建立自己的教会和教团，以免人们误入歧途，同时为意志消沉的男女提供更为急需的精神抚慰。官员们不遗余力地提供新闻纸，让难民能够发行自己的报纸，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对这些报纸不进行任何审查。文化活动如音乐和戏剧都受到鼓励，成人教育也受到鼓励。难民制订了自己的学徒计划，甚至在慕尼黑开办了一所难民大学。[46]

从一开始，盟国军队和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就尝试鼓励难民营自治，绝大多数营地都举行了选举，难民还建立了自己的法庭和警察部队，以应对不稳定因素。这些营地机构也不总是值得信赖。例如，在维尔德弗莱肯的波兰人营地，联合国善后救济署职员留意到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场景，营地议员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承诺取缔贩卖烈酒、牛肉、鸡肉的黑市”，但他们就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上面摆满了烧烤的牛肉、鸡肉以及白兰地酒瓶。[47] 某些营地成立的极端组织也让人担忧，尤其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团体。但营地职员认识到，控制犯罪和极端行为几乎总难奏效，重要的是赋予难民某些他们在苦难中丢失的东西：正义感和自尊心。

不幸的是，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慷慨总是被滥用。难民经常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署提供的物资，把营地变成黑市交易的中心。在维尔德弗莱肯营地，因为卷入腐败行为，波兰警察部队被彻底解散和轮换，而且在最初的18个月里，它不止被解散一次，而是被解散五次。[48] 盗窃、敲诈、私酒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开始把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首字母缩写（UNRRA）戏称为“你从不真正救济任何人”（You Never Really Rehabilitate Anyone）。[49]

正因如此，这个机构开始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者。批评声此起彼伏。派驻德国的英国军政府首长、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一开始就认为联合国善后救济署“非常不称职”，他之所以愿意移交照顾难民的责任，只是因为军政府无力继续承担英军从事的财政救济工作。美国政治家同样怒不可遏，毕竟他们为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划拨了几乎3/4的财政预算，但这个组织的挥霍、浪费、腐败令人忍无可忍。某些政治家甚至指责这就是“一出国际闹剧”，其主要目的不是救济难民，而是为共产党这样的“政治军事团体提供养分”。[50]

尽管有诸多不足，但联合国善后救济署还是得到了难民的衷心喜爱。联合国善后救济署职员通常是这些难民遇见的第一批非暴力的外国人，他们还提供了许多难民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同情。这个组织知道，友好和共鸣，有时同样能够阻止昔日的强迫劳工走上复仇之路，也许这是军人不会明白的。

最容易明白这种道理的也许是孩子，正是在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管理的难民营里，许多孩子第一次感觉到光明的未来。在欧洲大陆，许多孩子都害怕看见身穿制服的男人，但法国孩子看见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制服时的表现就很能说明问题。伊薇特·鲁宾（Yvette Rubin）是一位13岁的犹太女孩，她曾于1942年被送往德国。三年后，在目睹许多恐怖事件包括母亲被残忍杀害后，她回到了巴黎。回到家中，她向家人讲述自己的恐怖经历，只有在注意到叔叔穿着的衣服时，她的双眼才重现光彩：

> 叔叔，你不是士兵。你是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职员。我知道他们。在被英国军队解救后，我跟他们生活了超过两个星期。他们很好。他们拯救了我的生命。我当时患上斑疹伤寒，是他们治愈了我。他们给了我食物，还给了我现在穿的这身衣服……我很爱他们。他们是我第一次碰见的好人。[51]

个人权力问题

很难弄清楚，怎样才能最好地概括战后德国境内那些被解放的强迫劳工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行为只不过是席卷欧洲大陆的不法行为的极端形式。然而，他们的动机不仅仅是犯罪。经过多年压抑，他们把暴力、酗酒、放荡视为自我表达的合法而迟到的方式。他们的行动也有强烈的愤怒因素。许多人相信，一定数量的抢劫甚至暴力可被视为讨回公道的方式。他们渴望集体报复，也许更准确的描述是“复仇”。

在彼此冲突的情绪混乱中，所有这些动机纠结在一起，甚至难民自己也未能理解。人道组织如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些动机都可以归结为个人权力问题。在战争苦难中，许多强迫劳工被侮辱、被虐待：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严厉管束，这种管束有时长达数年。他们长期被剥夺任何形式的权力，而解放让这种状态走向另一个极端：在短暂的时间里，他们不仅自由自在，而且被允许为所欲为。如果说当时他们失去了自制力，那么这经常只是因为他们能够如此，重新发掘的权力意识使他们欣喜若狂。借用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心理学报告的说法：“刹车已然松开。”[52]

当某些军事机构试图重新以强力手段遏止这种暴力能量时，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的官员宁愿还给这些人某种平衡。他们的政策是让难民自己管理自己，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要开明得多：付出无限时间，划拨无限预算，宁愿救济个人，而非强调纪律。在战后的混乱状况中，这也有点理想主义。营地居民流动频繁，以至于看不到这些计划的成果，个人深受创伤，职员照顾不来。在许多个案中，特别是在战后初期的个案中，把权力还给难民只会增加他们复仇的机会。结果，在授予难民责任与约束难民行为之间，联合国善后救济署职员只能艰难地走钢丝。

在解放初期过后，如果被解放奴工的报复行为并未大范围发生，那主要是因为德国境内的难民从未真正地掌握权力。如果像欧洲其他地区那样，让难民负责管理营地，让德国人成为囚犯，情况可能会有所不

同。

事实上，唯一能够真正支配德国、在某种环境中实际拥有绝对权力的，是盟国军队。在战后，比难民更有机会复仇的，正是占领国的军队。

从那时起，盟军士兵及其指挥官如何对待这种复仇机会，就已成为具有争议性的话题。

---

[1] Novick，Peter，*The Holocaust and Collective Memory*（London：Bloomsbury，2000）.

[2] 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p.245-6.

[3] 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61.

[4] 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London：Penguin，2007），p.517.

[5] Beck，Earl R.，*Under the Bombs*（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6），p.164.

[6] Kardorff，Ursula von，*Diary of a Nightmare*：*Berlin 1942-1945*，trans. Ewan Butler（London：Rupert Hart-Davis，1965），pp.152-3.

[7] Beck，Earl R.，*Under the Bombs*（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6），p.143.

[8] Major R.C.Seddon，IWM Docs 95/19/1，typescript diary，entries for 6 and 12 April 1945.

[9] Major A.G.Moon，IWM Docs 06/126/1，typescript memoir，p.46.

[10] Botting，Douglas，*In the Ruins of the Reich*（London：Methuen，2005），p.282.

[11] 如可参阅Major A.J.Forrest，IWM Docs 91/13/1，typescript memoir，

ch.16，p.4；ch.18，pp.11-12。

[12] Bernard Warach，UNRRA welfare officer，引自Wyman，Mark，*DPs*：*Europe's Displaced Persons*，*1945-1951*（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p.38。

[13] Derek L.Henry，IWM Docs 06/126/1，typescript memoir，pp.92-3.

[14] Mrs M.Heath，Welfare Officer of DP centre at Hanau，IWM Docs 98/25/1，manuscript diary，entry for 7 May 1945.

[15] David Campbell of 180th Engineers，引自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72。

[16] Moorehead，Alan，*Eclipse*（London：Granta，2000），pp.241-2.

[17] R.J.Hunting，IWM Docs 10519 P339，typescript memoir，p.368；Mosley，Leonard O.，*Report from Germany*（London：Gollancz，1945），p.72.

[18] Major A.J.Forrest，IWM Docs 91/13/1，typescript memoir，ch.18，p.7.

[19] Major A.J.Forrest，IWM Docs 91/13/1，typescript memoir，ch.17，p.6.

[20] Mosley，Leonard O.，*Report from Germany*（London：Gollancz，1945），p.80.

[21] Mosley，Leonard O.，*Report from Germany*（London：Gollancz，1945），p.69.

[22] Mosley，Leonard O.，*Report from Germany*（London：Gollancz，1945），pp.69-70.

[23] Mosley，Leonard O.，*Report from Germany*（London：Gollancz，1945），pp.73，80，81.

[24] Davidson，Eugene，*The Death and Life of Germany*：*An Account of the American Occupation*（London：Jonathan Cape，1959），p.54.

[25] R.J.Hunting，IWM Docs 10519 P339，typescript memoir，pp.378-9.

[26] Major A.G.Moon，IWM Docs 06/126/1，typescript memoir，p.34.

[27] TNA：PRO FO 945/595，General Montgomery telegram to Foreign

Office，6 August 1945.

[28] Undated newspaper clipping kept by Katherine Morris："Death warning to food rioters：U.S.may invoke military law"，IWM Docs，91/27/1.

[29] Major A.G.Moon，IWM Docs 06/126/1，typescript memoir，p.34.

[30] 关于难民营的类型和状况，参阅Wyman，Mark，*DPs*：*Europe's Displaced Persons*，*1945-1951*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pp.38-60。关于1946以后的状况，参阅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Bodley Head，2010），pp.267-99。

[31] TNA：PRO FO 371/47719，telegram C-in-C Germany's political adviser to Foreign Office，11 August 1945.

[32] TNA：PRO FO 1005/1631-"Report on life in Germany during October 1945"，p.3；and 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 （London：Faber & Faber，2009），p.279.

[33] TNA：PRO FO 1032/1933-JIC report，"Possible dangers to the occupying power during the coming winter"，29 November 1945.

[34] Lt Gen.Frederick Morgan to Foreign Office，IWM Docs 02/49/1.

[35] 如可参阅Moorehead，Alan，*Eclipse* （London：Granta，2000），p.240；Botting，Douglas，*In the Ruins of the Reich* （London：Methuen，2005），p.46；Andreas-Friedrich，Ruth，*Battleground Berlin*：*Diaries 1945-1948*，trans. Anna Boerresen（New York：Paragon House，1990），p.43。

[36] 如可参阅TNA：PRO FO 1005/1631-"Report on conditions in Germany during May 1946"。

[37] Major A.G.Moon，IWM Docs 06/126/1，typescript memoir，p.69。

[38] 引自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Bodley Head，2010），pp.68-9。

[39] 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 （London：Faber & Faber，2009），p.252。这些观察结果得到军界人物的支持，可参阅Coles，Harry L. and Albert K. Weinberg（eds.），*Civil Affairs*：*Soldiers Become Governors* （Washington，DC：US Govt Printing Office，1964），p.858。

[40] Wilson，Francesca，*Aftermath*：*France*，*Germany*，*Austria*，*Yugoslavia*，*1945 and 1946*（London：Penguin，1947），p.131.

[41] 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332。

[42] 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167；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p.275-6.

[43] Kay Hulme，引自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167。

[44] UNRRA mission statement，according to Kay Hulme，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167。

[45] Wyman，Mark，*DPs*：*Europe's Displaced Persons*，*1945-1951*（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pp.99-104.

[46] Wyman，Mark，*DPs*：*Europe's Displaced Persons*，*1945-1951*（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pp.117-21.

[47] Kay Hulme，引自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166。

[48] Kay Hulme，引自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p.173，204.

[49] Kay Hulme，引自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143.

[50] Kay Hulme，引自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p.152-4.另可参阅Acheson，Dea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Norton，1969），p.201；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216。

[51] Yvette Rubin story related by Jean Newman，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p.248-9。

[52] 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 （London：Faber & Faber，2009），p.252。

第十一章 德国战俘

战时最为恶劣的暴行，通常并非发生在战斗期间，而是发生在战斗之后。一名士兵可能会因为替战友报仇而勇猛作战，但面对已被打败的、解除武装的、任人发落的敌人，他可能会更加凶残。当一名士兵负责看管战俘时，他可以为所欲为，而他的敌人只能坐以待毙。

为了防止士兵滥用权力，国际社会于1929年草拟了《第三次日内瓦公约》（*Third Geneva Convention* ），公约不仅禁止虐待和羞辱战俘，而且规定战俘应被收容、喂养、照顾。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冲突各方都对这些规定置若罔闻，以至于公约成为一纸空文。德国军队处决、羞辱、饿死战俘，在东线更是如此，而当攻守形势逆转时，对方渴望以同样的手法对待德国战俘，就不足为怪了。

在温斯顿·丘吉尔的多卷本战争回忆录里，他提到的一段往事能够说明当时对待战俘的普遍心态，由此可知复仇倾向甚至触及最高领导层。这件事情发生在1943年年底，“三巨头”在德黑兰第一次会面时。会议第二天，丘吉尔与斯大林和罗斯福共进午餐，斯大林提出祝酒，预祝铲除“至少5万名，也许10万名德国军官团成员”。丘吉尔清楚地知道，战争初期，苏联曾经在卡廷（Katyn）集体枪决波兰军官，丘吉尔对这句祝酒词感到恶心，因此直言不讳地提出英国人从不容忍集体处决。当斯大林再三坚持“必须枪毙”5万人时，丘吉尔终于忍无可忍，他说：“我宁愿自己被拖出花园枪决，也不愿意我自己以及我的国家为此蒙羞。”

罗斯福试图缓和气氛，但明显不得要领，罗斯福插话道，或许可以少枪决一些人，例如只枪决4.9万人。很明显，罗斯福以为这只是个笑话，但考虑到罗斯福同样知道斯大林的斑斑劣迹，这句插话显得很不得体。丘吉尔还未回答，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Elliot）马上接过了话

头。埃利奥特当晚也出席了晚宴，他急于打圆场。埃利奥特对斯大林说："您看，我们的军队开始从西线推进，而你们的军队正在从东线推进，我们终究会解决所有问题，不是吗？俄国、美国、英国的士兵将会在战场上解决这5万人，而且我希望，不仅这5万战犯会被解决掉，而且数十万纳粹党徒都会被解决掉。"

听到这句话，斯大林显得兴高采烈，拥抱了埃利奥特，并且与他碰杯。丘吉尔面露不悦，他说道："埃利奥特，我也同样爱你，但我无法原谅你发出如此懦弱的声明。你怎么能说这番话呢！"丘吉尔起身告辞并大步走出房间，把斯大林及其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托洛夫（Vyacheslav Molotov）晾在那儿，丘吉尔以此表明自己太过较真，而在座诸君都"太过儿戏"。[1]

这段轶事被许多历史学家反复传诵，并且从中引出各种解读，比如斯大林的冷酷无情、罗斯福的天真幼稚，以及丘吉尔与另外两位领袖相比愈益软弱无力。[2] 罗斯福总统的言论最能说明问题，因为他最为漫不经心。罗斯福似乎真的被处决5万名德国俘虏的念头迷住了，因为一年以后，当三巨头在雅尔塔再次聚首时，正是他首先提出这段旧话。[3] 如果人们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罗斯福的言论，再考虑到众所周知的总统对德国人的偏见，那么他已经开始表现得与斯大林一样冷酷无情了。

1945年对德国战俘的处理方案始终具有极大争议，因为它动摇了盟国声称为之而战斗牺牲的那些价值观念。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讨论的话题与所谓的解放完全背道而驰：数百万的欧洲人不是被释放，而是被禁锢；成千上万的欧洲人不是被拯救，而是被引向死亡。丘吉尔总是高瞻远瞩，深知此事不可轻率。这个决定，不仅对于被释放的、要复仇的奴隶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领袖同样至关重要。

战争结束后，德国俘虏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谁将他们俘虏。无论他们的无助是会博得同情、招致轻视，还是换来冷眼，都不只是运气的问

题，它取决于不同盟军、不同军阶的普遍态度。

美军管辖的战俘

战争期间，超过1100万名德军士兵成为盟军的俘虏。考虑到俄国战线一系列战役的巨大规模，人们可能会以为，绝大多数俘虏都是苏联抓获的，实际上，苏联红军抓获的俘虏只占1/3，即315.5万人。更多俘虏是被美军（大约抓获380万人）和英军（抓获370万人）抓获的。甚至法国军队都抓获了将近25万人，尽管法国军队参与抓俘虏还不到一年，而且法国军队的规模相对较小。[4]

这些悬殊的俘虏数字，与其说是因为苏军不够英勇，不如说是因为德军害怕苏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德军士兵想方设法避免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许多作战单位在本该投降的情况下，还是坚持作战了很长时间，因为他们害怕，如果落在苏军手中，还不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其他作战单位则是竭尽全力逃离东线，只求向英军或者美军投降。对于德国军队来说，就连投降都有优先选择，已是全军上下的共识：德军总参谋长阿尔佛雷德·奥古斯特·约德尔（Alfred August Jodl）将军在抵达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签署投降协议时，他还故意拖延了两天，好让德军部队抓紧时间向西杀出一条血路。[5] 在南斯拉夫，德国人和克罗地亚人拒绝了于5月8日投降的指令，向奥地利边境边打边退，又坚持了一个星期之久。[6] 于是，在战争末期，有数量惊人的士兵向西方盟军投降，仅仅在1945年4月和5月，美军就俘虏了大约180万人，而在东线，俘虏人数并没有相应地增长。[7]

大批德军士兵向西方盟军投降，让英军和美军感到极为意外。作为临时措施，英美盟军把这些俘虏收容在德国西部的16个大型关押区，统称为“莱茵牧场营地”（Rheinwiesenlager）。绝大多数营地都可以容纳10万人，但在当时，由于俘虏太多，许多营地都被迫严重超员。例如，超过11.8万人勉强被塞入辛齐希（Sinzig）关押区，而雷马根（Remagen）

关押区的人数很快超过13.4万人，某些规模更小的营地就更加拥挤了。例如，波尔（Böhl）关押区能够容纳1万人，但收容了超过3万人。[8] 显而易见的是，盟军必须尽力应对，盟军指挥官之间大批的往来备忘录都提到需要尽快提供额外资源。[9]

学术机构和德国政府于战后收集的老照片和口述史，让我们得知这些俘虏的状况。[10] 这些营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营地”，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帐篷或者棚屋：那里只是带刺铁丝网环绕的荒郊野地。俘虏没有栖身之所，而且只能日复一日地生活在野外。一名俘虏在莱茵堡（Rheinberg）关押区用厕纸写下了大量日记，他写道：“我通常就躺在地面上。”

> 天热的时候，我就爬进地洞。我穿着大衣和靴子，并把便帽拉下来遮住耳朵；我的战地背包里装着汤匙和叉子，并把背包当枕头用。在一次暴风雨期间，地洞边的土墙倒在我身上。我的大衣和袜子都湿透了……我们在这种没有住所、没有毛毯、没有帐篷的日子里还要过多久呢？曾经，每名德军士兵都有遮风挡雨的住所。就算是狗，下雨时也有个狗窝可以爬进去吧。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在被关押了六个星期之后，能够有瓦片遮头。就算是原始人都比我们住得好。[11]

在缺乏住所的同时，他们还缺乏毛毯或衣物。俘虏只能穿着他们被俘虏时的衣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还被剥夺了标准的随军装备。他们通常“身无长物，没有大衣，没有帽子，没有夹克，在许多情况下，只穿着平民的衣服和普通鞋子”。在海德斯海姆（Heidesheim），有许多14岁的孩子，只能穿着睡衣。他们也曾经在半夜被抓去充当“狼人”（Werewolves），即最后的狂热抵抗者，然后还穿着睡衣就被送进了营地。[12]

如果说缺乏衣物和住所已经足够可怕，那么，缺乏卫生设施也同样可怕。俘虏没有地方洗漱，只有少数地沟用来充当厕所。按照那些被关押在莱茵堡的俘虏的说法，营地“只有一条大阴沟，大家都蹲在阴沟旁边拉屎”。巴德-克罗兹纳赫（Bad Kreuznach）营地有些角落是“名副其

实的小便海洋”，德军士兵还被迫在那里睡觉。厕纸如此短缺，以至于俘虏经常使用德国钞票来擦屁股，对于这种做法，没有多少俘虏会大惊小怪，因为已有传言说德国货币将不再流通。[13]

他们最担心的是缺乏食物。俘虏过分集中意味着如果按照雷马根营地最初的每日定量，那么每25个人才能分得一条面包。这个定量后来提高到每10个人一条面包，但还是不足以维持生命。在巴德-克罗兹纳赫，面包断供长达六个星期，所以当面包最终运抵时引发了一场骚动。在此之前，那里的每日定量只是“三匙蔬菜、一匙鱼、一到两片西梅干、一匙果酱、四到六片饼干”。在巴德-赫斯菲尔德（Bad Hersfeld），俘虏每天只靠800卡路里的热量维持生命，最后每5个人就有1个人“骨瘦如柴”。为了补充这点可怜兮兮的热量，俘虏被迫在营区里寻找可以食用的杂草，还有人借助营区里随处可见的点点营火焚烧荨麻和蒲公英来熬汤。许多人靠罐头壳在地里挖芜菁，他们挖出来就生吃，结果营区里爆发了痢疾。[14]

缺乏水源才是更大的问题。坦克修理工乔治·韦斯（George Weiss）说道：“在长达三天半的时间里，我们完全没水用。”

> 我们只好喝自己的尿。味道很难闻，但那又怎样？有些人趴在地上舔地面，就是为了湿润一下喉咙。当我们得到一点点饮用水时，我已经太过虚弱，跪在地上起不来了。我想，如果没有那点水，我可能已经死了。但是，莱茵河就在铁丝网外面。[15]

在巴德-克罗兹纳赫，只有一个水龙头，却要供5.6万人饮用，盟军只好每天用卡车把水运到营地各处。在布德瑞（Büderich），五个水龙头供7.5万名俘虏饮用，但只在每天晚上放水一小时。当营地的美军指挥官被人问道，为何俘虏要承受如此不人道的待遇时，据说他如此回答：“这样他们就会永远失去当兵的乐趣。”[16]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这种营地里死亡率甚高，尤其是那些在战斗中

受伤未愈、筋疲力尽的人死亡率更高。但至于死亡率到底有多高，则始终充满争议。在极具争议的著作《其他损失》（*Other Losses* ）中，詹姆斯·巴盖（James Bacque）认为罗斯福那个无聊又无趣的、杀死德国人的玩笑，表明了充斥美国行政当局的复仇风气。巴盖声称，有80万名德军俘虏死于美军关押期间，这个数字足以让美军的复仇行为与苏联和纳粹的战争暴行相提并论。与巴盖的其他研究成果一样，由于数字高得惊人，好几个国家的学术机构都不予采信。[17] 官方数字只不过是巴盖数字的1/160：按照埃里希·马施克（Erich Maschke）为主席的德国政府委员会的说法，估计只有4537人死于莱茵牧场营地。[18] 其他学术机构估计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尤其是在考虑到时局混乱根本不可能有精确记录的情况下。但人们普遍同意，死亡人数不可能超过5万～6万人。[19]

这并不意味着巴盖描述的大范围死亡从未发生，而只能说明巴盖在错误的舞台上展现了这些数字。一如既往，真正恐怖的事情，不是发生在西方，而是发生在东方。

苏军管辖的战俘

如果说被西方盟军关押的俘虏处境糟糕，那么，在东线被关押的俘虏处境简直糟糕透顶，实际上，糟糕到东西方之间的对照几乎毫无意义。关押在莱茵牧场营地的战俘经历过的一切，在苏联建立的战俘营里也同样发生，只是范围更大、时间更长。此外，德国俘虏通常被迫走向关押地。这种“死亡行军”经常持续一周甚至几周，在此期间，俘虏通常得不到食物和水。

苏联在战时抓获了300万名俘虏，超过1/3死于关押期间。在南斯拉夫，情况还要更糟糕：大约8万名俘虏被处决、被饿死，或者因为缺医少药和强迫行军而死，大约每5名俘虏就会死掉2名。只要看看表1（见本书第140页），就能明白，为何德军士兵如此害怕落入苏联红军或者

红军游击队手中。在东线被抓获的俘虏与在西线被抓获的俘虏，前者比后者死亡率高出90倍。

东线战俘死亡率如此之高，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资源更为短缺。战争期间，苏联及其盟友严重依赖西方国家供应的食物和物资，可想而知，他们会把这些紧缺资源用于自己的同胞，尤其是自己的军队，最后才会把剩余的少量物资用于喂养俘虏。若论交通设施和基础设施的破坏程度，东线也比西线严重得多，而且在东线，行进距离也要遥远得多。数以万计的轴心国俘虏就死在穿越辽阔的苏联和东欧土地的路上。只要人们想想俄国的冬季多么严寒，就能理解为什么在苏联营地里死于露天的俘虏会比西线营地多得多。但是，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如此众多的德军俘虏死于苏联关押期间，主要原因是看管他们的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对德国以及德国人的绝对仇恨，已经成为战时苏联社会的一大特色。早在1945年春天，苏军士兵就已接受最为尖锐的仇恨宣传，这种宣传极尽所能妖魔化德国以及德国人。苏联军队报纸《红星报》刊发了阿列克谢·苏尔科夫（Alexei Surkov）的诗歌，标题为《我恨》，最后一行写着“我想勒死每个德国人”。[20]《真理报》印发了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的诗歌，标题为《杀死他！》。这首诗发表在攻陷伏罗希洛夫格勒[21]当天，它劝告俄国士兵：

> ……杀死一个德国人，尽快杀死德国人，只要看见德国人，就去杀死德国人。[22]

其他作者如米哈伊尔·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和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也都写过尖刻辛辣的故事和报告，以求增长苏联国内对德国所有事物的仇恨。但在苏军士兵心目中，正是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占据了特殊位置。爱伦堡在《红星报》上发表的颂歌被反复印行，以至于绝大多数士兵都能熟记于心。

> 德国人，非人类。于我而言，从此时起，“德国人”，如同诅咒。从此时起，“德国人”，伤我至深。我们不应振奋。我们应行杀戮。如果你一天未能杀死至少一个德国人，那么你就浪费了这一天……如果你不能用子弹杀死德国人，请你用刺刀杀死德国人。如果你的战线沉寂，如果你在等待战斗，请你杀死德国人……如果你已杀死一个德国人，请你再杀死一个德国人——人生最痛快之事，莫过于让德国人的积尸成山。[23]

在爱伦堡笔下，德国人并非人类，是永恒的主题。早在1942年夏天，他就写道：

> 人类可以承受任何痛苦：瘟疫、饥饿、死亡。但人类受不了德国人……只要这些灰绿色爬虫还活着，我们就无法生存。今日，世上无书；今夜，天上无星；今天，只存一念：杀死德国人。杀光德国人，埋入地底下。[24]

这里所说的“灰绿色爬虫”，有时会指蝎子、传播瘟疫的老鼠、疯狗甚至细菌。[25] 正如纳粹宣传曾经把斯拉夫人贬斥为“劣等种族”一样，苏联宣传也把所有德国人贬斥为害虫。[26]

这种作品的嗜血腔调，与其他国家的类似作品并无明显差异，如菲利普·维阿内（Philippe Viannay）也极力催促人们在沦陷的法国杀死德国人、通敌者、伪警察。[27] 但与绝大多数法国人不同，苏联人有能力将自己的言语大举付诸实行。经常有人指出，这种宣传是苏联红军进入德国后“杀戮狂欢”的主要原因。[28] 但在很大程度上，这还是应该归咎于被俘德军士兵在战时的所作所为。因为德国人对待俘虏毫无人性，俄国人就认为自己有权“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无数德国人刚刚投降就被射杀，尽管上级下达的命令是禁止射杀俘虏，但还是有无数德国人被醉酒的苏联红军士兵杀死，他们认为复仇也是庆祝胜利的方式。有时候，苏军士兵随手射击德军俘虏以取乐，一如德军在1941年对待苏军俘虏的做法。[29] 在南斯拉夫，德军俘虏同样会因为微小过失而被射杀，杀人的理由还包括想要俘虏的衣服和装备，想要复仇，或者想要练练手。[30]

我们应该记住，不仅德军士兵为此付出了代价，尽管德军俘虏肯定数量最多，苏联红军还俘虏了7万名意大利人，他们当中许多人有去无回。[31] 在东线，超过30.9万名罗马尼亚士兵下落不明，至于有多少人活下来最终成为俘虏，至今不得而知。[32] 并非所有俘虏都是战斗人员，实际上，官方统计经常分不清平民与士兵。战争结束后，至少60万名匈牙利人被苏联红军掳走，其中既有平民又有士兵，而理由仅仅是他们生不逢地，他们都被送到了遍布苏联各地的劳动营。[33]

这些无助的俘虏承受的屈辱，与纳粹德国的强迫劳工经历的屈辱同样糟糕。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被抢劫。苏军士兵最看重手表、结婚戒指以及其他贵重物品，但成群结队的抢劫者夺走了俘虏的装备甚至军装。托特·佐尔坦（Zoltan Toth）是一名匈牙利医生，1945年2月，布达佩斯被攻陷后他成为俘虏，他写道："穿马靴的人最倒霉，如果俄国人发现俘虏穿着有用的靴子，他们就会让俘虏站出队列，向俘虏头部开枪，然后扒下俘虏的靴子。"[34]

抢劫俘虏仅有的财物只不过意味着剥夺时期的开始，他们最终会有1/3的人死于非命。更有甚者，这种剥夺经常是刻意为之。如果说美军管辖的俘虏得不到足够食品定量通常是因为供应不力，那么，恰成对照的是，苏军管辖的俘虏经常被故意断供食物和水，无论是虏获他们的作战部队、转送他们的看守人员，还是管理他们的营务人员，做法都相差无几。最典型的例子是汉斯·舒尔茨（Hans Schuetz）的经历，他是战争最后阶段在德国东部被苏军俘虏的士兵。在前往东方的路上，许多当地人给他们带来一盒盒面包和一罐罐牛奶。"然而，看守严令我们不得触碰任何东西。他们向坛坛罐罐和三明治开枪。牛奶和水渗入地面，三明治被烧成灰烬。我们不敢触碰任何东西。"[35]

如果说美军管辖的俘虏不得不排队取水，那么苏军管辖的俘虏有时不得不偷水，在冬季还得设法吃雪。[36] 当美军无法提供足够的药物以

应对疾病暴发时，苏联医生有时会拒绝为俘虏提供药物，有人甚至指出，苏联医生把提供药物作为敲诈勒索的手段。[37] 在美军管辖的营地，俘虏至少不需要捕食猫狗，但在苏联的古拉格，俘虏甚至用面包为诱饵捕食老鼠。[38] 苏军管辖的营地的饥饿状况，比任何美军管辖的营地都要严重得多，而且这种饥饿不是持续数日、数周，而是持续数月之久。1946年，托特·佐尔坦在一座临时古拉格的医务中心工作，他经常看见停尸间的尸体被切开，内脏被偷走，估计是被偷去吃掉，一如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当他向主管医生报告此事时，他的热心只换来冷言冷语，主管医生说道："要是你看见一年前在这儿发生的一切……"[39]

有些幸运的战俘早在1947年就被遣送回家了，但绝大多数战俘在苏联的古拉格被关押到1950年，当时斯大林发布"大赦令"，让那些堪称"劳动模范"的德国人可以回家。[40] 然而，有些人还是未能摆脱麻烦，那些被认定为政治犯的俘虏，一直被关押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再次发布大赦令为止。最后被赦免的俘虏直至1957年才返回德国，那时战争已经过去12年了。在苏联偏远的矿山、森林、铁路、皮革厂以及集体农庄和工厂劳动多年以后，许多人已经熬成老弱病残。海因里希·冯·爱因西德尔（Heinrich von Einsiedel）伯爵后来提起与他一同回国的最早一批人，他说道："那些火车装载的货物啊！都是些饥饿、瘦弱的骷髅；人们因为食物不足而患上痢疾：骨瘦如柴、手脚发抖、面如土色、眼神模糊，只有在看到面包和纸烟时，才会两眼放光。"爱因西德尔曾经是虔诚的共产主义者，但当他看见这番景象时，他的信仰严重动摇了。他说道：这里每一名俘虏，都是"对苏联的生动控诉，对共产主义的死刑判决"。[41]

劣迹之代价

苏军管辖下的德国战俘，比美军管辖下的德国战俘，其处境要糟糕得多，这不仅被国际上普遍接受的伤亡人数所证明，而且被数以百计俘虏的证人证言所证明。然而，这并不足以阻止某些作家发表不同意见。

1989年，詹姆斯·巴盖出版《其他损失》，他试图向全世界证明，是美国人而非俄国人，要对数十万名德军俘虏的死亡负责。巴盖坚信美国领导层要为这些所谓的死亡数字负责，巴盖指责美国领导层执行故意复仇的政策，然后再以捏造的统计数字隐瞒“真相”。巴盖的言论，不仅让美国人关于道义战争的坚固信念成为疑问，实际上也是控诉美国领导人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这是典型的阴谋论，更加不要提此书出版时引起的争议了。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竞相贬损巴盖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错误引用文献，他的研究方法杂乱无章，最重要的是，他完全误解了统计数字。[42] 与此同时，某些曾经在战后担任监狱看守的美国退役老兵却为巴盖辩护。他们指出，在他们驻守的营地，状况一度非常糟糕，而且在他们中间，的确存在过不问生死甚至坐等复仇的风气。即使是巴盖的贬低者，也不能否认这种状况的真实存在。

如果这种论战气氛持续下去，数十年后，这将成为一段历史公案，因为巴盖的言论总是包含着真相的种子。或许巴盖最应该受到批评的地方，不是他误读真相，而是他转移了人们对真相的注意力。巴盖发掘的往事也许不如他想象的那样耸人听闻，但仍然使人震惊。

1962年，德国政府建立马施克委员会，以调查德国战俘的命运。根据马施克委员会提供的官方数字，美国军政府以及法国军政府的确需要对此做出解释。美军管辖的营地的死亡率，虽然不像苏军管辖的营地的死亡率那么高，但还是比英军管辖的战俘营的死亡率高出4倍。法军管辖的营地更加糟糕，尽管关押人数比英军管辖的营地的关押人数少1/3，但死亡记录却几乎高出20倍（共24178人）。我们必须记住，这些都是保守数字：即使是官方历史学家，都承认可能有数以千计的死者未被记录在案。

表**1** 战俘死亡情况 [43]

关押国家	战俘人数	死亡人数	死亡率(%)
英国*	3635000	1254	<0.1
美国*	3097000	4537	0.1
法国*	937000	24178	2.6
苏联*	3060000	1094250	35.8
南斯拉夫	194000	80000	41.2
波兰	70000	5400	7.7
捷克斯洛伐克	25000	1250	5.0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	76000	675	0.9
合　计	11094000	1211544	10.9

注：带*号的数字包含欧洲大陆营地。

法军管辖的营地的高死亡率，起码还可以用法国当时的食品短缺危机来解释。及至1945年秋天，食品供应状况是如此恶劣，以至于国际红十字会发出警告说，如果状况再无改善，俘虏当中可能要饿死20万人。于是，救济行动得以展开：美军提供的给养被转送到法军管辖的营地，提高食品定量，以免出现饥饿，更为严重的灾难由此得以避免。[44]

然而，英军管辖的营地与美军管辖的营地的死亡率差异，更加难以解释。就连英军都能为战俘提供给养，美军不可能做不到。实际上，在所有的盟国军队中，美军在实施补给方面最为得心应手。有人认为，美军管辖的营地有更多俘虏死亡，是因为美军负责管理那些条件更差的莱茵牧场营地，但这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营地比其他营地更难完成补给，而且某些营地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就移交给英军管辖。[45]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关键时期，美军比英军看管更多的俘虏，但比例并不悬殊：美军看管259万人，英军看管212万人。如果再比较英美两军的相对规模，人们就会发现，按照士兵与俘虏的平均比例，英军还要看管更多的俘虏。[46]

英美两军唯一的实质差异是释放俘虏的速度。1945年秋天，当英军已经释放超过80%的俘虏时，美军还关押着绝大多数的俘虏，直至当年冬季才开始放人。[47] 原因在于罗斯福曾经坚持，想方设法审讯德军士兵的战争罪行，就连基层士兵也不放过：美军关押的俘虏不得不在营地里停留更久以接受审查。[48]

或许我们发现了为何美军看管的俘虏的死亡率高于英军看管的俘虏。我们曾经提到，美国政府对待德国人的态度比英国政府对待德国人的态度更为严厉。在德黑兰会议上，当英国提出把战败的德国分为三个行政区时，罗斯福还想进一步瓜分德国。罗斯福说道："如果把德国分成107个省，德国对文明世界造成的危险会小得多。"[49] 在1944年英美魁北克会议期间，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提出拆卸德国所有的工业设施的计划，这实际上是要把德国赶回中世纪。罗斯福赞成这个计划，迫于美国的压力，英国只能随声附和。[50] 英美两国一致同意，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把俘虏当成强迫劳工，其实英国提出的期限比美国提出的期限更长，但美国（以及法国）还提出让俘虏去清理雷区。[51]

这种政策当然会导致更高的死亡率，但绝大多数相关政策其实从未实施：最后，英美两国对待俘虏的政策非常接近。然而，官方立场与官方政策一样，都会影响战俘的状况。从上文的尖锐字句中可以得出如下印象，越是基层官兵，对虐待俘虏就越是纵容甚至鼓励。如果任由敌视俘虏的风气蔓延开来，俘虏最终必然会被虐待。在极端的环境中，这种风气能够导致暴行，但即使是在温和的环境中，这种风气同样能够导致苦难，毕竟由于战败，俘虏可能已经筋疲力尽了。

美军对待德军俘虏的态度与德军俘虏的死亡率是否相关，至今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同样适用于法军。如果詹姆斯·巴盖仅仅致力于调查研究，而非虚构投机取巧的理论，他的

著作可能更能得到学术界的接受。在这种研究得以展开之前，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罗斯福关于杀死战俘的笑话，尽管似乎是个玩笑，但可能引发了实际后果。

---

[1] Churchill，Winston，*The Second World War*，6 vols.（London：Cassell，1948-54），vol.V，p.330；Roosevelt，Elliott，*As He Saw It*（New York：Duell，Sloan and Pearce，1946），pp.188-90.

[2] 关于这段时期的各种读物可参阅，如Rees，Laurence，*World War Two behind Closed Doors*（London：BBC Books，2008），pp.229-32；Beschloss，Michael，*The Conquerors*：*Roosevelt*，*Tr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1-1945*（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2），pp.26-8；Burleigh，Michael，*Moral Combat*（London：Harper Press，2010），pp.351-2；Sebag-Montefiore，Simon，*Stalin*：*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3），pp.415-16。

[3] Beschloss，Michael，*The Conquerors*：*Roosevelt*，*Tr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1-1945*（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2），p.179.

[4] Werner Ratza，“Anzahl und Arbeitsleistungen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V：*Zusammenfassung*，p.208.

[5] 参阅Botting，Douglas，*In the Ruins of the Reich*（London：Methuen，2005），p.112；Eisenhower，Dwight D.，*Crusade in Europe*（London：Heinemann，1948），p.464；Overmans，Rüdiger，‘German Historiography，the War Losses，and the Prisoners of War’，in Günter Bischof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143。

[6] 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56.

[7] 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11.另可参阅Overmans，Rüdiger，‘German Historiography，the War Losses，and the Prisoners

of War'，in Günter Bischof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43，147，155。

[8] 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15.

[9] 如可参阅General Lee's memo to SHAEF，2 June 1945，in NARA，引自Bacque，James，*Other Losses*：*The Shocking Truth behind the Mass Deaths of Disarmed German Soldiers and Civilians under General Eisenhower's Command*（Toronto：Stoddart，1989），p.51。

[10] 如可参阅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assim*；and Bischof，Günter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assim*。

[11] Anonymous diary of a German sergeant，entries for 17 and 20 May 1945，援引自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p.309-13。

[12] 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150.

[13] 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148.

[14] 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p.151-2，154.

[15] 引自Bacque，James，*Other Losses*：*The Shocking Truth behind the Mass Deaths of Disarmed German Soldiers and Civilians under General Eisenhower's Command*（Toronto：Stoddart，1989），p.40。

[16] 援引自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p.152，154。

[17] 参阅Bacque，James，*Other Losses*：*The Shocking Truth behind the Mass Deaths of Disarmed German Soldiers and Civilians under General Eisenhower's Command*（Toronto：Stoddart，1989），*passim*；Bischof，Günter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assim*。

[18] Werner Ratza，"Anzahl und Arbeitsleistungen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V：*Zusammenfassung*，pp.207，224-6.根据地方的记录，另有来自小营地的774人死亡可参阅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p.204-5。

[19] 如可参阅Albert E.Cowdrey，"A Question of Numbers"，in Bischof，Günter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91；以及Overmans，Rüdiger，'German Historiography，the War Losses，and the Prisoners of War'，in Günter Bischof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169。

[20]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413.

[21] 如今的卢甘斯克。——译者注

[22] 引自Service，Robert，*A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London：Penguin，2003），p.284。另可参阅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417，他对这首诗的引文略有不同。

[23] 引自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40。关于这段话的其他译文，另可参阅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414，以及Tolstoy，Nikolai，*Stalin's Secret War*（New York：Holt，Reinhart and Winston，1981），pp.267-8。

[24] *Krasnaya Zvezda*，13 August 1942，引自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 （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p.414。

[25] De Zayas，Alfred，*Nemesis at Potsdam*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7），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40.

[26] Beevor，Antony，*Berlin*：*The Downfall 1945* （London：Penguin，2003），p.199.

[27] *Défense de la France*，no.44（15 March 1944）.

[28] Von Einsiedel，Count Heinrich，*The Shadow of Stalingrad*：*Being the Diary of a Temptation* （London：Alan Wingate，1953），p.168.

[29] 如可参阅Von Einsiedel，Count Heinrich，*The Shadow of Stalingrad*：*Being the Diary of a Temptation* （London：Alan Wingate，1953），p.164；Beevor，Antony，*Stalingrad* （London：Viking，1998），pp.386，408。

[30] Rupić，Mate et al（eds.），*Partizanska i komunistička represija i zločini u Hrvatskoj 1944-1946*：*Dokumenti* （Slavonski Brod：Hrvatski institut za povijest，2005），docs.10 and 60（pp.60，171）；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I：*Jugoslawien*，pp.104-34.

[31] Istituto Centrale di Statistica，*Morti e Dispersi per Cause Belliche Negli Anni 1940-45* （Rome：Istituto Centrale di Statistica，1957），p.10.

[32] Giurescu，Dinu C.，*Roman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1939-1945*），trans. Eugenia Elena Popescu（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p.157.

[33]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I，*Hungary*，p.46.Glanz，Susan，‘Economic Platforms of the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Elections of 1945’，in Nándor Dreisziger（ed.），*Hungary in the Age of Total War*（*1938-1948*）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169，提供了介乎85万至90万之间的更高数字。

[34] Toth，Zoltan，*Prisoner of the Soviet Union*，trans. George

Unwin（Woking：Gresham Press，1978），p.5.

[35] Schuetz，Hans A. D.，*Davai*，*Davai*！：*Memoir of a German Prisoner of World War II in the Soviet Union* （Jefferson，NC，and London：McFarland & Co.，1997），p.21.

[36] 如可参阅Becker，Hans，*Devil on My Shoulder*，trans. Kennedy McWhirter and Jeremy Potter（London：Four Square Books，1958），pp.73-4；以及Toth，Zoltan，*Prisoner of the Soviet Union*，trans. George Unwin（Woking：Gresham Press，1978），p.7。南斯拉夫游击队抓获的俘虏也经常没水喝，如可参阅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In amerikanischer Hand*，pp.218-19。

[37] Beevor，Antony，*Stalingrad* （London：Viking，1998），pp.408-9；Becker，Hans，*Devil on My Shoulder*，trans. Kennedy McWhirter and Jeremy Potter（London：Four Square Books，1958），pp.77-81.

[38] Becker，Hans，*Devil on My Shoulder*，trans. Kennedy McWhirter and Jeremy Potter（London：Four Square Books，1958），p.87；Toth，Zoltan，*Prisoner of the Soviet Union*，trans. George Unwin（Woking：Gresham Press，1978），p.48.

[39] Toth，Zoltan，*Prisoner of the Soviet Union*，trans. George Unwin（Woking：Gresham Press，1978），p.48.

[40] Becker，Hans，*Devil on My Shoulder*，trans. Kennedy McWhirter and Jeremy Potter（London：Four Square Books，1958），p.184.

[41] Von Einsiedel，Count Heinrich，*The Shadow of Stalingrad*：*Being the Diary of a Temptation* （London：Alan Wingate，1953），p.206.

[42] 参阅Bischof，Günter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 （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assim*。

[43] 来源：Werner Ratza，“Anzahl und Arbeitsleistungen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V：*Zusammenfassung*，pp.207，224-26。20世纪90年代，Rüdiger Overmans把上述数字与其他相关数字作对照，发现其他数字更为

准确，可参阅他的Overmans，Rüdiger，‘German Historiography，the War Losses，and the Prisoners of War’，in Günter Bischof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46-63。

[44] Overmans，Rüdiger，‘German Historiography，the War Losses，and the Prisoners of War’，in Günter Bischof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152.

[45] Overmans，Rüdiger，‘German Historiography，the War Losses，and the Prisoners of War’，in Günter Bischof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148.

[46] Werner Ratza，“Anzahl und Arbeitsleistungen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V：*Zusammenfassung*，pp.194-5.

[47] Werner Ratza，“Anzahl und Arbeitsleistungen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V：*Zusammenfassung*，pp.194-7.

[48] Brian Loring Villa，“The Diplomatic and 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POW Camps Tragedy”，in Bischof，Günter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pp.67-8.

[49] Roosevelt，引自Beschloss，Michael，*The Conquerors*：*Roosevelt*，*Tr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1-1945*（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2），p.28。

[50] 关于原始档案，参阅Morgenthau，Henry，Jr，*Germany Is Our Problem*（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and Bros，1945），prelim.pages；关于讨论和共识，参阅Beschloss，Michael，*The Conquerors*：*Roosevelt*，*Tr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1-1945*（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2），pp.125-31；Rees，Laurence，*World War Two behind Closed Doors*（London：BBC Books，2008），pp.302-8。

[51]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on its activiti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September 1*，*1939-June 30*，*1947* ），vol. I：*General Activities*（Geneva：ICRC，1948），pp.333-5.

第十二章 无限复仇：东欧

如果说复仇是权力的功能，那么，只有在施害者与受害者角色完全逆转时，真正的复仇才有可能实现。受害者必须变成施害者；无权者必须变成全权者；之前承受的不幸必须设法转换为对方承受的痛苦。

在德国境内，这种情况并未大规模发生，毕竟盟国在阻止这种情况发生。被释放奴工不能反过来奴役他们之前的主人，集中营幸存者不能成为德国俘虏的看守。但在其他国家，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社区层面，这种翻天覆地的情况的确存在。

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种情况尤其明显，但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波罗的海国家甚至俄国，情况也相差无几，这些国家都有大批长期侨居于此的德语居民，被统称为德裔。战争期间，这些人获得各种特权，现在却成为众矢之的。他们被迫逃离家园，他们食不果腹、尊严扫地，因为他们的所在国都在仿效纳粹战时的措施。数十万人被强征为奴工，在各地区的工厂、煤矿、农场里劳动，一如纳粹当年对待他们的邻居那样。其余的人要么被送进监狱，要么被赶进中转营地，等待被逐回德国。

这一章是关于数百万德语平民的故事，他们被塞进欧洲各地的禁闭营、中转营、集中营，而这些营地才刚刚把战时关押的犯人全部清空。某些营地可与最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相比。必须澄清的是，最初发生在这些营地的暴行，论规模无法与纳粹的战争罪行相比，但同样必须承认的是，暴行的确发生过，而且相当野蛮。

施虐狂的极端行径总是令人难以容忍，且不论受害者是谁，但在这里，受害者换成了德裔，这引起我们另一种不安。在欧洲每个国家，实

际上在全世界，德裔都被视为暴行实施者，而非承受者。世人更愿意相信，即使战后有某些复仇措施，那也是德裔咎由自取，而且我们也愿意相信，考虑到当时的环境，德裔遭受的报复无论如何都是相当温和的。人们认为，德裔以令人恐惧的折磨和羞辱对待别人，不仅纳粹党徒如此，就连普通男人、女人、孩子都如此，那么，我们的同胞就有权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盟国的主流风气，也是回避责任的方便理由。

如果我们试图得知过去的真相，或者真正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应该对这些往事进行考究。最近数十年，过激论者和阴谋论者对这些往事颇感兴趣，而我们只是将其看成罪恶的秘密。新造的传言和夸张的言辞开始生根发芽，其中某些观点相当危险。因此，尽管会引起不安，我们还是很有必要让这些令人不悦的真相、传言滋生的土壤重见天日。

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

在欧洲，对德裔平民最具敌意的，就是那些德裔与其他民族比邻而居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就是典型例子。数百年来，布拉格曾经是德意志人与捷克人的共同家园，两个社群的矛盾可以追溯到奥匈帝国时期。[1] 如果不把维也纳计算在内，布拉格就是纳粹占领的第一座外国首都，也是最后被解放的外国首都，因此，捷克公民比欧洲其他国家的民众承受了更久的占领之苦。许多捷克人都把他们的德裔邻居视为叛国者，正是这些叛国者为1938年德国的入侵铺平了道路。

因此毫不奇怪，当布拉格居民在战争最后一周奋起反抗纳粹时，长期积压的怨恨终于演化成暴力。他们抓住德军士兵，群起殴打，淋上汽油，将其焚烧。[2] 数十人被吊在城市的路灯杆上，血肉模糊的躯体上被刻上纳粹万字符。游击队员冲进地窖，把躲藏在里面的德裔男人、女人、孩子拖出来，人们被殴打，妇女被强奸，有时甚至被杀害。[3] 数以千计的德意志人被赶出家园，被关押在学校、影院、营房，许多人受到残忍审讯，审讯者试图深究其政治立场。[4]

在这几天里，城市里弥漫着浓厚的恐惧气氛。一些布拉格居民后来提到，那种“会传染”的恐慌让他们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战壕里的岁月。一名德裔公务员形容当时的布拉格满大街都是“街垒和受惊的人”。当他试图回家时，他好几次误入人群，到处都是怒气冲冲的男人、骂骂咧咧的暴民、惊声尖叫的女人、屈膝投降的德军，还有许多贩卖捷克国旗和徽章的年轻人。他后来写道：“每间屋子里都传出枪声。”

> 许多捷克年轻人，手里拿着左轮手枪，要求查看路人的证件。我躲进一间房子的门廊；楼上传来让人头发倒竖的尖叫，然后传来一声枪响，然后就是一片死寂。一个长着猛禽面孔的年轻人走下楼梯，手脚麻利地把什么东西塞进左边的裤兜。一个老人，看得出是看门人，高声叫道：“那个德国婊子，你让她得到应得的下场了吗？这就对了，他们都得死！”

这座城市的德意志人，要么躲在地窖里，要么躲在捷克朋友和熟人家里，以避开愤怒的暴民。[5]

1945年5月5日，起义开始时，大约有20万德意志人生活在布拉格，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6] 根据捷克的统计报告，起义期间，只有数百名德意志人被杀，包括数十名妇女和至少八名儿童。这肯定是低估的数字，尤其是考虑到城内城外暴力行为的范围和性质，更不要说官方企图掩盖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了。例如，后来在布雷诺夫（Břevnov）郊区发现的集体墓穴，就收殓了300名德意志人的尸体，他们都是“在西面的战斗中被杀的”。受害者多数穿着平民服装，但捷克的统计报告仍然断定他们当中有3/4的人是士兵，并且将其纳入军人死亡名单而非平民死亡名单。[7] 考虑到统计报告如此不可靠，再加上数目不详的德裔受害者并未入册，人们根本不可能判断布拉格起义期间德裔平民的确切死亡人数。

战争结束后，还有数千名德意志人被关押在布拉格，首先是在临时拘留中心，然后转到大型聚集中心，如斯特拉霍夫（Strahov）运动场，

最后转到城市外围的关押营地。根据目击者证词，这些拘留中心的德裔犯人通常会被殴打，偶尔会未经审判就被处决。例如，一位名叫库尔特·施密特（Kurt Schmidt）的平民工程师，5月底从布尔诺被强迫走到布拉格，然后被关押在斯特拉霍夫。他后来声称："饥饿和死亡统治着这片营地。"

> 在营地里，我们被迫在大庭广众之下围观处决，他们以此提醒我们死亡会随时降临。任何在营地里发现的党卫队员，都会被公开处决。有一天，六名年轻人被殴打到动弹不得，他们被水泼醒（德裔妇女被迫去打水），然后继续被殴打到断气为止。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故意展示在厕所旁边，长达数天之久。一名14岁的男孩与父母一起被枪决，原因据说是他曾经试图用剪刀刺伤一名革命卫兵。这只是每天发生的处决案例的个别例子，而处决方式通常是枪决。[8]

按照施密特的说法，营地里的食物供应时有时无而且始终不足，最近捷克的研究确证了这一说法。[9] 卫生状况极为原始，装载食物的桶夜晚会用于"其他用途"。营地里痢疾流行，因为疾病和饥饿交迫，施密特失去了15岁的儿子。卫生设施缺乏，食品定量不足，在战后所有关押地中可谓家常便饭。

在斯特拉霍夫，妇女尤其难熬，她们不断受到捷克卫兵和俄国士兵的侵犯。施密特解释道，他与其他男人都无力保护妇女：

> 如果男人试图保护自己的妻子，他很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俄国人以及捷克人，甚至懒得把女人带走，他们就在孩子和营地所有犯人面前强奸女人，所作所为如同禽兽。在夜里，人们能够听见这些可怜女人的呻吟和呜咽。到处都在执行枪决，子弹就在我们头上擦过。人流密集，噪声不断。黑暗的夜空被探照灯和俄国人的枪火划破。我们的神经日夜不宁，我们仿佛坠入地狱。[10]

为了逃避这种状况，许多德意志人自愿到外面工作，尤其是因为城市里修理工的需求很大，包括拆除起义期间起义者修筑的街垒。但如果以为他们在外面的待遇会比在监狱的待遇更好，那就大错特错了。施密特经常被围拢在工地周围的群众殴打、吐痰、投石。他的描述得到一位

妇女的证实，那位妇女关押在另一处营地，她战时曾经在布拉格的德军女子通信兵部队服役。

> 街头暴民的行径（比监狱看守）还要恶劣。尤其是年长妇女，更加擅长用铁杆、铁棍、狗带等工具当武器。我们有些人惨遭毒打，甚至倒地不起。其他人，包括我自己，不得不到桥上的街垒藏身。捷克警察在我们的工地外围警戒，但暴民突破警戒线，我们再次惨遭虐待。我有些被打的同伴拼死跳入莫尔道河 [11] ，他们马上朝河里开枪……其中一个捷克人拿着一把大剪刀，挨个儿剪我们的头发。另一个捷克人往我们头上泼红油。我被打落四颗牙齿。他们强行从我们肿胀的手指上摘下戒指。其他人则看中我们的鞋子和衣服，我们最后几乎被剥个精光，即使是内衣也被剥去。男孩和男人踢我们的肚子。我完全绝望，我也试图跳进河里。但我被拖回来，再次受到毒打。 [12]

这就难怪有些德意志人宁愿自杀也不愿受辱了。例如，在布拉格的潘克拉克（Pankrác）监狱，两位年轻的德裔母亲勒死自己的孩子，然后试图自杀。她们被救活时说，之所以要杀死孩子，是因为看守威胁要“挖掉孩子的眼珠，折磨他们，杀死他们，就像德国人对待捷克孩子那样”。 [13] 关于战后初期的自杀人数，没有任何可靠的统计数据，但1946年捷克官方报告列出5558名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自杀的德意志人。再一次，真实数字肯定比统计数字多得多。 [14]

布拉格市内德意志人的处境，大体上代表了捷克其他地区的状况，尽管在很多地区最糟糕的日子要到夏末才到来。或许最著名的屠杀发生在拉贝河畔乌斯季（Ústí nad Labem，德语旧称为奥西希），7月底有超过100名德意志人被杀害，深感震惊的目击者后来将死亡人数夸大了10倍乃至20倍。 [15] 更为严重但更不为人知的屠杀发生在波希米亚北部城镇波斯托洛普尔季（Postoloprty），一支狂热的捷克陆军分遣队执行了“清洗”当地德意志人的命令。根据德国文献，有800人被残忍杀害。捷克文献也能印证：事件发生两年后，捷克当局在城镇外围的集体墓穴发现了763具尸体。 [16] 在陶斯（Taus，捷克人称为多马日里采），120人在车站后面被枪杀，然后埋在集体墓穴里。 [17] 在摩拉维亚城镇普热

罗夫（Přerov）附近的霍尔尼莫斯泰尼采（Horní Moštěnice），一位名叫卡罗尔·帕祖尔（Karol Pazúr）的捷克军官拦下一列满载斯洛伐克德意志人的火车，表面上是为了搜查前纳粹党徒。当天晚上，他的士兵射杀了71名男子、120名女子、74名孩子，最小的孩子是八个月大的婴儿。再一次，他们被埋在集体墓穴里。帕祖尔后来为杀死孩子狡辩道："我杀了那些孩子的父母，还能拿那些孩子怎么办？"[18]

这种行为绝对不可能得到捷克新政府的授权，捷克新政府还经常谴责这种过火行为。[19]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捷克新政府与这种行为毫无干系。回国复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签署了一系列惩罚德意志人的法令，包括充公土地、没收财产、取消国籍以及解散所有德语高等学府。贝奈斯以及新政府其他高官的言论无异于火上浇油。例如，在贝奈斯从流亡地回到布拉格后发表的第一次演讲中，他并未单独从道德上指责纳粹的战争暴行，而是指责整个德意志民族，声称他们活该"被全人类唾弃"。[20] 贝奈斯政府后来的司法部部长普罗柯普·德尔提那（Prokop Drtina）走得更远，他公然声称"没有好德国人，只有坏德国人和更坏的德国人"，他们是"我们体内的溃疡"，而且"整个德意志民族都要为希特勒、希姆莱、汉莱因、弗兰克的罪行负责，整个德意志民族都要为犯罪接受惩罚"。[21] 在1945年7月，后来担任捷克总统的安东尼·萨波托茨基（Antonín Zápotocký）在《劳动报》（*Pr áce* ）发表文章，要求当局在惩治通敌嫌疑犯时不应受法律约束，因为"当你砍树时，肯定木屑横飞"（一句捷克谚语，类似于"你不可能煎蛋而不打破鸡蛋"）。[22] 类似的观点还可见诸总理日德内克·聂杰德利（Zdeněk Nejedlý）、议长约瑟夫·大卫（Josef David）、司法部部长雅罗斯拉夫·斯特兰斯基（Jaroslav Stránský）的相关言论。[23]

如果说政府官员的言论充斥着对所有德意志人的恶毒咒骂，那么他们也是在为捷克人的复仇行动开脱。在战后一周年的一部法律中，写明了所有复仇行动都是对纳粹当局及其帮凶的"合理报复"，尽管类似行为

在平时会被视为犯罪。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赦免不仅适用于战时的报复行为，而且适用于1945年5月9日至10月28日的报复行为。[24]

很难说清楚，到底有多少德意志人死于捷克斯洛伐克战后的混乱局面中，但肯定数以万计。此事仍然极具争议，让德捷双方情绪尖锐对立，而所有关于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又彼此矛盾。德国文献列出18889名在捷克斯洛伐克驱逐行动期间死亡的德意志人，其中5596人死于暴力事件，上述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未被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25] 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经常声称真实死亡人数高达25万，但这个数字明显夸大了。[26] 正好相反，某些捷克历史学家声称，所有战后暴力事件都是德意志人为了索取赔偿而虚构的故事。[27] 最为可靠而且公正的统计数字由捷克历史学家托马斯·斯坦内克（Tomáš Staněk）汇编而成，他谨慎地估计，死于捷克斯洛伐克战后混乱期间的德意志人，为2.4万～4万人。[28] 不过，这个数字并未包括那些因为健康受损而在此后数年间英年早逝的人。

斯坦内克也给出了战后被囚禁的德意志人的人数。早在捷克官方大肆驱逐德意志人之前，官方记录的德裔囚犯人数就高达96356人，斯坦内克认为真实的数字至少还要多出2万。实际上，1945年8月中旬，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所有囚犯中，超过90%是德意志人。表面上是因为这些德意志人对捷克构成威胁，实际上也许有多达1万名囚犯是未满14岁的孩子。[29]

毫无疑问，囚犯当中某些人的确罪有应得，导致所有囚犯集体受过。但他们之所以被长期关押在营地里，许多人直至1948年才被释放，是因为他们被当成免费劳动力，尤其是农业部门和工矿企业的重要劳动力。

原则上，征召德裔劳工也是欧洲其他地区的惯常做法，甚至在英国也是如此，及至1948年年初，还有11万名德国战俘在英国工作。[30] 实

际上，使用德裔强迫劳工，是由三巨头在雅尔塔和波茨坦根据国际协议认可的。但在英国，被用作强迫劳工的仅限于战俘，而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征召的绝大多数是平民。更大的差异在于劳工待遇。在英国，按照国际红十字会的规定，德国劳工饮食与英国工人相同的，遵照相同的安全条例。在捷克，红十字会经常无法接近犯人，许多犯人每天得到的食物的热量少于1000卡路里，这还不到足以维持健康所需之一半，他们被迫从事所有危险工作，包括清除地雷。[31]

捷克斯洛伐克的强迫劳工通常会被羞辱，一如当年纳粹对待犹太人的做法。他们被迫戴上纳粹万字符、白臂章或者涂上字母“N”（Němec，指德国人）的补丁。[32] 当他们走出关押营地去上班时，他们经常被禁止搭乘公交、光顾商店、进入公园，甚至不得走上行人道。[33] 在他们被殴打或者被施以其他“惩罚”时，仿佛可见纳粹主义的幽灵在飘荡，尽管营地看守本身就是纳粹暴行的受害者。例如，一名德裔公务员还记得加害者的叫嚣：“我终于逮住你们了，你们这些婊子养的！四年来，你们在集中营里折磨我，现在轮到你们尝尝滋味了！”[34]

维诺赫拉德的市民们！

布拉格第12区本地民族委员会常委会，已经决定解决德国人、匈牙利人以及叛国者问题，措施如下：

1.“德国人”这个单词及其所有变体，只能以小写字母书写，“匈牙利人”这个单词亦然。

2.今后将对德国人、匈牙利人以及叛国者实施以下规定——

a.所有年满14岁且被认定为德国人、匈牙利人、叛国者或通敌者的人，将要在左臂佩戴明显的白色帆布标识，尺寸为长宽各10厘米，上面涂抹纳粹万字符以及个人编号。佩戴此标志的人，将不得领取定量口粮卡。措施同样适用于登记证书第6栏（民族栏）标注为“D”[35] 的人。

b.佩戴纳粹万字符标识的人，平时不得搭乘有轨电车，只有在上班路上才可搭乘，搭乘时必须站在后车斗，而且不得使用座位。

c.佩戴纳粹万字符标识的人，不得走人行道，只能走机动车道。

d.佩戴纳粹万字符标识的人，不得购买、订阅、阅读报纸，该措施同样适用于上述人等的房客。

e.佩戴纳粹万字符标识的人，不得逗留或穿越公共花园、公园、森林，不得逗留或光顾理发店、餐厅、各种娱乐场所，尤其是戏院、影院、讲堂等地；同样，他们不得光顾洗衣店、干洗店、油印店。他们光顾商店的时间，限定为上午11点至下午1点、下午3点至下午4点。无视此时间限制的买卖双方将同时受到处罚。他们到所有政府部门办事的时间，限定为早上7点半至早上8点半。

f.佩戴纳粹万字符标识的人，晚上8点后不得离家。

g.所有年满14岁且登记证书标注为“D”的人，务必在两天内向布拉格第12区本地民族委员会管制和登记委员会报到，以制作证章和登记入册。那些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报到的人，以及未佩戴上述证章的人，将会受到严厉惩罚，惩罚措施参照纳粹当局曾经采取的做法。惩罚措施同样适用于那些帮助和结交上述人等的人，且不论其方式和目的为何。

h.所有登记证书标注为“D”的人，务必马上现身，且不论其是否曾经收到上述调查委员会通知，且不论其是否曾经收到允许自由行动的临时证书。与此同时，他们（必须）递交所有财产清单，同时上交所有贵重物品，接收部门为第12区民族委员会民族财产信托公司，如有银行存折、银行账户以及其他储蓄，亦一并提交；他们必须报告，是否持有任何形式的资本利益，同时提交合法证据；而且，他们必须交出所有无线电设备及其证书。任何财产转移将被禁止并被宣布无效；德国人不得享用烟草配给，不得在公共场合或工作场所抽烟。

市民们、工人们、苦力们！按照政府规定的原则，我们将会在本区内执行清洗、建立秩序。此举将让你我的维诺赫拉德成为民族的、我们的市区。

上述措施只是临时措施，直至所有上述人等被驱逐出境后即行终止。

1945年6月15日发布于布拉格

布拉格第12区本地民族委员会

主席奥德里奇·哈拉斯

1945年6月张贴在布拉格一个区的告示。[36]

有一位名叫汉斯·冈瑟·阿德勒（Hans Guenther Adler）的犹太人，曾经被囚禁于特莱西恩施塔特。按照他的说法，他遭受的待遇，与德意志人战后在同一处营地遭受的待遇，相差无几：

> 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占领期间无疑是有罪的，但其他大多数人只是少年儿童，他们之所以被关押，仅仅因为他们是德意志人。仅仅因为他们是德意志人……？这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听起来太熟悉了；只不过是把“犹太人”换成“德意志人”。德意志人被迫穿上打着纳粹万字符补丁的衣服。人们饥饿难耐、饱受虐待，他们的待遇不会比德国集中营好多少。唯一的差异是，在这里，通过劳动实施的复仇，并非建基于由党卫队运营的大规模灭绝系统。[37]

阿德勒的道德观点让人无可辩驳：虐待无辜的德意志人，与虐待无辜的犹太人，同样是错误的。然而，他不应该缩小两者在规模上的差异。他同样忽略了一个事实，德意志人所受的痛苦都是由个人造成的，他们所受的折磨和谋杀，从来就不是政府的正式政策：捷克当局仅仅要求驱逐德意志人，而不是灭绝德意志人。当然，正是这种差异造就了全然不同的世界。

然而，还有其他人主张彻底灭绝德意志人，即使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没有发生这种灭绝事件，在其他地方也肯定会发生。1945年秋天，当数百万贫病交加的难民涌入德国时，他们也带来某些恐怖故事，内容无非关于“地狱营”“死亡营”“灭绝营”。他们说，在这些地方，德意志人通常会劳累至死、冻馁至死，甚至被集体处决。营地看守虐待人的方法，与党卫队在奥斯威辛虐待人的方法相差无几，甚至犹有过之。据说在某些营地，“只有大约5%”的犯人得以生还。[38]

这种关于营地的陈述，得到德国政府的极端重视，而且得到大量居民的全盘接受，他们宁愿把自己视为受害者，而不是暴行实施者。这种信念将会产生长久的政治效应，其影响从20世纪延续至今。

这些营地中最为臭名昭著者，并非在捷克斯洛伐克，而是在波兰，正因如此，我们接下来要关注波兰。

新“灭绝营”

1945年2月，苏联红军攻入德国领土后，在如今波兰西南部外省小城希维托赫洛维采（Świętochłowice）附近的兹哥达（Zgoda）发现了一座被废弃的劳动营。出于报复心理，波兰准军事部门公共安全部（UBP）将其重新开放，改为“惩罚营”。[39] 当地数千名德意志人遭到逮捕，并被送入营地服劳役。当地居民被告知，兹哥达仅仅是收容纳粹党徒和德国帮凶的营地，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可能被送进去。与前纳粹犯人同时被逮捕的，还有德国运动俱乐部的成员，罪名是没有合法证件，甚至有时候根本就不需要罪名。

当这些犯人抵达营地时，可能会猜想自己的命运。营地被高压电网环绕，电网上挂着骷髅头标识，上面写着“危险勿近”。[40] 按照好几位目击者的说法，当他们看到挂在电网上的几具尸体时，这些警告语显得更加触目惊心。[41] 犯人会在大门口见到营地负责人所罗门·莫雷尔（Salomon Morel），他告诉犯人，他会“让他们知道奥斯威辛意味着什么”[42]；有时他会取笑犯人，“我的父母兄弟在奥斯威辛被德国人毒死，我会不知疲倦地工作，直到所有德国人得到应有的惩罚”。[43] 战争期间，兹哥达曾经是奥斯威辛的附属营地：为了强化两者的联系，甚至有人在大门上写着“劳动使人自由”[44]。[45]

折磨很快开始，尤其是对任何纳粹组织的嫌疑犯，折磨更快降临。希特勒青年团成员被勒令躺在地上，任由看守从他们身上踩过，他们还

被迫唱纳粹党歌，即《霍斯特·威塞尔之歌》（*Horst Wessel Song*），同时举高双手，任由看守用胶棍敲打他们。[46] 有时候，莫雷尔会命令犯人叠罗汉，直至他们叠成巨大的金字塔；他会用凳子殴打犯人，或者命令犯人彼此殴打，以此为看守取乐。[47] 有时候，犯人会被送进惩戒室，那是个地下室，犯人被迫在深及胸口的冰水里站立几个小时。[48] 特别的场合意味着额外的毒打。例如，希特勒生日当天，看守会进入7号牢房，那是关押纳粹嫌疑犯的牢房，看守会用椅子殴打犯人。[49] 欧战胜利日当天，莫雷尔会从11号牢房提出一批犯人，进行另一场庆祝性的殴打。[50]

犯人的生活环境被故意弄得不宜人居。营地从建造时起，就只能容纳1400名犯人，但及至7月，营地已经容纳了超过3500人。最高峰时，这里关押了5048人，只有66人不是德国人或德裔。[51] 他们被塞进7座住满壁虱的木结构牢房，在那里，他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也没有标准的盥洗设施。食品定量通常会被贪婪的营地职员克扣，而营地外亲人送来的食品包裹则会被没收。[52] 2/3的男人每天被送去当地煤矿，有时他们会在那里劳累至死。[53] 第7号牢房的纳粹嫌疑犯不用去工作，但在营地里受到公共安全部看守的严密监视。流行性斑疹伤寒暴发时，染病的犯人没有被隔离，而是被迫滞留在过度拥挤的牢房里。结果死亡率急剧上升，一位负责掩埋尸体的犯人后来提到，每天都有将近20人死去。[54]

任何试图逃出这座地狱的人，马上会受到特别惩罚。格哈德·格鲁施卡（Gerhard Gruschka）是营地里一名14岁的德裔男孩，他目睹了一名不幸被重新抓获的逃犯遭受的惩罚。逃犯名叫埃里克·范·卡尔斯特伦（Eric van Calsteren）。当他被押回牢房时，一队看守群起对他拳击棒打，其他犯人则被迫围观。格鲁施卡说，这是他曾经见过的最为残忍的毒打。

> 埃里克……突然挣脱民兵包围，爬到一张木板床上。四个民兵从后面围住他，把他拖回牢房中间。他们明显被这种反抗激怒了。一个

> 民兵从牢房的角落里抽出一根铁棍，这根铁棍平常用来搬运我们的食物桶。当桶里装满食物时，用铁棍穿过桶边两个手柄，会比较容易搬运。然而，此时铁棍成为折磨人的工具。暴怒的民兵用铁棍敲打埃里克的双腿。当埃里克倒地时，他们拳打脚踢，然后把埃里克抓起来，再用铁棍殴打。在绝望中，埃里克只好求饶："枪毙我吧，枪毙我吧！"但他们打得更起劲。这是兹哥达最恐怖的夜晚之一。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狱友这次必死无疑。[55]

奇迹般地，卡尔斯特伦总算熬过了这次毒打。就像格鲁施卡那样，他才14岁。他还是荷兰公民，因此根本就不应该被关押在波兰。

这就是每天发生在兹哥达的事情。难怪这里经常被比作纳粹集中营，特别是因为营地指挥官本人似乎有意识地重现奥斯威辛的气氛。就连当时的旁观者也能做出这种类比。一名当地牧师向派驻柏林的英国官员传递了这座营地的信息，这名英国官员转而上报伦敦的英国外交部。英国的报告写道："集中营并未被废止，而是被新主人接管。在希维托赫洛维采，未被饿死或未被打死的犯人，被迫夜复一夜地仰起头站在冰水里，直至死去。"[56] 被释放的德裔犯人也把兹哥达比作纳粹集中营。一位名叫君特·沃尔尼（Günther Wollny）的男人相当不幸，他在奥斯威辛和兹哥达都被关押过，他后来说道："我宁愿在德国集中营待十年，也不愿在波兰集中营待一天。"[57]

在兹哥达所有折磨人的手段中，食物短缺和伤寒流行是两大杀手。然而，对于那些幸存者来说，瘟疫无异于救赎。伤寒暴发的详细情形被披露在波兰报纸上，波兰政府部门终于决定接管监狱和营地。莫雷尔因为任由营地状况恶化以及任意对犯人动用武器而受到正式训诫，其中一名营地高级管理员卡罗尔·扎克斯（Karol Zaks）因为克扣食品定量而被解雇。[58] 当局着手释放犯人，或者将犯人转送到其他营地。及至1945年11月，在犯人答应对自己的经历守口如瓶后，多数犯人被释放，营地也同时被关闭。

按照官方数字，在大约6000名先后被关押在兹哥达的德意志人中，

有1855人死亡，死亡率几乎达到1/3。尽管在正式表述中把惩罚营改称为劳动营，但某些波兰和德国的历史学家还是断定，兹哥达营地的功能，就是通过故意断供食物和药物，让德裔犯人步入死亡。[59]

人们也许乐意把兹哥达事件理解为个别残忍的营地指挥官的个人复仇，但其实类似状况在波兰其他营地和监狱比比皆是。例如，在特雷泽比卡（Trzebica，德语称特雷比尼茨）的波兰军事监狱，看守为了好玩而经常殴打德裔犯人，而且经常放狗吓人。一名犯人说道，当看守用带齿铁棍打他时，他只能卑躬屈膝地在牢房里跳来跳去。[60] 在格利维采（Gliwice，德语称格利维策），监狱交给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管理，他们用扫帚、棍棒、甩棍让德裔犯人招供。[61] 克沃兹科（Kłodzko，德语称格拉茨）监狱的幸存者提到，犯人“被橡胶棍打到眼珠迸裂”，那里还上演各种暴行，包括直截了当的谋杀。[62]

女人跟男人一样，承受了巨大痛苦。在波图利采（Potulice）劳动营，妇女通常会被强奸和殴打，成为营地职员的性虐待对象。或许更糟糕的是，她们与孩子骨肉分离，孩子只能在周日见到母亲一两个小时。有证人声称，这种做法体现了将德裔儿童波兰化的做法，正如纳粹在战时企图让波兰儿童德国化那样，不过，这份证言可能只是证人对与孩子分离一年半的痛苦的宣泄。[63] 波图利采其他犯人声称，她们被迫赤身裸体去工作，甚至被扔进粪坑，甚至有证人声称，一名看守抓住一只癞蛤蟆，将其塞进一名德裔犯人的喉咙里，直到这名犯人窒息而死。[64]

然而，最为臭名昭著的波兰营地也许是瓦姆比诺维采（Łambinowice），德语称拉姆斯多夫（Lamsdorf），这是德国占领者使用的称谓。1945年7月，这座曾经用作战俘营的营地重新开放，成为收容德裔平民的强迫劳动营，在波兰国界变动后，这些平民正在等待驱逐出境。强迫劳动营由时年20岁的切斯瓦夫·根博尔斯基（Czesław Gęborski）管理，“他是个形貌猥琐的波兰人，全靠踢打犯人来下达命

令”。[65]

按照一名早期犯人的说法，暴行几乎是突如其来。就在他们抵达当晚，他和其他40名犯人被叫醒，然后被赶出牢房，到营地的院子里集中，他们被迫躺在地上，民兵跳到他们背上。然后，他们被迫绕着院子跑步，同时还被鞭子和枪托抽打。任何人不支倒地，马上就会被民兵群起攻之。证人声称："第二天早上，我们埋葬了15个人。之后几天，我都要强忍住剧痛才能挪动身体，我的尿里都是血水，我的心跳也不规律。但还有15个人被埋在地底。"[66]

数天后，随着大批犯人被转送至此，暴行继续蔓延。不仅波兰民兵肆意打人，而且他们的德裔走狗也打人，尤其是"牢头"，一个来自卢布里尼克（Lubliniec，德语称卢布里尼茨）的名叫约翰·富尔曼（Johann Fuhrmann）的德裔犯人。"就在我眼前，他打破一个婴儿的头颅，婴儿的母亲只是想为孩子讨点热汤而已，在拉姆斯多夫，热汤是供应给最小的孩子的。然后，他追着那个女人，在院子里鞭打她，而那个女人臂弯里还抱着血肉模糊的婴儿尸体……然后，他带着他的'跟班们'回到房间里，喝光那些本来给孩子准备的肉汤。"[67]

按照同一位证人的说法，营地看守越来越喜欢变换花样折磨人。为了取乐，营地指挥官强迫一个男人爬上院子里一棵树，然后让那个男人大喊"我是一只大猴子"，营地指挥官和看守哈哈大笑，然后开枪射击，最后那个男人终于从树上掉到地上。或许这位证人做出的最为令人作呕的陈述，是关于邻近乡村格吕本（Grüben，如今波兰的格拉宾）的妇女的遭遇。那些妇女被派去挖掘一处在营地附近发现的万人坑，万人坑里有数百具苏军士兵遗体，都是当年战俘营里的死者，被纳粹掩埋于此。那些妇女没有手套或者其他防护服。当时正值盛夏，尸体早已高度腐烂，散发出难以忍受的恶臭。

由于尸体暴露在野外，妇女和女孩被迫面朝下方捡拾这些黏黏糊

糊的、不堪入目的尸体。波兰民兵用枪托击打受害者的脸，让她们埋首在腐尸堆里。通过这种方式，人体残骸被灌进她们的口鼻。64位妇女和女孩死于波兰人这种“英雄史诗般的”行为。[68]

类似证言的正确性几乎无法核实，而且证言本身很可能有所夸大。然而，发掘现场的照片得以保留，即使波兰历史学家也承认，妇女们被迫在没有手套和防护服的情况下发掘尸体。[69] 许多详细情况也得到营地其他幸存者的证实。一位女犯人提到，她的儿子雨果被迫徒手发掘尸体，尸体严重腐烂，以至于黏黏糊糊的东西浸透了他的鞋。[70]

不可否认的是，在瓦姆比诺维采，的确存在任意虐待犯人的风气。好几位证人都亲眼看见有人被殴打致死，或者因为试图逃跑而被枪决。[71] 绝大多数微不足道的过失都肯定会招致惩罚，如想要逃到德国境内的美军占领区（据说一位年轻人因此被打死），或者对异性讲话。[72] 一位妇女提到，当她在营地里发现丈夫还活着时，她欣喜若狂，结果因为大喊大叫，她和丈夫在面朝太阳的位置被绑了三天，作为对她的惩罚。[73]

随着暴力风气蔓延，犯人被迫忍受最为恶劣的生活条件。与其他营地一样，他们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通常是一日两餐，每餐两个水煮土豆，午饭就是寡淡如水的所谓肉汤。卫生设施付之阙如，就连被单都是回收再用的裹尸布，医院里的草席也是一样。[74] 一名营地掘墓人提到，由他掩埋的尸体，上面覆盖的虱子有时“厚达两厘米”。[75] 难怪这里与其他营地一样，两大杀手分别是疾病传播和营养不良。根据波兰文献，这里60%的死亡个案是由斑疹伤寒所致，许多是由斑疹热、痢疾、疥疮以及其他疾病所诱发。[76]

对于那些营地生还者来说，这段记忆如同地狱的幻象。等到他们被释放、被转送到德国时，他们已经失去家园、失去财产、失去健康，有些人甚至体重减半，但丧失亲人的心理痛楚才最为沉重。一名妇女在历

劫数年后解释道：

> 在营地里，我失去了我10岁的女儿、我的母亲、我的姐姐、我的哥哥、两个嫂子、一个姐夫。在我临近死亡的时候，我带着儿子和另一个女儿，设法爬上了开往西德的列车。我们在营地里待了14个星期。我们村里过半的人都死了……我们满怀渴望，终于等到我的丈夫。1946年7月，我们曾经收到噩耗，说他也死在地狱营，我们分别后真是经历太多事情了……[77]

这些往事从那时起成为德国的集体记忆。以此为题材的著作可以塞满整个图书馆，结果我们对波兰劳动营的观点仍然停留在主观印象层面。接下来我会说明，尽管德国政府竭尽全力收集数据、实物、个案，但要准确弄清楚如下事实绝非易事：到底有多少人关在这些营地里，到底有多少人死在这些营地里？

数字的政治

1945年10月其中一座营房起火，是发生在拉姆斯多夫的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谁也不知道火灾因何而起，但接踵而来的混乱事件都被记录在案。按照德裔目击者的说法，营地看守借机大开杀戒。看守不分青红皂白随意开火，杀死许多试图救火的人，然后把犯人扔进火堆。火灾结束后，犯人被迫挖掘集体墓穴。病房里那些病号的尸体也在此时被埋：某些病人先被射杀，但也有许多病人被打晕后活埋。[78]

1965年，当波兰共产党政府面对这些事件时，他们断然否认。在他们看来，大火是犯人发起暴动的机会，波兰看守被迫武力镇压。波兰政府坚决支持营地指挥官切斯瓦夫·根博尔斯基，声称在所有针对他的指控中，他都是清白无辜的。甚至，波兰政府声称，这些事件只是德国政治势力的宣传，目的是败坏波兰的名誉，迫使波兰归还1945年《波茨坦协议》授予波兰的土地。[79]

关于火灾时和火灾后的死亡人数，同样是争议不断。最低死亡人数

只有9人（来自一名埋尸人的证言，甚至得到战后波兰共产党政府的承认）。[80] 然而，有德裔证人声称，这是个大为缩减的数字。德裔营地医生海因茨·埃瑟尔（Heinz Esser）声称，根博尔斯基故意让他把尸体转移到三个相互隔开的地点，以免尸体数目得到确切统计，妇女和孩子的尸体要在正式墓地之外另行挖坑掩埋。埃瑟尔保存着一份火灾遇难者的秘密名单，分为如下几类：死于火灾者、死于火场外围枪击者、火灾后被活埋者、火灾后伤重不治者。他提供的最终死亡人数是581人。遗憾的是，这个数字与埃瑟尔在数年前提供的数字明显自相矛盾，他曾经声称只有132人死亡。[81] 考虑到一手资料的讹误、正式文献的缺乏以及战后高度紧张的政治气氛，我们几乎不可能弄清楚当天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拉姆斯多夫。9人死亡与超过500人死亡，差异极为巨大（在2000年对营地指挥官的审讯中，火灾死亡人数据说为48人）。[82]

争议同样出现在营地开放一年期间的总体死亡人数。根据海因茨·埃瑟尔提供的数字，1945～1946年，共有6488名犯人死于拉姆斯多夫。波兰共产党当局再次反驳，声称拉姆斯多夫只关押了4000名犯人，因此埃瑟尔提供的数字根本不可能。[83] 根据波兰最新研究成果，那里大约关押了6000名犯人，大约有1500人死亡，其中1462人名字可考。[84]

这种数字争议不仅仅是学术争论，当中还夹杂着强烈的情绪，既有个人情绪，也有民族情绪。9人意外死于火灾，还算是不幸，但大批人，也许是数百人，被故意烧死和活埋，那就是暴行。数百人死于斑疹伤寒，还算是难免的悲剧，但数千人被故意饿死和断药，那就是反人类罪行。数字是最重要的，因为数字本身就能说明问题。

如果把争议放大到国家层面，德国提供的数字与波兰提供的数字可谓差异悬殊。1974年，德国被逐者、避难者与战争受害者事务部向德国国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提到，有20万人被关押在战后波兰劳动营，包括拉姆斯多夫、兹哥达、梅斯沃维采（Mysłowice），以及位于

托谢克（Toszek）的苏联内务部监狱。总体死亡率估计为20%～50%。这意味着大约有4万～10万人死于这些营地，而报告也提到“肯定有超过6万人死于当地”。[85] 相比之下，波兰公共安全部的一份报告声称，只有6140名德意志人死于劳动营，就连报告编写者也知道，这个数字肯定是大为缩减的，即使在当时也太明显了。[86] 德国提供的数字几乎是波兰提供的数字的10倍。

又一次，数字对双方都至关重要。对于波兰人来说，这是重获道德制高点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波两国20年紧张关系的顶点：在纳粹（后来还有苏联）毁灭和分割波兰后，可想而知，波兰人肯定不愿意因为战后的暂时混乱而被视为罪人。因此，站在波兰人的立场上，这些令人尴尬的数字肯定是越低越好。甚至有更露骨的公然伪造政府文件的事例，在这些文件中，死亡率低得令人难以置信。

相比之下，德国则成为夸大数字的既得利益者。关于波兰反人类罪行的故事，不仅满足了德意志人在战时形成的种族偏见，而且有助于减轻民族负罪感：这种故事说明，德意志人不仅是暴行实施者，同时也是暴行受害者。德国本身越是悲惨，就越是能够摆脱自身罪恶，在某种程度上，东欧德意志人承受的罪恶，部分“抵消”了他们自己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犯下的罪恶。尽管这从来不是德国的主流思想，但时至今日，仍然有德国政治团体反对承认大屠杀，因为德意志人在东欧也承受了“同样的痛苦”。[87] 这是极端危险的观点。诚然，波兰劳动营存在某些虐待德意志人的恶心事例，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是官方灭绝政策的结果。实际上，波兰当局向营地指挥官下达了严格命令，再三强调殴打和侮辱犯人是违法行为，任何人违反命令都会受到惩处。[88] 那些虐待犯人的当事人都已受到惩戒（虽然处罚轻微），并且被调离岗位。无论是就性质还是就规模而言，把发生在拉姆斯多夫或者兹哥达的暴行，与纳粹大屠杀相提并论，都是荒谬绝伦的。

这个话题之所以长久没有定论，是因为战后禁闭营地的犯罪当事人几乎都没有受到审判。切斯瓦夫·根博尔斯基是拉姆斯多夫营地的指挥官，1956年曾经受到共产党当局的审讯，但最终无罪释放。1989年共产党统治结束后，拉姆斯多夫事件重启调查，2001年，根博尔斯基在奥波莱（Opole）出庭受审。然而，由于根博尔斯基与控方证人的健康状况同样糟糕，审判一再推迟，最后在2005年宣判。根博尔斯基于一年后死去。

所罗门·莫雷尔是兹哥达-希维托赫洛维采营地的指挥官，他同样设法逃脱了审判。共产党统治结束后，他移民到以色列，然后在此定居。波兰司法部申请将他引渡回国，但以色列只能驳回申请，因为根据以色列的时效法，犯罪时间已经超出了追诉期。[89]

这两个人以及其他数百名当事人，都应该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起诉，但他们都侥幸过关，因为当局另有打算。波兰民族与其他承受过纳粹占领的民族一样，更加关注恢复民族权力，而非关注德裔平民的权利。这或许令人愤怒，但绝不令人意外。无论如何，战后的公正是高度主观的公正，很少会在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法律体制内行事。

无论是在波兰还是在东欧，这些事情都并非孤例。正如我将要说明的，同样的问题在欧洲大陆普遍存在。唯一不同的是，受罚者不是德意志人，而是与德意志人合作的人。

---

[1] 参阅Gary B.Cohen，*The Politics of Ethnic Survival*：*Germans in Prague 1861-191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p.274-82。

[2] 类似酷刑通常用于德军士兵和党卫队成员，偶尔也会用于平民。参阅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 （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95。

[3]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 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p.390-91.

[4]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 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57；and 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94.

[5] Testimony of "F.B."，doc.24，in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 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366.

[6] 参阅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 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49；以及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p.89-90。

[7] 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97.

[8] Kurt Schmidt，引自Report 29 in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 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404；另可参阅for comparison p.59，以及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p.94-5。

[9] 关于监狱的状况，参阅Staněk，Tomáš，*Retribuční vězni v českých zemích 1945-1955*（Opava：Slezský ústav Slezského zemského muzea，2002），pp.36-8；关于劳动营的状况，参阅Staněk，Tomáš，*Internierung und Zwangsarbeit*：*Das Lagersystem in den böhmischen Ländern 1945-1948*（Munich：R. Oldenbourg，2007），pp.111-32。

[10] Kurt Schmidt，引自Report 29 in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 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p.404-5。

[11] 捷克人称伏尔塔瓦河。——译者注

[12] Report no.26 by “A.L.”，引自Report 29 in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389。

[13] Staněk，Tomáš，*Retribuční vězni v českých zemích 1945-1955*（Opava：Slezský ústav Slezského zemského muzea，2002），p.39.

[14] 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210；Kucera，Jaroslav，*Odsunové ztráty sudetoněmeckého obyvatelstva*（Prague：Federalni ministerstvo zahranicnich veci，1992），p.24；Naimark，Norman，*Fires of Hatre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18.

[15] 参阅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174；以及Pustejovsky，Otfrid，*Die Konferenz von Potsdam und das Massaker von Aussig am 31 Juli 1945*（Munich：Herbig，2001），p.561。关于情绪亲历者，参阅testimonies in Pustejovsky，Otfrid，*Die Konferenz von Potsdam und das Massaker von Aussig am 31 Juli 1945*（Munich：Herbig，2001），pp.315，338-9；以及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p.68，430。

[16] 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p.143-8.

[17] 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p.148-9.

[18] 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 （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p.155-6.

[19] 如可参阅Beneš's speech in Anon.，*Komu sluší omluva*：*Češi a sudetští němci*（*Dokumenti*，*fakta*，*svědectví*），p.90.

[20] Beneš，Edvard，*Speech delivered by President E. Beneš on the Old Town Square*，*Prague*，*on His Return to Czechoslovakia*，*May 16th 1945* （Prague：Orbis，1945；repr. Prague：Erika，1992），p.5.

[21] 参阅Drtina's postwar pamphlet *My a Němcí* （"We and the Germans"），pp.5，13，引自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p.66-7 fn.13；Staněk，Tomáš，*Odsun Němců z Československa 1945-1947* （Prague：Academia/Naše vojsko，1991），p.59。

[22] Article in *Práce*，14 July 1945，引自Petr Benařík，"Retribuční soudnictví a česky tisk"，in Vědecká Konference 'Národní podoby antisemitismu'，*Retribuce v ČSR a národní podoby antisemitismu* （Prague：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2002），p.23。

[23] Staněk，Tomáš，*Odsun Němců z Československa 1945-1947* （Prague：Academia/Naše vojsko，1991），p.59。

[24] Law reproduced as Annex 19 in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276.

[25]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4 April 1988.另可参阅Sayer，Derek，*The Coasts of Bohemia*：*A Czech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243。

[26] 如可参阅the website of the Zentrum gegen Vertreibungen，www.z-g-v.de/english/aktuelles/？id=56#sudeten，accessed 3 October 2011；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128；以及MacDonogh，Giles，*After the Reich* （London：John Murray，2007），p.159。Staněk有信心反驳这些过高的数字，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

（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p.208-12。

[27] 如可参阅Nováček’s description of the “voluntary” deportation of Germans from Brno，p.31.

[28] Staněk，Tomáš，*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 （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pp.208-12.

[29] Staněk，Tomáš，*Retribuční vězni v českých zemích 1945-1955* （Opava：Slezský ústav Slezského zemského muzea，2002），pp.24-5.官方数字是有6093人低于14岁，Staněk认为这个数字被低估了。

[30]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V：*Zusammenfassung*，p.197.

[31]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on its activiti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September 1*，*1939-June 30*，*1947*），vol. I：*General Activities* （Geneva：ICRC，1948），pp.334，336，676；法国和美国当局关押的战俘也被迫清理地雷阵，但从未使用平民。另可参阅Staněk，Tomáš，*Retribuční vězni v českých zemích 1945-1955* （Opava：Slezský ústav Slezského zemského muzea，2002），pp.28，37。

[32]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75，and eyewitness reports 27 and 59 on pp.392，441.

[33]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pp.75，88，and eyewitness report of Dr Hermann Ebert，Report 66，p.450.

[34]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Report 24，pp.373-4.

[35] Deutsche的首字母，意为“德意志”。——译者注

[36] Adler，Hans Guenther，*Theresienstadt 1941-1945*：*das Antlitz einer Zwangsgemeinschaft-Geschichte*，*Soziologie*，*Psychologie* （Tübingen：Mohr，1955），p.214.

[37]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 （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Reports 193 and 195，p.535.

[38] Poster reproduced from Anon.，*Tragedy of a People*：*Racialism in Czecho-Slovakia* （New York：American Friends of Democratic Sudetens，1946），p.2.

[39] 后来被改建为“劳动营”，但民族情绪并未改变。参阅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 （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17。

[40] Gruschka，Gerhard，*Zgoda*：*Ein Ort des Schreckens* （Neureid：Ars Una，1996），p.42.

[41] Testimony by Jadwiga Sonsala，doc.35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 （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115；另可参阅Henryk Grus testimony，doc.38 Testimony by Jadwiga Sonsala，doc.35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 （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120。

[42] Testimony of Henryk Wowra，doc.47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 （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146.

[43] According to Gruschka，Gerhard，*Zgoda*：*Ein Ort des Schreckens* （Neureid：Ars Una，1996），p.47.另可参阅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 （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146。

[44] Arbeit macht frei，奥斯威辛集中营大门标语。——译者注

[45] According to Edmund Kamiński，引自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 （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133。

[46] Testimony of Jadwiga Sonsala，doc.35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 （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115；Gruschka，Gerhard，*Zgoda*：*Ein Ort des Schreckens*

（Neureid：Ars Una，1996），pp.48-9，56.

[47] Gruschka，Gerhard，*Zgoda*：*Ein Ort des Schreckens*（Neureid：Ars Una，1996），pp.55-6；and Nikodem Osmańczyk testimony，doc.39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p.123-4.

[48] 参阅Henryk Grus testimony，doc.38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p.121-2；以及Gruschka，Gerhard，*Zgoda*：*Ein Ort des Schreckens*（Neureid：Ars Una，1996），p.50。

[49]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27；and testimony by Józef Burda，doc.42，pp.130-31.

[50] Testimony of Henryk Wowra，doc.47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p.25-6.

[51] Doc.7，Świętochłowice statistical report，1 August 1945，doc.7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p.46-7.

[52]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p.21-5.

[53] Doc.6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45.

[54] Gerhard Gruschka testimony，doc.46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144.

[55] Gruschka，Gerhard，*Zgoda*：*Ein Ort des Schreckens*（Neureid：Ars Una，1996），p.59.

[56] Statement by R.W.F.Bashford，TNA：PRO FO 371/46990.

[57] Testimony by Günther Wollny，German Federal Archives Ost-Dok 2/236C/297，引自Sack，John，*An Eye for an Eye*：*The Untold Story of Jewish Revenge against Germans in 1945*（New York：Basic Books，1993），pp.109，

204。

[58] 参阅docs.9 and 10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p.49-50。

[59] Doc.21 in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78；另可参阅pp.17，31。

[60]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Report 195，pp.537-8.

[61] Sack，John，*An Eye for an Eye*：*The Untold Story of Jewish Revenge against Germans in 1945*（New York：Basic Books，1993），p.67.

[62]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Report 192，p.532.

[63] According to eyewitness report by "P.L." of Łódź，in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Oder-Neisse*，Report 268，pp.270-78.

[64] Testimonies by Christa-Helene Gause von Shirach and E.Zindler in Bundesarchiv，Ost-Dok 2/148/103 and Ost-Dok 2/64/18，引自Sack，John，*An Eye for an Eye*：*The Untold Story of Jewish Revenge against Germans in 1945*（New York：Basic Books，1993），p.110。

[65]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40。

[66]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41。

[67]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42。

[68]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p.43-5。

[69] Edmund Nowak，“Obóz Pracy w Łambinwicach（1945-1946）”，in Nowak，Edmund（ed.），*Obozy w Lamsdorf/ Łambinowicach*（*1870-1946*）（Opole：Centralne Muzeum Jeńców Wojennych w Łambinowicach-Opolu，2006），pp.277-8.

[70]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38。

[71]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p.35，37。

[72]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46。

[73]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40。

[74]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39。

[75]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33。

[76] Nowak，Edmund（ed.），*Obozy w Lamsdorf/ Łambinowicach*（*1870-1946*）（Opole：Centralne Muzeum Jeńców Wojennych w Łambinowicach-Opolu，2006），p.284.

[77]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39。

[78]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

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p.38，44。

[79]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p.51-61.

[80]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32；以及Polish Communist account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59。

[81] Anonymous testimony，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32；以及Polish Communist account引自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26；cf.his testimony in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Report 193，p.534，除数字外，其余相同。

[82]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prosecutors，Frantiszek Lewandowski，引自the *Sunday Telegraph*，3 December 2000。

[83] 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p.60，98.

[84] Nowak，Edmund（ed.），*Obozy w Lamsdorf/ Łambinowicach*（*1870-1946*）（Opole：Centralne Muzeum Jeńców Wojennych w Łambinowicach-Opolu，2006），pp.283-4；Borodziej，Włodzimierz and Hans Lemberg（eds.），*Die Deutschen östlich von Oder und Neiβe 1945-1950*：*Dokumente aus polnischen Archiven*，4 vols.（Marburg：Herder Institut，2003-4），vol.II，p.379；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pp.99-127.

[85] Spieler，Silke（ed.），*Vertreibung und Vertreibungsverbrechen 1945-1948*：*Bericht des Bundesarchivs vom 28 Mai 1974*，*Archivalien und ausgewählte Erlebnisberichte*（Bonn：Bundesarchiv Koblenz & Kulturstiftung der Deutschen

Vertriebenen，1989），p.40.

[86] Borodziej，Włodzimierz and Hans Lemberg（eds.），*Die Deutschen östlich von Oder und Neiβe 1945-1950*：*Dokumente aus polnischen Archiven*，4 vols.（Marburg：Herder Institut，2003-4），vol.I，p.98.有趣的是，这份文件认为兹哥达/希维托赫洛维采的数字仅为30人死亡，而拉姆斯多夫/瓦姆比诺维采甚至没有数字.

[87] 如可参阅Ursula Haverbeck-Wetzel interview in Charlie Russell’s TV documentary for the BBC，*The Last Nazis*，Part II，Minnow Films，2009.

[88] Order no.19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risons and Camps of the Ministry for Public Security：in Borodziej，Włodzimierz and Hans Lemberg（eds.），*Die Deutschen östlich von Oder und Neiβe 1945-1950*：*Dokumente aus polnischen Archiven*，4 vols.（Marburg：Herder Institut，2003-4），vol.I，doc.25，pp.151-2.

[89]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pp.93-100.另可参阅www.ipn.gov.pl/portal.php？serwis=en&dzial=2&id=71&search=10599，accessed 3 October 2011。

第十三章 内部敌人

在战火最猛烈时，德国在欧洲直接或间接控制着超过12个国家，并且对其中超过6个国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军事能力，纳粹不可能在没有合作者的情况下控制这些国家，而合作者的数量可能多达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无论战后初期欧洲人多么痛恨德国人，他们更痛恨的还是那些与纳粹合作的通敌者。德国人起码还有借口，毕竟他们是外来文化、外来势力，相比之下，通敌者是叛国者。战后欧洲弥漫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气氛，通敌叛国便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在战后欧洲，通敌者遭受的非人待遇，远非现代人所能理解。在欧洲媒体上，通敌者被描绘成“害虫”“疯狗”，甚至是需要从社会中“清除”出去的“秽物”。[1] 在丹麦和挪威的民间艺术中，通敌者被描绘成老鼠；在比利时，通敌者也确实如过街老鼠被人人喊打，在英国观察者看来，比利时人对通敌者的仇恨已经近乎“宗教式狂热”。[2] 在这种气氛下，也难怪有人对通敌者暴力相向。彼得·武特（Peter Voute）是荷兰抵抗组织的医生，他在战后写道：

> 对通敌者的刻骨仇恨，对复仇的强烈渴望，在当时如此普遍，以至于滥用私刑在所难免。尽管人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报复。当时有谣言提及“刀斧之日”，暴民将会亲手执行法律。[3]

“刀斧之日”，法国人称为“肃清野蛮人”，在每个欧洲国家重复上演。肃清名单似乎永无止境：不仅包括战时领导人和政治家，而且包括地方市镇长官和行政官；不仅包括欧洲极右军事组织成员，而且包括参与镇压民众的普通警察和宪兵；不仅包括承包纳粹工程而大发横财的著名实业家，而且包括服务德军士兵而挣点小钱的咖啡店店主和零售店店主。因为从事纳粹宣传，记者、播音员、制片人声名狼藉；因为慰劳德军部队，演员和歌手饱受攻击。曾经为法西斯分子提供救助和鼓励的牧

师，曾经为德军士兵提供服务的妓女，甚至曾经对德国人报以微笑的妇女和女孩，也都一并遭殃。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用于报复德国人的手段，同样用于欧洲各国的通敌者和法西斯分子。在解放后的混乱中，荷兰和比利时的通敌者被当场处决，他们的房屋被烧毁，“警察对此不闻不问，甚至予以认可”。[4] 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尸体被晾在街头展示，路人可以踢打和唾骂，甚至墨索里尼的尸体也照此办理，被悬挂在米兰洛雷托广场的加油站的屋顶上。[5] 在匈牙利，极右组织“箭十字党”的成员被迫在酷暑天气挖掘犹太人的集体墓地，当地人朝他们身上投掷树枝和石块。[6] 在法国，人们设立秘密监狱，通敌嫌疑犯在那里受到各种虐待，包括截肢、强奸、强迫卖淫甚至花样各异的折磨。[7]

新政权以及盟国也对此感到震惊，甚至抵抗运动本身也认为这些行为令人作呕。1944年10月29日，《维瓦罗伊斯地区报》（*La Terre Vivaroise*）报道了“恐怖的情形”：

> 我们正在重复使用盖世太保使用过的最为可耻的手段；纳粹主义似乎迷惑了许多人，让他们相信暴力总是合法的，他们可以对那些被他们视为魔鬼的人为所欲为，人人都有权夺走别人的生命。如果我们模仿野蛮人、变成野蛮人，那么我们战胜野蛮人又有什么意义？[8]

显而易见的是，不能允许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盟军不能允许战线后方出现无政府状态，毕竟战争仍在进行中。新政府也不允许当地人自行执法，因为这会挑战新政府的权威。1944年8月，夏尔·戴高乐返回巴黎时声称：“公共秩序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面向民众的电台广播中，戴高乐坚称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拥有全权：“所有非正式权力机关必须马上停止运作。”[9]

西欧各国新政府立即从几个方面着手解决问题。首先，承认问题是由于民众对警察缺乏信任所致，竭尽所能支持警察部队，让警察成为捍

卫法律和秩序的中坚力量。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意大利和希腊，只能靠大批盟军士兵来提供支持。但在其他地区，只能靠清洗警察部队中的嫌疑分子来解决问题。例如，在法国解放后的一年间，每8名警察就有1名受到怀疑，每5名侦探就有1名丢掉工作。[10] 其他国家同样照此办理：在挪威和丹麦，清洗警察部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尽管清洗力度可能不如其他西欧国家。重要的是恢复警察的司法权威，让他们能够勇敢对抗那些控制了许多城镇及其邻近地区的自卫团体。

其次，新政府试图着手解除前抵抗组织的武装，正是这些人犯下了绝大多数暴力行为。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例如，在巴黎，爱国民兵公然无视政府命令，继续进行武装巡逻。在瓦朗谢讷（Valenciennes），他们保留了巨大的秘密军火库，包括手榴弹、防空机枪、反坦克枪等。[11] 在布鲁塞尔，政府允许“秘密军”成员在两周内解散，结果抗议示威演变为小型骚乱：警察开枪了，打伤45人。[12] 在意大利和希腊，数千名游击队员拒绝交出武器，原因很简单，他们不信任政府，因为即使在浴血解放后，新政府仍然容纳了无数与旧政权有关的人。

为了劝说前游击队员回归平民生活，许多国家都公布大赦令，赦免以解放名义犯下的罪行。例如，在比利时，当局对德国人被驱逐后41天内发生的、几乎任何抵抗活动视而不见。在意大利，大赦令涵盖战争结束后12周内发生的报复屠杀行为。在捷克斯洛伐克，大赦期达到惊人的5个半月。[13] 如果说在解放的热烈气氛中发生的激情犯罪可以宽大处理，那么，随着政府权力的巩固，后来发生的犯罪都会受到极端严厉的惩处。例如，在法国，1944年年末1945年年初的那个冬季，政府逮捕了许多前游击队员，这被普遍解释为政府在警告抵抗组织，是时候结束私刑处决了。[14]

然而，上述措施无异于胡乱用药。私刑处决如此泛滥，真正的问

题、主要的原因，在于许多人相信复仇是讨回公道的唯一手段。英国驻法国巴黎的大使达夫·库珀（Duff Cooper）曾经就法国私刑写过几份报告，借用他的话说："只要人们相信罪恶会得到惩罚，人们就会寄希望于法律，但当人们开始心存疑虑，人们就宁愿亲手执行法律。"[15] 战争结束后，这种疑虑随处可见。终止报复袭击的必由之路，是让民众相信国家有能力实现比利时报纸所说的"简单快捷的正义"。[16]

于是，欧洲各国新政府都在改革法律及其司法机关。设立新法庭，任命新法官，兴建新监狱和关押地，以应对突然涌入的被捕者。关于叛国罪，也颁布了新法律，以取代过时的、落伍的旧法律。因为通敌者人数众多，新司法观念的设计和应用因此也具有追溯性。在西欧，"民族贬斥"成为惩戒轻微罪行的新惩罚，包括剥夺通敌者的部分公民权，包括投票权。更为严重的罪行则适用死刑，丹麦和挪威虽早已取消死刑，但此时重新引入死刑。[17]

在欧洲某些地区，这种示范性做法更加容易奏效。在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抵抗组织总体上乐于把通敌者交给行政当局，与当局合作良好。然而，在法国的部分地区、意大利和希腊的大部分地区、东欧的绝大部分地区，游击队员以及平民百姓更加倾向于自行执法。这有多方面的原因，许多是政治原因，后文还会有所澄清，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当局缺乏信任。在经年累月的法西斯统治后，欧洲人不太指望政府捍卫"正义"。

或许这种不信任的最佳例子是意大利。这个国家当然是个极端个案：欧洲其他地区的通敌时期并不太长，而许多意大利人对法西斯分子的怨恨已经积压了20年。意大利的解放进程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漫长得多，持续了几乎两年，这两年间意大利北方还爆发了激烈的内战。欧洲其他地区发生过的许多事情，在这里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意大利提供了明显的例证，足以说明为何欧洲大陆普遍存在不信任。

清洗意大利

1945年，意大利是一个分裂的民族。战争最后两年，这种分裂是地理上的：南方被英美两国占领，北方被德国占领。但分裂也是政治上的，尤其是在北方。一方是法西斯党徒，德国入侵后，法西斯党徒针对民众的暴行有增无减；另一方是反对派，许多人是共产党，许多人来自其他党派，他们只是由于对墨索里尼及其党羽的共同仇恨才团结起来。

1945年4月，当法西斯党最终被击败时，游击队员开始猛烈复仇。任何与法西斯党有染的人都会成为攻击目标，不仅包括黑色旅（Black Brigades）或者戴奇玛·玛斯（Decima Mas）部队的战斗人员，还包括妇女辅助部队（Women’s Auxiliary Service）的队员，甚至包括法西斯共和党（Fascist Republican Party）的普通书记员和管理员。根据意大利文献记载，皮埃蒙特区、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威尼托区是最为暴力的地区，每个地区都发生了数千起枪击案。[18] 英国文献表明，欧战胜利日前夕，在米兰大约有500人被处决，在都灵更有1000人被处决，但负责向英国驻罗马大使报告的联络官说道：“被枪决者都是罪有应得。”总之，这些数字可能被低估了。[19]

盟军显然无力干预这种大屠杀，起码在早期是如此。据说在都灵，盟军代表团团长约翰·史蒂文斯（John Stevens）上校告诫当地解放委员会主席佛朗哥·安东尼切利（Franco Antonicelli）：“主席，听好了，两三天内，最迟第三天，我不想再看到大街上有死人。”[20] 许多普通游击队员同样声称，盟军允许他们自己决定讨回公道的方式。一位前游击队员战后说道：“美军允许我们这样干，他们看着我们，允许我们稍微折磨犯人，然后他们再把犯人带走。”[21]

结果，在意大利北部发生的战后暴力，比西欧任何地方都严重得多。统计数据足以说明问题。解放期间，在比利时被杀的通敌者大约是265人，在荷兰大约只有100人。[22] 在法国，解放进程更漫长、更暴

力，在这几个月中，被杀的维希政权支持者大约是9000人，尽管只有少数人是在解放后被杀的。[23] 在意大利，最终死亡人数甚至更高：大约在1.2万人至2万人之间，取决于你相信哪一个数字。[24]

换言之，在每个国家的每10万人当中，荷兰只有1名通敌嫌疑犯在复仇行动中被杀害，比利时有超过3名，法国有超过22名，而意大利大约有26～44名。

在意大利北部的复仇行动中，最令人震惊的不是杀戮的规模，而是杀戮的速度。根据意大利内政部于1946年的统计，仅仅在1945年4～5月，就有大约9000名法西斯党徒及其同情者被杀。[25] 某些历史学家将其描述为暴力狂欢，或多或少处于失控状态；但在激情犯罪随处可见的同时，还存在不带情绪、有所计划的有组织犯罪。某些特定个人被全副武装的战斗队员搜寻和处决，在某些个案中，游击队员甚至在举行简短的临时审判后再处决犯人。

就像西欧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抵抗组织成员那样，这些游击队员没有等待盟军到达，也没有将他们手上的犯人交付司法，而是自觉决定自行执法。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交由意大利法庭审判，法西斯党徒将不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罗伯托·巴塔利亚（Roberto Battaglia）曾经是游击队指挥官，他说道："我们必须现在实施清洗，因为解放后再无可能，因为战争期间你还能开枪，战争结束后你不能再开枪。"[26]

广泛流传的、针对意大利司法品质的笑话是有根据的。意大利北部的游击队员早已预见到将会迎来怎样的清洗，毕竟在过去的18个月里，他们已经看到意大利南部发生的一切。在南方，在佩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的腐败领导下，前法西斯党徒继续统治社会各阶层。在某些地区，盟军曾经坚持开除法西斯党徒的公职，但随着解放区被移交给意大利当局，这些人又马上官复原职。警察继续袭击共产党人，甚至袭击所有左派同情者，而在公众场合高唱法西斯歌曲仍然相当

普遍。1944年，在卡拉布里亚区出现法西斯主义回潮，甚至发生短暂的法西斯恐怖行动和法西斯破坏活动。解放一年多以后，意大利南部许多社区仍然由原来的市长、警长、地主统治，使用同样的暴力和压迫手段镇压民众，一如法西斯统治的年代。[27]

及至意大利北部解放时，意大利南部失败的清洗早已完成。问题在于法西斯党徒本身从未被视为罪犯，实际上也不可能被视为罪犯，因为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早在战争爆发前很久就已得到国际承认。然而，北方的情况稍有差异。在北方，以萨洛（Salò）为基地的法西斯党徒仍然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尽管早在1943年他们就已失去了全国政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支持和帮助德国占领意大利。结果，任何曾经在萨洛共和国担任政府职务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控告对象，因为他们既是法西斯党徒，又是通敌者。

从表面上看，在意大利北部进行真正的清洗，其前景远比在意大利南部更为光明。然而，在实际上，这种政治意愿从一开始就错过了时机。盟军到达时，许多政府官员和民政官员都成功保住了自己的职位：在解放后的混乱局面中，他们的经验有助于控制局势。同样，许多警察和宪兵被留用，因为可想而知的原因，盟军担心警察权力落入游击队手中。曾经通敌的商号被允许继续营业，以免工人失业；商号老板和经理被允许继续留任，以免破坏经济。实际上，除了在游击队强行改变的地区，那些未被触动的职务维持了原有的权力架构。

当清洗真正来临时，已经交由法庭负责，但首先并未进行任何司法制度改革。尽管有了新法律、新法庭、新法官以及新的法律人士，但司法架构内部的总体气氛是继承而非改革。某些新法律被付诸实行，但1930年制定的《法西斯刑法典》（*Fascist Penal Code* ）未被废除，实际上被沿用至今。审理通敌案件的新法庭成立完毕，即立法会议特别法庭（Extraordinary Courts of Assize），但其主要成员还是墨索里尼执政时

期的法官和律师。因此，意大利许多通敌者在出庭受审时，荒唐地发现主审法官也干净不到哪里去。当犯人被宣判有罪时，刑罚也微不足道。当法官自己的角色很成疑问时，他们很难做出不利于其他民政官员的判决。[28]

尽管犯下许多错误，立法会议特别法庭起码判决了暴力犯罪，比如臭名昭著的黑色旅对平民的谋杀和折磨。但这些判决也可以被推翻，只要向意大利的最高法院即罗马上诉法院（Court of Cassation）请求申诉就可以了。上诉法院法官都是厚颜无耻的法西斯主义同情者，明显倾向于为旧政权的所作所为辩护。通过反复宣告特别法庭判决无效，通过赦免、驳回、掩盖黑色旅犯下的某些最为严重的罪行，上诉法庭有组织地推翻所有将法西斯罪犯绳之以法的尝试。[29]

战后一年内，官方组织的清洗就已沦为闹剧。及至1946年2月，在39.4万名接受调查的政府雇员中，只有1580人被解职，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旋即复职。在意大利被关押的5万名法西斯党徒中，只有极少数人真正长期服刑：1946年夏，所有低于5年的徒刑都被取消，犯人当场释放。尽管见证了西欧某些最为恶劣的暴行，意大利法庭却比欧洲其他任何法庭都做出更少的死刑判决，在战后4500万人口中，死刑判决不超过92宗。按照比例，这只是法国处决人数的1/20。[30] 与他们的德国盟友不同，没有意大利人因为在意大利境外犯下的战争罪行而受审。

面对如此失败的司法，难怪平民百姓深感挫败。一旦民众认定当局不可能进行任何清洗，唯一捷径就是自行执法。战后几个月，又一波暴力浪潮席卷意大利全国，民众不信任官方组织的清洗，他们冲进监狱处决犯人。这种事情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和威尼托区极为普遍，但同样出现在北方其他地区。[31] 最为著名的事例发生在维琴察省的斯基奥（Schio），前游击队员冲进当地监狱，屠杀了55名犯人。从部分参与民众的言论中可知，人们多么痛恨当时失败的清洗。一位平民说

道："如果他们举行两三场审判，如果他们试图做点什么，也许就足以抚平民众心中的郁结。"另一位平民在50年后说道："我始终支持这次行动，因为对我来说，杀死他们就是讨回公道……我绝不同情他们，即使他们已经死去。"[32]

欧洲清洗行动之失败

意大利的情况仅仅是欧洲各地相似情形的极端例子。起码在一定程度上，战后清洗在所有国家都是失败的。例如，在法国，这个被盟国称赞为"彻底""得力"地从事清洗的国家，人们对法庭的失望情绪随处可见。[33] 在法国，在31.1万宗立案调查的个案中，只有大约9.5万宗个案做出定罪判决，只占立案调查总数的30%而已。在定罪者当中，不到一半的人，即只有4.5万人，被判处监禁或者更重的刑罚。最普遍的惩罚是剥夺公民权，如投票权或者出任公职权。然而，绝大多数惩罚都因为1947年的大赦而被取消，大多数囚犯亦被释放。1951年另一次大赦后，只有1500名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仍被囚禁。在1.1万名于早期清洗期间被解除职务的公务员中，绝大多数人在此后六年内相继复职。[34]

在荷兰，有一半受到惩处的人只是失去投票权，另一半受到惩处的人绝大多数只是被判监禁，他们的刑期通常很短。在比利时，惩处略为严厉，做出了4.8万宗徒刑判决，2340人被判无期徒刑，但这也只占立案调查总数的12%而已。比利时法官还做出2940宗死刑判决，其中只有242宗得到执行。[35]

欧洲大陆许多民众都把这些判罚视为无可救药的假慈悲，他们当然要宣泄自己的挫败感。1945年5月，比利时全国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游行示威，通敌者被当场处死，其家人遭到羞辱，其房屋被洗劫。[36] 在丹麦，几乎不存在严重的通敌行为，但还是有大约1万人走上奥尔堡（Aalborg）街头，要求严厉惩处通敌者，甚至发起总罢工。丹麦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小规模游行示威。[37] 在法国和意大利，暴民多次尝试冲

进监狱，私刑处死在押囚犯。[38]

或许唯一让民众对清洗感到满意的西北欧国家就是挪威了。在挪威，审判迅速而有效率，惩处也相当严厉。在300万人口中，9万宗个案被立案调查，超过一半个案做出定罪判决。换言之，超过总人口1.6%的人在战后受到某种惩罚；这还不包括针对妇女和孩子的非正式惩罚，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39]

事实上，法律裁决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差异巨大。个人最可能被立案调查的国家，毫无疑问是德国，去纳粹化进程必然导致整个德意志民族被妖魔化。然而，更加令人意外的是，个人最可能被囚禁的国家是比利时，紧随其后的是挪威。同样令人意外的是，个人最可能被处决的是保加利亚，该国做出了超过1500宗死刑判决。（然而，与其他东欧国家相似，许多死刑判决与共产党夺取政权有关，而非与惩处实际犯罪有关。）

最能说明不同国家对待通敌者采取不同做法的，也许是中欧国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虽然是邻国，但在清洗时有着天壤之别。在奥地利，通敌通常被视为轻微罪行，惩罚通常是罚款或者剥夺投票权。超过50万人受到这种惩罚。然而，这种惩罚并未长期实施：1948年4月的大赦，恢复了48.7万名前纳粹分子的公民权，其他前纳粹分子也在1956年得到赦免。大约7万名公务员被解职，与其他国家一样，这种解职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40]

相比之下，在捷克，通敌的后果就要严重得多了。捷克法庭对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做出了723宗死刑判决，而且由于捷克独有的判决三小时内执行死刑的政策，死刑实际执行率比欧洲任何国家都高，大约95%的个案，即686人被执行死刑。尽管绝对处决人数与法国相差无几，但不要忘记，捷克人口只有法国的1/4，那么捷克的死刑判决率就是法国的4倍。捷克处决通敌者的比例是比利时的2倍，挪威的6倍，东面的斯

洛伐克同胞的8倍。但与奥地利相比，最能说明问题。在奥地利做出的43宗死刑判决中，只有30人被实际执行，这使奥地利成为通敌者在欧洲最安全的避难所之一。捷克处决“战争罪犯”的比例是其奥地利邻居的16倍。

当然，这两个国家的差异，可以归结为文化、政治、种族等原因。捷克人想要为当年国破家亡复仇，想要为当年捷克境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排斥捷克人复仇，甚至在审判进行的过程中，捷克人就已经开始驱逐德意志少数民族了。相比之下，奥地利人相当欢迎1938年的德奥合并，他们对讲德语的同胞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们对奥地利是希特勒“首要受害国”的官方说法嗤之以鼻。正是因为奥地利的通敌行为如此普遍，当局感到无法正常惩处通敌行为。

至于这两个国家对通敌者的不同处理方式是否公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从超越国家的角度观察，根本不可能同时判断一个国家的严厉与另一个国家的宽容。

表**2** 针对西欧各国通敌者的司法裁决 [41]

	挪威	丹麦	比利时	荷兰	法国	意大利	捷克斯洛伐克	奥地利
1945 年人口	310 万	400 万	830 万	930 万	4000 万	4540 万	1050 万	680 万
死刑 *	1	0.7	3	0.4	3.8	0.2	6.5	0.4
徒刑 *	573	33	582	553	110	110	208	200
轻罚 *	1083	—	378	663	188	—	234	7691
合计 *	1656	33	963	1216	309	—	449	7892

注：带 * 号数字为每 10 万人受罚人数。尽管上述某些数字甚为精确，但由于确切数字仍有争议，还是应该将其视为概略数字。然而，通过国与国的比较，还是能看出大致精确的图景。

不同国家对通敌者的不同处分，仅仅是战后欧洲追求正义的其中一个障碍而已。欧洲各国的法庭对穷人和年轻人的裁决都更为严厉，他们没有关系、不善言辞，更加请不起昂贵的律师。（在共产党借助清洗行动实现自身政治目的之前，东欧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清洗行动早期，法庭对受审者的裁决也更为严厉，因为此时主观情绪仍然强烈：1944年足以判处死刑的罪行，战后可能只判处数年监禁。[42] 对不同类型的通敌行为，处分也有所不同。例如，军事通敌者、政治通敌者以及出卖机密者，所受惩处通常比较严厉。那些在新闻媒体工作的通敌者，所受惩处可能最为严厉，虽然他们的罪行相对轻微，但他们的罪行白纸黑字俱在，而且处分他们有杀鸡儆猴之效。[43] 相比之下，经济通敌者很少受到惩处，起码在西欧确实如此。这不仅因为针对商人的绝大多数指控难以取证，而且因为商人更有能力聘请律师，律师极力拖延审判，直到当事人被判无罪。此外，当时也缺乏审判商人的政治动因：战后欧洲情况如此糟糕，意味着无论商人多么不得人心，欧洲社会还是需要商人。

人们不能一味指责法庭，说法庭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放下民众的情感诉求不谈，法庭本身也陷入棘手的困境中。例如，围绕何谓“通敌”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有清晰的司法定义。例如，如果被告人深信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国家利益而委曲求全，那么这还是叛国行为吗？许多政客和官员都声称，他们不得不附和纳粹，因为这样总比团结抵抗从而引起大规模镇压要好。与之类似，经济通敌者经常声称，如果他们的工厂停止生产商品，人们就会挨饿，工人就会被征召为强迫劳工并被带到德国。通过与德国人合作，他们让自己的国家避免了更为糟糕的命运。也有人指出，针对通敌行为的新法律，是秋后算账的新法律，换言之，因为他们的行为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他们的行为怎能被视为犯罪呢？如果某人在胁迫之下被迫“通敌”，他们怎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战后当局怎能声称极右政党成员为不法分子？因为这同样是秋后算账。与此同时，战后当局不是还拥护自由结社的普遍权利吗？

在法国、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公诉人面临的额外问题是，整个国家都在与德国合作。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因为替德国人卖命而被起诉时，绝大多数普通官员又怎么可能与德国或者纳粹毫无关系？如果一个人仅仅是遵循所谓合法政府的指示行事，又怎能称其为叛国者？[44]

如此精妙的法律辩论，只能屈服于悠悠众口，民众不太关心冷静的司法程序，更关心自己的情感需要宣泄，他们想看到某些人被惩罚。无可避免的，某些审判纠缠于细枝末节而停滞不前。审判远非“简单快捷的正义”，而是经常缓慢得令人麻木和痛苦。例如，在比利时，解放6个月后已有18万宗案件被立案，但只有8500人被提审。一位盟军观察员啼笑皆非地评论道：“如果这种慢吞吞的节奏持续下去，至少要10年才能让所有案件过堂了。”[45]

提升速度的办法是做出简短裁决，或者在案件提审之前销案。最后，比利时也确实照此办理。在11万宗经济通敌指控中，只有2%的案件最终提审。[46] 同样的，在欧洲其他国家，大多数案件在提审之前就已销案。

便利神话之建构

欧洲清洗行动最终雷声大雨点小，主要是因为没有强烈的政治动因。严厉而缜密的惩处并不符合任何民族的利益。例如，在战争期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戴高乐的流亡政府都把法兰西民族描绘成团结一致对抗德国人和一小撮维希分子的群体。戴高乐在解放后接管权力时，他没有必要放弃这个团结神话，因为法兰西显然已经团结一致追随他。此外，法国必须团结一致，只有这样才能自我重建。战争结束后，通敌者和抵抗者只能比邻而居。挑起他们之间的仇恨，只会为将来留下麻烦。

欧洲其他政府以及抵抗组织也是照此办理。挪威、荷兰、比利时、

捷克的流亡政府，同样把各自的民族描绘成团结一致对抗纳粹的群体，以此弥合民族内部的紧张关系。战争结束后，抵抗运动成员乐见自己的战争事迹被反复传颂，尽管这会给人们留下错觉，仿佛他们的抵抗行为而非日复一日的屈辱合作，才是当时的常态。尤其是共产党倾向于营造人们团结一致站在他们一边的错觉，因为这能增强他们在东欧夺权的合法性。对于所有政府来说，团结的假象比清洗重要得多。因此，总体而言，只有在除掉那些妨碍团结的对象时，例如在为驱逐敌对种族找理由时，或者在战后东欧排斥直言不讳的政治反对派时，人们才会努力展开清洗。

这种对团结的坚持，造就了战后最具说服力的神话，即所有战争罪恶都是由德国人造成的。如果只有“他们”对“我们”施加暴行，那么，欧洲其他民族就能洗脱自作自受的嫌疑。[47] 甚至，欧洲各国都能分享对德国的“胜利”。因此，战争结束后，所有欧洲人对德国和德国人的憎恨，就只是对德国所作所为的反应，这也有助于欧洲各国治愈自己的创伤。

作为战败国，德国别无选择，只能背负骂名。毕竟，正是德国发动了战争。正是德国奴役了欧洲各国数百万名强迫劳工，并且发动了大屠杀。然而，即使在德国境内，还是有可能逃避这些罪行的。在很大程度上，德国人反复为战争道歉的典型形象，是20世纪60年代的创造：在此之前，德国人只是像其他任何民族那样，否认个人和集体要为1939～1945年发生的事情负责。多数德国人把自己视为受害者而非施害者，包括纳粹主义的受害者、战败的领导人的受害者、轰炸的受害者、盟国复仇的受害者、战后短缺的受害者，诸如此类。责任由此得以摆脱。

总体而言，去纳粹化审判与其他地方的清洗一样难以为继。在德国，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加致力于清洗纳粹；某些类别的犯人比其他类别的犯人受到更严厉的惩处；许多臭名昭著的纳粹党徒得以逍遥法

外，而他们的“同路人”却受到惩处。[48]

在众多审判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946年针对纳粹领导人的纽伦堡审判。与审判同时进行的公共宣传则是为了教育德意志民族，让他们知道纳粹主义的恐怖，但这也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德意志民族的罪恶仅仅由这些受审者承担。一旦审判结束，人们很容易以为正义已经得到了伸张。

此后数年间，根除纳粹影响的行动引起了普遍愤恨，尤其在美军占领区更是如此。这次行动持续到1949年，到德国西部建成新的联邦共和国为止。与欧洲其他地区相同，清洗行动正式宣告结束，曾经给予前纳粹党徒的惩罚正式被撤销或推翻。1949年9月20日，联邦德国新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第一次国会演讲中宣布，是时候“告别过去”。[49] 为了将来的新梦想，战争噩梦将会被刻意遗忘。

想象出如此这般的战后神话，其实也是用心良苦。如果团结的神话能够造就团结的现实，那么何乐而不为？如果忘记战时罪恶和通敌行为能够让欧洲迈步前行，并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这难道不是最好的选择吗？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特效药带有严重的副作用。试图在西欧恢复政治右派的地位，最终只是粉饰太平：荒唐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导致极右派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政党。

随着这个神话把德国定义为唯一需要负责任的国家，对通敌者的严厉处分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仿佛从简易判决变成对无辜者的大屠杀。在法国，及至20世纪50年代，大众媒体开始出现数以百计的可怕故事，绘声绘色地讲述游击队员如何折磨和虐待平民。在所有这些故事中，受害者的所谓无辜，要么是假装的，要么是夸张的。许多故事以妇女的遭遇为主题，她们被剥光衣服、剃去毛发、饱受凌辱，她们被铁棍毒打，惨遭猥亵和强奸。这种事情在战后确实发生过，但大众媒体上的故事经常是道听途说，并非事实，而且往往有所夸大。[50]

与这些故事同时出现的是捏造的数据。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作者声称，在解放后几个月内，有大约10.5万名通敌者被法国抵抗组织处决。这个数字来自1944年11月时任内政部部长阿德里安·迪克西埃（Adrien Tixier）的信口胡言，但迪克西埃死于1946年，没有任何档案证据可以支持这个数字。经过政府机构和独立学术机构反复核实的真实数字，还不到这个数字的1/10。[51]

同样，在意大利，政治右派也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粉饰为受害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们就把战后初期描绘成浴血时代，有多达30万人被谋杀。[52] 这种彻头彻尾的荒唐说法，如果被反复宣扬，也会营造出有板有眼的气氛。更有甚者，他们诡称战争期间被法西斯杀害的游击队员只有4.5万人，仿佛抵抗分子才是更加穷凶极恶的恶棍。[53] 实际上，战争结束后，被游击队杀死的人根本不可能是30万人，实际数字还不到这个数字的1/20。[54]

右派无辜的神话，在法国和意大利同样流行。实际上，最近几年更加流行。21世纪初，在意大利引起最大争议的著作是詹保罗·潘萨（Giampaolo Pansa）的《成王败寇》（*Il Sangue dei vinti* ），此书通过详细描述解放前后游击队杀人的场景，攻击意大利抵抗运动的英雄主义。潘萨大费周章地论述许多被杀者清白无辜，经常引用法庭的“无罪”判决作为佐证。这本书引起左派极大愤慨，因为作者从不援引其他文献，它们更多地考虑到这些杀人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即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普遍愤怒，以及人们对法庭判决缺乏信任。但最让左派感到愤怒的是，这本书竟然到处流传，出版第一年就卖出35万册。[55] 潘萨利用了意大利新右派志得意满的心态，右派也乐于利用他挑起的争论，再加上其他立场暧昧的历史学家的作品，这成为右派重新粉饰过去的手段。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欧洲共产主义退潮，右派政党随之崛起，欧

洲各国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曾经受到普遍谩骂的数字又被翻出来，因为这些数字可以映衬共产主义和苏联“更大的邪恶”。在大众想象中，战时独裁者如墨索里尼或者罗马尼亚的扬·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由于他们的所谓美德，他们犯下的罪行都有了理由，甚至被视而不见。匈牙利、克罗地亚、乌克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曾经在战时和战后任意杀害犹太人、共产党人以及自由主义者，现在也被视为民族英雄。这已经不是用心良苦的神话：他们在危险地歪曲事实，而事实已经湮没无闻。

我们可以理解战时专制统治下普遍存在的通敌行为，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容忍这种行为。当通敌者的行为逾越道德底线，我们不能以那些通敌者与我们重归和谐的政治前景而原谅他们。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容忍游击队在战后的残忍复仇，但我们也不能用现代标准来评判他们的行为。不公已然发生，无辜者已然被杀害。但是，对欧洲人来说，经历这么多年的镇压和暴行，大家都变得残忍粗暴，要求他们不要采取过激行为，无异于与虎谋皮。

---

[1] *Défense de la France* and Oslo *Dagbladet*；引自Novick，Peter，*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London：Chatto & Windus，1968），p.31 and Dahl，Hans Fredrik，‘Dealing with the Past in Scandinavia’，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54-8。

[2] TNA：PRO FO 371/38896，Major D.Morton，“Conditions in France and Belgium”，3 October 1944.另可参阅Conway，Martin，‘Justice in Postwar Belgium：Popular Passion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37-42。

[3] Voute，Peter，*Only a Free Man*：*War Memoirs of Two Dutch Doctors*（*1940-1945*）（Santa Fe，NM：The Lightning Tree，1982），p.181.

[4] TNA：PRO FO 371/48994，Sir H.Knatchbull-Hugessen to Churchill，2 July 1945；另可参阅Bodson，Herman，*Agent for the Resistance*（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1994），pp.144-5。

[5] 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24-6.

[6] Pelle，János，*Az utoisó vérvádak* （Budapest：Pelikán，1995），pp.193-5.

[7] 巴黎郊外德朗西拘留营一位医生列举了49名在审讯期间遭到毒打的人，他们受到大面积挫伤，被打破颅骨和面骨，被灼烧脚趾，在一宗个案中，伤势由长时间电击阴道和直肠造成。可参阅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 （Paris：Perrin，2001），pp.109-15。关于其他例子，参阅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 （Paris：Perrin，2001），pp.509-10，585-6；Fabienne Frayssinet，“Quatre saisons dans les geôles de la IVe République”，*Écrits de Paris* ，July 1949，pp.114-25；Aron，Robert，*Histoire de l’épuration*：*De l’indulgence aux massacres*，*Novembre 1942-Septembre 1944* （Paris：Fayard，1967），p.572；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 ，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p.139-40。

[8] *La Terre Vivaroise* ，29 October 1944，引自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 （Paris：Perrin，2001），pp.316-17。

[9] De Gaulle，援引自Philippe Boegner in Beevor，Antony and Artemis Cooper，*Paris After the Liberation* （London：Penguin，1995），p.63；radio announcement 14 August 1944，引自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 （Paris：Perrin，2001），p.346。

[10] *Journal Officiel* ，Parliamentary Debates，27 December 1944，pp.604-7；12 March 1954，p.831.另可参阅Novick，Peter，*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 （London：Chatto & Windus，1968），p.84，and the discussion of figures in Berlière，Jean-Marc with Laurent Chabrun，*Les policiers français sous l’Occupation* （Paris：Perrin，2001），pp.321-5。

[11] Beevor，Antony and Artemis Cooper，*Paris After the Liberation* （London：Penguin，1995），pp.111-12.

[12]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Pimlico，2007），p.65；Sonja van’t Hof，“A Kaleidoscope of Victimhood-Belgian Experiences of World War II”，in Withuis，Jolande and Annet Mooij（eds.），*The Politics of War Trauma*：*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Ⅱ *in Eleven European Countries* （Amsterdam：Askant，2010），p.57.

[13] 关于比利时可参阅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Pimlico，2007），p.44；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可参阅Annex 19 in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 ，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V：*Czechoslovakia* ，p.276；关于意大利可参阅Alessandrini，Luca，'The Option of Violence-Partisan Activity in the Bologna Area 1945-1948'，in Jonathan Dunnage（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 （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64。

[14] Novick，Peter，*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 （London：Chatto & Windus，1968），p.77.

[15] TNA：PRO FO 371/49139，Duff Cooper to Anthony Eden，11 January 1945.

[16] *Le Peuple* ，5 September 1944，"Une proclamation des partis…".

[17] Huyse，Luc，'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a Political Actor in Regime Transitions：The Case of Belgium，1944-50'，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61；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London：Pimlico，2007），p.46；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 ，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34，Derry，T. K.，*A History of Modern Norway 1814-1972*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3），p.405. 尽管死刑在挪威刑法中被保留到1902年，在丹麦刑法中被保留到1930年，但这两个国家自从19世纪以来就没有执行过死刑。可参阅Dahl，Hans Fredrik，'Dealing with the Past in Scandinavia'，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52-3；以及Nøkelby，Berit，'Adjusting to Allied Victory'，in Henrik S. Nissen（ed.），*Scandinav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rans. Thomas Munch-Peterse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319。

[18] 参阅the statistics for reported homicides in 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 （Rome：Riumiti，2004），pp.97，102.

[19] TNA：PRO WO 106/3965A，memo from Sir Noel Charles to Foreign Office，11 May 1945.近期来自意大利的研究认为都灵的数字是1322而米兰的数字是1325。可参阅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 （Milan：Sperling，2005），pp.55，117。

[20] 引自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18。

[21] Testimony of Benito Puiatti and Eraldo Franza，引自Pavone，Claudio，*Una guerra civile*：*Saggio storico sulla moralità nella Resistenza*（Turin：Universali Bollati Boringhieri，2006），pp.508，768 fn.11。

[22]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42.

[23] 关于更为具体的数字，以及如何达到这个数字的讨论，参阅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32，Rousso，Henry，'The Purge in France'，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93-7，119，and Novick，Peter，*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London：Chatto & Windus，1968），pp.202-8。

[24] 关于1.2万至1.5万人于战后被杀的数字，参阅Pavone，Claudio，*Una guerra civile*：*Saggio storico sulla moralità nella Resistenza*（Turin：Universali Bollati Boringhieri，2006），p.511；以及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67。关于2万人的数字，参阅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p.371。关于数字的讨论，参阅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pp.365-72，以及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16-18。

[25] 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18.

[26] Roberto Battaglia letter to the police chief of La Spezia，引自Pavone，Claudio，*Una guerra civile*：*Saggio storico sulla moralità nella Resistenza*（Turin：Universali Bollati Boringhieri，2006），p.509。

[27] 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85，205；Jonathan Dunnage，"Policing and Politics in the Southern Italian Community，1943-1948"，in Dunnage，Jonathan（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p.34-9；Woller，Hans，*Die Abrechnung mit dem Faschismus in Italien*，*1943 bis 1948*（Munich：Oldenbourg，1996），pp.90-91.

[28] 关于意大利司法改革失败的概述，参阅Battaglia，Achille，*I giudici e la politica*（Bari：Laterza，1962），*passim*；以及Modona，Guido Neppi，‘Postwar Trials against Fascist Collaborationists and Partisans：The Piedmont Experience’，in Jonathan Dunnage（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p.48-58；另可参阅Claudio Pavone，“The General Problem of the Continuity of the State and the Legacy of Fascism”，in Dunnage，Jonathan（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18。

[29] Modona，Guido Neppi，‘Postwar Trials against Fascist Collaborationists and Partisans：The Piedmont Experience’，in Jonathan Dunnage（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p.53-4.

[30] 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p.369.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p.47-8，认为不超过50人被处决.

[31] 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Rome：Riumiti，2004），pp.142-4；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pp.316-26.

[32] Testimonies of Valentino Bortoloso and Pierina Penezzato，interviewed by Morgan，Sarah，‘The Schio Killings：A Case Study of Partisan Violence in Postwar Italy’，*Modern Italy*，vol. 5，no. 2（2000），pp.154-5.

[33] Rousso，Henry，‘The Purge in France’，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03.

[34] 关于百分比和统计数字，参阅Rousso，Henry，‘The Purge in France’，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06-8。关于数字的轻微差异，参阅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46；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34。

[35] Conway，Martin，‘Justice in Postwar Belgium：Popular Passion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34；Huyse，Luc，‘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a Political Actor in Regime Transitions：The Case of

Belgium，1944-50’，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61-2.

[36] Conway，Martin，‘Justice in Postwar Belgium：Popular Passion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34，140，148；Huyse，Luc，‘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a Political Actor in Regime Transitions：The Case of Belgium，1944-50’，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61-2.

[37] TNA：PRO FO 371/47307，British Embassy in Copenhagen to Foreign Office，3 August 1945.

[38] *Le Monde*，13 January 1945；Farge，Yves，*Rebelles*，*soldats et citoyens*（Paris：Grasset，1946），pp.243-50；Novick，Peter，*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London：Chatto & Windus，1968），pp.76-7.

[39] Nøkelby，Berit，‘Adjusting to Allied Victory’，in Henrik S. Nissen（ed.），*Scandinav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trans. Thomas Munch-Peterse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p.319-20；Derry，T. K.，*A History of Modern Norway 1814-1972*（Oxford：Clarendon Press，1973），pp.405-6；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45.

[40] MacDonogh，Giles，*After the Reich*（London：John Murray，2007），pp.359-61；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52.

[41] 人口数字来自Maddison，Angus，*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2003），pp.38-9。捷克（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人口估计来自Maddison，Angus，*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2003），p.96。捷克人口普查数字另见Gyurgyík，László，*Changes in the Demographic Settle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Hungarian Minority in*（*Czecho-*）*Slovakia between 1918-1998*，trans. Jószef D. Lőrincz（Budapest：Teleki László Foundation，1999），pp.38-9。其他数字来自如下来源：丹麦和挪威，Dahl，Hans Fredrik，‘Dealing with the Past in Scandinavia’，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148；比利时和荷兰，Huyse，Luc，‘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a Political Actor in Regime Transitions：The Case of Belgium，1944-50’，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61；法国，Rousso，Henry，‘The Purge in France’，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08，110，119-20，包括司法法庭处决的767人和军事法庭处决的769人；意大利，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p.47-8，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p.369，温和制裁数字不详；捷克，Frommer，Benjamin，*National Cleansing*：*Retribution against Nazi Collaborators in Postwar Czechoslovak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91，220，243；奥地利，MacDonogh，Giles，*After the Reich*（London：John Murray，2007），pp.359-61，以及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52。

[42] Frommer，Benjamin，*National Cleansing*：*Retribution against Nazi Collaborators in Postwar Czechoslovak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38；Huyse，Luc，'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a Political Actor in Regime Transitions：The Case of Belgium，1944-50'，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65-6.

[43]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51；Huyse，Luc，'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a Political Actor in Regime Transitions：The Case of Belgium，1944-50'，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63，166-8；Frommer，Benjamin，*National Cleansing*：*Retribution against Nazi Collaborators in Postwar Czechoslovak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272-7.

[44] 关于各种法律问题，参阅Novick，Peter，*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London：Chatto & Windus，1968），p.209；Huyse，Luc，'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a Political Actor in Regime Transitions：The Case of Belgium，1944-50'，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59-69；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p.44-5；Nøkelby，Berit，'Adjusting to Allied Victory'，in Henrik S. Nissen（ed.），*Scandinav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trans. Thomas Munch-Peterse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p.320-21。

[45] TNA：PRO FO 371/48994，Sir H.Knatchbull-Hugessen to Churchill，2 July 1945.

[46] Huyse，Luc，'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a Political Actor in Regime Transitions：The Case of Belgium，1944-50'，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63.

[47] 参阅Tony Judt’s seminal essay，“The Past is Another Country：Myth and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in Deák，István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296，298.

[48] MacDonogh，Giles，*After the Reich*（London：John Murray，2007），pp.348-57；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p.53-61；Botting，Douglas，*In the Ruins of the Reich*（London：Methuen，2005），pp.315-53.

[49]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61.

[50] 如可参阅Fabienne Frayssinet，“Quatre saisons dans les geôles de la IVe République”，*Écrits de Paris*，July 1949，pp.114-25；and the story of the rape and torture of a forty-three-year-old woman in Villedieu-sur-Indre，in *La Gerbaude*，1951，issue 2，引自Aron，Robert，*Histoire de l’épuration*：*De l’indulgence aux massacres*，*Novembre 1942-Septembre 1944*（Paris：Fayard，1967），p.572。对比更为公允的官方调查，即在安德尔，在普瓦提埃拉沙文内里拘留营，在巴黎德朗西拘留营的调查：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p.139-40；以及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Paris：Perrin，2001），pp.109-15，509-10。

[51] 关于所有相互冲突数字的讨论，参阅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32；Rousso，Henry，‘The Purge in France’，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93-7，119；Novick，Peter，*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London：Chatto & Windus，1968），pp.202-8。

[52] 如可参阅Mungone，G.，*Operazione rossa*（Padua：Tipografia Gori di Tognana，1959），p.x。关于这些数字的讨论，参阅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pp.365-72；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16-18。

[53] 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66-7.

[54] 关于1.2万至1.5万人于战后被杀的数字，参阅Pavone，Claudio，*Una guerra civile*：*Saggio storico sulla moralità nella Resistenza*（Turin：Universali Bollati Boringhieri，2006），p.511；以及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67。关于2万人的数字，参阅Pansa，

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 （Milan：Sperling，2005），p.371。关于数字的讨论，参阅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 （Milan：Sperling，2005），pp.365-72，以及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16-18。

[55] 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 （Milan：Sperling，2005），p.x.

第十四章 报复妇孺

在西欧绝大多数地区，针对通敌者的复仇通常是小规模事件。复仇通常由个人或者少数游击队员执行，并且有特定的复仇动机。集体复仇则由整个城镇或者整个村庄的人共同执行，这实际上相当罕见，通常发生在解放过程特别惨烈的地区。总体而言，正如前文所述，西欧社群或多或少都愿意把通敌者交由当局处理。但在人们不信任当局的地区，人们会试图自行执法，而警察或者盟军则会迅速介入以恢复秩序。

唯一的例外情形，而且是西欧随处可见的例外情形，则是人们对待那些与德军士兵同床共枕的妇女的态度。这些妇女通常被视为叛国者，借用法国俗语，则是“躺卧通敌者”，这些妇女可能并未犯下任何触犯法律的罪行。战争结束后，当这些妇女所在的社区将矛头指向她们时，没有多少人愿意为她们辩护。偶尔在场的警察或者盟军士兵几乎总是袖手旁观，任由暴民为所欲为。实际上，在某些城镇，当局甚至鼓励人们侮辱这些妇女，因为市政官员将其视为民众发泄愤怒的减压阀。[1]

在西欧所有针对通敌者的报复方式中，侮辱妇女是最公开、最普遍的做法。妇女被单独挑选出来作为侮辱对象，有许多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她们的所谓叛国行为。妇女所受的惩罚，以及她们的孩子所受的对待，值得我们仔细审视，因为这很能说明战后欧洲社会如何看待自身。

欺凌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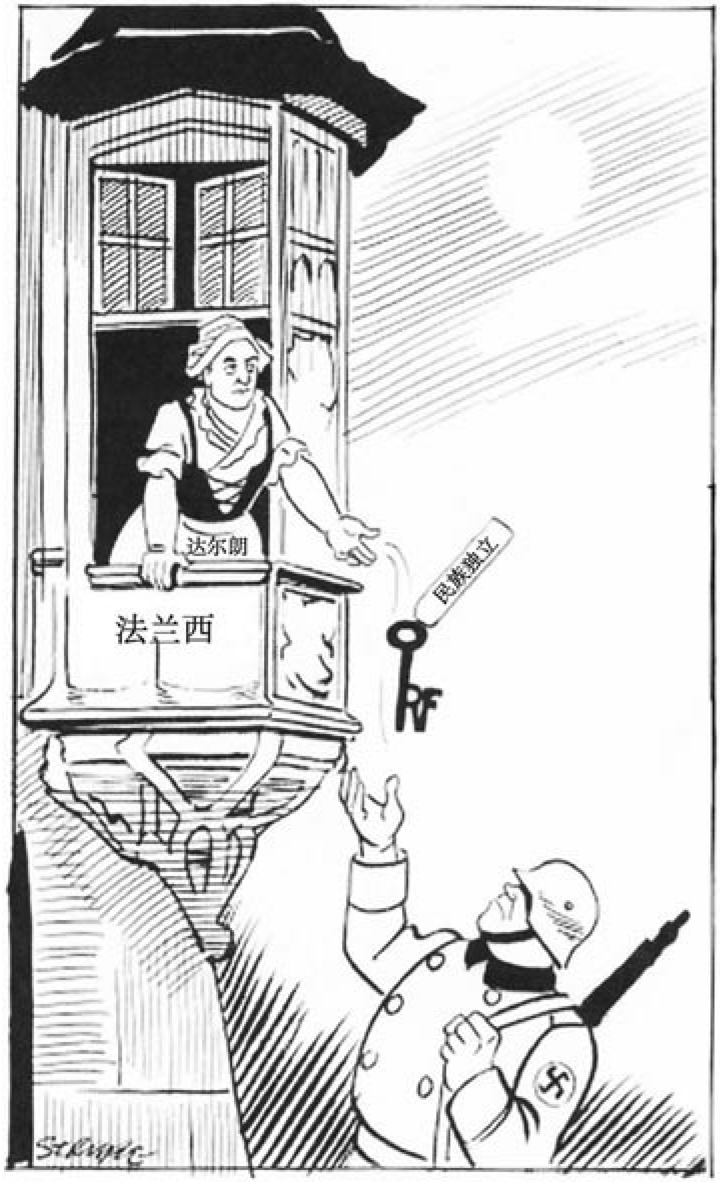
1944年秋，一位来自法国约讷省圣克莱芒的年轻女孩因为与德国军官“有染”而被逮捕。当她被警察盘问时，她公开承认一切。她说道：“我成了他的情人。我父亲生病时，他偶尔会来我家帮忙。他离开时，他留下了他的军邮号码。我给他写信，让其他德国人给我捎信，因

为我不能使用法国邮政。我给他写了两三个月的信，但我再也找不到他的地址了。”[2]

欧洲许多妇女是在战争期间与德国人扯上关系的。她们在为自己辩护时都会说“这是因为爱情”“真爱无罪”“真爱无关政治”“爱情是盲目的”。[3] 但在旁人看来，这都不成理由。性，如果与德国人有关，那就是政治。性，象征着欧洲大陆被彻底征服：一个法国的、丹麦的或者荷兰的女人，为一个德国男人而心醉神迷。同样重要的是，正如我在第四章已经提及的，性，还象征着欧洲男人被阉割。这些男人，已经在对抗德国军事力量的斗争中证明了自己软弱无力，现在又因为自己的女眷与德国人有染而受到集体羞辱。

战时与德国人有染的欧洲妇女，人数之多令人震惊。在战时的挪威，在15～30岁的妇女中，有德国男友的妇女多达10%。[4] 如果同时统计这些妇女为德军士兵生下了多少孩子，结果也可想而知：在西欧各国，与德国男人同床共枕的妇女恐怕多达数十万人。[5]

在被占领国家，抵抗运动为本国妇女和女孩的行为罗列出各种理由。他们形容，与德国人同床的妇女无知、贫穷，甚至心智有问题。他们声称，妇女被强奸，或者仅仅迫于生计而与德国人同床。这种案例当然存在，但近年有研究表明，与德军士兵同床的妇女来自各行各业各阶层。总体而言，欧洲妇女与德国人同床，并非由于他人强迫，亦非由于缺乏性爱，更非由于急需糊口，仅仅是由于她们发现德军士兵强壮如同“武士”，这种形象极具魅力，相比之下，本国男子太过软弱。例如，在丹麦，战时民意调查令人震惊地表明，51%的丹麦妇女公开承认，德国男人比本国同胞更有吸引力。[6]



维希政权领导人弗朗索瓦·达尔朗把“她”的房间钥匙抛给德国人

没有什么地方比法国更能体会这种需要。在这个国家，由庞大的几乎全部由男性群体构成的德国人，正好弥补了法国男人的缺失，200万法国男人，要么被关押在监狱里，要么在德国做苦工，难怪占领本身也带有性学含义。法国已经沦为“娼妇”，向德国卖身投靠，维希政府就是这个娼妇的皮条客。[7]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战后写道，尽管通敌卖国者企图把法德关系视为结合，“但在这种结合中，法国总是承担妇女的角色”。[8]

即使是那些满腔热血的爱国志士，面对此情此景，也不得不承认其屈辱。1942年，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写道，所有法国男人都摆脱不了战争期间妻女侍奉他人带来的屈辱，但他们不应任由屈辱感摧毁其爱国心：

> 难道身为丈夫，还会挨家挨户上门哭诉，说自己的妻子是个娼妇吗？这样就能保存他的颜面吗？不能，因为他的妻子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不能，因为他不能靠诋毁妻子来重拾尊严。让他回家面对妻子，让他消去怒火吧。因此，我不会说战败与我毫无关系，尽管这次战败让我时时感到屈辱。我是法国的一部分，而法国也是我的一部分。[9]

法国男人经历的这种情感波动，所有被占领国家的男人都经历过。作为自由法国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至少为解放自己的国家付出过努力。对于那些困守家中、无力还击的男人而言，这种挫败感更是难以承受。

国家解放给了人们反击的机会。一旦再次拿起武器，人们就开始入侵自己的国家，法国男人终于有机会在女人面前、在世人面前重拾尊严。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夏尔·戴高乐成为法国在战时的重要象征。与维希政权的摇尾乞怜截然不同，戴高乐从未放弃斗争精神，他顽固地拒绝屈从任何人的意志，甚至对盟友也绝不屈服。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的广播演说，充斥着雄赳赳的字句，包括“战斗法国”“自豪、勇敢、伟大的法国人民”“法国的军事力量”以及“我们种族的战斗天赋”。[10] 诺曼底登陆前夕，在阿尔及尔，在协商会议的演讲中，戴高乐热情地赞扬道：

> 我们伟大部队的丰功伟绩……我们的部队准备投入伟大战斗时的热情；我们的海军舰队的精神；我们的空军中队的英勇；还有游击队员的英雄气概，他们没有军装，几乎没有武器，就靠纯粹的战斗热情动员起来……[11]

类似字句经常被将军们用来提振士气。但这些字句在这里具有特殊

含义，与维希政权关于法国军事斗争前景的“阴阳怪气”的失败主义论调恰成对照。

重振法国男子气概的尝试最早开始于1944年8月登陆日之后，当时戴高乐及其“自由法国”部队终于打回了法国。此后数月间，他们赢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首先是解放巴黎，这是在菲利普·勒克莱尔（Philippe Leclerc）将军指挥下由法国部队单独完成的任务（美国曾经试图制止勒克莱尔，以便美国部队组织更为协调的进攻行动）。然后，8月15日，法国部队抵达普罗旺斯，他们一路挺进阿尔萨斯，最终突入德国，占领斯图加特。在路上，他们解放了里昂，这是法国第二大城市，他们同样没有借助美国的力量。缓慢地、坚定地，他们开始重拾1940年军事惨败时所丢失的尊严。

然而，也许法国人最为自豪并大肆宣扬的是英美两国没有的部队，一支活跃在法国境内的独立部队，他们在法国境内奋起与德国人交战。法国内地军（FFI），又被称为“菲菲”（les fifis），这个称呼带点亲切，也带点轻蔑，这是一支混合部队，集合了所有最为重要的法国抵抗部队，接受皮埃尔·柯尼希（Pierre Koenig）将军的统一领导。1944年夏，他们夺取了许多城镇，经常与英美部队并肩作战。他们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几乎解放了整个法国西南部，还为从马赛北上的盟军部队肃清了里昂以东的地区（详见地图8）。

法国内地军的爆炸式发展，给法国人尤其是法国年轻男人提供了巨大的道德心理优越感，他们蜂拥加入法国内地军：1944年6～10月，法国内地军人数从10万激增至40万。[12] 当老战士出于习惯保持低调时，这些新招募者却迫不及待地炫耀自己的男子气概。盟军士兵经常报告说，看见这些人“满身绑着子弹带”或者“满身挂满手榴弹”，“在大街上到处招摇”。[13] 朱利叶斯·尼夫（Julius Neave）是英国皇家装甲兵团少将，在他看来，这些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开着民用汽车，一

路叫器、彼此碰撞，他们打起仗来胡乱开枪，打自己人，打我们，也打德国佬。”[14] 甚至某些法国村民也说他们：“这些小兔崽子……戴着法国内地军的护身符到处炫耀，摆着英雄的姿势。”[15] 他们似乎太过急于证明自己，但这只是因为他们与英美盟军不同，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没有机会拿起武器对抗德国。此时，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堂堂正正地去战斗，像个男人那样去战斗。

不幸的是，这种重新焕发的男子气概也有其黑暗面。大批年轻男子突然涌入抵抗组织，让许多更有经验的女战士被边缘化了。例如，在圣马塞尔（Saint-Marcel），让娜·博厄（Jeanne Bohec）曾经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女爆破专家，但她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局外人。“我被礼貌地告知，请不必介怀。当如此众多男子加入组织，女性就不必去战斗了。但我仍然确信，我比许多法国内地军志愿者更善于使用冲锋枪，而他们只不过刚刚上手而已。”[16] 在德国占领法国的最后一个冬季，妇女逐步退出抵抗组织的舞台，共产党游击队（FTP）更是接连发布全部清退妇女队员的命令。这与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形成鲜明对照，在意大利和希腊，妇女继续在前线为游击队战斗，直到战争结束。[17]

如果说“好”女人被突然再现的法国男子气概逼得靠边站，那么，“坏”女人曾经使民族蒙羞，就只能等待更为苛刻的待遇了。解放后不久，法国内地军就把矛头指向这些“躺卧通敌者”。在绝大多数案例中，作为惩罚，这些妇女被剃光头发，而且经常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以便在最大程度上羞辱这些妇女。解放后，剃头仪式出现在法国的所有省份。

一名英国炮兵军官描绘了一次典型的仪式，他描述了自己战后在法国北部的见闻：

> 在圣安德烈德绍菲尔（St André d’Echauffeur），有人在我们路过时送上鲜花，还有人递上美酒，但在当地市场，却上演着残酷的场景，惩罚一名通敌者，一个所谓的坏女人。她被摁在椅子上，一名剃

> 头匠给她剃了半个光头，她吸引了许多旁观者到场，我后来得知，旁观者包括几名游击队员和一名自由法国军官。这位妇女的母亲也在场，目睹剃头匠剃去女儿的头发，母亲捶胸顿足、胡言乱语，对着旁观者大喊大叫。这位妇女倒也挺有骨气。当她被剃光头发时，她跳起来高呼“德国人万岁”，于是某人捡起砖头把她打翻在地。[18]

英国皇家工兵部队的理查德·霍尔博罗（Richard Holborow）中尉在迪耶普（Dieppe）附近一处小镇见证过类似的场景：“许多暴民从早到晚庆祝解放，绝大多数人喝得酩酊大醉。”大约有18名妇女和女孩被押上临时搭建的舞台，坐在当地的剃头匠面前：

> 剃头匠从口袋里掏出刮脸刀，打开刀刃，抓起一位妇女的头发，熟练地划过几下，就把剃下的头发抛向人群。当剃头匠把妇女彻底剃光时，她开始尖叫，然后，她被提起来，向叫嚣嘲笑的人群公开展示。

这还不是妇女所受折磨的终结。数日后，当霍尔博罗中尉的部队离开这座城镇时，他见证了惩罚妇女的第二阶段，当时他被另一群高声歌唱的人堵在了主干道上。

> 他们兴高采烈地围观一群被剃光毛发的妇女，所有妇女的脖子上都挂着告示板，被迫徒手捡拾路上的马粪。每当粪桶被装满时，就有人踢翻粪桶，整个过程又得重新开始。显而易见的是，这座城镇的妇女还在报复那些与德军士兵有所勾搭的女孩。[19]

在许多城镇里，妇女被迫半裸或全裸地承受折磨。1944年9月，《马赛曲报》（*La Marseillaise* ）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在昂杜梅（Endoume），一群年轻男子强迫一名女子“全裸在街道中穿行，在正于房屋外玩耍的天真儿童面前走过”。[20] 同样，在特鲁瓦（Troyes），法国内地军包围妇女，剥光她们的衣服，把她们示众，同时剃光她们的头发。当地行省解放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上记录着如下内容：

> 她们几乎一丝不挂，身上打着纳粹标志，浑身涂满黏稠的沥青，她们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最后会以特别的方式被剃光，看上去就像奇特的囚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这种残忍的捕猎行动持续到第二

天整个白天，许多当地人兴高采烈地围拢到街道两旁，看着这些妇女戴着德国国防军的帽子游街示众。[21]

法布里斯·维吉尔（Fabrice Virgili）也许是相关领域最为权威的专家，按照他的说法，在法国各地，至少有50座城镇发生了妇女被剥光衣服的事情。[22]

这种情景绝非法国独有。类似事件发生在欧洲各地。在丹麦与荷兰，被伤害的民族自豪感，夹杂着对当地妇女行为的性妒忌，造成数千名妇女被剃光头发。[23] 在海峡群岛，这个不列颠群岛中唯一被德国侵占的角落，也发生了好几宗与德军士兵上床的妇女被剃光头发的个案。[24] 在意大利北部，人们甚至唱着歌谣，歌词的内容有关于与法西斯党徒上床的妇女被剃光头发。在威尼托，游击队员唱着这样的歌谣：

你们这些美丽女子啊，

却与法西斯党徒勾勾搭搭。

你们这把美丽长发啊，

迟早会被剃成短发。[25]

这种极为流行的惩罚，以及围绕惩罚而进行的仪式，似乎迎合了人们的深层次需要，被解放的人们急于表达他们对通敌行为的厌恶之情。历史学家彼得·诺威克（Peter Novick）是客观研究这一时期法国历史的领军人物，他指出，剃光这些妇女的头发，让当地社区得到了情感宣泄，从而避免了对罪孽更为深重的通敌者的普遍屠杀，这些妇女仿佛成为“替罪羔羊”。[26] 通常在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星期，这种在市集广场上剃光妇女头发的仪式会明显缓解当地的紧张气氛，从而减少其他通敌者的流血事件。[27] 与此同时，某些历史学家也质疑这种说法，即剃光妇女头发肯定可以团结社区——作为一种相对安全的、非永久性的暴力，这是人人都能参与其中的简单报复行动。[28] 这种做法现在被视为欧洲

历史上的耻辱时期，但在当时却是人人弹冠相庆。1944年的抵抗组织报纸形容这种剃发仪式带有狂欢节气氛，人们自发唱起爱国歌曲。至少在法国的一个地区，当地人把这种动用小刀和剃刀的仪式视为生活的“纪念”。[29]

现在看来，所谓的爱国复仇显然只是这个故事的一个方面。这种剃光妇女头发的仪式并非新现象，甚至早在战前，它就已是历史悠久的、针对通奸妇女的惩罚方式了，但在欧洲历史上，这种惩罚从未如此大范围地普遍实施过。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为与德国人上床而被惩罚的法国妇女，绝大多数并未结婚：她们的“通奸”行为并非背叛夫婿，而是背叛国家。因此，通过一种微妙的方式，法国从阴柔、顺从的实体，重新变成阳刚、好斗的实体。

这种仪式的性特征同样值得注意。在丹麦，在剃发仪式期间，妇女经常被剥光衣服，胸部和臀部被涂上纳粹标志。[30] 在法国的许多地区，妇女经常被扒光裤子打屁股，胸部被涂上纳粹标志。[31] 实际上，这种在市集广场或者镇公所台阶上举行的仪式，向整个社区传递了非常清晰的信息：法国内地军把这些妇女的身体没收作公共财产。他们同样也把这些妇女的身体没收作男性财产，从数百张拍摄于惩罚期间的照片可以看出，惩罚几乎都是由男性执行的。

某些法国妇女也意识到自己被当成象征物利用。她们同样感到愤怒，因为她们的个人行为本来与战争毫无关系，却要因此受到谴责。1945年，当法国女演员阿尔莱蒂（Arletty）因为战时与德国军官有染而被判监禁时，她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我的心属于法国，但我的阴道属于我自己。”[32] 毫无疑问，法官对这种抗议充耳不闻。根据近年的研究，大约有2万名法国妇女因为通敌行为而受到剃发惩罚，其中绝大多数都曾与德军士兵上床。[33]

时间已过去70年，现在很难判断这些妇女是否罪有应得，或者应该

换种惩罚，或者完全无罪。盟军士兵和行政官员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去判断：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说过，那些没有经历过“占领之恐怖”的人，“没有资格对一个被占领过的国家说三道四”。[34]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妇女是替罪羔羊：剃光她们的头发，不仅象征着剃去她们的罪过，而且象征着剃去整个社区的罪过。借用法国记者罗伯特·布拉西亚克（Robert Brasillach）的话，整个西欧“都跟德国同床共枕”，西欧做了无数事情让德国占领西欧成为可能；但在许多西欧社区，只有妇女与德国人上床，只有妇女因此受到惩罚。[35]

唯一让这些妇女感到些许宽慰的，是情况本来可能更加糟糕。我们已经知道，在东欧，让民族重振雄风的其中一种做法就是普遍强奸。在西欧，剪断妇女的头发，代表着温和得多的性暴力，尽管其政治目的是一样的。

排挤儿童

如果说遍及欧洲各地的“躺卧通敌”行为需要证据，那么，因为“躺卧通敌”行为而诞生的孩子就是证据。在丹麦，有5579个孩子的法定父亲是德国人，毫无疑问，还有许多人隐瞒了父亲的真实身份。[36] 在荷兰，大约有1.6万～5万个孩子的父亲据信是德国人。[37] 在挪威，这个人口只及荷兰人口的1/3的国家，有大约0.8万～1.2万个类似的孩子。[38] 在法国，这个数字大约是8.5万甚至更高。[39] 在被占领的欧洲，到底有多少孩子的父亲是德军士兵，总数仍然是个谜，但估计介乎100万个至200万个之间。[40]

可想而知，这些婴儿降生时是不会受到所在社区的欢迎的。一段轻率的关系可能会被忽略、掩盖、遗忘，但一个孩子将会成为一名妇女挥之不去的耻辱标记，进而成为整个社区的耻辱标记。被剃光头发的妇女，可以安慰自己说头发很快会长出来。相比之下，一个孩子却无法回避。

在某些案例中，德国国防军士兵在当地留下的孩子，会被视为一种尴尬，最好被干净利落地处理掉。例如，在荷兰，许多目击者知道，许多孩子刚一出生就被弄死，通常是被这些误入歧途的女孩的父母弄死。据推测，这种做法是为了保全家族“颜面”，但偶尔是公开的政治行动，由家族以外的人士执行，以恢复整个社区的名誉。例如，根据佩特拉·鲁伊格鲁克（Petra Ruigrok）的记载，在荷兰北部，有一个婴儿被抵抗组织成员从摇篮中抢走，摔在地上摔死了。[41]

幸亏这种情形相当罕见，但这也反映出欧洲社会的强烈感觉，即战争期间德国父亲留下的当地孩子将会成为所在民族的负担。这种强烈感觉集中体现在《路佛特邮报》（*Lufotposten* ）的社论中，这是一份挪威日报，它的1945年5月19日的社论写道：

> 所有这些德国孩子，肯定会成长和发展为挪威民族当中一个杂种少数民族。因为他们的出身，他们肯定会好勇斗狠。他们没有民族，没有父亲，只有仇恨，这就是他们仅有的遗产。他们不可能成为挪威人。他们的父亲是德国人，他们的母亲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是德国人。允许他们留在这个国家，相当于合法培养第五纵队。混杂在纯粹的挪威居民当中，他们将会永远构成动荡不安的因素。对挪威也好，对孩子也好，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生活在他们本来所属的国家的天空下。[42]

研究挪威人对这些德军士兵留下来的所谓“战争儿童”的态度，其实大有文章可做，与其他国家不同，挪威在这方面的文字记载甚为丰富。战争结束后，挪威当局设立了战争儿童委员会，以考虑这些孩子何去何从。[43] 因此，一时间，这个问题在挪威得到公开讨论，这在欧洲各国当中可谓绝无仅有。这个课题最近也得到详细研究。2001年，迫于战争儿童团体的政治压力，挪威政府资助了一项研究计划，考证这些孩子在战后被如何处理，处理方式对这些孩子的人生有何影响，以及如何弥补当年因为潜在不公所造成的伤害。这项研究计划的成果，成为时至今日欧洲各国针对战争儿童的最为完整的研究。[44]

战后初期，挪威人对某些妇女和女孩的行为深感痛心。1945年初夏，数千名妇女被指控与德国人上床，她们遭到逮捕，被送入监狱和营地，光是在奥斯陆就关押了大约1000人。[45] 正如我们所知，她们当中许多人在解放时被剃光头发，有些人还被暴民公开羞辱。然而，或许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呼吁当局剥夺这些妇女的挪威国籍，将她们遣送到德国。这种行动很难说是正当的，因为与德军士兵上床并不违反法律。无论如何，负责审判战犯和叛国者的国家机构已经明确宣告，剥夺国籍不应成为惩罚方式。[46] 结果，放逐与德国人有染妇女的呼声渐趋平息。

然而，那些与德国人结婚的妇女，就没那么容易逃脱厄运了。1945年8月，挪威政府重新启用一条20年前制定的法律，妇女与外国人通婚者，自动跟随丈夫国籍。为了限定这条法律，挪威还通过了修正案，规定这条法律只适用于与敌国公民通婚的妇女，实际上就是指德国人。与挪威所有司法原则不同，这条法律具有追溯性。因此，几乎一夜之间，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妇女丧失了挪威国籍，尽管她们认为自己奉公守法。她们此时被称为“德国人”，因此她们可能会被遣送到德国，就连她们的孩子也一并遭殃。[47]

决定德军士兵孩子去留的标准甚至更为简单。按照这条法律，战争儿童的国籍跟随其父亲。即使没有这条法律，这些孩子都会被举国上下的公众舆论直接视为德国人。结果，这些孩子也面临被遣送到德国的前景。有许多人，包括政府官员，都认为遣送行动不必考虑孩子的母亲是否被允许留在挪威。

自然而然，这种计划带来各种各样的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没有多少人愿意反对遣返“德国”孤儿，但驱逐这些生母还在挪威的孩子，实在难上加难。1945年7月初战争儿童委员会成立时，委员会就奉命调查哪些法律需要改动，以驱逐这些孩子及其母亲。如果这种措施并不可行，

委员会就要考虑其他措施，既能保护孩子免受充满敌意的社会的侵害，又能保护社会免受具有潜在危险的儿童群体的侵害。

直至1945年年底，战争儿童委员会花了五个月的时间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仍然极具争议。一方面，委员会建议政府发起一场公众运动，呼吁当地社区接纳这些孩子；另一方面，委员会建议，如果当地社区坚持己见，那么孩子就应与母亲分离，被送往挪威其他地区，甚至被送往国外。委员会同样建议，孩子及其母亲都不应被强制遣送；但委员会主席英厄·迪贝斯（Inge Debes）据说想把9000名战争儿童移交给一个奥地利移民代表团，显而易见的是，他根本不考虑孩子母亲的想法。（这次移交最终因为不合情理而被搁置，而且奥地利人最终决定，奥地利同样不想要“德国”孩子。）[48]

因为政府似乎越来越难以遣送这些孩子，委员会开始考虑把这些孩子留在挪威境内的后果。最让挪威人感到担心的是，这些孩子可能智力低下。与其他国家类似，挪威举国上下普遍相信，任何被德军士兵引诱的妇女都可能心智不健全。与之类似，德国人选择这样智力低下的伴侣，那么德国人自身也可能心智不健全。按照这种循环逻辑，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孩子肯定也有同样缺陷。为了评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委员会委托知名心理学家厄尼尔夫·厄德高（Ørnulf Ødegård）出具一份战争儿童心智状况的评估报告。在选取数十个样本后，厄德高指出，在9000名战争儿童里面，多达4000名儿童可能智力发育迟缓，或者带有其他遗传缺陷。尽管委员会并未完全接纳这份评估报告，但委员会并未阻止其成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声称这些母亲及其孩子都具有智力缺陷。

结果，许多战争儿童都毫无根据地被打上了智力发育迟缓的标记，其中某些孩子特别是那些生活在老旧德语孤儿院的孩子，被迫在孤儿院度过余生。20世纪80年代，一位负责照顾这些儿童的医生指出，如果这

些孤儿像其他“非德国人”那样得到公平对待，这些孤儿很可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49] 实际上，战争儿童委员会的确建议，所有战争儿童都应该接受心理评估，以确定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但评估从未进行，因为人们认为评估花费太大了。

被自己的民族、社区甚至老师打上智力缺陷的标记，实际上是给这个已经无比脆弱的群体施加另一重迫害。有人后来回忆往事时说，还记得当年在学校总是被同学嘲笑，被排除于战争结束周年庆典之外，被禁止与“纯粹”的挪威孩子玩耍，课本和书包上还被涂上纳粹标志。许多人受到家族嫌弃，家族成员认为他们让家族蒙羞。他们的母亲改嫁时，他们还受到继父在言语上、精神上、肉体上的虐待，继父痛恨他们，因为他们是“敌人的孩子”。[50]

有人甚至受到母亲的嫌弃，母亲把他们视为自身痛苦的根源。例如，托弗·莱拉（Tove Laila）六岁那年正值战争期间，她被纳粹党徒从母亲身边带走，预计被培养为德国女孩，1947年，她返回挪威的家，但那时她只会说德语。她的母亲和继父设法让她在三个月内忘记德语，然后就是无休止的虐待、羞辱、恐吓。如今在挪威，社会服务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在当时付之阙如，这个不幸的女孩，在其余下的童年中都被自己的母亲称为“该死的德国猪”。[51]

战争儿童最普遍的共同经历是对父亲的情况讳莫如深。这种沉默同时存在于国家层面与个人层面。考虑到战争儿童的命运，尤其是看到掩盖历史的可能后，挪威政府推行了新政策，试图抹去这些孩子身上的德国痕迹。政府不再要求德国父亲赡养孩子，实际上也不鼓励德国父亲与孩子联系。如果孩子有德语发音的名字，政府就声称有权将其改为更加符合挪威传统的名字。[52]

在个人层面，这种沉默甚至更具毁灭性。孩子的母亲通常拒绝谈论孩子的父亲，也禁止孩子谈论自己的父亲。有些孩子根本不知道父亲的

国籍，直到他们在学校操场上被人嘲笑才恍然大悟。这种沉默似乎不能保护孩子，让他们免受外人的言语伤害。[53]

这种饱受嫌弃的遭遇给这些孩子造成的灾难后果，直到最近才公之于世。2001年，由挪威政府资助的研究表明，与其他挪威居民相比，战争儿童死亡率更高，成年后离婚率更高，健康状况也更差。与其他挪威人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更低，赚取收入也更少。与同龄人相比，他们的犯罪率更高。1941～1942年出生的人死亡率最高，研究人员认为，战争结束时，这些孩子已经到了懂事的年龄，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战后初期，正是这些孩子最为艰难的岁月。[54]

此后数十年，战争儿童在挪威仍然受到排挤。在某些关键领域，他们的待遇甚至还不如他们的母亲。1950年的新的《国籍法》，允许嫁给德国人的妇女重新获得挪威国籍；相比之下，战争儿童直至18岁才能获得这项权利。直至20世纪60年代，这些孩子及其监护人每年都要低三下四地向当地警察局申报，请求获得留在挪威的批准。

一般而言，挪威战争儿童的经历，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西欧战争儿童的经历。拥有德国父亲的孩子，在其出生地饱受威胁、嘲弄、冷落。有时候他们在肉体上受到虐待，但更多的是言语上受到伤害，各种贬义绰号包括“德国婴儿”（bébés boches，法语）、“德国孩子”（tyskerunger，挪威语；moeffenkinder，荷兰语）。每个国家的战争儿童，都受到其他孩子、老师、邻居甚至家族成员的欺负。他们在班级里被忽略，在社区里被冷落。

一如在挪威，一种讳莫如深的习惯一直与这些孩子形影不离，无论是在私人生活还是在公共领域。例如，丹麦战争儿童后来声称自己生活在“痛苦、羞耻、谎言的气氛中”。[55] 那些想要打听德国父亲下落的丹麦人，经常遇到重重阻碍。[56] 欧洲各国政府一贯低估了国内“德国”孩子的人数。实际上，在波兰，战争儿童的官方数字为零：对战争儿童现

象的严肃估计，不利于重新营造“普遍抵抗”德国占领的民族神话。[57]

当然，这并非事实的全部，也有许多孩子并未受苦，或者并未因为自己的德国父亲而受到歧视。实际上，在卑尔根大学的研究中，几乎有半数接受访谈的战争儿童都认为，自己并未因为自身背景而遇到问题。然而，这仍然意味着超过半数的战争儿童确实遇到了问题。[58]

在绝大多数案例中，没有人为这些孩子挺身而出，只有孩子的母亲为孩子出头，而母亲自己也饱受歧视。我们只能为一位勇敢的法国母亲鼓掌喝彩，当老师称呼她的女儿为“德国杂种”（batard du Boche）时，她回应道：“女士，我的女儿没有跟德国人睡觉，是我。当你想辱骂某人时，冲我来，不要侮辱无辜的孩子。”[59]

---

[1] 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173.

[2] 引自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26。

[3] 关于在夏朗德雅亚拘留营逮捕和起诉通敌者的警察报告，Archives Nationales，Paris，72 AJ 108（AVIII）；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26；Warring，Anette，‘War，Cultural Loyalty and Gender’，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46。

[4] Olsen，Kåre，‘Under the Care of the Lebensbor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24.

[5] 关于父亲是德国人的婴儿统计数字，参阅下文注释36-40。

[6] 关于丹麦妇女对德国人的态度，参阅Lulu Ann Hansen，“‘Youth Off the Rails’：Teenage Girls and German Soldiers-A Case Study in Occupied Denmark，1940-1945”，in Herzog，Dagmar（ed.），*Brutality and Desire*：*War and*

Sexuality in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p.151。另可参阅Warring，Anette，'War，Cultural Loyalty and Gender'，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p.44-5。

[7] 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 ，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238.

[8] 引自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 ，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239。

[9] Saint-Exupéry，Antoine de，*Flight to Arras* ，trans. Lewis Galantière（Harmondsworth：Penguin，1961），p.145.

[10] Speech on the BBC，8 November 1942，引自de Gaulle，Charles，*Mémoires de Guerre* ，vol. Ⅱ：*L'Unité 1942-1944* （Paris：Pion，1956），p.393；Christmas speech to the French people，24 December 1943，p.553；speech to Consultative Assembly，Algiers，18 March 1944，p.560。

[11] Speech to Consultative Assembly，Algiers，18 March 1944，引自de De Gaulle，Charles，*Mémoires de Guerre* ，vol. Ⅱ：*L'Unité 1942-1944* （Paris：Pion，1956），p.562。

[12] 参阅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 ，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80。

[13] Derek L.Henry，IWM Docs 06/126/1，typescript account，pp.48，52；Captain Michael Bendix，IWM Docs 98/3/1，typescript account，p.30.

[14] Major J.A.S.Neave，IWM Docs 98/23/1，typescript diary，entry for 3 September 1944，p.157.

[15] 关于塞纳河畔博尼埃的女性居民，援引自Major A.J.Forrest，12 September 1944；参阅IWM Docs 91/13/1，typescript memoir，ch.10，p.3。

[16] Bohec，Jeanne，*La plastiqueuse à bicyclette* （Paris：Mercure de France，1975），p.186.

[17] Weitz，Margaret Collins，*Sisters in the Resistance*：*How Women Fought to Free France*，*1940-1945*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95），pp.149，

170.

[18] Major A.J.Forrest，IWM Docs 91/13/1，typescript memoir，ch.8，p.11.

[19] Lt Richard W.Holborow，IWM Docs 07/23/1，typescript memoir，pp.135-6.

[20] *La Marseillaise*，3 September 1944，引自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191。

[21] Leaflet from the Comité Départemental de la Libération，Troyes，引自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191。

[22] 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189.

[23] Warring，Anette，*Tyskerpiger-under besættelse og retsopgør*（Copenhagen：Gyldendal，1994），pp.156-73；Diederichs，Monika，'Stigma and Silence：Dutch Women，German Soldiers and thei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p.157-8.

[24] Bunting，Madeleine，*The Model Occupation*：*The Channel Islands under German Rule*，1940-1945（London：HarperCollins，1995），pp.235，258-9.

[25] 引自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Rome：Riumiti，2004），p.126。一个更文学的译法是："And you beautiful young girls/ who go with fascists/ your beautiful tresses/ will soon be shaved."

[26] Novick，Peter，*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London：Chatto & Windus，1968），pp.69，78.

[27] Rousso，Henry，'The Purge in France'，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98.按照Diederichs的说法，至少发生在一个荷兰村庄的剃头行为其实是故意尝试延缓所谓"清算日"，Diederichs，Monika，'Stigma and Silence：Dutch Women，German Soldiers and thei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157。

[28] Virgili认为所谓疏导暴力的说法是不确定的，但认为这确实为社区团结提供了纽带，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 ，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p.93-4，172。

[29] 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 ，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p.65，94. 另可参阅the many examples in Brossat，Alain，*Les tondues*：*Un carnaval moche* （Paris：Hachette/Pluriel，1992），*passim* 。

[30] 如可参阅the photographs in Warring，Anette，*Tyskerpiger-under besættelse og retsopgør* （Copenhagen：Gyldendal，1994），pp.100-101，161.

[31] 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 ，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192.

[32] Rousso，Henry，'The Purge in France'，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98.Also variously reported as "My heart is France's，but my body is mine"，Arletty obituary，*Daily Telegraph* ，27 July 1992；and "My heart is French，but my arse is international" ［"Mon coeur est français mais mon cul est international"］ according to Buisson，Patrick，*1940-1945*：*The Erotic Years* （Paris：Albin Michel，2009），p.9.

[33] 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 ，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52.

[34] Anthony Eden interview in Marcel Ophüls's film documentary *Le Chagrin et la Pitié* ，part II："Le Choix".

[35] 引自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 ，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p.239。

[36] Warring，Anette，*Tyskerpiger-under besættelse og retsopgør* （Copenhagen：Gyldendal，1994），p.146.

[37] 关于荷兰的更高数字，参阅Johr，Barbara，'Die Ereignisse in Zahlen'，in Helke Sander and Barbara Johr（eds.），*Befreier und Befreite*：*Krieg*，*Vergewaltigung*，*Kinder* （Frankfurt-am-Main：Fischer Taschenbuch，2006），p.71；Diederichs，Monika，'Stigma and Silence：Dutch Women，German Soldiers and thei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

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 （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153，认为数字只有1.6万。

[38] 关于挪威的数字，参阅Olsen，Kåre，*Schicksal Lebensborn*：*Die Kinder der Schande und ihre Mütter*，trans. Ebba D. Drolshagen（Munich：Knaur，2004），p.7。Olsen认为真实的数字介乎1万至1.2万之间；然而，战时只有8000名儿童被德国生命之源组织正式记录在案，而9000人则是挪威战争儿童委员会的标准数字。

[39] Johr认为数字在8.5万至10万之间，Johr，Barbara，'Die Ereignisse in Zahlen'，in Helke Sander and Barbara Johr（eds.），*Befreier und Befreite*：*Krieg*，*Vergewaltigung*，*Kinder* （Frankfurt-am-Main：Fischer Taschenbuch，2006），p.71。8.5万的数字似乎来自1943年10月15日德国档案，后来的估计数字高达20万，参阅Buisson，Patrick，*1940-1945*：*The Erotic Years* （Paris：Albin Michel，2009），pp.116-17；Roberts，Andrew，*The Storm of War* （London：Allen Lane，2009），p.84。

[40] Drolshagen，Ebba D.，*Wehrmachtskinder*：*Auf der Suche nach dem nie gekannten Vater* （Munich：Droemer，2005），p.9.

[41] 参阅Diederichs，Monika，'Stigma and Silence：Dutch Women，German Soldiers and thei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 （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157。

[42] *Lufotposten*，19 May 1945，quoted and translated in Ericsson，Kjersti and Dag Ellingsen，'Life Stories of Norwegian Wa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 （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94.

[43] 关于委员会报告的描述，参阅Olsen，Kåre，'Under the Care of the Lebensbor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 （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p.307-19。

[44] 关于2001年研究计划及其发现的描述，参阅Ericsson，Kjersti and Dag Ellingsen，'Life Stories of Norwegian Wa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 （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p.93-111。

[45] Olsen，Kåre，'Under the Care of the Lebensbor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 （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26.

[46] Borgersrud，Lars，‘Meant to be Deported’，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p.71-2.

[47] Borgersrud，Lars，‘Meant to be Deported’，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p.71-2.没有关于战时德国男子与挪威女子结婚的精确数字，但Kåre Olsen估计数字大约为3000对，参阅Olsen，Kåre，‘Under the Care of the Lebensbor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26。

[48] Borgersrud，Lars，‘Meant to be Deported’，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87.

[49] 医生于1990年的评论，引自Olsen，Kåre，‘Under the Care of the Lebensbor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29。

[50] 关于上述以及其他轶事，参阅Ericsson，Kjersti and Dag Ellingsen，‘Life Stories of Norwegian Wa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p.93-111。

[51] Drolshagen，Ebba D.，*Wehrmachtskinder*：*Auf der Suche nach dem nie gekannten Vater*（Munich：Droemer，2005），p.101.

[52] Borgersrud，Lars，‘Meant to be Deported’，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85.

[53] Ericsson，Kjersti and Dag Ellingsen，‘Life Stories of Norwegian Wa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109.

[54] Ericsson，Kjersti and Dag Ellingsen，‘Life Stories of Norwegian Wa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p.105-6.

[55] Drolshagen，Ebba D.，*Wehrmachtskinder*：*Auf der Suche nach dem nie gekannten Vater*（Munich：Droemer，2005），p.96.

[56] Arne Øland，“Silences，Public and Private”，in Ericsson，Kjersti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 （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60.

[57] Arne Øland，“Silences，Public and Private”，in Ericsson，Kjersti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 （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p.60.

[58] Drolshagen，Ebba D.，*Wehrmachtskinder*：*Auf der Suche nach dem nie gekannten Vater* （Munich：Droemer，2005），p.118.

[59] Drolshagen，Ebba D.，*Wehrmachtskinder*：*Auf der Suche nach dem nie gekannten Vater* （Munich：Droemer，2005），p.137.

第十五章 复仇动机

战后初期的复仇行动，受到了许多责难，但鲜有人研究。我们现在可以用各种方式谴责复仇，但我们同样应该承认，复仇有几个目的，并非全然消极。对于胜利者来说，复仇等于强调德国及其合作者的失败，并且毫无疑问地执掌了战后权力。对于希特勒的受害者来说，复仇恢复了某种道德平衡感，尽管复仇要以放弃道德制高点为代价。对于整个欧洲社群来说，复仇起码宣泄了人们自纳粹统治以来形成的挫败感。

复仇行动无疑给个人和社区带来一种感觉，即他们不再是被动消极的旁观者。无论孰是孰非，暴民在布拉格街头私刑处死德军士兵，在米兰街头私刑处死黑色旅成员，这都让其感到心满意足：他们不仅狠狠打击了法西斯主义，而且凭借自己的双手夺回了权力。同样，数百万名在德国拘留营被释放的奴工，通常喜欢到德国人家中盗窃食物和财物，偶尔还虐待当地的德国家庭。多年以来，他们备受饥饿和虐待，他们将盗窃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

在欧洲某些地区，人们对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机关早已丧失信心，通过复仇，起码能让人们感觉到某种程度的正义尚有可能。在欧洲其他地区，不太暴力的复仇形式也被认为有助于社会团结。在西欧，最为普遍的复仇形式就是剃光妇女的头发，这在当时被认为有助于减少暴力，有助于曾被占领的市镇和乡村重新获得自豪感。尽管我们现在认为这些事件应受谴责，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事件能够团结社区，起码让社区感到安全。承认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容忍复仇，但如果未能承认这些事实，我们将永远不可能适当理解，在这个混乱时期，在暴力驱使下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复仇始终是极具争议性的话题，而且时至

今日仍然成为政治上踢皮球的道具。最为形象的做法是反复使用伪造的统计数据。种种夸大其词、言过其实的描述，既来自战后真正受苦受难的人群，也来自某些想从苦难中捞取资本的群体。例如，法国右派作家数十年来总是声称，在解放时和解放后，超过10万名通敌嫌疑人被抵抗组织谋杀，这个数字基本等同于战时被杀害的抵抗者。被杀通敌者的真实数字可能只是这个数字的1/10，而且只有一两千人真正死于报复性袭击。法国右派实际上是企图转移视线，以让人们不再注意他们战时的角色，甚至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捏造这些数字。

同样，战争末期被逐出家园的德国人也经常夸大发生在东欧的著名暴行。他们声称，在奥西希（Aussig）有2000名平民被杀害，在兰姆斯多夫拘留营有6500人被杀害（实际上，这两个数字分别可能是100人和1500人）。类似于“种族灭绝”和“大屠杀”这样的字眼也频频被使用，试图以此强调德国人也是受害者。为了达到目的，甚至反复陈述最为耸人听闻的故事，尽管许多都是道听途说。这种夸大毫无必要，而且产生了反效果：真实的数字、确切的故事，本身已经足够恐怖，不必人为加以渲染。

对于我们的普遍质疑，历史学家有时也拿不出求证的办法，这既因为缺乏可靠的资料来源，在某些案例中还因为夸大数字恰好迎合我们自己的政治观点。这是困扰战后历史的问题，正如这也是二战历史本身的问题一样。（再举一个例子，今天发表的著作和论文都声称1945年德累斯顿大轰炸的死者多达10万人，尽管在过去10至15年间最为权威的资料早已公布，包括2009年德国政府委员会的纪录，都记载死亡人数大约是2万人。）这些夸大的数字，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还会反复出现。

然而，如果说某些人夸大了战后复仇的范围，那么，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许多犹太人就指出，复仇实际上并不普遍。拜赖克·奥布乔夫斯基（Berek Obuchowski）从特莱西恩施塔特被解救出来后说道：“我们

不能复仇，否则我们就与他们毫无差别，在所有幸存者当中，我怀疑到底有没有5%的人对德国人复仇。”[1] 即使在当时，犹太人也已经明确宣告，不寻求复仇。1945年5月，扎尔曼·格林贝格（Zalman Grinberg）医生在达豪向参加集会的犹太同胞发表演讲，他说道：“如果我们复仇，就意味着我们掉进过去10年德意志民族的道德深渊。我们不能屠杀妇女和儿童！我们不能焚烧数百万人！我们不能饿死数十万人！”[2]

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复仇曾经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在欧洲许多地区，普通士兵、游击队员、被释犯人都表现出明显的克制，法治仍然存在。例如，在挪威和丹麦，战后很少发生暴力事件。但即使在这些与南欧和东欧相比更少受到物质和精神伤害的国家，还是发生了复仇，尤其是针对与德军士兵上床的妇女的复仇。实际上，尽管这是相对温和的复仇形式，但这仍然是复仇。

同样，与战后欧洲其他群体相比，犹太人在复仇方面也许更少犯下罪过。但那些选择复仇之路的人，也同样衷心承认，他们在拿自己的生命和无辜者的生命冒风险。实际上，格林贝格医生在达豪演讲中再三强调这一主题，正好反映了在犹太人当中复仇渴望多么强烈。正如我们所知，这种渴望在达豪被付诸行动，营地犯人和美军士兵都参与其中。

犹太复仇行动仍然是高度敏感的话题。在当时，绝大多数犹太人果断放弃复仇诱惑，原因一如格林贝格医生在演讲中阐明的，犹太人不想陷入纳粹党徒的道德泥潭。然而，时至今日，犹太人对复仇行动轻描淡写，理由却略有不同：他们担忧世人会误解他们的行动。持有其他信仰的人，可能无法理解犹太人对自身形象的担忧。数百年来，犹太人饱受反犹歧视以及犹太阴谋论之苦，1933～1945年纳粹煽动的仇恨情绪只不过是这种痛苦的顶点，可想而知，犹太人只想避免任何无谓的争议。研究表明，无论何时引发任何争议，如关于以色列问题，欧洲各地传统的反犹主义就会迅速沉渣泛起。在2006年，当以色列在南黎巴嫩采取军事

行动后，犹太人马上就受到疾风暴雨般的袭击。[3]

因此，毫不奇怪，20世纪90年代，记者约翰·萨克（John Sack）发表的关于犹太复仇行动的著作在犹太社区引发了轩然大波，美国犹太社区更是一片哗然。萨克采访了好几位在战后波兰拘留营系统中颇有名气的犹太人，他们承认自己折磨过德国犯人。萨克的著作尽管风格耸人听闻，但有档案证据支持，而且所有访问都已录音并且公之于世。然而，萨克的经纪人拒绝推荐这本书，萨克的美国出版商，尽管已经对萨克支付了版税，最后还是决定取消出版计划。同样，一本已经购买连载版权的杂志，最终还是在出版前两天抽回了萨克的文章。尽管萨克自己就是犹太人，但他还是被指控在出版物和电视上否认反犹主义和大屠杀。萨克的著作在欧洲也引起了类似争议，他的波兰出版商因害怕此书滞销而取消了出版计划，他的德国出版商也类似，收回销毁了6000套已经印刷的复本。尽管如此，该书的基本内容已经得到了其他具有国际声誉的历史学家的反复认可。

对于任何历史学家来说，承认战后复仇都非常令人不快，即使不涉及民族情绪或宗教情绪，这个话题都很容易得罪其他人。首先，人们担心如果复仇被视为报复行动，那么，这就等于历史学家部分认可其合法性。例如，如果苏军士兵强奸德国妇女被形容为报复行动，那么，强奸就变得情有可原，甚至理所当然。以此类推，德国妇女跟德国男人一样，构成纳粹政权的一分子，那么，被强奸也是她们咎由自取。这是当时许多苏联人的说辞。

相反，如果复仇行动被描述得如此恐怖，就会掩盖背后的原罪：援引同样的例子，在现代读者看来，发生在德国境内的集体强奸如此令人恶心，这也会让人忘记许多被强奸的女人曾经是这个邪恶政权的一分子。在我们心目中，以纳粹主义名义犯下的暴行，甚至恶劣如大屠杀那样的暴行，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被战后德国人承受的痛苦所“抵销”。例

如，1992年，突破性的关于集体强奸的档案文献被公布出来在德国出版界掀起轩然大波：愤怒的时事评论员认为这些档案文献永远不应流传于世，因为如果德国人开始把自己视为暴行受害者，他们就会对自己作为加害者的事实视而不见。[4]

为了避免在这两种极端状况中左右摇摆，许多历史学家只能自欺欺人。例如，绝大多数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都对战后复仇只字不提；同样，绝大多数著作在描述战后强奸和谋杀德国人时，对战时发生在东欧的暴行只是一笔带过，但正是这种暴行最早激起了难以抑制的复仇渴望。把复仇与更为广阔的背景割裂开来，让人无法理解为何人们在战后如此行事。从现代政治观点来看，这种做法还造成了谁是受害者的争议。

争论迟早会因为民族界限和政治立场而闹得不欢而散。可想而知，当历史学家开始谈论德意志人承受的痛苦时，波兰人和捷克人会愤愤不平，因为他们曾经被迫忍受长达数年的野蛮占领，那些德意志人也难脱干系。当右派作家夸大其词时，法国共产党人会怒不可遏，因为正是法国右派抓捕、折磨、处决了数万名共产党抵抗战士。为了消解战后虐待罗马尼亚平民和匈牙利平民所引起的愤怒，俄罗斯人声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本来就不该进攻苏联。余者类同。

真相是，战争造成的道德困境谁都不能幸免。所有民族群体、所有政治信念，尽管有着天壤之别，但都兼具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双重身份。尽管历史学家仍然努力关注事件的灰色地带，从中寻找确切的理解，但在当时，也许绝大多数人对战争的理解仍然流于表面，只能看见非黑即白的事实。时至今日，政治对立和民族对立仍然偶尔可见，在1945年，政治对立和民族对立更是无比强烈而且无处不在。

事实上，关于战后暴力的讨论，只要涉及种族或者政治，就经常陷入困境，这并非偶然。这说明在战时和战后初期，还潜藏着更深层次的

课题。且不论欧洲各地的人们在思想上和动机上如何渴望复仇，这本身并不足以解释战后欧洲发生的暴力，肯定还有其他更加意识形态化的力量在驱动。有时候，暴力并非对战争带来的巨变的反应，而是巨变的延续。有时候，复仇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成更激进的目标的工具。

对这些目标的追寻，以及在此背后的严重的种族歧视，将会是下一部分的主题。

---

[1] Berek Obuchowski interview，IWM Sound，9203，reel 5.

[2] Dr Zalman Grinberg，引自Gilbert，Martin，*The Day the War Ended*（London：HarperCollins，1995），pp.391-2。

[3] 参阅“Attacks on Jews soar since Lebanon”，*The Times*，2 September 2006；以及“Anti-Semitic Attacks Hit Record High Following Lebanon War”，*Guardian*，2 February 2007。

[4] Laurel Cohen-Pfister，“Rape，War and Outrage：Changing Perceptions on German Victimhood in the Period of Post-unification”，in Cohen-Pfister，Laurel and Dagmar Wienroeder-Skinner（eds.），*Victims and Perpetrators*：（*Re*）*Presenting the Past in Post-Unification Culture*（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6），pp.321-5.

第三部 种族清洗

你应该创造某种局势……某种他们自己极力避免的局势。

——约瑟夫·斯大林 [1]

---

[1] 斯大林给波兰战后领导人哥穆尔卡关于如何从波兰清除德国人的建议，引自Naimark，Norman，*Fires of Hatre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09。

第十六章 战时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来就不仅仅是领土争端，它还是一场种族和族群的战争。这场战争中的某些标志性事件与赢得和维持领土毫无关系，而是在已经占领的土地上打上自己的族群烙印。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西乌克兰的种族清洗、针对克罗地亚境内塞尔维亚人的灭绝企图：人们带着巨大的热情投入这些屠杀事件，一如他们的战争狂热。大批民众被故意消灭，受害者多达1000万甚至更多，这种杀戮毫无道理可言，仅仅是因为受害者碰巧属于错误的族群或者种族。

对于那些投入种族战争的人们来说，棘手的问题在于，个人的种族或者族群属性并非总是清晰可辨，在东欧那些经常彼此通婚的社区更是如此。碰巧长着金发碧眼的犹太人，也许就能摆脱搜捕的罗网，因为他们并不符合纳粹想象中的犹太种族特征。吉卜赛人也能够伪装成其他族群，只要他们乔装打扮就可以了。匈牙利境内的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境内的波斯尼亚人、乌克兰境内的罗马尼亚人，还有其他例子也是如此。要辨别族群敌友，最普遍的方法是看他们说什么语言，但这种方法也并非总能奏效。那些在各族混居社区长大的人能说好几种语言，并且能视对话者的身份转换语言，在战时和战后最黑暗的岁月里，这种技巧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

为了对欧洲居民进行分类，纳粹坚持对每个人发放身份证，并以证件颜色区分族群。纳粹创造了庞大的官僚机构，以便根据种族对全体居民进行分类。以波兰为例，人为设计的种族等级，把出生在帝国境内的德国人放在顶端，境外德裔人紧随其后，然后是拥有特权的少数民族如乌克兰人，垫底的是波兰人、吉卜赛人、犹太人。分类并未到此为止。例如，境外德裔人还有更多细分等级：血统最为纯正的可以成为纳粹党

员，血统足够纯正的可以成为帝国公民，那些受到波兰血统或者波兰文化沾染的人等而下之，最后那些仅仅因为长得像德裔而被归类为德裔的人再等而下之。[1]

那些未被归类为优选种族的人就只能自求多福了，但这并非易事。许多人有多重选择，或者因为他们有混血的父母或者祖父母，或者因为他们认为当中并无矛盾，比如在波兰出生、拿立陶宛国籍的德裔人。当被迫做出选择时，他们的决定经常是欠缺考虑的，也许是出于父母、配偶甚至朋友的原因而做出决定。那些有所盘算的人，则会视乎某种身份带来的好处而选择身份。例如，声称自己是德裔人，能够豁免摊派劳役，能够减免部分税收。另外，这也意味着服从军事征召：去俄国前线，还是去劳动营，这是个让人煎熬的决定。

人们对于自身族群属性的选择，将会影响他们在战后的命运。1945年5月，当欧洲的敌对状态正式结束时，各种各样的种族和族群冲突将会延续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有时这些冲突发生在气氛紧张的地区甚至个人之间，因为生活在小镇和乡村的人们都知道邻居的族群属性，并且据此采取行动。然而，冲突也逐渐上升到地区甚至国家层面。战后，全体居民都被迫离开他们生活了几个世代的家园，仅仅是因为他们填写在战时身份证上的个人信息。

法西斯主义对种族纯化的着魔态度，蔓延于德国占领区内外，对欧洲人的种族立场造成巨大冲击。它让人们对种族属性有所认知，而在此之前他们浑然不觉。它迫使人们选择阵营，无论人们是否愿意。而且，在人们几个世纪以来彼此和睦、比邻而居的社区里，法西斯主义让种族成为问题。实际上，正是法西斯主义让种族问题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如战争给人们的教训，某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样是激进解决，甚至是最终解决。

---

[1] Burleigh，Michael，*The Third Reich*：*A New History* （London：Pan，2001），pp.449-50.

第十七章 犹太难民

1945年5月初，一位时年18岁的、名叫罗曼·哈尔特（Roman Halter）的波兰犹太人被俄国人解救。他以及另外两名犹太人在从一次死亡行军中逃脱后，被德累斯顿附近一对德国夫妇收留。哈尔特曾经在好几处劳动营中死里逃生，其中包括奥斯威辛，此时他极度虚弱、骨瘦如柴，但他总算是活下来了，而且知道自己实属侥幸。

在被解救后，哈尔特辞别了那对收留过他的夫妇。他近乎绝望地寻找其他家庭成员的消息，想知道他们是否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存，因此他找了一辆自行车，在自行车握把上绑了几个玻璃罐子，装着他在废弃的农场里找到的腌肉，踏上了回归波兰之路。

哈尔特没有走多久就遇到一名俄国解放者，对方骑着摩托车。哈尔特非常感激俄国人，因为俄国人解救过他。他认为俄国人是犹太人的朋友、解放者、“好人”，他甚至还能说一点俄语，这是他孩提时代的记忆。不幸的是，他将会发现，他的这种兄弟情谊并没有得到回报：

> 我很高兴见到他……我还记得我从父母那儿学来的俄语单词。我说：“俄国人，我爱你。”然后又加了一句：“你好，朋友。”他惊奇地看着我，然后以极快的语速说了一溜俄语。我笑了笑，用波兰语告诉他，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他上下打量着我，然后看着我的自行车说：“给我手表。”我明白了。他撩起衣袖，露出前臂上戴满的手表，然后又重复了一遍：“给我手表。”
>
> 我瞥见他的双眼，他的眼神严厉而冷峻。我开始跟他说波兰语。我告诉他，我没有手表，而且把我两条瘦削的胳臂亮给他看。他指着我自行车握把上鼓鼓的毛毯，说了几句俄语。我上前打开一个罐子，并且递给他看。我说：“同志，这是肉。”透过玻璃罐子也看得见这是肉。他看着罐子，然后看着我。我说：“朋友，这是你的，拿走吧，享用吧。”
>
> 他把玻璃罐子举过头顶，端详了几秒钟，然后把玻璃罐子摔到地

上。玻璃和肉末四处飞溅。我看着这名俄国士兵，内心感到一阵恐惧。我该说什么才能让他放过我呢？在那瞬间，我感到手足无措。他用俄语说：“脱掉你的裤子。”我站在那儿瑟瑟发抖，不太明白他说什么。他重复着他的命令，手里还比画着，让我明白他要我怎么做。

……我小心翼翼地把自行车放到地上，以免打破口袋里的玻璃罐子，然后开始脱裤子。我在想：为什么他要我这样做呢？或许他以为我在裤腰带上绑着手表。我必须告诉他，我不是说波兰语的德裔人。所以，当我脱掉裤子，让他看见我没有裤腰带和手表时，我慢慢地用波兰语告诉他，我是犹太人。我知道这个单词怎么说。我重复着：“我是犹太人，我是你的同志。”

此时，我站在他面前，腰部以下脱个精光，我的本能告诉我，我可不能脱掉我那装饰精美的靴子，如果他拿走我的靴子，我就得打赤脚了。我可不能光着脚走到霍代奇（Chodecz）。所以，我就让裤子和底裤摊在我的袜子和靴子上。我再次瞥见他的双眼。当他看见我赤裸的身体时，眼中带着轻蔑。我在他眼中看见了杀人者的空洞眼神。

他从手枪皮套中取出左轮手枪，指着我的脑壳扣动了扳机。我能听到响亮的击锤撞击声。他不再跟我费口舌，启动摩托车绝尘而去。我在那里呆立良久，裤子和底裤还摊在地上，我看着他消失在远方。[1]

在哈尔特的余生中，这段记忆时常萦绕心头。这是一种不祥的预感。尽管他们都受到过德国人的迫害，尽管希特勒无意中让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但这位不知名的俄国人却像党卫队军官对待犹太人那样对待他：首先从你有没有割过包皮来判断你是不是犹太人，然后把枪顶住你的脑袋。至于哈尔特大难不死是因为对方手枪卡壳，还是因为没上弹药，他就永远不得而知了。

之后几个月里，类似情景反复在欧洲上演。各种国籍的犹太人会发现，德国统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迫害的结束。（迫害）远远没有结束。尽管犹太人受尽诸般苦难，但在欧洲许多地区，反犹主义在战后不减反增。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到处上演，即使在从未被占领的地区，如英国，也同样如此。在欧洲某些地区，暴力行为是终结性的、决定性的：就是为了永远清除犹太社区，纳粹做不到的事情，将由当地人来完成。

选择回国

战争结束后，欧洲犹太人开始从亲身经历中吸取教训。某些犹太思想家相信，战前和战时犹太人太过引人注目，因此招致杀身之祸。他们认为，要在将来避免类似灾难，唯一的办法是让自己不再引人注目，即完全融入他们生活的各种社区。

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声称这是胡说八道：即使是高度同化的犹太人，也依然被希特勒的走狗辨认出来，并且与其他犹太人一样惨遭杀害。他们认为，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唯一的办法是全体离开欧洲，建立自己的国家。

还有人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可行。他们相信，他们的责任是回归各自的祖国，竭尽所能重建犹太社区。 [2]

绝大多数幸免于难的欧洲犹太人最初倾向于最后一种观点，这并非出于任何特殊的信念，只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流放和监禁中经历数年，做梦都想回到家乡。在理智上而非情感上，绝大多数人都已意识到，他们所离开的社区已经不复存在。但大多数犹太人还是回去了，部分是由于故土难离，部分是由于渴望重建家园，这是他们唯一知道的生活前景。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满怀希望，希望自己回到家乡后能够受到欢迎。

在犹太人看来，战后欧洲是个混乱之地。德国战败后，许多事情有所改观，但许多事情还是一如旧貌。一方面，迫害犹太人的组织被帮助犹太人的组织所取代。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带来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食物、药物、衣物，并且在欧洲大陆帮助重建犹太会堂和犹太文化中心。非犹太援助组织，如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和红十字会也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帮助，比如建立专门的犹太难民营，帮助寻找亲友。各国新政府也开始改变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如废除所有反犹立法。

另一方面，持续数年的纳粹宣传，不可能在数周或者数月内消除，公开的反犹主义仍然到处存在。有时候，这种反犹主义的表现令人相当震惊。例如，1945年，犹太人返回希腊城市塞萨洛尼基，他们有时会遇到这样的问候：“啊，你还活着？”甚至是：“真遗憾啊，你们还没被做成肥皂。”[3] 在埃因霍温，回国的犹太人在登记身份时，官员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又是犹太人，他们怎么没把你们全毒死。”[4] 在德国城市加米施（Garmisch）和梅明根（Memmingen）电影院的新闻片提到600万犹太人被杀害时，却只换来一阵喧嚣：“他们还没被杀够呢！”随之引来震耳欲聋的掌声。[5]

让回国的犹太人最为恐慌的是，尽管各国政府和援助组织已经采取种种措施，但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还是从未绝迹。经验告诉他们，民主制度、表面上的平等权利、他们自身的爱国主义，都不能保护他们免遭迫害。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把每件小事都视为“未来爆发的迹象”或者“新的集体屠杀即将来临”的证据。[6] 如果他们想要克服挑战，他们就必须得到所回归社区的帮助。

因此，在回家这件事情上，犹太人最需要的就是保证。如果他们想要重建生活，他们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食物、住所以及医疗照顾，随着难民回归，这些东西总会慢慢建立起来的。他们最需要的是欢迎。

有些犹太人，比如普里莫·利维，的确回到了“朋友环绕、温饱无虞、工作稳定、回首往事”的状态。[7] 还有许多犹太人奇迹般地与亲人团聚的故事，还有许多陌生人自发地为犹太人提供食物和住所的故事，还有许多人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故事并不如想象中普遍，许多人的经历与此相去甚远。

回国：荷兰

战争期间，有11万荷兰犹太人被送进集中营，只有大约5000人得以

回国。他们混杂在1945年回国的71564名荷兰难民当中，绝大多数人正在前往阿姆斯特丹的路上。[8] 回到中央车站，他们就被面谈、登记，然后领取配给卡和布票。有时候，他们还会得到建议，在何处栖身，去何处求助；但有时候，各种援助组织的桌子都忙不过来。欢迎仪式虽然高效，但令人寒心，没有旗帜或者鲜花，没有管弦乐队，只有一排桌子和一堆问题，然后就是迅速地把人们指派到市中心的大街小巷。[9]

从一开始，在回国者当中就存在着微妙的差别。然而，这不是为了再次辨别犹太人，而是为了辨别回国者当中的通敌者。曾经自愿在德国工作的志愿者，回国卡上会被贴上字母“V”：这样他们就得不到食品包和食品票，实际上还会被他们今后接触到的所有机构拒之门外。

唯一受到热烈欢迎的是抵抗组织成员。抵抗组织成员所得到的优待也是立即兑现的。他们通常会被送到环境奢华的疗养中心，包括威廉明娜女王（Queen Wilhelmina）宫殿的一翼。他们受到媒体舆论、官方声明、街谈巷议的一致颂扬。“如果你来自抵抗组织，那么一切皆有可能！”一名前抵抗组织成员卡雷尔·德·弗里斯（Karel de Vries）说道，“你可以向任何人要钱。例如，所有建筑材料都很紧缺，但只要你说一声‘我是从集中营回来的抵抗战士’，那么很好，马上兑现！”[10] 后来，他们甚至被授予特别养老金，以褒奖他们在抵抗组织中的贡献。

回国的犹太人很快发现，荷兰人唯一感兴趣的是通敌者与抵抗者的差别。所有其他类别的群体，包括犹太人，都无甚差别。荷兰并非特例。当意大利流亡者回到意大利时，他们都被笼统地归类为“政治犯”，无论他们是犹太人、苦工还是战俘。[11] 同样，法国的回国者也被笼统地归为一类。实际上，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最为流行的历史著作依然如此。[12] 并不存在针对犹太人的歧视，但这几乎同样糟糕：他们似乎被完全忽略了。一位从集中营幸存的荷兰人说道：“当需要被怜悯的时候，我只遇到麻木不仁的、难以接近的、令人反感的、不可理喻的官僚

部门。”[13]

尽管回国的犹太人需要和渴望特殊的帮助，但为何荷兰当局并未给予这种帮助呢？原因有多个方面。首先，荷兰当局接受盟国的领导，尤其是接受英国的领导，英国的官方政策是并不把犹太人视为特殊群体。在回国者当中，犹太人只占较小的比例，因此不被认为具有优先地位。当局在迎接回国者时准备工作也较为仓促，因为荷兰是最后被解放的欧洲国家之一。

如果当局考虑得更为周到，他们就会更加重视犹太人，并且给予特殊待遇，包括道德上和人道上的照顾。在荷兰社会中，犹太人承受了比其他群体更为惨重的痛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荷兰有21万名死难者，其中半数死难者是犹太人，尽管犹太人仅占荷兰战前人口的1.5%。[14] 在绝大多数地区，犹太社区被完全抹去，即使在阿姆斯特丹，犹太社区也是幸存者寥寥。当其他回国者受到所在社区的欢迎时，许多犹太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社区，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家庭。

不仅“官僚部门”忽略这些事实，普通人也同样麻木不仁到令人吃惊。历史学家丁克·洪迪厄斯（Dienke Hondius）曾经收集了一系列普通荷兰人如何对待回国犹太人的案例。例如，曾经有熟人如此向丽塔·库普曼（Rita Koopman）打招呼：“你该庆幸你不在这里，我们都快要饿死了！”当阿布·卡兰萨（Ab Caransa）回到以前的岗位时，他的雇主完全无视他在奥斯威辛的痛苦经历：“由始至终，你起码有地方住、有东西吃！”绝大多数犹太人并未试图解释他们的经历的恐怖，比如格哈德·德拉克（Gerhard Durlacher），只是通过倾听别人的故事来“获取接纳”，并且对自己的困境保持“谨慎的沉默”。另一位荷兰犹太人解释道：“人们不理解，或者不相信。”[15]

许多类似的议论产生于纯粹的无知。在东欧，纳粹大屠杀就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发生，而与东欧不同，在西欧，许多人对犹太人被驱逐后遭

受的苦难一无所知。在关于集中营的新闻片放映之前，关于工业化集体谋杀的故事会被视为夸大其词；但即使在这些新闻片在电影院放映后，人们也完全不理解这段经历对幸存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然而，比人们的无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故事难免会引起的不安感觉。按照弗兰克·凯泽尔（Frank Keizer）的说法，荷兰人对其关押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经历回应道："我不想知道。那都过去了，很高兴你还活着。"[16] 回到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也有类似的遭遇。在法国，按照奥斯威辛幸存者亚历山大·科恩（Alexandre Kohn）的说法，"存在着普遍的漠视"，犹太人被迫对自己的经历缄默不语。[17] 在匈牙利，如果回国的犹太人胆敢声称自己比其基督徒邻居承受过更多的痛苦，他们肯定会被殴打。[18] 甚至在美国，移居至此的犹太幸存者也经常遭受不耐烦的对待："战争已经过去了，'已经受够了'！"[19]

我们必须记得，战争期间普通欧洲人也同样承受了恐怖的痛苦，尤其是在战争结束那年，当他们认为人人承受同样的痛苦的时候，他们起码会感到些许宽慰。解放后，整个欧洲大陆开始构建痛苦共同体的神话。这种神话适合所有人，从那些渴望回归社群的通敌者，到那些渴望忘记战争的筋疲力尽的公众，再到那些想要重建民族自豪感的政客。甚至在国际层面上，那种欧洲各民族共同承受纳粹主义之苦的观念，也有助于重建交战各国之间的兄弟情谊。但是，犹太人的出现是对这种神话的讽刺。犹太人不仅承受了远远多于任何人的痛苦，而且其他群体从未对他们施以援手：那种欧洲人曾经"同呼吸、共命运"的心安理得的想法，被证明是一派胡言。



— Vous savez, jeune homme nous avons terriblement souffert des restrictions, nous aussi

一对肚满肠肥的法国夫妇对一位从集中营回来的囚犯说：“你知道吗，我亲切的孩子，我们也曾经饱受不自由的痛苦啊。”（《马赛人报》，1945年6月3日）

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回国犹太人的痛苦遭到普遍忽视，不仅在荷兰如此，在整个西欧都是如此。当抵抗运动的故事让人们自我感觉良好，让人们分享到英雄主义的荣光时，犹太人的故事却有着反效果。这些故事提醒人们，这个社会曾经多么失败。犹太人的出现已经足以引起不安，似乎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揭示令人局促不安的秘密。因此，更加简单

的做法是，假装降临到犹太人身上的苦难与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并无不同。犹太人并未受到欢迎，他们遭到忽视、限制、禁言。

犹太财产争夺战

有时候，犹太人之所以不被欢迎回国，还有着更为黑暗的原因。战争结束后，在匈牙利流传着一则笑话。大意如此：一位集中营幸存者回到布达佩斯，碰见一位基督徒朋友。朋友问道："你还好吧？"犹太人回答道："不提也罢。我从集中营回来，除了你身上穿着的衣服，现在我已一无所有。"[20]

同样的笑话适用于任何一座东欧城市，在西欧也差不多，人们心领神会。战争期间，掠夺犹太财产，发生于每一个国家，发生于每一个阶层。这种掠夺的范围有时相当惊人。例如，在阿姆斯特丹的老犹太区，房子被拆得只剩窗框门框。[21] 在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犹太人的土地和财产经常被穷人瓜分。[22] 有时候，人们甚至在犹太人被驱逐之前就已经动手了。在波兰就有这样的例子。战争期间，熟人碰见犹太人时会说道："反正你都是要死的，为什么不让别人得到你的靴子呢？为什么不把靴子给我，起码我还会记得你呢？"[23]

战争结束后，当少量犹太人开始回国时，他们的财产有时候会毫无争议地得到归还，但这只是特例而不是常例。这一时期的欧洲历史，充斥着犹太人试图收回自己的合法财产，但最终失败的悲惨故事。[24] 那些曾经答应帮助犹太人在离家时看管财物的邻居和朋友，经常翻脸不认人：几年之间，这些人已经把犹太人的财产据为己有。战争期间耕种犹太人土地的村民，不认为自己有必要把土地归还犹太人，因为村民们认为犹太人无权享有村民耕作的成果。从战时当局手中分配到空置公寓的基督徒认为这些公寓就是自己的合法财产，而且他们还有文件证明。所有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讨厌和诅咒犹太人，所有犹太人在战争期间"消失"了，他们的东西就不该收回去。

有一个例子能够充分说明，在战争期间，犹太财产如何被瓜分以及这种瓜分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事情发生在匈牙利小镇昆马达拉什（Kunmadaras）。战争开始时，有250名犹太人生活于此，而当地总人口大约为8000人。1944年4月，所有犹太人都被驱逐，有些被送去奥斯威辛，有些被送去奥地利，只有73人幸存。犹太人离家期间，他们的财产被地方官员“充公”，他们首先中饱私囊，但也分配给穷人。在当局的默许下，有些住宅和商铺被社区抢夺。其他房产则被路过的各支军队占领，家具陈设则被分配给当地社区。当苏联红军到达时，他们反过来抢掠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住宅，许多贵重物品也被抢走。苏联红军抢到的财产，有些被用来交换食物，有些则在军队开拔时就地丢弃，于是，经过流转，这些财产落入当地农民手中。到了这个复杂网络的最终环节，初来乍到的共产党人征收了这些财产，或者自用，或者交公，偶尔用于地方贸易。[25]

经过一系列充公、掠夺、盗窃、转手，犹太人的财产随之散布于城镇的各个角落。在布达佩斯这样的大城市，这种混乱状况让回国的犹太人根本不可能追查到自己的财产。但在昆马达拉什这样的小城镇，找回自己的财产并无难度，但让财产的新主人交还财产才是难题。有些人当场拒绝，并且把犹太人的出现视为奇耻大辱和潜在威胁。有些人在警察的命令下归还了财产，但即使是自觉服从命令的人也很不情愿，并且对此感到愤怒。穷人尤其伤心，特别是他们要把财产还给曾经更加富有的犹太人。当地报纸采访时，一位妇女说道：“犹太人回来时一无所有，但现在他们吃着白面包，尽管我在田地里埋头苦干，但我还是一无所有。”[26]

从1945年冬到1946年春，在昆马达拉什开始形成紧张的反犹气氛。这种气氛于1946年5月走到尽头，一群妇女在昆马达拉什市场袭击了名叫库蒂·费伦茨（Ferenc Kuti）的犹太鸡蛋商贩，在他面前打碎了所有鸡蛋。带头袭击的妇女名叫埃斯特·托特·考鲍伊（Eszter Toth Kabai），她

以血腥的传说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即犹太人在宗教仪式上以基督教儿童献祭的古老传说。荒诞不经的谣言传遍了整个地区，说犹太人诱拐和杀死儿童，并且出售“人肉香肠”。当考鲍伊用木鞋殴打库蒂时，考鲍伊开始叫嚷：“我姐妹的孩子被犹太人拐走了。”有些非犹太商贩跑来帮助库蒂，但当其他商贩也受到袭击时，库蒂丢下摊子逃回了家中。[27]

库蒂的家很快被暴民包围。开始时人们还不敢进入库蒂的家，因为他们害怕库蒂可能有枪。但当警察进入屋内，发现库蒂并无武器并且错误地向人们宣布时，暴民一拥而入。库蒂向闯入者乞求饶命，但他被一位名叫卡尔曼·鲍拉日（Balázs Kálmán）的男人杀死，此人用铁棍将库蒂殴打至死，同时还叫嚣道：“谁让你用匈牙利孩子的肉做香肠！”[28]

袭击库蒂·费伦茨标志着一场集体屠杀的开始，至少还有一名犹太人被杀害，15名犹太人身受重伤。[29] 犹太人的住宅被破门而入、抢掠一空，犹太商店也受到抢掠。在屠杀期间，诱拐儿童的谣言和血腥传说被反复提及，暴民们喊出各种各样的口号，大意无非“我们必须殴打犹太人，因为他们会偷走我们的孩子！”然而，骚乱背后的真正动机，显然是为了抢夺犹太人的财产，当人们冲入一家服装店时，人们要求店主交出三个据说被囚禁于此的孩子，但人们并没有寻找失踪的孩子，而是自己动手抢夺衣服。犹太妇女罗森贝格太太遭到名为凯赖派希·萨拉（Sara Kerepesi）的妇女的袭击，她对罗森贝格太太怀恨在心，因为她曾经在法庭上被迫归还罗森贝格太太的财产，罗森贝格太太还记得袭击者在打人时的叫嚣：“为了我的鸭绒被！”[30]

发生在昆马达拉什的暴行，只不过是战后欧洲各地类似现象的冰山一角。不仅回国的犹太人难以取回自己的财产，而且遍及欧洲大陆的反犹主义让犹太人比任何群体都更加容易遭到袭击。在匈牙利某些地区，法庭裁定那些从犹太农场抢走的马匹和其他牲畜留在“保有”者手中。[31] 在意大利，当局不仅不愿意把犹太商店物归原主，而且还企图为战争期

间“看管”这些财产征收“管理费”。[32] 在波兰，任何曾经属于犹太人的“无主”财产，都被当地政府控制。换言之，当地政府拥有特殊利益，促使他们在犹太人战后回国时将犹太人再行驱逐。[33] 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可以找到这种例子。

战争期间，犹太人曾经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猎物，犹太财产曾经被视为人们竞相瓜分的财源。显而易见的是，有许多人，以及某些政府，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也依然作如是观。

犹太人是资本家，犹太人是共产党

昆马达拉什屠杀，仅仅是战后匈牙利许多类似事件中的个案。反犹暴力包括抢掠住宅和商店［例如在矿业城市欧兹德（Ózd）］、私刑和谋杀［例如在密什科尔茨（Miskolc）］、焚烧诸如犹太会堂等犹太建筑［例如在马科（Makó）］。除了暴力以外，犹太人还被迫承受所有非暴力形式的反犹主义：歧视、恐吓、谩骂等。种族仇视如此高涨、如此普遍，明显不能只以财产纷争来解释，还存在某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投身此种暴行的人们通常也承受过难以忍受的困苦。1946年，整个地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但匈牙利的情况尤其糟糕，通胀率已经高达每天158486%。[34] 在作家法卢迪·哲尔吉（György Faludy）的记忆中，这对普通人意味着如下事实：当出版商印行其著作的新版本，法卢迪可以得到3000亿彭格的稿酬，在1938年，这个数额相当于600亿美元。然而，在收到稿酬后，他必须直奔市场，因为他知道，在他冲往市场的路上，货币至少会贬值90%。他把所有钱用来买了一只鸡、两升橄榄油、一把青菜。[35] 这种程度的通胀率，对普通人的生活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们被迫用物品换取食品。工人们经常在工厂饭堂里吃饭，因为他们的工资一文不值。最终，某些雇主完全放弃了货币，用食品支付工资。

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两种人受到指责。首先是苏联人，因为正是他们造成了民生凋敝，因为正是他们到处抢掠，到处索取惩罚性的战争赔款。共产党人也受到牵连，在人们心目中，共产党人几乎普遍被视为犹太人。匈牙利并非特例，在整个东欧，共产党都被视为“犹太党”，而且这种看法不无道理。[36] 由于共产党人受到普遍憎恨，人们对犹太人的观感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例如，当犹太裔的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Mátyás Rákosi）来到密什科尔茨就经济形势发表演说时，工厂墙壁上出现的涂鸦把他称为“犹太国王”，正是他“把国家卖给俄国人”。[37]

因为匈牙利近乎绝望的经济形势而受到指责的第二种人是黑市商人和投机分子，他们囤积食品、哄抬价格。人们也普遍认为这些人都是犹太人。例如，当昆马达拉什妇女开始在市场上殴打犹太鸡蛋商贩时，人们安在他头上的罪名就是他的鸡蛋价格贵得离谱。犹太人普遍遭到坑害顾客、利用萧条、囤积食品、囤积黄金的指控。这些说法由来已久，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都被视为守财奴。[38]

共产党人渴望摆脱“犹太党”的形象，把后一种偏见视为赢得人心的机会。1946年夏天，他们开始在反对黑市的演说中把犹太人谴责为“投机分子”。当他们张贴相关海报时，“投机分子”被夸张地描绘成犹太人的形象：实际上，这些海报与纳粹统治时期关于“犹太寄生虫”的海报无甚差别。甚至有证据表明，共产党人在密什科尔茨对犹太人动用私刑，试图以此转移群众的愤怒。[39]

在1946年的政治经济混乱中，匈牙利犹太人没有多少回旋余地。赖因茨豪尔德·莫尔（Mór Reinchardt）是来自亚诺什豪尔马（Jánoshalma）的犹太人，他在8月写给匈牙利犹太事务局主席的信中总结了犹太人的困境：

> 遗憾的是，在密什科尔茨事件以及其他类似事件后，犹太人显然

> 同时受到共产党和小农党的憎恨。一方的口号和海报写着“打倒共产党和犹太人！”，另一方的口号和海报写着“打倒小农党和犹太人！”。犹太人受到普遍憎恨，所有党派都准备消灭每一个犹太人，无论此人有罪还是无辜……在我看来，别无选择，只有向占领军寻求保护。我们需要寻求他们的帮助。在这里，在匈牙利，犹太人已经无法立足。因此，我们需要离去。我们需要移居国外。我们需要请求苏联军事当局允许我们离开这个国家……当我们移居国外时……苏联红军应该继续占领这个国家，以便保护我们。[40]

这封信充分表达了欧洲各地成千上万犹太人的心声，他们相信，欧洲大陆已不再是他们安身立命之地。

凯尔采大屠杀

如果说战后匈牙利的反犹主义甚嚣尘上，那么，波兰的情况就更加糟糕。1945年夏天，从一系列纳粹劳动营中死里逃生后，时年16岁的本·赫尔夫戈特和表兄弟从特莱西恩施塔特返回波兰。然而，当他们在琴斯托霍瓦（Częstochowa）换乘火车时，他们被两名全副武装、身穿制服的波兰人拦了下来，对方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在看过文件后，对方要求这两个男孩到警察局接受例行检查。两个男孩没有发现当中有什么不妥，就跟对方进了城。在此期间，赫尔夫戈特试图与这两个陌生人说话，但其中一个人恶狠狠地对他说：“闭上你的臭嘴，你这个该死的犹太人。”两个男孩马上知道自己遇到麻烦了。

这两个人并没有把男孩带到警察局，而是带到一处黑暗的公寓，在那里，男孩被迫打开行李箱。在拿走所有值钱的东西后，这两个人把男孩带出了公寓，当时已经入夜，他们再次声称要把男孩带到警察局。当然，男孩不再相信他们，但由于这两个人有武器，男孩别无选择，只能顺从。男孩被带到城镇的废弃角落，这两个人掏出左轮手枪，告诉男孩走向最近的墙壁。本·赫尔夫戈特马上开始哀求他们，恳求他们看在爱国主义的份上，看在大家都是战争期间受苦受难的波兰同胞的份上，看在战争结束后互相帮助的份上，饶过两个男孩的性命。最后，其中一个

人动了恻隐之心，对同伴说：“放过他们吧。他们还是孩子。”这两个人收起左轮手枪，大笑着走开，留下这对表兄弟自己寻找回到火车站的路。[41]

战争结束后，波兰成为犹太人最容易遇到危险的国家。从德国投降到1946年夏天，至少有500名犹太人被波兰人杀害，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受害者人数大约是1500人。[42] 根本不可能得到确切数字，因为本·赫尔夫戈特所描述的个别事件，很少形成报告，更少留下记录，假如这两个男孩最终遇害，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犹太人被扔下火车，被洗劫财产，被带到森林里射杀。当地民族主义团体写信警告犹太人，要么离开，要么被杀。被遗弃的尸体口袋上写着这样的纸条：“所有还活着的犹太人，都是这个下场。”[43]

一如在匈牙利，居心险恶的古老血腥传说被反复提及。在热舒夫（Rzeszów），有谣言说“那些从集中营回来的嗜血的犹太人”执行了仪式性的谋杀。这些谋杀据说包括杀害一名9岁的名叫布罗尼斯瓦娃·门敦（Bronisława Mendoń）的女孩，1945年6月，她的“血被吸干，以用于宗教仪式”。在这些谣言引起的骚动期间，有犹太人被毒打，犹太财产遭到掠夺，还有一到两名犹太人可能被杀害。[44] 在克拉科夫，在传出一名基督教儿童在犹太会堂被杀害的谣言后，市里爆发了一场全面的屠杀。波兰警察和民兵混杂在暴民当中，拆毁犹太会堂，在城镇里到处追杀犹太人。在接下来的暴行中，数十名犹太人受伤，可能有五名犹太人被杀。那些到医院求诊的犹太人再次遭到殴打，护士对此袖手旁观，还说“犹太渣滓活该被射杀”。[45]

然而，战后最著名，可能也是最恶劣的屠杀，发生在波兰中南部的凯尔采。[46] 这次屠杀开始于1946年7月4日早上，当时人们诬称一位8岁的名叫亨里克·布瓦什奇克（Henryk Błaszczyk）的男孩被一名当地犹太人诱拐，并囚禁在普兰特街7号犹太委员会大楼的地下室里。那名受到

男孩指控的犹太人马上遭到逮捕和毒打。准备动用私刑的暴民群起冲进大楼，救出了其他据说要被用于献祭的孩子们。谣言迅速传遍整个社区，都说孩子们被绑架了，而且犹太人已经“杀死了一名基督教儿童”。犹太委员会的首领试图平息事态，但波兰人对他的劝告充耳不闻。

一小时后，当警察来这座可疑的大楼搜查的时候，他们发现里面没有任何基督教儿童，实际上那里甚至没有地下室。他们让那个说谎的孩子出去，并且把他送回家中，但伤害已经造成。此时，大批群众聚集在大楼外面，开始朝窗户扔石头。此后有超过100名士兵到达，试图恢复秩序，但在一声枪响过后（不知道是谁开的枪），这些士兵加入了警察的行列，共同冲击大楼，抓住里面的男男女女，强迫他们走到大楼外面大声叫嚣的武装暴民当中。

巴鲁克·多尔夫曼（Baruch Dorfman）当时在大楼的三楼，他和另外20人躲在一个房间里。

> 他们开始朝房门射击，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受伤，后来伤重不治。他们冲进房门。他们是穿着制服的士兵，当中夹杂着几个平民。然后我就受伤了。他们命令我们出去。他们让我们排成两列纵队。楼梯间里面已经站满了平民，当中还有妇女。士兵们用枪托击打我们。平民包括男男女女，都在殴打我们。我穿着一件类似制服的马甲，也许正因如此，他们当时没有打我。我们来到广场上。其他与我一起被带出来的人受到刀刺和枪击。人们朝我们扔石块，但我当时仍未受到伤害。我穿过广场走到出口，但肯定是我的面部特征让他们认出了我是被带出大楼的犹太人，因为一个平民尖叫道：“犹太人！”他们那时候才开始攻击我。石块朝我飞来，我被枪托击打，我跌倒后失去了知觉。过了一会儿，我恢复知觉，他们又用石头和枪托打我。当我躺在地上时，一个人想要射杀我，但我听到另一个人说：“不要开枪，他反正都要咽气了。”我再次晕了过去。当我醒来的时候，有人拖着我的脚把我扔上卡车。这可能是另一名士兵，因为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凯尔采医院了。[47]

有目击证人记得，犹太人被掷出窗外，扔到楼下的街道里。犹太委员会的首领被射杀在大楼后面，当时他正要打电话求救。后来，又有

600名来自卢德维科夫（Ludwików）铸造厂的工人于午后到达，大约15～20名犹太人被人用铁棍打死。还有人被石头砸死，或者被警察或士兵射杀。死者名单中包括3名犹太士兵，他们刚刚赢得波兰的最高战斗奖章，还有2名被误认为犹太人的普通波兰人被打死。当天还有一位怀孕的母亲被杀害，还有一位妇女和她的新生婴儿一起被射杀。总共有42名犹太人在凯尔采被杀害，还有多达80人受伤，此外还有大约30人在当地铁路沿线的相关袭击中被杀害。[48]

这场大屠杀最令人震惊之处在于，整个社区都参与了屠杀，包括男人和女人，包括平民，也包括警察、民兵、士兵这些本来应该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人。血腥传说的种族神话挑起了这次屠杀，但天主教会并没有驳斥这些传说，也没有谴责屠杀。实际上，波兰红衣主教奥古斯特·哈龙德（August Hlond）声称屠杀并非出于种族动机，无论如何，如果在波兰社会中曾经存在某种反犹主义，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犹太人的过错，因为“波兰人如今在波兰政府中占据要职”。[49]

地方党委和中央党委领导人勉强发挥了一点作用，起诉了屠杀事件的某些主要参与者，并且为一趟运送伤员离开罗兹的专列提供保护，但在事发当天，他们都保持沉默。当地党委书记给出了理由，他“不想人们认为（党）是犹太人的辩护人”。[50] 内政部部长雅库布·贝尔曼（Jakub Berman）本身就是犹太人，当他得知此事时屠杀仍在发生，但他拒绝采取任何激烈措施制止暴民。于是，甚至波兰最高当局也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施以援手。一如在匈牙利，波兰共产党人甚至波兰共产党中的犹太人，都希望与犹太人保持距离，撇清关系。

迁徙

人们对东欧反犹暴行的反应极具戏剧性。许多战后返回波兰的幸存者此时却回到德国，因为置身于这个最早开始迫害犹太人的国家，远比置身于祖国安全得多。他们现身说法，劝告其他人不要重蹈回家的覆

辙。迈克尔·埃特金（Michael Etkind）给出这样的建议："无论你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要返回波兰，波兰人正在杀害所有从集中营回来的犹太人。"[51] 哈里·鲍尔萨姆（Harry Balsam）也提出同样的说法："他们告诉我们，现在想回去简直是疯了，波兰人正在屠杀波兰犹太人了……他们告诉我们，波兰人正在做德国人想做都做不到的事情，他们能够活着回来已是万幸。"[52] 早在1945年10月，联合救济委员会（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的约瑟夫·莱文（Joseph Levine）就已经致信纽约方面："人人都发回波兰人杀人和抢掠的报告，所有犹太人都想离开波兰。"[53]

幸运的是，对于许多波兰犹太人来说，以及对于来自其他几个东欧国家的犹太人来说，逃亡路线是早已设计好的。战争结束后，有几个当机立断的犹太人群体建立了一个被称为"迁徙"的组织，这个组织早已开始保障一系列的安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遍布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的非官方过境点。开始时，他们还是一个非常隐蔽的秘密组织，但从1946年起，他们在东欧各国政府间获得了半官方地位。1946年5月，波兰总理爱德华·奥索博卡-莫拉夫斯基（Edward Osóbka-Morawski）公开表示，他领导的政府，不会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在凯尔采大屠杀后，他又重申了这一声明。[54] 屠杀结束之后，在华沙犹太人起义领袖之一伊扎克·"安泰克"·楚克曼（Yitzhak 'Antek' Zuckerman）与波兰国防部部长马里安·斯佩哈尔斯基（Marian Spychalski）的协商之下，一个正式过境点得以开放。其他与"迁徙"组织有关的头面人物也与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美国驻德国行政当局进行谈判，开放类似的过境点，而捷克方面也同意提供特别列车，以让犹太难民穿越国境。[55]

逃向西方的犹太人数量相当可观，而且从凯尔采大屠杀后开始激增。1946年5月，"迁徙"组织从波兰迁出了3502人。6月，迁出人数增长到大约8000人。及至7月，屠杀结束后，该数目翻了不止一番，达到1.9

万人，8月几乎又翻了一番，达到35346人，9月回落至12379人。这些数字还不包括通过其他方式逃离波兰的一两万人，他们多数是通过投机分子和偷渡分子找到门路的。此外，联合救济委员会派驻布拉迪斯拉发的机构回报，在凯尔采大屠杀后三个月内，大约1.4万名匈牙利犹太人取道捷克斯洛伐克逃亡。总体而言，在1946年7～9月，大约9万至9.5万名犹太难民逃离东欧。[56]

战后两年间，逃往西方的犹太人总数大致如下：20万人逃离波兰，1.8万人逃离匈牙利，1.9万人逃离罗马尼亚，也许还有1.8万人逃离捷克斯洛伐克，最后，这个群体被迫离开并非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捷克人把他们视为德国人。[57]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1948～1950年，大约4万名犹太人逃离上述国家，我们由此得出总体数字，大约30万人因为反犹迫害而被迫离开上述国家。这已经是相当保守的估计了。[58]

这些犹太人去往何处？短期之内，他们打算前往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难民营，讽刺的是，正是这些前轴心国义无反顾地为他们提供了救助。从长期来看，他们打算彻底告别欧洲大陆。许多人想要前往英国，或者大英帝国的海外领地，许多人想要前往美国，但绝大多数人更想前往巴勒斯坦。他们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们认为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真正逃脱反犹主义的迫害。

为了达成此目的，犹太人几乎获得了所有国家的帮助，除英国之外。苏联非常乐意其境内的犹太人离开欧洲，没有为他们的逃亡之路设置障碍，甚至为他们开放边境出口，但只有犹太人才有这个待遇。正如我们所见，波兰和匈牙利用尽各种手段，让犹太人在其境内过得不舒坦，再次鼓励他们通过任何方法离开。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意大利、法国都为犹太人提供了登船前往圣地的口岸，很少为他们设置障碍。但是，美国出力最多，这并非允许犹太人进入美国，而是帮助犹太人前往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美国向英国施加外交压力，迫使

英国在巴勒斯坦接纳10万名犹太人，但美国仅仅正式批准12849名犹太人进入美国，而且这还是杜鲁门总统关于迁徙人员特别指令的结果。[59]

英国是唯一试图阻止犹太人从东方涌入的国家。英国方面指出，绝大多数涌入者都不是希特勒集中营的幸存者，而是战争期间待在哈萨克斯坦以及苏联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因为他们现在回国似乎是“安全”的，英国方面认为，没有必要为他们提供庇护，苏联以及东欧国家也应该承担相应责任。英国乐意在德国境内为希特勒的受害者提供避难所，但英国的底线是不欢迎与战争无关的新犹太难民潮涌入。与美国驻德国行政当局不同，英国拒绝这些新来的犹太人进入英国控制下的难民营。

英国错误地认为，新犹太难民潮不是由于恐惧反犹主义而形成的，而是由以色列前往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煽动起来的，目的是招募新人投入他们的事业。平心而论，“迁徙”运动的绝大多数成员，的确是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但英国完全错误地假定犹太人渴望逃往巴勒斯坦是由于“迁徙”运动。历史学家耶胡达·鲍尔（Yehuda Bauer）早已断言，逃亡的动机完全来自难民自身，犹太复国主义者只不过为他们提供了一处目的地。[60]

英国还满怀热情地认为，“迁徙”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在纳粹大屠杀之后，允许欧洲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更是如此。按照英国外交部的说法，这“无疑是令人绝望的建议……实际上这等于承认纳粹是对的，纳粹坚持犹太人在欧洲没有立足之地”。英国外交秘书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坚信：“犹太人在欧洲大陆的重建工作中承担着关键角色，如果犹太人不能留在欧洲，那么，我们打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什么意义。”[61]

在道德哲理的呼吁之外，英国方面不甚乐意的真正原因还是政治因素：英国不想在中东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造成爆炸性的政治形势。

但是，由于缺乏任何欧洲伙伴的强力合作，英国未能真正阻止逃向西方的浪潮继续蔓延。英国阻止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的努力略为成功，在英国皇家海军的护送下，搭载着数万犹太移民的地中海船只，转道前往塞浦路斯的特别难民营。

但这完全是徒劳无功，英国最后也无能为力。1946年夏天，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对英国派驻巴勒斯坦的机构发动恐怖袭击（主要起因是战后英国反犹主义崛起）。一年后，英国开始减少耶路撒冷的驻军。1947年11月底，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强力游说后，联合国投票通过将巴勒斯坦部分地区授予犹太人，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最终，在1948年，在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势均力敌的内战后，以色列国得以巩固。犹太人可以无拘无束地在世界上一个小小角落找到自己的家园。

此处不宜展开讨论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从那时开始的残酷冲突，这种冲突至今充斥着我们的报纸版面。我们只能说，犹太人当时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考虑到他们在近代史上的经历，人们很难指责他们自主建国的愿望，借用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的说法，阿拉伯人“实在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为纳粹大屠杀付出代价”。[62] 无论如何，大批欧洲犹太人最终找到了一个自己当家做主的国家，在那里，他们不会受到迫害，在那里，他们可以遵循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色列不仅是应许之地，还是希望之地。



5.犹太人逃往巴勒斯坦的路线

然而，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犹太人一度生活于此的欧洲地区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在战争爆发前，波兰曾经是文化与族群的大熔炉，但此时已经面目全非。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整个东欧都是如此。

及至1948年，许多地区都达到了甚至超过了希特勒时代的设想，犹太人不复存在。

---

[1] Roman Halter，letter to Martin Gilbert，Martin，*The Boys*（London：Phoenix，1997），pp.266-8.另可参阅IWM Sound，17183，reel 10。

[2] Blom，J. C. H. et al.（eds.），*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the Netherlands*，trans. Arnold J. Pomerans and Erica Pomerans（Oxford and Portland，OR：Littman Library of Jewish Civilization，2002），p.337.

[3] Lewkowicz，Bea，'"After the War We Were All Together"：Jewish Memories of Postwar Thessaloniki'，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260.

[4] Hondius，Dienke，*Return*：*Holocaust Survivors and Dutch Anti-Semitism*，trans. David Colmer（Westport，CT：Praeger，2003），p.104.

[5] Report in *Neue Welt*，no.1，引自Gringauz，Samuel，'Our New German Policy and the DP's：Why Immediate Resettlement is Imperative'，*Commentary*，vol. 5，no. 3（June 1948），p.512。

[6] Abba Kovner，引自Bauer，Yehuda，*Flight and Rescue*：*Brichah*（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36；Gringauz，Samuel，'Jewish Destiny as the DP's See It：The Ideology of the Surviving Remnant'，*Commentar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vol. 4，no. 6（December 1947），p.504.

[7] Levi，Primo，*Survival in Auschwitz and The Reawakening*：*Two Memoirs*，trans. Stuart Woolf（New York：Summit Books，1986），p.373.

[8] Hondius，Dienke，*Return*：*Holocaust Survivors and Dutch Anti-Semitism*，trans. David Colmer（Westport，CT：Praeger，2003），pp.55，77.

[9] Hondius，Dienke，*Return*：*Holocaust Survivors and Dutch Anti-Semitism*，trans. David Colmer（Westport，CT：Praeger，2003），pp.78-82.

[10] Hondius，Dienke，*Return*：*Holocaust Survivors and Dutch Anti-Semitism*，trans. David Colmer（Westport，CT：Praeger，2003），p.80.

[11] Levi，Fabio，‘Italian Society and Jew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Between Silence and Reparation’，in Jonathan Dunnage（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26.

[12] 如可参阅Beevor，Antony and Artemis Cooper，*Paris After the Liberation*（London：Penguin，1995），p.172；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p.267-72；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3-16。

[13] Hondius，Dienke，*Return*：*Holocaust Survivors and Dutch Anti-Semitism*，trans. David Colmer（Westport，CT：Praeger，2003），pp.76，79-80，93-5.

[14] F.C.Brasz，“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From‘Jewish Church’to Cultural Minority”，in Blom，J. C. H. et al.（eds.），*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the Netherlands*，trans. Arnold J. Pomerans and Erica Pomerans（Oxford and Portland，OR：Littman Library of Jewish Civilization，2002），p.337.

[15] Rita Koopman，Ab Caransa，Gerhard Durlacher and Mrs’t Hoen，引自Hondius，Dienke，*Return*：*Holocaust Survivors and Dutch Anti-Semitism*，trans. David Colmer（Westport，CT：Praeger，2003），p.100。

[16] 引自Hondius，Dienke，*Return*：*Holocaust Survivors and Dutch Anti-Semitism*，trans. David Colmer（Westport，CT：Praeger，2003），p.100。

[17] 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p.271-2.

[18] Newspaper story，引自Pelle，János，*Az utoisó vérvádak*（Budapest：Pelikán，1995），pp.228-9。

[19] Ethel Landerman testimony，引自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393。

[20] 引自Kenez，Peters，*Hungary from the Nazis to the Soviet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Hungary*，*1944-194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58。

[21] Hondius，Dienke，*Return*：*Holocaust Survivors and Dutch Anti-Semitism*，trans. David Colmer（Westport，CT：Praeger，2003），pp.77-8.

[22] Myant，Martin，*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n Czechoslovakia*，*1945-194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103；Pelle，János，*Az utoisó vérvádak*（Budapest：Pelikán，1995），151；Jean Ancel，"The Seizure of Jewish Property in Romania"，in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The Confiscation of Jewish Property in Europe 1933-1945*：*Symposium Proceedings*（New York：USHMM Center for Advanced Holocaust Studies，2003），pp.43-55.

[23] 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44.

[24] 如可参阅Kovaly，Heda Margolis，*Prague Farewell*，trans. Franci Epstein and Helen Epstein（London：Gollancz，1988），pp.56-7；Acheson，Dea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Norton，1969），p.357；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p.39-51；Lewkowicz，Bea，'"After the War We Were All Together"：Jewish Memories of Postwar Thessaloniki'，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260；Gilbert，Martin，*The Boys*（London：Phoenix，1997），pp.268，274。

[25] 关于昆马达拉什等事件的详细分析，参阅Pelle，János，*Az utoisó vérvádak*（Budapest：Pelikán，1995），pp.151-68。

[26] Eszter Toth Kabai interview in *Haladás*，引自Pelle，János，*Az utoisó vérvádak*（Budapest：Pelikán，1995），p.161。

[27] Pelle，János，*Az utoisó vérvádak*（Budapest：Pelikán，1995），pp.157-60.

[28] Pelle，János，*Az utoisó vérvádak*（Budapest：Pelikán，1995），p.160.

[29] Kenez，Peters，*Hungary from the Nazis to the Soviet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Hungary*，*1944-194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59-60；犹太历史学家声称有3人死亡，有18人受伤，参阅Éva Vörös，"Kunmadaras Újabb adatok a pogrom történetéhez"，*Múlt és jövo*，no.4（1994）。

[30] Pelle，János，*Az utoisó vérvádak*（Budapest：Pelikán，1995），pp.161，162.

[31] Pelle，János，*Az utoisó vérvádak*（Budapest：Pelikán，1995），p.173.

[32] Levi，Fabio，'Italian Society and Jew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Between Silence and Reparation'，in Jonathan Dunnage（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p.28-9.

[33] 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p.47-51.

[34] Siklos，Pierre L.，*War Finance，Reconstruction，Hyperinflation and Stabilization in Hungary，1938-48*（Basingstoke：Macmillan，1991），p.1.

[35] 引自Eby，Cecil D.，*Hungary at War：Civilians and Soldiers in World War* Ⅱ（Philadelphi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8），p.287。

[36] 例如，在匈牙利，不仅共产党高层都是犹太人，而且在1945年大约有14%的普通党员也是犹太人，但犹太人只占该国总人口的1%～2%。参阅Kenez，Peters，*Hungary from the Nazis to the Soviet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Hungary，1944-194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56。

[37] Pelle，János，*Az utoisó vérvádak*（Budapest：Pelikán，1995），p.206.

[38] Pelle，János，*Az utoisó vérvádak*（Budapest：Pelikán，1995），p.160.

[39] Kenez，Peters，*Hungary from the Nazis to the Soviet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Hungary，1944-194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59-61；Pelle，János，*Az utoisó vérvádak*（Budapest：Pelikán，1995），pp.212-30.

[40] Letter，Mór Reinchardt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Hungarian Jewish Bureau，5 August 1946，引自Pelle，János，*Az utoisó vérvádak*（Budapest：Pelikán，1995），pp.166-7。

[41] Ben Helfgott，personal interview，19 May 2008.

[42] 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35.

[43] Bauer，Yehuda，*Flight and Rescue：Brichah*（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15；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36.

[44] 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p.74-5.

[45] 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82.

[46] 以下描述基于Gross对波兰档案中关于大屠杀证据的摘要，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p.81-117。

[47] 引自Gross对波兰档案中关于大屠杀证据的摘要，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89.

[48] Gross对波兰档案中关于大屠杀证据的摘要，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p.93，113.

[49] Bauer，Yehuda，*Flight and Rescue*：*Brichah*（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210；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138.

[50] 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98.关于对共产党当日的行动更为同情的观点，参阅Bauer，Yehuda，*Flight and Rescue*：*Brichah*（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p.206-11。关于对屠杀责任讨论中的相反观点，参阅Kochavi，Arieh J.，*Post-Holocaust Politics*（Chapel Hill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175。

[51] Gilbert，Martin，*The Boys*（London：Phoenix，1997），p.275.

[52] Gilbert，Martin，*The Boys*（London：Phoenix，1997），p.271.

[53] Report，Joseph Levine to Moses Leavitt，24 October 1945，引自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334。

[54] Kochavi，Arieh J.，*Post-Holocaust Politics*（Chapel Hill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p.173，227-8；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218.

[55] Kochavi，Arieh J.，*Post-Holocaust Politics*（Chapel Hill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p.175，187；Bauer，Yehuda，*Flight and Rescue*：*Brichah*（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p.216-23；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p.186-9，235-6.

[56] Bauer，Yehuda，*Flight and Rescue*：*Brichah*（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p.211-12.其他作者基于不同标准，提供了不同数字，但都显示7～8月的大幅增长，如可参阅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43。

[57] 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43；Bauer，Yehuda，*Flight and Rescue*：*Brichah*（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p.295，298；Kochavi，Arieh J.，*Post-Holocaust Politics*（Chapel Hill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185.

[58] Bauer，Yehuda，*Flight and Rescue*：*Brichah*（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p.318-20.基于不同时期的类似统计数字，参阅Prażmowska，Anita，*Civil War in Poland 1942-1948*（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4），p.176；以及Kochavi，Arieh J.，*Post-Holocaust Politics*（Chapel Hill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227.Proudfoot的表35基于前往以色列的移民的统计数字，提供了略高的数字。

[59] 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p.190-99；Bauer，Yehuda，*Flight and Rescue*：*Brichah*（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319.

[60] Bauer，Yehuda，*Flight and Rescue*：*Brichah*（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p.319-21.

[61] British Foreign Office to Washington，5 October 1945，TNA：PRO FO 1049/81.Bevin，引自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191。

[62] Walid Khalidi，引自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356。

第十八章 乌克兰与波兰之种族清洗

战争结束后，犹太人并非被逐出家园的唯一民族。犹太人也并非暴民、警察、武装民兵的唯一受害者。如果说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坚称自己是战争期间的主要受害者，那么，在战争结束后，这种说法就再也站不住脚了。正如我所指出的，犹太人的确受到虐待，但在解放后，民族主义暴力的真正焦点开始转向其他少数民族。

我们只要比较凯尔采大屠杀与同年发生在波兰其他地区的类似事件就足够了。1946年1月底，在斯坦尼斯拉夫·普鲁托上校带领下，波兰第34步兵团的士兵包围了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波兰语Zawadka Morochowska，乌克兰语Zavadka Morochivska），这是波兰东南部萨诺克（Sanok）附近的村庄。村民都是乌克兰裔，而村民的族裔血统就是接下来这宗事件的唯一原因。按照目击者的说法，军队到达此地，预示着一场与战争年代同样血腥的屠杀：

> 军队于黎明时分抵达村庄。男人们开始逃进树林，逃不出去的人试图在阁楼和地窖里找到藏身之所，但人们无处可躲。波兰士兵到处搜索，确保没有一个地方被遗漏。每当士兵抓到男人，男人就当场被杀；如果士兵找不到男人，他们就殴打妇女和孩子……我父亲藏在阁楼里，波兰士兵命令我母亲爬上梯子找我父亲。这些命令还伴随着枪托的重击。当母亲开始攀爬时，楼梯突然断裂，母亲摔到地上，摔断了胳膊，他们用重重的军靴踢打母亲。我和我四岁的女儿跑到我母亲身边，想要保护我母亲，但士兵开始殴打我和我的孩子。我瞬间失去知觉，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母亲、我的孩子，都已经被杀了，整个村庄被付之一炬！[1]

第二天，乌克兰游击队来到此地，他们发现此地已彻底荒废：“什么都没有剩下，只有冒着烟的废墟，还有几个晃动的影子，但那更像是山羊的身影，而不是人的身影。”[2] 除了掠夺村庄、盗窃牲畜，波兰士兵还杀害了数十名村民，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和孩子。比谋杀更加恶劣的

是他们从事谋杀的方式。许多人被活活打死、开膛破肚、扔入火堆。有些妇女被割去乳房，有些妇女被挖眼、削鼻、割舌。按照其中一名参与屠杀的波兰士兵的说法："我们当中某些人很享受这次屠杀。"[3]

关于这次屠杀，绝大多数史料来自乌克兰方面，他们绝对有兴趣描绘波兰人的残忍，甚至允许在一定程度上渲染这桩无可否认的恐怖事件。事情并未由此结束。两个月后，军队回到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通知所有幸存村民收拾行李，穿越国境前往苏联的乌克兰。除了学校和教堂，所有残余建筑都被付之一炬，为了警告村民不得在此停留，又有11名男子被射杀。最终，4月，在更多村民被杀害后，教堂和学校都被毁掉了，所有居民都被集合起来并强行驱逐出境。在这些行动期间，大约56人被谋杀，还有许多人身受重伤。这个村庄被从地图上彻底抹去。[4]

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大屠杀与凯尔采大屠杀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由军队执行的，而不是由桀骜不驯的暴民执行的。折磨和谋杀波兰犹太人，是反犹主义背景下的普遍现象。这不是政府行为的结果，而是政府不作为的结果：反犹主义者随意袭击犹太人，因为他们确信自己不会受到惩罚。好几名参与凯尔采大屠杀的罪犯都受到了审判，甚至因为其罪行而被处以死刑。相比之下，在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屠杀乌克兰语居民，则是直接授意于政府政策。军队被调遣至波兰东南部，目的就是清除那里的乌克兰裔居民。与犹太人不同，犹太人仅仅是被"鼓励"逃亡，乌克兰人则是被刻意驱逐，当他们拒绝离开时，要么惨遭杀害，要么被强制驱离。和在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一样，如果说军队这次的行动有些过火的话，那么他们总体上没有受到惩罚。最为重要的是，在政府看来，军队成功执行了任务。

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迫害和驱逐少数民族发生于欧洲各地，尤其是欧洲大陆中部和东部。但是，发生在波兰的事件尤为重要，部分是由于波兰是种族清洗最为广泛的地区，也是由于波

兰/乌克兰问题对欧洲其他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在这里爆发的民族主义紧张局势，最终让苏联决定利用民族主义，使其服从于苏联自身的目标，不仅在波兰如此，而且在整个东欧集团都是如此。正是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彼此驱逐，为欧洲大陆的种族清洗提供了模板。[5]

然而，在我们真正理解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追溯事情的起因。许多历史学家曾经指出，波兰的种族清洗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大战的后果。波兰人并非心血来潮驱逐乌克兰人：只有大战期间的重大事件，才让这种激烈的行动变得可欲而且可能。[6]

波兰/乌克兰种族暴力之起源

战争期间，波兰东部边境被入侵了不止一次，而是三次：首先是苏联，然后是纳粹，最后又是苏联。生活在这个多元文化地区的不同种族群体，对每次入侵的反应都是不同的。绝大多数波兰裔居民既抵抗纳粹也抵抗苏联，并且希望波兰能够恢复到战前的国境线。相比之下，乌克兰裔居民的意见要复杂得多。绝大多数人都害怕并憎恨俄国人，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俄国人以残忍的方式统治了苏联乌克兰地区；但许多人欢迎德国人，把德国人视为解放者，起码最初是如此。与此同时，犹太人不知应该相信谁。许多人希望，苏联入侵能够帮助他们摆脱波兰和乌克兰的反犹主义；后来，有人似乎希望，德国入侵能够让他们摆脱苏联迫害。及至1943年年底，当这片地区遭受第三次入侵时，为数不多的幸存犹太人已经对任何外来者丧失信心了，且不论外来者国籍为何。

苏联和纳粹都在挑动这些种族群体彼此敌对。纳粹尤其希望利用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便镇压其他居民。早在入侵之前，纳粹就已与乌克兰极右翼政治势力建立了联系，尤其是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建立了联系。这是一个非法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类似于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或者罗马尼亚的铁卫军，热衷于以暴力达成目的。纳粹抛出乌克兰独立的诱饵，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便与纳粹通力合作。在这

个声名狼藉的组织中，绝大多数有实力的宗派从未相信德国人的动机，但其他宗派热切盼望被纳粹利用，这既是因为他们认为纳粹会满足他们的欲望，也是因为他们与纳粹同样动机不纯。[7]

在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与纳粹之间，最为可耻的合作方式就是共同铲除犹太人。多年以来，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一直叫嚣种族纯化，呼吁建立“乌克兰人的乌克兰”，鼓吹革命恐怖的好处。在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过程中，尤其是在沃利尼亚（Volhynia）地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的行径说明，这些口号不仅是说说而已。这些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屠杀，为当地后来所有种族清洗提供了模板。最初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此时变得尤为可能。

1941～1942年，大约1.2万名与纳粹紧密勾结的乌克兰警察杀害了超过20万名沃利尼亚犹太人。作为通敌者，他们参与了这些行动的策划过程。他们对当地居民提供保证，让居民产生安全的错觉。他们会突然包围犹太村庄和居民点，甚至亲手参与屠杀。屠杀犹太人让他们在后来的屠杀中驾轻就熟。[8]

1942年年底，德国人败局初现，这些乌克兰警察纷纷弃职潜逃。他们拿起武器，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新近成立的武装游击队，即乌克兰起义军（Ukrainian Insurgent Army）。他们利用从纳粹那里学来的技能，对付他们的种族敌人，不仅包括当地残存的犹太人，还包括大批波兰居民。

他们开始屠杀波兰人的地区，其实就是乌克兰警察当年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地区：沃利尼亚。种族清洗从这里开始，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当地有广阔的森林和沼泽，特别适合游击队活动，孤立的波兰社区比其他地区更加容易遭到攻击，但之前的反犹行动也发挥了作用。禁忌已被打破：当地的乌克兰青年男子已经接受过杀人训练，而且对集体屠杀习以为常。1942年年底，当他们开始清洗这个地区时，他们就已经天不怕地

不怕了。

在之后几年的疯狂屠杀中，波兰社区被全部消灭，从老弱妇孺到新生婴儿无一幸免。例如，在1943年复活节一次存心恐吓波兰居民的行动中，奥勒克西塔（Oleksięta）村被付之一炬。[9] 在韦索茨科-韦兹纳（Wysocko WyAżne），13个孩子被锁在天主教堂里，然后被活活烧死。[10] 在沃拉-奥斯特罗韦茨卡（Wola Ostrowiecka），全体波兰社区居民被集中到当地学校操场。当男人们每五个人为一组，在旁边的谷仓里被砍死时，妇女和儿童则被赶进学校，学校被手榴弹炸毁，然后被付之一炬。[11]

在普德卡米恩（Podkamień）村，在一场针对偏僻农场和边远村庄的夜袭中，村民们被赶出家门。最初，他们睡在荒郊野地，以免遭到突然袭击，最终，他们在当地的修道院里寻求庇护。然而，1944年3月12日，就连修道院也被乌克兰起义军包围了。除少数人跳窗逃生外，全体社区居民，包括僧侣，都被杀害了。他们的尸体被倒吊在修道院周围，以此警告其他波兰社区，如果他们留在此地，这就是下场。[12]

这里列举的只是少数例子，1943～1944年，数以百计的波兰村庄遭到种族暴力的波及。按照波兰、德国、苏联的史料，乌克兰游击队热衷于对其受害者实施斩首、钉十字架、肢解、开膛破肚，经常有意展示尸体，企图以此恐吓残存的波兰社区。他们烧毁住宅和教堂，夷平村庄，抢走所有能够带走的东西。这种事情发生在波兰东部和乌克兰西部。任何乌克兰人试图保护其波兰邻居，都将一同被杀。[13]

即使在乌克兰起义军的报告中也提到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像消灭犹太人那样彻底消灭波兰人，在许多地区，他们的目标都已经达到。乌克兰起义军其中一名总指挥德米特罗·克利阿查基夫斯基（Dmytro Kliachkivs’kyi）建议其下属各级指挥官，“杀掉所有16岁至60岁的（波兰）男性居民”，而且命令道，“森林里面和森林附近的村庄，应该被夷

为平地”。扎韦克霍斯特（Zavykhost）地区的指挥官尤里·斯捷利马修克（Iurii Stel’mashchuk）承认，他曾经接到一条命令：“在乌克兰所有西部省份，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波兰居民。1943年8月，为了执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下达的命令，由几支乌克兰起义军部队组成的队伍，屠杀了超过1.5万名波兰人。”[14]

作为应对措施，有些当地波兰人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组织，以求自我保护。波兰地下组织也开始减少对德国占领者的抵抗，以便把资源用于保护波兰社区，使其免遭乌克兰起义军的侵害。有些沃利尼亚波兰人转而向德国人求职，希望在成为警察后有机会复仇。（德国人显然非常乐意招募他们，新一轮通敌浪潮由此产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招募警察是为了对以前的通敌者大开杀戒。）1944年，当苏军抵达时，许多波兰人加入苏联红军或者苏联内务部，这一次同样是为了复仇。乌克兰村庄被纵火焚烧，数以千计的乌克兰农民被杀，这就是对乌克兰起义军所作所为的种种报复。[15]

顺理成章的，这些报复行动又成为乌克兰游击队攻击波兰人和波兰村庄的理由。形势就此陷入恶性循环。战争最后几年以及战争结束初期，整个地区实际上已经被卷入内战。战火从沃利尼亚蔓延到加里西亚和波兰中部。波兰人与乌克兰人彼此屠杀，彼此焚烧对方的村庄，其热情远远超过他们对德国或苏联占领者的反抗。法尔德玛尔·洛特尼克（Waldemar Lotnik）当年是波兰游击队员，他对这种冲突有出色的描绘：

> 前两天晚上，他们杀了我们7个人，当晚，我们就杀了他们16个人……一周以后，乌克兰人开始报复，他们彻底抹掉了一个波兰居民点，他们放火烧屋，杀死那些未能逃走的居民，强奸落到他们手上的妇女……我们还以颜色，袭击了一处更大的乌克兰村庄，这次我们当中有两三个人杀了女人和孩子……乌克兰人再次报复，他们摧毁了一处有500名波兰人的村庄，折磨和杀死所有落到他们手上的人。我们再次还以颜色，摧毁他们两处更大的村庄……战斗步步升级。每次都有更多居民被杀害，更多房屋被烧毁，更多妇女被强奸。男人们很快变

得残酷无情，仿佛除了杀人放火，他们什么都不会做。[16]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回顾本章开头描述的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屠杀事件。当我们孤立看待这桩事件时，很容易就会得出结论，这是冷血的罪行、完全是波兰人的罪行、以种族清洗的名义犯下的罪行。当我们把时间尺度略为放宽，就会发现，参与屠杀的部队，本身就是前一天乌克兰起义军游击队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这样屠杀事件看上去就没有那么冷血了。[17] 当我们把时间尺度更为放宽，就会发现，某些卷入屠杀的人，其实是发生在沃利尼亚的波兰人与乌克兰人内战的退役老兵，复仇行动的动机开始变得更加明确。[18] 这种背景叙述不是为了给发生在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的屠杀事件辩护，或者为1946年发生在波兰东南部其他乌克兰裔村庄的袭击事件辩护，而是为了更加清楚地解释屠杀事件的来龙去脉。

即使按照最为保守的估计，也有大约5万名波兰平民在沃利尼亚被乌克兰游击队杀害，还有2万～3万人在加里西亚被杀害。总体而言，在遍及边境各地的内部冲突中，有高达9万名波兰人被杀害。乌克兰人的死亡人数也是成千上万，但由于波兰人并未带着种族灭绝的明确计划参与冲突，乌克兰人被杀的人数远远少于他们杀人的人数，也许总共为2万人。[19] 与许多其他地区的战时欧洲史相比，这些数字可谓充满争议，而且波兰与乌克兰两国历史学家的争议主题转移到了谁才更有资格自称为受害者上。一方面，绝对数字并不重要，只要我们知道发生了一场暴力内战，双方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这就足够了；另一方面，数字又无比重要，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在欧洲各地重新崛起的氛围中。乌克兰人自然不愿意承认，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开启了这个暴力循环，他们企图缩小波兰人的死亡人数，有时不惜篡改数字。然而，某些波兰人也把统计学视为再现内战历史的武器。[20] 在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中，人们不大可能就数字达成任何共识，而我所给出的上述数字，已经是目前最为不偏不倚的估计了。

苏联方案

1944年，当苏军再次进入乌克兰和波兰时，他们发现种族冲突的严重程度已经足以引起警惕了。当时战争还在继续，苏军当然不能允许这种混乱状况干扰苏军补给线。由于乌克兰起义军已经开始袭击苏军部队，他们必须采取措施稳定局面。

苏军的应对方法非常简单：如果不同族群无法在一片土地上和平共处，那么他们应该被隔离开来。这种隔离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波兰人应该生活在波兰，乌克兰人应该生活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双方的边界将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的旧波兰国界：边界将向西移动，因此绝大部分乌克兰人眼中的“西乌克兰”地区将会与“东乌克兰”地区重新统一。这样做不仅能够扩充苏联领土，而且能够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乌克兰起义军釜底抽薪，因为正是苏联将乌克兰人奋战而不可得的东西给了乌克兰人。任何生活在国界东面的波兰人都将被赶回波兰；同样，生活在国界西面的乌克兰人都将被“遣送回国”。

在当时，如果说这是一个带有争议的解决方案，那也未免太过轻描淡写了。对于暂居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来说，将乌克兰/波兰国界如此往西推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苏联提出的国界曾经是所谓的寇松线（Curzon Line），这相当于把等同于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面积总和的波兰东部国土割让出去。波兰城市利沃夫将会授予乌克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将会给予白俄罗斯，而维尔诺（今天的维尔纽斯）将会移交给立陶宛。承认这条国界，等于接受1939年苏联入侵波兰的结果。

西方盟国表面上也反对这个解决方案。丘吉尔和罗斯福此前都已表示愤慨，难以接受任何苏联控制上述领土的建议。[21] 然而两位政治家

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知道，根本不可能反对苏联的计划，因为苏联已经占领了整个地区。两位领袖都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挑战斯大林。当美国驻波兰大使建议美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站稳立场时，罗斯福冷冷地说："难道你想让我跟俄国打仗吗？"[22]

早在1943年11月，当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德黑兰首次与斯大林会晤时，他们就表示不会反对斯大林把波兰东部边境并入苏联的计划。在这个问题上，丘吉尔并不拐弯抹角，他试图说服波兰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ław Mikołajczyk）接受这个既成事实，这个米科瓦伊奇克断然无法接受的既成事实。然而，罗斯福还有更多的盘算，他并未表明立场，直至一年后竞选连任，因为他还要指望数百万波兰裔美国选民的支持。1945年2月三巨头的雅尔塔会议，最终击碎了波兰人的希望，三巨头正式发出联合声明，波兰东部边界应该遵循寇松线划定。[23]

这个过程的可悲之处在于，由始至终都没有咨询过波兰人的意见。甚至在德黑兰会议的交易敲定之后，也没有咨询过波兰代表团的意见。对于波兰人来说，这是英美两国出卖了波兰。1941年，当丘吉尔与罗斯福签署《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 ）的时候，他们曾经承诺永不支持任何"违背民众自由意志"的领土变更。由于在德黑兰和雅尔塔都同意了苏联的要求，丘吉尔与罗斯福都明确背弃了这个承诺。英美两国的保守派也有同样的感觉。美国驻波兰大使亚瑟·布利斯·莱恩（Arthur Bliss Lane）公开表示，这是向斯大林"投降"，这是"绥靖"政策，一如战争爆发前对希特勒的绥靖，是对美国的波兰盟友的"背叛"。[24] 在英国，工党议员约翰·里斯·戴维斯（John Rhys Davies）在下议院尖锐抨击道："我们怀着伟大的动机和高尚的理想开始这场战争。我们发表了《大西洋宪章》，然后又唾弃它、践踏它、烧毁它，正因如此，《大西洋宪章》现在已经荡然无存。"[25]

强迫"回国"

人们很少会考虑到，雅尔塔会议上决定的国界变更对当地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被视为斯大林权力范围内的事务，而不是西方盟国能够插嘴的事务。实际上，随着苏联势力渗透到这个地区，他们已经开始按照惯常的做法展开逮捕和驱逐行动了。但斯大林仍然谨慎从事，在《雅尔塔协议》签署之前，尚未开始全面驱逐波兰人。

在苏联看来，这是全新的事态。苏联早就懂得如何按照民族成分把一个地区的全体居民流放到另一个地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各个民族群体就像是国际象棋的棋子，在棋盘上被移来移去。[26] 最近一次迁移是在1944年5月，流放克里米亚鞑靼人（当时克里米亚还不属于乌克兰）。[27] 然而，到此时为止，这种流放总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而非出于纯粹的种族原因。而且，这种流放只是在苏联领土内进行，苏联从未试过把某个少数民族逐出苏联国境。因此，发生在乌克兰与波兰之间的人口交换，反映了苏联政策的显著变化。[28]

1944～1946年，大约782582名波兰人被赶出苏联乌克兰，重新定居在波兰。此外还有231152人被赶出白俄罗斯，169244人被赶出立陶宛，三者合计总数将近120万人。[29] 许多人是在当局的骚扰下被迫离开的，但还有许多人是为了逃避紧接而来的种族暴力而自愿离开的，暴力浪潮从1945年开始，持续到1946年。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苏联与乌克兰起义军似乎在通力合作，以达成共同的目标。例如，1945年7月，玛丽亚·约瑟夫维斯卡（Maria Józefowska）及其家人被迫离开捷尔沃诺哥罗德（Czerwonogród）村，因为乌克兰起义军已经把村庄烧成了平地。紧随在袭击后，苏联当局提供了一组特殊列车，把他们运出乌克兰，运到波兰加里西亚的雅罗斯瓦夫（Jarosław），仿佛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逃生机会。[30]

在苏联的允许下，波兰人同样将48.2万名乌克兰人“遣返回国”，绝大多数来自波兰东南部的加里西亚。[31] 扎法德卡-莫罗绍夫斯卡大屠杀

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典型地显示了其实施过程的血腥与残忍。又一次，波兰政府的正式行动伴随着民族主义团体和地下组织“波兰本土军”（Home Army）的非正式行动。他们针对无辜平民实施暴行，甚至针对那些并不认为自己是乌克兰人的平民。例如，兰克人（Łemkos）是一个生活在喀尔巴阡山脉贝斯基德（Beskidy）山区的种族群体，他们与乌克兰并无历史渊源，更加与民族主义扯不上关系，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土地。然而，他们还是成为众矢之的，并且与其他说乌克兰语的居民一起被驱逐出境。当地首领试图解释乌克兰人与兰克人的差别，但波兰人对他们的解释充耳不闻。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某些乌克兰人和兰克人转而寻求乌克兰起义军的保护以抗拒驱逐。波兰加里西亚地区的乌克兰起义军，不像乌克兰境内的乌克兰起义军那样不分青红皂白乱开杀戒，但也难免会谋杀、折磨、肢解敌人。当时一位退役的波兰士兵亨里克·扬·梅尔卡里克（Henryk Jan Mielcarek）满怀悲愤地写道，他的战友们被乌克兰起义军游击队殴打致死，战友们要么被挖眼割舌，要么被绑在大树上等死。[32] 但考虑到没有人对自己施以援手，许多乌克兰人别无选择，只能加入这种游击队，或者起码支持这种游击队。乌克兰起义军在加里西亚越来越受欢迎，结果只造成如下局面：波兰军队和波兰当局更有理由驱逐乌克兰社群。

1945～1946年，波兰人发动的“遣返回国”行动虽然同样残酷，但最终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然而，他们还遇到一个主要问题：及至1945年年底，有些已经离开波兰的乌克兰人又开始自愿回到波兰。许多人发现，尽管在波兰生活日子也不好过，但在乌克兰生活比在波兰还要难过得多。乌克兰不仅比波兰东南部要落后得多，而且在战争期间多次易手的乌克兰道路也崎岖难行。更为糟糕的是，苏联并不允许太多波兰乌克兰人定居在他们想要“回归”的地方：为了防止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乌克兰起义军的问题步步升级，超过75%的波兰乌克兰人将会被安置到苏联

其他地区。结果，1945～1946年，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返回了波兰，并告诫其他村民不要前往苏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许多乌克兰人抗拒驱逐，尽管他们面临着日益增多的暴力种族主义袭击，他们也不为所动。[33]

1946年年底，波兰当局忍无可忍，决定把所有说乌克兰语的居民彻底驱逐出境。随着遣返行动临近尾声，苏联关闭了乌克兰与波兰的边界。这并不符合波兰当局的心意，因为他们估计波兰境内还有大约7.4万名乌克兰人在逃避遣返。实际上的人数要多得多，大约20万人仍未被遣返。波兰政府请求苏联适当延长遣返期限，但没有收到答复。[34]

考虑到已经不可能再驱逐更多的乌克兰人，人们可能以为事情会到此为止。或许随着乌克兰起义军的恐怖活动逐步停止，波兰政府也会对留在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和兰克人感到放心。开始于1947年年初的波兰国内人口迁移也许会被搁置，绵延了好几个世纪的加里西亚乌克兰文化也许会得以保留。也许吧。

然而，这种想法纯粹是一厢情愿，因为波兰人与乌克兰语少数民族的紧张关系始终未见缓和，实际还在升级。1947年3月28日，爆发点终于到来，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卡罗尔·希维尔切夫斯基（Karol Świerczewski）将军被乌克兰起义军刺杀。这桩刺杀事件将会给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带来灭顶之灾，而且将会成为全面镇压行动的理由。刺杀事件发生的次日，波兰军官开始公开谈论“在波兰东南部边境彻底消灭残余的乌克兰裔居民”。[35] 波兰行政机关立即对这个地区再次发动清洗，以彻底铲除所有残余的乌克兰语居民。

这次行动被称为“维斯瓦河行动”（Operation Vistula）。行动目标不仅是清剿波兰境内的乌克兰起义军，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为了“最终解决”乌克兰人问题。[36]

强迫同化

1947年4月底维斯瓦河行动开始，一直持续到夏末。行动目的不仅是“清剿乌克兰起义军”，而且是配合国家遣返部门，执行“疏散行动，将所有具备乌克兰民族属性的居民，从东南部迁移到西北部，尽可能分散安置”。有些历史学家声称，行动目的仅仅是去除乌克兰起义军的社会基础，但这些历史学家都忽略了如下事实：国家安全部门明确声明，在国内进行种族清洗是一项公开的、专门的任务。[37]

行动目的是在国内根除所有残余的乌克兰语居民，直至最后一个男人、女人、孩子，甚至波兰-乌克兰混血家庭也未能幸免。这些人只有几个小时收拾行李，然后就被带到转运中心进行登记。从这里出发，他们会被转运到波兰西北部的各处居民点，那里曾经是德国领土，但此时已成为波兰领土。理论上，家庭成员会被整体迁移，实际上，所有人在登记时会被分配到一个号码。就这样，分开登记的家庭成员，经常会被送到相隔遥远的市镇和乡村，除非他们能够说服（或者贿赂）政府官员，让他们一家团聚。理论上，家庭成员允许带走衣物和财物，甚至带走一定数量的牲畜，以便维持他们在新家的生活。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收拾细软，经常被迫把贵重物品遗弃家中，最终落入波兰裔邻居的手中。许多人还抱怨，在迁徙之路上受到不守纪律的兵痞和当地人组成的盗匪的抢劫。

这种把整个村庄包围起来，进而把全体村民赶走的做法，在欧洲大陆已是见惯不怪，战争让这种做法变成惯例。及至1947年，驱逐乌克兰人的特别行动已经进行了超过两年。实际上，迁徙的规模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与我在下一章提到的、在欧洲大陆范围内驱逐德裔的行动相比，驱逐乌克兰人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驱逐乌克兰人的行动与所有其他行动的区别在于其目的：波兰当局不仅要驱逐这个种族，而且还要强迫这个种族完全放弃独立的民族属性。乌克兰人被迫改变说话方式、衣着方式、礼拜方式、教育方式。波兰当局不再允许他们成为乌克兰人或者兰

克人，“因为他们要我们都变成波兰人”。[38]

最近对说乌克兰语的波兰人所做的采访，清楚揭示了整个过程有多么痛苦。安娜·克利马斯（Anna Klimasz）和罗扎利娅·奈杜克（Rozalia Najduch）是兰克人，她们被赶出了加里西亚的贝德纳卡（Bednarka）村，最痛苦的莫过于驱逐本身，尤其是波兰裔邻居的行为。当地的波兰人并没有支持或者帮助他们，似乎只想赶走他们，甚至早在他们离开之前，波兰人就已迫不及待地抢夺他们的房屋和财产。拒绝盗贼入屋的村民遭到殴打，有些村民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盗贼洗劫自己的房屋。有盗贼甚至从村民已经打好包的行李车里拿东西，边拿边说：“这个就别带了，那个也别带了，反正你都用不着了……”[39]

对于其他人来说，最为压抑的时刻，莫过于被赶出村庄以后在破旧的转运营地里漫无目的地等待的那段日子。这段日子可以持续好几天，甚至可以持续好几个星期。奥尔加·兹达诺维奇（Olga Zdanowicz）是来自加里西亚格拉兹奥瓦（Grąziowa）的乌克兰人，她被迫在特里茨阿涅克（Trzcianiec）的露天营地里睡了三个星期。[40] 来自贝德纳卡的村民被迫在扎戈尔扎尼（Zagórzany）营地待了两个星期，而且同样是风餐露宿，除了随身携带的食品，他们几乎没有东西可吃。罗扎利娅·奈杜克只能偷取当地农民的饲料喂养自己的牲畜。安娜·谢夫奇克（Anna Szewczyk）和米科瓦伊·索卡茨（Mikołaj Sokacz）还记得，他们只能睡在牲畜栏旁边的行李车下面，以此遮风挡雨。[41] 在此期间，所有流放者还都要受到波兰官员的盘问，这意味着由于他们的民族属性，他们都洗脱不了乌克兰起义军恐怖分子的嫌疑。

正是在转运营地，那些最有可能卷入游击队活动的嫌疑人会被逮捕。对于这些人来说，压抑的迁徙变成了可怕的噩梦。他们会被送到监狱和拘留营，最为臭名昭著的是亚沃日诺（Jaworzno），它曾经是纳粹设立的拘留营，此时已被波兰当局接管。在这里，他们会被殴打、被抢

劫，还要忍受饥饿、疾病、虐待。其中一名营地指挥官，就是恶名远扬的所罗门·莫雷尔，在调任此处之前，他曾经在兹哥达主管一处关押德国人的营地（见第十二章）。一如在兹哥达，看守虐待成性，犯人饱受折磨，看守把犯人吊在管子上，用针扎犯人，用各种液体灌进犯人的口鼻，用铁棍、电线、枪托以及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刑具殴打犯人。在亚沃日诺的乌克兰人附属营地，有161名犯人直接死于营养不良，有5名犯人死于斑疹伤寒，还有2名妇女自杀。[42]

与此同时，大多数乌克兰人准备踏上迁徙之路。朋友和熟人被分开，并且和他们的牲畜一起被装上火车，平均每四个家庭及其牲畜被装进一个车厢，然后前往昔日的德国省份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这些地方都在波兰的另一边。尽管这趟旅程不像前往亚沃日诺那样充满磨难，但也要经历短暂的恐慌时刻，因为火车在奥斯威辛穿行好几公里。旅程可以长达两周，在此期间，流放者早已变得蓬头垢面、满身污秽，而且饱受虱子叮咬。[43]

在经历过旅途中所有不确定和不舒适后，到达新的未知土地的时刻总算是令人略感宽慰。之后的流程大抵如此：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目的地，而且在到达目的地后，要向当地的国家遣返部门报告。他们会分配到一处房产，有时房产分配由抽签决定。由于这些房子是被以前的德国主人遗弃的，因此里面应该家具齐全，也就是说，乌克兰人和兰克人那些旧家当都可以丢弃，毕竟新家里面有新家具。然而，实际上，任何有用的、值钱的东西早已被洗劫一空，或者早已被腐败的官员据为己有。及至1947年，所有最好的房子都已经被迁居此地的波兰人占有，只剩下那些废弃的房屋、空荡的公寓以及土壤贫瘠的破败农场。到达此地的家庭，通常会离开他们被指派到的地方，然后在乡间游荡，寻找更好的土地。[44]

欢迎仪式也说不上热情洋溢。由于迁移这些人的目的就在于拆散他

们的社区，因此，来自同一个村庄的家庭不会被分配在同一个片区。实际上，通常只有小家庭才允许生活在一起，大家庭则会像整个社区一样被拆散。因此，在绝大多数个案中，这些家庭都被完全孤立，没有任何土生土长的社区成员支持他们。更为糟糕的是，他们通常会发现，周围的人们对他们充满敌意而且极为鄙夷。许多波兰人刚刚从沃利尼亚以及苏联乌克兰其他地区迁居此地，他们好不容易才在家乡的野蛮内战中死里逃生，因此，这些波兰人最不愿意与乌克兰人成为邻居。有些在维斯瓦河行动中被驱逐的乌克兰人提到，自己在重新定居的城镇里被波兰人殴打，有些人干脆避之则吉，几乎所有人都很难找到工作、很难交到朋友。

针对乌克兰人的偏见无处不在。米科瓦伊·索卡茨还记得自己被民兵逮捕和殴打，民兵一口咬定他是乌克兰起义军的成员。他别无选择，只能坦然接受，正如他所说的："兰克人就只有挨打的份儿。"那些被送到亚沃日诺的人还记得，当地人向他们扔石头、吐口水，因为他们被认定为希维尔切夫斯基将军遇刺的罪人。[45] 特奥多尔·谢夫奇克（Teodor Szewczyk）无意中听到正在雇用他的波兰小农场主说道："我才不会给狗娘养的乌克兰人付工钱！他们有口饭吃就够了。"[46]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乌克兰人和兰克人可谓同病相怜，但他们彼此帮助甚至简单交往的机会都少得可怜。官方对乌克兰起义军充满戒心，干脆出台规定，禁止超过一定数量的说乌克兰语的人相互聚集。任何人对别人说乌克兰语，一旦被发现，都会自动成为阴谋活动的嫌疑人。东正教堂和联合教堂都被查封，乌克兰人只能在说波兰语的天主教堂里做礼拜，要么就不要做礼拜。

由于维斯瓦河行动的要点在于把乌克兰人吸纳进波兰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孩子特别受到当局的关注。所有孩子被迫在学校里说波兰语，

乌克兰文学被禁止。男孩也好，女孩也罢，如果被发现说乌克兰语，轻则受到斥责，重则受到惩罚。他们经常被迫接受天主教培训，而且每个孩子都要接受斯大林主义教条的例行教育。任何与波兰官方不一致的身份认同，都在禁止之列。[47]

然而，尽管如此，同化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他们的同学会让他们无法忘记自己不是波兰人。同学们取笑他们的口音，捉弄他们，甚至有时欺负他们。“乌克兰”孩子不会被邀请到波兰孩子家中做客。他们与同学不同，他们被其他孩子孤立，这让他们的处境非常类似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德国”孩子。目前还没有关于这些孩子的生活状况的比较研究，但在挪威有类似的研究，有理由假定，这些孩子在日后的生活中会更加焦虑、更加压抑、更加沮丧。他们甚至比挪威的德国孩子更加悲惨，时至今日，许多乌克兰人再次公开表示自己是波兰社会中一个格格不入的群体，如果我们回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可能想象不到今天会是这样的结果。

这种共同的经历，让所有这些人，数百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迫背井离乡的人，渴望回到“家乡”。[48] 然而，这是被严令禁止的。那些设法回到加里西亚村庄的人，要面对愤怒的民兵，要面临暴力和监禁的威胁。对于其他人来说，回家也毫无意义。那里已经没有他们成长的社区，那些村庄已经不是他们记忆中的理想家园。多年以后，奥尔加·兹达诺维奇曾经设法探访格拉兹奥瓦，但她在那里一无所获：“村庄已经被烧掉了，那里什么都没有了。”[49]

1947年发生在波兰的种族清洗，不能被视为孤立的事件。这是多年内战的结果，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西部开始，种族暴力持续了超过七年。种族清洗的祸根，从纳粹屠杀波兰犹太人开始便已种下，尤其植根于发生在沃利尼亚的大屠杀，还植根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通敌期间的暴行。战争结束后，波兰驱逐少数民族的做法得到苏联的明确支持，但在

此之后，迁徙和同化乌克兰人和兰克人，其实是波兰人的自发行为。维斯瓦河行动，其实是种族战争的最后一步，这场种族战争由希特勒发动，由斯大林继承，由波兰当局完成。

及至1947年年底，波兰境内已经几乎没有少数民族。讽刺的是，这种局面最早是由乌克兰人造成的，与其邻国相比，波兰的种族成分要单一得多。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信奉的“乌克兰人的乌克兰”从未变成事实，尤其是在乌克兰东部，即使是在西乌克兰忙于与波兰交换人口的时候，乌克兰境内还是有大量波兰和犹太少数民族。相比之下，及至20世纪40年代末，“波兰人的波兰”已经从理想变成事实。

短短数年间，数百年来的文化多元性就被摧毁，这个过程大致分为五步。第一步，纳粹屠杀犹太人，这是纳粹在波兰反犹主义的协助下完成的。第二步，波兰折磨回国的犹太人，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说的，这种做法导致犹太人全部逃离波兰甚至欧洲。第三步和第四步，在1944年至1946年间，驱逐乌克兰人和兰克人，在1947年维斯瓦河行动期间，同化乌克兰人和兰克人。

波兰种族拼图的最后一块，即我尚未触及的那一块，是驱逐德裔。这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类似行动，共同构成了下一章的主题。

---

[1] Anonymous witness，引自Dushnyck，Walter，*Death and Devastation on the Curzon Line*：*The Story of the Deportations from Ukraine* （New York：Committee Against Mass Expulsion/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1948），pp.15-16。另可参阅Misiło，Eugeniusz（ed.），*Repatriacja czy deportacja*？：*Przesiedlenie Ukraińców z Polski do USSR 1944-1946* （Warsaw：Archiwum Ukraińskie，1996-9），vol.II，pp.24，31，39，43；以及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94。

[2] Anonymous witness，引自Dushnyck，Walter，*Death and Devastation on the Curzon Line*：*The Story of the Deportations from Ukraine* （New York：

Committee Against Mass Expulsion/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1948），pp.16-17。

[3] Testimony of 2nd Lieutenant Bronisław Kuzma，引自Dushnyck，Walter，*Death and Devastation on the Curzon Line*：*The Story of the Deportations from Ukraine*（New York：Committee Against Mass Expulsion/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1948），p.21。

[4] 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94.列出了70个名字，但其中有些人伤势痊愈，参阅pp.18，19，31-2。

[5] 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82-7.

[6] 如可参阅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esp.pp.177，200。Gross对战后反犹主义有相同观点，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New York：Random House，2006），pp.260-61。

[7] 关于斯捷潘·班杰拉（OUN-B）的追随者与安德烈·梅尼克（OUN-M）的追随者之间的复杂分歧，参阅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64-8；Yekelchyk，Serhy，*Ukraine*：*Birth of a Modern 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27-8，141-4。

[8] 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58-62.

[9] Testimony of Jan Szkolniaki，AWK II/2091.

[10] Testimony of Mirosław Ilnicki，AWK II/3327.

[11] Piotrowski，Tadeusz，*Vengeance of the Swallows*（Jefferson，NC：Macfarland，1995），p.89.

[12] Testimony of Mieczysława Woskresińska，AWK II/2215/p.

[13] 如可参阅testimonies in AWK：II/36，II/594，II/737，II/953，II/1144，II/1146，II/2099，II/2110，II/2353，II/2352，II/2451，II/2650，II/2667。关于德国、苏联以及波兰的报告，参阅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69-70 and related endnotes。

[14] Kliachkivs’kyi and Stel’mashchuk，引自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86。

[15] 如可参阅the massacres of Ukrainians in Piskorowice，Pawłokoma and Wierzchowiny by Polish militias：Misiło，Eugeniusz（ed.），*Akcja ‘Wisła’*（Warsaw：Archiwum Ukraińskie，1993），p.13；Piotrowski，Tadeusz，*Vengeance of the Swallows*（Jefferson，NC：Macfarland，1995），p.93；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87。

[16] Lotnik，Waldemar，*Nine Lives*（London：Serif，1999），pp.65-6.

[17] Testimony of Bronisław Kuzma，引自Dushnyck，Walter，*Death and Devastation on the Curzon Line*：*The Story of the Deportations from Ukraine*（New York：Committee Against Mass Expulsion/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1948），p.21。

[18] 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94.

[19]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87-8；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205.另可参阅Siemaszko，Władisław and Ewa Siemaszko，*Ludobójstwo dokonane przez nacjonalistów ukraińskich na ludności polskiej Wołynia 1939-1945*，2 vols.（Warsaw：Wydawn. von borowiecky，2000），vol.II，pp.1038，1056-7；以及Siemaszko，Ewa，‘Bilans Zbrodni’，*Biuletyn Instytutu Pamięci Narodowej*，nos. 7-8（July-August 2010），p.94。关于其他更为夸张的统计数字的破绽，参阅Piotrowski，Tadeusz，*Vengeance of the Swallows*（Jefferson，NC：Macfarland，1995），pp.90-91。

[20] 如可参阅Siemaszko and Siemaszko，esp.Professor Ryszard Szawłowski’s introduction，pp.14-20，1095-1102。另可参阅Tsaruk’s questioning of their

figures，Tsaruk，Iaroslav，*Trahediia volyns’kykh sil*，*1943-1944 rr*．（Lviv：I. Krypiakevych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2003），pp.15-26。

[21] Rees，Laurence，*World War Two behind Closed Doors*（London：BBC Books，2008），pp.222，236.

[22] Lane，Arthur Bliss，*I Saw Poland Betrayed*：*An American Ambassador Repor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 and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48），p.66.

[23] Rees，Laurence，*World War Two behind Closed Doors*（London：BBC Books，2008），p.236；and Lane，Arthur Bliss，*I Saw Poland Betrayed*：*An American Ambassador Repor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 and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48），pp.55-88.

[24] Lane，Arthur Bliss，*I Saw Poland Betrayed*：*An American Ambassador Repor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 and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48），pp.84-8.

[25] House of Commons debate，1 March 1945，Hansard，Series 5，vol.408，col.1625.

[26] Conquest，Robert，*A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from Nicholas* Ⅱ *to Putin*（London：Penguin，2003），pp.133-4.

[27] 参阅Uehling，Greta Lynn，*Beyond Memory*：*The Crimean Tatars’Deportation and Return*（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esp.pp.79-107。

[28] 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82-7.

[29]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82.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87.Yekelchyk，Serhy，*Ukraine*：*Birth of a Modern 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47，提供了810415人被逐出乌克兰的更高数字。

[30] Testimony of Maria Józefowska，AWK II/1999.

[31]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82；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94；Yekelchyk，Serhy，*Ukraine*：*Birth of a Modern N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47.

[32] Testimony of Henryk Jan Mielcarek，AWK II/3332.

[33]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82.如同样可参阅the eyewitness testimony of Anna Klimasz and Rozalia Najduch，AWK I/344。

[34] 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96；Miroszewski，Kazimierz，*Centralny obóz pracy Jaworzno*：*Podobóz Ukraiński*（*1947-1949*）（Katowice：Śląsk，2001），p.11.

[35] Wacław Kossowski，引自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196。

[36] Misiło，*Akcja "Wisła"*，doc.42：Radkierwicz and Żymierski memo dated 16 April 1947，outlining "Special action'East'"，p.93.

[37] Misiło，*Akcja "Wisła"*，doc.44，pp.98-9：Office of State Security document dated 17 April 1947.Ryszard Szawłowski否认在维斯瓦河行动中存在任何形式的种族清洗，参阅his introduction to Siemaszko，Władisław and Ewa Siemaszko，*Ludobójstwo dokonane przez nacjonalistów ukraińskich na ludności polskiej Wołynia 1939-1945*，2 vols.（Warsaw：Wydawn. von borowiecky，2000），pp.15，1096。

[38] Rozalia Najduch，interview，1990，AWK I/344.

[39] Anna Klimasz and Rozalia Najduch interview，1990，AWK I/344.

[40] Olga Zdanowicz，manuscript，AWK II/2280/p.

[41] Anna Szewczyk，Teodor Szewczyk and Mikołaj Sokacz interview，1990，AWK I/790.

[42] Miroszewski，Kazimierz，*Centralny obóz pracy Jaworzno*：*Podobóz*

Ukraiński（*1947-1949*）（Katowice：Śląsk，2001），pp.19-22.

[43] Olga Zdanowicz，manuscript，AWK II/2280/p.那些被送往亚沃日诺的人也在奥斯威辛被拦截下来，参阅Miroszewski，Kazimierz，*Centralny obóz pracy Jaworzno*：*Podobóz Ukraiński*（*1947-1949*）（Katowice：Śląsk，2001），p.16。

[44] 参阅the testimony of former repatriation official Leon Dębowski，AWK II/457。

[45] Miroszewski，Kazimierz，*Centralny obóz pracy Jaworzno*：*Podobóz Ukraiński*（*1947-1949*）（Katowice：Śląsk，2001），p.17.

[46] Anna Szewczyk，Teodor Szewczyk and Mikołaj Sokacz interview，AWK I/790.

[47] According to Anna Klimasz，AWK I/344.另可参阅Karolina Hrycaj，typescript，AWK II/3404。

[48] 关于“家园”如何成为难民近乎神圣的理想化概念的杰出分析，参阅Uehling，Greta Lynn，*Beyond Memory*：*The Crimean Tatars’Deportation and Return*（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esp.ch.7。

[49] Olga Zdanowicz，manuscript，AWK II/2280/p.

第十九章 驱逐德裔

1945年，波兰东部边界不是唯一发生变动的边界。当三巨头在德黑兰会晤的时候，他们也谈到波兰西部边界。丘吉尔和罗斯福希望以德国部分领土和东普鲁士，补偿波兰人向斯大林交割的领土。在会议首日的深夜会谈中，丘吉尔解释了这个计划，他说道：“波兰可以向西移动，就像士兵‘向左’走两步。即使波兰踩了德国的脚趾头，那也无关紧要……”为了说明自己的意思，丘吉尔拿出三根火柴棍，平放在桌面上，并且向西推移。换言之，斯大林从波兰东部取得的领土，国际社会将会从波兰西部对波兰给予补偿。[1]

斯大林对这个想法感到高兴，不仅因为它让斯大林获取波兰东部边境的行动合法化，而且因为它把莫斯科与西方盟国的边界线向西推移了。实际上，只有德国丧失了领土，这看来才是一个合适的惩罚。

又一次，没有按照《大西洋宪章》的承诺去咨询“相关民众的自由意志”。战争期间，自然不可能咨询德国东部民众的意见，但没有一个大国的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在战争结束后咨询民众的意见。英国外交秘书在国会为这些计划辩护道：“《大西洋宪章》某些条款是为胜利者制定的……我们不认为德国也有权利……要求宪章适用于德国。”[2] 因此，1945年年初，三巨头在雅尔塔继续讨论波德边界，并且在次年夏天的波茨坦会议上得出最终结论。

作为这几次讨论的结果，奥德河与尼斯河以东的土地将会成为波兰领土，包括以前的德国省份波美拉尼亚、东勃兰登堡、上下西里西亚、东普鲁士大部分地区（另外部分地区割让给俄国人），以及但泽港。数百年来，这些地区都被视为德国领土，绝大多数居民都是纯粹的德国后裔，按照官方数字，当地居民超过1100万人。[3]

这个结果对于上述民众可谓至关重要。考虑到德裔少数民族在其他国家境内的历史，考虑到这些少数民族曾经被希特勒利用来挑起战争，实在难以想象这1100万德意志人还会被允许继续生活在新波兰的边界之内。诚如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所指出的："用德国饲料填满这只波兰鹅，恐怕它会消化不良。"[4] 谈判各方都心知肚明，这些德意志人肯定会被赶走。

当在雅尔塔会议上谈到将如此众多的民众赶出祖居之地是否可行、是否人道时，斯大林无动于衷地说道，当地绝大多数德意志人，"早已因为躲避苏联红军而逃之夭夭"。总体而言，斯大林是对的，因为害怕苏联的报复，当地大批居民早已逃离。但及至战争结束时，当地还有大约440万德意志人，而且在战争结束初期还有125万人返回，绝大多数人回到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总体而言，他们都能够重操旧业。按照苏联的计划，所有这些人要么被征集为强迫劳工，以支付德国的战争赔款，要么被逐出此地。[5]

严格来说，在边界最终确定之前，苏联和波兰都尚未开始将德意志人逐出上述地区。甚至在1945年夏季的波茨坦会议上，边界问题也尚未达成一致。人们曾经期待，最终边界将会在所有盟国共同签署的对德和约中划定。但由于在冷战期间，苏联与西方的关系最终破裂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分裂，这份和平条约只有留待45年后才能真正被签署。与此同时，波兰和苏联无视国际舆论，开始着手执行驱逐计划。当美国大使亚瑟·布利斯·莱恩（Arthur Bliss Lane）于1945年初秋访问弗罗茨瓦夫（Wroclaw）时，驱逐计划已经昭然若揭。直到几个月前，弗罗茨瓦夫还被称为德国城市布雷斯劳（Breslau），现在这座城市已经开始波兰化：

> 德国人每天都被送回德国领土。显而易见的是，波兰人并不认为自己只是暂时占领弗罗茨瓦夫，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占领将会得到和平会议的批准。所有德语标志牌都被移除，代之以波兰语。来自波兰各

地的波兰人陆续被迁到弗罗茨瓦夫，以取代被遣送回国的德国人。[6]

实际上，到此为止，当地的驱逐行动已经持续了数月之久。几乎从战争结束时起，波兰人就已经开始将德意志人赶出家门，并且自行征收德意志人的财产。不仅苏联红军会强奸和抢劫掉队的德国妇女，而且波兰人也会这样干。在什切青（斯德丁）、格但斯克（但泽）以及弗罗茨瓦夫这样的城市，德意志人被赶进隔离区，这样波兰人就能有条不紊地接管德意志人的财产，但这样也是为了保护德意志人。[7] 在波兰的许多地区，德意志人被集中送到营地，要么作为奴工，要么等待正式遣返。然而，某些波兰人可没有等待官方许可的耐性，他们开始把一个个德意志社区赶过边境。按照波兰的官方记录，仅仅在1945年6月的最后两个星期，就有274206名德意志人，在没有经过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赶过奥德河，被赶回德国。[8]

这种驱逐行动绝非只在波兰发生。1945年春夏两季，捷克人正忙于把数十万苏台德德意志人以狂暴的方式赶过边界。这种“闪电”驱逐的突然性说明驱逐行动顺乎民意，在捷克斯洛伐克更是如此：人们并未在中央政府的组织下采取行动，而是在地方情绪的触发下自行其是。[9] 波兰人和捷克人之所以如此急于下手，是因为他们渴望赶在外部势力插手干预之前，把德裔少数民族全部赶走。

正因如此，三巨头感觉到有必要就迁移德意志人的方式发表正式声明。1945年7月至8月，在波茨坦，三巨头要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暂停所有驱逐行动，直至类似行动能够以“遵守秩序、符合人道的方式”进行为止。问题不仅在于这些人被赶走的方式太不人道，而且在于派驻德国境内的同盟国行政当局无力应对大批涌入的难民。他们需要时间来建立制度，以便接纳新来者，让他们平均分布到德国各地。

尽管这份声明的确延缓了迁移德意志人的进度，但它明显无法让驱逐行动暂停下来。波兰人尤其拒绝停止从西里西亚和什切青驱逐德意志

人。[10] 而且，由于这份声明承认驱逐行动终将“不可避免”，波茨坦声明等于为所有卷入驱逐行动的国家提供了正式许可，即使不是马上驱逐，起码也是即将驱逐。结果，随着时间推移，欧洲各国驱逐德意志人的行动将不会仅仅局限于自发的、临时的状态。那时，驱逐行动可能会演变为官方的、永久的、全面的，将德意志男子、女子、孩子逐出欧洲每个角落的行动。正因如此，安妮·奥黑尔·麦克米克（Anne O’Hare McCormick）在《纽约时报》上把驱逐行动称为“以捍卫人权为己任的政府所做的最不人道的决定”。[11]

驱逐行动的人道真相

1945年7月1日，星期天，大约在傍晚五点半过后，波兰军队来到波美拉尼亚的马库施韦德（Machuswerder）村，告诉村民，他们有30分钟的时间收拾行李，然后离开。几乎所有村民都是德意志人，由于绝大多数男人在战场上杳无音讯，村民主要是妇女、儿童、老人。在慌乱和惊恐之中，村民开始收拾贵重物品、家庭照片、衣服、鞋子，以及所有能够塞进包袱和推车的杂物。他们在房屋外集合，沿着村道站成队列。然后，在波兰人的监视之下，他们开始徒步走向60公里外的新波德边界。

在他们当中有一位名叫安娜·金托普夫（Anna Kientopf）的农妇，她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后来，在为德国政府进行陈述的一份宣誓证言中，她描述了自己以及其他村民经受的磨难。[12] 她说道，旅程持续6天，到处可见战争遗留的碎石瓦砾，以及其他难民扔在边界上的推车。在兰茨贝格（Landsberg）城外，他们第一次看见死尸，那是一名妇女，她的脸已经变绿，她的躯体腐烂发胀。然后，看见尸体就是家常便饭了。当他们穿越森林的时候，他们看见动物和人类的死尸，他们的头颅和双脚从浅浅的坟坑中伸出来。他们当中陆续有人因为筋疲力尽而倒下。还有人，包括安娜的女儿安内洛蕾（Annelore）因为喝了路上水沟、水洼里的脏水而生病，还有人因为饥饿而倒下：

> 在这一路上，绝大多数人，只能靠在田地里捡拾谷穗，或者靠摘取路边未成熟的果实来维持生命。结果许多人都得了病。不满周岁的孩子几乎都死了。没有牛奶，甚至连妈妈熬的面汤都没有，这段旅程对那些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长了。天气也变幻无常，开始时烈日当空，后来却下起了刺骨的冰雨，这都足以致命。每天我们都往前走一点，有时候走了9公里，有一天也许只走了3公里，然后又走了20公里，甚至更多……我经常看见有人躺在路边，面色发青，大口喘气，还有人因为筋疲力尽而倒下，然后再也没有起来。

他们晚上就在被炸坏的房屋或者谷仓里过夜，但由于屋里很脏，安娜宁愿在室外过夜。在远离人群的地方睡觉也让她免于被波兰人劫掠，某些波兰人会趁着夜色跑来抢劫难民。她经常在夜里听到枪声，那些想要保住财产的人就这样被袭击者收拾了。

这种朝不保夕的危险状况终于避无可避，一天，安娜及其同伴被一群武装人员拦了下来，

> ……恐怖的一幕就在我们面前上演，让我们深受震撼。四名波兰士兵企图将一名女孩从她父母手上分开，她的父母绝望地拉着她。波兰士兵用枪托击打她的父母，尤其是女孩的父亲。父亲步履蹒跚，波兰士兵将他推到路边。父亲踉跄跌倒，一名波兰士兵拔出自动手枪，向女孩的父亲连开几枪。一时之间，周围一片死寂，然后，两个女人的尖叫划破天空。她们冲向已死的男人身旁，而那四个波兰人则扬长而去，消失在森林当中。

安娜·金托普夫不确定那四名男子是否企图强奸那名女孩，也许他们只是想把她征用为强迫劳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就不会被强奸，实际上成百上千的妇女早已遭此厄运。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许多妇女向德国的被驱逐者、难民及战争受害者部门讲述了自己在类似环境下遭到性侵犯的经历，许多人甚至反复受到侵犯。她们实际上是在行程到达边界时被绑架，然后就被遣送到农场或者当地工厂去干活，不过，一旦她们与家人分开，她们就很容易成为看管她们的士兵或者工头的攻击目标。

当安娜·金托普夫抵达塔姆塞尔（Tamsel）的时候，她也很可能被征集为强迫劳工，尽管她当时对此一无所知：

> 我们穿过一条站满波兰士兵的小巷，人们被拉出队列。这些被迫出列的人将要带着行李去路边的农场里干活。人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人们拒绝服从。被迫出列的通常只是个别人，尤其是女孩。母亲拉着女孩的手痛哭流涕。士兵企图强行分开她们，但并不成功，士兵就开始用枪托和马鞭殴打这些可怜人。人们在离得很远的地方，就能听见被鞭打者的尖叫。我永远忘不了这种尖叫。
>
> 手持马鞭的波兰士兵也走到我们跟前。他们满脸通红，命令我们走出队列，走向农场。埃尔泽·米塔格（Else Mittag）和希尔德·米塔格（Hilde Mittag）开始哭泣。我说："来吧，反抗也没用。他们会打死我们。我们事后再逃跑。"俄国人就在那里冷眼旁观。在绝望中，我向俄国人求助。他们只是耸耸肩，对我们说，在这里波兰人说了算。就在彻底绝望的时候，我看见一名波兰高级军官。我指着我的三个孩子问道，我带着三个孩子，我还能干什么。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在绝望中所说的话，但对方只是说："给我滚回路上去。"我们赶紧拿起行李，灰溜溜地走开……

7月6日，安娜和孩子们最终抵达库斯特林（Küstrin，现在被称为科斯琴）。他们试图穿越奥德河，但边界守卫拒绝让他们上桥，并且把他们送回农场。在绝望中，他们掉头南下，向着法兰克福（Frankfurt-an-der-Oder）前进。当天晚上雷雨交加。他们在河边过夜，无处栖身，没吃没喝，而且他们也无法确定，在经历了漫长旅途后，他们是否被允许返回德国。

最后，安娜·金托普夫相当幸运。尽管再次被抢劫，但桥上的俄国边界守卫最终让他们过桥，她相当迅速地穿越了边界，并且还算毫发无伤。许多被赶出村庄的人实际上都无法穿越边界：由于害怕德国苏占区人口太过密集，俄国守卫已经接到指示，不要再让更多难民过河。一位亲历者说道，1945年6月25日，他被波兰守卫押向边界，但那些波兰守卫随即被苏联军队解除武装，苏联士兵让难民回到自己的村庄。接下来那个星期，他不得不原路返回。数以千计的德国平民往返于边境地

区，“像牲口一样被赶来赶去”，因为没有人愿意或者能够为他们提供庇护。[13]

绝大多数亲历者都强调他们在旅途中遇到的彻底无法无天的状况：“每天都有德国人向我哭诉，波兰人抢走了他们所有的财物”；“波兰人就像汪达尔人……到处奸淫掳掠”；“波兰人抢走我们所有值钱的东西，诅咒我们，唾骂我们，鞭笞我们，毒打我们”；“我们被暴民反复骚扰和抢掠”。[14] 这种犯罪行为与官方没收德意志人所有财物的政策密切相关。按照波兰政府出台的规定，德意志人带出境外的现金不得超过500马克，其他货币不得出境。[15] 战争期间支持波兰或者反对纳粹的那些人也没有任何特权。反法西斯战士和德国犹太人都与其他德国人同等待遇，因为他们都被界定为“德国人”，且不论其战斗事迹或者政治面貌。[16]

最初的驱逐行动是自发的、无组织的，经常只是为了清空农村以方便抢掠。社区居民被迫徒步走向边界，因为没有其他交通方式。直至1945年年底1946年年初，政府组织才正式介入，最终安排转运列车。

平心而论，波兰当局不仅意识到这种状况，而且确实考虑到这种状况，起码在某些地区的确如此。为了让迁移行动更加“遵守秩序、符合人道”，1946年年初，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规定。例如，规定无人陪伴的孩子、老人、病人只能在夏天遣送，而且要由加挂医疗车厢的列车遣送；即将临盆的妇女不得遣送，必须在安全分娩后才能遣送；会说德语的医护人员必须跟车，充足的食物和饮水必须到位；作为基本的（不甚充分的）保障措施，每列火车将会由10名波兰守卫提供保护。[17]

随着波兰当局与英国军队进一步达成协议，一项考虑周全的时间表被制定出来，其再次规定，只有能够承受艰苦旅程的健康人士才能被遣返。[18] 这个时间表是迫于数十篇国际媒体报道的压力而制定出来的，就在此前的夏天，据国际媒体揭露，东普鲁士的许多孤儿院和医院，在

缺乏足够医疗设备的情况下，就被强行清空，人员直接被送上火车。[19] 然而，尽管公开虐待行为有所收敛，但还是无法确保新规定得到充分执行。渴望离开波兰的德意志人，想方设法隐瞒患病、体弱、怀孕等情况，以求尽快被遣送。与此同时，某些负责遣送事务的波兰官员也同意让他们离开。不仅这些官员感到不胜其烦、不堪其扰，而且波兰当局也宁愿留住青壮年，让他们在波兰工作：老人和病人是最早被遣返的，因为他们百无一用。结果，国家遣返委员会经常抱怨，地方官员根本不遵守遣返规定。[20]

在德国人看来，列车上的状况简直糟糕至极。一位亲眼见证难民到达边境的德国牧师如此描述其所见所闻：

> 人群中包括男人、女人、小孩，他们都被密集地塞进车厢里，这些用来运送牲口的车厢都从外面上锁。连日来，人们就被这样运送，在格尔利茨（Görlitz）车厢才第一次被打开。我亲眼看见，在一节车厢里就有10具尸体被拖出来，扔进简易棺材。我还留意到，有好几个人已经精神错乱……人们满身粪便，这让我相信，他们被紧紧地挤在一起，以至于他们根本不可能空出一个地方来解手。[21]

难民被告知可以随身携带四天的食物，但有时候，他们的列车会被迫停靠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以等待进入德国苏占区的放行许可。有一位来自尼斯（Neisse）的难民，在1946年年初的寒冬腊月被遣送回国，他所乘搭的列车在边境停靠了三个星期之久。在他随身携带的食物吃完以后，他只好用身上的财物到当地村民那里换点吃的。每天都有波兰民兵闯入车厢，从他的旅伴身上抢走值钱的东西。有时候，只有他们的现金和腕表被抢走；有时候，他们的鞋子和靴子也被抢走，甚至连他们刚刚弄到的食物也被抢走。

> 但与我们忍受的饥饿和寒冷相比，这些波兰人的袭击其实不算什么了。整整三个星期，我们就住在车厢里，寒风、冷雨、冰雪直吹我们的面颊。可怕的漫漫长夜似乎永无尽头。我们几乎连站立的地方都不够，更加不要说坐下或者躺下了……每天早上，波兰守卫都会打开车厢门，那些没熬过昨天晚上的死人就会被抬出来。死人的数量每天

都在急剧增加。有时候每天得死十个人。[22]

由于恶劣的天气，也由于边界那边缺乏接济难民的设施，苏联开始极力阻止搭载德意志人的火车进入德国，但波兰人渴望保持“遣返”进度，以继续驱逐德意志人。另一位难民告诉我们，他所在的群体如何设法在边界附近跳下列车然后徒步走完通向德国苏占区的旅途。在路上，他们的行李和鞋子都被偷走了。“当我们下午三点抵达福斯特（Forst）的时候……俄国人拒绝让我们入城，而且还想把我们往回赶。直到晚上八点，他们才最终允许我们入城避风。”[23]

如果考虑到波德边境的德国苏占区已经挤满难民，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何苏联冷酷地拒绝德意志难民入境并且拒绝为难民提供住宿了。一名西里西亚工厂主，曾经于1945年夏天往返于尼斯河两岸，试图挽回自己的财产，他发现格尔利茨城外的电线杆上贴满了关于当地实行封锁的告示。当地政府禁止难民进入，以防止经济衰退失控。告示上写着：“格尔利茨正在发生饥荒。当地所有解决难民问题的努力都已失败。所有回家的人，以及所有滞留此地的难民，请前往粮食问题不甚严重的地区。如果你无视这条警告，你很可能会被饿死。”

按照他当时看见的这份告示，河流两岸的状况同样糟糕。已经穿越边界的难民希望痛苦早日结束：

> 但当他们最终抵达尼斯河的时候，他们的希望完全破灭。那里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没有人能够告诉他们应该去哪里寻找庇护，或者谁能够提供临时庇护所。他们只能听天由命，就像麻风病病人那样，被人无情地任意驱赶。[24]

有些难民设法深入德国内地，但在那里，他们同样遇到类似的绝望境地。1945年夏天，威廉·拜福德-琼斯中校看到一车来自东方的难民。“这列火车是牛车和货车混编的，所有车厢都如此拥挤，以至于人们躺在车顶、挂在车边、吊在车前。孩子们被绳子绑在通风口、集热

管、铁栏杆上。”当火车停下来的时候，人们才发觉自己不受欢迎。月台上已经挤满了先来一步的难民，而他们也都无处可去。按照拜福德-琼斯的看法，群众如此拥挤，以至于跳下火车都得花上一分钟。

> 前几天到达的人，跑回来找地方栖身，他们一言不发。很快，当新来者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或者发现自己骗了自己的时候，月台上传来梦想幻灭的哭喊。他们成群结队地站在一起，抓住或者守住自己的行李。他们蓬头垢面，他们满身污秽，浑身都是煤烟油垢。孩子看着让人心痛，他们不停地抓挠自己的身体，看上去满不在乎。老人须发蓬乱，双眼通红，仿佛吸毒成瘾，他们对周围的事物充耳不闻、熟视无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问这些人为何他们纷纷离开柏林，估计他们多半说不上来。[25]

在德国各地的火车站见到类似场景后，英美观察家开始催促各自的政府采取行动。美国派驻德国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致函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政府“在波茨坦会议上”对波兰政府和捷克政府“明确无误地表明立场”。他写道：“最近几次集体驱逐行动让全世界都感到震惊。纳粹发动的集体驱逐行动，为我们投入这场战争提供了部分道德基础，而且也壮大了我们的事业……最为不幸的是，最近的集体驱逐行动说明，我们在其他场合经常谴责这种做法，但我们自己却又参与其中。”[26]

美国国务院的确指示其外交官表达美国对波兰的不悦，但美英两国驻华沙大使都拒绝这种指示，因为他们不想被人视为“亲德派”。当时，他们已经饱受共产党的抨击，共产党给西方各国政府打上了“法西斯主义”的烙印，这种策略相当成功。尽管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但英美两国外交官都不愿意别人认为他们在为德国难民出头，因为他们尤其相信上级根本就不在乎他们的抱怨。[27]

更为有效的行动莫过于1946年年初派遣英国医疗队前往什切青监督列车调度，以防止病人和无人陪伴的孩子在出发地登上火车。年底气温下降时，西方盟军当局也设法说服捷克政府和波兰政府取消某些列车运

行。通过这种方法，他们防止了上一个冬季暴露出来的恶劣状况再次出现。1947年1月，当天气状况低于可接受的程度时，国际红十字会也成功延缓了驱逐行动。[28] 但随着时间推移，只有当边界双方通力合作时，总体状况才会真正改善。这需要建立符合标准的转运营和难民营，这需要修复铁路线和列车供暖系统，这需要波兰在更短时间内更好地运送更多人，这需要苏联、英国、美国在难民到达时更好地接收和派遣难民。

这本来是三巨头在波茨坦会议上应该考虑到的环节，这是为了让国界两面的行政当局都能够更有效率地组织起来。绝大多数悲剧就是因为人们忽略了这个环节而产生的。波兰人和捷克人都迫不及待地要赶走德裔少数民族，他们采取驱逐行动时完全不顾行动产生的后果。结果，无数德意志难民，人数肯定是成千上万，死于令人难以置信的肮脏环境中。[29]

“返回”德国

1945～1949年，被驱逐的德裔人数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根据德国政府的统计数字，绝大多数被驱逐的德意志人都来自奥德河与尼斯河东岸，即被并入新波兰的领土，人数大约是700万。大约300万人被逐出捷克斯洛伐克，还有超过180万人来自其他地区，难民总数为1173万人。[30]

德国各地都以自己的方式应付涌入的难民潮。或许最为措手不及的是苏占区，当地城镇几乎都被战火摧毁，而且当地还要交出所有贵重物资向苏联支付战争赔偿。战争结束后，大批难民涌入，绝大多数人来自新波兰，但也有人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及至1945年11月底，已经有100万人试图来这里讨生活，但他们不知所措、一贫如洗。战后四年间，至少有320万人定居在苏占区，甚至可能多达430万人。此外还有300万人，在前往德国其他地区之前，在苏占区短暂停留。[31]

英占区与驱逐难民的波兰和捷克并不接壤，有更为充裕的时间迎接难民。1945年秋冬两季，英国组织了一次接纳数百万难民的行动，行动代号为“吞咽”（Operation Swallow）。1946年2月至1947年10月间，有八趟列车往返于什切青和吕贝克之间，每趟列车都由全面覆盖的货车车厢组成，总共可以容纳2000人。还有其他列车把难民从卡瓦夫斯卡（Kaławska）接到马林塔尔（Mariental）、阿尔弗斯多夫（Alversdorf）以及弗里德兰（Friedland）；从1946年4月起，难民也可以从海路前往吕贝克。这样，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6000名“东部”德意志人被送到英占区。[32] 及至20世纪40年代末，已经有超过425万人定居于此。

再往南，美国人继续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接收德意志难民，总数超过350万人。尽管当局极力应对，但及至20世纪50年代初还是有数十万人滞留在难民营。根据美国驻西德军政长官卢修斯·克莱（Lucius D.Clay）将军的说法，难民潮让西德英美占领区的人口增长了超过23%。在东德，根据首任总统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的说法，人口增长了25%。[33] 结果德国各地（法占区除外，当地接收的难民相对较少）几乎都到了崩溃边缘。战争期间，绝大多数城市都已被盟军轰炸机炸成碎石瓦砾，而国内被毁坏的基础设施已经不敷应用。难民即使到达目的地，还是有数以千计的人陆续死去，因为他们无法找到住所、药物、食物，以让他们在前往西方的奥德赛之旅后存活下去。

对于那些没有能力找到工作，又没有能力融入德国社会的人，比如病人、老人以及带孩子的寡妇来说，在难民营里待几年就是他们所能指望的了。有时候，这些难民营的条件并不比栖身于颓垣败瓦之间更好。例如，巴伐利亚红十字会丁戈尔芬格（Dingolfing）营地提交的报告就提到，大批残疾人和肺结核患者生活在过分拥挤的空间里。他们没有像样的鞋子、衣服、寝具。在施佩尔哈莫（Sperlhammer）的另一处营

地，必须在营房的墙壁上糊上硬纸板，以遮风挡雨。[34]

然而，更糟糕的是难民经受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来自东方和苏台德区的难民，有时会被其他德国人视为外国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1950年，克莱将军写道：

> 在与德国本土分隔许多个世代以后，这些难民甚至说着与德国本土完全不同的语言。他们不再与德国本土享有共同的习惯和传统，也不把德国视为祖国。他们无法让自己相信，自己已经永远被放逐，他们的眼神、思想和希望都停留在他们曾经生活的故乡。[35]

按照一位来自匈牙利的难民的说法，他和其他难民很难适应新生活，“不仅因为他们失去了故乡和财产，而且因为他们失去了身份”。[36] 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布里尔（Hermann Brill）如此形容他所看见的难民都充满挫败感：“他们彻底失去了归属感。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来自生活经历的安全感，来自个人自由和人类价值的某种自我感觉，对他们来说都已不复存在。”[37] 1946年7月，苏联方面一份关于莱比锡政治局面的报告形容难民仍然“深感压抑”，而且“对任何莱比锡居民群体的政治活动都漠不关心”。由于无法适应新环境，他们总是梦想着穿越国界回到祖辈寄居之地。[38]

全面驱逐

然而，这些德意志人并没有返回故乡的权利。驱逐行动本来就是永久性的，因此边境控制日趋严格：德意志人被允许离开，但不被允许回去。

而且，驱逐德意志人只是更大规模的行动的第一步而已：德意志人离开后，当地人还试图抹去德意志人在当地的所有痕迹。早在德意志人被赶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前，市镇、乡村、街道都已开始改名。至于那些从来没有波兰语或者捷克语地名的乡村，人们就冠以新地名。德意志人的纪念碑被推倒，代之以捷克人或者波兰人的纪念碑。纳粹万字

符被取下，但它在许多墙壁上留下的痕迹，在今后许多年还将清晰可辨。人们说德语的权利已被剥夺，少数允许留下的德意志人（前提是放弃德国国籍）将被建议说波兰语或者捷克语，即使在私人场合也是如此。[39]

在苏台德和西里西亚这样的地区，学校被禁止教授德国历史。相反，德国人被描述为侵略者，总是侵略自古以来属于波兰人和捷克人的土地。波兰的新领土被称为“光复领土”，波兰孩子要学会某些民族主义口号，比如“我们曾在此，我们已在此，我们永在此”，以及“这些地区是失而复得的遗产”。边境地区的学生不允许学习德语，即使把德语作为外语来学习也不允许，相比之下，波兰其他地区的学生倒是允许学习德语。[40]

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教育方式不仅存在于学校中，即使是成年居民，也要接受饱和宣传的灌输。例如，弗罗茨瓦夫举行了一次“光复领土展览”，参观者多达150万人。在这些政治宣传中，尤其强调波兰-苏联在历史上的兄弟情谊，而且还用大量篇幅描述波德关系。着重强调波德两国持续千年的冲突，以及波兰回归“皮阿斯特之路”（Piast Path，指波兰的中世纪王朝，这个王朝对抗德国历代帝王，最终以西里西亚为中心创建了独立的波兰），这个展览被冠名为“我们对光复领土的古老权利”。[41]

这不仅仅是获得领土或者收复领土，这简直是改写历史。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新波兰，任何德国本土文化的痕迹都被完全抹去：这是波兰人的波兰。当时的官方政策认为，收复领土只是相对简单的步骤：“我们的目标要艰巨得多、复杂得多：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抹去日耳曼化的旧痕迹。不仅仅是清除标志牌和纪念碑，而且是要在生活中清除日耳曼化的根基，在人们的心目中清除日耳曼化。”[42] 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如此，总统贝奈斯号召人们，不仅要“彻底清除德意志人”，而且要清除“德国对我国的影响”。[43]

在这种情况下，苏台德、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普鲁士的德意志人，想要回归故乡，不仅愈发困难，而且毫无意义。他们所离开的地方早已不复存在。即使考虑到战争破坏的因素，他们的社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语言甚至他们的社会结构，早已被彻底抹去。所有这些都被完全陌生的因素所取代：一个几乎完全由其他种族群体组成的新社会。

我们很容易因为波兰人或者捷克人在1945年以种族主义态度对待德裔少数民族而谴责他们。然而，我们必须记得：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对战争期间德国残酷对待波兰人和捷克人的种族政策的反应。无可否认，波兰人和捷克人使用的方法是残酷的，但与纳粹相比则完全是小巫见大巫。没有任何国家执行针对德意志种族的灭绝政策，即使某些关于驱逐行动的、更为偏激的文学作品，也承认：驱逐行动的目的只是赶走德裔少数民族，而不是消灭他们。没有任何驱逐行动的动机只为复仇，这在开始时被视为防范未来民族冲突的可行措施。尽管我们今天厌恶这种为了狭隘民族主义而将数百万人连根拔起的想法，但在战争结束时，流放大批民众早已是普遍观念。当整个欧洲塞满数百万难民的时候，这种想法也许比此前此后的时代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发生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并非孤例。类似过程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说德语的多瑙河士瓦本人也被赶去德国和奥地利。但在罗马尼亚，驱逐行动执行得马马虎虎，当地人对德意志人并无真正的敌意。[44] 但民意取向无关紧要，因为驱逐德意志人是官方政策。战后数年间，在欧洲，唯一欢迎德意志人的地方就是德国本身。

清洗过后

不仅德裔少数民族在不欢迎他们的国度受到非人对待。实际上，与一战之后的做法相比，二战之后的做法简直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是迁移

国界以适应居民，欧洲各国政府此时决定，迁移居民以适应国界。

这种事情在欧洲各地频频上演，典型例子是斯洛伐克境内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待遇，他们与德意志人一样备受憎恨。斯洛伐克人无法原谅匈牙利在战争爆发前夕曾经割占斯洛伐克领土。因此，当这些领土被交还斯洛伐克时，斯洛伐克人着手驱逐1938年以来迁入该地的31780名匈牙利人。[45] 但对于斯洛伐克主体民族来说，这还不够。政府官员呼吁“全面驱逐”匈牙利人，总数多达60万人。[46] 斯洛伐克人冷冰冰地提及“最终解决”匈牙利人问题，赤裸裸地声称“我们不承认少数民族”。大众媒体异口同声地表示：“斯洛伐克及其南部边境只能是斯洛伐克人的，不能是其他人的。”[47]

1946年，政府将大约4.4万名匈牙利人强行迁出斯洛伐克边境，而在与波兰的强迫同化计划相类似的行动中，又把匈牙利人分散到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地区。[48] 此后不久，大约7万名匈牙利人被送到匈牙利，这是人口交换计划的组成部分（类似数量的斯洛伐克人则被“遣返”捷克斯洛伐克）。还有6000名匈牙利人逃往国外，以避免种种形式的迫害。[49] 在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企图毕其功于一役，要求获得再驱逐20万人的权利。这一次，也许是吸取了驱逐德意志人的教训，英美两国拒绝其要求。结果，捷克斯洛伐克不被允许成为单民族国家。斯洛伐克人只好另辟蹊径，提出“再斯洛伐克化”政策：这个计划将会恢复匈牙利人的公民权利，但以放弃匈牙利人身份并正式宣告自己是斯洛伐克人为前提。不用说，这个计划不仅未能让匈牙利人融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反而进一步疏远了他们。顺理成章的，匈牙利人开始把自己视为替罪羔羊，斯洛伐克人只想利用匈牙利人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掩盖战争期间斯洛伐克人的通敌行为。[50]

这种行动在欧洲各地频频上演。匈牙利人也被逐出罗马尼亚，反之亦然。阿尔巴尼亚查姆人被逐出希腊；罗马尼亚人被逐出乌克兰；意大

利人被逐出南斯拉夫。战争结束时，当卡累利阿西部最终并入苏联，大约25万名芬兰人被迫离开此地。迟至1950年，保加利亚也开始在与土耳其交界处驱逐14万名土耳其人和吉卜赛人。这个名单还能够列下去。[51]

作为所有这些强迫迁移行动的结果，东欧比其现代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缺少多元文化。仅仅在一两年间，少数民族比例减少过半。随着旧帝国熔炉的倾覆，犹太人、德意志人、马扎尔人、斯拉夫人以及其他数十个种族和民族，彼此通婚、争吵、摩擦的盛况一去不返。在那里，只剩下一些单一文化的民族国家，其人口或多或少来自单一种族。东欧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自我清洗。[52]

---

[1] De Zayas，Alfred，*Nemesis at Potsda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7），*Nemesis*，p.42

[2] Parliamentary debate，23 February 1944，Hansard，Series 5，vol.397，col.937.

[3]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Oder-Neisse*，p.62.

[4] Rees，Laurence，*World War Two behind Closed Doors*（London：BBC Books，2008），p.338.

[5]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Oder-Neisse*，p.62.

[6] Lane，Arthur Bliss，*I Saw Poland Betrayed*：*An American Ambassador Repor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 and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48），p.185.

[7] AP Szczecin，UWS，file ref.939，“Sytuacja ludności niemieckiej na Pomorzu Zachodnim według sprawozdania sytułacyjnego pełnomocnika rządu RP na

okręg Pomorze Zachodnie”，article from June 1945，pp.13-15.

[8] Centralne Archiwum Wojskove，Warsaw，IV/521/11/54，“Sprawozdanie liczbowe z akcji wysiedlania ludności niemieckiej za okres od 19 do 30 czerwca 1945 roku”.

[9] The same was true in Poland：参阅Prażmowska，Anita，*Civil War in Poland 1942-1948*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4），p.182。

[10] Lane，Arthur Bliss，*I Saw Poland Betrayed*：*An American Ambassador Repor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and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48），p.153.

[11] *New York Times*，13 November 1946，p.26.

[12] 以下经历来自安娜·金托普夫于1950年8月15日已被核实的文本，全文引自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Oder-Neisse*，doc.291，pp.289-95。

[13]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 （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Reports 136 and 162，pp.405，478.

[14]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 （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Reports 70，71，72 and 125，pp.260-62，379.

[15] Białecki，Tadeusz et al.（eds.），*Źródła do dziejów Pomorza Zachodniego*：*Niemcy na Pomorzu Zachodnim w latach 1945-1950* （Szczecin University，2004），docs.27 and 30，pp.64-9，71-4.

[16] 参阅doc.217 in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Oder-Neisse*，p.233。

[17] Instructions from the Republic of Poland’s Ministry of Recovered Territories regarding the resettlement of Germans，15 January 1946，reproduced as doc.27 in Białecki，Tadeusz et al.（eds.），*Źródła do dziejów Pomorza Zachodniego*：*Niemcy na Pomorzu Zachodnim w latach 1945-1950* （Szczecin University，2004），pp.64-9.另可参阅docs.21 and 30 in Białecki，Tadeusz et al.（eds.），*Źródła do dziejów Pomorza Zachodniego*：*Niemcy na Pomorzu

Zachodnim w latach 1945-1950 （Szczecin University，2004），pp.57，71-4。

[18] Agreement between British and Polis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bined Repatriation Executive，reproduced as doc.30 in Białecki，Tadeusz et al.（eds.），*Źródła do dziejów Pomorza Zachodniego*：*Niemcy na Pomorzu Zachodnim w latach 1945-1950* （Szczecin University，2004），pp.71-4.

[19] 关于媒体报告的选择，参阅De Zayas，Alfred，*Nemesis at Potsdam*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7），pp.107-14。

[20] 如可参阅docs.51 and 115 in Białecki，Tadeusz et al.（eds.），*Źródła do dziejów Pomorza Zachodniego*：*Niemcy na Pomorzu Zachodnim w latach 1945-1950* （Szczecin University，2004），pp.114-16，192-4。另可参阅*Manchester Guardian* report，引自De Zayas，Alfred，*Nemesis at Potsdam*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7），pp.121-2。

[21] 引自Davies，Norman and Roger Moorhouse，*Microcosm* （London：Pimlico，2003），p.422。

[22]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 （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Report 51，pp.234-5.

[23]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 （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Report 66，p.253.

[24]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 （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Report 2，pp.128，130.

[25] Byford-Jones，W.，*Berlin Twilight* （London：Hutchinson，1947），p.50.

[2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5，vol.II，pp.1291-2.

[2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5，vol.II，pp.1317-19.

[28] De Zayas，Alfred，*Nemesis at Potsdam*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7），*Nemesis*，pp.122-4.

[29] 没有关于难民死亡人数的准确数字。关于德国政府的粗略统计，以及所谓200万德意志难民死亡的夸张说法，参阅Spieler，Silke（ed.），*Vertreibung und Vertreibungsverbrechen 1945-1948*：*Bericht des Bundesarchivs vom 28 Mai*

1974，*Archivalien und ausgewählte Erlebnisberichte* （Bonn：Bundesarchiv Koblenz & Kulturstiftung der Deutschen Vertriebenen，1989），pp.53-4；and 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156。

[30] German Federal figures，引自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156。

[31] 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48-9.

[32] Szczecin State Archives，UWS，Wydział Ogólny，sygn.231，Pismo do ob.płk Z.Bibrowskiego szefa Polskiej Misji Repatriacyjnej w Berlinie，p.29；Agreement between British and Polis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bined Repatriation Executive，reproduced as doc.30 in Białecki，Tadeusz et al.（eds.），*Źródła do dziejów Pomorza Zachodniego*：*Niemcy na Pomorzu Zachodnim w latach 1945-1950*（Szczecin University，2004），p.72.

[33] Clay，Lucius D.，*Decision in Germany* （London：Heinemann，1950），pp.314-15；Pieck，引自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49。

[34] Red Cross reports in 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p.131-2.

[35] Clay，Lucius D.，*Decision in Germany* （London：Heinemann，1950），p.315.

[36] Franz Hamm，引自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136。

[37] 引自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49.

[38] Naimark，Norman，*The Russians in German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49.

[39] Testimony of Josef Resner，引自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141。

[40] Testimony of Josef Resner，引自De Zayas，Alfred，*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p.142.另可参阅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210。

[41] Davies，Norman and Roger Moorhouse，*Microcosm*（London：Pimlico，2003），p.447.

[42] 引自H.Schampera，“Ignorowani Ślazacy”，*Res Publica*，no.6（1990），p.9。

[43] Beneš，Edvard，*Speech delivered by President E. Beneš on the Old Town Square*，*Prague*，*on His Return to Czechoslovakia*，*May 16th 1945*（Prague：Orbis，1945；repr. Prague：Erika，1992），pp.5，19.

[44]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vol.III：*Romania*，p.68.

[45] Janics，Kálmán，*Czechoslovak Policy and the Hungarian Minority*，*1945-1948*，trans. Stephen Borsod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120.

[46] Janics，Kálmán，*Czechoslovak Policy and the Hungarian Minority*，*1945-1948*，trans. Stephen Borsod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p.133，177.关于匈牙利少数民族的统计数字，参阅tables 1-3 in Gyurgyík，László，*Changes in the Demographic Settle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Hungarian Minority in*（*Czecho-*）*Slovakia between 1918-1998*，trans. Jószef D. Lőrincz（Budapest：Teleki László Foundation，1999），pp.38-9.

[47] *Čas*，26 February 1946；*Obzory*，11 October 1947；*Vychodoslovenská Pravda*，3 November 1946：引自Janics，Kálmán，*Czechoslovak Policy and the Hungarian Minority*，*1945-1948*，trans. Stephen Borsod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p.133，152，188。

[48] Janics，Kálmán，*Czechoslovak Policy and the Hungarian Minority*，*1945-1948*，trans. Stephen Borsod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172.

[49] 关于匈牙利—斯洛伐克人口交换的对照观点，参阅Gyurgyík，László，*Changes in the Demographic Settle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Hungarian Minority in*（*Czecho-*）*Slovakia between 1918-1998*，trans. Jószef D. Lőrincz（Budapest：Teleki László Foundation，1999），p.7，and Marko，Augustín and Pavol Martinický，*Slovak-Magyar Relations*：*History and Present Day in Figures*（Bratislava：Slovak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Democracy and Humanity，1995），pp.26-7。两者都给出了类似的数字。

[50] Janics，Kálmán，*Czechoslovak Policy and the Hungarian Minority*，*1945-1948*，trans. Stephen Borsod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p.136-9.

[51] 关于保加利亚的统计数字，参阅Marrus，Michael R.，*The Unwanted*：*European Refuge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353；关于卡累利阿芬兰人，参阅Proudfoot，Malcolm J.，*European Refugees 1939-52*（London：Faber & Faber，1957），p.41。

[52] Pearson，Raymond，*National Minorities in Eastern Europe 1848-945*（London：Macmillan，1983），p.229.

第二十章 欧洲缩影：南斯拉夫

如果说在东欧各地迁移和交换人口是残忍行为，那么，这还不算是可能出现的最为糟糕的状况。实际上，这些行动之所以得到多国政府的支持，甚至包括西方盟国政府的支持，是因为各国普遍认为，这是最不糟糕的选择。战争爆发时，德国利用其分布在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作为发动侵略的借口：迁移那些少数民族，被视为防范未来冲突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在那些战争引发种族狂热的地区，严肃地说，人口迁移被视为让弱势人口免于受害的最好办法。甚至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人们，也经常把逃亡视作唯一出路。他们的生活已经如此不堪，以至于他们把成功迁移到另一个国家视为幸运逃脱。

然而，人口迁移绝非战后所有种族问题的答案。某些群体无论多么不受欢迎，他们就是无法被驱逐，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可以投靠，例如吉卜赛人，他们像犹太人那样，在哪里都不受欢迎。某些国家只好整合彼此分离的社群，力求掩盖战争期间公开爆发的内部分裂，如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以及相对缓和的，比利时的佛兰芒人与瓦隆人。在最为极端的个案中，政府只好假装根本不存在种族问题，因为根本不可能在政治上承认这些问题。这里所指的是苏联和南斯拉夫，当局力求让民众相信战争期间的暴力行径是阶级差异的结果，而非种族差异的结果。

南斯拉夫值得被大书特书，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种族问题。由于绝大多数要对战争暴行负责的群体都不是“外人”，他们无法被驱逐，实际上某些试图逃离这个国家的群体还被禁止离开，他们也不能在国内彼此分离。当时，南斯拉夫情报机构曾经在报告中提到：“有人问道：为何塞尔维亚人不能拥有自己的斯拉沃尼亚联邦主体？又或者，为何克

罗地亚人不能迁到克罗地亚，为何塞尔维亚人不能迁到塞尔维亚？”[1]但是，重建南斯拉夫联邦的总体目的就在于将这些彼此分离的民族整合在一面旗帜之下。当铁托元帅大谈“兄弟情谊与民族团结”的时候，怎能把各个民族流放到这个国家的几个角落呢？当他允许民族主义倾向茁壮成长的时候，怎能宣扬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原则呢？因此，不同种族群体只好继续比邻而居，尽管实际上他们毫不隐瞒彼此之间的敌意。

南斯拉夫是欧洲某些最为恶劣的暴力行为的发生地，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这里的独特形势在于冲突的错综复杂。南斯拉夫抵抗组织不仅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对抗外国侵略者，而且在革命战争中对抗本国政府军，在意识形态战争中对抗其他抵抗组织，还要在恢复法律和秩序的战斗中对抗土匪和强盗。矛盾彼此缠绕，经常难以分辨。但在这团暴力的乱麻中，还是可以抽出一根线头：种族仇恨。战争期间，交战各方都在千方百计地利用这股仇恨的力量。几乎在半个世纪以前，南斯拉夫内战为全世界贡献了“种族清洗”这个术语，南斯拉夫由此被卷入20世纪最为邪恶的种族冲突的最后阶段。

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南斯拉夫的经过及其后果是20世纪史中一个最为复杂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布满道德和历史陷阱的研究领域。正如在其他发生过国内暴行的国家，人们对于南斯拉夫国内暴行的解释同样存在严重的偏颇之处，每个种族群体都在争夺扮演受害者的话语权。许多原始档案都被篡改，以符合那些拥有这些档案的种族群体的民族观点或者意识形态观点。即使没有这些陷阱，也还存在许多真正的争议，即使是该研究领域最为客观公正的历史学家也无法解决这些争议。[2]

首先，“南斯拉夫”（Yugoslavia）本身就是当时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时至今日，仍然如此。这个国家迟至1918年才出现，建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中。它横跨在19世纪三大帝国倾覆后遗留的断层上，

即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它由此成为三大宗教的交汇点，即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实际上是四个宗教，如果把少量犹太少数民族包含在内的话，但他们已经在战争中被完全抹去）。它是超过六个主要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的家园，他们之间已经睚眦必报地竞争和戒备了好几个世代。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两个最为强大的政治群体，塞尔维亚君主派和克罗地亚农民党，无休止地争论南斯拉夫是否应该继续作为一个王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每个地区应该被授予多少自治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民族的、种族的、政治的、宗教的分歧如此白热化，以至于“南斯拉夫人”自相残杀，如同杀死外国占领者。克罗地亚人以天主教的名义屠杀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焚烧穆斯林村庄，在伏依伏丁那焚烧匈牙利村庄；君主派切特尼克与共产党游击队发生激战。仿佛还嫌这不够复杂，民兵还经常把自己犯下的暴行嫁祸到别人身上。穆斯林游击队穿着塞尔维亚切特尼克的制服，克罗地亚乌斯塔莎打扮成穆斯林的样子，切特尼克又假扮成塞尔维亚游击队，因此并非总能直截了当地辨认出到底谁干掉了谁。[3] 躲在背后操纵大局的是德国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外国占领者，他们不仅自己犯下战争罪行，而且还煽动不同族群自相残杀。

在这些乱成一锅粥的暴力团体中，逐渐冒起了两大敌对势力。首先是乌斯塔莎，一个极右翼政治组织，战争期间曾在意大利支持下重建独立的克罗地亚傀儡政权。乌斯塔莎是欧洲大陆最令人反感的政权之一。战争期间，他们所进行的种族清洗和宗教清洗，其规模仅次于纳粹政权。他们有条不紊地谋杀了数十万塞尔维亚人，又强迫数十万塞尔维亚人改宗天主教。他们在雅森诺瓦克（Jasenovac）设立了最为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并在那里谋杀了大约10万人，其中超过半数是塞尔维亚人。[4] 乌斯塔莎绝非南斯拉夫境内唯一的通敌组织，还有几个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极右翼团体和民兵组织也在干同样的勾当，但乌斯塔莎无

疑是最有势力的。

南斯拉夫第二股主要势力是乌斯塔莎的死对头，他们取得了最后胜利：共产党游击队。游击队逐渐超越其他所有抵抗组织，包括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Draža Mihailović）的君主派切特尼克，成为得到盟军支持的庞大战斗力量。他们由各个少数民族的男男女女组成，但主要成员是逃避迫害的塞尔维亚人。后来在战争期间，大批切特尼克成员，他们也是塞尔维亚人，转而加入游击队。这既是出于站在胜利者一方的投机心理，也是因为他们与其他塞尔维亚同胞一样，强烈要求摧毁克罗地亚乌斯塔莎。于是，南斯拉夫战争的结局尤其带有种族狂热的因素。当游击队领导层全神贯注于克罗地亚回归南斯拉夫的时候，许多基层士兵却只惦念着一件事情：向全体克罗地亚人复仇，尤其向乌斯塔莎政权复仇。

“布莱堡惨案”

战争最后六个月，德军开始大举撤出巴尔干半岛。1945年4月，当德军撤到南斯拉夫的时候，当地各种通敌团体、士兵和民兵纷纷加入。这些团体的共同目标是，杀出一条血路，前往奥地利英占区和意大利东北部：在经过惨烈的战争后，他们断定，如果他们举手投降，英军会比铁托的部队更容易宽恕他们。

1945年5月6日，在乌斯塔莎政权最终放弃萨格勒布时，他们采取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措施，以挟持平民百姓。乌斯塔莎故意散布恐慌气氛，以便激起更大范围的逃亡潮。无论如何，大批难民混杂在败退的部队中间，某些平民还持有枪械，这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对手就很难区分平民和军人了。[5] 这巨大的人潮多达数十万人，他们向北穿越斯洛文尼亚，直趋奥地利边界。他们决心在投降之前抵达奥地利，为此，他们在欧洲其他地区战事平息后还继续战斗。战斗持续到1945年5月15日，直至第一支克罗地亚部队抵达奥地利国土布莱堡（Bleiburg）为止。在这

里，他们立即尝试向英军投降，但英军拒绝接受他们的投降，因为盟军的政策规定，所有轴心国军队必须向其交战部队投降。尽管乌斯塔莎刚刚经历过孤注一掷的战斗，他们还是被迫向游击队投降。

长期以来，发生在布莱堡的事件一直扑朔迷离、充满争议。战争结束多年以来，克罗地亚流亡者一直声称，全部克罗地亚军队已经抵达奥地利国土，英军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且把他们交还给游击队，让游击队消灭他们。许多人坚称，英军“出卖”他们构成了战争罪，因为英军拒绝保护他们，这违反了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然而，实际上，只有少部分克罗地亚部队和难民抵达奥地利领土，也许只有2.5万人，而其他17.5万人散布在长约45公里到65公里的狭长地带。英军别无选择，只能告诉他们向游击队投降，因为英军没有足够的设备和物资在奥地利的边远地区接纳如此众多的难民。此外，英军还想保持这个地区的安定，以免要对铁托的游击队采取军事行动，而此时游击队已经进入奥地利和意大利东北部，并威胁要将这些领土并入南斯拉夫。[6]

关于出卖的指控同样指向英军对待投降者的方式。就在克罗地亚人抵达前，一支1万～1.2万人的通敌者部队，即斯洛文尼亚本土卫队（当时刚刚改名为斯洛文尼亚民族军）抵达奥地利。英军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关押在维克特灵（Viktring）附近的营地，这是一个距离克拉根福西南面只有几公里的小镇，但英军不打算保留这些人，而是计划把这些人尽早交还给南斯拉夫。得知真相的斯洛文尼亚人拒绝任何遣返企图，英军便假装要把他们转送到意大利的营地。类似的欺骗伎俩也被用于当地的哥萨克俘虏，哥萨克军官被告知他们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实际上，他们是被移交给苏联。这种公然欺骗的行为让那些在接下来的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人，对英军好感全无。这只能充分证明，英军其实早就知道这些俘虏将要遭受的命运。[7]

对于那些被送出奥地利国境的人来说，或者对于那些在斯洛文尼亚最北端被铁托游击队俘虏的人来说，一场史诗般的、悲剧性的苦难正在等待他们。大多数人沿着德拉瓦河前进，前往马里博尔（Maribor），游击队在那里设立了转运营地。开始时行进队伍相当有秩序，而且组织良好，但按照幸存者的说法，越是远离盟军战线的安全地带，他们就越危险。游击队守卫不会给俘虏提供食物和水，甚至还抢夺俘虏的财物，如钢笔、手表、婚戒、靴子和鞋子。当队伍断开的时候，那些落在后面的人被迫跑步跟上队伍。为了让人们走快一点，那些落在后面的人经常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被开枪射杀。

20世纪60年代，克罗地亚流亡者约翰·普尔采拉（John Prcela）收集了那些曾经被迫走回南斯拉夫领土的人们的证言，其中绝大多数与上述细节完全吻合。[8] 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政府委员会收集的德军士兵证言提供了更多旁证。[9] 这种“死亡行军”是极端残酷的。在向马里博尔艰难跋涉的路上，克罗地亚士兵和平民经常由于各种想象得到的借口遭到枪击。当然，那些试图逃跑的人对此早有准备，但走出队伍上厕所同样足以致命。在经过沿路的村庄时，当地人给他们留下了食物和水，但任何人上前取用食物和水都会挨枪子儿。走不动也不是理由，一位名叫斯坦科维奇（Stankovic）的幸存者告诉我们，一位五十多岁的牧师仅仅因为累得再也走不动就惨遭杀害。[10]

有时候，人们似乎被随意选中：

> 一名共产党军官，通常是塞尔维亚人，但偶尔是斯洛文尼亚人，会突然大声叫喊：“杀掉那个比其他混蛋高出一头的家伙！”然后另一名军官会喊道：“杀掉那个矮子！”还有其他军官下令，干掉某个留胡子的人，或者干掉某个被脱去衬衣的人。[11]

按照另一名目击者的证言：“赤色分子射杀任何他们想要射杀的人。最初，他们把个别人拖出队列，然后在附近的树林里杀掉。后来，他们直接向人群开火。这种射击完全是滥杀无辜。”[12]

然而，尽管某些游击队员确实喜欢滥杀无辜，但更多屠杀行为其实并非看谁不顺眼就动手。给俘虏搜身，除了盗窃俘虏财物的明显动机以外，还是为了查明谁是乌斯塔莎军官或者精英成员。有些人愚蠢到把文件或者照片带在身上。那些比其他人携带更多财物的人，级别显然更高，尽管许多军官在投降之前扔掉了他们的制服，但有时他们还留着勋章和证章。一位名叫马克·斯托伊奇（Mark Stojic）的乌斯塔莎中尉就是如此，他的嫂子为了保护他，把他的证章绑在腿上。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掉在路上。某些守卫发现了这些证章，他们问斯托季奇的嫂子，这些东西是谁的。当她拒绝回答时，其中一名守卫在众目睽睽之下敲碎了她的脑袋。[13]

许多幸存者都提到，总有小批人被带进森林，然后传来枪响。由于几乎所有证言都来自受害者一方，我们无法确定游击队军官是如何选择这些人的，但在许多个案中，确实存在某些基本的选择流程。在为数甚少的游击队军官证言中，有一位军官提到他的同志如何从俘虏当中选出54名军官，然后把他们带进树林里杀掉。“为了弄清楚这件事情，我在士兵们掩埋尸体时走上前去。我看见几摊血迹，以及一具被捅过刀子的尸体，但我估计其他尸体也被刀子捅过，因为我只听到两三声枪响，但那里却有54具尸体。”[14]

一位名叫弗拉尼奥·克拉卡伊（Franjo Krakaj）的俘虏告诉我们，乌斯塔莎士兵也受到特别对待。他本人被误认为乌斯塔莎官员，马上被带进森林，同行的人都被射杀了。他在其他人引开守卫的时候侥幸逃脱。

克拉卡伊的故事相当有意思，因为他并非从游击队手中逃脱过一次，而是逃脱过四次。每次他都因为饥饿而暴露行踪。他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是因为他迷失了方向，结果落入一群特别变态的士兵手中，直到第二次几乎被处决时他才意识到，这场屠杀是游击队政策的组成部分。这一次，他被双手反绑，与其他俘虏一起被赶上卡车。

大约过了20分钟，我们在马里博尔岛被赶下卡车，这里是城镇的上游。当我们临近目的地的时候，我们听到断断续续的机枪开火的声音，不时还听到几声步枪开火的声音。我们知道自己大难临头了。

当我被推下卡车的时候，我总算站稳了脚跟。于是，我能够看清楚周围的恐怖场景，就像是在20世纪看见了但丁（Dante）笔下的炼狱……吸引我注意力的是300码开外几个已经挖好的万人坑。由于里面几乎填满了尸体，我无法判断到底有多深。我估计每个万人坑也许容纳了300具尸体。在这些尸堆上面，我能看出有东西在活动，有些受害者还活着！在这恐怖的场景中，传来一声叫喊："兄弟，杀掉我吧！给我补一枪！"我还记得这叫喊重复了好几次。坟坑里也有并未受伤的人，被层层堆叠的尸体活活闷死。他们也试图发出声响。有些受害者试图冲入树林，但游击队员朝他们开枪。

卡车又运来其他俘虏。当守卫开始把俘虏赶下车时，步枪和机枪开始枪声大作，因为这些俘虏一下车就试图挣脱。尽管我双手还被反绑，但我还能跑动。子弹打入树木，扫倒了我周围的灌木丛。我被倒下的树枝绊到，因而向前摔倒。或许就是这下摔跤救了我的命，因为守卫明显以为我被子弹打中了，他们的注意力转到了其他方向。[15]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屠杀行动绝非孤例，屠杀克罗地亚俘虏完全是成建制的部队所为。当然，屠杀行动的组织工作也相当严密。俘虏不是被个别处决，或者被小批量处决，而是被大规模处决。这种规模的大屠杀，如果没有游击队最高领导层下达的指令，根本不可能得以实施。

负责此事的地方指挥部似乎就设在附近的城镇马里博尔。在这里以及斯洛文尼亚的其他中心城镇，游击队在消灭俘虏之前遵守一套既定程序。首先，建立基本的选择流程，首要的是把平民和士兵分开，然后把乌斯塔莎部队和普通的退伍兵、现役兵分开，最后把军官和士兵分开。[16]"罪行最轻"的人被送上火车，送回采列和萨格勒布。数万人被迫步行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前往全国各地的战俘营。有些人作为强迫劳工被留在当地，从事繁重的或者恶心的工作。但对于剩下的那些人来说，这里就是生命的尽头。

在城镇附近有许多长长的反坦克壕沟，这些是德军开挖的最后防

线，用于应付游击队的进攻。俘虏被卡车运到这里，沿着壕沟排成队列，然后被射杀。这些俘虏清楚地知道什么在等待着他们，因为他们能够看见壕沟底部躺着上一批俘虏的尸体。许多人被脱光了衣服。他们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以防止他们逃脱或者袭击守卫。

以下是一位克罗地亚军官的证言，与其他在冷战期间逃离南斯拉夫但仍有亲人在国内的流亡者一样，他希望保持匿名。

> 那天晚上，游击队员把我们脱光，用电线反绑我们的双手，并且把我们每两个人捆绑在一起。然后我们就被押上卡车，前往马里博尔东面。我设法解开了双手，但仍然与另一名军官绑在一起。我们被带到一些大坑前面，里面早已堆满了尸体。游击队员开始朝我们背后射击。说时迟那时快，我自己跳到了尸堆上面。然后更多尸体压在我身上。游击队员扫射我们后就离开了，他们没有掩埋我们，因为大坑还能放下尸体。于是他们就去马里博尔寻找更多的受害者。我把自己从死亡的同伴身上解开，爬出了这个万人坑。我全身赤裸，浑身都是其他受害者的鲜血，我很害怕，也走不远。我爬到处决地点附近的一棵树上。游击队员还来了三次，每次都带来军官和牧师，并且把他们就地枪决。日出时分，我逃脱了。[17]

马里博尔屠杀持续了好几天，当反坦克壕沟被填满时，特别埋尸队就被指派去给壕沟填土，然后再把地面压平。当然，尸体也被埋入浅坑、弹坑以及专门挖掘的万人坑。

一位前游击队员后来也逃离南斯拉夫，他给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其中一支埋尸队的工作情况。

> 当我们执行这项恶心的任务时，另一支队伍在壕沟尽头挖了一个大坑。但当我看到这个大坑里堆满尸体的时候，我也感到恐怖。因为在这个大坑里，尸体都已经僵硬甚至开始腐烂了，他们很可能已经死去多时……
>
> 直到傍晚五点，我们还在执行任务，当时又有100名囚犯被带到刚刚挖好的屠宰场。我们接到指示，准备掩埋死者。然后，这些囚犯在堆满尸体的大坑旁边站成一排。他们身上的财物被搜走。最后，这100名犯人被机枪扫射。我在100码开外目睹了这场大屠杀。某些囚犯自己

跳进坑里躺平，从而躲过了机枪子弹。他们假装自己已死，但游击队员对尸体逐一检查，并且对那些怀疑未死者补上一刺刀。尖叫声响彻天际，这残酷地证明，那些躲过机枪子弹的人，还是躲不过死亡。后死者的尸体被堆在先死者的尸体上。然后，游击队员又对着大坑里的尸体开枪扫射，以确保无人生还。[18]



7.1945年南斯拉夫的屠杀地点

根据人口统计学家弗拉迪米尔·热里亚维奇（Vladimir Žerjavić）被普遍认为最客观、最可靠的南斯拉夫战争损失统计数据，大约5万～6万名通敌分子，绝大多数是克罗地亚和穆斯林部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短期内在布莱堡与马里博尔之间被杀害。这意味着1945年5月，在奥地利边界向游击队投降的南斯拉夫部队中，有半数俘虏被杀害。[19]

马里博尔绝非唯一发生屠杀事件的地方。在逃到奥地利的1.2万名斯洛文尼亚民族军成员中，绝大多数都被英军移交给游击队，他们都被

谋杀于科切维（Kočevje）附近的森林中。他们被带到科切维斯基（Kočevski Rog）深谷旁边，要么被枪杀，要么被活活推下悬崖。深谷两边的峭壁上都埋了炸药，以便在屠杀后引爆，让大量砂石掩埋谷底的尸体。按照目击者的说法，那里不分军官和士兵，也不分政治信仰："对囚犯既不盘问，也不审讯，更不甄别。被带到科切维的人都得死。"[20] 就这样，至少8000～9000名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被杀，此外还有某些克罗地亚人、黑山切特尼克以及来自三个塞尔维亚志愿团的成员。[21] 受害者中还有个别妇女，以及大约200名乌斯塔莎青年运动的成员，他们的年龄在14～16岁。[22]

类似事件还发生在普度提克（Podutik）深谷，就在卢布尔雅那城外几公里处。在这里，大批腐烂的尸体开始污染卢布尔雅那的饮用水，结果在6月，一批德军战俘被派去挖掘尸体，并且适当地掩埋在重新挖掘的万人坑里。[23] 游击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杀死受害者。在拉斯科（Lasko）和赫拉斯特尼克（Hrastnik），克罗地亚通敌者被扔进矿井，游击队再往矿井里扔手榴弹。[24] 在里夫尼克（Rifnik），俘虏被赶进地堡，游击队再炸毁地堡。[25] 在贝齐格莱德（Bezigrad）战俘营，俘虏被锁在封闭的蓄水池里，然后被灌水淹死。[26] 在伊斯特里亚（Istria），在南斯拉夫与意大利的边界上，数百名意大利俘虏被扔进矿井和深谷里摔死。[27]

正如在马里博尔，这里难免也会有个别幸存者。一位幸存者和数百名受害者一起，在卡姆尼克（Kamnik）被执行枪决，他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听起来不那么恐怖，甚至还有点幽默。他和其他俘虏被围成一圈，然后守卫开始朝他们开火。尽管前额被子弹擦伤，但他还是活了下来。当时他和已死的、垂死的伙伴躺在坟坑里，他听到游击队员之间的争吵。

> 他们非常沮丧，因为那帮笨蛋把我们排成一圈，然后又在我们外围排成一圈。于是，在开火的时候，他们既打中了我们，也打中了他

们自己。就是因为这个愚蠢的举动，两名游击队员丢了性命，两名游击队员受了重伤。[28]

如此众多的证言得以保留，实在是令人吃惊。某些证言令人难以置信，如米兰·扎伊奇（Milan Zajec）说自己在万人坑里躺了五天，五天后才得以逃脱，但绝大多数证言不仅真实可信，而且包含了许多可以求证的细节。[29] 这些证言关于德国战俘的人数、屠杀发生地的本地人数都比较吻合，甚至与游击队的各类档案和证言都比较吻合。[30] 如果将来还有什么证据浮现的话，那肯定来自遍布这个地区的万人坑。随着共产主义在南斯拉夫退潮，某些万人坑被发掘出来，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各地，现在竖立了许多纪念碑，以纪念铁托统治时期的死难者。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屠杀事件的动机是什么？仅仅是对昔日的军事对手的复仇吗？或者只是对一个政权开始的暴行循环讨回公道吗？屠杀是否出于政治动机或者种族仇恨？简单的回答是，上述动机同时存在，并且难以分辨。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政权是建立在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的基础上的，那么，处决与这个政权有关的士兵和官员，就同时兼具政治动机和种族动机，而且这也是对乌斯塔莎政权战时推行的种族清洗政策的对等报复，尽管这种报复等同于冤冤相报，而且经常出现过火行为。

然而，对于杀人者以及受害者来说，动机上的细微差别是无关紧要的。我已经强调，上述所有受害者都是克罗地亚人，也许，考虑到许多受害者自己就具有狂热的民族主义观点，这种结果并不令人意外。然而，即使来自共产党的资料也承认，在战后许多非官方暴力行为中，种族属性是决定性的因素。1945年7月，派驻克罗地亚的南斯拉夫情报部门提交报告称，“沙文主义仇恨如此炽烈，以至于塞尔维亚村庄与克罗地亚村庄都要打起来了”。战争结束后，纯粹因为种族背景而发生的谋杀和暴力行为比比皆是，尤其是当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返回村庄时，都会表现出对克罗地亚邻居和波斯尼亚邻居的偏见。据说在巴尼亚

（Banija），战后回村的塞尔维亚人问其他村民："为什么不把克罗地亚人都杀光？你们还等什么？"[31]

南斯拉夫：欧洲暴力之象征

这些大大小小的屠杀事件，让人们普遍形成了南斯拉夫是个肃杀之地的印象，这种印象又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残忍内战而变得更加巩固。全欧洲都用"巴尔干暴力"这个术语来表示特别邪恶的嗜血行为，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场景又进而支持了这种假说。[32]

的确，战后南斯拉夫的统计数据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糟糕得多。战争结束后，大约7万名通敌士兵以及平民被游击队杀害：与人口基数相比，这里的情况比意大利严重10倍，比法国严重20倍。[33] 一眼看去，战后发生的种种事件似乎也足以证明南斯拉夫人特别残忍。杜尚·武科维奇（Dusan Vukovic）11岁就加入了游击队，他说自己亲眼看过一名乌斯塔莎分子被活活剥皮，然后连人带皮一起被吊在树枝上。"我亲眼看见，游击队员削鼻、割耳、挖眼。他们还在俘虏身上用刀刻上各种标志，尤其是他们认定的盖世太保人员，更是难逃厄运。"[34] 其他目击者也提到例行公事的虐待行为，比如守卫用小刀慢慢杀死受害者，把俘虏当马骑，或者把男男女女绑在一起，扔进河里，看着他们活活淹死。[35]

然而，如果不看数字，那么战争末期发生在南斯拉夫的暴力行为，并不比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暴力行为更残忍。正好相反，同样的行为出现在整个欧洲大陆上。上述事件与法国自卫队士兵在德国占领区抓住抵抗战士时的做法并无不同，"挖出俘虏的眼睛，往伤口里放入昆虫，然后再把伤口缝上"。[36] 捷克的暴民也类似，他们会在被抓获的党卫队员身上用刀刻上纳粹标志，比利时游击队员则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通敌者活活烧死。[37] 因此，尽管发生在巴尔干这个不幸地区的残忍行为堪称典型，但这绝对不是孤例，正好相反，这是整个欧洲大陆非人性化的象

征。

南斯拉夫暴力事件的种族尺度亦非孤例。在西欧绝大部分地区，种族紧张关系也许已被人遗忘，但如我所述，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乌克兰，种族紧张关系却是战争及其后果的一部分。在欧洲大陆，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针对少数民族的地区冲突，这些地区冲突规模虽小，但若论残忍却是相差无几。

实际上，南斯拉夫的唯一独特之处，在于它同时涵盖本书迄今为止讨论过的所有议题。与欧洲其他地方相同，南斯拉夫许多暴力行为的动机仅仅在于复仇。与欧洲其他地方相同，一旦战争结束，战争造成的裂痕就可以被掩盖在团结的神话当中。在南斯拉夫，战后法律和秩序的崩坏，这与欧洲大陆其他地方并无不同。人们对重新组建的警察部队缺乏信任，担心这些警察“与土匪无异”，这与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奥地利人以及东德人对民兵（或者对苏联士兵）的恐惧也并无不同。[38] 人们对法庭缺乏信任与法国和意大利的相同，在那些国家，人们经常亲手执行法律。人们私下建立非官方的监狱，以关押通敌者，一如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们建立劳改营，以关押战俘，一如在苏联。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被驱逐，一如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

只有在谈到南斯拉夫的时候，才为我们尚未深入讨论的新主题指明方向，即暴力行为的政治动机。迄今为止，我们论述的几乎所有事件，都是在国家控制以外的个人行为或者集体行为，在盟军和传统政治家的共同作用下，这些个人或者集体最终也有所收敛。但在南斯拉夫，正是国家本身在实施暴力行为，盟军鞭长莫及，传统政治家已被革命者取而代之。或许这就难怪，这些战士以毫不留情的手段来恢复法律和秩序。

1979年，铁托的左右手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一份英国杂志的访谈中毫不回避地谈到这些手段：“当时的南斯拉夫是一个陷入混乱和破败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民政机构。没有组织完备的法庭。

没有办法对2万～3万人进行可靠的调查。所以，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全部枪毙，这样就解决了问题。”[39] 当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试图通过法庭审判清除通敌者时，人们抱怨这种清洗并不彻底，铁托认识到了本国司法系统的缺陷，干脆就将其全部抛弃。他后来回忆说：“我们一劳永逸地结束了这种状况。”[40]

毫无疑问，战后发生在南斯拉夫的屠杀事件，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政治动机。由于共产党试图强迫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重新加入南斯拉夫联邦，那就不可能容许数万名死不悔改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危害联邦。铁托也不能容许米哈伊洛维奇的君主派切特尼克危害自己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南斯拉夫。因此，两者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些没有被枪毙的人，将会被监禁数年甚至数十年。

出于政治动机的国家暴力也并非南斯拉夫的孤例。在整个欧洲，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其他共产主义团体也许更为巧妙，但同样无情，当他们认为有所必要时，他们同样愿意诉诸暴力。因此，对于欧洲大陆东半部的无数人来说，战争结束并不预示着“解放”，只预示着国家镇压的新时代。纳粹恐怖过后，新的恐怖接踵而至。

---

[1] Report of district committe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roatia in Nova Gradiška，2 June 1945，reproduced in Rupić，Mate et al（eds.），*Partizanska i komunistička represija i zločini u Hrvatskoj 1944-1946*：*Dokumenti*（Slavonski Brod：Hrvatski institut za povijest，2005），doc.52，p.151.

[2] Pavlowitch，Stevan K.，*Hitler's New Disorder*：*The Second World War in Yugoslavia*（London：Hurst & Co.，2008），pp.vii-xi.我从此书中获益良多。Tomasevich's *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 是关于战时和战后南斯拉夫的各种语言版本著作中最为公允者。

[3] Pavlowitch，Stevan K.，*Hitler's New Disorder*：*The Second World War in Yugoslavia*（London：Hurst & Co.，2008），p.ix.

[4] 在上述统计数字中，雅森诺瓦克的死亡人数出于政治目的被夸大了。关

于可靠的数字，参阅Žerjavić，Vladimir，*Yugoslavian Manipulations with the Number of Second World War Victims* （Zagreb：Croatian Information Centre，1993），pp.20，29-30；Pavlowitch，Stevan K.，*Hitler's New Disorder*：*The Second World War in Yugoslavia* （London：Hurst & Co.，2008），p.34；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726-8。1997年，贝尔格莱德种族灭族受害者博物馆以及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研究者整理了雅森诺瓦克营地78163名死难者的名单，参阅Croatian State Commission for Establishing Crimes of Occupying Forces and their Assistants，*Crimes in the Jasenovac Camp* （Banja Luka：Becjead，2000），p.27。

[5] 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53.

[6] 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757-63；Bethell，Nicholas，*The Last Secret* （London：Futura，1976），pp.118-22.关于英国的统计数字，参阅TNA：PRO WO 170/4465，WO 106/4022 X/L 03659 以及FO 371/48918 R 8700/1728/92。南斯拉夫的统计数字似乎与此吻合，参阅Tito's communication with Field Marshal Alexander of 17 May 1945 in Rupić，Mate et al（eds.），*Partizanska i komunistička represija i zločini u Hrvatskoj 1944-1946*：*Dokumenti* （Slavonski Brod：Hrvatski institut za povijest，2005），doc.31，p.116。

[7] 参阅Alexander's telegrams to AGWAR and AMSSO，17 May 1945，TNA：PRO FO 371/48918 R 8700/G；以及to 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TNA：PRO WO 106/4022。另可参阅Bethell，Nicholas，*The Last Secret* （London：Futura，1976），pp.131-5，147-55；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773-4；Pavlowitch，Stevan K.，*Hitler's New Disorder*：*The Second World War in Yugoslavia* （London：Hurst & Co.，2008），p.264。关于英国人撒谎的证人证言，参阅Nicolson，Nigel，*Long Life*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7），pp.120-22 以及testimonies by A.Markotic and Hasan Selimovic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 （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s.XXIV and XXVII，pp.279，292。

[8]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 （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passim* .

[9] 参阅the testimonies gathered by 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I：*Jugoslawien*，*passim* 。

[10]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IV，p.215.

[11] Account of "Ivan P."，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XXIV，p.335.

[12] Account of "G."，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LV，p.417.

[13] Account of Hasan Selimovic，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XVII，p.294.

[14] Branko Todorovic account，25 June 1945，TNA：PRO FO 1020/2445.

[15]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XII，pp.265-6.

[16] Accounts of M.Stankovic，Zvonomir Skok and Ante Dragosevic，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s.XIV，XXIII and XXVI；pp.213，274 and 289.

[17] Unnamed officer，引自Karapandzich，Boriwoje M.，*The Bloodiest Yugoslav Spring*，*1945*：*Tito's Katyns and Gulags*（New York：Hearthstone，1980），pp.72-3。

[18] Account of "L.Z."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XXII，p.325.关于上述来自德国的证人证言所证明的事实，参阅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I：*Jugoslawien*，p.108。

[19] 参阅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761，765；Pavlowitch，Stevan K.，*Hitler's New Disorder*：*The Second World War in Yugoslavia*（London：Hurst & Co.，2008），p.262。

[20] Account of "I.G.I."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LIV，p.375.

[21] 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74.

[22] Accounts of "I.G.I." and "M.L."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s.XLIV and XLVI，pp.375，381.

[23] Account of Ignac Jansa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LV，pp.377-9.

[24] Report of Vladimir Zinger and others，Karapandzich，Boriwoje M.，*The Bloodiest Yugoslav Spring，1945*：*Tito's Katyns and Gulags*（New York：Hearthstone，1980），pp.91-113.Accounts of "J.F." and "S.F."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s.XLII and XLIII，pp.369-70.

[25] 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I：*Jugoslawien*，p.108.

[26] Account of "K.L.V."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XXIX，p.360.

[27] Petacco，Arrigo，*A Tragedy Revealed*：*The Story of Italians from Istria，Dalmatia and Venezia Giulia，1943-1956*，trans. Konrad Eisenbichler（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5），pp.90-94.

[28] Account of “M.M.”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XXVIII，p.358.

[29] Account of Milan Zajec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XLVII，p.385.

[30] 如可参阅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I：*Jugoslawien*，pp.107-34；以及Rupić，Mate et al（eds.），*Partizanska i komunistička represija i zločini u Hrvatskoj 1944-1946*：*Dokumenti*（Slavonski Brod：Hrvatski institut za povijest，2005），doc.87，p.249。

[31] Minutes of the first conference of the head of Odjel za zaštitu narodna for Croatia，July 1945，in Rupić，Mate et al（eds.），*Partizanska i komunistička represija i zločini u Hrvatskoj 1944-1946*：*Dokumenti*（Slavonski Brod：Hrvatski institut za povijest，2005），doc.80，p.236.

[32] Mazower，Mark，*The Balkans*（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0），pp.143-51.

[33] 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65.有7万人被杀意味着每10万人就有466人被杀，对比法国的每10万人有22人被杀，以及意大利每10万人有26～44人被杀，参阅ch.13。Werner Ratza认为有8万名战俘，其中包括德意志平民但不包括南斯拉夫平民，见“Anzahl und Arbeitsleistungen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XV：*Zusammenfassung*，pp.207，224-6。

[34] Account by Dusan Vukovic in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LXVII，pp.461-4.

[35] Accounts of Ivan S.Skoro and Franjo Krakaj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docs.XXI and XXII，pp.258，268；以及by a Red Cross nurse，援引自Kurt W.Böhme in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vol.I：*Jugoslawien*，p.121。

[36] Account of postwar trial by lawyer Henri Rochat，引自Marcel Ophüls's film documentary *Le Chagrin et la Pitié*， two parts （Laboratoires Gennevilliers for Télévision Rencontre，1969；Marcel Ophüls），part II："Le Choix"。

[37] Bodson，Herman，*Agent for the Resistance* （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1994），p.145.

[38] Report of Interior Ministry for Federative Croatia to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roatia，10 July 1945，in Rupić，Mate et al（eds.），*Partizanska i komunistička represija i zločini u Hrvatskoj 1944-1946*：*Dokumenti* （Slavonski Brod：Hrvatski institut za povijest，2005），doc. 67，p.188.

[39] Interview in *Encounter*， vol.53，no.6，reproduced in Karapandzich，Boriwoje M.，*The Bloodiest Yugoslav Spring*，*1945*：*Tito's Katyns and Gulags* （New York：Hearthstone，1980），p.170.

[40] Tito，引自Djilas，*Wartime* （New York and Lond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7），p.449。

第二十一章 西欧宽容，东欧不宽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预示着欧洲东西两部分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新对比。在西欧，气氛变得比战前人们所能想象的还要世界主义。伦敦成为欧洲所有流亡政府的外交枢纽以及讨论世界军事问题的会晤地点。巴黎或者柏林的咖啡馆迎来欧洲各地的顾客：战后还迎来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美国人以及非洲人，黑白肤色的面孔共聚一堂。战前很少看见外国人的德国农村地区，现在挤满了波兰人、乌克兰人、波罗的海人、希腊人、意大利人。从未见过黑色面孔的奥地利人，不得不习惯与非洲裔美国人、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以及塞内加尔部落民混杂在一起。尽管难免存在种族主义，对“醉醺醺的波兰人”和“不守规矩的乌克兰人”也存在诸多抱怨，但这种新的世界主义还是逐渐被人们接受。[1]

在东欧，正好相反，数百年来的世界主义被部分地甚至全部地摧毁了。战争消灭了当地绝大多数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战争也让邻居彼此之间空前敌对，斯洛伐克人反对马扎尔人，乌克兰人反对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反对克罗地亚人，整个地区都是如此。结果在战后，仅仅因为其种族属性或者族群属性，整个族群成为替罪羊，或者被认定为通敌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数百年来得到东欧社会接纳的少数民族，或被铲除，或被驱逐，有时清洗过程仅仅持续几天。

欧洲两个半部之间的差异，部分是长期历史进程的结果。少数民族问题向来在东欧更为严重，尤其在老旧的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崩溃以来更是如此：甚至早在1939年以前，就有人发出警告，东欧许多地方可能会爆发民族主义暴力行为。但随着战争爆发，这些问题才真正酿成灾祸。纳粹及其盟友不仅擅长种族仇杀，而且他们通过分化和征服，在彼此竞争的种族群体中挑起仇恨。于是，乌克兰的乌克兰起义军，克罗地

亚的乌斯塔莎，诸如此类的团体在近距离目睹纳粹大屠杀后，不仅学会了大规模屠杀的伎俩，而且获得了亲手实行种族灭绝的机会。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在西欧。纳粹在西欧的暴行要温和得多，而且灭绝犹太人也发生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彼此竞争的民族主义紧张关系也很少会成为问题。

然而，战争进程的差异并非东欧的种族关系比西欧更为紧张的唯一原因。东西欧战后建立的政权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同样也是重要原因。在西欧，盟国不仅建立了要求不同族群和谐相处的制度，而且以实际行动提供了各族群和谐相处的示范。西欧盟军由六大洲数十个国家组成。军政府包括来自世界四大国的代表，四大国只能设法彼此协调。这也意味着，正是西欧行政当局的世界主义改变了人们的偏见。例如，比利时的瓦隆人太过担心自己的女儿被美国大兵占便宜，以至于不太关注与佛兰芒邻居的紧张关系。[2]

人们可能会期待苏联对东欧采取类似态度：他们的国际主义原则，要求各国工人团结起来，追求共同目标。但实际上，无论是在苏联国内，还是在即将成为苏联卫星国的东欧国家，它们都在迫害少数民族。正是苏联，推动波兰与乌克兰进行人口交换。正是苏联，支持波兰将德意志人逐出“光复领土”。正是苏联，坚持在东欧其他地区驱逐德意志人。在巴黎和会期间，英美两国拒绝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有驱逐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权利，但苏联代表团对此大力支持，而且苏联还在自己占据统治地位的所有国家，支持类似的种族驱逐行动。[3]

苏联并未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反对种族仇恨和族群仇恨，反而试图利用仇恨。他们采取了许多民族主义政策和种族主义政策，让战后欧洲符合苏联的需要。首先，背井离乡的人们比固守家园的人们更加容易受到控制。驱逐行动造成的混乱局面，也造就了宣扬革命的理想气氛。被难民抛弃的土地和财产，可以被没收，重新分配给工人和穷人，从而促进

共产主义进程。这种做法也在获得土地的人群当中造就出新的忠诚，他们把共产党视为捐助人。通过在全欧洲推进共产主义，苏联也推进了对莫斯科的忠诚，因为莫斯科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民族主义者都不愿太轻易被苏联利用。他们乐意一个超级大国支持他们的驱逐政策，但他们不乐意让苏联任意插手。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乐意向当地共产党移交权力，他们把对方视为苏联的傀儡。

西方盟国也同样难以被说服。在目睹苏联在东欧的所作所为后，西方盟国开始怀疑，苏联的意图不仅仅在于在忽略“居民自由表达意愿”的情况下驱逐德意志人。

于是，在战后种族暴力急剧增加的同时，更大范围的新冲突也正在酝酿。在地方层面是欧洲各国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一系列权力斗争，在欧洲层面则是超级大国的冲突，这预示着欧洲大陆内战新时代的到来。

---

[1] Shephard，Ben，*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p.158；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p.50-55.

[2] 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pp.92-7.

[3] 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86-7；Janics，Kálmán，*Czechoslovak Policy and the Hungarian Minority*，*1945-1948*，trans. Stephen Borsod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p.136-9.

第四部 内战

我们这些欧洲解放见证者都知道，共产主义者有充分理由害怕那些紧握自由不放手的人们。或许正因如此，共产主义阵营表现出某种进攻态势，决心扑灭所有建基于个人自由的政府架构。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48年 [1]

---

[1] Eisenhower，Dwight D.，*Crusade in Europe* （London：Heinemann，1948），p.521.

第二十二章 混战

1943年秋天，一支意大利游击队潜伏在上威尼托地区的阿尔卑斯森林，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将会严重考验他们的忠诚。这支部队隶属于一个共产党作战旅，他们既要对付德国人，又要对付名义上控制北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阶级。这个作战旅刚刚组建完成，仍然缺乏游击战经验。

有一天，这支部队偶然发现了三名德军士兵，这些士兵正在当地疗养，到树林里散步，完全没有发觉危险的“土匪”正在逼近。游击队只好把他们俘虏，抓到俘虏当然高兴，但此时游击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应该如何对待这些俘虏呢？正常情况下，游击队应该把俘虏关押在战俘营，但在游击战中这根本不可能。几番争论过后，游击队确信已别无选择，只能枪决俘虏。

这个决定马上让这支部队陷入混乱。没有游击队员想要执行这项可怕的任务，而且许多人严重质疑这一判决。在审讯期间，这三个德国人透露，在和平时期，他们都曾是普通工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杀死工人兄弟当然是不对的，纵使他们是德国人又如何？而且，他们都是被征召入伍的，因此他们也是资产阶级军队的受害者，他们被驱赶着加入一场违背他们意志的战争。争论过后还是争论，这支部队又举行了一次投票，通过投票决定是否释放德军俘虏。

这个故事也许是敌人之间同病相怜的罕见而感人的例子，且不论其结局如何。三天之后，通过被释放的德军俘虏口中得到的情报，德国国防军大举进攻整个地区，并且展开地毯式搜索。游击队饶恕了这些德军俘虏的生命，但未能促进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却让自己陷入被消灭的危险。游击队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从那天起，他们毫不留情地枪决所有俘虏。[1]

出于对21世纪人类安全的期许，我们宁愿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同盟国与轴心国为交战双方的冲突，是一场独一无二的、说一不二的冲突。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双方的动机和立场都是显而易见的：纳粹及其帮凶为统治欧洲而战，而同盟国为“自由世界”而战。这是一场是非之争，更简单地说，这是一场正邪之争。

当然，事实要复杂得多。在上述故事里，意大利游击队至少同时有三个战斗理由：第一，把德国人赶出意大利半岛；第二，击败法西斯主义者，从20世纪20年代起，法西斯主义者就控制了意大利；第三，发动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者及其统治机构，将权力交还给意大利的工人和农民。因此，正如邻国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那样，他们同时在进行三场平行的战争：民族战争、国内战争、阶级战争。[2]上述故事说明，对于游击队来说，有时难以分辨这三场战争的轻重缓急。

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类似情况在全欧洲比比皆是。隐藏在主要冲突背后的是无数场地方战争，在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着不同的特色和诱因。在某些个案中，人们为阶级分歧或者政治分歧而冲突。在其他个案中，人们为种族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而冲突。这些有所差别、相互平行的冲突，在过去乏人问津，因为这些冲突打乱了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简单想象。

我曾经数次提及，我们的战争记忆是建立在民族团结神话的基础上的：但正是这一点，足以解释那些神话其实何等脆弱。例如，法国在战时和战后都说不上团结。在地理上，法国分裂为北部与盟军解放的东南部、自行解放的中部和西南部，法国东部和大西洋沿岸还短暂存在过几个德军占领区。在政治上，法国分裂为只想恢复战前状态的团体与共产党那样还想爆发社会革命的团体。法国的民族抵抗组织法国内地军（Forces Françaises de l’Intérieur）是由许多完全不同的团体组合而成

的，他们的共同点仅仅在于希望看见维希政权倒台。一旦这个目标实现，就不再有任何强烈的动因维持组织的团结，抵抗组织的不同宗派很快就会大打出手。

在法国，主要的内部冲突在左翼势力特别是强大的自由射手游击队（Francs-Tireurs et Partisans）与戴高乐的中右翼追随者之间展开。但即使在这些团体的内部，也存在暴力冲突。例如，左翼分裂为彼此竞争的宗派，共产主义者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诸如此类，层出不穷，他们经常彼此指控对方为维希政权充当间谍。时至今日，已经无法说清楚，那些被当成告密者枪决的到底是真正的维希特工，还是共产党在当地实行内部清洗的受害者。[3] 西班牙共产党人多数是在西班牙内战末期逃亡到法国的，他们在内部清洗方面尤其冷酷无情。根据相关资料，1944年的最后三个月，大约有200名西班牙流亡者被刺杀，他们与占领者毫无干系，只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看到，解放是除掉非斯大林主义对手的适当时机。[4]

因此，尽管在民族层面法国还有着团结的外观，但在法国各地，在各个层面，法国都是不团结的。意大利也是如此，共产党游击队与温和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联盟，随着战争结束而迅速破裂。希腊也是如此，各种各样的抵抗组织彼此刀兵相向，甚至不惜与德国人达成地方约定，以便集中火力从事他们各自的战争。斯洛伐克也是如此，1944年反抗德军的起义产生出许多答案，人们无法确定是应该投靠苏联、德国、捷克，还是同时反对它们。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要承认这些地方混战的平行属性从来绝非易事，因为那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对于历史学家是如此，对于普罗大众也是如此。首先，在我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和神话中，有一条政治尺度。如果我们把战争简单地记忆为正邪之战，那么，战争就是师出有名。记忆的改变也会引起认知的改变：不仅撕碎了我们最为珍视的正邪观念，而且让以前

的“反面人物”有机会为自己申辩，这是福是祸，难以预料。全欧洲的新法西斯团体总是用以下借口来为自己的战时行径辩护，即他们只是为了对抗“更为邪恶”的国际共产主义。由于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他们的申辩似乎就有了理由。

其次，更为直接的后果是，承认这些平行混战将会挑战我们关于何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体概念。如果针对德国的国际战争只不过是某场更大冲突的组成部分，那么，就有理由推断，德国战败并不意味着战斗结束。因为主要战事结束，并不意味着各种各样的地方战事同样结束。正好相反，有时外部敌人的消失，仅仅意味着当地人可以集中精力相互仇杀。我们已经看到，在地区层面上是如何展开不同族群之间的特定冲突的。但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在整个欧洲层面上，正在展开左右两派之间的战斗。

在以下几个章节，我将会描述战后历史中最为暴力的几个片段，并且告诉大家，这些片段根本无“战后”可言。有些片段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政治斗争的延续。有些片段是数十年来紧张局面的沸点，战争结束后紧张局面继续沸腾。

在每宗个案中，起码在一定程度上，结果总是大局已定。一旦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在莫斯科、雅尔塔、波茨坦大笔一挥，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则三大国都不能容忍对其所代表的政治制度的重大背离。这是超级大国的年代，地方政治分歧只能退居于大国政治之后。在每个国家，内战将会成为欧洲大陆范围内全新两极斗争的表现，一方是共产主义势力，得到苏联支持，另一方是资本主义势力，得到美国支持。那些衷心希望“自由人民”将被允许“以自主方式实现自主目标”的理想主义者，注定要伤心失望。[5]

---

[1] Interview with former partisan “G.V.”，in Alessandrini，Luca，‘The Option of Violence-Partisan Activity in the Bologna Area 1945-1948’，in Jonathan

Dunnage（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 （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68.关于类似事例，参阅Pavone，Claudio，*Una guerra civile*：*Saggio storico sulla moralità nella Resistenza* （Turin：Universali Bollati Boringhieri，2006），pp.465-6。

[2] 参阅Pavone，who pioneered this view，*passim* 。

[3] 如可参阅the treatment of Trotskyist leaders Joseph Pastor and Jacques Méker，in 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 （Paris：Perrin，2001），pp.216-27。

[4] 参阅Pike，David Wingeate，*Jours de gloire*，*jours de honte* （Paris：Société d'Édition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1984），p.73。

[5] President Truman's famous “Truman Doctrine” speech，引自Kennan，George F.，*Memoirs 1925-1950* （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1967），p.320。

第二十三章 法国与意大利之政治暴力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尘埃落定之时，人们开始为自己刚刚经历过的事情寻求解释。战争年代搁置的问题，此时再被提起。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在第一场大战后旋即陷入第二场大战？为何未能及时制止希特勒？为何本国政治家未能保护本国民众，使其免受占领、剥削和破坏之苦？谁要对此负责，为何责任人仍未被清算？

毫不意外的，许多人此时对旧政权持轻蔑态度。人们试图清洗欧洲大陆的行政机构，但对某些人来说这还不够。他们坚信，整个政治制度都出了差错，如果人们想要避免未来的战争和不公，人们就应该寻找更有包容性的新的自治形式。激进之风席卷而来，随之而来的将是战后时期最为暴力、最为悲惨的片段。

如果盟军想要得到人心思变的证明，那么，几乎从他们踏足欧洲大陆时起，他们就已经感受到了。1943年9月，英美盟军正忙于把德军逐出意大利南部，他们惊奇地发现，他们解放的许多村庄此时都揭竿而起，并非针对盟军，亦非针对德军，而是针对意大利政府。在超过20年的法西斯统治之后，在几代人饱受不在地主制剥削后，许多村民都急于翻身做主人。最好的例子是坎帕尼亚地区的卡利特里（Calitri）村。解放后，卡利特里村的村民一致声称将实行自治。为了表明决心，他们把村庄周围的地区重新命名为巴托吉奥共和国（Republic of Battocchio），在村民的领导下，当地宣告脱离意大利而独立。[1]

在宏观视角上，此事只不过是毫不起眼的小事件，它曾经是孤例，但实际上，它是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和撒丁岛许多采取类似行动的村庄的缩影。在每宗个案中，村民采取的首要行动，几乎都是瓜分当地贵族、政府或者教会占有的未开垦土地。村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村民

饥肠辘辘，他们把未开垦土地视为资源浪费，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土地养活自己，也可以为社区谋点福利。在许多地区，农民还记得，在意大利统一（Risorgimento）期间，贪婪的贵族夺去了公有土地，因此，农民认为自己只不过是通过夺回公有土地来纠正历史错误而已。

不用说，地主的看法肯定与农民不同。更重要的是，新政府（正如我们所说的，许多地方的新政府也不那么新）明确表示要维持现状。在卡利特里村，盟军部队和宪兵进村才几天，共和国就被镇压了，土地被归还给原来的地主。其他地方的情况相同。在撒丁岛的奥尼费里（Oniferi）村，战斗持续了两天，结果一位村民被杀，几位村民受伤。在卡拉布里亚的考洛尼亚（Caulonia）农民共和国，以及斯蒂尼阿诺、斯蒂洛、蒙纳斯特拉齐、里亚齐、帕拉卡尼卡、比冯吉、卡米尼、帕扎诺以及许多其他地方，农民起义都被武力镇压了。[2]

上述事件也许足以表明，经历过战争震荡的意大利南部多么脆弱。每个村庄都理直气壮地宣告建立独立共和国，因为他们在地理上和政治上都与中央政府断绝了联系。他们把战争造成的中央权力暂时缺席视为亲手夺取权力的难得机遇。

然而，更重要的是，上述事件表明，某些村庄急于进行社会改革。与人们的预期正好相反，在上述起义中，只有极少数起义是由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因为在1945年以前，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其实尚未进入意大利南部。农民起义是自发抗议，是由痛恨社会不公的当地人组织起来的。[3]

战后进行社会改革的巨大渴望，不仅存在于意大利，而且存在于全欧洲。正是这种改革渴望，在欧洲大陆催生了数十个新政党；改革渴望还催生了数百份新报纸，左翼作家在这些报纸上提出进行社会改革的主张；改革渴望还催生了支持工人权利、支持经济改革、反对社会不公和司法不公的游行示威。战后时期见证了左翼声音的大爆发，这实际上是

纳粹占领时期被残酷镇压的力量得以重生的结果。即使在英国，这个从未被占领的国家，人们也在战后投票支持社会改革：1945年夏天，英国人抛弃了丘吉尔的中右翼政府，选举了英国历史上最为激进的左翼政府。

在欧洲绝大多数地区，从这种向左转的态势中获益最多的政治组织，无疑是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政党。他们不仅牢牢抓住了欧洲大陆的社会改革热情，而且他们是武装抵抗纳粹统治的骨干力量，由此得到了人们的道德认同。再加上他们与苏联结成同盟，而许多人又把苏联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胜利者，共产主义似乎成为欧洲政坛上势不可当的力量。我们关于冷战的集体记忆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有相当大部分的欧洲民众，把共产党视为英雄，而非恶棍。

而且，共产党不仅在后来形成东方阵营的国家里大受欢迎，它们在后来位于铁幕以西的国家里也颇得人心。在挪威和丹麦举行的战后选举中，共产党赢得12%的选票，在比利时是13%，在意大利是19%，在芬兰是23.5%，而在1946年11月的法国选举中，共产党获得28.8%的高票数，让共产党成为法国第一大党。[4] 更重要的是，在全欧洲，共产党都拥有大批忠诚的积极分子：例如，在法国，共产党拥有90万名党员；在意大利，共产党拥有225万名党员，这远远超过波兰甚至南斯拉夫的党员人数。在西欧，共产主义既是一场巨大的民众运动，也是一场庞大的民主运动。[5]

然而，也有许多人对这场群众运动深感困扰。丘吉尔总是抱怨社会主义的极权之恶，“其更为暴力的形式就是共产主义”，早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之前，丘吉尔就已经作如是观。[6] 在夏尔·戴高乐怀疑的诸多团体中，共产党轻易名列第一。在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私下对朋友说：“害怕未来的共和国会从左翼那里学习太多。共产党的团结、勇

气、组织、手段，让他们跟过去的法西斯主义那样具有威力。”[7] 甚至美国国务院也担心，“共产党在欧洲的发展模式，会让他们获得超过其实际人数的影响力，最终他们可能通过公开抹黑或者清洗消灭反对派”。[8]

这种恐慌与怀疑是由于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许多人为之而战斗的价值：国家主权。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不是解放法国或者意大利，而是要让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因此，许多欧洲政治家担心，共产党会把阶级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戴高乐尤其记得，1939～1940年，法国共产党拒绝对抗德国，因为当时德国仍然与苏联结盟。换言之，如果要在法国与苏联之间做出直截了当的选择，他们会选择苏联。

在更为抽象的层面上，在共产党脱颖而出的过程中，触动了太多欧洲多数居民习以为常的敏感点。共产党不仅反对中产阶级坚持到底的所有价值，如宗教、家庭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而且还要以暴力来达成目标。按照《共产党宣言》，共产党的目标就是“以武力推翻所有现存社会秩序”。[9]

在多年的野蛮冲突以后，绝大多数人最不想见到的就是一场新的阶级战争。不幸的是，在某些地区，即将上演的正是阶级战争。

政治暴力之对象

关于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有某些过分夸张的描述，因此有必要花双倍精力来澄清事实。首先，没有证据证明，法意两国的共产党领导层试图在战后初期夺取权力；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在鼓动政治暴力，实际上，他们曾经竭尽所能劝阻政治暴力。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亲自访问国内最无法无天的地区，劝告地区和行省的共产党领导人，好好约束党员，确保仇杀停止。无论是在私人场合还是公开场合，他都反复强调，任何社会改革运动都必须以民

主非暴力的手段实施。他甚至把党内某些鼓吹暴力的党员开除出党。[10] 同样，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明确表示，“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珍惜民族团结”。换言之，为了重建国家，共产党必须牺牲他们对激进社会改革的渴望。总体而言，多列士以及党的领导层都因为致力于恢复公共秩序而受到政府的赞誉。[11]

然而，党的领导层表达了与政治对手合作的意愿，并不意味着基层党员也有同样的意愿。在意大利和法国，都出现了“政治家”与“游击队”的决裂。后者参与了所有战斗，自认为有权让前者听从后者的政策：借用意大利游击队其中一位领导人瓦尔特·萨凯蒂（Walter Sacchetti）的说法，“是我们解放了你们”。[12] 从解放之初，法意两国就有许多干部对党领导层的路线感到失望。在法意两国许多地区，许多游击队员开始无视上级的指示，亲手执行法律。少数游击队员甚至煽动当地人，对传统的阶级敌人实施小规模清洗。这实际上已经是小型革命了。

我们很难看清楚，这些暴力少数派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由于缺乏领导层的支持，他们的行动不太可能取得任何长期的政治成果，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动机经常带有政治性。要弄清楚他们的目标和任务，也许最好的办法是，看看谁是受害者，看看受害者有何共同点。

在这些小型革命中，共产党的首要攻击对象经常是警察部队。这也许毫不让人意外，毕竟警察代表了声名狼藉的战时政府。然而，有许多袭击事件似乎与警察是否通敌卖国无关，而是完全出于长久以来的积怨。例如，在法国的许多地方，在战争爆发初期共产党员曾经遭到警察的围捕，因为他们效忠于斯大林（斯大林当时仍然与希特勒结盟），他们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解放后，某些法国共产党员可以把矛头指向曾经参与围捕的警察，仅仅因为这是公报私仇的绝好机会。[13]

其中一位受害者是阿贝尔·博内（Abel Bonnet），他是科涅克地区

的警察头目。博内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曾经在大战中负伤受勋，他曾经在敌人占领期间勇敢地参与各种抵抗活动。然而，当地的共产党员还记得，在1939年，博内曾经下令逮捕他们的武装同志。1944年9月，当共产党员解放科涅克地区时，这段往事拖累了他。博内被逮捕，并被带到附近的昂古莱姆（Angoulême），他在煤窑里被关押了两个月。在这里，他被左轮手枪击伤头部，几乎窒息而死。等到他被释放时，他已经无法在没有别人搀扶的情况下走路了，而且由于遭到反复殴打，他总是受到耳鸣困扰。他没有受到审讯，甚至没有被冠以任何罪名。有一次，他被带到当地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皮埃尔司令”面前，他问及自己为何被逮捕，却只换来一句含糊其辞的回答：“我只听命于斯大林。”[14]

博内的经历也得到另一位被关押在昂古莱姆同一个煤窑的犯人的佐证。菲利克斯·桑吉内蒂（Félix Sanguinetti）是一名抵抗战士，但隶属于戴高乐派的秘密军（Armée Secrète），尽管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他们应该被视为法国共产党的盟友。当桑吉内蒂被带到皮埃尔司令面前时，他只听到同一句话：“戴高乐、柯尼希还有其他家伙都应该下地狱。我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斯大林。”然后，他也被关进煤窑，在那里继续见证对方的野蛮行为。[15]

我们不可能弄清楚，在法意两国到底有多少警察因为反共经历，而非因为通敌卖国，成为攻击对象，但有大量事实证据表明，类似现象在法意两国相当普遍。很有可能的是，许多人被冠以“法西斯分子”或“通敌卖国者”的罪名，仅仅是为了损害他们的权威：如果警察都不可信，那么，人们就更有可能依靠游击队员来维持法律和秩序。在东欧，这是共产党屡试不爽的斗争策略。

另一个传统的“阶级”敌人是雇主阶层，包括那些剥削工人从中取利的厂长、经理。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中南部许多工业城市，战后出现过权力架构的暂时逆转，工人建立了委员会，以调查雇主的战时行为。

1945年年初，仅仅在里昂的工厂和商户，就出现过160个“爱国委员会”，尽管这些委员会根本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16] 在都灵，工人接管了菲亚特工厂，工厂主管几乎被射杀在工厂的院子里，但最终侥幸逃脱。1945年5月，来自美国国务院的观察员发回报告，工厂里有全副武装的枪手在巡逻，“管理完全被忽略”。[17] 在解放后几个月内，就有几位著名意大利商人被杀，包括基督教民主党的工业家朱塞佩·韦尔代里（Giuseppe Verderi），以及阿纳尔多·维斯基（Arnaldo Vischi），他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最大的工业集团的副总经理。[18]



8.截至1944年8月23日法国抵抗组织独自解放的地区

更加容易遭到攻击的是贵族阶层，尤其是与法西斯党有瓜葛的贵族。仅仅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战后就有103名地主被杀。[19] 最为著名的例子是谋杀曼佐尼（Manzoni）伯爵家族，事发地点就在拉文纳省卢戈（Lugo）附近的他们家族的乡村府邸。伯爵有三兄弟，都是公开

的法西斯党徒，他们是当地的主要地主以及当地最有权势的家族。他们在解放期间设法躲过了公审，但在战争结束后，他们拒绝与佃户重新协商分成租约，也拒绝修复战时受损的农场，这将被证明是覆水难收的错误。1945年7月6日，忍无可忍的前游击队员冲进府邸，不仅射杀了伯爵三兄弟，而且射杀了他们的母亲、仆人和狗。谋杀事件发生后，当地全体村民摧毁了府邸，而且自行瓜分了伯爵家的衣物和财物：这个片段可算是农民反抗长期压迫人的封建制度的缩影。[20]

在法国，贵族同样成为攻击对象，且不论他们是否通敌卖国。例如，莱维-米尔普瓦（Lévis-Mirepoix）公爵，他没有罪过，但他的头衔几乎让他难以逃脱帕米耶（Pamiers）“人民法庭”的死刑判决，因为新任省长阿列治（Ariège）关闭了当地法庭。皮埃尔·德·卡斯泰尔巴雅克（Pierre de Castelbajac）是来自图卢兹北面塔布（Tarbes）的伯爵，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似乎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人曾经通敌卖国，但当人们发现他的火十字团（Croix-de-Feu，战前一个极右翼政党）党员证时，罪名就坐实了。他遭到殴打，然后被匆匆处决。[21]

类似事件发生在法国各地，但夏朗德、多尔多涅、利穆赞、普罗旺斯的小贵族受害尤其严重。[22] 在维埃纳，一位名叫亨利·雷耶-苏尔特（Henri Reille-Soult）的男爵在猪圈里被关押了几个星期，经常遭到殴打，最终于1944年10月被处决。他不仅不是通敌者，他反而是英国战时情报网络的成员。[23] 克里斯蒂安·德·洛热里尔（Christian de Lorgeril）伯爵是一位在卡尔卡松受勋的战争英雄，但仅仅因为其贵族头衔和君主派立场就被处决了。按照人民共和运动（Mouvement Républicain Populaire）机关报《黎明报》（*L’Aube* ）的说法，他在临死之前饱受折磨：他的手指和脚趾被撕裂，他的双手和双脚被打断，他被烧得发红的刺刀反复刺入，最后被扔进倒满汽油的浴缸里烧成了灰烬。[24]

另一个容易遭到攻击的对象是教士，他们是共产党的传统敌人。在

图卢兹，城内谣言四起，说法西斯分子米利斯（Milice）在当地教堂的塔楼上架设了射击点，这个谣言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1944年8月起义期间，城内的教堂遭到破坏，并且遭到机枪扫射。在法国西南部，教士被抵抗组织殴打、折磨、处决的例子比比皆是，但通常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教士通敌卖国。[25] 在意大利，教士也经常遭到攻击，这既是因为他们有协助法西斯党的嫌疑，也是因为他们总是在布道坛上谴责共产党。[26]

最后，最重要的是某些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宗派开始袭击他们的民主派对手。法国解放初期，共产党领导人的确试图控制地方，尤其是法国西南部。在图卢兹，戴高乐派的共和国特派员被迫对抗共产党领导人的夺权行动，并且只有在抵抗组织指挥官的武力支持下才取得了成功。[27] 在尼姆，戴高乐派的省长遭到当地共产党领导人的持续威胁，有一次几乎被对方逮捕。只是在共和国特派员雅克·布南（Jacques Bounin）抵达后，他才被解救出来。[28]

在意大利，针对政治对手的暴力活动更加极端。暴力活动的中心是所谓的“红色三角”（Red Triangle），甚至被称为“死亡三角”（Triangle of Death），这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一片三角地带，夹在博洛尼亚、雷焦艾米利亚、费拉拉之间。1945年夏天，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谋杀案发生在此地，让基督教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脆弱的同盟关系变得极为紧张。6月2日，一位名叫安东尼奥·里齐（Antonio Rizzi）的工程师及其儿子埃托雷（Ettore）在诺南托拉（Nonantola）被谋杀。两父子都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人士，埃托雷甚至当过游击队员，但他们都是基督教民主党人。这并非激情犯罪，而是特定的政治谋杀，意大利人称为“漂亮谋杀”（omicidi eccellenti，换言之，对碍手碍脚的显要人物进行“必要的”谋杀）。六周后，在同一个城镇，一位基督教民主党员、解放委员会成员也被杀害。针对基督教民主党人的谋杀也发生在邦波尔托（Bomporto，6月8日）、拉马莫科尼奥（Lama Mocogno，6月10日）、

梅多拉（Medolla，6月13日）。[29]

此后一年，随着反共情绪开始明朗化，又一轮漂亮谋杀在同一个地区上演。1946年6月，以上述的基督教民主党工业家朱塞佩·韦尔代里被杀开始，至8月，以自由派律师费迪南多·费廖利（Ferdinando Ferioli）、出身社会党的卡萨尔格兰德（Casalgrande）市市长翁贝托·法里（Umberto Farri）、宪兵上尉费迪南多·米罗蒂（Ferdinando Mirotti）被杀告终。[30]



9.1945~1946年的意大利

必须强调的是，所有上述事件都是具体个案，并不能由此得出共产党密谋在法国和意大利夺取全国政权的结论。实际上，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共产党领导层似乎已经极力约束党内的边缘极端宗派。领导层明白，在法意两国，发动革命的客观条件并不存在，但某些党员似乎并不明白。

然而，某些地区领导人缺乏这种大局观，他们显然相信，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发生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大量暴力事件表明，有相当比例的党员仍然执着于暴力革命。某些党员显然是被复仇动机所驱使，或者被正义只能亲手实现的观念所驱使。其他党员则有更多打算，他们攻击阶级敌人，且不论受害者在敌人占领期间扮演过什么角色。某些党员想通过恐吓政治对手让对方闭嘴。其他党员试图在民众当中引起恐慌，一如他们在战时的做法。他们的行动缺乏焦点，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但共同点是，他们都相信革命不是即将来临，而是已经来临。

接下来的岁月里，在意大利和法国，许多共产党员都指责他们的领导层未能实施果断的暴力行动。他们醉心于地区层面的成功，在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一度控制好几个城市甚至一两个地区，他们相信，如果党的领导人抓住时机，这种成功本该转化为全国的胜利。但由于缺乏中央协调，他们的零星革命尝试注定根基不稳，最终归于失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战后初期的政治暴力毫无影响。正好相反，其影响极为深远，但与当地煽动者的期望相去甚远。

反应

前游击队员和共产党基层党员的好斗精神，并非无人注意。战后初期，这种好斗精神被归因于解放后暂时存在的无法无天的总体气氛，许多历史学家迄今为止都持有这种观点。[31] 后来，随着暴力活动持续，人们发现这不仅仅是短期现象，恐慌情绪开始蔓延。谣言到处流传，说

共产党已经失控，更糟糕的是说共产党的暴力活动是更有组织的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在巴黎，有谣言说法国西南部已经陷入恐怖统治，图卢兹已经宣布成立共和国，戴高乐派驻当地的代表皮埃尔·贝尔托（Pierre Bertaux）已经被共产党囚禁。贝尔托不得不亲自回到巴黎以澄清谣言。[32] 在意大利，到处流传着米兰和都灵爆发武装起义的传闻，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崩溃和共产党即将接管整个国家的谣言。共产党的敌人当然会利用这些谣言浑水摸鱼，添油加醋以激起民众恐慌。某些意大利反共分子也承认，这些骇人听闻的谣言纯属无稽之谈，并且被“渴望挑起反共情绪的右翼分子”故意夸大。[33]

在意大利南部，地主、商人、警察头目、地方法官以及其他中产阶级显要人物，利用人们对1943年占地运动的记忆，反对左翼官员组成的行政机构。他们为自己的地产、财富、名位感到担忧，但他们却声称共产主义带来国内不安，将会动摇同盟国军政府在新解放地区的统治。结果，右翼代表甚至某些前法西斯党徒，被任命到地方的实权职位上，而这仅仅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34]

在意大利北部，解放期间的暴力活动曾经更加猛烈，右翼和中右翼党派将人们对左翼暴力活动的恐慌作为竞选活动的踏脚石。1947年1～2月，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死亡三角”频频出现在《新闻报》（*La Stampa*）和《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这样的报纸上。[35] 及至3月，一篇刊登在《人道报》（*L’Umanit* à）上的文章提到，红色战斗团（Red Squadristi）必将引发一场“意识形态和现实恐怖”的战斗。[36] 这明显是要从左翼手中夺取道德制高点，方法就是把前游击队员从英雄抹黑为暴徒。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法国，关于游击队暴力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成为媒体上的陈词滥调。1947年，出身于社会党的总理保罗·拉马迪埃（Paul Ramadier）把持续高涨的罢工行动仅仅归咎为共产党的煽动，但

实际上，罢工主要是由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日趋严重的食物短缺、快速下降的生活水平造成的。5月5日，他把共产党阁员逐出了政府。然后，他又揭发了好几个共产党“阴谋”，如对老兵事务部（Ministry of Ex-Servicemen）的渗透。甚至有谣言说，法国境内正在组建“国际纵队”（International Brigade）。[37]

然而，无论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家如何诋毁共产党在其国内的煽动行为，国际共运才是真正的焦点。真正让中右翼感到恐慌的不是地区城市的零星暴力活动，而是发生在东欧的全面镇压。法国和意大利的报纸登载越来越多让人担忧的消息，这些消息来自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并且暗示，如果放任共产党取得权力，同样的镇压将会在意大利和法国上演。

同样对此感到担忧的是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1947年2月19日，美国驻法国大使声称，巴黎“确实是共产国际特工的蜂巢”，而且“苏联的特洛伊木马”被“伪装得如此之好，数百万共产党好斗者、同情者、投机者竟然相信，捍卫法国的最好方式是把法国的国家利益等同于苏联的目标”。[38] 此后不久，迪恩·艾奇逊也抛出类似论调，他把出现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共产党力量视为苏联随时接管法国的征兆。[39] 与此同时，在意大利，派驻罗马的外交官大谈意大利国内的“恐慌性精神病”，并且提醒美国国务院，有5万名甚至更多的训练有素、全副武装的共产党员，随时准备在意大利北部发起暴动。[40] 上述事实表明，只要有人在法意两国社会散播谣言，就足以在盟国之间引发轩然大波。实际上，有好几次，美国人似乎比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更加害怕法意两国出现动荡。美国躲在幕后，大力支持反共政党，而且威胁道，如果共产党在选举中赢得权力，美国就将撤回所有援助。[41]

在法意两国，政府对恐慌的反应颇为笨拙，但相当有效。在1947年秋天又一波罢工和骚乱浪潮后，在某些人心惶惶的破坏事件如巴黎-图

尔昆快车出轨事件后，法国内政部部长茹尔·莫克（Jules Moch）宣布全面动员纪律部队，包括征召所有预备部队和民防部队。在激烈的议会辩论过后，共产党议员埃罗（Hérault）被逐出内阁，此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以平息骚乱。[42]

在意大利，共产党在1948年选举中遭受重大挫败，当年7月又有人企图刺杀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党内怨气很大，国内的情况比法国更加动荡。共产党员通过发动一系列罢工、骚乱、绑架来宣泄挫败情绪，甚至破坏了意大利南北铁路干线。[43] 结果，意大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共措施，大批工会会员、游击队员、共产党员被逮捕。这次逮捕行动可被视为公开恐吓。1948年秋至1951年，共有9万～9.5万名共产党员和前游击队员被逮捕，其中只有1.9万人被起诉，约7000人被判罪，其他人在“预防性拘留”中被关押了长短不一的时期。核心党员，尤其是前游击队员，受到最为严厉的对待。1948～1954年，在1697名被逮捕的前游击队员中，共有884人被处以共计5806年的徒刑。尽管早在1946年就有既往不咎的大赦令，但某些人还是因为解放期间的犯罪行为而受到审判。且不论这些人是否罪有应得，这次“抵抗组织大审判”比起之前对法西斯党徒的清洗可要严厉得多。审判传递出清晰的信息：1945年的“英雄”，这些把意大利北部从法西斯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英雄”，最终成为新的敌人。[44]

所谓“失去的胜利”

考虑到战后弥漫于法国和意大利各个社会层面的恐慌情绪，我们不得不提出如下问题：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可能性有多大？当时，人们显然对这一威胁严阵以待，而我们则可以后见之明说这不过是杞人忧天。共产党在法意两国都从未赢得超过1/3的选票，即使算上暂时结盟的社会党，在法国也只是接近绝对多数。共产党夺取权力的唯一希望，仅仅在于说服同盟者不仅让共产党员出任总理，而且让共产党员控制所有重要部门。但正如派驻意大利的盟军观察员于1945年7月所说的，右翼政党

和中间政党绝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因为他们断定，共产党想要建立一党制国家："允许左翼掌权，等同于自己为自己签发死刑判决书。"[45] 在法意两国，共产党员屡次被排除在政府的重要职位之外。

因此，共产党赢得绝对权力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动全面革命。即使意大利和法国民众一度倾向于这种结果，西方盟国也绝对不会同意。解放后数月间，英美两国分别在法意两国派驻了重兵，其兵力足以镇压共产党起义。后来，随着盟国逐步退居幕后，美国更加倾向于通过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树立权威。德·加斯佩里把共产党阁员逐出意大利政府，只有在意大利获得大量投资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同样，法国人知道，如果他们想要重建破败的经济，他们只能依赖美国的金元。[46]

因此，所谓共产党本来能够赢得权力或者夺取权力的想法，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法意两国都依赖盟国，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法意两国政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威。法意两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1973年，意共北方指导委员会的前成员彼得罗·塞基亚（Pietro Secchia）写道：

> 如今的年轻人，在阅读我们某些浪漫主义的解放战争史时，总会留下如下印象，即我们曾经拥有权力，但（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我们不能或者不愿保持权力，不能或者不愿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但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即使是改良主义的民主政体亦无可能。实际上，考虑到意大利解放战争甚至欧洲解放战争的客观形势，我们（当我说"我们"的时候，我指的是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从未拥有权力，甚至从未能够夺取权力。[47]

陶里亚蒂和多列士曾经饱受左翼人士批评，因为他们决定让党在战后遵循民主道路。许多同志指责他们未能抓住主动权，未能带来人们期待已久的社会改革。但是，这两位领导人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明白，法国和意大利的状况并不适合暴力社会革命。他们坚信，民主道路是在法国和意大利推进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尽管这条道路未能为他们赢得任何真正的权力。

历史显然证明了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他们真的走上革命道路，那么，混乱的例子近在眼前，只要看看亚得里亚海对岸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够了。在希腊，共产党政治家决定退出民主的竞技场，结果开启了一场比纳粹的野蛮占领还要血腥得多的内战。正如我在下一章将要揭示的，在英国和美国的插手之下，这场内战将以彻底消灭希腊共产党而告终，而且此后30年都将对左翼政治势力实行残酷镇压。

*

在本章开头，我描述了1943年至1944年间，意大利南部农民自发占领土地的运动，似乎值得再花点时间解释这些事件在今后的岁月里对当地的影响。尽管没有希腊内战那么富有戏剧性，但土地占领运动以及对此的反应，也许更能代表西欧其他地区的类似情况。这些事件也说明，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正好相反，在社会主义者与“反动分子”之间，某些最为重要的战斗并非发生在城市，而是发生在乡村。

农民起义说明，在意大利南部的某些农村地区，一场突如其来的维权运动被鼓动起来了。为了利用这种情绪，意大利农业部部长、共产党员福斯托·古洛（Fausto Gullo）推出了农业改革计划。突然之间，最剥削人的分成租约被禁止。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中间人，早已因为盘剥和恐吓农民而声名狼藉，此时也被禁止。此外，如果农民向政府粮库超额出售粮食，农民将会获得额外奖励（这不仅是为了确保农民获得工资，也是为了打击极具破坏性的食品黑市）。然而，最为关键的决定是，所有未被耕种或者未被充分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在特定的期限内由农民占领和耕种，并且允许农民自行组织合作社。[48]

意大利南部的农民，长久以来都被忽视、被剥削，他们对政府这种姗姗来迟的承认感恩戴德，迅速组织起了合作社。古洛的土地改革是共产党在宣传上的一次巨大成功。1945年夏天，意大利共产党科森扎（Cosenza，在卡拉布里亚省）联合会提交的报告称：“不到一年前，农

民对我们还完全陌生，甚至对我们充满敌意”，“但现在他们加入我们，信任我们，我们支持者甚众……这首先要归功于我们在省内广泛开展的行动，分配未被耕种的土地，终结农业契约问题”。[49] 人们对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同样反映了东欧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在东欧，贵族的土地、教会的土地、中产阶级的土地、德国农民的土地，同样被重新分配。

不幸的是，对意大利农民来说，这种旨在减轻农民赤贫状况的立法措施最终彻底失败。许多地方官员从法西斯党统治时期就没有更换过，他们拒绝依法实施社会改革。所有耕种未开垦土地的申请都要经过地方委员会的听证，而地方委员会总是被地主和地方法官所把持。例如，在西西里，90%的申请都被驳回了。[50]

由于地方当局未能遵守法律的精神，深感挫败的梅索兹阿诺（Mezzogiorno）农民于1949年再次发起土地占领运动，这次运动的波及范围甚至超过上次。根据某些统计数字，大约8万名农民参与其中，但绝大多数人都被逐出了他们占领的土地，驱逐手段甚至比1943年更为残忍。[51] 在考洛尼亚（Caulonia），人们遭到当地农民的威胁，当地农民组成治安维持会，以驱散外来者。在斯特龙戈利（Strongoli），军队使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在伊索拉（Isola），劳动事务秘书的岳父被谋杀，以此作为对农民的警告。但是，最恶劣的事件发生在梅里萨（Melissa），宪兵向600名和平集会的群众开火，死亡人数不详。按照某些报告的说法，绝大多数死伤者都是在试图跑开时被子弹射中背部的。[52]

了解了上述事件，我们就能明白，为何如此众多的意大利左翼人士批评共产党领导层，批评他们寄希望于一个腐败的政治架构。此后数十年间，尽管共产党在选民当中继续受到欢迎，但共产党总是被迫靠边站，共产党提出的改革日程也总是被束之高阁。此后数十年间，政坛依旧腐败成风，农民依旧一贫如洗，尤其是意大利南部的农民更是赤贫。

陶里亚蒂也许让这个国家免于内战，但对许多意大利人来说，解放后他们白白错过了时机，未能推翻世世代代以来的种种不公正的制度。

---

[1] Ginsborg，Paul，'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Southern Italy，1943-1948'，*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 17（1984），p.89.

[2] Ammendolia，Ilario，*Occupazione delle terre in Calabria 1945-1949*（Rome：Gangemi，1990），pp.22-8.

[3] Ginsborg，Paul，'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Southern Italy，1943-1948'，*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 17（1984），p.88.

[4] 共产党只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选举中取得较好表现，1946年的得票率达到38%。参阅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10；Ginsborg，Paul，'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Southern Italy，1943-1948'，*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 17（1984），p.82；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p.79，88；Hodgson，John H.，*Communism in Finland*：*A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p.212。

[5]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88.

[6] Party political broadcast，4 June 1945，引自Cannadine，David（ed.），*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Winston Churchill's Famous Speeches*（London：Cassell，1989），pp.271-7。

[7] Letter，Alcide De Gasperi to Luigi Sturzo，April 1946，in De Gasperi，Maria-Romana（ed.），*De Gasperi scrive*：*corrispondenza con capi di stato*，*cardinali*，*uomini politici*，*giornalisti*，*diplomatici* 2 vols.（Brescia：Morecelliana，1974），vol.II，p.44.

[8] Telegram from State Dept to Rome Embassy，16 May 1945，引自Ellwood，David W.，*Italy 1943-1945*（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5），pp.184-5。

[9] Marx，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trans. Samuel Moore（Harmondsworth：Penguin，1967），p.120.

[10] 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13；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Rome：Riumiti，2004），pp.175-6.

[11] Thorez，引自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55；Novick，Peter，*The Holocaust and Collective Memory*（London：Bloomsbury，2000），pp.74-5。

[12] 引自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Rome：Riumiti，2004），p.175。

[13] 参阅Novick，Peter，*The Holocaust and Collective Memory*（London：Bloomsbury，2000），p.76；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Paris：Perrin，2001），pp.679-84。

[14] 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Paris：Perrin，2001），pp.486-9.

[15] 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Paris：Perrin，2001），pp.489-90.

[16] Veyret，Patrick，*Lyon 1939-1949*：*De la collaboration industrielle à l'épuration économique*（Châtillon-sur-Chalaronne：La Taillanderie，2008），p.194.

[17] Report in telegram，Kirk to State Department，28 May 1945，引自Ellwood，David W.，*Italy 1943-1945*（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5），p.186。

[18] 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Rome：Riumiti，2004），pp.168，176.

[19] 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Rome：Riumiti，2004），p.157.

[20] *L'Unità*，24 February 1953；另可参阅Alessandrini，Luca，'The Option of Violence-Partisan Activity in the Bologna Area 1945-1948'，in Jonathan Dunnage（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p.65-6；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11；以及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p.258。

[21] Bertaux，Pierre，*Libération de Toulouse et de sa région* （Paris：Hachette，1973），pp.63-6；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 （Paris：Perrin，2001），p.571.

[22] Aron，Robert，*Histoire de l'épuration*：*De l'indulgence aux massacres*，*Novembre 1942-Septembre 1944* （Paris：Fayard，1967），p.564.

[23] Aron，Robert，*Histoire de l'épuration*：*De l'indulgence aux massacres*，*Novembre 1942-Septembre 1944* （Paris：Fayard，1967），p.564.

[24] *L'Aube*，16 November 1950，引自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 （Paris：Perrin，2001），p.543。

[25] 如可参阅the treatment of various priests in Toulouse and Perpignan in 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 （Paris：Perrin，2001），pp.546-7，559-60，573。

[26] 如可参阅the killing of the priest Umberto Pessina in Emilia-Romagna on 18 June 1946：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 （Rome：Riumiti，2004），pp.176-7。

[27] Bertaux，Pierre，*Libération de Toulouse et de sa région* （Paris：Hachette，1973），pp.22-4.

[28] 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 （Paris：Perrin，2001），pp.523-4.

[29] 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 （Rome：Riumiti，2004），pp.168-9.

[30] 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 （Rome：Riumiti，2004），pp.174-7.

[31] 如可参阅Storchi，Massimo，*Uscire dalla guerra*：*ordine pubblico e forze politiche*，*Modena 1945-1946* （Milan：Angeli，1995），and Crainz，Guido，*Padania*：*Il mondo dei braccianti dall'Ottocento alla fuga dalle campagne* （Rome：Donzelli，1994），*passim*。另可参阅Piscitelli，Enzo，*Da Parri a De Gasperi*：*Storia del dopoguerra 1945-1948* （Milan：Feltrinelli，1975），pp.169-70。

[32] Bertaux，Pierre，*Libération de Toulouse et de sa région* （Paris：Hachette，1973），pp.109-10.

[33] American intelligence report by AFHQ Operations Division，引自Ellwood，David W.，*Italy 1943-1945*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5），p.187。

[34] Jonathan Dunnage，“Policing and Politics in the Southern Italian Community，1943-1948”，in Dunnage，Jonathan（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 （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p.34-40.

[35] Morgan，Sarah，‘The Schio Killings：A Case Study of Partisan Violence in Postwar Italy’，*Modern Italy* ，vol. 5，no. 2（2000），pp.148，158.

[36] *L'Umanità* ，29 March 1947；Ambassador Dunn to Secretary of State，1 April 194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7，vol.III，p.878.

[37] 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 ，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23-5.

[38] Ambassador Caffery to Secretary of State，19 February 194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7，vol.III，p.691.

[39] Acheson，引自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 ，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13。

[40] Ambassador Dunn to Secretary of State，7 May 1947 and 18 June 194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7，vol.III，pp.900，924.

[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8，vol.III，pp.853-4.

[42] 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 ，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29-30.

[43] “Blood on the Cobblestones”，*Time* magazine，26 July 1948.

[44] Alessandrini，Luca，‘The Option of Violence-Partisan Activity in the Bologna Area 1945-1948’，in Jonathan Dunnage（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 （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p.64；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

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 （Rome：Riumiti，2004），p.180.

[45] Psychological Warfare Bureau report，5 July 1945，引自Ellwood，David W.，*Italy 1943-1945*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5），p.193。

[46] Juan Carlos Martinez Oliva，“The Italian Stabilization of 1947：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4 May 2007），pp.18-30；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14.

[47] 引自Ellwood，David W.，*Italy 1943-1945*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5），p.190。

[48] Ginsborg，Paul，‘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Southern Italy，1943-1948’，*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 17（1984），pp.91-2.

[49] Ginsborg，Paul，‘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Southern Italy，1943-1948’，*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 17（1984），p.94.

[50] Ginsborg，Paul，‘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Southern Italy，1943-1948’，*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 17（1984），p.96.

[51] Ammendolia，Ilario，*Occupazione delle terre in Calabria 1945-1949*（Rome：Gangemi，1990），p.39.

[52] Ammendolia，Ilario，*Occupazione delle terre in Calabria 1945-1949*（Rome：Gangemi，1990），pp.45-9.

第二十四章 希腊内战

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数百万人的命运悬于一人之手，还好这样的时刻不算太多。其中一次发生在1944年10月9日晚上，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晤。与“三巨头”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的会晤相比，这次会晤规模更小，也没那么重要。美国人并未出席，但罗斯福同时向丘吉尔和斯大林拍发电报，坚持任何协议都应该“由我们三人商定，并且只由我们三人商定”。尽管如此，丘吉尔还是制定了一个他所谓的“淘气的文件”，在半张纸上写下了英国与苏联在战后一系列势力范围的百分比。例如，罗马尼亚，苏联占90%，“其他国家”占10%。保加利亚，苏联占75%，“其他国家”占25%。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都是各占50%。只有一个国家被确定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希腊，英国（也包括美国）占90%，苏联占10%。为了对上述百分比表示同意，斯大林在这份文件上打上了大大的蓝色弯钩。[1]

通过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方式，上述五个国家的战后命运就由此确定了，但实际上，这只是英苏两国外交官数月以来秘密谈判的最终结果而已。然而，这一举动同样意义非凡。我会在后面的章节提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此时最重要的是，斯大林愿意承认希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这个决定将会对希腊此后30年产生深远影响。

*

英国人总是对希腊感兴趣。希腊俯临东地中海，临近中东和苏伊士运河，因此是英国战略利益关键之所在。1941年，德国入侵希腊时，丘吉尔就曾经冒险为希腊提供援助，尽管只是换来一场命中注定的惨重失败。1944年10月，就在莫斯科会晤开始前几天，英军再次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就此而言，斯大林那大大的蓝色弯钩，只是对现实的追认：

英国军队正在向雅典进军。

然而，英国在希腊的统治却并非万事俱备。英军不是唯一为控制希腊而战的部队。与意大利和法国的情况相同，希腊也有大批游击队，实际上，早在英军抵达之前，这些游击队就已经控制了希腊本土绝大多数地区，迫使德国占领者退守到主要的城镇。最为庞大的抵抗组织是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及其附属军事组织希腊人民解放军（Greek People’s Liberation Army）。[2] 表面上，这两个游击队组织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实际上，这两个组织都由希腊共产党控制，而希腊共产党又忠诚于斯大林。战争期间，为了平衡左派的力量，英国曾经试图给其他抵抗组织提供武器和资金，但巨额资助也改变不了如下事实，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其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所有其他抵抗组织的总和。[3]

因此，可想而知，苏联对希腊的影响，与英国对希腊的影响，可谓同等重要，而且肯定超过丘吉尔在废纸片上写下的10%的份额。如果斯大林指示希腊共产党控制希腊，他们是很有可能做到的。苏联红军已经逼近希腊北部与保加利亚接壤的边界，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也与希腊北部的同志建立了联系。与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相比，1944年10月出现的英军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力量，而且当英军抵达雅典时，他们发现这座城市已经被游击队解放了。尽管如此，希腊共产党并未试图夺取全国政权。这既是因为抵抗组织相对缺乏组织能力，也是因为民族解放阵线内部有许多非共产党成员，他们威胁道，如果民族解放阵线自行夺取政权，他们就撤回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但最为关键的原因是，斯大林信守承诺：在莫斯科会晤开始时，斯大林已经向希腊派出代表团，指示共产党与英军合作。[4]

正如在法国和意大利，希腊共产党有许多基层党员，甚至某些领导层成员都无法理解为何他们要主动退让，留待别人来接手。1944年夏

天，在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激烈争论中，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萨纳西斯·哈迪齐斯（Thanasis Hadzis）抱怨道，抵抗组织被出卖了。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花费数年时间对占领者做斗争，并且已经在希腊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政权：为何此时要向英国人低头？他坚称："我们不能遵循两条路线，我们必须自己做选择。"[5] 许多希腊抵抗组织领导人怀疑，英国人是要把希腊变成事实上的殖民地，通过建立傀儡政权来统治，一如德国人此前的做法。

解放后才几个星期，英军与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关系的紧张程度就已经急剧上升了。英国军事机关对游击队充满猜忌，如同在法国那样，英军把游击队视为反复无常的乌合之众，因此总想找机会解除游击队武装。丘吉尔本人就声称，他非常期待与民族解放阵线发生冲突，并且指示盟军驻希腊指挥官罗纳德·斯科比（Ronald Scobie）将军随时准备应付政变。如果发生政变，斯科比务必动用所有武力手段，"粉碎希腊人民解放军"。[6]

反过来，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成员也极端怀疑英国人的动机。他们发现，英国人继续怂恿希腊国王，英国人正在保护某些通敌者，而不是把这些卖国贼送上法庭，英国人还把某些极端反共的官员任命到关键部门的职位上。例如，解放后的1944年10月，当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的所谓"民族团结政府"任命帕纳约蒂斯·斯皮利奥托普洛斯（Panagiotis Spiliotopoulos）上校为雅典军事指挥官时，英国人拒绝干预。德国占领期间，斯皮利奥托普洛斯与右翼反共团体过从甚密，他被希腊人民解放军视为通敌者。当一群希腊高级军官在意大利公开谈论推翻帕潘德里欧政府，代之以极端右翼政府时，英国人同样拒绝干预。[7] 英国人的这种暧昧态度以及某些英国官员的偏袒倾向，借用美国驻希腊大使的话来说，"英国人对待这个热爱自由的国家……如同对待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土著"，这意味着戏剧性的决裂只是时间问题。[8]



10.1994年游击队控制下的希腊部分地区

12月初，就在雅典解放还不足两个月的时候，决裂时刻终于来临，代表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长集体退出帕潘德里欧内阁。他们的抱怨与法国和意大利的抵抗组织政党相同：他们不愿意自动解除武装并且向新近成立的国民卫队（National Guard）移交控制权，起码在右翼通敌者被普遍清除出警察队伍之前，他们不能放下武器。然而，希腊与法国不同，希腊没有出类拔萃的、独具魅力的领导人，这个人必须在地位上足够强势、在政治上足够老练，能够约束共产党员和清洗警察队伍。希腊与意大利也不同，希腊共产党员本身不够团结，甚至不足以勉强达成妥协计划。在希腊，盟国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强迫冲突双方达成协议：与当时大举进驻法国和意大利的盟国军队相比，派驻希腊的英军部队可谓微不足道。政治僵局导致社会各层面持续紧张。作家乔治·塞奥托卡斯（George Theotokas）在日记中写道：“在雅典，只要点亮一根火柴，就能燃起熊熊烈火。”[9]

12月3日，就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长们退出政府次日，雅典街头爆发了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宪法广场（Syntagma Square）聚集，出于迄今未知的原因，警察向群众开了火，杀死至少10人，打伤超过50人。英国军队到了雅典警察不知所措时才到场维持秩序，但某些左翼人士声称，这是刻意为之的挑衅行动。[10] 无论警察开火的动机是什么，此举重新开启了刚刚平息几个星期的暴力循环。

由于对德国占领期间希腊安全部队的暴行记忆犹新，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者立刻封锁和袭击市内各处警察局。为了维持法律和秩序，英国军队此时被迫介入。最初，英国军队被希腊人民解放军的狙击手封锁在雅典市中心，但后来他们突破到城市南部，突入“红色”郊区，在那里，英国军队与希腊抵抗组织爆发了巷战。在战时和战后，这是西欧盟军仅有的一次与抵抗组织兵戎相见。丘吉尔以殖民者的傲慢口吻通知斯科比将军，他有权“在发生地方叛乱的城市，像对待被征服城市那样采取行动”。[11] 按照指示，英军炮兵用25磅重炮轰击卡萨里阿尼（Kaisariani）

的“共产党”郊区，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低空扫射希腊人民解放军的阵地，因为这些分布在松林和公寓中的阵地能够俯瞰雅典市中心。深受惊吓的和平居民发现自己置身于交叉火力之中，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英军完全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当中，大批妇女和儿童受伤和被杀。当英军卫生员来到科普瑟里（Kypseli）郊区的急救站时，他们不得不假扮成美国人，以免被怒不可遏的雅典人撕成碎片。某些在英国皇家空军低空扫射地方广场时受伤的市民说：“我们曾经喜欢英国人，但现在我们知道，德国人才是翩翩绅士。”[12]

从1944年12月到1945年1月，零星战斗开始发展为阶级战争，并且具备阶级战争的所有严重特征。一方是凶猛狂热的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战士，他们此时坚信，英国人企图恢复君主专制和右翼独裁；另一方是英国军队、希腊君主派和希腊反共派的松散联盟，许多人同样坚信，民族解放阵线试图发动斯大林主义革命。当英军包围大约1.5万名左翼同情者并且将其中过半数嫌疑犯流放到中东营地时，事态进一步升级。游击队还以颜色，在雅典和塞萨洛尼基抓捕了数千名资产阶级人质，并且强迫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向山区行进。其中数百名“反动分子”被处决，并被埋入万人坑中，而他们之所以被认定为“反动分子”，仅仅是因为他们相对富有。[13]

及至1945年1月底，双方都已在战斗中焦头烂额。2月，双方在海滨城镇瓦尔基扎（Varkiza）签订和平协议，希腊人民解放军同意解散部队、放下武器，省政府同意加快清洗通敌者。一份大赦令宣告赦免1944年12月3日至1945年2月14日间的所有政治犯罪，但不赦免“为了达成政治目的而毫无必要地伤害生命财产的普通犯罪”。[14]

假如双方严格遵守协议，那么事件也许就到此为止了。但很明显，政府此时没有能力控制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右翼武装，而且也没有自己的安全部队。一场针对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的反攻倒算即将开

始，并且最终导致了内战的爆发。

共产主义抵抗组织之特点

法国、意大利、希腊的抵抗组织战士很容易产生同病相怜的共鸣，尽管他们英勇战斗并且成功地解放了自己的国家，但战后成立的政府不仅拒绝给予任何回报，反而对他们大肆镇压。在法意希三国，共产党抵抗组织的成员都被排除在战后政府的任何实权职位之外。昔日的战争英雄，仅仅因为在战时合情合理的行为就遭到逮捕并且受到残忍迫害，而政府却任由昔日的通敌卖国者逍遥法外。更加让人寒心的是，他们在战争年代的英雄业绩被完全抹去，取而代之的是让人半信半疑的所谓共产党在欧洲搞清洗的所谓“罪恶”。右翼权势人物利用一切机会，夸大共产党发动骚乱甚至革命的所谓威胁。

然而，重要的是，右翼的说辞也并非完全子虚乌有。左翼抵抗团体也并非全是洁白无瑕的理想主义者，只为反抗暴君统治、开创美好世界而奋斗，左翼抵抗团体也有许多残忍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更加愿意借用暴君的手段，以推进意识形态改革。我们不可能给左右两派的斗争贴上黑白分明的标签：双方的手段、动机、信念都太过纠结，难以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开。战时和战后，没有一个地方比希腊更加纠结。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在希腊，冲突各方都喜欢任意使用恐怖手段对付恐慌的民众，人们发现，越来越难以避免卷入意识形态的战争。

在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在战时崛起完全是个新鲜现象。在德国占领之前，这个国家并没有大规模意识形态运动的传统，政治通常是自上而下之事，与劳动阶层无关，更加与乡野村夫无关。然而，战争期间，德国人、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的残酷占领以及随之而来的饥饿和贫困，深深触动了希腊民众。农民、工人甚至妇女，曾经与政治无甚关联，此时却把政治视为把破败疯狂的世界拉回正途的必由之路。数十万人投身民族解放阵线，因为民族解放阵线不仅提供了抵抗占领者的可能，还提

供了在战后建立美好世界的承诺。

在地方层面上，民族解放阵线可谓成就卓著，尤其要注意的是，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他们被占领当局视为非法组织，其生存发展颇为艰难。[15] 在饥荒时期，他们组织土地改革，甚至分发食物。他们重新建立了大受欢迎的“人民法庭”，这种法庭设在乡村而非地方城镇，听审人员包括地方陪审团而非费用昂贵的律师和法官，庭审使用通俗希腊语而非正式的高等希腊语，对绝大多数希腊农民来说，高等希腊语如同外语。他们在希腊各地创办了上千个农村文化团体，创办了数十个巡回演出团体，并且出版了全国都在阅读的报纸。他们开办了无数学校和幼儿园，为此前从来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们提供教育。他们鼓励成立青年团体，同时鼓励妇女解放，实际上，正是民族解放阵线于1944年首次赋予希腊妇女投票权。他们修桥铺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交通网络。这些成就在希腊偏远山区尤其显著，但遭到战后政治家的无视。按照战时派驻希腊的英国秘密特工克里斯·伍德豪斯（Chris Woodhouse）的说法：“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创造了希腊政府所忽略的成就：希腊山区的有组织状态。”正是民族解放阵线的努力，“才让文明和文化的好处首次被引入山区”。[16] 他们在希腊许多地区的民望，正是建基于他们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他们也乐意与上至乡绅下至村民的各色人等建立友谊。

然而，民族解放阵线也并不总是那么温和。从一开始，他们就不能容忍任何竞争者。与法国和意大利不同，总体而言，在法意两国，不同的抵抗团体为驱逐德国人而通力合作，但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却花费大量时间对其他抵抗团体开战，而非对占领者开战。例如，1944年4月，希腊人民解放军在罗梅利（Roumeli）处决迪米特里奥斯·普萨罗斯（Dimitrios Psarros）上校，这并非因为他叛变投敌，而是因为他是其他抵抗团体的首领。这个团体的许多幸存者，后来被称为“民族和社会解放组织”（National and Social Liberation），他们试图加入通敌

者的“保安营”（Security Battalions），因为他们此时相信，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比德国人更为邪恶。[17] 希腊共产党也把希腊民族共和联盟（National Republican Greek League）列为攻击对象，后者是活跃在希腊中部和西部的抵抗组织，他们的食物和牲畜都被希腊共产党征用，如果他们不肯脱离希腊民族共和联盟、加入希腊共产党，那么就连他们的生命也会受到威胁。结果，希腊民族共和联盟的许多成员都投向保安营。与此同时，希腊民族共和联盟的许多头面人物，包括领导人拿破仑·泽尔瓦斯（Napoleon Zervas），都转而与卖国政府甚至德国人紧密合作，结成非正式的反共同盟。[18]

战争结束后，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声称，他们的过火行为仅仅是“爱国主义的过失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与爱国斗争有关……不应受到惩罚”。[19] 但实际上，他们针对其他抵抗组织的暴力行为都是在民族主义的措辞包装下实施的，就连希腊人民解放军的缩写“ELAS”，也刻意让人联想到希腊语里面“希腊”（Ελλάς）这个单词，但这个抵抗组织的多数领导人却更热衷于阶级战争，而非民族解放战争。希腊共产党甚至反对英国人，尽管英国人为秉持各种政治信仰的希腊抵抗组织提供武器和资金，但他们也怀疑丘吉尔是君主派的同情者。[20]

在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完全控制的地区，人们经常受困于共产党地方领导人那些心血来潮的古怪念头，而这些领导人的统治可谓相当血腥。例如，在希腊偏远的东北部，一个化名为“奥德修斯”[21] 的希腊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嗜权如命。在埃夫罗斯（Evros）地区捣毁绝大多数黑市交易后，他又开始抓“叛徒”，这个罪名显然包括所有质疑他权威的人，以及那些表现出丝毫亲英倾向的人。许多人仅仅因为与奥德修斯的部下有私人恩怨就被杀害。有一次，一支特别“死亡营”被派去杀死列入名单的“告密者”，营队成员对名单上的某些姓名表示异议。营队指挥官“帖雷马科”[22] 冷冷地说：“这是革命”，“有些事总得有人干，即使杀掉几个无辜者，长远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埃夫罗斯地区的状况

如此糟糕，最终希腊人民解放军被迫更换地区领导人。奥德修斯被逮捕、审判、处决，此外还采取了许多措施，以恢复当地的法律和秩序。[23]

或许战争期间最为著名的游击队长是阿里斯·韦洛乔蒂斯（Aris Velouchiotis），他如同专制君主那样统治着希腊中部大片地区。阿里斯是希腊人民解放军的创立者之一，早在战争之前警察镇压共产主义的年代，他就学会把恐怖当成支配手段：他曾经被逮捕和折磨，直至愿意签署退党声明才被释放。他所承受的残忍折磨显然影响了他。此时他大权独揽，能够因为偷鸡摸狗等微不足道的过失而毫不犹豫地处决自己人，通过这种杀鸡儆猴的惩罚，他的部队再也不敢不听号令。他也毫不犹豫地处决和折磨他认为反叛或者有罪的民众。例如，1942年秋天，他下令逮捕克雷特索（Kleitso）村四位出身望族的男人，此后又毫不留情、毫不停歇地折磨了他们将近一个星期。他们的罪名是从村里的粮仓盗窃小麦，然而多年以后，一名仓管员向村里的神父忏悔，那四个人都是无辜的，因为正是仓管员自己偷了那些小麦。[24]

为民族解放阵线辩护的人，经常把这些过火行为归咎于胡作非为者和自行其是者，在一个被战争撕裂得支离破碎的国家，出现这些不服管束的人是在所难免的。然而，有许多证据表明，这种镇压行为是有组织行为，即使指示并非来自中央党部，起码也是来自地区党部。在希腊中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某些地区，恐怖是民族解放阵线故意采取的半官方手段，以此来控制当地居民。一个委员会拟定名单，另一个委员会审核名单，然后特别刺杀分队奉命处决名单上的人，特别刺杀分队通常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犯罪。这种冷冰冰的官僚主义特性，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25]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恐怖手段不仅指向叛徒，而且指向“反动派”，换言之，任何曾经出言反对共产党的人都是“反动派”。之后还会在“积极”反动派与“消极”反动派之间展开甄别程序，“积极”反动派被处

决，“消极”反动派被送往山区的集中营，但许多人被送到山区后就被处决了。[26] 许多村长、村医、商人以及其他乡绅都被杀害，且不论其是否反对过共产党，只要他们有可能不忠于民族解放阵线或希腊人民解放军就足够定罪了。

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某些地方领导人，比如控制阿戈斯和科林斯的塞奥佐罗斯·泽戈斯（Theodoros Zengos），显然为他们管辖之下的每个村庄制定了处决“反动派”的固定指标。[27] 如果反动派和通敌者不在家，那么他们的家人就会受到牵连。1944年2月，亚该亚省的共产党报纸发文警告通敌卖国的保安营向抵抗组织投降，“否则我们将会消灭他们，我们将会烧掉他们的房子，我们将会杀光他们的家人”。[28]

这种恐怖手段让居民感到无比困惑，因为这完全是史无前例。政争、起义、政变都曾经在希腊上演，但都没有那么血腥，而且从未导致如此突如其来的、计算定额的希腊人杀戮希腊人的结果。反动派嫌疑人会被带到山区营地，通常是偏僻的修道院，其恐怖情形如同盖世太保监狱。在这里，人们被反复折磨，还得忍饥挨饿，最终被割喉处决。[29] 有时候，整个村庄都被视为叛徒，村民随即遭到屠杀。例如，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赫利（Heli）村，希腊人民解放军抓捕了60～80名人质，绝大多数都是老弱妇孺，他们全部被杀，尸体被扔到井里。[30]

当然，这种恐怖手段并非希腊所独有：恐怖是纳粹控制欧洲绝大多数占领区的手段，希腊也不例外。正如在其他游击队活动大为活跃的国家，纳粹并非恐怖战术的唯一使用者：那些为民族自由而战的希腊人同样使用恐怖战术。起码在一定时期内，恐怖战术是奏效的，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区不再有意见分歧，反动派及其家人逃往城镇，共产党在当地建立起绝对控制。但是，恐怖战术也把许多人赶入德国人的怀抱，尤其是赶入由德国扶植的保安营。例如，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有一个由莱昂尼达斯·弗雷塔科斯（Leonidas Vrettakos）建立的保安营，他的主要动机就是

为兄弟报仇雪恨，他的兄弟于1943年秋天被希腊人民解放军杀害。[31] 另一名父母都被民族解放阵线杀害的保安营成员解释道："我的确投靠了德国人，当我无依无靠的时候，我还能怎么办？"[32]

1943～1944年，通敌卖国的保安营开始发展壮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共产党恐怖手段的反应。不幸的是，保安营通常同样残忍，他们在许多地区随意逮捕、折磨、处决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嫌疑人，将嫌疑人的房屋夷为平地，而且大肆抢劫食物、牲畜、财物。有时候，这只是部队中那些从城镇里招来的兵痞违反军纪的个案，但在其他个案中，这是受到反共狂热鼓舞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行为。

派驻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英军联络官如此总结双方步步升级的暴力行为：

> 希腊人民解放军终于发现他们的真正敌人，原来是右翼武装……希腊人民解放军对右翼武装充满敌意，希腊人民解放军许多最恶劣的暴行都是针对保安营战俘及其家人的，他们通常会被移送到集中营。希腊人民解放军对保安营的怒火与日俱增，而保安营也证明自己同样擅长恐吓和恐怖的艺术。[33]

再往北去，在色萨利和马其顿，随着反共情绪的增长，出现了德国扶植的其他组织，如公开的法西斯民族农业反共行动同盟（EASAD），该组织在沃洛斯（Volos）市实行恐怖统治。[34] 在马其顿，由乔治·普洛斯（George Poulos）上校指挥的极右翼准军事团体犯下无数暴行，包括在基阿尼斯塔（Giannitsa）屠杀75名希腊同胞。[35]

面对冲突双方的极端暴力行为，希腊普通公民越来越难以保持温和立场。正如在意大利那些共产党与法西斯党彼此争夺的地区，许多希腊人面对着两难选择，是加入通敌卖国的民兵组织（并且登上共产党的黑名单），还是加入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还要让家人冒身家性命的危险），通常并没有中间道路可以选择。这种局面正中德国人下

怀，德国人公开承认，他们的企图就是离间希腊人，这样他们“就能袖手旁观、隔岸观火”。[36]

或许最为悲剧的就是这种暴力的私人性质。希腊全国各地的村庄都因为政治立场而分裂，过去在当地咖啡馆通过争论解决的分歧，此时却导致累及家人的血亲复仇。而且，同一村庄的不同家族通常会认同这个或者那个政治团体，但他们的争吵却通常与政治毫无关系。佃农向民族解放阵线彼此告发，仅仅是为了染指对方的收成；村民相互指控对方叛变投敌，仅仅是为了发泄私怨或者洗雪世仇；竞争对手相互指控，也是为了排除竞争。在这些例子中，社区内部业已存在的紧张关系大大升级，而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或其对手）成了催化剂。

有无数例子可以说明，政治势力的影响如何让纯粹的私人恩怨走向失控。我只提供一个例子就够了，即多里斯（Doris）家族与帕帕季米特里乌（Papadimitriou）家族之间的血亲复仇，历史学家斯塔西斯·卡利瓦斯（Stathis N.Kalyvas）对此曾有抽丝剥茧的叙述。[37]

1942年，一位名叫瓦西利斯·多里斯（Vassilis Doris）的年轻牧羊人爱上了瓦西莉基·帕帕季米特里乌（Vassiliki Papadimitriou），她是生活在阿戈斯西部山区杜卡（Douka）村的女孩。不幸的是，她并未爱上瓦西利斯，而是爱上了瓦西利斯的兄弟索蒂里斯（Sotiris）。怒火中烧的多里斯决定报复她。多里斯告诉驻守当地的意大利部队，瓦西莉基私藏武器，结果，意大利部队闯入瓦西莉基的房子并将她毒打了一顿。

一年后，民族解放阵线来到此地，瓦西莉基的家族成为民族解放阵线的突出支持者。他们希望对多里斯的所作所为讨个说法，因此他们向民族解放阵线的官员反复告发，说多里斯是个叛徒。最后，他们提交的其中一份报告被送到民族解放阵线省委。此时已是1944年7月，共产党区委开始在当地清除反动派。因此，瓦西利斯·多里斯及其兄弟索蒂里斯都被逮捕，并被送到民族解放阵线设在菲尼奥斯（Feneos）的圣乔治

修道院监狱。一周后，一名守卫走进牢房，点了20个人的名字，包括多里斯及其兄弟。他们被告知，他们要被送到当地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但实际上，他们是向一处山洞进发，他们将在那里被割喉。

多里斯可不傻，他猜到自己大难临头。当这群人每两个一组被领去山洞时，他设法解开了手上的绳索，当他最终被带到行刑者面前时，他打伤了守卫并逃之夭夭。尽管守卫向他开火射击，但他还是逃跑下山，并且直趋阿戈斯。多里斯逃跑后一天，民族解放阵线处决了他的另一个兄弟尼科斯（Nikos），以此作为惩罚。

在解放几个月后，多里斯弄到了一些武器并且带着复仇动机来向瓦西莉基·帕帕季米特里乌及其家族寻仇。1945年4月12日，他与一帮亲戚朋友杀死了帕纳约蒂斯·科斯塔基斯（Panayotis Kostakis），此人是帕帕季米特里乌家族的亲戚，多里斯相信他曾经有份向民族解放阵线告发自己。作为报复，6月，帕帕季米特里乌家族两兄弟杀死了多里斯的亲家兄弟。接下来的1946年2月，多里斯及其伙伴袭击了帕帕季米特里乌家族府邸，杀死了瓦西莉基的母亲和小儿子雅尔戈斯（Yorgos）。三个月后，他们又抓住并射杀了瓦西莉基的一个兄弟、一个亲家兄弟以及三岁大的外甥。借用一名村民的话说："瓦西利斯（多里斯）和瓦索（帕帕季米特里乌）挑起了这所有事端；他们倒是还活着，但他们身边的人都死了。"

这个令人遗憾的故事是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战争和政治势力如何影响一处伯罗奔尼撒小村庄，并且如何把一桩小小的私人问题变成了暴力和谋杀的循环。如果驻守当地的意大利占领者对多里斯的恶毒告发无动于衷，他因为被瓦西莉基拒绝而产生的怨恨很可能就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冲淡。同样，如果民族解放阵线不对瓦西莉基家人的恶毒告发反应过度，那么局面可能不至于演变成仇杀。最后，如果战后当地的右翼政府逮捕多里斯，而不是授予他抓捕私敌的全权，暴力的循环可能就会

戛然而止。当多里斯及其同伙最终被捕和受审时，他们乐于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者的样子，说自己只是出于纯粹爱国主义的义愤去对付一个暴力的民族解放阵线革命家庭。不难理解，在1947年的反共情绪中，尽管他们的罪行明显带有私人性质，但多里斯及其同谋还是被无罪释放了。

共产主义在希腊之失败

考虑到斗争双方壁垒分明的政治谱系，以及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个人敌意，人们就不难明白，为何战后把这个国家拉回中间道路的尝试终归失败。帕潘德里欧的“民族团结政府”遭到斗争双方越来越多的抨击。甚至英国人也没有能力控制局势，战争结束后，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都陷入了程度不一但持续数年的混乱局面。

英国人经常由于扶植希腊右派并协助其恐怖统治而受到谴责。然而，出于对共产党的不信任，英国人犯下的更大罪过是政治上的天真，而不仅仅是镇压共产党。英国人的最大错误是，1944年12月他们屈服于君主派军队指挥官的要求，重新武装保安营以及其他右翼卖国民兵，这些人当时还被关押在雅典城外的营地里。由于遭到游击队的袭击，英国人没有理由拒绝援手，尽管这种援手根本靠不住。结果，英国人眼看着新近成立的国民卫队突然被那些右翼卖国者拖下水，尽管国民卫队最近才击败这些卖国者。

民族解放阵线同样犯下了天真的错误。从退出帕潘德里欧政府开始，他们就接连犯下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错误：讽刺的是，他们的行动导致了他们本想避免的结果，右翼国民卫队公开成立。此后数月间，许多国民卫队与右翼武装同流合污，在希腊乡村地区大肆制造白色恐怖。保安营被释放出狱，左派嫌疑犯及其家人遭到袭击，左翼团体办公室遭到洗劫。

民族解放阵线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实在是无可厚非，这就是他们严

格遵守瓦尔基扎的停火协议并且向当局交出部分武器。一旦被解除武装，昔日的游击队员就再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经常遭到敌人的无情追杀。那些拒绝解散的人，如阿里斯·韦洛乔蒂斯，不仅遭到共产党的谴责，而且最终被政府部队抓捕和杀害。一如中世纪的野蛮场景，阿里斯那砍下的头颅被放在特里卡拉（Trikala）主广场上示众。[38]

正好相反，希腊右翼甚至都懒得假装遵守停火协议。他们显然相信英国人“在任何情况和所有情况下”都将支持他们，因此完全放开了手脚。[39] 瓦尔基扎协议签订后一年内，根据官方统计，右翼武装谋杀了1192人，打伤了6413人，强奸了159名妇女，而真实数字无疑还要大得多。[40] 在某些地区，尤其是在希腊北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警察开始大肆搜捕任何被怀疑与民族解放阵线有关的人。英国人总是高调批评这种公开迫害，但他们并未对希腊政府或者右翼党派施加多少压力，以让他们停止迫害。[41] 在这种背景下，也就难怪共产党极端痛恨踏足希腊土地的英国人了。此后数年将会迎来“白色恐怖”时期，“大批君主主义-法西斯主义恐怖分子为所欲为，希腊人民彻底成为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奴隶”。[42]

此后数月间，希腊右翼紧锣密鼓地采取行动，确保他们控制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包括国民卫队、宪兵和警察。根据帕潘德里欧政府的内部资料，共产党员被排除在任何武装机构之外，因为难以确信他们是否会出卖希腊民族利益，但“共产党”这个术语迅速涵盖了任何秉持温和左翼信念的人。那些已经在军队或者警队里供职的同情左翼的嫌疑人，立即被转入预备役。右派的行动如此广泛，以至于许多盟国观察员开始担心右派计划发动政变。最起码，他们显然企图在即将到来的1946年3月的大选之前施加非正常的影响。[43]

由此引出了希腊共产党最后一个重大错误。由于被反复违反瓦尔基扎协议的现象所激怒，共产党决定违背苏联建议并退出1946年3月的大

选，就这样向保王右派拱手送出了一场重大胜利。当年秋天，君主派在一场似是而非的公民复决中确保了国王回归。在地方层面，右翼官员利用他们获得的新授权，强化反共镇压。宪兵部队急剧扩充，及至1946年9月，宪兵部队至少比上一年扩充了3倍。[44] 暴力活动步步升级，直至政府不再能够控制行省。及至1946年年底，形势已经明朗化，许多希腊左派别无选择，只能再次逃离家园、逃向山区。共产党组建了希腊民主军（Democratic Army of Greece），这是希腊人民解放军的天然继承者，内战再次降临这个国家。[45]

我不会详细叙述之后两年的情况，那只是冤冤相报的暴力与再暴力的循环，与战争年代并无不同。主要的差别在于，此时支持右翼势力反共的不再是德国、保加利亚、意大利，而是英国和美国，他们认为继续反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西方援助源源不绝地涌入这个国家，带来的不仅是英国和美国的物资，希腊政府最终还学会了英国镇压起义的古老办法，强迫数万村民搬进拘留营，以此饿死游击队。针锋相对的，希腊共产党也努力从国外争取支持。当斯大林拒绝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开始依赖铁托的南斯拉夫游击队，这种安排持续到1948年。当铁托与斯大林决裂时，希腊共产党站在斯大林一边，结果就连铁托也撤回了援助，一切也就由此注定。1949年，希腊内战终于结束，以左派的彻底崩溃而告终。

或许在这个时期的希腊历史中，最为令人震惊的是司法系统的双重标准。1945年，针对希腊通敌卖国者的诉讼大致停止，随即展开了对希腊共产党的大肆搜捕和迫害。1945年9月，根据官方数字，被关押的左派人士与被关押的通敌卖国者的比例大致超过7比1。处决人数的比例更为悬殊。及至1948年，根据美国方面的数字，只有25名通敌卖国者和4名战争罪犯在希腊被判处死刑。[46] 但在1946年7月至1949年9月间，却有超过100倍的左派人士被判处并执行死刑。[47]

那些未被处决的人，通常要在监狱里关押数年甚至数十年。及至1945年年底，大约48956名民族解放阵线支持者身陷囹圄，及至20世纪40年代末，关押人数还维持在5万人左右。[48] 即使在臭名昭著的马克罗尼索斯（Makronisos）拘留营于1950年被关闭后，希腊仍然有20219名政治犯，还有3406人被流放。[49] 迟至20世纪60年代，希腊仍然有数百名此类男女囚犯，他们的罪名仅仅是曾经参加抵抗组织，曾经对德国人作战。[50]

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所说的，这种“抵抗组织审判”发生在战后好几个国家，但没有哪个国家像希腊这么严厉。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受到保守主义政治家、军队以及美国在幕后支持的准军事组织的联合统治。这段时期的谷底是1967～1974年，这个国家陷入了军事独裁。在此期间，希腊通过了一部法律，彻底羞辱了那些在战争年代为希腊解放而战的男男女女：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被正式定义为国家“公敌”，而那些曾经与德国人并肩作战的保安营老兵则被颁发国家养老金。[51]

铁幕降临

希腊内战将会对欧洲其他地区产生深远影响。这场血腥至极的冲突，将会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左翼与右翼之间、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引发一场新的冷战。在某些方面，发生在希腊的事情定义了冷战。希腊内战不仅划定了铁幕的南部边界，而且对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乃至西欧各国共产党发出了严厉警告，如果他们试图夺取权力将会有什么下场。但或许最重要的是，希腊内战将美国拉回欧洲，迫使美国人明白孤立主义不再是选项。当英国宣布再也无力资助希腊政府发动反共战争时，美国就当仁不让地接手。在这个世纪余下的时间里，美国还会留在希腊，还会留在欧洲大陆所有战略要地之上。

正是美国突然卷入希腊内战催生了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这项美国政策旨在遏制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所谓的共产主义“洪流”，这道洪流将有可能席卷整个欧洲。[52]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对国会发表讲话，宣称美国的政策将会是“支持自由的人民，抵御武装分子或者外来压力的奴役企图”，因此应该开始为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巨额援助。[53] 这实际上是划清界限：东欧也许无法避免共产主义，但东地中海绝不允许步东欧后尘。

美国新政策的逻辑结果就是于1947年6月宣布的“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me），这项计划又以在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的名字被称为“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这项大规模援助计划表面上向所有欧洲国家开放，包括对苏联开放，为它们提供大规模经济合作的机遇。马歇尔计划的表面目的是对抗欧洲大陆的混乱和饥饿，但美国国务卿明确地暗示，援助将会优先给予如下国家，这些国家正在对抗“那些企图延长人道灾难以便从中捞取政治好处的政府、政党、团体”。[54] 换言之，马歇尔计划表面上是经济援助，但其真实目的几乎完全是政治性的。[55]

苏联被这种外交行动激怒了。苏联人曾经在希腊问题上置身事外，按照斯大林与丘吉尔的协议，希腊确实属于英国和美国的“势力范围”，但他们也不准备接受西方干涉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指示所有在苏联直接控制下的国家，拒绝美国提供的马歇尔援助，并且对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频频施压。于是，尽管有16个国家最终签署了马歇尔计划，但没有一个后来的共产主义国家参与其中。在苏联的进一步压力下，它们转而与苏联签署贸易协议。东西欧洲间的裂痕开始加深。

或许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的最重要后果，就是苏联决定正式加强对欧洲各国共产党的控制。就在马歇尔计划出台三个月后，苏联召集欧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到波兰小镇施科拉尔斯卡-波伦巴（Szklarska Poręba）开会。在这里，他们改组了共产国际[56]，新的名称为共产党情报局

（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或者Cominform）。与此同时，苏联实际上指示西欧各国共产党开始反美宣传战，这项指示导致自1947年年底以来意大利和法国的罢工数量急剧增长。欧洲各国共产党的自治状态和多元状态由此结束，从那时起，一切唯苏联马首是瞻。[57]

尽管这种连锁反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但正是希腊的形势成了催化剂。因此，希腊内战不仅仅是地方惨剧，而且是真正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西方大国承认这种格局，而且似乎准备支持任何不公正的现象，只要能够遏制共产主义就可以了。

对于普通希腊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为他们的悲惨经历再加上新的一页。他们不仅受困于国人的极端倾向，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多年，而且此时他们又成为超级大国新游戏中被踢来踢去的皮球。

---

[1] 关于莫斯科会议，参阅Dallas，Gregor，*Poisoned Peace*：*1945-The War that Never Ended*（London：John Murray，2006），pp.285-94。

[2] EAM stands for Ethniko Apeleftherotiko Metopo；ELAS for Ethnikos Laikos Apeleftherotikos Stratos.

[3]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40-42.

[4] Michael S.Macrakis，"Russian Mission on the Mountains of Greece，Summer 1944（A View from the Rank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23，no.3，pp.387-408；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96，359-60.

[5] 引自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95-6。

[6] TNA：PRO WO 204/8832，SACMED to Scobie，15 November 1944.另可参阅Churchill to Eden，7 November 1944，TNA：PRO FO 371/43695；Alexander，p.66。

[7]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364，413 fn.24.

[8] Iatrides John O.（ed.），*Ambassador MacVeagh Reports*：*Greece 1933-194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660.

[9] 引自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362。

[10] 引自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352.

[11] TNA：PRO PREM 3 212/11，Churchill’s order to Scobie，5 December 1944：参阅Clogg，Richard（ed.），*Greece 1940-1949*：*Occupation*，*Resistance*，*Civil War*：*A Documentary History*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187。

[12] TNA：PRO WO 170/4049，“Report on Visit to Greek Red Cross F.A.P.，Platia Kastalia，Kypseli，12 Dec 1944”；report by Ambassador Lincoln MacVeagh，6 December 1944 in Iatrides John O.（ed.），*Ambassador MacVeagh Reports*：*Greece 1933-194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658.

[13] 参阅the many reports of ELAS hostages in TNA：PRO FO 996/1。另可参阅WO 204/8301，“Account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events in Western Greece during the independent mission of 11 Ind Inf Bde GP”，esp.appendix C.10；WO 204/9380，“Report by Captain WE Newton on a visit to Kokkenia on 12th January 1945”。

[14] 关于瓦尔基扎协议的英译版本，参阅Richter，Heinz，*British Intervention in Greece*：*From Varkiza to Civil War* （London：Merlin Press，1985），pp.561-4；以及Woodhouse，C. M.，*Apple of Discord* （London：Hutchinson，1948），pp.308-10。

[15] 参阅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71，279-84。

[16] Woodhouse，C. M.，*Apple of Discord* （London：Hutchinson，1948），p.147.

[17] Woodhouse，C. M.，*Apple of Discord* （London：Hutchinson，1948），pp.84-6；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318，325.EKKA stands for Ethniki Kai Koinoniki Apeleftherosi.

[18] 参阅Hagen Fleischer，“Contacts between German Occupation Authorities and the Major Greek Resistance Organizations”，in Iatrides，John O.（ed.），*Greece in the 1940s*：*A Nation in Crisis* （Hanover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1），pp.54-6；以及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42，329-30. EDES stands for Ethnikos Dimokratikos Ellinikos Syndesmos。

[19] EAM member Konstantinos G.Karsaros，引自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71。

[20]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290.

[21] Odysseus，《荷马史诗》里伊萨卡岛的国王。——译者注

[22] Telemachus，《荷马史诗》里奥德修斯的儿子。——译者注

[23]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318-20.

[24] John Sakkas，“The Civil War in Evrytania”，in Mazower，Mark（ed.），*After the War Was Over*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94.

[25] 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61-2.

[26] 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57，159.

[27] 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48，163.

[28] *Odigitis*，8 February 1944，引自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57。

[29] 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53，159.

[30] 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54.

[31]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327.

[32] 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51.

[33] TNA：PRO HS 5/698“General Report”，pp.8-9.

[34] EASAD stands for Ethnikos Agrotikos Syndesmos Antikommounistikis Draseos.

[35]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p.334-9.

[36] TNA：PRO FO 188/438，“Summary of a Letter dated Athens 22nd November 1944 from Mr Justice Sandström，Chairman of the Greek Relief Commission to the Supervisory Board of the Swedish Red Cross”.

[37] The following example from Douka is dissected in greater detail by 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71-5.

[38]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373.

[39] 参阅report of Charles F.Edson，to Lincoln MacVeagh，29 March 1945，引自Clogg，Richard（ed.），*Greece 1940-1949*：*Occupation*，*Resistance*，*Civil War*：*A Documentary History*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192。

[40] Voglis，Polymeris，‘Between Negation and Self-Negation：Political Prisoners in Greece，1945-1950’，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75.

[41] 参阅reports by Charles F.Edson to Lincoln MacVeagh，29 March and 4 July 1945，引自Clogg，Richard（ed.），*Greece 1940-1949*：*Occupation*，*Resistance*，*Civil War*：*A Documentary History*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p.192，196；以及Woodhouse report，引自Richter，Heinz，*British Intervention in Greece*：*From Varkiza to Civil War* （London：Merlin Press，1985），pp.148-50。

[42] Democratic Army of Greece radio proclamation to the Greek people，24 December 1947，引自Clogg，Richard（ed.），*Greece 1940-1949*：*Occupation*，*Resistance*，*Civil War*：*A Documentary History*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205。

[43] 参阅report by Charles F.Edson to Lincoln MacVeagh，4 July 1945，引自Clogg，Richard（ed.），*Greece 1940-1949*：*Occupation*，*Resistance*，*Civil War*：*A Documentary History*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p.195-6。

[44] 参阅Mark Mazower's introduction in Mazower，Mark（ed.），*After the War Was Over*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1。

[45] 参阅Mark Mazower's introduction in Mazower，Mark（ed.），*After the War Was Over*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7。

[46] Eleni Haidia，"The Punishment of Collaborators in Northern Greece，1945-1946"，Mark Mazower's introduction in Mazower，Mark（ed.），*After the War Was Over*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54.

[47] 按照英国的统计，在1946年至1949年间，有3033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有378人被民事法庭判处死刑，总数为3411人。参阅TNA：PRO FO 371/87668 RG10113/11，Athens to Foreign Office，6 April 1950。

[48] P.Papastratis，"The Purge of the Greek Civil Service on the Eve of the Civil War"，in Baerentzen，L.，J. Iatrides and O. Smith（ed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Greek Civil War*，*1945-1949* （Copenhagen：Museum Tusculanum，1987），p.46.另可参阅Mark Mazower，"Three Forms of Political Justice，Greece 1944-1945"，in Mazower，Mark（ed.），*After the War Was Over*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37-8。

[49] TNA：PRO FO 371/87668，RG 10113/28.Voglis明显误用了这些数字，Voglis，Polymeris，‘Between Negation and Self-Negation：Political Prisoners in Greece，1945-1950’，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75。

[50]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376.

[51] Mazower，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p.376.

[52] 参阅George F.Kennan's statement to the War College，28 March 1947，Kennan，George F.，*Memoirs 1925-1950*（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1967），pp.318-20。

[53] Truman，Harry S.，*Memoirs*，vol. II：*Years of Trial and Hope*（New York：Signet，1965），p.129.

[54] George Marshall's speech at Harvard，5 June 1947，引自Truman，Harry S.，*Memoirs*，vol. II：*Years of Trial and Hope*（New York：Signet，1965），p.138。另可参阅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14。

[55] 参阅Milward，Alan S.，*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5-51*（London：Methuen，1984），pp.5，56-61。

[56]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或者Comintern，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停止活动。——译者注

[57]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143.关于共产党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煽动行为，参阅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29-30；“Blood on the Cobblestones”，*Time* magazine，26 July 194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8，vol.III（Western Europe），pp.853-4。

第二十五章 反客为主：罗马尼亚

我们很容易批评西方各国政府在战后的行为。后见之明的说法是，有好几次，西方各国政府如同偏执狂一般，急于粉碎合法的左翼抗议者，即使这样做违反他们自己提倡的民主原则也在所不惜。不公正现象的确发生了，人们的生命的确被牺牲了。但是，西方所面对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尽管西方各国政府手段笨拙，甚至经常事与愿违，但他们的确相信，他们是在退而求其次。

如果要在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与西方信奉的民主和威权的奇怪混合物中二者择其一，后者无疑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项。东欧各国共产党在追逐权力时展现的冷酷无情，让西方各国政府如同小巫见大巫。遮蔽在铁幕背后的十几个国家，每一个都足以说明问题，但也许最好的例子是罗马尼亚，因为在罗马尼亚，共产党接管政权的方式尤为激进且更成问题。

罗马尼亚是少数几个较少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的东欧国家之一。罗马尼亚某些地区的确遭到盟军的大范围轰炸，罗马尼亚东北部也遭到步步进逼的苏联红军的破坏，但与波兰、南斯拉夫、东德不同，上述三国的传统权力架构几乎被战争完全抹去，罗马尼亚行政机构却大致未受触动。因此，共产党要在罗马尼亚夺取绝对权力，绝非仅仅在白板上描画新制度，旧制度必须首先被铲除。在消灭和取代罗马尼亚传统行政机构的过程中，残忍手段和恐吓手段都是极权主义的制胜法宝。

八月政变

战后罗马尼亚的故事，得从1944年夏天一次突如其来的、引人注目的政权更迭说起。及至此时，这个国家一直在扬·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元帅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并且与德国结成了坚定不移的联盟。罗马尼亚相当热心地投入战争，罗马尼亚部队与德国国防军并肩作战，一直打到斯大林格勒城下。然而，此时局面已经倾覆，人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德国将要输掉这场战争。许多罗马尼亚人意识到，要避免被苏联红军彻底摧毁，就只有改换门庭。各反对党秘密形成了广泛的联盟，他们确信，安东内斯库将会跟希特勒陪葬，因此决定罢黜安东内斯库。

政变背后的驱动力量是民族农民党领导人尤柳·马纽（Iuliu Maniu）。正是马纽最早煽动密谋，也正是马纽最热衷于与盟军展开秘密和谈。战时和战后，他所领导的党派是最受欢迎的反对党，而且如果政变成功，他所领导的党派将会接管所有重要的政府部门。其他主要密谋者是社会民主党、民族自由党、共产党的政治家，以及密谋集团名义上的首脑，罗马尼亚的年轻君主米哈伊尔国王。

在经过数周准备之后，政变预计于8月26日发动。政变计划是，米哈伊尔国王邀请安东内斯库共进午餐，命令他与盟军展开新的谈判。如果他拒绝服从，国王将会立即解除他的职务，并且任命反对党政治家组成新政府。新政府将会提前做好准备，因此他们能够立即平稳地接管统治权力。

不幸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由于军事形势开始急剧恶化，元帅决定8月24日动身前往前线，通知来得很突然。情急之中，国王决定提前数天发动政变。23日下午，国王邀请安东内斯库来到王宫，在简短而紧张的当面对质后，国王逮捕了这个独裁者。这次行动似乎让安东内斯库完全措手不及。几个月后，当国王接受一位英国记者采访时，国王声称，他们“在夜间把安东内斯库押进王宫保险库，我被告知，宫廷侍卫在回忆安东内斯库的话语时，依然语带尊敬”。[1]

然而，由于事出突然，密谋者并未就如何组建新政府达成一致，因

此国王只好再次随机应变。在与顾问们开了个短暂的会议之后，他当场任命了一个临时内阁。晚上10点过后，米哈伊尔国王在电台上宣布政变。新任首相康斯坦丁·瑟讷泰斯库（Constantin Sănătescu）早已准备好的声明也通过电台公开宣读。上述宣言等于明确宣告，罗马尼亚已经接受盟军提出的停战条款；上述宣言也承诺，新政府将会迥异于安东内斯库的独裁政权，新政府将会是“公众自由得到尊重和保障的民主政权”。[2]

到目前为止，共产党都还只是扮演着相当微不足道的角色，但一旦政变发生，他们的反应比任何党派都要迅速得多。政变发生后，首先抵达王宫的是共产党政治家卢克雷丘·珀特勒什卡努（Lucreţiu Pătrăşcanu），他立即主动要求出任司法部部长，而且获得了任命。这并非荒唐的要求：珀特勒什卡努有法律背景，曾经协助国王起草告国民书。然而，由于直到政变后很久，尚未有其他政党的代表取得部长职务，这一行动未免显得唐突。这也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即共产党因为领导政变而得到回报：实际上，珀特勒什卡努后来的确利用这一印象，诡称在政变发生前，他是唯一受到咨询的反对派代表。[3]

共产党的另一重好运是，一旦政变结束，他们就奉命控制安东内斯库以及其他犯人。这一次，同样有着充分理由。由军队控制安东内斯库及其内阁成员，肯定不是个好主意，由于士兵也许仍然忠诚于他们的老长官，因此可能释放他。警察也同样不被信任。密谋者因此决定，把犯人交给民兵组织看管。最有可能承担此任务的是马纽的民族农民党志愿者，然而，政变发生时，他们已被派往特兰西瓦尼亚，协助盟军对德军作战。余下的反法西斯民兵就是共产党训练的“爱国卫队”（Patriotic Guards）。把独裁者移交给这支部队看管，再次造成这种印象，即共产党在政变中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尽管事实并非如此。

然而，共产党获得的最大礼物是由盟军在停战谈判期间主动送上的。及至政变发生时，尽管各方已经同意停战协定的总体条款，但在具

体条款上又僵持了三个星期才最终达成协议。其中一个谈判症结是，到底由哪支盟军来负责这个国家。苏联方面主张，由于正是苏联军队占领了罗马尼亚，他们也应该有权控制罗马尼亚。某些英国官员和美国官员担心，按照苏联的说法，罗马尼亚仿佛成了“俄国内政”：英美两国主张，所有三个主要盟国应该共同承担责任。然而，到最后，苏联方面的主张得以实现。停战协定的最终文本列明，这个国家将在盟国管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的控制之下，“接受盟军（苏军）最高司令部的总体指导和具体指令”。这就为苏联后来支配这个国家打开了方便之门。[4]

共产党的夺权斗争

1944年8月23日政变后，出现过三届前后相接的政府。首先是瑟讷泰斯库将军的临时政府，只维持了10个星期。苏联急切希望解散这届政府，因为共产党在这届政府内部几乎没有取得什么关键职位。瑟讷泰斯库有几个致命弱点。首先，他难以满足苏联要求的战争赔偿，而这种赔偿是他在签署停战协定时亲口承诺过的，现在他违反了自己的承诺。[5]但他倒台的真正原因是，他未能从社会上清除“法西斯分子”。根据美国战略服务局（American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提交的报告，23日政变后六个星期，只有8名罗马尼亚官员因为与德国人勾结而被革职。[6]除了少数高级情报军官被逮捕之外，绝大多数国家安全机关仍然未受触动。更有甚者，法西斯民兵组织“铁卫军”（Iron Guard）的老兵，还出没于布加勒斯特的酒吧和宾馆，“大肆吹嘘没有哪个政府敢动他们”。[7]某些内阁成员的确呼吁立即成立法庭，审判战争罪犯，但当尤柳·马纽提出反对动议时，这些呼吁就被当成耳边风。农民党领导人声称，他反对这种清洗，以免进一步流血，但人们广泛怀疑他的真正意图是避免数以千计的铁卫军老兵在一夜之间投向共产党。[8]

可想而知，部分民众会对这种不作为感到愤怒，相比之下，即使是意大利那种软弱无力的清洗行动，看上去也要有效得多。罗马尼亚共产

党把握住这种公愤，进而鼓动这种公愤。10月8日，他们在布加勒斯特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示威，大约6万名示威者云集市中心，要求瑟讷泰斯库及其政府辞职。大部分示威者无疑是自发前往的，但共产党也发挥了在工会内部的影响力，迫使更多人出席集会。[9]

在苏联以及国内的压力之下，瑟讷泰斯库将军于11月2日辞职。然而，国王随即请求他出面新建看守政府，任期直至大选举行为止。瑟讷泰斯库的新政府为共产党预留了更多职位，最重要的是任命共产党领导人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Gheorghe Gheorghiu-Dej）出任交通部部长。共产党的傀儡、小农党领导人彼得鲁·格罗扎（Petru Groza）出任副首相。然而，掌握全国警察部队大权的、最为重要的内政部部长职务，仍然留在民族农民党手中。这个职务被授予对共产党极为反感的尼古拉·佩内斯库（Nicolae Penescu），而且他也强烈反苏。为了推翻新任内政部部长，人们又组织了更多的游行示威，示威者收到特别指令，高唱“打倒佩内斯库”。[10] 这种煽动行为让共产党与工会越来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借助软硬兼施的手段动员起越来越多的民众。

第二届瑟讷泰斯库政府甚至比第一届更短命。11月底，在一次酒后斗殴中，两名工会成员被罗马尼亚士兵枪杀，这件事情被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充分利用。人们为这两名死者组织起盛大的葬礼，而葬礼又演变成另一场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与此同时，共产党媒体展开口诛笔伐，对政府内部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者”逍遥法外表示愤怒，并且直接指控民族农民党支持谋杀。面对民族民主阵线的激烈抗议，民族农民党和自由党的内阁成员集体退出内阁。备受压力的瑟讷泰斯库被迫辞职，此后未能东山再起。[11]

1944年12月2日，政变后的第三届政府组建完成。这一次，米哈伊尔国王任命其总参谋长尼古拉·勒德斯库（Nicolae Rădescu）将军出面组阁，他是一位得到苏联认可的无党派人士。为了停止国内持续已久的骚

乱，国王通知苏联代理外交部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i），如果共产党继续进行煽动，他将被迫退位并流亡国外。维辛斯基意识到，此举将会在苏联战线后方引起混乱，甚至可能迫使苏联正式控制这个国家，而这将会影响苏联在英美盟国眼中的形象。因此，他指示罗马尼亚共产党稍为降低调门，起码暂时停止街头的示威游行。[12]

然而，共产党的确是在利用政府改组来为夺权铺路。虽然共产党未能完全控制内政部，因为勒德斯库自己就兼任内政部部长，但他们的确让一位著名的共产党员担任副部长。这位新人是泰奥哈里·杰奥尔杰斯库（Teohari Georgescu），他不失时机地为共产党控制了这个部门。在16个省警察局中，他在其中9个省警察局安插了自己人，而且严格命令他们只听从他一个人的命令。他开始把共产党训练的“爱国卫队”引入罗马尼亚保安警察部门，即保安部队（Siguranţa），并且加速共产党员对其他安全机关的渗透。及至勒德斯库意识到其副手的意图时，一切为时已晚。当他下令解散“爱国卫队”时，无人听他号令。当他要求杰奥尔杰斯库辞职时，同样无人听他号令，他的副手来到他的办公室，直接向地区警察局发布命令。[13]

不久后，勒德斯库同样无法控制另一名副手。1945年年初，副首相彼得鲁·格罗扎就开始公然鼓励农民夺取大地产所有者的土地，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土地改革计划。2月13日，共产党报纸《火花报》（*Scînteia*）报道，在普拉霍瓦（Prahova）和登博维察（Dâmboviţa）等农村地区，大片地产已被农民占领。在两天后的内阁会议上，勒德斯库指责他的副手正在挑起内战。[14]

又一次，共产党组织游行示威活动，要求勒德斯库辞职，此时他们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在国内各大城市发起集会。2月24日，随着内政部门外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形势达到顶点。勒德斯库在内政部大楼内命令卫兵向天开枪以驱散群众。在接下来的混乱局面中，又传来了几声

枪响，群众当中有人被杀。勒德斯库因为共产党的持续挑衅而忍无可忍，又因为被称为杀人犯而失去耐性，当天晚上，他向全国发表电台讲话，他把共产党领导人阿纳·保克尔（Ana Pauker）和瓦西里·卢卡（Vasile Luca）称为“鬣狗”和“目无国家、目无上帝”的外国人。他斥责许多罗马尼亚共产党员不是民众眼中真正的“罗马尼亚人”，而是有着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德意志人甚至犹太人的血统；他还拐弯抹角地斥责他们的苏联支持者。[15] 然而，呼唤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对他并无好处，共产党进而要求逮捕他。事后组成的苏联和罗马尼亚医生联合委员会认为，勒德斯库的卫兵几乎不可能向群众射击，因为从受害者体内取出的子弹并非罗马尼亚军队使用的子弹。但到此时，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勒德斯库重蹈了瑟讷泰斯库的覆辙，他的政府已经岌岌可危。

发生在罗马尼亚的大规模罢工和游行示威，与发生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事情本质上并无不同。不同的是，在法国和意大利，盟国坚定地站在政府一边，这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但更是出于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考虑，盟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道德、财政、军事支持。正好相反，在罗马尼亚，盟国对政府的支持明显不足。苏联并未给这个国家提供财政援助，正好相反，苏联不断索取战争赔偿，正在吸干这个国家。苏联未提供道德支持，它也不打算利用其可观的军事力量让这个内部动荡不安的国家恢复秩序。当游行示威趋于暴力时，苏联只要袖手旁观，就足以坐视罗马尼亚政府被推翻了。

然而，苏联对共产党煽动者的支持也不仅仅局限于袖手旁观。在二月危机期间，苏联或多或少地表明了立场。1945年2月27日，苏联代理外交部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直接晋见米哈伊尔国王，要求国王辞退勒德斯库，转而任命彼得鲁·格罗扎出任首相。当国王借口拖延时，苏联调走了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军队，代之以苏联部队，从而让局势升温。在维辛斯基的进一步施压之下，米哈伊尔被迫于2月28日辞退勒德斯库。国王任命了格罗扎政府以及共产党控制的内阁，但当维辛斯基亮

出底牌、苏联准备亲自接管罗马尼亚时，米哈伊尔别无选择，只能举手投降。1945年3月6日，格罗扎政府上台执政。仅仅在政变六个月后，民族民主阵线就已经设法掌握了权力。

民主制度的瓦解

在格罗扎一年半的执政期内，罗马尼亚的民主制度急剧瓦解。民族农民党和自由党几乎完全被排除在格罗扎的新内阁之外：在18个内阁席位中，有14个席位被分配给民族民主阵线，而其余4个席位被分配给其他党派的退党成员，比如退出自由党的格奥尔基·特特雷斯库（Gheorghe Tătărescu），他被任命为副首相。共产党掌握了所有最为重要的部长职位，包括司法部部长、通信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以及最为关键的内政部部长，他们还掌握了农业部和通信部的副部长职务。[16]

最终，政府机关屈服于按照共产党意图进行的系统清洗与重组。在完全控制内政部后，泰奥哈里·杰奥尔杰斯库立即宣布从安全部队当中清除“法西斯分子”和“妥协分子”的计划。在他手下的6300名内政部官员中，几乎有半数被转入预备役或者被遣散。在新政府上台数周后，就有数百名警察和反间谍军官被逮捕。[17] 侦探队接到特别任务，搜捕所有仍然活跃的铁卫军老兵。毫无疑问，这种清洗是必需的，但清洗的方式同样服务于共产党和苏联的其他目的。数千名爱国卫队成员，终于被允许加入警察部队和安全部门。及至此时，一直以来掌管爱国卫队的苏联间谍埃米尔·波德纳拉希（Emil Bodnăraş），此时奉命掌管最令人恐惧的特别情报局（Serviciul Special de Informaţii）。另一名苏联间谍亚历山德鲁·尼科尔斯基（Alexandru Nicolski）奉命训练侦探队，在此基础上，这支部队不久后将变成声名狼藉的秘密警察（Securitate）。未来罗马尼亚警察国家的基础由此奠定。

在劫持政府及其安全部队后，共产党此时着手瓦解民主社会的两大支柱：出版自由和司法独立。1945年夏天，司法部部长卢克雷丘·珀特

勒什卡努在全国范围内清洗或者遣散了超过1000名地方法官，有些法官则被迫提前退休。他以忠诚于共产党的官员取而代之。他毫不犹豫地把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并且向他们口授判决结果，最终建立起了一种制度，每位法官上庭时都要配备两名“人民陪审员”（Popular Assessors），如果法官的判决违反党的政策，人民陪审员有权否决法官的判决。[18]

驯服媒体甚至比驯服法官更加容易，实际上，这项工作早已着手进行。从八月政变时开始，苏联就经常迫使敌对报纸暂时停刊，甚至彻底查封报社。例如，1945年1月10日，民族农民党的最大报纸《邮报》（*Curierul*）就被查封，其办公地点被移交给共产党报纸《火花报》。与之类似，自由党报纸《民主报》（*Democratul*）因为发表文章而被镇压，文章披露许多所谓被苏联红军解放的罗马尼亚土地，其实是罗马尼亚人自行解放的。更为可笑的是，2月17日深夜至18日凌晨，自由党机关报《未来报》（*Viitorul*）被暂时停刊，因为苏联认为这份报纸在印刷加密信息。这些信息“被怀疑”是英国军事代表、空军次帅唐纳德·斯蒂芬森（Donald Stevenson）的名字缩写。[19]

格罗扎执政一年后，民主媒体已不复存在。1946年6月7日，美国国务院提交报告称，在罗马尼亚出版的26份报纸中，民族农民党和民族自由党各自允许出版1份日报。相比之下，仅仅在布加勒斯特，政府就可以出版10份日报、9份周报或者双月报。独立社会民主党甚至连1份报纸都不允许出版。尽管人们向信息部提出许多申诉，但信息部只是搪塞说新闻纸供应不足。[20]

格罗扎政府曾经也被视为选举前夕的看守政府。然而，除非确保胜券在握，否则民族民主阵线并不愿意举行选举，因此格罗扎政府继续拖延选举，同时共产党在幕后继续推翻所有的反对派。在这届政府20个月的任期里，它轮番恐吓自由党、农民党、独立社会党以及其他反对派。

1945年8月，政府发现两个“恐怖”阴谋，并且顺理成章地把民族农民党卷了进去。1946年3月15日，前首相勒德斯库被一群手持棍棒的男人毒打，这件事情促使他逃亡国外。1946年5月，第一届瑟讷泰斯库政府的内政部部长奥雷尔·阿尔代亚（Aurel Aldea）因为“阴谋摧毁罗马尼亚国家”而被逮捕。他与55名“同案犯”一起接受审判，并于1946年11月18日，即选举前一天，被判处终身苦役。[21]

从选举开始时起，共产党及其合作者就想方设法让反对党举步维艰。民族农民党向国际社会反复抱怨，他们被迫忍受的政治局面：

> 集会并不自由，在政府尤其是内政部的承认和容许下，武装团体组建完毕。这些团体袭击公共集会以及反对党领导人；他们打死、打残、打伤政府的反对者。他们拥有自动武器。他们使用铁管、刀剑、棍棒；他们领取薪水；绝大多数入伙者都有犯罪记录。他们犯下的暴行不仅完全免于起诉，就算犯下谋杀案也能逍遥法外，他们的行动得到警察和宪兵的保护。[22]

我们必须记得，在阅读这些报告时，要知道在唇枪舌剑的气氛中，撰写这些报告的人也有着特定的政治意图。然而，我们也能找到更为中立的资料来源，证明上述描写与事实相去不远。英国政府的一份官方抗议照会声称，“粗暴的帮派”妨碍了反对派竞选、捣毁了反对派集会。英国和美国同样抱怨，反对派被禁止使用报纸和电台，选举名单被大肆篡改。至于选举本身，按照《纽约时报》一位编辑的说法：“恐吓选民、压制对手、篡改结果，甚至比保加利亚的情况更为刺眼，够得上南斯拉夫铁托元帅的标准了。”[23]

在1946年的选举中，共产党联合其他几个左倾政党共同参选，那些政党被说服加入所谓的“民主政党集团”（Bloc of Democratic Parties）。官方计票结果显示，这个集团获得大约70%的选票，以及84%的新议会席位，相比之下，民族农民党只获得12.7%的选票和7.7%的席位，其余选票和席位归其他小党派所有。[24] 然而，当时的独立信息来源以及近

年对共产党档案的研究表明，真实的选举结果正好相反：民族农民党赢得了多数选票。选举被做了手脚。例如，在索梅（Someş），民族农民党据说只赢得11%的选票，实际上他们赢得了超过51%的选票。通过篡改选举结果，共产党又朝着垄断权力的方向迈出一大步。[25]

现在看来，显而易见的是，由于缺乏来自西方的共同压力，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挑战共产党在罗马尼亚的绝对统治。不幸的是，对于罗马尼亚民主来说，西方的愤怒反应完全无济于事。选举之前两年间，英国和美国曾经提交过几份正式抗议照会，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些抗议照会过后会出现任何严肃行动。罗马尼亚共产党之所以胆大妄为地篡改选举结果，是因为他们坚信西方对此将会漠然处之。实际上，尽管英国和美国公开表示选举无效，但英美两国都不敢收回对罗马尼亚政府的正式承认。苏联明白，英美两国的抱怨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历史很快就证明苏联是对的。十个星期后，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罗马尼亚签署正式和平条约，在此之后，西方实际上已经对这个国家甩手不管了。[26]

在选举结束、和约缔结后，共产党又展开了最后一轮围捕，这次围捕的意图是一劳永逸地摧毁反对派。1947年3月20日，315名反对党成员因为捏造的罪名而被逮捕。5月4日夜间，又有600人被逮捕。6月2日，在克卢日（Cluj），警察逮捕了260名反对共产党的工人。按照民族农民党青年组织一位成员的说法，他们被带到当地兵营，后来被赶上开往苏联的火车，有些人因打开车厢底部的木板而得以逃脱。许多被逮捕的人从未被正式指控。多数人于六个月后被释放，这可能是因为到那时当局已经达到了目的。[27]

不久后，安全部队开始盯上反对派领导层。7月14日，出身民族农民党的前内政部部长尼古拉·佩内斯库与100名该党成员一起被捕，其中包括该党副主席扬·米哈拉凯（Ion Mihalache）以及民族农民党报纸《正义报》（*Dreptatea* ）的编辑。该党及其报社的办公室都被警察占领，

报社也被查封。

7月25日，民族农民党的领导人尤柳·马纽也被逮捕。在当年秋天的表演式审判中，他与农民党其他领导人被指控参与英美密谋，企图逃亡国外，成立海外流亡政府，或者密谋推翻罗马尼亚政府。在辩护环节，马纽非常明确地声称，让他受到指控的“违法行为”只不过是任何政治家的正常民主权利。但这无济于事，他与米哈拉凯被判终身苦役。他们的同案被告人被判从两年到终身不等的苦役或者监禁。[28]

最后的主要反对派，国王本人，两个月以来始终保持中立。及至年底，在胁迫之下，他终于签署退位诏书，并于数日后流亡国外。直至1992年共产党政权倒台后，他才回到家乡。

斯大林主义横行

在最终抹去反对派的痕迹后，共产党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实现其真正意图：整个国家的斯大林化。一场针对个人思想和媒体事业的斗争由此展开，包括清理教师队伍，关闭所有外国学校或者教会学校，禁止所有非共产主义的课本出版发行，强行灌输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权威解释。资产阶级孩子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工人阶级的孩子才能上学，有些学生仅仅因为祖父母曾经拥有房产就被赶出工艺学校。图书馆里所有不符合斯大林主义世界观的图书都被清理。诗人和小说家遭到共产党报纸《火花报》的抨击，他们的著作要么受到严格审查，要么彻底被禁。[29]

宗教事业首当其冲。教会财产被剥夺，教会学校由国家接管。当局下令禁止洗礼、禁止教会婚礼、禁止公开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共产党员不得出席任何宗教场合。天主教会纳入新近成立的“天主教行动委员会”（Catholic Committee for Action）的控制，那些不赞同委员会教令的人将被逮捕。东正教会遭到清洗，其领导层充斥着共产党员和亲政府人

士。东仪天主教会曾经有150万成员，但它现在被迫融入国家控制下的东正教会。东仪天主教会牧师拒绝承认这种绑架宗教信仰的做法，他们被集体逮捕。1948年11月，大约600名东仪天主教会教士被逮捕。三个教会都有若干位牧师和主教被杀害或被折磨死。[30]

与禁止自由演讲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中央集权化以及消灭私有财产。从交通、工业、矿业，到保险、银行，都被国有化：仅仅在1950年，就有1060家主要企业被纳入国家管制，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在此期间，市场功能被摧毁，小商小贩不复存在，经济被纳入"国家计划委员会"（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和斯大林主义"五年计划"（Five Year Plan）的管制之下。[31]

然而，也许最为重大的变动是农业集体化。1945年3月由格罗扎政府提出的土地改革，旨在增加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阵线的农村支持者。根据官方数字，在过去七年里，超过100万公顷土地被没收，这些土地本来属于"战争罪犯"、与德国人合作的卖国贼、逃亡地主等。拥有超过50公顷土地的人，被迫将超额土地交给国家，国家又将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总共有1057674公顷土地被分配给796129人，人均分得1.3公顷土地。尽管这是一场大受欢迎的政治运动，但其经济后果却说不上成功：如此细分的土地，耕种效率极其低下，再加上没有过去大型农场那种农业机械，粮食产量急剧下降。[32]

四年后，随着共产党完成对整个国家的绝对控制，他们对农村地区的真实意图终于表露无遗。1949年3月初，他们宣布，所有在此前的格罗扎土地改革中得到豁免的达到50公顷的农场，此时也要被无偿征收。地方民兵和警察部队立即进驻农场，将大约1.7万个农户赶出家园。[33]与格罗扎土地改革相反，这次剥夺土地和财产的行动激起了广泛抵抗。在多尔日、阿尔杰什、比霍尔、布加勒斯特、蒂米什瓦拉、瓦拉什卡、胡内德瓦拉，以及西特兰西瓦尼亚部分地区，农民为了保住土地而奋起

抗争，在某些个案中，甚至要动用军队来镇压农民。按照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后来的说法，全国都在大规模逮捕农民，结果有“超过8万名农民……被送上法庭”。[34] 但到此时，政府中已经没有任何人为农民发声或者保护农民免于受到新安全部队的残忍对待了，他们的抵抗注定徒劳无功。

从上述农民手中剥夺的土地被用于建立将近1000个集体农庄，大批无地农民或者贫苦农民在里面耕作。从一开始，这个计划就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政府未能建立足够的公社拖拉机站或者其他农机站，结果农作物播种和收成都不正常，导致整个国家出现严重粮食短缺。在违背人民意愿强制推行政策仅一年后，政府就被迫急剧缩小计划规模。但又过了一年，集体化狂热再次升温，10年后，德治终于可以宣布，全国96%的可耕种土地都已归国家农场、集体农庄或者农业合作社所有。[35]

平心而论，我们必须记得，在新制度之下，的确有部分贫苦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我们还要记得，在数以千计的罗马尼亚农民反对土地改革的同一年，还有数以万计的意大利农民因为未能等来土地改革而上街抗议。然而，这都不是以残忍的、反民主的方式在罗马尼亚推行农业集体化的理由。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这项计划都是彻头彻尾的灾难。

*

1944～1949年，罗马尼亚发生的变化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短短数年间，这个国家从尚未成熟的民主体制完全过渡到斯大林主义独裁体制。共产党能够通过受到操纵的大规模政治运动，而非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来达到目的。但是，罗马尼亚并未陷入希腊那种内战并不意味着政治运动就是和平手段。从恐吓工会成员到逮捕政治家，从城市里大规模的、经常失控的游行示威到农村里压制农民和农场主，暴力或者暴力威胁，在战后的罗马尼亚屡见不鲜。

在这暴力威胁的背后，如同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影子般的是苏联的力量。我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揭示，要驯服罗马尼亚，要驯服东欧其他国家，如果没有这种居高临下的力量，根本就不可能成功。我们不要忘记，把安东内斯库元帅赶下台的那场政变，其初衷仅仅是避免罗马尼亚被苏联红军毁灭。但在我们描述的上述事件中，这种威胁始终隐约存在，这也是人们对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几乎毫无抵抗力的主要原因。

此后数十年间，罗马尼亚政府将会变成东欧阵营里最具压迫性的政权之一。极为讽刺的是，1944年8月的政变，本来是为了在罗马尼亚建立民主制度的，结果却变成超过40年的压迫制度的前奏，这种压迫制度似乎让安东内斯库的独裁统治也相形见绌。

---

[1] Cedric Salter，interview with King Michael of Romania，*Daily Express*，23 November 1944.关于米哈伊尔争辩的详细描述，参阅*New York Times*，27 August 1944，p.12；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p.46-50；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83-4。

[2] Declaration of the new Romanian government，23 August 194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1944，vol.IV，p.191.

[3]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p.36-7，49.

[4] 关于罗马尼亚停战协定的全文，参阅TNA：PRO WO 201/1602。

[5] 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88；Hitchins，Keith，*Rumania 1866-1947*（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502-5.

[6]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59.

[7] *Daily Express*，23 November 1944.

[8] *Daily Express*， 23 November 1944. and TNA：PRO WO 201/1602，digest of OSS reports sent from Foreign Office to Minister Resident，Cairo，16 September 1944.

[9] 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98；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57.

[10] 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103；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p.56-9.

[11]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p.59-60.关于佩内斯库对上述事件的描述，参阅James Marjoribanks' minute to the Foreign Office on 2 December 1944，TNA：PRO FO 371/48547。

[12] 停战仅仅维持了三个星期。参阅the report by the Chief of Polish Intelligence，1 February 1945，reproduced in Giurescu，Dinu C.，*Roman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1939-1945*），trans. Eugenia Elena Popescu（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doc.1，pp.134-44。

[13]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p.61-3；参阅in particular the quotation of Georgescu's telegram to regional prefects "not to carry out orders...given by General Rădescu，who has proved himself by his dictatorial action to be the enemy of our people"。

[14]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p.63-4.

[15] 关于勒德斯库演讲的文本，参阅Giurescu，Dinu C.，*Roman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1939-1945*），trans. Eugenia Elena Popescu（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doc.4，pp.174-5；另可参阅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135。

[16] Tismaneanu，Vladimir，*Stalinism for all Seas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p.89-90.

[17]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 （London：Hurst & Co.，1999），p.72：2851名内政部官员被转入预备役，195人被遣散。

[18] 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 （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pp.67-8.

[19] 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 （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p.27；Winterton，Paul，*Report on Russia* （London：Cresset Press，1945），p.96.

[20] 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 （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pp.27，36-7.

[21]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 （London：Hurst & Co.，1999），pp.68 fn.32，75-7.

[22] 援引自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 （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p.40。

[23] *New York Times*，25 November 1946.关于选举形势的简要描述，参阅Hitchins，Keith，*Rumania 1866-194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530-34。

[24] 关于1946年议会席位的确切分配数字，罗马尼亚历史学家与其他各国历史学家都存在争议。因此，我只提供议会席位的大致百分比而不是具体数字。参阅Hitchins，Keith，*Rumania 1866-194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534；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 （London：Hurst & Co.，1999），p.78；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124；Betts，R. R.（ed.），*Central and South East Europe 1945-1948* （London and New York：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0），p.13。

[25]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 （London：Hurst & Co.，1999），p.78；Tismaneanu，Vladimir，*Stalinism for all Season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p.287-8 fn.10.

[26] Tismaneanu，Vladimir，*Stalinism for all Season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91；Fischer-Galati，Stephen，*Twentieth Century Romania*，2nd ed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99；E.D.Tappe，“Roumania”，in Betts，R. R.（ed.），*Central and South East Europe*

1945-1948（London and New York：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0），p.11.

[27]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79；*Le Figaro*，18 March 1948；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p.54.

[28] 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133-6；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pp.77-81.

[29]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88；*Le Figaro*，26/27 March 1949；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pp.109-10；Tismaneanu，Vladimir，*Stalinism for all Seas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91.

[30] 关于在罗马尼亚镇压三个基督教宗派的详细描述，参阅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and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p.88-113。

[31] 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161-70.

[32] 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111-12；Tismaneanu，Vladimir，*Stalinism for all Seas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108.

[33] 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p.90；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87.

[34] 1961年12月7日出现在《火花报》的说法必须被谨慎对待，因为这些数字后来被用于指控德治以前的竞争对手阿纳·保克尔和泰奥哈里·杰奥尔杰斯库，参阅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201。一份1953年的安全报告显示，仅在1951年至

1952年间，就有34738名农民被逮捕，参阅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140。

[35] 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335；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141.

第二十六章 驯服东欧

在罗马尼亚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过程也许是野蛮的，但绝不是孤立的。各国历史学家在研究本国建立共产主义的经历时，与外国人的观点终究有所不同。例如，法国、意大利、捷克、芬兰在战后经历过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民主运动，其领导人力求通过投票箱赢得权力。相比之下，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都经历过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运动，以强行推翻传统权力架构为目标。在其他国家，共产党试图综合运用这两种手段来夺取权力：外在的民主，内在的革命。借用东德共产党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话："看上去是民主，但我们必须控制一切。"[1]

然而，如果说战后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各不相同，那么，各国之间的共性还是要大于个性。东欧集团各国首要的、最为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它们几乎都被苏联红军占领过。尽管苏联始终坚持，他们的军队派驻当地仅仅是为了维持和平，但他们维持和平的方式还是带着政治暗示，就此而言，他们的政策无非是英军在希腊政策的反映而已。例如，在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恳求莫斯科不要撤走苏联红军，因为没有苏联红军，匈牙利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2] 1948年2月，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同样请求苏联军事分遣队前移到捷克边界，以产生某种心理效应。[3] 尽管苏联红军实际上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强加给东欧民众，但这种心理暗示还是显而易见的。

伴随苏联红军到来的是苏联的政治警察——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叫内务部）。尽管动用苏联军事力量来建立共产主义统治是预兆多于现实，但苏联内务部却早已亲自插手，尤其是在战争进行期间。正是苏联

内务部负责确保战线后方的政治稳定，因此他们获得授权，可以逮捕、监禁、处决任何被视为有潜在威胁的人。在表面上，他们的目的与英美行政当局在西欧的目的相同，防止任何内部冲突消耗前线资源，但他们及其地方机关以有条不紊的无情手段围捕和处置所谓的“政治不可靠分子”，这显然说明他们别有所图。

这在波兰尤其明显，波兰本土军（Home Army）成员被追踪、缴械、逮捕、监禁、流放。波兰本土军是有价值的潜在战斗力量，但在波兰自有其权力基础，同样不利于日后苏联对波兰施加影响。[4] 无论其说辞如何冠冕堂皇，苏联人从未把赢得战争作为唯一目的：他们始终密切关注他们所占领的那些国家的未来政治形态。

确保共产党支配地位的进一步方法是利用盟国管制委员会。战争结束时，盟国在所有前轴心国设立了这些临时委员会，以监督当地行政机关。派驻德国和奥地利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或多或少是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平起平坐的，各方的争吵经常导致僵局，最终导致德国分裂。在意大利，盟国管制委员会被西方盟国支配。正好相反，在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则是苏联支配委员会事务，英国和美国仅仅作为政治观察员列席委员会。

按照与前轴心国达成的停战协定，盟国管制委员会有权批准各国政府自行做出的政策决定，有权批准或者否决具体政府职务的人事任命。严格来说，这是为了确保民主原则得到贯彻，以免这些昔日的敌人走回支持法西斯主义的老路上去。然而，正是盟国管制委员会有权决定何谓“民主”。在芬兰和东欧，苏联经常滥用权力，以确保共产党的政策得到采纳，以确保共产党员被任命到政府的关键职位上。盟国管制委员会实际上成了王牌，每当地方共产党员发现自己的计划受到其他政治家的妨碍时，他们就亮出这张王牌。[5]

最好的例子是1945年的匈牙利，由将近1000人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

会实际上成了平行政府。正是盟国管制委员会施压以在当年提前举行选举，因为他们相信，这将有利于共产党。但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小农党（Smallholders Party）赢得了57.5%的多数票，盟国管制委员会支持共产党控制至关重要的内政部，从而妨碍了小农党自由组建新政府。苏联支配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同样干涉土地改革、书报审查、宣传事务以及清除战时官员，甚至阻止匈牙利政府成立某些不符合苏联计划的政府部门。[6]

战争结束后，无论共产党在哪里掌权，他们都遵循同一套运作方式。最重要的是取得实权职位的任命。战争结束后，东欧各国最初都建立起联合政府，政府首脑经常并非共产党员。然而，真正拥有实权的职位，比如内政部，几乎都被授予共产党。匈牙利总理纳吉·费伦茨（Ferenc Nagy）曾经把内政部称为"全知全能的部门"，这是掌管警察和安全部队的神经中枢，有权签发身份证明文件，包括护照和出入境签证，有权给报纸颁发许可证。[7] 因此，这个部门能够对公共舆论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发挥最大影响。利用内政部来粉碎反共情绪，并非罗马尼亚的特例，在战后东欧都是如此。在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2月的危机直接由人们对捷克内政部部长瓦茨拉夫·诺塞克（Václav Nosek）的不满而引发，人们抱怨他利用警察部队来推进共产党的事业。[8] 芬兰内政部部长于尔约·莱伊诺（Yrjö Leino）公开承认，当警察部队受到清洗时，"出现新面孔是很自然的，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这些新面孔总是共产党员"，及至1945年12月，共产党员占芬兰警察部队人员的45%～60%。[9]

另一个重要的政府职位是司法部部长，他负责法官的聘用和解雇，负责从行政机构清洗"法西斯分子"。如前所述，在罗马尼亚，这是共产党控制的第一个部门。这同样是共产党接管保加利亚的关键部门。1944年9月，祖国阵线（Fatherland Front）在索非亚掌权，共产党利用司法部与警察的关系，把全国所有的政府职位都清洗了一遍。在三个月内，大约3万名保加利亚官员被解除职务，不仅警察和官员如此，就连牧师、

医生、教师都是如此。及至战争结束，司法部授权的“人民法庭”（People’s Courts）审判了11122人，并且判处将近1/4的被告人（2618人）死刑。其中，实际执行了1046个死刑判决，但非官方统计的处决人数从3000人到18000人不等。按照人口比例，这是欧洲各国最为激进、最为广泛、最为残酷的“正式”清洗行动，尽管保加利亚从未被完全占领，从未与区域内其他国家卷入全面的野蛮冲突。如此清洗的原因仅仅在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被盖世太保或者当地机关完全摧毁，而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只能亲手完成任务。[10]

在其他国家，还有其他值得争取的部门，如捷克斯洛伐克的信息部和波兰的宣传部，因为这些部门控制着流向公众的信息流。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如同在罗马尼亚那样，农业部也是很有价值的部门，因为共产党很快认识到，大可以通过土地改革来争取新成员。前文已经阐明，在意大利南部，共产党是如何通过发动土地改革而迅速发展壮大的。在东欧，他们能够得到更多：他们不仅能够修改法律，而且能够把那些没收的大地产或者德意志家庭逃亡后留下的地产，直接分配给农民。他们确实获得了数百万农民的支持。

如果说共产党在追逐国家权力，那么，他们同样追逐地方权力，只不过他们总是着眼于如何利用地方权力来推进他们的全国事业。战后欧洲各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持经济运转，这意味着保持工厂和煤矿运作，确保货物能够被运送到全欧洲。因此，为了牢牢控制工业和交通，共产党向工会和工厂里的工人委员会渗透。通过这种方法，当全国领导层需要一场“自发行动”以展示民众支持、反对政治对手时，共产党能够组织起大规模的罢工。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形式的游行示威让1948年2月的危机看起来如同真正的革命。在所有从属于东欧集团的国家，如同在法国、意大利、芬兰，为了达成公开的政治目标，工人们经常上街罢工：在持续徘徊于饥饿边缘的欧洲大陆，控制了劳动大军，就控制了极为强大的工具。

正是这种对大众动员的渴望，催生出共产党的另一个主要目标，那就是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招募党员。战争结束初期，欧洲各国共产党都不太关心党员成分。他们招募暴徒恶棍和罪犯刑徒，他们发现这些人很适合安排到新近建立的安全组织之中。同样，他们也招募前政府成员，这些人简直喜出望外，因为这样他们就能避免受到战争罪行审判了。财阀、商人、警察、政客甚至教士都蜂拥加入共产党，作为逃脱通敌卖国指控的最佳政策保障：法国人有句谚语，“为了洗白自己，干脆染成红色”。[11] 还有许多“同路人”加入共产党，仅仅因为风向哪里吹，他们就向哪里倒。然而，即使算上这些人，还是无法充分解释为何中欧和南欧共产党人数呈现急剧增长。1944年，当苏联坦克逼近罗马尼亚边界时，布加勒斯特城内只有大约80名共产党员，全国也不到1000名共产党员。四年后，党员人数达到100万，增长了1000倍。[12] 在匈牙利，一年之内（1945年），党员人数从仅约3000人增长到50万人。[13] 在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5月有5万名党员，三年之内增长到140万名党员。[14] 在这些新党员当中，很大部分肯定是真心实意的狂热支持者。

在扩大自身权力基础的同时，共产党也极力削弱对手的权力基础。其中一种方法是通过媒体中伤政治对手，通过苏联审查机关，通过共产党在媒体中日益壮大的力量，他们能够控制媒体。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2月的危机期间共产党控制了电台，确保了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的演讲和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号召能够街知巷闻；相比之下，其他党派对全国发出的呼吁却无人知晓，因为造纸厂和印刷厂的工会会员让这些党派根本无法印刷报纸。[15] 在几乎每一个东欧国家，工会成员都发起类似的“自发”审查。[16]

由于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中伤所有对手，欧洲各国的共产党都开始采取蚕食政策。匈牙利人称之为“切片战术”，一点一点地排除掉竞争对手。每次都选出一小群人，要么被指控通敌卖国罪，要么被指控其他罪行。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的确是通敌卖国者，但许多人是因为捏造的

罪名而被逮捕，如波兰本土军的16位领导人（1945年3月被逮捕）、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克鲁斯图·帕斯图霍夫（Krustu Pastuhov，1946年3月被逮捕）、南斯拉夫农民党领导人德拉戈柳布·约万诺维奇（Dragoljub Jovanović，1947年10月被逮捕）。

然后，共产党会致力于离间对手。他们会试图中伤其他党派的某个宗派，迫使其领导人放弃这些宗派。或者，他们会邀请对手加入他们，组成联合“阵线”，让信任共产党的人与不信任共产党的人产生裂痕。这种战术在对付共产党最强大的左派对手时尤其成功，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深受其害。最后，随着分裂越来越严重，共产党会鲸吞这些党派的残余部分。在东德、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社会党最终都被并入共产党。

尽管使用了这些灵活机动的手段，但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能够通过投票箱获得足够的支持，进而赢得绝对权力。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在1946年，他们赢得了引人注目的38%选票，但他们还是不得不与反对派组成联合政府。[17] 在其他国家，选民支持度之低经常让共产党感到吃惊。例如，1945年10月，在布达佩斯市政选举中，共产党遭遇惨败，这场惨败被视为“灾难”，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瘫软在座椅上，“面如死灰”。[18] 他错就错在自欺欺人地相信共产党大受欢迎的宣传报告。

面对广泛质疑，共产党只好诉诸武力，开始时是运用秘密手段，后来则是公然运用恐怖手段。来自其他党派的、大受民众欢迎的竞争对手，遭到威胁、恐吓、逮捕，罪名则是所谓“法西斯主义”的不实指控。有些人则离奇地死于非命，如捷克外交部部长扬·马萨里克（Jan Masaryk）于1948年3月从外交部大楼的窗户摔下来。[19] 还有其他人，如保加利亚最有号召力的反对派政治家、保加利亚农民民族联盟的领导人尼古拉·佩特科夫（Nikola Petkov）则受到非正规法庭的审判，并被处

决。还有许多人，如匈牙利的纳吉·费伦茨和罗马尼亚的尼古拉·勒德斯库因为受到威胁而最终逃往西方。不仅反对派领导人深受威胁，全面发动的国家恐怖让每一个反对者都深受威胁。例如，在南斯拉夫，秘密警察头子亚历山大·兰科维奇（Aleksandar Ranković）后来承认，在1945年执行的逮捕行动中，有47%是不公正的。[20]

在这轮镇压期间，整个东欧地区的选举都迅速变成骗局。“不受欢迎”的候选人直接从选举名单上被划掉。其他政党与共产党被划入同一个“集团”，选民根本无从选择。选民在投票站也遭到秘密警察团伙威胁，以确保投票并非匿名进行。当所有手段都不奏效时，那就对投票结果做手脚。结果，共产党及其盟友最终“赢得”了根本不可能赢得的选票：在保加利亚是70%（1946年10月），在罗马尼亚是70%（1946年11月），在波兰是80%（1947年1月），在捷克斯洛伐克是80%（1948年5月），在匈牙利是荒唐的96%（1949年5月）。[21]

如同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只有在完全不受挑战地控制政府的情况下，才会说出他们真正的改革计划。在此之前，他们在欧洲绝大多数地区的国家政策总是相对保守的：土地改革、对所有人模糊地承诺“平等”、惩罚战争期间做坏事的人。从1948年开始（在南斯拉夫还更早），他们开始揭示更为激进的目标，如商业国有化、土地集体化，如同在罗马尼亚，共产主义欧洲的其他国家都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大约就在此时，他们开始为之前的行为找理由，包括制定反人民的法律，重启他们已经摧毁的行政机构。

这幅拼图的最后一块是展开恐怖的内部清洗，从党的架构内部清除所有潜在威胁。就这样，最后一点多元化的痕迹都被抹去了。持有独立见解的共产党员，如波兰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和罗马尼亚的卢克雷丘·珀特勒什卡努都被赶下台，甚至被监禁和处决。由于苏联与南斯拉夫决裂，曾经支持铁托的人都被逮捕、审

判、处决：就这样，阿尔巴尼亚前内政部部长科奇·佐泽（Koçi Xoxe）被除掉，同遭厄运的还有保加利亚共产党前领导人特莱乔·科斯托夫（Traicho Kostov）。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整个东欧都陷入了恐怖的清洗，可谓人人自危。1948～1953年，仅仅在匈牙利，这个人口不足950万的国家，就有大约130万人受到审判。将近70万人受到官方惩罚，超过总人口的7%。[22]

上述事件，与战前20年几乎压垮苏联的同类运动如出一辙，这绝非巧合。因为20世纪90年代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日益表明，正是苏联在背后操纵。现在已是证据确凿：只要读一读战后莫斯科与后来的保加利亚总理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往来信件就知道，苏联外交部部长实际上在口述保加利亚的内阁人员构成，由此可见苏联干涉东欧国家内政的严重程度。[23]

从苏联红军进入东欧时起，斯大林就决定，确保在这里建立如同苏联镜像的政治制度。在与铁托的副手米洛万·吉拉斯的对话中，斯大林说出了一段名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过去的战争不同，因为“谁占领了一片领土，谁就能够把自己的社会制度，移植到这片领土上去。人人都会在自己兵锋所及之处，移植自己的制度”。[24] 苏联红军的存在，肯定有助于确保整个东欧地区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但正是共产党政治家、苏联及其盟友的残酷无情，造就了这种逻辑结果。通过使用恐怖手段，通过对任何反对派的毫不留情，他们不仅在苏联与西方之间创造出一片战略缓冲地带，而且创造出一系列苏联的复制品。

---

[1] 引自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131。

[2] Rákosi，引自Kenez，Peters，*Hungary from the Nazis to the Soviet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Hungary*，*1944-194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224。

[3] 最后这些军事行动毫无必要。参阅Fowkes，Ben，*Eastern Europe 1945-1969：From Stalinism to Stagnation*（Harlow：Pearson Education，2000），p.23。

[4] 参阅John Micgiel，"'Bandits and Reactionaries'：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position in Poland，1944-1946"，in Naimark，Norman and Leonid Gibianskii（ed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1944-1949（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7），pp.93-104。

[5] Jan Gross，"War as Revolution"，in Naimark，Norman and Leonid Gibianskii（ed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1944-1949（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7），p.31.

[6] Nagy，Ferenc，*The Struggle behind the Iron Curtain*，trans. Stephen K. Swift（New York：Macmillan，1948），pp.160-64；Kenez，Peters，*Hungary from the Nazis to the Soviet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Hungary，1944-194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61-6，102.

[7] Nagy，Ferenc，*The Struggle behind the Iron Curtain*，trans. Stephen K. Swift（New York：Macmillan，1948），p.x.

[8] Igor Lukes，"The Czech Road to Communism"，in Naimark，Norman and Leonid Gibianskii（ed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1944-1949（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7），p.258.

[9] 引自Upton，A. F.，*The Communist Parties of Scandinavia and Finland*（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73），p.258。

[10] Crampton，R. J.，*Bulgar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309-11.

[11] Novick，Peter，*The Holocaust and Collective Memory*（London：Bloomsbury，2000），p.75 fn.38.

[12] Tismaneanu，Vladimir，*Stalinism for all Seas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87；Schöpflin，George，*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Oxford and Cambridge，MA：Blackwell，1993），p.65.

[13] Kontler，László，*A History of Hungary*（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392.Schöpflin指出共产党员从1944年11月的2000人增长到1948年5月的88.4万人，Schöpflin，George，*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

（Oxford and Cambridge，MA：Blackwell，1993），p.65。

[14] Myant，Martin，*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n Czechoslovakia*，*1945-194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06，222.Schöpflin指出共产党员从战争结束时的4万人增长到1948年10月的267万人，Schöpflin，George，*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Oxford and Cambridge，MA：Blackwell，1993），p.65。

[15] Myant，Martin，*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n Czechoslovakia*，*1945-194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04.

[16] 关于罗马尼亚，参阅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p.28；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58 fn.10；Giurescu，Dinu C.，*Roman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1939-1945*），trans. Eugenia Elena Popescu（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pp.34-5。

[17] Myant，Martin，*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n Czechoslovakia*，*1945-194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25-9.

[18] Z.Vas，援引自Bela Zhilitski，“Postwar Hungary 1944-1946”，in Naimark，Norman and Leonid Gibianskii（ed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1944-1949（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7），p.78.

[19] 马萨里克很可能死于自杀，但谣言认为他死于阴谋。参阅Myant，Martin，*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n Czechoslovakia*，*1945-194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17；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p.139。

[20] Fowkes，Ben，*Eastern Europe 1945-1969*：*From Stalinism to Stagnation*（Harlow：Pearson Education，2000），p.28.

[21] Crampton，R. J.，*Bulgar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315；Tismaneanu，Vladimir，*Stalinism for all Seas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288；Davies，Norman，*God’s Playground*：*A History of Po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426；Myant，Martin，*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n Czechoslovakia*，*1945-194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25；Kontler，László，*A History of Hungary*（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409.

[22] Molnár，Miklós，*A Concise History of Hunga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303.我调低了Molnár总共1000万人的估计数字，与Maddison一致，Maddison，Angus，*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2003），pp.96-7。

[23] Correspondence between Dimitrov and Molotov in Dimitrov，Georgi，*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1933-1949*，trans. Jane T. Hedges，Timothy D. Sergay and Irina Fa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diary entries for 15-29 March 1946，pp.397-402.

[24] Djilas，Milovan，*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trans. Michael B. Petrovich（London：Rupert Hart-Davis，1962），p.105.

第二十七章 “丛林兄弟”之反抗

共产党接管东欧的过程并非风平浪静。在苏联的同情者与反抗者之间经常爆发战斗，工人会以骚乱回应共产党的严厉统治，农民会拿起武器对抗新政府以反对农业集体化。在绝大多数案例中，人们自发地表达其愤怒，并且迅速遭到镇压。然而，有时候也会形成更有组织的抵抗形式。

在已经承受苏联奴役的欧洲地区更是如此。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国家以及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民族主义者组织严密、狂热爱国，准备战斗至死。与其南方邻国不同，他们对斯大林的意图已经不抱幻想。从战争爆发时起，他们就已承受苏联占领之苦，他们不把战后初年视为新时期，而是将其视为1939～1940年以来的历史进程的延续。

反苏抵抗运动是20世纪中一项最不受人待见的武装冲突，尤其在西方更是如此。在超过10年时间里，数十万民族主义游击队员抱着西方终将提供援助的渺茫希望，进行着一场注定失败的反抗苏联占领者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会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最终导致交战双方数万人阵亡。

最为波澜壮阔的抵抗运动发生于西乌克兰，在1944年至1950年间，卷入游击活动的男男女女可能多达4万人。[1] 然而，如前所述，乌克兰的形势极为复杂，甚至夹杂着种族清洗的因素。

反苏抵抗运动的“纯粹”版本发生在波罗的海国家，尤其发生在立陶宛，按照瑞典情报机关的报告，当地的反苏抵抗运动，“与其他反共游击团体相比，组织最为严密、训练最为娴熟、纪律最为严明”。[2]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为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中，他们的战斗壮举已经成为

名副其实的传奇故事。

卡尔尼斯克斯战役

1944年秋天，在苏联红军横扫波罗的海国家后，数以万计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藏匿起来。但是，要找到藏身之地却并不容易。他们要放弃家园和财产，要长期与家人和朋友断绝联系，经常陷入饥饿之中。有些人靠熟人接济，每隔两周换个地方，以免因为待得太久而不受欢迎，以免受到侦查。大多数人逃到森林，他们经常没有栖身之所，也缺乏足够的衣物。那个秋季频频下雨，让许多森林变成了沼泽，到了冬季，尤其是战后头两个冬季，在这欧洲北部地区，气温极为寒冷。那些受伤或者生病的人，很难指望得到充分的照顾。

如果说这些人置身绝境，仅仅是出于爱国主义，那就太天真了。在1944年，森林里涌入大量当地人，他们要么是试图逃避苏联红军的征兵，要么是因为过去的政治立场而害怕苏联。再后来，还涌入逃避流放的家庭、反抗集体化的农民、苏联的政敌团体。但在这些人当中，还有一个强大的组织核心，他们为民主和国家独立而战。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扛过枪：在一位立陶宛游击队领导人的口中，他们是“好士兵”，“他们不惜为家园献出生命”。[3] 这个核心团队把人们分为军事化单位，他们挖掘掩体、建造树屋、收集食物和补给，最重要的是，他们组织游击活动。



北
芬兰
芬兰湾
塔林
科赫特拉耶尔韦
纳尔瓦
希乌马岛
考特拉
爱沙尼亚
佩普西湖
萨雷马岛
派尔努河
母亲河
派尔努
维尔扬迪
塔尔图
俄国
波罗的海
里加湾
利沃尼亚
佩尔森
普斯科夫
文茨皮尔斯
瓦尔米耶拉
采西斯
拉脱维亚
阿伯热内
尤尔马拉
里加
奥格雷
马多纳
利耶帕亚
拉特盖尔
叶尔加瓦
雷泽克内
道加瓦河
马热伊基艾
米尼亚河
希奥利艾
克莱佩达
陶格夫匹尔斯
扎拉赛
帕涅韦日斯
尼维斯河
立陶宛
凯代尼艾
尤尔巴尔卡斯
涅曼河
约纳瓦
考纳斯
瑟苏佩河
加里宁格勒
（俄国）
维尔纽斯
白俄罗斯
阿利图斯
卡尔尼斯克斯
瓦雷纳
明斯克
0
50英里
0
100千米
战后立陶宛获得的领土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失去的领土
森林

11. 波罗的海国家

从一开始，这些大无畏的男男女女就着手进行某些非常大胆的行动，尤其是在立陶宛。在这个国家的东北部，以800人或者更多人为单位的游击队，对苏联红军展开了激战。在这个国家的中部，大批战士恐吓苏联官员，甚至在考纳斯市中心袭击官员的办公室和守卫森严的建筑物。在这个国家的南部，他们设计伏击苏联内务部人员，刺杀共产党领导人，甚至袭击监狱，以营救被俘虏的同志。

在这里，我们无法逐一列出苏军抵达头十二个月以来所有的大小战斗。[4] 我只描述一场战斗，多年以来，这场战斗足以象征其他所有战斗。卡尔尼斯克斯战役（Battle of Kalniškės）就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一周后，地点在立陶宛南部的一片森林。一方是从锡姆纳斯（Simnas）附近驻地抽调的、人数众多的苏联内务部分遣队，另一方是代号为“飞行员”（Pilot）的约纳斯·奈法尔塔（Jonas Neifalta）领导的、人数虽少但斗志坚决的地方游击队。

奈法尔塔是一位鼓舞人心的领导人，他在当地声名大噪，因为他既反抗纳粹又反抗苏联。他曾经是陆军军官，在苏联于1940年首次占领这个国家时，他就已被列入打击名单。1944年夏天，他曾经被逮捕，被子弹贯穿了胸膛，但他设法从苏联严密监视的医院里逃脱。在亲戚的农场里康复后，他与妻子阿尔比娜（Albina）于当年秋天进入森林。他们用六个月时间招兵买马、训练士卒，并且实施了几次打完就跑的、针对苏联官员及其合作者的袭击行动。

1945年5月16日，为了一劳永逸地制止奈法尔塔的活动，大批苏联内务部人员开进卡尔尼斯克斯森林。他们包围奈法尔塔藏匿的区域，并且步步进逼。得知已被敌人包围，奈法尔塔及其战友撤退到森林深处的一座山岗，并且准备战斗。他们英勇地守卫阵地，用自制武器和手榴弹给苏联方面造成重大伤亡。根据游击队统计的数字，敌人伤亡超过400人（尽管根据苏联方面的统计数字伤亡人数要少得多）。然而，经过几

个小时的战斗，他们弹药耗尽。奈法尔塔意识到，唯一的生还希望就是设法突破苏联包围圈。就靠着最后这点弹药，大约有20多人冲破了苏联封锁线，逃到附近的祖文塔斯（Žuvintas）沼泽。他们留下了44具游击队员的尸体，超过他们总兵力的半数，其中包括奈法尔塔的妻子，她死的时候手里还端着一挺机关枪。

奈法尔塔本人又战斗了一些时日，但最终难以逃脱命运的安排。当年11月，在附近一处僻静的农庄，他和同志们再次陷入包围，奈法尔塔在这最后的交战中阵亡。[5]

当立陶宛民众纪念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反苏起义时，这就是他们讲述的故事。这些战斗象征着立陶宛人想要纪念的勇气和崇高事业。

然而，客观来看，卡尔尼斯克斯战役也从多方面说明为何这种反抗注定失败。首先，苏联获得的补给要比游击队多得多，他们没有弹药耗尽之虞。在卡尔尼斯克斯，苏联在人数上也远远超过游击队，尽管还在进行其他战斗，但他们没有人员不足之虞。尽管在1944年至1956年间，据信有10万人卷入立陶宛抵抗运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分别有所谓2万人和4万人卷入抵抗运动，但对比曾经击败德国的数百万苏联士兵，这点力量简直微不足道。[6] 在地方层面，这意味着苏联可以承受一场战斗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的损失，但游击队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

且不论立陶宛抵抗组织如何高贵或者英勇，他们对抗苏联的方式存在严重的失误。游击队非常擅长打了就跑的突然袭击，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敌人展开激战。卡尔尼斯克斯战役就是最好的例子，能够说明这支队伍被迫按照苏联打法作战时会有什么后果。更加明智的打法是化整为零，仅仅在袭击开始前集结，打完再次疏散，实际上，这也是游击队后来采用的战术。但直至1945年夏天，他们始终坚持在特定地点发动大部队作战。正如奈法尔塔的惨痛教训，大部队更容易被发现，也更容易被摧毁。

发生在卡尔尼斯克斯的事情，预示着全国各地的命运：苏联逐个寻找游击队，然后各个击破。游击队发现自己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因为他们在全国层面没有协调的战略。早在1944年年底1945年年初那个冬季，能够发出号令的游击队全国机关就已经被苏联秘密警察捣毁了。直至1946年，重新团结抵抗运动的尝试才得以实现。因此，像约纳斯·奈法尔塔这样的地方游击队领导人宁愿单打独斗：他们与其他地区的领导人很少联系，战斗也纯粹局限于地方目标。与其他游击队大规模协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因此，卡尔尼斯克斯的绝望结局象征着所有失败的抗争：补给匮乏、伤亡惨重、战术失误，再加上缺乏任何条理分明的全国战略。他们唯一胜过入侵者的优势，仅仅是战斗的热情和狂热的勇气。然而，我们不要低估这种品质，尤其是这种品质能够鼓舞后人继续奋斗。

至于约纳斯·奈法尔塔，他也同样象征着游击队的勇气与缺点。他身先士卒、鼓舞战友，他与战友同生共死、同甘共苦。这是一种注定无法持久的领导风格：在卡尔尼斯克斯，他比阵亡的同志活得更久，但也只不过是多活了六个月而已。

苏联恐怖

苏联对游击队发起的战役，不仅极为有效，而且极为冷酷，一如他们在东欧夺取政治权力那样。事情不得不如此。苏联人极为关注他们在立陶宛遇到的抵抗运动的范围和决心。在战役早期，他们的优先目标是对德国作战，苏联人不允许游击战争破坏通往前方的补给线。1944年，苏联内务部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 Beria）下令在“两周之内”肃清立陶宛游击队，并且派出了其中一位最为信任的下属，谢尔盖·克卢格洛夫（Sergei Kruglov）将军着手处理相关事宜。[7] 在克卢格洛夫麾下各支部队中有几支特殊部队，它们刚刚完成把克里米亚鞑靼人集体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任务。

克卢格洛夫是冷酷无情但也才华横溢的战略家，他深深知道，不可能只靠军事手段击败游击队。从一开始，他就尽可能调动立陶宛地方民兵镇压起义，他特意营造出一种印象，这是一场内战，而不是一场反抗苏联占领的战争。在他的领导下，他的部下为了推进反游击队事业而无所不用其极，他的部队开始按部就班、深思熟虑地使用恐怖手段。

苏联使用的其中一种基本方法就是酷刑折磨。通常形式是殴打犯人，这种形式如此普遍、如此暴力，以至于在拉脱维亚一个地区，就有18%的嫌疑犯在警察审讯期间被打死。[8] 其他方法包括电击犯人、用烟头烫犯人的皮肤、用大门猛夹犯人的手和手指、用开水烫犯人。一位前游击队员承受过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里面描写的那种酷刑：埃莱奥诺拉·拉巴纳乌斯凯纳（Eleonora Labanauskienė）被锁在与电话亭大小差不多的厕所隔间里，然后从笼子里放出50只老鼠。[9] 这种酷刑并未得到当局的正式同意，但实际上，这种酷刑得到苏联各级行政机构的批准。早在战争爆发前，斯大林本人就曾声称使用酷刑“绝对是正确和有效的”，因为“能够大大加速人民的敌人撕下伪装”。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秘密警察还继续以斯大林的认可作为使用酷刑的借口。[10]

尽管酷刑确实能够为当局套取情报，但它同样带来不受欢迎的结果。所有游击队回忆录都骄傲地提到“丛林兄弟”宁死不降，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游击队员宁愿在绝境中杀出血路也不和平投降的故事。这不仅仅是传奇故事：苏联的报告也提到乌克兰和立陶宛游击队员战斗到死的非凡决心。例如，从1945年1月起，一份立陶宛警察的报告提到，安全部队包围了一所房屋，里面有25名游击队员，但他们拒绝投降，直至房子被付之一炬。5名游击队员跳窗而出，匍匐穿过空地，向着一个机枪班逼近，试图端掉这挺机枪。他们先后中枪，但并没有放弃前进，直至全部阵亡。其他游击队员从正在燃烧的房子中继续射击，直至房子最终倒塌，他们也葬身火海。[11] 这种决心部分是来自勇气。他们确信自己会

受到酷刑折磨，也许他们害怕自己会在审讯中泄露机密，这让游击队员鼓起巨大勇气，决心不被敌人活捉。

使用酷刑只是系统地恐吓游击队员及其平民支持者的其中一种方法。其他恐吓方法还包括公开绞死当地游击队领导人，流放那些被怀疑与抵抗运动有牵连的人，在市集广场公开展示尸体。在回忆录中，尤奥扎斯·卢克萨（Juozas Lukša）提供了六个例子，都提到死亡的游击队员被吊在村庄里，有时候还被摆成令人厌恶的姿势，以此恐吓居民，就连他兄弟的尸体也被如此处理。有时候，苏联内务部会强迫当地居民来观看尸体，通过观察当地居民的反应就能发现当地居民的立场。“如果他们发现人们经过尸体时流露出忧伤或者怜悯的情绪，他们就会逮捕和折磨居民，要求居民供出死者的姓名。”许多故事都提到，父母在看见孩子的尸体时，只能假装无动于衷，以免泄露自己的身份。[12]

在这种场合泄露立场的代价可能相当惨重。如果公开流露不满情绪，迫不及待的安全官员会立即盯上那些知名游击队员的朋友和家人。这些人起码也会被逮捕和审讯，然后可能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也许是游击队员在被包围时不愿意投降的另一个原因。许多被包围的游击队员会把手榴弹放在头上自行引爆，这样苏联当局就不能辨认他们的身份，进而追踪他们的家人了。苏联当局偶尔会尝试外科修复，但是，“炸成这个样子，就连父亲也认不出儿子了”。[13]

有时候，苏联安全部队会对普通民众使用更多残忍的方法。在立陶宛，放火焚烧房屋和农场是惩罚游击队嫌疑犯、恐吓其所在社区的普遍方式。最终，安全部队头子亲自下令，禁止这种做法，倒不是因为这种做法违反法律，而是因为他怀疑某些部队向无辜平民下手，以避免对真正的游击队员作战。[14] 一份内部调查揭示，被焚烧的不仅仅是房子，有时候就连平民也一并烧死。例如，1945年8月1日，里宾（Lipin）中尉率领一队苏联内务部人员放火焚烧了希奥利艾（Šiauliai）附近斯文德利

艾（Švendriai）村一处房屋。按照其他在场士兵的说法，房子的主人全家都在房子里：

> 列兵亚宁从房子外面放了一把火。一个老太太冲出房子，身后还跟着一个女孩，里宾喝令她们回去。老太太和女孩开始奔跑。里宾掏出手枪向她们射击，但都没打中。一个士兵一枪放倒了老太太，里宾追上女孩，近距离补了一枪。然后，他下令两个士兵把尸体从窗户扔进房子。士兵们提起老太太的双手和双脚，把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房子，然后把女孩的尸体也扔了进去。很快，一个老头和他的大儿子从另一个门口冲出房子。士兵开火，但又没打中。然后，我和另外两个士兵奉命追杀老头的儿子，但我们抓不到他，天黑了，他逃了。在走回房子的路上，我们开始搜索黑麦田。我们发现了那个老头，他受了伤，正在爬过黑麦田。一个士兵结果了他，我们把尸体扔到房子里……

第二天早上，士兵们回到被烧毁的房屋，扒出了老头的尸体，作为他们消灭了一队“土匪”的证据。在房子里，他们看到一具尸体，是一个被活活烧死的年轻人。他们可不愿意收殓这些烧焦的尸体，他们偷了这家人的一头猪、两只羊，然后就收兵回营。[15]

当然，也有许多游击队员拒绝投降而在房屋里被活活烧死的例子，但上述证人的证言表明，不分青红皂白地烧房子的做法，远远超出苏联当局最初的授权。任意使用恐怖手段反而迫使人们加入抵抗运动，因为人们对自己被迫目睹的所作所为感到厌恶，因为人们害怕自己也许会成为安全部队的下一个受害者。这种做法也坚定了游击队员的决心，给了他们真正值得为之战斗下去的理由。苏联的恐怖政策本来可以更有针对性，只针对那些证据确凿的支持抵抗运动的人：其他人只要设法与游击队脱离关系，就能感到相对安全。然而，官方政策从未被正确执行，暴虐成性的地方军官经常任意采取恐怖手段，这已成多年恶习。

随着游击战争的延续，苏联的反游击战的方法也更加复杂。1946年，苏联人成立了许多假游击队，以求抓住那些真游击队。这些人假扮成来自其他地区的游击队，与真游击队安排会议，然后将其一网打尽，

就连目击证人也被杀人灭口。他们还打着游击队的名义，谋杀和抢夺平民，以此败坏游击运动的名声。[16]

除了成立假游击队，苏联人还让特工打入真游击队内部。有时候，他们会使用共产党员，或者战争期间生活在苏联的波罗的海侨民，但更多情况下，他们会试图招募抵抗运动的旧成员，让其将转枪口对付自己的旧同志。最大规模的招募行动发生在1945年和1946年的特赦期间。按照特赦条件，如果游击队员同意反正，并且交出至少一件武器，就可以免于审判。然而，实际上，安全机关还威胁这些人，如果他们不同意提供同志的情报，如果他们不同意重新加入游击队，作为苏联内务部的内应，他们就会被流放。面对这种两难选择，大多数人别无选择：他们同意为安全部队工作，然后什么都不做。然而，有些人还是屈服于压力，开始出卖旧日朋友。

或许苏联间谍最为重大的成功就是渗透到立陶宛抵抗运动的中央组织机构。1945年春天，安全部门招募了一位名叫尤奥扎斯·马尔库利斯（Juozas Markulis）的医生，他成为最有价值的特工之一。此后几个月里，马尔库利斯设法让游击队相信他领导着一个地下情报团队，他如此深受信任，以至于游击队试图成立一个新的高级地下组织，民主抵抗运动总会（General Democratic Resistance Movement），他还当选为最高领导人之一。通过马尔库利斯，警察基本控制了这个委员会，他还利用其职务鼓动游击队员解除武装、交出武器。借口帮别人伪造档案，他还成功套取了游击队成员的名单甚至照片。通过类似的活动，好几个地区的游击队领导人被逮捕和杀害，在立陶宛东部一个地区，游击队领导人还被换成马尔库利斯的特工同事。[17]

及至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已经在特定地区建立起发现和监视游击队活动的特殊队伍。这些队伍致力于描绘游击队的全貌，游击队员的名字和代号、行动、伪装手段和通信手段、支持者和接头人，这些情况在

打入和消灭游击队之前便已全部掌握。[18] 随着游击队人数开始减少，普通民众的支持开始流失，抵抗运动就难以抵挡这些队伍的进攻了。游击队最后的残余势力逐个被抓获、逐个被摧毁。

游击队员还是“土匪强盗”？

爱沙尼亚前总理马特·拉尔（Mart Laar）在他撰写的爱沙尼亚游击队史中，曾经提到安茨·卡柳兰德（Ants Kaljurand）的故事，他是抵抗运动的传奇人物，人称“可怕的安茨”（Ants the Terrible）。按照书中所说，安茨每到一个地方，都习惯投书问路。有一次，他通知派尔努（Pärnu）的一位餐厅经理，他将在某日某时来吃午饭，他想吃一道味道独特的菜肴。餐厅经理立即通知了地方当局。到了约定的日子，一群身着便衣的苏联内务部人员包围了餐厅，准备抓捕这位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但是，安茨骗过了所有人，他坐着苏联军车到达此地，身穿苏联高级军官制服。毫无疑问，苏联内务部人员不敢碰他。在美餐一顿后，安茨留下了慷慨的小费，并且在碟子底部留下一张纸条：“非常感谢这份午餐，可怕的安茨留字。”当苏联内务部人员发现真相后，他与他偷来的苏军汽车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19]

类似的故事颇能说明波罗的海国家游击战争的问题。实在难以想象，任何游击队领导人会有投书告知陌生人自己何时到达的习惯，或者只为了一顿饭而冒这么大风险，而且这种故事还被反复传诵，仿佛真的发生过。立陶宛游击队员尤奥扎斯·卢克萨承认，这种传奇故事对于鼓舞民众相当重要，但他也承认，这种传奇故事绝大多数是胡说八道。1949年，他写道，“人们同情游击队员”，“因此，关于他们的英雄事迹，经常被夸大到与事实相去甚远”。[20]

考虑到我们今天同情所有反抗苏联镇压的人，我们很容易掉入英雄崇拜的陷阱。然而，尽管我们喜欢把游击队员想象成罗宾汉那样的人物，大多数游击队员却完全不符合这种浪漫形象。绝大多数加入抵抗运

动的人，不是出于勇气，而是为了避免被逮捕、被流放、被征召到苏联红军。只有当利益大于风险时，他们才会留在森林里：绝大多数游击队员都会在两年内回归平民生活。[21]

尽管绝大多数游击队员出于民族主义而选择抵抗，但也有许多游击队员仅仅是因为曾经与德国人合作，而选择逃避苏联追捕，希望能够逃脱惩罚。某些游击队员曾经在战争期间深深卷入反犹屠杀。尤其是乌克兰游击运动，就建立在暴力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在波罗的海国家，某些游击队也有其黑暗历史。例如，立陶宛的“铁狼”（Iron Wolf）团，成立于战争期间，曾经是法西斯组织。尽管到1945年夏时，这个团体的种族主义基础已经根本瓦解了，但他们讲述的故事还是带有反犹色彩。[22] 这也难怪，就连某些西方人物也怀疑他们的动机。例如，在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就在演讲中提到，那些出身法西斯主义者的波罗的海游击队员活该被流放。尽管他的评论肯定会引起误解，但他的评论也包含了充分的事实真相。[23]

对于游击队来说更成问题的是，苏联方面声称游击队不是自由战士，而是“土匪强盗”。当他们与苏联军队爆发激战时，要反驳这种指控当然很容易，但当他们不得不袭击平民目标时，这就很难说得清楚了。如前所述，立陶宛游击队前期损失如此惨重，他们被迫改变战术。从1945年夏天起，游击队绝大多数仇杀对象都是平民，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官员以及那些公开与苏联合作的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西乌克兰以及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抵抗运动从未强大到足以公开挑战苏联军队的程度，平民合作者从一开始就成为主要攻击目标。无辜的人们难免被错杀，人们对游击队的好感开始流失。

表**3** 游击队造成的总死亡人数（**1944**～**1946**）**[24]**

年份	袭击对象	西乌克兰	立陶宛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西白俄罗斯	总数
1944	苏军* 平民	3202 2953	413 262	无数据 —	10 57	251 76	3876 3348
1945	苏军* 平民	2539 4249	1614 1630	509 262	175 141	332 296	5169 6578
1946	苏军* 平民	1441 1688	967 2037	231 177	129 125	116 135	2884 4162

注："苏军"包括苏联红军、内务部人员、警察、民兵以及当地亲苏派。

因此，游击队被迫走钢丝。为了取得成功，他们不得不把自己描绘成与新政府分庭抗礼的地下政府，能够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民众。然而，他们还不能疏远民众。一方面，他们被迫惩罚那些与苏联过从甚密的合作者；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承认，许多地方官员除了与苏联合作就别无选择。在他们力量强大的地方，起码是力量暂时强大的地方，他们能够在农村地区实行自己的法律和秩序。然而，在他们力量薄弱的地方，他们就只能破坏法律和秩序。在想极力摆脱多年混乱和流血的居民当中，游击队越来越难以获取支持。

与他们的苏联对手相似，游击队有时也诉诸恐怖手段，以贯彻自己的意志。有时候，这种恐怖手段只会换来愤怒、沮丧、好战的结果。例如，1946年3月，在爱沙尼亚城镇奥苏拉（Osula），游击队对当地的"破坏营"即爱沙尼亚志愿民兵发动袭击。这场袭击是抵抗运动在当地树立权威的尝试，但也是对某些民兵暴行的报复。游击队领导人拟定了一份有罪官员的名单，把他们关押在当地药店听候处决。按照目击证人的证言，游击活动迅速蜕变为疯狂举动：

> 丛林兄弟准备按照名单杀人。他们很快意识到，名单并未包含所有他们想找的人。有些人杀红了眼，开始射杀不在名单上的妇女和孩子。有些曾经得罪丛林兄弟的政府官员，全家都未能逃脱他们的毒手。曾经，妇女们成功制止了流血。有一次，她们把游击队员从破坏

营指挥官的妻子身边赶开，她们说怀孕的妇女不应该被杀害。[25]

当天，在游击队收队回营之前，总共有13个被列入名单的人被处决。

有时候，他们有更加冷酷的政治理由去恐吓个别社区。例如，显然是为了阻止苏联土地改革，立陶宛游击队偶尔会袭击那些从没收的大地产中分得土地的农民。按照来自阿里图斯（Alytus）省的苏联报告，1945年8月，大约有31个家庭遭到游击队袭击，有48人被杀害：

> 在被杀者当中，有11个60～70岁的老人，有7个7～14岁的孩子，有6个17～20岁的女孩。所有受害者都是贫农，他们得到了（没收的）富农土地……所有被杀者都没有为政党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工作的背景。[26]

在后来的岁月里，当农庄被强行集体化时，游击队焚烧农作物、破坏公社农具、杀死牲畜。然而，由于这些集体农庄还要满足政府粮库的定额，受苦受累的通常只有农民。为了在此时收集补给，游击队经常别无选择，只能抢掠公社商店。由于这些商店此时属于整个公社，因此整个公社都深受其害。按照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随着岁月流逝，游击队的活动开始变得不像抵抗运动，更像是报复社会。[27]

许多人也开始质疑，继续暴力和混乱还能达到什么目的。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游击队正在为失败的事业而战斗，而绝大多数平民只想结束暴力。在被迫选边站的时候，许多人此时宁愿牺牲民族主义理想也要求取安定。20世纪40年代末，告发抵抗运动越来越成为普遍现象，告发者不仅有获取悬赏的人、被迫改换门庭的前游击队员，还有普通老百姓。及至1948年，大多数被捕和被杀的游击队员，都是由于告密而落网，其比例超过7/10。换言之，他们被出卖了。[28]

抵抗的终结

波罗的海游击队最为严重的错误是，把他们正在进行的战争首先想象为一场军事斗争。实际上，他们在好几条战线上四面受敌，不仅有军事战线，而且有经济战线、社会战线、政治战线。从一开始，苏联当局就了解到，游击队极为依赖当地的农村社区以获取支持。因此，苏联当局开始毫不留情地瓦解这些社区，让这些游击队战士无处立足。

第一步开始于战后初期，共产党着手推行土地改革计划，他们在欧洲其他地区同样实施了这些计划。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居民出现真正的分化，贫穷无地的人自然比被迫交出部分财产的人更能得到好处。中产农民自然比贫苦农民更加希望加入游击队。由此产生了阶级斗争的萌芽，而当局也能把游击队描绘成反动派。[29] 这个看似微妙的关键点，其实是共产党的重大政治胜利，他们可以声称自己是为穷人而斗争。再加上其他政治手法，比如把维尔纽斯划归立陶宛就是个高明手段。立陶宛总是对这座城市提出主权声索，但从未控制过这座城市。苏联把维尔纽斯划归立陶宛，就意味着并非所有人都会像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那样，全心全意地支持游击队。

第二步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苏联再次对政治敌人实施流放政策。1948年5月22～27日，超过4万人被赶出立陶宛；次年3月，又有2.9万人加入流放大军。[30] 在拉脱维亚，有4.3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实际上断绝了抵抗运动的所有希望。[31] 尽管在短期内，流放事件让更多的人愿意逃进森林和加入游击队，但流放事件在普通居民当中摧毁了游击队的支持网络。就此而言，游击队不再能够依赖社区提供食物和其他补给。他们被迫走出森林去索取必需品，由此让当局注意到了他们的行踪。

最后一步是通过土地集体化政策切断游击队的补给线，土地集体化实际上让个人完全无法染指农业。一旦所有农场都被国家拥有和控制，就不会再有任何同情游击队的小农可以依靠。在波罗的海国家，农业集

体化甚至比共产主义集团的其他国家更为激进。1949年年初，只有3.9%的立陶宛农场、5.8%的爱沙尼亚农场、8%的拉脱维亚农场被集体化。当正式宣布农业集体化政策时，许多农民奋起反抗，但在大批农民被流放后，余下的农民仓促服从新的规定。及至1949年年底，62%的立陶宛农场都已经被国家控制。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游击队没有那么强大，抵抗运动相对缺乏组织，这两个数字分别达到了80%和93%。[32]

随着本土支持网络被摧毁，游击队就只能指望西方援助了。[33] 在绝望中，他们向西方派出代表以争取支持。最为知名的就是立陶宛游击队的尤奥扎斯·卢克萨，他徒步穿越了波兰国界，最终于1948年年初抵达巴黎。他带着致教皇、致联合国的信件，信中描述了正发生在他的祖国的野蛮驱逐行动，但他试图争取西方支持的举动没有换来任何结果。除了西方情报机构提供了某些半心半意的支持，波罗的海游击队大体上就只能自生自灭了。[34]

1950年，当卢克萨回到立陶宛的时候，斗争已经失败了。1944～1947年，森林里曾经住满了活跃的游击队员，高峰期人数达到4万人，此时已经下降到只有2000人。及至1952年夏天，可能只剩下500人了。[35] 卢克萨回国被苏联当局视为重大事件。他被数以千计的苏联内务部人员追捕，他们搜遍普尼亚（Punia）与卡兹卢鲁达（Kazlų Rūda）之间的森林，就是为了抓到他。最后，他被某个所谓的朋友出卖，被引到伏击圈里射杀了。[36] 立陶宛游击队其他领导人逐一迎来厄运。及至1956年，在他们的斗争开始12年后，立陶宛最后一支游击队终于被消灭了。[37]

烈士民族

尽管苏联安全部队效率惊人，但游击队的事业从未彻底失败。即使在1956年，最后一位游击队主要领导人、代号为“鹰”（Hawk）的阿道法斯·拉马瑙斯卡斯（Adolfas Ramanauskas）被俘虏后，还有大约45名

游击队员在立陶宛的森林里坚持斗争。迟至1965年，还有两名立陶宛游击队员被警察包围：他们吞枪自杀，以免沦为俘虏。最后一名立陶宛游击队员斯塔西斯·吉加（Stasys Guiga）被一位农村妇女庇护了超过30年，他设法逃脱了追捕，直至1986年去世。[38]

在爱沙尼亚，也有两兄弟，胡戈·莫图斯（Hugo Mõttus）和阿克塞尔·莫图斯（Aksel Mõttus）于1967年才被警察抓捕。他们在冰冷潮湿的森林掩体里生活了20年，在此期间，因为饥饿和疾病，他们失去了父亲、兄弟、姐妹。他们把亲人都埋在森林里。1974年夏天，苏联当局射杀了游击队员卡利韦·阿罗（Kalev Arro），他们在沃鲁玛（Võrumaa）的村庄里偶然碰见了他。但是，最后一名爱沙尼亚游击队员直到4年后才被杀。1978年夏天，克格勃试图逮捕奥古斯特·萨比（August Sabbe），萨比跳进沃汉杜（Võhandu）河试图逃跑，却被淹死了。[39]

在冷战高潮期间，波罗的海国家处于苏联的牢牢控制之下，人们难免得出结论，这些人是在浪费生命。就像那些被遗忘的日本士兵，在遥远的太平洋海岛上坚守到20世纪70年代；或者如孤独的曼努埃尔·科尔特斯（Manuel Cortés），他是西班牙共和派，逃避佛朗哥追捕直至1969年。这些最后的游击队员还在坚持战斗，尽管外面的世界早已物是人非。[40] 他们把赌注压在美国和苏联爆发新冲突上，但代价是押上了自己的人生，还连累他们所爱的人身陷牢狱、浪迹天涯。他们的勇气和爱国主义，他们对苏联当局的反抗，最终似乎也改变不了什么。[41]

然而，人们无法否认游击战争对后来的抵抗运动的影响。苏联对待游击队员及其家人的手法，尽管在短期内非常奏效，但造就出大批永远对苏联不满的人。正是这些人，他们被排除在正常社会之外，他们的孩子既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又无法接受高等教育，这些孩子后来成为波罗的海异见运动最为活跃的成员。[42]

历经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波罗的海国家的民众继续抵

抗苏联的镇压，尽管他们不再能够拿起武器反抗苏联，他们仍然受到游击战记忆的鼓舞。游击队的故事被反复传诵，游击队的歌曲被私下歌唱，后来演变为塔林的“歌唱革命”。游击队员的回忆录被传抄和散发，比如尤奥扎斯·卢卡萨的《游击队员》（*Partizanai* ）。[43] 1990年，在立陶宛宣布独立后不久，这本书迅速成为立陶宛最畅销的作品。游击战也启迪爱沙尼亚后苏联时代第一位总理撰写关于游击战的著作。[44]

在本章开头，我曾经提到，卡尔尼斯克斯战役的故事是游击战鼓舞后人的最佳例子，而且迄今继续启迪后人。战役结束多年以后，他们的故事变成民间传说，还有歌曲纪念那英雄主义的最后一搏。他们的故事并未随着时间流逝，反而不断引起共鸣。20世纪80年代，前游击队员回国，为阵亡的同志修建陵墓，并且为那场战役举行纪念仪式。1989年，这又成为与苏联关系紧张的根源。士兵们在苏军驻地附近驻扎，他们故意在周年纪念期间进行实弹演习，并且向聚集的人群头顶开枪。后来，士兵们又在当晚捣毁了陵墓。然而，在独立后，新的纪念碑又竖了起来，在卡尔尼斯克斯阵亡的游击队员遗体被发掘出来，重新进行了体面的葬礼。时至今日，这场战役仍然在周年仪式上受到纪念，出席人员包括前游击队员及其家人、立陶宛政府和军队的代表、地方政治家和学校的孩子。这次战役不仅成为立陶宛游击队员英雄主义的象征，而且成为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为立陶宛独立而奋斗的象征。[45]

现在，我们不会如此轻易地说丛林兄弟的奋斗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他们那注定失败的起义也不再是无人倾听、结局悲惨的故事，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这个故事被融入一个悠长得多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所有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最终独立。就此而言，游击队员及其社区的牺牲起码还是有意义的。尽管三个国家都有数万人死亡，尽管生命在流放和躲藏中虚耗，但当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民众回顾丛林兄弟的事迹时，都会认为那是有价值的事业以及民族自豪感的源泉。

---

[1]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06.

[2] 援引自Laima Vincė，afterword 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 ，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403。

[3] Lionginas Baliukevičius，引自Gaškaitė-Žemaitienė，Nijolė，'The Partisan War in Lithuania from 1944 to 1953'，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 （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44。

[4] 关于游击战的大量事例，参阅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 ，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p.103-24。大事年表可参阅http：// www.spauda.lt/voruta/kronika/chronic1.htm，accessed 17 October 2011.

[5] 关于卡尔尼斯克斯战役的详细描述，参阅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 ，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p.119-21；以及http：//www.patriotai.lt/straipsnis/2009-05-22/jonas-neifalta-lakunas-1910-1945，last viewed 17 October 2011。

[6] 关于更高的估计数字，参阅Misiunas，Romuald and Rein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 （London：Hurst & Co.，1993），p.86；关于更低的估计数字，参阅Strods，Heinrichs，'The Latvian Partisan War between 1944 and 1956'，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 （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150；以及Mart Laar，"The Armed Resistance Movement in Estonia from 1944 to 1956"，in Anušauskas，Arvyd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 （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217。

[7] Beria，引自Starkauskas，Juozas，'The NKVD-MVD-MGB Army'，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 （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50。

[8]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47.

[9] Eleonora Labanauskien？testimony in Laima Vincė’s afterword to 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375.

[10] 例如，1947年7月，秘密警察头子维克托·阿巴库莫夫就援引斯大林的“指示”为酷刑折磨辩护。参阅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32-3，247-9，291-2。

[11]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07-8，112-13.

[12] 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p.210-11，226-30，305，331，335.

[13] 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335.关于其他例子，参阅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p.203，225，228，230，240，273；Vardys，V. Stanley and Judith B. Sedaitis，*Lithuania*：*The Rebel Nation*（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7），p.84；Gaškaitė-Žemaitienė，Nijolė，‘The Partisan War in Lithuania from 1944 to 1953’，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35；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08。

[14]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89；Starkauskas，Juozas，‘The NKVD-MVD-MGB Army’，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51.

[15] Testimony of Private Strekalov，引自Starkauskas，Juozas，‘The NKVD-MVD-MGB Army’，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p.50-51。

[16] 这种团体的存在得到西方和苏联双方资料的证实。参阅Misiunas，Romuald and Rein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London：Hurst & Co.，1993），p.91；Gaškaitė-Žemaitienė，Nijolė，'The Partisan War in Lithuania from 1944 to 1953'，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31。

[17] Gaškaitė-Žemaitienė，Nijolė，'The Partisan War in Lithuania from 1944 to 1953'，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32；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37.

[18] Starkauskas，Juozas，'The NKVD-MVD-MGB Army'，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60.

[19] Laar，Mart，*War in the Woods*：*Estonia's Struggle for Survival*，trans. Tiina Ets（Washington，DC：The Compass Press，1992），pp.117-19.

[20] 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124.

[21] Misiunas，Romuald and Rein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London：Hurst & Co.，1993），p.86.

[22] 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p.101-3，147.

[23] According to Alfred Käärmann，引自Laar，Mart，*War in the Woods*：*Estonia's Struggle for Survival*，trans. Tiina Ets（Washington，DC：The Compass Press，1992），pp.183-4。

[24] Table adapted from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25.

[25] Ilse Iher，引自Laar，Mart，*War in the Woods*：*Estonia's Struggle for*

Survival， trans. Tiina Ets（Washington，DC：The Compass Press，1992），p.98。

[26] Memo from Beria to Stalin，引自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32。

[27]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32-4，137-8；Misiunas，Romuald and Rein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London：Hurst & Co.，1993），pp.92-3.

[28] Starkauskas，Juozas，'The NKVD-MVD-MGB Army'，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58.

[29]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01-2.

[30] Gaškaitė-Žemaitienė，Nijolė，'The Partisan War in Lithuania from 1944 to 1953'，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37.

[31] Strods，Heinrichs，'The Latvian Partisan War between 1944 and 1956'，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p.154-5.

[32] Misiunas，Romuald and Rein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London：Hurst & Co.，1993），pp.99，102-3.

[33] 上述三国的游击队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例如组建"武装战斗同盟"，引自Laar，Mart，*War in the Woods*：*Estonia's Struggle for Survival*， trans. Tiina Ets（Washington，DC：The Compass Press，1992），p.108。

[34] 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 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p.24-7.

[35] Gaškaitė-Žemaitienė，Nijolė，'The Partisan War in Lithuania from 1944 to 1953'，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 （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p.38，42.基于1989年之前的数字Misiunas和Taagepera乐观地估计1950年还有5000名活跃分子，Misiunas，Romuald and Rein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 （London：Hurst & Co.，1993），p.357。

[36] 参阅Laima Vincė's afterword to 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 ，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pp.385-8。

[37] 最后一位主要游击队领导人阿道法斯·拉马瑙斯卡斯于1956被俘虏，并于1957年11月29日被处决。参阅Gaškaitė-Žemaitienė，Nijolė，'The Partisan War in Lithuania from 1944 to 1953'，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 （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44。

[38] Gaškaitė-Žemaitienė，Nijolė，'The Partisan War in Lithuania from 1944 to 1953'，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 （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pp.43-4.

[39] 参阅Laar，Mart，*War in the Woods*：*Estonia's Struggle for Survival* ，trans. Tiina Ets（Washington，DC：The Compass Press，1992），pp.196-206。

[40] 参阅"Japan：The Last Last Soldier？" *Time* magazine，13 January 1975；以及Ronald Fraser，*In Hiding*：*The Life of Manuel Cortés* （London：Allen Lane，1972）。

[41] 关于抵抗行动只会让苏联的镇压更为严厉的观点，参阅Alexander Statiev's comparison of Lithuania and Belarus，pp.117，137-8。

[42] Vardys，V. Stanley and Judith B. Sedaitis，*Lithuania*：*The Rebel Nation* （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7），p.84.

[43] Translated and updated as *Forest Brothers* ；参阅Bibliography。

[44] Laar，Mart，*War in the Woods*：*Estonia's Struggle for Survival* ，trans. Tiina Ets（Washington，DC：The Compass Press，1992），*passim* .

[45] 参阅http：//www.patriotai.lt/straipsnis/2009-05-22/jonas-neifalta-lakunas-1910-1945。

第二十八章 冷战镜像

1948年1月29日，作为大规模政治镇压计划的组成部分，一名16岁的女孩与母亲一起被逮捕并被流放，时至今日她还活着，但她希望隐姓埋名。在遥远的拘留营度过一年后，她被转送到所谓的“妇女再教育特殊学校”。在这里以及后来再去的拘留营，她受到强制洗脑和折磨，直至她最终同意签署悔过书，放弃她之前的政治信仰。数十年后，她告诉采访者：“这是我生命中最悲惨的时刻。”“我整整一个月没有下过床……我的睡衣从粉色变成黑色。我甚至不想洗澡或者换衣服。我几乎精神崩溃。”[1]

上述事件并非发生在铁幕背后，而是发生在希腊。拘留营也不在哈萨克或者西伯利亚，而是在爱琴海，在伊卡里亚（Ikaria）、特里克里（Trikeri）、马克罗尼索斯（Makronisos）这些海岛上，这里不是共产党实施迫害的地方，而是共产党遭到迫害的地方。被审问的女孩来自秉持左翼观点的家庭，因此被视为希腊国家的危险人物。

共产党在西欧某些地区的遭遇，与“资本家”在东欧的遭遇，形成了令人讨厌的对称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希腊当局实行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与发生在波罗的海国家和西乌克兰的大规模逮捕行动，其实并无二致，而且逮捕原因也是相同的，就是为了镇压反抗。希腊与铁幕西边许多国家一样，把数以万计的政治嫌疑犯流放海外，流放到英国控制下的中东，如同流放到苏联控制下的西伯利亚。政府指使的民兵，通过强奸、抢劫、谋杀来制服大部分居民，其为所欲为的程度和残忍蛮横的程度一如东欧。

右派在希腊夺权的方式，与左派在东欧夺权的方式，同样构成平行关系。在希腊政坛上，右翼保守主义者并不是占优势的力量，但他们还

是设法让更得民心的共产党靠边站，一如强大的传统政党在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靠边站。通过警察对政党的刻意渗透以捞取政治好处，在铁幕两边都同样下作。在希腊，这导致共产党早在1944年12月就退出内阁，以示抗议；三年后在捷克，传统政党因为同样的理由而退出内阁，两者如同镜子内外的映像。希腊右派，如同东欧共产党，使用媒体和法庭来抹黑和惩罚政治对手。表面上，各方似乎都没有破坏民主程序。1946年3月的希腊选举伴随着作废选票和恐吓选民，一如波罗的海国家的选举；同年稍后的恢复希腊君主制的公民复决，一如罗马尼亚那场事先做手脚的选举。

在每宗个案中，类似行为只有在统治当局得到外来超级大国支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在铁幕背后，正是苏联在支配各国共产党；在希腊，则先后由英国和美国为右派做担保。如果没有外来干涉，难以想象共产党怎么可能在东欧绝大部分地区获得权力，正如人们难以想象，共产党怎么可能在希腊丧失权力一样。难怪这两个地区的民众都痛恨外来干涉。如果罗马尼亚人和波兰人抗议他们受到“没有上帝、没有祖国的外国人”的陷害，那么，某些希腊人也大可以抱怨他们受到“外来帝国主义者的……奴役”。[2]


12. 冷战期间分裂的欧洲
1945～1948年成为共产主义国家
1945年南斯拉夫从意大利获得的领土
铁幕
1945年后的德国
北
北海
瑞典
芬兰
挪威
拉多加湖
赫尔辛基
波罗的海
奥斯陆
列宁格勒
斯德哥尔摩
塔林
爱沙尼亚
莫斯科
里加
拉脱维亚
丹麦
哥本哈根
立陶宛
苏联
加里宁格勒
维尔纽斯
明斯克
格但斯克
白俄罗斯
荷兰
什切青
阿姆斯特丹
柏林
波兰
华沙
布鲁塞尔
东德
基辅
弗罗茨瓦夫
比利时
波恩
布拉格
卢森堡
西德
克拉科夫
利沃夫
乌克兰
捷克斯洛伐克
法国
布拉迪斯拉发
摩尔多瓦
维也纳
布达佩斯
伯尔尼
奥地利
罗马尼亚
瑞士
匈牙利
黑海
布加勒斯特
贝尔格莱德
南斯拉夫
保加利亚
意大利
索非亚
伊斯坦布尔
罗马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
希腊
土耳其
地中海
雅典
0 200英里
0 200千米

不仅希腊“民主”政府的行为与东欧共产党政府的行为相互映衬，整个欧洲大陆都存在排挤和抹黑政治对手的倾向，只不过没有希腊那么极端而已。例如，1947年，把共产党逐出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卢森堡政府，与传统政治家被逐出东欧政府同样相互映衬。还有些方法对民主的破坏没有那么严重，但其目的是相同的：软化反对派，从超级大国那里获取支持。正是这些超级大国拿着所有的底牌，它们对各自半个欧洲的影响力足以分庭抗礼。美国试图指导西欧政策，一如苏联试图控制东欧政府，同样是多管闲事，只不过方法有所不同：美国使用马歇尔援助的“胡萝卜”，而苏联使用军事压力的“大棒”。

我不想在这种比较上走太远，因为资本主义政治模式比斯大林共产主义更为包容、更为民主、更为成功，这早已得到证明。但这些“民主”国家在战后的某些做法难称完美，这倒也是事实。在某些例子中，“民主”国家甚至比共产党国家做得更糟糕，例如意大利南部农民的境遇，政府拒绝进行早已承诺的土地改革，这比起共产党统治早期在东欧的进取态度，意大利政府实在是糟糕得可以。双方都未能独占道德制高点。在广袤多变的欧洲大陆上，以偏概全总是不明智的。

但在当时，这种总体对照日益明显。左派理论家总是把与他们世界观不同的人称为“法西斯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吸血鬼”。右派理论家则把秉持温和左翼观点的人称为“布尔什维克”“恐怖分子”。结果，中间人士也被迫选边站队，通常是站在当时的最强者那边。借用一位国际共产主义元老的话来说：“人们要么倒向帝国主义，要么倒向社会主义。中间立场只不过是伪装手段，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3] 如果站错队伍，尤其是在东欧或者希腊，后果可能相当致命。

如前所述，这种意识形态冲突并非战后的新现象。早在世界大战还在进行的时候，左派游击队与右派民兵就已经打得不可开交，有时候，他们甚至与德国人达成地区停火协议，以便集中火力投入左右互斗。地

方内战与世界大战相伴而行的现象，不仅发生在希腊，而且发生在南斯拉夫、意大利、法国、斯洛伐克、乌克兰。交战双方都如此狂热，以至于反对德国占领的民族战争都显得没那么重要了，首要问题还是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根深蒂固的斗争。

在这种左右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中，1945年的德国战败仅仅意味着欧洲最为强大的右派支持者倒了台，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战争的终结。事实远非如此：对于许多共产党员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已经持续数十年的宏观历史进程的某个阶段而已。希特勒的失败不是终点，而是发动下一阶段斗争的起点。共产党控制整个东欧也被视为这个进程的组成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教条，这个进程将会以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必然”胜利而告终。

仅仅是西方盟国的存在，尤其是美国的存在，阻止了共产主义传播到整个欧洲。因此，难怪战后多年以来，共产党员总是把美国描绘成帝国主义阴谋家，正如他们把匈牙利或者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反对派丑化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在共产党员心目中，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与更为民主的人物，如杜鲁门总统、纳吉·伊姆雷或者尤柳·马纽，都没有根本的差异，他们都代表着一种剥削工人阶级的、企图继续践踏社会主义的国际体系。

至于美国人，很快就被拖入两极对立。他们未曾打算投入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但在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也就同时卷入了右派反对左派的宏观政治进程。自从战后成为欧洲警察，美国人就发现自己陷入左右两派之间无数地方冲突的泥潭，每次他们都本能地支持右派，甚至不惜支持残暴的独裁者，比如在希腊。久而久之，美国人也开始丑化政治对手，及至20世纪50年代，迪恩·艾奇逊或者乔治·马歇尔曾经采取的慎重手段，已经让位于以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为典型的暴力话语。麦卡锡把美国共产党形容为“大得不着边际的阴谋

集团，让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任何冒险集团都相形见绌”，麦卡锡主义与东欧的反美主义同样是非理性的表现。[4]

正是欧洲的两极对立以及后来全世界的两极对立，把两大阵营对抗变成20世纪下半叶的明确特征。冷战不同于此前发生过的任何冲突。就其规模而言，冷战毫不逊色于两次世界大战，然而这不是以枪炮和坦克为主要武器的战斗，而是争夺人心的战斗。为了争夺人心，斗争双方都用尽一切必要手段，从操纵媒体到暴力危险，甚至把年轻的希腊女孩关进政治监狱。

对于欧洲来说，也对于欧洲人来说，这场新的战争将会同时显示欧洲大陆对于全世界的重要地位和无奈处境。一如此前30年的两场全球性战争，欧洲仍然是冲突的主要场所。但在欧洲历史上，欧洲人首次不再拉动绳索：从那时起，欧洲人将会成为捏在超级大国手中的马前卒，而这两个超级大国甚至都在欧洲大陆的边界之外。

---

[1] Tassoula Vervenioti，“Left-Wing Women between Politics and Family”，in Mazower，Mark（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09，115.

[2] Democratic Army of Greece radio proclamation to the Greek people，24 December 1947，引自Clogg，Richard（ed.），*Greece 1940-1949*：*Occupation*，*Resistance*，*Civil War*：*A Documentary History*（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205；speech by Nicolae Rădescu，援引自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p.67；Giurescu，Dinu C.，*Roman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1939-1945*），trans. Eugenia Elena Popescu（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doc.4，pp.174-5。

[3] Mao Zedong，1 July 1949，引自Conrad Brandt，Benjamin Schwartz and John K.Fairbank，*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London：Allen & Unwin，1952），pp.453-4。

[4] McCarthy，Joseph R.，*America’s Retreat from Victory*：*The Story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New York：The Devin-Adair Company，1951），

p.168.

结语

1978年，保加利亚异见作家格奥尔基·马尔科夫（Georgi Markov）在伦敦死于著名的“雨伞刺杀”[1]。在他死后，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写就的回忆录出版。在此书中，他讲述了战后时期极具标志性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他的祖国，但也发生在全欧洲。里面有一段涉及他的朋友的对话，他的朋友曾经因为质问插队买面包的共产党官员而被逮捕，问话者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民兵军官：

> 民兵队长问道：“现在告诉我，你的敌人是谁？”
>
> K思索片刻，回答道：“我确实不知道，我不认为我有任何敌人。”
>
> 民兵队长提高嗓子喊道：“没有敌人！你的意思是你不恨别人，别人也不恨你吗？”
>
> K回答道：“据我所知，没有。”民兵中校突然喊道：“你在撒谎！”民兵中校从椅子里弹起来：“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竟然会没有任何敌人？如果你没有敌人，你肯定不属于我们的青年，你不可能是我们的公民！……如果你确实不知道如何憎恨，我们会让你学会！我们会以很快的速度让你学会！”[2]

在某种意义上，故事里的民兵队长是对的，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其实不可能没有任何敌人。几乎没有什么比这个故事更能说明战争的道德遗产和人性遗产了。在整个地区沦为废墟后，在3500万人惨遭屠戮后，在无数次以民族、种族、宗教、阶级、私怨为名义的屠杀后，欧洲大陆上每一个人，其实都承受过某种程度的丧亡之痛、不公之苦。每个国家都经历过漫无目的的战斗，如保加利亚经历过政治骚乱，经历过与邻国的暴力争端，经历过纳粹的胁迫，最终经历新兴世界大国的入

侵。置身上述所有事件中，人们对敌人心怀怨恨，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实际上，各方领导人和宣传人员，足足用了六年时间来助长仇恨，以此作为追求胜利的必备武器。当这位保加利亚民兵队长恐吓索非亚大学的年轻学生时，仇恨已经不仅仅是战争的副产物，在共产党员心目中，仇恨已经上升为责任。

战争结束后，人们有许多许多理由不再关爱邻人。如果你是德国人，你就可能遭到几乎所有人的辱骂，如果你曾经与德国人合作，你的处境也可能同样糟糕：战争结束后，绝大多数报复行为都针对这两个群体。你可能会拜错神灵：天主教的神、东正教的神、穆斯林的神、犹太人的神，或者根本不信神。你可能会生错种族或者民族：战争期间，克罗地亚人屠杀塞尔维亚人，乌克兰人杀害波兰人，匈牙利人镇压斯洛伐克人，几乎所有人都在迫害犹太人。你可能入错政党：在欧洲大陆，法西斯党和共产党都犯下无数暴行，法西斯党和共产党都遭到残酷镇压，实际上，即使你选择这两种极端信仰之间的任何政治理念，你都难以逃避镇压。

1945年弥漫全欧洲的痛苦情绪，不仅说明这场战争波及的范围如何广泛，而且说明我们传统的理解方式如何不足。仅仅把这场战争描绘成轴心国与同盟国的领土冲突是远远不够的。战争当中某些最为恶劣的暴行与领土无关，而与种族或者民族有关。纳粹袭击苏联，不仅仅是为了生存空间（Lebensraum），而是为了坚持日耳曼种族优越于犹太人、吉卜赛人、斯拉夫人的主张。苏联入侵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也不仅仅是为了领土，而是为了让共产主义尽可能往西边扩散。某些最为惨烈的战斗也不是发生在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而是发生在当地人之间，他们终于能够借助世界大战的机会，发泄由来已久的沮丧情绪。克罗地亚乌斯塔莎为种族纯化而战，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为民族解放而战，许多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为废除君主制或者复辟君主制而战，许多意大利人为摆脱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枷锁而战。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不

仅仅是传统意义的领土冲突，它同时也是种族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中间还夹杂着几场纯粹出于地方原因而引发的内战。

由于德国人只不过是这锅冲突大杂烩的其中一道原料，人们完全有理由断定，德国战败并不意味着暴力结束。实际上，把1945年5月德国投降视为战争最终结束的传统观点完全是误导：实际上，德国投降只不过是其中一方结束战斗。关于种族、民族、政治的相关冲突，还持续了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之久。意大利的武装团伙，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还以私刑处死法西斯分子。曾经分别作为德国人的反对者和合作者的希腊共产党和希腊民族党，直至1949年还在上演割喉大战。产生于世界大战高潮时期的乌克兰游击运动和立陶宛游击运动，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还在坚持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像一艘巨大的超级油轮，驶过欧洲这片水域，它的动量如此巨大，尽管它的引擎已于1945年5月停止了转动，但它造成的余波却在数年以后才能平伏。

在格奥尔基·马尔科夫的故事里，那位保加利亚民兵队长所期待的仇恨相当具有典型意义。这正是苏联宣传人员如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和米哈伊尔·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在战争期间所期待的仇恨，也正是政治委员当时试图在东欧部队中鼓动的仇恨。如果那位受到民兵队长恐吓的学生对斯大林主义理论有所了解，他就会知道他的敌人是谁，这将会成为此后数十年每一位保加利亚学生学习的中心内容。

弥漫于战后欧洲的愤怒和怨恨的气氛，是煽动革命的理想环境。共产党并未把这种充斥着暴力和混乱的环境视为痛苦的诅咒，而是视为难得的机遇。早在1939年以前，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与农民、统治者与臣民相互之间的关系总是很紧张，但这种紧张关系通常局限于地方层面和短期事件。这场战争及其带来的经年累月的流血和贫困，让这种紧张关系远远超出共产党在战前的想象。大部分居民此时指责旧政府把他们拖

入战争的深渊，人们鄙视与敌人相互勾结的商人和政客。而且，当欧洲大部分地区濒临饥荒边缘时，人们痛恨任何在战争中捞到好处的人。如果说工人在战争爆发前就受到剥削，那么战争期间这种剥削简直达到了极限：数百万人被强迫奴役，还有数百万人被活活累死。这就难怪，在战争结束后欧洲大陆会有如此众多的人转而信仰共产主义：面对早已声名狼藉的政客，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激进的选择，而且为人们提供了机会，让人们发泄所有在恐怖岁月里积郁的愤怒和怨恨。

无数催促党员积极分子鼓动仇恨的文件早已证明，仇恨是共产党在欧洲大获成功的关键。共产主义不仅得益于人们对德国人、法西斯分子、通敌卖国者的憎恨，而且得益于人们对贵族、中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反感。后来，随着世界大战逐步演变为冷战，这种紧张关系很容易转化为对美国、资本主义、西方的反感。反过来，美国、资本主义、西方也同样厌恶共产主义。

不只有共产党把暴力和混乱视为难得的机遇，民族主义者也明白，战争期间点燃的紧张关系能够用于其他目的，如在国内进行种族清洗。许多民族利用战争结束后人们对德意志人的仇恨，把已经在东欧生活了好几百年的古老的德意志社区驱逐出境。波兰利用战时对乌克兰人的仇恨，发动驱逐计划和强迫同化。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着手进行一系列人口交换，反犹团体利用暴力氛围把仅存的少量犹太人逐出欧洲大陆。上述团体的目标无非在中欧和东欧创造一系列种族纯化的民族国家。

战争结束后，民族主义者从未达到目的，这部分是由于国际社会不允许他们胡作非为，部分是由于冷战的需要优先于其他所有需要。但随着冷战结束，昔日的民族紧张关系再次浮出水面。许多人认为早已作古的议题瞬间复活，由此造成的紧张局势让50年前的往事仿如昨日。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共产党政权垮台后的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是战后没有实行种族驱逐和流放的东欧国家之一。结果，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仍然杂居在遍布此地的混合社区中，当内战于20世纪90年代初爆发时，这种局面将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国内冲突的罪魁祸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作为他们为非作歹的理由，勾起了人们自1945年以来的旧日记忆和种族紧张关系。在当时反复上演的犯罪行为中，他们沉溺于集体强奸、屠杀平民以及大规模种族清洗。

此外，在共产党政权垮台后，欧洲许多地区也发生了不甚具有戏剧性但同样具有重要性的事件。例如，2006年，一位名叫赫德维加·马利诺娃（Hedviga Malinova）的斯洛伐克学生告诉警察，她因为带有匈牙利口音而遭到殴打。这一指控广为人知，重新勾起了斯洛伐克国内斯洛伐克人与匈牙利人的紧张关系。斯洛伐克内政部部长指控那名学生说谎，警察指控那名学生作伪证，斯洛伐克政府及其匈牙利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如1946年的往事。[3]

在国界另一边，匈牙利似乎回归到类似的但更为微妙的民族仇恨：20世纪40年代以来再未见过的反犹主义，此时又死灰复燃。2011年年初，一位获奖的匈牙利钢琴家希夫·安德拉斯（András Schiff）致信《华盛顿邮报》，声称他的国家正被“反动民族主义”席卷而去，这种民族主义以仇恨吉卜赛人和犹太人为特征。[4] 仿佛对钢琴家的讽刺置若罔闻，匈牙利右翼媒体立即还以颜色，声称只有犹太人才能够指控匈牙利犯有如此的罪行。例如，拜耶·若尔特（Zsolt Bayer）就在《匈牙利新闻》（*Magyar H írlap* ）上写道：“有一堆臭气熏天的粪便，名叫科恩，他在英格兰说什么从匈牙利‘飘来难闻的臭味’。科恩、科恩-邦迪、希夫……不幸的是，他们没有被活埋在欧尔戈瓦尼（Orgovány）的森林里。”[5]

这种情绪说明，最近在全欧洲死灰复燃的反犹主义，并不仅仅是中东紧张关系的产物。传统形式的、针对犹太人的仇恨情绪，仍然存留至

今。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共产党政权垮台后针对吉卜赛人的仇恨情绪，其在捷克、波兰、匈牙利尤为激烈。2011年秋天，在保加利亚，在一系列反吉卜赛人的种族主义游行示威后爆发了大规模骚乱。[6]

种族问题的重新出现，难免会让人认为，也许20世纪40年代民族主义者建立种族纯化国家的尝试是对的。如果在斯洛伐克或者匈牙利境内没有少数民族，就没有类似问题了。且不论这种想法存在明显的道德缺陷，问题在于，几乎不可能建成种族纯化国家。战争结束初期，波兰通过驱逐或者侵扰德意志人、犹太人、乌克兰人，几乎建成种族纯化国家。但即使在波兰，也不可能驱逐所有人，尤其是乌克兰少数民族，他们也许是波兰社会中最为根深蒂固的种族群体。最后，波兰人诉诸维斯瓦河行动这个充满争议的计划，通过分散乌克兰社区，把他们散布到波兰北部和西部来实现强迫同化。这一镇压计划在当时似乎大获成功，然而今天看来，同化计划显然未能奏效。20世纪90年代以来，兰克人和乌克兰人越来越坚持他们的共同种族权利。他们组成政治游说和施压团体，反复要求返还他们在战后被没收的财产。维斯瓦河行动并未解决问题，仅仅是为后来遗留了新的问题。

即使完全驱逐国内的少数种族，也未必能够解决问题。20世纪40年代，许多国家都在驱逐德意志人，尤其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很可能是战后最为广泛、最为彻底的种族驱逐行动了，其在德国境内造成了从未消散的愤恨情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被逐者组成德国境内一个最为强大的施压团体，借用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的话来说，这个团体“大致是保守的，而且肯定打算收复家园”。[7] 就像波兰境内的兰克人和乌克兰人，这些人持续不断地为收回他们在战后被窃取的土地和财产而展开游说。一想到要应对这些被逐者的要求，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政府就充满恐惧。例如，2009年，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就拒绝签署赋予欧盟更多权力的《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因为害怕条约某些内容会为德国人提出针对捷克的法律要求大开方

便之门。克劳斯把条约搁置了好几个星期，直到捷克被赋予某些条款的豁免权时才签署。战后驱逐德意志人并未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问题，仅仅是把问题出口到国外而已。

有人可能会期待，随着上一代人陆续去世，被逐者问题终究会消退，不幸的是，这种方法似乎也未能奏效。在德国以及其他国家，许多最为直言不讳的“被逐者”其实并非亲身经历驱逐行动的受害者，而是他们的孩子和孙子。人们只要看看发生在克里米亚的事情，就能知道民族紧张关系如何世代相传了。1944年，克里米亚鞑靼人被斯大林赶出家园，斯大林下令要把鞑靼人驱散到苏联统治下的中亚各地，作为鞑靼人在战时与德国人合作的惩罚。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约25万鞑靼人决定重返他们在克里米亚的家园。他们搬进废弃的房屋，并且将其修葺一新。他们在闲置土地上建立非法居留地，并且反复纠缠乌克兰当局，要求把他们登记为合法所有人。当警察威胁要赶走他们时，他们暴力抗议，有时甚至淋上汽油引火自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说，绝大多数所谓“回归者”其实并非“回归”此地：他们生在中亚、长在中亚。他们放弃相对富裕和安稳的生活，就是为了前往他们从未见过的故乡，而故乡却并不欢迎他们。[8]

民族神话之重要性

驱使这些人回到故乡的原动力，来自他们曾经反复听过也被整个社群反复传诵的故事和神话。鞑靼人记取他们在母亲的怀抱里被流放的痛苦，他们日复一日地讲述这些故事，口耳相传超过60年。在他们心目中，克里米亚被升华到应许之地的高度。一位鞑靼人说道：“对于苏联民众来说，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就是历史。对于克里米亚鞑靼人来说，现在就是历史……他们就生活在历史当中。”[9] 同样，德国被逐者无休止地缅怀他们向西艰难跋涉时的恐怖经历，而乌克兰人总是说起维斯瓦河行动的残暴野蛮，仿佛如在昨日。这些故事被反复传诵，不是因为它们曾经发生过，而是因为它们大有用处：这些故事是上述民族群体

的黏合剂。

说到构建神话，西方也未能免俗。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都建构起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种种不公的神话，并且通过无休止地讲述这些神话，力求营造这样的印象：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团结协作，共同反对法西斯分子和纳粹侵略者。于是，数十年来，人们广泛参与通敌合作的肮脏事实就被轻易地掩盖过去了。通敌卖国者也构建起解放后他们遭受不公的神话。关于政治右派的无辜成员承受极端暴力侵犯的故事，只要被反复讲述，就能营造这样的印象：上述国家的所有人都受到同等伤害，且不论其政治信仰为何。

胜利者也有他们的神话。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某种民族工业。关于那场战争的电影、戏剧、纪录片每天都在电视上放映，关于那场战争的图书总是雄踞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位置。那场战争出现在所有的国家典礼中，无论是世界杯期间英国球迷传唱的歌曲，还是国家典礼期间从人们头上飞过的喷火式战斗机和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与美国人一样，英国人也把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年代视为“伟大的世代”，那代人把世界从邪恶的纳粹主义手中拯救出来。与美国人一样，英国人宁可相信他们独自完成了这一丰功伟业。例如，人们只记得1940～1941年不列颠之战期间，英国人孤军奋战；人们很少承认，在保卫这个国家的每五位飞行员中，就有一位来自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法国，以及大英帝国其他地区。

如此深切地对这些神话敝屣自珍，难免会与同样珍惜神话的其他人发生冲突。对某人来说是复仇，对别人来说则是正义。如果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把自己被逐出捷克边境视为残忍暴行，那么，捷克人就会把驱逐德意志人视为对历史错误的拨乱反正。如果某些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为自由媒体对维斯瓦河行动的道歉而鼓掌欢呼，那么，某些乌克兰境内的波兰人就会视之为背叛祖国。如果英国人把兰开斯特式轰炸机视为民

族自豪感的象征，那么，德国人只会视之为无差别轰炸的象征。

南斯拉夫解体后，塞尔维亚报纸《时代》（*Vreme* ）一位专栏作家写道：

> 复仇还是宽恕。纪念还是遗忘。战后出现的种种挑战，并不符合上帝的公正：有太多非正义的复仇，有太多不应该的宽恕。纪念与遗忘的政策，并不服务于和平与安定。塞尔维亚人想要忘记的东西，正是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想要记住的东西，反之亦然。如果交战双方同时纪念某一事件，那么，一方眼中的罪恶行径就是另一方眼中的英雄事迹。[10]

同样的情感也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以及东欧绝大多数民族。

关于民族神话，另一个不断出现的问题是，民族神话要么真伪混杂，要么纯属谎言，但无法澄清。对于那些充满悲情的人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故事的真实内容，而是他们的情感共鸣。本书引用的所有统计数字，几乎都遭到某些民族团体的反驳。例如，德国被逐者组织仍然声称，在东欧驱逐行动期间，有200万名德意志人惨遭屠杀，然而只要看看他们声称援引的政府统计数字，就知道他们严重歪曲了事实。“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这样的术语被不求甚解地随意滥用，瓦姆比诺维采（Łambinowice）和希维托赫洛维采（Świętochłowice）这样的波兰拘留营被贴上“灭绝营”的标签，仿佛死在那里的数百人可以跟被铲进索比堡、贝乌热茨、特雷布林卡焚尸炉的数百万人相提并论。

欧洲各地彼此竞争的民族团体总是坚持自己的统计数字，同时贬低对手的统计数字，且不论其是否符合事实。于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战争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杀害6万～9万波兰人的数字，经常被波乌双方的“历史学家”故意忽视：波兰人把这个数字乘以5，乌克兰人把这个数字除以5。[11] 同样，塞尔维亚人总是夸大他们的战时死亡人数，夸张到大约70万人，而克罗地亚人同样夸大战后南斯拉夫政府的杀人数字。

[12] 西方的政治派系同样喜欢运用虚假数字。数十年来，法国右翼总是诡称，抵抗组织在战后冷血地谋杀了大约10.5万名维希分子，而现在为人们接受的实际数字只不过是1000多人。[13] 这些虚假数字流传甚广，甚至严肃的历史学家也会偶尔引用，结果这些数字更加以讹传讹。

如果说这些神话和虚假数字在相对细小的民族群体和政治群体中容易引发敌对情绪，那么，当这些小团体融入主流时，这些神话和数字也会更加神不知鬼不觉地引发敌对情绪。20世纪末以来，整个欧洲都在明显右转，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极右团体从未获得过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这些团体企图洗脱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引起暴力循环的罪责，并且把罪责归咎于他们的左翼对手。但在极右分子开始推销特定历史观念的同时，我们同样要保持警惕，如同我们过去对共产党的历史观念保持警惕那样。

关于如何利用历史谋取政治利益的生动例子，发生在2005年的意大利，当时政府各部门长官宣布成立一个全新的国家纪念日。他们希望纪念的那些事件发生在1945年，当时意大利东北边境正被南斯拉夫游击队占领。在一次疯狂的、一如南斯拉夫其他地方发生的种族清洗行动中，数千名意大利平民被屠杀，或者被活活扔下当地的峡谷。为了纪念这些事件发生60周年，也为了纪念与南斯拉夫就意大利东北边境问题签订条约，当局计划举行一系列纪念仪式。其中一场仪式就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举行，这座城市临近边境，并且还要上演南斯拉夫暴行的虚拟场景。在争议声中，意大利外交部部长詹弗兰科·菲尼（Gianfranco Fini）出席仪式，而他所属的政党民族联盟正是战后新法西斯运动的继承者。

在官方纪念日演说中，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向全国讲道："如果我们回顾20世纪的历史，我们会看见许多不堪回首的页面。但我们不能遗忘，也不该遗忘。"[14] 然而，说到援

引历史，意大利政府其实是以极具倾向性的态度来选择记忆的。1945年确实有数千名意大利人被南斯拉夫游击队屠杀，但只要再往前追溯四年，人们就能看到，并非南斯拉夫人或者共产党员开启了这个循环。正是意大利法西斯首先入侵南斯拉夫，首先犯下暴行，首先把乌斯塔莎这个战时欧洲最令人厌恶的政权推上前台。

实际上，纪念活动与“历史”完全无关，倒是与政治密切相关。随着意大利对东欧移民越来越敏感，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很容易把他们的斯拉夫邻居描绘成流氓恶棍，但这不仅仅是为了丑化外国人。纪念活动就发生在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国际纪念日后一周，其目的就是企图故意提起意大利国内的大屠杀。意大利人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把他们的邻居打扮成施害者。同样重要的是菲尼的观点，它挑战了意大利民众是法西斯暴行受害者的传统观点。在纪念活动中，流氓恶棍不是政治右派，而是左派。这是以狡猾的方式为詹弗兰科·菲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前辈洗脱战争罪行。[15]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只要我们继续纪念战争及其后果，欧洲各个彼此竞争的民族群体和政治群体就不会放下仇恨和敌意。2005年的纪念活动当然无助于提升意大利及其东北邻国的友好关系。或许乔治·桑塔耶那（George Santayana）的著名格言应该要反过来说，他说“那些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我们则可以说，正因为我们没有忘记过去，我们注定要重蹈覆辙。过去20年里民族仇恨的沉渣泛起，也许就能证明我们所言非虚。[16]

然而，如果我真的相信纪念是延续仇恨的原因，那么，我也就不会写作本书。耙梳战争的废墟瓦砾，复述许多引发敌对的故事，这也太过不负责任。如果人们遵循这样的逻辑，那么，关于这个时期也就不该有任何书本，也不该有任何报纸文章、电影或者电视纪录片，把这些故事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只不过是在重复罪恶的循环而已。纪念，甚至记忆本

身，都成了罪恶，那么，唯一正确的政策就是刻意遗忘。

但是，遗忘并不是选项。从一开始，本书记载的事件如此重大，根本不可能被遗忘。冷战期间，共产党曾经千方百计压制文化记忆，但结果却说明，试图忘记过去只会引起愤恨，最终引起对事实的危险歪曲。歪曲事实比事实本身要危险得多。我们也不应该遗忘。这些事件构成了我们周围的世界，而且继续塑造着今天的世界，这些事件不仅对历史学家无比重要，而且对所有人都同等重要。正是我们对过去的记忆造就了我们，不仅造就了民族，而且造就了个人。

在我们的近代历史中，战后初期是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大陆，那么，战后初期变化多端的混乱局面却造就了新欧洲。正是在这个充满暴力和复仇的时期，我们的希望、抱负、偏见、怨恨初次成形。任何人想要真正理解今日的欧洲，必须首先理解关键的成形时期。我们没有必要回避困难议题或者敏感议题，因为这正是建构现代欧洲的要素。

我们铭记过去的罪恶并不会挑起仇恨，关键在于我们纪念的方式。战后初期通常被我们所有人忽略、误解、滥用。贝卢斯科尼和菲尼的历史版本遗漏了对意大利罪恶行径的严肃承认；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历史观点掩盖了他们与纳粹合作的事实；德国被逐者则试图把他们吃过的苦头与犹太人承受的苦难相提并论。

那些想要利用仇恨和愤怒来谋取利益的人，总是企图以偏听偏信的方式歪曲历史。他们断章取义，他们推卸责任，他们企图让我们相信，历史问题就是现实问题。如果我们想要终止仇恨和暴力的循环，我们就必须抵制上述倾向。我们必须说明，彼此竞争的历史观点可以共存。我们必须说明，过去的暴行自有其历史背景，责任不能只由一方承担，而必须由各方共同承担。我们必须力求发现真相，尤其是在面对统计数字时更要小心谨慎，我们要把真相写入历史。但毕竟那是历史，不应该用

来毒害现实。

尽管有许多令人压抑的例子可以说明人们如何利用历史挑起旧日仇恨，但历史同样是希望的象征。在许多可供引用的例子中，我选择德波两国关系的例子。战争结束后，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的世仇宿怨似乎永远无法消解。波兰人厌恶那个蹂躏波兰、屠杀数百万平民、建立一系列集中营的德意志民族。也许是20世纪最邪恶象征物的集中营，就坐落在波兰境内。反过来，德国人也怨恨那些野蛮的“斯拉夫人”，他们强奸和谋杀了数百万德裔平民，夺取了他们在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东普鲁士的家园和农庄，割去了数千平方英里的德国领土，国际社会把这些领土交给了波兰。

然而，在1965年，波兰主教向德国请求和解与宽恕。1970年，波兰与西德签署条约。数百万波兰人可以探访他们的近邻，亲眼看看普通德国人的生活。同时成立了波兰-德国联席委员会，以修订历史课本，改正不准确的统计数字，防止历史片段被过度渲染以用于政治目的。往事并未被遗忘，但被放在合适的背景之中。今天，德国人与波兰人普遍把对方视为友好邻邦。残存的仇恨仅仅局限于少数群体，一方是被逐者，另一方是老一辈波兰人。这两个群体的成员都在陆续离开人世，或者随着时间流逝而淡出人们的视野。

对于生活在波兰和德国的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战时和战后的种种往事，已经不再成为芥蒂。民族竞争仍然偶尔可见，但那是在足球比赛中，在波兰和德国球迷的队歌和口号中，但足球终归是足球。至于真正的仇恨，那种政治委员和参战老兵用于鼓舞士气的仇恨，已经被绝大多数年轻人视为远去的历史。[17]

---

[1] 利用雨伞上的针尖，把蓖麻毒素注入受害人体内，从而导致器官衰竭。——译者注

[2] Markov，Georgi，*The Truth that Killed*， trans. Liliana Brisby（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3），p.16.

[3] *The Economist*， 13 November 2010，p.48.

[4] *Washington Post*， 1 January 2011；另可参阅István Deák，“Hungary：The Threat”，*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58，no.7（April 2011），pp.35-7。

[5] 引自István Deák，“Hungary：The Threat”，*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58，no.7（April 2011），pp.35-7。欧尔戈瓦尼是1919年大屠杀的发生地，反革命军官谋杀了共产党嫌疑犯以及没有政治倾向的犹太人；科恩-邦迪是匈牙利政府的左翼反对者.

[6]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European Union Minorities and Discrimination Survey：Main Results Report（Vienna：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2009），pp.9，15，167-70（available on http：//fra.europa.eu/fraWebsite/attachments/eumidis_mainreport_conference-edition_en_.pdf，last viewed 12 October 2011）.

[7] Clay，Lucius D.，*Decision in Germany* （London：Heinemann，1950），p.315.

[8] Uehling，Greta Lynn，*Beyond Memory*：*The Crimean Tatars'Deportation and Return* （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p.8-9.

[9] Uehling，Greta Lynn，*Beyond Memory*：*The Crimean Tatars'Deportation and Return* （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10.

[10] 援引自Jedlicki，Jerzy，'Historical Memor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s in Eastern Europe'，*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2，no. 3（1999），p.230。

[11] 参阅Jedlicki，Jerzy，'Historical Memor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s in Eastern Europe'，*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2，no. 3（1999），Chapter 18，note 19。

[12] Žerjavić，*passim*； Jurčević，Josip，*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in Croatia*：*The Crimes of Yugoslav Communists in Croatia in 1945* （Melbourne：Croatian Herald，2006），p.6.另可参阅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761 and Jedlicki，Jerzy，'Historical Memor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s in Eastern Europe'，*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2，no.

3（1999），Chapter 12。

[13] 参阅Jedlicki，Jerzy，‘Historical Memor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s in Eastern Europe’，*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 32，no. 3（1999），Chapter 13，note 51。

[14] *Guardian*，11 February 2005.

[15] 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31.

[16] Jedlicki，Jerzy，‘Historical Memor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s in Eastern Europe’，*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 32，no. 3（1999），p.225.

[17] Jedlicki，Jerzy，‘Historical Memor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s in Eastern Europe’，*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 32，no. 3（1999），p.227.

致谢

本书涉及的研究课题，乃是里程碑式的任务，如果没有欧洲各地众多个人与机构提供的巨大帮助，本书将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人对布伦德尔奖金（K.Blundell Trust）深怀感激，正是在其慷慨资助下，我才能够承担这项研究计划的大部分开支。本人特别感谢Joanna Pylat，Barbara Herchenreder，Kasia Piekarska，Irena Kolar以及Anna Pleban，她们为我收集和翻译波兰档案和乌克兰档案，还为我联系到许多位目睹战后重大事件的波兰见证人。如果没有Michaela Anderlova，Martina Horackova以及Dasha Conolly的帮助，我根本不可能理解如此错综复杂的捷克文献与斯洛伐克文献；至于Alexandra Sherley，则像是上帝派来为我翻译克罗地亚档案的助手。本人曾经尝试钻研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文献材料，并且得到Jennie Condell，John Conolly以及我两位精通多国语言的姐妹Natalie和Sarah的巨大帮助。本人的岳母Zsuzsi Messing，同样为我不知疲倦地翻译了大量匈牙利著作和档案。

欧洲各地以及美国境内数十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同样为我提供了帮助，但尤其必须提到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其外语文献的惊人收藏量可谓无出其右者。本人同样非常感激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东欧与斯拉夫研究学院（School of Eastern European and Slavonic Studies）的Richard Butterwick博士和Bojan Aleksov博士，他们为我引见了上文提及的几位研究者；本人同样非常感激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的Peter Hart，在我从事这项研究的入手阶段，他慷慨无私地与我分享了他的专业知识。

本人特别感谢所有同意接受访谈、对我陈述痛苦经历的人士，尤其是Ben Helfgott，Andrzej C.（他希望隐去姓氏），Barbara Paleolog，Stefa Baczkowska，Hanka Piotrowska，Maria Bielicka，Marilka Ossowski和Alik Ossowski，以及Zbigniew Ogrodzinski。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才为我这项相对枯燥的档案研究赋予了鲜活的生命。

我必须感谢我那几位出色的作品代理人，联合代理公司（United Agents）的Simon Trewin和Ariella Feiner，以及桑福德·格林伯格合伙公司（Sanford J.Greenburger Associates）的Dan Mandel。他们在那些实在非我所长的领域给予我极大帮助。

我同样必须感谢我那同样出色的编辑Eleo Gordon，如果没有他的帮助，这本书的篇幅将会增加一倍，而可读性将会消减一半。但我同样感谢企鹅出版社的众多无名英雄，他们是发行、营销、宣传、设计、制作方面的行家里手，这对任何一本图书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尤其必须提到企鹅出版社的海外版权团队，他们几乎凭借一己之力，让这本没有什么商业价值可言的图书得以出版发行。

最后，正如我生命中的点点滴滴，我把最终的感谢留给我的妻子Liza，感谢她的帮助、她的耐心、她的爱，感谢她在我写作此书数年间给我无微不至的默默支持。没有她，一切都不可能。

参考文献

档案

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Archiwum Państwowe（AP - State Archive），Szczecin

Archiwum Wschodnie，Ósrodek Karta（AWK - Eastern Archive），Warsaw

Bundesarchiv，Koblenz

Centralne Archiwum Wojskove（CAW - Central Military Archive），Warsaw Imperial War Museum，London，Department of Documents（IWM Docs）and Sound Archives（IWM Sound）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TNA；formerly known as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

Polski Ośrodek Społeczno Kulturalny（POSK - Centre for Polish Arts and Culture），London The Sikorski Institute，London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UNRRA）archives，New York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New York

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NARA），Maryland，USA

Zentrum gegen Vertreibungen，Berlin

官方出版物

Biuro Odszkodowań Wojennych przy Prezydium Rady Ministrów，*Sprawozdanie w Przedmiocie strat i szkód wojennych Polski w latach 1939-1945*（Warsaw，1947）

Burger，G. C. E.，J. C. Drummond and H. R. Stanstead（eds.），*Malnutrition and Starvation in Western Netherlands September 1944-July 1945*（The Hague：General State Printing Office，1948）

Centraal Bureau voor de Statistiek，*Oorlogsverliezen 1940-1945*：*Maandschrift van het Centraal Bureau voor de Statistiek*（The Hague：Belinfante，1948）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Statistical Digest of the War*（London：HMSO，1951）

Coles，Harry L. and Albert K. Weinberg（eds.），*Civil Affairs*：*Soldiers Become Governors*（Washington，DC：US Govt Printing Office，1964）

Croatian State Commission for Establishing Crimes of Occupying Forces and their Assistants，*Crimes in the Jasenovac Camp*（Banja Luka：Becjead，2000）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European Union

Minorities and Discrimination Survey：Main Results Report（Vienna：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200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available online at http：//uwdc.library.wisc.edu/collections/FRUS/

HM Government，*Statistics Relating to the War Effort of the United Kingdom*（London：HMSO，1944）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Debates（Hansard）（London：HMSO，1942-5）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on its activiti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September 1，1939-June 30，1947*），vol. I：*General Activities*（Geneva：ICRC，1948）

Istituto Centrale di Statistica，*Morti e Dispersi per Cause Belliche Negli Anni 1940-45*（Rome：Istituto Centrale di Statistica，1957）

Maddison，Angus，*The World Economy*：*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2003）

Maschke，Erich（ed.），*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15 vols.（Bielefeld：Ernst & Werner Gieseking，1962-74）

Schieder，Theodor（ed.），*Documents on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from Eastern-Central Europe*，trans. G. H. de Sausmarez，4 vols.（Bonn：Federal Ministry for Expellees，Refugees and War Victims，1958-60）

United States Army，Office of the Surgeon General，*Preventative Medicine in World War* Ⅱ ，vol. V：*Communicable Diseases transmitted through Contact or by Unknown Means*（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Over-all Report*（*European War*）（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5）

War Office，*Statistical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the Army*，*1943-1945*（London：HMSO，1948）

Webster，Sir Charles and Noble Frankland，*The Strategic Air Offensive against Germany 1939-1945*（London：HMSO，1961）

报刊资料

Le Courrier de Genève

Daily Express

Défense de la France

Écrits de Paris

Journal Officiel

Le Monde

Múlt és jövő

New York Times

Newswee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Le Peuple

Res Publica

Time

The Times

影视资料

Le Chagrin et la Pitié，two parts （Laboratoires Gennevilliers for Télévision Rencontre，1969；Marcel Ophüls）

The Last Nazis，part Ⅱ（Minnow Films for BBC，2009；Charlie Russell）

Millions Like Us （Gainsborough Pictures，1943；Frank Launder and Sidney Gilliat）

A Shadow Over Europe （BBC，2002；Charles Wheeler）

著作与论文

旅行指南

Baedeker，Karl，*Das Generalgouvernement*：*Reisehandbuch von Karl Baedeker* （Leipzig：Karl Baedeker，1943）

Ministry of Culture & Art and Ministry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Warsaw Accuses*：*Guide-book to the exhibition arranged by the Office of Reconstruction of the Capital together with the National Museum in*

Warsaw（Warsaw：Muzeum Narodowe，1945）

历史著作与学术研究

Abzug，Robert H.，*Inside the Vicious He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Alessandrini，Luca，‘The Option of Violence - Partisan Activity in the Bologna Area 1945-1948’，in Jonathan Dunnage（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

Alexander，G. M.，*The Prelude to the Truman Doctrine*：*British Policy in Greece*，*1944-1947*（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

Ammendolia，Ilario，*Occupazione delle terre in Calabria 1945-1949*（Rome：Gangemi，1990）

Anušauskas，Arvyd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

Arad，Yitzhak，*Belzec*，*Sobibor*，*Treblinka*：*The Operation Reinhard Deathcamp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

Aron，Robert，*Histoire de l’épuration*：*De l’indulgence aux massacres*，*Novembre 1942-Septembre 1944*（Paris：Fayard，1967）

Bacque，James，*Other Losses*：*The Shocking Truth behind the Mass Deaths of Disarmed German Soldiers and Civilians under General Eisenhower’s Command*（Toronto：Stoddart，1989）

Baerentzen，L.，J. Iatrides and O. Smith（ed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Greek Civil War，1945-1949*（Copenhagen：Museum Tusculanum，1987）

Barber，John and Mark Harrison，*The Soviet Home Front，1941-1945：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in World War* Ⅱ（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1）

Battaglia，Achille，*I giudici e la politica*（Bari：Laterza，1962）

Bauer，Yehuda，*Flight and Rescue：Brichah*（New York：Random House，1970）

Beck，Earl R.，*Under the Bombs*（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6）

Beevor，Antony，*Berlin：The Downfall 1945*（London：Penguin，2003）

——，*Stalingrad*（London：Viking，1998）

Beevor，Antony and Artemis Cooper，*Paris After the Liberation*（London：Penguin，1995）

Beevor，Antony and Luba Vinogradova，*A Writer at War：Vasily Grossman with the Red Army 1941-1945*（London：Pimlico，2006）

Benz，Wolfang and Angelika Königseder（eds.），*Das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Berlin：Metropol，2008）

Berlière，Jean-Marc with Laurent Chabrun，*Les policiers français sous l'Occupation*（Paris：Perrin，2001）

Beschloss，Michael，*The Conquerors*：*Roosevelt*，*Truma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1-1945*（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2）

Bethell，Nicholas，*The Last Secret*（London：Futura，1976）

Betts，R. R.（ed.），*Central and South East Europe 1945-1948*（London and New York：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0）

Bischof，Günter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

Blom，J. C. H. et al.（eds.），*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the Netherlands*，trans. Arnold J. Pomerans and Erica Pomerans（Oxford and Portland，OR：Littman Library of Jewish Civilization，2002）

Borgersrud，Lars，'Meant to be Deported'，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

Bosch，Manfred，*Der Neubeginn*：*Aus deutscher Nachkriegszeit Südbaden 1945-1950*（Konstanz：Südkurier，1988）

Boshyk，Yury（ed.），*Ukraine during World War* Ⅱ：*History and its Aftermath*（Edmonton：University of Alberta，1986）

Botting，Douglas，*In the Ruins of the Reich*（London：Methuen，2005）

Bourdrel，Philippe，*L'épuration sauvage*（Paris：Perrin，2001）

Bourke，Joanna，*Rape*：*A History from 1860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Virago，2007）

Brossat，Alain，*Les tondues*：*Un carnaval moche*（Paris：Hachette/Pluriel，1992）

Brosse，Thérèse，*War-Handicapped Children*（Paris：UNESCO，1950）

Buisson，Patrick，*1940-1945*：*The Erotic Years*（Paris：Albin Michel，2009）

Bunting，Madeleine，*The Model Occupation*：*The Channel Islands under German Rule*，*1940-1945*（London：HarperCollins，1995）

Burleigh，Michael，*Moral Combat*（London：Harper Press，2010）

——，*The Third Reich*：*A New History*（London：Pan，2001）

Cohen，Rich，*The Avengers*（London：Jonathan Cape，2000）

Cohen-Pfister，Laurel and Dagmar Wienroeder-Skinner（eds.），*Victims and Perpetrators*：（*Re*）*Presenting the Past in Post- Unification Culture*（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6）

Conquest，Robert，*A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 from Nicholas* Ⅱ *to Putin*（London：Penguin，2003）

Conway，Martin，'Justice in Postwar Belgium：Popular Passion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Crainz，Guido，*Padania*：*Il mondo dei braccianti dall'Ottocento alla fuga dalle campagne*（Rome：Donzelli，1994）

Crampton，R. J.，*Bulgar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Dahl，Hans Fredrik，'Dealing with the Past in Scandinavia'，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Dallas，Gregor，*Poisoned Peace*：*1945 - The War that Never Ended*（London：John Murray，2006）

Dallin，Alexander，*German Rule in Russia 1941-1945*：*A Study of Occupation Policies*（London and Basingstoke：Macmillan，1981）

Davidson，Eugene，*The Death and Life of Germany*：*An Account of the American Occupation*（London：Jonathan Cape，1959）

Davies，Norman，*God's Playground*：*A History of Po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Rising '44*：*The Battle for Warsaw*（London：Pan，2004）

Davies，Norman and Roger Moorhouse，*Microcosm*（London：Pimlico，2003）

Dawidowicz，Lucy S.，*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1939-1945*（Harmondsworth：Pelican，1979）

de Zayas，Alfred，*Nemesis at Potsda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7）

——，*A Terrible Revenge*：*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2nd ed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

Deák，István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Dean，Martin，*Robbing the Jews*：*The Confiscation of Jewish Property in the Holocaust*，*1933-194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Deletant，Dennis，*Communist Terror in Romania*：*Gheorghiu-Dej and the Police State*，*1948-1965*（London：Hurst & Co.，1999）

Derry，T. K.，*A History of Modern Norway 1814-1972*（Oxford：Clarendon Press，1973）

Diederichs，Monika，'Stigma and Silence：Dutch Women，German Soldiers and thei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

Dondi，Mirco，*La lunga liberazione*：*Giustizia e violenza nel dopoguerra italiano*（Rome：Riumiti，2004）

Drakulić，Slavenka，*Balkan-Express*：*Chroniques de la Yougoslavie en Guerre*（Paris：Éditions Mentha，1992）

Dreisziger，Nándor（ed.），*Hungary in the Age of Total War*（*1938-1948*）（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

Drolshagen，Ebba D.，*Wehrmachtskinder*：*Auf der Suche nach dem*

nie gekannten Vater （Munich：Droemer，2005）

Dunnage，Jonathan（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 （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

Dupuy，R. Ernest and Trevor N. Dupuy，*The Harper Encyclopedia of Military History* ，4th edn（New York：HarperCollins，1993）

Dushnyck，Walter，*Death and Devastation on the Curzon Line*：*The Story of the Deportations from Ukraine* （New York：Committee Against Mass Expulsion/Ukrainian Congress Committee of America，1948）

Dutton，Donald G.，*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Massacres*，*and Extreme Violence*：*Why 'Normal' People Come to Commit Atrocities* （London and Westport，CT：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2007）

Eby，Cecil D.，*Hungary at War*：*Civilians and Soldiers in World War* Ⅱ （Philadelphi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8）

Elkins，Michael，*Forged in Fury* （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71）

Ellwood，David W.，*Italy 1943-1945*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5）

Elster，Jon（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Ericsson，Kjersti and Dag Ellingsen，'Life Stories of Norwegian War Childre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

Ericsson，Kjersti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

Farmer，Sarah，*Martyred Village*（London and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Fisch，Bernhard，*Nemmersdorf*，*Oktober 1944*：*Was in Ostpreuβen tatsächlich geschah*（Berlin：Edition Ost，1997）

Fischer-Galati，Stephen，*Twentieth Century Romania*，2nd ed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

Fishman，Sarah，*The Battle for Children*：*World War* Ⅱ，*Youth Crime*，*and Juvenile Justice in Twentieth Century Fran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Florentin，Eddy，*Quand les Alliés bombardaient la France 1940-1945*（Paris：Perrin，1997）

Fowkes，Ben，*Eastern Europe 1945-1969*：*From Stalinism to Stagnation*（Harlow：Pearson Education，2000）

Friedländer，Saul，*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939-1945*（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7）

Frumkin，Gregory，*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ince 1939*（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Inc.，1951）

Gaillard，Lucien，*Marseilles sous l’Occupation*（Rennes：Ouest-France，1982）

Gaškaitė-Žemaitienė，Nijolė，‘The Partisan War in Lithuania from 1944 to 1953’，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

Gilbert，Martin，*The Boys*（London：Phoenix，1997）

——，*The Day the War Ended*（London：HarperCollins，1995）

——，*The Holocaust*：*The Fate of European Jewry 1932-1945*（New York：Henry Holt，1985）

——，*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Holocaust*，4th ed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

Ginsborg，Paul，‘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in Southern Italy，1943-1948’，*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 17（1984）

Giurescu，Dinu C.，*Roman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1939-1945*），trans. Eugenia Elena Popescu（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

Glantz，David，*Leningrad*：*City under Siege 1941-1944*（Rochester：Grange Books，2005）

Glanz，Susan，‘Economic Platforms of the Various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Elections of 1945’，in Nándor Dreisziger（ed.），*Hungary in the Age of Total War*（*1938-1948*）（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

Gringauz，Samuel，‘Jewish Destiny as the DP’s See It：The Ideology

of the Surviving Remnant'，*Commenta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vol. 4，no. 6（December 1947）

——，'Our New German Policy and the DP's：Why Immediate Resettlement is Imperative'，*Commentary*，vol. 5，no. 3（June 1948）

Gross，Jan T.，*Fear*：*Anti-Semitism in Poland after Auschwitz* （New York：Random House，2006）

Grüttner，Michael，Rüdiger Hachtmann and Heinz-Gerhard Haupt（eds.），*Geschichte und Emanzipation* （Frankfurt：Campus Fachbuch，1999）

Gyurgyík，László，*Changes in the Demographic Settle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Hungarian Minority in*（*Czecho-*）*Slovakia between 1918-1998*，trans. Jószef D. Lőrincz（Budapest：Teleki László Foundation，1999）

Hackett，David A.（ed.），*The Buchenwald Report* （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5）

Harrison，Mark（ed.），*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Tw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Hastings，Max，*Armageddon* （London：Macmillan，2004）

——，*Bomber Command* （London：Pan，1999）

Herbert，Ulrich，*Hitler's Foreign Workers*：*Enforced Foreign Labor in Germany under the Third Reich*，trans. William Templ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Herzog，Dagmar（ed.），*Brutality and Desire*：*War and Sexuality in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

Hionidou，Violetta，*Famine and Death in Occupied Greece*，*1941-194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Hirschfeld，Gerhard，*Nazi Rule and Dutch Collaboration*：*The Netherlands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trans. Louise Willmot（Oxford，New York and Hamburg：Berg，1988）

Hitchcock，William I.，*Liberation*：*The Bitter Road to Freedom*，*Europe 1944- 1945*（London：Faber & Faber，2009）

Hitchins，Keith，*Rumania 1866-1947*（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Hodgson，John H.，*Communism in Finland*：*A History and Interpret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

Hondius，Dienke，*Return*：*Holocaust Survivors and Dutch Anti-Semitism*，trans. David Colmer（Westport，CT：Praeger，2003）

Huyse，Luc，‘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s a Political Actor in Regime Transitions：The Case of Belgium，1944-50’，in István Deák et al.（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Iatrides，John O.（ed.），*Greece in the 1940s*：*A Nation in Crisis*（Hanover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1）

Ionescu，Ghita，*Communism in Rumania*，*1944-1962*（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Israel，David L.，*The Day the Thunderbird Cried*（Medford，OR：Emek Press，2005）

Janics，Kálmán，*Czechoslovak Policy and the Hungarian Minority，1945-1948*，trans. Stephen Borsod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

Jedlicki，Jerzy，‘Historical Memor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s in Eastern Europe’，*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 32，no. 3（1999）

Johr，Barbara，‘Die Ereignisse in Zahlen’，in Helke Sander and Barbara Johr（eds.），*Befreier und Befreite：Krieg，Vergewaltigung，Kinder*（Frankfurt-am-Main：Fischer Taschenbuch，2006）

Judt，Tony，*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Pimlico，2007）

Jurčević，Josip，*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in Croatia：The Crimes of Yugoslav Communists in Croatia in 1945*（Melbourne：Croatian Herald，2006）

Kalyvas，Stathis N.，‘Red Terror：Leftist Violence during the Occupation’，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Kenez，Peters，*Hungary from the Nazis to the Soviet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Hungary，1944-194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Kochavi，Arieh J.，*Post-Holocaust Politics*（Chapel Hill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

Kondufor，Yuri（ed.），*A Short History of the Ukraine*（Kiev：Naukova Dumka，1986）

Kontler，László，*A History of Hungary*（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

Krawchenko，Bohdan，‘Soviet Ukraine under Nazi Occupation，1941-4’，in Yury Boshyk（ed.），*Ukraine during World War* Ⅱ（Edmonton：University of Alberta，1986）

Krivosheev，G. F.（ed.），*Soviet Casualties and Combat Loss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Greenhill，1997）

Kucera，Jaroslav，*Odsunové ztráty sudetoněmeckého obyvatelstva*（Prague：Federalni ministerstvo zahranicnich veci，1992）

Laar，Mart，*War in the Woods*：*Estonia’s Struggle for Survival*，trans. Tiina Ets（Washington，DC：The Compass Press，1992）

Levi，Fabio，‘Italian Society and Jew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Between Silence and Reparation’，in Jonathan Dunnage（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

Lewkowicz，Bea，‘“After the War We Were All Together”：Jewish Memories of Postwar Thessaloniki’，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Lilley，J. Robert，*Taken by Force*：*Rape and American GIs during World War Two*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

Lowe，Keith，*Inferno* （London：Viking，2007）

Macardle，Dorothy，*Children of Europe*：*A Study of the Children of Liberated Countries*，*their War-time Experiences*，*their Reactions*，*and their Needs*，*with a Note on Germany* （London：Victor Gollancz，1949）

MacDonogh，Giles，*After the Reich* （London：John Murray，2007）

Mankowitz，Zeev W.，*Life between Memory and Hope*：*The Survivors of the Holocaust in Occupied Germa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Marcuse，Harold，*Legacies of Dacha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Marko，Augustín and Pavol Martinický，*Slovak-Magyar Relations*：*History and Present Day in Figures* （Bratislava：Slovak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Democracy and Humanity，1995）

Marrus，Michael R.，*The Unwanted*：*European Refuge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Marx，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rans. Samuel Moore（Harmondsworth：Penguin，1967）

Mayne，Richard，*Postwar*：*The Dawn of Today's Europe* （London：Thames & Hudson，1983）

Mazower，Mark，*The Balkans*（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0）

——，*Inside Hitler's Gree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

Mazower，Mark（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McCarthy，Joseph R.，*America's Retreat from Victory*：*The Story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New York：The Devin-Adair Company，1951）

McKinstry，Leo，*Spitfire*：*Portrait of a Legend*（London：John Murray，2007）

Milward，Alan S.，*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5-51*（London：Methuen，1984）

——，*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Miroszewski，Kazimierz，*Centralny obóz pracy Jaworzno*：*Podobóz Ukraiński*（*1947-1949*）（Katowice：Śląsk，2001）

Misiunas，Romuald and Rein Taagepera，*The Baltic States*：*Years of Dependence 1940-1990*（London：Hurst & Co.，1993）

Modona，Guido Neppi，'Postwar Trials against Fascist Collaborationists and Partisans：The Piedmont Experience'，in Jonathan Dunnage（ed.），*After the War*：*Violence*，*Justice*，*Continuity and*

Renewal in Italian Society （Market Harborough：Troubador，1999）

Molnár，Miklós，*A Concise History of Hunga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Moorhouse，Roger，*Berlin at War*：*Life and Death in Hitler’s Capital 1939-45* （London：Bodley Head，2010）

Morgan，Philip，*The Fall of Mussolin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Morgan，Sarah，‘The Schio Killings：A Case Study of Partisan Violence in Postwar Italy’，*Modern Italy* ，vol. 5，no. 2（2000）

Morgenthau，Henry，Jr，*Germany Is Our Problem* （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and Bros，1945）

Myant，Martin，*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n Czechoslovakia*，*1945-194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Naimark，Norman，*Fires of Hatred*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The Russians in Germany*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Naimark，Norman and Leonid Gibianskii（eds.），*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1944-1949* （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7）

Nichol，John and Tony Rennell，*The Last Escape*：*The Untold Story of Allied Prisoners of War in Germany 1944-45* （London：Viking，

2002）

Nissen，Henrik S.（ed.），*Scandinav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trans. Thomas Munch-Peterse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

Nøkelby，Berit，‘Adjusting to Allied Victory’，in Henrik S. Nissen（ed.），*Scandinav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trans. Thomas Munch-Peterse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

Nováček，Silvestr，*Drang nach Westen*：*Vystěhování Němců z Brna a odsun z jihomoravského pohraničí*（Czech Republic[no city]：Orego，1996）

Novick，Peter，*The Holocaust and Collective Memory*（London：Bloomsbury，2000）

——，*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London：Chatto & Windus，1968）

Nowak，Edmund（ed.），*Obozy w Lamsdorf/Łambinowicach*（*1870-1946*）（Opole：Centralne Muzeum Jeńców Wojennych w Łambinowicach-Opolu，2006）

Nurowski，Roman（ed.），*1939-1945 War Losses in Poland*（Poznań and Warsaw：Wydawnictwo Zachodnie，1960）

Olsen，Kåre，*Schicksal Lebensborn*：*Die Kinder der Schande und ihre Mütter*，trans. Ebba D. Drolshagen（Munich：Knaur，2004）

——，‘Under the Care of the Lebensborn’，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

Overmans，Rüdiger，*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Oldenbourg：Wissenschaftsverlag，2000）

——，‘German Historiography，the War Losses，and the Prisoners of War’，in Günter Bischof and Stephen E. Ambrose（eds.），*Eisenhower and the German POWs*：*Facts against Falsehood*（Baton Rouge and London：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

Overy，Richard，*Russia's War*（London：Allen Lane，1997）

Pansa，Giampaolo，*Il sangue dei vinti*（Milan：Sperling，2005）

Pavlowitch，Stevan K.，*Hitler's New Disorder*：*The Second World War in Yugoslavia*（London：Hurst & Co.，2008）

Pavone，Claudio，*Una guerra civile*：*Saggio storico sulla moralità nella Resistenza*（Turin：Universali Bollati Boringhieri，2006）

Pearson，Raymond，*National Minorities in Eastern Europe 1848-945*（London：Macmillan，1983）

Pelle，János，*Az utoisó vérvádak*（Budapest：Pelikán，1995）

Petacco，Arrigo，*A Tragedy Revealed*：*The Story of Italians from Istria*，*Dalmatia and Venezia Giulia*，*1943-1956*，trans. Konrad Eisenbichler（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5）

Pike，David Wingeate，*Jours de gloire*，*jours de honte*（Paris：Société d'Édition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1984）

Piotrowski，Tadeusz，*Vengeance of the Swallows* （Jefferson，NC：Macfarland，1995）

Piscitelli，Enzo，*Da Parri a De Gasperi*：*Storia del dopoguerra 1945-1948* （Milan：Feltrinelli，1975）

Porch，Douglas，*Hitler's Mediterranean Gamble*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4）

Prażmowska，Anita，*Civil War in Poland 1942-1948*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4）

Proudfoot，Malcolm J.，*European Refugees 1939-52* （London：Faber & Faber，1957）

Ray，John，*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Cassell，1999）

Rees，Laurence，*Auschwitz* （London：BBC Books，2005）

——，*World War Two behind Closed Doors* （London：BBC Books，2008）

Richter，Heinz，*British Intervention in Greece*：*From Varkiza to Civil War* （London：Merlin Press，1985）

Rioux，Jean-Pierre，*The Fourth Republic 1944-1958* ，trans. Godfrey Rog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Roberts，Andrew，*The Storm of War* （London：Allen Lane，2009）

Rousso，Henry，'The Purge in France'，in Jon

Elster（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Rubenstein，Joshua，*Tangled Loyalties*：*The Life and Times of Ilya Ehrenburg*（London and New York：I.B. Tauris，1996）

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Persecution of Religion in Rumania*（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

——，*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in Rumania*（Washington，DC：Rumanian National Committee，1949）

Rumpf，Hans，*The Bombing of Germany*，trans. Edward Fitzgerald（London：White Lion，1975）

Sack，John，*An Eye for an Eye*：*The Untold Story of Jewish Revenge against Germans in 1945*（New York：Basic Books，1993）

Sander，Helke and Barbara Johr（eds.），*Befreier und Befreite*：*Krieg*，*Vergewaltigun Kinder*（Frankfurt-am-Main：Fischer Taschenbuch，2006）

Sayer，Derek，*The Coasts of Bohemia*：*A Czech His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Schöpflin，George，*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Oxford and Cambridge，MA：Blackwell，1993）

Sebag-Montefiore，Simon，*Stalin*：*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3）

Sebald，W.G.，*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struction*（London，

2004）

Service，Robert，*A History of Modern Russia*（London：Penguin，2003）

Shephard，Ben，*After Daybreak*（London：Pimlico，2005）

——，*The Long Road Home*：*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Bodley Head，2010）

Siemaszko，Ewa，‘Bilans Zbrodni’，*Biuletyn Instytutu Pamięci Narodowej*，nos. 7-8（July-August 2010）

Siemaszko，Władisław and Ewa Siemaszko，*Ludobójstwo dokonane przez nacjonalistów ukraińskich na ludności polskiej Wołynia 1939-1945*，2 vols.（Warsaw：Wydawn. von borowiecky，2000）

Siklos，Pierre L.，*War Finance*，*Reconstruction*，*Hyperinflation and Stabilization in Hungary*，*1938-48*（Basingstoke：Macmillan，1991）

Skolnik，Fred and Michael Berenbaum（eds.），*Encyclopaedia Judaica*，22 vols.（Farmington Hills，MI：Thomson Gale，2007）

Snyder，Timothy，*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Spector，Shmuel，*Holocaust of Volhynian Jews*，trans. Jerzy Michalowicz（Jerusalem：Yad Vashem，1990）

Spoerer，Mark，*Zwangsarbeit unter dem Hakenkreuz*（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2001）

Staněk，Tomáš，*Internierung und Zwangsarbeit*：*Das Lagersystem in den böhmischen Ländern 1945-1948*（Munich：R. Oldenbourg，2007）

——，*Odsun Němců z Československa 1945-1947*（Prague：Academia/Naše vojsko，1991）

——，*Retribuční vězni v českých zemích 1945-1955*（Opava：Slezský ústav Slezského zemského muzea，2002）

——，*Verfolgung 1945*：*Die Stellung der Deutschen in Böhmen*，*Mähren und Schiesien*（Vienna，Cologne and Weimar：Böhlau Verlag，2002）

Starkauskas，Juozas，'The NKVD-MVD-MGB Army'，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

Statiev，Alexander，*The Soviet Counterinsurgency in the Western Borderland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Steinberg，Jonathan，*All or Nothing*：*The Axis and the Holocaust*，*1941-1943*（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

Storchi，Massimo，*Uscire dalla guerra*：*ordine pubblico e forze politiche*，*Modena 1945-1946*（Milan：Angeli，1995）

Strods，Heinrichs，'The Latvian Partisan War between 1944 and 1956'，in Arvydas Anušauskas（ed.），*The Anti-Soviet Resistance in the Baltic States*（Vilnius：Genocide and Resistance Research Centre of Lithuania，2000）

Takala，Hannu and Henrik Tham，*Crime and Control in Scandinav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Oslo：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1989）

Taylor，Frederick，*Dresden* （New York：HarperCollins，2004）

Tec，Nechama，*Defiance*：*The True Story of the Bielski Partis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Tismaneanu，Vladimir，*Stalinism for all Season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

Tolstoy，Nikolai，*Stalin's Secret War* （New York：Holt，Reinhart and Winston，1981）

Tomasevich，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Occu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Tooze，Adam，*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London：Penguin，2007）

Tsaruk，Iaroslav，*Trahediia volyns'kykh sil*，*1943-1944 rr* .（Lviv：I. Krypiakevych Institute of Ukrainian Studies，2003）

Uehling，Greta Lynn，*Beyond Memory*：*The Crimean Tatars'Deportation and Return* （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The Confiscation of Jewish Property in Europe 1933-1945*：*Symposium Proceedings* （New York：USHMM Center for Advanced Holocaust Studies，2003）

Upton，A. F.，*The Communist Parties of Scandinavia and Finland*（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73）

van der Zee，Henri，*The Hunger Winter*：*Occupied Holland 1944-5*（London：Jill Norman and Hobhouse，1982）

Vardys，V. Stanley and Judith B. Sedaitis，*Lithuania*：*The Rebel Nation*（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7）

Vědecká Konference 'Národní podoby antisemitismu'，*Retribuce v ČSR a národní podoby antisemitismu*（Prague：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2002）

Veyret，Patrick，*Lyon 1939-1949*：*De la collaboration industrielle à l'épuration économique*（Châtillon-sur-Chalaronne：La Taillanderie，2008）

Virgili，Fabrice，*Shorn Women*：*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 John Flower（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2）

Voglis，Polymeris，'Between Negation and Self-Negation：Political Prisoners in Greece，1945-1950'，in Mark Mazower（ed.），*After the War Was Over*（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Warring，Anette，*Tyskerpiger-under besættelse og retsopgør*（Copenhagen：Gyldendal，1994）

——，'War，Cultural Loyalty and Gender'，in Kjersti Ericsson and Eva Simonsen（eds.），*Children of World War* Ⅱ（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5）

Watson，Peter，*A Terrible Beauty*（London：Phoenix，2001）

Weitz，Margaret Collins，*Sisters in the Resistance*：*How Women Fought to Free France*，*1940-1945*（New York：John Wiley & Sons，1995）

Werner，Hermann，*Tübingen 1945*（Stuttgart：Konrad Theiss Verlag，1986）

Werth，Alexander，*Russia at War*（London：Barrie & Rockliff，1964）

Willis，F. Roy，*The French in Germany 1945-194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Wilson，Kevin，*Bomber Boys*（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5）

Winterton，Paul，*Report on Russia*（London：Cresset Press，1945）

Withuis，Jolande and Annet Mooij（eds.），*The Politics of War Trauma*：*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Ⅱ *in Eleven European Countries*（Amsterdam：Askant，2010）

Woller，Hans，*Die Abrechnung mit dem Faschismus in Italien*，*1943 bis 1948*（Munich：Oldenbourg，1996）

Wyman，Mark，*DPs*：*Europe's Displaced Persons*，*1945-1951*（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

Yekelchyk，Serhy，*Ukraine*：*Birth of a Modern 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Žerjavić，Vladimir，*Yugoslavian Manipulations with the Number of Second World War Victims* （Zagreb：Croatian Information Centre，1993）

论文集

Anon.，*Komu sluší omluva*：*Češi a sudetští němci*（*Dokumenti*，*fakta*，*svědectví*）

Beneš，Edvard，*Speech delivered by President E. Beneš on the Old Town Square*，*Prague*，*on His Return to Czechoslovakia*，*May 16th 1945* （Prague：Orbis，1945；repr. Prague：Erika，1992）

Białecki，Tadeusz et al.（eds.），*Źródła do dziejów Pomorza Zachodniego*：*Niemcy na Pomorzu Zachodnim w latach 1945-1950* （Szczecin University，2004）

Borodziej，Włodzimierz and Hans Lemberg（eds.），*Die Deutschen östlich von Oder und Neiβe 1945-1950*：*Dokumente aus polnischen Archiven* ，4 vols.（Marburg：Herder Institut，2003-4）

Cannadine，David（ed.），*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Winston Churchill’s Famous Speeches* （London：Cassell，1989）

Clogg，Richard（ed.），*Greece 1940-1949*：*Occupation*，*Resistance*，*Civil War*：*A Documentary History*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

Dziurok，Adam（ed.），*Obóz Pracy w Świętochłowicach w 1945 roku*（Warsaw：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2003）

Misiło，Eugeniusz（ed.），*Akcja 'Wisła'*（Warsaw：Archiwum Ukraińskie，1993）

——，*Repatriacja czy deportacja*？：*Przesiedlenie Ukraińców z Polski do USSR 1944-1946*（Warsaw：Archiwum Ukraińskie，1996-9）

Pustejovsky，Otfrid，*Die Konferenz von Potsdam und das Massaker von Aussig am 31 Juli 1945*（Munich：Herbig，2001）

Rupić，Mate et al（eds.），*Partizanska i komunistička represija i zločini u Hrvatskoj 1944-1946*：*Dokumenti*（Slavonski Brod：Hrvatski institut za povijest，2005）

Spieler，Silke（ed.），*Vertreibung und Vertreibungsverbrechen 1945-1948*：*Bericht des Bundesarchivs vom 28 Mai 1974*，*Archivalien und ausgewählte Erlebnisberichte*（Bonn：Bundesarchiv Koblenz & Kulturstiftung der Deutschen Vertriebenen，1989）

Stalin，Generalissimo Josef，*War Speeches*，*Orders of the Day and Answers to Foreign Press Correspondents dur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July 3rd*，*1941-June 22nd*，*1945*（London：Hutchinson，1946）

Trgo，Lt Gen. Fabijan（ed.），*The National Liberation 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Selected Documents*，trans. Anđelija Vujović，Karin Radovanović and Madge Tomašević（Belgrade：Military History Institute of the Yugoslav People's Army，1982）

回忆录、报告、目击证言、日记、书信

Acheson，Dea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Norton，1969）

Adler，Hans Guenther，*Theresienstadt 1941-1945*：*das Antlitz einer Zwangsgemeinschaft-Geschichte*，*Soziologie*，*Psychologie*（Tübingen：Mohr，1955）

Andreas-Friedrich，Ruth，*Battleground Berlin*：*Diaries 1945-1948*，trans. Anna Boerresen（New York：Paragon House，1990）

Anon.，*The Day War Ended*：*Voices and Memories from 1945*（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5）

——，*A Woman in Berlin*（London：Virago，2006）

Becker，Hans，*Devil on My Shoulder*，trans. Kennedy McWhirter and Jeremy Potter（London：Four Square Books，1958）

Bertaux，Pierre，*Libération de Toulouse et de sa région*（Paris：Hachette，1973）

Blunt，Roscoe C.，*Foot Soldier*：*A Combat Infantryman's War in Europe*（Cambridge，MA：Da Capo Press，2002）

Bodson，Herman，*Agent for the Resistance*（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1994）

Bohec，Jeanne，*La plastiqueuse à bicyclette*（Paris：Mercure de France，1975）

Byford-Jones，W.，*Berlin Twilight*（London：Hutchinson，1947）

Churchill，Winston，*The Second World War*，6 vols.（London：Cassell，1948-54）

Clay，Lucius D.，*Decision in Germany*（London：Heinemann，1950）

De Gasperi，Maria-Romana（ed.），*De Gasperi scrive*：*corrispondenza con capi di stato*，*cardinali*，*uomini politici*，*giornalisti*，*diplomatici* 2 vols.（Brescia：Morecelliana，1974）

de Gaulle，Charles，*Mémoires de Guerre*，vol. Ⅱ：*L'Unité 1942-1944*（Paris：Pion，1956）

Dimitrov，Georgi，*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1933-1949*，trans. Jane T. Hedges，Timothy D. Sergay and Irina Fa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Djilas，Milovan，*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trans. Michael B. Petrovich（London：Rupert Hart-Davis，1962）

——，*Wartime*（New York and Lond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7）

Donat，Alexander，*The Holocaust Kingdom*：*A Memoir*（London：Secker & Warburg，1965）

Ehrenburg，Ilya and Vasily Grossman（eds.），*The Black Book*，trans. John Glad and James S. Levine（New York：Holocaust Library，1981）

Eisenhower，Dwight D.，*Crusade in Europe*（London：

Heinemann，1948）

Esser，Heinz，*Die Hölle von Lamsdorf*：*Dokumentation über ein polnisches Vernichtungslager*（Bonn：Landsmannschaft der Oberschiesier e.V.，1969）

Farge，Yves，*Rebelles*，*soldats et citoyens*（Paris：Grasset，1946）

FitzGibbon，Theodora，*With Love*（London：Century，1982）

Frommer，Benjamin，*National Cleansing*：*Retribution against Nazi Collaborators in Postwar Czechoslovak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Fuykschot，Cornelia，*Hunger in Holland*：*Life during the Nazi Occupation*（New York：Prometheus，1995）

Geddes，Giorgio，*Nichivo*（London：Cassell，2001）

Grassmann，Ilse，*Ausgebombt*：*Ein Hausfrauen-Kriegstagebuch*（Hamburg：Haymarket Media，2003）

Gruschka，Gerhard，*Zgoda*：*Ein Ort des Schreckens*（Neureid：Ars Una，1996）

Haukelid，Knut，*Det demrer en dag*（Oslo：Nasjonalforlaget，1947）

Iatrides John O.（ed.），*Ambassador MacVeagh Reports*：*Greece 1933-1947*（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Jacobs，Ingeborg，*Freiwild*：*Das Schicksal deutscher Frauen 1945*（Berlin：Propyläen，2008）

Kaps，Johannes，*The Tragedie of Silesia 1945-46*（Munich：Christ Unterwegs，1952）

Karapandzich，Boriwoje M.，*The Bloodiest Yugoslav Spring*，*1945*：*Tito's Katyns and Gulags*（New York：Hearthstone，1980）

Kardorff，Ursula von，*Diary of a Nightmare*：*Berlin 1942-1945*，trans. Ewan Butler（London：Rupert Hart-Davis，1965）

Kennan，George F.，*Memoirs 1925-1950*（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1967）

Klemperer，Victor，*To the Bitter End*：*The Diaries of Victor Klemperer 1942-45*，trans. Martin Chalmers（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9）

Kopelev，Lev，*No Jail for Thought*，trans. and ed. Anthony Austin（London：Secker & Warburg，1977）

Kovaly，Heda Margolis，*Prague Farewell*，trans. Franci Epstein and Helen Epstein（London：Gollancz，1988）

Lane，Arthur Bliss，*I Saw Poland Betrayed*：*An American Ambassador Repor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 and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48）

Levi，Primo，*Survival in Auschwitz and The Reawakening*：*Two Memoirs*，trans. Stuart Woolf（New York：Summit Books，1986）

Lewis，Norman，*Naples ’44*（London：Collins，1978）

Lotnik，Waldemar，*Nine Lives*（London：Serif，1999）

Lukša，Juozas，*Forest Brothers*：*The Account of an anti-Soviet Lithuanian Freedom Fighter 1944-1948*，trans. Laima Vincė（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9）

Manus，Max，*Det blir alvor*（Oslo：Steensballes Boghandels，1946）

Markov，Georgi，*The Truth that Killed*，trans. Liliana Brisby（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3）

Moorehead，Alan，*Eclipse*（London：Granta，2000）

Mosley，Leonard O.，*Report from Germany*（London：Gollancz，1945）

Müller，Jens，*Tre kom tilbake*（Oslo：Gyldendal，1946）

Mungone，G.，*Operazione rossa*（Padua：Tipografia Gori di Tognana，1959）

Nagy，Ferenc，*The Struggle behind the Iron Curtain*，trans. Stephen K. Swift（New York：Macmillan，1948）

Nicolson，Nigel，*Long Life*（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7）

Nossack，Hans Erich，*Der Untergang*（Hamburg：Ernst Kabel Verlag，1981）

Olsen，Oluf，*Contact*（Oslo：Erik Qvist，1946）

——，*Vi kommer igjen*（Oslo：Erik Qvist，1945）

Owen，James and Guy Walters（eds.），*The Voice of War*（London：Viking，2004）

Padover，Saul，*Psychologist in Germany*：*The Story of an American Intelligence Officer*（London：Phoenix House，1946）

Patton，George S.，*War as I Knew It*（Boston：Houghton Mifflin，1947）

Polcz，Alaine，*One Woman in the War*（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2）

Prcela，John and Stanko Guldescu（eds.），*Operation Slaughterhouse*：*Eyewitness Accounts of Postwar Massacres in Yugoslavia*（Philadelphia：Dorrance & Co.，1970）

Robinson，Austin，*First Sight of Germany*，*May-June 1945*（Cambridge：Cantelupe Press，1986）

Roosevelt，Elliott，*As He Saw It*（New York：Duell，Sloan and Pearce，1946）

Ruhl，Klaus-Jörg（ed.），*Unsere verlorenen Jahre*：*Frauenalltag in Kriegs- und Nachkriegszeit 1939-1949*，*in Berichten*，*Dokumenten und Bilden*（Darmstadt：Luchterhand，1985）

Saint-Exupéry，Antoine de，*Flight to Arras*，trans. Lewis Galantière（Harmondsworth：Penguin，1961）

Schuetz，Hans A. D.，*Davai*，*Davai*！：*Memoir of a German Prisoner of World War II in the Soviet Union* （Jefferson，NC，and London：McFarland & Co.，1997）

Sington，Derrick，*Belsen Uncovered* （London：Duckworth，1946）

Smith，Lyn，*Forgotten Voices of the Holocaust* （London：Ebury Press，2005）

Toth，Zoltan，*Prisoner of the Soviet Union* ，trans. George Unwin（Woking：Gresham Press，1978）

Truman，Harry S.，*Memoirs* ，vol. II：*Years of Trial and Hope* （New York：Signet，1965）

Vachon，John，*Poland 1946*：*The Photographs and Letters of John Vachon* ，ed. Ann Vachon（Washington，DC，and London：Smithsonian Institute Press，1995）

von Einsiedel，Count Heinrich，*The Shadow of Stalingrad*：*Being the Diary of a Temptation* （London：Alan Wingate，1953）

Voute，Peter，*Only a Free Man*：*War Memoirs of Two Dutch Doctors*（*1940-1945*） （Santa Fe，NM：The Lightning Tree，1982）

Wilson，Francesca，*Aftermath*：*France*，*Germany*，*Austria*，*Yugoslavia*，*1945 and 1946* （London：Penguin，1947）

Wolff-Mönckeberg，Mathilde，*On the Other Side*：*To My Children from Germany 1940-1945* （London：Peter Owen，1979）

Woodhouse，C. M.，*Apple of Discord*（London：Hutchinson，1948）

索引

以下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斜体页码表示地图所在页。

Aalborg 154

abortions 55，56

ACCs（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s） 318，332-3

Acheson，Dean 71，289-90，363-4

Adams，Alicia 18

Adenauer，Konrad 160

Adler，Hans Guenther 135

Agriculture Ministry 293，334-5

AK（Armia Krajowa，Polish Home Army） 3-4，222，332，336

Akcja Wisła（Operation Vistula） 224-8，229，370，372，373

Albania

Chams 248

Communists 331

execution of Xoxe 338

alcohol 98，107-8

Aldea，Aurel 324

Allied armies

allowing revenge by Jewish camp survivors 90-91

attempts to feed the starving 38-9

cosmopolitan make-up 267

destruction caused by 6，11

in the face of vengeance on collaborators 146-7，150，152

and former slave labourers 99，100-104

and Greece 299，300

in Holland 36

and the landscape of chaos xvi，69-72，76

liberation by 20，45

military control of displaced persons 101-4

and the myth of the communist‘lost victory’ 291-2

sexual violence 52

and the UN 64-5

vengeance excesses 76

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s（ACCs） 318，332-3

Alsace，Natzweiler-Struthof camp 81-2

Alversdorf 243

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 192，207

amnesties 120，154，155，291，301，349

on revenge killings 131，148

Amsterdam 36，193，197

Andreas-Friedrich，Ruth 46

Andrzej C.（a Pole from Warsaw） 24-5，29-30，44

Angoulême 281-3

anti-Semitism *see* Jews：anti-Semitism，extermination and loss of

Antonescu，Ion 162，316-17

Antonicelli，Franco 150

anxiety 45，55

Arletty 172

Armia Krajowa（AK，Polish Home Army） 3-4，222，332，336

Arro，Kalev 357

Arrow Cross party，Hungary 146

assimilation，forced 224-9

Athens 35，37，296，299-300

Atlantic Charter 221，230

L'Aube 284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80，135，137

Aussig 130，180

Austria

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 332

and the Bleiburg tragedy 252-62

collaborators of the Nazis 155，156

displaced persons camps 102，103，208

Slovenian Home Guards/National Army in 254，260

Soviet treatment of Austrian women 53

'Avengers' 92

babies

born in foreign countries to a German father 164，172-4，175-8

‘foreign’babies born to German women 55

violence and the killing of 50，51，53，130，139，173，205，216

Bacque，James 112-13，116，121-2，124

Bad Hersfeld camp 115-16

Bad Kreuznach camp 115，116

Badoglio，Pietro 151

Baedeker，Karl 3，4

Balsam，Harry 206

Baltic States *see also* Estonia；Latvia；Lithuania

battle of Kalniškës，341-5，358

ending of the war xv，367

‘Forest Brothers’and their resistance to communism 341-58；end of the resistance 354-6

nationalist fighting xv，340，343-58

partisans 50，343-58

territorial losses and gains 342

ultra-nationalists 162

Baneth，Edith 17

Banija 262

Battaglia，Roberto 151

Battocchio，Republic of 277

Bauer，Yehuda 209

Bavaria 52

Bayer，Zsolt 369

BBC 81，167

BDPS（General Democratic Resistance Movement，Lithuania） 350

beatings *see* torture

Bednarka 225

Belarus 44，220，222，352

death toll in war 16

destruction in 6，10

Jews 18，19

Minsk 6，18

Belgium/Belgians

collaborators of the Nazis 145，146，147，148，149，150，154，155，156，158

covering of ethnic problems 249

ejection of Communists 362

food rationing 37

Resistance 148，149，159

Walloons 249，267

Belunek，Jan 85

Beneš，Edvard 130-31，246

Bergen-Belsen concentration camp 84-7

Berlin

children’s drawings of a hanging 57

cosmopolitanism 266

crime 46

destruction in 7，8

foreign workers 96

looting 44

rape 54，55

vagrant children 24

Berlusconi，Silvio 375，376

Berman，Jakub 206

Bertaux，Pierre 288

Bevin，Ernest 209

Bezigrad camp 261

Bibo，István 67

Bielenberg，Christabel 52

Bielicka，Maria 46-7

Bivongi 277

Black Brigades 149，152，153，179

black market 37，38，45，47-8，67，107-8，202，293，303-4

Błaszczyk，Henryk 204-6

Bleiburg tragedy 252-62

Blitz 6

blood libel 199-200，204

blood thirst 75-7 *see also* vengeance

Blunt，Roscoe 42-3

Bodnăraş，Emil 323

Böhl camp 114

Bohm，Fred 83

Bomporto 285

Bonnet，Abel 281

Bormann，Martin 58

Bosnia 251，262

Bounin，Jacques 285

Bracker，Milton 82

Bradley，Omar 82

Brasillach，Robert 172

bread 35

Breitburg，Victor 17

Breslau 233 *see also* Wrocław

Brest-Litovsk 210

Brichah 207-9

Britain/the British

black market 48

and the Bleiburg tragedy 253-4

British war stories 61-2，372

conscription 66

cult of heroism 61-2

and the death camps 80-81，84-8

death toll in war 13

destruction in 6

and the expulsion of Germans from Poland 243

food shortages 34

German prisoners of war 122-3，132

and Greece 295-6，298-300，309，310

and the Jewish flight to Palestine 208-11

medical teams 242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80-81

myth-building 372

Nazi ideology mirrored in British press 59

Operation Swallow 243

postwar sphere of influence 295

prisoners of war 27，96

propaganda 87-8

and Romania 325，326

Second World War as a British national industry 372

social reform 66-7，278

soldiers allowing revenge by Jewish camp survivors 90-91

treatment of SS men 86-7

VE day celebrations 23

brotherhood 63-5 *see also* national unity

Brussels 147

Bucharest 319，322，335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82-3

Ohrdruf camp 82，83

Budapest 6，39，199

Büderich camp 116

Buechner，Howard E. 84

Bulgaria/Bulgarians 295，365-6，370

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 332

collaborators of the Nazis 155

Communists 334，337，338-9

expulsion of Turks and Gypsies 248

farmers 20

and Greeks 70；massacre of Greek communities 21，50

Jews 20

Justice Ministry 334

‘People’s Courts’ 334

and Russia 53

Bushyhead，Jack 83-4

butter 34，47-8

Buxtehude 101

Byford-Jones，William 24，57，241

Caen 6

Calabria 151，277，286，293

Calitri 277

Calsteren，Eric van 136-7

Camini 277

cannibalism 85-6，120

Caransa，Ab 195

Carlsbad（Karlovy Vary） 29

Cassation，Italian Court of 152-3

Castelbajac，Pierre de 284

Catholic Church 206

Catholic education 228

forced conversion to 252

in Romania 327-8

in Yugoslavia 251

Caulonia，Peasant Republic of 277，294

Cham Albanians 248

Channel Islands 170

Chełmno concentration camp 22，50

Chetniks 251，252，260，264

children

abduction of 199-200

babies *see* babies

born in foreign countries to a German father 164，172-4，175-8

displaced 27，238，241 *see also* orphans；in prison camps after the war 130，136-7，138；in prisoner-of-war camps 115；unaccompanied German children expelled from Poland 238

gangs 24，46

German 55，58；in Czechoslovakia after the war 132；teenagers 58-9

juvenile delinquency 45，58

and morality 57-9

ostracism of 172-8

teenagers 58-9

vagrant 24

vengeance on 75-6，130，172-8

war orphans 23-6，57

youth crime 58

Christian Democrats 279，283，285

Church

Catholic *see* Catholic Church

Orthodox 328

Uniate 328

Churchill，Winston 36，64，111-12，220，221，230，231，279，295，296，298，300

cities，destruction in 3-8

civil war

Communist takeover of Romania *see* Romania/Romanians：communism

‘Forest Brothers’and their resistance to communism 340-58

Greek *see* Greece/Greeks：civil war

and the ideological struggle of nationalism with communism 362-4

Poland/Ukraine *see* ethnic cleansing：of Poland and Ukraine

political violence in France and Italy 276-94

and the subjugation of Eastern Europe 331-9

wars within wars 271-5

Yugoslavia *see* Yugoslavia：ethnic conflict

Clay，Lucius D. 89，243，244，370

Cluj 326

Clydebank 6

Cognac 281

Cold War xv，65，231，313，368-9

polarization of Europe in 359-64，361

and the treatment of Communists by‘democratic’countries 359-64

The Colditz Story 61

collaborators of the Nazis xv，145-62，193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venient myths 158-62

dehumanization of 145

and the failure of the purge across Europe 154-8

Greek collaborationist Security Battalions 303，305，306，309-10，312

and the Italian purge 146，147-8，149-53

judicial punishment of 148-9，152-8；comparison table across countries 156

myth-building by 372

punishment for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157；women who had relationships with German soldiers 163-72

Ustashas *see* Ustashas

violence against 50，145-7，149-51，152-8

in Yugoslavia 252-64 *see also* Ustashas

Cologne 7，8

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Cominform） 314

Communists/communism 70，159，162，268，278-9

Albania 331

and 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s（ACCs） 318，332-3

anti-Communist resistance 63，290-91，340-41；'Forest Brothers'341-58；ideological struggle of nationalism with communism 279，362-4；Ukraine 340-41

and Bulgaria 334，337，338-9

and civil war：France and Italy 276-94；Greece *see* Greece/Greeks：

civil war；Romania *see* Romania/Romanians：communism；Yugoslavia 251，252，253-61

Cominform 314

Communist indoctrination 228

Communist resistance 63，184，290-91；Greece 296-8，297，299，300-309，310-12

and Czechoslovakia 63，331-2，335，336，337，338；Czech heroes 63

and the duty and opportunity of hatred 366，367-8

Francs-Tireurs et Partisans 168

French Communist Party 280

goal of 179

and Greece 295-314；defeat of communism in Greece 309-12；Greek Communist Party 296-8，305，311-12

and Hungary 201，331，336，338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278，280，293-4

Italian partisans who freed German prisoners 271-2

and Jews 201，202

ministries targeted by 333-5

in Poland 338

postwar gains 66，278-9，335-6，367-8

in Romania *see* Romania/Romanians：communism

Soviet control over European Communist parties 314

Spanish 273

Stalin's postwar regime 71，314，339 *see also* Stalin，Joseph；Stalinization of Romania 327-30

and the subjugation of Eastern Europe 331-9

treatment of Communists by'democratic'countries after the war 359-64

and the US 363-4；Truman Doctrine 313

use of Justice Ministry 323

violence as an opportunity for 367-8

Yugoslav Partisans 251，252，253-61，296，311-12，374-5

concentration camps 20，22，49，50，78-93，125 *see also* slave-labour camps

archipelago of German camps 95

conditions 78-9，81-3，84-6，88；gradations of hardship 96；in Poland 135-41

death marches from 82-3

discovery of 78-88

liberation of 78-93

the new‘extermination camps’of Poland after the war 135-44

revenge of Jewish prisoners 88-93

conscription 66

Cooper，Duff 148

Cortés，Manuel 357

Cosenza 293

cosmopolitanism 266，267

Cossacks 254

Coventry 6

crime 46

looting *see* looting

sexual 52；rape *see* rape

theft 44-7，107-8 *see also* looting

towards prisoners of war after the war 126 *see also* vengeance：on German prisoners of war

violent 48-51，126 *see also* violence

youth crime 58

Crimea 221-2，371

Tatars 221，346，371，372，376-7

Crisp，Major R. 58-9

Croatia/Croatians *see also* Yugoslavia

and the Bleiburg tragedy 252-62

collaborators of the Nazis 158

and ethnic conflict in Yugoslavia 251-62，374

German-Croatian fighting after orders to surrender 113

massacres 20-21；in the Bleiburg-Maribor area 260

nationalists 162，264

Serbs vs Croats 70，251，262

ultra-nationalists 162

Ustashas *see* Ustashas

Croix-de-Feu 284

crucifixions 75

The Cruel Sea 61

Csákvár 53

Curierul 323-4

cynicism 49

Czechoslovakia/Czechs

animosity to Gypsies 370

black market 48

collaborators of the Nazis 155-6

and the Communists 63，331-2，335，336，337，338；Communist heroes 63

covering of ethnic problems 249

displaced persons 27

farmers 67

food rationing 37

Germans in Czechoslovakia after the war 126-35；expulsion 233-4，243，370-71

and Hungary 248

Interior Ministry 333-4

Jewish flight 208

Lidice massacre 22-3

and Marshall Aid 314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334

re-Slovakization 248

renaming of places and streets 245

resistance 159

rural changes 67

Theresienstadt 89

Częstochowa 203

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 83-4，94，181-2

Daily Express 58-9

dairy produce 34，47-8，199，202

The Dam Busters 61

Danzig 231

Dark，Philip 7-8

David，Josef 131

Davies，John Rhys 221

De Gasperi，Alcide 279，291

de Gaulle，Charles 64，147，158-9，166-7，279

death camps *see* concentration camps

death marches

and the Bleiburg tragedy 254-60

from concentration camps 82-3

Decima Mas 149

dehumanization 105，109，118，145，155，263

Demianova，Genia 53

Democratic Army of Greece（Dimokratikos Stratos Ellados，DSE） 311

Denmark

attraction of women to German men 166

babies born with German fathers 172

collaborators of the Nazis 145，147，148，149，154，156

Communists 278

heroes 63

Jews 20

resistance 149

shaving of women’s heads 170，171

Dessau，Max 91

destruction

and the landscape of chaos 69-72

moral *see* morality/moral destruction

physical 3-11；in cities 3-8；in rural communities 8-10；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10，39

Dimitrov，Georgi 338-9

Dimokratikos Stratos Ellados（DSE） 311

Dingolfing camp 244

displacement xvi，9，21，27-33，70，72 *see also* refugees

cynicism of displaced persons 49

displaced children *see* children：dispłaced；orphans

displaced persons camps 24-5，40，102，103，105-6，107-8，208，209；Jewish 192，209

through ethnic cleansing *see* ethnic cleansing

Jewish displaced persons 89，189-211 *see also* Jews

and the‘Iiberation complex’104-6

military control of displaced persons 101-4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of displaced persons 106-8 *see also* UNRRA（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repatriation 27，32，70，101-2，105，106，193；forced 220，221-4，238-40，248

and the revenge of slave labourers 97-101

Truman’s special DP directive 208

violence of displaced persons 49

Djilas，Milovan 264，339

Dnepropetrovsk 38

Domažlice 130

Dorfman，Baruch 205

Doris，Nikos 308

Doris，Sotiris 307-8

Doris，Vassilis 307-9

Dortmund 7

Drakulić，Slavenka 66

Drama 50

Dresden 8

Drohobycz 18

dropsy 36

Drtina，Prokop 131

Druhm，Mr and Mrs 30-31

DSE（Democratic Army of Greece） 311

Duisburg 7

Durlacher，Gerhard 195

dysentery 85，115，120，128，140

EAM（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296-301，302-10，312

East Brandenburg 231

East Prussia 21，39，52，54，230，231，238，377

Eastern intolerance 266-8

Eden，Anthony 172

EDES（National Republican Greek League） 303

eggs 34，48，199，202

Ehrenburg，Ilya 80，118，367

Eindhoven 192

Einsiedel，Heinrich von 120-21

Eisenhower，Dwight 82，83

EKKA（National and Social Liberation） 303

ELAS（Greek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296-301，302-8

Emilia-Romagna 283

‘Red Triangle’/‘Triangle of Death’285，289

Emmerich，Wilhelm 85

Endoume 170

Esser，Heinz 142

Estonia

anti-Soviet resistance 344，350-51，352，353，357

collectivization of farms 355，356

death toll in war 16

ending of the war xv

ethnic cleansing

of collaborators 145-62；Italy 146，147-8，149-53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230-48，232，370-71；and a cleansed landscape 247-8；and eradication of German culture 245-6；and‘home’to the Reich 242-5；human reality of 234-42；total expulsion 245-7

extent of（1945-47） xvi

Holocaust *see* Holocaust

the Jewish flight 189-211

local massacres/holocausts 20-23，50，75-6，130，212-14，222，259，305；Postoloprty 130；Ústí nad Labem 130

of Poland and Ukraine 212-29，370；forced assimilation 224-9；forced‘repatriation’221-4；Operation Vistula 224-8，229，370，372，373；origins of Polish/Ukrainian ethnic violence 214-19；Soviet solution 219-21

and wartime choices 187-8

Yugoslavia 249-65，369；and the Bleiburg tragedy 252-62；historical background 251-2；as a symbol of pan-European violence 262-5

Etkind，Michael 206

European East/West differences 266-8

European polarization in the Cold War 359-64，361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me（Marshall Plan/Aid） 69，313，314，362

European territorial changes（1945-47） *xii*

extermination camps *see* concentration camps

Extraordinary Courts of Assize，Italy 152-3

Faludy，György 201

famine 34-40，70 *see also* food：shortages/rationing；starvation

and moral destruction 41-8

farmers 20，32，35，90，294，302，330，341，354，355-6

and the black market 45，47-8，67

and collectivization and expropriation of farms：in Estonia 355，356；in Lithuania 355-6；in Romania 328-9

Farri，Umberto 287

Fascists 70，375

1930 Fascist Penal Code 152

Iron Guard 319，323

and the Italian purge 146，147-8，149-53，156，161

violence against 50

Ferioli，Ferdinando 287

FFI（Forces Françaises de l’Intérieur） 167-8，171-2，273

Fini，Gianfranco 374-5，376

Finland

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 332，333

Communists 278

destruction in 9

Interior Ministry 334

and Marshall Aid 314

FitzGibbon，Theodora 65，66-7

Fiume xiv

Flemings 249

Fog，Mogens 63

food

cannibalism 85-6，120

dairy produce 34，47-8，199，202

German diet 36-7，38-9

riots 39，40，101

shortages/rationing 34-40，70 *see also* malnutrition；starvation；and the black market 47-8，67 *see also* black market；denial of food 117，119-20，138-9，140，143；Hungary 201-2；and moral destruction 41-8；in prison camps after the war 137-8，140；in prisoner-of-war camps 115，119-20

Forces Françaises de l’Intérieur（FFI） 167-8，171-2，273

‘Forest Brothers’341-58

France/the French

aristocracy targeted by Communists 284

black market 47-8

clergy targeted by Communists 284-5

collaborators of the Nazis 146，147，148，149，150，154，156，158，159，161

Communists：choice for Soviet Union over France 279；ejection of 362；and the myth of the communist‘Iost victory’291-2；PCF（Communist Party）280；and political violence 280-83，284-5，287，289-90，291-2；postwar gains 278；reaction to 289-90；targets 281-5

death toll in war 13

destruction in 6，10

displaced persons 27

ending of the war xv

French masculinity 166-8

French prisoners of war 96

and French women’s relationships with German soldiers 166-72

German prisoners of war 113，122

industrial liberation 67-8

Jewish return 194，195，196

labourers on‘obligatory work service’96

massacre at Oradour-sur-Glane 22

myths 161；of national unity 158-9，273

police targeted by Communists 281-3

rape 52

Resistance 22，50，148，161，167-70，171，180，273，285，374；areas liberated in August 1944 by 281-3，282

shaving of women’s heads 170，171

theft 45

vagrant children 24

Vichy *see* Vichy/Vichyites

violence 22，50

Francs-Tireurs et Partisans（FTP） 168，281-3

Frank，Peter 91

French Communist Party（PCF） 280

Friedland 243

fruits 34

FTP（Francs-Tireurs et Partisans） 168，281-3

Fuhrmann，Johann 139

Galicia 218，219，222-4，225，228-9

gang rape 53，54

gangs 24，46，97

Garmisch 192

Gasperi，Alcide de 279，291

Gęborski，Czesław 139，142，144

General Democratic Resistance Movement（BDPS），Lithuania 350

Geneva Convention，Third（1929） 111，253

Georgescu，Teohari 320-21，323

Germany/Germans

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 332

British treatment of SS men 86-7

death toll in war 12-13

denazification process 155，160

destruction in 5，7-8

displaced persons in 28-32；DP camps 24-5，40，102，103，105-6，107-8，192

eastern 21，88，120，230，315，337；population increase 243-4

establishment of Federal Republic 160

farmers 32

food shortages 36-9

foreign workers 27，96 *see also* slave labour

German civilians/people：amnesties for 120，155；children 55，58-9，132，236；in Czechoslovakia after the war 126-35；death toll 12-13；dehumanization 118；diet 36-7，38-9；displaced persons 21，27-8；driven from parts of eastern Germany 21；ethnic Germans 130，183，188；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see* ethnic cleansing：expulsion of the Germans；foreign women married to Germans 174-5，177-8；guards 29，

31，50，80，84，87，89-90；hatred of 70；homelessness 8；policemen 99-100，102；pregnant German women in Poland 236；rape of German women 54，55，56，98；shock on seeing Belsen 87；stereotypical image of 159-60；teenagers 58-9；treatment throughout Europe after the war xv；violence against xv，50；Volksdeutsch and the inversion of power 125-44；women with‘foreign’children 55

German prisoners of war：American-held 113-16，121-4；British-held 122-3；in Czechoslovakia after the war 132-5；freed by Italian Communists 271-2；French-held 113，122；in the new‘extermination camps’of Poland after the war 135-44；official death toll 122；Soviet-held 113，116-21；vengeance on 111-24

German soldiers 30，37 *see also* Nazis/Nazism；and the Bleiburg tragedy 252-62；fathering babies born to foreign women 164，172-4，175-8；internment of 23；rape by 53；vengeance on women who had relationships with 163-72；in Warsaw 4

looting in 44，46，97，98-9

moral destruction 42

Nazis *see* Nazis/Nazism

and Poland 377-8；1970 treaty and subsequent relations 377-8；Germans in the new‘extermination camps’of Poland after the war 135-44；Poland’s expulsion of Germans 230-42 232，370-71；Polish and Czech propaganda about Germany 245-6；Polish border of Germany 230-31

rape in 54，55，56，98

and Russia 9；Russian women raped by German soldiers 53

slave labour in *see* slave labour

and the Soviet Union 9-10；German prisoners of war 113，116-21；and racial ideology 366

war orphans 24，25

Gheorghiu-Dej，Gheorghe 319，329

Glatz prison 138

Gliwice/Gleiwitz prison 138

Gofman（a Red Army soldier） 76

Gomułka，Władysław 338

Gontarz，Szmulek 90

Gore，Margaret 48

Görlitz 240

Gottwald，Klement 331-2，336

governments of national unity 64

Grabin 139-40

Grąziowa 226，229

Great Britain *see* Britain

The Great Escape 61

Greece/Greeks

areas under partisan control（1944） 297

black market 48

British influence in Greece 295-6，298-300，309，310

and Bulgarians 70；Bulgarian massacre of Greek communities 21，50

civil war xv，295-314；and American isolationism 313；brutal treatment of the population under the right 359-60；Communist resistance 296-8，297，300-309，310-12；defeat of communism in Greece 309-12，360；deportations 359-60；effects on Europe 312-14；government-backed militias 360；persecution of Communists/left-wingers 359；and subsequent Soviet control over European Communist parties 314

collaborators of the Nazis 147-8，149；Security Battalions 303，305，306，309-10，312

Communist Party 296-8，305，311-12

death toll in war 16

Democratic Army of Greece（DSE） 311

destruction in 9，10

EAM（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296-301，302-10，312

EDES（National Republican Greek League） 303

EKKA（National and Social Liberation） 303

ELAS（Greek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296-301，302-8

island prison camps 359

looting 44

National Guard 299，309-10

Papandreou’s‘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298-9，309-10

postwar unrest 71

rural destruction 9

Soviet influence in Greece 295，296-9

starvation 35，37

violence 50，360

White Terror 310

Greek Communist Party 296-8，305，311-12

Greek People’s Liberation Army（ELAS） 296-301，302-8

Grinberg，Zalman 181-2

Gross Heydekrug 75

Grossman，Vasily 18-19，54，118

Groza，Petru 319，321，322，324

Grüben 139-40

Gruschka，Gerhard 136-7

Guiga，Stasys 356-7

Gullo，Fausto 293

Gutman，Israel 88

Gypsies 80，82，187，248，249，369，370

Hadzis，Thanasis 298

Hallett，Jack 84

Halłstein，Walter 65

Halter，Roman 189-91

Hamburg 7

firestorm 12-13

foreign workers 96

juvenile delinquency 58

Hanau 98

Hanover 7，98-9

hatred 64，70，201，250，262，267，366，367-8，369，376，377，378

Haukelid，Knut 62

Heerlen 42-3

Heidesheim camp 115

Helfgott，Ben 89，203

Heli 305

Henry，Derek 28，97-8

The Heroes of Telemark 62

heroism，cult of 61-3，162

Hersh，Arek 91

Heydrich，Reinhard 22

Himmler，Heinrich 9-10，51，79

Hirt，August 81-2

Hitler Adolf 4，9，79，363

Hitler Youth 58，135-6

Hlond，August 206

Hof 30

Holborow，Richard 169-70

Holland

babies born with German fathers 172-3

collaborators of the Nazis 145，146，149，150，154，156

cult of heroism 63

destruction in 10

famine 35-6，37

Jewish return 193-7

moral destruction 42-3

resistance 149，159，173，193-4

rural destruction 8-9

shaving of women’s heads 170

Holocaust 17-20，79-83

death camps *see* concentration camps

local massacres/holocausts 20-23，50，75-6，130，212-14，222，259，305

refusal to acknowledge 143-4

scepticism about 81，82，195

homogeneity 22

Hondius，Dienke 195

hope 60-68

brotherhood，unity and 63-5

and the cult of heroism 61-3

and social changes 66-8

Hopkins，Harry 71

Horní Moštěnice 130

Hrastnik 261

Huberman，Alfred 91-2

Hulme，Kathryn 40

Hungary/Hungarians

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 332，333

animosity to Gypsies 370

anti-Semitism 199-203，369

British/Soviet influences 295

Budapest *see* Budapest

collaborators of the Nazis 146，158

and the Communists 201，331，336，338

and Czechoslovakia 248

death toll in war 16

destruction in 10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247

improvements for peasants 67，68

Interior Ministry 333

Jewish flight 208

Jewish return 195，198-203；and anti-Semitism 199-203，369；and property 197，198-200

land reform 67

massacre of Serbians 21

postwar hardship 201-2

reactionary nationalism 369

and Russians 46

and Slovakia 247-8，369

Smallholders Party 333

and the Soviet Union：and postwar hardship 201；Soviet treatment of Hungarian women 53，55

theft 46

treatment by Red Army after the war 119

ultra-nationalists 162

hunger 34-40 *see also* starvation and moral destruction 41-8

Hunting，Ray 39-40，100-101

ideology

communist-nationalist struggle of 279，362-4 *see also* Communists/communism；nationalism

Nazi 58-9，64 *see also* Nazis/Nazism

racial 64，246-7，250，263，351 *see also* ethnic cleansing；race

Second World War as a war of 366-7

and tyranny 301-2

Ikaria 359

Ill Met by Moonlight 61

illegal trading *see* black market

internment 23，128

Czechoslovakian detention centres after the war 128-35

intolerance，Eastern 266-8

Iron Guard 319，323

Islam *see also* Muslims，and Yugoslavia 251

Isola 294

Israel 93，182 *see also* Palestine；Zionism

Istria 261

Italian Communist Party（PCI） 278，280，293-4

Italy/Italians

1945-46 map 286

2005 commemoration ceremonies 374-5

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 332

aristocracy targeted by Communists 283-4

clergy targeted by Communists 285

Communists：ejection of 362；and the myth of the communist‘lost victory’291-2；and political violence 280-81，283-4，285-7，288-9，290-91，292；reaction to 288-91；targets 285-7；total activists 278

Court of Cassation 152-3

destruction in 10

displaced persons 27

Extraordinary Courts of Assize 152-3

factory bosses targeted by Communists 283

food shortages 39

Jewish return 194

Jews 20

northern：Communists 290；displaced persons camps 102，103，208；industrial liberation 67-8；industrial power inversion 283；purge on Fascists 149-53；reaction to Communists 288-9，290-91；shaving/shearing of women 170-71；violence 49，50，150-51；workplace opportunities 67-8

and Pansa’s *Il sangue dei vinti* 161-2

prisoners of war 96

purge on Fascists 146，147-8，149-53，156，161

resistance 161-2，290-91

Risorgimento 277

Rome *see* Rome

southern xiv-xv，8，151，276-8，288，293-4，334，362；

agricultural reform 293-4，362；land occupation by peasants 277，186，293-4；moral destruction 41-2，43，45-6；Naples *see* Naples；purge on Fascists 151

Soviet-held prisoners of war 119

vagrant children 24

village uprisings against the state 276-7

violence 50

and Yugoslavia：2005 commemoration of atrocities 374-5；expulsion of Italians from Yugoslavia 248

Jarosław 222

Jasenovac 252

Jaworzno camp 226

Jerusalem 211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American 192，107

Jews

anti-Semitism，extermination and loss of：Baltic partisans and anti-Semitism 351-2；and blood libel 199-200，204；British postwar anti-Semitism 211；in Croatia 20-21；death camps *see* concentration camps；Holocaust 17-20，79-83 *see also* Holocaust；in Hungary 199-203，369；and the Jews as capitalists 202；and the Jews as Communists 201；in

Poland 203-7，215；and the postwar Jewish flight 189-91，199-211；postwar resurfacing of anti-Semitism xvi，189-91，192，199-209，369-70；in Ukraine 215-16；Volhynian Jews 215-16；wartime violence throughout eastern Europe 49

displaced persons camps for 192，209

flight 189-211；Brichah movement 207-9；to Palestine 208-11，210

honourable treatment of 20

Nazi stereotypical image of 187

and Palestine 92，93，208-11

property 68，197-200

return 191-200，206-7；and fight over property 197-200；France 194，195，196；Holland 193-7；Hungary 195，197，198-203；Italy 194；to Palestine 208-11；and postwar myths 196-7；USA 195

sheltering and rescuing of 20

survivors 19-20，49，88-93；‘Avengers’92；playing down of vengeance 181-2；revenge of Jewish prisoners 88-93；rights 94；violent behaviour of freed Jews 49，88-93

victimization after the war xvi

Jodl，Alfred August 113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 192，207

Jovanović，Dragoljub 336

Judt，Tony xvii

Justice Ministry 323，334

juvenile delinquency 45，58

Kabai，Eszter Toth 199

Kaławska 243

Kalibová，Miloslava 22-3

Kaljurand，Ants 350-51

Kálmán，Balázs 199

Kalniškës，battle of 341-5，358

Kamnik 261

Katyn 111

Keizer，Frank 195

Kennan，George F. 7，313

Kharkov 6，38

Khrushchev，Nikita 120

Kielce pogrom 204-6

Kientopf，Anna 235-7

Kientopf，Annelore 235

Kiev 6，38

Kiselev，Salman 76

Klappholz，Kurt 91

Klaus，Václav 371

Kleitso 304

Kliachkivs’kyi，Dmytro 217

Klimasz，Anna 225

Kłodzko prison 138

Knoller，Alfred 90-91

Knorr，Karl August 54

Kočevje 260

Koenig，Pierre 167

Kohn，Alexandre 195

Königsberg 50

Koopman，Rita 195

Kopelev，Lev 54，57，76

Korwin，Marta 104

Kostakis，Panayotis 308

Kostov，Traicho 338

Kostrzyn Odrzański 237

Kovaly，Heda 67

Kovner Abba 92

Krakaj，Franjo 256-7

Kraków 204

Kramer，Josef 84

Krasnaya Zvezda 79，117，118

Krasnopol’ye 76

Kratsov，Second Lieutenant 76

Kruglov，Sergei 346

Kudeňíková，Marie 63

Kunmadaras 198，199-200，200

Kurnedz，Pinkus 89-90

Küstrin 237

Kuti，Ferenc 199

Laar，Mart 350

Labanauskienë，Eleonora 346

labour camps *see* slave-labour camps

Laila，Tove 176-7

Lama Mocogno 285

Lamb，G. H. 99

Łambinowice/Lamsdorf camp 138-44，373

land reform 67

Lane，Arthur Bliss 221，233

Lapland 9

Lasko 261

Latvia 16，342，346

anti-Soviet resistance 344，352，355

deportations 355

Le Havre 6

League of German Girls 58

Leclerc，Philippe 167

Leino，Yrjö 334

Leipzig 245

Łemkos 222-3，225，227，228，229，370

Leningrad，siege 38

Leo，Fritz 85-6

Levi，Primo 10-11，193

Levine，Joseph 207

Lévis-Mirepoix，Duc de 184

Lewis，Norman 41-2

lice 136，140，226

Lidice massacre 22-3

Lieberman，Celina 19

Lipin，Lieutenant 348

Lisbon Treaty 371

Lithuania 16，220，222，341，342，367

anti-Soviet resistance 341-58

battle of Kalniškës，341-5，358

BDPS（General Democratic Resistance Movement）350

collectivization of farms 355-6

deportations 355

ending of the war xv，367

‘Iron Wolf’ regiment 351

Jews 18，19

Soviet terror 345-50

Ljubljana 260

London 266

looting 44-7，97，98-9，119，377

anti-Semitic 200-201

shooting of looters 101

Lorgeril，Christian de 284

Lotnik，Waldemar 218

Lübeck 243

Luca，Vasile 321

Lufotposten 173

Lukša，Juozas 347，351，356

Partizanai 357-8

Luxembourg 362

Lwów 220

Lyon 167，283

Lysaker Bridge 62

Machuswerder 234-5

Magyars 70

Mainz 7

Majdanek concentration camp 78-80，81

Makó 201

Makronisos camps 312，359

malaria 39

Malinova，Hedviga 369

malnutrition 39，140，226 *see also* famine；starvation

Maniu，Iuliu 316，319，327，363

Manus，Max 62

Manzoni counts 283-4

margarine 34

Maribor 254，257-60

Mariental 243

Markov，Georgi 365

Markulis，Juozas 350

La Marseillaise 170

Marseilles 6

Marshall，George C. 363-4

Marshall Plan/Aid 69，313，314，362

Marxism 363

Masaryk，Jan 337

Maschke Commission 122

Maschke，Erich 116

masculinity，French 166-8

Mašin，Josef 63

Mayne，Richard 65

McCarthy，Joe 364

McCloy，John 81

McCormick，Anne O’Hare 234

meat 34

Mecklenburg 21

Medolla 285

Melissa 294

Memmingen 192

Mendoń，Bronisława 204

Metgethen 75

Mezzogiorno peasants 294

Michael of Romania 316-17，320，322

Mielcarek，Henryk Jan 223

Mihalache，Ion 327

Mikołajczyk，Stanisław 220

Milan 150，288

vagrant children 24

Milice 285

milk 34

Millions Like Us 34

Minsk 6，18

Mirotti，Ferdinando 287

Miskolc 201，202

Moch，Jules 290

Molotov，Vyacheslav 112

Monasterace 277

Monnet，Jean 65

Montenegrins 252，260

Montgomery，Bernard 108

Moon，A. G. 101

Moorehead，Alan 43，45-6，98

morality/moral destruction 41-59，365-6

and the black market 37，38，45，47-8，67，107-8，202

and children 57-9

and dehumanization 105，109，118，145，263

in labour camps 97-8，135

looting，theft and 44-7 *see also* looting；theft

and prostitution 41-3

and rape 51-7，75 *see also* rape

sexual 41-4 *see also* rape；in labour camps 97-8

and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111-24，134 *see also* prisoners of war

and vengeance *see* vengeance

and violence 48-51 *see also* vengeance

Morel，Salomon 135，136，144，226

Morgan，Sir Frederick 49

Morgenthau，Henry 123

Moroccan troops 52

Moscow 268，295

Mosley，Leonard 98-9

Mõttus，Aksel 357

Mōttus，Hugo 357

Mulde，river 31-2

Müller，Jens 62

Munich 8

Murphy，Robert 241

Murrow，Edward R. 67

Muslims

killed in the Bleiburg-Maribor area 260

massacres 20-21

in Yugoslavia 251

Mussolini，Benito 8，162

corpse 146

mutilation 75，128，146，161，213，222-3，263

Mykonos 35

Mysłowice camp 143

myths

of the communist‘lost victory’291-2

conflict of 372-3

and the cult of heroism 61-3，162

national/nationalist mythology 245，371-8

of national unity 63-5，158-9，160，196，272-3

postwar myth-making 158-62，196-7，371-8

Nacht und Nebel camps 81-2

Nagy，Ferenc 333，337

Nagy，Imre 363

Najduch，Rozalia 225

Naples 39

moral destruction 41，43，45-6

vagrant children 24

National and Social Liberation（EKKA）303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patriation 239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NDF）320，322-3，324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EAM）296-301，301-10，312

National Peasant Party，Romanian 316，318，319，320，322，324-7

newspaper，*Curierul* 323-4

National Republican Greek League（EDES）303

national unity

myths 63-5，158-9，160，196，272-3

Papandreou’s‘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298-9，309-10

nationalism *see also* resistance movements

Baltic States xv，340

Croatian nationalists 162，264

Czechoslovakia 245-7

fascist *see* Fascists

and homogeneous states 229，248，370 *see also* ethnic cleansing

Hungarian reactionary 369

ideological struggle with communism 279，362-4 *see also* Communists/communism：anti-Communist resistance

national hatreds 70，376 *see also* race：racial/ethnic hatred；hatred of Jews *see* Jews：anti-Semitism，extermination and loss of

national mythology 245，371-8

National Socialism *see* Nazis/Nazism

nationalist fighting xv，21，340

Poland 245-7

Poles killed by Ukrainian nationalists 21，216-19，374 *see also* ethnic cleansing：of Poland and Ukraine

Serb nationalists 262

Slovenian nationalists 254，260，264

and the Soviet cause 268

Ukrainian nationalists 21，162，215-19

ultra-nationalism 162，215，262

violence as an opportunity for 368-9

Natzweiler-Struthof camp，Alsace 81-2

Naumann，Marie 54

Nazis/Nazism

collaborators with *see* collaborators of the Nazis

death camps *see* concentration camps

Holocaust 17-20，79-83 *see also* Holocaust

identity cards 187

ideology：and German teenagers 58-9；mirrored in British press 59；of racial hatred 64

legacy of ethnic hatred 267

Lidice massacre and destruction 22-3

and Polish/Ukrainian ethnic violence 215-16

practices mirrored in treatment of Germans after the war 132-4 *see also* vengeance

and Prague 126-7

propaganda 52，77，192

starvation policy 35-8

treatment of SS men on camp liberations 83-4，86-7，89-90，91，92

trials 160

NDF（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320，322-3，324

Neifalta，Albina 343

Neifalta，Jonas（‘Pilot’）343-4，345

Nejedlý，Zdeněk 131

Nemmersdorf 75，77

Netherlands *see* Holland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81

New York Times xiv，325

Nicolski，Alexandru 323

Nîmes 285

Nissen huts 72

NKVD 54，218，332

and Kaljurand（‘Ants the Terrible’）350-51

and Lithuania 346-9，356；battle of Kalniškës，343-5

Toszek prison 143

Nonantola 285

Nord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 82，83

Norway

children born with German fathers 173-4，175-8

Citizenship Act（1950）177-8

collaborators of the Nazis 147，148，149，154-5，156

Communists 278

cult of heroism 62

destruction in 9，10

food rationing 37

resistance 62-3，149，159

War Child Committee 174，175，176

women who married Germans 174-5，177-8

Nosek，Václav 333-4

Nossack，Hans Erich 12，13

Novick，Peter 171

Nuremberg trials 160

Obuchowski，Berek 181

Ødegård，Ørnalf 176

Odessa 8

Odjel za zaštitu narodna 250

‘Odysseus’（ELAS band leader）303-4

oedema 36

Ogrodzinski，Zbigniew 21，45

Ohrdruf concentration camp 82，83

Oleksięta 216

Olsen，Oluf 62

Oniferi 277

Operation Swallow 243

Operation Vistula 224-8，229，370，372，373

Oradour-sur-Glane 22

Organisation de l’Armée Secrète 281-3

Organis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OUN）215-16，217，219，223

orphans 23-6，57

born in foreign countries to a German father 164，172-4，175-8

Orthodox Church 328

Oslo 174

Osóbka-Morawski，Edward 207

Ossowska，Marilka 31-2

Osula 353

OUN（Organis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215-16，217，219，

Ózd 201

Padover，Saul 28

Palestine 92，93，208-11 *see also* Israel

Pamiers‘People’s Tribunal’284

Pankrác prison，Prague 130

Pansa，Giampaolo 161-2

Papadimitriou family 308，309

Papadimitriou，Vassiliki 307-9

Papadimitriou，Yorgos 308

Papandreou‘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298-9，309-10

Paris 147，167，356

cosmopolitanism 266

Peace Conference 248

Paris-Tourcoing Express derailment 290

Pastuhov，Krustu 336

Pătrăşcanu，Lucreţiu 317，323，338

Patriotic Guards，Romania 320，323

Patriotic Militia，France 147

Patton，George 82

Pauker，Ana 321

Pazúr，Karol 130

Pazzano 277

PCF（French Communist Party）280

PCI（Italian Communist Party）278，280，293-4

peace，fragility of 69-72

Peasant Republic of Caulonia 277

pellagra 39

Peloponnese 296，304-5，306-9，310

Penescu，Nicolae 319，326-7

Petkov，Nikola 337

Pieck，Wilhelm 243

Pierre，Commandant 281，283

Pius Ⅻ 24，71

Placanica 277

Pluto，Stanislav 212

Podkamień 216-17

Podutik 260

Poland/Poles

animosity to Gypsies 370

Armia Krajowa 222，332

border change and separation from Ukraine 219-21

civil war xv *see also* ethnic cleansing：of Poland and Ukraine

Communists 338

death toll in war 16

destruction in 3-5，10

displaced persons 27，29，40，105-6，107

ending of the war xv

ethnic cleansing of Poland and Ukraine *see* ethnic cleansing：of Poland and Ukraine

and Germany 377-8；1970 treaty and subsequent relations 377-8；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230-42，232，370-71；German border of Poland

230-31；Germans in the new‘extermination camps’of Poland after the war 135-44；new territories 21

Home Army（AK）3-4，222，332，336

and Jews 18，19；anti-Semitism 203-7，215；emigration/flight 207，208；Jewish property 197-8，200

looting 44

middle class 68

Ministry of Propaganda 334

new ‘extermination camps’ after the war 135-44

origins of Polish/Ukrainian ethnic violence 214-19

Ostarbeiters 96

Poles at Auschwitz 80

Poles killed by Ukrainian nationalists 21，216-19，374 *see also* ethnic cleansing：of Poland and Ukraine

population fall 21-2

Public Security Service（UBP）135

racial hierarchy 187-8

renaming of places and streets 245

starvation 37，38

vs Ukrainians 21，50-51，70

war orphans 24-5

Warsaw *see* Warsaw

Polcz，Alaine 53

political violence 264-5 see also civil war

in France and Italy 280-94；and the reaction 288-91；targets 280-88

in Yugoslavia 264

Pomerania 45，54，231，234-5，377

Postoloprty massacre 130

potatoes 35

Potsdam conference/Agreement 132，142，234，242

Powayen 75

power

industrial power inversion in northern Italy 283

vengeance and the inversion of 109-10，125-44

Práce 131

Prague 126-30，179

Local National Committee poster（1945） 133

Pravda 79，80，117

Prcela，John 254

prisoner-of-war camps 80，94，113，114-20，125，261

Czechoslovakian detention centres after the war 128-35

prisoners of war

American 27，96

British 27，96

camps *see* prisoner-of-war camps

French 96

German：American-held 113-16，121-4；British-held 122-3，132；doing forced labour after the war 132-5；in the new‘extermination camps’of Poland after the war 135-44；Soviet-held 116-21；vengeance on 111-24，132-41

Soviet 38，80，96

and the Third Geneva Convention 111

propaganda 3，77

British 87-8

Nazi 52，77，192

Polish and Czech propaganda about Germany 245-6

Polish Ministry of Propaganda 334

Soviet 80，118

prostitution 41-3，146

Pruitt，Albert C. 83，84

Psarros，Dimitrios 303

Public Security Service（UBP，Poland）135

rabbits 34

race

ethnic cleansing *see* ethnic cleansing

nationalism *see* nationalism

racial/ethnic hatred 64，70，201，250，262，267，366，369，376

racial/ethnic purity 188，215，366 *see also* ethnic cleansing

racial hierarchy 187-8

racist ideology 64，246-7，250，263，351；of Ukrainian partisans 351

Second World War as a war of 365-7

and Western and Eastern tolerance 266-8

Rădescu，Nicolae 320-21，322，337

Rákosi，Mátyás 201，331，337

Ramadier；Paul 289

Ramanauskas，Adolfas（Vanagas）356

Ranković，Aleksandar 337

rape 45，75，98，138，146，161，172，183，233

gang 53，54

mass 51-7，183，236，310，360，369，377

Ravensbrück 22

Reach for the Sky 61

Red Army 6，18，21，27，53，67，331-2，339

in the Baltic States 341，343

discovery of concentration camps 78-80

and German prisoners of war 113，116-21

in Hungary 198

massacres in Germany 75-6

Poles in 218

rape 53，54，57，75

and Romania 315，316，330

Red Cross xvi，192

Bavarian 244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122，132，242

packages 40，96

‘Red Terror’305

‘Red Triangle’/‘Triangle of Death’285，286，289

refugees 9，21，27-33，92，98，106，134，231-47 *see also* displacement；ethnic cleansing

Jewish 207，209 *see also* Jews：flight

Reille-Soult，Henri 284

Reinchardt，Mór 202

Remagen camp 114

repatriation 27，32，70，101-2，105，106，193

forced 220，221-4，238-40，248

National Committee for Repatriation 239

resistance movements 22，81，146，149，159，164-5，171

anti-Soviet/anti-Communist 63，290-91，340-41；‘Forest Brothers’341-58；Ukraine 340-41

Belgium 148，149

Communist 184，290-91；Greece 296-8，297，299，300-309，310-12

Denmark 149

France 22，50，148，161，167-70，171，180，173，281-3，285，374；areas liberated in August 1944 by 282

Holland 149，173，193-4

Italy 161-2，290-91

Norway 61-3，149

Polish Armia Krajowa 222

revenge *see* vengeance

Rheinberg camp 115

Rheinwiesenlager 114-16

Riace 277

Riesa 32

Rifnik 261

Rijeka xix

rioting 99-100

Bulgaria 370

death penalty for 101

over food shortages 39，40，101

Risorgimento 277

Rizzi，Antonio 285

Rizzi，Ettore 285

Rjukan 62

Robinson，Austin 7

Romania/Romanians 39，64，119，295

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 318，332

collaborators of the Nazis 158

communism 315-30，335-6，337，338；August coup 316-18；and collectivization and expropriation of farms 328-9；and the dismantling of democracy 312-7；fight for power 318-22；Stalinization 327-30

democracy dismantled 322-7

expulsion of Romanians from Ukraine 248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247

Iron Guard 319，323

Jewish flight 208

Jewish property 197

land expropriation 329

and Magyars 70

Minister of Justice 323，334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319，323，325

National Liberal Party 316，324

National Peasant Party 316，318，319，320，322，324-7；*Curierul* 323-4

NDF（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320，322-3，324

Patriotic Guards 320，323

press 321，323-4，327

and the Red Army 315，316，330

religious suppression 327-8

Serviciul Special de Informaţii（SSI）323

Siguranţa 320

Soviet treatment of Romanian women 53

Rome 39，290

vagrant children 24

Roosevelt，Elliott 112

Roosevelt，Franklin D. 76，81，111，112-13，123，110，295

Rosenberg，Mrs 200

Rosenblum，Chaskiel 89

Rostov 6

Rotterdam 37

Royal Air Force 300

Royal Navy 209

Rubin，Yvette 108

Ruigrok，Petra 173

rural communities

destruction in 8-10

farmers *see* farmers

Russia/Russians

alcohol 98

and Germany 9；Russian women raped by German soldiers 53

and Hungarians 46

and Jews：allowing revenge by Jewish camp survivors 90，91；anti-Semitism 189-91

Russian soldiers 32，*see also* Red Army；rape and violence by 54

Soviet control of 338

Rzeszów 204

Sabbe，August 357

Sacchetti，Walter 280

Sack，John 182

sadism 126，134，138，139-40，144，146，226，263，349 *see also* torture

Saint-Exupéry，Antoine de 23，166

Saint-Lô 6

Salò 151-2

Sănătescu，Constantin 64，316-17，318，319，320

Sanderson，BSM（soldier） 86-7

Sanguinetti，Félix 281-3

Santayana，George 375

Sardinia 277

Sartre，Jean-Paul 166

scabies 140

Schiff，András 369

Schindler，Oskar 20

Schio 153

Schmidt，Kurt 128-9

Schuetz，Hans 120

Schwerin 54，97

Schwientochlowitz camp *see* Świętochłowice camp（Zgoda）

Scînteia 321，323，327

Scobie，Ronald 298，300

Sebastopol 7

Secchia，Pietro 292

Second World War

as a British national industry 372

British war stories 61-2，372

civil wars bound up with *see* civil war

death toll 12-17，14-15；in death camps 82-5 *see also* concentration camps；extermination of the Jews 17-20 *see also* Holocaust；local massacres 20-23；starvation 35-40

destruction caused by *see* destruction；morality/moral destruction

displacement caused by *see* displacement ending of the war for different countries xiv-x，113，367 *see also* civil war

famine caused by 34-40，70

vengeance following see vengeance

as a war of ideology 366-7

as a war of race 365-7 *see also* ethnic cleansing；race

as wars within wars 271-4 *see also* civil war

widows and orphans of 23-6

Seddon，Reuben 97

Sedlis，Gabik 92

Serbs 20-21，374

and Croats 70，251，262

and ethnic conflict in Yugoslavia 251-62

Hungarian massacre of 21

killed by Ustashas 50，252

nationalists 262

Serviciul Special de Informaţii （SSI）323

sexual morality 41-4

in labour camps 97-8，138

sexual violence 52，55，56

rape *see* rape

stripping，and the shaving of women’s heads 164-72，180

Sholokhov，Mikhail 118，367

Siberia 355

Sicily xiv-xv，277，294

Silesia 45，52，54，231，234，245，246，377

Simonov，Konstantin 79，117-18

Sington，Derrick 85

Sinzig camp 114

slave labour 94-110

camps *see* slave-labour camps

and the displaced person’s ‘liberation complex’ 104-6

German prisoners doing forced labour after the war 132-4

and the issue of personal power 109-10

military control of freed labourers 101-4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of displaced persons 106-8

revenge of slave labourers 97-101

slave-labour camps 49，80，82-3，94-6，97-8，135 *see also* concentration camps

new‘extermination camps’ in Poland after the war 135-44

Slovakia

collaborators of the Nazis 158

covering of ethnic problems 249

and Hungary 247-8，369

Jewish property 197

under partisan control 50

Slovenia/Slovenes 252，253，264

Slovenian Home Guards/National Army 254，260

Slutsk 10-11

Smallholders Party，Hungary 333

social reform 277-8

Britain 66-8，278

failures in 292，294

Sofia 334

Sokacz，Mikołaj 226，227

Solzhenitsyn，Alexander 54

Someş，election results 326

Soviet Union *see also specific countries*

anti-Soviet resistance 63，290-91，340-41；‘Forest Brothers’341-58；Ukraine 340-41

control over European Communist parties 314

covering of ethnic problems 249-50

death toll in war 16

destruction in 6-7，9，10

displaced persons 27

and Eastern intolerance 267-8

and Germany 9-10；and expulsion of Germans 230-31，240，243；German prisoners of war 113，116-21；and the Nazi genocide 78-80；and racial ideology 366

and Greece 295-9

and Hungary 201；Soviet treatment of Hungarian women 53，55

and Marshall Aid 314

NKVD *see* NKVD

Poland/Ukraine division and the extension of Soviet territory 220-21

and Poland’s expulsion of Germans 230-31

and Polish/Ukrainian ethnic violence/cleansing 214-15，218，219-29

postwar sphere of influence 295

propaganda 80，118

rape of foreign women 53，54，55，75

Red Army *see* Red Army

and Romania 315-30

rural destruction 9

Russia *see* Russia/Russians

Soviet prisoners of war 38，96；at Auschwitz 80

Soviet terror in Lithuania 345-50

Stalin’s postwar regime 71，314，339 *see also* Stalin，Joseph；Stalinization of Romania 327-30

widows and spinsters 24

Spain

Communists 273

food rationing 34

Sparks，Felix L. 84

Spiliotopoulos，Panagiotis 298

Spiro，Harry 91

spotted fever 140

Spottiswoode，Colonel 88

Spychalski，Marian 207

SSI（Serviciul Special de Informaţii）323

Stalag Luft III camp 62

Stalin，Joseph 64，111-12，120，220，221，230，231，281，295，296，298，311，313-14，339，371

postwar regime 71，314，339；Stalinization of Romania 327-30

Stalingrad 6-7

Scaněk，Tomáš 131-2

Stankovic，M. 255

starvation 35-40，70

amongst prisoners of war 117，119-21，128，140，143

starvation-*cont* .

and cannibalism 85-6，120

denial of food 117，119-20，138-9，140，143

and moral destruction 41-8

Stel’mashchuk，Iurii 217

Stettin 21 *see also* Szczecin

Stevens，John 150

Stevenson，Donald 323

Steyerberg 98

Stignano 277

Stilo 277

Stimson，Henry 81

Stockholm 45

Stojic，Mark 255

Stok，Bram van der 63

Strahov 128-9

Stránský，Jaroslav 131

strike action 154，289，290，314，321-2，335

Strongoli 294

Stroop，Jürgen 3

Stunde nul （‘Zero Hour’）xiv，xv

Sudetenland 244，245

sugar 34

beets 35

Surkov，Alexei 117

Švendriai 348

Swabians 247

Swallow，Operation 243

Sweden，looting 44-5

Świerczewski，Karol 224，227

Świętochłowice camp（Zgoda）135-8，143，373

Switzerland

food rationing 34

juvenile delinquency 45

Syntagma Square，Athens 299

Szczecin 234，242，243 *see also* Stettin

Szewczyk，Anna 226

Szewczyk，Teodor 227-8

Szkłarska Poręba 314

Tallinn 357

Tătărescu，Gheorghe 322

Tatars 221，346，371，372，376-7

Taus 130

Tehran conference 111，220-21，230，295

‘Telemachus’（a‘Death Battalion’commander） 304

La Terre Vivaroise 146-7

theft 44-7，107-8 *see also* looting

from Germans by Poles 237-8

of Jewish property 197-200

Theotokas，George 299

Theresienstadt camp 89，134，181

Thessaloniki 35，192，300

Thiele，Hannelore 54

Thorez，Maurice 280，292

Tito，Josip Broz 63-4，76，250

Tito’s Partisans 251，252，253-61，296，311-12，374-5

Tixier，Adrien 161

Togliatti，Palmiro 280，290，292

tolerance，Western 266，267

torture 50-51，82，126，130，134，135-7，138 139，146，150，161，183-4，222-3，226，263，281，284，285，304，305，306，

328，346-7，359 *see also* sadism

Toszek NKVD prison 143

Toth，Zoltan 119，120

Toulouse 284-5，288

transit camps 94-6，125，226

Tre kom tilbake 62

Treblinka concentration camp 80

‘Triangle of Death’/‘Red Triangle’ 285，286，289

Trieste 374-5

Trikeri 359

Troyes 170

Truman Doctrine 313

Truman，Harry S.208，313，363

Trzcianiec 226

Trzebica/Trebnitz prison 138

Tübingen 52

tulip bulbs 35

Turin 150，283，288

Turks 248

typhus 85，87，137，140，142

UBP（Urząęd Bezpieczeństwa Publicznego） 135

Ukraine/Ukrainians

anti-Communist resistance 340-41，352

assertion of ethnic rights 370

continued fighting long after the war 367

death toll in war 16

destruction 5，6，8，9-10

ethnic cleansing of *see* ethnic cleansing：of Poland and Ukraine

expulsion of Romanians from 248

homelessness 8

Jews 18-19

nationalist fighting with Soviet troops xv

origins of Polish/Ukrainian ethnic violence 214-19

Poles killed by Ukrainian nationalists 21，116-19，374 *see also* ethnic cleansing：of Poland and Ukraine

separation from Poland 219-21

starvation 38

ultra-nationalists 162

Volhynia *see* Volhynia

vs Poles 21，50-51，70

women raped by German soldiers 53

Ukrainian Insurgent Army（Ukrains’ka Povstans’ka Armiia，UPA）216，217-19，222-4，228，267

Ulbricht，Walter 331

UNESCO 25

Uniate Church 328

United Kingdom *see* Britain

United Nations xvi，64-5，69

and the Jews in Palestine 211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see* UNRR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 192，207

American prisoners of war 27，96

attitudes and conduct towards the Germans 83；allowing revenge by Jewish camp survivors 91；expelled from Poland 241-2，243-4；killing of SS men whilst liberating camps 83-4；treatment of German prisoners of war 113-16，121-4

and the Communists 313，363-4

discovery of concentration camps 82-4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me（Marshall Plan/Aid） 69，313，314，362

food rationing 34

and Greece 313

isolationism 313

Jewish return 195；help with emigration to Palestine 208

rape accusations against US Army 55

and Romania 325，326

scepticism about the Holocaust 81，82

Truman Doctrine 313

US troops 29，91

unity，national *see* national unity

UNRRA（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27，30，59，48，49，94，102-5，106-10，192

UPA（Ukrainian Insurgent Army） 216，217-19，222-4，228，267

Urzaęd Bezpieczeństwa Publicznego（UBP） 139

USSR *see* Soviet Union

Ustashas 20-21，50，251，252，253，255-7，260，262，263，267，366，375

Ústí nad Labem massacre 130

Vachon，John 5

Valenciennes 147

Varkiza peace agreement 300，310

VE day 64

celebrations xv

Velouchiotis，Aris 304，310

venereal disease 43，55，56，106

vengeance 83-4

amnesties on revenge killings 131，148

and camp liberation 83-93

on children 75-6，130，172-8

on collaborators，the enemy within 145-62；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venient myths 158-62；and the failure of the purge across Europe 154-8；Italian purge on Fascists 146，147-8，149-53

on German prisoners of war 111-24，132-41；American-held 113-16，121-4；Soviet-held 116-21

on Germans in Czechoslovakia 126-35

and the inversion of power 109-10，125-44

Jewish playing down of 181-2

by Jewish prisoners 88-93

and the new‘extermination camps’ 135-44

and the politics of numbers 141-4

purpose of 179-84

by the Red Army in Germany 75-6

by slave labourers 97-100

thirst for blood 75-7

on women 75-6，128-9，130，138，163-72；shearing and stripping of women 164-72，180

Verderi，Giuseppe 283，287

Vetrinje *see* Viktring

Vichy/Vchyites 150，158-9，166-7，273，374

Vienna 11，39

rape in 55

Vienne 284

Viitorul 323

Viktring 254

Vilnius 355 *see also* Wilno

violence 48-51 *see also* destruction

amnesties on revenge killings 131，148

anti-Semitic *see* Jews：anti-Semitism，extermination and loss of

to babies/children 50，51，53，130，136-7，139，173，205，216

'Balkan violence' 262

Bleiburg tragedy 252-62

civil war *see* civil war；ethnic cleansing：of Poland and Ukraine；Greece/Greeks：civil war；Yugoslavia：ethnic conflict

against collaborators 50，145-7，149-51；judicial punishment 148-9，152-8

as a communist opportunity 367-8

crucifixions 75

culture of 140

death toll in Second World War *see* Second World War：death toll

ethnic cleansing *see* ethnic cleansing

against fascists 50

against German prisoners of war 111-24，132-41

Holocaust and local massacres *see* Holocaust

and the inversion of power 125-44

mutilation 75，128，146，161，213，222-3，263

as a nationalist opportunity 368-9

northern Italy 49，50，150-51

origins of Polish/Ukrainian ethnic violence 214-19

politically motivated *see* political violence

by the right in Greece 360

sadistic *see* sadism

sexual 52，55，56；rape *see* rape；stripping，and the shaving of women’s heads 164-72，180

Soviet terror in Lithuania 345-50

torture and beatings *see* torture

in vengeance *see* vengeance

White Terror，Greece 310

Yugoslavia *see also* Yugoslavia：ethnic conflict：by Communist Partisans 255-64，374-5；massacre sites（1945） 259；as a symbol of pan-European violence 262-5

Virgili，Fabrice 170

Vischi，Arnaldo 283

Vistula，Operation 224-8，229 370，372，373

Vojvodina 21，251

Volhynia 18，21

Jews 215-16

torture/killing 50-51，215-16，217-19

Voronezh 6

Voute，Peter 145

Vrettakos，Leonidas 306

Vries，Karel de 194

Vukovic，Dusan 262-3

Vyborg 7

Vyshinski，Andrei 320，322

Walloons 249，267

Walsh，William P.83-4

War Child Committee，Norway 174，175，176

Warsaw 8

destruction in 3-5，11

Jews 18

water 92，98，238，255

contaminated 235，260；plot to poison water supplies 92

freezing 136，137

lack/denial of 8，29，115-16，117，119，120，253

waterboarding 346

Weiss，George 115-16

Werth，Alexander 81

Western tolerance 266，267

White Terror Greece 310

widows 23-4

Wiesner，Zdeněk 85

Wildflecken camp 40，105-6，107

Wilno 18，120 *see also* Vilnius

Wola Ostrowiecka 216

Wolfsburg 98

Wollny，Günther 137

women 180

abortions 55，56

displaced 27

emancipation and voting rights in Greece 302

German：with‘foreign’babies 55；through marriage 174-5，177-8；pregnant German women in Poland 236

giving birth to children of German fathers 164，172-4，175-8

married to Germans 174-5，177-8

in Polish camps after the war 138，139-40，141

and postwar myth-making 161

rape of *see* rape

shearing and stripping of 164-72，180

at Strahov 128-9

treatment throughout Europe after the war xv

venereal disease 43，55，56，106

vengeance on 75-6，128-9，130，138，163-72，180

widows 23-4

Women’s Auxiliary Service，Italy 149-50

Woodhouse，Chris 302

World War ii *see* Second World War

Wrocław 233，245-6

Wysocko Wyżne 216

Xoxe，Koçi 338

Yalta conference/Agreement 112，132，221，231

Yugoslavia *see also* Croatia/Croatians

British/Soviet influences 295

Communist Partisans 251，252，253-61，262-4，296，311-12，374-5

and the conflict of myths 373

death toll in war 16

destruction in 5，9，10

ending of the war xv，113

ethnic conflict 50，249-65，369；and the Bleiburg tragedy 252-62；and covering of ethnic problems 249-50；historical background 251-2

expulsion of Italians 248

German prisoners of war 119

Hungarian massacre of Serbians 21

intelligence service 250，262

and Italy 248，374-5

massacre sites（1945） 259

politically motivated violence 264-5，369

positive assessment of the war 66

postwar unrest 71

rhetoric of brotherhood and unity 63-4，65

rural destruction 9

Soviet-held prisoners of war 117

as a symbol of pan-European violence 262-5

Tito’s victory speech 63-4

Ustashas 20-21，50，251，252，253，255-7，260，262，263，267，366，375

vagrant children 24

violence 50，250-64

Zagórzany 226

Zagreb 253

Zajec，Milan 261

Zaks，Karol 137-8

Zápotocký，Antonín 131

Zawadka Morochowska/Zavadka Morochivska massacre 212-14，222

Zdanowicz，Olga 226，229

Zengos，Theodoros 305

Žerjavić，Vladimir 260

Zervas，Napoleon 303

Zgoda camp（Świętochłowice） 135-8，143，373

Zionism 191，208-11

Zuckerman，Yitzhak‘Antek’ 207

Žuvintas 344

Zyklon-B 8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英）罗威（Lowe，K.）著；黎英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7（2017.7重印）

ISBN 978-7-5097-7277-5

Ⅰ.①野… Ⅱ.①罗…②黎… Ⅲ.①欧洲-现代史 Ⅳ.①K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8692号

野蛮大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

著者/〔英〕基思·罗威（Keith Lowe）

译者/黎英亮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金勇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8.125 插页：1 字数：407千字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5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7277-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7198号

定价/7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宋　涛

精彩绝伦。才华横溢的构思，一丝不苟的研究……呈现出天才般的历史叙事。

——**BBC 历史频道**

形象生动而笔调冷峻。这部杰出著作，为这片陷入无序和混乱的大陆，描绘了一幅鲜为人知、令人胆寒的画面。

——**伊恩·克肖**

刻骨痛心。动人心弦，落笔审慎，荡气回肠。一幅引人注目的图画，描绘了一片在物质上、道德上因为残忍屠戮而变得残酷无情的欧洲大陆。

——**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星期日泰晤士报》**

立足于八种语言的原始档案、访谈记录、学术著作，《野蛮大陆》如同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二战结束后、冷战开始前那个稍纵即逝的混乱年代。这是关于那个年代的第一部重要历史著作。

《星期日泰晤士报》十佳畅销书

荣获英国笔会/赫塞尔-提尔曼历史图书奖

出版社官方微信

甲骨文官方微信

甲骨文官方微博

ISBN 978-7-5097-7277-5

9 787509 772775 >

定价：72.00 元